新编

中国历朝纪事本末

XINBIANZHONGGUOLICHAOJISHIBENMO

隋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编

中国历朝纪事本末

XINBIANZHONGGUOLICHAOJISHIBENMO

全书主编　王连升

撰稿人（按姓氏笔画

王　琳　王德金　江晓敏

刘文智　孙卫国　宋美云

杜家骥　杨生祥　杨丽英

肖立军　范丽珠　戴柏俊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王秦伟
装帧设计　易　一

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

全书主编　王连升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69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平遥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8.5　字数：959千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5440—0936—X
G·937　定价：　　　元

编 辑 说 明

在传统的史书中，纪事本末体也许是一种最为接近一般读者的体裁了。一朝历史通过若干大事而得以展示，为人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晰的线索，有助于人们连贯地完整地领略一个朝代的政治、军事风貌。

但是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有显明的问题。它主要反映政治、军事和朝代更替，而没有纪传体那样的气魄，能够涵盖相关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也没有编年体那样的胸襟，纳涓流于巨细，因而舍弃了相当多的宝贵资料。纪事本末体史书也不像纪传体史书那样，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著作群。春秋之前阙如，有清一代无书。其余问题还有，题目过大，内容松散，取材有限，基本上是将若干种书的材料堆砌一起，而少有创见。

在策划与组织编纂这套《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时，我们与主编王连升先生和诸位分卷主编达成一种共识：借助纪事本末体这种形式，通过某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事，展示一朝代乃至全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所谓新编，不仅指时间上前推至中国文明的起源，下延至辛亥首义清廷覆亡，而且在题目数量上予以扩充，增补了经济、文化等内容，力求全面反映中国历史的全貌。取材范围也扩至以往的全部史书。纪事力求详尽，内容则连贯紧凑，并能反映今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实际效果是否如愿，尚有待读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作出客观的评价，并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上　卷

下 卷

目　录

上　卷

下　卷

目　录

上　卷

下 卷

目　录

上　卷

下 卷

目 录

上 卷

下　　卷

%13/04

目　录

上　卷

下　卷

文明的起源

文明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明既可泛指人类社会自民智初开之时迄今，一切文化成就的总和，也可特指一个区域、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及生产方式，这样一个局部性的整体。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从公元前3500年—公元50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进人古代文明社会，这时人类文化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然而，具体到以什么为标志界定文明的起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众说纷纭。考古学家一般把金属工具的出现视为文明的开端；历史学家则把文字的发明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创立作为文明的肇始；还有学者认为冶金术、文字和大规模工程的结合才是文明出现的标志；更有学者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不管哪一种意见，学者们都认为文明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几百万年以前，中华广阔的大地上，已经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原始文明。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被人们称为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在中国，世界上唯一的绵延不绝、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也在中国。很少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当我们追寻中国文明起源时，才注意到造物主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如此厚爱我们的民族。当我们的登山队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顶，以此向世界宣告我们征服了喜马拉雅山，其实这不过是用喜马拉雅山给我们民族的力量做了点事。喜马拉雅山目睹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全过程。先有喜马拉雅山，后有中国文明。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先人咏唱的这样一首歌："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首歌描写的事件，古地质学家认为发生在距今五千万年至四千五百万年以前。那时，大地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碰撞，开始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横空出世，巍然屹立的喜马拉雅山，改变了我国自然地理环境，使多数地区的气候由湿润变为较寒冷干燥，大地植被由亚热带森林变为草甸。古人类学家认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不仅孕育了后来的黄河长江，由此产生出中国境内的大河文明，而且直接为古人类的进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因为气候和环境的巨大改变，使古猿不得不适应全新的环境，在这种适应中，促进了古猿向人类的进化。

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古猿古人类化石有：

森林古猿：1956 年和 1957 年，我国云南开远县两次发现森林古猿的化石，共有十枚牙齿化石，其距今约两千万年。

腊玛古猿：1932 年美国古生物考察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发现一块带有 6 枚牙齿的上颌骨化石，定名为短吻腊玛古猿，研究者一般认为它是人类的最早成员。世界各地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以我国云南禄丰的材料最丰富，而且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发现腊玛古猿头骨的地方。

猿人：中国考古发现的猿人化石有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人；距今 110 万年和 50 万年的蓝田人；距今 60 万年的北京人；距今 30 万年的和县人；距今 20 多万年的金牛山人等。

古人：主要有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长阳人等，他们生活在距今 20 万年至 1 万年之间。

新人：主要有峙峪人、河套人、资阳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顶洞人等，他们生活在距今 10 万年至 1 万年之间。

这些是在旧石器时代，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最早居民。由古猿过渡到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地质年代，如果从元谋人算起，大约

经过了170多万年的漫长时代，占人类全部历史的95%以上。这一时期人类的主要文化创造有：

石器的制造。这是远古时期人类文化最丰富、最重要的实物见证。元谋人遗址发现打制石器17件。它们以石英或砾石为原料，采用锤击法进行了十分粗糙的加工。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到蓝田人时期，部分石器有了第二步加工的迹象。北京猿人遗址发掘出石器一万七千多件。石器中最多的是刮削器和砍砸器。大部分石器的边缘经过第二次加工整理，未经修整的石器只占很少部分。北京猿人制造的石器以尖状器最精致。他们先从石核上打下石片，然后沿石片两边将其一端敲成细尖，用来割剥兽皮或挖取食物。北京猿人早期多用软质砂岩，晚期多用质地优良的乳白色或半透明的石英及水晶、燧石等为原料。随着加工技术的提高，石器种类逐步增加，越来越精细。石球的制造，是石器加工技术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在旧石器早期的蓝田猿人遗址和山西芮城匼河遗址已发现石球，但制作粗糙，数量少。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山西丁村遗址发现有一百多件石球。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发现一千多件石球，大号石球重达两公斤，直径100多毫米，最小的重不足半公斤，直径在50毫米以下。石球呈滚圆形，周身布满小石片疤，说明是以间接打制技术，反复加工而成。专家们从民族学、民俗学中受到启示，认为石球在使用时需要用棍棒或绳兜进行投掷，是一种很有威力的狩猎工具。这种复合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说明原始人掌握了多种复杂的技术，能狩猎巨大凶猛的野兽，能够进行远距离狩猎。发现石球的遗址都伴有较大动物遗骨。如许家窑遗址发掘出360多匹野马的化石。它被称为“石球制造者的文化”。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已经有专门的石器制造场。

火的使用。如果说古代人把石头、骨头等，用自己的双手加工成工具是对自然物的利用，那么，火的使用则是人类支配自然

力的最初尝试。我国远古居民用火的历史悠久。元谋人遗址厚约三米的三个地层发现大量炭屑，并与哺乳动物化石并存，有的骨头颜色发黑，显然被烧赤。北京猿人遗址发现有四层面积较大的灰烬层，并以中、上部的灰烬层最厚，甚至可达六米之多。说明当时人会管理用火，有控制、保存火种的能力，所以灰烬多呈堆状。他们把火放在顶上通风的洞内，使缕缕青烟冒出洞外，用火时添干柴，不用时加湿柴盖泥土，像我们封火炉一样。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遗址也有用火的遗迹，但却没有如同北京猿人遗址那样厚厚的灰烬。这大概是人们已经掌握了某种人工取火的方法，不需要让篝火长期燃烧以保存火种。人类用火可以驱寒、照明、防御野兽侵袭，还可以得到熟食，使原始人摆脱茹毛饮血的生活状况。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用火的遗址是 1961 年及 1962 年山西省博物馆在西侯渡文化遗址发掘的，发现呈灰绿的马牙已经炸裂成碎纹，经化验证明被火烧过。用古地磁初步测定西侯渡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至少也有 180 万年，也就是说中国远古居民用火的历史至少有 180 万年了。

生产活动。主要是采集和渔猎以攫取天然产品。

四五十万年前，当时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附近，那里的山上生长着冷杉、云杉等针叶林，还有桦、栎、松、柏等针叶混交林，山下及丘陵上生长着柳、栋、栗、榆、椴、朴等杂木林和灌木丛。北京人在树林中很容易找到果实充饥，但森林中有凶猛的剑齿虎、豹、狼、熊等食肉动物。这里是森林与草原的交界处，周口店东南是一片广阔的平原，成群的蒙古野马、野驴在那里的水草中生活着，肿骨鹿、梅花鹿、野羊等食草动物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西山的北面，沙多水缺，骆驼和鸵鸟占据了那里的干旱草场，周口店丰美的草场也同样对它们有吸引力。北京人住在龙骨山的天然山洞里。这里可以避风雨、防野兽。山洞的东边是一条小河，是山泉汇聚而成的。北京人在那里取水，从河滩上捡来砾石，制

作石器。小河两岸栖息着水牛，偶然有水獭和大河狸出没。河的两岸自然成了北京人狩猎的场所。

这里的纬度较高，当气候转冷时，山洞里不灭的篝火，使北京人御寒取暖。当时能在如此高的纬度生活的远古人类还是不多见的。北京人能够生活在气候多变的温带，克服自然条件对人类的限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用火防御猛兽，驱走了山洞中的阴暗潮湿。火使人类获得了熟食，减少了疾病，增强了体质，加速了脑髓的发展。北京人的脑容量比现代猿类大而完善，脑量平均约为1059毫升，比现代猿类平均脑量415毫升大一倍半以上。在已经发掘出来的六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的头骨中，最大脑量为1225毫升，接近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1400毫升。

面对恶劣的环境，北京人不停地劳动，用原始工具去对付大自然带给他们的种种灾难，抗击猛兽的频繁侵袭。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艰苦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在周口店发现的大约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岁就死去了。经过长期的艰苦劳动和斗争，他们顽强地改造着自然，也使自身不断进化，并创造了远古人类文化。

古人阶段的原始人类，体质形态已不同于猿人，马坝人的头颅骨比猿人薄，前额比猿人高；长阳人的上颌骨已不像猿人那样显著地向前突出；丁村人牙齿的某些特征比较接近于现代的蒙古人种。总之，古人体质的各方面都比猿人进步，正向现代人过渡。

广东韶关的马坝人，湖北长阳下钟家湾的长阳人，他们生活在江南，气候温热湿润，山间是茂密的森林，丘陵地带是灌木丛和草地。这里生活着各种不同的动物、植物，生活环境要比北京人好得多，马坝人、长阳人也更容易地猎取动物，采集各种食物。

丁村人生活在汾河流域。东边的太行山，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虽然剑齿虎已经灭绝，但豺狼、熊、狐等肉食动物仍在森林中出没。山前有丘陵和广阔的草原。这里是从森林到草原的交界处，无

论是森林动物还是草原动物都在这里汇集，大象、犀牛、梅花鹿、赤鹿、大角鹿，还有成群的野马、野驴奔驰于平原丘陵之间，大群的羚羊在这里啃食杂草。那时候的汾河水势大，很深，流速舒缓，水质清洁，水中成群的鲤鱼、青鱼在游动，河岸边上有各种河蚌、螺，河滩上的树丛、草丛中有原始牛、水牛，水草上有小河狸出没。如此丰富的物种，为丁村人提供了优良的狩猎场所。

丁村人使用的劳动工具以木器、石器为主。他们从河谷山沟中采集角质岩的砾石，用交互打击的方法，制成各种砍砸用的石器，有单边刃的，有多边刃的。他们把石灰岩厚而平的砾石，打制成大大小小的球形投掷器，以供打猎之用。加工石器的方法比北京人也有所发展，他们不仅用石锤直接在石核上打击，制成长而小的石片，还用双手举起大石块，用力向地上的石料摔砸，从石料上打下大石片，然后对石片进行二次加工，加工方法是在石砧上碰击，也用石锤打击而成。加工的石器主要有各种尖状器，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的刮削器。

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古人成为新人。新人在体质形态上逐渐失掉了猿人的原始性，而成为现代人。例如，脑的结构日趋完善复杂，柳江人、山顶洞人的平均脑量达1300—1500毫升，高于北京人的1059毫升，和现代人的脑量差不多。头颅逐渐变高，颅骨逐渐变薄，最宽处由耳孔上方移到顶骨结节附近，前额的倾斜也逐渐减小，额部丰满起来。猿人粗壮高突的眉嵴骨不见了，前突的上下颌骨大大地向后缩了，这样也就具备了现代人的基本特征。中国境内的新人：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代表着蒙古人种体质类型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新人比古人具有更丰富的劳动生产经验和技能。他们改善了制作工具的方法，仅以刮削器为例，已有凹刃、凸刃、圆刃和双刃的多种，凹刃刮削器适合切割、刮削木、骨、角等硬质材料，圆刃和凸刃刮削器则更宜于切割兽肉和皮革。

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河套的萨拉乌苏河两岸及不远处宁夏灵武水洞沟是河套人生活的地方。当河套人居住在萨拉乌苏河两岸的时候，河的两岸有广阔的草原和湖泊，不远处有针、阔叶混交林，附近可能还有荒漠草原。已经发掘的萨拉乌苏遗址，有三十多种动物，从森林到草原的各种动物汇聚在那里。林边的草地上有成群的原始野牛，大角鹿和赤鹿，还有羚羊、蒙古野马、蒙古野驴，驼驴和水牛也不时在这里出没。这里共出土了三百多件往往带有部分头骨的羚羊角心，还出土了许多大型食草动物、啮齿类、鸟类的碎骨。可见当时河套人有专门狩猎某一种动物的倾向，这种倾向有助于狩猎技术的提高。萨拉乌苏出土动物以羊居多，河套人被称为“猎羊人”。

萨拉乌苏“猎羊人”用的专门石器，一般比较小，考古学家称之为细小石器，多用黑色密致硅页岩制成，有一部分是用小砾石制成，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和端刮器。河套人生活过的水洞沟遗址，不仅石器类型多样，其打制技术超过了以往。水洞沟遗址，发现了灰烬和用火烧过的骨骼。考古学家认为河套人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技术，这种技术可能源于石器制造，因打制石器迸发的火星可能会引起燃烧。在制造木器时也会磨擦起火，中国自古就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这种传说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充分的生活根据。从河套人的技术条件判断，掌握人工取火技术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位于群山环峙的峡谷之中，山陵之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和灌木丛，东面是广阔无际的草原，洹河由此循峡谷东北流过，进入广阔的草原边里的石灰岩洞里，发现了古人遗留的石器、灰烬和动物化石。动物化石向我们表明这里有森林动物群，如猩猩、野猪、鹿等；有草原动物群，如野驴、披毛犀、狼、羚羊、山羊等。这里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为人类狩猎的良好场所。猎获的一些大型食草动物，如野驴、披毛犀等，多属幼

年或老年个体，说明猎人选择那些容易猎取的对象。猎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的石器制造技术，如先在石核上修理出较平坦的打击面，再用石锤从打击面上打下石片来，然后加工成所需要的石器。

山西省朔县峙峪村位于桑干河的发源处黑驼山东麓，南、北、西三面环山，东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遗址就在峙峪河和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沙丘中，是古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这里是森林与草原的交界处，动物群中有蹄类占的比例最大，种类上占百分之七十，数量上占百分之九十五。典型的草原动物有蒙古野马、野驴、原羚、鹅喉羚、诺氏驼等等，也有适于草原环境的马鹿，或生活于灌木草原的河套大角鹿。峙峪遗址发现了至少 120 个个体的蒙古野马化石，至少有 88 个个体的蒙古野驴的化石，峙峪人主要猎取草原动物，被称为“猎马人”。

峙峪发现的细小石器，为研究遍布于亚洲、美洲的细石器文化系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制造方法，一种是用直接打击法产生石核和石片；另一种是相当进步的间接打击法，即用一根棒状物，将其尖端对准台面边缘，用石锤敲打棒的另一端打下小石片来。制造的石器细小精致，有砍砸器，各类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石镞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弓箭这种更复杂的复合工具。另外还发现了骨制尖状器和作为工具用的骨片。

山顶洞人住在周口店龙骨山山顶东北部的一个自然洞里，因而被称为山顶洞人。洞长约 12 米，宽约 9 米，面积为 90 多平方米。洞里自然分为“上室”和“下室”。上室在洞口处，是他们的公共住室；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公共墓地。山顶洞周围的广阔地区是他们狩猎、捕鱼、采集的生活基地。

山顶洞人取得了不少新成就。发现的劳动工具有骨针、磨光的鹿角和鹿下颚骨，装饰品有钻孔的小石珠、砾石、青鱼眼上骨，钻孔的兽牙和海蚶壳，刻纹的鸟骨管。这些装饰品的制作过程有

制作的材料早已不再是石制、骨制的，而是由各种金属制成，但其形制基本沿袭了旧石器时代发明的最初形式。

人工取火技术。它包括两种，钻木取火，用燧石打火。这种技术与今日的打火机、电子点火器相比，其繁难和原始落后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却是一项科学技术上的巨大飞跃，因为数百万年来，人类一直日以继夜，成年累月地以不息的篝火来保存天然火种，打火技术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带给了人们以巨大的方便。

结绳记事、契木为文。在峙峪遗址中，发现许多骨片上刻划的痕迹，这些人工刻划的记号很可能是用来记事的。它们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史记与档案了。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把"结绳记事"、"契木为文"当作无稽之谈。

原始人的绘画主要有各地的岩画，如大漠南北有许多岩画，部分岩画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作品。但专家们对此有不同意见。当原始人开始打制石器时，实际上已经将艺术投射到他们的作品之上，一些非常精致的石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惊叹。在峙峪遗址，发现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内，发现了大量装饰品，有穿孔兽牙125件，穿孔的海蚶壳3件，有穿孔的青鱼眼上骨1件，钻孔小砾石1件，刻纹骨管4件，钻孔石珠7件。这些装饰艺术品都相当精致。带孔的小砾石是用微绿色火叶岩从两面对钻而成，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所有的装饰品都呈红色，可能被赤铁矿染过。看来华夏民族以红色表示喜庆，披红挂彩的观念早已形成。由此可见，山顶洞人所以对兽牙、海蚶壳、青鱼骨感兴趣，可能源于对猎获兽类产生的兴奋，及向人炫耀的荣誉感，甚至可能出自一种奖励、荣耀。至于石珠，它不仅具有形式的美感，而且是高超技艺的结晶，戴上那样的石珠，其美感不亚于戴着各种宝石钻戒的现代人。

原始宗教观念产生。山顶洞人的墓葬中，在尸体周围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显然这样做的理由是与某种观念相联系，可能是

为了防止野兽对死者的侵害，或者加上一些血液具有的红色为了使人复生，等等。对其确切含义还应继续研究探讨，但它大概与原始宗教观念有关，可能已经有灵魂、及死后世界的观念。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下室，可能是让他们随时可以和居住在上室的族人团聚。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了一件带有磨痕和刻纹的鹿角。鹿角通体被刮削后再加磨光，鹿角被人工截去，截断面被磨光，显然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然后在上面雕刻弯曲、平行的纹路。据推测，它可能是某种原始巫术的魔棒一类的东西，也可能是首领权力的象征。

社会组织。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是原始人群，原始人群是当时基本的社会单位。这个群体内最初对两性关系无任何限制，也就不会有稳定的两性结合。加上很低的劳动生产率，对老弱和后代的赡养、抚育，由群体负责。群体一般由几十人组成。在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大致仍处于原始人群阶段。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人类逐步脱离原始人群阶段，产生血缘家族。其主要特征是亲兄弟姊妹之间或从兄弟姊妹之间无约束的通婚，即有血缘关系的嫡系和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媾。在这种家庭形式下，婚姻集团按“辈”划分，同辈通婚，异辈禁婚。这样在这个家庭中，构成几个辈分婚姻圈。每一辈成员互为兄弟姊妹，也互为夫妻；但排除了不同辈分之间的婚姻关系，完成了两性关系的第一次重要进化。血缘婚家族大概是由于旧石器时期的自然分工，相对地限制了不同年龄的两性的接触，久之，按年龄和辈的区分便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继而在两性关系上反映出来。人类生育繁殖方面的自然淘汰在此种家族的形式上也可能起某种作用。

近亲繁殖不利于种族的发展，这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而杂交则具有杂种优势，因此在人类的近亲婚姻中，逐步地有了乱伦的种种忌禁，血缘婚被逐渐地废止，实行族外婚制。这样也就完

成了两性关系的第二次进化。人类社会进入了氏族公社阶段。它是原始公社的基本单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血缘纽带和血统世系相联结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婚姻形式是几个氏族公社互相通婚，形成比较固定的婚姻集团。氏族的产生除了外族婚制的原因，也与当时生产的发展有关系，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生产力的发展，猎取大动物，需要几个血缘家族之间加强合作。氏族具有的特征职能：生产资料公有；氏族成员之间社会地位平等；由族长管理，族长由氏族成员选举或撤换；内部禁婚；死后遗产由同族人继承；同族人有互相支援、保护及血亲复仇的义务；氏族有名称、崇拜的图腾、共同的宗教节日及墓地。山顶洞人可能进入了氏族社会阶段。

以上我们简略地叙述了我国大陆居民在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创造，它是我们这块大陆上先民开天辟地的壮举，正是这种壮举使这块亘古蛮荒的原野成了人化的自然。先民的文化创造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由于文化创造的累加性效应，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以很短的时间创造了远远超过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我国广大地区陆续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大约延续了五六千年，到距今四千年左右结束。我国至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七千多处，正式发掘的有一百多处。这时人类分布的范围和密度都远远超过了旧石器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苏秉琦认为："大体可分为六大文化区系。它们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种以各地方的考古资料提供的特点为基础的宏观的考察，启发人们重新对我国远古文化进行更深层的思考。严文明根据新石器各地文化发展的特点，提

出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宏观结构。他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是一个“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即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周围的燕辽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甘青文化区是花瓣。这表明，比起旧石器时代来，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的发展，各地文化联系加强、区域文化的发展开始显现出地方特征，较为发达的中心文化区形成。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历史进程的三部曲。这时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北方地区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

裴李岗文化。1977 年发现于河南新郑县裴李岗。这是一个长期被人居住的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一米以上。原始农业在该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有石斧、石镰、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还有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用具。石器大多采用磨制的方法，如椭圆形的石斧、扁长形的弧刃铲等磨制得很精细。作为收割工具的石镰，窄长扁薄，通体为拱背长三角形，柄部较宽而上翘，刃部锯齿细密。陶器中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胎壁厚薄不均，器表多素面，有小窝篦纹、划纹、乳丁纹。陶窑结构简单，初具规模。发现 114 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仅有个别双人合葬。裴李岗文化分布在豫中、豫东南一带，距今八千年左右。

磁山文化。1976—1977 年发现于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发掘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得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凿、石锛等石器。在一个窑穴内发现近两米厚的粮食腐烂后形成的绿灰土。遗址出土了猪、狗、牛、鸡等家畜骨骼。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表多素面，带绳纹、划纹、剔刺纹等纹饰者仅占三分之一。发现一片简单的彩陶。此外，还发现陶纺轮，说明已经有了编织和纺织技术。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相近，主要分布在河北省邯郸地区，距今七千五百年左右。近年在白洋淀湖底发现的遗址，仰

韶文化叠压在磁山裴李岗文化层上，表明二者可能有继承关系。

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区域相当广泛，以河南、陕西和晋南为中心，西到甘肃的河西走廊，东至鲁西，北到内蒙古的河套，南到湖北的汉水流域。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仰韶文化各具特色。其遗址多达一千多处，著名的有陕西西安半坡，渭南史家村，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村；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荥阳秦王寨、濮阳西水坡、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河北武安赵窑；山西芮城东庄村；甘肃秦安大地湾；湖北郧县大寺等。仰韶文化有定居的村落，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西安半坡遗址曾连续使用四百年，北首岭遗址竟达千年。彩陶是仰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成就，早期以红陶黑彩为主，中期以后或饰以白衣、黄衣或红衣为底衬，然后绘以黑、棕、红色的单彩或双彩。在半坡、姜寨、北首岭等地发现了随葬的绘画用具，如盛有颜料的小罐、带有红色颜料的研磨用的锤、磨石和石砚等。已发现二十来处近百座陶窑遗址，仅大地湾一处就发现三十座陶窑。可见，陶器制造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彩陶艺术是仰韶文化的精粹。仰韶文化从距今六千多年前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和四川、陕西部分地区。已发现遗址四百多处。马家窑文化以彩陶著称。早期彩陶纹饰绚丽对称，线条流畅，多采用单一的黑彩。以鸟、蛙等图案和几何形图案为主，器形瘦长，后期彩陶彩绘繁缛，纹饰由黑、红二色相间，在基本图案的中心或空隙处填以棋盘格、菱格、网状纹等，画面富丽堂皇。器形匀称，腹部浑圆。陶器的地方特色突出，陶器的形制多平底，鼓腹盆、长颈瓶、彩陶壶、粗壮耳罐等，以橙黄色为主，不仅在器物外部，且有内彩。常见的纹饰有菱形方格纹、旋涡纹、弧线纹、波浪纹等。生产工具以石质为主，骨、角、陶质次之。前后延续近二千年，距今约五千年左右。

齐家文化。1924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其分布范围与马家窑文化大略相同，且有继承关系，不少遗址的地层是齐家文化叠压在马家窑文化之上。齐家文化的重要成就是冶铜业的出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现有铜刀、凿、钻头等铜工具和铜渣。永靖县大何庄遗址有铜匕。永靖县秦魏家遗址有铜椎、斧、指环和铜饰。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有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铜镜。齐家坪遗址有铜斧、刀。齐家文化打破了原始平等的社会关系，发现不少殉葬墓，常以一人或数人为殉。婚姻关系产生变化，多次发现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肢，女子面向男子侧身屈肢。皇娘娘台遗址多次发现一男二女合葬墓，男于居中，二女分列左右侧屈其旁。齐家文化距今四千年左右。

大汶口文化。1959年发现于山东泰安和宁阳交界处的大汶口，发掘面积五千四百平方米，发掘墓葬133座，出土陶器一千多件。迄今发现同类性质的文化遗址有一百多处，主要在山东省和江苏淮北一带，在安徽北部和河南省中部也有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农业，尤其是养猪业比较发达，墓葬大多用猪骨，特别是完整的猪头骨随葬，三里河的一座墓葬随葬猪下颌骨32具。渔猎仍占有一定地位，发现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的骨、角质鱼镖和数量众多的网坠。陶器，早期均手制，多为红陶，烧制火候不高，器形比较简单；中期灰、黑陶比例增加，出现了薄胎的质地细腻的灰白陶；晚期采用轮制技术生产大件陶器，一种薄胎黑陶黑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大汶口文化距今六千年左右。

河姆渡文化。1973年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面积两千六百多平方米。遗址出土石、骨、木、陶质的各种生产工具数千件，其最具地方特色的是成批的骨耜。这些骨耜一般长20厘米左右，采用水牛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横凿方孔，以便穿缠藤条绑紧木柄。河姆渡文化是南方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栽培水稻的遗址。这里发现有大量的稻谷、谷壳、

稻杆、稻叶等的堆积，有的厚达1米，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亚种晚稻型。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发现不少狗、猪遗骨，还发现一件陶塑小猪和两件猪纹陶器，在陶器上捆扎整齐的一束稻穗与猪纹刻在一起，象征着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密切联系。渔猎仍占有相当地位，渔猎工具种类多，质地形制优良，有骨镞、骨哨、木矛、石丸、陶球等。骨制生产工具是河姆渡文化的一大特色，仅骨镞就有千余件。当时使用的木器很普遍，如木纺轮、木纬刀、木卷布棍、木桨、木锤。遗址发现一件瓜棱形圈足木质漆碗，外表涂有薄层朱红色生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涂漆制品。还发现我国最早木构水井遗迹。河姆渡载桩架板的干阑式建筑和载桩式地面建筑，颇具地方特色。河姆渡文化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

良渚文化。在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发现有上百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60年被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原始农业相当发达，除粳稻、籼稻外，还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多种农作物。丝麻纺织也达到相当水平，发现有平纹麻布、细麻绳等麻织物，还有绢片、丝带、丝线等丝织品。浙江余杭下溪湾发现有与墓葬复合的祭坛，坛上有12座随葬有大量玉器的墓葬。玉器制作精良，有玉琮、玉蝉、玉璧、玉戚等稀世珍品，其他如珠、管、坠、璜、瑗、镯等玉器也多有发现。良渚文化由同一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相沿发展而来，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

红山文化。本世纪三十年代在蒙古草原东部与河北北部、辽宁西部的结合部，发现细石器与磨制的大型石器共存的文化，1954年命名为红山文化。已发现遗址三百多处。红山文化的渔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细石器很多，制造精致。农业也发展到一定水平，磨制的大型农业生产工具也很精良。有陶器者多为红褐色，纹饰多“之”字形压纹、划纹、附加堆纹。红山文化发现有璧、环、棒、珠、龟、鸟、鸮等玉饰，尤以玉龙引人注目。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

址发现石砌大型祭坛，长 60 米，宽 40 米。出土有小型孕妇陶塑像、大型坐式人物残肢块、双龙首玉璜等。辽宁凌源、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发现有四座大型积石冢墓，墓地西北侧梁顶发现一座女神庙遗址，有赭红、黄白色交错的彩绘墙壁面残块，大中小三种类型的女神像残块，其中有一件比较完整的女性彩色人头像。红山文化距今五千年左右。

屈家岭文化。1955 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也波及于河南、湖南、四川部分地区。发出不少大粒粳稻遗存，与现在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很相近。施橙黄色陶衣的彩陶纺轮是颇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其单面和周边常绘以红褐色彩纹图案，有平行短直线纹、平行短弧线纹、同心圆纹、连续螺旋纹等。制陶技术水平较高，有 0.5—2 毫米薄胎陶器，有口径达 86 厘米的厚胎大陶锅。制陶工艺趋于规范化，豆、碗等陶器的器身呈仰折双腹形，特点一致，器身下根据不同用途安接圈足或三足。屈家岭文化房屋建筑特色可见其家庭关系。除了单间房屋，还有室内起土墙形成的横双间式，两间分别向外开门、隔墙无门相通或有小门相通，里外共走一门的套间。屈家岭文化距今五千年左右。

石峡文化。1973 年开始在广东曲江石峡发掘，1977 年命名。主要分布在广东北江、东江流域。最具特色的是石镬，长身弓背、两端有刃，一宽一窄，长者达 31 厘米，是适应于华南红壤地带的耕作农具。各种型号的石锛、石凿，还有可以凿出圆槽圆孔的木工工具。石峡遗址清理的墓葬 64 座，多为单人两次葬，每次葬皆有随葬品，人骨上或近旁往往撒有朱红粉末。有木工工具的墓往往坑大，朱红多，随葬成组陶器和贵重玉器，填土经夯实。可见有技术的木工备受尊重，地位较高。

龙山文化。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分布范围在黄河中、下游，遗址已发现七八百处。以灰黑陶为显著特征。黄

河中游地区，农业已成为主要生产活动。农业生产工具多样，除磨制精细的石器，还有蚌器和木耒、骨锄等。家畜以猪最多，邯郸涧沟一个灰坑中就有21个个体的猪头骨。陶器以泥质或加砂的灰陶为主，也有一些红陶或黑陶。常见纹饰是绳纹、篮纹、方格纹及附加堆纹，也有不加纹饰的素面磨光陶器。陶窑的结构分为火膛与窑室两部分。有规模较大的原始村落，汤阴白营遗址，在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至少62座房屋基址，这些基址排列整齐有序，规划比较周密。凿井技术比较普及，邯郸涧沟、洛阳矬李、汤阴白营等遗址的居住村落都有井址被发现。典型的龙山文化在山东，分布在山东及苏北，已发现二百余处遗址，重要的有潍坊姚官庄、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等。有典型的黑陶、蛋壳陶，器表以素面和磨光为主，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少见，以平底为主，罐类多矮肥，常见三足器和圈足器。临沂范庄出土的蛋壳高柄杯、磨光黑陶壶、有腹袋足鬶等精美绝伦。漆黑光亮的黑陶是专业化生产的产品，采用快轮法制造。有些陶器以及玉斧上出现了阴刻的纤细纹饰，其形状和后世的云雷纹、饕餮纹类似。龙山文化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之间。

上述新石器时代文化向我们表明：不仅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长江同样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的诸文化逊色，只是其特点不同。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诸文化间的联系加强，中心文化区逐渐形成，龙山文化之后的青铜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文化超过了长江流域。司马迁写《史记》时，楚越之地，有的仍然火耕而水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代黄河流域先进文化逐步向四周扩展，而在新石器时代则是黄河与长江各自哺育了我们的先民。

新石器时代文化创造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农业起源及原始农业的发展。新石器时代，我国栽培的作物主要有粟和稻，它们可分别作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栽培作物代

表。粟原产中国北方，在北方广大的地区内的新石器遗址中，先后发现炭化粟粒、粟壳或粟的谷灰达三十多处，说明粟是当时普遍种植的作物。其中磁山有 88 个窖穴，估计储存 10 万斤以上。我国早在八千年前就已经栽培粟，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目前，已在 7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稻，其中 57 处属于长江流域，属于黄淮流域大约有 9 处，广东、福建、台湾各 2 处。其中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距今有七千多年。此外黍、稷、麦、高粱、豆、麻等也在新石器时代开始栽培。油菜、葫芦、莲藕、菱芡、甜瓜、桃、李、梅、枣、栗等也是在新石器时代开始栽培的。

畜牧起源、原始畜牧业的发展。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驯化的动物是狗。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把狗驯化，作为狩猎的助手。当农业起源后，狗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北到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有狗的遗骨被发掘出来，如磁山、裴李岗、河姆渡等。另外，用狗做殉葬品的现象很普遍，从发掘情况看，殉犬的骨架多侧卧在人骨架的腿部之旁，其头与人骨架一致，也有的殉犬卧于死者脚下。这充分说明人与狗的亲昵关系。其次是猪，在农耕文化遗址中，大多伴有家猪的遗骨，这说明我国农耕与饲养业结合的生产模式，很早就已经确立。迄今所见最早的是桂林甑皮岩遗址中的家猪，距今约九千年。羊是温顺的动物，它也较早地被驯化为家畜。裴李岗出土了陶羊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也出土过羊头式陶塑器盖把钮，说明我国北方饲养家羊的历史有可能早到七千年前。牛、马在新石器时代已被驯化为家畜。家鸡的驯化年代早到八千年前，磁山、裴李岗都有家鸡遗骨出土。我国是最早饲养家鸡的地区。

制陶业的产生和发展。农业的产生和粮类食物的增多，促进了制陶业的产生。中国古代文献中说“神农耕而作陶”。磁山、裴李岗、河姆渡等遗址的陶器制作水平较低，小件器物的陶坯用手捏成，大件器物用泥条盘筑法，火候不高，胎质也比较松疏。仰

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红山文化等遗址的陶器，用慢轮加工技术制作，器物造型工整。彩绘主要用红、黑两种颜色，以红陶居多。而到了晚期，普遍采用快轮制坯，使胎壁薄厚均匀，器形美观，胎质坚硬。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黑陶，胎壁薄如蛋壳，坚实细腻，漆黑光亮，反映出制陶技艺高超。

纺织技术的发明。作为捻线工具的纺轮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偶有发现，到中期已经比较多了。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有成堆的陶纺轮，多达几十件。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不少陶器底部有制作陶坯时所垫的布纹痕迹。有的遗址出土了丝织品、麻织品。

铜器的出现和使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一件圆形铜片和一件铜管残片，属于含杂质较多的黄铜。山西榆次源涡镇仰韶文化遗址的一件陶片上附有铜渣，属红铜。山东龙山文化的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两段铸造的铜锥。河北唐山大城子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两件穿孔铜牌。河南龙山文化临汝煤山遗址发现有炼铜的坩锅残片。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一件浇铸的铜刀，永登蒋家坪遗址发现残铜刀一件。铜器的出现和使用，在新石器时代并不普遍，但是它开创了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之先河，并由此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

农具的发明。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畜牧业产生，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农具中最早发明的是收获和加工农具。当人们还在采集的时代就已经发明了割取野生谷物穗子的石刀，早在二万八千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峙峪遗址就发现这种小石刀。同时，人们要把采集的野生谷穗脱粒去壳，又发明了磨盘，在距今一万七千年前的沁水下川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石磨盘。磨盘为粗砂岩质，呈盘状，底面为自然平面，周围边缘打制修整，中间则由于加工谷物而研磨成圆坑。当农业发明之后，这两类工具优先发展。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遗址中，石磨盘制作精

良，石刀已发展为带锯齿的石镰。同时还发现了石铲、石斧等。河姆渡遗址发现很多骨耜、木耜，西安半坡遗址及其他新石器遗址发现了很多石铲、石耜和石锄，这些工具都是安装上木柄且来翻耕土地的，说明当时已进入了“耜耕”阶段，标志着原始农业生产力已达到一定水平。除了骨、石农具外，原始社会居民还普遍使用木耒翻耕土地。最早的耒是一根削尖的木棍，在下端安上一根横木便于脚踏，从采集时代挖掘植物的尖木棒发展而来。后来这种单齿耒又发展为双齿耒。陕西临潼姜寨、河南陕县庙底沟、安阳殷墟窖穴壁上都发现过双齿耒的痕迹。耒、耜是最古老的耕作工具，后来的犁就是由它演变来的。当时的生产工具有石制的、陶制的、木制的、骨制的，满足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一伟大革命必将使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革。当时的人类思考最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1978年在河南临汝阎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一件陶缸，其腹部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画，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原始绘画作品。画面内容为两部分，左是鹳鸟叼鱼，右是带柄石斧。鹳鸟圆润丰满，长嘴圆眸，昂首挺立，嘴叼一条大鱼，体微后倾，形态逼真，古朴优美。右边巨大的石斧绑在一根竖立的木柄上端，上有固定石斧的四个穿孔，柄部画有刻划的绳索花纹。鹳鸟衔鱼是自然界生灭不息的象征，也是人类昔日生活的象征；石斧则是人类力量的象征，是今日人类的象征，一把石斧把人类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了。它源于自然却又是人工制作，它脱离了原始的自然，人类要用它去改造自然，使自然人化。这幅画集中地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革命发生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人类有了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脱出去的意识。

尽管人类有了独立的意识，希望把自己与大自然区别开来，然而人们又希望人与自然和谐地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当时

占主导地位的观念。1979年在连云港锦屏山马耳峰南麓将军崖，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岩画。岩画长22米，宽15米。画面分三组，内容有人面、农作物、鸟兽、星云等图案及各种符号。把农作物作为岩画表现的内容，这说明作者要表现的是人化的自然。整个画面和谐统一，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星象图象银河系星带，用三条短线将它分为四个部分，似表现太空星象的变化。在长条星云图案中，还有表示太阳和月亮的图形，可能反映了对天体的崇拜。从内容上看，又与祈求丰年的活动有关。原始农业仍然要靠天吃饭。当时的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物候学知识。在郑州大河村出土陶器上发现了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和星座图等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天象资料。大河村一件复原的陶钵的肩部共有十二个太阳，可能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星座图的星虽已残缺不全，但从现存的部分看，三个圆点排列的形状可能是北斗星的尾部。人们通过对天象、物候的观测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

当人把自己从自然独立出来之后，并没有把自然当作对立面，而是对自然怀有由衷的崇拜。原始宗教主要包括两大部分，自然崇拜、祖宗崇拜。正是自然与祖宗对人们有养育之恩，因此他们定时地进行祭祀、祈求。古人对自然物的祭祀相当广泛，天地、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四方、山林、川谷、江河、山陵等都是被尊崇祭祀的对象。这表现了原始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表现了刚刚脱离自然的人们对自然之母怀有的无限眷恋之情。

也正因如此，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处处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欢乐情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及其他艺术品，人们用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创造出生动而古朴的动物和植物形象，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之一。以河姆渡文化为例：象牙雕刻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吭鸣啼的双鸟；陶塑作品是憨态可掬的小猪；绘画作品主要是谷粒、叶脉、花草和籽实等植物性图案；陶器口上刻有茎花连枝图案，宛如扬花的稻穗；陶釜、陶盘的沿

画有由叶片组成的均匀的图案；陶盆处壁上画着一组鱼藻纹，似有鱼虾遡游其间。人们塑造的艺术形象大多是他们喜爱的动物、植物。

这种文化氛围的出现，除了新石器革命提供了社会物质条件外，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成也提供了这种保证。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的社会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公社到新石器时代发展到新水平。随着氏族公社的壮大，原始部落产生。部落是由同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胞族构成。它在农耕民族中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语言、共同的文化、宗教观念和习俗。部落常常由若干个较小的地区村社组成。大家共同从事贸易、农业、建筑房屋、举行各种宗教活动。部落存在的基础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部落组织的最高级形式是部落联盟。通常由若干领土毗邻、操共同方言、有亲属关系的部落组成。参加联盟的各部落地位平等，内部事务自主，对外统一行动；各部落酋长组成联盟议事会，决定重大事情，推举联盟首领。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氏族制度有很大发展，从氏族公社发展到部落，进而产生部落联盟。但是，氏族的根本制度、根本原则并没有被破坏，财产公有，经济平等，内部民主，每一位氏族成员都有一种安全感。

这种社会文化的进步，形成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迈出了通向文明时代的矫健的步伐。随着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等进一步发展，人们首先意识到人对自然的征服力；这种征服力聚集的财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原始社会的平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征服开始了。从此之后，人们不再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和谐，而是要征服。崇拜征服的力量、崇拜英雄，把人类社会推向血与火之中。新石器时代和谐静谧的文化观念，平衡、稳固的文化氛围，逐渐变成对粗犷、刚健的讴歌，是对崇高和力量的赞美。新石器时代晚期神人兽面像、饕餮纹，其狰狞使

人敬畏，其怪异使人惊恐，其力量使人情绪激昂。

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在血与火的厮杀中，在奴役与压迫的呻吟中，回头俯视新石器时代平等、自然、和谐的文化田园诗，不禁化成无限的追寻的力量，这种追寻的力量又化作了新一代文明起源的动力。在失去与追寻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无数个推动文明发展的悖论需要我们去思索。

（马瑞江）

参考资料：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炎黄之战

许多创造出远古时代灿烂文化的先民，犹如长夜中划破天空的流星，以他们的光芒照亮了寰宇，而他们自己却骤然流逝。我们寻遍历史的尘埃却找不见他们的名字，只得以或许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今天的地名来命名，如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另一方面，在古代传说和记载中却有无数的英雄，由于这些英雄的业绩被无限夸大，甚至神化，而不被当今的历史学家承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人们往往感到英雄时代的古史传说常将人神化，把世间的人超凡拔高为天上的神；从神话研究的角度看，又往往觉得古史传说常将神人化，把本来虚无缥缈的神改铸为历史上的人。大体说来，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当时社会意识的转变，人们崇拜英雄，因此把祖先神话，甚至神人不分，直到战国秦汉的历史编纂学家，将许多神灵人化，并把他们纳入古史系统。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这种人化运动的总结性的成果。

原始社会的末期，产生一股崇尚征服力量、尊拜英雄的社会意识，在社会的激烈动荡中，许多氏族、部落常常汇聚在具有崇高威望的英雄人物的大纛之下。为了替当时的英雄人物呐喊助威，使他们具有更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往往把他们的祖先神化，这样，远古时代的杰出人物连同他们的后代，一起被赋予了神圣的灵光。英雄时代需要这样神圣的英雄，如果以前没有，英雄时代的人们自然会创造出来。

在那英雄时代，氏族部落林立，直到一两千年之后的战国时期，人们还能罗列出许多。他们是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从其他资料中还可以得到许多氏族的名字，如：钜灵氏、句疆氏、谯明氏、涿光氏、黄神氏、狛神氏、犁灵氏、大骢氏、鬼骢氏、弇兹氏、太逢氏、大敦氏、云阳氏、空桑氏、神民氏、辰放氏、厖傀氏、皇覃氏、豨韦氏、大巢氏、燧人氏、庸成氏、仓颉氏、女娲氏、混沌氏、昊英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等等。这些氏族的祖先几乎都被神化了。女娲氏的祖先女娲，被神化为顶天立地的巨人，曾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在她死后其体化为十位神，活跃在粟广的原野上。可见女娲氏是种粟的农耕部落，后世把他们的祖先神化起来。有巢氏的祖先，被认为在上古之时，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使百姓受大益，因而被推为王，号之曰有巢氏。燧人氏的祖先被认为是钻木取火的发明者，使百姓吃到熟食，化腥臊去恶臭，因而被推为部落首领。神农氏的祖先被认为是农业耕作技术的发明人，他砍削木头做成耜，弯揉木头做成耒，然后教给天下人。他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烈山氏则是放火烧荒以利耕作的发明人。包牺氏把绳索联接起来发明了捕获野兽和打渔的网。这些英雄被他们的后世拔高了，但他们毕竟是人，是圣人；有些则被神化了，如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是神话，杀黑龙以济冀州是半神半人，积芦灰以止淫水则可能是人创立的功绩，所以女娲是半神半人，反映在了当时人们神、人不分的意识。人们崇拜的是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这些英雄是后世人加工创造出来的。

黄帝和炎帝及蚩尤，他们是另一类英雄，是征服者。这类英雄的产生，反映了英雄崇拜意识的深化，表现了氏族林立，征战不断，在天下大乱之时，人们崇拜征服的胜利者和虽败犹荣的顽

强不屈的豪杰。以神农、燧人、有巢、包牺等为代表的英雄是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那种和谐统一的文化氛围相一致的，是和平时代的英雄，这类英雄为文明奠基。后一类英雄，炎、黄、蚩尤等与新石器时代后期赞美力量，崇拜征服者，讴歌奴役压迫、侵夺的文化观念的主旋律合拍，他们是文明的创造者，是战争时代的英雄。

黄帝和炎帝都是神农氏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强大的农耕部落的首领，炎、黄两族是从两个互通婚姻的集团少典氏与有蟜氏繁衍而来。黄帝姓公孙，名轩辕。炎帝因生于姜水而姓姜。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崇拜力量的社会意识的形成，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炎、黄部落最早居住地是姜水、华阳，一般认为最初居于陕北的黄土高原，这时黄河流域中心文化区形成，炎、黄肩负起将中心文化区的先进文化向外辐射，并且不断吸收周边文化创造的成果，进一步发展黄河流域中心文化的任务。黄帝族、炎帝族在黄河支流渭水上游一带，他们首先向东迁移，黄帝族迁移的路线偏北一些，东渡黄河以后，沿着中条山、太行山的山边地带，直到今河北省北部；炎帝族则偏南一些，顺着渭水和黄河两岸，向河南、河北南部、山东东北一带发展。总的来说，炎、黄两族是从黄河中上游往下游发展。春秋时代以前，黄河并不是由河南流向山东入海，而是自河南中部偏北的浚县一带向北转入河北，穿过冀中平原东北，流经天津一带入渤海。黄帝族从陕北直到北京附近，到达河北北部宣化附近，与古老的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后裔会合。

炎帝族、黄帝族这次迁徙的原因大概是：一、部落发展，需要扩展。由于获得先进文化，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因此部落急遽发展，急需向外扩张；二、游耕制度的作用。原始定居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曾出现了游耕制度，主要是由于长久地耕种一地，土地贫瘠，又没有发明施肥的方法，因此废弃耕种过的贫瘠土地

向新的土地转移，如此经常地移动，叫做游耕。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沿黄河中上游东移，到中下游土地更加肥沃、低平适于耕作，所以炎、黄两族如此迁徙就不难理解了；三、征服的需要，在炎黄时代多有战争的记录，有的战争持续多年，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凡五十二战，炎、黄在征战中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

在原始落后、缺乏交通工具和有效通讯手段、传播媒介的条件下，要想与外界建立广泛的联系，除了长途跋涉迁徙之外，没有什么好办法。黄帝和炎帝获得崇高威望，成为众望所归，令人仰慕的部落时代的英雄，其中原因之一是他们克服千难万险，率领百姓完成了这次大迁徙。

这种部落大迁移，必然要侵入周边部落的领域，因此要避免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关的战争记录非常之多，最著名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共工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共工是炎帝部落的一支，当时正由西向东发展；蚩尤是东方的渔猎、畜牧部落的首领，在他比较弱小的时候，曾经臣服于黄帝。后来蚩尤的部落发现了金属矿，并学会冶炼，铸造了许多新兵器。因此史称蚩尤作兵，说他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逐渐强大起来。据说他有兄弟八十一人，可见其联合众多的部落。蚩尤要从东向西发展，因此和炎帝部落中的共工冲突起来，爆发了激烈的战争。蚩尤的部落武器精良，因而攻占了共工部落的九个氏族居住区。共工拼死搏斗，他所处的西方地势较高，便修筑拦洪大坝，然后诱发洪水，淹没了蚩尤占领的许多地方。这场大水让人觉得昏天黑地，好像支撑天的柱子被共工发怒后触断了。蚩尤居住的东南方地势很低，当滔滔洪水来临时，人们觉得整个大地一下子塌陷了，混浊巨浪呼啸着卷起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滚滚而来，但是共工的这种洪水战术并非总是奏效，而蚩尤的部落是由于有了新的文化创造才强大起来的。共工向黄帝求援，同有熊氏结成联盟，不断地提防着蚩

尤的进攻。

共工和蚩尤之间的战争把黄帝卷了进去，这绝非偶然，因为炎、黄部落是从西北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部落，而他们在由西向东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掌握了先进文化、正在从东南方崛起的渔猎畜牧部落发生了冲突。蚩尤东面是大海，他只能向西方拓展。黄帝清醒地意识到，他必须参与这场战争，否则，当蚩尤消灭共工后力量更加强大，下一个被消灭的将是他自己，因此决心与蚩尤决战。于是，第二次大战爆发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空前惨烈。蚩尤不仅拥有先进的武器，而且英勇无比，勇猛善战。战争开始，黄帝使应龙蓄水，抵挡蚩尤，这显然采用了以前曾经奏效的战术，这次恰遇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这种环境显然离蚩尤的部落不远，因此蚩尤的部落比以前适应了这种水战，冲破了应龙的水阵。但是胜利了的蚩尤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离开了他的士兵熟悉的水战环境和他们游猎畜牧的森林，大举向北进攻。在华北平原、旱地农业区，显然这里是黄帝部落的天下。双方在冀中大平原上浴血奋战。庄子在描述这次大战时说，双方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最后蚩尤在这里被斩杀了。黄帝擒杀了蚩尤之后，让少皞统帅蚩尤的部落。蚩尤虽然战败了，但他的英勇被后世传颂，虽败犹荣，仍然是英雄时代中的英雄，被后世尊为战神、创设军法之神。周朝一直祭祀这位战神；秦代他是东方八神之一；汉朝在长安建立了蚩尤祠。

在蚩尤被打败后，黄帝掌握蚩尤部落的先进文化，炎帝、黄帝之间的力量均衡被打破了，对等的联盟关系破裂了，因此双方展开大战。据说是因为炎帝欲侵凌诸侯，争夺盟主地位，可是，诸侯咸归轩辕，无论怎么说，黄帝此时力量压倒了炎帝，平等联盟基础既然不复存在，黄帝吞并炎帝势在必行。双方共展开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在阪泉之野，炎帝被打败，黄帝从此更得志了。这时他率领部落，大规模南迁，一路上又打了许多仗，据说五十

二战而天下咸服。

黄帝天下无敌，天下有不顺从的人，黄帝从而征之。

炎黄大战打破了原始的宁静、和平、和谐，社会从此动荡不安，文明就是在这激动不安的热烈骚动中诞生了。

炎黄大战表明黄河流域中心文化区的形成，从此黄河成了华夏文明的摇篮，黄帝是传播中心文化区文明成果的第一位使者。

炎黄大战之后，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繁盛期。由于炎黄大战打破了一个个地僻一隅、封闭的氏族部落，各氏族部落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同时黄帝集中了各部落各氏族的各种文化创造，后世把衣服、舟车、文字、历法等许多发明创造集中在黄帝身上就是明证。

炎黄大战期间，产生了许多重要发明。需要是发明之母。由于需要，蚩尤冶炼金属，铸造兵器，因此大大推动了青铜时代的早日到来。黄帝则把蚩尤的成果推广到更大的地域，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黄帝在战争中也有很多发明，有的史书上记载，黄帝在江淮一带与蚩尤作战，因天气长期大雾，又因地理情况不熟，经常迷失方向，因此发明了指南车。显然在战争中黄帝部落有许多重要发明，否则他可能不会取胜。

阪泉大战，黄帝集中了他的最精锐的部队——黑貔貅貙虎，而当时黄帝的实力大大强于炎帝，尽管如此，还是经过三次大战，黄帝才算得志，可见炎帝部落进行了多么英勇顽强的抵抗。在那个崇拜英雄的时代，涌现出了一些多么了不起的战斗英雄。阪泉大战的影响极为深远。这种影响的证据是炎帝一族涌现了被后人传诵乃至神化的英雄。比如共工，这位炎帝部落的杰出人物，他比炎帝年轻许多，他的部落正处于黄河从高地降落平川，又有淇水渚水汇流，当时许多人对此束手无策，共工修堤筑坝与水患斗争。他后来与黄帝部落的颛顼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人们传说他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也塌陷下来，天从西北倾斜，连日月

星辰都移了位，地从东南下陷，洪水卷着泥沙向那里奔涌。可见共工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何等的英雄气概。这则神话真实地反映出共工身上体现出巨大的精神能量。人们在猛烈洪水面前，在惨烈的战争中都需要这种精神力量。

夸父也是炎帝后裔，夸，是形声字，其意是大。夸父是位魁梧奇伟的男子汉，夸父在蚩尤之后被黄帝的部下应龙杀害。夸父执著的追求精神也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加以表现的；夸父追逐太阳，为了要征服它，免去它带给人们的干旱。他闯过了太阳，非常渴，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向北想要到大泽去喝水，路上渴死了，他丢掉了手杖，化为邓林。这则神话表现了夸父为后人的幸福不怕牺牲，勇敢追求的壮举。

炎帝族的另一位英雄是刑天。刑天在与黄帝的斗争中，被斩下了头颅，埋葬在常羊山上。大概刑天生前的英勇斗争太感人至深了，死得也一定非常壮烈，所以人们觉得像刑天这样的英雄不会白白地长眠于地下，尽管他没有了头颅，还会以两乳为目，以肚脐为口，继续用双手舞动干戚，继续英勇地战斗。刑天这种宁死不屈、死而后已的斗争精神，对我们民族的影响非常深远。晋朝的大诗人陶渊明有这样的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炎帝的小女名叫女娲，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人们说她死在东海中，化为精卫鸟，常常呼叫不停，衔西山之木石，填在大海之中，表现了她大海不平，战斗不止的精神。

炎黄大战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

首先黄帝后裔南下，同那里原有的部落逐渐融合，共同发展。这不仅推动了那里原有的氏族部落发生分化和改组，而且也带来了他们本身的分化和改组。原来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之间，交错居住，互相通婚，有时因为某种需要结成联盟，这样就打破了原有部族的界限，奠定了华夏民族形成的基础。

炎帝被打败后，他的后裔被分割，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四支。一

支是烈山氏，善于烧山开垦田地。共工也是炎帝后裔，长期活动的地区在河南西部的伊水和洛水，共工曾想恢复炎帝昔日的地位，与颛顼争帝。争帝失败后，共工这支逐渐衰亡。后来的四岳据说是共工的后代。四岳发展为四个分支，即齐、吕、申、许。炎帝的后裔中还有一支在汾水流域，后来的沈、姒、蓐、黄四部源于此支。

蚩尤战败后，夷人融入华夏部落的四个分支。其余的仍保持着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于是有了华夷之别。

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这十二姓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姬姓，被认为是黄帝的嫡系，后来发展为异常强大的势力。祁姓中有陶唐氏，即唐尧所属的部落。任姓后裔有谢、薛、章、舒、吕、祝、泉、毕、过，散布在黄河流域。黄帝的后裔还有夏后氏，姒姓，即夏禹所在的部落。夏后氏由北而南，其中有一支仍留在北方，成为游牧部落。

黄帝的后裔在南下过程中，曾和强大的三苗发生冲突，除了三苗还有庸、蜀、微、卢、彭、濮等部落，大多相继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炎黄大战后，华夏族开始形成，分散的各个部落杂错融合，成为华夏族。

炎黄大战之后，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逐渐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就是这样形成的。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五帝本纪》

《山海经》

《吕氏春秋》

尧舜禅让

对于英雄的崇拜，对于力量的崇尚这种新的观念，把原始社会推入血雨腥风之中，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时代。原始的民主、平等原则不会轻易地被抛弃，而这时拥有权力的英雄们，也需要用旧传统的灵光，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使自身放射出神圣的光彩。尧就是用手中的暴力之剑削平天下后，又让自己放射出神圣灵光的第一人。

尧是陶唐氏后裔帝喾的儿子，他名叫放勋，祁姓，生于丹陵。史书上说他眉有八采，前额宽大饱满，下颌宽广。十五岁的时候辅佐他的哥哥挚，受封于唐，为诸侯，到二十岁的时候，登上了帝位。史书上说他处理政务谨慎，约束自己，明察四方，善于治理天下。思路通达，对人宽容温和，恭敬有礼，能够任用贤人；他能发挥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又明辨百官的善恶，使诸侯国协调和顺，天下众人从此友好和睦。

尧为了巩固帝位，对敢于反抗者则严惩不贷。被镇压的有帝鸿氏的后裔浑敦、少皞氏的后裔穷奇、颛顼的后裔梼杌、缙云氏的后裔饕餮。尧把他们斥之为四凶，流放到边远的地方。

当他的帝位巩固之后，便让一些部落的首领到他领导的部落联盟中担任职务，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益为秩宗，皋陶为大理。尧还有一项创举，设诽谤之木，在他的王宫前装上一个装饰美观的木架子，上面放置一声能敲响的响木，谁有意见都可以敲响这块诽谤之木，尧将随时走出王宫纳谏。后世王

宫前的华表，据说是源于尧的诽谤之木。

尧曾率领部落联盟发动对三苗的战争，这次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强大的三苗被削弱了。尧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他的氏族是从北方来的。但是尧的儿子丹朱封于丹水，到汉水流域去了，可见是征三苗之后，把他的儿子封在了三苗的土地上。在征三苗过程中，一些黄帝的后裔建立的国家，姬姓的随、唐、曾、巴，熊姓的罗国，先后迁移到南方去了。被打败了的三苗，遵从传统做法，被分割，有的参加了部落联盟。驩兜是源于三苗的部落首领，他在尧做联盟首领时，也参加了部落联盟。一向具有反抗传统的共工，这时也加入了部落联盟。

从尧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意识的转变，原始的平等原则、民主传统、言论自由在部落联盟时代又重新恢复起来，并成功地被用来治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部落联盟之间的内部矛盾。在氏族、部落被打破后，社会前进了，部落联盟的巩固，新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新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这时原始的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仍有适应性。但是，这种新的社会秩序还需要用暴力来维持。尧的创造性在于：使传统文化的社会意识与新时代的社会意识成功地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

尧的创造性还在于：实行禅让制。尧的父亲帝喾执政的时间很长，死后，把帝位传给尧的哥哥挚，尧又从他哥哥的手中接过了帝位。他执政五十年之后，决定不传位给他的儿子丹朱，而是把帝位让给一位贤德的人，这就是禅让制。禅让制仍然是旧的文化传统与新时代的社会意识结合的产物。禅让制没有退回到氏族、部落时代的民主推举制，同时他又不同于英雄时代，崇拜力的时代，以武力夺取、占据王位。他是由一位强有力的帝王，经过民主协商，把权力交给一位他信得过，大家又认可的贤德的人。这种帝位继承法使强权实力退居到幕后，表面上给权力移交赋予温

文尔雅的形式。禅让制创造的这种风格，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新时代的社会意识结合的形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禅让制本身。

禅让制是一种新的创造，它开始时并不被人理解，也不被人接受。

尧最初要让位给当时的著名隐士巢父。当尧要把天下让给他时，这位巢父断然拒绝。

尧又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为人正直仗义，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后隐居于沛泽之中。尧找到他，要让天下给他，说："当太阳、月亮升起来，光芒照耀大地的时候，地上的爝火纵然不熄灭，要显出它的光亮来，不也是很难的吗？当及时的春雨普降大地，还要用大泽中的水去浸灌田地，那不是徒劳吗？夫子这样的大贤人已经树立起来了，而我还尸位不动，我自己认为是一种缺憾。请您来执掌天下吧。"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大治，却要我来代替您，难道我是为了名吗？名是实的宾，我是那种有其名无其实的人吗？鹪鹩在深林中筑巢，它能占据的不过是一枝；鼹鼠到大河里去喝水，不过能喝饱肚子；您把整个天下给我，我没有什么用。厨子即使闲着没事，也并不离开厨房去干主持祭祀的事。"这位许由先生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逃走了。逃到中岳颍水的北面，箕山之下，隐居耕田，表示终身不过问天下大事。尧又召请他担任九州之长，许由不想听到这样的话，甚至认为这样的话玷污他的洁净的耳朵，竟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朵。正巧，他的好友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看到许由在洗耳朵，问他是什么缘故。许由说："尧想要召请我去当九州长，我讨厌听到过他这种声音，因此来洗耳。"巢父说："你要是居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人道不通，谁能见到你呢？你故意到处浮游，还不是想要听到这样的话，求得名誉？这简直要把我的牛犊的口也污染了。"于是巢父牵着牛犊，逆流而上，让牛犊饮用上游的水。这位许由

死后，就葬在箕山之巅。无论这段传说是否真实，都反映了尧要实行禅让制，并不被人理解，因为突然要接受帝王送给的天下，大概很少有人胆大包天地敢于接受，况且像许由、巢父这样的人，厌恶政治，不以权位为事，更不会接受了。汉代还有人在箕山上见到许由的墓，似乎确有其人。

尧曾经征求大家的意见，询问谁可以继承自己的帝位。有个叫放齐的人说，尧的儿子丹朱，十分开明通达，可以继承大业。尧却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言论荒谬，常常和人争论不休，影响团结，不是合适的人选。看来放齐也不理解尧的禅让，他以为尧不过是做做样子，尧肯定会像其父亲帝喾那样，把天下交给儿子的。

尧又让大家推荐善于处理政务的人才。讙兜推荐共工，他说共工主动承担许多政务，并善于聚集人力，做出许多成绩。尧更加反对，他说，共工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谦恭，其实连老天都敢怠慢。看来讙兜认为尧一定老糊涂了，觉得有机可乘，竟然推荐与他臭味相投的共工。

又过了许多时间，尧向四岳——即部落联盟里四位首领说，我占据帝位已经很长时间了，希望你们听从我的意见，继承我的位置。四岳都表示自己品德恶劣，会玷辱了崇高的帝位，所以不能接受。经过多次禅让，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四岳觉得尧的禅让之意非常真诚，不得不认真考虑。尧也下定了决心，让他们一定推荐一位很高明的人选，纵然出身微贱，也可以举荐。大家一致推荐一位叫舜的人。

大家说："在下面有一个穷困的百姓，名叫虞舜。"尧说："是的，我也听说过这个人，他怎么样啊？"四岳说："他是乐官瞽瞍的儿子。他的父亲心术不正派，后母说话不忠实，弟弟象傲慢不友好，而舜能同他们和谐相处。他用自己的孝德感化他们，又加强自身修养，不流于邪恶。"当时舜尚未婚配。尧考察了他三年，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以便观察舜的言行。舜经受了各种考

验，尧决定让位于舜，但舜却主张应当让给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推辞不肯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尧决定让舜先当摄政王，选定了吉日，举行了仪式，舜开始行使权利，主持政务。尧一直让舜摄行天子之政，二十八年后，尧去世了。虽然这二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未能使尧改变实行禅让制的决心，虽然舜确实没有辜负了尧对他的期望、众人对他的信任，但是当尧死后，舜没有立刻登上帝位，表示要将帝位让给丹朱，自己找个地方隐居下来。显然这样违背了尧的意愿，舜宁可让尧呕心沥血的禅让制这个创举毁掉，也要表示自己遵从传统，并无篡权之心。但是，由于舜已经执政二十八年，取得很高的威信，所以诸侯都去朝觐他，而不去朝觐丹朱；狱讼者也都到舜那里打官司，而不去找丹朱；民众所讴歌赞美的是舜而不是丹朱。舜对此无限感慨，说："这真是天意的安排呀！"其实，更不如说是尧的精心策划，使他创造的禅让制成功了。由此可见，尧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理解，对人有了不起的洞察力，最重要的是他至公无私，他明白要把天下交给儿子，有负天下人；把天下交给舜，虽有负儿子却利于天下，利于后世。

舜不仅从尧的手中接过天下，也接过了禅让的旗帜，他不仅将帝位传下去，也要再为禅让的旗帜添加光彩。

舜的儿子商均也是和丹朱一样的不肖子弟。

舜问四岳："有谁能奋发努力、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业，身居百官之长，辅佐政事呢？"大家都说："伯禹做司空。"舜对禹说："好啊！你曾经平定水土，现在你可要更加努力啊！"禹跪拜叩头，让给稷、契和皋陶。舜说："好啦，还是你来吧！"到了舜时，禅让制的成功，赢得了大家的理解，舜深刻地理解了尧的用意，贯彻起来更加彻底，不仅体现在禅位，在用人上也不拘一格。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成，被治罪，舜听从大家的意见，起用了禹，禹在治水中表现了高尚的品德和才华，所以得到大家的推荐。所以，舜不仅未把天下交给自己的儿子，反而把天下交给自己惩罚过的

政敌的儿子手中。他大胆地这样做了，并且大家并没有提出异议，关键是他与尧不同：尧在形成禅让的思想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人选后，又不被理解；而舜把禅让制所包涵的思想精华，延长到用人等多种政务上，所以到他要禅让时，合适的人才已经培养成熟，从上到下谁都没有异议，一切水到渠成。

舜逝世后，禹为他办完了丧事，也仿照舜过去的做法，避居外地，跑到阳城居住，以此来表示要让商均继位。然而，部落联盟的各个诸侯似乎有权选择他们的首领，像尧时一样，大家都拥护禹而不归服商均。禹演了一场与舜当年极为相似的历史剧，以无可奈何的姿态，表示听从天意的安排，接受帝位。但是禹只演到此为止，下面的历史剧，禹开始自导自演，不再与舜演过的有任何相似之处。

禅让制在禹的手中呈现了微妙的变化。禹当初治水时，选择了皋陶和益做他治水的助手，当禹即位之后，他首先选择了皋陶做他的继承人。皋陶是偃姓部落的首领，当时很有实力，在治水中也非常能干，舜在位时威望很高。他曾在舜和许多部落联盟的首领面前，高谈阔论，精辟地阐述选拔人才、治理天下、敬天安民的道理。他能言善辩的才能，使他成为善治狱讼的著名官员，连《诗经》中都有颂扬他这方面的才能的诗句。皋陶也曾当众诘难过禹。禹选择皋陶为继承人，无疑以此向天下表明自己是真心地举荐贤才。确实皋陶的才能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但是，事实上皋陶无法成为继承人，因为他的年龄比禹还大，至少和禹的年龄差不多，因为大禹治水时才二十岁，当时皋陶一直辅助他。禹的禅让并无诚意，他只是利用皋陶笼络人心，笼络皋陶。他确实笼络住了皋陶，拥有强大实力的皋陶，不但没有反抗，反而命令民众都要以禹为榜样。当皋陶被举荐不久便死去后，禹又举荐益为继承人。益在禹死后，又重演舜和禹演过的那场戏，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北，表示谦让，请启继承帝位。然而，诸侯不去朝觐

益而朝拜启；不去益那里打官司而是去启那里讼诉。理由是："启是我们君主的儿子。"讴歌者不去讴歌益而讴歌启，理由是："启是我们君主的儿子。"益也曾辅助禹治水，也同样德才兼备，但是禹并没有像尧、舜那样，让益当摄政王，这样益怎么能够得到诸侯、部落首领的承认呢？在他们眼里启最多是个部落首领，有什么资格当部落联盟的首领呢？他们不去向益朝觐，决不是益比启的德才差，而是禹精心导演的结果。禹举荐已入耄耋之年的皋陶，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故意延宕其后继者益的佐政时间，使益根本没有时间站稳脚跟。在这同时，他树立了自己及启的威信，为启世袭帝位铺平了道路。这样，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禹的禅让，分明是一个高明的圈套，贤德的益，有才能、有实力的皋陶，全都钻进圈套，却全然不知。《战国策》的作者尖锐地指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他不但落得禅让的名义，而且保持了自身高大完美的形象。但是，历史学家只能写尧舜禅让，而不能把禅让写在禹的名下。

公平地说，我们今天对禹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禅让制不过是古代权力结构演变的过渡形态。禅让是要让贤，但禅让过程中的民主是非常有限的。旧的民主传统的影响非常有限，真正能起作用的大概只有四岳等部落首领的意见，而尧舜的决定、部落联盟首领的个人意志是举足轻重的。这与昔日氏族、部落时代不同，那时重大事情由议事会与民主大会集体讨论决定、首领由拥有选举权的人们选举产生，并能够体现公众意志。禅让的过程不过是把部落首领的个人意志，披上了民主传统的外衣。如果不是四岳的推荐和尧的个人意志，像氏族时代那样选举，舜大概不会当选。到了禹的时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部落首领的权力不断强化，禹举荐皋陶，后来又让伯益继承帝位，根本没有征求部落首领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世袭制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伯益与启的权力斗争失败，主要原因是部落首领已经

开始对世袭制认同，启并不比丹朱、商均更有才德。

从禅让制的创立到名存实亡的过程，可以看出从选举制到世袭制的巨大转变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们用血与火为世袭制开辟了道路，但旧的民主传统的影响还存在，因而出现了禅让制，禹则实现了由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转变。但是这场斗争并未结束，到夏代中期让贤与世袭又经过了反复的较量。禅让制是为世袭制的最后成功做了必要的准备，它是连接民主制与世袭制的枢纽。世袭制战胜了原始的民主选举制，根本原因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强化君主的权力；因为君主权力的强化对于巩固部落联盟、稳定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世袭制逐渐地确立了。

尧舜禅让，让传统的原始社会文化最后一次放射出它特有的光华；禹顺应历史发展的形势与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作为新时代的奠基者，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五帝本纪》

《尚书·尧典》

大禹治水

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她是这样养育她的儿女的：一方面，她不失温柔地献出她的全部乳汁哺育华夏民族；另一方面，她不时地显露桀骜不驯的性格，经常不断地把她的孩子抛进浊浪翻滚的黄水之中，让他们在水中痛苦呻吟，在与洪水搏斗中强筋壮骨。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长大的：既受黄河的哺育，又受黄河的磨炼。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历史先民，勇敢地接受各种恶劣自然条件的挑战，创造出华夏文明的累累果实，演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壮剧。五千年黄河水流不完，五千年英雄血流不尽。大禹治水便是这历史壮剧中的一幕，大禹正是把血汗撒遍黄河两岸、九州方圆的英雄之一。

大约在距今四千一百年左右，黄河中游的许多氏族部落为了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为了治服水患，联合成一个很大的部落联盟。由于这个部落联盟主要活动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南部，陕西东南部，占据了中原地区的大部，历史上称之为华夏部落联盟。联盟的领袖是陶唐氏部落酋长尧。

尧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想办法治服洪水。因为这次洪水特别大，而且延续的时间很长。滔滔的浊浪到处翻滚，咆哮着横冲直撞，田地、房屋、庄稼、牲畜统统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洪水逼着人们逃上高岗，山洞又成了人们的避难场所。在低地生活的人们，找不到避难所，只好在大树上搭起架子，筑起了巢，既像鸟又像鱼似的在水中生活。

在一次部落联盟会议上，尧郑重地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他说："浩浩荡荡的洪水，掀起了滔天巨浪，快把山顶淹没了，也给人们带来灭顶之灾，忧心如焚的百姓怎么生活下去呢？你们看由谁来治理洪水呢？"四岳，即尧的四位辅佐大臣、诸侯之长，说"鲧可以治理。"尧说："这个人很自负，容易把事情搞坏，让人不大放心，最好别用他。"四岳说："现在我们找不到比鲧更强的人，还是让他去吧。"尧说："既然你们这么说，就让鲧试试吧。"于是，按大家的意见作出决定，让鲧负责治理洪水。

鲧的父亲叫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叫黄帝，黄帝和颛顼都曾是部落联盟首领，而他们各自的儿子则为人臣。鲧是黄帝的后裔，他的祖先由西北戎人地区迁到伊水和洛水（今河南西部）定居。鲧为夏部落的酋长时，尧封他于崇（今河南登封崇山附近）为崇伯，赐姓姒，故称崇伯鲧。鲧生性桀骜不驯，恃才傲物，耿直倔强，因此与一些部落酋长处得关系不大好，被人指责，说他品德不好。但他在以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中，仍是重要成员之一。

鲧受命之后，采用"堕高堙庳"的办法治水，即从高处取土石把低的地方填高，也就是把水围起来，不让它随意横流。这个办法是传统的治水办法，从前共工曾经用过，结果大水冲破了包围圈，害了天下人。鲧认为共工失败的原因是围堵的范围太小，堤坝筑得也太低，因此没有能堵住洪水。鲧自己有信心，用这种办法能治住狂奔的洪水。

鲧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世本》上说："鲧作城郭。"填土筑堤，修墙围城是他的拿手好戏。古代围城时，先挖护城河，顺便用挖河的泥土筑成墙，这样一举两得，既防止洪水灌入城中，又有效地防御敌人侵人，鲧是按照这种思路治洪的。在他看来治水不过是把修筑城池的工程扩大，完全可以照搬过去的经验。他决心已定，几乎全力以赴，一干就是九年。

可是，这项工程太浩大了。尽管他在九年之中，付出了辛劳无数，在奔波中几乎丧命，结果并不妙。因为用筑坝围堤的办法，把洪水围住了，堵住了，当洪水的能量积累起来之后，一旦把堤坝冲毁，大水会以更加凶猛的力量狂奔，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尽管他在九年中修筑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堤坝，可是堵东西溃，围南北毁，始终未能把洪水治服。

正在这时年老的尧把君位让给了舜。舜异常聪明，他认定鲧如此治水绝不会成功。他的方法，或许使一方受益一时，却常使他方受害无数，实际起着分裂联盟的作用，甚至会危害君位。他以远大的政治眼光，果断地决定惩治四个危害联盟的坏人，这其中就包括鲧。舜把鲧流放到了羽山（今江苏赣榆西南），理由是他治水九年没有成效，违背了天帝的命令，危害了同族。后来又把鲧杀了。

鲧的失败，原因很多。主要是他的思想没有从根本上适应部落联盟的新形势，仍旧停留在部落时期的旧的思想模式中。昔日部落酋长可以任意行事，这造就了鲧的自傲性格。昔日部落占据的地盘有限，他可以凭借自己建筑工程师的特长，把自己的地盘围起来，让水从别人的土地上流过去，这样使他在部落间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而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大，地方千里，怎么能把这所有的土地都围住呢？部落时期，以邻为壑的思想，在部落联盟时期过时了，行不通了，这是鲧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鲧的特长是筑城，他把筑城的办法原封不动地用于治水，以为这是发挥特长，可以胜过别人，能够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事实恰恰相反，筑城与治水毕竟是两回事，昔日筑城的经验大大地限制了他在新的治水领域的思路。四岳举荐他，大约是看中了他的特长。由于不恰当地运用过去当部落酋长筑城的经验，这是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在新的拥有广大地域的部落联盟中要求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能力在领导治水中至关重要。鲧带着过去部落时期的挑战性格加入联盟，不善于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而新的联盟则要求大家互相配合、统一行动。鲧的这种治水方法显然无助于他与各方面协调关系，反而加重了分裂。尽管他个人辛辛苦苦，却得不到大家的同情、理解，在治水中也不容易与入配合工作，获得必要的支持。这是他的失败的又一原因。

总之，在新的部落联盟中，许多条件都变了，像治水这样的艰巨任务，对领导者的要求很高，必须从部落的小圈子跳出来；必须冲破长久以来形成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因而能协调各方而的关系，获得广泛的支持；他必须具有创造性才能够解决这样的大难题，因为没有现成经验供他借鉴。显然，鲧不具备这些条件，当时别人也不具备。历史正期待着新一代领导者出现。

在尧死后，新一代的最高领导人舜，正式成为华夏联盟的最高领袖。在一次重要的联盟会议上，舜问四岳："现在谁能够治理水患?"大家说："让伯禹担任司空，他准能完成这个任务。"禹是鲧的儿子，他听了不由地感叹起来。

禹接受了舜的任命。当时他还是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头脑中没有多少框子，正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年龄。他是在部落联盟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因而形成了与上代人不同的思想观念。舜能够把如此重任交给了他的政敌的儿子，也确实需要大智大勇。舜用人不避嫌的做法，后代史家称颂不已。

禹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古南部一带），后随父鲧迁居到嵩山下（今河南登封）。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史书又称为伯禹。他是黄帝的玄孙，帝颛顼的孙子。他因治水有功，遍载史乘，称之为大禹，意思是伟大的禹。

禹接受任命，向舜提出请求，邀请契、后稷、皋陶三位氏族

部落的酋长协助他管理治水的事。后来，禹又邀请益（伯益）参加治水。舜都欣然同意。他深知完成治水重任，决不能靠他单枪匹马，需要调动千军万马。他邀请的这些各方部落的酋长，不仅在联盟中任职，而且各有专长。契是后来商族的始祖，当时是掌管教化的司徒；后稷是后来周族的始祖，当时担任农官；皋陶是少昊氏的后代，担任狱官；益是后来秦国的祖先，当时担任掌管山林池泽的虞官。禹邀请这些人共同领导治水，确实是明智之举，这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动各地区的氏族部落参加治水，有助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禹对先父鲧治水未成身先死，辛苦无功反获罪，感到非常悲伤。但是，他没有把这悲伤化为怨恨，而是切切实实地总结鲧治水不成的教训。他敏锐地看到鲧治水方案的致命之处，不仅实际上行不通，而且思想方法有问题。他必须从实际调查水情做起，亲自去观察水的流向，测量流速，制定出自己的治水方案。他不把自己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连续几年到处考察，不仅了解水情，也了解人情；知道水的运动变化规律以及与地势的关系；制定出了"疏川导滞，鍾水丰物"的全新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变水害为水利。这是对鲧被动治水方案的一种超越，表现了新一代的新思想、新观念。他不但使像脱缰野马一样狂奔的洪水，通过疏通河川，开挖阻滞的堤坝，驯服地听从人的指挥，畅快地唱着欢歌流入大海，而且还利用池泽洼地把水蓄积起来，以备旱时之需，治水与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史书说禹"尽力乎沟洫"，就是开挖小沟，既能灌溉排水又改造了农田。所以，禹的方案是个全面地综合治理的方案。这个方案一方面使参加治水的部落直接受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部落联盟的作用。正是在与水患的英勇搏斗中，统一的华夏联盟壮大坚强起来，挽起来的民族臂膀在洪水的冲击下，日益坚韧。如果说鲧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工程师，那么禹不仅是

个脚踏实地的杰出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有政治灵魂的工程师。

在治水工地上，禹手持耒锸，干在最前头，十几年如一日。许多历史文献都记载了大禹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形象，说他小腿上的汗毛全都被粘泥粘掉了、磨光了。头上束发的簪子、帽子掉了都顾不上拾。面目黎黑，身体枯槁，步履蹒跚。在后世人的心目中，他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公而忘私、吃苦耐劳、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代表，他的高大形象鼓舞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禹十八岁就结婚了。在嵩山之下，颍水岸边，他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妻子出身名门，并身怀六甲。禹为治水大业，抛家捐妻。当妻子生了儿子还不到七天的时候，禹路过自己的家门，乡邻们看到他，兴奋地向他报喜，希望他回家看一看娇妻爱子。禹心里一阵激动，可他说，治水刚刚开始，实在没有功夫。乡亲们佩服禹这样的男子汉，但又希望他能给妻子一个安慰，就出主意，让禹给儿子取个名字。他说就叫启吧。启是欲言未言，禹的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之中；启是开，治水刚刚开始；启是开拓，治水需要开拓进取；启是冲破黑暗，光明就在前头；启是明达，他希望儿子将来能理解自己；启是行，是前进；启是跪，表明他为愧对妻子儿子而内疚。这样的名字，相信会使他的妻子获得慰藉的。过了五年，启已经五岁了。禹又一次路过家门，他多么想见一下朝思暮想的妻子和未曾见面的启啊！可他还是未入家门。启听乡邻说完这件事，竟然放声大哭起来。就这样，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永远感人至深的一段历史佳话。

禹在治水平土中善于团结各个部落酋长和他们的百姓。参加领导治水的契、后稷、皋陶和益，不但把各种事情管理得有条不紊，而且积极配合、主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禹的综合治水方案，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人才的才能。后稷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指导百姓在低洼地带种植水稻，千方百计地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在治水引洪蓄水的同时，发展种植业，开放山林池泽，鼓励百姓狩猎、畜牧，把多余的粮食调剂给最需要的人。契、后稷、皋陶和益都充分发挥了各自专长。这样治水见效快，参加治水的人也越来越多。治水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淮水流域，很快遍及大河上下，江淮两岸，掀起历史上根治水患的一个高潮。

史书上说禹不重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如此珍惜时间的大禹，用十三年的时间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被他勘察、治理过的山、水、池泽，《禹贡》都有详细记载。正是由于禹的勘察，中国有了第一部地理学专著。不过学者们认为，《禹贡》记载了从南到北众多的山水，禹只有十三年的时间，被他治理过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说禹的足迹遍祖国大地，这并不夸张。所以《左传》上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就是这个意思。

禹通过勘察，深深懂得要治水先治山，因为大小河川大多发源于山区。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禹的治水工程主要在黄河中下游。

疏通河道，导水入海是大禹治水的主要任务。被大禹治理过的河流，根据《禹贡》的记载，主要有：陕西境内的沣水、渭水，山西境内的汾水、漳水，河南的洛水、伊水、古济水，山东境内的灉水、沮水。

积水在低洼处自然地形成湖泽，禹利用它们蓄水、排水，这是禹的治水工程的一部分。

相传治水的一项壮举是开龙门。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陕西韩城县北。黄河自北南流至此，被峡谷阻遏，形成水患。禹将两岸峡石凿开，将峡口扩大，于是黄河水在这里畅流而下。在两岸峭壁之上，开凿山石，其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左传》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所属今地，古书记载虽有详略之别，但大体都可确定。冀州包括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河南黄河以北、山西全省和内蒙古中部。兖州，包括

今山东西北部、河北东南部、河南内黄和延津以东。青州，包括今山东北部、辽宁东部、朝鲜西部。徐州，包括山东南部，江苏、安徽两省北部。扬州，包括今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浙江、江西、湖北东部和广东北部。荆州，包括今湖北西南部、湖南全省、广西北部、四川和贵州两省东部以及云南北部。豫州，包括今河南大部、陕西和甘肃两省南部。雍州，包括今陕西北部、宁夏全部、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及青海大部。

禹时的九州只是九个大致的自然区，疆界不会十分明确。禹是顺着自然的山势、地势、水的流势，进行疏导治水的，结果河流山脉、池泽正好成了自然区划的界线。严格地说不是禹的足迹划为九州，是禹治理过、勘察过的山、水、池泽划定了九州，禹不过是把祖国的地势、山水的脉络摸清了，因此认清了中国的地理大势，因而能够划为九州。

禹划九州，不仅有了中国自然地理的最早区划，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地理的划分。史书上说禹治水之后，“界万国”。“万国”也称“万邦”，是分布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禹领导他们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治服了水患。人民纷纷从高山岩穴，迁回到平原、丘陵地带，过上安定的日子。过去水患和部落的分散性，使各个部落以邻为壑，争斗不已。或者由于干旱争水，彼此动武。如今旱能灌，涝能排，因此，昔日的仇敌，今日拱手施礼了。

《禹贡》还记载，禹平水土后，凭着他对各种情况的熟悉、掌握，把全国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规定每等每级向国家交纳贡赋的标准，还根据各州地域距离王城的远近，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以便布政施教，均衡负担。

滔滔洪水制服之后，为了表彰禹的丰功伟绩，舜召集华夏部落联盟的酋长们，为禹开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会上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给禹的奖品是玄圭。玄圭是用黑色的玉石琢磨成的

上尖下方的礼器，它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象征。受赐的人把它捧在手中，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

禹治水的功绩永远为后世传颂。他劳神苦形，珍阴惜时，为治水奔波了十几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左准绳、右规矩，在陆地上乘车，在水上乘船，在泥沼中乘橇，在山地乘樺，总之，任何艰难困苦都挡不住他。他总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孔子说："禹！我简直找不到非议他的地方。他吃得很差，穿得很朴素，住得很简陋，尽力平治水土，开沟洫，发展农耕，鼓励人民从事农耕。"东周时的周景王的臣子刘定公对赵孟说："因为有了禹的功劳，这里才这么美好，如果不是大禹治水，我们大家可能都变成鱼了。我和你今天能穿戴整齐地来治理百姓、面对诸侯，都是禹之力啊！你为什么不永久地继承禹的功绩，像他那样爱护人民呢？"禹带给世世代代炎黄子孙的精神力量不可估量。多少仁人志士以禹为榜样，前仆后继地为民族、为国家、为百姓流尽血汗。

治水成功以后，对各氏族部落都论功行赏，只有三苗未受赏。三苗是江淮一带的强大部落，尧舜时期与华夏部落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争夺战。由于禹的出现，三苗参加了治水工程，并表示愿意参加华夏部落联盟。三苗因未受赏而不服，大举反叛。禹准备用兵征伐，但舜制止说：我们自己德薄，反要用武力去征伐三苗，不是以德服人。舜大概觉得三苗这次反叛，是自己做事有欠缺。于是修教三年，执干戚舞。干是长武器，干戚舞是操练军队的一种方式。操练时，士兵一手拿兵器，一手拿着用羽毛装饰的盾牌，在音乐声中边舞边练。三苗得知舜先文后武，只好归服了。

禹在华夏部落联盟中威望很高。这时舜已经八十三岁了。他看到禹在治水中使联盟巩固、发展，不仅中原地区有更多的氏族部落加入联盟，东南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西北的羌戎集团中的许多氏族部落先后加入了华夏集团联盟。舜挑选了禹

做接班人。按照联盟的传统，如果联盟会议通过，四岳说“可”，舜就主动退位，禹便以摄政大臣的身份，执掌国政。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三苗因治水未受赏，对禹耿耿于怀，当舜推荐禹做华夏部落联盟领袖时，便起兵大举进攻。禹正想把联盟的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以便进一步巩固联盟的统一。

禹出兵前，在祖庙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先祭上天，后祭祖先，祈求他们保佑出战的将士取得胜利。祭祀之后，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禹手握玄圭登上讲坛，他首先谴责三苗自恃强大，在治水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刁难他，企图阻止他治水。他说：作乱的三苗昏庸糊涂，轻慢众人，不恭不敬，妄自尊大，败坏德义。小人横行，君子抬不起头来。百姓在他们那里受罪。老天为了惩罚他们，降下灾祸。现在我率领大家，讨伐有罪的三苗。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建立功勋。

誓师以后，禹率领五千人的主力部队出发南下，沿途联合了一些受三苗侵扰的民族、部落，直抵三苗的根据地——江汉流域。三苗前来抵御。禹的部队经过执干戚舞的严格训练，气势很盛。苗军大乱，纷纷四散。大部分向南逃，有的向北方、东方逃去。后来只有向南逃苗民得以保存，其他苗民有的沦为奴隶，有的被融合在其他民族之中。相传我国南方、广西、广东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苗族，其祖先就是三苗。

禹对三苗的这次征伐，使多年来一直同华夏集团对抗的南方民族瓦解。也震动了北方民族和东夷各部落，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归顺。史书上说，禹胜三苗，“四方归之，辟土以王。”说明华夏部落联盟在禹的努力下有了很大发展。

舜有禹这样强有力的接班人，自然可以安心退位了。他让出王位，按照传统，出外巡狩。这位昔日的领袖，今天可以在巡狩中散心、游乐。所以他带了两个妻子——娥皇、女英。当他们跨

过长江来到苍梧山下（今湖南宁远南部），年迈的舜，心有余而力不足，病死在苍梧。他的最后归宿是九嶷山，这里后来叫做零陵。后人把舜的死加以升华，变为一段感人至深的神话：

舜喜欢苍翠的山岭，而娥皇、女英更喜欢在湖水边嬉戏。于是，舜把她俩留在湘江岸边。当舜独上苍梧不久，竟传来了噩耗，这使娥皇、女英二妃极为震惊悲痛。她们由湘江边上直奔苍梧。湘江两岸长满了青翠的修竹，二妃不时地抚在竹子上恸哭，泪洒湘竹。她们的泪流干了，眼睛流出的是血，青竹上布满了斑斑血泪。从此，湘江边的竹子上，布满了泪痕一样的斑痕，再也抹不掉，人们称之为“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可见娥皇、女英一定是哭得泪人一般，才为我们留下了“湘妃竹”。娥皇、女英太伤心了，共同跳入她们热爱的湘江之中。后人为了纪念舜和娥皇、女英，在九嶷山修建了舜庙，在湘江边修建了二妃庙，叫做黄陵庙。被娥皇、女英血泪染成的斑竹世世代代在那里生长。

舜死后，禹为他举行了祭奠，办理丧事，守孝三年。他按照传统，表示让位给舜的儿子商均。但是，大禹治水后，是他领导大家把社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他想遵从传统已经办不到了。他虽然可以把君位让给商均，但是天下的氏族、部落酋长们都不去朝见商均，而去朝见禹，因为禹才是天下人心所向的领袖人物。大家坚决拥护禹，禹只好继续带领大家向前走。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夏，姓姒氏。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诞生了。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之间。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五帝本纪》

《尚书》：《尧典》、《禹贡》。

夏朝创立与太康失国

夏王朝以华夏部落联盟为基础，统治地区由原来的中原地区扩大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改变了昔日小邦林立，面对巨大的天灾无可奈何，而部落间的矛盾斗争却又使人祸迭起的局面。

禹非常注重联盟的巩固和统一，注意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各种关系。他首先封尧的儿子丹朱于唐（今山西翼城西）；封舜的儿子商均于虞（今河南虞城西北），划定了他们奉先祀、安百姓的疆土。禹封皋陶的后人于英（即春秋时的蓼国，在今河南固始东北）和六（今安徽六安境内），又封了与夏同姓的姒姓氏族、部落和与他们联姻的部落的酋长们：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以及联盟内的其他氏族、部落的酋长为诸侯。这样夏王朝便有了雄厚而又稳固广大的政治基础。禹这次分封意义非常重大，第一，对于华夏族民族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民族意识在以后夷夏斗争中，常常形成民族的凝聚力；第二，正是有了这次分封奠定的政治基础，才使禹的后裔有了江山失而复得的可能，这次受封的诸侯，在后来夏朝政治动乱中，经常汇聚在禹的后裔的旗帜之下。禹这位夏朝的奠基者与设计师的政治眼光实在太远大了。也正因为这次分封的意义，在以后夏朝发展的历史中一再体现出来，所以后世开国帝王，新王朝的奠基人经常仿效夏禹的做法。

大禹深知要把一个统一的王朝建设好，需要干的事情很多。他

像当年治水一样，不停地到各地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以便设计出最佳治国方案。安抚了华夏各个部落之后，他立即到东南各地去巡狩。当走到当涂山（今安徽蚌埠西，淮河东岸）便停了下来，各方诸侯按照事先的约定前来当涂山相会。这是禹即位后第一次盛大的聚会。各路诸侯络绎不绝、纷纷相约前来。当涂山热闹非凡。诸侯们带来当地的土特产品作为朝觐的贺礼，带给这位即位的新君。史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会的开幕式上，举行隆重的祭天祀土仪式，表明禹受命于天，从此掌管天下。威武雄壮的大夏乐奏起来了，气势恢宏的干戚舞登场了。远道而来的诸侯、方伯看到了如此庄严肃穆、气势宏大、威震八方的场面，都对禹崇敬无比；对中原礼仪、文化赞不绝口；同声称颂禹功德无量，表示岁岁称臣，年年纳贡。禹这位新一代领导人从来就不是靠武力打天下，而是凭借治水成功赢得人心。这次他充分显示了威仪，达到了政治目的，也传播了中原文化。既然大家对他推崇备至，他对大家更是竭诚相待。对未有封号的氏族、部落酋长们，加封他们为诸侯、方伯。会议期间，他和各路诸侯、方伯商定每年向夏王朝进纳贡赋的种类、数量。最后由他当众宣布了规定的贡赋。方伯、诸侯们表示遵从天子之命，不起二心。

涂山大会是禹这位新一代领导人、华夏民族的伟大领袖的创造。昔日他平治水土，发展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名满天下，收到人心思归的效果。涂山大会上他充分展示了高超的中原文化，使各地诸侯心悦诚服，吸引他们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以先进文化作为统一各氏族部落的基础，从此有了华夷之别。在新的时代形成一股强大的华夏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禹的文化创造力，最早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放射出异彩。

涂山大会之后，禹把各地诸侯、方伯进献的金属，铸成了九尊鼎，象征着天下九州归于一统，万国家邦心向夏后。鼎是由三鬲来支撑的，象征着天下要由三德来支撑。面对禹铸的九鼎，该

让后来人想些什么呢？可以说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超越禹的丰功伟绩，禹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面旗帜。从这个意义上说，禹铸九鼎仍然是对今天乃至未来的华夏子孙的挑战。

涂山大会之后数年，禹再次外出巡狩。当时地处江淮流域的东南地区分布着古夷的许多氏族、部落。主要有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合称为东夷。当时东夷比起中原地区各部落来，在文化、礼教方面比较落后。禹这次出巡东南地区，主要是为了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礼教，加强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后世所称“禹东教乎九夷”。

禹这次东南巡狩是水陆并行，在江中乘船，在陆上乘车，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四千年前的祖国东南地区，荆棘遍野，沼泽漫流，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根本无路可行。禹为了促进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扬了平治水土时那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率领夏朝的军队和文武官员，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一次禹乘船在江中行驶，浩浩荡荡的船队，惊起水中的游鱼、岸边的野兽，因为它们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起的鱼群跃出水面，有的竟跳到了禹的船上。两条金色的大鱼，尾随着禹的船，掀起巨大的浪花。船在急流巨浪中颠簸，许多人惊慌失措，认为是龙来翻船，但是禹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他说：“我认定该干的事，就竭尽全力，连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还怕龙来翻船吗？”禹在危险时刻的镇定与威严，给大家以极大的鼓励，他那超人的精神力量又一次感染了大家。一会儿鱼潜浪平，船继续在急流中前进。

到东夷地界，禹便弃船登陆，沿途向耆老询问习俗，传播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鼓励夷民勤于农耕，告诉他们播种五谷，不误农时，教导夷人酋长们讲礼仪，知法度，不要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大家和睦相处，不要相互残杀。宣布若不听从教化，夏王朝定要前来征讨。夷人的氏族、部落无不感激禹的德教。

禹从那里进入越地（今浙江境内），传谕各地诸侯、方伯第二年春天，前来茅山相会。到了规定的日期，大家如约前来。禹对各地方伯、诸侯从来一律以礼相待，凡有功者一律封赏。觐见之后，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祭告天地和祖先。祭祀之后，宣告涂山大会后各个诸侯的贡献，按其贡献大小加封号行赏赐。在盛大的庆功会上又演奏了中原乐舞。

在对诸侯、方伯论功行赏后，禹断然对防风氏处以极刑。

防风氏的族居地就在距茅山不远的地方。他是古越人部落的酋长，曾表示臣服于夏。防风氏生得高大健壮，常自恃其勇力欺凌弱小部落。他在越人各部落中也算是一个有势力的酋长。他本来可以在血与火的拼杀中建国称王，可惜他生不逢时，由于禹的出现夏朝的统治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了。正当他蠢蠢欲动，得知比他强大得多的三苗都已经被禹打得大败，只好到涂山参加大会。他在那里接受禹的封号，成为夏朝的诸侯。他表面上愿意听从禹的教化、服从禹的号令，可内心总想独霸一方，满脑子部落间混战时那种以勇力取胜的观念，对于禹以礼仪教化建立统治秩序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当禹到达茅山，他本应先去觐见，可他不但没有提前到达，反而姗姗来迟，而且态度十分傲慢。他的所作所为，禹早有耳闻，禹断然命令将他杀了并暴尸三日，作为警告各地诸侯、方伯的靶子。让大家明白天子的权威不可侵犯，一旦为政令不容，防风氏的今天就是大家的明天。大家都表示防风氏该杀。

禹这次开杀戒，说明他的权利超过昔日部落联盟的首领，开始行使专制王权。尧舜致力于恢复的民主传统被大大地降低了。表明他要用软的和硬的两手建立夏朝的统治秩序。

当防风氏被杀的消息传到各地，一些未去参加茅山大会的氏族、部落纷纷向夏王朝进贡称臣。

禹这次东南之行传播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对建立夏朝的统治秩序、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他自己心力交瘁，

病死于会稽。群臣根据禹生前安排，只用衣衿三领、薄棺三寸把他装殓，葬于茅山之上。史载，“禹立四十五年”，从二十岁为民平治水土，用了十三年时间，在艰苦奋斗中度过了青春年华，以后虽登临帝位，执政四十五年，却仍然勤劳节俭，直到病逝时，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他身上集中了我们民族先贤的许多优秀品质，永远为后人敬仰。

禹死后，氏族社会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世界彻底地结束了。从此天子不再是辛苦操劳受苦的角色。被禹名义上指定为继承人的益，按照部落联盟的传统，主持了禹的葬礼，挂孝、守孝三年。益虽然聪明机智有才德，但不孚众望，也无力对抗夏后氏的强大势力，经过一番激烈的权力斗争，益被启杀害了，禹的儿子启登上了帝位，国都建在阳翟（今河南禹县）。

尽管启登上夏王朝的宝座，但是他要巩固世袭王权、建立君主专制制度，让那些源于不同氏族的诸侯、方伯完全听他的指挥，还要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首先向他发难的是姒姓诸侯有扈氏。

有扈氏族居在夏族中心，他们的活动中心在今陕西户县一带。活动范围很大。早在舜、禹时期，有扈氏就已经逐步向东发展。而以禹为首的华夏联盟自然不能容忍。为遏止有扈氏发展其势力，阻止其地盘的扩大，禹曾连续向有扈氏进攻，用兵不止。经过三次大的战役，虽然有效地阻止了有扈氏向东发展，但有扈氏仍不归顺。禹这时改变了对有扈氏的态度，修教一年，停止对有扈氏用兵，对有扈氏展开德教的强大攻势；同时，努力治兵，准备以更大的兵力投入这场战争。禹对他们文武并用，竭尽全力，才使有扈氏表示臣服了，加入了华夏联盟。启继承了王位，有扈氏觉得发展本氏族的时机到了，第一个向启的王权挑战。

启带领六路大军，来到甘地，这里已经是有扈氏国都的南部。在双方展开决战之前，启在甘地举行了盛大的誓师会。他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要向你们宣布有扈氏的罪行：他们轻慢金、

木、水、火、土五行，也就是侮辱上天。违背治国的根本大法，废弃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因此上天要断绝他的国运，我们大家奉行天命，同心协力地剿灭他们。左翼的兵士如果不奋力杀死左边的敌人，右翼的兵士如果不奋力杀死右边的敌人，驾车的兵士如果不能使马左右进退适当，也就是没有很好地遵奉我的命令。执行命令好的，我就在先祖的牌位前赏赐你们；不服从命令的，我就在社神的牌位前惩罚你们，降为奴隶，杀掉你们！”

誓师之后，启率领六军兵将和有扈氏大战。因夏王朝的军队是禹训练的军队，经历过许多的战役，而有扈氏毕竟是一个氏族，力量相差很大。有扈氏的兵将非常顽强，但最后还是被打得大败，启攻人有扈氏的都城，杀掉了他们的首领。这场战争虽然夏朝取得了胜利，但胜利来之不易，打得异常惨烈，成为我国古史上的著名战役——甘之战。

消灭了有扈氏以后，各地的诸侯、方伯纷纷向启进贡、朝贺。夏代的血缘部落有：有穷氏、伯明氏、斟灌氏、斟寻氏、有鬲氏、豢龙氏、御龙氏、昆吾氏、有仍氏、有虞氏等等。这些血缘部落历经夏代四百多年才逐步地发生根本性变革。有些直到周代，其血缘世系仍清晰可寻。夏代的王权为血缘部落最终被消灭创造了条件，而启把实现这一根本性变革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自己为巩固王权则必须得到这些血缘部落、氏族的承认。他坚决地消灭了有扈氏，只是为同巨大的传统势力达成妥协创造了条件，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巨大的保守势力的影响。他至少要得到昔日部落联盟首领们的承认。于是“启有钧台之享”。

钧台，在夏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县），也就是在启的祖宗根本之地。通过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向部落首领们灌输大家都要遵从上天的命意，大家拥有共同的祖宗，因此都必须听从天子的指挥的观念。通过举行庄严肃穆的盟誓活动，让诸侯、方伯、部落酋长们忠于天子。启宣布奖惩法规，使他们敬畏天子、服从

天子。通过钧台之享，为自己获得王权披上合法的外衣，为新的专制王权涂抹上传统的民主制度的油彩，也确立了特权阶层的人名单。特权阶层的大联合使夏王朝获得了必要的政治基础。钧台之享，使传统势力向新生的王权妥协，巩固了启的新生王权。钧台之享与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相提并论，可见其意义非常重大。

钧台之享与涂山大会目的一样，但形式与内容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把禹和启区别开来。当年禹在位时，一个叫仪狄的小臣，用米造出了一种醇香甘美的酒，进献给禹。禹喝过之后，觉得虽香甜可口，却又使人四肢无力，昏昏欲睡。他告诫群臣：不能喝酒，并且预言：后世一定会有喝酒误事而亡国的国君。在钧台之享上，启带头破坏了禹的禁酒令。他在接受了诸侯、方伯们的朝见和进献礼物时，举行祭祀活动，设酒食大宴群臣，名之曰"享礼"。大吃各种山珍海味，大喝各类香甜的美酒。用酒助兴，用酒来拉关系，大概启为中国第一人。当然也说明当时粮食充足，有余粮用于酿酒来款待诸侯。

启还用当时非常贵重的金属——青铜，制成了青铜鼎、彝尊等器皿来盛肉和装酒，来显示天子的富有和豪华。从此列鼎而食就成了贵族们的排场，直到汉代富人们仍以列鼎而食来显气派。至于陶、竹、木等精致的器皿那就更让人眼花缭乱了。饮宴过程中，还用乐舞助兴，鸣钟佐食。

启喜欢音乐歌舞，幸臣们知道后，便在民间采访到一些新颖的歌舞，取名为九辩、九歌和九韶，说是从天上神仙那里学来的。在钧台大会诸侯时，启特意让人表演了这些歌舞。启的这些歌舞是供贵族们享乐的，它与禹在涂山大会、茅山大会上的乐舞不同，缺少乐舞恢宏的气势；作用也不同：禹用乐舞行教化、传播中原华夏文化；启用乐舞自娱娱人。

启在钧台上眉飞色舞，非常得意，而他的弟弟武观看着非常

不舒服。给钧台之享罩上了一层阴影。

禹的幼子武观，封于观（今河南浚县和淇县一带）。这次他以诸侯的身份来到钧台大会。本来是平等的兄弟，而启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天子，武观不仅不能和他称兄道弟，还要随班朝贺，他觉得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于是口出怨言，在朝贺、祭祀、宴乐的礼仪上马虎从事，草率应付。尤其是武观看到启一改禹在世时的勤劳、节俭、朴实的作风，大肆铺张，纵情享乐，觉得父亲功劳盖世，却一点也没享乐过，而启只凭和诸侯们拉拉扯扯，登上了天子的宝座，却丝毫不想像父亲那样赢得人们的尊敬。启和武观同样是禹的儿子，两相比较，武观的心理一下子失去平衡。启在钧台大会上没正眼瞧武观一眼，但他感到武观不服从他管教，于是会后把禹王的这位小儿子武观流放到西河。西河因在黄河的西岸而得名，在今河南滑县和浚县一带。武观被放逐到西河，更加不平，决心和启彻底决裂，就蓄积力量，三年之后在西河拥兵自守，宣布背叛启。这对启的专制王权是个很大的威胁，启就命令彭国（今江苏徐州）的方伯名叫寿的率军前去征伐武观。

相传彭伯寿是尧时所封于彭的彭祖之后，当时是大彭氏的酋长，自禹时就是坐镇东方彭地的一个方伯。按其年纪、辈分来说，也是武观的长辈。选择这位长者去征讨武观，也使武观有点为难。当彭伯寿率兵跨过黄河，到达西河，武观虽以兵抵抗，一方面兵力有限，另一方面也不好与这位长者拼死决战，只好投降认罪。彭伯寿自然不肯杀死武观，觉得这是家庭内部纠纷，就把武观带到都城，交给启，让武观赔罪。但是启对武观极不放心，最后他没有放过武观，杀了他。这是启用专制王权镇压反叛的又一件大事。

武观反叛是对专制王权挑战的又一种势力，也反映出世袭王权继承上的又一方面的问题：同是禹王的儿子，继承者为什么是启而不是武观？尤其是禹在表面上并没有让启来继承。看来王权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伴随一种罪恶，启也是犯下这种罪恶的第

一人。

启在巩固了王权之后，“淫逸康乐”。时而带领大臣小臣去野外狩猎野食；时而在宫廷中列鼎而食；时而“万舞翼翼”；时而把石磬敲得铿铿作响；时而高举彝尊狂饮；时而狂奔于野，王宫越来越富丽高大，衣饰也越来越讲究，诸侯贡献的方物越来越多。但过多享乐并没有给启带来多大的好处，生活不节制，没几年他就得病死了。

启死后，由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为夏王。相传太康即位后，将国都迁到斟寻(今河南巩县)。据考古工作者在巩县稍柴进行试掘，结果发现与偃师二里头文化相似的文化堆积，这个文化遗址的面积很大。整个夏代文化目前仍有许多谜，其历史记载大多为后人所作，不甚清楚。而考古发掘又不像商周考古那么确定无疑，但考古界、史学界都为揭开夏代文化之谜而孜孜以求。

夏代的第一代禹，一生为民，劳形苦神，艰苦奋斗，领导人民建功立业，才有了夏朝；第二代启，为了巩固统治大开杀戒，为巩固王权不懈地斗争，苦心经营，竭尽全力笼络各地诸侯，推动新生王权的发展，使人们逐步建立起王权观念。第三代太康，很顺利地继承了王权，没有人向他挑战，他没有多少忧患意识，也不去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也没有多少朝政可管，他大概已经不知道还有国家大事可管。他坐在父祖的基业上安然地享受，整天去打猎游玩。这位天子，从国都出发，一直跨过洛水以南，而且越走越远，玩了几个月仍不想回去。史载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应当说是比较客气的。

本来夏朝的王权是建立在诸侯、方伯支持基础上的，太康只知盘游，不恤民事，引起人民的怨恨，诸侯、方伯开始离心。地处黄河以北有穷氏的方伯后羿一直等待时机，太康这次去洛水打猎，长时间不返国，无疑给后羿造成推翻他的借口和时机。

当时有穷氏是聚居在今河南东北部的一个方国。在英雄时代，

这个部落把自己的祖先神化。说尧的时候，天上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地上大旱，凶猛的毒蛇猛兽兴妖作怪，残害生灵。这时，天帝赐弓箭给羿，让他到民间除害。羿来到人间后，施展出全部神异的本领，把十个太阳射死九个，又射杀了那些毒蛇猛兽，使天下的人民重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后来，他又到西王母那里求来了“不死药”，却被他的妻子嫦娥偷吃了。吃了“不死药”的嫦娥，一人奔向了月宫。这位被神化的氏族领袖羿，是东夷人，是狩猎游牧部落首领，由于在弓箭上有了重大发明，因而在征战中取胜，使部落获得很大的发展；同时，由于此项发明，提高了部落狩猎游牧的生产力，使部落的人民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尧时羿是东夷各部落中较大部落的一个酋长；在禹时受封在鉏（今河南濮阳西南）。羿在东夷各部落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有的古书上称羿为“夷羿”。到少康时代的羿，不仅因祖宗被神化而备受夷人尊崇，而且因受祖传射箭技术，箭法精湛。他本人的确可称得上是位英雄。由于夷人是以渔猎畜牧为主，与夏族的农耕文化不同，王权观念淡薄，头脑中拥有的是崇拜勇力的观念。由于夏启在甘之战中，消灭了有扈氏，使他不敢妄动。钧台大会上，看到启受父亲的蔽荫，号令万邦，享有天下，而不是凭自己的勇力征服天下，心里很是不服，因绝大多数诸侯都拥戴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太康继位，他看到昏惯无能游猎无度的夏王，使人民怨恨，诸侯、方伯离心离德，乘太康渡洛水而畅游的机会，拥兵占据夏都，以重兵把守洛水北岸拒绝太康返国。这是历史上以夷乱夏的开始，是第一次以夷代夏。其实质是夏文化与夷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是新的王权与昔日英雄时代的部落酋长的冲突。根本原因是农耕文化的发展抑制了游牧文化，王权的建立抑制了血缘部落和酋长的权利。这也是旧时代的英雄们的一次反扑。

当昏愦的太康在洛水之南打猎尽兴归来时，一场灾难正在洛水边上等着他，他已经失掉了国家，他再也不能北渡洛水还朝了。

只得率领打猎的少数兵员，流落到洛水南岸，同时派人向各方诸侯求救兵。失掉王权的太康，哪里还能有诸侯、方伯听从他的指挥呢？无可奈何的太康，只得向东流落。最后找了个地方，修筑了一座城住了下来。此城后被名为太康，秦汉时期名之为阳夏，即今河南的太康县。失国不得归的太康，在那里住了约十年，因病而死。人们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使大禹建立了夏朝，安乐使太康失掉了王权。

后羿这位夷人的首领，占据了太康的王位，并没有强令推行夷人的那一套，而是把国都从钼迁于穷石。穷石在今河南孟县（或说在今河南巩县）。在政治上，“因夏民以代夏政”。这说明夏文化高于夷文化，王权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后羿无法改变这些，也只能顺应潮流，用夏代政令治理国家。但后羿无法解决夷夏矛盾，也无法消除仍然存在的血缘部落。这些曾经是使后羿取胜的因素，在他取胜之后，又成了向他挑战，并导致他失败的因素。夏族自大禹以来，在各地诸侯、方伯中威望很高，夏族也不会甘于听从夷人酋长的统治。王权的观念已经形成，夏族需要的是一位比太康好些的夏族自己的帝王。所以，后羿也不会完全得到夏族方伯、诸侯的真心拥护。

太康被拒于洛水之南，久久地不得归国，最痛苦的是他的母亲，这位母亲领着太康的弟弟们，痛苦地站在洛水北岸，望眼欲穿，等待着太康的归来。当他们得知太康向东流亡，强大的夏朝，王权仅传三代便失去了，实在难以接受这种现实。滚滚流淌的洛水，竟这样地为夏朝划开一条线。面对此情此景，他们怨恨太康，想起大禹的告诫，真是追悔莫及。他们面对洛水进行反思，将痛悔化作诗篇，这就是留传下来的《五子之歌》。在歌中，太康的五个弟弟表达了对太康的怨恨，回忆诉说着大禹的告诫：

其一说：我们伟大的祖先大禹留下了遗训：老百姓只能够被亲近，不能够认为他们卑贱。只有百姓才是立国的根本，百姓这

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在我看来，天下的愚夫愚妇个个都能胜过我，因此格外小心谨慎。当一个人多次误事，别人的怨恨难道还用明说吗？不要等别人的图谋已经显露，你才知道加小心。我面对亿万民众，畏惧的心情就好像用腐朽的绳索去驾驭六匹马拉的战车。地位凌驾于百姓之上，怎么敢不敬畏他们呢？

其二说：伟大的祖先大禹有这样的训诫：在王宫之内，迷恋女色，荒废政事；在都城外，沉迷于游猎，不理民事；纵情狂饮不知节制，嗜好歌舞宴乐不知满足；住着高大的屋宇，还要雕梁饰彩。以上这几项只要占了一样，就没有什么人不亡国的。

其三说：只有我们的先祖陶唐氏，占据了冀州这块最富饶的地方。可是如今太康丧失了先祖的治道，乱了先祖确立的纲纪，才招致灭亡。

其四说：今天我们把圣明的祖先大禹的遗训，明示天下及各诸侯的首领。这是他治国的典章，统民的法则。他把这宝贵的遗产留给了后世子孙。要是一味想获得好东西，却忘了祖宗遗训，这样王府是很富足，却荒废丧失了前人留下的伟大事业，使宗族覆灭，断绝了祭祀的香火。

其五说：唉！我们归向何方？我们怀有无限的悲伤，普天下的人、所有的诸侯都仇视我们，还有谁能够依靠呢？我们内心抑郁忧伤，脸面羞愧得不知往哪放。平时不谨慎修德，现在即使想改悔，难道还来得及吗？

近代有学者认为，《五子之歌》是伪托的，不是原文，原文已佚，有学者认为五子就是武观。其实，它真实地反映出大禹后世子孙对太康失国的反思。

当然《五子之歌》历经千年传唱，有些词句有了改动，这也是很正常的。无论如何它是一篇历史反思的佳作，感人至深的抒情诗，传播大禹思想的优秀作品。并无多少失实之处。

夏朝三世而亡，留给人们许多值得深思的启示。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夏本纪》

《尚书》：《甘誓》、《五子之歌》。

少康中兴

如果把太康失国仅仅归结为盘游无度，不恤民事，这似乎把这一历史事件简单化了。太康盘游无度，不过是引发这一事件的表面原因。

第一，太康引发了传子制与传贤制的长期斗争。传子制是王权观念兴起以后创立的政治制度，传贤制是传统观念与新的时代相结合的产物，这两种制度在夏代初期、中期都有其适应性。夏代初、中期的政治斗争，集中表现为传子制与传贤制的斗争，并且这两种制度都有其遵奉者，由此引发的斗争，使太康之后的王权像走马灯似地轮番更迭，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后边叙述的历史事件，主要反映了这场长期复杂的斗争历史。最后传子制代替了传贤制，而传子制也必须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适当地妥协。

第二，太康引发了夷夏两族的斗争。在禹当政期间，夷人已经使他深感不安，所以他在生命之火将熄时，仍历经艰辛到夷人中间巡狩，向防风氏开刀。太康给夷人的反扑造成了机会。后羿之所以能够“因夏民以代夏政”，在夏民的拥护下主持夏朝政事，很重要原因是利用了人民希望有一位贤君，或者说是沾了传贤制的光。因此，从传贤制的角度说，太康无德就应该被有德者取代，因此后羿才能够被承认。后羿也沾了夷夏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的光，这使长期的夷夏斗争淡化了，而后羿代夏，无疑促进了这种文化上的交融。从考古发掘来看，分布于今山东、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可能是古夷人的文化遗存。从出土器物来

看，夷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低，他们制造的各种手工艺品，有的十分精美，技术水平很高，说明它们有与夏文化抗衡的实力。从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延续的时间上推断，夷人是长期生活在那里的古老民族。考古发掘还向我们表明夷夏文化在后期的联系加强，关系逐步密切起来。这种密切的关系应在后羿乱夏之后，达到了高峰。

所以夷夏斗争、传子制与传贤制的斗争是我们理解下面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关键。夷夏斗争、传子制与传贤制的斗争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夏代初、中期历史发展的特点。

后羿取代了无德的太康，而他自己也不是贤明君主，只是个自恃勇力的武夫。相传后羿身边有四个很有才干的人，叫武罗、伯姻、熊髡、尨圉，是辅佐后羿夺取夏王朝政权的功臣。他们劝谏后羿要关心民事，吸取太康失国的教训，可惜后羿对此兴趣不大，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发挥他善射的本领，整天沉溺在获取野兽的游玩之中。而这四位有才德的功臣，反复劝谏他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不要终日沉溺于打猎游玩，久而久之，后羿不再理会他们四人说了些什么，逐渐地疏远他们了。这给了小人、佞幸亲近后羿的机会，寒浞就是其中的一个。

寒浞，因地名以为姓。寒在今山东省潍县东北，原是东夷一个氏族的族居地。寒氏在禹时臣服于夏朝，被封作方国。当时方伯叫伯明。由于寒浞是个奸诈小人，伯明十分厌恶他，把寒浞从寒国驱逐出来。寒浞流浪到有穷国，为后羿收养。凡小人都有取悦献媚的本领。他把后羿这位武夫哄得非常高兴，极力吹捧后羿善射的本领，使后羿相信自己勇力无敌，天下非他莫属。于是，后羿抛弃了四位贤臣，任用寒浞为辅佐大臣，对他言听计从。他为后羿出了不少吃喝玩乐的主意。本来对政事不擅长也无兴趣的后羿，将大权放心地交给了寒浞，寒浞利用手中的权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贿赂诸侯，愚弄人民，让后羿尽量玩乐游猎，使国家内

外完全听从寒浞的指挥。他甚至利用后羿外出的机会，长期与后羿的妻妾厮混，暗中勾搭，而勇力天下无敌的后羿，对此毫无察觉，甚至连后羿身边的家将逢蒙都被寒浞买通了。

逢蒙开始时是向后羿学习射箭的学生，由于他善于取悦后羿，后羿把他那天下无敌的射箭技术全部教给了逢蒙，他把逢蒙当作身边随从、最得意的学生。寒浞却收买了逢蒙，对他说，天下人都知道后羿射箭的本领天下第一，而逢蒙是后羿最好的学生，如果逢蒙把后羿射死，那么，逢蒙就成了天下第一射手了，也就像后羿那样天下无敌了。逢蒙果然听从了寒浞的话，在一次打猎中，乘后羿玩得正高兴，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射死了后羿。后羿体格强健，家将们还把他的肉煮了，强迫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父亲的肉，也被杀死在城门。就这样，寒浞夺取了后羿的大政，霸占了后羿的妻妾、财产，自称有穹国王。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得知太康的弟弟们对太康也不满意，纷纷谴责太康无德，所以对太康的弟弟们并未加以限制，对夏朝的贵族、臣僚也加以笼络，任用他们，请他们到新政权中供职，以安抚夏族百姓。太康的弟弟仲康，见哥哥久而不归，担负起领导夏王族的责任，在部分贵族、臣僚的保护下，在斟寻氏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小朝廷。在后羿看来那也不过是个小小的氏族部落，根本不放在眼里。

仲康不到二十岁就死了。在斟寻的夏族小朝廷仍坚持夏朝的传子制，仲康的幼子，名叫相继位为王。相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小君主。但有了这位小君主，也就打起了夏朝的旗帜，并且一些拥护夏朝的人不断地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其势力也有所发展。这必将引起后羿和寒浞的注意。在后羿武力的逼迫下，相的夏王室，迁居到帝丘（今河南濮阳）。在帝丘，相得到了同姓的斟寻氏两个诸侯的帮助。

斟灌氏和斟寻氏是夏王朝封的两个姒姓诸侯国。斟灌氏的封

国在今山东寿光，斟寻氏封在太康建都的地方（今河南巩县）。后羿代夏后，斟寻氏也被迫迁去与斟灌氏为邻（今山东潍县）。相本来微不足道，但后羿毕竟是夷人，并且后羿也越来越不得人心，斟灌氏和斟寻氏扶助夏朝后代的做法，影响了一些原来忠实于夏王朝的诸侯和方国，他们都对相的小朝廷表示拥护，这些人的王权观念，及其势力的发展使得寒浞的精神紧张。事实上正是寒浞自己把这些人推向了相的小朝廷。相自从迁到帝丘以后，在斟灌、斟寻两个诸侯的协助下，开始扩充实力，准备消灭寒浞，夺回失去的江山。

相在帝丘的实力扩充，尤其是斟灌、斟寻二国与夷人相邻，首先和夷人产生了磨擦。这些夷人在禹建国之前，分散于东部地区，夏王朝建立后，先后表示对夏臣服。但是由于太康失德，加深了与夷人的矛盾，夷人开始反叛，并导致后羿代夏历史事件的发生。复夏的活动，此时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夏相在帝丘先后征伐过淮夷、风夷及黄夷。

淮是夷族居在淮河流域的一个较大的部落。风夷和黄夷都是族居在现在山东和江苏北部。由于斟灌、斟寻的联合，武力较强，征夷战争取得了胜利。之后，有的夷人部落又恢复了对夏朝的臣服。后相七年，有个叫于夷的部落来向相的夏朝致礼朝贺，表示臣服。于夷在商代被称为盂方，其族居地在今河南睢县一带。

相在东夷的活动引起了寒浞的恐惧。他让相及有鬲的夏部落东迁，本来是想让夷人制约他们，现在相居然取得胜利，如此发展下去，显然是寒浞所不能容忍的。

寒浞在霸占了后羿的妻妾之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取名叫浇（傲），次子取名叫豷（意），长大后皆勇力过人。这无疑使寒浞的力量壮大了。他把大儿子浇封在过（今山东掖县北），小儿子豷封在戈（今河南杞县与太康一带）。这样扩大了有穷国的势力。寒浞更加有恃无恐，充分发挥其诈伪的本领，欺骗百姓，而不是

真正对百姓施以恩德。

当相刚刚在对东夷的征伐中取得胜利，寒浞就命令他的大儿子浇率领军队去消灭斟灌氏。第二年浇又师伐斟寻氏。斟寻氏凭借潍水之险与浇大战。结果被浇弄翻了船，战败了。浇灭了斟灌氏和斟寻氏，挥师直抵帝丘。这时的相，因“二斟”先后被灭，势孤力单，被浇杀死。这样，相结束了在帝丘二十多年的复夏活动。

相被灭掉，寒浞的有穹国势力大增，他愈加骄横，这使夏族的各方诸侯、百姓愈加不能忍受，恢复夏王朝的势力化为一股潜流。有个叫伯靡的夏朝贵族，他在后羿代夏后，留下来侍奉后羿，做有穹国的臣僚。见后羿被杀，寒浞篡国，伯靡弃官逃走，逃到一个叫有鬲的诸侯国（居地在今山东德州北），依附于有鬲氏。当相被迫迁于帝丘后，伯靡在有鬲氏的帮助下，也为消灭寒浞，恢复夏族的统治而积蓄力量。

当寒浞之子浇杀相时，相的妃子后缗已怀孕在身，后缗从城墙的一个洞中逃了出来。后缗直奔娘家有仍氏族居地（今山东济宁），不久便生了个儿子，这个相的遗腹子取名叫少康。有仍氏本来就是夏朝的诸侯，因此对夏后氏遗孤少康格外重视，有仍氏让他做了牧正，也就是主管畜牧的官。当少康得知自己的身世对寒浞和浇仇恨满胸膛，决心报仇雪恨。

少康在有仍当牧正的事，不知怎么被浇得知了。浇派了一个叫椒的人，到有仍寻找少康。而少康提前知道了消息，就从有仍逃到有虞氏的族居地（今河南虞城）。当时，有虞的诸侯叫虞思。有虞氏世代与夏后氏亲善，虞思见到夏后氏的这位历经磨难的后代，热情接纳。让少康做了有虞国的庖正，也就是掌管膳食的官。让少康从事内务，是为了少让他抛头露面，以免浇来杀他。虞思很喜欢少康，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纶（今河南虞城东）分给少康。这样少康有了一块十里见方的土地，有五百人供其使用。有了站脚之地后，他开始为准备复国积极活动。他广泛布恩施德，树

立贤德的声名，多方联络夏王朝的臣僚，安抚夏族百姓，收集夏王朝各方人才。派了自己身边的一个名叫女艾的人去打探情况。还曾经派了自己的儿子季杼（有的史书上称作予或伯杼）到戈城去诱惑。

与此同时，依附于有鬲氏的伯靡也在积极准备。伯靡得知相的遗子，禹的根苗尚存，觉得可以用来作为复夏的旗帜。他充分利用百姓怀念大禹的心理，以恢复禹建立的夏王朝为号召，号召人民推翻寒浞。因此他很快组织起一支武装力量，其骨干是斟灌、斟寻二国的残余部队，此二国百姓流亡离散，受苦很深，与浇有亡国的血海深仇，作战非常勇敢，战斗力很强。当伯靡率领这支队伍进入有穷国，一路所向披靡，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阻力就攻入了有穷国都穷石。寒浞不及防备，被众军杀掉。伯靡立刻率师直奔有虞迎少康回到夏邑。少康让伯靡助女艾在过城诛杀了浇，灭了过国。而在戈的豷孤立无援，少康之子季杼见时机已到，乘机杀了豷，灭掉了戈国。自此约有四十年历史的有穷国也就彻底灭亡了。

少康在伯靡及夏后氏贵族们拥戴下，正式继位为夏王。少康继位之后，决心恢复禹的业绩。各地的诸侯、方伯看到少康等人推翻有穷氏的统治都很高兴，纷纷回到夏都。少康主持了奉祀夏的祖先和天帝的仪式，恢复夏朝的统治，各地诸侯络绎不绝地带着贡物前来朝贺。

夏朝自太康被逐，历经三代，约四十年的斗争，才重新夺回政权。江山易失难得。到少康这一代，可以说是绝处逢生。真是巧得很，夏代王权，三代而失，三代又得。这一圈的历史轮回，让人们从中领悟了多少深刻的道理！

少康是在忧患中成长的，从小颠沛流离，深知民间疾苦。正是祖先大禹的威望，使他得到人民的帮助拥护，得以荣登帝位。因此他深知要像先祖禹那样，时刻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不能像

祖父太康那样盘游无度。所以要做的是“复禹之迹”。

第一，他恢复了稷官来指导农业生产。稷官这个管理按时播种五谷，指导农业生产的官，禹时是由周族的祖先后稷担任的。太康“去稷不务”把稷官也废了。农业是夏朝立国之本，邦本不立，自然失国。太康复禹之迹，先复稷官，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

第二，恢复水正，指导平治水土。大禹治水十三年留下的茫茫禹迹，也留在世世代代人民的心里。正是人民心中的禹迹在少康复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少康即位后恢复了管理水利工程的官——水正。自禹平治水土之后，黄河中下游不再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后羿代夏后，河道失修，水患又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危害农业生产的天灾，因此必须治理。少康任命商侯冥为水正，派他去治理黄河水患。冥是商族始祖契的五世孙。当年契佐禹治水有功，赐姓子氏。夏朝建立后，契的后人被封为诸侯。所以这次少康仍任命商侯冥去治理水患。水正冥，勤勤恳恳，身先士卒，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消除了黄河水患，使农业又有了较大发展。冥在治水时不幸淹死在水中，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隆重地祭祀冥，他是继大禹之后，又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

第三，恢复大禹时夏朝的中心地位。后羿、寒浞之所以能够以夷乱夏，根本原因还是夏族的国君失德，人民离心，凝聚力差。少康即位后关心生产，治理水患，逐渐地富强起来。当时虽然寒浞被消灭，但夷夏矛盾并未解决，东夷诸部落方国时服时叛，始终威胁着夏王朝的政权稳定。为了解除这一大忧患，彻底根治夷夏的敌对状态，少康一方面树立夏的正面形象，使夏朝强大起来，使远夷来服的“禹迹”再现。少康即位不久，东夷中的方夷曾来朝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少康积极备战，准备发动一场对东夷的征伐活动。不想大功未成身先死。相传少康在位二十二年。

少康是夏朝承前启后的一位帝王，如果没有少康也就不会有

夏朝中后期的历史。他的重要历史地位，在夏朝仅次于大禹，他的政绩被史家称为少康中兴。

少康死后其子杼继位。杼继承少康的遗志积极准备征伐东夷。为了扩大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即位不久，就将王都由斟寻（即太康所居之地，今河南巩县），迁到黄河北岸的原（今河南济源西北）。为了征伐东夷的需要，又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

东夷自古以来是善射的民族，涌现出后羿等伟大的射手，为防御夷人的箭，杼发明了衣甲，它用兽皮制成，作战时能有效地防身。杼还发明了进攻的长武器矛。杼率兵东进，沿途得到各地诸侯、方国的支持，顺利地征服了分布在今河南东部、山东和江苏北部一带的夷人部落，一直打到东海之滨（今黄河岸边）。看来防御武器与进攻武器的发明，在这次征夷中，发挥重大作用，使他连连得胜，捷报频传。当杼到达三寿这个东夷部落时，三寿表示臣服，献上了九尾狐，一种稀有的白狐。这是一种吉祥的瑞兽。获此祥瑞后，杼高兴地班师西归。不久病逝。杼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杼被夏族后人认为是继承大禹事业的明王，重新征服了东夷诸部，重振了昔日大禹的雄风，所以死后受到后人的隆重祭祀。

杼死，儿子芬（有的史书上写作槐）继位。史载，三年，九夷来御。分布在淮水和泗水流域的九个夷人部落：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都来向夏朝臣服。这是杼东征胜利之后，夏朝强大起来，夷夏关系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夏朝在夷人中的威望，又恢复到了大禹时的水平。是“复禹之迹”的一个重要方面。夷人都来进献贡物，表示愿意听从夏王的调遣。至此，夷夏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夷人乱夏，时叛时服的问题才算解决。这对夷夏的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芬在位四十四年，这一时期社会稳定，无内忧外患，各方面都顺利发展，是夏王朝建立以来的充分发展时期。

芬的儿子芒（有的古书上写作荒）即位。他即位的第一年举行了隆重的祭祀黄河之神的仪式。自太康任命冥为水正，经过长达二十二年的治理，消除了黄河水患。历经杼、芬两代约六十余年，黄河一直没有泛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因此，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酬答河神赐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芒和百官臣僚各方代表、诸侯、方伯们来到黄河岸边。震天的鼓乐之后是庄严肃穆、虔敬的祭祀仪式，在高声颂读祈祷的祭文之后，把牛、羊、猪等做牺牲，沉于河中，还将象征先祖大禹治水功绩、帝舜所赐的玄圭一同沉入黄河之中。这就是后世史书所载的“沉祭”。从此，这种虔敬而隆重的祭祀黄河之神的仪式，在我国一直延续了数千年。祭河之后，芒又率领臣僚们去东方打猎，到了东海之滨，捕捉到一条很大的鱼，群臣见了惊叹之余，一齐向芒称贺，认为是河神所赐，可永保江山安泰。这些活动是有深刻的政治意义的：如果说芒的父祖以文治武功巩固王权，芒则努力给王权披上一层神异的色彩，这是王权观念发展的新动向。

芒在位约五十八年而死，其子泄即位。

泄死后，其子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九苑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方国，说明夏朝的势力在向西发展。不降在位五十九年，因年老将王位让给了弟弟扃。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不降在他逝世之前就把王位交给了弟弟，而不是等他逝世之后，由儿子孔甲继承王位。显然不降认为其子孔甲不贤，才在生前让弟弟扃即位，从而剥夺了孔甲的继承权。

扃在位十八年而死，其子胤甲（有的古书上写作廑）即王位。胤甲即位后，把王都迁到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在黄河以西）。胤甲末年，天大旱，酷热异常。古人认为天有十个太阳，轮流值日，一旦天旱、酷热，则十日并出。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把发生大旱看作是天上有妖怪作祟。胤甲就在这年死去。这为不降的不肖子孔甲夺取帝位造成了藉口和机会。帝位果然被他夺取。

司马迁认为孔甲是个“好方鬼神，事淫乱”的昏君，《国语》上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意思是说孔甲扰乱夏的制度，使夏朝再过四代就灭亡了。孔甲乱夏与不降有直接关系。不降生前退位将王位不传子孔甲而让位于弟扃，势必在统治阶级、王室内部引起矛盾。扃得到王族、贵族、臣僚、诸侯的拥戴，称颂不降让位于弟的“圣德”。但是，孔甲也并非是等闲之辈，当扃的儿子胤甲（廑）死后，帝位又转到他的手里，这在夏王朝中是空前绝后的。

后世帝王被称为真龙天子，这要追溯到孔甲。历史上最早与龙发生关系的帝王就是孔甲。孔甲听到小臣们报告，说在汉水和黄河出现雌雄两龙，这龙顺应天命，是天帝赐给孔甲驾车的。孔甲不知道怎样饲养龙，只听说在尧舜时有个豢龙氏，专门饲养龙。自陶唐氏衰落之后，不知是否还有没有会饲养龙的人。不久小臣们给他找来一个叫刘累的人，自称先祖曾向豢龙氏学驯龙，并世世代代都是驯龙的能手。孔甲把这两条龙交给刘累饲养，并赐刘累为御龙氏，代替豕韦氏的后代。不久，雌龙因受伤而死，刘累将肉剁成肉酱给孔甲吃，孔甲食后觉得味道异常，便叫刘累再献这种美味，刘累无法，畏惧潜逃到鲁阳（今河南鲁山）。这当然不能据以为实，但它反映了孔甲夺位之时，编造过他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与龙有密切关系的神奇人物，他能得到龙，自然应当据天子之位。后世皇帝干脆自己说是真龙天子，汉代则有了君权神授说。正是孔甲把君权神化了，这是君权观念的重要发展。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故事说，孔甲有一次去打猎，南渡黄河来到伊水和洛水之间。当走到黄山（今河南偃师西北，一说今山东费县西南）时，突然起了大风，孔甲迷路，走进一个山民家中，女主人正在给孩子喂奶。有人说：“帝王今天来到这里，使这座小屋蓬荜生辉，今天是这孩子的良辰吉日，今后一定会大福大贵。”另外一个人说：“不对，这孩子将来一定大祸临头，阴谋诡计不胜防。”

孔甲把孩子抱过来要带走他，说："我会把这孩子当作我自己的孩子，看谁敢给他祸殃？"这孩子后来在王宫长大成人，有一次不小心碰掉了一把锋利的大斧，正好把他的脚砍掉了，只好去当看门人。孔甲不由地感叹到："唉，真没有想到，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样残废了，真是天命不可抗拒啊！"与孔甲"好方鬼神"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孔甲为巩固王权，坚决维持传子制，宣扬彻底的命定论。他的父亲虽不传位给他，但并未改变他成为帝王的命运，正像他不能改变那个孩子失去脚成为看门人的命运一样。

夷夏关系与王权观念的发展构成少康中兴前后夏代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少康中兴后，解决了以夷乱夏的问题，夷夏两族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相互影响；少康中兴使人们有了对王权的正确认识，取得了共识，使社会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夏本纪》

《尚书·胤征》

商汤灭夏桀

中国上古时期是部落统治的国家结构。在这种国家结构下，一个强大的部落方国征服周围的其他方国，从而建立起自己部族的统治。夏代自孔甲之后，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夏族同其他部族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使夏朝的统治不断消弱。与此同时，在夏朝的东方，商族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夏族的统治失衡，最终灭掉夏朝，建立起商朝。

孔甲死后，他的儿子皋（又作吴）即位三年而死，皋的儿子发即位，发在位七年而死，其子履癸即位。履癸又名桀，是夏代的最后一位帝王。到桀时，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王，历经四百多年。夏朝的统治中心，东面到达黄河下游和济水流域（今河北东南部和山东），西面到华山（今陕西东南部），南而到伊水流域（今河南西部），北到羊阳（今山西晋城一带）。这个统治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各地的氏族部落、方国、诸侯无不对它表示臣服，向它纳贡。但是孔甲之后，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专制王权的统治使诸侯离心离德。强大的夏王朝，在桀这位残暴的君主手中，顷刻灰飞烟灭。

相传桀是一个有才智又有勇力的人，他能一人生擒兕（野牛）、虎，空手能力断钩索，其勇力不凡，无人能比。即位后，为了控制动乱的局势，他把王都迁回到斟寻旧都（今河南巩县）。当时地处东方的有施氏（今山东滕县）对夏朝稍有反叛，桀立刻率大军去镇压，目的是杀一儆百。有施氏急忙投降认罪，夏桀不准，

一定要灭掉有施氏，有施氏投其所好，把一个名叫妹喜的美女献给桀。桀见了妹喜，笑逐颜开，带了妹喜，罢兵而去。

相传夏桀命令一个叫扁的武将率兵去征岷山，岷山氏进女于桀，一个叫琬，一个叫琰，桀得此两美女，宠爱无比，把她们的名字刻在苕华之玉上。

一次夏桀在有仍（山东济宁）大会诸侯、方伯，会上桀充分显示其专制君主的威严，大量地向诸侯、方伯们征收贡赋。当时有缗氏首领看到桀如此贪婪暴虐，不等散会就先回去了。桀不能容忍对他如此不敬，率领参加有仍之会的诸侯、方国去征伐有缗。他残暴地灭掉了有缗氏，将有缗的财物、美女、人口大掠而归。

以上这些事实，被许多史家用于说明桀的暴虐。其实像这样的事许多君主都做过，大禹不也把防风氏杀掉暴尸三日吗？桀也是以这种方式巩固他的统治，他征伐的本意未必是为了美女财产。问题在于：夏代王权到后期，逐步向着专制的方向发展，夏桀不由自主地朝着这个方向下滑，并且完全不识庐山真面目。可是，此时的诸侯方伯正在觉醒，对于专制王权已经无法忍受。所以夏桀越是征伐，诸侯越是离心离德，越是从内心叛夏，桀也就逃脱不掉众叛亲离的下场。

王权越是专制，帝王本人也就越穷奢极欲，桀在今河南洛阳附近做倾宫、瑶台，用尽了百姓的财力。这座宫殿修得很高大，从地面往上看，有将倾倒的感觉，故取名为倾宫。倾宫中最豪华的是琼室瑶台。当桀登上这座高大的倾宫，俯视其下，觉得自己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高高在上，永远享不尽荣华富贵。而老百姓却暗地里骂道：“你这位太阳什么时候发丧，我们宁可同你一起死亡！”倾宫中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池子，里面灌满了酒，称为酒池。酒池边无数男女戏乐，一阵鼓声过后，三千人跑到池边像牛一样地低头饮酒，有的醉了之后，竟死在那里，桀还以此为乐。夏桀的乐工舞女多达三万人，倾宫内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一旦声乐大

作，声震八方。他还在深谷之中筑长夜宫，宫中男女杂处，终日不出。

由于他纵情玩乐，长期不理朝政，有个叫终古的太史①，多次向他进谏，有时终古哭着苦苦哀求，得到的只是一顿责骂。终古知道如此下去，绝不会有好下场。于是，逃出夏都，投奔到正在崛起的商汤那里。

另一位官员关龙逄见终古苦谏无效，于是变换了一种方式。他手捧“皇图”来倾宫求见。皇图绘有夏代帝王、桀的历代祖先们的功绩。关龙逄试图让桀重温大禹治水、涂山大会的功业，让他效法先王，像祖宗大禹那样爱民、节俭，以高尚的德行，受到诸侯的拥戴。关龙逄越说越激动，竟指责夏桀挥霍无度、随便杀人。桀勃然大怒，把关龙逄当场杀死，焚毁了皇图。下令谁再像关龙逄这样进言，一律杀头。从此贤臣绝迹，言路堵塞。

夏朝的诸侯商，此时已经逐渐发展壮大，其首领汤，又名履，见于记载的他的名字还有成汤、武汤、商汤、天乙、天乙汤。商汤的祖先是契，曾因协助夏禹治水，因功被舜封于商，后成为夏朝诸侯。在英雄时代，商汤的祖先也被神化了。传说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夷人部落里，一个叫简狄的女子，有一天和另外两个女子一起在河边洗澡，忽然一只玄鸟飞过河边，正巧生下一只蛋，简狄拾起把这只蛋吞下肚，之后，她因此而怀孕，生下了契。这就是传说中商的始祖。少皞的部落以“鸟名官”，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鴡鸠氏、鳲氏、爽鸠氏、鹘鸠氏，还有“五雉”“九扈”。用鸟的名字为其二十四个氏族命名，商很可能出自玄鸟氏。少皞是一个东方部族，地处黄河下游。商是其中的一支。后来商又分化为有子氏、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佐禹治水的契，被舜封于商，赐姓子氏。

① 太史：职官名，掌天文、历法、祭祀、档案记录等。

他同时得到的封地还有番（今山东滕县），从此商发展壮大，传了十四代到了商汤。

商是游牧部落，契的儿子昭明跨过黄河向北逐水草而居，到砥石（今河北邢台以北），畜群大量繁殖。昭明之子相土，又赶着畜群回到商。相传相土驯马，用马来驮东西和拉车。使中原获得了畜力，生产力大大提高。相土还根据中原定居农业的特点，改变了游牧方式，用圈养、槽喂的方式与放牧结合，开始了定居畜牧，并且与定居农业生产结合，形成中原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壮大了商族力量。太康失政，社会动乱，相土领导的部落，具有发达的畜牧业，在征战中其势力一直达到东海之滨。相土佐夏，为司马，专事征伐。

相的曾孙冥，被少康任命为水正。在治水中贡献出许多马匹，为治水工程服务。功劳盖世，被后世奉为水神，称为“玄冥”。冥的儿子王亥，没有去做水正，而从事畜牧业，他把牛驯服来驾车和驮运东西。牛比马更难以驯服，“王亥服牛”这无疑为人民立了大功。因此后世商王祭祀王亥时非常隆重，用牛牲多至三百头。三千年前，大部分地区河流纵横、泽薮遍布、荆棘丛生，道路不通。王亥驯服了牛，就经常赶着马、牛驮运土特产品，在各方国、部落间开展贸易，交换产品。

有一年，王亥带着弟弟王恒，率领着商族人马，赶着牛羊驮着从东方交换得来的物品，向北跨过黄河来到易水流域的有易部落，打算与有易部落首领绵臣交换粮食和方物。有易氏的首领绵臣见到货物如此丰富的商队，非常高兴，大宴客人。商族人一路辛苦，在热闹的欢宴中不免好酒贪杯，对于侍宴歌舞的侍女有失检点。被激怒的绵臣竟乘夜杀死王亥，第二天把王亥兄弟带来的货物、马牛部扣下，把王恒和商族人赶出有易部落。王恒求绵臣交还牲畜货物，根本没有办到。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决心为父报仇。上甲微求得诸侯河伯的支持，经过认真准备，率领两个部落大军

前来攻打有易部落。绵臣在混战中被商族军士杀死。上甲微把有易的财产分给河伯，并用商的马牛羊犒军。有易部落的人成了上甲微与河伯的奴隶。这件事在夏王朝的诸侯、方伯中震动很大。从此，商族首领被刮目相看，同时也保护了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没有人再敢轻易冒犯商人。商族也获得了较大发展。自上甲微传至七代，到商汤。

商汤最大的贡献是实现了“殷革夏命”。他能够实现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主要是他把握了时代脉搏，充分利用了时代为他提供的机会。到了夏商之际，由于夏桀的专制、暴虐、人们更加怀念尧舜时代，更加希望圣明君主的出现。商汤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适应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充分扮演了一位圣明君主的角色。

一次，汤到荒野之中，看到人们四面张网准备围捕禽兽，并祝祷说，天下四方的禽兽都撞到我们的网里。汤见到后，感叹地说：“这样做不是赶尽杀绝吗?”汤让他们撤去三面的网，只留下一面的网，并且亲自祝祷说：“禽兽们想往左跑就往左逃命吧，想往右跑就往右逃命吧！我只要那些违犯天命的。”那些诸侯听到这件事后都说：商汤把他的德惠都及于禽兽，更何况人呢？于是四十个诸侯国弃夏归商。所以后人评论说，放置四面网未必得到鸟兽，汤去掉三面网，留下一面网却网罗了四十国，汤不只是捉到了鸟兽啊！

对于尧舜之道的渴求是当时强大的社会思潮。商汤正确地把握了这一点。在有莘之野隐居的伊尹是当时著名的贤者。他的处世原则是严格地按照尧舜之道行事，甚至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合乎仁义，不合乎尧舜之道，就是把掌管天下的大权作为俸禄给他，也不回头看一看，就是用四千匹马来拉他，也不屑于一顾；不合乎仁义，不合乎尧舜之道的，就是像一粒草籽那么微小也不轻易地从别人那里索取。成汤看中了伊尹这一点，派人带着贵重的礼物聘请他。伊尹自视清高，不为汤的贵重礼物所驱使，宁愿在

畎亩之中以尧舜之道为乐。成汤多次聘请，伊尹幡然醒悟。他说："与其我在畎亩之处劳作，以此来表示以尧舜之道为乐，哪里比得上让成汤成为尧舜之君呢？哪里比得上让成汤的民众成为尧舜治下的臣民呢？哪里比得上我亲自去见成汤以展宏图呢？天生下我们这些人，是让先知先觉的人去启发开导后知后觉的人。我是天生的先知，我将以尧舜之道启发民众。如果我不承此重任，还能有谁呢？我整天想着如果天下的普通百姓，没有得到尧舜的恩泽，就像是我自己把他们推进沟壑，让他们备受煎熬。"商汤得到了这位学识渊博、才智过人、处事聪敏的辅佐大臣。从伊尹身上我们见到夏商之际文化观念的变化潮流，及"汤武革命"的底蕴：高高举起尧舜之道的旗帜，民众就会汇聚在这面旗帜之下。结果"殷革夏命"，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十分成功。古书上的记载也犹如成汤的表现一样地夸张：成汤十一次征伐，大获全胜，天下无敌。他向东面征伐，西夷人便埋怨他，向南面征伐，北狄人便埋怨他，都说：为什么不先到我们这里，却把我们放在后面呢？成汤顿时成了大救星，民众盼望成汤，就像久旱之时盼望甘雨一样。

同样是灭掉诸侯，桀赤裸裸地运用专制王权，本意是使人敬服，结果却使人离心离德。汤灭诸侯，却要把赤裸裸的屠杀包裹上一层又一层仁义的外衣。葛（今河南宁陵北）是商的近邻，是夏桀在东方的忠实臣子与耳目，汤唯恐葛伯把他的活动报告给夏桀，坏了他灭夏的大事。汤想先争取葛伯为他服务，如果不能争取就坚决消灭掉，就是派使者质问葛伯为什么不举行祭祀。葛伯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礼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礼都要用许多牛羊，我们没有牛羊，拿什么祭礼呢？"商族经常举行祭祀，每次都要用牛羊犬豕做牺牲，甚至杀掉活人来做牺牲，有时多至十多人，至于牲畜一次可多至数百。牺牲是用家畜做祭祀活动的供品。用纯色的家畜，如牛、羊、犬、豕等叫做牺；用整体家畜叫做牲；纯色整体的家畜做祭祀时的贡品叫做牺牲。活人杀掉后做贡品叫人

牲。汤给葛伯送去一群牛羊，却仍不见葛伯祭祀，就再派使者询问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又说："我们田中种不出粮食来，没有酒饭来做贡品，还是没法举行祭祀。汤就派人到那里帮助种地，并且派人去给种地的人送酒饭。这些送饭的人常遭抢劫，一次一个孩子因被抢反抗而被杀。汤觉得灭掉葛的时机到了，于是出兵杀葛伯。汤占有了葛的土地、人民、财物。汤的灭葛行动，不仅没有引起诸侯的反对，诸侯们还纷纷指责葛伯不仁，被杀是咎由自取。有些诸侯、方国主动归顺，汤就授给他们冠冕和玉圭。就这样汤确立了诸侯盟主的地位。

商灭掉了与夏王朝关系密切的诸侯国葛，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商汤派伊尹到王都观察桀对此事的反映。伊尹带了方物、贡品来朝贡，见到桀，桀问："商侯为什么要灭掉葛国？"伊尹回答："葛伯不祭祀，商侯送给他许多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却还不祭祀，商侯派人帮他耕种，他不但不感激反而杀害送饭的人。商王见他如此不仁，有损夏王您的威望，才把他杀了。"夏桀点头不再说什么。伊尹又说是商侯派他来侍候天子，他愿意听从天子的差遣。夏桀只顾寻欢作乐，伊尹在他身边住了三年，竟什么事也派他去做。伊尹了解了夏桀的一切，向商汤献计：桀虽暴虐无道，但夏王朝毕竟是四百多年来天下尊崇的共主，因此，必须等待时机，还要蓄积力量，继续削弱夏朝势力。

与商毗邻有三个忠于夏朝的诸侯国：彭姓的豕韦（今河南滑县东），己姓的顾（今山东鄄城东北）和昆吾（今河南濮阳，或说新郑）。这三个强大的诸侯国执意以商为敌，经常向桀报告汤的不法活动。汤和他的谋臣伊尹、仲虺决心灭掉这三个诸侯国，以剪断夏桀羽翼。正当他们即将动手进攻豕韦时，被夏桀得知。桀为了及时遏止商的势力继续扩大，派臣征召商汤入觐。汤没有理由拒绝，于是随使前来。桀下令把汤囚禁在夏台（即钧台，今河南禹县，夏朝的国家监狱设在这里）。

伊尹和仲虺得知汤被囚禁，千方百计地搜集珍宝、玩器和美女，不惜一切，把夏桀喜欢的送给他，又以他们能言善辩的口舌，为汤说情辩护，桀下令释放商汤。汤返回商，竟像英雄凯旋一般，受到五百诸侯、方伯、贵族的慰问。他们纷纷要求到商供职，愿意受汤的差遣。

汤和伊尹、仲虺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率领各诸侯联合军队，进攻豕韦。大兵压境之后，豕韦连呼救求援都来不及，就被汤灭掉了。汤顺势挥师东进，乘胜灭掉了顾国。二国土地、财产、百姓全部归商。

韦、顾的北邻昆吾，是祝融的后代，国君称为夏伯。夏伯深知商汤要来进攻，立即整顿昆吾之军，派使日夜兼程赴夏都告急，并报告韦豕、顾国被灭的消息。夏桀大怒，下令九夷之师征商。汤决心拼死一搏，要立即率军灭昆吾，然后东征九夷、灭夏桀。伊尹对当时的形势有深刻的洞察力，对夏桀这位专制君王的心理也了如指掌。他认为东夷之民还听从桀的调遣，此时硬拼难以取胜，不如遣使入贡，向桀请罪，等待时机成熟，灭夏才能成功。商汤采纳了伊尹之谋，班师回商，写了一封悔罪的奏章，备办了丰富的贡品，派使臣到夏都陪罪。桀身边的谀臣纷纷向桀祝贺："天子真是威震天下，连强大的商侯都如此畏惧，兵戈未动，天下已服。"夏桀更加安心饮酒作乐。

夏桀罢兵不征伐商汤，这使昆吾的夏伯非常着急生气。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夏伯决定向商主动进攻，双方激战，昆吾大败。商汤乘胜杀夏伯，灭昆吾。昆吾土地、百姓归商，这使商更强大，足以与夏抗衡。

这时，伊尹献谋："今年本应向桀入贡，我们先不要向他进贡，看一看他有什么反映。"当夏桀得知商汤灭掉了昆吾，而且胆大包天，不来入贡，再次下令九夷之师起兵攻商。此时，夏桀对九夷已经失去威慑力，九夷并没有出兵攻商。伊尹说："可矣。"商汤

率军伐桀。

汤和他的谋臣伊尹、仲虺率领七十辆战车和五千步卒组成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夏桀调集了夏王朝的全部人马，气势汹汹地开出王都。夏商两军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或说在今山西安邑镇北）之野摆开阵势。会战前夕，在鸣条之野，汤对参战的各个诸侯、方国的将士们，庄严地宣读了伐夏的誓词：

“你们大家来听我说：不是我胆大包天犯上作乱，而是因为夏桀罪恶滔天，我奉天命来诛杀他。你们大家都明白作为帝王的夏桀，根本不顾我们的死活，荒废了我们赖以为生的农事，背叛夏朝的优良传统。我听到大家说过，夏桀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伐他，纠正他的罪恶。今天你们大家要问对夏桀的罪究竟怎办？夏桀耗尽民力，侵夺百姓。百姓全都对他轻慢不恭，说：‘你这个太阳何时发丧，我愿意和你一起走向死亡。’他的德行坏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去讨伐这个天怒人怨的暴君。你们还要帮助我，实行上帝对他的惩罚。我要给你们重赏！你们不要失信，我更不会食言。你们要是有谁违背誓言，我就会罚他为奴，或干脆杀掉，决不宽赦！”

经过动员，士气大振。两军在一场大雷雨中，在鸣条之野展开大战，商军真的以为这场大雷雨是上帝来惩罚夏桀的，作战更加勇敢。最后，夏桀只带了五百残兵向东逃到三㚇(zōng)（今山东定陶北）。三㚇是夏王朝的一个方国，三㚇伯见夏桀兵败逃来，立即陈兵布阵。商军挥师东夷，与三㚇军在成郕（今山东汶上北）交战，败三㚇军，杀三㚇伯，夺取了三㚇伯的宝玉、财产、百姓。夏桀带了五百残兵继续南逃，逃到了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当商汤追到南巢，夏桀又想从南巢逃跑，刚刚出城，就被商军捉住。商汤把夏桀监禁在亭山。夏桀对人说：“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立即在夏台杀掉，今天才落得如此下场！”商朝建立三年之后，夏桀忧愤病死在亭山。

汤挥师西进，消灭顽固忠于夏朝的地方势力。一路上风卷残云，根本没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很快占领了夏都斟寻。夏朝的亲贵大臣表示愿意臣服商汤。

商汤在斟寻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他向夏朝的臣民们表示，他们是按上天的意志来诛伐违背天道的桀，夏后氏的历数已尽。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至此宣告结束。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

商汤并没有立刻登天子位，而是率军回到亳。因为他是打着行尧舜之道的旗帜讨伐夏桀的。而尧舜是实行禅让制来传承帝位，汤自己却是用武力夺取帝位的。这显然与一贯标榜的行尧舜之道不相符合，这使他感到惭愧，唯恐贸然登上帝位，不仅天下人不服，反而会给人留下攻击他的口实。这时商汤的左相仲虺劝勉他说："只有天生聪明的人才能平息祸乱。夏桀昏乱失德，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天赐给您勇力智慧，使您成为所有邦国的表率、楷模。您只要继承禹的业绩，遵循禹的律典常规，就是奉天承命，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失道的夏桀假托天的意志对百姓发号施令，这是他的罪孽，现在该是商接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时候了。自从夏朝立国，一直把商看作是禾苗里的杂草、谷粒中的秕壳，总想除掉我们，现在，天赐良机，我们除掉了无道的夏桀。您如果把帝位让给夏后，商的臣民谁不害怕飞来横祸。再说，我们商的嘉言懿行已经使天下人心归服。应该灭亡的就促使它灭亡，应该生存的就促使它巩固。这样国家才会昌盛，人的德行才会不断达到新的境界，万国都会前来归服。君主要在百姓中显示出高尚的美德，让他们明白您遵循无情的天道。用仁义之心裁夺是非功过，用礼制去控制内心的情欲，德泽使后世子孙受益。我听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人可以称王；认为自己天下第一，就自取灭亡。要有好的结局，必须永远像开始时那么谦虚谨慎。有礼的就该发达，昏暴的就该灭亡。钦敬地尊奉天道吧，永远恪守上天的命意吧！仲虺

从理论上论证了商汤代夏是顺承天命，应该以有德者取代无德者，这也是天道无情，在强调德行天下的同时，充满了社会进化的观点，是汤武革命的理论体系。

这时商的声威达于八方，各地诸侯、方伯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首领，纷纷带着方物、贡品来到商都亳朝贺，表示向商汤臣服。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来朝觐。数月之间，三千诸侯大会于亳。汤对前来朝贺的诸侯以礼相待。看到三千诸侯宾服，汤乃践天子位。他在诸侯面前告祭于天，宣告商王朝的建立，完成了“殷革夏命”。

汤建国后不久，商王畿内发生了旱灾并延续了七年之久。烈日暴晒，河干井涸，草木枯黄，庄稼无收，人民困苦异常。虽然伊尹教民打井开沟，引水灌溉，但旱情愈来愈严重。自天旱发生，汤在郊外设祭坛，天天派人举行祭祀，祈求上帝除旱下雨。最初的祭祀仪式是在木柴上放上牛羊猪狗等牺牲，然后点燃。这种烧柴祀天的祭名叫做“尞”(liǎo)。汤还命史官向天地山川祷告说：“是不是因我们的王，政事无节制法度？是不是让人民受了疾苦？是不是官吏受贿贪污？是不是小人谗言流行？是不是女人干扰政事？是不是宫室修得太大太美？为什么还不快下雨呢？”史官替汤责备自己以求上帝鬼神赐福降雨。大旱延续七年，这种祭祀活动升级，祭坛移到一个叫桑林的地方，汤亲自率领大臣们举行祭祀求雨。祭完之后仍未下雨。史官们占卜问其原因，说是要人牲，就是把活人放在柴上焚烧，让他去上天祈雨。汤说：“我祭祀占卜求雨是为了百姓，怎么能让人去遭此焚烧之苦？就让我亲自去吧。”汤把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向上天祷告：“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是我一人的错。不要因为我一人而使万民受苦，生灵涂炭。”祷告完毕便坐在了烧柴上，准备以自身为牺牲，在大火中焚烧。在大火还未燃起时，天忽然下起了大雨。汤的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使人非常感动，赢得了广泛的敬佩和赞

誉。人民用歌唱来颂扬汤的德行。汤命伊尹把这些歌曲收集起来，编成乐舞，取名为“桑林”。这也就是“汤乐”。自汤祷于桑林之后，这种焚烧人的祭祀仪式就开始了，一直沿续到春秋时代才逐步废止。

汤武革命还实行一些改朝换代的措施。夏禹建国，立社祭祀土地神，同时祭祀五谷神稷，稷为五谷之长。夏王朝每年在社举行祭祀仪式，祈求后土农神福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夏是农耕民族，社稷存亡象征着国家存亡。汤灭夏后，想把夏社迁走，被伊尹阻止，为的是留下来告诫后人，作为因暴虐而亡国的见证。于是，汤命令把夏社这座露天祭坛上的树木砍掉，盖了一座房屋，把夏社封起来，永不使用，这就是“作夏社”。

我国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建有社稷坛，每年四季按时举行祭祀活动，尤其是春播开始时的祭祀最为隆重。相传发明社的人是共工的儿子句龙。共工世代为“水正”。一次洪水泛滥，句龙叫人挖土堆成丘，每一土丘住二十五家，称为一社。正是社这种民居聚落使不少人在洪水中逃生，所以，句龙死后，人们尊他为社神，称为后土。后土是后世土地神的始祖。稷是五谷之神，相传烈山氏的儿子柱做过稷正（掌播种五谷的官），后来被人尊为农神。

改正朔。夏历建寅，以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商正建丑，即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夏称一年为一岁，商称一年为一祀。

易服色，尚白。夏的衣服尚黑，即尊崇黑色，商改为“尚白”。商不光是衣服以白色为主，就是旗帜、器物，驾车的马，祭祀用的牛、羊、猪、狗也以白色为主。考古发掘，在商代遗址出土了不少白色陶器。朝觐也改在白天举行。

汤和伊尹把夏的九尊铜鼎搬到了商都。这九鼎象征天下九州归于一统，万国家邦心向夏禹。迁鼎于商，说明商虽灭夏，但仍

尊崇夏禹及夏禹之德。所以古书中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意思是由于夏桀昏暴无德不配拥有禹鼎，所以鼎被迁到商都，继续接受了商王朝六百多年的祭祀尊崇。商朝取得禹的九鼎，尊崇大禹的德行，因而受到人们的拥戴，也才有延续六百多年的江山社稷。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夏本纪》、《殷本纪》。

《尚书》：《汤誓》、《仲虺之诰》。

伊尹放太甲

有莘氏的一个采桑女，有一天去采桑，她在一棵长空了的桑树树干的空洞里，拣到了一个婴儿。她把这个婴儿献给了有莘部落的首领。有莘部落首领把这个婴儿交给了庖人——厨师，让庖人收养他。同时到处寻访、调查这个桑树洞中的婴儿的来历。原来这个婴儿的母亲家居伊水河的岸边，有一天，她梦见神灵告诉她：如果看到石臼里往外冒水就赶紧往东方跑，千万不要回头看。第二天，她看到石臼突然往外冒水，急忙去告诉村里人，让大家赶紧往东逃，她们一直跑啊，跑啊，这样跑了十里。这位已经怀孕的母亲实在太累了，想喘气歇一会儿，这时她不禁回头看，她看到村邑已经被大水淹没了，可她自己也因这一望，便化作了一株空桑。后来有莘的那位姑娘在这株空桑中发现了她的婴儿。由于这个婴儿的母亲居于伊水岸边，便为他起名叫伊尹（也有人认为尹是官名、其原名伊挚）。这位婴儿伊尹长大后成了商汤的辅佐大臣，以他的超凡的才智、显赫的功绩、美好的德行、无限的创造力，永垂史册。因此他的出身也被赋予了神话的美丽色彩。

伊尹是位从伊水流域流落到有莘氏的奴隶。少年时代经历过许多苦难，长大后做过厨师，种过地。有莘氏姒姓，是夏禹后裔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陈留，一说在今山东曹县北）。伊尹深知夏桀一定灭亡，想扶助一位德行好的诸侯取而代之。当时，有莘的国君是比较好的诸侯，由于伊尹会烹饪，也就有接近有莘国君的机会，在有莘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厨师。有莘国君发

现了他的才干，提升他当了管理膳食的小头目。他本来想劝说有莘国君担负起灭夏的重任，可是他越对这位国君有所了解，越觉得这不大可能，一是有莘是个不大的国家；二是有莘氏与夏桀同姓，都是夏禹之后；三是以有莘国君的性格，不会去贸然反抗夏桀。于是他又回到郊外去耕种。这时，商与有莘经常往来，汤见伊尹才华过人，多次请他到商来施展抱负。开始时，伊尹表现得清高，后来他终于想通了。可是伊尹毕竟是奴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时，商汤想与有莘联合，要娶有莘氏的一位姑娘为妃，伊尹便作为这位姑娘陪嫁的媵臣来到商。

伊尹跟随有莘氏女作为媵臣来到商汤身边，仍然做厨师，每天利用侍奉进食的机会，分析天下形势，谈论尧舜之道，以及怎样替天行道，推翻夏桀这位暴君。汤觉得伊尹的思想与自己相合，而伊尹的才智远远超过自己，便免去了伊尹的奴隶身份，开始任用他。汤的另一个重要谋臣仲虺则是贵族，从先祖起，世代在夏朝做车正，就是管理制造车子的官。仲虺的祖先奚仲是禹的车正。当夏桀灭了有缗之后，仲虺在商汤的邀请下来到了汤的身边。三人各有所长，志同道合。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核心，才得以完成“汤武革命”的重任。

商朝建立后，伊尹继续协助汤处理内外政事。过了十三年汤病逝于王都。汤死后，本该由他的长子太丁继位为商王，只因太丁在汤死前突然病死，于是伊尹和仲虺扶立太丁的弟弟外丙为王。外丙名胜，他只做了三年的商王就去世了。外丙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名庸，他在位四年而逝。这时仲虺也已病死，伊尹就立太丁的儿子太甲继位为商王。

太甲名至，是汤的嫡长孙，太甲做了商王以后，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因此太甲逐渐享乐起来，不理政事，还任意处罚和杀戮不顺从他的人。伊尹向他讲述商汤的遗训，规劝他改邪归正。

那是太甲元年十二月的一天，伊尹在祭祀成汤的仪式上，先侍奉太甲恭敬地叩拜先祖的灵位。侯服、甸服的各位君长、百官也都祭拜完毕。大家静听冢宰伊尹的号令。这时，伊尹阐述成汤建功立业的大德，用意是为了教导太甲。

伊尹说："古代夏的先王禹勤谨地恭行美德，使山川鬼神都异常安宁，鸟兽鱼鳖自在地繁衍。禹的后世子孙，不遵循先王的治国方针，皇天降下灾祸，假借我们的先王商汤之手，在鸣条严罚了夏桀。从此，我们的商，开始在天下显示神武的美德，用宽厚仁德取代了贪婪暴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当今的王要继承先王的美德，树立仁爱要从亲近的人开始，树立虔敬要从年长的人开始，先从家邦实行，最终达于天下。

"先王努力讲究做人的法度，虚心纳谏。虽高居人上却能明察下情；臣民都能尽心尽力。对人不求全责备，对己严格要求，唯恐失误，所以才赢得天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汤王广泛地寻求贤才，让他们辅佐后世，制定惩治官吏的刑罚，戒示百官。

"汤王说过：谁胆敢在宫室里经常纵情饮酒、放纵地欢歌曼舞，这叫行巫觋之风。胆敢有贪求财物、女色，迷恋游乐、打猎的，这叫邪恶之风。胆敢轻慢侮辱圣贤，拒绝忠直良臣的规谏，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亲近愚顽荒谬的人，这叫乱世之风。以上这三种风俗、十种过错，卿士沾染上一种，家必丧；诸侯沾染上一种，国必亡。臣下如果不能匡正君主的错误，就要给他脸上刺字涂墨。要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训诫有关人员。

"后代君王臣下都要念念不忘，时刻警戒。汤王的懿行天下赞美，汤王的嘉言非常明白。上帝并不专门降祸给夏朝，赐福给商朝，而是对行善的赐给各种吉祥，对作恶的就给各种祸殃。善事不要因为它小就不做，君主的小善，会使天下人庆幸。不善的事，不要因为它小就以为做了也无妨。君主作恶不大，也可能导致亡

国啊!”

以上可以看出，伊尹在太甲面前摆了三面镜子：第一面是夏禹，他为民立功，人民永远敬佩他；第二是夏桀，他暴虐伤民，失德亡国；第三是成汤，他除暴安民，赢得天下。他同时把汤王的训诫当作上方宝剑，以此来教导太甲，训诫百官。可是他越是如此教导太甲越觉得他多事，根本听不进去。太甲想，难道继承王位是为了受苦受累，给万民使唤？不愿做那样的傻事。祖先夺得天下就是为了让后世子孙享乐。因此，他认为是伊尹想要篡夺他的王位。伊尹与太甲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伊尹见太甲根本不理朝政，劝谏又没有作用，按照汤王的训诫，应该往自己脸上刺字，太甲如此放纵，做长辈的实在脸上无光。他在反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把太甲囚禁在王都郊外的桐宫（今河南偃师附近）。桐宫是商王朝的皇陵所在地，此地建有离宫。相传汤死后葬在桐宫。

太甲继位的第三年二月初一，伊尹带着帝王的礼帽礼服迎接太甲，回到国都亳。并且作书：“人民如果没有君主，就不能更好地互相救助来生存下去；君主如果没有人民，就不能取得天下，治理天下。皇天眷佑我们商朝，使我们的后继君王能够修善积德，实在是事关千秋万代的大喜事。”

太甲拱手叩头，说：“是我昏庸糊涂，不修德，以致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放纵情欲就会败坏法度，享乐不止就会藐视礼制。以致给自身招来罪过。天作孽，还能躲避；自作孽，不能免祸。过去我违背了您的谆谆教诲，违背了您的初衷，还望有赖您匡正求助的恩德，争取有个好的结局。”

伊尹拱手叩头，说：“注重自身的修养，用诚信的美德赢得民心归服，这才是英明的君主。先王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护贫穷困苦的百姓，百姓才听从君主的命令，人们无不心悦诚服。汤王当初虽然是和邻国一样的诸侯，诸侯们却说：等候我们的君王商汤来救助吧，他要来了，我们就摆脱了受惩罚的日子。所以，一

定要修德，面对您那建功立业的的先祖，千万不要享乐和懒惰。尊奉祖先自然想到孝顺；接近臣民自然态度谦恭；目光远大自然心明眼亮；听从贤德的规谏自然耳目聪明。这样，您继承先王的美德自然不会被抛弃。”

伊尹再三告诫太甲：“天道无情，只有对它虔敬的人才能亲近它；百姓的心最公平，只有行仁义之道的人才能受到他们的拥戴；鬼神并不专门护佑哪一个，只有真诚的人才能得到它们的护佑。保住天子之位真难啊！

“实行德政就太平，不实行德政就动乱。与治世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同流没有不灭亡的。从开始到终了都要一样地谨慎，才使君主更英明。

“先王明白这些道理积善修德为的是不违背天道。当今是您继承了先王的大业，一定要以先王的教诲自勉。要登高必须从下面一步一步地登攀；要行远，必须从近处一步一步地行走。千万不要因为民事琐细就心怀轻视，千万不要因为王位安稳就高枕无忧。一定要慎终如始。听到你不愿意听的话，看它是不是符合道；听到有些话顺合你的心意，看它是否远离了道。

“啊！没有忧患意识，江山怎么会平安？不认真地奋发有为，事业怎么会成功？天子美善，世风纯正。君主不要用诡辩搅乱了先王的德政，臣下不要凭恩宠获利居官邀赏，那样才会国泰民安。”

太甲居桐宫三年，确实思过、自责、改悔，另一方面看到伊尹摄政三年诸侯宾服、百官敬仰、内外皆顺，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向这样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德高望重的长者学习，听从他的教诲。这样当伊尹还政给他后，太甲继续为王，痛改前非，效法成汤，以德治民，四方诸侯前来朝贺。这使伊尹非常高兴，可仍有些担心。此时的伊尹内心矛盾，一方面，既然交还了权利，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封地，退隐终老，可又担心太甲德不纯一，于是又写了《咸有一德》：

"啊！茫茫的苍天，你是那样难以捉摸，你是那样的反复无常。我知道，若要巩固天下，只有持之以恒地修德。一旦不能坚持修德，国家就会灭亡。夏桀失德，侮慢神灵，暴虐百姓，皇天并不能保佑他，诸侯都背弃他，拥戴了德行纯一的汤王，做了天下的共主。汤王使道德纯正，天下人心归服，受天明命，被天下人拥戴，建立了商朝。

"这决不是老天特别偏爱我们殷商，天只是护佑、扶助道德纯正的人；并不是殷商招求百姓，而是天下百姓全都归附道德纯正的人。专心致志地实行纯正的道德，行动起来没有不吉利的；如果道德不良，三心二意反复无常，行动起来无不凶险。人得到的吉凶不会有错，因为天根据人的德行好坏来降灾赐祥。

"现在您重新担负天子的使命，要使德行日日更新，天天向上，始终如一，坚持不懈。任官只用贤才，才能左右尽是忠良。做大臣的职责是要使君主施行德政，使下属帮助百姓。最难的最需要多加注意的是，上下谐和，德行纯正。德没有固定不变的榜样，挑选最善的为老师。善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要努力达到符合纯一。使天下人都说：'伟大啊，君王的话。纯一啊，君王的心！'这样就能持守先王的祖业，永远使百姓幸福。

"啊！从供奉七代的祖庙，可以看出功德。从作为百姓首领的天子身上，可以看出政绩。君主失去百姓就失去一切，百姓失去君主也不能发达。千万不要为了私利而侵夺，千万不要为了自己放纵而使别人艰难。如果平民百姓不尽心尽力，君主怎么能取得成就！"

伊尹放太甲是王权观念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统治集团内部解决矛盾的新方式，对当时以至以后历史发展的作用不容低估，尤其对商王朝的长期稳定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对这件事古书上也有不同的记载。比如《竹书纪年》上记载：伊尹为篡夺王权，才把太甲放于桐宫。伊尹自已做了七年的王，得不到拥护，太甲

乘机从桐宫中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许多学者据此对伊尹放太甲作了不同的分析。但是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后世商王有过许多隆重祭祀伊尹的记录。在发现的甲骨卜辞中，伊尹列为老臣中的第一位，卜辞中有“侑伊尹五示”的记载，就是侑祭以伊尹为首的五位老臣。还有“十立伊又九”的记载，同样是祭礼伊尹和其他九老臣。卜辞中除了合祭先臣时把伊尹排在第一外，伊尹不单独享祀，或与先王大乙（汤）同祭。伊尹确实应该享有此种地位，因为他不仅辅佐汤灭夏，建立商朝，还扶立外丙和仲壬，又教诲太甲改过。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资格有能力放太甲。古书说伊尹家“世世享商”，“尊食宗绪”。伊尹家不仅世代受商人祭享，是商朝有势力的诸侯方国，而且出了许多名相。如果伊尹谋权篡位，后世商王的祀典中大概不会给他这么高的地位。

到了春秋时代，公孙丑对孟子讲述了伊尹放太甲这件事，他问孟子：“贤德的人做臣子，他的君主不贤，那么一定可以像伊尹那样流放他的君主吗？”孟子回答：“有伊尹那样的心志，那么就可以；没有伊尹那样的心志，就是篡权。”孟子回答可谓两全。后人不理解伊尹的心志，所以说他篡权。伊尹以纤毫不取之志，故能行此非常之事。伊尹不仅使太甲之后的商朝稳定下来，而且对商朝绵延六百年之久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伊尹这位伟人，看到复位后的太甲，修德安民，使商朝进一步巩固，相信他能继承汤的遗志，就不再参预朝政。但太甲只做了十二年的商王便病死。太甲的儿子沃丁继位为王。沃丁即位后八年，伊尹病死。沃丁用安葬天子的规格为他发丧，祀以太牢之礼，亲自为他守丧三年，以报答伊尹的恩德。相传伊尹享年百岁，葬于亳。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殷本纪》

《尚书》：《伊训》、《太甲》、《咸有一德》。

盘庚迁殷

汤灭夏后建立的国家，有人称之为商，有人称之为殷，也有人合称之为殷商。商与殷最初都是地名。商，即今河南商丘。夏禹建国，商的祖先契封于商、或契之孙相土迁于商，因此，把商这个地名作为部落名。但是，从契到汤，商族曾迁徙八次。

汤立国后，国都先后迁徙了五次。第九位商王太戊的儿子仲丁即位后，迁于隞。隞字与嚣字古音相同，也写作嚣（今河南荥阳东北）。太甲到太戊这段历史时期，商朝稳定地向前发展。到太戊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王室内部发生了权力之争。同时诸侯、方国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经过一番斗争，仲丁上台，但中央王朝的权力削弱了。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一方面他要摆脱王族争权夺利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找个更合适的地方加强对诸侯、方国的控制。仲丁迁都后，就和前来进犯的东南夷人中的兰夷部落进行了一场战争。仲丁在位十年，死后由他的弟弟外壬即位。不久，商的两个大诸侯国叛乱。一个叫姺、一个叫邳，本是与商关系很密切的诸侯，姺的祖先有莘氏与汤有婚姻关系。但他们强大起来之后，又在商的中央王权削弱时叛商，使商朝受到极大的震动。《左传》把姺、邳叛商比作三苗叛尧舜，有扈氏叛夏。

外壬在位十年而死，其弟河亶甲即位。为了缓和王族内部矛盾、消除姺、邳叛商后的不利影响，河亶甲只得放弃仲丁、外壬两王经营过的隞（嚣），把王都迁到相（今河南内黄东南），使王

族内部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姺、邳叛商引起连锁反应，首先反叛的是曾被仲丁征伐过的兰夷部落。河亶甲决定出兵征伐兰夷。这时邳侯已被商的一个方国——大彭（今江苏徐州）打败，邳侯只得归商。河亶甲在彭伯的帮助下，征服了兰夷。姺侯得知河亶甲取得一系列胜利，十分恐惧，急忙投奔班方。河亶甲命彭伯和韦伯（豕韦之后）率兵征伐班方。班方被征服后，姺侯归降，重新向商纳贡称臣。由于河亶甲迁都后很有作为，他受到后世商王的隆重祭祀。

河亶甲死后由仲丁的儿子祖乙即位。祖乙甲骨文中又称作祖乙、下乙、中宗祖乙等。祖乙即位后，王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又起，祖乙又把王都迁至黄河北岸的邢（即耿，今河南温县东）。可是，黄河大水泛滥冲毁了正在修建之中的这座王都。这时，辅佐过祖乙的著名贤相巫贤建议把王都迁到庇（今山东鱼台附近）。此地离彭伯所在地不远，社会环境安定，自然条件较好，有利发展农牧业。祖乙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把宫殿宗庙建成。迁都到这里之后，得到彭伯、韦伯等诸侯强有力的支持，内又有巫贤等名臣辅佐，社会生产力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安宁，使商王朝又得到复兴。祖乙成为与太甲、武丁并列的明君。后世祭祀祖乙的卜辞最多，用的人牲、牺牲都很多，多至数百。

祖乙死后三传至祖丁。祖丁在位三十二年，死后由南庚即位。由于争夺王权的斗争还在继续，南庚只好又迁都到奄（今山东曲阜）。这里属山东西南部的泗水流域，自然条件优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南庚死后，在王位继承权上，王室内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最后由祖丁之子阳甲即位为商王。阳甲在位十七年，死后由他的弟弟盘庚即位。

盘庚即位面对的是国势衰弱、内外问题成堆的极为复杂的局面，王朝统治危机四伏。首先是王朝内部矛盾斗争激烈。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基本上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存。也就是说，不是

严格的传子制。每当一位商王去世，都要引起一场争夺，主要原因是王位继承制本身的缺陷为争夺造成可乘之机。这一缺陷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王室之争，引起一系列问题。王朝内部混乱，诸侯、方国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王朝进贡，甚至发生了姺、邳之叛。到盘庚即位时，彭、韦二方伯叛商，北方和西北方的土方、𢀛方、羌方等方国，日益强大，夷人的部落时叛时降，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这些方国的强大，对商王朝的统治是个很大的威胁。

内忧外患，使即位后的盘庚不停地寻求解救的办法。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商王，他要效法成汤、太戊、祖乙来一场变革，但是他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盘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仍然没有改变国势衰弱的局面，如此下去，商王朝就有灭亡的危险。盘庚必须为商王朝找一条出路。他决定再一次迁都。

究竟迁到什么地方呢？盘庚经过周密思考，精心选择了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殷是祖宗肇启地之一。它地处黄河以北，洹水之滨，最适于控制四方。从战略上说，有利于防御北方、西北地区各方国、各少数民族的侵扰。从政治上说，迁到殷，远离了旧都奄，可以摆脱王族在旧都发展起来的各种势力，缓和这些势力对盘庚的牵制，使王部内部矛盾得到缓解。从经济上说，避开因年久失修、水涝不止的泗水流域，迁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上，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生产。

当盘庚宣布要迁都到殷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激烈反对。在商代，许多军国大事的决策，并不是由商王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同商议，他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陈述见解。据说在商代重大决策要谋及卿士、庶人、卜筮。这次反对迁都到殷的主要是王族中那些占有大量土地财富的人，迁都之后，无疑使他们的财富土地受损，留在旧都又使他们的政治势力被削弱。贵族们散布流言、蛊惑人心、欺骗人民，使一些平民也

跟着反对迁都。农耕部族安土重迁，更不愿迁徙。

盘庚一批又一批地把反对迁都到殷的人们找来，向他们一一讲明。《尚书·商书·盘庚》详细地记录了盘庚说的话，以及这一重大决策形成、实施的过程。

“你们留心听明白我的话，不要疏忽误解了我的旨意。从前，我们的先王千方百计地使百姓安居乐业。做君主的明白这一点，做大臣的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也就没有受到上天的惩罚。当令人受苦的大灾降临，先王们不是想着自己在都邑安居，而是考虑臣民的利益，向远方迁徙避难。你们为什么不仔细想想先王留下的故事呢？我迁都是想让大家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并不是因为你们有罪而用迁徙来惩罚。我呼唤大家到新的都邑去，完全是为了大家过上好日子，这非常符合大家的需要。

“现在我打算率领大家迁徙，使国家安定，大家的日子过得更好。可是你们不体谅我内心的痛苦，反而竟糊涂地发生了无谓的惊恐，还想用那些不正确的想法来动摇我的决心。本来大家已经走投无路，现在又自寻烦恼，就好像坐在船上，又不想渡过河去，难道坐等船朽之后沉下去吗？如果这样，沉下去的不只是你们，恐怕要救你们的人也要一起沉没。你们不审时度势，只是一味地抱怨发怒，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你们不作长远打算，也不想想不迁的危害，在忧患面前只是一味忍受，却不坚决地改变目前的状况，过了今天不想明天，你们依赖什么活在世上呢？

“我现在要嘱咐大家的是：一定要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要听信蛊惑而受邪言秽语的浸染。恐怕有人要使你们身子不正，使你们心眼歪邪。我是要从困顿之中把你们拯救出来，生活得更好。我怎么会用威势强迫你们呢？不过是想帮助你们、养育你们。

“我念念不忘的是，我们神圣的先王曾经烦劳你们的祖先，才推心置腹地把我寻求发展的心怀呈现给你们。可是，如果在政事

上失误，长久地耽搁在这里，先王会重重地降下罪责，问道：'为什么虐待我的臣民？'你们大家如果不去谋求生路，先王也会责怪你们，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和我幼小的儿孙同心协力，却要离心离德呢？'如果真的发生差错误了大事，上天也会责罚你们，谁也逃脱不掉。

"从前我们的先王已经烦劳你们的祖先和父辈，我有责任养育你们。如果你们心中却怀有恶念，我们的先王将会告诉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就会抛弃你们，不会来挽救你们的死罪。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迁都计划不会改变，对于我十分忧虑的事你们永远要警戒，我们千万不要相互隔绝疏远。你们应当放弃那些不正确的念头跟从我到新都去。让我们都心平气和，和衷共济。假如有人图谋不轨，心怀不善，欺诈奸邪，违法犯禁，胡作非为，我就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恶劣的孽种在新都邑中延续下去！"

盘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利用商代人敬畏祖先，信奉鬼神的心理，努力地让人们跟到新的都邑去。在迁徙的路上，有些人满怀信心，相信跟随这位有作为的君主会开拓出新的业绩；有些人忐忑不安，不知等待他们的是福还是祸；有些人心怀畏惧，唯恐倘不随从前来就会招来祸殃；有些人为在迁徙中丧失的财物而痛惜抱怨。无论如何，盘庚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开始营建殷都，宫室、房屋和其他设施，一切从简，粗糙、质朴的居所、用具，使人的思想行为安于质朴，一扫昔日王族中奢侈淫逸的风气。紧张的营建、开垦，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大家齐心协力，奋发向上，一改昔日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勾心斗角的内耗。此时盘庚的臣民们，虽然疲惫不堪，但心情舒畅好像清新空气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商朝后期二百七十三年的基业就是这样奠定的。

盘庚迁殷在商朝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这转折必然有一些人不理解，他们散布不满言论，消极怠工。这些人当中有些是王

室贵族，或是世勋老臣，他们的言行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建起简陋的住所后，盘庚安顿好宗庙社稷，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还用龟甲进行了占卜。之后，盘庚严肃地对臣僚、方伯、诸侯讲明他的政治原则。

盘庚说："你们不要懒惰、贪图安逸享乐，要努力地把我们负有的使命建树起来。我现在愿意掏出心肝，让你们明白我的心志。我心中决没责怪你们，你们也不要心存怨怒，散布流言。

"我们的先王为了取得比前人更大的功业，不辞辛劳地迁往山地。这样减少了洪水对我们的威胁，先王功高德厚使家邦受益。现在我们的臣民由于洪水动荡奔腾而流离失所，遭受的痛苦没有止境。你们问我：'为什么因迁都使万民震动?'是上帝要复兴高祖的美德，振兴我们的国家。我真诚恭谨地顺承天命，拯救万民，在这新都使先祖的基业永远传承下去。所以，我不敢使迁都的计划半途而废，也不敢违背神灵的意旨。啊！各位诸侯、方伯、全体官员，我会注意察看你们顾念怜恤民众的行为。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只恭请帮助民众谋生的人。对那些养育民众，为民众谋幸福，使民众安居乐业的人，我会非常敬重他们。现在我已经把立志要做的与决心要改掉的，都告诉你们大家了，希望你们不要轻视。不要聚敛财宝，要在为百姓谋生上立功。要把美德、恩惠施于百姓，永远与民众一心。"

盘庚把都城迁到殷邑后，一些臣民不喜欢住在这里。因此，盘庚请来一些亲近的贵戚大臣，对他们说："我们的君王迁都到这里，已经在这里修筑宫室住所安顿下来了，这是看重我们臣民，使我们不致受伤害。如果我们自己不能互相救助，只是依靠稽考占卜，将会怎么样呢？先王无论干什么事，都恭敬小心地遵从天命。这样，尚不能长治久安，不能长久地住在一个地方，已经迁都五次了。现在如果不继承先王恪谨天命的传统，怎么能知道上天对命运的评判，继承先王的事业呢？就像倒伏的枯树又长出了新芽，被

砍伐的树木又长新枝，老天将会使我们的国运在这个新都获得新生，先王的大业得到复兴，使天下人过上安乐的日子。”

盘庚开导臣民，又教导在位的大臣遵守旧制，重新以法度正天下。他说：“不能让有些人凭借小民的怨言，达到反对迁都的目的。”于是盘庚便命令臣民，全部迁到王廷来。

盘庚说：“来吧，你们各位，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抛弃个人的私心，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放纵、追求安逸。我们的先王，谋划重大的事情总是和老臣共同商量，大家共同管理国政。先王即将发布的政令，大家毫不隐瞒地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因此，先王很敬重他们。先王的大臣从不在臣民中随便散布不满的议论，因此，百姓执行政令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现在你们到处随便议论，不辨是非，我不知道你们究竟意欲何为！

“并不是我背弃了用人的美德，而是你们在众人面前的表现太恶劣失德。我对你们的行为看得清楚，洞若观火。如果你们不慎现在，那么将来大祸终将临头，像懒惰的农民好吃懒做，不勤奋地耕种，到头来就不会有五谷丰登的年景。

“古代贤人说过：人唯求旧，器为求新。从前，我的先王与你们的祖先共同奋斗，共同享乐。我怎么敢对你们随便惩罚呢？你们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我也不会埋没你们的美善。每当我祭祀先王，你们的祖先也跟着一同受到祭祀，无论是赐福还是降灾，我都不敢有任何偏心，都要赏罚得当。

“我把困难明白地告诉你们，是为了激发你们的心志，就像用箭射靶子一样。你们不要轻慢老人、成人，不要欺负弱者、孤苦、年幼的人。人人都要长久在这里生活下去，努力地贡献出你们的全部力量，听从我的谋划、决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用刑罚惩处那些作恶者，用赏赐表彰那些行善者。国家治理得好，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治理得不好，是我一人的罪过。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要告诫你们：从今天乃至将来，各自恭敬

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否则，一旦惩罚临到头上，后悔莫及！”

历史证明盘庚是位富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魄力和勇气的君王，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迁都成功，同时也治理了“九世乱”。在迁都过程中去奢就俭，根治腐败，同时充分利用了殷地自然地理、政治地理上的优势，成功地抵御了反叛的方国、部落的侵扰，迎来了殷商的复兴。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尚书·盘庚篇》

《史记·殷本纪》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为王朝的复兴找到契机，从此商王朝有了新的转机。盘庚在位二十八年，为振兴商王朝奠定了基础。他死后，他的弟弟小辛即位，小辛死后由小乙即位。

小乙做了商王，反复思考盘庚成功的经验，他认为迁都过程中的艰苦奋斗，不仅使王朝本身去奢即俭，更重要的是培养锻炼了一代年青人。他大胆地决定让自己的儿子武丁离开王都到边远地区，去和“小人”一起生活，以便磨炼他的意志和品质。

小乙即位时，武丁已经二十岁左右了。他聪明好学，有远大的志向。小乙为了让武丁学到更多的本领，为国家建功立业，成为一个安邦治国的君主，便把武丁由殷都派到远离王都的艰苦地方。先是隐居在黄河岸边，后来武丁经常在黄河两岸的许多地方观察人民的生活情况，调查人民对商王朝的态度，了解各地诸侯、方伯的动向。这样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其中不少是平民。武丁还和这些“小人”一起耕种，这使他倍尝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知道“小人”们生活艰难，也把他自己身上好逸恶劳的习气去掉了不少。

武丁还在民间处处留心访贤拜师，求学问。有一次他来到虞（今山西平陆一带），听说黄河岸边不远的一个村庄，住着一位很有学问的贤人，名叫甘盘（甲骨文中称作师般），就前去拜访。甘盘学识渊博，对武丁很有吸引力，他们谈得很投机。聪明机敏、才智超群的甘盘，一眼就看出武丁非凡人。他直截了当地问武丁，听

说当今商王之子居于民间，你是不是隐居民间的商王之子？武丁将甘盘引为知己，就以实相告，顺便向甘盘求教治国之道。甘盘见武丁英武神异，有远大抱负，将来一定是位有作为的君主，愿意为他出力。他为武丁讲述了商朝自从成汤灭夏以来，经历了二十一位君王，三百余年兴衰的历史，充分分析总结了历史经验，把深刻的道理从史实中引发出来，听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武丁对他非常佩服，拜他为师，以后经常听甘盘教诲。

甘盘的居地离虞山（今山西平陆与河南三门峡市之间）不远。有一天武丁来到这里。他走到一座山岩之下，见一道涧水飞流，隔断了道路，便逆流而上，转上山岩。这时，他看见许多人在紧张繁忙地劳动，他们把木板用木桩夹住，然后往里添土夯实筑墙堤。这是异常艰苦的劳动，可是干活的人的脖子还用绳子拴着，又把五个人或十个人结成一串。显然他们是被罚做苦役的刑徒，当时叫做“胥靡”。武丁向看管胥靡的小头目打听，在这里夯土筑墙做什么？他说，这里有一条通往邑中的大道，因山中洪水经常冲毁这条路，因此筑一道土堤把水拦住以保护道路。武丁说他想和胥靡们谈谈，这位小头目答应了，找来几人见武丁。

武丁一一问了这几个人的姓氏，和他们随便交谈着，不动声色地了解他想知道的情况。其中有个叫傅说的人，言语不俗，于是就单独和他聊了一会儿。从生活谈起，然后自然谈到胥靡犯罪的情况，由此联系到朝廷时政。武丁说罪犯多了，说明朝廷治民有失德之处，才使人民生活不安定，违法犯禁的事才多起来。傅说见武丁如此简洁地概括了朝廷弊端，就大胆地把他的切身体会和兴利除弊的计划说了出来。武丁听了，惊叹之余，非常佩服傅说。没想到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谈得这么深，更没想到罪犯之中还有如此贤才。可是武丁不可能立即把傅说从胥靡中解放出来，他暗下决心，一旦即位为王，一定请傅说到朝廷帮他执掌国政，一道治国。

武丁在黄河岸边一住十多年，在荒野之中锻炼成熟，他不仅深知“小人”疾苦，也观察到了各路诸侯、方国的动向；不仅从小人的呼声中深知当今时政之弊，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心中有了根治的办法。当他得知父王病重，就重返王都。小乙在病榻之上，看到磨炼得感情丰富、思想成熟、体魄健壮的儿子武丁，就把由武丁继承王位的事定下来。不久便安然而逝。他在位约二十一年。

武丁即位为商王不久，便先把甘盘请到朝中，任命他为辅佐大臣。他虽身为商王，可在守孝三年中不言政事。凡是国政大事皆委托给朝中执政大臣来处理。他只住在凶庐——守丧的房子里。这三年给了他“以观国风”的时间，不断“思复兴殷”修订振兴国家的大计。同时他越来越感到，如果得不到众多贤臣的辅助，仅靠他自己和甘盘等人，是完不成计划的。因此，他更加思念傅说，想着采取哪一种比较妥善的办法，使傅说成为辅佐大臣。如果像请甘盘那样去请傅说是不行的。谁都知道甘盘是个学识渊博的隐士，德高望重，而傅说却是个被人看管的罪犯，任命一个罪犯为相，王公大臣一定认为他疯了。即使任命了也没有用，谁会听从一个罪犯指挥呢？如果他们极力反对，借题发挥，甚至会引起混乱，这可真是个难题啊！他为此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

三年守孝期满，武丁祭告天地祖宗，诸侯、方伯、百官都来朝觐。一切礼仪过后，武丁告诉大家：“我昨夜梦见天帝赐给我一位贤人，天帝指着那位穿着胥靡衣裳的人，对我说：‘这是我的徒弟，姓傅名说。’我醒来后觉得奇怪，仔细想来，才弄明白。傅是来辅佐我的，应该任命他为相。说是喜悦、欢悦，任命他，天下人都会高兴的。这不是天帝要来帮助我并且使老百姓高兴吗？”武丁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于是把群臣挨个仔细地瞧了一遍，没有人和他梦中的人长得相象。武丁愁眉不展地问大家：“怎么办？”大家说只好到民间去找吧。武丁详尽地描绘了傅说的衣着长相，让百工画下来，派人到处访查。有人到胥靡中去找，果然在

虞山的岩下，把傅说找来。当梦中圣人到来时，武丁召集群臣百官前来，大家一看与先前所作画像一样，同声相贺，祝贺武丁美梦成真，得此圣人。武丁当时就任命傅说为相，辅佐他治理朝政。傅说面对群臣百官精神抖擞，发誓尽心辅政，为国为民倾尽全力，以报效知遇之恩。没有人把他当作刑徒，大家自然纷纷拜见这位圣人。

傅说、甘盘都是来自民间的才能卓异的贤人，武丁任命他们为辅臣后说："你们要早晚赐教，来帮助我修德。如果我是金属利器，你们就是磨刀石；如果我要渡过奔腾的大河，你们就是船和桨；如果年景大旱，你们就是百姓渴望的甘霖；打开你们甘泉般的心来浇灌我这久旱的心；如果吃了药却不头昏眼花，病就不会被治愈；如果光着脚走路却不看地下，就可能把脚碰伤；希望你们同臣僚下属，协力同心，纠正我的过失，使我沿着先王的道路，踏着成汤的足迹前进，让百姓过康泰安乐的好日子。啊！郑重地遵守我这些话吧，我们君臣一定善始又善终。"

傅说回答说："木头打过墨线就能砍削得正直，君主听从劝谏就会变得圣明。君主能够圣明，臣下不等待王命便会主动进谏，谁还敢不恭敬地对待您这美善的教诲呢？"

傅说接受武丁之命，总理百官，看到武丁赏罚有不当之处，及时地指出，他说："圣明的君王顺从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立君主，封诸侯，任命各级官员，不是让这些人贪图安逸享乐，而是让他们治理百姓的。老天明察一切，君主应效法老天，耳聪目明。做臣下一定恭谨，百姓要懂得顺从国家治理的需要。对君主来说，轻易发号施令有可能因不当招致羞辱；随便动用军队，因闪失而引起战争；官服要收藏在衣箱里，不轻易地赏赐给人，只赐给那些称职又为国立功的人；兵器要藏在府库中，不能随便地授予人，要授给称职且忠于朝廷的人。如果在这些方面有所戒备并公正地执行，就一切都会美善。国家太平还是动乱都在于百官，

因此，官职不要授给自己偏爱和亲近的人，爵位不要授给品德不好的，考虑是善政才行动，行动还要选择恰当的时机。自以为善而得意，其实已经丧失了善；以自己的才能自夸，反倒失去立功的机会；只有踏踏实实地干事情，凡事都往难处多做准备，则有备无患。不要以过错为耻而文过饰非。如果君主行动端直，朝廷政风自然纯正。祭祀时轻慢不庄重，就叫不虔敬；礼节太烦琐导致紊乱，会达不到事奉鬼神的目的。”

武丁说：“说得真好啊！傅说，你的话令人信服。如果不是你的话如此良善，我也就有可能糊涂地行事。”

傅说叩头下拜说：“我懂得这些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您要照着这些道理去做。你要是真诚地照此施行起来，也就不难了，那才真是合乎先王的盛德。我傅说不把这些话说出来，那才真是罪过。”

经过这次交谈，武丁与傅说更推心置腹，这从他们下面的谈话很容易看得出来。

武丁说：“来吧！傅说。从前我和甘盘学习，不久就跑到荒野之中，居住在黄河岸边。后来又来到亳。品德、学业始终没有明显进展。你要训导我，使我不断经受磨砺，具有远大的志向。如果要使我成为人们喜欢的甜酒，那你就是曲和糵；如果让我成为人们需要的羹汤，那你就是盐和梅。你要从各方而训导磨炼我，不要厌弃我，我一定履行你的训导。”

傅说说：“君王，一个人想多听，这是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只有多从古人的教导中学习才有大收获。做事不注意汲取古人的经验教训，却想使国家长治久安，我傅说没有听说过。要学会使自己谦虚而有大志，必须时时奋勉，品德修养的完善也就自然地形成了。相信记住这一点就会积道有成。教导别人自身也在提高，所以说教是学的一半，自始至终念念不忘学习，道德修养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完善。借鉴先王的成宪，就不会有过失。我傅说奉行你的旨意，广泛地招纳各种出众的贤才，把他们安置到合适的位置

上。”

武丁说：“啊，傅说，四海之内都敬仰我的德行，这是你训导我的结果。有手脚才能成为会行动的人；有良臣才能成为圣明的君主。从前先有保衡的正确训导才塑造出我们圣明的先王。他说：‘我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我内心感到惭愧和羞耻，就像公众用鞭子抽我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因没得到妥善安置，而没有充分发挥才能，他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他辅佐我的祖先建功立业，被皇天赞美。希望你也使我圣明起来，不要只让保衡在殷商独享盛名。君王没有贤臣就不会治理国家，贤臣没有君王任用也不能取得俸禄。你要让你的君王继承先王的业绩，长久地使百姓生活康宁。”

傅说跪拜叩头说：“我冒昧地说，我一定要宏扬天子的美好教导。”

武丁君臣合契同心，励精图治。武丁在位五十九年，甘盘逝世后，他主要在傅说、祖己的辅佐下建功立业。《史记·殷本纪》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人安乐欢悦，使殷道复兴。所以武丁就被称为“中兴”之王。

武丁深知稼穑之艰难，关心人民疾苦，勤于政事，努力发展生产。甲骨文向我们证实每年春秋两季，武丁都要举行专门的祭礼活动、祈求五谷丰登。从甲骨文中来看，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有稷、稻、麦（大麦）、秣（小麦）。武丁时期有不少“受黍年”、“受稷年”、“受稻年”的卜辞。可见这几种粮食作物尤其受重视。武丁还经常视察农田，卜辞中叫“省田”或“省鄙”。鄙指王都之外的田野。这些地区有大量的农田、牧场。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多有祈雨的记录。

武丁十分关心、注重发展畜牧业。经常亲自到牧区视察畜牧发展情况。卜辞中有“王往省牛”的记录。敦（今河南沁阳附近）是当时一个大的农牧区，武丁经常去那里视察养牛的情况。商

族原本是个游牧民族，畜牧业是他们的老本行，各地畜牧业在武丁时期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卜辞中有各地进贡“致牛”、“致马”、“致豕”的记录，其中有一次“致牛四百”之多。可见其畜牧业高度发展的景象。

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强盛起来，改变了王朝衰弱的局面。当时大大小小的方国，在商朝衰弱时纷纷叛变、反抗，有的还不断侵扰。武丁时期西北方的劲敌是𢀛方。从甲骨文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国，族居地在今内蒙南部、陕西、山西北部一带。这个方国在武丁时期还是个游牧部落，活动范围广大。一直也没有向商朝臣服。盘庚迁殷以前，商朝衰弱，无力顾及，使𢀛方势力逐步发展壮大起来，逐渐侵扰农耕区，甚至经常出现在商王畿内。武丁时期由于生产发展，境内富庶，经常遭到𢀛方抢掠，人民饱受其骚扰、掠夺之苦。甲骨文的记载向我们表明，武丁经常接到𢀛方来抢掠属国、属地的报告。其中有一次𢀛方抢走了向王朝进贡的五十头牛。武丁决心对𢀛方进行征伐。这次征伐持续了很长时间。除了动用常备军，还经常向各地征召军队，其中有步军，有战车。当时带兵将领有禽和甘盘，也曾命其他官员带兵征伐。商朝还调用了戈、羽等诸侯国的兵力。每次征伐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占卜，祈求上帝神灵和祖先保佑旗开得胜。经过大大小小的几十场战役，最后把𢀛方平服了。从此𢀛方在历史上消失。

土方是居在今山西和河北北部的游牧部落，虽势力不如𢀛方，但距离商王畿较近，也前来骚扰抢掠。武丁对土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大的战斗是由武丁亲自率领和指挥的。经过二三年就把土方的首领杀掉了，大批土方俘虏做了商的奴隶。土方的人民归顺商朝，成了商的国民。许多土地后来被开垦为良田。后来武丁多次到那里视察，关注商朝向北方的发展情况。

武丁征鬼方，用了三年时间，这件事见于史籍。甲骨卜辞中

也有记载。这是商代史上的大事。鬼方地处土方西北，占据了今内蒙南部、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一带。强大的商朝迅速地向北发展。

羌，又称西羌，或西戎，是一个古老的部落，“禹兴于西羌”说明夏与羌有族缘上的关系。到了商代，羌方、羌龙、北羌和马羌，分散于商朝西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绵地千里”，大致在今青海东部、甘肃、宁夏及内蒙南部。羌龙、北羌和马羌与商接境，离王畿较近。武丁对羌也进行征伐。羌人的部落很多，也有臣服于商的记录：马羌被武丁征伐后，臣服了。但羌人与商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商朝也一直未能彻底征服羌人。卜辞中记录的商王朝祭祀所有人牲，大多为羌人。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有“羌四百于祖”的记载。所以每当商朝衰弱，羌人也活跃起来。武丁中兴，镇压了邻近的羌人部落。

商朝境内大大小小的诸侯、公伯，在商中央王朝衰弱时，大多拒绝称臣纳贡，武丁对他们进行了征伐，使他们臣服，纳贡。武丁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诸侯、方国的统治。除封官晋爵还修建城郭、建立居民聚居点，帮助开垦农田、发展社会经济。

商代的东夷，基本向商臣服，这与商出自夷人部落有关，武丁时期有征伐夷人的记录，但不是很多。

《诗经》中有武丁征伐荆楚的记录。荆楚地区在商代获得很大发展，这与武丁时期先进的青铜文化传播到那里有直接关系。

武丁后期还灭了大彭和豕韦两个方国。这两个方国在商王朝衰落时曾反叛，自那时起不再纳贡称臣，被武丁消灭掉了。

武丁中兴时期，由于国力强大，使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在几十年间，不断征伐，结束了西、西北、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侵扰，加强了对诸侯、方国的控制，巩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促进了民族部落之间的交流、融合，使商朝统治中心繁荣起来，其中心地带虽仍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

地区，但势力所及已是东到辽东、山东半岛，西至陕西、甘肃南部、北至内蒙南部、河北北部，南抵江淮。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人民友好往来，新的被开垦的土地增多。经济文化的交往联系，增强了整体感，商王朝的中心作用突出。商朝进入了一个强盛的时期，武丁也成了以武功著称于世的君主。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病死，从甲骨卜辞中得知，他有三个入于祀典的王后，称为妣戊、妣辛、妣癸。前者生祖己（与辅臣祖己同名），中者生祖庚，后者生祖甲。

武丁的长子祖己以孝名闻天下，相传祖己经常一夜起来五次看看父母睡得好不好，也深得武丁的宠爱。祖己被人称作孝己。但祖己的母亲死后，武丁轻信了嫔妃的坏话，把太子祖己流放到边远地方。后来祖己忧愤而死。全国的百姓得知这位孝子的死讯，都沉痛哀悼他。他的两个异母弟祖庚、祖甲相继为商王。

祖己被流放而死，实际上是一场王权斗争。显然武丁有失德之处，人们对祖己的哀悼，实际上也是对武丁的指责。就在祖己这位孝子死后的第四年，武丁在太庙祭祀成汤；祭祀后第二天，又隆重地再祭，这叫肜（rǒng）祭。就在鼓乐齐鸣时，有雉（野鸡）飞来，在太庙飞了一圈后，落在了大方鼎耳上，伸着脖子鸣叫起来。武丁大惊失色，认为是先祖成汤不满意而降下不祥之兆。大臣祖己连忙乘机进谏，说："请帝王不要怕，只要您认真修德多做为国为民的事，也会让先祖满意免除不祥。"

祖甲出生时，武丁已老，老年得子，分外宠爱。当武丁又要废祖庚立祖甲时，受宠的祖甲却深明大义，为了不让祖己的悲剧重演，为了不让因兄弟争夺王权的"九世之乱"发生在他这一代，祖甲偷偷离开王都，像当年他父亲武丁那样，到平民中去生活、磨炼。他过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百姓一起劳作，亲身体会平民与奴隶的疾苦。由于祖甲远避他乡，避免了一场王位争夺。年老的武丁无力多顾，当他得知祖甲是逃到他年青时生活的地方，与"小

人”们在一起时，也就放心不管了。

当祖庚即位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在武丁中兴的基础上，他安享了十年的清福后死去。祖甲即位为新一代商王。这时正是商朝的兴盛时期，远近称臣，四方纳贡。祖甲和武丁一样深知民间疾苦，在民间经受过磨炼，懂得要巩固商王朝的统治，必须与民同乐，要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缓解武丁征伐四方造成民力疲敝的状况。祖甲时期，不但没有大的征伐战争，而且也不加重百姓负担，使他们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生产。祖甲为了限制诸侯、方伯和百官对百姓的过分盘剥、过分榨取方国贡物，防止他们奢侈、贪欲不止引起百姓反抗，下令将先祖成汤制定的刑法——《汤刑》加以修订、执行。这样一来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起，一些亲贵对祖甲心生愤恚，但并没有引起大的混乱，祖甲这一做法，却深得百姓拥护。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殷本纪》

《尚书》：《说命》、《高宗肜日》。

周族兴起

周族与夏、商一样，也是由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部落发展而来。早在部落联盟时代，周的先祖稷曾为尧的农官，并与夏禹、商契一起服侍过舜，稷还协助过大禹治水。稷也叫弃。传说，弃的母亲叫姜原，可能出自古羌人部落。她是帝喾的元妃。有一天姜原到野外去出游，忽然看到一连串的巨大脚印。不知怎么姜原对这些巨大的脚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由自主地用脚踩着这些大脚印，内心情不自禁地想象着留下如此巨大、深陷、清晰脚印的人，一定是位英武无比、力大无穷、目光犀利的英雄人物。她崇拜着内心勾画出来的那位英雄。姜原踏在巨大脚印之上的身体，忽然有所感应。就这样姜原怀孕了。

十月怀胎，姜原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她怕这个孩子为自己招来祸殃，内心的忧虑使她决心摆脱这个孩子。她把孩子丢弃在狭隘的小巷，迎面正巧走过来成群的牛马，她想就让这孩子被牛马踩死吧。可是，那些牛马竟小心地避开孩子，没碰他一根毫毛。姜原又抱着这孩子来到深山密林，可是平时荒无人烟的密林深处，这天竟来了许多人，他们迁居到这里，正忙着安家。姜原把这孩子从密林带到河边，把他丢弃在冰封的河面上。忽然大群的飞鸟落在这孩子周围，用毛茸茸、暖烘烘的羽毛覆盖在这孩子身上……姜原看到这孩子遇难呈祥，心里着实奇怪。她不敢违背天意，改变了最初的念头，决定把孩子抚养成人，为孩子取名叫弃。弃是丢弃、抛弃的意思。

弃果然发育得飞快，当他还是小孩的年龄，却已长得像位屹立的巨人。别的小孩游戏、玩耍，他却喜欢种植麻、栽树、种豆类和麦类植物。等到他长成大人，更加喜欢耕田种地。他能够分辨土质的好坏，知道哪一种土质适合种植什么。所以，他种的庄稼总是获得好收成。部落里的百姓纷纷向他请教，弃毫无保留地指导大家，结果，大家的庄稼都获得好收成。

弃种庄稼很有学问，并热心指导大家的事，很快就传到部落聪明首领尧的耳朵里。尧把他请来，任命他为部落联盟的农官。弃更加努力地奔波于全国各地，粮食逐年增产，使百姓脱离挨饿忍饥的境况。到舜即位后，弃帮助禹治理洪水。洪水退后，昔日的农田已经变为白茫茫的荒地，老百姓没有吃的。由于多年治水，弃高大的身体已经瘦弱了许多。疲惫的身体根本来不及恢复，舜就命令他动员指导百姓播种各种庄稼。弃不顾个人的劳累，又踏上征途，在广大的原野上奔波……

在受封的大会上，舜说："弃，洪水过后，黎民百姓忍饥挨饿，正是由于你的精心指导，才使五谷丰登。你的封地是邰，那里靠近姬水，你就姓姬吧。你的封号是后稷。"后来人们把这位后稷作为农神，供奉在庄严的社坛里，把他与土地神——社并列。人们还把他的事迹编成歌传唱。收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生民》，便是其中的一首。

后稷的部落由于封于邰，故称有邰氏。后稷死后传位于他的儿子不窋。不窋末年，正赶上夏朝衰落，太康只顾享乐，不修政教。不窋继父职为夏朝农官，太康根本不关心农业上的事，觉得这个农官是多余的，干脆罢掉了。不窋失官之后，不久太康失国。不窋大概不愿意接受夷人的统治，于是率领他那强大的部落，向西跑到戎狄的地方，在那里继续发展。不窋死后，他的儿子鞠成为部落首领。鞠死后，其子公刘即位。

公刘虽身处戎狄，却一心务农，保持其祖上农耕的传统。他

性情忠厚、善良、仁慈，深得百姓拥戴。但是戎狄之地，毕竟到处是牧场，部落间的冲突不断。周人也不断寻找发展的机会。公刘带领部落中的一大部分，来到渭水之滨的豳地。豳地山水相依，沃野广阔，周人一到这块适宜农耕的地方，发展很快。公刘带领大家伐树除草，使豳地逐渐地开垦出来。在开发荒原的过程中，周人已经“取厉取锻”，利用陨铁锻造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周族的生产力获得发展。来到一个新环境后，由于气候不同，公刘十分注意观测太阳、月亮的变化，因为这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他认真地研究了这里的土质，观察山间流水的规律，利用当地出产的各种材料，制作生产、生活用具。在开发这片荒原过程中，公刘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品质和出众的才能，人们万分感谢他，情不自禁地把他的事迹编成了歌，传唱开来。后来《公刘》这首长诗也收入《诗经》之中。人们敬仰公刘的德惠，纷纷投到周族的部落，从此人丁兴旺起来。公刘在豳地的发展，为周族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刘之后传了九代，古公亶父被立为姬姓部落首领。到了这时，姬姓部落由于农业生产长期稳定的发展，逐渐地富裕起来。邻近的游牧部落经常来骚扰、掠夺。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獯鬻、戎狄部落。这些崇尚征伐的凶残部落，大举进攻豳地。古公亶父没有办法，只得把珠玉、皮帛、犬马献给他们，以求安宁。但是，这一切全无效果，他们要占有这里肥美的土地，把它变为牧场，还要把这里的百姓留下来为他们放牧。百姓听到他们竟如此无理，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决心与他们决一死战。古公亶父何尝不愤怒，可是面对乱成一片、失去理智的百姓，他知道战而必败。这时，他异常冷静地对大家说：“大家推举我做君主是看我能为大家办事，我的责任是不能让大家受害。现在戎狄来攻打我们，是看中了我们这块土地和我领导下的百姓。你们大家想一想，大家在我的管理下种地，与在戎狄首领的领导下放牧，究竟有什么不同？

你们决心要与戎狄决一死战，甚至抱定必死的信念，难道还不是为了我吗？真的打起来，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是父亲，或者是儿子，必定要战死的。我不忍心这么做。”万般无奈之下，古公亶父带着部落的人们离开豳地，向他乡迁徙。

他们渡过了漆水和沮水（今陕西麟游境内），越过了梁山（今陕西麟游东南部），来到了岐山之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岐山南面是一片平原，沃野之上绿草如茵，这片肥美的土地被称为“周原”。古公亶父来到周原，忧愤郁闷的情绪一扫而光，奔走的劳累也无影无踪。他向上帝和祖先卜问一番，得到的尽是好兆头。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

古公亶父带领大家开垦周原，修好田界，开挖排灌的沟渠。肥美的周原给了勤劳质朴的开垦者以加倍的报偿。邻近人们见到古公亶父一班人竟这样不凡，使周原变了模样，变得更加富饶美丽，纷纷投到古公的部落。不久，居住豳地的百姓，听说他们日夜怀念的古公亶父已经在岐山开辟了家园，纷纷说：“古公亶父这样的君主，到哪里哪里就丰衣足食，我们决不离开他！”纷纷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亶父。古公亶父见到这么好的百姓，心情十分不平静。昔日寂静的周原一下子热闹起来。

当百姓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古公亶父带领大家修建了一座宗庙，感谢祖宗。当他们面临一场巨大灾难时，却因祸得福，姬姓部落又重新聚集在周原，这都是上帝与祖宗的保佑。接着又修建了宫殿。古公下令改革戎狄之俗，并设置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等五官有司。由于姬姓部落来到周原后，其文化习俗与周围部落明显不同，文明程度较高，从此他们被称为“周人”——开发周原，并在那里定居的人。

昔日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周原，如今到处是绿油油的庄稼。昔日弱小的姬姓部落，如今已是远近闻名，戎狄畏惧的周人的国家。得人心者得天下，周朝的王业是古公亶父开创的，古公亶父

被周武王追尊为太王。人民歌颂古公亶父的诗歌很多，收入《诗经》的不只一首。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季历的妻子太妊是位聪明、品格高尚的妇女，他们夫妻很讨古公的欢心。一年秋天，太妊与季历的儿子降生，一只红色的鸟正好落在他们的窗前，嘴里还唱个不停，它唱得非常悦耳，这在古公亶父听来，就像是专为他的孙子的降生来唱喜歌。古公认定这只红色的鸟将为季历与太妊的儿子招来“祥瑞”之兆，心中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周族日益昌盛，能成就大业的一定是我这个孙子啊！”于是，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昌，这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

姬昌的母亲端庄、贤淑，当她身怀姬昌时，眼睛不看邪人恶事，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不出恶语，为的是对姬昌进行胎教。如此精心进行胎教的孩子，生下来果然聪明伶俐。太妊教一，而姬昌知百。姬昌赢得了祖父古公亶父的深爱，古公恨不得马上传位给这位绝顶聪明的孙子。

古公亶父为姬昌所做的一切，自然逃不过太伯和虞仲的眼睛。他们深深地理解父亲是要使周族昌盛，才对孙子倾注如此多的深爱与厚望。既然父亲做了如此安排，兄弟俩决心要像父亲那样，凭着自己的本事与德行到远方开创出自己的业绩。于是兄弟俩便假托为古公采药，跑到南岳衡山，然后又跑到远离周原的荆蛮。他们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全心全意地行善施德，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与尊敬。不久，太伯被拥戴为首领。太伯率领大家在吴（今江苏无锡）修建了城郭，建立了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

古公病重，太伯和虞仲回来探望，季历再三让位于太伯，太伯坚持不受，又回到了吴。这样，由于姬昌还小，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继承了君位。

周族在古公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商朝已经封他为诸侯国君。

季历即位后，为了取得强大的商朝的支持，便在商王武乙三十四年到商都觐见。武乙见这位即位诸侯王，十分高兴，赏给季历三十里土地，还赏给他十双美玉做成的大璧和八匹好马。

季历对内继续奉行父亲古公亶父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发展农业生产，团结民众，增强实力；对外与诸侯搞好关系。如今又有了强大的商朝的支持，开始大规模地对长期欺侮周族的戎狄进行反击。他首先率军攻打了西落鬼戎，一下子抓到他们十二个部落的首领。初战告捷，季历洗刷了多年的耻辱，获得了大片土地、奴隶，使国力进一步加强。到了商王文丁时期，季历又率领周人去攻伐燕京之戎，但这次失利。文丁四年，季历总结了失败的教训，重振旗鼓，又去进攻余无之戎，结果大获全胜。商王文丁看到季历是个人才，封他为殷牧师，管理商朝的畜牧业。季历做商朝的官吏，并未停止对戎狄的军事行动。文丁七年，季历又领兵征伐翳徒之戎，把他们打败，并杀了三个重要大臣。季历一系列的征伐活动，解除了戎狄对周人的威胁，扩大了疆域，获得了大量财产和奴隶。

季历积极向外扩张、势力不断发展。季历一再献俘及报捷，文丁表面上很高兴，还不断地赏赐他，其中有用黍和香草酿制的香酒“秬鬯”、用美玉雕制盛香酒的圭瓒及祭祀时使用的其他器皿，这些都是规格很高的奖赏。还加封季历为西伯（统率西部地区的最大诸侯）。可是正当季历高兴地辞朝回归时，文丁突然下令把季历囚禁起来，把季历的随从放回周。季历一气之下，竟死在商都。

季历死后，儿子姬昌即位。这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决心为父报仇，积极准备。

过了两年，文丁病死，文丁的儿子帝乙即位。第二年，姬昌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前来攻商。帝乙得知姬昌要报父仇，感到父亲文丁实在过分，本来季历勤劳王事，并且攻打的是远在西部的戎狄之人，虽然周的势力扩大很快，可并无叛商之心。而这时，地

处东南的人方正与商朝矛盾重重，倘商周交恶之际，东南火起，商朝腹背受敌，这会引起众诸侯乘机叛商。于是，帝乙决心缓解与姬昌的矛盾。

他派了一位能言善辩的使者入周，使者首先代帝乙向姬昌道歉，一再说明，父辈交恶已经过去，后代应该忘旧仇修新好。为了表示诚意，帝乙决定把美丽端庄的妹妹嫁给姬昌为妻。既然肯结为亲缘，也就无仇可报。况且，真正的仇人都已长眠地下。姬昌虽为报仇做了充分准备，但他面对的毕竟是强大的商朝，是统帅诸侯的天子，取胜的把握也实在不大。况且帝乙此举有理有节，也不容他一意孤行，只好答应恢复亲善，暂去前嫌。于是备办了贡物，遣使入朝，与帝乙商定日期以便迎娶。帝乙备办了十分丰厚的陪送财物，并派亲军卫队护送妹妹，姬昌也把婚事办得极为隆重盛大。这件事无疑抬高了周在诸侯中的地位，这在诸侯中很有影响。显然，帝乙在下力量拉拢这位有实力的诸侯。周族的百姓，看到昔日被人欺侮的小邦国，如今竟能与大邦天子之妹联姻，真是可喜可贺，老百姓们热烈地唱起祝福、喜庆的欢歌。《诗经·大雅·大明》中有一段专门写这件事。诗中周人的欢歌笑语，引以为荣的情绪，至今仍在令人深受感染，其中"天作之合"一语，成为祝贺联姻结偶的成语，至今仍遗留在汉语中。商周联姻，缓和了恶化的关系。也是周族兴起的重要标志。有关周族兴起的这段历史，见于许多文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原进行多方考察探索，进行大面积的钻探、试掘，其中1976年在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西周早期基址，证明这里是周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发现了早期周人的宗庙基址，它深埋于地下约一米左右，宗庙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总计1469平方米。这是一座朝南的廊院式建筑群，最前是影壁，还有门道、中院、走廊、前堂大殿、东西小院和后室。显然这是由若干建筑组合而成的建筑群。

这里发现了用陶管做成的水道，用河卵石砌成的水道，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瓦。在这座庄严肃穆的建筑里，周人曾举行过各种盛典：祭祀神明祖先、祈求丰年、战前的誓师大会、献俘告捷、灼龟卜筮、占问疑难、庆祝胜利和丰收……

在这座遗址中的西厢房二号房间的一个窖穴发现了一万七千多片西周早期甲骨。其中卜甲一万六千余片，为龟腹甲。卜骨三百余片，为牛的肩胛骨。这样我们也就见到了周人自己用文字记录的历史。这批甲骨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大事。另外，发现周人采用"月相记时法"，如"既魄"、"既吉"、"既死霸"等等。这与商代甲骨的"干支记时法"不同。与夏代称"岁"，商代称"祀"不同，周人称"年"。这说明周人有自己的文化系统。

位于岐山之下，渭水之滨的周原，是周族文明的发祥地，周族从这里兴起，这里的宗庙宫室，在文王迁都于丰之后，仍然被周人精心保存，直到周末平王东迁后，才毁于戎人的战火。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

《诗经》：《生民》、《公刘》、《大明》等篇。

文王受命

姬昌与帝乙联姻，使双方极为紧张的关系得以缓解，也使双方都从中获利。帝乙让姬昌继封为西伯，位极“三公”，地位很高。他遵循祖先后稷、公刘的遗训，大力发展农业，不忘祖父古公亶父、父亲季历的榜样，要进一步使周族强大起来。他敬老爱少，增殖人口，励精图治，不仅使周国大治，也使自己在诸侯中威望越来越高。帝乙则腾出手来，向东南的人方大举进攻，帝乙还征伐过盂方，这无疑巩固了商朝统治。

帝乙的长子叫启，是庶出；幼子叫纣，也称受，是嫡子。帝乙很想让启继承王位，但朝廷的太史官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嫡庶不分，帝乙只好决定传位给纣。这件事说明传子制的嫡、庶之分，及宗法制度已经形成。同时也说明，朝廷大臣借助各种制度、先祖遗训、上天、百姓等对君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帝乙虽然看重启，可是他不能破坏祖制，只好遵制立纣。纣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取胜，说明传贤的影响大大削弱。帝乙在位二十多年，死后由帝辛即位，他就是著名的商纣王。

大臣们以劝谏的方式，借助祖制阻止了帝乙在王位继承上的个人意志。但是，他们对商纣王的任何个人意志也阻止不了，这就造成了商朝灭亡的悲剧。

商纣的曾祖父武乙是个喜欢田猎、征服的帝王。他只相信征服能使人屈服，其他的一切概不相信。尤其是他在周侯季历的协助下，征服了西部地区的方国，因此只相信武力才能维持统治。对

商族传统的上帝鬼神观念也产生了怀疑，对史官们借助祭祀、占卜来干涉他的行为极为不满。他大胆地打破神权，加强王权。他命令工匠雕了个木偶，称作天神。他让人把这个木偶神设置在廷中，设下赌局，召集群臣来观局，他要与天神赌博。有一位史官说木偶天神不会赌博，他便命这个史官代替天神，因为史官经常向天上神卜问。结果武乙连赢三局，便责问史官："你既能替天神言事，天神为何不助你赢我？可见天神不灵。"他命侍卫剥去天神衣冠，痛打一顿，以鞭笞神权证明王权至高无上。武乙为了要在天下人面前公开宣布神权无用，王权至上，命令在郊外立起一根很高的木杆，让工匠缝了一个皮革口袋，里面灌满了人们祭祀天神的牛羊血，把口袋挂在高高的杆上。武乙下令史官、朝臣、黎民百姓都来观看他射天。等待人们到齐了，他手持弓箭把口袋射穿，血水喷流而下，他却大笑着说："天也被我射得流血了。"自此以后史官、大臣不敢再干预武乙的行动。他更加放荡，以武力制人，无所顾忌地到处游猎。

武乙这件事说明，商纣王这种无道暴虐的君主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商朝后期王权发展的结果。第一，严格的传子制削弱了传贤制的影响。第二，制约王权的种种力量被王权冲破了。既然连商朝最为强大的神权，都被鞭笞、射穿，还有什么能制约王权呢？王权一旦失去限制，就自然会出现商纣王这样的君主。相比之下，做一个好的君主实在太难了，像武丁、祖甲要抛弃舒适的王公生活，去和小人生活在一起，像苦行僧般去磨炼；像武丁带领人们迁都，在各种矛盾斗争中周旋，当迁都完成之后，还要去奢即俭，不敢享乐；他们还要主动纳谏让大臣来制约、改正错误。总之，他们要敬畏天地鬼神，敬畏祖宗，遵守各种制度，要和诸侯搞好关系，防止他们背叛，更要敬畏百姓，千方百计地对他们施以德惠，等等。为了善始善终，他们时时刻刻，克勤克己。这些帝王从惨痛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对王权的正确认识，很容

易地被他们后人淡忘了。

纣天资聪明，敏而多才，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格斗。有一次，他把九条牛拽得向后倒退；还有一次用手托住宫殿的大梁，让人们从容地换掉梁下的柱子，仍面不改色。他能言善辩，遇事自以为是，认为臣子中没有人比得上他，不听臣僚劝谏。他好大喜功，性情残忍，对反对者施以酷刑，使讨其欢心的谀臣争相而来。他在商都以南的朝歌（今河南淇县）修建了离宫别都；在商都以北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也修建了离宫别馆，建有林苑亭台。这个南北二百多里的地区都算作商都的范围。纣经常带着美女歌姬和一些近臣，往来于朝歌和沙丘。沙丘有一个很大的苑囿。古代苑囿是皇家公园，里面畜养禽兽、种植果木。纣在沙丘苑囿中饲养了许多珍禽异兽，大兴土木，消耗了大量资财。于是纣下令全国增加赋税，规定属国进贡方物由一次增加到两次。但此时，诸侯、方伯常不来进贡。于是他下令各诸侯、方伯前来黎（今山西黎城）相会。

纣在黎逞尽强力之威，亲军卫队全副武装戒备森严，又让正规军举行大蒐的阅兵式，诸侯、方伯看到的是刀枪林立、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示威，就明白了几分。会上，纣当众宣布，各地要按期加倍贡赋税、方物。如此强大的武力，诸侯只好服从，但东夷首领按捺不住怒火，中途而逃，拒贡叛商。

东夷叛商，纣决不轻饶，为了征东夷，又要向诸侯征收一笔军费，有苏氏（今河南武陟东）因地小人稀，出产不多，无力提交年年增加的贡赋，纣认为有苏氏有意对抗，派兵征讨。有苏氏无力抵御，便献上美女妲己以求平安。纣见妲己确实很美，便撤兵免贡。

纣还下令各地诸侯出兵协助征伐东夷，甚至动用了象队，如此巨大的猛兽队伍令东夷人惊恐不已。大兵压境之下，经过几次顽强的抵抗，东夷人只好投降。纣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面，使

东夷人从此无力叛商。但是纣无力西顾，对周人全然放松了戒备，这为周人灭商创造了条件。

征伐东夷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本应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可纣却认为勇力、武力使天下已服，放纵地享乐。为享乐竟将农田荒芜变为游猎场所，使民无田耕种、流离失所。他修建了方圆三里，高过千尺的鹿台。加重天下赋税，让聚敛而来的钱财把鹿台装满。又修了个叫钜的仓库，把从各地搜刮来的粮食，装满这个其大无比的仓库。他还把天下狗马奇物运到宫室内外。好酒贪杯，宠爱妲己。让乐师师涓作了靡靡之音，让宫女们跳起淫秽不堪的“北里之舞”。在离宫别馆，摆出了酒池、肉林。肉林，即把熟肉挂在树上，人们可随便摘取来食。成群男女，赤身裸体，长夜纵情狂欢于酒池肉林之间。

在纣身边围着几个助纣为虐的谀臣。一个是善于谀媚贪图贿利的费仲，另一个是忠实走狗蜚廉，再一个是力大而又善于造谣生事诋毁他人的恶来。其中蜚廉和恶来是父子，也就是后来秦国的祖先。还有一个诸侯叫崇侯虎，他是纣的忠实耳目，好打小报告。这些人陷害贤良，仗势欺人，却深得纣王与妲己的信任。

但是，朝廷上直臣还是勇敢地面对邪恶，奋勇抗争。有个在朝的诸侯叫梅伯，多次劝谏纣不要任意对臣民施加重刑。纣竟把他杀了，还把他剁成肉酱分赏给诸侯们吃，并同时宣布再有劝谏者，以此为例。

为了镇压反抗，纣及佞臣制定了一系列野蛮的刑罚，镇压那些敢于反抗的人。其中有一种叫“炮烙之刑”，即用青铜铸造一根中间空的铜柱，把人绑在铜柱上，下面烧火，把人活活地烙烤而死。

纣有“三公”，是三位地位最高的诸侯。即九侯、鄂侯和周公（西伯）。九侯（封地在今河北临漳）有个漂亮的女儿，被迫献给纣王。妲己嫉妒九侯女的美貌，竟说纣王年老眼花，被九侯欺骗

送上个其丑无比的女人，竟被说成是漂亮的。经妲己一番胡言，纣竟觉得九侯的女儿是丑的，不但把九侯的女儿杀了，还迁怒于九侯，把他也剁成了肉酱。从此天下凡有美女者都千方百计地封闭，躲藏起来，唯恐被纣得知。鄂侯觉得九侯实在死得冤枉，为他申辩了几句，于是，也被纣王做成了肉干。西伯姬昌听到二人惨死的消息，兔死狐悲，不由地长叹一声。谁知隔墙有耳，竟被崇侯虎听到了。这位善于打小报告的心腹，马上报告了纣王。商王一听火冒三丈，下令把西伯姬昌关了起来。

姬昌被关在羑里的监狱内，他在高墙之中忧国忧民，研究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把古人传下来的易经八卦，推演为八八六十四卦，从此有了周文王推演的易经，即“周易”。周易后来被孔子列为儒家六艺之一，是中国的古代经典著作。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囚禁西伯的消息传到周以后，周的大臣闳夭、散宜生等人商议救西伯的办法。想到应充分利用费仲这好利的谀臣，通过他向纣打通关节。于是他们在有莘国（今陕西合阳东南）选了一个有莘氏的美女；在西戎选了些骏马；到各地千方百计地置办许多美玉、宝器、珍奇玩物，通过费仲的手，向纣说情。这时姬昌已经被关押了很长时间。纣见了有莘氏美女，异常高兴，说：“光是这个礼物（指美女）就足可以让我把西伯放了，何况有那么多东西？”于是下命令把西伯放了，还给了西伯弓矢、斧、钺等兵器，这些兵器是王权的象征。西伯得到这些，就被受命拥有征伐诸侯的权利，使他可以代表纣王征伐西方诸侯、方国。并且，纣还告诉西伯：“当初，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西伯愿意献出洛水以西的地方，请求纣废除炮烙之刑，纣也同意了。

西伯姬昌回到周以后，广为宣传这次受命，到周所建立的商代祖先的庙中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1977 年陕西周原考古队在周的祖庙遗址中发现的甲骨卜辞中记载了这次活动。卜辞还证明，这

次姬昌树起了周方伯的大旗，对内称周王。周文王是他死后的尊称。

姬昌足智多谋，自从他即位为西伯，虽然掌握着西部的征伐大权，维护商王朝在那里的统治，不过他充分吸取父亲季历的教训，从不到处征伐，炫耀武力。一方面，对商朝始终存有戒心，另一方面，对叛商的各戎狄、诸侯不再采取大规模的征伐。以免有扩大实力之嫌。他采用各种手段去拢络、收买，以争取人心。他先后调解过虞（今山西平陆北）和芮（今山西芮城一带）两国的矛盾，也利用他的权力征伐过犬戎（西戎的一支）、密须（今甘肃灵台）、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等国，都取得了胜利，这样他的胜利深入到了商王朝的腹地。

这次被放出来之后，姬昌仍然采取一贯做法，把全部机锋隐藏得滴水不露，表面上装出一幅对商王朝忠心耿耿的样子。在狱中，全凭他装作憨直、忠心才躲过被杀的灾祸。当时他的大儿子伯邑考被商纣王扣作人质，纣王把伯邑考杀了，并做成肉汤送到狱中，请姬昌喝。他虽然内心绞痛，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喝着肉汤。纣王听到报告后，说："谁说西伯足智多谋、见多识广、未卜先知？他喝了用儿子的肉做的汤怎么不知道啊？"因此觉得他是个平庸之辈，放心地交给他征伐大权。其实姬昌念念不忘杀父、杀子、被囚的大仇。不过其采用的方式极为隐蔽、高明，表面上甚至不干侵犯商朝利益的事。

他并不凭自己冲杀取得天下，而是赢得天下人心。纣王自己的暴虐无道，恰恰为姬昌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说是纣王自己把天下人推向了周王姬昌这一边。

他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和商纣王的专横暴虐形成鲜明对照。四方人士都纷纷投奔他。有时他从早到晚不停地接待来访，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甚至像商的老臣、忠臣辛甲大夫等都前来投奔。辛甲曾经劝谏商纣王达七十五次之多，觉得纣实在不可救药了，而

周早晚会取代商纣，所以才弃纣投周。在人心思归的大潮中，要数姜尚投奔文王的事情最富有戏剧性了。姜尚，字子牙。祖先曾为舜时“四岳”之一，曾帮助大禹治水，因功被封在吕，到后来姜姓子孙逐渐分化，因地为氏，故又称吕尚。到吕尚这一代，家里很穷。这位东海上人，年轻时为了生计，曾在繁华的朝歌当过屠夫，宰牛卖肉。后来在孟津开过酒店，卖酒赚钱度日。这位混迹于市井的人，其实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他在商朝怀才不遇，处处失意，直到满头白发，仍想寻找机会施展抱负。他听说西伯周王广招贤才，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多年来的理想与抱负。便来到周原，在岐山之下，渭水西南的一个支流，叫兹泉水的源头凡谷钓鱼。他知道周文王早晚要出游来到这里，想在那里等待遇上周文王的机会。

他在那里等了三天三夜，周文王不出来，鱼也一条钓不上来。据说这位白发老人心浮气躁，竟甩掉了帽子，扔掉了衣裳，十分狼狈。这时一个农夫模样的人，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别着急，把鱼饵做好些，把线弄得细一些，下钩时尽量轻一些，千万不要使鱼惊动！你再试试看。”他依法办理，果然钩钩不空。他毕竟悟性极强，他明白了要灭掉商朝，必须从长计议，一切都悄悄做好准备，千万不能惊动纣王这个力大无比的暴君，千万不能让他看出破绽。他也更加明白周文王智慧超人，于是便静下心来等下去。也有人说，姜子牙在那里用的是直钩，根本没想钓鱼，只是为等周文王做做样子罢了。

这天，周文王姬昌要出猎，照例先占卜。据说这一卦预示：所获并非龙虎熊罴一类的异兽珍禽，而是一位能辅佐他成就霸王之业的奇才。当他来到渭水南岸，遇上了早已在那时等待他的姜子牙。两个人愈谈愈投机，周文王认定这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就说：“我的爷爷古公亶父太公曾经说过：当有圣人来到我们周原的时候，周即将兴起。您真是位圣人，我们的老太公早就盼望您来了。”

从此，姜子牙又有了新号“太公望”。周文王把这位钓鱼的白发老头请上自己的车，兴高采烈地回到国都。

周文王广招贤才，今日才得到了姜子牙这位他最需要的人才。于是，他又有了第二次“天作之合”，真是如虎添翼。这使他灭商的大计不露声色地快速推进。

周文王并没有忘记纣王释放他时说过，是崇侯虎说他的坏话，他才被纣王关起来，差一点丢掉性命。崇侯虎是崇国（今陕西户县）的侯，也是商诸侯中最坏的一个，他是纣在西部地区的一个耳目。周文王受命得到征伐大权以后，利用手中的大权，找个理由去征伐，把崇国灭掉了。他不仅为报仇，更重要的是看中了崇这块地方。所以灭崇之后，便在沣水西岸修建了新的城邑，取名叫丰（今陕西长安西北），把国都由周原迁到丰。迁丰之后，叛商归周的人更多了。到此时，周人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无论是实际的力量对比，还是人心归向，周文王都已经占了绝对优势。

但是，周文王仍然表面上对纣称臣、按时朝觐纳贡，并没有出兵伐商。他仍以臣的身份事商。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引起商纣王的怀疑警惕，才为他的儿子姬发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迁丰后的第二年，周方伯姬昌病逝于新都。他在位五十年，死后儿子姬发即位。姬发便是周武王。

姬昌生活在商朝最黑暗的年代，许多无辜的生命惨死在暴君商纣王手中。姬昌一即位就决心报父仇，以后旧恨上又加新仇，儿子被杀，自己则身陷囹圄。姬昌在刀枪林立、血雨腥风之中，闯过了无数险关，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瞒天过海，拥有了商朝三分之二的天下。天下最想杀掉纣王、灭掉商朝的西伯姬昌竟得到了纣王受命的征伐大权，从即位起到逝世止，在位五十年的周王，没有哪一天不想报仇雪恨，可是到死仍保守着商朝臣子名分，一直没有攻打商朝，却最终拥有了天下。

周文王这个人给我们启示还有很多。《史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西伯姬昌以他的德行赢得诸侯们的信任，诸侯之间有了纷争都来找他评理，断狱决讼。虞和芮的两个诸侯国由于国土之争，几乎要动武了。在争执不下之际，两位诸侯国王决定一块儿去找西伯姬昌评理。当他们二人进入周的地界，看到人们以礼相让，走路时生人碰面，一定让长者先走，耕田人的地界相连，大家互让，从未见相侵。在这种良好民俗的影响之下，虞芮两国国君越往前走越自惭形秽。两人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以为耻的、我们为什么还往前走呢？到那里还不是自取侮辱吗？于是两人掉头而还。离开周地后，他们把原来争执不下的土地互相让了出来，谁也不去占有，一场纷争就这样平息了。诸侯听到这件事，都说西伯姬昌是乱世中的受命之君。他在乱世中能把一个诸侯国治理得民风淳厚，无论在民间，还是朝中，大家都以礼相让。所以他在死后被谥为文王。他确实在乱世中以文德教化治国，使天下归心。这与纣的暴虐无道形成鲜明对照，故纣亡周兴。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殷本纪》、《周本纪》。

《尚书·西伯戡黎》

武王伐纣

周文王逝世后，他的儿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姜子牙继续辅佐，以完成周文王未竟的灭商大业。姬发对姜子牙十分尊崇，称他为“师尚父”。另外，周公旦、召公、毕公等著名的文臣武将都聚集在周武王周围，辅佐完成大业，史载周武王有十位著名贤臣辅佐。君臣一体，合契同心，只待时机成熟。

姬发即位的第二年，就率领大军进入商王朝的境内。他在军中供奉他父亲的神主牌位，同时也向人们表示：他是尊奉父命才采取行动的。当武王坐在大船里渡过黄河时，他看到舟楫浩浩荡荡，士卒器宇轩昂，内心非常高兴。船到黄河中流，一条银白色的大鱼跃到武王的船上。武王不失时机地鼓舞士气，说：“殷人崇尚白色，这银白的大鱼落入我船是殷纣灭亡的象征！”大军登岸，一颗流星划破长空，更使战前阴森、悲壮、凝重的气氛加重了。

各路诸侯、方伯听说武王兴师灭纣，纷纷前来，共有八百诸侯赶到孟津（今河南孟津）会师。周武王面对前来会师的各路兵马，说：“啊！友好邦国的君主及各位官员，大家仔细听着。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之灵。君主应当耳聪目明，为人父母，养育万民。

“如今的商纣王，不敬奉上天，降灾给下民。他沉溺酒色，敢行暴虐，一人有罪连及全族。朝廷官员都是世袭亲贵。他不惜民力，滥建宫室台榭、陂池，服饰华丽奢侈。残害万民，焚炙忠良，剖开孕妇的肚子，皇天为之震怒，授命我的先父，严惩无道，重

振天威。可惜，大功未成。

“从前我姬发以及你们这些友好邦君，都亲眼看到商纣的种种罪恶。至今纣仍没有改过之心，仍是那么傲慢无礼，不事奉天地神灵，长时间不去祭祀已被遗弃的宗庙。祭祀用的牲畜和黍稷也都被恶人盗食。他还厚颜无耻地说：‘我拥有百姓，我受命于天！’却不知改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上天一定保佑下民，重新为民立君，为民立师来教民，让他们来佐上天，安定四方。有罪上天就会惩罚，无罪上天就会赦免，我怎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

“纣有臣亿万，却有亿万条心；我有臣三千，却都是一条心。商纣王恶贯满盈，天命诛之。我不顺从天意，那罪行和他相等。我接受了先父文王的命令，又去卜问上天，又在土神谷神面前卜问吉凶，然后才率领你们众人替天惩罚商纣。天怜悯百姓，百姓希望得到的，天必从之。只要大家帮助我，天下将会是个清平世界。时机啊，决不能失掉！”

周武王的队伍在黄河北岸停下来，各路诸侯的队伍源源而来，周武王在巡视这些队伍时，发表誓师的动员令：“从西方来的各路诸侯、民众，都听我说：好人做善事，整天做不够；坏人做恶事，也整天做不够。如今商纣王，坏事干尽，违反法度，遍弃老臣、忠良，与罪恶小人亲近，嗜酒、放纵、暴虐，臣下也都跟他学，朝廷上朋党作仇，持权相灭，无辜受害者呼天抢地。无德秽闻，昭彰于世。

“上天从来惠爱百姓，君主必须奉承天意，向百姓施惠。夏桀违背天命，祸害百姓，上天就佑助成汤，代替无道的夏桀。现在纣的罪恶超过了桀，他伤害、驱逐善良的元老大臣，残暴杀害劝谏的大臣。还声言自己受天命护佑，而又不敬天；说祭礼无益，又觉暴虐无伤。上天把拯救万民的重任交给了我，我的梦符合我的卜兆，梦和卜兆都是吉祥的，伐商必胜。纣有亿兆平民，却离心离德；我有图治大臣十人，都同心同德；纣王虽有至亲，却比不

上我有仁人。

“上天看到的来自我们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来自百姓听到的。百姓的责怪抱怨，全在于我一人未尽快灭商，今天我一定前往。

“我们的队伍威武雄壮、斗志昂扬；我们突破商的边防，擒拿凶残的纣王；我们征伐的队伍浩浩荡荡，比商汤征伐夏桀时更加辉煌。

“努力吧，将士们！如果你们无所畏惧，就奋力向商进攻吧，宁可错抓了，也不要漏掉敌人，因为在纣王的统治下，百姓们战战兢兢，叩头如山崩。啊，我们要一心一德，为解救百姓建功立业，让他们获得永世安宁。”

第二天，天刚亮，周武王再次大规模地巡视各路诸侯组成的六路大军，再一次向他们申明号令：

“啊！我们西方诸侯将士们，上天再一次向我们显示不变的常理，这些法则应当宣扬。如今商王纣，轻慢侮辱五常之理，荒废懈怠政事，不敬祖宗，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竟然砍断冬天涉水者的脚胫，说是看看为什么耐寒；他竟剖开贤人的心，说是看看有什么不同；他竟如此放肆地作威杀人，伤害天下人；他崇信奸邪小人，放逐贬黜大臣，摒弃常法，把品德高尚的士人囚禁起来，贬为奴隶，不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不去祭拜祖宗，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上帝不允许他这样胡作非为，降下惩罚。你们要奋勇努力，共同尊奉我一人的命令，恭敬地行使上天对他惩罚。

“古人说：‘抚爱我们的就是君主，虐待我们的便是仇敌’。一个受天宏福却作威逞恶的人，就是你们的世仇。建树美德，务求滋长；清除邪恶，力求根除。我要率领你们众将士去歼灭你们的仇敌。众将士一定果敢坚毅，来成就君主的大业。功多有重赏，过大多罚戮。

“啊！我的先父文王的德政如日月照临，光辉普及四方，在西

方诸国尤其显著。如果我们战胜了纣，并不是由于周的武力强大，只是我的先父没有得罪大家；如果不能取胜，也并不是我的先父有罪，只是我小子没有良好的德行。”

周武王这次孟津会师，公开举起了反对商纣的义旗，他利用各种机会、鼓舞士气，鞭挞商纣的罪恶，为以周代商大造舆论。这次观兵孟津，尽管八百诸侯前来，但相对于强大的商纣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倘力量不敌，岂不生灵涂炭。所以这次孟津誓师，只不过是一次灭纣的预演。周武王和他的师尚父姜子牙决定先收兵，继续加强准备，等待时机。

周武王观兵孟津的消息传到了商都，纣王一点也不多加警惕，仍把主要力量用在对东夷的征伐和淫乐上。朝中忠直之臣，惴惴不安，又不敢进谏，怕惨遭恶运。

微子启，以他庶兄的身份，多次劝谏纣王，但纣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微子的话当作一回事。微子内心的痛苦、忧伤、悲愤交加，使他实在难以忍受。他知道商朝就要灭亡，祖先的大业就要完结。这天，他和朝中的父师、少师一起商量，他说：

“父师，少师，现在四方叛乱，殷商已经不能治理天下了，尽管先祖成汤制定的办法还摆在面前，可是纣王沉醉酒中，败坏了美德。殷商的大小臣民无不抢夺偷盗、犯法作乱，官员们都不遵守法度。凡是犯罪者，常常不能及时惩办，老百姓纷纷兴起，与我们结为仇敌。现在殷商恐怕就要灭亡了，就好像船漂流在大水之中，却找不到渡口。殷商法度丧亡，才有今天的混乱局面。”

微子说：“父师，少师，我现在一点出路也没有，我的家将败亡、年老的我也将流落荒郊。今天，如果你们不加以指点，我面对大厦倾覆后的颠沛流离，究竟该怎么办呢？”

父师也说道：“王子，老天降下大灾要灭亡我们殷商，而君臣上下沉醉酒中，却不惧怕老天的威力，不把年高德劭的旧臣的话当回事。殷商的百姓竟偷盗祭祀天地神灵的猪牛羊三牲，把它们

藏起来，或是饲养，或是吃掉，竟都没有罪，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老天在上监视着殷民。我们殷商用杀戮和重刑横征暴敛，招致民怨也不放松侵夺。上下的罪合在一起，众多的人受害却又无处申诉。

“殷商受灾祸，我们都会蒙难；殷商沦丧，我们无不成为奴仆。我劝王子还是远远地离开这里吧。我早就说过，我们殷商就要土崩瓦解了，自己拿主意吧！别人把自己贡献给先王，我也不考虑逃亡的事。”

箕子也和微子一样内心明白殷商的灭亡已经不远，如若进谏，就会招来横祸。这种日子实在太难熬了，他再也不愿意上朝去当木偶了，于是装疯卖傻，到处游荡。尽管如此，箕子还是被纣王关了起来。

王叔比干看到微子一走了之，箕子无奈竟然装疯不成反而被关，心中感慨万千，他长叹一声说：“为人臣看到国君有错误却不谏阻，就是不忠；怕被屠杀就不敢讲真话，就是不勇。看到国君有错就谏阻，纵然以身殉职也要坚持这么做，这才是对君王尽忠。他不同意微子、箕子的做法，在纣王面前苦苦劝谏三天都不肯离去。对于敢于犯颜直谏的比干，纣王暴跳如雷。他看到比干抱定必死的决心，坚持到底，就说：“我听说绝顶聪明的人，心与众不同，我今天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有七窍，要不你怎敢如此大胆！”就这样，比干被残酷地施以剖心的酷刑。

比干的惨死，震动了朝廷内外，曾表示不考虑逃亡的少师、父师，看到朝廷重臣，忠心报国的，竟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知道纣王不可救药，商朝气数已尽。于是，静悄悄地把宗庙的祭器和各种乐器收拾起来，留作见面礼，急急忙忙地投奔周国去了。如此纷纷作鸟兽散尽，六百多年的成汤江山，已经衰微破败，顷刻瓦解了。

此时，周武王得知商王朝的亲贵，最忠心护卫商朝的人先后

被杀、被关，纷纷出逃，也就明白腐朽的商王朝一触即溃。师尚父姜子牙也认为灭商时机已到，决定大举伐商。

周武王率领了一支由三百辆战车、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组成的大军，开往商都。过了孟津，会合了前来助战的各方诸侯，一路所向披靡。

公元前1027年二月甲子日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武王率领的大军集结在离商都七十多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武王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大钺，一手拿着指挥大军的白旄旗，面对大军，神色庄严，举行誓师典礼。他说：

“辛苦了，从西方远道而来从征的将士们！啊，我们友好盟邦的首领们，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们，以及来自庸、蜀、羌、微、卢、彭、濮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牌，树立你们的长矛，让我们一起宣誓：

“有句俗话说：母鸡不该在早晨打鸣，如果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现在商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就像母鸡打鸣一样，为商朝招来祸殃。他轻蔑地废弃了对祖宗的祭祀，不闻不问。他昏庸无道把王室贵族勋臣丢在一边，起用罪人逃犯，让这些人残暴地对待百姓，在商朝内外犯法作乱。现在，我姬发执行老天对他的惩罚。

“今天行军打仗时，每移六步、七步，就要注意队形，保持阵容整齐。每次刺击时，不超过四下、五下、六下、七下，也要注意调整队形。这样才充分发挥集团作战的威力。

“努力吧，将士们！战斗中，你们一定要像虎那样勇猛无畏，像豺那样凶狠无敌，像熊那样力大无穷，像罴那样灵活无束。不要拒斥商朝军队中前来投降的人，让他们来帮助我们。努力吧，将士们！如果有人胆敢畏缩偷生，那我就立刻杀掉他。”

这篇气吞山河的誓词，就是保存在《尚书》里的《牧誓》。

誓师之后，周武王率领周军与诸侯军队向商推进，车辚辚，马

萧萧，旌旗招展，决战的阵势在牧野摆开，商纣王得知武王出兵的消息，也早做好了反击的准备，他调集了各路大军，号称七十万，妄图在牧野阻止武王军队前进。

战幕一揭开，周军以高昂的士气，排着整齐的战阵，在战车的掩护下，迅速而有秩序地推进。商军虽人数众多，但主将无能，士卒中多是俘虏不久的夷人的奴隶，或是早已和商朝离心离德的诸侯军队，早盼着周人快点打过来，他们从内心拥戴周武王这位有德之君。所以，两军一接，商王的军队纷纷倒戈，阵脚一乱就溃不成军。周武王抓住战机乘胜追击，直捣商纣王的老巢朝歌。

商纣王被打得大败后，逃回朝歌。大势已去的商纣，躲在鹿台之上，他眼睁睁地看着倒戈的商军与周军一起冲了进来，却毫无办法。他深知作恶多端，已众叛亲离，剩下孤家寡人，若被擒获，决无好下场。于是，他把多年搜刮的珍宝披在身上，堆在身边，就在豪华的鹿台之上，点燃了一把大火，自焚而死，结束了丑恶的一生。

已到朝歌城下的周武王得知商纣玩火自焚，威风凛凛地在诸侯面前宣布了这一消息，诸侯纷纷向武王参拜、祝贺。周武王率领诸侯进入朝歌，此时商朝贵族官吏早已跪在城外迎接。武王安抚这些已是魂飞魄散的人，叫他们不要害怕。当他来到已被焚烧的鹿台，恨从心头起，怒自胆边生，拿起弓箭，对准鹿台就是三箭。随后，拿着剑对着鹿台挥舞三下，表示诛杀无道。此时纣的尸体已经抬出，周武王用黄钺斩下商纣的头颅挂在白旗之下，昭示罪恶滔天的商纣受天之罚。纣的宠妃妲己等人都已自杀，周武王命人斩其头，挂在小白旗下，同样朝之射了三只箭。这样算是平息天下人的怒与恨，也为祖父、父亲、哥哥报了仇，雪了恨。

返回军营后，第二天，周武王在朝歌设立了祭坛，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宣告：周革殷命，商朝灭亡。周受天命来管理天下。自此周朝正式建立。

周武王命令南宫将纣王藏在鹿台的财富散发给百姓，又把仓库的粮食分给那些忍饥挨饿的人，以此来安抚民心。当他从商都撤离返回周都时，把夏禹所铸、象征华夏民族团结共存的青铜九鼎迁到了周都。这就是古书上说的“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商王朝的六百年的历史至此结束。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殷本纪》、《周本纪》。

《尚书》：《微子》、《泰誓》、《武成》。

周封诸侯

周武王灭掉了商朝，但商朝毕竟有六百多年历史，而周族比起商族的人数要少得多。如何统治人数众多的商族遗民，如何控制广大的新征服地区，这是摆在周武王面前的难题。他与太公望、召公、周公反复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太公望主张杀掉殷商贵族，以免除后患。周公建议：让他们耕种原来的土地，住在原来的地方，也不必改变他们原来的地位。只要他们向周朝靠拢，还可以提拔他们当官。这种以殷人治殷的方案，有利于缓解周族与商族的民族矛盾。武王采纳了这个建议，就把现在河南殷墟一带，商都王畿一起封给纣王之子武庚，让他继续管理商王朝的遗民。为了防止商族的反叛，周武王把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封在武庚周围，他把弟弟管叔封在现在河南郑州一带的管，把弟弟蔡叔封在殷墟以南的上蔡一带，霍叔则被封在殷墟以北的现在山西霍县一带。武王让他们三人暗中监视武庚，此举被历史学家称为武王设“三监”。

武王采取一系列措施，争取商族民心。除了散发财宝、粮食，还为商朝有名望的大臣平反昭雪，以争取商朝贵族、王公们在政治上的合作。武王命令召公把关在监狱中的箕子等人释放出来；命令毕公把关在监狱中的其他贵族也放了出来；命令闳夭到比干墓前去凭吊，以表示对这位犯颜直谏的忠直之臣的尊敬；为了表彰比干，把他的坟墓修得又高又大；对活着的忠臣商容，周武王抚慰有加，为了表示对这位贤人的尊重，把他的住宅修整一新，并立下表示尊重的特殊标记。这些措施缓解了商族对新统治者的敌

对情绪，起了联合商朝贵族的作用，让百姓看到了周武王的贤德。

周武王大力扶植昔日商朝的敌对势力。一些古老氏族的后代，如神农氏之后、黄帝轩辕氏之后、帝尧之后、帝舜之后、大禹之后等古老部族，这些部族在商朝的残暴统治之下，被迫受商族控制，与商族存在矛盾，甚至有敌对情绪。周武王利用这一点，对他们进行安抚，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陕县），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一带）、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这些在周武王的扶植下得以恢复邦国的古老部族，安置了祖庙，对周武王自然感恩戴德，也成了监视、牵制商族的重要力量。

周朝兴起于西方，对东方的控制是它的薄弱环节，甚至没有力量深入到商王朝控制的东方广大地区。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周武王从西向东，在黄河中下游大肆分封自己的功臣、亲戚，以加强对东方的控制。

周初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即封邦建国。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七十一国，其中姬姓子弟就占有五十多国。文王的弟弟们被封在东虢、西虢；文王的儿子们被封在管、蔡、霍、鲁、卫、毛、聃（dān）、郜（gāo）、雍、曹、滕、毕、原、郇；武王的儿子们被封在邗、晋、应、韩；周公的儿子们被封在凡、蒋、邢、茅、胙、祭。异姓诸侯中受封的以姜姓贵族居多，也有其他贵族。分封的目的是封建亲戚，并组成一个护卫周王朝的藩屏。每个诸侯国都是按照成周的模式建立的统治据点。这样在广大的被征服地区星罗棋布般的大小封国，构成了周朝统治的新格局。

康叔是武王和周公最小的弟弟，被封在黄河、淇水之间，建立了卫。他的封地很大，领有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使周公对这位小弟弟能否理好殷民很不放心，于是对他耳提面命一番，说：“康叔，你的伟大英明的父亲文王，崇尚德政，慎用刑罚，不敢欺侮鳏寡孤独，善于任用贤人，

尊重贤人，尊宠百姓，从而开创周在西方的地域、接受上天的命意。灭殷后，也才有你的封地。大家都看着你是否追随文王。你到殷地一定遍求贤明，接受殷长者明智的教训；爱养百姓，气度要比天宏大，用和顺的美德指导自已，努力不停地完成王命。上天辅助诚信的人，你可要当心。治理国家要劳神苦形，你可不能贪图享乐。百姓难于安定，要体察民情。我听说民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关键要使不顺从的乐于顺从，不愿努力的乐于努力。你要施惠于民。你要宽大地对待这些受王朝保护的殷民，你要为辅佐王朝做出贡献，使殷民成为新民。

"你要谨慎严明你的刑罚。看到臣民犯罪，像是自己生了病，臣民就会完全抛弃罪恶；保护臣民，好像保护小孩一样，臣民就会康乐安定。要依据殷人的常法断案，不要只顺从你的心意。有的诸侯不能教育好他们的家人和内外官员，作威肆虐，完全违背王命，对这些人不能用德治，而应当坚决惩罚。

"你教导百姓说：'我只求继承文王'。那我会很高兴的。老百姓经受教化善良安定，我们要时时思念殷代圣明先王的德政，你安治殷民要和他们媲美。现在的殷民，不加教导，就不会善良；不加治理，殷国就没有德政。不要制造怨恨，不要使用不好的计谋，不要采用不合法的措施，蔽塞你的诚心。你要努力施行德政，以安定殷民的心。顾念他们的美德，宽缓他们的徭役，丰足他们的衣食，这样，人民才安宁。"

康叔经过周公这番耳提面命，茅塞顿开。他到了卫国以后，小心按周公面授的机宜行事，得到不少殷贵族的支持。他维持殷旧有的统治关系，使用殷的原有法律。他改变了原有的所有制关系，把卫国的大片土地按照周朝的办法重新分配，从而使大小贵族获得土地权，而商族百姓则还在原有的土地上耕种。当成王亲政以后，康叔被提拔为周王朝的司寇，并得到了周王朝车、帛、旗、钟等许多礼、乐器和财宝的赏赐。在殷墟东南不远的浚县，出土了

有“康侯”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件簋上的铭文记载了康侯封卫的事迹。

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被封在黄河、汾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唐地。唐地原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历经商朝，夏人仍保持旧有的风俗。唐叔因俗而治“启以夏政”。他还被赐怀姓九宗和职官五正。怀姓九宗是商种族的奴隶，风俗近于戎狄，唐叔把土地按照戎狄的制度的怀姓九宗中进行分配，即疆以戎索。唐叔死后，他的儿子燮父迁居到晋水旁，改国号为晋。晋国周围有许多戎狄部落，先后都被晋国灭掉了，晋发展为一个大国。

太公望是周王朝三朝元老，他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立下汗马功劳、屡次受封。初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成王又把新征服的薄姑氏的土地人民封给他，为齐侯，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此外他还获得征伐大权，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国周围的东夷小国，先后被齐国灭掉，齐控制了山东北部的大片地区，成了周朝的东方大国。太公望在齐国进行文教礼治，经济上劝以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发展商业贸易，普天之下到处都可以看到齐国的衣冠履带。由于太公望治理有方，昔日的盐卤之地，成为各国诸侯向往的富庶地区，齐国的风俗成为天下人模仿的榜样。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辅佐武王灭商，功不可没；武王死后，又摄政，佐成王号令天下；特别是他与太公望，召公奭等率兵东征，伐夷践奄，实现了周王朝对东方的控制。他的儿子伯禽被封的地面，由河南鲁山到奄国故地。建都于山东曲阜，为鲁国。鲁公伯禽由于其父周公的赫赫功勋，受到特别优厚的赏赐，分到了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作为奴隶，还得到了大辂之车、旗、自夏代传下来的美玉、有名的封父宝弓等仪仗和带有城郭的土地以及大量的礼器。成王还特意给了伯禽一套典册文物，也就是允许他施行周天子的礼乐与典章制度，即实

行周礼。伯禽受封后，继续对徐夷、淮夷用兵，巩固了周朝在东方统治，成为周朝在东方的又一大国。鲁、齐成为周朝控制殷民的重要支柱。

召公奭始封于河南召陵，武王灭商以后，被改封在远离岐周的北燕，都城设在今天北京西南一带的蓟。由于召公留在周天子身边，位居三公，召公长子受封为燕侯。由于燕国远离周王都，又与其他诸侯国都距离较远，所以在周王朝的典册之中，有关燕国早期历史的记载很少，以致最早几代燕侯的名号都不甚清楚。但从出土文物看，燕国为北方的发展贡献巨大。在燕旧地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反映了召公开发燕国的事迹。北京琉璃河等地周初墓葬中出土了燕国青铜器。辽宁喀左发现了大批青铜器，其中的燕侯盂，被认为是周初所铸。朝阳也发现类似的青铜器。可见，燕国势力已经发展到那里了。燕国与鲁、齐、卫、晋遥相呼应，形成护卫周王朝的犄角之势。

燕国之东有孤竹（今河北卢龙南），是商的同姓国。孤竹君有二子，伯夷、叔齐。孤竹君死后，兄弟二人推让君位，结果都放弃了君位，因仰慕周文王的德行而来到周原。当武王发兵灭商，二人跪在马前进谏，坚决反对灭商。周朝建立后，伯夷、叔齐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后来有人说首阳山也是周朝的了，首阳山上长的薇也是周朝的，二人抱木不食而死。

燕国的北方是肃慎族。肃慎族当时散布在松花江到黑龙江的广大地区，很早就与周有密切的往来。曾向武王献楛矢、石砮。据近人考证，这是用当地特有的一种矽化木制成的箭，能坚利如铁。周公东征胜利后，肃慎来贺，成王以礼答谢，使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可见肃慎为周朝的远方属国。在东北、内蒙东部地区，考古发掘得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刀、矛、斧、镞以及陶鬲、石镰、卜骨等形制与中原商周遗物相似，说明这些地区也受了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

商朝的王族微子启受封后建立了宋国，在商丘建都。宋国成了周朝东南方的大国，统治着商族早期活动的地区。武王克商时，微子让把自己捆绑起来，口衔象征其地位的玉璧，让族人抬着棺木，向周军乞降。后来武庚叛乱，他没有参加。所以，在武庚被杀后，他作为商王后裔受封治理商朝旧地。宋国以仁德著称，成为周朝东南的最大的藩国。

在宋国周围，周朝还封了一些异姓小国，如姒姓的杞（今河南杞县），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另外，蔡叔的儿子蔡仲也受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同宋、陈等一起守卫着周朝的东南方。与这些诸侯国面对的大多是徐夷和淮夷，这些地方是周朝历来鞭长莫及的地方，为控制这些地方，周人曾长年用兵。这里主要有嬴姓的徐（今江苏泗洪南）、江（今河南止阳西南）、黄（今河南潢川西）、偃姓的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北）和巢湖沿岸的群舒（舒庸、舒蓼、舒龚、舒鸠、舒龙、舒鲍）等方国部落。他们时叛时降，周也不时征伐。

周的同姓诸侯国吴（今江苏无锡东南）是季历之兄太伯、仲雍率领一部分周人在那里开创的。太伯和周人接受当地风俗“断发文身”，同时把周人先进文化传播到那里，其中有农耕技术筑城技术等，这样当地逐步形成了融合兼有的文化特色。江苏中、南部和安徽东部已发现具有这种特色的文化遗存。吴国是周朝建立后追封的，与周王廷来往不多。

吴国的附近有个宜国，是成王把西部的虞侯改封在那里的。江苏丹徒出土的一批周初青铜器有一件矢簋，上面铭文详细地记载了虞侯矢被改封为宜侯的事。铭文记载了成王授予宜侯土地和人民，还赐予宜侯彤弓彤矢等，使其得专征伐。在江西和湖南发现了不少青铜器。这些发现证明，周朝的势力和影响已经到达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

在吴国的南方，出现了由夏人和楚人同当地人民融合而建立

的越国，对我国东南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汉一带的庸、卢、彭、濮等方国部落随武王伐纣。周朝沿汉水北岸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称为“汉阳诸姬，”其中最大的是随国。湖北孝感曾发现过一批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成王进征虎方的事迹。这次征伐曾到过曾地。

楚国的兴起，阻止了周朝势力的南下。楚国是一个芈姓贵族建立的国家，原居淮水下游，属于追随武庚叛周的熊、盈族。失败后，受周人压迫被迫南下，被江水所阻，沿江西上，开拓了长江中游地区。楚国继承了商文化，在南方加以发展，形成了我国南方颇具特色的一大文化区。

散国在宗周西方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占据了通往四川的交通要道。

巴国（今四川重庆北）是周朝西南最远的封国。武王把同姓贵族封在那里。那里的巴、蜀等族和周朝有同盟关系。四川彭县和新繁都发现了商末周初的器物。

周朝通过分封诸侯，不但巩固了原来商朝统治的地方，而且不断在周边地区扩大其势力和影响，成为远远超过商朝的一个更强盛的国家。其统治地区西到魏、骀（郃）、芮、岐、毕，东到蒲姑、商、奄，南到巴、濮、楚、邓，北到肃慎、燕、亳，其活动和影响所及还要广阔得多。

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的土地人民都属于周天子所有。首都丰镐一带的地方由卿大夫管理，这些由周天子直接掌握的地区，叫做王畿。

王畿之外的地区，分封给周王朝的同姓或异姓诸侯。这些封国，一般都世代相传。他们在封国内的行政、军事及经济等权，都有相对独立性，但必须承认周天子是他们的共主，承认周天子对他们领地拥有象征性的权利。分封诸侯要举行分封行赏的仪式，要

宣布周天子对诸侯王的册命和封地疆界的大小，奴隶的人数，并颁发给封国一定数量的祭器和贵重礼物。此外，还赐给一定的爵位，如侯、男，稍后又有公、伯、子等。周天子还要定期巡视封国。诸侯要按期向天子述职，朝觐、行聘、纳贡，必要时领兵出征，讨伐不从王命者，到王室戍守。

诸侯对其封地同样进行分封，这些受封的人是同族的卿、大夫。卿、大夫再把自己受封的采邑分配给同族的士做食地。士以下不再分封，食地由庶民耕种。卿大夫对采邑进行管理，收取封地上的贡赋，而采邑上的土地和居民还是直接属于诸侯。

由于分封制是上级对下级的统治、占有，自上而下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网，这样也就形成了各级土地占有者之间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由于周王朝的分封制及由此形成的严格的隶属关系是在同族内进行，这样，宗法制度也就形成了。天子世代相传，每一个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王位，主祭始祖，是周王室的大宗。而嫡长子之外的弟弟受封为诸侯，对天子而言，则成为小宗。每一代诸侯也是由嫡长子继承侯位，奉祭始祖，为大宗；卿大夫的弟弟们为士，士对卿大夫而言，就成了小宗。士的嫡长子仍继父位为士，余者为庶人。因此，大宗一定是嫡长子。诸侯以下的身份都是双重的，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但他是自己诸侯国的大宗；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但在本族内则为大宗。这种宗法制度确立了贵族内部的和外部的关系准则，确立了继承权和土地、财产、奴隶的分配制度，确立了政治权利的转移规则。宗法制是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形成，它的形成又巩固了分封制，防止兄弟间为争夺继承权而发生内哄，减少贵族内部的矛盾。

宗法制度又是联系贵族大家庭的纽带。每个大家族都有共同的直系祖先、共同的宗庙、共同的墓地，有互相保护的义务。大家族的嫡长子世代掌握着大权，成为居于家族中首要地位的大宗，是家族聚集起来的旗帜。周天子是各封国的这些大家族的总族长，

对各国同姓诸侯而言，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百世不迁的大宗。只要封国存在一天，就得承认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就要聚集在天子的旗帜之下。这样一来，周王朝同姓的大小封国就成为伯父、叔父，而异姓封国就是伯舅、叔舅了，都是周王朝的同族或亲戚，都是股肱周室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各自在周王朝这个整体中发挥其作用，真乃天下一家啊！

周代王权与族权的合流，是它的突出特征。宗法制度是周代所有制度的核心。周代的政治制度、礼制、法制、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全都是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宗法制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及有关封国的世家

《尚书》：《康诰》、《微子之命》。

周公摄政

周武王灭商后，这年四月的一天，在月亮开始放出光辉时，武王回到了丰邑。他把战马放归华山之南，把服牛放回桃林之野，明示天下，不再乘用。停止武备，修治文德。

四月丁未日，武王在周庙举行祭祀，在木豆竹笾中装上各种祭品。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的邦国诸侯也都前来助祭。第二天，举行柴祭祭天，举行望祭祀山川，遍告天地祖宗，伐商的武功已经完成。

武王由殷商返回镐京时，把箕子也带来了，他知道箕子是难得的贤才，向他询问治国方略。

箕子说，大禹治水有功，上天给了他九种治国大法。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敬用五事；第三是农用八政；第四是协用五纪；第五建用皇极；第六是用三德；第七明用稽疑；第八念用庶征；第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五行是水、火、木、金、土。水向下浸；火向上燃烧；木可曲可直；金能适合各种需要而改变形状；土可种植百谷，收获甘甜的食物。

五事是貌、言、视、听、思。容貌要恭敬，谦虚而又严肃；言论要正当，以使人听从；观察仔细就明白无误；听闻要广博，思想就不狭隘；思考明达就圣明。

八政是任命八种行政官员：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即管民食的官、管财货的官、管祭祀的官、管工程的官、

管教育的官、管盗贼的官、管朝觐的官、管军事的官。

协用五纪是制定历法的五种方法。记载一年的长度，一个月的长度，一日的长度，观察星辰的出没，推算日月运行所经历的周天度数。以便综合测定，敬授民时，指导农业。

建用皇极，即建立君权的法则。君主要为百姓谋幸福，为百官树立榜样。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天子做民父母，才能做天下的君主。

三德，一是正直；二是刚克；三是柔克。中正平和，不刚不柔，就是正直。刚而使人不能亲近是过分；和顺而失去坚强也是过分。君王应当阳刚与阴柔两美并重，即为人造福而又不失威严，为人父母又要防止百官背叛和百姓犯上作乱。

明用稽疑，即核查疑惑。选择任命掌管龟卜和蓍筮的官员，让他们预卜各种征兆。有重大疑难，先要自己考虑成熟，再与卿士们商量，然后再与庶民商量，最后卜问占卦。

念用庶征，天有各种征兆：雨、晴、温暖、寒、冷、刮风。一年中这五种天气齐备，顺序有常，依次发生，万物就欣欣向荣。某一种天气过盛，就会是荒年；某一种天气过衰，也会是荒年。好的征兆是：君主能敬，就像及时雨；君主能治，就像及时晴；君主明智，就像及时温暖；君主善谋，就像及时寒冷；君主通理，就像及时刮风。坏征兆是：君主狂妄，就像久雨；君主错乱，就像久晴；君主贪图安乐，就像久暖；君主严酷猛烈，就像久寒；君主昏庸愚昧，就像久风。君主视察政事就像年统月，高级官员就像月统日，普通官员就像日统时。假如年月日的关系不易，百谷就按时成熟，政治就清明，杰出人才就被表彰，国家平安康泰。假如日月年时的关系已易，百谷不会按时成熟，政治就昏暗，杰出人才不会被重用，国家不得安宁。百姓好比星星，有的星喜欢风，有的星喜雨。太阳和月亮有规律地运行，就有冬天和夏天。月亮追随星星的移动，就有风和雨。

向用五福是寿、富、康宁、遵行美德、高寿善终。威用六极，是六种困厄：早死、疾病、忧愁、贫穷、邪恶、懦弱。

武王还与太公望、周公等辅臣讨论了各种治国方略。

武王平定四方，各地诸侯方伯纷纷贡献方物。一次，西方旅国向武王进献大犬。太保召公怕武王玩物丧志，劝谏武王建立王业必须慎德，不宝远方珍物，应当重视贤能，保护百姓，安定国家。

召公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使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不看重远方的物产，远方的人就归顺，所尊重的，只有贤才，周围的人就会心安。"

最后召公语重心长地告诫周武王，不要"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周武王由于日夜劳神极能，在灭商后的第二年竟一病不起。当时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少，还不能担当重任，如果此时武王死去，将使灭商后复杂的政治局面更加棘手，因此辅佐大臣都心急如焚。太公、召公说："我们恭敬地为武王卜问吉凶吧。"周公说："是不是先向我们的祖先祷告？"

于是，周公清扫了一块土地，在上面筑起了三座祭坛。又在三座祭坛的南面筑起了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放好玉，拿着珪，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你们的长孙姬发，得了危急凶恶的病。假若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助祭的责任，就用我姬旦来代替姬发的身子吧！我柔顺巧能，多才多艺，更能侍奉鬼神，你们的长孙姬发不如我。他刚被上帝任命，镇抚四方，因面能安定你们的子孙。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敬畏他的。唉！如果不丧失上帝降给周国的宝贵使命，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了。现在，我来听命于大龟，假若你们允许我的请求，我就拿着璧和珪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如果你们不允许我，我就收藏璧和珪，不敢再请了。"

卜问了三龟，都是吉兆。打开锁钥看书，也都是吉利的。周公说："根据兆形，武王的生命没有危险。我刚刚向三位先王祷告，只谋求周的国运长远；现在我期待的，是先王让我去侍奉鬼神。"周公回去了，史官把周公祷告的简书放进金属装束的匣子。第二天，武王就痊了。

可是，不久武王还是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成王年纪还小，所以就由周公代替成王执政，历史上称为"周公摄政"。

周公权力的增大，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独揽大权，将对成王不利。"一时欺骗了很多人，连与周公共事多的燕召公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周公首先向王朝重臣师尚父和召公表明心迹，说："我们的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经过几代人艰苦创业，周朝才有了今天的规模。一旦在我们这些人手里发生叛乱，使周朝失地或亡国，我们有什么脸见先王于九泉之下呢？摆在大家面前的形势是：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年纪小，天下人心不服。所以，我甘冒篡国的嫌疑，暂时代替年幼的君主管理国政，这是为了能保住我们周王朝的江山！"姜尚和召公理解了周公磊落的胸怀，支持他辅佐成王，帮助他安顿了姬氏的其他兄弟。

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不甘心商朝的灭亡，抓住武王病逝，成王年少，管叔、蔡叔与周公闹矛盾的有利时机，进行叛乱，想摆脱周王朝的控制，并取而代之。他与管叔、蔡叔纠合在一起，并集结了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过去殷王朝的属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周公与太公望、召公奭等率兵东征。东征前召开了盛大的誓师会，《尚书·大诰》记述了这次誓师会的内容。

周公说："啊！努力吧，你们各位邦君和各位武将。要使国家清明，就得依靠明智的贤人，现在有十位贤德的人辅佐我，他们用诚信得知天命，何况上帝已经给周邦降下命意了呢？那些发动

叛乱的大罪人，勾结殷人，同室操戈。我长时间考虑着：老天想灭亡殷国，就像农夫有责任种田，我怎敢不完成我要耕的那块田呢？上帝也嘉惠我们前辈先王，我怎能放弃占卜呢？我怎敢不率领你们去重新巡视文王开辟的疆土呢？何况今天的占卜全是吉兆呢？所以，我要率领你们去东征。天命不会有错，卜兆的指示必须遵从！”

周公率兵东征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把蔡叔等人流放。接着又挥师东进，对那些与武庚、管叔、蔡叔一起作乱的东方各国大加挞伐，一举灭掉了薄姑、熊、盈、徐、奄等国。这次东征，前后共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自此，周王朝消灭了东方诸国的反抗势力，开始切实地把势力深入东方，逐步实现了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

周公东征，这一事关周王朝生死存亡地历史大事件，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多有记载。《保卣》铭文说：“乙卯这一天，成王命令太保（召公奭）抓住了武庚及追随他作乱的东方五国的首领，一举灭掉了这六个国家。成王慰劳并奖赏了太保，太保也高兴地赏赐了下属，并做了个供祭父亲用的铜卣，而且还可用这个卣参加周天子与四方诸侯朝会大典。时间是二月既望。”

召公位在太公望与周公旦之下，是周初十贤之一。他不仅在东征中被委以重任，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在武王死后，周朝生死攸关的时刻，协助周公，团结王室，粉碎管、蔡谣言，安定人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公摄政时做的另一件大事是营建成周。

武王灭商后，很快发现都城镐京远在西部，不便于控制东部新征服的广大地区。他曾假托伊洛地区是“天室”，想在被认为是天下之中的这一带大兴土木，建成一个能控制东方的据点。但武王未能实现这一宏伟计划。成王即位后，周公在第二次东征中，进一步认识到在伊洛建新都的重要性。因此，成王、周公决定按照武王的遗愿，大规模地营建洛邑。

为了使这一工程得到祖先的佑护，召公随成王到丰邑文王的宗庙进行祷告，然后出发到洛邑去察看地形。召公在武王当初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实地测量，确定修建宗庙、宫室的位置。又向上天进行占卜，得到吉利的兆象，于是，便回到镐京，把结果一一向成王报告。成王命周公去洛邑进一步进行审核，并负责监督修建新邑。周公把“殷顽民”迁来作为营建的劳动力，在洛水旁修起了宗庙、宫殿和市肆，一座与西方镐京遥相呼应的巨大城邑修建起来了。周人把镐京称为宗周，把新落成的洛邑称为成周，又叫东都。

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鼓励成王迁到洛邑，而成王则主张让周公治理东都，他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周公说：“王谦逊，似乎不敢参预上帝想命周居洛的大事，我继太保之后，全面视察了洛邑，并商定了措施，我要告诉您治理洛邑的措施。

“我在乙卯这天早晨到了洛京，我先占卜了黄河北方的黎水，又占卜了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结果仅有洛地吉利。”

成王说：“公不敢不敬重上帝赐给的福祥，亲自来勘察地址、营建了与镐京相配的新邑，很好啊！使我来到这里，让我们二人共同享受这一吉祥。愿公领着我永远敬重上帝赐给的福祥。”

周公说：“王啊，在洛邑举行祭祀，都已安排得有条不紊，您要振奋，您可要振奋啊！要到洛邑去！不要像火刚刚燃烧时的样子，那燃烧的火，不可让它熄灭，应熊熊燃烧起来。你要像我一样顺从常法，率领在镐京的官员到洛邑去，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功勋。注重大事，完成大业。您的功业也将永远被后人称誉。”

周公说：“你虽然是个年轻人，该考虑先王未竟的功业。你应认真考察诸侯的享礼，因为诸侯对享礼不尽心诚意，百姓知道了，就会认为可以不朝享了。这样，政事将会错乱轻慢。我急着想让您分担政务，我没有闲暇管理这么多的政事。

“我教给你辅导百姓的法则，假如你不认真学会这些，您的善政就不会推广。像我一样督促训示您的大臣，使他们不敢弃置你的命令。我们的公卿百官，要奋发努力，教导好百姓，远方的百姓才会因此归附我们。您到新邑去，可要谨慎啊！”

成王说：“公啊！请努力保护我年轻人。公发扬伟大光辉的功德，使我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奉答上帝的教诲，使四方百姓和悦。勤劳施于四方，普遍推行美好的政治，虽遭横逆不迷乱。文武百官努力实行您的教化。”

成王说：“公啊！我要返回镐京就位了，请公继续治洛。四方还未安定，仍需治理教导；宗礼也没有完成，公善于教导扶持臣民，要继续督促各级官员，安定文王、武王所接受的殷民，做我的辅佐大臣。”

成王继续说：“公留下吧！我要到镐京去了。公要妥善迅速地敬重和睦殷民，公不会被难倒困住的。我要不懈地学习政事，公要不停地示范，四方臣民将会世世代代朝享。”

周公跪拜叩头说：“王命令我到洛邑来，继续保护先祖文王所受的殷民，宣扬您有父亲武王的伟大，我恭奉您来视察洛邑，考虑优礼殷商的贤良臣民、制定治理四方的新法，作为创立周法的先导。我曾说：‘从这九州中心治理百姓，万国都会喜欢，王也就有功绩。我姬旦率领众卿大夫和治事官员，经营先王的成业，集合众人，做修建洛邑的先导。’实现了武王的遗愿，发扬光大了文王的美德。

“您派遣使者来洛邑慰劳殷人，又送来了两卣黍香酒问候我。我不敢停留过夜，立即用黍香酒祭祀文王和武王。我向他们祈祷说：‘请保佑我们顺利遂愿，不常遇到罪疾，万年蒙受您的德泽，在洛邑治理殷民能够成功。愿成王使殷民能够顺从万年，您们将永远看到我们怀念先王的德惠。’”

戊辰这一天，成王在洛邑举行冬祭，向先王报告岁事，用一

头红色的牛祭文王，又用一头红色的牛祭武王。成王命一个叫逸的作册官，宣读祭祷的册文，报告文王、武王，周公将继续治理洛邑。助祭诸侯在杀牲祭祀先王的时候，都来到了。成王进入太室，举行灌祭。

这样周公接受成王之命，继续治理洛邑，作册官逸把这件大事喻告天下。周公继续居留洛邑，完成文王、武王未竟的使命。

营建成周洛邑主要目的是为了治理殷人。东征之后，曾将部分殷人分封给鲁、卫、唐等诸侯国。这时，又把大邑商的殷民迁到成周。殷民留恋故土，多有怨恨。周公代表成王发布诰令，说明让他们迁徙的原因，宣布政策，指明前途。周公对被迁的殷民说：

"你们这些殷商的臣民们，纣王不敬上天，才把灾祸降给殷商。我们周国佑助天命，奉行上天的明威，执行王者的诛罚，宣告殷的国命被上天终绝了。并不是我们小小的周国敢于改变殷命，而是因为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些信诬怙恶的人。我们都应当敬畏天命。上帝不把大命给予不行德政的人。凡是四方小国、大国灭亡，无人怀疑上天的惩罚：

"啊！告诉你们众官员，我将把你们迁居西方，并不是我秉性好动，这是天命。不可违背天命，我不敢迟缓执行天命，你们不要怨恨我。

"现在，我从大邑洛招徕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有德要任用，我是赦免你们的罪过、怜悯你们。这不是我的错，是天命。

"殷的众臣，以前我曾对管、蔡、商、奄四国发布命令，让他们从远方迁到这里，近来他们臣属侍奉周族很恭顺。

"告诉你们殷商的众臣民，我不想杀害你们，我在洛地建成一座大邑，这是为便于四方诸侯前来朝贡，也是为你们服务奔走，因为你们臣属我们很恭顺。

"你们可以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会有安宁的生活。你们若

不谨慎恭敬，你们不但不能保有土地，我也将会把老天的惩罚降到你们身上。

“现在你们要好好住在你们的城邑，继续你们的事业；你们在洛邑会有安乐，会有丰年。从迁洛开始，你们的子孙也将兴旺发达。

“要顺从我，只有顺从我，你们才能长久安居！”

宣布政策，安定人心，分化瓦解的同时，周公还有“成周八师”在这里重兵戍守，随时镇压敢于反抗的殷人和东方各民族。周公对殷人实行军事镇压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殷商遗民逐渐顺从了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死后，成王曾一度把都城迁到成周。因此，成周洛邑的兴建对周王朝统治的巩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出土了一件“何尊”，提供了有关营建洛邑的宝贵资料。“何尊”是一件圆唇的方尊，器身布满了饕餮纹，上起四道觚棱。器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周成王开始迁都成周，并按照武王的礼制，举行祭祀。成王对宗小子发布诰命说：“当初你们死去的父亲曾为文王效劳。文王接受上天之命，到武王时战胜了大邑商，曾向老天卜问：我要住在国的中央，在那里治理四方民众。啊，你们这些人那时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呢！现在你们要学习父辈公氏的榜样，为上天立功，完成使命才会受到后世的祭祀！”成王恭德裕天，发布诰命后，还赏赐给何贝币三十串。何特此铸此铜器以为纪念，时间在成王五年。

据学者们研究，“何尊”在宝鸡一带出土，这一带曾是周王朝赐给虢公的封地，所以铭文中提到的“公氏”可能是虢公。这件尊的所有者何，可能是虢公的后人。他随成王迁都成周之后，做了这件尊，纪念这件大事。尊上铭文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它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廓清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它

确证成王五年曾迁都洛邑；还有周公摄政七年并不包括在成王在位的年数内，等等。

周公还制礼作乐。为了巩固西周统治阶级政权，加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他参照夏商的礼乐制度并结合周族固有的氏族传统，制定了一套区别君臣、上下、父子、亲疏、尊卑，维持周统治关系的礼制及其他典章制度。这被后代历史学家称为周公“制礼作乐。”

所谓周礼有二层意思，一是周代的礼法、政法制度。主要有分封制、宗法制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法、礼法制度。它们有力地维护周的统治。另一层意思是礼俗。主要是周代的各种文化制度、风俗，它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

周代宗伯所掌之礼有五大类：

（一）吉礼，共十二项：以禋祀祭祀天上帝；以实柴祭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二）凶礼，共五项：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

（三）宾礼，共八项：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日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頫曰视。

（四）军礼，共五项：大师之礼用众；大均之礼恤众；大田之礼简众；大役之礼任众；大封之礼合众。

（五）嘉礼，共有六项：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亲之礼亲异姓之国。

以上五类三十六项只是宗伯所掌之礼的目录，要详细了解这些礼的具体内容，非专书不可尽知。正是这些礼俗塑造了周代国

民的社会人生。下面略举一二，略见周代礼俗一斑。

冠礼。男子到二十岁行冠礼。行冠礼前要占卜选择吉日，选择主持人。到了日期，要到专门的地方，主持人带着三种帽子：缁布冠、皮弁、爵弁，举行加戴这三种帽子的仪式，然后，要给参加冠礼的宾客斟酒，为行冠礼的年青人取字。冠礼完毕要拜见国君，谒见乡大夫、乡先生，来表明他是成年人，可以参加成人的行动了。嫡长子在阼行冠礼；庶子在房行冠礼。嫡长子举行醮的斟酒仪式用醴；庶子则用酒。这是为了区别嫡庶。凡士以上都要行冠礼。天子在十二岁时也要行冠礼。

婚礼：周代的婚礼，先要派媒人与女家通言。女家答应后，还要派人纳采，接着要问名、纳吉、纳征、请迎等。纳采用雁，纳征用缁布。卿以上则要加玄、纁俪皮及珪璋。到了日子，父给儿子斟酒，命他去迎亲。子承命到亲家，带着雁进入，郑重把雁送给亲家，还要稽首。出门要乘车，预先到门外等待妻子出门，引导她上车同归。夫妻同享祭品。第二天，妇见于舅姑，舅姑宴请他们。三月而庙见。女子许嫁，要把头发梳成成年人样子并取字。祖庙未毁，要到祖庙祉老年人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已毁，则教于宗室。

乡礼。乡饮之礼。以乡大夫为主人，处士贤者为宾介。宾至，拜迎于门外；入门要行揖三逊之礼，自西阶升，司正北面受命安宾；升歌、间歌，合乐，主拜宾至，宾拜主洗。宾中六十岁以上者坐，五十岁者立。为六十岁者摆三豆莱馐，七十岁者摆四豆，八十岁者摆五豆，九十岁者摆六豆。主人为宾客敬酒完毕，大家就坐，脱屦升堂，享受各种美酒佳肴。

除此之外，丧礼、祭礼、射礼、朝礼、聘礼等都是很重要的，其中的祭祀之礼在周代被认为与军旅大事等同。周代的祭礼遍及天地、山川、日星、风雨、户灶、门行、猫虎、厉鬼之类，都有专门的祭祀活动。

周代的行住坐卧都有其礼俗，下面略举一二：

饮食之俗。饭盛在器皿中，要用匙取，同时用手接着。饭前要洗手。吃的时候要双手捧起。吃完了，要把手弄干净。如果是宾主同食，主人给宾进酒，叫献；宾用酒报答，叫酢；主人饮酒劝宾，叫酬；正献已经完毕的酒，叫旅酬；旅酬既毕的酒，叫无算爵。凡献酒，必荐食。君之酒叫膳；臣之酒叫散；酌而无酬酢叫醮。要用左手拿盛酒的爵。君臣男女不互换酒爵。

相见执挚之俗。与尊者相见，一定要带礼物。天子用鬯，诸侯用圭，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庶人用鹜，工商用鸡。野外军中无挚，则以缨拾矢。凡宾执挚来见，主人必辞；所以士见士，及士见大夫，主人都要辞挚，不收礼。两士相见，要把客人带来的礼物奉还，客人要辞让而接受。士见大夫，主要等客人出门后，在门外把他带来的礼物交还。臣见君，则不还挚。如果此国之臣带着礼物去见他国之君，君也要送还其挚。妇人之挚，枣、栗、腶、修；无挚，则不能成礼。

类似的礼俗还有迎送揖让授受之俗，拜跪之俗，坐立行走之俗，这些礼俗未必是周公制定的，但周公制礼，对其有推动作用。

周公作乐。有关周代音乐的记载，资料也颇为详备，非专门著作，不足以详细记叙其内容。主要有：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五音：宫、商、角、征、羽；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周代的乐舞上备先代，旁及夷野，既继承了历史相传之功德，又传播了各地人民的习尚。凡用礼皆作乐，乐与礼的内容相配合。如，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礼天神；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礼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周代已经有非常完整而又庞大的乐队、舞队，并且因等级不同而规模递减。

周代异常重视礼乐相配合，将功利目的与美统一起来。周公制礼作乐，不但对当时，而且对中华民族后来的礼乐制度、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公摄政前后共出现两次危机。一次是摄政不久，管叔、蔡叔散布谣言，周公曾写了一首诗送给成王，诗名为《鸱鸮》。成王虽不敢责备周公，但也不满意。这使周公离开都城，到东方征战。秋天，雷雨狂风大作，即将成熟的庄稼倒伏了，大树连根拔起。国人惊恐，成王和大臣穿上朝服，打开金属盒子，得到周公愿代武王去死，以保周族江山的祝词。太公、召公和成王询问史官及有关人员，他们说："这是真的，周公命令我们不要声张出去。"成王拿着书简感动不已，说："过去，周公勤劳王室，我不知道。现在，上天动怒来显示周公的功德，我要亲自把周公迎接回朝，我们国家的礼制也应该如此。"成王走出郊外，天还下着雨，风向反转，把倒伏的庄稼又扶了起来。太公、召公命令国人，用土把庄稼培好，这年获得了丰收。

另一次是周公还政成王，有人向成王说周公的坏话，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周公有口难辩，只得悄悄地离开成王跑到南方的楚国去避难。一个偶然的机会，成王打开了档案库，看到了周公在自己生病时，向老天爷祈祷的记录。那是在周公摄政的年月里，成王得了病，周公非常着急赶忙向上天为成王祈祷，说："国王年纪轻，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如果有什么错事惹得上天发怒，那责任在我，请上天来惩罚我好了。"周公的祷告词被史官记录，藏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成王见到祷告词，被周公的一片忠心感动，为自己听信谗言、无端怀疑周公而懊悔，竟然痛哭流涕，连忙派人把周公请了回来。此后成王对周公深信不疑，更加敬重。

周公是在成王年幼时摄政的，七年后还政给成王。后来，周公生病，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把周公葬于毕，和文王安葬在一起，他说："这表明

我不敢把周公当作臣子。”

周公与文王一样不仅具有君主之才，而且多才多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音乐家。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

《尚书》：《武成》、《洪范》、《金滕》、《大诰》、《浩浩》、《多士》。

成康之治

周公、召公等十位贤臣不仅是成王的辅佐大臣，也是他的老师，在武王死后，担负起对他教育的职责。

当周公还政之后，召公对成王说：

“王要认真地做事，施行德政，借鉴夏、商两代灭亡的经验教训。

“我不知道，夏代接受天命，该有多久；我也不知道，夏的国运是否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认真行德，才失去了他们的福命。

“我不知道，殷接受天命，该有多久；我也不知道，殷的国运是否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认真行德，才失去他们的福命。

“现今，王接受了治理天下的大命，要以这两个国家为借鉴，继承他们的功业。

“王初理政事，应该懂得明哲的道理。现今上天已经显示了明哲的道理，给予你吉祥，给予你永年；您要认真推行德政！用你的美德，向上帝祈求长久的福命。

“愿王不要使百姓多行犯法的事，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百姓。要建功立业，表彰那些最有德行的人，让百姓效法并在天下推行，也使王的美德更加显扬。君臣上下勤劳治国，心怀忧患。这样，我们接受的大命比夏代、殷代都要久远。愿君王和臣民共同行德，以求得上帝赐给的永久的福命。”

最后，召公向成王行叩拜之礼，表示衷心拥戴成王。

周公对成王更是耳提面命，时刻向他讲述夏商的历史，让他懂得君主的艰难。周公还政成王以后，担心他年轻贪图享乐，荒废政事，告诫成王不可逸乐。史官把周公的这些教导记录在《尚书·无逸》篇中。

周公说："唉！君子决不可贪图安逸享乐。先要懂得百姓稼穑的艰难，再与百姓一起快乐，才会深切地体察百姓生活的苦尽甜来。看那些百姓们，父母勤劳稼穑，他们的儿女却不懂稼穑的艰难，只知寻欢作乐，时间久了，竟轻慢侮辱他们的父母说：'老辈子的人真不懂得生活！'"

接着周公向成王讲述殷周两代帝王的故事："我听说，过去殷中宗神态庄严，心怀敬畏，自己谋求天命，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而且恭敬谨慎，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殷高宗做太子时，长期与百姓一起劳役，懂得爱护百姓。等到即位时，三年不轻易说话。说了就合乎哲理，使国家上下和睦，没有怨恨他。高宗在位达五十九年。

"祖甲以为代兄称王不义，逃到民间做了很长时间的平民百姓。即位后向百姓施恩予惠，连鳏寡孤独也不敢轻慢。祖甲在位达三十三年。

"后来的殷王贪图安逸享乐，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也就没能长寿的，仅十年、八年，甚至三四年。

"我们的周的太王、王季克制自己，敬畏天命。文王则穿着平民的衣服，从事开山垦荒，耕田种地的劳役。他和蔼可亲，善良恭敬，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忙得从早晨到晚上没有功夫吃饭，来求得万民和乐。他不敢嬉游田猎，不敢动用各邦国贡赋供自己享乐，他在位达五十年。

"从殷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他们都很明智。有人告诉他们：'百姓在怨恨你，骂你。'他们会更加谨慎，有人举出他们的过错，他们会老实承认，不生气。不这样，人们就会互

相欺骗，诈惑。如果不从长远考虑国家法度，不能使自己心怀宽大，乱罚没犯过错的人，乱杀没有罪过的人，老百姓的怨恨会合起来，就会聚集到你自己身上。”

当成王即位后，东方各国的叛乱平定，许多人的头脑松弛下来，一种过度相信天命的思想，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召公、周公非常警觉，意识到这种思想的传播将使臣依赖天命，怠于政事。于是二人分别做重要讲话，主张事在人为，鼓励君臣奋发有为，廓清了天命说的毒雾。《尚书·君奭》记录了这一事件。

召公说：“我们应当依靠自己，不敢安然依赖天命。要想没有过失，应当依靠人。考察年轻一代，大多数不能恭敬上天，顺从下民，不能发扬前人创业的光辉，把前人的基业丢弃了，不懂得天命难得，不懂得天命难信，这样就会失去天命，不能长久地得到江山。继承前人的遗志，奉行明德治国，就在今天这一代人身上。”

周公说：“我赞成你的看法，勤劳王事，只想着把前人的光辉传给后代。你说过‘天命不可信’。我说只要把文王的美德加以推广，上天不会废弃文王接受的福命。”

周公广泛征引史实，说明贤明辅臣的重要作用。伊尹辅佐成汤，保衡辅佐太甲，伊陟和臣扈、巫咸辅佐太戊，巫贤辅佐祖乙，甘盘辅佐武丁，所以君王施政于四方，没有人不相信。文王也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五位贤臣。有人说，没有人奔走效劳，努力施行常教，文王就没有恩德降给国人。武王时，文王的贤臣有四人仍健在。正因为这四人辅助武王，才使天下赞美武王的恩德。

周公对召公奭说：“现在我好像要渡河，我和你一起前往，或许可以渡过。您现在应当看到，我们接受大命，有无限美好的前景，也有无限的艰难困苦。现在，我请求你，把你的智慧献出来，不使后人迷惑。”

周公回忆了武王当初对他们二人的信赖与托付及二人的精诚合作，周公问召公："除了我们二人，您还有合意的人吗？您会说，只有我们两个人。上天赐予的休美频频而来，仅仅我们二人应接不暇，希望您敬重贤德，提拔杰出人才，以完成大业。"

周公最后说："君奭啊！善始容易，善终难啊！把这些话作为座右铭，勤劳恭敬地治国吧。"

这场讨论意义非常重大。周公、召公等老一辈人善始善终，激励后代人努力地赶上去，这为成康之治的出现，提供了精神力量。

周公的上述思想，在《蔡仲之命》中进一步得到发挥。周公摄政时，蔡叔参加叛乱，平叛后，周公把蔡叔囚禁在郭邻，直到死时都没有赦免他。蔡叔儿子蔡仲贤明敬德，周公任命他为卿士。蔡叔死后，周公向成王请命，封蔡仲于蔡地。在蔡仲践诸侯位的重大时刻，周公不失时机地教育这位年轻人。

周公说："你要遮盖前人的罪过，恩忠思孝。你要迈步前进，自己立身。勤劳而不懈怠，青史留名，为后人留下榜样。要遵循祖父文王的教诲，不要像您父亲违抗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行善的方法不同，都归于天下大治；为恶的方式不同，都归于国家大乱。你可要谨慎警戒啊！

"慎始，更要慎终，这样结局不致遭困。不考虑结局，最终就会困迫。努力建功立业，和睦四邻，护卫王室，协和兄弟，康济小民。遵循中道，行为适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先王成法。审慎视听，不要因妄言乱语变更法度。不要忘了我的训告。"

在周成王亲理朝政的第二年，淮夷和奄觉得成王年轻，朝政不稳，乘机发动叛乱。成王亲自征伐，灭掉了奄国，不仅重振了周国的雄威，也提高自身的威望。五月，成王返回镐京，各国诸侯都来朝会。周公代表成王发布诰命，讲清了政策，启发这些诸侯思考，让大家和睦、团结，明德慎罚，勤劳王室，不受坏人的引诱。自此以后，成王时的西周不仅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还加

强了与远方少数民族的联系。居住的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族，贡献他们特有的楛矢石砮，据说其坚利如铁。据近人考证，这是一种用矽化木做成的箭头。居住在西方的氐、羌族来贡献了鸾鸟，南方的越裳献白雉，这些都是盛世吉祥的象征。这一切都说明，周王朝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也表明周王朝声威扩大，到达远方。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不少地方，如吉林省的骚达沟、土城子等许多地点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青铜器，其中有铜刀、铜矛、铜斧、铜箭镞等。此外还有陶器、石镰、卜骨等。这些遗物与中原周文代相近，说明了周文化对边远地区的影响。

成王并没有躺在已有的成就上，他和周公等辅佐大臣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方面，《尚书》中的《立政》与《周官》作了集中反映。

《立政》是周公晚年对成王的诰词，主要是阐述设官理政的法则。而对日趋安定的政治形势，周王朝的迫切任务是健全政治制度，以求长治久安。

周公首先告诫成王说："您要教导常伯、常任、准人、缀衣和虎贲。"上述官分别是治民官、治事官、执法官、掌管国王衣的官和守卫王宫的武官。

接着周公说："在美好的日子里就知道谨慎的人，很少啊！夏代君王知道真诚地遵循九德的准则，并告诫诸侯说：'善于考察任用你们的常任、常伯、准人，才称得上是君王。不依循德行，而以貌取人，这样任用官员，你们的常任、常伯和准人就没有贤人。'夏桀背离了这些准则，任用暴虐的人，也就国破家亡了。

"成汤选用事、牧、准三宅，都克尽职守；三宅属官，都是贤能俊才。三宅三俊在商都，协和万民；在四方，显扬君主的圣德。

"商纣任官不重德，竟让暴虐失德的人共同治理他的政事，上帝重重地惩罚了他。

“文王、武王能够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来敬事上帝，为民立官长。设立的官职有：任人、准夫、牧作为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大小邦国的君主、艺人、外臣百官；太史、伊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此外，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夏商遗民的官员。

“文王能够度知三宅的思想，设立官员，让这些俊才管理百姓，大建功德。文王并不是什么都自己管理起来，而是放手让专任官员处理政事。武王不敢丢弃文王的善德，考虑顺从文王宽容的德行。”“现在您已是君王了，要设立合适的官职，明确职责，不使其相乱。任用贤德的人，帮助我们治理百姓。一定任用德才兼备的人。”

“我姬旦把前人的嘉言美政都告诉您了，我们先王的贤子贤孙，千万不要在各种狱讼和各种政令上犯错误，这些事只让主管官员去负责考察他们，扶持他们，放手让他们治理国事，就不会有失误。用人不当，君王终世不会有显著的政绩。您要治事好军队，使普天之下，没有人不臣服，循着大禹的足迹，遍行天下。显扬文王圣德的光辉，继续武王伟大的功业。”

在这之后，成王宣布了周朝官制的诰会。设立了太师、太傅、太保，这是三公。其职责是论道经邦，燮理阴阳，阐明治国思想，依顺事物发展的规律，调和阴阳。设立少师、少傅、少保，叫做三孤。其职责是协助三公弘扬道化，敬天信地，辅弼君王。冢宰掌管国家的政治，统理百官，平均四海。司徒常管国家教育，传布五教，安定和谐天下的百姓。宗伯掌管国家的典礼，治理神和人的事，和谐尊卑贵贱的关系。司马掌管安邦定国，统帅六师，以军事力量保卫国家，平治诸侯。司寇掌国家禁令，查办奸邪为恶的人，刑杀强暴作乱的人。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分给士、农、工、商四民居住，使国家人民按时受地利。六卿各有分职，各自统领属官，倡导天下九州的牧、侯、伯，使百姓富足安定。

成王还颁布了朝觐会同制度。每隔六年，五服内的诸侯在京师朝会一次。每隔十二年，天子巡狩天下，在四岳考正制度礼法。四方诸侯在方岳朝见，有功的提升，无功者罢免。

成王在颁行上述政治制度的同时训示百官，他说："我恭敬勤奋修养德行，起早带晚犹不及古人。凡我在位的大小官员，都应认真负责地工作。发出号令要慎重，号令一出就执行，不允许违抗。用公心灭私欲，老百姓就会信任。学好古代的典章制度，才可步入仕途。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以典章作常师，不要只凭能言善辩干扰政事。蓄疑不决就会败坏智谋，懈怠疏忽就会荒废政事。入不学习就如同面对墙壁什么也看不见，遇事也就没有办法心烦意乱。

"啊！公卿大夫们，敬守官职，治理政事，辅助君王，安抚百姓，万邦才不厌弃周德！"

周公、成王曾把殷商遗民迁到成周，由周公亲自监管教化。这一措施，对于稳定当时政局，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周公死后，周成王发布策书，命令君陈继任周公的职务。成王对君陈说："君陈啊，你具有美好的品德，孝顺父母，恭敬上级。现在任命你去治理成周。要敬慎啊！从前，周公在成周教诲安抚百姓，百姓怀念他的恩德。你要更加谨慎，循行周公的常法，努力发挥光大周公的遗训，百姓就会安定了。

"我曾听说：最好的政治，馨香远闻，能感动天上的神明。黍稷的香气不是远闻的馨香，只有明德才是远闻的馨香。你要为此而像周公那样，每天孜孜不倦地努力。千万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凡人看不到圣道，是不能见到圣道；有人能见到圣道，可又不行圣道，你可不要这样。

"你是风，百姓像草，风吹草动，上行下效。治理政事，无论是兴是废，没有一件不是艰难的，你要反复地和众入商量，即使众人意见相同，你也要深思熟虑然后施行。你要是有好的谋略，就

进入内廷，告诉君主。当你的谋略，在外边受到人们的拥护，你会说：‘这些良策嘉言得以施行，这都是君主的德惠。’这样做臣子，就会臣良君显啊！

“君陈，你要以周公的伟大训导为准则，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不要依仗国法施行苛政，应当宽裕有制，举止从容和合万民。殷民犯了罪，我说要处罚，你不要处罚；我说要赦免，你不要赦免，一定依法公平合理地判决。有人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接受你的教化，要是惩罚能制止犯法，就惩罚。对于习惯于犯法作乱，败坏常教、扰乱风俗、屡教不改的人，即使三者中的小罪，也不赦免。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要愤怒疾恨，不要求全责备。必须忍耐，才能渡过难关；必须宽容，德才算大。要善于挑选那些修德的人，也要挑选那些有时不修德的人；任用那些贤良的人，以勉励那些有时不太贤良的人。要使百姓过上富裕的日子，他们会因物质丰富而易于教化。要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而违抗君命，应当顺从他们为好。你能够重视常典，施德行惠，殷民就没能不改变的。你的政教确实升到大道的境界，我一人膺受多福，而你的美德，终将被世世代代地永远称誉。”

成王在位三十多年，当他重病之后，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钊。

那是四月，月亮新现光明。甲子这天，成王洗了头发，洗了脸。太仆为他戴上王冠，披上朝服，成王靠着玉几，召见了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官之长及办事官员。

成王说：“唉，我病得很重，病情还在一天天发展，很危险，或许已经到了临终的时刻，恐怕不能郑重地讲后嗣的事了。我在此时要仔细地训告你们：

“过去文王、武王宣德重光，奠丽陈教，臣民都努力奉行不违背，因而能讨伐无道的殷商，承受上天的大命，建立周朝。后来，

幼稚的我，敬奉汤威，遵循文王、武王的遗训，不敢昏乱越轨。如今上天降下重病，几乎不能起床讲话了，希望你们明白我此时的心情，认真地保护我的儿子姬钊度过艰难。要安抚远方的邦国，和善近邻。我想你们几位不会自己乱了威仪，你们也不能让姬钊触犯礼法，陷入非法的境地。"

群臣接受了成王的遗命，就退了出来，郑重地把成王的朝服摆放在王庭。第二天，成王驾崩。

太保命令仲桓和南宫毛跟从齐侯吕伋，二人分别拿着一干一戈，率领百名虎贲，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请他进入侧室，在那里忧伤地主持发丧。丁卯这天，命令作册，制定丧礼的程序。又过了七天，到了癸酉这天，召公、毕公等主持官员，命令准备发丧时用的各种器物。

狄人陈设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屏风和先王的礼服。门窗间朝南的位置，铺设双层竹席，镶饰黑白相间的丝织花边，陈彩玉、几案。在西墙朝东的位置，铺设双层细竹篾席，镶饰上花边，摆上彩色贝壳、几案。在东墙朝西的位置，铺设双层草席，镶饰绘有云气的花边，陈设雕刻的玉器、几案。在堂的西边的夹室里，铺设双层青竹篾席，镶饰黑丝绳连缀的花边，陈设各种漆器、几案。

陈设越地献的玉五种，陈列各种宝器，赤刀、记载先王遗言的大训、大璧、琬、琰，它们被陈列在西墙向东的席前。华山出产物大玉，东北出产的夷玉、天球、河图，被陈列在东墙向西的席前。胤制作的舞衣、大贝壳、大军鼓、陈列在西房。兑制作的戈、和制作的弓，垂竹作的竹矢，陈列在东房。

成王的玉车安置在宾客经过的台阶前，金车放置在主人走的台阶前，象骨装饰的车放在门左侧堂屋的前面，木车放在门右侧堂屋的前面。

二人戴着赤黑色的礼帽，手持叫师的兵器，站在祖庙门里边。四人戴着青黑色的礼帽，持戈，戈刃向外，相对站在台阶两旁的

斜石上。一人戴冕，执大斧，站在东堂的前面。执钺，立于西堂的前面。一人戴冕，执三锋矛，站东堂外边。一人戴冕，执另一种三锋矛，叫瞿，站在西堂外边。一人戴冕，执锐，站在北堂北面的台阶上。

姬钊戴着麻质礼帽，穿着绣有斧形花纹的礼服，从西阶上来。卿士们和从诸侯戴着麻质礼帽，穿着黑色礼帽，进入中庭，进入各自的位置站好。太保、太史、太宗戴着麻质礼帽，穿着红色礼服。太保捧着大圭，太宗捧着酒杯和瑁，从东阶上来。太史捧着策书，从西阶走上来，迎着姬钊宣读策命，说："成王靠着玉几，宣布临终遗命：命你继承文王、武王的遗训，继承王位，做周国的君主，遵守大法，和谐天下，宣扬文王、武王的明训。"姬钊拜了又拜，回答说："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子，要竭尽其能，治理四方来敬忌天威。"

姬钊接受了酒杯和瑁，前进了三次，祭酒三次，尊爵酒三次。上拜说："王啊，请喝酒！"王喝酒后，太保接过酒杯，走下堂，洗了手，又登堂。这次太保对姬钊行臣子之礼，用另外一种酒杯，自斟自饮作答。然后把酒杯交给宗人，对王下拜，王也回了一拜。太保又从宗人那里接过酒杯，祭酒、尝酒、奠酒。然后把酒杯交给宗人，又拜。王又回拜。太保走下堂，礼毕，撤去了所有的陈设仪仗。诸侯卿士们都走出祖庙大门，恭候即位的康王视朝。

周康王即天子位，于是诰命诸侯。

康王走出祖庙，来到应门内。召公率领西方的诸侯进入应门左侧，东伯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进入应门右侧，他们都穿着绣有花纹的礼服和黄朱色的韨。接待诸侯，导行仪节的官员，进献命圭和贡物，诸侯上前进贡，说："王室护卫向王奉献我们土地上的出产。"诸侯们都再拜叩头。康王照礼节辞谢，然后升位答拜。

太保召公和芮伯同走向前，互行揖礼，同向康王再拜叩头，说："敬告天子，皇天更改了大国殷的命运，我们周文王、武王大受福

祥，安定西方。新谢世的成王，赏罚完全合宜，功德已定，把幸福留给后人。如今王要敬谨，使王朝军队扬威，不要败坏我们高祖的大命。”

康王说：“侯、甸、男卫的各位邦君诸侯！现在我姬钊答复你们的劝告。过去，先君文王、武王很公平，仁厚慈爱，不滥施刑罚，致力于忠信，因而光辉普照天下，拥有像熊罴一样勇武的将士，忠贞不渝的大臣，安定治理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并未辜负天命。

“皇天以天道训示，把天下交付先王。先王分封诸侯，建藩树屏，眷顾我们后人。现在，我们一定互相顾念，像你们的先公臣服于先王那样。虽然你们身在朝廷之外，可你们的心不可不在王室，要辅助我顾念国家，不要把羞辱留给我。”

三公和诸侯群臣听完了康王的诰命，相互作揖行礼，快步走出。康王脱去吉服王冠，返回居丧的侧室，穿上了丧服。

康王在召公、毕公这些顾命大臣的帮助下，生活节俭，专心处理政事。据说当时晋侯修了个漂亮高大的宫殿，受到康王的严厉斥责。他遵循祖训，按照文王、武王、成王订下的规矩行事。他带领王朝的军队按时到四方巡狩。在我国古代文献里，有关康王用兵的记载很少。康王时留下的青铜器《小盂鼎》上的铭文，记载了康王曾命盂进攻匈奴，并把他们的首领杀死。近年在岐山贺家村出土的青铜器《史䛐簋》也是康王时代的作品，并提供了研究康王时代历史的新资料。它的底部铸有铭文二十三字，记载了乙亥这天，周康王诰命毕公，赏给了史䛐贝币十朋，史䛐以此为荣耀，作簋铸铭。

史䛐记载的康王诰命毕公这件事，发生在康王十二年，康王册命四朝元老毕公继君陈之后治理成周。

这年六月庚午日，新月初出，到了第二天任申日，康王早行从镐京到了丰，完成这项册命。康王对毕公说：“周公辅助先王，

安定国家，把殷顽民迁到洛邑，让他们接近王室。因此，殷顽民被周公感化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三纪。时世和风俗都有变化，四方没有令人忧虑的事发生，正是大家的努力使我很安宁。世道有好有坏，政教因俗而治。如果不褒奖良善，百姓不会勉励向善。您辅佐四代君王，庄重地统率臣下，没人敢不敬重您说的话，您嘉绩多被先王表彰，我垂衣拱手，仰仗您的辅佐才有所成。

“啊，文师，国家安危，全在于教化殷顽民。不刚不柔，修德行善。周公能慎于开始，君陈能和洽于中，您最终完成教化。三位君长齐心协力，同归于治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的那些披发左衽的蛮族，都心悦诚服，我真是永膺多福，您要治理好成周，当您建了无穷之基，也就有了无穷的美名传扬。子孙要遵循您的成法，国泰民安。哎！您不要说不能胜任，您会竭尽全力；不要说殷顽民寡德少善，只有慎于政事。敬守先王盛大的功业，还要取得比前人更美好的政绩。”

对成周等地殷顽民的治理，不仅使国家安定，也促进了商与周文化的交流融合。周族学习吸收了殷人的先进文化，广泛地使用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农业获得空前的大丰收。

司马迁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得好，因此天下几乎没有人触犯刑法，近四十多年内，国家没有动用过刑罚。固然有溢美之处，但也表明成王、康王时代，国家确实繁荣稳定，因而有成康之治。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

《尚书》：《召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文攻》、《周官》、《贿肃慎之命》、《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

周穆王西征

楚国在商朝末年已经比较强大，文化上受商王朝的强烈影响。因参与武庚叛乱，在周公平叛后，沿长江向西发展，在长江中游一带定居下来。为了拉拢楚国，周成王曾封楚国贵族熊绎为子爵，但实际上周王朝很看不起地处蛮夷之邦的楚国。据说一次周成王在岐山下大会诸侯，楚国为会盟贡献了滤酒用的香草和祭祀山川时的标志木杆。参加会盟的楚王和一个鲜卑人被委派看守庭院里祭神用的熊熊燃烧的火堆，连正式参加会盟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楚国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并严重地威胁着汉水北岸的周姓诸侯国。昭王依靠成康之治积聚的强大国力，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昭王十六年，周王朝伐楚的大军渡过了汉水，从此周昭王对楚国连年用兵。虽然征伐的胜利使他获得了不少财富和奴隶，但激起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昭王十九年，他又率领浩浩荡荡的六师人马讨伐楚国。传说，在他南渡汉水时，当地人把一艘用胶粘起来的大船献给了他。昭王坐上这艘船，得意洋洋，不料船至河心解体，昭王落入河中。恰好有个胳膊长、力气大的侍卫辛游靡，不顾一切地抢救昭王。等他把昭王拖到岸上，昭王已被淹死了。昭王浩浩荡荡由北方开来的六师人马，被楚国打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

周王朝对此惨败的记载是"昭王南巡不返"。从此，周王朝失去了对南方的控制，楚国日益强大。到了春秋时代，楚国终于发展成雄据南方的大国。

昭王南征而不复，历来被认为王道衰微的象征。不过近年发现的资料表明，当时的周朝贵族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1976年12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白家生产队发现了一批西周窖藏青铜器。铭文器中,《史墙盘》铭文最多达284字。做盘者名墙，是位史官。墙的烈祖是武王、成王时代人，乙祖是成王、康王时人，亚祖祖辛为康王、昭王时人，文考乙公是穆王、恭王时人，而墙本人生活在恭王、懿王时代。《史墙盘》铭文的前半段歌颂了周朝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国王的功烈，后半段铭文叙述了墙的光荣家史。谈到昭王，铭文上说，“伟大淳厚的昭王，大规模地打击荆楚，为了巡狩而亲自到南方。”这说明史官墙对昭王伐楚极为重视,把这件事作为昭王的重要功绩。史墙的看法在当时应有代表性，说明当时的周人对昭王伐楚的功绩还是肯定的。昭王伐楚，使南方的金属，特别是铜输入中原，这对促进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史墙盘》对昭王伐楚行动赞赏的原因，可能是伐楚行动保护了汉阳诸侯各国。

昭王死后，他的儿子姬满即位，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穆王。

昭王南征全军覆没，不仅使周朝军事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更重要的是昔日周天子的雄威也不复存在，立国一百多年的周王朝已是王道衰微，一些少数民族纷纷拒绝向周王朝纳贡称臣，周王朝开始从全盛时期向下坡滑去。这使刚刚即位的周穆王备感艰难。这在他任命君牙做大司徒时说的一番话中，不难看出，他说：

“君牙，你的祖辈、父辈世代忠实坚贞，服劳王室，有功绩，这都记录在王室的太常旗上。我这个年轻人继承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业，也需要先王的忠臣，能够辅佐我治理天下。我心怀忧愁危惧，像踩着老虎尾巴，又像是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面。

“现在我任命你来辅助我，使你就像运用我四肢那样地得力。仍然承袭你祖先的旧职，不要辱没你的祖辈和父辈。如果你自己

能行为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不知道中正，希望你要表现中正。夏天炎热大雨，老百姓只知道怨恨叹息；冬天严寒大雪，老百姓也只知道怨恨叹息。他们自叹生计艰难，你要想着他们的艰难，设法帮他们度过艰难，百姓就安宁了。伟大的文王的谋略，光辉的武王的功绩，开导佑助我们后代子孙，使我们依从正道。你要敬明正典教化，弘扬文王、武王的明训，就能取得与前人相匹配的功绩。

"君牙，祖辈、父辈为我们立下了旧典善法，民之治乱全在于此。让我们以前辈美善的行动为榜样，取得昭示后人的治功。"

穆王即位之初，满怀忧患，与君牙一起立下了正身、思艰、安民的治国方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犬戎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穆王以犬戎不按时供应贡品为理由，决定对他们进行征伐。祭公谋父劝阻他说："君王您不能随便征伐犬戎，我们的先王历来是以良善的德行劝导人，而不是炫耀武力来威吓人。动用武力要选准时机，不动则已，一动就要显示威严。动不动就用它吓唬人，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就失去了它的震慑力。先王对待百姓，正其德，厚其生，富其财。使其趋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先王使用兵器是万不得已，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无论远近都听从周王朝的命令。你这么去征讨犬戎，难道不是废除先王遗训了吗？我听说犬戎民风淳厚，他们对您的无端征伐，一定会全力抵抗。"

穆王不听祭公谋父劝告，出兵西征犬戎，俘虏了四个以白狼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和四个以白鹿为图腾的部落的酋长。但从此以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再也不来朝贡了。征服犬戎的胜利反而使王道更加衰弱。为了加强对西戎的控制，周穆王把西戎的五个王也抓来，还把他们的一部分迁到了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

穆王打败了戎狄，扫除了通往西方道路上的障碍。善于驾车的造父，为穆王驾着八匹骏马拉的车子，日行千里，开始了他那

充满传奇色彩的巡游活动。据说穆王向东走过的路程有二亿零二千五百里，向西的路程有一亿零九万里，向南的路程达一亿零七百多里，向北的路程有二亿多里。其中最富有传奇性的是穆王西行的故事。

有关穆王西行的故事记载虽然完整，但历来不被史家相信。春秋战国时代，有人根据穆王西行的历史记载和有关西王母的神话故事，编写了《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后来失传了。到了晋朝太康二年（281），有个叫不准的人，在汲郡（今河南汲县）悄悄地挖开了六百年前魏襄王的大墓。墓中的珍宝被不准席卷而去，剩下了一堆狼藉的竹简。后来西晋朝廷得知了这件事，人们发现墓中竹简上写有文字，便将竹简取出，足足装了几大车，全部被运回朝廷。当时著名学者荀勖等人研究考证，发现这是一批已经失传的先秦古籍。经过整理，写定成书，共七十五篇，十多万字。这些书被称为“汲冢竹书”。这是我国古代史料的一个重大发现。汲冢竹书除了《穆天子传》，还有另一部重要史书《竹书纪年》，都记载了穆王西行。

《穆天子传》对我国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介绍得比较详细，特别是书中介绍的名山大川及其他地名，对我们研究古地理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还可以根据西北至中亚的地理沿革找到相应的位置。这说明当时已经对这地区有所了解。根据这些记载，穆王这次西行，历经现在的河南、山西、内蒙、甘肃等省、区、到达新疆的叶尔羌河一带，而西王母之邦离这一带还有三千里之遥。据学者们研究穆王到达了中亚一带，与汉代张骞通西域经的地区基本一致。对此，《穆天子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穆王带了大批人马和财宝从成周出发，进入河南，沿太行山西侧，渡过黄河，越磐（今山西平度），沿滹沱河北岸西行，通过现在的雁门关一带到达河宗部落（今内蒙古河套以北）。河宗部落

的一支鄘伯絮派人前来迎接，先献给穆王十张豹皮和三十六匹好马作见面礼。住下之后，穆王黄河边上去垂钓，又到滲泽去打猎。穆王用猎到的白孤和黑狛作祭品，特意去祭祀河宗部落的祖先，并与鄘伯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穆王继续西行，经过乐都、积石等地（今甘肃、兰州附近），到达了昆仑之阿。穆王登上了昆仑之巅，瞻仰了这里的名胜黄帝之宫，举行了隆重的祭山典礼。北上到了珠泽，当地部落贡献了白玉，还有供食用的三百匹马、三千只牛羊及美酒。穆王也把黄金之环、朱带贝饰、布匹、种牛等许多礼物赠送给当地人民。

向北到春山，穆王登山远望，山上木茂花繁，果实累累；山下春山之泽清澈见底，它是由温和的山泉汇聚而成。当时风和日丽，飞鸟、百兽汇聚于此，那里有赤豹、白虎、熊、罴、豺狼、野马、野牛、野猪，还有白鸟……穆王在一块大石上刻铭为记。

向西到了赤乌部落。赤乌部落与周人同宗，是古公亶父时流落这里的一支。这次他乡遇同宗，自然万分亲切。赤乌部落向远方的客人献上千斛美酒，九百匹食用的马，三千只牛羊和大批粮食。穆王回赠了一辆墨车，还有黄金四十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贝带五十，等等。

向北，渡过洋水，到达曹奴。部落首领为穆王一行举行了丰盛的宴会，把九百匹马、七千只牛羊和百多车粮食赠给穆王做继续赶路的资助。穆王也把金、银做成的工艺品、四十副贝带的大批布匹回赠给了他们。

穆王北征东还，到达黑水，正赶上那里连续降雨七天，在那里建一个留骨之邦。沿黑水到达了山容氏，在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美玉。

向西到达了剞闾氏，穆王登上了铁山。再向西到了鹑韩氏，那里穄麦丰盈，犬马牛羊繁多。他们把这些贡献给穆王，穆王回赠了金银珠宝。穆王一行连续西行，最后终于来到西王母之邦。

穆王在西王母之邦受到了隆重的接待，穆王献上了白圭、玄璧和精美的织锦，他们在美丽的瑶池祝酒相贺。西王母唱了一首情深谊厚的歌谣助兴，穆王即席赋诗：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吾顾见女。
比及三年，将复尔野。

穆王还登上了弇山，豪兴大发地挥笔写下了“西王母之山”，刻在山石之上，留作纪念，还栽上一棵槐树。然后带着西方人民的深厚情谊东还。乐于探险不疲的周穆王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回国。经过旷原，在那里作了休整。打猎获得了各色的鸟兽。经过智氏，互相交换了礼品。从那里南征东还。到达献水，继续向东南进发。到了瓜纑之山，那里的阏氏、胡氏护卫穆王东行，进入大漠，由于无水喝，有个叫高奔戎的刺开马的脖子，取马血请穆王喝。穆王喝完，觉得美极了，赐给高奔戎佩玉一只。到了积山才见草木。有人来向穆王献酒，穆王报之以黄金、珠宝、朱丹。向东到滔水，那里是浊繇氏的地域，继续向东南到了农耕民族地区。过黑水、采石之山、文山，继续向东南，见到河伯之孙，后又见到鄗伯。穆王在鄗伯的陪同下，在沼泽中休息了五天，等待疲惫不堪的随从陆续到达。继续南还，过钘山，沿太行山南行，南渡黄河，驰驱千里，到达宗周。

在热烈欢迎穆王归来的仪式上，执事官向穆王献上白鹄之血，向造父献上羊血，为他们洗尘。接着在宗周的祖庙，举行了盛大的朝会，接着又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周穆王这次西行，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一次成功的探险，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对外贸易活动，还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穆王西行的时候，徐国带领一些东夷部落乘机向周朝进攻。穆王日夜兼程从西北赶回，伐徐、伐越，以巩固周王朝在东南的

统治。

尽管《穆天子传》歌颂了穆王不畏辛劳，长途跋涉，与西方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歌颂了穆王的探险精神与慷慨大度。但另一方面穆王连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给周人带来沉重的负担。祭公谋父为劝阻穆王“周行天下”。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屈原也曾在《楚辞·天问》中批评了穆王。

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掌管皇帝车马。穆王曾忧虑地对他说：

“伯冏啊！我不能够修德行，继承先王做一个合格的君王，如今诚惶诚恐，夜难成眠。

“过去文王、武王的大小臣子，都心怀忠良，他们的侍臣，没有一个不是忠贞正直的人。他们早晚侍奉、匡正他们的君王，所以君王出人起居，没有不慎重的；发号施令，没有不美善的。百姓恭敬顺服，万邦和美。

“现在我任命你做太仆正，你要使群仆近臣正直，努力使你们的君主行德。互相指出不足之处，并加以改正。你要慎重地选择你的部属，不要选择那些巧言令色、奸邪献媚的小人。君主有德在于臣下，君主失德也在于臣下。

“啊！要警惕啊！永远辅助你的君王实行常法。”

虽然穆王真心悔悟，但社会动乱已经酿成，江淮东南地区的淮夷、群舒反叛不断，徐夷僭号来伐宗周，已经西到黄河。这引起了周穆王的极大恐慌，他一方面调动周朝九师的兵力，另一方面不得已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把随徐夷反叛的夷人部落交给徐偃王。徐偃王大行仁义，东南一带竟有三十六国前去朝拜。穆王见此，决定对徐偃王发动突然袭击。他命令造父骑着最快的战马一日之内就到楚国，命令楚国出兵伐徐。楚大举进攻，徐偃王毫无戒备，他以仁义获得成功，也就不忍心以他的仁义之师去和气势汹汹的楚国军队搏斗。所以，国破家亡，败走彭城东山之下，老

百姓跟随他的数以万计。在那里落脚之后，名之为徐山。临终前，徐偃王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说："我依赖文德，却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却不知诈人之术，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

周穆王也认真地总结了教训。晚年的穆王面对周道衰微，动乱不止的新形势，觉得光是用祖宗的治国办法，似乎不能适应他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由于政乱民怨、滥用刑罚，造成民众及少数民族更激烈的反抗，刑罚愈酷反抗愈烈，如此则造成恶性循环。晚年周穆王任用吕侯为相，吕侯劝导穆王明德慎罚，制定明确的刑律，这样才能使动乱不止的国家，走出恶性循环的恶圈，得到根本治理，功绩流传后世。

吕侯向穆王申述了夏代的刑罚，制定了新刑罚，这就是史官记录下来的《吕刑》。《吕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刑法专著。

穆王说："过来吧，各位诸侯大臣，我来宣告善法。如今你们安定百姓，最重要的要选择什么？难道不是人吗？最谨慎的是什么？不正是刑罚吗？考虑的最仔细的是什么？不就是判断公正适宜吗？

"审断狱讼，法官要按五刑审查，如果罪行核实可信，就用五刑来惩治；如果够不上五刑，就用五罚（五等罚金）来惩治；如果够不上五罚，就用五过（五种过失及处罚办法）来惩治。采用五过惩治的弊端是：畏官势，报恩怨，常说情，索受贿，受请托。有上述弊端，法官与罪犯无异，必须详细审查严加惩处。

"判五刑有疑问，应从轻；处五罚有疑问，应从轻。一定要详核严查。要从多方面核实验证。审理审件要有共同办案的人。没有核实不能治罪，应当同敬天威。"

接着穆王宣布了有关法律及执行的原则："判处墨型有疑问，从轻，罚金一百锾，并进一步核实罪行；判处劓型有疑问，从轻，罚金二百锾，进一步核实罪行；判剕刑有疑问，从轻，罚金五百锾。

判处宫刑有疑问，从轻，罚金六百锾；判处死刑有疑问，罚金一千锾。墨罚的条目有一千，劓罚的条目有一千，剕罚的条目的五百，宫罚的条目有三百，死罪的刑罚条目有二百。五种刑罚的条目共有三千。

“遇到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例，可按相应的刑律上下比照，不要用已废除的法律，应当依法明察。上刑能减，就要从轻；下刑宜重，就用上刑。量刑轻重允许有些灵活性，还要根据社会情况有所变更。无论依法量刑，还是适当灵活，都要合乎道理和要求。

“处以刑罚虽不置人死地，但要使受处罚的人感到比重病还痛苦。所以佞人不可断罪，必须由正人君子量刑，以使量刑公正无误。办案时不放过任何矛盾、漏洞，使犯罪的人心服。应当怀着哀敬之心断狱决讼，明白无误地根据法律条文斟酌，力求公正适当。”

穆王最后说：“哎，警惕啊！诸侯国君同姓百官们，我说的话可要戒惧啊！因为我谨慎用刑，刑罚才会给百姓带来德惠。如今上天扶助下民，你们要配合天意。应当明察一面之辞。治民，一定要公正地听取审理双方的诉讼，没有任何偏私。办案中接受贿赂不是好事，要加重处罚这类事。不是天道不公，不公的是人自己的行为。天罚不加在恶人身上，百姓哪有公正可言。”

经历成康时代四十余年的天下安宁，到了昭穆时代，王道开始衰微，社会动乱，各种刑事案件增多，于是有了如此细密的《吕刑》。

1975 年底，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了西周青铜器三十七件，其中有一件叫做《训匜》，上面的铭文记录当时发生的一个案件及审判经过。铭文共一百五十七字，大意是：周天子的重臣伯扬父审理一个案件，经过是：小官牧牛违背了忠于上司的誓言，诬告他的上司训。伯扬父审理后作出判决：一、责成牧牛履行前誓，立即去啬地归还训五名奴隶；二、牧牛的诬告行为构成犯罪，应

予以惩处。惩处的判词上说："查牧牛违誓诬主，按刑律应处以千鞭之笞，脸上刺字并蒙黑布羞辱。念其初犯，姑从轻惩处，可减为鞭打一千，黥面、免职；但根据赎刑的有关规定，可罚金三百锾，鞭打五百之最轻罚条执行。此判决下达后，罪犯应立誓不再上诉纠缠。如继续伤害训，告到本官，定严惩不贷。"

牧牛听罢判决，立誓认罪，悔悟自新，当场签字画押，表示不再上诉。训中受诬陷之害，但得到赔偿，用它造了一件青铜留作纪念，并把案件审理经过，铸铭于上。

从《训匜》铭文看，伯扬父依律办案、审案、判决，并使罪犯认罪，处罚是依照刑典进行的，诉讼程序完备，判词也有一定格式，并立有结案书。具备了全部法律程序。《训匜》上记录的案件，发生的时间离穆王作《吕刑》不远，并与《周礼·条狼氏》有关制度相合，说明穆王依法治国影响深远。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尚书》：《君牙》、《顾命》、《吕刑》。

《史记·周本纪》

《国语·周语》

国人暴动

“国”字在西周时期有两个含义：一是国家；二是城廓，尤指国都。西周有“国”与“野”之分。国人，主要是指居住国都，城里的平民和手工业者、商人等居民。这些平民本来是氏族成员与贵族处于平等地位。在阶级分化之后，平民虽处在被统治地位，但毕竟与奴隶不同，他们仍然保留着原始社会的民主传统、平等观念，尤其周初文王、武王的文治及“敬德”观念，使平民敢于反抗专制暴君，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国人暴动发生在周厉王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西周中期以后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

穆王之子繄扈即位为恭王。有一次他到泾水出游，陪同的人中有个叫密康公的，竟乘机弄到三个女人。他的妈妈见到后，就劝他说：“一定要把她们献给恭王。三兽为群，三人为众，三女为粲。君王打猎不敢取群，官府要想着为众人谋福利，君王驾车不敢用一样颜色的马，以免显得太奢华。这三个粲美的姑娘，怎么能平白无故地属于你呢？即使她们愿意从你，你又以什么德行消受呢？你这个小丑要是贪心太大，一定离死不远了。”密国的康公并未把这三个姑娘献出。一年后，周恭王灭掉了密国。

这件事表明了社会时尚的改变，纵情享乐、不顾礼法，把周初强调殷鉴的那种忧患意识丢在了脑后。

到懿王时，周朝国力衰弱，周室衰微。民间有讽刺的诗流传。这时戎狄更盛，轮番侵扰中原，懿王死后，他的叔父辟方立，为

孝王。

周孝王对养马业非常重视。当时有个叫非子的人善于养马，他养的马膘肥体壮，繁殖很快。周孝王把非子请来，让他在汧水和渭水之间富饶的平原上主管养马。由于他对马调教有方，深受周孝王赏识。周孝王把秦（今甘肃一带）封给了他，并让他继承了舜时赐给他的祖先伯翳的姓，称为秦嬴。非子成为秦国的始祖。非子向来与西戎各部落关系较好，为周王朝争取西戎各部落，做了很多工作。

但孝王七年冬天，一场大雨夹杂着巨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冰雹大得像磨刀石。不少牛马被冻死，江水和汉水都结了厚厚的冰。此后北方变冷，大象等热带、亚热带型的动植物不是被冻死就是被迫南迁。这场灾害无疑消耗了周朝的国力。

孝王死后，诸侯把懿王之子燮扶上了王位，这就是周夷王。周夷王对拥立他的诸侯非常感激，不敢摆架子，当诸侯进王廷朝见，他常常从天子的殿堂走下来，随便与他们交谈。这是以前的周天子从未做过的。这一举动受到诸侯的高度评价。也有人认为这有失天子威严，对他不够尊重。夷王三年，各国诸侯被召集到镐京，齐哀公被活活地扔进大鼎里烹死。周夷王是想杀一儆百，使天下诸侯服从他的统治，这件事反映了周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冲突加剧，王权越来越专制暴虐，诸侯也日益放纵，蔑视礼法。非动用非常手段，不能制服。

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派人来贡献美玉，夷王在黄河边上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七年，他派虢公统帅六师去征伐太原的西戎，双方在俞泉遭遇，虢公大胜，掳获了上千匹好马。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虢季子白于盘》，上有长篇短文，记载虢公征戎狄的胜利。夷王十二年正月初吉（月初的第一个星期）丁亥那天，虢季白做了这件铜盘。他在伐戎之役中大显武功，成为周王朝安定天下的重臣。他在洛水北岸打败戎人，共斩杀玁

犹五百颗人头，还抓了五十名俘虏。战功卓著，英武异常的虢季子白，在献俘典礼上，向周王献功请赏。周天子对他大加赞赏。在周庙赐宴犒赏。席间，天子对他说“白父，您英姿勃发，光彩照人，我赐给您一匹好马，您骑它驰骋疆场，保卫周王朝。再赐给你宝弓，红色的箭头，还有大钺。这些是王朝专行征伐之权的象征，您可以随时调兵遣将，征讨叛乱的蛮方！”学者们认为虢季子白就是见于史书记载的虢公。他在这次战役中仅是前行，其后还有大军随行，可见战争规模很大。另一个同时期的《不娶簋》，详细记载了虢公部下不娶与戎人作战的经过，原来，戎人向西侵扰，虢公占领了戎人的地盘，并在其后紧紧追赶。有一股戎人向西逃到洛滨，又渡过洛水南高陵，被不娶率领的大军消灭。而这时又一股戎人冲了上来，不娶又与他们激战，并歼灭了他们。虢公把弓矢、奴隶、土地赏赐给不娶。

夷王时南部地区同样不安定，他曾亲自南征群舒。《噩侯》的铭文上记载了“王南征，伐角鄐。”《敔簋》则记载了淮夷一度深人到上雒（今陕西商县）一带。敔受王命，打退了淮夷，并夺回了被淮夷抓住的四百多名周人。

西周中期，从恭王、懿王、孝王到夷王时，由于四周戎狄和淮夷交相侵扰，四顾不暇，忙于应付。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使周朝元气大伤。加上天灾不断，统治者贪图享乐，加重了赋敛，孕育了各种社会矛盾。

夷王在位十六年而死，儿子胡即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之一——周厉王。

周厉王生活腐化，生性贪婪，聚敛成性。他任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当时土地国有的缺口已被打开，贵族“私田”越来越多。顽固维护土地国有的荣夷公，向厉王建议，实行“专利”政策，即宣布山林泽薮的所有出产，都归周天子所有。这项政策大大地侵害了需要到山林中砍柴、摘果，到江湖中打鱼摸蟹的平民利益。这

种公开与民争利的政策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一个名叫芮良夫的大夫不顾个人安危，劝谏厉王，让他废除这种无理规定，因为这些出产，自人类学会采集渔猎以来，民众就赖此为生。芮良夫向厉王指出专利的危害。

他说："荣夷公好利而不知大难即将临头。财利百物所生，天地所载，它本不属于任何人，又是人人都可以利用的，怎么允许天子专有呢？您这样会激怒众人，而众怒难犯，不可不戒备。如此，您的统治怎么会长久呢？

"受人拥戴为王，就是要给百姓广开财路，把利传布给上下臣民。要使天赐百物都被百姓充分地利用，为民心怀忧虑，唯恐招来怨言。周朝的先祖向来对百姓施惠布利，所以百姓也一直拥戴至今。您现在开始专利，这能行吗？况且匹夫专利被人说成是盗贼，身为君王却要专利，哪有这种事呢？如果要用荣夷公的办法，这肯定行不通。"

周厉王对芮良夫披肝沥胆之言，听不进去，继续任用荣夷公为卿士，结果许多诸侯都不来朝拜。民怨沸腾，谤言四起。

大臣召公听到朝野上下对厉王的批评，向厉王如实报告。厉王听了火冒三丈，派卫国的一个巫师去监视，下令：如果听到有谁再发表谤言，格杀勿论。这样一来，确实没人敢公开批评厉王了。但是，这只能使百姓更加不满厉王的暴虐，人们敢怒不敢言，路上碰见熟人时，互相使眼色。这叫"道路以目"。

听不到百姓批评指责的言论，厉王非常高兴，他把召公找来，对他说："怎么样？我能弭谤吧？他们再也不敢随便瞎说了吧。"召公并不以为然，他说："不是谤言被止住了，而是你堵住了百姓的嘴。你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堵住百姓的嘴就像堵住了奔流不息的河川，积累的流量一旦冲垮堤坝，就会伤人更多。因此要正确疏导，要让老百姓讲出心里话，让百姓把心中的积怨宣泄出来。过去天子听政，从公卿列士到百工庶人，大家献计献策，

充分发表各种意见、谏言，最后才反复斟酌决策。这样，事行而不悖。老百姓有嘴，就像大地有山川生出各种财物器用。老百姓的嘴无非议论政事的善败，君主由此可以兴善备败，这样做就国富民强，衣食财用富足。百姓用心思虑，用嘴宣泄，形成善政推而行之，怎么能堵住百姓的嘴呢？像你这样堵住百姓的嘴，究竟能坚持多久呢？”

厉王拒绝了召公广开言路，放弃专利，吸取百姓的意见兴利备败的建议，继续一意孤行。正如召公预料的，三年之后，百姓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向王宫；愤怒的国人手持武器，前呼后应，包围了厉王的王宫。大势已去的厉王，在国人还没有冲进王宫之前竟偷偷地溜走了，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暴君，夹着尾巴渡过黄河，跑到了彘地（今山西霍县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厉王流彘”事件。

厉王逃走时，非常狼狈，连他的太子静也被丢在宗周。在混乱中，太子静躲进了召公的家中。愤怒的国人得知后，包围了召公的家。国人对召公比较尊敬，但是决不能放过太子，因为厉王的逃走，使满腔仇恨的国人，无处发泄。这使召公非常为难。召公说：“过去我屡次进谏，厉王不听，反而怪罪我。他今日逢此劫难，我不能落井下石。如果我把太子交出去，太子因此被杀，厉王一定认为我恨他，才这么做的。我服事君王怨而不怒，厉王逃去了，仍是天子，太子是未来的天子，不能交给国人。”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代替太子，混乱中，召公之子当了太子的替死鬼。真正的太子躲过这场灾难。

国人暴动之后，贵族百官召开会议，公推共伯代行天子之政。共伯，名和，好行仁义，在诸侯中享有贤名。诸侯奉和行太子事后，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的另一说法是，诸侯请召公、周公二位宰相，共同执掌国政。

国人暴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见于铜器铭文。周宣王时的《㝬盨》追述了这件事，从铭文看，参加暴动的国人，有正人，即工正、陶正、车正、马正等下级官吏，也有胥徒之类的人；还有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队）、邦人（普通的城市平民）。铭文还分析了暴动发生的原因：上级官吏平时怠惰政事，对下属不善检束，直到有罪过、必须惩处时，才派人去告诉㝬，而自己却照样懈怠。因此那些不法僚属和民众有恃无恐，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驱逐国君和官长的大乱。

这次国人暴动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共和行政期间，去掉了厉王时期的种种弊政，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正是国人暴动摧垮厉王的专利政策和他的专利暴虐的统治。这次政治暴动发生在周的政治统治中心——宗周，并且具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沉重地打击了周朝的政治体系，从此周朝衰落下去。原有的政治体系、思想观念体系，相关的礼乐制度，天子的神权招牌，都在这次暴动中分崩离析，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及新的政治体系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这次暴动给历代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他们不得不以此为鉴戒。

从此，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司马迁所著《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

《国语·周语》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逸周书·芮良夫》

宣王中兴

共和行政十四年（前 827），久旱不雨，庐舍俱焚。正巧这年周厉王在彘地死去。周公、召公说："老天已经惩罚了厉王，现在应当把太子请回，归天子位，否则，我们将受天罚。"共伯请诸侯共同拥立太子静为天子，为周宣王。共伯和回到卫国。

周宣王铭记父亲厉王被国人逐出国都的教训，珍惜江山失而复得的机会，在召公、周公的辅佐下，恢复周王朝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克励谨行，革除厉王的各种弊政，使衰败的周王朝出现新气象。

宣王时的青铜器《毛公鼎》，是目前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青铜器，共有四百九十七字。铭文记载了周宣王面对内外动荡不安的局面，极度震恐，要求臣下处理政事时，要广开言路，下情上达，不得壅累庶民；宣王警告官吏在征收赋税时，不得贪污中饱，鱼肉百姓；还要求大臣对其僚属平时要严加管束，不准纵酒胡闹。显然，《毛公鼎》上记载的宣王发布的各项政令，都是针对厉王的苛政及政纪败坏的情况而发的。

由于宣王励精图治，使国内各种矛盾有所缓解，一些诸侯纷纷来宗周朝见宣王，周王朝的威望逐渐有所恢复。

宣王在整饬内政的同时，不断对西北和南方的一些不服从周王室的少数民族大举用兵。自周室衰落，邻近的游牧部落一直困扰周王室。西北一带的猃狁、西戎等，是对周王室威胁最大的戎狄部落。他们畜牧游猎，迁徙不定，战斗力强，经常入侵。周王

室中一再用兵，反而使他们骚扰活动愈加频繁，甚至直接威胁首都镐京的安全。公元前827年，宣王任命召公穆为相，任命非子的后人秦仲为大夫，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戎人的战争。在与戎人战斗中，秦仲兵败被杀。不甘心失败的宣王，继续任用了秦仲之子庄公等兄弟五人，给了他们七千人精兵，重振旗鼓，再战西戎。这次取得胜利，挽回败局。

与此同时，宣王发动了对薰育、昆夷、猃狁的战争。这些戎狄之人乘周朝内部危机，竟深入到宗周腹地放马牧牛。对周人侵害非常严重，使习惯于定居农业生活的周人东逃西躲，无家无室，生活得极不安定。这次宣王发兵，把猃狁赶到了北方很远的地方，减轻了他们对周朝北部边境的压力。胜利之后，周宣王命南仲驻守朔方，建立起一道屏障，以阻止游牧民族南下侵掠。与猃狁的交战中涌现两位最出色的英雄，其一就是南仲，《诗经·小雅·出车》对他大加赞美，反映了百姓对这次胜利的欢欣鼓舞。诗中唱道：

王命南仲，
往城于方。
出声彭彭，
旂旐央央。
赫赫南仲，
猃狁于襄。

另一名英雄是尹吉甫。他率领大军，直捣猃狁的老窝太原。《诗经·小雅·六月》赞美他说：

薄伐猃狁，
至于太原。
文武吉甫，
万邦为宪。

出兵猃狁，主动进攻，驻守朔方，建立屏障，使中原人民获

得安宁，这是宣王中兴的重要内容，深得人民拥护。上述诗歌赞颂了征战的英雄，也透露出百姓欢欣鼓舞，歌唱胜利的喜悦。

宣王还从公元前826年开始，对南方的荆蛮和东南的淮夷主动出击。宣王命令方叔带兵攻打荆蛮，召虎攻伐淮夷，尹吉甫征伐徐戎。直到公元前810年，经过多年艰苦激烈的战斗，打了数不清的战役，才把这些部落征服。周宣王把这些新征服的地区赏赐给召虎、申伯、仲山甫等有功之臣。这些在《诗经》中的《江汉》及《崧高》诗中都被记载并加以颂扬。

宣王连年对外征战，夺回了在他之前因国力衰弱而被少数民族占去的土地，而且在复先王之境土的基础上，扩大了周王朝的版图。少数民族又像从前一样恢复了同周王朝的关系，这与自周恭王以来门庭冷落的局面形成对照。因此，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宣王中兴的重要内容。

周宣王与北方、西方、南方、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在铜器铭文中也多有记载。《兮甲盘》铭文记载，兮甲随周宣王出战北方猃狁，砍了不少敌人的人头，抓了许多俘虏。归来后，又接受王命，征伐淮夷。他向南淮夷征收贡物，包括布帛、冠服和奴隶。他对南淮夷软硬兼施，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出兵镇压。"兮甲就是尹吉甫。《召伯虎簋》铭文记载了召伯虎伐淮夷取得胜利，当他回到丰京，宣王为他举行献俘报捷的告庆典礼。这个召伯虎就是上文提到的召虎，宣王时期的另一件铜器《师寰簋》铭文记载了师寰也曾受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他老成持重，指挥得当，用兵神奇，屡立战功，斩获了不少敌人的首级，抓到了一批俘虏。

宣王时期，用兵频繁，但仅仅依靠武力维持，这种武力同时在不断地消耗，其政治威慑力越来越差，根本不能与昔日四方归周同日而语。到后来，终于暴露出宗周内部虚弱。到宣王晚年，除战胜一次申戎外，伐太原戎、条戎和奔戎都遭到失败；特别是在

伐姜戎之役中，双方大战于千亩，宣王调去“南国之师”，结果丧失殆尽，大败而归。周本有西六师、成周八师等重兵，这次动用南国之师，反映了兵力近于枯竭。

征伐南国后，宣王还曾裂土分封，如：命其舅申伯作邑于谢（今河南安阳），把宗周附近的棫林分封给庶弟友，称为郑（今陕西华县）。

宣王即位后不久，就不籍千亩，即废除了每年春天必须举行的籍田典礼。原来，自西周初期，土地为周王朝国有，周天子让人把土地划分为井田。奴隶、农夫在井田上从事集体劳动。每年春天，周天子都要举行的籍田千亩，是向全国进行耕作的总动员。这显然是天子必须做的一件大事。周宣王违反祖训的做法，引起大臣的恐慌。虢文公谏止这种不合常理的举动，对周宣王说：“你取消了一年一度的籍田典礼，这怎么行呢？农业是百姓要做的一件大事，先王立下籍田之礼，是表示对农事极为重视。祭祀上天的各种用品，养活百姓并使他们繁衍子孙，全都出自农业；农事搞好了国家才兴旺发达，财用才充足；老百姓丰衣足食才能对他们进行教化，使民风淳厚。所以，历来管理农业的稷官地位很高。自古以来，籍田典礼都非常隆重。先由太史测定时序，选择一个阳气上升的吉日；测定合适的方位，以免破坏地脉，使五谷不生；再由稷官向君王报告。说太史帅阳官让我去主持典礼，距今九日，是个好日子，您要去向土神祈祷，去凶祈福，监农不易。君王要命令司徒劝戒公卿百吏庶民努力耕作。命司空在籍田地点封坛；命农官大夫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五天前瞽者告诉说有和风来到，君王就要到斋宫斋戒，百官及参加籍田仪式的有关人员都要斋戒三天。君王要沐浴，到时会有各种人献上各种祭品，如用香草黑麦酿成的美酒等等。祭祀之后，就到籍田地点，百官庶民都要跟从，后稷主持仪式。君王行籍田之礼，太史盛赞君王关心农事的美德，君王下田耕地，掘起一块土，大臣打三下，百姓在千亩之中开始

耕田。百姓纪农协功，司寇、农师、农正、后稷、司空、司徒、太保、太师、太史、宗伯分头巡行，君王也要四处巡行。百姓看到天子、百官都要参加劳动，并且到处巡行，都会受到鼓舞，更加努力生产。从此每日整治田界，疏松土地，没有人懈怠。农业丰收了，财用不乏，万民和乐。这时，君王只致力于农事，不敢向他的官员求利，不敢随心所欲地让百姓从事其他工作。每年春、夏、秋三季让百姓一心务农，各季进行军事训练、讲武。这样国富民强，出征则兵强马壮，威振四方；守则粮草充足，财源茂盛。这样，更会受到神的护佑，百姓也会和美无比。祭礼享礼的日子到了，布施优裕。当今，您决心继承先王的绪业，怎么能抛弃大功业，使神匮乏祀，百姓困顿，您将用什么来求福用民呢？”

尽管虢文公说得口干舌燥，宣王根本不听。

周宣王拒绝劝谏，不籍千亩，自然被认为失德，从而受到批评。当他为政三十九年时，恰恰在千亩这个地方被姜戎打败。这时有人把失败归罪于不籍千亩。

到了宣王时期，昔日周王朝规整的井田，及土地国有制已遭到严重破坏，不仅荒地被开垦为一块块私田，就是原来大片的“公田”，也有不少被化公为私。这些田地被贵族划为许多小块交给原来的人们自行耕种。厉王为了维护土地国有制、捍卫王权的尊严，采用专制暴虐的手段，结果是他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宣王充分认识到应当顺应时势，他“不籍千亩”，实际上是对已经出现的土地国有制逐渐瓦解，私有土地增加的形势的一种认可。既然土地私有已成为事实，有关礼制似乎也不必拘泥。他这种面对现实，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不被理解，反而受到顽固维护礼制的贵族的反对。正是由于宣王承认了土地私有关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解放了生产力，使厉王时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宣王也才能够北伐玁狁、西戎，南征荆蛮、淮夷，并取得胜利，也才有了“中兴”的局面。

宣王三十九年，遭千亩之败，南国之师既丧，于是，料民于太原。料民，即统计人口。宣王料民措施出台后，立刻遭到贵族的反对。大臣仲山甫对宣王说："百姓的数目不能进行统计。自古以来，不进行人口统计就知道人口数字。司民负责生死登记；司商负责赐族受姓；司寇负责处决罪犯；牧民知道他管辖的人口；司工知道他管的工匠；场人知道国库收入；廪人知道粮草支出。这样一来人口生死数目，实际人口数字，国家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情况，都很清楚。国王的责任是统筹全局，治农、籍田，农闲指导习武，通过打猎、籍田核实人口数字。又何必大张旗鼓地搞什么人口统计呢？"

最终周宣王没有听仲山甫这一套，仍照常进行人口统计。这无疑增加了国家控制人口，有助于兵源问题的解决。

宣王中兴主要是武功，政治改革作为不大，也难以进行，料民之举直到他临终前仍未进行完毕。到了晚年深宫宴乐，中兴之志锐减。伐鲁国，杀死鲁懿公，强立其弟孝公，从而同姓诸侯出现不和，使贵族惶惶不安，有的看情况不利，就准备逃跑，说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趋于尖锐。西周王朝的天下已呈朝夕难保之势，到周幽王的时候，终于灭亡了。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

《国语·周语》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诗经》：《出车》、《六月》、《江汉》。

烽火戏诸侯

中国人的观念中，常把女人视为祸水。这祸水一词源于周幽王时太史伯与郑桓公的一场谈话。

周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宫涅即位，这就是西周有名的腐朽昏愦的末代天子——周幽王。周幽王上台之后，任用善谀好利虢石父为卿，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当时在朝廷任职的太史伯和司徒郑桓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可都不被重用。这二位聪明绝顶的大臣，已经预感到周朝即将灭亡，并且已经想不出挽救的办法，在一起商量怎么躲过这场祸乱。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谈话，因为史伯在这场谈话中谈的许多内容，全都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验证。这不能不使人佩服他的才华；也为幽王感到遗憾，因为他身边才华横溢的大臣不被任用，只能使其成为一个预言家。

史伯在那场谈话中详细分析了周朝一定灭亡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幽王三年，得到一个美貌的女子褒姒，周幽王对她非常宠爱。谈到这位女子的来历，史伯说，还是夏朝开始衰落的时候，有两条神龙来到王庭，说："我们是褒国的二位君长。"夏朝君臣惊恐无比，不知道对他们怎么办才好，提出好几种办法：杀掉；送走让它们离开；制服它们……占卜的结果都不吉利。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又一个办法，进行占卜验证，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吉利的办法，那就是想办法让它们流唾液，并把这些唾液珍藏起来。于是摆上各种礼品，并把这想法告诉了神。当神龙飞走之后，夏王让把它们留下的唾液珍藏在一个精致的盒里。夏朝灭亡后，这

个小盒传到了殷代，殷灭亡后，又传到周代。夏、商、周三代，没有哪一个人敢打开这个盒子。但是到厉王时期，这位无道的暴君胆大妄为，竟在王朝之上打开盒子，要看个究竟，结果腥臭的唾液流得宫廷内外到处都是，想尽办法也除不掉。周厉王突发奇想，让宫中妇人脱光了衣服，大喊大叫，说是以秽治秽。忽然唾液化为一只乌龟，进入王府，碰上后宫内的一个小宫女，等她长大后，竟身怀有孕。当周宣王时生下了一个女孩。未婚而生育，使她非常害怕，生怕国王怪罪，于是偷偷地把这个婴儿丢掉了。有一对卖桑木弓和箭囊的夫妇，夜里碰见这个在路旁哀哭的弃婴，觉得很可怜。于是，抱着她逃到了褒国。这个小女孩在褒国长大，竟然姿色超群。后来褒国的褒姁犯了罪，便把这个美丽绝伦的女子进献给周幽王，来赎罪。因为她来自褒国，被人称之为褒姒。周幽王对她宠爱无比。后来她生了儿子伯服，幽王便废掉了皇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又正式册封褒姒为皇后，册立伯服为太子。史伯引经据典，似乎考证了褒姒的身世，其实他不过是讲了一个寓言，其寓意是：女人是祸水，自夏朝衰微，传至殷商。到周厉王以降，酿成的灭国之祸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

周幽王自得褒姒，终日饮酒作乐。可是这位褒姒竟是位冷美人，难得一笑。越是这样，幽王越是要让她发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想使她发出笑声，都没有达到目的。有一天，周幽王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能逗得褒姒大笑不止的办法，一场“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就这样上演了。

原来，古代交通不便，通讯联络极为困难，而来自北方、西北的游牧民族的马队，常常以极为迅捷的速度入侵。我国古代发明了用狼烟报警的方法。《望长城》剧组，经过试验其报警速度大大超过了现代化的汽车、火车、飞机。其方法是，在山顶上修筑起高大的烽火台，上而提前预备放好多狼粪、火把之类的点火工具，并派兵在台上驻守。一旦有敌情出现，看守烽火台的士兵白

天就燃起狼粪，这时，一缕白烟便直冲云天，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见，凡是见到远处有白烟升起的烽火台，就立即点起狼烟，一个又一个烽火台便很快把敌人入侵的消息传入京城。若是在夜里，则点起火把，远处看见火光冲天，便知道发生了紧急军情。由于戎狄的入侵，抢掠烧杀，无恶不作，这种狼烟四起，火光冲天之后，便是浴血奋战，拼命厮杀。所以，狼烟四起，是说有敌人入侵，它不能不使人神经紧张。尤其是国都之内，王宫的烽火台上要是燃起狼烟、烽火，那意味着国难当头，不能不使人惊心动魄。

这天，周幽王陪伴褒姒来到烽火台上，点起了狼烟火把，把战鼓也擂得震天作响。于是各地烽火连天，各地诸侯如约前来藩屏王室，以为外敌已进入京师，个个连忙率领兵马赶到镐京。惊魂未定，前来勤王的诸侯们，来到烽火台边，只见周幽王陪伴着褒姒悠悠地饮酒作乐，根本不是什么紧急军情。心惊胆颤的诸侯，受到如此愚弄，怒不可遏，可又无处发泄。褒姒看到一个又一个诸侯先后赶来，得知被骗后的狼狈相，禁不住大笑不止，真是此起彼伏，高潮迭起。周幽王看到褒姒的大笑，内心的满足使他更是心花怒放。

周幽王一看这办法真的能使褒姒发笑，为了让她继续欢笑，于是如法炮制，结果前来勤王的诸侯一次比一次少。后来，当幽王再点起烽火时，根本没有人理睬了。这非常像一个被人熟知的寓言故事：《狼来了》。在人们编写的寓言中，主人公不过是个说谎的孩子。可是烽火戏诸侯的主人公竟是一国之君主。他点起的狼烟比那个高喊“狼来了”的孩子更使人震怒，结果自然比那个孩子更惨。不同的是一个是寓言，用来教育孩子；一个是历史，见于最令人信服的史籍。

幽王、褒姒加上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为政如此奸邪，真是周法不昭而妇言是用。朝外诸侯被愚弄，朝内的才德之士被排斥，内外离心离德。朝中司徒郑桓公很得人心，在宗周及东方诸

侯国中很有威信，可他内心忧惧，竟向太史伯提出这样的问题："王室多变故，我很害怕；大难就要临头了，怎么样才能逃死呢？"太史伯分析了朝廷内及各个诸侯国的形势，最后指出，当今最强的诸侯国是申国、缯国和西戎。王室骚乱不已，纵欲不止，想改变是非常难的。幽王想要把太子宜臼杀掉来使伯服继承王位，他首先要征得申侯的同意，如果申侯不答应，他一定会讨伐申侯，而缯侯与西戎一定会起来伐周王室。这样幽王守不住王都。缯侯与西戎会把申侯推上重要位置，而申侯和吕侯是最强大的，并且会一致拥立幽王的大儿子宜臼，这是可以断定的。这样一来会有一场恶战。周的存亡不出三年就见分晓，你要想避难，必须尽快地找到避难所，不然，大难临头再寻找恐怕来不及了。

周幽王废黜申后之后，申后的父亲申侯非常恼火。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了缯国对周王朝大兴问罪之师。申侯正像太史伯预料的那样，勾结了西戎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一同向周王都进攻。周幽王吓慌了手脚，连忙燃起了烽火向各国诸侯报警。但是，各国诸侯已被周幽王欺侮愚弄了多次，这次的烽火狼烟又从王都升起，自然被认为是幽王又一次戏弄他们，谁还来理睬呢？所以，这次没有诸侯前来勤王。镐京很容易地被申、缯和西戎的联军攻破。周幽王带着褒姒出逃，到骊山脚下（今陕西临潼）被戎人追上杀死，褒姒成为戎人的战利品，繁华的王都镐京被洗劫一空，乱兵在这里烧杀抢掠，周王朝聚敛的大批财宝、珠玉被席卷而去，经营了达二百五十年的都城，被破坏殆尽，残破不堪。

从武王灭商到幽王被杀，一共经历了十一代，十二王，历经约二百五十七年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人们提到西周的灭亡免不了提到女人祸水，提到烽火戏诸侯这样怪诞的史实。但是，杀了周幽王，除掉了褒姒，不但没有挽救西周灭亡的命运，我国历史反而进入了一个更加混乱的大动荡时期。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找西周

灭亡及随后的历史动荡的原因。这里让我们听听列子这位真正的寓言家讲的寓言故事：公仪伯因为力大无穷而在诸侯中闻名。堂谿谷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宣王。周宣王以最高礼仪把这位力大无穷的大力士请来。但一见面，看到他的形象，却是位懦夫。宣王迷惑不解而心生疑问，问道："都说你力大无比，究竟怎么样啊?"公仪伯说："我的力量能折断春蠡的大腿和秋蝉的翅膀。"宣王变了颜色说："我的力能撕裂犀兕的皮，倒曳九头牛的尾巴，还恨力量不足。可你竟以折春蠡的大腿和秋蝉的翅膀而力闻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公仪伯长叹一声说："善哉，王之问也，请允许我把实情告诉您。我的老师商丘子，力无敌于天下。可是，他的六亲都不曾知道他的力量天下无敌。因为根本没让他用过他的力量。我死心塌地追随他，他才告诉我说：'人们想要看他不能看到的东西，先视别人不去窥视的东西；想要得到他不能得到的东西，先修习别人不去做的东西'。所以，学习提高看的能力，先注意看一车柴；学习提高听力，先去听撞钟的声音。有些事对自己容易，对别人也不难；对别人不难，所以名声不会传得很远。如今我在诸侯中有名气，是因为我违背了老师的教导，把自己的本事显示出来了。我有名声，不是因为我有力量，而是因为我能用我的力量，难道我不是超过了有力量而不用的人吗?"这则难以理解的哲理寓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列子抓住了那个动乱的时代的基本观念，那就是对力的崇拜，把周朝原有思想观念体系、礼制、价值观念彻底冲垮，使社会陷人长期的混乱，只要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未重新建立，社会就会混乱下去。这种时代正是忽略了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美学理想等对于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力量，而只崇拜那些显示出来的外在力量。

所以，周幽王也实在是个不走运的帝王。当他登上君位的第一年，就发生了大旱灾。全国的河流，泉池都干得见了底，草木庄稼全都枯死了，赤地千里。民众背井离乡，到处流浪难以谋生，

哀鸿遍野，路有饿莩。《诗经·大雅·云汉》和《召旻》等诗篇记述了这次旱灾的悲惨景象和人民痛苦的心情：

严重的旱灾已经持续了很久，

河湖干枯山野光秃。

大旱的恶魔逞凶施虐，

骄阳似火到处在燃烧。

酷暑像把我的心点着，

忧虑像把我的心烤焦。

我向群神列宗列祖求告，

可他们似乎谁也不知晓。

老天啊！上帝啊！

难道我真得没有活路了吗？

这场大旱无疑给幽王带来了许多难题，使这位刚刚即位的君主束手无策，听凭百姓呼天抢地。屋漏偏逢连天雨，幽王即位的第二年，首都镐京和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叙这次地震的景象：

隆隆巨响强震电闪。

突降灾异心惊胆颤。

所有河流巨浪漫卷，

山峦倾倒天塌地陷

高岸突陷成为低谷，

深渊隆起丘陵忽现。

连续不断的天灾，使生活在动乱社会中人们的心灵蒙上巨大的阴影，周王朝的史官先是用阴阳说学说分析地震爆发的原因，接着他认为灾异是上天对周幽王的警告。他认为连续的灾变，民乏财用，国家就要灭亡了。他说："过去，伊水、洛水干枯而夏朝灭亡；黄河干枯而商朝灭亡。如今周德也像前二代末世那么衰落，又有山崩川竭的亡国征兆。河流干枯，山岭一定会崩裂，国家灭亡

不会超过十年。上天要抛弃周朝这一代了。"果然，他说这话当年，三川（泾水、渭水、洛水）枯竭，而周人祖宗肇启之地周原上的岐山也崩塌了。十一年后，周幽王被杀了，西周灭亡了。

如此说来，或许周幽王也无力回天，旱灾和地震使周王朝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与动荡之中。周幽王只顾享乐，终于酿成了国败身亡之祸。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

《国语·周语》

平王东迁

当周幽王死后，各国诸侯才得到确实消息，这次烽火并非像往常为戏诸侯而燃。卫国、晋国、郑国和秦国的诸侯都带领人马前来救援。各路大军星夜赶到镐京以后，杀退了戎人。但留下的只是一座被焚毁、洗劫后的空城。各国诸侯看到幽王已死，就与申侯、缯侯商量，把幽王的长子宜臼从申国请回来了，共同拥立他为周王朝的天子，为周平王。

与此同时，虢公翰也拥立了王子余臣为天子。称为携王。于是，出现了两周并立的局面。但周平王是太子，并且得到了郑、卫、秦、晋等国的有力支持，十余年后，晋文侯仇杀携王，周室才归于一统。

平王见镐京已成为一座废墟，这里离戎狄太近，担心受其侵扰洗劫，于是就把都城向东迁移。公元前770年在诸侯的护卫下，平王把都城迁到了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平王东迁”，从此以后的周王朝称为东周。由于有一部史书《春秋》记载此后东周的前期历史，所以又称为春秋时代。

平王东迁主要依靠的是郑、卫、秦、晋四国，这四个诸侯国从东、北、西三面环绕着东周王室，有地利之便，又可护卫王室，春秋初年与王室关系密切，又都是拥立平王迁都洛邑的有功之臣。

郑国与周王畿东南部接壤，本是个受封很晚的小诸侯国。始封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弟弟，名友。宣王中兴，学着周初裂土分封的样子，把他封在郑（今陕西华县东），这就是郑桓

公。由于他为政有方，深得百姓拥戴，周幽王请他到王室做司徒，掌管民政事务。他预感到周室将亡，向太史伯求避难之计。史伯告诉他：地处河南中部的虢、郐之地，有河、洛、济、颍四水之便，而虢、郐之君贪财好利，百姓不真心拥戴他们，而你身为司徒，百姓都爱戴你，你可以先把妻室和财产寄放到那里去，一旦有机会，虢、郐之民都会成为你的百姓。郑桓公依计而行，后来果然在这里建立了郑国。遗憾的是，郑桓公本人并未躲过幽王之乱，在护送周幽王出逃时，被西戎杀死。他的儿子郑武公，率领大军为父报仇，在与戎人的战斗中身先士卒，战功显赫。周平王让他继任父职，为司徒。

东周王室的东北是卫国。它据有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广大地区，国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卫始封于周初，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卫康叔。卫顷侯曾被周夷王封为侯爵。到了卫武公时，由于他努力恢复了卫康叔时实行的各种德政，使卫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得知西戎杀死幽王的消息，他奋力平乱，立下大功，被周平王封为“公”的爵位，得到周平王的特别嘉奖。

秦国在东周王室的西边。始封君是周孝王时的非子。周厉王任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让他讨伐西戎。秦仲为国捐躯，宣王又命他的儿子秦庄公继续攻打西戎。秦庄公的儿子是秦襄公。由于世代与西戎有家仇国恨，秦襄公在幽王被杀后，奋力与戎人拼杀，为雪祖仇兄辱之恨，立下了战功。在建立东周王朝的过程中，秦襄公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在驱逐犬戎的过程中战功卓著，而且护送周平王“东徙洛邑”，也出了大力。这使周平王感激涕零，把本是大夫的秦襄公一下子破格擢封为“诸侯”，并把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封给秦国。周平王还与秦襄公约定说：“戎人太猖獗，竟夺去了岐、丰一带大片土地，今后秦国如能把戎人赶跑，收复的失地尽归秦国所有！”这极大地刺激了秦襄公。他在汧水和渭水的会合处建立了国都。继秦襄公之后，他的儿子秦文公打败了西戎，

西周关中富饶的土地尽归之于秦。其地与东周为邻，东北与晋隔河为界，南过秦岭到达今陕西南部。

秦襄公护送平王到洛邑后，凯旋归国，踌躇满志。在西畤刻石纪功，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石鼓文》。在十块圆顶平底、圆柱形花岗岩大石上，刻满了秦国大篆文字，又称籀文。十件石鼓，各刻四言诗一首，原文700字以上。内容主要记述了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攻戎救国，天子的命辞，秦作西畤，汧源一带的风土人情、国君的狩猎、庆典等等。早在五代以前，就由着余庆把散落在陈仓荒野十只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内。以后历经战乱，多次转移。目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保和殿东部的箭亭内。

在平王东迁中立下大功的另一个诸侯国是晋国。它地处周王室的北面，以汾水、浍水为中心，是周公灭掉唐国后建立的一个侯国，始封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据说周成王即位后，叔虞还小，成王也不大，两人在一块玩耍，周成王用一张桐树叶做成一个圭（古代贵族受封标志，由玉制成，要在朝聘、祭祀等重大场合佩带的礼器之一），他把这个桐叶圭送给叔虞，开着玩笑说："我就用这个封你吧。"这话恰好被周公（一说是史佚）听到了，就要求成王兑现，成王说："我是和他开玩笑的。"周公说："天子无戏言。"这样就封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县境），称为唐叔虞。对这个"桐叶封弟"的故事，唐人大文豪柳宗元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辩其妄，但成王弟叔虞确实封在山西一带。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一说因他把都城迁到晋水旁而得名）。燮父之孙成侯南迁到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到穆侯迁到绛（今山西翼城东）。穆侯之子文侯护送周平王东迁，后来又攻杀了与平王对峙的携王，平王赐他秬鬯、圭瓒和车马弓矢表示特别感激。在受封册命的仪式上，周平王对晋文侯说：

"伟大光辉的文王和武王，能够敬慎行德，昭示上天，德泽下土，上帝及时降下福命给文王、武王。那时的公卿近侍，贤明地

辅佐服侍他们，不管大事小谋无不遵从，真心拥戴先君之位。

“唉，我这个不幸的人，继承王位恰遇上天责罚，断绝了给百姓的福泽，戎狄不断入侵。我的治事官员，缺少德高望重的人选，而我又不能胜任。祖辈父辈的同族诸侯们，希望竭诚助我。只有我做出成绩，才能使周位永固。

“您是伟大的唐叔虞的后继者，您的智慧足以制御百官，您会合了卫侯、郑伯、秦伯在成周显威就是证明，您足以追效先贤。您的长处，足以在我艰难之时护佑我，您已经这么做了。所以，我要嘉奖您。

“您回归故里，巡视您的军队，使您的邦家获得安宁。带去我赐给您的香酒一卣，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一张，黑色的箭一百支；四匹马。

“您前去安抚边远的臣民，亲善近处的邻国，给小民施惠，让他们过上康宁的日子，不要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专心治国，来成就您的光辉的美德。”

平王即位后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幽王的暴政加上严重的天灾，关中地区经济被破坏，人口锐减，戎族入侵，镐京被洗劫，这样周王室失去了这块宝地，被迫东迁。与此同时，军队也完全失去战斗力。东迁之后，这种严峻的形势并没有多少改变，从此诸侯坐大，天子式微。

平王东迁，故土丧失，后为秦人所有。东周王朝只拥有今河南西北部的一隅之地，它东不过荥阳，西不跨潼关，南不越汝水，北仅至沁水南岸，只有方六百余里之地。此后，在公元前 712 年又把黄河北岸沁水之南的温赐给了有功之臣郑国诸侯（后又转赐给了晋国）。公元前 673 年又把陕西东边的酒泉赐给虢国，虎牢（今河南荥阳境内）以东之地赐给郑国。公元前 638 年秦晋两国将允姓九戎迁到伊川（今洛阳南伊河），于是周的地盘仅方一二百里，与方圆数千里的大国相比，周王室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诸侯国。

由于王室式微，西周一套严格的礼制被破坏了。在维持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繁杂的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列鼎制度。鼎本是一种三脚炊器，用来煮食物。原来是陶制的，青铜出现后用青铜制造。古代生产力不发达，获得好的食物很不容易，且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旦猎获野兽便认为是祖先神灵赐予的。当食物在鼎锅内煮熟、就食之前，都要向祖先神灵举行祭礼，这是一种虔诚的谢恩仪式，是祈求更多的赐予。主持这种仪式的人自然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是一位与神灵沟通的代表，能代天发号施令。久而久之，一方面鼎成了祭器而具有神圣的意义；另一方面鼎成为权力的象征，由鼎的数量确定人的等级。因此，鼎的得失往往是政权更迭的同义语。所以，当楚庄王向王孙满打听周鼎的轻重时，受到王孙满的严厉斥责，被认为是想取而代之。

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列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死后也应用此数随葬。1956—1957年在河南陕县上村岭发现了虢国的墓地，有一座是西周末到春秋初的虢太子墓。墓中有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七个鼎和六个簋等共二十六件青铜器，这是一套完整的大牢七鼎。按照西周礼制，七鼎应为诸侯国君所享用，诸侯的太子应低于此数，列五鼎。可见，这位虢国太子僭礼了，而允许他僭礼的虢国国君无疑是用九，僭用天子礼数。诸侯敢于僭礼反映了天子已无多少威严可言。尤其是在用鼎这类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重器上僭礼，毫无疑问，这在强大的西周时代一定要被杀头。到了东周，周天子却对此没有办法。

按照西周礼制，天子每隔几年就要到各地巡狩，以便考察诸侯政绩。之后，天子要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以便提升政绩好的，降下政绩差的。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诸侯要定期到王都朝见天子，叫做述职。一次不到就降他爵位，两次不到就削减封地，三次连续不到，就要兴师问罪。

天子巡狩的事，东迁后就不再进行。以前，天子巡狩的内容

之一是对名山大川进行祭祀。郑国原有参与天子祭祀泰山的义务，故在泰山脚下有一块“祊田”，其收入专供祭祀之用。鲁国在许国（今河南许昌）也有一块“许田”，本是赐给周公在王室做官的采地。由于天子无力巡狩，郑国的“祊田”无用，于是便与鲁国的许田进行交换。这一换田行动，表示天子的巡狩礼彻底崩溃。

诸侯不再带着贡赋去朝见天子，相反，倒是天子去聘问诸侯。比如在鲁隐公执政的十一年间（前722—前712），周王派宰咺、凡伯、南季三次往鲁聘问，而鲁国派人朝见天子的事却无记载。

诸侯受天子之命也是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诸侯死了，儿子继位，在治丧完毕后，必须穿上低级贵族的服装到王都朝见天子，天子再按爵位赐给衣冠和圭璧等礼器。东迁后，诸侯治丧完毕，新君即位不再朝见天子。受天子之命为诸侯，这个形式还是要的，但不是到王都去领受，而是派入去“请”。周天子也只好派人把册命送去，并把这种做法名之为赐命。对那些大国诸侯，周天子为得到其支持，就找机会主动派人把“王命”送去。

平王东迁后的东周，周天子由至尊的权威逐渐变为诸侯利用的工具。强大的诸侯国君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般诸侯也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周王朝失去诸侯定期的朝聘贡纳，财政上出现了十分窘迫的情况。据说，周平王死后，周王室穷得连埋葬费及随葬物品都拿不出来，他的孙子桓王只得到鲁国“求赙”，即请求诸侯接济办理丧葬。

平王东迁后“王室式微”，周天子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宗主”，再也没有力量控制天下。从此，各国诸侯之间，恃强凌弱，以大欺小，我国历史进入了政由方伯的大动乱时期——春秋时期。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尚书·文侯之命》

《史记·周本纪》

《左传》

鲁隐公执政

鲁国在今山东的西南部，泰山山脉是鲁国与齐国的天然分界线。当年周武王封周公旦在鲁，建都于曲阜。可是，周公并没有到鲁国就任，而是留在周天子身边掌管整个周王朝的大事，这样，由周公长子伯禽当了鲁国的始封君。由于周公功劳卓著、地位显赫，鲁国初封就是头等侯国。武王还赐给殷民六族以充实周人的力量。但尽管如此，鲁国直到春秋时代却始终未能强盛起来，这不仅是由于它东有强齐，西有郑、宋等国制约它的发展，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鲁人死守着周王朝旧制度不知变通，养成了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世风。据说伯禽和姜太公受封就国时，齐国的姜太公五个月就整顿就绪回报周公，周公问他为何这么快，太公说：我简化了君臣仪节，依从当地人的风俗，所以很快就使齐国步人正轨。可是，伯禽过了三年才去回报周公，周公问他为什么等这么长的时间才来，伯禽回答说：我要改变当地人的习俗，变革旧的礼节，教他们如何守三年丧，所以这时才来。这不由得使周公长叹一声说：未来的鲁国必定要北面事齐。为政繁，百姓就不会亲近，而为政简易则近民，百姓乐于归附。当初齐、鲁政治上的不同特点，社会习俗，培养了不同的百姓。到春秋时代。管仲治齐有尚法精神，而鲁国则成了儒家的发祥地，产生了孔丘这样的圣人。司马迁比较齐、鲁的文化习俗说：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鲁国犹有周公遗风也，俗好儒，备于礼，百姓拘谨，循规蹈矩，俭啬，

畏罪远邪。

东周初年，鲁国的国君是惠公。鲁惠公夫人孟子无子而卒，继室是声子，生了长子息，后来又娶了宋武公的女儿仲子为正室，生了儿子轨。

关于鲁惠公的婚姻及王位继承，历史上众说纷纭。按照周礼，诸侯的夫人死去后，续娶的妃妾不得为正妻，而鲁惠公则把仲子扶为正室，这有违周礼。有的史书上说仲子本来是为他的庶子息娶的，等鲁惠公见到仲子后，又决定自己续为正室。《左传》虽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两件事可以作有力的证明，一是鲁惠公死后，他的长子息当时为摄政王，却不参加鲁惠公的葬礼。息后来为鲁隐公，他是位循规蹈矩的人，做出如此越轨行为，一定有理由。二是周天子在诸侯死去后，应及时送去丧仪。《左传》是明确记载鲁隐公是一月摄政的，直到秋七月周天子才派遣宰咺来馈送鲁惠公和仲子的丧仪。这时惠公已经死去了很久，显然是送的太晚了。而仲子还没有死，周天子竟为她送来了丧仪，这显然是对她的谴责。并且按照周礼，天子死后，历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历五个月下葬，而周天子却在七个月之后才送来丧仪。这都是极不正常的。接下来的王位继承问题：如果鲁惠公不续娶仲子，鲁隐公是当然的继承人。鲁惠公承认了仲子的正妻地位，因此公子轨则为嫡子，因此鲁隐公无继承权，只能做摄政王。当时公子轨不过是两三岁，本来一切都由鲁隐公说了算，但他不是一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这使他非常难受；由于父亲不遵守周礼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这使他难堪；心里不服，而礼教又使他不得不遵从父命，承认公子轨的法定继承人的地位。这种内心的矛盾、痛苦，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也使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因为如果他从内心承认公子轨的地位，历史为他提供了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的机会；如果他不遵从礼教，他完全可以杀掉年幼的公子轨而不是被公子轨杀掉。这就是春秋初年，在礼教严

格的鲁国发生的历史悲剧。

隐公五年（前718）春，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人捕鱼，臧僖伯劝阻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就不应有所举动。国君要使百姓入轨纳物：讲事来端正法度叫使百姓入轨，选取材料来制作重器叫做纳物。做事情不能使百姓入轨纳物，叫做乱政。多次地做乱政的事，就是国家败亡的原因。所以，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四种打猎的仪式，都是利用农闲来讲事使百姓人轨。每过三年进行一次大的演习，进人国都整顿军队，回来祭告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从，以计算俘获的东西。要使文教的华彩昭示天下，贵贱分明，等级不乱，少长有序，使百姓习惯君主的威仪。如果那些鸟兽的肉摆不到宗庙的祭器里，它们的皮革、牙齿、骨角、羽毛不能用于制作礼器、武器等，那么国君就不应该射杀它，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池泽的出产，制作一般器物的材料，这是下级官吏、有关基层部门该管的事，不是君主该管的事。"鲁隐公说："我是想顺便视察边境啊。"于是前往棠地，到那里，让捕鱼者专门为他捕鱼，以便观看游乐。臧僖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到这年冬十二月二十九日，臧僖伯死了。隐公说："叔父对寡人怨恨，寡人不敢忘记。"于是，按照原等级加一级安葬，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样子。

隐公五年九日，祭仲子庙，正式地把她作为诸侯正夫人，并打算在庙内献演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执羽舞的规格、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行，诸侯用六行，大夫四行，士二行。跳这种舞时要用八种乐器伴奏。传播八方的德风。所以最多不能超过纵横八行。"隐公听从了众仲的意见，第一次献演六羽乐舞，开始使用六行舞人。这件事表明，鲁隐公承认仲子的正室地位，也就承认了她的幼子王位继承人的地位。这种形式的虚礼之下，包含着实质性的政治内容。鲁隐公不像去棠地观鱼那样敢于突破礼的束缚。

鲁隐公八年二月，郑庄公请求把周天子祭祀泰山的祊田舍弃而要祭礼周公，并想用泰山旁边的祊田交换鲁国在许地的许田。三月，郑伯派遣宛来致送祊田，表示不再祭礼泰山了。可是，这次郑伯并未如愿，因为这件事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废弃了周天子巡狩望祭封泰山之礼，这是对周礼的重大挑战，也是对周天子的极大蔑视，拘于礼的鲁隐公不敢如此放肆。

鲁隐公十一年三月，鲁隐公会合郑庄公率军首先进入许城。事成之后，齐侯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君王认为许国违背法度，所以寡人跟随君王讨伐它。许国既然已经伏罪，虽然君王有这样的好意，寡人是不敢领受的。"于是把许国送给了郑庄公。郑庄公让许国的大夫百里帮助许叔住在许都的东部，说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话，让公子获住在许都的西部，来辅助已经伏罪的许叔，并且表示以后要撤离许国。总之，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合于礼。连《左传》的作者对此都大加赞赏。其实，打下许国后，郑庄公仍然想把用祊田交换许田的事做成，用许国做为交换的筹码。而鲁隐公并没有上当，这使郑庄公也不敢造次。

隐公十一年冬，羽父请求杀掉公子轨，想以此求得太宰的官职。早在鲁隐公四年秋，当时各诸侯国联合攻打郑国，宋殇公派人请求鲁隐公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会合，隐公不同意。羽父先是坚决请求出兵，后来见隐公还是不同意，竟然擅自领兵前去会合。《春秋》的作者对他这种作法非常厌恶，只用羽父帅师记载这件事。而软弱的鲁隐公对此毫无办法。后来羽父同诸侯会合作战，曾拿下了宋国的郜城和防城，在上文提到攻打许国的战斗中，又打了胜仗，觉得有功劳，更加嚣张，竟厚着脸皮要当太宰。另一方面他看到摄政王鲁隐公受到鲁国上下的拥护，在诸侯中也逐渐有了些威望，连郑庄公对鲁隐公也表示尊重，而公子轨这个嫡子的名位本来就不太实在，而且还是个儿童。羽父胸有成竹，认定隐公一定会同意的，因为只有杀了公子轨，鲁隐公

才能由摄政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君。他没想到隐公对他说："由于他太年轻，才由我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逐渐长大，我打算把国君的位子交给他了。我已经让人在菟裘建筑房屋，我打算去那里养老了。到时候你去向他请求吧。"羽父未料到隐公真想把已经到手十一二年的君位出让。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万一把自己要杀掉公子轨的话告诉即位的新君，那可就什么都完了，因此非常害怕。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到公子轨那里，诬陷隐公，请求公子轨让他动手杀掉隐公。公子轨表示同意。

当鲁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经和郑国人在狐壤作战，被俘。郑国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钟巫神前祷告。后来，他和尹氏一起回国。回国后，在鲁国立了钟的神庙。每年十一日，隐公都要在钟巫神庙祭礼，在社圃斋戒，住在 氏那里。这一天，羽父派人在 氏家里刺杀了隐公，然后又把刺杀隐公的罪名转嫁给 氏，派兵攻打 氏，就这样 氏被诬陷枉杀。公子轨即位，为鲁桓公。桓公没有按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

鲁国这个最严守周礼的国家竟出现臣弑君的严重违礼的行为。可惜鲁隐公这位摄政王，虽偶有越轨行为，但一直比较注意依礼行事，正当他准备依礼把国君之位移交给所谓的嫡子时，竟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西周时代不依礼办事要受到严重惩处，依礼而行则要受到鼓励、表彰。东周王室衰弱，无力正礼正法，因此违法背礼的行为得不到纠正，奸诈邪恶的人总是得逞占先，社会崇尚力、智，动乱不止。鲁桓公依靠羽父这样的邪恶的权臣得君位，其后果是可想而知。

桓公元年（前 771），为了和郑国修好，郑人又提到用祊田换许田的事，桓公一口答应。这年三月，郑庄公以璧作抵押先把鲁国的许田借过来，为周公祭祀。四月，鲁桓公与郑庄公在越地会盟，达成了用祊田换许田的协议。并且盟誓说：如果违背盟约，不

再享有君位。这是一次大逆不道的交换。郑国把祊田出让，意味着拒绝对周天子巡狩，拜祭泰山担负应尽的义务；鲁国把许田出让，意味着鲁国把这个朝拜天子的朝宿之邑随便给人，也不再对天子负有义务。更严重的是，双方都违背了“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的周朝礼法。从此，拼杀、厮搏成了新时代的旋律，谁也无力改变这一局面。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左传》隐公元年至桓公元年

《史记·鲁世家》

周郑交质

春秋初年，第一个在中原地区称霸的诸侯国家是郑国。完成霸业的国君是郑庄公，历史上习惯地称为“郑庄公小霸”。虽是小霸，但郑庄公是称霸的首创者，许多事情都由他破了旧例，所以，他也是最早看清那个时代形势的诸侯国君。为什么郑国这个分封得很晚，在平王东迁后刚刚在中原立足的小国，能够迅速地成就霸业呢?

其一，郑国对春秋初年的形势早有准备。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很有政治才能，西周末年在王室秉政。他较早地预料到西周的灭亡，听从了周太史伯的计谋，把国内的百姓财产从关中地区迁到今河南附近。西周末年的战乱，使周王室及有些诸侯国受到的损失很大，而郑国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势。地盘虽不大，却地处交通要冲，有利于发展。

其二，当时为避免天灾人祸而东迁的诸侯国不止郑国，但是只有郑国是提前准备的，所以它占据的是交通方便、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区，有利于农业和商业发展。郑国的统治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并且和商人订立了盟约，规定商人不背叛统治者，统治者也不刁难商人。各地的商人都能够安心在郑国经商。政府还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这些无疑促进了郑国商业的发展。当时郑国商人的足迹遍及齐、鲁、周秦、荆楚、晋燕等四面八方。大量的商税成为国赋的重要来源。商业的发达是郑国强盛的重要因素。这样一来，东迁后的郑国，财政收入比别国

充裕，郑国还利用这些经济收入，大力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成为一个新兴的富裕强盛的诸侯国家。

其三，由于郑桓公在周王朝秉政，并且在周末动乱中殉国，郑武公则在平息战乱、维护平王东迁中功勋卓著，历代郑国国君都在周王室秉政，因此政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非其他诸侯国所能相比。

其四，郑国是西周后期始封的国家，受西周宗法统治秩序的束缚比较轻。尤其是观念上比较开放，思想也比较容易解放，这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其五，郑国的周围都是一些弱小国家：北面的晋国还没有兴起；南面楚国的势力还未伸展到中原地区；齐国、秦国离它还较远，无法制约它的发展。西面是东周王室，关系和它极为密切。由于郑国国君的政治地位很高，常常代表周王室讲话。所以整个形势是：大的诸侯国无法威胁它的崛起，客观上造就了郑国成就霸业的有利条件。

其六，连续几代的郑国国君都是能干有为的君主，成为霸主的郑庄公是个非常有才能的君主，是春秋初年的一代枭雄。

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他的父亲郑武公也在朝中秉政，但父子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发展郑国上。到了郑庄公时，他连打胜仗，与周王室的矛盾越来越大。鲁、齐、陈、宋等国和郑国越来越接近，郑庄公也逐渐不把周平王放在眼里。周平王还要保持自尊与权势，于是就以郑庄公无暇顾及朝政为由，把郑庄公掌握的那部分王室权力私自交给了另一个卿士虢公。虢公是周文王弟弟的后代，在西周末期具有很强的政治势力，平王东迁后，虢国是东周王室西边的屏障，地位重要，同周室的关系密切。当郑庄公知道虢公要取代他在周王室的地位后，很不高兴。平王很想削弱他的势力，但又得罪不起他，只好在庄公面前否认了这件事，说："没有这回事。"霸道的郑庄公根本不相信，于是周郑交质，平王

把儿子王子狐交给郑庄公，让他带到郑国作为人质，郑庄公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忽作为人质，让住到都城洛邑。这件事是破天荒的，表面上看是对等交换，实际是周天子的地位降到了受诸侯制约的地步，而郑庄公的势力则使天子畏惧。公元前720年，周平王逝世，他的孙子即位为桓王。周桓王想把政事交给虢公处理，郑庄公分毫不让，到了麦子成熟的时候，郑庄公派祭足（即祭仲）带领军队抢先收割属于周天子所有的温地的麦子。到了秋天，又抢先强行收割属于周天子所有的成周的谷子。郑庄公此举使周王朝和郑国结下了仇恨。郑庄公和周王朝的关系恶化了。

公元前717年，郑庄公才去朝觐周桓王。可是，周桓王并未因此而转变态度，对前来朝觐的郑庄公不加礼遇。有人对周桓王说："我们周室东迁，依靠的就是晋国和郑国。好好地对待郑庄公来鼓励后来的人，恐怕人家还不来呢，更何况对郑庄公这么不礼貌呢？郑国不会再来朝觐了。"

过了两年，虢公忌文开始做周王室的卿士。而这年八月郑庄公仍然带着齐国僖公一起来朝觐周天子。又过了几年，到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在郑国取得邬、刘、蒍、邘四邑之后，把它们从郑庄公手中要了过去，用来交换的却是周桓王实际上并不能支配，属苏忿生所有的，位于黄河北岸的温、原、絺、樊等十二邑。当时的人们认为周桓王这件事做得欠妥，因此知道周桓王会失去郑国了。也就是说周桓王这么做事，已经失去周天子的身份和尊严，竟然以诈术获得土地。不久，郑国用祊田交换了鲁的许田，两国都表示不再承担对周天子的巡狩、朝觐的有关义务。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正式剥夺了郑庄公在周王室担任的卿士的职务，郑庄公也不再去朝觐周天子。这年秋天，周桓王还亲自统帅陈、蔡、虢、卫各诸侯国的军队讨伐郑国。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周平王助长了郑庄公的专横跋扈。周桓王一即位，决定对郑庄公施行强硬政策，他根本不管周平王与

郑庄公订立的盟约与交换的人质，坚决实施削夺郑庄公权力的计划。郑庄公则更想给这个新即位的周天子一个下马威，二者以硬对硬，使郑庄公失礼，周郑关系极为紧张。虽然周天子并没有多大的实力，但是他毕竟是可以号令天下的天子，郑庄公意识到失掉他祖上传下来的王室职务，同王室关系破裂，对他在诸侯中争雄极为不利，因此改变策略，由硬变软，一再求得与王室搞好关系。这使执行强硬政策的周桓王一再得逞，甚至白白拿走了郑国四邑的土地，并开始制裁郑庄公，使他彻底丢掉了自郑建国后就拥有的世代相传的王室职务。周桓王率诸侯伐郑，对于周郑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当周桓王统帅各路诸侯大军前来讨伐时，郑庄公带领祭足、原繁、高渠弥等大臣统率大军迎战，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县以北）摆开战场，这就是周郑繻葛之战。

王师是按照商周时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战法，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军。中军是主将率领的主力部队，左右两军起配合进攻和掩护中军的作用。后世军事家把这种军队配置称为“鸟阵雁行”，意思是说，它像鸟展开翅膀飞行，中军为鸟身，左右军为双翅，也像群雁在空中飞行的人字队行。桓王是当然的中军主将，虢公林父率领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蔡、卫两国军队随虢公林父的右军，陈国军队随左军指挥。郑国的子元根据周军的部署，提出了不用中军突出的老式阵法，而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上，主将所在的中军则摆在左右两方阵中间靠后。方阵中把战车排列在前面，步卒配置以战车之后，填补了车与车之间的空隙，组成密集的方阵。战斗时让左右方阵先与敌人较弱的两翼交锋，容易取胜，当打垮敌人两翼后，三军形成对敌人中军的包围之势。左右两方阵，这时像张开的网，把敌人中军主力尽收网中。所以这种阵法古称“鱼丽之阵”。古字丽与罹通，是使敌人陷入其中的意思。

子元进一步分析了敌情，进一步指出如此布阵的优势，他说：

"陈国国内局势很不稳定，军士不想出国打仗，因此不会有很强的战斗意志。如果我们先打陈国，陈国军队一定会逃散；周军要去照顾乱了营的陈国军队，整个阵势必然大乱；蔡、卫两国力量薄弱，必然首先撤退，以保存实力，我们集中力量攻打周王室的军队，一定会取得胜利。"郑庄公依从了子元之计，命曼伯率领右军，祭仲率领左军，原繁、高渠弥护卫着庄公中军，并说："等大旗招展，左右两军就同时击鼓进军。"当两军交战时，完全按照子元当初的预料发展，周军两翼溃败。当时郑国三军，越战越勇，对周桓王率领的中军发动进攻，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周桓王忍着伤痛，赶紧指挥撤退。勉强指挥军队逃出了郑军的重围。郑庄公心中无比高兴，这时祝聃要再立新功，要求去追击桓王，郑庄公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侵犯上级已经不对了，更何况他是周天子呢？我们作战是为了挽救自己，只要郑国免于危亡，这也就足够了。"这样，郑军并未乘胜追击周天子。

到夜间，郑庄公却又派遣祭足去探望周桓王的伤情，慰问受伤的周天子，同时问候他的左右随从。

周郑繻葛之战是周王发动的，本想通过战争来制服郑国，恢复周天子昔日的雄威，但毕竟时过境迁，王室没有实力，诸侯离心离德，想恢复王权的努力必然遭到惨败，反倒成就了郑庄公霸主的地位。郑庄公从与周平王交换人质，发展到繻葛之战，射伤周天子，所有这些都是破天荒的，他把至高无上周天子的王冠踩在自己的脚下，使天子的威信扫地，周朝礼制已经没有任何约束作用了。从此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号令诸侯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大国争霸的局面掀开了第一页。

第二年，北戎攻打齐国，齐国被迫向郑国求援，郑国的太子忽率领军队前去救援，结果，把戎人打得大败，俘虏了两个主帅大良和少良，砍了带甲戎军三百人的头颅。这无疑又提高了郑国的威信。这样，春秋早期，郑庄公小霸的局面形成。

公元前705年夏天，盟邑、向邑向郑国求和，不久又背叛了郑国。秋，郑军、齐军、卫军联合攻打这两个邑。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周桓王把盟邑、向邑的百姓迁到王城。被打败了的周桓王，仍然对当时诸侯霸主态度强硬，仍有天子余风，这种余风能保持多久呢？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左传》鲁隐公元年至桓公七年

郑伯克段于鄢

宗法制度有力地巩固了西周的政权。然而进入春秋时代，宗法制的基石一次次地被撼动。大宗和小宗由宗法制规定了他们的财产和权力的差别，因此，使大宗能够统帅小宗、小宗能够尊崇大宗。随着社会的发展，当财富、实力有了变化，或政治权力转移，小宗必然要求取代大宗。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宗法思想不再束缚人们的头脑，争夺君位的斗争频繁地发生。

与鲁隐公相比，郑庄公则在争夺君位的斗争中，显得格外老辣。

郑武公从申国娶妻，他的妻子叫武姜，生了郑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的时候难产，脚先头后，使武姜备受折磨，受到惊吓，给他取名为寤生，非常讨厌他。武姜喜欢次子共叔段，要立他为太子，多次向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后，武姜请求把制邑作为共叔段的封邑。制这个城邑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北临黄河，地势险要，也就是有名的虎牢关。郑庄公对他母亲说："制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虢叔死在那里。要是其他地方我会唯命是从。"《史记》上说，虢叔自恃地势险要，傲威不驯，郑庄公的爷爷郑桓公把他消灭掉了。郑庄公一眼就看出武姜为共叔段请求这个险要地方，是别有用心，也使郑庄公想起傲威不驯的虢叔与共叔段是一类人。因此话中带刺，坚决回绝。武姜又要求把京邑封给共叔段，京邑也是郑国的大邑，在今荥阳的东南。庄公无法再推托，只好同意，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为京城太叔。

共叔段到了京城后，就把这里的城扩建了，这违背有关的规定。郑国大夫祭仲对郑庄公说："凡是都邑，城垣的周墙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的制度：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规定，它违反了先王的制度，您将失去控制，会受不了的。"郑庄公回答说："姜氏要这样，又怎么能避免祸害呢？"祭仲说："姜氏怎么会满足！不如早点给她安排个地方，不要让她的欲望滋长蔓延。一旦让它像野草那样地随便滋生蔓延，就难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锄掉，何况是您尊贵的兄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一定自己摔跟头，你就等待这件事的发生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同时听从他自己的命令，事实上是把这些地盘抢了过去。郑国大夫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情况发生，君王打算怎么办？君王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事奉他；如果不给他，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取其祸。"

共叔段得寸进尺，收取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这样，他的地盘从郑国西部和北部向东北扩展到与卫国接界的廪延（今河南延津东北），事实上郑国已经是二君并立的局势。公子吕又说："可以除掉他了，如果让他继续扩大实力，他将得到众多的百姓。"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团结众人，势力雄厚，反而会分崩离析。"

共叔段羽翼一旦丰满，就动作起来：整治城郭，积聚粮食，修缮武器装备，充实步兵、车兵。当他做好袭击都城的准备后，姜氏则在都城为他内应，准备一旦他率兵前来偷袭，为他打开城门。而这一切都逃不过庄公的眼睛，因而早有防备。听说共叔段与姜氏约定的日期后，就命大将子封率二百乘兵车提前进攻京城。京城里的人也反对共叔段，起来做内应。共叔段很快大败，逃到了鄢地，庄公乘胜追击，攻打鄢地，逼得共叔段又逃到共邑（今河南辉县境）。

《春秋》上记载这件事时说："郑伯克段于鄢。"兄弟相争，不像兄弟，所以未点明他们是兄弟，而像是两个国君争斗，所以用"克"字。把郑庄公称为"郑伯"，含有讥讽之意，讽刺他有失教诲。整个事情是由庄公蓄意安排的，他放纵了共叔段与姜氏的贪心，选择适当的时机，狠狠打击。

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要相见。"不久又感到很后悔。当时有个叫颍考叔的人，他是颍谷封人即管理边界的官。听到这件事后，就找机会献给庄公一些礼物。庄公赏赐他吃饭。吃饭的时候，颍考叔把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小人有母亲，我吃过的东西，都要先请她尝，可我母亲还没有尝过您的肉汤，请允许我给她带回去一些。"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就送吧。唉！可我却偏偏没有母亲！"颍考叔说："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向他说明了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后悔的心情。颍考叔回答说："您对这件事还忧虑什么呢？如果深掘地下，直到黄泉，在凿成的隧道里你们母子相见，又有谁说不是这样呢？"

郑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意见。郑庄公走进隧道，见到母亲，便赋诗："即使在这大隧道里，我的心情却快乐无比。"姜氏走出隧道才赋诗："走出隧道外，心情多愉快！"就这样，母子和好如初。

《左传》的作者，对此非常赞赏，说：颍考叔是位纯粹的孝子，爱他自己的母亲，并把这种爱的行为推广到庄公身上，使他也爱自己的母亲。还引用《诗经》上的两句诗："孝敬的儿女不停地尽孝，永远给你们同类人以良好的影响。"这大概说是颍考叔纯孝的行为吧。可是，为什么要等到打败共叔段才孝呢？到了春秋阶段，所谓礼、所谓孝、所谓仁义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它们或是一种点缀，起到掩饰狰狞面目的作用；或是一种工具，使自己在争夺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或是一种枷锁，用来锁住别人的头脑和手脚。

颍考叔因此受到郑庄公的重用。

叔段有个儿子叫公孙滑，在他父亲作乱失败后，逃到卫国，卫桓公收容了他，并派兵攻取了郑国的廪延。郑庄公以王臣卿士的身份率领王室及虢国的军队打到卫国的南部。他还以周王的名义，要求邾国出兵相助。邾当时与鲁国友好，就去联络鲁国一道出兵。鲁隐公不同意。邾国就派人私下和鲁国的公子豫商量，公子豫就自己带兵走了，帮助郑国攻打卫国，并在邾国的翼地（今山东费县西南）与郑、邾结盟。鲁隐公三年，郑国与齐国在石门（今山东清县西）会盟，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关系，这就使它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郑庄公的胜利，使郑国的权利争夺告一段落，但这改变不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宗法制破坏后，权利争夺愈演愈烈。就在郑庄公死后，他的八个儿子中有四个参加君位争夺，结果有三个在权利争夺中丧命，强大的郑国也在这种内部矛盾中，在你死我活的争夺中消耗得越来越弱。

既然宗法制本身已经崩溃，那么进一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的宗法思想观念也遭到否定，大宗的王位继承权，受到具有实力的小宗的挑战，争夺君位的斗争频繁地发生。最大的宗周王室内，首先发生了权利争夺。继幽王废嫡子宜臼立庶于伯服，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及伯服，为宜臼夺回王位之后，周王室又发生了数次庶子争位的斗争，王室大乱，周天子的地位愈益衰弱。

鲁桓公十八年（前694）秋，周公就打算杀掉周庄王姬佗而立王子克。辛伯把这件事报告了庄王，并帮着庄王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亡到燕国。当初，子仪受到周桓公的宠信，桓王把他嘱托给周公。辛伯就劝谏说："妾媵并同于王后，庶子相等于嫡子，二卿有同等的权力，大城和国都一样，这都是祸乱的本源。"周公没有同意，所以遭到祸难。辛伯列举了一系列导致祸乱的现象，这在当时非常普遍。一旦有了实力，就有争夺，有争夺就免不了祸

难。

当初，王姚受到周庄王的宠爱，生了子颓。子颓也因为母亲的缘故而受到宠爱。蒍国做他的老师。等到周惠王继承王位后，占取了蒍国的菜园子作为畜养野兽的地方。边伯的房子近在王宫旁边，惠王也占取了。惠王又夺取了子禽祝跪和詹文的土地，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所以蒍国、边伯、石速、詹文、子禽祝跪联合起来发动叛乱，依靠苏氏。鲁庄公十九年（前 675），五位大夫事奉子颓攻打周惠王，没有得胜，逃到了温地。苏子事奉子颓逃亡到了卫国。卫国、燕国的军队攻打成周。立王子颓为周天子。

这件事并未结束，因为它未得到当时有实力的诸侯郑厉公的同意。于是郑厉公就出面调解王室的纠纷，但没有成功。他抓住了燕仲父。第二年夏，郑厉公带了周惠王回国。惠王住在栎地。秋天，周惠王和郑厉王公一起来到邬地，于是就进入成周，取得了成周的宝器而回。

王子颓登上天子位后，设宴招待帮他夺取天子位的五位大夫，奏乐、舞蹈，把所有能够上演的乐舞都演遍了。郑厉公听到这件事，见到虢叔说："寡人听说：悲哀和高兴得不是时候，祸殃一定到来。现在王子颓观赏歌舞却不知疲倦，这简直是以祸患为乐。司寇杀人，国君还为此而减膳撤乐，更何况敢以祸患为乐呢？篡夺王位，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面临祸患而忘记忧愁，忧愁一定到来。为什么不让天子复位呢？"虢公说："这是我的愿望。"

鲁庄公二十一年，郑厉公和虢公在弭地会谈。夏天，一起进攻王城。郑厉公事奉惠王从圉门入城，虢叔从北门人城。杀了王子颓和五个大夫。

郑厉公在宫门口西阙设享礼招待惠王，全套乐舞一样不缺。惠王赐给他郑武公时代的土地，在虎牢以东。原伯说："郑伯学了坏样子，恐怕也会有灾祸。"五月，郑厉公死了。

郑厉公设享礼招待惠王的时候，惠王把王后的鞶鉴赐给了他。

虢公请求赏赐器物，惠王把青铜酒杯赐给了虢公。由于鞶鉴没有青铜酒杯贵重，郑厉公从此开始怀恨周天子。

周惠王巡视虢公防守的土地,虢公为惠王在玤地建造行宫,惠王把酒泉赐给他。不久，周惠王从虢国回到了成周。

鲁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派遣召伯廖赐命齐桓公，请他去攻打卫国，因为卫国曾立王子颓为天子。齐桓公攻打卫国，并把他们打败，用周天子的名义责备了他们，取得卫国贿赂他的财宝之后，返回齐国。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宗法制被破坏，天子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实力的贵族、诸侯可以任意把他们喜欢的，对他们有利的人扶上天子宝座。宗法制的面纱一旦被撕下，天子与诸侯，天子与贵族、臣僚之间的关系，完全成了一种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关系，而交换的前提是实力、武力。这种交换其实就是抢掠。

既然最具有权威的周天子的宝座都已落到这种地步，诸侯的王位争夺更不值得奇怪了，所以人们常常责备郑庄公的狡诈与狠毒，说他一手导演了共叔段的悲剧，及母子之间的悲剧。但历史发展到了这个时代,给郑庄公提供做另外选择的可能性太小了。他必须吃掉共叔段。否则就可能被共叔段吃掉。也正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利害关系，常常使争夺者与被争夺者不择手段。

西周的宗法制，以血缘的亲疏为准则，确定贵族间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的分配，防止争夺，曾长时间地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到了春秋时代,新的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使宗法制的部分作用完结。然而，要摧毁宗法制毕竟需要许多人流血。当春秋的历史刚一揭幕，这股血腥味就迎面扑来。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左传》鲁隐公元年至庄公二十八年

卫州吁宣姜之乱

卫国的始封君姬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也就是卫康叔。东周初年，为平王东迁立下大功的卫武公死后，其子即位为卫庄公。卫庄公五年（前753）娶了齐国国君的女儿庄姜为夫人，她虽然很漂亮，可是未生子。于是卫庄公又娶陈国国君的女儿厉女妫为夫人，生了儿子，却又夭死。庄公又纳陈国夫人的妹妹戴妫为妾，生了儿子名完。当完的母亲死后，庄公让齐国夫人收养完为子，并立完为太子。庄公还有个宠妾，生了另一个儿子，名州吁。到州吁长大时，受到母爱父宠，非常骄纵，他又喜欢带兵打仗，卫庄公就让他带兵为将。大臣石碏多次劝谏庄公说："庶子好兵使将，祸乱常从这样的事起始。"卫庄公把它当作耳旁风，根本不听。卫庄公对州吁不加约束，而庄姜则非常讨厌他。

石碏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卫国正酝酿着一场祸乱，他决心让卫庄公去制止这场祸乱的发生。他对卫庄公说："我听说真正地喜爱儿子，就应当用道义教导他，不要让他走上邪路。骄纵、无礼、放荡、违法，这些会使人走上邪路。这四种恶事之所以发生在儿子身上，主要是宠爱过分，给他的钱财太多了。如果确实想立州吁做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迟迟不定，犹豫不决，就会逐渐酿成祸乱。受宠却不骄纵，骄纵却懂得收敛，收敛却不怨恨，怨恨却又懂得克制，这种人太少了。况且那些以贱妨贵，以少凌长，以远间亲，以新间旧，以小加大，以淫破义，这所谓六逆的事，经常发生。国君行事得宜；臣下受命奉行；父亲慈爱儿女；儿女孝

顺长辈；兄长宽厚和睦，兄弟恭敬友爱，这就是六顺。如果去掉六顺而效法六逆，这就会很快招致祸害。作为人君，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去除祸害上，并且越快越好，难道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可是，对石碏的话，卫庄公还是听不进去。石碏的儿子石厚常和州吁一起游乐，石碏禁止石厚这么做，也无济于事。

卫庄公死后，太子完即位，为卫桓公。这时石碏已经年老就退休了。后来州吁果然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主。

在这之前，宋国也发生了王位的争夺战。宋殇公即位后，公子冯被迫出奔到郑国。当州吁自立为卫桓公之后，为转嫁危机，继续挑起与郑国的战争，以便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得到诸侯的承认，于是向宋殇公提出，共同攻打郑国，除掉宋殇公的政敌公子冯。宋殇公当然同意。这时陈国、蔡国是卫国、宋国的盟友，于是宋、卫、陈、蔡四国联合攻打郑国，包围了郑国国都的东门，连续攻打了五天才回去。这就是东门之役。

当时鲁隐公问众仲说：“卫国的州吁这么做会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使百姓和乐安定，没听说用祸乱能成功的。用祸乱只会是乱上加乱，如同要理出乱丝的头绪反而乱揪乱缠，只能越来越乱。州吁这个人，倚仗武力而安于残忍。倚仗武力就会使众人背叛；安于残忍就没有亲信。众叛亲离，怎么会成功呢？兵乱，就像火一样，不加制止，就会烧毁自己。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暴虐地驱使他的百姓，而不致力于建树美德，反而想通过祸乱以取得成功，就一定不能免于祸难。”

州吁的做法未能平复民怨。石厚向父亲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碏本来就非常厌恶州吁，曾多次地劝谏石厚不要和他搅在一起。这时，石碏突发奇想，心生一计，石碏告诉石厚说：“让他去朝觐周天子，求得合法地位，百姓才会人心信服。”石厚明白，对于州吁这样的弑君的乱臣贼子，百姓人心不服，早已臭名昭著，周天子不会轻易接见，更不会轻而易举地承认其合法地位，于是

便问石碏："怎样才能去朝觐周天子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关系很好，如果去见陈桓公，然后请他先去向周天子请求，就一定能达到目的。"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与此同时，石碏这位在卫国地位很高的老臣，派人告诉陈桓公说："卫国地方狭小，我年纪又老，已经做不了什么事了，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国君主，所以冒昧地请求您给想想办法惩治他们。"等石厚和州吁到了陈国，就被逮捕了。陈桓公派人到了卫国，请他们派人来陈国处置这两个人。公元前719年九月，卫国人派右宰醜在陈国杀死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獳羊肩在陈杀死了逆子石厚。当时人们非常赞赏石碏这位老臣忠于国家、大义灭亲的行动。

杀了州吁，卫国人到邢国迎接公子晋。这年十二月，公子晋即位，为卫宣公。《春秋》上说"卫人之晋"，意思是说晋即位是出于众人的意志。

到了第二年夏天，卫国重新安葬卫桓公。至此，卫国州吁之乱才算了结，国内局势趋于平定。

州吁之乱是平定了，可是卫国又一场内乱正在酝酿之中。

起初，卫宣公和他父亲的妾夷姜私通，后来生了急子（《史记》作伋子)。卫宣公把急子嘱托给右公子职教养。当卫宣公即位后，元配夫人邢妃不受他的宠爱，只有夷姜得幸，成了实际上的夫妻。子因母贵，卫宣公答应急子为君位继承人。当急子长大成人后，卫宣公为他聘齐僖公的长女为妻。当使者返回卫国后，卫宣公听说齐僖公的长女，艳丽无比。这位贪恋美色，淫纵不检的父亲，派遣急子到宋国聘问，在淇河之上筑起了华丽的新台，派人把齐僖公的女儿迎到新台之上，自己做了新郎官。新娘就是宣姜。人们对这件事议论纷纷，觉得身为国君、父亲的卫宣公行为不检，于是作诗讽刺他，大意是淇河上漂亮的新台里，有位艳丽的新娘等待佳人，结果等来个奇丑无比的汉子，河中由于设了鱼

网吓跑了鸿胪。

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寿，一个叫朔。他把寿嘱托给左公子洩加以教养。卫宣公自从有了宣姜，逐渐地冷淡昔日情人夷姜。由于宣姜有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所以，一场王位争夺战明火执杖地进行，宣姜恃宠诬陷夷姜母子，夷姜本是卫宣公父亲的妾，现在失宠后，地位更加尴尬，本来希望儿子继承君位，现在眼看宣姜母子日益受宠，仗势欺人，夷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竟上吊自杀了。

宣姜和公子朔乘机诬陷急子。卫宣公在她们母子的唆使下，竟决定除掉急子。他派急子到齐国出使，实际上却派杀手到莘地等待急子，等急子一到，立即杀掉。寿子虽然和朔子是一母所生，但由于他和急子同受左公子和右公子的教养，亲如兄弟。于是，寿子便把卫宣公夫妇的诡计告诉了急子，让急子赶快逃走。没想到急子却不同意逃跑，他说："背弃父命，怎么称得上是儿子呢？逃到没有父亲的国度，我就会好起来吗？"寿子非常佩服急子是位视死如归的男子汉，更要诚心诚意地救他。等到急子临行前，寿子把他灌醉。寿子坐上打着太子旗帜的车子走到前面，到了莘地，杀手把寿子当作急子杀害了。当急子赶到莘地时，早已抱定必死决心的急子见到寿子已被杀，就对杀手说："他们要杀的是我，这个人有什么罪，请杀我吧！"杀手果然杀了急子。得知两公子被杀的消息，左公子洩和右公子职简直恨透了朔子。

卫国百姓闻听两公子视死如归非常感动，作诗吟咏。《诗经·卫风·乘舟》诗中描写了兄弟争死之前，相对在舟中饮酒，内心有千言万语，二人都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默默流淌的河水，把人带入无尽的悲思之中。

卫宣公得知两公子争死的报告，内心非常后悔，由于自己听信谗言，竟失去两个这么好的儿子，不久，悲忧悔恨就把他折磨死了。公子朔即位，为卫惠公，时年仅十五岁。

三年后，左公子洩和右公子职及大臣宁跪，乘卫惠公出国之际，发动政变，立公子急的同母弟黔牟为国君。卫惠公失去了君位，只好到他母亲的娘家齐国寻求保护。第二年，齐国、鲁国、纪国在黄地结盟，这次会盟中三国商量怎么联合起来对付黔牟执掌的卫国。所以卫惠公虽然被推翻了，但由于他有强大的齐国做后盾，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

八年之后，卫惠公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以齐国等诸侯兵马为后盾，打进了卫国，重登卫国君位。他把黔牟放逐到成周，把宁跪放逐到秦国，杀了左公子洩、右公子职。可怜这两位公子，有能力把黔牟扶上君位，却没有能力为他巩固住君位。他们痛恨卫惠公却没有能力除掉他，结果反而被他除掉。卫惠公依靠别国力量，登了君位，日子也不会好过，民心不服，又得听令于别国。由于二位公子谋划不周，勉强行之，再一次使卫国陷入动乱。

公元前668年，卫惠公去世，他的儿子即位，为卫懿公。这位昏君的儿子，喜欢养鹤，甚至为鹤封官晋爵，让鹤坐上华贵的车子到处游玩，却慢待手下文臣武将。

公元前660年十二月，狄人攻入卫国，卫懿公……与狄人作战。那些带甲胄的武士对他说："还……鹤享有官爵禄位，我们哪有哇，怎么能去作……

卫懿公把玦给了石祁子，把箭交给宁庄……"我现在只能拿出这些来赞助国家了，你们看……吧。"他把绣衣交给夫人，说："你要听二位的……军与狄人决战，渠孔为他驾驶战车，子伯为车右……婴齐殿后。在荧泽和狄人决战，结果卫军被打得……卫国灭在了这位好养鹤玩乐的国君手里。卫懿公不肯去掉自己的旗帜投降，所以败得非常惨。卫懿公本人也战死了。

狄人囚禁了卫国的史官华龙滑和礼孔，并继续追赶败逃的卫国人。这两个人说："我们是太史之官，执掌祭祀。如果我们不先

回去，你们是无法得到国都的。”于是，狄人放他俩回去。他们俩回到国都，告诉守卫国都的人说：“不能再抵御了。”连夜和国都的人一起退走。狄人迅速进入国都，跟着就追上撤退的卫国人，在黄河边上再一次杀掉了许多卫国人。

当初，卫惠公即位时才十五岁。齐国人在卫宣公死后，让卫宣公与夷姜生的另一个儿子昭伯续娶他的继母宣姜，因为昭伯的父亲曾续娶爷爷的妾而生下他，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因此，昭伯不愿意再干这样的事。可是，齐国竟逼着昭伯就范，这样昭伯与宣姜共生了五个孩子：长子齐子早死；次子申，后来为戴公；三子燬，后来为文公，两个女儿分别作了宋桓公的夫人和许穆公的夫人。公子燬还在卫懿公执政时，由于这位昏君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使卫国到处充斥着祸患，先到齐国躲避。等到卫国被狄人灭亡，卫懿公被狄人杀掉后，齐桓公在黄河边上接收卫人，并连夜渡河。当时的卫国遗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才剩下七百三十人，加上共地、滕地的百姓约有五千人。昔日周武王的弟弟卫康叔建立的强大卫国，在几十年人为的祸乱中，竟到了如此惨境。这些卫国难民，立公子申公为卫戴公，寄住在曹邑。齐桓公赠送给戴公驾车的马匹，还有祭服五套，牛、羊、猪、鸡、狗各三百，还有一些立门户的东西。赠送给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车子，还有上等的锦三十匹。齐桓公派遣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守卫曹邑。

卫戴公在战乱中心力交瘁，不到一年就死去，复立其弟燬，为卫文公。卫文公在危难之际，登临君位，与百姓同劳苦，亲身参加劳动，来解救卫国之难。

这时各个诸侯联合出兵，赶走了侵略卫国、邢国的狄人。第二年春，诸侯们又联合起来救援卫国、邢国的难民。在楚丘为卫国筑城。卫文公立下了务农、通商、惠工、敬教、勤学、授言、任能的施政方针，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

卫康叔建立的大国，由于后世之君，放纵淫欲，招来种种祸乱，终致国灭家亡。祸乱中有石碏大义灭亲，舟中二子对饮，慷慨悲歌的卫风与桑间濮上的淫风相互映衬。危难中，卫文公的施政方针，给卫国以生的希望。卫国春秋早期的历史告诉我们：死于安乐，生于忧患。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史记·卫世家》

《左传》隐公三年至僖公元年

宋殇闵昭公之弑

宋国的始封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周朝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封微子在今河南省东部，建立宋国。宋国继承了殷代宗祀和殷商文化。宋国四面平川，易攻难守，以利于周朝控制殷人。宋国国君是公爵，属上等诸侯。

殷商的王位传承有兄终弟及的传统。西周时期，宋国大体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到了西周末年，宋宣公传位给弟弟宋穆公，而没有把王位传给太子与夷。这就埋下了宋国内乱的种子。

公元前720年，宋穆公病重，他召来大司马孔父，决定传位给与夷，而不传位给太子公子冯。他嘱托孔父说："先君舍弃了他的儿子与夷，而立寡人为国君，这是我不敢忘记的。如果托大夫的福，寡人得以保全首领而死，到了阴曹地府，先君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为回答呢？请您事奉与夷为国君，让他主持国家社稷。寡人虽然死去，也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孔父回答说："群臣可都愿意事奉公子冯啊！"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寡人贤德，才让寡人主持国家社稷。如果抛弃了德行而不让君位，这就辜负了先君的提拔，哪里还能说是德才兼备呢？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难道还能三心二意吗？你们也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命令太子冯出国到郑国居住。八月初，宋穆公去世，与夷即位，为宋殇公。

从这件事上看，宋宣公确实知人，传位给弟弟穆公，穆公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又把君位还给了他的儿子。显然宋宣公

是出于道义，把君位传给了一位贤德的人，而与夷安分守己，也支持了这种道义的实施，这也不能不说是贤德的。正所谓：受命咸宜，百禄是荷。

宋殇公即位后，公子冯逃到了郑国，郑国曾打算送他回国。这当然对宋殇公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不久卫国的州吁杀死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国内人心不服，为转移视听，州吁决定挑起与郑国的战争，作出对前国君与郑国结下的仇冤进行报复的姿态，以此讨好诸侯，安定民心。他派人对宋殇公说："君王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公子冯这个祸害，宋国为主，卫国、陈国、蔡国都会发兵跟从，这是卫国的愿望。"宋殇公答应了，因此有了东门之役。到了秋天，再次向郑国进攻，诸侯联军打败了郑国军队，割了郑国土地里的谷子才回师。从此郑国与宋国积怨日深，相互攻打，双方各有胜负。到公元前716年，宋郑媾和，双方在宿地结盟。但不久，因为宋殇公不去朝见周天子，双方又开战。

公元前711年，宋国的华父督在路上见到了孔父的妻子，他眼睛紧紧地盯着她走过来，又目不转睛地把她送了很远，不由地赞叹说："既漂亮无双又艳丽无比。"第二年华父督攻打孔氏，杀死了孔父，占有了孔父的妻子。宋殇公非常生气，华父督有些害怕，就把宋殇公也杀了。华父督先后杀死了顾命大臣和国君，显然是罪大恶极。因此，他迅速地把公子冯从郑国接回来，即位为宋庄公。华父督讨好了郑国，又把郜国的大鼎馈送给鲁桓公，对齐、陈、郑等诸侯也都馈送财礼。各国诸侯接受了他的贿赂。不久，鲁桓公、郑庄公、陈桓公、齐釐公在稷地会见，居然承认了华父督的这次叛乱。鲁桓公把郜国的大鼎，陈列在祖庙里加以炫耀。这样华氏政权也就站住了脚。这表明各国在抛弃道德、贿赂公行、树立邪恶、丧失正义上是一致的。

对鲁桓公在祖庙内安放华父督贿赂的郜国大鼎这种严重不合礼法的行为，臧哀伯劝阻说："作为人君，要发扬道德而阻塞邪恶，

以监临百官，还怕有时失误，所以要发扬美德以昭示子孙。因此，大庙用茅草盖顶，大辂用蒲席铺垫，肉汁不放调料，主食不吃精米，这是为了表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大圭、大带、裙子，绑腿，鞋子……尊卑上下各种规定，这是为了让人明白制度。缫藉、佩巾、刀鞘、刀饰、革带、带饰、飘带、马鞅，等级不一多寡不同，这是为了各有限制。画火、画龙、绣黻，是为了让人崇尚美。锡、鸾、和、玲发出的美妙声音，使人心境和美。五色再造自然，使人欣赏万物之美。画有日、月、星三辰的旌旗飘扬，让人们向往光明。判断善恶的行为准则，是为了使人不放纵而有度，升降而有数。用各种美的事物色彩来培养道德，用各种美的声音，光明的形象来激励德行，临照百官，百官因此有所警戒畏惧，不敢违反纪律。如今，消除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里，以此向各级官吏作出坏榜样，百官也跟着这样，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的邪恶。官吏的失德是由于失宠而贿赂公行。把郜鼎放在太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当年周武王打败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义士还认为不对，更何况把表明邪恶叛乱的器物放在太庙里，这又该怎么办呢？”鲁桓公根本不听劝阻。

宋国在宋殇公时期与郑国争夺对诸侯的领导权，连年征战，又经历了宋殇公被杀这场内乱，人心不稳，国力消耗很大，公室的地位下降。宋庄公死后，儿子于公元前691年即位，为宋闵公。

宋闵公即位八年后，公元前684年，齐桓公攻打鲁国，吃了败仗，到六月，齐国的军队和宋国的军队驻扎郎地。鲁国的公子偃说：“宋军的军容不整齐，可以打败他。把宋军打败了，齐国军队必然回国。请下令攻击宋军。”鲁庄公不同意。可是，公子偃竟私自带兵从雩门出击，把马蒙上老虎皮先攻打宋军，鲁庄公得知后，也领兵前来，结果在乘丘把宋军打得大败。齐军只好回国了。

第二年夏天，宋国为报乘丘失败之仇，而去侵袭鲁国。谁知

鲁国早有准备，当宋国的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鲁庄公就率军发起攻击，在戳地又一次打败了宋军。

到了秋天，宋国发了大水。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到了宋国，使者说："上天降下大雨，受害如此深重，怎么能不来慰问呢？"宋闵公回答说："孤实在是对天不诚敬，上天降灾，还让贵国国君担忧，承蒙关注，实不敢当。"

臧文仲评论说："宋国恐怕要兴起了吧！禹、汤责罚自己，勃然而兴；桀、纣责罚别人，导致灭亡，列国发生灾害，国君称孤，合于礼。说话知道畏惧，行动合于礼，这还差不多。"不久，又听说这是公子御说的话，臧孙达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爱抚百姓的心意。"

还是在乘丘之役中，鲁庄公用一种叫金仆姑的箭射中南宫长万，鲁庄公和东右歂孙活捉了他。宋国请求把南宫长万释放回国。回国后宋闵公和南宫长万开玩笑说："当初，我很尊敬你，现在的你，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囚犯，我不尊敬你了。"南宫长万因此怀恨在心。

公元前682年，南宫长万在蒙泽杀死了宋闵公。随后在东宫的西面遇到了太宰华督，又把华督杀死，立子游为国君。宋国的公子们逃到萧国，公子御逃到了亳地。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了亳地。这时，萧叔大心及宋国戴公、武公、宣公、穆公的族人，率领曹国的军队前来，杀死了南宫牛，又在宋国都城杀了子游，立公子御为国君，即位为宋桓公。猛获逃到了卫国，南宫长万逃到陈国。宋国人到卫国请求归还猛获。卫国想不给。石祁子说："不能这么做。普天下的邪恶都是一样的。在宋国作恶的人而在我国受到保护，保护他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结交恶人而失去友好国家，这不是好主意。"于是卫国人把猛获交给了宋国。宋国又到陈国请求引渡南宫长万，并送上财礼。陈国人知道南宫长万力气很大，便让女人劝他喝了很多

酒，等他醉了便用犀牛皮包起来，等抵达宋国时，南宫长万的手脚已经挣破了犀牛的皮露在外面了。宋国人把这两个人全都剁成了肉酱。

这场动乱的平息，宋国公室的力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从此以后宋国君主比较注重依靠公室宗族。到宋昭公时（前619 前611年在位），公室宗族各支的力量已经发展得非常强大了，这些力量对君主已经形成了威慑。当时公子成做右师，公孙友做左师，乐豫做司马，鳞矔做司徒，公子荡做司城，华御事做司寇。

宋昭公准备除掉这些重权在握的公子们。乐豫说："不行，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去掉它们，那么树干就没有树荫遮蔽了。由于葛藟能遮蔽它的躯干和根，所以君子常拿它作比喻。说明相互照应就像根与叶不能分离，何况国君，更需要公族辅助。您的想法就像谚语说的：想要遮荫，却又用斧子乱砍乱伐。这怎么行呢，您要办好这件事，就要用德去亲近他们，使他们成为您的左膀右臂，君臣一体，谁敢怀有二心？怎么能除掉他们呢？"宋昭公不听劝阻，然而没等他动手，宋穆公、宋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来攻打昭公。宋昭公的亲信公孙固、公孙郑被杀害在昭公的宫里。六卿出面调停，双方才算讲和。乐豫被迫放弃司马官职让给了公子卯。这次动乱中许多无辜的人被杀，宋昭公虽未失去王位，但他的势力被削弱，公族更嚣张了。

宋襄公的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她在宋国的权势越来越重，和宋昭公逐渐有了冲突，宋昭公不听她指挥，也不对她加以礼遇。于是，她依靠戴氏的族人杀了襄公孙子孔叔、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卯，这些都是昭公的党羽。司马公子卯手持符节而死，司城荡意诸逃出来后，把符节还给府人，然后被迫出走。他在鲁国受到鲁文公的礼遇。这次斗争使宋昭公又遭受挫折，实力再一次被削弱。在以后的几年内，宋昭公忙于权力斗争，不注意笼络人才，收

买人心，因此，无论是权势还是威望都在下降。他的弟弟公子鲍见有机可乘，积极收买人心，到处拉关系，收买人才。对此宋昭公毫无防备。

公元前611年，宋国发生严重饥荒，公子鲍乘机礼遇国人：他把粮食全部拿出来用于施舍。他千方百计安抚七十岁以上的长者，馈送财物佳肴；拉拢六卿，召揽人材，亲近公族。

公子鲍是漂亮的美男子，非常有魅力，宋襄夫人想和他私通，却不能，于是就帮助他施舍。宋昭公失势、无道，国人都侍奉公子鲍，并进一步依附宋襄夫人。

当时华元做右师，公子友做左师，华耦做司马，鳞矔任司徒，荡意诸任司城，公子朝任司寇。起初，司城荡死了，公孙寿辞去司城的官职，请求让儿子荡意诸担任这个职位。不久他和人说："国君无道，我的官位接近国君，很害怕祸及于身。可是，弃官不干，家族便失去庇护。儿子，是我的化身，姑且由他来分担一下死亡吧。即使儿子死去，还不致于使家族灭亡。"

不久，宋襄夫人打算让宋昭公在孟诸打猎时，乘机杀死司城荡意诸。宋昭公知道后，带上全部珍宝出行。荡意诸说："何不到别的诸侯那里去躲避？"昭公说："上至我的祖母、我的大夫们，下至国人，谁也不信任我，诸侯谁还接纳我？况且已经为人君主，再去做别人的臣下，不如死了。"于是，把他的全部珍宝赐给左右侍从，让他们离开。

宋襄夫人派人告诉司城离开宋昭公。他回答说："做他的臣子却又躲开他的祸难，怎么能侍奉以后的君主？"

宋昭公九年（前611）十一月二十二日，宋昭公准备到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宋国的薮泽）去打猎，可是当他还没到达时，宋襄夫人就迫不及待地调集公室田庄上的甸师部队去进攻，并杀死了他。荡意诸也同时被杀死。公子鲍即位，为宋文公。宋文公任命他的弟弟须做了司城。华耦，这位很有才华的华督的后代也

死去了，派荡虺做了司马。

第二年春天，晋国荀林父、卫国孔达、陈国公孙守、郑国石楚。领兵伐宋，责问宋国："为什么弑君?"好像要主持公道，讨回正义，其实不过是趁火打劫。可是，宋国公族仍试图反叛。公元前613年，宋武公的族人怂恿昭公的儿子，打算和宋文公的同母弟司城须一起进行叛乱。十二月，宋文公杀了兄弟须和昭公之子，让宋戴公、宋庄公、宋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里攻打宋武公的族人，就这样把宋武公、宋穆公的族人赶出了宋国。

宋国在短短的春秋前期的历史中，有这么多的国君被弑，决非偶然。纵观春秋时代，有三十六位国君被弑，主要是西周礼法失去约束作用，周天子无力讨逆，各国诸侯虽名为兴师讨逆，实为趁火打劫。其实这种弑君行为一再受到鼓励，因为每当这种事出现，总免不了厚贿诸侯。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左传》隐公三年至宣公三年

鲁文姜之乱

齐僖公有两个女儿，长女叫宣姜，次女叫文姜。宣姜当初要嫁给卫宣公的太子伋，可是由于她太漂亮了，卫宣公见了之后，便据为己有。后来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君位，竟杀了太子伋。文姜比她姐姐更漂亮，而且挺有才气，谈古论今，博通文墨，起名叫文姜。文姜有个哥哥叫诸儿，也是个美男子。他们的父亲都是齐僖公，却并非同母所生。兄妹俩很要好。公元前709年，公子翚在把鲁隐公刺死了二年之后，来到齐国，为鲁桓公做媒，请齐僖公把他的小女儿文姜嫁给鲁桓公。在这之前，齐僖公曾想把文姜嫁给郑国的公子忽，可公子忽竟然拒绝了这门亲事，正在气头上的齐僖公也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订在这年九月娶亲。这意味着鲁国与齐修先君之好。

到了成婚的日子，鲁国派公子翚前来迎接，可是齐僖公竟然亲自把文姜送到灌地。这违犯了周礼，说明齐僖公对文姜一向溺爱，他自己也不顾礼法。按着周礼，凡本国的公室女子出嫁到同等级的国家，如果是国君的姐妹，就由上卿护送她，以表示对前代国君的尊敬；如果是国君的女儿，就由下卿护送她。出嫁到大国，即使是国君的女儿，也由上卿护送她。嫁给天子，就由各位大臣去护送，国君不亲自护送。出嫁到小国，就由上大夫护送。到了这年冬天，齐僖公又派仲年前来鲁国聘问，这是专为文姜而来。

三年之后，也就是桓公在位六年的九月，文姜生了儿子，取名叫同。同出生后便为他行太子之礼，举行了太子出生的仪礼：父

亲接见儿子时用太牢，用占卜选择了有吉兆的士人背他，由被选中的这位吉士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同宗妇人为这位太子命名。

鲁桓公问申缙有关命名的事。申缙回答说："可以从五个方面命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的情况来命名是信；用祥瑞及有教化意义的字眼命名就是义；用相类似的字眼来命名就是象；用万物的名称来命名就是假借；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就是类。命名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疾病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礼品名。周朝人事奉神灵要避讳。所以，用国名命名就会废除人名，用官名命名就会改变官称，用山川命名就会改变山川的神名，用牲畜命名就会废除祭祀，用器物礼物就会废除礼仪。晋国因为僖公而废除司徒，宋国因为武公而废除司空，我们鲁国因先君献公、武公而废除了具山、教山二山之名，所以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鲁桓公听了申缙的话，很受启发，想了想便说："这孩子出生的日子，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日子，就管他叫同吧。"

然而文姜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在齐僖公的溺爱中长大，对这场政治婚姻并不满意。且不说她的哥哥诸儿那样的美男子的吸引力，她在鲁桓公身上似乎找不到。更让她伤心的是，她与郑国的公子忽的婚事，竟两次被拒绝。公子忽却又的确是她爱慕的英雄。决不是鲁桓公所能比的。这些不由得让她伤感而又不平。

可又无可奈何。她曾为公子忽大病一场。

当初，北方的游牧民族来到齐国抢掠，齐僖公派人到郑国求援。郑国的太子忽率领军队前来救援齐国。这个年青勇武的太子把戎人的军队打得大败。俘虏了他们的两位主帅大良、小良，砍了带甲的戎军的三百人的脑袋，献给了齐国。这一仗给当时的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太子忽自然也就成了当时传奇般的人物。齐僖公对太子忽更是称赞不已，正是由于太子忽的果敢的行动，挽救

了齐国，沉重打击了前来骚扰的戎人。于是，齐僖公便要把文姜嫁给太子忽。这本来应该是一段美满的婚姻，太子忽英武无比是战场上的英雄，文姜很漂亮，又是个博通经史，出口成章的才女。但如此相配的一对却难成眷属。太子忽谢绝鲁僖公的好意。别人问他为什么拒绝，太子忽说："人人都有合适的配偶，齐国是强大的，但我不是看齐国强大就和它联姻的那种人，她不是我的配偶。《诗经》上说：'求于自已，多受福德。'所以，靠我自已就是了。要和大国联姻做什么？"当时像太子忽这样勇于自立，不依附于大国，又不向强大的敌人低头并敢于战胜他们的诸侯很少，因而受到普遍的赞誉。君子说："太子忽才是真正善于为自己打算。"这样的人格，既然能赢得普遍的称誉，也一定能使许多女子倾心。而文姜不能不为太子忽心动，她想嫁的就是太子忽这样的人，既能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又能自强自立，具有受人广泛赞誉的人格，可是，她眼巴巴地失去了这样的如意郎君。齐僖公也确实看中了太子忽。当打败了戎人之后，齐僖公又一次当面提出要把另一个女儿嫁给太子忽。其实仍在打探太子忽的意思，希望挽救这段婚姻。要不是文姜的强烈请求，作为大国君主大概很难这么做。太子忽再一次辞谢。别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问他为什么两次把绝色女子拒之千里之外呢？太于忽说："我为齐国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再说还不敢娶妻。只是受国君之命奔赴齐国解救它的危急，反而借机娶了妻子回国，这是利用战争来成婚，百姓将会对我有什么议论呢？"就这样，文姜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这位如意郎君。

文姜下嫁的鲁桓公，从各方面都是无法和太子忽比的。鲁桓公就凭借前来求婚的公子翚这个佞人，搬弄是非，不择手段地杀害了鲁隐公，才登上君位的。登上君位的鲁桓公，实际上仍然捏在公子翚手里。毫无独立的人格可言，他和太子忽比起来形象就显得太渺小、委琐、可怜了。

与太子忽那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格相反，鲁国当时在

公子翚这位凭借奸诈的诡计，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佞人的操纵下，常常玩弄奸计。就在齐国危急，诸侯国的兵马在齐国边境上防守戎人的时候，齐僖公要馈送食物给他们。他让鲁国来确定各国军队的先后次序。鲁国便把威震敌胆的太子忽率领的郑国放在最后一个。这使太子忽非常生气，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很难忍受鲁国的奸诈与势利眼。所以，这导致了后来郎地的战役。

公子翚操纵下的文姜与鲁桓公的这场婚姻纯粹是场政治婚姻。公子翚看准文姜被公子忽拒绝后的失意与苦恼的时机，促成了这段政治联姻。这个鲁桓公在国内依附权臣公子翚，在国外又依附于强大的齐国，还自得其乐地活着。这使文姜难以忍受。后来人们说，公子翚这位佞人作为牵线人，这本身就不吉利。十五年之后，鲁国终于有了祸乱的契机。

鲁桓公十八年的春天，鲁桓公准备外出，他要和文姜一起到齐国去。申繻就劝阻说："女人有丈夫，男人有妻子，不可以互相轻慢，这就叫有礼。违反这一点必然坏事。"从《左传》记载的申繻的谏言看，似乎已经感觉到鲁桓公与文姜婚姻的危机。另一方面，当时文姜的父母俱亡，已经没有归家的义务。当时诸儿已经继承了王位，为齐襄公。文姜夫妇再去齐国，就是以妹宁兄，这不符合周礼。显然申繻之所以如此进谏，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鲁桓公已经答应了文姜，他自己大概也想外出去散散心。

鲁桓公和文姜到了齐国，先在泺地会见。兄妹相见，气氛自然热烈，文姜见到了已是齐襄公的诸儿，看到他更加漂亮、英武，好像他身上的光亮一下子使她从阴影中摆脱出来。齐襄公见到文姜，觉得她不仅异常美丽，而且谈吐不俗，顿时使他身边女人黯色失色，况且他至今未娶正室，只有大夫连称之妹为偏室，而且已经不再相处。

在泺地相见之时，文姜和齐襄公兄妹二人单独相处。兄妹本来就亲密无间，有了适当的机会竟然越轨通奸，鲁桓公发现后，把

怒气全部发泄到文姜身上，狠狠地责骂她。本来一直在政治婚姻阴影下生活的文姜，无处诉说心中的痛苦，于是把这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齐襄公。

四月初十，这天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夫妇。为他们饯行。心中充满怨恨，而又习惯于依附的鲁桓公，对大国君主齐襄公并没有多少办法。宴会之后，齐襄公让公子彭生帮助鲁桓公登车。可在路上，鲁桓公竟死在车中。这位杀死庶兄鲁隐公登上君位的君主，就这样结束了他并不光彩的一生。好像天假借齐国人的手，为鲁隐公报了仇。

鲁桓公死后，鲁国人并没有人敢于公开为他报仇，只是派人对齐国说："寡君畏怯君王的威严，不敢安居，来到贵国重修旧好。礼仪完成后，却没有回国，又没有地方追究罪责，在诸侯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请用彭生来消除这种影响。"对这种卑微的请求，齐襄公很容易做到，于是，杀了彭生了事。

鲁桓公死后，儿子即位，为鲁庄公。鲁庄公即位这件事，连鲁国的史书《春秋》都没有记载。大概是由于文姜外出没有回国。另外，他对父亲的死竟没有什么强烈的抗议行动。史官大概对此不满。

第二年，文姜回到了鲁国，鲁庄公为此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左传》的作者认为鲁庄公这么做合于礼。她是这年三月回国的。直到秋天，鲁国在城外建造了文姜的行馆；因为此时文姜已不被视为是鲁国的君夫人了。

文姜不仅失去丈夫，而且失去了儿子，失去所有一切名份、地位，甚至失去了立足之地，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似乎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可是不久，即鲁庄公二年，文姜与齐襄公在禚地相会，继续通奸。

鲁庄公六年，齐国把卫国的宝器归还给他们。齐国这么做，是应文姜的请求。说明文姜仍然抛头露面。

鲁庄公七年，文姜和齐襄公在防地继续相会，这次是出于齐襄公的意愿 。

而鲁国似乎仍不敢得罪齐国。鲁庄公八年，鲁国军队和齐国军队包围了郕国。郕国向齐军表示投降。仲庆父向鲁庄公请求攻打齐国。庄公说："不行。我实在缺乏德行，齐军有什么罪？罪是由我而来的。《夏书》上说：'皋陶勉力培育德行，德行具备了，别人自然来降服。'我们还是致力于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吧！"鲁国军队没有攻打齐国，而是回国了。《左传》上说，当时，君子因此而赞美鲁庄公。可是后人却指责鲁庄公忘记父仇，没有什么德行可言。

尽管鲁庄公没有为报父仇与齐襄公刀兵相见，这一年还是有人杀了齐襄公，也算是为鲁庄公报了杀父之仇吧。

齐襄公被杀十一年后，文姜离开鲁国到莒国去了。

（马瑞江）

参考资料：

《左传》桓公三年至庄公十九年

齐兴东方

齐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的国家。

相传，齐国人的祖先在大禹时代曾经帮助大禹治理洪水，取得很大的功绩，被其他部落的人们推举做四岳（部落联盟酋长）之一。夏代初年，一部分人被分封于吕，一部分人被分封于申（都在今河南南阳境内）。商代的时候他们在这一地区不断繁衍发展，又分封出一些小国。这些国家都姓姜，但吕国是他们的宗主国。商代末年，吕国的贵族尚曾经为商王纣供职，人称吕尚，或称为姜尚。姜尚不满意纣王的荒淫无道，弃纣而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姜尚遍游各国，寻求开明的君主，但未能如愿。当时，周文王被商纣拘囚在羑里。周人的贵族散宜生、闳夭闻听姜尚有超人的才能，便把他请去商议营救周文王。姜尚对周文王的为人早就有所耳闻，便慨然应允。他们三人为救出周文王，四处寻找美女和珍奇贵重物品献给纣王，将周文王赎出。周文王回到周国后，拜姜尚为国师。

周文王回国之后，在姜尚的辅佐下，积极改善国内的局面，施行德政，让人民安心从事生产，使百姓安康，政平人和。周文王的德政同商王纣的暴虐无道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人民纷纷背弃商纣，投奔周文王。姜尚还为周文王献计，在诸侯国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当时，虞国和黄国长期以来不断发生外交争端，周文王出面，妥善地解决了两国的矛盾。对周围那些残暴无道的小国，积极出兵讨伐，先后征服了崇、密须、犬夷等国。据说，在

当时的中原国家中，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脱离商纣的统治，归附到文王那里。文王死后，儿子武王即位，姜尚又继续为国师，辅佐武王。

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便开始了讨伐商纣的第一步行动。周武王亲率大军从国都丰镐出发，向东挺进。姜尚左手执黄钺，右手执白旄发布命令："各宗族部队的长官：速率你们的部队，带着你们的船只，立即出发，贻误军机者斩！"大军直抵孟津（今河南孟县南），有八百多个小国前来会合，准备一同讨伐商纣，历史上称为孟津之会。姜尚看到第一步的目的已经达到，诸侯人心可用，但商王朝内部还没有完全分崩瓦解，灭纣的时机还未完全成熟，便协同武王将军队撤回。两年之后，商朝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纣杀掉前去劝谏他的王子比干，将大臣箕子拘捕，完全失去了人心。武王便准备出兵灭商，先占卜看是否吉利成功，结果不祥，同时，狂风暴雨起。人们惊恐万分，都认为出师不利，只有姜尚劝告武王不要坐失良机。是年正月，周人在商都不远处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会合各部落方国，声讨商纣的残暴罪行，然后直扑商都殷（今河南安阳），一举灭商。

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尚到东方建立齐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西北）。姜尚带领着自己的族人东行就国，走得十分缓慢，途中下榻客舍安卧而睡。客舍里的人对他说："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您客居途中迟迟缓行，实在不像受封的样子。"姜尚听后如梦初醒，急忙起身，星夜兼程奔赴营丘封地。这时，莱侯带领着人马前来欲与姜尚争夺营丘，被姜尚击溃。营丘靠近莱国，莱人是东方的土著民族，这时力量逐渐兴起，看到当时天下混乱，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疆域，结果没有成功。

姜尚到了营丘，没有将周人的制度照搬过来，而是结合齐国的具体情况作了适当的调整。齐国地处今山东半岛的西北部，靠近沿海地区，捕鱼、晒盐业十分发达，地理位置适中，商业繁荣。

这与原来吕、申地区单纯依赖农业生存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姜尚看到齐地人民思想活跃开放，工商业发达，觉得这是齐国富强的基础，便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简化原来的礼法制度，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于是，当地的土著人纷纷归附到齐国，齐国迅速在那里扎下根基。成王的时候，天下动荡不安，为了稳定东方地区的秩序，派召康公册命姜尚齐国："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关（今山东临朐东），北到无棣（今山东无棣北），在此范围内的所有诸侯方国都由你们管理。"从此，齐国在东方代表天子征伐不服的方国，成为东方最大的诸侯国。

到公元前9世纪初，纪侯（封地在今山东寿光南）到周夷王那里说齐哀公的坏话，周天子盛怒之下将齐哀公处以烹刑，另立哀公的弟弟静为国君，是为齐胡公。胡公为国君期间，齐都由营丘迁到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北)。哀公的胞弟对胡公即位耿耿于怀。于是，率领营丘自己的武装袭击胡公，将他杀死，自立为君，是为齐献公。献公即位后，迁都到临淄（今山东淄博）。献公在位九年后去世，他的儿子武公即位。在这期间，西周王朝陷入危机，周厉王被国人赶跑，大臣代行国政。然而，齐国也不安宁。齐武公死后，齐厉公即位。齐厉公是一个非常暴虐的君主，很不得人心。胡公的儿子便趁此机会回到齐国。齐国的国人想拥立胡公的儿子为国君，就自动联合起来攻杀齐厉公。齐厉公被杀死，不幸的是胡公的儿子也在作战中身亡，于是齐国的人民就拥立齐厉公的儿子赤做了国君，他就是齐文公。齐文公即位后，立即为父亲报仇，把参与谋杀厉公的七十余人全部处死。

公元前8世纪后期，齐国的国君是齐僖公。齐僖公二十五年（前706），北戎进攻齐国，齐国面临危机，遂向各诸侯国求援。郑国派太子忽率军救齐，立下战功，赢得了齐僖公的好感，齐僖公便要把公主嫁给太子忽。然而太子忽却说："郑国弱小，齐国强大，两国之间门户不当。"以此婉言谢绝了。击败北戎的进攻后，齐国

便开始向周围扩张。齐国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地处东北的纪国。纪国也是姜姓国家，比较弱小。这年夏天，齐僖公联合郑侯一同到纪国，名义上是访问，实际上是想借机袭击纪国。不料阴谋被识破，结果没能得逞。纪国惧怕齐国的势力，便请求鲁国的国君出面，求见周天子，使天子下令齐、纪两国订立和约，这一想法被鲁桓公断然拒绝。此后，纪国在外交上仍坚持不懈地努力，直到齐襄公三年（前695），才由鲁桓公出面，邀请齐襄公和纪靖公在黄（今山东淄川东北）举行会谈，以使两国改善睦邻关系。但是，这并没有抑制住齐国的扩张野心。四年后，纪侯的弟弟把自己的封地酅邑投到齐国的怀抱，以达到乞求齐国庇护的目的。纪国从此开始走向分裂。这年冬天，纪侯请求鲁庄公出面，邀请郑伯一起帮助纪国解决这次危机。郑伯表示不参与此事，由此纪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齐襄公八年，纪侯因不堪忍受齐国的欺凌，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兄弟纪季，自己便悄然离开了纪国。而纪季早已投靠并依附于齐国，从此纪国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的地位，逐渐成为齐国的一部分了。

齐国灭亡纪国之后，又把矛头指向鲁国。早在齐襄公三年的时候，齐国就曾同鲁国发生过边界争端，结果，两国军队在鲁国的奚地大战一场。随后，齐国派军队侵犯鲁国的边境地区，守边的官吏急忙向鲁桓公报告。鲁桓公告诫边将说：“守卫边疆是你们的重任，绝不能让敌人侵犯。同时，要防范发生意外事件，平时忠于职守，战时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

齐襄公十二年，齐国拉拢鲁国一起发兵围攻郕国（今山东范县）。郕国战败，向齐国投降。鲁桓公的儿子庆父要求出兵讨伐齐国，鲁桓公不允，怕得罪齐国，并说鲁国派军协助齐国攻郕国是自己的过错。

同年秋天，齐襄公派齐国大夫连称、管至父二人率军镇守葵丘，他们是在瓜熟时出发的，齐襄公与他们约定：“到明年瓜熟时，

就另派人去接替你们。”可是，他们戍守期满一年之后，齐襄公也没理睬他们。连称和管至父就派人到首都，请襄公派人前去替换，但齐襄公不应允。于是，连称和管至父便图谋作乱。齐僖公有个胞弟名叫夷仲年，夷仲年有个叫公孙无知的儿子，很受僖公宠爱，所穿的衣服和生活安排同太子一样。齐襄公即位之后，就取消了公孙无知的待遇，公孙无知因而对齐襄公心怀不满。于是，连称、管至父就利用公孙无知发动叛乱。连称有一个妹妹在襄公宫中，不受襄公宠爱，连称就以她为内线监视襄公的行动，并对她许诺说：“如果大功告成，就立你为齐侯夫人。”

同年十二月，齐襄公到姑芬（今山东博兴东北）视察，顺便在贝丘（今博兴贝中聚）打猎。打猎时遇到一只大野猪，随从人员说：“这就是公子彭生！”原来，早年齐襄公曾与鲁桓公的夫人、自己的妹妹文姜私通。后来，鲁桓公携夫人访问齐国，齐襄公又与文姜干起了见不得人的勾当。鲁桓公知道后非常生气，文姜却把这件事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便借宴会的机会，用酒把鲁桓公灌醉，唆使力士彭生在把鲁桓公抱上车的时候，将鲁桓公暗杀。待下车时，鲁人发现桓公已死，便向齐国问罪，齐襄公便杀死彭生向鲁国谢罪。这件事本来是襄公指使的，可他又杀死彭生，对此他很心虚。这次打猎，别人说野猪是彭生的显形，齐襄公自然十分害怕，恶狠狠地吼叫：“彭生你竟敢再现！”迅速拔出弓箭射向野猪。说也奇怪，野猪居然像人一般地站起来对着襄公哭叫，襄公恐慌之中，一头从战车上栽了下来，摔伤了脚，丢了鞋。回到宫中之后，就向宫人费要鞋。宫人费找不到，襄公便命人将费痛打一顿，鞭子抽得费的背部流出了血。费痛苦不堪，从宫中逃出，恰在宫门口碰上叛军连称、管至父袭杀齐襄公，被抓住捆了起来。费说：“我哪里会反对你们呢？”说话间让人解开衣服，露出后背给他们看，轻易地赢得了叛军的信任，他们将费放开。费请求先进宫去侦察情况。费进宫后立即把暴乱的情形告诉了齐襄公，并

把襄公隐藏起来后出来与造反的人们搏斗，直至战死。另一个小臣名叫石之纷如，也奋力战死在台阶下。叛军冲进宫中，把躺在齐襄公床上的人杀死，随后叫道："这家伙不是国君，赶快再搜！"有人突然发现屋门下面露着一双脚，拉出来一看，果然是齐襄公，便当场把他杀死。随后，立了公孙无知为齐国国君。

第二年，齐君公孙无知到雍林出游，雍林人与公孙无知宿有怨忿，便借此机会杀死公孙无知，然后告诉齐国大夫说："公孙无知杀害襄公自立，我们将他诛杀，希望改立其他公子为君主，我们唯命是听！"

到公元前7世纪初，齐国由于内部经常发生动乱，政治不安定，使齐国对外扩张的过程受到影响。后来，齐国公子小白继位为君，人们称之为齐桓公。他任命管仲为相，在齐国实施社会改革，终于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强国。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齐太公世家》

《左传》桓公五年至庄公九年

《公羊传》庄公四年

郑厉公争国

春秋初年，郑国与周天子的关系恶化，随之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双方互相抵押人质作为履行协约的保证。在抵押人质中，郑国的公子忽到周桓王那里做了人质。陈桓公误认为郑庄公受到周天子的宠爱，于是就托媒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郑国的公子忽。郑庄公答应了这门亲事。不久，陈、郑两国举行了订婚典礼。

鲁隐公八年（前715）四月初六，郑国的公子忽到陈国去迎娶他的夫人妫氏。十三日，带着夫人起程回国，十六日，回到郑国的都城，同行的还有护送妫氏的陈铖子。公子忽与夫人先行同房，然后才告祭祖庙。陈铖子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说：“你们这算什么夫妻！还没有告祭祖宗就同房，这是违背周朝礼法制度的，没有祖宗的保佑，你们会断子绝孙！”

第二年，郑国北方的少数族北戎发兵袭击郑国，郑国的国君亲自率兵反击。郑庄公看到北戎人来势凶猛，忧心忡忡地对大臣们说：“敌军是步兵，我军是战车，万一敌军从我们后方突然绕到前方，对我军突然袭击，我们就很难招架得住。”公子突沉思片刻，心生一计说：“我们可以先派一批轻敌冒进却不顽强的士兵前去与敌军作战，他们与敌军一交锋必定会仓皇退却。这时，陛下可设下三重伏兵，以逸待劳等待北戎军队的追兵。戎人生性浮躁，作战时军队行列不整齐，贪婪于掠夺财物彼此不顾，战胜的时候不知道退避，战败的时候不懂得救援。我军败退的时候，北戎的先

锋部队必定会拼命向前猛冲，遇到我军的伏击后会抱头鼠窜，后面的戎军又不肯前来救援，这样前面的戎军等于失去了援兵，我军定会首战告捷。”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策略。戎人的前锋部队遇到伏击后果然狼狈奔逃，郑国的大夫祝聃率兵紧追不舍，将戎军拦腰截成二部分，前后夹击，将敌军的先锋部队全部歼灭，残余的戎兵仓皇而逃。十一月，郑国军队再次击溃戎军。

戎人对郑国的进攻被挫败后，转而积聚力量进攻东方的齐国。鲁桓公六年（前706），齐国派使者到郑国求援。郑国派太子忽率领大军紧急救援。这年六月，郑国的军队将北戎军队打得大败，生擒戎军两员将领大良和少良，斩首三百余级，一同献给齐国，取得赫赫战功。当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家也都派了军队帮助戍守齐国。齐国用上好的食物慰劳各国军队的官兵，让鲁国的大夫确定各国军队的先后次序。鲁国的大夫把郑国排在了最后。郑国的太子忽认为自己功勋卓越，却落得如此地位，遂大发雷霆，以致几年后爆发了“郎之战”。

当初，鲁桓公没有娶文姜为夫人以前，齐僖公本想把文姜嫁给郑国的太子忽，却被太子忽婉言谢绝。人们问他拒绝的理由，太子忽说：“每个人都有适合于自己的配偶，当今的齐国那样强大，我们郑国弱小，所以文姜并不适合做我的配偶。《诗》说：‘自求多福’，意思是说追求幸福全靠自己，仰仗大国有什么益处？”当时有人评论说，太子忽善于为自己谋算。如今他率军击败了北戎，齐僖公又提出把另一个女儿嫁给他，可是他再次谢绝。人们又问他拒绝的理由，他解释说：“凡对齐国没有帮助的事情我都不敢做，现在我既然是奉国君命令来解救齐国危难，假若在这种场合下迎娶齐侯之女而归，那就等于倚仗援军的势力而成婚，人们会怎样议论我？”郑国的大夫祭仲提醒公子忽说：“公子一定要娶齐君的女儿才为妥当，当今我们的国君有很多内宠，假如公子没有大国作为靠山，将来恐怕难以被立为国君。公子突、公子亹、公子仪

三人同样都是继承君位的候选人，您不可不慎重考虑。”公子忽还是不听从。最后，太子忽假托郑庄公名义，再次婉言谢绝了这件亲事。

当时，郑国有人作诗讽刺公子忽道：

与我同车那姑娘，美如芙蓉花一样；
将要走来将要行，戴的美玉闪闪亮；
美丽姑娘是文姜，真是又美又漂亮。

与我同行那姑娘，美如木槿花一样；
将要走来将要行，佩戴美玉叮咚响；
美丽姑娘她姓姜，她的德性不能忘。

又有诗道：

山上桑树多枝丫，洼地水里长荷花；
好人你都未遇见，却遇这样狂娃娃；
山上长着长青树，地下低湿有游龙；
好人你都没遇到，遇到他那坏狡童。

鲁桓公十年，郑国为发泄几年前救援齐国时被鲁国大夫冷落的怨忿，就联络齐国一同讨伐鲁国，齐国又联络卫国一同参加。这年冬天，郑、齐、卫三国联军与鲁国军队在郎这个地方交战，双方各有胜负。

第二年夏天，郑庄公去世，郑国的执政大夫祭仲立公子忽为国君，是为郑昭公。公子突的母亲是宋国大夫雍氏的女儿，雍氏想立公子突为郑国的国君。看到祭仲立了郑昭公，十分恼怒。雍氏深得宋庄公的宠信，便借宋庄公的名义把祭仲骗到了宋国，胁

迫祭仲说："你若不改立公子突为国君，那我们就要你的命！"同时，也拘捕威胁公子突，索取贿赂。在这种情形下，祭仲只得同宋人盟誓，然后与公子突一道回国。

九月十三日，郑昭公逃亡到卫国。九月二十五日，公子突被立为国君，是为郑厉公。

郑厉公继位的第二年，鲁桓公看到宋、郑两国关系亲密，力量较为强盛，便提出要与这两国结成友好邻邦。这年秋天，鲁桓公与宋庄公会盟于宋国境内的句读之丘（即谷丘，今河南商丘东南）。由于不知道宋国是否有诚意，鲁桓公随后又在宋国的虚地（今河南延津县东）再次会盟。同年冬天，鲁桓公与宋庄公在宋国的龟地（今河南睢县境内）第三次会盟，宋庄公终于公开拒绝与鲁国同盟，盟会破裂。在此情况下，鲁桓公匆匆赶到郑国，在武父（今山东东明西南）与郑厉公会盟，两国决定联合讨伐宋国。鲁郑两国之所以要伐宋，是由于宋不讲信义，订立盟约也没有用。《诗》中说，君子屡次会盟，而战乱仍在不断滋蔓。这都是不讲信义的结果。

宋庄公不讲信义，贪得无厌，屡次向郑国索要贡物，给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实在不堪忍受，鲁国和齐国的军队与宋国、卫国和燕国的军队展开激战。随后，郑厉公来到鲁国，进一步改善了两国的友好邻邦关系。

鲁桓公十四年夏天，郑厉公的胞弟子人来到鲁国，重修过去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也是为了介入鲁国与曹国缔结的盟约。宋庄公对郑厉公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和愤恨，这年冬天，宋国联合齐国、蔡国、卫国和陈国等讨伐郑国，以报二年前郑国军队进攻宋国的仇恨。宋国方面的联军来势凶猛，放火焚烧郑国国都的城门，随后攻入城内的中央大街，并且攻打郑国都城的东郊，除了占领牛首（今河南陈留西南），还拆下郑国祖庙的椽木作为宋国城门的椽木，凯旋而归。

郑国的执政大夫祭仲在国内专权自恣，不把郑厉公放在眼里，郑厉公对此十分不放心。于是，郑厉公就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雍纠准备在郑国都城的郊外设宴招待祭仲，借机把他杀掉。这事被雍纠的夫人雍姬知道了，她便去问母亲："我父亲与我丈夫这两个人相比较，谁跟我的关系最亲近？"她母亲回答："天下任何一个男人都能当你的丈夫，而你的生身父亲却只有一个，这两个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当然是父亲最亲近。"于是，雍姬告诉祭仲说："雍纠不在家里宴请您，而准备在郊外设宴，我觉得此事蹊跷，很不放心，请您多加防备。"祭仲听后，随即杀死雍纠，暴尸于市。郑厉公把雍纠的尸体安放在车上，说："与妇人商量大事情，怎么能够成功！你被杀掉活该！"随后离开了郑国。鲁桓公十五年夏天，郑厉公流亡到蔡国。六月二十二日，祭仲将郑昭公接回郑国，复立为国君。这年秋天，郑厉公策动自己原先封邑——栎的人们杀死栎大夫檀伯，随即回到了栎邑（今河南禹县境内），宋国也派军队去守卫栎邑。同年冬天，鲁桓公与宋庄公、卫惠公、陈庄公在宋国的袲地开会，商议讨伐郑昭公，送回郑厉公复位。但是，由于作战不利，各自的军队不得已撤回了国。

鲁桓公十六年春天正月，宋庄公、鲁桓公、卫惠公、蔡桓侯在曹开会，商议再次讨伐郑昭公。同年夏天，各国联合出兵进攻郑国，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连年的战争给郑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无法过上安定的生活，衣食也失去保证。没有大国能够帮助郑国，人们想到郑昭公拒绝与齐国联姻，才落得如此境地。于是，人们作诗以发泄怨忿：

　　你那顽固的狡童，
　　一再不听我劝告，
　　只是因为你之故，
　　使我无食又无餐。

你那顽固的狡童，
不能使我食三餐，
只是因为你之故，
使我不能得安息。

当初，郑庄公打算任命高渠弥为卿。可是，郑昭公十分讨厌高渠弥的为人，便极力从旁劝阻郑庄公，郑庄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等到昭公被立为国君后，高渠弥十分害怕自己会被杀掉。桓公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高渠弥杀死郑昭公，另立公子子亹为国君。第二年秋天，齐襄公召集各诸侯国君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会盟，郑国的子亹带着人前往与会，有高渠弥随从，祭仲声称有病没有前去。祭仲之所以不去，是因为早在齐襄公做公子的时候，曾与子亹打架，结下了怨仇。所以，当祭仲得知齐襄公会盟各诸侯国君时，曾力劝子亹千万不要去，以免遭遇不测。子亹考虑再三后说："眼下齐国强大，厉公又在栎地虎视眈眈，假若我们不去会盟，齐襄公必定会率领各诸侯国来进攻我们，使厉公复位。因此，我还是前去会盟为妥，即便受些屈辱，也不至于葬送国家。"子亹带人到了首止，见了齐襄公后也没有表示问候，齐襄公大怒。七月初三，齐襄公设下伏兵杀死了子亹。高渠弥侥幸逃回郑国，同祭仲商议迎立在陈国的子亹的弟弟子婴（也叫子仪）为国君，是为郑子。

郑厉公在栎邑不断积聚实力，图谋有朝一日夺回国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经营，条件日趋成熟。鲁庄公十四年（前680），郑厉公率军从栎出发，进攻郑国首都。途经大陵（今河南临颍东北）时，俘虏了郑国的大夫傅瑕。傅瑕对郑厉公说："假如你能放了我，我就帮助你回到国都。"于是，郑厉公与傅瑕盟誓，然后放走了傅瑕。六月二十日，傅瑕杀死了郑子（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随后迎立郑厉公为君。

早在六年前，郑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郑国都城的南

门下，一条门内的蛇与一条门外的蛇相斗，结果门内的蛇被咬死。很多人认为这是郑子（子婴）遭灾的征兆。后来，郑厉公回国夺回君位，郑子被杀，似乎是应了验。鲁庄公听说这件事后便问申繻，申繻回答："一个人是否遇到他所顾忌的事情，是由于他自己的气焰所决定的。妖孽由人而生。一个人如果没有过错，就不会出现妖孽。如果一个人违背常理，就会引发妖孽。"

郑厉公攻入国都之后，就违背当初的盟誓杀死傅瑕，并派使者告诉郑国大夫原繁说："傅瑕为人臣而身怀二心，周天子曾制定刑罚惩处这种奸臣，现在傅瑕是罪有应得。凡是一心一意地迎接我的，我都许诺任命他们为上大夫。关于这些事情我愿意跟伯父您商量，况且，我逃离国都漂泊在外时，伯父并没有说过拥护我的话。如今我回到了国都，伯父也不表示欢迎，这使我感到很遗憾！"原繁回答到："先君郑桓公命令我的先祖负责管理宗庙事务，因此，为臣世代一心一意管好宗庙。社稷神灵只要有国君在就有主祭人。假如宗庙的守臣三心二意地惦记着国外，那世间还有比这更离心离德的臣子吗？假如您能再次被立为国君而主持社稷，国内的人民都将成为您的臣民。臣子不能有二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子婴在位已经十四载了，那些谋划迎接您回来为君的人，难道不都是有二心的臣子吗？庄公的儿子眼下还有八个人，如果他们都用高官厚禄收拢人心，都想取得君位，请问到时您该如何办？臣现在愿意接受您的命令！"原繁说完这番话不久就悬梁自尽了。

郑厉公从栎邑攻入国都夺取君位后，隔了一年才派使臣通报楚国。楚国认为这是郑国瞧不起自己，便在这年的秋天发兵攻打郑国，一直攻到栎邑附近，才算罢休。

楚军的骚扰刚刚结束，郑厉公就追究惩罚当年参与杀害雍纠的人。九月，斩杀了公子阏，又砍断祭仲党羽强钽的腿。公父定叔逃亡到卫国，国内政治空气极为紧张。三年之后，郑厉公宽宥公父定叔回国，并派人对他说："不能使公叔段在郑国断绝烟火。"

这年十月，公父定叔回到郑国国都。他得意地对别人说："这是个吉祥的月份，数字刚好是十。"有识之士讽刺说，从名词上说，强鉏还很坚强呢，但终究没有保住自己的双腿，谁知道你将来会落得什么下场！

郑国自郑庄公去世，先后有郑昭公、郑厉公、子亹、子婴参加争夺君位的内乱，延续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内乱期间，既有国内贵族大夫的彼此之争，也有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郑国的人民身陷水火，生灵涂炭。人们慨叹贵族内部的离心离德，将之比喻为浅浅流淌的扬溪之水，作诗咏道：

浅浅扬溪水，
荆条漂不起，
没有真兄弟，
只有我和你，
勿信别人言，
那是诳骗你。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郑世家》

《左传》隐公八年至庄公十七年

《诗·郑风》：《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狡童》、《扬之水》。

曲沃并晋

春秋早期的晋国，仍然沿袭着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曲沃武公作为封臣后来竟然消灭了晋国的君主，正是这种分封制度的悲剧。

晋穆侯四年（前808），晋穆侯迎娶齐国国君的女儿姜氏为夫人。三年后，晋穆侯攻伐条地（今山西安邑北）的戎族人，结果打了败仗，晋穆侯非常不悦。恰逢此时，姜氏生下一男孩，穆侯便给他取名叫“仇”，想以此记下对条戎的仇恨。仇就是后来的太子。又过了几年，晋穆侯进攻千亩（今山西安泽北），旗开得胜，晋穆侯十分高兴。恰在这一年夫人姜氏又生下小儿子，便取名叫“成师”，用以铭记这次战役的胜利。晋国大夫师服听说此事十分诧异地说：“这名字取得太不妥当了！国君给孩子起名字，太子叫‘仇’，仇就是仇敌；小儿子叫‘成师’，成师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名称，是成就功业。一个人的名字影响着一个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决定着名分。如今，太子和公子取名恰与他们的名分相悖，要想晋国今后不生变乱，是不可能的。”

晋穆侯二十七年，穆侯去世。穆侯的弟弟殇叔倚仗势力强大，自立为国君。在这种情况下，太子仇率领自己的徒众逃亡国外。四年后，穆侯的太子仇率领自己的党徒袭击殇叔，杀死殇叔，自立为晋国国君，他就是晋文侯。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去世，他的儿子伯继立为君，是为晋昭侯。晋昭侯元年（前745），昭侯将他的叔父成师封于曲沃。曲沃的城池比晋国的国都翼城还大。成师受

封曲沃后，被人们称为“桓叔”。桓叔任用庶出的叔父栾宾辅佐自己，积极推行德政，收拢人心，晋国的百姓纷纷投奔桓叔。桓叔此时五十八岁。晋国的大夫师服又评论说：“我听说，建立国家的基业应该本大而末小，国君是本，封臣是末，君强臣弱，国家才能长久稳固。正因如此，天子封授诸侯建国，诸侯封授卿立家，卿封授自己的臣下置‘侧室’[1]，大夫封授自己的臣下为贰宗，士有自己统领的宗族，庶人、手工业者、商人各有自己的等级名分，这样人们才能服从封君的指挥，而不犯上作乱。如今，晋国本来就是王畿之内的甸侯[2]，却又在自己的封国内再建立封国。国君的力量日益衰弱，国家怎能够长治久安呢？”

曲沃桓叔推行德政，施惠于人民，深得人民的拥戴。晋国人民作诗咏唱道：

滚滚扬河水，
浪击白石多。
素色朱领衫，
随你到曲沃。
见到君子您，
怎能不欢乐！

东流扬河水，
白石荡碧波。
素衣红绣领，
随你到鹄邑。
见到君子您，

① 春秋时期，“侧室”的含义很多。一般说来，是指等级地位比卿大夫低一级的受封的贵族。

② 依照周代的礼法制度，距离天子京城较近的封侯为甸侯，封国的势力相对弱小。

还有何忧愁！

滚滚扬河水，
浪击白石多。
时刻听君命，
绝无有二心。

晋昭侯七年，晋国大臣潘父杀死国君昭侯，准备迎接曲沃桓叔为君。桓叔率领徒众准备进入晋都翼，遭到翼人的截击，大败而归，回到曲沃。晋人拥立昭侯的儿子平为国君，是为晋孝侯，诛杀了潘父。晋孝侯八年（前732）曲沃桓叔去世。桓叔的儿子鲜继承封爵，是为曲沃庄伯。晋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在翼杀死了国君晋孝侯。晋人闻讯向曲沃庄伯发动攻击，庄伯败回曲沃。晋人拥立孝侯的儿子郄为国君，是为晋鄂侯。曲沃庄伯联合郑国、邢国的军队攻打晋国国都翼，周天子也派尹氏、武氏前来支援。晋国的国君鄂侯逃到随地。这年秋天，曲沃庄伯背叛了周天子。周天子派虢公[①] 率军讨伐曲沃庄伯，同时，在翼册命哀侯为晋国国君。

就在晋哀侯为国君的第二年，曲沃庄伯去世，曲沃庄伯的儿子称继承爵位，他就是曲沃武公。晋哀侯八年（前710），哀侯派军掠夺晋国边境南部陉庭的土地，引起陉庭土著居民的不满。于是，陉庭人找到曲沃武公那里，商议一道进攻哀侯。第二年春天，曲沃武公派大军进攻晋国，大军行到陉庭驻扎下来，经过休整后沿汾水迅速进发。曲沃武公站在指挥战车上，韩万驾车御马，梁弘执戟站在武公右侧警卫。大军疾行到汾水岸边的时候，与哀侯的部队遭遇，展开激战。韩万驾御战车直奔哀侯冲去，由于一匹骖乘的马被树枝挂住，战车停住，没有追上哀侯。当天夜里，曲

① 虢公：虢国的君主，在周天子的朝廷中任卿士、公爵，辅佐天子处理政务。

沃武公的军队俘获了晋哀侯和栾共叔。武公下令将晋哀侯带上来，就地斩首。然后，问栾共子："假如你能背弃哀侯，不为他而死，我将同你一道去参拜周天子，让周天子册命你作晋国的上卿，治理晋国政治，你看如何?"武公不想杀栾共子，是因栾共子的父亲栾宾曾辅佐过曲沃桓叔。栾共子严辞拒斥道："我听说，民生于三，应事之如一。其一，父生之；其二，师教之；其三，君食之。人没有父亲就不能诞生，没有君主就不会饱食长大，没有老师就不懂得人生的道理。所以，应对他们尽心效力，在哪里都应该一心不二。报生以死，报赐以力，这是人间正道。如果我因个人利益背弃了人间正道，背叛君主，您将来怎样去教化国民?"随后慷慨就义。

哀侯被杀，晋国的人们立哀侯的儿子小子为晋国君主，称小子侯。晋小子侯四年（前706），曲沃武公引诱小子侯，将他杀死。周桓王听到报告，立即派大夫虢仲率军讨伐曲沃武公，武公撤回曲沃，虢仲依照周桓王的命令立哀侯的弟弟缗为晋国君主。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晋国的曲沃封君与国君之间战事不断，人们一时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无法正常地从事生产，食不饱腹。人们把自己比作无处栖息的野雁，作诗唱道：

野雁飞来沙沙响
飞来聚集栎树上。
王爷差役无休止，
使我无法种稷黍。
家中父母靠谁养，
苍天呀苍天，
何时能够返故乡！

晋缗侯二十八年（前679），实力雄厚的曲沃武公出动全部人马，向晋缗侯发动全面进攻，一举击败晋缗侯的军队，占领晋国首都，杀死缗。为了笼络周天子，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曲沃武

公将缴获的晋国所有的珍宝器物送给周釐王。周釐王收到礼物后非常高兴，完全改变了过去对曲沃人的态度，派虢公出使晋国，册命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允许晋国拥有一军的军队。至此，曲沃武公正式成为诸侯，统治了整个晋国。当时，曲沃武公已经在位三十七年。受封之后，改称晋武公。晋武公迁都翼，加上他在曲沃即位的时间，合计达三十八年。自桓叔受封于曲沃，经儿子庄伯和孙子武公，最后灭掉晋国的国君正宗，共经历了六十七年。晋武公受封为晋国诸侯两年后去世，儿子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

晋献公继位后，积极从事外交活动，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晋献公元年（前676），献公带着丰厚的礼品朝拜天子。当时，恰逢虢公也去拜见天子。周惠王设酒宴款待他们，然后赏赐给他们每人宝玉五双、马三匹。按照周代的礼法制度，虢国国君的爵位是“公”，晋国国君的爵位是“侯”，他们在天子朝廷中的政治地位是不同的。然而，周天子却把他们放在平等地位对待，很显然晋献公是受周惠王宠爱的，这使晋国在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有利的政治优势。

与此同时，晋献公还着手解决晋国内部宗族的政治矛盾。当时，曲沃桓叔和曲沃庄伯的子孙很多，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宗族势力，对国君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重演曲沃灭晋那样的小宗灭大宗的悲剧。况且，当时已经屡次出现小宗欺凌晋国公室的事情，献公为此忧心忡忡。晋国的大夫士蒍献计说：“现在晋国国内的宗族势力已经比较强大，应该逐步地解决，否则会引起内乱。第一步铲除桓叔和庄伯二族中势力最强大的富子，只要魁首被除，其他势力就好解决了。”晋献公略作考虑后说：“那就由你具体负责这件事吧！”随后，士蒍就暗中串联那些宗族公子，诬陷桓、庄二族中势力最大的富子，将其势力消灭。一年后，士蒍又同晋国的公子们合谋，唆使公子们杀死了游氏一宗的两个公子。然后士蒍告诉晋献公说：“大功初步告

成，两年之后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晋献公八年，士蒍又进一步指使晋国的公子们将游氏宗族的势力斩尽杀绝，随后，修筑了聚城，把余下的公子势力统统赶进城内看守起来。这年冬天，晋献公派军队把聚城围住，将晋国的公子势力一网打尽，全部根除。公族势力的铲除，消除了晋国内乱的隐患，为晋国此后的稳定和富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晋国便开始向外扩张，首先灭掉了周边弱小的虞国和虢国，到晋文公的时候，终于形成晋国称雄中原的政治局面。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晋世家》

《左传》隐公五年至庄公二十六年

《诗经·唐风》、《扬之水》、《鸨羽》

庆父之乱

在晋国发生曲沃武公以封臣身份杀死晋国国君，自立为君主后不久，最秉承周礼的鲁国发生了大夫庆父接连杀死二位国君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与鲁庄公治政不善直接相关。

鲁庄公是一位不恪守周代礼法制度的国君。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夏天，齐国准备举行祭祀社神的盛大典礼。庄公听到消息后，打算前去观看。鲁国大夫曹刿听到此事后，急忙赶来上朝劝阻庄公说："庄公您千万不能去。周代的礼法制度是用以治国安邦的。周代的先王统治天下，规定五年中诸侯要朝拜天子四次，诸侯之间相会一次。每次诸侯相会结束时，都要重申王朝的礼仪制度，使人们懂得诸侯在天子王朝中的爵位次序，人们之间的宗法伦理关系，君主与臣下的等级差别，以及征敛赋税的规定，使诸侯们在未来的五年中依照既定制度办事。如今，齐国背弃他们的先祖太公制定的制度，擅自聚集国民观看祭社神大典，而您却准备前去观看，这不符合周礼制度，今后还怎样教育臣下和人民？祭社神应该在春分时节，地下水气开通，为得是求得社神保佑而获得好收成。现在齐国祭社神却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这不符合先王的教导。周礼规定，天子祭祀上帝的时候，诸侯应前去助祭，同时接受天子的命令；诸侯祭祀先王先公，卿大夫前来助祭，同时接受国君的命令。我从未听说诸侯祭社神由别的诸侯前去助祭，况且，齐国这次祭社神活动本身就不符合周代礼法。国君的重要活动都有档案，像这样不合礼法的事记录下来，后代的人看了会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鲁庄公不听曹刿的劝阻，最后还是去了齐国。

同年秋天，鲁庄公为迎娶齐侯的女儿哀姜为夫人，派人把鲁桓公庙堂的柱子涂成红色，将屋檐椽木雕刻上花纹。这又一次严重地破坏了周代礼仪制度。依照规定，诸侯庙堂的柱子只能涂成黑色，椽木只能作简单的纹饰，不能精雕细磨。因此，负责施工的大夫御孙对庄公说：“我听说，我们的先祖文王、武王和周公，为我们制定了规章制度，为得是使我们知道怎样做事。他们自己就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了万世楷模，使得这些制度得以贯彻至今。我们的先君桓公就很节俭，而您却奢侈违礼，使先君的美德被丢弃。”鲁庄公辩解说：“我这样做为得是昭彰桓公的美名。”御孙说：“这样做不但不会张扬桓公的美名，反而会玷污桓公。正因如此，我才劝您立即停工。”庄公仍然没有听从。

第二年夏天，鲁庄公依照礼节亲自到齐国迎接哀姜为夫人，不久，回到鲁国。哀姜来到鲁国后，依礼节应与鲁国的宗族大夫及夫人们会面。会面的时候，庄公让鲁国的贵族大夫及夫人一律手执玉器。当时，贵族相见的仪式都有专门的规定，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手执玉器，诸侯的太子及附庸国君手执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一般平民手执鹜，手工业者和商人手执鸡。贵族夫人则依照身份手执榛、栗、枣、脩。因此，人们从每个人手中拿的东西就可知道对方的身份地位。现在，庄公让贵族大夫及夫人一律手执玉器，既使大夫超越了名分，也使得男女无别了。负责社交礼仪的宗人夏父展对庄公说：“这样做不符合过去的惯例。”庄公答道：“我今天来创立一个惯例。”夏父展马上说：“君主的所作所为符合制度才能成为惯例，不符合制度就会在档案文献上记录下那是错误。我是负责礼仪的官员，担心把君主的过失记录在档案上，所以不得不予奉告。贵族夫人见面应该手执枣、栗，取其早起、颤栗的谐音，用以显示敬意；男人手执玉、帛、禽、鸟不等，用以表明身份。如今夫人也手执玉器，使得男女无别。男

女有别，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不能破坏。”鲁庄公仍是不听。

导致鲁国发生庆父之乱的直接原因是庄公未能早立太子。早在庄公娶哀姜为夫人之前，庄公修筑高台，修建的高台距离党氏族的宅院很近。一次，庄公偶然碰见党氏的女儿孟任，见她相貌超群，便紧紧地尾随。孟任发现后疾步回家，关闭上大门。庄公在门外对孟任说，如果她答应与庄公缔结姻缘，将来就立她为夫人。孟任听后表示同意，随后与庄公一同划破胳膊，歃血为盟。后来，孟任生下子般。此后，庄公又娶齐君的女儿哀姜为夫人。哀姜没有生下儿子，她的妹妹叔姜却生下了公子开[1]。鲁庄公宠爱孟任，想将来由子般继位为国君。鲁庄公的弟弟庆父与哀姜私通，有意将来使公子开继承君位。

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国准备祭神求雨，先在大夫梁氏院中演练。演练的时候，梁氏的女儿也在旁边观看，负责养马的荦从墙外对她加以调戏。子般发现后大怒，派人将荦抓起来狠狠地鞭打了一顿。庄公对子般说：“你最好把他杀掉，此人力大超群，能把稷门的门扇投到城楼上去。你鞭打他，他记下仇，将来恐怕对你不利。”不久，庄公得了重病，久治不愈，便问他的弟弟叔牙谁继承君位最合适。叔牙回答：“按照鲁国的传统，一代子继父位，下一代就由弟弟接替哥哥。现在有庆父在，您有何可忧虑的？”鲁庄公共有三个弟弟，长弟庆父，次弟叔牙，最小的弟弟是季友。庄公听完此话内心忧虑万分，怕万一叔牙拥立庆父为君，子般就不能为君了。于是，又征询季友的意见。当时季友是执政大夫，他斩钉截铁地对庄公说：“我坚决拥护子般为君，至死不变！”庄公告诉他：“刚才叔牙告诉我庆父有才能，可以继位。”季友听后非常愤怒，立刻派人以庄公的名义命令叔牙到鍼巫家中等候处置，然后命令鍼季用毒酒毒死叔牙，对叔牙恫吓说：“你饮下这毒酒，还

① 春秋时期，贵族中实行姐妹陪嫁制度。哀姜的妹妹叔姜就是随哀姜陪嫁给鲁庄公的。

可使你的子孙活在鲁国；不然的话，将你们全家斩尽杀绝。”叔牙被逼无奈饮下毒酒，然后回家。刚走到逵泉便一命呜呼，命归黄泉。后来，他的后代成为鲁国的叔孙氏。

八月初五，鲁庄公病逝。季友依照庄公的旨意立子般为国君。子般为庄公守灵，住在他的舅家党氏家里。庆父没有被立为君，心怀怨恨，便怂恿与子般有仇的养马人荦去暗杀子般。十月初二，荦潜入党氏家中，将子般杀死。季友听到消息十分恐慌，逃往陈国。于是，庆父立庄公的儿子开为君，这就是鲁闵公。

鲁闵公元年（前661）六月，由于鲁国内部动乱，庄公遗体到这时才下葬。八月，鲁闵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请齐侯帮助季友返回鲁国。齐侯慨然应允。派使者到陈国迎接季友，闵公在郎（今山东曲阜东南）等候，然后，一同回到鲁国的国都。

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到鲁国，对鲁国的灾难表示慰问。仲孙湫回到齐国之后，对齐侯说：“不除去庆父，鲁国不会安宁。”齐侯问：“怎样才能除去庆父呢？”仲孙湫回答：“鲁国内乱不止，庆父将自取灭亡，您就等着瞧吧！”齐侯又问：“我们是否可以夺取鲁国？”孙仲湫回答：“不能夺取。鲁国仍然在遵循着周礼办事，周礼是治国之本，所以，鲁国的本仍然是很牢固的。我常听别人说，一个国家行将灭亡，必定是它的本先动摇，然后它的枝叶才会颠覆。现在鲁国仍然按周礼办事，别人是无法动摇它的。国君您应该借此机会，帮助鲁国平息灾难，亲近有礼仪的国家，依靠稳定牢固的国家，离间内部涣散的国家，灭亡昏庸动乱的国家，这是称霸称王的要诀。”

鲁闵公的师傅倚仗国君的势力，强夺鲁国负责占卜的官员卜齮的田亩，闵公并没有加以阻止。鲁闵公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庆父派卜齮到武闱门去刺杀闵公，鲁国再次陷人内乱。大夫庆父先后杀了二位国君，自知罪恶重大，畏罪逃到了莒国。庆父逃走后，季友才带着闵公的弟弟返回鲁国都城，立他为君，这就是鲁僖公。随

后，季友用重金贿赂莒国的国君，要求莒国把庆父引渡给鲁国。莒国接受了鲁国的好处，于是把庆父遣送回鲁国。到达鲁国的密（今山东费县北）地时，庆父派公子鱼先回到鲁都，请求季友免他一死。季友不答应。公子鱼痛哭而归。庆父在密地听到公子鱼哭着回来，知道季友没有答应自己的请求，便悬梁自尽了。

在鲁国的内乱中，哀姜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由于她不受庄公宠爱，便与庆父勾结通奸，并鼓动立庆父为鲁国国君。谋害闵公事件，哀姜事先就知道内情。事件发生后，她也畏罪逃到莒国。齐国的国君为此而恼怒，派人到莒国把她押回，随后在夷地把她杀死。鲁僖公派人把哀姜的尸体运回鲁国，内乱才暂告平息。

庆父之乱平息后，鲁国的实权开始落入季友的手中。当初，季友将要出生时，鲁桓公让鲁国的占卜大夫楚丘的父亲为儿子季友占卜，楚丘的父亲占卜后说："所生的应是个男孩，他的名字最好叫友，以后他的政治地位在国君身旁，处在周社与亳社之间①，成为国君的辅臣。不过，季氏一旦灭亡，鲁国也将衰败。"随后，又用筮竹再占算，得到的是"大有"卦演变到"乾"卦。卜筮的人解释说："这位小公子以后将同他父亲一样有名望，人们对他尊敬如同国君一般"。季友出生后，手掌上呈现出"友"字形的纹路。于是，桓公给他取名"季友"。鲁庄公的妾成风闻听季友占卜的消息后，觉得以后季友有可能掌握国政，便积极改善同季友的关系，特别尊重季友，无论何事都听从他的建议，并把儿子僖公托付给他。因此，季友才立僖公为国君。

鲁僖公元年（前659）九月，鲁国军队在偃地击溃邾国军队，邾军是在戍守虚丘之后返回国都的途中被击败的。同年冬天，莒国人再次求索贿赂，作为当初引渡庆父回鲁国的报偿。鲁国非但没有报答之意，季友反而带着军队迎头痛击，在郦地打败莒军，俘

---

① 周社和亳社都是鲁国的神庙，位于国君宫廷外门（库门）之内的两侧。每当国家有重大紧要的事情，都要在此召集群臣作出决定。

虏莒侯的弟弟公子挐。鲁僖公非常高兴，将汶水北岸的田地和费邑赐给季友。季友的势力日益强大。

鲁僖公三十三年，僖公逝世。第二年春天，周天子派内史[①]叔服前来参加僖公的葬礼。庆父的儿子公孙敖听说叔服善长给人相面，于是带着两个儿子去见叔服。叔服把他们叫到跟前，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对公孙敖说："你的大儿子谷（文伯）将来能奉养你，二儿子难（惠叔）将来能办你的丧事。从谷的面相看，他地庭方圆，将来在鲁国必会后继有人。"公孙敖一直为自己家族未来的命运担忧，听了叔服这番话，稍得宽慰。文伯的母亲戴己是莒国国君的女儿，惠叔的母亲声己是随姐姐嫁给公孙敖的。几年后，戴己因病而死，公孙敖想在莒国续娶一位夫人。莒国国君认为还有声己在，拒绝了公孙敖的要求。

鲁文公七年（前620）冬，徐国进攻莒国，莒国火速派使者向鲁国求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与莒国结成同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夫人。到了莒国的鄢陵（今山东临沭境内），登上城楼一看，莒国的女子长得天姿出众，就娶来作了自己的夫人。公子遂知道后大怒，向鲁文公请求讨伐公孙敖。鲁文公想答应，叔仲惠伯劝阻说："据我所知，战争发生在国内叫乱，发生在国外叫寇。寇给别国造成祸灾，而乱却给自己带来灾难。现在臣下在国内作乱，而陛下却不加制止，无异于在制造内乱，这如何是好？"鲁文公听后立即阻止公子遂，由叔仲惠伯出面调解公孙敖与公子遂之间的冲突，叫公子遂放弃这门亲事，让公孙敖把莒女遣送回莒国。如此，他们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兄弟之情。然而，公孙敖对莒国的美女并不死心。第二年秋天，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作为特使前去吊丧，公孙敖半途之中就带着币帛逃到莒国，去追随去年遣送回莒国的美女。

① 内史：是周王室负责天文、历法、册命典礼、祭祀、文书、占卜等活动的官长。

公孙敖到莒国，找到了莒君之女便定居下来。于是，鲁国人便让公孙敖的儿子谷接替父亲的卿位。鲁国公孙敖的宗族，后来被人们称为孟孙氏，公孙谷被称为孟文子。孟文子为卿时期，果如出生时占卜所言，保全了孟孙氏的财产和政治地位。一次，鲁文公大概是因公孙敖私逃莒国的积怨，想拆毁孟文子的宅第，派人对孟文子说："国君想借用你们宅院的地盘，在外边宽敞地方给你们再建一处宅院。"孟文子义正辞严地回答："授予爵位是建设政治的需要，设置官署是为了表明职位，使用车舆服饰是为了使贵贱有等，建设住宅是为了表明贵贱高低，俸禄是为了使贵贱不同而饮食有别。君主制定下爵位、官署、车服、宅第、俸禄五项制度是政治的需要，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既定原则。现在，国君派人来命令我改变原来的官署和车马服饰，并说'换个地方，建设的比原来还好'。官署是臣下每日执行君主命令的地方。我身处先祖的官署，使用先祖的车马服饰，如果为了宽敞条件就改换宅府，是玷污君主对我们的信任，我实难从命。如果是我有什么罪过，我请求交还君主赐予的爵禄和车马衣服，撤离官署，削职为民！"鲁文公听了使臣的汇报，也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公孙敖在莒国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想回到鲁国，让儿子公孙谷替他请示。公孙敖回到鲁国后，公子遂劝他不要上朝。所以，公孙敖回到鲁国后不出家门。三年之后，他又回到了莒国。后来，孟文子生了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向鲁文公请求说："我的儿子还年幼，请立我弟弟公孙难接替卿位吧！"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孟文子死后，公孙难继承了爵位，他就是孟献子。鲁文公十四年，公孙敖又重金贿赂鲁国人请求回国，由孟献子出面活动。鲁国人表示同意。当公孙敖将要回鲁国时，同年九月死在齐国。家人向鲁国报丧，请求归葬鲁国，鲁国人没有答应。

公孙敖身死齐国，不得安葬，既使齐国人感到晦气，也使孟孙氏一族寝食不安。于是，齐国有人替孟孙氏策划说："鲁国是你

们的祖国和宗亲，你们把公孙敖的棺材放在齐鲁边界的堂阜（今山东蒙阴西北），鲁国必定会派人来把它运回。”孟孙氏于是照此去做了。堂阜地近卞邑。卞邑大夫便把此事向鲁文公作了报告。与此同时，孟献子日夜为父亲默哀，到鲁文公朝上请求将父亲安葬。鲁文公最后答应了孟献子的请求，于是公孙敖的棺材才运回鲁国。齐国人也来送葬。鲁文公十五年，依照庆父丧葬的礼仪安葬了公孙敖。声己怨恨公孙敖私奔莒国追随美女，不到棺材前去看灵，而只是在堂上隔着帐哭。公子遂也因公孙敖抢走自己的美女而怨恨，不想哭灵。叔仲惠伯劝慰说："丧事是与亲人关系的终结。人们之间虽不一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是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史佚说过这样的话：'兄弟之间应各自尽力做得圆满。救济困乏，吊唁灾祸，祭祀恭敬，丧事悲哀，人们之间的感情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不要断绝他们之间的友爱，这是对待亲人的道德。'您只要自己不丧失这些道德，又何必怨恨别人呢！"公子遂听了很高兴，就率领着兄弟们一起去哭灵了。

若干年后，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来到鲁国。孟献子十分喜爱他的这两个弟弟，鲁国人都知晓这件事。可是，有人诬陷孟献子的这两个弟弟，对孟献子说："他们兄弟俩企图谋害你。"孟献子把这话告诉了季文子。那兄弟二人听到此消息后感慨地说："献子喜爱我们兄弟二人，国人皆知；说我们要谋害他的谎言也尽人皆知，我们兄弟二人岂不是太悖于情理了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后来，他们一人守冥黾门，一人守戾丘门，先后战死。

经过孟文子和孟献子的不懈努力，庆父的后代在鲁国政治中立稳脚跟。后来，成为"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三大族）中重要的一支。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鲁周公世家》

《国语·鲁语》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至文公十五年

楚国始兴

春秋初年，在中原地区的南方逐渐兴起一个国家，这就是楚国。

传说楚人最早的先祖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后代重黎任帝喾的火正，负责宗教事务，很有政绩，使得国家昌盛。帝喾给他命名叫“祝融”，意思是光明正大。共工氏部落作乱，帝喾派遣重黎去讨伐。重黎未能完成任务，被帝喾杀死，由他的弟弟吴回代替重黎，后来也主掌火正，仍叫祝融。吴回共有六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名叫季连。季连姓芈，楚人是他的直接后代。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有一支名叫鬻熊，曾职事周文王。鬻熊的儿子名叫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生当周成王的时候。因熊绎有功，周成王把他分封在南方的楚地，授予男爵，定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周夷王的时候，是熊绎的后代熊渠。当时，周王室力量逐渐衰微，有些诸侯开始不肯朝觐天子，互相攻伐。然而，熊渠很得民心，起兵讨伐周围的庸、杨粤等小国，不断向江汉流域扩展。渠的力量不断增强，便说：“我们地处蛮夷，不用中国的名称谥号。”于是封长子康为镶王，次子红为鄂王，三子执疵为越章王。这些地方都处在长江沿岸的蛮夷地区。到周厉王时，厉王暴虐无道，熊渠害怕厉王伐楚，自动放弃了这些王号。

熊勇六年（前842）周厉王暴政，国人围攻厉王。从这一年起，楚国开始有了较准确的历史纪年。若敖二十年（前771），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王室东迁。后来，若敖的孙子熊通杀掉嗣君自立

为国君，这就是楚武王。从此，楚国开始了征服南方诸国、争霸中原的过程。

楚武王对外扩张，首先引起了邻近的蔡国和郑国的恐慌。楚武王三十一年（前710），蔡侯和郑庄公在邓邑相会，两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防御楚国。三年后，楚武王发兵攻打随国（今湖北随县南），先派大夫芳章去随国谈判，武王自己带领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等候消息。随国派少师为代表参加谈判。楚国大夫斗伯比对楚武王说："我们楚国难以在汉水以东地区扩展，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策略不当造成。我们扩充三军，并且装备甲兵，用武力威逼随国。如果随国恐惧就会团结一心抵御我们。在汉水以东的各国中，随国最为强大。假如让随国炫耀自己的武力，其他小国必定会与随国离心离德，而这恰好对我们楚国有利。随国的少师为人很狂妄，因此，我们的军队应显得很疲惫，以便放纵随国少师的野心。"楚国大夫熊率且比说："随国有足智多谋的季梁当政，我们这样做恐怕也无济于事。"斗伯比说："这是从长远考虑，少师很得随侯的信任和宠爱。"于是，楚王故意把军队阵容搞得乱七八糟，然后才接待少师。随国的少师看到楚国的军容不整，果真以为楚军不堪一击。回去之后，便向随侯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刚要批准，季梁阻止道："老天爷正把天命赐予楚国，楚军的混乱是楚国的诱骗阴谋，君主何必急于从事？据臣所知，小国所以能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而大国骚乱。所谓有道，就是忠于人民而信仰神明。在上位的人想造福人民，这种行为就是忠；庙祝史官义正辞严，这种行为就是信。如今，人民连饭都吃不饱，而国君却享乐无度，庙祝史官用虚伪的语言骗神，我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成功！"随侯说："我用于祭祀的牛羊毛色纯正而肥大，用于祭神的谷物粮食丰盛而多样，这怎能不算忠信呢？"季梁回答说："人民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古代的圣王都先为人民造福，然后才致力于祭祀鬼神，奉献牛羊并祈祷说'既大又肥'，表

示人民普遍富庶，他们的牲畜既肥壮又多，牲畜的毛皮没有癣疥，又有各色好的品种。在奉献黍稷的时候祈祷说‘谷物洁净而饱满’，用以证明春夏秋三季没有灾害，人民安和乐利年年丰收。奉献甜酒的时候祈祷说‘又甜又好的美酒’，表明全国上下都有美德而没有邪念。所谓酒香可以远闻，就可以证明人心无邪。人们一年当中辛勤劳作，国家修明五教，九族和睦，所以才举行庄严的祀典。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生活安康，鬼神也赐福，国家的任何事情都能成功。然而，如今国内的人民各怀二心，神鬼丧失了主人，君主虽然自己很富有，可这又算什么福呢？假如陛下能修明政治，进而使国内的人民兄弟和睦，友邻国家亲善，如此才能避免一切灾祸的发生。”随侯听了季梁这番话，没有向楚国发动攻击，并且进一步使国家政治清明。楚国此后一段时期内没敢进攻随国。

楚武王三十七年，随国的少师日益受到随侯的宠信，楚国大夫斗伯比经过探询后，对楚武王说：“时机已经成熟，敌人内部有了裂痕，可以趁此发动进攻，绝不可坐失良机！”这年夏天，楚武王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钟祥东）大会诸侯，黄国和随国没有参加。于是，楚武王一面派芳章去责问黄国，一面统帅大军讨伐随国。当时，楚军屯驻于汉水与淮水之间。季梁分析了战争形势，然后向随侯献计说：“我们应先派使者向楚国求和，假如楚国不接受我们的请求，我们再跟楚国决战，那时不但会振奋我们的士气，同时也瓦解了敌军的斗志。”可是，少师却对随侯说：“我军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否则，将会失去打败楚军的机会。”随侯采纳了少师的策略，亲自统帅随国军队迎击楚军。当两军遥相对峙时，季梁对随侯说：“楚军的主力在左翼，楚王也必定在左翼。我们应避实击虚，不去同他们正面交锋，而应攻其右翼，那里敌人兵力虚弱，我们可将其一举击溃。右翼退败，敌军就会全线崩溃。”然而，少师逞强说：“不敢同楚军正面交锋，算不得抵御强敌！”随侯听信了少师的话，随、楚两国军队在随国的速杞（今湖北应山

西）展开决战，随军大败，随侯狼狈而逃。楚国大夫斗丹缴获随侯的战车，并俘虏了少师。

这年秋天，随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派使者与楚国议和。楚武王本不想答应，大臣斗伯比劝他说："上天已铲除了随国的祸患少师，随国目前还无法征服。"楚王听了此言才答应议和，两国缔结了停战协约。

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国的国君派特使韩服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面，帮助巴国与邓国建立睦邻邦交关系。楚武王答应后，便派大夫道朔陪同韩服前往邓国。途经邓国南部地区时，遭到鄾（今湖北襄阳境内）人的袭击，道朔和韩服都被杀，携带的礼品布帛被抢走。楚武王听到消息，立即派大夫𫇭章前去谴责邓国，然而邓国不认错。这年夏天，楚武王派大夫斗廉率领楚军与巴国军队会合，围攻𫇭人。与此同时，邓国大夫养甥及聃甥也奉命率军支援𫇭人，邓国军队接连三次向巴军进攻都没成功。楚国大夫斗廉把军阵列在巴国军队之间，当邓军再次攻来时，就假装败逃。邓军急忙追击，结果陷入巴军和楚军的包围之中。巴楚两军四面围攻，邓军大败，𫇭人也在深夜溃散了。

楚国的扩张政策和炫耀武力使邻国深感不安。楚武王四十年，楚国准备召集贰国和轸国会盟，郧国人得悉后便把军队驻屯蒲骚（今湖北应城西北），准备联合随、绞、州、蓼四国一同进攻楚军。楚国的莫敖（军事长官）屈瑕为此感到忧虑。斗廉对他说道："郧国把军队派到都城外，如此来看，他们必然没有充足的戒备，而是每天盼望四国联军前去。现在，你带一部分军队驻守郢城（今湖北钟祥郢州故城）郊外，任务是防御四国联军；我率领精锐部队连夜突袭郧国。郧军指望四国联军救援，又倚仗靠近自己的都城，一定缺乏斗志。假如我能击败郧军，其他四国军队必定溃散。"屈瑕说："为何不向国君请求增兵支援？"斗廉回答："作战的胜利取决于团结一心，而不在于兵员的多少。殷纣王的兵力超过周武

王若干倍，但最终失败了。我们已经有一支劲旅，为什么还要援军！”屈瑕不放心，又说：“那就占卜一卦，看能否取胜。”斗廉回答：“占卜用来解决疑虑，如今我们根本用不着疑虑，还占卜干什么！”楚军精兵突袭，在蒲骚打败郧军，粉碎了郧、随等国联军攻楚的计划。同时，与贰国和轸国缔结了盟约。

第二年，楚国为报复随、绞等国企图联合进犯的阴谋，派大军讨伐绞国，攻至绞国都城的南门。楚国的莫敖屈瑕说：“绞国弱小而轻浮，缺乏谋略，我们派出樵夫砍柴，不用武装保卫，以便引诱绞人上钩。”于是，楚军按照屈瑕的计策，诱使绞国人抓住三十名楚军樵夫。第二天，绞国人争先恐后地出城，到山中抓捕楚军樵夫。楚军一部分驻扎在绞国北门外，一部分埋伏在山下，最后终于大败绞国，迫使绞国订立了城下之盟，胜利凯旋。

在这次楚军进攻绞国的战役中，楚军曾渡过彭水。当地的罗国人想乘机袭击楚军，阴谋未能得逞。楚武王四十二年春天，楚将屈瑕又率军讨伐罗国。斗伯比为他送行，回来后对自己的车夫说：“屈瑕定会战败，你看他走路时趾高气扬，说明他心神不定。”随后，斗伯比就去进见楚武王，说：“必须增派援军为屈瑕助战，否则，胜负难说！”楚武王没有听从，回到后宫将此事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说：“斗伯比之意未必一定派援兵，而是告诫君主要以诚信安抚百姓，以德政训诫官吏，以刑罚控制像屈瑕这样自以为是的将领。屈瑕自以为蒲骚之战有功，自信能力超人，会极端轻视罗国，如果君主对这种情况不予以监督，他会轻率从事而不加戒备。”楚武王听到此言，立即派赖国追赶屈瑕，但没追上。此刻，屈瑕已在前线军中发布命令：“敢前来劝阻者，一律处罚！”楚军抵达鄢水岸边，部队由于渡河陷入混乱，全军既无秩序，也没设防。楚军进抵罗国境内，遭到罗国军队和卢戎的两面夹击，全军惨败。屈瑕兵败后吊死在荒谷。其他逃回的将领被囚禁在冶父（今湖北江陵南），听候处置。楚武王最后懊悔地说：“这都是寡人

的罪过!”把这些将领都赦免了。

进攻罗国的失败，使楚国的实力受到严重损失。此后几年中楚国一直没有大的作为。到了楚武王五十一年，经过休养生息的楚国又重新拉开战幕。这年春天，楚武王使用名为“荆尸”的军阵，把戟杖发给士兵，准备攻打随国。在分发武器前，楚武王特地到祖庙去祭祀。回宫时对夫人邓曼说：“我今天的心神动荡不安。”邓曼听了这话叹息道：“陛下的命数恐怕即将终结。一个人的命数终了，就会心神不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楚国的先王大概已经明白这种道理，所以，在楚国即将进攻别国的前夕，使您心神不定。这次战役即使楚军不损兵折将，君王您也必然会死在行军途中。最好的结局恐怕也不过如此。”楚王没有听从邓曼的劝阻，率军出征，半途死在樠树之下。楚军令尹斗祁①、莫敖屈重秘不发丧，开路前进，架桥渡过溠水，指挥楚军进逼随国。随国人十分恐慌，急忙向楚军求和。令尹屈重以楚王的名义，进人随国都城迫使随国签订协约。同时，又迫使随侯到汉水折弯处会盟，然后才撤兵。楚军回师渡过汉水后，才发布楚武王的死讯，开始办理丧事。

楚武王在位长达五十一年之久。在这期间，楚国做为南方的一个小国，开始发展壮大，向周边的小国扩张势力。楚国先后征伐了随、邓、郧、绞、罗等国，名义上与这些国家结盟，实际上是迫使这些国家臣服于楚国。由于这位国君的赫赫武功，后人追谥他为“武王”。武王去世之后，儿子熊赀继位，是为楚文王。楚文王元年（前689）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从近年考古发现的情况看，郢都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约四十八平方里。在城墙外有八十米宽的护城河，规模在当时是比较宏伟的。

楚文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楚文王二年，楚国征伐申国（今

① 令尹：楚国官名，辅佐国君处理全国的政务，相当于中原地区国家的相。

河南南阳)。途中，经过邓国。邓祁侯认为，楚文王是邓曼之子，是邓国的外甥，便慰劳楚文王。骓甥、聃甥、养甥请求邓祁侯借此机会杀掉楚文王，除掉邓国未来的祸患，邓侯不允。他们三人苦苦劝谏说："将来灭掉邓国的必是楚文王，若不早做计议，将来悔之莫及！如果预测未来，长远打算，现在除掉楚文王正是机会！"然而邓侯却说："趁人不备而暗害于人，这样做背离人心，会遭人唾弃，神灵不佑！"三人又说："陛下若不听我们的忠言劝告，国家将会覆灭，哪里还谈得到神灵佑助？"邓侯坚决不依从。楚文王征伐申国回国后，便开始攻伐邓国。到楚文王十二年的时候，楚国最终灭了邓国。

《说苑》记述了楚文王伐邓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楚伐邓，楚文王命令王子革和王子灵一起出去装作采集莱果，以侦察邓国的情况。这两位贵公子来到野外，见一个老翁挎篮乞讨，不但什么也不施舍，反而凌辱了老翁，抢走老翁的物品。楚文王得知此事，下令将二人抓起来，准备斩首。楚国的大夫们劝阻说："抢人东西固然有罪，然而因小罪就斩首，处罚也太重了。是否可以免他们一死呢？"此话刚说完，就听军营前老翁喊道："邓国残暴无道，你们才征伐他们；然而，如今你贵族公子欺凌我，夺走我的东西，比邓君还要暴虐无道！"楚文王闻听，将老翁迎进军营，说："征伐残暴腐败的国家，却同时抢夺别人，这算不得除暴安民；倚仗自己年轻力壮欺凌老人，今后无法再教育后代；宠爱自己的儿子，不依法办事，就无法治理国家。保全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国家的政治，这万万不能！老翁你不必再说了！"随后，将两个王子在军营外斩首。这个故事虽有渲染成份，但反映了文王治国的严明纪律。

楚文王六年，蔡哀侯从陈国迎娶夫人，息国的国君也同时从陈国娶妻。息侯的夫人息妫归国途经蔡国，蔡侯认为息妫是自己夫人的姊妹，不必用对待息国夫人的礼节招待她，因此，没有特别款待。息侯听了此事后觉得受了污辱，大怒，立即派使者对楚

文王说："请你们发兵攻打我们息国，然后我们向蔡国求援，以便为你们进攻蔡国制造借口。"楚文王听到此事十分高兴，立即接受了息侯的建议。这年九月，楚军在莘地打败蔡军，俘虏蔡侯献舞胜利而归。

蔡哀侯因得罪息侯而被楚军击败，十分痛恨息侯。为了报复，就向楚文王夸耀息妫美貌夺人。楚文王随后又率军到了息国，用丰盛的酒宴款待息侯，不费吹灰之力灭了息国，夺走了息妫。后来，息妫生了堵敖和成王，但她从未主动与文王说过话。楚文王问她为何如此，她回答说："我是一个女人，却当了两个男人的妻子，既然没有为守节而死，还有什么话好说！"楚文王因蔡侯的缘故平灭了息国，又调过头来攻打蔡国。楚文王十年七月，一举平灭了蔡国。

早在楚武王的时候，楚国曾征服权国，然后派楚国的大夫斗缗去管理权人。不料，斗缗对武王心怀不满，利用权人起来反叛。楚武王平息了斗缗和权人的叛乱，杀死斗缗，将权人迁移到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那口城），改派另一位楚国大夫阎敖管理。楚文王继位后，准备联合巴国一起进攻申国，引起巴人的不满，巴人背叛楚国而进攻那处，一举占领那处，楚国大夫阎敖游过涌水逃走。巴人随后又进逼到楚国都城跟前。阎敖逃回楚都后，文王大怒，将他处死。阎敖的族人害怕，随后发动叛乱，联合巴人一同攻打楚国。

楚文王十四年春天，为平定巴人和阎敖族的叛乱，楚文王率兵讨伐，却在津（今湖北江陵南江津戍）大败而归。守卫国都城门的大夫鬻拳觉得大败而归有辱国威，不放楚文王进城。无奈，楚文王又率军攻黄国，在踖陵（今湖北潢川西南部）将黄国军队打败，胜利而归。回到湫（今湖北钟祥北）地的时候，突然患病。同年六月十五日去世。鬻拳把楚文王安葬在夕室（王族墓地），然后自杀殉国。人们把鬻拳安葬在楚文王的墓前。

楚文王在位十四年，先后伐灭申、邓、息、蔡、黄各国，使楚国的领土有了很大的扩展。他是一位在政治上开明的国君，听从臣下的劝谏，励精图治，使得楚国进一步富强。所以，后人称之为文王。同年，文王的儿子堵敖即位。

楚王堵敖五年（前672），堵敖准备杀死弟弟熊恽。熊恽惊恐万分，匆忙逃往随国。随侯派人将堵敖暗杀，熊恽即位为楚国国君，他就是楚成王。楚成王执政以后，在国内广施德政，安民力农、发展生产；在国外广泛结交友邻国家，并派人向周天子敬献礼品。周天子十分喜悦，册命楚成王："镇守南方，平定百越族的叛乱，不要扰乱中原地区！"这样，楚国在南方的扩张更加迅速，领土更大。

楚成王六年，楚国的令尹、文王的弟弟子元对文王夫人息妫心生邪念，便在文王宫殿旁边盖起一座房子，在里面表演"万舞"，想引诱息妫。息妫听到舞乐后十分伤心，流泪说："文王在世时也曾演练过这种舞蹈，不过那是用来练兵习武的。如今令尹不想为国家复仇，却在先君宫殿旁表演万舞，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楚文王夫人的侍臣把这话告诉了令尹子元，子元听后深感愧疚，说："妇人都不忘记为国家复仇，而我身为令尹反而忘记了！"同年秋天，子元指挥着六百辆战车去攻打郑国，大军一直进逼到郑国国都外城的桔柣门，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等人举着军旗在第一线督阵，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等人殿后，楚军浩浩荡荡从外城的纯门开进，一鼓作气直攻到郑国国都的逵市。然而，郑国国都内城门大开，楚军见后莫明其妙，不敢贸然而入。楚军的将士们用楚国方言议论纷纷。子元赞叹道："郑国确实有精通战略的人才呀！"当时各诸侯国的援军纷纷开来，楚军只得连夜逃遁。城内的郑国人已准备弃城而逃，郑国的侦察人员报告说："楚军的帐篷上落着乌鸦。"这才知道楚军已经撤走，没再有人。楚国令尹子元率军返回楚国，子元先进入王宫。这时，楚国的大夫斗射师

前来劝告，子元非但不听，反而将斗射师逮捕，铐住双手。子元的这种做法很不得人心。第二年秋天，申公斗班杀死令尹子元，斗谷菟被任命为令尹，人们称他为令尹子文。由于伐郑战争，楚国受到很大损失，经济上也出现困难。子文为令尹后，立即捐献自己的家财给楚国的百姓，来缓和国家的困难。据《潜夫论》记载，在这一时期，子文虽为令尹执掌一国之政，但他的妻子儿女却过着艰苦的生活，同平民一道共度难关。经过令尹子文的一番努力后，楚国才逐渐摆脱困境。

这一时期，楚国的法令严明，深得人民的拥护。《说苑》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令尹子文的家族内有人干了违法的事情，被有关司法部门拘捕。后来廷理（司法官）听说犯法者是令尹的族人，便将罪犯释放了。令尹子文知道此事后，立即召来廷理斥责说："国家设置廷理，目的就是惩罚那些敢于触犯国法的人。作为一个正直的执法官，应该廉洁奉公，不屈不挠。如今你违背君王的法令将罪犯释放，就是没有秉公办事，这难道真是我的愿望吗？我身为令尹，应该以身作则，成为国民的表率。或许已经有人因犯罪而怨恨我没有赦免他，现在我的族人犯法却被释放，这是让全国人民知道我执法不公，营私舞弊。执一国之政而让百姓怨恨，还不如死掉的好。"随后把犯法的族人押送到司法部门，说："不把他处刑，就由我来代他服刑！"廷理十分害怕，便依法将罪人处罚。楚成王闻听此事，匆忙赶到子文家里，说："寡人用人不当，廷理严重失职，违背了你的意愿。"立即将那个司法官撤职。楚国的人民听到此事，议论说："像令尹这样公正，我们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人们作歌赞颂道："子文族人，触犯法令；廷理释放，子文不应；一心为民，公正严明！"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楚国重新振兴起来。楚成王十七年，令尹子文率大军征伐弦国，一举将弦国吞并，弦国国君狼狈逃往黄国。当时中原地区的齐国强大，江、黄、道、柏等小国都与齐国关系亲近，而这几个小国都是弦

国的姻亲之邦。弦国国君以为有这些小国以及齐国为后盾，不必惧怕楚国，所以一直没有加以防备，结果被楚灭掉。楚灭弦后，又把矛头指向黄国。黄国想借助于齐国的声威，同时认为楚与黄相距九百里之遥，不必惧楚，因而与楚国矛盾日益激化。楚成王二十三年冬天，楚军又大规模讨伐黄国。第二年夏天，又把黄国灭掉。

在汉水东岸各国中，随国最大，楚国若要吞并汉水以东各国，必须先征服随国。自楚武王时起，曾屡次想征服随国，随国则力图摆脱楚的控制。楚成王三十二年，随侯鼓动汉水以东那些小国背叛楚国。楚国得到消息，令尹子文率领大军伐随，迫使随国与楚国结盟，受楚国控制。楚成王三十四年，宋国进攻郑国。郑国与楚国是盟国，所以，楚成王派军伐宋。楚、宋两国军队在泓水（今河南拓城北）交战，宋军大败。第二年，陈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私下与宋国结交。于是，楚国大夫子玉率军攻陈，吞并了陈国的焦（今安徽亳县）和夷（亳县东南），并在顿国（今河南项城西）构筑城池，然后才回师。令尹子文觉得子玉伐陈取得辉煌战功，便将令尹的职位让给他。大夫叔伯问子文："你把令尹让给子玉，你自己怎么安置?"子文回答："我这样做是为了使国家安定。立了大功而得不到显贵的地位，能够甘心为臣的人能有几个?"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两国联合出兵攻打秦与楚两国边境地区的鄀国。楚国的申公子仪和息公子边分别调遣申地和息地的军队戍守鄀国都城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后迁至今湖北宣城东南）。秦军经过析地（今河南淅川西北），绕道丹江，捆绑自己的士兵装作俘虏，包围了商密。黄昏时刻兵临城下。深夜，装做与楚国守将子仪、子边盟誓的样子，掘地歃血。城里的商密人听到动静，以为秦军已经占领析地，楚军已经变心，便向秦军投降。秦军押着楚将子仪和子边胜利返回。楚国的令尹子玉闻讯追赶秦军。但为时已晚，没有追上。

楚成王三十八年，楚国寻找借口进攻夔国。夔是楚的同姓国，大约在西周厉王或宣王时从楚国独立出来。楚国责问夔国："你们为什么不祀奉祝融和鬻熊？"夔人回答："早在我们的先王熊挚的时候，他身患重病，神鬼不保佑他，他才从楚国逃到夔地。从那时起就与楚国脱离了关系，怎么能够祭奠祝融和鬻熊？"同年秋天，楚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领楚军攻伐夔国，将夔国一举平灭。

楚成王在位达四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楚国先后灭掉弦、黄、夔等国，征服随国。但是，他却因没有处理好嗣君问题而被逼身亡。最初，楚成王准备让商臣当太子，征询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您尚未年老，而且内宠又多，如果现在立商臣为太子，将来再改变主意，恐怕要生内乱。依照过去的惯例，楚国选立太子一般是年少的。商臣不年少，而且眼睛像胡蜂，声音像豺狼，是个生性残忍的人，不能立为太子。"楚王没有听从。然而，立了商臣以后不久又后悔，想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听到一些风声，但也没有准确可靠的消息，便请教他的老师潘崇说："怎样能把这件事搞清楚？"潘崇献计说："这很简单，你设宴招待江芈，然后激怒他！"商臣照计而行。江芈果然发怒说："你这下贱东西！无怪君王要杀掉你另立职为太子！"事后，商臣告诉潘崇："确实有这回事。"潘崇问："你能事奉公子职为君吗？"商臣答："不能！"又问："能逃到国外去吗？"又答："不能！"潘崇最后问："那你能干大事吗？"商臣恶狠狠地回答："能！"这年十月，商臣带领宫中的卫队包围了楚成王。成王请求吃一顿熊掌后再死。商臣不答应。十八日，楚成王自缢身亡。商臣继位，是为穆王。

楚穆王二年（前 624）楚军进攻江国，把江国都城团团包围。江国求救于中原地区强大的晋国。晋国派大夫先仆率军讨伐楚国，以解江国之围。同时，晋侯把楚攻江的情况报告了周天子。周天子派王叔桓公同晋国大夫阳处父一同率军讨伐楚国，作为声援。伐楚大军一直攻到楚国方城城门下。这时，楚国进攻江国的军队由

息公子朱带领回救楚国，放弃了江国。见江围已释，晋国的军队也就撤回了。第二年，趁江国不备，楚国一举将江国吞并。此后，楚国的势力进一步向东扩张。楚穆王四年，六国（国名）背叛楚国，与东方各族亲近。同年秋天，楚国大夫成大心、仲归率军灭掉六国。这年冬天，楚国的公子燮又率军灭了蓼国。蓼国地处今河南固始县东北，远离汉水流域，说明到楚穆王时楚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西北部地区。若干年后，楚庄王继位，楚终于成为与中原地区的晋国并驾齐驱的大国。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楚世家》

《左传》桓公二年至文公五年

管仲相齐

管仲，名叫夷吾，祖籍是颍上（今安徽颍上）。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鲍叔牙。鲍叔牙很了解管仲，知道他才能非凡，将来必能成就大业。当时，管仲的家境贫困，与鲍叔一同从事商业活动，得到鲍叔的很大帮助。后来他们来到齐都临淄城。

当时，齐国的国君是襄公。齐襄公是一个荒淫残暴的国君，与他的妹妹、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私通。鲁桓公稍有怨言，他便暗中将鲁桓公害死，随后又将由他指使去害鲁桓公的凶手公子彭生杀掉。在国内，一味追求美女而求淫乐，不理政事，不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并随意处罚官吏和百姓。齐国的政治岌岌可危。

齐襄公有两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早年，他们的父亲齐僖公命鲍叔辅佐公子小白，鲍叔不肯，便声称自己有病，闭门不出。管仲和召忽前去看望，问道："你为什么不肯辅佐小白呢？"鲍叔回答道："老人们常说，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如今，僖公知道我没什么能耐，所以才让我去辅佐公子小白，我知道自己将来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召忽听后便说："只要你坚决辞职不接受，然后闭门不出，我谎报你已经得病而死，僖公便会改换别的人了。"鲍叔迟疑地问："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什么政事也做不成了。这怎么能行呢？"管仲说："那怎么行！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不能逃避政治活动，况且，将来谁是国君现在还难知道，你应该接受这个职务。"召忽接着又说："我们三个人对于齐国来说，就像鼎有三足，缺一不可。依我观察，公子小白将

来不会成为国君，鲍叔最好还是不要任职。”管仲答道：“目前国内的人们厌恶公子纠和他的母亲，而可怜小白孤苦零丁没有母亲，公子诸儿（即齐襄公）虽然年长，但做的事情没有气度，将来不一定会怎么样。依我看，将来能安定齐国的，除了公子小白和公子纠，没有别人！公子小白这个人，做事不拘小节，胸襟宽阔，有宏谋远略，除了我没有别人真正了解他。如果上天将灾祸降在齐国，公子纠即便被立为国君，也不会成功。鲍叔你不来辅佐公子小白平治齐国，还有谁能承此大任呢？”召忽听后生气地说：“若干年后，假如我所拥戴的公子纠遭遇不幸，不能被立为国君，或被人废黜，你们即使得了国家，我也不会再苟且偷生地活下去。受君命而至死不渝，拥戴自己的主人永不变心，这是人生的大义所在！”管仲却说：“我作为主人的臣仆，辅佐公子纠，是为了使国家强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绝不会因为一个公子纠去葬送自己的性命。当然，我丝毫不畏惧死，但那必须是国家破灭，人民遭殃。否则，我就要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能对国家作贡献；我死了，对国家没好处。”鲍叔听后转过头来问管仲：“那我该怎么办？”管仲说：“你上朝接受任命便是了。”鲍叔应允，作了公子小白的臣僚。不久，鲍叔又问管仲：“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管仲回答：“作为人家的臣子，当然应该尽心尽力，否则主人就不会信任你，也不会亲近你，你就无法让主人接受你的主张。侍奉主人应该一心一意。”鲍叔允诺而去。齐襄公即位后，日益荒淫无道，内乱将起，鲍叔牙拥戴着公子小白逃难到莒国，管仲和召忽拥戴着公子纠逃到鲁国。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连称、管至父发动叛乱，杀死襄公，奉公孙无知为齐国国君。第二年春天，由于公孙无知与雍人有仇，所以当他到雍地巡视的时候，被雍人杀死。一时间，齐国没有了国君。当时，齐国的国卿是国氏和高氏两家世袭贵族，他们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公子小白回国为君。鲁国听到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

后，也急忙派军队拥卫着公子纠回国，企图抢夺君位。公子纠派管仲带领一支人马快速赶往从莒国通往齐国的必经之路，企图拦截并杀死公子小白。管仲受命迅速赶到目的地，待公子小白的队伍行至跟前，立即掩杀过去，公子小白的队伍四散而逃。管仲瞄准小白的心胸拉弓射箭，小白应声倒在马上，落荒而走。管仲以为小白已被射死，便派人将情况报告了公子纠。公子纠得到消息后，便不慌不忙地带着人马向齐国进发，只等回到国中登上君位。走了六天才靠近齐都临淄。他哪里料到，管仲一箭正巧射在小白腰带的金属挂钩上，小白便佯装被射中逃走，然后迅速赶到临淄。国卿高傒立即拥立公子小白为齐国国君，是为齐桓公。公子纠眼见公子小白夺走君位，无奈带着人马又返回鲁国。

同年秋天，鲁国派大军护送公子纠回齐国，试图用武力赶走桓公，扶公子纠执政，遭到齐国人的抗击。八月十八日，齐鲁两国军队在乾时（今山东临淄西南）交锋，鲁军战败，鲁庄公落荒而走，乘坐他人的战车逃回鲁国。

齐桓公即位后，准备任命鲍叔牙为宰（执政大臣）。鲍叔牙辞谢说："臣是平庸之辈，无甚才能，陛下能使我不受饥饿冻馁，也就是对我的最大恩赐了。如果说要治理国家，管仲比我更适合。管仲有五个方面的才能：第一，能施惠于民，赢得人民的拥戴；第二，懂得治理国家的策略，使君主稳操政柄；第三，能取信于民，使万民一心，政平人和；第四，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国政，使国家富强繁荣；第五，能率军作战，使百姓冲锋陷阵而不畏死。这五个方面我都远不如管仲。"齐桓公怒气冲冲地说："这个管仲，一箭射在我的带钩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怎能用他！"鲍叔牙解释说："人各为其主，作为公子纠的臣下，管仲当然要为公子纠尽力，这叫一心不二。陛下若能宽恕他的罪过，把他迎回国来，他也会一心一意地为陛下卖力尽职。"桓公平息了一口气，然后问："那你说该怎么办呢？"鲍叔回答："把他从鲁国迎接回来。"桓公摇了

摇头说："施伯是鲁庄公的智囊，他要是知道我准备用管仲，肯定不会放管仲回国，那岂不落空了吗？"鲍叔思忖片刻献计说："我看这样，先派人到鲁国去，对鲁庄公说：'我们国君的仇敌管仲犯上作乱，射伤国君，国君要把他带回去斩首示众！'鲁庄公就会把他放回了，如何？"桓公高兴地说："好！就照你说的办！"

随后，鲍叔牙率军来到鲁国，见到鲁庄公后说："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弟兄，桓公不忍亲自杀他，请你们鲁国杀掉；管仲和召忽是桓公的仇人，请你们把他俩交出，带回国去由桓公斩首示众，报仇雪耻！"鲁庄公问施伯怎么好，施伯说："齐桓公并非真的要杀管仲，而是想让他回国秉政。以管仲的才能，他所在的国家必能强盛，他回到齐国后肯定会成为鲁国的忧患！"鲁庄公问："那怎么办！"施伯说："杀掉他！杀了以后将尸体交齐人带回。"得知鲁庄公要杀管仲，鲍叔牙急忙说："我们国君要亲自杀他以解心头之恨，若不能亲自杀他，岂不同没把他带回国一样吗？我们要把他活着带回齐国。"无奈，鲁人杀死了公子纠。召忽是忠义之士，见主人已死，便自杀殉国。鲁人将管仲捆绑起来交给鲍叔牙。鲍叔牙得到管仲后，马上告辞回齐国，刚刚到齐国边境的堂阜（今山东蒙阴西北）就给管仲松了绑，马不停蹄地赶往齐都临淄。

齐桓公求贤心切，得知管仲即将归来，十分高兴，沐浴薰衣，整饰仪容，亲自到郊外迎接。入宫之后，齐桓公和夫人三次举杯为管仲接风洗尘。然而，管仲看到桓公如此这般地追求修饰仪表，不谈国事，很不高兴，转身走出宴会厅。桓公很生气，对鲍叔牙说："为迎接管仲，我特意修饰容貌，管仲却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这实在太无理了！"鲍叔牙和隰朋赶紧去追赶管仲，对他说："桓公生你的气了！"管仲又返回宫中。先是站在大厅门口，桓公没有理睬他；管仲又向里走到中厅，桓公还是不理睬；最后走到跟前，桓公才问道："寡人为迎接你从几天前就作准备，自以为这样做就可消除你的误会。你今天不辞而出，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管仲

回答："臣听说，沉湎于娱乐当中会忘记国家的忧患，贪图吃喝享乐会怠慢自己的行为，不勤于上朝会使国家政治荒废，政治荒怠会使国家灭亡！我是因此才不辞而别的。"桓公听后急忙起身说："你如今年长，寡人也有些力衰，所以才想到稍事安息一下。"管仲答道："臣听说，年壮的人应该勤奋，年老的人不应该苟且偷安。夏、商、西周的衰落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陛下怎能这样想呢？"最后，齐桓公以朝廷上的君臣之礼将管仲送出。

《说苑》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桓公得管仲后，为使管仲威望过人，称之为"仲父"（伯父），然后召集文武百官说："赞同我的决定的人站在右边，不赞同的人站在左边！"然而有一个大臣既不靠右边站，也不靠左边站，而是站在宫廷中间。桓公诧异，问是何缘故，那人回答："管夷吾的智谋可以得天下，他的军事才能可以打天下，然而您真的放心依靠他吗？把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大权统统地交给他，齐国的人都听从管夷吾的，陛下您的意下如何？"桓公说："正合我意"。于是转身对管仲说："我把国家的大权就交给你了，政治不好的方面都由你来纠正。"退朝后，管仲忧心忡忡，担心受到桓公的猜忌。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桓公任用管仲是信而不疑的。

一次，晋国有个使者来到齐国会见齐桓公，有关部门问桓公该用什么礼节接待，桓公说："这事去问管仲好了！"旁边有人笑道："像这样的事也去问臣下，您这君主当的算是无忧无虑了。"桓公回答："我常听人说，君主的精力要用在任贤使能上，任人得当，自然可以高枕无忧。我费尽心机求得管仲，正是为了今天的安逸。"

齐桓公是春秋前期具有远见卓识的开明国君。任用管仲之后，仍进一步广招人材，各地有能之士纷纷前来。有一个叫宁戚的人，才能超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来到齐都临淄。为使自己能接近齐桓公，宁戚便为一个贵族当车夫喂牛。一次赶车来到宫城东门，宁戚敲着牛角低声吟唱，正巧被桓公听到，桓公派管仲去

找此人。管仲找到宁戚，宁戚唱道："浩浩乎白水……"管仲百思不得其解，闷闷不乐。他的妻妾便问："我看你面色忧郁，难道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管仲不快地说："妇道人家，你不懂得这些！"妾随言说道："常言道，不要因年老和年幼而看不起别人，也不要因身分卑贱而轻视别人。"管仲追问："你能否说得具体些？"妾解释说："据说太公姜尚年纪七十的时候，曾在商都朝歌的市场上做屠夫，八十岁的时候被文王拜为国师，九十岁时才被封到齐国，他可算得上年老；伊尹是作为陪嫁的臣仆到商汤宫中的，被商汤立为辅佐大臣，他可算得上身份低贱；皞子年方五岁就帮助大禹治水，他可算得上年幼；駃騠出生不久就显示出智慧，他可算得上弱小。然而他们都成就了大事业。"管仲听后恍然大悟说："前几天桓公让我迎接宁戚，宁戚却唱'浩浩乎白水'，我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才感到郁闷。"妾听后大笑说："他已经告诉你他的志向了！古代有一首《白水》诗：'浩浩白水，自在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不安，我来治理。'这是宁戚想要从政呀！"管仲十分兴奋，立即报告了桓公。

齐桓公与管仲进一步商议选拔人材，管仲推荐说："审查案件，断民狱讼，调解民事纠纷，在这方面我不如弦商，可以任命他为大理（司法官）；外交方面，送往迎来，礼待宾客，不卑不亢，我不如隰朋，可以任用他为大行（外交官）；垦荒务农，发展生产，经世济民，这方面我不如宁戚，可以任命他为大田（经济官）；训练军队，勇往直前，使国家武备强盛，我不如公子成父，可以任命他为大司马（军事统帅）；敢于直言，指出君主的过失，我不如东郭牙，可以任命他为谏官。有这五个人齐心协力地辅助君主治国，齐国定会富强。"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使一批优秀的人材献力于齐国。

一次，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一同饮酒，酒过三巡，桓公有些醉意，对鲍叔牙说："你怎么不给我祝酒呢！"鲍叔牙起身

举杯祝酒说："祝君主别忘记身在莒国流亡的时候，祝管仲别忘记在鲁国被捆绑的情形，祝宁戚别忘记当初是怎样喂牛赶车的！"桓公大悟，感叹说："寡人与你们几位贤臣都能记住这番话，齐国何愁不强！"

管仲为相以后，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对齐国进行了改革。

第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齐桓公认识到，齐襄公时期政治腐败严重地影响了齐国的强盛，长此以往将有可能使国家倾覆。他说："我们的先君襄公大量兴建亭台楼阁，狩猎无度，四处游玩，不理朝政。同时，不注意选贤任能，冷遇有能之士，一味追寻美女，三宫六院，姬妾数百。这些宫女们吃的是鸡鸭鱼肉，穿的是绫罗绸缎，而保卫国家的将士们却挨饿受冻。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国家遑遑不可终日，朝不保夕，祖宗之庙烟火将灭，神灵也得不到祭典，应该怎样扭转这种形势呢？"管仲答道："从前周昭王、周穆王的时候，依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去建设国家，结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广招文武之士，任用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创立了图形法律公之于众[①]，依法治政，用赏赐奖励人们的成绩，用处罚纠正人们的过错。他们还整饬社会伦理秩序，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范。"桓公听后忙问："那你快说，他们怎样做的呢？"管仲答道："从前先王治理天下，实行了参国和伍鄙的制度，来固定人们的居住地，从而使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老有所养，老有所葬；同时，对人们的赏罚十分慎重。"

要对国家实施改革，首先要安抚人民，得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桓公在即位之初就想对外争霸，说："我想称霸诸侯，怎么样？"管仲劝阻道："不可，国内还没安定。"桓公问："怎样

---

① 据文献记载，周穆王时制定了《吕刑》，由于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便将各种罪行以及惩罚的办法用图画方式张贴在宫门城墙上，使人们知晓。战国时期的成文法是其进一步发展。

使国内安定?”管仲回答:“应反省先王制定的礼法,符合今天需要的,就应该继续推行;落后于形势的,要抛弃。应让人们选择自己擅长的职业,发展经济,赈济那些贫穷的人,这样国家才会安定。”桓公采纳了管仲的这一主张,在国内博施广济,彻底改变了齐襄公以来的政治风气,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社会迅速安定下来。

第二,改革内政。

在总结历史成败经验的基础上,齐国开始实行内政改革。齐桓公问管仲:“应该怎样安排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管仲回答:“对于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不使他们混杂在一起居住,假如混合在一起居住的话,就会使人们思想混乱,做不好本职工作。”桓公迫不急待地问:“那你说怎样安排士、农、工、商四种人?”管仲回答:“从前圣王治理天下,使士兵专门练兵作战,工匠在官府中工作,商人在市场经营,农夫在农田中劳作。”

具体说来,是让军队中的战士集中居住,练兵打仗,完全脱离生产劳动①。这样,父辈之间讨论的内容是仁义,子辈之间讨论的内容是孝顺,为臣考虑的是恭敬,年青人议论的是尊老爱幼。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安心于本职,不见异思迁。因而,父兄无形中做了榜样,子弟有意无意中学会了先辈的职能,父子相传,世代不变。

同样,手工业者也要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内,根据季节的变化安排生产,一起研究技艺,日夜切磋,取长补短。同时,他们用自己的技巧传授子弟,使后代懂得如何掌握技术,互相激励。这样,他们的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安心于手工业技术,不见异思迁,子承父业,世代相传。

---

① 常备军是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的。商周时代,兵农不分,人们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管仲在齐国改革军事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要假借先王的旗号去进行。

对于那些商人，也要让他们居住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季节的变化，调剂市场物品的余缺。他们了解各地市场的物价行情，知道哪里出产什么，哪里需要什么，以此地所有易彼地所无。商人们日夜奔波，并以此教育子弟，告诉他们怎样盈利，怎样避免亏本。后代子弟逐渐地学会了先辈的生意经，就不会轻易地放弃这门职业了。

农民要居住在农村，依照四时季节的变化，安排农业生产，准备好自己的耒、耜、锄、镰等生产工具。冬季除去田里的草丛，以备春耕；春天来临，深耕熟耘，以等待春雨播种；到了播种时节，从早到晚劳作于田亩，头戴茅笠，身披蓑衣，风吹日晒，汗流浃背，不辞劳苦。农夫的子弟从小受到父辈的传教，自然就接受了父辈的一切，安心于农业生产。他们当中才能出众可以提拔任职的，可以让有关官员推荐上来，任以合适的职务。

内政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地方行政区划。当时的齐国，旧的宗族组织已开始瓦解，社会上出现混居杂处的现象，如何对人民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是齐国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齐桓公问管仲："怎样使人们定居下来加以管理？"管仲回答："把首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桓公说："可以。"随后付诸实施。在首都的二十一个乡中，包括了六个由工匠和商人组成的乡，十五个士组成的乡。这十五个士乡，由齐桓公直辖五个乡，国氏管辖五个乡，高氏管辖五个乡。这样一来，齐都内便建立起三套并行的行政区划体系，每个系统中包含五个士乡，一个工匠之乡，一个商人之乡，与此相对应，设置宰（主要行政官员）、族（管理工匠）、乡（管理商人）官各一人，此外，还有虞（管理川泽）和衡（管理山林）。

在整顿了国都内的秩序之后，管仲又着手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一套行政体制。具体做法是，把三十家划为邑，设有司；十个邑（三百家）组成卒，设置卒帅；十个卒（三千家）区共组成五个属，

所以共设五个大夫。在国君朝中，设立五个官员，直接领导五属的大夫，大夫领导县帅，县帅领导乡帅，如此层层辖制。各级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桓公告诫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恪守职责，不许违法乱纪！"

在全国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体制之后，齐国同时还实施了相应的官吏考核任免制度。制度规定，每年的年初，无论是国都内还是农村地区的官吏都要接受国君的审查。国君考问都内的乡长："在你们乡里，有没有勤奋好学，聪敏过人，孝敬父母，受到乡里赞誉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必须汇报，不汇报以压抑人才罪论处！"于是被考问的乡长向国君述职，完毕后退下朝去。然后，国君又考问别的乡长说："在你们乡内，有没有身体强健，力大超人的人，有的话要及时汇报，如不报告以压抑贤才论罪！"被考问的官员汇报工作完毕后，退下朝去。国君也要追查那些在地方上败坏政治的人："在你们乡里，是否有不孝敬父母，骄奢淫逸，不服从政令、败坏风纪的人，有的话必须汇报，隐匿不报，以同党之罪追究责任！"这样的考核制度，使地方官员在自己的政区内积极地做好工作、选荐人才，这些人才由国君亲自审核，最后任命职务。

同时，国君也审查乡村地区的官员，敦促没有政绩的人："分给你的田亩、人口与别人一样多，为什么你的政绩平平？"这样，就迫使属大夫督责县吏，县吏督责乡吏，乡吏督责卒吏，卒吏督责邑吏，邑吏督责每一家。在这种情形下，无论谁有才能都会被选举上来，有罪过都会受到处罚。

据文献记载，齐桓公还规定官员每年作一次书面工作汇报，称为"书伐"。桓公根据书面报告的内容，对有政绩的官员，将他们召上朝廷，亲自查问，考核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齐桓公设定题目，让官员想出解决的办法，对那些才思敏捷者，进一步考查其品行，德才兼备者，授以高官重任，这叫"三选"，即层层选拔的意思。用这种办法督促各级官员和百姓，积极努力，一丝不

苟。

第三，改革经济制度。

在齐襄公的时候，齐国的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当时齐国民间流行的诗歌中这样唱道：

无人耕种那甫田，
甫田之中长野草；
无人思念远方人，
免得使人心如煎。

甫田是国君和贵族的田地。过去，这些甫田靠国内的宗族群众耕种，收获物归各级贵族所有，用以支付国家的各项财政开支。甫田被荒弃不种，国家失去了财政来源，国家机构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形下，管仲实施了相地而衰征的办法，即依据人们耕种田亩的数量多少，以及土壤质量的好坏，确定适当的征税额。好田多征，次田少征；好年成多征，坏年成少征或不征税。征税额最多可达十分之三，一般情况下征税十分之一。征税的办法是由国家收取实物，种植什么庄稼，就收什么粮食作为赋税，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为“与民分货”。

同时，也开始征收商业税。在以前，手工业者和商人完全受国家控制，人身不自由，商品不流通。随着这种局面的改变，私人工商业者大量涌现，并形成市场。齐国在国都内专门开辟出商业市场，让人们交换产品，并指派官员管理，抽取商税。由于当时大多是实物交换，所以，收税也采取征收实物的办法。至于征税额的多少，文献中没有记载。

第四，军事改革。

在春秋以前，各国普遍实行亦农亦兵的兵民合一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一旦发生战事，临时征集人民组成军队，投人战斗。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把这种情形称为“登人”，登与征是同一个意思。西周时期，文献记载说有“西六师”

和“成周八师”，是指西都镐京地区可以组织六个师，东都洛邑可以组织八个师，这些军队都是召集王畿内的人民临时组成的。战争结束，人们解甲归田，因此，当时并没有常备军，国家也用不着养兵。

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旧的宗族组织解体了，国家依照人民的居住地重新加以组织，过去依照宗族组织征兵的办法陷入困境。所以，管仲相齐后实施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士组织起来，集中居住在国都中。前面提到在国都内组成十五个士乡，正是这种情况。齐桓公对管仲说：“我要称霸诸侯怎么办？”管仲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把国都内的士乡组建成军事组织。”具体做法是：五家组成轨，设轨长；十轨（五十家）组成里，设里有司；四里（二百家）组成连，设连长；十连（二千家）组成乡，设良人；五乡（一万家）组成军，设军帅。作战的时候，轨长率领自己的轨，里有司率领自己的里，连长率连，乡长率乡，军帅率军，齐国共三军，设三帅，由齐国的国君以及国氏和高氏分别担任。国君的军置于中间，称中军，是主力军；国君也是元帅，指挥三军。管仲夸耀这支军队的特点是：“春季练兵称作狝，秋季练兵称作蒐；小规模的练兵在乡里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练兵在郊外举行；这支部队有严格的纪律，不许随便离开居住地；同一卒伍的兵士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患难与共，居住于邻里。因此，夜战的时候从声音就可以彼此辨别，白天作战时彼此相熟悉。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战之能胜，守之能固。国君有了这样的三万军队，可以诛伐大逆不道的国家，拥卫周天子，横扫天下。”

齐国建立常备军后，随之而来的是解决军费开支问题。齐桓公问管仲：“军队建立起来了，但我们缺乏军需武器，该想些什么办法呢？”管仲主要从两条途径解决问题。第一条途径，也是最基本的办法，是向国民征收军赋，向农民征粮解决粮食的来源，向手工业者征收工业产品。第二条途径，是采取以兵械赎罪的政策。

对于那些犯罪的人，允许他们缴纳兵器赎罪，重罪需缴纳一套铠甲剑戟，中等程度的罪过需缴一套盾和戟，轻罪需缴一定数量的金属，民事纠纷经审理结案的，应缴纳一束箭矢。国家收缴的金属，质量上乘的用来铸造剑戟刀枪，劣质的用来铸造农具。这一政策实施后，补充了齐国兵器的不足。

第五，尊王攘夷的称霸策略。

春秋早期，天子地位衰落，诸侯兴起，旧秩序开始被打破。但同后来的诸侯称雄争霸相比，齐国的桓公争霸具有明显的早期特点，即表面上是打着拥卫周天子，维护旧秩序的旗帜，实际上是诸侯称霸，打破旧秩序。

首先，齐国积极改善同邻国的关系。桓公问管仲："经过一系列的内政、军事、经济改革，国家已经富强，我想称雄诸侯，可以吗？"管仲果断地回答："不可，邻国还没有亲近我们。若要称雄天下，必须要搞好睦邻关系。要仔细核实我国的国界，凡是我们侵占的邻国领土，一律归还，双方确认共同的疆界，而不要接受邻国的礼物。同时派使者携带贵重的礼品，到各邻国访问，使邻国接受我国的好处，从而亲近我国。还要派使者到其他的国家，携带车马衣服金钱，广泛召集天下的有能之士到齐国来。发现那些昏庸无道的国家，我们就可以派兵讨伐了。"齐国先后还给南方的鲁国棠、潜两个地方，还给西方的卫国台、原、姑、漆里四邑，还给北方的燕国柴夫、吠狗二邑。齐国此举赢得了人心，国际威望大增。重新审定的齐国边界，南部到岣阴，西边到济水，北至黄河，东边至纪鄰。当时，齐国有战车八百辆。

有了良好的睦邻环境后，齐国便开始尊王伐暴的活动。齐国东南方的莱、莒、徐夷、吴、越等国，治政不善，齐国没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三十多个小国；南方，大规模远征楚国，渡过汝水，逼近方城（楚都），使楚国向周天子纳贡称臣；北方讨伐山戎、令支、孤竹（今辽东一带）等国，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国无不服从

听命；西方，远征白狄地区，进抵黄河以西一带，直至石枕，跨跃太行山，征服流沙、西吴等国，使常山一带的诸侯国纷纷归服。在阳谷地区召集各诸侯国开会，匡正天下秩序，不诉诸武力，而主要靠尊王的旗帜，使各诸侯国顺从周天子的统治。

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各国，周襄王派宰孔给齐桓公送来祭肉，说："依照周文王、武王的惯例，特派宰孔送去祭肉，以示褒奖。"并特令齐桓公："你平定天下有功，鞍马劳顿，免除下拜受命之礼"。桓公找管仲商议，管仲说："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会酿成大乱。"桓公听后十分惧怕，立即接见宰孔说："天威浩荡，丝毫不得违犯，我小白若接受天子的恩典，不下拜受命，恐怕会破坏周代的礼法，犯下滔天大罪！"随后下拜接受天子的册命。周襄王赐予齐桓公金色战车、饰有九旒的龙旗和红色的渠门旗。诸侯们纷纷前来祝贺。

齐桓公在春秋时期能成为第一个称霸的诸侯，这应归功于管仲。管仲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齐国富强的基础，而在对外政策中又打着尊王的旗帜，使得齐桓公征服诸侯更加名正言顺。十分恪守周礼的孔子曾赞誉管仲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的礼法秩序，使我们到今天仍能得到益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早就被戎狄征服了！"

回顾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和功名成就，管仲感慨万端。他说："当初我贫穷的时候，与鲍叔合伙做生意，我曾多分给自己财物，鲍叔从来未责怪我，知道我是因贫穷才那样做的；我曾经帮助鲍叔谋策，结果使鲍叔陷入困境，鲍叔也不说我愚蠢，知道外界环境的变化多端，难以预料；我也多次为主人们供职，屡次被弃逐不用，鲍叔并不认为那是我无能，知道人有怀才不遇的时候；我也曾作战败逃，鲍叔也不认为我怯阵，知道我家中有八十老母靠我供养；公子纠失败，召忽就义不辞，我却受囚笼之辱返回齐国，鲍叔也没说我不仁不义，知道我不拘小节而胸怀大志。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鲍叔呀！”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管晏世家》、《齐太公世家》。

《国语·齐语》

《管子》：《大匡》、《中匡》、《小匡》。

《左传》庄公九年至僖公十七年

《诗·齐风·甫田》

《吕氏春秋》

《韩非子》

《论语·宪问》

齐桓公称霸

春秋早期的齐国，由于地处山东半岛西北部，以捕鱼、晒盐、冶铁为主的工商业较为发达，旧制度首先在这里陷入危机。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后，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逐渐强盛起来，为桓公称霸诸侯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齐桓公也开始对外扩张，并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霸主。

齐桓公二年（前684），为报复鲁庄公用武力支持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齐国派军队攻击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当时，鲁国有个叫曹刿的人请求面见鲁庄公，献计纳策。他的同乡人劝阻说："有贵族大夫们专门谋议决策，你何必去参与呢？"曹刿断然回答："那些贵族大夫们孤陋寡识愚昧无知，根本没有深谋远略！"随后，曹刿晋见了鲁庄公。他问庄公准备如何抗御进犯的齐国军队，庄公回答："朝中的衣食财物，寡人从未敢独自享受，都拿出来与人们共同分享了。"曹刿回答："这种小恩小惠无法使人民普遍得到好处，人们不会都为国家卖力的。"庄公又说："我祭祀神灵用的牛羊和玉帛，从不敢擅自增减数量，而且祀典的时候非常虔诚。"曹刿回答说："这点虔诚微不足道，难以使天地间的鬼神都满意，神灵不会降福给鲁国。"庄公再次申明说："百姓的纠纷诉讼案件，虽不敢说百分之百都判决正确，但寡人是尽了最大的心力去审查核实，以使裁决公正。"曹刿听后说："这还算得上是爱民如子，我们不妨可以同齐国一战！作战的时候，臣请求与陛下一同参战。"

鲁庄公率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曹刿与鲁庄公同乘一辆战车，大军行到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与齐国的军队遭遇，两军对峙摆开战阵。鲁庄公准备下令击战鼓冲锋，曹刿急忙阻止说："不行。"直到齐军击了三次战鼓，齐军已冲到半途，曹刿才说："我军可以击鼓了！"两军短兵相交，齐军战败而逃。鲁庄公想乘胜追击，曹刿又急忙阻拦，跳下战车仔细查看齐军的车辙，然后又登上战车向前方眺望，最后才说："可以下令追击！"一战使鲁国大获全胜。战斗结束后，鲁庄公问曹刿用的是什么战术，曹刿解释说："军队的战士作战，依靠的是勇气和力量。第一次击鼓冲锋，战士们勇气高涨，浑身是力量；第二次击鼓，士兵已冲出一段距离，勇气降低，气力消弱；等到第三次敲击战鼓时，士兵已经冲得气力耗尽。在齐军力量竭尽之时，也恰是我军敲响首次战鼓，士气昂扬之时，所以，两军一旦交战，我军便能取胜。同时，齐国是一个大国，兵力多少很难猜测，为臣深怕他们伪装败退，设下伏兵，所以，跳下战车观察他们逃走时的痕迹，结果发现他们的车辙混乱，登高远望，又见齐军旌旗东倒西歪，判定齐军真正战败，不会有诈，所以才建议下令追击。"

齐桓公初试锋芒便惨遭挫败，复仇之火随触即燃。同年六月，齐桓公纠集宋国联合发兵攻鲁，联军进抵鲁国都城不远处的郎邑（今曲阜附近）。鲁国大夫公子偃请求率军出城，说："宋军阵容不整，我军能把他们击败。宋军一旦败北，齐军也就会撤回了，请陛下派我出击。"然而，鲁庄公不应允。无奈，公子偃悄悄率军从南门出城，在战马身上披上虎皮，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为时已晚，只得率军助战。宋、鲁两军在乘丘交锋，宋军大败。齐国军队眼看联军瓦解，撤了回去。

齐桓公两次伐鲁都没有如愿，便把怒火转移到其他小国身上。当年，齐国内乱桓公流亡莒国时途经谭国，谭国人没有礼遇他。桓公即位后，各方诸侯都前来祝贺，谭国却没有派人来。回想起这

些往事，桓公怒不可遏。同年冬天，齐军灭掉了谭国。

齐桓公五年，为了帮助宋国平定内乱，齐桓公召集宋、陈、蔡、邾等国在齐国的北杏（今山东东阿境内）开会。这是诸侯召集他国集中盟会的起始。遂国（今山东宁阳西北）没有到会，齐桓公一气之下派军队一举灭亡遂国，吞并其领土。

在这几年中，齐国不断吞并与其接壤的鲁国领土。鲁国虽也派军守卫，但无济于事，均告失败。这年冬天，齐桓公武力威逼鲁庄公在柯（今山东阳谷阿城镇）举行盟会。随鲁庄公一道参加会盟活动的有鲁国大夫曹沫。曹沫勇猛过人，曾率鲁军屡次与齐军作战，均告败北。他十分痛恨齐桓公。听说两国君主要举行盟会，便怀藏匕首跟随鲁庄公。正当齐桓公与鲁庄公在盟坛上歃血为誓的时刻，曹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掏出利刃对准桓公。齐桓公顿时目瞪口呆，左右的文臣武将也不知所措。齐桓公向曹沫："你想干什么？"曹沫怒呵道："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你们屡次欺凌我们鲁国，使我们忍无可忍！如今我们鲁国城墙毁坏，朝不保夕，齐国又是我们的邻国，陛下该想一想了！"桓公被劫持，不得不答应归还侵夺鲁国的全部土地。话说完后，曹沫放下匕首，走下盟坛，面朝北面，回到了群臣的行列里，泰然自若，仍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与别人谈话。

齐桓公蒙受莫大的污辱怒发冲冠，要收回刚才的承诺。管仲忙劝告说："不能因小失大。只图眼前利益和一时痛快，弃信于天下诸侯，会失去人心。既然答应了，就绝不可反悔。"于是，桓公将近年侵占的鲁国土地如数归还给鲁国。

齐桓公六年，宋国没有履行北杏盟约，于是，各诸侯国的联军一起攻打宋国。齐桓公派人到周天子那里，请周天子发兵。这年夏天，周天子派卿士单伯率军参战，这就使得齐桓公的称霸更加名正言顺。直到宋国同意履行北杏盟约后，各国方罢兵回国。同年冬天，由于宋国归服，单伯与齐桓公、宋、卫、郑各国国君在

卫国的鄄（今山东鄄城西北）正式举行盟会。

第二年春，齐桓公召集宋、陈、卫、郑各国国君再次到鄄地会盟。至此，齐桓公确立了霸主地位，号令于诸侯。这年秋天，各盟国帮助宋国攻打郳国。然而，郑国却借此机会袭击了宋国。

齐桓公八年夏天，齐国又联合盟军讨伐郑国，替宋国报仇。郑国降服后，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各国国君在幽地举行了盟会。

齐桓公九年春，齐国俘虏了郑国的执政大臣郑詹，以惩罚郑国不派使者到齐国朝见。同年夏天，遂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各族联合设盛宴慰劳戍守遂地的齐军，将齐军兵将灌醉后全部杀死。

齐桓公二十二年，燕国受到山戎的侵扰，派使臣到齐国，请齐桓公发兵解救燕国的危难，讨伐山戎。于是，齐桓公就带着大队人马北上攻伐山戎。

齐国的大军到了燕国，山戎人听说燕国请来援兵，便大肆劫掠而去。管仲说："山戎不与我军交锋就走，我们更应警惕对方。如果我们就此撤军，山戎必会再来掠夺骚扰。要安定北方，定要击败山戎。"齐桓公便决定继续北进，燕庄公率军随齐军一同远征。燕庄公向齐桓公介绍情况说："离燕国不远处有个无终国，与燕国关系友好，可以请无终国的人为我们领路。"这样，齐、燕、无终三国联军大规模北上攻伐山戎，山戎人见齐军来势凶猛，便抛弃帐篷、财物仓皇北逃。联军救回许多被山戎掳去的燕人，并俘虏一批山戎百姓。齐桓公对这些俘虏采取了宽厚政策，然后问他们："你们的头子逃到哪里去了？"人们回答："一定逃到孤竹国（今辽宁朝阳境内）去了。"齐桓公与管仲商议后，决定进一步北伐孤竹，以彻底安定北方。大军继续北进。

联军进至孤竹境内，遇到密卢率领的山戎军队和黄花率领的孤竹军队的联合抵抗，两军激战，山戎和孤竹军队战败而逃。第

二天，不料孤竹大将黄花拿着密卢的首级前来投降。他奉上密卢的人头说："我们国君不听我良言相劝，一定要帮助山戎，结果吃了败仗，他要带着人马逃走去找救兵。我不愿与山戎人一道，故杀死密卢，将首级献上。"经辨认，黄花拿来的确是密卢人头。随后，黄花献计说："我愿意带领你们去追杀孤竹国君，以除去我将来的祸患。"

联军跟随黄花直入孤竹城，见城内人畜皆空，便认定孤竹国人全都逃走了。齐桓公让燕庄公率燕军驻守孤竹城，自己带着队伍继续追击。

大军浩浩荡荡继续向前进发，黄昏时刻来到一个叫"迷谷"的地方。不多久，队伍就迷失了方向。再寻找孤竹人黄花，已经踪迹皆无，这才知道中了孤竹人的诡计。第二天，齐军仍无法走出迷谷，管仲急中生智，猛然想到老马识途的传说，便说："马也许认得路，我们可以挑几匹无终国的老马，让它们在前面走，我们随后跟着。"果然，队伍随着老马走出迷谷。

走出迷谷之后，部队连续行军，山中缺乏水源，人们干渴难耐。隰朋又献一计说："蚂蚁冬天居于山南侧向阳的地方，夏天居于山北侧阴凉的地方。凡是有蚂蚁的地方，向下掘就可以找到水。"齐军一试，果然灵验。经历了重重困难，齐桓公终于击败了孤竹国，大获全胜。平定了孤竹，在北方开辟了大片领土，齐桓公对燕庄公说："孤竹平灭，山戎驱逐，燕国可以管理这广阔的领土了。"燕庄公推辞，齐桓公又说："齐国离此千里，鞭长莫及。这里是周天子北方的边防，应为天子守卫疆场，使王土万里。"

齐国军队从燕国撤回，燕庄公亲自送行，不知不觉到了齐国境内的长芦（今河北沧州北），这已出燕国国界五十余里。两国君王分手的时候，齐桓公突然想到西周的礼法，说："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怎能违背礼法？齐、燕两国就以此为界，从此以北一律划归燕国。"

燕国初受北戎侵扰时，也曾求救于鲁国。鲁庄公召集群臣商议，大臣们都反对说："部队千里远征，进入蛮荒之地，很难保证安然无恙地返回。"鲁庄公不便公开拒绝燕国使者，表面应允，实际上按兵不动。齐桓公率军从燕地返回，欲借此讨伐鲁国的不义行为。管仲急忙劝阻说："诸侯尚未完全亲近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诛伐鲁国，必使邻国都惧怕我们，那霸王之道也就无法实现了。"齐桓公觉得管仲言之有理，不但没有用武力干涉鲁国，反面把缴获山戎的珠宝器物献给鲁国，纳之于周公之庙。鲁国人十分喜悦。

齐桓公二十五年，卫国（今河南淇县）突然受到赤狄袭击，派使臣到齐国求救。齐桓公不以为然，没有发兵。没过多久，卫国的大夫跑到齐国报告说："我们国君被赤狄杀死，国破家亡，只剩下少数人逃到曹邑（淇县东南）去了。他们派我来报告，请求援助。"桓公听后方知问题严重，派公子无亏带领人马赶赴曹邑。赶到那里的时候，卫国的幸存者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境况十分凄惨。公子无亏从别的地方好容易又找来些人，凑了五千人，立卫国的公子燬为国君，即卫文公。

公子无亏眼见卫国没有城池，处境仍然十分危险，便留下三千人戍守，自己回到齐国向桓公作了汇报。管仲说："留下三千人，不修城池总不是妥善办法，应该帮助卫国修筑城池。"齐桓公觉得言之有理，打算召集各诸侯国共同帮助卫国。

正当齐桓公准备替卫国筑城，不料赤狄又北上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西南），情况十分危急，派使者向齐国求救。管仲对桓公说："戎狄蛮族有如豺狼一般，贪得无厌；华夏诸侯各国都是兄弟邻邦，所以不能遗弃任何国家而由蛮族随意侵略。安居享乐有如毒药一般，不可贪恋。《诗经》中说：'谁不怀念故乡，只因畏惧简书。'简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就是让各诸侯国同忧共患，共御外敌，这是大义所在。臣认为我们应立即发兵援救邢国，维护王道大义！"齐桓公听取建议，立即发兵赶往邢国。

齐桓公派兵救邢的同时，派使者通知鲁、宋、曹、邾等国一同派兵去援救邢国，约定在聂北（今山东聊城）会合。各国接到通知后，想法不一，只有宋国和曹国的国君带着部队赶到聂北，鲁国和邾国不肯出兵。齐国人深知北狄作战凶猛，便寻找借口拖延，说："我们还是等到鲁国和邾国的队伍来到后共同进攻吧！"于是按兵不动在聂北观察了两个月。

邢国人顽强守城，赤狄日夜猛攻不息。最后，邢国人实在无法坚守下去，便打开城门杀出一条血路，向城外逃亡，人员伤亡惨重。赤狄冲入邢国城中，大肆抢掠，然后放火将全城焚为一片废墟。等到齐桓公率军赶到，为时已晚，整座城池成了一片焦土，找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屋。齐桓公问邢国国君叔颜："你看这城还能修复吗？"叔颜摇头答道："即使修得再好也没多大意义，因为老百姓都逃到西边的夷仪去了。"齐桓公于是带着齐、宋、曹三国的人马到了夷仪，帮助邢人修造城墙。齐桓公派人回到齐国运来粮食、衣物、木材等，还赶来了牛马。经过一番努力，不但修筑了城墙，还在城内建起了庙堂、宫殿和民房。邢国的人们感激万分。

宋、曹两国的国君见邢国城墙已经筑好，便打算收兵回国。齐桓公立即说："邢国城池虽已筑好，卫国人还荒居在野外，我们不能弃之不顾。"于是，带着人马奔往曹邑。见到卫文公，说明了造城意图。卫文公说："如果再筑城的话，最好在楚丘（今河南滑县）兴建。"齐桓公带领宋、曹各国人马赶到楚丘，修城筑墙，又派人回到齐国运来建筑材料。一座新城就这样平地拔起，卫国人又有了自己的新都，人们对齐桓公感恩涕零。

救邢存卫，的确救了两个濒临绝境的国家，使齐桓公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威望，各诸侯国纷纷归向齐桓公，向齐国纳贡，听从齐桓公的指挥。鲁国和邾国没派军救邢，自知理亏，也向齐桓公表示歉意。

就在齐桓公威震天下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征服周围的小国，势

力逐渐强盛起来，也试图向中原地区扩展势力。齐桓公二十八年九月，齐国先发制人，召集宋、江、黄各国君主在宋国的贯（今山东曹县南）地举行盟会。江、黄两国原来一直依附于楚国，江、黄两国叛楚，使楚国更加愤怒。同年冬天，楚国派军攻打地处楚国北面要冲的郑国，俘虏郑国大夫聃伯。

齐桓公二十九年秋，齐桓公召集宋桓公、江和黄两国国君在齐国的阳谷（今山东阳谷北）会谈，策划讨伐楚国。阳谷之会，鲁国没有参加，所以，齐桓公派人到鲁国，要求鲁国参加联盟。同年冬天，鲁僖公派季友到齐国，与齐桓公举行盟誓。此时的楚国也剑拔弩张，再次发兵攻击郑国。郑文公想向楚国求和，大夫孔叔却不赞成，说："齐国目前正想援助我们，帮助我们解除外患，我们切不可辜负了齐国的美意。"郑国派人向齐国求救。

管仲对齐桓公说："与其去救郑国，不如直接攻击楚国。要进攻楚国，必须会合各诸侯国共同出兵。"齐桓公说："约合各诸侯国共同出兵，难免声张出去，这会使楚国做好充分的准备。"管仲说："蔡国与陛下结怨，陛下早就想报此怨仇。我们声言讨伐蔡国，到时候袭击楚国，定能成功！"

当初，齐桓公同夫人蔡姬在花园的湖中划船，蔡姬同桓公开玩笑，故意摇晃小船吓唬桓公，桓公吓得要命，喝令蔡姬停止晃船。可是蔡姬不听，摇得更凶了。桓公非常恼怒，一气之下将蔡姬遣送回蔡国娘家，但并未解除婚约。岂料，蔡侯一怒之下把蔡姬又嫁给了楚国，做了楚成王的夫人。因此，齐桓公早就想征伐蔡国。

齐桓公三十年春，齐桓公率领着齐、宋、鲁、陈、卫、郑、曹、许八国联军征伐蔡国。蔡国不堪一击，一战即溃，蔡侯连夜跑到楚国。于是，联军转面进攻楚国。刚入楚国边境，楚军已严阵以待了。齐桓公诧异地问管仲："楚国怎么会知道我们来？"管仲说："莫非有人走漏了消息，使其有了防备。不过，既然楚国使臣已经

前来，我们先礼后兵也无妨。”齐桓公派管仲去会见楚国大夫屈完。双方见面后，管仲还未开口，屈完就抢先发难了：“我们楚成王听说贵国大军前来，特派我前来迎问：齐国地处北方，楚国地处南方，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如今你们大兵压境，到底是为什么？”管仲振振有辞地答道：“当初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姜太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伯爵你都可以发兵征讨，以便和周公共同辅佐周王朝。’周天子册封我先君直接统治的地域，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楚国应向天子献贡的苞茅没有送去，致使周天子无法酿酒，我们特地前来索取，此其一；以前周昭王南巡一去而不返，我们齐国请问你们楚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其二。”据说周昭王曾率领大军南巡征伐，需要造船渡过汉水。楚国地区的造船匠使用诡计，用胶粘船体，然后交给周昭王。周昭王乘船渡河，船至河心开胶解体，大军覆没，周昭王和祭公都丧身汉水。所以，这次齐桓公伐楚，管仲把这事重新提出来当作理由。楚国大夫屈完软中带硬地回答：“没有按规定向周天子献纳贡品，这是我们楚国的过错，今后定要按时纳贡。至于说周昭王南巡未归，阁下去问汉水两岸的人好了！”齐桓公没有得到什么口实，仍率各国联军向楚都进发，驻扎在楚国的陉这个地方。

同年夏天，楚成王派屈完为特使，再次来到齐桓公这里，以便观察联军的虚实。不久，联军撤至召陵。齐桓公命令联军各部队摆好阵列，然后让屈完与他同乘一辆战车检阅军队，为的是炫耀武力，恫吓楚人。齐桓公对屈完说：“寡人并非夸耀军威，只为继续先君之间的友邻关系。阁下认为我们双方重建邦交如何？”屈完回答：“陛下为楚国带来福禄，如蒙不弃，我们楚国当然十分欢喜。”齐桓公话锋一转：“你看看这么强大的军队，以此陷阵，没有打不败的对手，用来攻城，没有攻不下的城堡！”屈完以牙还牙：“陛下如用德政安抚天下，天下各国没有人敢不服从；要倚仗武力威胁别国，我们楚国宁愿把方城山作为城墙，汉水作为护城河，陛

下军队虽多，但丝毫没用！”齐桓公见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知道楚国不易征服，便说：“大夫文武双全，令人钦佩！我们各国订立盟约，建立友好关系怎么样？”屈完笑着答道：“陛下恩赐楚国，我们求之不得！”随后，屈完代表楚国与中原地区的八个诸侯国订立了盟约。屈完替蔡国陪情，齐桓公也为郑国解释，事情也就这样了结了。随后，各国罢兵而归。

回军途中，鲍叔牙问管仲：“楚为四等诸侯，应该称楚子，但是他们擅自称王，罪名很大，你不责问，却问他们不纳贡苞茅这样的小事，你是怎么想的？”管仲解释说：“楚国擅自称王，罪大滔天，如果我以此责问，必然会陷人僵局，就非得打仗不可了！一场战争，双方损耗都很大。正因为不献纳苞茅事小，楚国容易承认过错，知道理亏，也就容易达成和解了。”鲍叔牙听后更加佩服管仲的谋略。

战事刚刚告罄，诸侯内部矛盾便生。八国联军回撤途中，陈国大夫辕涛涂对郑国大夫申侯说：“这次联军返回，如果再经过陈、郑两国的边界地区，我们两国还要沿途犒劳，人民负担沉重。若使联军绕道东方，向东夷人显示军威，沿着海岸地区回国，岂不更好？”郑国大夫申侯说：“好极了！”辕涛涂便把这个建议向齐桓公提出，齐桓公好武，同意了。谁知郑国大夫申侯却暗自会见齐桓公说：“我们各国军队已疲惫不堪，再绕道东方，难以支持，遇到敌军就危险了。况且，走陈、郑两国边界地区，部队可以得到犒赏，有充足的军粮和草鞋供应，何必绕道。”齐桓公觉得有理，也悟出陈国的用意。遂下令逮捕辕涛涂，把虎牢关（今河南巩县东）赏赐给郑国。这年秋天，齐桓公又讨伐陈国。

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带了苞茅去拜见周惠王，周惠王十分喜悦，对楚国大加赏赐，还把祭祖的祭肉赏给楚国，对屈完说：“好好镇守南疆，莫与中原各国相争。”恰好齐桓公派隰朋来向周天子报告南征情况，周惠王对齐桓公也大加褒奖。

齐桓公率各诸侯国军队讨伐陈国，陈国的国君十分害怕，便向齐桓公求和。齐桓公见事已如此，也只得作罢，将辕涛涂交还给陈国。

辕涛涂回到陈国以后，十分痛恨郑国大夫申侯的卑鄙伎俩，便设法报复。他表面上装作丝毫也不记仇的样子，劝申侯说："你真幸运，齐桓公能把虎牢这块宝地赏给你。应该把你封邑的城修得富丽堂皇，让你的子孙们永远铭记此事。你自己不便去说的话，我可以到国君跟前替你求情。"申侯果真照辕涛涂说的去做了。后来，当申侯把虎牢城修缮之后，辕涛涂又跑到郑文公那里说坏话："申侯在自己封地内把城修得那么坚牢，莫不是要叛逆造反吧？"郑文公听后顿生疑心，终于将大夫申侯抓起来治罪。辕涛涂总算出了这口怨气。

齐桓公三十一年秋天，为使周王朝的太子郑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齐桓公召集宋、鲁、陈、卫、郑、许、曹各国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开会，并要周惠王派太子郑光临大会。原来，隰朋拜谒周天子的时候，要会见太子。太子郑是王后所生，王后死后，惠王就把他所宠爱的妃子立为王后。因而，周惠王有意废掉太子郑，另立第二位王后的儿子王子带为太子。隰朋要见太子，周惠王便让太子郑和王子带一同出来见面。隰朋立刻明白了其中用意。回到齐国后，隰朋对齐桓公说："陛下身为霸主，王室要出乱子，您怎么能视若罔闻呢？"齐桓公召来管仲商议此事，管仲说："陛下可以对天子说，各诸侯国君要会见周太子郑。一旦开过大会，天下皆知，周惠王想废掉太子也不成了。"周天子无可奈何，只得让太子郑前去与会。齐桓公对太子郑说："你的处境我十分清楚，不必担心，我来帮助你。"于是，故意拖延会期，使太子郑与各国诸侯都非常熟悉。直到秋季八月，才最后举行盟誓。

齐桓公此举使周惠王十分恼火，自己的如意心愿化为泡影，惠后也怒气冲天。为报复齐桓公，周惠王派周公前去召来郑文公说：

"你们郑国近年一直不安定，无非是齐、楚相争造成的。如果你同楚国搞好关系，我再让晋国帮助你，那么郑国就可安然无恙了。"郑文公听天子一席话，十分高兴，但一想没有参加各国盟誓又很担忧害怕，不敢再去与会，想偷偷溜回郑国。郑国的大夫孔叔劝阻说："陛下的一举一动且不可轻率，否则会失去忠臣的辅佐；一旦失去贤佐，祸患就会降临。到灾难来临再请求参加盟会，为时就晚了，悔之莫及！"郑文公听不进孔叔的良言相劝，以为有楚、晋两大国撑腰，郑国的处境就好了，于是直接回郑国去了。

郑国不参加盟会激怒了齐国。齐桓公三十二年夏天，桓公召集宋、陈、卫、曹各国开会，声讨郑国的罪行，并派军包围了郑国的新密城（今河南密县）。郑国派使者向楚国求援，楚成王立即发兵围攻齐国的盟国许国。各国联军急释郑围救许。郑围已解，楚成王也班师回国。

齐桓公三十三年春，齐国再次发兵围攻郑国。郑国的大夫规劝郑文公："俗语说：'心志不坚，何惧屈辱？'如果一个人的意志既不坚强，也不柔弱，那他就危险。我们郑国已面临生死存亡，请陛下臣服齐国，拯救国家！"郑文公思忖后说："寡人知道齐国来伐的原因，请你们姑且稍候！"孔叔焦急地说："郑国朝不保夕，如何等待！"

这年夏天，为了取悦于齐桓公，也由于听信陈国大夫辕涛涂的谗言，郑文公将大夫申侯杀死。申侯是楚文王的宠妾申姬所生，很受楚文王钟爱。楚文王临终时赐给申侯一块玉璧，让他离开楚国，说："只有寡人最了解你，你贪图钱财不知满足，过去一味地向我索求，这没什么事。将来继位为君的人，将会苛求于你，到时恐怕你难逃噩运。寡人死后你必须赶紧离开楚国，而且不要到小国去，小国保不住你。"楚文王下葬后，申侯就逃亡到郑国，受到郑厉公的宠信。现在，郑文公杀死申侯，楚国大臣令尹子文说："古人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真是至理名言呀！"

郑国杀掉申侯，做出与楚国疏远的姿态，使齐国怒气大消。同年秋天，齐桓公与鲁僖公、宋桓公、陈国太子款、郑国太子华在鲁国的宁毋（今山东鱼台）开会，讨论有关郑国的问题。管仲奉劝齐桓公："据臣所知，招抚离心的人要有礼貌，怀柔远方的人要有品德，二者兼有，人们就会深受感动。"桓公听后若有所悟，对与会各国礼遇有加，各国都心甘情愿地接受齐桓公的号令，向天子贡献应纳礼物。郑国的太子华对桓公说："我们郑国的泄代、孔氏、子人氏三族专门与陛下您作对，陛下如能帮助郑国铲除这三族，对陛下来说是件好事，郑国会一心一意地听您指挥。"

齐桓公准备答应太子华的请求，管仲劝阻说："陛下用礼和义号召诸侯，诸侯召之即来，如今却要背弃礼义，万万不可。不干涉别国内政是礼，救人危难是义，违背这两项原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齐桓公说："我们先前曾讨伐郑国没有成功，如今郑国内讧，岂不是天赐良机？"管仲回答："陛下用德政服人，训之以理，这样去讨伐郑国，郑国人危亡求存，怎能不惧怕？太子华在国外干这样的事，他是郑国的罪人。我们随着罪人去威胁别人，郑人必会振振有词地辩驳，怎会惧怕我们。联合诸侯各国是为了维护国际正义，否则如何垂范于后人！大规模的国际活动各国都有档案，把不正当的事记录下来，我们的尊王称霸活动就是失败。郑国的子华身为太子，却企图借别国力量来干预自己国内的事务，他这是在制造祸患。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人执政，我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拒绝了郑国太子华的请求。同年冬天，郑文公派特使到齐国，请求与齐国结盟，郑国正式结束了与齐国的对立。

齐桓公三十四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立刻召集宋、鲁、卫、陈、郑、许、曹各国君主在曹国的洮城（今山东濮县西南）开会，共同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

齐桓公三十五年夏，同盟各国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东）续修

盟约，齐、鲁、宋、卫、郑、许、曹各国国君都前来参加。周襄王也派宰孔到会，并赐给齐桓公祭肉，说："周天子祭祀文王和武王，特将祭肉赐予伯舅。"① 齐桓公准备下台阶行跪拜大礼接受赏赐，宰孔忙加阻拦："且慢！天子还有诏令。我临来前天子特意恩准说，伯舅年事已高，加赐一级，免去跪拜之礼。"齐桓公听后洋洋自得，准备接受祭肉，管仲一见急忙阻拦，低声耳语道："万万不可违背周礼，否则霸业告吹！"齐桓公慌忙奔下台阶，回答说："天子的威严丝毫不得违背，小白若接受免礼的恩赐，会破坏礼法，使天子蒙受玷污，我必须下拜！"行跪拜礼后，桓公走上台阶接受了赏赐。

同年秋天，齐桓公再次召集同盟各国国君开会。在这次大会上，齐桓公摆出一副霸主模样，发号施令说："凡我同盟各国，续修盟约之后言归于好。各国之间应彼此关照，不准堵塞河流断人水源，不许饥荒年代囤粮不卖，严禁违背宗法制度废黜太子，严禁立妾为妻，严禁妇人干预国政！"各国国君看到齐桓公的样子很是反感。

齐桓公想借诸侯会议之机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地位，声称："寡人南征召陵，抵达熊山；北伐山戎、孤竹；西伐大夏，穿越沙漠，攀登太行山，抵达卑耳山。所到之处，没有人敢违背我的意志。我率军南征北战，救死存亡，使天下安然有序。过去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承天命为天子，他们的功德超过我了吗？我要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承受天命！"齐桓公蓄意取代周天子的地位。管仲听了齐桓公的表白之后大惊失色，设计阻挠，但桓公一概不听。最后管仲说："古代先王封禅受命，在祀典上要有鄗上生长的黍，北里生长的禾，江淮流域生长的三脊茅草，东海的比目鱼，西海的比翼鸟。然后，吉祥物自动就会来临。可如今，凤凰和麒麟

① 周人姬姓，齐人姜姓，姬、姜两族世代通婚，况齐桓公年长，故周襄王尊称之为伯舅。

没有来临，田里没生长嘉谷；来临的是乌鸦，田里野草茂盛，怎能封禅！”桓公理屈词穷，才没干出越轨行为。

齐桓公的骄横行为日益不得人心，会盟的诸侯人心分离。葵丘会盟后，宰孔在返回的途中遇到赶去会盟的晋献公，宰孔说：“贤公根本不必去参加会盟，齐侯不重道义，一味炫耀武力，北征山戎，南伐楚国，往西召开这次诸侯大会，往东还不知道搞些什么名堂！晋国内乱未息，不必急于参加这样的盟会。”晋献公听完这话便绕道回国了。

齐桓公三十九年春，桓公派大夫仲孙湫到周襄王那里朝见，以便讨论流亡在外的王子带的问题。周襄王不愿议论此事。仲孙湫回到齐国后对桓公汇报说：“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天子余怒未消，最少还要等待十年。否则，天子是不会让王子带回国的。”同年夏天，东方的少数族淮夷侵犯杞国，齐桓公在卫国的咸（今河南濮阳东南）地召集宋、陈、卫、郑、许、曹各国开会，商议护卫杞国。秋天，戎人侵犯周王朝，各诸侯国纷纷派兵守卫，并推举齐国大夫仲孙湫为联军统帅。

齐桓公四十一年春，由于徐国（今安徽泗县西北）亲近中原各国，楚国派兵攻徐。同年秋天，齐国、曹国军队为救援徐国，联合攻打楚的盟国厉国。冬天，楚军在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击败徐军。第二年，齐国再次出兵伐厉，未能取胜，转而救徐。自葵丘之会以后，由于齐国的内部矛盾，以及失去各诸侯国的同心协力，力量日衰，已无法阻挡楚国的北进。

齐桓公四十三年，七十三岁的桓公得重病，被竖刁、易牙和公子无亏关闭在宫中，病困而死。不可一世的齐桓公，最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感叹！

齐桓公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环境看，天子地位衰落，当时有秦、晋、楚、齐四个大国。秦地处西部边远地区，对中原事务鞭长莫及；晋国内乱，使献公无力

外争；南方楚国蒸蒸日上，虽也想争霸，但主要力量需用于征服周围小国；唯有齐国处中原腹心之地，可号令各弱小国家。从国内情况看，齐桓公早年知人善任，起用政治家管仲，一方面在国内适时地进行改革，使国力大增，另一方面策略得当，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使王室认可，诸侯归附。齐桓公晚年，居功自傲，外失诸侯，内失国政，奸臣干政，霸业垂危。桓公一死，五子争位，内乱大起，几十年的功业毁于一旦。随之而来的是晋、楚两国厮杀不已的并霸局面。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齐太公世家》、《刺客列传》、《封禅书》。

《左传》庄公十年至僖公十七年

《国语·齐语》

《管子》：《大匡》、《中匡》、《小匡》。

《谷梁传》

《公羊传》

晋灭虞虢

曲沃武公以封臣的身份消灭了晋国宗室,取得周天子的认可,正式列为诸侯。两年之后，武公去世，随后即位的是晋献公。晋献公吸取了曲沃灭晋的经验教训，在大夫士蒍的帮助下，一举根除了曲沃桓叔和曲沃庄伯的宗族势力,除去了发生内乱的隐患。随后，晋国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对外扩张。先是讨伐骊戎，又讨伐皋落，并灭掉了耿、霍等周边小国。在这一系列的对外扩张中，最有影响的事件是晋国灭掉了虞和虢两个国家。

虞和虢位于晋国南方，虞国在今山西平陆东北，虢国位于今河南陕县东南。春秋初年，周平王为摆脱郑国的控制，曾任命虢公担任周王朝的卿士，与郑伯共同辅佐天子执政。鲁桓公十年(前 702),虢国的国君虢仲与大夫詹父发生矛盾,便到周天子面前说詹父的坏话。大夫詹父闻听此事，立即率领周天子的军队讨伐虢仲。虢仲自知力不能敌，仓皇逃跑到虞国。这时虞国的国内也是内乱重重。虞国的贵族虞叔有一块宝玉,国君虞公向虞叔讨要,虞叔不肯献纳。事后又觉得不太妥当。他对别人说:“周人有一句谚语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罪,可是当他身怀宝玉的时候就有了罪。既然如此,我又何必保留这块玉石,这简直等于自惹灾祸。”因此,就把这块宝玉献给了国君。然而虞公贪得无厌，不久又向虞叔讨要宝剑。虞叔顿时怒发冲冠,说:“这简直是贪得无厌!如此下去,早晚有一天要加害于我。与其等到将来受害，不如现在就铲除祸根!”于是，率领自己的族人讨伐虞公，迫使虞公逃亡到共池（今

山西平陆境内)。虢、虞两国的内乱大大地消弱了这两个国家的实力。然而,力量弱小的虢国竟然不自量力,想从晋国捞取好处。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虢国先后两次派兵骚扰晋国。这时晋国的国君是献公。晋献公在国内清除了桓、庄两族势力,自己立稳脚跟,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看到虢国前来寻衅,准备立即派兵攻击虢国。大夫士蔿劝阻说:“陛下切不可轻举妄动。现在虢公自以为有周天子作靠山,骄狂无度。如果我们现在暂时克制自己,让虢公事事都凌驾于我国之上,他就必然会更狂傲,丧失人心。等到没有人民支持他的时候,我们再发动进攻,那时灭掉虢国不过是举手之劳了。礼、乐、慈、爱这四个要素是战争的重要条件。使人民谦让有礼、安和乐利、抚养亲人、哀悼死亡,然后才能使他们为国家效力。虢国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人民都有后顾之忧,可是虢公却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怎能不导致国家灭亡。”

鲁庄公二十九年,周天子朝中的大夫樊皮发动叛乱,周惠王命令虢公领兵讨伐。第二年四月十四日,虢公率军进入樊邑逮捕了樊皮,然后押送回京师。

鲁庄公三十二年七月,据说有神降临在虢国的莘地。消息传到周天子朝中,人们议论纷纷。周惠王就此事询问太史过:“这是怎么回事?从前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太史过镇定地回答:“从前就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国家将要兴旺发达,它的国君励精图治,按礼法办事,恭敬地祀奉神灵,在国内实施德政赢得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神灵会佑助,人民会同心同德一致行动。于是,神灵便会出现,观察这个国家实施的德政,然后赐予福禄。一个国家将要衰亡,它的国君荒淫无度,骄奢淫佚,不祀鬼神,残暴地镇压人民,导致人民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形下,神灵不佑,人民叛离。于是,神灵也会出现,观察这个国家的暴政,然后降下灾祸以示惩罚。可见,同样是神出现,有的时候是国家将要兴盛的标志,有时是即将灭亡的标志。从前,夏代将要兴盛的时候,祝

融神降临崇高山；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火神回禄降临聆隧。商族即将兴盛的时候，梼杌神出现于丕山；商朝将要灭亡，在商郊牧野出现了一只神羊。周族兴盛前，神鸟在岐山上长鸣；周朝将衰，被无辜杀死的杜伯再显神形射死周宣王。夏、商、周三代这些事例，都是神灵显现的例子。”

周惠王听后，急着又问：“如今虢国出现的是什么神？”太史过回答说：“从前周昭王娶房国的公主为夫人，人们称她为房王后。房后的行为有些像神灵丹朱，所以，丹朱依附于房后身上，房后生下了周穆王。可能就是这个神灵在观察着周人的子孙后代，随时赐福降祸。一般说来，神灵不向远处迁徙，依此看，可能就是丹朱神。”周惠王随后又问：“现在这神灵是向着谁而来的呢？”太史过回答：“是对着虢国而来的。”惠王迫不急待地问：“那它要怎样？”太史回答：“臣曾听人说，政治清明而显现神灵，会得到福佑；荒淫无道而得到神灵，会得到祸灾。如今虢国政治不好，恐怕是要灭亡了。”周惠王又问：“那我该怎么办呢？”太史回答：“陛下可派太宰、太祝、太史[①]率领着丹朱的后代狸姓各族，带着祭祀用的牛羊和五谷以及玉帛前去虢国的莘地，到那里之后献上礼品，然后就回来，千万不要向丹朱神祈求什么，否则会遭殃。”

随后，周惠王又问太史过：“你看虢国还能延存多久？”太史回答：“从前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每隔五年到各地视察一次。丹朱是尧的后代，仍会遵循尧的惯例。一般说来，神灵出现不会违背自己的常规。依此来看，虢国最多还能延续五年。”

听完太史过的一番讲解，周惠王便派太宰忌父率领着太祝、太史以及狸姓各族的人们带上丰厚的祭品前去莘地献祭。太史过随从一同前往，到了虢国境内，看到虢公正派虢国的祝和史官向丹朱神请求赐予土地。太史过回到周王朝后感慨地说：“虢国不亡才

① 太宰：即卿士；太祝：负责祭神祈祷；太史：史官。

是怪事！不诚心诚意地祭祀神灵，却想得到神灵的保佑，神必会降下灾祸；不对百姓施行德政，却想让人民为他效力，人民必会背叛。如今虢公耗尽人民资财，为所欲为，神灵和人民都对他不满意，他却还在想扩张国土，岂不难比登天！”

在进攻虢国以前，晋国先灭掉了周边的小国狄和霍。一天，晋献公出外打猎，看到狄国内混乱不堪，心中便生伐灭狄的念头。打猎回去之后，食不甘味，寝不能眠。大夫郤虎上朝，献公对他说：“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你看是何缘故？”郤虎明知其中缘故，却搪塞说：“陛下睡眠不好，莫不是骊姬没有在身边？”郤虎退下朝后，遇到士芳，对士芳说：“现在国君夜不能眠，必是打算讨伐狄的缘故。狄的国君昏庸无道，聚敛财富失去民心，朝中官员一味阿谀奉迎献媚以求得高官厚禄，正直的官员受到排挤迫害。如果现在攻伐狄，定能取胜。这些话我没对国君讲，就请你去商议吧！”士芳随后上朝，把狄国内的情形作了全面分析，劝献公出兵。献公听后十分喜悦，立即下令整军出发。大军攻至狄城下，郤虎一马当先，攀登城墙，他手下的军官阻拦说：“你是负责指挥的将领，怎能跑到前面冲锋陷阵？”郤虎回答：“我没有神机妙算，若再不奋勇杀敌，用什么报答国君！”说完，奋勇当先，率领部队一举攻克狄城。此后不久，晋献公又率军一举灭掉霍国。

虢公不修德政，日益残暴。一天，他在庙中休息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神人脸上长满白毛，脚像虎爪一样，手执铁钺站立在庙内西墙下，自己吓得魂不附体，抱头窜逃。神人大声怒斥道：“站住！上帝已经下达命令，派晋国军队袭击虢国。”虢公听毕，就地跪拜叩头。醒来后十分害怕，召来史官占卜。史官占卜后回答：“照陛下描述的形象，那神人是上帝宫廷中掌管刑罚的蓐收。上天是赐福还是降祸，从派来的官员就可以得知。”虢公内心空虚，听完史官的话更加恐惧。但他为了排泄自己的恐惧，竟然下令将史官囚禁起来，并且命令文武百官上朝祝贺自己。大夫舟

之侨对自己的族人说："人们都说虢国不久就要灭亡，我今天真正知道灭亡的原因了。国君不思悔过自新，却让人们去祝贺自己的国家遭受袭击的梦，这对自己的国家有什么益处？真是荒唐至极！我听人们常说，大国有道，小国纷纷靠拢叫归服；小国无道，大国来讨伐叫诛。如今虢国人民痛恨国君骄奢无度，人心叛离。国君让人们前去祝贺他，他必定更加奢侈无度，这是上天在把他引向绝路。一旦晋国发动进攻，国君下达作战命令没人执行，国外没有诸侯的支援，岂不危险！"

鲁闵公二年（前 660）春天，虢公对周边的少数族犬戎发动进攻，在渭水和汭水流域击败犬戎。舟之侨对族人说："不修德政，一心想攻击别国取好处，这是国家的祸殃，大祸即将临头了！"带着族人逃到晋国去了。

鲁僖公二年（前 658）的一天，晋献公召集文武官员上朝问道："寡人近来睡眠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大夫荀息上前说道："是否虢、虞两国的事搅得陛下心神不宁？"荀息此语正中献公下怀。献公把荀息召入内宫秘密商议说："我想进攻虢国，但担心虞国救援；如果进攻虞国，又怕虢国援救，这便如何是好？"荀息沉思着说道："陛下若采纳我的建议，今天攻克虢国，明天就能铲平虞国，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献公忙问："你说该怎么办？"荀息继续说："请陛下拿出屈地所产的名马，以及垂棘出产的美玉，送给虞国，然后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献公显出有些不舍的样子，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晋国的稀世珍宝呀！"荀息说："如果虞国肯于借路，我们消灭了处于虞国外面的虢国，虞国就像晋国的国库一样，处在晋国腹地。我们今天把这些宝物送到虞国，就像从内部仓库里取出东西放到外边仓库里一样，一件也不会少，陛下有什么不放心呢！"献公听后觉得言之有理，略作思忖又说："可是虞国还有名臣宫之奇在呀！宫之奇足智多谋，不会不知道我们的主意。"荀息继续回答："说起宫之奇的为人我很了解，他生性懦弱，不能始

终坚持自己的主见与君主抗争。况且，他从小跟虞君一起在宫中长大，虞君同他关系亲昵，不会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虞君贪图财利，不会听从别人的话。”

于是，晋献公让荀息带着宝马和美玉来到虞国，向虞君借道说：“从前冀国不遵守国际正义，从颠軨侵入你们虞国，攻打你们虞国鄍邑的三门。后来冀国所以会衰弱，正是因为虞国国君陛下的英明。如今虢国不守国际正义，派军攻占我们晋国的边邑，侵略我们的南部边疆。因此，我们晋国才决定向贵国借一条进兵之路，以便我们向虢国兴师问罪。”虞君见到宝物心生欢喜，立即应允了。宫之奇劝谏说：“人人都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虞虢两国唇齿相依，一存俱存，一亡俱亡。晋国今天灭掉虢，明天就会掉转头来灭虞。陛下千万不可应允！”虞君不但不听宫之奇劝告，还派军队一同进攻虢国。同年夏天，晋国大夫里克、荀息率领晋国军队与虞军会合，一同进攻虢国，一举攻克虢国北部城邑夏阳。

夏阳失守，虢公不考虑如何收复自己的国土，却对北戎族发动攻击，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虽然在桑田（今河南灵宝稠桑驿）击败戎人，却无法挽救虢国的灭亡。晋国大夫卜偃说：“虢国必定亡国无疑了。丧失了夏阳不知恐惧，反而新建战功，这等于上天夺去虢君的镜子，使他失去自知之明，更加轻视晋国，蔑视国内人民。虢国很快就会灭亡。”

鲁僖公五年，晋献公再次向虞国借路进攻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也再次苦苦劝告虞君说：“虢国犹如虞国的外城墙，如果虢国灭亡，我们虞国就失去了城墙的屏卫，必会随之灭亡。晋国贪得无厌，我们决不可助长他们这种行为，应时刻警惕他们。上一次借路给晋国军队已经是错误的，怎能第二次再错上加错！人人都知这样的俗语：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用唇齿来比喻虞、虢两国关系是再恰当不过了。”虞君满不在乎地说：“寡人与晋国都姓姬，同一个祖宗，难道他们还会加害于寡人不成？”宫之奇回答：“太

伯和虞仲都是周太王的儿子，由于太伯不听从太王的话，以致他没有被立为嗣君。虢仲和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而且他们都担任周文王的卿士，对周王室建立了卓越功勋，这些功勋都记录在档案上，保存在档案库内。如今的晋国想要灭亡虢国，又怎会爱惜虞国。况且，虞国与晋国的关系不会比桓叔、庄伯二族与晋献公的关系更亲近。陛下说晋献公爱护虞国，那我请问：桓叔、庄伯的后代族人有什么罪过竟遭灭门之祸？依我看，正是因为他们关系亲近才使得晋献公感到受威胁。虽是骨肉亲族，受到威胁都要斩尽杀绝，对于我们虞国又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谈呢！”虞君争辩说：“寡人祭祀用的贡品丰富洁净，神必能保佑寡人。”宫之奇继续说：“据臣所知，鬼神并非保佑所有的人，而是谁有德行它保佑谁。所以《周书》中说：‘上天不亲近任何人，谁有品德保佑谁。’又说：‘祭品不是香气的唯一来源，光明磊落的德行才真正香气四溢。’由此看来，假如没有德政，人民不拥护，神灵不会享用祭品，因为神重视的是德行。如果晋国实施的是德政，他灭掉了我们虞国，然后给神灵供奉上洁净的祭品，难道神灵就不肯接受并保佑晋国吗？”

虞君无论如何也不听从宫之奇良言相劝，同意了晋国借路的要求。宫之奇悲痛地带着家人离开虞国：“虞国今年冬天就要亡国了，晋国借虞国之路消灭虢国，回来的时候顺路就会吞并虞国，用不着再特意派兵了！”

这年八月，晋献公率军包围了虢国都城上阳。献公问大夫卜偃：“寡人这次能否一战成功！”卜偃回答：“定能一战成功。”献公又问：“什么时候？”卜偃回答：“有歌谣唱道：‘丙日的清晨看不见尾星，一色的军装多么威武，军旗迎风招展。鹑星光芒四射，天策星暗淡无光，火星升高之时，虢公狼狈逃窜！’依此看，丙子日的清晨太阳在尾星附近，月亮在天策星周围，鹑星出现于正南方，这样的星象大概在九、十月之际。我们晋国可能就在此时取

胜。”

这年冬天十二月初一，晋军一举灭亡虢国，虢公狼狈逃到周天子那里，晋军凯旋归来。途经虞国时，袭击虞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虞国灭亡了。虞国的国君成了晋献公的阶下囚，此时悔之已晚。

晋灭虞、虢标志着晋国开始强大起来。此时，齐桓公在首止大会诸侯，眼看着晋国对外扩张却无力干涉。二十几年之后，献公的儿子文公终于使晋国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桓公十年至僖公五年

《国语》：《周语》、《晋语》。

《史记·晋世家》

《公羊传》

宋襄公图霸

宋襄公是一位以仁义著称的国君。齐桓公死后，他想继承桓公的霸业，争当霸主。但是，他根本不懂得争霸的实质，幻想用仁义实施霸业，结果泓水之战被楚军打得大败，自己也受了伤，回国之后不久便死了。宋襄公图霸遂成为春秋大国争霸中可悲的一幕。

宋襄公的父亲是宋桓公。宋桓公在世的时候，立了公子兹父为太子。后来，宋桓公却又十分喜爱另外一个儿子公子目夷。一次，宋桓公生了病卧床不起，公子兹父非常担忧。他想，父亲有病，怎样能使他高兴呢？于是，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便来到宋桓公床前，说："请陛下改立目夷作太子吧！他既比我年长，也比我有能力。将来他当国君，我当相辅佐他。"宋桓公问："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公子兹父回答："我的舅舅在卫国，他十分喜爱我。如果我将来即位为君，就没办法到卫国去居留了。不能到卫国去，是违背我母亲心愿的。另外，我的才能确实比不上目夷。"桓公不同意，公子兹父一再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桓公便点头同意了。派人召来公子目夷，对他谈了此事，目夷推辞道："我弟弟兹父能以国相让，这是世间最大的仁义之举。我的为人修养实在不如他，而且是庶子(非正妻所生)，即位以后名不正言不顺。"说完这话后，目夷就躲到了卫国，公子兹父也跟着一起到了卫国。三年之后，有一天宋桓公生病，派人到卫国去召公子兹父回国，说："你若再不回来，国无太子会使我担忧，病情加重。"听到这话，太

子兹父才从卫国回到宋国。不久，公子目夷也回到宋国。

宋桓公三十一年（前651），宋桓公病死。太子兹父即位，是为宋襄公。襄公即位后，由于公子目夷的宽宏仁厚，襄公就任命他担任左师[①]，管理政务。公子目夷很有行政能力，使宋国的政治局面迅速改观。

宋襄公即位不久，恰逢齐桓公召集各国诸侯在葵丘会盟。开会的时候，齐桓公和管仲当面托付宋襄公，让宋国将来帮助齐国的公子昭继位为君。宋襄公见得到霸主的信任十分高兴，一口答应下来。

早年，宋襄公的母亲生下襄公后回到卫国，就没有再回宋国。宋国在黄河以南，卫国在黄河以北。自襄公离开卫国后，母亲没能再见到他，思念之情难以排遣。于是，作诗一首以抒情怀：

谁说河面太宽广，
芦苇编筏可渡航。
谁说宋国路遥远，
踮起脚来可相望。

谁说河面太宽广，
一条小船可通航。
谁说宋国路遥远，
疾行只需一早晨。

宋襄公八年（前643），齐桓公去世，齐国五个公子争夺君位，厮杀不已。内乱中，公子昭逃到宋国，请求宋襄公帮助。宋襄公受了齐桓公的委托，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联络诸侯，接着齐桓公做个霸主，就答应了公子昭，准备会合诸侯共立公子昭为齐国的君主。

① 宋国是殷人的后代，仍延用殷代官名。左师，是国家的执政官，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

宋襄公通知各国诸侯，约定共同护送公子昭回齐国即君位。可是，多数国家没有理睬宋襄公，只有卫、曹、邾三国的人马前来会合。宋襄公带着四国的兵马气势汹汹地到了齐国，齐国的大臣们见来者不善，而且对方是来执行当初桓公遗嘱的，名正言顺，于是杀掉已经立为国君的公子无亏，迎接公子昭即位，是为齐孝公。

齐国是霸主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屈服于宋国，使得宋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宋襄公踌躇满志，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自己当第二个霸主。宋襄公十年，襄公想再次约合各国诸侯开会。鉴于上次经验教训，怕大国不理睬自己，便先召集曹、邾、滕、鄫四个小国举行会盟。到了开会的日子，曹国和邾国的国君准时到了，滕侯没把宋襄公放在眼里，过了几天才到。鄫国的国君鄫子干脆没有前去参加。宋襄公好像蒙受了奇耻大辱，觉得如不给不听指挥的诸侯一点颜色看看，自己的威信就树不起来。宋襄公责问滕宣公何故迟到，滕宣公讲不出合适的理由，宋襄公一怒之下把他囚禁起来。鄫子听到这个消息，知道鄫国不是宋国的敌手，便匆匆赶赴会议。宋襄公见到鄫子更是怒发冲冠，喝道："我召集盟会，小小鄫国竟敢不来参加，罪大滔天！"随后命令邾文公把鄫子押到次睢神庙内，用鄫子祭神，用以威慑东方的小国。宋国的左师目夷警告宋襄公说："古代祭祀有专门的制度，六种牲畜不能随便使用，小的事情不能用大的牺牲祭祀，又怎么敢用人来作牺牲品呢？祭神是为了人，人是神的主宰，用人作牺牲品祭神，神灵怎么能接受！过去齐桓公迁邢封卫，广施德政于天下诸侯，还有人批评他。如今陛下仅仅一次会盟就虐待两个国家的君主，而且用人去祭祀不合礼法的鬼神，这种做法想要称霸诸侯怎能成功？"宋襄公没有听从目夷的劝告。

杀了鄫子，滕宣公百般求饶，宋襄公此时怒气已消，便下令释放滕宣公。宋襄公的做法引起曹共公的极大愤慨。没等到歃血为盟的日子，曹共公就径自回到曹国。宋襄公本想杀一儆百，震

服各小国，岂料曹共公暗中逃会，今后还怎样发号施令？宋襄公又带着宋国军队进攻曹国。左师目夷眼看宋国失去人心，劝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知道崇侯暴虐无道，于是派兵讨伐。围攻三十天而崇侯不肯投降，周文王就自动撤兵，然后加强教化。随后再度发兵攻打崇侯，兵临城下没动一刀一枪，崇侯就主动投降了。所以《诗经》中说：'先立下规矩来管教自己的妻子，然后再把这种规矩扩展到兄弟之间，最后变成法制推行到全国。'如今陛下的德政在国内尚未昭彰，却发兵攻打别的国家，怎么能行得通？应该先检讨自己的品德，等到自己品德完善以后再讨伐别国。"这次进攻曹国结果不了了之。

宋襄公以武力威胁各小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称霸之心不死。这时，楚成王已经约合齐、鲁、陈、蔡、郑等国结成同盟。宋襄公以为借助于楚国的力量或许可以在大国间确立自己的地位，便决定前去联络楚国。只要楚国靠近宋国，其他各国自然也就会跟过来了。宋襄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臣，左师目夷坚决反对。他认为，楚是蛮夷之邦，素来不讲信义，约请楚国前来好比引狼入室。宋襄公却不以为然，他以为只要把楚国拉过来，自己马上就可以当上霸主，于是，便派遣使臣前往楚国，带去丰厚的礼品，请楚成王到宋国的鹿上（今山东曹县东北）与齐、宋共同开会，商议会合天下诸侯订立同盟，彼此友好，不再互相攻伐。楚国欣然接受了宋国的要求。宋襄公十二年春天，齐孝公先来到宋国。齐孝公是由宋襄公帮助当上国君的，当然不能忘了他的大恩。没过几天楚成王也到了宋国的鹿上。三位国君排位坐下。宋是公爵，又是主人，坐了第一位；齐是侯爵，坐第二位；楚是子爵，排第三位。宋襄公振振有辞地说："敝国打算会合诸侯，共辅周室，地点在盂（今河南睢县盂亭），时间在七月，我们开的是乘车之会，大家都不要带军队，你们看如何？"楚成王、齐孝公都表示同意，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左师目夷十分忧心地说："宋只不过是个小国，

却要同大国争地位，这是一种招惹祸端的行为。假使宋国仅仅被楚国打败倒是幸事，弄不好会亡国的！”

这年秋天，宋襄公乘车到盂地去会盟。左师目夷提醒说：“楚是蛮族，向来不讲信义，万一带来武装力量就危险了。还是应该带些兵马赴会为妥。”宋襄公不再乎地说：“既然约定不带武装，我们怎能失信于诸侯呢？”宋国左师无奈，只得依从。

宋襄公赶到盂地的时候，楚、郑、陈、蔡、曹、许各国君主都已经到了，只差齐孝公和鲁僖公没到。齐孝公因宋襄公把自己当作臣属一般，心中不悦，不愿意与会；鲁僖公不愿与楚蛮交往，所以没来。在这次盟会上，宋襄公还想与楚成王争地位，楚成王毫不客气地将宋襄公用武力劫持起来。左师目夷慌忙逃回国都。

左师目夷回到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立即同宋国的司马公孙固商议抵御楚军。公孙固认为，楚人劫持襄公为人质，必会以此要挟宋国。为安定国内，根绝楚人的要挟企图，应立即选立新的国君。大臣们一致赞同目夷为君。大敌当前，目夷也不推辞，随后发号施令派兵固守睢阳。不久，楚国大军攻至城下。楚将斗勃在城外高声叫道：“你们国君已被我们俘虏，如果你们尽快投降，或许还能保住他的性命！”公孙固站在城上高声回答：“我们宋国已经有了新的国君，我们决不会投降！”楚庄王见要挟不成，便下令攻城。连攻数日，没有丝毫结果。庄王十分恼火，要杀宋襄公。大夫成得臣劝阻说：“陛下曾说宋襄公不该杀死鄫子。陛下若杀了襄公，岂不同他一样？宋国已立新君，杀其旧君犹如一般的俘虏，没有什么意义，倒不如把他放回宋国。”这样放走宋襄公似乎有损楚庄王的威严，怎样寻求一个两全之策呢？成得臣说：“这次会盟，齐、鲁两国没有参加。鲁国自称礼义之邦，我们不妨带上礼品请鲁国前来。鲁僖公来后，一定会替宋襄公求情，我们借机顺水推舟。这样，既能落得一份人情，又能把鲁国拉拢过来。”楚成王觉得言之有理，立即照办了。

这年十二月十日，鲁僖公到了宋国的薄（即亳，今河南商丘北），参加各国诸侯的会盟。早年周天子曾唆使郑文公投靠楚国，郑文公便在盟会上提议由楚庄王当盟主。其他小国不敢反对，鲁僖公说到："做盟主必须注重道义，使人心服。眼下劫持了宋襄公，让天下人怎能心服呢？应该先放了宋襄公。"其他诸侯闻听此言，纷纷表示赞同，楚成王便顺势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被放出来，听说公子目夷已经做了国君，正不知投奔何处为好，公子目夷这时已派人来迎接他了。襄公回到国都，重新做了国君。回想这次盟会，越想心越烦。楚国蛮不讲理，诉诸武力；小小郑国竟然也为虎作伥，推举楚人做霸主。宋襄公满腹怨气一下子全都集中到郑国身上。

宋襄公十三年夏天，襄公发兵讨伐郑国。司马公孙固劝阻说："郑国虽小，但它依靠楚国。宋郑交战，楚必派兵干涉，我军敌不住楚军。"左师目夷也极力阻止，宋襄公概不依从。目夷无奈地说："襄公大难即将临头了！"

宋国的大军气势汹汹扑向郑国。郑文公慌忙派人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得悉，率领大队人马径直扑向宋国国都，宋襄公急忙回军阻击。司马公孙固警告说："上天从很久以前就遗弃了商族。我们作为商族的后裔，没有天命保佑我们。陛下执意复兴宋国，上天必不会赦免我们！"襄公还是不听。

这年十一月初一，宋、楚两军在泓水两岸隔河对峙。当时，宋军已经摆好军阵，等待出击。楚军正在抢渡泓水，有的已经上岸，有的仍在河中。司马公孙固见有机可乘，对襄公说："楚军兵力强，我军人少，应趁楚军还没完全渡过河的时候发动攻击，可将其一举击溃！"不料宋襄公却说："寡人不能乘人之危！"楚军陆续上岸，但还没摆好阵列，一片混乱，公孙固再次提议发动攻击，宋襄公仍坚持说："那不行！"直到楚军摆好阵列，襄公才下令开战。宋军哪里是楚军的对手，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宋襄公

的腿部也受了伤。

逃回国都后，人们都责难宋襄公。事已至止，襄公仍不知改悔，强辩说："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古人在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靠的是德政人心。寡人的国家虽然贫弱，也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公孙固批评说："陛下根本不懂战术，当我军面对强大的楚军，楚军在险要之处无法布阵，这就等于上天在帮助我们。当敌人在半渡时，我军应乘机攻击，或许可以取胜。凡是与我军作战的人都是敌人，即使其中有老年人也必须杀掉，何必去考虑他们是否头发斑白？培养人民的爱国思想，使他们勇于作战，唯一的目的是杀敌卫国。受伤的敌人，为什么不能杀死？假如可怜敌军中的老年人，还不如向他们屈膝投降。三军将士靠勇气作战，战鼓就是用来鼓舞士气的。善于鼓舞士气的话，遇到险阻也可以作战；鼓声大作士气高昂，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也是可以的。"

大约过了七个月时间，宋襄公腿部的伤急剧感染，屡治不愈，最后一命归天，他图谋称霸的事业也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宋国从此日益衰弱下去。后来真正成为中原霸主的是晋文公。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僖公八年至二十三年

《史记·宋微子世家》

《诗·卫风·河广》

《公羊传》

《谷梁传》

齐五子争位

春秋时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迁邢封卫，北伐孤竹，南伐荆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霸主。他是一个十分开明的国君，知人善任，胸襟宽阔，目光宏远，不计私怨。他任用政治家管仲，在齐国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社会改革，民富国强，国泰民安。

随着霸业的成功，齐桓公的骄傲自大情绪逐渐滋蔓起来。在国际事务中，他不再满足于充当霸主，而欲取周天子之位而代之，直接统治天下。一天，桓公问管仲说："寡人当初想称霸天下，借助于几位贤臣的忠心尽力，如今已经大功告成。我现在想进一步称王，你看怎么样？"管仲立即回答："此事我一概不知，请陛下找叔牙去问好了！"桓公又召来鲍叔牙问及称王的事，鲍叔牙也拒绝说出任何意见，说："陛下应找宾胥无来问这样的事。"桓公最后召来宾胥无，宾胥无断然回答："古代先王，上承天命，宏韬伟略，臣下恭行君命。如今，陛下的辅臣有韬略，足智多谋，我就知这些，不知其他！"桓公徘徊良久，反复思忖，才说："从前，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都有卓越的才能。周武王伐灭了殷朝，统治了天下七年而后逝世。周成王即位，靠周公旦的辅佐勉强维持住天下的统一局面。如今，寡人的儿子不如寡人，寡人也不如几位贤臣，同先王相比，我是注定难以称王了。"称王之事遂告罢休。

桓公晚年放纵于享乐，丢弃了当初的励精图治的精神，使得一群平庸无为、阿谀奉迎之徒聚集到周围。据说，桓公贪于饮食，

遍尝天下山珍海味，唯独没有尝过人肉的滋味。有一个叫易牙的人，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下锅烹了，然后献给桓公品尝，以此博得桓公的欢心。桓公贪于女色，三妻四妾，后宫数十人，经常发生内乱纠纷。有一个叫竖刁的人，为了接近桓公，自己用刀将自己的性器官割除，然后自告奋勇地帮助桓公治理后宫。卫国公子开方，出于个人的野心，离开卫国，来到桓公这里，百般献媚，取得了桓公的宠信。还有一个叫常之巫的巫师，善医人病，知人生死寿夭，经常为桓公释疑解难，也得到了桓公的纵容。这些人倚仗着桓公的恩宠为所欲为，成为齐国政治的潜在隐患。

针对齐国的这些问题，当时齐国有人编成隐语，设问于齐桓公。隐语说："齐国有三难。"到底有哪三难，难的是什么？桓公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去请教管仲。管仲答道："接近阿谀奉迎的小人，疏远正直耿介的君子，这是齐国的第一大灾难；爱炫耀武力，四处讨伐，忘记以德招抚天下之人，这是齐国的第二大灾难；国君年迈，却迟迟不立太子，这是齐国的第三大灾难。"桓公听后若有所悟，遂立公子昭为太子。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齐桓公在葵丘召集中原诸侯举行会盟。在这次盟会上，桓公将公子昭托付给刚刚即位的宋襄公，宋襄公答应将来一定予以扶助。桓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齐国公族内部的混乱局面造成的。齐桓公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是王姬，第二位夫人是徐嬴，第三位夫人是蔡姬。夫人虽多，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桓公还有六位妃子：第一妃是长卫姬，生下了公子无亏；第二妃是少卫姬，生下了公子元；第三妃是郑姬，生下了公子昭；第四妃是葛嬴，生下了公子潘；第五妃是密姬，生下了公子商人；第六妃是宋华子，生下了公子雍。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确立太子依照两条原则：第一，立嫡（正夫人之子）；第二，立年长者。嫡夫人无子，自然要立庶子，立庶子一般也要依年长的原则。规定这样的制度是为了避免群公子为争夺继承权而发生

内乱。然而，齐桓公喜爱郑姬和公子昭，随意立公子昭为太子。当时诸公子都已年壮，自然不会甘心服输。长卫姬拉拢易牙和竖刁，让他们鼓动桓公改立公子无亏为太子，桓公竟然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就埋下了后来齐国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的隐患。

齐桓公三十八年，桓公派管仲为特使前去朝拜周襄王。管仲归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患了重病，卧床不起，久治不愈。桓公的霸业完全倚仗着管仲的策略和才能，管仲病重，桓公十分焦急。眼见良医无回春之力，桓公便前去请教今后的国事安排。桓公悲伤地问："贤臣病重，大家都很焦急难过。万一贤臣不幸，寡人把国家委任于何人呢？"管仲有意推托说："臣过去竭尽智虑努力工作，没有把工作做好，如今卧病在床，朝不保夕，更是糊涂不清了。人常说，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还是请陛下自己考虑安排为妥。"桓公闻听此言着急地说："这是国家大事，万望贤臣赐教寡人。"管仲缓慢地点了点头。桓公继续说："你看将来相职委任给谁合适？"管仲若有所思，没有回答。桓公随后说："你看鲍叔牙怎么样？"管仲答道："鲍叔牙是一位正人君子，千乘之国委任于他，若不合他的志向，他也不会接受。话虽如此说，他担任相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他这个人生性耿介正直，好善乐施，嫉恶如仇。看到别人的某种缺点，念念不忘，不能宽容，不知用人所长，避人所短。""那么你看谁比较合适呢？"桓公接着问道。管仲略作思索，然后说："我看隰朋合适。隰朋这个人能理解君主的意图，而且能广泛听取别人的建议。能以德安抚别人，这是仁；能用资财帮助别人，这是良。能以善心待人，会使人心悦诚服。这正是隰朋的长处。他处理国政的时候，能够抓住重要问题，而不被一些小问题困扰；处理家政的时候，不计较那些皮毛小事。而且，隰朋看问题比较全面，身居家中，时刻不忘国家重任；身居宫廷中，能分清家与国的关系。一心事君，忠诚不二，这是隰朋的大仁大义所在。"桓公听后点了点头，顺口问道："别的大臣怎么样？"管仲说："除了鲍

叔牙为人耿介之外，宾胥无的特点是好善乐施，宁戚的特点是肯干实事，孙在的特点是能言善辩。”桓公问：“这四个人中，谁能胜任做全面的领导工作，执掌国政呢？”管仲回答：“谁都难以胜任。鲍叔牙太正直，只能伸而不能屈，不能团结人；宾胥无太善良，不能使人畏服；宁戚只知干事，不会做组织工作；孙在能言善辩，却不能使人心服。臣听人说：‘善于观察，能文能武，方能治理国家。看来只有隰朋一人比较合适。”管仲叹了口气，然后感慨地说：“上天降生了隰朋不过是作为我管仲的口舌呀！哪里有人死而口舌还能存活的呢？”

生命垂危之际，管仲最后劝诫桓公说：“万望陛下远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开方四人，这四人各怀异志，将会为害于齐国。”桓公不解地问：“易牙为了我，烹了自己的儿子，可说是忠心耿耿，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管仲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残忍地烹死，怎会爱陛下呢！”桓公又说：“竖刁阉割了自己，为寡人治理后宫，可算是忠心耿耿了吧？”管仲说：“不对。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竖刁不爱惜自己是出于野心，不是真正忠于陛下。”“那常之巫怎么样呢？”“常之巫虽能为陛下诊疾治病，占算命运，但人生命运是早就确定了的，常之巫也改变不了。他这个人心术不正，会害国害民的。”桓公最后说：“卫国的公子开方背井离乡来到齐国，跟随寡人十五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都不肯背离我回卫国哭丧，难道还值得怀疑吗？”管仲说：“人没有不爱父亲的。一个不爱父亲的人，怎能会真心地爱陛下呢！”桓公点头答应道：“言之有理！”不久，管仲就病逝了。管仲死后不久，隰朋由于过度悲伤也随之而逝。

依照管仲临终之言，齐桓公将易牙、常之巫等人驱逐出宫。然而，没有了这些佞幸小人，桓公寝食不安，遂生病卧床不起。桓公悻悻地说：“管仲的话也真是太过分了，问题哪有这么严重？管仲的话并非都完全正确呀！”不出一年，又把这些人都召回了宫中。

齐桓公四十三年，桓公此时已七十三岁，生了重病。常之巫为桓公诊过病之后，与易牙、竖刁等人聚集在一起秘谋说："陛下活不过几天，我们可以动手了！"于是共同发动叛乱，堵塞宫门，筑起高墙，使内外消息隔绝。然后矫称桓公的命令，大肆屠杀朝中异己官员，拥立公子无亏为国君。公子昭逃亡到宋国去了。有一个宫女翻越墙进入桓公宫中，桓公对她说："我需要吃饭和喝水。"宫女答道："现在宫门已被封住，常之巫、易牙等人发动叛乱，哪里还能有饮食呢！公子开方占据靠近卫国的大片齐国领土，投靠了卫国。"闻听此言，桓公慨叹流涕说："惭愧呀！圣人远虑，我不能及！若管仲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他呢！"这年十月初七，桓公病困而死。因朝中大乱，桓公尸体停放在宫中，尸体腐烂，蛆虫爬到了户外。两个多月之后，才勉强收尸入殓安葬。一代霸主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深思。

齐孝公元年（前642），公子昭在宋国军队的护卫下返回齐国。宋襄公是应当年齐桓公之托，武力扶助公子昭回国继承君位的。宋国军队来势汹汹，齐人恐惧，杀死公子无亏，准备迎立公子昭即位。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眼见君位又要被别人夺去，发动叛乱，与宋国军队发生激战。这年五月，宋国军队在甗（今山东济南附近）击败四公子的军队，立公子昭为君，是为齐孝公。

齐孝公九年，鲁国与莒国和卫国结为盟国，而没有理睬齐国，引起齐孝公不满。齐孝公于是发兵侵略鲁国的西部边境地区。同年夏天，又率军侵占鲁国北部边疆地区。卫国与鲁国是盟国，出兵援助鲁国。鲁国不是齐国的对手，鲁僖公便派大夫展喜去与齐国举行和平谈判，谈判的策略是由柳下惠周密计划的。展喜率人来到齐国军中，见到齐孝公后说："我们鲁僖公听说阁下亲自率军到鲁国来，特派小臣前来慰劳。"齐孝公气汹汹地问："你们鲁国人是不是害怕了？"展喜回答："普通老百姓都害怕了，但士大夫们都不害怕。"孝公接着说："你们鲁国城内没有储备粮，野外也

没有青菜可以充饥，为何不害怕?”展喜回答：“我们靠的是先王的遗命。从前周公旦和姜太公共同辅佐周王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成王赏赐给他们盟誓说：‘你们齐鲁两国从此往后子孙万代都不要彼此伤害!’这一盟誓就保存在国家的档案馆里，由外交官员保管着。当年齐桓公号令诸侯，目的就是解决各诸侯国间的矛盾，救济各国的困难和灾难，弥补各诸侯的过失。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先王的遗命。贤君即位的时候，各国诸侯都殷切地期待说，您定能继承桓公的遗志，使各国之间和平共处。谁也没有料到贤君仅仅即位九年就背弃桓公的功业，使齐鲁两国失去安宁，这怎能告慰于九泉之下的齐桓公呢？我们鲁僖公以及士大夫们都认为贤君不会伤害鲁国，所以才不害怕的。”展喜这一番感人肺腑的外交辞令，终于把齐孝公说服而自动退兵。

就在派展喜与齐人谈判的同时，鲁僖公还派公子遂和大夫臧文仲到楚国请求援军。臧文仲一见到楚国的子防，就怂恿他出兵讨伐宋国和齐国。楚将子玉率一支部队进攻宋国，另派一支部队支援鲁国。这年冬天，楚、鲁联军一举攻占了齐国的谷（今山东东阿）这个地方。然后，鲁僖公把这个地方交给齐桓公的儿子公子雍镇守，由齐国太监易牙辅助，以威胁齐国。楚国的申公叔侯也率军协助防守，齐桓公的另外七个儿子，逃到楚国后都做了大夫。

齐孝公十年，孝公不幸身亡。卫国的公子开方见有机可乘，便唆使孝公的弟弟公子潘杀死孝公的儿子，立公子潘为君，是为齐昭公。齐昭公在位期间，他本人没有什么政治作为，公子开方胡作非为，更使齐国内政不治。当时晋楚两国争霸愈演愈烈，齐鲁一带的东方倒显得相对安宁。

齐昭公的夫人叫叔姬，叔姬生了个儿子名叫公子舍。由于叔姬不受齐昭公的宠爱，所以公子舍也就不被人们重视。齐桓公的儿子公子商人贼心不死，以为有机可乘，便在国内大肆施舍以收

买人心。自己的家财施舍光了，又向国家借贷继续施舍。同时，招募了很多勇士，以扩充自己的私家力量。齐昭公二十年（前613），齐昭公死，公子舍即位为君。公子商人不甘心永为人臣，看到人心可用，便在当年七月一天的夜晚，派人杀死齐君公子舍。然后假惺惺地对他的弟兄公子元说："你年长，你当国君吧！"公子元回答："你日夜盼望能即位为君，我可以侍奉你为君，而你实际上难以侍奉我为君。假如立我为君，将招致你莫大的悔恨，到时你必不能宽容我。还是你自己即位为君吧！"当时有星辰进入北斗星附近，周王室的史官叔服观察完星象，又经过占卜，然后说："过不了七年，齐、宋、晋三国国君都会在动乱中死去。"

公子商人虽害死新君，但人心早已归附于他，也就没人找他的麻烦，相反，拥立他为齐国的国君，他就是齐懿公。公子舍被杀，鲁国人想把公子舍的母亲叔姬接回鲁国。齐懿公非但不放，反而将叔姬囚禁起来。

齐懿公统治时期，齐国的外交、内政极为恶劣。齐懿公元年（前612）秋天，齐国为了发泄对鲁国的不满，派军队攻占鲁国的西部边疆。鲁文公急忙派季孙行父到晋国去求援。同年十一月，晋灵公、宋昭公、卫成公、蔡庄侯、郑穆公、曹文公等各国君主在郑国的扈（今河南原阳西）地举行国际大会，重申过去的盟约，同时准备讨伐齐国。齐懿公害怕，忙派使者带上礼品贿赂晋灵公，致使诸侯联军瓦解，中途退兵。诸侯联军瓦解后，齐懿公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鲁国，然后进一步侵略曹国，一直攻人曹国国都的外城。齐懿公穷兵黩武使齐国的国际形象日益损坏。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说："齐君难免要遭祸殃，自己无礼却去攻伐礼义之邦。礼是顺应天意的。《诗经》中说：'为什么人们畏礼，是因为人们畏天。'所以，君子不虐待弱小和贫贱。《诗经》中还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就能维护福禄。'不怕天，怎能保住福禄。凭叛乱夺取的国家，即使奉天守礼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怕安稳不住；况且在

各方面又违背常理，定不会统治长久。”

齐懿公二年，鲁国出于无奈，再次主动求齐国议和。因鲁文公生病，派季孙行父到阳谷同齐懿公会谈。季孙行父想同齐懿公歃血为盟，结为友好国，被齐懿公拒绝，说：“等你们鲁文公病好了，让他来同我盟誓！”被齐国拒绝后，鲁国感到不安，随后派公子遂带上丰厚的礼物送给齐懿公。见到礼物，懿公才改变态度，齐鲁两国在齐国的郪丘完成誓盟。然而，齐懿公并不遵守盟约，第二年夏天又发兵侵略鲁国北疆。鲁国的公子遂受命前去与齐国谈判，同年六月齐鲁两国在齐国的谷地达成停战协定。这年冬天，公子遂再次带着许多礼品到齐国，拜谢谷地的协议。公子遂返回鲁国后汇报文公说：“我听人们议论纷纷，说齐国要抢夺明年夏天我们收割的小麦。然而，依臣之见，这不大可能。齐懿公在接待我的时候无精打采，言语有气无力。这正像臧文仲所说的，君主精神不支，那是活不久了！”

齐懿公即位以后，完全剥下了过去收买人心的虚伪面具，专横暴虐，无恶不做。早在即位之前，曾与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结果没有争到手。等到即位以后为了泄恨，把已经死去的邴歜的父亲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砍断双腿。然后，让邴歜替他赶车。臣下阎职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懿公顿生歹意，强行抢入宫内，纳之为妾，让阎职做自己的戎车卫士。

齐懿公四年五月，齐懿公到城南门外的申池去游泳。邴歜和阎职一同前往。游泳中，邴歜用木棍打阎职，阎职很生气。邴歜用激将的口吻说：“人家霸占了你的妻子，你都不生气，我逗你一下却也值得生气？”阎职反唇相讥：“假如把一个人父亲的双腿砍断，这个人却不为父亲报仇，又该怎样解释呢？”两人的话都捅到对方的痛处，对懿公的仇恨同时爆发出来。于是，二人共同杀死齐懿公，把尸体抛到竹林中。然后回到家中痛饮一番，大摇大摆地离开齐国。懿公被杀，可谓大快人心事。齐国的人们废掉他的

儿子，到卫国把齐桓公的儿子公子元迎接回国，立为国君，是为齐惠公。到此，齐国政局才稳定下来。

在齐桓公死后的三十多年中，桓公的五个儿子——公子无亏、齐孝公、齐昭公、齐懿公、齐惠公先后投身于争夺君位的厮杀中。不断的内讧使齐国国力大伤，昔日霸主风采一扫而光，留给人们的是不尽的慨叹！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僖公二年至文公十八年
《史记·齐太公世家》
《管子》
《吕氏春秋》
《韩非子·难三》

王子带之乱

春秋前期，诸侯兴起，周王室日益衰微，继王子克、王子颓之乱后，又发生了王子带之乱。

王子带是太子郑的同父异母兄弟。太子郑的母亲因病早死，周惠王决定续娶一位夫人。周惠王元年（前676），虢公、晋献公、郑厉公经商议后，让周惠王的卿士原庄公到陈国，迎娶陈国国君的女儿陈妫为夫人。不久，原庄公就将陈妫接到周王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周惠王很喜爱这位夫人，便又立她为王后，人称惠后。

一年以后，惠后生下一位王子，惠王为他取名叫带，人称王子带。惠王宠爱陈妫，自然也就喜欢王子带。惠后见惠王先前已立王子郑为太子，心中不悦，便时常在惠王面前议论太子郑的长短，意在使王子带代替太子郑的太子地位。周惠王久而久之也就有了此意。

当时，齐桓公以尊王攘夷、恢复秩序为旗号称霸诸侯。一次，桓公派大夫隰朋到京师拜见周天子。隰朋见到惠王之后，提出要见一见太子。惠王有些为难，是让太子郑出来呢，还是让王子带出来？此时太子郑的名分已定，众人皆知，如果让王子带会面显然不合适。左思右想，惠王便决定让太子郑和王子带二人一同出来见面。隰朋一见此场面，顿时明白了此中含义。回到齐国后，隰朋对齐桓公说："陛下身为霸主，王室将要因王位继承权发生动乱，不能见之不管！"齐桓公找管仲商议对策，管仲献计道："陛下可

以对天子说，各诸侯国君想会见太子郑，希望开个大会。一旦开完大会，天下皆知，惠王再想废换太子也不成了。”齐桓公觉得言之有理，依计而行。

周惠王二十二年秋天，齐桓公召集宋、鲁、陈、卫、郑、许、曹各国君主在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开会，同时派人去京师迎接太子郑到会。太子郑到会之后，齐桓公故意拖延会期，使太子郑与各国诸侯都很熟悉。在最后盟誓时特别加上一条：“不准废嫡立庶。”这显然是针对周惠王而言的。

齐桓公此举使周惠王十分恼火，自己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惠后也怨气冲天。为发泄怨恨，惠王派大臣召来郑文公说：“郑国近年来一直不得安宁，无非是齐、楚相争造成的。假如你同楚国搞好关系，我再让晋国帮助你，郑国就可安然无恙了。”于是，郑国背叛了齐国，投入楚国的怀抱。

周惠王二十五年，惠王去世。由于王位继承权的问题，周王室政治空气极度紧张。太子郑担心王子带会发动政变，没敢立刻即位为王，推迟发布惠王的死讯，派使者火速赶往齐国，请求齐桓公扶助。齐桓公得到消息，立即召集鲁、宋、卫、许、曹、陈各国君主，携同太子郑的特使在曹国的洮城（今山东濮县西南）开会，拥立太子郑为天子，是为周襄王。周襄王正式即位之后，才公开发布惠王的死讯。

王子带没有得到王位，他并不死心，便暗中积极活动。周襄王三年（前649）夏天，王子带勾结居住在扬、拒、泉、皋、伊水、洛水附近的戎族，共同发兵攻打周王朝的都城。由于来势凶猛，一举攻入王城，纵火焚烧东门。秦、晋两国得到消息，一同发兵讨伐戎族。同年秋天，由晋惠公出面，调停戎族与周王室归于和平。战争停息后，周襄王就派兵讨伐叛乱的王子带，王子带仓皇逃到齐国。

周王室内乱，齐桓公便出面予以调解。他派管仲穿梭往来于

襄王与戎人之间，使双方达成谅解。同时派隰朋协调晋国与戎族的冲突，和平共处。看到齐桓公派人来维持秩序，襄王很高兴，以上卿的礼节招待管仲。管仲婉言推辞说："臣只不过是一个职位卑微的官吏，齐国还有卿大夫国氏和高氏二族。"周襄王说："卿是齐桓公的使臣，你帮助桓公尊王攘夷，匡正秩序，立下了丰功伟绩。我为了嘉奖你的美德，才予你上卿之礼。希望你不要辜负寡人的一片心愿！"管仲不得已，用下卿的礼节接受了襄王的奖励。

王子带到齐国避难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觉得这样拖延下去总不是办法，便派大夫仲孙湫到周王室拜谒，想同周襄王讨论和解王子带的问题。仲孙湫到了周王朝，见周襄王对王子带恨之入骨，根本无法讨论，也就没有提及此事。回到齐国后，仲孙湫对桓公说："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天子余怒未消，难以讨论王子带的归国问题。依我观察，可能要等上十年，否则襄王是不会让王子带回去的。"周襄王五年秋天，戎族人再次侵略周王朝，各国诸侯纷纷派军勤王，并且推举齐国大夫仲孙湫为联军统帅。戎族见诸侯联军保卫周室，罢兵而去。诸侯联军撤走后，戎族又屡次前来骚扰。

在内忧外患不断的情况下，周大夫富辰对周襄王说："请陛下允许王子带回到都城。《诗经》中有一篇诗说：'只要能同邻居和睦相处，那么亲友都会对你很好。'如果兄弟之间都不能和睦相处，陛下怎能埋怨诸侯不和睦相处呢？"周襄王听了富辰一番话觉得言之有理，很是高兴。周襄王十四年，襄王召王子带回都。在外漂泊整整十年的王子带才从齐国回到都城洛邑。

周王室内部的矛盾刚刚解决，外部的乱子接踵而来。几年前，滑国人背叛郑国而投靠了卫国，郑文公很是生气，便派公子士和大夫泄堵寇率兵讨伐滑国。郑军攻入滑国，滑人屈服与郑国结盟。但郑国军队一撤走，滑人又投向卫国。于是，郑文公又派公子士和大夫泄堵俞弥率军伐滑。郑、滑两国战事不断，周襄王觉得作

为天子应予劝阻。周襄王十六年，襄王派大夫伯服、游孙伯二人到郑国阻劝郑文公，要求郑国罢兵。然而，郑文公怨恨当年周惠王回到都城洛邑后而不予郑厉公爵位，又怨恨周襄王偏袒卫国和滑国，不仅没有听从周襄王的劝告，反而把襄王派来的两位使者囚捕起来。周襄王大为震怒，要讨伐郑国。周天子自己没有多少武装力量，诸侯也不听指挥。怎么办呢？万般无奈中准备发动狄人出兵攻击郑国。周大夫富辰急忙劝谏说："千万不要这样！据臣所知，安抚天下的臣民应该依靠德政，先安抚关系亲近的，然后安抚关系疏远的，而不能依靠武力。从前周公旦感伤管叔、蔡叔因叛乱而不得善终，所以才大规模分封诸侯作为周王室的屏卫。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等国，这些都是文王的后代，属于昭序列；晋、应、韩等国都是武王的后人，属于穆序列。此外，凡、蒋、邢、茅、胙、祭等国是周公的后代。以前昭穆公看到周人德政衰微，就把周人各族召集到成周洛邑，作了一首诗说：'棠棣花没有不光辉，如今的人再也没有超过兄弟那样亲爱的。'又说：'兄弟之间在屋里打架，可是对外能够共同御敌。'意思是说，兄弟之间虽有小小的不愉快，却不能废弃伦理亲情。如今陛下竟然不能宽容兄弟间的不愉快，断绝与郑国的伦理亲缘，这怎么能行呢？酬劳功勋、亲爱亲戚、友爱兄弟、尊重贤人，这些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接近聋子、盲从瞎子、亲近顽劣、重用奸邪，这些是最大的败德行为。何况背弃道德而宠信奸邪，更是招惹祸端。郑国在平王和惠王时代有辅佐功勋，又是厉王和宣王的骨肉至亲，郑国国君舍弃宠臣而重用叔詹、堵叔、师叔三贤臣。在各姬姓国中，郑国与王室的关系最近。陛下具有前面所说的四种高尚道德，狄人却占有上述四种败德品行，周人与戎狄，犹如泾水与渭水，清浊分明，难以混同。从前周王朝处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尚不忘兄弟团结，诸侯和睦；而今，周德已经衰弱，怎能够改变原来的传统，背弃兄弟，依靠奸邪呢？"

可惜周襄王根本听不进富辰的逆耳忠言，派大夫颓叔、桃子二人去狄族求兵。

这年夏天，狄军攻打郑国，占领了郑国的栎邑（今河南禹县）。击败郑国，周襄王感激狄人，于是想娶狄女做王后。周大夫富辰又劝阻说："不行！狄族生性贪婪，不知礼义；女人的心愿永不会满足，贪心不已。俗语说，报恩的人已经疲倦，而求报的人还没满足。现在陛下与狄人的关系正是这样。娶狄女为后，祸患无穷！"周襄王仍没有听从富辰的忠言劝告，取狄女隗氏为王后。

然而，隗后无德，竟然与王子带勾搭通奸，周襄王觉得这有伤风化，便把隗后废黜为平民。这时颓叔、桃子二人商议说："当初是我们二人请狄人进攻郑国的，现在狄女被废黜，他们一定怨恨我们二人。"为转移祸患，他们二人鼓动王子带带领狄军攻击周襄王。襄王率领卫队抵抗，但转念又说："如果我杀死王子带，先王和惠后会怎样批评我？倒不如让诸侯解决这个问题。"

为躲避王子带的围攻，周襄王离开京都前往坎（今河南巩县东南）。但是，周贵族及国人一致要求襄王回都。同年秋天，颓叔和桃子奉王子带之命，带领狄人攻周，大败周王朝军队，俘虏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周襄王逃到郑国避难，住在郑国的氾城（今河南襄城南）。王子带赶跑周襄王后，就带着隗氏一同到温（今河南温县西南）邑居住下来。

为了借诸侯之手杀掉王子带，周襄王派人到鲁国诉苦说："寡人没有修养，结果得罪了惠后最宠爱的王子带，寡人到郑国的氾城避难，特派人向叔父之国倾诉苦衷。"人们听到周天子说出这样的凄凉话语，很是同情。鲁国大夫臧文仲答复说："天子在国外流浪，遭遇如此不幸，臣民怎敢不派使者去问候呢？"同时，襄王还派大夫左鄢父到秦国求援，派简师父到晋国告急。郑国与周王室的关系近几年一直不好，但目睹天子遭难，也产生了同情心。郑文公亲自带领着大夫孔将钼、石甲父、侯宣多到氾城问候周天子。

接到周天子的告急通知，各诸侯国都紧急行动起来派兵勤王。秦穆公率领秦国大军驻扎到黄河岸边，准备为天子护驾。晋国大夫狐偃对晋文公说：“陛下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号令天下诸侯，最好的办法就是效忠周天子，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德义的美名，威服诸侯，继承我们先君晋文侯辅佐周平王的大业，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现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晋文公有些犹豫，让卜偃占卜看是否吉利，占卜的结果说：“所得是吉祥之兆，是黄帝跟神农大战于阪泉而取胜。”晋文公还是有些犹豫，说：“我怎能同古代的帝王相比呢？”卜偃说：“周代的礼法沿袭至今而不改，如今的周天子就同于古代的帝王。”晋文公又说：“那你再筮一卦。”筮占的结果，是从“大有卦”演变为“睽卦”，卦词的内容为“吉利”。卜偃对晋文公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卦。九三爻辞说，作战胜利后接受宴享。受天子设宴招待，当然没有再比这更好的了。而且，此卦的卦象是上天用水泽去承受太阳的照耀，象征着天子屈尊来迎接陛下，这还不吉祥吗？大有卦去掉睽卦，又回到大有卦，意味着天子回到自己的京都。”

于是，晋文公辞退秦国军队，自己率领晋国军队顺着黄河东行。周襄王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晋国军队驻扎于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右翼部队包围了温地的王子带，左翼部队前往汜城迎接周襄王。四月初三，周襄王在晋军的拥卫下回到京都。然后，由晋人在温地囚捕王子带，押到隰城后处死。四月初四，晋文公正式朝见周天子，襄王设盛宴招待，并赏赐给晋文公礼品。晋文公请求襄王恩准他死后用“隧”这种天子的葬礼，周襄王婉言谢绝：“这种葬礼是天子的象征，现在还没有人有德行能取代周天子，却出现两位天子，寡人以为你也不会赞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吧！”周襄王赏赐给晋侯阳樊、温、原、攒茅等地的封地，晋国的疆域从此开始向南拓展了。

王子带先后两次发动叛乱，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这场动

乱实际上是由周惠王和周襄王两人酿成的。周惠王宠惠后，使王子带滋长了骄气；周襄王又娶狄女为王后，这些都违背了周代的礼法，造成内乱。在王室动乱过程中，齐桓公防患于未然，晋文公戡之于既乱之后。王室衰落，诸侯成长强大，二者恰好呈现彼此消长的趋势。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庄公十八年至僖公二十五年

《国语》：《周语》、《晋语》。

郑穆公之立

郑厉公时期，群公子争夺君位，给郑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灾难，民不聊生。厉公第二次为国君后，经过一番治理，郑国逐渐稳定下来。当时，周王室发生王子颓之乱，周惠王向郑厉公告急。后来，惠王在郑厉公和虢叔的帮助下，杀死王子颓，恢复了王位。郑厉公死后，儿子踕即位，是为郑文公。

郑文公时期，郑国的国力得到进一步恢复。齐桓公称霸，楚国也向中原扩张势力，郑国位于其间屡遭齐、楚相争之难。

郑文公有个贱妾名叫燕姞，一天夜里梦见天使送给她一束兰花，天使对她说："我的名字叫伯儵，是你的祖先。你可把这束兰花当作你的儿子，而且把这种兰花视为国花，人们闻到它的香味就会喜欢它。"后来，郑文公来见燕姞时果然带着兰花，很宠爱她，就与她同宿了。燕姞有些忧虑地说："妾出身低贱，假如有幸生个儿子，只怕将来人们不会相信，陛下敢不敢用兰花来发誓?"郑文公说："好吧！我将来会承认这是我的儿子。"郑文公二十四年(前 649)，燕姞生下一个公子，郑文公便给他取名"兰"，以纪念当初用兰花之事，这就是公子兰。

此前，郑文公曾娶郑子的妃子陈妫为妾，先后生下公子华和公子臧。这两个公子为非作歹，很不受郑文公喜爱。一次，公子臧犯下大罪，逃往宋国。郑文公二十九年，郑文公派人在南里杀死公子华。

公子臧逃到宋国后，喜欢戴用鹭鸶羽毛装饰的帽子。郑文公

得悉后更是生气，便暗中唆使强盗引诱他。郑文公三十七年八月，公子臧被杀死在陈、宋两国的边界上。

这年秋天，郑文公率军讨伐滑国，滑国屈服，与郑国结盟。郑国军队撤走后，滑国又背叛郑国投靠卫国。郑文公大怒，率军再次进攻滑国。不久，周襄王派特使来到郑国，要求郑国停止进攻滑国。郑文公怨恨早年周惠王流亡在栎邑时，父亲郑厉公曾帮助惠王取得王位，然而惠王却没有赐予厉公爵位；也怨恨如今襄王偏袒卫国和滑国。郑文公不但没听从周天子的阻劝，反而囚禁了使臣。于是，周天子请来狄族的军队进攻郑国，双方混战没分胜负。这年冬天，狄人转而进攻周襄王，襄王仓皇逃到郑国的汜城。郑文公不计前嫌，前去慰问了襄王。

郑文公曾娶江国女子为妃，生公子士。一次，公子士去楚国访问，楚人在他的食物里下毒，将公子士毒死。后来，郑文公又娶苏国女子为妾，生下公子瑕和公子俞弥。公子俞弥早死。郑文公不喜欢公子瑕，没有立他为太子。后来，郑文公干脆把公子们都驱逐出境，公子瑕逃到楚国，公子兰逃到晋国。

当年晋文公为公子时，为避内乱流亡国外。一次途经郑国，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郑文公的弟弟叔詹劝他说："重耳（晋文公名）这个人很贤能，与我们又是同姓，遭遇不幸来到郑国，我们不应怠慢无礼。"郑文公满不在意地说："各国流亡的公子多得很，我哪能都以礼相待，照顾那么周到呢！"叔詹警告说："你若不能待之以礼，就把他杀掉，否则，将来他回国执政，对郑国不利。"郑文公没听。后来，晋文公当了晋国国君。郑文公想到当年的失策，便与楚国接近，企图依靠楚国的帮助。

郑文公四十三年，晋文公联合秦穆公共同发兵进攻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秦军驻扎在汜南（今河南中牟南）。郑国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如今我们国家已经面临生死存亡，假如陛下能派烛之武去劝说秦穆公，秦国必会撤兵。"

郑文公采纳了这一建议，派烛之武去见秦穆公。烛之武此时已经年老，多年来在郑国一直未受重用，心怀不满。见郑文公此时来找自己，便推辞说“为臣年轻的时候，才能都比不上一般人，况且如今已年老力衰，更难以受此重任了。”郑文公有些歉意地说：“贤卿才干超人，寡人这些年没有重用你，这是寡人的责任。现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你不肯受任，将来国家灭亡，对你也不利呀！”烛之武见国君言词恳切，就答应了这次使命。

当夜，他叫人用绳子把自己从城墙上送到城外，乘夜来到秦军营中。他见到秦穆公之后说：“如今秦、晋两国大军围困我们郑国都城，郑国人都意识到国家快要灭亡了。假如灭亡郑国对秦国有利，秦军灭掉郑国也是值得的。可是，有一点我必须告诉陛下，那就是越过别人的国家去灭掉一个不相邻的小国，能不能据为己有守得住？如果是为别国打仗，是否值得？晋、秦相邻，晋强秦就弱，为什么还要灭掉郑国去扩大晋国的领土呢？假如陛下保存下郑国，两国结为同盟，将来贵国到东方去，途经郑国的时候，郑国还可尽地主之谊供给粮草，这对秦国也是有好处的。陛下从前对晋国君主有过恩惠，晋君当初答应把焦、瑕二城割让给秦国，谁知晋君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背弃了诺言，难道陛下忘了不成？晋国贪得无厌，灭掉东方的郑国，就会调头西向开拓国土，只有进攻秦国了。但愿陛下三思而后行！”

秦穆公听完这番话，很感激烛之武的忠告，不但答应立即停止围攻，而且同郑国结成盟国，派大夫杞子、逢孙、杨孙率军替郑国守城，自己率领大军班师回国了。

晋国见秦国背信弃义，很是恼怒，眼见快要成功的事化为泡影。大夫子犯请求追击秦军，晋文公考虑了一下说：“算了吧！当初若没有秦国的帮助，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靠秦国的支持，回国取得君位，如今反过来攻击秦国，别人会说寡人不仁不义。遗弃朋友，这叫不智；师出无名，这叫不武。我们还是不追吧！”晋

国没再追击秦军。

郑国的公子兰流亡在晋，这次也随晋国军队讨伐郑国。进入郑国境内后，觉得自己身为郑国公子，却攻击国君，这样做有失体统，便向晋文公请求不参加攻击郑都，留在郑国东部待命，晋文公同意了。

这时郑国国都内的大臣们也在商议对策。大夫石癸说："据我所知，姬姓与姞姓结为夫妻，他们的子孙后代必能兴盛。姞姓是吉祥的姓氏，他们的祖先曾是我们周祖后稷的妃子。因此，将来公子兰必会有所作为。"于是，石癸、孔将鉏、侯宣多三位大夫共同出城迎接公子兰回到国都。先到祖庙祭祀祖先，然后宣布公子兰为太子，随后向晋人请和。晋文公见公子兰被立为太子，也就答应了郑国的请求，罢兵回师。

郑文公四十四年，留守郑国的秦国大夫杞子秘密派人回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们守卫北门，钥匙就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暗中发兵，里应外合，可不费吹灰之力取得郑国。"秦穆公征询大夫蹇叔的意见，蹇叔回答说："劳师动众去袭击远方的国家，我还没听说过这种事情。我军千里奔波必然极为疲倦，远方的郑国以逸待劳容易防守，这在军事上是不可行的。我军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难免让人知道消息。我军长途跋涉，最终一无所得，劳民伤财！"秦穆公本想能得到支持，没想到听到这些言语，很不高兴，坚持派兵袭郑。秦将孟明、西乞、白乙率兵东征，蹇叔哭泣着为他们送行，说："我眼见你们率军出征，可叹以后却无法看见你们回来！"秦穆公见状十分生气，派人对蹇叔说："你懂什么！你已经活了一百岁，如果你没有这么长寿命的话，你坟墓上的树也该有一抱粗了！"

郑文公四十五年，文公去世。太子兰即位，是为郑穆公。郑穆公元年（前 627）春天，郑国有个商人名叫弦高，准备到周都做买卖，途经滑国时遇到了秦国军队。当他得知秦军袭击郑国时，立

即想出了一个对策。他首先献给秦军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以示慰劳，说："我们郑国国君听说贵国军队将要路过郑国，特派我前来慰劳。我们郑国一向很穷。贵军如果要在郑国留宿的话，可以准备一天的粮草，贵军继续前进时，可为贵军守卫一夜。"然后，立即派人火速回国报告郑穆公，以便国内的人们有所准备。郑穆公得到情报之后，马上派人到留守的秦军那里侦察，发现他们都已准备好，正秣马厉兵等待秦国大军的到来。郑穆公马上派皇武子辞绝秦国的留守兵说："各位将军在我国守卫很久，我们郑国贫乏，粮食和牲畜都快吃光。你们马上也该离开了，各位将军不妨自己去打猎备粮，也好让我们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你们看如何?"杞子等人听到这话，知道自己的机密已经泄露，再呆下去十分危险，便仓皇逃走。杞子逃往齐国，逢孙、杨孙逃往宋国。再说前来袭击的秦军，以为郑国已经有了防备，就班师回国了。

同年冬天，楚军攻伐陈、蔡二国，陈、蔡二国向楚国屈服，楚军转而攻伐郑国，为的是将公子瑕护送回国。当楚军攻打郑国的桔柣门的时候，公子瑕突然从战车上跌落到叫周氏洼的池塘中。仆人髡屯趁机把公子瑕杀死，献给郑穆公。郑文公共有六个公子，至此，只剩下郑穆公一人。

《墨子·明鬼篇》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白天，郑穆公正在祖庙中，忽然看到从庙门走进一位神人，身穿白色的素服，四方的面庞。郑穆公见后十分害怕，撒腿便跑。神大声叫道："不要跑！上帝派我来慰劳你，知道你有美德。特赐予你十九年的爵禄，使你们国家繁荣富强，多子多孙。"郑穆公跪地叩头，问是何神?神回答说是句芒。

郑穆公二十二年，穆公得了重病。他对别人说："寡人是借着兰花而降生的，今年兰花衰败时，我也就命该终结了。"同年冬天人们割掉兰花时，郑穆公果然死了。公子夷即位，是为郑灵公。

郑灵公元年（前 605），楚国人献给郑灵公一只大甲鱼。这天，

公子宋和公子家正准备进宫，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抖颤起来。他对公子家说："依照我的经验，一个人产生这种现象，预示着要有好筵席要吃。"公子宋入宫后，看见厨师正在杀甲鱼，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郑灵公问他们为什么笑，公子家就说出了实情。可是，待到吃甲鱼的时候，郑灵公命令分给众人，唯独不给公子宋吃。公子宋很生气，用手指在鼎中蘸着品尝了一下滋味，然后走出宫去。郑灵公也很恼火，想杀死公子宋。公子宋想先动手，找公子家密谋，公子家却说："连家畜老了，人们都不忍心将它杀死，何况是国君呢？"见公子家不肯依从，公子宋就到郑灵公跟前说公子家的坏话。公子家知道后担心被灵公杀死，便依从了公子宋。这年夏天，他们合谋杀死了郑灵公。灵公即位不到一年就死于兄弟之手，表明公族内部已经到了十分混乱的程度。

郑国人准备拥立公子良为国君，公子良不肯，说："论才干，我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论年纪，公子坚比我年长。"于是，郑国的人们拥立公子坚为君，是为郑襄公。眼见公族内部祸患不断，襄公想把穆公的诸公子——自己的兄弟都杀掉，只留下公子良。公子良劝阻说："穆公的子孙后代都应该留下，这是我的衷心愿望。假如陛下想逼他们逃亡，那我与他们一同出走国外好了！"郑襄公听从了劝告，并且任命他们为郑国的大夫。郑襄公时期，晋、楚两国争霸愈演愈烈，楚国先后几次发兵攻伐郑国，迫使郑国服从。晋国随之向郑国兴师问罪。在公子宋的策划下，郑国与晋国达成了谅解，襄公也改变了对公子宋的态度。

此后，郑国公族内部小乱仍不断发生。先是杀死了公子曼满，后来又清算当初杀害郑灵公的暴乱。公子宋得以幸免，公子家虽死，人们挖出他的棺材，暴尸于外，赶跑了他的族人。

春秋初年，郑为强国。经过二百年时间的不断内乱，国力日渐衰弱。郑穆公的七个公子在郑国延续下来，后人称之为"七穆"。这似乎算是应了当初神灵的启示了。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郑世家》

《左传》僖公十六年至宣公十年

骊姬之乱

曲沃武公灭晋宗室，取得了诸侯地位。二年后，武公去世，公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

早年，晋献公娶贾侯的女儿为夫人，这位夫人没有生育子女。献公随后又娶亡父的爱妾齐姜为夫人，所生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秦穆公，齐姜还生下公子申生。再后来，献公又从戎狄娶来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

晋献公五年（前 672），献公准备攻伐骊戎（骊山一带的戎族），命令史苏先占卜，看是否吉利。史苏占卜后回答说："此战能胜，但不吉利。"献公不解地问："为什么胜利却不吉利？"史苏回答："从兆纹上看，两条纹路相交，顶端如齿牙，好像鲠骨在喉。两纹相交，是戎族与我们晋国彼此都有胜利，所以我说胜而不太吉利。特别是口牙的形状，会扰乱视听，惑乱人心。"献公说："能有什么口舌！我是国君，寡人不接受，别人说也无用！"史苏继续说："既然此人能接近陛下，自然有使陛下接受的办法。陛下难以察觉，此人的言语是阻挡不住的。"献公不采纳史苏的意见，大规模讨伐骊戎，大获全胜，带着戎女骊姬归来。骊姬生得一副天姿，很受献公宠爱，被立为夫人。既得胜利又获美女，献公高兴异常，大宴群臣。在宴会上，派主持宴会的官员给史苏斟酒后，对史苏说："只给你酒，不给你菜吃。这次战役前，你说'胜而不吉'，胜你说对了，赏你酒；不吉，你说错了，罚你没有菜肴。打了胜仗又得夫人，还有比这更吉利的事情吗？"史苏把酒喝了下去，

行礼后对献公说："龟兆是那样显示的，为臣不敢隐瞒。谎言瞒君，那样做不忠于职守，是有罪的，不仅没有菜吃，而且会受到陛下的惩罚。我只是衷心希望陛下万事吉顺，同时也保持警惕，如果真的没有凶患，防备一点有何不好？我所说的凶患真没有的话，这是国家的大福，为臣即使受罚也高兴。"

宴会结束后，史苏对其他的大夫们说："有男兵必有女兵，晋国用男兵战胜戎族，戎族必会用女兵战胜晋国，怎么办才好呢？"大夫里克不解地问："请你仔细说一说。"史苏说："从前夏桀讨伐有施族，有施族把美女妹喜送给桀，妹喜受宠后，便与伊尹合谋而使夏朝灭亡了。殷纣讨伐有苏族，有苏族把妲己送给殷纣王，妲己受宠后，于是与胶鬲合谋而使殷人亡了国。周幽王讨伐有褒氏，褒人把褒姒献给幽王，褒姒受宠，生下了伯服，与虢石父合谋驱逐了太子宜臼，立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逃到申国，申侯联合西戎进攻周朝，使周朝灭亡。当今的晋国没有盛德，立俘虏的戎女为夫人，还很宠爱她，把晋国同夏商周三朝末年相比较，我看没什么不同。况且，我占卜的时候，兆纹显示出鲠骨在喉，口舌为乱，这是不好的征兆。华夏民族听从了戎族，怎能不国家败亡？从政的大夫们不可不保持警惕，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大夫郭偃不完全同意史苏的看法，他说："夏商周三代末年国家会灭亡，这毫无疑义，因为那是天子执迷不悟，铸成大错，直至灭亡还没觉悟为什么会亡国。然而晋国则不同。晋是侯国，领土狭小，周边有大国。国君虽想执迷不悟，也不可能。口，是三五之门；谗言造成的祸患，近者三代，远者五代，国家要灭亡。占卜显示的征兆为鲠骨挟喉，这是内乱，而不是丧失国家。这当中只是有人受到伤害罢了。依我观察，骊姬若为乱，至多不过像雇农为主人种田一样，虽努力耕作，收获物也不属于自己，为别人罢了。"大夫士蒍最后说："还是多加警惕为好，可以有备无患。大家注意就是了，或许你们二人说得都对。"

晋献公十二年，骊姬生下公子奚齐，她的妹妹生下公子卓子。骊姬想把自己的儿子奚齐立为太子，于是她就贿赂献公宠信的大夫梁五和东关五二人，唆使他们对献公说："曲沃是陛下祖庙的所在地，蒲、屈是两座边疆重镇，都不可以不派亲信守卫。祖庙所在地如果没人管理，人民就体会不到先君的德行；边防重镇无人管理，容易滋长周边蛮族的侵略野心。蛮族一旦侵略，又会引起国内的不安。这是至关紧要的事情。如果派太子申生去管理曲沃，派重耳、夷吾分别管理蒲、屈两城，陛下就可高枕无忧了！"此外，骊姬又让两个大夫对献公说："把晋国的首都建造的规模大些，对国家开疆拓土，发展强大岂不是好事！"晋献公听到这些话很是高兴。同年夏天，派太子申生去驻守曲沃，派公子重耳驻守蒲城，派公子夷吾驻守屈城，还把其他的公子也都派遣出去，国都内只留下公子奚齐和公于卓子。

看到这些微妙的变化，史苏忧惧地对大夫们说："各位大夫，多加注意，祸根已经萌生了！从前立骊姬为夫人，人们已经开始不满意了，本来讨伐骊戎，动员百姓是为了百姓，所以人们高兴，无不尽忠竭力努力战斗。结果，靠百姓的力量自己得到好处，人民没得到益处，反而看到了君主的贪欲，怎能不上下离心离德？上天助虐，又让她生下男孩，使其野心膨胀，怎不生乱！作为一个君主，应该喜爱好的，厌恶坏的，这样国家才能有规可循。伐木不刨根，必会再生；堵水不塞源头，必会再流；祸患不除根，必会再乱。如今，陛下杀了她的父亲，却宠爱她本人，这是祸根；宠爱她，遂其心愿，她想替父报仇，即使生得漂亮，心灵不美，不能算好人。顺从她的险恶居心，必使国乱。骊姬必会为害晋国，夏商周三代的经验教训是前车之鉴！"

一天，大夫里克、丕郑、荀息三人聚集在一起。里克说："史苏的预言果然不错，怎么办呢？"荀息说："我听人说，作为臣下应该一心为君，不能有贰心，君主怎样安排就应怎样服从。"丕郑

说："我听人说，作为臣下应顺从君主对的，不对的事情就不能服从。否则，不对的命令会误国害民、违背礼义。"里克发表意见说："我没什么才能，虽不知道什么是礼义，但也不会奉承君主的过错，静观时变罢了。"三人说完，各按自己的信条去做了。

晋献公有一个优伶（歌舞者）名字叫施，与骊姬通奸。骊姬想加害于诸公子，便向他请教说："我想成就大事，担心申生、重耳、夷吾三人作梗，该怎么办？"优施回答："给他们早作安排，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归宿前途。一般来说，人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就不会有非份之求了，即使有了越轨行为，也容易治服。"骊姬又问："应该从哪下手做起？"优施毫不迟疑地回答："就先从申生下手。公子申生的为人，小心谨慎，忠厚稳重，心地善良。胆小就容易受辱，忠厚就容易受害，心地善良不忍害人就会伤害自己。可以先用不仁不义这些罪名污辱他。"骊姬迟疑地问："别人都知道申生忠厚，说他坏话恐怕陛下不会相信。"优施回答："申生过分胆小，正易于诬陷；你办得成功，别人自会相信；假如他不忠厚，依照通常的办法就能使人相信。你受献公宠信，无论你说得是否真实，他都会相信。如果你从表面上装作赞扬申生，暗中加害于他，准会成功！"于是，骊姬便开始在献公跟前陷害公子申生。

晋献公十六年，晋国建立两个军的编制，设上军和下军。早年，周天子封曲沃武公为诸侯，是一个军的编制。军队数量扩大了一倍，献公自己亲自统帅上军，命令太子申生率领下军，准备讨伐霍国。军队还没出发，大夫士蒍对大夫们说："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他的使命是恭敬地等待继承君位，不应担任什么职务。现在，国君把太子申生安排到曲沃，又让他率领下军，是在疏远太子，我要劝谏献公。"随后上朝对献公说："太子是嗣君，陛下安排他统帅下军，恐怕不太合适吧？"献公阴沉着脸回答："下军是辅助上军的，寡人在上军，申生在下军，有什么不好！"士蒍继续说："下无法辅佐上。"献公问："为什么？"士蒍回答"："以人的

身体为喻，人的四肢是用来辅助心灵的，四肢各有分工，使身体受益。上肢是用来拿东西的，下肢是为了行走，四肢配合，才能随心所欲。假如用下肢代替上肢，则不灵便，不听大脑的指挥。大脑反而劳累，还怎能做好事情？古人建立军队，设左军和右军，使两军相互补充配合，所以战之能胜。设上军和下军则不然，下军无法补充上军，两军缺乏统一指挥，对作战不利。作战的时候，用旌旗和战鼓指挥，上军和下军难以协调一致；若各自指挥，两军步调不一，会给敌军造成可乘之机，陷于失败。战争失败，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编上军和下军，讨伐小国还可以，与大国抗衡很困难，万望陛下三思！”献公见士𫇭百般阻挠，很恼火，说：“寡人有儿子要听寡人的安排，你何必那么操心！”士𫇭仍继续苦苦相劝：“太子是国家的栋梁，太子如今年龄已经成熟，陛下轻易作变动，这很危险，弄不好会出乱子！”献公回答：“不给他实权，能出什么危险！”

从宫中出来后，士𫇭告诉别人说：“太子恐怕难以即位为君了。献公蓄意改变太子的职务，给职不给权，有充分的防备，说明国君另有所图，申生怎能继承君位。这次攻伐霍国，申生率军打了胜仗，国君会担心，想尽办法迫害；申生打了败仗，可以趁机加罪。可见，无论是胜还是负，申生都难逃恶运。与其劳而得罪，不如逃到国外，这样，国君可以立别人为太子，申生可以免于死亡，而且还可以获得历史上吴太伯避贤的美名，这也是很不错的结局。”太子申生听到别人传来的话，说道：“士𫇭为我着想，算得上忠心耿耿。然而，我听说，为人子者，不怕没有美名，就怕不顺从父命；为人臣者，不怕没有爵位，就怕不努力效命。我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忠孝父君，没有别的企求，怎能比得上吴太伯呢？”于是，太子申生率军出发，讨伐霍国取得辉煌战绩。回来之后，谗言日益增多。

这年冬天，晋国准备祭祀曲沃武公。武公的庙在曲沃，献公

称自己有病，派公子奚齐代为祭祀。献公之意不言自明，是要让奚齐顶替国君的角色。奚齐到了曲沃之后，太子申生的谋臣猛足对太子说："这次国君没来，奚齐自己在庙内主祭，何不趁机把他杀掉！"申生说："羊舌大夫经常说，用恭敬侍奉君主，用孝顺侍奉父亲。忠心履行自己的职责是敬，顺从父亲的安排是孝。如果我杀害了奚齐，就是最大的不敬不孝，今后怎样做人！离间父亲对别人的爱，使自己获得好处，这是不忠；废弃别人而成全自己，这是不贞。只有实行孝、敬、忠、贞，国君才能高枕无忧。我违背这些，会使国君不安，决不能做！"

献公的优伶施进一步为骊姬策划阴谋，让她深更半夜的时候哭泣着对献公说："妾听说申生特别仁义有为，宽厚待人深得民心；而且人们纷纷议论我迷惑陛下，扰乱国家。有传闻说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劫持陛下。陛下因此不得天年，如何是好？干脆杀了我吧，不要因一个贱妾扰乱国家。"献公半信半疑地说："申生既然爱护人民，又怎能不爱父亲？"骊姬继续抽泣着说："我也只是为陛下担心。我听外边的人说，治理国家与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不同。为人处事，爱护别人叫仁；安邦治国，利国利民，也叫仁。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以国事为重，不受亲缘关系干扰。如果利国益民，怎能顾及伤害国君？况且，以国家为重，人民拥戴，虽然最初名声不好，最终会得到好名声。杀害国君而有益于人民，人民怎会反对？即使杀了父亲，也不落坏名声，人们怎会不拥护？这种个人得利又得人心的事，会引起人的贪欲邪念，谁在这样的引诱下会不迷惑？再想爱君主，也抑制不住邪念了。以陛下比作殷纣王，假如纣王有贤能的儿子，自己先杀掉父亲，而免得被周武王讨伐而死，同样都是死，既免除了被人杀死，又使商朝能够延续至今，人们也就不会知道纣王的罪过了。陛下能下得狠心吗？等到灾难发生再下决心，一切都晚了！"献公听后十分害怕，便征求骊姬的意见："你说怎么办好？"骊姬阴险地说："陛下何不告老逊位，把君

位让给申生，他得到君位，欲望满足，也就不会加害于陛下了。难道陛下就没想过，自从桓叔受封曲沃之后，有谁真正爱过自己的父亲？正因为抛弃亲缘关系，曲沃最后才能灭掉晋。”献公听后怒气冲冲地说：“我决不让位！我靠威武二字治国，降服了诸侯各国。不死就丢掉君位，算不得英武；不能治服自己的儿子，算不得威严。我退位后，诸侯不再归顺晋国，而且还会加害于我。丢掉君位又使国家受害，我不能忍受！你不要再忧惧了，我自有办法！”

骊姬见阴谋得逞，便进一步献毒计说：“近来东山一带的赤狄不断骚扰我国边疆，使人们无法种田，国库难以充实，而且有可能侵占我们的国土。陛下可以让申生讨伐赤狄，观察他与百姓的关系，看百姓是否为他卖命。申生若打了败仗，陛下可以将他治罪；若打了胜仗，必定是得人心，而且贪欲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增加，陛下正好惩办他！打败了赤狄，使周围的诸侯恐惧，边境地区得以安宁，陛下也可高枕无忧了。请陛下三思。”献公此时已经完全被骊姬迷惑，照计而行。

晋献公十七年，献公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的赤狄。大夫里克进谏说：“太子是未来国家宗庙和社稷的主祭人，同时，还要早晚侍奉国君的饮食起居，所以才特别称为‘冢子’。如果国君离国访问，按制度规定要由太子镇守国都；太子随国君出征，才能由其他公子留守。太子随国君出征叫‘抚军’，留守国都称为‘监国’，这些都是传统。谋策战略，率军作战，发布军令，这些是属于国君和卿大夫的职责，不是太子的事情。假如让太子在军中发号施令，那就显示不出太子的崇高地位；反言之，假如太子擅自发号施令，那将成为不孝之子。因此，无论如何太子也不宜领兵外出作战。陛下任命太子为帅本来已经不合礼法，若再让太子率军出战也就没有军威，何必如此呢？为臣听说赤狄将要与我军决一死战，请陛下收回成命才万无一失。”献公板着面孔说：“寡人有好几个儿子，还不知道谁能当太子呢！”里克没再说什么

就退下朝来，立即赶去见太子申生。申生怯怯地问："我可能要被废黜了吧？"里克勉励申生说："既然国君让你治理曲沃，又让你统军作战，你就应该全力以赴，好自为之！应该害怕的是不能完成任务，害怕落上不孝的罪名，不要害怕被废黜，没有过错怎能无故被废掉呢？修养自己的品德，不要责怪别人，如此就能免除灾难！"

太子申生率军出征，晋献公让他穿上左右颜色不同的衣服，其中一侧的颜色类似献公的戎装，同时给他佩带上金环。大夫狐突给太子驾御戎车，大夫先友担任车右。另派梁余子养给罕夷驾御戎车，先丹木担任车右，大夫羊舌担任军尉。先友对太子申生说："身穿国君的半侧戎装，手握指挥兵马大权，胜负在此一举，请太子全力以赴！身穿君主的半身军衣并非坏事，手握兵权才可以远离灾祸，既身近君主又远离灾难，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然而，狐突的想法却不太乐观。他叹息着说："时节是事物的象征，军服是身份的标志，佩戴的徽章反映内心的想法。让太子去做一件事，在半年前就应该发布命令；赐予军服应该用纯色，表现太子思想应佩戴适当的标志。如今国君在隆冬季节下达命令，这等于阻碍太子完成使命；身着两色戎装，与太子身份不相当；用带缺口的金环给太子佩戴，暗示着分离。太子还有什么指望呢？即使太子竭尽全力奋战，也难以将赤狄全部消灭。"

梁余子养也为申生发泄不满说："统军出征应在祖庙接受命令，祭祀祖宗神灵后接受祭肉，更应该穿规定的朝服。如今让太子穿杂色衣服，对太子的态度可想而知了。与其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不如保命逃亡国外！"罕夷议论不平地说："让太子穿奇怪戎装，佩戴不完整的金环表示不让太子归来，其实回来又有何益！国君对太子居心叵测。"先丹木也愤愤地说："这种杂色服装，即使一个疯子见到都会奇怪，还说什么把赤狄消灭干净再回师，赤狄怎么消灭得净！即使把赤狄消灭干净，也难逃内宫的谗言。反

正还是亡命国外妥当。"大家都劝申生逃亡，羊舌大夫却说："不能让太子逃亡。违背父命是不孝，违背君命是不忠。即使君主对太子刻薄，却也不能抗命不遵。太子应拼死一战才是臣子之道。"

太子申生决定领兵出征，狐突最后劝告说："历史经验教训不可不予借鉴。从前辛伯劝周桓公说：'内宠与王后并立，受宠的庶子与太子抗衡，大都邑与国都相等，这都是一个国家的祸根。'周桓公不采纳辛伯的建议，后来果然遭了难。如今的晋国祸根已经种下，你有把握继承君位吗？还是尽忠孝之道呢？由你自己最后决断！"申生没顾众人的劝阻，毅然率军讨伐赤狄，取胜而归。这时国内谗言四起，狐突为了免遭灾难，从此闭门不出。

骊姬千方百计制造谣言陷害太子申生，而太子申生竭忠尽诚，克己奉公，使骊姬找不到杀害申生的借口。申生不除，骊姬不安。晋献公二十一年，即讨伐赤狄归来的第四年，骊姬鼓动献公说："我听外面的人们传说，申生将有大阴谋。几年前，我就告诉陛下申生收买人心，图谋不轨，如果他不得人心，怎么能打败赤狄？打了胜仗，野心会更大。正因为申生谋图不轨，狐突从那时以后闭门不出，不再参与申生的活动。我听说，申生的为人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既然他对众人泄露了阴谋计划，再想罢休不干，众人也会不答应。陛下现在已危在旦夕，再不除掉申生，就要大祸临头了！"献公迟疑地说："你说的这些我知道了，但杀死申生总要有个把柄借口才行。"

随后，骊姬找到优施说："国君已经答应杀死太子申生，然后立奚齐为太子。大夫里克足智多谋，我担心他会从中作梗。你看该怎么办？"优施回答："这好办，把里克交给我处理，我马上就能让他改变主意。请你给我准备好丰盛的筵席，我请里克来饮酒，我是唱歌演戏的，说话可以随便。"骊姬表示同意，按照优施说的做好了准备。优施请来了里克，一边饮酒，一边闲谈。饮酒尚未酣醉，优施站起身翩翩起舞，对里克的夫人说到："夫人为何不为

我劝酒，我会教夫人的夫君平安无事地侍奉国君呀！”随后，装作半醉的样子唱道“侍奉国君保己平安，此人不如乌鸦；别人都栖息在苑林，他却独落枯树！”里克以为是在开玩笑，笑着问：“什么人呀乌鸦的，你说说，什么是苑林，什么又是枯树？”优施眯着眼睛狡黠地说：“他的母亲是夫人，他本人即将为君主，难道不是苑林？他的母亲早已死亡，他又受人毁谤，难道不是枯树？不但是枯树，而且还有伤病呢！”

优施一番话说得里克坐卧不安，回到家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天半夜，里克派人把优施找来，试探着问：“你白天所言开玩笑呢？还是有所耳闻？”优施洋洋自得地回答：“当然有所耳闻。不瞒阁下说，国君已经同意杀死申生，然后立奚齐为太子，马上就要动手了！”里克惶恐地说：“让我帮助国君杀害太子申生，我不忍心去干这样的事；让我向太子申生报信，起来反对国君，我不敢。如果我保持中立，不参与此事，是否可免受灾难？”优施立即回答：“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

第二天清晨，里克匆匆去找大夫丕郑，说：“史苏当初说的话今天就要应验了！优施告诉我说，国君准备杀死太子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丕郑问：“你是如何回答的？”里克说：“我告诉他，我保持中立。”丕郑说：“太可惜了！如果你当时对他说你根本不相信，可能会使他们意志动摇，从而稳定太子申生的地位，然后再寻求对策，使他们离间瓦解；你对他们说你保持中立，实际上是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已经心中有底，难以改变他们的计划了。”里克说：“言已出口，无法改变了。事实上，他们心中根本无所顾忌，是阻挡不住的。你怎么办？”丕郑回答：“我什么都不考虑了。作为一个臣下，应该听从国君的，我起不了什么作用。”里克说：“为维护正义而杀掉国君，然后倚仗自己有功劳而欺凌别人，我不敢这样做；改变志向屈从国君，废掉太子自己从中捞取好处，我不愿这样做。进退两难，我只有隐居不出了。”第二天，

称自己有病，从此不再上朝。

看到朝中大臣无人反对，骊姬便直接下手迫害太子申生。她把申生召来后对他说：“昨晚睡觉梦见你的母亲，你马上去祭祀，然后把祭肉带回。”申生答应后，便动身到曲沃去祭祀母亲，然后把祭品带了回来。献公当时正在外打猎，骊姬代为接受了祭品。然后，暗中在祭品中下了毒药。献公打猎归来，骊姬让申生把祭品献给晋献公。献公接过祭酒，洒祭土地，毒酒浇在地上土壤立即隆起。申生见状，吓得躲到了外面。骊姬拿过祭肉投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然后，又让仆人喝下祭酒，也中毒而死。献公大怒，以为申生谋害自己，下令杀死申生的老师杜原款。申生仓皇逃往曲沃。

杜原款临终前派人告诉太子申生说：“我杜原款不才，愚昧寡谋，没能教导好太子，也没能早些知道国君的想法，让你早些离开太子的地位到国外避难。都因我过分谨慎小心，延迟至今，陷于死地。然而，我杜原款并不怕死，宁愿死也不能承担坏的罪名。我听人说，君子不改变自己忠君之情，不同制造谗言的人申辩，受谗言陷害而死，还可留下美名。至死不改变自己的感情，这是坚强；让父亲心情舒畅，这是孝顺。宁可身死而不改变志向，这是仁；至死不忘国君，这是敬。好自为之！宁死也要留下美名，让人们思念，这不也是件值得的事吗！”申生听完这一番话，点头答应了。

有人给申生出主意说：“你本来没有罪过，为什么还不赶紧逃走？”申生回答：“不能逃走。假如我逃到国外，我没有罪了，必然会使罪名落到君主头上，这是我怨恨国君。张扬父亲的过错，见笑于诸侯，我又能在哪个国家落脚呢？国内失去父母之爱，国外受困于诸侯，这是内外交困。为逃罪名弃君出走，这是逃亡。常言说：‘仁者不怨君，智者不交困，勇者不逃亡。’若真正有罪，畏罪而逃是罪上加罪。逃亡而加重自己的罪名，这不理智；逃亡而

怨恨国君，这不仁慈；有罪而不敢去死，这不勇敢。不能加重自己的罪名，不能逃避死亡，我唯有等待国君的处置！”

骊姬见太子申生逃回曲沃，步步紧逼。她随后赶到曲沃，大哭大叫着对申生说：“对自己的父亲忍心下毒，又怎么会爱别人？想杀死父亲自己得好处，别人谁敢靠近你？干下这种滔天大罪的事情，你还有什么脸面再活下去！”骊姬走后，太子申生承受不住这莫大的罪名，在曲沃的祖庙内悬梁自尽。临死前，派猛足对大夫狐突说：“申生有罪，当初没听大夫劝告，以至今日陷于死地。申生虽死无悔，只是担心国君年迈，国家又遭多难，大夫不上朝理政，国君会无所适从。假如大夫上朝辅助国君，我申生虽死无憾！”

骊姬杀害了太子申生，又在献公面前陷害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说：“他们两位公子参与了申生谋害陛下的阴谋。”献公命令阉楚去杀公子重耳，重耳逃亡北狄；命令贾华去杀夷吾，夷吾逃亡梁国。不久，晋献公在骊姬的鼓动下将公子们都驱逐到国外，随后立奚齐为太子。

自晋献公十二年骊姬生奚齐，至晋献公二十一年杀申生立奚齐，整整十年，使晋国演了一幕可怖的悲剧。骊姬正是抓住了太子申生忠孝谨慎的弱点，百般陷害，终使阴谋得逞。逐渐走向强盛的晋国，重新陷入内乱之中。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晋世家》

《国语·晋语》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四年

晋文公称霸

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年轻时爱好结交贤士，十七岁时身旁即有贤士五人，他们是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当晋献公还是太子的时候，重耳已经长大成人，献公即位为君时重耳时年二十一岁。

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骊姬害死太子申生后，又进一步诬陷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参与了申生谋害国君的活动。公子重耳听到消息立即逃回蒲邑（今山西隰县西北）。晋献公二十二年，献公派军攻打蒲邑。蒲邑人想迎战，重耳不同意，说："我是受到父亲的宠任才来到蒲邑的，有了蒲邑才得百姓的拥护。因为有了百姓的拥护就反抗国君，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晋军攻入城内，宦官勃鞮在后面追赶，抓住重耳的衣袖挥刀便砍，将重耳的衣袖斩下一截。重耳随即逃到狄国去了。狄是他母亲的故国，这年重耳已经四十三岁。跟随他逃往狄国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其余不知名的还有数十人。

到了狄国后，一次狄国攻伐另一支赤狄隗咎如，俘虏了他们两位公主。狄国国君把赤狄的长女赐给重耳为妻，生下伯鯈和叔刘二子；次女嫁给赵衰，生下赵盾。在狄国住了五年，晋献公逝世。当时，里克杀死奚齐和卓子，派人前去迎接重耳，欲立他为国君。重耳畏惧被杀，不肯回晋国。不久，晋人就迎立重耳的弟弟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惠公即位后，始终畏惧重耳回国争夺君位。第七年，便派人去狄国刺杀重耳。狐偃听到消息后对重耳

说："当初我们逃到狄国来，并非是到狄国可以求得荣耀，而是为了成就大事业。当时我说：'狄国距离我们较近，容易到达，到了那里可以得到资助和安定休息。'如今已经安定很久了，时间过久会使人怠惰。怠惰到头来，还怎能重新振作精神？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当年我们没有到齐国和楚国，是因为这两国路途遥远。经过十余年的养精蓄锐，现在可以远行了。齐桓公年长，想与我们晋国亲近。管仲已经去世，桓公身边多是些奸臣小人，没有宏谋远略，会使桓公思念当初管仲的忠言劝告，招贤纳士。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我们可以前去投奔。"随即准备出发。出发前重耳对夫人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改嫁好了。"夫人笑着回答："等你二十五年，我坟墓上的柏树都会长大了。虽然如此，我愿意等你回来。"重耳在狄国共住了十二年后才离开。

重耳一行前往齐国，途经卫国时，卫国正遭受邢国和狄族的侵袭，所以卫文公没有依礼节招待公子重耳。卫国的执政大夫宁庄子提醒卫文公说："礼，是国家的基本原则；宗法，是组织人民的关键；善，是德行的基础。一个国家没有立国原则不会长久，人民没有宗法不会团结一致，德行没有根基就建立不起来。上述三点是国君要慎重考虑的。现在国家把这些抛弃，怎么能行！晋国的公子重耳是个善良的好人，晋国与我们卫国的先祖又是亲族，陛下不以礼相待重耳，是荒废了上述三个方面，所以为臣提醒陛下慎重考虑。晋国的先祖是唐叔，唐叔是武王的儿子；卫国的先祖是康叔，康叔是文王的儿子。周代建立功勋的是武王，上天的使命将落在武王后代的身上。假如姬姓国家不灭绝，能守卫天下的必是周武王的后代。武王的后代在今天唯有晋国昌盛。公子重耳有德行，如果上天让晋国强盛，将来统治晋国的必是重耳。一旦他当了国君，修行德政，安抚人民，必会称霸诸侯，征伐不礼遇他的国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卫国就难逃灾祸了。为臣想到这些忧心忡忡，不能不禀告陛下。"然而，卫文公不听从。

离开卫国都城向东行走，经过五鹿（今河南濮阳南）不远，半途饥饿难耐，便向一个乡野百姓乞讨饭食。那人将土块放在碗里献给重耳，重耳非常恼怒。赵衰解释说："土块象征着获得土地，这是上天的赐予呀！人民依存于土地，别人把土地奉献给你，这是最好的事情。上天的意志要通过事情象征出来。二十年之后，我们晋国必会得到这里的土地。各位朋友牢记：当岁星出现在寿星和鹑尾星一带的时候，晋国得到这块土地。上天已经显示出意志，下一次寿星出现，定能称霸诸侯，大概是戊申这一天吧？"重耳听后转怒为喜，行礼告谢接过土块，放到了车上。然后，赶往齐国。

到了齐国之后，齐桓公以厚礼接待，并将女儿嫁给重耳，送他乘马八十匹，重耳生活得非常舒适。在齐国住了两年，齐桓公去世，竖刁等奸臣作乱，在齐孝公一段时期，诸侯各国的军队屡次帮助齐国平乱。重耳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因为很爱他的夫人，根本就没有离开齐国的意思。赵衰、子犯等人眼见齐国内乱，不能帮助重耳夺回国家，便在野桑树下商议回国计划，他们没有注意到夫人的侍女正在树上采桑叶。侍女听到子犯等人的计划，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重耳的夫人。夫人害怕泄露消息，便将侍女杀死，然后劝重耳离开齐国。重耳漫不经心地说："人生一世，能享受安乐就足够了，哪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我决定此生死在齐国，别无他求。"夫人解劝说："夫君是一国公子，因为穷困才来到齐国，跟随的几位贤士都寄希望于您，您却不想赶快回国报答辛劳的臣下，眷恋儿女之情，我为您感到羞耻！如不谋求回国，何时才能成功？"重耳还是不依从。无奈，夫人便同赵衰、子犯等人商量，决定用酒把重耳灌醉，然后放在马车上，疾驰出齐国都城。重耳醒过酒后，发觉已经离开齐都，大怒，拿起戈矛要杀子犯。子犯说："如果杀了我能够成就大业，我死而无憾！"重耳怒冲冲地说："如果大事不成，我就吃你的肉！"子犯回答："如果不成功的话，我的肉也是腥臭的，没什么好吃的。"重耳无可奈何，只得随从着

离开齐国。

离开齐国后，开始寻找别的大国作依靠。途经曹国，曹国的国君对重耳很不礼貌。曹共公听人说重耳的肋条排列很密，像是并成了一块，便想看看他裸体的样子。趁重耳洗澡，他躲在苇簾子后面偷看，被重耳发现了。曹国大臣僖负羁回家后把此事告诉了夫人。他的夫人说："我看晋国公子随从的那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有他们的帮助辅佐，晋国的公子重耳定能够回国为君。做了国君后，国家也会强大，称雄于诸侯。到了那个时候，他就要惩罚报复那些对他无礼的国家，而曹国是第一个。夫君为何不早些向他表示敬意呢?"于是，僖负羁又提醒曹共公说："晋国的公子来到我国，地位与我们平等，是否应该以礼相待?"曹共公不以为然地说："各诸侯国逃亡路过我国的公子太多了，我怎能照顾得过来？一概不予礼遇！"僖负羁劝告说："臣听人说，爱护亲族礼遇贤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宾客待之以礼，对穷人予以关照，这是礼节的核心内容；为政依礼法而行，这是常规。失去了常规，国家的根基将不牢固，这些事陛下都清楚。作为一个国君，应该不亲私亲，把别的国家作为亲戚朋友。我们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儿子。正是由于文王和武王的不朽功勋，才使得我们周人得以统治天下。所以，文王和武王的后代，彼此之间的血亲关系能够永远维持。现在陛下背离这种血亲关系是不妥当的。晋国的公子重耳从十七岁就离开国君身边，后来流亡在外，始终有三个贤士随从，可以说是贤能的。陛下轻视他们是不明智的。礼貌待客，施舍穷困，这些是人之常情，不可不周；玉帛和酒食，这些犹如粪土，不可惋惜。因粪土之物违背人之常理，是不值得的，请陛下慎重考虑。"曹共公还是拒不听从。负羁只好自己送饭给重耳，并赠送他玉璧。重耳接受了饭菜，而把玉璧还给负羁。

重耳对曹共公的态度很不满意，没住几天就离开了曹国，前

往宋国。宋国的司马公孙固与重耳私交甚密，闻听重耳前来，立即对宋襄公说："晋国的公子重耳虽流亡在外，但对别人彬彬有礼，好善乐施，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狐偃，以赵衰为老师，尊重贾佗。狐偃是他的舅父，待人宽厚有谋略；赵衰是赵夙的弟弟，过去给晋献公驾御战车，以忠贞著称；贾佗是公族子弟，有宏谋远略。这三位贤臣实际上左右着公子重耳，重耳的一行一动都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很少有失礼的时候，陛下一定要善待他们。"虽然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刚刚受伤，得知重耳贤能，便以礼相待。公孙固对重耳说："宋是个小国，不久前又打了败仗，没有能力帮助您回到晋国，还是另找强大的国家扶助吧！"于是，公子重耳一行离开了宋国。

经过郑国的时候，郑国的国君郑文公也没把重耳当回事。郑国大夫叔詹劝郑文公说："晋国这位公子十分贤能，他的随从臣下都是卿相之貌，晋国与郑国同姓，我们郑国的先祖是周厉王，晋国的先祖是周武王。"郑文公不以为然地说："诸侯逃亡的公子经过郑国的数不胜数，哪里用得着都以礼相待！"叔詹见郑文公如此说，便转过话语说："陛下对他们若不想以礼相待，干脆把他们杀掉，免得得罪他们，留下将来的祸患。"可是，郑文公既没礼遇他们，也没杀死他们。

重耳一行离开郑国后，然后取道南下，来到了楚国。楚国国君楚成王以诸侯的礼节隆重接待，重耳再三推辞不敢接受。赵衰劝说道："您在国外流亡多年，连许多小国都轻视您。楚国是大国，却用如此隆重的仪式来迎接，这是上天有意要授大命于你，应该接受，决不能推辞。"于是，楚成王以迎接诸侯国君的礼仪接待重耳，重耳从未受过这样的招待，受宠若惊，显得十分拘谨。酒至酣时，楚成王故意问重耳："如果公子将来回国为君，怎么样报答我的盛情款待？"重耳随口说："羽毛象牙玉帛这些宝物都是楚国的特产，晋国远不能比，真不知用什么来报答。"楚成王进一步追

问："话虽如此，难道你真的一点也不想报答我的厚待吗？"重耳见楚成王追问不舍，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回报的话，万一晋楚两国将来发生武力冲突，我将撤退三天行军的路途。"楚将子玉听后很生气地对楚成王说："大王对他如此厚待，他却好像理所当然，出言不逊，干脆把他杀死算了！"楚成王并不在乎地说："公子重耳贤能超人，虽在国外流浪多年，但随从的人都非等闲之辈，将来必成大器，这恐怕是上天的安排，决不可轻易地杀他。你想，他不这样说，还能怎样回答呢！"在楚国住了几个月，正遇到晋国发生内讧，太子圉从晋国逃亡到秦国，秦国人与太子圉素有怨仇。看到晋侯在国内不得人心，重耳虽流亡国外却人心所向，便派人请重耳到秦国去。楚成王见秦国来请，便对重耳说："楚、晋两国相隔千山万水，中间隔着许多国家，虽想拥护公子回国也不方便。秦、晋两国土地接壤，秦王又非常贤明，公子还是投奔秦国去吧！"随后将重耳护送出了国界。

重耳到了秦国，秦穆公盛情款待重耳，把五位公主嫁给重耳为妻，对他寄予厚望。在这五个夫人中，有晋国太子子圉的前妻怀嬴。重耳因此缘故对怀嬴有成见，不想要她。一次，重耳故意让怀嬴去打洗脸水，然后挥手让她端走。这样的活本应该让妾或者女仆去做。重耳对怀嬴如此无礼，使她极为不满，生气地说："秦、晋两国地位相当，你为何如此看不起我？"重耳见得罪了秦穆公的女儿，担心她到穆公面前告状，便急忙到秦穆公那里去请罪。秦穆公明白其中缘故，和颜悦色地对重耳说："寡人的嫡生子女中，怀嬴品貌双全。早年子圉在这里为人质，我把她送过去侍奉子圉。本想缔结两国姻缘，我又担心子圉的坏名声。事情原本如此，我没有按婚姻大礼把怀嬴嫁给你，而是与其他四人一同出嫁，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如今使公子蒙受屈辱，这是寡人的罪过。是否娶怀嬴为夫人，由你自己决定，寡人唯命是听。"

重耳当时未置可否，回去之后同几位贤臣商议。司空季子说：

“接娶子圉的前妻没有什么不好的，古来就有同姓兄弟共妻的传统习惯。不久晋国内部将有动乱，缔结晋秦之好可以得到秦国的支持，何必拘于小节而耽误大事！”重耳转头问子犯：“你说怎么办好？”子犯态度明朗地说：“公子将要夺取子圉的国家，还在乎夺他的妻子吗？听从秦人的吩咐就是了。”重耳心中仍不认可，便又问赵衰，赵衰回答：“礼书中曾记载说，将要有求于人，必须先使人得到好处；要别人爱自己，必须先去爱别人；要别人听从自己的，必须先听别人的意见。对别人没有施舍一点好处，却想让别人恩赐于你，哪里可能？当前的婚姻一事应该听秦人的，而且还应该像娶秦国未婚公主那样郑重地对待，让秦穆公产生好感，甚至还要像唯恐失去这次机会一样，再也不要犹豫不决了！”见几位部下态度如此坚决，重耳也就宽慰多了。随后，将怀嬴送回穆公的宫中，然后像正式缔结姻缘一样，先送去订亲礼品，择定吉日，隆重地迎娶怀嬴。

不久的一天，秦穆公准备宴请公子重耳。重耳让子犯随自己去赴宴，子犯建议说：“这样的场合我不适合，赵衰文质彬彬，能言善辩，请您让他随从为妥。”

重耳带着赵衰到了秦穆公宫中，秦君招待重耳完全依照接待国君的礼仪，对赵衰像贵宾一般。宴会结束后，秦君觉得重耳及其臣下气象非凡，将来必成大事，便对臣下们说：“实施礼节要自始至终，行使礼节要表里如一。待人不礼，华而不实，不计长远，不能善始善终，这些都是不明智之举，你们务必多加注意！”

第二天，秦穆公再次宴请重耳。在宴会上，宾主双方用赋诗的方式表白心志。穆公赋了一首《采菽》，诗中说：“君子来到我这里，我用什么赐予你？虽没什么赐予你，车辆乘马作礼品。”赵衰听后让重耳立即下堂拜谢，穆公也马上走下来还礼。赵衰对穆公说：“陛下赏赐重耳，重耳怎敢不拜谢？”礼毕，重新回到座位上，赵衰让重耳赋《黍苗》，诗中道：“田中细小的黍苗，全靠雨

露的恩泽。”赵衰随后说：“重耳仰仗陛下，犹如黍苗依赖春雨一样。如果陛下能使黍苗受到泽润，长成丰硕的谷实，献祭到祖庙里，这是无尚的功德；换句话说，陛下若能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东渡黄河，率军以复兴公子之业，这正是重耳的愿望。假使重耳有德，当了晋国国君，还能不听从陛下的吗？陛下扶助重耳得国，其他各国诸侯还有谁敢不听从陛下的指挥！”秦穆公叹了口气，然后说：“能指挥天下诸侯的将是公子重耳，大概不会是我了。”随后赋《鸠飞》诗说：“看那栖息的鸣鸠，将要振翅冲上天。”重耳赋《河水》诗作答：“波涛汹涌黄河水，奔腾不息归大海。”隐意是说，自己即使将来得志，也会继续依赖穆公。穆公又赋了一首《六月》诗，描述尹吉甫辅佐周王室平定天下，成就大业。赵衰让重耳下堂拜谢，秦君下堂还礼。赵衰解释说：“陛下用辅佐天子匡正天下的诗勉励重耳，重耳怎敢怠惰不尽竭全力去实现呢？”

晋惠公十四年秋天，惠公去世，太子圉即位。子圉无德，不得民心。晋国的大臣们听说重耳在秦国，都暗中劝说重耳回国，他们在国内作接应。重耳不知能否成功，便让史官卜筮，看能否得国为君。卜筮的结果，得到的是屯卦和豫卦，史官回答说：“不吉利，没有什么作为。”司空季子大怒说：“谁说不吉利，吉利得很！用《周易》占算，筮辞是‘利于建国为侯’，是说能得到国家，还有比这更吉祥顺利的吗？应该立即回国，切勿犹豫，以免失去良机！”在赵衰等人的劝说下，重耳决定立即返回晋国。

同年十二月，秦国军队护送重耳回国。重耳一行走至黄河西岸，子犯将保管的玉璧还交重耳，说：“我跟随公子奔走天下，犯了许多错误，我自己都清楚地知道，何况您会知道的更多？我不愿自己将来因罪而死，现在就离开公子吧！”重耳郑重地说：“如果我回国后不与贤臣同心同德，就让这东流的黄河把我冲入大海！”说完，把玉璧投人黄河为誓。当时，介子推也随行，看到这场面暗自思忖：“公子的大业实受上天之命，子犯还以为是他的贡

献，竟然向公子邀功，真是厚颜无耻，这种人难以共事。”后来，辞官隐居了。

晋国的史官董因到黄河西岸迎接重耳，重耳问董因：“你看我此行能否成功?”董因胸有成竹地回答：“现在岁星出现在大梁上空，天道将有重大转机。当岁星在实沈之虚的时候，您已经居住在晋国，开始兴业了。如今只有公子能承此大任，定会成功！天象表明，您不但能入晋为君，而且能称霸诸侯。子孙后代都仰仗着您的功业，千万莫再犹豫了！”

晋文公元年（前636）春天，在秦国军队的护卫下重耳一行渡过黄河，派人去令狐、臼衰、桑泉三邑招降，三邑不战而降，归附了重耳。二月，晋怀公派大军抗御重耳，驻扎于庐柳。秦穆公派公子絷到晋军中交涉，结果，在秦人的威胁下晋军退至郇邑。狐偃约合秦、晋两国大夫在郇邑谈判，双方达成一致。随后，重耳到了晋国军营中，不久就进入了曲沃。进入曲沃后，重耳立即到祖庙中祭祀，并派人刺杀晋怀公。当时晋怀公已从都城绛出逃，在高梁被人杀死。重耳即位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四十三岁开始流亡，在外漂泊十九年，此时已经六十二岁了。

吕甥和郤芮是前晋惠公和怀公的宠臣，与晋文公矛盾很深。晋文公为君，他们担心以后获罪被杀，便密谋作乱，准备先放火焚烧晋文公的宫殿，然后趁乱杀掉文公。寺人披（也叫勃鞮）得悉此事，打算立功赎罪，便求见文公。文公一听是寺人披，很反感，派人转告他：“当蒲城之乱时，献公让你第二天去刺杀寡人，你当天就赶到蒲城。后来寡人同狄国君主在渭河之滨打猎，惠公命你杀死寡人，让你三天到达，你星夜兼程两天就到了。虽说是执行君命，你也算得上不遗余力！寡入的那截衣袖还在你手里，你赶紧走开！”寺人披回答：“臣以为陛下此次回国之后，必定精通治国之道了。如若不然，将来恐怕还会遭难。作为臣下，一心一意执行国君的命令，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铲除君子所痛恨的人，责

无旁贷。过去，我跟蒲邑和狄国的人有什么君臣关系？如今陛下即位，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君臣关系了。众所周知，齐桓公不计较管仲用箭射杀自己，而且还用他为相。陛下若能不计前嫌，为臣照样尽力效忠。进一步说，当初跟陛下离心离德的人很多，难道只处罚臣一个人吗？”小臣把寺人披的话转告了晋文公，晋文公便立即召见了他。面见了晋文公，寺人披把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烧宫的事作了汇报。

晋文公得知此事后并未声张，暗中作好了准备。晋文公把此事通知了秦穆公，求得秦国的帮助。三月末的一天，文公的宫殿果然突起大火，人们惊恐万分。吕甥和郤芮想杀晋文公，怎么也寻找不到，于是就到黄河边上去找。这时，早已作好准备的秦国军队将他们抓住杀死。平息了暴乱之后，晋文公把夫人怀嬴从秦国接回，秦穆公派三千卫队护送，并把这支部队称作“维护纲纪的臣仆”。

当初晋文公有一个名叫头须的侍臣，专门为文公负责管理钱财。后来文公流亡国外，头须就携款潜逃。原来，头须是把这些钱花在文公身上，用这些钱贿赂其他国家，求得护送文公回国。然而晋文公本人并不知道这些。晋文公即位以后，头须求见文公，文公以洗澡为由拒绝接见。头须不满地对小臣说：“洗澡的时候头朝下，心正好翻转过来，因而思想也就本末倒置了。思想混乱了自然就不知道怎样待人了，我也不便此时拜见文公。陛下流亡时需要的是牵马的仆人，即位后需要的是安邦治国的大臣，这些人都有了，我算得什么？”侍臣把这话回禀了文公，文公自觉刚才所言不妥，立即召见了头须，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晋文公即位之后，狄国国君把文公在狄国的夫人季隗送回晋国。当初虽约定二十五年为期，时光转瞬已经阔别七载了。赵衰的夫人叔隗却未能回到晋国。后来，晋文公把一个公主嫁给赵衰，生下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衰的第二位夫人对赵衰说，

应该把第一夫人叔隗迎接回来。赵衰觉得如果叔隗被接回，晋文公的这位公主的位置就不好处理，干脆就不想考虑此事。但这位第二夫人十分开明，对赵衰说："有了新人忘掉旧人，别人会怎么看待你？一定要把叔隗接回来。"在晋文公的帮助下，才将叔隗和她的儿子赵盾接回。她看到赵盾很有才干，便请求文公允许赵衰让赵盾为嫡长子，叔隗作嫡夫人，自己甘居其下。

晋文公即位以后，对那些随他流亡的臣下论功行赏。当时，几乎所有的随从都获得赏赐或官职，唯独介之推不向文公提出要求，而文公也暂时忘却了他。介之推对母亲表白自己的想法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如今只剩下文公一人在世，惠公和怀公也没留下子孙后代。上天既然没有使晋国断绝烟火，就必会降下大命使某个人来为晋国主祭，这位主祭人不是文公能是谁呢？然而，一些臣子却认为文公得国是他们的功劳，把功劳归于自己，这岂不是贪天之功吗？一个人盗窃别人财物会被指为盗贼，盗窃上天的旨意和功劳又该落什么罪名？看看现在的朝中，贼臣把自己的罪过当成功绩，君主又大加封赏，上下欺骗，我怎么能跟这些人共事！"介之推的母亲劝他说："你不愿混同于人这没关系，但你应该去跟国君说明白，表明自己的心愿，否则，你死以后有谁能理解你？"介之推淡淡地说："我认为那些人沽名钓誉，然而却去效仿他们去摆自己的功劳和清白，岂不同他们一样了吗？当初秦国军队护送文公渡过黄河回国的途中我曾暗自发誓，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母亲继续劝他说："你不愿为官我不怪你，总要同国君打个招呼，让他想到你呀？"介之推固执地说："言语等于是身上的花纹，儿子要把自己隐蔽起来，又何必在身上涂花纹？那岂不是故意显露自己吗？"母亲无奈地说："既然你如此清高，那我就随你一同隐居吧！"于是母子一同隐居山中。后来，晋文公想到介之推，千方百计找不到，就在一块绢帛上书写封赐介之推的文书，惆怅地说："寡人以此表明自己的疏忽罪过，也是为了表彰一位善良的忠臣。"

另有一位随文公流亡的小兵，眼看别人都封官受爵，自己还没有得到，有些沉不住气了。于是，亲自找到晋文公说："陛下三番论功行赏都没我的份，不知我犯了什么过错？"文公微笑说："我第一次封赏，赏赐那些用仁义引导我，用恩德防止我的过错的臣下，是这些人忠心耿耿地辅佐我，使我成功，这些人受一等爵位；第二次封赏，奖励那些冒着枪林弹雨厮杀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这些人受二等爵位；第三次封赏，勉励那些尽力于我，却没有持别人的功劳的人，这些人受三等爵位。三番行赏之后，就该轮到你了！"晋文公论功而赏、不阿私亲的做法，很得人心，赢得人们的衷心拥护。无功者，邀功不赏；有功者，不邀必赏。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尽忠竭力。

自从晋文公回国即位之后，积极治理内政富国强兵，第二年就想向外扩张争霸。子犯劝阻说："称霸天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应该逐步地教育人民，让百姓懂得什么是礼法和信义，使他们肯于服侍陛下，然后霸业才能成功。"恰在这年周王室发生王子带之乱，周襄王从王都出逃到郑国的汜城，襄王派人向秦国和晋国求助。秦穆公火速率军赶到黄河岸边，准备护送天子回京。晋国大夫狐偃着急地对晋文公说："陛下若要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是扶助周天子，这不仅能获得仁义美名，而且能借机驾御诸侯，发号施令。继承先君文侯辅佐周平王的功业，现在正是良机，切莫错过！"晋文公让史官先占卜，再作决定。史官报告说："所得是个吉利的卦象，是黄帝与神农大战于阪泉之野，最后获胜。"晋文公说："那是古代的帝王，寡人怎么敢当？"史官解释说："如今还是周代的天下，周天子就等于古代的帝王"。晋文公迟疑，又让史官占筮，筮占的结果是从"大有"卦演变到"睽"卦，史官解释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卦，是天子屈尊请求臣下的卦象。"

于是，晋文公决定出兵勤王。他先派人辞退了黄河对过岸边的秦国军队，然后亲率大军沿黄河而下。三月十九日，晋军抵达

到阳樊，文公派右师领兵包围温邑，派左师到汜城迎接周襄王。四月初三，周天子在晋军的护卫下重新返回京都。晋军攻破温邑，抓住了王子带，然后押至隰城处死。

四月初四，晋文公正式朝见周襄王。襄王很感激晋文公，赐盛宴款待他。周襄王还赏赐了大量币帛财物，晋文公借机请求襄王准许自己死后使用天子葬礼的仪式，周襄王拒绝说："仪式是地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现在周王朝的正统还没有改变，怎么有两个天子？寡人并不认为你真的想那样做。"随后，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攒茅等地封赐给晋国，晋国的领土开始扩展到南阳一带。可是阳樊地方的人民并不愿归服晋国，晋文公派军把阳樊包围。阳樊人仓葛在城上高声怒吼说："德，是为了安抚中国，刑，是为了威服四夷。你们竟然用对待蛮族的手段对待我们，我们才不愿服从。我们是周王室的亲族，难道想拿对待俘虏的态度对待我们吗？"闻听此言，晋人把阳樊人放出了城，仅仅得到了阳樊的封地。

同年冬天，晋国军队又包围了原邑，晋文公命令军队只带三天的军粮，如果三天原人不投降，就放弃此城。三天时间过去了，文公下令撤兵。就在即将撤兵的时候，谍报人员回来报告说："原人就要投降了！"有人提出先不要撤兵，晋文公对他们说："信义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信誉，国将不存。这次我们虽然可以得到原邑，但却失了信用，今后还怎样取信于民？决不能因小失大！"遂令全军撤退。晋军撤离三十里之后，原人见文公是礼义之君，便宣布归服。文公把原邑封君迁到冀地，任命赵衰为原邑大夫，又任命狐溱为温邑大夫。

晋文公四年冬天，楚成王率军进攻宋国，宋国派大夫公孙固到晋国告急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说："报答宋国以前赠马的恩惠，解救宋国的危难，建成我们的霸业，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夫狐偃建议："楚国刚刚得到曹国，同时与卫国结成婚姻，假如我

们攻击曹、卫两国，楚国必会释宋围而去救援，一举两得。”为了与楚军展开决战，晋国由原来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商议元帅的人选。赵衰建议：“郤縠可以担当这一职务，因为他喜爱礼乐诗书。诗书是礼义的宝库，礼乐是品德的法则。《夏书》中说，采纳一个人的建议，测验他的功劳，勉励他的成绩。陛下为何不让他试一试呢？”晋文公听从此议，任命郤縠为元帅，由郤溱为副职；另派狐偃统帅上军，狐偃把职位让给狐毛，自己作副手；任命赵衰为卿，赵衰让给栾枝、先轸。文公任命栾枝率领下军，先轸为副职。三军组建后，晋文公在被庐检阅三军，然后出发。

晋文公五年春天，晋国军队大举攻曹，向卫国借路，卫国不答应。于是晋国回军，从河南渡过黄河袭击了曹国。然后调过头来攻打卫国。正月初九，晋军占领了卫国的五鹿。二月，晋国的中军元帅郤縠不幸病死，先轸升任中军元帅，由胥臣代替下军副帅职务。

晋文公随后再次发兵攻曹，向曹国都城发起猛烈攻势，晋军伤亡惨重。为摧垮晋军士气，曹国人把晋兵的尸体挂在城门上示威，晋兵看后很恐惧。晋军有人提议说：“他们悬尸，我们可以挖他们城外的祖坟！”晋军随即开向曹国陵墓区。曹国人见后恐慌不已，主动把晋兵尸体装进棺材送出城，以阻止祖坟被毁。晋军趁机猛攻曹都。三月初八，晋军终于攻入曹国都城。攻入曹都后。晋人声讨曹国国君的罪状，指责他不任用僖负羁，当年胆敢观看晋侯洗澡，现在是罪有应得！下令三军：任何人不得骚扰僖负羁的家宅，不许伤害他的族人！晋军将领魏犨和颠颉不满地说：“国君不报答我们这些厮杀疆场的人，反要报答什么僖负羁，岂有此理！”命人烧了僖负羁的家宅。文公听后大怒，想杀死魏犨，又可惜他的才干。听说魏犨在作战中受伤，就派人送去东西，借机观察病的轻重，如果伤得重不能治好，就下令杀他以申军纪。使者到了魏犨那里，魏犨得知此情，让人把自己的伤口包扎好，见到使者

说："托君主的福，我还要杀敌立功！"说着，前后跳跃了几下。晋文公以为魏犨还可利用，就饶恕了他，杀死颠颉通报三军。

此时楚国仍在围攻宋国都城，情况危急，宋国再次派门尹般到晋国求援。晋文公为难地对臣下们说："现在宋国来求援，我们不帮助的话，宋国有可能倒向楚国一边；我们同楚国开战，秦、齐两国又不支持我们，这可如何是好？"先轸献计说："我看不妨这样：让宋国送礼品给秦、齐二国，请求他们救援，让秦、齐二国出面与楚国交涉；我们把得到的曹国和卫国的土地让给宋国。楚国喜欢曹卫二国，必不会答应秦齐二国的请和要求，秦齐二国与楚的关系就会恶化。"文公觉得言之有理，立即依计去做了。

形势变得对楚国越来越不利。楚成王决心撤军，他率军驻扎到申邑，命令子玉从宋国撤兵。他派人对子玉说："晋侯在外漂泊十九年后得到晋国，艰难险阻辛酸苦辣都尝过，民情心理他都了解。老天爷让他晚年大难不死，不是偶然的。兵书上说，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德不可挡。这三个条件正适合晋侯，我们还是不要与他交战。"子玉年轻气盛，怎听得此言，立即派伯棼到楚成王那里请战："虽不敢说立大功劳，但我要用实际行动和胜利堵住奸佞小人的胆怯言论的嘴巴！"楚成王听到这样狂妄的语言，十分恼怒，只拨给子玉少量的军队和一百八十辆战车。

子玉派大夫宛春到晋国军中谈判说："如果你们晋国恢复卫侯的君位，让他回国，同时把曹国的土地归还，我们楚军就解除对宋国的围攻。"晋国大夫子犯听后吼道："子玉是什么东西！他仅仅解除围宋，就要我们付出复卫封曹两项，这不合算！"先轸却冷静地说："陛下务必三思而行！安定别国叫礼，楚人一句话而使宋、曹、卫三国得安宁，我们不答应使三国遭难，我们岂不是无礼了吗？没有礼义，靠什么得人心霸诸侯？我们一定要答应楚人的请求才是。当然，我们还应策略些，暗中派人给曹国和卫国恩惠，使他们归附我们晋国；同时扣押楚使宛春，以激怒楚军，使他们孤

注一掷。”晋文公拍手称妙，照计而行。不久，曹、卫两国果然与楚国绝交。

子玉的阴谋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下令向晋军进攻。晋文公下令撤退。将士们都不解地埋怨说：“作为国君率兵出战，却逃避对方臣下的军队，这是奇耻大辱！况且，楚军已经疲惫不堪，一击即溃。”子犯这时向大家解释说：“出兵作战，正义的一方压倒非正义的一方，有理则气壮。当初陛下流落楚国，曾答应如果两国交兵就退避三舍。当初受人恩惠，现在应该报答，知恩不报，这是亏理。如果我们退避了，楚军以臣犯君，理亏在他方，会挫伤他们的士气，那时他们才是真正的不堪一击。”将士们想通了，主动地撤退了三天行军的路程。

见晋军撤退，楚军的将士们不愿再战，要求停战，子玉不同意，强令追击。

四月初一，晋、宋、齐、秦与楚、陈、蔡双方军队对峙于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城）。楚军背靠着险要的丘陵扎营安寨，晋文公很不放心。子犯勉励说：“出战吧！战而得胜，称霸诸侯，岂不痛快！战而不胜，撤退就罢了。”晋文公有些为难地说：“当初楚国给予我很多恩惠，我不忍心交战。”栾枝进言道：“陛下看一看，楚国把汉水以北的姬姓国家吞并殆尽，又向中原下手。您只想到了以前的小恩小惠，而忘记了大辱。”这天夜里，文公作梦与楚庄王搏斗，楚王压在文公身上吸吮文公的脑髓。恶梦醒来，毛骨悚然。子犯却宽慰文公说：“这是个好梦，吉利！我们向着天，得天意；楚王面对地，是伏罪”。

第二天，晋、楚双方摆好阵列，子玉派将军斗勃请战，对晋文公说：“让楚、晋两国的武士较量一下，我子玉陪陛下一同观看。”文公派大将栾枝回答：“楚国的恩情从未忘记，所以撤退至此，我们以为楚国已经撤兵了。既然你们不肯休兵，那就奉陪到底！”晋国投入此战共七百辆战车，装备整齐。晋军一字摆开军阵，胥臣

使下军对着陈、蔡两国的军队。子玉把若敖氏的一百八十乘战车作中军，子西统左军，子上统右军，子玉蔑视地说："此战定要灭亡晋国！"晋将胥臣把马蒙上老虎皮，首先向陈、蔡的军队发动猛攻。陈、蔡军队本不想战，是在楚国的胁迫下参战的，所以一战即溃，右翼瓦解。在正面，栾枝让战车拖着木柴伪假败逃，尘土飞扬，楚军信以为真，急忙追击，原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击子西的左翼部队。楚军全线溃败。

城濮一战，楚军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伤，向中原扩张的过程暂时受挫。晋国击败楚国，一举成为中原霸主。

四月二十七日，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召集各国诸侯前来会盟，并筑造王宫，请周天子前来参加。

五月十日，晋文公把俘虏和战利品献给周天子：战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十二日，天子设宴款待晋文公。周天子命令尹氏和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册封晋文公为诸侯领袖，赐给文公高级乘车和战车以及相应的服装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红箭百枝、轩弓十把、黑箭千枝，香酒一卣，勇士三百人，勉励他说："今后要带领四方诸侯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安抚四方，惩罚邪恶！"接受了册命文书，晋文公率军离开了周都洛邑。

晋军胜利而归，六月十六日北渡黄河，舟之侨违背军规擅自先回到国内。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国都，在祖庙告祭祖宗战争的情况，然后置酒宴犒赏三军。文公下令斩杀舟之侨，通报全国。人们纷纷赞誉说："国君赏罚严明，我们信服。"

同年冬天，晋文公再次召集鲁、齐、宋、蔡、郑、陈、莒、邾、秦等国君主在温地会盟，商量出兵讨伐不顺服的国家。同时，晋文公派人迎请周天子到会，文公亲自到天子的住所朝见。

回国后不久，晋文公生了重病，卧病在床。曹国人侯獳贿赂晋国的史官，让他把国君得病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灭了曹国。晋国的史官进见文公，劝说到："当年齐桓公当霸主，会盟的时候封赐

异姓国家，而如今陛下会盟却灭同姓国家。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文王之子，我们先君唐叔是武王之子，曹、晋是兄弟国家。会盟诸侯却灭兄弟之国，这有违礼法。况且，曹和卫两国情况相同，让卫国恢复了国家，却不理睬曹国，罪过相同而处罚不同，这不合刑法。礼法是为了维护道义，刑法用来惩治奸邪，不遵守这两条原则，何以使诸侯和人民信服。”文公听后觉得言之有理，恢复了曹伯的君位，并让他参加在许国召开的诸侯盟会。

晋文公八年，晋国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扩建了两个军，共五个军的兵力。这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赵衰被任命为国卿。

晋文公霸业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能任人唯贤，在他周围有一群为国为君忠心耿耿的贤材。最典型的例子是赵衰。赵衰追随晋文公多年，尽忠竭虑，不计私利。晋文公组建新军，征求元帅的人选，越衰提议说：“郤縠合适。他年近五十，学识渊博，懂得德政仁义。德政仁义是治理国家之本，只有牢记这些才能不忘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文公依从了他的意见，并准备让他担任国卿。赵衰又推辞说：“栾枝正直谨慎，先轸机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他们都可以为辅佐，我不如他们。”文公便任命栾枝为下军统帅，先轸为副帅。当年攻克卫国的五鹿，正是听从了先轸的计策。后来，郤縠去世，先轸代理了元帅职务。狐毛任上军统帅，他死后，晋文公让赵衰接任此职，赵衰又辞让说：“城濮之战时，先且居任副帅立下了功劳，有才能，应该任命他。箕郑、胥婴、先都三个人都不比我差。”晋文公感慨地说：“赵衰屡次让贤，一心奉公，难能可贵！所推举的人选都十分合适，我依从他，也正因此故。”到晋国作五军的时候，任命赵衰担任了新上军统帅。

郤缺是郤芮的儿子。郤芮曾与吕甥同谋焚烧晋文公的宫殿，对郤缺的态度也反映了晋文公的宽容和大度。一次，胥臣出使路过郤野，看到郤缺耕田，他的妻子到田间送饭，夫妻相敬如宾。一

问，方知是郤芮的儿子，便带他一同返回国都，推荐给文公说："臣得到一位贤才，告知陛下。"文公已得知此事，问道："他的父亲有罪，能任用他吗？"胥臣回答："从历史上看，鲧治水不成功，舜杀了他，而用其子禹；管仲截杀齐桓公，齐桓公后来用他为相。有什么不可的呢？"晋文公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

晋文公九年冬天，文公去世。晋文公六十二岁即位，在位九年，终年七十岁。晋文公是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霸主，同齐桓公比较，晋文公更崇尚德政和仁义，更能任人唯贤。齐桓公晚年任人不善，太子不立，结果五子争位，国内大乱；晋文公去世后，襄公即位，国内安定，政治清明，霸业未衰，这同样是晋文公的功绩。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晋世家》

《国语·晋语》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

宁武子弭卫难

晋文公争霸，楚庄王也争霸，两国争霸的实质是争夺对其他各国的统治和指挥权。由于两国彼此的实力在不断变化，你强我弱，或者我强你弱，那些受其指挥的弱小国家也在不断地受治于新霸主。卫国就是在晋文公争霸崛起过程中遭难的国家之一。

卫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在当时也算是一个较大的封国。但卫国自身的发展并不快，至春秋初年，国内先后发生了州吁之乱和懿公亡国的灾难，国力日益衰弱，变成了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南方有楚，东方有齐，西方有秦，北方有晋，这四个强国彼此争战，卫国是必争之国。卫国只有不断地调整外交政策，密切注意时局的变化才能求生存。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这一时期卫国的国君只知淫乐，忘却治国，使国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几乎无法立足。这时卫国出现了一位足智多谋的大夫，名叫宁武子，周旋于卫国的政治舞台上，使卫国转危为安。

晋文公早年流浪在外的时候，一次途经卫国。当时卫国正遭受邢国和狄族的侵袭，所以没有按正常的礼节招待晋文公。卫国的国卿宁庄子提醒卫文公说："礼是国家的基本原则，宗法是组织人们的纽带，善是德行的基础。一个国家没有立国原则不会长久，没有宗法人民不会团结一致，没有基础国家不会稳固，上述三点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履行。陛下把这些弃之不顾，我们卫国还怎样立国？晋国的公子重耳善良有德行，晋国与我们卫国的老祖宗又是亲族，陛下对重耳不以礼相待，这就背弃了上述

三个方面，臣提醒陛下应谨慎从事。晋国的封君唐叔是周武王之子，卫国的封君康叔是文王之子。周代建立功勋的是武王，上天的使命是落在武王后代身上的。假如姬姓的天下不灭，能守此大业的必是武王的后代。武王后代中，如今唯有晋国最盛。在晋国诸公子中，唯独公子重耳最得人心，将来统治晋国的很有可能是他。一旦他当了国君，修德安民，称霸诸侯，必会讨伐与他关系不好的国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卫国就要遭殃了。臣想到这些便毛骨悚然，特禀告陛下。”但卫文公满不在意。

不久，公子重耳离开卫都东行，在卫国的五鹿（今河南濮阳南）饥饿难耐，便向一乡间百姓乞食。那人将一块土块送给公子重耳，重耳见自己竟然受乡野之人的污辱，很是恼怒。他的部下赵衰急忙解释说：“土块象征着土地，土地上居住着人民百姓，别人把土地人民献给您，这可能是天意的显示，岂不是好事！上天的意志要通过小事显现出来，天意不可违。我掐算了一下，十二年之后我们晋国会得到这块土地。从星象上看，是在岁星出现于寿星和鹑尾星一带之时。下次寿星出现，定能称霸诸侯，此乃天意，为什么发怒？”重耳听后转怒为喜，毕恭毕敬地接过土块放到车上。

时光飞逝，几年过后，公子重耳在晋国取得君位。经过休养生息和富国强兵之后，便开始向外扩张称霸，卫国自然成为目标之一。这时卫国的君主是卫成公。卫成公三年（前632）春天，晋文公先攻伐与卫相邻的曹国，随后便进攻卫国，迅速占领了五鹿。卫成公见晋军来者不善，十分害怕。占领五鹿后，晋文公准备大规模进攻卫都，先与齐国结成军事同盟，在卫国的敛盂（今河南濮阳东南）两国会盟。卫成公想参加盟会，遭晋国拒绝。晋军大兵压境，卫都内人心汹汹。卫成公想拉楚国人作靠山，同楚国结盟，国人纷纷反对。为免遭灭国之灾，卫国人将卫成公驱逐出国都，以讨好晋。卫成公仓皇逃到卫国的襄牛（今山东范县）。

楚国与卫国和曹国关系较为亲密。当时楚国军队正在围攻宋国，见卫国告急，便派使者对晋文公说："请你们晋国把卫成公送回国都，恢复曹国，我们楚国停止攻宋。"晋国扣留了楚国的使者，楚将子玉大怒，两军随后在城濮展开决战，楚军战败而逃。卫成公闻听楚军败退，自己没有了指望，怕晋人前来报复，立即从襄牛奔向楚国。中途经过陈国的时候，派大夫元咺返回卫国，拥戴叔武临时代理国政。然而有人制造谣言说："元咺拥立叔武为国君，卫成公再也回不到卫国了。"卫成公听后极为恼怒。元咺的儿子此时跟随着卫成公，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可是，元咺并不因此痛恨国君，而是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叔武共同守卫国家。

同年六月，晋国人见卫成公出逃后，卫国内井然有序，无机可乘，便允许卫成公返回国都。卫成公是被国人驱赶走的，他回到国都内势必形成两派之间关系紧张，一些大夫害怕国君回国后自己被杀，一时间国内人心惶惶。有鉴于此，宁武子召集卫国的卿大夫在宛濮（今河南长垣西南）开会，他与大家盟誓说："现在，上天给我们卫国降下灾祸，使我们君臣之间不能和睦相处，国家遭难。灾难即将过去，上天又保佑我们卫国，使国君还都。希望大家能放弃成见，以诚相待，放开胸怀。没有人留在国内，由谁来保卫家园？没有人随从国君，由谁来保卫那些牧牛养马的人？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因此，我们现在要起誓：订立盟约之后，随君在外的人不要仗恃自己的辛劳，留在国内的人不要认为自己有罪。谁若违背盟约，灾祸将落在他的头上，由神灵和先王来诛罚！"会盟之后，留在国都内的人们才放下心来。并约定了国君回都的日期。

卫成公不相信国都内的人们真心欢迎自己回去，怕时间久了生出变故，提前回到国都。为了避免误解，宁武子乘车走在卫成公前面。当时守卫城门的官员是长牂，他以为宁武子是受国君派

遣而来，便与他同乘一车而进城内去了。长牂一走，城门也就不守，卫成公一行畅行无阻地进了城。公子歂犬和华仲驱车在前方开路。此时叔武正在洗澡，听说国君回到首都十分高兴，用手抓着头发跑出来欢迎卫成公。公子歂犬对叔武有成见，拉弓射箭将叔武杀死。卫成公见此情况，知道自己以前听信的是谣言，叔武无辜而死，扑在叔武尸体上放声痛哭。看到歂犬从宫内走出，派人上前将他杀死。元咺听闻叔武被杀，以为事情有变，匆忙逃往晋国。

元咺逃到晋国，诉说卫成公杀害了叔武，自己是受到威胁才逃亡的。晋人听后以为卫成公并非真心归附晋国，派使者召卫成公至晋解释事情的原委。卫成公前往晋国，宁武子作为国君的诉讼人，歂庄子作为卫侯的代理人，士荣作为卫侯的答辩人，一同随行。到了晋国，卫侯与元咺当着晋人的面展开辩论。尽管卫侯竭力解释不是有意杀害叔武，也根本不想加害元咺，但他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提前赶回卫国，无法使人相信他提前回国与叔武的死没有关系。晋人很生气，杀了士荣，砍掉歂庄子的双脚，认为宁武子仁义忠诚而赦免了他。将卫成公逮捕，押送京师，囚禁在地下室里。宁武子负责给卫成公送饭。元咺回到卫国首都，立公子瑕为卫国君主。

卫成公五年，晋人觉得卫成公活着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一旦回国只能有害，便派一名叫衍的医生毒死卫成公。宁武子得此消息，万分不安，找来一些珍奇宝物贿赂这位医生，让他减少毒药的剂量。这位医生得到好处，自然照办。结果卫成公虽然中毒，但并未死亡。当时鲁国国君僖公正在这里，见此惨状，便把鲁国的美玉献给周天子和晋侯，请求放掉卫成公。周天子同意了鲁僖公的要求。晋人无奈地放走了卫成公。

卫成公虽被释放，但卫国内已有新君，元咺执政，自己无处可归。于是，卫成公派人潜回卫国贿赂大夫周歂和冶廑说："如果

你们迎接我回国为君，我任命你们二位为卿。”周歂和冶廑见有利可图，便寻机谋杀了元咺和公子瑕以及公子仪。随后，派人迎接卫成公。卫成公回到国内，先到祖庙祭祀祖先。周、冶二人见大功告成，兴高采烈地穿上朝服，准备接受任命。周歂先进祖庙，刚到庙门口，暴病突发而死。冶廑莫明其妙，内心恐惧不安，辞绝了国卿的职位。卫成公就这样重新夺回了国君的宝座。

卫成公六年，狄包围了卫国。卫国不断的内乱使国力日益衰弱，根本无法抵挡狄人的进攻。于是，卫成公将国都迁移到帝丘。卫成公让史官占卜此地是否宜于定都，筮卜的结果说可以立国三百年。据说，这个地方原是夏代帝王相的封地。卫国迁都此地后不久，卫成公梦见自己的先祖康叔说：“你们虽然给我祭品，但这些祭品都让相夺走吃了。”卫成公梦醒后立即命令祭祀相。宁武子不同意，他说：“自古以来，人们从不祭祀异族的神灵，因为神灵不享用异族的祭品。相有自己的后代杞国和鄫国，应由他们二国祭典。相很久以前就没有人祭祀了，这是杞国和鄫国的罪过，与我们卫国毫不相干。不能违背周成王、周公制定的礼法，请陛下立即撤回命令。”卫成公依从了。

卫成公七年夏天，狄人发生内乱，卫国军队乘机进攻狄国，狄人请求议和。这年秋天，卫国与狄国结盟。狄族的威胁解除了，国内的动乱也平息了，卫国逐渐稳定下来。

卫国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忧患不断，重要原因不仅在于外国的入侵，也在于君主不善治国，臣下唯利是图，这与晋文公及其大臣形成鲜明的反差。宁武子虽算不上是杰出的贤佐，但能够把握大局，左右逢源，使国家度过险关。卫成公十二年，卫成公派他去鲁国访问，鲁文公设宴招待。在宴会上，鲁文公为他赋诗两首，一首是《湛露》，一首是《彤弓》。宁武子既没有辞谢，也没赋诗作答。宴会结束后，鲁文公私下派人去问宁武子为何没有表态，宁武子回答：“下臣以为这是贵国君主在随便说说，并非正式对我说

的。按照周人的礼法，每年正月诸侯去天子那里朝拜，天子设宴奏乐，在这种场合才赋《湛露》这首诗，用来表示天子对着太阳，诸侯听命于天子，把天子痛恨的人作为仇敌，努力效劳。正因如此，天子才赋《彤弓》诗，把红色的弓一把、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把、箭一千枝赐给诸侯，以表彰功绩。现在小臣前来访问，承君赐宴，岂敢违犯天子大礼而自取罪过?”鲁文公这才知道自己违礼，而宁武子的处理方式也较为妥当，深为赞佩。

宁武子的事迹流传下来，孔子听到后评论说："宁武子这个人表面上憨厚，内心机敏。政治环境好的时候，积极有为；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佯作糊涂无知。真可谓大智若愚呀!"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至文公四年

《国语·晋语》

《论语·公冶长》

秦霸西戎

继晋文公称霸之后，在西方又逐渐崛起一个国家——秦。秦穆公想争霸中原，但遇到了中原大国强有力的阻击，便调头西向，兼并周围的许多小国，使秦跻身于春秋大国之列，奠定了战国争雄，并最终统一中国的基础。

秦是华夏民族的一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裔。一次，颛顼的孙女女修织布的时候无意中吞下一只鸟蛋，随后有孕生下大业。大业娶少典族的女华为妻，生下大费。大费是秦人最早的祖先。

大费曾经帮助大禹治理洪水。治服洪水后，舜赐给禹黑色的玉圭，禹说："治服洪水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大费也有功劳。"舜于是把姚族之女嫁给大费，勉励他说："你帮助禹治服了洪水，我赐给你白色的旗旒，你的子孙后代定会昌盛!"大费接受了奖赏，又帮助舜调驯鸟兽，鸟兽都很驯服，舜赐他姓嬴。

夏代末年，大费的后代费昌投奔商族，替商汤驾御战车，在鸣条打败夏桀，帮助商族夺取了天下。商代末年，费昌的后代恶来勇力过人，恶来的儿子蜚廉善于行走，父子靠特殊的才能辅佐殷纣王。周武王伐纣，杀死恶来。当时，蜚廉正替纣出使北方，商朝灭亡，他归国无路，便建筑祭坛于霍太山向商纣王汇报。掘土筑坛时在土中得一石棺，棺上有铭文："上帝诏告蜚廉：你未参与商纣之乱，所以赐你石棺，以光大你的氏族。"蜚廉死后留葬于霍太山。

周穆王的时候，蜚廉的后代造父因善于驾御车马很受宠爱。他为周穆王赶着骅骝、騄耳等骏马到西方巡游，乐而忘返。徐偃王乘机在国内作乱，造父替周穆王驱车一日千里赶回国内，平定了动乱。周穆王嘉奖他的功绩，将他封于赵邑（今山西霍县），造父这一族从此姓赵。

周孝王的时候，秦人的祖先非子替孝王在渭水流域养马，马匹饲养得又肥又壮，孝王很高兴，说："从前大费为舜主持畜牧，牲畜繁衍很好，舜赐姓嬴；现在他的后代为我牧马，我就分封一块土地让他成为附庸封君吧！"于是把秦地赐给非子，让他继续嬴姓的庙祀，号称秦嬴。

周厉王无道，诸侯纷纷背叛，西戎也乘机作乱。周宣王即位后，任命秦仲为大夫，率军讨伐西戎，结果秦仲反被西戎杀死。周宣王继续命令秦仲的五个儿子伐西戎，给他们七千士兵，最终打败西戎，将大骆、犬丘的土地全部收复，周宣王封秦仲的长子庄公为西垂大夫。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太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又用烽火戏诸侯，诸侯人心叛离。这时，申侯联合犬戎共同攻周，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庄公的儿子襄公立即率兵救周，派兵护送周平王至东都洛邑。襄公护驾有功，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把岐山以西的土地统统赐给秦国。他说："犬戎很凶恶，夺走了我们岐、丰的土地，只要你能把戎族赶走，所有土地都属于你们。"至此，秦正式成为诸侯国，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互通礼节，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头在西畤筑坛祭祀上帝。

秦文公时期，秦的疆域开始向东扩展，到达汧水和渭水交汇的地区。秦文公说："从前周室赐我祖先秦嬴居在这里，并成为诸侯。"于是，占卜定居此地是否吉利，占卜的结果很好，立即营造宫室。不久，用三牢祭祀上帝，设置史官记事，人民也逐渐开化。派兵讨伐西戎，西戎逃走，收复周朝原来的土地和人民，疆域到

达岐山，并把岐山以东奉献给周室。

秦宁公七年（前709），芮国（今山西芮城）发生内乱，芮伯的夫人芮姜讨厌国君宠信美女，将芮伯赶出国都，芮伯居住在魏地。秦人见有机可乘，第二年便发兵侵伐芮国，以为芮国不堪一击，不料遭芮国强有力回击，大败。随后，秦军与周王室的军队联合包围了魏地，俘虏芮伯后才回师。几年之后，秦军护送芮伯回国。夺回君位。这是春秋初年秦国第一次大规模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从此拉开了秦国对外争霸的序幕。

秦武公时期（前697—前678），攻伐彭戏氏，势力达到华山脚下，都城平阳（今陕西眉县西），齐桓公开始称霸诸侯。武公死后，用活人殉葬，陪葬者达六十六人。武公的弟弟德公随后即位，徙都雍（今陕西凤翔）。德公用三百头牛羊大规模地祭祀上帝，国力日益强盛。周边的一些小诸侯开始向秦国朝贡。德公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宣公、成公、穆公先后为秦的国君。

秦穆公即位后，秦国开始逐鹿于中原，试图同中原国家争夺霸权。穆公即位不久，便亲自率兵攻打茅津，大获全胜。秦穆公四年（前656），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为夫人。

为了富国强兵，穆公积极招贤纳士。晋献公灭了虞国之后，俘虏虞国国君和大夫百里奚。晋献公把百里奚送到秦国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小臣，百里奚从秦国逃到楚国的宛，被楚国人捉住。秦穆公听说百里傒有才能，想用重金赎回他，但又怕楚人不给，就派人故意向楚国人说：“有个陪嫁的百里傒从我们秦国逃到楚国，我们想用五张黑羊皮把他赎回，怎么样？”楚人觉得一个陪嫁小臣，只值五张羊皮，没有什么可惜的，便把百里傒交给了秦国。此时的百里傒已经七十多岁，秦穆公亲自迎接他，并向他请教治国方略。百里傒辞谢说：“我是亡国之臣，没有什么值得问的。”穆公摇头说：“虞国灭亡不是你的罪过，虞君正是因为不听你的忠告才导致国家灭亡的。”一定要百里傒赐教。百里傒见穆公求贤若渴

便谈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据说连续谈了三天，穆公极为赞同，命他管理国家大政，并戏称他为："五羖大夫"，意思是五张黑羊皮换来的大夫。百里傒推辞说："我的才能不及我的朋友蹇叔，他才能卓越，但不为世人所知。早年我游历齐国时饥寒交迫向人乞食，蹇叔收留了我，使我在齐国内乱中免遭牵累。后来我到了周王室，王族的王子颓爱牛，我就用养牛的才能谋求从政，等到王子颓想用我时，蹇叔又阻止我，使我再次免于遭难。我在虞国做官时，蹇叔又阻止我，我虽知虞君不会重用我，但贪于爵禄私利，留在了虞君跟前，导致了受亡国之辱。在我的经历中，屡次听从蹇叔的劝阻免除了灾祸，一次不从，却遭灾难。我知道蹇叔目光宏远，非常人所能及。"穆公听了百里傒此言，立即派人带着贵重的礼品去迎请蹇叔，封他为上大夫。

晋献公死后，晋国发生内乱，骊姬的儿子奚齐被立为国君，不久就被大臣里克杀死。荀息又立卓子为君，不久又被里克杀死。晋国的公子夷吾当时在秦国，请求秦穆公用武力帮助他回国夺权，秦穆公见有机可乘便答应了。随即派百里傒带兵护送夷吾，夷吾非常感激，对穆公说："如果我能回国为君的话，一定割让黄河西岸的八座城池给秦国。"夺取君位后，晋惠公违背诺言，拒不割让河西八城，并且杀掉大臣里克。当时晋国大臣丕郑正在秦国，他对秦穆公说："依我看晋国人不欢迎惠公为君，而是欢迎重耳。惠公违背诺言杀害大臣，恐怕是吕甥、郤芮二人的主意。陛下若能把吕、郤二人召来秦国，然后再护卫重耳回国为君，这样对秦国最有利。"穆公听从了丕郑的建议，送丕郑回晋国，召吕、郤二人至秦。吕、郤二人不敢至秦，怀疑是丕郑的阴谋，便让惠公把丕郑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到秦国，他一心想为父亲报仇，鼓动穆公说："晋惠公昏庸无道，百姓人心叛离，现在正是攻打晋国的良机！"穆公心里有数，回答他说："假如百姓大臣都跟晋惠公不一心，他怎能随便地杀掉大臣呢？我看百姓还是拥护他的。"没有听

从丕豹的意见，但知道他有才能，有意重用他。

同春秋前期的其他霸主一样，秦穆公也很重视德政。秦穆公十二年，晋国遭受严重旱灾，粮食歉收，人们生活无着落。在这种情形下，晋惠公派人到秦国借粮，丕豹劝穆公不但不要借粮，还应趁晋国遭灾向其发动袭击。穆公又问大臣公孙支的意见，公孙支回答："晋国遭灾，我们这时帮助他们，他们晋国人一定会感激我们。"穆公又问百里奚，百里奚冷静地说："惠公过去有负于陛下之恩，是他得罪了您，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错呢？不应该见死不救。"穆公听取了百里奚和公孙支的意见，借粮给晋国。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城，一路上运粮车队络绎不绝，晋国的人民很是感激。

二年后，秦国遇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反过来向晋国借粮。晋惠公同大臣们商量，虢射说："现在秦国有难，正是我们向它发动军事进攻的好时机，一定会马到成功！"晋惠公听后十分高兴，随后发兵攻秦。秦穆公见晋惠公不但不借粮，而且以怨报德，非常愤怒，任命丕豹为大将，亲自率军迎击。

秦穆公十五年九月，秦、晋两军大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西南）。晋惠公远离中军作战，未料走入泥泞地带，战车进退不便。秦穆公率领部队追赶，反被晋国主力军队包围。穆公左右冲杀难出重围，身上也受了伤，形势危急。在此时刻，从前受过穆公之恩的三百多秦军士兵赶来，拼死格斗，救出穆公，而且活捉了晋惠公。这三百名士兵为什么舍生忘死地救秦穆公呢？

原来，在几年前，秦穆公走失了一匹良马，很是痛心。有人发现那匹马被岐山脚下的乡民捉到杀吃了，官吏想严惩他们。秦穆公知道后阻止说："君子是不因为牲畜而伤害人的，不要处罚他们了！我听说吃好马的肉不喝酒对身体有害，给他们些酒喝吧。"结果，这些乡民不但没有受罚，反而喝了穆公赐的酒。听说秦晋两国交兵，他们都摩拳擦掌要求参战。当他们得知穆公被困，便

浴血奋战以报穆公的恩德，使秦军转危为胜。

秦穆公俘虏晋惠公回到国内，声称："过几天我将用晋惠公祭祀上帝。"周天子听此消息很不安，派使者赶到秦国对穆公说："晋国是我们周族的同姓诸侯呀！"希望穆公能够宽恕。穆公的夫人是惠公的姐姐，听到这个消息，披着黑色的麻布衣光着脚来见穆公说："惠公是我的兄弟，我却不能救他，救了他就破坏了陛下的命令，可怎么办呢？"秦穆公有些为难了，说："我俘虏了晋惠公要惩罚他，不但天子来求情，夫人也不安。"于是放了晋惠公，把他安排在最好的处所，用诸侯的礼节招待他。十一月，护送惠公回国。惠公十分感激，回国后把晋国黄河以西的土地送给秦国，让太子圉留在秦国做人质。秦穆公也把公主嫁给子圉。这时秦国的疆域已经东临黄河。

秦穆公二十年，秦国灭掉了周边的梁和芮两个国家。秦穆公二十二年，在秦为人质的晋国太子圉听说晋惠公生病，说："梁国是我母亲的国家，现在被秦灭了，我在国外没有了依靠。在国内，兄弟众多，万一惠公死，秦人一定不会让我回国，国内的大夫们也会立别的弟兄为国君。"于是，子圉偷偷逃回晋国。第二年，晋惠公就死了，子圉即位为君。

当时，晋国的公子重耳周游列国来到秦国，秦穆公早就闻听重耳的好名声，有意拉拢重耳，把从前子圉的妻子、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重耳最初不愿接受，但想到自己回国夺权需要秦国的支持，便答应了。秦穆公用隆重的礼节招待他。秦穆公二十四年，秦国派人联络晋国大臣，欲护送重耳回国为君。由于子圉在晋国不得人心，大臣们就答应了。不久，重耳回晋国当了国君，他就是晋文公。

这年秋天，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联络狄国攻击周襄王，襄王逃到郑国，派人到秦国和晋国请求帮助，秦穆公得到通知立即率军赶到黄河西岸，准备渡河救援，利用这个机会树立秦国的地位。

但晋文公此时争霸心切，利用晋国的有利地理位置，辞退了秦军，使秦穆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秦穆公三十年，郑国背晋联楚，晋文公约秦穆公共同出兵讨伐郑国。晋军驻屯于函陵，秦军驻屯于氾南。郑国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派烛之武潜出城外，见到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围郑，郑国的人都知道国家即将保不住了。如果灭了郑国对秦国有利，也值得去做，但问题是灭了郑国，郑地与秦国距离遥远，根本无法控制，岂不是在为晋国卖力？晋国强大，就等于秦国衰弱，秦、晋两强相争，这对秦国是不利的。假如能使郑国不亡，将来秦国使者路过郑国，郑国还会提供些方便。晋国贪得无厌，今天灭了郑，明日就会掉头攻秦，请陛下三思。"秦穆公恍然大悟，与郑人结盟，不但不再围攻郑国，反而派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领兵守卫郑国。

秦穆公三十二年冬天，留守郑国的秦国大夫杞子秘密派人回国报告穆公："郑国让我们替他们把守北门，城门的钥匙在我们手里。如果陛下派军突袭，我们为内应，郑国可轻而易举地征服。"穆公征询蹇叔的意见，蹇叔说："远征袭击，此乃兵家大忌。长途奔袭，自己的部队疲惫不堪，对方也会得到消息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形下，双方一旦交锋，后果不堪设想。这次伐郑，郑国很可能会得到消息，即使我们中途停止进攻，将士们劳而无功有可能发生其他临时变故，此举决不可行！"然而穆公说："不要再说了，此事我已作出决定。"随后派百里傒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率军远征。出发那天，大军集结于国都东门之外，蹇叔到那里为儿子送行，痛哭着说："乞术呀，我只能见到你带兵而出，见不到你率军回城了！"穆公见军队出发，蹇叔哭行，很是恼火，派人对他不客气地斥责说："你是老糊涂了吧！如果你不活这么长寿，你坟墓上的树都生长很粗了！"蹇叔悲痛不已，与儿子泪别道："晋国人很有可能在殽这个地方伏击你们，殽山有南陵和北

陵，你们从两陵间经过，必会在此遇难，我只有到那里去为你收尸了！”

秦穆公三十三年春天，秦国大军途经周天子都城的北门，将士们都脱去头盔跳下战车致敬，有三百多人随即跳上车去了。这在当时是不合乎礼节的。王孙满年纪还小，看到这种情形后对周天子说：“秦军轻佻无礼，一定失败。轻佻意味着缺少计谋，无礼反映出满不在乎。进人他国之境危险难测，又缺乏谋略，还能不打败仗！”

到达滑国的时候，郑国的商人弦高准备到成周洛邑去做买卖，偶然遇到秦军，心想秦军很可能是向着郑国而来，国内还不知道，情况危险。他心生一计，先送给秦军四张熟牛皮，再送十二头牛犒劳秦国军队，撒谎说：“我们郑国的国君听说你们要从郑国路过，特派我前来慰问。”同时派人回国报信。秦军三个将领感到意外，商议说：“我们是来袭击的，现在郑国有了防备，去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干脆撤回吧！”当时秦军离滑国很近，顺便灭掉了滑国，然后无精打采地撤回。

当时晋文公刚去世不久，还没有下葬，正在办理丧事。晋人听说秦国军队灭了滑国，撤退途中到了晋国，紧急召开军事会议。晋国大夫先轸急不可待地说：“秦国贪得无厌，平白无故地灭了滑国。现在他们从这里路过，这是老天赐予我们的机会，不能放过他们！”栾枝却说：“秦国给我们很多好处，我们还没有报答，现在袭击他们，这样做对不起死去的先君。”先轸不耐烦地说：“既然秦与晋是友邻国家，我们有国丧，他们不但不悲伤，反而消灭了我们姬姓国家，这是无礼行为！放走一时的敌人，会留下永久的祸患，不要再犹豫不决了。”晋襄公听从了先轸的意见，把丧服染成黑色，亲帅大军出发了。这年四月十三日，晋军在殽（今河南洛宁西北）伏击秦军，没有一人逃脱，俘虏秦军三员大将而归。

晋襄公的母亲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见孟明视等三人被俘，想

办法救他们。文嬴对襄公说："这三个家伙挑拨我们秦晋两国君主的关系，违背国君的旨意胡作非为，如果秦穆公得到他们，恐怕吃他们的肉都难解心头之恨，何劳陛下去杀他们呢？放他们回秦国，让穆公处置他们，怎么样？"襄公答应了。第二天先轸朝见，问起秦军战俘，襄公回答："母亲为他们求情，我把他们放了。"先轸听后极为生气地说："将士们拼死疆场俘虏敌人，女人几句话就救了他们，放弃自己的战果长敌人的志气，晋国快要灭亡了！"愤怒地往地上吐唾。襄公也有些后悔，立即派阳处父带人追赶，赶到黄河边，孟明视等三人已经船在河心了。阳处父解下驾车的战马，用襄公的名义赠送给他们。孟明视得意地说："承蒙贵国君主不杀之恩，使我们回国受诛。假如我们秦穆公赦免我们的罪过，三年之后定来拜谢你们！"

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的消息传到秦国，秦国的很多大夫和臣僚都对穆公说："这次战败是孟明视的罪过，使得全军覆没，应该将他斩首以示处罚。"穆公对这些臣下说："这是寡人的过错。从前周朝的芮良夫曾批评周厉王说：'风大起来会把一切摧毁，贪婪的人会把善良人摒退。听到流言蜚语就喜欢答对，一读《诗》、《书》就昏昏欲睡。不任用贤良之士，反使自己与道义相背。'芮良夫批评的贪婪正如同寡人呀！寡人贪于得到郑国，从而使他遭遇灾祸。"穆公穿上丧服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孟明视等三人，流着泪对他们说："寡人没有听从蹇叔的劝告，让你们蒙受了屈辱，这次战败不是你们的过错，你们应记下这次耻辱，准备报仇雪恨。"又恢复了他们三人原来的官职。

殽战役的失败，是秦穆公扩张争霸以来受到的较为沉重的一次打击。秦穆公时刻想着复仇雪耻，挫败中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三十五年，穆公命令孟明视领兵进攻晋国。二月七日，秦晋两军在彭衙交锋，秦军大败。晋人把秦国的这支部队戏称为"拜谢之师"。

秦军再次失败后，穆公仍然留用孟明视，积极在国内推行德政，发展生产，施惠于民。所以，尽管在战争中人民痛失亲人，仍很感念穆公，一心奉命。晋国大夫赵成子对别人说："秦军如果再一次来进攻，我们一定要避开它。秦穆公由于失败而进一步修明政治，这样的部队是不可抵挡的。《诗经》中说：'怀念你的祖先，修明你的德行。'孟明视做到了这两句话，这样的军队所向无敌。"

戎国国君派大夫由余前来秦国，由余的祖先本是晋国人，懂得晋国的语言。戎君听说秦穆公很贤能，因此派由余来参观秦国的政绩。穆公向他展示华美的宫殿和聚藏的财宝粮物。由余观看后感叹说："这些成果，如果是让鬼神完成的，则太劳动鬼神了；如果是让人民劳动完成的，人民就太辛苦了！"穆公听后很惊讶，问他："我们中国一向本着诗书礼乐的精神治国，然而却不时发生变乱；你们戎狄不懂诗书礼乐，是怎样治理人民的？是不是政治很糟糕？"由余笑着回答："这正是中国动乱的原因啊！自上古圣人黄帝制作礼乐法度，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也仅仅能达到小治的程度。后世社会，在上位者日渐骄奢淫逸，依恃法度的威严苛责人民，使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人民指责统治者的不仁不义。上下交相怨责，彼此篡夺杀戮，以至灭绝了宗嗣，都是这类事情。戎狄民族与此不同。上边的统治者怀着纯朴的恩德来对待臣民，人民忠心耿耿一心不贰地事奉君上。治理一个国家犹如整理自己的身体，上下和谐才能形成有机的一体。治理国家并不依靠什么诗书礼乐，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政治呢！"穆公回宫后问内史廖说："我常听人说，邻国中有圣人存在，就是与这个国家敌对之国的忧患；现在戎国的由余如此贤达，这是我国的隐患，该怎么办呢？"内史廖献计说："戎国居穷乡僻壤，不曾听过中国音乐，陛下不妨送他女乐以转移他的志向，同时为由余求官职。我们这里留住由余，使他不能如期回国。戎君必会产生疑心，心存猜忌，君臣之间产生隔阂，我们便有机可乘了。戎君沉湎于音乐，也会懈

怠政事。”穆公采纳了这一建议，同由余接席而坐，传器而食，非常亲近，并问他戎国的地形与军队。然后命令内史廖送给戎君乐队美女十六人。戎国君主果真喜爱上了音乐，过了一年仍不奉还。这时候，穆公让由余归国。由余归国后屡次劝国君放弃乐舞，戎君都不听从。穆公派人暗中约请由余来秦，最后由余离开戎国到了秦国。穆公以宾客之礼待他，向他求教伐戎的策略。

同年冬天，晋、郑、陈、宋各国联军进攻秦国，秦军抵挡不住联军的强大攻势。联军一举攻占了汪地和彭衙。为报此仇，第二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视率领大军进攻晋国。部队东渡黄河之后，秦军破釜沉舟，以示必胜决心，不能取胜则无退路，终于大败晋军，占领了晋国的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和鄗，终于为殽之战雪耻。晋国人困守城中不敢出战。于是，穆公率军从茅津（今山西平陆茅津渡）渡河，埋葬了殽之战中为国捐躯的秦军将士，并下令全国哀悼三日。秦穆公通告全军说：“古时候的人，有事向老年人请教商量，不会做出错事。我当初没听蹇叔的劝告，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今天通告全军，是让后人牢记这一经验教训。”

当时的有识之士评论说：“秦穆公作为国君，知人善任，不因一时成败论英雄，用人专一不贰；孟明视作为臣下，坚持不懈地努力，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秦国君臣同心同德，所以他们能够成功。”

晋国不甘失败，于秦穆公三十七年派军攻秦，包围了秦国的邧（今陕西澄城南）和新城（澄城北），但没有什么结果，也就罢兵东归了。

秦穆公虽励精图志，富国强兵，试图称霸中原，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利，东有强大的晋国，向东方的发展受阻。在这种情形下，穆公用由余的策略攻伐戎国、都国等西方的弱小国家，先后兼并十二国，使秦的国土在西方拓展千里，成为西部首屈一指的大国，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作秦穆公霸西戎。当时，周天子曾派遣召公带

着金鼓向秦穆公祝贺。

秦穆公三十九年，穆公去世。墓地在雍，有一百七十七人陪葬，其中有奄息、仲行、铖虎三位良臣。秦人为了哀悼这三位良臣，写了一首《黄鸟》诗：

黄鸟飞去又飞来，
飞到枣林中徘徊。
谁人陪葬秦穆公，
子舆奄息遭了灾。
可惜奄息这贤臣，
能力超人一当百。
走近他的坟墓地，
使人战栗使人哀。
苍天为何不睁眼，
残害良臣不应该。
如果能把他赎回，
纵死百次也无悔。

当时的正义之士评论秦穆公说："秦穆公拓展秦土，兼并他国，东与强晋相争，西方称霸群戎。但是，他并没有成为诸侯的盟主，并非偶然。死后就抛弃人民，要良臣为他殉死，从前的君主去世尚且给后世留德垂范，而他却残害好人，使人心哀痛。由此可知，秦不可能成为霸主了。"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
《左传》桓公三年至文公六年
《诗·秦风·黄鸟》

晋灵公之弑

在中原地区的大国晋国，继创立霸业的晋文公和维持霸业的晋襄公之后，出了一位昏庸无道的君主，因厨师烹熊掌不熟就杀死厨师，用弹弓射人取乐，他就是晋灵公。

晋襄公七年（前621）八月十四日，襄公去世。在由谁即位为君的问题上，晋国内部发生了争执。当时太子年幼，晋国与周围的楚国和秦国不断发生战争，大臣们想拥立年长的公子为国君。但由谁为君，意见难以一致。国卿赵盾想拥立公子雍，他说："应该立公子雍。公子雍有几个长处：第一，年长；第二，他善良仁义；第三，他受先君的宠爱；第四，与秦国亲近。立长者为君名正言顺，事奉善良之君国家安宁，立先君所爱合于孝道，与大国亲近可减少外患。有这四项有利条件，对国对民都是有益的。"

大夫贾季不同意赵盾的主张，他认为应立公子乐为君，说："我认为应拥立公子乐，他的母亲辰嬴先后受过怀公和文公的宠爱，立她的儿子，百姓自然拥护。"

赵盾反驳说："辰嬴地位低贱，在夫人当中排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威严？说她受两位国君宠爱，我看那是她没有廉耻！不能得到大国的帮助却想依靠小国，是目光短浅。母亲淫荡，儿子孤陋无识，就没有威严；陈国弱小而且遥远，有事不能救援，国家怎能安定？公子雍的母亲杜祁由于国君的缘故，让位给偪姞而使她在上；由于狄国的缘故让位给季隗而屈居于下，所以才排位第四夫人。先君见她有美德，才喜欢她的儿子，让公子雍出仕秦

国，做了亚卿。秦是大国而且邻近，有事可以救援；母亲有道义儿子受爱戴，足以安抚百姓。”

然而，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赵盾派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派人到陈国召回公子乐。赵盾派人在半途将公子乐杀掉。

晋灵公元年（前620）夏天，秦康公送公子雍回晋国，对公子雍说：“当年文公回国的时候没有卫士，所以回到国内有吕甥、郤芮发动叛乱，今天我多派些卫士保护你。”

自襄公死后，太子的母亲穆嬴每天抱着年幼的太子在朝廷上哭闹，说：“先君何罪之有？太子何罪之有？先君尸骨未寒，你们违背先君的遗诏，丢开太子不立，反到国外去迎立他人，你们准备如何处置太子！”下朝的时候，穆嬴就跪到赵盾家中，给赵盾叩头说：“先君抱着这孩子嘱托于您，说：‘这孩子如果成材，我就受了你的恩惠；如不能成材，就是你的责任。’现在国君虽然去世，这些话言犹在耳，怎能忘记？”穆嬴为人泼狠，软硬兼施，朝中大臣和赵盾也有所顾虑，万般无奈地背弃了公子雍，改立灵公，随后发兵抵御护送公子雍回国的秦国军队。赵盾亲自统帅中军，荀林父率上军，先蔑率下军，浩浩荡荡抵达堇阴（今山西临猗东）。赵盾动员全军说：“如果我们迎接公子雍回国，那他是客人朋友；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就是敌人对头。如今，我们已经不能接受他，只能展开战斗。如果我们的队伍拖拖拉拉，将会使敌人有隙可乘。相反，做好充分的准备，时刻准备作战，就战无不胜！”训练士兵，磨砺武器，喂足马匹，隐蔽行动，夜里出兵。四月初一在令狐将秦军一举击溃，乘胜追击至刳首（今临猗西）。

由于晋人立灵公为君，秦人送公子雍为君的计划落空，诱发了秦、晋两国连年不断的战争。晋灵公初即位，国卿赵盾为稳定晋国，召集齐、宋、卫、陈、许、曹、鲁各国君主在扈（今河南原阳西）会盟，与会各国都承认灵公为晋国君主，共结友好邻邦。

第二年夏天，为报复令狐之战的失败，秦军进攻晋国，一举攻占武城（今陕西华县东）。晋国也不甘吃亏，晋灵公四年春天，派大军反攻秦国，占领秦国的少梁。同年夏天，秦国军队反攻晋国，攻克晋国的北徵。

秦晋两国数次交锋，互有胜负，难解难分。秦国地处边远，缺少盟国策应，对晋形不成严重威胁，便想拆散晋的盟国。晋灵公六年，秦康公派大夫西乞术带着丰厚的礼品出使鲁国。会谈期间，秦国的西乞术提出讨伐晋国，鲁国十分为难，不敢参与。鲁国大夫襄仲把秦国送来的美玉退还给对方，说："阁下不忘先君的友谊，光临鲁国，镇定安抚我们的国家，这是莫大的恩赐。至于贵国赠送的玉器，这太贵重，我们国君不敢接受。"西乞术也明白鲁人此举的含义，但此次出访的任务就是拆散晋国的同盟，完不成任务怎好回国交差？西乞术回答襄仲说："一点微薄礼品，不足挂齿，还望贵国笑纳。"鲁人坚决不要，秦人坚持要给，双方辞赠不休。西乞术最后说："我们国君愿意在周公、鲁公这里求点福禄，敬事贵国君主，所以才备下如此薄礼，派为臣送来，不过是作为吉祥物罢了。如果用它缔结我们两国的友好，传达君主之间的友谊，有什么不可的呢？"襄仲随机应对说："没有您这样的君子，贵国不会如此开明，这块美玉就算我们国君送给阁下的吧！"西乞术执拗不过，只得带着玉器回了国。此次出访当然不会取得什么成果。

同年冬天，秦国军队再次进攻晋国，占领了晋国的羁马（今山西永济南）。晋国得到消息，立刻动员三军发动反击。赵盾为中军元帅，荀林父为副帅；郤缺为上军统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为下军统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为赵盾御马。大军进抵河曲，两军对峙。臾骈建议说："秦国孤军深入，难以持久，请高筑堡垒巩固军营消耗他们。"赵盾采纳了他的建议，不再进攻。

秦军见晋军并不急于夺回失地，反倒沉不住气，想展开决战。秦康公问已降秦的士会："我们应采用什么战术？"士会想了想回

答："赵盾最近提拔了一个部下，名叫臾骈，这很可能是他的主意，企图拖垮我军。赵盾有一远宗兄弟名叫赵穿，是晋国公族的女婿，年轻气盛，受宠骄纵，不懂战术，头脑简单而且狂妄，他讨厌臾骈任上军副帅。如果我们派出士兵袭击上军，然后立即撤回，或许形势会有变。"秦康公采纳此议，把玉璧投入黄河祈求神灵保护。

十二月初四，秦军袭击晋军的上军，晋将赵穿立即追击，没有追上。回到军营后发怒说："全副武装来干什么？作战！如今可好，敌军来了避而不战，搞得什么名堂？"部下回答说："在等待战机呀！"赵穿不耐烦地说："他们没什么高谋，我要自己率人马去打！"随即冲上战场。赵盾见赵穿擅自行动孤军作战，知道凶多吉少，对将领们说："现在情况突变，如果秦军击败赵穿将他俘虏，等于俘虏我们一位国卿，秦军胜利而归，我怎么向晋国父老交待？"立即下令全线出击，双方刚一交战，彼此都退了回去。

秦军见相持久了对自己不利，便派使者通知晋军方面说："我们两军的将士们都没打痛快，明天再战。"臾骈看出了破绽，说："那使者眼珠子转动，声音失常，说明他害怕，大概秦军要逃跑。我军趁机把他们逼到黄河边，定能击败他们。"赵穿、胥甲自作聪明，挡住营门大叫说："阵亡的战士还没下葬，丢下他们不管，这不仁义；不等到约定的日期而把别人逼到险地，这是没有勇气。"赵盾没有办法，只好作罢。秦军连夜逃走了。不久又袭击晋国，占领瑕地。

晋灵公虽然即位为君，但他年幼，实际掌政的是卿大夫赵盾。赵盾执政，实施德政，任人唯贤，使这时的晋国仍不失大国声威。继提拔臾骈之后，又选拔韩厥为司马。为考验韩厥，河曲之战时赵盾有意派人乘坐自己的战车违犯军令，韩厥发现后立即军法处置。人们议论说："韩厥是自讨苦吃，早晚有一天要掉头。国卿刚刚任命他为司马，掌司军法，他就杀了国卿的宠臣，国卿怎能不恨他！"然而，赵盾派人把韩厥召来，以礼相待，说："人们常说，

事奉国君应该比而不党。在一起讨论忠义，这是比；在一起谋私利，这是党。执行军令秋毫无犯，这是忠义。我把你推荐给国君，只怕你没有忠义贤能，那样的话，等于我拉你结党营私。作为大臣，结党营私是不能允许的。所以，这次我故意慎重考验你一下。努力吧！坚持下去，执掌晋国大政的人可能就是你了。"

晋灵公十三年春天，晋国派詹嘉驻守瑕地，扼住桃林（今河南灵宝与陕西潼关交界处）这个要塞，以防秦人袭击。当时，士会仍在秦国，晋人担心士会在秦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商议解决的办法。赵盾说："自陛下即位以来，贾季在狄国，士会在秦国，一直威胁着我们国内的安宁，大家看该怎么办？"荀林父建议说："请让贾季回来，他了解国外情况，过去也有功劳。"郤缺则说："贾季这个人不安稳，喜欢作乱，不如让士会回来，他能伸能屈，待人柔和又不受人欺，足智多谋，他也没有什么罪过。"讨论到最后，决定召士会回国。

为使士会回国，晋人设下圈套以骗秦人。魏寿余假装背叛晋国，晋人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抓了起来，魏寿余连夜逃往秦国。到了秦国后，魏寿余要求把自己的封邑献给秦国，秦康公答应了。魏寿余走到士会跟前的时候故意踩了一下他的脚，士会立即就明白了一半。秦国疆域在黄河以西，魏地在河东。魏寿余对秦康公说："请陛下先派一位河东人，而且能同魏地官员合作的，先同我一块回去镇守那里。"秦康公也没多想，就派士会去。士会推辞说："晋国人如同虎狼，如果他们背信弃义不放我回来，我死在那里，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被杀，这对陛下不好，我就是后悔也没办法。"秦康公立即回答说："如果晋人不放你回来，我不遣送你的妻子家人回去，算我不义，河神为证！"士会得到承诺，放心地跟魏寿余走了。士会手下的绕朝把马鞭递给他，说："您可不要以为秦国没人识破你们的把戏，我不愿说罢了。"渡过黄河后，魏地人一哄而散。秦国不久就把士会的家人送回晋国。

晋灵公自幼为君，缺乏师教和约束，随着他年龄成长，日益昏庸暴虐。据《说苑》记载，晋灵公建造九层的高台，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资财。大臣们劝谏，他一概不听，下令说：“敢有再来劝谏者，斩首勿论！”有一个名叫孙息的小臣朝见灵公，叩拜说：“为臣有一小技，能在十三层棋子之上再累九层鸡蛋，不知陛下愿看否？”灵公听后大喜，说：“寡人少见无识，你赶紧摆给我看。”孙息随后开始逐层叠累，摆到最后，摇摇欲坠。灵公不觉屏住呼吸，说：“危险啊，危险！”孙息借机说到：“臣以为还有比这累卵更危险的。”灵公急忙说：“你说给我听听。”孙息答道：“陛下兴建九层高台，三年不能完工，百姓无法正常生产，国库空虚，户口锐减，人民叛逃，邻国企图侵略我们。一旦国家破灭，岂不更加危险？”灵公若有所悟，才下令停止筑台。

晋灵公执政以后，向人民征收沉重的赋税，用于自己的奢侈和挥霍，建筑宫殿，在墙壁上绘上彩图，供自己观赏。文武百官上朝，他把百官引到高台上，手拉弹弓射击外边的行人，行人躲闪不及，奔跑呼叫，灵公却在台上大笑。文武百官面面相觑，无人敢言。

晋灵公十四年的一天，赵盾上朝，看到有人从后宫背着畚箕出来，觉着奇怪，便问那人畚箕中是何物。那人回答：“您自己看吧！”赵盾走到跟前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里面竟然装着死人！赵盾立即问：“死者是谁？为什么被杀？”那人才告诉说，被杀者是厨师，因为熊掌没有做熟，灵公发怒，将他砸死，然后将尸体肢解，命人弃之宫外。此事传开，文武百官都十分震惊。赵盾准备进谏，士会拦住他说：“您去劝他不听，就没人能接着劝了。还是让我先去，不听的话，您再去不迟。”

士会走进宫门，灵公从远处就看见了他，但不理睬。士会接着向里走，到了院中，灵公还是不理。直到走近，晋灵公才抬头，迎头便说：“你不用讲了，我知道自己错了，打算改正。”士会叩

头回答："哪一个人没有过失？有了错，改正了，这就好。《诗经》中说，事情都有个开始，但能坚持到最后的却不多。陛下能够弃过从正，这不仅是臣民的幸福，也是国家的保障。"

晋灵公尽管口头上说改正，但事实上非但不改，反而日甚一日。赵盾屡次劝谏，晋灵公很讨厌他，便派鉏麑去刺杀赵盾。一天清晨很早的时候，鉏麑前去行刺，看到赵盾卧室的门大开着，正穿戴得整整齐齐准备上朝。由于时间很早，赵盾正盘腿坐在屋内等待。鉏麑见此情景退了出来，感慨地说："不忘记恭敬，他真正是百姓的主人。刺杀百姓的主人，那是不仁；放弃国君的使命，那是不忠。这是两难选择，我只有一死解脱了。"到了外面，撞在树上自杀了。

同年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入宫饮酒，埋伏下甲士，准备将赵盾杀死。进宫之后，此事被赵盾的车夫提弥明察觉。他快步登上殿堂，说："臣下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三杯就不合礼法了。"随即扶赵盾下殿。灵公见赵盾突然离开，便唆使恶狗猛扑赵盾，提弥明拔剑把恶狗杀死。赵盾气愤地说："不能用人而用狗，狗虽凶，能管什么用！"埋伏的甲士冲上来，赵盾边斗边退，提弥明战死在宫廷内。赵盾得以脱身，多亏了甲士中一人突然倒戈，护卫赵盾。

早年，赵盾在首山打猎，来到翳桑，看见一人饿得厉害，便问他有什么病。那人说："我已经整整三天没吃饭了。"赵盾送给他食品，他只吃一半，留下一半。赵盾问他为什么不都吃掉，那人回答："我离家三年，不知母亲是否健在，现在快到家了，让我把一半留给她吧！"赵盾让他都吃完，又让人给他拿来一篮饭和肉。后来，此人参加了晋灵公的卫队。看到要杀的人是赵盾，便倒戈保卫他。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那卫士回答："我就是翳桑那个挨饿的人！"多亏此人使赵盾幸免于死。

晋灵公为非作歹，引起人们公愤。同年九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死晋灵公。当时，赵盾正逃往国外。闻听灵公被杀，便

返回重登卿位。晋国的史官记录说："赵盾弑其君。"拿到朝廷上给大夫们看。赵盾驳斥："不是我杀的！"太史回答："你身为国卿，逃亡还没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杀国君的不是你还是谁？"赵盾后悔地说："太可悲了！《诗经》中说：'因为我的怀恋，给自己带来忧伤。'这恐怕说的就是我了。"

后来，孔子评论此事说："董狐，秉笔直书而不加隐讳，是位好史官；赵盾，是晋国的好大夫，为维护礼法而蒙受恶名。可惜呀，赵盾要是走出国境就可以免于杀君的恶名声了。"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文公六年至宣公二年

《公羊传》宣公六年

《国语·晋语》

陈灵公无道

传说，陈国的始封国君是舜的后代。在舜还是平民的时候，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居住在妫水沿岸，后来人们便按地名取了姓——妫氏。经历了夏商两代，周武王灭了商朝，寻找舜的后代，找到妫满，把他封在陈地建立国家，以祭祀舜帝，他就是陈胡公。

春秋初年，陈国的国君是厉公。陈厉公三年（前705），厉公生子名完。当时周王室的太史正从陈国经过，厉公请太史用《周易》卜筮，筮的结果是由“否”卦演变成“观”卦，太史解释说：“从卦象来看，是有国有土的吉利征兆。可能将来会朝见天子，为天子的宾客，也就是说成为诸侯，却不在陈国，而是在别国；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很可能是到齐国，齐国姜姓，是尧时四岳的后代，陈、齐两国将来不能并存，陈国衰亡后，他的后人会在齐国兴起。”

陈厉公是个荒淫无道的国君，他娶蔡国公主为夫人，他的夫人与蔡国人胡混，他也借机多次到蔡国淫乐。厉公很不得人心，即位几年后，公子跃让蔡国美女引诱厉公，然后把厉公杀死，自己立为国君，即位几个月就去世了。后来，公族内部屡次发生争权夺位的内乱，公子完怕惹祸杀身，便出奔到齐国。陈国的国都在宛丘（今河南淮阳），介于齐、楚两大国间。齐桓公称霸，陈国随从齐国伐楚；楚庄王争霸，陈国又与楚国结盟。

公元前613年，灵公即位为陈国国君。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危机，旧的社会体制开始解体，很多国家纷纷实施改良，

以调节社会机制。但是，陈国的贵族们只知淫乐享受，置国家的危难于不顾。

一次，周天子派大臣单襄公到宋国访问，然后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的时候，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败落景象：大路上长满野草，路人无法行走，边境地区没有官员监察，湖泊干涸，桥梁毁坏，收获的粮食堆积在野外，场院上的粮食无人收拾，道路两旁没有种植上树木，农田中杂草丛生。外国使者到了陈国，负责饮食的官吏不给送饭，负责住宿的官吏不给安排馆舍。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都到陈国大夫夏征舒家修筑高台去了。单襄公进到城内，陈灵公和他的大夫孔宁、仪行父也不理睬，一同戴着南方楚国人习惯戴的帽子赶到夏征舒家去，把单襄公这位天子的使者冷落在那里。

据《列女传》记载，夏征舒的母亲夏姬是绝世美人，有沉鱼落雁之容，聪明过人，虽已中年但美容不衰，先后与三位国君七位大夫通奸。当时的公卿大夫都被她的绝美迷住心窍，争先恐后地赶到夏征舒的家中与她鬼混。夏姬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当时陈国的人民作诗讽刺这些无耻之徒说：

是谁匆匆去株林，
赶到夏邑去开心；
其实并非去株林，
找到夏姬去纵淫。

骑上高马跑不停，
径直跑到株林边；
来来往往不停息，
吃喝淫赌无休尽。

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到夏姬家里纵淫，然后还穿着夏姬的衣服上朝，相互嬉戏。大夫泄冶为此忧心忡忡，屡次劝谏

而灵公不听。泄冶苦苦劝告说："我们的国家再这样下去就要灭亡了！我屡次劝告陛下，陛下都不听从，日益失去君主的威严。一个国家的风气，上行下效，就像风吹草地一样，刮东风草向西倒，刮西风草向东歪。国君就像风，人民就像草。所以，国君的一行一动都应小心谨慎，注意影响。树是弯曲的，影子难直；国君不注意自己的言行，放纵不羁，国家就危险，迟早要亡国。《易经》中说，君主虽在深宫之中，一言一行千里之外都知道，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诗经》中说，说话要斯文，行为要威严。现在陛下言语随便，没有威严，这是十分危险的！"陈灵公表面上应付说："我改正就是了。"但实际上仍我行我素。

泄冶直言不讳的劝告，引起了孔宁和仪行父的不满，他们向陈灵公请求杀死泄冶，灵公未加阻拦。二人见国君默认了，便肆无忌惮地杀了泄冶。

陈灵公十五年（前599），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一同到夏姬家中饮酒作乐，醉醺醺的时候，灵公指着夏姬的儿子夏征舒对仪行父说："我看他长得像你！"仪行父反唇相讥："我看他更像陛下！"然后哄堂大笑。夏征舒听到这些污言秽语，不禁怒火中烧。陈灵公饮酒完毕返回，走到门口的时候，夏征舒早已隐蔽在马厩内，对准灵公拉弓射箭，灵公应声毙命。孔宁、仪行父见状仓皇逃往楚国。

此时的楚庄王正积极对外扩张，企图充当霸主，见陈国内乱，正是吞并陈国的好时机。第二年十月，楚庄王以平定陈国的内乱为名，出动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向陈国。陈国人们见楚军来势汹汹，惶恐万分。楚庄王假惺惺地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只为诛杀伤害国君的夏征舒！"陈国人知道抵抗也无济于事，便听任楚军冲进国都。楚人抓住夏征舒，然后在陈国的栗门将他五马分尸。随后，把陈国改置为楚国的一个县。

楚庄王轻而易举地灭了陈国，十分高兴，文武百官都上朝表

示祝贺。申叔时受楚庄王的派遣到齐国访问，回国之后，向庄王报告了齐国的情况，转身就退下朝去。庄王叫住申叔时，不高兴地责备他说："夏征舒大逆不道，杀害国君，寡人带领各国诸侯惩罚他取得重大战果，各国诸侯和国内的大夫们都前来祝贺，你却丝毫不提此事．难道寡人做错了不成？"申叔时听完此一番话，轻声地问："小臣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吗？"庄王回答："当然可以。"申叔时义正辞严地说："夏征舒杀害陈国国君，罪大滔天，陛下兴义师去诛罚他，这天经地义，大快人心。可是民间有谚语说：'牵着牛去践踏别人的田地，可对方竟把牛夺走，这种惩罚未免太重了。'陛下出兵的时候对天下人说：'夏征舒有罪，我们才去讨伐他。'杀了夏征舒，又灭了陈国据为己有，划为一县，这说明陛下贪图陈国的财富，是假借讨伐不道之名满足自己的欲望私利，别人会怎样评论？"楚庄王听后十分惭愧，说："贤卿的话对极了，是寡人从未听说的仁义之见，寡人再把陈国恢复，可不可以呢？"申叔时回答："当然可以，这叫物归原主。"

于是，楚庄王重新复兴了陈国，从晋国迎回了陈灵公的嗣位人太子午，立他为国君，他就是陈成公。恢复陈国后，楚庄王从陈国的每一个乡邑带着一人回到楚国，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称之为"夏州"。

后来孔子阅读史书，读到楚庄王恢复陈国时感慨地说："楚庄王是贤人啊！把陈国一个国家看得很轻，却十分重视一句良言。没有申叔时就没有忠义之言，没有楚庄王就不会接受这样的良言。楚庄王真是贤明之君呀！"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陈杞世家》

《左传》宣公九年至十一年

《国语·周语》

《诗·陈风·株林》

楚庄王争霸

继中原地区的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之后，在南方地区出现了一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新霸主，他就是楚庄王。

楚国在楚成王的时候就已吞并江汉流域的许多小国，成为南方的大国。后来成王被他的儿子商臣害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楚穆王在位期间，进一步兼并南方小国，并向中原地区渗透势力，把郑、陈、蔡各国置于自己的武力胁迫之下。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后去世，他的儿子熊侣即位，是为楚庄王。

晋国乘着楚人国丧的机会，会合宋、鲁、陈、蔡、郑、卫、许七国诸侯重新订立盟约，晋国重新做了盟主。楚国的大臣们见此情景十分焦急，纷纷劝告楚庄王去争夺霸权。然而楚庄王自即位后连续三年时间不理政事，整日只是吃喝玩乐。据说，他在宫中左手搂着美女秦姬，右手抱着越国美女，前面是大规模的乐队演奏乐舞。他十分讨厌前来劝谏他的大臣，下令：“敢前来劝谏者，斩！”不久，有个叫伍举的大夫进宫来到庄王面前。庄王抬头看了看他，问：“难道你不知道寡人的禁令吗？”伍举叩头回答：“知道。小臣并非故意违令，而是有一点不明，请陛下指教。有一段隐语说：

楚国山上，
有只大鸟，
身披五彩，

可真荣耀。
一落三年，
不飞不叫，
人皆不知，
此为何鸟。”

楚庄王听后大笑道：“这可不是普通的鸟，它是在观察情况，积聚力量，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伍举若有所悟地退了下去。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见楚庄王有何作为，而且荒淫佚乐日甚一日。大夫苏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闯入宫中进谏。庄王面带愠怒地说：“你不怕违令被杀吗？”苏从义正辞严地回答：“使陛下明于道义，富强国家，纵使我苏从被杀，死得其所，毫不足惜！”然后，详细地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楚国的对策。

楚庄王听后拍案而起说：“好极了！我发布禁令，就是要观察哪些人阿谀奉迎，哪些人不谋私利，为了国家利益勇于直谏！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治国争霸。”第二天早朝，楚庄王立即罢免了一批无能营私之徒，提拔任命了一批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官吏。楚国人民见庄王非寻常之君，异常喜悦，相互祝贺说：“过去有这样的诗句：‘为何久久在那里，定有原因非寻常。’这就是说的我们国君吧！”

经过一番治理内政，楚国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随后，便开始对外征伐争霸。楚庄王八年（前606），楚国发兵讨伐陆浑（今河南嵩县和伊川一带）的戎人，然后大军来到周王室的都城洛邑，在那里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周定王只好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岂料楚庄王却向王孙满提问：“周天子有九鼎，这些鼎有多大多重？”显而易见这是有野心的挑衅言行。王孙满义正辞严地回答：“一个拥有天下的成功统治者，关键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远古夏代的时候，四面八方的诸侯国绘制地方风物，并且经由九州的官

吏贡献铜，于是夏王就用这些铜铸造成九座鼎，鼎上分别浮雕上各国风物，以便使人民都能认识鬼神奸邪的形状，使人民除妖避邪，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到了夏桀的时候，由于他暴虐无道，九鼎就被商朝夺去，总共经过六百年之久。后来又由于殷纣王暴虐无道，九鼎才被我们周朝得来。只要君主修明政治，九鼎虽然是那么小，却似乎显得那样重，他人无法轻易夺去；反之，假如君主昏庸、政治动乱，那么九鼎即使再大，看起来也是很轻，他人就可轻易夺去。上天保佑有明德的君主，不过也有一定的限制，绝对不可以强求。从前周成王把九鼎安置在郏鄏地方时，曾经占卜国运有多少代，占卜的结果显示我们周朝将享国三十世七百年，所有这些都是天命中的定数。现在，周朝的力量虽已衰弱，但天命未曾改变，因此有关这九鼎的轻重大小，并不是诸侯随便可以探问的。”楚庄王自讨没趣，随后率军回到楚国。

当时楚国的令尹是斗樾椒，他是一个残暴凶狠的家伙。早些年的时候，他的伯父子文是令尹。斗樾椒出生后不久，子文就对斗樾椒的父亲司马子良说：“你应该及早杀死这个孩子，他生来一副虎狼般的相貌，发出的声音更像豺狼。假如你不把他杀死，他必会使我们若敖氏整个宗族遭殃。俗语说得好，狼子野心。这孩子就是一只虎狼，可不能养虎为患！”子良舍不得无端把儿子杀死，没有依从子文的意见。令尹子文为此一直感到不安，他临死的时候，召集族人对大家说：“将来有朝一日樾椒继位掌权，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逃走，以免因为他而遭殃。”说完后，子文又哭着自言自语地说：“鬼神都要有食物吃，若敖氏的祖先鬼神就要挨饿了！”

子文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斗般接任令尹，樾椒接任了他父亲司马职务，芳贾出任工正①。芳贾为了讨好樾椒，就在国君面前陷害斗般，使其被杀，樾椒接任了令尹一职。樾椒担任令尹职务

①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设“工正”一职，楚国有时也叫“工尹”，据《左传》杜预注认为是负责手工业生产的官员，但从史籍看偶尔也有率军作战的情形。

后，权势日大，不久就杀死了𫇭贾，并调集军队准备杀掉楚庄王。若敖氏一族在楚国势力很大，庄王对他们也畏惧三分，就把楚成王、文王、穆王的儿子送到椒椒那里做人质，谋求妥协。然而，椒椒却坚决不答应，意在除掉国君由他自己独裁国政，陈兵于漳水河岸。

楚庄王九年七月初九，楚庄王率军与若敖氏展开决战。椒椒拉弓射庄王，第一箭射穿车辕和鼓架，最后停止在铜钲上；第二箭射穿车辕反弹上去贯穿了顶盖。庄王身边的人见椒椒箭法如此厉害，都很害怕。庄王派人大声宣告说："我先君文王消灭息国时得利箭三枝，两枝被椒椒盗走，他已经用完了，大家不要害怕！"随后下令攻击，一举将若敖氏消灭干净。

当时，子文的孙子克黄受国君使命正在齐国，回国途中到宋国的时候听到叛乱的消息。别人都劝他说："你千万不能回楚国去了！"克黄回答说："我是奉君命而出，丢掉国君的使命，还能有谁肯容纳我？国君就是上天，上天难道可以逃避吗？"马不停蹄地赶回楚国。向国君汇报了工作后，自己到司败那里等待治罪[①]。楚庄王回想起子文治理楚国的功绩，不忍心断绝子文家族的烟火，便说："子文如果没有后代，还用什么来劝勉人们忠贞为国呢？"仍任命克黄原来的官职，把他的名字改为"生"。

楚庄王是一位开明而知人善任的君主。一次，有一位擅长给人相面的术士来到庄王的宫中。据说，他给人相面算命非常灵验，从无差错。楚庄王见面后问他："你是怎样判断别人命运和未来的？"术士回答："我并没有超人的本领，我是依据一个人交际的朋友来作判断。一个平民百姓，如果他交往的是孝敬父母遵守法令的人，他的家庭必会日益富裕，安度终生；一个官吏，如果他交往的是忠义之士，好善乐施的人，他的官职必会不断提升，地

① 司败：楚国主管司法的官吏。

位更加巩固；一个君主，如果他朝廷中都是忠正耿介不谋私利的大臣，敢于进谏君主的过错，他的国家必会日益富强，他自己也会更加受尊重。"庄王听后很受启发，便延纳天下的有能之士前来楚国，为复兴楚国日夜不休地作准备。孙叔敖就是在这时开始担任楚国令尹的。

孙叔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和才干的大臣。据《新序》记载说，孙叔敖儿童时代，一次到田间游玩，突然从路旁草丛窜出一条两只头的蛇，他不顾一切地把那条蛇杀死然后埋了。回到家中非常担心害怕，母亲问他："孩子，为什么哭呀?"孙叔敖回答："别人都说碰上双头蛇的人会死，刚才我就碰上了，恐怕我就要离开母亲死去了。"母亲又问："那条蛇现在哪里?"孙叔敖回答："我怕别人再碰上，就把它杀死埋了。"母亲松了口气说："双头蛇凶猛异常，伤人至死。你把它杀了，它也就没法害你了。人常说，老天会保佑善良有德行的人，你会得好报的。"

孙叔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踏上仕途，他背井离乡来到楚都郢城。在郢城留居三年，但在政治上却毫无进展。他结识了一位朋友叫期思。期思与孙叔敖是同乡，了解孙叔敖的才能。看到孙叔敖怀才不遇，便对孙叔敖说："你有大仁大义，有政治才干，能治国平天下。这些，我远不如你。但是，交际社会，接人待物，协调人际关系，取悦于国君，你却不如我。依我看，你先归回乡里，我留在这里为你游说，为你寻找机会。"孙叔敖回到了家乡。

几年光阴转瞬即逝，期思终于得到了楚庄王的宠信，楚庄王准备任命他为令尹，执掌国政。期思向楚庄王推荐说："为臣有一同乡名叫孙叔敖，有卿相之才，要说安邦治国，臣远不如他。"于是，楚庄王派人赶着自己的轿车去迎接孙叔敖，任命他为楚国令尹。

孙叔敖为令尹后，积极改善楚国政治。他的主要做法是用仁

义忠孝教育人民，让人们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奖善罚恶。经过一番整顿，民风为之大变，家庭和睦，君臣和调，违法事件锐减。秋冬季节，政府劝导人民入山狩猎，春夏季节，劝导人民致力于农耕和捕鱼。人民的生活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楚庄王为使国家多聚财富，奠定向外争霸的基业，便把原来铜币的面值改大。这样一来严重地干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正常秩序，人们纷纷弃农经商，市场上的秩序也混乱起来。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吏把情况向令尹孙叔敖作了汇报，孙叔敖问："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市吏回答："三个月吧。"几天之后，孙叔敖上朝，向楚庄王请示说："前些时候我们认为币值小，增大币值，结果引起市场混乱，还是恢复原来的样子吧!"庄王同意，颁布新令，市场迅速稳定下来。

楚国人原先习惯于乘座车身很低的轿车，但这种车不便于马匹的驾驶，楚庄王想下令把车身造高些。令尹孙叔敖说："法令是很严肃的事情，令出必行，令禁必止。随便颁布法令，人民不知所从，这有损法令的威严。若要想让人们乘高车，只要我们下令让里邑的门槛修筑高些即可。乘车的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到乡里不便屡屡下车，自然会把车身造高些。"半年之后，人们都自动地把车身造高了。

孙叔敖还善于周密计划、有条不紊地安排工作。一次，楚国在沂（今河南正阳）这个地方修筑城池。在具体动工前，他命令工程师计算工程进度，然后再交给施工人计算工作量及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工具及材料，亲自到工地调查巡视，最后制定了工程计划。此后，按部就班地实施，结果仅用三十六天就完成了筑城任务，与事先的计划完全相同。这在当时的建筑工程中是很少见的。随着内政的改革和国家的富强，楚庄王对外争霸的步子也越走越快。楚庄王争霸心切，恨不得立刻就当上盟主，但中原大国晋国使庄王的这一愿望难以实现。楚庄王决意要攻伐晋国。据

《韩诗外传》记载，楚庄王下令，任何人不准进谏，违者死罪不赦。令尹孙叔敖觉得伐晋时机还不成熟，轻举妄动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祸患。他直截了当地劝谏楚庄王说："臣听人说过，畏惧父亲的鞭笞而不敢劝阻，这是不孝；畏惧君主的诛杀而不敢进谏，这是不忠。在目前条件下，轻举妄动会招致难以料想的恶果。为臣的家院里有一棵榆树，树上一只蝉在振翅鸣叫，自饮清晨的露水，洋洋自得。在它后面，一只螳螂正向它靠近，准备捕食它。在螳螂的后边，又有一只麻雀在准备捕食螳螂。在榆树的下面又有一童子手执弹弓对准了麻雀在向前靠近，没有看到跟前有一个洞窟会栽入。这都是只顾眼前小利而忘记隐蔽在后面的祸患。昆虫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怎能因一时急躁而引发祸难呢？"根据孙叔敖的策略，对外争霸，一要以德政服人，二要在征服周边小国的过程中同晋国寻机决战。

楚庄王同晋国争夺霸权，把目标集中在楚晋两国之间的一些弱小国家身上。楚庄王首先讨伐郑国和陈国，迫使这两国服从楚国指挥。楚庄王十三年，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舒国。楚庄王十六年冬天，陈国发生了夏氏之乱，楚庄王立即发兵攻打陈国。他告诉陈国的百姓说："你们不要惊慌，我只是为了讨伐夏征舒的叛乱。"攻入陈国后，杀掉夏征舒，却又灭掉陈国，把陈国置为楚国的一个县。当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刚刚返回，觉得楚庄王灭陈之举不妥，没有向庄王祝贺。庄王责问，申叔时回答说："夏征舒杀害国君，罪恶滔天。兴师讨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初陛下对别人宣布说，是为讨伐夏征舒而出兵，而现在杀了夏征舒，随后又灭了陈国，今后还怎样取信于人？"楚庄王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便恢复了陈国。

郑国受楚、晋争霸之难，苦不堪言。郑国大夫子良说："楚、晋两国都不修明政治，只知穷兵黩武，我们郑国无法应付。干脆，谁来攻伐，我们就同谁讲和结盟。他们两国都不讲信义，我们又

怎能讲信义呢?"郑国的这一政策使楚人深为不满。楚庄王十七年，楚军大规模进攻郑国。郑国人想求和，占卜的结果却不吉利。于是，郑人再到祖庙中哭卜，这次占卜的结果是郑人只有拼死抵抗才吉利。闻此消息，郑国都城内的百姓甚至守城的将士都痛哭起来。楚庄王一看郑人决意死战，就撤兵了。不久，又发兵围郑。这年三月，楚军攻陷郑都城，从黄门攻入城内大道上，郑襄公光着上身（表示请罪）牵着羊迎接楚庄王，说："寡人得不到上天的保佑，所以没能事奉贤君，以致使贤君怀恨寡人，这都是寡人的罪过，我怎敢不服从贤君的命令呢？即使贤君把我俘虏到江南，放逐到海滨荒野之地，我也唯命是听；把郑国的土地和人民赏赐诸侯大夫作臣妾，我也决无怨言。不过，贤君若能念及从前我们两国的邦交友谊，让寡人托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庄公之福而使郑国不亡，使郑国洗心革面侍奉贤君，降低郑国的名位，比照楚国的九县，这就仰仗贤君的恩赐了。这是我们郑人的最大心愿，斗胆说出，望贤君裁决!"

楚庄王身边的部下们说："不能答应郑国的请求，既打算灭掉它，就不必怜悯它。"楚庄王语气缓和地说："郑国的国君具有谦逊的美德，对人民又讲信义，灭掉这样的国家对我们楚国的声誉没好处。"楚军自动撤退三十里，答应郑国的求和条件。楚庄王派大夫潘尪进入郑都城签订和约，郑襄公派兄弟子良到楚国做人质。

早在楚军围攻郑国的时候，晋国就派军队救援郑国，荀林父任中军元帅，先縠为副帅；士会为上军统帅，栾书为下军副帅；赵括、赵婴齐担任中军大夫，巩朔、韩穿担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担任下军大夫，韩厥担任司马。当晋军风尘仆仆赶到黄河北岸时，得悉郑国已同楚国议和，荀林父想撤兵回国，对各位将领说："已经没必要再救郑国，同楚军交锋作战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劳师动众。依我看，等到楚军撤走后，我们再找郑国人算帐。"

士会表示同意元帅的意见，他说："据我所知，用兵讲求乘隙

而动。现在楚国的道德、刑法、政治、典章、礼仪一切都在正常状态下，我们不便直接与他们交锋。况且，楚国围攻郑国是由于郑国背弃他们过去的盟约，郑国屈服求降，楚国又不忍将郑国灭亡掉。如此，他们楚人能用刑罚去征讨叛逆，用德义去怀柔臣服者，说明楚人现在是开明的。楚国去年伐陈，今年伐郑，人民如草随风，说明楚君是得人心的。孙叔敖担任令尹，制定了严格的军规：行军时车上的甲士必须用手抓住车辕，有专门的官员在先头部队准备粮草，尖兵负责侦察，殿后用精兵，等等。百官分类任职，责任明确，不待军令而秩序井然。楚庄王现在很重视选贤任能，无论是同姓或异姓贵族以及一般平民，以贤能作为选拔任官的条件，奖赏有功，惠赐老者，甚至对路途中的行人也都有施舍。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楚国上下一心，军纪严明，人才济济，我们最好不要同楚军交战。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摧枯拉朽，伺机而动，这是用兵之道。”

然而，先縠年轻气盛、自恃强勇，听完荀林父和士会的话，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火气，大声叫道：“不行！我们晋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强大的军队，所向无敌。如今，我们坐视郑国沦亡而不去营救，有损于晋军的威名；大敌在前而不敢决战，这是胆怯。自从文公争得霸权，历经多年，怎能眼看着丢掉霸业？在我面前丢掉霸业，还不如让我拼死在疆场。兴兵救郑，遇强敌畏缩退却，算不得男子汉大丈夫！我只知冲锋陷阵，不知退却！”说完，就独自率领中军渡河。

下军大夫荀首见此情形，知道先縠此举凶多吉少，议论说：“这太危险了！《周易》上有这样的卦象，是从《师》卦演变到《临》卦，爻辞多：‘出征作战必须有军纪’，服从军纪的叫‘臧’，违犯军令的叫‘否’。军队的纪律如同大河的流水，执行军纪，河水才能畅行无阻，违犯军纪，如同河水堵塞，水溢出堤岸，终会酿成水灾。不服从主帅的命令叫‘临’，这是卦中最严重的。假如

先縠带领的人马遇上楚军，必会全面溃败，即使他侥幸不死，也会大祸临头！”

司马韩厥劝告元帅荀林父说：“您是元帅，先縠率军困败于楚军，您有推卸不掉的责任。部下不听指挥，元帅就没有责任？丢掉了属国郑国，又损兵折将，责任太大了！我看不如一同渡河，万一战败就由大家共同承担责任，这反比您一个人承担罪过要好，您看怎么样？”

事已至此，元帅荀林父进退两难。无奈，他听从了韩厥的主意，命令三军一起渡河作战。当时，楚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地（今郑州北），沈尹率领中军，子重率领左军，子反率领右军，楚军打算到黄河南岸饮马以后就回楚国。听到晋国军队已经渡过黄河，楚庄王最初并不想作战，打算按原计划回师。楚将伍参求功心切，想与晋军一决雌雄。孙叔敖阻止说：“我们楚军去年进攻陈国，今年进攻郑国，战事已经不少了。将士疲劳，不宜再战。如果我军失利，你是打算让楚国人吃你的肉吗？”伍参勇气不减，说：“如果此次作战能够取胜，是你令尹没有策略；如不能取胜，我伍参的肉将留在晋军那里，你想吃也得不到！”孙叔敖没有理睬他，军旗向南一挥，队伍开始向回撤了。伍参来到庄王跟前说：“晋军元帅荀林父新近执政，没有威严，军队步调不一。他的副手先縠刚愎自用，有勇无谋，不肯服从荀林父。其他主帅也同样没有宏谋远略，令出而不能行，国君又没在军中，真正是群龙无首。这种情形，晋军怎能不吃败仗？陛下是国君，晋军那边是卿大夫，国君逃避大夫，您怎能受这等污辱！”楚庄王难以忍受这样的刺激，命令孙叔敖挥师调头北上，驻扎在管地（今郑州）严阵以待。

晋军行至敖山和鄗山之间的时候，郑国派皇戌到了晋国军中，说：“郑国屈从楚国实属无奈，只为了使国家免于覆亡，郑国人内心是向着晋国的。如今楚军刚刚得胜，自以为很了不起，其实已经暮气沉沉，毫无防备，不堪一击。只要晋国大军发起进攻，我

们郑国就追随在后，楚军必然一战就败。”郑人的解释是为了免使郑国再次遭晋军的浩劫。晋、楚一旦交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郑国的日子更好过些。

先縠听到皇戌一番议论，总算遇到了知音，便吵嚷道：“击败楚国，臣服郑国，就在此战！一定要答应郑人的要求！”

下军副帅栾书有些忧虑地说：“自从消灭庸国以来，楚国的国君一直在励精图治。他教训人民：‘大家生活很艰苦，不知战祸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应随时戒备，切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楚军不断加强装备和训练，楚王还随时告诫将士：‘谁也不能保证永远胜利，不吃败仗。商纣王攻打东夷百战百胜，到头来却身死国亡。’我们没有理由说楚国骄狂无度。已故大夫子犯说过：‘出师作战重在理直气壮名正言顺，没有理由随便地兴师动众会士气低沉。’如今我们晋国国内的政局不安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人心不一，却要与上下一心的楚军作战，后果难以料想。子良是郑国的杰出人物，被送到楚国做人质；潘尪是楚国的重臣，到郑国来缔结盟约，由此可见郑楚两国关系的密切。郑国派人来鼓动我们与楚国开战，我们战胜就臣服于我们，我们战败就臣服于楚国。我认为决不能轻信郑人的话。”

赵括、赵同与先縠是同党，发表意见说：“自从发兵作战以来，我军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到敌人歼灭他，何必再犹豫不决？听先縠的就是了。”

晋国的将领们意见纷纭，帅无主见，还没作战内部就乱成一团。楚庄王派使者来到晋军营中，通告说：“我们楚庄王年幼时遭遇不幸，所以不善辞令，如实向各位表达想法：我们楚国的先君成王和穆王虽然屡次北上，但都是为了教训郑国，此次庄王北上也无得罪你们晋国之意。所以，请你们不要在此逗留太久。”晋国的上军统帅士会以礼作答：“从前周天子命令我们先君晋文侯：‘晋、郑两国要通力合作，辅佐周王室，切不可违背天子的诏命！’

如今郑国不遵守王命，我们晋国国君派我们质问郑国，此事与贵国不相干，有劳贵国君主相告。”先縠认为士会的话太软弱，随后派赵括对楚使说：“刚才士会讲得不符合我们国君的意思，我们国君要求把楚国人送出郑国，命令：‘不许逃避敌人！’我们不能撤回去。”

事隔几天，楚庄王又派使者向晋国求和，晋国人同意，双方商定了结盟的日期。楚军方面也有些军将求功心切，恨不得与晋军痛快打一仗。楚将乐伯单独一辆战车向晋军营前挑战，许伯为他御马，摄叔为他作车右。许伯把战马赶得飞驰，说：“单车挑战，应把战车赶得飞快，使战旗偃倒，迫近敌营后才能回来！”乐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左用利箭射敌，而且能代替御者执掌马缰，使御手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马匹，然后才撤回。”摄叔更是逞强：“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右应进入敌营，杀死敌人切下左耳，还要抓个俘虏然后才能回来！”这三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了，然后迅速回撤。晋军反击追赶，左右两翼夹攻。乐伯拉弓射箭，左边射马，右边射人，箭无虚发，使得晋军两翼不敢靠近。乐伯最后只剩下一枝箭，看到有只麋出现在前面，一箭正中麋的后背。晋军鲍癸正在后面紧紧追赶，乐伯让摄叔把麋献给鲍癸，说：“由于今年还不到季节，应该献的禽兽还没到来，谨以此麋献上作为膳食。”鲍癸下令停止追击，说：“他们的车左善于射箭，车右善于辞令，都是些英雄。”这才使得乐伯三人免于被俘虏。

晋国的魏锜想当公族大夫未能如愿，早就对执政者不满，这次跟随出征恨不得使晋军陷于失败。他请求出兵挑战，没有被批准，却又派他为军使。他来到楚军阵前，擅自改变自己的使命，向楚军发动袭击。楚国的潘党率人马追击，魏锜夺路而逃，眼看就要被俘虏，正巧看见战场上有麋鹿，迅速射死一只，献给潘党说：“你率军作战想吃到野味恐怕也不容易，特意射死这只麋鹿献上以表敬意。”潘党这才下令停止追击。

晋国的赵旃想当卿没有如愿，心有怨愤，又看到楚军来挑战的人逃了回去，也要求到阵前挑战。荀林父没有同意，派赵旃、魏锜二人前去与楚国订立盟约。郤克忧虑地说："让这两个牢骚满腹的人去盟会，如不做好两手准备，恐怕会使我军失败。"先縠不在乎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听从；楚人要同我们讲和，我们也没有既定的计策，真不知何去何从！发动一场战争没有确定战略，怎么准备？"士会解释说："还是有所准备为好。假如他们二人激怒了楚军，楚军突然发起攻击，我们毫无戒备，恐怕要吃亏。如果楚人不想开战，我们到时解除戒备，再缔结和约也不迟。"

赵旃、魏锜二人名为前去和谈，实际上是率领着人马向楚军发动攻击。楚庄王得此消息大怒，亲自坐着战车追击赵旃，赵旃丢弃了战车逃进森林中。晋国人担心赵魏二人遇到危险，便派战车前去接应。楚将潘党望见晋军战车扬起的灰尘，以为晋军发动全面进攻了，便派人回去报告："晋国大军开到了。"

孙叔敖深怕楚庄王陷人晋军之中发生意外，立即派兵救援，并发布作战命令："兵书上讲，先发制人。谁先动手谁就有主动权，宁可我们先发起攻击也不能等敌军来进攻我们。现在我军立即进攻！"楚军战车奔驰，士卒狂奔，向晋军阵营冲了过去。

晋军元帅荀林父没料到楚军会突然全线进攻，吓得手足无措，赶紧下令后撤："先撤过黄河者有重赏！"当时的晋国三军，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做好战斗准备，派巩朔、韩穿在敖山前面设了七处伏兵，守住了阵脚，处于不败地位。中军和下军都抢渡黄河，船只不够用，将士们你争我夺，上了船的恨不得立即开船，没上船者用手扒住船向上爬。为夺船逃生，船上的士兵挥刀去斩扒船者的手指，船中砍下的手指处处皆是，甚是悲惨。

楚庄王见遇到了晋军上军的有力抗击，一时力量不够，就派唐狡、蔡鸠居通知楚国附庸国国君唐惠侯说："寡人无德，遭遇到

强敌，这都是寡人的罪过。假如楚军战败，想必也是你们的羞耻。因此，想借你们的军队前来助战。”潘党率领战车四十辆，唐惠侯率自己的军队随后，向晋国上军攻来。郤克同士会商议：“我们是否等楚人来进攻？”士会说：“楚国力量强大，如果集中全部力量来攻击我军，那我军会全军覆没。因此，撤退为妥。这样既可以不受别人的诽谤，也不致于使生灵涂炭，岂不是两全之策！”于是，晋国的上军在最后才撤过黄河，保持着不败的战局。

当天黄昏时刻，楚大军抵达邲（今河南荥阳北），晋军已经撤走，通宵都能听到渡河的嘈杂声。随后楚军开到衡雍，潘党对楚庄王说：“陛下为什么不修筑高台，把晋军阵亡士兵的尸体埋在下面以示武功呢？我听人说打了大胜仗都要树立标志以展示给子孙后代，使他们不忘先辈的功绩。”楚庄王回答：“你并不理解什么叫‘武’。从字面上看，止、戈二字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武字，是停止战事的意思。从前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人们作《周颂》说：‘把干戈收藏起来，把弓箭也收藏起来，先君使用仁义治天下，要使其发扬光大，延续千秋万世。’所谓武德，就是消除暴乱，停止战争，安定民生，协和万邦，建功立业。寡人不德，没有先贤那些美行，给子孙后代展示什么呢？只能在这里建一座祖庙，告祭一下先祖。古人发兵是为了讨伐不义，现在晋国没有什么罪过，战死的将士又是尽忠而死，我怎忍心拿他们的尸体示威？”楚人在黄河岸边先祭祀河神，然后建起一座祖庙，向祖宗汇报之后，就凯旋而归了。

邲之战改变了长期以来楚晋争霸的局面，楚国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北上，控制了黄河南岸的许多国家，取得了同晋国一样的盟主地位。楚庄王为了彻底治服宋、郑两国，便故意制造借口。楚庄王十九年夏天，庄王派申舟出访齐国。从楚至齐途经宋国，他却对申舟说：“不要向宋国借路，就像走在楚国境内一样。”派公子冯到晋国出访，也不向郑国借路。申舟得罪过宋人，知道此行

凶多吉少，对庄王说："郑国清明，宋国昏庸，去晋国没有什么危险，我经过宋国必死无疑了。"庄王说："宋人若杀了你，我就发兵为你报仇！"申舟把儿子托给庄王然后出发了。途经宋国，宋人不允许申舟经过。华元说："途经我国却不向我们打招呼，分明是把宋国当作楚国的边鄙了，这实际上是要使我们亡国。杀了楚人的使者，至多也不过是亡国，还能怎么样！"随即杀死申舟。

楚庄王得到消息，一甩袖子站起来，急冲冲地走了出去，走到院中仆人才送上鞋子，走到大门才接过送来的佩剑。同年九月，楚国出动大军攻伐宋国。

宋人派乐婴齐向晋国求救。晋景公本打算发兵救宋，大夫伯宗却劝阻说："陛下千万不要发兵。古人说：'鞭长莫及。'意思说，鞭子虽长，也打不到马肚子。如今上天正赐福于楚国，我们不宜同它交锋，晋国虽强，也不可违背天意。凡是河流湖泊总要容纳污水，山林草丛总会有毒蛇猛兽，哪怕是美玉也有瑕疵。因此，作为君主总要忍受些羞辱，此乃人之常情，请陛下稍稍忍耐。"

晋国不发兵救宋，却派大夫解扬前往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当解扬途经郑国时，郑国人把他捉住交给楚国。楚庄王给解扬很多好处，让他背叛自己的使命，劝说宋国投降。解扬不肯答应，楚庄王一再相求，解扬表面上答应了。解扬来到宋国城跟前，爬上楼车对宋人高声喊道："晋国的援兵已经出发，马上就开到了！"楚庄王大怒，派人质问："你既然答应寡人，为何又出尔反尔？"解扬辩解说："据臣所知，君主的职责是制法行令，臣下的职责是奉行君命一心不贰，这是人间道义。陛下贿赂小臣改变使命，说明陛下不懂得君臣之道。小臣使命在身，应该奉守职责，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该大义凛然。该说的都说完了，我现在死而无憾！"楚庄王听到这一番话，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把他放了。

同年五月，楚军见攻不下宋都，准备撤军回国。申舟的儿子申犀拦住楚庄王的马磕头说："先父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国外，与陛

下有约在先，陛下如今怎能食言！”一席话把楚庄王问得哑口无言。这时，申叔正好驱车过来，他献策说：“假如陛下在宋人城外修建营房，让需要种田的人先回国，宋国人看到我们打算长久包围下去，一定会屈服。”楚庄王立即下令实施。

宋人一瞧楚军准备打持久战，十分恐惧。于是，派大夫华元到楚军求和。华元半夜潜入楚军，走到子反床边叫醒他说：“我们国君派我来把实情相告：宋国城内已经没有粮食，人们易子而食，析骸代柴。虽然穷困到这种程度，人们也决不举手投降。只要你们退兵三十里，一切都可以商量。”子反受到华元的胁迫，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要求，然后报告了楚庄王。楚庄王立即下令后撤三十里，宋、楚结盟，化干戈为玉帛。从此宋国臣服了楚国，华元到楚国作了人质。

战国秦汉时期流传着许多颂扬楚庄王美德的故事。据《说苑》记载，一次楚庄王赐群臣宴会饮酒，并且让他的姬妾来助酒兴。晚宴酒至酣时，一阵大风吹来，灯被吹灭，一片漆黑。一个醉醺醺的臣下借着黑暗之机去抓美人的衣服，美人顺手将作恶者的冠缨扯断，然后告诉楚庄王：“有人趁着黑暗撕扯我的衣服，我把他的冠缨抓了过来，请陛下查验！”楚庄王却大度地说：“多饮了些酒，有失礼的地方，算不得什么。”随后大声对大家说：“今日高兴，大家多饮几盅，不喝得酩酊大醉不算尽兴！”结果君臣喝得东倒西歪，冠缨纷乱，也分不出谁的冠缨被扯去了。

三年之后，楚、晋两军作战，经常发现一个勇士在阵前冲锋陷敌，出生入死，使楚军取得胜利。楚庄王奇怪，便问这位勇士：“我未曾给你什么好处恩惠，你为什么这样拼命作战呢？”这位勇士回答：“几年前臣酒醉失礼，陛下没有诛杀为臣，我这条生命是陛下赐给的，我日夜思念着以死相报，纵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悔！”

《吕氏春秋》也记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次，楚庄王到云梦一带去狩猎，射中一只科雉，一个叫申公子倍的小臣跑上前来把

科雉夺走了。楚庄王很恼怒，想把申公子倍杀了。旁边的大夫们都劝阻说："子倍是一位贤良之士，他这样做恐怕事出有因，请陛下宽容。"没过三个月，申公子倍得暴病而死。后来楚军打了胜仗奖赏功臣，申公子倍的弟弟前来邀赏。楚庄王不知何故，他解释说："臣的哥哥顶着大不敬的罪名，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夺走了那只科雉，这是事出有因的。古书中说，射科雉的人不出三月就会死亡，他是为了保护陛下才去抢那只科雉的，请陛下明察。"楚庄王命令史官核查，果然有此记载。于是，重赏了这个小臣。

上面这样的故事未必一定确有其事，但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楚庄王施德政，得人心。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楚国由原来的与晋国争霸，经过邲之战一举削弱晋国，使郑、宋等一些中原国家归附于楚国，确立了霸主地位，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楚国的梦想。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文公十四年至宣公十八年

《史记》：《楚世家》、《循吏列传》。

晋灭赤狄

在春秋时代的华夏大地上，仍存在着许多国家和部族，既有华夏民族，也有那些文明水平较低的落后民族。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这些落后民族也已建立自己的国家，国家名称不一，华夏国家称之为赤狄、长狄等，赤狄又包括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很多分支，统称之为狄。自春秋以来，这些狄族国家日渐强大，不断袭扰周围的华夏国家，向东攻击齐国，向南攻击郑国和卫国，一度几乎灭亡邢国。

齐桓公称霸的时候，率领各诸侯国迁邢封卫，使这两个国家得以摆脱狄难延存下来。晋文公继霸，狄族的势力在强大的中原国家强力攻势下受到挫抑。晋国的霸势衰弱，狄族又向东方的齐国发动进攻，随后又威胁鲁国、卫国、宋国。狄族当中赤狄最为强盛，而赤狄当中潞氏一支最大。随着中原国家势力的不断强大以及国土的不断扩张，这些狄族国家最终难以逃脱被吞并、消灭的恶运。

鲁文公十一年（前616），长狄的一支——鄋瞒发兵侵略齐国，随后又骚扰鲁国。鲁文公打算让叔孙得臣率军抵御，先让史官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于是下令出征。侯叔夏为叔孙得臣御马，绵房甥担任车右，富父终甥站在车尾部。十月初三，在咸地打败狄军，俘虏狄将侨如。富父终甥用戈顶住他的喉咙把他杀死，然后把尸体埋在鲁国的子驹门。为了纪念这次战功，叔孙得臣用狄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叫叔孙侨如。

在此前的宋武公时代，鄋瞒的军队曾经进攻宋国。宋国的司徒皇父率军抗击，耏班为他御马，公子谷甥担任车右，司寇牛父站在车尾。宋军在长丘（今河南封丘南）击败狄军，俘虏长狄的将领缘斯，皇父、谷甥、牛父等人都战死。为纪念此次胜利，宋国的国君把一座城门赐给耏班，让他享受这道关门的税收，从此这座门就称为“耏门”。

长狄在其他国家也屡遭挫败。晋国灭掉潞国的时候，曾俘虏侨如的弟兄焚如。鄋瞒进攻齐国时，齐国大夫王子成父生擒焚如的兄弟荣如，并把他的人头埋在周首城（今山东东阿以东）的北门。从齐、鲁被击溃的长狄逃窜到卫国的时候，卫国军队又俘虏焚如的弟弟简如。至此，长狄的鄋瞒这一支就逐渐灭绝了。

鲁宣公六年（前603）秋天，赤狄袭扰晋国，包围了怀（今河南武涉西南）和邢丘（今河南温县东）两座城邑。晋成公想发兵反击赤狄，荀林父劝阻说：“赤狄屡次发动战争，使人民饱受战争的艰辛，等到他们的人民再也忍受不住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把他们打垮。《周书》中说：‘把殷人全部消灭’，就是说要等待时机，打彻底的战争。”晋成公接受建议，容忍了赤狄。

赤狄人见晋国没有出兵，得寸进尺，第二年夏天又发兵攻晋，并抢夺向阴（今河南济源南）的庄稼。晋人还是没有反击。

为了孤立赤狄，晋国派下军副帅郤成子联络受赤狄欺压的其他狄族国家，共同结成联盟。狄族国家纷纷向晋国靠拢，表示愿臣服于晋国。同年秋天，晋国与狄族各国在狄地欑函续订盟约，诸狄都服从晋国的号令。在这次结盟前，晋国的一些大夫想把狄族各国召集到晋国来结盟。郤成子说：“据我所知，没有高德众望就不能怕辛劳，不勤劳又怎能求助于别人呢？只有勤劳才能建立丰功伟业。《诗经》中说：‘文王勤劳来创业。’周文王这样的贤人都不忘努力勤奋，何况我们这些平庸之辈呢？”最后还是屈尊到狄族那里结了盟。

潞国是赤狄中最强大的国家。晋景公的姐姐嫁到潞国为国君的夫人。潞国的执政大臣丰舒专权自恣，残暴无道。鲁宣公十五年，丰舒由于仇视晋国，将国君的夫人杀死，并把国君的眼睛弄瞎。晋景公获悉后大怒，再也不愿忍受赤狄的无礼，准备派兵讨伐丰舒。多数大臣认为，丰舒才干超人，晋国目前境况不佳，邲之战遭惨败，元气未复，不可轻举妄动，还是继续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大夫宗伯力排众议，他认为："赤狄有五大罪状：第一，不虔诚地祭祀神灵；第二，贪于酒色；第三，不重用贤臣仲章；第四，无故杀害晋国的亲眷；第五，伤害国君，大逆不道。丰舒虽有能力，但他的能力没有用在施行德政、安抚人民上，而只知胡作非为仗势欺民。所以，他的能力只会增加他的罪过，使他走向灭亡。古代的夏桀和商纣就是这例子。有人说，观察一段再说，问题是丰舒在国内国外不得人心，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被人们除掉，改换贤臣。到那时，我们再想讨伐赤狄也就没有借口，而且敌人也就不易攻破了。不可失去这次机会，一定要立即出兵讨伐！"

晋景公采纳了宗伯意见，决定立即发兵。六月十八日，晋国元帅荀林父统帅晋军直扑潞国，在曲梁（今山西潞城北）将潞国军队打得大败。随后直逼其国都，六月二十六日，将潞国一举平灭。潞国的贼臣丰舒兵败后仓皇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住，押送到晋国，晋国人将丰舒斩首示众。

晋国不费吹灰之力便灭掉潞国，晋景公非常高兴，犒赏三军。赐元帅荀林父一千户狄国的臣民和土地，把晋国的瓜衍（今山西瓜城）赏给士伯，对他夸奖说："这次灭掉潞国的胜利完全是你的功劳。先前邲之战我军战败，人们把罪责推给荀林父，是你坚持谏诤说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使他保留原职。如果没有你，哪里还能有荀林父和这次胜利呢！"晋景公奖赏三军将士，全国上下一片振奋，使晋国重新振作起来。大夫羊舌职兴奋地说："《尚书》中说任用那些恭敬严谨的人，这话真正有道理呀！士伯认为荀林父

有能力可用，国君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时也重用士伯，这是国君的明德远略。周文王之所以能创立周人的天下，正是以德政临天下。《诗经》中说：'文王把恩福赐予天下人民，周人的德行才溢于四方。'施德政于民，符合民心，人民就同心同德地跟着国君走，干什么都能成功！"

晋景公派大夫赵同把俘虏来的一部分潞国人献给周天子。然而，赵同在献礼的时候行为放荡，有悖臣节。王季子生气地说："从赵同的行为来看，他有些魂不守舍，用不了十年他就会犯下大罪，招致杀身之祸！"

灭潞国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晋国的士气。第二年春天，晋景公命令士会率军讨伐赤狄的甲氏、留吁、铎辰各国，结果大获全胜，这些地方的国土尽归晋国占领。晋景公再次奖赏将士，并派人把俘虏献给周天子，同时请求周天子册封士会为国卿，周天子同意了。三月二十七日，正式封授士会为国卿，让他穿上卿的服装，同时任命他为中军元帅，还担任太傅，全面执掌晋国的军事和政治大权。士会的贤德在晋国很出名，据说他任职以后，晋国的乱臣贼子纷纷逃到国外。

据《列子》记载，晋国是一个多盗贼的国家，执政者很头疼此事，却毫无办法。有一个叫郄雍的能力超人，可以依据人的相貌和眉宇之间的表情判断察觉哪个人是盗贼。国君把他请来让他帮助缉拿，从无差错。国君非常高兴，告诉赵文子说："这回不用发愁了！我得到一位能人，善观人相貌而捕贼，百拿百中！"赵文子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陛下依靠伺察想禁绝盗贼，这是不可能的。郄雍本人说不定哪天就会遭遇灾难身亡。"郄雍察盗，盗贼都很痛恨他，于是共同商议除掉郄雍。不久，郄雍被害身亡。晋侯闻悉很惊骇，找来赵文子问道："果然如同你所料一样，郄雍被杀了。你快说说，怎样能从根本上禁绝奸邪盗贼？"赵文子不急不忙地说："周人有谚语说：'看得见水底下的鱼的人，不吉祥；能知晓别人

隐私的人，遭殃。’陛下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用贤人，施教化，使人们都有羞耻之心，懂得礼义廉耻。”所以，士会执政以后，晋国国泰民安，动乱问题逐渐解决了。

晋国大夫羊舌职评论说：“从历史上看，夏禹重用贤良之士，那些邪恶之人都远离而去。《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由于有贤良之士执政，人们都很勤恳努力，不存侥幸心理，克尽职守，安心本职，在这样的社会中容不下奸邪，坏人怎能不远逃呢？”

几年以后，晋将郤克和卫将孙良夫，共同率兵讨伐赤狄的残余势力——廧咎如。由于廧咎如的统治者不得民心，百姓不愿为其卖命，两军刚一接触，廧咎如的军队就全线溃败。晋国一举消灭了廧咎如，吞并了其土地和人民。至此，赤狄的势力几乎消失干净了。通过对周边狄族的战争，晋国的国土不断扩大，人口增多，增强了国力，再次振兴起来。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文公十一年至成公三年

《公羊传》

靡笄之战

众所熟知，宋襄公图霸，在与楚国的泓水战役中痴用古礼，结果争霸不成，反而受伤而死。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后的晋国与齐国的靡笄之战中，也曾发生过晋国将军韩厥在战场上对齐顷公讲君臣礼节，结果使齐顷公走掉的故事。

公元前6世纪初，齐国的国君是齐顷公。《搜神记》把顷公的诞生说得非同寻常。据说顷公的母亲是先君齐惠公的妾，身份很低。有了身孕之后不敢张扬，结果到荒野里去生孩子，孩子生下后弃之田野。原野上的动物都过来哺乳他，鸟用羽毛为他覆盖。人们见到这种情形，觉得这个婴孩非同一般就把他抱入宫中，并给他取名叫“无野”。后来他做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齐顷公。

鲁宣公十七年（前592），晋景公派大夫郤克到齐国出访，约请齐国参加各诸侯国的盟会。郤克是个瘸子，走起路来左右摇摆，齐顷公便让他的母亲肖同叔子躲在帷幕后面偷看以寻开心。郤克走上大厅台阶的时候，肖同叔子竟忍不住笑出声来。郤克很生气，觉得这是污辱，立刻退了回去，发誓：“我不报此羞辱之仇，决不再东渡黄河！”他自己动身回晋国，留下副使栾京在齐国等候命令，说：“不完成此次使命，你就不要离开齐国！”

郤克回到晋国以后，立即请求晋景公发兵攻齐。晋景公觉得这算不得什么大事，也不应该因为某一个大臣的私怨而兴师动众，就拒绝了郤克的要求。郤克又请求率领自己的私兵进攻齐国，晋景公仍然不应允。

齐顷公看到郤克突然归国，知道事情不妙，不敢亲自参加盟会，于是委派大夫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等人为特使参加诸侯大会。高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半途走到卫地敛盂（今河南濮阳东南）时，就逃回齐国。这年夏天，各诸侯国在断道举行了会盟。会盟之后，晋人就把齐国的使者扣留，把晏弱囚禁在野王（今河南沁阳），把蔡朝囚禁在原（今河南济源北），把南郭偃囚禁在温（今河南温县西）。晋国大夫苗贲皇出使他国，在野王恰巧遇见晏弱。回到晋国后，他劝谏晋景公："晏弱究竟犯了什么罪就把他关押起来？先君称霸诸侯靠的是信义，所以深得诸侯拥戴。如今诸侯虽参加盟会，但都怀有贰心，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信义。齐顷公不亲自参加会盟，就是担心我们不讲礼义的缘故。他派四个大夫去会盟，当时就有臣下劝谏说：'陛下不亲自会盟，派去的使者会有危险。'所以，高固刚走到敛盂就中途逃回。而其他三人则表示：'如果我们也逃走，会断绝齐、晋两国的友好邦交，所以我们即使有危险，也一定要前去赴会。'他们的精神诚为可嘉，而我们却把他们囚禁，这岂不更证明我们晋国失礼了吗？假如我们重恩德，对他们以礼相待，才能消除别国对我们的误解，使天下诸侯向我们聚拢。请陛下三思！"晋景公觉得苗贲皇言之有理，就撤去了看守，故意让齐国的使者逃走了。

晋、齐关系的恶化是因郤克的个人恩怨造成的，晋国的执政卿范武子（即士会）为此忧心忡忡，准备辞去执政大权，让给郤克。他对儿子文子说："人们很难把握住自己的喜怒哀乐，是因为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诗经》中说：'君子发怒，可以止祸；君子喜悦，国家安宁。'君子的一喜一怒都应合乎礼义，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不知郤克会怎么样，能否控制自己。所以，我准备辞去元帅和执政大臣职务，由郤克接替，使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小心谨慎，服从指挥。"晋景公同意了武子的请求，任命郤克执政。

郤克执政以后，晋、齐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第二年春天，晋景公亲自率军会同卫国军队进攻齐国。当晋、卫联军进抵阳谷（今山东阳谷北）时，齐国人害怕求和。齐顷公亲自到鄫地会见晋景公，两国战事才算告结。齐国的公子强被带到晋国做人质，晋国撤兵回师。

齐顷公不甘心受晋国的摆布，便去联络南方的楚国，以共同对付晋国。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南方以楚为核心，北方以晋为核心。齐国倒向楚国，对鲁国构成严重威胁。鲁成公元年（前590），鲁国派大夫臧孙许到晋国，与晋国缔结新的军事同盟。在国内积极备战，修缮城池，整顿军赋制度。

果然不出鲁国所料，第二年春天齐顷公便亲自率领大军攻打鲁国。齐国军队从鲁国北部边疆进攻，首先围困鲁国的龙城（今山东泰安东南）。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率众猛攻城门，不幸被龙城人俘虏。齐顷公派人对龙城人说："只要你们放了卢蒲就魁，齐国军队马上就离开你们的境界。"龙城人没理睬齐顷公的议和条件，随即杀死卢蒲就魁，并把他的尸首挂在城墙上向齐人示威。齐顷公见宠臣被杀，极为震怒，亲自到阵前督战，齐兵士气高昂，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龙城攻陷，大肆屠戮。然后挥兵南下，攻占了巢丘。

卫国与鲁国是盟国，齐军侵鲁，卫国立即派兵救援。卫穆公派大夫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等人带兵出征。卫是弱国，齐是强国，两军刚刚遭遇，石稷就很恐慌，想退兵回避。孙良夫阻止说："受国君的命令出征，遇到敌人就想逃走，怎样向国君交待？如果害怕，当初就不应该接受命令。既然来了就应该拼死努力！"石稷则说："我军肯定敌不过齐军，如果硬拼下去，恐怕伤亡惨重。假如全军覆没，就更不好向国君交待了。"听完这话，大家默默无言以对。石稷最后说："孙良夫是国家的卿，如果被敌人捉住，那是国家的耻辱。你们大家都撤走，我留下少数兵力继续抵抗。"随

后宣布说，大批援军马上就到达。齐军闻听消息，也未敢轻举妄动，驻扎在鞫居观察动静。恰在此时，卫国的新筑（今河北魏县南）大夫叔于奚率兵赶来援救，使卫军免于惨败。孙良夫没有回卫都，就直接奔向晋国请求援兵。

鲁国的臧宣叔也到晋国求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都到了晋国元帅郤克家中。郤克请求晋景公立即派兵伐齐，晋景公答应派战车七百辆。郤克认为兵力不足，说："七百辆战车是四十年前城濮之战的兵力，那时仰仗先君的英明和先大夫的智谋所以得了胜利。如今让为臣带这些兵力去作战，实在没有这个能力。"晋景公让了一步，派兵车八百辆。郤克率领中军，士燮率领上军，栾书率领下军，韩厥任司马，浩浩荡荡紧急救援鲁、卫两国。

鲁国得悉晋国援军到来，臧宣叔亲自迎接晋军充当向导，季文子率军前来会师。晋军开到卫国境内时，有人违背军令，韩厥要依法严惩。郤克认为大敌当前宜宽不宜严，急忙前去劝阻。他赶到韩厥那里时，人已被斩首。郤克马上用自己元帅的名义通告全军，宣布执行死刑。他向御车人解释说："开始想从轻处罚是从大局着眼，人既然已经杀掉，就应该有军威，同时也可以分担韩将军的一些谤言。"

晋、鲁、卫三国联军合击齐军，齐军力不能挡，迅速撤退到卫国莘地。联军乘势猛攻，齐军节节败退，六月十六日抵达靡笄山（今山东济南千佛山）脚下。齐顷公派军吏到联军中约定说："郤元帅率领大军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远途劳苦，我们齐军不忍心真正交锋，不过派些老弱残兵应付一下罢了。如果愿意较量的话，明天早上再奉陪不迟。"

郤克不答应，说："晋国与鲁、卫两国乃兄弟邻邦，鲁、卫两国的使者到晋国求救说：'齐国无道，侵略我们。'我们晋景公听后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才派我们同贵国交涉，但愿我们的军队在这里停留不会很久。有一点必须申明：军令在身，只知前进，

不知等待！”使者回去报告，齐顷公答复说：“你们愿意一比高低，这也正是寡人的心愿。话反过来说，你们想逃走不打，恐怕也办不到吧！”

齐国大将高固首当敌冲，带领一支人马攻入晋军，用大石块投掷晋兵。晋军猝不及防，队伍混乱，高固乘乱抓住一些俘虏带在战车上凯旋而归。他在战车尾部绑了一棵桑树，押着俘虏巡行齐军阵前，高声吼叫说：“想成为勇士的人请出来，我可以把我余下的勇气分给他！”

六月十七日，晋、齐两军在靡笄山下的鞌地摆开军阵。邴夏为齐顷公御马，逢丑父为车右；解张为郤克御马，郑丘缓为车右。齐顷公狂傲地说：“干脆把晋军消灭后我再吃早餐！”没有披上铠甲就冲上战阵，两军厮杀得难解难分。晋帅郤克作战一开始就被流箭射伤，鲜血一直流到战靴上，仍不停地击鼓督战。他告诉身边的将士：“我受伤了！”御手解张激励郤克说：“从作战一开始，我的手和胳膊都被箭射伤，我把箭拔出来继续驾车，你看，战车的左轮都被我滴下的血染红了，我都没说受伤，请元帅坚持战斗到底！”车右郑丘缓也说：“自从开战，车跑到危险的地方我就下去推车，你们知道吗？不过，你们确实都负伤了。”解张接着说：“全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大家眼望着军旗，耳听着战鼓，进退都服从着指挥。这辆指挥车有人坐镇，我军就能取得胜利，决不能因个人的伤痛而使国家利益受损。我虽然受伤，但只要不死，就要继续奋战！”郤克听完部下一席话语，顿时勇气倍增，左手接起马缰，右手猛击战鼓，战车向前飞驰，全军随着冲杀，结果把齐军打得大败。晋军追击齐军，围绕着华不注山追赶了三圈。

在这次作战的前夜，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告诉他说：“作战时，你要避开战车的左右两边！”所以作战的时候，他就站在战车中间指挥作战。他率军紧紧追赶齐顷公，齐顷公的御手对顷公说：“射后边战车中间的人，那好像是位君子。”齐顷

公却说:"既然你知道他是君子,却要用箭射死他,这不合乎道义!"齐军就射韩厥左边的人,应声倒下;又射右边的人,也应声而死;战车上只剩下韩厥一人。晋军大夫綦毋张战斗中战车损坏,看到韩厥车上缺人,就追赶上来对韩厥说:"让我上你的战车吧!"綦毋张准备站在战车的两侧,韩厥知道危险,把他推开,让他站在身后。韩厥猛追不舍,与齐顷公战车的距离愈来愈近,弯下腰把车右的尸体稳住。趁此机会,逢丑父与齐顷公互换了位置,韩厥没有发现。在华不注山下的华泉这个地方,齐顷公战车的马匹被树丛挂住,逢丑父的胳膊几天前刚刚受伤,隐瞒着没有说,所以现在眼看着战车前进不得,却没有办法。韩厥的战车顷刻之间就追了上来。

韩厥跳下战车,走到齐顷公战车前面,就地跪下向齐顷公三次叩头,手拿着一只酒杯,又献上一块玉璧说:"我们国君派群臣前来为鲁、卫两国向陛下请命,并指示说:'晋国军队不得进入齐国界内。'如今为臣身在军中,行不由己,才赶到这里。我深怕有辱晋、齐两国国君的尊严,现在听候着陛下的命令!"韩厥是在彬彬有礼地对齐侯劝降,但他却不认识谁是齐顷公。逢丑父假装自己是国君,命令齐侯到华泉取水饮马,齐顷公就这样溜掉了。不远处的郑周父御车,宛茷为车右,把齐顷公拉上战车就跑。韩厥方知上当。

韩厥俘虏了逢丑父,郤克想把他杀掉。逢丑父高声吼叫说:"从现在起,再也没有别人能替我们国君承担过错了,只有我肯这样做,难道你们就该杀我吗?"郤克听后动了恻隐之心,说:"逢丑父事君一心不贰,忠心耿耿,他本人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过,我若杀了他,还怎么教训别人忠于君主呢。"随即免他不死。

齐顷公逃走后,十分感激逢丑父的诚心,决心要把他救出,三番五次地冲入敌军。狄军和卫军都是晋军的盟军,当齐顷公冲入狄军中的时候,狄兵不肯伤害齐顷公,都用戈盾来保护他;冲入

卫军后，卫军为了避免祸患，也没有伤害他，故意把他放走。最后，他从齐国的徐关（今山东淄川镇西）回到国都临淄，进城时激励守城的将士说："我军战败，大家要加强戒备！"

齐顷公回到城内，在大路上遇到一女子，问进城的将士："我们的国君平安回来了吗？"有位将领回答："平安回来了。""锐司徒是否也平安回来了？"她又问。"也平安回来了。"别人回答。这位女子才松了口气说："国君和我的父亲都能平安归来，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齐顷公当时正在车上，听到此话，觉得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就派人详加追问，才知道他是辟司徒的妻子。于是把石窌（今山东长清东南）封赏给她。

不久，晋军就追击到马陉（今山东益都东南），迫近齐都。齐军的军力受到严重挫伤，齐顷公不想再战，就派大夫宾媚人前去议和，献上纪国所产的玉壶和齐国的玉磬，还答应归还所占鲁、卫两国的土地。宾媚人来到晋国军中，见到郤克，表示了齐国的愿望。然而郤克不肯答应，提出两个议和条件：第一，必须交出当初嘲笑侮辱郤克的肖同叔子；第二，必须把齐国的田亩改成东西方向，以利东西方向的道路行驶。如果齐国不接受这两条，晋国决不议和。

齐国谈判使者宾媚人解释说："肖同叔子并非别人，而是国君的母亲。如果所有诸侯地位平等的话，齐君的母亲也就相当于晋君的母亲。阁下一定要齐君的母亲为人质，有悖于礼义，还怎样号令天下的诸侯？又怎样让天下的人们奉行孝道？《诗经》中说：'孝子奉道，施于天下。'孝敬自己的父母，就应让别人也同样能孝敬父母，这叫由己及人。再说第二个条件，让齐国把田亩改成东西方向，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情。田亩的方向顺应地势。因势利导地挖渠修路，自古而然。《诗经》中说：'我疆我理，东南其亩。'是说先王根据地形确定田亩向东或向南，阁下怎能违背先王之道呢？违背先王之道就是不仁不义的人，一个不仁不义的人

又怎能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诗经》中还说：‘施德天下，福寿长久。’广施德政才能招抚天下的人心。如果阁下能垂恩齐国，使齐国人民免于战火涂炭，我们甘愿献出齐国所有的宝物；如果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背城死守！”

鲁、卫两国见齐国答应退还领土，双方议和也只能如此，便劝告郤克说：“齐国主动求和，给晋国献上宝物，归还我们鲁、卫两国的土地，我们也就取得了赫赫成果，不知阁下还有什么可求的。晋、齐两国的胜败都是上天的旨意，不知上天什么时候会改变意志，晋国也未必永远获胜。一旦时机转变，悔之莫及！”

齐国使者言之凿凿，鲁、卫主和人心所向，郤克不便再执己意，便接受了齐国的求和条件，改变口气对齐使说：“晋国只为鲁国和卫国的请求才出兵的，鲁、卫两国已经答应，我们晋国没什么可说的。但愿齐国能履行诺言。”

同年七月，晋、齐两国在爰娄（今山东临淄镇东）订立和约。条约中规定，齐国归还过去占领的鲁国的汶阳之田。鲁国收回领土非常喜悦，鲁成公亲自赶到上鄍（今山东阳谷）去慰劳晋国军队。

晋军凯旋而归，范文子走在队伍的最后入城。他父亲范武子不高兴地问：“难道你不知道我盼望你早点归来吗？”范文子解释说：“军队凯旋归来，人们夹道欢迎，走在队伍前面必然引入注目。我走在前面，岂不是抢夺主帅的这份殊荣？我是因此才走在后边的。”范武子骄傲地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看来我以后不会因你有过失而受牵连的。”

郤克归国后朝见晋景公，晋景公赞扬郤克说：“这次取得重大胜利完全是你的功劳。”郤克毕恭毕敬地回答：“此次胜利既受陛下的教导，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为臣个人的功劳。”范文子和栾书上朝后，晋景公又用同样的话语夸奖他们，他们都推让说是别人的功劳。晋景公奖赏他全军的将士。

同年冬天，晋景公派大夫巩朔到周天子那里，贡献攻伐齐国的礼品。然而，周定王不予接待，只派单襄公谢绝说："依照周代礼法，当蛮夷戎狄不服从周王室的号令时，天子命令诸侯讨伐，取得胜利后才向天子献纳礼品和战俘，由周天子亲自接见，目的是惩戒那些叛逆，鼓励诸侯尊王有功。如果是同姓的兄弟之国或异姓甥舅之国间发生边界冲突，天子下令讨伐违礼者，战胜国只要派人报告一下即可，用不着献礼和献俘，这是为了表示华夏诸侯内部应与其他民族相区别。如今晋国取得胜利，不应该献什么战利品，只要派一位卿前来就可以了。可是，来者不是卿，王室的档案中没有记录，所以天子不能接见，这是礼法。"巩朔听后无言答对。周定王命人把礼品交给三公，用降一等的礼节招待了巩朔。

鲁成公三年冬天，齐顷公前往晋国访问。当要举行迎宾典礼时，郤克走上前去，用嘲笑的语言对齐顷公说："陛下这次来到晋国，完全是由于四年前女人的笑声引起，我们国君可不敢接受这种歉意。"齐顷公十分尴尬。

晋景公设宴招待齐顷公，席间齐顷公威严扫地，他把目光投向韩厥。韩厥笑问："陛下还认识我韩厥吗？"齐顷公不好意思地应对说："你的衣服换了，所以有些不认识了。"韩厥举杯祝酒说："小臣在战场上努力拼搏，正是为了使二位君主到一起聚会。干杯！"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宣公十七年至成公三年

《国语·晋语》

晋秦约盟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诸侯争霸愈演愈烈，群雄并起。由于晋国位于中原腹地，以及晋国较为强大，形成以晋国为焦点的群雄纷争局面。这里我们所介绍的是晋与秦两国之间时战时和的一些故事。

自从秦晋殽之战以后，秦向中原扩张受挫，转而征服西方的一些小国，人们称之为"霸西戎"。晋国又不断地与楚国和齐国发生冲突，战争连年不断。晋灵公末年，晋国想暂时停止与秦国的冲突，以稳定后方。晋国大夫赵穿独出心裁地向晋灵公提议说："我们堂堂大国去向秦国屈辱求和，有损于晋国的威望。我们不妨假装袭击秦的盟国崇国，崇国一定会向秦求救。那时我们顺水推舟与秦国约和，岂不更好？"晋灵公竟然采纳了这一主意，派赵穿率大军进攻崇国。当晋国提出可以同秦国和谈时，遭到了秦国的拒绝，并由此导致双方长达三十年的军事对抗。

为了报复晋国的侵略，秦国随即派大军直接攻击晋国，包围了焦（今河南陕县南）。晋将赵盾急忙率军救援，秦军攻打不下，便撤军回国了。

晋成公即位以后，晋国征服了白狄，随后会同白狄进攻秦国，以报复秦国。双方军队稍一接触，彼此都撤兵了。晋国人抓住一个秦国的间谍，把他带回杀死在绛城内的大街上，不料六天后，此人竟神奇地复活了。

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一个爱妾，没有生儿子。后来魏武子生了

病，吩咐他儿子魏颗说："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她嫁出去吧！"到了病重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改变主意对魏颗说："你一定要把她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把这位妇人嫁了出去，解释说："人得了重病头脑混乱，胡言乱语，我当然应按照头脑清楚时的指示去做。"晋景公六年（前594），秦桓公率军进攻晋国，包围了晋国的辅氏（今陕西大荔东）。秦军中有个大力士名叫杜回，力大超人，人们都很害怕他。魏颗率晋军救援辅氏，与杜回遭遇，魏颗心中有些紧张。突然战场上出现一位老翁，用草绳把杜回绊倒在地，魏颗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杜回。当天夜里魏颗作了一梦，梦见那位老翁对他说："我是你所嫁出的那个女子的父亲，你听从你父亲头脑清醒时的话，我很感激，以此作为回报。"

秦、晋之间战争时停时续，彼此难分上下。晋厉公即位后，想结束两国僵持不下的战争状态，与秦国约和，双方商订在令狐（今山西临猗西）会盟。晋厉公元年（前580）冬天的一天，晋厉公先到达令狐。然而，秦桓公担心晋国有诈，不敢渡过黄河，自己留在王城（今陕西大荔东），派特使史颗到达令狐同晋厉公会盟。晋厉公也派郤犨西渡黄河到王城与秦桓公盟誓。晋、秦两国就这样总算凑和着达成了和约，暂时结束了冲突。晋国的范文子议论说："歃血为盟是为了保证信义，相互放心。两国君主约定地点会面，这是彼此信任的第一步。眼下这一步都达不到，说明会盟的人根本就无诚意，勉强盟誓又有何益处！"结果，秦桓公回去不久就违背了和约。

秦桓公虽然同晋厉公缔结了令狐之盟，但并无诚意，不久就派人到白狄和楚国，鼓动他们与秦联合攻打晋国。白狄和楚国对秦国这种不讲信义的做法很反感，便告诉了晋国。晋厉公三年四月初五，晋国派吕相到秦国宣布断绝两国的同盟关系，斥责秦国说："我们晋厉公即位以后，怀念晋、秦两国的传统友谊，特约你们结为友好邻邦，从而达成令狐之盟。但刚刚结盟不久，你们就

背弃盟约。你们一面对我们晋国说：'白狄是我秦国的仇敌，希望秦、晋联合攻击它！'白狄与我们晋国是婚盟国家，但考虑到晋、秦刚刚缔结的令狐之盟，还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然而，你们却立即跑到白狄那里对他们说：'晋国要发兵进攻你们了！'白狄厌恶你们挑拨离间，把一切都告诉了晋国。楚国也派人对晋国说：'秦国违背同贵国的盟约，要求同楚国结盟，并且发誓说，秦与晋结盟完全是权宜之计。'各国诸侯闻听你们的言行，莫不为秦国的重利轻义面痛心疾首，因此纷纷背离你们而与晋国接近。现在，诸侯兴师要来讨伐你们秦国，如果你们考虑到这一现实又能体恤晋国，晋国愿意再次同秦国结盟，言归于好；如果不肯结盟的话，恐怕诸侯的军队不会答应，晋国也就无能为力了。特前来奉告，请你们自择何去何从！"

秦国不肯轻易服输，晋国于是兴师讨伐。晋国的栾书统帅中军，荀庚为副帅；士燮率领上军，郤锜为副帅；韩厥率领下军，荀䓨为副帅；赵旃率领新军，郤至为副帅。晋厉公亲自随军出征，由郤毅御车，栾铖为车右。晋军上下一心，斗志昂扬。同年五月初四，晋军协同各诸侯军队与秦军在秦国的麻隧（今陕西泾阳北）交战，结果秦军大败，晋军俘虏了秦国大夫成差、女父等，凯旋归国。

麻隧之战使秦国受到沉重打击，第二年秦桓公就忧郁而死。秦景公即位后，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不甘寂寞于西部边陲，于是派大夫士雃到楚国，准备约请楚国共同攻晋。楚共王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楚国大夫子囊劝告楚王说："目前我们还难以同晋国较量。晋悼公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严格推行既定的国策。晋国的卿肯于让贤，大夫忠于职守，士努力教育百姓，庶人致力于农业生产，工商业者安于本分，不想改变职业。韩厥告老，知䓨继承他执掌国政；范匄比中行偃年轻，中行偃却让贤给他，由自己辅佐中军；如此等等，不可胜计。目前的晋国精诚团结，国君

清明，大臣忠诚，百姓勤勉。在这种场合，晋国是不能战胜的，请陛下慎重考虑，不要答应秦人的请求。”楚共王听了子囊的话觉得有理，但考虑到已经答应秦国，不能出尔反尔，便说：“既然已经答应，就酌情去做吧！”楚共王把军队派驻武城（今河南南阳北）以策应秦国军队。秦国军队侵袭晋国。当时晋国正闹饥荒，因而没有回击秦军。

第二年，晋国派荀罃率军攻打秦国，以报复秦国的侵扰。秦国也不甘示弱，随后派遣庶长[①]鲍和庶长武率兵袭击晋国。晋国派士鲂率军迎击。士鲂认为秦军人少不堪一击，没有多加戒备。结果，遭秦国两军夹击，惨败于栎地。秦国为了联合楚国，两国缔结婚约，秦嬴嫁到楚国，楚国的国君派司马子庚到秦国回访。

晋悼公十四年，晋国为了报栎之战失败的仇恨，联合中原各国诸侯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伐秦活动。晋悼公并没有亲自出征，只是派六卿率领诸侯联军向西进发。当大军开抵泾水时，诸侯的军队不肯渡河。晋国大夫叔向来找鲁国的叔孙穆子，穆子吟诵《诗经·匏有苦叶》一诗：

> 葫芦叶苦难入口，
> 遇水渡河可作舟；
> 别人渡河我不予，
> 只为等待那朋友。

赋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鲁国虽无大用，但还是会同舟共济的。叔向回去准备好船只，让鲁国和莒国的军队先渡河。郑国的司马子蟜对卫国的北宫懿子说：“各国军队共同讨伐秦国，自己没有既定主张怎么能行？又怎能对得起国家？”两人随后会见诸军首领，劝大家赶紧渡过泾水。联军过河后，就屯驻在河的沿岸。

秦人见诸侯联军驻扎在泾水沿岸，就在上游向河中投毒。联

① 庶长：秦国官爵名，春秋初年已经设置，多见于武将。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又把庶长分为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大庶长四等。

军毫无防备，很多人中毒死亡。郑军统帅不顾别国，一马当先地前进，其他诸侯军随从而后。大军抵达秦国的棫林（今陕西泾阳），秦国仍不求和。晋军统帅荀偃下令："明日清晨鸡叫起床，堵塞水井，毁掉炉灶，要同秦军决一死战！是进是退看我战马的方向行事。"

栾厌有些不服气，说道："晋国从来没有这样下达军令，恐怕我的马头要朝东了！"说完竟自作主张撤兵而归。栾厌是下军统帅，整个下军就随他撤走了。左史对魏绛说："难道将军也不等荀元帅吗？"魏绛回答："荀元帅吩咐大家服从各自统帅的命令，栾厌是我的统帅，我应该服从栾厌，这也就等于服从荀元帅的命令。"眼见部队四分五裂各自行事，荀偃后悔地说："我的号令确实不妥，后悔也来不及了，白白送给秦国一次胜利的机会。"随即下令全军撤回。人们把这次战役讽刺为"迁延之役"。

晋将栾针愤怒地说："兴师动众为报仇而来，就这样乱糟糟地撤回去，这是晋国的耻辱。我们栾家有两位将领从军，同样难以忍受这屈辱！"说完，便同士鞅一同冲入敌军。栾针战死，士鞅逃了回来。栾厌警告士匄说："你儿子硬拉我弟弟去冲杀，我弟弟战死，你的儿子却逃回，难道不是你儿子有意害死我弟弟吗！如果你不把士鞅赶走，我就杀了他！"士鞅闻讯，仓皇逃往秦国。

士鞅到了秦国，秦景公问他："你看晋国的大夫中哪一家先灭亡？"士鞅回答："大概是栾氏吧！"秦景公问："是不是因为他太骄纵了呢？"士鞅回答："确是如此。不过栾厌虽然骄横无度，他还不至于被别人杀死，因为他的先辈栾书的政绩还留在人们心中，就如同周人怀念召公，甚至爱惜召公休息于其下的甘棠树一样。到了栾厌的儿子栾盈的时候，祖先的恩德逐渐淡化，自己又不得人心，人们回想起当年栾厌的罪恶，就会把怨恨发泄在他儿子身上。到那时，栾氏就要遭灭门之祸了。"秦景公觉得士鞅很清明，就替他向晋国求情，使他回到晋国。

迁延之役的第二年，晋悼公去世。晋平公即位为君。这一时期晋、秦两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先后两次订立和约。第一次晋国派韩起到秦国，秦景公的弟弟铜到晋国，双方约和，总算达成表面上的停战。第二次是在晋平公十一年（前547）春天，秦景公派弟弟针前往晋国订约。晋国大夫叔向准备派行人（外交官）子员出使秦国。子朱争执说："我也任职行人，为什么只派他，不派我去？"再三请求，叔向都不同意。子朱非常气愤，提着剑去追叔向，叔向断然拒绝他说："几十年来，晋、秦两国战火不断，生灵涂炭。如今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万一事情弄糟，三军将士又要暴尸沙场。子员办事谨慎有礼节，而你却很鲁莽，我因此不派你去！"说完，拂袖而去。秦、晋两国终于达成了友好协约。

自晋灵公到晋平公的半个多世纪时间，晋、秦两国亦战亦和，双方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也没有一刻真正的和平。清人马骕评论说："这一时期秦国闭关自守，不与中原地区的国家争战，是在积蓄国力，养精蓄锐，有宏图远略。秦能吞并天下统一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鲁宣公元年至襄公二十六年

《国语·晋语》

《史记·晋世家》

马骕：《绎史》卷六十。

鄢陵之战

战争从来都是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厮杀，谁曾听说过在战场上讲斯文、给敌人送酒喝的事？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鄢陵之战中就出现了这样罕见的场面。

春秋中期形成了以晋国为轴心的复杂国际形势，晋国西击秦，东抗齐，但主要的目标还是对抗南方的楚国。当时，中原地区形成了以晋国为盟主的军事同盟，南方形成以楚国为盟主的军事同盟，彼此相互抗衡。晋景公即位初年，在邲之战中楚国击败晋国，晋军伤亡惨重，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

晋景公十六年（前584），楚国派子重率军袭击晋国的盟友郑国，大军直抵汜地（今河南襄城）。诸侯闻讯立即发兵援助郑国，将楚军包围。郑军俘虏了楚将钟仪，把钟仪作为战俘押送到晋国。晋国人把钟仪囚禁在一个军用仓库里。

一次，晋景公到军用仓库去视察，无意中遇到钟仪，就问有关人员："那个戴着南方帽子而被关押的人是谁？"官吏回答说："那人是郑国送来的楚国俘虏，名字叫钟仪。"晋景公命人立即放开钟仪，并亲自召见慰问他。事出意料之外，使得钟仪诚惶诚恐，再三叩头谢恩。晋景公问他的家族做什么官，他回答："乐师。"景公饶有兴致地问："你能演奏乐曲吗？"钟仪毕恭毕敬地回答："这是我们家族的职责，怎敢荒废。"景公命人取来琴让钟仪演奏，钟仪弹起了楚国的音乐。景公问他："你们的国君怎么样？"钟仪拒绝加以评论，说："这不是小臣随便能议论的。"景公再三追问，他

才闪烁其辞地回答："当我们共王是太子的时候，受师、保的教导，每天早晨向太师婴齐求教，晚上向太保侧求教。我就知这些，别无所知。"

事后，晋景公把钟仪的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对景公说："钟仪是位君子呀！奉守先辈的职业，演奏的是家乡的乐曲，对国君忠诚不贰。钟仪具有忠信仁义的品格，能够促成大事，陛下何不把他放回楚国，让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友好？"晋景公听从了范文子的建议，对钟仪备加礼遇，然后送他回楚国，向楚共王转达晋国的和平诚意。晋景公十八年十二月，楚共王派子辰到晋国，回复晋国的和平要求，双方缔结友好条约。

第二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伐为特使到楚国，作为楚国派人来结盟的回报。这样，长期以来的楚、晋相争局面有了转机。宋国的大夫华元与楚国令尹子重有交往，又同晋国的栾武子友善，听到晋、楚两国愿意和平，便穿梭往来于晋、楚之间，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和解。晋厉公二年五月，受华元之约，范文子代表晋国，公子罢、许偃代表楚国，双方到宋国都城的西门之外缔约。条约规定："自缔约之日起，签约双方将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两国将统一志向，帮助危难的国家，救济小国和弱国。两国结成军事同盟，对其中任何一方的侵犯，都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犯，两国将共同予以抵抗。谁违背此盟约，将遭神灵的惩罚，使其军队战败，国家遭殃。"楚、晋结盟，这是两国关系中近百年来的新气象，使当时出现了暂时的国际和平新秩序。

晋厉公派郤至到楚国访问，楚共王设隆重的礼节招待，悬挂起全套的乐器演奏音乐。郤至由子反陪同，准备走进大殿，忽听到钟乐声吃了一惊，立即退了出去。子反着急地说："时间已经不早，陛下正在等候，赶快进殿吧！"郤至回答："贵国陛下对小臣礼遇有加，小臣不胜荣幸。不过，万一上天赐福，我们两国君主相见，还能用什么更高级的礼乐呢？我实在不敢当。"子反毫不在

乎地说："万一两国君主相会，我看用一枝箭彼此相赠就可以了，还演奏什么音乐！你不要犹豫了，进去就是了！"郤至不安地说："你此话有些不妥。用箭为见面礼，这是祸中之祸，万万不可取！你的话是动乱之道，实不可取。不过，我是客人，客随主便，依从你们安排便是。"随后入殿会见了楚共王。回到晋国后，郤至把这经过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说："楚乃蛮夷之国，不讲礼义，说话不算数，说不定哪天就要爆发战争了。"

楚共王也派公子罢到晋国访问，晋国同样依礼予以款待，双方再次重申盟约。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晋、楚结盟的第三年，楚国就背弃盟约向郑国和卫国发动战争。楚共王召集群臣商议此事，子囊劝阻说："刚同晋国结盟两年就弃盟，这怎么合适呢？"子反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利益就是一切，对我们有利的就可以做！"楚共王听从了子反的意见，决定发动战争。楚国的申叔时已经年老，居住在他的封地申邑，听到要发动战争，气愤地说："子反总有一天要遭殃！信用和礼法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他把这些都抛弃，早晚要众叛亲离！"

楚国军队首先侵略郑国，一直攻到暴隧（今河南原阳西）；随后转而攻卫，攻至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晋人听到楚国进攻郑、卫两国的消息，立即商议对策。栾武子要求立即出兵，讨伐楚国的背信弃义行为，韩献子阻止说："楚人背信弃义自会人心叛离，人民不听从，他们自然就穷途末路了。姑且不要理睬，让他们自取灭亡！"晋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见晋国没有反应，楚人变换了策略。晋厉公六年春天，楚共王派公子成到郑国，将汝水北岸的田地送给郑国，要求同郑国结盟。郑国在军事上敌不住楚国，见楚国采取友好的姿态，也就依从了楚国。从楚就是叛晋。郑穆公的儿子公子驷到武城（今河南信阳东北），同楚共王举行了盟誓。

楚国把郑国拉拢过去，晋人再也沉不住气了。晋厉公准备出兵，范文子仍然阻拦说："等到诸侯都叛离了楚国，我们再大肆挞伐楚国，那将顺合人心，不费任何力量。因为郑国背叛了我们，我们去进攻郑国，这恐怕不太合适。"栾武子再也按捺不住怒火，说："决不能在我执政的时候使晋国失去诸侯，所以我一定要进攻郑国！"于是，晋厉公下令伐郑。栾武子为中军元帅，范文子为副帅；郤锜率领上军，荀偃为副帅；韩厥率领下军，郤至为副帅。决定出兵后，晋国又派人到各诸侯国寻求武力支持。郤犨先到卫国，随后到了齐国。栾厌到了鲁国，鲁国大夫孟献子说："此战晋国准能打胜。"

四月十二日，晋国大举发兵。郑国得到晋国发动进攻的消息，赶紧派人向楚国告急。楚共王见晋人终于忍不住而动手了，正中他的愿望，马上派子反率领中军，子重率领左军，子辛率领右军，星夜兼程赴郑。楚军路过申邑时，子反问申叔时："依阁下看，这次战争胜败如何？"申叔时正色回答："道德、刑法、祭祀、礼制、信义，这些都是战争的重要条件。如今楚国对内遗弃人民，对外得罪诸侯，撕毁同各国订立的盟约。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失去人民的支持，外边有诸侯的挞伐，我真为楚国的前途担忧。但愿你能好自为之，恐怕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向楚国求援的姚句耳回到郑国，子驷问楚国情况如何，他回答说："楚军行军迅速，但经过险要地区时却不加戒备，纪律松弛。行军疾速反映出内心慌张，纪律松弛反映军纪荒废。内心慌张而又无军纪，怎么能够打胜仗？楚军恐怕靠不住。"

同年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到楚国军队已经开来，范文子想退兵，说："我们不如撤军，这样可使晋国免除忧患。至于大会诸侯建立霸业，并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让给未来的贤者去做吧，我只要能同大家和睦相处侍奉好国君也就心满意足了。"栾武子大怒道："临阵逃脱，有损国威，不行！"同年六月，晋、楚两军相

持于鄢陵。范文子还是不想战，郤至对他说："自惠公以来，我们晋国已经蒙受了许多屈辱，韩原之战、箕之战、邲之战难道就忘记了吗？如今再躲避楚军，晋国还有什么面目去会合诸侯？"范文子强作解释说："我们先君时代的战争都是有原因的，那时秦、楚、齐各国都很强盛，假如不励精图治，晋国就不能立足。如今情形已然不同，只剩下一个强楚。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只有圣人才能实现天下太平。我们都不是圣人，为什么不留下外患以抑制内忧呢？"

六月三十日清晨，楚军在晋军营垒附近列好军阵，等待决战，晋军将士见楚军来势汹汹有些紧张。范文子的儿子范匄走上前说："我们应该马上填井毁灶，在营垒中摆好军阵，准备同敌军决战。晋、楚两军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天意，有什么可害怕的！"范文子拿起戈追打范匄说："什么是天意？你无知童子懂得什么？"栾武子说："楚军士气浮躁，只要我们守住营垒，严阵以待，三天之后楚军必然撤退。当楚军撤退的时候，我军再下令出击，准能大获全胜。"郤至提议立即开战，他说："眼下楚军有六个弱点，这是我军的战机，不能放过。他们的两位卿子反和子重之间意见分歧，楚王的亲兵都是从旧家族中选任，郑国军队的阵势杂乱不整，楚军摆阵没避开忌讳的时日，士兵在阵中喧嚣不已，各军之间左顾右盼没有作战意志。所以，我们一定会获胜！"

楚共王登上楼车观望晋军，子重派太宰伯州犁侍立在楚共王身后。楚共王观望着晋军阵地的情形说："晋军的战车在向左右驰骋，干什么？"伯州犁说："这是在召集军官开会。""都集中到中军了。"伯州犁说："这是商议战略战术。""帐幕揭开了。"伯州犁说："这是在祖先的神主前占卜。""撤掉帐幕了。"伯州犁说："这日将要发布命令。""喧闹得很厉害，而且尘土飞扬。"伯州犁说："这是打算填井平灶摆列军阵。""都上了战车，将帅都拿着武器下了车。"伯州犁说："这是在听取军令。""他们将要作战吗？"伯州

犁说："目前还不知道。""将帅上战车后，又跳了下来。"伯州犁说："这是作战前的祈祷。"伯州犁把晋厉公亲兵的情况报告给楚共王。

在晋军的中军，晋国的军师苗贲皇在晋厉公的身旁，也把楚王亲兵的情况告诉了晋君。晋军的很多将领都说："楚国那里有智囊伯州犁，而且中军坚牢，恐怕我们抵挡不住。"苗贲皇为晋厉公献计说："楚国的精兵集中在中军，我军应把精锐部队放在两翼，攻击他们的薄弱部位，而把非精锐力量都集中对付敌人的中军，两翼溃散，敌军必定会败。"晋厉公让太史占筮，太史占筮后说："吉利。得到《复》卦，卦辞说：'南方的国家局促不堪，用箭射它的国君，会射中眼睛。'国家局促，国君受伤，不失败还等什么？"晋厉公随即下令开战。

晋军阵前一片泥沼，晋军绕道左右避行。步毅为厉公御马，栾针为车右。彭名为楚共王御马，潘党为车右。石首为郑成公御马，唐苟为车右。栾、范两族的力量拥卫在晋厉公两侧。当厉公的战车陷在泥沼中时，栾武子想让厉公乘自己的战车，他儿子栾针说："你不要管这些！你是国家元帅，身负重任，怎能擅离职守做士兵的事情！何况你侵犯别人的职责，失掉自己的职守，远离部下，触犯了三条军纪。"栾针用力掀起厉公的战车摆脱泥沼，又继续向前进军。

潘尪的儿子潘党和养由基是神射手，他们二人把皮甲重叠七层，然后拉弓劲射，都射穿了。他们把皮甲拿给楚共王夸示说："陛下有我们这样的神射手，不必担心战争打不胜。"可是楚共王却发怒说："一味夸耀武力是国家的耻辱，明日作战你们还这样不小心，将会死在这武艺上！"

晋将吕锜梦见射月，一箭便射中了，自己却陷进了泥沼。醒后便占卜，卜师说："姬姓是日，异姓是月，射中月亮就是射中楚共王。然后你自己掉入泥沼，预示着你会死亡。"战争开始后，吕

锜一箭果然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共王喊来养由基，交给他两枝箭说："把射我的人射死！"养由基接过箭，拉弓瞄准，只听嗖的一声，正中吕锜的咽喉，当即毙命。养由基把剩下的那枝箭还给共王，说："一枝箭足够了！"

在战火纷飞的沙场上，晋将郤至三次与楚共王遭遇。每次迎面遇到楚共王的战车，郤至都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小步向前疾跑。楚共王派工尹襄送上一把弓以示答谢，说："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有位穿红色皮军服的将领是位君子，每当遇到我都摘盔下车，难道负伤了吗？"工尹襄来到郤至跟前，郤至再次摘下头盔接过弓，回答楚共王说："尊贵的楚王陛下，小臣郤至跟随晋君作战，托陛下的洪福，由于甲胄在身不能行君臣大礼。谨向陛下报告丝毫也没受伤，感谢陛下的赏赐。由于身处战场，只得向使者叩拜。"然后叩拜了三次才退走。

晋将韩厥追击郑成公，车夫杜溷罗对韩厥说："赶快追击郑伯，他的车夫屡次回头看，可见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马上，我们一定可以追上。"韩厥却说："我曾经羞辱过一次齐侯，这次可不能再羞辱郑伯了。"遂下令停止追击。当时，郤至的战车在向前飞奔，车右茀翰胡对他说："赶快派轻车从小道迎击，我们从后面赶上就能把郑伯捉住。"郤至也说："无缘无故地俘虏伤害国君要受罚的。"下令停止追击郑成公。车夫石首对郑成公说："从前卫懿公同狄国作战，只因不肯拔下帅旗才导致失败的。"郑成公于是拔下帅旗放入袋中。车右唐苟对石首说："我们保卫国君责任重大。你留在国君身边，我下车拦击追兵，掩护国君快走。"随后唐苟奋力截击战死在那里。

战争的形势对楚军越来越不利，楚军开始败退，被困在一个险恶的地方。楚大夫叔山冉对养由基说："虽然国君有令不得乱射，但如今到了这种地步，你也该拼射一番了。"养由基抓起弓箭，稍作瞄准，一连几箭射出，箭无虚发，晋兵应声而倒。叔山冉徒手

与晋兵格斗，抓起受伤的晋兵向晋军的战车掷去，把战车前面的横木都砸断了。晋军受到这二人的拼力反击，只得停止进攻。

栾针看到楚帅子重的军旗，请求晋厉公说："楚军的那面军旗是子重的旗帜，那可能就是子重了。从前臣出使楚国，子重问晋国军队的威武和勇猛表现在哪些方面，臣回答：'军容整齐，按部就班。'子重问还有什么，臣又回答：'从容不迫。'现在晋、楚两国交兵，不向楚军派遣使者，不能算按部就班；事到临头而说话不算，不能叫从容不迫。恳请陛下准许我给子重进酒。"晋厉公批准，栾针派人给子重送去一杯酒，对子重说："我们国君帐下无人，让栾针在身旁侍卫，所以他无法前来，特派小臣前来敬酒，请阁下赏光！"子重笑道："栾针在楚国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从容不迫，一定是这个原因才送酒来的吧？他的记忆力还真不错。"说完，一饮而尽，接着擂起战鼓再战。从清晨一直厮杀到黄昏，战争还没有结束。

当天夜里，楚帅子反命令官吏视察伤亡情况，补充兵员，修缮盔甲武器，列好战车马匹，鸡叫的时候开饭，听主帅的命令发动进攻。当时士卒已经疲惫不堪，晋军听到楚军准备拼死作战，有些人内心紧张。晋将苗贲皇通告全军说："检查战车，补充士卒，喂好马匹，磨快武器，吃饱喝足，一定要把楚军消灭！"随后故意让楚军的俘虏逃走。

楚军俘虏逃回后，报告了晋军准备死战的情况。楚共王听完汇报，立即召子反商议对策。可是，当天夜里子反饮酒过量，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进见。楚共王叹息道："这是上天要让我楚国失败呀！我不能再等下去了。"立即下令全军连夜逃走。

晋军得悉楚军窜逃，也不追赶，大军开进楚军的营垒，缴获了大量军械物资，楚军遗留下的粮食吃了三天都没吃光。范文子站在晋厉公车马的前面，说："陛下年轻，群臣不才，取胜之后更要加倍警惕才是！《尚书》中说：'天命并非恒久不变。'只有具备

高尚德行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永远佑助。"

楚军大败而归，楚共王把战败的罪责都加在了子反的头上，派人告诉子反说："城濮之战我军战败，那时成王不在军中，是子玉的责任，应由他负责；这次鄢陵战败，寡人亲自在军中，是寡人的罪过，没有你的责任！"子反自知共王此话的含义，叩头谢罪说："君王赐为臣一死，为臣不敢不死，死而不朽。为臣的部下的确败逃，这是我的罪过。"子重见国君加罪子反，便施加压力说："当初子玉兵败之后的结局你也知道，你也该考虑自己的结局了！"子反回复子重说："即使没有子玉自杀的先例，阁下命令我自杀，我也不敢贪生害义。是我使国君的军队战败，我当然不再苟且贪生！"楚共王闻听子反要自杀，有些不忍，立即派人去阻止。使者还没赶到，子反已自杀身亡。

鄢陵之战洗掉了晋人邲之战败于楚国的耻辱，重振了晋国作为华夏大国的信心，开创了晋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局面。不久的晋悼公复霸，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功业。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成公七年至十六年

《国语·晋语》

《史记·晋世家》

巫臣助吴

吴是春秋中期以后逐渐兴起的一个国家。吴国位于当时的东南方，地理位置占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

传说，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能，又有一位圣明的儿子姬昌。太王想让季历继承君位，以便将来使姬昌执掌周人的国政。太伯、仲雍了解父亲的心意，因此二人就一起逃到南方的蛮族地区，在身上刺上花纹，剃去了头发，以表示自己不能在宗庙主持祭祀，来避让弟弟季历。季历即位后，别人称他叫王季。王季去世后，儿子姬昌即位，他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周文王。太伯逃到南方，最后定居在吴地。当地的蛮族人认为太伯很文明，有高尚的德行，有一千多家前来归服于他，拥立他为吴太伯。

从太伯建立吴国，传了五代，武王消灭了商朝。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寻找太伯和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当时周章已是吴地的君长，因此就封他于吴。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周室北边从前的夏虚之地，是为虞国。吴国和虞国都列为诸侯。

大约又传了十二代，晋献公借道于虞以伐虢，消灭了虢以后，顺便又灭掉了虞国。虞国灭亡后，吴国又传了两代，当时的国君是寿梦，吴国逐渐兴起。从太伯到寿梦共传了十九代。

吴国的兴起和强盛同申公巫臣教吴国人使用战车、摆列战阵训练军队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申公巫臣要使吴国强大起来呢？这

里面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早年，陈国发生了夏征舒杀死国君的内乱，楚国趁机出兵陈国，杀死了夏征舒。夏征舒的母亲是当时的绝世美女，使得当时无数的贵族公子垂涎三尺。陈国的这次内乱，她有直接责任。楚庄王平定了陈国内乱，把夏姬带到楚国，想纳夏姬为夫人。楚国大夫申公巫臣见到夏姬的天姿，早已神魂颠倒，想把夏姬弄到自己手中。听到国君要纳夏姬，急忙出来阻挡，一本正经地说："陛下千万不要这样！陛下召集诸侯讨伐陈国，是为了惩罚有罪的人。如今想招纳夏姬为妃，诸侯们会认为原来陛下伐陈是贪于夏姬的美色，是为了私欲，今后还怎样号令诸侯，取信于人！而且，贪色是淫乱，淫乱是不可宽恕的大罪过。《尚书》中说：'要修养品德，谨慎刑罚。'文王之所以能创立周人的天下，是他修养品德一心推行德政，小心刑罚而慎于行事。陛下号令诸侯，却贪于美色放纵淫欲，就算不得有品德和行德政；自己不慎于刑罚而犯下大罪，也就算不得慎罚了！"楚庄王还算得上一位有霸业胸怀的明君，觉得申公巫臣此番言论有理，就立刻打消了寻欢作乐的念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楚国大夫子反也迷于夏姬的姿色，一心想要娶她。申公巫臣又出来制止："夏姬是邪恶祸水，走到哪里，哪里就遭殃。她的哥哥郑灵公夭寿而死，她的丈夫御叔也被她克死，勾引陈灵公使陈灵公被杀，她儿子夏征舒也因她身亡，陈国大夫孔宁和仪行父也因她逃亡国外，甚至陈国几乎亡在她的手中。你怎不冷静地想想，这该是一个多么不吉祥的妖妇！人生在世，只有性命诚为宝贵，谁不愿意福寿延年？天下美女何处不有，何必娶此妖妇，我真心劝你冷静地想一想。"迎头一盆冷水把子反浇得凉了半截，申公巫臣的污言秽语更使他对夏姬的兴趣索然，遂打消了纳娶夏姬的念头。

不久，楚庄王把夏姬送给了连尹襄老。说也凑巧，在楚晋两国的邲之战中，连尹襄老战死沙场，而且连尸体都没找到。连尹

襄老的儿子黑要早已色心难捺，见他父亲死了，立即把夏姬据为己有。

申公巫臣再也忍受不了欲望的煎熬，派人引诱夏姬说："黑要算得什么猪狗东西，简直令人作呕。你何不回到郑国，会有豪门公子娶你。"同时，申公巫臣又派人假装从郑国回来，对夏姬说："连尹襄老的尸体可以得到，不过必须由你到郑国去迎灵。"夏姬把这些事报告了楚庄王，楚庄王征询申公巫臣的意见，申公巫臣立即回答："我看此事可信。知罃的父亲荀首是晋成公的宠臣，同时又是荀林父的弟弟，他最近被任命为中军副帅，一向跟郑皇戌关系亲密。邲之战，我们俘虏了知罃，荀首很爱这个儿子，必是想通过郑皇戌作中间人，用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的尸体交换知罃。郑人不敢得罪晋国，必会照晋人的吩咐办，这事我们可以先让夏姬去把连尹襄老的尸体弄回。"于是，楚庄王让夏姬回她的母家郑国。临行时，夏姬有意对送行的人们说："找不到连尹襄老的尸体，我决不回来！"

夏姬回到郑国，自然弄不回连尹襄老的尸体，也就没有回楚国。这时，申公巫臣秘密派人到郑国，向夏姬求婚，郑襄公答应了这桩婚姻。楚共王即位，准备在阳桥攻打鲁国，派申公巫臣出使齐国，通知齐国出兵攻鲁的日期。申公巫臣携带家眷和全部家财而行，半途遇上了申叔时父子到郢都去。申叔时知其所图，便对他说："真奇怪呀！阁下奔赴战争使命，本该紧张恐惧，可你却喜形于色，莫不是交上了桃花运，要拐走髡人的老婆吧！"

走出楚国边境，申公巫臣不再去齐国，立即奔往郑国夏姬那里，派人把将要送给齐国的礼品还给楚共王。找到夏姬后，本想带夏姬到齐国，可是齐军刚刚战败，就对同行的人们说："不能寄居在战败的国家，靠不住。"于是，带着家眷到了晋国，由郤克的儿子郤至推荐做了晋国的大夫，封于邢地。

申公巫臣丢弃使命私自奔逃，国内舆论哗然。子反得知申公

巫臣夺走夏姬，使当初自己的美梦落空，更是怒不可遏。他觐见楚共王说："我们应该用重金贿赂晋国，不让申公巫臣在晋国立足！"楚共王思索了一下说："算了吧！他这次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他在先君的时候忠心耿耿，立过功劳。忠诚于先君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他对晋国有用，我们即使送去重礼，晋人还是要用他；如果他对于晋国无用，晋国自然不会留用他，用不着我们祈求晋国把他赶走。"

子反同申公巫臣的矛盾还有另一个原因。楚国讨伐陈国几年后，楚国攻伐宋国。在这次战役中，子反立下了功劳。回国后，子反请求楚庄王把申邑和吕邑（都在今河南南阳）的部分土地封给自己，楚庄王答应了。然而，申公巫臣从中作梗，说："没有这些土地，申、吕两邑就失去了依靠，无法征取军赋以巩固北方边防。没有申、吕二邑，晋国和郑国就会平川直下，一直攻到汉水。"结果，楚庄王没有给子反封地。现在，申公巫臣又夺走了夏姬，新仇旧恨使子反忍无可忍。子反最终鼓动楚共王同意，大肆屠杀申公巫臣的族人子阎和子荡，以及清尹弗忌、连尹襄老的儿子黑要，并且吞并了他们的家产。

申公巫臣在晋国闻此凶讯，非常痛心，发誓一定要报此仇。他写信给子反、子重二人说："你们用贪婪和邪恶事奉国君，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我一定要让你们不得好死！"不久，申公巫臣请求出使吴国，晋景公答应了。到了吴国后，申公巫臣千方百计地讨好吴王寿梦，吴王很喜欢他。经过申公巫臣的努力，吴国和晋国结成了亲密的关系。申公巫臣从晋国带到吴国三十辆战车，训练吴军使用战车，教吴人如何排列军阵，并且送给吴军射箭手和御手。经过申公巫臣的一番努力，吴军的作战能力迅速提高。申公巫臣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吴国，吴王寿梦让他担任外交官。吴国逐渐强大起来，便开始向周边国家扩张，开始进攻楚国的东部边境，以及巢国（今安徽巢县东北）和徐国（今安徽泗县西北）。

楚国召集马陵之会的时候，吴国又乘机进攻州来。当时，子反和子重在楚国执政，吴国不断攻击楚国和楚国的盟国，使子反和子重极伤脑筋，不得安宁。至此，吴国开始强盛，并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通使往来。

吴王寿梦十年（前576），中原霸主晋国约合诸侯会盟，吴国派特使赶到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参加盟会，这是吴国正式加入诸侯国的行列。

吴国不断骚扰，使楚这个南方强国十分恼火。吴王寿梦十六年，楚国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由子重亲自统帅攻伐吴国。楚军一举攻下吴国的鸠兹（今安徽芜湖东南），随后大军直抵衡山。子重派邓廖率领一支穿组甲的车兵三百人、穿练甲的徒兵三千人组成的装甲部队攻袭吴国首都。不料遭吴军伏击，邓廖被俘虏，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车兵八十人、练甲兵三百人侥幸逃回。

楚军伐吴失败，子重带兵回国后却用了三天时间庆功贺胜。没等楚军喘息，吴国军队便出击楚国，攻占了驾邑（今安徽无为境内）。驾邑是楚国的大城，邓廖也是楚国的大将，丢城折将，楚人对子重很不满。人们纷纷议论说："子重这次攻伐吴国，取得的胜利还不如失败多。"听到这些讥讽和议论，子重心情郁闷，后来竟然患精神病死亡。

就在吴、楚两国激战的这年，晋国召集诸侯在鸡泽（今河北邯郸东）会盟，并派大夫荀会到淮上（淮水北）迎接吴王寿梦。由于战事紧张，所以吴王未得脱身与会。吴王寿梦十八年，寿梦派遣大夫寿越到晋国，解释没有参加鸡泽之会的缘故，并带去礼品表示敬意。同时表示了想会见诸侯的愿望。晋悼公打算为吴王约合诸侯，先让鲁、卫两国约会吴国，并商定会盟的日期。所以，鲁国大夫孟献子和卫国大夫孙文子在善道会见了吴国大夫。

吴王寿梦二十三年，寿梦终于在相地（今江苏邳县加口）会见了中原各国诸侯。这次会盟规模较大，晋悼公、鲁襄公、宋平

公、卫献公、曹成公、莒君、邾君、滕君、杞君、小邾君、齐国太子光共十二位国君参加了大会，吴王寿梦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成公二年至襄公十年

《史记·吴太伯世家》

季札让国

自古以来，人们争权夺势，纷争不已。尤其是为了取得国君宝座，享受那九五之尊、嫔妃之乐，兄弟相杀，君臣相篡。拱手把君位让给别人，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凤毛麟角。本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正是这一千古奇观。

吴王寿梦二十五年（前561），寿梦去世。寿梦共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札。季札自幼才思敏捷，有君子气度，不与人争，极受寿梦宠爱，寿梦有意把君位传给他，其他兄长也都认可。然而，寿梦去世后，季札无论如何也不肯即位为君，认为长子继承是国家的制度，不能破坏礼法，给国家带来动乱。在这种情况下，长兄诸樊代理国政，准备待国丧期满，再由季札即位为国君。

吴王诸樊元年（前560），国丧一年期满，诸樊佩服弟弟的才能和人品，自己不肯再主持国务，坚持让季札即位。季札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他说："当年曹国人都认为曹成公不守仁义，不能让他当国君，想拥立曹成公的庶兄子臧为君。然而，子臧却不肯为君，为了成全曹成公，他就逃离了曹国。君子认为子臧能恪守节义。如今我们的吴国，依照宗法应该长兄即位为君，任何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格，谁能出来冒犯礼法？我没有什么才能，担任国君也不是我的职分，我宁愿做子臧那样的仁义之士。"可是，吴国的人们坚决要拥立季札为君，季札迫不得已，抛弃了家室，躲到乡村去种田为生，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吴国的人们看他态度如此

坚定，万般无奈才改变主意，继续由诸樊为国君。

这时，楚共王去世。吴国人认为这是进攻楚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乘楚人国丧发动攻击。楚人毫不示弱，立即派养由基和子庚率领军队迎击。养由基同子庚商议说："吴军趁我们国丧而来，认为我们守丧期间不动兵戈，必然轻视我们而放松警惕。你设好伏兵，我前去迎击，然后迅速回撤，把敌人引诱入埋伏的军队中间。"子庚依从了养由基的策略。养由基把吴军引入庸浦（今安徽无为南），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军的公子党。

楚国的国丧完毕后，看到吴国竟敢乘楚国有难前来寻衅，决定报复吴国。楚康王派子囊在棠（今江苏六合北）集结军队，然后讨伐吴国。吴人看到楚军来势凶猛，干脆据守城池，避而不战。楚军对吴国无可奈何，只得撤军，由子囊率兵殿后。不料，吴国军队从皋舟的险要地带冷不防地拦腰袭击楚军，楚军前后难以救应，竟被吴军打得大败，公子宜谷作了吴军的俘虏。

皋舟之战后的十年时间内，吴、楚两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吴王诸樊十二年夏天，楚康王派出水军沿江河东下进攻吴国，企图捞取好处。但由于没有严肃的军纪，无功而还。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派遣水军作战的记录，当时人们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作"舟师之役"。这时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也不甘示弱，第二年十二月，诸樊亲自率军攻伐楚国，围攻巢邑（今安徽巢县），吴军昼夜不停地猛攻城门，守将巢牛臣说："吴国人性急而轻率，如果我们故意松开城门，诸樊必会带兵贸然向里冲，我们乘机用箭猛射，一定会要他的性命。诸樊丧命，我们边境地区可能会稍得安宁。"人们听从了他的意见，主动放松了城门的守卫。吴军冲向城门，牛臣藏在矮墙内拉弓瞄准诸樊射去，诸樊应声倒下，回到吴国不久就死去。

吴王诸樊临死前留下遗嘱，要把君位传给二弟余祭，以便顺着兄弟的顺序相传，一定要传国给季札为止。这是为了实现先君

寿梦的心愿，也是为了嘉奖季札让国的节义。他们兄弟几人也都想如此传位，最终使季札为国君。季札被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人称“延陵季子”。

吴王余祭三年（前545），齐相庆封有罪，从齐国逃到了吴国。吴王余祭把朱方封给庆封，作为他的采邑，并且把宗室公主嫁给他为妻，使得他比在齐国的时候更富有，初步显示了吴国的大国风度。吴王余祭四年[1]，余祭派遣季札出使鲁国。季札到了鲁国之后，请求欣赏保留下来的周人的音乐。鲁人先为季札歌咏《周南》、《召南》的诗章，季札听完之后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周朝的教化已经奠定了基础，可惜的是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虽然如此，人民已经能勤于王事而无怨言。”接着又为他歌咏《邶风》、《鄘风》、《卫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德化深远，人民虽然有忧患之思，可是并不至于达到困穷的境地。我听说卫康叔、武公有如此的德泽，那么这些应该是卫国的风诗了吧！人民虽然有忧患之思，可是心中并没有恐惧感，那么，这些应该是周王室东迁之后的诗歌了吧！”又为他歌咏《郑风》的诗章，季札听后评论说：“音节过于细琐，象征着郑国政令的苛细繁琐，人民怎么能够忍受得住呢？正因如此，郑国恐怕要先灭亡了！”又为他歌咏《齐风》的诗篇，季札议论说：“这些乐章真美呀！音节深宏高远，具有大国风范，象征着可以作为东部沿海各国的表率，这应该是姜太公的气度吧！可以看出齐国的远景实在不可限量。”又歌咏了《豳风》中的诗篇，季札评议说：“这些乐章真正优美！音节坦荡宽宏，象征着民情的欢快愉悦，同时又能适当节制，这些应该是周公东征时的诗篇吧！”又歌咏了《秦风》的诗篇，季札评论说：“这就是诸夏之声了吧！

---

①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吴王余祭四年）记载，吴国在进攻越国的时候，抓获一个俘虏，让他守城门，后来看守船只。这年夏天余祭检查船只，被此俘杀死，与《史记》不同。今从《史记》。

音节宽阔宏大，以至于宽宏到了极点，这些应该是周朝旧地的风诗了吧！”又为他歌咏了《魏风》的诗篇，季札高兴地说：“这些乐章真美啊！音律中正平和，象征着志向高远和态度委婉，俭约行事容易成功，如果能以美德来辅政的话，就可以成为英明的君主了！”随后歌唱的是《唐风》，季札感慨地说：“忧患之思不绝，这恐怕是陶唐（尧）的遗风了吧！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如此忧思深远呢！不是先圣的后代，有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随后歌唱的是《陈风》，季札鄙夷地说：“音乐放荡无所节制，象征着国家没有明君主政，这样的国家怎能传承久远！”《桧风》以后的诗歌，季札没有再作评论。

各国的“风”诗演奏完之后，鲁人又为季札歌唱了“小雅”。“风”是各国、各地的歌诗，反映了各地方的民风和政风。“小雅”是西周王室的诗歌，比起“风”诗显得典雅，故称“小雅”。“小雅”由很多诗篇组成，听完这些诗篇，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更加美妙了！音律中虽流溢出忧患之情，可是并无叛离之意；虽有怨恨之情，可是却不敢尽情倾吐。周德虽已逐渐衰微，但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啊！”

“小雅”完毕之后，又接着咏唱“大雅”。“大雅”是反映周朝建立之前，周人的先贤的功德和业绩的诗篇，比“小雅”更加古典。演唱完这些篇章，季札评论说：“音节宽宏和乐，表面上虽然曲折柔缓，可是其中却刚劲有力，这大概是文王的美德吧！”

“大雅”演奏完毕后，最后歌唱的是“颂”诗。“颂”是在庙堂祭祖时唱的颂扬先祖英明伟大的诗。演唱完这些诗篇后，季札感慨良久，说：“这些颂诗简直美妙无比了！音节虽然刚劲，但并不放肆；虽然委婉曲折，可是并不卑下靡弱；虽然紧密，可是并不局促狭隘；它又悠远疏朗，并不散漫游移；音律变幻多端，又不放荡不羁；虽然曲折反复，并不使人感到厌烦；虽然心怀哀思，可是并不忧惨愁伤；虽然欢快愉悦，并不过分逾度。乐调丰富多

采，变幻多端而无穷尽，犹如施物于人，但本身的东西并不见少；犹如向人索物，自身之物又不见增多；节奏均匀适度，没有偏轻偏重的弱点。有时音乐好像中止了，但实际上并没中断；有时声音好像流动不已，但实际上又非泛滥无归。五音协和，八律调适，节奏严整，相守不乱，象征着圣人德义的协同一致，真是尽善尽美、纯洁无疵啊！”

歌咏结束，鲁人又请季札观赏乐舞。季札观赏了《象箾》、《南籥》之舞后评论说：“舞姿优美，然而还感到美中不足。”又观赏了周武王的《大武》之舞，季札说：“舞姿真美，周人的盛德就是这样的吧！”观赏了商汤的《韶护》之舞，季札说：“很能表现、的恢宏之度，可是在德性上还有亏缺，真是圣人难当呀！”观赏了夏禹的《大夏》舞，季札说：“舞姿美得很，很能表现勤于民事而不居功自傲的胸怀，若不是大禹，谁能做到！”最后观看了虞舜的《招箾》之舞，季札动情地说：“伟大的德性善美至极，犹如上天无处不覆盖，犹如大地无物不负载。这样美好的品德，谁人能及！观赏乐舞至此，算是到了终极。即使再有其他什么舞乐，我也不会再欣赏下去了！”

季札离开鲁国，又出使到齐国。到齐国后见到了晏婴，劝晏婴说：“你最好赶快把封邑和职务交还给国君，没有封邑，不参与国政，你才能避免祸难。齐国的政权将要发生重大变故，在没有最终确定归属之前，祸患是不会止息的。”晏婴听从了季札的劝告，把封地和政职经过陈桓子交给齐国国君。后来，齐国爆发了栾施和高强的内乱，晏婴却安然无恙。

离开齐国后，又到了郑国。见到子产，二人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季札对子产说：“目前郑国的执政大夫荒淫无度，不久就会遭遇祸端，郑国的国政迟早要由你来执掌。你将来处理国务的时候，应该谨慎小心按照礼法办事。不然的话，郑国会有大难。”

离开郑国后，到了卫国。在卫国结识了公子朝、公子荆、公

叔发、史狗、史鰌等人，与这些人谈得很投机。季札说："卫国有这么多的君子，国家是不会有祸端的。"准备到晋国去，离开卫都，半途寄宿在孙文子的采邑戚地。听到孙文子鸣钟作乐，说道："孙文子的作法真叫人不可思议！不以德服人，却逞才强辩，这种人必会遭殃。现在卫献公大丧期间，停殡尚未安葬，他却在这里寻欢作乐，这会犯下大罪！现在已经危如累卵了！"第二天就离开戚邑而去。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孙文子，孙文子追悔莫及，从此终生不再听音乐了。

到了晋国，很喜欢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国政将来要落在这三家大夫手中了。"临别前对叔向说："你可要尽量努力呀！现在晋国的国君奢侈无度，国内又有很多贤能的大夫，他们实力雄厚，赢得民心，晋国的国政会被赵、韩、魏三家控制。你为人正直，不肯屈从别人，这正是你所应特别注意的呀！"

季札出使中原各国之初，曾经路过徐国，拜见了徐国君主。徐国的国君很喜爱季札的佩剑，但又不便说出口来。季札当时已看出此意，但由于使命在身，不得无剑，所以打算回来的时候把剑赠送给他。完成使命归来，再到徐国，那位国君已经逝世。于是，季札解下自己的宝剑，把它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然后才离开。随从的人们说："徐君已死，挂在这里岂不可惜了这柄宝剑？"季札回答："不然。当时我心里已经默许把这柄宝剑送给他，难道能因为他死了，我就违背自己默许的诺言吗？"

吴王余祭在位十七年后死去，三弟余昧即位。吴王余昧在位仅四年就逝世了。余昧临终前申明，要由弟弟季札即位为君。但季札硬是不肯，最后躲了起来。吴国的人们说："先王有遗嘱，哥哥死了，由弟弟即位为君，直到把君位传给季札。如今季札让位逃走，最后一位国君是余昧，就由他的儿子僚即位为君吧！"

吴王僚即位之后，公子阖闾深为不满。公子阖闾是吴王诸樊的儿子，他认为父亲兄弟四人，兄终弟及，应该按顺序传位给季

札。既然季札不肯即位，就应该重新由自己即位为君，怎么说也不应该有吴王僚的位置。他怀恨在心，暗中结交贤士，伺机杀死吴王僚夺回君位。这时，楚国大夫伍子胥逃难来到吴国，鼓动吴王僚伐楚，声称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公子阖闾说："伍子胥的哥哥、父亲都被楚人杀死，他只是想借机伐楚图报私仇，对吴国并没什么益处。"后来，伍子胥窥察出公子阖闾心藏异志，就寻来一个叫专诸的勇士，把专诸推荐给公子阖闾。阖闾见了专诸非常高兴，便以宾客之礼招待伍子胥。伍子胥退身乡野，等待专诸成就大事，自己涉足政坛。

吴王僚十二年（前 515）冬天，楚平王去世。十三年春天，吴王趁楚人国丧之机进攻楚国，派公子盖余、烛庸率军围攻楚国的边邑。同时，派季札出使晋国，以观察诸侯的反应。不料攻楚的吴军遭楚军伏击，断绝了归路。公子阖闾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告诉专诸说："这个大好机会决不能放过，现在不动手还等什么呢！我才是真正国君的后代，按宗法应该即位。我想趁此机杀掉僚，自己即位为君。将来季札回国，料想他不会夺我的君位。"专诸说："吴王僚的母亲已经年老，儿子幼小，两个兄弟领兵伐楚，又被困在那里，国内又没有人肯为他卖命，我们动手定能成功！"阖闾握住专诸的手说："我的命运就交给你了，一切都托付给你了！"

同年四月的一天，公子阖闾在地下室埋伏好了甲士，邀请吴王僚到家中饮酒。吴王僚也内心警惕，从王宫一直到阖闾家里，沿途、门户、席位处处布置了护卫人员，又有带剑的卫士在身旁时刻守卫。宴会刚刚开始，公子阖闾假装脚痛，进入地下室，派专诸在烤鱼中藏了匕首刺向僚，当场把吴王刺死。专诸当场也被吴王的卫兵杀死。

吴王僚被刺后，阖闾夺取君位，成为吴王。为了报答专诸，任命专诸的儿子为卿。这时季札回到国内，见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地说："如果能使先王的烟火不断，吴国人民能有国君，社稷神灵

得到祭祀，也只得由他即位为君了，我还能责怨谁呢？哀悼死者，事奉生者，听天由命吧！这祸乱并非由我引起，谁当国君我就顺从谁，这是先哲之道。”先到吴王僚的墓前汇报出使经过，哭祭了吴王。然后守候在自己的职任上，听从吴王阖闾的旨令。

在战国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季札的感人事迹，人们赞颂他的美德，钦佩他的明智。这些事迹保存在至今流传的许多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十二年至二十九年

《史记·吴太伯世家》

晋悼公复霸

晋悼公姓姬，名周，是晋襄公之孙惠伯的儿子。晋国自曲沃灭晋和骊姬作乱以来，为了避免国内公族内部夺权和篡杀，通常都把公子送到国外。姬周从小的时候就来到周王室，在单襄公职下谋事。姬周是一位正人君子，为人正派，慈善爱人，政治上有宏谋远略，时刻关注着晋国国内的势态。

单襄公临终前，把儿子单顷公叫到床前，嘱咐他说："你一定要善待姬周，他将来会得到晋国的。姬周具有十一种美德：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天六地五，合为十一，这是天数。经天纬地，这是恢宏气象。周文王以文得天下，姬周崇尚文德，在晋国公族中血统亲近，很有可能得到国家。我听说当年晋灵公被杀，晋成公回国为君，当时占筮得到了《乾》卦变为《否》卦，结果是'虽得晋国，三世而终'。晋成公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神灵在她儿子的臀部弄了块黑痣，说：'让他得到晋国，三代之后还给襄公的曾孙。'所以，他出生后称'黑臀'，到现在已经两代了。我还听说姬周做过梦说：'晋襄公的曾孙会得到晋国。'占卜得到的卦辞说：'晋国会三次从周王室迎立国君。'他的品德又有君主风度。上面三项完全吻合。《泰誓》中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说：'我做的梦与占卜完全一致、吉祥，必能灭商。'你应尽早与姬周搞好关系，以作后图。"单顷公点头应允。

晋厉公为国君后，日益腐败奢侈，身边聚集了一批阿谀奉迎之徒。鄢陵之战，晋国侥幸胜楚，晋厉公更加狂妄恣肆，想赶走

所有的卿大夫，任命那些受他宠信之徒。厉公的宠臣胥童因父亲胥克被郤缺罢免官职，对郤氏一族怀有刻骨仇恨。郤锜夺走了夷阳五的田亩，夷阳五也很受厉公宠信。郤犨与长鱼矫争夺土地，把长鱼矫逮捕，把他的父母妻子系在一根车辕上。不久后，长鱼矫也受到厉公的宠信。卿大夫栾书嫉恨郤至，因为郤至不听从自己的主意，结果击败楚军，使自己很尴尬，想要废除郤至。于是，让楚国的公子茷告诉晋厉公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把楚国军队召来的，他告诉楚人说东方各诸侯国的军队尚未赶到，晋军统帅也没有到齐，晋国军队一定会战败，晋军失败后好拥立姬周为国君。"厉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栾书，栾书佯作不知地说："难免有这样的事。不然，他怎么会冒着危险接见楚军的使者呢！陛下可以派他去成周，考察他同姬周的关系。"厉公采纳了栾书的主张，派郤至到天子那里去拜见，栾书暗中派人让姬周招待郤至。厉公派人伺探，情况与栾书预言一致，相信了栾书的话，非常痛恨郤至。

厉公带群臣外出打猎，他自己先猎取，然后饮酒，再让卿大夫们去猎捕。郤至猎得野猪前来奉献，太监孟张夺走野猪。郤至一怒之下射死孟张。晋厉公对别人说："郤至太欺负我了！"

晋厉公准备清除卿大夫。宠臣胥童说："一定要先除掉三郤，他们族大仇人多。除掉大族，陛下才不受胁迫；人们怨恨他们，杀他们容易成功。"郤氏一族听到此事，郤锜想发兵攻打厉公，说："纵然是死，也要死个鱼死网破！"郤至不同意，说："信用、明智、勇敢这三点是立身之本。讲信义，不能背叛国君；讲明智，不能伤害百姓；讲勇敢，不能发动祸乱。违背这三条，谁还亲近我们？我们死了，又使人们痛恨我们，岂不更糟！君主杀臣，谁也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有罪，死得已经晚了；如果我们无罪，国君会失去人心，他想不死，能办得到吗？还是听候处置吧！"

晋厉公七年（前574）十二月二十六日，胥童、夷阳五率领甲

士八百人准备围攻郤氏。长鱼矫请求不必兴师动众，只要清沸魋同他二人即可。他们二人衣襟相结，手执戈，装出一副打架争吵的样子，三郤为他们调解，长鱼矫乘机用戈刺死郤锜和郤犨。郤至这才说："冤枉而死不如逃走。"立即奔逃。然而为时已晚，长鱼矫追上他的车子，用戈将他刺死。郤氏三人的尸体被弄到朝廷上示众。

同时，胥童率领甲士在朝廷上劫持了栾书和中行偃，准备把他们也杀死。长鱼矫说："不杀这二人，国君将来会遭他们的祸难。"厉公却说："一天当中已经杀了三个国卿，我不忍心再杀下去了。"长鱼矫警告说："陛下对他们不忍心，他们将来对陛下会忍心的。国外的祸患是奸，国内的祸患叫轨。应该用德行招抚奸，用刑罚对待轨。德、刑不立，政局不稳。下臣请求离开。"于是逃亡到狄人那里。

厉公派人向栾书和荀偃解释说："寡人讨伐郤氏，郤氏已经服罪，请你们莫记前嫌，继续工作。"栾书和荀偃都叩头说："陛下诛杀罪人，而宽恕小臣一死，这是陛下的恩德，我们二人至死也不会忘记君主的浩荡天恩。"于是，都回府去了。晋厉公任命胥童为卿。

不久的一天，晋厉公在匠丽氏那里游玩，栾书、中行偃发动政变，囚捕厉公。他们二人召士匄和韩厥前来商议，士匄和韩厥不肯参与。韩厥说："从前我在赵氏家里养大，孟姬诬陷赵氏，我能顶住不出兵。古人云'杀老牛没有人敢作主。'何况是国君呢？你们二位不能事奉国君，还召我去干什么？"

第二年正月初五，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派程滑杀死厉公，葬在翼城东门之外，仅仅派了一辆车子。随后，派荀罃、士鲂到成周迎接姬周回晋国为君，卿大夫们都到清原（今山西稷山东南）去迎接。姬周说："我从没想到过回国为君，如今出现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天意吗？人们立国君，是为了由他发布政令；有了国君，又

不愿听他的，当这样的国君有何意义？你们大家是否用得上我，今天应说清楚。神灵保佑听从君命的人。”群臣叩头回答：“迎立陛下是群臣的衷心愿望，敢不唯命是从！”十五日，君臣在清原结盟后回到国都，住在伯子同家里。二十六日，在祖庙拜祖，朝见群臣，驱逐了七个阿谀奉承之徒。

二月初一，姬周正式即位，是为晋悼公。晋悼公即位后，重新任命百官，免除穷困百姓所欠国家的债务，照顾鳏夫寡妇老弱孤独，起用贤能人才，救灾扶困，惩治邪恶，少征赋税，宽赦罪人，节俭政府开支。任命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厌、韩无忌为公族大夫，让他们教育贵族子弟恭敬、节俭、孝顺和仁爱；任命士渥浊为傅，以范武子为榜样教育太子；右行辛为司空，学习士会的榜样；祁奚为中军尉，魏绛为司马……。新任命的这些官吏，都是百姓所拥护和赞扬的人，荐举的人不失职，任官的人坚持原则，爵位与每个人的能力相符。在晋悼公即位后，政治安定，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国泰民安。

晋国国内政局稳定后，马上继续对外争霸活动。在当时华夏大地上，主要的国际矛盾是晋楚两国之争，而晋楚相争，又主要是争夺位于两国之间的郑国以及宋国。郑国成了晋悼公称霸的焦点。

晋悼公元年（前572）五月，晋国派韩厥、荀偃率领诸侯军队进攻郑国，攻入郑都外城，在洧水沿岸击败郑国军队。随后，晋军协同驻扎在鄫地（今河南睢县东南）的诸侯军队进攻楚国的焦邑和夷邑，最后又攻伐陈国。这年秋天，楚国派子辛率军救援郑国，进攻宋国的吕（今徐州东南）、留（今江苏沛县东南）二地，作为报复。

晋悼公二年，郑成公得了病。大夫子驷请求国君顺服晋国以解除面临的危机，郑成公不同意，说：“楚共王是为了郑国才在鄢陵之战中眼睛被射瞎的，如果背叛了他，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还

能有哪个国家来亲近我们郑国？我只有依靠你们几位大臣同舟共济了。”当时子罕、子驷主持国政，子国为司马。晋军进攻郑国，大夫们想归属晋国，子驷斥责说：“陛下没有改变国策！”晋、鲁、宋、卫、曹、邾各国大夫在戚地开会，商讨征服郑国的问题。鲁国大夫仲孙蔑说：“可以在郑国的虎牢筑城，来逼迫郑国首都。”知武子说：“可以。在鄫地盟会的时候，大家听到了齐国大夫崔杼的一番议论，现在他公然不来开会，滕、薛、小邾几个国家也仿效齐国不来开会，问题的关键在齐国。我们准备请示悼公，要求齐国参加盟会。如果齐国同意，这是大家的幸运；如果不同意，齐国就是战场。”

同年冬天，诸侯各国再次在戚地开会。齐国人听到知武子欲攻伐齐国，有些害怕，前来参加会议，滕、薛、小邾三国也都参加了。各国联合在虎牢筑城，郑国人感到不安，遂向晋国求和。

晋国的中军尉因年老请求辞职退休，晋悼公问他由谁接替合适，祁奚荐举解狐。解狐是祁奚过去的仇人，当晋悼公想任命他时，不料解狐竟得病而死。晋悼公又问祁奚，祁奚又回答：“我的儿子祁午也可以。”这时羊舌职也死了，悼公问：“谁接羊舌职的职务合适？”祁奚回答：“他儿子羊舌赤很好。”晋悼公就任命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为副将。当时人们赞美祁奚说：“祁奚推荐人才唯能是举，不管他是自己的仇人，还是自己的儿子或自己的朋友，没有人认为他存有私心。他一个人荐举了三个人才，算得上举贤的典型，唯有贤能的人才会荐举贤才。《诗经》中说：‘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正是这样的贤人。”

晋悼公三年六月，晋悼公第一次以盟主身份召集诸侯主持会盟。单顷公也参加了这次会盟。会盟的地点是在鸡泽（今河北邯郸东），故称“鸡泽之会”。晋悼公派荀会到淮水岸边迎接吴王寿梦，由于吴、楚两国正发生战争，所以未能与会。陈国大夫袁侨到会请求与各国和好，晋国答应了陈国的请求。同年秋天，各国

大夫同陈国大夫袁侨结盟。

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曲梁（鸡泽附近）扰乱军队的阵列，司马魏绛为整肃军纪，杀了扬干的御车夫。晋悼公听后很生气，对羊舌赤说："我会合诸侯是件荣誉的事，扬干受到屈辱，还有什么荣耀！我要杀掉魏绛。"羊舌赤义正辞严地说："魏绛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他不避危险和惩罚勇于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他会前来谢罪的，陛下不必发怒。"言语刚毕，魏绛来到，呈上书信一封，随后准备自杀。士鲂、张老阻止住了他。他在给悼公的信中写到："陛下帐下缺人，让臣担任了司马职务。我常听人讲：'服从军纪叫武，保持军纪叫敬。'陛下约合诸侯，为臣岂敢不敬？陛下的军队不武，任职的人不敬，这是重大罪过。为臣不敢违背原则，所以触犯了扬干，无法逃脱罪责。臣事先没能教育好全军，以至动用了大刑，这是严重失职，请求陛下赐死！"晋悼公读完信，深受魏绛一片忠心感动，光着脚跑出来接见魏绛，向他赔罪说："寡人的话是出于对兄弟的亲爱，大夫动刑罚是执行军法。寡人没能教育好弟弟，使他触犯军令，这是寡人的罪过。恳求你不要再加重寡人的过错了。"

晋悼公觉得魏绛坚持原则，忠于职守，盟会归来后，在太庙设宴招待他，并提升他为新军副帅，张老为中军司马。

无终国的国君嘉父派遣大夫孟乐到晋国，通过魏庄子的关系向晋悼公献纳虎豹的皮革，请求晋国同各部戎人言和。晋悼公认为，戎狄六亲不认，贪婪成性，不能同他们和好。魏庄子劝谏说："近来诸侯归服，陈国约和，都在观察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有德，诸侯就亲近；否则，就背叛离去。我们讨伐戎人，万一楚国攻陈，我们来不及救援，就等于抛弃了陈国，而且还会导致中原各国的背叛。戎人是禽兽之邦，得到戎人而失去中原，那怎么能行？"悼公说："就没有比约和更好的办法了吗？"魏庄子回答："同戎人约和有五方面的好处：第一，戎狄游猎，逐水草而居，重财货而轻

土地，他们的土地可以收买；第二，边境地区可解除战争状态，人们可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第三，戎狄归服，会增加晋国的威严；第四，没有战争，将士不疲劳，兵器不损坏；第五，鉴于后羿的教训，使天下安宁。希望陛下全面权衡利弊。”晋悼公听了很高兴，派魏庄子同各部戎人议和。同时还听从了魏庄子的劝告，致力于安邦治国，减少了打猎的次数。

晋悼公五年，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到晋国，解释没有参加鸡泽之会的缘由，同时请求与各诸侯国建立友好邦交。晋悼公先让鲁、卫两国同吴国协商开会的日期。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晋、鲁、宋、陈、卫、郑、曹、莒、滕、薛、齐、吴、鄫各国君主在戚地会见，缔结盟约，同归于好。会后，晋悼公命令诸侯派兵守卫陈国，以防备楚人进攻。同年冬天，楚军就向陈国发动了进攻。

晋国的卿大夫韩献子告老退休，悼公准备任命穆子接替韩献子的职务。穆子身患残疾，辞谢悼公说：“《诗经》中说：‘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说：‘弗躬弗亲，庶民弗信。’穆子不才，请别人来任此职吧！由我的弟弟宣子担任此职可能更合适。他同田苏交往，田苏称赞他仁义。《诗经》中说：‘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体恤百姓是德，忠正不阿是正直，有了这些好的品德，神灵会看得见，赐下大福。立宣子为卿，是否可以呢？”悼公七年十月初九，韩献子上朝，正式卸任。悼公认为韩穆子具有仁义品德，让他做了公族大夫。

晋悼公八年五月，晋国召集郑、鲁、齐、宋、卫、邾各国在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开会，准备朝聘天子，晋悼公提出各国应缴纳的礼品数。郑国向大会奉献了攻伐蔡国的俘虏。

同年冬天，楚国的子囊率军大规模进攻郑国，以报复郑国侵犯楚的盟国蔡国。形势很危急，郑国的大夫之间出现了意见纷歧。子驷、子国、子耳提出要归服楚国；而子孔、子蟜、子展认为要坚守，等待晋国军队的支援。子驷说：“《周诗》中有这样的话：

'等待黄河清，寿命有几何？占卜实在多，自己陷网罗。'同众人商量事情，人人言殊，无所适从，事情怎能成功？目前形势危急姑且顺从楚国，以免百姓肝脑涂地。晋国军队来到，我们再顺从他们就是了。我们恭恭敬敬地准备好礼物，等待大国的到来，这是弱小国家的保国之策。敌国不造成祸害，百姓不遭难，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子展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说："小国用来事奉大国靠的是信用，小国不讲信用，战争和灾难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头上，甚至会灭亡。先后五次会盟，现在轻易地违背，即使楚国肯帮助我们，又管什么用？亲近楚国不会有好结果，楚人时刻都虎视眈眈地想吞并我们。晋国则不然。晋国的君臣贤明，有四个军的强大兵力，八个卿之间团结一心，他们不会抛弃郑国不管。楚国距离我们遥远，粮食将要吃完，不久就会撤兵，有什么可怕的？保持信用，坚守城池，等待晋军，此为上策。"

子驷不满地说："《诗经》中说：'谋者太多，意见纷纭。有了失误，谁敢负责？与路人谋，终无所得。'大家不要再争论了，我决定归从楚国，由我承担责任！"

郑国同楚国言和，同时派王子伯骈向晋国报告说："悼公命令我们郑国：'准备好你们的战车，军队保持戒备状态，时刻准备讨伐动乱的国家。'蔡国不驯服，我们遵从贵国君主的命令讨伐蔡国，俘虏了蔡国大夫司马燮，奉献于邢丘之会。然而，楚国现在前来问罪：'你们为什么对蔡国用兵？'进攻我们的国土，焚烧我们的城邑。我们郑国的男女老少竭尽全力拼死抵抗，无奈死伤甚众，人人哀痛，惨不欲生，不知怎样才能逃生。在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形下，人们要求接受楚国的盟约。我们国君和大臣们也阻止不住，特此前来报告。"

晋人闻听郑国背叛非常恼怒，知武子派行人（外交官）子员答复郑国使者说："郑国受到楚国威胁，也不派人向晋国报告，反

而立即顺从了他们。你们愿意怎么办，别人谁能阻止？随你们的便，准备在你们的城下同诸侯们见面吧！”晋国立即派使者通知各国，准备出兵讨伐郑国。

第二年春天，晋国因闹粮荒，延迟至下月才向郑国发兵。鲁、齐、宋国的军队跟随荀莹、士匄进攻郑国都城的鄟门，卫、曹、邾国军队跟随荀偃进攻梁门，滕、薛二国军队跟随栾厌、士鲂攻打北门，杞、郳二国的军队跟随赵武、魏绛砍掉路边的栗树。晋悼公命令各国军队说："准备好武器和干粮，送回老弱，让有病的人住在虎牢，立即攻打郑国！”

郑国人十分恐怕，马上派人求和。荀偃说："不能就此罢休！应继续包围郑国，等待楚国军队前来救援，我们同楚军决战。不击败楚国，没有真正的和平。”知罃则说："我看应该答应郑人的要求，然后退兵。楚军必定会前来找郑国算帐，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办法使楚军疲于奔命。同时，把我们的四个军分成三部，加上各诸侯的军队，迎击前来的楚军。我们以逸待劳，可以击败楚军。与楚军硬拼，攻打郑国，会白白地送掉无数将士的性命。君子用智，小人用力，这是圣贤的战略。”诸侯的军队都不想作战，于是晋悼公接受了郑国的求和要求。十一月十日，郑国同诸侯各国在戏（今河南登封）结盟，又顺服了晋国。

在盟会上，晋国的士庄子草拟盟书说："从今会盟之后，郑国再不听从晋国指挥，心存三心二意，将照盟约记录的办法惩罚！”郑国大夫公子騑不能忍受晋国的苛约，疾步上前说："上天降祸于我们郑国，使我们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反复遭受蹂躏。大国不想给我们帮助，反而动用武力要挟我们结盟，订下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们的鬼神都得不到祭祀，百姓无法安生。从今往后，郑国如果不服从合于礼义而又强大的国家，敢有别的三心二意，甘愿受一切惩罚！”

荀偃说："这样的盟约不行，必须修改！”郑国大夫公孙舍之

说："已经报告神灵了，无法修改；如果可以修改的话，也就可以背叛大国了！"

知罃劝荀偃说："我们所作所为不合于道义，反而制定严厉的盟约要挟别国，恐怕不太合适。召集诸侯盟会，应该以道义为准则。姑且与郑国结盟退兵，修养德政，休整军队，然后再前来，早晚会得到郑国，何必一定要在今天呢？如果强行结盟，各国看到我们不讲礼义，也会背叛我们，岂止是一个郑国？"晋悼公听从了知罃的建议，主持了盟会，罢兵北归。

回到晋国后，晋国的君臣们对这次盟会越想越不如意，日益恼火。于是，不久又出动军队讨伐郑国，将郑国的都城团团包围，三面猛攻。由于难以攻克，不得已从阴口（今河南新郑西北）撤兵回国。郑将子孔说："晋军长期奔波在外，疲惫不堪，现在思念归国。趁此时出击，定会获胜！"子展阻止说："不行！那样会招致大祸。"

晋人不满意郑国，楚人也不满意郑国。听说郑国与中原诸侯结盟，楚国立即发兵攻郑。郑国大夫子驷想同楚国约和，子孔、子蟜不同意，说："刚同中原大国结盟，嘴唇上的血还没干就违背它，那行吗？"子驷、子展说："我们在盟誓中本来说'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楚国进攻，晋国不前来救援，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这同样是誓言，怎可背弃？那盟誓本来是在武力压迫下结成的，没有诚信，神灵不会知道。信义是善良，是道德，是神灵的意志，神灵只维护讲信义的盟会。没有信义的盟约，当然可以抛弃。"于是郑国又同楚国约和。楚国的公子罢戎进入郑国都城，郑、楚两国结盟。

由于连续出兵和自然灾害，晋国的人民生活出现困难。晋悼公回到国内后，便同百官商议解决的办法。魏绛提议，把国库中的资财借给百姓，政治上暂时停止兴师动众。悼公听取了他的建议，不但把国家的积蓄借给人民，卿大夫们还把自己的私财取出

来帮助百姓。这样一来，国内没有不流通的财物，也没有穷乏的百姓。国家允许人们牟利，但人们并不贪婪。为了节省政府开支，祭祀时用物品代替牛羊，招待外国宾使只用一种牲畜，朝廷中不增加新的办公用品。车马服饰够用即可。这些措施的实行，使晋国出现一派新的气象。

晋悼公十年四月初一，晋、鲁、宋、卫、曹、莒、邾、滕、杞、小邾、齐各国君主在柤（今江苏邳县北）地会盟。在这次盟会上，晋国荀偃和士匄要求攻打偪阳（今江苏邳县西北），把它作为宋国大夫向戌的封邑。荀罃不同意，说："偪阳虽是小国，但城池坚固，万一攻不下来会被人耻笑，攻下来也算不得勇敢。"荀偃和士匄坚决要打。最后依从了他们的要求。

将偪阳包围后，虽尽力攻打，却久攻不下。鲁国孟孙氏的家臣秦堇父用人力拉着辎重车赶到战场。偪阳人打开城门，诸侯军队乘机向城内冲锋。哪知这是偪阳人的阴谋，刚冲入一部分人，偪阳人就把空悬的城门放下，企图把入城的部分军队消灭。在这危急的时刻，鲁国郰邑宰叔梁纥（孔丘的父亲）奋力用双手擎住悬门，使跑入城内的将士逃出来。鲁将狄虒弥把大车轮立起，蒙上皮甲作为大盾牌，左手举着车轮，右手持戟，向前冲锋。孟献子赞叹说："这就是《诗》中所说像老虎一样有力气的英雄啊！"

偪阳的军队在城墙上垂下布绳，秦堇父毫不畏惧奔过去抓住布绳向墙上攀登，刚到墙垛，守兵把布绳斩断，秦堇父从半空跌落。随后，守城人又把布绳放下，秦堇父苏醒过来，接着向城上攀登，城上的守兵又把绳子斩断。如此三次，秦堇父舍生忘死，守城军钦佩他的勇敢，不再垂绳。秦堇父把那三段布绳带回，展示在军中。

强攻不下，晋将荀偃、士匄有些忧惧，便请求荀罃说："雨季很快就到，万一大军撤不回去就糟了，还是尽早撤兵吧！"荀罃听后大怒，说："你们两人坚决要开战，我担心意见不一扰乱人心，

采纳了你们的意见。两军既已开战，你们又缺乏勇气，不能战斗到底，让我下令撤兵。到了国君问罪的时候，你们可以说：'只因他下令撤兵，否则，就攻下了！'这难道不是给我加罪吗？限你们七天，攻不下城池，把你们的人头送来！”说着，把弩机向他们二人投去。荀偃二人没有退路，唯有死战到底。五月四日，他们亲自带兵猛攻，箭矢和石块像暴雨般向他们袭来，他们拼死而战。五月八日，攻下了偪阳，灭了这个妘姓小国。

晋悼公把偪阳封给向戌，向戌辞谢说：“假如陛下安抚宋国，用偪阳的土地扩大宋国，这将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如果是赐给小臣一人，岂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发动这么大的战争，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小臣以死请求陛下。”于是就把偪阳给了宋国。

宋平公在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设宴招待晋悼公，请求用商朝（宋国是商朝遗民）的《桑林》舞表演，荀䓨辞绝。荀偃、士匄说：“在诸侯国中，鲁保存的周代乐舞最多，宋保留的商代乐舞最多。中原国君欣赏一下《桑林》舞，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开始表演，乐师手举着“旌夏”旗帜走进大厅。晋悼公看到“旌夏”旗很害怕，躲进厢房。宋人拿走“旌夏”旗，才使这次宴会顺利结束。晋悼公在归国途中因此而生病，巫师给悼公占卜，看到了桑林之神。荀偃想回到宋国祭祀此神，荀䓨不同意，说：“我们周人早已不祭祀桑林神，只有他们还祭。如果桑林神作怪，灾祸会落在他们头上！”不久，晋悼公病好。偪阳国君被带回晋国，后来送到了周天子那里。

同年冬天，各诸侯国的军队攻打郑国，楚国派子囊率军援救郑国。十一月，诸侯军队绕到郑都之南，驻屯在阳陵（今河南许昌北），摆出一副威胁楚军的姿态。然而楚军却不惧退。知武子想要退兵，说：“我们暂时退避楚军，楚军必然骄傲。他们骄傲了再同他们决战，才好取胜。”栾厌不同意，说：“堂堂晋军竟然退避楚军，这是耻辱。召集诸侯，向他们展示耻辱，真不如死掉好。我

宁可孤军作战!”随即率军挺进，与楚军隔颍水对峙。

郑国大夫子蟜说：“听说诸侯国军已准备撤退，不会再战了。我们顺从了晋国，他们退兵；不顺从，他们也退兵。他们退兵，楚军来围，还是有麻烦。不如顺从楚国，这样双方都会退兵。”郑国派人半夜渡过颍水，同楚人结盟。栾厌要攻打郑国，荀罃不同意，说：“我们不能击败楚军以保卫郑国，楚人来攻，郑国人到底有什么罪？况且不能肯定取胜，万一失误，会被诸侯笑话。”晋国军队回撤，楚国军队也撤了回去。

晋、楚两大国之间的拉锯战术，搞得郑国焦头烂额，时刻不得安宁。郑国大夫们商议彻底解除困扰的办法。多数大臣认为，晋强于楚，问题是晋国不想同楚国决一死战。怎样才能使晋国下定决心击败楚国呢？子展说：“我这里有一计策，不妨一试：我们向诸侯的盟国宋国挑衅，诸侯联军必来，我们马上同他们结盟。楚军来到，我们再归从楚国，晋人必会大动肝火，同楚军决战。楚国失败，我们就可一心无挂地跟从晋国了。”大家觉得此计可行，就派边境地区的官员向宋国寻衅。宋国向戌率军报复，俘虏了一些郑人。子展说：“时机成熟，我们可以大举攻宋了。只要诸侯一出兵，我们就派人通报楚国。楚军来到，我们就同他们结盟，同时贿赂晋国，让他们交兵。”

晋悼公十一年夏天，郑军大举攻宋，诸侯联军急忙救援。齐、宋两国军队驻扎在郑国东门外，晋国军队驻扎在郑都西郊，卫国军队屯驻在北部。六月，诸侯军队会合，包围了郑都城。

郑国向诸侯国军求和，七月，在亳城订立盟约。盟约规定：“凡是同盟的国家，不准屯积粮食，不要垄断利益，不准包庇罪犯。救济灾荒，平定祸乱，辅助周天子。谁违犯盟约，神灵诛戮，使他失去人民，国破家亡!”

楚国在长期的征战中，也搞得精疲力尽。眼见郑国倒向晋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派人联络秦国。秦国的右大夫詹率军协

助楚军攻郑。郑国派人前去迎接，表示臣服。

同年九月，各诸侯国军队倾巢而出再次伐郑。郑国派良霄到楚国，通知楚人郑国将要降服晋国，说："为了国家的生存，郑国不能再侍奉楚国了。楚国若能与晋国握手言和，当然很好；如若不然，用武力征服晋国，更符合郑国的愿望。"楚人不敢同晋人较量，却囚禁了郑国的使者。

诸侯联军在郑国东门外炫耀武力，郑国派王子伯骈求和。晋国大夫赵武进入郑都同郑简公结盟。随后，郑国的子展出城同悼公结盟。十二月初一，晋悼公与郑简公在萧鱼（今河南许昌境内）相会，双方正式达成谅解。联军放回郑国俘虏，将警卫部队撤回，禁止士兵掠抢。晋悼公派人到各诸侯国通报郑国结盟。

郑简公赠给晋悼公三位著名的乐师、作战进攻和防守用的战车各十五辆、盔甲武器齐备，加上其他战车共一百辆，歌钟两架，舞女十六人。

晋悼公很高兴，把乐队的一半赐给魏绛，说："你让寡人同戎狄国家和好，使寡人八年中九次约会诸侯，就像音乐一样地协调，你同我分别享受这音乐吧！"魏绛辞谢说："同戎族言和，这是国家的福祉；会合诸侯，诸侯团结一致，这是陛下的宏恩浩荡，也是诸位卿大夫的辛劳。为臣没有特殊的贡献，只是希望陛下从长计议，居安思危，巩固现有的成果。"晋悼公点头称是，说："贤臣苦口良言，寡人铭记在心。有功者赏，这是国家的原则，你还是不要推辞了吧！"

秦国派庶长鲍、武二人率军攻击晋国，以援救郑国。晋国大夫士鲂率兵抵御，认为秦军人少而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受到秦军夹击，晋军在栎地大败。

两年后，楚共王去世。吴国乘机攻楚，吴、楚矛盾升级，楚国逐渐无力再逐鹿中原。秦国虽也有意染指中原，但因地处僻远，力不从心。晋国的霸业到这个时候，可说是第二个顶峰了。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成公十七年至襄公十三年

《国语》：《周语下》、《晋语》。

《史记·晋世家》

子罕为政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春秋中晚期，在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名叫子罕的风云人物，一位在宋国，一位在郑国。这里介绍的是宋国的子罕执政的一些事迹。

自泓水战败后，宋国一蹶不振，大国地位急剧衰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旧贵族日益堕落，内部斗争长年不断。楚、晋两国争霸，宋国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之一。子罕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施行德政、救民危亡的。

子罕在当时的职务是司城，即其他各国的司空，因避宋武公之讳而改。司城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工程建设，同时参与朝政。子罕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宋平公十二年（前564）春天，宋国发生了一次极为罕见的火灾，火势凶猛，疾速蔓延。子罕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伯氏察看火势，组织救火。在火没蔓延到的地方，拆除掉那些茅草棚，不便拆除的大房子则用泥厚厚地涂住，迅速地打开了隔离带。同时，让人们准备好汲水的瓦罐和绳索，以及其他能贮水的东西，注满水塘，堆积泥土，巡查城郭，修缮守卫工具，立标指明火势的趋向。将所有人员作了周密的安排：派华臣调集常备的士卒，华臣又命令下属将郊区的徒兵集合起来，赶赴火场；派华阅负责右师，向戌负责左师（右师、左师是宋国朝廷的两大衙属），督促自己的部下各司其职；派乐遄准备好刑具，防备坏人趁火打劫；派皇郧命令校正（养马官）将马匹转移到空旷地带，工正将战车推出，准备好武器装备，守卫好武器库，预防敌国侵袭；

派西鉏吾守卫好国库，西鉏吾下令司宫、巷伯在城内的宫廷和街巷巡逻警戒。右师和左师命令四个乡的长官祭祀四个乡的神灵，祝宗用马匹祭祀四城的神灵，在国都西门外隆重祭祀祖先盘庚，以求保佑。

这次火灾给宋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抗灾组织得井然有序，危害被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子罕在宋国还积极推行德政，施惠于民。郑国的子展死了，子皮继任为卿，执掌国政。当时郑国闹饥荒，粮食歉收，百姓困乏。子皮遵照子展的遗嘱，把自家的粮食赠给郑国的人们，每户一钟，很受郑国人民的拥戴。子罕听到此事后，感慨地说："善待百姓，百姓就衷心拥护。"不久，宋国也发生了灾荒，百姓生活困难。子罕向宋平公请求开仓赈民，同时让大夫们都向百姓放粮。子罕自家借给别人粮食的时候，不写契约，还帮助那些缺粮的大夫借粮给百姓。大荒之年，宋国竟然没有人饿死。晋国大夫叔向听到此事后评论说："宋国的子罕一族会福禄长久的吧！施舍于人，必然取得人心，他们的命运将伴随着宋国的存亡。"

一次，楚国使者士尹池到宋国访问，子罕在宫中设宴招待。宾主在宴饮的时候，士尹池发现宫殿的南城墙向内凹进一部分，便问子罕是怎么回事。子罕解释说："南宫墙那里住着一户做鞋的人家。当初修建宫殿的时候，我曾想把他们迁到别处居住。但他们不愿意，说他们已经三代靠制鞋为生，人们都知道他们住在这里。如果迁到它处，会使他们失去生计。因此，这宫墙就向里凹了一段。"士尹池又问："为什么还有一条泄水沟从宫殿前穿过？"子罕又解释说："宫殿西边的人家地势高，宫殿区在其下，不向这里流，还能往哪里流呢？"士尹池回到楚国后，楚国想发兵攻宋。士尹池劝阻说："宋国是难以征服的！他们的君主开明，大臣贤能，人民肯于为国家卖命。这样的国家怎会容易征服呢？"

子罕在宋国得人心，受人爱戴。一次，有人得到一块美玉，献

给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的人说："拿给玉工看过，玉工认为是宝物，所以才献给阁下的。"子罕回答："你把美玉作为宝物，我把廉洁、不贪婪作为宝物。你把玉给了我，会使我们双方都丧失自己的宝物。"献玉的人叩头对子罕说："我听说，一个平庸之人不能把无价的宝玉带在身上，因为那对他来说，会使他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图财害命的事肯定会发生在他头上。所以，把玉送给您，也是为了保我自己的性命。"话说成这样，子罕不好再坚持，便把玉收下。找来玉工为他精雕细琢，把这件玉器卖了出去，把钱给了他，把他送回乡里。

宋平公十七年，宋国的皇国父做太宰，为平公建造了一座台榭，供国君享乐。由于工程较大，短时不能完成，妨碍了农民收割庄稼。子罕知道后立即找到国君，请求放农民回去务农，过了农忙季节再继续施工。国君不答应，人们对国君很不满，作歌谣说："泽门里的白皮肤（指皇国父），征发我们出劳役；城里的黑皮肤（指子罕），体谅我们的心情。"子罕听到后很不安，亲自拿着竹鞭到工地，监视人们卖力劳动，鞭打那些偷懒的人，怒呵他们说："我们这些人都有遮风御寒的房子住，为国君造一座台榭而不尽快完成，那怎么行！"人们见他这样的态度，就不再歌颂了。有人问子罕何必如此，子罕解释说："我们国家本来就弱小，人们这样一唱，会在朝廷内部造成对立，这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他用这样的办法，消弭了有可能产生的他与皇国父的隔阂。

在政治活动中，子罕坚持公正原则，不畏邪恶。宋国的华弱和乐辔二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昵，长大以后彼此戏斗，有时甚至相互诽谤。一次乐辔发怒，在朝上用弓套在华弱的脖子上，犹如带上了枷锁一般。平公见此情形不高兴地说："华弱身为司马，却在朝廷上戴上了枷，今后作战还怎能取胜！"华弱很不安，不久逃到齐国去了。子罕觉得这事有些不公正，便对平公说："他们二人罪过相同而惩罚不同，这不合于刑法。乐辔在朝上肆意侮辱别

人，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平公于是也驱逐了乐辔。乐辔很痛恨子罕，把一枝箭射在子罕住宅的门上，威胁说：“让你不久也跟我一样！”但子罕并不计较，仍像过去那样宽待他。

宋平公三十年，经过宋国左师向戌的一番努力，晋、楚两国第二次达成停火协议，促成了当时的国际和平局面。弭兵大会之后，向戌向宋平公邀赏，说：“臣为这次弭兵的成功，出生入死，才有今天，请陛下封给我城邑。”宋平公无奈，封授给他六十个邑。然后，把封授文书拿给子罕阅读。子罕对向戌这种做法很反感，生气地说：“大凡诸侯小国，都受晋、楚两国的武力威胁，使各小国莫不感到畏惧，因而才上下精诚团结，团结之后国家才太平无事。可见，小国侍奉大国是小国免除内乱的重要因素。反之，如果没有外患的威胁，小国就会骄纵，骄纵就会发生暴乱，暴乱一旦发生就会亡国，这是小国衰亡的原因。大自然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人们运用这五种元素，创造万物，缺一种元素都不可。武力也是这样。国家设置军队由来已久，目的在于镇压暴乱，推行德政。历史上的圣贤商汤、周武王以此兴邦，暴君夏桀、商纣却因此亡国。可见，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其兴衰存亡都与武力相关。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竟然有人认为自己在地球上消除了武力，并用这种谬说欺骗世人！这种做法是不可宽恕的罪过，不但没有治罪，反而要求奖赏，真正是贪得无厌！”拿起刀削去了写在竹简上的授封文书，然后把竹简扔在地上。向戌见此情形，也就推辞不再接受封邑了。

向氏的族人闻听此消息，十分憎恨子罕，想兴兵杀子罕。向戌劝阻说：“我邀功请赏是自蹈灭亡，是子罕挽救了我，使我们一族得以生存平安，我们应该感谢他才是，怎能恩将仇报呢？”当时的有识之士评论说：“《诗经》中说：‘那位君子，乃正直之士。’子罕就是这样的人；《诗经》中还说：‘用何赐我，我都接受。’向戌就是这样的人。”

子罕是一个与人为善的正人君子，不去计较个人恩怨。《说苑》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子罕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名叫子韦，两人亲密无间，同吃同住。有一个时期，子罕遭遇了不幸，子韦却避而不见。后来，子罕当上了司城，子韦又来找他，子罕又待之如故。周围的人们对子罕说："你遭难的时候，他躲着你；你得志了，他又来投靠你，这样的人愧对朋友。"子罕却不在意地说："当初我之所以遭难，正是由于我没依从子韦的建议；我能够东山再起，是由于我听从了过去子韦对我的指教。所以，我应该报答他。"

《礼记》记述了另一个故事，说宋国死了一个平民，子罕前去吊唁，哭得很悲伤。一位晋国使者当时正在宋国，觉得不可思议，回国后报告了晋侯。晋侯听后感叹说："有这样的执政者，人民怎么会不同心同德呢！"

战国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子罕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未必都确有其事，但其反映出的子罕的高尚人格却是可信的。孔子曾赞扬子罕说："子罕身处朝中，但他的影响却达到千里之外。宋国处于楚、晋、齐三大强国之间，在子罕为政的时候，边境不受侵犯，国内安宁，这是他的仁义和正直的结果啊！"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六年至二十九年

《吕氏春秋》

卫献公复辟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开明君主，也有无道昏君。对于开明君主，自然赞誉之声不绝；对于无道昏君，则人们讳莫如深。在传统思想中，天下万物归君主所有，天下百姓是君主的臣民。因此，便产生了如下的不可动摇的神圣信条：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君命臣亡，臣不得不亡。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个叛逆的声音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人民不是君主的臣仆，而是主人！无道昏君应该被赶下政治舞台！这是晋国的师旷针对着卫献公的昏庸无道而发自心底的声音。

卫定公十二年（前577），定公身患疾病，让大夫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姒的儿子洐作为太子。同年冬天，卫定公就去世了。夫人姜氏非常悲痛，哭灵之后坐下休息，看到太子一点也不悲哀，叹气说："这个人将不仅使卫国陷入灾难，而且也会给我带来祸殃！天啊，为什么不让他的弟弟鲊（子鲜）即位，偏偏选择了他？"大夫们听到此事后，无不感到恐惧害怕。卫国大夫孙文子把家族的重器从国都转移到封邑戚地，同时积极同晋国的大夫们改善关系。

卫献公十一年（前566），孙文子代表国君前往鲁国访问，重温两国的友好关系。举行迎接仪式的时候，鲁襄公登上台阶，孙文子也不相让，同鲁襄公并肩而上。鲁国大夫叔孙穆子很不满，快步走上前对孙文子说："诸侯盟会的时候，鲁国的排位总是在卫国前面。现在阁下不走在我们国君后面，真不知我们国君错在什么地方。请你放慢脚步。"孙文子毫不理睬，没有感到自己错了。穆

叔评论说："这个不知礼节的孙文子，早晚会逃亡国外。作为臣下而和国君并肩而行，有了过错还不知改悔，这是他的要害问题。《诗经》中说：'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是说小心谨慎地事奉君主。孙文子骄横肆恣，必会遭受挫折。"

卫献公十八年的一天，献公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二人吃饭。他们二人穿着朝服在宫内等候，直到很晚献公仍不召唤他们。原来，献公正在园林中射天鹅。两人无奈到园林中去观看，献公对他们不讲礼节，戴着帽子就同他们讲话，两人更觉受到侮辱，非常气愤。孙林父（文子）一气之下到了戚邑，派他儿子孙蒯到献公那里听命。献公给孙蒯酒喝，并且吩咐乐师奏颂《巧言》这段诗歌的最末一节。乐师推辞说这首诗不宜演奏，可是有位姓曹的乐师却主动请求由他演奏。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卫献公有个宠妃，派师曹教她弹琴，由于这个妃子不好好学琴，师曹竟用鞭子抽打她。献公知道后大怒，下令痛打师曹三百鞭。从此，师曹怀恨在心，寻机报复。现在，他想利用这首诗激怒孙蒯，让孙氏家族报复献公。献公当时不知此中含义，只是想刺激孙氏，便由师曹吟诵。师曹高声朗诵道：

究竟他是什么人，
住在河岸水草前。
没有力气没有勇，
专门制造那祸源！

孙蒯听后知道这是隐喻孙氏家族，非常不安，赶紧回去告诉了父亲。孙文子说："事情明摆着，国君在嫉恨我们，如果不先发制人，我们难逃恶运。"随后，把妻子儿女都转移到戚邑，然后去见大夫蘧伯玉，说："国君暴虐无道，这一点你也很清楚，我担心国家会被他搞灭亡，你说该怎么办好？"

蘧伯玉是位正人君子，听得孙文子一番话，严肃地对他说：

“国家是国君的，臣子怎敢干涉？即使干涉了，君主会不会接受呢？”孙文子离开后，蘧伯玉知道即将爆发内乱，为逃避叛逆的罪名，从最近的一个关口逃到国外。

孙文子发兵进攻卫献公，卫献公有些害怕，派子蟜、子伯、子皮三人前去与孙文子结盟，请求双方尽弃前嫌，就此和好。孙文子毫不客气地把这三人统统杀死。四月二十六日，子展逃到齐国，卫献公逃离首都到了鄄地（今山东鄄城西北）。献公又派子行到孙文子那里求和，被孙文子杀死。献公见国内无处容身，逃亡齐国。孙文子率兵从后面追击，并且在卫国的河泽（今山东阳谷东北）打败献公的卫队，这些溃散的卫兵被鄄地人捉住。

卫献公的弟弟子鲜随从逃亡。逃到卫国边境，卫献公派祝宗（祭祀官）向祖先报告逃亡，同时诉说自己并没有罪过。定公的夫人姜氏生气地说：“如果没有神灵的话，你报告何用？如果有神灵，你就不能欺骗！你明明有罪，为什么说没有？你有三条罪状：第一，抛弃大臣而同小臣议政；第二，怠慢大臣；第三，我是先君的夫人，你却对我无礼。报告逃亡算了，不要报告无罪。”

卫国发生内乱，鲁襄公派厚成叔到卫国去慰问，对卫国的大臣们说：“听说贵国国君流亡在外失去国家，特派人前来慰问。鲁、卫是同盟国家，我们的看法是：国君不善良，臣下不明达；国君不宽恕，臣下也不尽职。积怨日久，终于爆发出来了，怎么办好！”卫国的太叔仪回答：“群臣不才，得罪了国君。国君不依法惩处，反面抛下他们而去，致使贵国国君忧虑。你们不忘记两国间的友谊，前来慰问我们，我们深表感谢。”厚成叔回到鲁国，告诉臧武仲说：“卫君有可能重回国内，有太叔仪在国内，有同胞兄弟子鲜跟随着他，这二人都有威望。”

齐国人把卫献公安排在郲地（今山东昌邑东南）寄居。右宰谷跟随献公逃到国外，后来改变主意，又回到卫国。卫人打算杀死他，他辩解说：“过去的事情并非我愿意做的。难道我就像羊皮

袖的狐皮大衣一样，因为一点不完美就被抛弃吗？”听了此言，卫人赦免了他。

卫国的人们拥立公孙剽为国君，他就是卫殇公。孙文子和宁惠子担任执政大臣，交往于诸侯各国。

一次，卫献公同鲁国大夫臧武仲谈话的时候，态度十分粗暴，臧武仲很不高兴。臧武仲退出后对手下人说：“卫侯很难回国了。满口胡言乱语，如今逃亡在外，仍不知悔改，人们怎么能拥戴他！”子展和子鲜听到这话，找到臧武仲交换意见，非常通情达理。臧武仲又转变了想法，对手下人说：“卫侯一定能回国。手下的人这么贤明，会使他回国复位的。”

卫献公被赶出国外，失掉君位，在当时国际上影响很大，人们议论纷纷。晋悼公对臣下说：“卫献公确实不够开明。不过，把他赶到国外，这种做法也太过分了吧！”师旷接过话茬说：“依我看是卫献公太过分了！作为一个国君应该奖善罚恶，安抚百姓，就像天地对万物那样；反过来，百姓对待国君如同父母，待之若日月，敬之若神灵，会把他赶走吗？国君是神灵的主祭者和人民依赖的人，使神灵失去祭祀，人民生活困苦，还要他干什么！上天先诞生了人民，为了组织他们的生活才为他们树立国君，有了国君又设立辅佐大臣，让这些辅臣教育帮助国君，使他做事不至于过分。因此，天子设公，诸侯设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为的是帮助主人，匡恶扬善。上天爱护人民是无微不至的，难道会让某一个人骑在百姓头上胡作非为吗？不会的。卫献公被百姓赶跑，罪有应得。”

晋悼公问晋国应采取什么对策，荀偃建议说：“最好承认卫国的现状。卫国已经有了新的国君，若讨伐他，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反而兴师动众。史佚曾经说过：‘不可动摇的就安抚它。’仲虺也说过：‘亡者侮之，乱者取之，安者定之。’这是外交常规，陛下应该安定卫国才是。”同年冬天，晋国召集了鲁、宋、卫、郑、莒、

郕各国在戚（今河南濮阳北）开会，商议安定卫国的政局。

卫殇公六年（前553），卫国执政大臣宁惠子生了病，把儿子宁喜叫到床前，后悔地说："当初真不该把献公赶出国外，现在真是后悔莫及。诸侯各国的档案里都记录着：'孙林父、宁殖赶走他们的国君。'这会让后人谴责的。将来献公若回国，你要千方百计掩盖这件事。能够掩盖这件事，你就是我的儿子；不然，我做了死鬼也不会享受你给的贡品！"宁喜一口答应。不久，宁惠子就死了。

卫殇公十一年，晋平公派大夫魏舒、宛没到齐国去迎接卫献公，让卫国人把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给献公居住。献公回到夷仪后，派人同宁喜谈判复位为君，宁喜同意了。太叔仪听到此事，哀叹说："《诗经》中说：'自身难保，怎保后人？'宁喜保护不住他的家族后代了。君子的一行一动都要考虑后果，留条后路。《尚书》中说：'慎终如始，不陷困境。'《诗经》说：'勤勤恳恳，侍奉一人。'下棋的人举棋不定能不能战胜对手，应该走一步看两步。现在宁喜做事一点也不考虑下一步会怎么样，恐怕他是在劫难逃了。相传九代的卿族，可惜呀！"

献公派人同宁喜谈判的时候，宁喜提出一个条件，一定要献公的弟弟子鲜出面协调，否则不答应。所以，献公派子鲜同宁喜见面，具体商议安排。子鲜知道献公为人不善，不肯答应。母亲敬姒说："你必须去！否则你哥哥不能重登君位。"子鲜回答："他不讲信用，我不愿为他作保证人。"敬姒说："看在我的情份上，你还是去吧！"子鲜只得答应了。

子鲜见到宁喜后，在没有得到献公许诺的情况下，借献公的口气说："如果回国复位，政事由你主持，祭祀由寡人主持。"宁喜把这事告诉了蘧伯玉。蘧伯玉说："我当初就不知道国君的出走，怎敢知道他复位。"又从最近处的关口躲到国外。宁喜又告诉右宰谷。右宰谷劝他说："此事万万不可行！你先得罪了献公，又要得

罪殇公，两位国君都恨你，你还在哪里安身!”宁喜丧气地说：“我也不愿这样干，家父的遗愿，我也已经答应，不能三心二意。”右宰谷说：“既然如此，我出去观察一下再说。”于是，到夷仪会见了献公。回来后对宁喜说：“国君在外流浪了十二年，却一点也不忧愁，也没有说一些宽容国内大臣的话，同过去一模一样。如果不停止你的行动，我们离死没有几天了。”宁喜说：“有子鲜作证人。”右宰谷说：“子鲜能起什么作用？他能阻挡住献公吗？顶多自己逃亡罢了，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帮助。”宁喜固执地说：“事已至此，随它去吧!”

卫殇公十二年二月初六，宁喜、右宰谷率兵围攻孙文子在都城内的寓所，当时孙文子在戚邑，他的儿子孙襄留在都内守卫。宁喜没有攻下孙氏住宅，率兵退到城外。孙襄在战斗中受伤，当天夜里死亡，家人在夜里哭号。城里有人给宁喜报信，宁喜率兵乘机再攻，攻入宫中，杀死卫殇公和太子角。孙文子将戚邑献给晋国，投靠了晋人。

二月十日，卫献公回到都城。大夫在国境上迎接的，献公拉着他们的手跟他们说话；在大路上迎接的，站在车上向他们作揖；在都城门迎接的，点点头示意。卫献公回到宫中，派人谴责太叔仪说：“寡人流亡在外，大夫们都给我传递消息，唯独你不关心我。古人云：‘不该怨的，不怨。’寡人现在怨恨。”太叔仪回答：“为臣知罪。下臣不才，未能跟随陛下鞍前马后侍奉，这是第一条罪状；两位君主，一位在国外，一位在国内，臣未能三心二意，里外传递消息，这是第二条罪状。两条罪状在身，岂敢贪生不死!”说完转身向外走，从最近处出了宫门。献公觉得言重了，立即派人阻止了他。

卫国军队进攻孙文子的封地戚邑，孙文子告诉了晋国，晋国派兵戍守。卫将殖绰率军攻击，杀了晋国守军三百人。孙蒯奉父命追赶殖绰，但由于害怕不敢发动进攻。孙文子怒骂说：“你这不

中用的东西，猪狗都不如！”孙蒯率军追上去，在圉地（今河南濮阳东）打败卫军，俘虏了殖绰。

同年六月，晋平公召集鲁、宋、郑、曹各国君主和大夫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开会，声讨卫国。重新划分卫国的西部边界，把卫国西部的六十邑划归了孙文子。当时，卫献公带着大臣参加了这次会议，晋国人逮捕了宁喜、北宫遗，把他们押到晋国。卫献公被带到晋国，囚禁在士弱家里。

齐国是卫献公的盟友，见献公被囚，联合郑国一同为他说情。齐侯、郑伯到了晋国，晋平公设宴招待。齐侯和郑伯都摆出友好和顺从的姿态，晋平公很高兴。齐国大夫晏婴私下对晋国大夫叔向说：“晋国的国君实行德政，安抚人心，讨伐那些违背礼义的人，因此受到人们拥戴，才做了盟主。现在，为了卫国的大臣而囚禁了国君，违背了礼义，恐怕影响不好。”叔向把这话告诉了赵文子，赵文子又转告了晋平公。晋平公举出卫献公的罪过，派叔向告诉了齐侯和郑伯。国景子代表齐侯赋《辔之柔矣》一诗，以喻宽政怀柔，子展代表郑伯赋《将仲子兮》一诗，以喻人言可畏。叔向回去作了汇报，晋平公才允许卫献公回到卫国。

卫献公回国后，宁喜为执政大臣，权势日益扩大，献公很不安。公孙免余请求杀掉宁喜，卫献公有些踌躇地说：“没有宁喜，我不会复位为君。当初我已对他许诺由他执政，现在杀他，岂不坏了我的名声？”公孙免余说：“这事只要陛下点头，不必参与就是了。”随即找到公孙无地和公孙臣，让他们率兵攻击宁喜。公孙无地和公孙臣不胜，二人都战死。公孙免余亲自带人马攻击，杀了宁喜和右宰谷，把他们的尸首陈列在朝廷上。

献公的弟弟子鲜眼见宁喜被杀死，自己作为证人失去信用，气愤地说：“孙文子驱逐国君，至今逍遥法外；宁喜迎接国君回国，却被无辜杀死。该赏不赏，该罚不罚，用什么治理国家？国君失信，我的人格也没了，还怎样做人！”立即起身离开卫国。卫献公

派人阻拦，子鲜不听，渡过黄河后发誓永远不再回到卫国，到死也没回卫国做官。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成公十四年至襄公二十七年

《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

鲁霸邾莒

提起争霸，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那么，除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国之外，小国就不称霸了吗？当然不是，规模不同罢了。春秋初年，在华夏大地上有数以千计的部落、方国；战国末年，秦吞并六国，一统中华。在前后五百年的时间内，这么多的国家和部族从中华大地上消失，融合成一个综合性的民族，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一过程？是生存竞争，是激烈的厮搏。强凌弱，智欺愚，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历史法则。

鲁国是一个以正统自居的传统色彩最浓的国家，正是由于它的这一特点，使得这个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毗邻的齐国，备受大国的欺凌。一部《春秋》，几乎就是一部鲁国遭受外国压迫的历史。然而，鲁国也同样以大国自居，称霸于那些更弱小的国家。

山东半岛的土著居民古称东夷，东夷只是一个泛称，包括许多部族。邾，也作邹，曹姓，地理位置在鲁国东南。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冬天，邾国突然发动进攻，灭亡了须句（今山东东平东南）。须句是一个风姓小国，据说是太皞的后代。须句国君的母家是鲁国，所以，亡国后他逃到了鲁国。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对僖公说："尊崇明祀，保护弱小，这是周人的礼法；蛮夷扰乱华夏，这是我们周族的忧患。如果扶助须句，这是尊崇太皞、济水神灵，修明祀礼缓和灾祸的机会呀！"

鲁僖公听从了母亲的劝导，第二年春天就发兵讨伐邾国，占

领了须句，把须句的国君护送回去，重新恢复了这个国家。邾国不甘失败，同年夏天便集中全部兵力进攻鲁国。鲁僖公没把小小的邾国放在眼里，因而没有加强防备。大夫臧文仲提醒说："国家之间无所谓强国和弱国，国家虽大，没有防备，也是要吃败仗的。《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说：'慎之又慎，天命难测。'这是先王制作的经典，先王具有那么高尚的美德，都是那样小心谨慎地从事，何况我们这些后代呢？陛下切莫以为邾国弱小，黄蜂、蝎子虽小，却是极其恶毒的，何况一个国家呢？"僖公不理睬。这年八月初八，鲁国军队同邾国军队在升陉作战，由于鲁军准备不足，大败而归。邾国军队缴获僖公的头盔，挂在邾国的城门上向人们展示胜利。鲁僖公三十三年，鲁国军队进攻邾国，以雪升陉战败的耻辱。鲁军占领了邾国的訾娄。邾国没有设防，所以大败。

鲁文公十三年（前 614），邾文公准备把国都迁到绎（今山东邹县东南），命令史官占卜吉凶。史官占卜后说："对百姓有利，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如果对百姓有利，也就是对我有利。上天诞生了百姓，然后设置了君主帮助他们，设立君主就是为了使他们得到好处。百姓能得到好处，我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左右的官员劝导说："人的生命是可以延长的，陛下为何不延长呢？为什么要为难自己？"邾文公回答："我活着就是为了安抚百姓，早死或晚死，那是命运决定的。对百姓有好处，迁居就是了，这就是我的命运。"于是邾国迁都到了绎地。迁都不久，邾文公果然去世。人们赞颂他说："邾文公是知道天命的人。"

鄫是一个姒姓小国，位于鲁国东南方，鲁国想把它变为自己的附庸国。鲁襄公四年（前 569）冬天，襄公到晋国去访问，听取大国的命令，晋侯设宴招待襄公。席间，鲁襄公请求晋侯把鄫国作为鲁的属国，晋侯不答应。孟献子上前说："我们鲁国弱小，周围紧挨着一些虎视眈眈的国家，时刻不得安宁。尽管如此，我们

国君仍时刻不忘听从晋国的命令。鄫国并没有向晋国缴纳贡赋，把它归属鲁国丝毫也不影响晋国的利益。鄫国归属了鲁国，鲁国得了它的贡赋，还可向晋国缴纳。”晋侯听完此言，也就同意了。

鲁国想得到鄫国，邾国和莒国也想得到鄫国。同年冬天十月，邾、莒两国军队进攻鄫国，鲁国见既得利益受到影响，立即发兵救援。臧纥带领着鲁军进攻邾国，在狐骀（今山东滕县东南）竟然被邾军打得大败。国内的人们闻听此讯非常愤怒，都用麻扎系着头发去迎接死亡的亲人，鲁国从此开始有了系麻的习俗。人们作歌谣抨击臧纥说：“臧纥身穿狐皮袄，使鲁军在狐骀打败了；我们国君小孩子，派给侏儒这差使。侏儒啊侏儒，使我们败给邾！”

鲁襄公十九年春天，鲁军随晋国攻伐齐国，齐国大败。诸侯联军取胜后还师，沿沂水归来，帮助鲁国逮捕了邾悼公。同时，重新划定邾、鲁两国边界，将漷水以西的土地全部划归鲁国所有。诸侯的帮助使鲁国洗掉了多年的耻辱，襄公非常感激。第二年春天，襄公亲自到晋国访问，以示感谢。

邾国的大夫庶其逃到鲁国，并将自己的封地交给鲁国。鲁人又新得土地，十分喜悦。季武子把襄公的姑母嫁给庶其为妻，对庶其的随从也都大加赏赐。当时，鲁国的盗贼很多，臧武仲担任司寇，季武子责备地说：“你为什么不严厉惩罚盗贼？”臧武仲回答：“根本无法惩治，况且我也无力惩治。”季武子不解地问：“我国四面都有关卡，盗贼想跑也跑不掉，怎么不能惩办？”臧武仲说：“你招纳外国的盗贼，而且用礼节对待他们，我又怎好惩办国内的盗贼呢？庶其在邾国偷窃了封地前来鲁国，你把姬氏许给他为妻，还封给他城邑，随从都得到奖励，这难道不是赏赐盗贼！我听人说，身为人臣应该一心一意事奉君主，按照礼法办事，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百姓就会随之如风。执政者做得符合礼法，民间的盗贼能不惧怕犯罪受罚吗？”

几年以后，季武子又率军进攻莒国，占领了莒国的郓地（今

山东沂水东北)。鲁昭公元年(前541),诸侯在虢(今河南郑州北)会盟,莒国人向楚国投诉,于是,楚国人对晋人说:“诸侯弭兵,一再重申强不凌弱,鲁国攻占莒国领土,破坏盟约,请求斩杀鲁国的代表。”鲁国参加盟会的代表是叔孙豹。晋国大夫乐桓子想从叔孙豹这里索取好处,然后为他求情。乐桓子派人索要叔孙豹的财物,叔孙豹却不给。他的家臣劝他说:“财货乃身外之物,是为人服务的,怎能因财伤身?”叔孙豹解释说:“诸侯相会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我用贿赂的办法想使鲁国免除灾难,但财富只能助长人的贪欲,非但不能帮助鲁国,只会使它遭受进攻。人们盖了房子是用来阻挡坏人的,自己把墙壁弄破裂,强盗入室行窃,又该怨谁呢?这件事情季武子有责任,但季氏守国,我们出使,这是传统分工,我又能怨谁?随他们怎么办吧!”叔孙豹召来乐桓子的使者,撕下一条绢帛给他,说:“没有什么别的可送。”

晋国大夫赵孟听到此事,说:“叔孙豹身临祸患不忘国家,这是忠心;意识到危难而不放弃职守,这是诚恳;为了国家利益而不畏惧,这是坚强;申明大义,这是懂得道义。这样的人能伤害吗?”于是向楚人解释说:“鲁国固然有罪过,但他们的使者不逃避责任,恭敬地等候处置,这样的人怎能杀害?如果贵国有这样忠诚的大臣,那国家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安抚贤人,树立表率,这是为政的原则。鲁国的叔孙豹正是这样的贤人,请贵国赦免他。况且,边界问题从来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尧舜时代有三苗,夏代有扈氏,商朝有邳氏,周朝有徐国和奄国,都是因国界问题发生纠纷,好在当时有开明君主,使问题得以澄清。自那时以后,诸侯相争,谁能说得清?作为盟主,应该注意大的祸乱,不要被琐事烦扰。鲁、莒两国争夺郓地由来已久,别人不好去管。请贵国三思。”由于晋国人的保护,才使叔孙豹幸免于难。叔孙豹对季武子极为不满。

叔孙豹回到鲁国,季武子到叔孙氏家中去看望,一大早就到

了叔孙氏家里，然而叔孙豹避而不见。季武子的御手曾夭对曾阜说：“从清早一直等到中午，我们也知道自己错了。忍让治国是鲁国的传统，在国外都忍让了，回到国内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曾阜说：“他在外几个月，我们等一个上午，有什么不可以？”随后曾阜走进内室对叔孙豹说：“该出去了吧？”叔孙豹指着屋里的柱子作比喻说：“它有时挡路碰痛你，又去不掉，没有办法。”随即出去会见了季武子。

鲁昭公四年，莒国发生内讧，莒国国君新即位而不知安抚百姓，百姓背叛了他。鲁国乘机吞并了莒的邻国鄫国。鲁昭公十年，鲁国又出兵攻伐莒国，占领了郠邑（今山东沂水境内）。

鲁昭公十八年四月，鄅国的国君巡视藉田，邾国军队趁机袭击鄅国。鄅国人准备关闭城门，但为时已晚，邾国军队冲入城内，将鄅国人都俘虏回去。鄅君说：“我什么都没有了，到哪里去呢？”于是到了邾国，邾国放了他的夫人。鄅夫人是宋国大夫向戌的女儿，宋国出兵讨伐邾国，占领了邾国的蟲地。邾国恐惧，放掉了鄅国俘虏回国。

鲁昭公二十三年，邾国在翼（今山东费县西南）地修筑城池，完工后返回国都，打算抄近路走经过离姑的那条路线。走这条路要经过鲁国地界，如不事先征得鲁国同意，有可能会遇到麻烦。公孙钼说：“邾、鲁两国关系不好，走这条路有危险。”于是考虑走武城那条路，沿着山路向南返回。行至半途，徐钼等人说：“这条路险峻，万一碰上雨天，我们就回不去了。”又改变主意决定走离姑。这时已经靠近武城，武城也是鲁国的边邑。武城人前面堵住去路，后面设下埋伏。邾国人返回的时候，遭鲁人伏击，伤亡惨重。

邾国人无端遭此劫难，便向晋国那里去告状，晋国派人到鲁国问罪。鲁国派叔孙婼到晋国去解释，晋国把他囚禁起来。晋国让鲁、邾两国的代表当面对质，叔孙婼不同意，说：“周代的礼法

规定，大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君主，我不同邾国的大夫辩论，由我的助手子服同他们交涉。”

叔孙婼的态度使晋人很恼火，韩宣子打算把叔孙婼押送到邾国使者那里，让邾国人处置。叔孙婼闻听此讯，一个人赶到韩宣子那里质问。晋国大夫士弥牟劝告韩宣子说：“把叔孙婼交给邾人，他肯定会丧命。鲁国失去叔孙婼，必会出兵伐灭邾国。邾国亡了国，这些使者归到哪里？恐怕到那时您就难办了。盟主的主要任务是讨伐叛逆，不插手那些琐细的事情。否则，整日为小事奔忙，哪里还是盟主？”韩宣子这才改变主意。

晋国的范献子想从叔孙婼这里索取好处，派人讨要叔孙婼的帽子。叔孙婼知道范献子的用意，不但不给帽子，反而找了两顶其他人的帽子送出来，说：“我们的东西都在这里了。”鲁国国内得到晋人索贿的消息，派申丰带着丰厚的礼品到晋国。叔孙婼派人通知说：“让申丰来见我，我告诉他把东西送到哪里。”申丰到了叔孙婼那里，叔孙婼把礼品全部扣留，一件也没送给晋人。箕地的官吏讨要叔孙婼的狗，叔孙婼不给。临回国前，叔孙婼把狗杀死，请来那位官吏同他一起吃狗肉。临行前，晋国大夫士弥牟前来送行。叔孙婼派梁其踁埋伏在门内，对他说：“我向左边看咳嗽，你就动手把他杀死；向右边看并且笑，你就别下手。”士弥牟对叔孙婼说：“晋国是盟主，把贵国使者久留了。临行前，特派我送来一点礼物，请笑纳。”叔孙婼接受了礼品就回国了。

鲁哀公七年（前 488），季康子准备攻伐邾国，召集大臣们商议。子服景伯不同意出兵，说：“小国服从大国依靠的是信，大国安抚小国靠的是仁。鲁国背弃与诸侯的同盟是不信，攻击小国是不仁。不信不仁，这样的国家很危险。”大夫们也都不愿意作战，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这年秋天，鲁国派大军进攻邾国，到了邾国的城门，还听到邾国国君在听钟乐的声音。邾国大夫茅成子向邾君请求到吴国搬

援兵，郳君不同意，说："郳国离鲁国很近，离吴国千里迢迢，远水解不得近渴！"茅成子见国君无所准备，便投降了鲁军，鲁军顺利地开进郳国都城。鲁军大肆劫掠，俘虏了郳君，把他囚禁在负瑕（今山东兖州西）。

郳国人茅鸿夷带着礼物到吴国求救，吴国应允。第二年三月，吴军进攻鲁国，途经鲁国的边邑武城。武城人过去曾欺负邻近的鄫国人，所以，鄫人带领着吴军攻打武城，没费力就攻下了武城。吴军来势汹汹，孟孙氏有些害怕，问子服景伯："形势危急，你看怎么办？"子服景伯执拗地说："吴军来了就同他们作战，怕什么？况且，是我们攻击郳国才把他们招引来的。"吴军连续攻下东阳、吾梧、蚕室，势不可挡。公宾庚、公甲叔子率军前去迎战。结果在夷地全军覆没，公甲叔子被俘杀死。吴军继续前进，抵达泗水沿岸。

吴国胁迫鲁国订立城下之盟，子服景伯坚决不同意，说："当年楚围宋，宋人易子而食都不肯屈服。我们现在远没到那种程度，订立城下之盟，那是奇耻大辱！我要求坚持再战。"鲁国的执政者不想再战，于是子服景伯同吴国的使者带着草拟的文书到了鲁国外城的莱门，接受了吴国的和平条约，释放了郳君，恢复了郳国。鲁国吞并郳国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八年

《国语·鲁语下》

五尹代政

忠于君主，孝顺父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对不能动摇的两条铁则。当这两项原则发生冲突矛盾，忠与孝不能两全时该怎么办呢？楚国大夫弃疾的抉择可谓悲壮，启人深思……

春秋中后期，楚、晋争霸愈演愈烈，楚共王继承了楚庄王的事业，楚国在南方的势力不断扩展，疆域日广。楚共王去世后，康王即位。康王幼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在几位强臣的辅佐下，仍霸业不衰。

楚共王三十一年（前560），共王得了重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间，忧虑自己死后的谥号，对大臣们说："寡人没有什么美德，年幼的时候就作了一国之君，没有受很多师、保的教训，致使我在鄢陵打了败仗，使国家和大夫们蒙受了耻辱。受各位贤臣之福，使我大难不死，将来我归入先君的祖庙之后，就给我起谥号为'灵'或'厉'吧！至于这两者之间选哪一个，由贤臣们决定。"没有一个大臣回答，共王一定要大家表态，大臣们才点头答应。

这年秋天，楚共王去世。令尹子囊同大臣们商议谥号，大夫们都说："陛下生前已经有了遗嘱，我们依从就可以了。"子囊说："不行！陛下在位期间，励精图志，开创大业，鄢陵之战失利后又知道自己的过错。陛下是用恭敬治国的，应该谥号为'共'。"大臣们都依从了子囊的意见。

吴国趁着楚有国丧，发兵袭楚。子囊派养由基和子庚二人率

兵迎击。养由基说："吴人乘我们大丧前来袭击，肯定认为我们不能动干戈，会轻视我们。你设好埋伏，我去把吴军引诱过来。"子庚依从了养由基的策略，在庸浦（今安徽无为南）大败吴军，俘虏了公子党。

楚康王即位后，为报复吴军的侵袭，命令尹子囊在棠地集结军队讨伐吴国。吴军守城不肯出战，楚军无奈只得撤回。子囊殿后，放松了对敌人的戒备。吴军在险峻地带设伏袭击楚军，楚军大败。败军而归，子囊忧愤不已，不久病逝。临终前对子庚说："吴国兴起，威胁楚国，一定要修筑郢城才能保证国都的安全。"子囊死后，人们赞誉他说："国君死，坚持谥号为'共'；自己临死，不忘国家安全。忠臣啊，有这样的大臣，百姓就有希望。"

子囊死后，子庚继任为令尹。子庚安排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谏官），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文武百官井然有序，没有纷争。

一次，令尹子庚出使秦国，被秦人囚禁。子庚的弟弟给晋国的叔向送去厚礼，请晋国帮助。叔向接受礼物后，对晋平公说："我们可以在壶丘筑城，秦人必定害怕，这样就会释放楚国令尹子庚，阻止我们在那里筑城。用这个办法可以解除楚国的忧患，他们必会感恩戴德。"于是，晋国在壶丘筑城，秦国果然释放了子庚。子庚归国后，楚人送给晋国三百辆车的军赋以表感谢。

楚康王五年，郑国大夫子孔想消灭诸大夫的势力，准备借助楚国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子孔派人与子庚联系，子庚不同意。楚康王听到消息后，派尹宜告诉子庚说："寡人即位到现在五年，在这五年中，军队没有什么活动，人们或许以为寡人只顾贪图安逸而忘了先君的霸业，恐怕寡人死后得不到安葬祭祀了吧！请你认真考虑一下。"子庚听出了此话的弦外音，叹息说："君王大概是怪我贪图安逸了吧！安民乐业是为了百姓，怎么是为了我自己

呢?”然后对使者说:“目前晋国同诸侯的关系很和睦,能否成功没有把握,先让我试探一下。如果行,陛下再行动;不行的话,退兵撤回,国家和军队不受伤害,陛下也不会蒙受耻辱。”

子庚在汾地(今河南许昌西南)集中军队,分发武器,兵分三路进攻郑国。一路渡过颍水,迂回于旃然一带;一路由薳子冯、公子格率领的精锐部队攻打费滑、胥靡、献于、雍梁(皆在今河南偃师、禹县一带),然后向东绕过梅山,进攻郑国东北部;一路由子庚亲自率领,直接攻打郑国首都。当时郑伯带着子蟜、伯有、子张随晋侯攻打齐国,子孔、子展、子西留守。子展和子西知道子孔有阴谋,决定死守城池决不出战。子孔这时不敢出城同楚人接应,子庚率楚军攻城不克,只得撤兵。恰遇大雨,楚军将士寒冷难耐,很多人冻死。

楚康王八年夏天,令尹子庚去世。楚康王任命薳子冯为令尹,薳子冯私下征询申叔豫的意见。申叔豫说:“目前陛下宠臣很多,君王又年轻,国家的事情难办。”于是,薳子冯就推托自己有病,拒不受命。当时正值暑热天气,他在床下掘地,然后放进冰块,把床架在上面。薳子冯身穿两层衣服,外边套上皮袍,吃很少的饭食躺在床上。楚康王派医生去诊视,医生回去报告说:“人很瘦,但气色很好。”康王无奈,就任命子南为令尹。

子南执政后,对家臣不加约束。观起在朝中没有任何职务,不享受俸禄,子南却给了他许多马匹。子南的举动引起群大夫的不满,他们都到康王跟前说子南的坏话。康王准备杀掉子南和观起。子南的儿子弃疾做康王的御车夫,康王每次见到他都装作很悲伤的样子。弃疾不知其故,便问:“陛下近来经常落泪,请问是什么缘故?”康王说:“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令尹为政不善,放纵家臣,大臣们要杀掉他,你还想留在宫中吗?”弃疾为难地回答:“父亲被诛,君王还怎能继续留用儿子?走出宫外通风报信,违抗君命,我也不会那样做!”第二天上朝,康王下令把子南斩杀在朝廷上,

观起被车裂，尸体挂在城内示众。

子南的家臣对弃疾说："我们想到朝廷上把主人的尸体运回来安葬。"弃疾阻止说："君臣之间有规定的制度，看朝廷怎样处理吧，你们不要参与。"过了三天，弃疾请求为父亲收尸，康王答应了。安葬完毕后，手下的人们问："到国外去吗？"弃疾说："我知道父亲将要被杀，但没有挽救，什么地方会收留我这样不孝的人？"手下人转念说："那么，还是做君王的臣下吧！"弃疾又说："不能为父亲报仇，反而侍奉仇人，我无法忍受！"随后悬梁自尽了。

楚康王再次任命薳子冯为令尹，薳子冯无法再推辞，只得受命。公子齮为司马，屈建为莫敖。薳子冯有几个家臣很受宠信，不享受国家的俸禄，但马匹都很多。过了些时候，上朝的时候，薳子冯同申叔豫打招呼，申叔豫不理他，扭头便走。薳子冯奇怪，便跟着他，申叔豫见他跟着，就走入人群里。薳子冯还跟着他走，申叔豫干脆回家了。下朝之后，薳子冯找到申叔豫家中，请教说："您在朝上屡次躲避我，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您，请您指教？"申叔豫回答："同你在一起，我害怕不久就要遭祸殃。"薳子冯问："为什么？"申叔豫直言相告："从前观起受到子南的宠信，子南有了罪过，观起被车裂，往事历历在目，我怎能不躲着你，跟你疏远呢？"薳子冯听后心中忐忑不安，立即告辞回家，自己赶着马车，马车都无法走正于大道上。到了家，对那几个宠臣说："我刚才见了申叔，这是个能使死者复生、白骨长肉的智者呀！能够理解我的就留下，不愿甘于寂贫的请自便！"辞退了那几个行为不检点的家臣，楚康王才放心。

吴人为了报复楚国派水师对吴国的侵扰，唆使舒鸠（今安徽舒城）人背叛楚国。舒鸠是楚的附属国，楚人当然不能容忍其背离。楚康王得到消息立即召集军队，准备攻舒鸠。楚国先派尹寿和师犁祁前去谴责舒鸠人，舒鸠人恭恭敬敬地迎接楚使，并告诉他们决无背叛的事，同时请求楚、舒两国结盟。尹寿和师犁祁回

到楚国作了汇报，康王仍要派兵。遠子冯劝阻说："不能出兵。他们自己说不背叛我们，而且要求结盟，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出兵，等于是攻伐无罪的国家。我们姑且再作观察，看情况到底怎么样，如果真正跟我们同心同德，自然没事；如若不然，再派兵征伐不迟。"康王听从，解散了军队。

楚康王十二年，令尹遠子冯去世，康王任命屈建为令尹，屈荡为莫敖。舒鸠人最终背叛了楚国。康王派屈建领兵讨伐，大军抵达离城（今安徽舒城西）。吴国派军救援。屈建命令右翼部队前进，子强、子骈等人率左翼部队退却。吴军驻扎在楚国两路大军之间达七天之久，两军相持不下。子强提议说："时间拖久了军队会疲惫不堪，有战败的危险，不如速战。现在我带私兵前去引诱吴军，你们挑选精兵摆好阵列，等待我的结果。我战胜了，你们迅速攻击；我若失利，你们看情况决定，这样我军才不致惨败。"

大家依从了子强的建议，五位大夫带着自己的私兵出击吴军，吴军逃到山上观望，看到楚军主力没有开来，又折回原地抵抗。楚军主力迅速出动，把吴军打得大败。随后猛攻舒鸠，舒鸠战败投降。同年八月，楚国吞并了舒鸠。

屈建也是一个恪守礼法的人。他的父亲屈到爱吃菱角，对家人说："我死了以后，你们祭祀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献上些菱角。"屈到死后，家人祭他的时候添上了菱角；屈建命令家人撤去菱角。家人说："这是先公生前嘱咐的。"屈建说："不行。家父在国家执政的时候，政令严明，百姓信服，诸侯赞誉。祭法有规定：国君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猪、犬，庶人用鱼。不允许添加自己想要的东西。先父虽去世，他也不想违犯国家的礼法。"最终没有献菱角。

屈建执政时期，楚国实行了军赋制度改革。当时𫇭掩担任司马（军政长官），屈建让𫇭掩拟定具体措施。楚康王十二年十月初八，楚国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高山和森林，水泽的出产，田

亩土壤质量的好坏高低，水塘的面积，等等。在肥沃的农田地区，划出应出军赋的土地面积单位，从面根据土地收入向国家缴纳军赋，包括战车、马匹、甲杖武器等等。清算工作结束后，登记造册，作为以后征收军赋的档案。

楚国灭掉舒鸠，康王奖赏屈建。屈建推辞说："这是前任薳子冯的功劳。"芳掩是薳子冯的儿子，康王把奖品给了芳掩。

楚国的伍举和蔡国的声子二人是好朋友。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为妻。王子牟与申公巫臣关系亲近，申公巫臣逃亡晋国，王子牟也逃到国外。有人举报说："伍举帮助了王子牟叛逃，应逮捕他治罪。"伍举得到消息，匆忙逃往郑国，准备再到晋国。声子受蔡君之命出使晋国，途经郑国的时候，在郊外遇到了伍举。不期而遇，非常惊讶。二人席地而坐，详细谈了事情的经过，伍举谈了自己想回楚国的愿望。声子说："别急，我有办法使你回国。"

宋国的向戌弭兵，声子也积极从中调停，先到晋国，后来又到了楚国。楚国令尹屈建会见声子，询问晋国的情况，问："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谁更贤明？"声子回答："晋国的卿不如楚国，但它的大夫却很有能力，都是卿相之材。这些人才很多是从楚国去的，就像楚国产生的杞木、梓木被晋国使用一样。"屈建不解地问："这些到晋国去的大夫难道在楚国就没有宗族亲戚吗？"声子回答："虽然有，但楚国不会收留任用他们。我听说，一个国家若要富强安定，必须赏罚严明。只有赏罚严明，才能使贤才效力，盗贼逃遁。失去贤人，国家就不会强盛。《诗经》中说：'那人逃亡，国家遭殃。'古代贤圣治国，力求赏罚得当。现在，楚国刑罚失当，很多贤才逃亡四方，为敌国献计纳策，反而危害楚国。析公逃到吴国，绕角之战，晋人采纳了析公的建议，转败为胜；雍子逃到晋国，彭城战役是雍子使晋国转败为胜；申公巫臣逃到晋国，教吴国练兵和使用战车，对楚国危害不小；苗贲皇逃到晋国，鄢陵之战使楚军大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屈建感慨地

说：“确实如此。”

声子继续说：“恐怕今后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叛逃，人们说伍举参与了，伍举害怕逃到了郑国。听说晋国要封给伍举采邑，让他到晋国效力，可是伍举时刻惦记着回楚国。你们该认真考虑怎么处理了。”屈建听后立即汇报了康王，康王决定给伍举重要职务和优厚俸禄，召伍举回国。

总之，在楚康王即位的短短十几年中，先后有五位令尹执政。虽然康王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但在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的辅佐下，使楚国免除灾难，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军赋制度的改革，保持了楚国与晋国争霸齐驱、弭兵平分秋色的政局。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十三年至二十六年

《国语·楚语下》

庄公尚武

齐国一心想充当东方霸主。齐顷公时期，齐国侵犯鲁国和卫国，晋国出兵干涉，晋、鲁、卫三国军队在靡笄山下把齐军打得大败，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卫两国的领土。第二年齐顷公亲自到晋国拜见晋景公，受到晋国大臣们的嘲笑和奚落。

顷公死后，灵公即位。随着时光的流逝，齐国人逐渐淡忘了靡笄战败的耻辱，又作起了称霸东方的美梦。齐灵公二十五年（前557），晋国召集盟国在温地开会，各国诸侯都前去参加，唯独齐灵公不去，派大夫高厚为代表前去与会。开会的时候，各国大夫们为君主吟诗舞蹈，大家约定："诗的内容要同舞姿配合。"齐国大夫高厚怏怏不乐，故意使诗和舞不相和谐，晋国大夫荀偃很不高兴地说："有的诸侯国产生别的想法了！"意指齐国有了三心二意，让各国大夫同高厚盟誓。高厚更加恼怒，拒不参加誓盟，扭头回了齐国。鲁国的叔孙豹、晋国荀偃、宋国向戌、卫国宁殖、郑国公孙虿以及小邾国的大夫在一起盟誓说："我们要共同讨伐不尊敬盟主的人！"

齐国代表满心不快地回到国内，听到诸侯大夫会盟的词句，明明是冲着齐国说的，齐人越想越生气，便把这股怒火发泄到邻近的鲁国人身上。这年的秋天，齐国出动大军气势汹汹地向鲁国北部边疆开来，包围了鲁国的成邑。鲁国大夫孟孺子速率军拦击。齐灵公不想真正开战，便说："这个人喜欢勇敢，我们避开他，成全他这一美名。"随后撤兵回国。

鲁国立即派穆叔到晋国，向盟主报告遭受齐国的侵略。当时晋悼公去世，晋平公初即位，国内尚不太稳定，便推辞说："我们国君尚未举行禘祭大典，百姓也没有得到休息，暂时不能出兵。不过，我们晋国不会忘记诸侯盟会的誓言。"穆叔焦急地对他说："齐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我们鲁国人身上发泄怨恨，使我们终日不得安宁，人们踮着脚尖伸长脖子望着西方，说：'盟军快要到达了吧！'如果等到贵国有了时间，我们鲁国恐怕早就亡国了。"穆叔找到中行献子，为他赋了一首《小雅》中的诗："祈父呀，你是天子的卫士；为何陷我忧患中，使我不能得安居！"中行献子回答说："我知道罪过了，怎敢不跟从阁下，使鲁国陷人灾难？"穆叔又找到范宣子，赋了"小雅"的另一首诗："鸿雁高空正徘徊，声音叫得很悲哀；恐怕只有明白人，知我劳苦在野外；可是那个蠢家伙，说我逞强太骄乖！"范宣子高声说："有我范宣子在这里，怎能让鲁国不得安宁！"齐灵公二十六年夏天，齐国再次出兵攻伐鲁国，在鲁国北部边疆大肆骚扰，包围了桃邑（今山东汶上北）和防邑。鲁国派军援救，郰叔纥、臧畴、臧贾率甲士三百人，夜袭齐国军队，把防邑内的臧纥迎救出来。齐军攻克防邑，俘虏了臧坚，派宦官夙沙卫去慰问他，劝臧坚不要死。这是齐人故意侮辱臧坚，臧坚怒气冲冲地说："感谢你们的好意，你们既然赐我不死，为什么又派一个身体残缺的人来慰问我！"用戈刺进自己的伤口，当即身亡。

齐灵公二十七年秋天，齐国第三次出兵攻打鲁国，鲁国告急，向晋国求救。晋国大夫中行献子准备率军迎救，夜里做梦，梦见自己同死去的晋厉公争辩，自己辩论不过。晋厉公用戈向着自己的头砍来，头被砍落于地。中行献子跪下拾起自己的头颅，安在脖颈上，用双手扶着头走路，半途遇到巫皋。恶梦醒来，不觉一身冷汗。几天后，中行献子在路上遇见巫皋，向他谈起自己梦里的情形。不料，巫皋也做了完全相同的梦。巫皋对中行献子说："看起来你是不会活过今年的，如果能死在对齐国的战争中，对你

的家族来说倒是一件幸事。”

晋国发兵攻齐救鲁，将要东渡黄河，中行献子站在河边，手里提着用丝系住的两对玉器祷告说：“齐灵公倚仗着齐国地势险要和人多，背叛诸侯的同盟，欺凌百姓。我们国君平公率领诸侯前去讨伐，小臣我随同前去，若能成功取胜，我不敢再渡河回国，请圣明的神灵裁决！”说完，把玉沉入黄河。

十月，晋、鲁、宋、卫、郑、曹、莒、滕、薛、杞、小邾各国国君在鲁国济水河岸相会，重申过去的盟誓，共同讨伐齐国。齐灵公率军在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防守，加宽城池的壕沟。夙沙卫对灵公说：“这次诸侯人多，我们若能坚城自守，这不失为上策。”

诸侯军猛烈攻城，齐军很多人战死。范宣子通告齐国大夫析文子说：“你我是知心朋友，向你通报些实情。鲁国和莒国都请求带一千辆战车从各自的方向围攻齐国，如果他们开到，齐国能否存在下去就不好说了，你自己应该早找条出路。”析文子把这话告诉了齐灵公，灵公有些害怕。晏婴知道后生气地说：“国君本来就没有勇气，现在受到惊吓，恐怕活不久了！”

齐灵公登上巫山观察晋军的阵容。晋军派人开拓山林中的险路，漫山遍野都布置了士兵，在军队达不到的地方，也要树上一面旗帜。战车上左边是真人，右边放上假人，战车后边拖曳柴木，跑起来尘土飞扬。齐灵公看到晋国这么多军队，犹如天兵天将，吓得连夜逃走。随后，齐军大队人马也撤退了。

第二天清晨，平阴变成一座空城，乌鸦落在城上得意地啄叫。师旷对晋平公说：“乌鸦在城上叫得这么愉快，齐军八成是逃走了吧！”有将士来报告，齐军已经撤走。

十一月初一，诸侯联军开进平阴城内，随后就继续追赶齐军。齐军宦官夙沙卫把战车捆系起来堵塞山间小路，自己带着部分士卒殿后。殖绰和郭最看见后说：“堂堂齐国，由你这样的人领兵殿

后是耻辱！你先撤吧。”夙沙卫把马匹杀死堵在路上。晋将州绰追赶上来，嗖嗖两箭，一箭射在殖绰左肩，一箭射在右肩，高声叫道：“站住！你停在那里不跑，饶你作俘虏不死；如若不然，就射你的喉咙，要你的命！”殖绰回过头说：“你要发誓。”州绰发誓说：“有太阳神作证！”殖绰停下来不再逃跑，州绰扔下弓箭，把殖绰绑了起来。晋将具丙将郭最捆绑，把两个俘虏推到了战车上。

诸侯联军兵分多路进攻齐国：鲁国和卫国的军队进攻险要地带，荀偃率领中军攻占京兹（今山东平阴东南），魏绛、栾盈率下军攻克邿地（今山东平阴西），赵武、韩起率上军包围庐地（今山东长清西南），没有攻克。十二月，晋军抵达齐都临淄外围的秦周，砍伐了雍门外的萩木林。范鞅领兵到了雍门之外，勇士追喜冲上前去，在城门下杀死一条狗，孟庄子砍下一块城门的木头。随后，晋军纵火焚烧雍门和西、南两侧的外城。几天后，又放火烧了东、北两面的外城。

外城攻破，晋军继续攻打内城，范鞅率领军队攻打扬门，州绰攻打东闾门，遇到齐军的殊死抵抗。齐灵公胆怯，打算逃到邮棠（今山东平度东南），太子光和大夫郭荣拉住灵公的战马，给他壮胆说：“敌军虽然凶猛，但他们不会坚持长久，就要撤退了，没什么可怕。作为一国之君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会亡国亡民。一定要坚持下去！”灵公还是不听，打马向前走，太子光抽出宝剑斩断马鞅，战车才停下来。晋军见临淄城难以攻克，向东攻至潍水，向南攻至沂水。诸侯军在沂水会合，各国再次结盟说：“大国不准欺负小国。”然后撤兵回国了。

早年，齐灵公在鲁国娶颜懿姬为夫人，没有生孩子。陪嫁的声子生子光，灵公就立了光为太子。后来，灵公又纳妾，戎子很受宠爱，也没有生儿子。仲子生了公子牙，把他托付给戎子。戎子要求灵公立公子牙为太子，齐灵公又答应了。公子牙的母亲仲子有些担心，劝阻说：“这怎么行！违背国家的制度，弄不好会出

乱子。光已经被立为太子，并且已经参加了诸侯的会盟，尽人皆知。平白无故地废黜他，既违背国家的制度，又触犯天下的诸侯，恐怕将来陛下也会后悔。”灵公不在乎地说：“一切由我安排，没你的事。”不久，灵公就把太子光派往东部边境地区，任命高厚为公子牙的太傅，正式宣布牙为太子。又任命夙沙卫为少傅。

齐灵公二十八年，灵公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崔杼偷偷地把太子光从东部边境地区迎回，宣布光是真正的太子。太子光杀死戎子，暴尸于朝廷。五月二十九日，灵公死。太子光即位，是为齐庄公。庄公派人逮捕了公子牙，认为夙沙卫参与了过去的阴谋，派人追杀。夙沙卫逃到高唐（今山东高唐东），踞城叛国。

同年冬天，齐国同晋国言和，两国在大隧（今山东高唐）结盟。借此机会，鲁国的穆叔前去会见晋国大夫叔向，赋《载驰》这首诗的第四节：“盟于大国，谁依谁靠？”表达了对齐国侵略的恐惧。叔向立即表态：“晋国随时听候贵国的招呼。”穆叔回到鲁国后，对国君说：“齐国人狼子野心，我们不能不警惕。”鲁国就在武城筑城。

齐庄公元年（前553），鉴于齐国言和，晋国以盟主身份召集鲁、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各国君主到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北）聚会，订立同盟条约。第二年冬天，晋平公以盟主身份召集同盟各国到商任（今河南安阳境内）开会，通报晋国大夫栾盈的罪过，各国不得录用。晋国为了内部的政事而劳驾诸侯各国，有些诸侯表示出不满的样子，齐庄公显得非常不情愿。晋国大夫叔向议论说：“齐庄公恐怕不会得善终。诸侯聚会，讲究的是礼仪。齐庄公不遵从礼仪，说明他在国内同样礼法松弛。不发生内乱，那才怪呢！”

然而，就在盟会不久，晋国栾盈的党羽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逃到了齐国，齐庄公收留了他们。一天，庄公安排大臣们会见，庄公指着殖绰和郭最对州绰说：“我这里勇士济济，他们二人

就像永远不败的雄鸡！”州绰不以为然地说：“陛下说他们是雄鸡，谁敢说不是？然而小臣不才，在平阴之战中，比他们二位先鸣叫了（喻俘虏了他们二人）！”庄公为勇士们排定爵位次序，殖绰和郭最想要一份，州绰自荐说：“攻打东闾城门那次战役，我的马匹被挂在城门下，我把城门上的乳钉都数了一遍，是否可以安排个职位？”庄公说：“我知道你勇猛超人，不过你过去做的事情都是为晋君效力呀！”州绰傲视地说：“为臣为陛下效力不久，没有机会罢了。如果那二位是猎兽的话，我能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

第二年秋天，栾盈也从楚国投奔到齐国，庄公热情收纳。晏婴警告庄公说：“去年诸侯在商任相会，晋平公已经有言在先了。现在陛下收纳栾盈，准备怎样安排他？小国事奉大国靠得是信用，没有信用就难以立足，请陛下三思！”庄公不予理睬。

齐庄公是一位崇尚武力而不行仁义的国君，当时的朝廷中亡命徒聚集，仁义之士远避。庄公不但不以此为忧，反而引以为自豪。一天，晏婴会见庄公。庄公问：“难道古代的圣贤不是靠武力兼并天下的吗？”晏婴答道：“诚然如此，不过，仅仅靠武力还是不行的，必行仁义才能得人心。古人说：按礼法办事，不畏死亡，这叫勇敢；铲除坏人，不畏惧坏人的强悍，这叫力。从前，商汤和周武王虽然灭掉了别人的国家，这不算贪心；军队周行天下，也不算叛逆。为什么？因为他们顺行了礼义，得人心。相反，夏代末年任用了勇猛无匹的推侈、大戏，商朝末年收纳了费仲、恶来，这二人日行千里，力搏猛兽。怎么样呢？他们欺凌善良，无恶不作，最终导致了国家灭亡。前车之鉴，不可不思！”

《淮南子》中叙述了一个齐庄公尚武的小故事。一次，庄公外出打猎，途中看到一只小虫在奋力阻挡车的轮子，企图将车挡住。庄公觉得有趣，问车夫：“这是什么昆虫？”车夫回答：“这种昆虫叫螳螂，只知前进，不知后退，而且不估计自己有多大力量，轻视敌人。”庄公赞赏说：“好，勇敢！它若是人的话，必定天下无

敌!"命令车夫绕开螳螂行走。这个故事表明，齐庄公不行仁义、一味追求武力在当时是声名远扬的。

齐庄公四年，齐国忘记了战败的创痛，背叛与诸侯各国的盟约，大规模攻伐卫国。晏婴劝阻说："陛下一味倚仗武力，背叛盟主，如果这次行动不成功，算是国家的福气；如果成功了，恐怕要有灾难降临到国君头上了!"崔杼也劝谏说："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为臣听说：'小国钻大国的空子，一定会遭殃。'陛下还是应该冷静一下。"庄公一概不听。

进攻卫国之后，继续西进，进攻晋国，占领朝歌（今河南淇县境内）。齐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西侧的孟门（今河南辉县西）北上，另一路向东边的太行陉北上。齐军攻势凶猛，一直攻到离晋都不远的荧庭（今山西翼城东南），将晋军士兵的尸体收集起来，埋在一个大坑里，上积冢土，树立标志，以炫耀齐军的武功。到这个时候，齐庄公似乎算是出了受晋国攻伐的怨气，打道回师。

齐军从晋国耀武扬威地回来，没有回首都，又继续袭击莒国。猛攻莒国的城门，齐庄公受伤才暂时停止攻击，准备第二天再战，约定大军在寿舒集中。当天夜里，齐军将领杞梁和华还带领部队进入且于一带的狭路，准备在这里宿营，第二天突袭莒国。第二天，杞梁率领的这一支部队与莒国国君率领的大队人马遭遇，莒君送给杞梁重礼，不愿让他们自讨灭亡，说："我们结成同盟怎么样?"华还一听莒君是让他们投降，说："贪于财物而违背君主的命令，您也不喜欢这样的人。昨天我们受命于国君，怎么能今天就背叛!我们别无选择。"于是齐、莒两军交战，莒君亲自擂击战鼓，齐军寡不敌众，大败，杞梁战死。可悲的齐庄公，此时竟同莒国停战言和。

齐庄公攻伐卫、晋、莒三国后，率大军回到国都。不久，又害怕晋人报复。第二年夏天，准备联合楚国共同抗晋。楚君派芳启疆到齐国访问，商议两国君主具体相会的有关事宜。齐庄公又

大规模检阅军队，让楚国使者观看。陈文子忧心忡忡地说："炫耀武力终将危害自己，齐国的大难就要临头了。"

同年秋天，齐庄公听说晋国准备发兵伐齐，就派大夫陈无宇跟随楚国前来的使者到楚国，请求楚国发兵援助。当时，晋平公召集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等各国君主在夷仪（今河北邢台西）开会，决定联合出兵伐齐。不料，由于发生水灾，这次伐齐没有得以实现。

虽然上天暂时缓和了齐国的外部威胁，但不能改变齐庄公的悲剧命运。由于他在国内为所欲为，使大臣心怀嫉恨，终被崔杼杀死，落得可悲的下场。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十六年至二十四年

《晏子春秋》

崔庆之乱

自古以来，同姓不婚。然而在齐国，不但发生了同姓而婚这种违背礼法的事情，而且作为一国之君的齐庄公也干出了有悖人伦的龌龊勾当，直接导致了杀身内乱的惨剧。

崔杼出自齐国公族，崔氏世代任齐国卿大夫，崔杼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齐惠公的宠爱。齐惠公十年（前599），惠公去世，齐国的世卿国氏、高氏两大族担心将来崔杼势力太大难以控制，就把他赶出国外。崔杼逃到了卫国。

齐国大夫庆克是个荒唐无稽的家伙，齐惠公死后，竟勾引惠公的夫人、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与她通奸，身上穿着女人的服装同别的女人同乘一车往来于后宫。鲍牵见到了，把这事报告了国武子。国武子听后很愤怒，把庆克召去臭骂了一顿。庆克有些害怕，躲在家里不敢再到声孟子那里去，派人告诉她说："国武子责骂了我。"声孟子失去了庆克，对国武子恨之入骨，便寻机报复。齐灵公八年（前574）夏天，灵公到柯灵（今河南许昌南）参加诸侯会盟，国武子陪同前往，高无咎、鲍牵留在国都。齐灵公回国，将要到达首都时，恰逢关闭城门检查城内行人。灵公回到宫中，声孟子借机诬陷说："当初高无咎和鲍牵准备把你关在城外，废黜你而另立公子角为国君，国武子也参与了这场阴谋。"齐灵公听后不辨真伪，竟然相信了。七月三十一日，在朝廷上下令砍掉鲍牵的双脚，将高无咎赶到国外。高无咎仓皇逃到莒国，高无咎的儿子高弱占据封邑卢地（今山东长清西南）发动叛乱。齐灵公派人从

鲁国召回鲍国继承鲍氏的爵位。由于国武子跟随自己在外，所以齐灵公没有处罚国氏。

高、国两族失势，崔杼大摇大摆地回到齐国，灵公任命他为大夫，并派他和庆克二人率军包围庐地的高氏。当时国佐正率军跟随诸侯讨伐郑国，获悉国内发生变故，立即率军赶回国内。到了庐地，杀死庆克，然后占领谷邑（今山东东阿）叛乱。齐灵公已经知道关闭城门一事出于偶然，便赦免了国佐，同他盟誓后恢复了他的官职，庐地的高弱也归服了齐灵公。

然而，国佐和高弱回都不久，在声孟子的唆使下，齐灵公又改变了主意。齐灵公九年正月二十九日，灵公派士华免把国佐杀死在宫廷的前厅，其他大夫吓得惊慌失措，纷纷逃到夫人的宫里。随后，又命令清地（今山东聊城西）人杀死了国佐的儿子国胜。国弱逃亡鲁国，王湫逃到莱地。齐灵公任命庆克的儿子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不久以后，齐灵公又让逃到鲁国的国弱回到齐国，继承国氏的卿位。齐灵公执政无道、反复无常，不但使内政混乱，而且埋下了此后动乱的祸根。

不仅如此，齐灵公在继承问题上违背宗法制度，随意废嫡立庶。周代的宗法制度规定，只有嫡（正妻）长子才有继承父亲爵位财产的资格，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防止贵族内部争夺权位。齐灵公从鲁国娶了夫人，名叫颜懿姬，颜氏无子。颜氏的陪嫁声姬生下公子光，灵公把他立为太子。灵公的姬妾很多，后来移情于戎子。戎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强求灵公废黜太子光，另立公子牙为太子。无道的齐灵公竟然应允，把太子光废黜，赶到东部边鄙地区，立牙为太子，让高厚当太傅，夙沙卫当少傅。

齐灵公二十八年，灵公病危，不久于人世，野心勃勃的崔杼暗中把公子光接回齐都，宣布他是当之无愧的太子，大夫们默认了。太子光立即动手杀死戎子，暴尸于朝堂。五月二十九日，灵

公死，太子光即位，他就是尚武不仁的齐庄公。庄公即位后，派人追至句渎之丘囚捕了公子牙，并追捕夙沙卫。夙沙卫占领高唐（今山东高唐东）叛乱。同年八月，大夫崔杼借机报私仇，杀死高厚，兼并了高氏的封邑。齐庄公命令庆封带兵围攻夙沙卫占据的高唐，没有攻克。十一月，齐庄公带大队人马增援，把高唐重重包围，呼唤夙沙卫。庄公问："你城里的防卫力量怎么样，准备如何较量？"夙沙卫作礼回答："防守甚弱，不过愿意奉陪到底！"齐庄公命令军队冲锋，士兵冲到城下缘城而上，守军奋力抗击。当天夜里，守城军将殖绰、工偻从城墙上垂绳而下迎纳齐军入城，夙沙卫猝不及防，城池陷落，夙沙卫被杀。齐庄公二年（前552），庄公任命庆佐为大夫，命他率兵围攻躲到句渎之丘的公子牙，将公子牙囚捕。公子钼逃到鲁国，叔孙还逃亡到燕国。

崔杼拥立庄公为君，功盖齐国，受到庄公的宠信，权势日大。齐国的棠公去世，崔杼前去吊唁，由东郭偃为他赶车。棠公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吊唁的时候，崔杼看到棠公的妻子很漂亮，顿生淫欲，要东郭偃帮忙，让棠公的遗孀嫁给他自己。东郭偃劝阻说："自古以来同姓不婚，这是制度。您是丁公的后代，臣是桓公的后代，同为姜太公之后，怎能成婚？"崔杼无言答对，命人占筮，结果是从"困"卦演变成"大过"卦，占卜人说："这可是个吉祥卦。"崔杼很得意，拿给陈文子看。陈文子不以为然地说："不吉祥。从卦象上看，'困'卦的下边是'坎'，象征中年男人，'大过'卦的下边是'巽'，象征着风，发展趋势是夫从风；而两卦的上边都是'兑'，象征少女，年轻的女人乘在风上，必会坠落。而且爻辞的内容是：'被石头围困，据守在蒺藜丛中；进到屋内，不见妻子，凶。'被石头所困，意味着不能成功；身处蒺藜丛中，意味着倚靠的东西伤人；回到房中，不见妻子，意味着没有归宿。没有比这样的卦更凶险的了！"一盆冷水把崔杼浇得凉了半截。但他欲火不灭，强词说："她是寡妇，死去的丈夫已经承担了凶险，对

我无害。”硬是把棠姜娶了过来。

见到棠姜的玉容娇姿，齐庄公也顿萌春心，不断地到崔杼府中，同棠姜干起了风流勾当。不仅如此，还不把崔杼放在眼里，故意把崔杼的帽子带到宫中，赐予别的大臣。侍从劝告说：“陛下切不可这样！”齐庄公不在乎地说：“拿他一顶帽子算得了什么！”崔杼妒火心中燃烧，又受到庄公这般侮辱，气得咬牙切齿，决心寻机报复。晋国发生内乱的时候，齐庄公发兵袭扰，崔杼就想杀死庄公以取悦于晋人，只因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才没动手。齐庄公六年春天，齐庄公派崔杼带兵攻击鲁国，鲁襄公害怕，急忙派人向晋国求救。鲁国大夫孟公绰却说：“崔杼这次行动异常，对百姓和蔼可亲，军旅所到之处不劫掠，恐怕他要有大行动了。所以，这次进攻鲁国不会真正用心，不必害怕。”

齐庄公的仆人贾举平白无故地受到庄公的鞭打，十分痛恨庄公。崔杼知道这一情况后，将贾举拉拢到自己一边，准备利用贾举杀掉庄公。同年五月，莒国的国君到齐国访问，庄公在都城北部设宴招待莒君。崔杼见时机来到，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见，声称自己有病。五月十七日，齐庄公假借看望崔杼的名义，又找棠姜鬼混。庄公进了崔宅的大厅，姜氏进了内间，跟随崔杼从侧门溜了出去。庄公在厅里等待，拍着柱子唱起歌来。仆人贾举把别人挡在大厅门外，禁止任何人进去，随后一人进入大厅，关上了厅门。事先埋伏好的士兵一拥而出，将庄公包围。庄公见事情有变，知道事情不妙，登上高台请崔杼免他一死。崔杼此时露面，当然不会留下后患；庄公又请求与崔杼结盟，崔杼还是不同意；请求到祖庙里去自杀，士兵们仍然不放，说：“国君的大臣崔杼现在病重，不能前来听令。这里靠近国君的宫殿，我们夜里搜捕淫棍，不知道别的命令！”齐庄公夺路而逃，士兵一箭射在他大腿上，栽倒在地，士兵们一拥而上，杀死了齐庄公。

崔杼既然已经动手，便一不做二不休，把跟随前来的大臣州

绰、郱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等人都杀死，连贾举也没放过。祝佗父奉命出使，回来后向庄公汇报，在宫中没有找到，便找到崔杼宅中，一进门就被杀死。申蒯是负责渔业的官吏，也随从齐庄公。看到国君被杀，退出门对仆人说："你带着我的妻子儿子赶快逃走，我准备死在这里了。"仆人说："主人死而仆人逃，这不合乎道义！"同申蒯一同自杀。

晏婴当时也跟随着国君，留在大门外。国君和很多大臣被杀，他的家臣问："您也为国君殉职吗？"晏婴反问："难道庄公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我为什么要死？"家臣便说："那您就赶快逃走吧。"晏婴回答："我什么罪过也没有，为什么逃亡？"家臣只得说："那我们回去吧。"晏婴却说："国君死了，能回到哪去？作为君主，难道是要凌驾于百姓之上吗？不是，是为了治理国家；作为国君的臣下，难道是为了讨得高官厚禄吗？不是，是为了尽职工作。所以，如果国君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死，臣下应该为他殉职；如果国君是为了人民而逃亡，臣下也应该随他逃亡。但是，如果他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遭意外，除了他所宠信的那些人之外，别人谁能同他共命运？况且，是别人杀死国君，我有什么责任？我现在既没有道理死，也没有道理逃，也没有什么地方作为归宿了！"大门打开后晏婴走进院子，枕在庄公的尸体上嚎啕大哭，又站起来跳着哭，然后走出大门。有人对崔杼说："杀了他吧！"崔杼说："不行！晏婴深得民心，杀了他不利。"放晏婴走了。

杀了庄公，崔杼立庄公的同父异母弟为国君，是为齐景公。崔杼立自己为右相，庆封为左相（右为上，左为下），召集文武大臣在太公庙盟誓。崔杼宣布盟辞说："如果谁不与崔氏、庆氏同心同德，让他……"话未说完，晏婴仰天长叹道："晏婴如果不与忠君利民的人同心同德，不得善终，苍天作证！"音调颤动悲壮，崔、庆二族无奈，于是大家歃血为盟。

齐国的史官在档案上作下记录："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

见到后，把史官杀死。史官的弟弟继任，接着这样记录，崔杼又把他杀死。史官还有一个弟弟，仍坚持这样记录。崔杼见死并不能动摇人心，只得由他去了。齐国另有一个史官叫南史氏，听说崔杼把史官及家人都杀了，在自家写好同样的竹简到朝中去，听到已经如实记录下来，才回到自己家中去。在中国上古时期，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件都要记录下来。由于有了这一传统，才留给后人大量的确凿可信的历史资料。

崔杼把齐庄公草草安葬在外城的北城，墓坑用砖圈砌，用四把长柄扇随葬（依照礼法诸侯六扇，大夫四扇），用了七辆破车送葬，也没有派士兵护灵。

齐景公二年（前546），齐国的左相庆封前往鲁国访问，服饰奢侈，乘舆华丽异常。鲁国大夫孟孙氏对叔孙氏说："庆封的车真够漂亮呀！"叔孙氏鄙夷地说："我听别人讲：'人的服饰与职位不相称，必会出现恶果。'漂亮的车子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叔孙氏招待庆封吃饭，庆封傲慢不倨，有失礼节。叔孙氏很生气，当场颂了一首《相鼠》诗："老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老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早死！"然而，庆封竟然没有听出这是什么意思。

崔杼最初娶妻，生下两个儿子就死了，一个叫崔成，一个叫崔强。后来，崔杼又续娶了东郭姜（前夫棠公，故曾叫棠姜），生下崔明，东郭姜还带来了前夫的儿子，名叫棠无咎。棠无咎和东郭偃（东郭姜的哥哥）一同辅佐崔杼。崔杼很喜爱小儿子崔明以及棠无咎。崔成有病，崔杼便立崔明为继承人。崔成很不满，请求到封邑隐居，崔杼答应了。然而东郭偃和棠无咎却不给他封地，说："崔氏封邑是崔家祖庙所在地，只有宗主才能占有。"崔成和崔强见受制于家臣，打算杀死他们，找到庆封说："家父的为人您是了解的，现在偏偏又宠信棠无咎和东郭偃，把我们兄弟排挤在外。我们只怕将来出什么伤害老人家的事，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庆封对他们兄弟二人说："你们二位先回府，容我考虑一下。"庆封把这事告诉了家臣卢蒲嫳，卢蒲嫳说："崔杼是国君的仇人，犯下了滔天大罪，现在他家出了内乱，或许是上天要处罚他了！崔氏内乱，您担心什么？崔氏的削弱，就是庆氏的强大。"几天后，崔成和崔强又找到庆封，抱怨他们的父亲崔杼。庆封当即表态："如果除掉棠无咎和东郭偃对你家有利，我理应当仁不让。有什么困难，我来帮助你们！"庆封的怂恿直接导致了崔氏的内乱。

齐景公二年九月初五，崔成、崔强把东郭偃和棠无咎杀死在崔氏府中，家人吓得四散而逃，崔杼反而无计可施，离家出走，找车夫套车竟然找不到。让养马人套上马车，宦官为他赶着马车匆匆离开家门，口中喃喃自语地说："如果崔氏家族有福气，就让祸害停止在我自己身上吧！"找到庆封家里，庆封假惺惺地说："崔、庆是一家人，您的事情我责无旁贷！他们怎敢这样胡作非为，我为您讨伐他们！"

庆封命令卢蒲嫳带领人马讨伐崔氏，崔成、崔强加筑府宅顽强坚守，攻打不下。庆封就动员国内的人们共同攻击，就这样灭亡了崔氏，杀了崔成和崔强，夺取了崔家的全部人口和家产。崔杼的妻子上吊而死。卢蒲嫳带着人马回府向崔杼报告，崔杼呆若木鸡。卢蒲嫳赶着车把崔杼送回家，这哪里还像是家，人财皆空，已经无家可归了，崔杼便悬梁自杀。可悲的崔杼，弑庄公，杀大臣，可谓文武双全的一代枭雄，最终落在庆氏的圈套中竟毫无察觉，终至家破人亡。崔明乘夜躲到了墓地里，然后逃到鲁国。

除掉崔杼，齐国执政大权落入庆封手中。庆封喜欢打猎和酗酒，让他的儿子庆舍主持政务，自己带着妻妾和饮食到家臣卢蒲嫳家中，整日饮酒作乐，交换妻子陪着喝酒。庆封不上朝，官员们只得到卢蒲嫳府中汇报工作。庆封宣布，凡是因崔杼之乱逃亡在国外的人，只要检举崔氏的余党，可将功折罪，允许回国。卢蒲癸就在这个时候回齐国，做了庆舍的家臣，受到庆舍的宠信，庆

舍把女儿嫁给了他。庆舍的家臣对卢蒲癸说："男女结婚应区别是否同姓，卢氏同庆氏都是姜姓，你为什么不回避呢？"卢蒲癸却说："同姓的人赐我婚姻，怎么让我单方面回避，这叫什么道理？赋诗的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我为什么躲避？"同庆氏结成了婚姻同盟。卢蒲癸又向庆舍推荐流亡在外的王何，庆舍派人将王何召回，二人都受到庆舍的宠信，庆舍让他们二人持戈作为随身护卫。

庆氏专权，为所欲为。按照规定，齐景公每日应该供应两只鸡，作为膳食，然而，负责饮食的人给换成鸭子。送饭的人知道了，干脆把鸭子也拿走，只给齐景公送汤吃。公族的子雅和子尾二人知道后，对庆氏口出怨言。庆封想把子雅和子尾杀掉，杀一儆百，示人以威，便把这事告诉了卢蒲嫳。卢蒲嫳气势汹汹地说："我杀这两个家伙就像杀鸡一样毫不费力！"

庆封有了动手的念头，先要得到大臣们的默认。派析归父把此番含义通知了晏婴，晏婴畏惧地说："婴智不足谋，人不足用，实在难以效力。不过，我是决不会把消息透露给任何人的，我们盟誓吧！"析归父回去向庆封汇报，庆封说："话已至此，还盟誓干什么！"庆封又派析归父向大夫北郭子车打招呼，子车回绝说："人各有志，你们想做的事我不愿去做。"陈文子得到了庆封要有所动作的消息，对儿子陈无宇说："国内又要爆发动乱了，不知我们从中能得到些什么好处？"陈无宇回答："得到庄街上庆氏家族的木材百车！"陈文子会意地笑了："那我们可要谨慎地保住它。"

就在庆氏家族阴谋准备的同时，齐国的栾氏、高氏、陈氏、鲍氏诸家卿大夫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消灭庆氏家族。他们收买了庆舍的扈从卢蒲癸和王何，让他们二人作内应。在即将动手之际，卢蒲癸和王何拿着占卜的龟甲给庆舍观看，说："有人为消灭仇敌而占卜，请您看这龟兆怎么样？"庆舍竟然毫无警觉，应付着说："取胜了，而且见了血。"

齐景公三年十月，庆封到莱（今山东昌邑东南）地打猎，陈

无宇跟着一起去了。十七日，陈文子派人召陈无宇火速返都，对庆封请假说："无宇的母亲病重，要他立即回去。"庆封命人为他占卜，把结果拿给陈无宇看，陈无宇故意声张说："这可是必死无疑的结果！"手捧着龟甲放声痛哭。庆封信以为真，就让他回去了。庆封的族人庆嗣听说陈无宇突然回都，觉得事情蹊跷，便警告庆封说："我看情况有变，我们应立即回都。陈文子老奸巨滑，突然召他儿子回去决非偶然。如果我们迅速返回，还来得及，事变大概发生在尝祭（秋祭）的时候！"庆封却不以为然。庆嗣对别人说："庆封执政不得人心，树敌过多，在国内难以长久立足，八成他是准备逃亡国外了，或许会逃到吴国或越国。"陈无宇匆匆返都，过河之后沉了船，拆了桥，断了庆封的归路。

卢蒲癸准备动手，他的妻子、庆舍的女儿姜氏看出了苗头，对他说："你有事情瞒着我，必然难以成功！"卢蒲癸也就毫不隐讳地告诉了她。姜氏说："我父亲性格倔强，没有人阻拦他，他倒不会前去。让我去劝阻他！"卢蒲癸说："那好吧！"

十一月初七，在太公的庙里举行秋天的尝祭，庆舍准备前去参加。他女儿姜氏告诉他："有人要搞政变，千万不要去！"庆舍不听，说："我看谁敢这样胆大妄为！"亲自前往姜太公庙。卢蒲癸、王何执戈跟随庆舍，庆舍让士兵将太公庙围住担任警卫。陈氏和鲍氏的人在那里表演舞蹈，庆氏的马受惊，四处奔跑。士兵们也都解下甲胄去观看舞蹈了，离开了岗位。栾氏、高氏、陈氏、鲍氏的族兵乘机穿上他们脱下的甲胄，拿走他们的武器。子尾看见时机已到，按预定的暗号用木槌在门上敲了三下，卢蒲癸立即用戈对准庆舍后背刺去，王何也举戈向庆舍砍来。庆舍身受重伤，一步跳起，用手抓着庙宇的房檐，随后抄起盛肉的俎和壶向敌人投去，终因伤势太重倒地死亡。卢蒲癸等人又杀死庆绳和麻婴等庆氏同党。突然的事变使齐景公万分恐惧，不知如何是好。鲍国对景公说："陛下不必害怕，大臣们是为陛下铲除庆氏。"陈须无

领着齐景公走进内宫去了。

庆封打猎完毕归来，迎面碰到前去报告的人，知道已经发难，便率领人马攻打都城西门，没有攻克。转攻北门，北门失守，庆封率军攻入城内，又继续围攻宫殿区，没有攻下。庆封要求同宫内的人举行决战，对方不同意，庆封无奈，只得率领人马逃奔鲁国。

到了鲁国，庆封把华丽的乘舆献给季武子，车的光泽可以照出人影。鲁国的庄展叔去见季武子，看见庆封送的车，议论说："这么漂亮的车，无非是民脂民膏，他无家可归纯属罪有应得！"叔孙穆子设宴招待庆封，庆封却先祭神灵。依照礼法，这是主人的事情。叔孙穆子很不高兴，让乐师赋《茅鸱》这首诗讽刺他，庆封也不明白。不久，齐国派人来责问鲁国收容叛臣，鲁人不敢得罪齐国，庆封只得逃往吴国。

庆封逃到吴国后，吴王勾余热情欢迎，并把朱方（今江苏丹徒南）赏赐给庆封。后来，庆封在吴国恢复很快，他的族人纷纷聚拢到那里，财富超过了他在齐国的时候。

庆氏逃亡后，齐国召集崔杼作乱时逃亡国外的人们回国，为他们准备了生活用具和封邑。然后，求取崔杼的尸体，准备戮尸，却没找到。不久，有一位过去崔氏的家臣前去报告说："如果你们把崔杼的大玉璧给我，我愿意告诉你们他的尸体在哪里。"齐国人重新按国君的葬礼安葬了齐庄公，把崔杼的尸体挖出，暴尸于大街上。齐国的人们从大街上经过，看见崔杼的尸体都知道是他，指点着说："这就是崔杼！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下场。"

（张荣明）

参考材料：

《左传》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八年

《史记・齐太公世家》

向戌弭兵

春秋无义战。自大国争霸出现后，诸侯之间兵戎相见，社会上没有一日真正的安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受害最重的是那些小国，受争霸大国的蹂躏苦不堪言。向戌弭兵就是弱小国家试图调停大国相争、使世界获得暂时安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能够成为现实吗？

公元前六世纪中期，晋国的执政大夫是赵文子。赵文子是一位开明的士大夫，他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当时的国际关系，减轻弱小国家缴纳给晋国的贡品。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秋天，鲁国大夫叔孙豹到晋国访问，当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时，赵文子推测说："从现在的形势分析，齐国的崔杼、庆封刚刚执政，他们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会改善同诸侯的关系；我同楚国令尹屈建关系较为密切，假如他循行礼节，有人从中调停，晋、楚关系有望得以改善。我分析，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战争是有可能停止的。"

几年前，在齐国的内乱中，齐国大夫乌余投靠了晋国。归服晋国后，他却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侵扰邻国，先占领了卫国的羊角城，又偷袭并攻克了鲁国的高鱼城（今山东郓城北），后来又夺取了宋国的一座城池，把这些地方归在晋国的名下，实际上由他自己控制。赵文子执政后，要改善同邻国的关系，晋国侵夺诸侯国土成了一个首要的问题。赵文子劝告晋平公说："晋国是盟主，当诸侯之间相互侵扰违背礼法的时候，晋国就讨伐他们，使其按礼法办事。如今，乌余侵占别国领土，可我们晋国却贪图从中得

到好处，今后还怎样号令诸侯？请求把乌余夺来的土地归还给诸侯。”晋平公说：“可以考虑这样做，派谁具体完成这事呢？”赵文子建议说：“胥梁带足智多谋，能够顺利完成这一任务而兵不血刃。”平公同意，便派胥梁带去办理。

胥梁带接受任务后，立即作了周密的安排。他分别派人通知被占土地的国家和乌余，告诉那些国家说：“请你们速到晋国领取你们丢掉的土地，行动必须秘密。”对乌余却说：“国君准备把土地封授给你，各国也来人核实清楚。”乌余听后很高兴，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前去受封。胥梁带乘机逮捕乌余，把他占领的土地当即归还了各诸侯国。收回土地的各国对晋国感恩戴德，其他各国也纷纷投向晋国。

宋国大夫向戌同晋国执政大臣赵文子很要好，跟楚国令尹屈建的关系也不错，看到各国之间特别是晋、楚之间有缓和矛盾的倾向，想借机沟通晋、楚两国，使他们达成停战的和平协定，使国际间维持和平，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首先来到晋国，向赵文子谈了自己的愿望，希望晋、楚两国达成谅解，停止战争。赵文子召集大夫们商量，韩宣子说：“战争是残害人民的祸端，尤其破坏各国经济，使民不聊生，小国遭灾最为严重。向戌发出倡议弭兵，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虽然战争无法根除，我们却不得不答应。试想，我们不应允，楚国必会答应，借机发动诸侯蛊惑人心，我们岂不被动？”晋国欣然应允了向戌的弭兵倡议。

向戌又前往楚国游说，狡猾的楚国人看得更清楚，也一口答应。向戌又到了齐国，齐国人认为弭兵未必能够实现，徒劳无益。陈须无提醒说：“晋、楚两国已经答应，我们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大家都在高喊停止战争，我们却自作聪明，说战争谁也挡不住，将受到人们的普遍谴责。这是策略问题，一定要答应！”这样，齐国也响应了向戌的弭兵倡议。向戌最后赶到西方的秦国，秦国也满口答应。晋、楚、齐、秦四大国响应，便商定了具体的时间，由

他们负责通知各自的附庸国到宋国共同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国际和平会议。

鲁襄公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晋国大夫赵文子到达宋都。二十九日，郑国大夫良霄也到达。六月初一，宋国人设盛宴招待赵文子，由叔向陪同。第二天，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和陈须无、卫国的石恶等人也先后到达。八日，晋国的荀荼也赶来，邾悼公、楚国的公子黑肱和令尹屈建、滕成公陆续到会。

楚国令尹屈建向向戌提议，希望晋、楚两国的属国相互朝见，向戌把这番意见转告了晋国执政大臣赵文子。赵文子更进一步提议说："各国相见是件好事，齐、秦两国也应前来相见。晋、楚、齐、秦是平等的兄弟国家，晋国不能对齐国发号施令，楚国也不能够对秦国发号施令。如果楚国能让秦国前来开会，晋国也乐意去请齐国前来会面。"

得到晋国的新建议，向戌又转告了楚国令尹屈建。屈建不敢做主，急忙派人去请示楚康王，楚康王不同意，说："除了齐、秦两国外，其他国家都可以彼此会面！"晋、楚两国的意见初步统一之后，赵文子同楚国的公子黑肱正式会面，拟定了会议的日程。

当时，各国代表都用篱笆隔离开，搭起营帐，晋、楚两国分别扎营南北两头。荀荼提醒赵文子说："我看楚国的气氛异常，也许会生出什么变故。"赵文子胸有成竹地说："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只要向左转移到宋国的东门，楚国能把我们怎么样？"

七月初五，各国代表会聚宋国的西门之外，准备签订停战和约，楚国代表暗中怀甲。楚国大夫伯州犁劝告说："约合各诸侯国前来是为了建立信义，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却是如此不信任别人，让诸侯怎样信服楚国？这样搞会使楚国威望扫地，应该把甲胄脱下来！"令尹屈建不同意，说："楚、晋两国长期以来厮杀不已，从来就没讲过什么信义，彼此双方完全以利害关系决定自己的对策。我们应该有备无患！"伯州犁生气地走出去对别人说："令尹屈建

大概离死不远了！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背信弃义，他的欲望难道就能满足？不讲信义的人是难以长久立足的。”

晋国人得到了楚人在衣中暗藏铁甲的消息，赵文子感到不安，把情况告诉了叔向，叔向却豁然大度：“不会有什么灾祸发生，不必多虑。一个平民百姓如果不讲信义的话尚难在社会上立足，何况是召集天下诸侯开会，公然做出背信弃义的事，必定自招失败。这次开的是和平大会，目的是停止战争，有人想在这时候发动战争，会遭各国普遍反对，什么时候才能危及到我们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冲进宋国，据城而守，楚人也会没有办法。况且，事情也不至于糟到那样，他们不过是奸人自扰而已。”

这次会议名为弭兵会议，实际是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各弱小国家要把这两个大国作为共同的统治者。鲁国人担心这次会议给鲁国确定的贡献负担太重，季武子派人用鲁襄公的名义对参加会议的叔孙豹说：“要让鲁国纳邾国和滕国那样份额的负担，千万不要多！”然而，齐人请求把邾国作为自己的属国，宋人请求把滕国作为属国。这样一来会议就不用再讨论邾、滕两国的贡纳。叔孙豹无奈地说：“邾、滕两国是别人的私属，我们鲁国是堂堂的诸侯国，同宋、卫这样的国家是对等的，怎么能和附属国相比呢？”

弭兵大会进入最后一道程序，与会各国要歃血为盟，需要一人充当盟主，晋、楚两国发生争端。晋国代表说：“晋国从来就是盟主，按理不应由别国主盟！”楚国丝毫不予让步：“你们明白地声言楚、晋两国平等，如果你们经常主盟，我们楚国岂不成了陪衬，哪里还有平等？平等意味着两国轮流当盟主，既然过去都是晋国当盟主，这次也该轮到楚国为盟主了！”叔向劝慰赵文子说：“天下诸侯归服晋国，是仰慕晋国的德义，并非因为晋国是盟主。因此，我们着意追求的是施行礼义，没有必要争那盟主名誉。各国订立协约，不但大国能当盟主，小国也可以当盟主，现在就让楚国为晋国做些事情吧，这对晋国来说不也是很光荣的吗？”结果

由楚国主持了会盟。这是楚国第一次能在中原大国参加的会议上主盟，多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尽管经历了重重曲折，弭兵大会总算圆满成功。七月六日，东道主宋平公宴请与会的晋、楚两国代表，赵文子做主客。当屈建同赵文子谈话时，赵文子竟然无言答对，让叔向同屈建谈话。叔向问起了一些问题，屈建也无言答对。七月九日，宋平公再次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在城外见面。代表们随便交谈，屈建问赵文子说："贵国大夫叔向的品德如何？"赵文子赞扬说："没有比叔向再好的士大夫了：他治家严谨，治国忠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鬼神都相信他！"

屈建回国后，把这事报告了楚康王，楚康王也赞叹说："叔向太高尚了，这个时代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他连续辅佐了五位国君，每位国君都使晋国成为霸主，我实在是自愧不如呀！"

诸侯弭兵，国际和平，宋国大夫向戌立下了首功，他向宋平公请功说："为臣不才，冒死请求封邑。"宋平公准备封给他六十个邑，把封授文书拿给大夫子罕看。子罕说："我看没有外患必生内忧！晋、楚争霸，我们这样的小国内部倒也平安无事，上下和睦，一心无它。现在平安了，就要骄傲了，祸乱也就随之发生。再说，名为弭兵，谁能使战争真正停止？天生五行，产生出万物；有了社会，就有了战争。有人声称他平弭了战争，而且邀功请赏，真是贪得无厌！"拿起刀子把竹简文书上的字削去，然后把竹简扔在地上。向戌受了一顿奚落，也就慌忙表态不要封邑了。向氏的族人很不满，要发兵进攻子罕，向戌劝阻说："这事本来是我的不妥，他及时地挽救了我，没有比这再大的恩德了，怎么能恩将仇报？"

弭兵会议结束后，晋国派荀莹到楚国访问，楚国派大夫子荡到晋国回访，晋平公设宴款待。宴会即将结束时，子荡彬彬有礼地赋了一首《既醉》诗：

既已请我喝醇酒，

身教又示我以德；
君子享寿万万年，
上天助尔大福泽。

晋国君臣听到这样的赞美十分高兴，叔向说："子荡是有前途的，他执行君命勤劳不怠，能用恭敬侍奉君主，必能治理人民，不让这样的人当政，还能找什么人呢？"

晋、楚弭兵之后，等待那些弱小国家的并不是歌舞升平，而是疲于奔命。大国争霸的时候，小国效劳于一个大国就可以，现在两大国握手言和，小国要听从两个大国指挥，献纳两份贡品。

盟会后的第二年夏天，齐、陈、蔡、北燕、杞、胡、白狄各国君主到晋国朝见，履行和约的规定。齐景公临行前，执政大臣庆封曾阻拦说："去年的盟会是晋、楚两国搞的，我们没有参加会盟，而且我们也是大国，为什么要去朝见他们？"陈文子解释说："今天的齐国已非桓公称霸时可比，顺从强国对我们也没有坏处，不要仅仅考虑那点礼品。我们以前不是参加了葵丘会盟吗？这次还是应该去的。"鲁国派孟孝伯到了晋国。

中原诸侯朝见晋侯的时候，郑国不敢怠慢楚国，先派游吉去楚朝见。一行人带着礼物走至汉水岸边，被楚国人拦住，通知说："去年在宋国结盟是贵国君主亲自前去的，不知为什么现在派大夫来，请你们各位先回去，我们楚君有公务，没时间接待！"郑国大夫游吉辩解说："在去年的盟会上，贵国君主说只要有利于各国，安定社稷镇抚人民，依照礼法办事，贵国君主就欢迎，这也是许多国家的愿望。由于国家有难，我们国君派臣来朝见，送来礼品，而你们却说：一定要让你们的国君丢弃政事，离开田土到楚国来！我真不敢想象这是贵国君主的命令。"无论怎么说，楚人一概不听。游吉只得返回郑国，向郑伯作了汇报，诅咒楚康王说："他快要死了！不修德行，贪图财货，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想活得长久，能办得到吗？"郑国大夫裨灶说："从星象看，岁星混乱到了明年的

位置，使鹑尾星变了形，是周天子和楚君的凶兆。”

郑简公不敢同楚国对抗，只得把游吉派往晋国朝见，自己由子产陪同亲自前往楚国。到了楚国都外，也没有筑台基就搭起帐篷宿营。外仆[①]对子产说：“以前先大夫辅佐先君到各国出访，从没有不筑台基就搭帐篷的。今天也不清除草地就这样粗莽宿营，恐怕不太合乎礼仪吧？”子产当然明白这是郑国发泄给楚国的怨气，便勉强解释说：“小国事奉大国，困难重重，能维持着使国家不受祸殃就很不错了，哪里还能再铺张？让大国看一看小国的穷困潦倒，这样可免除灾祸。”

同年冬天，鲁、宋、陈、许各国君主也前往楚国。鲁襄公途经郑国，郑伯不在国内，受到郑国大夫伯有的接待。走到汉水沿岸，得到楚康王死去的消息，鲁襄公想返回鲁国，叔仲昭伯劝阻说：“我们是去朝见一个国家，难道是为了一个人吗？继续走吧！”子服惠伯想回去，说：“君子可以考虑得很长远，小人顾不得这么多了。眼下我们饥寒交迫，哪还顾得上将来？回去算了。”叔孙豹和荣成伯都赞同去楚国，鲁襄公依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宋国的向戌说：“我们是为了一个人，不是为了楚国。饥寒交迫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先回国再说，等楚人立了国君再作计议。”宋平公扭头回国了。

小国国君来到楚国，适逢楚国大丧，楚人非常无礼，竟然提出让鲁襄公为楚康王的遗体放置衣服。鲁襄公很不安，但又不敢违抗。叔孙豹说：“找人先驱除棺材和尸体的邪气，然后再给他放衣服，这也就等于朝见时献纳礼物了。”于是，鲁国先让巫师用桃棒、苕帚扫除棺材那里的凶邪。楚国人开始没在意，后来却感到很晦气。

鲁襄公二十九年四月，楚康王下葬，鲁、陈、许各国君主为

① 外仆：官名，负责清除草地、筑台基、搭设营帐。

他送葬，送至都城的西门外，大夫们送到墓地。公子郏敖即位为君，王子围任令尹。

楚国刁难弱小国家，晋国也非真正的仁义之邦。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的公主，杞国的城墙年久失修，晋平公想帮助修复，便让各国出人帮助。各国心里不情愿，但又不敢不派人去。各国的人到了杞国议论纷纷发泄不满，郑国大夫子太叔对卫国的太叔文子议论此事，太叔文子说："让我们为杞国筑城，晋国做得太过分了！"子太叔说："我们能把晋国怎么样！他们不关心周人的衰弱，却帮助夏朝的后裔，这叫什么道理？晋国不把兄弟之国当回事，谁还能同它亲近？"

晋国有一个役夫看上去很老了，人们见这样的年纪还来干劳役都很同情，问他为什么不让儿子来，他说没有儿子，问他多大年龄，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岁数，我出生的时间是正月初一甲子日，我已经过了 445 个甲子日了，最末一个甲子日刚过二十天。"有关官员到朝中查问，师旷掐算着说："正月初一为甲子，这是鲁国的叔仲惠伯会见郤成子那一年。这一年鲁国在咸地打败狄人，俘虏长狄侨如，叔孙庄叔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叫叔孙侨如。满七十三岁了。"

鲁昭公元年（前 541）正月，第一次弭兵会议已经开过五年，各国再次派人到郑国的虢（今河南古荥）地开会，重申弭兵会议的精神。晋、楚、郑、鲁、齐、宋、陈、蔡、许、曹各国都派大夫参加。晋国的祁午提醒赵文子说："上次在宋国的会盟，楚人把盟主地位夺走了，楚国非礼妄为，楚国的令尹公子围更是没有德行，这是诸侯有目共睹的。楚国原先的令尹子木（屈建）还算有德行的人，同晋国争盟都不相让，何况这回的公子围呢！这次务必注意，不能再把盟主地位让给楚人。"赵文子说："谢谢你的关照。上次在宋国开会，楚国有害人之心，而晋国有爱人之心，结果让给了他们。现在，我们还是仁义为本，只要有德行就能赢得

天下诸侯，楚国强行无礼是不会得人心的。这就像农夫种田，只要深耕细耨，功夫下到，早晚会有丰收的。楚国能夺走人心吗?”楚国令尹子围派人来要求主盟，赵文子答应了。

经过一系列的会议活动，三月二十五日最后歃血为盟。楚国令尹子围得意洋洋，用国君的仪仗服饰，两个卫士持戈侍立两旁，显示威风。鲁国大夫叔孙豹低声说:“你看他神气的样子，简直他就是国君!”郑国的子皮说:“是呀，竟然让两个武士护卫。”楚国的伯州犁解释说:“这些东西是临来之前向国君借来的。”郑国的子羽讽刺说:“你们国君是不是要把君位也借给他呀!”伯州犁反唇相讥:“你还是关心一下你们郑国子皙要作乱的事情吧!”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总的来看，向戌弭兵促成了暂时的国际和平，使长期深陷水火的各国人民获得了一时的休养生息，是有益的。这一时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段停战时期。当然，停战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和平，一旦各国间力量平衡被打破，和平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也正是不久之后重开战端的真正原因。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至昭公元年

《国语·晋语》

子产相郑

人世间果真有鬼吗？鬼到底是怎么回事？子产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通议论，很能反映中国古代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子产，也叫公孙侨，郑国贵族的后代。从年轻的时候起，子产便表现出超人的聪明才智。子产的父亲子国担任郑国的司马。鲁襄公八年（前565），子国和子耳率领郑国军队进攻蔡国，取得了胜利。郑国的人们都很高兴，唯独子产闷闷不乐，忧心忡忡地说："一个弱小国家没有文治却有武功，这是潜在的祸患。假如楚国以此为借口前来讨伐，我们怎么办？顺从了楚国，晋国又来讨伐，恐怕我们四五年之内难得安宁了！"他父亲子国听到子产品头论足，十分生气地怒呵道："你懂得什么！发兵的命令是国君作出的，而且还有执政大臣，你小子多嘴多舌，不怕掉脑袋吗？"

郑国的上卿子驷同大夫尉止有矛盾。鲁襄公十年十月十四日，尉止联合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四人发动叛乱，清晨率人马冲进朝廷，杀死执政卿子驷、子国、子耳三人，并劫持了郑简公。子产听到叛乱的消息，立刻组织自己的族人，设置守门的警卫，关闭国家的档案库，派人守卫国库，把士兵组织起来，带领十七辆战车准备平乱。子产先为父亲收殓了尸体，然后率兵在北宫围攻叛乱分子。子蟜率领国内的人民支援他，杀死尉止和子师仆，迅速平灭了叛军。

子孔执掌了郑国的国政，想强迫文武官员顺从自己的指挥。朝中的官员们讨厌他专权，不肯听从他的调遣。子孔强迫官员们同

他盟誓，听从他的命令，并准备诛杀不服从的人。子产劝阻子孔，请他烧掉盟书。子孔不同意，说："制作盟书是为了安定国家，有人发怒就烧掉盟书，我还怎么执政？"子产劝告说："众怒难犯，专权难成，把这二难合在一起却想安定国家，怎么可能！不如烧毁盟书以安定人心，人心安定，您的权位也能得以巩固，岂不两全其美？"于是子孔在仓门外焚毁了盟书，人们见子孔的心志有所收敛，才安定下来。

子孔执政独断专行，国内的人们日益无法忍受。于是，大夫们追究西宫那次祸难和纯门那次战役的责任。子孔知道自己罪责难逃，就组织自己的甲士联合子革、子良的武装保卫自己。鲁襄公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大夫子展和子西率领国内的人们攻伐子孔，杀死子孔，瓜分了他的封地和家产。郑简公任命子展掌握国事，子西主持具体工作，子产为卿辅佐国务。

晋国的范宣子执政，各诸侯国要向晋国缴纳很重的贡礼，郑国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鲁襄公二十四年二月，郑简公到晋国去朝见，由子西陪同。子产让子西给范宣子带去信札一封，信中写道：

"阁下执政晋国，四方诸侯没有听到阁下的美德，只知道晋国讨要很重的贡品，我对此举深感不解。我常听君子们说，有德行的人不担心别人不送财礼，只害怕自己落下坏名声。名声和德行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是至关紧要的，是家族和国家兴盛的基础。有了良好的声名和德行，远方的人们会归附，近处的人们才安心。阁下是喜欢让人说'您养活了我们'，还是喜欢让人说'您榨取我们养肥了自己'？大象正因为有了值钱的象牙，才使得自己被杀害。阁下该作考虑了！"

范宣子读了子产的信，觉得很有道理，十分高兴，减轻了各国的贡品。

晋国大夫程郑去世，子产开始对然明有了一些了解。子产向

然明请教怎样施政，然明回答说："把百姓看作像自己的子女一样，对那些不仁不义的歹徒小人，要像老鹰追赶麻雀一样。"子产听后很受启发，把这些话告诉了子太叔，而且感慨地说："以前我了解的只是然明的相貌，如今我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形象地比喻说："政事就好像是农活，白天黑夜地思考它，不但考虑它的开始，还要考虑它的终结，早晚都照想着的去做。所做的不超过所想的，好像田里有田埂，犯的过错就会少了。"

郑国攻伐陈国取得了辉煌胜利，郑简公十分高兴，封赏群臣。鲁襄公二十六年三月初一，郑简公赏赐子展车舆和衣服，然后封给他八座城邑；又赐给子产车舆和衣服，然后封给他六座城邑。子产只接受了车舆服饰，辞掉了城邑。他解释说："从上而下，礼数以二的数目递减，这是规定。为臣的地位在第四，而且伐陈是子展的功劳，臣不敢接受这样的赏赐，请求辞去封邑。"郑简公一定要让他接受，他再三推辞，最后无奈才接受了三座城邑。公孙挥评论说："子产恐怕将要执政了！依礼而行，谦虚让人，怎能不受人信任和爱戴！"

郑国与许国发生矛盾，许灵公到楚国求援，请楚国发兵攻郑，楚人不愿多管此事。许灵公执拗地说："楚国若不发兵，我就永远不回国。"结果死在楚国。楚人觉得影响不好，发誓说："不讨伐郑国，楚国还有什么地位！"鲁襄公二十六年十月，楚军浩浩荡荡扑向郑国，郑人准备抗击。子产说："目前晋、楚媾和，楚也不想打仗，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而已。小人的本性，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的血气之勇，贪图得到好处，没有什么了不起，姑且不要理他！"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没派兵拦击。楚军进入南里，拆毁城墙，然后渡过济水，攻打师之梁门。逞示了威风，楚军便撤回国去了。郑国没有遭受什么大损失。

吴国公子季札周游列国，来到郑国。子产接待季札，二人一

见如故。季札送给子产白色绢带，子产赠送季札麻布服装。季札忠告子产说："郑国执政者奢侈，大难即将临头。此次动乱之后，政权将落入阁下手中。您掌政之后，定要依礼行事，否则后果难料。"子产点头称谢。

就在季札离开郑国这一年的冬天，郑国执政卿伯有派大夫公孙黑出使楚国。公孙黑不肯听命，说："目前郑、楚两国关系紧张，让我去楚国，岂不是去送死？"伯有坚持说："你们家族世世代代担任国家的外交官，当然应该由你去。"公孙黑听罢此言更是怒不可遏："能去就去，条件险恶就不去，世世代代没有用！"伯有强制公孙黑去，公孙黑大怒，要发兵杀掉伯有。大夫们急忙出来调解，最后大夫们在伯有的家里结盟。事后，裨谌评论说："恐怕这样的结盟管不了什么事。结盟，只能使祸患滋长得更加严重。"然明问："你看政权将会由谁掌握呢？"裨谌说："善人代替恶人，这是规律。如果不是越级提拔别人，那只有子产了。上天已经为子产执政开辟了道路，使伯有失去人心，子西去世。上天降祸于郑国已经很久了，一定会让子产安定国家。否则，郑国将要灭亡。"

郑国的执政大臣伯有日益荒唐不经。他不务政事，饮酒无度。请示工作的官员到了他家里，他的酒还没喝完。来人问："主人在哪里？"伯有手下人说："我们的主人在山沟里！"请示工作的人只得回去。一次，伯有率文武百官朝见郑简公，同时又派子皙到楚国去。下朝回家后，又开始饮酒。襄公三十年七月十一日，子皙率领驷氏围攻伯有，放火烧了他的家。伯有醉得不省人事，逃到雍梁（今河南新郑西南）后，方才醒酒知道怎么回事。随后，逃亡到许国。

大夫们聚在一起商议国政，子皮说："古人云，乱者取之，亡者欺之。摧毁灭亡的，巩固存在的，这是国家利益的要求。伯有骄傲奢侈，所以遭难。"有人对子产说："你可要靠拢正直的人。"子产听后很生气，说："难道我与伯有是一伙吗？如果主持国政的

人正直无私，也就不会发生今日的灾祸了。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

子产为被杀死的伯有氏的族人收尸安葬，随后就要出走。大夫印段跟从。子皮不让他们二人离开。大夫们说：“他们跟我们不是一心，不必把他们留下。”子皮解释说：“子产对死去的人都不忘礼节，何况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就亲自去劝阻子产。于是，子产和印段又回到了国都，两人到子皙家中接受了盟约。郑简公同群臣在太庙结盟，国内的人们在师之梁门结盟。

逃到许国的伯有听说郑国人结盟，共同对付他，极为生气。但听到人说子皮的族人没有参与攻打他，很高兴地说：“子皮是亲近我的。”七月二十四日，伯有从城墙的排水道钻人郑国都城，带领自己的族人攻打旧北门。驷带率领国内的人们进攻伯有。伯有和驷带两族的人都去召子产，子产叹气说：“兄弟之间的仇杀到了这个地步，我只有听从上天保佑的一族了。”伯有战败被杀。子产为伯有的尸体换好衣服，然后枕在伯有的大腿上号哭，把伯有安葬了。驷氏想要攻杀子产，子皮怒气冲冲地对驷氏的族人说：“礼，是国家的命根。杀遵守礼的人，是作恶，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驷氏只得罢休。

郑国的上卿子皮把执政大权给子产，子产辞绝说：“我们郑国弱小，却又邻近大国；国内大族多，难以管制。我没有这个能力。”子皮恳切地说：“有我在这里，还有谁敢不听你的指挥?好好地干吧，国家小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能协调好国际关系，国家也就可以稍得安宁了。”

子产执政后，有事情需派伯石去处理，同时授予伯石城邑。子太叔很不满意，说：“国家是大家的，为什么只给他一个人。”子产解释道：“人是有欲望的，欲望得到满足，把事情办成功，难道不是好事吗？城邑难道还能跑到外国去?”子太叔又说：“你这样做，邻国会怎样议论?”子产继续说：“如果这样做可以使国内安定，别人能议论什么?《郑书》中说：‘安定国家，一定要安定大

族。’我们先安定大族，等待以后的结果。”不久，伯石有些害怕，交回封邑。子产坚持封给了他。郑简公让伯石担任卿的职务，伯石辞绝了前去任命的太史。太史刚出门，他又让手下人拦住太史，再次宣读任命。如此反复三次，才接受文书上朝拜谢。子产很讨厌伯石的贪婪和虚伪，但由于害怕他作乱，就让他担任了仅次于自己的卿位。

子产执政时期，积极在郑国实施改革。

当时，旧的宗族血缘体制遭到破坏，正在瓦解，政府的政令不能有效地贯彻实施。所以，子产首先改革整顿行政体制。具体是如何改革的，史籍中没有太多记载，但史籍中明确地记录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都鄙有章，是说国都和乡野都建立起行政体制；上下有服，是说各级组织都设官任职，下级服从上级；田有封洫，是整理田界；庐井有伍，是说农村地区最基层的组织是伍（五家）。同时，对各级官员中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者奖赏，对奢侈枉法者惩处。

子产还颁布了新的军赋制度。在原来的宗族制度下，人们亦农亦兵，不纳军赋。子产实施了“丘赋”的办法，丘可能是一种地区单位，一定的地区要缴纳一定数量军赋。军赋的征收，加重了人们的经济负担，人们指责子产说：“他父亲子国被人杀死，他自己也像蝎尾一样毒狠，要把国家怎么样？”有人把这话转告了子产，子产无可奈何地说：“让人们说吧！如果我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我问心无愧。《诗经》中说：‘礼仪上没有过错，不必怕别人的议论。’要想成功，不能轻易改变法制。”

子产还在郑国公布了刑法。在过去，刑法是不公开的，由贵族控制，人们的命运完全操在贵族家长手中。为了振兴郑国，鲁昭公六年三月，子产把郑国的刑法条文铸在鼎上，公布出来，让人们知晓，以便让人们自觉遵守。这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晋国大夫叔向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信中说：

“开始我对你抱有希望，现在完了。从前，先王依照事情的情况来定罪，不制定刑法，使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如果不够，再用道德去约束。你现在把刑法公开，百姓知道了刑法的内容，就会产生侥幸心理，甚至会依照律条争辩，会对上级不尊敬。人们都这样做，社会会乱，国家也就难以治理了。

“从前，夏代有禹刑，商代有汤刑，周代有九刑，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我听人说：‘国家将亡，法令滋张。’现在的郑国恐怕就是这样吧！”

子产复信说：“照您所说，我实在没有才能，没有为自己的子孙留条后路。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我公布刑法是为了稳定社会，不这样无法救国。虽然我无法接受您的忠告，但还是十分感谢您的。”

子产实施的这些改革，有些受到人们的称赞，有些遭到人们嫉恨。子产很清楚这种情况，但他清楚地看到，社会在变，旧制度难以适应新情况，不变革，国家会亡。改革之初，多数人民诅咒子产说：“计算我的家财而收费，丈量我的土地而征税。谁杀子产，我助他一臂！”过了几年，人们尝到了改革的好处，颂扬子产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土田，子产栽培。子产去世，谁来即位！”

子产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知人善任，用人唯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各具其能的人才：冯简子能决断国家大事，子太叔英俊而有文采，子羽能知晓四方各国的政令以及各国大夫的家族姓氏、官职地位，善于外交辞令，裨谌能出谋划策。郑国有外交上的事情，子产就向子羽询问诸侯各国的情况，并让他草拟外交辞令稿；然后同裨谌商议计划安排是否可行；把最后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决断什么时候实施；同子太叔研究外交问题，事情很少有办坏的时候。

子产执政时期，人们经常在学校里聚会，议论政治得失。人们的议论对政治造成很大压力。然明对子产说：“毁掉乡校，你看

怎样？”子产反问到：“为什么要毁掉呢？人们在乡校里议论政治，可以及时地为我提供政治信息，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施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及时地改掉。我听说，人应该用自己的良善来减少别人对自己的怨恨，没听说恫吓能平民愤。压抑舆论是极其危险的。人们常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湍湍细流不会有什么祸害，若积之成川，一旦决口，伤害极大。我要一点点地疏导，让人们的议论作为我执政的药石。”然明恍然大悟说：“我从前并没有真正了解你呀！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国，而且有利于己。”后来，孔子听到子产的开明精神，感慨说：“从这件事情上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郑国的上卿子皮喜欢尹何，想任命他负责封邑事务，征询子产的同意。子产委婉地说：“尹何太年轻了些，不知能否胜任。”子皮说：“这个人办事小心谨慎，我喜欢他，他不会背叛我的。年轻没关系，任职以后学习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子产进一步劝阻说：“我们喜欢某一个人，总是想着对他有益。您喜欢尹何却把政事委任给他，这就好像一个人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割东西，在多数情况下会损伤自己。您喜欢尹何，却又在伤害他，还有谁敢求得您的喜欢？您有漂亮的彩绸是不会让别人用它学习裁衣的，高官和封邑不是比彩绸重要得多吗？我只听说过学而后官，从未听说官而后学。您是国家栋梁，栋梁折断，国家危险，我将会被压在下面，特实言相告。”

子皮听后很受启发，他说：“你讲得句句在理，我服你！我只知小而不知大，穿在身上的衣服知道爱惜，却不知道任人唯贤更重要。从前我曾对你说，你治理郑国，我治理我的家族。现在看来，治理家族也不容易呀！从今往后，即使是我家族的事情，也由你处理了。”子产解释说：“每个人的思想不会一样，犹如每个人的相貌不一样，是正常的。我内心怎么想的如实告诉您就是了。”子皮认为子产忠诚可鉴，把全部政务都交给了子产，所以子产能

治好郑国。

伯有被杀后，郑国经常闹伯有鬼。有时人们看到伯有来了，吓得惊慌逃散，无处躲藏。就在铸刑书那年的二月，有人梦见伯有披甲而行，说："三月二日我要杀死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要杀死段。"到了三月二日那一天，驷带果然死了。国内的人们恐慌万分。第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又死了。国内的人们愈加害怕。为了安定人心，子产命令公孙洩（子孔之子）和良止（伯有之子）安抚子孔和伯有的鬼魂，闹鬼的事才算平息下来。子太叔向子产讨教其中奥秘，子产解释道："鬼只有找到归宿，才不会作恶，我不过是为他安排归宿罢了。"子太叔仍不完全理解，问："那你任命公孙洩和良止为大夫，与闹鬼有什么相干？"子产说："是为了取悦于死鬼呀！虽然伯有身行不义，但他也需要受到享礼。我立良止为大夫，让良止能祭祀先祖，便能安抚伯有的死鬼了。不媚于鬼神，人们不信服执政；人们不信服，政治就难搞好了。"

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访问，赵景子问他："伯有真的能闹鬼吗？"子产肯定地回答："当然能！人刚刚诞生的时候，产生魄，魄生了以后，它显现的阳性叫魂。一个人生长在人世间，吃得好，吃得多，他的魂魄就强，于是产生出精爽的神明。一个中壮年人暴死，他的魂魄很强，往往能依附在别人身上，作恶捣乱。伯有的家族三代执政，吃得精美，族大势壮体强，他突然身亡，为鬼作祟是很正常的事情。"

鲁昭公十七年冬天，彗星在大火星旁边出现，光芒四射直达银河。申须议论说："彗星（俗称扫帚星）是除旧布新的，天象的变化影响着人间的吉凶。彗星对着大火星清扫，大火星再次出现时必定散布祸灾，诸侯各国中恐怕有要遭殃的。"梓慎接着说："大火星的出现，夏历是三月，殷历是四月，周历是五月。夏历和天象相适应，如果发生火灾，将有四个国家承当，大概是宋、卫、陈、郑。宋是大火星的分野，陈是太皞的分野，郑是祝融的分野，

都是大火星的居野。彗星到达银河，银河是水。卫国处颛顼的分野，和它相配的星是大水。大火星和大水星是双偶，大约在丙子日或者壬午日相会，火灾就在那时发生！”

大夫裨灶听说后，立即找到子产，说：“宋、卫、陈、郑将要发生火灾了，赶快用宝器祭神以免灾！”然而子产不同意。

第二年五月，大火星开始在黄昏出现。隔了一天，狂风大作。梓慎解释说：“这叫祝融风，是火灾的开始。七天后大概就发生火灾了！”狂风日甚一日，五月十四日，宋、卫、陈、郑同时发生火灾。裨灶生气地说：“当初我说祭神禳灾，不听；再不祭神，还会发生火灾！”人们纷纷请求子产祭神，子产坚决不听。子太叔对子产说：“宝物是用来保护百姓的。有了灾祸，国家将亡，还爱惜那点宝器干什么？”子产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者毫无关系。裨灶怎么能了解天道？话说多了，偶然巧合罢了！”仍然坚持不祭神。后来也没再发生火灾。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立即组织人们抗灾救险。他派人辞退了晋国的使者，并把新来的客人送走，让久住的宾客不要走出馆舍。派子宽、子上巡逻祭祀的处所太庙，派公孙登运走占卜用的龟甲，派史、祝运走庙内的神主，向先祖紧急报告，命令府库官员看守并作好防火戒备。司马、司寇组织救火，城下的人列队登城，防止敌国趁火打劫。火灾发生的第二天，子产命令野司寇组织郊野的人们清除郊外空地，堆筑土坛祭神，向火神、水神祈祷。记下被烧的人家，免除他们的赋税，发给他们建筑材料。子产还派人迅速向各国通报了灾情。尽管火灾严重，由于组织工作有条不紊，人们的生活得以正常维持。

由于郑国火灾的时候子产安排军队守卫城池，防备晋人趁机进攻，晋人很不满意。晋国的边防官员谴责郑国说：“郑国遭灾，同样是我们晋人的不幸，我们晋国为你们占卜、祭祀，奔走四方。而你们却分发武器登上城墙，这是防备谁？晋国边境的人民害怕，

特派人通报。”子产不卑不亢地说：“我们郑国遭灾，只是担心恶人趁火打劫。如果坏人的阴谋得逞，岂不更使你们晋国担忧？幸亏郑国没有灭亡，今天还可以解释；假如郑国亡了，你们再关心我们也无济于事了。郑国事奉晋国决无三心二意！”

就在郑国发生特大火灾的隔一年，郑国又发生了大水灾，有两条龙在时门外的洧渊中相斗。当时人们认为，洪水与龙有关，为了平息洪水，人们请求祭祀龙。子产不同意，说：“龙与我们人类有什么关系？我们人间争斗，龙不前来观看；龙相斗，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呢？向它们祈祷，让它们离开，它们能到哪里去呢？我们对龙没有要求，龙对我们也没有要求。”没有安排祭龙。

鲁昭公二十年冬天，子产生了重病。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将会由你执政。治理社会依靠德和刑，然而，只有圣人才能仅仅靠德使百姓顺服，否则，必须用刑。举例说，火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懦弱，人们不在意到水中游玩，结果溺死的人很多。所以，实施宽政不容易。”病了几个月后去世了。

后来，子太叔执政，不忍心严厉镇压，放松了管理，使郑国出现很多盗贼，聚集在芦苇塘里。太叔很后悔，说：“我要是早点听从子产的话就好了，没想到糟糕到这地步。”子太叔调动军队进攻苇荡中的盗贼，将他们全都杀掉，才使郑国得以安宁。

孔子听到子产死去的消息，很悲伤，流着眼泪说：“子产的仁爱精神，是古人的遗风啊！”

子产辅政十年，执政二十余年，前后共三十余年，为郑国的富强和安定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位改革家，积极在郑国实施新制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国内斗争中，他不眷私情，站在正义一边；在国际事务中，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使郑国处于不屈的地位。他执政宽柔相济，用刑罚镇压坏人，允许人们批评政治，把人们的批评作为政治的镜子。他的鬼神观是矛

盾的，一方面他强调人与自然界无关，互不影响；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人死有鬼，沿用古时的祭祀制度。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时代的反映。子产大仁大智的精神，在后来影响很大，流传着很多动人事迹，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

灵王祸楚

老子有一句名言："强梁者不得其死。"意思是说以刚强面目出现的人，难以得到善终。一个平民百姓是这样，一个统治者也是这样。楚灵王正是这样一个生动的事例。

楚灵王名围，楚共王之子。楚共王的正妻没有生儿子，嫔妃们共生下五个公子，都很受共王宠爱，不知道立哪一个为太子好。为了选立太子，楚共王想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他祭祀了许多名山大川的神灵，祈祷说："请求神灵帮助我在五个儿子中选出一个，让他将来治理国家！"随后，把玉璧展示给山川，说："神灵选中了谁，就让他在玉璧上下拜。"祭祀完毕，就同夫人秘密地把玉璧掩埋在祖庙的院子里，让五个儿了斋戒，然后依长幼次序进院拜祖。长子康王两脚跨在玉璧上，次子灵王的胳膊压在了玉璧上，三子干、四子皙都离得很远，幼子平王当时年幼，由别人抱着进院，两次下拜都压在了玉璧的纽上。五个王子有三位都沾到了玉璧，后来果然出现了康王、灵王、平王先后即位为君的场面。

楚灵王是一个逞强争功、不讲情理的人。早在他当公子的时候，人称他王子围。一次，楚国和秦国联合出兵进攻吴国，由于吴国有了防备，楚军放弃了攻吴，转而攻郑。楚康王十三年（前547）五月，楚军包围了郑国的城麇。郑国的守将是皇颉，率军出城迎战。郑军战败，楚将穿封戌俘虏了皇颉。王子围看到穿封戌俘虏了皇颉，抢走了头功，十分眼红，便前去抢功，硬说是他俘虏了皇颉。穿封戌不服，二人找楚军大夫伯州犁判断是非。伯州

犁说："那就找俘虏来认定一下吧！"把皇颉叫到了跟前。伯州犁示意说："你是他们二位争夺的俘虏，到底是谁俘虏了你，你是君子，最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随后高举起手指向王子围，说："这位是王子围，是我们国君尊贵的弟弟。"又随手一指穿封戌，说："那是穿封戌，是方城山外的一个县官。好了，到底是谁俘虏了你？"皇颉一看这阵势，唯恐自己遭殃，便说："我遇上了王子，王子勇猛超人，我实在招架不住。"穿封戌一看到口的肥肉被人夺走，大怒，抄起戈追杀王子围，但没有追上。王子围就这样夺走了功劳。

楚王郏敖元年（前544），楚康王去世，太子郏敖即位，王子围做了令尹。前去楚国朝见的各国诸侯为楚康王送葬。人们看到郏敖年轻，王子围任令尹，势力强大，议论纷纷。郑国的使者子羽说："这样的安排是不适宜的，恐怕令尹要代替楚王统治国家了。常言说，松柏的下面，小草是不能茂盛的。"

第二年，楚王派大夫薳罢到鲁国访问，作为诸侯朝楚的回报。鲁国大夫穆叔问起楚国令尹子围执政的情况，薳罢避而不答，说："我这样的小人物唯君主之命是从，还怕不能完成使命，招致罪过，哪里还敢参与政事！"穆叔再三追问，薳罢硬是一字不说。穆叔看出破绽，对大夫们说："楚国令尹子围将要发动大祸乱了，恐怕薳罢是他的同伙，还在尽力地掩盖事情的真面目呢！"

就在这年的秋天，王子围杀死了大司马蒍掩，夺取了蒍掩的封邑和家财。楚国大夫申无宇私下议论说："王子围看来恐怕难得善终了！善良的人是国家的栋梁，王子围执政为令尹应该扶助善人，打击邪恶。然而，他反倒向善人施暴，危害国家。大司马本来是令尹的助手，也是国君的手足。毁坏国家的栋梁，去掉自己的助手，斩断国君的手足危害国家，这是多么不吉祥啊！王子将来怎能不遭报应！"

楚王郏敖三年，北宫文子陪同卫侯到楚国访问，看到王子围的行为举止，私下对卫侯说："令尹子围简直像国君一样了，不讲

臣节，依我看，他在图谋不轨。虽然他有能力实现当国君的愿望，但他难得善终。《诗经》中说：‘善始者易，善终者难。’况且，令尹子围违背臣节，既无善始，何以能有善终。”卫侯问道：“你从哪里知道的呢？”北宫文子回答：“《诗经》中说：‘敬慎威仪，唯民之则。’子围自己没有威仪，百姓就没有行为准则，这叫上行下效。不能作为百姓榜样的人，很难永久地处于百姓之上。”卫侯进一步问：“那你再说说什么叫威仪？”北宫文子说：“威，是使人恐惧；仪，是使人仿效。国君有国君的威仪，臣有臣的威仪，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都各有威仪。周文王攻打崇国，发兵两次，崇国就顺服了，其他国家纷纷归服，这是周文王有威。文王的功业受到天下人的赞颂，后人也遵循着去努力，这是文王有仪。威仪实在是成败的标志啊！”

楚王郏敖四年，王子围由伍举陪同带领一支人马到郑国访问，同时在公孙段家娶妻。王子围将要进入郑国都城，郑国人对王子围心怀芥蒂，派行人子羽前去婉言谢绝，王子围只得在城外扎营。举行完聘礼仪式后，王子围打算到城内去迎亲，子产再次派子羽拒绝，说：“郑国城邑狭小，无法容纳阁下的随从，请求在城外清场作坛，与阁下共叙友谊。”王子围命令伯州犁回答说：“贵国君赐恩王子围，准备把丰氏的女儿嫁给他，缔结秦晋之好。王子围感恩不尽，陈列几筵，在祖庙中告祭后前来迎亲。如果在野外相会，岂不把贵国君主的恩惠抛在草丛中了？不仅如此，我们楚国的先王也不会答应，王子围也很难再回国去了，请你们慎重考虑！”子羽仍然毫不让步，说：“如果一个小国没有罪过，想依靠大国而不设防就是罪过，很难说哪一个大国没有包藏祸心打小国的主意！万一发生意外，使得诸侯们惶恐不安而怨恨大国，罪过就更大了！”伍举知道郑国人有了防备，请求倒转弓袋进入郑都，郑国同意了。正月十五日，王子围带人进入郑都，迎娶而出。

在郑国娶亲之后，王子围率领大队人马奔赴虢地（东虢，今

河南郑州古荥），与诸侯续修弭兵之会。由于第一次在宋国会盟楚国争当盟主，晋国大夫祁午警告晋卿赵文子，应当争当这次会议的盟主。赵文子无意相争，使得逞强好胜的王子围得到了机会。他对晋国人说，这次仅仅宣读一下过去的盟约，然后对着盟约为誓就行了。赵文子答应了。

三月二十五日，各国再次结盟。王子围排列着国君的仪仗，身穿国君的服饰，两名卫士持戈侍立两旁。鲁国大夫叔孙穆子鄙夷地说："这个王子围简直就像国君了，神气十足活灵活现！"郑国的子皮说："还有两个卫士守卫在身旁呢！"蔡国大夫子家说："他在国内的时候早就住在国君的离宫内了，今天用国君的仪仗还有什么惊奇的！"楚国大夫伯州犁听到人们议论纷纷，便解释说："这些仪仗是这次出来前向国君借的，国君已经同意了。"郑国的子羽讽刺说："这次借了恐怕就不会还了吧！"伯州犁反唇相讥："你还是去关心一下你们国内子皙想要作乱的事吧！"

会盟结束，子围率军回到国内，随即派公子黑肱、伯州犁在栎、郏两地筑城。郏是郑国边邑，看到楚人在那里筑城，郑国人十分害怕。子产说："没有关系。依我看是王子围要干大事，准备先除掉公子黑肱和伯州犁，祸患不会在郑国，不必害怕。"

同年冬天，王子围打算到晋国访问，由伍举陪同而行。走到北部边境，听说楚王郏敖生了重病，立即返回楚都。伍举到郑国去了。十一月初四，王子围进宫探问楚王郏敖的病情，借机把楚王勒死，并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幕和平夏。右尹子干逃亡到晋国，宫厩尹子皙逃到郑国。王子围派人把伯州犁杀死在郏地，把楚王葬在郏地，称他为郏敖。派使者到郑国传递讣告，伍举询问谁即位为君，使者说："王子围。"

王子围即位为君，是为楚灵王。灵王即位后，任命薳罢为令尹，薳启疆为太宰。郑国大夫游吉到楚国参加郏敖的丧礼，同时对新即位的楚灵王表示问候。游吉回到郑国后对子产说："赶快准

备行装吧！楚王骄傲奢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加掩饰，而且自我欣赏。他此番小人得志，必会要诸侯前去朝见，没有几天我们就要前去了！”。子产却说：“不会这么快，没有几年时间是办不到的。”

事情果然如同子产所料，楚灵王最初几年并未来得及会合诸侯。国内的形势稍稍稳定之后，楚灵王便想充当国际领袖了。楚灵王三年（前538）春天，楚王派大夫椒举前往晋国，对晋国人说：“从前在宋国召开弭兵会议，弭兵协约中规定，诸侯们要分别朝见楚国和晋国。近几年楚国多难，没有顾得上与各国相会，这是非常遗憾的。希望贵国陛下不忘过去的盟约，允许晋国的盟国前来楚国相会。”

晋侯本不想答应楚人的要求，司马侯劝谏说：“还是答应为好。目前楚灵王求功心切，做事情很过分，上天或许是故意满足他的愿望，使别人怨恨他，然后再惩罚他。如果楚灵王荒淫暴虐，楚国的人民也会抛弃他，想同我们争夺也是不成的！”晋侯坚持地说：“我们晋国地形险峻，盛产马匹，而楚国内乱不止，我们有上述三条有利条件，怎能让楚人争当霸主？”司马侯回答：“倚仗着自己的有利条件和别人的灾难，想成就霸业是危险的。殷纣王荒淫暴虐，文王仁慈和蔼，结果殷朝灭亡，周朝兴起。只有那些有德行的人才能赢得天下。”晋侯觉得言之有理，派叔向答复椒举说：“我们国君大事在身，不能前往楚国与贵君相会。至于诸侯，他们本来就是贵国陛下的臣仆，贵国可以随时命令他们，用不着前来通报。”椒举还转达了楚灵王想与晋国缔结姻缘的愿望，晋侯也答应了。

这个时候郑国大夫子产正在楚国，楚灵王问子产：“晋侯会允许诸侯朝见楚国吗？”子产回答：“会允许的。晋侯胸无大志，苟且偷安。他的那些臣下营私舞弊，不能帮助国君。况且，宋国的弭兵之会明确规定诸侯交相见，如果晋侯不允许，弭兵会盟的条

约还管什么作用？”楚灵王担心地说：“那诸侯们会来吗？”子产答：“一定会来。履行会盟的条约，晋国人同意，与楚国发展友好关系，为什么不来呢？不过，或许鲁、卫、曹、邾四国会不来。曹国惧宋，邾国惧鲁，鲁、卫惧齐而从晋，所以可能不来。至于其他国家，处于贵国的武力威慑之下，谁敢不来呢？”

诸侯们接到楚国的通知，惧于楚国的武力，纷纷前去朝见。鲁、卫、曹、邾拒绝与会，曹国和邾国称国内有祸难不得脱身，鲁国声称要祭祖，卫侯假称有病。这年六月十六日，各国诸侯来到申地（今河南南阳北）。楚大夫椒举提醒楚灵王说：“诸侯相会，归于有礼，希望陛下谨慎从事。霸业能否成功，在此一举。我听说，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会，齐桓有召陵之会，晋文有践土之盟，不知陛下准备采用哪一种形式？宋国的左师、郑国的子产都在这里，他们是大夫中很有影响的人，应尊重他们。”楚灵王略作思忖说：“我只能采取齐桓公会诸侯的方式吧！”随后派人向左师和子产询问应采用的礼仪。左师彬彬有礼地回答：“小国敬奉大国，怎敢不实言相告？”献上公侯的礼仪六项。子产回复说：“小国依从大国是职责，当然应克尽职守。”献上伯子男的礼仪六项。

相会的时候，楚灵王让椒举跟在身后，随时指点礼仪上的过失，到仪式结束时，椒举也没说话。灵王问其缘由，椒举回答：“我也不懂得这些礼仪呀！”

宋国的太子佐晚到，灵王正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打猎，很久也没接见他。椒举请灵王派人辞谢，使者前去说：“我国陛下在武城有祭祀活动，不能亲自接见，甚表歉意，将要把你们的礼品献于宗庙。”

徐国的国君是吴国人的外甥，楚灵王认为他心怀二意，在申地将他逮捕。

楚灵王日益对前去赴会的诸侯及大夫不礼貌，人们议论纷纷。

椒举劝谏说："诸侯相会，务必以礼相约，否则人心思叛。夏桀举行仍地之会，有缗背叛了他；商纣举行黎地之会，东夷背叛了他；周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狄背叛。这些背叛都是因骄傲引起的。现在陛下显示出骄傲，恐怕会影响大业的！"灵王不听。

郑国大夫子产见到宋国的左师说："终于原形毕露了！楚国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灵王骄纵不安，不会活过十年！"左师赞同说："对！没有几年的时间，他的恶名不会远扬，等到他声名狼藉的时候，必会被抛弃的！"

会合了诸侯，楚灵王仍不满足，又带领着诸侯们进攻吴国。灵王派屈申包围了吴国的朱方（今江苏镇江丹徒），不久，攻克朱方，捉住了齐国逃亡到吴国的庆封，把他的族人全部消灭。灵王准备杀死庆封，椒举警告说："臣听说只有完美无缺的人，才能诛杀别人。庆封是由于在国内作乱才逃到这里的，他肯服服帖帖地听命就戮吗？如果他散布些胡言乱语在诸侯中传播开，对陛下恐怕影响不好。"灵王不听，让庆封背上斧钺，在诸侯的军队中示众。楚灵王让庆封边走边说："不要像庆封那样杀死他的国君，削弱国君的孤儿，去同他的大夫会盟！"然而，庆封却大声喊叫说："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子围那样杀死他的国君——哥哥的儿子郏敖——而取代他，也不要同他相会！"楚灵王听到消息后很惊慌，立即把庆封杀了。

杀了庆封，又带领诸侯灭亡了赖国。赖国的国君让人把自己反绑两手，嘴里衔着玉璧，士大夫袒露后背，抬着棺材跟在后面，到了楚国中军帐前。灵王问该怎么办，椒举说："从前成王攻下许国，许僖公就这样。成王亲自为他松绑，接受了玉璧，焚烧了棺材。"灵王照此做了，把赖国迁移到鄢地。随后，要把许国的人迁徙到赖国境内，派斗韦龟和公子弃疾筑城，然后返回楚都。

楚灵王为所欲为，一帆风顺，日益骄纵。大夫申无宇预言说："物极必反，楚国的祸难已经开端了。他召集诸侯，诸侯就前来；

攻打别国，随即攻克；要在边境筑城，也没人阻拦。他的愿望都能实现，还知道天高地厚吗？国内的百姓还能得安宁吗？如果百姓不堪忍受，后果难以料想！”楚灵王最后的命运怎么样呢？请阅“楚平王得国”。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四年

楚平王得国

善始者易，善终者难。一般说来，一个朝代，一个统治者，在执政初期或许能够比较开明，但随着权位的巩固或人们的赞誉，往往失去自知之明，最终走向反面。楚平王的例子恰好可以作为证明。

楚平王名弃疾，楚共王的幼子。楚共王没有嫡子，却有五个庶子，不知立哪一个为太子好。于是，他祈求神灵帮助选择太子，暗中把玉璧埋在祖庙院内，看谁拜祖时离玉璧最近。结果，五位儿子中有三人贴近玉璧，弃疾就是其中之一。

公子弃疾是一个遵循礼法的仁义君子。楚灵王为国君，派公子弃疾到晋国访问，作为晋女嫁楚的回报。去的途中经过郑国，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太叔跟随国君前往相地接待。公子弃疾见郑伯前来，于礼有加，便回避见面。在郑国人的再三恳求下，公子弃疾才同他们相见，用觐见楚王的礼节觐见郑伯，献上八匹好马作为见面礼；会见子皮犹如会见楚国的上卿，献上好马六匹；献给子产马四匹；献给子太叔马两匹。郑国人见公子弃疾如此循规蹈矩，很是惊讶。途经郑国期间，弃疾向随从下令：禁止随意放牧践踏农田啃食草场，不准随便砍伐林木，不准轻易向郑国人讨要。有触犯禁令者，君子撤职，百姓降级！郑国人看到公子弃疾行为举止谨慎有礼，认为他很有可能会替代楚灵王为国君，更是热情款待。

与公子弃疾截然相反，楚灵王却是一个放纵不轨的人。早在

他任令尹的时候，他就使用国王的旗帜去打猎。大夫申无宇见到后很不满，挥剑斩断旌旗飘带，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国二主，国家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楚灵王即位之后，建成章华宫，招待逃亡的人安置在宫内。大夫申无宇的守门人逃到章华宫内，申无宇要进去逮捕逃亡者，守卫章华宫的大夫警告说："闯进国王的宫内逮人，罪大滔天！"申无宇不听，被守卫大夫拘捕，交给楚灵王。楚灵王正在饮酒，申无宇说："《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历来的制度。现在有臣仆逃到章华宫内，守卫官员责问：'你为什么要到王宫内逮人？'不到王宫又到哪里去逮呢？早在周文王的时候就规定，臣仆无论逃到哪里都要找回，并说，匿赃与盗同罪。周武王声讨商纣的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他隐匿逃亡，所以人们最终抛弃了纣王。陛下现在的作法恐怕不妥吧！"灵王见申无宇言之凿凿，便说："那就把你的奴隶抓走吧！"并赦免了他的罪过。

楚灵王筑成章华台，邀请诸侯前去参加落成典礼。鲁昭公应邀前往，灵王在章华台设宴招待，并把宝贵的大屈之弓送给鲁昭公。然而不久就后悔了，把此事告诉了大夫薳启疆。薳启疆随后找到鲁昭公，见了面就下拜祝贺。鲁昭公感到莫明其妙，问："你祝贺什么呢？"薳启疆回答："大屈之弓乃称霸宝物，谁有了它，谁就能称霸四方，所向无敌。齐、晋、越三国从很久以前就想得到它，我们国君终日不安，不知如何处置才好。现在贵国陛下拿走了它，替我们国君解除了心头之患，我怎能不拜谢？"鲁昭公闻听此言知道其中有奥妙，赶紧把弓退还给楚灵王。

楚灵王十年（前531），楚国灭掉陈国和蔡国之后，在陈、蔡故地筑城，把公子弃疾派往蔡地做蔡公。楚灵王征询大夫申无宇的意见，说："把弃疾封为蔡公怎么样？"申无宇回答："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卫庄公把公子元封在栎，

结果卫昭公被废。臣听说，五种重要的大臣不能到边疆地区，五种小人物不能居朝中。也就是说，亲近大臣不能离都在外，寄居的人不能居住内宫。现在，公子弃疾在蔡地，郑丹在宫内，陛下要多加戒备了!”灵王不在乎地说：“国都有高墙深池，纵然他图谋不轨，又能怎么样?”申无宇回答：“郑国栎地的封君杀了曼伯，宋国亳地的封君杀了子游……。从这些例子来看，封重臣有害于国君。树木的枝大害本，动物的尾大害体，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楚灵王讨厌大夫成虎，便诬蔑成虎是若敖氏的余党，将成虎杀死。又派荡侯、潘子、司马督等人率兵包围徐国，进而威胁恫吓吴国。楚灵王住在乾谿作为大军的后援。寒天大雪，灵王头戴皮帽、脚穿豹皮靴、身穿皮衣在外巡视。右尹子革朝见灵王，灵王把他引人宫内，问子革：“从前我们先王熊绎和吕伋、王孙牟一同事奉周康王，别人都受赐，唯独我楚国没有。现在我想派人至成周，请求把王鼎赐给楚国，周天子会答应吗?”子革回答：“会给的。从前我们先王地处僻远，而齐、晋、鲁各国是天子的亲戚，所以亏待了我们。现在楚国强大，诸侯降服，周天子也会唯命是从的。”楚灵王又问：“我们的先祖昆吾居住在旧许，后来这里的土地被郑人夺去。我想找郑国要，郑人会还吗?”子革回答：“周天子都不敢爱惜自己的宝鼎，郑国怎敢爱惜那点土田!”

工尹路走了过来，向灵王请示说：“请陛下同意破开圭玉用来装饰斧柄。”灵王进宫去察看。大夫析父对子革说：“你可是楚国有威望的人，现在灵王说什么你奉承什么，国家的命运堪忧!”子革回答：“我早已磨快了刀刃等待着，灵王出来，我这刀就要落下来了。”

楚灵王多行不义，很多大臣都痛恨他。他曾杀死大司马蒍掩，没收其家财。后来又夺取遈居的田地，把许国迁往他处，以许大夫为人质。灵王还先后没收斗韦龟和蔓成然的封邑。鲁昭公十三年春天，这些失意的大夫联合起来发动叛乱，攻占楚国的固城，又

攻克息舟，据城自守。

被楚人灭国的蔡国的旧贵族也想乘机复国。观从劝朝吴说："现在不图复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以蔡公弃疾的名义把子干、子皙从晋国召回，强迫他们二人结盟，随后进攻蔡地。公子弃疾见到这种情况，匆忙逃走了。朝吴聚集蔡地的人们宣布："现在我们拥戴蔡公，谁想为楚灵王效命请自便，不想为楚王效命的，就跟从蔡公！"大家表示："不从楚王，跟从蔡公！"于是，拥戴蔡公弃疾，召见子干、子皙会盟。叛乱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向楚都，蔡公派须务牟和史猈进入国都，杀死太子禄和公子罢敌。公子比做了王，公子黑肱作了令尹，驻扎在鱼陂（今湖北天门西北）。公子弃疾做了司马，派观从到乾谿鼓动楚灵王的部下背叛，说："先回楚都者官复原职，执迷不悟者受刑！"楚灵王的军队在返都途中就溃散了。

楚灵王听到太子和公子被杀的凶讯，从马车上一头栽了下来，说："别人也像我一样爱子吗？"侍从说："还有比您更爱惜儿子的人。"灵王自语说："我曾杀死很多人的儿子，自己今天才落到这一地步。"右尹子革说："先在郊外静候，看有什么变化。"楚灵王说："众怒难犯啊！"子革说："要么我们退守大的城池，向诸侯请求救兵。"灵王说："人们都背叛我了！"无奈，子革离开了灵王。不久，灵王便上吊自杀了。

公子弃疾不甘心让公子比夺走王位，准备除掉公子比和公子黑肱。观从劝公子比说："如不杀死弃疾，早晚要受他暗算！"公子比说："我不忍心杀他。"观从说："别人会对你忍心的，我不能再留下去了。"随后离开了公子比。公子弃疾暗中派人常常在夜里惊叫："灵王回来了！"都城内人心汹汹。不久，公子弃疾派蔓成然跑去报告公子比和公子黑肱："灵王回来了！都城内的人们杀死了公子弃疾，正向这里杀来。你们应早作打算，以免受辱！"后边又有人跑进来说："不好了，人们来到了！"公子比、公子黑肱便

自杀了。楚灵王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公子弃疾即位，是为楚平王。平王派人安葬了公子比，杀死一个囚犯，给他穿上灵王的衣服，随后收尸安葬，以安定人心。

楚平王夺得君位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广施德政。他宣布恢复陈、蔡两国，召集逃难的人回到国内，赏赐有功之臣，大赦罪犯，选贤任能。他召见观从，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观从说："我的祖先是卜尹的助手。"楚平王于是任命观从为卜尹。宣布归还侵占郑国的犨、栎二地，派枝如子躬前去同郑国交涉。枝如子躬到郑国后，没按平王的旨意办，拒绝把犨、栎二邑交还郑国。回国后，平王也没追究他的责任，反而安慰了他。

适逢此时吴国灭亡州来，令尹子期请求讨伐吴国。平王冷静地说："我刚得国，立足未稳，目前需要的是安抚百姓、敬奉鬼神、加强守备。否则，百姓未附，一旦失利，后果不堪设想。"

楚平王元年（前528），平王派然丹到楚国西部训练军队，安抚当地的百姓。施舍贫贱，救穷困，抚育孤幼，赡养病老，宽免孤寡的赋税，赦免罪人，选拔人才，优待旧族。派屈罗到东部地区训练军队，同样安抚人心。

楚国的令尹子旗对平王有佐立之功，然而他恃功骄宠，毫无节制，并同养氏相勾结，贪得无厌。平王很不安。最后，下决心杀了令尹子旗，诛灭了养氏一族。

平王为公子的时候，郹阳人的女子私奔到平王那里，生下太子建。平王即位后，派伍奢任太子建的师傅，费无忌任少师。费无忌与太子建的关系不好，便要阴谋陷害太子建。他对平王说："太子建应该娶妻了。"平王依从费无忌的主意，派他到秦国聘娶。然后，他又鼓动平王自己娶了秦女为夫人，用以挑动平王与太子建的关系。

不久，费无忌又对平王说："晋国所以能领导诸侯，是因它接近中原。楚国地处僻远，无法同晋国争夺。不如加固城父（今河

南宝丰西），把太子安置在那里，镇守北方，陛下可攻取南方，夺得天下。”平王又依从了费无忌的主意，把太子建派到城父。

太子建离开都城到了城父后，费无忌加紧诬陷活动，楚平王良莠不辨，对费无忌言听计从。费无忌说：“太子建和伍奢准备发动方城山的人们背叛，并联络了齐、晋等国内外呼应，马上就要动手了！”平王召来伍奢质问此事。伍奢直言相谏：“陛下真假不辨，听信谗言，把太子派到都外，已经做过一次错事，为什么还要错上加错？”平王大怒，逮捕伍奢，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知道太子建没有过错，便派人通知他逃走。楚平王七年三月，太子建逃亡到宋国。平王得悉太子建逃走，十分愤怒，召来奋扬质问：“话从我口出，入你耳中，是谁给太子报得信？”奋扬毫不畏惧地回答：“是我让他逃走的。陛下最初命令我：‘侍奉太子要像侍奉我一样。’现在又下达相反的命令，我无法执行，仍然按最初的命令做了。”

伍奢的两个儿子在楚国边邑，费无忌担心将来对自己不利，想斩草除根，便对平王说：“陛下可用赦免伍奢的名义召他的儿子回来，然后一网打尽！”平王派人去召他们，说：“你们回国我就赦免伍奢。”伍尚对弟弟伍员说：“你到吴国，我回国都吧！我能死，你足智多谋，能报仇。不回国，使父亲不能赦免，这是不孝。你要好自为之！”伍尚到了国都，费无忌立即把他们父子二人杀了。伍员逃到了吴国。

太子建的母亲住在郹邑，她召来吴国军队，为他们打开城门。吴军攻入郹邑，带着太子建的母亲和珍奇宝物而归。

楚国的百姓对平王的昏庸开始不满。令尹子常修缮郢城，人们议论说：“如果国家没有内忧外患，修城墙干什么？如果内部人民不附，国外有敌国进攻，城墙再高也没有用！”

为了报复吴人攻伐郹邑，楚平王九年冬天，平王组织水军袭击吴国。沈尹戌怨气地说：“这一次楚军必损无疑。不安抚百姓，

却使他们疲惫不堪，吴军待机而动，楚国边防不作防备，怎能不丢城！”楚军到达圉阳而归。吴军尾随其后，乘楚人不备，灭了巢和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二邑。沈尹戌议论说：“楚国的祸患已经开端了。一次小小的战役就丢了二邑，吴军很快就会兵临郢都城下的！”

从此以后，楚国开始走向内外交困。国内人怨声载道，国外吴国攻伐不已，使楚国失去与中原国家争霸的声威。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昭公六年至二十五年

陈蔡灭兴

陈国和蔡国是周初分封的两个诸侯国家。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两个国家都位于今河南东部，并占有安徽的毗邻地区。陈、蔡两国是邻国，陈北蔡南。西周初年武王分封，封虞舜的后代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建立陈国；封文王之后叔度于蔡（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建立蔡国。

春秋以后，楚国的势力不断扩大，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吞并一些小国，陈国和蔡国自然也在劫难逃了。早在陈灵公时期，由于陈国政治混乱，陈灵公同大臣们荒淫无道，夏征舒杀死陈灵公，楚国便借机发兵，以讨伐夏征舒为名，一举吞并了陈国，把陈国置为楚国的一个县。后来，楚国又恢复了陈国，使陈国得以劫难余生。然而，陈国的统治者没有接受亡国的沉痛教训，旧贵族们仍然只图享乐，积聚财富，盘剥百姓。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六月，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到陈国参加诸侯结盟，回国后对大夫们说：“陈国是走向没落、必定灭亡的国家。统治者只知聚敛粮食，高筑城池，却不知道安抚人民。没有百姓的拥护，政权没有稳固的根基，贵族公子们奢侈腐化，大夫们骄傲，各行其是，互不统属。一个邻近大国的小国，本来就时刻受到大国的威胁，又不知自强自安，想不灭亡，这太难了！依我看，陈的亡国不超过十年。”

蔡国的国内也不安宁。蔡景侯为太子到楚国娶妻，不久就同太子的夫人私通。太子忍无可忍，密谋杀死了景侯。

陈哀公内宠很多，第一夫人郑姬生了太子偃师，第二夫人生了公子留，第三夫人生了公子胜。后来，陈哀公十分喜欢第二夫人，公子留也格外受哀公的恩宠。哀公担心将来公子留受迫害，便把他托付给了司徒招和公子过。哀公患有慢性病，久治不愈，委政大臣。鲁昭公八年（前534）三月十六日，公子招、公子过合谋杀死太子偃师，然后立公子留为太子。他们担心将来哀公反悔治罪，又进一步派军队围困哀公。不久，哀公悬梁自尽，太子留即位，是为陈惠公。公子胜不满意公子招等人的行为，向楚国投诉。楚国人借机杀掉陈惠公的使者干征师，陈惠公吓得逃往郑国。

陈国的公子招见楚国出兵干涉，十分恐慌，把罪责推到公子过身上，杀了公子过。同年九月，楚国的公子弃疾率兵包围了陈国的首都，宋国大夫戴恶领兵前去助战。十一月，一举灭掉陈国，把陈置为楚国的一个县。楚灵王任命大夫穿封戌为陈公，勉励他说："你在城麇之战中坚持正义，我特此作为奖励。"不久，穿封戌陪灵王饮酒，楚灵王问道："你如果知道寡人即位为君的话，当时一定会附从我了吧？"穿封戌却说："如果知道陛下后来能得国，我当时就冒死相争了！"

晋平公听到楚国消灭陈国的消息，问史赵："陈国大概从此就亡国了吧？"史赵回答："不会的。"晋平公问："为什么？"史赵回答："陈国人是颛顼的后代，颛顼氏的灭亡是岁星处于鹑火位置的时候。陈国的灭亡，也将是岁星再次处于鹑火位置的时候。现在，岁星在箕宿、斗宿之间的银河，陈国还没到灭亡的命数。陈国还会复兴，而且陈氏要在齐国站住脚之后，陈国才会灭亡。陈人的祖先从幕到瞽瞍一直没有违背天命，舜又有盛德，所以到了胡公不淫的时候，周人为他赐姓授封。我听说，盛德之后享祀百代，现在舜的后代不满一百，将会在齐国延续下去。"

鲁昭公九年四月，陈地发生火灾。郑国大夫裨灶议论说："再过五年，陈国就会复兴，复兴后再过五十二年就该灭亡了！"执政

大夫子产听到这样的议论觉得不可思议，问这样说有什么根据，裨灶回答："陈国属水德，楚国火德，水与火相对而成。现在大火星出现，陈地发生火灾，这是上天在迫使楚国重立陈国。五行之数以五为周期，所以我说五年之后陈国复兴。陈国的历数也是五，也就是大火星为陈国主运五周。五周五十二年，所以我说陈国还能存在五十二年。人副天数，这是天人之道，自然规律。"后来果如裨灶所言，陈国复封于鲁昭公十三年，亡于鲁哀公十七年，历五十二年。裨灶言之凿凿，到底是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得而知了。

楚国灭掉陈国引起了周天子的关注。周景王向苌弘询问说："现在诸侯各国中，哪个国家吉利，哪个国家不吉利？"苌弘回答："蔡国不吉利。岁星在豕韦，这是蔡侯般杀死国君的年份。楚国将会得到蔡国，但这对楚国并没有好处。等到岁星到达大梁位置的时候，蔡国又将复国。"

鲁昭公十一年春天，楚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蔡灵侯准备前去，蔡国的大夫们劝阻说："楚人生性贪婪不讲信用，对蔡国久怀歹意。现在他们却用财物和甜言蜜语召见我们，定没怀好意。为安全起见，不去为妥。"蔡侯不听从。三月十五日，楚灵王设宴招待蔡灵侯，事先在会场四周埋伏下士兵。楚灵王乘蔡灵侯喝醉，将他逮捕，不久，将他杀死，同时还杀死随从七十余人。随后，楚灵王派公子弃疾带兵包围了蔡国都城。

晋国的韩宣子问叔向："楚国会取胜吗？"叔向回答："会取胜。蔡灵侯杀君自立，百姓也不拥护他，上天不过是借楚国的手把他处死罢了。但另一方面，楚国人靠欺骗取胜，胜利不会长久。当初欺骗陈国说：'你们有灾难，楚国帮助你们！'结果灭陈置县。这次骗杀了蔡灵侯，虽侥幸取胜，也会因此而遭殃。"

楚军围攻蔡国，晋国的荀吴对韩宣子说："晋国是霸主，不久前陈国灭亡，眼下又不救援蔡国，别人还怎么服从晋国？事奉盟

主义有什么用?”韩宣子采纳了这一建议，同年秋天，晋国召集鲁、齐、宋、卫、郑、曹、杞各国代表开会，商议救援蔡国。郑国的子皮代表郑国前去开会。临行前，子产对他说：“这次开会是没有意义的，蔡国马上就要灭亡了。蔡国小而不顺服，楚国大而不讲仁义，上天既要抛弃蔡国，也要抛弃楚国而让他积累劣迹。蔡国无君，必定灭亡；楚国不出三年，必有灾殃。岁星绕行到一周的时候，上天就要降下惩罚!”晋国派狐父到楚国请求宽恕蔡国，楚人不答应。同年冬天，楚灭蔡，将蔡国太子杀死以祭冈山。楚国大夫申无宇说：“这不吉祥。五种牺牲不能替代用来祭祀，更何况用诸侯呢?”

灭蔡之后，楚人在陈、蔡故地筑城，任命公子弃疾为蔡公。楚灵王踌躇满志，带领人马到蔡国故地的州来（今安徽凤台）去打猎，住在颍尾。不久，就派荡侯、潘子、司马督、尹午、陵尹喜五位大夫率军攻打东方的徐国，并进一步威胁吴国。楚灵王带兵屯驻乾豁（今安徽亳县东南），作为后盾。

楚灵王执政很不得人心。早在他任令尹时，他曾杀死大司马蔿掩，又没收了他的财产。即位之后，又夺取蔿掩的同族蔿居的田地，同时又把许国迁到他处，让许大夫围做人质。楚灵王还先后没收大夫斗韦龟和蔓成然的封土，羞辱越大夫蒙。这些人对楚灵王积怨已久，看到楚灵王带兵远征东方，便借机联合起来发动叛乱。他们首先发兵攻击楚国的固城和息舟，攻克之后据城自守。

观从对蔡大夫朝吴说：“这可是千载难逢之机，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复兴蔡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他们就假托蔡公弃疾的名义，把楚国公子干、公子晳从晋国召来。公子干、公子晳二人来到城内时，蔡人将准备暴动的实情告诉了他们二人。强迫他们盟誓，一同攻打蔡公弃疾。当时蔡公正在吃饭，得知事情突变，落荒而逃。

观从召集蔡地的人们说：“蔡公勾结两位公子来到蔡国，企图

共同发兵攻伐楚灵王，他们已经订立盟约，马上就要发兵了！”一些官员不愿反叛，逮捕观从。观从说：“反叛的人已经出发，正在调集军队，你们杀死我有什么用？”朝吴也借机鼓动：“楚灵王暴虐无道，蔡公行德好义，大家不如听从蔡公的命令，也好保存身家性命。”人们纷纷表示：“我们听从蔡公的！”

蔡地人民决定拥护蔡公弃疾，联合公子干、子皙共同举大事。于是，他们三人会同蔓成然、蔡大夫朝吴等人，率领陈、蔡、许、叶等地军队，在远居、蔡洧等族人们的协助下进攻楚都。当这一支大军浩浩荡荡开到楚都郊外时，安营扎寨。蔡公弃疾派须务牟、史猈潜入城内，这二人勾结太子的近臣，杀死太子禄、公子罢敌。然后，人们拥立子干为楚王。子干任命子皙为令尹，驻军鱼陂；任命弃疾为司马，让他进宫清理内务。随后又派观从到乾谿，潜入楚灵王的军中策反说：“凡是先回到首都的将士，一律官复原职，保全家财；死心塌地追随楚灵王的人，要施以劓刑！”楚灵王率领军队回救首都，刚刚抵达訾梁（今河南信阳），军队就溃散了。灵王得悉太子和公子都被杀，一头从车上栽下来，对侍从说：“别人也像我一样爱子吗？”侍臣回答：“一般人比陛下更加爱子，因为一般平民子弟死了以后，有可能弃尸山野。”灵王接着说：“如此说来，我杀死这么多别人的儿子，人们会很怨恨我，我今天才落得如此下场。”右尹子革说：“陛下在郊外等待，看城内人们的意向如何再作决断。”灵王失望地说：“人心背离，这是无法镇压的。”子革献计说：“我们或许可以占领一座大城，坚城自守，向诸侯求救。”灵王无可奈何地说：“已经没有大城可以收容我了。”子革最后说：“那就逃亡国外吧！”灵王说：“人生福禄只有一次，流亡他国徒遭羞辱而已。”子革见楚灵王山穷水尽，便悄悄地离开了他。楚灵王沿汉水南行，只有申亥不肯背叛他。申亥把灵王接到自己家中，不久，灵王悬梁自尽了。

观从劝子干杀掉弃疾，说：“不杀弃疾，必生后患。”子干却

说："我怎忍心去杀害他呢？"观从说："你不忍心杀他，他会忍心杀你的！"说完就离开了子干。

不久，弃疾便阴谋除掉子干和子皙。他派人在城内到处传播消息，说楚灵王回都来了，用以恐吓子干。鲁昭公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弃疾派一队人马从城外开入城内，大喊道："灵王回来了！"同时，派蔓成然告诉子干、子皙说："灵王回来了，国人要杀死司马，正冲向这里。假如你们早作准备的话，或许能不蒙受耻辱。一旦人们来到这里，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时外边有人大声呼叫说："人们冲过来啦！"子干、子皙一见这场面，当即自杀身亡。十八日，公子弃疾即位，是为楚平王。

楚平王即位后，为了缓和楚国内外的矛盾，在国内施德政，以收揽人心；在国外积极改善楚国的形象，重新恢复了陈国和蔡国。陈国复兴后，延存到鲁哀公十六年，算是应了史赵和裨灶所说陈国五十二年后亡国的预言。蔡国亡于周贞定王二十二年，比陈国多存在了三十二年。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三十年至昭公十三年

晏婴相齐

继管仲相桓公之后，大约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齐国又出现了一代名相，他就是晏婴。

晏婴，字平仲，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大约生于公元前6世纪前半叶，出身于贵族家庭。当时的齐国，政治混乱，旧贵族日益腐化，先后发生了崔杼之乱和庆封之乱，田氏在齐国逐渐崛起。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晏婴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为相，受到各方人物的拥护，名扬而不辱。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晏婴是一个具有传统特征的人。晏婴的父亲晏弱在齐国任卿，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晏弱去世。晏婴穿着粗布丧服，头上和腰间系着麻带，手执竹杖，脚穿草鞋，睡在草席上，头枕草枕睡觉，不食粱肉，每日只喝些稀粥，为父亲守丧尽孝三年。这样的习俗在当时早已不再流行，所以，他的家仆劝他说："现在的大夫们已经没有这样尽孝的了，您何必呢？"晏婴却说："我还算不得大夫，所以要守孝。"

晋国大夫栾盈背叛国君，逃往楚国，后来转道来到齐国。晏婴劝齐庄公不要收纳，他说："齐国不久前在商任与诸侯结盟，接受晋国为盟主。现在接受栾盈，又怎能任用他？小国事奉大国靠的是信义，没有信义就不能立国，请陛下三思！"齐庄公未予采纳。晏婴退出以后，告诉陈文子说："作为国君应该讲信用，作为臣下应该讲恭敬。忠、信、诚、敬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背离了原则是

危险的！国君不注意自己的影响，未来难测。”

齐庄公四年（前550）秋天，庄公不顾形势，贸然发兵攻卫，随后攻晋。晏婴劝谏说：“陛下一味诉诸武力，竟然攻打盟主。如果不能成功，这对齐国未尝不是好事。不修德政而取得功绩，后果不堪设想！”崔杼也劝阻庄公说：“小国钻大国的空子，企图用武力占便宜，一定会遭到报复。”庄公坚决不听。

庄公尚武，晏婴尚文，晏婴的主张很不受庄公喜欢。一次，庄公饮酒，派人召见晏婴。晏婴入门后，庄公命人奏乐歌唱说：“扫兴啊扫兴，寡人真是扫兴，你为何还不辞行！”晏婴入座后，乐师先后演唱了三次，晏婴才知道这是庄公有意给自己听的。他立即从席位上站起来，面北背南坐到了厅堂的土地上。齐庄公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入席，反而远坐在地上？”晏婴回答：“臣听人说，诉讼的人要坐在地上。我今天将要与陛下争论，怎敢不坐于地上？我常听人说，倚仗自己人多势众而不讲义，倚仗自己强大而不讲礼，一味追求勇武而不用贤人，必将遗祸于后。陛下正是这样的人，而且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请求辞职！”说完走出朝廷回到府中，将官印文件呈还给齐庄公。晏婴对别人说：“国君为人民谋福利，我就接受他的爵禄，为民做事；国君不为国民，一心为己，这样的俸禄我不取，这样的官职我不要！”

当时齐国国内的政局十分混乱，国君荒淫无道，群臣狼狈为奸。在这种局面下，恪守传统的晏婴显得很矛盾。一方面他要遵循旧礼制，按君臣之道办事；另一方面又对旧贵族的腐败痛心疾首，嗤之以鼻。

齐庄公荒淫无道。大夫崔杼的夫人棠姜长得漂亮，被庄公看中了。于是，庄公屡次到崔杼家里去同棠姜鬼混，并且把崔杼的帽子带到朝上显示。崔杼极端怀恨。齐庄公发兵进攻晋国时，崔杼就准备发动政变，只因没有机会才没得逞。齐庄公六年五月十六日，庄公又去崔杼家中与棠姜寻欢作乐。崔杼事先做好了周密

的准备，埋伏下士兵，将庄公杀死。当时，很多随从和大臣都被崔杼杀死，晏婴正在崔氏的宅院门外。他的部下问："您是否为国君而死?"晏婴回答："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为他死?"部下转过话头说："那就赶紧躲开这里吧！"晏婴反问："又不是我的罪过，我为什么逃亡?"部下被问得不知如何才好，于是说："那就回府吧！"晏婴反问："国君死了，我能回到哪去？作为君主，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高高在上吗？不，是让他主持国政。作为臣下，难道是为了白食俸禄吗？不，是为国家做事。因此，如果君主是为了国家人民而死，臣下就要同他一道去死；假如他是为了个人的私欲，臣下就不必随他去死。"说完，打开大门走进院内，头枕在庄公的腿上嚎啕大哭，然后走出院子。有人劝崔杼杀掉晏婴，崔杼说："他是有威望的人，留下他可以收拢人心。"

几年后，大夫庆封的势力兴起，灭掉了崔杼及其党羽，执掌了齐国大权，在齐国专横跋扈，引起了公族的不满。庆封准备除掉公族中的异己势力，事先派人通知了晏婴。晏婴不满意庆氏专权，也不敢得罪庆氏，当即表态："我的家族没有什么势力，不能为你们出力，我晏婴也没有什么计策可以献纳。虽不能效力，但决不敢泄露任何消息，我们可以盟誓！"庆氏的党羽见晏婴如此说，也就放心了。

由于晏婴正直的人品和中立态度，以及机智的处理，在齐国的几次政变中都险境逃生，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和人们的拥护。吴国的公子季札周游列国，来到齐国专门拜访了晏婴，二人一见如故。季札劝告晏婴说："齐国政局不稳，不久还会出乱子，你赶快把封邑和权位交还给国君，方能免于灾难。"晏婴听从了季札的劝告，通过陈桓子交还了封邑和职务。不久栾氏、高氏发动祸乱，晏婴得免于难。

栾氏、高氏之乱发生在齐景公十六年，栾氏、高氏是齐国的两个大族，势力很大。但是，他们不修政务，终日只知饮酒作乐，

听信女人的谗言，所以得罪了很多人。陈氏、鲍氏势力较弱，但与他们不是一派，所以双方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栾氏、高氏故意排斥陈、鲍二族。

这年夏天，有人暗中传递消息给陈桓子和鲍文子说："栾施和高强准备发兵进攻你们！"陈桓子得到消息，立即给族人发放兵器，并亲自通知鲍文子。陈桓子去找鲍文子的途中，正遇高强喝得醉醺醺骑马飞奔。到了鲍氏那里，鲍氏也已分发了兵器。他们二人立即派人到栾、高二人那里侦察，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陈桓子说："当初的消息虽不一定靠得住，但我们这里的行动将来一定会暴露，到那时他们会报复我们的。不如现在趁他们没防备，先下手为强，你看怎么样？"鲍文子听从了陈氏的话，二族合兵猛攻栾、高二族。

栾、高二族受到突然袭击，惊慌不知所措。高强说："先控制齐景公，陈氏、鲍氏能跑到哪里去？"于是，栾、高二族发兵攻击齐景公的宫门。

晏婴当时正穿着朝服站在宫门外等候接见，交战的双方都派人请他去，都被晏婴拒绝，部下问他："帮助陈氏、鲍氏吗？"晏婴反问："他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么帮助栾氏和高氏吧！"晏子又反问："谁能肯定他们一定取胜？""那就回去吧！"晏婴回答："国君遭受攻击，我能回到哪去？"齐景公召见晏婴，晏婴走进宫去。

栾氏、高氏战败，逃往鲁国，家产被陈氏和鲍氏瓜分。晏婴对他们二家说："栾氏和高氏的财产一定要上缴国君！谦让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凡有血气的人都有利益之心，但礼义是利的关键。不讲礼义而贪利，必生邪恶！"陈桓子听从了晏婴的劝告，把栾氏和高氏的家财交给了国君。

晏婴是一位衣食有节、不纵私欲的人。庆封之乱后，齐景公封给晏婴六十个邑作为俸禄，晏婴推辞不肯接受。子尾不解地问：

"富乃人之所欲，你为什么不接受?"晏婴回答："人的欲望是不可以使它满足的。庆氏的欲望满足了，他也就跟着灭亡了。我的欲望没有满足，加上六十个邑就满足了，岂不危险？我不是厌恶财富，而是怕失去财富。况且，富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如同布帛有一定的幅宽一样。人的私欲不能消灭，但也不可无限制扩张。物极必反。"

在日常生活中，同其他贵族相比，晏婴显得十分俭朴。据说，他身穿布衣，吃普通的饭菜，很少吃肉。他自己常说："富而不骄、贫而不恨的人很少，但我就是贫而不恨的人。只有安于贫，才能乐于善。骄而弃善，岂不危险!"一次，齐景公派使臣到晏婴家中，恰逢进餐时间，于是一道用餐。使臣认为晏婴的生活清贫，回去报告了景公。景公给晏婴增加俸禄，晏婴不肯接受，说："我的生活并不贫困，若我把这些财富用来赈济贫困的人民，是掠取国君的美名；如果作为私用，仁义的人肯定不会这样做；如果高官厚禄，骄纵妄为，最后落罪而亡，这不明智。"景公说："从前管仲相桓公，受封书社五百，同管仲相比，你这点俸禄算得了什么?"晏婴回答："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正是管仲的一失，我的一得吧!"

晏婴居住在齐都临淄城中靠近市场的平民区，房屋内阴暗潮湿。齐景公提出为晏婴盖新房，说："你的住宅靠近市场，低湿狭小、喧闹多尘，居住很不舒适，在高处盖所房子吧!"晏婴推辞说："臣的先辈一直住在那里，我不能发扬先祖的事业，住在那里已经很不错了！而且靠近市场，早晚购物方便。"景公笑问："那你知道市场上货物的贵贱吗?"晏婴回答："当然知道。"当时齐景公滥用刑罚，很多人受刖刑（挖掉膝盖骨）而不能行走，市场上便有卖假腿的。晏婴借题发挥说："鞋子贱，假腿贵。"景公听后若有所悟，减轻了刑罚。当时有人赞扬晏婴说："仁人之言，德泽无边。"齐景公九年，晏婴受命出使晋国。在晏婴出国的这段时间，景公

为他重建住宅。晏婴回到齐国时，住宅已经建成。晏婴向景公谢恩，然后拆毁了新宅，把被拆的邻里住宅原样复建，让人们回来居住。景公很生气，晏婴解释说："常言道，不为宅卜，而为邻卜。邻居是很重要的，这是占卜决定的。违背占卜不吉祥，这是古代的制度。"

晏婴为相，积极帮助景公推行德政和礼制。一次，齐景公身上生了疥疮，同时还得了疟疾，病情很重，一年时间都没治愈，诸侯们都派人前来问候。大夫梁丘据和裔款对景公说："陛下虔诚地敬奉神灵，比先君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陛下病重，诸侯们都忧心忡忡，这是祝、史对鬼神不恭敬的缘故。别人不了解，也许要说陛下对鬼神不诚。应该诛杀祝、史以昭明天下。"景公相信了这些话，告诉了晏婴。晏婴却旁敲侧击地说："从前在宋国召开弭兵会议的时候，楚国大夫屈建向晋国的赵武询问范会的情况，赵武说：'他老人家族内的事情井井有条，在朝中的工作全心全意，丝毫没有私心杂念。所以，他的祝、史在向鬼神祷告的时候，据实而言内心无愧。'屈建把这话转告了楚康王。楚康王感慨地说：'范会忠正无私，神和人民都喜悦他，所以他能在晋国先后辅助几位国君。'"景公听后不高兴地说："梁丘据和裔款都认为寡人能事奉鬼神，是祝、史的工作没能尽职尽责，才要诛戮他们。你对我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晏婴正色回答："德行高尚的国君，为国为民一心奉公，不纵私欲，神和人民都喜欢他。他的祝、史如实向神灵禀告，内心无愧。所以，神灵愿意接受献上的祭品，给人世间降下福祉，祝、史也能享受一份。如果碰上放纵的国君，为政不善，歪门邪道，行为举止违背常理，利欲熏心，掠夺百姓，骄奢淫佚，神灵和人民都会怨恨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祝、史如实祷告，这是报告国君的罪过；如果祝、史掩过饰非，只说好事，这是欺骗神灵。所以，神灵不接受他们的祭品，降下祸灾以示惩罚，祝、史也有一份。"景公听后很害怕，问道："那怎么办？"晏

婴继续说："没有办法啊！神灵愤怒，人民哀怨，祝、史在那里祈祷，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诅咒，祝、史纵然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因此，只有施行德政、修养身行，然后一切都会好的。"景公很高兴，让官吏宽政恤民，废除苛政，减轻赋税，蠲免债务。

齐景公二十六年十二月，景公外出打猎，只有梁丘据随行，晏婴在遄台（今山东临淄附近）等候。景公来到后对别人说："只有梁丘据跟我和协呀！"晏婴立即驳斥："梁丘据只不过是同，而不是和！"景公问："同与和还有什么区别吗？"晏婴答："当然有区别。和，就像厨师做汤，用水、盐、醋、酱、辣各种调料加以调和，使美味适口。人们喝了这样的汤，心旷神怡。宫廷中的政治也是这样，国君的不足需要臣下补充，国君的偏颇需要臣下摆平，臣下的过失也需要国君指正。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合于礼义，百姓一心。《诗经》中说：'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无言，时靡有争。'音乐也同此理，有五音、六律、轻重、缓急，所以才和谐美妙。梁丘据是什么样的臣下呢？陛下认为好的，他就说好；陛下说不好的，他就说不行。所以是同，而不是和。"

一次，景公饮酒至半醉的时候，痴心地说："人生如果只有生没有死，那该多好啊！"晏婴略作思索，然后答道："当然好极了！不过，如果自古以来就没有死的话，陛下的欢乐早就是古人的欢乐，陛下什么都不会有了！最早是爽鸠氏居住齐地，后来是蒲姑氏，然后才是姜太公。如果人不死的话，这里的欢乐是属于爽鸠氏的，陛下恐怕不愿意这样吧！"

齐景公三十二年十二月，齐国上空出现彗（扫帚）星。当时的人们认为出现彗星不吉祥，都很恐慌。景公派人祭祀，企图消灾。晏婴说："徒劳无益，只是自己欺骗自己。上天的意志不可转变，祈祷祭祀也没有用。彗星是天上的扫帚，用来清扫邪恶行为的，如果陛下没有过失，害怕什么？如果有过失，祈祷也没用！《诗经》中说：'只有文王，小心翼翼，敬奉上帝，受赐有福。'

'前车之鉴，夏桀商纣，无德乱政，终致灭亡。'国家兴亡取决于政绩，祝、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景公接受了劝谏，停止祭祀，注意修德。

晏婴陪同景公在宫中饮酒，景公环顾宫廷四周叹气说："多么宏伟漂亮的宫殿呀！将来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晏婴问道："陛下是有什么心事吧？"景公接着说："我在想，有德行的人将会拥有这一切。"晏婴接过话说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将归于陈氏了。陈氏虽没盛德，但对百姓施以恩惠，用大斗借出，用小斗收回粮食。陛下征税多，而陈氏施舍多，百姓自然归向他了。《诗经》中说：'没有别的报答你，只有报以歌和舞。'现在百姓已经为陈氏歌舞了。如果陈氏不亡，您的后代又不修政理，齐国就将变成陈氏的封地了！"景公失望地说："那如何是好？"晏婴说："只有用周礼去制约。依照礼法，家族的施舍不能扩大到国内，百姓不迁移，士、农、工、商各务本业，大夫依礼办事。"景公绝望地说："你说得很对，我却很难做到了！"晏婴勉励说："能够做到的！依礼治国，由来已久。国君发令，臣下恭敬，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妻和睦，婆媳顺从，这就是礼法。君主无过，臣下无二心，人民拥戴，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呀！"

孔子是与晏婴同时代的人，比晏婴年轻。据说他很赞赏晏婴的人品，他评论说："灵公行为不端，晏婴用礼义约束他；庄公崇尚武力，晏婴用正义去诱导；景公奢侈，晏婴用恭敬节俭去诱导。他相佐三位国君，不谋私利，真正的君子啊！"后来，晏婴见到孔子，问道："听说你赞扬我，实不敢当！晏婴不才，不能胜任辅君的使命，只为祀奉先祖、养家糊口罢了，哪里有君子之道。"晏婴辞行，孔子送出很远，多次感谢晏婴的教诲。回到府中对弟子们说："晏婴这个人，救民水火而不居功自傲，长期辅政，对齐国做出重大贡献，却说自己没做什么，受到人们的拥戴，却始终不忘勤勤恳恳，他果然是位君子！"

晏婴在齐国辅政将近半个世纪，历尽政道沧桑，功垂后世。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正处于旧社会解体、新制度初建的转型时期。晏婴哀叹旧贵族的腐败没落，试图用传统制度拯救社会；对旧贵族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残酷斗争痛心疾首；他幻想着君爱民、民拥君这样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在激烈的政治倾轧中，他明察秋毫，机敏过人，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对传统道德的恪守和对私欲的压抑，使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晏子春秋》一书中保存了他的许多政绩，时至今日仍有着影响。

晏婴死后，举国哀痛。据说当时景公正在郊外巡游，听到晏婴的死讯，驱车匆匆赶回都城。进入城内，徒步前往，边行边哭。到了晏婴的遗体前，伏尸哭号，说道："有你在我身旁，经常不断地提醒劝谏我，使我免于大错。是我的过错，使上天降下惩罚落在了你的身上。没有你，齐国的社稷还能依赖谁呢！"

晏婴为什么能在政治上成功、受人爱戴呢？汉代司马迁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晏婴身为三朝辅相，节俭力行，为国所重。身为国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在朝中，国君征求他的意见就直言相告；不询问他，就自正其身。国君有道，他就积极效力；国君无道，他量力而行，可做则做，不可做则止。这是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为相，名显于诸侯的原因。"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十七年至昭公二十六年

《史记·管晏列传》

《晏子春秋》

晋国卿族兴废

到春秋晚期，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政治重心逐渐转移到卿大夫身上，诸侯的地位日益衰落。在晋国，群卿相争，大致经历了从八卿到六卿、四卿，直至最后三卿分晋的过程。

在群卿中，影响最大的是赵、魏、韩三家。赵、魏两家的兴起是在晋献公的时候。晋献公讨伐耿、霍、卫各国，取得重大胜利。回国之后，把耿地封给赵夙，把魏地封给毕万，赵、魏两家始列为大夫。卜偃评论说："毕万的后代必能昌盛。万，是数字的尽头；魏，是巍峨高大。刚开始受封就这样，这是上天的预示。天子统治天下，称百姓为兆民；诸侯统治天下，称百姓为万民。现在，毕万据有魏地而统治人民，将来必会成为诸侯了！"起初，毕万在任官前也曾为自己占卜吉凶，得到屯卦演变为比卦。为他占卜的辛廖预测说："这是吉卦。屯表示坚固，比表示取得，你将来定能繁衍昌盛。这是公侯的卦象，公侯的子孙会恢复到最初的地位。"

当年吴国公子季札周游列国到晋国的时候，见到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非常高兴，对别人说："晋国的政权大概要归这三家了！"同时又对大夫叔向说："你要好自为之吧！国君奢侈，大夫强盛，晋国政权将归人私家了。你为人直率，应该多加注意！"晋哀公十年（前526），鲁国大夫子服昭伯随国君访问晋国，目睹了晋国的政治现状，回国后对别人说："晋国公室的地位日益衰落，很难挽回了。国君幼弱，六卿强大专权，习惯成自然，人们已经

司空见惯了。”

当时晋国有八家卿大夫，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八家中祁氏和羊舌氏两家势力最弱，祸难也就首先落在这两家头上。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卿大夫祁盈将祁胜、邬臧两个家臣抓起来，准备惩罚他们，原因是祁胜和邬臧两家竟搬到一间大屋内居住，过起了共妻生活。在抓他们之前，祁盈曾同司马叔游商量。叔游劝阻他说：“如今奸臣当道，多一事莫如少一事。《诗经》中说：‘邪臣当政时，自己莫找事。’我看你就视而不见罢了。”祁盈觉得有伤风化，坚持说：“这是我家族内部事务，不关国家的事！”照自己的想法办了。

祁胜是个善于邪道歪门的家伙，他派人暗中贿赂执政的卿大夫荀跞，求他帮助。荀跞接受了好处，便在晋顷公跟前说祁盈的坏话，顷公将祁盈逮捕。祁盈的家臣很愤怒，说：“反正主人是死定了，倒不如在他死之前杀死祁胜、邬臧，他心里会舒服些！”随即把祁胜和邬臧两个家伙杀死。

同年夏天六月，晋国杀死祁盈。叔向的儿子羊食我（伯石）与祁盈是密友，看到祁盈无端遭受谗言被害，为他鸣不平。晋人随即杀掉羊食我，将祁氏、羊舌氏两家满门抄斩，二卿遂绝。

羊舌氏遭殃，完全是由羊食我造成的。早年，叔向想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可是叔向的母亲想娶自己的娘家人。叔向说：“我讨厌亲上加亲。”母亲解释说：“巫臣的妻子是绝世佳人，但她先后使三个丈夫、一个国君（陈灵公）、一个儿子（夏征舒）遭殃，同时又使一个国家和两个正卿灭亡，难道不可怕吗？人常说：‘美丽的女人，心地险恶。’巫臣的妻子是郑灵公的妹妹，上天集人间之美于她一身，是用她引起灾祸。晋国太子申生的灾难，夏、商、周三代的灭亡，都是美女造成的。申公巫臣之女虽然漂亮，但她是天生尤物，足以惑人，若无美德，必生祸端。你为什么要娶她

呢?”听了母亲的话，叔向觉得不妙，也就改变了主张。晋平公得知此事后，硬要叔向娶她，婚后生下伯石。伯石出生的时候，叔向的嫂子跑去告诉叔向的母亲：“生了个男孩。”叔向的母亲前去看望，走到堂前听到婴儿的哭声，停住了脚步：“这简直像豺狼的声音，狼子野心，他会使羊舌氏家族败亡的!”转身回去了。羊舌氏果然绝灭在羊食我手里。

祁氏、羊舌氏二卿绝灭后，晋国还有六卿执政。同年秋天，韩宣子死，魏献子执政。魏献子把祁氏的封邑划分为七个县，把羊舌氏的封邑划分为三个县，然后选贤任能任命了十个县大夫，其中有魏献子的庶子魏戊。魏献子问大夫成鱄：“我任命魏戊为县大夫，别人会不会说我有私心!”成鱄回答：“不会的。魏戊的为人正派，克己奉公，与人团结，事君不贰，为什么不能任命他为县大夫?从前武王灭商封天下，其中就有兄弟十五人。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贤能，而不是亲疏。现在您选贤任能，人们赞同，有很好的声誉啊!”贾辛动身到他的县里任职，临行前辞别魏献子。魏献子勉励他说：“你过去做得很好，我因此选拔了你。今后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再建新功!”

孔子听到魏献子选贤任能，认为他做得符合道义，赞扬说：“选任官吏，近不避亲，远不避疏，这是有德行的人。”听到魏献子对贾辛讲的一番话，说：“他是真正的忠臣啊!教育部下克己奉公，体现了他的忠诚，他会在晋国长保爵位的。”

同年冬天，梗阳发生了民事纠纷，县大夫魏戊难以断案，便把案件上报给魏献子。诉讼的一方贿赂魏献子，把舞女乐队送给他，魏献子应允了。魏戊知道后很不安，对魏献子的部下阎没、女宽二人说：“主人为政清廉，名播天下，这次若收纳了梗阳人的好处，岂不败坏名声?请你们二位劝告。”两人答应了。二人在魏献子府宅的院中等待，献子退朝回来，正值开饭，献子呼唤二人吃饭。吃饭的时候，二人屡次叹息。吃饭完毕，献子留住他们，问：

"我听人说'食而忘忧'，你们二人吃饭的时候愁眉不展，有什么大事使你们这样？"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请我俩饮酒，只顾饮酒，没有吃饭，所以今日饥饿难耐。厨师把饭食摆上一斗的时候，我们担心饭不够吃，所以叹气。后来知道自己错了，想到将军请我们吃饭怎会不管饱，于是第二次叹气。吃饱了饭，心里想，用小人的心去揣度君子之腹，岂不荒唐，才又叹息的。"魏献子一想这二人话中有话，什么事呢？肯定是梗阳人争讼的事，便拒绝了诉讼者的贿赂。

晋顷公十三年秋天，有龙出现在晋都绛城（今山西侯马）郊外。魏献子问大夫蔡墨说："我听人说，动物中没有比龙更精灵的了，从来没有人捉到过龙，是这样吗？"蔡墨回答："实在是人不聪明，而不是龙聪明。古代曾有人豢养龙，豢养龙的家族称豢龙氏、御龙氏。""这两个家族我也曾听说过，但不知道他们的来历，怎么回事呢？"蔡墨回答："从前有一个叫董父的人，很喜欢龙，知道龙的生性嗜好。很多龙到了他那里，他就驯服龙，让龙为舜帝服务，舜帝为他赐姓董，赐氏豢龙。夏代孔甲的时候，顺服天帝，天帝赐给他龙驾车，一雄一雌。孔甲不会饲养，又没寻找到豢龙氏。不久找到刘累，刘累曾向豢龙氏学过驯龙，所以他就为孔甲驯龙。孔甲奖励他，赐氏御龙。后来雌龙死了，刘累偷偷剁成肉酱给孔甲吃了。孔甲很爱吃，命令刘累再做。刘累害怕事情败露被杀，逃到鲁县（今河南鲁山东北），范氏是他的后代。"献子饶有兴致地问："现在为什么没龙了？"蔡墨回答："事物都有专人管理，昼思夜虑，想着如何把他的事情做好。从前有负责水木金火土五行的官员，玄冥是水官。龙是水中动物，玄冥死，水官废，便没有人能豢养龙了。《周易》中乾卦说'潜龙勿用'、'龙在田中'、'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坤卦中说'龙战于野'，如果不是早晚都能见到，谁能描述它们？"

在魏献子执政的一段时期内，晋国政局基本稳定。献子死后，

赵简子（鞅）执政。晋定公十五年（前497），赵简子对赵午说："你把卫国献来的五百家还给我，我把他们迁到晋阳去。"赵午答应了，回去后把这事告诉了兄长。兄长们都说："不行！这五百家是卫国用来帮助我们邯郸人的，安置到晋阳会损害我们同卫国的友好关系。赵简子的意思我们也不好违背，可以用讨伐齐国的办法，然后借机再安排他们去晋阳。"赵午照此去做，把卫国的五百家人安排到了晋阳。赵简子不明其意，以为赵午故意拖延，把他叫来囚禁了。赵午的部下涉宾到赵简子那里，简子派人命他解下佩剑才许进去，涉宾坚决不肯，赵简子愈加生气。他派人告诉邯郸赵午的族人说："我要惩罚赵午，你们再选个继承人吧！"随即杀了赵午。

赵午的族人怒不可遏，赵稷、涉宾率领邯郸人反叛。同年六月，赵简子派上军司马籍秦率军包围邯郸。赵午是荀寅（中行氏）的外甥，荀寅与范吉射是姻亲，彼此关系很亲密，所以中行氏和范氏不参加赵简子包围邯郸的行动，并准备攻击赵氏。董安于听到消息后对赵简子说："应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赵简子却说："晋国的法律规定，先发动祸乱的人处死，我们后发制人好了。"董安子不安地说："与其危害百姓，毋宁我一个人受难。请杀死我向他们谢罪吧！"赵简子不同意。

这年七月，范氏、中行氏两家联合进攻赵氏，赵简子逃往晋阳，中行氏和范氏随即包围了晋阳。

范皋夷、梁婴父、知文子、韩简子和魏襄子五人同中行氏、范氏关系不好，于是这五人策划联合起来驱逐荀寅，由梁婴父代替卿位；驱逐范吉射，由范皋夷代其卿位。

荀跞对晋定公说："先君曾有规定，谁发动祸乱就处死谁。现在三个卿违背规定，却唯独驱逐了赵简子，这不公正。请把范氏和中行氏也赶走。"十一月，晋定公带领荀跞、韩不信、魏曼多等人讨伐范氏和中行氏。

范氏和中行氏见国君来伐，准备领兵抗击。齐国逃到晋国的高强阻止他们说："久病成良医，久乱得教训。攻击国君是万万不可的，人心会叛离。当年我正是因攻击国君才导致流亡在外的。与他们三家有仇，直接攻伐他们好了，击败他们，国君还能不听你们的？如果进攻国君，他们必会聚集到一起，那就不好办了。"范氏和中行氏不听，遂发兵攻国君，国内的人们都帮助国君，两家战败。十八日，荀寅、范吉射逃往朝歌（今河南淇县）。

韩、魏两家替赵简子求情，十二月十二日，赵简子回到晋都，与大家结盟。梁婴父讨厌董安于，对知文子说："董安于在赵简子那里出谋划策，不杀掉他，赵氏一定会控制晋国，可以借责备董安于以谴责赵氏。"知文子派人对赵简子说："虽说范氏和中行氏作乱，但这是由董安子挑起的。晋国有制度，挑起祸乱者死，谨此奉告！"赵简子见知氏把矛头指向自己，十分不安。董安子说："如果我死能使晋国和赵氏安宁，死而无憾！人谁不死，我早就准备好死了！"随后上吊自杀。赵简子把他的尸体拖到大街上，通知知氏说："接受您的命令，已经把董安子正法。"知文子同赵简子结盟。

范氏和中行氏据守朝歌和邯郸，晋人包围久攻不下，齐、鲁、郑、卫各国纷纷出兵干涉。晋定公十九年八月，齐国为范氏运送粮食，由郑国的子姚、子般负责押送。范吉射派人去迎接，赵简子派人堵击，双方在戚地遭遇。赵简子的部将阳虎说："我们的战车少，把大将的旗帜插在战车上，这样可以威慑敌人。敌人害怕，开战时才好取胜。"赵简子依从了。赵氏命人占卜此战的吉凶，龟甲烤焦。乐丁鼓气说："《诗经》中说：'谋略得当，于是占卜。'我们有既定策略，相信过去的卜辞好了！"赵简子与全体将士盟誓说："范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斩杀百姓，图谋专权害君。现在郑国背弃道义，抛弃国君而帮助乱臣，我们大家顺从天命，推行德义，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取胜，上大夫封县，下大夫封郡，士授

田十万，庶人工商可以任官，奴仆可获自由。如果不胜，死无葬身之地！”

八月七日，一场决战在即。邮无恤为赵简子御车，卫国的太子为车右。登上铁丘，远望郑军人多势众，卫太子害怕，跳到车下。邮无恤斥责他说：“你像个胆小的女人！”赵简子巡视队伍，鼓励大家说：“当年毕万是个普通人，屡次建立战功，受封为大夫，得以善终。诸位努力，此次未必不胜！”繁羽为赵罗御车，宋勇为车右。赵罗胆怯，别人用绳子把他捆在车上。军吏询问怎么回事，御手回答：“他疟疾发作。”两军混战，赵简子肩膀受伤，倒在车内，郑兵缴获了他的军旗。卫太子赶过来救援赵简子。赵罗被郑军俘虏。最后，郑军战败，全部粮食被赵氏缴获。

晋定公二十年十月，赵简子率军包围朝歌，在城南屯驻重兵。荀寅为了吸引赵氏的注意力，派在朝歌外城的南门发起战事，使城外的人马从北门入城，自己带人突围而出，逃往邯郸。第二年九月，赵简子又包围邯郸。不久，邯郸投降。荀寅逃亡到鲜虞，赵稷逃亡到临地（今河北临城西南）。齐国军队攻击晋国，把荀寅护送到柏人（今河北尧城）。晋定公二十二年春，晋军包围柏人，荀寅、范吉射逃往齐国。范氏和中行氏的封地部分被赵氏侵吞，部分归入晋国公室。至此，晋卿只剩下四家。

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四家将原先范氏和中行氏的封邑全部瓜分，晋国公室一无所得，晋出公极不满，向齐、鲁两国借兵要讨伐四卿。四卿害怕，就联合起来攻击国君，出公逃往齐国，死在半途中。知伯便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晋君，是为晋哀公。

晋哀公的祖父雍，原是昭公的幼子，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与知伯关系较好。忌早死，所以，知伯虽欲吞并晋国，却没有立即行动，便立了晋哀公。当时，晋国的一切政务都由知伯决定，哀公没有任何权力。通过兼并范氏、中行氏的土地，知氏成为四卿

中势力最强的一家。

知伯当政十分骄纵，为实现吞并晋国的愿望，他强迫韩、魏两家割让土地，韩、魏两家惧怕，只得忍痛割爱。知伯又向赵氏索求，赵氏坚决不给。知伯恼怒，率领三家人马攻打赵氏。赵襄子害怕，退守晋阳。

原过跟随赵襄子外逃，途中掉队。他走到王泽，遇到三个人。这三人从腰以上看得到，腰以下却看不见。他们交给原过一节两头不能通的毛竹，说："把这竹子交给赵襄子。"原过到了晋阳，把竹子交给赵襄子，并诉说了经过。襄子斋戒三日，亲自剖开竹子，内有红字写道："赵襄子：我们是霍泰山山阳侯的天使。我们将使你转败为胜消灭知氏，然后你在百邑立庙祭祀我们，我们又将赐予你林胡的土地。你的后代中将有亢强之王，长得肌肤赤黑，龙面鸟喙，鬓发浓眉，气量宏大，威武雄壮，穿着左衽的胡服，骑马作战，南征晋邑，北灭黄姑。"赵襄子再拜叩头，接受了神旨。

知、韩、魏三家包围晋阳一年有余，屡攻不克，便引汾水灌城，城内一片汪洋。人们悬灶而炊，易子而食，几乎到了绝境。赵襄子绝望生智，派张孟同半夜出城联络韩、魏二家，对他们说："知氏今日灭赵，明日便灭韩、魏，请你们三思！"韩、魏两家一听，如大梦方醒，立即停止攻赵。晋哀公四年三月，韩、魏两家倒戈，同赵氏一起灭掉知氏，并瓜分了知氏的全部土地。晋卿由四家变成了三家。

晋幽公即位（前433）后，国君的力量更加衰弱，三家强大，其中赵氏最强。韩、赵、魏三家不但不朝拜晋国国君，晋幽公反倒朝拜三家。晋君只占有绛和曲沃二城，其余国土尽归三家所有。韩、赵、魏三卿已经成为独立的诸侯。不久，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延续二百余年的晋国卿族的斗争方告彻底终结。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闵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

《史记》：《晋世家》、《赵世家》。

晋失诸侯

晋平公二十四年（前534），晋国传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魏榆（今山西榆次西北）的一块大石头竟会发出声音，而且像人在说话。消息传出，人心惊动。晋平公很快得到消息，这使他感到非常不安，立即找来师旷，向他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师旷解释说："石头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石头讲话，大概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什么东西依附于它，或者是人们听错了。我过去曾听人讲过，做事情不合时令，百姓不满，就会有不能说话的东西说话。现在晋国的宫殿修建的富丽堂皇，百姓财力耗尽，怨声载道，所以石头才有可能说话的。"

晋平公是怎样一位国君，为什么人们哀怨他？这要从若干年前讲起。

晋平公是一个没有政治远略、贪图享乐的国君。晋平公即位后，晋楚两国实现了第二次弭兵，两国平分了霸权。晋平公不注意争取各国诸侯的支持，随意妄为。

平公的母亲是杞国的公主。杞国的城墙年久失修，晋平公却要诸侯各国出力帮助整修。各国虽不情愿，但又不敢违抗晋国。在施工的工地上，人们牢骚满腹。卫国大夫文子见到郑国的太叔说："晋国要各国来帮助杞国修城真是太过分了！"太叔说："他们强迫我们来，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晋国不关心姬姓的兄弟之国，却关心夏朝的残余（杞国是夏人后裔），诸侯各国都有意见。晋国这样对待同姓国家，还有谁肯归服它？我听说，抛弃同姓，靠近异姓，

这叫离德。离心离德已经开始了。”

晋国不但为杞国筑城，而且帮助杞国讨要各国侵占杞国的土地。杞是与鲁为邻的小国，很多领土被鲁国侵占。杞君找到平公的母亲，让她说服平公帮助杞国讨要。平公便派司马女叔侯前去鲁国，迫使鲁国还地。鲁人不情愿，只归还杞国一部分。平公的母亲得到消息很生气，告诉平公："女叔侯办事不力。如果先君有知的话，不会宽恕他的！"平公把这话告诉了叔侯。叔侯生气地说："晋国今天辽阔的领土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攻占小国而来？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这些姬姓国家都被吞并了。杞国是夏人的后代，地处东夷。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与我们晋国同姓，而且同晋国关系很好，为什么要助杞弱鲁？如果先君有知，让夫人自己去亲自办好了，还派我老臣去干什么！"

晋平公还是一个贪恋女色的荒淫君主。当时的制度规定，同姓不婚。晋平公不顾这些，违背制度，娶了四个姬姓妾妃，纵欲无度，终致疾患。郑国人听说霸主生了病，便派子产前去慰问。到了晋国，叔向问子产："我们国君的病很重，卜官说是实沈、台骀二神作祟，太史也不清楚这二神是怎么回事，你能说说吗？"子产思考了一会，慢慢答道："在很久以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次子叫实沈，居于丛林之中，二人犹如水火不能相容，攻伐不止。帝尧为了解决他们的矛盾，把阏伯迁居到商丘，商朝人沿袭下来，大火星是他的族星；把实沈迁居到大夏，唐国人沿袭下来，参星是他们的族星。周武王的时候，夫人邑姜身怀六甲，梦见天帝对她说：'我为你的儿子取名叫虞，准备给他唐国，隶属参星，让他在那里蕃衍养育后代。'那婴儿生下来果然是个男儿，他的掌心纹路像虞字，就取名虞。周成王时灭了唐国，就封给了弟弟虞，继承参星为族星。所以，实沈是参星神。"

"金天氏有个后代叫昧，任水官，生下允格、台骀二子。台骀世世代代继承他的官位，疏通汾水、洮水，堵住大泽，居住在广

阔的高原。颛顼帝嘉奖台骀氏的功绩，把他们封在汾川，沈、姒、蓐、黄四国是其后代。近年晋国灭掉了这四个国家，台骀是这四国之神，所以有人说是台骀作祟。此前还灭掉虞国，实沈也正是它的保护神。”

“但是，我觉得贵国陛下的病不是这些神灵造成的。人得疾病，是由于劳逸、饮食、哀乐不协调的缘故。我听说，君子有四段时间，早晨听取政事，白天调查咨询，晚上确定政令，夜里安息身体。如果是这样，体内的气便能有节律周而复始地运行，血脉畅通不塞，身心清明。相反，如果人世间的美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男人贪恋美色，终日无休，也是会生病的。若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病就危险了！赶快送走这四个姬姓女，否则积重难返！”

当时，秦国有一个著名的医生，名叫和，人称医和，善医百病，复死如生。平公派人到秦国延请医和，秦君派医和来到晋国。医和仔细地诊查了平公的病情，叹息说：“这病已经无可挽回了！美女犹如蛊虫，是不能亲近的呀！这病既不是由于鬼神，也不是由于饮食，而是蛊惑所致。而且，良臣也将要死去，上天无法帮助了。”平公不解地问：“漂亮女人就不能接触吗？上天为什么还要降下美女？”医和回答：“并非不能接触，而是应该有所节制。譬如音乐，先王用它来节制百事，所以有五声、快慢节奏，使其和谐动听。靡靡之音使人心荡神烦，情致偏激，君子是不听的。人间的事情也是一样，适可而止。纵欲过度，必生病患。阴没有节制生寒病，阳没有节制生热病，风没有节制生关节病，雨没有节制生腹胃病，夜生活没节制生迷乱病，白天没有节制生心病。女人，属阴性，时间是在黑夜，所以，对女人没有节制会生内热蛊惑的病。现在陛下不分昼夜地同女人厮混，能不到这种地步吗？”

医和从平公的寝室中出来，把详情告诉了晋卿赵孟。赵孟问：“您说良臣将随君主死去，谁是这个良臣？”医和毫不避讳地说：

“大概就是您了吧！您执晋国之政已经八年，在这八年中，晋国内部安定，诸侯和谐，可说是良臣。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阻止灾祸的发生，必然自己受到祸殃。贵国君主纵欲无度而得病，妨害国家政治，难道还不是灾祸吗？您也没有加以阻止，难道就没责任？”赵孟继续问：“您方才说到蛊，什么是蛊？”医和解释说：“在文字方面说，器皿中的毒虫，谷物中的飞虫，都可以叫蛊；就《周易》而言，女人迷惑男人，大风吹倒林木，这些都叫蛊。这两类事物从根本上讲是相同的。”赵孟说：“真是良医呀！”送给医和贵重的礼品，把他送回了秦国。

晋平公的病情稍见恢复，又派大夫韩须到齐国去迎接齐国公主为妃妾。齐国大夫陈无宇护送少姜到了晋国，平公一见倾心，昵称她为少齐，终日厮守，形影不离。晋平公认为送亲的陈无宇不是卿，把他拘留起来。少姜为陈无宇求情说：“陈无字不是卿，韩须也不是卿呀！齐国只不过因为害怕才派大夫送亲的，有什么不可呢？”然而好景不长，没出半年时间少姜就死了。当时陈无宇仍被拘押，叔向对晋平公说：“陈无宇有什么罪？我国派大夫迎亲，齐国派大夫送亲，陛下说齐国不恭敬，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本来是我们不讲道理，反而把齐国使者扣押起来，今后还怎么当盟主？况且，少姜也是求过情的呀！”平公这才放陈无宇回国。

晋平公十九年，郑国派大夫游吉来到晋国，参加少姜的葬礼。晋国大夫梁丙和张趯同游吉相会。梁丙说：“您为什么事而来，有些过分了吧？”游吉怨气冲冲地说：“难道我愿意来吗？从前晋文公、襄公领导诸侯们三年而聘、五年而朝，有事情就相会，不和睦时就结盟。当时，国君去世，大夫吊唁，卿参加葬礼；夫人死，士吊唁，大夫参加葬礼。一切井然有序。现在则不然，宠妃的葬礼，别国不敢照原来的制度派人参加，而要派职位更高的官员，唯恐降下什么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怪我们过分？少姜受宠过分而死，齐国必会再次送女前来，不久我还要来晋国，不仅仅是

这一次呀!”张趺听后顿生感慨，说:“听了您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然而，恐怕您今后来不成了。事情就像大火星一样，当它出现于正空的时候，它也就到了尽头，寒暑即将转换；晋国肆意于诸侯，恐怕也到了极端，将要失去诸侯了！您想再来，还难得呢!”

少姜的葬礼过后不久，齐侯派晏婴到晋国，请求续齐女为平公之妃。晋国的叔向会见了晏婴，续订了婚约。完毕之后，二人攀谈起来。叔向问齐国国内的情况如何，晏婴说齐侯奢侈，陈氏收拢人心，将要据有齐国。晏婴又问晋国的情况怎么样，叔向回答:“晋国的公族垂亡殆尽。国君的势力必会随着公族的削弱而衰败。我这一宗原本有十一族，现在只剩下了羊舌氏，也不知哪一天就灭绝呢!”

同年夏天，晋国的韩起到齐国迎亲。齐国的公孙虿见原先少姜受宠，便将自已的女儿顶替国君的女儿，而把国君的女儿嫁给了别人。有人对韩起说:“公孙虿欺骗晋国，你怎么还接受?”韩宣子漫不经心地说:“公孙虿想使两国友好，有什么不可?”

晋平公二十六年一月，有一颗星偶然出现于婺女宿。郑国的裨灶对子产说:“今年的七月戊子日，晋国的国君将要死了。从星象上看，岁星在玄枵，姜氏和任氏保持着这里的土地，婺女宿正当玄枵的首位。这里有了妖星，预示灾祸将要归于邑姜。邑姜，是晋国的先妣。上天用七来计数，戊子这一天是平公的死日，我是依此来卜算的。”

七月戊子这一天，晋平公果然死了。九月，郑、鲁、齐、宋、卫、许、曹、莒、邾、滕、薛、杞等各国代表前去晋国参加平公的葬礼。葬礼完毕后，有的大夫想拜见晋国的新君，叔向拒绝说:“我们新君现在服丧，如果穿着孝服再见大家，等于是再接受一次吊唁；如穿平常的衣服，有悖孝道。”于是，各国代表都回国去了。

晋昭公二年(前530)，各国诸侯朝见晋国新君昭公。齐景公

到晋国相会，双方举行完正式的会见后，晋昭公宴会招待齐景公。宴会期间，二位国君进行一种名为“投壶”的赌博，败者罚酒。昭公先投。晋卿中行穆子为昭公祝辞说：“有酒像淮流，有肉像山丘，寡人投中，统帅诸侯！”昭公投中了。齐景公举起矢诵道：“有酒像渑水，有肉像山陵，寡人投中，代晋兴盛！”也投中了。晋卿伯瑕见此情状极为不满，责怪中行穆子：“你说得是什么话！我们晋国本来就是霸主，投壶干什么！谁说投中就可以代替霸主地位？”中行穆子解释说：“晋国国富兵强，士兵踊跃，今天的晋国同过去一样，齐国还能怎么样！”鲁国大夫公孙傁听得二人此言，慌忙走上来对齐景公说：“天不早了，陛下劳累，该回去休息了！”赶紧把景公扶出去。

晋昭公即位后没几年光景，晋国的霸主地位就开始衰落。晋昭公六年（前526），齐国大举出兵攻伐徐国，延续整整二十年的弭兵局面被彻底打破，各国又重新陷于战火之中。二月十四日，齐国大军直抵蒲隧（今江苏睢宁西南）。弱小的徐国哪里是齐军的对手，向齐国投降。齐国召集徐、郯、莒各国君主到蒲隧，结成军事同盟，齐国重温了东方霸主的美梦。鲁国的叔孙昭子看到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地说：“诸侯各国没有强有力的霸主，对小国是危险的。齐景公无道，也想当霸主，攻伐别国，正是晋国霸主地位衰落的反映。”

到晋定公的时候，诸侯之争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内卿大夫专权，更使国际形势变得复杂。晋定公五年（前507）冬天，蔡昭侯前去朝见楚昭王，把一件皮衣和玉佩献给楚昭王，另一套留下自己用。楚昭王穿上了这件皮衣接待蔡昭侯，蔡昭侯自己也穿着同样的皮衣相会。楚国的执政大臣囊瓦见后十分眼红，向蔡昭侯索要，蔡侯不给，囊瓦便下令将蔡侯扣留，一拘就是三年。唐成公到楚国，囊瓦索要唐成公的两匹骕骦马，唐成公不给，也被扣留三年。后来，唐国人偷出这两匹马献给囊瓦，唐成公才被放回。蔡

国人看到唐国的先例，强迫国君将宝马献给了楚人。蔡昭侯被释放，渡过汉水时发誓说："大河为证，我决不会再渡河朝楚！"蔡昭侯把儿子送到晋国做人质，请晋国发兵攻楚。

于是，晋国召集各诸侯国会同伐楚。晋卿荀寅向蔡国索贿，遭拒绝。荀寅随后对范献子说："眼下晋国危急，诸侯们三心二意，在这种情形下伐楚，胜负难说。雨季马上就来临，中山国也不服，远途伐楚，恐有不测，不如拒绝蔡国的要求。"范献子同意，蔡国报复楚人的愿望遂成泡影。晋人又向郑国借用羽毛，郑国人给了晋人。第二天，晋人把羽毛装饰在旗帜上向诸侯炫耀，诸侯们都很反感。散会之后，诸侯纷纷背叛晋国。

晋定公八年，郑国与晋国的关系日益恶劣。出于晋国的要求，鲁国派军攻伐郑国。鲁伐郑，途经卫国，也不向卫国通报，卫鲁两国关系也紧张起来。第二年，齐、郑两国结成反晋同盟，并召集卫国参加。卫侯想答应，大夫们不同意。卫侯派北宫结到齐国，暗中对齐人说："你们把北宫结扣留，然后伐卫。"齐国如此做了，卫国的大夫们害怕，便加入了反晋同盟。

当时，只有鲁国和宋国没有背叛晋国。宋国大夫乐祁对宋景公说："各国叛晋，如果我们不派人到晋国表明态度，晋人必会怨恨我们。"几天后，宋景公对乐祁说："只有你理解寡人的心愿，就辛苦你去晋国一趟了！"乐祁的家臣陈寅对他说："晋国之行凶多吉少，您最好立了继承人再去，也好使我们家族不亡。"乐祁出使晋国，赵简子接待乐祁，设宴款待乐祁，乐祁把六十面杨木盾献给赵简子作为礼品。陈寅不安地说："从前我们到晋国都是事奉范氏，现在突然投靠赵氏，必然得罪范氏，危险了！"果然，范献子跑到晋定公跟前煽动说："乐祁从宋而来途经郑国，郑人不知同他搞了些什么名堂，来到晋国也不报告使命就私下饮酒作乐，实在是不把两国君主放在眼里。决不能允许他胡作非为！"于是，晋人囚捕了乐祁。

赵简子受到乐祁的好处，便对晋侯说："现在，诸侯之中唯有宋国事奉晋国，好好地迎接他们还怕来不及，怎么能轻易地扣留使者呢？这会使宋国背叛的。"晋定公打算放走乐祁，士鞅从中作梗说："拘留他这么长时间，无缘无故地放走，会使宋国背叛。"随后私下对乐祁说："我们担心得罪宋君，因此才把您留在这里。请您派人通知让儿子来替换。"乐祁把士鞅的话告诉了陈寅，陈寅献策道："宋、晋两国关系已经破裂，不能让您的儿子来。"晋人释放乐祁，乐祁死在归国途中。宋国背叛了晋国。

晋定公十年夏天，齐国伐鲁，晋定公派赵简子、荀寅率军援救。

晋国迫使卫国同自己结盟，赵简子对大夫们说："谁敢作使者去同卫国结盟？"涉佗、成何二人道："我们二人愿往。"到了卫国，卫人让他们二人主盟。成何气势汹汹地说："小小卫国，不过如同晋国的温地和原地，竟然也算得诸侯！"将要歃血，涉佗粗暴地推开卫侯的手，血流到卫侯的手腕上。卫侯忍无可忍，卫国大夫王孙贾快步冲上前喝道："结盟是用来宣扬礼义的，我们国君依从礼义，哪里有不合适的地方？"

卫侯想背叛晋国，又担心大夫们反对。王孙贾让卫侯住在郊外。大夫们问什么缘故，卫侯把所受的侮辱告诉了他们，并说："寡人使 ·国蒙受了屈辱，愧对国人，请你们拥立别人为国君吧！"大夫们说："这是国家的危难，陛下有什么过错？"卫侯继续说："还有使人更担心的事呢，晋人一定要太子和大夫们的儿子到晋国为人质！"大夫们表示："如果有利于卫国，去就去吧！"卫侯召集国都内的人们开会，王孙贾对大家说："晋国欺压我们，如果我们卫国背叛晋国，晋国军队攻打我们五次，将会怎么样？"人们气愤填膺："纵然晋军进攻十次，我们也将拼死以战！"王孙贾于是说："那我们先不要送人质，看情况再说。"卫国背叛晋国。晋人请求再次结盟，卫人不答应。

晋定公十一年和十五年，齐、卫两国先后两次大规模出兵攻伐晋国。这时晋国国内政局不稳，卿大夫之间争夺厮杀，无暇外顾。此后晋国国君的势力日益衰弱，卿大夫分裂割据，晋国的霸业也就寿终正寝了。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至定公十三年

《国语·晋语》

田齐兴起

齐国姜姓，是西周初年姜太公的封国。春秋晚期，逐渐兴起一个异姓家族，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到战国前期，这个家族终于取代了姜氏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田氏齐国。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仅靠这一方面是不够的，田氏夺齐伴随着血淋淋的历史一幕。

田氏本姓陈，始祖陈完，字敬仲，陈厉公之子。陈完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周王室的太史路过陈国，陈厉公让他为陈完算命。用《周易》占筮的结果，得到观卦演变成否卦，太史说："此卦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意思是，离开国家，成为君王的贵宾。从这卦来看，此人可能会享有国家，但又不在陈国；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子孙后代。如果能得到别国，必定是姜姓国家。姜姓是太岳的后代，从姜氏方面来说，山岳高大足以与天相配。但事物不可能两强并立，陈国衰弱，他就开始壮大了！"

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72）春天，陈国发生内乱，太子御寇被杀死。陈完与御寇关系亲近，怕受到牵连迫害，于是逃往齐国。

当时齐桓公要称霸诸侯，正在招贤纳士，很器重陈完，准备委任他为卿。陈完推辞说："小臣逃亡在外，承蒙陛下宏恩浩荡得以栖身免我不死之罪，这已是陛下最大的恩惠了。我得到的待遇已十分优厚，怎敢再贪图高官厚禄招来别人的指责？"齐桓公便任命他做了工正，负责手工业生产。

一日，陈完宴请齐桓公，桓公很高兴。宴饮一直持续到傍晚，

桓公意犹未尽，说："点上蜡烛继续喝酒！"陈完诚惶诚恐地说："臣只知白天伴君，不知晚间陪饮，实难从命！"别人听到此事赞扬陈完说："饮酒是一种礼节，又有适当的约束，这是义；同国君饮酒合于礼义，这是仁。陈完是一个懂得仁义的君子啊！"

齐国大夫懿仲想把女儿嫁给陈完，先找人占算是否吉利。卜师算完后兴奋地说："真是大吉大利的婚姻呀！凤凰飞翔，啼歌嘹亮；妫氏后代，宏于齐国；五代昌盛，至于正卿；八代之后，无可匹敌。"懿仲听后十分高兴，便把女儿嫁给陈完。陈完到齐国后，改姓田。

春秋后期的齐国，政治昏暗，旧贵族日益腐败不堪。栾氏和高氏是齐国的两家卿族，控制着齐国的很大权力，骄横跋扈。齐景公八年（前 540），晋国的韩宣子到齐国访问，子雅（栾氏）招待韩宣子，把儿子子旗召来与韩宣子见面，韩宣子对子雅说："子旗举止轻佻，很难保住家族。"子尾（高氏）招待韩宣子，把儿子高强召来会见韩宣子，韩宣子对高强的评价同子旗一样。栾氏和高氏力量强盛，齐国无可匹敌，人们听到韩宣子的评论都觉得他无知可笑，只有晏婴相信韩宣子的话。他说："韩宣子可是君子，他既然如此说，必有根据，不会是轻易说出来的！"

不但旧贵族腐败，齐景公更是残暴无道。在国内，他敛取很重的赋税，占人们收入的三分之二，国库中的积蓄如山，以致腐朽霉烂，而老百姓却在挨冻受饿。当时的刑罚也极为残酷，人们稍有怨言，便遭刑戮。有很多人因受刑罚中的刖刑而失去腿不能行走，只得装上假腿。据说，齐国的市场上，买鞋的人少，鞋很贱；买假腿的人多，假腿反倒贵了起来。

与齐景公的昏庸统治截然相反，田氏在齐国积极收揽人心。百姓缺粮，田氏便借粮给人们，用自制的大量器借出，而用标准的量器收回。当时齐国的容器有几等：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田氏的豆、区、釜

都加大四分之一的容量，钟的容量就大多了。田氏把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出售，价格却同山上一样；把鱼、盐、海产品运到市场上，价格也同海边相同。哪里的百姓有疾苦，田氏就到哪里慰问安抚。哪里有困难他就帮助。百姓从内心拥戴田氏家族。

齐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预测到齐国的未来政局。栾氏子雅去世，有人报信给晏婴说："子雅死了！"晏婴感叹地说："真是太遗憾了！他的儿子子旗恐怕难逃灾祸了！惠公本来就两个明达事理的孙子，现在死了一个，姜氏危险了！"

田桓子知道，要加强和巩固田氏在齐国的实力地位，仅仅靠拉拢人心还不够，还必须用武力手段削弱姜氏。田氏的力量还较弱，直接消灭姜氏还不可能，田桓子便运用各种政治阴谋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齐景公十四年七月八日，高氏子尾去世。栾氏子旗自恃势盛，干涉高氏的家政，杀死高氏的家臣梁婴，并驱逐了子成、子工、子车三人，亲自确立自己宠信的人主宰高氏的家族事务。高氏族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栾氏企图兼并高氏，立即分发武器，准备攻打栾氏。田桓子见栾、高二族发生矛盾，自己正好从中渔利，也给田氏族人分配武器，准备伙同高氏灭掉栾氏。有人把此事报告了栾氏子旗，子旗最初不相信，但报信者接踵而来，子旗将信将疑，便亲自到田氏族里去察看。田桓子已经组织人马准备出发，忽听得子旗前来，估计是有人泄露消息，便立即改变主意，换上便服出去迎接。子旗质问："你要干什么？"田桓子献媚地说："您听说了没有，高氏子良已经把武器都分发下去了，准备进攻您。"子旗回答："我没听说此事。""您何不早作准备，我时刻听您调遣。"子旗说："你怎么这样说！子良年轻，我帮助他选立家臣是担心他不能成功，怎能与他互相攻打？那样做怎对得起先人？《尚书》中说，要施惠于没受恩惠的人，帮助没帮助过的人。你把我这番意思转告子良吧！"子旗不肯吞并高氏，田桓子的阴谋落空；桓子随

机应变，使田氏化险为夷。

齐景公十六年对田氏来说极不寻常。齐国的栾施（子旗）和高强（子良）在执政中不务政德，丧失民心，民怨很大。他们整日只知饮酒作乐，淫戏女人。田氏和鲍氏二族得人心，力量弱于栾、高二族。栾氏和高氏想寻机除掉田、鲍二族、以免后患。这年夏天，忽然有人传出消息说："栾氏和高氏要求发兵灭掉田氏和鲍氏。"田桓子得此消息，惊恐万分，立即下令分配武器给族人，准备应战；同时派人火速通知鲍氏。过了一阵，有人看见高强喝得醉醺醺纵马奔驰，不像要打仗的样子。田桓子赶到鲍文子那里，鲍氏也已武装好族人。他们派人去侦察，回来报告说栾施、高强二人正在狂饮。田桓子说："最初的消息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事已至此，他们若听说我们分发了武器，一定会找我们算帐。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不做二不休，趁着他们喝得晕头转向，攻击他们怎么样？"鲍文子见事已如此，只好依从桓子的主意，两族合兵向栾氏和高氏发起了攻击。

栾施和高强喝得晕天昏地，闻听受到田、鲍二族攻击，竟然发昏说："先把国君控制在手里，然后再找他们算帐！"随即派兵攻打齐景公。景公闻讯大怒，命令大夫王黑使用齐侯的旗帜，统领国内的人们围攻栾氏和高氏。人们早就怨恨栾氏、高氏，便集中起来协同田氏和鲍氏的行动。五月，在稷地击败栾氏、高氏，人们乘胜追击，又在鹿门再败栾氏、高氏。栾施和高强逃往鲁国，田氏、鲍氏瓜分了他们的封邑和家产。

晏婴找到田桓子说："栾氏和高氏的家产应该归还国君，大臣无权擅取。况且，德行和道义是为政的根本，违背这些会生邪恶！"田桓子无奈，只得把吞并的家财交给齐景公，并请求到莒地告老退休。

消灭了栾、高两大族，田氏进一步拉拢人心，争取大夫们的支持。他把被栾施驱逐到国外的子山、子商、子周、子成、子工、

公孙捷等人召回国内，使他们官复原职，取得封邑，得到家产。帮助国内的穷人，送给他们粮食和衣物。田氏得人心，齐景公也赏识他，把莒地的城邑封给田桓子，田桓子谢绝了。到这个时候，田氏在齐国强大起来，列于正卿的位置，从陈完到田桓子刚好五代。

田氏的强大使晏婴感到不安。一日，齐景公与晏婴在宫中闲坐。望着漂亮的宫殿，景公叹了口气，说："多么豪华的建筑呀！将来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晏婴明知故问："请问陛下是什么意思？"景公说："我在想，有德行的人将会主宰齐国。"晏婴借题发挥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齐国将落到田氏手中了！田氏的为人并无大德，但他擅于搞小恩小惠拉拢百姓。用大量具向外借，用小量具收税。同田氏相比，陛下施舍少，征税重，百姓自然就归到他那里去了。您的子孙若不注意修德，田氏继续发展势力，齐国也就非田氏莫属了。"景公若有所悟地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田氏，保证姜氏的天下延续不绝？"晏婴献计说："唯有用礼来约束他。按照礼法制度，施舍不能超出自己的家族而及于国内，士、农、工、商各务本业而不迁居，各级官吏恪守职责。"景公说："你说得极有道理！不过，我是很难做到了。"

田氏在齐国的发展壮大是在齐景公时期。齐景公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终日只图享乐，很少过问政治，大权控制在权臣手中。眼见田氏拉拢百姓，拆姜氏政权的台，他却置若罔闻。晏婴屡次劝告他长此以往，必有隐忧，他都不理会。

景公的夫人燕姬生了儿子，未及成年就夭亡了。宫中内宠很多，景公喜欢年轻漂亮的鬻姒，有意把鬻姒所生的公子荼立为太子。大夫们讨厌公子荼的人品不好，唯恐他被立为太子，对齐景公说："陛下年事已高，应该及早树立太子为妥。"景公不耐烦地说："你们操心过多会生病的，姑且回去寻找快乐，不必为主人担忧。"景公晚年生病，把国惠子、高昭子召进宫，立公子荼为太子，让他们辅佐，并把其他的儿子驱逐出首都，安置在莱地（今山东

烟台莱山)。齐景公五十八年秋天，景公死。公子们害怕受到迫害，纷纷向外逃亡。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到卫国，公子鉏、公子阳生逃往鲁国，国内一片混乱。莱地的百姓作歌谣讽刺说："景公死了不安葬，国家大事不商量，公子们啊，你们往哪里逃亡！"公子荼即位为君，是为晏孺子。

田桓子死后，他的儿子田乞继承卿位。当时，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叛国，向齐国请求帮助。田乞为了在诸侯中树立党羽，劝景公说："范氏、中行氏过去对齐国有恩德，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景公就派田乞去解救，并送去军粮。

晏孺子即位，国惠子和高昭子任左右相，田乞受到排挤，极不满意，便阴谋消灭这两族势力。田乞表面上装出顺服高氏和国氏的样子，每逢上朝，一定与他们同乘一辆车，并不断蛊惑说："那些大夫们傲慢不恭，不顺从你们的命令，他们都说：'高氏和国氏受国君宠信，必会专权迫害我们，我们应除去他们。'他们现在正在积极准备，伺机动手，你们应考虑对策，最好把他们消灭干净，犹豫等待会遗祸终身！"到了大夫们那里，又煽动说："高氏和国氏受国君宠信，握生杀大权，他们说：'国家多难是由于大夫专权，各自为是，只有铲除他们国家才能安定。'计划已定，一切安排就绪，随时都会动手。一旦祸起，悔之莫及！"大夫们信从了田乞的话。

晏孺子元年（前489）六月二十三日，田乞、鲍牧联合大夫们率领人马冲入宫中，高昭子和国惠子闻讯急带人马冲向宫中，双方在宫中激战，高、国二氏寡不敌众而败。国氏逃往莒国，后来又随高昭子、晏圉（晏婴之子）、弦施逃到鲁国。

高氏、国氏出逃后，晏孺子年幼，成了孤家寡人。在几位公子中，田乞与公子阳生关系最亲密。于是，田乞秘密派人到鲁国去迎接阳生回国夺位。阳生接到通知后，怕走漏消息，急忙找到公子鉏，托词说："我献给季孙氏那几匹马算不上好马，所以又找

了几匹，你和我一起去试试。”二人乘车出城到了郊外僻静处，阳生才把真相告诉公子钮。阳生的家臣阚止事先知道此事，等在城外，准备同主人一同到齐国。阳生说：“事情能否成功还尚未可知，你先回去照顾壬（阳生的儿子）吧！”随后驱车直奔临淄。

回到首都的时候已是半夜时分，国内有人知道了此事，但都为田氏保密。田乞安排他的妾照顾阳生。田常邀请大夫们说：“我家中准备了些粗茶淡饭，请各位到寒舍一叙。”大夫们以为是商议高、国二氏逃走后的问题，都应邀前往。鲍牧喝得醉醺醺地也到了田乞家。席间，田乞把阳生请出来会见大夫们，对大家说：“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国君呀！”要与大家盟誓，废掉晏孺子，立阳生为君。鲍牧的家臣鲍点怒气冲冲地质问田乞：“这是谁的主意？”田乞诬赖说：“这是你家主人鲍牧的主意，你去问他吧！”鲍牧此时酒意方醒，斥责田乞说：“难道你忘记景公的遗诏了吗？他的尸骨未寒，你怎能背叛他！”

阳生见此对峙场面，十分害怕自己被杀，跪下叩头说：“你们各位都是奉行道义的，如果大家认为我行，我将来不会伤害任何一位大夫；如果认为我不行，这也不要紧，我退回便是，不要伤害哪一个公子。我只是希望大家合于道义的就办，否则就不做，不要伤害任何人，这是我的衷心愿望。”

鲍牧见大夫们都愿意立阳生为君，担心将来晏孺子勾结高、国二人秋后算帐，众愿难违，立即表态：“各位公子都是景公的儿子，立谁都合乎道义。”大家盟誓，拥立阳生为国君，是为齐悼公。

悼公即位后，命令胡姬带着晏孺子到赖地（今山东章丘西北）居住，把鬻姒迁居到别处。晏孺子的亲信，有的被杀死，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流放。宫中的隐患消除了，但晏孺子仍然还在，说不定哪一天又会被大臣迎立为君，悼公为此寝食难安。他派大夫朱毛对田乞说：“没有卿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但是，国君同物品不一样，物品可以有几件，国君只能有一位，否则，祸患

无穷。这是我的一点忧虑，请卿体谅。”田乞一听悼公要杀晏孺子，此事非同小可，弄不好自己落个杀君的恶名，有损田氏名声，便闭口不言，泪流不止，最后才说：“难道国君还不相信臣下吗？齐国贫困，忧患不断，由于国家有困难才把年长的公子请回来为君，为的是安定国家。陛下能够宽容别人吧，荼有什么罪过呢？”朱毛回去汇报了田乞的态度。悼公见田乞不支持，后悔当初不该去问。朱毛说：“大事去征询田氏的意见，小事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去掉公子荼是公族内部的小事，陛下自己裁决！”悼公派朱毛把晏孺子从赖地迁到骀地（今山东昌潍境内），意在杀掉晏孺子。朱毛领会悼公的旨意，在去往骀地的途中，把晏孺子杀死在帐篷里。

齐悼公四年（前485），田乞去世，他的儿子田常代为齐相，人称田成子。由于在立悼公为君的问题上鲍牧曾持反对意见，悼公即位后，君臣之间两相猜疑，互不信任，矛盾日益尖锐。鲍牧担心自己被杀，便先下手杀了悼公，拥立悼公的儿子壬为国君，是为齐简公。

简公当初随悼公避难鲁国时，阚止为家臣，深受宠信。简公即位后，就让阚止执掌齐国内政，田成子的地位削弱，担心遭到阚止的暗害。上朝的时候，屡次回头窥望阚止。侍臣对齐简公说：“田氏、阚氏不能并立，请您确定其中的一家。”简公觉得田氏迎立先君有功，阚氏是自己的亲信，不愿伤害其中的一家，没有采纳侍臣的意见。

田氏与阚氏的矛盾日益加深。田成子为稳固自己的势力，重施田桓子的故伎，用大斗将粮食借给人民，用小斗收回，以拉拢人心。齐国人歌颂他说：“老婆婆采芑子，采了芑子送成子！”

在田成子与阚止的斗争中，田氏的族人田豹起了关键的作用。早年，田豹想当阚止的家臣，让公孙为自己引荐。公孙对阚止说：“有一个叫田豹的人，高个子有点驼背，眼睛上翻，愿意当您的家臣。您如果接受他，一定会使您满意。”过了些时候，阚止召见田

豹，二人相见倾心，阚止很高兴，把他作为亲信。后来，田、阚两族矛盾尖锐，阚止对田豹说："我打算把田氏家族的人都赶走，立你为田氏的继承人，怎么样？"田豹拒绝说："我在田氏族中是远支，没有地位，而且同您为敌的不过是个别人，为什么把他们都赶走？"随后就向田成子密告了此事。子行对田成子说："阚止受国君信任，危险迫在眉睫，如不先动手，后患难卜！"于是，子行搬到宫内居住，准备作为内应。

齐简公四年（前481）五月十三日，田氏经过准备，终于动手了。这天，田成子兄弟四人同乘一车到简公的宫中，阚止正在那里，便出来迎接他们。田成子四人走进内宫，反手把阚止关在门外。卫士抵御田成子等人，被子行杀死。简公正与妇人在檀台饮酒作乐，田成子让简公到内宫，简公见有变故，抄起戈要杀田成子。太史子余从旁劝告说："他们不是要加害陛下，而是要替陛下铲除有害的人。"简公仍很愤怒。田成子打算逃亡，说："哪里没有君主，何必在这里！"子行抽出剑阻止道："迟疑软弱永远办不成大事，你若逃走，谁都能作田氏的宗主！你一定要逃的话，我不杀你枉为此生！"田成子才没有外逃。

阚止回到族地，召集人马攻打田成子占据的宫殿，战败而逃。国人纷纷帮助田氏，阚止逃到弇中（今临淄西南弇中峪）迷路，误入田氏封邑丰丘。丰丘人逮住阚止，报告了田成子，把他杀死在外城门。

国中大乱，齐简公出逃，田氏的族兵在徐州（今山东滕州）追上简公。简公痛悔地说："我当初若听从别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田成子怕简公回国后杀自己，便下令杀死简公，另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君，是为齐平公。

平公即位后，田成子为相。田成子杀简公，怕诸侯讨伐自己，就把从鲁国和卫国侵占的土地全部归还，西边同晋国的韩、赵、魏三家联盟，南方同吴国和越国通使友好。在国内，修行德政，论

功行赏，亲近百姓，齐国重新安定下来。

田成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持齐国实权。他对齐平公说："恩惠是人们都想要的，由陛下赏赐；刑罚是人们厌恶的，由臣来办理。"如此夺取了齐国的刑罚大权。齐国势力较大的卿族鲍氏、晏氏、阚氏等被斩杀殆尽，田氏的封邑扩大到安平（今山东临淄东南）、琅邪（今诸城东南）一带，超过了国君的领地。至此，齐国实际上已控制在田氏手中。一百年后，田氏终于取代姜氏拥有了齐国。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至哀公十四年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鲁国列卿兴起

鲁国，是春秋时期最恪守传统的诸侯国，但无论如何它也无法躲避时代潮流的荡击。庆父之乱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一支正在迅速崛起的政治力量——卿族的成长，此后这支力量急剧膨胀，实际上控制了鲁国的政局。鲁国的卿族，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臧孙氏、子叔氏等，而以前三家为强。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都出自鲁桓公，人们称这三家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都是桓公的儿子。桓公死后，庄公即位，庆父、叔牙、季友为公子。庄公晚年身患重病，久治不愈，眼见他的三个弟弟有些势力，担心将来自己的儿子不能稳座君位。庄公问叔牙："将来由谁即位为国君呢？"叔牙却心怀异志地说："依照我们鲁国的传统，一代父子相传，另一代就兄弟相传。现在有庆父在，你还忧虑什么？"庄公听后更加不安，怕万一叔牙拥立庆父，太子子般就没有位置了。于是庄公又找来季友商议。当时季友是执政大夫，他斩钉截铁地对庄公说："我坚决拥立子般为君，至死不渝！"庄公对季友说："可是，叔牙要拥立庆父。"季友听后很愤怒，立即派人以庄公的名义命令叔牙到鍼巫家中等候处置，随后命令鍼巫用毒酒毒死叔牙，威胁叔牙道："如果你饮下这毒酒，子孙还能存留鲁国；若不然，就把你们斩尽杀绝！"叔牙被逼无奈，饮下毒酒，回家途中便命归西天。后来，他的子孙在鲁国得以蕃衍，为叔孙氏。

叔牙被杀，庆父想即位为君的美梦落空，心中十分不满。庄

公死后，庆父唆使与太子般结仇的人去暗杀太子。太子般被杀死的消息传出后，季友知道是庆父所为，害怕庆父暗害自己，仓皇逃往陈国。庆父立了庄公的儿子公子开为君，他就是鲁闵公。庆父立闵公是出于无奈，闵公在位他仍耿耿于怀，第二年又派人刺杀闵公。闵公被杀，国内政局陷入一片混乱，大夫们纷纷外逃。庆父先后杀了两位君主，自知罪责极大，在国内无法立足，畏罪逃往莒国。

庆父逃离鲁国后，季友带着闵公的弟弟从国外返回鲁国，立他为君，是为鲁僖公，季友辅政。不久，季友用重金贿赂莒国君主，要求把庆父引渡给鲁国。庆父被莒人遣返回鲁，途中派人先回到鲁都，请求季友赦免一死。季友不答应，庆父在归国途中绝望自杀。他的子孙后代在鲁国为孟孙氏。

到这个时候，鲁桓公的几个儿子只剩下了季友。当年季友刚要出生的时候，鲁桓公让负责占卜的大夫占卜，占卜后说："所生应是位公子，他的名字最好叫友，以后他的位置在国君左右，成为国君的辅佐。季友的后代世世兴盛，他这一家族衰亡，鲁国也将衰败了。"桓公听后很吃惊，让人再次用筮竹占算，得到从"大有"卦演变成"乾"卦。卜筮的人解释说："这位小公子以后将同他的君父一样有威望，人们尊重他犹如国君一般。"这位公子出生后，手掌上呈现出"友"字形的掌纹，桓公便给他取名季友。鲁庄公的妾成风知道季友的底细，推测季友以后很有政治前途，积极拉拢季友，把儿子托付给季友。季友回国后立了这位公子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僖公即位后，莒国人再次向鲁国索要好处，作为引渡庆父的报酬。此时，僖公和季友立足已稳，很厌恶莒人贪得无厌，非但不再给莒人好处，季友反而率领军队迎头痛击莒国军队，俘虏了莒侯的弟弟公子拿。鲁僖公十分高兴，将汶水北岸的田地和费邑赏赐给季友，季友的势力强盛起来，他的后代称为季孙氏。

鲁僖公时期，孟孙氏和叔孙氏的势力也在逐渐成长。庆父的儿子孟穆伯（公孙敖）和叔牙的儿子叔孙戴伯（公孙兹）先后领兵会合诸侯，攻伐他国。到了鲁文公时期，三家之间的矛盾较为缓和，各自都在积聚力量。

鲁文公元年（前626），周天子派内史叔服到鲁国参加僖公的葬礼。孟穆伯听说叔服擅长给别人相面，于是带着两个儿子去见叔服，让叔服给他们相面。叔服把他们二人召到近前，仔细地审视了一番，然后对孟穆伯说："您的长子文伯将来能奉养您，次子惠叔将来能料理您的丧事。从文伯的面相看，他天庭饱满，地庭方圆，将来在鲁国会后继有人。"孟穆伯一直为孟孙氏家族的未来担忧，听了叔服一番话稍得宽慰。

孟穆伯是个贪恋女色的家伙。当初，孟穆伯娶了莒国的公主戴己为妻，公主的妹妹声己陪嫁。几年后，戴己因病身亡，孟穆伯想在莒国续娶一位夫人，莒国的国君认为还有声己在，拒绝了他的要求。鲁文公七年，文公派孟穆伯到莒国为公子遂迎娶夫人。到了莒国的鄢陵（今山东临沭境内），孟穆伯一见这位莒国的女人天姿出众，擅自娶来做了自己的夫人。公子遂知道后勃然大怒，向鲁文公请求讨伐孟穆伯，孟孙氏家族危在旦夕。鲁文公想批准公子遂的要求，叔仲惠伯劝阻道："战事在国内爆发叫乱，在国外爆发叫寇。寇给别国造成灾祸，而乱给自己的国家制造灾难。现在臣下作乱，君主却不加劝阻，岂不是在制造祸端？"文公听后阻止了公子遂，由叔仲惠伯出面调解，让公子遂放弃这门亲事，让孟穆伯把莒国女人遣返回国。这样，才算制止了一场祸患。然而，孟穆伯对莒国的美女并不死心。第二年秋天，周襄王去世，文公派孟穆伯前去吊丧。孟穆伯半途中带着布帛逃到莒国，寻找那个莒国女人去了。

孟穆伯出逃后，鲁国人便让他的儿子孟文伯接替卿位。孟文子为卿时期，果如出生时占卜所言，保全了孟孙氏的财产和政治

地位。一次，鲁文公大概是因孟穆伯私逃莒国的积怨，想拆毁孟孙氏的府宅，派人通知孟文子说："国君想借用贵府的宅院，在外边宽敞的地方再给你们别建一处。"孟文子听后知道事出有因，他争辩道："授爵是政治的需要，衙署是政务的需要，住宅用以表明身份贵贱高低。这些制度是自古就有的，不能轻易变动。现在要我们改变府宅，并说再建的会更好，如果那样就违背了先王的制度，会玷污先君的信任。如果是我有什么过错的话，我请求辞职为民，撤离府宅，请君主裁定！"鲁文公听了使臣的汇报，自知理亏，也就作罢了。

后来，孟文子生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向鲁文公请求说："我的儿子还年幼，请让我的弟弟接替卿位吧！"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文子死后由惠叔接任卿位，惠叔就是孟献子。鲁文公十四年，孟穆伯出重金收买鲁国人，请求回来，孟献子积极出面活动，鲁国人同意了。回国途中，孟穆伯死在了齐国。家人回鲁国报丧，并请求归葬，鲁国人不答应。

眼见父亲身死异邦不得安葬，孟献子焦虑万分。齐国有人替孟孙氏出主意说："如果你们把穆伯的棺材放在齐、鲁两国交界的堂阜（今山东蒙阴西北），鲁国人自会答应的。"堂阜地近卞邑，卞邑大夫把此事报告了文公。这期间，孟献子每次上朝都请求安葬父亲，哀痛不已。最后，文公只得答应了献子的请求，使孟穆伯得以安葬。

孟穆伯在莒国的时候，又生下两个儿子，孟献子把他们召到鲁国，十分喜爱他们。然而，有人诬陷孟献子的这两个弟弟，对献子说："他们兄弟二人想谋害你，夺取你的地位和家财。"孟献子将信将疑，把这话告诉了季文子。那兄弟二人得悉此事后，感慨地说："献子喜爱我兄弟二人，国人皆知；说我们要谋害他的谣言也尽人皆知，我们兄弟二人岂不是太丧失天良了吗？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了清白！"后来，他们先后在战争中壮烈牺牲，为孟

孙氏赢得了荣誉。

鲁文公时期，叔孙氏的执政卿是叔孙庄伯。狄族进攻鲁国，形势很危急，文公准备派叔孙庄伯领兵抗击，先让人占卜。占卜的结果很吉利，叔孙庄伯便领兵出发了。文公十一年十月三日，叔孙庄伯击败狄人，俘虏了狄族首领长孙侨如。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就把自己的儿子叔孙宣伯命名为叔孙侨如。

同叔孙庄伯相比，季文子是文治多于武功。他以礼义在鲁国闻名，多次代表国君出使别国，落得好名声。文公十八年，莒国的太子仆依靠国人的支持，杀死了无道的国君，带着宝玉逃到了鲁国。鲁宣公得到他的好处，准备收留下莒国太子，并赐给他城邑。然而，季文子却让司寇把莒太子赶出鲁国。鲁宣公得悉后很生气，质问季文子为什么这样做，季文子派太史克答复说："先君周公曾制定了礼法制度，规定'要用礼仪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毁弃礼仪的人是贼，窃取财物是盗，收藏窃物是窝赃。'我仔细地观察了莒太子的行为，他杀死国君是不忠孝，窃取国家宝物是盗贼。如果收了他的礼物，就是窝赃。收容他，就是违礼。如果这样做了，还怎样去教育国内的人民？我是考虑了这些才把他赶走的。"听得季文子一番辩言，鲁宣公也无可奈何，只得依从了。

鲁宣公年间，三桓的势力迅速发展，成为左右鲁国政治举足轻重的力量，国君和一些大夫深感不安。公孙归父的父亲襄仲曾拥立宣公即位，宣公很信赖公孙归父。公孙归父想除去三桓的势力，恢复公室的权威，但自己又没有这个力量。于是，他同鲁宣公商议借助晋国的力量驱逐三桓，借口到晋国访问去了晋国。不料，此事被季文子看出破绽。宣公十八年的（前591）冬天，宣公突然病亡。季文子在朝廷上当众宣布："当年让我杀嫡立庶的人就是襄仲，结果使我们失去了大国的支持，应该追究他的责任！"臧宣叔知道他想加害公孙归父，有些不满说："那你当初怎么不治罪！他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不过，你要驱逐襄仲一族的话，我也会

依从的。"其他的大夫更是不敢同季氏对抗，结果，东门氏被逐出鲁国。

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知道密谋泄露，季氏已先下手，停在了笙地。在那里筑坛，向国君汇报了自己的使命，然后逃往齐国。

随着三桓的强大，三家内部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暴露出来。叔孙宣伯野心很大，他同鲁成公的母亲穆姜私通，让穆姜对成公施加压力，铲除孟孙和季孙二家，夺取他们的职位和财产。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晋国召集诸侯盟会，准备攻伐郑国。成公准备前去开会，穆姜为他送行，同时要求他驱逐孟献子和季文子。鲁成公知道这是叔孙宣伯的主意，十分厌恶他，根本就不想去除孟孙、季孙两家，便推托说："现在晋国迫使我们会盟伐郑，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穆姜一看成公不听自己指挥，怒气冲冲地说："你要是不听从我的话，当然可以，不过，公子偃、公子鉏都能立为国君，并非没有你就不行！"成公听后很不安，临出发前，加强了宫廷的守备，命令孟献子在宫中守卫，季文子随自己出国。

同年秋天，鲁成公赶到沙随与诸侯相会。由于国内的乱事，到了会盟地点已经迟到了。叔孙宣伯想通过穆姜驱逐孟孙、季孙二家，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派人带着厚礼到了晋国大夫郤犨那里，诬陷鲁成公说："成公不愿参加盟会，观望等待，结果才迟到的。"郤犨是晋卿，主持诸侯的东方各国事务。他从叔孙宣伯那里接受了好处，就到晋侯那里说成公的坏话，结果，晋厉公不肯接见鲁成公。

不久，叔孙宣伯又派人对郤犨说："鲁国有孟孙氏和季孙氏，就如同晋国有栾氏和范氏，鲁国的政令被他们两家控制。现在，他们两家正在密谋摆脱晋国，投靠齐、楚，说：'宁可亡国，也不能再听晋国的指挥了！'晋国若要得到鲁国，应趁这次会盟伐郑之机，逮捕季文子然后杀了他，我在国内除掉孟献子。这样，鲁国随从晋国再也不会三心二意了。鲁国一心事晋，其他东方小国自然也

就不敢违背晋国了。否则，季文子返回后必定叛晋。”同年九月，晋人在苕丘拘捕了季文子。鲁成公率军返回，到达郓地后停留在那里，派人到晋国请求放回季文子，郤犨答复说：“如果你们杀掉孟献子，把季文子留在这里，我们晋国对待鲁国会像自己的公室一样亲近。”子叔声伯据理力争说：“叔孙宣伯的为人您一定有所了解，季文子的人品人们更有耳闻。孟献子和季文子是鲁国的栋梁，早晨除掉他们，鲁国晚上就会灭亡。因此，灭了孟孙、季孙二家，就如同惩罚鲁国的国君。若蒙不弃，阁下看在周公的福份上，使鲁国得以平安，鲁国会一心一意追随晋国。”郤犨见子叔声伯坚持己见，引诱他说：“你若听从了我的话，我为你在鲁国请求封邑。”子叔声伯诚惶诚恐地回答：“我不过是鲁国的小臣，岂敢倚仗大国而邀功求禄？如果阁下答应我的请求，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了。”范文子劝郤犨说：“季孙氏在鲁国深得民心，季文子先后辅佐两位国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难道他还不是忠臣吗？相信邪佞抛弃忠良，今后还怎么号召诸侯？子叔声伯一心奉公，不计私利，如果拒绝他的要求，就是背弃善良的人，请你认真考虑一下。”最后，晋人答应了子叔声伯的请求，赦免了季文子。

同年十月，鲁人驱逐了叔孙宣伯，叔孙宣伯逃亡到齐国。季文子回到鲁国后，暗杀了公子偃，把叔孙豹从齐国召回，让他接替了叔孙宣伯的职务。

在三桓的这场角逐中，虽然叔孙宣伯失败，只不过他自己失去爵位，而他的家族仍保持着卿位，这种情形与晋国很不相同。因此，三桓的势力并没有被削弱，而是更加强了。特别是季文子，以周礼的护道者自居，时刻不忘拉拢人心，使人心归己，盛于国君。他身为上卿，先后辅佐宣公、成公、襄公三位国君，克己奉公的形象使人们赞佩不已。据说，他家族的人过着平常人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奢侈华丽。一次，孟献子的儿子子服对季文子说：“您身为国家的上卿，先后辅佐三位国君，位高权重无人可比，然而，您

的家人过平民一样的生活，别人都说您吝啬，这对于鲁国来说也不够体面吧！”季文子回答说：“难道我就不愿吃得好、穿得好吗？你看一看国内的人民，食不饱腹，衣不避寒，我怎么敢铺张奢侈呢？如果那样的话，人们还会拥戴我吗？国家的体面与繁荣体现在德政上，而不是体现在奢侈上。”

不久，季文子把子服的话告诉孟献子，孟献子很生气，把子服关闭了七天。从此以后，子服也学起了季文子的榜样，妾衣布衣，马食莨莠，不忘勤俭。季文子听说后十分高兴，说：“有了错误能改正，就能受人们拥戴！”任命子服为上大夫。三桓的势力在鲁国盘根错节，落地生根。鲁国的公族腐化败落，同三桓形成鲜明的反照。至此，鲁国的国政已经牢牢地控制在三家的手中了。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至襄公五年

《国语·鲁语》

三桓弱鲁

到鲁宣公时期，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家族的政治势力日益强大，由于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直接后代，人们称之为“三桓”。三桓的壮大引起了国君以及一些大夫的不安，他们想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除掉三桓，恢复国君的一统天下。然而，三桓没有坐视自己灭亡，反而先下手除掉了异己势力，把鲁国政权稳稳控制在自己手中。

三桓中季孙氏势力最大，在鲁国世代执政，为上卿。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国政，季武子认为有必要直接控制鲁国的军队。鲁襄公十一年（前 562），季武子找到叔孙穆子商议控制国家军队的办法，他打算在鲁国创编三个军，三家卿大夫各统辖一个军。叔孙穆子担心这会造成国内的军事争端，说：“将来你执掌国政，恐怕不能协调好各家的关系。”季武子坚持己见不肯罢休，叔孙穆子便说：“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们三家要结盟。谁有三心二意，让他不得善终！”

三家结盟后，正式在鲁国创编三军，把原来国君统辖的军队一分为三，再补充各家的族兵，形成三军。那些原来属于三家的族兵，本来是封臣的地位，编入军队后，三家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季孙氏把族兵并入军队后，收回了封给他们的采邑，从此不再向他们征租税；叔孙氏是把族兵并入军队，没有收回他们的封地，也就是仍保持他们原来的身份关系；孟孙氏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收回族兵的一半采邑，使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家臣家

兵，又是国家军队中的将士。这样一来，鲁国的兵权完全被三家控制，国君也就失去了控制国内政治的真正权力。

当时正值晋、楚两国弭兵，鲁国作为弱小国家，不但朝拜晋国，也要朝拜楚国。鲁襄公二十九年，襄公朝楚，季武子借此机会强行夺走国君的领地卞邑（今山东泗水东），扩大自己的领地势力。占据之后，派家臣公冶带上书信报告襄公。信中称："守邑的人要想发动叛乱，形势危急，臣率军讨伐他们，已经攻占。特此报告。"襄公虽然极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悻悻地说："想要卞邑径直对我说，何必这样！"随后又问公冶："我还能回鲁国吗？"公冶对季武子所为很反感，他对襄公说道："国家是陛下的，为什么不回去！应该看一看到底是谁在国内作乱！"襄公不想回鲁国，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才回到国都。

季孙氏的野心越来越大，为了达到架空国君、控制鲁国的目的，季武子密谋彻底废除国家军队，完全归私人所有。鲁昭公五年（前 537），叔孙穆子已经去世，季武子执政，他会见朝中的卿大夫一起商议。叔孙氏的家臣竖牛是个狂妄之徒，他首先拍手称快："我家主公早就想瓜分国君的军队了！"征得了大夫们的认可，季武子正式废除国家军队，把原来属于国家的军队一分为四，季氏占四分之二，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占四分之一。这样一来，鲁国的国君再也无法制服三桓强臣了。

季武子瓜分了中军，但他又避讳恶名声，想把罪名加在已故的叔孙穆子的头上。他命令叔孙穆子的家臣杜洩带着大夫们的盟书向穆子灵位报告说："阁下早就想毁掉中军，现在遵从了您的命令，您就安息吧！"杜洩一见此情景十分生气，愤怒地说："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从没想瓜分中军，当初创编三军的时候他就反对，所以才让大家盟誓。如今把这名声安在他头上，岂有此理！"接过盟书扔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随着季氏势力的壮大，季氏日益骄横跋扈，引起鲁国很多大

夫的不满。

早年，季公鸟娶了齐国鲍文子的女儿为妻，生下了一个儿子。季公鸟死后，他的弟弟季公亥、公思展和季公鸟的家臣申夜姑共同主持季公族的事务。季公鸟的妻子季姒与厨师檀通奸，但又担心受到季公亥的指责，于是让侍女把她打伤，然后到了季公鸟的妹妹那里诬告说："季公亥是个无耻之徒，强逼我同他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我不答应，他竟然动手打我！"随后又到季孙意如的弟弟公甫那里告状说："公思展、申夜姑也对我心怀不轨，要污辱我！"季公鸟的妹妹把此事告诉了季孙意如的弟弟公之，公之又把此事告诉了季孙意如，季孙意如听后大发雷霆，首先逮捕了公思展，随后又把申夜姑抓起来，准备处死他们二人。季公亥跑到季孙氏那里哀求说："看在祖先的份上，饶恕了他们吧！杀死申夜姑就等于杀死我！"季孙意如不接见他，使他白白地等了一天。最后，季孙意如下令处死了公思展和申夜姑，季公亥怀恨在心。

郈孙氏与季氏住得很近，所以两家的鸡经常斗架。季氏在自家鸡的身上披上甲胄，郈氏更胜一筹，竟然给鸡绑上铁爪，两家因此积怨。季氏寻找借口侵占郈氏的地盘修建房屋，而且经常责骂郈氏。郈氏敢发怒而不敢言。

臧为的弟弟臧会同臧为闹意见，赌气躲到了季氏家里。臧为派人到季氏家中寻找。季孙意如不但不放，反而扣住了臧为的人。臧为因此很恼火。一次，鲁国为襄公举行祭祀时，跳万舞（一种祭舞）的只有两个人，其余的人都被季氏掠到自家去了。臧孙口出怨言说："人们常说'万舞不能用在先君庙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本来大夫们都不满，经臧孙点破，大夫们议论纷纷。

众怒难犯。季公亥积极活动，想除掉季氏势力。一次，季公亥把一张弓献给昭公的儿子公为，同他一起到郊外狩猎。到了郊外僻静处，季公亥提出要消灭季氏。公为回去后把此事告诉了弟弟公果、公贲，公果便派手下的僚柤密报鲁昭公。昭公闻听此事

十分吃惊，不知真伪虚实，随手抄起戈来把僚柤赶跑，并大叫道："把他抓住！"也没有真正下令逮捕僚柤。僚柤吓得要命，一连几个月不敢出门，后来，公果又派他去汇报此事，鲁昭公又抓起戈来要杀他，并且说："这不是你们奴仆之辈的事！"

公果见派人不成，只得亲自禀报。昭公心中怨恨季孙氏，但又无可奈何，怕引火烧身，便把此事告诉了臧孙。臧孙思忖片刻说："此事难办。"昭公又把此事告诉了郈孙，郈孙表示支持。昭公又找到子家羁，子家羁说："他们这些奸佞小人妄想借助国君以报私怨，然而万一不成功，陛下就不好办了，最好别答应他们。鲁国公室丧失民心已非一朝一夕，季氏收拢人心早已成定局。现在实权操在季氏手中，要想成功难上加难！"鲁昭公对子家羁的话很反感，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让他离开，子家羁一看骑虎难下，当即表示："臣知道陛下的心意，但臣绝不敢泄露。"留住在了宫中。

鲁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昭公联合国内的大夫出兵进攻季氏。在季氏门口杀死季公之，然后涌入季孙氏家中，季孙意如冷不及防，走进前厅请求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罪过，陛下却派军队来讨伐我。我希望陛下派人详查，让我在沂水岸边等候处置。"昭公见季孙意如想金蝉脱壳，当然不肯答应，季孙意如见一计不成，马上改口说："那么就把我囚禁在费邑听候处置吧！"昭公仍不答应。季孙意如见穷途末路，拖延着说："既然这也不行，我干脆离开鲁国，从此不再过问鲁国政治，怎么样？"鲁昭公犹豫不决。大臣子家子劝告说："还是答应了他为妥。陛下想一想，季孙氏执政很久，深得人心，百姓受他们的恩惠，官吏受他们的恩泽。如果犹豫不决拖延下去，到天黑以后，说不定会发生什么突然变故呢！再说，公室不得人心已非一日，如果这次处理不好，使人们怨气增加，久而久之会生叛乱之心，那些人聚集在一起就十分危险了！"郈昭伯却说："一定要杀掉季孙意如，免除后患！"事情争执不下、继续拖延着。

昭公拿不定主意，派郈昭伯去迎接孟懿子商议。此时叔孙氏家族也在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叔孙氏的司马同族人商议对策。他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国家大事，但我想知道的是，除掉季孙氏和留下季孙氏，哪一种情况对我们叔孙氏有利？"大家毫不迟疑地说："事情显而易见：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司马于是宣布："那我们立即救援季孙氏！"带领着族人冲向季孙氏那里，从季氏府宅的西北角攻击。当时，昭公的亲兵正在等候命令，毫无防备，被从外边攻来的叔孙氏的军队打得大败而逃。

孟懿子到了昭公那里，派人登上西北角观望情况，侦察的人看到叔孙氏族的军旗，把情况报告了孟懿子，孟懿子知道了叔孙氏的态度，形势已经十分明朗，立即改变态度，把郈昭伯抓了起来，在南门把他杀死，随即率军攻打昭公的亲兵。

突变的情况使昭公措手不及。大臣子家子献计说："现在形势危急，我充当劫持陛下攻打季孙的人，带人逃到国外；陛下留下，称宽恕季孙意如。这样，季孙氏还会继续事奉陛下的。"昭公说："我不能再受季氏的压迫。"随即带人一同出逃。先到祖庙告别了祖宗，然后逃往齐国。

十一月十三日，鲁昭公逃到齐国，住在阳州。齐侯打算到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去慰问鲁昭公，昭公先行到达野井，迎接齐景公。齐景公见鲁昭公远途奔来，歉意地说："这真是寡人的罪过，派官员到平阴迎接，是为了离阳州近的原故。"两位君主道了问候，齐景公继续说道："鲁国的灾难就是齐国的灾难，先把莒国边境以西的二万五千户送给贵君，齐国时刻听从召唤，派出军队随从你们。"子家子一见齐景公划给昭公领地，立即阻止道："这可万万不行！陛下离开鲁国，却领受齐人的封地，岂不成了齐国的封臣低了身份，还有谁肯为陛下回国复位卖力？况且，齐国人从来就言而无信，不如离开齐国，前往晋国。"鲁昭公没有听从。

臧昭伯跟随鲁昭公逃难于齐。他把大家找到一起，起草盟书。

盟书中说："从今以后，大家同心协力，坚决跟从国君而无三心二意，决不内外串通！"随后以昭公名义传阅盟书。子家子看后很生气，说："这是什么样的盟书！我不能参加。我没有才能，不能同各位同心协力，我也可能内外串通，为国君回国复位而奔走四方。你们几位喜欢逃亡在外就安居在这里吧，我不能与你们同心协力；使国君身处危难寄人篱下，这是罪过，内外通气才能使国君回国，不通气行吗？你们死守在这里吧！"

在鲁国国内，叔孙昭子从阚地回到鲁国首都，去找季孙意如。季孙意如行礼问道："不知你来有何见教？"叔孙昭子生气地说："人生在世，谁能不死。你驱逐了国君，名声流传千古，子孙议论，难道不可悲吗？我能要你做什么？"季孙意如思考了一会，似有所悟，试探着说："如果让我改变态度，重新事奉昭公，那就是死而复生了。"

叔孙昭子见季孙意如态度有所转变，随即赶到齐国，拜见鲁昭公。子家子为了保密不走漏消息，让人把随行的知情人都隔离起来，鲁昭公和叔孙昭子二个躲在帷帐中谈话。叔孙昭子说："大家打算迎您回国，安定国家。"不料，昭公的亲兵得到了消息，准备杀死叔孙昭子，埋伏在他归国的途中。左师展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昭公，昭公便让叔孙昭子走经铸地的那条路回国。叔孙昭子安全回到国内，准备进一步同季孙意如磋商。不料，季孙意如又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昭公回国。叔孙昭子见事不成，骑虎难下，愧对国君，十分内疚。十月四日，叔孙昭子在家中斋戒祭祀，让祖宗在神灵面前为自己求死。一周后，叔孙昭子去世。

然而，鲁昭公并不知道季孙意如改变了态度，准备回到鲁国。这年冬天，左师展陪同鲁昭公乘坐一车回国，途中被昭公的亲兵截住，此事才算告吹。

第二年夏天，齐景公打算武装护送鲁昭公回国，命令臣下不得收受鲁人的礼物。季孙意如闻听齐国要护送昭公回国，十分恐

慌，忙派申丰和女贾二人怀藏两疋锦到齐国，贿赂齐景公的宠臣子犹的家臣高齮说："如果你能劝说子犹，让他阻止齐景公护卫昭公回鲁国，我们将帮助你做高氏家族的继承人，送你粮食五千庾。"高齮把锦转送给子犹，并说："鲁国人的锦多得很，一百疋一堆，只因道路不通，才把这点样品送来。请您在陛下那里多加劝阻。"子犹得到了好处，便找到齐景公说："陛下护送鲁昭公回国的事一定要慎重。鲁昭公在国内，群臣背叛，他才逃亡国外；宋元公为了他的事情到晋国去，结果中途死在曲棘；鲁国的叔孙昭子请求让他回国复位，回国后叔孙昭子就死了。我对这些事情深感奇怪，不知道是上天要抛弃鲁国呢？还是鲁昭公得罪鬼神的报应？我想，陛下应该留在国内，派臣下随从鲁君同鲁人作战。如果打了胜仗，陛下再去不迟；如果不成功，也免得陛下遭难受辱。"齐景公被子犹说得不辨真伪，依从了他的意见，派公子鉏率军护送鲁昭公回国。

鲁国的成邑位于齐鲁两国之间，是由齐入鲁的必经之地，孟孙氏的封地。成邑大夫公孙朝对季孙意如说："城邑是用以护卫国家的，请让我们抵御齐军。"季孙意如答应了。公孙朝怕季孙氏不相信自己，说道："请留下我的亲属做人质吧！"季孙意如阻止说："没有必要，我信任你，放心地去吧！"公孙朝回到成邑，派人对齐军说："孟孙氏在鲁国是破落家族，竟然占有成邑，我们不能忍受，请求降服齐国作为靠山。"齐军以为成邑人真的要投降，便将成邑包围，也没多加戒备。岂料公孙朝是诈降，为的是麻痹齐人的警惕，乘齐军不备，袭击在淄水（小汶河，今已涸）饮马的齐军，然后给齐军送信说："这是给国内的人做样子看的，说明我们抵抗了。"成邑的人们经过充分的战备活动，最后却告诉齐军说："多数人不愿意投降，实在不好办呀！"

随后，齐、鲁两国军队在炊鼻交战，双方厮杀得十分激烈，最后齐军不胜，撤了回去。齐景公见护送鲁昭公没有成功，便召集

莒、邾、杞各国在郚陵开会，商议进一步帮助鲁昭公的问题。会后，鲁昭公回到了鲁国的郓地（西郓，今山东郓城东）。

鲁昭公被季孙氏赶跑的消息传到晋国，晋人觉得自己是霸主，不能不管。鲁昭公二十七年秋天，晋、宋、卫、曹、邾、滕各国代表在扈地（今河南原阳西）开会，商议帮助昭公复位。宋国和卫国觉得送回昭公对自己有利，便表示坚决支持。季孙氏得到消息，立即派人带着厚礼贿赂晋国执政卿范献子，请他阻止此事。范献子收受了好处，对宋国的代表司城子梁、卫国代表北宫贞子说："季孙意如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国君就带人围攻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求把自己囚禁，请求流亡国外，昭公都不同意。结果，昭公没有战胜国内的人们就自己到了齐国，这能算季孙氏赶走国君吗？季孙氏不亡，保全了家族，这是天意。叔孙氏担心国内的动乱，主动和季孙氏站在一起，这也是天意。再说，鲁昭公请求齐国帮助，三年都没有成功。在鲁国，季孙氏深得百姓的拥护，淮夷也亲附他们，齐国和楚国也表示支持他，季氏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拼死守战的决心，只是没有把事情公开，仍像国君还在那样恪守臣节。依我看，护送昭公复位一事难办。不过，你们二位为国家着想，想帮助昭公，这也算忠臣之举了，我很赞佩你们。如果你们二位同意的话，就派你们二位率军去攻伐鲁国，希望你们一定成功，不能成功的话就不要活着回来了！"司城子梁和北宫贞子听得此说，十分害怕，都说难以当此重任。于是，范献子让与会的各国代表率军回国，自己回晋国向国君报告说各国不愿出兵帮助，阻止了此事。

鲁昭公失位数载，眼见齐国的帮助归于失败，晋国的帮助无望，十分着急。鲁昭公二十八年春天，昭公不得已带着臣下前往晋国寻求援助，准备住到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子家子劝说道："陛下如此有失礼节。有求于别国，却又跑到别国那里安稳地住着，还会有谁同情您，支持您？应该到我国与晋国的边界地区等待。"

昭公不听，住在了乾侯，然后派人通知晋国迎接。晋国人十分生气，说："上天降给鲁国灾祸，使国君漂泊在外，也不派人来通知一声，却安安稳稳地住在齐国，一住就是几年。现在又派人来让我们去迎接，难道要到齐国去迎接不成？"把昭公安排住在乾侯。

昭公在晋国一住又是三年。昭公三十一年，晋定公初即位，准备用武力扶持昭公复位。范献子与季孙氏有勾结，不愿让定公把季氏赶跑，立即劝说道："陛下不必急于动武，鲁国的事情谁是谁非还很难说，不妨派人把季孙意如召来，当面查问，如果他不来，那他确实有失臣道，然后再派兵攻伐他也不迟。"晋定公同意，派人召季孙意如到晋。范献子派人暗中通知季氏说："此次你一定要来，我保证你的安全。"季孙意如动身前往晋国，来到适历。晋国大夫荀跞质问季孙意如："我们国君问你，为什么赶走国君？不事奉国君，周朝的刑罚有规定，请你解释一下！"季孙意如头戴练冠，身穿麻衣，赤光着脚，伏身回答说："事奉国君，下臣求之不得；如若有违规章，甘愿受罚。如果认为我有罪的话，请把我囚禁在费地，然后由君王调查，听候处置，如能念及先君的友好，不使季氏断绝烟火，赐我个人一死好了；如果免我不死，也不让我逃亡，这是君王的恩惠，死而不朽；如果允许我随君王回国，那是我求之不得的，怎敢有别的念头呢！"

同年四月，季孙意如随着荀跞到了乾侯。在昭公是否归国问题上，君臣有不同的意见。子家子希望昭公回鲁国，他说："陛下同季孙意如一起回国去吧！不忍受一次流亡的耻辱，难道能忍受终身流亡的耻辱吗？"昭公表示："你说得有理，我应该回去。"多数大臣不同意，怒冲冲地说："一定要赶走季孙氏，陛下一句话就办得到！"荀跞代表晋定公慰问昭公，劝说道："我们晋君命令我责备季孙意如，季孙知罪而甘愿听候处置，这也就可以了。君王还是回国吧！"昭公回答："贵国君主施惠鲁国，使我这样逃亡的人蒙受恩泽，使我回国主持政治祭祀祖先。但是，我决不能再见

到那个作乱的人，河神为证！”荀跞急忙堵住耳朵，高叫道：“我们晋国怎敢参与鲁国的祸难，我回去禀报国君去了。”荀跞出去后告诉季孙意如：“国君的怒气未消，一时还回不去，您还是自己先回鲁国吧！”子家子仍然劝告昭公说：“陛下还是回去吧！您自己单乘一辆车到季氏那里，季孙意如一定会拥戴您回国的！”昭公想听从，无奈众愿难违，没有能回鲁国。

鲁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昭公身患重病。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便把自己的财物赏赐给大夫们，大夫们都很悲伤，不肯接受。昭公赏赐给子家子一对玉虎，一只玉环，一块玉璧，一件裘皮衣。子家子接受了。随后，大家也都接受了。十二月十四日，昭公去世。子家子把赏赐给自己的财物交还给府人①，解释说：“我当时接受，是为了顺从国君的命令。”大夫们也都把东西还给了国君。

鲁昭公丢掉君位，流落他乡，身死异邦，在当时各国引起极大的轰动。晋国史墨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晋国的执政卿赵简子问史墨：“季氏赶走他的国君，然而国内的人民却顺服地听从他，以至国君死在外面也没有人批评季氏，这是为什么？”

史墨回答：“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所以，天有三表，地有五行，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为了相辅助的。天生了季孙氏，让他辅佐鲁君已经历了几代。在这些年间，鲁国的国君放纵安逸，季孙氏世世代代勤于为民，因此，国内的人民忘记了他们的国君，只知道季氏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君死在外边，有谁去怜悯他呢？自古以来，朝代变迁，没有永久不变的祭祀主持人，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君臣秩序。季孙氏自桓公以来已经是第四代了，人心转移，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昭公流亡死在国外，国内的人民安之若素，这表明鲁国公室

① 府人：官职名，掌管国君的财物，犹如今日的仓库管理员。

已经彻底失去人心，季孙氏已经稳操权柄。第二年，鲁定公即位，昭公的灵柩也从乾侯迎回国内。季氏仍对昭公怀恨在心，派人到鲁国公族的墓地，把昭公的墓穴与公族墓区隔开，中间挖一条深沟。大夫荣驾鹅觉得不妥，劝阻季孙氏说："国君活的时候，您不能依君臣之礼事奉他；国君死了，您又把他的坟墓与祖坟隔开。您这样做是想昭彰国君的过错，还是显示自己的过错？您一定做下去，后人会怎样评论？请您三思。"季孙氏听后觉得有理，立即派人通知停止挖沟。随后，季孙氏又问荣驾鹅："我想为国君起个谥号，让子子孙孙都知道他的罪过。"荣驾鹅一听，缓缓说道："国君活着的时候，使他流亡在外，死了之后再加上个恶谥，人们就不议论您了吗？"季孙氏也就罢休了。

鲁定公五年（前 505），季孙意如去世，他的儿子季孙桓子（季孙斯）继承卿位。此时，季孙内部矛盾重重，定公实际上听从季孙氏的摆布，所以，双方倒也彼此相安无事。定公在位期间，孔子曾担任鲁国的司寇。孔子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人，定公向他请教恢复传统秩序的办法，孔子献计说："依照传统，臣下的家中不可私藏兵器，卿大夫的封邑的围墙不能超过三百丈。"定公听后有些兴奋，依从孔子的计策而行。孔子派仲由去当季氏的家宰，并下令拆毁季氏、叔氏、孟氏三家封邑的围墙。首先，叔孙氏把自己郈邑的城墙拆了，季孙氏准备拆毁费邑的围墙。当时，费邑宰公山不狃和叔孙辄不肯，便率领费邑的人们发动叛乱，向国君发动进攻。孔子急忙派申句须、乐颀带兵讨伐，国人也起来支援，最后把叛军彻底击败。公山不狃、叔孙辄逃往齐国，费邑的围墙被完全拆掉。最后，只剩下孟孙氏的成邑围墙没拆，成邑宰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拆毁成邑，就等于向齐国打开了门户；况且，成邑是我们孟孙氏的生命保障，没有成邑，孟孙氏便不能图存，成邑的围墙坚决不能拆！"定公下令围攻成邑，但是没有攻下。

定公在位十五年去世，哀公即位。哀公名义上是国君，实为

傀儡。鲁哀公十一年（前 484），季康子在鲁国彻底推行了依田亩数量征税的办法，旧制度的基础被彻底摧毁了。孔子虽然极力反对，终于无济于事。哀公惆怅地问孔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任臣下，仁义的人在位，国家才能平安无事。"哀公虽明白其中道理，但鲁国政治发展到此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谁也难以挽回了。哀公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孔丘逝世。哀公无限伤感，感叹道："老天爷啊！你怎么这样不仁慈，不肯留下这位贤人，使他弃人而去，我孤零零地留在世上，实在是痛心啊！夫子呀，我难以再依礼法办事了！"

公子荆的母亲受哀公宠爱，哀公打算立她为夫人，命令宗人（司仪官）准备立夫人的仪式。宗人拒绝说："没有这样的礼节仪式。"哀公发怒说："你身为司仪官，确立国君的夫人是重大事情，你为什么说没有?"宗人回答："从我们鲁国的传统看，周公和武公在薛国娶妻，孝公和惠公在宋国娶妻，桓公以后在齐国娶妻。从来没有一位国君把妾立为夫人。"哀公不听，强行把公子荆立为太子，把公子荆的母亲立为夫人。哀公二十四年，哀公前往越国访问，同越国太子适郢关系极为密切。太子适郢打算把女儿嫁给哀公，同时送给大片土地。哀公与越人关系亲密，对季孙氏构成潜在的威胁。季康子的耳目公孙有山急忙回鲁国报告，季康子很害怕，派人带上丰厚的礼品去贿赂越国的太宰嚭，让他阻止了此事。

第二年六月，哀公从越国返回鲁国，季康子和孟武伯到五梧迎接。郭重对他们的专权不满，鼓动哀公说："这两个人专权自恣，在背后言语不轨，请您当面质问他们！"哀公在五梧设宴招待，孟武伯嫉恨郭重，借敬酒之机挖苦郭重："你为什么那么肥胖?"季康子拿孟武伯开玩笑说："要罚你喝酒！由于鲁国与齐国为邻，两国关系紧张，所以我们未能陪陛下出国访问。然而，你却说远途奔波的郭重吃得肥胖，这可不太妥当。"哀公一语双关地发泄不满说："这个人食言太多了，能不胖吗！"君臣虽然在一起宴饮，但

各怀心志，貌合神离，最后不欢而散。

鲁哀公二十七年春天，季康子去世。哀公不堪忍受三桓的压迫，想利用诸侯各国的力量消灭三桓，恢复公室的天下。三桓也害怕哀公勾结国外力量，使自己遭殃，以致君臣之间猜忌日深，难以弥合。一次，哀公到陵坂巡游，在孟氏之衢碰上了孟武伯。哀公当面质问："请问你，我能得善终吗？"孟武伯不在乎地回答："我怎么能知道。"哀公再三追问，孟武伯坚决不答，这使哀公更加不安。哀公想借用越国的力量除掉三桓势力。这年八月一日，哀公到了公孙有山家里居住，以避人耳目。随后，逃到邾国，最后去了越国。闻听哀公至越，三桓家族很不安，把怒气发泄到公孙有山头上，把他囚禁起来。

由于三桓贿赂越人，所以越人拒绝帮助鲁哀公。后来，鲁国人把哀公重新迎回国内，哀公死在公孙有山的家中。公子宁即位，是为鲁悼公。

悼公在位时期，三桓势力远远胜过公室，国君的地位远不及三桓，鲁国公室名存实亡。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

宋国公族兴废

宋襄公图霸，使宋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一度振兴。然而，好景不长，到春秋中叶以后，宋国便迅速衰弱下去了。虽然晋、楚两大国争霸使宋国处于不利地位，影响了宋国的发展和强大，但宋国内部连年不断的政治内讧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春秋时代被史学家称作“乱世”，旧的社会秩序逐渐被破坏，宋国内部贵族的腐朽无道更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宋成公死后，宋昭公即位。昭公是一个不行德政、残酷暴虐的君主，他认为公族（先君的儿子的族人）的势力对自己构成了威胁，想用武力把他们统统赶到国外，不然的话就杀死。司马乐豫劝阻说：“这不行。公族是国君所依靠的力量，犹如树长枝叶一样，是为了遮掩自身。如果去掉树的枝叶，大树就没有遮蔽了。如果陛下能安抚、亲近他们，他们都会成为陛下左右的辅弼大臣，谁还能有三心二意？您为什么要除掉他们呢？”昭公不听，召集人马准备进攻公族。宋穆公、宋襄公的子孙们闻听消息，先下手为强，召集国内的人们攻打昭公，在宫廷内杀了公孙固和公孙郑。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由大臣们出面同公族讲和，乐豫把大司马的官职让给了公子卬，此事才算暂告平息。

宋昭公对襄公的夫人王姬（昭公的君祖母，周王室的公主）粗暴无礼，王姬很不满意。宋昭公元年（前 619），王姬依靠戴氏族人的力量杀了昭公的党羽孔叔、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卬，司城荡意诸逃往鲁国。

与昭公的昏庸无道截然相反，他的异母弟公子鲍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积极收买人心。宋国发生饥荒，他就把自己的粮食全部捐献给国人；对年纪七十以上的老人，他按季节送去时令用品；拉拢公族，使他们亲近自己；同时，还极力招揽有能之士到自己的门下。经过公子鲍的苦心经营，人们对他很有好感。公子鲍生得英俊潇洒，襄公夫人十分动心，便有意亲近公子鲍，想与他发生性关系。公子鲍不肯，襄公夫人不但不恼怒，反而取出自己的财物帮助他施舍。就这样，宋昭公眼望着公子鲍羽翼丰满起来。

不久以后，襄公夫人安排昭公到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去打猎，准备乘机杀死他。昭公知道事情不妙，但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便带上了全部珍宝前往孟诸。司城荡意诸劝告说："与其坐以待毙，何不逃到诸侯各国去？"昭公叹息说："文武百官不信服我，君祖母抛弃我，诸侯谁肯接纳我呢？况且，我身为君主，再去做别人的臣下，还不如死了好！"随后，把珍宝散发给左右侍从，让他们各自离去了。襄公夫人派人告诉司城荡意诸离开昭公，荡意诸拒绝道："我身为人臣，君主有难自己逃开，今后还怎么做别人的臣下？"

宋昭公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宋昭公前往孟诸打猎，襄公夫人王姬派人在半途中把昭公杀死，荡意诸随行以身殉职。公子鲍即位，是为宋文公。他任命弟弟公子须做了司城，荡虺做了司马。

宋昭公被杀后，昭公的党羽、武氏族人勾结昭公的儿子，准备拉拢公子须发动叛乱。不料，阴谋败露，宋文公二年（前 609）十二月，宋文公首先杀了公子须和昭公的儿子，然后派戴公、庄公、桓公的族人攻伐武氏，把武公、穆公的族人赶出宋国。文公重新命公孙师为司城，乐吕为司寇，以安定国内的人心。

宋文公和宋共公在位的三十多年间，宋国国内政局比较稳定。在这表面的平静下面，各族的力量逐渐积聚，日益壮大。宋共公十三年（前 576），共公逝世，平公即位。这时，华元任右师，鱼

石任左师，荡泽任司马，华喜任司徒，公孙师任司城，向为人任大司寇，鳞朱任少司寇，向带任大宰，鱼府任少宰。君弱臣强，政出多门，矛盾顿起。司马荡泽想削弱国君的力量，杀了公子肥。华元立即表态："我任职右师，辅佐国君理政，现在，国君的势力衰弱，我却无能为力去帮助，这是我的过失。不能尽职尽责，怎能贪图利禄！"于是，打点行装出走晋国。

右师华元、司徒华喜是戴公的后代，司城公孙师是庄公的后代，其他六位大臣都是桓公的后代。左师鱼石看到华元出走，感到不安，打算留住华元。少宰鱼府说："如果右师回来，他必定会讨伐荡泽，这会伤害我们桓氏族人！"鱼石说："我们把他迎回来，即使允许他讨伐荡泽，想必他也不敢。华元在国家建立过大功，调停诸侯弭兵，人心归服，他出走，国内的人民会背叛我们，将来我们会更危险。假如华元讨伐荡泽，也只不过亡掉桓氏的一支，无害于桓氏大局。"说服了族人，鱼石自己亲自到黄河岸边劝阻华元回国。华元提出条件："必须讨伐荡泽！"鱼石点头同意，华元才返回国都。随后，华元派华喜和公孙师率领国内的人民进攻荡泽，将他杀死。

虽然桓氏一族事先默认华元讨伐荡泽，但眼看着骨肉兄弟被杀，却又难以认可，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大宰向带、少宰鱼府一起离开国都躲到睢水岸边。为避免内乱，华元派人劝他们回到国都，就任原职。鱼石等人不同意。这年十月，华元亲自去安慰鱼石等人，他们再次拒绝。华元走后，鱼府焦虑地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回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华元此次来去匆匆，说话的时候眼睛乱转，这是他在打别的主意。如果他现在匆匆而回的话，就是不想接纳我们了！"说完，登上山顶远望，看到华元疾驰而去。鱼石、鱼府等人急忙驱车追随华元，但为时已晚，华元命人掘开睢水，关闭城门，鱼石等人想回都也不可能了。无奈，他们五人逃亡到楚国。华元任命向戌（桓氏族人）为左师，

自己的族人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安定人心。

鱼石等人逃难到楚国，正好给了楚国干涉宋国内政的机会。三年之后，楚、郑两国联合攻伐宋国，先后攻占宋国的朝郏（今江苏夏邑）、幽丘（今安徽萧县）、彭城（今江苏徐州），把鱼石、鱼府、向为人、向带、鳞朱安置在那里，并派武力戍守。宋国人感到十分不安，西鉏吾气愤地说："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楚国人真心帮助我们，施予我们德惠，我们就同他们一心；如若不然，我们即使把全部宋国送给他们，他们的贪心也不会满足。把人们讨厌的人送回宋国，这是企图钻我们的空子，加害于我们，既然这样，晋国也会出面干涉，我们也可以求得晋国的帮助！"就这样，宋国陷入了楚、晋两大国的争斗之中，连年战祸不已，弭兵局面彻底破坏了。

桓公的族人势力削弱之后，戴公族的势力在宋国强大起来，内讧随之而起。宋平公二十年，大臣华阅死，他弟弟华臣认为华阅的儿子皋比年幼好欺，便阴谋霸占皋比的家财，派人杀死了皋比的家宰华吴。当时歹徒一共有六人，他们把华吴杀死在左师向戌的房后。向戌很害怕，对人表白说："我老头子没有罪！"歹徒说："不关你的事，皋比为了家政而处死华吴。"宋平公闻听此事，很气怒："华臣不仅欺负自己的族人，而且破坏宋国政治，我要把华臣赶走！"向戌劝阻说："华臣也是一位卿，大臣不能忠君爱国，这是国家的耻辱。我看，不如息事宁人罢了。"平公赦免了华臣的罪过。向戌对华臣的为人感到厌恶，他自己准备了一把马鞭，每当经过华臣的家门时，他都打马赶紧跑开。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宋国人追杀一条疯狗，疯狗逃入华臣院中，宋国的人们冲入华臣家中，华臣心虚，恐慌之中逃到陈国去了。

宋国的芮司徒生了个女儿，红色的皮肤长满了毛，芮司徒很不安，命人把此女抛弃到外边。恰巧，共公的夫人共姬的仆人从那里经过，顺便抱回去送给了共姬。共姬把她养大，生得十分漂

亮，取名叫弃。一次，宋平公去向母亲共姬问候平安，共姬留下平公吃晚餐，无意之中，平公看见了弃，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共姬就把弃送给平公做妾。平公十分宠爱弃，生下公子佐，长得十分难看，但性情温和。太子痤生得英俊，但心地凶狠，向戌很讨厌他。寺人① 伊戾任太子的内师，与太子的关系也很糟糕。

宋平公二十九年秋天，楚国使者到晋国访问，途经宋国。太子痤与这位使者是故友，向平公请求在郊外设宴招待楚使，平公答应了。寺人伊戾请求随太子一同前往，平公奇怪，问："太子不是讨厌你吗?"伊戾回答："小人事奉君子，受宠爱不敢亲近，受讨厌不敢远离。我事奉太子。岂敢有三心二意呢？陪同前去是我的职责。"平公看他言辞恳切，就让他去了。寺人伊戾是个内心险恶的家伙，他想借这个机会陷害太子。到了相会的地点，他偷偷地挖了坑，在坑内杀了牺牲，把伪造的盟书放在牺牲上面，使人看似盟誓的样子。然后，驱车疾速返回国都。他到了平公跟前，诬告太子说："报告陛下，太子企图勾结楚人作乱，杀君自立，他们已经结盟了!"平公有些惶惑，说："他是太子，怎么会杀我自立呢?"伊戾立即说："太子早就想当国君，已经迫不及待了!"平公派人去查看，回来报告说有此事，平公又问向戌和弃。他们都厌恶太子痤，便不失时机地说："确实听到过类似的话。"平公相信了，把太子痤囚禁起来。太子身陷囹圄，说："只有公子佐能救我一命了!"让人把公子佐召去，请公子佐到平公跟前求情。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到中午他不给我回话，我是必死无疑了!"

太子痤的话被左师向戌知道了。向戌把公子佐找到自己府中，寻找话题说个没完，故意拖住公子佐。中午已过，太子痤见公子佐没有回音，以为平公不同意赦免自己，就悬梁自尽了。公子佐被立为太子。不久，平公逐渐了解到事情真相，就把伊戾处死。

① 寺人：割去生殖器官的内官男仆，后来宦官、太监缘此而来。

宋平公晚期，向戌召集晋、楚两大国举行停战谈判，实现了春秋时期的第二次弭兵，在国内大权在握，与华氏共辅国政。一次，向戌看到一个遛马人，问道："你是哪家的人？"遛马人回答："我是君夫人的家人。"向戌听后心中不快，板起面孔道："谁是君夫人？我怎么不知道？"太子佐的母亲弃本是妾，所以向戌明知故问。遛马人回去把这话报告了弃夫人，夫人也怕向氏三分，派人给他送去马和锦，同时还有玉器，说："国君的妾弃派我们献给您的。"向戌这才改口称"君夫人"，接受了礼物。

寺人伊戾作难的十年后，寺人柳又演出了相似的一幕。寺人柳受平公的宠信，太子佐却很厌恶他。右师华合比对太子佐说："我一定杀了他！"不料，这事被寺人柳得悉，他把寺人伊戾的故伎重演，在北城郊外挖坑、杀牲、伪造盟书，然后报告平公说："华合比暗中勾结逃亡在外的华臣，想把华臣迎回国内，他们已经举行盟誓了！"平公立即派人去侦察，结果发现了盟书，一怒之下驱逐了华合比。当时，华氏族人华亥想接替右师职务，就同寺人柳勾结在一起，证明华合比确实与华臣有勾结。结果，宋平公任命华亥担任了右师。华亥去见左师向戌，向戌指责他说："你将来也会被赶到国外的！你对别人怎样，别人对你就怎样。《诗经》中说，族长如城，勿使城坏，自己无畏。你破坏你的宗族，使你的族长流落他邦，难道你不害怕吗！"

宋平公在位长达四十多年，他死后太子佐即位，是为宋元公。这时，华、向两族势力再盛，君权衰弱，酝酿着一场新的危机。宋元公十年（前522）春天，鲁国史官梓慎观测天象时对别人说："从星象上看，今年宋国会有内乱，而且乱得国家几乎灭亡，三年之后才会安定。"叔孙昭子议论说："那就是戴公（华氏）、桓公（向氏）两族的祸乱了。他们大权在握，奢侈无极，肯定是他们滋事！"

宋元公虽为国君，强臣在下，使他终日不安。他打算驱逐华、

向两族。华定、华亥、向宁也凑到一起密谋策划，准备先下手发难。随后，华亥假装有病不再上朝，以引诱杀掉元公的族人。公子们前去探望，华亥就把他们扣押起来。这年六月九日，先后杀死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六人，并把元公的亲信向胜、向行囚禁起来。宋元公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到华氏那里哀求。华氏非但不就此罢休，反而劫持了宋元公。六月十六日，元公把太子栾和兄弟公子辰、公子地交出作为人质，华亥也把儿子华无慼、华定把儿子华启、向宁把儿子向罗交给元公作为人质，双方盟誓后，才暂告罢休。

在华、向之乱中，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郑、楚建等人避乱逃到了郑国。他们的党羽同华亥在鬼阎交战，战败后逃往晋国。

华亥扣留国君的太子做人质是担心元公不讲信用，说了不算。华亥和他的妻子每天吃饭前，都要先侍候作为人质的公子们吃完，然后自己才去吃饭。宋元公和夫人每天都要到华亥府中，看着公子们吃完饭，然后才回宫吃饭。时间一久，华亥感到很不安，想放人质回去。向宁不同意，说："正因为他缺乏信用，我们才扣留人质。如果把人质放回，他很快就会向我们发难！"

宋元公召大司马华费遂前去，对他吐露了打算攻打华氏的心思，华费遂同情元公，回答道："陛下有令，臣不惜肝脑涂地奉命执行，决不敢有二心。不过，在目前草莽行事只怕旧虑不除又添新忧，这是臣的一点想法，如实奉告，听候陛下的命令！"宋元公说："孩子们死在华氏那里是命中注定，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了！"这年十月，元公杀死了华氏、向氏的人质发兵攻打这两家，华氏、向氏逃亡到陈国，华登逃到吴国。临逃前向宁想杀死太子，华亥叹息说："我们上犯国君，若再杀公子，还有谁肯收留我们？况且，放他们回去还可以取得功劳。"华亥派哥哥华轻送公子们回宫，说："您年纪大了，不能再流亡了，送回三位公子的功劳，一

定可以使你免罪。”华轻把公子们送回宫内，准备离开。宋元公急忙召见他，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没有罪，你应该官任原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司马华费遂有三个儿子，华貙、华多僚和华登。华登参与华亥叛乱，逃亡在外，华貙任少司马，华多僚做御士。华多僚与华貙兄弟二人不和，华多僚屡次在元公面前诬陷华貙说：“他打算迎回那些逃亡的人。”元公最初不信，久而久之起了疑心，说道：“大司马为了我，使他的儿子逃亡在外，我不能再驱赶他另外的儿子了”。华多僚却说：“陛下若怜惜大司马，不愿再让他的儿子逃亡，自己可要做好逃亡的准备，而且逃得越远越好！”元公听后很不安。第二天，派人召来华费遂的仆人宜僚，赏给他酒喝，对他谈了自己的顾虑。宜僚回去告诉了华费遂，华费遂叹息说：“一定是多僚干的！我生下这样一个无事生非、制造谣言的儿子，既不能杀了他，又不能违背国君的旨意，这可如何是好？”随即入宫同元公商量，打算安排华貙到孟诸去打猎，然后打发他出国躲避。

华貙临行前并不知事情的原委，宋元公把他请进宫去宴饮，送给他很多贵重的礼物，甚至赏赐了他的随从。华费遂也像国君那样优遇华貙。华貙的亲信张匄觉得此事奇怪，说：“一定是有什么异常的事了！”华貙拔出剑放在仆人宜僚的脖子上呵道：“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宜僚无奈把真情吐露出来。张匄想杀死多僚，华貙说：“父亲已经年老，华登逃亡在外已经使他十分伤心，我不愿再把事情闹大，干脆逃亡算了！”

宋元公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华貙打算拜见父亲后动身，不巧在朝中正好碰见华多僚。张匄怒火上冲，控制不住自己，同华貙、郑翩一起杀死华多僚，劫持华费遂发动叛乱，召回逃亡国外的人们。二十日，华亥、向宁带着逃亡的人们返回国内，元公派乐大心、华轻等人率军阻击。华氏的人马驻在庐门之外，宋都内的人们加固城墙严阵以待。

十月，华登引导着吴国军队救援华貙。当时，齐将乌枝鸣率军戍守宋国。部下对他献策道："兵书中说：先发制人可以摧其士气，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竭。我们可以乘其疲惫发起攻击。如果等到敌人都赶来安营扎寨，华氏人多势众，就难以取胜了。"乌枝鸣采纳此策，齐、宋两军在鸿口将吴军击败，俘敌将偃州员。华登率领余部反击，击败宋军。宋元公一见战败，想逃亡国外，厨邑大夫濮劝阻道："我是臣下，宁可战死，决不陪着陛下逃亡！"随后来到军中高声叫道："愿意为陛下而战的勇士，挥舞你们的旗帜！"将士们听后都挥动军旗。元公在城门上一见这场面，增添了信心，喊道："国家灭亡，国君逃亡，这也是各位勇士的耻辱！希望大家同仇敌忾，卫家卫国！"乌枝鸣说："以少战多必须勇于死拼，要想死拼必须破釜沉舟。把所有守备力量都集中过来，用剑同敌人决战！"宋元公依从，指挥军队同吴军决战，华登败走，厨邑大夫用裙衣包上砍下的人头，举起来高叫："华登已被杀死，大家冲呀！"将华氏人马彻底击溃。

这时，公子城引导着晋国军队同前来支援宋国的曹、卫、齐各国军队会合。十一月七日，双方军队在赭丘对垒。华貙的部将郑翩想摆列鹳形军阵，他的御手建议摆列鹅形军阵。干犨为华貙赶车，张匄为车右；子禄为公子城御车，庄堇为车右。两车相遇，公子城退了回去。华貙大叫："你就是公子城吧，不敢过来吗？"公子城受辱，驱车返回。公子城想拉弓，华貙已经拉弓对准了他，公子城说："有平公的神灵保佑我！"华貙一箭射出，箭从公子城和公子禄之间穿过。公子城想搭箭还击，华貙手疾眼快又拉满了弓。公子城怒斥道："不让我还手，你卑鄙！"华貙撤下箭，公子城一箭射去，华貙应声倒下。张匄持戈向公子城冲来，公子城一箭射在张匄的腿上，张匄用戈砸坏了公子城的车轮。公子城又一箭把张匄射死。干犨请死，公子城说："我替你向国君求情。"干犨答道："不同战友一起死，那是耻辱，你就快点动手吧！"也死在战

场上。

华氏战败，退守南里，宋军把南里包围，华亥绝望地对华貙说："我们不会完蛋。"经过商议最后决定派华登到楚国去求援，华貙率领十五辆战车、七十人护送华登突出重围，然后又冲回南里。

华登到了楚国，楚平王接见了他，准备派薳越带兵救援。太宰犯劝谏说："诸侯之中只有宋国事奉楚国，帮助宋国的叛臣攻击国君这恐怕不太妥当吧！"楚平王说："你言之有理，但说晚了，我已经答应了华登。"

薳越率领楚军来到宋都城外，派人进城对宋元公说："我们国君听说你们宋国出了乱子，有臣下不服从命令，使贵国陛下不得安宁，我们准备把那些人带到楚国加以处罚。"宋元公生气地回答说："孤没有才能，使国内出了乱子，有劳贵国君主操心忧虑。如果贵国君主说'我一定要帮助作乱的臣下'那孤唯命是听！不过，人们常说：'不要经过歹人的家门'，宋国的臣子作乱作歹，希望贵国君主慎重考虑！"楚人听了这一席话感到不安，便静观时变。守卫宋国的诸侯军将领们商议说："华氏困兽犹斗，会拼死抵抗；楚军无功，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他们齐心协力，对我们很不利，不如把华氏放走，使楚人得功，宋国也去掉了祸害，这是两全齐美之策。"于是，将领们请求放走华氏叛臣，元公答应了。宋元公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带族人逃往楚国。

宋元公任命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卬为大司徒，乐祁为司城，乐大心为右师，乐輓为大司寇。至此，延续二年多的一场内乱才告平息。

二十年之后的宋景公时期，宋国又爆发了公子地和公子辰之乱。景公的异母弟公子地宠信蘧富猎，把他的家产分成十一份，给了蘧富猎五份。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景公的宠臣向魋想要，景公把白马弄来，在马尾上染上红颜色给了他。公子地知道后很生

气，派手下人痛打了向魋一顿，把马夺回。向魋很害怕，向景公哭诉，景公也很难过，落下了眼泪。景公的弟弟公子辰批评公子地说："你把家产分给蘧富猎，却不给向魋，这不公正，你的所作所为有失臣道，应该检讨。你平日对国君彬彬有礼，这次偶然有过失，最严重的处罚也不过是流亡到国外，而且，国君必然会挽留你，事情也就了结了。"于是，公子地打点行装出走陈国，但景公也没挽留他。公子辰为他求情，景公还是不允。公子辰说："这等于我欺骗了哥哥（异母兄），让我今后怎样做人！我带着人们出国，看还有谁同国君在一起！"宋景公十七年（前500）秋天，公子辰和仲佗、石彄也出走陈国。这就埋下了日后动乱的种子。

第二年春天，公子辰带着仲佗、石彄、公子地回到宋国的萧邑（今安徽萧县西北）发动叛乱。同年秋天，右师乐大心也跟着叛乱，宋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这次动乱完全是由于景公过分宠信向魋所致。

在宋国与郑国之间边境地区有大片的开阔无人地区。郑国曾明确向宋国表示，把这些地区让给宋国。宋国内乱之后，公子辰、公子地带着人马从萧地逃难到郑国，郑国人为他们在这些空旷地区的嵒、戈、锡地修筑了城邑，安置他们住在那里。宋景公三十四年九月，宋景公派向巢率军向郑国发动攻击，占领锡地，杀死元公的孙子，随后又包围了嵒邑。郑国立即派出大军救援，把向巢率领的宋军团团包围。

宋国得悉后，立即派向魋率军赶去救援。郑军将领子賸通告全军："活抓向魋者有赏！"向魋十分恐惧，连夜逃回宋国，郑军在嵒邑将宋军全部歼灭，并俘虏了成讙、郜延，把边境地区的六座城邑劫夺一空，使之再次成为一片废墟之地。

宋景公一味宠信向魋，使向魋的势力逐渐强大，日益骄纵，甚至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景公见自己养痈为患，十分懊悔，准备除掉向魋。他让夫人邀请向魋前来参加享礼，准备借机除掉他。还

没来得及动手，向魋却先打起了景公的主意，要求用封鞌邑换宋国的薄邑（也作亳，今河南商丘北）。景公拒绝道："不行！薄邑是我们殷人祖先的发祥地和祖庙所在地。"景公把鞌邑附近的七个邑并入鞌管辖，归向魋统治。向魋准备了宴会答谢景公，请景公中午以前赶到，暗中埋伏下武装，想劫持景公。景公得到了实情，告诉大司马皇野说："我把向魋养大了，现在他要反过头来加害于我，你赶紧救救我吧！"皇野恭敬地回答："逆臣叛君，神灵不容，我岂敢不竭尽全力讨伐？可是，我需要得到左师向巢（向魋之兄）的承诺，否则难以成功，请以陛下的名义召见他。"

向巢每天吃饭前都敲钟，吃完饭后奏乐。当时，皇野起身准备用国君的名义去请向巢，景公听到远处传来的钟声，说："稍等一会吧，他正吃饭呢。"过了一会儿，传来奏乐的声音，才让皇野前去。皇野只乘一辆车到了向巢那里，说道："刚才有迹人进宫报告说逢泽发现一只麇，国君说：'向魋不肯同我去打猎，就让左师向巢同我一道去吧！'特派我前来相邀，希望您快一点，所以只派了一辆车来迎接。"向巢与皇野同乘一车来到宫中，景公把事情真相告诉了他。向巢以为祸连自己，叩拜不起，皇野对景公说："陛下同他盟誓吧！"景公扶起向巢发誓道："有苍天和祖宗作证，我决不会使你株连祸难！"左师向巢回答："魋不敬国君，这是大逆不道，我怎敢不奉命讨伐！"皇野从国君那里接受了符节，命令部下攻打向魋，他的父长和老臣都不同意，而新部下都愿意，皇野便发兵进攻。

向魋得到消息，想带人马进攻景公，部下子车劝阻说："既不顺从国君，反而攻打国君，如此叛逆的行为会使您失去人心，迅速败亡。"于是，向魋带领人马占领曹邑叛乱。

宋景公二十六年六月，左师向巢率军进攻向魋。他想以国中的大夫作为人质交给向魋，谋求妥协和解，景公不答应。他进入曹邑，想找向魋索要人质带回国都，又被向魋拒绝。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背叛了向魋。向魋逃往卫国，向巢逃往鲁国。景公派人挽留左师向巢，说："我已与你盟誓在先，不能断绝向氏的宗祀。"左师向巢谢绝说："我知道自己有罪，即使把我们这些桓公的后代斩尽杀绝也不过分。假如念及我们先人的功绩，不使桓氏绝嗣，这是国君的恩赐了。像我这样的罪人，已经没有脸面再回宋国了。"

宋景公没有生儿子，抱养了公孙周的儿子得和启，但一直没有确立一个作为继承人。景公晚年，皇缓任右师，皇非我任大司马，皇怀任司徒，灵不缓任左师，乐茷任司城，乐朱鉏任司寇，六卿三族共同执政。当时，大尹（或官职，或人名，不详）受宠，一切政事都通过他转达。大尹专权，经常欺上瞒下，不向景公报告而擅自作主，景公也不予追究。国内的人们都讨厌大尹。司城乐茷想除掉大尹，左师灵不缓劝说他："进一步放纵他，好使他恶贯满盈。他权力虽大，但没有根基，难以长久。"

宋景公四十八年（前469）十月，景公到空泽游玩，死在那里，大尹调动空泽的一千名甲士，护卫着景公的遗体从空泽赶到沃宫，派人召来六卿。六卿来到后，大尹用武力劫持了他们，强使他们盟誓，说："国君重病在身，命令你们发誓。"大家在院子里盟誓说："决不做危害公室的事情！"然后，大尹才通知说："陛下驾崩，遗诏立公子启继承君位。"把景公的遗体安放在祖庙里，此时景公已经死了三天了。司城乐茷不满大尹所为，派人在国内宣传说："大尹蛊惑国君，专权好利，现在国君无故身亡，他又隐匿不报。大尹有阴谋，应该讨伐他！"

公子得年长，没有被立为国君，心中不快。一日，他梦见公子启睡在庐门之外，头向着北方，自己化为一只大乌鸦站在他的身上，嘴巴放在南门上，尾巴放在北门上。依照当时习惯，人死后头向北；得君位，面向南。公子得醒后很高兴，对人说："我做了一个好梦，将会成为国君。"

大尹知道自己不得人心，有些不安，对别人说："前些时候我

没有参加六卿的盟誓，恐怕他们会赶走我吧？我要同他们盟誓。”命令太祝制作盟书。当时六卿正在唐盂，想同大尹会盟。太祝把盟书的内容密告了皇非我，皇非我便同左师灵不缓、门尹得、司城乐茷一起策划说：“大尹不得人心，把他赶走吧！”召集各自的族人，发下武器，让他们到国都内示威说：“大尹欺压公室，迷惑国君，恶贯满盈！谁想救援国君就跟我们走！”人们纷纷依从。大尹获悉后也宣布说：“皇氏和戴氏打算谋反作乱，谁跟我平乱，将来能升官发财！”人们却说：“鬼才知道你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

皇氏和戴氏的人打算进攻公子启，乐得劝阻说：“他欺君有罪，我们发兵攻击他，岂不也有罪了？”随即带领人们讨伐大尹。大尹寡不敌众，带着公子启逃亡到楚国。公子得被立为国君，是为宋昭公。大家会盟说：“从今以后，三族共辅国政，不要彼此伤害！”

在春秋后半期的一百五十年中，宋国发生内乱达十余次，时间短者一年，长者数十年，严重地伤害了国家的力量。清人马骕一针见血地评论说：“自从宋襄公泓水之战失败后，宋国国力日衰的重要原因就在内乱多，大臣之间离心离德。”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文公七年至哀公二十六年

《史记·宋微子世家》

王子朝之乱

继春秋前期的王子克、王子颓之乱和王子带之乱后，公元前6世纪末期，周王室又发生了王子朝之乱。

王子朝之乱的发生，有偶然性因素，也有必然性因素。周景王十八年（前527），周王室的太子寿因病突然身亡。太子死后二个月，王后也因过度忧伤身亡。这就为日后的王位继承留下了隐患。

嗣君问题历来是一个棘手问题，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引发内乱。周景王没有为太子人选作好安排，却忙于一些违背礼法的事情。当时，由于社会的变化，王室的经济陷入困难之中。为解决这一困难，景王想铸面值很大的铜钱，用这个办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臣单穆公闻听此事急忙劝谏说："不能这样做！在古代，只有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才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发行大面值货币，如果人们认为面值太大，就再发行面值小的，二者相辅而行，互为调剂，使国家安定。如今，要废除原来的旧制，铸造大面额货币，会使百姓的生活破产。一旦百姓的生产、生活维持不下去，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就无从取得了。而且，人民活不下去便会离心离德，甚至背叛朝廷，这更危险！我们周王朝本来已经衰弱不堪，上天不断降下灾祸，我们自己再人为地制造祸端，这怎么行！请陛下三思！"然而，景王拒不采纳。

周景王沉溺于舞乐，不满足听到的音乐，让人铸名叫"无射"的大钟以取悦。这又是违背礼法的举动。乐官泠鸠说："天子

大概该死了吧！人的心灵是音乐的接收器，钟是发音的器物。天子考察各地风情，然后制作乐曲来汇聚它，用声音来表达它。无论多么细小的乐器发出的声音都能使人听到，无论多么大的乐器发出的乐声也不粗犷，音调是那样的和谐。美的音乐入于耳，藏于心，心情愉悦，身体健康。如果纤细的乐声不能使人听到，粗犷的乐声使人难以忍受，心灵会因此躁动不安，人会生病。现在铸大钟，声音使入无法忍受，难道能活得长久吗？"

王子寿死后，景王立了王子猛为太子。宾起（也作宾孟）是景王的宠臣，王子朝的师傅。景王和宾起都非常宠爱王子朝，有意改立王子朝为太子，王子朝也经常口出狂言。朝中大臣们讨厌宾起的恶劣人品，又厌恶王子朝的狂妄。刘献公的儿子伯蚠在单穆公手下做事，他认为宾起和王子朝所为违背礼制，想杀掉他们。一次，宾起到郊外游历，无意中看到一只公鸡用嘴弄断自己尾部漂亮的羽毛。这本是很偶然的事情，宾起问随从这是怎么回事。侍从开玩笑回答说："可能是它害怕自己太漂亮，将来会被用于祭祀吧！"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宾起似有所悟。随后，他向景王煽动说："臣今日外出，遇到一只雄鸡自残形体，因为它怕自己将来成为祭品送命。牺牲是受人摆布、控制的，所以它们决定不了自己。人就不一样了，人能选择控制，使自己免于成为别人的祭品。"景王听后，顿悟其意，但没有正面回答，心里有了打算。景王二十五年四月，景王去北山打猎，命令公卿大臣陪同，准备借机杀掉单穆公和刘献公，免去后患。

天有不测风云。景王患有心脏病，没来得及动手杀单穆公和刘献公，自己突然死在大臣荣锜氏那里。王子猛继承王位，没过几日，刘献公也死了。由于他没有嫡子，单穆公替刘氏立了庶子刘蚠。五月四日，刘蚠进见王子猛，乘机带人动手杀死宾起，与王子们一同到单氏那里结盟。

王子朝不甘王位落入王子猛手中，看到宾起被杀更是怒发冲

冠。他暗中联络朝中受冷遇不得志的大臣，以及灵王、景王的族人，伺机发动政变，夺取王位。同年六月十一日，周景王下葬，王子朝借机率众在郊、要、饯地动手，杀戮异党，刘蚠逃到扬（今河南偃师境）。单旗（穆公）见突发事变，把王子猛接到自己府中。当天夜里，王子还又把王子猛迎回宫中。单旗恐惧，也逃到国都之外。

王子朝的党羽王子还和召庄公商量说："不除掉单旗，国家难得安宁。我们不妨派人去通知他前来结盟，同归于好，他必会前来，他来了就下手，定能成功！"召庄公依从。樊顷子反对说："这恐怕不会成功。"王子还带着王子猛赶到单旗那里，大张旗鼓地一起结盟，然后回去又杀了挚荒，以向单旗表示诚意。然而单旗并没有回都，而是逃往平畤，刘蚠逃到刘地。王子朝带领人马赶去追杀，结果大吃败仗，王子还、王子姑、王子发、王子弱、王子延、王子定、王子稠等八人战死，王子朝仓皇逃到京地。单旗带人马追杀到京地，京地的人们逃到了山里。二十五日，单旗打败巩简公；二十九日，单旗又击败甘平公。刘蚠率军进入都城。

周王室内乱，形势危急，单旗想向晋国求援。同年七月三日，单旗带着王子猛赶往平畤，后到圃车，继到皇地。刘蚠撤到刘地。单旗派王子处在京都守卫，同百官在周平王的庙内结盟。王子朝的死党鄩肸率领人马进攻皇地，被单旗打败，当了俘虏。单旗把鄩肸押送到国都内的市场上烧死。八月十六日，单旗的军队在前城战败，部下倒戈，围攻单氏的住宅，被单旗打败。

同年十月十三日，晋国的籍谈、荀跞率领九州的戎人和焦、瑕、温、原等地的军队，把王子猛护送回京都。单旗和刘蚠率军与王子朝在郊地决战，单、刘战败。王子朝的同党前城人在社地击溃陆浑人的武装。十一月十二日，王子猛不幸死亡。十六日，周敬王即位，住在子旅氏的府中。晋军在籍谈、荀跞的带领下发动猛攻，先后占领阴地（今河南孟津北）、侯氏（今河南缑氏）、谿泉

（今河南洛阳东南）、前城。周敬王的军队攻克汜（今河南巩县东北）、解（今河南洛阳西南）、任人（今洛阳附近）。

随着晋军发起的强有力的攻击，形势逐渐好转。周敬王元年（前519）初，晋军和周军包围了郊地。郊地人寡不敌众，一触即溃。周敬王派人向晋军通报形势好转，晋军也就停止了军事攻击，撤军回国了。

晋军的撤离，减弱了周军的力量。同年四月，单旗占领訾地，刘蚠占领直人（地名），王子朝占领尹地。尹地人诱杀了刘佗。六月，单、刘二军合击王子朝屯驻的尹地，单军从山路，刘军从大道进攻。单军先至，被王子朝击破，刘军一见形势不妙就撤回了。单旗、刘蚠、樊齐护卫周敬王离开王都，到了刘地。四月二十四日，王子朝进攻京都，住在左巷。七月初九，鄩罗和尹辛在周庄王的庙内拥立王子朝为王。这时，二王并立，一方是周敬王，一方是王子朝。

这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原一带发生地震，南宫极被倒坍的房屋砸死。苌弘对刘文公（刘蚠）说："我们努力吧！先贤所致力的消灭王子朝的事情将要成功了！西周灭亡的时候，三川发生了大地震。现在，西王（指王子朝，地处西方）那里又发生地震，这是上天要抛弃他了。东王（敬王）必然大胜。"

周敬王二年，王室大臣甘桓公背叛敬王，投奔到王子朝那里，召简公、南宫嚚带着甘桓公进见王子朝。刘文公对苌弘忧心忡忡地说："甘氏也转向王子朝一边了，我们的力量更加衰弱。"苌弘回答："这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合乎道义。《尚书》中说，纣有万人，离心离德；文王有贤臣十人，同心同德。这就是殷与周对峙的结果。希望我们致力于德行，人们最终会支持我们的。"在这一年中，王子朝的军队步步紧逼，先后占领鄩（今河南偃师南）、瑕、杏（今河南禹县北）。十月十一日，王子朝使用王室的宝珪向河神祈祷，然后把珪投入黄河。第二天，船工

无意中捞到这件珪，阴不佞率部队袭击王子朝，拘捕了捞玉的人，把珪据为己有，准备把珪卖掉，不知怎的，玉珪变成了石头。卖不掉，后来阴不佞把它献给了周敬王，敬王把东訾赏封给他。

周敬王战事失利，再次引起诸侯的关注。郑国的国君到晋国访问，子太叔陪同。到了晋国后，子太叔拜访范献子。范献子问："您说王室会怎么样？"子太叔不满地说："我老头子对自己的国家和家族都不能操心，怎么会知道王室将会怎么样？常言道，织妇放下自己的织作，忧虑国家的安危，是因为祸患将要危及于她。现在王室动荡不安，郑国的人们焦虑万分，不知你们作何打算。《诗经》中说，酒瓶空空，酒缸的耻辱。王室不宁，这是晋国的耻辱。"范献子听后觉得十分难堪，立即找韩宣子商量，准备来年召集诸侯开会，商议勤王事宜。

第二年夏天，晋国召集郑、宋、卫、曹、邾、滕、小邾各国代表在晋国的黄父（今山西沁水西北）开会，晋国的执政卿赵鞅命令各国为周天子运送粮食，并动员军队，准备转年武装勤王，把周敬王护卫回都。

宋国代表乐大心反对说："我们宋国没有义务给周天子送粮，对于周朝来说，我们殷人是客人，客人怎能有这样的责任？"晋人一听火冒三丈，士伯质问："自践土之盟以来，哪一次结盟你们宋国不参加，哪一次战争没有宋国？从前早就有盟约在先：共同捍卫周王室！今天你代表国君前来开会，想使宋国违约，你可要考虑周全！"乐大心一听非常害怕，接受了晋人的吩咐退了出去。

到了周敬王四年，战争形势对周军日愈不利，王子朝的攻势步步紧逼，刘文公带着周敬王从刘邑逃到阳渠。王子朝的军队一把火把刘邑烧成一片废墟。周敬王随后又逃往褚氏、萑谷、胥靡、滑地（以上地皆在今河南洛阳周围）。单穆公匆忙赶赴晋国报告紧急情况。晋国的知跞、赵鞅带兵赶到滑地护卫周天子。

晋军参战立即扭转了战局。同年十一月，晋军攻克巩邑。召

简公一看形势生变，立即反戈一击，攻打王子朝。王子朝带着召氏的族人和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逃往南方的楚国。召简公赶到尸邑迎接周敬王，并同刘文公、单穆公结盟。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敬王回到王都。晋国派成公般在王都留守，大军撤了回去。

王子朝南逃到楚国，并不甘心失去天子宝座。他派人通告诸侯说："武王克商，光复天下，分封诸侯，拱卫王室。从那时以来，由于诸侯同心协力拥戴王室，使天下得以安宁。如今，王室发生动乱，单旗、刘蚠搅乱天下，倒行逆施，随心所欲地废立天子，肆无忌惮。他们触犯王法，亵渎鬼神，违背盟约，抛弃礼义。晋国无道，助贼为虐。现在，寡人流落楚国，失去归宿，悲戚万分。如果你们诸侯国家能发扬先前的传统，帮助王室伸张正义，不帮助为非作歹之徒，这是我衷心的愿望，谨把内心苦衷通告大家，希望你们深思！

"王位传承，周邦自有制度：立嗣以嫡，无嫡立庶，立庶以长，年纪相当以德，德行相当占卜决断。穆后和太子寿早逝，单、刘二人擅立幼君有悖周邦礼法。希望各国年长的公子们注意，前车之鉴，后世之师。"

但是，人们对王子朝的宣传并不以为然。闵马父说："漂亮的文辞是为了修饰礼义的。王子朝虽然年长，但景王立王子猛为太子这是事实，不容诡辩。一心想当天子，无耻至极，狡辩有什么用！"

召简公虽然反戈立功，也难逃厄运，两年后，周敬王的王位稳固了，最终杀掉了他。

周敬王十年，周天子派富辛和石张到晋国，请求帮助修缮王都的城墙。敬王捎话说："上天给我周王室降下灾祸，使我们兄弟离心相叛，给邻近的诸侯们带来麻烦，已经整整十年不得休息。诸侯派军守卫王城也已经五年了。我一天也不敢忘记这些，终日忧心忡忡。你们能够继承晋文侯和晋文公的功业，缓解王朝的忧患，

向文王和武王求取福佑，巩固盟主地位，传名千古，这正是我的愿望。成周王城是成王兴建的，我想向文王求福，增修成周的城墙，也免得使各国的戍卒再辛劳守卫，天下安宁，这要依靠晋国的力量。晋国的功绩，会赢得文王、成王的保佑！”

晋人接见了周敬王的使者，没有立即答应他的要求。范献子同魏献子商量说：“我们的军队长年累月在王城守卫也是负担，如果加固了城防，就可以把军队撤回来。而且天子自己也已经表态，我们帮助修了城，即使以后再有事情，我们晋国也可以不再干预了。服从天子的命令，缓解了诸侯军队的奔劳，去掉了晋国的忧虑，一举三得，为什么不答应呢？”魏献子也表示赞同，于是派伯音答复说：“天子有令，我们岂敢不执行，我们将派人通知各国，至于工程的进度和具体工作任务的分配，由我们安排好了。”

同年十一月，晋国的魏舒、韩不信到了王都，召集诸侯各国代表开会，重修过去的盟约，命令为天子修缮城池。发布命令时，魏舒面南背北，神情傲慢。本来诸侯对此事就不满意，再看到魏舒也像君主那样面南而令，卫国大夫彪傒议论说：“魏子会遭报应的！超过名分发布命令，怎会不遭灾！”

士弥牟任修城工程的总工程师。他研究制定了工程规划，估计城墙周长，城的高度和厚度，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运土的距离和土方量，最后估算出总工程量、需用人工、完成日期。然后按照各国的大小分配了工程地段，刘文公总负责，韩简子监督工程的实施。

第二年春天开始施工。宋国大夫仲几不肯接受工程任务，说：“滕国、薛国、郳国是为我们服役的。”薛国大夫听后发怒说：“宋国无道，胁迫我们小国断绝与王室的关系，去事奉楚国。早年，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盟约规定：同盟各国，地位一律平等。或者服从宋国，或者履行践土盟约，薛国唯命是听！”仲几说：“践土盟约与你们做宋国的附属国并不矛盾。”薛人说：“我们薛国先祖

在夏代做车正，在商代任左相。我们是天子的大臣，怎能当诸侯的附庸!”双方争执不下，工程师士弥牟调解说:“晋国的执政者是新人，不熟悉情况，你们先接受工程任务，然后派人查一查历史档案吧!”仲几仍不满意，高叫道:“即使你们忘了，鬼神却不会忘!”士弥牟很生气，对韩简子说:“宋国人用鬼神压迫我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一定惩罚仲几!”晋人逮捕了仲几。

周密的计划和严格的实施，使修城工程三十天全部完工。诸侯的卫戍部队各自回国去了。

周敬王十五年春天，周人在楚国杀死了王子朝。应该说，延续十五年之久的王子朝之乱结束了。但是，周王室并没有安定下来。王子朝死后第二年，王子朝的党羽儋翩再次带领部下联络郑国人，准备在王都发动叛乱。郑国发兵攻击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动乱发生后，晋国派阎没到王城戍守，并在胥靡筑城。

就在这年冬天，周敬王为躲避儋翩的作乱，逃离王都到了姑莸。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昭公十五年至定公六年

《史记·周本纪》

《国语·周语》

老子论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无名，
天地之始；
有名，
万物之母。

两千多年来，这个恢宏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华夏大地，萦绕在人们的心际。讲出这番洞见的是春秋后期的伟大智者——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说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周王室的柱下史（负责管理图书的史官）。

关于老子的事迹，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极少，据说，老子是春秋后期著名的智者，很多人纷纷向老子求教，其中就有先贤孔子。

一次，孔子专程来到周王室向老子求教，向老子提到一些贤人。老子说："你所说的人，他的人和骨骸都已腐朽，只有他的言论尚存。作为一个智者，如果遇到政治机会可以当官乘车，如果没有政治机会，他就像蓬蒿一样流移而行。人常说，会做生意的商人，会把自己的财物保存得很严密，不使别人发现，仿佛什么都没有一般；智者身怀盛德，他的外貌却谦逊得像愚夫一般，把

傲慢和欲望统统都能抛弃。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仅此而已。”孔子离开后，告诉他的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升天；鱼，我知道它能入渊；兽，我知道它能狂奔于野。荒野的兽可用网罗，渊中之鱼可垂钩而钓，空中飞鸟可用箭射。至于龙，我真不知道它是否乘风驾云。今天我见到的老子，他大概就是龙吧！”

春秋后期的周王室日益衰落，老子看到自己难以长久安身，便离开王室西去，经过函谷关的时候，关尹喜见到老子，说：“你就要隐居了，请留下一些教诲吧！”于是，老子著《道德经》上下篇，讲述“道”和“德”的涵义，凡五千余字。随后西行而逝，世人再也不知他的踪迹。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他活了二百多岁。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能讲修道德，所以他能长寿。

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老子关于道的阐说并不多，但解释起来却相当困难。自古以来，对《道德经》的注释解说不下几十种，歧义纷繁，难定是非。总的来看，可以分成两大流派。第一派讲求脱俗修心，把《道德经》作为修辞的经典，由此产生出道教。第二派把《道德经》作为一种哲学，从中阐发出一些自然的和社会人生的哲理。到目前为止，两种学说针锋相对，似乎水火难以相容。为了对老子学说的道作出全面的考察，需要将上述两派观点分别作出介绍，从而得出我们的结论。

在绝大多数古代的人们看来，老子学说是一种宗教体验和养生原则。老子的学说被名之为《道德真经》，奉为宗教经典，多方注疏，仅收人《道藏》的注本就达五十余种之多，没有收人的更是不计其数。

在古代人看来，“道”首先是一种养生方法，用老子的话说是“长生久视之道”。《道德经》第五十九章说，若要修身养性，必须注意节制自己的情欲，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步步修身正道。节制了情欲，就是修养了功德，有了功德才能逐渐深入，最终走向

一个没有终极的世界。到了这个无极的世界中，才是又重新回到自然母体中，功力才能根深蒂固。这是养生之术的要诀。在这种养生功夫中，人们逐渐忘掉了外界的一切，甚至忘掉了自我肉体的存在，完全沉浸在修炼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幅与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完全背道而驰的景象。《道德经》第十六章说，当心灵空虚到达极点，继续坚持下去，内心豁然开朗，再现出一个万物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万物在时间上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回退溯，重新归回其原始状态。

在古代人看来，“道”也是一种主观存在。所谓主观存在，是说它确实是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不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眼、耳、手）的感知，而是通过自省、内视的方式认知的。除去使用人的感觉器官，难道人还能有感知、有认识吗？在古代人那里，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是不言而喻的。前面我们谈到，道是一种养生方法，在这种方法的驱使下，人可以体验到一种万物回归的状态。也就是说，人可以看到宇宙生成、万物发展的逆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道。《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由道产生出一，一又生出二，二化生三，三化生万物。道处于与万物相对的另一极。第二十五章说，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前，有一种混沌的物质，想听它听不到，想看它看不清，但它却自由自在，永不停息，它是万物之母。人们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勉强给它起个名称叫道。在第二十一章中，老子对道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描述。他说，道这物质，恍恍惚惚看不清楚，虽然看不清楚，但它有形象，有物质。仔细地观察，它处于幽冥之中，由精细物质构成，这种物质是那样纯真，而且还包含着运动的信息。

道不仅衍生了宇宙间的万物，而且仍然隐含于万物之中。在老子看来，道是恒体，它不生不灭，处于物质世界的起点，也普遍地存在于一切物体中。《道德经》在述说了道是一种包含信息的精细物质之后，又说，这种精细物质及其名称自古至今始终存在。

关于道的现实普遍性，老子没有作详细的论述，所以往往不易被人察觉。如果我们参照道家后学庄子的学说，问题就昭然了。有人向庄子请教道在哪里，庄子信手一指说，道在泥土中，道在尿屎里。这样的解说似乎有点讽刺意味，但却反映出道的这一特征。

与古代的解说截然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人（也包括少数古代人）看来，道学完全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在现代文化领域中，道学仅仅作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思想，被学者们研究并传授。

在现代人看来，老子是运用唯心主义（有人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有人说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手段去认识世界的，他对道的认识完全是抽象思维的结果。在考察宇宙万物起源的时候，他没有观察、研究千奇百怪的物质世界，从而探讨其一般规律和性质，而是仅仅作一种主观哲学的思考。他说万物产生于道，宇宙的发展经历了从一到二到三直至万物这样一个过程，但他丝毫没有拿出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他说道这种物质恍恍惚惚，道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使用了当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看不见？他说道先于天地而生，然而他本人并不是先于天地而生，他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他说道是细微物质，万物由道产生出来，但他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依此来推断，道又是一种虚无。既然是虚无，当然无法通过人的感观去认识，而只能从人的空想中得来。

现代人更为看重的是，老子所说的道体现着宇宙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道无形不可见，恍惚不可随，但它作用于万物时，却表现了某些规律，这些规律可以作为人类的行为准则。第一，对立统一律。老子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状态下存在的。在《道德经》第二章中，他说，有和无相互发生，困难和容易相伴而成，长和短相比较而言，高和低由其形体而得。同样，人间的价值观念也是相对形成的，没有此就没有彼，缺一不可。他说，人们知道什么是美，是因为他们同时知道什么是不美；人们

认为什么是善，也说明他们同时知道什么是不善。任何事情都有对立面，依赖于对立面，这是“相反相成”。第二，相反运动律。事物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运动的。运动的方向是走向另一极。在现代人看来，事物在其发展前期，前途是美好、光明的，只有到达强盛期之后才开始衰弱，走向死亡。而在老子哲学中，美好的事物在其起点并不是美好的，或者说前途是暗淡的、悲观的。这是因为，在道这里，事物的存在只有两极，没有中点，事物都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反者，道之动”。在第五十八章中，他说，灾祸，是幸福的起点；幸福，是灾祸的开始。祸福相因，这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的故事来。《淮南子》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居于边疆的人，善于骑马射箭。然而有一天他的马走失，走到胡人的马群中去了。大家都为他感到遗憾和不幸，只有他的父亲说：“谁说这又不是件好事？”几个月后，这匹马重新回到主人家中，而且引来一匹骏马。这一次，邻里们都前来祝贺，他父亲却偏偏说：“很难说这不是一件坏事！”自从有了这匹骏马后，这家主人爱不释手，终日骑马驰骋。一天，主人不幸从马上栽落在地，造成严重骨折，落下了残疾。邻里都前来探望慰问。他父亲说：“很难说这不是福分。”一年后，胡人入侵，政府征召壮丁参军作战，有十分之九的从军者在战斗中丧生，而他却因身有残疾没有从军，保住了性命。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以上我们扼要叙述了对老子道说的两种主要观点，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解释正确，哪一种解释错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完全相同的生理条件、自然环境；即使同一个时代的人，境况也不完全相同。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用近代西方智者的话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道德经》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自然灵光，有些语句成为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佳句和格言。下面选录几段，并稍作阐

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告诫人们，人生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成就事业要从细琐小事着手。他说，合抱的大树，由细小的萌芽生长而成；九层的高台，由一锹又一锹的土积筑而成；万里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完的（第六十四章）。要完成一件艰难的事业，要从容易处着手；要完成一件大事，要从细微处做起（第六十三章）。他告诫人们说，踮起脚尖站立的人难以坚持长久，用力跨着大步赶路的人难以走完千里征途（第二十四章）。

“大方无隅，大音希声”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有这样一段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要理解其中涵义，关键要明白什么是“大”。在老子哲学中，认识的基点是站在“道”的高度，而“道”具有超脱一切的绝对的性质。所以，这个“大”不是人的感官所得到的印象，而是超感官的。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大方无隅”，真正大的空间是没有边际的。在古代人那里，人们认为天如盖，地如板，天地之间构成最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有边际的。近代以来，人用科学仪器考察宇宙，地球之外是太阳系，太阳系之外是银河系，银河系之外还有无限的空间，这个空间才是真正的“大方”，才是永恒的。“大音希声”，真正大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从常识来看，似乎震耳欲聋的声音才是大的，然而它传播的毕竟有远近的限度。真正传播遥远的音波，人的感官却感觉不到，如电波、超声波、宇宙声波。“大象无形”，真正大的形象是看不到的。人类的视觉有先天的局限性。地球上的事物都看不全，又怎么能去看永恒的宇宙？站在地球上看水面是平的，到星际去看地球上的水面却是球面形的；地球上的位置用平面二维坐标，宇宙间却要用三维甚至四维坐标。在人类的视觉能力之外，存在着超于已知形体的形象，而绝对的大

象，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认识。“大器晚成”，越大的物体形成的历程越漫长。地球用了几亿年，太阳系用了几十亿年，银河系或许是几百亿年。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说：“大直若诎，大辩若讷，大巧若拙。”诎，是忍辱受屈，直，是不辱不屈不挠，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站在道的高度，这是小直，而不是大直。真正的大直，是站在道的高度，通古贯今，察往知来，不计琐事，不受人扰，超然一切。在这种心态下，人才能真正得以保全，生命才能获得完美意义。“大辩若讷”，真正善于辩言的人看着好像不善言谈。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心智往往用他的雄辩表现出来，不能很好表达自己思想基础的人往往与弱智相近。在老子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大辩”，而不是小辩。小聪明是在普通人的基础上，稍稍有一点超越，令人们折服。如果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远远超于一般人，他的思想基础就很难被别人理解，无论他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在这种状态下，他便会有大辩若讷的感觉了：他难以用既存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别人也听不懂他的胡言乱语。“大智若愚”这一成语就是在老于思想上发展而来，意思说特别聪明的人看起来似乎有点傻，含义与“大辩若讷”相同。郑板桥有一句名言：“难得糊涂。”人离不开现实社会和物质生活，糊涂下去难以生存，这是人的聪明之处。在老子看来，人类在自作聪明，并非真正聪明。一个并非真正聪明的人希望自己糊涂，岂不可笑？“大巧若拙”，巧夺天工却似技艺拙劣。就不同的人之间的巧而言，站在大气层之外看地球，只有那雄伟的万里长城依稀可见；但当观察者落回地面，看到的长城是那样拙朴粗犷，简直无法同精雕细琢的玉器相比。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巧而言，虽然长城逶迤万里巧夺天工，但它难以同巨大的银河系同日而语，后者才是真正的天工，它是纯自然的、朴拙的。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德经》第九章的原文是这样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室，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里讲的是人生的道理。用手捧东西装得满满的，必然会往下掉落；把针磨得锋尖无比，这样的针难以长久锋利；家财遍天下，怎样看守也难免盗失；既富有又有权势，骄横跋扈，早晚会给自己招惹祸灾。所以，老子劝告人们，适可而止，功成而退，这才是真正的沧桑大道。这使我们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陶朱公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最终灭了吴国。越王勾践雪耻复仇，范蠡功盖群臣，勾践称要与他平分天下。但是，范蠡感觉到，越是功高震主，自己的处境越危险。况且，勾践的为人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于是，隐姓埋名出走齐国，做起了商业。随后，他写信给越国大夫文种，劝他尽快离开越国，否则后果难测。文种似乎觉得，自己努力几十年，虽不一定官至卿相，但坐享江山总是应该的。他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不久，勾践借口有人告文种谋反，赐剑自刎。这表明，范蠡是一个识时务的部下。第二件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摇身一变成为宋太祖。他是靠枪杆子夺取后周政权的，因此，他对手握兵权的部下心怀芥蒂。一次，他请将领们宴饮，席间，他借酒意对武将们说：“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想搞兵变呢？”部下闻听此言，个个面色如土，深怕被宋太祖加罪。第二天，纷纷交出兵权，坐享荣华富贵去了。北宋初年没有杀戮武将，表明赵匡胤是一位豁达的君主。以上两个例子，从君臣两个方面反映出“功遂身退”适可而止的哲理。

“强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是站在自然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道的运动规律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作为活动着的人就应该避免走向反面。要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就应该始终居于事物的起点，正所谓

“弱者，道之用”。譬如一个人，他（她）出生之后，就开始走向死亡，而不是他强壮后才走向死亡。为了避免死亡，就应该使自己不成长，永远使自己幼弱。做事情，我们通常说好事做过了度就是坏事，而老子则说，你做好事之初，事情就在向坏处发展。所以，他大声疾呼：“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往往难尽天年！”枪打出头鸟。在老子这里，“圣人被（披）褐怀玉”，“智者不言，言者不智”，“俗人昭昭，我独昏昏”，完全一副弱者的可怜相。老子讲无为，完全一种放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他还告诫人们，“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实话不中听，漂亮话却不可信。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能言善辩者的夸夸其谈，往往令人生疑；倔强无华之言，更加稳妥可靠。前者是强者，后者是弱者。可见，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对强者抱着一种敌视态度，当这种敌视发展到极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张荣明）

参考资料：

老子《道德经》
沙少海《老子全译》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伍子胥仕吴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叫伍奢，祖父伍举，曾帮助楚王治国有功，受到楚王的尊宠。

楚平王立建为太子，任命伍奢为太子太傅，费无极任少傅。费无极为人奸险不轨，与太子建产生隔阂。楚平王派费无极为太子到秦国娶妻，费无极借机向平王献媚："秦女之美天下无双，陛下何不自纳为妃，再替太子另外选择？"费无极一番话拨动了平王的心神，遂改变主意，纳秦女为妃。秦女受宠，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轸。费无极也因此博得平王的欢心。

费无极与太子有隙，担心将来平王死后太子即位对自己构成威胁，便设下阴谋陷害太子建。当时，楚平王又有新欢，对太子建的母亲很冷淡，把太子建派往城父守卫边疆。一天，费无极在平王跟前煽动说："因为您娶秦女的缘故，太子建一定心怀怨恨。自从他到城父之后，我听人纷纷议论他在那里操练军队，与周围国家联系频繁，恐怕他是准备搞政变吧？陛下不能不防。"

楚平王把太子太傅伍奢召回，查问此事。伍奢知道是费无极在背后搞鬼，劝平王说："陛下千万莫信谗言小人的话，疏远自己的骨肉至亲。"费无极急忙插言道："陛下再不动手的话，将会成为别人的阶下囚。到那个时候，再看到事情真相也晚了！"

费无极火上加油，楚平王不分青红皂白拘捕了伍奢，派奋扬带人捕杀太子建。奋扬知道太子建从未有什么阴谋，便派人快马加鞭通知太子建逃跑，不然性命难保。太子建逃到宋国。

费无极担心将来伍奢的儿子报仇，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能力，尤其是伍子胥，才能超人，留下会成为国家的后患。"楚平王派人告诉伍奢："把你的两个儿子召回来，可饶你一条性命，否则，决不宽恕！"伍奢说："长子伍尚性情慈善，叫他一定会来；次子伍子胥性情刚烈，能忍辱负重，他知道来了会被杀，肯定不会来。"楚平王强迫伍奢，派人对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二人回国，饶伍奢不死；否则，立即斩首！"伍尚见父亲性命危在旦夕，准备回都。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二人回去，是为了斩草除根，我们回去不但挽救不了父亲的性命，还会失去报仇的人。我们与父亲一同死，对父亲有什么好处？不能为父亲报仇雪耻，这是耻辱！"伍尚解释说："我知道这可能是费无极的阴谋，但我不能眼望着父亲受害而无动于衷。如果父亲被杀，又不能为他复仇，我们又怎样做人！我宁愿去死。"

伍子胥不肯回都，楚王派人追杀。伍子胥听说太子建逃到宋国，便也逃往宋国追随太子。伍奢闻听伍子胥逃往国外，叹息道："楚国的君臣恐怕要因他而吃苦了！"伍尚来到楚都，平王立即下令把他们父子杀死。

伍子胥到了宋国，恰遇宋国发生华氏之乱。宋国住不下去，他就同太子建一起逃往郑国，受到郑国人的盛情接待。随后，太子建又到晋国。晋顷公说："既然太子同郑国关系很好，郑国人信赖你，你能否作我们的内应，我们从外边发动进攻，里应外合灭掉郑国。事成之后可以把郑国的地盘封给你。"

太子建萌生贪心，答应了晋人的要求，回到郑国积极准备。不料，太子建的阴谋被手下人秘密报告了郑定公。定公听后勃然大怒，捕杀了太子建。伍子胥害怕，匆忙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往吴国。

途经昭关，昭关的守军奉命捉捕伍子胥，紧闭关门。伍子胥只得绕道而行，来到江边。后面追兵赶来，情况危急万分，只见

江心一只渡船迅速划来，把伍子胥和公子胜送过江。伍子胥感谢万分，解下佩剑送给船翁道："此剑价值千金，特送给阁下。"船翁淡然一笑，说："楚国悬赏捉你伍子胥，爵拜上卿，赏粟五万石，比你送剑要多得多呢！"辞别而去。

伍子胥到了吴国，正值吴王僚执政，伍子胥便通过公子光的介绍进见吴王。当时，吴、楚两国边境地区经常发生争端，两国关系随之紧张。吴王派公子光伐楚，攻克楚国钟离、居巢两座边境城邑。伍子胥借机鼓动吴王："可以乘此胜利一举攻破楚国！"公子光则阻止说："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杀死，现在他让我们伐楚，不过是想借机替自己报仇。伐楚不易取胜。"伐楚一事没有实现。

早年，吴王寿梦想传位于幼子季札，结果王位在寿梦的几个儿子中依次相传。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先后为王。余昧死后，季札拒绝为王。在这种情况下，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吴王。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眼看僚当了王，心中不满，时刻想着杀掉僚，自己为王。伍子胥知道公子光的心志，便在吴国觅访到一位叫专诸的勇士，结为挚友，然后推荐给公子光。自己退归田里，静待时变。

楚平王死，公子轸即位，是为楚昭王。吴王僚乘楚国大丧，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率大军击楚。满以为稳获全胜，不料楚人早有防备，楚军设下埋伏，切断了吴军的归路。公子光闻听消息，假装宴请吴王僚，命专诸乘机杀死吴王僚，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夺权，伍子胥立下头功。阖闾即位后，立即委任伍子胥为行人（外交官），召请他共同参议国政。此时，楚国诛杀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伯嚭逃到吴国，吴王任命伯嚭为大夫。

吴王阖闾三年（前512），吴王派伍子胥、伯嚭、孙武统军伐楚，攻陷舒邑，活捉叛逃到楚国的两位公子。阖闾想乘胜攻郢，孙武劝阻说："目前国内百姓生活清苦，大规模战争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于是罢兵东归。

此后几年中，吴国南伐越国，西伐强楚，不断取得胜利。到吴王阖闾九年，吴王问伍子胥和孙武："起初二位先生说伐楚时机不成熟，现在情形怎么样了？"伍子胥和孙武回答："楚国将军囊瓦贪财好利，唐国和蔡国都愤恨他和楚国。陛下如果伐楚，一定要争取这两个国家的支持。"吴王听从了劝告，派人联络唐、蔡二国共同伐楚。

这年秋天，吴、楚军队隔汉水对峙。吴王的弟弟夫概请求出兵冲锋，吴王不答应，夫概便率领自己手下五千人的部队贸然进攻，楚将子常败走，逃往郑国。吴王只得命令全线进攻，前后经过五次激战，一举攻克楚都郢城。楚昭王落荒而逃。

楚昭王逃入云梦泽，遭强盗的袭击，随即逃到郧地。郧公的弟弟怀狠狠地说："楚平王杀死了我们的父亲，灭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我要杀他的儿子偿还血债！"郧公怕弟弟闹出祸端，便携同昭王逃到随地。吴军包围随地，对随人说："汉水流域的姬姓国家几乎被楚国消灭干净，你们怎能庇护他们！"随人打算杀死昭王，昭王逃到王子綦的家中。王子綦把昭王藏起来，自己冒充昭王承当灾难。随人最后占卜，看把楚昭王交给吴军是否吉利，结果不吉，便谢绝了吴国，把楚昭王留在随地。

伍子胥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包胥，二人皆才华出众，但志向不同。伍子胥逃亡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灭亡楚国，报仇雪耻！"申包胥则说："你若灭了楚国，我一定再次复兴楚国！"吴军入郢，楚昭王逃走，伍子胥便命人挖开楚平王的坟墓，拉出平王的尸体，抽打了三百鞭以解心头之恨。申包胥逃亡在外，派人捎信给伍子胥说："你报仇如此，太过分了吧！人常说，人多可以胜过天理，但归根到底天理要伸张正义。你从前是平王的臣下，现在他死了，你却侮辱他，难道不是丧尽天理到了极点！"伍子胥对送信的人说："请你带句话，转告申包胥：我急着复仇，犹如黄昏赶路一般，只怕来不及，所以只能如此，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吴王阖闾九年冬天，申包胥跑到秦国，向秦王报告楚国的危急，请求秦出兵相救。秦、楚两国关系一般，秦对援楚不感兴趣。申包胥站在秦国宫城外边夜以继日地哭泣，据说连续七天七夜没有中断。秦哀公可怜他，说："楚王虽是无道昏君，但这样的忠臣却难得呀！"遂派五百辆兵车救楚伐吴。第二年六月在稷地打败吴军。恰在此时，吴王的弟弟夫概偷偷地回国篡夺王位，阖闾闻此消息立即从楚国返回。夫概仓皇逃走。楚昭王看吴国发生内乱，才又回到郢都。

二年后，阖闾令太子夫差领兵伐楚，占领楚国边城番邑。此时楚国力量已衰，惧怕吴军再次进攻楚都，便把都城从郢迁至鄀。这一时期，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辅佐之下，西面破楚，北面破齐晋、南面击越，成为强盛的国家。

吴王阖闾十九年，吴军大举伐越。越王勾践迎战吴军，在姑苏把吴军打得大败，阖闾的脚趾也被越军击伤。阖闾临死前对太子夫差说道："你能忘记越王勾践杀父亲这样的仇吗？"夫差回答："永世不忘！"

阖闾死后，夫差即位为王。夫差任命伯嚭为太宰，加紧操练士兵。吴王夫差二年（前494）春天，吴军大举伐越，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领残余的五千军队逃到会稽山上，派大夫文种送厚礼给吴国太宰伯嚭，请求投降议和。伯嚭是夫差的宠臣，极力怂恿夫差答应，伍子胥警告说："越王勾践能忍辱负重，现在不灭掉越国，将来一定会吃亏！"吴王不听伍子胥良言相劝，听从了伯嚭的主意，答应了越人。

吴王夫差七年，夫差听说齐景公去世，齐国内大臣争权，国君幼弱，便发大军北伐齐国，想捞取好处。伍子胥劝告吴王："越王勾践食不甘味，睡不重席，在国内安抚人民，看样子是要重用人民做大事情。勾践不死，必成吴忧。越国对于吴国是腹心之患，陛下不注意去掉心腹之患，却要北伐齐国，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吴王不听劝告，率大军伐齐，在艾陵大败齐军，威震东方各国，然后耀武扬威返回国内。这样一来，伍子胥开始受冷落了。

诡计多端的勾践见夫差兴师北伐，正中自己心愿，便采纳子贡的计策，率军助吴作战，借机训练军队。同时，给太宰伯嚭送去无数宝物。伯嚭受了越人的贿赂，不断在吴王跟前说越国的好话，吴王完全丧失了警惕。

伍子胥旁观者清，目睹伯嚭受贿不轨，吴王养痈为患，十分痛心疾首，为吴国的前途担忧。他救国之心不死，仍对吴王苦心相劝，他说："越国地处吴国腹心地带，他们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欺骗我们，内心却对吴国恨之入骨。齐国对于吴国来说没有实际意义，犹如石头田地，徒有空名没有用处。而越国对吴国则不然。《尚书》中说，对那些叛逆不道的人，要彻底杀戮灭绝他们，使他们没有后代，灭绝祸根。希望陛下放弃齐国，斩绝越国。如不这样，将后悔莫及。"

吴王根本听不进伍子胥的话，便打发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空怀壮志，不为人理解，痛苦万分。他带着儿子一同去到齐国，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对儿子说："我屡次劝说吴王，一切都无济于事。眼见吴国就要灭亡了，你回吴国一起灭亡没有意义。"独自一人回国汇报工作。

太宰伯嚭与伍子胥不和，闻听伍子胥把儿子留在齐国，借机在吴王面前陷害伍子胥说："伍子胥的为人刚强暴戾，不讲感情，心怀猜忌，他的怨仇恐怕会酿成大祸。陛下以前进攻齐国，伍子胥百般反对，结果伐齐获得重大胜利，伍子胥为自己的失策感到羞辱，反而怨恨起陛下了。现在陛下再次准备伐齐，伍子胥骑虎难下，恨不得吴国兵败，来显示自己的宏谋远略。现在，他假称自己有病，拒不上朝。而且，我曾暗中考察，知道他出使齐国把儿子留在了齐国。作为臣下，在国内不得意，便勾结外国势力，其险恶用心昭然可见。希望陛下早作准备。"夫差接着话茬说："即

使你不告诉我，我也早就怀疑他在搞阴谋！”盛怒之下，吴王夫差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宝剑，说：“让他自便吧！”

伍子胥身在家中，突然接到夫差的赐死之剑，仰天长叹道：“苍天啊，你怎么这样助纣为虐！伯嚭阴谋害国，国王黑白不辨，吴国就要灭亡了。夫差呀，夫差！是我帮助你父亲成就霸业，又是我舍生忘死使你立为太子。你做了国王，要分吴国给我，我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奢望。谁料想，今日你竟听信谗言，杀害长者！”最后，他吩咐家人：“我死之后，你们要把我的双眼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一看越人是怎样攻入吴国的！”说完，自刎身亡。

使者回去汇报了伍子胥的遗言，夫差不仅没有悔悟，反而十分恼怒，命人把伍子胥的尸体用皮革卷起，抛入江中。可惜大智大勇的伍子胥，落得如此凄凉下场。

吴王杀了伍子胥，便北伐齐国，无功而归。此后，仍想北上称霸，搞了一次黄池会盟，争当霸主。正当夫差得意忘形的时候，越王勾践率军袭击吴国，攻破吴都。夫差闻讯火速返回，与越国议和。此时越国已经羽翼丰满，几年之后，最终消灭了吴国。此时的夫差大梦方醒，痛悔自己当初没听伍子胥之言，落得家破国亡，饮恨自杀。

吴、越两国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两国政治的决斗。范蠡佐勾践，伍子胥助夫差，旗鼓相当，结局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勾践知人善任，使范蠡的政治谋略得以实现；夫差任人不当，权臣当道，误国害民。只可惜伍子胥一代枭雄，不计小义，终雪大耻，最终却身死人手，诚为可悲。这也正是他略逊范蠡一筹之处。

伍子胥死后，吴国人民怀念他的忠灵，在江边为他建立祠堂，长年祭奠。人们把祠堂所在的山叫胥山。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史记·伍子胥列传》

《左传》定公四年至哀公十四年

孙子论兵

春秋末年，齐国出现了一位学贯古今、名传千古的军事家，他就是孙子。

孙子，名武，齐国人①。生卒年月已不可详知，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至前5世纪前期。春秋后期，中原各国都已衰弱，新兴的吴国越战越强。孙武知道，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吴国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他把自己所著兵法献给吴王阖闾。阖闾看后大为赞赏，立即召孙武面谈。

孙武入宫后，阖闾说："先生所著兵法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我已细读三遍。只是不知先生所著理论能否付诸实施，你是否为我实地演练一番？"孙武答道："当然可以。"吴王想给孙武出点难题，考验他一下，便问："为方便起见，可否就近召集宫中妇女，以便在宫内操练？"孙武不在乎地回答："完全可以。"于是吴王传令："宫中妇女一律出来操练！"共来了一百八十人。孙武把她们分编两队，任命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命令她们全都持戟，准备训练。

队伍排好后，孙武问她们："你们晓得自己的左手与右手、前胸与后背吗？"女兵答道："知道！"孙武继续说："那好。等我下令让你们向前走的时候，你们要朝自己胸前的方向行进；命令你们向左转的时候，你们就朝左手的方向转身；命令你们向右转的

① 关于孙武故里，今存二说：一说在今山东惠民；一说在今山东广饶。

时候，你们就朝自己右手的方向转；命令你们向后转的时候，你们就朝自己后背的方向转。听明白了没有？”众女兵高声答道：“听明白了！”操练要领和规范动作都已宣布完毕，随即命人宣布军法，架设刑具，郑重地告诫女兵：“一切行动都要依照军令，不得马虎嬉闹，否则军法处罚！”

随后，孙子击鼓为号，向女兵发布向左转的命令。岂料，女兵们不但没有向左转，反而哄然大笑起来。孙武见状，板起面孔宣布：“训练军队没能使士兵明白，下达命令没能使士兵牢记在心，这是将领的责任。”说着，又把规定动作和有关问题详细地解释了两遍。然后，击鼓肃军，下达向左转的命令。众女兵仍大笑如故，丝毫不把军令当回事。孙武严肃地说：“你们第一次没有执行命令，可以认为你们不完全清楚，这是军官的责任。所以，我又给你们解释了两遍。既然已经把要领申述得明白无误，你们就应严格执行。违背军令，这是你们的罪过。依照军法：违令者斩！但是，士卒不能都杀，应由队长受罚。”说毕，命人把两个队长拉出队列斩首。

吴王阖闾正在高台上观看练兵，突见孙武要斩宠爱的妃子，心头一惊，急忙命人传下令旨，告诉孙武：“寡人已经知道先生治军有方，初次练兵算作例外，宽恕女兵算了。没有那两个妃子，寡人食不甘味、寝不能眠，希望先生宽宥一次。”孙武却冷言回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臣即受命为将，自应依照军法办事，不知其他！。”言毕，依照军法把吴王的两个宠妃斩首示众。

孙武随后宣布，两队的排头兵为队长，继续操练。此时，操练场上一片肃静。孙武擂动战鼓，下达各种各样的命令，女兵们前进、后退、转身严肃整齐，没有一个违背军令，更没有人敢嬉笑了。训练完毕，孙武派人报告吴王：“队伍已经操练完毕，请陛下检阅。这支军队大王尽可调用，纵使赴汤蹈火，也会令行禁止。”吴王痛心宠妃被杀，满脸不高兴地派人回告孙武：“将军解散队伍，

回去休息吧，寡人没有心思再看了。”孙武闻言，走到吴王跟前说：“陛下治国治军有方，然而也不过是喜欢我纸上谈兵罢了，不能把理论用于实际。”吴王听罢，虽然心中不快，也真正了解了孙武的军事才能。不久，便任命孙武为大将。

孙武在吴国为将，先后辅助阖闾和夫差，统军东征西战，西破强楚，攻入郢都；北上中原，威震齐晋。吴国称霸，其中有孙武的功劳。

孙武死后一百余年，他的子孙后代孙膑也对兵法颇有研究，名扬天下。孙膑曾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但志向不同。庞涓求官心切，后来从齐国到了魏国，得到魏惠王的信任，被任命为将军。庞涓知道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及孙膑，担心将来孙膑出山，自己失势，便暗中派人把孙膑骗到魏国。孙膑至魏国后，庞涓设下计谋，陷害孙膑。魏王以为孙膑不忠，将孙膑囚禁起来。庞涓施展手段，给孙膑用刑，斩断了双腿，并用墨黥面，为的是使孙膑永远不能再出去任职。这样，也就不会再同他相争成为敌手了。最初孙膑不知事情真相，后来终于清楚了庞涓的阴谋。为报仇雪耻，他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一次，一位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孙膑委托一名刑徒设法会见这个使者，谈了自己受害的经过，请使者搭救。使者得知此中缘由，觉得孙膑可能是位奇才，便设法营救。他完成使命后，偷偷把孙膑带出魏国，一同来到齐国，把孙膑介绍给齐国大将田忌。田忌会见孙膑后，非常佩服他的军事才能，便把他留在府中，养为宾客。

田忌喜欢养马赛马，经常押很大的赌注，却又经常输。田忌很不服气，便让孙膑帮助想办法。孙膑看了田忌的马，又看了参加角逐的其他的马。他发现，这些马奔跑的速度相差不多，一个新的方案便胸有成竹了。他对田忌说：“下次跑马比赛，您尽管放心去同别人赌输赢，我自有办法使您获胜。”

不久，贵族们又要举行跑马大赛，田忌相信孙膑的话，报名参赛，同其他公子们押下千金赌注。临赛前，孙膑向田忌献策道："第一场别人用最快的马，您要用下等的马；第二场您用上等的马与别人中等的相比；第三场您用中等的马与别人下等马比赛。"田忌照计而行，结果三局比赛赢了两局，只输一局，赢了齐王千金赌资。齐王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怎么也没料到自己输在田忌手中，便问田忌此中原因。田忌把孙膑的赛马策略告诉了齐威王，并向齐王推荐孙膑。齐王把孙膑召入宫中，促膝而谈，十分叹服孙膑出众的才华，当即任命孙膑为军师。

一次，魏国出兵攻打赵国，包围了邯郸，形势十分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任命孙膑为将前去救援，孙膑推辞说："我是个受过刑罚的残废人，难以当此重任。"齐王改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让孙膑为田忌出谋划策，乘座轻车相随。大军出发后，田忌想率大军直逼赵都邯郸解围，孙膑建议说："若要解开纷繁的绳索，一定要理清它的端绪，慢慢解开它的绳结，切不可心急用力拉扯；若要劝解两个人斗殴，不可卷人其中打成一团，而要注意避开双方的拳脚，伺机猛击其中一方腹部，他自会双手捧腹，收回攻势，斗殴的形势顷刻改变，否则，只会更乱。现在魏国的军队倾巢而出围攻赵都邯郸，国内只留下一些弱老兵将守卫。我军若乘此机直捣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占据他们的交通要塞，袭击他们守备空虚的地方，围攻赵国的魏军必会赶回相救。这样一来，一可解赵国之围，二可击魏国之弊，岂不一举两得?"田忌一听，觉得此为上策，便依计而行。果如孙膑所料，魏国大军从邯郸火速回救，齐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以逸待劳，大败魏军。此战不仅落得赵国人情，也确立了齐国的强国地位。

十三年后，魏国又伙同赵国攻打韩国。韩国又向齐国告急。齐王仍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大军救援。孙膑和田忌仍然采用上次的策略，大军直逼魏都大梁。魏军接报，得悉齐军攻击国

都，只得放弃韩国回救。当时，齐国军队已出国境。进入魏国东部，孙膑得悉庞涓率军返回，同田忌商议说："三晋士兵向来强悍勇猛，看不起齐国士兵，认为齐兵胆小怯弱。作为一个将领，就应该善于顺应情势，加以利用。兵法上讲，急行军百里，不战自败；急行军五十里，只有半数能够到达。现在，我们正好利用魏军的轻敌冒进，引诱他们上钩，给他们造成急行军的条件。具体办法是，我军在魏国东部以逸待劳，等到魏军离我军一定距离的时候，我军主动撤退，造成怯懦的假象。第一天，我军营造十万人做饭的灶；撤退的第二天，营造五万士兵的灶；第三天，营造三万士兵的灶。"

田忌照计而行，大军主动撤退。庞涓见齐军后退，更加紧追不舍，第一天估计齐军有十万人，第二天一看只剩下一半，到第三天又少了一半，更加轻敌，只怕齐军逃脱，抛下大军和辎重，率轻兵昼夜兼程拼命追赶，将士们精疲力尽。孙膑估计魏军的行程，算定他们黄昏时刻能够赶到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马陵的地理形势，道路狭窄，两旁多险阻，适宜设兵埋伏。孙膑下令士兵砍伐树木堵塞道路，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剥去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赫然几个大字。在周围埋伏下善射的士兵，约定："晚间但见大树下有人点火，就万箭齐发。"

庞涓率军急急追赶，黄昏时刻进入马陵险要地带。前面士兵来报："道路被堵死，不能前进。"庞涓赶到前面查看，发现路旁大树上仿佛有字，命人点燃火把细看。火把刚一点燃，字还没有读完，只听周围一声呐喊，箭如雨下。魏军大乱，自相践踏逃窜。庞涓自知中计，陷入绝境难以逃脱，于是拔剑自刎。临死前悔恨地说："当初不忍杀掉孙膑，如今养痈为患，成就了他的名声，真是咎由自取呀！"齐乘机追击，彻底击败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胜利凯旋。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不仅报仇雪耻，除掉庞涓，而且名扬天下。

自古以来，治军者莫不读《孙子兵法》。孙武著兵法传世，人称《孙子》、《吴孙子兵法》或《孙子兵法》。后来，孙膑也著兵书，人称《孙膑兵法》或《齐孙子》。遗憾的是，《孙膑兵法》到隋朝的时候就失传了，所以，只剩下《孙武兵法》了。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残简，与传世的《孙子兵法》大致相同。《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上被奉为经典，它所阐发的道理在商业、经济各方面都有启发意义，受到世人的注意。该书被译成多种语言文本，流传于全世界。现采撷《孙子兵法》中若干名句片断，以供借鉴。

“兵者，诡道也”

兵，是敌我双方的生死决斗，要在这场决斗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应不择手段，运用各种各样的谋略击败敌人。因此，在这里没有信义可言。军事策略中有句名言，叫“兵不厌诈”，实际上就是从“诡道”发展而来。孙武进一步谈到一些具体的方略。他说，对自己方面来说，能进攻要装作不能进攻，能攻击敌人要装作没有能力攻击敌人，明明准备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却要在远方国家制造战争气氛，以欺骗敌人。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诱引他；对于混乱的敌人，要乘机攻克他。对于强大的敌人，万不可放松警惕；对于情绪急躁的敌人，要用挑逗的办法激怒他；对于轻视我的敌人，要故意纵容敌人使其更加骄傲；对于和睦的敌人，要设法离间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总之，战争中的具体情形千变万化，要善于抓住时机加以利用。

同敌人讲仁义是自寻苦吃。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也想争当霸主。公元前 638 年，宋攻郑，楚派兵救郑，宋楚两军对峙于泓水。楚军渡河进攻，宋将目夷主张乘敌人半渡攻击，宋襄公却说：“君子不乘人之危。”楚军渡过河，尚未排好队列，目夷又请求发动攻击，宋襄公又说：“君子不打没准备好的敌人。”等到楚军列好阵，两军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身受重伤，不久身亡。这表明，宋

襄公根本不了解战争的本质。与此相反的事例则不胜枚举。公元219年，吴国想乘蜀将关羽北伐樊城之机，夺取荆州。由于关羽对吴将吕蒙有所戒备，留下重兵把守江陵、公安等地。吕蒙为麻痹关羽，假装病重回到首都建业，由关羽看不起的吴将陆逊代替，以掩饰吴国夺取荆州的企图。关羽果然放松警惕，吴军发动袭击，迅速夺取公安、江陵，最后占领军事重镇荆州。这被人称作“大意失荆州”。不是关羽没有警惕，而是敌人的诡计所致。

“兵贵胜，不贵久”

孙武认为，战争是一种极端残酷的行为，以生命为代价，以物资为基础。战争的目的就在于用最小的损失取得最大的胜利，因此，要速战速决。旷日持久的战争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经济枯竭，轻则劳民伤财，重则亡家亡国。孙武总结说，从来没有利国利民的持久战争，不懂得战争的害处，就得不到战争的好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运用现代的作战手段，迅速占领波兰、法国、比利时等许多国家，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正是速战的结果。然而，希特勒想征服整个欧洲，战线愈拉愈长，速决战变成了持久战，终致失败。日本法西斯在远东的惨败，也有这种因素。速战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久战则会失去控制战争的能力。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胸中有数。战争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存有丝毫的空想，不能揣度。要掌握敌人的情况，孙武非常重视使用间谍。他认为，间谍有五种。第一种是“因间”，是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做间谍；第二种是“内间”，是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第三种是“反间”，是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方效力；第四种是“死间”，是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敌人的间谍知道后传

给敌方，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第五种是“生间”，是派往敌后侦察情况，然后亲自返回报告的我方间谍。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可行的方案，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掌握敌情。

掌握敌情之后，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至少要比较五种情况：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交战，什么情况不能战；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用不同的战术；要知道自己的军队内部是否上下团结一心，造成同仇敌忾的情绪；要使己方有准备而敌方没有准备；了解自己的将领指挥作战的能力。真正了解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在具体行动中才能灵活自如，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战胜。孙武总结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将有五危，不可不察”

作为一个决策者和指挥者，就该知人善任。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对将领也有特殊的要求，而不能用通常的社会标准去衡量。就是说，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孙武指出，将帅往往有五种致命的弱点：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有可能被敌人诱杀；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人俘虏；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有可能轻举妄动；廉洁清高注重名声，过于自尊，就有可能受敌人污辱而失去理智；过分爱惜人民，重于亲情，就有可能受敌人的摆布。对将帅的弱点认识不清，往往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项羽两军展开殊死搏战。一次，刘邦的父亲和妻子被项羽俘虏，项羽以杀死刘邦的父亲威胁刘邦，要求刘邦答应他的条件。刘邦满不在乎地告诉使者：“如果项羽吃我老父的肉，千万不要忘记给我留一碗哟！”再一个例子是伍子胥。伍子胥的父亲被楚王囚禁，楚王传出口信：“如果伍子胥回到国都，便饶他父亲不死！”伍子胥知道，即使自己回都，父亲也难免一死，自己也不能再报仇了。于是，忍受着不孝的名声出走他国，最终报仇雪耻，几乎灭亡楚国。从来没有人批评刘邦、伍子胥的不孝，

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肯定他们的大智大勇。小谨者不大立。拘于小节的人不会成就大业。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家难得成为道德楷模，虽不一定人人如此，但大多是这样。统治者用将所长，而不求全责备。

孙武对战略战术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以上几点可以窥见一斑。人世间从来都充满竞争，战争只是一种特殊的竞争形式。因此，孙武论述的战争策略和用人之道，对于当今的政治、商业经营，仍有着普遍意义。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子兵法》

宋元公论龟灵

古人信神，大凡举办一件大事，必先求问于神灵。神灵赞许的，就做；神灵不佑的，就止。问神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用龟骨者，有用蓍草者，还有用兽骨者。为什么求神要用这些东西呢？

古代文献中记载说："下有伏灵，上有兔丝；下有神龟，上有擣蓍。"求得"伏灵"、"神龟"还有一套特殊的办法。据说，人们看见的"兔丝"很像飞鸟的样子，就知道下面必有灵物。待到一场大雨过后，天气晴朗，风丝皆无，趁着黑天星夜把兔丝挑去，拿灯笼照看观察。灯灭之后，把这地方做上标记，用新布在四周包围起来。天亮之后，原地向下挖，浅者四尺，深者七尺，就可以得到。过深或过浅都得不到。伏灵是什么呢？是千年的老松树根，据说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也有文献记录说，蓍草长满一百根茎的，下面必有神龟隐守，上面有青云覆罩。人们认为，天下太平，王道荡荡，蓍草可以长到一丈长。实际上，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得到八十茎、长八尺的蓍草已经很不容易了。

能够得到有名的神龟，财物随来，其家大富，可比王侯。据说有八种神龟：第一种是北斗龟，第二种是南辰龟，第三种是五星龟，第四种是八风龟，第五种是二十八宿龟，第六种是日月龟，第七种是九州龟，第八种是玉龟。这八种龟的腹部都带图纹。这样的宝龟不用说大到一尺二寸，若能得到七八寸大的，已算幸运了。假如能得到百茎的蓍草，同时得到蓍草下的神龟，用于占卜，就足以定吉凶决嫌疑了。

《万毕术》中记载，江南嘉林中有一巨龟，林中没有虎狼，没有鸱枭，没有毒螫。野火不烧，砍伐不到。所以，人们称之为嘉林。林中之龟常处芳莲之上，龟腹左肋有字：甲子重光，得我神龟，匹夫为君，诸侯为王。据说江南有一老翁，用龟支垫床脚。二十多年后，老翁去世，别人挪床，龟仍然活着。龟能行气导引，故能经久不死。或许有人要问：既然龟如此神灵，为什么人们还要杀死它，取其腹甲呢？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答，因为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谁能知道远古人类怎么想到要用龟甲卜吉凶呢！

春秋时期有一乡民得到一只灵龟，养在家中，遂致家道殷富，财源不期而到。主人担心招惹祸端，便同家人商量，准备把灵龟送走。家人劝道，送走灵龟，岂不带走财运，家道衰落？还是杀掉为好。主人听后觉得言之成理，准备杀死此龟。不料，当天夜里梦见此龟乞求说，千万不要杀我，把我送到江河中吧！主人不听，开了杀戒。没过多久，这家人死的死，伤的伤，终致倾家荡产。依此理说，灵龟不该杀，杀了不吉祥。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宋元公时期，有神龟出于大河，到了泉阳。渔夫豫且正在捕鱼，一网下去把神龟打捞上来，带回家中，养了起来。当天夜晚，神龟托梦宋元公，说："我奉江神之命前往大河，不意渔网拦住我去路，被泉阳的豫且捉住，身陷苦难之中。听说阁下是有德义的人，特来相告，请求搭救。"宋元公惊醒，急召卜官询问说："我梦见一神灵，长长的脖子，小小的头，身穿黑色锦绣衣裳，坐着有围子的车，在梦中见我。他说，他是江神的使者，不幸被泉阳的豫且捉住，遇到危难，请我营救。请问，这神灵到底是什么东西？"

卜官听后，摆上观象仪器，仰头观看月光，再看看北斗星所指的方向，定准太阳方位，左右规矩，上下权衡。四维已定，八卦即位。观察良久，才回答宋元公说："昨日壬子，星宿牵牛，河水聚会，鬼神聚集。天河南北，江河相会，南风已到，使者先行。

白云壅塞天河，万物滞积不动。北斗星的星柄指向太阳，有一使者，身穿青衣，名为龟。陛下应立即派人寻找。”宋元公立即派人直到泉阳，对泉阳大夫说：“你们这里有几家捕鱼？谁叫豫且？豫且捕得一灵龟，灵龟托梦于国君，特派人来查找。”泉阳大夫立即查访，不久便找到豫且，问：“你最近捕鱼得到什么意外的东西？”豫且答说：“不久前夜半时分捕到一只龟，别无其他。”“龟在哪里，国君已知此事，要取走灵龟。”随即带走了龟。

出了泉阳城门，暴风骤雨，白昼无光，祥云缭绕，呈五彩之色。进了宫门，龟前行如流水，润泽有光。见到宋元公，先是伸长脖颈向前爬去，随后缩回脖子，退了下来，回到原来的位置。宋元公一见觉得奇怪，问卜官：“此龟见了寡人，先是疾行而前，随后退缩原处，这是怎么回事？”卜官答道：“龟罹此劫难，身陷囚笼。陛下仁德，把它救出。它向前疾行，是表示谢意；向后退缩，是要回去。”宋元公惊叫道：“怪呀！龟的神灵真到这种程度呀！不可久留，立即驾车把它送走，以免贻误日期。”卜官劝道：“龟乃世间宝物，得此龟者为天子。龟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晓天道，明古今之事。静则安，动则力，寿蔽于天地，随万物而变化。平时隐伏不饮不食，春天呈苍色，夏天呈黄色，秋天呈白色，冬天呈黑色。明于阴阳，通于道德，晓于祸福。以之作战，占之必信，百战百胜。陛下若把它保护起来，诸侯都会服从，成就霸业，社稷安宁。”

宋元公思忖片刻说：“既然龟很神灵，身陷危难之中，认为我有德行才向我求救。若不把它送走，我不也成了渔夫？渔夫贪其肉，寡人贪其力罢了。从小处说是不仁，大处说是无德，不仁无德怎能求得神灵帮助？我实在不忍，还是应该把它放走。”卜官继续说道：“陛下所言乃小仁小德。君子言，盛德不报，重托不还。上天所授是盛德，予而不受，上天就要收回宝物。现在这龟周游天下，上自苍天，下到泥途，途经九州而未曾中止，偏偏到了宋

国泉阳滞阻，这是天授。陛下将其放走，河神也会发怒。到了那时，霪雨不止，洪水泛滥；或者是天旱不雨，大风扬尘，蝗虫暴生。出现这种情形，没别的缘故，必是此龟之祸，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还是留下这龟为妥。”宋元公长叹一声，说道：“违逆人家的使者，阻遏人家的计划，把人家的东西拿来当自己的宝物，这能说不是强暴行径吗？我听说，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无后功。桀纣强暴，身死国亡。现在我依从你的话，会无仁义之名，而有强暴之行，江河成为汤武，我成为桀纣。未见其利，恐受其祸。我心中不安，赶快用车把龟送走！”卜官听后继续劝告说道：“天地之间，累石为山，虽高而不坏，大地得之而安。所以说，有时事情看似危险，实际上却很平安；有时东西虽然轻，却不可轻易移走。至于人，有时忠正诚实，反不如夸张放肆，丑恶之人当了高官，正人君子反受祸殃。此类事情自古及今，多不胜数，没人解释得清楚。春秋冬夏，或冷或热，冷热不合，乃贼气相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人类来说，或为仁义，或为暴强，仁义有其时，暴强有其地。物有物理，人有人道。禽兽有牝牡，乃放之于川野；鸟类有雌雄，乃布于林泽；世间有人民，要为他们修筑城郭，划分闾巷，分给房宅田亩，辨别宗族，设置官吏。从这里看，没有强暴是完不成的。种田者不强，囤仓不满；商贾不强，不能得利；妇女不强，织帛不美；官吏不强，权威不成；将军不强，兵士不从；诸侯不强，不成霸主。所以说，强是事情的起点，是事之理，物之数。现在，神龟自己送上门来，撞在网上，被渔夫捉住，这是国家之强，国家之福，陛下有何担心的呢？”

宋元公调转话头说：“我并不是仅仅担心龟的问题，还担心国内的政治。我听说，朝中有谏臣，这是国家之福；朝中有阿谀奉迎之臣，这是国之祸。人间的福与祸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非由天降。桀纣的时候，与天争功，阻遏鬼神，溜须拍马者很多。有个谄谀之臣名叫赵梁，专教夏桀做无道坏事，把商汤囚禁于夏台，

杀死关龙逢。左右大臣贪生怕死，都在一旁说夏桀爱听的话，苟且偷生。国家政局已经危如累卵，却说国泰民安。终于导致商汤起兵，夏桀身死国亡，这是夏桀缺少忠臣的缘故。商朝末年，纣有个谀臣名叫左强，此人有口才，善讲话，为巧诈，他教纣王荒淫奢侈，挖圣人之心，砍正士之腿，使得箕子装疯。纣杀死周太子季历，囚禁姬昌。后来，姬昌逃归，训练人马，讨伐商纣。周武王牧野一战，纣全线溃败，身死国亡。这些人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然而却骄奢放纵，贪心无止，不用忠良，偏信奸臣。现在寡人的国家，地处诸侯各国之间，国小力微，举事稍有不妥，便会国破家亡，怎能不格外小心？”卜官应声说：“陛下所言极是！不过，陛下不自比于汤武，而自比于桀纣，这便不妥了。桀纣赋敛无度，残害人民，用皮革制成口袋，装入牲畜的血，悬挂起来作为天神，与之相搏，号称射天。谏者必死，奸臣在旁，圣人为之潜伏，神灵为之受殃，天因之枯旱，国多妖孽，蝗灾大作，五谷不生。这样的情景，人民不能在家安生，鬼神不食人间祭祀。日月皆食，息灭无光，列星失序，乱了朝纲。这样的国家，怎么能长久？纵然没有汤武，也会自己灭亡。汤伐桀，武伐纣，都是时代造成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成名，贵为天子，子子孙孙承嗣不断。人间之事，当弱则弱，当强则强，时势造英雄，帝王之业同于此理。现在，龟为神使，为圣人授命，传之贤士。不用手足，雷电随之，风雨送之，流水行之。君王有德者方能受此圣物。陛下有盛德，却不敢接受，反要把它送走，这有违天意。若一定送走，宋国必生灾祸。往后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宋元公闻听到此，彻底明白，高兴起来。他向着太阳称谢，再拜而受。择吉日良辰，斋戒沐浴，甲乙之日，杀白雉鸡和骊羊，用它们的血灌龟。筑起高台，在台上用刀剥开龟身，取出腹甲，然后用酒奠，烧荆枝以占卜，为龟治伤。用文彩错杂相间，为龟装饰，一切合乎礼节。据说，宋国得此龟后，声名远扬，战必胜，攻

必克，一时之盛，颇为壮观。前面所说一乡民杀龟而致倾家败亡，而君子得宝龟却得以富强。

龟之神，能在梦中会见宋君，不能免于渔人网罗；甲能通神，每兆必当，却不能通使于大河，还报于大江，能力可使人每战必胜，却不能自免于刀锋之灾。悲哉，悲哉！人间事理亦然。圣人聪明，但也不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日月光明，也不免被浮云遮蔽。人世的聪明，往往顾之于前，失之于后。孔子曾评论说，神龟知吉凶，骨头虽直，中间却枯。腾蛇之神，也受蝍蛆的威胁。竹子外面有节有理，中间空虚。松柏为百木之长，但植立于门侧。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上天造物都不能十全十美，何况人呢？

上述事迹，多出于民间传说，未必确凿可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的普遍心态，信神是一种通常的现象，不信神反倒是例外的了。这与当今社会恰恰相反，而这正是人类进步的结果。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庄子・外物篇》

《史记・龟册列传》

陪臣执国命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政治重心逐渐下移，先是王权衰微诸侯争霸，随后是卿大夫专权，最后是陪臣执国命。所谓陪臣执国命，是指卿大夫的家臣控制国家的权力和命运。这一情形在鲁国最典型。

春秋后期，三桓治鲁，季氏最强。季悼子死后，季平子继卿位，对其家臣南蒯很冷淡。南蒯对季平子极不满意，找到子仲说："我想赶走季平子，由你代替卿的职务，同时我凭借着费邑封地作为鲁国的大臣，你看如何？"子仲一听对自己有好处，一口答应。南蒯又找到叔仲穆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叔仲穆子也对季平子不满。叔孙昭子在鲁国是再命之卿，季平子率军攻莒立了战功，昭子也同季平子一起拜为三命之卿。叔仲穆子想挑拨季氏与叔孙氏两家的关系，就对季平子鼓动说："叔孙昭子没有什么功劳，也要拜受三命之卿，超过了他的祖辈，这有悖于礼义。"季平子想了想说道："你言之有理。"随即找到叔孙昭子，让他自己辞去三命身份。叔孙昭子大怒说："叔孙氏家族由于发生了灾祸，杀嫡立庶，所以我才有今天。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毁掉叔孙氏，我唯命是听！不过，我的地位是国君给的，一切要听君主的裁决。"叔孙昭子上朝的时候对官员们说："我准备同季平子打一场官司，你们听证的时候，希望大家公正而不偏袒。"季平子一听叔孙昭子要同自己大干一场，有些害怕，忙改口说："是叔仲穆子唆使我这么干的。"所以，叔仲穆子对季平子怀恨在

心。

南蒯、子仲、叔仲穆子合谋企图除掉季氏，子仲把这个计划告诉了鲁昭公，带着昭公前往晋国求援，遭晋人拒绝。预定南蒯在国内下手，南蒯担心不能得手，便占据费邑发动叛乱，投靠了齐国。子仲从晋国返回，刚走到卫国就听到南蒯作乱的消息，匆忙直回鲁国。在鲁都郊外闻听南蒯占据费邑投靠了齐国，便逃往齐国去了。

南蒯作乱之前，他的宰邑有人得到消息，从他家门前走过时唱道："令人忧来令人愁，志向大而无智谋，貌似亲近心神离，身为家臣想当卿，这还算得什么人！"

南蒯动手之前不知能否成功，曾找人为他占卜。卜人问他占问什么事情，他拒绝说出。占卜的结果，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说："黄裳元吉。"南蒯觉得这是大吉大利的卦，把卦拿给子服惠伯看，并说："如果我们举大事，你看怎么样？"惠伯不以为然地说："我曾经学习过周易卦法，它只能用来占卜正义的事情，否则就不好说了。外部强盛内部温顺，这是忠诚；用温顺的态度占卜，这是信义，这才是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部的服装，元是第一位。内心不诚，与颜色不和；处下位不恭敬，与服装不合；办事不善，不符合最高标准。所以，卦辞虽然看起来吉利，实际上难以成功。"

南蒯准备到封地费邑去，他的同乡人知道他此行有异常行动，唱歌讽刺道："我有块菜地，却长了枸杞；听我的劝告，莫背叛亲戚，别那样卑鄙；罢手吧罢手，维护我亲族！"

季平子怀恨叔仲穆子，让叔孙昭子把他赶走，叔孙昭子不愿意这样做。叔仲穆子得到消息，吓得不敢上朝。叔孙昭子派人通知叔仲穆子上朝，说："我可不愿干得罪人的事情！"

南蒯到了费邑，占领费邑发动叛乱。季平子派叔弓率军前去平乱，结果被费邑的人打败。季平子大怒，下令："只要见到费邑

的人一律逮捕！”冶区夫劝阻说：“这不妥！如果见到费邑的人，给受冻的人衣服，给挨饿的人食物，供应他们所缺乏的东西，费邑人就会像投奔亲人一样前来投靠您，南蒯自然就垮台了。相反，您用刑罚对待人们，使他们畏惧怨恨，你这是把人们推到了南蒯那里。人们不到南氏那里，还能到哪里去呢？”季平子恍然大悟，招抚费邑的人们，费邑人背叛了南蒯。

南蒯占据费邑叛乱，费邑人并不是一心一意跟随他。当初南蒯与费邑人结盟，司徒老祁假装有病，派人对南蒯说：“臣愿意参加盟誓，可是突然生病不能前去，托您的福，我若能康复，日后再与您结盟。”南蒯也没多虑。昭公十四年春天，老祁知道百姓想要赶走南蒯，便把他们召集起来，然后召南蒯前来结盟。南蒯来后，立即劫持南蒯说：“费邑人跟随你闹事已经三年了，但大家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国君。大家不愿背叛国君，只能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了。大家想把你送出国，你希望到哪个国家？”南蒯请求宽容五天时间。到了第五天，南蒯一看人们彻底背叛了自己，只得逃亡到了齐国。南蒯陪齐景公饮酒，景公鄙夷地说：“你是国君的叛徒。”南蒯强辩说：“我不是国君的叛徒，我是季氏的叛徒，为的是加强国君的权力。”子韩皙插嘴说：“身为家臣却想参与朝政，这就是罪过。”

二十几年后，鲁国又发生了阳虎之乱。南蒯逃亡齐国后，阳虎做了季平子的宠臣，公山不狃（子洩）任费邑宰。鲁定公五年（前 505）六月，季平子到鲁国东部视察，在归都途中死在了房地。季桓子继承卿位。阳虎准备用鲁国的宝器玙璠随葬，仲梁怀不给，说：“玙璠是国君的用器，昭公流落国外，季平子摄理国政才用它；现在有定公在，平子就不应再用玙璠。”阳虎见仲梁怀竟敢顶撞，非常恼怒，便找公山不狃商量，想把仲梁怀赶走。公山不狃说：“他是为了国君，有什么错呢？”阳虎才把此事暂时搁置下来。季平子下葬之后，季桓子外出巡视，来到封地费邑。公山不狃到邑

外迎接，季桓子对公山不狃很客气，然而随行的仲梁怀却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公山不狃很不快，主动找阳虎说："你不是要把仲梁怀赶走吗，为什么迟迟还不动手?"

阳虎见时机已经成熟，便伺机动手。九月二十八日，阳虎软禁了季桓子和公父文伯，驱逐了仲梁怀。十月十日，杀了公何藐。目的达到之后，阳虎同季桓子在稷门起誓，互不报复，然后才把桓子放回。

定公在位，君弱臣强，受制于强臣。三桓专权，季氏最强，季氏又受制于家臣阳虎。因而，这一时期实际上是阳虎专权执政。鲁定公六年二月，鲁国受晋国之命攻伐郑国，占领郑国的胥靡（今河南偃师东）。去的时候途经卫国，没有事先向卫国打招呼；回军的时候，阳虎让季桓子和孟献子带队从卫国都城的南门进去从东门出城，故意向卫国寻衅。卫侯很愤怒，派弥子瑕带队伍追鲁军。当时，公叔文子已经告老退休，得此消息立即赶到卫君那里，劝阻说："鲁昭公有难的时候，陛下准备了国家的宝器说，谁把鲁昭公送回国复位，就把宝器赐给谁，现在因为一点小事而忘掉过去的友谊和恩德，这不太合适吧！周公的鲁国和康叔的卫国是兄弟邻邦，应该和睦相处。阳虎专权妄为，这是天在增加他的罪过，将会惩罚他，您就瞧着吧！"卫侯才停止追击。

同年夏天，鲁国要向晋国奉献伐郑的俘虏。季桓子亲自前去，阳虎坚持让孟懿子同去，向晋侯夫人送礼，以讨好晋人。晋人设宴盛情款待他们。宴会后，孟懿子站在门外对范献子说："万一有一天阳虎在鲁国呆不下去，前来晋国的话，你们晋国至少要让他做中军司马，老祖宗为证！"范献子推卸说："国君治国，任人自定，我完全听命于君，没有别的权力。"事后，范献子同赵简子议论说："看来鲁人开始讨厌阳虎了。孟懿子已经看出苗头，所以要想为阳虎留一条后路，准备让他到晋国栖身。"

阳虎专权，知道人心不服，同年冬天同鲁定公和三桓家族在

周族的神庙里结盟，随后又召集国人结盟，最后在光天化日之下诅咒说："谁有二心，天诛地灭！"

定公七年，齐军侵鲁。阳虎自以为了不起，让季桓子、孟懿子趁半夜袭击齐军。阳虎为季桓子御车，公敛处父为孟懿子御车。齐军得到密报，仍装作没有知道的样子，设下埋伏，准备歼灭鲁军。公敛处父十分不放心，警告阳虎说："你做事不考虑后果，一失利，你必死无疑！"苦夷也恨恨地说："阳虎你把二位卿推人险境，万一有闪失，用不着司法官，我就先杀掉你！"阳虎一听人们都反对自己，急忙改变主意，才使鲁军免于战败。

为报齐军伐鲁这一箭之仇，鲁军第二年袭击齐国的廪丘（今山东鄄城东北）。鲁军用冲锋车猛攻城池，情况险恶。廪丘人从城上投下熊熊大火，点着了冲车。鲁军战士脱下麻布短衣蘸水扑灭了火，继续攻城。廪丘守军出城抗击，鲁军战败，溃逃。阳虎一看大功告吹，假装没有看见身旁勇士冉猛，高声说："冉猛如果在的话，一定能打败他们！"冉猛受到激励，返回去抵抗敌人。但是，眼见敌人人多势众，自己孤身御敌危险，假装摔倒，不再前冲。阳虎看了很失望，说："都是徒有虚名！"

季寤、公钽极、公山不狃在季氏手下不得志，叔孙辄在叔氏那里不受宠，叔孙志在鲁国也不得志，所以这五个人都投靠阳虎。阳虎想除去三桓，许诺由季寤代替季桓子，叔孙辄代叔孙氏执政，自己取代孟孙氏。定公八年十月，鲁人举行祭祖大典。大典完毕，阳虎准备在蒲圃设享礼，借机动手，命令各部队按时到蒲圃集结。

孟孙氏的邑宰公敛处父闻听消息，问孟孙："季氏命令部队集合，这是怎么回事？"孟孙回答："我不知道此事。"公敛处父判断说："这么说，可能是阳虎搞的阴谋，您的处境很危险，应该做些准备。"于是回成邑组织人马，约定十月初三相会。

举行享礼这一天，阳虎驱车走在前面，林楚为季桓子赶车，卫士执戟在两旁护卫，阳越在最后。桓子突然问林楚："你的祖辈都

是季氏家族的忠臣，你应该继承他们。”林楚回答：“这话听到的已经晚了。阳虎执政，人们谁也不敢得罪他，谁违背他的意志谁遭殃。”季桓子问：“现在还不晚，你能把我送到孟氏那里吗？”林楚回答：“死不足惜，怕的是不能使主人摆脱灾难。”季桓子说：“那就赶紧去吧！”林楚调转马头，猛抽几鞭，乘车飞速离开队伍。阳越拉弓搭箭射去，没有射中。马车跑入孟氏府中。

孟孙氏事先有所准备，挑选了三百壮士在府中准备着。季桓子的车跑入宅内，迅速关闭大门。阳虎一见事情突变，劫持了定公和武叔，围攻孟氏府宅。公敛处父率成邑人马赶来救援，从上东门入城，在南门内与阳虎展开激战，没能取胜。随后两军又在棘下交战，阳虎战败。阳虎脱去皮甲赶往宫中，带上宝玉、大弓才出来，然后来到五父之衢，命人安锅做饭。同伙说：“追赶的人马上就到了。”阳虎不以为然地说：“鲁国的人们听说我逃走，正是乐不可得的事，哪里还会来追我？”手下人说：“快点套上马吧，有公敛处父在那里。”

公敛处父要求追赶阳虎，孟孙氏不同意。公敛处父想杀死季桓子，孟孙很害怕，就把季桓子送回府中。季寤在季氏的祖庙内祭祀了祖宗，然后才逃走。阳虎占据讙邑、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固守。

鲁定公九年六月，鲁人围攻阳关。阳虎寡不敌众，命人放火点燃阳关的城门。鲁军大惊，阳虎趁机带人冲出阳关逃到齐国。到了齐国之后，怂恿齐景公伐鲁，说：“鲁国不堪一击。”齐景公想答应，鲍文子劝阻说：“臣了解鲁国的内情，鲁国人君臣和睦，上下一心，事奉晋国，怎么能够轻易战胜？阳虎受季氏的宠信，他反过来谋害季氏。这种人贪图私利，不讲仁义。他来齐国，无非是陛下有财有势，阳虎看着眼红，想颠覆齐国。鲁国除去了祸害，陛下收留他，难道不是祸害吗？”

齐景公逮捕了阳虎，准备把他关押在齐国东部地区。阳虎想

逃往晋国，便假装高兴地说："我正想留在东部呢！"齐景公一听，就把他关押在齐国西部。阳虎准备从这里逃跑，担心当地人会追赶他，便把当地的车都借来，用刀子把车轴切得容易折断，随后归还。然后，在一辆车上装满衣物，自己躲在车内，逃向西方。齐人得悉，把他抓住，囚禁在齐国都内。他又一次寻机躲在装衣物的车内，逃往宋国，随后转道晋国，投奔了赵氏。孔子议论说："赵氏从此难得安宁了！"

在阳虎之乱结束的第二年，叔孙氏的家中也起波澜。叔孙成子打算让武叔做自己的继承人，家臣公若坚决反对，然而，最后还是立了武叔。叔孙成子死后，武叔继承卿位。武叔对公若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公若为郈邑宰，武叔派郈邑马正（养马官）侯犯杀掉公若，侯犯不肯答应。武叔的养马人说："您给我一柄宝剑，我拿着他从公若堂前经过，公若一定会问：'谁的剑？让我看看。'我说是您的宝剑，他一定会感兴趣。我装作不懂规矩把剑刃递给他，可以趁机把他杀死。"武叔就派他去了。养马人拿着宝剑到了公若那里，公若一见他把剑刃对着自己，知道事情不妙，高叫道："难道你要效法专诸刺吴王僚的先例吗？"然而为时已晚，立刻毙命。闻听武叔杀死了公若，侯犯怒火顿起。率领郈邑人发动反叛。武叔率军包围郈邑，但没有攻下。

鲁定公十年秋天，武叔和公南率领鲁军会同齐军再次包围郈邑，仍是久攻不下。武叔对郈邑的工师（负责工匠的官员）驷赤说："郈邑的问题不仅是叔孙氏的忧患，而且是国家的祸患，难道你不认真想一想？"驷赤回答："《扬水》这首诗反映我的愿望。"武叔一听，立刻明白了驷赤的想法，向他称谢。

驷赤到了侯犯那里，对侯犯说："郈邑地处鲁、齐两国之间，不依靠其中的一国恐怕是不行的。你何不投靠齐国作为靠山，不然的话，百姓将会生变的。"侯犯依从驷赤的意见，派人联络齐国。齐国派使者来到郈邑，驷赤在郈邑散布谣言说："侯犯准备拿郈邑

同齐国交换，齐国要把郈邑的人们迁到别处去居住。”人们闻此消息，人心浮动，吵嚷不安。驷赤又回到侯犯那里，说：“看来大家的想法与你不一样，干脆，把郈邑同齐国土地交换，可以解除目前的危机。况且，齐国人想借郈邑逼迫鲁国，必会加倍给你土地。为稳妥起见，可以准备些甲胄放在门内，以防意外。”侯犯仍不察驷赤阴谋，说道：“照你说的办！”

侯犯派人与齐国商量交换土地，齐国派人前来郈邑察看情况。齐国使者要进城，驷赤派人在城内奔跑着喊叫：“齐国军队来了。侯犯把我们出卖了！”郈邑人一听，带上武器包围了侯犯。驷赤存心想把事情搅乱，抽箭拉弓要射郈邑人，侯犯阻止道：“你不要再把事情闹大了。”侯犯向郈邑人请求出走，郈邑人同意。驷赤先到了宿地（齐地，今山东东平东南），侯犯走在后面。侯犯每出一道城门，人们就把门立即关上。到了外城门，人们拦住侯犯，说：“你带着叔孙氏的武装出去，我们担心将来官员问罪。”驷赤留在郈邑，归服了鲁国。侯犯只身逃往齐国。

定公受制于三桓，三桓又受制于家臣，人们为陪臣乱政感到不安。仲由做季氏的家臣，他想削弱臣权，加强君权，便提出毁掉三桓的封邑，以杜绝乱臣事件的发生。叔孙氏刚刚赶跑侯犯，欣然同意，立即拆毁了郈邑。季氏打算毁掉费邑，费邑的臣属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作乱，袭击鲁国都城。鲁定公和季孙氏等三人躲在季氏宅中，费邑人围攻，没有攻下。当时，孔丘任司寇，他命令申句须、乐颀带兵反击，打败费邑叛军。国内的人民组织起来，共同讨伐费邑人。公山不狃和叔孙辄逃往齐国。费邑的围墙被拆掉了。最后只剩下孟孙氏的成邑。成邑宰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毁掉成邑，等于毁掉鲁国的大门，齐国军队会畅行无阻地抵达鲁国首都。再说，成邑是孟孙氏的根据地。毁掉了成邑，孟孙氏就无立足之地了。您只当不知道此事，我来保卫成邑。”定公率军包围成邑，久攻不下，只得罢休。

南蒯之乱、阳虎之乱、侯犯之乱、公敛处父之乱接连的发生，表明鲁国的君权已经十分衰弱。尾大不掉，这是鲁国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左传》昭公十二年至定公十二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

孔子仕鲁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伟大人物。他的名字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幼皆知，他的思想光彩照人，垂范后世，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影响到全世界，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时代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泗水南）人，生于公元前 551 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死于公元前 479 年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的祖先原为宋国的贵族。他的第十代祖叫弗父何，是宋缗公的长子。缗公死后，应由弗父何继位，但他让位于弟鲋祀，即宋厉公。弗父何因让国而声誉远扬，世为宋大夫。孔子的第七世祖正考父是弗父何的曾孙，他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见称，曾连续辅助宋国三君即戴公、武公和宣公。到了六世祖孔父嘉时，家族逐渐没落，孔父嘉只做过宋国的司马，后因在一次宫廷政变中同宋殇公一同为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避难奔鲁，从此定居鲁国陬邑。

从木金父定居鲁国以后四代一直默默无闻，到了第五代，即孔子父亲叔梁纥时，算是有点小名气了，主要是立了两次战功。第一次是偪阳之战。鲁襄公十年（前 563），以晋国为首的几个诸侯国攻打一个叫偪阳（今山东枣庄南）的小国，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武士，也参加作战。当他们攻入偪阳城时，守城的

人突然把城门上吊起的悬门放下，意欲把入城队伍拦腰截断，然后分别消灭。正在这时，叔梁纥赶到，用手托起悬门，使已入城的队伍能够赶紧退出，避免了损失。第二次是夜突齐围救臧纥之战。鲁襄公十七年（前 556），齐国侵入鲁国的北部，围困了防邑，那时被围困在防邑里的有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和叔梁纥，鲁军前去解围，被齐军阻止在近防邑不远的地方。叔梁纥率甲兵三百人保护臧纥等夜间突围成功，然后又冲进防邑而固守，齐军久攻不下，只好撤退了。由于叔梁纥在这两次战役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和膂力，所以曾一时以勇力闻名于诸侯之中。他虽有两次战功，并没有加官进爵得到提升。终身只不过是一个处于贵族中最低级身份的武士，做过一个陬邑宰这样低级的官职而已。

叔梁纥防邑突围之战胜利归来时，年已六十多岁了，过了几年，他与一个年轻姑娘颜征在结了婚，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孔子，据传说，颜征在有妊时，夫妇因望儿心切，按当时迷信习惯，就于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同去位于今曲阜城东南的尼丘山祷告神灵，保佑他们生下一个儿子。祈祷后即到附近一个山洞中休息，不料就在洞中分娩，产下了孔子，所以给他取名为孔丘，字仲尼。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颜征在母子，名此洞为“坤灵洞”，又名“夫子洞”，此洞至今还在。

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就去世了。于是颜征在离开纥家，带着三岁的孔丘，寡母孤儿，迁居到鲁国都曲阜内的阙里去了。从此母子俩相依为命，颜征在既要操心维持母子生活，又要教育孔丘，希望他能够从小就好好学习，成人后重新回到贵族的行列中去。孔丘从小就勤奋好学，刻苦读书，他幼年游戏时，不像一般儿童那样好玩耍，而是经常把祭祀时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由于孔丘自幼受到母亲的严格教导，大概十六岁时已懂得一些“礼”和“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在后来处理母亲丧事时，并不慌乱，而是按照一定的习俗礼仪治理丧

事。

由于繁重的劳动，使颜征在过分憔悴，再加之带着年轻寡妇凄凉的沉重心情，终于在三十多岁就去世了。这对孔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按照当时的礼仪，父母双亡后要合葬，叔梁纥去世时孔丘只有三岁，后来颜征在又一直没有把墓地告诉孔丘，所以孔丘不知道父亲葬在何处。为了打听父墓以便将父母合葬，孔丘只得把母亲装殓后暂时安置在曲阜城内一个名叫五父地方的路口旁，藉以引人注意，好问询父墓处。后来有一位陬邑车夫的母亲，原是和征在很合得来的邻居，她知道梁纥墓在鲁国东部的防山，就告诉了孔丘，孔丘才将母亲和父亲合葬在防山。

孔母死后不久，孔子腰间还系着孝麻带，正值鲁国贵族季孙氏举行宴会款待名士，孔丘自以为是已故叔梁纥武士的儿子，大概也有资格参加，于是就跟别人走了进去。哪知季孙氏一个叫阳虎的家臣，以侮慢的态度呵斥孔丘说："季家宴请的是士，谁宴请你呢！"于是孔丘只好退了出来。这是十七八岁的孔丘想进入贵族社会所遭遇到的当头一棒。但他不灰心，反而更加激励他奋发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母亲一去世，不到二十岁的孔子，就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独立谋生了。为了谋生，像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和给人家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但他虽做过这些事，自己心里又很鄙视这些事，认为这些都不过是自己年轻时家贫不得不做而藉以谋生的鄙事。不过，孔子还是很认真地去干，做得很熟练。正因为他很能干，据说在他二十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曾有两次充当掌管具体职司的小差吏：一次是提任管理牛羊的小吏乘田，一次是提任主管仓库的委吏。他勤勤恳恳地把这些小差事都做得很好。他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养得肥胖强壮起来。"又说："叫我

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

春秋末年，每一个要参与贵族政治而取得社会地位的人，都要学会从西周时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基本功。孔子为了能全面、熟练地学习和掌握这六门基本功，刻苦努力，勤学好问，甚至达到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地步。

有一次，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的附庸小国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孔子听说这件事后，便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后来，他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倒是真的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

还有一次，孔子初次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时，遇事就问这问那。有人见此而说：“谁说陬大夫的孩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遇事就问东问西。”这话传到孔子耳里，他说：“这才是合乎礼的呢。”孔子说是根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认真学习。

孔子曾向师襄学琴，据说，孔子学了十天，还是老学同一个曲子。师襄对他说：“此曲你已学会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曲调已学过，奏曲的技巧尚未学好。”过了一会儿，师襄又说：“技巧已学好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能领会此曲子的志趣神韵呢。”过了些时，师襄说：“已领会志趣神韵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体察到此曲作者为谁并想象到其为人风貌呢。”又等了些时，孔子抬头仰望，若有所思地说：“我已体察到作者的为人风貌了。此曲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得出来呢！”师襄站起来连连作揖说：“对呀！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正是说此曲名叫《文王操》呀。”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孔子学琴的态度是何等认真啊。孔子不仅会弹琴奏乐，而且很喜欢唱歌，他

和人同歌，如果唱得好，必请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去和他同歌。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不仅常和人谈起音乐问题，而且欣赏能力很强。

孔子到三十岁的时候，不仅通晓了原来意义上一般贵族未必都能掌握的"六艺"，而且进一步通晓了贵族必须掌握的全部高级的"六艺"①，即汉以后尊为"六经"的"六艺"，并能把这高级"六艺"的实际内容和精神融会贯通。

这时候，鲁大夫孟釐子病危，告诫儿子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他的祖先在宋国。他的先祖弗父何当初该继位做宋国国君，却让位于他的弟弟厉公。到正考父时，历佐宋戴公、宋宣公、宋武公，三次受命都益发恭敬，所以他在鼎上刻下铭文说道：'第一次任命时曲身而受，第二次任命时折腰鞠躬而受，第三次任命时俯首深曲腰而受。顺着墙行走，没有人敢怠慢我。这个鼎就是我用来煮面糊和稀粥以糊口度日用的。'他说是这样恭谨节俭。我听说圣人之后，虽然不一定能在国君之位，但也必定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如今孔丘好礼仪，他不就是要显达的人吗？我已是朝不保夕的人了，你一定要师事孔丘啊！"釐子死后，懿子和鲁国人叫南宫敬叔的便往孔子处学礼。

不久，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让我与孔丘前往周王室。"鲁君派了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跟随的童仆，到周室去学礼。到当时周天子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去亲自学习周礼和古文献，是孔子一生中最大的心愿。这次洛邑之行，在孔子的学习经历中，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孔子到洛邑后拜访了老子。告辞时，老子送行。并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行时赠的是财物，品德高尚的人送行时赠予的是嘉言。我不是富贵的人，只好冒充品德高尚的人，临别赠言。这几句话是：'聪明深察的人常常遇到死亡的威胁，是因为

①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代典籍。

他好非议他人的缘故；博学善辩、才能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及自身，是因为他好揭发他人的不善；做为子女在父辈面前不要总是突出自己，做为臣子的在君上面前不要总是抬高自己。'”

孔子到洛邑学习考察，收获很大。回到鲁国后，招收的弟子渐渐增多，他开始了私人讲学。以后，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弟子有三千人，著名的有颜渊、子路、子贡等七十二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开创了私学（私人传授生徒）。孔子在进一步通晓以“六艺”为代表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的同时，又积极地观察当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政治及社会动乱情况，经过思考，加以概括，逐渐形成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儒家。

关于孔子的政治思想，由于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的很多言论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讲的。《论语·乡党》记载孔子的生活习惯都按礼的规定，非常讲究，连吃的肉也要按照规矩切成方块，否则就不吃。这显然是贵族的生活习惯。孔子向往西周的政治制度，他希望维护旧的等级名分，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他希望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反对诸侯、大夫、陪臣的僭越。他强调君臣父子各要守自己的名分，不要违反旧的制度。他认为西周的制度最好，主张建立西周式的国家，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文化是丰富多采的，是值得效法的，所以他认为通过他和他的学生们的努力，可以在东方建立一个和西周有类似之处的国家。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僭越礼的行为，他表示反对。如晋国的赵氏把法律铸在鼎上公布出来，孔子认为这违反了晋国的祖宗唐叔所订立的“法度”，使得“贵贱没有等序”，国家就不太好统治了。鲁国的季氏采用了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的大型舞蹈，孔子知道后说：“这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非常生气。齐国的田氏杀了齐简公，孔子认为卿

大夫不该杀诸侯，要求鲁国出兵去讨伐田氏。因为社会上的现实变化了，而旧的名分制度还保留着，造成“名”与“实”的不符，因此，孔子要求“正名”，要使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符合于过去规定的名分。他认为“名不正”就“言不顺”，“言不顺”就“事不成”；所以他主张恢复旧的名分、重兴旧的礼乐制度。

从总体上讲，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有保守、落后倾向。这是他政治思想中主要的一面。但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也有不少积极性的因素。孔子主张：“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他希望社会财富的占有能够平均一点，社会秩序能够安稳一点，来巩固当时的统治秩序。《礼记·檀弓》记载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经过泰山，遇见一个女人在坟前哭泣，孔子问其原故，她回答说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吃了。又问她为什么不搬家，回答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听后叹息说：“苛政猛于虎呵！”在这里孔子流露出同情人民疾苦、主张减轻剥削的思想。所以他知道“贫而无怨难”的道理，要老百姓无衣无食而没有怨恨之声，这怎么行呢？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氏收税，孔子认为季氏之富已经超过周公了，冉求还要帮季氏去搜括，对此，他非常不满意，叫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反映出同情人民，主张减轻剥削的思想。另外，孔子还主张统治者要“举贤才”，把有贤能才德的人选拔出来管理政治，这也违反了西周时代亲亲贵贵的制度；他还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期望统治者不要太奢侈腐化，让老百姓能搞好生产，生活也能过得去，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这不能不说是孔子的思想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反映出来的积极因素。所以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实际上和西周时代的社会是有些不同的。他是想在保留西周政治秩序和周礼的形式下来推行自己所理想的政治，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选拔一些出身低微的贤才来管理政治，对社会作一些改良，反对上下僭越的暴力行为，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者的

地位。孔子的政治思想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也反映了出来。他认为，搞好政治就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于是，他提出了“仁”的学说。《论语》一书中记载他回答学生问题时，对“仁”作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像颜渊问仁，他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他回答是爱人，樊迟又一次去问仁时，他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仲弓问仁，他回答是恭敬、宽厚、诚信、谦让、互惠等等。孔子的说法虽然不一样，但是他的基本定义是爱人，体现了孔子理想中的一种人与人关系。孔子说，“君子”不仁者有之，但是从没有“小人”能做到仁的。君子指的是贵族，小人指的是劳动者，孔子的仁只局限在统治阶级的范围里面，他的仁的思想有鲜明的阶级性，爱人当然不是指爱劳动者。但他认为，统治阶级应该根据“仁”的思想办事，就是要做到忠和恕，形式上是恢复礼治，实际内容是统治者人人要积极为人，想到自己的时候也想到别人，不要把自己不希望的东西强加于别人身上，人人都要恭敬、宽厚、诚信、谦让、互惠，只有这样，社会秩序就会搞好。这样的政治推广开来，就能取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效果，人民也能得到统治者施给的一些恩惠。孔子还特别强调礼，礼就是周礼，即西周的典章规范制度。他向往西周的政治，提倡“克己复礼”，认为恢复了礼治就做到了仁了。但他所说的礼和西周时代的礼应该有所区别，因为他认为应该对过去的礼要有所变动。因此说，礼的具体表现就是仁，仁的核心内容就是礼。这个礼除了周礼的形式外，就是包括了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仁和礼，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是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仁和礼的思想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确实没有丢掉西周以来的宗法性。他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孝、悌观念强调亲亲尊尊，是西周宗法制下的产物，是西周时代主要的统治思想。他认为做到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另外他又把仁和礼连在一起，强调克己复礼，希望保留和恢复西周的统治秩序的

形式。但是，孔子仁的思想也有进步的意义，如果把这种道德推广到政治生活中去，也会部分地打破宗法的限制，对劳动者会减轻一些压迫剥削。当然，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孔子承认天、命、鬼、神，认为它们对人有支配作用。有一次他在宋国遇难，宋国的贵族桓魋要杀他，他在学生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老天爷把盛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他碰到危险时总是抬出天来，以为天是决定他的命运的。他强调祭祀，重视丧葬，就承认了鬼神的存在。他很看重命，说君子是"惧怕天命"的，强调"不知道天命，就是可以做君子"，认为自己的理想能不能实行，是由命来决定的。他的学生子夏转述他的意思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而，孔子对天、命的看法和商周奴隶主贵族毕竟有所不同，就是他逐渐流露出不把天看作上帝，而把天看作自然的倾向。他认为一年四季的运行变化，天地万物的生长发育，就是天的表现。孔子是重人轻鬼的，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对鬼神要敬而远之，这就和商周时期的鬼神观念有很大区别。

到了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即孔子三十岁时，齐景公带着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从前秦穆公国家很小，又处于偏僻地方，他为什么能称霸？"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志向却很远大；所处地域虽然偏僻，而施政却十分恰当。他亲自举拔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百里奚，授予他大夫的爵位，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和他一连深谈三日，并让他执掌国政。用这种精神治理国家，就是称王天下也办得到，要是只当个霸主就太小啦。"景公听了非常高兴。

过了五年，鲁国发生内乱。原因是：由来已久的鲁国公室衰微，世卿专横，政在季氏的局面，使鲁昭公不得不想方设法削弱以至铲除季平子，以恢复公室权力。正巧这年（前517）夏天，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郈昭伯两家斗鸡而引起纠纷。鲁昭公就利用这一

矛盾，支持郈氏，抑制季氏，并一直发展到联络郈氏和另一贵族臧昭伯秘密策划，在同年秋天带领军队围困了季平子。平子便联合了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同围攻昭公，昭公的军队吃了败仗，昭公逃到了齐国，齐君将他安置在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这就是史称“斗鸡之变”的始末。

在鲁国这种内乱局面中，孔子离鲁去齐，当了高昭子的家臣，想藉此打通关系，以接触齐景公。有一次，孔子与齐国乐官谈论音乐，听到了歌颂舜的《韶》的古乐，他专心致志地学着奏唱，甚至于接连三个月食肉而不知肉的味道，齐人非常称赞他。

不久，齐景公召见孔子，问他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大臣要像个大臣，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景公说：“讲得好极了！真要是国君不像君，大臣不像臣，父亲不像父，儿子不像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难道能吃得着吗？”改日景公又向孔子问为政的道理，孔子说：“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控制开支，节省经费。”景公听了很高兴，想用孔子，并想把尼谿一带田地封给孔子，使他做一个领有封邑的齐国贵族。晏婴劝阻景公说：“凡是儒者都能言善辩，圆通而无法约束他们；傲慢任性，作为臣下很难任使；推重丧事，追求过分尽哀，不惜破费厚葬，不能让他们的这种主张变成风俗；到处游说求取官禄，这种人是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圣贤们先后下世，周王室也就随之衰微下去，礼乐制度崩坏残缺已有不少时候了。现在孔丘过分装饰外表，提出繁杂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讲究快步行走的琐碎规矩，让人好几代也不能究尽这些繁文缛节的学问，一整年也学不完各项礼节仪式。您如果想改变齐国风俗的话，恐怕是不宜用这些来倡导老百姓的。”由于晏婴的反对，齐景公打消了封给孔子采邑的想法，而且从此对他很冷淡。有一天，景公对孔子说：“我不能把季氏那样高的待遇给你。”于是，就以上卿季氏、下卿孟孙氏之间的待遇对待孔子。不久，齐国的大夫中有人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迫

于形势险恶，仓促中正在淘的米未等到做饭就提起来一面赶路一面滤干，回鲁国去了。

孔子四十二岁时，鲁昭公死在乾侯，定公继位，定公五年（前505）夏天，季平子死，桓子继做上卿。季桓子凿井得到一个陶罐，里面有一只像羊一样的东西，告诉孔子时却说："得到一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里面应是羊。我听说，山林中的怪兽是一足龙和山精鬼怪；水中的怪物是龙和叫作'罔象'的水怪；土中的怪物是一种雌雄未成的坟羊。"

吴国攻打越国，攻陷并摧毁了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得到了有一车那么长的一架人体骨头。吴派使者问孔子："谁的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召集群神聚会于会稽山，防风氏迟到，禹杀了他并陈尸示众，他的骨头一节就有一车长，这就是最大的骨头了。"吴使又问："那谁又是神呢？"孔子说："山川之神灵能兴云致雨足可造福天下监守山川，负责祭祀的就是神；主持土地和谷物的就是公侯。他们都隶属于王者。"使者又问："防风氏监守的是什么？"孔子说："汪罔氏部落的君长主持监守封山、禺山的祭祀，是釐姓。虞、夏、商称作汪罔，周代称长翟，现在叫做大人。"使者问："人的身长有多少？"孔子说："矮人僬侥氏高三尺，是最矮的。最高的不过十尺，数得上是最高的了。"吴使者听后说道："了不起呀圣人！"

这时期，鲁国的政治局面是，公室鲁定公的权操纵在世卿季氏手中，世卿季氏的权操纵在家臣阳虎手中，即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就在季平子死的当年，阳虎便把嗣立的继承季平子的执政者季桓子囚禁起来，威逼桓子屈服后才放了他。从此阳虎专鲁政。阳虎很想巴结拉拢孔子，借孔子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因此多次要求见孔子，都被孔子婉拒了。于是阳虎便将一个蒸熟了的小猪送给孔子，欲待孔子拜谢时见孔子。孔子不想见，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拜谢，但不巧在路上遇到了阳虎。

阳虎对孔子说："来吧！我有话和你说。"孔子不答。阳虎又说："自己有德有才，而听任国事迷茫，这样的人能算是仁人吗？"他又说："怕不能算是仁人吧！自己很想出仕做事，而又屡失时机，这样的人能算是智者吗？怕不能算是智者吧！时光一天天过去，岁月是不会等你啊！"孔子这才说："我是打算迟早出仕做官的"，说完就走了。

阳虎劝说孔子出仕，孔子只是口头答应，一心整理研究《诗》、《书》、《礼》、《乐》等书，弟子很多，直到遥远的地方，无不前来虚心向他领教。

鲁定公八年（前502），即孔子正好五十岁的这一年，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失宠于季氏，转而依靠阳虎作乱，打算废掉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桓"的嫡长子，另立阳虎所亲近喜欢的庶子，于是便把季桓子又抓了起来，桓子用计骗他，才得逃脱出来。由于谋杀季氏未成，作乱失败，阳虎就逃到讙（今山东宁阳西北）、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反叛，公山不狃逃到费城（今山东费县西南）反叛季氏。后他派人来召请孔子，孔子说："当初周文王、武王兴起于丰（周文王时京城，又称丰京，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河西）、镐（武王时京城，又称镐京，在今陕西西安曲乡西北）而成王业，现在费城虽小，或许与丰、镐差不多吧！"孔子想应召而往，他的学生子路很不高兴，极力阻止。孔子说："他们请我去，我能白白跑一趟吗？如果能用我，我就可以在东方施行周朝的礼乐制度啦！"但在子路的不断阻止下，孔子终归没有成行。

转年，鲁伐阳虎，攻打阳关。阳虎突围奔齐，旋逃亡宋国，最后逃到晋国，投靠了赵简子。

前面说过，孔子在二十多岁时曾做过"委吏"和"乘田"，那是较低级的管理人员，不算做官。真正开始在鲁国做官是鲁定公九年（前501），当时孔子已经五十一岁。孔子自己说："五十而知天命"，那时孔子无论在学问上、经验上，都已达到很高的地步。

教育成绩也很大，学生遍及四方，社会声誉很高，由于阳虎反季氏而引起鲁国的内乱，已经平息，鲁国仍由季桓子执政，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第一次当了中都（今山东汶上西）宰。孔子上任后，首先颁布了几条“养生送死”的制度，如规定：老年、壮年和幼年的人饮食应有不同；按体力强弱分配劳动任务；男人与女人应走不同的路；东西掉在路上也无人拾取；日常用具注重实效而不追求雕饰外表和弄虚作假；丧葬要用四寸的棺，五寸的椁，埋葬在山丘之旁，以山丘为坟，不要人为地建造坟墓，也不要植树，等等。另外，孔子在经济上尽量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起来，在教育上巩固和扩大办学规模，也有所作为。由于孔子当时的声望已很高，做中都宰的成绩也不差。据史书记载，孔子上任一年，中都周围各地都来效法和学习，所以，很快就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贵族中央政权的小司空，管理土地和营造工程的事务。孔子上任后做出了哪些政绩，史书记载很少，《孔子家语》中只说，孔子将土地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原、平地五种，并分别因地耕种不同作物。

鲁定公十年初，孔子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的司寇。孔子一生仕鲁仅四年左右，而任司寇的时间最长，从定公十年到十三年，约三年左右。

司寇一官是掌管处理案件，审判官司。孔子时代，没有法律明文，判断案件主要由贵族官吏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习惯专断判定的。孔子主管其事，上任后就一反常规，他听话不专断，而是从众议。在判断狱讼之前，他首先要把了解此案情况和对此案有意见的人找来谈话，一一问他们：你对此案看法如何？某某对此案有何意见？等等。大家意见都发表以后，孔子才斟酌众议而作出裁决。孔子任司寇仅三个月，就把鲁国的治安管理得很好，卖猪、羊的商人不敢哄抬价钱；男女都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遗物也没有人拣走；各地的旅客到了城里，不必特意去向官员们送礼

求情，都能给予接待和照顾，使他们满意而归。

另外，孔子为了把事情办好，不惜屈己求人。鲁定公时，鲁国的实际执政者不是定公，而是季桓子，所以孔子办事不是向定公负责而是向季桓子负责，孔子常去见季桓子。有一次，孔子去见季桓子，不知为了什么，季桓子不高兴。大概事情没有办成，所以孔子又去见他。弟子宰予对此不满。向孔子进言道："从前我曾听老师说过：'王公不邀请我，我不去见他。'现在老师做了司寇，日子不长，而屈己的事已经好多次了，难道不可以不去吗？"孔子答道："不错，我曾讲过此话。但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来已久，而负责当局不去治理，必将大乱。危乱的时局需要我负责办事，这岂非比任何邀请都更郑重和紧迫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孔子对事认真负责而又屈己对上的精神，也可以看出孔子与季桓子的矛盾已露萌芽。

孔子在任司寇期间最大的功劳就是在夹谷之会中取得的胜利，鲁定公十年夏，齐国大夫黎阻对齐景公说："鲁国重用了孔丘，就形势的发展来看，必定会危及齐国。您可以派使者告诉鲁君，希望两国国君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举行友好会晤。"景公于是派使者去鲁。齐国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次会盟，显示力量，压服鲁国，使鲁国无条件成为自己的附庸国。定公接到消息后准备毫无戒备地乘车前往赴会，孔子向定公进言道："臣听说办理文事必须有武备，办理武事必须有文官随从。古代诸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配齐文武官员跟从。请您安排左右司马陪同前往。"定公说："行啊！"于是就带着左右司马①做随从，并任命孔子以司寇身份兼任相礼②，前去赴会。鲁定公与齐景公到夹谷后，双方以简略的礼节相见，拱手揖让登台。彼此馈赠应酬之后，齐国官员快步上前请示说："请演奏四方各族乐曲。"景公说："可以。"于是齐国

① 官名，高级武官，掌军政、军赋。
② 相当于现在的司仪。

乐队以旌旗为先导，头插羽毛，身披皮衣，手执矛、戟、剑、盾等兵器，喧闹蜂拥而至，以便在混乱中劫持鲁君。孔子一见，立即登上临时筑成的盟坛土阶，眼睛直视景公，一甩袖怒斥道："我们两国国君友好相会，异族人的乐队为什么弄到这里！请命管事的下令撤下去！"主事官叫乐队后退，他们不走，左右看晏婴和景公的眼色。景公心里惭愧，挥手叫乐队离去。不一会儿，齐国官员又快步上前说："请演奏宫中的乐曲。"景公说："好。"于是齐国的戏谑艺人、矮小侏儒边唱边舞走上前来，孔子又快步向前，登上台阶说道："百姓戏弄诸侯，论罪当斩！请主事官去执行吧！"主事官执法，腰斩侏儒戏谑之人。景公忐忑不安，心知失礼，回去后对随从人员说："孔丘引导他的国君遵循古人礼义，你们却引导我学夷狄的陋俗，让我得罪了鲁君，这该怎么办呀！"随从回答说："君子有过错就老老实实向人家道歉认错；小人有了过错，向人家解释时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您如果很痛心，就老老实实地赔礼道歉吧。"景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盟会最后缔订盟约时，齐国人突然在盟约中加了一条，说齐国出征时，如果鲁国不出三百乘兵车相从，就是破坏此盟。显然是要鲁国无条件承认自己是齐国的附庸国。孔子看到当时两国强弱悬殊的客观形势，这一条虽然难以拒绝，但不能无条件接受，于是当机立断地提出新的条款，派人回答说，如果不把齐国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归还鲁国，而要鲁国出兵车，也是破坏此盟。这使景公很难堪。会后只好把侵占的汶阳地区郓、讙 、龟阴三地归还鲁国。

孔子在夹谷之会中，随机应变，折冲樽俎，用周礼作武器，进行斗争，保全了国格，因此威望大大提高了。再加上孔子以礼律己，对上恭敬，办事认真，更博得鲁定公和季桓子的赞赏和信任。所以，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岁时，由司寇而受季桓子委托，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并参与国事的讨论，孔子面带着得意的神色，他的弟子看到孔子这样的神态，对他说："听说君子大祸临头时不

恐惧，大福来到时也不喜形于色。”不过，孔子所处的这种地位是不稳固的、短暂的，他与季氏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此后的“堕三都”活动中，矛盾就更加暴露出来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忠君尊王”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对当时鲁国政治定公虚位，三卿擅权，三卿之家又被家臣垄断的混乱局面极为不满。他想通过他和他的学生的努力来扩大鲁君的权力，压抑和打击在鲁国专权的季氏等三家的势力，依靠鲁国的公室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提出搞一次“堕三都”的活动。三都是指三桓割据领地内的三个城堡。费邑是季孙氏领地城堡，郈邑是叔孙氏领地城堡，成邑是孟孙氏领地城堡。由于三桓都住在曲阜，所以当时这三个城堡实际上就操纵在其家臣手中，形成了独立割据力量的根据地，他们用此对三桓闹独立，侵凌三桓，以至越过三桓而干预国政，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三桓对此极为不满。孔子就利用三桓的不满情绪，与季氏计议决定拆毁三都的城墙。于是叔孙氏的根据地郈城（今山东东平东南）的城墙，首先被拆毁了。第二步拆毁季氏的费都（今山东费县）时，却遇到费宰公山不狃的强烈反对，并先发制人地以费都兵力袭击曲阜，定公和三桓都躲进了季氏住宅，费都人进攻没有成功。这时孔子指挥曲阜兵力反击，取得胜利，费都兵败退。孔子命申句须等乘胜追击，在姑蔑（今山东泗水东）击溃逃兵。公山不狃败逃奔齐，费都终于被拆毁了。接着准备拆毁成都（今山东宁阳北），成都宰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毁成都，齐人必到于北大门。况且，成都是孟氏屏障，没成都也就没有孟氏，我坚决反对拆毁成都。”于是定公亲自出马围城，但没有成功。后来季氏也逐渐觉察了孔子的图谋，不再信任他了。孔子面临着新的选择。

恰好这时齐国国君为了腐化鲁国贵族统治者，使他们迷于声色，怠于政事，疏远孔子，于是在国内挑选美貌女子八十人，都穿着华丽服装，能歌善舞，又挑选一百二十匹骏马，饰以耀眼的

锦绣绸缎，一起送给鲁君。齐国先安置女乐队、文马彩车在鲁城南面的高门外进行表演。季桓子穿着便装多次前往观看，打算接受这个乐队，就告诉鲁定公以外出到各地巡逻视察为名，乘机前往整天地观看，连国家事务都懒得去管理了。子路见此情景便说："先生，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孔子却说："鲁国现在还要在郊外祭祀，如果仍将祭祀用的烤肉按礼送我一份，那么，我还是可以留下来的。"孔子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的美女骏马，终日观舞听乐，一连三日不上朝听政。孔子参加陪祭回家后，也没见送来祭肉。于是忍无可忍，只好匆匆弃官离开鲁国了。

孔子在即将离开鲁国前，在国境边屯这个地方住下来过夜。鲁大夫师已赶来送行说："先生是没有错的。"孔子说："我唱个歌吧！"歌词大意是："美人的一张嘴啊，可以把亲信和大臣赶走；亲近那妖艳的美人，可以使国破身亡。悠闲啊悠闲，我只有这样度过岁月！"唱完就带着弟子出了鲁境到卫国去了。

就这样，孔子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季氏等三桓的憎恨，开始了他十四年漫长的周游列国的生活。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

《孔子家语》

《孟子》

《春秋左传》

孔子周游列国

“堕三都”活动以后，孔子弃官离开鲁国，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漫长旅程。

孔子去鲁周游列国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任用他实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中的贤明国君。他出游列国的经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卫国（今河南北部，国都帝丘）为中心的阶段；二是以陈国（今河南中南部，国都陈）为中心的阶段；三是又回到卫国的阶段，主要停留地区是卫陈两国，时间共计十四年之久。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第一站到了卫国，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里。由于孔子声望已很高，又做过鲁国上卿，所以卫灵公接待他很有礼貌。卫灵公问孔子说：“在鲁国领取多少俸禄？”孔子回答道：“俸粟六万小斗。”于是卫灵公也给他六万小斗的薪水。在卫居住不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灵公就派公孙余假带兵仗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害怕得罪卫国君，居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孔子想去陈国，经过卫国的匡地（今河南长垣西南）时，孔子用鞭子指着说：“过去我来这个地方，是从这个缺口进去的。”话声刚落，一群匡地人围了上来，原来孔子与鲁国季氏家臣阳虎长得像，而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所以匡地人才把孔子围困起来，达五天之久。颜渊后来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先生健在，弟子何敢去死！”匡人围攻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

恐慌起来。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去，周代礼乐制度就不在这里存在吗？上天要是毁灭这种制度，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来承担起维护这种制度的责任。上天并未要毁灭这种制度，匡人又能对我们怎么样！"孔子派了一个随从向卫国宁武子称臣，然后才得脱离围困。

离开匡地路过蒲(今河南长垣东)，恰遇公叔氏据蒲举行叛乱，蒲人拘留了孔子。弟子中有一个叫公良儒的，自己带了五辆车追随孔子。他身材高大，有道德，很有勇力。他对孔子说："我跟随先生在匡地遇难，今天又在这里被围困，这是命运吧！我和先生再次蒙受灾难，宁可搏斗而死。"双方拼搏十分凶猛激烈。蒲人胆怯了，便对孔子说："你们如果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走。"孔子对蒲人起了誓，却带着弟子回到了卫国。子贡看见孔子不信守他与蒲人的盟誓，便问孔子说："盟誓可以违背吗？"孔子说："要挟别人订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卫灵公听说孔子又回来，大喜，亲自到郊外迎他。孔子回到卫国就住在大夫蘧伯玉家里。一天，灵公问孔子说："蒲地可以攻打吗？"孔子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臣以为不可以。现在蒲地是卫国防御晋、楚两国的屏障，用我们卫国的兵力去攻打，恐怕是不可以的吧？"孔子说："那里的男子有誓死效忠卫国的决心，妇女有守卫自己家乡西河的志气，[illegible]不愿意跟着叛乱。所以我认为应当讨伐的不过是四五个叛乱的头目而已。"灵公说："先生说得很对。"然而灵公始终也没有发兵去讨伐蒲地的叛乱。

卫灵公有一个叫南子的夫人。一天，她派人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不受侮辱，又想和我们国君建立交情、作为兄弟的人，必定会来见见我们夫人的。我们夫人也很愿意见见您。"孔子开始时辞谢，实在不得已才去见她。会见时，夫人在细葛布帷帐中等候。孔子进门后，向北面恭敬地叩头行礼。夫人在帐中也拜了两拜，披戴的环珮玉器首饰发出了叮当碰击的清脆声响。孔子回来说："我

一向不愿见她，既然相见就要以礼答谢啊！”子路本来是反对孔子去见那个夫人的，听孔子这么一说还是有点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假如我做的不对，天一定厌弃我，天一定厌弃我的！”子路听后才作罢。

过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夫人同坐一辆车子，侍人雍渠陪坐在右边。出宫后，灵公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大摇大摆走过街上。孔子回来怀着厌恶的心情说道：“我从没见过像好色那样爱好德行的人啊！”

鲁定公十五年，定公死。其子蒋立，是为哀公。这年，晋国中牟（河南汤阴西）邑宰佛肸叛乱，赵简子带兵讨伐。佛肸早听说孔子的声望，所以派人去招请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对孔子说：“我从先生那儿听说，‘那种自身做了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现在佛肸自己凭着中牟起兵背叛晋国，先生有意前往，这话对您不就符合了吗？”孔了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不是还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不黑吗？我难道是只能挂着好看而不能给人吃的匏瓜吗？”但是最终孔子也没去。

有一天，卫灵公问起军队作战的阵法，孔子说：“祭祀方面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排兵布阵的事还没学过。”次日，灵公又和孔子谈话，这时，一群大雁从上空飞过，灵公抬头仰望，神色根本不在孔子身上。

卫灵公表面上对孔子很尊敬，但却不让孔子参与政事。孔子感到他周游列国的求仕目的在卫国不能实现，因此对卫灵公非常失望，他曾感慨地叹息说：“如果让我主持国事，一年就差不多见成效，三年就会很有成绩的。”一天，孔子正敲打石磬，有一个背着草筐的人从门口经过，说道：“有心思啊，敲磬的这个人！敲得又响又急，既然人家不赏识自己，那就算了吧！”孔子听后深有感触。

孔子看到在卫国得不到重用，就打算向西去投奔赵简子，看看有无可能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治国主张。到了黄河边，听到赵简子杀害了窦鸣犊、舜华两个贤人，他在岸上向黄河兴叹道："壮美呀黄水，多么浩荡盛大！我所以不能渡过河，是命运安排的吧！"子贡快步走上前问道："冒昧问一下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呀？"孔子说，"窦鸣犊和舜华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不得志时，靠这两个人才得以掌权，现在他竟然杀死这两个贤才，真让我痛心。我曾听说过这样的话，剖腹取胎、杀害幼兽，麒麟不会来到郊外；放干水池捉鱼，蛟龙就不肯来调和阴阳、兴云致雨；倾覆鸟巢，毁坏鸟卵，凤凰就不愿往这里飞翔。为什么呢？君子忌讳杀害他的同类。那些兽对于不义行为尚且知道躲避，更何况我呢？"以后，孔子创作了《陬操》琴曲以哀悼这两位遇害的贤人。孔子想西到晋国不成，又回到了卫国。这时，卫灵公的世子蒯聩因不满意他母亲南子的淫乱行为，想杀死她而未成功，就出奔到晋国，投靠赵简子。鲁哀公二年（前 493）卫灵公死。南子依灵公遗命，让小儿郢继位。郢不敢继位，卫人故立蒯聩的儿子辄继位，是为卫出公。不久，赵简子助蒯聩回国向他的儿子争夺君位，到了晋、卫边境上一个叫戚（今河南濮阳内）的地方驻下。卫出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兵去攻打，没有成功。后又请求齐国出兵包围了戚地。孔子看到卫国因君位继承问题使国内不安定，不得已离开了卫国，准备到陈国去。

孔子带着弟子们先到了曹国，曹国没有接待。他们又到了宋国。一天，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突然宋国司马桓魋听说孔子来到宋国，就派人来追杀，砍倒了那颗大树。弟子们催促着说："快点走吧。"孔子说："天赋予我传播道德的使命，桓魋能把我怎么样！"话是这么说，孔子看到宋人凶猛的样子，只得仓皇地离开那个地方。他与弟子们化装离开了宋国，又到了郑国。

孔子来到郑国，与弟子们走散，独自一人站在外城东门。郑

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一个人，额头像尧，后颈像皋陶，肩部类似子产，而从腰部以下比禹差三寸，狼狈得像只丧家之犬。"子贡后来把原话告诉孔子，孔子笑嘻嘻地说："说到形状，那是无关紧要的。要说是像丧家狗，正是这样呀！"

孔子终于在鲁哀公三年（前 492）到了陈国，住在他曾相识的贤人司城贞子家里。

这年秋。季桓子病，懊悔过去长期未能用孔子而影响了鲁国的振兴。临死前，他叹息道："过去这个国家几乎兴旺起来，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鲁国没有兴旺起来。"回过头来又对他的儿子季康子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你必然要继承我的位置。继位后，一定要招仲尼回来。"过了几天，桓子去世，季康子即位。办完丧事，康子就准备派人去陈国请孔子回鲁。大夫公之渔阻拦说道："从前我们先君用他不能善终，最后被诸侯耻笑。现在任用他，如不能善终，是要再被诸侯耻笑的。"康子说："那么我可以把谁请来更合适？"公之渔说："应该招冉求。"于是康子便派人去招冉求。冉求临行前，孔子说："这次鲁国招请你，不会小用，必将重用。"他又对其他的弟子说："回去吧！我的这一帮学生志向高远而行动疏阔，他们很富于文采，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去指导他们。"子赣知道孔子思念故国，在为冉求送行时，叮嘱说道："你要是受到重用，一定要想着把先生请回去呵。"

不久，鲁桓公、釐公庙堂失火，南宫敬叔前去救火。这时，孔子在陈国听到消息后，就说："火灾必定在桓、釐庙堂吧？"不多时消息传来，果然如孔子所说。

由于司城贞子的推荐，孔子在陈国得到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当时也有俸禄，但不像在卫国那么优厚。

有一天，有一只隼落在陈湣公庭院而死，原来是楛木箭穿在隼身上。箭头是石制的，箭长一尺八寸。陈湣公看到此情景，不

知何故，便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隼来的地方很远①，这箭是肃慎部族的箭②。过去周武王灭商纣以后，沟通了通往东方、南方、北方的联系，让九夷百蛮各族贡献各自地方的特产，使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于是肃慎族就贡来了楛木石镞弓箭，长一尺八寸。先王想宣扬他臣服远方的美德伟业，就把肃慎箭分给了长女大姬，又把女儿许配给虞胡公，然后把陈国封给他。那时分赠珍玉给同姓，是为了表示亲上加亲，把远方的贡品分赠给异姓诸侯，是为了使他们不忘听从王命。因此，肃慎族的箭便分赠给了陈国。"陈湣公派人到旧仓库试着找一找，果然找到了楛木箭。所以，他对孔子很敬佩。

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到鲁哀公六年，正遇上晋、楚争霸，两国轮番攻打陈国，吴国也乘机侵犯陈国，孔子不得不避兵乱离去。那时楚国有一位大夫名叫诸梁，采邑在叶（今河南叶县内），人称叶公，正驻守负函（今河西信阳）。鲁哀公二年楚伐蔡，蔡迁州来（今安徽寿县），楚迁蔡人于负函，叶公驻负函即为此。大概叶公是当时一位有贤名的政治家，所以孔子离陈后就想到负函去看他。

当孔子走到陈、蔡两国边界时，楚昭王听说孔子的贤德，便派人聘请他。孔子正要前往答谢，陈、蔡两国的大夫暗中谋议说："孔子是有才德的贤者，过去他所指责讥讽的都切中各诸侯的弊病。近来他长住陈，还想去蔡，我们两国的大夫们的为政措施多与他的主张不合。现在，楚国是个大国，却来招聘孔子，孔子在楚国受到重用的话，那么我们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们处境就危险了。"于是双方就派了一群人围困孔子于野外。孔子在陈蔡间被

---

① 隼（sǔn）：鸟纲隼科各类的通称，如鸷鸟，又名鹘，凶猛善飞，即属隼科，属于鹰类。

② 肃慎：古族名，后来的女真族。居长白山北，东滨大海，北到黑龙江中下游，从事狩猎。周武王时以"楛矢石砮"来贡，臣服附朝。

困，绝粮七天，随行弟子饿病了，许多人都爬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弟子和随从人都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却仍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唱歌不止。子贡等由于屡遭挫折，对孔子之道产生了怀疑，他看到孔子这般逍遥自在的样子，气冲冲地对孔子说："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在困窘面前能坚守节操，小人遇到困窘就不能控制自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子贡听出孔子在骂他，气得脸色都变了。孔子又问："子贡，你认为我是博学强记的人吗？"子贡回答道："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我只是用一种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知识中而已。"

孔子深知弟子们都怀愤懑之心，便叫来子路问道："《诗》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它却徘徊在旷野。'我们的主张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吧？所以，人们才不放我们通行。"孔子说："有这么回事吗？假使有仁德的人能使人信任，哪里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要是有智慧的人必定能够处处通行无阻，哪里会有王子比干的被剖心呢？"

子路离开后，子贡又前来进见。孔子对他说："子贡，《诗》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它却徘徊在旷野。'是我们的主张不对吗？我们为什么被困在这里？"子贡说："先生的政治主张最为高明，但天下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容纳您。先生何不降低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孔子说："子贡啊，一个好的农夫虽然善于播种，然而却不一定能得到好收成；好的工匠虽有精巧的手艺，然而却未必能使人们都称心如意；有才能有道德的人能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能按一定办法治理社会，统筹管理国家，然而却不一定能被社会容纳。现在，你不坚信自己的理想，而是追求让人家承认。子贡啊，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子贡出去后，颜回走了过来。孔子又说："颜回，是不是我们

的主张不对呢？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颜回说：“先生的政治主张最为广大，因此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纳您。虽说是这样，先生还是努力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容纳有什么妨碍，不被容纳，然后才能显现出君子的本色！要是提不出治国道理，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既然旗帜鲜明地坚持好的主张，却不被采纳，那就是当权者的耻辱了。”孔子欣慰地笑着说道：“是这样呀！颜家的好小子，要是你成了大富翁，我一定做你的管帐先生。”

孔子围困被解后，继续向负函前进。途中遇见了长沮、桀溺并肩耕作，孔子看出他们是隐居乡间的贤人，就故意让子路去向他们打听渡口在哪里。长沮对子路说：“那个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回答道：“是我先生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是应该知道渡口的人呀！”桀溺问子路：“你是谁？”回答说：“是仲由。”又问：“你是孔丘的门徒吗？”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如今到处都动荡不安，而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与其跟随躲避暴君乱臣的人，还不如追随躲避乱世的人呢！”说完还是干活不停。子路把此话转告孔子，孔子失望地说：“我们不可与鸟兽同群，要是天下太平，我也就用不着操心改变这个局面了。”

又一天，子路正在行走间，路遇一位肩扛锄草工具的老农，问道：“您看见我的先生吗？”老农说：“你们这些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先生！”说完，只管拄着杖锄草。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说：“这定是位隐者。”等到子路回去再看时，老农人已经走了。

一天，楚国有个名叫接舆的人，装疯哼着歌从孔子身边走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主张和道德为何不吃香；过去的事虽然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防患。算了，算了！如今当政的人积重难返了。”孔子赶忙下车，想同他谈谈，但那人已经快步如飞地走远了，没有讲成。

孔子终于到了负函，和叶公见面。叶公问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治理国家在于招纳远方贤能，使附近的人归服。"另一天，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情况，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听说这事，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回答他说，'他为人呀，不过是学习道理不知疲倦，教导别人不知厌烦，发愤时忘记吃饭，快乐时忘记忧愁，以致于不知道衰老就要到来'罢了。"

是年，楚昭王又派人奉币来聘请孔子，并想把书社之地七百里赐给他。令尹子西劝阻楚王道："大王派往诸侯各国的使者，有比得上子贡的吗？回答只能说'没有'。大王的宰臣有像颜回这样的人吗？回答只能说'没有'。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人吗？回答还只能说'没有'。大王的各主事官佐有像宰予这样的人吗？回答仍是说'没有'。况且楚国始祖受封于周室，封号是子男爵，封地五十里。现在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申明周公、召公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如果用他为臣，我们楚国世世代代统辖的几千里土地还能保得住吗？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统管百里之地，最终称王于天下。现在让孔子占有七百里土地，再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弟子辅佐，这并不是楚国的福音啊！"昭王听了子西的一番话，这才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卫出公即位后，卫政局日趋安定，孔子弟子中多人在卫做官，于是要求孔子回卫的呼声很高。这样孔子就不再经过陈国而从楚地负函径回卫国去了。这年是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已年六十三岁了。

孔子一回到卫国，子路就问孔子："假使卫国正等待先生回来主持政务，先生认为什么问题是应该首先解决的呢？"孔子先提纲挈领地说了一句话："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端正名分，使各安其分的问题。"子路比较直率，立刻表示不同意："问题能这样提法吗？先生未免有点不切实际、拘泥固执了吧？端正名分的问题，怎么能行得通呢！"孔子很不以为然，说："子路啊！你说这话多么粗野

浅薄呀！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一般应采取保留态度，不可乱发表意见啊！”接着孔子申述了他所以提出“正名”问题的理由，他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会顺理，说话不顺理就办不成事业，事业办不成则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则量刑就不会准确，量刑不准确则百姓就会手足无措。由此可见，君子对于端正名分问题是必须讲的，讲了也必然能行得通的。君子对自己讲的话，必须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是。”

孔子第二次回卫国，卫出公最终也没有给他官做，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仅仅给予孔子“公养”的待遇。

这时期，孔子弟子如冉有、子贡、樊迟等都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鲁国去。早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国时，鲁季桓子死去，他曾命其子季康子一定要把孔子请回鲁国。又过了几年，冉有做了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前484）春，齐攻鲁，四十一岁的冉有率领鲁军与齐国战于清（今山东长清东南），战败了齐军。当时季康子就问冉有：“先生的军事才能，是跟谁学的？”冉有回答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季康子又问：“孔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呀？”回答说：“孔子办事符合名分，不论是拿到老百姓那里，还是在鬼神面前，都是真诚而无遗憾的。我按照先生的这种原则处理事情，虽然有二千五百户的封赏，先生也会毫不动心的。”季康子听了冉有的一番话，说道：“我想招请孔子，可以吗？”冉求说：“想要请他回来，不要让小人从中阻碍，事情就好办了。”不久，卫国的大夫孔文子要攻打另一大夫太叔疾，问策于孔子，孔子说，他曾学过文事，没有学过武事，立即让人驾车准备离开。文子连忙劝阻，赔礼道歉。孔子正在犹豫，这时正好季康子听了冉求的话，派人带着厚礼来聘请孔子，孔子便回鲁国去了。

孔子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在外到处奔走了十四年，希望能实现自己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在到处碰壁之后，结束了流浪生活，最后回到了鲁国。

孔子返鲁后，鲁哀公问政，孔子说："治理国家首先在于选择好大臣。"一天，季康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推荐正直的人，废弃心术不正的人，心术不正的人慢慢就会变为正直的人。"季康子忧虑盗贼为患，向孔子请教，孔子说："如果您没有贪欲，就是鼓动他去偷窃，他也不去干。"

不久，季康子想要颁布新的"田赋"，便派冉有问于孔子。孔子开始说："我不了解。"冉有再三问，孔子才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该在合于'礼制'的范围内，根据三条原则办事，好施于民的要宽厚；为民办事要避免过和不及而适得其中；敢于民的要少一些好。如能按照这三条原则办事，那么，实行原来的田赋也就够用了。如果不按'礼制'办事，贪得无厌，那么，即使实行新的田赋，也将会不够用的。"季康子最终也没有听孔子的话，而于第二年春就开始实行新的田赋了。对此，孔子非常恼火。

鲁哀公最终也没有重用孔子，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孔子在"没有人了解我啊!"的感叹声中，决定不再求仕为官，而是把"不知老之将到"的晚年的主要精力，用在教育事业和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工作，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且继续聚徒授业，培育治国贤才。孔子在世时，正值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诗》、《书》残缺。于是孔子追溯考查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述解《书》，上起尧舜之际，下至秦穆公，编排其间的历史事实。他说："夏朝制度我能说得出来，但是杞国没有留下足够证明这些制度的文献。殷朝的制度我能说得出来，但是宋国没有留下足够证明这些制度的文献。文献、文物充足的话，我就能有更充分的证据证实这些制度了。"孔子在观察了夏、殷制度的演变情况以后，说："这些制度虽然已过百世，还是可以说得出来，其演变大体上都是文采与质朴的交替。周王朝参考了夏、殷二朝制度，呈现出多么丰富多采的文化呀！我赞成周朝的制度。"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余篇，到孔子时，他删去重复

部分，选取其中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上采商族始祖契、周族始祖后稷的史迹，中述殷、周的兴盛，至于周幽王、周厉王时制度的破坏。把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及爱情内容的《关雎》篇作为《风》的开始，把反映宴飨群臣嘉宾的《鹿鸣》篇作为《小雅》的开始，把反映周文王创业建国的《文王》篇作为《大雅》的开始，把反映周公建洛邑，率诸侯祭祀文王的《清庙》篇作为《颂》的开始。另外，孔子还把《诗》都配乐歌，以求配合《韶》、《武》、《雅》、《颂》乐舞之音，使各篇诗应有的名声和地位各得其所。

孔子曾说："不成啊，不成啊！君子最担忧的是死后没有留下好名声。我的主张行不通了，能给后人做出点什么贡献呢？"于是，孔子便依据鲁国的史记编辑《春秋》一书，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载了鲁国十二个国君的历史。孔子写《春秋》是以鲁国历史文献为依据，以周王室为宗主作为指导思想，同时兼顾追溯殷朝旧制，上推承继三代法统。全书文辞简约而旨意精深。另外，孔子还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中，即所谓"微言大义"，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是晋侯召周天子，《春秋》避讳说"天王狩猎于河阳"等等。这种褒贬之意，微言大义，是为《春秋》义旨，因而盗名窃位的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

孔子晚年喜好读《易》，并为《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作序。他读《易》勤奋，以致把编竹简的皮绳都磨断了好多次。他说："要是给我几年时间，像这样，我对于《易》从文辞到义理就都可以充分掌握了。"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到了晚年，更加专心从事教育，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对教育的对象主张打破阶级和等级的限制。他私人讲学，开门授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把贵族垄断的文化知识，传播到社会基层。在春秋时代提

出这种思想是对西周时代世官世禄、亲亲贵贵的世袭制度的否定。他主张学习好的人就可以当官，因此一些出身下层的士参与政治活动和当官，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现象。这些都是在社会形势的推动下，由孔子首先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中的精华。

在授业上，孔子从四个方面入手教育学生：即学问、行为、忠恕、信义。他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四条禁律：不臆断、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认为应该谨慎对待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把私利与天命、仁德联系在一起讲述。

在学习上，孔子主张读了书要复习，同时还必须勤于思考，而且要坚持到底，这样才能有所收获。《论语》开头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说："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学过的东西要经常复习，要边学习边思考，才能巩固学到的知识，并推知新的道理。他还强调应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认为"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做我老师的。选择他们的优点加以学习，发现他们的缺点则作为借鉴，而改正自己。"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对学生注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他要学生把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后实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提出来发问；他对学生问话的回答都很简单，而且根据不同的对象，根据每个问话者思考到什么程度，然后来回答，并注意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

到了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听到弟子颜回和子路相继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死的前七天的早晨他扶杖站立门前，意态逍遥，很有感慨而又自信地自吟自歌道："高高的泰山啊，要崩颓！直直的梁柱啊，快要断折！炯炯的哲人啊，快要枯萎！"歌罢入门，当户而坐，悠然长叹道："大概我快要死了啊！"自此卧床不起，七天后，即这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鲁哀公作了一篇悼辞说："上天太不公平啊，不肯留下这位老

人，让我一人在位，孤零零我深感内疚。啊！多么悲痛！尼父那样，我不再自我拘束了。”

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泗水岸边。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又相对哭泣尽哀然后相别而去。独有子贡一人留下，在墓旁筑了茅舍继续守丧三年，才离开先生坟墓。之后有些弟子和鲁国人因为追念孔子，把家搬到墓旁住下的约百余人家，于是就把这里叫做“孔里”。后来又把孔子的住房和讲堂以及弟子宿舍，改为孔庙，用以纪念孔子并收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等生前用物。自此以后，年年奉祀。今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所谓“三孔”，就始创于此。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

匡亚明《孔子评传》

阖闾入郢

春秋后期，正当晋楚弭兵，中原各国之间的战乱日渐平静的时候，地处今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吴国日益强盛起来。此后它与当时力图保住霸主地位的楚国展开了长达九十年的争衡斗争，这场斗争最终以吴王阖闾入郢败楚宣告结束。

吴国是周族建立起来的国家，也称句吴。它的政治中心在吴（今江苏苏州）。关于吴国的建立和发展，据史书记载，周文王的祖父太王喜欢他的幼子、文王的父亲季历，想传位给他，文王的伯父太伯和仲雍二人，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季历，就从关中地区逃到今江苏南部，和当地的“荆蛮”（即居于长江以南的我国古代越族中的一支）混居在一起，并受到荆蛮人的拥戴，建立了吴国。他们最初居住在梅里（又称太伯城，今江苏无锡东南）。吴国开始建立时只有千余家，而且习用蛮族的风俗习惯，断发文身，和周族没有什么来往。周朝建立后，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知道周章已当上吴国的君主，就封吴国为诸侯；另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到周王室都城北面夏墟，建立虞国，亦列人诸侯之中。所以吴国和中原姬姓国家原来是有宗法血缘上关系的。

吴国统治的地区是荆蛮居住的地区，原来经济、文化就很落后，西周时期可以说和中原没有什么联系。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吴国兴起得比较晚，但又使它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比较少。到了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国家加强了联系，在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吴国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到了春秋中期，吴国实

际上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国了。从生产水平看，春秋中叶，吴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很发达，尤以制造名贵而锋利的宝剑而闻名，其技术水平优于中原各国。冶铁技术也发展了起来，吴国开垦了很多荒地，后来吴国开凿了沟通长江、淮河的大运河——邗沟，显示了它生产力的水平，从文化上看，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北方各国，在鲁国观看了周代的礼乐，他对此非常熟悉，作了种种称颂和评论，可见当时吴国统治集团的文化已经不低于中原各国多少了。从军事力量看，公元前584年，吴国的军队打到了靠近鲁国的郯国[①]，郯国不得不向吴求和。鲁国的执政者季文子看到吴国兵势凶猛及其扩张领土的贪婪程度，惊叹地说："中国（这时中原地区华夏族国家自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可见中原各国因为吴国用蛮族的习惯，而一向把吴国作为蛮夷来看待的。但吴国自太伯仲雍以后，是姬姓国家，而到了太伯的十九代孙寿梦时自称为王，国力逐渐强盛。吴国的强大，使鲁国以及中原其他国家不能不承认它是同姓国家了。

晋国和楚国是世敌。吴国的兴起及其日渐壮大引起了晋国的注意。吴伐郯以后，逃奔到晋国去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怨恨楚将子重、子反杀掉他留在楚国的家族，瓜分他的财产，想借用吴国的力量来报复他在楚国的敌人，便要求晋国派他出使吴国，晋国同意了。吴王寿梦很热情地接待了申公巫臣，从此吴、晋之间建立了联系。申公巫臣帮助吴国训练军队，教会他们用兵车打仗，他还极力怂恿吴王寿梦发动对楚的进攻。由于吴国长期不和中原相通，因此不熟悉中原的车战，但他们擅长于水上作战和步兵作战。现在，巫臣帮助吴国建立车兵部队，这样一来，吴国如虎添翼，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从而助长了吴的扩张野心。

吴国在巫臣的阴谋煽动和统治者扩张野心的支配下，此后与

① 郯（tán）国是少皞氏的后代，己姓。有人说是伯益的后代，嬴姓；也有人说是少昊的后代，盈姓。位于今山东郯城西南。

楚国展开了长达九十年的争衡战争。

在这场斗争的初期阶段，吴国一面大造战车，冶铸武器，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实力；一面实行联晋抗楚的方针，极力结好晋国，还开始与晋国等中原各国打交道，与晋的反楚斗争遥相呼应，频频进击楚国，不断扩大和巩固疆土。这时楚国采取的对策是以与晋争夺中原为主，在适当的时机反击吴的挑衅，其目的是给吴以惩罚性的打击，制止它的入侵，并注意切断晋吴的交往通道，破坏晋吴同盟。

公元前 584 年，即巫臣使吴的这一年，吴开始进攻楚的边邑驾（今安徽无为）、棘（今河南永城南），并攻占了处于楚吴中间地带的巢、徐两个小国。同年八月，吴军又攻打楚邑州来（今安徽凤台），正率兵攻郑的楚将子重，急奉命从郑国赶回援救。在这一年当中，子重和子反先后七次奉命奔驰以抵御吴军，弄得忙于应战，疲于奔命。

楚共王十五年（前 576），晋大夫士燮率领鲁、齐、宋、卫、郑等国大夫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从而大大提高了吴国的政治地位，并且有力地支持了吴国的反楚斗争。

楚国则努力寻找机会，力图切断晋吴联系。楚共王十八年（前 573），楚郑联军兵讨宋国，攻占了朝郏（今河南夏邑）、幽丘（今安徽萧县）、鼓城（今江苏徐州）等地。楚共王还以武力将宋左师鱼石及其党羽送回宋国。鼓城是各国往来的交通要道，特别是晋吴之间的必经之路。为了切断晋吴联系，共王便将鼓城分封给鱼石，并留下三百辆楚国兵车协助他戍守。

楚共王二十八年（前 563），晋悼公又召集鲁、宋、卫、曹、莒、邾、薛、杞、齐等国国君与吴国国君寿梦相会于柤，这次会盟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偪阳国（今江苏邳县西北）。偪阳国战略地位很重要，它处于晋吴之间与彭城平行的第二条通道上。这年四月，晋与诸侯联军围攻偪阳，荀偃等将领亲冒矢石才攻下。这样，晋吴

之间的又一条道路得到了开通。

楚康王元年（前559），晋国再一次召集鲁、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等国与吴国相会于向（今安徽怀远西）。这次会盟的目的，《左传》上说得很清楚，是“为吴谋楚”，也就是帮助吴国策划进攻楚国。

通过上述几次盟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晋国非常重视他的东南方盟友吴国在反楚斗争中的作用，企图形成晋、吴两面攻楚的局面，迫使楚国必须同时应付东方和北方的两面进攻。吴国也确实起到了配合晋国进行反楚斗争的重要作用，吴国已经对楚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楚令尹子囊伐吴失败归来，临死时对子庚说：“一定要加固郢都城墙”，说明了楚国核心统治集团对吴国的忧虑。

公元前546年楚晋弭兵之盟以后，楚晋之间的矛盾逐渐趋向缓和。楚便拿出主要力量对付吴国，从此开始了楚对吴的进攻。

楚康王即位以后，为了对付吴国，也开始筹建训练舟师。所谓舟师就是使用船只在水上作战的水军。春秋前期，大国争霸的战争多在中原平坦地区进行，以车战为主。春秋中期，吴国最先建成舟师。公元前559年吴正是利用舟师的优势出奇兵截击子囊，打败楚军的。可以说，舟师的使用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争形式的新发展。楚康王正是看到了舟师的优势，才积极组建楚国的舟师，并向吴展开了进攻。这一时期，楚吴对中间地带的争夺非常激烈，其中包括对徐、巢、钟离、群舒、六、潜等国的争夺。而尤以对州来的争夺最为突出。州来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南是楚，东南是吴，扼守楚吴交通的咽喉要道。楚控制州来，可以御吴；吴控制州来，可以窥楚。因此它成为楚吴长期争夺的目标。

公元前584年吴攻占州来后，不久又被楚夺回。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攻克朱方以后，派军队加固州来城，但因这一带水势太大而未能实现。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假冬猎为名来州来以威胁吴。两

年后，吴军攻灭州来，州来又沦为吴邑。但不久又被楚军夺回，楚平王又下命令加固州来城，结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件事遭到沈尹戌的批评，他指出：加固州来城不但使老百姓过度疲乏、辛苦，而且会招致吴的不安和进攻。果然四年以后，楚与吴在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作战，楚军大败，吴又乘胜攻占州来，把季札封在那里。从此以后，吴长期控制州来，到公元前 493 年又将蔡国迁到这里，改州来为下蔡。

在楚吴之间还有一小国舒鸠(今安徽舒城)，它本来依附于楚。吴为报复公元前 549 年楚军舟师之役，强召舒鸠来吴，舒鸠被迫背离楚国。

第二年，楚令尹屈建便率师讨伐，吴军来救，楚以伏兵打败吴军后，乘势消灭了舒鸠。随后，吴王诸樊为雪舟师之役的耻辱，亲自率兵包围了巢，巢人利用诸樊勇敢而轻率的特点，故意打开城门，让吴军进城。诸樊果然亲自带头入城，巢人牛臣藏在短墙里暗中猛射一箭，吴王诸樊应声倒下，巢人借混乱之机，打退了吴军的进攻。

按照楚晋第二次弭兵之盟的规定，原来分别亲附楚晋两大国的小诸侯国，应该同时纳贡于楚晋两国。楚灵王三年（前 538 年）的夏天，楚国取得了晋国的同意，在申地大会诸侯。会后，楚灵王趁势率领各诸侯国的军队进攻吴国，派屈申包围并攻陷了朱方（今江苏镇江东南），诛杀了齐国的庆封。同年冬天，吴国为报朱方之役之仇，派兵攻打楚国，夺去了棘（今河南永城南）、栎、麻（今安徽砀山东北）三邑。

第二年冬天，楚灵王带领蔡、陈、许、顿、沈、徐、越等七国与淮夷的军队又一次进攻吴国，是为了夺回棘、栎、麻三邑。楚军兵分两路，南北并进。南路由大夫薳启疆率领，尾随于吴军之后，打算伺机进击，却不防吴军突然回师进攻，在鹊岸（今安徽无为南到铜陵北，沿长江北岸一带）被击败。

北路由楚灵王亲自率领到罗汭（今河南罗山）。吴王为了探听楚军的虚实，就派他的弟弟蹶由犒劳楚军。楚灵王囚禁了蹶由，准备杀死他，血祭战鼓。在杀他之前问道："你占卜过来这里是吉利吗？"蹶由回答说："吉利。寡君派我来，是为了观察大王火气的大小而加以戒备的。您如果高高兴兴地迎接使臣，敝邑会因懈怠而遭到灭亡；您现在准备杀我祭鼓，吴国就知道加强戒备了。占卜吉利，是国家的吉利，并不是我个人的吉利。"楚灵王知道吴国有了准备，就没有杀他，只在坻箕山（今安徽巢县踟蹰山）检阅军队，向吴国示威。吴国面对气势汹汹的楚军，也没有主动出击。这样，楚灵王就派沈尹射驻兵于巢，遠启疆驻兵于雩娄（今河南固始东南），以加强对吴的防御，然后，率大军回郢都去了。

公元前530年冬天，楚灵王带领军队去打猎，驻在州来，同时派荡侯率师包围了徐国，威吓吴国，自己则在景色优美的乾溪玩乐。

第二年，楚灵王的几个弟弟发动宫廷政变，楚灵王慌慌张张撤兵而去，包围徐国的楚军也随之而撤，吴军趁势追杀，楚军大败，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嘉等五个将领被吴国俘虏。

楚平王即位后，因害怕自己是采用欺诈手段杀害两个王而上台的，恐怕国人和诸侯国不服，便对内安抚国内人民，整治政会教化，向百姓施行恩惠；对外缓和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与吴国的战争暂时停止。五年后，楚平王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争霸的欲望又驱使他发动了对吴的进攻。公元前525年，楚令尹阳丐率舟师与吴水军在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展开了一场大战，打败了吴军，还缴获了一条吴王余祭过去乘坐过的大船"余皇"号。楚国将士非常高兴，将大船拖到岸上，还在船的四周挖了一条深沟，沟里填满了木炭，目的是防止吴军袭夺。

失去"余皇"，肯定要处死罪，吴军统帅公子光心里非常焦急，

他对残兵败将们说："丢了行王的坐船，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你们大家就没有责任吗？现在我请求大家同心协力，夺回'余皇'，以免死罪。"大家同意了。于是选派了三名身材高大、长满胡须的人冒充楚人，预先潜伏在大船的附近。到了半夜，公子光带领吴军向"余皇"号的方向摸索前进，三次高喊"余皇"。埋伏的人轮番回答，虽当场被楚军杀死，却造成了楚军的混乱。公子光等乘势猛冲上去，打败了防守"余皇"号的一支楚军，夺回了"余皇"号。楚平王十一年（前518），楚军又对吴国发动进攻，但被吴军打败，吴借机灭亡了巢和离两个小国。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病死，太子壬继位，年仅八岁，是为楚昭王。次年，吴趁楚平王新丧和昭王年幼，派遣公子掩余和烛庸率兵包围了楚国的潜地（今安徽霍山东北）。楚闻讯后，立即出动了四路大军，由莠尹然、王尹麇二人与左郤宛、工尹寿二人各领兵一支救潜，左司马沈尹戌率领先头部队到达穷（今安徽霍丘西南），另由令尹子常率领舟师顺淮河而下到达沙（今安徽沙水人淮水处）遥相策应，把吴军阻截于穷、潜之间，使之进退不得。

这时，吴公子光在国内发动政变，刺杀了吴王僚。在前线作战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听到消息后，分别逃亡到徐国和钟吾，后来二人都投降于楚。由于吴国的内乱，楚军不战而胜。

公元前515年吴国发生的宫廷政变，对吴国的政治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同时也使楚吴战局开始出现重大变化。

原来，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馀眛和季札。季札最小却最贤，深得寿梦的喜爱，寿梦想立他为太子。但季札谦让不受，于是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病终时对四个儿子说："以后要把王位传给兄弟，让季札当王。"诸樊当王后让位于季札，季札坚决不受，诸樊死后只得由馀祭当王；馀祭死了，馀眛当王；馀眛当王三年死了，吴国人按照寿梦的遗嘱，想立季札为王，季札又坚决不肯接受，于是吴国人只得叫馀眛的儿子僚当王。公子光

是寿梦的长孙，诸樊的长子，他觉得既然叔父季札不愿当王，这个王位当然应该由自己来继承。因而他一心想发动政变，夺取王位，于是他到处招纳贤才，其中著名的有伍子胥、孙武和专诸等，成为公子光的心腹和得力助手。

伍子胥本是逃亡到吴国来的楚国人。原来楚平王在政变夺权之前，曾奉命到蔡国聘问，带回一蔡国女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建。楚平王继位国君后，把建立为太子，任命大夫伍举的儿子伍奢为师，费无极为少师。费无极这个人阴险狡猾，两面三刀，干了许多卑鄙的勾当，太子建很不喜欢他，他便设法诬陷太子，希望得到楚平王的宠幸。有一天他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已经成年了，可以为他娶亲了。"楚平王为太子在秦国订了亲事，派费无极迎亲。楚平王六年（前523）正月，迎亲的队伍回到郢都的城外，费无极抢先跑到楚平王面前鼓动："秦国的这个姑娘漂亮极了，可算得天下无双，君王不妨自己娶了她，为太子建另外订一门亲事不也一样吗？"荒淫的楚平王自己竟真的占有了这个姑娘，另为太子建娶了一位齐国的姑娘。从此，费无极得到了楚平王的宠幸，但是他怕太子建继位后会复仇处死自己，便挖空心思地图谋暗害太子。不久，他又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称霸，是因为他们靠近中原，而我们楚国处于偏僻的地方，所以难于和晋争夺。如果扩建城父（今河南宝丰东）城墙，把太子安置在那里控制北方，君王控制南方，就便于向中原扩展，称霸天下了。"楚平王大喜，接受了他的建议，使太子建镇守城父，派伍奢辅佐。第二年，费无极又对楚平王说："如今太子建非常怨恨您娶了秦国的姑娘。他已得到了齐晋两国的支持，打算将方城山以外的地方控制起来，自立为王，背叛楚国。"楚平王听信了费无极的谗言，召回伍奢查究这件事。伍奢知道是费无极的阴谋，就对平王说："大王怎么能听信谗言而疏远骨肉至亲呢？"平王不但听不进这些话，反而把伍奢拘禁起来，还派遣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太子听到这个消息，便逃到

宋国去了。

伍奢有两个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员，字子胥，都很有才干，特别是伍子胥谋略过人。费无极担心他们会投靠吴国，成为楚国的祸患，他怂恿平王强迫伍奢写亲笔信给儿子伍尚和伍员，叫他俩赶快到郢都来向平王谢恩，平王就可以免除伍奢的死罪。伍奢有口难辩，只得照平王和费无极的意思写了。兄弟俩接到这封信后，明知是费无极出的奸计，于是商量对策。伍子胥说："如果我们不回去，他们怕我们报仇，父亲还不至于死；如果我们二人去，只会和父亲一道被杀，还是不去为好。"伍尚说："听到父亲能够赦免的消息，如果不回去扪心有愧，肯定会遭到别人的议论；两人都回去，将来报仇无人。最好是只回去一个，这样既孝顺了父亲，又有人报仇。我的才智不如你，让我回去，你逃出去报仇吧！"兄弟俩人就这样决定了。伍奢听说伍子胥没有回来，叹了口气，说："楚国从此将不会安宁了。"果然不出所料，楚平王杀了他们父子俩，又派兵追捕伍子胥，并发了通告，在全国各重要关口悬挂伍子胥的画像，派兵把守。声言捉住伍子胥的可以赏粮五万石，封为大夫，窝藏者全家处死。

伍子胥逃到了宋国，会见了正避居在那里的太子建。这年冬天，他俩人又因避宋国华氏之乱，逃到了郑国。郑国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还给太子建一块封地。以便他能安心地住下来。太子建暗暗想联合晋国的力量夺取郑国的政权，再打回楚国去，结果机密泄露，被郑定公处死。伍子胥害怕，连忙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出郑国，向吴国奔去。

从郑到吴要穿过楚国的东北部，伍子胥一路上避开通关大道，专走小路，倒也没有被搜查盘问。但是走到昭关时，因为没有小路可绕，必须要通过城门。把门的关吏认出了他，打算扣押起来，伍子胥谎称："原来国君要缉拿我，是因为我有一颗明珠，但它现在不在我身上，君王已经同意我去取回这颗明珠。你不让我去取，

见了君王，我就说你将珍珠夺去吞了，请君王剖腹取珠。”关吏无奈，只好放了他。

伍子胥到达江边时，远远望见后面尘土飞扬，有追兵赶到。正着急时，看到江上有条渔船顺流而来，伍子胥连声呼唤：“渔父渡我！渔父渡我！”渔父一看附近有人，便唱起渔歌，暗示伍子胥到前面芦苇中隐蔽的地方让他上了船，把他渡到了对岸。渔父见伍子胥面有饥色，对他说：“你在这棵大树下等我，我为你取饭去。”伍子胥怀疑有诈，就躲进芦苇深处。过了一会，渔父拎着一篮麦饭转回来，发现伍子胥不见了，便连声呼唤“芦中人”。伍子胥仔细看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才应声而出。渔父说：“我为你去取饭，你怎么不放心啊？”伍子胥说：“我的性命全靠丈人搭救，怎敢不放心！”渔父拿出饭来，伍子胥先喂好公子胜，然后自己才吃饱了饭。饭后，他解下身上的佩剑送给渔父说：“这是我祖上留下的一柄宝剑，上面嵌有七颗宝石，价值百金，现在赠送给您，以报您活命之恩！”渔父说：“我听说楚国的命令，只要捉住伍子胥，赐粟五万石，爵能执珪①，难道我救您就是为了贪图这百金之剑吗？”伍子胥又请问渔父姓名，渔父说：“今日萍水相逢，却心有默契，何必问什么姓名，你是‘芦中人’，我是‘渔夫人’，富贵之后莫相忘！”伍子胥连连称是，再三道谢，然后背起公子胜叩别。伍子胥走了几丈远后，再回头看时，渔父已弄翻了渔舟，自己沉没到江水中去了。伍子胥不禁肃然起敬，沉默哀悼了许久才怅惘而去。

伍子胥背着公子胜，直到进入吴国国境后，才放下心来。他到达溧阳（今属江苏）时，身上已无分文，腹中饥肠辘辘，孩子也饿得哭叫不停，只好沿路乞讨。有一天，他们走到一条急流水边时，见一中年女子在那里击絮，于是上前乞食。那女子见他们

① 执珪：又称上执珪，爵位名，春秋时楚国设置，为楚国的最高爵位。

悲惨可怜，就让他和孩子饱餐了一顿。伍子胥临别时，请她收起碗筷，不使别人知道。她说："我与寡母生活了三十年，自守贞节，不愿从人，今送饭食于您，是越礼行为，这是看见您们可怜才这样做，您去吧！"伍子胥称谢而去，再回头看时，女子已经投水而死。伍子胥又一次悲从中来，默致敬意后离去。

伍子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吴都，见到吴王僚，极力宣扬进攻楚国的好处，僚连连点头称是，站在一旁的公子光却极力反对说："伍子胥的父亲兄长被楚王杀害，他想要报自己的仇罢了，他的话万万不可听。"伍子胥一眼就看出了公子光的内心深处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他知道：伐楚，是公子光的一贯主张，今天却一反常态，不过是怕吴王重用了我，妨碍了他的夺权行为。一个念头在他心头闪过：既然如此，我何不助他一臂之助，再借他的手去伐楚呢？于是伍子胥私下物色到一位仗义任侠的勇士专诸，一起去求见公子光。公子光本想利用伍子胥来帮助他夺取王位，振兴吴国；伍子胥则想利用公子光和吴国的力量来攻打楚国，报父兄之仇。因此，三人成为至交。公子光以极其优厚的礼遇来款待他们。专诸则以厨师的身份隐居在公子光家里。专门练习煮鱼。伍子胥则到郊外耕田，避免外人的注意，观察事态的发展。

七个年头过去了，公子光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篡权的机会。公元前515年初夏，楚平王死，吴王僚派遣自己的两个弟弟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领兵进攻楚国，被楚军困于穷、潜之间，同时吴王僚又派遣公子季札出使到晋国，吴国国内实力空虚。公子光认定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便和专诸商议谋杀吴王的事。专诸说："君王是可以杀掉的，但是我上有老母，下有小儿，怎么办？"公子光说："如果你不幸被杀，你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一定负责照顾他们！"

公子光知道吴王僚最爱吃炙鱼，早就让专诸学到了一手烹调炙鱼的好本领，一天，公子光在自己住宅里举行盛宴招待吴王僚，

请他吃炙鱼。公子光预先在地下室中埋伏了甲士，作好了刺杀的准备。但是吴王僚也早有提防，从王宫到公子光住宅的大门口都布满了士兵，从大门口一直到吴王僚的坐席旁边，都是全副盔甲、手持武器的亲兵，要想行刺确实难上加难，能够进出的只有端菜的人。为了防止端菜的人暗藏兵器，吴王僚命令他们先在门外脱光衣服，然后换上指定的衣服，而且在上菜的时候，必须跪在地上膝行而进，慢慢将菜放在几上。在这样周密的安排下，吴王僚才开始放心地大吃起来。酒过三巡之后，公子光假称脚痛，偷偷出来到地下室中叮嘱专诸把一把锋利的短剑放在鱼肚里献上来，乘机行刺，这时装成端菜人的专诸，双手恭敬地端着一大盘炙鱼跪在地上，慢慢地前动着，甲士的短剑几乎碰到了他的身上。当他靠近吴王僚的席前，把菜盘放到几上时，突然扒开鱼肚，抽出短剑，跃起身，猛刺吴王，锋利的宝剑刺穿了吴王僚的铠甲，戳人了胸膛，吴王僚大叫一声，气绝身亡。专诸也被吴王僚的亲兵杀死。这时，地下室里的甲士们立即拥出，消灭了吴王僚的警卫兵。

公子光就这样夺得了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吴王阖闾（一作阖）。他论功行赏任命伍子胥为相，协助管理国家大事，任命专诸的儿子为卿。伍子胥推荐大军事家、齐国人孙武为将军。原来伍子胥在浪迹吴国期间，结识了孙武，孙武字长卿，是春秋末年有名的军事家。他的祖先居住在陈国，因避战乱而逃至齐国。他的祖父陈书为齐国战将，因为攻莒有功，被赐姓为孙。孙武年轻时就研究军事，苦练剑术。后因齐国内乱，来到了吴国，从军数年，参加过对楚作战，受伤后隐居于吴国边地，就和伍子胥认识了。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吴王阖闾召见了孙武，和他一起谈论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孙武还把他著的兵书十三篇献给阖闾，并在他面前进行阵法的实际操练，深得阖闾赏识，因此任命他为将军，训练吴国的军队。

另外，伍子胥还推荐伯嚭当了吴国的大夫。伯嚭是被楚灵王杀掉的伯州犁的孙子，也是被迫逃到吴国的，他的精明干练也得到吴王阖闾的重视。

吴王阖闾是一个心雄志壮，决意击败楚国，谋求霸业的人，这时又得到了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的辅佐，简直是如虎添翼。吴王阖闾为图霸灭楚，对内锐意整饬朝政，安抚百姓，他自己的生活极为俭朴，吃饭只要吃一道菜，坐着只垫一层席，用具不施雕饰，车船不加装璜，宫苑内不造楼阁，住室不建在高坛上，衣着穿戴只求实际耐用。每当国内遇到灾害时，他就亲自去巡视灾情，安抚孤寡，赈济危难。在行军作战时，常常要等到士兵都分到了煮熟的食物之后，自己才食用，他有时得到一些珍贵的食品，也往往分给将士们尝尝。就这样，经过吴王阖闾的奋发图强，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更加强大，结束了楚吴争衡中楚对吴的进攻阶段，而转入了吴对楚的反攻阶段。

伍子胥知道楚国执政的人虽然很多，但因为相互不和，没有人敢承担责任，所以对吴国的进攻，不能分别独立作战，往往几个掌权的人同时领兵而出。他便利用楚国的这一弱点，建议阖闾将吴国军队组成三支独立的作战部队，轮番对楚发动突然袭击，遇到抵抗就迅速撤退，待楚军退回，又马上出击。每次出兵，吴只需出动一支部队，楚却要出动全部兵力，其结果必然使楚军疲于奔命。而且此计还可能诱使楚军失误，只要楚军判断有误，吴军即可组织全部力量猛攻，必胜无疑。这就是有名的“三军病楚”之计。阖闾完全采用了这个策略。

因此，楚国在楚昭王继位后年年受吴的进攻，楚军被拖得兵疲将倦，困顿不堪，辛辛苦苦却落得军事上的连连失败。公元前512年吴攻克舒地，杀了投降楚国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同年冬天，活捉钟吾国君，灭亡了徐国。这时吴王阖闾想攻进楚郢都，孙武对他说：“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机会还没到。”第二年吴又伐楚，攻

占了六与潜两地。公元前508年攻占巢邑，俘获了驻守在巢邑的楚大夫公子繁。几年里，楚吴之间长期反复争夺的军事目标，都被吴国占领。吴国取得了战略大反攻的极其有利的形势。

楚国不仅面临着军事大崩溃的严重威胁，而且国内也处于极为混乱的状况之中，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统治者穷奢极侈，尤以令尹囊瓦为最。他聚敛无度，百姓生活贫困不堪，纷纷铤而走险，聚众反抗。

公元前506年初春，吴王阖闾问伍子胥、孙武道："当初你们不同意攻打郢都，现在吴国连连胜利，可以进攻了吧？"二人回答说："楚国令尹囊瓦贪婪，引起了蔡国和唐国两国国君极大反感和不满。大王一定要大举进攻，必须得到唐、蔡两国的支援才行。"阖闾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派伍子胥出使唐、蔡两国，请求联合出兵攻楚，同时调动全国兵力，准备攻楚。

囊瓦引起唐、蔡两国国君怨恨的事情是这样的：蔡昭侯得到一大块美玉后，派玉工精雕细琢制成两件玉佩。又使缝工制成两件轻厚软、毛色纯净的皮衣。当他朝聘楚国时，自己穿了一件皮衣，戴了一块玉佩，把另一件皮衣和一枚玉佩献给了楚昭王。在欢迎他的会上，楚昭王和他两人都穿戴着相同的皮衣和玉佩，都非常高兴，酒席尽欢而散。第二天，囊瓦向蔡昭侯索要皮衣和玉佩，被蔡昭侯拒绝了。囊瓦竟公然将他囚禁在郢都，过去了三年还不肯释放。唐国的唐成公朝聘楚国时，带去了两匹马。囊瓦一看，喜之不尽，便向唐成公索取，唐成公没有给他，结果也被扣留起来。

唐国有人商量了一个办法，派人来替换唐成公的随从人员，用酒灌醉了他们，将马偷去献给了囊瓦，唐成公才得以释放。回国后，偷马的人自请囚禁，唐成公不但没有处罚他们，反而给予了奖励。

蔡国人知道这件事后，便坚决请求蔡昭侯将皮衣和玉佩献给

囊瓦。蔡昭侯无奈，只好忍痛割爱。在他回国的途中，路过汉水时，将身上佩戴的另一枚心爱的玉佩折断丢进江中，并发誓说："我如果再过汉水去朝见楚国，就像这汉江一样，一去不复返！"

伍子胥就是利用了楚与唐、蔡两国的这个矛盾，迅速出使蔡、唐，游说他们反楚，结成了吴、蔡、唐联盟。蔡昭侯还把自己的儿子乾和一名大夫的儿子派到吴国做人质。

这年的冬天，三国联军开始向楚发起规模空前的进攻，攻夺的目标是楚国的郢都。

吴王阖闾亲统大军，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吴王的兄弟夫概为先锋，出兵六万攻打楚国。吴军乘战船溯淮水西进越过蔡地后，舍舟登岸，将船只停泊在河岸边，经豫章继续向西，一直抵达汉水东岸，与楚军隔水对峙。

这时，楚国的左司马戌与囊瓦商量说："你沿汉水与吴军上下周旋，不使他们渡过汉水，我先率领方城山以外的兵力毁掉他们的船只，然后回师堵住大隧、直辕、冥阨三关，截断吴军退路，您再渡过汉水进攻，我们两面夹攻，必能大败吴军。"囊瓦同意了这一战略计划。

当左司马戌领兵出发以后，大夫武城黑却建议速战速决，大夫史皇也别有用心地挑拨说："楚人厌恶您而喜欢司马，若司马毁舟堵隘，战败了吴国，将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您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就会对您不利。"囊瓦在他们的怂恿下，便不顾原先与司马戌所订的计划，贸然下令渡河进攻。吴军为防止后路被堵，便向南作战略撤退，到达小别山（今河南光山以南）与大别山（今湖北英山北）一带时，囊瓦组织了三次进攻，都没有得利。十一月八日，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相遇。那天的清晨，夫概针对楚军士气不高的弱点，率五千吴军抢先猛攻楚军，楚军一触即溃，被打得大败。囊瓦逃奔到郑国去了，史皇死于乱军之中，吴军一直到清发（今湖北安陆涢水），趁楚军半渡之机，又一次打败楚军。

吴军又在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等地五次大胜楚军后，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攻进郢都。楚国这个建都近二百年的古城第一次沦于敌人手中。

郢都沦陷的前一天，楚昭王仅仅带着一个妹妹在箴尹固、王孙由于、钟建等人的护卫下，仓皇出城西逃。他们渡过睢水（今湖北枝江东北之沮水），进入云梦泽，曾遇到“盗”的袭击，王孙由于为了掩护楚昭王而受伤。他们这一行人又折回头逃到郧县（今湖北安陆）。郧公斗辛的兄弟怀因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要杀死楚昭王报仇，但被郧公劝阻。郧公又和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斗巢陪同楚昭王等人一直逃奔到随国（今湖北随州南）。吴军也追赶到了随国，要求随人交出楚昭王。但随国由于世代和楚国友好，因此他们婉言谢绝了吴军的要求。

吴军在郢都，按照尊卑次序分别住进楚国君臣的宫室和住宅，强占了他们的妻妾。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极大地污辱了楚国人，但同时却使吴国人内部由于争夺胜利品而加深了矛盾。

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而立下的誓愿也得以实现，他亲自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拉出楚平王的尸首，狠狠地打了三百鞭子才住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鞭尸三百”故事的来源。

起初，楚国大夫申包胥和伍子胥关系很好，伍子胥逃离楚国时曾碰到过他。伍子胥对他说：“我一定要覆灭楚国。”申包胥回答说：“如果你覆灭了楚国，我就一定要复兴楚国。”在楚昭王逃到随国以后，申包胥连夜跑到秦国，哀求秦国出兵，他对秦哀公说：“寡君现在已失守了国家，特使下臣报告危难。吴国就像封猪长蛇一样吞食上国，楚国只是开始受害。楚国是贵国的邻国，所以，吴国也将是贵国的祸患。如果以君王的福灵存恤楚国，楚国将世世代代事奉君王。”秦哀公说要好好商量一下，让他到宾馆去安歇，他说：“寡君现在逃难在荒野草莽之中，没有安身之处，下臣怎敢安歇啊？”于是，他倚靠着秦国宫殿的院墙，站在那里痛哭

流涕。他一连哭了七天七夜，直哭得声嘶力竭，气息奄奄，到最后，眼睛、鼻子、口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可是，他仍然哭个不停。这七天七夜他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滴水。他的这种行为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秦哀公觉得楚国的君王虽然昏庸无道，但有这样的忠臣，楚国终究还有复兴的希望，于是就答应出兵救楚，申包胥向他叩头拜谢了九次才坐下。在申包胥的带领下，秦将子蒲、子虎率战车五百辆救楚，在沂地（今河南正阳）联合一部分尚存的楚军大败夫概。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夫概看到阖闾留在郢都不想回去，秦、越军队又在攻打吴国，为了夺取权力，便率军偷偷地回到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不得不和楚国的贵族讲和，恢复了楚国。随后率军回吴，消灭了夫概，夫概逃到楚国，被楚封于堂谿（今河南西平西北），这就是后来的堂谿氏。

随后，秦楚的军队在雍澨、麇、公壻之谿（今湖北襄樊东）等地大败吴军。楚昭王这才回到郢都，他奖赏了斗辛、斗巢、王孙由于、钟建、申包胥等人，但申包胥不愿接受赏赐而去。

楚昭王十二年（前 504），吴国太子终累又打败了楚国的舟师，俘虏了潘子臣、小惟子两名将领和七名大夫；吴军还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北）打败了楚国子期率领的陆军。楚人极为恐惧，就把都城从郢迁到都（今湖北宜城东南）。此后，在继任令尹子西的治理下，楚国的秩序逐渐得到了安定。

正当楚吴铁马金戈、争霸于淮汉的时候，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下的越国开始兴起。当吴军入郢都时，越则利用吴后方空虚之机袭击吴。楚昭王二十年（前 496），吴越又大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受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夫差恨越入骨，从此不再西攻楚国，而把力量放在进攻越国上。从此，楚吴争衡就让位于吴越争衡了。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楚世家》、《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

《左传纪事本末》

孔门弟子

传说，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意思是说，孔夫子教授了大批生徒，并培养了很多有才华、有成就的人。例如，以品德高尚著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于出仕为官的，有冉有、季路；以口才雄辩著称的，有宰予、子贡；文学方面才华横溢的，有子游、子夏。从性情方面来说，颛孙师言过其辞，曾参温厚笃实，高柴忠正憨厚，仲由粗率勇猛。综而言之，孔子生徒千姿百态，各具千秋，不愧为圣人门生。下面只能扼要作些介绍。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比孔子年轻三十岁。一次，颜渊向孔子求教关于“仁”的问题。孔子开导他说：“学习仁学，就是要善于约束自己，一切依循礼义而行。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天下的人们便会赞佩你的仁德了。”颜渊一生注重道德仁义的修养，从不为金钱物利所动，吃得粗茶淡饭，穿的是粗织的布衣，却能自安自得。孔子知道颜渊的情况后赞叹地说：“颜渊的行为真是难得呀！吃的是粗粮，饮的是冷水，住在僻陋的环境中，却泰然处之，孜孜以学，不因贫穷而改变志向。若是别人的话，恐怕早就不能忍受了。”又说：“颜渊平时学习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听讲，看起来并不聪敏。但是，学完之后能落实到行动举止上，经过自己的思虑，能阐发精义，发明光大，颜渊实际上不愚钝。”还有一次，颜渊进见老师，谈得十分投机。孔子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受人赏识就出来行道济世；不被赏识就隐居修道，乐天听命，大概只有

你同我一样具有这种生活态度。”颜渊二十九岁的时候头发就白了，三十多岁就去世了。颜渊死时，孔子哭得很伤心，说：“自从颜渊来我的门下，弟子们都比原来亲近好学了。”后来，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徒弟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有个颜渊勤奋好学，他发怒生气很快就能消解，从不迁怒于人；有了过错立即改正，绝不再犯。只可惜他短命早死，剩下的这些学生们，没人能像他那样了！”

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年少十五岁。闵损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著称，对父母孝道有加，对兄弟谦让温和。孔子赞美他说：“他真是个孝子呀！顺事父母，爱护兄弟，从没给家庭招惹什么是非。”季氏在鲁国专权，把国君赶到国外，闵损很看不惯。听到闵损有好名声，季氏派人去请闵损出来当官，为自己办事。闵损一口拒绝，对使者说：“如果再来召我的话，我就渡过汶水到国外去。”

冉雍，字仲弓，比孔子年少二十九岁。冉雍有良好的德行，名声很好。他待人接物，就像会见贵宾一样谦恭有礼；有别人为自己办事，像承办祭祀大典一般虔敬谨慎。孔子认为冉雍很有道德心和政治才能，说：“像冉雍这样的人，有政德修养，无论任职于诸侯国家还是大夫家宰，都不会有人怨恨他。这样的人做君主也无不可呀！”冉雍家世不好，父亲是个身份卑贱的人。当时，虽然世卿世禄开始被打破，但主流仍是贵族执政。有人对孔子的话表示不满，说：“冉雍出身贫贱，怎能当君主呢？”孔子却说：“即使是耕牛所生的牛犊，只要毛色纯正，头角整齐，就具备了做牺牲的体德。有人顾忌这样的牛犊出身低贱而不用于祭神，神灵会嫌弃吗？不会的。人也是同样道理，只要品行端正，道德化身，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

冉求和子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具有政治天赋，不计较小仁小义，先后投身到当时政治的洪流中，一展宏图。

冉求，字子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虽然他也曾混迹于孔门，

但他志在仕宦，踌躇满志，后来做了季氏的家臣。季康子在起用冉求之前，曾经向孔子了解情况。季康子问："冉求仁义吗？"孔子回答："一千户人家的城邑，或者是能出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冉求可以治理得有条有理。至于他仁义不仁义，那我就不知道了。"一天，冉求请教孔子："先生，听到一件应该做的事，需要立即去做吗？"孔子回答："是的，应该立即去做，雷厉风行。"冉求走了出去。一会儿，子路走了进来，同样问孔子："先生，听到一件事可以立即去做吗？"孔子却说："有父亲兄长在，就应该先商量计议，怎么可以见风就是雨呢！"当时，公西华侍立于孔子一旁，听了老师两种矛盾的回答很不明白，问："请问先生，冉求和子路的问题相同，为什么解答却不一样呢？"孔子回答："问题虽同，因人而异。冉求生性畏缩多虑，所以我激励他；子路性急好动，所以我劝阻他。"

仲由，字子路，鲁国卞地人，比孔子年轻九岁。子路原来很粗野，喜欢逞勇斗力，气性刚猛爽直，头上经常插着公鸡羽毛，身上佩戴着公猪的牙齿，据说还戏谑过老师。为了改造子路，孔子陈设礼乐，不断诱导，终使子路开化，步入正途，穿起儒者的服装，备礼矢志，千方百计地求见孔子，希望做个好学生。子路经常向孔子求教治国理家之道，孔子说："领导民众要以身作则，凡事要先做个榜样给别人看，等到事情做好了，还要再慰劳鼓励一番。"子路请老师再多告诉自己一些，孔子说："只要能坚持不懈，这些就可以了。"子路又问："君子也崇尚武力吗？"孔子作色答道："不！君子崇尚的是仁义。一个有官有职的人只知勇而不知义，必会叛逆作乱；平民百姓尚勇而不尚义，就会为非作歹。"子路为人豁达大度，多于行而寡于思。孔子给他讲道理，总是先说明一点，然后让他实践。对待这种人，最怕刚说完一个道理接着又说一种道理，他会觉得无所适从。孔子曾忧虑地说："子路好勇超过了我，只是遇事不知深思熟虑，像他这种性子，我真担心他难得寿终呢！"

一次，季康子问子路的为人是否仁义，孔子说："他的情况同冉求差不多。即使穿着破袍子与穿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他也不会觉得寒酸。"

子路任鲁国季氏家臣多年，后来受卫国君主之邀，准备出任卫国的蒲邑大夫。临行前向老师辞行，孔子叮嘱他说："蒲邑之地多勇士，很难治理。我要告诉你的是：只要能恭敬谨慎，就能制服那些鲁莽的人；能宽和公正，人们就会归附听命；能冷静稳重处事，必不会辜负君主的重托。"子路到卫国后，卫国发生了蒯辄父子争国的事件。卫灵公的宠妃南子为立公子郢为太子，百般施计。太子蒯聩害怕被杀，逃到国外。灵公死后，南子想立公子郢，公子郢不肯，结果立了太子蒯聩的儿子公子辄。这时，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蒯聩在国外漂泊十几年，不甘心身死异邦，想夺回国政，便勾结孔悝一同作乱。在孔悝的帮助下，公子辄战败，蒯聩夺取君位。当时子路奉命外出办事，听到内乱的消息立即赶回卫都。城里逃出的人劝阻他："国君已经逃走，城门已经关闭，你还是赶快躲走吧，免得受牵累。"子路断然回答："我受人俸禄，怎能主人有难不管！"这时正好有使者回城，子路跟着混了进去。找到孔悝，孔悝正陪着蒯聩饮酒。子路吵嚷着说："孔悝身为大臣，叛变君主，怎能留下这种人呢！"说着，杀向孔悝。蒯聩急忙命令卫士捉拿子路，子路寡不敌众身受重伤，帽子落在地上。他大义凛然地说："一个君子，死也不能让帽子落地！"拾起帽子戴在头上，随后死去。

孔子门徒中，能言善辩的当属宰予和子贡了。宰予，字子我，口齿伶俐，小有辩才。一天，宰予对孔子说："一个父母过世守孝三年，时间岂不太长了？一个君子，三年不学习礼仪，礼仪就会废弛；三年不奏乐，音乐也会溃败。依我看，守孝一年足够了。"孔子生气地问："父母去世一年你就一切如常，你能心安吗？"宰予不在乎地说："我觉得无所谓。"孔子继续说："你若心安就那样

做吧！不过，君子为父母守孝，即使美味在口也不觉甘甜，美乐盈耳也不觉动听，所以才宁愿守孝三年的。”宰予退出去后，孔子斥责说：“宰予实在是不懂仁义！一个人出生三年，才脱离父母之怀；子女为父母守孝三年，还有什么不应该吗？”宰予学习不勤奋，好吃懒做，经常大白天睡懒觉，孔子自言自语地说：“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宰予不务实事，却侈谈三皇五帝事迹。一次，他对孔子夸夸其谈，孔子告诫他：“我不是上古时代的人，不知道过去的事，只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后来，宰予当了齐国的临淄大夫，参与了田常的政治阴谋，因罪全家遇难。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子贡的口才远远超过宰予，经常因空谈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器重颜渊，轻视子贡。一次，他故意问：“子贡，你觉得你同颜渊相比谁更聪明？”子贡听出了话音，转着弯子说：“我怎么敢同颜渊相比！颜渊举一反十，我不过举一反二罢了。”意思是说，自己是聪明过人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子贡头脑灵活，不死守教条，能灵活运用，切合实际。他自恃小聪明，问孔子：“老师觉得我这个学生怎么样？”孔子思忖了片刻，说：“你就像庙堂里的器物。”子贡问：“什么样的器物？”孔子回答：“宝器。”子贡听后很得意。陈子禽私下里问子贡：“你可否知道，仲尼广博的学识是怎么得来的。”子贡振振有词地说：“周文王和武王创造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失落，人世间仍在流传，只不过贤人记住了重要部分，不贤的人记住了细小枝节。孔夫子无所不学，因此，他的学识不仅仅是通过老师得来的。”陈子禽又问：“孔子每到一个国家，必然参与那里的政事。是他自己主动去的，还是人家请求他的？”子贡回答：“孔夫子的为人温文有礼，具有传统美德，因而受世人敬重。他关心政治和时代命运，如果这算他追求政治的话，也与别人不同。”还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请问老师，一个人富贵而不放纵，贫困而不谄媚，您看怎么样？”孔子高兴地说：“这很不错啦！不过，更高的标准

是，贫而乐道好学，富而谦虚有礼。”

田常想夺取齐国政权，担心高昭子、国惠子、鲍牧、晏圉几家大族从中阻挠，只得转移人们的视线，准备发兵攻打鲁国。孔子闻听此事焦虑不安，对学生们说：“鲁国是我们的祖国，祖茔所在，父母所居，现在危险到这种地步，你们怎能无动于衷呢？”子路一马当先请求到齐国，孔子不同意；子张、子石也请求，孔子还是不答应。子贡要求到齐国，孔子同意了。子贡来到齐都临淄，对田常说：“听说您要攻打鲁国，那将是大错特错。鲁国的城墙又薄又低，领土狭小，国君愚昧不仁，朝中大臣循私不公，士兵不愿意拼死打仗。因此，您不应同鲁国开战，而应攻伐吴国。吴都城墙高厚，国土肥沃千里，兵器锐利，士卒勇战。应该进攻吴国。”田常听后很生气，变了脸色说：“你不让我进攻容易的国家，却让我攻击强国，到底是何居心！”子贡不忙不慌地说：“您不必发怒。我听说，一个忧患在于朝廷的，必去攻打强国；忧患在于百姓的，才去攻打弱国。您的忧患在于朝廷，三次受封都没有成功，是因为朝中有大臣反对你。如果你占领鲁国打了胜仗，你的君主会更加骄傲，朝中大臣更加尊贵，而你自己却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别人心生猜忌。想将来办成大事，岂不更难？如果进攻吴国，人民在外拼命效力，大臣出战，朝中空虚，没有强臣的猜忌对抗，没有百姓的怪罪，反能使君主孤立，对你自己岂不更是有利？”田常闻听觉得言之有理，说：“好！可齐国军队已经开往鲁国了，现在离开那里攻打吴国，大臣们必会疑心我，该怎么办？”子贡回答：“这好办，只要你按兵不动，我到吴国去让他们出兵救鲁伐齐，你趁机而动就行了。”田常答应了，让子贡前往吴国。

子贡到吴国，进见吴王后鼓动说：“我听说，一个称霸诸侯的霸主是不会让属国被人消灭的，也不容许别人来抢夺自己的霸业。现在齐国为与吴国争强，要强占鲁国，我十分为陛下着急。如果吴国发兵救鲁国伐齐，既可得到好处，也可扬名诸侯。名义上挽

救了鲁国的危亡，实际上成就了自己的霸业，聪明人不会不干。”吴王很高兴，说道：“好极了！不过，吴国背后有越国，越王勾践不辞辛苦，训练士卒，想着复仇，等我平定越国后再救鲁国吧。”子贡不以为然地说：“越国不足忧，等到平定了越国，鲁国也早就让齐国吞并了，人们还会认为吴国害怕齐国，难以成为霸主。勇者不畏艰险，仁者不避困惑，智者不失良机，霸者不失属国。应把握时机，解救鲁国，制服齐国，向晋国显示吴国的强大，诸侯必会相约而来降服吴国。到那时，霸主非陛下莫属。越国的问题，我可以用陛下的名义，让越国出兵助战，使其国内空虚，问题就解决了。”吴王听后很高兴，派子贡到越国去了。

子贡到越国，越王闻悉到城外迎接，陪同子贡到下榻的住所，谦恭地说：“我们越国是个落后不开化的地方，你这样的贵客怎么屈尊来到这里呢？”子贡开门见山地说：“吴王准备救鲁伐齐，可是担心越国是心腹之患，说：‘等我伐破齐国之后，一定灭掉越国，斩绝祸根。’越国的处境实在是危险了。”勾践闻得此言，吓得面色如土，说：“过去，我曾不自量力想同吴国一决高低，结果惨败，我对吴国恨入骨髓。我为复仇，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使我报仇雪耻？”子贡献计说：“吴王为人凶残狠毒，国家长年征战，人民怨声载道，大臣心叛，伍子胥因谏言被杀，太宰嚭主政弄权，这样的国家难得长治久安。依我之见，您现在应派兵助吴，鼓励吴国穷兵黩武，同时出重金收买他们，卑词谦恭地奉承，他们就会放弃疑心，发兵伐齐。吴与齐交锋，如果输了，越国坐收渔利；如果赢了，必会北上中原同晋国相争，那时越国协助晋国伐吴，稳操胜券。”勾践听后很高兴，答应照计而行。勾践送给子贡黄金二十两，宝剑一柄，子贡婉言谢绝了。

子贡回到吴国，向吴王报告说：“我已经把大王的话郑重地通知越国，越王听后很害怕，说：‘寡人不自量力，得罪了吴国，遭受了屈辱，这是罪有应得。幸蒙吴王恩赐，得以保全首领和宗庙，

大恩大德至死难忘，岂敢存有邪念！’越国表示时刻听从大王的召唤。”没过几天，越王派大夫文种出使吴国，文种跪地叩头说：“东海罪臣勾践特派文种前来听命，并向大王请安。听说大王将兴正义之师讨伐齐国，救援弱小国家，辅佐周王室，越国特征召三千义军效命，勾践愿为大王打先锋。先献上铠甲二十套，以及一些刀枪剑戟，向大王致意！”吴王见状十分高兴，把此事告诉了子贡，并问：“勾践想要亲自随我作战，你看如何？”子贡立即阻劝，这不妥。借用别人的军队，再带着别国之君，这不合道义。可以收下他们的礼物，留下其军队。吴王接受劝告，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北上伐齐了。

子贡随后离开吴国，又赶赴晋国。子贡对晋君说：“没有周密的计划，无法应付紧急事变；没有训练军队，难以战胜敌人。现在吴军气势汹汹攻伐齐国，不胜还好说，如果取胜，必会逼近晋国，对晋国不利。”听得此说，晋君紧张地问：“那怎么办好？”子贡说：“应该加强戒备，严阵以待。”晋国依从了。随后子贡回到鲁国。

吴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艾陵遭遇，将齐军打得大败，乘胜向晋国进发。吴王夫差与中原诸侯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盟会，正当夫差争当霸主的时候，越王勾践率大军袭击吴国，吴都告急，夫差获悉立即率军回救。后来，吴国还是被越国灭亡了。

子贡不但善于投机政治，还善于经商致富。他能根据季节的变化和各地物资需要，巧妙地囤积转卖，获取暴利。他喜欢宣扬别人的优点，却也不避讳别人的缺点。子贡家境富裕，拥有万贯家财，晚年死在齐国。

颛孙师，字子张，陈国人，小于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是一个言语冒失、不拘小节的人，经常招惹是非，孔子经常教导他。一次，子张问孔子怎样才能求得官位，孔子说道：“多听别人的话，经过自己的分析，把不妥当的内容去掉，得当的

话再去讲，这样说的错话就少了。”

“多观察别人行事，觉得不妥的事不做，做事谨慎小心，才会少做后悔的事。少说错话，少做憾事，表里如一，官位便会不求自得了。”又一次，子张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两国遭遇困境。他问道：“怎样的为人才能处处行得通？”孔子说：“一个人说话诚实，对人恭敬，就是到了蛮荒之地也行得通。相反，言不由衷，倨傲不恭，就是在自己的家乡也行不通。”子张恭敬地把这些话书写在束腰的带子上。还有一次，子张问：“请问先生，一个士人怎样算是显达？”孔子反问：“你说的显达是什么意思？”子张解释说：“在诸侯国中有声誉，在卿大夫那里也有声誉。”孔子纠正道：“那是声闻，不是显达。显达，是正直好义，谦恭退让；声闻，是外表仁义，行为悖理。”

原宪，字子思。子思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耻，孔子答道：“国家政治清明，身居官位白吃薪俸毫无建树；国家混乱的时候，不能修身行道。这两种人都可耻。”子思又问：“一个人好胜、多怨、贪欲都能克制住，算得上仁吗？”孔子回答：“做到这些可真是难能可贵了，至于说是不是仁，我不晓得。”孔子死后，子思退居乡野，到荒山中居住。这时子贡在卫国当了高官，荣华富贵。一天，他乘座四马车舆，带着一队卫士，趾高气扬地来到荒山之中看望子思。子思穿戴着破衣褴衫会见子贡，子贡觉得很不光彩，便假装着问道：“怎么！你是不是病了？”子思见子贡那副样子很是生气，没好气地回答：“一个人没有钱财叫贫，而学了一身道术不能付诸行动才叫病。我这寒酸样子只是贫，不是病！”子贡听后觉得很不是滋味，惭愧不已，闷闷不乐地走了。后来，每当他想起这件事都很懊悔。

司马迁说：“后世学者谈论孔门弟子事迹，有的赞誉过度，有的讥评失真，大多依据传闻罢了。”从我们采撷的孔门弟子的事迹看，虽然他们天性各异，有的善言，有的善政，有的善德，有的

善勇，但都受到孔子的谆谆教诲，对他们日后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因材施教，使得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能，展现出孔门生徒一幅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崔一心）

参考资料：

《论语》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蒯辄父子争国

卫国从西周末年起，中经整个春秋时期，贵族内部争权斗争迭起，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屡屡发生，致使卫国变得更加动荡和脆弱。蒯辄父子争国，就是卫国内部权力斗争中腥风血雨的惨痛一幕。

卫襄公九年（前 535)，襄公死。卫国的齐恶向周天子报告丧事，同时请求赐予恩命。周天子派郕简公去卫国吊唁，同时追命襄公说："叔父升天，在我先王的左右，以辅佐事奉上帝，我岂敢忘了高圉、亚圉?"

当初，襄公有个小妾叫婤姶，很受宠爱，有孕后曾梦见有人对她说："我是康叔，一定让你的儿子享有卫国，你的儿子应取名'元'"。婤姶醒后十分惊讶，急忙去问孔成子。成子说："康叔是卫国的始祖。我前几天也梦见康叔对我说：'立元为国君，我让羁的孙子圉和史苟辅佐他!'"这时，史朝来拜见孔成子说道："我梦见康叔对我说：'我将要命令你的儿子史苟和孔烝钼的曾孙圉辅佐元，管理卫国'。"等到婤姶生下孩子，果真是个男孩，就把此梦告诉了卫襄公。襄公说："这是上天安排的!"于是就给这个男孩取名叫"元"，恰好襄公夫人未生儿子，于是便立元为嫡子。公子元即位，他就是卫灵公。

卫灵公十三年（前 522)，灵公很看不起司寇齐豹，就剥夺了他的官职和封地鄄。灵公还很讨厌北宫喜和褚师圃，总想除掉他们。这时，公子朝和襄公夫人宣姜私通，公子朝害怕灵公知道，所

以很惧怕灵公，总想乘机发动祸乱。就这样，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和公子朝终于发动了叛乱。

起初，齐豹把宗鲁推荐给灵公做了骖乘。齐豹将要发动叛乱时，对宗鲁说："灵公这个人不好，您是知道的，还要和他一起乘车了，我要杀死他，免得您也身遭灭顶之祸。"宗鲁却回答说："我由于您的推荐才能奉事灵公，又由于您在灵公面前极力吹嘘我，我才能受到灵公的亲近。虽然灵公不好，我也知道；但听到有祸难就逃走，这不是使您的话没有信用了吗？您办您的事吧，我不打算离开灵公，即使死了，我也事奉灵公到底，绝不后悔。"齐豹无奈只得作罢。

这年的六月二十九日，卫灵公正在平寿，齐豹发动叛乱。灵公听到叛乱的消息后，马上坐上车子，由庆比驾车，公南楚做骖乘，华寅乘坐副车，驱车回到国都。齐豹率兵紧追灵公也回到国都，齐豹用箭射伤了灵公，射中了南楚的背，灵公又仓皇逃出国都，到了死鸟。

这时，齐侯派公孙青到卫国聘问。已经走出国境，听到卫国发生叛乱，就派人回去询问齐侯该如何才好。齐侯说："卫侯还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就是卫国的国君。"于是公孙青就跟着到了死鸟，见到了灵公。公孙青请求按照命令行聘礼。灵公却辞谢说："逃亡的人没有才能，失守了国家，坠落在杂草丛中，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您执行君王的命令。"公孙青说："寡君在朝廷上命令下臣说：'卑微地去亲附执事。'下臣不敢有三心二意。"灵公说："君王如果能照顾到先君的友好，光照敝邑，镇抚我们的国家，卫国的百姓一定感激齐侯的大恩大德的！"公孙青听后就停止了聘问。

不久，齐国出兵平定了齐豹之乱，杀死了齐豹，公子朝、褚师圃等人逃亡到晋国。这年的八月十二日，灵公又杀掉了宣姜。就这样，卫国在齐国的帮助下，平定了齐豹之乱，卫国国内又重新安定起来。

不过，从此以后灵公更加专横跋扈，残暴无道，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之，灵公与夫人南子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致使卫国国力衰落。

灵公三十九年（前497），灵公驱逐了公叔戍。原来，有一次，公叔戍上朝请求设享礼招待灵公。退朝后，公叔戍见到史鳍，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史鳍说："您必然要招来祸患了！您富有但国君贪婪，祸患恐怕就要降临到您的身上了！"公叔戍也后悔地说："是这样啊，我没有事先与您商量一下，这是我的罪过。不过，国君已经应允我了，您看该怎么办呢？"史鳍说道："没有妨害。您谨守臣道，可以免祸。富有而能谨守臣道，一定能免除祸难。"但是，灵公还是视公叔戍为眼中钉，这时灵公又听说公叔戍打算去掉夫人的党羽，夫人向灵公控告说："戍要发动叛乱。"灵公于是马上派兵去捉公叔戍，将他逐出了卫国。

卫灵公的专横无道和南子的淫乱行为早就激起太子蒯聩的不满，他伺机想要杀掉南子。这年的春天，蒯聩与他的家臣戏阳速商议说："跟我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我时，我用眼色看你，你就杀死她。"戏阳速说："是"。等到南子接见蒯聩时，戏阳速后悔，没有动手。蒯聩多次使眼色示意他，戏阳速都不肯向前。南子看到太子的脸色，十分恐惧，知道太子想要杀她，急忙大叫道："太子想杀我！"灵公大怒，太子被迫逃到了宋国，不久又逃到晋国。灵公将太子的党羽全都杀死了。

后来，太子蒯聩对别人说："戏阳速加祸于我。"戏阳速听到后十分生气，对告诉他的人说："太子才是加祸于我呢。太子无道，派我杀死他的母亲。我不答应，他就会杀了我，如果我杀了夫人，他就会把罪过推在我身上而解脱自己。我所以答应而不动手，就是以此暂免一死。俗话说：百姓用信用保全自己，我就是用道义来作为信用的。"

卫灵公四十二年（前494）的春天，灵公在郊外游玩，公子郢

为他驾车。郢是灵公的小儿子，字子南。灵公怨恨太子蒯聩逃亡，就对郢说："我没有嫡子，打算立你做继承人。"公子郢没有回答。过些时候灵公又对他那么说，公子郢说："郢不足以有辱国家，您还是改变主意吧。君夫人在堂上，卿、大夫、士在下边，您没有和他们商量，我听从了只能是有辱您的命令。"

到了夏天，卫灵公死了，南子对郢说："先君命令你做太子，你为什么不答应？"公子郢回答说："逃亡在外的太子蒯聩的儿辄还在卫国，我怎么能继承君位呢？"于是卫人就立辄为国君，这就是卫出公。

六月的一天，赵简子想送蒯聩回国争夺君位，于是就让阳虎带着十多个人装扮成卫国人，身穿丧服，假装从卫国来晋国迎接太子，简子为蒯聩送行。卫出公听到消息，急忙派出军队攻击蒯聩。蒯聩不能回卫国，又遭到卫军的袭击，只好跑到宿地自保，卫出公也就停止了进攻。

出公十二年(前481)初，孔圉文子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为妻，生了悝。孔文子的仆人浑良夫英俊漂亮，孔文子去世后，浑良夫与悝的母亲私通。太子在宿地，悝母便让浑良夫到太子那里。太子对浑良夫说："假如你能协助我回国争夺君位，我将赐你大夫所乘的车子，还赦免你三种死罪。穿紫衣、袒裘服、带宝剑，都不在死罪之中。"二人订立了盟约，太子还允许悝母做浑良夫的妻子。

这年的十二月，浑良夫和太子蒯聩暗地里回到卫国，暂住在孔圉文子的外菜园子里。当时，天黑以后，两个人身着妇女衣服，头蒙围巾，由寺人罗驾车，乘车来到孔家门口。孔氏的家臣栾宁盘问他们的姓名，他们自称是姻戚家的侍妾，于是顺利地进入孔氏家，直抵伯姬住所。吃完饭，悝母持戈先到孔悝住所，太子与五人身穿甲胄，载着公猪随后而行。伯姬把孔悝逼到墙角，强迫他订立同盟，并劫持悝登台，逼他召集群臣。这时栾宁正要饮酒，烤肉还没有烤熟，就听到外面一片乱糟糟的响声，派人告诉子路，

然后又召人驾上坐车，在车上边喝酒边吃肉，护奉着出公辄逃奔到鲁国。

子路闻讯后赶到，就要进孔氏宅时，遇到了刚刚逃出孔家的子羔。子羔说："门已经关闭了。"子路说："我暂且去看一看。"子羔说："来不及了，你不要跟着悝去受难啊！"子路说："吃了他的俸禄，不能看他受难不救。"子羔见说不动子路就独自逃走了。子路随后进入，当走到孔氏大门口时，公孙敢关紧大门说："不要再进去了！"子路说："你是公孙吧，拿着别人的俸禄却躲避别人的危难，我不能这样做。享受人家的俸禄，一定要拯救人家的危难，这才是君子的品德。"这时有使者出来，子路才趁机进去。子路对孔氏家人说："太子怎么用得着孔悝做帮手？即使杀死他，也一定有人接替他进攻了。太子缺乏勇气，如果放火烧台，必然会释放孔叔。"太子听后，十分害怕，让石乞等二人下台阻挡子路，二人用戈击中子路，把帽缨也截断了。子路说："君子死，帽子不能掉到地上。"说着，系好帽缨死去。孔子听到卫国动乱的消息后说："唉！柴会回来的，但是子路可回不来啊！"孔悝终于立太子蒯聩为卫君，这就是庄公。

庄公即位后，怨恨大夫们不迎立他为国君，想要把他们全部除掉，就先对司徒瞒成说："我在外边遭遇忧患很久了，请你也尝一尝吧！"瞒成回去后告诉了褚师比，二人感到将要有杀身之祸，于是想攻打庄公，阴谋叛乱。不料，叛乱计划泄露，二人被迫逃亡到宋国去了。

卫庄公二年（前479），庄公派鄢武子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向周天子报告说："蒯聩得罪了君父、君母，逃亡在晋国。晋国由于王室的缘故，没有抛弃兄弟，把聩安置在黄河边上。上天开恩，使我得以继承君位保有封地，故而聩特派下臣鄢武子谨向周室报告。"周天子派单平公回答说："鄢武子把好消息已经告诉我了，回去对叔父说：我赞许你继承先世，恢复你的禄位。要恭敬啊！这

样才能得到上天的赐福。如果不恭敬上天，就不能受到上天的赐福，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啦！”

这年六月，庄公在平阳设宴招待孔悝。孔悝喝醉了酒，大骂庄公无道。庄公大怒，想杀了孔悝。孔悝十分害怕，随后乘车准备逃走。到达西门时，派副车回到西圃宗庙里去取神主匣子。子伯季子起初是孔氏的家臣，近来升官到庄公那里。他听说孔悝逃走，马上追赶他，在路上碰到取神主匣子的人，就杀了他而坐上他的车子。许公为奉孔悝的命令回去迎接取神主匣子的人，正好碰上子伯季子，许公为说：“和不仁的人争高下，没有不胜的。”于是就让子伯季子先动手，季子射了三次箭，都没射中，许公为只射一箭就将季子射死，然后取回神主匣子，与孔悝一起逃亡到了宋国。

有一天，庄公对浑良夫说：“我继承了先君的位子，但没有得到他的宝器，该怎么办？”浑良夫让执烛的侍者出去而自己代他执烛，然后说道：“逃亡在外的国君是您的儿子，召他回来可以量才录用。如果没有才能就废掉，这样宝器就可以得到了。”后来庄公的侍从将浑良夫的话告诉了太子，太子劫持了庄公强迫和他盟誓，而且请求他杀掉浑良夫。庄公说：“我与他曾经盟誓过，赦免他死罪三次。”太子说：“那么就请您在三次以后有罪再杀了他。”庄公答应了。不过，从此太子与庄公就结下了怨恨。

卫庄公三年（前478）春天的一天，庄公在藉圃造了一座刻有虎纹的小木屋。建好后，要找一个有好名声的人和他在里面吃第一顿饭。太子听说后极力劝告庄公请找浑良夫。浑良夫接到庄公召见的消息后，坐上两匹公马驾着的车子，穿上紫衣服狐皮袍就去赴宴。来到以后，他敞开皮袍，没有解下佩剑就吃饭。太子一见这情况，马上派人牵出浑良夫，举出三条罪状后将浑良夫杀了。

这年六月，晋国的赵鞅（赵简子）派人对庄公说：“君王在晋国的时候，我是主人。现在请君王来一趟，以免除我的罪过。不

这样，寡君恐怕会说这是我授意这样的。”太子极力阻挡庄公不要去，随后又假惺惺地对晋使者说：“寡君已经取得君位，所以不想再提过去在晋国避难的情况。”太子的目的是想挑起晋国对庄公的不满，果然，赵鞅听说后，十分生气，于是派兵包围了卫国。庄公急向齐国求救，齐君派国观、陈瓘率兵救援卫国，晋国只得退兵。

十月，晋国再次攻打卫国，将要进入内城时，赵简子对人说：“叔向曾说过：‘仗着动乱而灭亡别国的，没有后嗣’。”卫人趁机赶走了庄公而和晋国媾和。晋国立了卫襄公的孙子般师为国君。十二月，齐国讨伐卫国，俘虏了般师，改立公子起为国君。

卫君起元年（前 477），卫国的石圃又赶走了卫君起，起逃亡到齐国。卫出公辄又从齐国返回卫国赶跑了石圃，做了国君。

卫出公回国后，夺取了公孙弥牟的封邑，罢除了司寇亥的官职，又把公文懿子的车子推下池塘里。不久，公孙弥牟、公文懿子、司寇亥等人发动叛乱，赶走了出公。出公打算到蒲地去，拳弥说：“晋国没有信用，不能到蒲地去。”出公又打算到鄄地去，拳弥说：“齐国和晋国在争夺我们，不行。”出公又准备去泠地，拳弥又劝阻说：“鲁国不足以亲附，我请求您到城钼去，以联系越国。越国有能干的国君。”于是出公就到了城钼。

出公在城钼问子赣说：“我能回国继承君位吗？”子赣回答说：“我不懂”。然后私下对人说：“从前成公避居于陈国，宁武子、孙庄子在濮宛结盟，然后辅佐成公回国继位。献公避居于齐国，子鲜、子展在夷仪结盟，然后辅佐献公回国。现在国君再次避居在外，内部没有听到有像成公和献公时代的亲信，外部没有听到有像成公和献公时代的大臣，出公又怎么能回国呢？《诗经》上说：‘得到人才能强大，四方将会顺服。’如果得不到这样的人，四方把他作为主子，取得国家又怎么能谈得到呢？”

卫出公逃亡在外时时不忘回国继位。到了公元前 469 年，他

准备靠着祝史挥作内应回国继位。卫人以此为患。公文懿子听说后，进见公孙弥牟，请求赶走祝史挥。出公知道消息泄露，又派人到宋国想求助越、宋军队帮助他回国。不久，叔孙舒领兵会合越国的皋如、舌庸、宋国的乐茷送回出公到卫国。公孙弥牟想迎接他，懿子说："国君执拗而暴虐，他回国必定毒害百姓。"二人又去见皋如，对他说："您是打算大举灭亡卫国呢，还是把国君送回来就算了呢？"皋如说："寡君的命令没有别的，把卫君送回来就算完了。"公孙弥牟回来后召集群臣征求意见，说："国君带着蛮夷大军攻打国家，国家差一点灭亡了，你们说接纳国君吗？"群臣说："不要接纳。"公孙弥牟重重地贿赂越人，请求他们退兵。然后大开城门，接纳卫君。出公不敢进去。卫人于是立了出公叔父黔为君，这就是卫悼公。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卫康叔世家》

《左传纪事本末》

楚惠王灭陈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攻灭陈国，使之成为楚国的一个县。后来，楚庄王为了提高自己政治威望，扩大政治资本，以便此后号召天下诸侯，取得霸主的地位，决定恢复陈国。于是派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二人回国，协助陈成公主持朝政。从此陈国完全降服于楚国，不敢背离了。

公元前543年，陈国发生内乱，楚灵王不但没有以霸主的身份去安定陈国，反而打着“安定尔国”的旗号再次灭了陈国，把陈国的领土并人了楚国的版图。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用厚重的礼物和甜言蜜语把蔡灵侯骗到申地，预先设下伏兵，在酒席筵上活捉了蔡灵侯及其随行人员。随后以“杀父夺权”的罪名杀了蔡灵侯，并出兵消灭了蔡国。把蔡灵侯的太子杀了去祀冈山，最后将蔡国的领土改置为楚国的蔡县。

楚灵王灭亡蔡，是干了楚庄王想干却又认为不妥而没有干的事。这件事使诸侯认清了楚灵王“贪而无信”的面目。

楚灵王的胡作非为，终于导致了众叛亲离的结果。公元前529年爆发的宫廷政变，使他王冠落地，国败身亡。楚平王即位后，恐怕国人和诸侯会因他是采用欺诈手段取得王位而反叛他，因此，对内安抚百姓，整治政令教化，对外结交诸侯，退还原来陈国的土地，立原来陈国悼太子的儿子妫吴为陈侯，是为惠公。

楚昭王十年（前506），吴国大军攻破楚郢都，吴王阖闾在郢

都派人到陈国要求陈怀公来都拜见他。陈怀公知道消息后犹豫不决，去吧，陈国与楚国素有旧情，结有盟约；不去吧，会得罪吴王，对弱小的陈国是极为不利的。于是，陈怀公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他说："诸位大臣，愿意继续与楚国友好的就站在右边，愿意与吴国结友的就站在左边。"这时大夫逢滑上前对陈怀公说："我听说，国家兴盛，就会福星高照，天降祥瑞；国家衰弱，就会祸光四起，天降灾害。现在吴国还没有达到福星高照、国富民裕的地步，楚国也还没有到了天降灾害、国弱民贫的境地。所以说我们不能放弃楚国，但也不能服从吴国。晋国是天下诸侯的盟主，如果陈国服从吴国而远离晋国，结果会怎样呢？"陈怀公说："国破君亡，必定招致灾祸。"逢滑接着说："陈国面前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现在是服从吴国，还是服从楚国就是一例。我还听说：'国家兴盛就必须视民如伤，这样才能使福祥降临；国家灭亡就是因为把百姓视为土芥，这样必然招致祸害'。如今楚国虽然无有德行，但它也不杀害自己的百姓。而吴国却日弊已久，暴骨如莽，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德行。所以说吴国虽新得意，导致楚王逃亡，但楚国必定重振雄威。况且陈国与楚国旧有交情，不可背弃。"陈怀公听了逢滑的一番说，感觉很有道理，于是就借口有病辞谢了吴王。

陈怀公四年（前491），吴王夫差又召怀公。怀公恐惧，前往吴国。吴王夫差对他前次不听召唤非常恼怒，就扣留了他。不久陈怀公死在吴国。陈国听到陈怀公客死吴国的消息后，就立怀公的儿子妫越为侯，这就是陈闵公。

陈闵公元年（前490），吴国派大军征讨陈，夺取了三个城邑就退兵了。转年，即楚昭王二十七年，吴国又来征讨陈国，陈闵公急派使者向楚国求救。楚昭王听到消息说道："我的先君与陈国订有盟约，现在陈国有危险，我不能不派兵去救援。"于是派楚军去救陈国，楚军驻扎在城父（今河南宝丰东）。这年十月，楚昭王病倒在军中，天空有红色云霞像鸟一样，夹着太阳飞了三天。昭

王询问周王室太史，太史说："这对楚是有害的，但是可以把灾祸移到令尹和司马身上，那样灾祸就可以免除。"这时，楚令尹和司马听到周太史的话就请求昭王向神灵祷告，让他们代替昭王，以免除楚国的灾害。楚昭王却说："令尹和司马犹如我的胳臂和大腿，现在把灾祸转移到胳臂和大腿上，难道能够免除我身体的病害吗?"不听令尹和司马的请求。于是就占卦问病因，卦卜说是黄河作祟，大夫们请求祭祷河神。昭王又说："自从我先祖受封，望祭的大川大河不过是长江、汉水，黄河神我们从来没有得罪过。"于是他止住且不许去祭祷河神。这时孔子正在陈国，听到楚昭王这些话，说道："楚昭王通晓大义，他不应该失去国家啊!"

昭王病得很厉害，于是他喊来各位公子和大夫们说："我没有才能，两次使楚国军队遭受屈辱，现在能够享天年，寿终正寝，是我的幸运啊!"于是推让他的大弟公子子西做国王，子西不肯接受。又推让二弟公子子期，也不肯接受。又让给三弟公子闾，让了五次，公子闾才答应做国王。过几天，楚昭王就死在军营里。公子闾说："君王当时病得很厉害，舍弃自己的儿子，把王位让给我们，我当时答应他的原因是宽慰他的心意。今天君王去世了，我怎敢忘记君王推让的好心!"于是就与子西、子期商量，决定暗地里派出军队迎接越国女子生的儿子章来继王位，这就是楚惠王。然后撤兵回京，安葬了昭王。

正当吴国军队进攻陈国的时候，孔子与其弟子们正住在陈国。由于战乱，孔子不得已离开。当时，楚国有一位大夫名叫诸梁，采邑在叶（今河南叶县内），人称叶公，正驻守负函（今河南叶县内）。大概叶公是当时一位有贤名的政治家，所以孔子离陈后就打算到负函去看他。

当孔子走到陈、蔡两国边界时，驻扎在城父的楚昭王便派人来聘请孔子。孔子正要前往城父答谢昭王，这时陈、蔡两国的大夫知道了这件事，暗地里商议说："孔子是有才德的贤者，过去他

所指责讥讽的都切中各诸侯的弊病。近来他长住在陈国，还想去蔡国，我们两国的大夫们的为政措施多与他的主张不合。现在，楚国是个大国，却来招聘孔子，孔子在楚国受到重用的话，那么我们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们处境就危险了。”于是双方就派了一些服劳役的人围困孔子于野外。孔子及其弟子在陈、蔡边界上被困，绝粮七天，随行弟子饿病冻馁，许多人都爬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弟子和随从人都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却仍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唱歌不止。

楚昭王听说孔子被困于陈、蔡两国边界上，就派出军队去援救他，这样才使得孔子得以脱身。不久，楚昭王又派人到负函奉币来聘请孔子，并想把七百里的封地赐给他。令尹子西劝阻道：“大王派往诸侯各国的使者，有比得上子贡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令尹群臣有像颜回这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各主事官佐有像宰予这样的人吗？”昭王说：“没有。”子西接着说：“况且楚国始祖受封于周室，封号是子男爵，封地五十里。现在孔子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召公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如果用他为臣，我们楚国世世代代统辖的几千里土地还能保得住吗？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统管的不过百里之地，但最终能称王天下，现在让孔子占有七百里土地，再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弟子辅佐，这不是楚国的福音啊！”昭王听了子西的一席话，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这年秋天，楚昭王就死在城父军中。

楚惠王即位以后，面对吴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决心重振楚国昔日的雄威。他对内安抚百姓，训练军队，增强军事力量，对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希望恢复楚、陈、蔡的联盟。

公元前484年，吴国借齐景公刚死，国内不稳定之机决定伐齐。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夫差赶快攻越国，消除这个心腹之患，不

要忙于进攻齐国。吴王夫差为了北上称霸，根本不听伍子胥的话，于是亲率大军向齐国进攻，在艾陵（今山东泰安东南）打败了齐军，吴王得胜而回。回到吴都后，马上派人去陈国，要求陈闵公来吴都拜见吴王。陈闵公非常害怕，恐怕再被吴王杀死。但慑于吴国的雄威，又不得不去。

陈闵公屡次不遵守与楚国的盟约，和吴国友好，激起楚惠王的不满，于是派子期率领军队去攻伐陈国。吴国派延州来季子救陈。他对子期说："我们两国的君王不专修德行，却力争诸侯，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让他们遭受战火的洗劫。我请求先退兵，希望您也随后退兵。"子期不听。楚军占据陈四个城邑而回。

公元前480年夏天，楚国派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伐吴。楚军驻扎在桐汭。陈闵公派公孙贞子到吴国，请求吴王出兵援救陈国，以防止楚攻陈。当公孙贞子走到良地的时候，得病而死，其他的人就带着贞子的尸体继续向吴国前进。吴王派太宰嚭去迎接。太宰嚭对陈国使者说道："公孙贞于途中得病而死，你们带着尸体来拜见吴王，这成什么样子？你们还是回去吧！"这时陈人芋尹盖说道："陈侯知道楚王行不道之举，派兵攻打吴国，想灭亡吴国。陈国与吴国结下了盟约，陈侯想世世代代服侍吴王。如今企图拆散陈、吴联盟的阴谋，不幸贞子在来吴国的途中，客死良地，我们只得带着他的尸首前来吴国，以表示陈侯恳请救兵的决心。可是吴王却命我们回去，说是把尸体带到吴国，是对吴国的侮辱，会给吴国带来灾难。吴王的这作法是把陈侯的恳请置于草莽之中，我们感到非常伤心。我听说：'事死如事生，这叫做礼'。于是天下就有了朝聘而终，用尸首将事的礼仪；又有了朝聘而遭受丧事的礼仪。如果不用尸首将命，一旦遭受丧事就回去，这是不符合礼仪的。以礼仪治理百姓，百姓就会心悦臣服，天下太平。现在吴王这种'死而弃之'的作法是不合于礼的，是无法在诸侯中树立威信的！"吴王听到芋尹盖的话，无奈只得接纳了陈侯派来的使者，

并答应派吴兵救援陈国。

这时秦国想乘楚国侵陈之机，进攻楚国，于是先派使者到楚国，以观看楚国宝器为名，刺探楚国的国势，楚惠王急忙召来令尹子西说道："秦国派来使者想看一看楚国的宝器，你看该怎么办呢?"子西回答说："我也不知如何才好。"楚王又召来昭奚恤问他该怎么办。昭奚恤回答道："秦国名为观看楚的宝器，实际上是想刺探楚国的动向，以便向楚国发动进攻。"楚惠王于是让昭奚恤去接待秦使者。昭奚恤派出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内，又在西门的东面筑起两座坛，在南面筑起四座坛，在西面筑起一座坛。秦使者一到，昭奚恤就对他说："你是楚国的客人，就请上坐东南的座了吧。"然后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叶公子高等人依次就坐，昭奚恤就在西面坛上。坐定后，昭奚恤对秦使者说："您想观看楚国的宝器。治理百姓，充实粮仓，使楚国的老百姓各得其所的，令尹子西在此；奉执珪璧，出使诸侯各国，解除仇恨之难，结交两国之欢，使得两国无兵乱之忧的，子敖在此；防守边界，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来侵犯楚国的，叶公子高在此；整饬军队，修治兵戎，以抵挡敌人向楚国发动进攻，并且能够率领百万之众，赴汤蹈火，提着白刀，置生死于不顾的，司马子期在此；胸怀霸王的雄风摄治乱事的遗风的，昭奚恤在此。"秦使者听了昭奚恤的一番话，又看到楚国有这么多文武兼备的大臣，非常恐惧，急忙告辞回国了。秦王听到这些情况后，就放弃了对楚国发动进攻的想法。由于吴国出兵救援陈国，再加上秦国对楚国的威胁，楚惠王不得不退兵。

公元前479年，楚国发生了白公胜之乱。原来，白公胜是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在费无极的谗害下，太子建被迫离楚出逃到宋国，后来又到了郑国。不久，太子建被郑国人杀害。伍子胥带着胜，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吴国。楚惠王三年（前487）令尹子西将胜接回楚国，把他安置在和吴国接壤的白邑（今河南息县

东），号为白公。白公胜为报杀父之仇，多次要求进攻郑国，但遭到子西的阻挠，于是他就把对郑国的仇恨转嫁到子西的身上。他还认为自己是楚平王的嫡长孙，是楚国王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所以他想杀掉子西和司马子期，从惠王那里夺回王位。

白公胜时时寻找复仇的机会。是年，吴军进攻楚国的边境慎地（今安徽颍上北），白公胜领兵打败了吴军，缴获了许多甲杖武器。他请求将战利品献给朝廷，楚惠王同意了。白公乘机率领军队进入郢都，在宫廷内杀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劫持了楚惠王，控制了宫廷。

陈闵公听到楚国发生白公胜之乱，便派出大军侵犯楚国，楚军大败。不久，驻守在蔡地的叶公子高率领军队来到郢都，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使楚惠王恢复了王位。随后，惠王派公孙朝率领楚军大举进攻陈国，一举将陈国吞并。灭掉陈后，将它的土地纳入楚国的版图内。

此后，楚国又灭亡了蔡国、杞国、莒国，将地盘扩展到泗水一带。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楚世家》、《陈杞世家》、《孔子世家》。

《左传纪事本末》

白公胜之乱

楚灵王十二年（前547），楚公子弃疾（后改名为熊居，即楚平王）奉命到蔡国聘问。公子弃疾在蔡国与郹阳（今河南新蔡）封人[1]的女儿关系暧昧，等到公子弃疾回国的时候，封人的女儿也随他私奔到了楚国，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建。楚平王继位为国君后，把建立为太子，派大夫伍举的儿子伍奢为师，大夫费无极为少师。

费无极是一个专会吹牛拍马的奸臣，太子建很不喜欢他。费无极担心将来会失宠，便设法诬陷太子，希望博得楚平王的宠爱。太子建十五岁的时候，一天费无极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已经成年了，可以为他娶亲了。"费平王为太子在秦国订了亲事，派费无极到秦国替太子迎娶新妇。楚平王六年（前532）正月，迎亲的队伍回到楚国郢都的城外，费无极抢先跑回城内，在楚平王面前无耻之极地说："秦国的这个姑娘漂亮极了，可算是天下无双，君王何不自己娶了她，为太子建另外订一门亲事不也一样吗？"楚平王见到秦国的姑娘后，顿时淫心大发，于是就自己娶了这个秦国姑娘，生下了熊珍。另外为太子建娶了一位齐国姑娘。从此，费无极得到了楚平王的宠幸，但是他怕太子建继位后会复仇处死自己，便挖空心思地图谋暗害太子。不久，他又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称霸，是因为他们靠近中原，而我们楚国却处于偏僻的南方，所

---

① 封人：春秋各诸侯国的官名，掌管典守封疆事务。

以难于和晋争雄。如果扩建城父（今河南宝丰东）城墙，并派太子建到城父去驻守，这样太子在那里控制北方，君王在郢都控制南方，我们就便于向中原扩展，称霸天下了。”楚平王大喜，接受了他的意见，命太子建驻守城父，派伍奢跟随他。

费无极又日夜在平王面前毁谤太子建说：“自从我把秦国女子送进您的后宫，太子非常怨恨我，对您也不能说没有埋怨，您多少要有点戒备啊！并且我听说太子建在城父，独揽兵权，对外结交齐晋两国，打算将方城山以外的地方控制起来，自立为王，背叛楚王。”楚平王听信了他的谗言，把伍奢召回查究这件事。伍奢知道是费无极谗害太子，就对楚平王说：“大王怎么能听信小臣的话呢？大王先前收纳了太子建的未婚妻，已经够严重的了，如今王又何必听信谗言破裂自己亲骨肉的感情呢？”楚平王有些后悔，这时，费无极又忙说：“现在大王不制住太子建等到他叛乱之时，您后悔也来不及了。”楚平王终于下了决心，把伍奢拘禁起来，还派遣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

奋扬是一个正直的人，平时深恶费无极的为人，也知道太子建的冤屈，便事先派人去通知了太子，自己后到城父。太子建听到消息，就带着自己襁褓中的儿子公子胜，连夜逃跑到宋国去了。奋扬到达城父之后，叫城父的大夫逮捕了自己，押回郢都。楚平王审问他说：“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奋扬说：“消息是我告诉太子的。”楚平王听到后无比震怒，大声吼道：“你为什么要违背我的命令？”奋扬沉着地回答说：“当初君王派下臣到城父时说过，‘你侍奉太子应该像侍奉我一样。’下臣不才，不敢苟且反复，我放走了太子建是遵照君王当初的命令，不忍心执行君王后来的命令，虽然我知道错了，但已经来不及了。”楚平王沉吟了一下，又问：“你为什么敢回来呢？”奋扬说：“下臣没有完成君王交给我的杀死太子的使命，如果召我而我又不回来，岂不是又一次违背了命令。这样的人，又能够往哪里逃呢？”楚平王这

时已经冷静下来了，感到奋扬的话说得很好，就没有杀他，让他回城父继续担任司马去了。

太子建从城父逃往宋国后，楚平王听从费无极的话，诬陷伍奢和太子一起造反，强迫伍奢写亲笔信给他的儿子伍尚和伍员(伍子胥)，叫他俩赶快到郢都来向平王谢恩，平王就可以免除伍奢的死罪。伍奢有口难辩，明知是费无极以赦免自己为由，召他们两人回来，企图斩草除根，但无奈只得照平王和费无极的意思写了。兄弟俩接到父亲的亲笔信后，知道是费无极的奸计，便商量好伍尚回去见父亲，死在一块儿，伍员逃走，等待日后报杀父之仇。伍奢听说伍子胥没有回来，叹了口气，说道："楚国从此将不会安全了。"楚平王杀了伍奢和伍尚。

伍子胥逃亡到了宋国，跟太子建在一起。这一年的冬天，宋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华氏之乱，太子建和伍子胥为避乱又逃亡到郑国。郑国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还给太子建一块封地，以便他能安心地住下来。

太子建为了争取强大的晋国支持，便来到晋国访问。晋却企图利用太子建攻占郑国。晋顷公对他说："听说您很得郑君的信任，如果您能作内应，我们在外面攻，就一定能够灭亡郑。灭郑国之后，我们就把郑国封给您，不知道您是否同意?"为了贪求郑国的土地，太子建答应与晋合谋袭郑。于是他怀着鬼胎，回到了郑国，郑国仍然像当初那样热情地接待他。

晋顷公派间谍秘密到郑国与太子建商定袭击郑国的日期。由于太子建对下暴虐，封邑里的人告发了他，郑国搜查到晋国的间谍，发觉了他们的阴谋。郑定公与执政子产商议后，处死了太子建。伍子胥害怕，连忙背起了太子建的儿子胜，向吴国奔去。

当太子建遭受奸滑的费无极的谗害，被迫从楚国出逃以后，他的母亲平王夫人也因此离开了楚郢都，回到了郹地的娘家。太子建被郑国人杀害，消息传到平王夫人的耳朵里，引起了她极大的

悲痛。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经过千辛万苦，偷过楚国境的昭关，到了吴国。平王夫人听说孙子胜被伍子胥带到吴国，她便设计奔赴吴国。

楚平王十年（前519），吴国公子光率兵攻打楚国，在鸡父打败了楚国军队，平王夫人便暗中派人召吴兵来郹地，带了身边的青铜宝器，随吴兵来到吴都，找到了自己的孙子胜，一起在吴国住下，耐心地抚养他，并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这孩子身上。

三十多年过去了，公子胜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进入了中年。这时的楚国国君是昭王的儿子惠王。担任令尹的子西，是楚平王的儿子，也是公子胜的叔父。他认为公子胜是楚王宣的嫡系血统，应该把胜找回来。但叶公子高不同意，他说："我听说公子胜为人狡诈而好作乱，就怕以后会成为祸患。"子西说："我却听说他诚实而勇敢，不干没有利的事。召他回来，安置在边境上，让他保卫边疆地区吧！"叶公子高还是不同意，又说："符合仁爱才能算作诚实，遵循道义才能算作勇敢，胜不管什么诺言都要实现，不能算是诚实；不管什么事情都不怕死，也不能算作勇敢。而他还努力寻求不怕死的人，大约是有私心吧！你召他回来，将来会后悔的。"子西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于楚惠王三年（前487）派人把公子胜接回了楚国，把他安置在楚国与吴国接壤的白邑（今河南息县东），号为白公。

白公胜为了报杀父之仇，两次要求进攻郑国，子西同意了，但还没有发兵。公元前480年，晋国进攻郑国，楚国却出兵救郑，与郑订立了友好盟约。这样，就激起了白公胜的强烈不满。在他的复仇思想中，第一，要报费无极诬父之仇；第二，要报郑国的杀父之仇。然而费无极因毁谤太子建，迫使他出逃；又杀了伍奢父子和郤宛，宛的宗族伯氏的儿子嚭和伍子胥逃奔吴国，帮助吴国多次打败楚国，所以楚国人非常怨恨费无极，早在公元前515年，当时的令尹子常为了取悦国人，就杀了费无极，族人亦被尽诛，因

此，这个报复目标已不存在。而另一报复目标郑国却因两个当权的叔父——子西和子期的阻挠，不肯给予复仇的机会，他就把对于郑国的仇恨转移到两个叔父的身上。公子胜还认为自己是楚平王的嫡长孙，是楚国王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所以他想杀掉子西和子期，从惠王那里把王位夺回来。

有一天，他在家里磨剑，子西的儿子平看见了，就问道："您怎么亲自磨剑呢？"他回答说："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爽直，不告诉你，怎么能算得上爽直呢？告诉你吧：我打算杀死你的父亲！"平大吃一惊，立即把公子胜的话告诉了子西。子西却满不在乎地说："胜就像一只蛋，是在我覆翼下长大的。在楚国，只要我死了，令尹、司马不是他还会是谁呢？"公子胜听到了子西这些话后说："令尹真狂啊！他要是能得到善终，我就不是我了！"子西虽然也知道了这些话，但仍然没有引起警惕。

白公胜这时极力搜罗党羽，积蓄力量。他与死党石乞密谋说："国君与子西、子期二卿，要有五百人才能够对付得了啊！"石乞说："找五百个人很难，市场的南边有个大力士，名叫熊宜僚，他一个人可以抵挡五百个人。"二人便去找熊宜僚，一见谈得很投机，但是当石乞要求熊宜僚去杀掉两个卿士时，却遭到了熊宜僚的严辞拒绝，虽然再三劝说，又以重金相聘，也没有打动熊宜僚，甚至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一动都不动。白公胜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走吧"！石乞却怕熊宜僚走露了风声，想杀了他。白公胜说："这个人不为利诱，不怕威胁，是不会靠泄漏别人的秘密讨好于人的，我们可以放心地走吧！"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路过白邑，会见了白公胜。白公胜问孔子说："人可以与别人说自己内心的私事吗？"开始孔子没有回答。白公胜又问："如果把石头投入水中，结果会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吴国擅长水性的人会从水底把石头找到，放到岸上。"白公胜又问："如果把水洒入水中，又怎么样呢？""淄水和渑水合而

为一，易牙曾经知道。”白公于是又问：“这么说，人是不可以和别人说自己内心的私事了？”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不过要看跟谁说了。”白公胜频频点头称是。

一天，石乞与屈建对坐吃酒。屈建问：“听说白公胜想发动叛乱，是不是有这么回事？”石乞装作不知道地说：“这是什么话，白公到白邑以后，不营造新室，手下的士人也不过三五个人，与他亲善友好的人也不过八九个人，手下率领的兵士不过千余人。这么少的人马怎么会叛乱呢？”屈建又说：“这就是白公胜叛乱的原因。天下人按照君子的标准行事，就可以对国家有利；如果行为超过了礼的范围，国家就会怀疑他。古人云：不难下其臣，必定不难高其君。所以说白公胜将会作乱。”

齐国有一个叫子兰子的人，侍从白公胜。白公胜准备发动叛乱之前，曾经告诉子兰子说：“我将要举大事于国，希望你与我一起行动。”子兰子却说：“我侍奉您，而您却让我与您一起举事杀楚君，这是帮助您做不仁义的事情。为了成就我的仁义之名，我不愿意与您一起杀君。我请求回到齐国去。”白公胜无奈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

白公胜日日夜夜在寻找复仇的机会，公元前479年，复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这年，吴国军队进攻楚国的边境慎地（今安徽颍上县北），白公胜领兵打败了吴军，俘获了许多军杖武器。他请求将战利品献给朝廷，楚惠王同意了。白公胜便准备乘机率领军队进入郢都。在出发之前，听说有一个名叫易甲的勇士，想得到他，于是派人找到了易甲。当易甲来的时候，白公胜陈兵勒卒，向易甲示威，希望他屈服从命。白公胜对易甲说：“你与我举事杀楚国君王，我保你富贵；如果你不答应，今天就是你的死日。”易甲笑了一笑，说道：“天下人都说我忠义，您恐怕不会没有耳闻吧？行不义之事而取得君王的位子，我不会跟从；以兵刃之险来威胁我行不义之事，我更不会答应。如今您将要杀楚君而让我跟从，这

不是我做人的原则，我死也不会服从。”白公胜于是就杀了易甲，然后率军进入郢都，在宫廷内杀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劫持了楚惠王，控制了宫廷。

白公胜素来为人贪吝，舍不得将府库的财货分给国人以争取人心，但保存府库却有可能被别人利用；白公胜一时还不想杀死楚惠王，但留下楚惠王可能使反对者存有幻想。基于这些原因，石乞建议白公胜焚烧府库、杀掉楚惠王。但白公胜不同意，他说：“杀死君王，不吉祥；焚烧府库，靠什么维持国用？”石乞说：“能够保住和巩固您的权位，吉祥自然会降临，积蓄也自然会有，您怕什么呢？”白公胜还是不同意。

白公胜是楚平王的嫡长孙，他的父亲太子建含冤出逃，死于国外，曾经得到楚国宗室贵族的同情。但这样兴兵乱、劫王杀卿的举动，却大失人心，因为楚国自吴兵破郢以后，元气大伤。子西、子期辅助朝政以来，国力稍有起色，人们还希望在他们的治理下，社会秩序更为安定，经济更加复苏，国力更加强盛。如今子西、子期无端被杀，楚国的命运又面临危难，自然激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同时，白公胜长期生活在吴国，在国内既无强宗大族的支持，国外也没有能联络吴国作为外援；特别是暴乱发动之后，他提不出真正有利于楚国的政治纲领和措施来争取人心，只是靠那一点微弱的兵力控制王宫，却无法控制整个楚国的局势。

白公胜深深感到势孤力弱，不敢贸然称王，便打算推出子闾为王。子闾也是楚平王的一个儿子、楚昭王的哥哥，白公胜的另一个叔父。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楚昭王率兵驻于城父救援陈国的时候，病重将死，于是喊来各位公子和大夫们，说：“我没有才能，两次楚国军队遭受屈辱，现在能够享受天年，寿终正寝，是我的幸运啊！”然后命令子西继承王位，子西不同意，命令子期继位，子期也不同意；又命令子闾继承王位，子闾辞谢了五次才同意。等到昭王死后，他和子西、子期商量说：“君王当时病得很厉

害，舍弃自己的儿子，把王位让给我们，我当时答应他的原因是为了宽慰他。如今君王已经去世，我怎敢忘记君王推让的好心呢！”于是就与子西、子期商定，暗地里派人迎接楚昭王从越国娶来的一个妃子所生下的儿子熊章继承了王位，即楚惠王。子闾的坚持辞让王位，在楚国的宗室贵族中声誉甚高。因此，白公胜打算借助子闾，以稳定楚国的政治局势。

由于子闾现在还是坚持不愿担任国君，白公胜就用武力劫持了他。子闾说：“您如果整顿王室，安定楚国，然后庇护我，让我主持朝政，我不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如果您不顾国家的命运，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倾覆王室，我宁死也不会从命。”白公胜一怒之下杀了子闾，他又怕别人劫持走楚惠王，便把他囚禁在高府①，派石乞把守高府大门。这事被大夫圉公阳知道了，偷偷地在高高的围墙上挖了一个洞，把楚惠王背到他的妈妈、昭王夫人的宫里。

驻守在蔡地的叶公子高，在方城以外的人们的要求下，率领军队来到郢都。人们对叶公子高说：“郢都的人们盼望您就像盼望一年的年成那样，您来了，大家就安心了，我们人人都愿意和您一道奋战平定叛乱。”叶公子高便把大府里收藏的财物分给国人。把仓库里贮存的武器武装郢都的民众。叶公子高还说服了准备帮助白公胜的箴尹固，叶公对他说：“白公胜使楚国不成其国，你放弃君德而跟从贼胜，今后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想想看吧！”箴尹固就归服了叶公。叶公派他率领军队和郢都人进攻白公胜。白公胜大败，叛军被歼，白公胜见大势已去就逃到山上，被申鸣杀死。

原来申鸣是一位楚国的勇士，靠种蔬菜养活父母，他在楚国以孝闻名。楚惠王曾派人召请他，申鸣谢辞不愿去。他的父亲说：“君王让你有禄于国，有位于廷，你地位高了，我也就放心了。”申

① 高府：别府，即楚王正式宫室以外的宫室。

鸣听从了父亲的劝说，到郢都，被楚惠王任命为左司马。当白公胜举兵作乱，杀死子西、子期，劫持楚惠王时，申鸣正率兵攻打卫国，那时，白公胜对石乞说："申鸣是天下有名的勇士，而且他手中还握有重兵，我很想得到他，你看该如何才好？"石乞回答说："我听说申鸣是个大孝子，您可以派兵劫持他的父亲，派人对申鸣说：'你服从我，就把楚国的一半土地给你；不服从我，就杀死你的父亲。'这样申鸣必从。"申鸣听到这些话后痛哭流涕，无奈只好答应，他说："作司马以前，我是父亲的儿子，现在做了司马，就是楚君的臣子。我已经不能在父亲面前尽孝了，现在又怎能不做个忠臣呢？"他发誓要杀掉白公，以尽忠臣之节。不久，他杀死了白公，他的父亲被石乞杀死。后来，楚惠王重新掌权，想大大地赏赐申鸣，他却说："接受君王的俸禄，君王在危难的时候，却设法逃避，这不是忠臣的行为；遵循忠君的原则，而使自己的父亲被杀，这不是孝子的行为。人生在世，忠、孝不能两全，名声不能同时立于世间，太可悲啦！像这样继续活在世上，又怎么能昭示天下的士人呢？"于是自刎而死。

白公胜死后，叶公子高到外寻找石乞，最后终于活捉了石乞，将他处以烹刑①。

白公胜的妻子知道胜死了，发誓终身以纺织为业，永不再嫁。吴王听说她美貌无比，便派大夫带金百镒、白璧一双，辎车三十乘去迎聘她，想立为夫人。白妻谢辞不应，对来使说道："白公生前，我幸得持箕帚、掌衣履、拂枕席，做他的妻妾。现在白公死了，我发誓守在他的坟墓旁，以终天年。如今吴王赐给我金璧之聘、夫人之位，我实在不敢接受。而且放弃仁义而跟从欲望，叫做污；看见利益而舍命去追求，叫做贪鄙。贪污之人，大王怎能立做夫人呢？我听说：'忠臣不以别人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① 烹刑：古代用鼎镬煮杀人的一种刑罚。

贞节之女不以自己的美色来引诱别人。’我已经不仁义了，如果再嫁人，不也太过分了吗?”吴王听到白妻如此坚守贞节，也就作罢，赐白妻号贞姬。

就这样，一场叛乱平息了，叶公子高使楚惠王恢复了王位，使子西的儿子子国继位令尹，子期的儿子公孙宽继任司马，自己便回到叶地退休养老去了。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楚世家》

《左传纪事本末》

勾践灭吴

春秋后期，在今浙江北部钱塘江流域的越国日益强盛起来，从此出现了吴、越北上争霸的局面。

越国是古代越族人建立的国家，越族是我国古代的兄弟民族之一。传说越人的祖先是大禹的后代，夏朝时被少康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掌管那里对禹的祭祀。也有人认为越国是楚国宗族的支系分封出来的，所以春秋时晋亲吴，楚亲越，最后楚国要统一南方，就把越吞掉了。越国原来的风俗是“断发文身”，即头发散着，身上画着各种花纹，保留着原始氏族制度的习惯。越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劳动，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在钱塘江流域开荒垦田，建立城邑，发展了农业、手工业生产，到了春秋中期，越族人建立的越国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越王允常和他的儿子勾践也想学着中原诸国的样子，称霸天下。但是，越国的北方是比它强大得多的吴国，越国要北上，首先要消灭吴国。这就是吴越争霸产生的根源。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吴王的兄弟夫概为先锋，出兵六万攻打楚国。吴军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攻克了楚国的郢都。吴王阖闾沉迷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庆功作乐，奖励君臣。越王允常看到吴国国内空虚，乘机伐吴，吴国派另一支军队抵抗越军。由于越国的进攻，迫使吴王阖闾不得不退出郢都，从此不再西攻楚国，而把力量放在进攻越国上。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承了王位。吴国乘机攻越。吴王阖闾率领的军队和越王勾践率领的的军队会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勾践派遣敢死之士挑战，他们排成三行，冲到吴军阵前，就大喊大叫而刎颈自杀。吴军将士看得目瞪口呆，越军乘势冲上前去，大败吴军，并刺伤了吴王阖闾，吴军后退。吴王创伤发作，临死前对太子夫差说："你能忘记勾践杀了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天晚上，阖闾就死了。

夫差继位后，任用伍子胥为相国，大夫伯嚭为太宰，积极训练军队，加强吴国的军事力量，并经常叫人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越国的杀父之仇。过了两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要向越国报仇，就打算在吴国未发兵时前去讨伐。范蠡规劝说："不行。我听说武器是凶器，发动战争是违背道义的事，争夺是各种事情中最下等的。暗中策划违背道义，喜欢使用凶器，亲身参与于最下等的事情，上天是不允许的，这样做没有好处。"越王勾践说："我的主意早已打定，立即执行吧！"于是就出兵攻吴。吴王夫差听到越王出兵的消息，立即派遣所有的精兵还击越军，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大湖中）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及其残兵败将五千人逃回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围住。

越王勾践对范蠡、文种说："当初不听信你们的话，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我的事业就在这里完结了吗？"文种劝告说道："过去商汤被囚禁在羑台，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晋国的重耳逃亡到狄国，齐国的小白避难到莒国，结果不是当了王就是成了霸主，从这里看出，祸往往可以成福的。"这时范蠡进谏说："人主能够保守成业的，就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能够挽危为安的人，就能够得到众人的支持；能够精简节约的人，就能够得到地利。现在大王应忍辱负重送重礼给吴国。如果吴国还不答应讲和，就只好把自己抵押给吴国，亲自去侍候吴王。"勾践说："是"。于是派大夫文种到吴国求和。

文种见到吴王夫差，马上跪地前行，一边磕头一边说："陛下的亡国之臣勾践派陪臣文种壮着胆子奉告您：勾践请求做您的奴仆，妻子甘愿做您的侍妾。"吴王夫差准备答应，伍子胥急忙劝说道："现在上天把越国赐给了吴国。您千万不要答应啊！"

文种回去后，把事情的经过禀告了勾践。勾践打算杀掉妻子儿女，烧掉宝器，然后拼死决战。文种急忙阻止勾践，说道："吴国的太宰伯嚭很贪婪，我们可以用美女、珍宝去引诱他，要求太宰伯嚭在吴王面前代为解说。"于是，越王勾践就派文种带着美女和珍宝秘密地献给了伯嚭。伯嚭一见到这么多的珍奇之宝，非常高兴，马上收下了，随后便引文种见吴王。

文种磕头对吴王夫差说："请大王饶恕勾践的罪行吧，勾践愿把国内所有的财宝献给大王。如果您不肯饶恕的话，勾践决心杀掉自己的妻子儿女，把财宝全部烧毁，带领五千人决一死战。这样，大王不但得不到财宝，而且必然会带来很多损失。"夫差正在犹豫，伯嚭插嘴道："越王勾践已经降服做您的臣子了，如果您能赦免他，对大王是有利的呀！"

吴王准备答应，伍子胥又进劝说："从前有过氏灭了斟灌去攻打斟寻，灭亡了夏朝帝王相。帝相的妃子后缗正怀孕，逃到了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少康做了有仍国的牧正①。有过氏又要杀死少康，少康逃到了有虞国。有虞国思念夏朝的恩德，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封给他纶邑（今河南虞城东南），使他拥有十方里土地，五百口人。少康立志图强，招揽夏的民众，整顿法制，并派人诱惑有过氏，乘机灭掉了他，恢复了夏禹的业绩和原有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少康中兴的故事。现在吴国比不上有过氏那么强大，但勾践却比少康强盛，如今不乘此机会灭掉越国，以后定会后悔的。况且勾践是个有志气的君主，他手下的文种、范蠡是能

① 牧正：官名，主管畜牧。

干的臣子。如果让他们返回越国，将来定会作乱的!”伯嚭贪财，又嫉妒伍子胥功劳大，就怂恿吴王同意文种的要求。吴王夫差最终也没听伍子胥的劝谏，和越国讲和，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勾践和范蠡起初留在吴国为吴王服役，后来吴王夫差看到他们君臣两人勤劳服役，以为没有反抗的意思，就放他们回国了。

就这样，吴王夫差因胜利而骄傲起来，信任奸臣伯嚭拒绝忠臣伍子胥的劝谏。越王勾践却重用忠贞又能干的范蠡和文种，发奋图志，准备在国内踏踏实实地做一番振兴国家，重振霸业的大事。

勾践回国后，时时不忘复兴越国的大业。他身穿粗布的衣服，亲自耕种，吃饭从不吃两样肉食。他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晚上就睡在铺着席草的木柴上面。他在居室中自己坐和睡的地方挂了一个苦胆，吃饭、睡觉前、坐着、躺着的时候，经常抬起头来尝尝苦胆，还时时扪心自责道：“你忘记了在会稽被包围大败的耻辱吗?”他还放下架子接近贤德的人，热情招待四面八方来的宾客。谁家贫困，他想方设法去救济，谁家有事，他上门慰问，他一心一意想的是要把越国复兴起来。为了迅速复兴越国，他根据越国的具体条件，进行了社会改革。人口急剧减少，他就在国内采取了奖励生育的政策，规定男子到了二十岁、女子到了十七岁不成亲的，他们的父母就要受到处罚；有两个儿子的，国家养活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国家养活两个。他鼓励种田织布，在劳动紧张的时候，越王也去各地视察，自己亲自拿起锄头，和人民一起劳动；他的妻子也去各家各户串门，看看养蚕织布的妇女们，也和她们一起劳动，以鼓励全国人民积极劳动，发展生产。这就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勾践想叫范蠡来协助自己治理国内的政事，范蠡说：“带兵打仗的事，文种不如我；安抚国家，亲近百姓，我不如文种。”勾践觉得很对，就把国家的政事交给文种；而把治兵打仗的事，交给

范蠡，让他们两人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勾践采用了范蠡、文种的计谋，表面上讨好吴国，避免吴国的攻伐，争取时间使越国尽快地强大起来。越王勾践还乘着吴国北上，连年征伐，士兵死伤很多，国力损失疲惫之机，积极在国内训练军队，发展生产，越国的力量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这时，越王勾践就打算向吴国发动进攻，以报亡国之仇。大夫逢同规劝道："越国刚有点殷实富裕，如果我们整顿军备，进攻吴国，吴国一定很害怕；吴国害怕了，越国的灾难就会临。况且凶猛的鸟袭击目标之前，一定要隐藏好它的形体，再抓住机会突然进攻。现在吴国正准备讨伐齐国和晋国，它又与楚、越结了深仇，它的名声超过了所有的国家，实际上妨害了周王室的威信，道德少而武功多，一定会骄傲自大。为越国打算，您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厚待吴国。吴国的野心很大，它一定会轻易地发动战争。这样我们就联络这些国家，让齐、楚、晋三国进攻吴国，然后我们再利用吴国的疲惫，就可以打败吴国了。"勾践说："好！"

夫差当吴王后的第十二年，听说齐景公刚死，大臣们争权夺利，新君年幼，国内不稳定，就准备发动军队北上进攻齐国。伍子胥进谏说："我听说勾践吃饭不上两样好菜，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哀悼死者，抚慰病者，能和百姓同甘共苦。这个人不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根。现在吴国有越国，正像一个人有心腹疾病一样；而齐国对于吴国，只是像疥癣一样的病。如果大王不先对付越国，而去攻打齐国，这对吴国是很危险的。"吴王不听，亲率大军在艾陵打败了齐军。

吴王得胜回来，越王勾践率领越国的群臣朝见吴王，向吴王祝捷，又贡献了许多礼品，吴王非常高兴。只有伍子胥忧心忡忡地再次劝谏吴王说："越国是我们的心腹之患，现在大王听信它的虚伪诡诈的花言巧语而去贪图齐国。攻破了齐国，好像得到一片

石田，没有什么用处啊！并且《盘庚之诰》说：'有颠倒礼法、不遵上命的，就要割除、灭绝它，使它不再遗传、繁衍，不要让它在这城邑里留种'。这就是商朝所以兴盛的原因。希望大王放弃齐国而先考虑越国，如果不这样，以后反悔就来不及了。”吴王不听。

在越国励精图治，准备向吴国发起灭绝性进攻的时候，吴国的政治却日趋腐败。越国又用重金买通太宰伯嚭，让他在吴王面前替越国讲好话，当时，勾践知道吴王夫差淫乐好色，就采纳了文种的计谋，派范蠡向吴王进献两名越国的美女，一个名叫西施，一个名叫郑旦。吴王见到西施的美色，大喜地说：“这是勾践尽忠于我的证明啊！”伍子胥劝谏说不要接受，吴王早已被西施的美色吸引住了，不听从伍子胥的劝说。西施到吴国后，吴王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了姑苏台，自己和西施在上面日日夜夜饮酒作乐，不理政事。吴国的人力、物力受到了严重的消耗，国内政治愈益腐朽。

这时，文种对勾践说：“吴国衰弱下去了，吴王越来越骄了，我们不妨请求他救济越国一批粮食，用以试探他对我们的态度。”于是，越国要求吴国贷粟，吴王夫差准备给，伍子胥又劝谏不要给，吴王对伍子胥总是反对自己的意见很恼火，还是贷给了越国粮食。伍子胥痛心地说：“君王不听我的劝说，三年以后，吴国怕要被越国踏成废墟了啊！”

奸臣伯嚭听了这些话，就趁机在吴王面前说伍子胥的坏话：“大王不要表面上看伍子胥很忠诚，他实际上是个为人强硬凶暴、缺少恩德、猜忌狠毒的人。他为了自己逃走可以不顾父兄，又怎么能够顾及大王您呢？大王以前打算讨伐齐国，他极力劝阻，但大王终于进攻齐国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伍子胥因为自己的计策没被采用而感到羞耻，竟反而产生埋怨大王的情绪。现在大王又要再次进攻齐国，伍子胥专擅执拗，强行劝谏，败坏、毁谤大王要办的事业，只是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他自己的计策高明罢了。如

今大王亲自出马，调动全国的兵力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没被采纳，他因此推辞，装病不去。大王不可不有所戒备，不然伍子胥定会作乱。”吴王开始不相信，就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预见到吴国将会被越国灭亡，所以临行前，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屡次劝谏大王，大王都不听。我今天看到吴国的末日了，你跟吴国一道灭亡，没有好处。”于是把他的儿子寄托给齐国的鲍氏，回国将齐国的情况报告吴王。

吴王知道了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这时伯嚭又对吴王说：“伍子胥出使齐国，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这怎么了得，作为臣子，在国内不得志，在国外依靠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重用，就郁闷埋怨，我看伍子胥定会作乱，希望大王要及早提防这件事啊！”吴王夫差气冲冲地说道：“没有你的这番话，我也怀疑他。”于是就派人把属镂剑赐给伍子胥，叫他自杀。伍子胥仰天叹息道：“唉！说人坏话的小人伯嚭作乱，大王却反而诛杀我！我帮助你的父亲称霸，攻克了楚国的郢都。自从你还没有确定为王位继承人时，公子们争夺太子的位置，我拚死在先王面前力争，你差点得不到太子的地位。你被立为太子后，知道了我功劳，就想把半个吴国给我，我怎敢奢望。现在你听信谄媚小臣的坏话来杀害长辈，唉，天啊！你一个人必定不能独自立国的。”说罢，就告诉他的门客说：“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上梓树，使它能够制作棺材；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国都城东门的城楼上，我将亲眼看一看越国打进东门灭亡吴国！”于是自刎而死。这一位对吴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忠臣就这样被迫害死了。吴王夫差后来听到伍子胥说过的一番话，大发雷霆，就命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制的袋子，扔进江里。吴国人怜悯他，替他在江边设立了一座祠堂，因而命名叫胥山。

伍子胥死后，伯嚭独掌了吴国的大权。吴国更是忠言塞路，奸邪当道，政治腐败。越王勾践和文种、范蠡听到后非常高兴，勾

践就问范蠡道："吴国已经杀了伍子胥，阿谀逢迎的人很多，我们可以进攻吴国了吧?"范蠡回答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在橐皋（今安徽巢县西北）会见了鲁、卫等国的君主，许多诸侯都听从吴王的号令了。转年，夫差又一次打败齐国。吴国便通知中原的诸侯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开会，想和诸侯订立盟约，共尊周室，自己当霸主。在黄池之会上，晋、吴两国争当会议的盟主，吴王夫差说："在周朝王族中，我是老大。"晋定公说："在姬姓诸侯中，我是霸主。"两国君主争执不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吴强于晋，晋国国内各个卿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很激烈，晋不敢和吴打仗；同时，晋的主要敌人是楚国，在盟会上让一下吴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主盟时是先吴后晋。黄池之会使吴国北上称霸达到了目的，巩固了吴、晋之间的联合，但也标志着吴国霸业的顶峰。

吴王北上黄池会盟诸侯，带去了吴国的精锐部队，国内只剩下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这时勾践又问范蠡，范蠡说："现在时机成熟了。"于是勾践便乘吴国国内空虚之机，派水兵二千人，训练有素的陆军四万人，近卫部队六千人，大规模地向吴国发起了进攻。由于吴军连年征伐，伤亡很大，加之国内防御力量薄弱，结果被经过长期训练的越军打得大败，太子也被越军杀死。吴国急忙派人报告吴王，吴王夫差正会盟诸侯于黄池，怕各诸侯国听到吴国战败的消息，所以秘而不宣，生怕走露消息。吴王会盟诸侯以后，急忙从北方撤军回国。吴军长途跋涉，劳累不堪，无法抵挡越军的进攻，于是夫差只得派伯嚭带了丰厚的礼物去越国求和。越国看到不能一下子灭掉吴国，就答应与吴讲和，

以后越国越来越强，屡次打败了吴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带了范蠡、文种亲率大军攻吴，吴军连连败退，吴王被包围在姑苏山上。吴王无奈只好派公孙雄裸露肢体，跪地前行，向越王求和说："我失势无援的臣子夫差冒昧地吐露心里话，以前曾在

会稽得罪了您，如今我不敢违背您的命令，如能与您讲和，想来您也会像当年在会稽对您一样饶恕我的罪过吧？”勾践下不了狠心，想答应他。范蠡说：“过去天意叫吴国灭掉越国，可是吴国偏偏不要；现在天意叫越国灭掉吴国，难道大王要违背天意吗？况且，王一大早就是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灭掉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的事，一旦要放弃它，可以吗？再说，上天给予的机会却不接受，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诗经》上说：‘砍伐斧柄，它的样子就在手头。’您忘记会稽的灾难了吗？”勾践说：“我想听您的话，但我实在不忍心如此对待他的使者。”范蠡于是击鼓出兵说道：“君王已经把政事委托给我了，你赶紧走吧，否则我就要杀了你！”吴国的使者流泪走了。

勾践最终还是接受了范蠡的劝告，吸取了过去吴国没有灭亡越国的历史教训，拒绝了夫差求和的要求，灭掉了吴国。

勾践准备把夫差迁到甬江以东的海边上，让他管理一百户人家。夫差羞愧交集，流着眼泪对越王勾践：“我老了，不能服侍大王了。我悔恨不听伍子胥的忠言劝告，才落得今天的下场！”说罢，挥剑自刎。越国灭吴后，成为一个地跨江、淮、钱塘江的南方大国。勾践处死了吴国的奸臣伯嚭，要求和他共度难、助他复国的范蠡、文种继续帮他完成霸业。但是范蠡觉得自己服侍越王勾践，身心劳瘁，帮助他周密策划了二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吴国，雪洗了勾践当年在会稽所受的耻辱。攻灭吴国后，勾践又封他为上将军，名气太大了，难以久留，而且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共处安乐，于是就写了一封辞职的信向勾践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受辱，我所以没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已经报仇雪恨了，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勾践接到信，马上派人对范蠡说：“我就要把越国的江山分给您一半，让我们共同享有。不然的话，就要惩罚您。”范蠡对来人说：“君主执行自己的命令，

臣子实行自己的意愿。”说罢就打点包装了细软珍宝珠玉，带着私属乘船从海道去齐国了。

范蠡浮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他与儿子耕种于海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并治理产业，在齐国住了几年，就拥有数十万财产。齐国听到他有才能，就让他做相国。范蠡极力推辞，他说：“住在家里能弄到千金财产，做官做到卿相，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就达到顶点了。长期享受尊贵的名号，不吉利。”于是他归还相国的印信，发散了他的全部家财，分给相知的好友和乡亲们，然后带着贵重的财宝，悄悄地离开齐国，到宋国的陶地（今山东安陶西北）去了。范蠡认为陶地是天下的中心，交易买卖，做生意可以致富，于是他自称“陶朱公”，在陶地囤积储存，等候时机，转卖货物，从事商业活动。

范蠡离开越国后，文种仍留在越国。范蠡到齐国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射杀完了，好弓就被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猎取光了，猎狗就被煮了吃掉。越王脖子长得很长，嘴尖得和鸟嘴一样，这种相貌的人只可以共处患难，不可以和他同享安乐。您为什么还不离开呢？”文种接到信，就自称有病不再上朝了。后来有人在勾践面前诬告文种谋反，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把剑说：“当初您教给我进攻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用了三条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条在您那里，您跟随死去的国王，试试那些计策吧！”文种后悔没有听从范蠡的话，于是就自杀了。

勾践平定吴国后，便带了大批人马渡过淮水，在徐州（今山东滕县）会合了齐、宋、晋、鲁等国诸侯，各国都听从了越的号令。周元王正式派人赐给勾践祭肉，命他做霸主。越国完成了霸业。勾践为了长期称霸中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就把国都迁到琅琊（今山东在诸城境内），函谷关以东的诸侯也都向他祝贺，越国军队横行于江淮一带，成为了春秋战国之际最强的国家。直到战国中期，越国才为楚国所败。之后越族诸公子争立，有的做了

王，有的做了君，臣服于楚。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
《左传纪事本末》

陶朱公事迹

陶朱公范蠡是春秋晚期一位著名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辅佐越王勾践图强灭吴，号令诸侯，最终成就霸业，使越国成为一个地跨江、淮、钱塘江流域的南方大国；后期离开勾践，游历各国，从事商业活动，在十九年中，三次积累了千金的巨富，最后定居于陶地，称为“陶朱公”。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出兵六万攻打楚国。吴军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一举攻克楚国的郢都。这时，越国看到吴国国内空虚，乘机伐吴，吴国派出军队去抵抗越军。由于越国的进攻，再之，这时秦国在楚臣申包胥的劝说下出五百乘兵车救楚击吴，最终迫使吴王阖闾不得不退出郢都。从此，吴王阖闾决心要打败越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承王位。吴国乘机攻越。吴、越两军会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南）。越军利用吴军的疏忽，进行偷袭，击败了吴军，越将灵姑浮用戈刺吴王，吴王受了重伤，在回军的路上死了。

阖间的儿子吴王夫差继位，他任命伍子胥当相国，大夫伯嚭为太宰，积极训练军队，加强吴国军事力量，并经常叫人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越国的杀父之仇。

勾践三年（前494），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要向越国报仇，他就打算在吴国未发兵之前去讨伐它。范蠡急忙规劝越王勾践道：“国家的事情，主要有三种：一是具备盈满，二是具有定倾，三是要从政节俭。”勾越问：“这三者是什么意思？”范蠡

回答道："具备盈满之势，说的是与上天的关系；具有定倾之态，说的是与人间的关系；从政节俭，说的是与地利的关系。大王不问，我不敢说。"勾践说："那你就详细地说一说吧？"范蠡说道："上天的道行盈满但又溢流不出，盛大但又不骄慢，受到辛苦但又不表白它的功劳。圣人遵循天时而在人间行事，这叫做守时；天时不发作，不作人客。人间的事情不发起，就不做开始的事。如今大王的势力还没有达到盈而溢，未盛而骄，不辛苦而就表白功劳的时候，大王如果一味违反天时又不和于人事就去干事的话，那定会对国家有危险。"勾践不听。

范蠡接着说："我听说武器是凶器，发动战争是违背道义的事，争夺是各种事情中最下等的。暗中策划违背道义，喜欢使用凶器，亲身参与干最下等的事情，上天是不允许的，这样做没有好处。"勾践还是不听，说道："我的主意早已打定，你不要再说了。"于是就出兵攻打吴国。吴王夫差听到越王出兵的消息，立即派遣所有精兵还击越国，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及其残兵败将五千人逃回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围住。越王勾践看到自己惨败的样子，后悔地对范蠡说："由于不听信你的话，所以才弄到这个地步，这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说："人主能够保守成业的，就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能够挽危为安的人，就能够得到众人的支持；能够精简节约的人，就能够得到地利。现在您需要低声下气地送重礼给吴国，如果他们不答应求和，就只好把自己押给吴国，亲自去侍候吴王。"

勾践没有办法，不得不采用范蠡的计谋，派文种暗地里带着许多礼物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请求让越国当吴国的属国，表示越国君臣愿意当吴国的奴隶。奸臣伯嚭高兴地收下了勾践送来的钱财，引文种见了吴王夫差。文种对吴王说："请大王饶恕勾践的罪行吧，勾践愿把国内所有的财宝献给大王。如您不肯饶恕的话，勾践决心杀掉自己的妻子儿女，把财宝全部烧毁，带领五千人战死。这样，大王不但得不到财宝，而且必然会带来很多损失。"夫

差正在考虑，伯嚭插嘴说："越王已经投降了，就赦免他吧，这对大王是有利的呀！"吴王夫差终于同意了。伍子胥却极力反对，他举夏代一度亡国，后来少康中兴的故事，劝告吴王说："现在勾践的力量大过复国前的少康，不乘此机会灭掉越国，以后勾践扩大了力量就会来打我们，那时大王将后悔莫及！"吴王不听，保留了越国，把勾践和范蠡留在吴国为他服役。

勾践五年（前492）的一天，吴王夫差召勾践等人入见。勾践跪在前面，范蠡跪在后面。吴王对范蠡说："我听说贞节的妇人不嫁给破亡之家，仁贤的臣子不在绝灭的国家里做官。现在越国大行无道的事情，国破家亡，社稷坏崩，身死绝世，成为天下诸侯的笑柄。现在你和你的主子到吴国做我的奴隶，难道你不感到耻辱吗？我想赦免你们的罪过，你能够改过自新，放弃越王而服从我吗？"范蠡回答说："我听说亡国之臣不敢谈论政治，败军之将不敢说自己勇敢善战。我在越国是个不忠信之人，纵使越王不遵奉吴王的命号，出兵与大王争战。如今被俘伏罪，蒙吴王鸿恩，使我们君臣得以保全性命，我愿意一辈子为大王做牛做马。"吴王夫差心里知道范蠡说的是假话，就说："既然如此，我把你们君臣放在石室之中，看你们的表现怎么样。"范蠡回答说："我请求按照大王的命令去行事。"

于是，越王与范蠡等人住进了石室。在吴国，越王勾践饲养牸牛，他的夫人做家务。一晃三年过去了，越王与范蠡勤劳服役，毫无憎恨之意。一天，吴王登高远望，看见越王勾践与他的夫人及范蠡坐在马粪旁边，君臣之礼，夫妇之义俱存。吴王回过头来对伯嚭说："勾践是亡国之君，范蠡是亡国之臣，他们虽然身处穷厄的境地，但不失君臣之礼，我很可怜他们。"伯嚭说道："希望大王能够以圣人之心可怜他们"。吴王说："我是打算赦免他们，再过一段时间，选择个吉日。"

越王勾践听到吴王的一席话，高兴地对范蠡说："这样，我们

就可以回国了！”范蠡却很镇静，说道：“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伍子胥会极力劝阻吴王不要赦免我们君臣的。”果然，吴王听从了伍子胥的劝说，召见越国君臣。过了很久，吴王也不出来接见。这时，范蠡暗暗卜占，偷偷地对勾践说：“吴王身缠重病，所以不能出来会见我们。”过了一会儿，伯嚭出来，对越王说道：“吴王有令，越王勾践君臣继续居住石室，服役劳动。”

不久，伍子胥又劝谏吴王说：“我听说称王的人攻破敌人的国家之后，必定要彻底摧毁它以使它们没有报复的心理。如今越王已经被囚禁石室，您应该早作打算，以绝后患。”伯嚭说道：“过去齐桓公割让齐国之地赐给燕公，使齐君在天下得到美名；宋襄公渡河而战，春秋以多其义。功劳建立又使美名传世，这样才能在天下树立威信。现在大王如果赦免越王，就会功过王霸，名留千古。”吴王说：“等我病好了，就赦免勾践。”

一天，勾践对范蠡说：“吴王得病三个月也不见好。我听说人臣之道，主疾臣忧。况且吴王待我恩重如山，请你给吴王占卜，看他的病何日才好。”范蠡卜后说道：“吴王虽然重病缠身但不会危及生命，到己巳日就会痊愈。”范蠡又接着说：“我看吴王只不过是一般人而已，他虽然谈论成汤之义，但不执行。愿您前去探问吴王的病情，求得他的粪尝尝，观看一下粪便的颜色，告诉他疾病不会致死，并假意占卜，告诉他己巳日疾病就可痊愈。”越王勾践果然按照范蠡的话去做，吴王听说重病不久就将痊愈，非常高兴，于是就赦免了越王，让他搬出石室，住进了为他建造的房屋里。

自从勾践尝了吴王粪便以后，就得了口臭。范蠡于是就让左右人都吃岑草以乱其气味。不久，吴王果真在勾践说的那天病好了。于是吴王在文台摆酒筵，并派人去叫越王，让他坐在北面的位子上，命群臣用客人的礼节对待越王。坐好以后，勾践与范蠡站起来，为吴王献祝寿词，说道：“下臣勾践与小臣范蠡举杯祝吴

王千岁之寿。皇天在上，号令在下。天地四时遵循法律运行，大王心地慈爱。仁爱的吴王，广施宏恩，立义行仁，威服群臣，传德无极，对上感动太阳，使它降瑞临祥。祝大王延寿万岁，永保吴国，四海皆服，诸侯宾从。”吴王听后大悦。

吴王看到勾践毫无反抗的心理，不久，就放他们回国了。当勾践等人走到三津的时候，勾践仰天长叹：“上天啊！没想到我今生还能再渡这三津之地。”范蠡说道：“大王大难不死，越国必有后福，吴国必定有忧。”

回到越都后，勾践召集范蠡、文种、大夫郢等人，问道：“我想选择个好日子临朝听政，抚爱百姓，你们看何日才好？”范蠡说道：“今天是丙午日。丙，阳气将降，是个吉日，臣以为今天合适。”勾践临朝以后，时时不忘复兴越国的大志。他身穿粗布的衣服，不吃两种肉食，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晚上就睡在铺着席草的木柴上面。他在居室中自己坐和睡的地方挂了一个苦胆，吃饭、睡觉前、坐着、躺着的时候，经常抬起头来尝尝苦胆，并自言自语地问：“你忘记了在会稽被包围的耻辱了吗？”他一心一意想的是要把越国复兴起来。为了迅速复兴越国，他根据越国的具体条件，进行了社会改革。经过战争后越国的人口大量减少，他就在国内采取了奖励生育的政策。他鼓励种田织布，在劳动紧张的时候，越王也去各地看看，自己也拿起锄头，和人民一起劳动；他的妻子也去各家各户串门，看看养蚕织布的妇女们，也和她们一起劳动，以鼓励全国人民积极劳动，发展生产。穷困或受灾的人家，国家也常救济他们；遇到了丧事的人家，勾践就派人去慰问；有贤能才德的人，勾践都热情地接待。越王勾践想方设法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复兴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内容。

勾践想叫范蠡来协助自己治理国内的政事，范蠡说：“带兵打仗的事，文种不如我；安抚国家，亲近百姓，我不如文种。”勾践

觉得很对，就把国家的政事交托给文种；而把治兵打仗的事，交托给范蠡，让他们两人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勾践采用了范蠡、文种的计谋，对外结好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表面上讨好吴国，避免吴国的攻伐，争取时间使越国尽快地强大越来。对内积极训练军队，发展生产。越国的力量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在越国励精图治的时候，吴国的政治却日趋腐败。越王勾践又用重金买通了吴国的伯嚭，让他在吴王面前替越国讲好话。不久，勾践又采用文种的计谋，派范蠡向淫乐好色的吴王进献两名越国的美女西施和郑旦。范蠡对吴王夫差说："越王勾践回国后发现了两名美貌的女子，越国是吴王的属国，所以不敢把这两名美女留在越国，勾践特意派我来将这两名美女进献给吴王。希望大王不要认为是越国的女子，就不肯收留。"吴王见到西施的美色，大喜地说："这是勾践尽忠于我的证明啊！"伍子胥极力劝谏吴王不要接受，吴王不听。西施到吴国后，吴王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了姑苏台，自己和西施等在上面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政事。吴国的人力物力受到了严重的消耗，国内的政治愈益腐朽。

过了三年，在伯嚭谗言的诱惑下，吴王夫差对伍子胥起了疑心，在他出使齐国回来后，迫使他自杀了。伍子胥死后，伯嚭独掌了吴国的大权。吴国更是忠言塞路，奸邪当道，政治腐败。越王勾践和范蠡、文种听到了非常高兴。这时，勾践对范蠡说："吴国已经杀死了敢于进谏、忠直不阿的伍子胥，如今阿谀逢迎之徒充满吴国的朝廷，可以进攻吴国了吧？"范蠡回答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公元前 482 年春季，吴王夫差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合诸侯，吴国的精锐部队跟随吴王，国内只剩下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这时，勾践又问范蠡，范蠡说："现在时机成熟了。"于是，勾践出动精兵五万人袭吴，杀死了吴国的太子，打败了吴国的军队。夫差得悉后，急忙从北方撤军回国。吴国长途跋涉，劳

累不堪，无法抵挡越军的进攻，于是夫差只得派伯嚭带了丰厚的礼物去越国求和。越国估量自己还不能一下子灭掉吴国，就和吴国讲和了。

以后越国越来越强，几次打败了吴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带了范蠡、文种亲率大军攻吴，吴军连打败仗，吴国被包围在姑苏山上。吴王只得派公孙雄裸露肢体，跪地前行，向越王求和说："失势无援的臣子夫差冒昧地吐露心里话，以前曾在会稽得罪了您，如今不敢违背您的命令，如能与您讲和，就回国都。现在君王高抬贵足，来惩罚穷困的臣子，穷困的臣子绝对听从您的命令，想来您也像当年在会稽对您一样饶恕我的罪过吧？"勾践下不了狠心，想答应吴王讲和的请求。范蠡极力劝阻道："过去天意叫吴国灭掉越国，可是吴国偏偏不要；现在天意叫越国灭掉吴国，难道大王要违背天意吗？再说，大王一大早就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灭掉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的事，一旦要放弃它，可以吗？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诗经》上说：'砍伐斧柄，它的样子就在手头。'您忘记会稽的灾难了吗？"勾践说："我想听你的话，但我实在不忍心如此对待吴国的使者。"范蠡听越王这么一说，马上走出门去，击鼓进兵说："君王已经把政事委托给我了，你走吧，否则我可要得罪你了！"吴国的使者流着泪回去了。

勾践准备把夫差迁到甬江以东的海边，给他管理一百户人家。夫差羞愧交集，流着眼泪对越王勾践说："我老了，不能服侍大王了。我悔恨不用伍子胥的忠言，才落得今天的下场！"说罢，用剑自刎。

范蠡服侍越王勾践，身经劳苦，勤奋努力，帮助他周密地谋划了二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吴国，雪洗了勾践当年在会稽所受的耻辱。之后，他又帮助勾践向北进兵，渡过淮河，紧逼齐、晋。不久，越王勾践在徐州（今山东滕县）会合齐、宋、晋、鲁等国诸

侯，使各国都听从了越王的号令。周元王正式派人赐给勾践祭肉，命他为霸主。越国完成了霸业。

得胜返回越国后，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不过，范蠡认为自己名气大了，难以久留在越国，而且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共处安乐，就写了一封辞职的信向勾践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受侮辱，我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已经报仇雪耻，我请求追论使君王会稽受辱的罪过。"勾践接到信后，马上召见范蠡对他说："我要把越国的江山分给你一半，让我们共同享受。不然的话，我就要惩罚你。"范蠡说："君王执行自己的命令，臣子实行自己的意愿。"于是他就打点包装细软珍贵珠玉，与私属随从乘船从海道走了。

范蠡出走后，勾践将会稽周围三百里的土地作为范蠡的俸地，说："后世子孙有谁胆敢侵扰此地，定当受到惩罚！"他又命令工匠用纯正的黄金铸造一座范蠡的金身，放在朝廷上，朝夕论政。

范蠡离开越国，开始了他后半生游历各国，弃官从商的生涯。

范蠡到齐国后，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飞鸟射杀完了，好弓就被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猎取光了，猎狗就被煮着吃掉。越王脖子长得很长，嘴尖得和鸟嘴一样，可以和这种相貌的人共处患难，不可以同享安乐。您为什么不离开越国，另寻生路呢？"文种接到信，就自称有病不再上朝。后来有人在勾践面前进谗言，说文种将要谋反，越王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给我进攻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用了三条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条在你手里，就请你跟随死去的先王，试试那些计策去吧。"文种仰天长叹道："我听说大恩不报，大功不还，这句话对我太适合了。我后悔没有听范蠡的话，而遭受勾践的迫害。后世的忠臣一定会以我为借鉴的！"说罢，伏剑而死。

范蠡浮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耕种于海

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父子治理产业。他们住在齐国没有多久，就弄到了财产数十万。齐国人听到他有才能，就让他做相国。范蠡叹息地说："作为百姓能弄到千金财产，做官做到卿相，一个普通人能这样，也就达到顶点了。如果长期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利的。"于是就归还了相国的印信，把全部家财分给与他相知的好友和乡亲们，然后带着贵重的财宝，悄悄地离开齐国，来到宋国的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住下来。他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交易买卖和各地相通，做生意可以致富。范蠡自称"陶朱公"。父子两人囤积储存，等候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利润。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商业，所以在陶地住了不久，就发家积累资产到达万金，天下都称他为陶朱公。

朱公住在陶地，生了一个小儿子。小儿子长到壮年时，朱公的二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朱公说："杀人偿命，这是本分。但是我听说，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被杀在闹市之中示众的。"于是就叫他的小儿子到楚国去看看。小儿子带着一千镒金，装在粗布袋中，用一辆牛车载着，将要上路的时候，朱公的大儿子坚决要求去楚国，朱公不答应。大儿子很生气对朱公说："家中有长子，就叫'家督'，现在弟弟犯了罪，父亲不派我去，却派小弟弟去，这是说我不贤明了。"说罢就想自杀。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景，对朱公说："现在派我的小儿子去楚国，未必就能救活二儿子。如果还没有救出二儿子，就先白白死了大儿子，那怎么好呢？"朱公不得已，只好派大儿子去。朱公写了一封信要大儿子送给他的老朋友庄先生，嘱咐大儿子说："到了那里，把这千镒黄金送到庄先生府里，听凭他去办理，千万不要和他争论。"大儿子回答说："父亲放心吧！"然后自己又私带了几百镒黄金上路了。

大儿子到了楚国，找到了庄先生的家。他看到庄先生的住房靠近外城，房前是一大片野菜地，居住条件相当贫若。大儿子如

他父亲吩咐的那样，拿出书信，将千金送给庄先生。庄先生看完信后，对他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千万不要停留，即使你弟弟从监牢里放出来，你也不要去问是怎样放出来的。"大儿子离开庄家，没有回陶地，而是私自住下来，把他私自带来的黄金送给了楚国那些当权的贵族。

庄先生虽然住在贫民窟中，但他廉洁正直，在全国有名。从楚王以下，都把他当老师一样尊重。至于朱公送给他的金子，他并不是有意接受，只是想在事情办成之后再还给朱公作为信用罢了。所以当金子送到后，他对妻子说："这是朱公的金子，如果我病死了，来不及提前交给你，你记住要归还朱公，不要动它。"但朱公的大儿子不知道庄先生的用意，他认为送给他的黄金不会发挥作用，所以他就私自留在楚国，想自己救出弟弟。

庄先生找到了个适当的机会进宫去拜见楚王，说："天上某星的位置移动到了某处，这对楚国不利。"楚王向来信任庄先生，就问："现在该怎么办呢？"庄先生说："只有做好事，才能消除灾害，使上天降临祥瑞。"楚王说："先生回去休息吧，寡人就照先生的指点去做。"然后楚王就派遣人员，封闭了储存金钱的库房。这时，楚国受贿的贵族惊讶地告诉朱公的大儿子说："国王就要大赦了。"朱公的大儿子急忙问："何以见得？"回答说："国王每次大赦的时候，都要先封闭储存金钱的库房。昨天晚上，国王又派人把金库封了。"朱公的大儿子想，既然大赦，弟弟本当得到释放。他很吝惜那千镒黄金，认为白白送给庄先生，实在毫无意义。于是，他又去见庄先生。庄先生吃了一惊，说道："你怎么还没走呢？"大儿于说："我确实没有走。当初我是为了弟弟的事情来的，现在听说楚王要大赦，我弟弟自然就会得到释放，所以前来向先生辞行。"庄先生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拿回他的千金，就说："你自己进屋去取金子吧。"大儿子就自己进屋取走了金子。

庄先生被小儿辈出卖感到非常羞恼，于是就再次进宫去拜见

楚王，说："我上次说了某星的位置移动那件事，君王说要用做好事来报答它。现在我在外面听行人纷纷传说陶地的富人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他家里拿很多金钱贿赠君王身边的人，所以君王并不是为了体恤楚国百姓而实行大赦，而是为了朱公的儿子缘故。"楚王听后大怒说道："寡人虽然无德，也不至于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而施恩大赦呢！"就下令判决，杀了朱公的儿子。到了第二天，才下达赦令。朱公的大儿子只得带着弟弟的尸首回陶地了。

到家以后，他的母亲和街坊邻里的人们都很悲痛，只有朱公一个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他去一定会置弟弟于死地的！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不过是他有些舍不得花钱。他小时候和我在一起，受过苦，知道谋生的艰难，所以不轻易花钱。至于小弟弟，出生以来就看到我富有，只知道乘好车，骑良马，出外打猎赶兔子，哪里知道钱财的来处，所以随便花费，毫不吝惜。原来我要派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的缘故。面大儿子去做不到，结果使他弟弟被杀。这是事情的常理，没有什么可悲痛的。我本来就日日夜夜等着二儿子的尸体运回来啦。"

范蠡三次迁移，驰名天下。他去哪里并不是随便的，所到之处，一定有所作为，立功成名。后来终于老死于陶地。所以世人相传叫他陶朱公。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

《国语·越语》

《吴越春秋》

《左传纪事本末》

三家分晋

春秋初期开始，周天子王权衰微，江河日下，各诸侯国之间争夺土地人口，战争连绵不断。所谓王室衰微，政出私门。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各自实力大小，战争成为当时社会最频繁、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在残酷的战争中，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之类的诸侯，一方面兼并周边小国及少数民族部族的土地，索取岁贡，干着僭越周礼、大逆不道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打着周天子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会盟这一活动形式，尊王攘夷，维持周礼，出兵干涉他国事务，建一代霸业。春秋大国争霸给当时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其影响远远超出战争本身的意义。

为了赢得战争，实现霸业，一些雄才伟略的诸侯招揽贤才，起用寒士，奖励军功，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做出一些变革，借以增强国力，适应高强度的武装冲突需要。这样一来，诸侯富国强兵的措施客观上就加速了旧的宗法血缘纽带崩溃的速度，把一大批因军功而受封赏的新贵族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些人逐渐在战争中掌握了部分诸侯的权力，同时培养和发展私人势力，父子相因，世代卿相。成为与旧的宗室亲缘势均力敌的集团。春秋中叶以后，各国卿、大夫势力急剧膨胀。鲁国“三桓”、郑国七穆、齐国田氏、晋国六卿实际已经掌握国政，弄权朝野，割据一方，变成国中之国。手握实权的卿、大夫往往精心计划，缓慢而又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兼并弱小的家族，蚕食诸侯。一些势力最强大

的卿、大夫千方百计拥戴有利于已的公子为君，擅自废立国君，政出私门。晋国曲沃强宗形成于东周初，其他异姓或同姓大族，如知氏、范氏、中行氏、韩、赵、魏、郤、栾、先等大都在晋文公称霸前后形成并发展起来。这些贵族多有军功，世代为卿、大夫，领有封邑。封邑面积很大，多则数县、人口十几万户，封君在封邑内称“君”称“公”，封位世袭，设有家臣和私庭，可以征收赋税，训练军队，讨论政事。封邑内的家臣、军队只效忠封君一人，带有强烈的私人政治色彩，封邑俨然如国中之国。各封君大族平日刻意强化自己的实力，苦心经营自己，遇有机会，彼此吞食，形成一些势力更加强大的卿和大夫。

晋平公四年（前554），范宣子为中军之将，执掌晋国大权。

晋平公六年，栾黡子广施好舍，颇得民众。范宣子担心栾氏得势，先行动手，驱除栾黡子。杀死栾氏党羽羊舌虎，囚禁叔向。平公七年，栾黡子从楚逃到齐国。平公八年，齐兵掩护栾黡子潜回曲沃（今山西闻喜县西北），借助魏舒的帮助回到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发动叛乱。范宣子奉平公之命迎击栾黡子，范鞅阻击魏舒。栾黡子孤军奋战，战败退回曲沃而死。范宣子将栾氏宗族尽行铲除。

晋平公二十六年，虒祁之宫落成。晋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劳民伤财。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韩宣子执政。祁氏内乱，羊舌氏推波助澜，趁机闹事。六卿依法诛灭祁氏、羊舌氏。韩宣子死，魏献子执政，将祁氏之地分设七县，羊舌氏之地分为三县，县设大夫。县是不同于采邑的行政组织，始见于春秋初期，为国君直接领地。后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边境防守力量，往往将新兼并的小国直接改建为县。县设主官，下设丞、尉，也有设置御史的。县之下有乡、里、闾各级基层组织。县有一整套征赋制度和军备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常备军制度。

晋顷公十三年，赵简子、范行寅铸刑鼎，将范宣子所作刑书公布出来，杜绝私法的随意性。在长期的吞并中，晋国大族最终剩下韩、赵、魏、范氏、中行氏、知氏，并称六卿。

就在赵简子、中行寅铸刑鼎前后，六卿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改革田制，废除百步为亩的井田制。井田制原为村社土地制度。村社土地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公田，由村社社员集体耕作，收获物用于祭祖和公共活动；另一部分是私田，分配给个人耕种，用以维持家庭生计。周天子立国后将土地和居民分封给贵族，原来的公田归贵族占有，由集体劳动耕种，称籍田，原私田按百步为亩，每户百亩的原则分配给年满二十岁的成年男子，六十岁再收回。周宣王时，籍田已维持不下去了，只好废籍田。井田制在越来越多的私田冲击下，日益荒废。六卿废除井田制，代之以田亩制和地税制。范氏、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魏以二百步为一亩；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赵氏不按亩征税，其余五家实行五分抽一的税制。六卿程度不同地打破井田制，减轻赋税，承认自耕农私垦土地合法，有利于生产发展。

晋定公十五年（前497），赵简子杀赵午，招致范氏、中行氏联合进攻。赵简子迫于形势，放弃都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退守晋阳（今太原市西南）。不久，知氏、魏、韩与范氏、中行氏挟嫌争权，知、魏、韩三家奉定公而伐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逃到朝歌（今河南淇县）。赵简子回到绛。晋定公十八年，齐与郑运粟支持范氏、中行氏，与赵战于铁（今河南濮阳西北）。赵简子临阵誓师：战胜敌人，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封田十万，庶人及工商可以为官，奴隶可免释其身份。重赏之下，赵军奋勇，大获全胜，缴获齐粟千车。晋定公十九年。范氏、中行氏逃奔邯郸，接着到中山，最后落魄于齐。

晋出公十七年（前458），知、韩、赵、魏四家联合一起，准

备瓜分原来范氏、中行氏的封地。出公不肯，四家驱除出公。知伯扶立晋哀公，出公死于出逃路上。知伯因立哀公而得掌晋国朝政，趁机占领范氏、中行氏原封地。势力大于韩、赵、魏三家。

此时四卿分别是知伯瑶、赵襄子无恤、韩康子虎、魏桓子驹。知伯瑶想逐渐蚕食其他三家，独占晋国。

晋哀公二年（前455）①，知伯瑶假称晋侯之命向韩、魏索要百里之地及户口，得地后又向赵襄子要同样数量的土地、人口，赵襄子一口拒绝了知伯瑶。知伯瑶挟迫韩、魏攻赵，答应灭赵后三家平分赵地。知伯与韩、魏三军攻赵。赵寡不敌众，采用谋士张孟谈的建议，退守晋阳。晋阳原为赵地，经董安于、尹铎多年经营，民心归附。赵襄子到晋阳城后，想不到晋阳城池不坚、仓无积粟、府库无钱，守城兵甲不齐，顿时慌恐不安起来。张孟谈向赵襄子解释说：治国要靠民心所向，民众手中有东西支持我们，我们就有了最有利的条件。赵襄子深为张孟谈所言打动，迁居晋阳城。由于晋阳军民士气旺盛、坚守晋阳，知伯、韩、魏三军围晋阳近两年，相持不下。晋哀公四年，知伯水淹晋阳城。晋阳危急。赵襄子派张孟谈偷偷出城潜入韩、魏军中，晓以利害。韩、魏本不满知伯的跋扈，受挟迫攻赵，并不情愿。深恐知伯得势，危及自身，与赵盟约，然后合力攻知伯。韩、赵、魏出其不意，水攻知伯军营，知伯被俘而死。随后，赵襄子尽灭知氏一族，与韩、魏平分了知氏的土地与人口。

晋哀公十八年，哀公死，幽公立。韩、赵、魏借机蚕食晋国国君的土地，除绛、曲沃留给晋君居住，晋国其余的土地全部为三家瓜分。此后，韩、赵、魏各不隶属，自成体系，幽公不但不能君临三家，反而屈尊向三家朝拜。

魏、赵、韩三国形成后，都积极实施改革，使三国力量迅速

① 此纪年依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强大起来。

魏文侯元年（前445），魏国初具封建国家规模。文侯励精图治，礼贤下士，麾下谋臣如雨：

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特别是李悝，才干过人，主张：努力发展农业生产、重视地力；同时杂种五谷，避免单一农作物易受灾害的弊病；要勤于耕作，抢收快藏；利用宅基田埂空地，种植农副作物。李悝还推行平抑粮价政策，防止粮贱伤农，米贵伤民。在政治上，李悝主张以法治国，编撰《法经》。

用西门豹为邺县（今河南安阳附近）令，整治地方。西门豹到任时，邺地田地荒芜，市面萧条，目光所及，人烟稀少，只有漳水混浊而逝。问及原因，得知百姓苦于为河伯娶妇，流离失所，财税凋敝。所谓河伯娶妇，是指漳河年久失修，夏秋暴雨泛滥成灾，为害地方。地方三老、廷掾勾结巫祝，谎说漳河水灾是河神显圣，只要每年为河神娶妇，水患不兴，民得安宁。以此，他们借机搜括民脂民膏，得钱百万，除二三十万用于河神娶妇，其余中饱私囊。百姓家有少女的，为躲避少女被选为河神之妇，纷纷外逃，邺县经济日渐衰败。西门豹决心根除陋习，造福地方。到了一年一度为河神娶妇的时节，西门豹推说所选河神妇人不美，请人告诉河神，改日选到漂亮的少女再行送上。派人将巫婆及三个弟子先后抛到河中淹死，并以女流之辈不会办事为由，将三老一并打发下水去向河神送信。西门豹毕恭毕敬做了这一切，巧妙惩治了巫祝和恶吏，教育了现场的官民。革除陋习后，西门豹征民凿渠，引漳水灌溉。尽管工程浩大，民有怨言，但西门豹认为：虽然兴修水利给地方带来了暂时的负担，百年后，子孙后辈却会感谢我的好处。西门豹主持修筑了十二条水渠，减少了水害，灌溉了田地，使邺地农业发展起来。在西门豹的治理下，邺县农业和军事力量强大起来，成为魏国东北方向的屏障。

魏文侯三十七年，文侯以吴起为将讨伐秦国，攻掠五城，为

魏赢得全部秦西河地（今陕西大荔东）。文侯四十年，吴起为西河守。

魏文侯用乐羊为将，跃过赵国进攻中山国，准备假道于赵。赵认为魏攻中山，即使胜利了也会因隔着赵国而无法治理中山；败则势力受挫，不得不倚重赵国。魏伐中山，胜负均于赵有利，赵允许魏假道攻中山。乐羊率魏军经赵国攻陷中山。文侯四十年，乐羊因军功被封于灵寿。为加强对中山的控制，文侯派公子击镇守中山故地。三年后击返回魏，其弟挚为中山君，不久中山复国。

魏文侯还以卜子夏为师，对田子方、段干木也备加尊敬。

魏文侯时魏国强盛，西得秦西河之地，北灭中山，东与韩、赵联合打到齐长城，南得大梁（今河南开封）。

赵烈侯六年（前403），赵以公仲连为相国。烈侯问于公仲连：对自己爱的人可以使其尊贵吗？公仲连认为对自己爱的人只能使之殷富，不能使其尊贵。烈侯于是要赏给郑的歌伶枪和石二人田各万亩，公仲连答应照办。事隔月余，烈侯由代地返赵，问及此事，公仲连搪塞说，没有找到合适之人。不久，烈侯再问，公仲连干脆称病不朝。番吾君从代而来，向公仲连举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公仲连将三人转荐给烈侯。牛畜主张治国要用仁义，以王道规范行为；荀欣建议根据能力和才干选用官员；徐越建议节财俭用，借以考察功德。烈侯从中有所领悟，将赏歌伶田万亩的事作罢。用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烈侯即位前后，赵国势渐盛，多次联合韩、魏两国攻击楚国。战争中，韩、魏趁机将楚盟国郑、宋的不少土地占为己有，而越国因地势关系，出力不少，却没有得到多少土地。

赵敬侯四年（前383），赵勒兵攻卫，局势于卫不利。卫国向魏告急。魏国派兵击赵救卫，魏、赵两军大战于兔台，结果赵军失利。敬侯五年，卫国借赵军失利之际趁机攻占了赵的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并挥师直逼赵都中牟（今鹤壁西）。敬侯六年，赵

求救于楚，楚援赵击魏，兵锋直指魏国黄河一带。在楚兵的威慑下，赵军反攻成功，一举攻克魏国的棘蒲（今山东魏县）、黄城（今河南内黄）。这一次战役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大战。

赵成侯三年（前372），赵继续攻卫，攻取七十三个邑。七年后，赵夺卫国的鄄（今山东鄄城北）。赵得卫地，势力大增。

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其国内晋时的制度尚未废除，所建新制就已实施；先王之命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政局较为混乱。韩武子十年（前415），韩都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

韩景侯元年（前408），韩伐郑取雍丘（今河南杞县）。次年，郑反攻韩，败韩于负黍。至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混乱局面才有所好转。

韩文侯二年（前385），韩军击郑，攻陷郑国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韩军同时攻宋，克宋彭城，俘虏宋君，不久又将宋君释放。

韩哀侯二年（前375），魏国与楚国打得精疲力竭之际，韩国乘机起兵进攻郑国。此时魏国和楚国已无暇它顾，韩国得以一举吞并郑国。由于得到郑国的全部土地，韩国疆域扩大了许多。

自从晋幽公开始，晋国公室江河日下，而韩、赵、魏三国在三家的苦心经营下蒸蒸日上，发展迅速。随着三国相继在封国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封建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三晋已经到了开国立鼎的程度。虽无诸侯之名，已具列国之实。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国、赵国、魏国同时派遣使者到成周朝拜周天子，三国的使者是侠景、公仲连、田文。三人奏明周天子，请将三晋列于诸侯名册之上。周天子问他们：晋国的土地是否已经全部归于三家？田文回答说，晋国早已失势，内忧外患不断，国家已无宁日。韩、赵、魏三家凭自己的力量，剿灭盗贼，夷平外敌，从别人手中夺取了土地，并非从晋国公族那里抢夺的土地。周天子认为，既如此，三晋做诸侯何必告诉周天

子。公仲连毫不客气地回答，三晋只不过出于尊敬周天子，才来通知一声。只要周天子正式封了三晋，三晋日后必能辅助天子。周天子眼见晋唐叔之后已经不行了，只好顺水推舟承认既成事实。封韩虔为韩景侯、赵籍为赵烈侯、魏斯为魏文侯。三晋受了周天子册封，魏建都于安邑，赵建都于中牟，韩建都于平阳，并正式建了宗庙。但晋国国君的封号仍然保留着，呈现着三晋与晋国国君并存的局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韩、赵、魏联合行动，将有名无实的晋君废掉，绝了晋国的香祀，彻底去了心病。晋国亡了，三晋专心致力自已的发展。

起初，韩、赵、魏为了便于发展，经常联合对外，在扩张土地和抵御外敌时联合作战。随着三晋各自力量的不断强大，韩、赵、魏三家时有分歧发生，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攻伐征战不断出现。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晋为诸侯以后，三晋各自独立。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完全表面化，三晋之间的利害关系再也不能阻止他们的分裂。

魏武侯二十六年（前370），武侯去世。公仲缓与公子莹争夺王位，两派势力相互残杀，各不相让，魏国大乱。早已窥测机遇、伺机削弱魏文侯以来魏国巨大实力的韩国、赵国立即行动，借口魏国内乱，帮助魏国平乱，联合起兵，直捣魏国都城。此时，魏国陷于内乱，朝政混乱无序，根本无法抵御韩、赵联军，魏国岌岌可危。韩、赵联军直取魏国都城，意在索取，并非为帮助魏国，很快两国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按照赵国的打算，联军要以公子莹为目标，最好能杀死他，趁机占领魏国的土地。即使瓜分不了魏国，也能得到实惠。韩国则比较客观，认为魏国虽然内乱，但国力并没有损失太大，不如借机将其一分为二，化大为小，一步步吞食魏国。韩、赵两国各怀主意，分歧越来越大，最终两国在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闹翻了。韩国不经赵国认可自行退兵，把赵军孤零零留在魏国土地上。公子莹抓住时机，一鼓作气击败公

仲缓，随后又将赵国打败。自立为魏君。从此，三晋终于自谋发展，再无联合对外可言。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孙子兵法·吴问篇》

《史记》：《晋世家》、《魏世家》。

《水经注》引《竹书纪年》

《韩非子·说疑篇》

《说苑》

《战国策·魏策》

魏文侯称雄

晋哀公七年（前445），魏驹病逝，魏斯代立，为魏文侯。

自韩、赵、魏三家灭知伯以后，三家势力迅速发展强大，与诸侯并列。从春秋开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以及后来崛起于东南一隅的吴、越两国，先后称霸中原，周天子不过是春秋霸主蛊惑人心的傀儡而已。各诸侯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欺小，战争连绵不断。在漫长的兼并战争中，最后只有齐、楚、燕、秦及韩、赵、魏七雄各据一方，逐鹿中原。战国初期，七雄先后进一步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借以提高各自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其中较早致力改革的人物是魏文侯。

魏文侯二十七年，秦魏两国矛盾冲突加剧，魏国修筑少梁城（今陕西韩城南），秦魏两军相持少梁城，战争持续两年，少梁城毁于战火。魏文侯二十九年重修少梁城，以备秦军进攻。

魏文侯三十年，晋幽公深夜出城，行为不轨，为人所杀。晋国都城大乱，文侯举兵平乱，并将幽公之子止立为晋君，为晋烈公。晋国公室更加虚弱。

魏文侯三十三年，魏军在郑（今陕西华县）大败秦兵。与此同时，齐国开始进攻魏国，焚毁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包围阳狐（今山东阳谷）。楚国攻魏上洛（今陕西洛南）。魏国强大，向四周扩张，与各诸侯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战火四起。

魏文侯三十四年，文侯起用李悝，李悝是战国初期法家的重要人物之一。文侯任李悝为相，逐步建立一些封建制度。李悝为

文侯筹划，百里见方的地方，山川、村镇约占三分之一。宜耕田地约有六百万亩。地种得好，每亩多收三斗粮，完全能够做到；耕种得不好，每亩少收三斗粮，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事。百里之地多收或少收点粮食竟相差一百八十万石，全国计算起来就是个大数。为了增产粮食，提高国力，李悝制订了有关农业耕种政策，解决魏国人口稠密、土地相对较少的问题。李悝向魏文侯提供的分析，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进一步制订了平衡粮价的平籴法。即将好坏年成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时官府出钱按等级收购一定的余粮，坏年成官府按等级平价卖出一定的库粮，以此平抑市场粮价。防止粮贱伤农、粮贵伤民。

文侯还继承三晋铸刑鼎的做法，委派李悝搜罗各国法律，编撰一部《法经》。它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共六篇。盗法是盗窃他人财产的处罚条例，贼法针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囚法和捕法是惩治上述两项犯罪的实施细则，杂法是惩处窃取官印兵符和官吏贪污等项的条例，具法是依特殊情况从轻或从重处罚的办法。《法经》的实施，使魏国在七国中率先步入封建法制轨道。

文侯起用李悝的同时，抓紧部署扩张计划。派太子击率兵攻下秦地繁庞（今陕西韩城）。为巩固战果，魏军将繁庞原秦国之人驱除出城。

魏文侯三十七年，文侯谋士翟璜举荐吴起为将，率魏军攻秦，攻占秦地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

吴起是卫国人，喜欢剑术，颇有抱负，重名轻利。为求仕途散尽千金家私，从卫国来到鲁国。吴起到鲁国拜孔子弟子曾参为师，昼夜发奋，小有名望。齐国大夫田居欣赏吴起的勤奋，将女儿许配给吴起。吴起滞留鲁国，没有回过一次家。并重申自己不成就功名绝不回家的誓言。曾参对此极为不满。吴起母亲死时，丧信传到鲁国，吴起仰天大哭三声，仍旧读书。曾参怪吴起不孝，将

其逐出师门。吴起由此弃文习武，苦读兵书战策，三年而成。鲁相公仪休把吴起举荐给鲁穆公，拜为大夫。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齐国进攻鲁国，公仪休主张用吴起领兵御齐。鲁穆公认为吴起是齐国的姑爷，不放心将军队交给吴起。吴起知道这事后杀了妻子，鲁穆公无奈，只好拜吴起为大将，率军二万迎击齐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杀妻求将的故事。

吴起用兵，与将士同甘共苦，军心大振。经过仔细分析，吴起命鲁军坚守勿战。齐军派张邱到鲁军打探军情，吴起借机示以黯弱，态度卑恭，请张邱在齐军统帅田和面前斡旋，两军和好，吴起给齐军造成的错觉是鲁军不堪一击。齐军准备第三天对鲁军发动总攻击。就在齐军轻敌之际，吴起提前向齐军发起攻击，齐兵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田和深感吴起非等闲之辈，留在鲁国必成心腹大患，重新派遣张邱携重金潜入鲁国境内。张邱见到吴起，转达了田和之意，自然得到吴起的承诺，齐鲁军阵对峙，平静无事。张邱暗中散布流言，谎称吴起受了田和重礼，流言四溢，鲁穆公即责人查办吴起。吴起事先得到消息逃到魏国，住在翟璜家中。田和的离间计成功了。

魏文侯三十八年，文侯以吴起为将，领兵攻占秦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陕西合阳），迫使秦国将兵力收缩到洛水一带，秦西河之地全部为魏国占据。吴起军功卓著，颇受文侯信赖。文侯以吴起为西河守，全力经营这一战略要地。吴起带兵，纪律严明，进退有度。将与兵同甘共苦，卧不设席，行不骑乘。部队战斗力极强。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和军事家，吴起在西河二十余年，一手抓吏制，整顿乡风，体察民情，发展生产，充盈府库。一手抓军事制度建设，协助文侯建立武卒常备兵制。

武卒必须经过严格挑选、训练、考核。考核标准是：一名士兵要能够身穿上身甲、股甲、胫甲三层甲胄，头戴铁盔，腰佩利剑，持十二石的强弓，带五枝箭、肩扛长矛，背三天粮，半天步

行百里（约合今天四十余里）。考核合格者，免全家徭役，奖励田宅。然后根据兵士的特点合理编配武卒，充分发挥战斗力。凡身强力壮、善于近战的士兵编在一起；机智灵巧、善于登高跨跃的士兵编在一起；耐力强、善于长途跋涉的士兵编在一起。发生战争，根据地形和战场情况，交配合理地使用不同特点的兵士，充分发挥士兵个人特长。

西河在吴起的惨淡经营下成为魏国重要的军事要地，有效地牵制了秦国与韩国的力量。

当魏国西南边境相对稳定时，文侯开始考虑解决北方中山国的问题。春秋时期中山为赤狄之国，是游牧民族，在与晋国汉民族的交往融合中发展了农业和青铜制造业，产生了文字。归附晋国后，年年朝贡。三晋兴起后，中山国不再朝贡。此时中山国君荒淫无道，国势微弱，极可能被赵国或韩国趁机灭掉。解决中山国的问题已在文侯扩张发展计划之中。翟璜又向文侯推荐了乐羊。

乐羊品行端庄，闻过则喜，从善如流。曾远足求学，中途回家，正在织帛的妻子见乐羊便问，学业是否已成？乐羊回答因思念而归。妻子用剪子将机上丝线剪断，比喻半途而废，劝乐羊专心学业。乐羊深为动容，一去离家七年，奋发向上，学有所成。

文侯听了乐羊的经历，比较满意，准备派人延请乐羊。文侯左右顾虑乐羊之子乐舒在中山为官，乐羊不能全心全意攻打中山国。翟璜认为，乐舒曾奉中山国君的命令延请乐羊，乐羊拒绝到中山国。谈到中山国君荒淫无道，乐羊反劝儿子不要回中山为昏君殉葬。乐羊深明大义，由他领兵进攻中山，一定成功。

文侯以乐羊为大将，带兵五万，进攻中山。中山国君姬窟派鼓须领兵迎战魏军，被魏军用火攻法击败，魏军乘胜包围中山国都。姬窟听从大夫公孙焦的建议，派乐舒游说乐羊。乐舒再三推托不掉，只好登上城门楼，与乐羊阵前相见。乐羊对儿子毫不容情，历数姬窟无道，让乐舒弃暗投明。乐舒肯求宽容一月，双方

商定歇兵。姬窟无意投降，连拖三月。前方僵持的消息传到魏国，引起猜疑。文侯派人到乐羊军中慰劳，意在催战。乐羊军中人心浮动，议论很多。乐羊却另有考虑，两次三番推迟进攻，意在让姬窟失信，争取中山国的人心。乐羊安抚了军心，加紧准备攻城。姬窟眼见拖延战术无用，听从公孙焦的主意，杀了乐舒，做了人肉羹传送乐羊军中，要动摇乐羊军心。乐羊极端气愤，督兵猛烈攻城。文侯四十年，乐羊攻陷中山国都。姬窟自杀，公孙焦被俘而死。乐羊留下五千兵马镇守中山，挥兵凯旋。

乐羊受到文侯的赞赏，并收到文侯赏赐的密封箱子。乐羊回到府邸打开密封的箱子，竟是一箱弹劾他临战不力、战前通敌的奏章。乐羊百感交集，深感文侯知遇之恩。次日拜谢文侯：没有文侯明察秋毫，哪能有我乐羊的成功。文侯颇为感慨：没有我谁还能如此信任乐羊，没有乐羊谁又能为我建此奇功。文侯封乐羊为灵寿君，同时收回乐羊兵权。

中山故地远离魏国本土，中间隔着赵国。为便于经营中山地方，文侯封太子击为中山侯，招回留守中山的西门豹。太子击乘车耀武扬威到中山，出京都城门遇见文侯的名士田子方。太子击下车拱手侍立，田子方目不旁视、傲然坐着破车而去。太子击负气拦住田子方问，谁更值得骄傲，是富贵之人还是贫贱之人？田子方笑着回答太子击："富贵之人不能骄傲。国君骄傲国家难保，大夫骄傲家室难保。楚灵王骄傲亡了国，知伯瑶骄傲灭了宗族。而贫贱之人吃粗茶淡饭，穿破衣草鞋。不仰仗富贵之人，不思虑争权夺利，贤明君主请教时可以献点计策，君主不采纳时就随意走开。周武王灭纣，却请不动首阳山上两个穷士。只有贫贱之人才能够神气。"太子击受了一番教训，灰溜溜地奔中山而去。文侯所用之人，有许多都是田子方这样安贫乐贱而又学识过人的。

太子击镇守中山，西门豹回到魏都安邑。文侯因邺城接近上党（今山西长治）、邯郸（今河北邯郸），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派

西门豹为邺城守，治理地方，西门豹在邺城革弊兴利，禁绝了河伯娶妇的陋习，治理了漳河，把邺城经营成又一军事重镇。

魏文侯四十一年，齐国田悼子去世，田氏内乱。公孙会将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献给赵国，齐出兵包围廪丘。魏、韩、赵联合攻击齐兵，取得重大胜利，斩首级三万多，缴获战车两千余辆。次年，三晋联合攻齐，一直打到齐国长城脚下。

魏文侯四十三年，周威烈王册命魏王为诸侯。

魏文侯四十四年，楚声王被杀，楚悼王继位。楚国政局波动，内忧外患。次年，三晋联军趁机攻楚，一直打到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

魏文侯五十年，文侯死，儿子击即位，为魏武侯。

魏武侯三年（前393）开始，武侯继承文侯的霸业，利用魏国多年的基业不断发展。这一年魏军在汪（今陕西澄城境内）大败秦军。随后，与赵、韩两国合兵攻楚，先后在大梁、榆关重创楚军，几乎一举灭楚。

魏文侯在位四十九年，雄才大略，充分利用魏国肥沃的土地，人口众多的优势，积极向外发展，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发愤图强。在中央建立了由国君直接任免的百官，在地方设立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守令治理地方的官僚制度。礼贤下士，用人唯贤，依靠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全国上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建立了新兴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早称霸的国家。

（胡安贵）

参考资料：

《晋书·刑法志》

《汉书·食货志》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魏世家》、《货殖列传》。

《荀子·议兵》

《战国策·魏策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

田氏代齐

齐国本姜姓，西周初姜太公的封国。

齐地处山东，依山傍海，有渔盐之利，土地肥沃，经济比较发达。春秋时齐桓公用管仲为相，革弊兴利，打破旧的井田制，为某些贤达而非贵族世家的平民晋升铺平道路;实行以铜铁赎罪、释放奴隶的办法；盐铁官营，使国家掌握财政大权，富国强兵。桓公在管仲辅弼下九合诸侯，首建春秋霸业。齐桓公四十三年（前643)，桓公病死，齐国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乱。

桓公晚年沉溺酒色，所生儿子为争夺王位继承人的身份明争暗斗。桓公霸业多靠管仲等贤臣辅佐，管仲死前曾劝桓公远离竖刁、易牙等奸佞之臣。管仲死后，桓公将良言抛到脑后，宠信竖刁、易牙。竖刁逐渐掌握了一部分权力。桓公死后，竖刁、易牙大开杀戒，除掉桓公手下旧人故臣，将他们喜欢的公子无诡扶为齐君，遂引起桓公其他儿子的不满。齐国爆发内乱，朝纲失纪，桓公尸体停床十七天而不出殡，生了蛆虫，无人过问。桓公生前偏爱公子昭，曾把他托给宋襄公。公子无诡立为齐君，公子昭逃到宋国请襄公帮助，宋襄公带领其他几个小国组成的联军，打进齐国，武力拥戴公子昭，立为齐孝公。经过这场内乱，齐国元气大伤，国势日衰。

齐景公元年（前547）开始，齐国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被迫将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官府，自已则要忍饥挨饿，甚至三老之类的小吏也不免挨饿。为加强统治，齐国动辄施行酷刑——刖

(砍去一只脚)，由于乱施酷刑，齐国市场上的草鞋滞销，假肢(踊)供不应求，价格奇贵。齐姜丧失人心。

齐国田氏祖上为陈国厉公后裔，厉公儿子名完；厉公被侄儿杀死，侄子继为陈庄公。陈完不能继承王位，只当了陈国大夫。随后陈庄公的弟弟杀了太子御寇，自立为陈宣公。陈完与御寇私交甚笃，为躲避株连，陈完逃到齐国。

齐桓公四年(前 682)，陈完晋见桓公，桓公欲封陈完为卿。陈完推辞，仅接受了工正之职。陈完改名田完。田完在齐娶贵族懿仲女儿为妻。桓公十四年，田完死于齐国，谥号敬仲。

田完五世孙称田桓子，为齐国大夫。

齐国量具依次是升、豆、区、釜、钟，升到釜是四进位，釜到钟为十进位制。田桓子自制一套量具，升、豆、区、釜、钟，升到釜是五进位制，釜到钟仍为十进位制。田氏量具大于齐姜。田氏往外借粮时用自己的量具，收回粮食时用齐国通行的量具。大斗出，小斗入。让利于民，同齐国官府相比，田桓子颇得民心。大批齐国百姓依附到田氏门下，寻求庇护。田氏称投奔到自己门下的齐民为隐民。

齐景公十六年，田桓子、鲍氏与高氏、栾氏间的冲突表面化。栾氏为齐惠公公子子坚的儿子，高氏为齐惠公儿子之后。栾、高二氏地位显赫，给田桓子造成很大威胁。夏季时节，栾、高二氏要进攻田桓子和鲍氏的消息传来，局势紧张。田桓子当即发放铠甲武器、秣兵厉马，积极寻找战机。一天夜晚，栾、高酗酒狂饮，田桓子和鲍氏抓住时机大举进攻，双方先后两次交战，栾、高二氏都被击败。栾、高二氏逃往鲁国。田桓子将栾、高的土地分给受排斥的落魄贵族，分化瓦解旧贵族势力；又把粮食分给贫寒孤寡之人，收拢民心。田氏力量愈加强大。

齐景公二十二年，景公向晏婴问神仙不死之道。不久，景公死去。

齐晏孺子元年（前489），田桓子的儿子田乞有计划地准备推翻执掌大权的国、高二氏，利用上朝的机会做舆论准备，对诸大夫作动员。夏季六月，田乞和鲍牧联合诸大夫冲进公宫。高昭子与国惠子率兵入宫救援晏孺子。双方混战，田乞在六轨大道上打败国、高氏。国惠子逃到莒国，高昭子被杀，晏孺子被赶跑。田乞将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立为齐君，为齐悼公，自立为相。次年，鲍氏反对田乞独秉朝政，为田乞所灭。悼公四年，田乞杀了悼公，立悼公儿子壬为齐简公。田乞控制了齐国的朝政。

齐简公四年（前481），田成子继父田乞为齐左相，简公亲信监止为右相，以此牵制田成子。田成子与监止不可并存，简公用监止意在铲除田成子。田成子处境日趋艰难，危险迫近。为增强实力，田成子加紧收拢人心，继续实行祖上行之有效的办法，大斗斛出贷，小斗斛收回，颇得民心。同时，田成子整饬内部，团结宗亲。监止企图收买田氏远房族人田豹，让田豹杀死田成子，并且取而代之。田豹向田成子揭发监止阴谋。五月，田成子举兵起事。简公支持监止，亲自镇压田成子。对此，田成子曾犹豫不决，甚至准备出逃。同族人田行对他说："紧要关头，优柔寡断将导致失败。"田成子醒悟过来，调兵与监止展开决斗。监止战败外逃，在丰丘被人抓住杀死。田成子杀了简公，立简公的弟弟骜为齐平公，自己为相。田成子手握齐国大权，极力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措施：

一、亲自控制齐国刑罚大权，对残留的旧贵族鲍氏、晏氏、监止以及其他有势力的公族，逐渐一一削平。继续奉行笼络百姓的政策，论功行赏，提拔贤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还把田氏兄弟和同族入安排做邑大夫。

二、扩大自己的私人土地，将安平（今山东临淄东）以东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南）的地区划入自己的封地，其面积大大超过齐平公的地盘。田氏封地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田成子苦

心经营下经济发展很快。通过整顿市场，平抑物价，使田氏封地内山竹、海盐、鱼虾等物产物畅其通，充盈市场，物价稳定而且远远低于齐国其他地方，民间有歌谣："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寄托了一些人对田氏的敬慕。田氏封地内井然有序与齐君领地的混乱恰成对比。

三、广交各国，区别情况，投其所好，争取支持和理解。

鲁与齐接壤，其地处山东半岛西南部。两国一向交往很多，也常常因利害关系不同而冲突。齐简公元年时，齐军伐鲁。鲁大夫季氏宰冉求率鲁军左师樊迟为车右，拼力击退齐兵。但孟孺子洩所率鲁军右师失利，鲁童子汪锜战死。齐鲁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吴国夫差联合鲁军攻齐，在艾陵（今莱芜东北）打败齐军，杀死齐国卿大夫国书等多人。此时鲁国公室衰微，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经过两次瓜分，将公室军赋抢夺干净。三家采用征税制完全控制了鲁国军赋大权。鲁君只不过保留了一个宗主的虚名，鲁国实际已分为三国。鲁哀公曾要借助越军除掉三桓，结果反被三桓联军逐出鲁国。此时齐、鲁交战，实际是田氏与三桓争夺土地。齐简公四年田氏兵变逐杀简公，实为典型的臣弑君、子弑父，犯上作乱，破坏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名分制度。消息传到鲁国孔子耳中，孔子认为卿大夫杀死诸侯是大逆不道，恳求鲁国出兵齐国，讨伐田氏。孔子的请求自然被鲁国掌握实权的三桓拒绝。三桓与田氏作为新兴社会集团势力，在对待旧国君的立场上比较一致。田氏重新掌握齐国大权后，与鲁国、卫国和好，将先前占领的鲁、卫之地归还给两国，以免鲁、卫等国在田氏与公室的斗争中出兵干涉。

田氏兴起之际正值南方吴国、越国争霸。吴、越虽后起于东南一隅，霸业更迭迅速，但来势凶猛，构成目前齐国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吴王夫差臣服越王后北上争盟，修筑邗城（今江苏江都），下挖深渠，经射阳湖（今江苏宝应东），至末口（今江苏淮

安），贯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不久沟通沂水、济水。吴军水师可乘船由海上经江淮及泗水、沂水、济水一路北上。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越灭吴，越王勾践北上至徐（今山东滕县），大会齐、晋等国共尊周天子。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赐封勾践伯爵。越为当世霸主。随后越迁都琅琊（今山东诸城境内），函谷关以东的诸侯都要向越表示祝贺，越军横行江淮流域，成为春秋末最强的国家。对吴、越这样的强盛之国，田氏先后派使者分别到达吴、越，修好关系。

齐平公二十五年（前456），齐平公、田成子先后死去，平公儿子积立为齐宣公，田成子儿子襄子盘代田成子立。此时正值知伯瑶、魏桓子、韩康子围赵晋阳。

齐宣公三年（前453），韩、赵、魏联合灭知伯，三家分晋之势已成，田襄子（襄子盘）与韩、赵、魏遣使修好，以便彼此支持。

田氏内修政和，外结盟约，目的是为了减少自己夺权的阻力，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各国的承认。田氏取代姜齐君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齐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死，齐国内乱。公孙会将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献给赵国。齐军进剿公孙会，与三晋联军遭遇。三晋联军战胜齐军，直攻入齐国长城。齐军在这一战中死甲士三万，丧失战车千乘。齐宣公病死，儿子康公贷即位。齐国势微弱。

齐康公元年（前404），田和代田悼子之位。康公为人，好酒色、不理朝政，昏庸无能。齐姜大权完全落入田齐手中。

齐康公十四年，田和把齐康公放逐到海岛上去，只留下一座城邑作为他的食邑。田和成了齐国实际的君王，田齐代姜齐。

齐康公十八年，田和与魏文侯相会于浊泽（今河南白沙水库东）。田和恳求魏文侯在周天子和各国诸侯间斡旋。仿行三晋之例代为齐侯。魏文侯派人请求周天子和诸侯承认田和为诸侯。次年，

周天子正式册封田和为诸侯。

田和元年（前386），田氏名正言顺立为齐君。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田氏在齐国经过长时期的反复斗争，最终取代姜姓齐国。这场斗争，表面看去好像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但当人们把这场斗争同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实质上是新兴的封建势力与旧势力的一场生死搏斗。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六国年表》。

《韩非子·二柄篇》

《左传》哀公十年

《晏子春秋·谏上篇》

邹衍谈天

邹衍，齐国人。约生活在周显王十四年（前355）至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5），享年九十余岁。邹衍生于齐，后为稷下先生，成长后游历魏、燕、赵等国。邹衍一生著述颇丰，据《史记》、《汉书》记载，共有《主运》等五十余篇，可谓洋洋大观。邹衍著述三国时期以后已不能见，学说散见时人著作，资料比较零散。

先秦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是朴素、原始的，战国诸子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天地万物的自然世界进行了研究和解释，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各种思想百花齐放。但总的来看，认识水平仍停留在“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阶段。对冥冥宇宙的研究，尚需要解决方法论的问题。邹衍在解释“天”究竟是自然的还是神秘的产物这一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命题中，从已知状态出发，推而远之，穷极天地未生的混沌物，考察研究“天地剖判以来”的自然历史，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由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被人们称为“谈天衍”。

邹衍认为：天地不是与生俱有的原始物质，更不是永恒不变、绝对无穷的。天地是一个发展过程，有自身的生成、发展、变化过程。天地永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即天地分判之前，存在着一个无法考究和说明的原始混沌状态。天地、万物是这个幽冥、无形变化的结果。邹衍知道混沌的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既不可考，也不必研究，因而只能在一般概念上对世人勾画出它的演变顺序。他的这种认识本身就在表明这样的内涵，即作为自身有着发生发展

历史的天地，就是物质的特殊形态。天是自然的、物质的，不是神秘的，天没有任何意识。邹衍所谈的“天”，具有时间意义，既然它并非从来就有，不是绝对的物质形式，那它也就与物质形态依存条件之一的时间不可分割。邹衍对“天”的物质属性，特别是时间概念的论述使他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神秘之“天”的认识。在那里，“天”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这个有目的、有意识的神秘之“天”既没有过去、现在，也没有将来，是一个超脱于时间之外的永恒的东西。邹衍却提出“天地未生”、“天地剖判”作为“天”起始的时间标界，从客观世界寻求到“天”发展的顺序标定，从而为自己的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邹衍认识自然世界所采用的方法论，决定了他的思想在研究其他事物上的开放性。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天是神秘不可知，天地作为一个偶合概念，“地”同“天”属于不可知范畴。但“地”不可知的形式不同于对“天”的认识。“天”是纯自然的、抽象的，“地”则是地理的、具体的。其表现是狭义的，不可探索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即天下”，把地理与中国等同起来。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不断广阔，邹衍的思维空间开始冲破这一封闭观念的束缚，针对儒墨之徒不知天地宏大，守一隅而欲知天下万方的心态，提出著名的“大小九州”的论说。邹衍认为，所谓中国只不过是苍茫大地的一个区域，中国名“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包括九个州，即大禹治水，经营九州的行政区划；赤县神州不过是小九州。这样的九州共有九个，称大九州。每个州都有小海环绕，交往困难；大九州之外还有更大的海域环绕，其外为天地尽头。邹衍所谓“天地无垠”，本质却是个有限的地理空间。所谓的“无垠”是小九州对大九州而言；而大九州只是一个相对大的地理空间而已。天的大小与地的广延性对应，天的界定以地为标准。天地偶合概念被一同纳入空间、时间范畴，“地”也就具有了顺延性、不可逆性和认识参照物，也就是客观物质属性。

显而易见，邹衍描述的“天”是自然物质的特殊形态，没有神秘性和意识性，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自然物。邹衍理解的“地”是针对“中国即天下”的狭隘、封闭的地理概念提出来的。立足中国，中国之外尚有九州，九州之外还有更大的九州，天下如此之大，远非中国可比。从这方面来看天地无限广大，“天地无垠”。邹衍的自然观，特别是他关于天地空间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推测、臆念的性质，因而遭到后人的指责。如王充批评邹衍的“大小九州”说：邹衍的智慧没有大禹那样聪颖，所到过的地方又十分狭窄有限，所目睹的范围也仅限于一个狭小的天地。其才智无法与圣人相比，所描述的事情又不是天所授与的，天地无垠缘何而来？用《山经》和《地形》实录相衡量邹衍描述的天地之际，会发现它完全是不实之词。后人对邹衍认识论的非难并不能否定邹衍谈天的意义。理性思维是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认识不仅仅是消极的直观反应和感性经验。先秦时代，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着推今而知古，推有形以知无形，推有限以知无限的。根据已知事实推演并建立自己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由于其坚实的事实依据，应该是一种构筑在实证和逻辑之上的哲学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邹衍的宇宙观摆脱了神秘主义的虚妄和经验主义的直观。在他看来，人的思维能力可以由对小的东西进行观察、实验、比较、分类、排比、综合的分析，认识大的东西；由个别事物及现象得出一般及本质的规律；由已知而达到未知。先研究中国的名山大川、通俗禽兽、常见植物，然后推之海外人所不能目睹的事情。显然，邹衍“以小推大，以近推远”的方法不同于毫无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断和迷信。虽然它有推测性质，但绝非没有分析论证的猜测、玄想。因而，邹衍谈天说地大大开阔了时人的思想和眼界。

邹衍的社会史观同他的自然史观同样，是以小推大理性思维的结果，通过以近推远，以今推古，即由现实上溯到黄帝，再由

黄帝追溯到天地未生之前；从天地未生由远而近。如此反复分析、考察，邹衍提出人类历史“五德终始”学说。“五德终始”中的五德指水德、火德、木德、金德、土德，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终而复始，循环往复，“五德终始”又叫“五德转移”或“五德转运”。五德是由五行改变而来，邹衍之前有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传说有扈氏，暴殄五行。五行即水、火、木、金、土。水润下，火炎上，木曲直，金从革，土稼穑，五行各有特色，相互联系。土得水可以润下，木得土可以生长，火得木可以燃烧等等。对五行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已经包含相生相克的思想萌芽。春秋时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有了周先祖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的说法。用五行的分离与组合作为万物生成的本源，分离与组合的形式就是相生相克。五种不同的物质相互滋生、彼此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彼此克制，彼消此长。金、木、水、火、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五行无常胜”，它们之间相生相克，没有哪一种物质处于绝对优胜的支配地位。到了战国，邹衍赋予五行道德属性，把五行改造成五德，依然用相生相克的运动形式作为五德运行的轨迹，阐述历史变迁的内在规律。邹衍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代表着五德中的一德，朝代的兴衰由它所代表的德决定。按照这个逻辑，虞受土德支配，夏受木德支配，殷受金德支配，周受火德支配。土德兴盛则虞氏王天下，但土又生木，兴盛中的土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生木德，最终为木德取代。如此类推，每一德的兴盛决定着所代表王朝的盛衰，内在质的东西是五德各自包含的自我否定因素。如战胜虞而有天下的必然是受木德支配的夏朝。正如后人所道：“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按照邹衍的逻辑，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都是本着“五德终始”的定律不停地运转变化的。从“五行”的出现到“五行相生相克”，再到“五德”的相生相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人的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

低级到高级的深化。尽管这种认识是机械的和生物链式的社会化运用，但它包含的否定之否定原则，使五德的每一德都注入自我否定因素，如土德可以生木德，兴盛中的土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生出木来，为木战胜，为木所否定。如此以往，自天地分判以来，五德轮流交替，治天下者拥有恰好配合五德的属性。“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胜”说为理论基础，同时借助神秘之“天”的意志，以对自然的看法、理论及自然界的种种怪异现象来理解和说明社会历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邹衍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五德终始”说的逻辑中近乎合理，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却抹煞了自然和社会质的区别，背离了他自己对“天地”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五德转移”借助神秘的力量，虚构了五德相克的矛盾运动，推演出历史的变化及王朝的更替。社会发展史也就变成了“五德终始”的历史。邹衍力图从杂乱无章、由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堆积起来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出内在的客观规律，用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去诠解、推论历史变迁。结果就是用先验的模式匡正历史发展的线索，用臆造的联系代替现实联系，把历史描绘成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不过，邹衍认为任何一种兴盛的德性中都包含着彼此联系的对立因素，矛盾的对立体中，肯定与否定共存。这种矛盾运动过程排斥人的意志，任何一个王朝的存在都只是暂时的现象，没有永恒、绝对不变的王朝，历史不是静止的。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又具备着某些朴素辩证的因素。

邹衍的学说一经出现，即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王公贵族的惊奇和关注。喜好邹衍之术的人逐渐增多，最终形成阴阳五行学派。其代表人物除邹衍之外，还有邹忌、邹奭是为齐国著名的“三邹子”。从历史记载来看，邹奭可能晚于邹衍。邹奭生平、事迹及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贡献已无从考证，只能根据司马迁的叙述，认定他是邹衍后学中的佼佼者，对阴阳五行学说的传播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邹衍及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稷下黄老学派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吸取和借鉴了邹衍的某些思想内容，荀况、韩非在综汇先秦诸子思想过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邹衍学说的某些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邹衍的学说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秦汉以来，它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改正朔，易服色”的理论根据，为维护和论证王朝更迭的合法性提供了武器，成为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需要、构造封建政治理论体系的逻辑骨架。

总而言之，邹衍对后世的影响，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消极、落后的一面。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封禅书》、《魏世家》、《燕世家》、《平原君列传》。

《汉书·艺文志》

《盐铁论·论邹》

墨翟论爱人

春秋时的“士”，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受较好的教育，能文能武，但是其分化和组合也是剧烈的。一部分人担任卿、大夫的家臣，战时充当下级军官；另外一部分人丢掉田产，丧失职守，或凭借六艺知识成为传授学问的老师，或者为典礼时的赞礼者，或者参加政治活动，纵横游说，走布衣卿相之路。

春秋战国之际，新兴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改革并推行封建政治制度，迫切需要选拔各方面人才。有作为的国君招徕并敬重贤士，大臣也举荐人才，相互标榜，盛行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一个很平凡的士人，一经国君或权臣赏识，即可平步青云，出将入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文人学士游说之风。战国中叶，各国显贵每每养士为食客，有一技之长的士，包括鸡鸣狗盗之徒，都在网罗之内，形成强大的私人幕僚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私学之风大兴。著书立说、聚徒授业成为著名学者传播思想的重要途径。以上社会条件为士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活动空间。旧有的士分化改组，新的士从平民阶层中涌现。士的性质由原来奴隶主贵族的下层分子变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称。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利益集团从自己的地位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活跃的思想争鸣同士活跃的社会活动相结合，形成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流派有鲁国孔丘聚徒讲习六经而成名的儒家学派；宋国墨翟教习讲学，发

展为组织严密的墨家流派。墨家与儒家并为当时显学。其他的还有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与儒、墨合称九流，时称诸子百家。

墨翟又称墨子，宋人。生活在周定王元年（前 468）至周安王二十六年（前 376）间。

宋国是周初殷代贵族微子启的封国（今河南省东部），国土平坦，四周没有险隘关碍，易攻难守，封殷民于此，意在防止其日后反叛。宋君爵号是公，属五等爵之首。周边陈、蔡、鲁、卫势力不强，只有郑为劲敌。春秋，宋襄公不顾国力，欲图霸业，泓水一战为楚军俘虏，宋国力受到极大削弱。春秋至战国，齐、楚、晋、秦相继建立霸业，中原地区特别是宋国地势平坦、交通四达，为各国逐鹿之地，饱受战火蹂躏。战争给宋国造成极大破坏，给平民造成巨额的财产负担。楚庄王曾围宋九个月，宋粮草皆尽，甚至易子而食。宋国在长期的争霸战争和贡赋压迫下强烈渴望休养生息，所以首先倡议交战国缔结休战条约。周灵王二十六年（前 546）宋国大夫向戌主持晋、楚、齐、秦等十三国缔结休战盟约于宋。此后，宋国得到一段相对安宁的时间。进入战国后，宋国势更弱，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宋已岌岌可危。

墨翟出身平民，生活俭朴，生活中量体而衣，饮食饱腹而止，崇尚节俭。贫寒的出身和宋国的积弱形势强烈地影响了墨翟的思想，在其学术流派中深深打下了平民的烙印。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墨翟四处奔波，不辞辛劳，比较广泛地宣传和反映了平民的政治主张，创立了宗教色彩较浓厚的政治性团体。墨翟和信徒统称墨者，组织严密，等级要求明确，最高首领称钜子。墨翟死后，钜子之位传给贤达之人，代代相传，类似主教，墨者的活动大都由钜子率领，表现了原始的组织性。其特点是：

生活艰苦，主张节俭，墨者大都短衣草鞋，吃藜藿之羹。反对精食美肴，崇尚量体裁衣，腹饱即止。推崇大禹，昼夜工作不

息，以自愿吃苦为荣，好逸恶劳为耻。

服从钜子，钜子有令，墨者必须服从。即使官府的厚赏严惩，也不能动摇墨者对钜子的忠诚。

舍命行道，舍身取义。墨翟门下多义勇之士，弟子信徒一百八十余人都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钜子孟滕在战斗中，坚守城池，以身殉义，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全部跟随战死。只要对大众有意义，全身从头到脚磨成粉齑，也心甘情愿。

组织纪律严格。墨者有法：杀人偿命，伤人受刑。钜子腹黱居住秦国时儿子杀了人。秦王为其开脱说："先生已经年至耄耋，膝下只此一子，我已赦免他的死罪。"腹黱正色回答秦王："墨家有法，杀人处死罪，伤人受刑惩，就是为了禁止杀人。大王美意成全，但我不能不执行墨家定法。"坚持把儿子杀了。

实行教义，墨子弟子腾绰被举荐到齐国做官，他作战勇敢。墨子责备他违背非攻理论，要他辞官回来。

勤于实践活动。战国著名工匠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攻城利器云梯，楚军准备携云梯攻宋。楚为大国，宋是小国，再加上楚军装备了云梯，楚军处于极端优势。为施行墨子非攻的主张，阻止楚军攻宋，墨翟步行十昼夜赶到楚都，说服楚王和公输班不要以强凌弱，欺侮小国；同时墨翟还派人到宋国做好准备，应付不测，最终制止了楚宋战争。

墨翟周游列国，自称贱人，他和他的后学著有《墨子》一书，集中记录了墨家的政治思想。《墨子》经上、经下两篇，共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鬼十一题（除"非儒"为上下两篇，其余各篇都是上中下三篇），可信为墨翟本人思想。

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爱人。

墨翟认为，世界纷乱不息，彼此攻击都起源于人与人之间没有爱人之心。盗贼爱自己的家室，不爱他人的家室，所以盗窃他

人的财物充盈自己的家室，这是盗贼产生的根本原因，偷窃他人财物不是兼爱，不是爱人。再深入一步说，大夫爱自己的家族宗室，不爱他人的家族宗室，所以要扰乱他人宗族而利于自己发展，这就引起大夫与大夫间的纠纷，这不是兼爱，不是爱人。推而广之，诸侯各爱其国，不爱他人之国，所以攻伐他人之国来满足自己的国家，这显然不是兼爱和爱人。墨翟总结说：天下引起动乱的原因，不过是这个事实！不相爱，不爱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势必出现富贵侮辱贫贱，尊贵傲视低贱，奸诈欺凌愚钝的局面。

墨家的兼爱、爱人有别于仁爱。仁爱中的小人是不能行仁的，爱有等差。墨家兼爱和爱人的爱，对社会一切人都适用，爱无等差。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墨子郑重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就是说要视他人之国像对待自己的国家一样，视他人之家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视他人之身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如此这般，则诸侯相爱不征战，家族相爱不攻讦，人与人相爱不相盗窃。君臣相爱，则上明下忠；父子相爱，则上慈下孝；兄弟相爱，则彼此和睦协调。普天下的人都相爱时，强不凌弱，众不欺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智不诈愚。天下无生怨根，就因为兼相爱，人人相爱。

做到兼相爱、爱他人，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就会出现交相利的利他行为。墨子阐述道：爱他人之人，他人因而爱他。便利他人的人，他人必定因此而便利于他。厌恶他人的人，他人也必然因此而憎恶他。害他入的人，他人必因此而害他，这是极容易的事情。携泰山而跨黄河、越济水，古往今来从没有过，兼相爱，爱他人，彼此互助互利与担山越水不同，是像火焰上窜，水流下淌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人人相爱互利，饥饿之人便能得到食物，冻寒之人就可得到衣服，劳苦之人得以休息。

兼相爱而交相利，人人相爱而互助互利是墨子思想的核心，由

此而往才萌生出其他的观点。既然人与人要互助互利，所以反对战争，非攻本质上是为兼爱、爱人服务的。

墨子认为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春天会使土地荒芜而无人耕种，秋季会使收割耽搁。战争中失败一方损失无数，胜利者付出的代价也往往大于得到的。墨子特别反对那种进攻无罪之国的暴力活动，谴责战争中抢割人家庄稼、砍伐人家树木、杀死人家牲畜、焚毁人们宗庙、屠杀别国百姓、掳掠别国财宝的野蛮行径。

要普遍实施人人相爱互助，消弭战争，就必须选举贤达，推崇权威，尚贤尚同。墨子认为，最早管理国家的人由选举产生，最贤能的人做国王，其次为三公，再次的是将军、大夫、乡长、里长。要打破等级界限，不论农工商何种身份，因才而用。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他说：进献国宝不如举荐贤良之人。又说：国家贤才众多，则长治久安。国家缺乏栋梁之材，则国家面临困境。他把崇尚贤能之人视作为政之本。只有选贤举能，才能天下大同。

墨子的兼爱、爱人中包含着原始的平等思想，强烈反对奢侈和铺张浪费。对当时统治者挥霍无度，不管劳动人民死活，动辄大兴土木，作宫殿台榭，衣必锦绣文彩，食必美食琼浆的行为极为痛恨。具体地说，就是针对儒家礼仪中等级差别所要求的尊卑贵贱，特别是在丧葬上讲排场、营造坟墓、厚为棺椁、葬品众多，造成的民劳苦于外，财产乏匮于内，农民耕种树艺和纺织副业受到极大破坏的现实，主张节用、节葬。进一步则把钟鸣鼓瑟竽笙和搜刮民脂民膏相联系；将贵族生活讲求钟鸣鼎食与普通劳动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贫病交加，冻饿而死相比较，抨击贵族阶层的为富不仁。在墨子看来，饥饿而不得食，贫寒而不得衣，辛劳而不得息，三种问题是劳动人民最大的祸害，是兼爱、爱人首要解决的事情。基于此，墨子代表下层社会喊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心声。

墨、儒两家并为一时显学，在各自宣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

一些极为明显的对立。墨子对儒家的攻击集中反映在《非儒篇》里。孔子认为天命在上，贫富安危是不可更改的天命，因而人的富贵在天，尊卑有别、人有等差。对不可改变的事实，孔子主张刻意渲染，通过礼来强化、固化，在儒家自然是繁文缛节，厚用鼎食，显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不同等级。墨子说：天施善政，而有人乱政，神鬼赏善罚暴，亡国之君是上天的报应。反对把等级差别无原则的绝对化。只有爱人之心才是不可动摇的。抨击儒家贪于饮食，懒于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样子。墨子通过对儒家政治主张的批评把自己兼爱和爱人的核心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人人相爱、彼此互助这一朴素的道理规范成伦理道德中最基本的原则，再把互爱互利解释成国君兼爱一国之人，天子兼爱天下之人，从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想。

墨子思想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大主张，核心是论述爱人的命题。应该说这是出于对王公大人横征暴敛、奢侈腐化、残酷无情的强烈不满，以及要求减轻人民负担、实现社会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

墨子比较重视劳动生产，既然人与动物不同，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衣食财产，仰仗自己劳动的人才能生活，不劳而获是没有权利活在世间的。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所论述的“力”和“劳”不是单纯的体力耕织，它包括行政管理和理财、讼狱。这就导致了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比较重视实践活动。墨子指出，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人的耳、目等感观接触，从客观世界获得的。具体方式是闻知、说知、亲知，由别人传授知识、自己亲身体验、理性思维。墨子对人理性思维的论述，克服了前人在认识论上的狭隘经验主义，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派。墨家严密的组织团体逐渐为一些国君和卿大夫利用，变成封建主雇佣的武士集团。阳城君因参加反对吴起变法，叛乱出走，

楚收回阳城君封邑，墨徒孟胜竟率众一百八十余人为其殉身。诸如此类，说明墨家后学奉行的思想已不再是墨翟人与人互爱互利的主张了。

（胡安青）

参考资料：

《墨子》

《庄子·天下篇》

《吕氏春秋·去私篇》

《淮南子·泰族篇》

吴起仕魏相楚

周考王元年（前440），吴起生于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一个殷富家庭。

吴起自幼喜欢舞枪弄棒，少有大志，成年后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为谋求政治上的发展，吴起四处交游，仗义疏财。平时做事一丝不苟，崇尚法家，待人处事，以法家思想原则为准，一点一滴积累经验，为日后步人仕途积累经验。传说吴起曾与朋友约定一起在家吃饭，届时朋友爽约未至。吴起认为有约必遵，自己空腹等待一夜，直至次日清晨派人请来朋友才一同进餐。又传说，吴起治家极严。吴起曾让发妻织一条丝带，妻子织完后吴起发现尺寸不合适，就吩咐发妻改织。改织后的丝带仍然不合尺寸，吴起大发脾气。发妻辩解说："我固定了经纬线以后你才让我改织，怎么来得及呢？"吴起一气之下，休了发妻。吴起的哥哥对哭泣求情的弟媳说："吴起推崇法家学说，为了将来建功立业，一定先在妻子身上实行自己的主张，然后再推广开来。你还是回家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起家产散尽，妻子也被他遗弃，仕途却毫无希望，周围邻里的一些人开始讥笑嘲讽吴起。吴起恼怒，一气之下杀了嘲笑他的人。卫国吴起是不能呆了，只好逃到其他国家谋生。吴起辞别老母，用牙咬着自己的手臂发誓，不为卿相王侯绝不回家。吴起逃到了鲁国。

吴起到鲁国投在曾参孙子曾申的门下，昼夜研读，不辞艰辛。齐国大夫田居见吴起刻苦自学，胸有大志，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

给吴起。吴起从曾申学数年，后来因为吴起母亲病死而吴起没有回卫国尽孝，曾申与吴起断绝师徒关系，吴起改学兵法。三年后由鲁相国公仪休保荐，当上鲁国大夫。周威烈王十六年（前410），齐军进攻鲁国，为取得鲁穆公的信任，吴起杀死齐国籍贯的妻子，率兵退齐。鲁穆公听信谗言，认为吴起为人残忍而不讲信义，将吴起辞掉。

此时正值魏文侯招揽贤才，励精图治之际，吴起由鲁国到了魏国，投奔魏文侯效力。

魏文侯向大臣李克寻问吴起的才识，李克介绍说："吴起贪于功名，生活作风也失于检点。但他的军事才干过人，带兵打仗就连杰出的军事家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用人以才取胜，知道吴起有大才，还是留用了吴起。

吴起向魏文侯谈起军国大事，魏文侯推托说自己不喜欢兴兵打仗。吴起并不罢休，他毫不客气地对文侯说："根据臣下的观察，大王心里想的与口中所言并不一致。魏国一年四季宰杀牲畜，剥皮制革，日夜加紧制造长短兵刃；官车制做得朴实耐用，不加修饰，说用它行猎却又不轻便。这一切大王不知道干什么用吗？"吴起见文侯不语，知道他在等候自己后头要说的话，就继续说："如果用这些东西准备进攻或防御敌人，而不去寻找一个善于使用它的人来驾驭，无异于雏鸡与猫斗，小狗与虎搏，勇气可嘉，必然失败。古时承桑氏国君只讲文德，不修武备，终致亡国；有扈氏穷兵黩武，也丢了王位。善于治国的明主必须文武兼备，不但内修明政，更要武备常抓，两者不可偏废。对来犯之敌不予以回击，是不义；怜悯战场上敌人的尸体，就是不仁。"

文侯对吴起的见解实在很赏识，不久即在庙堂之上拜吴起为将。

吴起用兵能与部下同甘苦、共患难，深得部下拥戴。传说吴起曾为一个背生脓疮的士兵吸吮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闻知后便

大哭起来。大家不解其意，问她原因。她说："先前孩子父亲在吴大人麾下效力，背生脓疮，大人以嘴为他吸吮脓血。他感念大人恩德，战场上拼死效力，奋不顾身，战死沙场。今天，大人又这样善待我的儿子，不知将来这孩子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老母亲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起带兵高明之处。

不久，吴起率魏兵从秦国收复西河之地，随后又在吞并中山国的战役中立下大功。魏文侯四十年（前 406），吴起任西河守，主持对秦、韩两国的防备。周安王六年（前 396），魏文侯病死，魏武侯即位，吴起仍旧镇守西河。

魏武侯到西河巡视，吴起陪武侯乘船顺河而下。黄河激流，水势漫漫，仰观魏国一侧，山峦起伏，山河壮丽。武侯赞叹说："高山大川，形势险峻，真是一条牢不可破的防线，把敌人阻挡在魏国之外，这是魏国的瑰宝。"吴起对武侯说："国家兴衰不能只靠山川地形，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制度和策略。三苗氏左傍洞庭湖，右接鄱阳湖，地势不可不谓险峻，但不修德政，不讲求治理国家，被夏禹消灭。夏桀所居左临黄、济二水，右邻太华之山，南傍伊阙，北依羊肠坡，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可是他荒淫残暴，政治腐败，结果被商汤放逐。殷纣都邑左倚孟门山，右靠太行山，恒山在其北，黄河流经它的南部，同样因政治腐败而为周武王剿灭。国家兴衰不能只依靠山川地势。如果大王您治理不好这个国家，恐怕连这艘船上的人都可能成为您的敌人。"吴起的耿耿忠心和超人的见解，博得了武侯的重视，君臣二人的关系很是融洽。

武侯即位后拜田文为相国，这件事使吴起心中不服。吴起曾当面质询田文，到底是谁的功劳大。吴起说："统率三军，驱使士卒舍生忘死，守土卫国，使敌人不敢觊觎魏国，你我谁的贡献大？"田文承认自己不如吴起。吴起又说："管理百官，亲近万民，使仓库钱粮充实，你我谁的方法高明呢？"田文还是认输。吴起又说："镇守西河，秦国不敢东窥，韩赵两国与我国结好，你我相比，谁

的功劳更大?”田文依然承认不如吴起。吴起气咻咻地问:“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却官居我上,为什么?”田文回答:“大王年少即位,全国惊疑未定,大臣们尚不俯首听命,对这种形势,是把大权托付给你处置,还是托付给我处置?”吴起沉思片刻,承认应该把国家大权托付给田文。

吴起在西河为守二十七年,前后带领军队与其他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为魏扩张领土上千里。吴起在繁忙的政治、军事斗争之余,总结以往的战争经验,写成兵书《吴子兵法》,该书后来全部遗失,现存六篇系后人整理成书,但从中仍可看到吴起卓越的军事才干。

吴起总结了以往和当代的历史,主张在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统治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他曾对魏武侯说:齐桓公以五万精兵称霸诸侯;晋文公有四万先锋就实现独步中原的愿望;秦穆公靠三万人冲锋陷阵拓地千里。今天,只要有三千人的精锐即能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他还向武侯分析说: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必须首先搞好内部团结。吴起提出,国内不团结不能出兵作战;军队不协调不能布阵列队;军阵不彼此呼应不能开战;作战各部不协调不能取胜。武侯请教军队取胜的原因。吴起告诉武侯,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军有度,政令严明,兵精必胜。吴起肯定地回答武侯说:赏罚不严,军令不严,百万之众,也不堪一击。吴起建议:重赏有功将士,对死难将士的眷属,每年由官府派人慰问,善加抚恤;重罚临阵脱逃的人,赏罚严明,令行禁止。只有守信用,严军令,明赏罚,才能做到兵锋所指,将士效命。吴起论述将才必须文武兼备、刚柔并重。

由于吴起卓越的军事才干和巨大的功绩,深受文侯、武侯父子器重,但他锋芒毕露,也遭到许多人的忌恨。田文死后,韩国贵族公孙继任相国。公孙娶武侯女儿为妻,交结大臣王错,千方百计陷害吴起。他们针对吴起自尊心强的特点,攻其虚弱,向武

侯进谗言，诬陷吴起志大心高，功高盖主，嫌弃魏国池浅水少，不如强邻秦国有前途，有不肯留魏之心。他们又向武侯进言，试探吴起，将公主嫁给吴起，如果吴起打算留在魏国，就会接受；如果吴起有择枝他就之意，必然推辞。由此可以判断吴起的心志。公孙征得武侯同意后，即殷勤地将吴起邀请到自己的家中，授意自己的妻子当着吴起的面耍脾气，埋怨丈夫，瞧不起丈夫。这件事给吴起造成很坏的印象，使他相信公主都是骄横无理、桀骜不驯的。当武侯向吴起提亲时，吴起考虑相国之尊尚且不足以驾驭公主，自己更不行了。当即婉言拒绝。吴起不知道其中利害，回绝这门亲事，但武侯却从此产生了猜疑，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吴起。王错又不断在武侯面前搬弄是非，说吴起的坏话，武侯恐怕吴起生变，周安王十九年（前 383），撤掉吴起西河守之职。吴起怕遭迫害，由西河入楚，结束了在魏的军事生涯。

楚本南方大国，春秋以来不断向周边蛮荒之地扩张。疆域膨胀，实力强大。楚庄王问鼎周室，中原震动，名列五霸。终春秋一代，楚一直是列国中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到了春秋末战国初之际，楚国公室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讧，政局陷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这期间，越国兴起，不断向楚挑战。而楚国奸臣当道，良臣遭贬，内乱不止，无力反击越国。楚平王、昭王时，连败于越。周敬王四十一年（前 479），公族白公胜武装夺取政权，随即为叶公子高击败，楚惠王复位。楚国经过此乱，形势更加不妙，贵族权臣上欺楚王，下压百姓，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 402），楚声王被盗刺杀。内政不稳，外患频至。楚接二连三地被三晋和秦国击败。内忧外患，国事堪忧。楚悼王即位后不甘心楚国的沉沦，迫切希望改变积弱局面，四处求贤，广召人才。

吴起在这种形势下来到楚国，立刻受到楚悼王的器重，受任为苑地守（今河南南阳）。苑为楚与中原列国交往的要道，经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吴起在苑一年，地方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改

变了楚国对三晋防卫的不利局面。悼王对吴起在苑的作为比较满意，起用他为令尹，主持楚国政务。

吴起在魏国没能施展自己的才干和志向，楚悼王对他的信任给了他扶霸图强的机遇。吴起向悼王建议：楚国疆土辽阔，军队庞大，本应强于列国。但今天连与列国平起平坐的资格都不具备，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一是权臣势大，二是受封贵族过多。这些人上逼国君，下虐百姓，祸国殃民，必须彻底改变现行制度。

楚国是否需要变法，大臣们意见不一，贵族公族和一部分人反对变法，声势很大，只是由于悼王决定变法，吴起才得以战胜反对意见，在楚国进行变法。在悼王的支持下，吴起在短期内协助悼王推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新政：

采取措施削弱旧贵族势力，借以强化君权。将那些与国君血缘关系业已疏远的贵族一律废为平民；对封君称号已传三代的，收回封爵、俸禄和封邑，废除宗族谱籍；将部分居住在京城的贵族迁到边远地区。这些做法打击了旧贵族，加强了君权。

罢免无能之官，裁减多余无用的人员，按照“用贤”、“去不肖”的原则精简行政机构，使官僚机构的设置趋于合理，提高各级政权的办事效率。缩减开支，把财力使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在精简机构的同时，针对官场长期形成的腐败风气，扬善惩恶，奖功罚过，大力整顿吏治。对私情枉法，贪污受贿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对忠义爱民，为官清廉的人予以奖励。教育官吏不要因私害公，形成善恶分明，忠奸有别，忠言达上，正义不惧邪恶的一心在君，直言进谏，维护正义的风气。

楚地幅员辽阔，边远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待开发的土地极多。吴起协助悼王将居住在郢都人数众多的贵族连同其庞大的家族组织强行迁往乡邑，就地发展生产，开拓当地的荒地，推动楚国广大边远地区的开发。

吸取魏国变法时李悝制定《法经》的经验，因地制宜，结合

楚国的各种不同情况，重新订正楚国的法律条令，废除其中不合时宜的东西，补充了为新政服务的内容，“明法审令”，公布于世，在全国强行推行，匡正楚国习惯风俗。为新政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保证。

选练军队，加强武备。要改变楚国在对外战争中被动挨打的局面，重要的一点是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吴起在楚国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的同时，全力加强楚国的武备，“砥砺甲兵”。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将废除血缘疏远贵族、没收三世以上封爵俸禄，以及精简机构、淘汰冗员节省下来的大笔经费专项用于军备，征召军队，并对踊跃从军、武功好、作战勇敢的将士进行奖励。在吴起主持下，楚国在短期内就征召、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大军，军事实力一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破横散纵，拒绝结盟。针对中原列国纷纷在竞争中争取、拉拢与国，服务于自己，兼并别国土地的问题，特别注意那些四出游说，利用诸侯国内矛盾和派系斗争，达到鼓动该国参加“连横”或“合纵”政治目的的人。吴起非常熟悉其中的奥妙，深谙诸侯国中的权臣或有野心的公族贵戚，往往会借助所谓“连横”、“合纵”活动结党营私，以外力挟迫国君，谋取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为了防微杜渐，防止说客花言巧语干扰悼王变法的决心，动摇自己内修明政、外求强国政策的根基，吴起建议悼王严禁游说之士接触百姓，“破横散纵”，使纵横之士无从开口，更进一步则禁止说客到楚国来，不给这些人以任何可乘之机。吴起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是防止楚国旧贵族通过游说之士牵线，与其他诸侯国的守旧势力勾结，伺机兴风作浪。在吴起的参与下，悼王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方略，不与任何诸侯缔结盟约，保持独立自主的姿态，以便楚国对内“禁朋党”，激励百姓士气，确定楚国的大政方针，使楚国在不受外力骚扰的情况下，顺利实现变法图强的目标。

吴起辅助悼王变法图强，这严重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吴

起被委任为令尹不久，曾因公出访魏国，顺便拜访逃亡在魏国的楚国贵族屈宜若。吴起对他说："楚王不知我才学浅薄，委以令尹之职，先生如何看待我呢?"屈宜若直截了当地问吴起准备怎么干。吴起告之要削减旧贵族爵位，限制贵族俸禄，损有余而补不足，选练军队，择机争雄天下。屈宜若对吴起的打算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会变更祖宗法度，破坏常规，标新立异。屈宜若按照他的逻辑教训吴起："你就爱干些违背常理、不合道德的事。在鲁国如此，在魏国如此，到了楚国，故态复萌，旧习不改，依然故我。常言道，只有惹祸的人才能招来祸害。楚悼王一再违背天理人道，却没有遭到报应，看来是等你一起受祸。"吴起推行的新法与旧贵族的利益形若水火，遭到他们的反对也就不可避免。吴起推行新法的决心已定，不会因为旧贵族反对而动摇，他不断打击旧贵族，旧贵族势力对他的仇恨与日俱增。

吴起主持的变法虽然遭到旧贵族的仇恨，但在悼王支持下，吴起呕心沥血，彻底推行新法，实行新政，一年后楚国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倚仗权势肆意干扰国政的贵族受到打击，气焰顿减，吏治得到整顿，行政效率提高。建立了新法，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政局。经济上，节省了不必要的行政开支，移民开发边远地区，奖励耕织，促进了农业生产，政府财政开支状况改善。加强了国都防卫，改变了城墙的构筑方法。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大，威震诸侯，名播天下。南平百越；北并陈、蔡两国；击退三晋袭扰，迫使韩、赵、魏三国不敢南向谋楚；向西攻伐秦国。楚一跃而成列国劲雄。

周安王二十一年（前 381），楚悼王暴死。

吴起在楚变法一年使楚声震天下，原因在于楚的变法不但迅猛而且彻底，这才使楚国得以摆脱旧势力的束缚。所谓重疾用猛药，这也是不得不如此。吴起的变法愈迅猛，对旧贵族的触动愈大，遭到的仇恨越深。在这种形势下，楚悼王的支持不但是吴起

变法的保障，甚至也是吴起生命的保证。悼王暴死，给蓄意向吴起进攻的旧贵族提供了机会。他们从四面八方扑向郢宫，包围了正忙于处理悼王丧事的吴起。吴起面对杀气腾腾逼上来的贵族毫无准备，危急中忙伏身于悼王尸体之上。楚国法律规定，伤害王尸，祸灭三族。吴起要借王尸躲避刀箭。但叛军毫无惧怕，乱箭射向吴起。吴起与尸体瞬间钉满了利箭。叛军杀了吴起。

悼王被安葬了，太子肃王即位。按照法律规定，肃王将参与射伤王尸的旧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只有阳城君逃往他国。

肃王即位后，身边重新菌集起旧贵族人物，吴起新法夭折，旧势力重新控制了楚国军政大权。此后，屈、景、昭三家把持朝政，楚虽地大物博，却不能建立一统霸业，也许确如韩非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

吴起作为战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数十年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仕魏相楚，在魏则秦不敢犯西河，相楚则楚兴而天下震动，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胡安青）

参考资料：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蔡泽列传》。

《战国策》：《魏策一》、《齐策五》、《秦策三》。

《吕氏春秋·义赏》

孟子答梁惠王问

战国中期儒家出现了一位大师，他将孔子的儒家学说补充、发挥、改造，从而使其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就是孟轲。孟轲以其对儒家的卓越贡献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和孔子一起创立和完善的学说经过汉儒的改造，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孟子，名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活在周安王十二年至周赧王十年（前390—前309）之间。有人说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宋王偃称王前后，孟轲先后游历过宋国、滕国、魏国、齐国，会见过魏惠王、魏襄王，做过齐宣王的卿。约在齐宣王伐燕后不久，愤然离开齐国，晚年在邹度过。

孔子死后，儒家后学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诠解先师的观点，服务于自己的社会目的。后人说孔子死后，儒分八派。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是八派中比较正统的一支，自诩得儒学真谛，为儒学真传所在。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孟母择邻而居，教子有方，使孟子自幼仰慕子思之学。孟子并没有见过子思，仅从子思学生读过书，但孟子极其尊重子思，以子思再传弟子而自豪。

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是“王道”，中心内容是“仁政”，他的思想和奴隶制社会的各个方面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他还是主张封建演化，希望在基本保留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建立封建主义国家。孟子的“王道”是先王之道，法先王是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原始社会后期和奴隶社

会时期的先圣美化为政治楷模，备加推崇。尧舜之道，不实行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在孟子的心目中，不但尧舜，周文王也是应该效法的，以文王为师，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就能够在天下实施政治理想。孟子学说中的政治体制分为“王道”与“霸道”，以暴力治天下是霸道，行德行仁义者才能称为王。不难看出孟子鼓吹法先王为的是反对现世某些国君的虐政和霸道。基于这种认识，孟子主张通过实行“王道”、“仁政”来完成统一大业，反对战争，反对兼并和扩张领土。

如何复兴“王道”？孟子的主张就是施行“仁政”。其重要的设想和内容都反映在孟子与梁惠王的论述之中，即孟子答梁惠王问。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

“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魏国，想必有足以兴邦利国的高见？”

孟子回答道：“大王何必言则谈利呢，重要的是应有仁义啊！国君开口就是如何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开口就是如何才对我的家有利，士及庶人开口就是如何才对我有利，整个社会由上到下互相只谈利，国家就危险了。万乘之国的国君会被拥有千乘车骑的卿大夫杀害；千乘车骑的卿大夫会被百乘车骑的家臣所杀。如此计算，即使万里取千，千中取百，也不可不谓人数众多。如果人人都以利字为先，将义抛于身后，得不到利是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过仁义之人遗弃自己亲人、正义为本的人把君长放在第二位的。”

孟子这一通大道理是纯理论的，梁惠王此时更关注的是挽救每况愈下的国势，寻求富国强兵的良策。孟子所言对梁惠王来说实在太理想化，梁惠王不置可否地附和道：“是应倡导仁义，谈利做什么？”

孟子到了魏国，其名声已令魏国朝野瞩目，虽然，梁惠王同孟子初次谈话并没涉及实质问题，梁惠王还是很尊敬孟子，请孟

子垂教左右，随时请教。

一天，梁惠王与孟子游赏园林。惠王站在曲折回旋的岸边，仰目长空，鸿雁阵行，秋兴正浓，又见麋鹿悠悠，徘徊田野，不禁心旷神怡，悠然自得。他转过身问身后的孟子："贤德之人也有这种快乐吗？"

孟子借题发挥说："贤德之人乐于此，没有贤才道德的人就是面对美景也不会快乐。《诗经》记载：周文王始建灵台，事先周密地测量了四至方位，选择了最佳方案进行建设。四方百姓闻讯而至，自愿出力，不日已将灵台建成。周文王曾劝慰百姓惜力而作，但百姓就像儿子孝敬长辈那样不遗余力地奔忙。周文王游历于灵台下的园囿，但见鹿鸣悠悠，丰泽自得，百鸟怡然，色泽纯洁。周文王临轩灵池，鱼欢水碧。周文王借民力，筑灵台，掘灵池，而民众能欣喜而为，将高台美称为灵台，池塘命名为灵池。从麋鹿鱼鳖这些自然景物上感受到乐趣。古至贤之人能与民同乐，所以才获得欢乐。而《汤誓》却反映了另外一种情景，百姓诅咒：昏昧的夏桀什么时候才能灭亡，我宁愿与你一同去死。民众诅咒愿与其一同毁灭，纵然有台池鸟兽，岂能有所欢乐！"

梁惠王听出孟子话有所指，自我辩解地说：

"寡人治国尽心竭力，河内年景不好，就将灾民移居到河东，组织粟米赈济河内；河东遇荒年，我也采用相同的办法。同邻国执政比较，他们都不如寡人治国尽心。但邻国的人口并不减少，寡人的子民也没有增多，什么原因呢？"

孟子丝毫不客气地说：

"大王善于作战，就以作战比喻这个问题，敌我双方对垒，战鼓频敲，刀刃相交。有人弃甲而逃。其中，有人退了百步而停住，有人退了五十步而停住，以五十步而讥笑一百步，是不是合适呢？不合适，退五十步也仍然是逃兵。若大王明白这个道理，就别指望自己的臣民多于邻国。耕作不违农时，五谷可望富足；不用密

孔的网，竭泽而渔，鱼鳖就不会贫乏；按时令季节入山采伐，林木就不会因为滥伐而不足使用。谷物、鱼鳖食不完，林木使不尽，百姓生而无忧，死则无憾。'王道'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给民五亩宅地、杂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足以穿着绸帛；各种牲畜适时繁衍，七十老人就可以有肉吃。有百亩土地耕种的人家，只要不受干扰，不误农时，一家数口无饥馑之忧。再倡导和维持学校，申明孝悌之道。人到晚年也就不必为衣食奔波劳碌。待到七十岁的老人能够穿绸帛、吃饭有肉食，黎民百姓无冻馁之危，大王就没有道理不称王天下了。但是，现在狗猪宠物食人吃的东西，没有受到禁止；路旁有饿死的人，却没有人赈济。看到有人饿死却辩解说，不是我造成的，是灾年所致。这与罪犯用刀杀了人，然后说是刀杀人有什么区别？待到大王能够做到不再把责任推到荒年身上时，也就到了天下黎民前来归顺的时候了。"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竭力排斥"利"，讲求"仁政"。推行"仁政"的目的是实行"王道"。"仁政"首先要使黎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在孟子理想中，每户农家有百亩的耕田、五亩宅基地，宅基地上杂种桑树，可以养鸡、狗、猪等家禽，吃得饱、穿得暖。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织品穿，七十岁以上的有肉吃。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小农之家有能力抗拒一般灾荒，遇有旱涝天灾也不至于饿死人。应该说，孟子的一家百亩的经济设想是井田制度的翻版。方一里为一井，一井九百亩，中间为公田，四周为私田，分布着八个家庭单位，各种一百亩。八家共种公田，公田耕种完毕才能够耕种私田。孟子以井田制构筑出社会基层政权模式的环境，实行井田制可以使乡里彼此相助，团结和睦，有病的人得到关怀和照顾，井田制下的黎民不管老死迁移都不出乡里。因此说，孟子的井田制并不等同于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他主张农民可以有自己的家宅、土地，可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家庭经济，实行劳务地租。农民世世代代安居在土地上。孟

子要恢复井田，让梁惠王等诸侯推行百亩一夫的土地政策，不是为了恢复西周的井田，实际是设想了一种包含封建生产关系内容的土地制度。使黎民有一定的私有财产，维护相应水平的生产、生活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封建统治者不要干扰农时，要建立相应的教育场所，用孝悌伦理道德感化黎民，从而达到"王天下"的目的。

孟子在诱导梁惠王如何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鼓吹王者之道和井田制，在旧的形式下增加新的内容，由封建统治者加以实现。因此，对梁惠王任何表示感兴趣的承诺，孟子都报以十倍的热情，不厌其烦，循循善诱。

孟子对梁惠王说："用刀杀人和用木棍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用刀杀人与施政害人有不同吗？并无不同。厨房存有肥肉，厩有骠马，但黎民却面有饥色，田野有饿死的尸体，这种情形就像驱赶禽兽吃人。野兽同类相食为人类厌恶，为民父母官却驱赶纵容野兽吃人，还算什么父母官呢？孔夫子说，起初作俑随葬的人，不会绝后吗？只是考虑它像人形而用罢了，怎么能坐视黎民冻饿而死竟无动于衷呢！"

梁惠王说："晋国是天下强国，这是先生知道的，但到了寡人当国的时候，东败于齐国，长子阵亡；西丧地七百里，尽为秦国所蚕食鲸吞；南受辱于楚国。寡人深深感到耻辱，如要替死亡将士复仇，怎么做才行呢？"

孟子回答梁惠王："即使方圆百里的小国也是可以称王天下的。大王如能施仁政于民，减刑罚、薄税敛，实行深耕易耨的耕作方法。壮年劳力在农闲时间，讲修孝悌忠信。在家孝敬父兄，在外服从长上。即使让他们拿着木棍也可以击溃秦、楚的坚甲利兵。对那种强夺农时，使民不能耕种以赡养其父母，父母冻饿饥寒，兄弟妻子离散，害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君，您大王率众征讨他，谁能抵挡得住大王！所以，仁者无敌，大王请不要再迟疑。"

孟子在魏国期间除伴随梁惠王纵谈为政之道外，还曾拜访过惠王世子，并对其有过很有特色的追述：孟子告别梁襄王（惠王之子）后对人谈起初见襄王的印象：看起来不像君王，近前也不见慑人的威仪，猛然问了一句话却很令人刮目相看，“天下怎样才能和平安定？”孟子回答说：“求安定太平必须一统天下。”襄王继续问：“如何才能够大一统？”孟子回答：“不崇尚武力的君王能完成天下大一统。”襄王故意问：“谁又能归顺这样的君王呢？”孟子举个例子说：“天下没有不归顺的啊！您知道禾苗生长的道理。七八月间，干旱使禾苗枯萎，天油然作云，降下充沛的甘霖，禾苗受滋润后长得生机勃勃，这种生长旺势谁能阻止。当今天下各国的统治者无不崇尚武力，嗜杀成性。一旦有不尚暴力的君王出现，天下黎民百姓都会翘首而望。诚如此，黎民归附必然像水往低处流淌，顺势而下，无人能挡。”

孟子所鼓吹的“王道”和“仁政”，是一种适应地主阶级大一统事业要求的政治学说，孟子强调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性，把国君的一己之私放到次要地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针对当时的虐政、暴政提出节约民力、轻税薄敛，减轻人民负担，从而吸引天下黎民归附，无敌于天下，最终达到天下定于一统的目标。孟子在魏国同梁惠王阐述的政治观点仅仅是他庞大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要更完整地展示孟子的政治思想就要了解他与其他诸侯君王的谈话，特别是与魏惠王同时的齐宣王的问答诘难。

齐宣王曾向孟子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事迹。孟子推以孔子后学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后事鲜有传闻，所以罕有所闻。如果勉强谈起，只能说个“德”字。国君要君临天下，德行的核心是保民，懂得并做到保民使天下无敌。孟子鼓励齐宣王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据说齐宣王坐于大堂之上，见手下人牵牛祭祀鬼神，就命人不要用牛做牺牲，因为他不忍心看到牛胆颤心惊的神情。他想用羊替代牛做牺牲。孟子针对这件事赞扬宣王有爱心，并进一

步对宣王分析，以羊换牛做牺牲并非出于吝啬，齐国虽小也不至于怜惜一牛。大王考虑的是牛无罪而死。大王不必责怪百姓的误解，以羊代牛做牺牲本是不忍，但牛羊都要去死，对于不忍是没有区别的。大王虽然一时解释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不伤大雅，您的情感是属于仁人所有的。仁人大都惜生，不愿杀生。您只看见了牛，没有见到羊，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孟子巧妙的解释说得齐宣王兴趣盎然，孟子尽兴发挥道："君王的恩泽不可以只施及禽兽而不及百姓，能举百钧重而不能拿一支羽毛，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拿；明察秋毫而不见一车柴木，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去见。百姓得不到恩泽，是君王不愿爱护他们。以敬重父兄的道理推之他人，以爱自己儿子的情感施之于人，治理天下会变得易如反掌。但凡能够以身作则，为人楷模；爱人如己，推恩于人，也就可能保有四海。"孟子对齐宣王描绘施"仁政"的前景说，今施"王政"，会使天下仕林中人都愿效力于朝，黎民都愿到齐国来耕作求生计，行商坐贾云集于齐的都邑，行旅之人接踵来往于齐国的大道。天下不满其君王所为的都愿听诸大王。孟子还告诉齐宣王："人无恒产而志趣道义依然不减，只有士这样的人才能做到，民无恒产就会志趣恒心消磨殆尽，人无志趣恒心就会生出各种事情，及至作科犯罪，官府这时才对他们绳之以法，真是害人不浅。故此，施'仁政'一定要为民置私产，使其上足以侍养父母，下得以养活妻小，丰年足食，凶年也不会饿死，然后施教化于民，民可感化。"

孟子与齐宣王的问答，基本勾勒出孟子心目中的政治蓝图。在长期的游历过程中，孟子广泛接触了各国的上层人物，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侧面广泛阐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容。孟子的政治思想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思想基础上，孟子主张性善论，他认为每个人生下来时的性情都是一样善良的，性善是天生的。当然性善并不否定个性差异，人性有仁、义、理、智等善端。具体说就是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些是与生俱来的，但为什么后来有的人做坏事，有些人做好事呢？孟子说，原因就是外界事物引诱所至。为避免外界不良事物的引诱，使人性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等善良的性情得以发扬光大，清心寡欲、“不动心”是有效的方法。对外界事物的干扰不动心，不想心以外的事情，培养“浩然正气”，最终使浩然正气充斥天地之间。如此恢复和扩充人的善性。孟子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性善论为他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战国时期社会处在一场巨大的变革漩涡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变法改革，下层社会的反抗斗争，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兼并战争都是无法回避的。孟子对梁惠王的说教反映了地主阶级中改良派的要求。他们愿意实行封建制度，但又同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希望在不改变旧形式的前提下，由最高统治者通过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的办法来维护既得利益。孟子以周文王的事例校正梁惠王言行，借鉴古代圣贤的经验，避免暴力行为。这实质上是借用古代的方式实行社会改良，既不触动自己的经济利益，保全已有的政治地位，又使庶民生活过得去，保有一个起码的再生产条件，缓和阶级矛盾，使梁惠王之类的统治者得以长治久安。当然，无论是梁惠王，还是齐宣王、滕文公，都没有采纳孟子的主张。孟子退而著书，与门徒讨论社会问题，最终形成《孟子》一书。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孟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商鞅变法

秦穆公称霸西戎以来，秦国逐渐发展为西方一大强国。至春秋战国之际，许多中小诸侯国为大国兼并，剩下的鲁国、宋国之类的中等诸侯也只能默默无闻，承认自己是弱国，苟延残喘。实际只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在纵横捭阖，逐鹿中原。此时的秦国，虽然与中原其他大国一样内部萌生了一些封建因素，但其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还远远落后于它国。秦国位于西方，中原诸侯视其为戎族，多年来交往不多。秦国内部旧势力比较强大，宫廷斗争异常激烈。秦厉公、秦躁公、秦简公时，贵族每每侵凌王室、干涉王位，借机执掌大权。

秦简公六年（前 409），秦西河之地全部被魏国占领，内忧外患，国势日弱。秦不得不强化某些统治措施，命令官吏佩带利剑，以便于自卫防身。次年，秦开始征收实物地租，承认民间私垦土地合法性。

秦惠公十三年（前 387），惠公死。秦出子即位。这一年出子年龄刚满 12 周岁，尚不及而立之年。出子母亲与宦官执政，朝臣不满，百姓多有怨言。此时，长期留居魏国的秦公子连早已窥测时机，侍机回秦，借群臣不满情绪，取代出子为秦王。公子连经郑所之塞（今陕西华县东）入秦，为秦国守塞的右主然断然拒绝，只好借道少数民族戎狄居住区。由焉氏塞（今宁夏固原东南）潜入秦国。秦庶长菌改将公子连迎接入境，随即面临出子母亲及其手中掌握军队的威胁。公子连潜回秦国的消息传到秦都，出子母

亲立即做出反应，调集军队讨伐公子连。事出不测，前去讨伐的士兵和将领半路哗变，迎入公子连。公子连率倒戈的军队迅速逼进秦都。走投无路之际，出子母亲杀了出子，然后自杀。公子连登上秦国王位，为秦献公。

秦献公元年（前 384），秦国宣布废止杀人殉葬制度，结束了秦三百余年的人殉陋习，限制了贵族的某些特权。

秦献公二年，秦国将栎阳（今陕西临潼北）、蓝田（今陕西蓝田西）、蒲、善明氏建设为县，推行县制。同时，逐渐实行户籍伍甲，确立户籍制。五家编为一伍。献公意在改革秦国旧制，加强秦王权力，巩固边防。

秦献公七年，秦国明确设置市场，鼓励市场交易，培育和发展经济。献公二十三年，献公死，儿子渠梁即位，为秦孝公。秦献公在位二十三年，苦心经营，秦国势略有好转，为孝公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秦孝公元年（前 361），孝公年方 21 岁，眼见东方各国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国力大增。特别是齐威王、魏惠王并为七雄霸主，声势显赫。秦为大势所迫已到非奋发自强不足以生存的地步，于是一面发兵陇西一举将豲戎吞并，一面颁布求贤诏令，广揽人才。孝公在求贤诏令中追述了穆公之时，广施德政，崇尚武功，平定晋国之乱，拓展疆域，东达黄河，西服戎狄，天子、诸侯纷纷来贺，开创了丰功伟业。而后，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之世，内乱迭起，外患不休，先君开辟的国土西河之地丢失了，诸侯瞧不起秦国。每想到此，脸上无光，痛心疾首。孝公决心光复祖业，号召宾客群臣献计献策，能使秦国富强的，封官晋爵，赐给土地。孝公求贤诏令颁布后，一些有识之士多来效力，卫鞅由魏人秦。

卫鞅为卫国公族之后，原姓公孙名鞅。少年时倾慕李悝、吴起一派改革人物，喜好刑名之学。成年后投奔魏惠王相公孙痤，任官中庶子。卫鞅才干过人，颇为公孙痤赏识。公孙痤常有意将卫

鞅举荐给魏惠王。公孙痤重病弥留之际，魏惠王亲自前往探视。惠王问起身后之事，公孙痤介绍卫鞅年少而有奇才，希望惠王让卫鞅接替相之职务。惠王默然不语，没有赞同。公孙痤屏去左右，劝魏王不用卫鞅，就杀了他，别让他离开魏国。惠王允诺而去。公孙痤见惠王离去，又忙派人告诉卫鞅赶快离开魏国以免杀身之祸。此时恰值秦孝公求贤诏令传入魏国，卫鞅西走入秦。

卫鞅入秦，由好友景监举荐给秦孝公。景监为孝公宠臣，卫鞅凭景监的关系得见孝公。卫鞅与孝公大谈帝王之道，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竟将孝公谈得昏然欲睡。这次相会，孝公极为不满，责怪景监所举之人迂腐无能。卫鞅请景监再为引荐。卫鞅二见孝公谈王者之道，旁若无人，孝公依然无精打采，似睡非睡。孝公第二次召见卫鞅后，深怪卫鞅无能。景监将孝公的态度告诉了卫鞅，卫鞅并不着急，求景监再次予以引见。五天后，卫鞅第三次晋见孝公。与孝公谈论霸王之道，此言一出，孝公精神为之一振，表示自己并非反对王道，只是王道需百年见效，自己等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只求有什么富国强兵之策。卫鞅自诩霸王之道可以使秦国富强。卫鞅分析说：王道顺乎民情，慢慢引导；霸道不可，不但不能顺乎民情，反要努力改变他们的习气。没有见识的男女只贪图眼前好处，看不到以后好处；而有魄力的国君目光远大，他的计策要考虑到将来。实行霸道就得有决心，老百姓喜欢的事情不一定马上就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情要做的还得做，等到有了成效，百姓得了好处，才会欢天喜地。卫鞅进而向孝公献策：要打算富国，就得讲求农业；要打算强国，就得奖励将士。有了重赏，百姓就会效命；有了重罚，百姓就不敢犯法，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卫鞅的霸王之道受到孝公极大重视。孝公不但不打盹，反而精神抖擞，不知不觉间两人坐得越来越靠近，抵膝而坐，到了促膝谈心的程度。卫鞅劝孝公下个决心，要干就干到底。然后，嘎然而止，告辞而出。孝公急不可耐想听卫鞅继续讲下去，卫

鞅推到三天后再谈。

三天后，孝公与卫鞅再次促膝而谈，昼夜相继，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此，卫鞅颇受孝公信赖，君臣二人经常一起共商变法大计。

秦孝公三年，孝公在栎阳宫召集群臣商讨国家大事。孝公提出变更旧法的主张，同时又顾虑天下之人议论。对此，卫鞅力劝孝公去掉犹豫，下决心变法。圣人治国，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沿用古法；只要有利于民，就不须遵守古礼。

大臣甘龙对卫鞅所言之辞不以为然，他说："圣贤之人不用改变民众习俗推行教化，明达之人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遵循民俗施教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用旧的制度治理国家，官吏民众都很熟悉，不致引起混乱。现在盲目变法，破坏老规矩，要遭到天下人议论。"甘龙所言的中心意思就是反对变法。

卫鞅反驳甘龙的观点，他认为，有独到解见、方法高明之人总会受到世俗讥讽和反对。凡愚蠢之人在事情发生后往往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之人，则能预见事情的苗头。不能与平庸之辈商量革新创造，只能与其坐享其成。做大事之人不必拘泥一般人如何考虑。圣贤之人只要能够使国富民强，就不必考虑旧法。

卫鞅希望孝公不要再犹豫不定。

另外一个大臣杜挚赞同甘龙的主张，攻击卫鞅的变法主张。杜挚说："听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必更换旧的东西。法古不会出差错，循礼不会入邪门。"

卫鞅反驳说："前代的政教各有不同，该效法哪一个呢？过去的帝王不是相互因袭，能依循哪一个帝王故礼呢？所以我认为治理天下不能只按照一个道理。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要效法古制。成汤、周武王不修古法而兴旺发达，殷纣王和夏桀没有变更旧的礼法仍然灭亡了。所以，违反古之礼法不应遭到非议，遵循旧礼教的不值得予以称赞。"

孝公从卫鞅、甘龙、杜挚三人的辩论中颇受启发，坚定了变法信念。穷乡隘巷之人少见多怪，搞歪门邪道的文人巧言令色。愚笨之人高兴的事，正是贤惠之人所忧虑的。孝公当场表示即使天下人都在议论我，我对变法也不会再犹豫了。

秦孝公六年，卫鞅为左庶长，积极筹备变法。为做到新法一出，令行禁止，赏惩分明，卫鞅从小事开始做起，取信于民。卫鞅派人在南门竖立一根木头，悬赏说：谁将此木扛到北门，赏金十两，此事一经宣传，围观之人逐渐增多。扛根木头能获赏金十两，天下有这么便宜之事？人们将信将疑，观望不前。卫鞅将赏金增至五十两。有人扛起木头，在众人簇拥下来到北门。卫鞅当即赏金五十两。消息传开，民心大振。朝廷威信开始在民众中间树立起来，变法条件成熟，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一、在魏国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增加连坐法。改法为律，在秦国推广施行。所谓连坐法就是在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连同治罪的制度。凡告发奸人者可以获得同斩敌首级一颗同样的奖赏；知情不举者处以腰斩之刑。一家藏奸，全家就要受到与投敌一样的处罚；同什的其余九家倘若不检举告发，也要一起治罪。旅客住店要有官府凭证，客店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卫鞅所推行的法律体现了轻罪重罚的思想，迫使人们循规守矩，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如：对盗窃牛马者要处以死刑；统一度量衡，规定超越统一标准者有罚。卫鞅施行法治，改变秦简公以来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的状况，在短时期内使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民不妄取，盗贼匿迹的状况，强化了封建集权力量。

二、针对当时兼并战争频繁的特点，颁布鼓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规定个人军功大小要视其在战争中斩得敌人首级多少而定。凡斩敌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爵一级，想当官的，给予五十石俸禄的官职。官爵晋升与斩敌首级、军功大小成正比。二十等爵由

低到高依次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连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列侯。按爵位高低可以享受诸如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等特权，还可以担任一定官职。爵位高的甚至可以获得三百家以上的税邑，犯罪得以减刑。按照规定，公族中没有军功的旧贵族不能列入二十等爵簿籍，不能享受爵禄特权。在严厉推行二十等爵制的同时，要求个人占有田宅、臣妾数量及服饰穿戴都必须按照爵位等级规定，不遵守规定的要受到处罚。

三、奖励垦荒，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秦处西戎，地旷人稀。开垦荒地是秦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变法新令规定。凡致力于农业耕织而增加收入致富的，免除其自身徭役；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陷入困境而赤贫的，连同妻女一并收入官府为奴。通过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生产、垦荒，促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了限制商业豪强势力，新法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自己拥有奴隶的数量、姓名，以此摊派徭役；严格规定上市酒烟税额（约高出成本十倍）；加重关卡税；不准许私卖粮食。种种措施，目的在于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

卫鞅变法对于沉寂的秦国社会不啻于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沉重打击了世袭贵族的种种特权，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一如风卷残云而去。主持变法的卫鞅成为王公贵戚的眼中钉。各种丧失了既得利益的人们蠢蠢欲动，伺机制造事端，向卫鞅发难。新法颁布不久，公子嬴驷在贵族的怂恿下触犯新法，这使卫鞅十分为难，只好晋见孝公，陈述自己的看法：国家法度要求人人遵守，如果王公贵族不遵守法度，上行下效，下层百姓就会失去对朝廷的信任。太子犯法，他们的师傅应当替他承担罪名。孝公让卫鞅自己全权处理此事。卫鞅将公子嬴驷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以割鼻子和脸上刺字的刑罚。在渭水河畔镇压了七百多个破坏

变法的旧贵族，并将另外一批不满变法的人流放到边远地区。

秦孝公七年，孝公与魏惠王相会于杜平（今陕西澄城），秦国寻机而动。

秦孝公八年，魏、赵、卫三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孝公乘机派卫鞅率秦军伐魏，秦、魏两军经过激烈交战，魏军大败，秦军斩获敌军首级八千，攻克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秦孝公十年，卫鞅率秦军再次攻魏，包围了魏的旧都安邑，迫使守将投降。卫鞅因军功升为大良造。

秦孝公十一年，秦夺取魏国固阳（今内蒙包头、固阳一带）。魏国对秦的威胁大大减轻了。秦就此越过洛水，收复了部分西河之地。为对付秦国攻势，魏国与齐、赵两国先后讲和，集中力量对付秦国。孝公十二年魏军回头反攻秦国，围困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东）。魏与秦对峙不分高下，双方力量消耗很大，结果孝公与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相会修好，订立盟约。孝公将西河部分地方和安邑退给魏国，换取了边界的安宁，为即将实施的新一轮改革赢得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

秦孝公十二年开始，卫鞅在秦进一步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布废除井田制，将百步一亩的阡陌和顷田的封疆统统打破，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一亩的新田亩。除地主和自耕农私有土地外，将秦国的国有土地分授给无田耕种的农民。原则上，凡成年男子都可以从官府领受百亩土地。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用法律形式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二、将一定数量的乡、邑、聚（村落）合并成县，普遍推行县制（共建置四十一县）。每一县设县令一人，为一县之长；县丞一人掌管民政；县尉一人掌握军事。孝公十三年开始配置县官以下有定额俸禄的小吏。县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式建立起来。通过县的政权制度，全国政权、兵权逐渐集中到朝廷，建立了强大

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三、秦旧都雍（今陕西凤翔）地势闭塞，不便于发展，再加上旧贵族习惯势力较大，对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为了日后图谋向东发展势力，争取中原，孝公在卫鞅的策划下将国都由雍迁移到渭河流域、位于秦国中心地点的咸阳，并按照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和宫殿。

四、秦孝公十四年，秦国开始按人口征收军赋（户赋、口赋）。凡成年男子要向政府登记，另立户籍，缴纳户赋。男子成年而不分家另立户籍者，课以一倍的户赋。对隐瞒户口，逃避户赋的，就定为隐户，严加惩罚。按人口征赋而不按田亩征赋，有利于促进人们多垦荒地，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

五、革除陋习，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与少数民族杂居，戎狄残留风俗较多。卫鞅革故鼎新，推行中原人民风尚。

六、在秦孝公十八年实行统一度量衡，并在赋税、俸禄、商业等领域广为应用。

孝公用卫鞅变法，前后不过十年时间，秦一改落后状况，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迅速发展。

秦孝公十八年。此时魏仍为东方强国，魏惠王眼见秦国势力发展很快，准备借朝见周天子之名，纠集众多的小国会盟，乘机攻秦。卫鞅认为以秦一国之力，难敌众力。建议孝公表面尊魏为王，麻痹魏惠王。孝公采纳卫鞅建议，并派卫鞅游说魏惠王。卫鞅劝魏惠王号令宋、卫、鲁等小国，西面争取秦国，公开穿王服。然后，再打齐国和楚国。魏惠王为卫鞅虚幻的蓝图迷惑，没有识破卫鞅真实目的，竟然扩展宫殿，处处摆出天子场面，为实现卫鞅描述的目标，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召集宋、卫、鲁等国国君及秦少宫会盟，朝见周天子。魏惠王不顾自己实力强弱，强行以盟主身份召使诸侯，遭到韩国等诸侯抵制，加剧了中原军事形势的紧张程度。

秦孝公二十年，魏军攻韩，韩向齐告急。

秦孝公二十一年，齐国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伐魏救韩。魏太子申、庞涓带兵十万迎敌。孙膑采用减灶诱敌的计策，在马陵道重创魏军，俘太子申，庞涓自杀。魏国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

秦孝公二十二年，魏军惨败的消息传到秦国，卫鞅主张抓住魏国新败、士气低落的时机，出兵攻打魏国。孝公采纳了卫鞅的建议，派卫鞅带兵五万，出咸阳东击魏国。秦军一路直奔魏国西河，消息传到魏惠王宫中，魏惠王命大臣献策。大夫公子卬曾与卫鞅有点私交，自荐领兵前往劝和卫鞅，劝和不成功，可以固守西河，向韩、赵借兵攻秦。魏惠王认为公子卬的打算可以一试。拨给他精兵五万救援西河。魏军到达西河后驻扎在吴城，卫鞅派信使向公子卬致意，言语中流露出食君俸禄，身不由己的歉意。约定三天后双方在玉泉山相见，修订盟约。三天后卫鞅、公子卬各带酒食和几百名士兵相会于玉泉山。公子卬以主人身份敬卫鞅酒，卫鞅让手下两名最出色的勇士回敬公子卬。突然，远处战鼓声传来，公子卬生疑，质问卫鞅："怎么敲起战鼓，难道先生骗我吗？"卫鞅狡黠回答："不敢，仅此一回。"话音未落，公子卬及随从已被秦国两名勇士制服。随后，卫鞅让人假扮公子卬，诈开吴城，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魏军。魏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连失大将，兵力消耗很大，无力再战，只好将西河全部割给秦国，讲和罢兵。孝公鉴于卫鞅收复西河的功勋，封他为侯。将商地十五邑封给卫鞅，称商君，又名商鞅。

秦孝公二十四年，卫鞅派兵攻魏岸门，俘获魏将军魏错。此时的魏国，军事上连遭重创，丧地辱国，尤其是西河一失，国都安邑在秦军兵锋下暴露无遗。无奈，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求万全。

卫鞅在秦国二十余年，屡建奇功，声名卓著。但时时刻刻为守旧的势力所忌恨，遭受攻击。卫鞅封侯后，赵良公开指责卫鞅

滥施酷刑，殃及太子，先劓公子虔，后杀祝騹、公子贾，多行不义，虽然甲士环卫，也难逃危险。赵良蛊惑人心地游说卫鞅交出封地，到偏僻的地方浇浇园子，以求万全之策。

这一年孝公身染重病，弥留之际要传位于卫鞅，卫鞅坚辞不受。随后孝公死去，儿子嬴驷即位，是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当政，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立即四出活动，制造事端，向惠文王进谗言："大臣权势太重则国家危险，左右太亲近就会使身家性命危险。秦国妇女儿童都知道商君之法，不谈大王之法，商君反为主，大王变成了臣子。"诬告卫鞅图谋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卫鞅。

卫鞅事先得知消息，赶忙打扮成老百姓，准备逃往他国。卫鞅到了函谷关，天已全黑，无法再走，只好到客店过夜。客店掌柜要查验卫鞅凭证，卫鞅没有，客店主人对卫鞅说："这位客人真不明白，商君之法，收留没有凭证的人过夜，脑袋可就保不住了。"卫鞅感慨万分，只好另外想办法过了函谷关。卫鞅打算到魏国去，可魏惠王痛恨他诈胜公子卬，正要抓他报仇。卫鞅百般无奈，只好重新折回封邑，调集邑兵北出击郑（今陕西华县）。秦惠文王立即发兵围攻卫鞅，双方力量悬殊，卫鞅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被俘，随即处以车裂之刑，全家诛灭。

卫鞅虽死，但卫鞅所推行新法未废。卫鞅变法，兢兢业业二十余年，深入人心，妇幼皆知。虽然卫鞅个人落了个悲惨的结局，但秦国经过他的经营筹划一跃成为七雄之首，逐渐具备了扫平六国，一统天下的条件。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六国年表》。

《商君书·更法篇》

《战国策·秦策》
《韩非子·内储说上篇》
《汉书·地理志》

威王强齐

齐国都城临淄城外的驿道上，兵将执刀秉戟，询查往来的行人，间或驰过一两匹快报飞骑，马蹄叩落，尘埃四起，给齐都稍嫌紧张的空气增添了几分沉闷。齐桓公（田午）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已是第十九天了。尽管临淄及京畿周围的各地官府一直在遍访名医扁鹊，结果却如泥牛人海，杳无音信。宫廷内外都预感到桓公怕是快要殡天了。嗣子守在宫中，不敢因偶尔的疏慢而错过父亲最后一面。临淄在懵懵噩噩中度过了一天，桓公再也没有醒来……。

这是周显王十三年（前 356）的事情。桓公在位六年而逝，儿子因齐即位为齐威王。齐国田和代姜氏而立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经开始掌握政权，随后三十余年间齐王励精图治，任用贤才，逐步建立了一些具有封建性质的规章制度。但是任何新政权建立后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巩固和发展，由于各种旧势力影响，田氏政权的发展道路坎坷不平。朝内朝外有些人身居高位，玩忽职守，严重腐蚀了田氏政权。就外部条件而言，齐南有泰山，东据琅邪，西襟清河，北滨东海，地方两千里，带甲数十万。战车精良，军粮充足，再加上有比较完备的五都兵役制，真如世人所言是“四塞之国”。齐外部条件优越，是东方大国，齐桓公小白曾凭借它成就了春秋一代霸业。此后，齐始终是争霸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居于足以左右天下大局的位置。但是要将这些因素适时转化为国力，成就霸业，仍要有明主良臣的共同努力，才有希望重振春秋齐桓公

时的威名。齐威王即位，田氏虽早已为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但齐国在连续不断的政权更迭中消耗很大，诸侯对田齐颇不以为然。齐威王元年（前356），各诸侯便以武力表示对威王的蔑视，韩、赵、魏三国起兵攻齐。即位之初的威王一派洒脱不羁的风流劲头，委政卿大夫，终日沉溺声色。前方战争吃紧，齐军败阵失地，他全不放在心上。随后，弱小的鲁军攻掠齐地。紧随其后的还有力量弱小的卫国。面对积弱之势，威王一筹不展，日渐消极。此时的齐国已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

齐国的形势特别是齐威王的消沉引起了齐国统治阶级和部分士人的不安，他们迫切希望威王振作精神，勤于政务。据记载：

齐国著名琴师邹忌不忍看到齐国衰败下去，将个人得失抛开，要求进见齐威王。威王喜乐，召见邹忌。邹忌挟琴入宫，拜见了威王。他调好琴弦，整勅装束，似乎准备为威王演奏一曲。威王自己也能弹琴，自认是邹忌的知音，端坐在王位上洗耳恭听。过了许久，邹忌只把双手搁在琴弦上，一副准备操琴的神态，但不动手。威王挺纳闷，不知邹忌装神弄鬼干什么。问道：

“邹忌，你调好了弦，引而不发为什么？”

邹忌回答说：“大王，我不但善于操琴，而且还能为大王讲弹琴的道理。”

威王善琴，却不曾听过弹琴还有什么道理，就同邹忌坐论琴道。邹忌对着威王信口开河，漫无边际地诌了一通玄乎其玄的话。威王似懂非懂地听着，不耐烦起来，觉得这些空洞的话毫无用途。他打断邹忌的话说：

“你说的挺对，挺对。可是为什么不弹琴给我听一听呢？”

邹忌见威王不以为然的神态，知道开诚布公的时机到了，语气平和但字字铿锵地说出一番道理：“大王瞅着我持琴不弹，装模作样，一定认为我这是尸位素餐，于是很不高兴。同样的道理，齐国人瞧着大王拿着齐国这把大琴，没有弹过一次，都不高兴！”

威王恍然大悟："先生原来是拿着琴来劝我啊!"忙让人把琴拿下，与邹忌谈论起国家大事。

这段记载反映了威王纳谏的品质。大约从这时起，威王以邹忌为相，决心励精图治，改变积弱局面，并命人铸铜器，勒记自己要继承和发扬桓公田午的业绩，远追祖宗黄帝，近则学习齐桓公（小白）、晋文公号令诸侯的霸业。

邹忌为相，辅弼齐威王修明吏治，建立法制，集权中央。他开导威王在谨修法而督奸吏时，首先做到端正君臣关系。树正气，灭奸邪。做国君的要亲贤人，远小人，鼓励臣民进谏，不为阿谀奉承之辞蒙蔽，顺乎民心，体贴民众；做臣下的要尽心竭力辅佐国君，以国事为先。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国家才有希望。邹忌有感齐国官场陋习积弊，想方设法规劝威王勤于观察，别让左右之人奉承和谗言蒙蔽。最生动的事例是，邹忌身高八尺，相貌堂堂，自我感觉很好。早晨，邹忌穿戴整齐，瞄着铜镜问夫人："我与北门徐公谁更漂亮?"城北徐公是齐国美男子，邹忌颇想在亲人心目中与其一试高低。夫人回答："徐公哪儿比得上您呐!"邹忌迟疑片刻，又问仆人，仆人回答的与夫人一样。恰巧有客造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竟然也这样回答。邹忌得意极了。第二天，城北徐公拜访邹府，邹忌望着徐公觉得还是徐公美。他偷偷瞧了瞧镜中的自己，再端详徐公，越看越觉得比不上徐公。晚上邹忌躺在床上想，夫人称赞我美是因为偏爱我，仆人称赞我因为害怕我，客人夸奖我因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美。邹忌向威王讲述了这件事并总结说："明明我比不上徐公，但夫人爱我，仆人怕我，客人有求于我，都说我比徐公美。大王之国，周围千余里，城邑一百二十多座，宫中美女和近侍无不想讨大王喜欢，朝上官员无不害怕大王，全国各地之人没有不求助于大王的。由此看来，大王您的耳目很可能蒙蔽得很厉害。"

齐威王被邹忌所言深深打动。颁布一道命令：凡朝廷大臣，地

方官民人等，能当面提出批评建议的，给予上等赏赐；用书面提出的，给予中等赏赐；在街头巷尾批评议论朝政的，只要传到国君耳中，也要奖励。诏令下达后，提出建议和批评的人争先恐后，热烈的情景维持数月之久。

齐威王得邹忌辅弼，言听计从，如鱼得水。邹忌因此而拜相，地位显赫。威王手下另一名士淳于髡，赘婿出身，勤奋好学，后入稷下为博士。《孟子・告子下篇》记载淳于髡曾两次当面指责孟子，认为鲁缪公重用儒者而弄得国家削弱，儒家之道无益于国；孟子事于鲁而无功，就算不得贤人。淳于髡为人坦荡无私，注重功利。他见邹忌骤然得宠于威王，终日论道，颇不放心邹忌的学识人品，率门生弟子数人傲然造访邹忌。淳于髡问道：

“做儿子的不能离开母亲，妻子不能离开丈夫，对吗？”

邹忌回答：“对。我作为臣子从不敢离开君王。”

淳于髡又问：“车轱辘是圆的，水是往下流的，是不是？”

邹忌说：“是。方的轱辘不能转动，河水不能倒流。我不敢不顺乎民情，近于百姓。”

淳于髡丝毫不放松，紧紧追问：“貂皮破了，别拿狗皮去补，对不对？”

邹忌回答：“对。我不敢让小人占据高位。”

淳于髡仍不放心，继续问：“造车必须尺寸有度，弹琴一定要定音合律，对吗？”

邹忌胸有成竹地说：“对。我必须注意法度，整顿纪律，动有方圆。”

淳于髡与邹忌交谈，意在用微言进说邹忌，试其学识。淳于髡眼见邹忌才学渊博，学有所归，知道威王已有贤才辅佐，放下心。向邹忌行礼而退。

齐威王得邹忌、淳于髡，逐渐革弊鼎新，重振精神。从用人、吏制等方面开始刷新朝政。

齐威王知人善用，受益不浅。为广揽天下人才，齐国于临淄稷门之外建立学宫，利用地处周文化与各种新兴思潮汇集之地的条件，鼓励各种学派到此讲习。来稷下讲学、著书、辩论的各国学者被称为“稷下先生”。稷下学宫时间长，来此讲学的人多，有许多著名的人物，从而成为战国时学术活动的重要中心，稷下学宫荟萃当时各种学术思想，一直是齐国招揽人才的蓄水池。齐威王继续苦心经营稷下学宫，建高屋大门，赐稷下先生为大夫，提供华贵的宅舍，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据《说苑·寻贤篇》记载，稷下学宫人才济济，威王时竟多达千余人。秦汉时博士官制度就起源于此。其中著名的人物有田骈、接子（又作捷于）、环渊、宋钘（又作宋轻）、慎到、邹奭等。淳于髡更是稷下学宫的佼佼者。稷下学宫固然是由于齐国统治者招贤纳士兴旺发展起来的，这一学术活动中心为齐王输送了许多人才和有效的治国思想。另一方面，它对于传播文化思想，倡导学术争鸣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稷下学宫诸家思想流派中以黄老学派最为显赫，后世一些思想家即源于此。稷下黄老学派分为三支：一支以《管子》“心术”、“白心”、“内业”各篇为代表，师承老子而有变化，以道为万物之本，道可以释为“灵气”，释为“精”，老子的道独立于人，灵气、精则通过人的涵养藏于内心。因此，这一支的黄老之学把道家的道与世俗的礼义法度联系起来。明君圣人能够保持体内“精”、“灵气”，先知先觉，所以圣明贤达之人得以推崇。二是田骈、慎到一派，因长于名辨，时人称“天口骈”，其社会政治思想重礼重法。尤其是慎到主张“势”，认为如果尧是一名普通人的话，连邻人也统治不了；桀所以能乱天下，就因为他是天子。由此可知权势职位足以信奉秉仗，而贤慧智能实在不足羡慕。在慎到一派心目中没有势就无从谈法，这种认识为法家后来集大成者韩非所继承，成为韩非法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环渊派，该学术流派重于老子所谓的道，较多保留了老子虚无主义思想，主张无为，脱离

现实世界，独善其身，是稷下黄老学派中真正继承老子衣钵的一支。齐威王经营稷下学宫，招揽了众多的学者，繁荣了思想学术活动。同时，又必然为稷下学宫的活动印上现实主义烙印；稷下门派既为威王输送人才，又为威王提供统治思想，扩大宣传。

齐威王治国，极重视人才。邹忌、淳于髡之辈固然皇恩浩荡，宠遇无加。就是邹忌举荐的人才也受到威王重用。威王心目中，只有这些栋梁之材才是社稷之宝。威王同当时其他诸侯，如魏惠王相比，可谓独具慧眼。

齐威王曾与魏惠王郊猎。秋草碧绿，风高气爽，郊外秋意尽染，齐王、魏王并辔而行，纵鹰驱犬，铁马金戈，情趣盎然。情之所至，魏王陶然，信口谈及自己的宝贝，“径寸”大小的珠子，光夺人目，可照见车前后十二乘的地方。魏王声称拥有这样的明珠十颗。齐王听了很不以为然，称自己以得力的大臣为宝。如南城守檀子，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使楚人不敢觊觎，泗上十二个诸侯仰慕来朝；盼子守高唐，使赵人不敢偷渔于河；此外还有徐州黔夫、大臣种首。齐王以人才为宝，声威千里。齐、魏二王并驾逐鹿，好恶不同，日后桂陵之战的胜负似乎可以预定了。

齐威王曾经年不治国，百官荒乱。一朝奋发图强，成败关键在人才，在吏治。据传说，淳于髡打隐语启发威王说：“国中有一大鸟，栖息王庭，一停竟达三年之久，不飞不鸣，不知此鸟是什么道理?”威王狡黠而答：“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威王从中似有所悟，要使齐国一朝振奋，自己成为一代英明君主，必须采取某些断然举措，整顿吏制，以儆效尤。邹忌巡访百官政迹，常闻一语：“中等政绩的官员很多，难以叙述。只知道地方官员中以阿大夫最好，即墨大夫最坏。”邹忌禀明齐威王，暗中派人查访阿大夫和即墨大夫政绩。

不久齐王似乎无意间问及左右关于阿大夫与即墨大夫的官声政绩，左右之人盛誉阿大夫，诅咒即墨大夫，结果依然如旧，好

像这个问题早已不容置疑。事实上每次威王及邹忌问及阿大夫与即墨大夫的情况，朝官和威王左右之人都很起劲，他们希望阿大夫高升，各人都得好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而即墨大夫平素不通人情世故，无人希望他晋升。这是齐国官场的积弊顽疾，不是一日之事。很快，威王召阿大夫、即墨大夫回朝述职，众人认为这就等于叫阿大夫领赏，即墨大夫受刑，蜂拥而至，静观佳音。

朝廷大臣及威王近侍、阿大夫、即墨大夫朝见威王。当庭安置着一口大锅，锅中翻腾着开水。威王叫即墨大夫，指点着说：

“你到即墨为父母官，朝中天天有人告你，举说种种过失。我派人到即墨调查核实，他们到即墨见田地里的庄稼绿油油，一片葱茏，人民安分守己，神态怡然，好像不知什么是苦楚，不存在纷争。地方富饶、百姓安居乐业是你的功劳。你专心治理百姓，不懂与官僚们拉关系，也不送礼给大家，惹得怨声四起。像你这样勤勉踏实，不吹牛拍马的地方官，在齐国真是凤毛麟爪。”威王眼乜着众人，嘲弄一番，郑重宣布“为即墨大夫增加万户俸禄。”

众人听着威王的话，都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威王又对阿大夫说：

“你到阿城，几乎时刻有人夸你，捧你。我的人到阿城调查，却见田地荒芜，遍地饥馑，百姓噤声，背后悲叹。这就是你阿大夫的罪过。你欺压百姓，中饱私囊，还利用从地方搜刮来的财富行贿朝臣和内侍，买动他们替你吹牛，蛊惑人心，像你这样专营贿赂，买动人情，巴结上司，专事私利的贪官污吏不受惩治，国家安成体统！”威王气愤已极，下令武士把阿大夫投入锅中烹死。平日为阿大夫说好话的人脊梁骨冒凉气，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

齐威王决心重症下狠药，一不做、二不休，一举革除官场陋习。他看着受贿的大臣说：“我在宫中怎么能知道外边的事情，大臣就好比是我的耳目。你们贪赃受贿，黑白颠倒，无异坏我耳目，要你们干什么？”威王又烹杀几个徇私枉法的大臣。

齐威王严惩贪官，赏一人、诛一人，大大矫正了官场恶习，齐国风气为之一变。邹忌辅佐威王有功，被封为成侯。

此时齐国国内大治，声势开始强大起来。先后击退赵、卫两国侵袭，并迫使赵国归还了先前占据的齐长城。在同三晋中国力最强的魏国几次交锋中，齐国也占了上风。为了能够在以后的诸侯活动中获得主动权，齐威王选择了周天子作为突破口。

邹忌认为齐桓公（小白）、晋文公执牛耳称霸诸侯，无不打出尊王旗帜。今世周天子虽然衰落得不如中等诸侯，毫无王室之实，但名份仍是天子。齐王如能举起这面大旗，等于挟天子号令诸侯，齐王就是霸主。齐威王却有所疑虑，自己已是王，怎么去朝见另一个王呢？邹忌老谋深算，为威王献计：借朝见周天子的机会自称齐侯，从而博得天下诸侯对田氏齐侯的承诺。威王朝见周天子，周天子及臣民喜不可禁，赏赐齐王“齐侯”的封号。威王朝见周天子得齐侯之封，沿途多闻赞美之辞，真是名实兼收，心中得意。回到临淄便开始一心一意致力向外发展。

恰在齐威王准备向外发展，需要军事人材之际，传来军事奇才孙膑为同窗好友庞涓陷害致残、在魏国备受煎熬的消息。威王立即派淳于髡率人出使魏国，设计救回了孙膑。威王得知孙膑平安到了齐国，派大夫田忌出临淄城外迎接，随后立即接见孙膑并将其妥善安置在田忌家中。

齐威王四年（前 353），赵国出兵攻打魏的盟国卫国，迫使卫国改朝赵国。魏惠王恼羞成怒，纠集宋、卫两国军队围攻赵国都邯郸。赵军苦苦支撑到次年，魏国联军不退。赵国已近绝境，只好向齐国求援。魏国自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以来，国力强盛，魏惠王上承父辈余烈，雄心勃勃，虽然比不上文侯雄才大略、知人善用，但并非平庸无能之辈。在李悝等人建立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基础上，惠王侧重水利交通和战备城防建设。凿鸿沟，开逢泽，筑长城（大梁以西段），魏此时仍是中原各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威王经营齐国数年，国内形势稳定，齐国已将注意力转到诸侯国相互间的关系上来。强大的魏国客观上变成齐国对外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威王同惠王之间的矛盾已不可避免。赵国求援的消息传到威王耳朵里，好比天假齐国出兵的时机，威王用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八万迎战魏军。齐、魏桂陵之战爆发了。

田忌、孙膑先派两个都邑大夫率部分军队南下进攻宋、卫两国之间的东阳，围困敌方战略要地平陵，既可牵制魏、卫等国联军，又可以鼓舞邯郸赵军，坚定他们的抗魏信心。此刻，秦军乘机攻打魏国少梁，渡过黄河，占领安邑。庞涓率魏军浴血苦战，付出巨大代价后攻陷邯郸，已精疲力竭。田忌、孙膑抓住战机，攻其必救，轻兵奔袭魏都，然后引诱魏军，在桂陵设伏大破魏军。齐国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齐军大破魏军的同时，楚宣王派景舍救赵攻取了魏国睢水、涉水之间的一些地方，再加上秦国在西线渡过了黄河，魏国损失惨重。但是魏国仍然占据着邯郸，手中握有一张讨价还价的牌，恰逢秦公子壮攻占韩国的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韩与秦之间矛盾激化。魏惠王抓住矛盾，调集韩军，在襄陵打败齐联军。战局骤变，威王不得不放弃乘胜扩大战果的企图，转而采取有节有利的方法，与魏国在赵国境内的漳水上结盟，使魏将邯郸归还赵国。

到了齐威王十三年（前 344）时，魏国已从桂陵之败中恢复过来，并先后与秦孝公、赵肃侯修好结盟。这一年，魏惠王撑起尊周天子的旗号，准备以朝周天子之名，纠集诸侯会盟，图谋攻秦。秦孝公审时度势，决定尊魏为王，麻痹魏国，派卫鞅游说惠王称王。惠王没有识破孝公真意，率十二诸侯朝周天子，并在逢泽（今开封附近）会盟称王。惠王称王引起各诸侯不满，威王借机起兵攻魏，各诸侯纷纷附和齐国，魏国只好讨好齐国。齐取得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韩国在周烈王元年吞并了郑国，疆域和国力有了较大增长。齐

威王十五年，魏国得到消息，赵自魏军一度占领邯郸后，时刻思念报仇，寻找时机进攻魏国。经过密谋，韩国答应与赵军结盟，联合攻魏。时刻思念复仇的赵国与新近扩充疆域的韩国一旦携手攻魏，危害太大了。魏惠王只好在主动出战与被迫防守之间，两害相衡取其轻，命庞涓为将，倾全国之兵攻韩，争取各个击破。魏军精锐直捣韩都，韩军猝不及防，仓猝间连遭重创，眼看着魏军打了几个胜仗，包围了自己的国都，只好求救于齐。

齐威王听取孙膑的建议，吸取桂陵之战的经验，善待韩国求救人员，答应出兵救韩，使韩国军心稳定，更坚决地抵抗魏军，从而达到最大限度消耗交战双方兵力，坐收渔人之利的战略目的。齐军整装待发，但数月间对魏、韩两国的厮杀并不介入，只作壁上观。齐威王十六年，韩、魏两军苦战不休，两败俱伤。魏军虽汇集了全国精锐，但并不占据太大的优势。齐王仍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出兵五万，采用减灶诱敌之计，在马陵大破魏军。魏军统帅太子申被俘，大将庞涓被杀。马陵之战是魏国前所未有的惨败。

齐、魏拼死混战时，魏国本土还遭到秦、赵两国的进击，魏军一度反攻秦军，结果又失败了。次年，魏公子卬率兵与卫鞅交战，被卫鞅设计俘获。

齐威王十九年，秦军攻击魏国，大获全胜，魏将军魏错被俘。

此时，魏国在一连串的失败中，元气大伤。不但兵员损失很大，土地丢失较多，而且战将死伤、被俘不在少数，补充困难，士气受到影响。魏国本是战国前期第一强国，齐威王强齐称雄，在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与魏争雄，削弱魏的实力是齐威王的巨大胜利。马陵战败后，魏王衔恨发誓向齐复仇。并在这一目的下积极备战。

魏惠王此时任用惠施为相。

惠施是宋国人，在思想认识流派上属于名家，在认识论上强

调事物的相对性、可变性，政治上主张不法先王，不昌礼义。在魏为官时曾与庄子论道，一些传闻成为后世雅趣。

魏惠王重用惠施，很想听取他对魏、齐两国关系的意见。惠施通过分析魏国的内外形势，不同意惠王再与齐国决战。他建议：

“目前国家匮乏，国力衰弱，客观条件不容再操兵戈，更不能与齐国决战。不如脱去王服，屈节朝见齐国，抬高齐王地位，借以引起楚国对齐的不满，再借机行事。”

惠施的见解不合魏惠王原意，但惠王再三思考，权衡利害，最终采用了惠施的建议。君臣二人选择齐相田婴为牵线搭桥之人，打通齐威王关节。

田婴是齐威王同族贵族，继邹忌为相。田婴既为宗族，恩宠集于一身，权势远远超过邹忌之辈。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通过变法相继建立了封建制度。其中年终考绩作为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有效手段，是国君考核官吏政绩，晋升和罢免官员的重要依据，因其考查范围包括仓库存粮数字，垦田和赋税细目，户籍人口及社会治安等各项统计簿册，所以称年终考绩为上计制度。田婴为相，独掌齐国上计大权，取彭城（今江苏徐州）作为自己的封地，不久再改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修筑城池，号靖郭君或薛公。田婴为齐威王晚年权臣。在田婴的撮和下，威王准备与魏惠王相会。

齐威王二十三年，魏惠王率韩国和其他小国国君，屈尊前往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一带）朝见威王，尊威王为王。威王随后尊惠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徐州相王”。惠王不惜用卑下的外交手段扩大齐、楚矛盾，以求孤立齐国，说明魏国再也无力支撑七雄首强的门面。同时也说明齐国为了牵制秦、楚两国，联合魏国，仍尊惠王为王，为下一步发展争取条件。徐州相王是威王振兴齐国事业达到巅峰的标志。齐取代魏为东方强国。

齐威王二十四年，楚国和赵国不满齐、魏相互尊王，联合行

动。赵肃侯举兵围困魏的黄城（今河南内黄），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了长城，防备齐、魏两国。楚威王则亲率大军，进围徐州，大败齐将申缚的齐军。此时魏国虽然赢得了与齐国的暂时安宁，但却连遭秦军重创，先后丢失了雕阴（今陕西甘泉）、河西、汾阴（今山西万荣）、皮氏（今山西河津）、曲沃等地。周显王四十二年，秦派张仪入魏，挟迫魏将上郡十五县献给秦。次年，秦主动将曲沃归魏。秦国基本掌握了黄河天险，声势逐渐壮大，于是秦惠文君自称为王。

周显王四十四年，魏惠王与韩威侯在巫沙相会，尊韩威侯为王，称韩宣惠王。魏惠王此举意在此拉拢与国，增加与秦国抗衡实力，同时也在与齐国的交往中争取多得一份筹码，夺取主动权，摆脱齐威王的影响。就在这一年，惠王和宣惠王带太子朝拜赵国，试探齐的反应，一旦齐国对此采取行动，则齐、赵之间就将发生冲突。果然，齐借马陵之战的余威，立即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以田肦为将，率兵击赵。大败赵军，俘获赵将韩举。齐威王三十二年，齐、魏、韩在平阿（今山东阳谷）相会，修好三国关系；次年惠王、威王再会于甄（今山东甄城）。在这两次会晤中，威王俨然大国身份，以战争实力为筹码，处处主动，惠王态度卑下，唯唯诺诺。

齐威王三十四年，秦相国张仪与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相会。企图拉拢两国攻魏，实施连横战略。为对抗三大国的进逼姿态，号称犀首的魏将公孙衍发起并主持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当时出现了以合纵和连横为主要斗争方略的争雄局面。

周慎王四十八年（前321），齐威王死去，齐宣王即位。

总的来看，战国前期三晋由于利害关系相近，曾不断联合伐齐，伐楚。魏国仰仗这种优势，率先在国内进行了一些封建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成为诸侯中的第一强国。到战国中期齐威王强

齐，齐、魏矛盾加剧，两国间的冲突反映了封建争霸战争已从春秋争霸过渡到了兼并统一阶段。在这个角度上分析威王强齐的意义可以看出，齐与魏的争斗构成战国中期的主要矛盾，最终把齐国推到东方大国，与秦并称帝王的位置。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赵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秦本纪》、《六国年表》、《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孟尝君列传》。

《战国策》：《齐策》、《秦策》、《魏策》、《中山策》、《韩策》。

《孙膑兵法》

《韩非子》

《群书治要》卷三十七

《管子》

《庄子》

申不害相韩

周定王十六年（前453），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三家灭知伯，三分其地。韩康子死后，儿子韩武子即位。武子在位十六年，死后由儿子韩虔即位。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天子册封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韩虔即韩景侯。

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小，地处晋国南部，西与秦国为邻，北和东北与魏国接壤，南与楚国毗邻，处于秦、魏、楚三强之间。仅从韩景侯正式受册封算起，数十年间外患接踵而至，内部政治动荡不安。韩虔取得正式封号后三年而死，韩烈侯即位，新兴的韩国政权尚未稳定，国君更迭频繁，新旧制度、官员交错并存，矛盾错综复杂。韩烈侯二年韩国又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大事，相国侠累被刺。

原来侠累与严仲子同朝为官却素有仇恨，一日言语不投，两人发生了冲突。虽然当时两人被同僚劝住，没有闹出人命，但严仲子再也不敢继续留在韩国。严仲子从韩国流亡到了齐国，时时刻刻不忘向侠累复仇。经过细心的寻访，他结识了屠夫聂政。聂政是魏国人，因命案逃匿齐国，为人宰牛侍奉老母和姐姐。严仲子了解了聂政的家世和人品后，以重金资助聂政养母嫁姐，进行感情投资。不久，聂政老母死了，严仲子向聂政吐露了心事。聂政受人财物，为人分忧，尚且家母已死，老姐有了归宿，再无牵挂。于是聂政来到了韩国，在大堂之上将侠累刺死，随后自毁容貌而死。韩烈侯悬重赏查访刺客身份，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聂政

的姐姐聂荌的耳朵里，聂荌断定容貌已毁、暴尸街头的刺客一定是弟弟聂政。于是聂荌自己从齐国来到了韩国。聂荌为替兄弟扬名，在弟弟尸首前向围观的人说明了真情，然后一头碰死在弟弟尸前。韩烈侯闻讯后，感念聂荌的大义，派人收殓了他姐弟的尸体。此事情节曲折，结局奇异。又有韩烈侯悬赏令的传播，搞得韩国妇孺皆知，影响很大。无论事情的真相和性质如何，侠累以相国的身份被刺，这更加剧了韩国政权内部的不稳定。到了韩哀侯时，国君又被杀。一连串的事件削弱了韩国的力量，使它在对外关系中只能消极、被动地做出反应，经常处于周围大国的压力之下。

周烈王元年（前 375），韩哀侯灭郑，为减轻秦国对韩首都造成的直接压力，韩哀侯将都城迁到郑（今河南新郑）。

韩哀侯六年，秦军进攻韩重镇宜阳，一举攻占韩国六座城邑。

周显王七年（前 362），韩昭侯即位。此时，列国中大都经过变法和改革，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已逐渐趋于稳固。一些国家相继强盛起来，积极向外扩张。就在这一年，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次年，中原小国宋国竟然也出兵攻韩，占领了黄池（今河南封丘）；魏国从韩国夺走了朱地（今河南禹县）。

面对日益加重的内忧外患，韩昭侯意识到消极的防御抵抗不住由变法而强大起来的大国进攻，只有励精图治，才能求得生存。

约在周显王十五年（前 354），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国。

据《史记》记载，申不害是郑国京人（今河南荥阳），出身微贱，生于何年已无法知道，大约死于周显王三十年（前 339）。

申不害出身低微却学有所成。在学术上他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本，融于法家名实的内容，好刑名之术。属于那种将道家“清虚自守”和法家“循名而责实”、“严刑峻法”互为表里，表面上无为无欲，内里严酷苛责，讲求政治权术的法家流派。申不害主张“法”、“术”，人称“法术士”。讲求“法”，通俗说是法制，“术”

是贯彻法制的手段。从他的实践活动中看：法是治理国家的准则，为了更好地把“法”治的思想付诸实践，必须将“术”广泛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去。

在申不害的思想理论中，国君立法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君王治国，必须有明确无误的法律来主持正义，有了法就像有了高悬的权衡，轻重标准自然一目了然，就有了约束群臣的准绳。国君首要之务是明法察令，法令既明，就像权衡公平标准，无为而轻重是非便能分辨得清清楚楚。申不害把国君立法比作悬秤以定轻重，有了秤就能量出物体轻重份量，有了法才能辨别是非曲直。国君用法来驾驭臣下，治理国家。申不害把法作为人事关系和国家政务活动的客观标准，主张以法建立并维护新兴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

仅仅建立了法还远不能万事大吉，还要实行法制，执法者依法办事，杜绝人的随意性，防止执法者凭主观意识和个人好恶任意解释和使用法。要维护法的地位。申不害特别反对只凭各人的“耳目心智”等感觉器官决定事情，主张以法代替人的情感和心智，即使身为国君也必须依法办事而不是靠个人的好恶办事。不依法办事，而是根据各人的心智，随心所欲地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能搞乱国家。依法办事，实施法制，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不能掉以轻心。

如何实施法制？申不害主张用“术”来运作。

申不害讲求的“术”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百官的方法、手段。韩非子曾对“术”的概念作过精辟的诠解：“术”就是根据任务和实际需要而设置官职，依据官职的职责权限来衡量他的政绩，掌握并运用官员的晋升和贬黜，考课群臣功过才干的具体方法。这也就是驾驭群臣的权术。国君要集权于一身，将国家官吏的设置、官员的任免、考课、赏罚等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一人之手，国君必须做到独断，只有独断才能为天下之主。国君要考课

官员是否尽职尽责，从其名实是否相符，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上是否忠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检查。提拔忠诚人才，清除奸邪的官吏。要真正做到“循名责实”，必然靠机密的手段，广泛深入地调查、细致全面地观察，然后去伪存真，分析推理，决定是非曲直。做到这种程度的工作，还必须含而不露，装作听不见、看不见，装愚作傻，不暴露自己的欲望、观察力，使群臣百官无从猜测国君的真实意图，无法巧言令色，讨好上司，更不能隐藏自己的缺点。所有这一切做法，最直接的结果是便于君王潜藏在暗处更有效地控制群臣百官。按照法家的说法就是“法”要明确无误，“术”要深藏不露，不见端倪。这种做法可以使君王知道一切，甚至听到看到一切，由“独视”、“独听”而“独断”。申不害评论道“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申不害要国君用术驾驭百官，要求百官只能够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本职权限范围内的事，不要过问，不可干预。其目的是防止大臣私下联系，沟通情况，威胁国君的统治。

总而言之，申不害在政治上奉行的是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

在经济上，申不害着眼点仍然是国家政权的巩固。他重视农业生产，强调土地的重要性。他认为四海之内、六合之间，土地是最贵重的东西。土地是百姓食粮的根本所在。国家要富强，必须要有粮食。国君要统一天下，必须在国家富强、粮食充足的前提下实现。申不害的经济观实际是一种重农主义，出发点是把人民吸引在土地上务农，为国家提供粮食，为国家积累财富，有利于对外取得战争胜利，对内巩固封建统治。十分清楚，申不害的重农主义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地主经济，巩固封建统治，增强地主政权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

申不害由布衣而平步卿相，出于对韩昭侯的知遇之恩，全力

辅佐昭侯，不遗余力。针对韩经年形成的积弱形势，内政不稳、外患频至的险象，申不害教昭侯以“术”为手段，内修政教，明法责实，考课群臣；外应诸侯，联络与国，增加韩在外交、军事活动中的地位。申不害深得昭侯信赖。

韩自封侯以来，时常发生以下犯上，叛臣弑君的事情，这一类事情往往对国内政治的稳定造成恶劣的影响。申不害相韩，通过对春秋以来列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大量历史的分析，掌握了一条规律。对国君生命和地位的主要威胁，在一般条件，不是黎民百姓造成的，而是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来自国君左右的亲近大臣和宗亲贵戚。他对昭侯分析说：

“现在国君之所以高筑城墙，加固城郭，严肃门禁户籍，为的是防备盗贼流寇。然而今天弑君窃国的人，却不必翻跃城郭而冒门禁森严的风险。”

这无异于在说，盗贼流寇固然不可不防，但真正犯上作乱，取君王之位而代之的，往往不是这些暴徒，倒是平时笑容满面、阿谀奉承的王公贵族。正是这些共享富贵的人，对封建国君唯恐其不死，国家破败得不够。昭侯必须对身边的大臣格外小心，防止出现宠臣独擅君权，群臣难见君颜的局面。今日权臣，就可能是明日篡臣逆子。

申不害将自己的理论广泛运用于自己在韩为相的十五年政治活动中，苦心传授权术，使本来就老谋深算的韩昭侯，对权术的理解和运用逐渐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申不害教昭侯“修术行道”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稳固的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申不害向昭侯描述，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应该呈现这样一种局面：君王就像躯体，群臣如同手臂；君王是号角，臣属只能是声符。君与臣的关系决定了群臣只能像车轮凑集于车毂那样，围绕着君王运转。君王掌握根本，大臣居于末梢；君王决策，大臣具体操办。一言以蔽之，君王必须得心应手地支配群臣，必须绝对把握“本”、

“要”、“柄”，即根本、决策、权柄三种东西。

据记载：韩国祭祖的时候，韩昭侯偶然发现三牲形体太小，他认为这对神不敬，就吩咐主管祭祀的官员赶紧调换大些的。昭王吩咐完就忙其他事去了。看到昭王离去，主管祭祀的官员图省事，仍用原来的三牲祭祀，想搪塞过关。但昭侯重新看到三牲时，竟一眼识别出主管祭祀的官员的伎俩，严厉斥责了他阳奉阴违的做法。事后昭王左右之人问昭王怎么发觉的，昭王告诉左右，从三牲耳朵大小、形状辨认出来的。

申不害闻知昭侯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凭耳目心智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察事物，但耳目心智产生的直觉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事物的认识很有限。听觉虽然灵敏，但十里之间的距离，耳朵就无法听见；视觉尽管敏锐，但帷帐城墙之隔，眼睛无法看见；心智虽然聪颖过人，但三亩大小的地方心智已经有不可尽知的东西。如此大的天下，万物世界，世态万变，凭感官和心智，人又能干些什么呢？闻不及闻，视有不见。申不害请昭侯“行无为之术”，不能持耳目心智治国，重要的是抓住事物规律性的东西，施展权术，控制臣下。申不害从这件事启发引导昭王向“无为”和“专断”努力：昭侯平日召见群臣，要装作一无所知，对事情看见了也要装作没看见，听见了也要装作没听见。不露心智，不动声色。“示天下无为”，用假象和错觉伪装自己，疑惑别人，使群臣莫名其妙，无从猜测君王的真实想法。昭王很明白，申不害要自己“无为”，并非真的无所做为，而是要自己平素深藏不露，对任何事情在最后决定前都不要轻易表态。更不能在左右亲近之臣面前流露个人好恶。应尽量使大臣们对自己无所准备，阿谀逢迎；使他们暴露自己的错误和缺陷，君王就可以从中窥测他们的内心世界，洞察其间，掌握这些无能或不轨之臣的弱点、把柄。只有在无为的伪装下才能做到这些。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昭侯常常要弄一些权术，出其不意考课臣下。

有一年春夏之交，昭王派使者骑马到地方上巡查，使者快骑远行，一路观察风土人情，特别是那些变化幅度小，容易被人忽视和遗忘的景物。使者回朝复命，昭王仔细询问了使者沿途的所见所闻。使者回复昭侯说，一路平静，并没有见到特别意外之事，只有南门之外一条小黄牛犊在道路左边啃食青苗。使者提供的这件平凡琐事竟使昭侯如获至宝，他吩咐使者对当日所见所闻严守秘密，不能泄露半句。然后严令大臣：政府早有规定，禁止牲畜在禾苗生长期间闯入田里践踏啃食禾苗，可是地方胥吏对此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对国君的命令漫不经心，致使今年牲畜闯入田地间啃食禾苗的现象严重。各地方官要立即派人下去，摸清情况，迅速将情况如实报来，如有遗漏，重治其罪。很快，京畿田乡的有关情况相继汇集上来，昭侯阅知其中没有使者见到的情况，随即驳回奏报，要求地方官继续调查。按照昭侯的意图，各乡地方官重新进行查访，直到发现南门外道路左边有小黄牛犊吃禾苗的情况，并将此事奏明，才算结束。昭侯通过这种手段震慑群臣，使人感到昭侯拥有洞察一切的本领和手段。为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妄为。

“术”必须与“无为”互为表里，“术”要求国君巧于用人，精于体察。按照申不害的理解，昭侯不要事事过问，纠缠于事务圈子，更不要与臣争事。昭侯当务之急是掌握用人之道，掌管赏罚大权，驱使、监督大臣，昭侯决策，百官执行。《吕氏春秋·任数》对此解释道，君王要以静制动，在幕后处于核心地位，驱使、控制群臣。

按照申不害的理论，治国必须用法，“术”是实施法的手段。但申不害在韩任相国十五年，辅弼昭侯自强，君臣二人用术有余而行法不足。在政治实践中每每采用实用主义态度，视情况需要，援引旧法有利就行旧法，施行新法有利则推行新法，结果造成韩国始终没有统一法律宪令，晋国旧法没有彻底废止，韩国新法已

经颁布；晋侯成令尚在，韩侯新令重生。新旧法令重叠交错，矛盾百出。新旧法令相互干扰，韩国官民莫衷一是，既影响了韩国政治领域的法制化建设，更谈不上变法图强，以新法克服旧法。旧的传统、观念根本得不到法制的更新和约束。昭侯与申不害讨论这个问题，也深感法制不容易推行。申不害指出其中症结：

“法的功能主要在于赏赐有功之人，根据人的才干政绩晋升官职。但国君您虽然设法颁令，却听任左右亲近之臣的请求，私授官职，所以法制难以得到顺利推行。”

昭侯被指责徇情枉法，随意对亲信卖人情，干扰了国家的法度，实在尴尬。但他既是一位有所做为的君王，也就有过人之处，能人所不能。对申不害的指责，昭侯惭愧地表示今后少卖亲信的人情，知法尊法。

昭侯用申不害，两人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推心置腹，相互信任。就在昭侯表示今后不再开后门、卖人情不久，申不害自己竟然也到昭侯面前为从兄求官。对申不害宽于对己，严于对人，以相国之尊带头以私害法的做法，昭侯毫不客气地责备他：

“这与先生平素主张的原则背道而驰。我是接受你的请求，破坏你的原则呢？还是维护你的原则拒绝你的请求呢？”

昭侯的态度使申不害深感难堪，只好暂时请求闭门思过。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有关事迹散见于多种文献，非常不完备。能知道的只是他在韩为相国，通过辅佐韩昭侯，在韩建立起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他那套驾驭、操纵、控制群臣百官的权术理论，虽然充斥着阴谋与奸诈，但其中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的原则，对于韩国封建官僚体制的建设起到一定作用。正是申不害在韩为相国时期，韩国官吏的设置、评定、奖罚和考课有了规范化标准，在君王独断的政治背景下，一种强大的震慑力量使得各级官吏对君王俯首贴耳，尽职尽守，不敢稍有懈怠，中央的政令和行政效率得以贯彻和提高。韩国由多年的混乱和落后达

到国内大治，政局呈现几十年未有的稳定。

由于韩国内部的稳定，对外斗争的效率和实力增强了，再加上申不害辅弼韩昭侯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避免与大国发生直接对抗，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巧于周旋，大大缓解了被动挨打的局势。史书对申不害相韩的评价是：

“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诸侯无侵韩者。”

申不害在韩为相国十五年，韩有十五年的国内安定。

但是，申不害在韩所推行的“术”，既不是一项方针政策，也不是某种制度，只是一种政治权术，其成功与功效取决于玩弄权术的统治者个人的能力。所以申不害相韩十五年，虽然暂时改变了韩积弱形势，但终归没能铲除韩国落后的旧因素，没能为韩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政随人去，韩国终战国之世而没有强大起来。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申子·大体》

《韩非子·定法》

《吕氏春秋·任数》

列子寓言

列子，名御寇，战国初年郑国人。列子是道家人物，对人世间的问题有精辟的见解，被当时人们称为“有道之士”。向他求学的弟子很多，有时多至四十人随行。与老子不同的是，列子没有像老子那样直截了当地阐述大道理，而是运用寓言的形式说明事理，更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列子的许多寓言保留在《列子》一书中。

在人类文明史上，希腊寓言的杰作是《伊索寓言》，印度寓言的典型是《百喻经》，而中国寓言的经典是《列子》。《列子》是一座中国寓言的宝库，它总结和提炼了大量的中国远古故事和神话传说，铸成了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寓言佳作，赋予了它们特殊的含义。毫无疑问，这些寓言即使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所以，我们择录其中一些片断，以供欣赏和借鉴。

杞人忧天

杞国有个人担心天崩地陷，人会没有地方居住，整日发愁，寝食不安。

有一位乡邻听说了他的情况，很为他担心，便前去开导他说：“天，只不过是聚集的气体，气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你行动呼吸都离不开它，怎么还忧虑它崩塌下来呢?”这位忧天的杞国人说：“如果天是聚集的气体的话，太阳、月亮和星星不是会掉下来了

吗?”乡邻说:“太阳、月亮和星星也是积聚的气体,只是有光亮罢了,即使掉下来也不会砸伤人的。”杞人又问:“那地要是陷下去怎么办呢?”劝说他的人又解释道:“地,只是积聚的土块,充塞于四方,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土块,你脚踏、行走、跳跃,整天在地上活动和休息,怎么还担心它陷下去呢?”

那个杞国人听后放宽了心,十分高兴;劝导他的人也放宽了心,十分高兴。

天不会塌,地也不会陷,这个杞国人担心天崩地坏,是操心他不该忧虑的事。这则寓言说明的是,不要为日常生活中不该操心的事而费思虑,导致贻误正事。成语“杞人忧天”就是从此寓言而来。

商丘开求富

晋国范氏族内有个叫子华的人,很有政治手腕,树立起自己的声望,晋国的人们都很敬佩他。子华虽无官位,但受国君宠爱,与他亲近的人可以得到爵位;与他关系不好的人,往往受到贬斥。往来于子华门庭的人熙熙攘攘,犹如集市一般。子华的门客之间,聪明人与愚钝者相互攻击,强者与弱者彼此欺凌,互相伤害,子华却毫不在意。子华用这种方式来取乐,在晋国形成了一种风气。

禾生和子伯是子华的门上客,有一次外出到远郊,住在一个叫商丘开的农夫家中。半夜里,禾生与子伯谈论子华的声名和权势,说他能让活人致死,死人复活;能使富者变穷,穷者变富。商丘开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窗外偷听到他们二人的谈话。于是,他借了些粮食,背着个草袋子,投奔到子华的门下。

子华的门徒都是些贵族子弟,穿着绢做的衣服,坐乘华丽的车子,迈着方步,目空一切。看到商丘开年老力衰,破衣褴衫,无不嗤之以鼻,更有甚者,侮辱欺凌,嬉笑怒骂,无所不用。为了

求官求富，商丘开一点也不在意，这些门客手段用尽，也就没有兴趣再取笑他了。

一次，商丘开与众门客登上高台，子华对众人扬言说："谁能从这高台跳到平地，赏金一百！"众人闻听欢呼雀跃，跃跃欲试，商丘开信以为真，没加思索抢先从高台上跃下，身轻似鸟，飘飘然落到地面，居然一点也没有受伤。子华众门客以为此事纯属偶然，也没有奇怪。又一次，子华指着湍急的河流深处说："河底有宝珠，谁敢游下去就可以得到。"商丘开闻听后，毫不犹豫地游了过去，潜入水底。等他游回来，果真得到了宝珠。大家这才开始怀疑，不知商丘开有何高超本领，子华也让商丘开加入到衣帛食肉门客的行列中。不久，子华家的仓库失火，子华喊道："谁能取出火里的锦缎，锦缎就归谁所有！"大火漫天，众门客畏死，无人敢靠前，只见商丘开毫不畏惧，冲人大火蔓延的仓库，一次又一次地取出锦缎，竟然没有烧伤。事后，子华的众门徒以为商丘开有高超的道术，一起向他道歉说："我们有眼无珠，不知您是隐世的高人，对您礼节不周，请您多多原谅，就把我们这些人当作瞎子、聋子吧！请问，您有什么道术呢？"

商丘开坦诚地说："我没有什么道术，即使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能做到那些事情。不过有点想法，愿意同你们说说。从前，两位门客在我家借宿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称道子华先生的权势，能使富者变穷，穷者变富。我听到深信不疑，不辞远途前来投奔。到这里之后，以为你们的话都是真的，唯恐自己内心不诚，行动跟不上，也就顾不上身体的安全了。现在才知道你们欺骗我，虽然内心痛苦，外表却装作若无其事，留意别人的议论。想起前些日子没有淹死和烧死，仍心有余悸，再也不能干那种事情了。"

从此之后，子华的门徒即使在路上遇到乞丐、马医一类的贱人，再也不敢凌辱了，还要下车致以敬意。

这篇寓言说明，心诚则灵，诚心诚意，可以做到难以想象的

事情，如坠台不伤，急水不溺，入火不焦。这启示我们，做事应一心一意，不管别人的议论，才会取得惊人的成就。

梁鸯养虎

周宣王的畜牧官手下有一驯兽人，名梁鸯，会驯养珍禽猛兽。他把食物放在庭院之中，让禽兽自行取食，即使是虎狼猛兽、鹏鹗猛禽，无不柔顺服从，从不相互撕咬，更不会伤人。人们都很惊叹梁鸯的驯技。周宣王怕梁鸯死后此技失传，派毛丘园向梁鸯学习饲养术。梁鸯说："我是个卑贱的驯兽人，能有什么值得向你传授的呢？既然天子让你来学习，姑且随便说说我养虎的方法吧！凡有生命血性的动物都有性情：你顺着它就高兴，逆着它就发怒。但它并非无缘无故发怒，而是因为触犯了它。凡是养虎的人，从不敢拿活物给虎吃，因为虎扑食活物，活物会挣扎厮斗，使老虎发怒；也不敢拿大块的肉喂虎，怕它撕咬时发怒。喂虎要掌握它饥饱的时间，知道它什么时候饥饿，这时性情急躁。虎与人类不同，谁向它献媚，它就愉快；谁违背它的意愿，便会兽性暴发。然而，我要驯虎，也不能一味地依从着它。高兴过头，也会生怒；生怒极端，又会高兴。所以，我驯虎既不顺从它，也不违逆它，使它不喜不怒。那么，禽兽看到我，就像见到了它们的同类一样。在庭院内的禽兽，不思念高林大川，不愿住深山幽谷，一切极为自然。"

这则寓言通过驯养动物的事例，说明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开动脑筋，掌握规律，顺其自然，才能取得成功。

朝三暮四

宋国有一养猴老翁，十分喜欢猴子，他家养了成群的猴子，能

理解猴的心愿。这群猴也格外精灵，讨得老翁的欢心。为了养这些猴子，老翁不惜减少家人的粮食以满足猴的需求。

一年，闹起了饥荒，老翁家中粮食短缺，准备限定猴的食物。他怕猴不高兴，欺骗猴群说："现在不够吃的，准备给你们橡子吃，早晨三颗，晚上四颗，怎么样？"猴子听了嫌少，都愤怒地站了起来。老翁一见十分不安，想了一会，又说："这样吧，给你们橡子，早晨四颗，晚上三颗，够了吧！"猴群听了很高兴，都跳了起来。

动物世界中，有才能者笼络鄙陋者，如同这则寓言一样。圣人用他的才智统治一群愚昧的人，老翁用他的才智饲养猴群。人们的一喜一怒，往往是由于会不会巧妙地欺哄；事情的成败，在于能否随机变通。

愚公移山

在黄河以北，冀州的南部，有两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方圆七百里，高八万仞。

山的北面住着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人称"愚公"。他的家门正对着这两座大山。苦于出门受大山阻挡，出人要绕许多弯路，就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商议说："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削平家门前的这两座山，打开到豫州的通路，直达汉水，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他的老伴提出了疑问："凭你这点力气，即使一个小土丘也搬不掉，更不必说搬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了。况且，移开的石头又能放到哪里去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可以运到东方的渤海去，填海造田！"

于是，愚公率领他的子孙凿山挖石，用畚筐运到渤海之中。邻居有个寡妇，让她刚刚几岁的儿子也来帮忙。春夏秋冬，这儿童一年才走完一个来回。

黄河转弯处有个聪明绝顶的老者，人称"智叟"，听到此事觉

得好笑，前去劝阻说："你们也太愚蠢了！一个老翁要移动山上的一草一木谈何容易，又怎能搬走两座大山呢？"愚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虽然极为聪明，但这个问题你就错了，甚至不如寡妇的孩子。你想，即使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孙子又生重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但这山是不会增长的，挖一点少一点，怎能挖不平呢？"说得智叟无言以对。

山神听到了愚公的这番话，害怕愚公挖山不止，报告了上帝。上帝被愚公的诚心感动，派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去背走这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以后，冀州南部和黄河以北再也没有大山阻碍了。

这篇寓言采取夸张的方式，充满浪漫色彩，说明了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的道理。

扁鹊换心

鲁国的公扈和赵国的齐婴二人有病，一起到扁鹊那里请求为他们治病。扁鹊为他们治病，不久就治好了。扁鹊对公扈、齐婴说："你们二位先前得的病是从外部侵人五脏六腑的，药物能够治好。现在你们得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病，随着身体的生长而发展，我再给你们治疗一下怎么样？"二人反问："我们愿意先听听这病的症状。"

扁鹊先对公扈说："你的意志坚强，气质却很弱，所以你谋略虽多，但办事欠果断。"又对齐婴说："你意志软弱，气质却较强，所以考虑问题欠周全，办起事情却莽撞。如果把你们二人的心（大脑）互换一下，两人都周全了。"

两人同意后，扁鹊给他们喝了麻醉酒，使他们昏迷三天。扁鹊剖开他们的胸膛，把他们的心取了出来，互换了位置。然后，敷上神药。不久病愈，两人告别扁鹊回到家去。

公扈到了齐婴的家，去找齐婴的妻子，但齐婴的妻子不认识公扈。齐婴也到了公扈的家，去找公扈的妻子，公扈的妻子也不认识齐婴。因此，两家的妻子闹起官司，求扁鹊帮助辨别是非。扁鹊把换心的事告诉了她们，两家才停止争论。

这篇寓言说明，古人把心作为思维器官，心换了，人的精神内容也就改变了。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高山流水

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长于听音。伯牙弹琴，心里想的是高山，钟子期听后便说："动听啊，高峻得像泰山的样子！"伯牙弹琴，心中想的是流水，钟子期听后便说："浩浩荡荡哟，就像大河流水一般！"每当伯牙弹琴，钟子期都能把他想的准确地听出来。

一日，伯牙在泰山之北游览，突然遇到暴雨，便在岩石之下避雨，心中悲伤，就拿起琴弹了起来。刚开始时，演奏的是反映连绵大雨的节律。接着，又演奏了山崩的声音。伯牙每奏一支曲子，钟子期都能听出旨趣。伯牙放下琴，感叹着说："难得呀！您听音乐的功夫实在太高明了，您心里想的同我一样，我的琴声逃不过您的耳朵。"

这个寓言表明，朋友之间最宝贵的是知心，是理解，否则不能成为好朋友。

九方皋相马

秦穆公对伯乐说："您的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子孙中有没有可以派出去寻找好马的人呢？"伯乐回答："一般的好马是可以从外表筋骨上观察出来的，但天下最好的马，却是恍恍惚惚，若有

若无，从外形上很难说准。这样的马跑得飞快，跑起来尘土不扬，不留足迹。我的子孙们都是智能低下的人，他们只能识别一般的好马，而不会识别千里骏马。有一个人，他叫九方皋，识马能力与我不相上下，请您召见他吧！"

秦穆公召来九方皋，派他去寻找良马。经过三个月光景，九方皋回宫报告："好马已经找到，在沙丘。"秦穆公问："什么样的马？"九方皋回答："是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去牵马，拉来一看却是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不高兴，把伯乐找来，埋怨说："您推荐来的那个寻马人，连毛色公母都分辨不出来，还谈什么识别千里马呢！"伯乐听后慨然说道："他竟然达到这种境界吗？这说明他胜过我千百倍了。九方皋注意的是马的天性素质，抓住了马的本质而忽略了马的外表，看到了需要的东西，忘却忽略了不需要的方面。九方皋这样相马，包含着比相马更有价值的道理。"

待到把那匹马牵来，果然是匹天下难得的好马。

这则寓言启发我们，看事情要抓本质，不要把精力投注在表面现象上，才能准确无误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歧路亡羊

杨子的邻居走失了一只羊。这位邻居带领他的全部家人去寻找，又回来请求杨子派家人帮忙寻找。杨子不解地问："丢失了一只羊，为什么要派这么多的人去追？"邻居答："岔路太多了。"追羊的人们回来后，杨子又问："找到了没有？"人们回答："没找到。"杨子不解地问："为什么沿着道路找不到呢？"人们纷纷说："岔路太多了，岔道上又有岔道，我们不知道羊从哪条道上走失的，所以只好回来了。"

杨子听得变了神色，面带忧容，整日沉默寡语。杨子的学生们奇怪地问："羊并不是值钱的牲畜，况且也不是您的，何必呢？"

杨子也不作答，他的学生也没得到个圆满的答案。

这个寓言以“道”（路）寓意，说明办事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否则一事无成，“大道以多歧亡羊”。

鲍氏之子

齐国贵族田氏在院中祭祖。田氏养着门客千余人，其中有一位向田氏献上了鱼和雁。田氏看到后，感叹地说：“老天爷对百姓真是大恩大德呀！繁殖五谷，生长鱼鸟，以供人们食用。”众门客随声附和，余声经时不断。

贵族鲍氏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也在人们当中，听了田氏的话觉得不妥，便对田氏说道：“事实并不像您说得那样。天地万物都同人类一样生息，是不同种类。不同种类之间不分尊卑贵贱，仅仅以其形体大小、智力高低相互制约、相互利用，并不是为了一种生物而创生另一种生物。人取来可以食用的东西为食，并没有老天为人类专门安排。况且，蚊吸吮人的血液，虎狼食肉，难道上天是为了蚊子而生下人、为了虎狼而生肉吗？”

这个寓言是说，天没有意志，不会给任何人恩赐。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应该顺应自然。

（崔一心）

参考资料：

《列子》

《庄子·列御寇》

庄子传道

春秋战国儒、墨两家并行于世之际，关尹老聃之学，即后人名之为道家的学说也开始流行起来。老聃著《道德经》五千言，一道而贯之，开道家先河。庄子继承老聃衣钵，身体力行，潜心传道。道家学说的内涵借助庄子飘逸峻奇的文字，神奇脱俗的喻兴和古朴雄厚的辩才大盛于世，得以与儒墨并为显学。庄子传道，改造和发挥道家精义，弘扬了道家学说的真谛，庄子对于道家学说来说，功载青史。

老聃创道家学说，庄子传道。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地人。约生活在周烈王七年至周赧王二十九年（前369—前286）之间。据史料记载：庄子出身没落贵族家庭，曾为漆园小吏，管理漆园，征收漆税。庄子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窘困，衣食不足，但矢志于道，著书立说，交友传道。挚友中不乏魏国惠施这样的显贵，但庄子始终安贫乐贱，淡泊功名，志在山林，不为富贵所动。今世所见《庄子》一书，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传统上认为内七篇为庄子自己的著作，外篇、杂篇是其后学所著。庄子的思想保存在《庄子》一书中。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道”也就是庄子哲学观点的基础与核心。庄子认为“道”同人一样有感情，有信义，但它无为无形，可以流传而不能教授，人能够感知它却又摸不着、看不见；它自生自本，先于天地而存，古

今贯穿；鬼、神、天、地始于“道”；太极之先对它来说不算高，六极之下对它来说不为深，先天地而生对它来说也不算久，长于上古对它来说也不为老。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先于天地而存的不是物，创造演化物的是“非物”，亦即是“道”。“道”是天地万物之本，“道无始终”，是永恒的、绝对的。相对于“道”而言，万物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因此，“道”无所不在，在蚂蚁身上、稗子里、瓦甓里、屎尿中都有“道”的踪影。庄子虽然继承了老聃的“道”，但老聃的“道”经过庄于的改造和发展，已经成为另外的东西。庄子之“道”与老聃之“道”有较大的差异：老聃所说的“道”，是人们的器官感觉不到、认识不了的，“道”即“无”，“无”生“有”，“有”生万物，“道”是一个虚幻抽象、恍恍惚惚、似是而非、人类无法认识和体察的精神实体，这种“道”不存在于人的心中，始于开天辟地而存在于客观世界，是主宰和决定天地万物的精神实体。老于的哲学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庄子所说的“道”却是人的主体精神。他认为人只要自以为精神上得“道”，就可以与“道”同体，天地可以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道”既然存在于天地万物中，自然也就存在子我，我即“道”，“道”即我，世界也就成了为我的主观观念的产物。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导致了他的悲观厌世世界观。人生在世界上一切都可以无所谓，都可以随自然。人的生、老、病、死，社会的一切变化动荡都没有关系，因为人总要和万物本体“道”合而为一的。自然界与人、与道皆为一体，人不生不灭，无穷无尽，死了也还是存在。如此，人生可以不生不灭，无穷无尽，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也就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欢乐。人的命运决定于自身修养和内心活动，靠这种内心修养与活动，即可成为有道之士，成为“真人”。庄子还以提问的方式进一步强调天人合一的命题：怎么能说我所言的天不是人呢？怎么能说我所谓的人不是天呢？

庄子的认识论是一种相对主义，否认认识外界事物的客观标

准和界限，把客观物质世界看成一个浑浑噩噩的东西，否认任何规律性。在有无的问题上，庄子认为：你说有，我可以说无；你说无，我可以说有。因此，无论是有还是无，一切都无所谓。你说飞鸟的羽毛很小，可我说这根羽毛比山还大；你说夭亡的婴儿命短，可我认为他比八百岁彭祖还长寿。庄子排斥事物的绝对性，片面地夸大事物的相对性。否认事物的区别。他的认识论中，高下、好恶、是非、贫富、真假、生死、祸福，统统都一样。首先，客体自身是相对的，最后结果都一样，它们的性质也就无法辨认；其次，主体认识能力是相对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第三，是非标准是不可知的，彼也是此，此也是彼，是也是非，非也是是，果真是有是非呢？还是无是非呢？庄子看来，客观事物简直就没有是非标准，因而可以无限怀疑。这样事物的性质、差别，以及客观真理也就都不存在了。完全可以凭借主观认识世界，只是看你用什么观点。比如说，从不同的观点、角度去看，即使像肝脏与胆器官这样在人体内很近的距离也会像楚国与越国那样相隔遥远。如果从对事物相同的观点看问题，则万物又毫无差别。按照庄子的思想，贵贱、大小、有无、是非都不是由客观事物本身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从大小不同的角度看，你看着大就是大，你看着小就是小。一切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道”才是绝对的。其他的高谈阔论、微言细语、礼法之辨、利害之争，统统都是自找烦恼，唯一的办法是不分是非。任何进步、耳聪目明等等都是通向死亡的道路，只是浑浑沌沌，“绝圣去智”，自毁肢体，抛弃聪明，离开肢体，忘掉知识，“坐忘”一切，回避现实，回归蒙昧，才能保住身体，不受伤害，孝养双亲，以终天年。即所谓“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庄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代表了一种虚无主义倾向，带有强烈的没落贵族情调。庄子鼓吹要听从命运的摆布，否定反抗，否定矛盾，把无可奈何、安然处之的逆来顺受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生

死、富贵、贫贱、饥渴、寒暑都是命运的安排。不要以人的作为抵消天命，不要以人的原因违背天命，人要安安稳稳、心甘情愿作自然的奴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对每个人都一样。庄子否定文化，否定知识，反对社会进步。认为社会上没有圣贤才智的人，大盗也就没有了。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于社会进步，主张社会回到混沌状态。

庄子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尽管其中充斥着浓郁的颓废、悲观的消极情绪，但他提出和论证了哲学上的一系列问题，开拓了人们的思路和眼界。更为精彩的是，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大师，他为传播、宣传自己的学说创造了许多瑰丽的形象。

庄子传道，善于借助神奇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表达思想。不但其思想学术主张很容易为人们接受，而且许多形象生动，情景绚丽的人物故事更为人们世代吟咏。

庄子生活的时代，充满着战争、离乱和痛苦，现实世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到处是强凌弱、众暴寡。因此，庄子很自然地开始从无穷的时空寻求精神解脱，传播自己独特的世界观……

庄子说，彭祖活了八百岁，是人所无法比拟的；世上还有一种叫朝菌的生物，晨生暮死，生命异常短暂，对朝菌来说，根本没有一个月这样的时间概念；比朝菌生命稍长的有寒蝉，春生夏死，从来没有经历过四季。楚国以南的海上有一只巨龟，五百年只不过算它的春季，再五百年也不过才是个秋季，巨龟的生命非常漫长。然而比这一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古生长着一种椿树，它的季节以八千年为单位，椿树年轮中的四季更替需要一万六千年之久。椿树年轮有两万年以上，巨龟有一万二千岁，彭祖有八百岁，同它们相比，朝菌、寒蝉只能称"小年"，灵龟、彭祖、椿树是"大年"，"小年"是无法理解"大年"的；但彭祖八百岁同灵龟、椿树比起来不也只能算是"小年"吗？彭祖的所谓长寿实在悲哀得很。

庄子说，小小的麻雀嘲笑一飞九万里的大鹏，自以为在树上唱唱歌，在地上吃些小虫自由自在。麻雀和大鹏的知识、境界不一样，人们不必嘲笑麻雀的无知浅薄，羡慕大鹏的博大雄姿。人必须自觉存在，顺乎自然，不要以他人的标准苛求自己。

惠施接受了魏王赠与的葫芦种子，用这种葫芦种子长大结的葫芦个大体胖，平均每个葫芦的容积可装五石粟。惠施用葫芦装水，葫芦的容积不小但不坚固，注满水的葫芦一拿起就破。惠施把葫芦切半为瓢，瓢不破但装水极少。惠施得出结论，葫芦虽大，却不中用，只能打破了事。庄子看到惠施的行动非常惋惜，惠施不会用大的东西。这么大的葫芦可以用网将它们套在一起，然后绑在腰间，浮于水面而不沉。不一定要用葫芦装水。葫芦在惠施毫无用途，在庄子则大有用处。庄子从中悟出道理：有用和无用是相对的，葫芦不一定只能装水，也可以浮水，一种想法不通，变通另一种想法，这是无用之用。庄子进一步联想到，宋人善制奇药，冬天搽在皮肤上使皮肤不干裂，所以宋国的这一族人世代做在水中漂白布絮的营生。一位商人知道这一秘密后以百金购得这一秘方，并将秘方献给吴王。吴越两国交恶，吴王按秘方制奇药用于士兵，在冬季发动水战，吴军恃奇药不生冻疮。越军无药防冻，战斗力受损，结果大败而归。吴王得胜，赏赐了献秘方的商人，商人荣华富贵。同样一种药方，宋人只能靠它世代漂布，商人恃其裂土封侯，全在变通使用。惠施对庄子的道理不以为然。惠施说，有一棵樗树高大如盖，其主干木瘤盘结，枝条扭曲，不合绳墨矩规。樗树生于路边没有木匠理会它，你的话就像樗树，大而不当。狐狸和野猫捕食的本领很好，结果多丧命于陷阱机关，犛牛体大如垂云下伏，却对付不了老鼠，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反驳道：樗树大如伞盖，自然可以作为遮荫休息之处。樗树无用，不会被人采伐，正是无用之用。越地风俗断发文身，宋人贩衣冠到越地无用武之地，衣冠的有用对越人变成了无用。有用与无用不

是绝对的。

庄子善辩，更善于喻理子平凡的事例。《庄子》中就保留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南郭子綦有一天斜靠矮桌，仰头青天，悠然自得，忘乎自我。弟子子游问南郭子綦："先生今日不同以往，难道人的形体可以变为枯木，心灵可以化为死灰吗？"南郭子綦对子游说："你听过人的箫声，却没有听过大地的箫声，既使听过大地的箫声，也还不曾听过天的箫声。人的箫声无非是云箫或排箫，而大地的箫声就是风声。大地吞吐之气就是风，风一发作，所有的孔穴便叫喊。风过之处，山林巨木的孔穴似鼻、似嘴、似耳，如舂臼、如深池，空穴来风，音如潮涌，音如羽箭，音如呼息，或粗、或细、或深远，或急切，所有的孔穴协调默契。大风过后，孔穴寂静，只有枝叶摇曳。这就是大地之箫。子游所问正是，我在这种情景中已进入忘我的境界。"声音本无喜怒哀乐，以人的感情听箫声才有喜怒哀乐，用自然的感情听箫就没有喜怒哀乐。

啮缺曾问王倪是否知道万物知识都有共同的标准？王倪不知。啮缺很失望。王倪讲出一番道理：人睡在潮湿阴暗的地方会得病，泥鳅会吗？人呆在高树之上会害怕，猴子会吗？人、泥鳅、猴的生活习性不同，什么才是统一标准？人喜欢吃肉、鹿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乌鸦喜欢吃鼠，这四种生物口味各异，哪有统一的标准？王倪劝啮缺不必失望，万物知识的标准不一，人的标准不是绝对的，误把相对当作绝对，就会远离大道。如果当初把天叫作"马"，把地称为"指"，那天地就成了"马指"；人认为西施是美女，鱼看了西施则可能厌恶而避开。所以如果用人的观念创造知识，只能被它束缚住。

据说庄子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他拍拍翅膀，果然像一只大蝴蝶，快乐得很，他完全忘记自己是庄子。过了一会，他于梦中大悟，意识到得意的蝴蝶就是庄子。庄子由此得出结论：庄

了可以是蝴蝶，蝴蝶可以是庄子。在庄子眼中，人世复杂多变，不懂道理的人在世上横冲直撞，只会徒劳地损耗形神。庖丁替惠文君解剖牛，动作和刀子在牛骨缝间的声音完美得像古代桑林妙舞。庖丁解剖了牛，牛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对此庖丁解释说：我解剖牛不是用刀，而是用道。最初我解剖牛，只看见一条牛，三年后，解剖的牛多了，眼睛看见的便不再是一条整牛，而只是牛身上的筋骨脉络。普通厨子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又砍又割。好的厨子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只割不砍；我的刀用了十九年，锋利如初，因为我不砍不割。我的刀锋只在牛的筋骨脉络缝隙间游来荡去，行动自如。牛没有痛苦，不知自己已死。

庄子的这种顺乎自然的思想还表现在无为方面。颜阖向蘧伯玉求教：有人嗜杀成性，任其发展，纵容他必然要危害社会；如果劝其为善，恐怕劝说之人招致危险，因为这个人只看到人家的过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蘧伯玉认为，对付这种人，要善于和顺他，别激怒他，他行为像婴儿一样，你也要装得像婴儿一样，他颠三倒四，你也颠三倒四，先使他相信你，觉得你是他的同类，设法引诱他。颜阖问其中道理，蘧伯玉说："螳螂激怒时要举臂挡车，自以为力气很大。你如果夸大自己的才干冒犯他，就像螳螂挡车一样。劝人向善时所用方法不当，招致危险，用自己的长处去压别人，更危险。"庄子又说养虎是件危险的事，懂得养虎的人不敢用整只活动物喂虎，因为老虎在搏杀时会引发怒气，野性一发，后果不可收拾。所以养虎之人要顺着虎的性情来养它，把它哄得像猫一样温顺，虎有虎性，顺其性情，老虎既不凶暴，也不可怕。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怪人，头垂到肚脐下面，双肩高耸过头顶，发髻朝天，五脏不正，腰夹在两股间。怪人名叫支离疏。支离疏替别人缝洗衣服就可以养活自己，替人卜卦算命竟可养活十几个人。乱世拉夫，支离疏大摇大摆走在路上也无人抓他；官府赈济，支离疏算甲级贫困得到柴米。智慧之人不计

较形体残缺，残缺丑陋能免除许多灾害。宋国荆氏地方适合种植楸、柏、桑树，三种树长到一握粗时即可砍去作养猴的木桩，再粗大的被砍去作梁，最粗的伐作寿材。所以它们年轮都很短。祭祀河神不用白额牛、高鼻子猪、有痔疮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常以不才、不祥的面目出现，以免除灾难。

自然一词是庄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庄子的自然是指运动的天体、静止的大地。河伯问海神，什么是自然？什么叫人为？海神说，牛马各有四条腿这叫自然，把马头套上辔衔，牛鼻子穿上缰绳，就叫人为。夔是独脚兽，蚿是百足虫。夔不理解蚿用百足如何走路，孰不知蚿顺乎自然安排，一点也不用费心。无私无我，师法自然，合乎自然，这是道啊！道无处不在。

庄子认为连古代大盗跖也有道。做大盗的人能预先猜出房间中财物藏在哪里叫圣；偷东西时一马当先叫勇；偷完东西撤回来或遇危险最后撤出叫义；判断情况，选择作案时机叫智；公平分财叫仁。不具备这五种道德而想成为大盗是不可能的。善人得不到善人之道就不成其善，坏人得不到坏人之道也就不成为坏人。

庄子传道，善于用形象生动的事例阐述深刻玄妙的哲理，于平易、浅显处见神奇，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寓言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这样几则。

井底之蛙。东海巨龟偶然路过一口井，居住在井下的青蛙邀请巨龟做客。巨龟问起青蛙的生活，青蛙很自豪。“我独霸一口井，俨然一个国王，怎么会不快乐呢？我跳入井中，水就来扶着我的两腋，托着我的肋；我钻入水底，泥巴赶快抚摸我的双脚。傍晚时，我跳出水，在井沿的缺口尽情做神奇的梦。天明时，我可以在井边散步。日复一日，水中的小螃蟹、蝌蚪都不如我快乐。”青蛙请巨龟到井中体验他的快乐。巨龟嫌小下不去。青蛙惊奇地说：“这么大的井怎么嫌小呢？”巨龟说：“要说大，东海才大呢？东海之大，千里之长不足以形容它的广阔，八千尺之高不足以形容它

的深度。禹的时候，十年九涝，东海之水没有增加；汤王当政，八年七旱，东海之水不为减少。这才是大的内涵。”青蛙从未听过见过比井更大的东西，以为巨龟在骗自己。井束缚了青蛙的视野，它的目光越来越短浅。

邯郸学步。燕人以为邯郸人走路的姿态很美，收拾了行装到赵都邯郸学赵人走道的步伐。过了一段时间，燕人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的步伐，反而自己原来走路的方法也忘记了，因此，他只好爬着回家了。读书原本是为了追求大道，恢复自然本性，但如果久久迷失在书本里，怕像燕人一样走都走不回来。

螳螂捕蝉。庄子游栗园，一只黄雀扑面撞来，随后又迅速飞向一棵大树。庄子持弹弓寻踪来到栗树下。只见树枝上有只鸣蝉正欢快地歌唱，一副安枕无虑的神态。鸣蝉后面潜伏着一只螳螂要捕捉鸣蝉。螳螂专心于前，没有注意身后的黄雀正想吃它。垂涎于前的黄雀也根本没有想到有人持弹弓打它。而持弹弓立于树下的人竟忘记隐藏自己，被人误认为在偷栗子。螳螂、黄雀、持弹弓人追逐外物，见利忘害，真是危险极了！

屠龙之技。朱泙漫非常喜欢剑术，他向著名的剑师支离益学习屠龙剑法。花费三年时间，耗尽千金，朱泙漫学剑成功，拜师下山。为了能一试自己的剑法，他遍游天下，寻访真龙，试验屠龙剑法。人们只听说过龙，谁也没见过龙在哪里，朱泙漫终不能了却心愿，试试屠龙剑法的威力。

秋水。秋天时节，雨水连绵。大小百川之水汹涌澎湃汇入黄河。黄河水势浩荡，河面更加辽阔，两岸的景物和水中的沙洲都隐入茫茫水气中。河伯有些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下之水，自己为最。河伯顺流淌入北海，四顾茫然，海面辽阔无际，不由惭愧起来。倘若不是来到这里，真要贻笑方家了。井底之蛙不可和它谈大海，夏虫不足谈冬雪。大海对河伯说：“小儒不可和他谈大道，你知道自己的浅薄，我可以与你谈大道了。天下之水海为大，可

与天地相比，大海尤如泰山上的卵石一般；中国在九洲，就像太仓中的一粒米，人在万物中，就像马身上的一根毛。如此说来，五帝所承，三代所争，仁者所忧，能者所劳，统统不过是一粒米、一根毛、一颗石而已。人为无知而自大，被有限的知识所束缚，所以不能超越知识的局限认识大道。"

鼓盆而歌。庄子妻子去世，惠子前来问候，见庄子正敲盆唱歌。惠子说："你的妻子照顾你的家庭子女，如今体弱下世，你不但不哭，反而敲盆唱歌，真是过份。"庄子分辩说："我妻子过世，哪能没有感触呢？但后来想到，人本无生命，连形体也没有，气体也没有。在若有若无之间的自然变化中，偶然有了气，气变化而有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现在我的妻子变化去世，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卧室里，如果我还大哭大叫，就实在不通达自然情理了。"

在庄子笔下，无论有生命与无生命，抽象的与具体的，都被赋予神奇的活力，成为有思想、有精神、活跃在读者眼前的生动形象，其文章生动活泼，"汪洋辟阖，仪态万千"，对后世影响巨大。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庄子》

神医扁鹊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和生理卫生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这时生理卫生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道家养生学方面，道家养生之学对人体的构造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按照道家的学说，人体有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脏）、六府（腑）。一个人的健康必须是肌肤密致，脉血通畅，筋骨强劲，心志调和，精气通行。养生之道要吐故纳新，使精气日新、邪气弃尽、病无所居，达到尽其天年的目的。古代著名医书《素问》把能够“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善于调养天年的人称之为“真人”。可见道家在养生之道方面反映的是人们对人体生理构造的认识水平。当时人们还认识到嗜欲无度，情绪剧烈波动，会损伤人的精元之气，往往劳神而疾病难除。特别是在饮食上，讲求饮食定时，保持不饱不饥的状态。如果暴饮暴食，肉食酒海，必然招致疾病缠身。人们还理解到运动对人体的意义，如果人身体缺乏运动，精气就会不流通，精气不流通，产生气郁，气郁于人身体的哪一部位，哪一部位就会生病。人们开始注意居住条件，认为房屋进深过大就会阴凉，台地高则阳光充足，多阴多阳都可能导致病疾，住所阴暗潮湿会造成腰疾，由偏瘫致死。人们开始认识到放纵情欲的恶果，淫荡的音乐、靡曼皓齿是“伐性之斧”。所有这些表明，战国初年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已经比较全面和科学了，这种认识的进步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

战国时，中国医药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战国时，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认识到流行病的暴发常常与时节、气候有联系，气候失常会导致疾病流行。如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秋季的到来容易引起“大疫”，春夏之交天气酷暑也会引起“病疫”。虽然人们还不能了解气候变异导致流行病的内在原因，但已经开始注意并摸索出一些现象规律，知道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与大喜、大怒、大忧、大恐一样对人身体是有害的。

对传染病的预防当时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一些书籍开始记载某地特产对某种流行病有免疫作用。特别是对一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有了比较系统的检验标准。如《秦律》规定，凡鼻梁折断，眉毛脱落，鼻腔损坏，刺鼻孔没有生理反应，关节以下肢体瘫痪并伴有溃疡，手上没有汗毛，呼号时声音气急败坏。这些症状即可诊断其为麻风病人（瘤型）。为了防止麻风病的流传，对确诊为麻风病的人要实行隔离，将其迁居到统一的“疠迁所”，严加控制。

气功疗法在战国时也已经出现。在道家的经典书籍《庄子》中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面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意思是说通过深长的呼吸，吐故纳新，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新陈代谢的目的。当时练习气功的方法，即行气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要经过循环一小周天（或一大周天），先行吸气深人，通过做深呼吸使气积蓄起来，气积蓄起来就会使气伸长，然后气往下沉，把气定在丹田，气沉丹田并稳定下来，萌生新气，萌生的新气成长后以与深呼吸相反的方向上行，一直到头顶。这便完成了行气的一个周天。天机上动，地机下行，顺行长生，逆行短命。

经络学的进步。战国时的人们发展了先人关于人体经络的研究成果，对人体经络的名称、循环过程、主要病候和疗法有了更

加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彻底改变了对脉络运行方向的认识，纠正了那种认为经络由四肢末梢起始，止于躯体中心部位的逆心方向的观点，认为人体的十二条脉中，六条仍为向心性循环，手三阴脉和足三阳脉都改为远心性循环，这反映了经脉学说理论的发展已由原始发展到新的阶段。

当时的药物学发展也很令人瞩目。可从医书上加以统计的药名即有二百四十余种。有汤剂、丸剂、散剂，丸药的名称已经出现。在医疗手段上除了药物外敷和灸法、砭法，还有药浴、烟熏、蒸气熏法、熨法、按摩法、角法等等。

春秋以前，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由于受生产力落后的局限和神权高于一切思想的束缚，巫医不分，巫术占据重要地位，巫师即医师。古代医学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医学科学的进步。到了战国中期，医学科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巫医分家。著名的医生有医缓、医和，医道高明，诊断病因比较准确，被人们称之为“良医”。他们认为人的疾病不是“鬼因”所致，而是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失和造成的。这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病理学说，把整个医学发展水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著名民间医生扁鹊就产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扁鹊原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郡鄚州人（今河北任丘），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年。

传说扁鹊青年时善于学习，虽然家境不宽裕，但虚心好问，知识面很广。为求生计他曾在一家客店为舍长，管理来往商旅。一日客店来了一位老者，名长桑君。老人仙风道骨，知识渊博，是位颇有造诣的民间医生。扁鹊平日很注意学习，得知长桑君的学识后，很是仰慕老人，暗中打定主意，拜长桑君为师学习医道。扁鹊很恭敬地在老人跟前侍奉，虚心向老人求教医术。扁鹊的诚意和态度赢得了老人的好感，特别是扁鹊为人正直，医德正派，长

桑君决定向扁鹊传授自己的医术。扁鹊从此开始向长桑君学习医道，并从老人身旁得到许多“禁方书”，就是秘而不宣的丹方医书。扁鹊一面学习，一面行医，经过十几年的刻苦钻研，扁鹊在继承长桑君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开始在实践中开拓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医疗技术，并带出许多徒弟。由于扁鹊曾经医治过许多生命垂危的病人，人们把他比作古代传说中黄帝时代的名医——扁鹊，称他为“扁鹊先生”。久而久之，扁鹊的称号代替了他原来的姓名秦越人，在民间广泛流传。

尽管战国时医药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一般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并不了解医疗卫生。普遍相信鬼神，有病时首先想到的是让巫师来占卜祷告，诵念咒语，而不是请医服药。许多病人不但得不到治疗，反而因此病情加重，丧失生命。扁鹊作为一名医术高明的民间医生，坚决反对巫术，他常领徒弟周游列国，不辞劳苦地为普通百姓治病。他先后到过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和陕西，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和需要，分科治病。

从今天能够见到的资料看，当时医学已有医师（大医师，应该是技术称谓）、食医（营养医生）、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科医生），在民间则有带下医（妇科）、小儿医（儿科）、耳目痹医（耳目科）。扁鹊医术高明，兼各科之长。赵国都城邯郸，风俗重视妇女，扁鹊到了邯郸就以妇科为主，使许多妇女恢复了健康。周国都城洛阳，习俗崇尚老人乃礼义之邦，许多老年疾病在当地受到关心。扁鹊到了洛阳，按当地人们的愿望，以五官科医生的身份满足当地老年人的需要，为老年性疾病患者解除了烦恼。秦都咸阳，风俗习惯于孩子儿童地位尊崇，扁鹊到咸阳，即以儿科疾病为主要医治对象。由于扁鹊医术高明，为许多疑难患者解除了痛苦，挽救了不少生命。

扁鹊不但精通儿科、妇科、五官科，在内科诊断治疗上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医生诊断病情的方法有用“五气”、“五

声”、“五色”判断病情的说法。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的手段诊断病情，后世医学望、闻、切、问四诊都已具备。扁鹊通过病人的气色和舌苔、声音、脉搏、病情四种症候的综合观察，正确判断病人的症结对症下药。

扁鹊特别擅长“切诊”和“望诊”。

传说晋国权臣赵简子患重病卧床不起，最后至昏迷不醒，五天五夜不见好转。赵简子家人和家臣焦急万分，但又毫无办法，请过几位名医，都不清楚病人患的是什么病，束手无策。眼看着赵简子没有希望了，家人只好私下准备后事。正巧扁鹊途经晋国，被赵简子手下的人请来看病。赵简子此时气息微弱，虚弱异常。扁鹊来到病人床前，静心给赵简子切脉，随后又寻问了病情，十分肯定地说：病人血脉不畅，不致命。只要用心调理，不出三天，病人可以治愈。经过扁鹊的精心护理，两天半后，病人苏醒。

扁鹊到齐国临淄，齐桓侯知道扁鹊为民间名医，医术高明，亲自接待扁鹊，扁鹊发现齐桓侯气色不佳，就在与他谈话时细细地进行观察，断定齐桓侯潜藏着疾病。两人谈话结束时，扁鹊对齐桓侯说：“大王有病，病在表浅，但如果不抓紧治疗，病情会加重。”齐桓侯对扁鹊的忠告颇不以为然，断然否定说：“寡人无病”。扁鹊见齐桓侯的神情，知道他错误地理解了自己，不便再劝说下去，就告辞而去。齐桓侯望着扁鹊离去的背影对左右侍奉的人说：“扁鹊故意说我有病，炫耀自己医术高明，谋取名利。”又过了五天，扁鹊拜见齐桓侯，一见面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还要加重。”齐桓侯还是不相信扁鹊的话，两人不欢而散。又过了五天，扁鹊找个机会又见到齐桓侯。扁鹊仔仔细细观察了齐桓侯，慎重但不容置疑地对他说：“大王病已到肠胃，如果不治，恐怕会更严重。”齐桓侯不但不相信扁鹊，反而对他三番五次的忠告很是反感。又过了五天，扁鹊偶然遇见齐桓侯，他稍一端详，扭头就走，连一句话也不说。齐桓侯很奇怪，忙派人追上扁鹊问原

因。扁鹊对来人说："病在身体表面时，用'汤'、'熨'的方法可以治疗；病到了血脉用'鍼石'也能治疗；病到了胃肠用'酒醪'还能治好；现在齐侯病入骨髓，没有办法能够治了，我只能躲开。"五天后，齐桓侯突发大病周身疼痛。急忙派人请扁鹊，扁鹊这时早离开了齐国。不久，齐桓侯病死。可见扁鹊擅长"望诊"，已到极高的水平。

扁鹊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不为"一技见称"束缚手脚，将学到的民间秘方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病情需要运用和发展针砭医术。为更好地发挥药物时效力和便于使用，把药配制成丸、散、膏、丹、汤剂、药酒，一病多方地进行综合治疗，治好了许多濒于死亡的病人。

据记载，扁鹊率众徒弟周游列国，行医治病。路过虢国宫门时，虢国王室正为太子办丧事，里里外外一片悲伤。扁鹊止住脚步，随意向内宫近侍打听太子死因。近侍告诉扁鹊："太子犯了血气病。正气压不住邪气，邪气蓄积，不得宣泄，突然暴发，昏厥而死。"扁鹊又问太子死了多久，近侍告诉扁鹊不到半天。扁鹊很有把握地对近侍说："我能救活太子，请让我看一看。"侍从不相信人已死了，还能够救活，拒绝为扁鹊向国君通报。经过扁鹊再三请求，终于得到国君许可，进了王宫。扁鹊详细观察了太子后说："太子犯的是'尸蹶（休克）'，因脉搏微弱而紊乱，静静躺在那里，就像死了一样。实际并没有死，只要治疗及时，可以治好。"扁鹊说完，就从徒弟手中接过几根细细的银针，在太子头顶、前胸、四肢的穴位上进行针灸。很快太子醒了过来。随后，扁鹊又让徒弟为太子煮好药服下，并在太子两腋下进行热敷。不久，太子已经能够坐起来了。又经过二十余天的精心治疗，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消息传出宫禁，人们无不对扁鹊的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盛赞扁鹊"能生死人"。而扁鹊却很实际地说："我并不能使死人回生，病人回生是因为他并没有死，我不过是使他能起来罢

了。"

扁鹊对于疾病很强调预防为主，他认为聪明人在病状初露的时候及早就医，病也容易治好。但有六种病人是不好医治的：

骄横无理的人；只看重钱财而轻视身体保健的人；穿衣不适合季节，吃饭不适量的人；脉理混乱，血气不定的人；身体非常虚弱，体质弱不胜药的人；迷信鬼神，不信医药的人。

扁鹊一生周游列国，到过许多地方，为病人治病无数，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世人称为神医。扁鹊晚年开始把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传授给自己的弟子。自己年迈时，弟子都能独立从事医疗工作，他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总结多年的治疗经验，提出一整套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理论和方法。传说扁鹊还写有文字著述，但确信出自扁鹊之手的著作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只有东汉时的人根据他遗留下来的经验和理论整理成的《黄帝八十一难经》。

扁鹊在医学上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一些贪庸无能之辈的嫉忌。扁鹊在秦行医时，秦太医令李醯知道自己的医术不如扁鹊，即派人刺杀了扁鹊。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扁鹊列传》

《素问》

桂陵之战

魏惠王炫耀自己珍爱的明珠，引出齐威王有关国家与人才的一番高论。虽然只是闲情所致，有感而发，但惠王却难以忘怀。惠王懊恼威王言辞尖刻，反衬出自己的笨拙，让齐国占了上风；更为威王流露出来的才识所担忧。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威王治下的齐国蕴含着的威胁。举目环顾，秦孝公得商鞅辅佐；吴起跑到楚国效力；眼前的齐王以邹忌为相，任用淳于髡等一班贤士。而自己身边尚无得力之人。要完成魏文侯未竟之业，惠王渴望得到商鞅这样的人才。惠王相信，重金之下必定招来贤才俊杰。因此，凡是投奔魏国来的士人，都受到了魏惠王的优待。惠王爱惜人才的名声逐渐在诸侯之间传播开来。

魏惠王招贤的消息通过行旅之人也传到了一些荒蛮之地。位于崇山峻岭间的鬼谷（传说不一，一说在今河南登封一带）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周围树木葱莽，怪石巍峨。当世奇人鬼谷子先生看好这里幽雅的环境，终年隐居于此，聚徒讲习，传道授业。鬼谷子先生有两名得意学生，一是魏国人庞涓，另一是齐人孙膑。惠王思贤若渴的消息传到庞涓耳中，作为一名魏国人无疑愿意报效魏国，何况自己学有所成，读过不少兵书战策，正想出山建功立业，大干一场。庞涓决心已定，辞别了老师和同窗好友，信心十足，投奔了惠王。

惠王知道鬼谷子先生的奇才学识，对前来效力的鬼谷子高足很是器重，亲自召见庞涓。庞涓介绍了自己的学业，又滔滔不绝地谈了一番用兵之法。惠王态度恭敬地听完庞涓的介绍，吐露出

对魏国所处形势的忧虑。他说：

"魏国东临强齐，西连虎狼之秦，南与荆楚为邻，北与韩、赵、燕三国接壤。四周都是大国，赵又从我们手中抢占了中山国，这种形势我们如何才能在列国中立足啊！"

庞涓接着惠王的话自信地说："大王何必顾虑！如果大王用我为将，把它们灭了也非难事，还用得着怕它们吗？"

惠王对庞涓的话有些似信非信，庞涓却极有把握地说："如果我办不到，情愿受罚！"

惠王对庞涓的印象不错，也挺赏识他的才华，很快就拜庞涓为将军。庞涓颇感惠王知遇之恩，日夜勤政，操练兵马。庞涓的儿子庞英、侄儿庞葱、庞茅都很剽悍勇武，善于作战，因庞涓的关系都到前军效力。庞氏父子每日操演军兵，不曾苟且怠懈。魏国原来的武卒兵制很有特色，又加上庞涓的积极训练，战斗力大为提高。惠王君臣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力较弱的卫、宋两国。结果牛刀小试，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卫国、宋国、鲁国在春秋后期就已沦为霸主的附庸，谁的实力强大，谁得势，就向谁朝贡。到了战国时，只能够依附大国，仰承大国鼻息而生。魏军在庞涓的统率下势不可敌，三个小国不得不依附魏惠王，入朝大梁。自庞涓在惠王麾下带兵，魏军尚未失败过。周围诸侯朝贡的朝贡，沉默的沉默，只有齐国表现傲慢，丝毫没有敬畏之意。不朝拜也罢，反倒发兵侵犯魏国边境。此时齐军尚不强大，又不是全力进攻。庞涓要借击齐一役在惠王面前表现，倾全力出击齐军，稍一接触，齐兵溃退。惠王更加信任庞涓。

庞涓仕途得意，鬼谷子先生的另一位高足孙膑仍于山野间苦心研习兵书，过着闲云野鹤、晨鼓暮钟的隐士生活。孙膑是春秋著名军事学家孙武的后代，颇得家学真传。既师从鬼谷子，登堂入室，学得兵势奇正变化，又苦心钻研孙子兵法战略，掌握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从后世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看，孙膑总结了

前人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作战思想和原则。孙膑出山后即卷入动荡颠沛的生活漩涡，没有记载能推断他重新隐退前获得过著书立说的机会。可以推测孙膑在出山之前，其军事学术研究就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也正因为如此，庞涓对孙膑的敬畏中充斥着强烈的忌妒，以至于他在魏国出将入相，连自己子侄之辈都委以重任，而不愿意把孙膑举荐给魏惠王。

恰巧这时，墨翟门生禽滑厘云游天下，谒拜鬼谷子先生。禽滑厘在鬼谷居住的时间里与孙膑坐谈天下大事，古今兵戎战策。孙膑的才干给禽滑厘留下极深刻印象。孙膑为人虚怀若谷，不卑不亢，他对禽滑厘执弟子之礼，更博得禽滑厘的叹服。墨学一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他国的不义之战。禽滑厘赏识孙膑才干过人，如果能劝他下山，为国君专事防守，无人能胜，战事也就减少了。禽滑厘劝说孙膑下山做事，免得荒废了时光。孙膑告诉禽滑厘：好友庞涓下山前约定，他有了事情，一定替我引荐。孙膑知道庞涓到了魏国，正恪守约定，等待庞涓消息。禽滑厘告诉孙膑，庞涓已在魏为将，并自荐到了大梁替孙膑把情况核实。孙膑和禽滑厘又谈了些天，禽滑厘才辞别了鬼谷子到魏国去了。

禽滑厘是墨翟高足，大多数国家的官府对他都要高看一眼。在魏国他很快见到了魏惠王，将鬼谷遇孙膑及孙膑的才识抱负告诉了惠王。送走了禽滑厘，惠王召见庞涓，两人谈了一阵军事。惠王问庞涓：

“将军同窗孙膑，才识超群。听说是孙武的后人，知道祖上的兵法密诀。将军可否请他出山呢？”

庞涓没有料到惠王也知道孙膑和自己的关系，很窘迫不安。他掩饰说：“孙膑确是当世英才，我也很想请他到魏国来为大王效力。可他是齐国人，祖上和亲属、家眷都在齐国。我担心他即使到了魏国，做了魏官，心仍在齐国。一旦他居心叵测，怎么办？”

惠王对庞涓的话很不以为然，沉着脸说：“照你的说法，不是

本国人就不能用了？”

庞涓再无话搪塞，答应写信请孙膑出山到魏国相见。但庞涓忧虑孙膑的才干超人，自己会因他的到来失宠。

经过一番曲折，孙膑终于见到了惠王。

惠王极为赏识孙膑的才学，也很喜欢他的人品，并没有过多的质询就准备拜他为军师，与庞涓共掌兵权。庞涓觉得不很妥当，认为孙膑年长，学识绝伦，不应居于副职。最好先作客卿，待立了功，可擢升正职。客卿位于群臣之上，但没有实权。庞涓的意思是害怕孙膑分权，但孙膑待人以诚，只当老同学是一番美意，非常感激庞涓的建议和安排。

过了一阵，庞涓私下对孙膑说：

“你一家人都在齐国，何不将他们接到魏国，你们一起团聚呢？”

孙膑听了，默然不语。此时此刻，他心中很是悲伤。孙膑四岁丧母，九岁丧父，寄养在叔叔家中，叔叔孙乔是齐康公的大夫，田太公把齐康公流放到海屿，大臣四散飘零。孙膑和叔伯哥哥孙平随着孙乔流落到洛阳。适逢荒年，孙膑为人仆役，又与孙乔父子失散，至今孙膑尚孤身一人。孙膑与庞涓数载同学，但孙膑从未吐露过身世。孙膑向庞涓叙述了自己的遭遇，庞涓叹息不语，再没有说什么。

半年后，突然有一齐国口音的人送来信函，自称叫丁乙，在洛阳谋生，受孙平之托送信给孙膑，先到鬼谷，后寻至这里。孙膑谢了丁乙，从信中得知孙平已由洛阳回到宋国，叔叔已死。如今齐王正召集旧臣，孙平准备回齐。信中，孙平约孙膑回齐团聚，祭祖修坟。孙膑读了家书虽然也很难过，但考虑自己身为魏国客卿，不能随便就走，只好修书托丁乙带回去。丁乙身上的信最后落到了惠王手中，惠王对孙膑流露的思乡之情很为不安，庞涓窥测到惠王的心情乘机说：

“父母之邦不能忘记，只是他回到齐国做了将军，与我们为敌可不得了。我想劝劝他，他愿意继续留在魏国，大王给他加官晋爵；万一他坚持要走，他是我举荐的，大王交给我办。”

庞涓征得了惠王认可，立即开始行动。他先装模作样询问孙膑家书一事，即劝说孙膑打消顾虑，向惠王告假回乡探亲。孙膑原打算有机会再回家乡看看，现在经庞涓的怂恿，立即给惠王上了个奏章，要求回家乡上坟。

这一时期，正是齐威王励精图治，内修政理，外谋发展，齐、魏矛盾加深，魏国强大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之际。惠王爱惜人才，需要这些人为魏国效力，一旦怀疑这些人的忠诚，则宁愿玉碎，也不甘其为他人所用。孙膑奏章一上，惠王大为气恼，怀疑他私通齐国，叛魏投敌。下令逮捕孙膑，押到军帅府审问。庞涓接下孙膑，假惺惺地安慰孙膑放宽心，由他向惠王求情。随后谎称惠王震怒，仅免死罪，给孙膑施膑刑①，并在脸上刺了字。孙膑蒙酷刑，感激庞涓救命之恩。庞涓整日为孙膑养伤治疗操劳。大约一个多月后孙膑的刑伤愈合了，但却成了残废，只能爬行，生活自理困难。庞涓对孙膑百般照顾。每日三餐，都有专人侍奉，孙膑对庞涓的恩情非常感激。

尽管孙膑生活并无忧虑，但心灵的创痛时时煎熬着他。每天他无需做什么，实际也做不了什么，无聊的生活增加了烦闷，更使他觉得欠着庞涓许多。偶然一天，庞涓探问孙膑：

“你祖上秘传的兵书能否凭记忆写出来，让我拜读拜读，又可留传后人？”

孙膑对祖上传书早已背诵得滚瓜烂熟，此刻他正不知该如何感谢庞涓“救命之恩”，便一口答应庞涓。此后，孙膑每日默写祖上传下的兵书，庞涓则时常过来照料。不知不觉，又过了些时候，

① 剐去人腿的膝盖骨。

孙膑已快将书写完了。一天傍晚，他吩咐侍奉自己的仆人准备明烛，要连夜完成全书，明早献给庞涓，了却心愿。孙膑待人谦和，数月来已深得仆人爱戴。仆人见孙膑如此急于报恩，忍不住对孙膑吐露了实情。原来，庞涓嫉妒孙膑之才，操纵并一手导演了孙膑的悲剧，为了获得孙膑祖上的兵书，他想出毒计诓骗孙膑，一待书完再杀孙膑。孙膑听完仆人的话，如梦方醒。忙烧掉写成的书稿，装起疯来。庞涓闻讯赶来，懊悔万分，书已经成灰。他用了各种方法试探孙膑是否装疯，结果相信孙膑是疯了。渐渐地，对孙膑的禁拘解除了，疯子能够上街了。

魏惠王爱才却不识才，因听信庞涓的谗言而失去了盖世奇才孙膑。而他的对手齐威王却在千里之外密切关注着孙膑，他相信孙膑是能够光耀齐国的明珠，无论如何也要把"国宝"弄到齐国。威王从禽滑厘那里得知了孙膑的遭遇和近况，立即安排淳于髡和禽滑厘到魏国聘问，寻找机会救出孙膑。自庞涓相信孙膑疯了便高枕无忧，再不提起他了。惠王自然也把这件事忘掉了。魏国君臣的松懈为齐国救出孙膑提供了机会。淳于髡、禽滑厘用掉包之计，把孙膑挟带出魏国。待庞涓发现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惊悸之余，庞涓向惠王谎称孙膑淹死了。

魏惠王又一次相信了庞涓。两个不共戴天的人物即将在惠王毫无知晓的情况下，扮演齐、魏两国利益冲突中的主要角色。

孙膑随淳于髡、禽滑厘到了齐都城，齐威王派大夫田忌把孙膑迎进齐宫。威王立即接见了孙膑，推心置腹地谈了许久。威王早已闻听孙膑的才学，现在对他的人品也佩服极了，当即准备重用孙膑。孙膑推托无功不受禄，愿意隐居于齐国，见机效力。从此孙膑在齐国蛰伏下来。

齐威王日夜勤政，志在使齐国变得更加强大，他识人用人，重在考察真才实学。孙膑是威王准备重用的将帅之材，他需要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检验孙膑的学识。威王平素喜欢骏马，喜欢赛马，

赛马得到趋炎附势的宗族和大臣的捧场。比赛中赌注下得很大。田忌也有几匹骏马，但较威王的略逊一等，一场、二场、三场下来，每场赛马总比威王的马差几步。田忌请教孙膑取胜之道。孙膑则请田忌大胆与威王赛马下注，保证田忌得胜。田忌赛前告诉威王自己肯定会赢，与威王赌赛，每场千金。威王自信马快，两人说定。比赛开始，第一场威王赢了，胜负双方相差悬殊；但第二、第三场，田忌却以微弱优势连赢两场。比赛结果，田忌赢威王一千金。威王的马每匹都好于田忌的，怎么会输给田忌呢？威王不明白是什么道理。田忌禀告威王：

"并非我的马好，是孙先生计策好。孙先生筹划：用我三等马与大王头等马赌第一场输，用头等马与大王二等马赌第二场赢，用二等马与大王三等马赌第三场赢。这样我输一赢二，变劣势为优势。"

威王听了田忌的话赞叹不已，深感孙膑机智无比，精于谋略，堪当大任。

周显王十六年（前354），此时魏惠王即位十八年，国内形势稳定，用庞氏父子为将，兵精粮足，窥测时机，向外发展。位于魏国东南、黄河西南的卫国与魏结盟，朝于魏已经数年。但赵成侯也看中了卫国"四战之国"的地理位置，在这年突然袭击卫国，企图以武力迫使卫国朝于赵。惠王接到战报，立即派庞涓为将，带精兵八万，攻击赵都邯郸。庞涓一路进攻顺利，直抵茌丘，即将包围邯郸。成侯举足无措，派使节向齐求救，并表示愿意将中山国送给齐国。齐得中山，又可结赵为盟国，而且在赵、魏双方激战中出兵，掌握着主动权，这对齐国的发展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威王点田忌为将，拜孙膑为军师，发兵八万，救援赵国。

孙膑分析了魏军攻赵的力量，认为庞涓所带的魏军是全国的精锐。精锐在外，国内空虚，齐军如果避实就虚，攻魏都城，惠王必调庞涓放弃邯郸，回援魏都。这样一来，既解赵围，又可使

庞涓率领的魏军疲于奔波，齐军以逸代劳，相机出战。这是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的策略。田忌采纳孙膑建议，筹划部署兵力。

此时，庞涓率兵完成对邯郸的包围，督兵日夜攻城不止，赵国倾全力抗击魏军，攻守双方死伤惨重，僵持不下。齐军秣马厉兵，派很少的兵力突袭魏的战略要地襄陵（今河南睢县），主力则原地不动，不做实质性的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被围赵军的士气，使其指望齐军救援，拼死抗击魏军，从而消耗魏军实力，坐收渔利。经过一年左右的苦战，庞涓于次年十月攻陷邯郸，但赵国的抵抗仍在进行，占领邯郸的魏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得不到休息。

田忌、孙膑按既定战略，抓住魏军疲惫不堪、占据邯郸却进退维谷的战机，全力突击魏都大梁。齐兵神速奔袭，旨在大梁，意在必得。魏惠王接到攻陷邯郸的消息，刚刚松了口气，想不到齐军乘虚而入，兵锋直指大梁。秦兵西迫，全国已无兵可调，眼看着齐兵步步紧逼，国都危急，只好速调庞涓回驰都城，救驾护航。田忌、孙膑知道惠王调庞涓回援，第一步任务顺利完成。立即着手下一步打算，组织轻快便捷的战车和善于奔跑的徒兵，不带辎重，星夜赶往大梁城下，有意提前行动。这一举动似乎是想抢在庞涓前头攻打大梁，实际是故意激怒庞涓，为全歼魏军创造条件。

果然，魏惠王被一连串的告急搞得心急如焚，一再派人催促庞涓回援，庞涓在惠王的催促下，顾不得久战师老，匆匆起兵回援大梁。经年征战，庞涓手下的精锐之师消耗巨大，装备、兵员已非离开魏国时候的状况。一路回援，又连续接到大梁战报，庞涓对齐军又急又气。军情如火，不能不急；齐军好像故意捣乱，不容别人喘息，可恼可气。庞涓越来越急躁，挥动大军，拼命奔驰。一路不断有人掉队，越是靠近齐军，兵员减少得越多，庞涓的力量急剧削弱。

庞涓变得更加暴躁不安。齐军有多少人马，部署如何，主帅

是谁，大梁近况如何？所有这些情况他一无所知。战况将会如何对他就像一个未知数，吸引着他全神贯注地注意对手，对自己实力的涣散和削弱则视而不见。焦急和愤怒使庞涓几乎丧失了冷静，对纷纭复杂的战场形势不可能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搞不清楚齐军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王命、解大梁之围，代替歼灭敌人成为他的最终目标。魏军已经完全听凭齐军调动，丧失了主动权。

孙膑见庞涓所率魏军长途奔袭，疲劳万分，除去人数、辎重还居优势外，已接近强弩之末。孙膑向田忌建议将齐军分散，给庞涓造成错觉，以为齐军兵力单薄，轻敌上钩。孙膑的这一思想源于祖上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观点，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依靠主观努力牵制敌人，掌握主动权，用伪装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听从自己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使敌人受骗上当，达到以小利调动敌人，用重兵伏击歼敌的目的。孙膑将这套理论提炼概括为我方集中优势兵力，而用种种方法使敌军骄傲、疲劳、迷惑、分散，然后全力攻击敌人。孙膑对于兵法战策的深刻理解，使其在实际指挥战斗中把孙子兵法的精髓发挥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庞涓被眼前的情景迷惑了。他看见的齐兵，体弱羸瘦，战车很少，缺乏辎重，显然兵力也不足。他不能冷静下来了。一种单纯的冲动驱使他，冲上去，不顾一切冲上去，消灭眼前的齐军。眼前的情况告诉他，做到这些易如反掌。愤怒和焦急以及后来的盲目骄纵阻碍了庞涓把握实质东西。庞涓下令丢掉辎重，轻装奔袭，自己亲自率领战车轻骑兼程追赶齐军，孙膑的第二步战略目的顺利实现。

田忌、孙膑分兵诱敌狂奔的同时，迅速收拢兵力，集中在桂陵（今山东鲁山堌堆）设伏。桂陵地形复杂，地势起伏跌宕。四周树木葱郁，极便于隐藏兵力。齐军主力悄悄埋伏在山道两侧，以

逸代劳，静候魏军。过了一段时间，庞涓率战车轻骑突入山道。魏军长途跋涉，最后又经过激烈的追击，个个精疲力竭。再加上山路狭隘，战车行进困难，行军队列前拥后挤，乱成一团。埋伏的齐军趁机进攻，魏军措手不及，死亡严重。这场伏击战出其不意，魏军轻骑、战车丝毫发挥不了作用，步兵被庞涓远远抛在后面，无法投入战斗。齐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庞涓望着齐军“孙”字大旗，斗志全失，他万万想不到孙膑不但没死，而且正是今日自己的对手。孙膑复出的突然性，震撼了庞涓的斗志，起到了瓦解敌人精神的巨大作用。魏军直到战斗结束也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死伤两万多人，主将庞涓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桂陵之战发生在战国中期最强大的齐、魏两国之间，是魏文侯经营数十年之久的政治集团与齐威王励精图治刚刚崛起的政治集团之间，彼此消长的关键。桂陵之战后，惠王借文侯余威，仰仗数十年积累的雄厚国力东荡西击，在漳水与赵结盟，在彤（今陕西华县）与秦结盟，勉强挽回颓势，但魏国的地位却再也不可复得；而齐国由此一跃面成为中原第一大国，与秦一起扮演了合纵、连横的主要角色。

桂陵之战作为战国统一兼并过程的一段历史，并非可以用简单的正义、非正义概念解释。战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双方兵力，特别是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战策、主将的指挥运筹以及将帅个入的气质品德有密切关系。从齐威王决定救赵开始，齐军在孙膑高超的指挥下，始终把握着战场上的指挥权。在双方兵力相等的条件下，一步步诱使魏军丢弃各种有利条件，最终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与齐军主力遭遇。战争胜负与其说决定于战场，不如说决定于“庙算”。七雄并立，兼并混战，得入才、得人心者才有希望得天下，孙膑、庞涓同师鬼谷子先生，学识分高下，人品有高低。惠王广招贤才，孙膑、庞涓同处惠王门下，孙膑受酷刑去齐，庞涓集专宠于一身，惠王用入不当，有失察之责。桂陵之败，源于

惠王不明。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魏世家》、《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孙子吴起列传》。

《战国策》：《齐策》、《魏策》、《楚策》。

《孙膑兵法》

马陵之战

虽然天气燥热，鸣蝉叫个不停，但修竹婆娑，浓荫摇曳，草庐内静谧安宁，凉爽宜人。孙膑席地而坐，奋笔疾书，全神贯注于几案竹简，暑热的气温全然不能侵扰他的文思。他的思想仍然沉浸在昔日刀光剑影、铁骑奔驰的一桩桩战斗回忆中。孙膑在齐威王治下卓越超凡的战争指挥艺术已使他闻名诸侯，为齐王倚重。他没有留恋富贵荣华，于功成名就时激流勇退，隐没山林，效法先生研习兵学，综生平所学和经验，著书立说，传于后人。近些日子，他的思路经常在先人所传的兵书战策与自己经历的实际战争中回旋，古人关于用兵布阵，战争性质等格言通过现实印证，逐渐形成规律性的东西，它们汇集凝聚在一捆捆竹简上，真实反映了当时战争的面貌，客观揭示了战争中的一般性规律。孙膑隐姓埋名后，每天从不中断写作，即使腿上的刑伤剧痛不止也不能使他辍耕。从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看，他的工作没有结束，生命就终止了。未竟之业由他的后学完成。《孙膑兵法》内容深刻，分析透彻，是继《孙子兵法》后又一部不朽的兵书。从孙膑及其后学留下的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了作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孙膑认为战争规律反映在“道”之中，道包括天文、地理、民心、军阵、武器等等，是有关战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作为将帅要善于从道中发现、总结规律性东西，从而预见战争胜负。孙膑通过总结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取胜的条件。一是分析情况，提

炼本质性的东西，临战前已经预测到交战双方胜败结局；二是统兵将帅有足够的权威，行军布阵，调兵遣将，其作战指挥权不受王命干扰；三是得民心，所从事的活动得到支持；四是将帅、官兵、君臣和谐统一；五是掌握一手资料，分析判断敌情、勘察选择地形准确。

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孙膑主张采用激励士气，团结官兵等各种办法和骄傲、疲劳、迷惑、分散敌人，取得对敌的相对优势。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基本战术是，调动分散敌人兵力，自己则集中优势兵力全力进攻。因此，单纯的兵多、国富、武器精良不一定必胜，决定胜负安危的关键在于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即“知道”。一旦掌握战争规律，就能够夺取主动权，分散和削弱敌人兵力，集中收拢自己的兵力，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形成相对优势的兵力。做到这一点，兵力虽少而实力不一定不足，否则兵力虽众却不够使用。

孙膑的军事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他特别强调弱与强、胜与负、众与寡的相互转换，矛盾对立面的转变。孙膑认为有利的作战态势是足以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而有利的作战态势是能够争取和利用的，将帅要善于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要掌握主动，因势利导，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选择不同的作战方式。地势平坦使用战车，地形险峻改用骑兵，山高林密的沟谷则配备弓弩手，使不变的地形变为于我有利，占据有利地形，打击被迫处在不利地形的敌人，就是说自己在可以生存的位置，迫敌于死地。所谓生存之地必须进、退、左、右，道路畅通无阻，前进、撤退、左突、右驰、原地静止各种行动不受牵扯。居于死地之敌，前、后、左、右四路不通，前进、后退、左突、右驰、原地静止五种行动受到困扰。这是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有效手段。

孙膑基于对战争内涵的透彻了解，突破盛行的仁义之说，客观地分析了战争目的与手段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解释说：权是聚

合人员、凝聚人心的，势是驱使士兵冲锋陷阵的，谋是疑惑敌人，令其防不胜防的，诈是困扰敌人，引诱其产生错觉的。要取得胜利，以上这些都十分必要，但就用兵之道而言，贵在主动进攻。以进攻为主，不能专事防守，这也是掌握主动权、创造有利于己的形势的途径。主动进攻不是盲目进攻，必须分清情况有的放矢。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采用灵活不同的进攻方法：特别对固守坚持的敌人，要抓住他的弱点，攻其必救，诱使他离开有利的地形、工事，弄清他必经之路，于险要之处设伏，以逸代劳，乘其移动之机，施以攻击。

孙膑重视攻城，重视阵法，看准了城池众多，聚集大量财富和人口，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点，论述了不同城池的特点。孙膑详细论述了十种阵法的特点和作用。

从《孙膑兵法》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孙膑著书，继承先人的优秀成果和总结提炼实际战例中的规律是他两条重要的依据。他曾两次默写过祖上孙武留传下来的兵书，第一次是受骗于庞涓，献书报恩，是单纯的笔录孙子兵法；第二次是隐姓埋名，著书立说，运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发扬光大前人的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思维，是继承和升化。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代表了他运用先人军事理论的高超艺术，集中反映了他把握时机、驾驭形势的军事才干。特别是马陵之战，更是他军事才能的集中展现，他留给后世的书中，许多重要的原则都出自马陵之战的经验与总结。可以想象，茂林修竹中著书不辍的孙膑不止一次地回忆、思索过这场战争，战前局势、战事发展和各种人物的表现常常在他眼前闪现……

齐王用贤臣、远小人，整顿吏制，革故鼎新，齐国逐渐强大起来。桂陵之战结束后，齐国实力已跃居七雄之首。秦用商鞅，国内诸事初兴，跃跃欲试。魏原为大国，虽然军事上遇到挫折，但实力仍然强大，图谋发展的雄心尚在。各大国纷纷争取盟国，加

紧活动，迫使小国入朝，以谋求扩大势力。

孙膑与田忌率得胜之师，凯旋回朝，临淄城内一片欢声，朝廷内外，无处不洋溢齐国必胜的情绪。唯有齐威王与孙膑等君臣在胜利中对形势仍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魏军在桂陵遭创，但赵都邯郸依然由魏国控制。另外，庞涓围邯郸之际，援赵的诸侯除齐国外，还有秦、楚等国。齐、魏主力交战时，秦军出兵魏国，在元里大败魏军，随后攻取少梁（今陕西韩城），秦还乘齐、魏、赵等大国集中全力拼杀，无暇他顾之际，派公子壮率兵进攻韩国，连克上枳、安陵、山氏三座城池，巩固城防，作长期据守的打算，此举等于在韩、魏之间楔入钉子，控制了两国的联系；楚宣王也抓住时间，一改前一阶段与中原各国的态度，以景舍为将，率兵援赵，攻击魏国，占了魏在睢水、涉水之间的土地。秦、楚两国军队借齐军专力击魏的机会，轻而易举地占了魏地，齐出力而他人得利。秦、楚两国并不退兵，而是屯兵不动，静观待变，形势对齐来说并不乐观。

果然，齐威王五年（前352），秦继续吞食魏国的土地，攻占河东，围困安邑，转年又围固阳，迫其投降，秦一举越过洛水，收复了部分被魏夺走的河西之地。秦国的时机抓得很准，魏国尚未从赵国境内体面地挣脱出来，视齐为大敌，顾不上秦的蚕食，秦得以大胆进攻。魏惠王此时与韩昭侯结盟，调用韩国兵力，在襄陵与以齐国为首的宋、卫联军相遇，魏军将士个个杀红了眼，视死如生，正是所谓的哀兵必胜，齐、宋、卫联军被魏、韩联军击败。齐国面对秦国咄咄逼人之势，不容许拼全力厮杀，以免两败俱伤，使秦人坐收渔利。齐国不得不请楚将景舍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调和，双方息兵。次年，魏国借齐息兵之机，迫使赵国单独与自己在漳水相会，讨价还价，魏还邯郸于赵。至此，魏虽然有桂陵之败，但还是体面地从赵国泥潭脱身；齐得中山，但也劳兵于外，齐、魏双方胜负得失相差无几。

齐威王七年，秦孝公将都城从雍迁至咸阳，图谋进一步向东发展。魏在与齐、赵暂时结盟讲和后，腾出力量对付秦国，借秦机构调整、混乱无序之机，向秦反攻，派兵围秦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华县一带）秦孝公迫于形势不利，只得与魏惠王相会于彤，以示两国修好。魏基本恢复了原来的地位。

这时魏惠王以白圭为相。白圭，名丹，周人。善于筑堤治水；讲求贸易致富，被时下商人奉为祖师；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减轻土地税率，二十取一。

齐威王十三年，魏惠王老生常谈，又打出周天子的旗号，号召诸侯朝见周天子，誓盟天下，图谋攻秦。秦孝公与卫鞅商议对策，卫鞅认为，魏号令诸侯伐秦，如果秦以武力回击，就将出现秦与以魏为首的联盟为敌的局势，恐怕实力不足，如果尊魏称王，麻痹惠王，使他错误估计形势，造成失误，可以致敌于绝境。孝公采纳卫鞅的建议，派卫鞅游说惠王。卫鞅来到魏国，劝他号令宋、卫、鲁、邹等小国的同时，西要与秦结盟，北要争取燕国。先要称王于天下，着王服，名正而言顺，然后再图谋齐、楚这样的大国。惠王迷恋于此道，卫鞅的话正合他意。于是竟真的按照卫鞅的话行动起来，征调人力，扩建宫室，规格标准仿行周王制度，制做王服，乘坐宝辇，所用旌旗仪仗，都按王制。出入宫禁俨然天子排场。惠王行天子制度，分头通知各国诸侯朝见周天子，宋、卫、邹、鲁等十二国诸侯在孟津会见周天子。惠王以盟主身份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召集会盟。秦孝公尊惠王并非真意，因此并没有亲自参加逢泽之会，只派公子少官赴盟。在封建制度下，王是最高统治者，魏自信无敌于天下，自称为王，遭到各大国的抵制。齐、楚、韩等国不但没有参加逢泽之会，而且反对惠王称王。齐、楚的主张得到许多诸侯的附和，给魏国造成很大压力。

齐、魏马陵之战就在各国力量彼此消长中爆发了。

韩国本是三晋中力量最小的诸侯国，周安王十七年韩文侯有

计划地开始灭郑，同年占据郑阳城（今河南登封），到周烈王元年吞并郑国，并迁都于郑，领土得到扩充。此后，韩在时机合适之际，总是与其他诸侯结盟，联合进攻另外的诸侯国。赵国与魏有漳水之盟，但赵失邯郸之耻未报，赵与魏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逢泽之会魏惠王称王遭到天下诸侯反对，魏国陷入困境，韩国与赵国准备联合伐魏。消息传到魏国，惠王决定在韩、赵联合行动之前先进攻韩国，以求各个击破韩、赵联盟。

齐威王十五年，魏惠王以太子申、庞涓为将，率精兵攻韩，在梁、赫两败韩军。韩国没有料到魏军会主动进攻，更想不到攻势凶猛，连受重创，再无招架之功，连忙求救于齐。威王采纳孙膑建议，故伎重演。答应出兵救韩，坚定韩国抵抗决心，调集军队，从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实际齐不急于出兵，而是坐观韩军消耗魏军实力。韩国实力比魏国相差不少，但魏军逼近韩国都城，把韩逼入绝境，韩国拼死抵抗，对庞涓所率的部队造成很大伤害，魏军一时也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对峙拼杀。实力消耗很大。韩国又一连数次催促齐国出兵救援。齐百般抚慰，韩国只好死力抵抗，等待援兵。

齐威王十六年，韩魏两国间的战争已经一年有余，眼看韩国再也无力支撑下去，魏国虽然占据上风，但也消耗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威王以田忌为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仍为军师，发兵五万救援韩国。孙膑摸透庞涓秉性，为人狭隘，刚愎自信，不接受教训。因此，孙膑建议仍按桂陵之战中总的指导原则，避实就虚，回避在韩国作战的精锐魏军，督军直扑魏国境内的城池。正如孙膑估计的那样，在魏王的敦促告急下，庞涓回援魏国，沿途奔袭，丝毫没有警戒防备。

魏军抵达韩、魏边界时，齐军已经进入魏境几天了。庞涓为没有截住齐军，错过时机，异常恼怒，他又开始变得急躁不安了。此时，齐军统帅正在数百里之外研究对策。孙膑分析说：

"魏国军队一向剽悍凶狠，目中无人，看不起齐国人，轻视齐国军队。他们眼里的齐兵个个胆小如鼠，不敢拼杀，善于用兵的人要抓住敌人的弱点，引诱他们中计。魏军轻敌，这是他致命之处，我们可以诱使他们上钩。"

田忌、田婴一向敬佩孙膑的学问，听完他一席话，很同意他的分析。孙膑的计策是，按兵法所说的，追击敌兵，如果日行军超过五十里，行军行列就会前后不衔接，只有一半军队能够抵达目的地；如果超过一百里，就会因补给线过长，后勤辎重跟不上，使上将军受挫，部队发生危险。现在齐军已深入魏国境内，可以用减灶之法诱敌追赶，寻机破敌。田忌采纳了孙膑的计策，齐军立即按计而动。

很快，庞涓率领的魏军接触到了齐军行军踪迹。第一天，庞涓发现了齐军宿营的地方，他带领部将仔细清点齐军使用过的行军炉灶，发现炉灶之多足够十万人吃饭。这就是说，庞涓必须同十万敌军交战。庞涓吃惊不小，因为他没有料到敌人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在庞涓的思维中数量是个绝对概念，几乎是取胜克敌的唯一法宝。如此众多的齐兵在魏国境内，怎么能够将其驱除出境？庞涓忧虑地回到自己营地，一筹莫展，一夜没得休息。第二天勉强沿着齐军行进的道路追了下去，傍晚来到齐军扎营营地，又数了数炉灶，只够大约五万人吃饭。庞涓迷迷糊糊，说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又派人清点了一遍齐军用过的炉灶，确确实实只够约五万人吃饭的。庞涓兴奋了，盼着天亮，能早点发现新的东西，结果他又是一夜没合眼。次日，庞涓挥动大军，寻齐军留下的痕迹，一鼓作气追到齐军刚刚留下的宿营地址。此时天色尚早，庞涓迫不急待地把齐军留下的炉灶数了又数，奇迹出现了，炉灶只够大约三万人吃饭。就是说，齐军人魏国境内三天，兵力由十万减少到三万。庞涓得意了，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他对左右之人说：

"齐国人都是胆小鬼，到了魏国才三天功夫，十万人就逃掉了

一大半。"

庞涓心里想，田忌这次是死定了，桂陵之仇可以报了。左右部将也都嘲笑齐人胆怯，鼓噪追杀齐军。庞涓下令，不再宿营休息，连夜追赶齐军。

庞涓及率领魏军的弱点又一次将他们引向覆灭之路，孙膑看准了这一点。

庞涓催动大军拼命疾行军，整整两个白天、一个夜晚没有休息，老弱士兵掉队，就连许多精壮士兵也支撑不住了。到天傍晚之际，庞涓的骑兵将步兵远远甩在身后，来到马陵道（今河北大名）。马陵道两山夹道，一侧道旁是深不见底的山涧，怪石峥嵘，一线通天，地形凶险异常。十月天气，星月无光，征途劳碌两天一宿的魏军在秋风吹拂下，更加疲惫不堪。庞涓不顾部下体力消耗很大，更不考虑天黑路险，兵家所忌，恨不得一步追上齐军，用优势兵力将它压垮，以雪桂陵之恨。吩咐大军不许休息，沿马陵道继续追赶齐军。

魏军在庞涓的驱使下，全都挤到崎岖的马陵道，进了田忌、孙膑早就布置好、专等庞涓来的伏击圈。

庞涓正催促队伍前行，前面士兵报告：所经山道被砍倒的树木堵住了，无法通过。庞涓心里想，这一定是齐国人害怕我们连夜追上他们，故意放倒树木堵死山路，不能让他们得逞。庞涓策马赶到队伍前头，沿途树木已全被齐军砍倒。到了树木堵住的地方，见有一颗大树独自立在那里，很是显眼，庞涓奇怪为什么单单留下一颗树，细细辨认了一下，那颗大树已经刮掉了树皮，白森森地露着树干，仿佛写着一行什么字。庞涓要看清树上写的字，叫士兵点上火把，下马到树下看字。火光映照下，树上字清清楚楚：

"庞涓死于树下！"

庞涓大吃一惊，知道中计了，忙对手下的人下命令："快退！"

但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早已埋伏好的齐兵，见火把亮起，立即万箭齐发，射向大树下的火把和人群，庞涓和周围的人被箭雨淹没，庞涓浑身上下中箭无数，当场毙命。这是孙膑早已安排好的，利用庞涓的弱点，减灶诱敌，在马陵道设伏，测算庞涓赶到的时间，弓箭手见火把亮时放箭。

魏军大将已死，太子申和将士乱成一团。山前山后都是齐兵，杀得魏军毫无还手之力，鲜血染红了山路，这场伏击战直打到天明。魏军伤亡无数，只有极少的人逃了出去。魏太子申也作了俘虏。大获全胜的齐军打扫完战场，带着战利品及俘虏撤出战场。走了很远一程，才碰上庞涓的侄子庞葱带领魏国一部分掉队的士兵赶来。孙膑命令齐军挑起庞涓人头，向魏军示威。庞葱看清楚后，斗志尽丧，带领部下投降。田忌请庞葱给魏王送信，放了庞葱。

……

孙膑收住回忆的翅膀，他从马陵之战的刀光剑影中汲取了丰富的体会，他要把这些都写出来，传之后代。此时天色已深，月光下竹影斑斓，万籁无声。孙膑的心情却不像这平静的夜晚，一种冲动促使他提起笔，在竹简上写下《擒庞涓》。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赵世家》、《魏世家》、《秦本纪》、《六国年表》、《孙子吴起列传》。

《战国策》：《秦策》、《楚策》、《齐策》、《魏策》、《韩策》。

《孙膑兵法》

《韩非子·说林上篇》

苏秦合纵

马陵之战以后，魏遭到极大削弱，秦乘机强大起来，出现了秦齐两国遥相对峙的局势。秦齐两国为争夺土地不断发动战争，各诸侯国为在兼并战争中获胜纷纷开始争取与国，借以孤立自己的敌人。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势蒸蒸日上，魏、齐、赵等国混战之时，秦一举攻占了魏的少梁，屡创魏军，先后收复被魏夺回的河西之地，进而攻下上郡。秦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秦的强大使山东诸国震惊，更使它们恐惧。于是在韩、赵、魏等国内部出现了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种主张。各国之间结约联盟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时各国之君主把对外政策看得极为重要，这样一来，社会上的食客和游士就获得了进身的机遇，他们讲求权变，积极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形成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结约活动，这就是合纵连横的局面。

所谓合纵就是关东各国，具体说是以韩、赵、魏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再与齐缔结稳定盟约关系，是弱国联合攻打某一强国，阻止强国进行兼并的策略。连横是强国（主要是秦）利用各种手段挟迫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战略。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发展，合纵连横的具体内容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可能出身农民家庭（自称鄙人），曾想见周显王，苦于无人举荐，只好游说于秦。苏秦向秦惠王进言献策，主张秦联合与国，一步步蚕食六国。苏秦所献的就是连横之策。但此时惠王刚刚杀了商鞅不久，对客居游说的策士很不相信。不理

睬苏秦的建议，借口羽毛不丰满，道德不淳厚，不可以高飞，不可以使民，推托他日再向苏秦讨教。苏秦无奈，只好暂时放弃劝说，退了下来。苏秦碰了个软钉子，并不灰心，他花了很多时间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见解和方略写成书，详细说明兼并列国的方法，献给秦惠王，继续推销自己。不久，苏秦打听到惠王并不赏识自己的书，只潦潦草草地看了看，就搁在一旁，再也不理会了。苏秦在秦国受不到重用，随身带来的钱花光了，穿的黑貂之裘也破了，只得放弃游说秦王的初衷，无精打采回到洛阳家中。

苏秦在秦一年有余，极不得意。他衣服破旧，背个破旧的皮囊，面容枯槁，肤色黧黑，回到家中，家人见他狼狈不堪，知道他在外一年并不得意。苏秦面对家人，满脸愧色，又被母亲臭骂了一顿，更是沮丧不安。一回头见妻子正在机上织帛，对自己的到来连头也不抬，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又见嫂子站在一边，忙央求嫂子给自己做些饭吃。嫂子对他翻着白眼，说了句“没有火信”转身出屋。家人的冷淡使苏秦黯然神伤。晚上，苏秦对灯沉思，深感人情淡漠、世态炎凉。人在贫穷失意时，母亲不把他当儿子，妻子不把他当丈夫，嫂子更不必说。苏秦思前想后，倍感悲愤，最终抛弃杂念，奋发苦读。

据记载，苏秦在家苦心经营，潜心学问，对天下大势、列国情况做了大量的研究。在疲劳不堪、支撑不下去时，竟用针锥扎腿，驱散睡意，秉烛夜读。一年的时间一个庞大的计划在苏秦头脑中形成，联合列国对抗强秦，通过向六国国君游说，取得信任，施展抱负。

一年后，苏秦离开家乡洛阳来到赵国。此时赵烈侯当政，启用自己的兄弟做相国，称奉阳君。苏秦先交结奉阳君作为进身之道。但奉阳君不理睬苏秦的游说。苏秦出师不利，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文公手下的人不愿引荐苏秦，苏秦暂时寄宿在客店，准备找机会再见燕文公，苏秦在客店一住就是一年，钱财用尽，眼

见要挨饿受困，进退维谷之际，店老板同情他的境遇，接济了苏秦。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苏秦终于见到了燕文公。

苏秦向燕文公游说道："燕在列国中，虽说土地二千里，带甲几十万，兵车数百乘，但与西边的赵国、南边的齐国相比，就显得力量不够。近些年赵国、齐国强大起来，战事不断，倒是弱小的燕国平安无事。其中缘故是什么，大王可知道？"

燕文公不知。苏秦继续说："燕能免于秦的觊觎，原因是秦与燕相距遥远，而且隔着赵国，秦越过赵击燕很困难。而赵若击燕则很方便，早上发兵，下午就到，容易得很。大王不与近邻赵国修好，反把土地送给远方的秦国，很不妥当。不如与赵国结盟，然后再联络中原诸侯齐心抗秦。这样，燕国可以高枕无忧。"燕文公很赏识苏秦的策略和见识，只是顾虑诸侯不齐心。苏秦自荐游说赵王，燕文公即为他准备下礼物、车马、随从和费用，委托他前往赵国联系。

此时，赵的相国奉阳君已死。苏秦以燕国使者的身份出使赵国，受到赵肃侯亲自迎接。赵肃侯与苏秦对坐长谈。苏秦首先分析了赵的地位，指出如今赵为中原强国，早为强秦忌恨。秦迟迟不出兵击赵，原因之一是因有韩、魏两国牵扯秦国。但韩、魏两国并无山川可守，一旦秦倾全力攻打两国，两国难保不在绝望中降秦。韩、魏降秦，赵国就危险了。苏秦的一番话说得赵肃侯连连点头。苏秦又进一步分析天下形势。中原列国的土地合起来是秦国的五倍，军队是秦国的十多倍，倘若六国协力抗秦，还有秦国独霸的余地吗？现在六国只能单个地割地媚秦，拒绝联合，各自为政。要知道六国土地有限，秦贪心无限，割地求和实在是亡国之政。如果大王能大会天下诸侯，订盟约，尊兄弟，无论秦出兵攻击哪一国，其余五国都出手救援。这种形势，一个孤立的秦国定不敢欺负联合的列国。列国联合一致，抵御共同的敌人，这是救国良策。苏秦系统地为赵肃侯勾勒出一副合纵抗秦的蓝图，赢

得了赵肃侯的信任。此时赵王正值年轻，血气方刚，很想有所作为，当即拜苏秦为相国，托付赵国相印。随后又赠与苏秦百辆车马、千斤金、白璧百双、绸缎千匹，以资苏秦游说列国。

苏秦得意于赵，即派人持重金到燕回谢了曾经资助过自己的客店掌柜。随后准备到韩、魏游说，推销合纵方略。就在此时，传来边报：秦兵击败魏国，魏割十余座城池求和。消息传来，赵王惶恐不安。苏秦担心一旦秦兵乘胜击赵，赵孤掌难鸣，一旦割地求和，合纵之计必遭夭折。苏秦不得不暂时放弃游说韩、魏的打算，留在赵国，协助赵王御秦。恰在此时，苏秦旧识张仪在秦做了客卿，这使苏秦抓住了机会。

张仪是魏国旧贵族的后代，先求职于魏惠王，不得意。又携妻投奔楚威王，寄宿于令尹昭阳门下，后受辱而归。张仪闻知旧友苏秦在赵为相国，即到赵都城来谋出路，到了赵都无意中遇见商人贾舍人，两人一见如故，言语投机。张仪忙向贾舍人打探苏秦是否真的做了相国，又自我介绍了身份和此行的打算。贾舍人听了张仪的介绍，很倾慕张仪。双方越谈越近。最后，贾舍人向张仪介绍了离相国府不远的街上有一家客店，请他暂住客店，相约几天后见。张仪感激贾舍人，两人分手，张仪即去求见苏秦。

苏秦做了相国，已经不容易求见了。张仪连去相国府几天，都无人为他通报。第五天，好不容易央求到相国府的下人为自己通报，不想苏秦正忙，只吩咐下人把张仪住址留下，改日派人去请。张仪回客店等候消息，一连数日没有动静。张仪负气，对着客店老板大发牢骚，准备收拾回家。但老板知道了相国与张仪有约在先，说什么也不敢放张仪离店。张仪无奈，只得向老板打听贾舍人的下落，老板根本不知道贾舍人是谁。又过了几天，张仪终于得到消息，苏秦明日召见。张仪忙向老板借了一套衣服和鞋帽，第二天早早赶到相国府。相国府大门紧闭，不要说苏秦，就是下人也没有一个，似乎根本不知道有相国召见之事。张仪懊恼不已，忍

气吞声地向守门人说明来意。照守门人的吩咐，张仪从偏门进了相国府，又被人拦住等在一旁，眼见苏秦在堂上与人闲聊，走了一批又来一群，过了晌午，才听有人喊“张先生在哪里?”张仪忍着屈辱来到堂上，苏秦端坐不动，傲然相待。苏秦淡淡地同张仪寒暄了几句，就命人带张仪下堂用饭。苏秦堂上用餐，张仪堂下吃饭，堂上山珍海味，堂下粗茶淡饭。张仪的愤恨已经按捺不住，抢上大堂，指责苏秦忘恩负义，不念旧人。苏秦冷笑着奚落张仪：“我知道你的才干比我强，总该比我先出山。哪知先生穷困潦倒到如此田地。我原打算向赵王推荐你，让你富贵，可怕你没有志气，做不了大事，连累我苏秦。”张仪大声回答：“大丈夫得富贵荣华全凭自己，不必靠你举荐。”苏秦看着被激怒的张仪，索性更加上几句不恭之词：“先生既知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找我呢！好吧，看着昔日同窗之情的面子，帮助你一锭金子。就请自便吧。”

张仪扔掉苏秦的锭金回到客店，见自己的铺盖行李被扔在外边。老板对张仪说：“先生见了相国，做了大官，不会住我们这里了吧。”张仪羞愧难当，只好脱下衣服还给老板，可欠的店钱怎么办呢？张仪急得抓耳挠腮。可巧贾舍人这时来看张仪，替张仪还了帐。张仪简单向贾舍人叙述了自己的遭遇，贾舍人除了深表同情外，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张仪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赵国了，又无颜回家再见父老，思前想后，决定西行入秦。贾舍人也正好到秦探亲，两人相约结伴而行。一路上贾舍人对张仪照顾备至，张仪在落魄之际得此知己，不禁感慨万分。两人到了秦国，贾舍人不惜钱财为张仪进身铺路。秦惠王正为错过苏秦后悔不已，听左右之人举荐张仪，当即召见张仪，拜为客卿。

贾舍人知道张仪受客卿后，就来辞行。张仪正盘算着报答贾舍人，不料贾舍人即将离开，不禁万分感慨，再三挽留。贾舍人见周围没有别人，笑着对张仪说：“你的知己不是我，是苏相国。”原来，苏秦使的是激将法，故意羞辱激怒张仪。并派亲信扮成贾

舍人，以巨资为张仪在秦进身铺路。张仪如梦方醒，原来自以为机警、聪明，竟一直蒙在鼓里毫无觉察。真相大白，张仪对苏秦既感激又佩服，向贾舍人托咐，一定要向苏秦致谢。

贾舍人回到赵国回复了张仪的情况，苏秦料想张仪暂时不会建议秦王伐赵。就向赵王辞行，带着重礼和随从，一路浩浩荡荡游说列国。苏秦合纵抗秦的方略颇具诱惑力，韩、魏、齐、楚等国的国君都被苏秦说服，纷纷出具资信，支持他的活动。苏秦沿途所遇官府无不持礼恭迎，路经洛阳，周王遣臣出城相迎，全城净路欢迎。苏秦老母笑逐颜开，站在道旁等候儿子荣归故里。苏秦衣锦回乡，妻子、嫂子不敢正目相视。对比两次回乡的不同情景，苏秦从家人前倨后恭的变化中，微微有些怅然，在家稍待数日，即打道回到赵国。

赵肃侯对苏秦游说列国的成绩较为满意，封苏秦为武安君。苏秦积极筹备诸侯盟会，诸事齐备后，由赵王派使者约会列国会盟。

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苏秦陪同赵肃侯第一个来到洹水。随后燕、韩、魏、齐、楚五国国君陆续到齐。为便于安排坐次，苏秦建议六国一概称王，赵肃侯是会盟发起人，又是主人，坐主位。其他五国国君依国家大小依次排列。会盟之日，六国君主入坐，苏秦禀告六国君王："在坐君王统属的都是大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兵力雄厚。不愿屈辱向秦磕头求和，割地卖国。各国君主已经达成意向，愿意在此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有难互相支援。"六国君王齐声赞同。苏秦主持盟誓，亲自捧着牺盘，引导君王歃血盟誓，敬告祖宗，血印盟书，一式六份，各国收藏。盟誓结束，赵王建议："苏秦奔走游说，各国才能联合起来。我们应封他合适的官职，专司合纵之事。"其他五国的君王都同意赵王的主意，公推苏秦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

洹水盟会，各国在对秦这一大前提下达成一致，苏秦合纵抗秦的第一步成功了，在联合弱国抵抗秦扩张兼并的目标下，六国

找到了一个基点。盟会结束，六国君主都比较满意地返回自己的国家。会议的成功、政治主张得以施展、以布衣挂六国相印的殊荣，使苏秦荣膺亘古罕见的荣誉。苏秦随赵王回赵国，颇有意味地说："如果当初我在洛阳郊野拥有四顷地的家私，恐怕不会出门求富贵挂六国相印。"

洹水六国之盟使秦国大为震怒。苏秦合纵成功必将极大地阻碍秦的发展，给秦的强大增添意想不到的困难。秦王听从谋士寒泉子的建议，派张仪游说列国，联络一国，拆散合纵联盟、伺机进攻。张仪承秦王旨意，制订了攻赵、亡韩、屈服楚魏、拢络齐燕为连横方针。周显王四十七年，张仪出使魏国，随后又到燕国。秦王鼎力支持张仪的外交活动，张仪游说韩、魏、燕等国，秦王则准备归还魏国的城池，与燕王联姻。在秦王的配合下，张仪连横之计首先在魏收到效果，随后燕王贪图近利也开始改变了对秦的态度。

秦国连横战略初见成效，引起合纵主持国赵肃侯的不安，这不仅仅因为赵是合纵联盟的主持人和中坚分子，最招秦国忌恨；更因为合纵联盟寄托着赵王抗秦的全部希望。苏秦与肃侯以焦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魏、燕两国动态。随着事态的明朗化，肃侯、苏秦决定不能坐视自己所倡导的共同抵抗强秦的六国合纵联盟，因魏燕两国的变心而毁灭。君臣二人商量，由苏秦出使燕、魏两国，把两国的事办好，挫败秦的连横阴谋。

苏秦到了燕国，燕文公已经去世，当政的是燕易王。苏秦见到易王还没来得急说服他，就被易王将了一军。易王拜苏秦为相国，既做了燕的相国就得为燕分忧解难。齐国趁燕文公去世、燕国国丧之际，用武力夺得燕的十座城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十分棘手。易王的话倒是很有道理："先君遵从先生的计谋，希望合纵抗秦，六国和好，彼此帮助。现如今先王尸骨未寒，齐即夺了燕十座城，洹水之盟意义何在？先生纵约长，总该想个解决办法。"

苏秦原要责怪燕国，反被燕王问得张口结舌。只好全力解决燕国的问题。

苏秦先赶到齐国见到齐威王，陈述了利害得失。苏秦的意思很明显：燕是威王的盟友、秦的姻国，齐贪十城而结怨于燕、秦两国，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威王如能归还燕地，修好两国，必然取得诸侯信任，感昭天下，建立霸业。威王被苏秦说得心动，特别是感昭天下，建立霸业的话更是使他全身舒服。原来，齐赞同洹水之盟，是想借机扩展影响，齐、秦同为大国，相距又远，齐正可放心大胆以合纵名义号令列国。赵在洹水之会成了实际的主持人，齐很不服气。攻占燕地，是故意破坏盟约。苏秦看准了这点，怂恿威王收买人心，竟使齐很快归还了燕地。

苏秦为燕讨回了失地，增加了纵约长的威信，燕易王十分感激苏秦，态度有了变化。齐威王通过此事也觉得苏秦眼光远大，颇有见地，招苏秦为齐的客卿。

燕齐之间的矛盾在苏秦的斡旋下暂时平息了。但另一个合纵与国魏的麻烦更大。周显王三十九年，秦军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大败魏军，擒魏将龙贾。次年，秦又攻占魏汾阴（今山西万荣）、皮氏（今河南津西）、焦（今河南三门峡一带）。周显王四十一年，秦公子华取魏蒲阳（今山西隰县）。转过年来，秦又将焦、曲沃等地归还魏国。周显王四十四年，身居秦相国的张仪攻取魏的陕地，驱除当地居民后又归还其地。秦王对魏采取打一拳揉三揉的计策，想迫使魏死心塌地顺服秦国。但魏惠王并不甘心，先是与韩威侯相会于巫沙，同年又与韩王各带太子入朝于赵，借以对抗秦的压力。

周显王四十五年，魏惠王与齐威王会于平阿，次年再会于甄（今山东甄城），魏王态度颇为恭卑。魏的形势每况愈下，惠王任公孙衍为将。公孙衍，号犀首，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人，原在秦为官，后受张仪排斥，回到魏国。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孙衍

按照合纵的方略，约集三晋及燕和中山搞了个五国相王。但会后五国矛盾随即暴露出来，中山国被迫放弃王号，魏又被楚军夺走了八个邑。

周显王四十七年，秦军再度攻下魏的曲沃、平周。魏联齐、楚以求平安的打算全部落空。魏惠王迁罪于惠施，驱逐惠施，用张仪为相。张仪是连横战略的发起人和执行者，任魏相，意在促使魏国归顺秦国，其威胁巨大。周慎靓王二年（前 319），齐、楚、燕、赵、韩五国公开支持公孙衍为魏相，将张仪逐回秦国。

周慎靓王三年，在公孙衍的主持下，合纵形势有了较大的转机，三晋并燕、楚五国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一同讨伐秦国。

秦国面对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秦此时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义渠位于秦西北部，是西戎部族中比较强大的一支。秦与义渠时有接触，因其首领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秦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仍以羁縻怀柔为辅助手段。双方时和时战。秦惠文王三年（前 335），义渠在洛水流域击败秦军，不久义渠内乱，秦派庶长操率兵平乱。义渠向秦称臣。惠文王更元五年（前 320），秦伐义渠，占据郁郅（今甘肃庆阳）。义渠部族处于畜牧生产阶段，也能筑邑，总起来说尚未完全开化。秦对义渠采取无事攻掠，有事拢络的蚕食手段。东方五国攻秦，秦怕后方战事再起，赶紧送给义渠君“文绣千匹，好女百人”，企图安抚义渠。但义渠听从公孙衍的话，乘机出兵攻秦，在李帛将秦军打得大败。秦不得不处于两面作战，前后受敌的被动境地。

五国攻秦，又有义渠袭击秦的后方，形势如果发展下去，对合纵各国有利。但是，五国各怀主意，并不真正全力攻秦。实际出兵攻秦的只有韩、赵、魏三国。周慎靓王四年，秦庶长樗里疾率兵出函谷关，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击败三晋联军。后三年，秦大举攻打义渠，攻掠徒泾等二十五城。秦的势力更加强大。

周慎靓王五年，燕国发生了一桩奇事。燕王哙在位时，以子

之为相国。子之为人干练精明，办事果断，善于使用权术监督考课臣属，颇得燕王哙赏识。燕国当政多是贵族大臣，子之却提拔重用小吏出身的人。燕王哙为支持子之为政，将三百石俸禄以上官职的大印全部收回，委托子之任命。燕王哙自认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周赧王元年（前314），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纠集贵族党羽，起兵围困宫禁，攻打子之。子之坚守数月后反攻，杀太子平和市被，平息了内乱。然而，燕在这场内乱之中遭到了极大的削弱。齐宣王采纳田臣思的建议，派将军匡章带“五都之兵”大举攻燕，五十天灭燕。生俘子之，随即处死。齐军灭燕后，烧杀抢掠，燕人反抗异常激烈。齐军无法控制形势，只好选择了退兵之策。在韩为人质的燕公子职由赵军护送回燕继位，为燕昭王。

周赧王十四年，齐宣王死，闵王即位，孟尝君田文为相。次年，苏秦为报答燕昭王知遇之恩，由燕人齐，反间齐王，阻止齐在近期攻燕。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秦免除楼缓相位，改用魏冉为相。次年，齐国也调整对外政策，采取祝弗之计，驱除亲魏大臣周最，用秦五大夫吕礼为相。齐、秦两国怀着各自目的开始联合。秦首先派兵攻韩，占韩新城（今河南伊川）等两城，韩国联合魏国击秦，双方战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韩魏联军大败，死亡二十四万多人。伊阙之败是韩魏两国所受到的最惨重的损失。秦将白起率得胜之兵又相继攻陷韩的宛城；另一秦将司马错攻取魏的轵和韩的邓（一在今河南济源，一在今河南孟县）。宛、邓两地为韩两个著名的冶铁中心，秦得两地实力大增。周赧王二十五年，韩魏两国承受不住秦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分别将武遂（今山西垣曲）二百里和河东四百里割让给秦国。

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宋国发生内乱，宋太子出逃，宋王偃复位。但太子死党人心不死，积蓄力量，伺机而动，宋国内形势很不稳定。宋的定陶是当时中原最繁华的都市，素为大国垂

涎。宋国内乱为各国提供了机会，赵、齐、秦围绕夺取定陶展开了争斗。

秦相魏冉图谋与齐联合，两国相约，互称为帝，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闵王为东帝。秦国拉拢齐国是连横战略的一个环节，目的在于拉着齐国讨伐赵国。所以秦与齐订立盟约，“著之盘盂”约定共同出兵灭赵，然后平分赵地。

苏秦在齐极力怂恿齐闵王伐宋，苏秦说：“伐赵不如攻宋有利可图，要使天下爱齐而憎秦，才可能乘机攻宋。”在苏秦的游说下，闵王在当年自动取消帝号，由苏秦发动合纵行动。闵王听从苏秦计谋，违约攻秦，目的在于攻宋；苏秦劝齐伐宋却是另有目的。宋国位于齐国南部，燕国在齐北边，齐南向则必然削弱北部的实力，而且宋与楚、魏接壤，齐攻宋必招致楚、魏的不安，再加上宋也是秦长期觊觎的目标，齐染指宋，无异于掠取秦的猎物，引发秦、齐之间的冲突。最终把齐放到四面受敌的位置上去，削弱齐国，增强燕国的外交地位。

苏秦在齐的活动，实际是燕昭王复仇计划的重要部分。燕昭王表面屈从齐国。齐攻宋，燕王派张庫率兵助齐，结果反被闵王杀死。燕王为此遣使入齐，向齐王谢罪。但燕昭王和苏秦暗中仍然积极活动，积蓄反齐力量。

周赧王二十八年，在苏秦的游说下，齐联合韩、赵、魏、燕组成五国联军伐秦。五国组成反秦联盟，实际却同床异梦，各怀打算，联军滞留荥阳、成皋一带迟迟不能西进。特别是齐闵王并不真心伐秦，私下仍然与秦勾结，想乘各国准备攻秦之时一举灭宋。秦抓住时机，迅速分化瓦解合纵联盟，自动废去帝号，归还魏、赵两国的失地。结果五国攻秦之事被秦瓦解。

齐闵王忽而与赵合纵攻秦，忽而与秦连横伐赵，目的是企图防止秦、赵等国干涉自己的扩张，造成灭宋的有利条件。周赧王二十九年，闵王用韩眠为相，起兵一举灭宋。宋王偃逃到魏国，死

于温。齐灭宋，囊括了宋以前取得的楚淮北土地，一时声势大振，直接威胁到三晋和楚国的安全，秦也感到不安。各大国间酝酿的反齐计划在秦相国魏冉的主持下开始付诸行动。

周赧王三十年，秦昭王与楚顷襄王会于宛，与赵惠文王会于中阳商讨伐齐大计，随后秦昭王派蒙骜率兵攻齐，夺取九城，设九县。次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攻入齐，在济西大败齐军。齐闵王发觉了苏秦的反间活动，将其处以车裂极刑。至此，苏秦的合纵活动方告终结。

（胡安贵）

参考资料：

《战国策》：《秦策一》、《齐策一》、《魏策一》、《赵策四》。

《韩非子·初见秦》

《淮南子·说林篇》

《战国纵横家书》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宣王好士

周慎靓王元年（前320），齐威王病死，儿子辟疆即位，次年改元，为齐宣王。

齐宣王为太子时就喜文学之士，与贤良文士交往密切。后人说他“喜文学游说之士”，声名远播。宣王元年（前319），魏惠王死去，魏襄王即位，孟子由魏入齐，投奔宣王。孟子为当世儒学大师，门徒众多，儒学到了孟子一代已经成了当代显学。但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阶级施“仁政”，轻徭薄赋。他崇尚“王道”，反对霸道，反对暴力，强调缓和社会矛盾。这与统治阶级之间武力兼并战争、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各国统治者对孟子倡导的“仁政”、“王道”，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因其不合时宜，迂腐空洞遭到彻底拒绝。孟子在魏的境遇并没有影响宣王对他的敬仰。孟子在齐不但能常伴宣王左右，而且拜为客卿。孟子一生终于获得唯一跻身仕途的机会，足见宣王好士至诚至实。

据记载，宣王很敬仰孟子，常常执师徒之礼向孟子求教。宣王问孟子：“周文王园囿方圆七十里大吗？如此大的园囿，百姓却嫌它太小。寡人园囿方圆四十里，百姓却埋怨它太大。这是什么原因？”孟子告诉宣王，“周文王园囿方圆七十里，百姓能进去砍柴捕猎，文王与百姓共同享受园囿之利，园囿虽大百姓尤嫌其小，这是很自然的；臣入魏国境界，问当地有什么禁俗，得知有四十里方圆的王家园囿，在园囿行猎罪同杀人。方圆四十里园囿竟如

国中陷阱，百姓哪有不嫌弃它大的道理。”

宣王向孟子寻问外交之道，孟子指出：仁者之君能够以大国的身份善待小国，智者之君能够以小国平等交往大国。宣王推辞说：“寡人有毛病，好勇斗狠。”孟子追而不舍，斥之为匹夫之勇。为人君王，一怒而天下民众安居，这才是百姓喜欢看到的品质。

宣王问孟子关于武王伐纣之事：“武王以臣子的身份起兵伐纣王，以下犯上，臣弑君，符合伦理纲常吗？”孟子旗帜鲜明地表示：“残害仁人的行为叫‘贼’，迫害正义的人称之为‘残’，‘残贼’之人可称为独夫，诛杀独夫纣王，不算弑君。”

孟子对宣王比较耿直，对他的缺点弱点能够直言不讳地加以指责。宣王对孟子颇能容忍，甚至孟子书卷气十足，置宣王面子于不顾，言语直刺宣王肺腑之疾，宣王也只是顾而言他，不加罪于孟子。正是由于宣王的这种气质，使得宣王在齐当政之时，举国尊重文学游说的士人。

齐国都城临淄城西门名叫稷门，齐恒公为招揽天下贤才，光大齐国尊士养士的风气，在稷门之外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学宫，被人称为稷下学宫。他广延天下俊才，传道授业，振兴文化。齐本是东方大国，兼山海盐铁之利。由于齐的地理位置和国家威望所致，齐自西周开始既汇集了西周正统的礼乐制度和各种新兴的思潮，又加上最高统治者长期的支持倡导，齐稷下学宫逐渐成为酝酿、产生和传播各种学术思想的理想场所。齐威王任用贤才，赏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赏贤罚劣，四处收集人才，革故鼎新，刷新政治，使齐在与战国初年第一强国魏国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并最终取代魏成了七雄之首。齐威王的所作所为已唤醒了古老的稷下学宫，各种人才，各种思潮开始荟萃于此。宣王即位，好与士人交往，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社会政治主张来齐传播，宣王拜孟子为客卿，无异向天下士人做了一次最好的宣传：宣王好士，宣王喜才。

宣王为了广延天下人才，振兴稷下学宫，不惜花费巨资扩建稷下学宫的房舍，造高门大屋。此举使齐国的文化设施成为成周以外条件最好的地方。无论宣王扩建稷下学宫的目的是什么，同当时其他各国统治者只会穷兵黩武，营造宫殿相比，宣王终究是做了件好事。史书还记载：宣王称稷下学宫中那些学有所成的人为“稷下先生”，都封列大夫之爵。在当时各国中，爵位一般仅赏赐给有军功和政绩的人，很少赐予文人学士。

秦国最典型，其他六国也不例外。即使有将爵秩用以鼓励学术研究的事例，也是个别现象。只有齐国在宣王当政时，把爵秩等级同时用于鼓励学术发展。这种封建爵秩等级代表着新的封建特权，按等级占有物质和政治权力。宣王封“稷下先生”为列大夫实在是他鼓励学术研究的独创之举。宣王还在稷下学宫设立博士官制度，后世史书说汉的博士制度起源于稷下学宫，如果真的如此,宣王设置博士官的影响一直延续了封建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列大夫为官秩品爵，博士官应为学术职称。宣王时，稷下学者中，有七十余人被封列大夫和博士官。这是很高的礼遇，宣王好士不同于个人简单的好恶，宣王好士，完善并振兴了战国时期的文化。

也正因为如此，稷下学宫在宣王时达到了鼎盛阶段，人数多达一千人左右，可谓人才济济。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于、环渊、宋钘、慎到、邹奭等七十余人。稷下之学中道家学派极盛，宋钘、尹文、田骈、环渊、接子等人都是道学大师。

宋钘与孟子同时，宋人。主张克制情欲，无欲无望，待人宽恕，以和为贵。宋钘四处传教，节俭刻苦，寻求“救世”，以达到制止战争，天下太平，生灵安居的政治目的。他的哲学思想中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反对拘泥于成见的先验论。

田骈是齐国人，擅长与人辩论，口才很好，时人称“天口骈”。田骈认为从“大道”来衡量天下万物，万物应该是齐一的，应付事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听其自然，任其变化发展，在变化中自

然内含着某种规律,顺应物质自然属性来认识它便不会不适当。在政治上，田骈反对“好得恶予”。国虽很大，但如果统治者“好得恶予”，灾祸即日降临。

道家学说由老子创立，虽然其中有不少积极的社会内涵和深奥博大的哲学思想，但道家同儒家、墨家比较，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稍事发挥改造就变成了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东西。宣王好士，大兴稷下学宫，既为各种学术交流、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又不可能不给稷下学宫的发展打上强烈的社会、政治烙印,影响和诱导学术研究方向。稷下学宫的主要流派道家学说也难以跳出这个巢臼。老子的道家学说在这里被改造而成黄老学说，又分三个支派：宋钘、尹文一支，田骈、慎到一支，环渊一支。宋钘、尹文把道家的道德精义与礼法大度联系起来,“名正法备”。田骈、慎到一派主张“贵齐”,“贵齐”是齐万物，万物齐于道，又“贵分”、“贵均”，也具有法家倾向。黄老学说更确切地应该称黄老刑名学说。

慎到是赵国人，齐宣王稷下学宫的博士官，直到齐闵王末年才离开齐国。著《十二论》，他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

慎到把“大道”包容万物的理论应用到社会政治生活。国君要兼容并蓄天下,针对民众不同的技能而使用生财,征敛储蓄,不去糜耗浪费，使民众技能各异，但都能为上所用。国君虽然终日无事,国家却无事不治。基于这个前提,慎到一反儒家圣贤之学,认为国君不必最贤能至明。只靠国君一人之力，必然弄得精疲力尽，事情未必搞好。何况只由国君一人为善，臣民就不敢争先为善。慎到从道家无为而治的命题引申出必须调动臣下积极性，充分发挥臣下的才能,使得“事无不治”。与此对应的是必须建立法制，无为与法制相辅相承。法体现了公义，扬弃的是私念。他对法的看法是如果立法而行私，等于以一己之私与法争斗，其混乱的后果甚至大于没有法。慎到分析说，法制之所以能体现公众意

愿，排斥一己之私，是因为法具有“分”的功能，“分”可以赏罚，凭借这个东西，能够杜绝无功劳的人晋职，避免官员徇私。法如此重要，所以上下官民都要维护法，官吏要用生命守法，百姓要全力支持施行法。慎到还主张国君要善于按照“道”的要求变法，适时而变，不因循守旧。只知守法而缺少适时的变化调整，法的精神也要散殆。慎到作为一个杰出的法家学说大师，他详细地阐述了治国之术，为宣王的政治实践摇旗呐喊，寻找理论根据。孟子要宣王以古代圣贤为楷模，施“仁政”，行“王道”，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教；慎到则为宣王找到一种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理论，“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就是说只要民心专制于君王，事情依法而断，没有必要再去尊贤。既立了君王，再尊贤尚能，无异唆使君王与贤能竞争，造成的混乱影响比无君王时候还糟。慎到为宣王在世俗生活中找到了唯我独尊的解释，正是慎到等博士官在学术研究中的有益探索，为稷下学宫注入了生命力，使宣王好士精神得以长存。

慎到在稷下讲习整十年，其学说影响极大。他关于“势”的命题，是法家学派的重要内容，与“法”、“术”一起成为法家各具特色的三支流派。“势”指权势，慎到重视统治者的权势，贤和智不足以制服臣民、驾驭国家。只有权势才能够牧民。国君有了权势，令则行，禁则止。国君与权势的关系像龙与云一样，飞龙凭借云雾在天空飞舞，云消雾散，龙就只能同蚯蚓一样伏在地上。假如尧仅仅是一匹夫，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桀因为贵为天子，才能因一人而扰乱天下。由此知道权势能决定一切，贤智丝毫不值得仰慕。慎到又说，官吏守法守职就行，不需忠君，“忠”字充盈天下人心，会殃及国家。

稷下道家学派中真正继承老子真谛的是环渊一派。在他的学说中较多地保留了虚静无为的思想，主张脱离现实，独善其身。

总起来看，在宣王的倡导和支持下，稷下学宫的学术研究有

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儒家大师，还是道家学说，以及后来由道而法、由儒而法的其他学说，通过借助稷下学宫进行交流，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宣王好士，尊崇学问。后世有人指责他“褒儒尊学”，确切说宣王好士，兼容并蓄，以才取人。仅就稷下学宫来说，儒（荀子）、法、道诸家云集，并不见褒崇哪一种学说，更多的是重视社会效果，择善而用。

齐国的政治形势，从齐威王改革算起，经过与魏、秦、楚几十年争斗，到宣王一代才基本奠定了东方第一大国的地位。宣王没有威王励精图治的业绩，但在赏识、延揽、使用人才方面，宣王独具慧眼，匠心独具。从这一点出发看问题，才能理解宣王为什么能在战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演出壮观的历史剧目。

周慎靓王四年，秦国在修鱼击败三晋联军，拆散魏、赵、韩、燕、楚的合纵联盟，势力急剧膨胀。次年，张仪连横成功，与魏结盟，秦、魏攻韩。齐宣王当然不愿坐视秦的势力过于膨胀，便召集臣下商讨对策。宣王主张救韩伐秦，谋臣田臣思不同意宣王的看法，他说：“大王的打算错了。秦魏伐韩，最好听之任之。目前子哙与子之祸乱燕国，百姓不拥戴，诸侯不承认。秦国攻打韩国，楚赵两国肯定要出兵救援韩国。列国混战无暇他顾，这是天赐予齐国攻打燕国的时机。”

燕为齐北方大国，国势虽然不强，但拥地数千里，士卒几十万，是战国北方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燕王哙五年（前316），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二年后太子平率众叛乱，数月后内乱平息，但燕国的形势仍处于动荡之中。在战国兼并局面的条件下，各诸侯国交往的原则是利益关系。燕国内乱是齐国千载难逢的良机，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齐国如何行动最为有利，实在令人难以把握。宣王好士，麾下多有奇才。田臣思的建议确实是真知灼见，宣王采纳了这种意见后，即命匡章为将，起

五都之兵，会同征发的北地精壮，全力攻燕。齐攻燕这一仗，一是宣王采纳了正确的建议，选择了良机，下定了决心，倾全国兵力进攻，势在灭燕；二是用人得当，军队作战采取以常备兵带民众的配置，有效地保持了进攻锐势。五十天横扫燕国。如果不是其他各国的干预，齐国几乎在一次战役中就灭掉了燕国。这种声势、气魄，终战国一代绝无仅有。宣王之所以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燕国的弱点，与他好士，尊重人才，相信人才不无关系。

宣王好士，尊崇人才，其影响巨大。稷下学宫在宣王死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在列国士人中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战国著名学者，兼儒法两家之长的荀况，少年到稷下游学，广泛涉猎各家学术思想。后游历楚国，又重新回到稷下，成为学宫最有才识的先生。

战国时代，各国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后，士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广义范畴，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各种人才。在如火如荼的政治变革和军事活动中，地主阶级政权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就是士。一些国君和宗亲贵族招徕贤士，给予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一些大臣和著名的学者也常常向国君推荐人才。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现了布衣卿相和养士之风，宣王好士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当时，著名招贤纳士的诸侯有：魏文侯用翟璜、魏成子，翟璜又向魏文侯推荐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魏成子举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有这些人都受到文侯重用。鲁缪公用博士公仪休为相，以子柳、子思、申洋为臣。赵烈侯尊崇番吾君、公仲连、牛畜、荀欣、徐越。燕昭王广延人才，麾下菌集着郭隗、苏秦、邹衍、乐毅、屈景等当世英才。齐宣王好士同当世之人相比，除具有较强的实用和政治特色之外，齐宣王能够将礼遇优待士人的做法制度化，兼容诸子百家学说，鼓励学术研究。这是其他诸侯无法相比的。齐宣王好士并不是鸡鸣狗盗之徒一概网罗，齐宣王好士，左右多学士，这也

是宣王能他人所不能之处。

宣王好士，千古美谈。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孟子·梁惠王下》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敬仲完世家》。

《说苑·尊贤篇》

《战国策》：《燕策一》、《齐策五》。

张仪连横

张仪是战国时期魏国人。魏惠王在位时，张仪不得任用，携妻小南入荆楚寻求功名。此时，昭阳为楚令尹，辅佐楚威王，权势炽盛。张仪人楚便投昭阳门下为客。楚威王六年（前334），昭阳打败越王无疆，越的残兵败将和臣民被迫南逃，越国灭亡。原吴国属地全部归了楚国，楚国版图扩展很大，疆界延伸至浙江（今钱塘江）。昭阳又主持攻打滇国（今云南一带），举荐庄蹻率兵人滇，一举成功，占领了大块土地。昭阳这两件功劳颇受威王赏识，威王赐和氏璧给昭阳，以示恩宠。

关于和氏璧的来历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传说楚人卞和在荆山得一朴石，知道内含稀世之宝。卞和将璞石献给楚王，楚王传玉工辨认，玉工肉眼凡胎不识真货，告诉楚王这只是一块普通的顽石。楚王大怒，命值殿武士砍下卞和的一只脚，惩罚他欺君之罪。楚王的儿子继位后，卞和重新献上此宝，结果又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另一只脚。等楚文王即位后，残废的卞和已无法献宝，只能怀抱顽石在荆山下痛哭三天三夜。文王知道后派人接回了卞和，又命人劈开顽石，琢磨美玉，结果制成了旷古无双的玉璧。文王感念卞和的执著，便命名美玉为和氏璧。此璧传世约有四百余年，是无价之宝，威王把和氏璧赐给昭阳，昭阳自然感到得意非常。

昭阳将平日的好友和家臣请来，一边饮酒，一边纵谈古今，酒到好处时昭阳让人取来和氏璧，让众人传看玩赏。美玉碧洁无暇，众人连连称奇。这时，厅外水池的一条大鱼突然跃出水面数尺，紧

接着又是数条大鱼跳出水面，众人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同时，天边一块乌云迅速涌动，转瞬间阴云密布，大雨将至。待这一阵骚动慢慢平息后，和氏璧却不知传到了谁的手里不见了。大家又是一乱，四处寻找，但连影子也没有。昭阳十分扫兴，不好意思得罪客人，只好让客人先走，留下家臣们查找。俗话言道：狗咬穷人。众人见张仪穷酸小气，都有意无意地暗示张仪偷了宝贝，连昭阳也起了疑心。随即张仪被人鞭打，逼他承认。张仪没有偷宝，不承认这一切，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昭阳见问不出什么，只好让人把垂死的张仪送回家去。

张仪妻子见丈夫被打成如此，不禁放声大哭。过了一会张仪睁开眼，悠悠一口气含在嘴里看着妻子。妻子伤心地埋怨张仪，要是不想做官，哪会遭此毒手！张仪哼哼地问妻子："你瞅一瞅我的嘴，看看舌头还在吗？"妻子挺纳闷说："当然还在。"张仪说："只要舌头在，我就不怕。"

传说是传说，但张仪确是能言善辩。

张仪在楚混不下去，只好回魏蛰伏。大约在周显王四十年（前 329），张仪西行入秦。秦惠王比较赏识张仪的才干，拜他为客卿。

秦自商鞅变法后逐渐强盛，给山东六国带来不小的压力。在苏秦的活动下，山东六国联合对秦，合纵形势已经形成。如何对待这种局面，秦惠王接受寒泉子的建议起用客卿张仪。张仪向惠王上书说：

"要破天下合纵之策，使秦成霸王之业，即攻赵，亡韩，使楚、魏两国臣服，齐、燕归附而不敢生非分之心，必须采取连横战略，拉拢与国。"

惠王对张仪的建议深为赞许。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张仪的连横战略成为秦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

张仪入秦这年，公孙衍由秦跑到魏国为将。秦攻魏正猛，先

后攻克魏的汾阴等四地。次年，秦惠王用张仪为相，对韩、魏采取时打时拉的连横政策。一面迫使韩、魏太子入秦来朝，一面派公子桑攻取魏的蒲阳，随后又归还蒲阳。为博取魏对秦的信任，张仪建议秦王将公子繇送到魏做人质，并亲自入魏进行活动。魏把上郡十五县献给秦，秦归还魏的焦和曲沃。

对秦的连横活动，魏惠王并非没有觉察，他一方面与张仪虚与应付，表面和顺，但暗中加紧与山东列国的联系，先后与韩威侯、齐威王频繁相会，拉拢与国，积存力量，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向秦摊牌。张仪则在啮桑（今江苏沛县）约见齐、楚大臣，以备不测。

周显王四十六年，魏召集韩、赵、燕、中山四国，搞了个五国相王，借以对抗秦、齐、楚三国，结果也没有能够扭转被动局面。同年又同楚、秦打了几个败仗。次年，张仪再次入魏，游说魏惠王。

“秦挟韩攻打魏国，韩屈于压力，不敢不从。秦韩合一而攻魏，魏亡国在即。”

张仪恐吓惠王后又献计说：

“以臣之计，魏不如事秦，果真如此，楚、韩两国不敢犯魏。无韩、楚之忧，大王可以高枕无忧，魏国无难。”

魏自桂陵、马陵之战后，烽火不断，狼烟四起，虽然也有得胜之时，但惨败居多，元气大伤。更兼战事不息，民力恢复乏力，国势江河日下，欲求安息不能。相国惠施建议惠王屈节朝齐，以赢得齐、魏息兵。但数年后看，魏的局面并无起色，惠王逐走惠施，用张仪为魏相国。张仪在魏的连横活动获得了一定成功。

张仪在魏活动四年，始终围绕一个目标行动，就是促使魏国依附秦国，从而迫使其他诸侯效法魏国。张仪身居魏相国之职，其活动能量很大，对各国的威胁更大，因面遭到各国越来越强烈的抵制。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前 319），齐、楚、燕、韩、赵五国公

开支持公孙衍合纵政策，迫使魏国用公孙衍为相国，张仪被逐回秦国。公孙衍以魏国为本，召集楚、燕、韩、赵共五国联军伐秦。次年，联军为秦军击溃。至此，由于张仪、公孙衍等人的活动，合纵连横已成为战国外交纵横捭阖的主要方策，一纵一横，其声势足以倾动天下。

五国伐秦失败后，秦抓住东方暂无大的战事之机向西扩展。秦惠王即位以来，在如何宏扬祖宗基业，对外扩张这个问题上，秦内部一直有两种主张：以司马错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首先剿灭西南戎狄族建立的蜀国，兼并其土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具体说就是利用巴蜀的财富富民养兵；在战略上巴蜀有水道通楚，得蜀等于攫取了楚的地形优势，楚亡则加速天下统一步伐。司马错反对贸然进攻韩国，并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认为这样做徒蒙罪名而得不到实利。司马错反对的正是以张仪为代表一派所主张的。惠王权衡利弊，采纳司马错的主张。恰逢此时，蜀国和巴国、苴国之间发生战事。巴、蜀两国为世仇，苴侯与巴王比较友好，蜀王伐苴。苴侯出逃到巴国，向秦求救。周慎靓王六年（前 316）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兵经石牛道伐蜀。蜀王亲临前线，双方战于葭萌（今四川剑阁），蜀王兵败身亡。张仪等人又乘胜一举灭巴、苴，平定了西南地区。为了迅速稳定巴蜀地区人心，惠王以武力为后盾，对当地少数民族部族采用羁縻政策，改巴地统治者为君长，改封蜀王子弟为侯。仍然以秦女嫁给当地首领。派陈庄相蜀，张若为蜀地守。同时将秦民万家迁移到蜀地。不久，又封公子通为蜀侯。秦又改革当地赋税制度，规定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用土产布和鸡羽纳赋。

秦在西南用兵前后又大举进攻义渠，夺取义渠二十五城。

秦在西和西南方的发展为秦的兼并战争提供了可靠的支持，秦获得了广阔的战略腹地和物质基础。

周慎靓王六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乘机起兵攻燕，杀了

燕王，几乎灭掉燕国。齐声势浩大，六国震动，随后齐、楚联合起来，给本来已经声势浩大的齐国平添了几分威力。齐、楚联合，使秦攻齐的打算落了空。张仪要推行连横战略，非拆散齐、楚联盟不可。张仪辞去相国之职，到楚国游说楚王，破坏齐、楚联盟。

张仪入楚，先以重金贿赂楚怀王宠臣靳尚，通过靳尚很快见到了怀王。张仪对怀王说：

"秦王派我来跟贵国交好。秦与楚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大王如能听臣之言，臣即请将秦太子送到楚国做人质，楚也将太子送到秦为人质。同时将秦公主送给大王，侍奉左右。"

怀王根本无法回敬张仪的说辞，只说："秦、楚交好固然吸引人，但秦王总盯着别国的土地，不给就动武，谁还敢和他好呢！"

张仪看透了怀王的贪婪无能，抓住他的弱点对症下药。"如今天下七分，只有秦、楚、齐三国可以称雄列国。秦、齐联合起来，齐就强大于楚，秦、楚携手，楚则比齐强。如果大王能与齐绝交，秦必与楚和好，还愿意将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献给大王。楚国凭空可得三样好处：一是削弱了齐国，二是得土地六百里，三是博得了秦王的信任。楚举一而得三，秦、楚为兄弟之邦，永不开战。"

昏愦贪婪的怀王对张仪的话深信不疑，当即在朝廷向群臣宣布自己与张仪决定的事情。群臣纷纷祝贺楚王得到六百里土地，唯有大臣陈轸没有向怀王祝贺。怀王询问陈轸原因，陈轸对怀王说：

"臣认为秦商於之地不可能让我们得到，而麻烦一定会来了。秦冠看重大王是因为大王有齐国的支持，如今土地绝无可能归楚而先与齐绝交，楚必然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楚成为孤立无援的国家，秦何必再看重楚呢？应该先把土地接受过来，然后再与齐绝交，秦计无法得逞。先与齐绝交，后向秦讨地，肯定会受骗于张仪。大王被张仪欺骗，必然愤恨恼怒。西与秦为敌，北与齐绝交，两国兵患交加，楚国危险极了。"

怀王也觉得陈轸的话有道理，在与齐绝交的同时，赏了张仪

大量财宝，派逢侯丑随张仪接受商於六百里土地。

逢侯丑与张仪相伴而行，看看这一天已到咸阳城外，二人痛饮了一番。张仪似乎喝多了酒，摔了一跤，被人送去看医生，逢侯丑只好独自住在客店。张仪一去再难见面，逢侯丑多次登门求见都被挡了回来，一拖就是三个月。逢侯丑无奈只好上书秦惠王。很快，惠王传下回话，大意是说：相国的话一定会照办，可是楚与齐绝交不彻底。我不能简单从事，等相国病愈再考虑。逢侯丑只好回楚向楚怀王如实复命。楚怀王愚蠢至极，竟听信秦王的话，打发使者到齐国辱骂齐宣王。齐宣王愤怒到了极点，随即遣使到秦，相约攻楚。

逢侯丑再回秦国，一见张仪就提商於土地一事。张仪故作惊异地问逢侯丑："怎么将军还在这里闲逛，难道那块土地还没有接收吗？"逢侯丑回答说："秦王要等相国病愈才谈，请相国现在一同见秦王。"张仪说："我把自己的封地献给楚王，不用秦王恩准。"逢侯丑有些不相信张仪的话。"是您自己的封地？"张仪狡黠地说："我情愿将封地商於之地六里献给楚王。"张仪的话把逢侯丑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质问张仪："明明是六百里，怎么能说六里？"张仪正色对逢侯丑说："秦国的土地全是打仗得来，哪能白白送人。别说六百里，六十里也不行！我说的是六里，是我自己的封地。"逢侯丑瞠目结舌，惊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楚怀王接到逢侯丑的回报，大骂张仪无耻。周赧王三年（前312），楚怀王拜屈匄为大将，逢侯丑为副将，起兵十万，向秦发起进攻，以报前仇。秦自逢侯丑离开咸阳，料想楚必起兵伐秦，早已做好准备。楚军未动，秦惠王已拜魏章为大将，甘茂为副将，率兵十万迎击楚军。齐宣王也派大将臣匡章领兵攻楚。楚军在丹阳（今河南淅川）被秦、齐等国联军击败，阵亡将士八万多人，屈匄被俘。秦、齐联合击败楚军的消息传开，其他国家也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楚国。楚怀王商於六百里土地没到手，反将汉中的地方丢

给了秦国。只好派大夫屈原到齐谢罪，陈轸到秦军求和，情愿再割两城给秦。

魏章将楚怀王的意思转报给秦惠王，惠王表示，楚不需再割城池，只要同意把商於之地换成楚的黔中地方，秦军可以不再进攻。魏章回复了楚怀王，楚怀王并不在乎土地，只是志在必杀张仪。楚怀王告诉魏章："也不用调换土地，秦王交出张仪，情愿把黔中之地送给秦王。"

楚怀王这个要求给秦惠王出了道难题。楚王索要张仪的消息传开，平素忌恨张仪的朝臣立即散布流言，制造空气，压迫秦惠王献张仪，换黔中土地。惠王也觉得利害得失的砝码相差太悬殊了，要知道黔中是块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怎么能献出功在秦国的大臣呢？张仪却不这么悲观，他向惠王表示愿意去楚，死了我一个人，得了黔中之地，实在很体面。张仪反安慰起秦惠王来了。张仪不是轻率作出决定，他对楚国政治，特别是楚怀王太了解了，因而已经找到了化解问题的途径。从怀王宠臣靳尚、宠姬郑袖身上打主意，更何况自己奉秦王之节出使楚国，楚怀王也不敢放肆。

张仪到了楚国就被拘禁起来。消息传到靳尚耳中，靳尚很是不安。先前他接受张仪不少馈赠，不好意思坐视张仪受难而无动于衷，只好设法为张仪开脱。靳尚对楚王说，拘禁张仪，秦王必然恼怒，各国知道楚国见罪于秦国，一定会轻视楚国。靳尚担心怀王义愤难平，自己的话发挥不了作用，暗中又对怀王宠姬郑袖下功夫。谎称张仪被囚禁，对秦王触动很大。张仪对秦王有大功，秦王不能对张仪的处境视而不见。只要能换张仪回秦国，秦王不惜挑选绝代佳人、歌姬粉黛，再加上金银珠宝、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一带）六县来向大王换回张仪。一旦大王见了秦女，考虑倚秦自重，必然将秦女扶正。大王沉溺于秦女新欢，理所当然疏远夫人，夫人的地位真是岌岌可危。靳尚把郑袖说动了，两人

商量好一起劝怀王放张仪回秦。怀王对郑袖言听计从，再加上靳尚也这样劝说，糊里糊涂地放了张仪。

张仪回到秦国，真可谓不辱王命而归。秦惠王依张仪的建议，命魏章退兵，同时考虑到秦对新近占据的汉中实际控制能力不够，便主动退还楚国一部分汉中土地。惠王的这一决定，使张仪连横之策显得更加灵活有力，为张仪的游说活动增添了许多实际内容。

秦、楚丹阳战后迅速和好，昏昧无能的怀王竟认为张仪办事厚道，够朋友，昏头昏脑地把自己捆在了连横战线上。

秦惠王深感张仪连横活动的威力，赏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加封为武信君，张仪名声大震，更兼秦王的封号，俨然成为当时各国连横活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努力下，秦在短短的时间里又取得了发展。

张仪至齐，见齐宣王，蛊惑人心地说，楚已将公主嫁给秦太子，秦也将公主嫁给楚王的另一个公子，秦、楚两国已成婚姻联盟。燕及三晋为邀好秦王，纷纷献地给秦王，以示诚意。五国和好，齐可孤立了。一旦韩、魏由南攻齐，赵军进攻临淄、即墨，秦再发兵攻齐，齐可危险了。等到大难临头，齐再打算与秦和好，可就晚了三春。当今局势，与秦好则平安无事，与秦作对就休想安宁。宣王明知张仪在恫吓威逼，只是也知道张仪所言是实，只好顺水推舟承诺与秦修好。

张仪离开齐国后，又先后到赵国、燕国活动。靠三寸不烂之舌，张仪又使燕国向秦献了五座城池。张仪自己也颇得意，由燕回秦复命。

周赧王四年，张仪在回秦途中得讯：秦惠王死了，太子即位，是秦武王。张仪知道，武王尚武，性情直爽，平素交结多是粗人勇士，做太子时就看不惯张仪摇唇鼓舌，一些反对张仪的大臣时常在武王跟前说张仪的坏话。武王在位，自己的职位恐怕保不住了。回到咸阳，张仪主动向武王要求到魏国活动：

“齐王心里最恨我，我到哪国他就派兵进攻哪国。我到魏国后，齐、魏必战。大王可乘机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关。轻而易举兵临周室，挟天子，席卷天下，成就王业。”

正如张仪的预料，武王并不想用张仪。武王顺水推舟答应了张仪的要求，资助他车马三十辆。张仪终于以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离开了秦国。

张仪入魏，魏襄王拜张仪为相国。

齐宣王当初相信张仪的话，以为三晋真的与秦和好，自己不得不随着做出和好的姿态。很快他就明白原来是张仪弄的诡计，目的是借助齐国胁迫别国。自己兴师动众地调整外交姿态，完全是受了张仪的愚弄。宣王真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张仪。秦惠王一死，齐宣王立刻叫相国田文通知各国，重立盟约。齐出面组织合纵抗秦，宣王为纵约长。同时悬赏十座城邑，捉拿张仪。魏襄王不但收留张仪，而且委以相国要职，齐宣王觉得魏是故意与齐过不去，即派兵攻魏。

齐国向魏国宣战，给疲惫不堪的魏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魏襄王忧心如焚，忙请张仪一同商议对策。张仪劝襄王宽心勿躁，一切由他处理。张仪告退后，派人找来自己的心腹冯喜，让他扮成楚人按计行事。冯喜到齐后设法见到了齐宣王，他恭维宣王一通才把话题引向齐、魏之间的战争：“闻听大王恨透了张仪，不知是否真的？”宣王咬牙切齿地回答：“恨不能把张仪千刀万剐，生吞活剥。”冯喜不以为然地说：“大王果真恨他，就不会暗中助他一臂之力。要知道，没有大王支持，张仪难成好事。”宣王请冯喜把话说透。冯喜侃侃而谈：“我从咸阳来齐，在秦时就听说张仪离秦赴魏是个计谋。秦王料定大王恼怒张仪，张仪所至，一定招至大王的进攻。秦王派张仪赴魏，使大王全力攻魏而无暇他顾，秦兵趁机攻灭韩国，吞灭成周，取周天子而代之。这就是秦王资助张仪三十辆车马，派他到魏国的原因。如今大王果然发兵攻打魏国，

难道不是支持张仪计划顺利实施吗?”宣王被冯喜说得真假不辨,赶紧命令攻打魏国的齐军后撤。

张仪轻而易举地解了魏王之急,使魏王对他更加信任。周赧王六年,张仪病死在魏国。

张仪虽然死了,但是他为秦国制定并身体力行的连横方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是秦进行外交军事活动的基本内容。

战国是继春秋诸侯兼并而形成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是东周数十年分裂动荡向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帝国的过渡阶段,军事、外交活动在这一时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种成功的外交、军事斗争策略足以左右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可以说由此而导致的国家生存是压倒一切的根本问题,在各国力量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七国中不论强弱都在寻找自己的盟友,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保存自己,这就产生了合纵连横活动。政客、士人以游说之士的身份,研究形势,奔走各国之间,成为合纵连横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最初,合纵是各弱国联合抵御强国的行动,出现过“三国攻秦”、“五国攻秦”,实际情况是,合纵国家多少不一,进攻的对象有秦国,也有齐国,齐、秦两大强国对峙的形势形成后,合纵成为齐、秦两大国压倒对方和谋求进一步兼并的手段。连横以秦为中心,涉及到的国家也不如合纵多,特别是张仪的连横活动基本是以秦、楚、魏三国为主。由于各国强弱此消彼长,矛盾错综复杂,连横合纵形势变化很快,很不稳定,一件历史事件、一项军事活动往往是合纵、连横兼施。各国的关系也是朝秦暮楚,今天是盟友,明天是敌人,带有很强的权变色彩。从事合纵连横活动的纵横家也蒙上浓郁的权术气味。但从本质上说,合纵连横和纵横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张仪一类人物曾经在中国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胡安贵)

参考资料：

《史记》：《犀首列传》、《楚世家》、《苏秦列传》、《张仪列传》、《秦本纪》。

《战国策》：《秦策一》、《魏策一》、《赵策四》、《齐策二》。

靖郭君相齐

齐威王时期（前 356- 前 320）的相国靖郭君，是战国时期一个著名的人物。

靖郭君姓田，名婴。他是齐威王的小儿子，是齐宣王的异母弟弟。

田婴从齐威王的时候起任职掌权，曾经跟随成侯邹忌和田忌统率军队援救韩国，攻打魏国。成侯和田忌争权夺利，成侯陷害田忌。田忌恐惧，偷袭齐国的边境城市，不得手，便逃跑了。后来齐威王知道了成侯陷害了田忌，便又召回田忌任命为将领。此后，田婴又参加了著名的马陵之战。

公元前 342 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急忙向齐求救。齐威王根据孙膑的建议，对韩国表示救援之意，坚定韩的抵抗决心，但并不马上出兵。到公元前 341 年，当魏韩打得精疲力尽时，齐威王派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起兵五万攻魏救韩。魏惠王派太子申和庞涓为将，带了十万大军前来迎战。孙膑以逐日减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迷惑魏兵，引诱追击。待魏军追到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险要地区，齐军万弩齐发，全歼魏军十万，魏将庞涓被迫自杀，魏太子申也被俘杀，从此魏国的国势衰落。田婴在此战役中建立了很大的功劳。

到了齐威王晚年，相国邹忌和将军田忌又发生矛盾，田忌一度被迫出走到楚国。田婴趁着这个空隙，接替邹忌当上了齐国的相国，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这时候，齐威王的夫人死了，留下了七个孺子，个个都比后来即位的齐宣王受宠。当时，威王想立其中一个为嗣，但还没有最后确定。田婴知道齐威王的心思后，于是请威王立一夫人。他想，如果威王听了他的话，就知道威王重视立夫人之事，如果不听，就不重视此事。为了进一步弄清威王的想法，田婴进献给齐威王七个玉珥耳饰，并把其中一个制作得很精美，以暗示威王七个孺子中要更加宠幸其中的一个。威王果真把这七个玉珥分给了七个孺子。第二天，齐威王询问田婴最美的玉珥到底美在哪里？田婴仔细地介绍玉珥美的所在，并进而劝谏齐威王要立一夫人。齐威王明白了田婴的用意后，非常高兴，此后更加尊重田婴，田婴因此权势也越来越大。齐威王封田婴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作为他的封地。

田婴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势，决定采用欺骗手段把"终岁之计"（即上计）①的大权夺到自己手中。他对齐威王说："终岁之计，您不必要每日都看。"齐威王说："我本来对这件事是很厌烦的，这样吧，以后群臣年终上呈的计帐就由你处理了。"

过了几天，有个人对齐威王说："群臣年终上呈的计帐，您可不能不看啊！您如果不看的话，就无法知道您的臣属的奸邪得失。实际上，看群臣上呈的终年计帐也花不了多少时间。"齐威王听后感觉很有道理，说道："好！"

田婴听到这件事后，马上向齐威王进言，说明自己对上计的看法，并且请求齐威王继续看群臣上呈的计帐，并假惺惺地对齐威王说："我看您终日操劳国事，太辛苦了，我想分担您的辛劳，所以劝您不要看群臣上呈的计帐了。现在既然有人提出希望收回上计的大权，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您就收回吧！"齐威王听田婴这一番话，心里很高兴，没有对田婴产生猜疑之念。

---

① 上计：战国、秦、汉时年终考核地方官员成绩的方法。战国时群臣于年终须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国君考核，称为上计。

田婴骗过齐威王以后，于是下令群臣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齐威王亲自看群臣上呈计帐，由于田婴暗中作了手脚，上呈计帐无计其数，搞得齐威王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吃过中饭，马上又坐下观看群臣上呈的计帐，一直到深夜，连晚饭都吃不了。田婴看到齐威王这般样子，心里暗暗高兴。一天，他又假惺惺地对齐威王说："群臣上呈计帐如此这多，是由于他们勤于政务，不敢偷怠，您这样辛苦地观看他们上呈的计帐，他们知道后，一定更加勤奋地工作。"齐威王面带苦笑地说："唉！别提了，看上呈计帐，搞得我疲惫不堪，这项工作还是由你负责吧。"田婴听后，内心非常高兴，但他面不挂色，还假惺惺地说："不，不，您还是负责吧，我不能胜此重任！"威王说："你别推辞了，就这样办了。"田婴笑嘻嘻地走了。

成驩知道此事后，对齐威王说："您太仁爱，太不狠心了！"威王反问说："太仁爱，不狠心，不是可以扬名于世吗？"成驩回答道："不然，太仁爱，不狠心，应是属臣的善美之处，却不应是大王的行为。如果属臣仁爱，才可以与他合谋；不狠心，才可以亲近他。如果不仁爱，就不可以与他合谋，狠心就不可以亲近他。"齐威王进而问道："既然这样，那我哪里做得太仁爱了，哪里又做得不狠心呢？"成驩回答道："大王对田婴太仁爱了，对诸田氏太不狠心了。您对田婴过于仁爱，那么就会轻视了其他属臣；对诸田氏太不狠心，那么就会放纵诸田氏，导致父兄犯法，无人敢问。属臣不受重用则会兵弱于外，父兄犯法则会政弱于内。兵弱于外，政弱于内，就是国家灭亡的根本祸患。"齐威王听了，不以为然。

后来，田婴出使到韩国和魏国，韩、魏两国表示归服于齐国。田婴陪同韩昭侯和魏惠王到阿邑（今山东阳谷东北）南面会见齐威王，订盟后离去。齐威王后来又跟魏惠王在甄邑（今山东鄄城北）会见。

本来魏国经过桂陵之战（前353）和马陵之战后，国力大为削

弱，魏王和相国惠施商议，魏王说要报仇，要和齐国进行决战。惠施说："现在国家弱，没有力量，不能决战。不如变服（就是不着王服）表示屈节朝见齐王，楚王必怒。"魏王觉得这办法好，于是采用惠施"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建议，通过田婴的关系，率领韩国国君和其他小国国君，到齐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向齐威王屈膝约和，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所谓"会徐州相王"。由于三晋国家都到齐国朝见，淮泗间的小诸侯当然都顺从齐国。齐威王也会诸侯，朝天子，代替魏国而称霸了。

楚威王听到齐威王与魏惠王在徐州会见，互相承认对方称王的消息后，非常气愤，责怪田婴从中牵线，并亲率大军，进围徐州，打败了齐将申缚的军队。楚威王乘战胜之余威，派人责令齐国放逐田婴。田婴忙派门客张丑去劝说楚威王。齐威王二十五年（前 332），张丑来到楚国，对楚威王说："大王战胜齐国军队，取得徐州之役的胜利，是由于齐国没有重用田盼子。盼子对齐国有大功，齐国的老百姓都佩服他。但是，田婴对盼子不友善，看不起他，所以，盼子得不到重用，而申缚受到重用。但齐国上下百官都不服申缚，百姓也看不起他，都不为他致力尽用，所以，大王才能在徐州战胜齐国军队。如果您责令逐放田婴，那么，盼于一定会取代申缚而得到重用，他就会重整齐国的士卒，趁机与楚国决战，这样就对楚国不利了。"楚威王听了张丑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迫使齐国放逐田婴的念头。

齐威王三十六年（前 321），齐威王想改封田婴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楚怀王听到后，大怒，准备攻伐齐国。楚国为什么听说齐封田婴于薛地，就想进攻齐国呢？这是因为薛邑南而靠近楚地，齐国封田婴于薛，使南方弱小诸侯国感到恐惧，使楚国很愤怒。恰好，这时候楚柱国昭阳大破魏襄陵，之后又乘胜魏之势而攻打齐国。魏国和齐国的交战，在魏国起决定作用的是惠施，在

齐国起决定作用的则为田婴。楚国既然不想让魏、齐两国联合，就必须战胜魏国，而后才可能有力量去进攻齐国。

齐威王听到楚国将要进攻的消息后，对封田婴于薛地的事又有些犹豫不决。这时，公孙闬对齐威王说："封田婴于薛，成与不成在于齐国，但又在于楚国。"公孙闬又到了楚国，对楚怀王说道："您不应该阻止齐国封田婴薛地，因为北方的鲁国和宋国已经臣服楚国了，而齐国却不心悦诚服。齐国力量强大，鲁、宋两国力量弱小，齐国分出薛地封给田婴，这样就使齐国的土地缩小了一点儿，国势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齐国力量减弱了，就没有充足的实力与楚国抗衡，所以说，齐封田婴于薛，对楚国是有好处的，您为什么还阻止呢？"楚怀王听后连连称道："好，好！"就不再阻止齐国封田婴于薛地了。

田婴受封薛地后，号为靖郭君或薛公。他想要在自己封地内筑城，但遭到门客的反对。田婴对此非常气愤，他对其中一个劝阻的门客说："你们知道什么，我们的封地内居然没有一座城池，还算什么封地。"这个门客听后，摇摇头走了。

有一天，有个齐国人来到田婴的门前，对侍卫说："我只对你们主人说三个字，多一个字，你们就把我煮死，我死而无憾！"侍卫急忙告诉田婴，田婴听后感觉很奇怪，不知这个人想说什么，于是命侍卫请这个人进来。来人见到田婴说完"海大鱼"三个字后，扭头就走。田婴更感觉奇怪，急忙拦住了这个人，说道："我愿听听你的详情。"来客转过身来说道："我有言在先，不多说一个字，我不能失言，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田婴忙说道："不，你说说没有关系。"说罢，马上请来人住下。来人住定以后，对田婴说："您恐怕不会没有听说过海里的大鱼吧？大鱼，体肥身长，用网也提不住，用钩也牵不住，难以驯服。今天的强大齐国，说是您的海水。您如今在齐国当了相国，位显权重，为何又吝惜那区区薛城呢？您失掉齐国，既使把薛地的城墙筑得高上天，对您也没有

什么好处。”田婴听后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停止建筑薛城。

田婴对一个名叫昆辨的齐国人极为友善，但昆辨为人却大大咧咧，他虽有奇才却不修细节，因此，田婴的门客都对他没有好感。其中一个叫士尉的门客极力劝阻田婴不要对昆辨过于宠任，这样会失去许多忠诚的门客。田婴不听。田婴的儿子田文（即孟尝君）也多次劝阻田婴。田婴不但不听，反而对田文大发雷霆，气冲冲地说道：“我纵使家族破灭，也改变不了对昆辨的态度，你们不要说什么了。”接着，又把昆辨安置住在上等的客舍里，令善童幼子朝夕侍从，不可怠慢。

过了几年，到了公元前320年，齐威王死，宣王即位。齐宣王非常看不上田婴，田婴因此就辞官，回到自己封地去了。昆辨也与田婴一起回到了薛地。过了几天，昆辨对田婴说：“我想去谒见齐宣王。为您澄清他对您的错误认识。”田婴回答道：“齐宣王对我是非常不感兴趣的，他知道你是我的门客，你去见他，他一定会把你杀死。”昆辨大义凛然地说道：“人生必有一死，我不是为了求生而活着的，我恳求您还是让我去吧。”田婴说不过昆辨，无可奈何，只得让他去了。昆辨从薛地到了齐国都城，拜见了齐宣王。齐宣王强忍愤怒接待了昆辨，对昆辨问道：“你的主子靖郭君是不是很仁爱，治国很有办法呢？”昆辨回答说：“是啊！大王原来做太子的时候，我曾经对靖郭君说过：‘太子太不仁爱，齐国的老百姓都不信服他，不如废了太子，立卫姬的儿子郊师为太子。’可是，靖郭君说道：‘不可以啊！我不忍心。’当时靖郭君如果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大王就不会继承先王的王位，靖郭君也不会辞官回到薛地去了。另外，先王封靖郭君薛地后，楚国的令尹昭阳曾经请求靖郭君用薛地换楚国数倍于薛地的土地。当时，我极力劝靖郭君同意楚国的请求，但是，靖郭君却说：‘薛地是先王封给我的，虽然宣王对我有成见，我也不能愧对先王。并且先王的庙堂在薛地，我怎能可以把先王的庙堂给楚国呢？’”齐宣王听

了昆辨了一番话，长叹一声说道："靖郭君对于寡人，原来是如此忠心啊！寡人年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靖郭君的一番苦心！昆辨，你肯不肯为寡人请回靖郭君？"昆辨急忙答道："当然可以。"

昆辨回到薛地，把拜见齐宣王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靖郭君，靖郭君非常高兴。于是，他穿着齐威王时期的衣帽，佩带长剑，从薛地出发，赶向齐国都城。齐宣王亲自到都城郊外迎接。靖郭君到了国都以后，齐宣王又拜靖郭君为相国，靖郭君再三推辞，不得已而接受了。过了不久，靖郭君又辞去了相国，齐宣王于是改用储子为相国，靖郭君又回到了薛地。

靖郭君是齐国的封建贵族，他自接替邹忌当上相国以后，就采用欺骗的手段把"终岁之计"的大权夺到自己手中。以后，他更大肆扩大权势，营私舞弊。靖郭君不仅私家富累万金，还取得了彭城作为封地，公元前322年又改封于薛，并在那里筑城。他残贼其百姓，害伤其群臣，弄得国人要背叛共逐之。等到发生动乱，曾迫使他一度出亡于野而饥。因此说，靖郭君可以列入"篡臣"的行列中。

大约到了公元前310年以前，靖郭君的儿子田文承袭了薛的封地，而且当上了齐国的相国。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韩非子》

《新序》

周分东西

历史上常称的周朝包括西周和东周。到西周末年，申侯（被废的申后的父亲，申国的国君）联合缯国和西夷犬戎的军队讨伐西周。幽王被迫在烽火台上燃点烽火，征集诸侯的军队前来救援。然而诸侯派来的军队极少，西周的京城镐京（今陕西西安沣河以东）被攻破，西戎军队在镐京内外大肆烧杀抢掠，并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幽王失国后，周贵族们拥立太子宜臼于公元前770年即王位，就是周平王。因为躲避犬戎的威胁，平王将国都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东周。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统治的地区很小，力量很弱；而诸侯国家的力量日益增强，郑、齐、宋、晋、秦、楚、吴、越等国相继称霸。周王名义上保留“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根本难以号令诸侯，有的诸侯公然和周王进行战争，有的诸侯名义上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是要把周王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争夺指挥诸侯的霸权。因此，在东周前期——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周王成了霸主的傀儡。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兴封建势力以不同方式先后在各国取得了统治权，形成了“政在私门”、“三分公室”、“四分公室”的局面。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实际降到了一个小国的地位。它只占有王城洛邑附近相当于现在十多个县的一片土地，人口不多，力量更加微弱。处在大国之间，不时受到大国的攻击，七大国根本看不起王室。

但是，周王名义上还是天子，从礼制来讲，各国要向他朝拜，各国国君爵位，要由他册封。实际上，各国诸侯只是表面上表示尊重周室，不然就会遭到其他诸侯国的反对。公元前 309 年齐王写信给楚王，其中说让楚王和他尽力争取韩、魏、燕、赵，联合起来尊周王室以号令天下。诸侯国有时为了需要，也要利用周天子来作号召。相传从夏代传下来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人们认为得到九鼎就能得到天子的地位，并且号令天下，诸侯顺从，成就王业。战国时期也和春秋一样，诸侯国觊觎王室的九鼎。有一次，秦国兴师临周，想得到九鼎。周向齐国求救，齐兵出，秦兵退。齐国又“将求九鼎”。周派颜率说齐王，九鼎要是经过魏国或楚国，会被魏楚劫去。颜率又说，每鼎需要九万人牵引，九鼎共需要八十一万人牵引，哪里有这么多人呢？齐王听后也就作罢。

不过，由于周王室力量太小，毫无威力，各个大国愿意的时候，表面上遵守周代礼制，不愿意的时候，就把这些礼制一脚踢开。周威烈王时就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以后安王又封篡齐的田氏为诸侯。这些诸侯的力量已很强大，周王室不过是礼制上的一个形式而已。

继封诸侯以后，各大国对于诸侯的称号不满足了，要求称王，到了公元前 332 年，战国七雄中除楚国早已在春秋时称王外，其余六国都称王了。不但七个大国如此，一些二等国也都相继称王。周王对此毫无办法。

东周传二十二代王到赧王时为秦所灭，周嗣就不祀了。

春秋战国之交从周元王算起，元王传给定王，定王传给考王，考王传给威烈王，威烈王传给安王，安王传给烈王，烈王传给显王，显王传给慎靓王，慎靓王传给赧王，赧王被秦国所灭。定王死以后，长子哀王继位，才三个月，哀王弟杀哀王自立，为思王，才五个月，思王弟又杀思王自立，就是考王。哀王和思王的时间

都不到一年，过去史书算世系有的计算这二王，有的又不算，传位的王数就不同了。公元前256年，秦灭赧王。这时离秦统一中国还有三十多年，所以早在秦统一以前周王朝就不存在了，比秦灭山东各国为早。

周考王时，考王封他的弟揭于成周洛邑，说是为了要继续周公的官职，历史上就称他为西周桓公。这就是说在周王室的那点领土内又封出一个小国。周桓公死后，传给了儿子威公。

威公时，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有个名叫宁越的鄙人，他非常厌倦耕种庄稼，觉得太辛苦了，总想离开这种繁重的劳作。有一天，他对一位朋友说："你告诉我，干什么事可以免除耕种庄稼这种累死人的活？"那位朋友回道："既然你不想干农活，那么何不学习，增长学问。"这个人说完这句话，看了看宁越，宁越面带不解的神态，望着他的朋友。那人接着说道："你现在就开始刻苦学习，到了三十岁就可以满腹经纶，学识渊博了。"宁越果真听了他朋友的忠告，刻学攻读学问，终于做了威公的谋士。

有一天，周威王对宁越说道："选择谋士有何标准？"宁越回答道："如果这个人很贫苦，那就使他富有；如果这个人想出走，就极力地留住他；如果这个人被废弃，就高高地起用他。这样，天下之士就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您的身边，为您效力。如果贫苦的人，不能使他富裕，想出走的人，不极力挽留住，被废弃的人，不能重重任用，那么，天下四方之人，就不会风动影从，投靠您了。城池再坚实，没有士卒去使用，也不会显示出它的威力。所以说，得到了谋士，却不注意加以任用，让他离开就会后患无穷。谋士存则君主尊，谋士失则君主卑。"威王接着问道："谋士真的如此重要吗？"宁越又说道："您恐怕不会没有听说过楚平王有个谋士叫偰胥丘吧，平王将要杀他，偰胥丘逃走，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重用，他在城濮之战中使晋击败楚国。又有一个谋士叫苗贲皇，平王想杀死他，他也逃到了晋国，受到重用，后来在鄢陵之

战中建立功勋。又有一个谋士叫上解于，平王也想杀死他，他也逃到晋国，同以上两个人一样受到重用，后来在两堂之战中大败楚国。再有一个名叫伍子胥的谋士，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平王杀死了他的父兄，他被迫出逃，经历宋郑等国来到吴国。他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使吴国的力量不断强盛。由此可见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伍子胥父兄被杀，愤怒出走吴国，他的知交申包胥看到伍子胥是个难得的人才，极力挽留，最后也未能如愿，害得他痛哭七夜，也无济于事，吴国大军攻入楚国郢都。"① 威王听后频频称是。

晋国太史屠黍看到晋国的内乱，削弱了晋国的力量；他又目睹了晋公骄横无度，荒废国政，享国之日不会太久，因此他就投奔周威公去了。威公对屠黍非常敬仰，经常与他谈论天下大事。有一次，威公问屠黍道："天下诸侯各国谁最先灭亡？"屠黍回答说："晋国最先灭亡。"威公问是什么原因，屠黍回答道："臣在晋国做官已经很久了，看到大臣们都不敢直言劝谏。臣曾向晋公进言道：'天妖正在发怒，日月星辰的运转极为不正常'。晋公却说：'这对我的君位没有什么影响。'臣又曾向晋公进言过：'当今晋国官吏多行不义之事，百姓困苦不堪'。晋公却说：'这对晋国没有什么伤害。'臣又曾说过：'现在周围的邻国都不如以前那样服从晋国了，国内许多贤良之士得不到重用'，他却说：'这对晋国没有什么损失'。国君昏庸到如此地步，他竟不知道这是灭亡的先兆，能不亡国吗！所以臣说，晋国最先灭亡。"

过了三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灭亡。周威公知道后，又召见屠黍，问道："天下诸侯国，谁次于晋国之后灭亡呢？"屠黍回答道："中山国次之。"威公又急忙问屠黍是什么原因，屠黍回答道："上天降生众民，让他们各自都不同，从事不同的工

① 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吴国采用伍子胥计策攻破楚国，楚国贵族申包胥到秦国求救，他在宫廷痛哭七日夜，终使秦发兵救楚。

作，这是人有别于禽兽麋鹿的地方，只有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君臣上下的从属关系才能确立。中山的风俗，以白天当作黑夜，以黑夜当作白天，男女混俗，国君喜好歌舞，淫逸奢侈，毫无法度，这是亡国之俗，臣所以说，中山次之。”

过了二年，中山果真灭亡了。威公又召见屠黍问道：“哪个诸侯国随晋国和中山国之后灭亡？”屠黍不回答。威公很是奇怪，急忙再问，屠黍严肃地回答说：“您次之。”威公听后大为恐惧。随后，采纳屠黍的建议，广求天下仁义之士，得到义时、田邑等人，以礼对待他们。又得到史黔、赵骈，任用他们为谏臣。下令废除三十九种上纳的贡品。然后威公亲自到屠黍家中，告诉他这些做法。屠黍听完后说道：“臣听说，国家兴盛，上天就会派来贤德之人和极言进谏之士；国家败衰，上天主会派来乱佞之人和善于巧言花语之士，您是注意到这一点了。”

过了不久，威公死。传位给儿子惠公，惠公的长子朝叫西周公，封他在洛阳，惠公在位时封他的小儿子根于洛阳东面巩（今河南巩县西南）的地方，沿袭他父亲的称号叫东周惠公。西周公又叫西周惠公。

惠公在世时，公子根和太子朝就有矛盾。惠公封朝为太子，公子根对此极为不满。周显王二年（前 367）公子根为争夺太子的地位，发动反叛。韩国和赵国乘西周的内乱，帮助公子根在巩独立。转年，又把本来领土很小的土地一分为二，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又有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到了赧王时，东周西周各自设政，各居一都，西周占王城，东周占成周。这两个小国逐步占有了周王室的土地，以至赧王没有容身的地方，或是寄住东周，或是寄住西周。

西周惠公死后，武公继位。不久，武公的共太子就死了，留下了五个庶子，武公都非常喜爱，不知道立哪个庶子为嗣。楚国大臣司马翦听说后，对楚怀王说：“为何不请求周武公立公子咎为

太子呢？”楚国另一个大臣左成对司马翦说：“不可以，如果周武公不听的话，这不就使楚国与周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吗？不如对周武公这样说：‘您想立谁为太子，请暗地里告诉司马翦，司马翦回到楚国，告诉楚王，让楚王拥立他。’”楚王听从了左成的建议，于是派司马翦去周。司马翦到周后，将左成的话转告给武公。武公立公子咎为太子。

周赧王八年（前 307），东周与西周发生战争，西周君请求韩国出兵去援助。有个人为阻止韩兵去援助西周，亲自到韩国对韩王进谏道：“西周之地，是周天子的国都，自敬王以来，周王都居住在那里，那里有许多名器重器，世上罕见。如今大王只要出兵帮助西周，却不去进攻东周，那么西周君就会对韩国出兵助西周感到不安，这样西周的宝器一定都会归韩国了。”

这一年，秦国想借两周之间的道路去攻伐韩国，两周恐怕借道给秦国会得罪韩国，因此不敢借道秦国。韩国史官厌对西周武公说[①]：“您为何不派人告诉韩公叔说：‘秦国敢横渡阻止邻国往来的垣垒去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您不如先答应借道给秦国，然后派使臣到楚国去。秦、楚两国是敌国，一直互相攻伐，周派使臣楚，秦国一定怀疑，不相信周会借道给秦，这样韩国就不会受到秦国的进攻了’。再后派人去对秦王说：‘韩国强大，周力量微弱，只得让一部分’，这样让秦国怀疑周、韩联合，秦国一定会阻止周割让土地给韩国。”

周赧王十五年（前 300），楚军攻雍氏，韩王派人向东周君征调兵器和军粮。东周君非常恐惧，急召苏代商讨对策。苏代对东周君说：“您不要害怕，臣能使韩国不征调兵器和军粮，又能得到韩国的高都（今河南新城北）。”东周君忙说：“你真能如此的话，那就太好了！”苏代到韩国以后，拜见了韩相国公仲侈，对他说：

---

① 这时，周赧王微弱，不主盟会，寄住西周。

"楚国攻雍氏，已经三个多月了，楚国本打算三个月攻下雍氏，现在看来还是楚国兵力弊弱，力量不足。韩国向周征调军械粮草，就是告诉楚国，韩国的军事力量也不是很强。"会仲侈听了苏代的一番话，感觉很有道理，连连称是，于是不派使者去周。苏代接着道："韩国为什么不把高都给周呢？"公仲侈听后勃然大怒，说道："韩国不向周征调军械粮草就可以了，为什么还把高都给周！"苏代不慌不忙地说："韩把高都给了周，秦国知道后一定很愤怒，不通使于周。这样，韩国失去小小的高都之地，却得到了周，何乐而不为呢？"公仲侈听后连说："是，是！"果真把高都给了周。

这一年，东周与西周又发生争端，西周想同楚国和韩国和好，以作为西周的后援。辩士齐明对东周君说："臣唯恐西周把宝器献给楚、韩，让楚、韩帮助西周攻占东周的土地。您不如派人去楚、韩，对两国国君说：'西周想把宝器给两国，是看形势变化而定。如果东周凶猛地攻打西周的话，就将宝器给两国，不然就不给了。如今我东周大军不准备急于攻打西周，这样西周的宝器就不会给楚、韩了。'楚、韩两国想要得到宝器，就会催我东周去攻打西周，西周拿出宝器给楚、韩，这样我东周帮了楚、韩两国大忙了，西周的力量就会减弱。"

不久，东周想种植水稻，但西周居河的上流，切断了河水，使东周田地得不到灌溉，为此，东周非常忧患。苏代对东周君说："臣请求出使西周，让他们畅通河道，使河水流过来。"东周君答应了。于是苏代到了西周，见到西周君，对他说道："您的计谋太过分了！您切断河水，使东周田地得不到灌溉，这不会使东周困苦，反而会富足东周。"西周君听后不解其意，急忙问道："这是什么原因？"苏代接着说："东周得不到上流水，就让百姓种麦子，不种别的庄稼了。您想让东周困乏，不如开通河道，这样就会使东周的麦子全都涝了，东周还会再种水稻的。您牢牢地把握了东周的水源，就等于控制住了东周的生命，这样东周的百姓就会受

命于您。”西周君听后，说道：“好！”于是开通了河道。苏代也得到了东周和西周的奖赏。

有个名叫昌他的人因为犯了罪而逃出了西周到了东周。他把西周的实情全都告诉了东周，东周君非常高兴。西周君知道后极为愤怒。这时，冯旦对西周君说：“臣能杀了他。”西周君给了冯旦金三十斤。冯旦派人带着金子和他写给昌他的书信去见昌他。书中写道：“告昌他：事能成功，就勉强成之；事不能成功，就快快逃去，事情久了就会泄露，等于自取灭亡。”然后又派人告诉东周的侦候之吏说：“今夜有一奸人要经过你守防的关卡，你要留心捕捉。”侦候吏果真捉住了冯旦派去的使者，从他身上搜到金子和书信，呈献给了东周君，东周君看过信后，马上命令手下杀死了昌他。

西周武公死后，文君继位。不久，文君免除了工师藉的相位，任用吕仓为相。国人非常不满。有个人对文君说：“国家必须有诽谤之词和赞誉之语，忠臣一般使诽谤之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赞誉之语一般掌握在国君手中。宋国君妨碍百姓耕种农田，把他们聚集起来建造高台，宋国百姓都非难国君，但宋国的忠臣却不能掩盖国君的过失。子罕放弃做相而去当主管木土建筑的司空，百姓也都非难他。齐桓公宫中建有九市，宫女多达七百多人，国人都非难他，管仲为此遣还了很多女子回家，以掩盖桓公的过失。所以说，大臣得到赞誉之语，不是国家的美德。”周文君听后，遂不问此事了。

到了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国大将摎伐韩取得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四万，又伐赵取得二十多县，斩首九万。这时东方各国又发动合纵抗秦的运动。秦国大败韩、赵，使西周君非常恐慌，他背弃与秦的盟约，参与了合纵抗秦的行动，会同各国统帅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企图截断秦通向阳城的后路。秦将摎便向西周发动进攻，西周君被

迫把三十六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秦国灭掉西周后，把西周文君迁到惪（dàn 但）狐（今河南洛阳南）。这一年赧王死，周朝算正式结束。公元前 249 年，秦庄襄王任用吕不韦为相国，继续进行兼并战争，把东周也灭了。整个周代，经历西周东周共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秦国灭东周后，继续出兵攻韩，取得韩的成皋、荥阳，连同原先的西周和东周的故土，合建成三川郡。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吕氏春秋》
《战国策·东周策》
《史记·周本纪》

秦并巴蜀

巴、蜀是上古时代地处今四川省境内的两个重要诸侯国家。

巴约有今四川东部沿长江南北之地，北至剑阁，西边沿嘉陵江流域阆中、南充等地与蜀交界，西南沿长江流域至合江、泸州、宜宾一带，东到万县、云阳与楚交界。蜀国约有今四川中部岷江、沱江、涪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南边、西边和巴国接壤，北至今甘肃的文县与秦接界，西到今邛崃山一带。这里说的是较固定的地域范围，但巴蜀地域不大固定。

巴、蜀之地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是很富庶的地方，号称“天府”。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地盛产五谷、桑麻、鱼、盐、铜、铁、丹漆等，六畜有马、牛、羊、鸡、犬、豕。蜀地有璧、玉、银、铁、犀、象、桑、漆、麻之饶，有山林泽渔之富，一年四季有各种蔬菜瓜果。《汉书·地理志》、《史记·货殖列传》也都有相似的记载。

巴、蜀两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由来悠久。相传周以前，巴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廪君为著名首领，后向川东扩展，武王克殷商后，封巴为子国，称巴子国。巴国成为周朝南土的封国，国君为姬姓。巴的人民被称为南蛮，与国君可能不属于同一民族。蜀国则为历史久远的少数民族所建。传说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了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巴、蜀均曾随周武王伐纣。西周时期，巴、蜀皆属周王朝管辖，周对巴蜀封官职。“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战

国时巴也称王。开明氏为蜀王传了十二世，到第十二世时为秦所灭。《华阳国志》、《蜀王本纪》都说约在战国前期，蜀“徙治成都”，在成都定都城。战国时巴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州）、平都（今丰都）、阆中（今属四川）定过都。

战国时巴、蜀两国都早已进入奴隶社会。考古资料表明，它们和中原地区文化有密切关系，并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又有自身的地方特色。1959 年在彭县竹瓦街出土的一批青铜器，1956 年在成都发现的西周土台遗址和在广汉中兴公社出土的一批玉器，同中原地区的殷周青铜器、礼器纹饰、形制相似，这说明巴蜀文化前身与中原文化已有密切关系。1972 年在涪陵小田溪发现巴蜀文化遗址，出土铜器种类繁多，有编钟、錞于、铜壶、钲、罍、甑、戈、矛、剑、弩机等，纹饰、形制只有剑尚有巴蜀铜兵器的特点，其他与秦楚相似。巴蜀铜兵器出土很多，类别有戈、矛、钺、剑等，巴蜀铜兵器很有地方特色，如剑的形制为柳叶形、扁茎、无首、柄内有两穿。成都罗家碾和峨符溪出土的器物中有带铜鞘的双剑，有学者认为是文献记载过的用以掷击的飞剑，是有道理的。戈、矛的纹饰也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巴蜀地区有一种葬俗，即船棺葬，时代属战国时期或稍后，分布地区相当广。凡是船棺葬就随葬巴蜀铜兵器。这是少数民族的葬俗，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和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现过类似的船棺葬。1965 年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发掘一件嵌错赏功宴乐铜壶，壶腹有银图案四层，内容有采桑、狩猎、宴乐、后边蹈、击磬、水战、陆战攻城等图像，内容和风格与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鉴和宴乐铜壶基本相同。另外，巴蜀文化青铜器多有特殊文字的铭文，一般称为巴蜀文字。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有的符形与铜兵器上的铸文相同；另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为了方便，学术界把前者称作巴蜀文字甲，后者叫做巴蜀文字乙。两者目前都尚未解读。但从文字结构考察，巴蜀文字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

段，而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字。以上这些都反映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两国与华夏国家接触更加频繁。巴与华夏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与楚国的关系，有时与楚联合，有时为楚附庸，有时与楚通婚姻。巴内部曾有内乱，向楚国求救，楚国出兵帮助巴平定内乱。巴本来是较强大的，战国中期，还曾与蜀联合伐楚。此后逐渐衰弱，连长期作为其政治中心的今四川重庆一带都放弃了，退居到北方的阆中。蜀和周围国家有战争，但主要是和秦国的关系，有时对秦发动战争，如春秋时大举攻秦，兵至雍（今陕西凤翔），有时对秦纳贡，奉秦为盟主，如周显王时（前368—前321），蜀王曾与秦惠王遇于打猎的山谷之中，秦惠王赠给蜀王黄金一笥（sì，一种盛饭食或衣物的竹器），蜀王回赠一种珍奇的玩物给秦惠王。秦惠王回国后，再看蜀王所赠的东西却变成了一堆土块儿，非常愤怒。群臣却对惠王贺喜道："大王，这是上天赐予您的啊！您将要得到蜀国的大片土地了。"惠王听后，转怒为喜，极为高兴，于是让石匠造了五头石牛，说石牛能屎金，以诱骗蜀王。蜀王听到此事后，派使臣到秦国，请求将石牛送给蜀国。惠王答应了，于是派人护送石牛到蜀国。蜀王见石牛不能屎金，极为气愤，嘲笑秦国人，说他们是东方牧犊儿。秦惠王听说后笑道："秦国虽为牧犊儿国，但能得到蜀国的土地啊！"另外，周显王二十二年（前347），蜀王出使秦国，秦惠王听说蜀王贪图美色，因此赠给蜀王美女五人。蜀王派人到秦迎回这五个美女，不料，这些人走到半途的时候，被山崩压死。蜀王得知后非常痛心，特建造"思妻台"，以表示悼念之情。

蜀和巴的关系常不好，长期为仇。巴退居北方以后，蜀国的势力向东发展，与巴连年交战。蜀王曾封其弟于汉中，号苴（jū）侯，其封邑在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苴侯与巴王友好，蜀王对苴侯与巴相好很生气，于是蜀王伐苴，苴侯出奔到巴国，向秦国

求救。这次蜀王和苴侯的战争就是秦国君臣所议论的蜀有“桀纣之乱”。

自从公孙衍合纵失败以后，秦、齐两大国又开始各谋兼并土地。秦国自从秦惠王即位以来，进一步图谋对外扩展，建立“王业”。在蜀王与苴侯发生战争之前，秦惠王就曾与群臣商议，准备派兵征伐楚国，而不打算进攻地处西僻之地、与戎狄为邻的蜀国。但是，中尉司马错坚决反对，他说：“蜀国为富饶之地，得到蜀国的布帛金银充实军队，军队就强大。如果进攻楚国，就必须走水路，乘大舶船而东才能到达楚地。但如果得到蜀国，进攻楚国就容易得多了。”惠王认为极是。这时，苴侯向秦国告急，惠王想趁机派兵伐蜀，恰巧此时韩国攻秦，惠王又想先打韩国，对韩国取得胜利以后再征伐蜀国；虽然伐蜀是个好机会，但又恐怕韩国趁机攻秦，犹豫不决。于是惠王召集群臣商议。

司马错和张仪代表两种不同的意见激烈争论，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伐韩。惠王让他们说说各自的道理。

张仪说：“亲近魏国，友善楚国，进兵三川（韩三川郡，今河南宜阳一带），堵塞韩国的退路，使魏国绝南阳（在今太行山南，黄河以北），楚国临南郑（今属河南），秦国攻新城（今河南密县）、宜阳（今属河南），兵临东周西周。然后，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王必定知无救，而献九鼎宝器，这样，就可以造成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形势，诸侯谁敢不听，这能成就帝王的事业。而蜀因为西僻之国，戎狄之长，如果兴师动众，诛伐蜀国，不足以成就帝王的事业，得到蜀地，不足以获得多少好处。所谓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三川、周王室就是当今天下都想争夺的朝市，不争这里而去争偏远的巴蜀戎狄，这就离帝王的事业远了。”

司马错反对攻韩挟天子的方案，他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要富国就要扩大土地，要强兵就要富民，要成王业就要广施恩德。如果这三者都拥有了，那么王业就能成功。今天秦国还是地狭民

贫，蜀是西僻之国，是西边戎狄的首领，现在蜀又有'桀纣之乱'，秦现在趁机发兵，容易征服。得到了蜀的地方，秦国国土扩大多了，得到巴蜀的财富，秦国军民富足多了。攻取巴蜀，天下并不认为秦国残暴，也不认为秦国贪，这样一举数得，又能使秦国得到禁暴正乱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今天攻打韩国，劫持天下，有不义之名。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的友好国。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失三川，两国就会紧密联合，向齐、赵、楚、魏求救。九鼎给楚国，土地给魏国，秦国是阻止不了的。总之，伐周、韩对秦国是很大的危险，不如伐蜀有利。"

秦惠王最后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决定派司马错等人率军伐蜀。

秦惠王更元九年（前316），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带领秦兵从石牛道① 征伐蜀国。蜀王亲自率兵到葭萌抵御秦国军队，失败后逃走至武阳，为秦国所杀。蜀相及太子退到逢乡，死于白鹿山，蜀国灭亡。灭蜀后，张仪铸造一高鼎，鼎上刻有铭文"定蜀"二字。随后，司马错、张仪等人又率秦军攻灭了苴国和巴国，把巴王捉了回去。这年，秦国设置巴郡。

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惠王封蜀公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三年，秦国又设蜀郡。

秦国兼并巴、蜀以后，由于少数族的统治者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秦采用了羁縻政策，统治巴蜀之地。秦国虽然在进行攻伐时杀了蜀王，俘虏了巴王，仍改封蜀王子弟为"侯"，改封巴国的原来统治者为"君长"。在设置巴郡、蜀郡的同时，也还继续保留蜀为属国，并且派遣相和蜀国守。但是，蜀还不断发生叛乱。周赧王三年（前311），丹犁族臣降于蜀侯，陈壮反秦，杀蜀侯通国。丹犁是蜀西南的部族，这时臣服于蜀侯，说明蜀侯还

① 石牛道：古道路名，又称金牛道，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入四川，经朝天驿趋剑门关，是古代联系汉中和巴蜀的交通要道。

在扩大其势力。蜀相陈壮把蜀侯杀死，该是与蜀侯发生冲突的结果。次年，秦武王为了安定蜀地，派遣庶长[1]甘茂、张仪、司马错征伐蜀，杀死陈壮，又讨伐了丹犁。七年，秦武王又封子辉为蜀侯。十四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率领秦兵入蜀，迫使蜀侯子辉自杀。蜀人将子辉埋葬于成都城外。次年，秦昭王又封子辉的儿子绾为蜀侯。秦昭王听说子辉本来没有罪，是冤枉屈死的，因此派遣使者到蜀地，将子辉的坟迁到成都城内。三十年，秦怀疑蜀侯绾反叛，把他杀死。从此，秦只派张若为蜀守，设置蜀郡了。秦先后杀死了三个蜀侯，才巩固了对蜀的统治。

秦灭巴蜀后，积极加以经营。周赧王五年（前310），张仪和张若设计在成都筑城，筑有大城和少城，少城连接在大城的西边。少城内设有馆舍，并有盐铁市官及长丞。全城里閭和市肆的布局同秦都城咸阳规模一样。此外，张若也曾在郫（今四川郫县）和临邛（今四川邛崃）筑城。秦还在巴蜀进行了封建性的改革，实行封建的征收赋税制度，规定巴族人民相当于不更爵位[2]，用土产的布和鸡羽纳赋。

自从废除蜀侯而设立蜀郡以后，秦在巴蜀采取发展经济的措施，对巴蜀的经营有进一步的发展。兴建都江堰（今四川灌县西北岷江中游）水利灌溉工程，就是秦国为促进巴蜀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公元前3世纪前，四川成都灌县一带几乎年年都要发大水。因为流经这里的岷江水从海拔3000至4000米的松潘县流出，沿途山多地狭，水流很急。汹涌的江水到灌县一带，忽然进入了一马平川，流速骤然减慢，水中夹带的泥沙石子沉积下来，淤塞了河床。每年夏秋之间，雨水较多，江水暴涨，又不通畅，水溢出两

---

① 庶长：官爵名。春秋时秦国设置，掌握军政大权，相当其他各国的卿。

② 不更爵：秦国二十等爵的第四级。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整理了秦过去的爵制，制定了以军功为基础的二十等爵。

1市尺，人们一看就可以知道岷江水位高低。

都江堰的建成，不仅消除了岷江水患，而且方便航行和灌溉。由于水流平稳，江上船只可以自由航行，岷山出产的梓、柏、大竹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出四川，促进了岷山的开发。都江堰还灌溉了13个县的农田，大大提高了稻谷产量，使成都平原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人称之为“天府”之国。

李冰在四川除兴建都江堰以外，还曾凿开溷崖（今四川夹江境内），疏通沫水（今大渡河），又曾疏通文井江（今四川崇庆西河）、绵水（今绵远河）等；还在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镇一带）开始开凿井盐，使四川人民得到不少好处。李冰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也一直怀念他。四川人民尊李冰为“川祖”，并在都江堰边建成了一座“二王庙”，里面有李冰父子的塑像，人们常到那里瞻仰参观，赞扬李冰的功绩。

秦国在经营巴蜀地区的同时，又谋划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周赧王三十年（前285）蜀郡守张若攻取了笮及其江南地区（今金沙江以南地区）。

秦攻占巴蜀以后，对楚国的进攻处于有利的地位，军队从蜀的中心地带乘船而下，一日可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很大的劳苦，不要十天就可以到扞关（今四川奉节东），扞关惊恐，再从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往东，尽得防守，黔中（治设今湖南沅陵）、巫郡（治设今四川巫山）就很容易为秦占有。秦国以威胁的口吻对楚国扬言：“蜀地的兵甲，从岷江坐船，如在夏天长江水盛涨时顺江而下，五天就可以到郢（今湖北江陵）。江中的兵甲，乘舟出于巴，水涨时下江，四天可以到五渚（今汉江下游）。”可见，秦占巴蜀以后，对七国中的大国——楚国，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周赧王七年（前308），秦派司成错率领十万军队，载米六百万斛，从巴国的涪水，乘船沿江而下，攻取楚的商于（今丹江中下游一带）之地，建立黔中郡，

并迫使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给秦国。

攻占巴蜀对秦国的富强有很大的意义，司马错论述当时伐蜀和伐韩的利害是正确的。经过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国内奋发图强，对外积极向山东发展。但是，秦国的国力还有弱点，和山东各国争霸还缺乏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楚国相比，秦国的土地比楚国小，人口比楚国少，虽然关中富饶，但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还比不上楚国。兼并巴蜀以后，秦国的地位大为改善，后方更扩大更巩固了，秦国的人力物力雄厚多了。因此，秦灭巴、蜀，对于秦国日后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华阳国志》

燕王哙让国

在中国古代，为争夺权位，兄弟反目、君臣相篡的事件屡见不鲜。然而，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燕国的国王哙拱手将王位让给了大臣子之，可说是千古绝唱。

周显王八年（前361），燕桓公传位给文公，后文公传给易王。易王初立时齐国乘文公死攻燕，夺取了十座城池。苏秦说服齐宣王，让齐国归还了十座城池。易王死，燕王哙继位。

苏秦的弟弟苏代看到哥哥取得了成就①，也想学着哥哥合纵诸侯的样子，奔波于齐、赵、韩、魏、燕等国之间，组织合纵攻齐伐秦。为此，他到了燕国，求见燕王，说道："我本是东周的一个乡野之人，私下听说大王的义气很高，鄙人很愚笨，放下农具来冒犯大王。我去到赵国都城邯郸后，所看到的情况比我在东周所听到的相差很远，我暗暗地立下为您做一番事业的志愿。等到来到燕国的朝廷，看了大王的群臣和下属官吏，给我们印象是：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君主。"

燕王反问道："你听说的贤明君主是怎么样呢？"苏代回答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务必要听到人们议论自己的过失，不希望听到人们夸赞自己的优点。我请求您允许我指出您的过失。"苏代接着

---

① 苏秦（？一前284年）：一生主要谋求燕国的强大，同时奔波于齐、赵、魏等国之间，组织合纵攻齐伐秦。他的策略是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从而牵制齐的力量，转移齐对燕的视线，以防止齐国吞并燕国。齐湣王时任他为齐相，赵封他为武安君。

说道："齐国和赵国，是燕国的仇敌；楚国和魏国，是燕国的盟友。现在大王拥护仇敌去攻打盟友，这不是利于燕国的行为。大王自己若是想一想，就会认识到这是策略上的失误。不把这种失误向您说明的人，就不是忠臣。"

燕王说："齐国本来是我的仇敌，是我要讨伐的国家。只是由于我担心自己的国势较弱，力量不够，才没有行动呢。你能凭借燕国现有的力量讨伐齐国，那么我愿将整个国家委托给你。"

苏代没有正面答应燕王，他又接着说道："天下足以互相征战的国家共七个，燕国处于弱小的地位。单独作战就不行；如果有所依附，那么不管依附谁，谁都没有不因此而提高地位的。向南依附楚，楚国地位就会提高；向西依附秦国，秦国地位就会提高。中部依附韩、魏，韩、魏地位就会提高。如果燕国所依附的国家提高了地位，这就一定使大王的地位也跟着提高啦。现在齐国的君主年事甚高又一意孤行，连续向南攻打楚国，长达五年之久，积蓄的财富耗费尽了；向西困扰秦国达三年，士兵们疲惫不堪；向北跟燕国交战，覆没了全部军队，仅仅俘虏了两名敌军将领。然后用它剩余的兵力向南攻破拥有五千辆兵车的宋国，并慑服十二小国。可见这样的国君一心想要侵略，以致他的百姓力量枯竭，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况且我听说过，连续作战，人民就劳累，长期用兵，士兵就疲惫。"

燕王说："我听说齐国有清济和浊河便于固守；长城、巨防足够作为要塞，果真有这些吗？"苏代回答道："天时不给它有利的机会，虽然有清济、浊河，哪里能够固守！人民的力量疲惫了，虽然有长城、巨防，哪能够作为要塞！况且，从前济西地区不征发兵役，是为了防备赵国；河北地区不征发兵役，是为了防备燕国。现在济西、河北一带都已经征发兵役，全国范围都疲惫不堪了。骄横的君主一定好利；亡国的臣子一定贪财。大王如果能够不因为用爱子胞弟去做人质而感到羞愧，用珍珠、宝玉、绸绢去贿赂齐

王的亲信，齐王就会友好地对待燕国，并轻易地去攻灭宋国；那么齐国就可以灭掉了。”燕王说：“我终于靠着你而得以承受上天的旨意了。”于是，燕王决定派遣一个公子到齐国去做人质。

有个名叫陈翠的人也向燕王建议，说为了与齐国联合，燕国要派公子为人质去齐国，以表示燕国的诚意。太后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怒，对燕王说：“陈公老心里不想着怎样使燕国强盛起来，只想着拆散我们母子，老妇定和他没完！”陈翠听说后想当面向太后解释，燕王对他说：“太后正在气头上，你不要去。”陈翠说：“没关系。”于是去见太后。他对太后说：“如果国君爱他的儿子，还不如老百姓那样爱得深的话，那么国君并不是不爱他的儿子。”太后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原因？”陈翠说：“太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诸侯，奉以千金，赠地百里，也就到头了。现在大王想封自己的儿子，但是，朝廷的百官都尽职效力，群臣都效忠为国，他们会说：‘公子没有建立什么功勋，不应该受封。’如今大王把公子派到齐国做人质，就是想让公子为国家做些事，日后好封受公子。况且，太后和大王如今还健在，所以公子能备受宠爱。如果太后和大王千秋以后，太子即位，公子就会比百姓的地位还低，就不会受到宠爱了。因此，如果太后和大王在世时不封公子，那么公子终身就会得不到受封啦！”太后听后说道：“老妇不知道你的苦心，好，我答应了。”于是替公子准备好了车子和衣服，送到齐国去做人质。

燕王派苏代到齐国去服侍那位做人质的公子。苏代到了齐国，想拜见齐宣王，宣王不见。苏代对淳于髡说：“有个要出卖骏马的人，接连三天呆在市上，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去见相马的专家伯乐说：‘我有匹好马要卖掉它，接连三天呆在市上，没有人来过问过。希望您给帮帮忙，去围着我的马转个圈儿看看它，临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它一眼，我愿意奉送给您一天的花费。’伯乐接受了这个请求，就去围着马转圈儿看了一看，临走的时候又恋恋不

舍地回头看了一眼。这匹马的价钱立刻暴涨了十倍。今天我自喻为骏马推荐给大王，您是否有意做我的伯乐呢？我请求献给您白璧一双，黄金千镒，以作为骏马的饲料。”淳于髡说：“我会把你推荐给齐王的。”之后，齐王召见了苏代，对他非常赏识，让苏代做了齐国的臣子。

燕王哙三年（前318），燕国跟楚国和韩、赵、魏三国攻打秦国，不胜而回。子之当了燕国的国相。子之为相国时，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有一次，子之召集群臣在庭院中开会，只见一人牵着一匹黑马从门前走过，子之问左右的群臣：“刚才我看见一匹白马从门外走过，是不是真的？”子之旁边的群臣都说没看见，只有一个人跑出门外看了看，回来对子之奉承说：“报告相国，是一匹白马。”子之通过这件事，来观察左右群臣是否讲真话，是否对朝廷效忠，可见他很讲究督责臣下之术。燕王哙很看重子之，对他很赏识和重用。子之也因此位尊权重，主決国事。

子之和苏代很要好，子之想取得燕国的政权，就让苏代去说服燕王。这时候，齐国因燕国派公子到齐为人质的事情，派苏代回报燕国。子之正好抓住这个机会，让苏代去拜见燕王哙。燕王哙问苏代道：“齐宣王大概要称霸了吧？”苏代说：“不可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苏代说：“齐宣王不信任他的臣子。”苏代是想用这个办法激发燕王更加重用子之，燕王果然更加信任子之。子之送百金给苏代作为报答。

鹿毛寿对燕王说：“不如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人们之所以说尧是贤人，是因为他把君位让给许由，许由没有接受。他有了让君位的名声，而实际上并未失去君位。如今大王能以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表明大王同尧有相同的美名。”燕王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把王位让给了子之。

又有人对燕王说：“禹推举益接他的王位，随即任用启的亲信做官吏。到了年老时，禹认为启是不能胜任王位的人，把君位传

给了益。启跟他的党羽攻打益，夺取了王位。天下人说禹名义上把王位传给了益，实际上不久就让启自己夺去了。如今大王说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而官吏却没有哪个不是太子平的亲信。这是名义上把国托付给子之，而实际上由太子当权。”燕王果然把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官印交给了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国王的职权。燕王哙年老不处理政事，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事全由子之决定。

但是，燕国朝廷大臣都是贵族（即所谓“太子之人”），而子之所提拔的官吏（即所谓“子之之人”）只是些小官吏。这时燕王哙把三百石俸禄以上大官的官印全部收回，另由子之任命。燕王哙又因年老不再过问政事。从此，国事皆决于子之，这对以太子平为首的贵族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朝廷官员都对子之不满。

公元前 314 年，子之当权为王的第三年，国中大乱，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将要攻打子之。这时，齐国的大臣劝说齐宣王乘燕国大乱之机进攻燕。齐宣王又派人对太子平说：“我知道太子深明大义，将要废弃私情，树立公义，整顿君臣大义，明确父子的地位。我们国家小，不够做您的先锋和后卫，虽然如此，却希望按照太子的命令行事。”齐国想笼络太子平，乘机进兵燕国。太子平没有听齐宣王的话。太子聚集他的党羽，命令将军市被包围公宫，攻打子之，连攻几个月没有成功。将军市被和百官转过来攻打太子平。市被和太子平最后被子之杀死，尸体被用来示众。燕国大乱，在几个月里，死了几万人，百姓惊恐。

孟轲认为这时是伐燕的大好时机，他对齐宣王说：“现在征讨燕国，是周文王、武王当年那种时机，不可失去呀！”齐宣王于是派将军匡章率领临淄等王都的兵马和齐国北部的丁壮伐燕。燕国处于乱中，齐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燕国国都，仅五个月齐军就占领燕国大片土地。齐军擒子之，剁为肉酱，又杀了燕王哙。

齐军在燕国占领达三年之久，由于齐军对燕国的蹂躏，引起

了燕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再加上各国对齐国的干涉，公元前 312 年，齐军被迫撤出燕国。这次燕国内乱和齐、中山的占领，对燕国是很大的打击，国家受到很大损失。

公元前 312 年，赵武灵王护送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公子职回国即位，是为燕昭王。

燕王哙“禅让”王位的事，是具有封建的政治改革性质的。燕王想通过禅让的办法来确立地主政权和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但没有成功。不过子之在平定太子平等人发动的贵族叛乱中，取得大胜，杀死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狠狠地打击了燕国贵族势力。接着齐宣王勾结燕国贵族进行武装干涉，而在燕国人民群众强烈反抗下被迫退兵，这又磨砺了广大人民的斗志。这样就为后来燕昭王奋发图强，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最终大败齐国扫清了道路。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燕世家》、《苏秦列传》。

《战国策·燕策》

樗里疾甘茂相秦

到了战国后期，华夏一统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各国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不得不重用那些士人，以图富国强兵。有些士人便借这样的机会，巧舌如簧，左右逢源，游说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甚至影响着一国的政治命运。樗里疾和甘茂就是其中较为有影响的二人。

樗里疾，名叫嬴疾，因居于樗里（一作楮里），又称樗里子。他是秦惠王的弟弟，与惠王同父异母。他的母亲是韩国的女子。樗里疾能言善辩，足智多谋，秦国人称他为“智囊”。

秦惠王八年（前330），惠王赐给樗里子右更的爵位①，让他带兵攻打魏国的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他把那里的人民全部赶走，夺取了那里的城池，土地归属秦国。公元前328年，秦惠王起用张仪为相②。张仪采取联合韩魏的连横策略，对外进行扩展土地的战争，从面使秦国占有河西、上郡，并在河东占有部分土地，在河南占有陕等地，秦国的声威震动一时。

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伐秦。次年，秦派樗里疾和三晋联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交战，把三晋联军打得大败。

秦惠王二十五年（前313），秦国派樗里疾担任将领，率领秦

---

① 右更：战国时秦国商鞅制定的二十等爵的第十四级，地位相当于卿，有食邑。
② 是年：秦始置相邦，张仪为之。

军乘中原各国因为齐国攻破燕国，纷纷图谋“伐齐存燕”的时机，攻取了赵国的蔺邑（今山西离石西），取得大胜，俘虏了赵将赵庄。次年，他协助魏章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国的将领屈丐，夺取了汉中（今陕西南部、湖北北部）。在这次战役中，秦国取得的楚地汉中，使秦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从此排除了楚国对于秦本土的威胁，秦国因而更为强盛起来。樗里疾因战功显赫，被封号为严君。

由于樗里疾地位的不断提高，秦相张仪觉得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因此陷害樗里疾。他让楚怀王请求秦惠王封樗里疾为相，然后又在秦惠王面前诽谤樗里疾说：“您听从楚王的建议，封樗里疾为秦相，这样可以使秦、楚两国结交。樗里疾曾对楚怀王说：‘我们秦王是想让张仪一辈子都在秦国为相了，我想为大王出力’。楚王听了樗里疾这些话，认为很对，因此请求大王封他为秦相。大王如果真的听了楚王的建议，樗里疾一定感激楚国，为楚国卖命。”秦惠王听了张仪一番话，勃然大怒，非常憎恨樗里疾。樗里疾害怕被杀，就出走了。

公元前 310 年秦惠王去世，太子武王登位。公孙衍想驱逐张仪。李仇对公孙衍说：“您不如进谏大王召回在魏国的甘茂，在韩国的公孙显，重新重用出奔在外的樗里疾，这三个人都和张仪有仇。大王如果重用了这三个人，那么天下诸侯就会知道张仪在秦国不再受到重用了。”公孙衍听从了李仇的建议，向武王进言召回这三个人。武王果然听了，驱逐了张仪和魏章，用樗里疾和甘茂担任左右丞相。

不久，秦武王让甘茂进攻韩国，打下了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让樗里疾带着百辆战车进人周都。周王派了士兵迎接他，态度很恭敬。楚怀王听说后发怒，责备周王为什么尊重秦国来的客人。游腾替周王劝说楚怀王道：“过去知伯攻打仇犹时，送给它大车，趁机把军队跟在后面，仇犹于是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防备的缘故。齐桓公攻打蔡国时，名义上是讨伐楚国，其实是

袭击蔡国。现在，秦是一个像虎狼一样的国家，让樗里疾带着百辆兵车进入周都，周王以仇犹和蔡国作为借鉴，所以让扛长戟的士兵走在前面，发射强弩的士兵跟在后面，名义上说是护卫嬴疾，其实是囚禁他。周王难道能够不担心自己国家的安全么？怕的是一旦亡了国便会让大王感到忧伤。"楚王这才高兴，不过问这件事了。

公元前 307 前，秦武王因举鼎折断胫骨而死。因为他没有儿子，诸弟争夺君位。秦国这场争夺君位的内乱，持续有三年之久，最后由芈八子（楚国贵族出身，后称宣太后）和她的异父长弟魏冉（后封穰侯）拥立被赵、燕两国护送回来的公子稷（秦武王异母弟，芈八子之子）即位，即秦昭王。

秦昭王即位后更加尊重樗里疾。

昭王元年（前 306），樗里疾将要进攻卫国的蒲邑（今河南长垣），蒲邑长官恐惧，求计于卫国大臣胡衍。胡衍为了蒲邑的事向樗里疾说道："您进攻蒲邑，是为了秦国，还是为了魏国？为了魏就好，为了秦国就不算有利了。卫国之所以会作为卫国而存在，就是靠着有蒲邑。现在您进攻蒲邑，迫使蒲邑投靠魏国，卫国也一定会投靠魏国。从前魏国失去了西河以外的土地而无法夺回的原因在于兵力薄弱。现在让卫国并入魏国，魏国一定会变得强盛起来。魏国强盛起来的时候，西河以外的地方就危险了。况且秦王要观察您的行为，贻害于秦而有利于魏，秦王一定会加罪于您。"樗里疾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胡衍答道："您放弃蒲邑不去进攻，我试着替您进蒲邑去说说这件事，从而施恩于卫君。"樗里疾说："好。"胡衍进入蒲邑，对那位长官说："樗里疾已经了解蒲邑的弱点了，他传出的话说：'一定要攻下蒲邑！'但我能让他放弃蒲邑不予进攻。"蒲邑的长官害怕了，急忙接连两次向胡衍下拜，说道："我希望就这件事求救于您。"于是献出黄金三百斤，说道："秦军如果撤退，请允许我一定把您的功劳告诉卫君，让您受到我

们国家的最高礼遇。”胡衍在蒲邑接受了黄金，劝说樗里疾放弃蒲邑走了。樗里疾撤军后又回头攻打皮氏（在今山西河津西）；皮氏没有降服，他又率军离开了。

秦昭王七年（前 300），樗里疾去世，葬在渭南章台（秦国离宫台名，在今陕西西安西北）的东面。他临终前说：“百年以后，这里会有天子的宫殿把我的坟墓夹在中间。”到汉朝建立以后，长乐宫建在他墓地的东边，未央宫建在他墓地的西边，武库对着他的坟墓。秦国人有句俗话说：“力气最大要算秦武王时的力士任鄙，智慧最高要算樗里了”。

甘茂是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侍奉下蔡史举先生，学习百家的学说。他通过张仪和樗里子的关系拜见了秦惠王。惠王一见到他就很喜欢，让他带兵，协助魏章夺取并平定了汉中地区。

惠王去世，武王登位。张仪、魏章被驱逐出秦国，往东到了魏国。公元前 311 年，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反叛。次年，秦武王为了安定蜀地，派甘茂去平定蜀国。甘茂率军伐蜀。杀死陈壮，讨伐丹犁，取得胜利。他从蜀国回来后，秦武王拜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

秦武王很喜欢公孙衍，曾对他说：“寡人想要拜你为相。”不料，这些话传到甘茂耳朵里。于是甘茂去拜见武王，问道：“大王得到贤相，我特来贺喜。”武王问：“寡人拜你为相，哪里又有什么贤相呢？”甘茂答道：“大王想拜公孙衍为相。”武王问：“你从哪里听到的？”甘茂答道：“公孙衍告诉我的。”武王听后非常气愤，责难公孙衍泄露了这件事，于是就把他驱逐出秦国。

有一天，秦王对甘茂说：“楚国来的使臣多善于强辩，他们和寡人争论，寡人都说不过他们。该怎么办呢？”甘茂回答道：“大王不必担忧，以后如果楚使来的是善于词令的人，您就不听从他说的事；如果来的是不善强辩词令的人，您就听一听，这样，您就容易控制自己了。”

秦武王三年（前308），武王对甘茂说："我想要开辟一条御驾亲征的路线，通过三川（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因黄河、伊河、各河流经其境而得名）地区到周朝去看看；即使我死了，也算是不朽了。"甘茂说："请让我到魏国去，约它去攻打韩国，并请派向寿协助我前去。"甘茂到达魏国后，对向寿说："您回去，把事情对大王说：'魏国已经听从我的意见，但是我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韩国。'事情成功之后，全部算作您的功劳。"向寿回去，把甘茂的话转告秦王。武王亲自到息壤迎接甘茂。甘茂到达后，秦王问他希望不进攻韩国的缘故。他回答说："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是一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物资积蓄在那已经很久了，名义上叫做'县'，实际上是'郡'。现在大夫让我离开许多险要地带，走过千里路程去进攻它，这很难办。从前曾参住在费邑（今山东费县西北），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姓名的人杀了人，别人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还是织着布，神色镇定自如；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又来告诉她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还是织着布，神色仍然镇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了人。'他母亲丢下织梭，走下织机，越墙逃跑了。像曾参这样有德行的人，母亲对儿子又如此信任，可是因为有三个怀疑他杀人，结果使得慈母也对他怀疑起来。我现在的贤德不如曾参，大王相信我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相信曾参，怀疑我的不止三个人，我恐怕大王会中途像曾母投杼那样改变对我的信任。当初，张仪在西边兼并了巴蜀的土地，在北边开拓了西河以外的地方，在南边夺取了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天下人都没有称赞张仪，而是颂扬先王贤明。魏文侯让乐羊带兵攻打中山，经过三年，把中山攻下来了。乐羊回国以后论述战功，魏文侯把一小箱子毁谤乐羊的文书给他看。乐羊连连跪拜叩头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由于主上的英明'。现在我是一个寄居秦国的客卿。樗里疾、公孙衍两人凭着韩国有一定的实力，对进攻韩国的事提出反对意见，大王一

定会听从他们的话。这样，等于是大王欺骗了魏王，而我却要遭到韩相公孙侈的怨恨。”武王说：“我不会听信他们的话，请让我跟你订个盟约。”于是武王与甘茂在息壤立下了盟誓。

然后甘茂就还兵去攻打宜阳，打了五个月攻不下来，秦军死伤很重，甘茂想放弃进攻而收兵。有人劝他说，国内樗里疾、公孙衍反对你，国外韩侈等人反对你，今天如果失败，你就危险了；如果攻下了宜阳，你的功就大了。

这时樗里疾、公孙衍两人在秦武王面前说甘茂的坏话。武王相信了，便召甘茂回来，让他退兵。甘茂回来后对武王说：“息壤还在那儿，您忘了我们盟约吗？”武王说：“有那么回事。”于是又大规模地出动秦军，让甘茂进攻宜阳，甘茂亲自临战击鼓，决一死战，并发誓宜阳城就是他的坟墓。他请求增加兵力，秦国又派来大军，甘茂还拿出他的私金作为奖赏将士的钱，再一鼓作气，终于攻下宜阳。韩襄王让公仲侈到秦国请罪，跟秦国议和。

当甘茂攻打宜阳的时候，杨达曾对公孙衍说：“请求您允许我带五万秦兵，攻打西周；如果得胜，这个功劳就归甘茂了；如果不胜，就会遭到天下诸侯国的憎恨，韩国必定不会助秦攻打宜阳，那么甘茂就不能取胜了。”公孙衍不听。

楚王听到秦兵攻打宜阳，非常气愤，准备出兵救韩。秦武王听说后非常恐惧，冯章对秦王说：“现在我们正在攻打宜阳，楚是想乘秦国内部空虚之机，进攻秦国，这样秦国就危险了。您不如把楚的汉中归还楚国，以取得楚国的欢心，这样楚国就不会进攻秦国了。楚国不解韩国之危，韩国必危，宜阳就会容易被攻克了。”秦王说：“好。”然后派人去楚国告诉楚王这件事。后来秦武王忙于国内事情，就把归还汉中给楚国的事放下了。楚王等了很久，还不见秦国的使臣来，更加气愤，于是准备出兵救韩。武王听说后极为恐惧，甘茂听到这件事后，急忙写信给武王说：“楚国虽然与韩国联合，但楚国不会为了韩国而与秦国开战；韩国也害怕楚国

有什么变化，韩、楚两国定会相互制约。楚国虽宣称出兵救韩，但不愿得罪秦国，所以说，楚国救韩的决心是不大的。”武王听了甘茂的信，也就作罢了。

秦武王命甘茂攻取宜阳，实现了车通三川、窥视周室的愿望，从此秦国的领土就扩展到中原。

秦武王死后，秦昭王即位。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的女子。楚怀王怨恨从前秦国在丹阳打败了楚国而韩国不去援救，便派兵包围韩国的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韩国派公仲侈到秦国告急。秦昭王新登位，宣太后又是楚国人，不肯去救援。公仲侈托付甘茂，甘替韩国向秦昭王进言道：“公仲侈正因为有可能得到秦国的援救，所以才敢于抵御楚国。现在雍氏被围，秦军不肯下崤山（在今河南西部）去援救，公仲侈将会傲慢地抬起头不来朝见；公叔将会让韩国跟楚国联合。楚国、韩国成为一个整体，魏不敢不听从他们的旨意。这样，他们共同进攻秦国的形势就形成了。不知坐着等别人来进攻跟主动进攻别人哪个有利？”秦昭王说：“好。”便从崤山开出军队去援救韩国。楚军撤离了雍氏。

秦昭王让向寿平定宜阳，让樗里疾、甘茂进攻魏国的皮氏（今山西河津）。向寿是宣太后娘家的亲戚，跟昭王年少时就互相推重，所以受到任用。向寿前往楚国，楚听说秦国把向寿的地位抬得很高，因而优待向寿。向寿替秦国镇守宜阳，打算进攻韩。韩国公仲侈让苏代对向寿说：“禽兽在危困的时候，还可能冲撞颠覆人的车辆。您打败了韩国，侮辱了公仲侈；公仲侈收拾好国事再服侍秦国，自认为一定可以得到秦国的封赏。现在您把解口地方送给楚国，把杜阳（今陕西麟游西北）封给小令尹。秦、楚联合，再次进攻韩国，韩国必然灭亡了，公仲侈将亲自率领他自己的部属来跟秦国对抗。希望您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向寿说：“我联合秦、楚两国，不是用来跟韩国作对，您可以替我把这个意图告诉公仲侈，说秦国和韩国的外交关系可以搞

好。”

苏代说：“我愿意向您有所申述。人们说，珍重自己所以受到别人尊重的地方，将使自己更加受到尊重。秦王宠爱和亲近您，比不上公孙衍；秦王相信您的聪明能干，比不上甘茂。现在他们两人都没有亲身参与秦国的大事，而您却独能跟秦王一道主持和决断国事，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丧失信任是有原因的：公孙衍跟韩国勾搭，而甘茂同魏国勾搭，所以秦王不信任他们。现在秦国和楚国争强，而您跟楚国勾搭，这跟公孙衍和甘茂是走的同一条路，您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人们都说楚国是善于改变外交策略的，您一定会葬送在它手里，这是您自讨苦吃呢。您不如跟秦王商量着对付楚国的反复多变，跟韩国亲善，以防备楚国，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祸患了。韩王一定会先把国家大事听从公孙衍，然后把国家命运托付甘茂。韩国是您的仇敌。现在您提议跟韩国亲善，以防备楚国，这是在争取盟国时不排除自己的仇敌。”向寿说：“对。我很想要跟韩国合作。”

苏代回答说：“甘茂答应公仲侈把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归还韩国，让宜阳的人民返回家园。现在您想要空口结交韩国，十分难办。”向寿说：“既然如此，那么该怎么办呢？武遂终究不能得到了？”苏代回答说：“您为什么不倚仗秦国的声威替韩国向楚国索还颍川？这里是韩国的根据地呢。您向楚国提出要求而让韩国得到了它，这是您的命令在楚国得到实行，并用那块地方赢得了韩国的悦服。您向楚国提出要求，而韩国仍然得不到它，这样韩、楚两国间的怨恨不能消除，就会交相奔走于秦国。秦、楚两国争强，您从而慢慢谴责楚国，借以拉拢韩国，这是有利于秦国的。”向寿说：“该怎么办呢？”苏代回答说：“这是件好事。甘茂想要借助魏国去进攻齐国，公孙衍想要借助韩国去进攻齐国。现在您取得了宜阳，建立了功勋；又联络了楚国和韩国，并安抚了他们；进而声讨齐国和魏国的罪过，因此公孙衍和甘茂就无所作

为了。”

甘茂终于向秦昭王进言，把武遂再还给韩国。向寿、公孙衍反对这件事，没有达到目的。从此，两人怀恨甘茂，在秦昭王面前说甘茂的坏话。甘茂害怕，停止进攻魏国的皮氏而逃走。樗里疾跟魏国讲了和，退了兵。

甘茂逃离秦国投奔齐国，遇着了苏代。苏代准备替齐国出使到秦国。甘茂对他说：“我在秦国犯了罪，感到害怕，逃到这来，无容身之地。我听说有个穷人的女儿跟富人的女儿一同绩麻，穷人的女儿说：‘我没法子买蜡烛，您的蜡烛的光亮幸而有余，您可以分给我一点剩余的光亮，对您自己的照明没有损害，而我却能同样得到这种方便’。现在我陷入了困境，而您正要出使秦国，而且当权了。我的妻子儿女在那里，希望您用一点剩余的力量拯救他们。”苏代应允了。他到秦国完成了使命。过后，趁机劝说秦昭王道：“甘茂不是一个普通的士人呢。他留在秦国，连续几代被重用。从崤山要塞直到鬼谷（今陕西淳化东），那里地形的险阻和平坦他都清楚地了解。他凭借齐国的力量，联合韩、魏，反过来算计秦国，这不是秦国好事。”秦昭王说：“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苏代说：“大王您不如加重送给甘茂的礼物，提高他的俸禄，去迎接他回来。假使他回来，就把他安顿在鬼谷，终身不让他回来。”秦王说：“好。”便赐给甘茂上卿的官位，并叫人带着官印到齐国去迎接他。甘茂不肯去。

苏代回到齐国，对齐闵王说：“甘茂是一个贤能的人。现在秦国赐给他上卿官位，并带着官印来迎接他。甘茂感激大王的赏赐，乐意做大王的臣子，所以推辞不回秦国。现在大王准备用怎样的礼节来款待他呢？”齐闵王说：“好。”便安排甘茂上卿的官位，以期把甘茂留下来。秦国便免除了甘茂家里的赋税和徭役，用以同齐国争着收买甘茂的心。

齐国让甘茂出使楚，楚怀王刚刚同秦国通了婚姻，楚、秦两

国关系很亲密。秦国听说甘茂到了楚国，派人对楚王说："希望送甘茂到秦国来。"楚王向范蜎回答说："我没有辨别丞相的能力。"楚怀王说："我想让甘茂回去做丞相，可以吗？"范蜎回答说："不可以。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他大而言之不为国君，小而言之不为家室，以苟且、卑贱和不廉洁传闻于世，而甘茂却肯顺从地去服侍他。所以，像秦惠王的精明，秦武王的洞察，张仪的雄辩，甘茂服侍他们，谋取上十个官职而没有什么过失。甘茂确实是一个贤能的人，然而不能让他去秦国做丞相。秦国有贤能的丞相，不是楚国的好事。况且大王以前曾经让召滑在越国得到任用，而召滑暗地指使章义发难，越国动乱，所以楚国能够在南方把厉门（关隘名，当时通岭南的要路）作为边塞，把江东（因长江从芜湖至江苏镇江一段成南北流向，故此段江南地区称之为江东）作为郡县。揣度一下大王的功绩所以能达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在于越国混乱而楚国安定呢！现在大王明知这种使用于越国的有效手段，却忘了使用于秦国，我认为大王这是重大的失策。然而大王如果想要在秦国安置丞相，那么不如向寿那亲戚的人为宜。向寿对于秦王来说是亲戚，年少时跟他同穿一件衣服，长大后跟他同乘一辆车子，因此言听计从。大王如果能让向寿在秦国担任丞相，那就是楚国的利益。"楚王于是派使者求秦王让向寿在秦国担任丞相。秦王终于让向寿做了丞相。甘茂最后也没有再返回秦国而死在魏国了。

司马迁曾评价樗里疾和甘茂说："樗里疾因为是秦王的至亲而被重用，但他才智过人，为秦国人所称道。甘茂出身于下蔡的平民，显名各国，为强大的齐国和楚国所尊重。他们虽不是行为敦厚的有德君子，然而是战国时代的谋士，值得称赞。"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绎史》

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虚心好学，有远见卓识和雄心壮志。他在位期间，实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由于这一改革，使赵国在一个时期内跃居为军事强国。

赵国是三晋中地理位置靠北一个国家。它的东北面与东胡部落和燕国相接，东面与中山、齐国接壤，南面和西南部与卫、韩、魏、秦等国交界，北面与林胡、楼烦两部落相连。在战国七雄中，赵国是疆域较大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它的都城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周威烈王元年（前425），赵献侯执政时迁都到中牟（今河南汤阴西），周安王十六年（前386），赵敬侯统治时，又迁都到邯郸。

三家分晋以后，赵国与韩、魏一样成为独立的诸侯国。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赵国不断进行政治改革。赵烈侯统治时（前409—前387），任命公仲连为相国，进行了政治改革。当时赵烈侯爱好音乐，曾问相国公仲连："寡人爱的人可以贵之吗？"公仲连答道："只能'富之'，不能'贵之'。"赵烈侯因此要赏赐给郑的歌者枪、石两人田地各万亩，公仲连答应了。隔了一个月，烈侯从代回来，问有没有赏给歌者田亩，公仲连答道："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隔不多时，烈侯再问这件事，公仲连就称病不上朝。接着番吾君从代来，向公仲连推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公仲连把这三人推荐给烈侯。牛畜建议"以仁义治国，约以王道"，荀欣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烈

侯因此宣布把赏田给歌者的决定作罢。起用牛畜为“师”[1]，荀欣为“中尉”[2]，徐越为“内史”[3]，进行改革。荀欣和徐越主张的“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就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选择人才，处理财政和考核臣下成绩，这是法家的政策。而牛畜主张的“以仁义治国，约以王道”，是儒家的政策。由于赵烈侯注意在具体的政治工作和财政工作中采用法家政策，严厉地实行“法治”，加强对臣下的考核和监督，选择贤才和节约开支，勤俭建国，同时，在教导方面采用儒家的政策，讲究“仁义”和“王道”，对人民进行欺骗和笼络，因而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赵敬侯时（前 387—前 375），尽管敬侯纵欲，制刑杀戮没有法度，但是继续注意选择贤才，图志改革，进一步贯彻发展生产和加强军事训练的政策，使赵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封建国家，国力逐渐强大。随后，赵国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展。周安王十九年（前 383），赵国大举进攻卫国，卫国在危急中向魏求救，赵国在楚国的帮助下，大败卫、魏，取得胜利。周烈王三年（前 373），赵国继续向卫进攻，攻取了卫 73 个乡邑。后七年，又攻下卫的鄄（今山东鄄城北）。赵国因为夺取了不少卫国的土地，国力进一步增强。

到赵武灵王时（前 325—前 293），赵国虽然有时能战胜像卫国这样一些小国，国力也有了进一步增加，但赵国在当时各国中只能算是二三等级国家，经常受到一些强国的欺凌，甚至被齐国、秦国打败。有一次，秦国杀了赵国八万人。还有一次，秦国不但侵占了赵国好几座城池，而且把大将赵庄也俘虏去了。国家的安危，使赵武灵王伤透了脑筋。

此外，原来赵国的北方和东方边界大部与胡人部落相邻。那

---

① 师：负责教化的官。
② 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择官吏的长官。
③ 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臣下的政绩的财务官。

时，胡人是强悍善战的游牧部落。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胡人作战时，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裤，脚穿皮靴，骑在马上，举动灵便，往来如飞，一边跑一边射箭，流动性很大。他们人马不多，最多也不过五六千骑，可是打起仗来，却能以少胜多，战斗力很强。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优越，但大多数还是步兵和车兵混合编队，而且官兵都是身穿宽袍大袖，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而盔甲笨重，结扎繁琐，骑马做事很不方便。虽然在春秋战国之交，骑兵作为一个新的兵种已经出现，但是还很少，各国的军队主要是“带甲”的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每辆战车由四匹马拉着，车上站着三个甲士，中间一个赶马御车，左边一个持弓射箭，右边一个使用长矛。战车两边有十个甲士随从，战车后边有十五名步兵跟着。一动就是几万、几十万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要求赵国在军事制度上必须进行改革，发展骑兵，而骑兵的扩大，就要求对士卒的服装、武器进行相应的改革，否则，就不适应作战的需要。于是赵武灵王决心继承先辈赵简子、赵襄子和赵烈侯的事业，奋发图强，立志改革，使赵国强大起来。为此，他决定要对现行的军政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胡服骑射”。

周赧王八年（前307），有一天，赵武灵王召大臣楼缓商议说：“我们先祖南征北战，开疆保国，而功业还没有完成。今天北边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国、韩国，中山在我国腹心地带，四面受到敌人的包围。没有强兵，就不能生存，我们要奋发图强，否则，就有亡国的危险。可是要想富要强兵，却有旧的风俗习惯拖累着我，不进行改革是不行的。”楼缓不住地点头，对国君的雄才大略，表示佩服和称赞。“比如我们穿的长袍大褂，袖子太宽，腰身太大，打仗干活都不方便。”武灵王用手提着自己穿的大袍子，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叫楼缓看。楼缓笑着说：“是应当改改。”武灵王接着说：“我想从改革服装入手，我们都改

穿胡服，再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楼缓说：“好！”

但是，许多大臣都想不通。后来，武灵王又将自己要实行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想法告诉了大臣肥义，并征求他的意见。武灵王说：“简襄两主的功业，在于能够抗击胡人、狄人。如今我要继续襄主的事业，开拓胡人、狄人居住的乡土。可是遍寻世间，却找不到得力的贤臣。我穿胡服是为了困弱敌人，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不耗尽百姓的劳力而能继续以往简襄二世的勋业，大凡建立盖世功业的人，往往遇到世俗习惯的阻力；有独到见解的深谋远虑之士，要被骜慢之民所怨恨。如今我将教导百姓穿胡服，习骑射，这样做，社会上必定有人议论我，碰到阻力，怎么办呢？”肥义是拥护赵王改革的，他答道：“我听说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行动犹疑就不会成名。大王既然决定宁愿背负着被世俗指责的忧虑，承担世俗的谴责，就不必顾虑社会上旧习惯势力的反对和议论，而且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苗人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后来禹也向倮国这个部落学习过舞蹈。所以大王既下决心改革，就不要管世俗的议论。愚蠢的人不懂得如何成事，智慧的人能预见来来，为了国家富强，陛下就下定决心学习胡服骑射吧，还怀疑什么呢？”武灵王说：“我不是怀疑胡服的好处，是恐怕天下人笑话我呀！如果全国都按照我说的办，胡服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不管世俗如何看我，我的决心是下定啦！”

于是，赵武灵王率先穿起胡服，把赵国原来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上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赵王改穿胡服看来是一种服装改革，实际上是封建的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它关系到赵人的风俗习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富国强兵，阻力是很大的。

这时，以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为首的一些宗室贵戚，形成一股反对改革的势力。赵武灵王派王緤到公子成家，公子成穿着

又肥又大的袍子，迎上前去，请王缧坐下，王缧说："国君将要穿着胡服，在朝堂举行会议，请您也这么做。他让我转告您：'我教导百姓改穿胡服，如果叔父不穿的话，恐怕天底下的人会议论纷纷，难以行通，希望叔叔用自己的名望和行动，使服装改革成功。'"公子成接连两拜叩头说："我本来听说大王穿上胡服了。因为闹病，没有去劝说他。我听说中原是聪明睿智的人居住的地方，万物齐备，又有圣人贤人在这里推行教化，施行的是仁义，用的是诗书礼乐，奇巧技能也发达，本来是蛮夷戎狄学习的榜样。现在大王要丢掉这些自古以来的礼、教、习俗而去搞什么胡服骑射，这是改变古代圣贤的教导，更换古代的章程，离开中国的习俗，是万万行不得的。希望他再三考虑考虑。"

王缧把公子成的话禀告给武灵王。武灵王说："我知道叔叔病了，要亲自去向他请教。"

武灵王带上胡服，坐车到公子成家。他首先问候叔叔的病情，表示他的关心，随后讲起改穿胡服的事。他耐心地解释道："衣服是为了便于使用，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圣人观察地方习俗来适应自己的行为，根据具体事情来制定礼制，使它有利民众又有益于国家。如果环境不同了，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已经不适应形势变化的习惯和制度。所以圣人认为如果有利于国家，他的措施不必专一；如果可以便于行事，他的礼制不必相同。儒家虽出于一师，现在不是也在不断演变和分出了不同的流派吗?"武灵王明确地说："效法自古以来的成法，不足以统治现在，必须因时制宜，制定礼法，所谓'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我国东有黄河、漳水，与齐国、中山国为邻，却无船只使用。从常山（山名，即今恒山）直到代地、上党一带，东有燕国和东胡，西有楼烦、秦、韩，如今没有骑兵防守。所以我觉得没有船只的使用，傍水居住的百姓，将怎样守住黄河、漳水？改变服装来学习骑射，为的是防御毗邻燕、三胡、秦、韩的边界，我

要建造舟船，更要变服骑射，建立一支强大的守边军队。以前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大兵力，侵占糟踏我土地，掳掠我人民。先王把这些当作耻辱，愤恨还不能够报复。如今以骑射来防守，近可以便于观察上党的地势，远可以报中山国的仇。而如今叔父顺从中国旧习惯，却违背了先主简子、襄子的意愿，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武灵王谦虚的态度，使公子成深受感动；武灵王讲的道理，他也心悦诚服。他跪在武灵王面前，非常抱歉地说：“我愚昧无知，不懂得陛下所讲的道理，如今要继承先主的遗志，富国强兵，我哪里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公子成终于同意用胡服，并表示愿意亲自带头穿上胡人的服装。武灵王立即将带来的胡服赐给他。

第二天上朝，武灵王、公子成和楼缓，都头戴装饰着貂尾的帽子，穿着短衣长裤，腰系装饰着金钩的皮带，脚穿皮靴，完全像胡人的打份，精神焕发，斗志昂扬。

文武百官看到武灵王等人的穿戴，大吃一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道说什么好。

赵武灵王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道命令：不分贵贱穷富，一律改穿胡服！

当时，公族赵文、赵造等人仍然反对武灵王的改革。这时，赵文走到武灵王跟前，严肃认真地说：“臣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君主广开言路，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我虽然愚昧无知，但是愿诚心诚意地给国君提点意见。”武灵王面带笑容，回答说：“好！你就放心大胆地说吧。”赵文说道：“自古以来，都是照老习惯办事，穿什么衣服，是古代圣人给我们规定好的。现在国君扔掉我们的衣服，穿胡人的奇装异服，违背先圣的教导，百姓会造反，这是一种罪过。”武灵王驳斥说：“你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古今的习俗不同，有什么古法可仿效？帝王们都不是世袭，有什么古礼可遵循？伏羲、神农注重教化而不用刑罚，黄帝、尧、舜使

用刑罚而不暴虐。到了夏禹、商汤、周文王，都是根据形势和需要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社会情况的不同而制定礼仪。法度礼制诏令各自顺应当时时代的变化而制定，怎么合适就怎么订；衣服器械各自便于使用，怎么方便就怎么用。所以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贤圣的君主，不沿袭前人能成就王业，昏庸衰败的君主，不变易先王的礼也会灭亡。所以说，要管理今天的国家，就不能完全按照老规矩办事。”赵文哑口无言，再也讲不出多少道理，红着脸退了下去。

赵造向前迈了两步，说道：“不忠诚老实，是奸臣。我愿意做个忠臣，说老实话，就是死了也没啥。”

武灵王说：“忠臣不躲避危险，明君不拒绝别人讲话。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穿奇装异服会动摇人们的意志，移风易俗会造成思想混乱。按照旧礼法办事，才不会有什么过失，国君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武灵王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古代有作为的帝王，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礼、制法、制衣服。夏代、殷代的帝王，因循守旧，没有一点革新创造精神，先后都灭亡了。违反古制不可非议，遵循旧礼不值得称赞。如果穿异服就是心意淫荡，那么邹、鲁两国就没有离奇古怪的行为了；习俗奇特老百姓就轻慢，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有德才优异的人了。进退的礼节，衣服的制度，是用来齐一普通百姓，不是用来约束贤能的人。所以百姓与习俗同流，贤人跟变革一道。谚语说：‘用书本知识驾马的人，不了解马的性情，用古制治理今时的人，不懂得事理的变化。’遵循旧法的规定不可能超出世俗，照搬古代的学说，不可能治理今时。难道你不懂得这些吗？”赵造理屈词穷，只好听从命令，改穿胡服。

王子的老师周绍开始不愿意穿胡服，经过赵武灵王说服，答应穿胡服。赵武灵王赐给他胡服、衣冠、腰带。

还有一个叫赵燕的公族，违抗命令，仍旧穿着长袍大褂，摇摇摆摆，装模作样，拒绝改穿胡服。在当时，这是应该严刑治罪的。但是，武灵王没有简单地处罚他，反而亲自找上门去，耐心地去劝说："一个家庭，孩子们如果都随意行动，这个家庭肯定要乱；一个国家，如果臣民都各行其是，这个国家必定陷入危机。我教百姓穿胡服，你迟迟不穿胡服，有意违抗我，罪恶是很大的。我担心你获罪犯法，特来向你说明利害。"赵燕听罢，吓得直打哆嗦，一再称罪，说道："前几天国君就命令穿胡服，并派人给我送到家里，我违抗命令，拖延时间，本来应该判刑治罪，但是国君不这样做，而是耐心地教导我，启发我。您对我的好处太大了。我现在马上就改穿胡服。"

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改革服装成功，全国上下一律穿上胡服。

同时，赵武灵王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装，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武灵王还亲自训练士兵，教他们骑马射箭。插箭岭就是他训练骑兵的场所。

插箭岭遗址位于邯郸西北郊，京广铁路西侧。看上去，像是一个高低起伏、蜿蜒曲折的土岗。有500米长，20至40米宽，拐角处都是宽阔的平台，最高的地方距地面大约有10多米。上面布满战国时代的砖头瓦片。当年，上面是高大的宫殿和亭台楼阁，下面是练兵场。北边不远，有一排排的铸箭炉。赵武灵王组织一支骑兵队伍，都穿着胡服，在这里演习骑兵射箭。插箭岭下，每天人喊马嘶，箭飞嗖嗖，炉火通红，热气腾腾。直到现在，人们在附近还能捡到那时候的箭头。

就这样，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就练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支骑兵成为赵国军队的主力，后来，它不但打败了过去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还在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使赵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时期"七雄"之一。

赵武灵王训练出强大的骑兵后，把西北边界上的重镇原阳

(今内蒙古萨拉齐县境)的步兵和战车合编的军队解散，变为驻扎骑兵的基地。他的做法，遭到大将牛赞的反对。牛赞气呼呼地说道："军队的组织和国家的组织一样，都有一定的方规，随便改变，就会引起混乱，削弱力量。如今国君解散原阳步兵，换成骑兵，恐怕得到的利益，没有失掉的好处多。"武灵王细心地听完他的话，讲道："建立军队，是为了用来打仗。如果军队的组织不适于打仗，为什么不能改变呢？我们的军队组织庞大，盔甲笨重，行动不便，遇到险境难以越过。胡人的军队骑兵射箭，就没有这些缺点。所以我决定把步兵变成骑兵。"一席话把牛赞说得心服口服，他回答说："臣坚决听从命令。"

周赧王九年（前306），赵武灵王身穿胡服，跨上战马，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深入胡人部落，闯过道道难关，战胜重重强敌，一直打到榆中（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开辟了千里国土。后又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宁葭。次年，武灵王又亲自率右、左、中军三路大举攻中山，攻取丹丘、华阳、鸱、鄗、石邑、封龙、东垣等地，中山国献四邑求和。周赧王十五年，赵国又攻中山，扩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随后，赵武灵王命令把赵国士大夫的私家奴隶迁徙到九原，又命将军、大夫、嫡子、代吏等穿貂服，学习骑射。"貂服"就是胡服。这是胡服骑射的进一步推广，它既有利于开发边地，巩固防守，也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周赧王十九年，赵国就灭了中山国，迁中山王到肤施（今陕西绥德东南）。从此，赵国西土到代地的交通畅通无阻。赵灭中山，举国欢腾，赵王行赏，大赦，大摆筵席五日。赵武灵王灭掉中山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赵灭中山，领土大为扩充，国力大增，赵国成为强国。齐国衰落以后，在战国后期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就是赵国了。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军事改革，组成强大的骑兵队

伍，在中国军事史上有一定地位。轻装的骑兵，行动迅速，战斗力强，适宜于北方草原地区作战，因而它成为后来封建国家的一个重要兵种。历史上，战国封建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主要是依靠骑兵，如秦汉时代抗击匈奴的历次战争，就是使用骑兵的。可见，“胡服骑射”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于周赧王十六年，在东宫大朝群臣，举行传王位的礼仪，立自己的小儿子何（即惠文王）为王，以肥义为相国，辅佐朝政，武灵王自称“主父”。

主父想让儿子主持治理国政，而自己身穿胡服率领士大夫们到西北边夺取胡地，打算从云中、九原径直南下突然进攻秦国。为弄清秦国的地理环境和政治情况，看看秦王是什么样的人，他装扮成赵国的使臣赵招，率使团到了秦国首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他见到了秦昭襄王，向他讲了赵武灵王传给小儿子王位的事情。秦昭襄王惊奇地问：“你们的武灵王老了吧？”“他不老，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他回答说。“那为什么自己不当国王，叫儿子当呢？”秦王又问道。“我们的国君这么做，一来是为了叫儿子锻炼；二来是自己腾出手来干别的事情。”他比划着解释说。晚上，秦王反复琢磨他和赵国使者的谈话，觉得：“赵招，这个人外表雄伟，举止大方，能说会道，不像是给人当臣的样子。”第二天，他早早地让人去请“使臣赵招”。赵人声称：“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拜见大王。又过了几天，秦王派人去请“赵招”，他真的来了。秦王一见赵国使者，不是原来那个“赵招”，非常生气。仔细询问后，秦王才知道他的那个“使臣赵招”就是赵主父，不由得惊恐万分，立即派人带着军队，连夜追赶，一直追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得知主父早已骑马奔离开秦国了。秦国人大为惊愕。

主父又封自己的长子章为安阳君，有代地。章一向奢侈放纵，内心对弟弟立为王不服。主父很担心，又派田不礼辅助赵章。

太傅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身强力壮，意气骄横，党羽众多，

野心很大。田不礼残忍嗜杀又骄傲。两人互相投合，必定有阴谋贼乱的事情发生。小人有野心，轻虑浅谋，只见利，不顾害。根据我的观察，祸害不会久了。你肩负国家的重任，如果事情有变，祸患就会从你开始，目标集中你，你性命就难保了。你何不说病辞官，将权力传给公子成，可免除祸难。”肥义回答说：“不可以。当初主父把王托付给我，说：‘不变你的法度，不改你的思虑，同心坚守，直到你去世。’我拜命受了重托。今天害怕田不礼就忘了主父的托咐，这个变化太大了！我宁愿忠于我诺言，不怕粉身碎骨。”李兑说：“你尽力而为吧！我能见到你就只有今年了。”说完，涕泪交流地走了出来。李兑还多次去见公子成，商量防备田不礼的对策。

另一天，肥义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表面上说得好，暗地里打坏主意。我听说，奸臣在朝廷，是国家的祸害；谗臣在宫中，是国家的蛀虫。这种人贪婪而野心大，内得君宠而外为残暴。他们想倚仗主父，假借主父命令作乱，我很担忧，夜不能眠，不想吃饭，不可不备。从今以后，如有人请君主，必先见我的面，我将先用自身抵挡他，保护王。”信期答应了。

赵惠文王四年（前295）的一天，主父要惠文王召见群臣，而自己从旁窥察群臣和宗室贵族礼仪。他看到长子章垂头丧气，反而北面称臣，屈服在他弟弟之下，心中很可怜，很同情他。主父于是想把赵国分为两部分，让公子章在代地称王。不过，这个计划还没有决定下来就中止了。

这年，赵主父与惠文王游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分住不同的宫里。公子章也跟随从游。晚上，等到夜深人静，公子章和田不礼率领他的党徒作乱，假称主父的命令召见惠文王。肥义先进去，被四处埋伏的人杀死。高信立即跟惠文王一起与公子章作战。公子成和李兑率领四个城的骑兵，星夜兼程，从国都邯郸赶到沙丘，一鼓作气，打败了叛军，杀死了公子章和田不礼，歼灭了他

们的党徒，安定了王室。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称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由于惠文王年少，公子成和李兑专权。

公子章败退的时候，逃到了主父的宫殿里，公子成和李兑因而包围了主父住的宫殿。公子章死后，公子成、李兑商量说："我们因公子章的缘故包围了主父，即使现在解除了包围，退了兵，也属于反君的犯罪行为。有朝一日，主父会杀我们的。"于是，他们第二次下令包围主父行宫。命令宫中的人赶快出来。主父想出来，公子成和李兑不让他出。宫中没有吃的东西，饿得他掏小家雀吃。过了三个月，一个很有作为、对赵国很有贡献的国君最后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赵国力量减弱。

后来，赵惠文王启用廉颇、蔺相如、赵奢等有才能的人辅政，继续承袭武灵王的事业，赵国又强盛起来。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赵世家》

《战国策·赵策》

赵攻中山

中山是上古时代地处今河北省境内的一个古老国家。春秋时称鲜虞，属白狄族。白狄族原居住在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地区，公元前八世纪末中原诸国混战的时候，白狄乘机进入太行山以东地区，就是后来的中山国。中山的名称，最早见于鲁昭公十二年(前503)。

中山国的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太行山东麓的保定、石家庄以西的丘陵地区。在它强盛的时候活动范围要大，大致北面到徐水、安新一带，南面达高邑以南，西面至太行山，东面至里县、安平、深县、新河、巨鹿一带。唐县一带是它早期的活动中心，晚期活动的中心在平山县一带。

过去的历史书对中山国的记载很少，又零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唐县北城子、行唐李家庄、石家庄市以及平山县三汲村等地发掘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批属于中山国的遗迹遗物，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中山国的历史是一部历尽沧桑的历史，在它自建国至最后为赵所灭亡的过程中，两次复国，三次灭国而亡。

《战国策·中山》记载：楚昭王“伐中山，中山君亡”。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510年楚昭王在位，中山亡国应在这几年中。公元前507年记载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说明鲜虞即中山已经复国。国都定于顾（今河北定县）。

魏国自从魏文侯进行了社会改革，国势逐渐强盛起来。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命吴起伐秦，吴起统率魏军一举攻下了秦国洛水以东的五座城池，在那时设立了西河郡，从而使“秦国不敢东向”。次年，魏国就开始对中山国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魏文侯为攻伐中山曾经借道于赵国，赵烈侯不答应。赵利对赵烈侯说：“魏国攻伐中山，如果不能胜，魏国一定会疲困，这样，赵国就会比魏国强了；如果魏国攻取了中山，但它不能越过赵国去占有中山，这样，用兵伐中山的是魏国，而得到中山国之地的却是赵国，您不如答应魏国。您应允魏国的要求，魏国就会感激您。”常庄谈不同意赵利的意见，他对赵烈侯说：“魏吞并中山后，必将对赵国构成威胁。您何不如请求魏文侯将他的女儿嫁给中山国君为正妻，那时魏国就不会进攻中山了。”赵烈侯最后还是借道给了魏国。

公元前407年，魏文侯命乐羊为将，率领魏军进攻中山。当时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君听说乐羊率魏军攻伐中山，极其气愤，就把他的儿子给煮了，并做成肉酱，留给了乐羊一碗。经过三年战争，魏国又一次灭亡了中山。当乐羊率军进入中山国都顾。看见自己儿子的遗骨时，忍不住泪水即下，悲痛欲绝，他忍痛吃下了那碗酱。魏文侯听说这件事后，对睹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原故，吃了他自己儿子的肉。”睹师赞却说：“他儿子的肉尚且吃了，那谁的肉能不吃呢？”乐羊因攻伐中山有功，魏文侯将灵寿（今河北平山三肖村）封给乐羊。乐羊死后，葬在灵寿，从此，他的子孙就居住在这里。

魏国征服中山后，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派李悝去治理。后太子击归，以其弟挚为中山君。

由于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魏不能强有力地控制中山，等到魏和周围各国混战的时候，中山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左右，乘机摆脱魏的控制而复国。复国后迁都于灵寿。

中山从魏的统治下复国迁都到灵寿以后，根据平山一号墓出土的铜器铭文，都于灵寿的中山君有桓公、成公、𰯼、𧊒，在《吕氏春秋・当染》中，还提到中山最后一个亡国之君叫尚，一共是五代。

中山原为“白狄别种”，它进入中原地区后，与当地的居民杂居在一起，同中原先进文化的各国人民长期交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自然会逐渐发生变化。战国时期的封建兼并战争，大大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从出土遗迹、遗物来看，到战国时代，它的文化基本上已和中原相同，出土遗物、铜器铭文以及墓葬所反映的陵寝制度，尤其与魏国相似。就青铜器的风格来说，接近于三晋特别是赵国。平山一号墓出土有铭文铜器达六十多件，其中四件最重要，一件叫“兆域图”，是一幅建筑平面图，一件铁足铜鼎，有铭文四百六十九字，一件圆壶，有铭文一百八十二字，一件方壶，有铭文四百五十字。这些铭文在王𰯼和王𧊒时所刻。这些出土的铜器，造型精美，工艺高超，反映了中山手工业的高度水平。从铭文看，大讲天命、忠、孝、仁、义、礼、信、慈爱，这在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上，也与华夏诸国一样。

另外，中山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多为铁制，有锄、镰、铲、锛、斧、镬、削等。当时铁农具和其他铁工具已普遍使用，礼器和生活用具也有铁铸的。平山一号墓出土了许多金匕、银贝、铜泡、戈、剑、铜镜、玉饰、玛瑙、铜鼎、铜壶、铜甗、盉、盘、簠、匜、豆等，数量很多，像铜错金银纹饰四鹿四龙四凰方案，形态优美，花纹精致；十五连盏灯，铜身银首宝石镶睛八俑灯，有错金银纹饰的虎吞鹿、吞牛、吞犀双翼神兽，都十分精美。

从灵寿古城址看，当时都城的规模很大，城址南北长四公里，东西宽二公里，城内有居住遗址、制陶作坊、制骨作坊、制铜铁器作坊遗址等；从瓦件等建筑遗物看，王宫建筑也一定相当宏伟。这一切都与华夏的一些王国的都城相似。

不过，出土遗物还有大型山字形铜器作礼器和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错金银兽、犀、牛、虎等，还能建筑物顶部用山字形脊瓦，随葬有便于携带的帐架和帐内用器，这些都反映了中山国还保留有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遗风。

中山国为千乘之国，又处赵国腹心之中，因此，对赵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赵国从敬侯开始就对中山国发动进攻。赵敬侯十年（前377），赵派大军进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次年，赵国又征讨中山，在中人（今河南唐县西南）展开激战。赵敬侯十二年赵敬侯去世，他儿子成侯种即位。这时，公子赵胜跟成侯争立为君，发动叛乱。

中山乘赵国内乱之机，为加强对赵国的防御，于公元前369年在与赵国边境地带修筑长城，并且积极充实国力。

公元前323年，秦国派张仪和齐、楚大臣在石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目的在于拉拢齐楚，以便向魏进攻，这是张仪的连横策略。为了对抗秦、齐、楚的联合，魏国公孙衍采取合纵策略，发起"五国相王"。参加的五国是：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就是参加的五国互相承认为王。中山是小国，别国看不起，他们想利用"相王"的机会，能够得到一些大国的承认，也就可以称王了。

齐国借口中山国小，不承认它有称王资格，因此坚决反对，齐国想联合魏赵燕三国迫使中山废除王号，于是对赵、魏扬言道："和中山并称王①，这是莫大的耻辱，愿和大国一起讨伐，不许中山称王。"中山王很害怕，便和大臣张登商议了一个办法，让张登带重金去见齐国的权臣靖郭君田婴，田婴误听张登的话答应中山称王。这时张登对赵、魏说，齐国本来羞与中山为王，现在又许中山称王，是因为齐国要用中山的兵攻魏国的河东。这样一说，赵、

① 公元前334年，魏齐"会徐州相王"，这时，魏已称王，徐州之会实际上魏承认齐为王。

魏对齐很是反感，更加保护和支持中山称王。

为了反对中山称王，齐国还对中山“闭关不通”，说中山是小国，不配称王。齐国还想割平邑地方给燕赵，一起攻打中山。燕、赵没有听齐国的话，认为这是齐国故意离间燕赵和中山的关系而想把中山国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燕赵坚决支持了中山称王，齐国干涉中山称王之事就此作罢。

这次中山能够称王，全靠了魏、赵这几个大国的保护，和齐国作斗争才实现的，否则齐国是想利用中山称王发动进攻。当时中山相兰诸君就说过，齐国如果向中山发动进攻，中山不是亡国，就是放弃称王，魏、赵支持中山称王，一方面是为了抗抵齐国，另一方面是想把中山置于它们的势力之下，并不是真正的想扩大中山的国力。

中山称王以后，国力逐渐增强，公元前314年，中山乘燕国内乱之机，派兵进攻燕赵。向南在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打败赵军，向北在中人打败燕军。据出土的中山王譽铸造铁足大鼎铭文记载，中山王派相邦司马赒亲率中山三军之众，征伐燕国，在燕国扩地数百里，攻占众多城邑。并且得到周天子的嘉奖和诸侯的赞赏。这是中山取得的一次大胜利。中山为千乘之国，与两个万乘之国交战，屡战屡胜，这说明中山国已处于最强盛的时期。

中山国强大，对赵国的威胁愈来愈大。赵武灵王即位以后，为了富国强兵，他在信宫（今河北永年西）召见肥义等文武大臣，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商天下大事。他亲自跑到北面、东面的国境线上，观察齐国、中山国的状况。有一次，他要了解中山国情形，从房子走到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从无穷（今河北元氏西）走到西河（今山西、陕西交界的黄河）。还爬上了黄华山顶。

回来后，他对大臣楼缓说：“我们先王南征北战，开疆保国，而功业没有实现。现今中山国处在我国当中，北边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靠着林胡、楼烦和秦国、韩国，四面受到敌人的包

固。如果没有强兵保卫，就有亡国的危险。我想继承赵襄子的业绩，胡服骑射，增强赵国的国力。”在肥义、楼缓等人的支持下，赵武灵王在全国推行胡服，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赵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了。

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武灵王身穿胡服，跨上战马，率领赵军进攻中山，攻到了宁葭（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不久，他又向西深入胡人部落，闯过道道难关，战胜重重天险，一直打到榆中（今陕西东北方）一带，开辟了千里国土。

转年，赵武灵王命赵袑为右军将，许钧为左军将，公子赵章为中军将，全军由他统一指挥大举进攻中山。武灵王还令牛翦率领战车与骑兵，赵希率领胡地和代地的士兵，让他们指定经过的山隘，在曲阳（今河北曲阳西沙河之东）会师，然后攻取丹丘（今河北曲阳东北）、华阳（今河北唐县西北）和鸱上（今河北唐县北）的关塞。武灵王则率领赵军主力先后夺取了鄗、石邑（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封龙（今河北无氏西北）、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中山王献出四个城邑请求讲和。武灵王答应，停止战斗。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赵国又攻中山，扩展的国土北至燕国、代地，西至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

为了专心致力于富国强兵，巩固边防，次年五月，武灵王在东宫举行大朝会，传王位，立王子赵何为王，即赵惠文王。武灵王自称主父。

中山到了王𧧧时国力日衰，《吕氏春秋·先识》记载说，中山国统治者不顾信用，信用都完了，不顾名誉，名誉都完了，不亲爱属下，属下都叛离了，路人没有粮，家居没有食，粮财都尽了，不能用人自己又没有能力，什么事也不能做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战士怠于战斗，农夫惰于田地，中山国已经很衰败了。

主父又准备大举攻灭中山，在攻取之前，他派李疵去观察中山的情况。李疵回来说："可以伐中山！大王如果现在不去攻打中山，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主父不解地问："为什么？"李疵回答说："现在中山王倾注所有的车子和房子用来招致穷巷之中的士人。"主父说："这不是贤君吗？怎么能攻打呢？"李疵说："不对，招揽天下名士，那么百姓就会追求名声而放弃农事；求贤入朝，那么耕作的人就会怠惰，战士就会怯懦，所以说，现在是灭亡中山的时候了。"

于是主父率赵军大举攻中山，打到了距国都仅八十公里的地方，中山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已为赵国所有。中山国君𧾷逃到齐国。

后来，王𧾷于公元前299年死于齐国，𧾷以后的王是尚。公元前296年，赵国终于灭亡中山国，中山王尚被遣送到肤施（今陕西绥德东南），筑灵寿宫，让尚居住。

中山王举士朝贤，民务名而战士怯懦，已经露出必亡的预兆。这和平山铭文中体现的尊贤的观点正相符合。中山此时贵儒学而忽略了武备，恰与赵武灵王的政策相反。华夏的赵国学习胡服骑射而终于吞灭中山，白狄的中山则以举士朝贤而归于衰亡，不能不说是东周历史上饶有意味的事件。但就整个社会发展而言，中山的华化被视为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潮流的组成部分，其结果是为列国的统一奠定基础。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赵世家》

《战国策》：《中山策》、《赵策》、《魏策》。

《韩非子》

《吕氏春秋》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

列国难周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统治的地区很小，力量很弱；而诸侯国家的力量日益强盛，郑、齐、宋、晋、秦、楚、吴、越等国家相继称霸于中原。周王名义上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根本号令不了诸侯，有的诸侯公然和周王进行战争；有的诸侯名义上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是要把周王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争夺指挥诸侯的霸权。周王变成了霸主的傀儡。

到了战国时期，分裂的情况继续发展，周王室只占有王城洛阳附近相当于现在十多个县的一片土地，人口不多，力量更加微弱。处在大国之间，不时受到大国的攻击，七大国根本看不起周王室。周王室实际降到了一个小国的地位。

战国前期，周考王把王城封给他的弟弟揭，说是为了要继续周公的官职，史书上就称他为西周桓公。这就是说在周王室的那点领土内又封出一个国来。到战国中期周显王时，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地，以奉王为名，号为东周，称东周惠公。这样，周的王畿实际上分裂为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逐步占有了周王室的土地，以至赧王没有容身的地方，或是寄住东周，或是寄住西周。到周临亡的时候，所统治的地域只有汉代的七个县，洛阳、平阴、偃师、巩四邑属于东周，河南、缑氏、穀城三邑属于西周。

诸侯难周的事件，在战国时期也和春秋时一样屡次发生。周赧王八年（前 307），秦国为打通韩三川郡，窥视周室，将领土扩

展到中原，攻取了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这时，秦向周王室借道，准备过周地去攻打韩的荥阳、成皋。西周武公[①]恐怕借给秦道路伐韩而得罪于韩国，又怕不借给秦道路而得罪了秦国，因此犹豫不决，焦急万分。史黡对他说："您为什么不派人去对韩国公族公叔说：'秦国敢于横过周地去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您何不给周地，派重使去楚国？秦国知道后一定怀疑，不相信周室，这样，韩国就不会受到秦的攻伐了。然后，您再对秦王说：'韩国强大，给周地，我不敢不给。'这样，秦国必定没什么话讲，让周君不要听韩国。而周室就会不得罪秦、韩两国了。"周君听从了史黡的建议，秦国果然没有向周室借道，而是绕道去攻打韩国。

不久，秦武王召西周君至秦，西周君不想去，于是派人对韩襄王说："秦国召西周君去秦，目的是为了派兵攻打韩的南阳，大王为什么不先出兵南阳呢？如果大王派兵驻守南阳，那么，周君就有理由不去秦国了，这样，秦国就不敢渡过黄河去攻打南阳。"韩襄王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派兵去南阳。秦国看到韩兵已经驻扎南阳，就放弃攻打南阳的阴谋。

这年，楚国围攻韩地雍氏，韩国向东周征调兵甲和粮食，东周君很害怕，急忙召见苏代与他商议。苏代说："您不要担心，我有办法可以让韩国不向周室征调兵甲和粮食，周室又能得到韩的高都。"周君很不相信，但又没有好的办法，于是就让苏代去韩国了。苏代到了韩国，对韩相国说："楚国围攻雍氏，已经三个多月了，但久攻不下，这说明楚国的力量还达不到攻取雍氏的地步。现在韩国向周室征调兵甲和粮食，这无异于告诉楚国说韩国的力量也很不够。"韩相国说："你说得很好，不过韩国派去周室的使者已经走了，怎么办呢？"苏代说："何不把高都给周？"韩相国听后

---

① 这时赧王微弱，不主盟会，寄居于西周。

大怒，说道："韩不向周室征调兵甲和粮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高都呢？"苏代不紧不慢地说："韩把高都给了周室，秦国一定很气愤，它定会与周室断绝往来，不向周出使，而认为韩国与周室联合，这样对韩国很有利的。"韩相国听后，很高兴，果然把高都给了周室。

周王室由于力量微弱，一直依赖韩、魏来摆脱秦、楚等国的威胁。周室的大臣宫他就对周君说："宛地依靠秦国而轻视晋，秦饥，无法救宛，因此被晋灭掉；郑国依仗魏国而轻视韩，魏攻打蔡而韩灭掉了郑。邾和莒为齐国攻灭，陈、蔡被楚灭掉，这些都是依靠援助的国家而忽视身边的强敌，最终灭亡的。现在您依靠韩、魏而轻视强秦，这对我周室是很不利的。您不如暗地里派使臣与赵国合好，以备秦国的进攻，这样就减轻了秦国对我周室的威胁了。"

不过，赵国对周室也早有侵吞之心，因此对宫他的请求，根本看不上眼。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赵国想攻取周室的祭地，周君听说后极为恐慌，急忙找郑朝商议对策，郑朝对周君说："您不必惊慌，您给我三十斤金子，我可以让赵国不取祭地。"周君马上给了他三十斤金子。郑朝到了赵国，把金子送给了赵国的太卜①，并且告诉了他赵国准备攻取周室祭地事，请求他帮助不让赵取祭地，太卜答应了。不久，赵王得了重病，命太卜官卜卦，太卜告诉赵王说："周室的祭地为神祸，不可得，您有攻取周室祭地的想法，故而得了重病。"赵王听后才作罢。

随着秦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秦想取代周王地位的想法也逐渐增强。相传从夏代传下来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那里认为得到九鼎就能挟天子号令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听的，就能成就王业。早在春秋时，楚庄王就曾问鼎于中原，遭

---

① 太卜：官名，掌管占卜事务。

到周室大臣王孙满的驳斥。周赧王三十三年，秦国兴师临周，也学着楚庄王的样子，想得到九鼎。周君很害怕，把颜率召来与他商议，颜率对周君说："您不必害怕，我去齐国请求援助。"颜率到齐，对齐王说："秦国大逆不道，想兴师临周求得九鼎。现在周王室的君臣商议说，与其给秦国，不如给齐国。齐国救亡危难的国家，可以美名传于天下；得到九鼎，又可以得到丰厚的实惠，希望大王好好考虑一下。"齐王非常高兴，于是派五万齐军，由陈臣思率领去救周，秦兵退，齐国又想求得九鼎，周君又派颜率对齐王说："周王室靠着齐的援兵，得以保全君臣父子，所以答应将九鼎奉送，但不知道大王怎么把九鼎运回齐国？"齐王说："寡人想借道于魏国。"颜率说："不可以，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曾谋划于晖台之下，沙海之上，为日已久，九鼎一旦进入魏国境内，定会出不来。"齐王又说："寡人想借道于楚国。"颜率说："不可以，楚国的君臣想求得九鼎，曾谋划于叶庭之中，为日也很久了。如果九鼎进入楚国境内，必被楚劫去。"齐王着急地问："到底走哪路才可把九鼎送回齐国呢？"颜率说："周室本来也为大王考虑这件事，但九鼎不是一般的小鼎，可以手提怀挟就能带走，运送九鼎每鼎需要九万人牵引，九鼎需要八十一万人牵引，这从哪里得来呢？"齐王听后也就作罢了。

这年，楚国想借道于西周与东周之间去攻打韩国和魏国，周君很惊慌，苏代对周君说："您清除道路通到黄河岸边，韩、魏一定害怕。齐、秦怕楚国取得九鼎，一定会派兵去救韩、魏，进而去攻打楚国。楚国连方城以外的地方都防不了，怎么能借道于两周之间呢？"周君听从了苏代的建议。

周赧王三十四年，楚顷襄王又想和齐国、韩国联合去攻打秦国，乘机打周王室的主意。赧王派武公对楚相昭子说："三个国家想用武力划分周的郊区来方便自己的运输，并把周的宝器运到南方去尊崇楚王，我认为不应该。杀害天下共同的宗主，奴役世代

统治天下的君王，大国就不会亲近他；依仗人多去欺压人少的国家，小国就不会归附他。大国不亲近，小国不归附，就不可能获得威名和实惠。威名和实惠都不能取得，就不值提为此去损伤百姓。有谋害周王室的名声，就不能用来发号施令。”昭子说：“若说谋害周王室，那没有这样的事。不过，周王室为什么不可以图谋呢？”武公回答说：“兵力不超过敌人五倍就不要进攻；不超过敌人十倍就不要围城。一个周王室因共主关系就相当于二十个晋国，这您是知道的。韩国曾经以二十万兵力，在晋君的城下遭受侮辱，冲锋陷阵的精兵锐帅战死，一般士兵受伤，晋都一直拿不下来。您拿不出一百个韩国的兵力来图谋周王室，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跟西周、东周两国结下深仇大怨，会阻塞邹、鲁这样的礼仪之国的人民向往楚国的心，跟齐国断邦交会使名声丧于天下，这样处事多危险哪！再说，您们危害两国以加强韩国，你们的方城以外一定要受到韩国的削弱。怎么知道会这样呢？西周土地，截长补短，纵横不过一百里。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瓜分它的土地不能使国家富庶，俘虏它的军民不能使军队强大。虽然不去攻打它，却已有弑君的罪名。但是有些好事的君主，喜爱攻伐的权臣，发布号令，指挥军队，何尝不想把矛头指向周王室。这是为什么？看见祭器宝鼎在周，只想搬来炫耀自己，却忘了弑君的祸患。现在韩国要把祭器宝鼎搬到楚国，我担心天下人会因为祭器与楚国为敌呢。让我打个比方吧：老虎的肉本来腥臊，又有爪牙防卫自身，但人们还是要猎取它。如果让草泽里的麋鹿披上虎皮，猎取它的人一定比猎取老虎的人多万倍。瓜分楚国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庶；谴责楚国的罪名，足以使国君尊荣。现在您想凭着个人私欲残害天下的共主，占有三代传国的重器，鲸吞九鼎，自以为比当今诸侯高出一筹，这不是贪婪又是什么呢？《周书》上说：‘要想在政治上起家，不要首先倡乱。’所以周王室的宝器一南迁，讨伐楚国的大军就会紧跟着来了。”于是楚王就中止了窥视周王室

的计划。

周赧王四十二年，赵、魏联合攻韩到华阳（今河南郑州南），秦派白起、胡阳救韩，大胜于华阳，打跑魏将孟卯，攻取卷、蔡阳等城，又战败赵将贾偃，声势大振。由于华阳距周地很近，周君害怕秦国会进攻周王室，于是召大臣马犯商议。马犯对周君说："您请魏国来加固围城。"周君就派马犯去魏国，马犯对魏王说："现在秦国攻克华阳，秦军逼近周地，周君忧惧国破，终日焦急万分，就得了快死去的重病。周君说想把九鼎运到魏国，大王得了九鼎定会谋划援助周室。"魏王说："好！"听信了马犯的矫言，派魏兵去守卫周地。马犯又对秦王说："魏国不是去守卫周地，而是将要攻打周，大王不信可以派兵到边境去看一看。"秦王果然出兵。马犯回来又对魏说："周君病得很重，迁九鼎到魏国之事得往后拖一下。现在大王派军队到周地戍守，诸侯国都生疑心，您不如让士卒为周修筑一下城池，以平息诸侯们的疑虑。"魏王又听信了马犯的话，让魏兵修筑周城。

周赧王四十五年，周君准备到秦国去，有人对周公子周最说："您不知赞誉秦昭王注重孝道，并且把应地送给秦昭王母宣太后作为养地，这样，秦王和宣太后一定高兴，您也与秦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交往好，周君必定把功劳归给您；如果秦与周交往不好，周君必定把罪名加在您的身上，所以您应该劝说周君去秦。"

不久，秦攻周，周最到了秦国，对秦昭王说："如果秦国有为大王谋划的臣子就不会支持大王去攻打周王室之地，因为周室虽有重器名宝，但土地狭小，不会给秦国带来多少实惠。大王如果派兵攻围，就有了攻伐天子的名声，这样就让天下诸侯畏惧秦，诸侯必会归到齐国一边，秦国就会孤立无援，大王称王天下的打算就不能实现了。有的人极力鼓动大王去攻打周室，是为了困弊秦国，所以大王是不会做对秦国不利的事情的。"秦王听后也就作罢了。

周赧王五十五年，昭献在阳翟，周君想让相国到阳翟与昭献相会，相国不想去，于是请苏厉为他向周君解释。苏厉对周君说："楚王与魏王相遇，主君派陈封去楚，派向公去魏。楚、韩两国国君相遇，主君派许公去楚，派向公去韩。现在昭献并不是人主，但主君您却让相国前往，如果昭献的国君在阳翟，您将派谁去呢？"周君听了苏厉的一番劝说，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不让相国去了。

周赧王五十八年，三晋诸侯围攻秦，周君派相国去秦。有人对相国说："秦国如何对待您还不知道，但现在秦国很想知道三晋的情况，所以您不如对秦王这么说：'我请求大王为您观察三晋的情况。'秦王一听必会看重您。秦王看重您，就等于看重周室。"相国果然听从了那人的话去见秦王，秦王真的相信周，随后去攻打三晋。转年，秦将摎伐韩取得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四万，又伐赵取得二十多县，斩首九万。

这时，东方各国又发动合纵抗秦的运动，西周君参与了这次合纵行动，会同各国锐帅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企图截斩秦通向阳城的后路。秦将摎便向西周发动进攻，西周君被迫把三十六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就在这年，周赧王去世，从此挂名的天子也没有了。

到了秦庄襄王元年（前249），任用吕不韦为相国，又把建都于巩地的东周灭掉了，将其地并入秦国，令东周君迁往阳人（今河南临安西）。从此，周王室最后的一支也被吞并了。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楚世家》。

《战国策》：《东周策》、《西周策》。

楚怀王客死于秦

公元前318年，修鱼（今河南原阳西）之战后，齐国出兵打败了赵和魏，并与楚结成了联盟。齐是东方的强国，楚则虎视于南方。因此，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大患。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王和相国张仪商议，问他有什么办法。张仪对秦惠王说："我有办法可以拆散齐楚联盟！"秦惠王便派他来楚国。楚怀王听说张仪带了一份厚礼来见，腾出上等宾馆，亲自送他住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对他谦卑地说："楚国是南方的僻陋之国，先生能教导我什么呢？"张仪回答说："我国君主最喜欢的人无过于大王，即使我张仪很想为之充当看门小厮的那个主人，也莫过于大王；我国君王最憎恨的人莫过于齐王，我张仪最憎恨的人也莫过于齐王。但是，只因大王跟齐王和好，我国君王不能服侍大王，也使得我张仪不能做您的看门小厮。大王如果为我关闭东方的关卡，跟齐国废除盟约，断绝往来，我请求秦王献商於（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给楚，让秦国女子成为大王的姬妾，秦楚两国嫁女娶妇，互通婚姻，永久结为兄弟盟邦。这样就可以削弱北方的齐国，西可以亲善秦国，自己又可以收回商於地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怀王大喜，天天摆筵席款待张仪，还宣扬说："我又得到我的商於之地了。"

楚国的大臣们都向楚怀王祝贺，唯有大夫陈轸不但不祝贺，反而感到忧愁。怀王很生气，对陈轸说道："我没有兴师动众就轻而易举地得六百里土地，大臣们都庆贺，只有你愁眉不展，为什么？"

陈轸回答说："依我看，商於一带的土地不会得到，而且齐国和秦国会联合，齐、秦两国一联合，那么祸患一定会降临。"怀王不解地问："你能说说理由吗？"陈轸接着说："秦国之所以尊重楚国，是因为楚齐联盟。现在，秦国的土地还没有到手就和齐绝交，这样楚国就孤立了。秦国怎么会看重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呢？一定会轻视楚国。如果先要求秦交割土地而后和齐绝交，秦是不会干的；如果先和齐绝交而后请秦割土地，一定会受到张仪欺骗。大王被骗，就会怨恨秦国。西有秦的祸患，北与齐已经绝交，两国的军队都会来进攻楚国，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表面上与齐绝交，派人随张仪到秦国取土地，等到土地到手，再与齐绝交不迟，即使得不到土，也不会得罪齐国。"应该说陈轸的主张是一种万全之策，但楚杯王因为被张仪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一心想得到六百里土地，对陈轸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他一面派人随张仪去取土地，一面派人去齐宣布绝交。

张仪回到秦国后，假装登车时没有拉住绳索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个月没有上朝。楚怀王听说这个情况后，说道："张仪以为寡人与齐国绝交不坚决吧？"于是派勇士宋遗到齐国去，当面把齐宣王辱骂了一顿。齐宣王十分恼火，折断了楚国符节跟秦国联合。直到秦齐联盟正式建立后，张仪才出来上朝。他对楚国使臣说："我有俸邑六里，愿意献给贵国君王。"楚使臣说："我接受楚王的命令，来接取商於之地六百里，没有听说六里之事。"

使臣回国报告楚怀王，怀王听后大怒，气冲冲地要兴兵攻打秦国。陈轸又建议说："攻打秦国不是办法，为今之计不如就此送给一个有名的都邑给秦国，和秦一道进攻齐国。这样，我国丢了土地给秦国，却从齐国取得补偿，楚国还不会受到多大损失。现在大王已经和齐国绝交，不要出兵向秦国责问欺骗之罪，这是我们去撮合秦、齐两国的联合，而又招来各国的军队围攻自己，国家一定会大受损失啊！"

楚怀王盛怒之下，一心只想报复张仪，根本不听陈轸的正确意见，于是派大将军屈匄与裨将军逢侯丑等带兵进攻秦国。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的春天，楚军与秦军大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结果楚军大败，屈匄、逢侯丑和受封有爵的将领共七十余人被俘，八万楚国军队被消灭，汉中郡被秦国夺去。秦占领汉中以后，使得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了秦的后方，解除了楚对秦本土的威胁。战败的消息传来，楚怀王简直气得发昏，在狂热的复仇情绪的支配下，他调动楚国的全部军队进攻秦国。在出发之前，楚怀王曾向天神祈祷，请求天神保佑楚军取得胜利。

楚军沿着丹江向西北方向进攻，越过商县，攻克了天险兰关，取得了不少进展，一直深入到秦国境内，构成了对秦的严重威胁。

这时，秦惠王不但动员了全部兵力投入抗楚战争，而且派人写了一篇文章，镌刻在石碑上，诅咒楚王，祈求"巫咸"、"大沈厥湫"和"亚驼"等天神保佑，制克楚兵，夺复边城。他为每一位天神刻一石碑，在举行祈祷仪式时将石块沉入水中或埋入地下。宋代先后在不同的地方出土了三块这样的刻石，称之为《诅楚文》。苏轼曾撰《诅楚文诗》一首，诗序说，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开元寺东南几十步祈年观故址（秦穆公墓地）发现了祈祷巫咸神的《诅楚文》刻石，共三百二十六字，所以该诗开头四句说："峥嵘开元寺，仿佛祈年观。旧筑扫成空，古碑埋不烂。"

第二块是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发现的大沈厥湫文，共三百一十八字。第三块是亚驼文，共三百二十五字，藏于洛阳。根据郭沫若同志的诠释，现将《诅楚文》中某些过于艰深难解之处予以评述，文意如下：

"自尊自大的秦惠文王，恭谨地用吉玉做成宣璧，派宗祝①邵

① 宗祝：官名，负责向神祝告军队征战等方面的事务。

謦发布檄文敬告大沈厥湫，以指正楚怀王熊相的许多罪过。昔我先君穆公与楚成王曾经努力同心，两邦若一。内则以婚姻结共亲谊，外则郑重立盟约。曾于天神大沈厥湫面前，祝愿子孙后代，不要干相互不利之事。

“如今楚怀王熊相，虚伪无道，淫逸昏乱，奢侈放纵，不遵守盟约。对内则暴虐无度，刑戮孕妇，暗中缢杀敹地（秦国边邑名，即莘，在今河南卢氏境内）俘虏，囚禁其叔父于冥室棺木之中，对外则劣性不改，不敬畏皇天上帝与大沈厥湫之神威，违背了十八世[①]的盟誓，率诸侯之兵攻我[②]，欲铲除我秦国社稷，伐灭我国百姓，废除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赏赐给的血食、珪玉与牺牲，遂夺取我边城新郢、郕、长（皆为秦国边邑名，新郢，今地无考；郕，即商於；长，是丹水附近的地名）及敹等地，我无可奈何。

“现在楚国又征调全国兵力[③]，列矛部弩，整甲厉兵，奋士雄师，逼近我秦国边境，欲逞凶夺地。我将率领秦国弱兵敝甲，朝野下上同心，救亡图存。秦国定会得到皇天上帝与大沈厥湫神灵保护，打败楚师，保我边境。谨列举楚王熊相背盟应诅咒的事实，刻在石章之上，以告大神之威灵。”

在秦国集中全力抵抗之下，由于楚军孤军深入，在蓝田（今属陕西）被秦军打得大败。这时韩魏两国也乘机向南进攻楚国，一直打到邓邑（今河南邓县），楚国腹背受敌，急忙撤兵，只好割让了两座城邑向秦国求和。

楚怀王在张仪的欺骗下，不但没有得到六百里的商於之地，反而在丹阳，蓝田两次作战中遭受重创，失去了汉中等许多地方。因

---

① 十八世：根据《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以后，经历了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秦厉共公、秦躁公、秦怀公、秦灵公、秦简公、秦惠公、秦出公、秦献公、秦孝公等，至秦惠文王恰为十八代国君。

② 指楚怀王十一年（前318）五国伐秦之事。

③ 指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楚怀王败于丹阳后又兴兵伐秦之事。《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大怒，乃国兵复袭秦”，与《诅楚文》记载字字相合。

此他对张仪恨之入骨，如果得到了张仪，真要吃他的肉，剥他的皮。

楚怀王十八年（前311）。秦惠文王派使者对楚怀王说："秦愿意分汉中一半的土地与楚媾和。"楚怀王说："不愿得到土地，只愿得到张仪。"

张仪知道以后，请求秦惠文王让他到楚国去，秦惠文王说："楚王恼恨您背弃奉送商於地区的诺言，他会向您发泄怒气，一定要报仇雪恨才甘心，您怎么能够去呢？"张仪说："我是作为秦国的使臣到楚国去的，秦国强，楚国弱，谅他也不敢加害于我；而且，我与楚怀王的侍臣靳尚的关系很好，靳尚侍奉楚王的宠妃郑袖，郑袖的话楚王没有不听从的。再说，我国为前次出使楚国，背弃了给楚国商于之地的约言，如今秦、楚两国大战，结下了仇怨，就是楚王真的去杀死我，只要能为秦国保留汉中一半之地，也是臣的心愿啊！"于是，秦惠文王派张仪来到楚国。

张仪进入郢都，首先拜访了靳尚，送给他一份厚礼，然后，进谒楚王。楚怀王一见到张仪，顿时怒火冲天，马上下令囚禁张仪，准备活剐了他。靳尚看到这个情况，连忙对楚怀王说："拘捕张仪，秦王一定会发怒。各国看到楚国没有秦国做朋友，必定轻视大王。"然后又对郑袖说："秦王很宠爱张仪，可是大王要杀死他。现在秦国打算将上庸六县（今湖北房县、均县一带）的土地送给楚国，还将把美人嫁给楚王，拿宫中擅长歌舞的人给大王当侍女。大王重视土地，秦国女子必定会得到宠幸，那夫人必定要被斥退了。夫人不如劝说大王释放张仪。"

郑袖是一个忌妒成性、刁滑奸诈的女人，她最担心的就是失宠于楚怀王。有一次魏国国君送了一位美人给楚怀王，郑袖看到楚怀王很喜欢这个美人，也装出一副非常喜欢她的样子，把自己最好的宫室送给了她，还把最好的衣服、穿戴、床帐被褥以及各种珠宝玩好、陈设用具都送给了这位新美人。楚怀王一看到这个

情况，喜不自禁地说："郑袖知道我爱魏美人，而没有一丝忌妒心，就像一个孝顺的儿子对待父母、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侍奉君王一样，真是太好了。"郑袖见楚怀王和魏美人都对自己消除了戒心，就开始了挑拨离间的活动。

有一天，她似乎是无意地对魏美人说："大王非常喜爱你的美貌，不过好像嫌你的鼻子低了一点儿，以后你最好在见到大王时，用手帕捂住你的鼻子，这样，大王就更喜欢你了。"魏美人非常感激郑袖对自己的关心，于是以后见到楚怀王时，就常常用手捂住鼻子。对此楚怀王不禁有些疑惑。有一次，他向郑袖问起这件事，郑袖说："我知道这个原因，但我不敢说。"楚怀王说："不管是什么话，你都必须告诉我。"郑袖说："她好像是怕闻到君王身上的臭味。"楚怀王一听，怒不可遏地说："好一个大胆的女人，我今天倒要把她的鼻子割下来看看。"便立刻下令处魏美人劓刑①，并从此再也不见她了。楚怀王仍然像过去一样专宠郑袖一人。

这次郑袖听说秦国要送一个美人来，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她发誓要使出全身本领，一定要在秦的美人到来之前，赶快放走张仪。于是，她日夜在楚怀王面前哭诉说："张仪上次欺骗了大王，那是臣各为自己的国君效劳。如今秦国拿它的土地来换张仪，我们没有得到土地，反把张仪杀了，秦王一定要大发脾气，派军队来攻打楚国，眼看我们就要受刀兵之祸了。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迁到江南去，免得遭秦国残害。"楚怀王也有些后悔，就下令释放张仪，像以前那样优厚地款待他。

张仪便乘机对楚怀王说："秦国土地占天下的一半，兵力足以抵挡四周的国家，背靠天险，有黄河围绕，四周有要塞可以坚守。勇猛的士兵有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贮粮堆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兵处于危难视死如归，君主英明威严，将帅聪慧、英勇，

① 劓（yi）刑：从商代开始的割去鼻子的刑罚，为五刑之一。

既使不出动军队，凭它的声威就可以席卷险峻的常山，折断天下的脊骨，天下不服从的国家一定先被灭亡。再说合纵的国家要跟秦国斗，无异于驱赶群羊进攻猛虎，是肯定斗不过的。

“当今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两个大国交战，当是势不两立。大王如果不亲附秦国，秦国将出兵占领宜阳，韩国的土地就会被隔断。秦国攻下河东，夺取成皋，韩国一定会投降，魏国就会闻风而动。秦国打楚国的西面，韩魏攻打楚国北面，国家怎么会不危险呢？

“再说合纵的国家集合一伙弱国去攻打最强的国家，不估量对方的力量而轻率地交战，国家贫穷而频繁用兵，这是招致危亡的策略。我听说，军队不如别国强的，不要挑起战争；粮食不及别国多的，不要打持久战。鼓吹合纵的人粉饰巧言，空发议论，使国君的思想言行高傲，他们只说它的好处，不说它的害处，一旦招来秦国的祸害，就来不及对付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秦国现在据有巴蜀，用大船装运粮食，从岷山出发，沿长江而下，到楚国三千多里。两船相并运送士兵，顺流而下，一日能行五百余里，里程虽然长，但不到十天就可以到达扞关（今湖北长阳西）。扞关受到威胁，楚国的东都地区就很难保住，西部地区的黔中、巫郡就不会再属于楚国了。秦如果这时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楚国北部地区也会断送。秦军攻打楚国，危难在三个月之内，而楚国等待各国的援救到达至少得半年，这势必等不到。再说，坐等弱国的援救而忽视秦国的威胁，这正是下臣为大王所担心的事情。

“秦国之所以十五年不出兵函谷关去攻打齐国和赵国的原因，在于暗中策划，有并吞天下的野心。楚国曾经跟秦国发生冲突。在汉中交战，楚国失败，丢了汉中。大王大怒，又发兵袭击秦国，在蓝田交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虎相斗哟！秦、楚两国厮杀，消

耗力量，韩、魏两国却用全力趁我们疲惫之后予以打击，没有比这更危险的计策啦。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秦国和楚国接境连界，本来是地缘亲近的邻国。大王如果能听取我的意见，我将让秦国太子到楚国做人质，楚国太子也到秦国做人质，把秦国女子做大王的姬妾，两国长久作为兄弟邻邦，一辈子互不攻战，岂不是很好吗？这对楚国来说，是上上之策啊！”

一席话说得楚怀王连连点头称是，马上同意与秦和好，并送走了张仪。屈原出使齐国归来，听说放走张仪，对楚怀王说：“前次大王被张仪欺骗了，这次张仪来，我认为大王定会煮死他；现在大王却不忍心杀死他，反而又听信他的邪说，这怎么行呢！”楚怀王又后悔了，赶快派人去追，但已经追不及了。唐代诗人崔道融在《咏楚怀王》一诗中气愤地指责郑袖说：“宫花一朵堂中开①，缓颊② 反为敌国谋。六里青山③ 天下笑，张仪容易去还来。”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全貌。

此后的数年中，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与利害关系的变化，楚怀王的外交策略摇摆不定，时而绝秦合纵，时而联秦反齐。

公元前 311 年，秦惠文王死，继位的秦武王不满意张仪的策略，加上秦国大臣们的攻击，张仪又被赶回了魏国。他在魏国当了一年相以后即死去。

这时候，齐闵王想当纵约长，怨恨楚国和秦国联合，便派使者送给楚怀王一封信说：“我担心您不曾考虑尊贵的称号呢。现在秦惠文王死了，武王登位，张仪逃回了魏国，樗里疾、公孙衍被重用，楚国却去服侍秦国。樗里疾跟韩国友好，公孙衍跟魏国亲善。楚国一定要服侍秦国，韩、魏两国害怕，一定要能通过他两

① 宫花一朵：指郑袖；堂中开：指郑袖插手国事。
② 缓颊：说情。
③ 六里青山：指张仪将六百里赖成六里事。

人请求跟秦国联合，那燕、赵两国也会跟着服侍秦国。四个争着服侍秦国，那楚国会降为秦国的郡县了。大王何不与我齐心协力拉拢韩、魏、燕、赵四国，跟他们结成合纵联盟，尊崇周王室，从而按兵不动，休养人民，号令天下？天下没有人敢不乐意听从，大王的尊名就可以成就了。然后大王率领各国一同讨伐秦国，就一定能打垮秦国。那时，大王夺取秦国的武关、巴蜀和汉中地区，垄断吴、越一带的富饶物产，独占长江、东海的利益，韩、魏两国割给上党，向西直逼函谷关，那楚国的强大比现在要超过百万倍了。再说，大王被张仪欺骗，丧失汉中土地，大军受挫于蓝田，天下没有不替大王心怀愤怒的。现在您要率先服侍秦国，希望大王考虑这件事。"

楚怀王看到齐王的信，犹豫不决，就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有的主张和秦国好，有的主张听从齐王的意见。昭雎对楚怀王说："大王即使从东方的越国夺取了土地，也不足以洗雪耻辱；一定要从秦国收回土地，然后才可以在诸侯间洗雪耻辱。大王不如深交齐、韩两国，以提高樗里疾的权位，这样，您就可以依仗齐、韩两国重要力量，要回秦国侵占的土地了。秦国曾在宜阳打败韩国，但韩国还要服侍秦国，因为韩王先祖的坟墓在平阳，而秦国的武遂离平阳只有七十里，因此特别害怕秦国。不这样，秦国进攻三川，赵国进攻上党，楚国进攻河处，韩国一定灭亡。楚国去援救韩国，也不能保证韩国不亡。韩国已经从秦国夺得武遂，以黄河、崤山为要塞，所要报答的恩德，没有再比楚国深厚的了，我认为韩国服侍大王一定很快，因为只有大王能保全韩国。目前齐国所以信任韩国，是因为韩公子昧担任齐国的国相。韩国已从秦国收回武遂，大王表示十分赞赏，使他们以齐、韩两国的实力去提高樗里疾的权位，樗里疾得到齐、韩两国的支持，他的主子就不敢抛弃他。现在又加上楚国给他的支持，樗里疾一定会向秦王进言，再次退还从楚国侵占的土地了。"楚怀王赞许这个意见，

没有和秦国联合，而跟齐国联合去亲善韩国。

秦武王野心勃勃，梦想做天子，他打算通过魏国窥测周室，因此主要进攻对象是魏国。公元前308年夺取了魏国的宜阳。第二年却因举鼎折断胫骨，伤重而死，其希望也就成了泡影。

秦武王死前，时年20岁的秦昭襄王即位，由宣太后临朝主持政事。宣太后名叫芈八子，是楚国人，不愿与楚为仇。这时秦丞相甘茂主持伐楚，但受到向寿等人的排挤，被迫逃到齐国。这样，楚秦矛盾有所缓和。

这一年，楚国乘此有利形势向东攻灭了越国。越国原来也是一个古老的诸侯国，相传其始祖是夏代国君少康的庶子无余，国都建于会稽（浙江绍兴），春秋末年逐渐强大起来，与吴国争雄。公元前496年吴越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之战越军打败了吴军，吴王阖闾重伤而死。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后立志报仇。过了两年，吴王夫差在夫椒（古代山名，在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之战中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忍辱求和。此后的二十年，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使越国强盛起来，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占有了吴国原有的大片土地。后又曾经称霸东方，向北扩展，所以越国的疆域很广阔。到战国初期，越国的势力大大衰弱。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曾北伐齐国。齐王派人对他说，伐齐不如伐楚有利。无疆便把兵锋转向楚国。结果楚军大败越军，并乘机消灭了越国，占领了越国的全部土地。

在宣太后实行联合楚国的方针下，楚秦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楚怀王二十五年，楚秦联姻，楚怀王派人到秦国迎亲，秦送给楚丰盛的聘礼。次年，楚怀王和秦昭襄王在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盟会，又将上庸地方还给楚国。楚秦关系更加巩固。

一年后，齐、韩、魏三国因为楚与秦友好违背了合纵反秦的盟约，就联合出兵进攻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去做人质，请求秦出兵支援。秦昭襄王便派遣客卿通领兵救楚。三国一见秦国

出兵，立即撤军而还。

到楚怀王二十七年，秦楚关系破裂，其原因是楚太子横在秦国与秦大夫私争斗，杀之后，逃回了楚国。

齐国趁此机会，联合韩、魏，再次进攻楚的方城。楚怀王派大将唐蔑率兵抵抗。双方在泚水两岸列阵，相持达半年之久，三国联军因不知泚水深浅，一直未敢贸然进攻。后来，三国联军找到当地渔夫探问泚水深浅，于是派出精锐部队乘黑夜从楚军重兵防守的浅水地带——垂沙强行渡河，发动突袭，把楚军打得大败。联军杀死了唐蔑，韩魏两国还分别攻占了宛县和叶县以北的土地。

这一次秦国不但没有出兵相救，反而乘楚国战败兵疲之机，于公元前301年派出华阳君芈戎和庶长奂率兵伐楚。经过大约一年的战斗，楚军大败，将士死伤二三万人，大将景缺战死。秦国还攻占了楚国的襄城。

秦军的胜利使楚怀王极为害怕。他于公元前300年又派太子横到齐国为人质，与齐讲和。公元前299年，秦军又攻占了楚国的八座城池。

楚秦两国前线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秦对楚占有明显的优势，楚急于求和，秦则希望能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夺取更多的地盘。在这样的形势下，秦昭襄王写信给楚怀王说："当初，寡人与君王相约为兄弟，在黄棘订立盟约，您送太子做人质，关系十分融洽。您的太子欺侮杀死我的重要臣子，不向我认错就逃回去，我实在压抑不住心头怒火，才派兵侵犯贵国的边境。现在听说君王派太子到齐国为质求和；但秦楚两国山水相连，历来互通婚姻，结成亲密友好的关系已经很久了。如果不和，就难以号令诸侯。寡人希望跟您在武关会晤，当面订约结盟。"

楚怀王看了这封信以后，疑虑重重，犹豫不决。去吧，怕被秦国欺骗，再受骗上当；不去吧，又怕秦昭襄王责备，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大臣昭雎说："秦是虎狼之国，有兼并诸侯的野心，他

们的话不可信，所以君王不能去，只要加强边境的防守就行了。”他的意见得到了三闾大夫屈原和许多大臣们的支持。但楚怀王的儿子子兰却劝父亲去，他说：“为什么要拒绝秦国的好意呢？”楚怀王为了谋求与秦的和解，使楚国在逆境中避免更大的损失，就决定冒极大的风险应约赴会。

秦昭襄王根本就没有来武关，却命令一名将军假冒自己率军队埋伏在武关。楚怀王一到，秦军立刻关闭武关，将楚怀王劫持到咸阳，不但不以对等的王礼接待楚怀王，反而强迫他以属国藩臣的礼节到章台去朝拜秦昭襄王。楚怀王大怒，深悔没有听昭睢和屈原的话。秦昭襄王要挟楚怀王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坚持要先订立盟约，秦昭襄王则要先得到土地。楚怀王愤怒地说：“你们欺骗我，又强迫我割让土地，我坚决不干！”于是，秦国扣留了楚怀王。

消息传到楚国，大臣们很着急，一起商量另立国君之事。有人说：“君王在秦国回不来，太子又出质到齐国，也回不来，只能立一位在楚国的王子了。”昭睢不同意，他说：“大王和太子都被困在别国，现在又违背王命另立庶子，是不合适的。”昭睢立即奔赶齐国，假说楚怀王已死，要求让太子回国继位。齐闵王召集群臣商议。有人说：“不如扣留太子，要挟楚国割让淮北之地。”齐国相说：“如果楚国另立王，我国扣留他也无用，而天下人说我不义，岂不是反为不美。”又有人反对说：“不然，如果郢都另立王，我国可以与新王提出交换条件，让楚给我淮北地，我为你杀死太子。否则，我将与秦、韩、魏等国共立太子为王。”大家意见纷纷，最后齐闵王还是采纳国相的意见，决定让太子横回国。

太子横回国后，被大臣们拥立为君，就是楚顷襄王。秦昭襄王见楚国又另立新王，要挟不成，非常生气，就于公元前298年，派兵出武关攻打楚国。楚军大败，五万多将士被杀。秦国夺取了析地（今河南西峡）及其附近十五座城。

次年，楚怀王乘看守疏忽的时候，从被囚禁的地方逃走，打算回到楚国。秦国很快发觉，封锁了所有通向楚国的道路。楚怀王害怕，就沿小道来到赵国，想借道回国。这时赵主父退居代地，赵惠文王继位不久，不敢得罪强秦，于是拒绝楚怀王入境。楚怀王便折回准备到魏国，却被追到的秦兵又捉回了咸阳。不久楚怀王发病死亡。楚人见到楚怀王的灵柩以后，如同死了亲戚一般，感到非常悲伤，也更加痛恨秦国。从此，楚秦关系断绝。

从张仪使楚到楚怀王客死于秦，前后共十八年。这十八年是楚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关头：与秦的交往中一再受骗；在与秦、齐、韩、魏的战争中一再遭受惨败；国土大片沦丧；兵力大大削弱而一蹶不振。其中楚怀王昏庸无能，不采纳陈珍、昭雎、屈原等人主张联齐抗秦的正确策略，而是听信了子兰、靳尚、郑袖等一般佞臣宠妃的话。屈原对这一时期昏君佞臣危害国家十分愤慨，他借谴责桀纣的昏愦表示对君王的不满。他抨击："想着贵人们的偷乐安逸，那道路黑暗而又危窄。""大家都争着往上爬而又贪心，偏偏都不满足于求索。"他愤怒谴责那些人无止境地贪求私利把国家引到昏暗和危险的境地。

如果说在此以前，楚国曾经具备与秦、齐抗争的势力，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失败以后，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秦、齐两个大国在东、西方争雄，再也无能为力了。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楚世家》、《张仪列传》。

《战国策》：《楚策》、《秦策》。

《离骚纂义》

屈原放逐

楚怀王在位期间，对秦、齐的斗争一再遭到挫折和失败，引起了楚国无数爱国志士的忧虑，他们为祖国的危亡担心，为人民的命运哀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楚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屈原本名屈平，字原。他的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他本是与楚国国君同姓（楚为熊姓）的贵族，楚武王的儿子瑕的后裔，因为瑕分封的采邑在屈地，古代的人往往以地为氏，以后姓氏不分，故屈原也就称屈氏了。

屈原的名字也是有来由的，据他在《离骚》中自述，他出生的那一年，属寅年，又恰当寅月寅日，相传这一天出生的人可算是真正的人。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平，“平”即平正，象征着天；字“原”，“原”即广平的土地，象征着地。这样，天地人三者就统一在他身上了。

当然，一个人出生的时日与取的名字都不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生活道路，但是，它却反映了屈原的父亲希望屈原做个真正的人，屈原也常以此勉励自己。自汉代以后，大家多采用他的字，屈平的称呼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了。

屈原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他读书用功，学识渊博，通晓国家盛衰兴亡的道理，擅长应酬交际的辞令，而且有理想、有抱负，品节坚贞。所以他在年轻时就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二十岁便

当上左徒[1]，在朝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接待宾客，办理对诸侯国的事务。地位仅次于楚国的最高官职——令尹。

当时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都较强大，都具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性。照当时的局势看，如果以秦国为首实行连横，天下就将统归于秦；但如果东方各国以楚为首实现合纵抗秦，楚就将成为天下统一的中心；屈原看到这点，打算努力实现以楚为中心联合抗秦，进而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他主张对内选贤任能，厉行法治，限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对外则实行合纵，联齐抗秦。

在公元前313年张仪第一次奉命来楚国之前，楚怀王对外曾经采取合纵策略，派屈原出使齐国，与齐结好，并联合五国合纵伐秦，还担任过反秦的纵长，对内授权屈原起草宪令，准备改革，使得楚国的政治局面一度有了起色。

屈原的才能和对内对外的主张，受到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妒忌和反对，他们千方百计排挤屈原，离间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有一次，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写好了草稿，还没能最后定稿呈上，上官大夫想夺为己有，遭到屈原的严辞拒绝，他就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王任命屈原起草法令，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每次发布法令，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是除了他别人都做不到。眼中完全没有大王，大大地妨碍了君王的威望。"楚怀王听了很生气，从此渐渐地疏远了屈原。

屈原与上官大夫的矛盾冲突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自吴起变法失败以后，楚国的严重问题，仍然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屈原的主张和吴起的变法基本精神是一致，矛头也是针对奴隶制旧贵族，客观上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以上官大夫代表反对屈原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奴隶主旧贵族的利益，反对屈原的

---

[1] 左徒：官名，为楚国特有的官职，是国王的近臣，参与国家政令起草和外交等工作。

政治改革。

不久，屈原被罢免左徒的官职，他感到改革无望，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又知道楚怀王对自己不信任，便离开了郢都，流浪于汉北（今湖北宜城、襄阳一带）。据传说，屈原这次被楚怀王放逐时，曾经回到过自己的故乡（今湖北秭归县乐平里）。在故乡，屈原有一个很贤惠的姐姐，名叫女嬃。听到屈原被放逐，她也回到老家来劝解他，全乡人都希望屈原能听姐姐的话，放宽心，所以当地取名为姊归。“秭”和“姊”同音，可以通用，也就是秭归来了。

在秭归一带，现在还存留着许多有关屈原的古迹：如屈原故宅、女嬃庙、捣衣石、照面井、玉米田等。这许许多多的古迹，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屈原的无限崇敬之情。而且在这些古迹中，还有许多带着神话色彩的传说。例如，乐平里有一块大约三亩左右的田地，被人称作“月形丘”，因为田形弯弯，就像初三晚上的蛾眉月。这块田里所生产的稻谷，颗颗雪白，晶莹剔透，就像玉粒一样，所以叫做“玉米田”，据说这粒粒玉米都是屈原的泪珠化成。那时，秭归一带的老百姓由于天灾兵祸和统治者的无情压榨，已经断粮绝炊，饥饿难挨，少壮流落四方，老弱死于沟壑。屈原回到家乡后，看到如此惨痛的场面，立即打开粮仓，把存粮全部分给了乡亲，救活了一些人的性命。然而，有限的粮食却无法满足一群一群络绎不绝的饥民。屈原看到这种凄惨的景象，好似揪心一般痛苦。他伸出双手，仰望天空，大声呼唤道：“先王啊，天神啊，您们的在天之灵，快睁开眼睛，看看楚国的黎民百姓吧！您们施些恩惠，拯救受灾的饥民吧！”屈原哀号着，痛哭着，他的泪水像一串串珍珠，连续不断地落到地上，润湿了这块土地，不久又聚集起来，随着阵阵旋风升到天空，接着又落到地面，沙沙作响。人们捧起一看，不禁悲喜交集，原来竟是一颗颗洁白如玉的大米。为了纪念屈原，从此人们称这块地为“玉米田”。

屈原在放逐的过程中，目睹着国势日衰，百姓生活痛苦，而自己又无力救国救民；回想楚王的昏庸以及那些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贪婪残暴，不顾国家安危，不顾民族危难的党人们的可恶行径，自己却无法拯救国家，实现政治抱负，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悲愤、抑郁的思想感情交织在一起，时时困扰着他。在这种沉重的心情下，屈原写出了诗篇——《离骚》。

《离骚》是一首自叙性的抒情长诗，全诗共三百七十三篇，二千四百九十字。题目“离骚”二字是遭遇忧患的意思。屈原在这首诗中反复表述了他的远大政治理想，充满着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疾恶如仇的思想感情和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屈原在诗中用各种比喻表明，要在楚国实现唐尧、虞舜那样的“美政”。他表示：

我并不怕自己的身子会要遭殃，
我怕的是君王的乘舆要被毁坏。
……
我长太息地禁不住要洒下泪水，
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
……
怨恨你，国君啊，你没能动脑筋，
始终不顾及人民的生活和愿望。

这些诗句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感情，展示了屈原立志改革的思想根基。后来，当他发现高尚的人变节并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时，便沉痛地哀叹说：

兰花、白芷变得不香了，
荃荪和蕙草也化为茅草了，
为什么从前的香草，
今天却简直变成了臭蒿艾呀？

为此，诗人决心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

合污，宁死不屈。诗中又写道：

我要把碧绿的荷叶裁成上衫，

我要把洁白的荷花缀成下裳。

没有人知道我也就让他抹杀罢。

……

只要我的内心是真正的芬芳。

我就是奄奄死去而魂离魄散，

也决不肯合乎流俗，屈节卑躬！

这些形象的比喻，动人的诗句，充分反映了屈原纯洁的心灵，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这是一个爱国主义政治家所具备的高贵品质。

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驱使着屈原坚持政治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的政治主张在诗篇中有明显的表现。诗中写道：

选择贤才，信任有能力的人，

遵循法度而不偏移。

还说：

美女们嫉妒我的蛾眉，

散布谣言说我淫荡。

这里是指上官大夫等人对他的嫉妒和诬害。因此，诗中还对上官大夫等人的丑恶灵魂进行了愤怒的斥责。他写道：

实在是世俗之人善于取巧，

违背规矩而随便改作。

背弃了正直而追求邪恶，

把竞相逢迎以求宠幸当成了常理。

然而在楚国的官场与贵族中，何止一个上官大夫！官吏们的种种歪风邪气，贪婪受贿，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丑恶现象俯拾皆是。屈原对此进一步揭露道：

大家都争着往上爬而又贪心，

偏偏都不满足于求索。

内心原谅自己，却去限制别人啊，

各自勾心斗角而又嫉妒。

……

想着党人们的偷乐安逸，

那道路黑暗而又危窄。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屈原是多么迫切地渴望一个横扫“党人”、“佞人”，贤能得用，法度修明，国强民富，蒸蒸日上的楚国出现啊！为此，屈原在诗中还借助女媭、灵氛等人的劝戒，一层一层地反复表明自己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坚定不移地坚持真理的意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前进的道路又长又艰险，他仍然要上天下地，不畏困难地去寻求解决困难的方法，从而表现了屈原在政治改革中所具有的英勇气概。屈原在《离骚》中除了叙述现实斗争外，还借助于神话传说和宇宙间奇丽的景象来抒发自己的悲愤，倾吐自己的忠贞和抱负，使诗篇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他使用凤凰拉车，以风、雨、雷、电、云、月做侍御，奔驰于苍穹，来往于宇宙。他忽而飞到了天国的门前，忽而攀上了世界的屋顶，忽而又跑到了两极的海边，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美政”、“天国”。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绘出了一组雄奇瑰丽的画卷，反映自己的思想情感，使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

《离骚》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后人常常将《离骚》作为楚辞的代表，或称楚辞为骚体诗。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屈原的《离骚》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国风》里的诗歌虽有对美色的爱慕，可不涉及淫乱；《小雅》里的篇章虽流露怨恨讥讽，但不主张暴乱。像《离骚》这首长诗，可说是兼而有之。诗中上古提到了誉帝，下世谈到了齐桓公、中古说及了商汤、周武，用历史事实来批评时政。阐

明道德内容的广博高深，政治治乱的条理系统，无不详尽体现。它的文字精约，语辞含蓄，志向高尚，品行廉正。它的文句写的虽是花鸟草木等细小事物，但它的意义却极其恢宏博大；列举的比喻虽是眼前近事，但体现的思想意义却很深远。

随着屈原的离去，楚国的改革也随之流产，联齐抗秦的策略也失败了，政治危机又笼罩着楚国的上空。

后来，楚怀王又想联合齐国，于是又重新起用屈原，并再次派他出使齐国。屈原回国以后，怀王任命他为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的职掌是督导屈、景、昭三家宗族，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做，不过是宫廷中一个近侍罢了。由此可见楚怀王对屈原仍旧不很信任。

秦国打算攻打齐国，由于齐国和楚国订立了合纵联盟，秦惠文王非常不放心，就派张仪假装脱离秦国，备了大量礼物来投靠服侍楚国。张仪对楚怀王说："秦国很憎恨齐国，齐国和楚国从亲，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楚怀王贪图土地则听信了张仪的话，就宣布和齐国断交，并派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使者说："我同楚王约的是六里，没听说过什么六百里。"楚使者发怒离开秦国，回来禀报怀王。怀王恼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秦国派兵迎击，在丹阳大败楚兵，斩首八万，俘虏了楚将军屈匄，乘胜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地区。怀王又动员全国兵力，深入进击秦国，在蓝田又被秦军打得大败。这时韩魏两国也乘机向南进攻楚国，一直打到邓邑（今河南邓县）。楚国腹背受敌，急忙撤军。齐国终因恼怒怀王不肯援助楚国，楚国大为困窘。

公元前311年，秦国要割让出汉中地与楚媾和。楚怀王说："不想得到土地，只要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到后，请求秦王让他到楚国，张仪一到楚国，马上用丰厚的礼物送给楚当权大臣靳尚，继而施展诡辩哄骗怀王的爱妾郑袖。楚怀王听信了郑袖的话，放走了张仪。这时屈原出使齐国回来，问怀王为什么不

杀掉张仪？楚怀王后悔，派人追赶张仪，为时已晚。

不久，秦昭王和楚怀王结为姻亲，要求怀王武关会晤。怀王疑虑重重，犹豫不决。屈原向怀王进谏说："秦国是虎狼一样凶暴的国家，是不能信任的，不如不去。"但怀王的儿子子兰却劝怀王前去，他说："为什么要拒绝秦王的欢心呢？"怀王终于去了。结果受骗被扣，终于客死秦国，使楚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楚顷襄王继位以后，任命他的弟弟公子子兰为令尹。楚国许多人都责备子兰不该劝怀王到秦国去不得生还。屈原不但同意这种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无论国君是否贤明，都想寻求忠臣来保卫自己，选择贤才来辅佐自己。然而弄得国亡家破的相继出现，而那圣明的君主，太平的国家却好多世代都见不到，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忠臣并不是忠臣，所认为的贤才并不是贤才。怀王因为不识忠臣的本法，所以在内被郑袖、子兰所迷惑，在外受到张仪的欺骗，结果军队吃败仗，国土被削割，自己也客死在秦国，遭到天下的耻笑。这是不识人的贤和不肖的祸害啊，怀王这样昏庸，哪可获得幸福呢！

这些看法逐渐传到子兰的耳朵里，他非常嫉恨屈原，极力排挤屈原。因此，在楚顷襄王面前挑拨是非，诬害屈原。楚顷襄王比他父亲更加荒淫无道，排斥忠良。他不分是非曲直，只听子兰的一面之辞，就罢了屈原的官，把他放逐到遥远的南方——荒凉的溆浦（今属湖南）。这样，楚国在失败的道路上就越走越远，终于无法自拔。

屈原从郢都出走，沿长江东下，一直到达陵阳（今安徽青阳南陵阳镇），经过一段时间后，溯江而上，到达鄂渚（今湖北武汉武昌），后向南折入洞庭湖，溯沅水抵辰阳（今湖南辰溪西南）。

当屈原行至今湖南江桃花港东岩的凤凰山腰时，发现一座楚王庙。庙内两厢的墙壁上画着天象、地理、山脉、河流等自然景物，还画有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等先帝的肖像以及许多天神鬼怪

和民间传说的故事，真是琳琅满目，十分丰富。屈原观看着庙内的壁画，回想着自己的不幸遭遇，满腔悲愤，心中塞满了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疑团：为什么人世间这样浑浊，而且是非不分？为什么忠贞正直的人没有好下场，而那些妒贤忌能的人却能够飞扬跋扈？人生在世究竟是应该忠诚老实，勤国爱民，还是应该阿谀奉承，同流合污？……屈原面对着如此纷杂的不解之谜，无法回答。于是，他想去询问上天。

第二天一清早，天边刚刚呈现出一抹鱼肚白，屈原便登上楚王庙的倚天楼。据说他头戴高冠，身穿长袍，手执宝剑，指向天庭，提出一连串问题，问得天帝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天帝忙令天将紧闭天门，让云神播浓云，雨师下暴雨，风伯放狂风，雷公电母各逞其威。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整个宇宙似乎都要毁灭。但屈原毫不退让，继续质问天帝。这时，在南海翱翔的一对金凤凰立即飞来，点燃松枝为他照明，张开翅膀为他遮雨；无数的人民群众簇拥着他，支持他的正义之声。屈原就这样一连问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天帝被迫收云住雨，太阳重放光明，人群中响起声震云霄的欢呼声，纷纷向他祝贺。随后屈原将提出的问题整理成诗篇，即为有名的《天问》。

后来，人们把楚王庙改建成天问台。据当地传说，每逢风雨交加的时候，在天问台上，还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屈原对天帝的质问声！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事，但它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屈原的深切怀念。

《天问》是屈原最奇特的诗篇。它从头至尾使用疑问语调，以四言为一句，共提出 172 个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天象方面的问题，例如，天的尽头在哪里？日月星辰附在何处？太阳从早到晚要行多少路？后羿到底是怎样将太阳射掉的？月亮为何有盈有亏？嫦娥是怎样得到不死之药，奔上月亮，安居于华丽的厅堂之上的？江河东流，为什么大海永远不满？大地呈椭

圆形，它的东西与南北各有多长？共工怒触不周山，东南方何以会倾斜？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充分表现了屈原对大自然奥秘的探索精神。

第二类是人类学方面的问题，例如，女岐没有丈夫，为何生有九子？尧说鲧不能治水，众人为何要推举他？鲧死后怎么变成黄熊跃入羽渊？简狄怎么吞尽了燕卵就生了契？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表现了屈原对华夏的起源的关心。

第三类是历史问题和天道问题，例如，伊尹如何接受了消灭夏桀的任务，最后使夏朝灭亡。上天既然命某君王治理天下，为何又派人取代他？为什么天命周占有殷商？为什么纣王自身已受到上帝的惩罚，商王朝命运仍然无法挽救，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展示了屈原对天道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由此可见，《天问》这篇长诗，涉及的内容极广，名为天问，实际上涉及到天上人间、大地万物、历史传说、宗教信仰、人生观念等各个方面，充分显示出诗人的渊博学识和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可以说，《天问》既是对历史、宗教的一种批判；也是勇于探索自然和追求真理的表现。它体现了战国时代人们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时代风貌。

不久，屈原又折道东进，到达了溆浦。溆浦位于湖南西部山区，这一带偏僻荒凉，山高谷深，几乎与世隔绝。这时的屈原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已是精疲力尽，也不想再走了，打算就留在溆浦。在这里的期间，屈原写了《涉江》一诗。“涉江”就是渡江而南的意思。诗中记叙了他从鄂渚到溆浦的行程。尽管当地偏远荒凉，但诗人仍然坚持斗争，毫不妥协。他写下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可怜我一生毫无乐趣啊，

孤零零独处山中。

我不能改变意志而随波逐流，宁愿一辈子不成为见风使舵的

“聪明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屈原听到了秦军攻陷巫郡的消息。如果不赶紧离开溆浦，就可能成为秦国的阶下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顺沅水东下，入洞庭湖，渡湘水，最后走到了现在长沙东北的汨罗江畔。

不久，秦将白起攻占楚国郢都。屈原听说后，痛感国家前途的黯淡无光；痛感楚国人民惨遭屠戮与颠沛流离之苦；痛感权臣当道，诬害忠良；痛感楚王不分忠奸，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一时千愁万恨，一齐涌上笔端。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了思乡的千古杰作——《哀郢》。诗中写了郢都人民流离失散的痛苦情景，记叙了自己离开郢都后流放以来的苦难历程，并以极大的热情倾吐了自己对故乡的无比思念之情。然后笔锋一转，愤怒地写道：

轻佻的谗佞之人一天天麇集在君王的身边啊，

贤良的君子们却只能远远地走开。

他把郢都的失陷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归咎于那一伙口是心非的佞人们身上，强烈地反映了诗人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公元前278年的一天，屈原披头散发缓步悲吟于汨罗江岸。他面容憔悴，体形枯槁。一位渔翁看见他，问道：“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弄到这般地步？”屈原回答道：“世人都是混浊的而我独干净；大家都昏醉而我独清醒，因此遭到放逐。”渔翁说：“有圣德的人不固执地对待事物而能与世推移。既然世人都是污浊的，何不也随其流而推其波？既然大家都昏醉了，何不跟着吃糟喝酒呢？为什么怀抱着美玉般的德操，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过，刚洗了头的人一定要弹弹帽子，才洗了澡的人一定要抖抖衣服，人们又有谁肯让自己清白之身，去受外物的污垢呢！宁可投身常流的江水，而葬身江鱼腹中，又怎么能让洁白的品德去蒙受世俗的污染呢？”于是，屈原怀抱石头自沉汨罗江而死，留给后人无限的惆怅和哀思。

屈原在自沉汨罗前不久，写下了临终前的绝命辞——《惜往日》。诗中概述了自己一生政治斗争的艰难历程，痛感祖国、人民的厄难与自己政治理想的难以实现，处此绝境，惟求一死，保持了他清白高洁的完美形象。他说：

面对沅水湘水的深渊啊，

我只好忍心投水而死，

我终于淹没了我的身躯并断绝了我的名声啊，

可惜受蒙蔽的君王始终不明白。

这首诗语言未加过多雕饰，明白易懂，自成一格。屈原的诗自称"贞臣"，直呼楚顷襄王为"壅君"。他想用自己的死和这样明白易懂的语言使楚王醒悟，表明诗人坚持国家民族利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而表现出屈原坚韧顽强，至死不渝的彻底战斗精神。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当时虽然被黑暗势力迫害致死，但他那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的思想情操，他那正确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他那雄浑飘逸的不朽诗篇却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堪与日月并存，永垂不朽。司马迁评述道："他心志纯洁，所以提到的都是芳香的事物；他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愿离楚国。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能自加洗濯，像蝉脱壳于浊秽泥土之中，而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被世俗的污浊所玷辱，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他的志趣和品质，即使与日月争比光明，也是很恰当的。"

后人永远敬爱这位伟大的诗人，相传农历五月五日是屈原投汨罗江的殉难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人们都用划龙船、吃粽子等方式来纪念他。划龙船是表现当年楚国人民抢救打捞屈原的情景，包粽子最初是投到江里祭祀屈原的。这个风俗也传到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屈原定为国际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并进行纪念。这说明屈原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也是受世界人民尊敬的伟大诗人之一。我们为祖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楚世家》。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

孟尝君相齐

齐闵王时期（前300—前284）的相国孟尝君，是战国时期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与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合称为战国四大公子。

孟尝君姓田，名文。他的父亲叫靖郭君田婴。田婴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弟弟。田婴从齐威王时候起任职掌权，在齐宣王时为相，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号靖郭君或薛公。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

起初，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田文是在五月五日由田婴的小妾生的。田文出生后，田婴告诉田文的母亲说："不要抚养他。"不料田文的母亲却偷偷地将他养活。等到田文长大，他的母亲通过她的兄弟向田婴介绍了她的儿子。田婴得知后，非常生气，斥责田文的母亲道："我让你丢掉这个孩子，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养活了他，是什么道理？"在旁边的田文急忙磕头，说道："您为什么要把我丢掉呢？"田婴气冲冲地说："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高得跟门户相等，会不利于他的父母的。"田文反问道："人的生命是由上天来安排的，还是由门户来决定呢？"田婴沉默不语。田文接着说："如果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的，您何必忧虑它；如果命运是由门户来决定的，那么加高那个门户就是了，谁能够达到那么高呢！"田婴愤愤地走出门去。

过了好久，田文趁机会又问他父亲道："您当权担任齐国相国，到今天经历三代国王了，齐国没有扩大，而您的私家积累却财富

万金，门下看不到一个贤能的人。我听说，将帅家门必有将帅，相国家门必有相国。现在您的姬妾穿着绸缎，而士人穿不上粗陋的衣服；奴婢吃不尽鱼肉，而士人吃不饱粗劣的伙食。现在您还在多积蓄、多储藏，要想把它留给不知道什么人，却忘掉了国家的事业一天天在削弱，我私自感到诧异。”田文的一席话，改变了田婴对他的看法。此后田婴越来越看重田文，让他主持家事，接待宾客。宾客一天天多起来，田文的名声传扬到各国。田婴死后，田文承袭了他父亲的封地，而且当上了齐国的相国。

孟尝君以好士闻名。战国时期的“士”是社会上一个十分活跃的阶层，数量比春秋时期大大增加，就他们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看，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制造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千方百计地反对改革，为复古守旧势力充当吹鼓手、打手、刺客之类，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另一部分则投身于地主阶级变法革新和谋求统一的事业中，适应历史潮流，成为地主阶级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孟尝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抬高自己的声望，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宾客、游士和有罪逃亡的难民，甚至有些鸡鸣狗盗的亡命之徒，他都收留下来，给他们安家乐业，供养生活。这种被供养的人叫门客，也叫食客。孟尝君的食客有几千人，他们的食用不分贵贱一律跟田文相等。孟尝君接待宾客，坐着交谈，屏风后面常有随从秘书，负责记录孟尝君同宾客的谈话。宾客退去，孟尝君就已经派出使者去慰问，赠送财物给他的亲属。孟尝君曾经款待客人夜餐，有个人遮蔽了烛光。客人发怒，以为饭菜不一样，不肯吃饭，要告别离去。孟尝君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菜跟他比较。客人一看，没有什么两样儿，很羞惭，随后自杀身死。由于孟尝君广收天下之士，并且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因此，天下士人很多都来归附他，他们都认为孟尝君亲近自己。

秦昭王听到孟尝君很贤能，便先派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要求会见孟尝君。孟尝君将要去秦国，宾客们都规劝他不要去秦国，他不听，有一个宾客叫苏代对孟尝君说："今朝儿我从外面来，看见木偶和土偶互相交谈。木偶说：'天一下雨，你就要毁坏啦。'土偶说：'我从泥土里产生，毁坏了就回到泥土里去。如果天下雨，漂流着你前进，不知道你的归宿在哪儿呢。'当今秦国是如狼似虎的国家，而您想前去，倘若不能回来，您能不被土偶讪笑吗？"孟尝君才作罢。

孟尝君担任齐国的相国以后，为了操纵力量较弱的诸侯国，迫使强国屈服，以便兼并土地，扩展势力，就采用近交远攻的合纵策略。本来楚和齐"从亲"，这时楚怀王和秦昭王结盟，违背了纵约；同时韩、魏由于秦国不断进逼，想投靠齐国，于是齐、韩、魏三国联合起来。孟尝君在合纵成功后，就向楚发动攻势。公元前301年，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yuān 渊）率领三国联军进攻楚的方城。两军夹沘水列阵，相持六个月之久，三国联军因为不知道沘水深浅，不敢渡河。后来向渔夫打听到楚国重兵防守处的沿河地带就是水浅的地方，而楚兵力少的沿河地带就是水深的地方，于是三国联军派兵在夜间从楚人重兵防守的浅水处渡河发动进攻，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大败楚国军队，杀死楚国将领唐蔑（或作唐昧），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境内）以北土地为韩、魏两国所得。

由于垂沙之役齐、韩、魏三国大胜，楚国受到很大的打击，楚国向齐屈服，派太子横为质，向齐国求和；秦国也恐惧起来，又派泾阳君为质，和齐国修好。到公元前299年，秦昭王早已仰慕孟尝君的贤能，就请他入秦为相。

秦昭王邀请孟尝君入秦为相的时候，有人就劝说秦昭王道："孟尝君虽贤能，但他是齐国的王族，如果他做了秦国的相国，一定会先替齐国打算，然后才替秦国打算，秦国就会危险啦。"秦昭

王不听。这时，赵武灵王正谋灭中山和攻略胡地，把王位传给王子何，即是赵惠文王。同时宋王偃也把王位传给太子，国力已比较强盛。赵国因为秦、齐两大国联合不利于己，因此想促使秦国免除孟尝君的相位，由赵国派楼缓入秦为相，派仇郝入宋为相。秦昭王不得已，就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并拘留了他，计议要杀掉他。孟尝君派人冒昧地见秦昭王的爱妾请求向秦昭王求情，赦免他的死。爱妾对来人说："我想得到孟尝君的白狐皮袍子。"这时孟尝君确有一件白狐皮袍子，价值千金，天下无双，到秦国后，把它奉送给了秦昭王，再没有另外的这种皮袍子了。孟尝君忧虑不安，问遍所有的宾客，没有谁能回答对策。这时有一个能做小偷的宾客，站起来说他能把送给秦昭王的那件袍子偷回来。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宾客潜入秦国王宫的仓库里，拿到了那件袍子。孟尝君把它奉送给秦昭王的爱妾。爱妾替他向秦昭王讲情，秦昭王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得以脱身，立即驾着车马飞快离开，更改通行证，改名换姓通过关卡。半夜里来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秦昭王后来反悔释放孟尝君，去找他，才知道孟尝君已经逃走，立即派人乘坐快车追赶。孟尝君驱车来到函谷关，关防法令规定鸡叫才许放旅客出关，孟尝君恐怕追赶的人马来到，一筹莫展。这时有个位居末座的宾客能够模仿鸡叫，他一叫，许多鸡也随之叫了起来，于是拿出通行证来出了关。出关约不足一顿饭的工夫，秦国追赶的人就来到关址，他们得知孟尝君已经出了关，便回去了。

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的平原君用客礼接待他。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出来看他，都笑着说："原先以为薛公是魁伟的样子，现在见到他，竟是一个矮小的汉子罢了。"孟尝君听到这些话，发火了。跟他同行的宾客跳下车来，连砍带打杀死了几百人，然后才离开。

齐闵王认为是他派遣孟尝君到秦国为相的，有愧于孟尝君。孟

尝君回来以后，便又任命他做齐国的相国，主持政务。

由于孟尝君被秦国迫害，险些被秦昭王杀死，因此，他非常怨恨秦国，准备用齐国的力量，协同韩、魏两国一道攻打秦国。齐闵王三年（前298年），齐国发动齐、韩、魏三国攻秦的战争，三国联军一直攻到了函谷关。这时，三国联军粮食缺乏，孟尝君想向西周①国借军粮。苏代劝孟尝君说："您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魏攻打楚国，取得了宛、叶以北土地，去加强韩国、魏国。如今又攻打秦国去加强它们。韩、魏南边没有楚国为害，西边没有秦国为害，那么齐国就危险了。韩、魏一定会轻视齐国而畏惧秦国，我替您感到危险。您不如让我国跟秦国深相交结，您不进攻，又不借军粮。您迫近函谷关不进攻，让我把您的意图对秦王说：'薛公一定不会打败秦国去加强韩、魏。他进攻秦国，是想要大王迫使楚王把东国②割让给齐国，然后秦国释放楚怀王，从而媾和。'您让我用这种办法施恩于秦国，秦国能够不受打击，而拿东国来让自己避免灾难，秦国定愿意这么办。楚怀王能够脱身，一定感激齐国。齐国得到东国就更加强大。那么薛邑可以世世代代没有灾祸了。"孟尝君说："好。"

当齐、魏、韩三国大军兵临函谷关时，秦国君也正在焦急地商议是否割地求和。如果割地求和，大臣们认为秦王必然会感到可惜；不讲和，咸阳必危。秦国害怕三国联军继续前进，秦王说："宁可割让土地，也不能使咸阳受到危险。"

不久，三国联军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秦国归还了从前攻取的魏的河外、封陵以及韩的河外、武遂，三国兵才退去。

接着，齐、韩、魏三国乘胜利的余威又向燕国进攻。获得大

① 西周：国名。周考王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姬揭（周考王弟），建都河南（今河南洛阳西），为战国时小国，前256年被秦国灭亡。
② 东国：指徐国。西周初期，为东夷的徐戎部所建，春秋时被楚国打败，归属楚国。

胜。覆灭了燕的三军，擒获了燕军的二将。

孟尝君联合韩魏两国，连年不断地向楚国和秦国进攻，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迫使强国屈服，不干涉他对外兼并，以便攻取宋国以及淮北的土地。但是，结果没有成功。

起初，有个叫冯欢的穷人，听到孟尝君爱好宾客，因无法生活，便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亲自接待了他，问他："先生远道来临，有什么指教呢？"冯欢说："听说您爱好士人，我就来了。"孟尝君又问他："你爱好什么？"他答道："没有爱好。"又问："你能做什么？"答道："不能做什么。"孟尝君鄙视地笑了一下说："你留下吧！"并把他安顿在三等门客里，给予普通食客的待遇，吃的是粗菜粗粮。过了十几天，孟尝君问客房所长道："那个客人干了些什么？"所长回答道："冯先生很穷，只有一把剑，还用草绳缠着剑把。"一天，冯欢倚着柱子，弹着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孟尝君听说后，对所长说："就给他鱼吃吧！给他二等门客的待遇。"过了一段时间，冯欢仍弹着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左右人都讥笑他，又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车子坐吧！给他一等门客的待遇。"又过了一段时间，冯欢仍弹着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还是回去吧！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家啊。"周围人听了都很讨厌他，说他贪得无厌。孟尝君了解他家有老母，于是派人供养他的母亲。从此以后，冯欢就不再弹唱了。

冯欢为什么要弹唱呢？原来冯欢本来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弹剑的目的是为了试探孟尝君是否真正赏识他。冯欢自信他的才能可以报答孟尝君对他生活的优厚待遇。

孟尝君担任齐国相国时，在恭邑受封一万户。他的食客有三千人，封邑的收入不够用来供养食客，于是派人到薛邑放债，以掠夺更多的财富。但是连年没有收成，借钱的人多数不能偿还利息，食客的供养将会不够，孟尝君忧虑这件事。有一天，他要派

人到薛地去收债，问在跟前侍候的人道："有谁熟习会计，能替我到薛邑去收债？"三千门客，平日养尊处优，这时面面相觑，默不作答。只有自称无能，平日受人嘲笑的冯欢答道："我能去。"孟尝君对冯欢说："宾客不知道我无德无能，不幸地来到我这儿的有三千多人，封邑的收入不够用来供养宾客，所以在薛邑放了些债。薛邑年岁没有收成，有些人不能偿付利息，如今宾客的食用恐怕不够，希望先生去索取那些欠款。"冯欢说："是。"临行时，他又问道："我把债收齐了，顺便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回答道："我这儿缺什么你就买什么，你看着办吧。"

冯欢赶着车子到了薛地，立即吩咐地方官员通知各债户前来合券。古代债券是合同式的借据，放债的人和借债的人各拿一份，合券就是双方来核对借据。这一天，冯欢杀牛宰羊大摆酒宴。薛城的老百姓都愁眉苦脸地拿着债券来核对，他们为还不起债而焦急，一看到杀牛摆酒的场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具有远见、敢作敢为的冯欢，为了替孟尝君收买人心，决定焚券。他拿着契约到席前验证，能够偿付利息的，跟他们约定期限；贫穷不能够偿付利息的，收缴他们的契约而后烧毁了它们。他把债券核对以后，立即假传孟尝君的命令，说道："孟尝君所以放债的目的，在于帮助没有资金的人去进行农业生产；其所以索取利息的缘故，是因为没有财物去供养宾客。如今对富裕的人约定期限还债，对贫穷的人烧毁契约废除这些债务。你们有这样好的主人，难道可以辜负他吗！"薛城的老百姓听罢，十分高兴，大家嚷着说："孟尝君真是我们的恩人啊。"

孟尝君听到冯欢烧毁了契约，恼怒地派人招回冯欢。冯欢回来后，孟尝君气冲冲地问道："我的食客有三千人，所以在薛邑放债。我们俸禄田地少，而人民还有很多不按时偿付他们的利息。宾客的食用恐怕不够，所以请先生去收讨那些欠债。听说先生得了钱就用来多多备办牛酒，又烧毁了契约，怎么回事？"冯欢回答说：

“您别生气，不多备办牛酒就不能全都集合，无从了解他们财力有余或者不足。有余的人，与他们约定了期限。而那些贫苦百姓实在还不起债，您留着这些债券也没有用，再过五年、十年，利钱越来越多，他们怎么也还不清，如果逼急了，他们就会远走他乡，用逃亡的办法摆脱这些债务。如果逼得太急了，终究没有东西来偿还，上面会认为您贪好财利，不爱惜士人和百姓，下面会落得背离和触犯长上的罪名，这不是勉励士人和百姓，显扬您的名声的做法。您说过，要我看您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我看到您家里高屋大厦收藏着那么多的珍宝，您玩弄的狗马成群，伺候您的美女来来往往，出出进进，样样不缺，所缺的就是给老百姓做好事，使人民拥护您。所以我用债券买回了人心。”孟尝君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冯欢接着说：“您现在只有薛城这么一块小小的封地，您对百姓们不但不爱护，反而不顾他们的死活，发放大量的高利贷在他们身上谋取重利。我这次烧毁了无用的空头债权契约，放弃不可能收到的空头帐目，让薛邑人民亲附您，从面显扬您的仁爱的名声。老百姓非常感激您，激动地谈论着您给他们的恩德。我用债券给您买回了义啊！”孟尝君听了虽也觉得有点道理，但是仍不满意。既然木已成舟，只得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说：“先生，你算了吧。”

过了一年，齐闵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又听信了一些流言蜚语，就罢了他的官。这时，众宾客看见孟尝君被罢免，都纷纷离开了，只有冯欢等少数人跟着他。他们一起跟着孟尝君到封地薛城去。当他们一行走到离薛地一百里左右的地方时，只见薛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他们。孟尝君看到这种动人的场面，连忙回过头来对冯欢说：“这就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心呀！我今日终于见到了。”

冯欢更进一步为孟尝君谋划，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对孟尝君说：“机灵的兔子有三个窝儿，您至少也得有三个能安身的

地方才好，您现在只有一个薛城，应该再找两个地方。”冯欢想奔走于齐国、秦国之间，为孟尝君活动，使齐闵王重新起用孟尝君。

冯欢乘着马车，带着孟尝君给他的礼物，便西行说秦国去了。冯欢见到了秦昭王说道：“天下的游说之士驾着车马奔忙西行来到秦国的，没有谁不想要加强秦国而削弱齐国，驾着车马奔忙东行去到齐国的，没有谁不想要加强齐国而削弱秦国。这两个国家必须一决雌雄不能并列称雄，优胜的就能统一天下啦。”秦昭王问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秦国不做劣败者呢？”冯欢回道：“大王也知道齐国罢免孟尝君的事吧？”秦昭王说：“听到了这件事。”冯欢说：“使得齐国被各国重视的，是孟尝君。如今齐王由于毁谤免了他，他心里怨恨，一定背弃齐国。如果他背弃齐国，来到秦国，那么齐国的真实情形，君臣下上的内幕，会全部泄露给秦国，齐国的土地可以取得，难道只是称雄吗！您可迅速派遣使者装着礼物去秘密迎接孟尝君，不可失却了时机呀！如果齐国觉悟了，再任用孟尝君，那么优胜劣败各在哪边，就不可预料了。”秦昭王听后非常高兴，便派遣十辆车子带着百镒黄金去迎接孟尝君。冯欢告别秦昭王先走了，回到齐国后，马上拜见齐闵王，同样劝他说：“天下的游说之士驾着车奔忙东行来到齐国的，没有不是想要加强齐国而削弱秦国；驾着车马奔忙西地去到秦国的，没有不是想要加强秦国而削弱齐国。秦、齐是必须一决胜负的国家，秦国强些，那么齐国就弱，这种形势是不能并列称雄的。现在我私下听说秦国派遣十辆车子装着百镒黄金来迎接孟尝君。孟尝君不西行就罢，如果西行去担任秦国的相，那么各国就会归附它，秦国就会成为优胜者而齐国就成为了劣败者。处于劣败者的地位，那么临淄（齐国都城，今山东淄博东北）和即墨（齐国邑名，当时为齐国重要城邑，今山东平度东南）就危险了。大王何不抢在秦国使者没有到达的前头，恢复孟尝君权位，并多给他田地去向他道歉？孟尝君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秦国虽然是个强国，难道可以请去别人家

的相么？我们应当挫败秦国的阴谋，粉碎它的称霸逞强的策略。”齐闵王说：“好。”便派人到边境迎候秦国的使者，想证实此事。秦国的车子刚好进入齐国边境，齐闵王的使者回转车马飞快报告，齐闵王召回孟尝君恢复他的相国职位，并归还他原封邑的田地，又增加一千民户食邑。秦国的使者听到孟尝君又担任了齐国的相国，掉转车子回去了。

自从齐闵王听信毁谤而罢免了孟尝君，众宾客都离开了。后来齐闵王召回并恢复了孟尝君的官爵，冯欢去迎接他。还没有到达齐国都城，孟尝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一直爱好宾客，对待宾客不敢有一点差错，食客有三千多人，先生是知道的。宾客看到我被罢免，都背弃我走开了，如果有再来见我的，一定要对着他们的脸吐唾他们三口，狠狠地侮辱他们一顿。”冯欢听到这儿，驻马停车，向孟尝君跪拜行礼。孟尝君下车扶起他，说道：“先生是代替宾客道歉吗？”冯欢说：“不是代替宾客道歉，而是为着您的话说错了。事物发展有它的必然归宿，人情世态有它的本来面目，您懂得这些道理吗？”孟尝君说：“我不懂先生的意思。”冯欢接着说：“有生命的东西一定有死亡，就是事物发展必然归宿；富贵者有很多门客，贫贱者很少有朋友，就是人情世态的本来面貌。您难道没有看见那些赶集市的人吗？早晨，偏斜着肩膀争夺入口挤进去；太阳下落之后，经过集市的人们，甩着胳膊走过去，看也不看一眼。他们不是爱好早晨而厌恶傍晚，而是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在那里已经没有了。您今天失去了职位，宾客都离开，不该因此埋怨士人，从而徒然断绝了宾客的来路。希望您照旧那样对待宾客。”孟尝君连连说道：“我恭敬地听从先生的指教。”

孟尝君担任齐国的相国以后，他的家臣魏先生又替孟尝君去收取封邑的租税，三次往返而没有一次得到财物。孟尝君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道：“有个贤德的人，我私自用您的名义给他了，因此没有带回财物。”孟尝君生气地斥退了魏先生。

过了几年，即齐闵王七年，有人对齐闵王说："孟尝君会要作乱。"不久，就发生了贵族田甲用暴力劫持齐闵王的事件，即所谓的"田甲劫王"。齐闵王心中怀疑此事与孟尝君有关，孟尝君无奈出逃。魏先生赠送了粮食的那个贤德的人听到这件事后，便报告齐闵王说明孟尝君不会作乱，请求用生命作保证。随后在王宫门前自刎以证明孟尝君无罪。齐闵王这才吃了一惊，便去调查了解，孟尝君果然没有反叛阴谋，便又召回孟尝君。孟尝君趁此托病请求辞官，回到薛邑去养老。齐闵王答应了。

后来齐闵王更加骄慢，不放心孟尝君，想要排除孟尝君。孟尝君恐惧，便前往魏国。魏昭王用他做了相国。

这一年，秦国免除赵武灵王的宠臣楼缓的相位，改用穰侯魏冉为相。齐国为了与秦结交，也跟着改变策略，采取祝弗的计谋，驱逐亲魏大臣周最，改任秦的五大夫吕礼为相国。齐、秦怀着各自的目的，相互联合起来。秦国为的是便于攻略韩、魏的土地，齐国为的是便于灭亡宋国。

这时候，苏代对孟尝君说："周最对于齐国，关系极为密切，而齐王驱逐了他，去信任祝弗，任用吕礼为相，其目的是想要交结秦国。齐国和秦国联合，那么祝弗和吕礼就会更受重用，而齐国和秦国一定会轻视您。您应该破坏秦、齐两国的联合。"孟尝君听从了苏代的策略，因此吕礼嫉恨并想加害于孟尝君。

孟尝君任魏国的相国以后，在魏国大反齐国，他曾和赵将韩徐为一起计划伐齐。齐闵王十四年，赵梁率赵军攻齐，次年韩徐为再率赵军伐齐。同时燕昭王也正在纠集群臣谋划，准备等待齐兵在攻宋前线失利时，进而攻齐。齐闵王得知后，被迫暂时从宋撤兵。齐闵王十五年，齐国吞并了宋国，兼有宋以前所取得的楚淮北地，一时声势很盛，直接威胁到了三晋和楚，并且使秦国也感到不安。当时，秦国的策略摇摆不定，既想操纵齐国，领导合纵伐齐，又派了吕礼入齐为相，和齐连结。孟尝君看到这种情况

后，给秦国相魏冉一封信，写道："我听说秦国想要由吕礼来交结齐国，齐国是天下的强国，您一定会被轻视了。齐、秦两国互相联合去对付三晋，吕礼一定会兼任齐、秦两国的相，这就等于您交通齐国而加强了吕礼的地位。假如齐国免除了各国的军事威胁，它一定会深刻地仇视您。您不如劝说秦王进攻齐国。齐国失败了，我愿意把所取得的土地送给您，齐国失败了，秦国畏惧三晋的强大，秦国一定会重用您去交结魏国。魏国被齐国挫败，又畏惧秦国，魏国一定会借重您来交结秦国。这样，您打败齐国建立了功劳，倚仗魏加强了地位，并扩大了自己的封邑，秦、魏两国就会共同重视您。如果齐国不遭挫败，吕礼再被重用，您一定会非常困窘。"魏冉听从了孟尝君的话，向秦昭王建议进攻齐国。齐闵王十七年，以秦为首的合纵五国大举伐齐，孟尝君极力主张魏参加合纵，攻打齐国。齐国经这次打击后，急剧走下坡路，再没有争强的力量了。

孟尝君在齐国为相先后达三十年之久，没有什么出色的功绩。相反，他却在政治上结党营私、大肆专权，弄得"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经济上，他封万户于薛，征收万户的租税，还大放高利贷，残酷盘剥人民，把农民榨取得无衣无食。而他却豢养食客三千多人，还招引天下的力士侠客来到薛邑达六万多家。同时他还挖空国库以肥自己。他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搞得朝政混乱不堪。军事上，采取远攻近交的错误军事策略，连年对外攻伐，以获得邻国支持来巩固自己在齐国的地位，从而耗尽国力而一无所获。难怪荀子把他和赵国的奉阳君列为"篡臣"，认为这种篡臣结党营私，专门惑乱君主而谋取私利。

到了齐襄王（前 283—前 265）时，孟尝君因病死。他的许多儿子争着继位，于是齐国和魏国一道灭掉了薛邑。孟尝君断绝了继承者，没有了后代。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孟尝君列传》。

《战国策》

《荀子》

齐闵王灭宋

刘向在《战国策·叙录》里说战国时："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宋就是五个千乘国之一。

宋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的后代。周灭商以后，武庚作乱，周公诛武庚，命微子启代替武庚，接续商的后代，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国号为宋。

春秋时，宋国曾一度强大。春秋五霸的霸主，其中一种说法认为宋襄公（前653—前637）是五霸之一。

到了战国时期，在几个二等诸侯国里，宋和中山又算是大国。宋兼并了淮泗的一些小诸侯发展起来。以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来看，宋国东到今江苏徐州西部地区，南到今安徽宿县，西到今河南商丘地区西部，北到今山东荷泽定陶一带，地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与齐、楚、魏等大国接壤，号称五千乘之国，有陶邑这样著名的都市。

春秋战国的时候，宋国与其他诸侯一样，也曾发生过卿大夫夺取政权的事，不过时间比较迟些。韩非子曾把"司城子罕取宋"和"田成子取齐"相提并论，又曾把"戴氏夺子氏于宋"和"田氏夺吕氏于齐"相提并论。所以说，到后来被齐灭亡的宋国已经不是子氏而为戴氏。

从春秋战国之际宋昭公算起，昭公四十七年去世，儿子悼公即位。悼公八年去世，儿子休公即位。休公二十三年去世，儿子

辟（又称璧、璧兵、辟兵，即宋桓侯）公即位。辟公三年去世，儿子剔成即位。据说，辟公是很奢侈荒唐的，曾大兴土木，建造苏宫，剔成虽为父位子继，但也经过一番斗争。剔成所以能夺得政权，据韩非子说，是由于“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由于戴氏夺取了宋国的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宋国逐渐富强起来。剔成四十一年，他的弟弟偃袭击他，他失败出奔齐国，偃自己登位做了宋君。

不过，宋国只是战国诸侯中的二等国，国力不及周围的齐、楚、赵、魏等强大国家，因此经常受到这些邻近大国的攻伐。宋国为了求得生存，有时在受到一个大国攻击时就向另一个大国求援，有时也和一个大国一起攻击另一大国。

由于宋国地处中原，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富饶，齐、楚等国一直想并为己有。秦远离宋，秦强大以后也觊觎宋国。

齐国早在孟尝君相齐时就有灭宋之心。孟尝君为了要操纵力量较弱的诸侯国，迫使强国屈服，以便兼并土地，扩展势力，就采用近交远攻的合纵策略。本来楚和齐“从亲”，这时楚怀王和秦昭王结盟违背了纵约；同时韩、魏由于秦国不断进逼，想投靠齐国，于是齐、魏、韩三国联合起来。孟尝君在合纵成功后，向楚发动攻势，在垂沙大败楚军。由于垂沙之役齐、韩、魏三国大胜，楚国向齐屈服，派太子为质，向齐国求和；秦国也恐惧起来，派泾阳君为质，和齐修好。到公元前 299 年，秦就请孟尝君入秦为相了。

这时，赵国害怕秦、齐两大国联合不利于己，促使秦国免除孟尝君的相位，由赵国派楼缓入秦为相，派仇郝入宋为相。由于赵国的“结秦连宋之交”，促成了秦、赵、宋三国和齐、韩、魏三国两个对立集团的形成。

公元前 298 年，齐、韩、魏三国便大规模进攻秦国，前后三年之久，终于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接着齐、魏、韩三国

乘胜利的余威又向燕国进攻，获得大胜，覆灭了燕的三军，擒获了燕的二将。

这时期孟尝君联合韩魏两国，连年不断地向楚国和秦国进攻，目的在于迫使强国屈服，不干涉它的对外兼并，以便攻取宋国以及淮北土地。正如苏秦说的："薛公相齐地，伐楚九岁（当作五岁），攻秦三岁，欲以残宋，取淮北。"

不久，齐国就大举攻伐宋国。宋国向楚求援，楚王答应出兵援助。宋国本来是想依靠楚国的力量，迫使齐国与宋谈和，不要进攻宋国。齐国不听。苏秦受宋国之命到了齐国，对齐王说："大王不如与宋国和好，以表明宋国不是真心实意地想求楚国以对付齐国。楚国听说齐、宋和好，必然大怒，一定会拒绝援助宋，而与齐国和好。齐、楚联合，那么攻打宋国就易如反掌了。"齐国还是不听。

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又进攻宋国，宋急派臧子到楚国，向楚求救。楚国听说后非常高兴，满口答应了。臧子看到楚王这么痛快地答应，心里想楚王一定另有打算，所以在返回宋国的路上闷闷不乐，一言不发。给他驾马车的御卒看到了臧子忧愁的样子，就问道："您求得了楚军的救兵，为什么还不开心呢？"臧子答道："宋国弱小而齐国强大，楚国救了小宋而得罪了强齐，这是我最担忧的。楚王这样痛快地答应出兵救宋，就会使宋国盛而不衰，而使齐国受到损失，那么楚国就会从中得到好处。"臧子还没能回到宋国，齐军就攻克了宋五座池城，大胜而回。

宋君偃即位后，为了使宋国成为"五千乘之劲宋"，大力推行"王政"，不断增强宋国的势力。早在君偃十一年（前318）的时候，他便和其他各国诸侯一样"自称为王"，是为宋康王。随后积极对外扩展，东面打败齐国，夺取五座城池。南面打败楚国，夺取土地三百里。西面打败魏国军队。灭滕国，伐恭地，攻取了楚的淮北地区。

到了公元前 295 年，秦国免除了楼缓的相位，改用魏冉为相。齐国也跟着改变策略，采取祝弗的计谋，驱逐周最，改任秦的五大夫吕礼为相。这时孟尝君已做了魏昭王的相。齐、秦怀着各自的目的，相互联合起来。秦国为的是便于攻略韩、魏的土地，齐国为的是便于灭亡宋国。

不久，齐国将要派兵攻伐宋国，秦国和楚国听到后极力反对。齐国想与赵国联合，赵不听从。这时魏昭王通过赵国奉阳君李兑的关系，入赵朝见赵惠文王，把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阴成两地献给赵惠文王作为"养邑"，又把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姑密（今河南河阳附近）两地献给奉阳君，作为奉阳君儿子的封地。于是魏国投入赵的怀抱。赵国则想联合魏国一起攻宋，因此不想与齐国联合，攻打宋国。赵国想独自占领宋国。

正在这时，宋国发生了内乱，宋太子失败出走。原来宋君偃把王位让给了太子，太子与偃不和，出走后宋王偃又恢复了王位。但宋国"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内部很不稳定。宋国的定陶是当时中原最繁荣的都市，素来为各大国所垂涎。这时齐国想灭宋，赵的奉阳君李兑和秦的穰侯魏冉又都想取得定陶作为自己的封地，而魏相孟尝君想得到宋的平陵为封邑。因此，赵、魏出于各自的目的，都和齐争宋地。

由于赵国不听从齐联合攻宋，于是齐国派公孙衍到赵国，对李兑说齐国答应攻取宋国后把定陶给他，希望他与齐联合攻宋。这时苏秦对齐王说："我准备联合三晋各国攻打秦国（指后来的五国攻秦），不是为了毁灭秦国而使得齐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目的是为了使齐国灭亡宋国。宋国置太子为王，现在太子出走，那些太子周围的党徒们，都有为太子拼死的决心，所以宋国很乱。如果趁这机会再去攻伐宋国，宋国必定会亡。我还替您让公孙衍对奉阳君说：'您已年事很高了，封邑可不能不打算。齐国为您考虑，除了宋，其他国家都不可。秦人贪鄙，韩、魏危险，燕、楚辟远，

中山之地薄，哪个都比不上宋的陶邑。如果您失去现在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宋国罪重，齐国怒深，残乱的宋国，早是齐国吞并的对象，您若能助齐国攻宋，必会得到陶邑，而成百代之业。'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奉阳君是非常想得到陶地的。我希望大王发兵攻宋国，以满足奉阳君的愿望。"

不久，齐国又想攻打宋国，秦国听说后派起贾到齐国阻止齐国。齐国于是派人去赵国，希望与赵国联合攻宋。秦昭王听到后大怒，非常怨恨赵国。这时，李兑组织五国合纵伐秦，但由于五国各有打算，貌合神离，军队停留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荥阳西北）而不前进。李兑虽出面组织了五国伐秦，但他一直想得到宋地陶邑为封地，所以合纵组织起来以后，对秦国的行动很迟缓。赵国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一时机与齐国争宋地，更有害的是，赵还是退出合纵与秦联合伐魏。魏昭王对此非常气愤，派人去齐国，对齐王说："我替您对魏王说：'三晋各国都害怕秦国，如今五国合纵伐秦，为的是赵国。赵初约伐秦，今又暗地里和秦勾当，如果五国伐赵，赵国一定会灭亡。秦国驱逐李兑，李兑必死，如今伐秦就是救李兑，免他死。现在赵国的军队停驻在成皋，暗地里与秦联系，让秦国攻打魏国以实现李兑受封的目的，那么大王又得到什么好处呢？'魏王听到这些话，一定会没有什么好讲的。我请求为您将对魏的怨恨转移到赵国身上，希望您暗地里与赵和好，又不让秦国发现。秦国见到后一定也会与赵和好。齐、秦都与赵国和好，燕、韩也一定与赵国和好。"

本来齐国参加五国伐秦的真正意图是想利用五国伐秦之机，达到兼并宋的目的。而这时的合纵、连横的形势又很复杂，不少大国的大臣和纵横家参与合纵、连横的活动。魏相孟尝君和赵将韩徐为是主张连横伐齐的。赵相奉阳君是主张合纵伐秦的，秦大臣吕礼和曾为齐相的韩珉都是主张齐、秦联合的，做过魏相和齐相的周最又是主张魏、齐联合而反对齐、秦联合的。齐闵王忽而

与赵联合发动合纵攻秦，忽而与秦联合攻赵，目的都是企图防止秦、赵等国对它的扩张领土进行干涉，造成攻灭宋国的有利形势，以达到其取得陶邑等大商业城市的目的。这样，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形势与齐国灭宋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这时韩珉献书齐闵王，请求重新与秦联合，以便乘机攻取宋国，进而攻破三晋和楚。苏秦在跟齐闵王讲联合攻秦与伐宋的利害关系时，劝说齐王只有在五国合纵攻秦胜利以后，才能造成攻伐宋国的有利形势。但齐王不听苏秦的劝说，公元前286年，齐闵王任韩珉为相，在五国攻秦期间，发动攻宋。

这时期宋国内部统治衰弱，国力不足。宋康王在位很久，他急于想成为天下霸主，荒淫暴虐，大肆杀戮，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他用牛皮袋盛着血，悬挂起来用箭射，说是“射天”。要宫内宫外，国中人都呼他万岁。他沉溺于酒色，大臣们有进谏者，就被射死。这就惹怒了齐国，骂宋康王是“桀宋”，说“宋国又会干纣王干过的事，不能不杀。”同时，宋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分崩离析，不仅曾经继任为王的太子出走，而且由于相国唐鞅争权，发生了驱逐太子的事件。接着唐鞅又被宋康王杀死。

秦昭王听到齐国攻打宋国后，发怒说：“我爱宋国和爱韩的新城（今河南商丘南）、卫国的阳晋（今山东西城东北）一样，韩珉和我是好友，却进攻我喜欢的地方，这是为什么？”苏秦替齐国向秦王解释说：“韩珉进攻宋国，这样做是为了秦王。齐国强大，用宋国来辅助，楚国、魏国一定害怕，害怕就一定向西侍奉秦国，这样，大王可以不费一兵，不伤一卒，轻而易举地夺取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这就是韩珉之所以祈求于大王的啊！”秦王说：“我担心齐国令人捉摸不透，一时搞合纵，一时又搞连横，这又怎么解释？”苏秦回答说：“天下各国的命令齐国能知道吗？齐国已经攻占宋国，它知道侍奉秦国是需要用万乘之国的力量来装备自己；不向西侍奉秦国，宋地就不得安定。中原各国老奸巨猾的游说之

士都挖空心思离间齐、秦联盟，车辙交错向西行驶的车队中，没有一个说齐国的好话，车辙交错向东行驶的车队中，没有一个说秦国的好话。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都不想让齐、秦联合。怎么晋、楚如此聪明，齐、秦却愚蠢起来了！晋、楚联合必定商议破坏齐、秦联合，齐、秦联合必定打晋、楚的主意，请大王按这个原则处理事情。”经过苏秦的一番劝说，秦昭王被说服，不再干涉齐国攻宋了。

当齐国大军进攻宋国时，宋康王派人侦察齐军的动向。派出的人回来报告康王说齐军已很近了。国人非常惊恐。左右大臣对康王说：“宋国的强盛，齐国的弱小，怎么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康王听后大怒，下令杀了告信的人。然后又派人去观察齐军的动向。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齐军已经很近了，康王又大怒，下令杀死了那个人。这样前后共杀死了三个派出的人。然后又派人去刺探齐国动向。这个人半路遇到他的弟弟，他对弟弟说：“国家已经危险到了这种程度，派出前几个打探齐军动向的人都被康王杀死了，现在报告齐军动向的是死，不报告也是死，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他的弟弟说：“你就回去对康王说没有看到齐军，国人安定无事。”这个人回去后果然这么说了，康王听后大喜，左右大臣都说：“前几个死的，都活该。”不久，齐军就攻入宋境，所向披靡，宋军不堪一击，宋康王逃到魏国，死于温（今河南温县北）。

齐国自孟尝君相齐以来先后多次对宋发动进攻，终于吞并了宋国，这是齐国国势向上发展的顶点。齐国从而吞并了宋国淮北地区，等于增加了一个齐国的力量。

不过，齐灭宋也得罪了其他诸侯国，引起它们的不满。齐国灭宋，使齐国成了当时国际上的众矢之的。只过了两年，各国就组成了六国攻齐的合纵，齐国几乎亡国。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韩非子》

《战国纵横家书》

乐毅伐齐

乐毅伐齐是战国时期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燕国为什么攻打齐国呢？燕、齐之仇，由来已久，这里还得从燕王哙时说起。

公元前四世纪末期，燕王哙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引起燕国大乱。齐国乘机派兵攻燕，仅用五十天时间就攻占了燕国都城。由于齐国军队非常残暴，燕国人民群起反抗，再加上各国对齐国的干涉，齐国被迫撤兵。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即位，是为燕昭王。

燕国原是战国七雄中较弱的国家，这次齐国的占领，对燕国是很大打击，国家残破不堪，人民饱受灾难。燕昭王（前311—前279）即位后，决心复兴燕国并报齐国武装干涉之仇。后来苏代和昭王一次谈话里讲道："我听说大王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常常想着如何报齐国的仇。"昭王说："我对齐国有深仇大恨。我想攻伐齐国，但是，我感到燕国国力还很疲惫，力量不足。"从这段对话里，可见燕昭王报仇的心切。

燕昭王为了报仇雪恨，他设法求得贤臣良将，无论是"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还是了解齐国险阻要塞、君臣之间关系的人，以及善于用兵的人，他都以十分恭敬的态度、隆重的礼节去招揽他们。燕昭王去见贤士郭隗（kuí 葵）。他对郭隗说："齐国乘燕国内乱，偷袭和攻破了燕国，我很知道燕国力量薄弱，不能够报仇。要是能够求得贤士和我一起治理国家，就能洗刷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郭隗告诉昭王应该如何才能求得贤士。他说："如

果大王向着东面盛气凌人地求臣，只能是干苦力、服劳役的人来；如果向着南面也不失君臣的礼仪求臣，那会是有一般才能的人来；如果向着西面十分恭敬十分虔诚地求臣，那就会有很有才德的人来。有贤臣辅佐，可以王、可以称霸。”郭隗让昭王真诚实意求贤士。他还对昭王讲了一个用重金买死马后来果然买得千里马的故事。他说：“古时候有个想拿千金高价买千里马的国君，买了三年也没有买到。一个侍臣对这位国君说：‘请允许我去找一下吧！’国君就派他去了。三个月便找到一匹千里马，但这马已经死了，他就用五百金买了马头，回来献给国君。国君大怒说：‘我想要的是活马，怎么会要死马，白费了我五百金？’侍臣回答说：‘死马都用五百金买下它，何况是活马呢？天下人一定都认为您善于买马，千里马眼看就会送上门来了。’于是，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三匹。”郭隗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让燕昭王明白，只要真心实意地重视人才，就一定会得到天下贤士。之后，郭隗又接着说：“大王想招揽贤士，我愿意为天下之士开路。”意思是让昭王在他身上做出一个样子。从此，昭王对郭隗很尊敬，为郭隗修筑宫室，在三年的长时间里，常让郭隗向着南面的上座坐。

燕昭王为了招揽贤士，还在易山（今河北易县）脚下盖了一座高台，里面堆着黄金，作为求得贤士的用费，这座台就叫黄金台。当时不少有才干的人应招到了燕国。

邹衍从齐国游说诸侯来到燕国。昭王知道邹衍是个贤士，对邹衍十分尊敬。昭王用衣袖裹着扫把一边退走一边扫地接他。昭王坐弟子的位置请邹衍给他授业，还为邹衍筑碣石宫，昭王亲自去师事邹衍。此外，还有从赵国来的剧辛、从卫国来的屈庸、从魏国来的乐毅。其中乐毅最受昭王重用。

乐毅的先祖叫乐羊，乐羊担任魏文侯的将军，攻占中山有功，魏文侯将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赐封乐羊。乐羊死后，葬在灵寿，从此，子孙就居住在那里。乐毅很有军事才能，最初由赵人

推举在赵国做官，到赵武灵王被围困饿死沙丘时，他就离开赵国到魏国去了。后来他作为魏的使者来到燕国，燕昭王以客礼节接待他。乐毅在魏国时就听说燕国因子之之乱，被齐国打得大败，燕昭王没有一天忘记要向齐国报仇，因此，他降低身分，尊重士人，广招天下贤士。乐毅来到燕国后，看到燕昭王对他非常尊重，以客礼接待他，感到燕昭王招贤纳士的所作所为与他听到的一样。他极力推辞、谦让，燕昭王还是任他为亚卿①。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军事改革，主张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授给官职，"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乐毅还帮助燕国训练军队，使燕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燕国等待时机，总是想报仇，但表面上还是对齐友好。燕国派苏秦去齐国作反间活动，以削弱齐国力量。

苏秦，东周洛阳乘轩里人，自称是"进取之臣"，"以不复其常为进者"，帮助燕昭王谋划攻略齐国。从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前十四章来看，苏秦始终是燕昭王的亲信，为燕出谋划策，奔走于齐、赵、魏等国之间，进行游说和上书，目的在于使齐、赵关系恶化，防止齐国进攻燕国，并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以便燕昭王成就振兴燕国的"大事"。

这时侯，在各诸侯国称王的情况下，势力强大的国家，已不满足于称王了，于是想起称帝，作为国王最尊的称号。秦相魏冉为图谋与齐联合，便到齐与齐王相约，齐、秦并称为帝。齐王答应了。于是，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王在宜阳称西帝，齐闵王称东帝。秦国这时拉拢齐国同时称帝，主要目的是约齐伐赵，要迫使其他各国共同攻打赵国，把赵国灭亡后三分赵地。

眼看齐秦联合后齐国将更加强大，对燕国不利，于是燕昭王

① 战国时爵位的称谓。

又派苏秦去齐，继续在暗中从事反间活动。

公元前300年左右，苏秦去齐搞反间活动，在齐国的五年中，苏秦做到使齐没有谋燕。

苏秦到齐国后，一方面劝告齐闵王主动放弃帝号，另一方面极力怂恿、引诱齐闵王去攻宋。苏秦对齐王说："您认为称帝怎样？"齐王说："不称，秦恨齐，称吧，天下恨齐，还是称帝。"苏秦说："立两帝，天下是尊秦，还是尊齐？"齐王说："尊秦。"苏秦又问："两帝立相约伐赵，比伐宋哪有利？"齐王说："不如伐宋。"苏秦说："齐与秦相约称帝，天下独尊秦而轻视齐；齐放弃称帝，那么天下就会爱齐而憎秦了。"齐闵王接受了苏秦的游说，去帝号仍称王。

苏秦引诱齐闵王攻宋的目的，在于转移齐国对燕国的压力，进而加剧齐国与秦、楚等国的矛盾。因为宋处齐国南面，燕在齐国北面，齐南向攻宋必然置北面边防不顾；再说楚、魏与宋接壤，齐攻宋，势必与楚魏发生矛盾。还有，秦是极力保护宋国的，攻宋必然得罪秦，因而引起秦跟齐冲突，这样就把齐放到了一个四面树敌的地位上。苏秦劝齐闵王主动放弃帝号的目的，是用以孤立秦国，拉拢各国反秦，以便乘机攻灭宋国。齐闵王采纳了苏秦的主张，由苏秦发动合纵，联合韩、赵、魏、燕组成五国联军共同伐秦，同时不放松攻宋。

由于五国统治者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军队停留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荥阳西北）而不前进，一直没有发动对秦国大的进攻。特别是齐国不仅不真心伐秦，反而私下和秦国勾结，想利用五国攻秦的有利形势独吞宋国。虽然苏秦对齐闵王讲联合攻秦与伐宋的利害关系，劝说齐王只有在"攻秦之事成"以后才有利攻宋，但齐王不听苏秦的劝说，在五国攻秦期间，齐趁机大举攻宋。

公元前287年，由于燕国尚不能单独抗衡齐国，只能表面上

屈从齐国，昭王派了两万人自带粮食助齐攻宋。齐闵王很傲慢，杀了燕国的将领张魁。昭王很生气，想“举兵以攻齐”。凡繇劝燕王说：“大王忍辱听从齐王的命令出兵攻宋，是由于燕国的力量还不能抗击齐国。”昭王只得忍屈反而向齐王谢罪，说是选派的将领不合适。

正在这时候，苏秦给燕昭王一封信，要求昭王乘齐攻宋之机，进攻齐国。他说：“燕国居于大国的地位却向齐国派遣人质，名声低下而权力微小；以大国的身分帮助齐国进攻宋国，使得人民疲劳，财力耗费；这三者，对燕国来说，都是大坏事。然而大王不在乎继续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但是齐国却把不守信用的罪名加在大王身上，而且嫉恨燕国更加厉害，这说明大王的策略错了。把宋国跟楚国的淮北合在一起，抵得上一个强大的万乘国家，齐国吞并了它，这里增加了一个齐国。北夷的土地纵横千里，加上鲁国和卫国，也抵得上一个强大的万乘国家，齐国吞并了它，这是增加了两个齐国。只有一个强大的齐国，燕国尚且惊疑恐惧而对付不了；现在用三个齐国的力量压到燕国头上，那灾祸一定很大。虽然如此，明智的人办事，可利用灾祸取得幸福，使失败变为成功。现在大王如果想做到这一步，就不如怂恿称霸的齐国而推崇它，让它派使者到周朝去订立盟约，烧掉秦国的符信，宣称‘最好的计策是打败秦国，中策是一定要永远排斥它’。秦国遭受排斥，面临被别人打败的威胁，秦王一定担忧。秦国近五代以来，经常攻伐各国。现在屈居齐国之下，按照秦王的意愿，如果能挫败齐国，既使倾注全国的力量也在所不惜。那么大王就可以派说客劝秦王说：‘燕国和赵国打败宋国，壮大了齐国，并且推崇齐国，甘愿屈从齐国的原因，燕国和赵国并不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利益；燕、赵两国既不能从中得到利益，却又要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不相信秦王。既然如此，那么大王为什么不派遣可以信赖的人来联络燕、赵，让泾阳君、高陵君到燕、赵？这样，燕、

赵两国就会相信秦国了。如果日后韩、魏不服从，就由秦国去讨伐它们；齐国不服从，就由燕、赵两国去讨伐它们。天下谁敢不服从？天下顺从了，趁势驱使韩、魏去攻打齐国，警告说：一定要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淮北，这是有利于燕、赵两国的事。如果您不争取燕国和赵国，齐国的霸业一定会成功，各国拥护齐国而您不服从，这样您就会招来各国的攻伐。各国拥护齐国而您也服从，您的声望就会下降。如果争取燕国和赵国，既能使您的国家安宁，而声誉也崇高；反之，您的国家就危险，声誉也下降。丢掉尊荣和安宁，却选择危险和卑下，聪明的人是不干的。’秦王听到这些话，一定会像刺痛了他的心脏一样。如果这样，秦国一定会被争取过来，齐国也一定会遭到讨伐啦。”

燕昭王听从了苏秦的建议，同群臣谋划，准备等待齐兵在攻宋前线失利时，趁机攻齐。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宋国，宋王偃逃到魏国，死于温。齐国灭了宋国，兼有宋以前所取得的楚淮北之地，一时声势很盛，直接威胁了三晋和楚。并且使秦也感到不安。秦国本来反对齐国灭宋，因为秦国也想灭宋。秦王得知齐灭宋后大怒道：“我爱宋国与爱新城、阳晋是一样的。”赵国害怕秦齐联合，因为齐秦联合，赵国必然两面受敌，因此，赵国亲秦大臣奔走秦、赵之间，主张合秦、赵两国伐齐。魏当时是孟尝君为相，他是反齐的。魏也想得到宋地，孟尝君想得到宋的平陵为封地，魏也是和齐争宋地。楚也想瓜分宋国，齐灭宋以后，齐国就逼近楚国了。齐国灭宋引起了各国的不满和恐慌，齐国成了当时各诸侯国的众矢之的。

为此，各国准备组织一次对齐国的重大进攻。各大国之间活动频繁，秦国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为了组织攻齐，公元前285年，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在宛（今河南南阳）相会，又和赵惠文王在中阳相会。公元前284年，秦王和魏昭王在宜阳相会，又和韩厘王

在新城相会；同年燕国由于赵国的拉拢，昭王也入赵会见赵惠文王。

秦国为了“先出声于天下”，公元前285年，派遣蒙骜带了秦兵，越过韩、魏，开始向齐进攻，占领了九个城。

这时候，燕昭王询问乐毅进攻齐国的事，乐毅回答说：“齐国有霸国遗留的基业，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能轻易地单独进攻，大王一定要攻打齐国，不如联合赵国和楚国、魏国。”燕昭王于是派遣乐毅与赵惠文王订立盟约，另外派使臣联合楚、魏，并让赵国拿攻打齐国的好处诱劝秦国。

公元前284年，燕国征发全国军队出征，以乐毅为上将军。秦派尉斯离率兵和三晋之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伐齐。齐也征发全国兵众拒战，战于济西，齐将触子没有斗志，一战就下令退兵，单身乘车溜走，因而齐军大败；达子统率余卒继续作战，屯兵于秦周（今山东淄博雍门以西地方），又战败，达子战死。这时乐毅遣还秦、韩之师，分魏师攻占旧宋国地，分赵师攻取河间，自己率师长驱进击，攻占齐国都城临淄。燕军进入临淄后，大肆掠取了齐国的财宝和祭祀用的礼器运送到燕国。燕昭王非常高兴，亲自到济水边慰问军队，大办酒宴，犒赏士兵，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东），号昌国君。当时，燕昭王接收了从齐国掳掠来的战利品回去，派乐毅再率领军队去平定齐国没有投降的城邑。

乐毅率大军乘胜追击，齐城望风奔溃。乐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寻求齐国的逸民，以礼对待他们。乐毅还下令宽松赋敛，废除暴政，以笼络人心。接着分兵五路：一、左军渡过胶东、东莱（今山东平度、莱西、乳山等地区）；二、前军沿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三、右军沿黄河、济水，屯阿、鄄以连接魏师；四、后军傍北海，以抚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五、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这样分兵进攻和镇守，是为了控制整个齐国。结果六个月之间，攻

下齐国七十多城，设置郡县，隶属燕国。齐国只剩下莒、即墨两城未被燕军攻下。齐都被燕军攻占后，齐闵王出奔到卫国，折回到莒。

乐毅为了拉拢齐国地主阶级，在齐国封了二十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还把一百多个燕国爵位赏赐给齐人。

这时齐所以会被攻破，主要原因为：首先齐闵王和一些封建统治者暴虐无道，阶级矛盾和封建统治内部矛盾都很尖锐；其次，孟尝君当权以来，连年不断发动战争，弄得民穷财尽，士卒疲乏。正如苏代所说的："南攻楚五年，国家的积蓄散尽；西困秦三年，百姓困苦不堪，士卒疲敝；北与燕战，……后又以余兵南面进攻五千乘的宋国，国家的力量已经枯竭了。"

在这一战役中，秦国占领了以前齐国所得的宋国陶邑，后来封给了穰侯魏冉。魏占领了大部分宋地。赵国占领了济西部分地。楚乘机收复了以前为宋所攻取的淮北地。甚至像鲁这样的小国，也攻取了齐的徐州。

本来楚国没有参加合纵攻齐。反而派淖齿率兵救齐，目的在于瓜分齐国，收复淮北地。淖齿到了齐国后，被齐闵王任为相。淖齿在莒把齐闵王杀死，太子化装成平民，躲到太史的家里做佣人方免于难。当初，淖齿杀死了齐闵王后，莒邑的人就访求齐闵王的儿子田法章，在太史的家里找到了他，他在替人家灌种园地。太史的女儿怜悯他而好好对待他。后来田法章私下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她就和法章发生了性关系。等到莒邑人共同拥护田法章做齐王，凭仗莒邑抵抗燕国，太史的女儿就被立为王后，就是人们所说的"君王后"。

燕军起初攻入齐国的时候，听说画邑（今山东淄博东北）高士王蠋贤德，乐毅就命令军队说："在画邑周围三十里以内不许进入。"不久，又派人对王蠋说："齐国众多的人称赞你正义的品德，我要任用你做将军，封赏你万户的领地。"王蠋坚决谢绝。燕军使

者说："你如不肯听从，我们要大军血洗画邑。"王蠋说："忠节的臣子不能侍奉两个君主，贞烈的女子不肯更换第二个丈夫。齐王不采纳我的意见，所以隐居起来在乡野种田。齐国已经破亡，我不能使齐复存，现在又用武力来劫持我做你们的将领，那是帮助桀王来作恶啊！与其活着来干这不义的勾当，倒不如煮死为好！"就把自己的脖子吊在树枝上，自己奋力挣扎，把脖子扭断而死。齐国逃亡在外的大夫们听到这件事，说："王蠋是一个平民，尚且守义不肯向燕军屈节称臣，何况有着职位、吃着俸禄的人呢！"于是自动聚合奔赴莒邑，寻求齐闵王的儿子，拥立他为齐襄王。

"诸子"评论齐闵王时曾说过："齐闵王把强大的齐国给葬送了。""等到燕国、赵国起兵攻伐齐国，齐国如同摇落枯叶一样，迅速灭亡了。"齐国败得很惨，国王因而死亡，这在战国史上是很少有的。

到了公元前283年，燕、赵两国仍联合攻齐。秦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进攻齐国，却想乘机一举灭掉魏国，使秦的本土能和新得的陶邑等相连接。秦曾用大军一直进攻到魏都大梁，由于燕、赵两国出兵救魏，方才退兵。次年，秦又迫使韩、魏两国投入秦的怀抱，对赵作战。秦派了白起攻赵，攻取了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两城，而赵也攻取了魏的伯阳（今河南安阳西北）。再次年，秦又取了赵的离石，赵也继续向魏进攻。

再说乐毅率大军攻克齐七十多城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池，由于齐将坚守，未能攻下。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子惠王即位。惠王自从当太子时就曾与乐毅有矛盾，即位后，改用骑劫为统帅，召回乐毅。乐毅知道燕惠王是不怀善意地派人代替自己，害怕被杀，就向西投奔赵国去了。赵国把乐毅封于观津，号望诸君。赵国尊重宠信乐毅，一时震动了燕国和齐国。

骑劫为统帅，改变了乐毅的作战方针，对齐的降兵滥施劓刑，还挖掘城外的坟墓，焚烧尸体，激起齐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齐军在田单的率领下，大摆“火牛阵”，燕军溃败，骑劫被杀，田单率军乘胜反击，陆续收复了丧失的七十余城，并从莒迎回齐襄王。

燕惠王后悔骑劫代替乐毅，以致燕军被打败，将军被杀死，曾经占领过的齐国土地丢失；又埋怨乐毅投降赵国，害怕赵国重用乐毅，乘燕国吃了败仗的时候来进攻燕国。于是惠王派人去赵国，向乐毅表示歉意说：“先王将整个国家委托给将军，将军为燕国打败齐，报了先王的仇恨，天下没有谁不震动，我哪敢忘记将军的功劳呢？正当先王离开人世，我新近登位，身边的臣子迷误了我，我派骑劫代替将军，没有其他用心，只是因为将军长期在外，行军作战辛苦，所以调回将军暂且休息，商量国家大事。将军误听闲言，认为与我有矛盾，就丢下燕国，去到赵国。将军为自己打算，这样做是合宜的，可是将军拿什么报答先王对待您的情意呢？”乐毅复信回答燕惠王道：“我不肖，不能遵循大王的命令，来顺应您左右大臣的意愿，恐怕回到燕国被杀死，伤害先王的英明，损害阁下的道义，所以逃奔到赵国。现在阁下派人责问我的过错，我恐怕您的侍人不能体察先王任用、爱护我的理由，又不能明白我服侍先王的心意，所以大胆地写信回答您。

“我听说贤明的国君不把爵禄赏赐自己偏爱的亲信，功劳多的人就赏赐他，才能合适的人就安置他。所以通过考察其才能而授予官职的，是能够成就功业的国君；能够衡量德行而结交朋友的，是能树立名声的士人。我私下观察先王选拔人才，有高出当世一般国君的见识，所以我利用替魏国出使的机会，让自己到燕国接受考察。先王提拔了我，让我担任亚卿。我私下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可以侥幸不犯错误，所以接受命令而不推辞。

“先王命令我说：‘我与齐国有宿怨深仇，我不考虑国家力量

的弱小，而要以向齐国报仇为任务。’我说：‘当今的齐国有霸国遗留下的基业，是常胜国家的后代，士卒训练有素，娴于用兵作战。大王如果想要攻打它，必须同其他各国一道商量对付它。最好是和赵国联合，另外还要联合魏、韩等国，这样齐国就可以彻底打败。’先王认为我的意见对，就准备好符节，派我出使赵国。我回国汇报后，就出兵攻打齐国了。先王的威灵，黄河以北的军队都追随先王会合到济水边上。接着济上的联军接受命令进击齐军，把齐军打得大败。轻装精锐的士兵，长驱直入抵达齐国都城，齐王逃到莒邑，仅仅只身逃脱；珠玉财宝、战车武器、传国重宝等，全都运回燕国。从五霸以来，丰功伟绩没有比得上先王的呢！先王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心愿，所以划分一块土地封赏我，使我能够比得了小国的国君，我私下没有自知之明，接受了。

“我听说，善于创始的人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头不一定有好的结局。以前伍子胥的意见被吴王阖闾采纳，因而阖閭的足迹远达郢都，夫差不认为伍子胥的意见对，赐给他皮袋，让他的尸体漂浮江中。夫差不能理解他先前的意见可以建立功业，所以把伍子胥沉到江里而不悔悟；伍子胥不以早些看到两代国君的不同器量，因此一直到抛入江中还不识几微。

“使自身不受灾祸，建立功勋，来证明先王重用我的心意，这是我最高的方略。遭受诽谤以至被侮辱，被杀害，毁坏先王的名声，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面临不可估量的大罪，还要以侥幸的举动去谋求私利，从道义上讲，我是不会去做的。

“我听说古代的君子，与人断绝交情，不说恶言恶语；忠臣离开本国，不洗刷自己的名声。我即使没有才能，也曾多次接受过君子的教导。我担心您听信左右侍从的絮聒，不体察被疏远人的行为，所以才敢写信向您汇报，希望大王给予留心注意。”燕惠王看过信后，长长叹了口气，自言道：“我的过失太大了！”

此后，燕惠王仍旧赐封乐毅的儿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

来于燕、赵两国之间，再和燕国和好。乐毅最后死在赵国。

乐毅大败齐国，使齐国几乎亡国，至此，苏秦的弱燕胜强齐的计谋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终于成功了。但苏秦在齐为燕反间的阴谋也完全暴露了，齐闵王用车裂之刑把他处死，死时约五十多岁。从此，东方强大的齐国一蹶不振，齐、秦两大强国对峙的局面也随之结束了。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乐毅列传》、《苏秦列传》。

《战国策》：《燕策》、《齐策》。

《战国纵横家书》

田单复国

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韩、魏、赵、秦合纵伐齐，在济西大败齐军。当齐国在西线失败后，燕昭王派乐毅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向齐国的北线猛烈进攻。燕国长驱直入，攻占了齐的国都临淄。随后，乐毅不到半年连攻齐国七十余城，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齐国几乎亡国。

正当齐国处在千钧一发之际，齐国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田单，担负了复国的重担，他设下火牛阵，向燕展开了猛烈的反攻，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田单是齐国田氏王族的远房亲属。齐闵王时他在国都临淄做一名佐理市政的小官，没有人赏识他的才能。燕国派遣乐毅攻破齐国，齐闵王逃出，后来退守莒邑，燕军长驱直入，平灭了齐国，田单逃到安平（今山东临淄东北），让他的同族人把他们的车轴两端突出的部分统统锯去而箍上铁箍。不久，燕军攻打安平，城防被攻破，齐国人逃奔，争先抢路，撞断了车轴，车子坏了，被燕军俘虏。只有田单的族人因用铁箍包住了车轴，得以逃脱，全部顺利地逃到即墨（今山东平度）。燕军探知齐闵王逃到莒邑，急调集兵力攻打。这时，淖齿已在莒邑杀死了齐闵王，莒邑军民奋力抵抗燕军，几年没有被攻下。

随后，燕将乐毅带领大军包围即墨，即墨守城的长官与燕军交战中战败阵亡。即墨军民共同推举田单为首领，他们说："安平那一仗，田单命族入用铁箍包住了车轴，所以安全脱险，他很会

用兵。”于是，田单带领即墨军民奋力抵抗燕军。田单和部下同甘共苦，不分日夜地亲自巡城，受到全城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他一方面加强城防的守备；另一方面派人到燕国侦察敌方的情况。他听说燕昭王死了，他的儿子惠王登位，惠王跟乐毅原来就有矛盾，互相很不信任。于是他便实行反间计，派间谍去燕国造谣说：“齐闵王已经死了，齐国的城池没有为燕军大军攻下的，只不过两座而已。乐毅现在以伐齐为名，其实是想联合齐国的残兵败将，在那里称王。只是齐国人民还不肯归顺他，所以他才不急于攻下即墨，为的是等待时机的成熟。现在齐国人民担心的，就是怕燕国改派别的大将来，要是那样，那即墨就无法保全了。”燕惠王听了，便信以为真，就另派骑劫去代替乐毅。乐毅被革职之后，惧怕燕惠王杀他，回家乡赵国去了。乐毅是个好统帅，士兵们听说乐毅被革职回赵国了，都愤愤不平。骑劫是个无能的将领，由于他代替乐毅为大将，使燕军的军心动摇了。

田单用反间计去掉乐毅后，进一步做鼓舞士气的工作。田单命令即墨城内百姓，每到吃饭时，必须先在庭院里祭祀自己的祖先，使得众多鸟雀因争食祭祀的食物，都飞到城上空盘旋翱翔再下来啄食。燕军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田单又用迷信的形式，在军队里挑出一个机灵的士兵，叫他假装“神师”。以后每逢下令，田单总是非常恭敬地请这位“神师”出来，说是出于天神的教导，是出于天神的命令。齐军将士听说有天兵天神下凡帮助，都非常高兴；相反燕军听到这消息，以为齐军得到天神的帮助，都非常害怕。

接着，田单又派人宣言说：“我们别的不怕，最害怕的是燕军把俘虏的齐国士兵割去鼻子，再派他们到队伍的前面和我们作战，这样一来，即墨城里就会人心涣散，再也守不住了。骑劫是个愚蠢的家伙，他听了这些话，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攻克即墨，于是看见齐军投降的尽割去鼻子。城里人见到齐国的众多降兵都被割掉

了鼻子，都很愤怒，更加坚密防守，只怕给燕军俘虏过去。

田单又派人混进燕国军队煽动说："我们害怕燕军挖掘我们城外的祖宗坟墓，凌辱我们的祖先。要是你们这样做，即墨城里的人一定伤心害怕，不愿死守了。"骑劫听到后，又上当受骗，果然下令燕军尽挖齐人的祖坟，烧毁齐人的祖宗尸骨。即墨的百姓在城头看到这种情景，都十分悲愤，号啕大哭，痛心疾首，纷纷要求出城与燕军拼命，大家的斗志又比以前增高了。

田单见到士气高涨，知道可以动员出战。他就亲自拿着夹板铲锹，和官兵分劳修筑工事；又把自己的妻妾和亲人都编到队伍里，并亲自分发酒肉，犒劳将士，与士兵同甘共苦，取得士兵和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决战前，他命令穿着铁甲的精壮兵士埋伏起来，叫老弱残兵和妇女站在城头上守城，然后派出使者假意向燕军投降。燕军围城已经三年多了，十分厌倦，现在看到齐军要投降了，"皆呼万岁"。这样燕军斗志松懈，思想麻痹了。田单又以重金作为礼物，让即墨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去送给燕军将领说："即墨就投降了，大军进城以后，请保全我们这几族人家的妇女，让他们得到安全。"燕军将领见到这么多黄金，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下来。燕军满以为即墨即将投降，因而对即墨城的包围和监视更加松懈了。

田单用各种办法麻痹燕军，自己却在即墨城里积极做战斗准备。他准备用"火牛阵"打败骑劫。他把城里的一千多头牛集中起来，给牛披上大红绸绢制成的被服，在上面画着五颜六色的蛟龙花纹，两只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快刀，牛的尾巴上绑上浸透油脂的芦苇。他叫人预先在城墙根凿了几十个洞，趁着黑夜，用火点燃牛尾巴上的芦苇，把火牛放出去，五千精壮的士卒紧跟在火牛后面。被火烧着尾巴的牛拼命地向前飞奔，直冲燕军兵营，跟随火牛后面的五千壮士奋勇冲杀。燕国军队在黑夜里毫无防备。只听得鼓声隆隆，眼前红光一片，杀声震天，急忙仓皇应战，在浓

烟和闪炮之中，燕军看见大批"怪物"身上长着像龙一样的斑纹，头上长着利刀，身后一团火，猛冲过来，燕军碰上它们的，不是死就是伤，都吓得魂飞胆散。五千壮士，乘机冲杀过来，猛击敌人，即墨城的老百姓站在城墙上使劲地敲打各种铜器，大声呐喊。喊声夹着鼓声和铜器声，震天动地，齐军声威大振。燕军不知所措，以为遇到天兵天将，十分慌乱，纷纷夺路逃跑，溃不成军，大败而归，主将骑劫在混乱中被齐军杀死。齐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被占领的齐国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配合田单拦击燕军。

田单以"火牛阵"出奇制胜地破燕之战略，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役。田单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扬长避短，养精蓄锐，团结人民，壮大自己的力量，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打败了强敌，这在我国军事战争史上不失为一个光辉的范例，田单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

田单即墨城下大败燕军后，随即率齐军收复失地。当田单攻打被燕占据的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时，打了一年多，久攻不下，士兵伤亡很大。鲁仲连写了封信，系在箭上射进城去，送给燕将，劝其撤退。信中说："我听说，明智的人不违背时势而放弃有利的机会，勇敢的人不逃避死亡而埋没名声，忠臣不先顾自己而把君主放在后面。现在您逞一时的气忿，毫不顾念燕王无法驾驭臣子，这是不忠；失去聊城自己也遭杀身之祸，威名不能伸张于齐国，这是不勇；事业失败，声名破灭，后世对您无所称道，这是不智。有了这三件的人，当世君主不会要他做臣子，游说之士不会加以陈述。所以聪明的人不会犹豫不决，勇敢的人不会贪生怕死。目前是生和死、荣和辱、贵和贱、尊和卑的关头，时机不会再来，希望您详加考虑，不要跟俗人同样见解。

"况且，楚国进攻齐国的南阳（今山东邹县西北），魏国进攻齐国的平陆（今山东汶上北），可是齐国没有向南面反攻的打算，认为丢南阳的害处小，不如夺回济北（济水之北，指聊城一带地

方）的好处大，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来。现在秦国出了兵，魏国不敢东进；齐、秦联合的形势已经形成，楚国形势十分不利；齐国丢掉南阳，放弃右边的土地，全力来收复济北地区，这是经过权衡得失而定下来的决策。对齐国夺回聊城的决心，您不能存任何犹疑观望。现在楚、魏先后从齐国退兵，燕国的救兵又见不到。以整个齐国的兵力，对天下别无所求，全力来夺取聊城，如还要死守这已经围困了一年多的聊城，我看您是绝不会得到成功的。而且燕国国内发生动乱，君臣想不出治理办法，全国上下人心混乱。栗腹率领十万大军对外连续打了五次败仗，一个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却被赵国所包围，土地丧失，国君受困，民心动摇。现今您凭借聊城这一支困疲的兵力抵挡住了整个齐国的进攻，可以说是像墨翟一样善于守城了。物资缺乏到拿人肉当食物，骨头当柴烧，而士卒没有涣散叛离之心，可以说是像孙膑一样善于用兵了。您的才能已经显现于天下了。虽然如此，为您打算，还是不如保全兵士来答谢燕国。部队完好无损地回去，燕王必然高兴；平安地返回故土，百姓好像重见父母，朋友们会振奋地推崇赞许，功业能得到显扬，上辅国主以约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助游说之士，矫正国政，更化风俗，功名可由此而建立。如果无意这样做，就离开燕国，摈弃世俗的议论，到齐国来吧！齐国会划地分封，富贵可和魏冉、商鞅相比，世世代代独立称孤道寡，和齐国长远并存，这也是个好办法。这两个方案，既可显扬名声，又能获得丰厚的实惠。希望您详加考虑，慎重地选定一条！

“我还听说这样的话，拘守小节的人不能成大名，耻受小辱的人不能立大功。从前管夷吾（即管仲）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这是犯上的行为；丢下公子纠不能为他效死，这是怕死的表现；身受捆绑，被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受尽了耻辱。具有这三种情况的人，当世君主不会以他为臣，亲友不会跟他交往。那时假使管仲一直坐牢不能出狱，身死没有回到齐国，那他不免落个人品污辱、

行为卑贱的臭名了。就是奴婢们也会羞与他相比，更何况一般人呢？因此管仲不以身遭囚禁为耻，而以不能使天下太平为耻；不以不为公子纠效死为耻，而以不能在诸侯之间伸张威名为耻。因此他虽然兼有犯上、怕死、受辱三重过失，却终于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名扬天下，光耀诸侯。曹沫做鲁国的将军，三战三败，失去土地五百里，当时假使曹沫不多方面地考虑，不从容地计议，就急躁地刎颈自杀，那也不免被人称为常败被擒之将了。曹沫不顾三次战败的耻辱，回来跟鲁君商议，趁齐桓公大会天下诸侯的机会，曹沫凭借一剑之力，在会盟坛上指向齐桓公的心窝，曹沫颜色不变，义正词严，三次战败失去的土地，一个早晨就轻易地收了回来。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名传遍吴、赵等国。像这两位志士，并不是不知道顾全小的名节，讲究小的操守，只是认为一死之后，身亡名灭，功业无从建立，这不是聪明的行为。因而放弃一时的愤怒，建立一辈子的威名；摈弃一时的愤怒，奠定累世不朽的功业。因而他们的功业和三王竞争相流传，声名跟天地同长久了。希望您选定其中一个方案而实行吧！”

燕将看到鲁仲连的信，哭了好几天，犹豫不能自作抉择。要是回燕国，已经产生了嫌隙害怕被杀；要是降齐国，自己杀死、掳掠过许多齐国人，担心投降后受侮辱。他长叹道：“与其让人杀我，不如自杀。”随后就自杀了。燕军失去主将，立刻大乱，田单率军攻人聊城。回来向齐国谈起鲁仲连，准备封他爵位。鲁仲连坚决不肯接受，说道：“我与其富贵而屈身侍奉人，宁肯贫贱反可以轻视流俗放任自己的意志啊。”田单听后非常敬佩鲁仲连。

收复聊城后，田单又率领齐军挥扫齐国境内的燕军，很快就收复了被燕军占据的七十余座城池，把燕军完全逐出齐境。

公元前 279 年，田单从莒邑把齐闵王的太子田法章接回国都临淄，正式做了国君，就是齐襄王。襄王论功行赏，封田单为安平君。

不久，田单准备带军攻打狄（今山东高青东南），他先去请教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这次去攻狄，我看是攻不下来的。"

田单说："我凭靠这座小小的即墨城，指挥老弱残兵，打垮了兵车万辆的强大燕国，收复了齐国失地，如今先生说我攻不下小小的狄邑，不知从何说起啊！"田单说完就气鼓鼓地上了车，招呼也没打一声就走了。

接着田单就带兵去攻狄，打了三个月，还是没有打下来。那时候齐国的小孩子们唱道："高高的帽子，像个簸箕，长长的剑柄，抵住下巴，连个小小狄邑都打不下，将军把兵驻扎在枯草堆上。"田单吃了一惊，再去请教鲁仲连，说："先生说我攻不下狄邑，请把其中的道理告诉我吧。"

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着就编草绳，站着就拿锹干活，给士兵做出了好榜样。激励将士们说：'向前吧，宗庙都给毁啦，没有日子可望再活啦，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啊！'在那个时候，将军有牺牲的决心，士兵也没有偷生的念头。听了你的话，没有一个不悲愤落泪，决心跟燕军拼个死活的。这就是将军能打垮燕军的道理。如今将军东面有夜邑（今山东掖县）可以供奉，西面有菑上可以欢娱，金带围腰，驱车跃马，驰骋于淄水、渑水之间，一味贪图生活享受，全无牺牲决心，这又怎么打得了胜仗呢！"

田单说："我的心思，先生都知道了！"第二天，他就亲自出马鼓舞士气，巡视城防，站在矢石如雨的前方，抢起大槌，擂鼓指挥。这一下，狄人就给征服了。

由于田单建有功勋，齐襄王封他为齐相。田单为齐相后，有一次，过菑水，到河边看见一位老人站在菑水岸边，马上把自己身上的裘衣脱下披在老人身上。齐襄王听到这件事后，非常不快，说道："田单广施恩泽，是想取替我啦！我必须早作打算，以绝后患。"说完看了看左右侍从，然后问道："你听见我说的话吗？"侍

从回道："听见了。"襄王说："你们认为怎样？"回答道："大王不如把它作为是自己做这件好事。"襄王问："什么意思？"回答道："您应该奖赏田单为人以善的行为，并且下令说：'寡人忧患百姓的饥苦，田单收敛他们，给他们吃的；寡人忧患百姓的冷暖，田单解下裘衣，给他们穿上。寡人忧患百姓，田单也忧患，他是替寡人为百姓分忧。'田单有如此好的行为，大王应该奖赏他。"襄王听后，说道："好！"于是赐给田单以牛马、美酒，以表扬他的行为。后来，侍从又对襄王说："大王应该派人去闾里中，听一听百姓们议论。"襄王果然派人去百姓当中，听他们正在议论什么。派去的人回来告诉齐襄王说："百姓们都说田单友善爱人，都是大王教导得好啊！"襄王听后非常高兴。

需要指出的是，田单虽然挽救了齐国遭受亡国的灾害，使齐国还能存在下去，但是，齐国自公元前 284 年乐毅破齐以后，到公元前 279 年田单复国，这五年中受到的损失太大了，国力大衰，此后强国地位一直没有恢复起来，再不是秦国的对手了。

所以，秦国乘燕齐相互攻伐，齐国败落之机，就集中力量对付另一个大国——楚。公元前 278 年，秦派大良造白起率大军攻楚，直捣楚都郢（今湖北江陵），楚军溃不成军，无力还击。楚国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秦以郢地为南郡。次年白起又攻占巫（今四川巫山以东）、黔中（今湖北沅陵西），设立了黔中郡。从此，楚国更加衰落了。而秦却愈战愈强，在战国七雄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绎史》

魏冉相秦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的相国穰侯魏冉，是战国后期一个著名人物，他与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合称为秦国“四贵”。

魏冉是秦昭襄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从秦惠王、秦武王时就担任官职掌握大权。

秦武王是一位尚武的国君，他十分喜欢力士，对有些力士如任鄙、乌获、孟说等都委以高官。武王自己也有一身蛮力气，因妄想得到象征着周天子权位的周鼎，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武王四年（前307），武王在同力士孟说举鼎时，胫骨被折断，当年八月竟因此而死。这个雄心勃勃的武王，因好勇逞能，偏要做力不胜任之事，所以当了四年国君就离开了人世。

秦武王死后，秦国发生内乱。因为武王无子，武王诸兄弟皆争君位，武王的生母惠文后早死，庶母芈八子有两个弟弟：其同母异父的大弟弟就是魏冉；同父异母的弟弟叫芈其（后为华阳君）。芈八子生了三子：则（后为昭襄王）、显（后为高陵君）、悝（后为泾阳君）。当时魏冉权力最大，所以当武王诸弟争君位时，魏冉便将芈八子所生的则立为王，是为秦昭襄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王即位之时，年仅二十岁，宣太后干预国政，樗里疾仍为相，魏冉为将军，又信用宣太后的外族并与昭王年少时同衣同车的向寿。满朝文武不少为宣太后亲族。

秦昭襄王元年（前306），楚出兵伐韩，韩向秦求救。宣太后

本为楚国人，不愿救韩而与楚为敌，但甘茂力主救韩伐楚。最后昭襄王听从甘茂的主张，出师救韩，楚兵遂退。为了拉拢韩国，甘茂又说服昭襄王将武遂还给韩国，这就引起向寿等人不满。向寿、公孙衍向昭襄王进谗言，这时，秦正命樗里疾和甘茂攻魏的皮氏（今山西河间西）。甘茂听说向寿等将不利于己，就从前线逃跑，到了齐国，齐王以上卿待之。由于甘茂逃亡，樗里疾只得与魏讲和退兵。

虽然宣太后和魏冉依靠手中兵权将昭襄王扶上君位，但昭襄王的诸兄弟不服，秦昭襄王二年，公子壮及诸公子发生叛乱。公子壮因不承认昭襄王而受到武王后及一些朝廷大臣的拥戴，自号为季君。魏冉以将军为名义戍卫国都咸阳，控制着国都的武装，立即发兵平定叛乱。结果，凡参与叛乱的昭襄王诸异母兄弟以及一些朝廷大臣都被杀，武王的王后为魏国人，也被逐回魏国。

秦国这场争夺君位的内乱，持续了三年之久，至此暂告结束，秦国军政大权实际操纵在魏冉手里。

昭襄王即位之初，由于宣太后、魏冉专政，所以采取同楚联合的方针。公元前 305 年，秦昭王与楚怀王联姻。次年，秦昭襄王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会盟，秦将占领楚国的上庸（今湖北竹山）退还给楚。在以后的三年中，秦、楚两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秦昭襄王四年，秦出兵攻取魏的蒲阪（今山西永济北）、晋阳和封陵（均在今山西永济境），又攻取刚刚退给韩国的武遂。由于秦国的势力大，韩、魏也不得不暂时向秦屈从。秦昭襄王五年，秦王、魏王和韩太子婴在临晋会盟，表示休战。

这时，楚国派到秦国做人质的太子横杀死秦国的一个大夫，逃回楚国，从此秦、楚两国的联盟破裂。当秦昭襄王六年，齐、韩、魏三国联合起来向楚国大举进攻时，秦坐视不救，结果，楚军大败于沘水旁的垂沙，大将唐蔑被杀死。

秦昭襄王七年，樗里疾死，魏冉第一次做了秦国的相国。

由于垂沙之役齐、魏、韩三国的大胜，楚国向齐屈服，派太子横为质，向齐国求和；秦国也恐惧起来，派泾阳君公子市去齐为质，和齐国修好。一年以后，即秦昭襄王八年，齐国孟尝君入秦，代替魏冉为相。

与此同时，秦国向楚国发动进攻。秦昭襄王六年，派华阳君芈戎和庶长奂率兵伐楚，大破楚军，杀死大将景缺，攻取楚国的襄城（又作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将华阳君芈戎改封于此，号新城君。在楚国节节败退之际，秦昭襄王致书楚怀王，表示愿意修好，约怀王至武关结盟。楚怀王求和心切，贸然赴会。至武关，秦军立即将怀王劫持而西，直至咸阳，秦昭襄王提出要割巫、黔中两郡给秦，才放他回去。怀王不答应，结果，怀王被留在秦国，后客死于秦。

不久，赵国因为秦、齐两国联合不利于己，便促使秦国免除了孟尝君的相位，由赵国派遣楼缓入秦为相。孟尝君免相后，被囚在秦，在门下宾客的帮助下才逃回齐国；孟尝君回齐后任相，从此齐、秦之间结怨更深。

到了秦昭襄王九年，齐、韩、魏、宋、中山五国伐秦。三年后，联军攻入函谷关，秦国只得将属于魏的河外的封陵归还魏，属于韩的武遂还给韩，攻秦的联军才退兵。

秦昭襄王十二年以后，秦齐两国内部发生变化，各国的形势又为之一变。这时，赵国派仇液到秦国，请求用魏冉担任秦国的相国。仇液将要出发，他的门客宋公对他说："秦国如果不听从您的意见，罢免了楼缓，任魏冉为相，那时楼缓一定会要怨恨您。您不如对楼缓说：'为了您，我不会认真要求秦国这样做的。'秦王感到赵国请求用魏冉做相国的意见不认真，将会不听从您的话。您说了而事情不成功，可以讨好楼缓；事情成功了，魏冉当然会感谢您。"仇液果然听了宋公的话，是年，秦国免去了楼缓相位，再

用魏冉为相。

魏冉为相后主动与楚修好，援助楚国粮食五万石。这时，齐国也改变策略，采取祝弗的计谋，驱逐亲魏大臣周最，免去主张与秦为敌的孟尝君相位，改任秦国的五大夫吕礼为相。于是秦、齐两国又重归于好。

吕礼相齐后，孟尝君十分恐惧。苏代对孟尝君说："周最对于齐国，关系极为密切，而齐国驱逐了他，却去信任祝弗，任用吕礼为相，其目的是想交结秦国。齐国和秦国联合，那么祝弗和吕礼就会更加重用，而您就会受到齐秦两国的轻视。您不如迅速挥师北上，进攻赵国，而跟秦、魏和好，召回周最以显示敦厚的作风，并且挽回齐王的信誉，又能控制国际政局的变化。齐国不同秦国相勾结，那么各国都会归向齐国，祝弗等人一定会逃跑，那么齐王要靠谁来治理国家呢！"孟尝君听从了苏代的计谋，因而吕礼嫉恨并想加害于孟尝君。

孟尝君更加恐惧，于是写给魏冉一封信，信中说："我听说秦国用吕礼来交结齐国，齐国是天下的强国，齐、秦两国联合去对付三晋，吕礼一定会兼任齐、秦两国的相国，这就等于您交通齐国而加强了吕礼的地位。假如齐国免除了各国的军事威胁，它一定会仇视您。您不如劝说秦王进攻齐国。齐国失败了，我愿意把所取得的土地送给您。齐国失败了，秦国畏惧魏国的强大，则秦国一定会重用您去交结魏国。魏国被齐国挫败，又畏惧秦国，魏国一定会借重您来交结秦国。这样，您打败齐国建立了功劳，倚仗魏加强了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封邑，秦国和魏国就会共同重视您。如果齐国不遭挫败，吕礼再被重用，您一定会非常困窘。"

秦、齐停战，各有目的。齐国在于集中兵力攻宋，秦国则为了便于攻略韩、魏的土地，因此魏冉根本不理睬孟尝君的话。

到了秦昭襄王十三年，魏冉推荐白起，让他代替向寿担任大将领兵攻打韩国和魏国，先后攻占了武始（今河北武安南）、新城

（今河南伊川西南）。次年，韩、魏两国联合抵抗秦国，在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被左更白起打得大败，死了二十四万多人，俘虏了魏国将领公孙嘉，白起因功升为国尉。

秦昭襄王十五年，魏冉谢病免相，秦以客卿寿烛为相。同时，秦国继续向韩、魏进攻。这一年，攻下魏国的垣（今山西垣曲东南），没有占领，又归给魏，转而向韩进攻。秦昭襄王十六年，攻取原属楚后属韩的中原重镇宛（今河南南阳）。是年，秦免除寿烛的相位，再用魏冉为相国。这是魏冉第三次担任秦相。下一年，另一支秦军由司马错率领，攻取了魏国的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又重新攻取垣。同时又攻占韩国的邓（今河南孟县西）。

宛、邓两地原是韩国的南北两个冶铁手工业地区，为秦取得后，秦的力量更强了。原来秦把魏冉封在穰邑（今河南邓县），称为穰侯，把公子市封在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称为泾阳君，将公子悝封于高陵（今陕西高陵西），号高陵君，将芈戎封于华阳（今陕西华阴华山之南），号华阳君。秦攻取新城后，已将华阳君先封于新城，故又号新城君。这时，秦又攻占宛、邓后，改封泾阳君于宛，改封高陵君于邓。穰、宛、邓和新城，都是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四个封君得到这些地方后，大肆搜刮财富，出现了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奢侈，比王室还富足的局面。

秦昭襄王十八年，魏冉为将军与白起、客卿错率秦兵伐魏，攻蒲阪等大小六十一城。由于秦国势如破竹的进攻，使韩、魏遭到沉重打击，只好向秦求和。结果，韩割武遂二百里，魏割河东四百里，使秦暂时停止进攻。

据史书记载，秦昭襄王十九年，魏冉复相秦，六岁而免。这是魏冉第四次为相，时间从公元前 288 年至前 283 年。按此次魏冉为相，实际与前一次相接，只不过在穰侯封四岁时，曾被任命为将军，率兵攻魏，故史书载“复相秦”。

这时，秦相魏冉又图谋和齐联合。由于各大诸侯国的国君早已称王，王号已不那么尊贵，魏冉便和齐相约，并称为“帝”，把原来上帝的称号作为两国国君的尊称。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便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自称西帝；而尊齐闵王为东帝。秦国这时拉拢齐国同时称帝，主要目的在于约齐伐赵，要迫使其他各国共同攻打赵国，把赵国灭亡后三分赵地。但是，这时苏秦为造成“弱燕敌强齐”的有利形势，游说齐闵王，认为伐赵不如伐宋有利，要使天下诸侯爱齐而憎秦，以便趁机攻灭宋国。就在这年十二月，齐闵王取消帝号。结果由赵国的奉阳君李兑出而约定五国合纵伐秦。在五国合纵的形势下，秦昭襄王也被迫废除帝号，并把前夺取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归还魏国，把前所夺取的符逾等地归还赵国。这是秦国的又一次大挫折。

公元前286年，齐国趁五国伐秦之机，攻灭了宋国，并占领了宋以前取得的楚淮北之地，一时声势很盛，直接威胁了三晋和楚，并且使秦也感到不安。于是各国之间活动频繁，而秦国则居于左右局势的主动地位。这时魏冉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封地，谋求取得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同时赵国的亲秦大臣金投也奔走于秦、赵之间，主张合秦、赵两国伐齐。结果秦国便以盟主的地位主谋合纵伐齐。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军伐齐，大败齐军，攻占了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齐闵王辗转逃亡到莒邑（今山东莒县）。联军共占齐国七十余城，齐国的名城仅剩即墨和莒邑两处。在这一战役中，秦国攻取了以前齐所得的宋地陶邑，把它封给了魏冉。魏冉终于实现了欲占陶邑为其封地的愿望。

当攻齐的战斗还未结束，秦国的军队已向三晋和楚国发动了进攻。秦昭襄王二十四年，秦军攻取魏国的林（今河南新郑东

北）和安城，直逼大梁，燕、赵两国军队来救，秦军才退去。是年，魏冉辞去相位，但秦国的政权仍操纵在宣太后的手中，华阳君、泾阳君亦未被触动。魏冉对秦国的政治依旧有很大影响。

次年秦国向赵进攻，先后攻取兹氏（今山西汾阳）、离石（今属山西）等地。当对三晋的打击刚一停止，秦国的军队又转向楚国进攻。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率领攻破楚国都郢，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并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是穰侯魏冉所信任推举的，彼此相亲善。

当秦国对楚停止进攻以后，又将主力军队派往进攻大梁的前线。秦昭襄王三十二年，穰侯魏冉第五次担任秦国的相国，随后带兵攻打魏国，赶走魏将芒卯，攻入北宅（今河南郑州北），接着围攻大梁。这时魏大夫须贾劝说魏冉道："我听说魏国的高级官员对魏王说：'从前魏惠王进攻赵国，在三梁（今河北唐县东）打了胜仗，攻下了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赵国不肯割地，后来邯郸又被赵国收回了。齐国进攻卫国，攻下了旧都（指楚丘），杀了子良；卫国人不肯割地，后来旧地也被卫国收复了。卫国、赵国之所以能使国家得到保全，军队保持精锐，而土地不被别国并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忍受患难而不肯轻易割让土地。宋国和中山几次遭到进攻而割让土地，国家随着灭亡。我认为卫国和赵国值得效法，而宋国和中山都值得引为鉴戒。秦是一个贪婪暴虐的国家，不讲究情谊。蚕食魏国，割完了晋国旧地，战胜了韩将暴鸢，割去了八县，土地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接收，军队又出动了。秦国有什么能够满足呢！现在它又赶走了芒卯，进入北宅，并不是它敢于攻灭魏国，而是权且威胁大王，借以要求多割些土地。大王一定不要听从它的要求。如果大王背弃楚国和赵国而与秦国和解，楚国和赵国一旦发怒而抛弃大王，跟您争着去服侍秦国，秦国一定会接受它们的要求。秦国挟制楚国和赵国的军队再来进攻魏国，那么魏想要不灭亡是不可能的。希望大王一定不要议和，大

王如果与秦议和，必须少割让土地而要求秦国派遣人质，否则，一定会被欺骗的。’”穰侯听了须贾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这时魏国献出温地求得秦国暂时退兵，于是魏冉便停止了对大梁的围攻而撤军了。

到了秦昭襄王三十四年，魏国投人赵的怀抱，赵、魏两国组织联军向韩进攻，攻到华阳（今河南郑州南）。韩向秦国告急，秦没有来援救。韩国相国对陈筮说："事情紧急，您虽然患病，希望您还是连夜到秦去求救兵吧！"陈筮到了秦国，见到魏冉。魏冉问："事情一定很紧急吧？"陈筮回答说："不急啊。"魏冉不解地问："您这样怎么能作为您国君的使者呢？韩国使者来往不断，向秦国报告情况都说很紧急。您来却说不急，这是为什么呢？"陈筮说："韩国要是危急，就会改变立场依附他国。因为情况还不那么紧急，所以我再一次来这里了。"穰侯说："您不必去见秦王，我就派兵去救韩国。"过了八天，魏冉与白起和客卿胡阳率领秦兵大破赵、魏联军于华阳，斩首十五万，又夺取了魏的卷邑（今河南原阳西）、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和赵国的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

后来，秦又把观津还给赵国，用兵力增援赵国，让它进攻齐国。齐襄王害怕，派苏代替齐国暗地送给穰侯一封信说："我听到道路往来的人说，‘秦王精明善于谋划，穰侯明智而善于办事，一定不会增援赵国四万兵力来进攻齐国。’这是为什么呢？赵、魏、韩三国联合，这是秦国的深仇。秦国对它们上百次相背弃，上百次相欺骗，都不算是不守信用和不讲道义。现在打败齐国去壮大赵国，赵国是秦国的深仇大敌，这样不利于秦国。这是一。秦国的谋士一定说‘打败齐国，让三晋和楚国疲困，然后制服三晋和楚国。’齐是一个疲惫的国家，用天下各国的兵力进攻齐国，好比用力重千钧的强弩去冲破一个溃烂的毒疮，它一定会灭亡，怎么能使三晋和楚国疲困呢？这是二。秦国出兵少，那么三晋和楚国

就不会相信秦国，出动兵力多，那么三晋和楚国就会受秦国控制。齐国恐惧，不会投靠秦国，一定会投靠三晋和楚国。这是三。秦国宰割齐国去引诱三晋和楚国，三晋和楚国用军队控制了它，秦国反而会受到它们的对抗。这是四。这实际上是三晋和楚国利用秦国来算计齐国，又利用齐国来算计秦国，为什么三晋和楚国会如此聪明而齐国和秦国如此的愚蠢呢？这是五。所以说，取得安邑并好好地加以镇抚，也就一定没有祸患了。秦国有了安邑，韩国就一定失去了上党了。取得天下的枢纽地带，与出动军队却害怕全军覆没哪一个有利呢？我所以说秦王精明善谋，穰侯明智善断，是因为秦国一定不会增援赵国四万兵力去进攻齐国。”穰侯听了很有道理，于是不再前进，率军回去了。

秦昭襄王三十六年，穰侯魏冉取得陶邑作为封邑后，想进一步扩大其封地，于是，他听从客卿灶（一作造）的建议，攻取了齐国的刚邑（今山东宁阳东北）、寿邑（今山东东平西南），“以广其陶邑。”其目的就是客卿灶所说的：“攻取齐国一旦成功，那么陶地就会成为万乘之国，天下小国就会率先来朝拜，这样，就成就了五伯的事业了。”

这时魏国人范睢自称张禄先生，入秦，他通过秦国的谒者王稽进见秦昭襄王。他对秦王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众多，军民勇敢，可以成就霸王之业。但闭关十五年，不敢进兵山东，这是因为穰侯为秦谋划不忠，大王计有所失。”秦王说：“我愿意听你说说我的失误。”

范睢害怕有人偷听，不敢谈内部矛盾，就先谈外交事务，借此观察秦王的态度。他趁机走上前，靠近秦王说：“穰侯要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邑和寿邑，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能对齐国怎样，出兵多了对秦国有害。今天秦和邻国的关系不亲，越邻国去攻别国，行吗？以前齐闵王南攻楚国，破军杀将，辟地千里。然而最后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到吗？是因为形势不

允许呀！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又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就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送给敌人粮食。大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一寸土地就是大王的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大王的一尺土地，今天放弃这样的策略而去远攻，不是荒谬吗？大王要想称霸诸侯，一定要征服韩、魏，以掌握天下枢纽，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这就是范雎献的著名的"远交近攻"的策略。秦昭襄王对此很赞赏，于是封范雎为客卿，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

范雎日益受到秦王的信任，又过了几年，他又找机会劝说秦王说："我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有听说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听说有秦王。独揽国家大权才叫王，能够兴利除害才叫王，有控制生杀予夺的威权才叫王。现在太后擅自行事，不顾一切，穰侯出使，不向大王请示汇报，华阳、高陵、泾阳君惩罚杀戮毫无顾忌，他们兴革政令，任免官吏都不向大王请示。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怎么能不倾覆，令怎么能从王出呢？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是对内巩固自己的威信，对外重视自己的权力。穰侯派出的使者窃取大王的威权，对各国发号施令，在天下订盟立约，征战敌国，没有谁敢不听从。打了胜仗，攻占了土地，利益就归于陶国，损害落到各国头上；打了败仗，就跟百姓结下仇怨，而灾祸归于国家。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子，齐王被他们所害死。李兑是赵国的臣子，他困主父于沙丘，百日饿死。今天秦国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华阳、泾阳君为羽翼，秦王也不会有好结果，这和崔杼、淖齿、李兑的事相似。今天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穰侯的，大王在朝廷实际是孤家寡人。我实在为大王害怕，百年以后，统治秦国的恐怕就不是大王的子孙了！"

范雎的言论代表了一般地主的利益，他们要求加强王权而限制封君贵族，在这点上与昭襄王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一拍即合。于是，秦昭襄王四十一年，秦王果断地下决心废掉太后，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改用范雎为相。

魏冉免相以后，被从国都逐出归回到自己的封邑——陶。高陵、泾阳君也各自回到自己的封邑。这时宣太后死，从此，魏冉家族在秦国的专政结束。

自公元前 306 年秦昭襄王即位，到公元前 265 年，秦国虽几易国相，但实权大部分时间都控制在宣太后和魏冉手中。魏冉因宣太后的异父弟，又有立昭襄王之功，所以在昭襄王之世曾先后五次出任相，时间共二十五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相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在他任相期间，秦国的领地得到很大的扩展，他任用著名的军事家白起为将，取得对齐、楚和三晋的重大胜利，削弱了这几个国家势力，其功劳是很大的，对秦的统一有积极作用。所以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穰侯魏冉说："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

但是，在魏冉当政期间，他错误地推行舍近求远的国事策略，一贯主张先攻击齐，后来又因被封于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他为扩大自己这一块领地，竟不顾距秦很近的韩、魏而更积极向齐刚寿进攻，这是秦国在战略上连连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之一。

在对内方面，他大权独揽，一反秦国一贯任用客卿的传统，反对接纳诸侯宾客，而将本家族安置于秦国朝廷内掌握大权。如华阳君曾为将军，后有罪去楚，但不久又被召回，任左丞相。高陵、泾阳君也都以贵族的身份执掌国政。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这一家族朝廷上的权势愈来愈大，他们不仅每人各自都有大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君，而且擅权专政，连秦王也不放在眼里，从而造成国内政治昏暗，对外斗争失利。范雎为

秦相后，加强了中央集权，使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有了一个稳定的内部统治核心，为秦的最终统一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穰侯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孟尝君列传》、《韩世家》。

《战国策》：《秦策》。

《资治通鉴》卷五

白起伐梁破楚

在战国后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军事家——白起，他为秦国称雄天下，“蚕食”六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白起亦名公孙起，眉邑（今陕西眉县）人，他长期作战，精通兵法，长于计谋，常能以奇兵制胜，并以凶狠残暴著称于世。在伐梁破楚的战争中，他率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为秦国打败强敌三晋和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楚怀王被拘于秦后，楚国大臣拥立太子横为君，是为楚顷襄王。楚顷襄王在位三十六年（前298—前263）期间，是楚国历史上又一段重要时期。如果说楚怀王对秦斗争的失败成为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那么，楚顷襄王对秦斗争的失败就使得楚国进一步衰落了。

这时楚国对秦国斗争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楚顷襄王。他的父亲客死于秦，楚国人都极其愤怒，希望报仇雪恨，真是民心可用。如果他发奋图强，力挽狂澜，是有可能使楚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重新与秦、齐争雄的。但他却完全不以国恨父仇为重，反而排斥忠良，宠幸佞臣，专事淫乐，不理国政。他对屈原的处理也是极其错误的，不问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仅凭令尹子兰的一派诬言，就继续了他父亲楚怀王的错误，再度放逐了屈原。

楚顷襄王当政下的楚国内政腐败，吏治黑暗，百姓离心，军无斗志，危机四伏。而他宠幸的州侯、夏侯、鄢陵君与寿陵君等人，又都是些贪婪无能的人。一些忧心国运的有识之士，曾为他

敲过警钟，但他根本听不进去。楚庄王的后代庄辛就曾经对他说："君王亲近的是小人，喜爱的是美妃，像这样继续下去，郢都实在是太危险了！"然而楚顷襄王却回答说："先生是老糊涂了吧！你简直把夏侯他们当作楚国的凶兆了啊！"庄辛说："并不是我把他们当作楚国的凶兆，如果君王继续宠幸这四个人，楚国的灭亡是必然的。下臣请求暂时到赵国去躲避一下，留在那里观察局势的发展吧！"于是，庄辛就到赵国去了。果真如庄辛所说的，仅仅五个月的功夫，就发生了秦军大举进攻楚国的祸事。

原来，那时几个大诸侯国之间的争夺极其尖锐激烈，而楚顷襄王在这场拼搏中，无所作为；在强秦的步步进逼面前，一味退让，屈辱妥协，终于在秦军东进时无法保住自己的国土。

当时楚国有个惯于用轻弓细绳射中北归鸿雁的人，顷襄王知道了，叫他来。其实这个人是个谋士，很有计谋。他对顷襄王说："我喜欢射小雁、小鸟，这是小矢发挥的作用，哪里值得向大王陈说。如果发挥楚国的优势，凭借大王的贤明，所取得的收获就不会只是这一点点呢。从前三王获得尊号，五霸获得各国的拥护。当今的秦、魏、燕、赵等国，好像是小雁；齐、鲁、韩、卫等国，好像是小野鸭；邹、费、郯、邳等国，好像是小鸟。其余的就不值得一射了。看见这六双小鸟，依您的意见该怎么射取呢？大王何不用圣人作弓，用勇士作绳，看准时机张弓去射取，这六双小鸟，可以射下来用一个袋子装回去。这快乐就不只是一朝一夕的快乐；这收获就不只是一鸟一雁的猎物了。大王早上开弓去射魏国大梁的南部，射伤他的右臂就可直接牵制韩国，那中原地区的通路就断绝了，上蔡一带就不攻自破了。接着转身射向圉的东面，割断魏国的左肘，再向外射击定陶，那魏国东部将被迫放弃，而大宋、方与两郡就可以拿下来了。魏国的左右两臂既经割断，就会动荡不安；再从正面进攻郯国，大梁就可以为楚所有了。这样大王就可以在兰台祝捷，到西河阅兵。平定魏国的大梁，这就是第一次

射箭的快乐。如果大王对于射猎真正爱好又不觉得厌倦，那就拿出宝弓，准备新绳，到东海去射取有钩喙的大鸟，整修长城作为防线，然后早上射取东莒，晚上射取浿丘，连夜射取即墨，回头占据午道，那么，长城以东、泰山以北就到手了。向西连接赵国，向北直通燕国，楚、赵、燕三国就如鸟张开翅膀，合纵局面就不必等待盟约而自然形成了。大王向北可以游幸燕国的辽东，向南可以眺望越地的会稽，这就是第二次射箭的快乐。至于泗水流域那些诸侯国，左手一指，右手一挥，可以一个早上全部拿下来。现在秦国打败韩国反而成了长久之患，占领一些城邑都不敢据守；他攻打魏国没有进展，袭击赵国反而受害，那么秦、魏两国的势力都快消耗尽了，这时，大王拿出宝弓，准备新绳，等待秦国疲困之机，向秦进攻，这样山东、河内的广大地区就可连成一片了。不过秦国仍是一只大鸟，它背靠大陆居住，而向东方站立，左臂控制赵国的西南，右臂挟制楚国的鄢郢，当胸对着韩、魏，俯瞰中原各国，所处地形方便，地势有利，展翅翱翔，纵横三千里，所以秦国不可能单独缚住和一夜射得的。现在楚国疆土纵横五千里，拥有百万强兵，尚足以在战场上扬威逞志，但老是坐受困厄，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忧虑。”这个人想激怒楚王，唤起他的奋发图强的斗志，并为楚国谋划了攻魏伐秦的扩张策略，但楚顷襄王一点也听不进去。

公元前 296 年楚怀王死，楚秦关系破裂。次年，秦国为了集中力量进攻韩、魏以扩张领土，免去楼缓相位，用魏冉为相，又主动与楚修好，援助楚国粮食五万石，楚顷襄王不问缘故，欣然接受了这一番“好意”。同时，秦国又与齐国重归旧好，使齐国免去了主张与秦为敌的孟尝君的相位，而以秦国的五大夫吕礼为相。

秦国稳定住齐、楚两国后，从公元前 294 年开始，就大举向韩、魏进攻了。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 294），秦派左庶长白起等率兵先后攻占

韩、魏两国的武始（今河北武安南）、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次年，韩、魏两国联合抵抗秦国，在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被左更白起打得大败，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嘉，接着白起又攻克五座城邑。白起因功升为国尉。随后，他渡过黄河攻取了韩国从安邑以东直到干河一带的土地。

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秦军继续向韩、魏进攻，这一年攻下魏国的垣（今山西垣曲东南），又归还给魏，转而向韩进攻。次年，秦派大良造白起攻取原属楚后属韩的原重镇宛（今河南南阳），又派司马错攻取魏的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和韩的邓（今河南孟县西）。宛、邓两地原是韩的南北两个冶铁手工业地区，为秦取得后，秦的经济、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了。

秦昭襄王十八年（前289），白起和客卿错又率秦兵伐魏，攻破蒲阪等大小六十一城。由于秦国势如破竹似的进攻，使韩、魏遭到沉重打击，只好向秦求和。结果，韩割武遂（今山西临汾西南）二百里，魏割河东（今山西西南）四百里，使秦暂时停止进攻。

原来，秦国曾经派人到赵国，请求赵出兵与秦联合伐魏。魏王听说后马上派人到赵国对赵王说："秦伐魏，魏若灭亡，那么赵国离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过去晋国想灭虞，先攻打虢国。虢国灭亡，虞国离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当时荀息献给虞国马匹和玉璧，请求借道伐虢，宫之奇极力反对，但虞国还是借道给晋国。晋大举伐虢，灭虢国后，在回来的路上就把虞国灭了。如今赵国国力强大，可以与齐、秦抗衡；大王贤明天下，为诸侯所了解，所以赵国成为秦国的腹心大患。臣下恐怕魏国会成为赵国的虢国，赵国会成为魏国的虞国，大王如果听任秦国出兵伐魏，那么赵国就会成为当年虞国最终会被秦国灭掉，臣下恳请大王好好地考虑一下。"赵王听了魏使的一番话，犹豫不决。

此后不久，魏王听从芒卯的建议，派张倚出使到赵国，对赵

王说："如果赵王不出兵助秦伐魏，魏国愿意把邺地让给赵国。"赵王听后大喜，召集大臣们商议。赵王说："魏王请求割让邺地，使寡人绝断秦。"相国说："从秦伐魏，最后得到的好处也不会超过得到邺地，现在赵国不用一兵一卒，就得到邺地，这很合适，大王可以答应魏王。"随后，张倚问赵王："大王答应收取邺地，那么，您将如何报答魏国呢？"赵王于是下令关闭秦国通过魏国的道路。秦、赵关系恶化。

秦军虽攻伐魏、韩两国取得大胜，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这时，秦昭襄王写信给楚顷襄王说："楚如果背叛秦，秦将率诸侯的军队进攻楚，请君王整顿军队，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打一仗。"这封信明明是秦担心楚趁机联合韩、魏袭秦所采取的一个军事威胁与讹诈手段，谁知昏庸的楚顷襄王一接到这封信，便害怕得不得了，赶紧与他的宠臣们商议对策。他的那些宠臣们想来想去想了一条绝妙之计，竟建议向秦国求亲以维持两国的友好。这正中秦国下怀，亲事一求即准。第二年，楚顷襄王就派人从秦国又迎来了一位夫人。这时，秦进攻韩、魏的战争还在继续，然而楚国却袖手旁观，坐视秦国势力的迅速扩张。

后代的许多思想家与史学家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往往拍案不平。宋朝的司马光认为秦太残暴，"杀其父而劫其子"；楚顷襄王太不争气，"忍其父而婚其仇"。

公元前 286 年齐灭宋，声势强大，威胁到三晋。三晋联合秦、燕打算进攻齐国，秦同意了。秦昭襄王为稳定侧翼，于公元前 285 年约楚王在宛相会。楚顷襄王应召赴会，完全没有考虑如何牵制秦的扩张问题。

公元前 284 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军在燕将乐毅的指挥下攻齐，大败齐军，攻占了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齐闵王辗转逃到莒（今山东莒县）。联军共占齐国七十余城。齐国的名城仅剩下即墨和莒两处了。

这战争开始时，楚未参加任何一方作战，后来乘齐大败之际，夺回了齐原攻占楚国的淮北之地。后又派淖齿率兵来到莒救齐。但是，淖齿却打算与燕瓜分齐国的土地，便在莒地杀了齐闵王。闵王的儿子法章乘混乱之机改名换姓逃到莒太史敫家做佣工。齐闵王的近侍王孙贾为了给齐闵王报仇，来到莒邑市场中大声呼喊说："楚国的淖齿杀了齐王，你们中间有愿意同我一起去报仇的，把右肩膀露出来！"在他的召唤下，有四百多人随同他一起去杀了淖齿。最后，王孙贾找到了法章，继立为王，即齐襄王。

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以火牛阵打败燕军，乘势收复了齐国的土地。齐国虽然得到恢复，但元气已伤，失去了强国的地位，秦终于消除一个足以与他抗衡的大国。

从当时的斗争形势来看，齐灭宋以后，齐的势力迅速发展，对楚不利。经过这场战争后，齐的势力过度削弱，齐、秦、楚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形成了秦的绝对优势，同样对楚不利。淖齿救齐原本是符合楚国利益的，但他救齐不利，使齐的损失太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淖齿擅自行动，杀了齐闵王，使齐受到更大挫折，客观上助长了秦的气焰，从而使楚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由于齐受到的打击极为沉重，因此，在对齐的战争尚未完成结束时，秦国的军队已向三晋发动了进攻。

秦昭襄王二十四年，秦军攻占了魏国的林（今河南新郑东北）和安城，直逼大梁。

当魏王听到秦军即将兵临城下，连夜召见国相孟尝君，对他说："秦军就要攻打大梁了，你为寡人谋划，该怎么办？"孟尝君回答说："如果有其他诸侯国来救，魏国可望不亡。"魏王急忙说道："你就为寡人到诸侯国中求援助吧。"孟尝君首先到了赵国，他对赵王说："我请求大王借给重兵用来救魏。"赵王不答应，孟尝君接着说："我向赵国借兵救魏，也是为了赵国。"赵王不解其意，

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孟尝君回答说："赵国兵力并不比魏国强多少；魏国的兵力也并不比赵国弱多少。然而赵国之地得以保全，老百姓得以平安；而魏国每年都受到威胁，老百姓终日不安，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赵国的西边有魏国做屏障。现在赵不出兵救魏，魏国一旦与秦联合，那么赵国就会与强秦为界，赵国就危险了。"赵王听了孟尝君的一番劝说，马上派赵兵十万，战车三百乘去救魏。

然后，孟尝君又到燕国，对燕昭王说："如今秦军攻打魏国，希望大王能出兵救魏。"燕昭王说："燕国的庄稼已经两年没收获了，现在又要行数千里去助魏，燕国没有这种余力。"孟尝君说："行数千里之地而救人，这对燕国的声望是有好处的。"燕昭王还是不答应。孟尝君说："大王不采用臣下的请求，我就回去了。不过，我恐怕天下将会有大的变化！"燕昭王急忙问："你说的变化是什么意思？"孟尝君回答道："秦国攻打魏国，国家就要灭了。可是，燕国却不去援助，魏国一旦战败，对燕国是不利的。到那时，魏国割地求和，把国家一半给秦国，秦国必定撤兵。魏国就会马上调集魏韩兵力，而借兵于秦，并依仗赵国的力量，向北来进攻燕国。到那时大王会得到什么好处呢？"燕昭王说："寡人听你的，你先回魏国去吧！"随后派燕兵八万，战车二百乘去救魏。魏王听到赵、燕大军来救，非常高兴。秦军看见赵、燕援军已到，就退兵了。

次年，秦又向赵进攻，取得兹氏（今山西汾阳）等两城。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又攻下赵的离石（今属山西）。

秦对三晋的进攻刚告一段落，便将进攻的矛头又指向了楚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秦派大将司马错率十余万大军、大舫船上万只、米六百万斛，从陇西出发，沿涪水而上，经由蜀郡，攻占了楚的黔中郡。又乘军事胜利的威势，迫使楚国将上庸、汉北之地割让给秦。

为了集中力量进攻楚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秦昭襄王邀请赵惠文王到渑池（今河南渑池西）相会，两国修好停战。赵王不想赴会，大臣廉颇、蔺相如认为：若不去则向秦示弱。于是赵王带蔺相如赴会。与秦王宴会间，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请秦王击缶（瓦盆），秦王不肯，蔺相如则以兵刃相胁，对秦王说："如不击缶，五步之内，臣请以颈血溅王！"秦王只好击缶，终不能辱赵王。赵王敢于同秦王在渑池之会上对抗，一方面固然是蔺相如机智、勇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秦国当时主要目的在于稳定北面，以便集中兵力，更大规模地南攻楚国，因此不愿同赵决裂。

与赵结盟以后，稳定了侧翼，秦就大举向楚进攻。这次秦军的战略目标，是以夺取郢都为目的。秦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白起率领主攻部队，由汉北地区南下，先夺鄢（今湖北宜城西南）之后再夺郢；另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侧翼部队，由四川出发，进攻巫、笮、黔中一带，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配合主力部队，牵制楚国兵力，使楚军首尾无法相顾。同时夺取楚国西部地区。

鄢城虽不大，但战略地位很重要，南距郢百余公里，且有大路相通，是郢都西北的重要门户。因此，楚国在这里集中主力数十万人防守以保卫郢都，决心与秦国进行决战。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楚军为保卫京城，决不会轻易放弃这小小的鄢城，而白起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将领。在白起一生领兵作战中，被他所杀的敌方兵达百万人之多。因此，双方都决心死战。

白起率领部队迅速围住了鄢城，但因楚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于是，他想出一个惨无人道的办法，很快地消灭了楚国的抵抗力量。原来，鄢城西有一条鄢水（一名长谷水，即现今之蛮河），发源于荆山与康狼山之间，向东南注入汉江。白起在城外命士兵筑土为堨，堨长约百里，把水从城西灌入城里，滔滔河水，淹没全城。城的东部地势最低，水汇集到那里成为深渊，大水还冲毁了城墙的东北角。楚国军民被淹死达数十万之多。大

量尸体随水漂至城东，尸体腐烂，臭气冲天，人们后来就把那里称为臭池，称淹没鄢城的水渠为“白起渠”，亦名“长城”。白起就这样靠水淹之计不战而胜楚军，攻占了鄢。

这时，张若率领的秦军在长江上游也取得不小的胜利，牵制了楚军，使楚无力在大别山以南作战。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今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并攻下楚都郢。楚顷襄王仓皇出逃，把国都迁到了陈（今河南淮阳），并把陈称为郢。

郢都在楚国的历史上曾两度失守。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06年被吴攻占，旋即收复。而第二次被秦夺去，直到楚国灭亡，也没有再收复。在秦军铁蹄蹂躏下，无数的郢都百姓遭到屠杀，高大巍峨的宫殿被焚毁，传世千百年的宝器被劫夺，许多重要的典籍简册被破坏，郢都几乎沦为废墟。当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曾作《哀郢》一诗，从他的心灵深处发出了深沉悲痛的哀鸣：想不到宫廷大厦变成一片废墟啊，故都两座东门怎么变成荒芜之地！心情久久不舒坦啊，旧忧与新愁紧紧相连。

这一年，秦军在楚国境内又向东攻占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等地；向西攻占了西陵（今湖北宜昌），烧毁了楚先王墓夷陵；向南攻占了巫郡、黔中郡，一直到洞庭湖，并占领了沿湖地区。这一年，秦开始设置了南郡。白起以作战有功，被封为武安君。

白起拔郢在楚国历史上是一次重大事件，也是楚国进一步衰落的标志。楚国从此失去了强国地位，不再作为秦国的强劲对手而存在了。随着齐楚两国的迅速衰落，从此秦国对东方六国处于明显的绝对优势地位。

公元前273年，楚顷襄王为了缓和与秦的关系，决定派黄歇出使秦。黄歇使秦之前，秦已经决定派遣武安君白起率领军队与韩、魏两国联合进攻楚国，但军队尚未出发。黄歇到达秦以后听到了这个消息，害怕秦乘胜一举灭楚，于是赶紧上书给秦昭襄王

晓以利害，极力离间秦国和韩魏的关系。

黄歇首先劝秦王不要做得过头，物极就必反。他说秦国使盛桥入韩，秦不用兵，得韩百里之地，可谓大王能干了。秦攻魏得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虚（今河南乍津东）、桃（今河南长垣西北），秦国的功算是多了。后来又攻取魏的蒲（今河南长垣）、衍（今河南郑州北）、首（今河南睢县东南）、垣（今山西垣曲东南），割取濮磨（今河南封丘一带）以北之地，到了齐国的边境，秦国的国威算是充分发挥了。如果这时秦王还不考虑适可而止，恐怕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有所谓"始之易、终之难也"。

黄歇说，秦国对于韩、魏，有多世的怨恨。韩魏父子兄弟皆死于秦军，将近有十世了。如果秦还要和韩魏联合伐楚，这不大错了吗？再说怎么出兵吧，如果经过韩魏，韩魏和秦如果关系一破裂，归路就被切断。如果不经过韩魏而从随水的右岸进兵，这都是不毛之地，有得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黄歇提醒秦王说，秦楚相斗，魏国必然趁机占领过去宋国的领土，齐国必然占领楚国淮北的地方。这样的结果，楚国是破了，但韩、魏得到很大的好处，齐国也会强大起来。齐、魏、韩强大起来，那时秦国想称帝也不行了，这是大王应该很好考虑的。秦国最好的办法是与楚友善，楚秦联合攻韩，韩就会屈服，秦再以十万人占领郑，魏也就要屈服，韩魏屈服了，齐国也就容易攻取了。

秦昭襄王果然被黄歇说动了，于是取消了白起出兵伐楚的计划，谢绝了韩、魏两国的军队，并使黄歇回国，与楚国订立友好盟约。

黄歇的游说，使楚国避免了可能遭致灭亡的重大威胁。在此后一二十年里，楚秦两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使楚国的寿命整整延长了半个世纪。

魏国屡经秦国打击，早已疲弱不堪，其国都大梁又处中原要

冲之地，秦欲兼并天下，就打算先从魏开始。因此，自公元前276年对楚停止进攻后，秦国即将主力军队派往进攻大梁的前线。当年就攻下魏国两城。

次年，秦军已攻至魏都大梁。这时苏厉对周君说：“败韩、魏，攻取赵国的蔺、离石、祁地的，都是白起所办。白起善于用兵，又得天时地利，所以能连连胜利。现在白起又率秦兵攻打大梁，大梁必破。大梁被攻战略，周室就危险了，您不如派人去阻止白起，对他说：从前楚国有个神箭手，叫做养由基。他能在百步以外，对准指定的杨柳叶，射一箭中一箭，百发百中。一天，广场上人山人海，数千百姓三面围着，争看养由基表演百步穿杨。养由基弯弓搭箭，果然箭无虚发。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声。养由基十分得意，他再次搭上箭，正要拉弓时，只听得身旁有人说：不错，此人值得一教！养由基一听，倏地转过头，只见是个陌生人，胸中不由得腾起一股怒火。他放下弓，握住剑，跨前几步，冲着那人厉声责问：别人都夸奖我射得好，你却说：此人值得一教，请问你有什么本领教我？那人说：你的射箭技术的确很高明，我没有本领教你怎样弯腰展肢来射箭，不过，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应该适可而止，要是毫无休止地射下去，等会儿气衰力竭，如果拨弓扣箭稍有失手，一箭不中，岂不要前功尽弃了吗？”苏厉是想用“百发百中”这个故事劝戒白起，功劳已经很大，不要因为一旦大梁攻克不了，而使过去的赫赫战功毁于一旦。白起不听，继续领兵攻梁。

这时韩国派兵来救魏，也被白起打败，斩首级四万之多，后来魏派大夫须贾到秦国劝说穰侯魏冉，并献出温地给秦，穰侯才命白起率兵暂时退回，大梁不致立刻陷落，但这一年秦国仍将魏的重要城市　　启封（今河南开封附近）攻占。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279），秦又攻取魏的蔡（今河南上蔡）、中阳（今河南中牟西南）等四城。

这时，唯有赵国尚强，魏即同赵结成联盟，公元前273年，白起和客卿胡阳率军同赵、魏联军大战于华阳（今河南郑州南）。华阳原为韩地，这次战役本是韩、秦联合共同与魏、赵交战。

当时，魏、赵联军进攻华阳时，韩国向秦告急，秦国没有来援救。韩国相国对陈筮说："事情紧急，您连夜到秦国去一趟。"陈筮见到穰侯，穰侯问："是不是事情很紧急，韩王特派您来这里？"陈筮说："不急。"穰侯生气地说："您这样怎么可以作为国君的使者呢？韩国已经向秦求救，说明事情很急，您来说不急，这是什么原因？"陈筮说："韩国要是危急，就会改变立场依附他国，因为情况还不是那么紧急，所以我再一次来这里了。"穰侯说："您不必去见秦王，我马上派兵去救韩国。"过了八天，白起率兵就到了华阳，在华阳打败了赵、魏联军。

秦在华阳大胜之后，接着进逼大梁。燕、赵两国急派兵来救魏，秦见一时不易取胜，只好迫使魏国献出南阳地而退兵。

秦军两次逼近大梁，而未达到灭亡魏的目的，说明灭魏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魏国地居要冲，攻魏，燕、赵、韩等国必然来救。尤其是赵国，当时为最强国之一，尚有力量与秦匹敌，因此，赵不削弱，攻魏也不可能彻底胜利。于是，秦国又掉转矛头向赵进攻了。

（张东刚）

参考资料：

《史记》：《白起列传》、《春申君列传》、《周本纪》、《秦本纪》、《魏世家》、《韩世家》、《穰侯列传》。

《战国策》：《秦策》、《魏策》、《赵策》、《韩策》。

《水经注》

《读史方舆纪要》

将相和

战国后期，由于西方强秦崛起，东方各国已相继削弱，相比之下，只有赵国还有相当力量。赵国自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后，军队战斗力显著增强，几年之中，相继灭中山、攻楼烦、伐林胡，扩地千里，令人刮目。继武灵王之后的惠文王也是有为之君，他为政期间，招徕人才，简能选贤，任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名将廉颇、赵奢为将军；在国内实行赋税改革，缓和矛盾，善度民力，一时民富府实，政绩斐然。君臣之间，将相之间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精诚团结，为了赵国的生存和利益与强秦在军事上、道义上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此时的秦国昭襄王当政，他自恃强大，雄心勃勃，欺凌弱小，遍辱诸侯，全不把东方各国放在眼里。忽一日，秦王接报说当时的稀世之宝和氏璧到了赵王手中，立时贪心萌动。秦王为何如此动心？皆因这块美玉来历很不一般。春秋时有一个名卞和的楚国人，入山时得到一块玉石，该石外表粗糙与一般石头无异，然而卞和凭经验推知里面包含着绝好的宝玉。卞和便怀着一片赤诚将它奉献给楚厉王，厉王将信将疑，命玉工检验，玉工断言并非宝玉，只是一块石头。于是厉王大怒，卞和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左脚。不久，厉王死，武王继位，卞和不甘心宝玉被埋没，抱着一线希望又去献宝，检验的玉工仍一口咬定是石头，于是楚武王也被激怒，卞和又失去了右脚。武王死，文王继位，卞和失去了希望和双脚，从此不再献宝，却怀揣宝玉坐在楚山之下终日哭泣，三日

三夜后，眼泪哭干，眼中滴血。文王听说后，非常惊异，忙派人去询问。卞和说我如此哀伤是因为无价宝玉被枉为石头，满腔忠诚却被诬为骗子。卞和的执著精神使文王大受震动，他忙委派技艺高超的工匠用心琢磨，终于得到这块珍宝。为了纪念卞和，才命之为和氏璧。因为它价值连城，举世无双，秦王早就梦寐以求，只是不知它落于何处。此时听说被赵王搞到手，真乃天赐良机，只要自己张口，谅他赵王不敢不给。于是，秦王派使节入赵送信，提出秦国愿以十五座城为代价与赵国交换和氏璧。

赵王立即召集满朝文武紧急讨论这个外交难题。结果君臣一致认为，秦国一贯贪得无厌，言而无信，所谓交换明明是个圈套，名为交换，实为骗取，把宝物白白拱手送出，让秦王捡了便宜，实在不甘心。如果拒绝秦王的要求，又恐怕对方恼羞成怒，又开战端。何去何从，赵国君臣反复权衡，总也想不出个稳妥的万全之策。

这时，秦国一方立等回信，急需派出一人出使秦国回复此事，情况紧急。此行责任重大，吉凶难卜，谁能担此重任？君臣面面相觑，鸦雀无声。这时，只见宦者令缪贤打破沉默，站了起来："臣下推荐门客蔺相如出使秦国。"赵王问其理由，缪贤说："过去我曾犯过罪，担心大王惩罚，打算逃往燕国。蔺相如得知后问臣下奔燕有什么把握，臣下说曾与大王在边境上与燕王会晤，燕王对臣十分友好且愿与臣交朋友，因此想投奔于他。相如劝阻我不要入燕，说：'燕弱赵强，燕王与大人结交是因为大人受赵王宠幸，现在您逃到燕国，燕国惧怕赵国，必然不敢收留您，甚至会把大人遣返回国，那样反而更糟。依臣之见，您不如主动坦白罪行，或许还可得到大王的谅解。'相如的话使臣下茅塞顿开，大王果然赦免了臣下。臣认为，蔺相如有谋略，有远见，深明大义，忠于赵国，此行出使秦国，必不负众望。"

于是，赵王召见并问计于相如："现在秦王提出要以十五座城

池交换和氏璧，你看，该不该答应呢？”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如果秦王收了璧，却言而无信，拒不割让城池怎么办？”相如答：“秦王提出以城池交换宝玉，如果赵国拒绝，便是赵国理屈；如果赵国交出璧后，秦国食言不割城池，那么理屈的就是秦国一方，二者相比较，还是后者在舆论上对赵国有利。”赵王认为相如句句在理，又问：“你看，谁出使秦国比较合适？”相如胸有成竹：“大王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臣下愿担此重任。大王放心，如果秦王如约割让了城池，臣下就留璧秦廷；如果想白白诓骗，臣保证完璧归赵，誓与宝玉共存亡。”之后，相如便奉玉西行入秦。

秦昭襄王根本未将赵国使节放在眼中。见赵王派人来献璧，以为好梦成真，得意非凡。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昭王在离宫中接见蔺相如一行。相如不卑不亢，先将璧献于秦王，秦王一见宝玉美不胜收，爱不释手，随后宫中朝臣美入争相传阅。满朝皆喜，众人齐声祝贺秦王终于如愿以偿。相如在一边冷眼观瞧，见秦王只是把玩宝玉，绝口不提割城之事，便趋身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玉上有个不易发现的小毛病，请臣下冒昧指点给大王。”秦王信以为真，将璧交给相如。相如立即持璧后退，身倚廷柱，变色道：“大王贪求这块玉，赵王得知后曾召集满朝官吏商讨对策，大家众口一辞认为秦国历来贪得无厌，言而无信，依仗着国力强大欺凌弱国。这次也决不会平等交换，必然是想靠几句空话诓骗宝玉，因此一致反对把璧送来。可是臣觉得布衣之交尚且讲求信义，何况堂堂大国？再说，因一块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玩物，扫了大王的兴致，伤了秦赵和气也不值得。最后臣下说服赵王，赵王沐浴斋戒了五天后，在宫廷上郑重地将宝玉和国书交给臣下，赵王对大王的敬意日月可鉴。可是如今臣下来到贵国，大王不仅不在正殿正式召见，而且态度狂傲、礼节简慢，将如此圣洁之物在众入手中随便亵渎，来嘲弄臣下，且只字不提割城交换之事。我看大

王根本无意平等交换，才设计从大王手中取回宝玉。事已至此，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臣下交出，臣下情愿把自己的头和宝玉一齐在柱子上撞碎，同归于尽。”相如一边说，一边斜视着柱子，随时准备猛撞上去。秦王心疼宝玉，连忙向相如道歉，立即命令取来秦国地图，假意指点十五座城给相如看。相如心如明镜，知秦王是为了宝玉敷衍搪塞，便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共宝，赵王慑于大王的威势，不敢不献。宝玉入秦时，赵王曾郑重地斋戒五日，现在大王接受宝玉，也应该照此办理，然后在正殿里举行隆重的仪式，臣下才敢把宝物进献给大王。”秦王虽然不快，但考虑到璧已然在蔺相如手中，也不好当众强夺，只好答应了五日后重新受璧。相如回到馆舍，断定秦王虽然答应了斋戒五日，却必定不肯割让城池，便于当日夜晚，派一个随员装扮成麻衣百姓，连夜悄悄将璧送回赵国去了。

五日之后，秦王果然在宫中举行隆重的仪式，接见蔺相如一行。相如上前施礼道：“臣下有事禀告大王。臣下那日回馆之后，前思后想，觉得贵国从春秋穆公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代君主，却从未见过一个讲求信义的。臣下怕这次再受大王蒙骗，因此几日前已派人将宝玉送回赵国了。臣下欺骗了大王，自知有罪，是杀是烹，就请大王随便处置吧！”事出意外，秦国君臣们又气又恼，哭笑不得。秦王手下人有的建议治相如的罪，秦王却惊叹相如的胆识，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更感叹相如对赵国的忠诚，不惜以身护国，因此并没有难为相如，反而大度地说：“算了吧，不要为一块玉伤了两国的和气。”接着，安排了隆重的接见。这样相如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安全回到赵国。

相如归国后，赵惠文王感念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封相如为上大夫。或许是羞于阴谋被挫，以后秦王再也没有索璧于赵。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国与楚国开战，为防止腹背受敌，秦国与赵国讲和，双方暂停战事。为与赵王修好，秦昭王给

赵王送信，要与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畏惧秦王玩弄阴谋，打算辞谢不去。将军廉颇和大夫蔺相如等人认为，如果不赴会，只会暴露出赵国软弱，在外交上对赵国不利。即便是刀山火海，也应慷慨赴会。大家动员之下，赵王决定接受邀请，蔺相如受命随侍左右，相机行事，保护赵王。

出发之日，廉将军亲自护送赵王来至边境上，临别廉颇与赵王约定："大王此去吉凶难测，如果不出意外，最多一个月就可返回，如果回不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请您允许立太子为王，以断秦国挟大王为质的恶念。"与此同时，廉颇又在两国边界上进行了严密的军事布防，百般警惕秦国的突然袭扰。

渑池会上，赵王与秦王相见。秦王心怀鬼胎，赵王强作镇静，双方貌合神离。几杯酒下肚，秦王微露醉意，建议赵王为他鼓瑟一曲助兴，以此贬低对方。赵王畏惧秦王之威，无奈之下含辱忍气为秦王奏了一曲。早已侍立一旁的秦御史立即上前记录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对于秦王的这套卑鄙伎俩，相如早有思想准备。为了维护赵国的尊严，他毅然挺身上前对秦王说道："我国国君早就听说大王擅长秦国音乐，现在请大王为赵王击缶。"秦王正在沾沾自喜，此时忽见赵国陪臣以牙还牙，令自己击缶，如何肯答应？相如将缶高高举着，长跪不起，执意要求秦王敲击，秦王仍固执不从。见此情景，相如颜色大变，厉声喝道："大王如果再不肯演奏，五步之内，你我二人今日同归于尽！"席间气氛骤然紧张，秦王左右侍从蠢蠢欲动，一见相如怒发冲冠，凛然正气，咄咄逼人的样子，立时萎靡，没敢上前。秦王被逼无奈只得勉强敲打了一下，相如立即回首对赵国御史吩咐："请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朝臣们为了替秦王挽回面子，一齐哄道："请赵国割十五城为秦王祝寿。"相如针锋相对："请秦国割咸阳为赵王祝寿。"双

方唇枪舌剑，寸步不让，相如据理力争，力挫群雄，直至酒宴结束，秦国方面也没占上风。秦昭王心中虽然恼恨不已，但是听说赵国已在边界严密布防，未敢轻举妄动。

不久，赵王安全返回首都邯郸。为了报答相如在渑池会上面斥强秦，舍身护国的出色表现，封相如为上卿，地位竟在老将廉颇之上，引起了廉颇的不满。廉颇是当时著名将领之一，战功赫赫。惠文王十六年，率军伐齐，大获全胜，取晋阳，始封上卿。惠文王、孝成王期间三十多年，攻魏伐齐，抗击强秦，立下了数不清的战功。孝成王十五年，廉颇任相国并封信平君。同年，燕国乘赵国长平之战后国力衰微讨伐赵国，廉颇大破燕军，掳乐间、卿秦，杀栗腹。廉颇和蔺相如一样，对赵国和赵王都耿耿忠心。此时廉颇见蔺相如只靠口舌之辩，就身居高位，心里不服气，到处扬言："这些年来，我为赵国驰骋疆场，九死一生，立了多少战功，才封了个上卿，他蔺相如不过是个卑贱的小门客罢了，仅仅靠个灵牙利齿，就一步登天，让我位居他之下，真是我的奇耻大辱，待我见到他，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廉颇的恶言恶语很快风传到相如耳中，他不但没有发作，而是主动回避，不与廉颇见面。上朝时假称有病不去，避免与廉颇争座次。有时，相如出门，只要远远地望见廉颇的车子过来就赶紧避开。久而久之，相如的门客们心中都愤愤不平起来。终于有一天，他们集体向相如辞行了："我们这些人离家背井，投奔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先生的为人和才干。如今您功劳不比廉将军小，地位不比廉将军低，可是一听到廉将军的恶言恶语就被吓成这个样子，一天到晚鼠避猫般躲躲藏藏，连面都不敢见。这样胆小如鼠连普通百姓尚且不耻，更何况先生这样的朝廷重臣呢？长此下去，我们实在忍受不了，现在请让我们离开吧！"相如沉吟良久，然后耐心地启发道："依你们看，廉将军与秦王哪个更凶恶一些？"众人道："当然是秦王。"相如道："秦王如此凶恶蛮横，我尚且敢于当庭面斥，煞他的淫威，

相如虽不才，难道却单单怕廉将军不成？相如之所以避免与廉将军发生冲突是始终铭记这样一个事实：强悍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有所企图，就是因为今日之赵国有相如、廉将军这样一个团结合作的群体。一旦赵国将相之间因为争夺名利地位出现矛盾，只能是自毁长城，给无孔不入的秦国以可乘之机。我这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相如的一席话很快传入廉颇耳中，他大受震动。回想自己一介武夫，目光短浅，气量狭小，较之相如的坦荡心胸差之甚远，不觉更加自惭形秽，懊恼不已。廉将军性格直率，知错就改，立即按当时习俗，袒露肩背，背负荆杖，由门客领路，亲自到相如家中登门谢罪。相如闻讯慌忙迎出，深为将军的磊落心胸折服。于是二人促膝而谈，肝胆相照，遂成刎颈之交。

此后几年，赵国在对齐、魏、秦等国的战争中都取得胜利，赵国保持住了战国后期第二强国的地位。

赵惠文王时期出现的将相和的故事已流芳百世，蔺相如善自谦抑，相忍为国的拳拳爱国之心，明可鉴人；廉颇将军不饰非，不掩过的胆识和勇气，可敬可佩，仍令今人动容。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本纪》。

《战国策》：《赵策》、《秦策》。

《战国纵横家书》

清·梁玉绳《史记汉书诸表补十种》

林剑鸣《秦史稿》

范雎相秦

秦武王立四年死，诸弟争位。武王生母惠文王后早死，庶母宣太后有三子则、显、悝，另有兄弟二人，一名魏冉、一名芈戎。魏冉在惠文王、武王两朝为臣，很有权势。因此，武王诸弟争位之时，魏冉利用自己的职权拥立其姐之子则为王，是为秦昭襄王。昭王上台，诸弟不服，第二年，庶子壮不承认昭王，自号季君，另立山头，魏冉迅即发兵平叛，壮及其同伙兵败，结果凡参与叛乱及不与昭王合作的宗室贵族都被残酷诛杀，自此，王位的争夺才算告一段落。魏冉立昭王及平叛有功，任国相，封穰侯，任相专权二十多年，对秦国的政治、军事影响极大。

昭王母宣太后名芈八子，楚国人。昭王立，她以太后的身份干预国政，操纵昭王。封同父弟芈戎为华阳君，后贵至将军、丞相，又封自己的另外二子为高陵君、泾阳君，二人也曾执掌国政。随着秦国对外扩张的不断胜利，宣太后一家的权势越来越大，封地日益扩展，这些人擅行不顾，出使不报，进退不请，随意妄为，全不把昭王放在眼里。

穰侯一伙嫉贤妒能，排斥异己，满朝文武多为亲信族人，党亲连体，互为羽翼；经济上聚敛财富，生活奢靡，私家重于公室，他们的胡作非为，使秦国国内政治黑暗，君权旁落，延缓了秦国的统一进程。

客观地评价魏冉专权，其中有功有过，不可一笔抹煞。昭王初年，设计破坏齐楚联盟，使楚国处于孤立之境，多次遭到秦及

东方各国的进攻，怀王囚死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秦又派白起和张若大举攻楚，白起水淹鄢城，次年拔楚郢都，焚楚先王墓夷陵，设南郡。从此，当时三大国之一的楚国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声威。

魏冉执政期间，提拔任用著名军事家白起，取得了对东方各国作战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昭襄王二十四年（前283），白起率军大败韩、魏联军，攻陷伊厥（今河南洛阳龙门），斩首二十四万，给韩魏两国以重创。此后几年，又连续攻打韩、魏，二国抵挡不过，只好割地求和。昭襄王三十一年，白起同赵、魏联军大战于华阳，大胜之后进逼大梁几乎灭魏。

在此期间，魏冉还利用宣太后消灭了一个长期隐患——义渠戎。义渠戎为秦西边的一个游牧部落，迁徙不定，骄悍凶恶，桀骜不驯，在秦全力东顾之时，时时威胁秦国的后方，自惠文王以来，就难以将其制服。昭王初立，义渠王前来朝贺，宣太后就利用色相取悦义渠王，并与之私通，笼络住义渠王，稳固了秦国后方。之后，又乘义渠王沉溺于温柔之乡全无防备之时，将其杀死。接着，举兵攻伐义渠，义渠遂灭，巩固了秦国后方，使之可以全力东进。

但魏冉出于私利，一贯主张伐齐，又导致秦国军事战略失败的一面。魏冉封地在陶（今山东定陶），与齐境接壤，为扩大私邑，多次率军越三晋而伐齐，劳而无功，这种舍近求远的错误方针，使秦国在战略上连连处于不利局面，正在此时，魏人范雎来到了秦国。

范雎，字叔，明天下之事，有口辩之才，家贫无资财结交魏王，便投奔到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

一次，魏昭王派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同前往，齐襄王风闻范雎满腹经纶，有将佐之才，欲与范雎交结，便私下派人送给范雎金十斤、牛、酒等礼物，范雎百般推辞不敢受此厚礼。须贾得

知范雎收了齐王的礼物，不禁怒火中烧，他断定齐王如此厚待范雎，必是范雎出卖了魏的国家机密，勒令范雎只收牛、酒，将金十斤退还。

归国后，须贾将齐王与范雎私下来往一节如实汇报给当时的魏相魏齐，魏齐闻报勃然大怒。为了杀一儆百，令手下人毒打范雎，可怜范雎被打得骨折齿落，气息奄奄，昏死过去。打手们用薄席将范雎裹起，扔在厕所中。夜晚，魏齐府中大宴宾客，酒醉醺醺的客人们更将尿溺在范雎身上，范雎受尽了非人的侮辱。醒来之后，为求脱身，范雎挣扎着对看守说："我范叔非无能之辈，日后必能发达，今天你放我出去，他日一定以一还百加倍报答于你。"看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为放走范雎，他对魏齐说："范叔已死，干脆将他扔出去吧。"魏齐此时已略有醉意，信口答应。范雎终于死里逃生，躲在好友郑安平处潜藏起来，并更名为张禄。魏齐酒醒后发现范雎脱逃，又令人四处捉拿，终无所得。

此时，秦昭王派谒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乔装混入兵卒侍从之中，侍奉秦使。归国之前，王稽问郑安平，魏国可有贤能之士愿意与之一同去秦国，郑安平说，附近有位张禄先生，有德有才，愿与先生共谈天下大事。他在魏国有仇人，白天不敢露面，只能夜间出来见你。于是王稽与范雎夜晚相会，稍一交谈，秦使就断定此人是个治国之才，决定带他回秦国，于是约定了第二次见面的地点后便很快分手。

王稽辞别魏王，将范雎藏在车厢中，一路平安回到秦国。

此时秦国国内魏冉专权，将本家族的人安插到重要的部门，大权独揽。为巩固自已的地位和本家族的利益，魏冉一反秦国任用客卿的传统，恶纳诸侯客，对外来人士入境严格检查，私带客人入境者要处以重罚，因此王稽带范雎入秦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入秦之后，反倒比在魏地行走加了许多小心，以免被人发现。

王稽一行走到胡地，远远见一队车骑从西往东喧嚣而来，范

雎忙问："来者何人？"王稽答："秦相穰侯巡视东方。"范雎道："我听说穰侯专权，最反对接纳外来客人，最好不要让他见到我。"说着，忙藏到车里。一会儿，穰侯果然到来，慰问了王稽几句之后，使站立车旁问道："这次有没有带外人一起回来？我最恨游说之士，这种人成不了事，只会把国家搞乱。"王稽低声下气连道不敢，穰侯便策马继续东行。

穰侯走远，范雎忙从车中爬出，王稽问其故，范雎说："穰侯是个聪明人，刚才他已怀疑车中有人，只是一忙乱忘记搜了，只怕他一会儿还会回来搜车。"行不多久，穰侯果然派人回来搜查车中，见车中无人才放心而去。王稽一见，对范雎更加佩服。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范雎入秦。

王稽向昭王汇报魏国之行，乘机向秦王推荐范雎。王稽说："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是个将佐之才，明天下大事。他认为秦国貌似强大，实则危若垒卵，他愿意为大王出谋划策，使秦国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些话只可面谈，因此我从魏国将他带回来，请大王不要错过时机。"而此时的秦昭王受穰侯的影响，对外来的游说之士全无兴趣，只给予范雎下等待遇，范雎耐心等待时机到来。

这一年，范雎听说穰侯再次准备越韩、魏，远征伐齐，夺取纲、寿二地以广其封地，认为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就此问题上书昭王，以期引起昭王对自己的重视。

范雎写道："臣听说明智的君主赏有功而罚有罪，功大禄厚，劳多爵尊。如果大王认为臣的话可信，您就采纳，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可信，那么请准许我离开。善理家者，财富取之于国，善理国得财富取之于诸侯；良医知人生死，明主明察事之成败，有利则行，有害则免。今臣有利秦之言，愿当面向大王进言，如果大王认为臣之言荒谬欺妄，臣愿以死抵罪。"范雎言真意切，打动了昭王，昭王下令车载范雎入宫进见。

范雎受命在离宫等待秦王到来。为了进一步警醒秦王，范雎

佯装不识路，径直走到宫后的监狱里。不一会，昭王到了。侍从忙通报范睢，大王到了，范睢满不在乎，反讥道："秦国哪有什么大王？只有太后、穰侯而已。"昭王来到，听到范睢与宦者的争执，知范睢为了感怒自己，便慌忙解释道："从前，因为义渠王的事，寡人常去请示太后，使得太后一家干权过重，现在义渠既灭，一切政事由我亲自主持，请先生放心。现在让寡人行宾主之礼。"然后深深施礼，范睢辞让不及，侍从们见此景莫不对范睢肃然起敬。

二人进入宫室，秦王屏退左右，双膝跪地，请范睢畅言。连请三次，范睢都诺诺不语，秦王怨道："难道先生不愿教诲寡人吗？"范睢道："臣不敢无礼。昔者周文王在水滨遇姜太公时，他们交情不深，后来任吕尚为太师，同车而归是因为他们言语投机，友情加深的缘故。这样文王才得力于吕尚之功而有天下，臣乃飘零之人，与大王没有深交，然而为了秦国，臣愿献一片忠心。今日我想对大王讲的都是利国利民之言，陛下如果采纳我的主张，必定会伤害大王的骨肉亲情，臣不知大王的心意，是以国家为重，还是以亲情为重，因此大王问臣三次都未表态。臣知今日进谏，明日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臣尽忠而死，死而无悔，只怕天下贤士都因此背秦而去。眼下大王上畏太后之威，下被奸佞迷惑，身在深宫，难辨忠奸，长此下去，大者国破，小者身危，臣说的危若垒卵就是这层意思，为此臣终日忧心，故冒死进言。臣不畏死，如果臣死而国治，虽死无憾。"

昭王闻此肺腑之言，深为感动："先生何出此言！秦国偏远落后，寡人愚钝不明，今日先生至此，是天助秦国。请先生随意讲来，无论大事小事，不要有所顾虑。上及太后下至大臣，但说无妨。"

范睢先分析了秦的形势："秦国地理条件优越，战可攻，退可守；军事力量强大，有战车千乘，勇士百万，百姓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其他国家难以相比。有此王者之地，加此王者之民，秦

国已具备了称雄天下条件，早就应该成就霸业了。然而，至今向东进展迟缓，主要是穰侯对国家不够忠心，只求谋取私利，导致战略上的失误造成的。”

昭王又请范雎进一步分析失利的原因。范雎怕左右有穰侯的耳目窃听，先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后来见秦王耐心倾听，并无加害之意，便开始大胆批评时政：“现在穰侯越韩、魏而伐齐，过涉千里，劳而无功。出去的军队少了，对齐国没有威胁，出去军队多了，秦就会国内空虚，邻国可能乘虚而入。因此，千里迢迢，越人之国攻打它国，战略上是下下策啊！当时齐闵王不远千里，攻打楚国，虽破军杀将，辟地千里，但一尺一寸齐国也没得到。并非齐闵王不想得，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因此齐伐楚虽然获胜，非但寸土未增，反而引起诸侯的群起攻击。齐远征楚国，国困军乏，不堪一击，齐国遂破，国内大臣作乱，田文逃走。二强之一的齐国何以衰败如此之快?主要就是齐国战略上的一着错棋，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望大王一定要吸取齐闵王的教训。战略上要实行远交近攻，以三晋为主要目标，蚕食东进，步步为营，得一寸一尺都是大王的土地。过去赵国独吞了方五百里的中山国，功成名就捞了那么大的好处，诸侯们却对赵国无可奈何，就是因为赵国与中山相接，赵国战可攻退可守。大王现在应全力攻韩、魏，对齐国要友好，使之保持中立。现在韩、魏二国处于天下之中，大王应先亲近韩、魏，以威胁楚国、赵国，楚、赵亲附秦国，齐国自然惧怕，必然低声下气侍奉秦国，这样，称霸天下就指日可待了。”

昭王道：“寡人一直打算亲附魏国，可魏国政策多变，无法令人亲近，请问先生该怎么办?”范雎道：“大王先卑辞重币附和他，不行就割地贿赂他，再不可就举兵讨伐。”昭王认为范雎所言头头是道，便拜他为客卿。昭王四十一年，派五大夫王绾伐魏，取邢丘、怀。

范雎又劝昭王伐韩："秦韩两国地形，犬牙交错，韩国对秦国来说，如同木有蠹虫，人有心腹之患。天下如有乱，韩国对秦的威胁最大，大王不如伐韩。"昭王道："我早就打算收韩，韩国不听从怎么办？"范雎道："大王按我的计策办，韩哪敢不听从。大王派兵攻占荥阳，那么巩、成皋之道不通，从北边断绝上党之道，那么韩上党郡的军队就过不来，大王一攻荥阳，韩的领土一断为三，危在旦夕，到了那时，韩哪能不听秦国的摆布，韩国归附，霸业可望。"于是昭王派使赴韩。

昭王对范雎日益亲近，几乎言听计从，随着范雎在秦地位的提高，对魏冉专权越发不满，二人矛盾日益尖锐。为消除魏冉这个政敌，范雎常有意激怒昭王："臣在魏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田文，听不到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高阳、泾阳几贵，没听说过秦王。一国之主应独断朝政，掌握生杀大权。现在的情形是太后独断专行，穰侯出使他国不向国君禀报，另外三君任意胡为，不向国君行臣子之礼。这四个人居于国君之上，已经成了国家的危害。大权旁落，政令出于权贵，这种情况非改变不可了。善于治国的君主，应在国内巩固自己的威势，对外扩张自己的权力。现在穰侯掌握了国君之权，征伐政令出自他口，诸侯莫敢不听，胜则利归于陶，败则祸归于社稷，长此下去，大王难保平安。君不见齐国崔杼、淖齿专权，射齐王股、擢王筋，将齐王悬于庙梁而死。赵国李兑专权，囚主父武灵王于沙丘百日饿死。臣尊必然君卑，穰侯就是淖齿、李兑一类人。夏、商、周三代亡国的教训，就是国君将权柄授人，不听政令，使奸人御下蔽上，以成其私，国君不省悟，终失其国。现在朝中上下都是相国安插的人，大王势单力孤，臣担心几代之后，秦国就不是嬴姓家族子孙所有了。"昭王听了范雎一席话，不禁冷汗涔涔，后怕起来，连说："你提醒得好！"于是废太后，罢穰侯相，逐四贵归回自己的封邑。穰侯出关回陶封，财产千车有余，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昭王四十一年，秦以应地（今河南鲁山东）封范雎，号应侯，任相国。范雎执政后，强公室、杜私门，强化了君权。与此同时，他自己的权势地位也在增长，昭襄王对范雎越加信任，人前人后竟将自己得范雎比作齐桓公得管仲，又自称范雎为叔父，人称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可见范雎的权势地位。

此时魏国君臣只知秦国穰侯失势，新相姓张名禄，其他情况一概不知，更不知张禄乃范雎化名。魏齐须贾之流多年未闻范雎音信，以为他早死了，做梦也想不到今日范雎已贵为秦相，操生杀大权于手中。

魏国听说秦国要讨伐韩、魏，便派须贾使秦进行斡旋。范雎听说须贾来到秦国，报复之心顿生。他身着旧衣，步行来到馆舍，求见魏使。须贾一见范雎大惊道："先生别来无恙？何时来到秦国？是来游说秦王吗？"范雎笑道："我得罪了魏齐，逃生尚来不及，哪还敢游说秦王？我现在每日为人做佣为生。"须贾见旧日门客落魄至此，心下哀怜，留范雎吃饭，饭后又取一绨袍相赠，以示故人之情。须贾又问范雎："我有事要求见张禄先生，听说他极受大王信任，我的事要仰仗张禄先生帮助，你可有朋友认识他？"范雎道："我的主人认识先生，可以替你想想办法。"

范雎回府，取来驷马大车让须贾乘坐。范雎为须贾驾驭径直进入秦国相府，府中人望见纷纷回避，须贾心中非常奇怪。范雎在门前下车，先进去通报，让须贾在外稍等。须贾在外扶车而立，许久不见范雎出来，便问府中人："范叔为何还不出来？"府中人答："这里没有叫范叔的。"须贾道："范叔就是刚刚为我赶车的那人。"府中人道："那不是范叔，是我们相国张禄先生啊！"须贾闻听大惊失色，忙脱衣肉袒，自言该死，入府请罪。

范雎坐于高堂之上，侍从如云，气概非凡，须贾哪敢正视，忙顿首请罪："臣有眼无珠，没料到君青云直上，罪该万死。"范雎喝道："你有三罪：第一，你错认为我私通齐国并向魏齐诬告；第

二，魏齐辱我于厕中，作为主人你并未阻止；第三，客人酒醉便溺我身，给我以奇辱。你无故生事，陷我于九死一生，若非郑安平相救，我哪有今日。你早就该死，然而我今日不杀你是因你今日赠绨袍一件，还有点故人之情，凭这一点，我给你留一条性命。”

不久，须贾返魏。临行前向秦相辞行。当日范雎大宴诸侯使节，大家都高坐堂上，饮食甚精美，独独魏使须贾一人置坐堂下，而前摆一小盘豆，让两个刑徒侍候，进行羞辱。之后范雎反复叮嘱须贾：“回去转告魏王，马上送魏齐的人头来，不然的话，秦国将屠大梁。”须贾归国后，将此话告诉魏齐，魏齐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往赵国，藏在好友平原君府中。

范雎时刻不忘当年之辱，誓杀魏齐。魏齐亡赵，不知所终，后来方探听到他被平原君收留。于是秦国又要求赵国交出魏齐，终不可得。秦昭王为了替范雎报仇，假意邀请平原君到秦国来作十日之饮，交个朋友，平原君不敢拒绝。与昭王畅饮几日之后，昭王道：“秦相范雎是寡人的叔父，他的仇敌魏齐现在君家中，请快取他的人头来，否则就不放你回国。”平原君乃侠义之人，如何肯出卖朋友，于是自己被扣留做人质。秦国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派人给赵王送信，以平原君为质，逼取魏齐人头。于是赵王派兵将平原君府团团包围，欲捉拿魏齐。魏齐闻讯，连夜出逃求救于赵相虞卿，虞卿弃相印，与魏齐一同逃回大梁，打算借信陵君之力逃往楚国。魏齐求见信陵君，信陵君怕秦国报复，犹豫不定该不该帮忙。魏齐见信陵君不肯帮忙，绝望之下，拔剑自刭。赵王闻听，忙取来魏齐人头献于秦相，才将平原君赎回。

范雎其人，恩怨分明，一饭之德必偿，怒目相嗔之怨必报，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为相后，首先说服秦王提拔救命恩人王稽做了河东守，后来又提拔同党郑安平做了将军，并尽散家财，报答曾帮助过他的人。与此同时，对有怨仇之人则不遗余力无情追杀，不置对方于死地决不罢休。作为一国之相，器量狭小，个人恩怨

过重，加之将个人情感与国家政治混同一谈，必将对国家带来不利影响。

但是总的来讲，范雎相秦比魏冉专政时期在内政、外交上都有进步。内政方面，修秦蜀间的栈道，使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加强了秦对巴蜀的控制和联系。范雎为政最重要的功绩是扭转了穰侯时期错误的舍近求远战略，为昭王制定了"远交而近攻"的正确方针，从此使秦国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在对外扩张中一步步走向胜利。

范雎初任客卿时，昭王就依照范雎远交近攻的方针伐魏，获胜之后，又将矛头指向心腹之患韩国。在卑辞重币，割地贿赂都无效之后，秦将白起攻韩，拔陉、城汾等九城，斩首五万，这时是秦昭襄王四十三年。第二年，白起又攻韩的南阳郡，绝韩太行道。昭王四十五年，五大夫王贲攻韩，取十城。白起伐韩的野王，野王降秦，韩的上党郡与本土断绝。四十六年，秦又攻占韩的缑氏、蔺二地。四十七年，秦又派大将王龁攻韩的上党。就这样，秦将最弱小的韩国作为主攻目标，连续几年，攻韩不止，韩被秦打得七零八落，招架不住，领土一块块被蚕食，从此更加衰落。

秦对韩的胜利，使它同另一强国赵国之间的固有矛盾激化，于是秦赵两强之间发生了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长平之战。

秦攻占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之后，截断了上党郡与韩本土的联系，上党郡守冯亭见归路已绝，孤立无助，就以上党降赵，以求保护，共同抗秦。赵孝文王受降，封冯亭为华阳君，派老将廉颇驻守上党。

昭王四十七年，秦国左庶长王龁率兵进攻上党，廉颇驻军长平（今山西高平）壁垒以待。秦军在阵前不断挑战谩骂，廉颇令将士坚守不出。秦军长途跋涉而来，欲速战速决，见赵军坚守，不为所动，知此必出自廉颇计谋。范雎知时间一长，秦军必被拖垮，

须速战速决，才对秦有利。于是秦国派人行使离间计，派奸细在赵国到处散布流言，诽谤廉颇。他们诬蔑廉颇年老怯战，且有降秦之意，秦国真正怕的是马服君之子赵括。赵括乃赵奢之子，其实不懂军事，只会纸上谈兵。谁知赵王不辨真伪，果然中计，立即将廉颇撤换，命赵括为主将率兵作战。秦国方面闻报离间计果然奏效，大喜过望，立即将主将换成白起，且严禁走漏消息。白起为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身经百战，战无不胜，因战功赫赫受封武安君，毫无军事经验的赵括哪里是他的对手。

赵括上任后，志得意满，急于取胜。秦军挑逗。果然轻易出击，秦军佯败逃走，赵括不知是计，奋力追赶，追至秦营前，秦军退入城中，此时秦伏兵尽发，阻绝了赵军的退路，又发五千骑兵横冲直撞，将赵军截为二处，首尾难顾，被秦军团团包围起来。赵军只得临时筑壁垒自卫，等待援兵。秦国倾全国民力遍遮于路，阻绝赵国粮草及救兵的来路。被围赵军外援无望，处境日蹙。从七月至九月，赵军已断粮四十六天，饥兵甚至以人相食。赵括无奈，率众拼死突围，激战中赵括被对方射死，主将阵亡，群龙无首，赵军四十多万悉数降秦。秦将白起唯恐赵卒谋反，竟下令将四十多万降卒活埋，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幼卒归赵，让他们回去宣扬秦国的声威。长平一战，赵国损失四十五万精壮，从此元气大挫，失去了以往强国的地位。

白起在长平大败强赵，使秦国声威大震，然而却引起了范雎的嫉妒。范雎对白起的敌意一方面因白起是穰侯所荐之人，令他放心不下。另外他担心在秦国这样的尚武功之国，白起功劳过大，自己的专权局面难以维持。正值此时，韩、赵两国为了本国的生存，派辩士苏代入秦游说，利用范雎与白起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秦国将相关系。苏代对范雎说："武安君南征北战，为秦国先后攻取七十余城，扩地千里，杀敌百万，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有上古召公、吕望之功。如果赵国灭亡，秦为天下王，武

安君必为三公，地位在先生之上，您能甘居其下吗？不如同意韩、赵两国请求，割地求和，不要给白起增加立功机会。”

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率军直指赵都邯郸，欲乘胜一举灭赵。第二年十月，白起令再攻上党，又令王龁率一路兵马攻武安、皮牢，又令司马梗率一路军攻太原，白起自己率主力留在上党，整装待发，做好攻打邯郸的准备。

谁知范雎听信了苏代之言，为了个人私利，他决定放弃灭赵，与韩、赵讲和。范雎力劝昭王休战，说什么秦军长期作战，士卒劳困，久战恐怕不利，不如同意二国的请和，让士兵休整。昭王闻听有理，就下令白起罢兵还师。

白起盼望进攻的命令在前线整整等了两个月，哪知盼来的却是撤兵的命令。眼见到手的战功化为泡影，白起的愤怒不满自不待言，他非常清楚是范雎从中作梗，却无可奈何，从此以后二人的隔阂更深。

秦赵的和解仅仅维持了几个月便破裂了。本来，秦与赵、韩约定退兵的条件是：韩割垣、雍，赵割六城送给秦国。结果只有韩国乖乖地献出垣、雍二地，赵城一直未献不说，还悄悄派虞卿去齐国联齐抗秦，惹恼了秦国。秦昭王一怒之下，便决心再次伐赵。九月，昭王令白起再次率军伐赵，白起认为此时并非攻赵的有利时机，不宜出战。白起之所以反对伐赵，除了对范雎的不满外，更主要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分析：长平大战之后，形势对秦有利，当时如果一鼓作气，攻取赵国，胜券在握，而有利时机现在已经失去。赵国自长平惨败后，君臣同德，早朝晚退，卑辞重币，结连诸侯，积虑备秦，上下都做好了应战准备，即使秦国军队再增一倍，赵国自会有十倍的抵抗。这种情况下，秦军很难取胜。白起的分析相当有道理，无奈秦王受到范雎的蛊惑，哪里听得进去，白起见劝阻无效，便托病拒绝出战。

昭王四十八年九月，昭王令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遭到顽强

抵抗。第二年正月，王陵率领的秦军在进攻邯郸的过程中也受挫，将卒多有伤亡，昭王于是又想起了白起。

眼见贸然出击，取胜无望，白起怎肯因此必败之战毁自己一世英名，因此当焦虑万分的昭王再次强令白起出马时，白起仍是托病不肯出战。昭王见白起不给面子，就派范睢出面劝说，他哪里知道这二人本是冤家对头，如何能谈得拢，范睢不会真心请白起，白起自然更没有理由出马。为阐明自己的观点，白起又进一步对范睢分析了形势，说明此次伐赵必无得胜的可能。谁想范睢却以此作为激怒昭王，陷害白起的时机。在他的挑动下，昭王大发雷霆，命王龁代替王陵，增兵遣将，继续围攻邯郸。情况正如白起的预见，赵国防御极强，拼死抵抗，王龁的军队攻打邯郸八九个月之后，毫无进展，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又率几十万大军前来解邯郸之围，秦军损失惨重，死伤甚多。

白起眼见秦军节节失利，批评了伐赵之失，昭王闻知更加恼怒。但前方战事危急，非白起不能扭转战机，于是他再一次来到白起府中，强令白起带病出征，软硬兼施。白起见诸侯纷纷援赵，秦军必败无疑，因此不但不肯出战，反而从大局出发，分析战局，继续劝阻昭王停止伐赵，固执己见的昭王哪里听得进去，反而更加认定白起故意和他作对，气咻咻拂袖而去。白起当即被削去封爵，贬为士伍，并令他离开咸阳，迁至阴密（今甘肃灵台西）。当时白起因病未愈，暂缓成行。三个月后，诸侯军发动攻势，秦军数败，消息传来，昭王更将战败之责归罪于白起，盛怒之下，勒令白起即时起程，离开咸阳，白起只得抱病起程。范睢一伙欲陷白起于死地，乘机对昭王进言，说白起起程时，面有不服之色，留着他恐有后患，不如斩草除根。昭王听信谗言，立即派人追赶白起，在出咸阳西门十里的杜陲追上白起一行。使者授剑传达了昭王的旨意，令白起自刭。白起执剑仰天长叹道："我何罪于天，遭此下场?"过了一会儿自答道："我罪孽深重，应该死。长平之战，

下令将赵四十万降卒全部活埋，足以死罪。”于是伏剑自刎。此时是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白起自昭王十三年任左庶长，三十多年，为秦国开疆辟地，战功赫赫，拔城七十余，杀敌近百万。可怜一代枭雄，就这样命丧政敌之手。秦人同情白起，怜之死非其罪，乡邑民间皆自发祭祀白将军，陕西境内，仍有不少有关白起的古迹至今尚存。

范雎陷害白起之后，乘机举荐自己的同党、恩人郑安平为将军，率军配合王龁猛攻邯郸，邯郸危急。平原君连连发信向魏求救，魏公子无忌窃兵符，杀晋鄙，率八万精兵救赵。同时，平原君亦率门客二十人突围至楚，搬来救兵。邯郸城内居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终于坚持到魏楚援军的到来。秦昭王五十年，秦与赵、楚、魏三国联军之间的一场恶战在邯郸城下展开，直杀得天昏地暗。赵国军民在内同仇敌忾，拼死冲杀，楚魏援军在外，决一死战，秦军受到内外夹击，阵脚大乱。主将王龁败逃，郑安平所统二万秦军被围困突围不成，只得投降，后被赵国封为武阳君。邯郸之战就这样以秦国的惨败而告结束。

郑安平降敌，范雎举荐非人，按秦国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按律而论，范雎与郑安平同罪，当诛灭三族。因此当郑安平率二万军队降赵的消息传来，应侯范雎主动向昭王请罪。昭王私庇范雎，非但没有照章处罚，反而下令国人禁谈郑安平之事，对范雎宠信如初，加赐日厚。

昭王五十一年，秦伐韩，取阳城、负黍，又攻赵，取二十城。西周武公想乘秦大败之机，与诸侯联合，率天下精兵出伊阙攻秦，却被秦军击败，西周武公顿首投降，尽献其邑三十六城，秦王受降，西周灭亡。

秦虽灭西周，但在河东地区却遭楚、魏联军的打击，领土丧失，河东、太原二郡从此失守。秦在河东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河东守王稽与诸侯私通，出卖秦国。王稽亦为范雎所荐，范雎

为报当年的知遇之恩力荐王稽做了河东守，谁知这王稽更不争气，竟私通外邦，给秦国造成巨大损失。

昭王闻知王稽的罪行，怒不可遏，当即将其诛杀。王稽通敌更属重罪，事牵相国，按罪当同死。范雎此次死罪断不可免，就对昭王进言："臣本为魏国一卑贱之人，承蒙大王抬举，今日贵为相国，使臣下施展抱负，名扬天下。大王之恩臣刻骨铭心。今臣举荐失人，按律当死，臣死而无怨。只是希望大王不要让人杀臣，以免引起诸侯误解，对大王不利。因此，臣恳请大王赐臣下自尽，并以相国之礼葬之，这样，天下人就不会对大王有所非议。"昭王听了范雎的肺腑之言，深受感动，回想起相国以往的功劳和好处，如何忍心杀他？于是，竟将范雎赦免。

一连串的打击使昭王终日忧虑。一日，昭王临朝而叹，范雎慌忙请罪。昭王道，人说楚国铁剑利而倡优拙，铁剑锋利士兵必定勇敢，倡优拙劣君主必定思虑远，楚国有此二利，以谋虑深远之君驾驭勇猛之士，寡人担心楚国谋伐秦国，现在武安君已死，郑安平降敌，内无良将，外多敌国，不能不令人担忧。范雎闻言，知昭王对自己已渐生不满，且因郑安平、王稽这事，处境难堪。正值此时，燕国辩士蔡泽入秦，范雎以为贤，将他推荐给昭王。昭王召见蔡泽与之语，大喜，拜为客卿。范雎乘机称病免相，昭王强行挽留，范雎自称病重，坚辞不就，于是昭王任蔡泽为相，东收周室。昭王五十二年，范雎死。

范雎自秦昭襄王四十一年拜相至五十二年免相止，共掌朝政十二年。在此期间，打击私家势力，强化公室权力，加强了君主集权。另外修栈道，通巴、蜀，巩固了秦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对楚国造成很大的威胁。外交方面，范雎为秦制定了正确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扭转了穰侯时期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并使之成为几代秦王的外交方针。军事上，连续征韩、伐魏，长平之战又给赵国以毁灭性打击，使三晋的实力大为削弱，为秦国的最终

统一取得了关键性进展。

范雎为政失当之处皆源于个人心胸狭隘，过分注重个人恩怨。对有恩于己的人，不辨才能与品德，极力提拔，对过去亏待过他的魏齐之流，则不惜运用国家力量进行报复，不遗余力。范雎这种以个人恩怨出发的做法不仅给秦国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军事上也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他对白起的嫉妒和陷害，则几近于卑鄙，令人不齿，而范雎这种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做法，最终也导致了他自身的毁灭。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六国年表》、《秦本纪》、《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雎蔡泽列传》。

云梦秦简《编年纪》、《战国策·秦策》、《战国纵横家书》

长平之战

秦昭王时，魏人范雎避难入秦，不久得秦王重用，受封应侯，贵为秦相。昭王听信范雎之言，罢穰侯、废太后、逐四贵，加强了手中的权力。在对外扩张上，昭王接受范雎“远交而近攻”策略，暂时与大国齐、楚等国修好，将主要力量用来打击近邻韩、魏，弱小的韩、魏无力抵御秦国的进攻，领土不断被秦国侵吞。

秦国势力不断向韩魏两国扩展，便与当时富甲山东六国的赵国利益发生了冲突。赵国自从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和赵惠文王三十几年励精图治，国力大振，一跃而成为山东最强的国家。秦国为了削弱赵国，曾在昭王三十七年（前270），大举进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形势很紧张，包括廉颇在内的几员大将都持悲观态度，唯赵奢对胜利充满信心。赵奢率军驻守邯郸附近，先坚守不出，麻痹秦军斗志，而后急行军，出奇兵突现于阏与阵前，迅速占据有利地形，赵军如同神兵天降，令秦军措手不及，狼狈归逃，赵奢因功受封马服君。阏与之战后，秦国领教了赵国的力量，再不敢轻易与赵国交手。由于赵国的抑制，秦国四十多年不敢为所欲为。

但秦赵之间的这种平衡没有维持多久。赵惠文王三十三年，惠文王死，子孝成王继位。孝成王的统治才能远不及其父，且贪图小利，他一上任，马上任用了同样平庸的平原君赵胜为相。廉颇虽健，却并不完全受信用，蔺相如此时身患重病，难理国政。因此，这时的赵国远非惠文王时代可比，已埋下了衰败的种子。秦

国势力却在不断发展，终于在秦昭王四十七年，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在两国之间爆发，两强并立的局面最终被打破了。

长平之战是战国后期秦赵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战，两强相争，当然是智者勇者胜，秦国内有精明的范雎出谋划策，外有名将白起的英明指挥，而赵王却一错再错，先是贪图便宜引火烧身，继而听信流言，罢免廉颇，加之赵括骄纵无知，终于使这场战国时期规模最大、场面最为惨烈残酷的大战以秦人大获全胜，赵人惨败而告终。这是秦国推进统一进程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从此赵国永远失去了强国的地位，秦国则以一强吞并天下再无敌手，真可谓一战定乾坤。

长平之战的导火线由韩国上党郡守冯亭亲手点燃。

范雎任秦相以后，从“远交近攻”的战略出发，视韩国为秦的心腹之患，立即将进攻矛头指向这个七国中最弱小的国家。昭襄王四十二年，攻占了韩的少曲（今河南孟县境内）、高平（今河南济原西南）；第二年，又占取了韩的九座城，斩首五万；第三年，白起又占取了韩的太行地区；第四年，秦军又攻取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将韩国拦腰截为两半。从此，韩的上党郡同韩本土的联系被截断。

秦国连续不断地进攻，令韩国君臣惊恐不安，为求保全，韩桓惠王忙派阳城君入秦请和，并答应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与此同时，又派出韩阳为使去上党传达王令，希望上党郡太守靳黈能遵守王令，放弃抵抗，以上党郡入秦。谁知这个靳黈偏不买帐，反而表示要尽发守军抵抗秦军，自己要恪守职责，以死效韩，决不让上党失守。韩阳只好将靳黈的态度报告了韩王，韩王虽然感念靳黈忠心可嘉，但考虑到自己已向应侯范雎作了许诺，如不献上党，自食其言，一旦惹恼了秦国，非同小可。于是忙下令将靳黈解职，另派冯亭走马上任，代为上党郡守。

冯亭上任一个月，对面强秦的威势，知上党郡终非韩国所有，

便召集下属共同商议："现在归韩本土之道已断绝，而且秦军的攻势日甚一日，韩国无力应付，这样下去，咱们最终也难作韩国臣民，与其归附秦国这个虎狼之国，还不如归赵。赵国如果接受我降，就会激怒秦国，秦国必然攻打赵国，则攻韩可稍缓。再者两强相争，赵国必然亲附拉拢我国，韩赵两国联合，就可以抵御秦国。"众人认为此乃一举两得，一致同意，冯亭便悄悄派人前往赵国联络。

冯亭的使者入见赵王道："现在韩国已守不住上党，有人要将其献之于秦，上党的吏民都不愿为秦民，愿入赵，现在全体臣民愿将十七座城归降赵国，愿大王裁定。"孝成王一听不由心下暗喜，这真是天赐之福，这样的便宜，哪能不要。于是赵王兴冲冲召来平原君等几个人商议此事。

冯亭的使者入赵三天前，赵王曾作过一个怪梦，他梦见自己身着两色之衣，乘飞龙上天遨游，不想未至天空便坠下地来，只见地上金玉珠宝堆积如山。赵王猛然醒来，惊诧不已。他忙找来巫史为之释梦，巫史占卜之后说："大王这个梦不吉利，梦双色衣，预示着残破，乘飞龙上天，预示着有气而无实，金玉堆积如山，预示着忧心之事。"赵王听后不以为然，三日后，便有上党献地之事。

赵王喜滋滋地对赵胜、赵豹等人说道："现在秦韩相战，韩无力守上党，想献之入秦，谁知上党臣民皆不愿入虎狼之国，都愿为赵国的臣民。现在太守冯亭已派人前来联系，想献上党郡于赵，你们看此事如何？"赵豹对赵王说："古人言，圣人特别忌讳无故之利，我觉得此利不可得。"赵王一听，心中不快道："上党人感怀赵国之义，才来投奔于我，怎么能说是无故呢？"赵豹道："秦国蚕食韩国之地，令韩国中绝不通，秦国本以为可以坐受上党之地，现在韩国以上党入赵的目的，是想嫁祸于赵国。秦国为攻韩不堪其劳，而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坐受其利，秦国如何肯善罢甘休？而且现在秦国牛耕积谷、水漕运粮、政行令严，死士皆有犒

赏，如此之强秦，不可与之交战，所以得这个郡并不是什么便宜事，一定会引来灾祸。”赵王一听大怒：“我国百万之众，逾年历岁作战，都未见占领一座城池，现在不用兵卒就可得城十七座，为什么不能要？”

赵豹怏怏而出后，赵王又征求赵胜和赵禹二人的意见，二人道：“咱们发百万之师，一年也得不到一座城池，现在不花费一丝气力，平白得十七座城，当然要捡这个大便宜。”赵王大喜，马上派赵胜前往上党受地。

平原君到了上党后，对臣民加官进爵，吏民相安者，皆有犒赏。又封太守冯亭为华阳君，冯亭泪流满面，不肯见赵胜。因为他自认为有三罪，处于三不义之中，一是为国君守地，不能以死保全，致使国土入于他国；二是主令入地于秦，自己不顺主公，擅自入地于赵；三是自己封官进爵，等于出卖国土。冯亭因此没接受封号回到韩国本土，对韩王谎称赵国听说韩国无力守上党，已发兵攻占了上党，韩王竟信以为真。

韩王马上派人向秦国报告赵国已发兵攻占了上党，秦昭王闻报大怒，马上发兵攻赵，赵派老将廉颇在长平（今山西高平）拒守应敌。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两军相拒长平。此时赵奢已死，蔺相如病笃，孝文王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以援上党。四月，赵国士兵与秦军侦察兵遭遇，赵将茄被杀。六月，秦军又攻占二城堡，七月，又小败赵军，赵军初战失利，便筑壁垒坚守不出，廉颇下令全军坚壁以待，以拖垮秦军。任凭秦军在阵前如何挑战，赵军始终不出，廉颇深知此时秦军强于赵军，正面作战，只对秦国有利，因此准备待拖得秦军疲惫不堪，士气下降之时，再出奇兵击之，或许可以取胜。

赵孝成王不懂军事，又自恃强大，对廉颇的做法不理解，认为廉颇年老怯战，心中渐对老将军的做法不满。

秦相范雎见赵军坚壁不出，知其出自廉颇计谋。为破坏赵军的战略部署，范雎冥思苦想，终于设计出毒计一条。他不惜重金收买一批无赖之徒，在赵国到处散布流言，说什么秦国不怕廉颇，只怕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廉颇年老好对付，而且马上就要投降了。流言传到赵王耳中，赵王本来已对廉颇出战失利不满，后又对廉颇拒不应战心存疑忌，此等流言一出，竟不加分析，信以为真，马上撤掉廉颇，任命只会纸上谈兵，毫无作战经验的赵括为主将，正中了范雎的诡计。

赵括何许人也？其父姓赵名奢，是一位英雄。曾率领赵军在阏与把秦军杀得大败，令秦人大惧，不敢东向，并因功劳卓著受封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位，此时已死。

赵括自小热衷于军事，颇似乃父，然而他习军法，只知其皮毛，不知权变，又与其父有天壤之别。赵括自幼熟读兵书无数卷，说起兵法，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天下无双，但从无实战经验。赵括曾与父赵奢谈论兵法，赵括张口滔滔不绝，赵奢虽理论不过，但并无一句称赞的话。赵括母忙问其故，赵奢道："兵事，生死大事，不可轻视，而赵括谈起来却轻轻松松，好像容易得很，所以他只能纸上谈兵，并不能真正领兵作战，将来国家不任他为将则可，一旦用他为将，破赵军的必定是他。"

这次赵王任赵括为将，许多大臣都有不同看法。蔺相如抱病进谏："赵括只知死读其父的兵书，死守教条，遇事不知变通，他应付不了战场上的瞬息万变，不应让他为主将。"无奈赵王铁了心，谁也改变不了他的愚蠢决定。

赵括任主将即将走马上任。临行前，他的母亲上书赵王，极力反对任赵括为主将。赵王问其理由，赵母说："赵括与赵奢不同，不能为将。赵奢为将时，谦恭礼让，没有私心，常亲捧饮食送人，朋友众多，他不贪图钱财，每次接受了大王和宗室贵族赏赐的财物，全部发散给军官士兵，自己不贪求一点，一旦接受出征的命

令，便一心为国作战，不过问家事。赵括的品行无法和他父亲相比，既骄且贪，一旦做了将领，马上就高高在上，下级军官士兵谁还敢仰视他？他贪图钱财，大王赏赐的金帛财物，他全都拿来藏在家里，不肯分给别人，随时准备购买便宜的田宅土地，他的私心之重，一点不像他的父亲，他只是个败军之将，望大王千万不要让他领兵作战。”赵王哪里听得进去，赵母见阻拦无效，就又对赵王说：“如果大王一定要派他，妾有一个要求，如果赵括败阵，请不要牵连于我。”赵王点头应允。

秦王知道赵王果然中了反间计，断定此战赵国必败，不由惊喜万分。为了对付赵括，马上调整了军队，并悄悄让久经沙场的武安君白起代替王龁为主将，并下令军士严守军事机密，泄密者斩，以此麻痹赵军。白起为当时最著名的一员大将，三十多年来为秦国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战无不胜，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是个当之无愧的军事家；而赵括乳臭未干，只会背几本兵书，毫无实际参战经验，哪里是白起的对手。如此二人对阵，虽战事未开，胜负已明。

赵括上任后，自负轻敌，没将秦军放在眼里，又急于建功立业，因此，他一上任就整个改变了廉颇原有的坚守不出的战略部署，作了出击的准备。

白起探知赵括放弃坚守，准备出击，不禁大喜过望。他决定诱骗赵括上钩。白起利用赵括骄傲轻敌的弱点，预先埋下二处伏兵，然后纵骑兵挑战，赵括率众迎敌，几个回合后，秦军佯败逃走，赵括竟不知是计，率主力穷追不舍，一直深入到秦军营垒前。此时秦军二支伏兵齐发，一支二万五千人，断绝赵军退路，一支一万五千人冲入赵军大部队中间，将赵军一冲为二，秦军遮绝后路，赵军被困，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孤立无援，秦军又出轻兵击之，赵军自然作战不利，为求自卫，只好在原地筑营垒以待援军。

秦军为彻底遮绝赵国粮食及援军的通道，将国内年满十五岁的民众全部发往长平，赐国人每人进爵一级，倾全国人力阻挡通道，使赵军的外援及粮食久不得至。

昭王四十七年九月，被围赵军已断粮四十六天，饿疯了的士兵竟互相残杀以求充饥。赵括见援军无望，只好率士兵反复拼死突围，但秦军的重围如铁桶一般，如何冲得过去？赵括在一次突围中被秦军乱箭射死，主将一死，群龙无首，军队立即瓦解，四十多万赵军成为秦国的俘虏。赵国士兵经受过胡服骑射的训练，英勇善战，而且数目庞大，秦将白起担心赵军虽然被迫投降，可是一旦作乱，无法控制，为了杜绝后患，他竟残忍地下令将四十多万赵卒全部活埋，只剩下二百四十个年幼者放回赵国，以宏扬秦国的声威。长平一仗，赵国共计损失士卒四十五万，锐气大伤。白起的暴行，使赵国国内一片切齿之声。

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国从赵国手中夺走上党。接着，秦军分出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打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北），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平定太原，白起则率主力坐守上党待命。长平之战后，形势对秦有利，白起打算乘胜灭掉赵国，因此拉开了灭赵的架式。韩、赵两国见秦不罢兵，非常惊恐，为破坏灭赵的计划，派遣辩士苏代入秦，重金贿赂秦相范雎，并说服范雎与韩、赵罢兵修好。

苏代知范雎、白起二人之间门户之见之深已非一日，白起为前相穰侯魏冉一手举荐任用，范雎毁穰侯，白起自然不满，范雎亦视白起为死对头，对白起的屡建战功，范雎又妒又恨，苏代巧妙地利用二人的微妙关系，大作文章。

苏代见到应侯范雎便问："武安君白起打败了赵括，马上就要包围邯郸了，对吗？"范雎道："对，没错。"苏代又说："赵国灭亡后，秦国就是天下之王，武安君白起自然会因灭赵之功封三公。武安君自事秦以来，战无不胜，先后为秦攻取了七十余城，南定

鄢、郢，北擒赵括，功劳之大无人相比，甚至连古代周公、召公、吕望都不能超过武安君之功，如果现在让武安君再灭掉赵国，他的功劳就更大了。那时，必封为三公，应侯您能够心甘情愿地位居其下吗？如果不早想办法，任凭事态发展到那一步，再想改变也来不及了。再者说为秦国本身的利益着想，攻赵也得不偿失。从前秦国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臣民都甘心降赵，天下百姓早就不愿作秦国的臣民。如果灭掉赵国，赵人肯定纷纷入逃他国，例如北方的人燕、东方的逃入齐国，南方的入韩、魏，秦国还能得到多少？灭赵又对秦国有多少好处？依我看，倒不如同意赵国的请和，不要再给武安君增功的机会。”

范雎听了苏代一席话，反复权衡，最终认为灭赵对自己利少弊多，便对昭王进言：“秦兵长期作战，困顿疲惫，久战恐怕不利，不如答应韩、赵割地求和，暂时休整军队。”秦王一向对范雎言听计从，立刻同意休战，同时韩割垣雍，赵割六城人秦，作为求和之资。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秦赵罢兵。白起本想乘赵国国内战后混乱之机，一鼓作气灭赵，为此在上党率军待命二三个月，到头来，却等来一纸撤军令。眼见到手的战功化为泡影，白起的恼怒自不待言，他知道这个主意必定出自范雎，从此二人之间结怨更深。

长平之战刚爆发时，赵军的初战不利，一有都尉阵亡，赵王便有些惊慌。他对大臣楼昌和虞卿道：“我军初战不胜，为扭转战机，我想先发制人，发动进攻，和秦军决一死战，你们看如何？”楼昌道：“硬拼不是办法，我看不如派人去同秦国讲和休战。”虞卿历来主张东方各国合纵抗秦，反对投降秦国，此时听楼昌的投降论调，立即驳斥道：“楼昌所言认为如不求和，赵军必败，因此才要求与秦国讲和，如此则讲和的主动权掌握在秦国手中。现在请大王分析秦军此战的目的是不是打败赵军？”赵王道：“秦军为破赵军，可以说不遗余力了。”虞卿道：“所以这时向秦国讲和，很

难成功。请大王听从臣的建议：首先派使节携厚礼结好楚、魏，楚、魏两国收了大王的礼物，必然收纳我国使者。赵使进入楚、魏，秦国必定疑心东方各国合纵抗秦，必然惊恐，在这种氛围下，与秦国的媾和才可能成功。”孝成王执迷不悟，终究不听虞卿的耿耿忠言，仍旧让平阳君赵豹主持媾和，并派贵族郑朱入秦为质。

赵王见秦国接纳了郑朱，以为秦已同意双方讲和，很是得意，他又将虞卿君召来说道：“寡人委托平阳君主持讲和，秦国已入郑朱，你以为如何？”虞卿道：“大王不可能与秦媾和成功，因为赵军必败。如果秦国取胜，天下庆贺的人都会汇集秦国，郑朱是赵国的贵人，今入秦媾和，秦王与应侯必然会在各诸侯来宾面前着意显示，以孤立和贬低赵国，楚、魏知赵与秦国媾和，必定不再救赵，秦知天下无人救赵，则媾和决难成功。”此时的赵王只想一心求和，哪里听得见虞卿的一番真知灼见，结果，事情的发展正如虞卿所料，应侯范雎果然将郑朱入秦请和之事显示天下，以扬秦国声威，只是最终也没答应赵国的请和，结果赵国长平惨败，邯郸随即被围，成为天下笑柄。

长平之战后，双方休战。不久，赵王朝见秦王，并派赵郝为使与秦约定今后赵国一切服从秦国，同时献六城之地入秦以为求和之资。虞卿反对赵国如此卑屈事秦，他问赵王：“秦停止攻赵，是因为秦军困乏不愿打了，还是尚有力量进攻，只是出于对大王的友谊而放弃进攻？”赵王道：“秦国进攻，不遗余力，无友情而言，如今休战，是因为秦军困顿，无力进攻。”虞卿道：“秦军以其力攻赵，未取一城，兵力困顿，只好休战，而如今大王却以秦国力不能取之地拱手送之，这就等于帮助秦国攻打自己。如果明年秦再攻赵，大王何以自救？”赵孝成王优柔寡断，觉得虞卿言之有理，但赵郝极力主张割让六城于秦，因此举棋不定，就又一次征求虞卿的意见。虞卿道：“难道割让六城就能保证秦国不再入侵吗？如果秦国再次进攻，又割地而和，如此再三，这种割地求和

的作法无异于自尽，还不如根本就不同秦讲和。秦虽善战，它终究夺不走这六城，赵虽不善守，也不至于丢六个城。秦国攻之无获，必定收兵。赵国再舍出六个城去收买东方诸侯攻打疲惫之秦，必胜，这就是赵国失之于天下而从秦国得到补偿。赵国仍有一定力量自保，为什么要做这种削弱自己，增强秦国力量的傻事？赵郝主张割地求和，就等于答应秦国说赵国每年要无偿献六城于秦，这样不过几年，赵国国土就丧尽了。以后，秦国再要土地，大王用什么给？一次不给就等于前功尽弃，自惹秦祸。现在这样任秦摆布，秦不损一兵一卒，坐受赵地，才是弱赵而强秦的下策。以越发强大的秦国挟制越发弱小的赵国，秦的无理要求就会无尽无休，王的土地终究有限，而秦的欲望无有终止，以有限的土地满足无厌之求，结果必定是赵国不复存在。”

赵孝成王为人平平庸庸，寡谋少断，此时听二人之言，各有道理，正拿不定主意，正值辩士楼缓刚从秦来。楼缓是当时名士之一，亲秦派。为督促赵军早日献地于秦，他入见赵王。赵王便问计道：“先生刚从秦国而来，比较了解情况，先生看赵国割地与不割地，哪种作法更有利？”楼缓先假意辞让，在赵王的一再恳求下，便说：“大王听说过鲁国公甫文伯母的事吗？文伯在鲁国做官，病死后，有两个妇人为他在房中自杀殉情，他的母亲听说儿子死了，并不哭泣，家中邻人朋友惊诧不解。其母道：孔子是贤人，被鲁国驱逐后，文伯不追随孔子而去，今日有二妇人为其自杀而死，说明他对长者情薄而待妇人情厚，这样的儿子死了，作母亲的怎能痛哭。当时人们听了，都认为这位母亲非常贤明。同样的话语，如果出自他妻子的口，人们就必定认为是出于嫉妒。因此，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出，听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现在臣新从秦来，如果反对割地，那样明明不是好办法，如果赞成割地，只恐怕大王以为臣为秦国说话，因此不敢明言。如果让臣为大王着想的话，我觉得不如割地。”

虞卿听说楼缓诱骗赵王献地，立即入见赵王，提醒千万不要上楼缓的当。楼缓听后又见王，王又将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道："虞卿错了，他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秦赵两大国开战，东方各国都幸灾乐祸，暗自高兴，因为他们都想倚仗强秦而欺凌赵国。现赵军被秦军围困，天下贺胜之人都在秦国。现在应该赶快与秦割地求和，一来可以讨好秦国，另一方面可令东方各国怀疑秦赵和好，不敢再图谋赵国。否则，东方各国会乘秦国之怒，群起而攻之，瓜分掉赵国，哪里还等秦国来攻打。因此臣请大王千万不要犹豫，马上作出决定。"

虞卿又入见赵王，指出："楼子是秦国派来的，他所谓慰秦之心，实际是将赵国的弱点暴露于各国前。臣主张以这六座城贿赂齐王，齐、秦之间的仇恨远非一日，齐得我六城，必会与赵合力抗秦，王失之于齐而取之于秦，不仅齐、赵二国之深仇可报，而且可以昭示天下，长平虽败，赵国仍不失为强国。我相信王只要宣布联齐，不待齐赵联军逼近秦境，秦国就会反过来重贿赵国，与赵媾和。韩、魏二国听说后，必敬重大王，必以重宝争相结好于王，王可以一举而结三国之好，变被动为主动。"赵王受到感染，终于决定不献城于秦，并派虞卿入齐，联络合力抗秦。正如虞卿所料，不待虞卿返赵，秦已闻讯派出使者来到赵国。楼缓闻知此事，知阴谋失败，慌忙逃走，赵王为表彰虞卿之功，封赐一城给他。

秦赵之间和平并不长久，因赵国拒绝割地且派虞卿联齐抗秦，昭王一怒之下，于同年九月下令再次伐赵，然而，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赵国已从混乱、悲愤中猛醒，上下振作，同仇敌忾，此时攻赵不利。但昭王执意伐赵，既听不进白起的劝告，更恼怒白起不与自己合作。他先后派王陵、王龁攻打邯郸，遇到赵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前线的节节失利，使秦王更加迁怒于白起，于是在范雎的挑唆下，白起于昭王五十年十一月被逼自杀。

由于秦王听不进白起的正确分析，贸然攻打邯郸，久战无功，加之楚、魏数十万援军的到来，结果，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秦主将王龁败逃，副将郑安平率二万军队投降，邯郸之围遂解。

长平之战，赵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此后再无往日的雄风，至此山东六国皆靡，唯有一秦独强。从此后，秦国节节进逼，先后灭掉六国，终至统一。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世家》、《六国年表》、《秦本纪》、《平原君虞卿列传》。

《战国策》：《秦策》、《赵策》。

《通鉴纪事本末・秦灭六国》

平原君相赵

平原君赵胜，赵武灵王之子，惠文王之弟，礼贤好士，素有贤名，曾于惠文、孝成时期两朝为相，是赵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诸侯贵族们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纷纷敞开门户招致宾客，争取士人，既可备一时急需，又可赢得政誉。这些门客来源庞杂，包容了各个阶层，各色人等，其中既有巧舌如簧的利禄之徒，亦有侠肝义胆的正直之士，不乏老谋深算的智者，亦包含鸡鸣狗盗之徒。贵族们为了猎取名声，对前来投奔者往往广泛收纳，根据来者的名望及能力分为不同的等级待遇。战国时期的平原君赵胜、孟尝君田文、信陵君魏无忌、春申君黄歇，人称“战国四公子”，即以养士著称，门客都达三千左右。由于门客的参与，使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生动，变幻莫测和富有戏剧色彩，在四公子的政治生涯中，时时处处无不闪烁着门客们智慧的光芒。

由于养士之风日盛，因此，“好士”与否，成为舆论品评某一贵族政治上是否开明的重要标准。因此，贵族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往往不惜一切代价。

平原君家的楼窗临街，家中姬妾常临窗观景。一日，附近居住的一跛腿人，一瘸一拐地来到井边汲水，一美人正临窗眺望，一见那人姿势有趣，不禁大笑起来，放肆的笑声令汲水人十分恼火。第二天，跛腿人登门来找平原君，说道：“臣听说君有好士之名，

许多人不远千里来投奔您，就是因为君贵士而贱妾。如今臣不幸腿有残疾，君家美人见我非但不同情，反而大声嘲笑，如果君真好士的话，臣请求将这个女人杀掉。”平原君听后，认为这人的要求太过分，但表面上仍假意答应了。瘸腿人离开后，平原君笑对左右道：“这小子真是自不量力，想因为一笑之故就杀我心爱的美人，太不像话了。”最终也没有杀那女子。

过了一年多，平原君发现家中门客有将近一半的人离他而去，不禁心中纳闷。一天，他对一些正准备离去的人说：“胜待诸君从未有失礼之处，为什么你们都要离开呢？”其中一人向前回答道：“因为您不杀美人，我们都认为您过份看重美人而轻视士人，空有好士的名声，所以才要离去。”平原君一听，顿时醒悟，为了挽回名声，留住宾客，他立即下令杀掉那美妾，亲自到瘸腿士人家登门谢罪，并献上美妾人头。不久，离去的士人又都渐渐返回。此时，其他几位公子也如此礼贤下士，彼此竞争，揽取士人。

赵胜最早的封地是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故称平原君，后又封东武城。

平原君为人才干平平，既无虞卿那种洞察一切的远见卓识，又无信陵君领兵作战的将佐之才，但他善纳人言，稍可弥补其不足，对赵国忠心耿耿，与孟尝君那种为了个人私利，不惜出卖自己国家的卑劣行径，恰成鲜明对照。为相期间，不屈服于秦国压力，力主抗秦，长平之败，是赵胜为政之过，但解邯郸之围，赵胜又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赵胜两朝为相期间，虽无突出业绩，却也不虚其位。

因为平原君反对卑躬事秦，因此秦王始终对他很恼恨。惠文王时，秦国攻取魏的宁邑，诸侯们慑于秦威，皆遣使相贺。赵国亦派使前往，使者三往而无法入秦。赵王为此忧心忡忡，召集下属商议：“秦攻取宁邑，诸侯皆贺，秦独不受我贺，不久必然加兵于我国，你们看该怎么办？”左右道：“大王不必过分担忧，使者

三往不被接纳，必然是所派之人不合适，大王可以派辩士谅毅去试一试。”

谅毅受命前往秦国，上书秦王：“大王取宁邑，敝邑寡君也替大王高兴，因此派下臣奉礼物前来王庭祝贺，三次都被大王拒绝，不知何故，如果使者无罪，愿大王不要让使者扫兴而归，如使者有罪，愿大王指出罪在何处。”秦王派人通告谅毅道：“寡人希望赵王无论大小事都听从秦国，可行，我就收受国书和贺礼，不可行，就请使者回去。”谅毅道：“下臣前来，就是希望秉承大国的意志，哪敢违抗，大王只要下令，下臣必定回国转告，不敢迟疑。”

于是，秦王会见了谅毅。秦王态度蛮横，说道：“赵豹、赵胜二人，几次欺弄寡人，赵国如能杀此二人，解我心头之恨，秦赵两国方能相安无事；如不能杀此二人，那寡人就要率领诸侯讨伐赵国。”谅毅道：“赵豹、赵胜二人乃我君之同母弟，就如同大王有母弟高陵君、泾阳君，如今大王以孝悌闻名天下，对两位弟弟关怀备至，衣服、饮食、车马未尝不与二弟共同享用。臣听说：毁掉巢卵，凤凰就不会飞来，杀害幼兽，那么麒麟就不会来到。现在臣受大王之令，回报赵王，赵王畏惧大王不敢不行，如果赵王按照大王的意愿真杀掉二公子，他们死不足惜，只怕世人知道后，要影响大王的孝悌之名了。”谅毅之言句句击中要害，秦王果然怕毁坏自己的声誉，便不再坚持：“你所言有理，我饶他们一命，只是回去转告赵王，不要让他们从政。”谅毅道：“寡君有母弟不能教诲，得罪了大王，一定要罢黜掉，不让他们从政，保证让大王满意。”秦王果然大喜，马上接受了赵国的贺礼，友好地接待了谅毅。

惠文王三十三年（前266），惠文王去世，孝成王立。孝成王元年（前265），赵王任平原君为相，因赵王新立，惠文太后用事。

秦国见赵国新丧，认为有机可乘，派兵伐赵，拔三城。因秦攻势汹汹，赵忙向齐国求救。可是齐国提出必以长安君为人质，方

可出兵。长安君是惠文太后的小儿子，太后疼爱倍加，如何舍得让他为质于外，受那种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坚决不答应让长安君为质。

平原君等见秦攻日急，齐军迟迟不出，心急如焚，只得轮流劝谏太后，谁知不但不见效，反而将太后惹翻，她明白地告诉左右众臣："谁敢再提让长安君为质，老妇就唾他一脸。"一言既出，群臣哑言，然秦军日近，众人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

正在这时，左师触詟求见太后，太后盛气以待。触詟入宫后，慢腾腾地蹭到自己的座上，对太后道："老臣脚有病，不能行走，已很久未入宫拜见太后了。老臣担心太后身体不好，因此前来问候太后。"太后道："老妇也是靠着车才能行走。"触詟又问太后饭量如何，太后答只能吃粥。触詟又谈起自己吃不下饭，就强迫自己运动，一天行走三四里，这样可以多吃一点，对身体有利。这时，太后脸上的怒气稍稍平息。触詟又说："老臣的小儿子舒祺年少不成材，而臣年已老，却很疼爱他，希望求太后准许他到王宫作个卫士，因此冒死向太后进言。"太后问起舒祺的年纪，触詟说："十五岁了，年纪尚小，但老臣希望在自己临死之前，为儿子安排好出路。"太后见触詟为幼子想得如此周到，感到很惊奇，便问道："难道男子也特别爱怜幼子吗？"触詟道："超过了妇人。"太后笑道："不对，妇人爱幼子超过男人。"触詟道："老臣以为您爱燕后超过长安君。"太后反对，认为自己最爱长安君。触詟道："父母爱其子女不能只顾眼前，要为他们作长久的打算。当年您送燕后远嫁，燕后上车后，太后您持其脚痛哭不已，那是因为念她远离国家，心中悲哀。燕后走后，您每次祭礼都要祝愿一定不要让她回来，难道是您不思念她吗？那是为她作长久之计，子孙在燕相继为王啊！"接着左师又问太后，三世以前，赵王子孙为侯的，继位者现在还有吗？"太后道："没有。"触詟又问："不但赵国，其他诸侯国三世以前为侯的，现在还有继位者吗？"太后说，没听说

有。触詟道："这并不是这些王侯子孙不成材，只是这些人无劳而居尊位，无功而享受富贵，近者祸及其身，远者殃及子孙。如果为他们作长远打算，与其现在多封肥沃之地，多赏宝器，不如让他们今日有功于国。您现在不让长安君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他以何功自立于赵国？因此老臣以为，您为长安君想得短浅，爱之不如燕后。"触詟的循循善诱终于说服了太后，太后终于同意让长安君入齐。随后齐兵出发援赵，秦兵则退。

孝成王四年，秦伐韩，占野王，将韩国从中一截为二，上党郡与本土断绝。郡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孝成王与平原君贪图眼前之利，不听赵豹的正确意见，自引秦火，遂成长平之祸。长平之战结束几个月后，因赵对秦有不敬之举，秦昭王又令入急攻邯郸，遭到赵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秦军攻打邯郸十几个月，始终攻不下来。此时城中已民困兵竭，弹尽粮绝，情况十分危急。平原君一面组织指挥城内的抵抗，一面不断派出使者，向其他国家求援。赵国使节道路相望。诸侯国们慑于秦国的威吓不敢出兵。平原君一筹莫展，一面向信陵君发信责怪他不积极救赵，一面决定自己亲赴楚国搬救兵。

平原君准备从自己的众多门客中挑选二十个文武兼备之人与他同行。平原君决心不虚此行，必与楚王歃血成盟，先文后武，如果文的成功，最好，否则就以武力迫使楚王与己结盟。谁知，选来选去，够标准的只有十九入，余下的一人却再也挑不出来了。这时，有个叫毛遂的门客自荐于平原君前："臣听说君要去与楚国结盟合纵，与二十人相偕而行，目前尚缺一人，臣请求凑个数与你们同去。"平原君见毛遂大胆自荐，很新奇，便问："先生到我门下几年了？"毛遂道："至今已三年了。"平原君道："贤士处世，犹如锥子放在口袋里，其锋芒毕露，马上就可以看到。先生到我的门下已三年，没听人对先生有称颂之言，先生肯定没有多大的长处，先生不适合使楚，还是留在这里吧。"

毛遂道："臣今日就请君将臣处于囊中，如果早让毛遂入囊中，锋芒早就脱颖而出了。"平原君听毛遂讲话有趣，便同意让他一同使楚。见到这种情形，其他十九人都相视窃笑。

一路之上，毛遂与同行人议论为政治国之道，十九人皆服，此时才知毛遂果然是个人才。

入楚之后，平原君提出与楚国合纵抗秦，并力陈合纵之利。谁知楚王亦惮秦国的威吓，不敢答应。因此二人从清晨一直谈到中午，楚王始终犹豫未决。同行诸人焦急万分，鼓励毛遂："先生请上。"只见毛遂手扶宝剑，一步一阶急步而上，对平原君道："合纵抗秦的利害，两句话就能讲清，可是君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为什么？"楚王见殿上突然出现一武士，忙问平原君来者何人。平原君道："他是我的宾客。"楚王立即喝斥道："你还不马上下去。现在我与你主谈话，你来干什么？"毛遂此时非但没下，反而按剑上前道："大王所以敢呵斥我，全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如今五步之内，大王可就没有倚仗了。现在大王的性命掌握在臣下手中，您不应该当着我家主人的面叱责臣下。臣常听人说：商汤以七十里土地起家终至称王天下，周文王以百里土地起家，终于灭商纣建西周，难道他们靠的是士卒众多吗？非也，商汤、文王建功立业的原因是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发扬威势。今楚国方圆千里、士卒百万，具有称霸天下的客观条件，楚国应该是天下无敌的国家。然而秦国白起这个无知小子，率领几万士卒，攻打楚国，一战陷鄢陵，二战毁夷陵，三战而拔郢都，烧楚祖庙，焚楚陵墓。秦国对楚的暴行百世难解，连赵国都感到羞辱，而大王至今仍麻木不仁。楚、赵两国合纵，实际上为的是维护你们楚国的利益，并不是为了赵国，难道这点道理大王还不明白？"楚王只好说："对，对，先生所言句句在理，寡人愿倾楚国之力同赵国合纵。"毛遂马上要求楚王左右取鸡马狗之血，与楚王举行歃血为盟的仪式。只见毛遂手捧铜盘跪着进献楚王，楚王、平原君、毛遂

等人按次序饮了血酒，于是赵楚两国歃血定纵事成。

不久，平原君一行人回到赵国。想到无名之辈毛遂此行的出色表现，平原君不禁感叹万千："赵胜至今接触过的士人多者上千，少说也有几百，自认为独具慧眼，从未漏掉一个贤人，如今才知小看了毛先生。先生一到楚国，赵国声威大振。先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以后，赵胜再不敢称不失天下之士。"于是，毛遂成为平原君家的上客。

平原君归赵不久，楚国就派春申君黄歇率大军救赵，适逢魏国信陵军也矫命夺晋鄙军率军前来，此时二军都在途中。

此时秦攻甚急，援军迟迟不到，眼看邯郸难以坚持，平原君忧心忡忡。这时一员小吏李同对平原君说："君难道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道："赵国灭亡我就是阶下囚，如何能不担忧？"李同道："如今，邯郸城中百姓，力乏粮尽，炊骨易子而食，再也无法坚持守城了，而君家后宫几百姬妾，至今穿绸食肉，优哉游哉，而守城百姓衣裳破烂，糟糠不饱。民力困乏，兵器用尽，只得削木为矢，而君家钟鸣鼎食还同以前一样奢华。如果秦国攻破赵国，君还能如此享受吗？如果赵国保住了，君还怕将来没有这些吗？如果君真的能将夫人以下家人、姬妾编于士卒之中，和普通人一样，各领一份工作，可以振奋民心斗志。另外，尽散家中财物分给士兵，以鼓舞士气，博得兵众的回报，邯郸或可以继续坚守。"平原君于是采纳李同之言，以家人姬妾尽入卒伍，尽散家资于士卒，果然军心大振。平原君又乘此民心激奋之时，招募了三千勇士，组成敢死队，由李同率领，猛然扑向秦军，令秦军丢魂丧胆，为之却阵三十里。正值此时，魏、楚援军先后赶到，里外夹击，共击秦军。秦军寡不敌众，立时大败，主将败逃，俾将郑安平率众投降，邯郸之围遂解。李同英勇战死，赵胜不忘李同之功，遂封其父为李侯。

解秦围，存邯郸，平原君有回天之功，因此虞卿主张为平原

君请封。虞卿是个游说之士，当年脚着草鞋，打着雨伞前来游说赵王，受到赏识。第一次就受赏白璧一双，黄金百镒。第二次赵王就封他为上卿。虞卿不同于一般游说之士，战国时游说之士莫不为了私利，朝秦暮楚，反反复复，独虞卿始终事赵，专持合纵之说，反对屈服强秦的压力，一心维护赵国的权益，可谓耿耿忠心。虞卿还是侠义之士，秦昭王四十二年，魏相魏齐为仇人秦相范雎所逼，逃到赵国平原君府中，藏匿起来。范雎听说魏齐藏在平原君家中，就让秦王致书平原君邀其入秦，作十日之饮。平原君不敢违抗，入秦，饮酒间秦王要求平原君交出魏齐，否则就要将他本人扣压为质。平原君不畏威吓，婉言道：魏齐与自己是多年交义，即使藏在家中，也不会交出，再说还没在自己家里。秦王见平原君不肯交魏齐，果真不放他回国，并修书赵王，以平原君为质，要赵王交出魏齐。于是赵王发兵，捉拿魏齐。魏齐逃出，投奔虞卿，当时虞卿贵为赵相，封万户侯，为救挚友，虞卿竟弃相印，陪伴魏齐回到魏国，投奔信陵君。后魏齐自杀，赵王才以其头赎回平原君。虞卿、平原君虽然没能保全住好友魏齐的性命，但其不畏强权、侠胆高义于此可见。

虞卿为平原君请封，开始平原君并不反对。名士公孙龙闻知此事，连夜求见平原君。公孙龙是当时著名的辩士，擅“坚白之辩”与“白马非马”之说，以讲形式逻辑与诡辩著称，很受平原君的欣赏。公孙龙对赵胜说：“臣听说虞卿为存邯郸之功为君请封求赏？”赵胜道：“是。”公孙龙道：“此事不可行。大王任命君为相赵国，并非因为君之智谋能力过人，只是因为您是王亲的缘故，而君受相印，受封地不因无能、无功而推辞，坦然受之，也是因为君是大王亲戚的缘故。如因存邯郸之功而再次受封，那么您就是无功时以亲戚地位受封，有功时又以国人地位受赏，这种唯利是图的作法决不可行。而且虞卿提出这项建议，可以左右逢源，如果事成，他可以像债主那样不断向你讨取报酬，事情不成，他也

可以送个空头人情，请君千万不要接受虞卿的建议。”平原君接受意见，没有接受封赏。

平原君赏识公孙龙之才，对其优容礼遇，公孙龙与其徒于是在赵国大谈“白马非马”之论，不久，齐人邹衍来到赵国。邹是当时著名的阴阳学家，学究天人，雄于辩口，故称“谈天衍”，以五行相胜为序，创“五德终始”之说，邹衍攻击公孙龙一派学说为繁文饰词，无益于世，只能害大道、害君子，面折公孙龙，于是平原君弃公孙龙之说。

邯郸之战后，平原君曾想北伐上党，出兵攻燕。一日，平原君对谋臣冯忌谈论伐燕之事，冯忌说：“不可伐燕。当年秦将白起乘七胜之威与马服君之子赵括战于长平，大败赵师，旋即以余兵围邯郸，赵国以战败之众守城而秦军久攻不破，这就说明攻难守易，现在赵国并无白起的七胜之威，燕地更无赵的长平之祸，现在若以弱赵攻强燕，决不会取胜，因此臣认为攻燕不妥。”平原君连连称善。

不久，魏国派使者来谋求与赵国合纵，平原君不记前嫌，主张两国联合。孝成王犹豫未决，便召虞卿前来商议，平原君私下对虞卿表示：希望虞卿力求合纵之利。虞卿人见赵王，赵王道：“魏国来使，请求合纵，先生看此事如何？”虞卿道：“魏国做错了。”赵王又说：“寡人没答应合纵。”虞卿又说：“大王也错了。”赵王不解问道：“刚才魏国请求合纵，先生讲魏错，寡人不答应魏的要求，先生又说寡人错了，难道合纵这事就根本不能谈了吗？”虞卿回答：“小国与大国联合，有利则大国受其福，失败则小国受其祸，现在魏国以小国请其祸，而大王以大国辞其福，所以臣说魏国和大王都错了。臣私下以为应该合纵。”赵王拍案而起说：“好！”于是赵国、魏国合纵乃成。

平原君在惠文王、孝成王时期两朝为臣，三罢相、复相，翩翩浊世一佳公子。然而他为人平平庸庸，才干与见识远不及信陵

君、虞卿，甚至赵豹。孝文王时，赵王与平原君贪取上党之利，听不进赵豹之谏，引起秦火烧身。及至战争爆发，又愚蠢地中了秦相应侯的圈套，自毁长城，遂成长平之祸。利令智昏，邯郸几亡，平原君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然而平原君虽无大才能，却也有其光辉的一面。首先他识大体，能接受劝谏，善纳人言，如李同、冯忌、公孙龙的正确主张都被其接纳；另外，赵胜一心为国，耿耿忠心。为解邯郸之围，尽散家财，以振士气，舍生冒死，亲赴楚国搬求救兵，又力促魏援，终使邯郸得以保全。与孟尝君为谋私利，不惜勾引敌仇自伐其国之劣行，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更见平原君的可贵之处。

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平原君赵胜死，后代相继为平原君，直至三十年以后，赵国灭亡。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赵世家》、《秦本纪》、《春申君列传》。

《战国策》：《赵策》、《秦策》、《淮南子·道应训》。

信陵君窃符救赵

秦赵长平之战后，秦昭王听信应侯范雎之言，未乘胜灭赵而与韩、赵媾和罢兵。秦退兵的条件为韩献垣雍、赵割六城入秦。不久，韩国如约献垣雍，赵国却在虞卿的劝告下，不仅一城未献，反而派虞卿入齐联系共同抗秦，赵王的反叛令秦昭王大怒，立刻令王陵率军攻打赵都邯郸，两国又开战端，这时是秦昭王四十八年九月。

这时的形势与几个月前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国主将白起抱病拒绝出战，使军力大受影响，赵国经受了长平惨败，使君臣民众警醒，国民已摆脱了惊惧与悲哀，上下一心，戮力同忧，从各个方面都作好了抵御秦国再次入侵的准备。因此，王陵攻赵几个月，没有大的进展。昭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秦王又调兵遣将，全力围攻，发誓要拿下邯郸。不久，又派王龁代替王陵为主将，攻势更猛。赵国君臣一面组织军民进行拼死抵抗，一面派人向魏、楚等盟国求救。

魏安釐王见到平原君的求援使者，派出大军打算援救盟国。谁知秦军得知魏王的救赵举动，马上派人送信进行威胁："邯郸马上就会陷落，如果谁敢救赵，克赵之后，我马上移师攻之！"于是魏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出于友谊与道义，救赵责无旁贷；可是秦国的威吓又不能不叫魏王心惊肉跳，最终魏王慑于秦威决定暂不救赵。此时援赵大军已经出发，魏王忙派人飞马驰报大将晋鄙停止前进。于是魏军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停止不前，名为救

赵，实则首鼠两端，对战局持观望态度。

援军迟迟不至，邯郸危急万分，悲观投降的论调渐渐滋生，魏王为使秦赵停战，作为第三国，出面调停。魏王主张让赵国尊秦为帝，讨好秦国，以此换得秦国退兵。与此同时，派了一个叫辛垣衍的说客入赵说服赵王。

辛垣衍到了赵国对平原君说："秦国之所以攻赵，是因为以前与齐闵王争为帝，后因为齐国的原因取消了帝号。现在齐国衰弱了，只有秦国强于天下。秦攻赵只是贪图一个帝号，并非要取邯郸，如果赵王能尊秦为帝，秦昭王必定大喜，罢兵而去。"平原君对辛垣衍的话似信非信，犹豫未有所决。

此时，齐人鲁仲连正在赵国游历。鲁仲连其人奇伟卓异，高风亮节，侠肝义胆，视富贵金钱如粪土，一生不仕。鲁仲连入赵，正值秦攻打邯郸甚急，他听说魏国提议让赵王帝秦，便求见平原君，问平原君形势如何。平原君面有愧色道："胜如何还有脸谈论国家大事！长平之战损失了四十多万兵卒，现在秦又围邯郸，无法解围。现在魏王派人来劝赵帝秦，我有什么办法？"鲁仲连道："我一直以为平原君您是天下的贤公子，今天才知并非如此，辛垣衍现在哪里，我来替君质问于他！"

鲁仲连见到辛垣衍后默然不语。辛垣衍说："我见邯郸城中之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独独见先生奇伟高雅，不同于那些有求者，既然如此为何居此危急之地，不快快离去？"仲连道："秦国乃尚功之国，不讲礼义，在国内以权迫使人民为他作战，奴役国民，如果肆志为帝，为政天下，我宁肯赴海而死，也决不为其民，所以我求见将军想帮助赵国。现在齐、楚已乐于救赵，我还要动员梁、燕共同助之。"辛垣衍道："先生如何说服梁王？"鲁仲连道："梁王此次派先生来主张尊秦为帝，是因为他未见秦称帝之害，如果知其危害，则必然转而助赵了。当年齐威王曾行仁义于天下，率天下诸侯朝周。此时周室贫弱，天下莫朝，独齐朝之。一年后，周

烈王崩，葬礼上齐王迟到，烈王的太子斥道：'天崩地陷，天子驾崩，东藩之臣齐王后至，当斩'。齐王因不忍其求，大怒，周天子对齐国的态度不足为怪，因为名义上他是天子。"

辛垣衍道："先生见过与人为仆者吗？十人而从一人，是力量和智慧不如人吗？不是，是因为这些人畏惧主人。"鲁仲连立即驳斥辛垣衍："梁国好比是秦国的仆人吗？如果那样，我将使秦王烹杀梁王。"辛垣衍不相信，鲁仲连道："昔者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王的三公。地位已经很高了。九侯将女儿献于纣王，纣王不满意，杀九侯。鄂侯为他申辩，也被杀。文王闻之，喟然而叹，也被囚禁在羑里，差点丧命。以上三人的遭遇都因为处于纣王的淫威之下。当年齐闵王依仗强大，巡视各国，行至邹、鲁小国时，欲行天子礼于二国，被两国拒绝入境。现在秦国与梁国都是万乘之国，同样称王，而梁因秦打胜一仗就要怯而尊之为帝，这样做就是使三晋之大臣还不如邹鲁国的仆妾有骨气。秦国一旦称帝，必会大施淫威，变易各国诸侯大臣，夺其所爱与其所憎，又要逼迫各国诸侯收娶秦国子女为妾，日夜受到监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梁王还能安然生活吗？先生又怎能得宠？"辛垣衍终被折服，他起身拜谢道："我今日才知先生为天下之士，我马上就回梁国，从此再不敢提帝秦之事。"

投降论调被驳斥，更坚定了赵国君民抵御强秦的决心。赵孝成王和平原君一面积极组织军民进行拼死抵抗，一面更急切地派人前往各国搬救兵。

赵国与魏国不仅是政治上的盟国，而且有姻亲关系，魏无忌之姐嫁与赵胜为夫人，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此次解邯郸之围，赵国对魏国抱有最大的希望。谁知使者派出一批又一批，只是不见魏国援军到来。后来听说魏军在邺地停止不前，平原君知必是秦威所致，大失所望。此时邯郸已被围多日，城中弹尽粮绝，兵民困顿，城中人易子而食。秦军主力在王龁、郑安平率领下猛攻邯

郸，并以偏师攻魏，情况危急。赵相平原君为鼓舞士气，尽散家财于士卒，姬妾家人全编入军队，分工而作，与百姓共赴国难，于是民心大振。同时组织了敢死队三千人，由勇士李同率领，猛扑秦军，秦为之退却三十里。

平原君眼见邯郸日危，援军不至，心急如焚，他怨恨妻弟魏无忌平日与他友情甚笃，此时见死不救。于是他手书一封，派人送往魏国。信中道："赵胜之所以愿与公子结为姻亲，是仰慕公子的高义亮节，能救人于危难之中不顾自己。现在邯郸马上就会陷落，而魏军迟迟不至，这能说救人于危难之中吗？公子纵然轻视我赵胜，任凭我国被秦降服，难道公子也不怜惜你的姐姐吗？"公子无忌见到平原君的责让信，心中有苦难言。自从赵都被围，他就力主救赵，无奈魏王畏秦如畏虎，屡次劝说都不见成效。公子又派宾客中辩士百般劝说，魏王决心已定，不肯出兵，魏无忌急得团团转，竟一点办法也没有。此时赵平原君的书信又是满纸责怨之词，更令公子急火攻心。

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封信陵（今河南宁陵西），因此人称信陵君。此人仁而下士，为人重义节，勇于助人于危难，门下宾客三千，名望甚嘉，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

因为公子礼贤下士，爱才若渴，从不因富贵而盛气待人，故千里之内无论贤与不肖者都争相归附于他，终至门下人才济济。诸侯各国因魏国有公子无忌这个有德有才的贤人，十年不敢轻易加兵于魏。

信陵君礼贤下士，门客们忠心耿耿，各施其才，使公子受益非浅，他们作为公子的智囊或耳目，使公子不出门尽知天下事，遇事能迅速作出正确判断。

一日，公子与魏王对弈，北方忽传烽火，有人报赵国人侵北方，魏王大惊，立即要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讨对策。只见信陵君不

慌不忙道："赵王只是田猎，并非入侵。"二人继下棋，魏王似信非信，如坐针毡，无心对弈。不久，果然传来消息：赵王确是田猎，并非入侵，君臣们才算放心。魏王惊问公子何以知之，公子道：门客中有深知赵王私事者，因他的密报，我才知赵王近日的行踪。魏王听后，既佩服公子用人之神，又畏惧公子的贤能，从此竟不敢以国事委任公子。

公子好士，并非附庸风雅，博取虚名。为了招徕人才，公子常亲至其所，诚心招请。当时魏国有一老隐士，姓侯名嬴，年已七十，家贫无以为生，故作了魏都大梁东门的守门者。地位虽贱，但素有贤名。公子无忌慕其名，欲与之交往，不仅亲自登门相请且赠以厚礼，侯生坚辞不受，并对公子说："臣修身洁行数十年，不能因为贫穷就受公子的财物。"公子见侯生不贪图富贵，心下更加敬重。公子为表示自己的敬意，决定大宴宾客。待客人们落座之后，公子才亲往东门迎接侯生，并空出车左边的贵宾座，亲自驾车前往。侯生见公子到来也不称谢，随便整理一下衣冠，大模大样毫不谦让竟自坐了上座，同时偷偷观察公子的表情。只见公子对侯生的狂傲之态并不在意，执缰绳反而更加恭敬。途中，侯生又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上卖肉，请烦劳公子赶车从那里经过一下。"公子又驾车来到市场，侯生下车见到朋友朱亥，双方交谈良久，公子呆在车旁耐心等候。侯生边与朋友交谈，边用余光观察公子有否烦躁愠怒之色，只见公子非但不焦不躁，气色反而更加平和。这时市上人都看见公子驾车等待侯生，公子的随从都在心里暗骂这个侯生太不知趣。侯生见公子从始至终心平气和，就辞别朱亥，上车继续赶路。

此时，公子府中，魏国的王公贵族，济济一堂，都在等待公子回来举杯开宴。二人入府后，公子引领侯生直人上座，并将在场宾客恭恭敬敬地一一向侯生作了介绍。公子对侯生之敬，举座皆惊。酒酣之时，公子为侯生敬酒祝寿，侯生道："我乃一守门的

卑贱之人，承蒙公子不弃，亲自驾车迎接臣于大庭广众之中，公子待臣已大大超出了常规的礼数。为了报答公子的一片好意，我要替公子扬礼贤下士之名，为此，臣故意与公子车骑久立市中，过往行人观察公子，公子态度愈恭谨，因此市人都以嬴为小人，而公子为长者宽容，礼贤下士，因此今天我已对公子的恩德作了回报。”侯生之言，令公子及在场宾朋为之心动，酒宴之后，侯生成为信陵君的上客。

一日，侯生对公子说：“前次我在市上会见的屠夫朱亥，是个贤才，因为世人不知其贤，因此隐居在屠户中。”于是，公子为求朱亥，几次上门亲自相请。

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秦军围困邯郸已一年多，情况危急。邯郸城内，平原君忧心如焚，大梁城中，信陵君一筹莫展。多方劝说魏王无效之后，信陵君决心个人拼死救赵，与赵国共存亡。信陵君清点人马，共凑集车骑百余乘，率宾客出城奔赴赵国，准备与秦军拼一死战。

车骑一行出东门，遇见侯生，公子将自己准备救赵赴死的打算讲给侯生，与侯生诀别之后就要出发。只听侯生淡淡地说：“公子自重，恕老臣年迈体弱不能跟从了。”侯生的态度令公子心中怏怏不乐，心想，我待他礼遇备至，天下无人不晓，今日我奔赴赵难，必有一死，而这个侯生竟如此薄情寡义，并无一言半语送我。莫非是我看错了人？公子越想越心烦，车马行出几里后，又率众折回，当面质问侯生。侯生答道：“我知道公子必会回来，公子好士，天下闻名，扶危济难，无计可施便要自己去与秦军拼命以救赵国。公子这样做就如同以羔投虎，除了白白送死，有什么用处！公子一向待臣厚，公子往死而臣不送，不合情理，所以臣知公子必然会怀恨而返。”此时，公子方知错怪了侯生，又忙施礼道歉，同时求问侯生有什么救赵良策。

侯生屏去左右，悄悄地对公子道：“嬴听说魏将晋鄙兵符的另

一半常常藏在魏王的卧房之中。现在宫中只有如姬最为受宠，能随意出入王的卧室，只有她有机会窃出兵符。我听说，如姬之父被仇人杀害，如姬为替父报仇，出资请人复仇，历时三年，连魏王在内都不能为她报此仇。如姬向公子哭泣，公子派门客很快斩掉其仇人的头，献给如姬。当时如姬涕泣发誓要舍命报效公子，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只要公子开口求如姬，如姬必会答应。得到兵符，夺得晋鄙军，就可以北救赵国，西却强秦，建立春秋五霸一样的功业。”公子听从侯生的计谋，去请求如姬盗兵符，如姬果然偷出兵符交给公子。

公子身藏兵符正要出发，老谋深算的侯生又对公子说：“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利于国家。公子到晋将军军中，如果一切顺利最好。一旦晋鄙起疑心，虽然兵符相合，他不将军队交出，重新请示魏王，那样事情就难办了。为防止意外，我的朋友大力士朱亥可暗袖铁锥，与公子同往。如果晋鄙听命交出军队，自不必再说，如果他不听令，就让朱亥击杀他。”公子一听晋鄙可能无辜被杀，竟落下泪来。侯生问：“公子为什么哭，难道是怕死吗？”公子道：“晋鄙乃一员猛将，我担心他很可能不听令，结果必当被杀，因此哭泣，哪里是我自己怕死。”于是公子又去请朱亥同行，朱亥笑道：“我本一介市井屠夫，而公子数次屈尊前来恤问，我一直没报谢公子，是因为虚礼对公子并无太大用处，现在公子有急难，正是我报效公子的机会，义不容辞。”于是朱亥慨然与公子同行。公子谢过侯生，侯生道：“臣本该跟从公子，但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请让老臣在此计算公子的行期；公子到晋鄙军中之日，就是老臣北向自刎之时，请让老臣以死报效公子知遇之恩，为公子壮行。”最终，侯生果不食言，公子至晋鄙军之日，他面向北方自刎而死。

公子出发后加紧赶路，不久就到了晋鄙军营地。公子拜见晋鄙，假传魏王命令，取出虎符，让晋鄙交出军队。晋鄙合符验看无误，只是事出突然，不免心存疑惑，他举手望公子道：“今日我

肩负国家重任，率十万大军，屯驻国境。今公子单车前来替代，恐怕不太正常吧。”事情果如侯生所料，晋鄙不愿交出军队，此时朱亥迅速抽出早已藏在身上的四十斤重铁锥，击死晋鄙，公子于是顺利接管了军队。

公子为振作士气，立即在军中传下命令：“父子二人都在军中的，父归，兄弟都在军中的兄归，家中为独子的，归家奉养父母。”公子此举大得人心，一时军心大振，最后共得精兵八万，信陵君率领这支军队，迅速向邯郸进发。

这时邯郸城内战斗越发艰苦，平原君见魏援无望，就准备拼死向楚国求救。平原君率二十个门客到了楚国，楚王在平原君的门客毛遂的劝告和武力相逼下，两国歃血为盟，楚王派春申君黄歇率救赵大军此时也向赵都挺进。

邯郸城内军民艰守一年望眼欲穿，终于盼到援军到来。

秦昭王五十年，一场大战在邯郸城下展开，魏、楚援军在外猛攻，赵国军队在内拼命冲杀，将秦军夹在中间。秦军被几国军队内外夹击，寡不敌众，主将败逃，副将郑安平率二万秦军投降，邯郸之围遂解。

赵王和平原君为感谢公子无忌舍命相救之恩，亲自到国界处迎公子入赵，平原君亲自替信陵君背着装箭的箭囊，在前面引路，对魏无忌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最高的敬意。赵王再三拜谢公子窃符救赵之功，口称自古贤人虽多，却没有比得了公子的。

然而公子窃符救赵的壮举却惹恼了魏王，魏王恼恨公子盗其兵符，且矫旨杀晋鄙，公子也自知自己得罪了魏王，从此不敢归国。于是在救赵却秦之后，公子让将领率军归魏，自己与随从滞留赵国。赵孝成王感念公子舍己救赵之义举，便与平原君商议要封五座城给公子。公子得知消息，脸上渐现骄矜自得之色。这时，一位门客劝告公子：“世上的事，有的不可忘，有的不可不忘。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于人，希望公子能够忘掉。

公子窃符矫令，夺晋鄙军以救赵，对赵国来讲当然是立了大功，对魏国来说则算不得忠臣。现在公子倨功自傲，臣下以为，公子不应该这样。”门客的提醒，使公子幡然省悟，谦恭如前。赵王宴请公子，执主人之礼，亲迎公子，并遵照迎接贵宾的礼节引公子从西阶而上，公子却谦让自走东阶，并口称罪过，既无功于赵，又有负于魏。赵王与公子宴饮直到黄昏，因公子谦恭有礼，赵王欲封公子五城一事始终无法开口。最终，赵王封鄗地为公子的汤沐邑，公子留赵十年不归。

留住赵国期间，公子仍礼贤下士，搜求人才。一次，他听人说有两隐士，一名毛公，一名薛公，住在此处。因不愿为仕，毛公混迹于赌徒之中，薛公混迹于卖浆者中。公子欲访，二人隐之不见。公子探听到二人的住处后，换布衣，徒步前来拜访，公子的一片赤诚打动了二隐士的心，此后三人交往频繁，引为知己。平原君听人说，公子无忌整日与赌徒、卖浆者混在一起，便对夫人讥讽道：“我听说夫人的弟弟贤达天下无双，可今日我听说公子整日与赌徒、卖浆的下等人来来往往，真是个狂人。”夫人将平原君的话告诉了公子，公子拜谢了姐姐，说：“开始我听人说平原君贤，才不惜背负魏国舍命相救。哪知平原君交友求士，只图虚名排场，并不是真求索人才。在魏国时，我就常闻薛、毛二公的贤名，及至赵国，欲与之交结，还担心二公不愿与我交往。现在平原君竟嫌弃他们，以与之交游为耻，如此图虚名，见识浅的人，我无法与之为友。”于是，公子准备离开赵国。夫人将公子的话转告平原君，平原君立即免冠登门向公子谢罪，并执意挽留公子。平原君家的门客闻知此事，有近一半人离去投奔公子门下，天下贤士又都开始投奔公子，公子一时门客云集，声威大振。

秦国听说公子无忌留居赵国不归，便放心大胆地连续攻伐魏国。魏王忧患秦国之攻，多次派使者请公子回国组织抗秦。公子恐怕魏王追究当年窃符救赵之事，不敢回国。魏王不断派人前来

劝说，公子不胜其烦，于是告诫门下人道："谁再敢为魏使者通报的，死。"命令一下，众人皆恐，宾客们却背叛魏国，来到赵国，无人再敢劝公子归魏。

这时，毛公、薛公二人往见公子，说："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备受尊敬，名闻天下，都是因为有魏国的缘故。现在秦国攻魏，魏国危急而公子无动于衷，不去救助。假如秦国攻陷大梁，夷灭魏先人先王的墓地宗庙，那时，公子有何面目立于天下？"言未毕，公子颜色大变，乘车归国救魏。

魏王见公子归来，激动不已，二人相对而泣。之后，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率军抗秦。此时，是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公子派使者遍告诸侯各国，各国仰慕公子的高义，纷纷出兵救魏。同年，公子统帅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向秦国进发。秦将蒙骜率军迎击，双方大战于河外，秦军寡不敌众，一败涂地，蒙骜败逃，联军乘胜追至函谷关，从此秦兵不敢轻易出兵东向。合纵攻秦的成功，使公子名望如日中天，威震天下，诸侯之客纷纷投奔公子。宾客们献计献策，公子将其保留集中，辑录成册，世人称此书为《魏公子兵法》。

秦国患公子之威，于是又采用惯用的反间计挑拨离间公子与魏王的关系。秦国花费重金，收买晋鄙的门客，让这些人在魏王面前诋毁公子，说公子流亡国外十年，现在掌握了各诸侯国的军队，诸侯们只知有魏公子无忌，不知有魏王。还有的人说，公子有南面称王的野心，诸侯们畏惧公子的威势，也要共同拥立公子。魏王本来就忌讳公子之才，此时，听到这些议论，更加心存疑惑。与此同时，秦也在外加紧配合，几次派人假意祝贺公子立为魏王，害得公子有口说不清。秦军的卑鄙阴谋这一次居然又成功了，魏王最终相信了秦国杜撰出来的故事，不久公子的兵权被夺，成为秦国阴谋的牺牲品。

公子知自己被人谗毁，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此后，称病不再

上朝，每日只与宾客饮酒浇愁，常常通宵达旦，而且多近女色，自暴自弃，如此四年，终因酒色过度而卒，同年，魏安釐王亦死。

秦国听说公子死，大喜过望，立即派蒙骜率军攻魏，拔魏二十城，在此地设置了东郡。以后，秦国不断蚕食魏国，十八年以后，秦国虏魏王假，屠大梁城，魏国灭亡。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魏公子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六国年表》。

《战国策》：《秦策》、《赵策》。

荀学百家

荀况，字卿，人尊称为荀子。古代孙、荀不分，故又称为孙卿或孙子。荀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哲学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上古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光辉命题；在政治伦理方面，他讲求仁义，主张性恶，隆礼重法，具有儒法结合的思想倾向。他批判各家之短，博采众家之长，成为战国后期百家之学的集大成者。现有《荀子》三十二篇，一直流传至今，其中大多数篇章为荀子所著。

荀子是赵国郇邑人。传说郇伯为周文王之子，封于此，故郇为姬姓国。郇伯后人世代居郇，上古人以邑为氏，故以郇为氏，后由郇演变为荀。荀氏在晋国和后来的赵国都是大族，荀况即为这一大族的后人。

荀子出生于战国后期齐威王时，年少有英才，十五岁时便以有秀才而闻名。少年荀况意气风发，满腹经纶，自然不愿蜗居于赵地，于是他便学着当时有识之士的样子，打点行装，为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游历他乡。

荀子的第一个落脚点大概是燕国。这时，燕王哙在位，任用子之为相。燕王哙对子之不仅言听计从，甚至欲效法上古尧舜禅让的故事，想让位给子之。荀况知此举必然导致内乱，便上书燕王，反复批评尧、舜的禅让，劝谏燕王不要采用如此愚蠢之举。结果燕王不听劝告，反以荀卿之说为非，以致于引起国内大乱，齐宣王借机伐燕，子之与燕王哙皆死于战乱，燕几乎亡国。

荀子离燕后转道来到齐国。这时齐国国力兴盛，人才济济，稷下学宫十分繁荣。稷下学宫乃战国时期齐国的一个学术文化中心，因位于齐国临淄稷门外而得名。战国时，养士之风极盛，诸侯权贵们为了增强实力，都不拘一格广招人才。齐国政府亦顺应时尚，在稷门外设一学馆讲堂，招聘天下贤人学者来此讲学，这些人不官而议政，既探讨学问又品评时政，人称稷下之学。来此参加学术活动的学者，被人称之为稷下先生。稷下之学自田齐桓公时始兴，中经几度荣衰，至宣王时达到极盛。这时，游学稷下的学士多达一千多人，许多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孟轲、宋钘、尹文、告子、慎到、环渊、彭蒙、荀况、邹衍等都曾来此讲学。稷下云集了各家各派学说，各色人等，他们观点不同，派别各异，常常相聚一堂，穷事理而致诘难，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学术气氛。学者们在这种具有原始民主的氛围中间，既议学且议政，不仅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分野和融合，而且产生了许多雄辩的政论家，这些人成为游说诸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好手。齐宣王时许多学者位列大夫，或身列卿相，很受尊宠。荀子大约就在此时慕稷下之名从燕入齐，加入稷下先生的行列。荀子在此曾同孟子就人性善恶问题进行过辩论，并以擅长讲解《诗》、《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称。

齐国威、宣二世，国富兵强，威行敌国。闵王之时，余威犹烈，西摧三晋，却强秦，各国宾从，泗上诸侯俯首听命。然而闵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国内民怨沸腾，百姓难以为生，诸国表面臣服，实则居心叵测。因此闵王时的齐国尽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已经处于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境地。对此，有识之士纷纷进行谏齐王，齐王拒不听谏，于是诸生陆续离齐而去，荀子亦在此时离齐入楚。荀子作为一个头脑冷静、有远见的政治家曾向齐相进谏："一个君主如果处于优势，再加上恰当的胜人之道，天下的人自然会心服口服，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君主如

果用不正当的手段来保持地位，这样的人想作天下之主是不可能的。如今齐国处境并不美妙，大楚悬在齐国之前，燕国雄踞在后，魏国虎视在右，如有一国动恶念，三国必定联合起来与齐国作对。如果齐国不改变现在以势压人的作法，齐国终有一日会自引其祸，亡国失家为天下笑。”齐相却以为荀况在危言耸听，并不在意。荀子见齐相执迷不悟，便离开齐国。事情发展正如荀子所料，齐闵王听信燕策士苏秦的蛊惑，夸耀武功，不尚德治，不顾舆论，竟于闵王十五年（前286）悍然出兵灭掉了宋国，触犯了众怒，引火烧身。闵王十七年，燕将乐毅衔齐破燕之恨率秦、燕、韩、赵、魏等五国联军伐齐，一举攻下齐七十多城，陷临淄，结果闵王被杀，齐地失陷达五六年之久，直至齐襄王五年，田单用计击退燕军，燕师败退，齐地才得以恢复，但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见往日辉煌。

齐襄王五年，齐将田单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襄王归位后，立即着手国家的重建工作，整顿稷下学宫，列大夫之缺，广招流散天下的学者文人，于是稷下先生们又相继归齐，稷下学宫复兴。由于老一代学者都已死去，这时的荀子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成为最受尊重之人，曾三为祭酒，长时期担任学宫领袖。大约孙氏之儒也在这时形成，这时的荀子年已五十左右，显然是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面貌活跃在学术领域的。

齐襄王十八年，秦王任范雎为相，荀子此时曾应聘诸侯，游说昭王。秦昭王酷爱用兵，喜征伐。荀子利用儒家说教，建议昭王休征战，行王道，任用儒者，以三王之法统一各国，这些话秦王听来简直迂腐之至。这时的秦国正采用法家学说，崇尚武力，推行霸道，一统天下，荀子的主张自然无法被采纳，于是荀子又回到齐国。

荀子回齐国后，继续在稷下聚众讲学。这时的荀子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荀子仍不改忠正直言的本性，对齐国政治又有看法。这时齐王建在位，国家大权却掌握在建母君王后的手中。荀

子曾向齐相进谏，劝其求贤，并对齐国的政治现状进行了批评，于是引来一些人对荀子的攻击诬蔑，荀子为避谗言，于齐王建十年（前255），来到楚国。

此时楚考烈王在位，春申君为相。春申君相楚八年，北伐灭鲁，攻取鲁国，迁鲁君于莒，新得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楚势稍振。春申君对荀卿敬仰已久，此时得知荀卿入楚，立即任命荀子为兰陵令。

不久，有好事之人在春申君耳边吹冷风："古时候商汤以亳、周武王以镐起家，两地都不过百里，但终以区区百里之地而有天下。如今孙卿为天下贤士，君如果给他百里之势，就如同给虎添翼，臣以为将来对君不利，请君三思。"春申君耳软心活，觉得此人言之有理，就派人婉言辞谢了荀子。荀子见在楚国仍不免为谗言所伤，心灰意冷，只好回到家乡赵国，做了上卿。

荀子离楚之后，又有人埋怨春申君："过去伊尹离夏入殷，结果殷王天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进入齐国，齐国称霸天下而鲁国弱小。所以贤人所在之国，其君必受人们敬重，其国亦称霸称雄，如今孙卿为天下贤人，不知君为何要辞谢掉？"春申君觉得此人说得也有道理，又忙派人入赵请荀子回楚。荀子在给春申君的回信中，对楚国的国政多有批评，拒绝了春申君的请求。春申君并不计较，再派人请荀子，盛情难却，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为兰陵令。

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考烈王死，国戚李园杀春申君，春申君死而荀卿被废。此后荀卿闲居兰陵，闭门著书，终成几万言而卒于兰陵，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荀子一生游历各国，仕途多舛，然而正是这不平凡的阅历，给了他多知多识的机会，他可能曾拜宋钘为师，因为他的著作中多次称宋子为子宋子，表现出不寻常的敬意。他也曾招收弟子，讲学传道，战国末期的两位杰出人物韩非、李斯就出自荀子的门下。

二位高足继承和发展了其宗师的法制思想，成为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二位荀氏弟子相得益彰，韩非从理论上集战国法家思想之大成，李斯则在实践上具体实施，为秦最终实现大一统立下了不朽功勋。

荀子生活的时代，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封建制度的建立，奴隶制度的崩溃等急剧的社会变革，促使旧有的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奴隶制度下的贵贱等级秩序大乱。值此大浪淘沙，泥沙并下之际，新兴的地主阶级，旧有的奴隶主贵族残余，社会小生产者，破落的旧贵族等不同阶层对眼前的破坏和变革各有不同主张，他们不甘心寂寞，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言人站出来，或抨击现实，或阐述理想，或以纯学术探讨的面目委婉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颇具民主色彩的称之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期。

荀子曾三任祭酒的稷下学宫，更是战国时百家荟萃的文化学术中心。荀子先游学后为师，经历了稷下学宫的荣衰和复兴，由于长时间的思想交流，他熟知各家各派的学说特点，渊博的学识成为他能批判、继承、融汇百家之说的客观基础。战国后期，封建制度已经确立，新兴地主阶级已牢牢地掌握了政权。在国家统一前夕，在意识形态方面需要对百家之学进行批判总结，使之更适合于封建统治的需要。荀子于是作为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理论大师，应时而动，集百家之大成，取长补短，终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在《非十二子》中，荀子对包括儒、墨、道、法、名家在内的十二位思想家的主张逐个进行了批判和继承。荀子批评道家的宋钘、尹文学派崇尚功用，提倡节俭，反对等级差别的主张，对于宋尹学派的虚壹面静、见侮不辱的主张更作了无情批判，但与此同时荀子又吸收了宋子关于“气”的主张，从而使自己的自然的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气本源的基础之上。另外，宋子关于礼、

法结合的思想也被荀子吸收，并继承和发展起来。

对于墨家学派，荀子也多有批评。二者观点的差异主要在于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墨家主张节用、非攻，反对等级差别，荀子则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批评墨家不懂统一天下的国家大事，只知崇尚功用，粗俗无知，非攻定使天下大乱，节用将使天下贫穷。但是墨家关于“尚贤”的主张，却被荀子吸收，成为荀子主要政治主张之一。另外对于墨家在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成果，荀子也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

对于惠施、邓析等名家，荀子的批判十分激烈。他认为名家不法先王、不讲求礼义，好讲求怪说异道，实际上是玩弄文字游戏，于社会毫无用处。荀子对于公孙龙“离坚白”、“别同异”的学说也进行了批评。在批判名家的同时，荀子发展完善了自己的逻辑思想。在《正名》篇里，荀子通过对名和实关系的研究，阐述了他的“正名”逻辑思想。

对于法家，荀子也是有批评的。他主要批评过去法家过份强调某一方面的错误倾向。他主要批评了申不害片面追求势的权势主义和慎到片面的法治主义，不懂得礼治与尚贤使能。荀子主张礼法并用，并不反对权势与法治。相反，在他的著作中，将这二者作为巩固统治的必要手段却大大发展了。其弟子韩非在其师的基础上，将法家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终于形成“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成为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虽然自我标榜属于儒家，但对于战国名儒子思、孟轲之流的批评却毫不留情。他批评思孟学派并非儒家正统，批评子思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附会义仁智礼信的五常观点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怪诞逻辑。另外荀子还极可能在稷下学宫同孟轲就人之性善恶的问题进行过争辩。至于战国时的其他儒家学派如子夏氏之儒、子张氏之儒、子游氏之儒，荀子更是不留情面，直斥为贱儒、腐儒、

俗儒、陋儒。对于孔子，荀子却十分敬重，甚至以其继承人自居。但对于孔子的许多观点，荀子并不完全赞同，荀子批判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与此同时又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的理论。荀子继承了孔子关于礼的观点，但他的礼显然与孔子所提倡的周礼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荀子并不纯属于儒家，他只是要在批判继承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更加适合于新兴地主阶级统治需要。

荀子思想的最光辉之处就是他的“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荀子的自然天道观是接受了道家天道观影响的。老子的天道观否定了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虽然这种道仍为一个神秘的精神实体，但它终究不同于儒家那种有意志的、人格化的天，为从有意志的天过渡到自然的天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荀子正是在老子的基础之上，将天发展成没有意志的自然物质，又将道家的神秘的道发展为有规律性意义的道，从而在吸收道家思想合理成份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在《天论》中，荀子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天与人之间并不相及。他认为日月星辰，阴阳风雨，草木水火，鱼虫鸟兽，世界上各种生物和自然变化，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他们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不断变化，列星运行、日月照耀，草木生长，四时交替等都是自然现象，并非出自什么人的主宰和意志，从而剥掉了长期以来统治者强加给天的神秘外衣，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在哲学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对天给予自然解释的思想家。

荀子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要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个飞跃。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界。同时他认为人又是自然的主人，具有独立的力量，可以征服和利用改造自然，从而比较

正确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荀子认为，在自然界中，物类竞争，适者生存，人类也要利用自然维持自己的生存。自然界的变化和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一种制约的客观作用，人的思想和行动必须符合和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能随心所欲，轻易违背自然规律。

但是荀子认为，人类在自然面前决不仅仅是消极地适应，而是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他认为，一切自然资源都可以为人类所掌握，为人类服务，成为人类的财富。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提高生产力，土地多长五谷，果实累累，鱼蟹成群，人类吃穿不尽。这体现了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朝气和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荀子的政治主张是隆礼重法，礼法并用。这一观点是荀子在对儒、法两家主张的长期研究和学习的基础之上兼容并蓄，批判继承后才形成的。荀子生存的时代，尽管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十分激烈，但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荀子作为一个新生地主阶级思想家，顺应历史趋势，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的王道与礼治思想和法家的霸道法制经验，将本来相互对立的王道与霸道、礼治与法治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为新兴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荀子认为，礼是一种封建地主阶级治国的政治纲领原则，是制定各种法令和制度的依据，是确定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标准，是人们活动、行为的界限准则，所以，荀子虽然名义上继承了儒家"礼"的主张，但他所说的礼与孔子的礼在其阶级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君道》中，荀子主张君主要以身作则，以礼作为统帅群臣、治理国家的纲领，有礼则国正，有礼则各级官吏各司其责，有

礼则百姓安分守己，人们的言行都符合礼的规定，国家就可大治。

由于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生之初天性就恶劣，这种恶劣的天性，是与礼的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就需要通过礼义的教化，使人们去恶从善，为此要加强对人们的礼义教育，使人们老老实实地服从统治。

荀子在强调礼治的同时，又强调重法。在他看来，法与礼一样，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两手缺一不可。荀子主张重刑罚，赏罚严明，以进贤劝善，禁暴除恶。赏罚必须严明，为善者不赏，贤人就会失去上进的机会，为恶者不罚，不肖之徒就得不到惩治，恶行不禁，国家就会陷人混乱，因此明赏罚是国家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另外，应用礼、法结合的办法来争取人心，对破坏现行制度的首恶分子可以不必教育就施以刑罚，而对犯了小错的人则可以进行礼治教育，使他们转化，如再不悔改，再进行处罚。

荀子从早期法家那里继承了重法思想，又将儒家的隆礼思想加以改造后与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的礼法结合的独到见解，使之更适用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需要。

荀子生于战国后期，他的活动年代正是秦国日益强大，国家走向统一的前夕，为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荀子又提出了“法后王，一制度”的主张。围绕着如何才能统一，荀子提出了实现封建大一统，确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

荀子主张建立集权于君主的专制政体，要求君主以权势统治人民。封建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至尊无上，是国家政权的中心。只有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才有可能一统天下。荀子认为，君权决不能分散，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国家大事一定要听从君主的决断。荀子关于君主专制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韩非，成为韩非提倡建立封建君主专制集权政治的思想来源。

为了封建国家的基业，除了有一个大权在握的专制君主，还

应该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来辅佐君王。为了得到人才，荀子主张“尚贤使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贤能之人可以被破格提拔，即使是庶人子弟，只要有才德，懂礼义，一样可以作卿相大夫。荀子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吸收了墨家的有关学说，同时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旧有的世卿世禄制，要求参与政权和权力再分配的要求。

春秋时期，奴隶制度开始崩溃，到了战国时期，旧的礼仪、等级秩序已溃不成形，因此，旧贵族的代言人孔子惊呼：天下无道；其门徒孟子又大叫：世道衰微。为此他们提出要复兴王道、法先王，恢复旧的统治秩序。历史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复古倒退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只好听天由命，其思想主张与天命观相联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孔孟一派提倡复古、法先王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荀子与他们不同，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生的、进步的阶级那种勃勃生机和对未来前途的信心。此时，各国都先后建立了封建政权，但诸侯割据的局面阻碍着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荀子顺应这一历史趋势，提出“法后王，一制度”的封建一统论。荀子一直标榜要继承儒家传统的，因此并不反对法先王，但他认为先王距今年代久远，事迹模糊，远不如近世的君王事迹粲然可靠，而且后王的事迹是继承先王的传统而来的，二者一脉相承，并不矛盾，与其法事迹模糊的先王，倒不如法事迹粲然可靠的后王。“法后王”的具体作法就是荀子主张应该树立一个在他看来理想的君主作为学习榜样。这个理想的统治者应该隆礼重法，确立封建等级制，尚贤使能，推行王道，最终要建立中央集权的，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制度，这就是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图景。由于荀子的主张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时势的要求，因此他的历史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必须看到，荀子的历史观有一种循环论的倾向。虽然他承认历史在变

化，但他认为古往今来的历史过程，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在这里，有一个永远起作用的不变的道贯穿其中，这种道叫作道贯。尽管百王兴废，道贯却始终如一。这种循环论的历史观正表明荀况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性。

为了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封建统治秩序，荀子认为应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为此他提出了明分使群的社会观。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类能群，即共同生活和劳作，人力不如牛大，走不如马快，但牛马却被人类驱使，其原因就在于人有群体。荀子主张人性恶，认为不能无群，有群而不分高下贵贱则必然发生争执，争执发生就出乱子，因此人类有群的同时一定要有差别。荀子主张人们必须区别出贵贱上下的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社会伦理关系，士农工商的社会分职分工关系。明确了这些关系之后，再晓之以礼义，使各个阶层安于现状，不作非分之想。这样，国家就可安定。不难看出，荀子的这种明分使群的社会组织论，表面上看好似要确立一种社会分职分工的关系，实质上是要建立一种封建的伦常秩序。战国时期，奴隶社会旧的等级秩序已被破坏殆尽，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政权后，需要重新建立一套等级制度以便维护统治秩序。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有关思想，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社会伦理思想重新整理，使它为地主阶级服务。为了将这种等级秩序固定化，荀子还把它奉为合乎天理，永世不变的根本，清楚地表明了荀子的阶级立场。不过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角度看，它又具有维护封建制度，反对奴隶社会宗法制的积极意义。

荀子还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对认识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建立了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其主要观点主张集中在《解蔽》这篇作品中。解是解决，蔽是偏见与片面性。荀子希望通过解蔽，能够全面、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这一观点，是荀子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一大发展。

荀子否定了孔孟极力鼓吹的生而知之、不虑而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唯心主义先验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而知之”的思想，强调人的知识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在《劝学》篇中，荀子认为人只有坚持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积累知识，才能进步。他认为，学习不可能停止，青取之蓝而胜于蓝，冰成于水而寒于水，只有不断学习和积累，才能成为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人。

荀子明确肯定人的本性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既区分了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观对象，又没有将二者完全隔离开来。荀子的这种世界可知的观点，显然是受宋钘、尹文的影响，并且将其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加清楚明确起来。荀子不承认有什么生而知之的人，也不承认有天生的上智下愚，他认为知识只可以从学习中获得，通过学习，人可以由愚变智。学识渊博、品行高尚的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普通人不断学习积累的结果。因此，后天的刻苦努力对一个人的成就起决定作用。荀子以鲜明的态度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否定了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但是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认识论自有其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他不懂得有限的个人对于无限的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穷尽，因此人的认识也是无限的。荀子不懂得人类实践与认识的无穷性，因此他妄图从主观上将人们的认识匡定在符合封建伦常法制的狭隘范围内，这样就使其认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其唯物主义也不可能彻底。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封建制度全面形成和发展的战国时代，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国家走向大一统的趋势，运用其独具的概括能力和对百家之学的深刻了解，去各家之弊，采各家之长，使之融汇贯通，形成了其独特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封建社会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誉为先秦时期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燕世家》。

《荀子》、张秉楠《稷下钩沉》

《战国策》：《齐策》、《楚策》。

《孟子·尽心上下》

《管子·心术上》、《庄子·天下》

春申君相楚

楚顷襄王三年（前 296），一位老人孤独地死在秦国，他就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楚怀王芈槐。怀王客死异邦，虽咎由自取，但楚人闻之，仍举国悲怜。提起怀王入秦，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

楚怀王十六年（前 313），秦欲攻齐。此时是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秦国刚刚经过变法，国富兵强，雄心勃勃极富侵略性。而此时的齐、楚两国为了自身的安全，结为同盟，以抗强秦。于是乎秦、韩、魏为一方，齐、楚为另一方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齐、楚联盟成为秦向东推进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秦国决定利用外交手段，离间齐、楚两国关系，破坏两国联盟。不久，秦国方面放出风来，说张仪已被罢官，以消除楚国疑心。张仪乃战国时著名游说之士，纵横家，魏人，游说入秦，曾在秦、魏为相，主张连横说，为人狡诈善辩。此时奉命使楚，阴纵反间，破坏齐、楚联盟。张仪入楚面见怀王，开始摇唇鼓舌道："秦王一直十分敬重大王，张仪因此愿意投奔大王门下。现在秦王最恨的莫过于齐王，张仪也如此。如大王与齐王修好合纵，这样做是使秦和臣张仪都无法侍奉大王，秦、楚两国也难以修好。假如大王现在能闭关绝齐，不仅可与秦国改善关系，还可以派使臣随张仪入秦，面见秦王，将以前秦占有的楚国商於之地六百里还给楚国，这样，齐国必然被削弱。因此，大王绝齐一可以北弱齐，二可与秦国修好；三还可得商於之地六百里，一举而三得，大王何乐而不为？"张仪的一通鬼话，竟使昏庸贪婪的怀王大喜，立即将他延为上宾，置相

玺于张仪，并置酒设宴。群臣皆贺，唯谋士陈轸独吊。陈轸亦为游说之士，曾与张仪共事秦王，深知张仪为人狡诈无信，此次必给楚王设下圈套。因此他力劝怀王不要听信张仪的一派胡言，万不可与齐绝交，陷于孤立。谁知怀王利令智昏，不见欺骗之辱，绝齐之祸，一心听信张仪的摆布，并派一使者随张仪入秦受地，同时派人宣布与齐断交。

张仪归秦后，假称坠车摔伤，三个月不出门，楚使者焦急等待，虚无的商於之地迟迟不可得，愚钝的怀王仍未觉察其中有诈，竟愚蠢地认为一定是秦国嫌楚国与齐国绝交不十分彻底。为取悦秦王，早日受地，楚王派一勇士入齐，当面辱骂齐王，齐王大怒，齐、楚之交终于彻底破裂。于是齐国转而与秦国修好，楚国彻底孤立。

听说齐楚两国彻底破裂，张仪才自称病愈，面见楚将军。受地之事，张仪矢口否认六百里之说，只称答应给楚王六里，楚使有口难言。怀王知自已被耍弄，怒而伐秦。楚怀王十七年春，秦楚两军大战于蓝田、丹阳，楚国准备不足，又无外援，自然大败，楚国自此元气大伤，第二年，双方休战。怀王二十七年，为质在秦的楚太子陵与秦大夫发生私斗，失手杀了对方，畏罪逃回楚国，一下子惹恼了秦王。怀王二十八年，秦齐胁迫韩魏共国伐楚。二十九年、三十年秦连伐楚国，楚国惊恐，忙派太子横入质于齐，重新与齐修好。楚国的反复无常激怒了秦王，于是秦昭王投书楚王，要求与楚王在武关会盟。怀王接秦书，犹豫未决，不去，恐秦怒，去则恐见欺，众人皆认为凶多吉少，劝阻怀王。怀王却听信庶子子兰之言，不愿绝秦之欢，决定人见昭王。

秦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冒充昭王，待怀王一到，立即闭关，劫怀王西至秦都咸阳。昭王态度狂傲，待怀王如同藩臣，此时怀王方才悔恨不听陈轸之言，秦王扣留楚王，要挟怀王割巫、黔中之郡，然后才可结盟。怀王誓死不允，于是滞留秦国。为绝秦念，

楚国又接太子横归国立为王，是为顷襄王。顷襄王二年，怀王乘机逃出秦国，入赵，这时赵惠文王初立，惧秦，不敢接纳怀王。怀王想转而奔魏，不料此时秦追兵大至，怀王又被捉回并严加看管。第二年，怀王发病，抑郁而死于异邦。

秦国欺楚王新立，派大将白起伐楚，大败楚军，取巫、黔中之郡，又水淹鄢城，楚损失几十万众。秦又陷郢都，焚夷陵，建南郡，大有一举灭楚之势，楚国上下皆恐。为退秦师，楚顷襄王决定派左徒[1]黄歇入秦游说秦王。

黄歇，楚人，游学博闻，能言善辩，事楚王为左徒。

黄歇入秦后，上书秦王："现在天下秦、楚最强，二强相斗，两败俱伤，他人获利，因此不如和睦相处。今大王伐魏、攻卫，绝楚赵之纵，大王之威尽行天下。假如大王能持功守威，罢攻取之心，行仁义之举，即可称王于天下。可是大王如果自恃兵甲之强，军徒之众，以武力服天下，臣唯恐大王后患无穷。当年赵国的知伯只知伐赵之利而不知有榆次之祸；吴国只知伐齐之便而不知有干隧之败，他们国破身亡并非武力不强，而是遇事顾头不顾尾，才引来祸患。现在大王势在灭楚，却不知灭掉楚国只会使韩、魏获利，因此臣认为大王之虑不足取。

"如今大王轻信韩、魏与秦国友好，这正是吴王夫差相信越王勾践的历史重演。臣担心韩、魏表面上卑辞屈膝实际为了蒙骗大王。臣这样讲自有道理：因为秦国无大德于韩、魏，只有累世的怨恨，韩、魏的国君已有十代人相继死于秦手，此恨累世接代。因此，韩、魏两国才真正是秦的后患，而如今大王却助之攻楚，不是太糊涂了吗？

"大王攻楚之时，四国必起兵响应。魏国将出兵占据留、方舆等宋国故地，齐入攻楚则必占泗上之地。这样，膏腴之地为魏、齐

① 左徒：楚官名，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接待宾客等。

等国尽得，大王即使破楚也无实际利益可图，齐、魏等敌国反而因此强盛起来。他们虽不至于称帝天下，但抑制大王成就帝业则是绰绰有余的。

“再说大王攻楚，必向仇国韩、魏借路，这是大王以兵资助敌国。如不取道韩魏，就必须攻打随水右壤，这一地区到处是山林溪谷的不毛之地，大王得之毫无用处；因此大王空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

“今秦国以国土广博，人口众多，兵革强劲，然而一出兵而与楚国结怨，还使得韩、魏等倒向齐国，这就是大王的失策之处。臣为大王计，不如与楚国修好，楚、秦合一抑制韩国，韩国必然言听计从，这样韩国就实为秦国所有了。此时大王再以十万大军兵临新郑以威慑魏国，魏国必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魏国亦为秦国所有。秦楚友好，大王再以两万乘之力讨伐齐国，则齐国右部领土拱手可得。因此大王只要和楚，一威燕赵，二抑齐楚，三臣韩魏，不动兵戈，各国皆服，请大王考虑臣的肺腑之言。”

黄歇巧妙地利用秦与韩、魏等国的矛盾，大作文章，切中了秦昭王的要害，竟然说服了秦王不再伐楚，马上下令白起停止进击，并遣散了韩、魏等国的军队。与此同时派使者携礼人楚讲和，从此双方约为与国。

黄歇与秦王盟约已成回到楚国后，楚顷襄王令左徒黄歇辅佐太子完入质于秦。于是黄歇与太子一行滞留秦国。多年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楚王病笃，可是太子完为质于秦，无法归国。为使太子归国准备继位，黄歇自告奋勇前去游说应侯，正巧楚太子与应侯私交很好。黄歇对应侯道：“现在楚王病势沉重，恐不久人世。为秦国计，不如现在送太子回国继承王位，如太子立，将来事秦国必然恭敬，对相国的感激自然不尽。如果此时太子不归国，必然他人篡立，这些人定然不会事秦，其结果楚太子失位，秦国又失去了盟国，这才是下下策，请

相国三思而行，不要错过与楚修好的天赐良机。”

应侯范雎便入宫与秦王商议此事，秦王老谋深算，生怕有诈，便表示可以先让楚太子的师傅去探视楚王的病情，如情况属实，待太子的师傅返回后再作计议。

黄歇猜测出秦王的意图，便策划太子归国，他对太子道：“秦国阻拦殿下归国，必是想挟持殿下谋求私利，臣担忧殿下无利秦之能，难以归国。如今阳文君有两个儿子在国内，一旦大王驾崩，太子不在，阳文君之子必然会被拥立，这样殿下就失家失国，不得奉祀祖先宗庙了，依臣愚见，殿下不如乘此机会，乔装与使者一同混出关去，回国待位，臣请留秦国，以理善后。”太子完便依黄歇之计，变装换服，顺利过关，逃归楚国。太子出逃之后，黄歇对外称病不出门，直至推算太子已逃脱，秦兵无法追上了，黄歇便主动进见秦王，当面请罪：“大王，楚太子依臣之计如今逃离秦土，已近楚国，臣自知犯下欺君之罪，罪大当诛，臣恳请大王赐臣一死。”昭王一听黄歇胆大包天，竟敢策划楚太子逃亡，不禁怒火中烧，立即下令黄歇自杀。这时应侯谏道：“黄歇作为人臣以身救主，忠义可嘉，并不为过。若太子得立，黄歇必受重用，为将来着想，臣以为不如现在放他归楚，以利秦楚之交。”昭王见应侯言之有理，便忍下怒气，赦免黄歇，并送之归国。

黄歇归楚三个月后，即顷襄王三十六年秋，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考烈王元年（前262），任命黄歇为相，又赐淮北十二县为封地，赐号春申君。后来因其地近邻齐国，不甚安全，考烈王应春申君要求，收回淮北十二县为郡，又重封江东之地给春申君。黄歇以古吴国都城为都邑，从此果如秦相应侯所料，黄歇志得意满，大富大贵起来。

春申君为相楚国，辅国持权，声誉日增，竟与当时名噪一时的齐国孟尝君、赵相平原君、魏公子信陵君齐名，人称“战国四公子”。

春申君为相之后，顺应时尚，为求人才，广招四方宾客，礼贤下士，一时各国怀才抱德之士，纷纷投其门下。这时，一个叫汗明的人来求见春申君，等待了三个月，才被接见。二人谈话投机，春申君大悦。汗明意犹未尽，还想谈下去，春申君却道：我已经了解先生了，请先生歇息吧。汗明道："臣请问君与尧哪个更圣明？"春申君道："臣比不上尧。"汗明又问："先生看，臣与舜哪个更贤明？"春申君道："先生即是舜。"汗明道："先生错了，依臣之见，君之圣不如尧，臣之贤不如舜，当年以贤舜事圣尧，三年后方可相知，今日君一见就知臣，岂不是先生圣于尧，臣贤于舜了吗？"春申君大服，立即纳汗明为门客，五日一见。

春申君为相期间，对内礼贤下士，广招人才，取得国人的支持和承认，对外则与秦国修好，同时与魏、赵等邻国和睦相处，避免冲突。

考烈王元年，楚国向秦割地求和，以示修好。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死，楚王派春申君亲往秦国吊唁，楚秦双方至此未有战事。

考烈王四年，秦军在长平坑杀赵卒四十万，第二年，又围攻邯郸。赵相平原君冒着危险亲自率门客到楚国求援，楚王在平原君门客毛遂的文武夹击下，同意救赵。考烈王六年，春申君率大军前往赵都邯郸，适时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又至，秦军败去，邯郸得以保全。救赵之举，使楚国及春申君的声誉颇有提高。

考烈王八年，楚国乘秦国与中原各国混战无暇南顾之机，乘机北伐，又任命当时的著名学者荀卿为兰陵令，至此，楚势稍振。

考烈王时期，与秦国的暂时修好，灭掉鲁国，与赵、魏等国的友好相处，令楚国的统治者沾沾自喜起来，楚国自上而下，出现了一派虚假的和平景象。楚国君臣沉溺于这种升平之象中，其生活也越发奢侈腐化起来。

赵国平原君想与春申君结交，派出使节前去拜访。为向楚人炫耀富有，平原君特命使者精心装扮，头上戴着玳瑁，刀剑上皆

饰以珠玉，光彩夺目。使者入楚后，春申君安顿他们在宫中住下，宫室之华美令赵使咋舌。正式会见时，只见春申君家的门客个个衣饰华丽，上客皆足蹬珠玉鞋，相形之下，赵使差之甚远，倍感自愧不如。

楚国宫室之美，为战国之冠，春申君之宫，其华美又在众宫之上。甚至几十年以后，太史公司马迁游历至此，亦惊叹：宫室盛矣。

楚考烈王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立刻加快了东向的步伐。同年，灭东周君，伐韩，占据成皋和荥阳，建三川郡。第二年，秦派蒙骜伐魏、赵，拔赵三十七城。第三年，又攻上党、晋阳，设太原郡，秦军所向披靡。秦军的节节进逼令东方各国倍感惊恐。庄襄王三年，赵、韩、魏、楚、燕五国合纵，采取了联合行动。由魏公子无忌率领向秦国进击。结果联军大胜，秦军主将蒙骜败逃。

五国伐秦虽大挫秦军，但并未对秦国实力造成根本影响。在谗毁了联军主将魏公子无忌之后，秦国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秦王政二年，秦军又大举攻卷，斩首三万。三年，秦又攻韩，取十三城。四年，又拔魏邑畼、有诡。五年，蒙骜攻魏，拔二十多城，置东郡。

秦国的东进较前次来势更加凶猛。为了自身的安危，于是在秦王政六年，韩、赵、魏、卫、楚五国又学着几年前的样子联合起来，再次合纵伐秦。此时，才德兼备的魏公子无忌已死，联军以楚王为纵长，春申君和赵将庞煖为具体指挥，率军浩浩荡荡向秦国进发。然而今非昔比，今日的山东各国已大不同于前，在秦国的不断打击和各国的自相征伐中，六国的有生力量已消耗殆尽，早已失去了足以与秦国抗衡的实力，因此，这时的合纵伐秦，正如同以众卵击一石，其失败在所不免。因此，这次联军开至函谷关，刚与秦军交手，就溃不成军，大败而归。这样战国时期最后

一次合纵行动就以联军的惨败而告终。从此以后，在强秦面前，东方各国一个个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联合不起来。此次惨败，考烈王归咎于春申君指挥不力，自此二人关系渐渐疏远。

自从秦将白起破鄢郢，楚都东徙陈城后，基本与秦国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关系。这种和平局面，除了楚国方面春申君等人的努力之外，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并非秦国对此时的楚国有所偏爱。如果此时秦国攻打楚国，只有两条通路：一是从南郡攻楚这条路需经冥阨三关，险塞重重，易守难攻；一条路是假道西周，越韩、魏而攻楚，如此越三国而伐他国，几乎不可能。因此，秦灭楚时机并不成熟。而且，当时秦正积极地与中原诸国作战，也希望拉拢楚国。

秦昭王之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多年来，秦国不断打击削弱韩魏，攻占了两国大片领土，直至二国衰弱不堪，面临亡国。魏国惧于秦威，将许地割给秦国。许地乃是通楚的重要交通枢纽，秦据许地，就可从南阳通过鄢陵直达楚都陈城。陈失去天然屏障，距秦境仅一百六十里，敌军一日可至。为了避开秦国的锋芒，确保都城安全，春申君接受门客朱英的建议，于考烈王二十二年，合纵伐秦失败后，将都城迁至寿春。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楚王到处搜求女子，结果后宫嫔妃众多，却仍无人生出太子，楚国君臣为此忧心忡忡。这时，一对诡计多端、野心勃勃的兄妹入楚来投奔春申君。这对兄妹是赵国人，其兄名李园，其妹名李环。李环美貌而有心计，希望以美色为资本捞取名利富贵。此次入楚，李园本打算献妹于楚王，后来听说楚王有疾，担心生不出儿子来，美梦难成真，就暂时没有行动，转而投到春申君门下作了舍人。不久，李园请假回赵国，却没有如期归楚。春申君向李园询问误期的原因，李园故作玄虚道："齐王闻舍妹之名，派使前来求婚，只因臣陪齐使饮酒，因而误了归期。"春申君果然大感兴趣，忙问："婚事定了没有？"李园道：

“没有。”李园于是又大谈其妹的才德，会鼓琴，谈诗书。春申君动了心，便与李园相约明日与其妹在离亭相见。

第二天，李园带李环如约前来，春申君见李环果然容貌艳丽，且鼓琴而歌，多才多艺，聪颖练达。春申君一见倾心，当下便决定收留府中，李环果然颇讨春申君的欢心。不久，李环自知有孕，便与其兄计谋，打算以此为筹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

一日，李环乘春申君心情愉快，对春申君婉言道：“现在君受大王宠幸，比亲兄弟还亲。可是大王至今无子，这样大王百年后，就必然以兄弟相传。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必定要提拔任用自已的亲信和故人，到那时，君又如何保持如今的地位？这还不算，君为相弄权二十多年，多失礼得罪大王之兄弟，兄弟继位，必会报复，君马上就会祸及自身，更别谈保持相印和江东的封地了，如今妾有一计，可使君常保富贵荣华。妾蒙君宠幸，身怀有孕已一月有余，无人知晓，君如能献妾于王，妾自有办法受大王宠幸，如赖天助生一男孩，将来继位为王，楚王就是君之子，到那时，整个楚国都是咱们自己的了，哪里还用担心什么不测之祸？”

春申君觉得李环所言极是，便依其计，将其推荐给楚王，果然备受楚王宠幸。几个月之后，李环生一男孩。楚王大喜过望，立即立为太子，并封生太子有功的李环为王后，从此以后，李园以国舅身份掌握了朝政大权。

李园作贼心虚，唯恐春申君泄露了太子出身的机密，又担心将来不好控制春申君。于是他在家中偷偷豢养了一批武士，待机杀春申君灭口。李园的险恶用心，国人颇有知之者，惟春申君本人尚蒙在鼓中。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楚王病笃。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人世上的祸福难以预料。如今君处生死无常之世，事喜怒无常之主，定会有吉凶难料之人。”春申君不解，朱英道：“君相楚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如今楚王病重，朝不保夕。如君相少主，当

朝摄政，就如同古代伊尹、周公一般，待王长大，再归政于王。否则就南面称孤道寡而有楚国，这就是意想不到的福份。如今李园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听说他私自养了许多武士，待机行事。楚王一死，李园必先入宫，埋伏下刺客，杀君以灭口，这就是想不到的祸。请君提拔臣为郎中，待楚王一死李园必定立即入宫，臣请求乘机为君杀李园以绝后患。”

春申君道：“先生太多虑了，我了解李园，李园乃一软弱之人，我待他又友好，他决不至于如此狠毒！”朱英闻听此言，知自已的话不为春申君所用，为避祸及身，只好逃往他国。

十七天以后，考烈王死。事实果如朱英所料，李园得到消息，抢先入宫，将刀斧手埋伏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伏兵上前，刺死春申君，割其头抛入棘门之外。李园又派手下人抄灭了春申君的家，将其家人斩尽杀绝，夷灭三族，而李园妹所生之子立为楚王，是为楚幽王。

同年为秦王政九年，秦国嫪毒作乱被诛，国相吕不韦废。十五年后，秦灭楚，以为三郡。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楚世家》、《春申君列传》、《秦本纪》、《越绝书》。

吕不韦相秦

战国后期，卫国濮阳出了个名叫吕不韦的大商人，为经商谋利他时常往来奔波于各国之间。由于经营有方且精于筹划，吕氏很快便家累千金。商业上的成功，使吕不韦的野心膨胀起来。他自恃聪明过人，时刻在寻找时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政治上大显身手。

一日，不韦经商路经赵都邯郸，偶遇一秦国落魄王孙。此人名异人，是当时在位的秦昭王之孙，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安国君有子二十多人，异人生母夏姬无宠，异人随之亦受冷落。时逢秦赵交质，异人作为人质被送往赵国，已滞留赵国多年，当时秦赵关系紧张，异人在赵国备受冷遇、处境窘迫。不仅生活困苦且生命安全无保障，断无归国的希望，只有客死他乡的命运等着他，因此异人终日忧虑。不韦此时一见公子异人，立刻感到此人身份特殊，奇货可居，是个政治筹码，应该在他身上下笔大赌注。为证实自己的判断，回家后他又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对他说耕田可获利十倍，从事珠宝生意可以获利百倍，而搞政治投机立一个国君所获的利润无法计算。无价利润的诱惑更坚定了吕不韦投机政治的信心。不韦由于常往来于各国，对秦国的政治内幕有所了解：秦昭王年事已高，安国君即将登上王位，以华阳夫人为后，华阳夫人一家虽然权势中天，但夫人一直无子。有希望继承基业的是安国君的另一子傒，但华阳夫人不喜欢他，故安国君的继承人迟迟未定。因此，在秦国统治集团内部，王位继承权还大有争夺的

余地。基于以上情况吕不韦决心倚自已的才能和资产，倾家荡产资助异人谋取君位，创立吕氏的万世基业。

不久，他到异人住地正式拜访。二人一拍即合，言语投机。不韦先给异人分析了形势："你的兄长子傒本人又有权势地位，又有生母在宫中为他做主说话，继承王位的可能最大。而你既无母亲为内应，本人无权无势且身居国外，不必说立太子无望，一旦秦赵反目，只怕你性命都难保。现在请听从我的计策，我能改变你的处境，提高你在国内的地位，使你继承王位。"异人以为不韦开玩笑就笑道："你先去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地位，再来抬举我。"不韦道："你真不明白，我家的门第全仰仗着你来提高呢。"异人见不韦一脸正色，绝非闲谈，便请不韦深谈。不韦继续说："现在安国君为太子，华阳夫人有宠而无子，按传统只有华阳夫人的儿子才可为嗣，因此你父亲虽然有二十多个儿子，可嗣子迟迟没确定。你排行中间，不受宠且为质于外，即使大王马上去世，安国君为王，你连同兄弟们争夺作太子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马上想点特别的办法，你做太子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异人听了非常失望。"照先生的意思，我该怎么办呢？"不韦说："现在你要在赵国广泛交结名流贵族，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影响，我拿出一半家产资助你作为经费。我带着另一半财产去秦国活动，游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设法说服他们立你为嗣。"异人对不韦感激涕零，顿首许诺：如果计划成功，我一定与先生共享秦国。"

不韦重金购买了许多珍奇宝物后，便携宝入秦。到秦都后，先求见华阳夫人之姐，并通过她将宝物献于夫人。夫人姐收受了不韦的赂贿后，便向华阳夫人夸赞异人如何贤明，结交诸侯宾客，朋友遍天下，声望卓著。又夸异人如何仰慕夫人，日夜思念秦国。华阳夫人听后很感动。夫人姐乘机劝夫人立嗣："以貌事人的，终有一日会因年老色衰而失宠，为保将来一生富贵，你应该乘年轻受宠时在诸子中选一个贤明孝顺的立为子嗣。这样，即使国君百年

之后，儿子为王，母以子贵，总不至于失去依靠。如果现在不立嗣，一旦子傒做上国君，咱们全家不但荣华富贵无望，只怕性命都难保住，异人贤德，有自知之明，知自已立嗣无望。如果你立他为嗣，那么他肯定会对夫人感恩戴德，言听计从，将来他作了国君你就是太后，后半生的富贵荣华就全有指望了。”

为促成此事，吕不韦又去游说华阳夫人的兄弟阳泉君。阳泉君倚仗着姐姐的权势，骄横跋扈，富比王室。不韦见到阳泉君后，先声夺人：“你已经犯了死罪。自己还不知道吗？你仗着夫人的权势，家中珍宝、美女、骏马应有尽有，手下侍从无不高官厚禄，大大超过了子傒，难道他不嫉恨你？现在安国君年事已高，一旦将来子傒为君，你们华阳一族便无立身之地，性命难保！”阳泉君见不韦之言句句在理，不觉冷汗淋漓，不知不觉到不韦跟前洗耳恭听，讨求对策。不韦说：“他日一旦子傒为君，必定会士仓专权，咱们要千方百计阻止这种不利局面出现，我听说异人是个贤明之人，为质于赵，威望很高，他怀念故国，日夜盼望回来。如果夫人能接他回国立为子嗣，那样就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一举而两得。一旦大王百年，你们一族终不失势，这才是长远之计。”阳泉君便也去说服姐姐立异人为嗣。

夫人接受了姐弟二人的规劝。一日，见太子兴致好，便向太子谈起异人在赵国如何贤明，声誉日盛，众口皆碑。说着便不觉垂下泪来：“妾蒙太子宠幸，不胜感恩。可今有一事始终令妾放心不下。妾侍奉太子多年，至今无子以保妾终身，请太子恩准妾立异人为子以安妾心。”安国君见自己心爱的人的要求合情合理，欣然应允。于是二人便刻玺为凭，相约立异人为嗣子，并赏赐远在赵国的异人许多财物，命吕不韦为师。从此异人一步登天，由落难王孙变成大秦国的王位继承人，不韦的投机计划初步实现。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秦赵两国又开战端，秦重兵包围邯郸，赵人一怒之下要杀人质。危在旦夕之际，吕不韦重金收买了

看守，异人乘机逃入秦军才保住性命。不久，异人随军返回秦国。

为了取悦华阳夫人，吕不韦对异人与夫人的第一次会面作了精心安排，华阳夫人出身楚国，对故国深怀眷恋，不韦让异人身着楚服拜见夫人。夫人一见果然大喜，加之异人言辞得体，自然更加称心，当下便将异人更名为子楚，视若己出。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死，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孝文王在位的一年中，子楚常在宫中奔走，为秦王出谋划策，尽心竭力。一次，子楚建议秦国加强边防，以防他国突袭。秦王觉得子楚一片忠心，而且考虑问题全面细致，对他大为赞赏。华阳夫人乘机进言劝秦王立子楚为太子，孝文王也早有此意。于是，择一良辰吉日，当庭宣布："诸王子中只有子楚最贤，现在正式立子楚为太子。"

子楚取得太子地位时，夫人赵姬和儿子尚滞留赵国。子楚夫人本是吕不韦的妾。当年吕不韦经商邯郸，曾纳一色艺绝佳的赵女为妾，绝爱之。一日，异人到不韦处饮酒。偶然得见，惊为天使下凡，顿生爱心，便忍不住厚着脸皮向不韦讨要。不韦见异人竟打自己爱妾的主意，心中不快，继而想到自已为了异人得势已近乎倾家荡产，事已至此，如何还吝惜一女子！万万不可多年之功，毁于一旦，于是忍痛割爱将爱妾送与子楚，只是瞒住赵姬已有身孕的隐情。赵姬到了子楚那里，几个月后便临盆产下一男婴，取名政。不久，赵姬就因生子之功被正式立为子楚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秦攻邯郸时，子楚逃回秦国。赵国见秦国人质脱逃，恼羞成怒要杀子楚夫人和幼子政泄恨。夫人闻讯，携子避祸藏匿于有权势的娘家，得以大难不死，子楚为太子后，赵国为了结好秦国，隆重地奉送赵姬母子归秦。

孝文王执政一年后死去，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立王子政为太子，另外任命恩师吕不韦为相国，受封文信侯，食邑洛阳十万户，兑现

了二人共享秦国的承诺。

庄襄王在位三年，壮年早逝，太子政继位为王，吕不韦继任相国，被年轻的秦王敬称为“仲父”。此时秦王政年方十三，尚未亲政，大权皆揽于吕氏集团之手。此时的吕不韦，多年的期待终于实现，正是春风得意时，他身居高位，独断专行，操纵国权于掌股，高官贵勋皆出自他的门下，一时名声大噪于各国，此时，各国名流贵族中养士之风盛行，不韦便以齐孟尝、魏信陵为榜样，交结诸侯权贵，广招三教九流，不久吕氏门下便麇集门客三千。天下只知有吕相国，不知有秦王矣！

此时，东方强国齐国由于燕齐战争，几于亡国，后来虽然田单复国，但早已国力衰弱，江河日下，著名的稷下学宫随之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齐国人才纷纷外流。慎到、接子、田骈、荀卿等著名学者先后离去，更加速了稷下学宫的衰微。与此相反，秦国在与各国较量的过程中，急需招徕各种人材。吕不韦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门纳客，一大批人材迅即集中到秦国，不韦让各家各派人士畅所欲言，集所闻所见，最后集中辑录成书，这就是汇集诸子百家学说，融铸战国时期各国文化的学术巨著《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一书的诞生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结晶，亦是吕不韦任相国期间为秦国不拘一格广招天下宾客人才的历史见证，也标志着战国后期继稷下学宫之后新的文化中心的诞生。

《吕氏春秋》的编写历经几年方成，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多万字。

由于吕氏门客来源繁杂，故而《吕氏春秋》一书不同于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它融合了各家各派的观点，辑百家之说，内容庞杂，兼容并蓄，却又有所倚重，不韦以为，偏视使人目盲，偏听使人耳聋，偏虑使人狂妄，三处皆偏者，待人处事必不公正，福去祸来。因此，《吕氏春秋》一书集中了当时流行的墨家、法家、儒家、道家等主要学派的观点，但特别倚重道家主张，可见吕子

门下道家势力的强大。因该书内容庞杂，难以归类，故汉人将其列入杂家，流传至今。

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的主要动机是借各家各派之口，表述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以该书为阵地，对秦王政潜移默化施加影响，使之接受书中的观点和主张。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学说流行，君权强大专制。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长，他那独断、专制、暴虐、刚愎自用的性格日益显露出来，不韦崇尚道家，大权在握，希望秦王政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君主。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于是君权与相权出现了冲突，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吕氏春秋》中用道家观点解释了万物的产生，认为万物始于太一，生于阴阳，人们的欢悦生于平和，平和生于道，道这个东西非常玄妙，听不见，看不着，无法描述出它的形状，如果能在不见中有所见，于不闻中有所闻，于无形中见到形状，那就几乎懂得道了。道就是一，一就是准则和法令，如果能够用一来处理国家政事，就会国泰民安，人人欢乐；如果用一来治理国家，贤人就会来到，国家就会大治。因此懂得道就是聪明，否则就是愚蠢。吕不韦在《大乐》篇中如此提倡道家的主张和统治思想，表明了他对法家所热衷的君主专制主张的不满，他希望秦王政能接受道家，实行无为而治，以便自己继续独揽大权。

吕不韦还吸收了儒家的部分主张，主张君主应以民为务，勿夺农时，用人要公平无私，顺民心。例如在《顺民》一篇中以商汤、周文王、越王勾践为例，阐述了治天下顺民心即功成名遂，丧失民心必然失败的道理。勾践在会稽失败之后，为得民心，几年身不安席，目不悦色，食不贪味，内亲群臣，下养百姓，躬耕而食，亲织而衣，结果擒夫差，戮吴相，称霸诸侯。勾践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他取得了民心。吕不韦希望秦王不要一味以严刑酷法维护统治，应该以德得民心，这是孟轲一派的民本思想在《吕氏春

秋》一书中的直接反映。

另外吕不韦还含沙射影地讽刺秦王政不知贤、不礼贤、骄妄、恣睢自用，充分暴露出吕不韦与秦王之间的矛盾。《骄恣》中开门见山指出，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视别人。自骄就不好士，自以为聪明必然专制独裁，轻视别人就不加防备，无防备就召来祸患，专制独裁就岌岌可危，不好士就耳目闭塞。人君必须礼贤下士，顺应人心，才能享有天下。不虚心纳谏，轻者身死，重者国亡。吴王夫差就是刚愎自用，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终被越国报复，祖庙社稷被毁，殃及祖先，最终以黑布蒙面羞愧而死。不韦试图以古代的教训来刺激秦王政去自骄、专独、虚心纳谏。

不韦还通过《吕氏春秋》抨击秦王以天下为己有，逞一己之威。在《贵公》中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君主应该公正无私，则天下平。可以看出，君相二人争权夺利已经表面化。吕不韦反对秦王的家天下，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向秦王的抗争，反映了秦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吕不韦的所谓天下人之天下是针对一人之天下而言，并非真心希望天下人所有。

秦王政八年（前 239），秦王二十一岁。第二年就要加冕亲政。他那专横、暴虐、独断的品性已经形成，对不韦专权的不满溢于言表。不韦感受到秦王对自己的威胁，因此在这一年，匆匆忙忙将刚刚编纂好的《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中，公开宣称：有能增减一字者赏千金。当时竟无有一人能增损者。《吕氏春秋》一书文字并非上乘，无一人能增删的原因实在是人们慑于吕相国的威势。吕不韦公布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借此向秦王示威，借以显示自己在国人眼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希望公布该书，能使秦王接受书中的观点，使秦王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受自己的影响，谁知秦王政恰恰不是吕不韦所期望的那种任人摆布、言听计从的君主。他决不愿受制于人，包括像吕不韦这样的恩人。他热衷的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独断专行等法家主张，吕不韦的作法非但未使他

有所丝毫改变，反而使二人的矛盾冲突更加深化，终至公开爆发。

不韦为相十几年中，采取了促进秦国经济发展的措施，他一反商鞅以来形成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实行农、工、商百业并举的方针，使秦国国力大增，经济上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两朝为相期间，不韦都致力于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首先，对先朝遗臣和宗室贵族优容礼遇，大赦罪人，施惠于民，使秦国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秦国的对外扩张创造了条件。

吕不韦相秦最重要的功绩是继续执行秦昭襄王时制定的“远交近攻”的正确战略方针，不断发动攻势，削弱三晋。庄襄王时，东周小国君不自量力，想乘秦王新立，联合诸侯攻打秦国。这个东周君并非正宗，真正挂名的天子周赧王早已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被秦灭掉了，但周王室尚有一支仍以东周的名义存在。庄襄王元年（前 249），不韦派军队灭掉东周，又注意政治影响，夺其国而不绝其祀，以阳人（今河南临川西）一邑赐周君。这样，周王室的最后一支也被清除掉了。

同年，不韦又派大将蒙骜伐韩，韩献成皋（今荥阳汜水）、巩二地。成皋和巩经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为巩固战果，在此地设置了三川郡。于是秦国的边界向东扩展，几乎接近魏都大梁。庄襄王二年，蒙骜又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三年，攻占了魏国的汲、高都等二十城；同年，又攻取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庄襄王四年，秦将王龁又一次占了韩的上党并设置了太原郡。太原郡原为赵国所建，秦昭王时，秦将司马梗曾攻取太原，不久为魏楚联军击败，太原复归赵。此次重建太原郡，说明秦国与三晋的力量对此已发生巨大变化，太原一地已为秦国牢牢掌握。

秦国迅速向东扩张的凌厉攻势引起了东方各国的恐惧和警觉，外界压力促使他们再一次合纵伐秦。庄襄王四年，魏公子无

忌率韩、赵、魏、楚、燕五国军队西讨强秦，双方大战于河外，秦军寡不敌众被五国联军击败，秦将蒙骜逃走，这次合纵的成功使秦东进的锋芒稍稍受挫。

秦王政继位之时，接受的是祖先留给他的一份庞大的遗产。是时，秦国南并巴蜀、汉中，设立南郡，北吞三晋大片领土，设河东、太原、上党三郡，灭掉东西二周，领土东抵荥阳。几代君主的征战和开拓，秦国越战越强，国土已从关中扩展到相当于今日的陕南、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广大地区。

秦王政初年，不韦积极推进削弱东方各国的战争。秦王政元年（前 246），蒙骜定晋阳（今山西太原）；二年，麃公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拔韩十三城，同年又攻打魏的𬨎、有诡二邑；第二年攻克。五年，秦将蒙骜率军攻魏，连拔二十城，并设置东郡。

秦国锋芒东向的节节进逼，又一次震惊了东方各国。来自西方的严重威胁使他们再次联合起来，秦王政六年，韩、赵、魏、卫、楚五国之师在楚国春申君和赵将庞煖率领下，浩浩荡荡向秦国蕞地进攻。与上一次合纵比较，仅相隔六年，然而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的五国联军已不堪一击，秦军一反击，联军便如落花流水，从此再也联合不起来，战国时期的最后一次合纵就这样宣告结束。联军败逃之时，秦军乘机进击，拔卫都，迁卫君角于野王（今河南沁阳），灭其国而不绝其祀。从秦对东周君和卫君的安置作法看，不韦执政时对敌国采用恩威并施的作法，与过去的一贯杀戮的法家作风略有不同，反映了吕不韦儒道法兼容并蓄的统治思想。

五国伐秦的失败，说明秦国的蓬勃发展已无法阻挡。秦王政七年，秦攻取赵的龙、孤、庆都和魏国的汲；秦王政六年，攻占了魏国的朝歌；九年，又攻克魏的垣、蒲阳等城。此时的秦国已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东方各

国已疲弱不堪，再也无力抗争，只有等着被秦一个一个消灭，秦国统一的趋势已成定局。

此时秦相吕不韦家中，终日门客云集。不韦鼓励策士们出谋划策，探讨统一天下之道。楚人李斯慕名而来，投到不韦门下。不韦羡其才干，推荐他作了秦王的随身侍从。此后，李斯得到秦王赏识被任为客卿，终至相国，成为秦统一天下的有功之臣。

然而随着秦国统一事业的步步推进，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越发水火不相容，一山难容二虎，终于在秦王政二十二岁刚刚亲政那年，以宫廷丑闻为导火线矛盾公开爆发。

秦王政初继位时，只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不韦欺他年幼无知，与太后赵姬旧情不断，暗渡陈仓。秦王渐渐长大，不韦怕引来杀身之祸，便打算金蝉脱壳摆脱太后的纠缠。不韦从众多舍人中物色到一年轻英俊的后生嫪毐，然后拔去须眉，冒充宦者，又用重金收买了验身的官吏，将他顺利送入宫中，做了太后的贴身侍从，太后绝爱之。

从此嫪毐便以宦者的身份留居宫中，陪伴太后。不料好事多磨，不久太后有孕，为了防止丑事败露，嫪毐与太后以避灾邪为名，迁居雍地，先后产下二子。

嫪毐倚仗太后的宠幸，直上青云，不可一世，出入宫禁，干预朝政，大小国事几乎都经他决断，权势几与相国不韦相当。太后出面为他讨封，被封为长信侯，赐居山阳地，仍嫌不足，又擅自占有太原、河西二郡为自己的封地。嫪毐生活豪奢，宫室、车马、服饰、苑囿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家中门客上千，奴仆上万，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奔到其门下，权重一时。秦王政早就对不韦及嫪毐一伙的专权心怀不满，他那独断专横的性格，决不愿受制于人，听人摆布。他向往的是独制其民，君主集权。因此儒家的民本主张与他格格不入，法家的君主专制集权的主张却很合他的口味。因此《吕氏春秋》中的主张和观点，其中相当大

一部分他是难以接受的，而吕不韦、嫪毐一伙作为他实行君主专制道路上的障碍，必在清除之列。秦王政九年，二十二岁的秦王政行冠礼，正式登基后，便着手铲除吕、嫪集团。不久，便有人告发嫪毐不是宦者，与太后秽乱宫禁，而且有谋反企图。秦王闻报大怒，令人密察实情禀报，实如其言。消息走漏，嫪毐知自己已被人告发，死到临头，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真造起反来。他假借太后印玺，调动军队据兵抵抗，秦王令昌平君、昌文君平定叛乱，双方大战于咸阳，嫪毐兵败，落荒而逃，不知所踪。秦王下令全国悬赏捉拿叛逆，生擒者赏一千万，杀死者赏五百万。不久，嫪毐果被生擒，献于秦王。嫪毐被处以车裂极刑，三族被夷，宠臣二十四人亦车裂以殉，灭宗族。舍人门客中罪行轻微者被流放于蜀地，罚作苦役，不久被赦免。秦王二异父弟被杀，太后被迁入雍，打入冷宫。后来经过齐国辩士茅焦的游说，秦王为避不孝之名，才将太后重新接回咸阳。

嫪毐谋反事件牵连到相国吕不韦。因其为不韦所荐，秦制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嫪毐谋反不韦同罪，按律应诛。但秦王一方面感念不韦辅助先王夺嗣之功，不忍下手，另外诸侯贵族中为不韦求情者甚众，众愿难违，再者，不韦与秦王矛盾的焦点在于权力之争，因此只要借机削夺权力，便达目的，无须夺他性命，故而仅仅免去不韦的相职，使之闲居，并未绳以国法。

谁知不韦为相多年，已培植了雄厚的个人势力，在诸侯贵族中威望甚高，朋友众多，虽免相一年多，各国往来拜望者仍不绝于路。秦王政闻听文信侯吕不韦在诸侯中影响不减当年，不禁怒火中烧，不仅嫉恨不韦超过自己，更怕有朝一日，不韦不甘寂寞，聚众与他作对，于是欲置不韦于死地。他差人送信给不韦，信中满纸责难之词："吕不韦你受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高官厚禄，你对秦国有何功劳？你号称仲父，与秦室有什么亲情？我现在要把你和你的亲属全流放蜀地做苦役！"见到这封充满杀机的信，不

韦心中异常惊恐。他深知秦王的狠毒暴虐，此次祸不可免，想到自己虽聪明盖世，此时已无计可施，绝望之中饮毒酒自杀而死。不韦死后不久，秦王政就提拔出身低微的李斯为相。李斯吸取吕不韦覆亡的教训，小心谨慎，言听计从，秦王政时期秦国再无相国擅权的局面出现。

秦王与吕不韦的矛盾实质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是君主专制与君臣共治观念的冲突，双方斗争的结果，专制君主获得了胜利。秦王政铲除了吕嫪集团及太后势力后，将国家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独裁统治者，为统一以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纵观吕不韦传奇一生，当年重金钓奇，阴谋窃国，虽算不得光明磊落，但为相期间，积极发展经济，缓合国内矛盾，推进削弱东方各国的战争，对秦国的富强和促进统一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位高权重、封侯拜相，顷刻之间，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身死家破，令人深思。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吕不韦列传》、《六国年表》。

《战国策·秦策》

《战国纵横家书》

杨宽《战国史》

《吕氏春秋》

《孟子》

云梦秦简《编年纪》

韩学刑名

韩学，即韩非之学。韩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政治主张对秦王造成直接深刻的影响，形成有秦一代的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代代相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为韩王室宗室子弟。其祖先本为姬姓，世代事佐晋国，后来被晋国国君封于韩原，结果这一支以封地为氏，人称韩氏。这一支人丁兴旺，逐渐发达强大起来，成为晋国强宗之一。战国后期，韩氏与赵、魏两家同灭知氏，三分晋国。韩景侯六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同列诸侯，韩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韩国地处今山西东南和河南中部，西邻强秦，南接楚国，北有赵、魏，东有齐国，处于几大国的夹击之中，又处于交通要地，地理条件十分特殊。在战国纷乱不已的兼并战争中，韩国首当其冲，成为各强争夺、蚕食的目标，军事上的必争之地。秦国倡导连横统一天下，韩国首罹其祸，东方各国合纵攻秦，韩国又成为战场。范雎任秦相之后，更是将韩视为秦的心腹之患，韩又成为秦国近攻的主要目标，连年挨打。国家弱小，地位又重要，结果使韩国在外交处境上极为尴尬。多年来，韩国一直疲弱不堪，常无故被其他诸侯侵扰。韩国历史上最富光彩的所谓兵强国富时期，只有韩昭侯任用早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当政以法术治国时期，而这一短暂的辉煌，也仅仅是韩国能得以自保而已。韩昭侯一死，韩又倒退回老样子，重新成为众矢之的。

自秦昭襄王采纳范雎远交而近攻的策略后，加紧对近邻弱国韩与魏的侵吞，韩此时已无力自保，唯秦命是听，名存实亡。秦王政十七年，即韩王安九年（前230），秦派内史腾攻韩，俘王安，尽纳其地，设颍川郡，韩国灭亡。

韩非一生，正处于韩国横遭强暴欺凌，国土日削，濒临灭亡之际。此时的韩国国内政治与外交同样糟糕，君主昏暗无能，政治腐败，法令不行，下民作乱、官吏犯罪君主不加追究，致使吏治败坏，大臣擅权致使公室弱而私门愈尊，赏罚不明致使贤者懈怠不再努力，奸人更加肆恣妄为。

满怀爱国之心的韩非，处身于这样一个政治暗乱，对外软弱无力的国家里，其悲愤是不言而喻的。韩非天生口吃不善言，无游说之士的伶牙俐齿，但他有一支如椽之笔，可以将满腔忧国忧民之情倾注笔端。他曾经奋笔疾书，多次向韩王进谏，劝君主励精图治，整顿政治，纳谏听言，任人唯贤，建立法制，振作国威，但始终不被昏君采纳。

韩非并不灰心，他在此期间发愤写成《难言》、《和氏》两篇文章，再次上书韩安釐王，希望韩王能听进劝谏，以法术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结果仍让韩非大失所望。这时，见多识广，老谋深算的老官吏堂谿公见韩非上书不止，怕他惹恼了韩王，自引其祸，就自称受王命来劝韩非："老臣听说服礼、辞让，修行退智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如今先生主张立法术、行法治，老臣以为此举最为危险。以商鞅、吴起为例，二人的法治主张绝对正确，楚不用吴起国乱，秦用商鞅国强，可是最终吴起被分尸，商鞅被车裂，都没得到好下场。望先生不要蹈他们的覆辙，保全自己为好。"这时的韩非血气方刚，忧国心切，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听了老人的话，他慷慨作答："先生之言臣已明白，谢先生的好意，然治理天下，利国利民，并非易事。臣以为立法术是明智之举，强国之道。只求保全自己，躲避祸患，是过分自私而不为国为民着

想的卑劣之行，臣不愿做这种势利小人，不敢伤仁智之行。"

韩非反驳了堂谿公之后，不变初衷，继续上书。只可惜生不逢时，昏君佞臣当道，正义不行，韩非的一颗拳拳之心无人理解，但他毫不放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追求，发愤写作。

韩非针对当时国君不修法制，政令不明，听信佞臣，不任贤人，不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势驾驭臣下，更不知奖励耕战，实现富国强兵之道，而热衷于听信虚言浮说，尊重游侠，任由工商牟利，小农破产，致使国家经济凋敝、法度混乱、禁令不行的种种腐败现象，并结合历史上的成败教训，写就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几万言，字里行间，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孤愤》篇中，韩非满怀孤独与愤慨，揭露了当时严重的社会现实与法术之士的艰难处境。韩非针对韩国的政治现状，沉痛指出：掌权的"当途之人"，窃夺了国家权力。他们善于逢迎，骗取了君主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人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惑主败法，使君主愈卑、私门愈尊，长期以往，君主必处于危亡。这种奸人当道、正义不行的局面，归根到底，罪责还在于君主过分纵容大臣，因此君主不可不提防臣下的私心，防止出现主卑臣重、主失势臣得国的局面。

在《五蠹》篇中，韩非认为有五类人为社会蛀虫：一为学者，即儒生；二为游说之士；三为游侠刺客；四为逃避兵役之人；五为工商之民。韩非一一指出这些人对社会的危害，并提出清除危害国家利益的五蠹之民的主张，他认为纵横家、儒侠等人蛊惑君主，致使国家祸乱四起、法制败坏，工商业者唯利是图，侵夺农夫之利，破坏耕战，危害国家，必须坚决加以铲除。

在《说难》中，韩非论述了向君主进谏的种种困难与进说之士的险恶处境，并详尽分析了进说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由于韩非屡次进说韩王都不成功，对进说之难有切肤之痛，通篇充满韩非

的亲身体验，是他根据战国时进说的教训和自已的切身体会写成的一份进说经验的总结，读来极为深刻感人。因此太史公在编写《史记》时，将《说难》全篇录用，以寄哀思。

韩非认为进说之难还由于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之口，或不同时间，效果截然不同。如宋国有一般富人家，围墙因下雨坍塌，富人儿子说，如不马上把墙修好，必有盗贼前来，当时富人邻人也如此说。晚上，富人家果然被盗，于是富人家认为自已儿子有远见，而怀疑邻人与盗贼有牵连。又如卫国大夫弥子瑕年轻时很受卫君宠幸。一次，弥子瑕母亲得急病，弥子瑕夜间得知后，连夜矫君命驾车而出探望母亲，卫君得知后，不但不怪罪，反而以为贤：弥子瑕太孝顺了，为了母亲，忘掉了刖刑，当时卫国法律，偷驾君车的要砍掉双脚。过了几日，弥子瑕陪卫君在果园游玩，弥子瑕摘了个桃，觉得很甜，便将余下的给了卫君，卫君赞之道："弥子瑕最爱我，不自已贪食，以美味让寡人。"后来弥子年老失宠，有事得罪卫君，这时卫君翻起老帐：当年你矫诏驾车，又给我吃剩桃。弥子的行为没有变，只是君主先以为贤，后以为罪，是因为君主对弥子的爱憎改变了。有鉴于此，游说之士在游说之前，必须先观察君主的爱憎喜怒之后再进说，君主就如龙一般，喉有逆鳞，如不小心触动了它，必招杀身之祸，而进说者不触犯君主逆鳞的则太少了。

韩非还认为国家之法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世异则法不同。因此圣明君主，不因循守旧，拘泥于传统，应根据社会需求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在当今社会动荡，战乱纷争的时期，决不可再用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的主张，应该改行法制，并从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和历史现状出发，论证了实行法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充分阐述了他"法后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为了谋求济世救国的方略，韩非四十多岁的时候又来到楚国，拜当时的著名学者、当时正担任楚国兰陵令的荀况为师。此时楚

人李斯也来求学于荀子。同学期间，李斯读了韩非的文章，就深知自己才能不及韩非。学成之后，李斯不愿久处卑贱之位、穷困之境，感到留在楚国没有什么前途，便离楚入秦，投到当时秦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了舍人，不久便任官为相，飞黄腾达起来。韩非一心为韩，不谋求私利，满怀救国之心、济世之术回国报效，然而此时在位的桓惠王仍是昏君一个，韩非虽几经努力，仍不被任用，眼见得韩国日日削弱，韩非忧愤不已。

桓惠王三十四年（前239）死，韩王安继任后，韩非才得到重用，却为时已晚。面对强秦的咄咄逼势，韩王安与韩非日夜谋求抗秦自保之术。在这期间，韩非的一些文章，几经辗转传到了秦国，秦王政如获至宝，细细研读了《孤愤》、《五蠹》等篇章后，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感韩非的思想主张正是他统一全国建立大帝国所急需的，只是不知作者何人。于是他忙问丞相李斯，李斯道："这是我的同学韩非的文章，此人正在韩国。"秦王不禁叹息道："我如能见到此人，并与之相处，死也无憾了。"

为了得到韩非，秦王集中军队，猛攻韩国，韩国本来就弱小，加之秦国多年的攻击蚕食，早已凋敝不堪，如何招架得住秦国的凌厉攻势？韩王安急得走投无路，只得忍痛答应让韩非入秦，以求保全。韩非决心施展才能，报效韩国，因此，韩非人秦立即上书秦王，力陈保全韩国之利，这就是《存韩》篇前半部分。当然，韩非的存韩之说与秦国统一六国的政治目标相抵触，自然不会被秦国君臣接受，因此他的上书立即遭到秦相李斯的驳斥，《存韩》篇的后半部分即为李斯驳斥韩非的上书。

李斯知韩非之才超出自己，深怕有朝一日秦王任用韩非，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对韩非非常嫉恨。于是他利用韩非上书存韩之机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韩非入秦，就劝大王存韩，目的不是为了秦国，实际上是为维护韩国的的利益。他人在秦国，心却向着韩国，切望大王不要听信韩非的饰非辩说之辞，让韩国得到好

处。”于是，秦王政在李斯的蛊惑下，也感到韩非对秦国不忠，便对韩非存有了戒心，从此不再重用。韩非滞留秦国，忠正直言的性格不改，终于因言招祸，死于李斯、姚贾一派奸人之手。

秦王政十四年（前233），燕、赵、吴、楚四国准备合纵攻秦，秦王很焦虑，忙召集大臣们商讨对策，最后大家认为应派一人出使四国，破坏四国联盟，从而使合纵破产。由谁来担此重任？百官皆缄默不语，只有姚贾自告奋勇，愿意出使四国。姚贾凭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挑拨离间终于大获成功，此行不仅打消了四国的攻秦计划，并使四国分别与秦缔结了和约。秦王大悦，封姚贾为千户，并提拔为上卿，以示嘉奖。韩非对此不以为然，便在秦王面前攻击姚贾道：姚贾用珍奇珠宝，曾在吴、楚、燕、代几国之间活动了三年，四国联合攻秦的可能性不大。此次姚贾出使又以大量珍奇重宝与之交结，实际上是姚贾用大王之权、国之重宝私下交结诸侯，愿大王明察此事。姚贾出身卑贱，其父为大梁守门人，又曾在大梁为盗，在赵国为臣期间，因行为不端又被人驱逐，现在大王让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这样的人参与国事，臣认为不是英明之举。

秦王以为有理，便将姚贾召来问道：“寡人听说先生以寡人之财物私自交聘诸侯，可有此事？”姚贾道：“有。”秦王又问：“既然如此，你有何面目见寡人？”姚贾道：“从前曾参有孝名，天下人都愿以其为子；伍子胥对吴王忠心耿耿，天下诸侯都愿以其为臣；贞女心灵手巧，天下女子都愿与她为友。如今贾对大王的忠心大王并不知道，如果贾不忠于大王，四国诸侯交结贾一人有何用？当年夏桀听信谗言诛杀良将关龙逢，商纣听信谗言杀王子比干，终于身死国亡，如今大王若听信谗言，也就不会有忠臣了。”

秦王又问：“有人说你是监门之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对此你有解释？”姚贾说：“太公望吕尚，当年入赘齐国被老妻逐出，在朝歌售肉又赔本，后来又被子良驱逐，在孟津钓鱼，鱼也不上

钩，想做佣又无人雇用，这样的人却辅佐武王取得天下。齐国贤臣管仲，曾在鄙人作买卖，在南阳贫困潦倒，未死于公子纠之难，被鲁国押往齐国，齐桓公任用他而霸天下。百里奚，在虞国不受重用，曾以五张羊皮身价被卖为媵，秦穆公用他而霸西戎。晋文公用中山盗而在城濮大胜楚国。以上几人都有世人皆知的不光彩历史，然而明智之君用之而称霸天下。如果这些人像卞随、务光、申屠狄等人那么清高无瑕，恐怕也不能为人主所用了。因此贤明的君主用人之时，只应仔细察其能，并使之为自己所用，而不应只拘于其历史。对那些虽有高世之名，却无尺寸之功的人不必行赏。这样，群臣就会去掉顾虑，尽心尽责，建勋立功，不敢企图以虚名博取封赏。”

姚贾的能言巧辩终于说服了秦王，秦王竟认为姚贾为贤、韩非为谮，彻底失掉了对韩非的好感。姚贾认为时机已到，便与丞相李斯共谋，开始设毒计，谋害韩非。

此时的李斯早已将同师之谊抛在一边，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成为谋害韩非的主要杀手。一日，李斯乘机对秦王诋毁韩非：“大王，韩非是韩国宗室子弟，必定忠于韩国。如今大王要吞并诸侯而王天下，大王断断不可用他，韩非人在秦国，心在韩国，行事只会为韩不会为秦，大王不用他，不如将他杀掉，如遣还韩国，只能是自留其祸。”

姚贾、李斯二人的此呼彼应，使秦王深信不疑，于是立即罗织罪名，将韩非逮捕下狱。韩非无辜被拘，成为阶下囚，他曾多次想向秦王申诉，都被李斯之流阻挠，终未如愿。这时，李斯又命人端来药酒。强令韩非喝下，这样，一代宗师就含冤死于奸人之手。后来，秦王政冷静下来，爱惜韩非之才，忙派人去赦免韩非之罪，却为时已晚。

对于韩非之死，太史公司马迁感慨万端。韩非在《说难》中对进说之难了解得那么完备，对进说之术解释得那么周详，而他

本人却终因进说而死，这正说明韩非虽然是个理论天才，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却无任何实际经验，因此他被政治老手姚贾、李斯等迫害致死，并不足为奇。

韩非虽死，但他的著作却代代流传。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却为有秦一代统治者所接受，成为秦王建立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大帝国的理论基础。

韩非之学的价值在于他吸收总结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成果，继承了早期法家的“法”、“术”、“势”的理论，使之形成一整套适应时势的政治主张，不仅对当时，甚至对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之学的实质是一种纯粹的君主独裁理论，即“帝王之学”，其核心就是法、术、势、兼治的君主专制论。

韩非认真研究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总结出在战国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君主巩固自己地位的种种措施和手段，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对前代法家思想兼容并蓄，吸收其合理成分，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构成了法家理论的完整体系，成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首先吸收了商鞅实行法制的主张。他认为，法应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公开向民众公布，以便臣民以此作为行为准则。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却不受法律的制裁。很明显，韩非提倡的法，实质上只不过是君主凌驾万民，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韩非又论证了当今社会实行法治的必然性并提出制定法律应遵循的原则。韩非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观点，认为人之生都有趋利避害之心，欲望无穷，为了约束人性之恶，必须制定一个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而战国社会的时代特点也要求实行法治，先前那种提倡德治、礼治的温和政策已难以治理当时的急世之民，因此推行法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韩非认为，实行法制应掌握以下几个原则：首先，立法时要充分考虑其实际效应，利大于弊时，才可以制定实行。二、立法要因时制宜，适应时势的需要，古代用名教，今世行法制，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只是不同时代的需要。三、法令必须统一且具有一个时期的稳定性，绝对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人们无所适从，奸人也会有可乘之机。四、法令必须清楚明白，便于人们了解掌握，遵照执行。五、制定法令必须掌握厚赏重罚、重刑少赏的原则，使法真正起到惩恶扬善的目的。人们慑于法律，才能遵纪守法，从而使国家安定、太平，如果处罚轻微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伤民。

韩非还提倡普及法律知识，以吏为师，严明法令，使人人懂法。执法时，臣民一视同仁，法不阿贵，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除了万夫之上的君主，一切人只要犯法都要接受处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这一主张打破了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的贵族特权，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法制时代。在《内储说上》等篇章中，韩非列举了许多信赏必罚的事例：

春秋之时，郑国名相子产将死，对继位者游吉叮嘱道：执政后，一定要实行重罚。法如同火，人们畏之便很少烧伤。而水貌似懦弱，因此很多人溺水而死，因此只有实行严厉的法律，才可使百姓免于犯罪。子产死后，游吉不忍严治，结果郑国人相率为盗，最后动用了军队，才最后剿灭，这时游吉才后悔不已。

殷法严酷，规定弃灰于路者处以断手之刑。子贡听说后，觉得以弃灰的区区小过，处以断手重刑，太过分了，就去请教老师孔子。孔子道：弃灰于路必然粉尘飞扬，过路之人必然不满，双方容易发生争执，争斗中双方亲族再参加进去，危害就大了，因此处以重罚，并不为过，而且不弃灰很容易做到，重刑又令人畏惧，这样，人们反而不容易犯罪了。

吴起为魏西河守之时，秦国边界上有一小亭，吴起想拔掉它，又担心攻不克，为振奋士气，吴起令人放一车辕在北门之外，宣

称有能将其移至南门者，赐上田上宅，果不食言。不久又置一石于东门之外，称有能移之者，厚赏如前。于是人们争相搬运。这时，吴起宣布，明日攻小亭，先登上者，封大夫，赐良田良宅。第二天，人们勇猛无比，拼死向前冲，一下子就将小亭拔掉了。

除了法以外，韩非还吸收了申不害“术”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

术即统治术、权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和心计。术与法恰恰相反，不能公之于众，只能藏于心中，因此它比法要玄妙复杂得多，变幻莫测，不可捉摸，因此君主更要在这一方面下些功夫。

韩非提倡法制，又提倡术治，源于他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他认为臣与君无有骨肉之亲，只是慑于权势不得不小心侍奉君主，二人的根本利益绝不一致，因此君对臣只可使用，决不可轻信，正因如此，才有不少劫君弑主之事发生。韩非认为，君主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要信任，包括妻子、儿子在内，臣下就更不可相信了。这些人不怀好心，表面上恭顺，实际上居心叵测，时刻窥测动向，伺机篡夺君主的权力。君主必须掌握“术”，才能威临天下，驾驭群臣使其只能听命效力，不敢恣意妄为。

韩非在著作中详尽地罗列了君主驾驭臣下的计谋和各种各样的手段。这些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即君主对臣下的考核和任用，另一类即为搞阴谋权术，包括各种防奸治奸的手段，这些内容在作品中有极详密的论述。

君主对臣下的考核又叫形名术或刑名术，是术中最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也最为重要，在《主道》、《二柄》、《扬权》等许多篇章中都有论述，因此司马迁称韩非喜刑名之学。

刑名同形名，形指事物的外在形态，名则指事物的名称，一切事物有形又有名，形是名的实际内容，名是形的称呼，要求事物形名相符的做法就是刑名术。

关于事物的形名含义十分广泛。例如，在言论方面，形名术认为如果言论为名，那么其行动就是形，言行必须一致；如果法令为名，那么具体行为就是形，行动必须合法。赏罚为名功罪即为形，赏罚与功罪必须相合；职位为名，政绩就是形，职位与政绩必相符。形名术包罗万象，它将君主胸中的智谋转化为较为公开的行为准则。这种术实际为法制思想的延伸，君以名来督促臣下努力工作，以求实效。韩非的形名术不同于儒家。孔子主张先要正名，名正则言顺，韩非则主张正实，以名为标准，以求名实相符。

刑名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君主要时时用臣下的言论衡量其行动，用臣下的职位去考核其职权与政绩，要求官吏们各司其职，不可失职，亦不可越权，否则都要被罚。韩昭侯时，善用权术。一次，昭侯酒醉睡着了，这时管帽子的官吏典冠怕昭侯受凉，便给他盖了件衣服。昭侯醒后，问左右盖衣者何人？众人道：典冠。于是昭侯将典衣、典冠二人统统处罚。典衣受罚是因失职，典冠受罚是因越权。因此对于官吏们来说，韩非的刑名术是相当苛刻的，当官不谋其政不行，越权立功也不行，刑名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约束群臣的言行规范，使之不敢妄言妄行，成为君主的驯服工具。正由于韩非的刑名术过于教条、苛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真正实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它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他反对臣下讲大话、说假话，提倡实事求是的政风，二是他比较注重实际，给赏罚提供了较为公平的依据，使形名术成为考核臣下的较为客观公允的办法，较之以君主好恶为准更具有合理性。韩非之所以极力提倡形名术，在于他认为君主实施形名术，赏罚就会比较合理，这样赏优罚劣，臣就会忠心效力，这样国家就会强大，因此形名术是富国的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术。

除形名术之外，君主还应讲求用人之术，如果君主手段高明，有时甚至会比刑名术更有效果。首先，君要慧眼识人，选择任用

对君主忠心耿耿，死心塌地效命，又有治国之才的人。在择人问题上，君主要有主见，不听他人的毁誉，不区别贵贱，依法选择人才。即使伯乐推荐了千里马，也不可盲目相信，一定要骑上它跑一跑，这样认真核实，群臣就不敢讲假话了。

为了杜绝臣下擅权，韩非提倡一人一职一事，不要兼职兼事，反对权力过于集中，使大权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君臣利益不同，臣为君所用，主要因为君掌握了权势，这些人常常伺机攫取权力，君若无术防奸治奸，就会被奸臣劫杀。因此韩非为君主设计了许多察奸、防奸的手段。

首先，君要兼听，不偏听，做到兼听则明，以便做出正确决定。再有，有时不妨耍个小手段，以考察臣下的智慧与忠诚。比如故意说错话，来试探臣下。子之相燕时，坐在堂上忽然发问：刚刚走过的是一匹白马吗？左右的人都说没看见，这时有一臣追到门外，看了回来回答：是有一匹白马。于是子之便知臣下的诚实与否。再如韩昭侯时，一日派亲信出门办事，亲信回来后，昭侯便问他在外边看见了什么，使者道：没有什么，只看见一只黄犊在道左田中吃苗。于是昭侯令此人严守秘密，同时下令禁止牛马吃禾苗，并让地方官吏自查举报，否则处以重罪。于是地方皆上报情况，昭侯看了后说：还有。官吏只得复查，终于发现那吃苗的黄犊，众人皆以为昭侯神明，明察秋毫。从此，人人畏惧，不敢胡为，这就叫明知故问，震慑臣下。三要奖励告奸，必要时辅之以重罚厚赏。同时要惩治匿奸。在《八奸》中，韩非归纳了八种奸行，这些奸人往往是君主的亲近之人，如夫人、父兄、近臣，对这些人除了信赏尽能、尽罚明威之外，有时还就应该让他们作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让他们摸不透君主的用意，也就不能投其所好，这叫做“疑诏诡使”。韩非在这方面的主张与申不害的说法基本一致，申不害提倡君主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让臣下摸不透君主的心思，也就无法为奸。

韩非对权术所作的赤裸裸的描述，在古今中外的著作中都是罕见的。面对这些，我们不能不钦佩韩非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也说明当时残酷的政风人情。正面揭露，较之掩盖事实，粉饰太平，要客观得多。

除了法、术之外，韩非还要求君主讲求“势”。势即指威势或权势，即统治地位，君主只有利用自己有利地位，牢牢抓住统治权，才能驾驭臣下。统治万民。“势”最先由早期法家慎到倡导，韩非继承慎到关于势治的主张，并将这种权势之术推向极端。他认为，民众绝大多数只臣服于威势，极少有人能服于仁义。即使像孔子这样公认的德才之士，也只能臣服于有权势的鲁哀公。

正因为权势如此至关重要，因此韩非告诫君主绝不可将权势借人使用，或与他人共享，更要防止臣下篡夺权力，时刻不忘保持君主唯我独尊的地位。

韩非认为，法治、术治、势治缺一不可，三者并存，君主专制独裁便会巩固。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君主专制独裁，一切以君为本，君权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不可非议，更不受法律制约。建立一个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超五帝、侔三王的统一的君主专制独裁的大帝国是韩非的政治理想，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使得秦王如获至宝。

韩非是公认的法家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是战国时期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及动荡的社会现实的产物，融铸了经他深刻反思的先秦各家思想，所以其内涵才如此丰富多采，五光十色。

司马迁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思想吸收了老子的学说，并对老子有相当深刻的研究，《解老》、《喻老》篇便是解释老子思想、借用历史故事来阐发老子思想的作品，只不过他已对老子的学说进行了改造。例如老子的“道”，本来指一种先于物质存在的精神实体，是产生万物天地的根源，而韩非所谓的道指的却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和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

老子的“虚静”主张一种放任态度，提倡君主无为而治，民自正其行，反对法治。韩非虽然也主张君主在表面上无所作为，实际却处处留心，无为而无所不为，在法制的限度之内，民众可以自为。因此韩非思想出于老子而又不同于老子，将老子的避世主张改造成为积极进取的入世学说。

韩非的这一整套完整的君主专制政治理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加速了贵族政治的崩溃和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他的思想不仅主宰了有秦一代，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韩非的思想，丰富复杂，有利有弊。自古至今，人们对其褒贬不一。辩证地看，韩非思想确有种种缺陷，如他的尊君抑民思想，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禁止臣民有自己的意志，绝对不提倡民主。同时将君臣关系对立起来，将一切人格异化，必将使本已十分残酷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秦统一六国，建立大帝国，得力于韩非的理论，而其迅速灭亡，韩非又难逃其咎。另外，韩非过分片而强调严刑峻法，反对道德教育，亦未免失之偏颇。

但是，韩非对中国历史所做的巨大贡献，却无人可以否定。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化的历史观，注重实际的社会观以及他的法治思想、改革主张都有其宝贵的价值。因此，韩非之学不仅主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至今仍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列传》。

《韩非子》

《战国策、韩策》

荆轲刺秦王

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一个个被打得落花流水，毫无反击招架之功，唯有秦国越战越强，尤其是秦王政继位以后，叱咤风云，雄姿英发，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秦国首先拿韩国开刀。一则六国之中韩最弱小，二则秦一向视韩为心腹之患，灭掉韩国方可解除顾虑，大胆东进，所以，尽管韩非上书秦王的《存韩》篇写得洋洋洒洒，有理有据，也难以改变秦王的意志。

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派内史腾灭韩，次年虏韩王安，韩国亡。

秦王政十八年，秦国开始大举攻赵。秦将王翦、杨端率军分别攻赵，赵派大将李牧、司马尚迎击，顽强抵抗，秦军一时无法取胜，于是，又使出反间计，诬陷李牧、司马尚，赵王中计，杀李牧，自毁长城，并以赵忽为主将。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人之境，十月，王翦大破赵忽，入邯郸，俘赵王迁，赵国亦亡。

秦灭赵后，兵临易水，虎视眈眈，直逼燕国，燕国举国惊恐。燕国居于北部边陲，一直比较弱小，很少参与中原各国混战，尤其是子之之乱时，齐国乘机入侵，燕几于亡国，元气大伤，因此燕国从来都不是秦国的敌手。此时，秦军兵临易水，亡国之祸旦暮可至，燕王喜君臣不由得忧惧万分，难有良策。

燕太子名丹，其人智勇深沉。丹儿时曾入赵为质，而秦王政生于赵国，二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十分友好。后来，太子丹归燕，

秦王政入秦，二人才分手。不久，秦王政立为王，骄横暴虐的性格逐渐形成。及至秦燕二国结盟，太子丹作为人质来到咸阳，满心指望秦王念故友之谊，得到好生款待。哪知，此时的秦王政早已变成一个冷峻的暴君，他自恃强大，鄙视燕国，他视太子丹如藩臣，言语行为多有欺凌，早已忘却了旧时的友情，因此太子丹对秦王心怀怨望，伺机潜逃。燕王喜二十三年（前232），太子丹成功地离秦归国，秦国之辱刻骨铭心，他日夜思报此仇。但是，此时的孱燕对强秦，正面对抗犹如以卵击石，太子之心，一时难以如愿。

此时秦祸相逼，满朝惊恐。太子丹眼见不仅报仇无望，且亡国在即，愁肠百转，终无良策，为此，他去讨教太傅鞠武。鞠武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很受太子丹敬重。鞠武道："秦国国强地广，势逼韩、赵、魏三国，北有甘泉山、谷口的险固，南有泾、渭流域千里沃野，巴、汉两地的富饶之乡，右有陇、蜀之山，左有关、殽之险，人口众多，士兵善战，兵甲充裕。秦国有天时、地利之优势，因此，只要意有所指，长城以南、易水以北无人可阻止其擅行其事。如此强秦，断不可招惹，太子为什么仅仅因为枝节小事来触怒暴秦？"太子道："那现在如何是好？"鞠武道："请臣进一步考虑，答复太子。"

不久，秦国将军樊于期，因事得罪了秦王，逃奔燕国，太子丹收留了他。鞠武闻知，极力劝阻："太子万不可收留樊于期。秦国对燕积怨已久，足已令人心惊胆战，此时如再收留秦国叛将，必会激怒秦王，灾祸马上就到，无人可救，事情如果到此地步，虽管子、晏子再生，也无计可施了。因此，臣建议太子速送樊将军入匈奴以杜绝秦口，尔后再西约三晋，南联齐、楚，北方与匈奴媾和，万事俱备，燕国的安全方可保障。"

太子道："老师所言极是。但此法虽好，恐旷日持久，解不了今日燃眉之急。不仅如此，樊将军孤苦无依才投奔于我，我无法

因秦的威逼而置朋友于不顾，使其沦于蛮夷之手，丹虽死不敢从命，望师傅另加考虑。”

鞠武见太子至死不肯送走樊将军，叹息道："人在危险中企望平安，遇祸企求祥福。太子如今不忘秦怨，只图眼前，为了一个人，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这样做，真真是触秦的逆鳞，加速灾患，燕于秦就如同将鸿毛置于炉炭上，必不可救药。一旦秦国逞怨暴之怒，肆行暴虐，臣是无计可施了。臣闻国人田光先生，为人大智大勇，太子可与其谋划对策。”太子道："请先生代为介绍结识田光先生。”

鞠武出见田光，告知太子有事相求，田光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鞠武带领田光亲至太子宫中相见。太子亲自到门外相迎，并在前恭敬地倒行领路。入宫之后，亲自跪着拂拭坐席。待田光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便离席向前深施一礼，请求道："燕、秦两国势不两立，今日秦祸在即，先生可有什么高见？”田光道："臣听说千里马盛壮之时，日行千里，而一旦年老体衰，劣等马也比它快得多。如今太子对臣抱以厚望，是只知臣壮年之时，不知现在。如今臣年老体弱，精力消亡，不敢图谋大事。不过，臣门下有一名荆轲的义士，有胆有识，可与太子谋划大事。”太于便要求田光引荐与荆轲相识。田光爽快地答应后，慢腾腾走出厅堂，太子送出大门外，并叮嘱田光道："刚才丹与先生所言，都是国家机密，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田光微笑答应了。

田光先生所言荆轲，祖先为齐国人，后来徙居卫国，卫人称之为庆卿，入燕后，因荆、庆音相近，燕人称之为荆卿。

荆轲喜爱读书、击剑，有政治抱负，为人智勇深沉，重侠义，曾以术游说卫元君，但不为卫君所用，于是游历各国。

荆轲曾游历至榆次，与名士盖摄论试剑法，二人言语不投机，盖摄以眼怒视荆轲。荆轲出去后，有人建议盖摄召回荆轲。盖摄道："从前凡与我论剑言语不投的人，经我怒视之后，不敢再留在

这里。你可以去试一试，荆轲此时多半离开了。”于是盖摄派人去荆轲居处，果然不出所料，荆轲已经离开榆次了。

荆轲游历到邯郸，与鲁句践争斗，鲁句践怒而叱责荆轲，荆轲逃去，从此不再与之会面。

荆轲入燕之后，与狗屠及高渐离为友。高渐离乃击筑高手，名冠一时。荆轲侠气豪壮，嗜酒如命，常与狗屠及渐离畅饮于市，酒醉之后，渐离乘兴击筑，荆轲相和而歌于市中，始而相乐既而二人相泣，随心而欲，旁若无人。荆轲虽混迹于酒徒之中，但与一般酒徒又绝不相同，其为人深沉好读书，有胆有识，且游历诸侯各国，不仅见多识广，且尽与当地贤人豪士长者相交结。在燕国，名士田光先生知荆轲并非庸人，对他亦十分敬重，好生款待。

田光弯腰驼背出见荆轲道：“光与卿二人相善，燕国无人不晓。如今秦祸在即，太子向老臣求计，臣年老智衰，已无此能。老臣难以辜负太子之望，便向太子推荐了先生，太子允诺，现在请先生人太子之宫，共商救国大计。”荆轲慨然应允。田光又道：“臣闻人言，长者之行，不能使人生疑，刚才太子与老臣告别时告诫国家机密，不可向外人泄露，表明太子对臣不放心。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使旁人生疑，就不是有义气的人。愿先生马上入宫晋见太子，告诉太子田光已死，再不会泄露太子之言。”语罢，田光即自刎而死，以激励荆轲。

荆轲人宫面见太子，转达了田光之言，并告之田光如今已死。太子闻言大惊，懊悔不已，痛哭流涕，再拜膝行。过了许久，太子平息下来，对荆轲道：“丹主要是为了成就大事，才告诫田光先生勿泄给外人。如今先生因丹之言而死，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

荆轲坐定后，太子离席顿首道：“丹有幸面识田光先生，聆听教诲，这正是上天哀怜燕国而不遗弃丹的缘故。如今秦国贪求利益，欲壑难填，不占尽天下之地，臣服海内诸侯，决不满足。如今秦国已掳韩王，灭韩国，且举兵南向伐楚，北临赵国。秦将王

翦率几十万军队驻拒漳邺，李信率军出击太原、云中。赵国力不能支，必然入地称臣，赵国降秦，则灭国之祸马上降临燕国。燕国小且弱，再经几次兵败的打击，不堪一击，倾全国兵力无以抵挡秦国。而今诸侯皆臣服强秦，无人敢再行合纵之事，依丹之见，现在若保全燕国，只有一法可行，如果能得一天下之勇士出使秦国，以重利诱，力图接近，伺机劫持秦王。如果成功，一定迫使他全部返还侵吞掉的各国土地，不行的话，就干脆将他刺杀，造成混乱。这样，秦国大将率重军于外而国内乱，必君臣相疑，打乱秦的战略部署。丹再乘秦内乱之机，串联各国诸侯联合合纵抗秦，则秦国必破，这是丹的心愿，只是至今不知何人可担此重任，恳请先生留意可用之人。”荆轲闻太子之言，沉思良久，开口道："此乃国之大事，燕之存亡，在此一举，臣愚钝无能，恐怕不足以担此大任。”

太子马上趋步上前，再次顿首道："请先生勿要辞让，此事非先生不可。”于是荆轲点头相许。

于是，太子尊荆轲为上客，留居宫中。太子日日登门拜访，珍肴美味，珍奇宝物，日日进献，车骑美女，尽随荆轲所欲，以顺其意。

过了许多天，荆轲并无出发入秦的意向。这时，秦将王翦破赵，俘赵王嘉，尽吞赵国之地。继而大军向北挺进，直至燕国南部边界，虎视眈眈。太子丹沉不住气了，上门请求荆轲马上行事："秦兵马上就要渡过易水河了，时间紧迫，丹虽想长期服侍足下，已无时间，请先生马上入秦行事。”荆轲答："臣正准备谒见太子。臣入秦而无信物进见，恐难以取信，难以接近秦王。现在秦王悬赏千金，邑万家，捉拿樊将军，臣如得樊将军首级及燕国督亢的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然大悦而接见臣下，臣可乘机靠近秦王，相机行事，以死报效太子知遇之恩。”太子不忍杀害无辜的樊于期，拒绝了荆轲的建议："樊将军穷困无依投奔于此，丹怎么忍心以自

己的私怨伤害将军，请先生再作考虑。”

荆轲知太子重朋友情谊，断不会同意杀掉樊将军作进见礼，于是私自拜见樊将军，对将军道：“将军对秦国的仇恨一定很深了，将军的父母宗族都被秦国所杀，如今秦王又悬赏千金、邑万家求购将军的头，现在不知将军准备怎么办？”将军仰天长叹，泪流满面道：“于期每念至此，常常痛入骨髓，只是不知此仇如何得报！”荆轲道：“今日臣有一计，一可解燕国之患，二可报将军之仇。”樊于期一听，忙上前问计，荆轲道：“臣应太子之请，即将入秦，如能得将军首级进献秦王，秦王必然大喜面见臣下，臣借机接近秦王，左手抓秦王衣袖，右手以剑刺其胸，事情成功，不但将军之仇得报，太子之恨也得消，只是不知将军意下如何？”于期将军并不吃惊，左手扼右腕道：“只要能杀秦王，报臣的日夜切齿之恨，臣死而无怨，幸蒙先生指教！”言罢，立刻自刎而死。

太子闻将军自杀，忙奔入宫中，悲哀至极，抚尸恸哭，然面入死不可复生，只好命人将樊将军首级用木匣装殓，交与荆轲，作为进献秦王之资。

同时太子又秘密征求天下的锋利匕首一把，又用百金收买工匠以毒药染刀锷，其刀刃又锋利无比，以此匕首试之于入，中者无不立死。武器选好后，又在国中搜求勇士，结果一个叫秦舞阳的勇士被选中，据说他十三岁时就杀过入，胆大如虎，人入畏惧。太子令秦舞阳做荆轲的副手，并着手为荆轲准备行装。荆轲欲邀友入同往，因其人未到，没有动身。太子见荆轲迟迟不出发，以为他反悔了，便来催促荆轲二入道：“时间已不多了，荆卿何日准备出发？不行的话，丹请求先派秦舞阳入秦。”荆轲早明白太子的用意，心中恼怒，叱道：“不用太子催促。我们至今不出发，是在等着朋友同去。既然太子以为太迟，臣就此辞别出发。”

因为荆轲此行不论成功与否，断难生还，出发之时，太子及宾客们凡知此事者都换上白衣、白帽为之送行。人们来到易水之

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慷慨，众人初闻皆垂泪涕泣，既而瞋目振作，怒发冲冠，歌罢荆轲上车而去，终不回顾。

燕王喜二十八年（前 227），荆轲一行来到秦国。荆轲先以价值千金的厚礼贿赂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收受礼物后，对秦王道："燕王敬畏大王之威，不敢以兵相向，愿举国为秦国之臣，望大王给燕王一条生路，以奉先王之宗庙。燕王恐惧大王之威，不敢自陈其意，谨斩樊于期的头，并献上燕国富饶地区督亢的地图，派使节拜送于王庭，唯大王之令是听。"秦王闻言果然大喜，下令设九宾，着朝服，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臣。

到会见之日，荆轲手捧装樊将军人头的木匣，副使秦舞阳手捧地图木匣跟从在后，依次而进。二人刚行至宫前台阶处，秦舞阳慑于秦王的声威，过度紧张，竟惊恐得颜色大变，满朝文武皆为燕使的失态惶惑不解。唯有荆轲不慌不忙，回首看看秦舞阳，从容向秦王谢罪："臣乃北方蛮夷人，未曾见过天子，因而不胜惶恐，请大王不要怪罪。"秦王见荆轲自然从容，疑心顿消，忙对荆轲道："请取舞阳所持地图。"荆轲奉上图卷，秦王接图细细翻看，荆轲在旁指点讲解，乘机靠近秦王，翻到最后，图穷匕首见，只见这匕首寒光闪闪，森气逼人，秦王一下子被惊呆，荆轲速将匕首抓在手中，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匕首直抵秦王前胸。秦王大惊失色，忙起身逃脱，一下子扯断了衣袖，因此荆轲匕首未中秦王之身。秦王忙拔佩剑自卫，心慌手颤，一时拔不出来，只好跳下宝座，脱身逃命，荆轲手持匕首紧追不舍，秦王靠着庭柱的掩护，逃避荆轲的追杀。事发突然，满朝文武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秦国法律为了保障君主的人身安全，规定殿上群臣随身不得佩带武器，而带着武器的秦王亲兵都列队殿下，不得王命不得上殿，此时卫兵们并不知殿上发生了什么事，而满朝官员又无法救助，故而荆轲便在朝官们的惊愕之中，与秦王二人追逐殿上。正巧，秦

王御医夏无且随侍殿上，手中持有一药袋，情急之下，夏无且以药袋掷荆轲，荆轲躲闪之间，秦王赢得了时间，在众人的提醒下，一下子抽出剑来，回身以剑反击，荆轲未加提防，一下子被刺中左腿，瘫坐地上。荆轲不甘心，再以手中匕首投掷秦王，未中。秦王走过来，以剑狠狠再刺，荆轲身上八处受伤。荆轲知大事难以成功，非但毫无惧色，反而倚柱大笑："此次大事所以不成，错在开始欲生劫秦王，定了契约，以报效太子。"这时殿下侍卫得令，一拥而上，尽杀荆轲及舞阳，一场风波方告平息，秦王遭此暗算，心情久久不愉快。

事后，秦王论功行赏，赏罚严明。秦王感念御医夏无且在紧要关头立大功，赏金二百镒，并说无且以药袋掷荆轲，对王最忠实。

燕太子丹派人行刺之举，激怒了秦王，秦王政立即增援军队进入赵国故地，并下令大将王翦率军伐燕。燕王喜二十九年十月，拔燕都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率精兵东逃辽东以自保。秦将李信率军穷追不舍。这时赵代王嘉派人送信给燕王喜，信中道："秦军紧追不舍，主要是因为太子丹的缘故。王如能杀太子丹并献其头于秦王，秦王必能解燕之危急，燕国社稷江山才可得以保存。"

果然，李信军紧追太子丹不舍，太子丹只好藏身于水中。燕王喜被秦王追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只好忍痛派人杀掉太子丹，将其头函封献于秦王，秦军的追击才暂且停止。五年以后，即燕王喜三十三年，秦军大举攻燕，虏燕王喜，燕国灭亡。

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统一天下，秦王自号为始皇帝。为报当年之恨，秦始皇下令杀害、追捕、驱逐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徒，许多人为避杀身之祸远走他乡，更名换姓，隐匿民间。荆轲密友高渐离为保性命，换名改服，藏身宋子城（今河北赵县东北），为人作佣。工作虽异常辛苦，但对音乐的酷爱却使渐离不能久甘寂寞，时间一长，每闻主人堂上有人击筑，渐离常留连不肯离去，忍不

住要品评几句，竟头头是道，令对方口服心服。久之，主人知自己这个雇工不平凡，懂音乐，是行家里手，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一日主人家会宾朋，便召渐离前来击筑助兴，一曲未终，赢得满堂喝彩。渐离触景生情，想如今隐姓埋名，自甘卑贱，不禁感慨万端。他退回自己房中，取出自己心爱的筑和旧时衣冠，穿戴齐整后出现在众人面前，一时举座皆惊，主人慌忙谢罪，力邀渐离就上座。渐离也不推辞，从容就座，击筑而歌，歌声慷慨悲怆，亡国之恨尽在其中，闻者莫不流涕而去。城中人闻之，争相请渐离至家中击筑作歌，渐离名声远扬。

宋子城出一击筑高手的消息渐渐传到始皇耳中。始皇喜爱音乐，马上下令诏见乐手。渐离接旨入宫，朝臣中有人认识他，忙向始皇报告其人叫高渐离，是荆轲的死党，建议将渐离逮捕处死。始皇惜其才，下令赦免其罪。然面为防止意外，始皇令人将渐离双目熏瞎，令为宫廷乐师，其乐之美无人不赞。始皇对渐离之才极为欣赏，常命令他一人人室演奏，时间一久，始皇渐渐对渐离放松警惕，越加亲近起来。渐离却时刻不忘为国、为友复仇，见时机已到，便在筑中暗暗灌了许多铅，乘始皇沉醉于乐声，临近他时，便突然举筑击秦皇，可惜眼瞎看不见，没有击中，始皇大怒，立即下令诛杀渐离。从此以后，终身不再接近与旧诸侯有关的人。渐离之死，闻者莫不感其义。

鲁句践闻听荆轲刺秦王失败，暗自叹道："可惜荆轲剑术不精！当年我与他二人下棋，我叱责荆轲，他便离去，我原以为他惧怕而去，现在想来，他必定认为我是无法交结的人，我真是有眼不识真人！"

在战国时期史载有名的刺客中，唯有壮士荆轲的事迹最为感人。虽同为刺客，荆轲的行动远远超出了专诸、聂政等人行刺完全出于个人恩怨的做法，具有舍生忘死、见义勇为、反侵略、反强暴的积极意义。虽然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秦统一六国有进步

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当时各国不应进行任何抵抗，自甘灭亡。在一个国家行将灭亡，山穷水尽之际，一群爱国志士不甘为虏，奋起抗争，虽然不能挽救危局，不免于失败，但其气节感人，事迹可歌可泣，千古流芳。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刺客列传》、《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

《战国策》：《燕策》、《秦策》。

王翦灭赵楚

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死，他的儿子——一位十三岁的少年登上秦王的宝座，他姓嬴名政，就是后来赫赫威名的秦始皇。秦王政继位之时，秦已南并巴蜀、汉中、楚郢，设置了南郡，北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灭东西二周，国土扩展到荥阳，设置了三川郡，秦国军事实力已雄踞于东方各国之上。

秦王政亲政之后，诛嫪毒、吕不韦集团，夺回了君权，同时对内广招人才、任人唯贤，对外继续执行昭襄王后期制定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剿抚结合，东征西讨，加快了统一的步伐。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秦将统一战争的第一个目标指向韩国。韩国在七国中本来就最弱小，又加之秦国几十年的攻伐蚕食，早沦为秦国的附庸，因此，秦灭韩如囊中取物一般。这一年，秦王派内史腾攻韩，虏韩王安，尽纳其地，设颍川郡，灭掉了多年的心腹之患。灭韩后，秦又将第二个目标指向赵国。赵国本是军事强国，但长平一战元气大伤，又加之与邻国燕多年相互攻伐，国力削弱，但赵终究不失为大国，因此秦灭赵的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

秦王政十八年，秦派名将王翦率大军攻赵。王翦，秦频阳东乡人（今陕西富平东北），自幼好兵，被秦王政任用为将领，为秦国东征西讨，多有功勋，为战国著名军事将领之一。

王翦曾率军多次攻赵，秦王政十一年，王翦曾率军攻打赵国阏与，大破赵军，拔九城。

此时的赵国力不振，与燕交战数年，两败俱伤，秦国渔翁得利，乘隙而入，蚕食赵地，赵已无抗秦之力。加之此时当政的赵王迁，素无德行，昏庸无能，国内政治一团糟，迁的母亲本为娼妓，只因有宠于悼襄王，便蛊惑悼襄王废掉嫡子嘉而立迁为太子。赵王迁听信谗言，奸佞当道，排斥贤才，致使赵国内忧外患，势在必亡，然而秦灭赵并不顺利，主要原因就是赵国还有一位大将李牧。

李牧，亦为战国时期一代名将，有勇有谋。早年曾驻守赵国北疆，常年率军驻扎雁门关以防备匈奴入侵。李牧为政清廉，将驻地所收租赋全部存入库府，作为军费开支，并勤于军政，监督士兵每日训练，学习射骑，并加强烽火的管理。同时又多派耳目刺探匈奴方面的军情，每日都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兵，令战士们养精蓄锐。这时，李牧在军中下令：如果匈奴入侵，必须马上收兵自保，有敢与匈奴交战者，斩。所以每当匈奴入侵，赵兵都马上收兵入营垒自保，不敢与之交战，如此这般几年的光景，李牧既无辉煌战绩，也未失掉土地。然而时间久了，匈奴方面的人便认为李牧是胆小鬼，赵兵也认为主将怯战，为此赵王曾责怪过李牧，但李牧依然我行我素，最后，赵王终于震怒，将李牧免职召回，以别人为守将。

此后一年多，每次匈奴入侵，赵兵都积极出兵交战，可是几次都败于匈奴，土地财产多有亡失，边境人民也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李牧的做法自有他的一番道理。赵王无奈，只好请求李牧再次出山。李牧自称患病，杜门不出，赵王强令李牧出任将领，李牧推辞不过，要求道："大王如果一定要用臣，请允许臣继续以前的做法，方敢受命。"赵王满口答应。

李牧至北方，对匈奴的政策如前，几年来匈奴入侵，无有所得。但匈奴人和赵国军将仍以为李牧胆怯。一次，匈奴大股入侵，无恶不作，赵军将士群情激昂，皆表示宁愿不要犒赏，也要与匈

奴决一死战。李牧见军心可用，便选战车一千三百乘，军骑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射手十万人，设下重围。李牧乘一次匈奴小股人侵骚扰之机，派几千人与之交战，之后佯败退走。匈奴单于麻痹轻敌，闻听赵军败，立即派大股军队急追，结果落人赵军的罗网之中。这时李牧纵奇兵，左右夹击，大败匈奴军，斩杀十几万骑，灭襜褴族，破东胡、降林胡，匈奴单于仓皇逃走。自此之后，匈奴心有余悸，十几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

赵悼襄王元年（前244），大将廉颇流亡魏国，赵王任李牧为将军攻燕，拔武遂、方城。几年后，秦与赵在武遂交战，杀赵将扈辄，赵以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大败秦军，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李牧驰骋疆场，多次战胜秦军，成为秦克赵的一大障碍。

秦王政十八年，派王翦率大军攻赵，赵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李牧战斗经验丰富，有谋略，与王翦棋逢对手，秦军一时难以取胜，秦王深以李牧为忌。于是秦决定再次使惯用的反间计，借赵王之手除掉李牧。

这时，因吕不韦事发，其下属司空马避祸逃入赵国，被封了个小官。司空马自然不满意这个职位，于是他游说赵王，想受重用。他对赵王说："文信侯相秦时，臣为丞相的尚书。深知秦国的内幕。现在假如秦赵二国交战，不知谁败谁胜。现在请问大王，赵与秦哪个大？民众哪个多？哪个国家金钱粮草更充足？哪个国内更安定？哪国丞相贤明？哪国将领更英武？哪个国家政令更明？"对此问题赵王皆答不如秦国。于是司空马道："现在大王之国，处处不如秦国，两国交战，大王之国必亡。"赵王一听，担忧起来，忙向司空马讨教救国之策。司空马道："如果大王分一半国土给秦国，秦国必然接受，秦不废吹灰之力得半个赵国，必然大悦而受地却兵。秦国受赵地而实力增强，山东各国必然惊恐，唇亡齿寒，诸侯们必然惧而救赵，于是合纵之事乃成。这样，大王虽然名义上亡赵一半，实得山东各国支持以抗秦，秦国就有可能不足抵抗

而亡。”

赵王一听司空马的馊主意，不免十分失望，回答道：“前日秦攻赵，赵国贿以河间十二县，仍不免于秦祸，如果今又割国之一半，赵国力不能生存，这是亡国之计，望君再想一个好办法。”

司空马又道：“臣本为秦刀笔吏，未尝领兵作战，请大王任臣为将，与秦军交战。”赵王无法同意任他作将领，于是司空马告辞离开赵国。

司空马行至平原渡口时，守令郭遗问道：“请问客人，现在赵国形势如何？”司空马便说赵王不用其计，赵必亡。平原令又问：“以客人推断，赵国何时亡？”司空马道：“赵王若用武安君李牧为将，还可维持一年，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现在赵王听信奸佞韩仓，这个人嫉贤妒功臣，如今赵国危在旦夕，赵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果不出司空马所料，武安君李牧因战功赫赫，遭韩仓的嫉妒，于是他在赵王面前极力诬陷李牧。另一奸臣郭开收受了秦国的重金贿赂，也向赵王诬告李牧谋反，昏庸的赵王迁不辨忠奸，信以为真，马上下令逮捕李牧，让赵忽及齐人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自知为奸人所害，拒不受命，但终于被赵王派来的人逮捕。李牧被押解到邯郸，韩仓当面诬陷李牧：“有一次，将军获胜，大王向将军敬酒，将军借口为大王祝寿，欲行刺大王，罪当死。”武安君申诉道：“臣身长臂短，不能及地。为此，请工人以木材接手，大王不信，请亲自观看。”李牧出示双手让韩仓观看，并请求韩仓向赵王言明。韩仓本欲置李牧于死地，一口回绝：“大王赐将军死，不赦，臣不敢言。”李牧知自己必死无疑，只得向北面拜后，赴死。因赵制人臣不得在宫中自杀，李牧便迅速出宫，举剑自诛，因臂短不能及，便口衔宝剑抵柱自刺而死。名将武安君终被谮杀，司马尚被废，这样，赵王自毁长城，为秦灭赵铺平了道路。

秦将王翦闻知李牧死，大喜过望，忙率大军攻赵，赵葱、颜

聚率军抵抗，这二人哪里是王翦的对手，一仗下来，一败涂地。赵王迁八年（前228），秦军攻人邯郸，虏赵王迁及颜聚等。灭赵之后，秦王政亲至邯郸，将那些曾与自己母亲、外祖父家有仇怨之人全部活埋掉，泄恨之后，又从太原、上党郡回国。

赵悼襄王嫡长子公子嘉率其家族几百人逃至代地，自立为代王。代与燕军合兵，驻军上谷，秦王政二十五年，虏代王嘉，赵国彻底灭亡。

同一年，王翦之子王贲率军攻魏，以河水灌魏都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尽纳其地。

秦王几年内，连灭三晋，志得意满，打算一举灭楚，当时的楚国仍是贵族当政，政局动荡，在位的楚王负刍乃是弑其弟哀王后夺得的王位，因此，此时楚国政治黑暗，政变频繁，几位楚王多昏庸之徒，加之秦国几十年的攻伐蚕食，楚虽名为大国，实际早已有名无实。因此，秦王灭楚是有相当把握的。

正式攻楚之前，秦王政召集各位将领商讨灭楚之策。秦王先问大将李信，灭楚需要动用多少军队，李信口出狂言，说只用二十万人就够了。这位李信，年少英雄，血气方刚，曾经以几千兵力追逐燕太子丹，终获太子丹首级，平了秦王的怨恨，自此秦王政对他另眼相看。问过李信之后，秦王又转而问老将王翦，王翦沉稳地回答："楚国虽疲弱，但终究为大国，想灭楚，非用六十万军队不可。"秦王一听，觉得王翦过于保守，便笑道："将军老了，怎么那么怯阵？还是李将军少年英雄，寡人采纳他的意见。"

王翦见自己的意见不为秦王所用，便称病告老，回老家频阳东乡闲居。

李信与蒙恬率二十万大军攻楚，这时是秦王政二十三年。秦军先兵分两路，李信率军攻兴与，蒙恬率军攻寝，首战告捷，大败楚军。李信军又破鄢陵，之后引军西归，准备与蒙恬军在城父会师。没想到，楚人乘机在秦军后面紧紧追赶，三日三夜，马不

停蹄，追上之后，乘秦军麻痹不备，出奇兵，大破李信军，秦军大败而归。

李信兵败的消息传来，秦王不禁大怒。兵败的现实使他发烧的头脑冷静下来，认识到自己过于急躁，轻视对手，悔不该不听老将王翦之言。秦王政闻过则改，立刻亲自飞骑到频阳王翦家。入见王翦后，立即自责致歉："寡人过于急于求成，未用将军之言，听信了李信，结果令秦军蒙受耻辱。如今楚军已从西而来，将军纵然有病，难道就不愿意帮助寡人吗？"王翦辞谢道："老臣年老多病，恐怕难以担此重任，请大王另择良将。"秦王政道："请将军不要推辞，为了秦国，将军一定要挂帅出征。"王翦道："如果大王不得已而用臣，老臣要求动用六十万军队。"秦王痛快答应了。于是王翦率六十万军队出发，秦王亲自送行至灞上。临行，王翦为使秦王放心，向秦王请求封赏，张口向秦王要了许多良田、美宅、园池，以示自己贪于产业决无叛心。秦王道："将军只管放心出征，何怕无田宅财产？"王翦道："为大王作战，有功也不得封侯，臣才及时讨封为子孙后代之业。"秦王政闻听王翦的解释，大笑不已。

王翦率军出发，行至函谷关，又派人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所讨田宅传之五辈，有人责怪王翦过于贪心：将军的请求，也太过份了。王翦道："君所言差矣，大王为人多疑而骄躁，如今他倾全国甲士交到我的手中，他必然放心不下，如今我只有为子孙请求田宅以为世业，才能消除大王的疑虑，难道我能让秦王怀疑我图谋不轨吗？"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率大军伐楚。楚人闻听王翦代替李信率大军浩浩荡荡而来，马上倾全国兵力以拒秦。王翦军至营地，立即下令士兵筑壁垒以自守，不得与楚军交战。楚军多次挑战，秦军终不应战。王翦令军士每日洗浴休养，改善伙食，抚慰军士以养精蓄锐，并亲自与士卒同食，如此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王翦派

人至军中看士兵们每日作什么游戏，结果发现士兵们以投石跳跃为戏。王翦知现在士气旺盛，立即下令出征。这时楚人因多次挑战，秦军不出，便转而引兵东向。这时王翦率军在后面紧紧追击，追上之后，又率领勇士猛冲楚军，楚军本已疲惫，此时又遭突袭，立时乱作一团。秦军一鼓作气，大败楚军。秦军追至蕲南，楚军大将项燕战死，楚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

秦军乘胜占领了楚国的许多城邑，并攻入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尽平楚地。接着，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以及降服于楚国的百越进攻，不久越君投降，至此，楚地全部划为郡县，楚国灭亡。

赵、楚、韩、魏四国已灭，大大扩展了秦东、南的领地，如今六国之中，只剩燕、齐未灭，秦王政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自此，一个统一的崭新的大帝国终于诞生。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白起王翦列传》、《赵世家》、《楚世家》。

《战国策》：《赵策》、《秦策》。

《通鉴纪事本末·秦灭六国》

王贲灭燕齐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王翦率秦军攻入邯郸，赵国亡。灭赵之后，秦军兵临易水河待命，摆出一副灭燕架式。

这时，燕国的执政者为燕王喜。燕王喜为孝王之子，为人刚愎自用，少谋略，不听劝谏。

早在燕王喜四年（前251），燕欲与邻国赵修好，于是燕王喜派相栗腹入赵与赵王修好结欢，同时以五百金相赠为赵王祝寿。两国立了盟约后，栗腹回到燕国后，竟置道义于不顾，鼓动燕王伐赵："现在赵国青壮年都死于长平，国内如今只剩老弱，兵力不足，可乘机讨伐。"燕王动了心，便召昌国君乐间入宫商议此事。乐间为名将乐毅之子，早年乐毅曾率燕军攻入齐都，报了齐湣王当年破燕之仇。只因惠王与乐毅有隙，以骑劫代替乐毅为将，乐毅便愤而离燕人赵。于是燕王以其子乐间继为昌平君。乐间反对攻赵："赵国为四战之国，其民习武善战，不可伐。"燕王道："我以五伐一，可以吗？"乐间仍说不行，燕王大怒。群臣见燕王主意已定，便顺燕王之意，齐声说赵国可伐，燕王便拿定主意，乘赵国战后疲弱之时讨些便宜，乐间见自己的话不为燕王所采纳，便逃往赵国。

燕发兵车一千乘、兵分两路。栗腹率四十万主力攻鄗，卿秦率二十万军队伐代。大军即将出发之际，大夫将渠仍苦苦劝谏燕王不要伐赵："大王与赵王刚刚通交约好，又以五百金相赠作为寿礼，可是使节刚刚回来就翻脸，转而相攻，这样言而无信，于情

于理都讲不过去，不义之战，不得人心，这次出战决不会成功。”谁知燕王已经头脑发昏，不仅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自己还亲自率领一支军队随大军出征，将渠抓住燕王衣带不松手，苦苦哀求燕王不要去，燕王恼了，竟用脚踢开将渠，将渠见燕王终不可劝，便伤心哭泣道：“臣不是为自己，实在是为大王着想啊！”

燕军行至宋子，赵国已接报知燕军来伐，便起用廉颇老将率军相拒，结果，廉颇率八万军队在鄗地大败栗腹军，乐乘以五万军队在代大败卿秦军，燕军大败，仓皇而逃。廉颇乘胜穷追五百里。第二年，廉颇、乐乘率军包围了燕国，燕人以重礼求和，赵人不同意，最后，燕王以将渠为相，出面请和，赵人才同意和解，解燕围而去。

燕王在血的教训面前，才意识到伐赵之不智，深悔不听乐间等人的良言。他立即派人投书乐间自责：“寡人不智，不能听信君之明言，君才弃国而去，这是寡人之过。常言道：仁者不轻易断绝，智者不轻易结怨。君在先王之世的功绩，世人皆知。望君能教诲寡人，并帮助寡人掩饰过错。如今寡人之罪，天下尽知，虽然如此，恐怕君也不够宽厚。常言道：宽厚之人不毁人以自誉，掩人之非，救人之过，是仁厚之人的做法。难道君不希望掩寡人之非，救寡人之过吗？可是君虽受先王尊位，却轻而易举地离弃寡人，就无法掩邪救过了。如今寡人有任人不贤之罪，君有失仁厚之名。国家有封疆，就如同家庭有围墙，是用来和好掩恶的。家内不和，诉之邻家，并非上策。寡人虽不肖，却不是殷纣，君虽不得意，也比不得箕子、商容。然而君不掩寡人之非，使外人知之，恐怕足以让人感到君之不厚。明寡人之薄，君不得厚，扬寡人之辱，君不得荣，一举而两失。义者不伤人自益，何况伤人自损。过去柳下惠仕鲁，三次罢黜都不离开，有人对他说：你可以离开了。柳下惠道：如果到了他国，与人有异议，能保证不再遭罢黜吗？如果仍受罢黜，我宁愿呆在故国。柳下惠不忘前业，不

因罢黜离国，不以去为念，故人人称赞。愿君弃怨归国，追念先王，重新教诲寡人，愿君早日归来，敬以书谒。”乐间接燕王书后，仍怨恨燕王不听劝告执意伐赵，终不肯原谅燕王，因此既未归燕，也没给燕王回信。其后，燕、赵两国又互相攻伐多次，国力皆大受损伤。

这时，秦王政令王翦军自赵国北上，驻军易水河畔，意欲灭燕。燕王十分惊恐，忙派使者向秦王道贺。使者途经赵国，被赵王阻拦，使者道：“秦、赵已为一统，天下诸侯臣服。燕国之所以听命于赵，都是因为秦国的缘故。如今臣出使秦国，大王阻拦，只能说明秦、赵两国有隔阂，天下诸侯知道后，就不会臣服了，燕国也将不受命于赵。”赵王一听燕使言之有理，便放他入秦。

在秦国，秦王接见了燕使者。燕使拜见了秦王后说：“燕王闻知秦已并赵，特派臣以千金相贺。”秦王道：“燕国无道，我命令赵国吞并它，对此燕王有什么好贺的？”燕使答：“臣听说赵国强大之时，南临楚国，北临燕地，地广三百里，然而与秦国两强并立相持五十多年，数次为秦所败，主要原因就是赵国地小人少。如今大王令赵国北向并燕，结果会使燕赵两国国力合二为一，必将人多地广，这样赵国就有可能不听命于秦了，臣深为大王忧虑。”秦王以为使者说的有道理，忙起兵救燕。

秦王政十七年，秦将内史腾攻韩，韩国灭亡。十九年灭赵之后，赵公子嘉率众逃往代，自立为代王，与燕国联合。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剧辛率军攻打燕、代，燕、代联兵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在易水之西被秦军击败。

这时，为质于秦的燕王喜之子太子丹，因秦王待之不善，心怀怨恨，从秦国逃回燕国，正值秦军大兵压境，燕国岌岌可危之际。太子丹明白，若以武力相抗，燕国国小力弱，显然不是秦国的对手，于是他决定用暗杀秦王政的恐怖手段来扭转败局。不久，太子丹通过田光先生的推荐结识了壮士荆轲，做好了行刺秦王的

一切准备。在秦王政二十年的一个寒风萧萧的日子里，荆轲带了秦叛将樊于期的首级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出发入秦，并通过秦王宠臣蒙嘉见到秦王。秦王政一见礼物果然大喜，荆轲上前献图，图穷匕首见，荆轲抓起匕首欲刺秦王，可惜未能成功，最后被秦王砍断右腿，肢解而死，荆轲临死仍大骂秦王不止。

荆轲行刺失败，反而加速了燕国的灭亡。秦王政盛怒之下，调兵遣将至燕、赵边境，同时令王翦军立即攻击伐燕。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军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自保。这时秦将李信率几千人在后面穷追不舍，燕王与太子焦虑万分，这时代王嘉派人送信，建议燕王杀太子以平秦怒。燕王无奈之下，挥泪杀掉太子丹，并将首级献给秦王，秦军攻势才稍稍缓解。

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翦之子王贲受命攻魏，围大梁，魏据城自保，王贲于是掘开黄河，水淹大梁最后城墙坍塌，魏王假出降，魏亡。

秦王政二十四年，秦将王翦率军伐楚，攻入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楚亡。

秦王政二十五年，秦派大将王贲攻辽东郡，俘获燕王喜，燕亡。同年，逃至代郡的代王嘉亦被秦军俘获。至此，秦王仅用了几年的时间，东方六国就被他灭掉了五个，如今只剩下一个齐国。

齐国在战国时期曾有过几度辉煌，战国初期齐威王与魏惠王徐州相王，齐湣王与秦昭王并称东西二帝，成为世所公认的强国。后来只因为齐湣王利令智昏，听从了策士苏秦的鼓噪，在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出兵灭宋，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导致韩、赵、魏、燕、秦五国联合攻齐，结果齐军大败，燕将乐毅乘机率军攻入齐都临淄，几乎占了齐国全境。六年以后，齐将田单率军反攻，打败了燕将骑劫，齐国才得以复国。但从此后，元气大伤，再也振作不起来。

齐国战乱时，太子法章换装便服，隐姓埋名逃至太史敫家做

灌园小工，太史氏的女儿知此人非寻常人士，善事之。田单复国后，因湣王已死于战乱，便迎归太子复位，这就是齐襄王。襄王立太史氏女为后，史称君王后，王后生太子建。

秦昭襄王前期，魏冉专权，出于个人私利，一贯主张先攻击齐，后来更因为自己在陶的封邑与齐地相接，为扩大封邑，更积极地向齐国进攻。

范雎相秦以后，提出远交而近攻的策略，主张先攻击韩、魏等邻国，而与相距较远的齐国修好，自此之后，秦、齐两国互不相攻，对秦与他国的争伐，齐始终保持中立，甚至在秦一个个吞掉各国的时候，齐国仍沉溺在两国友好的幻想之中，既不援助他国，也不整顿本国的军备，采取了自甘灭亡的下策。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齐襄王死，太子建继位。这时范雎刚刚担任秦相，极力推行与齐友好的外交政策，加之君王后为人贤智，事秦国十分谨慎，因此齐王建继位四十多年，尽管中原地区硝烟弥漫，唯有齐国一派和平景象。

君王后有才有德，事秦不卑不亢。一次，秦王派人送来一副玉连环，对齐王道："听说齐国多智者，不知能否有人解开这个环？"这副玉环两环相连，无法可解，秦王显然给齐王出了个难题。君王后将玉环遍视群臣，无人知道解法。君王后不慌不忙，用锤子只一砸，环便断为两半，君王后对秦使说："请回报秦王，环已解开了。"

君王后病重将死，告诫王建说："群臣中某某人可用。"王建竟记不住，要求写下来，待取来纸笔，君王后却推说已忘掉了。

君王后死后，齐王建昏庸无能，任用后胜为相，一味听信佞臣之言。后胜为贪婪之徒，多次接受秦国贿赂，蛊惑齐国臣服于秦国，不作任何防备外来入侵的自卫准备，一味追求享受玩乐，看不见日益迫近的危险。对此，齐国朝内的一些明智之士都曾劝谏齐王，不要上秦国的当，可是糊涂的齐王建硬是听不进去。

一次，齐王建登车打算入朝秦王，过雍门时，司马向前道："敢问大王，齐王是为社稷而立还是为王而立"？齐王道："自然是为社稷而立。"司马道："既然王是为社稷而立。为何要弃社稷而入朝秦王？"齐王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调转车头回宫。

即墨大夫闻听齐王接受了雍门司马的劝谏，便以为齐王建还不十分昏庸，于是抱着希望来劝谏齐王。即墨大夫见到齐王后，提议道："齐国地方千里，甲兵几百万，现在韩、赵、魏三国亡国的大夫们都不甘心事秦，逃聚在阿、鄄两地之间的大夫有几百人，如果大王将这些人搜罗起来并予之百万之众，让他们收复三晋的失地，三晋的恢复还是有希望的。另外，楚亡之后，鄢、郢的楚国大夫也不愿事秦，流亡齐境的也有几百人，如果大王收编他们并组织相应的军队，使之收复楚国故地，那样，楚地也可能失而复得。这样，大王就可建立如同齐威王时的声望，秦国也有可能灭亡。大王现在这样在国内南面称制，却还要西面事秦，大王不应采用此道。"可是齐王建根本听不进去。

齐王建四十四年（前221），秦借口齐国不通秦，派王贲发兵攻齐。齐国成为秦统一日程表上最后一个目标。

秦在统一前，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打击邻近的国家，与齐修好，成功地离间了齐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破坏了合纵。齐王建听信后胜和受秦贿赂的许多宾客的胡言，中了秦国的奸计，使其一个个吞并各国的野心最终实现，如今秦军转而相攻，齐王建终于自食恶果。

面对秦军入侵，齐王建仍然听信后胜之言，不予抵抗。临淄百姓和平日久，早已不习战争，竟无人敢抵抗秦军，于是王贲军一路未遭任何抵抗，顺利进入临淄，齐王建降。

不久，秦国派使节陈驰入齐，伪称秦国答应给齐王五百里土地的封邑，要齐王随他一起入秦受地。即墨大夫一眼看出这又是秦国玩弄的政治阴谋，目的是诱齐王入秦。为了齐王的安全，他

力阻齐王入秦。齐王建却又昏又贪，死到临头，还盲目相信秦国方面的谎言。果然入秦以后，立刻被囚禁在共，在松柏之间饥饿而死，咎由自取，结束了昏庸的一生。

齐人怨恨齐王建听信奸佞宾客之言不与其他诸侯合纵抗秦，终至国破家亡，因此编了歌谣来讽刺他："松啊、柏啊，让王建住在共的是宾客啊！"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国扫六合，并天下，海内清一。秦王政自恃有盖世之功，为天下之主，如仍以王自称已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至尊无上的地位，因此他下令让群臣为他议定一个新名号。于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联名上书："陛下兴义兵诛残贼，擒六王，定天下，海内为县，法令为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三皇五帝都不及陛下之功，臣等请博士们议陛下尊号：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言尊号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诰，天子自称朕。"秦王道："好，去掉泰，再采用上古帝位号，号为皇帝。朕为始皇帝，后世以世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此以后，秦王政改称秦始皇，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第一位专制君主。

（朱柳郁）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燕召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秦始皇本纪》。

《战国策》：《燕策》、《齐策》。

《通鉴纪事本末》

上尊号，称皇帝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将军王贲统率着强大的秦国军队自燕国南下，很快攻灭了齐国。至此，六国全部被平灭，结束了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开创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秦帝国时期。

秦统一天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国，秦王嬴政也由囿于关中地区的国君一跃为统辖整个华夏大地的独裁者，原有的秦王称号已不能表示至高无上的权威。于是，统一后不久的一天，嬴政就向他的丞相，御史们提出了上尊号的问题。

他说："昔日韩王向我国割让土地，奉送王印，请求我收纳他作为藩臣，过后却违背初约，与赵国、魏国联合背叛秦国，所以我便派出军队诛伐韩国，俘虏了韩王。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战争差不多可以至此止息了。因而当赵王派遣他的国相李牧前来结盟和好时，我就放还了驻在秦国的赵王家族人质。不料，赵王竟然违反既定盟约，攻打我的太原郡(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所以我才下令兴兵征讨，活捉了赵王。赵公子嘉出逃自立为代王，也被我军击灭。魏王开始时表示愿意向秦国投降，后来竟与韩国、赵国阴谋袭击秦国，秦因此派出兵吏征战，破灭了魏国。楚王最初打算割地求和，奉献青阳(在安徽南部，长江南岸)以西的土地，过后毁约，进攻我国南郡(治所郢，在今湖北江陵东北)地区，所以我们发兵诛伐，生擒其王，平定了楚地。燕王昏乱，他的儿子太子丹暗中派遣刺客荆轲入秦企图行刺于我，兵吏们杀了他，灭了燕国。齐王采用他的国相后胜的计策，断绝与秦国使者交往，想要作乱，军队诛伐，俘虏了齐王，平灭了齐国。我自己以微眇的身体，兴发正义之

兵，戡平天下暴乱，依赖着祖宗庙堂的灵光，使六国国王都各伏其罪，从此天下大定。所以，今天如果不更变国王的名称，就无以显示成功，适合业已取得的宏伟功绩，使之流芳后世。请你们商议确定帝号。"

当下，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召集群臣研讨，而后上奏说："在远古五帝的时候，疆土只有方圆千里，国境之外是分封的诸侯和臣服的少数民族君主统辖的地境，诸侯们有的按时朝觐，有的干脆不朝觐，天子却无力控制。现在不一样了，陛下兴举义兵，诛灭垂死的敌国，平定了天下，海内疆域都划作郡县，法令由国家统一制定执行，自从上古以来未尝有过如此盛世，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位帝王都比不上您伟大。臣等与博士们进行了认真的商议，大家说：'古时候有过天皇，有过地皇，有过泰皇，而以泰皇为最尊贵。'所以，我们冒死陈请奉上尊号，大王您可以称为'泰皇'；您的命叫作'制'，令叫作'诏'，天子您自称'朕'。"

嬴政说："去掉'泰'字，留下'皇'字，采用上古的'帝'位号，号称作'皇帝'。其余的同意你们所议。"就这样，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帝王称号被确定了下来，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

嬴政称皇帝后，立即追尊他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并对谥法进行了改革。古时贵族死后依照其生前事迹，评定一个称号，叫"谥法"。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据说，先秦时的一整套谥法是由周公创作的。秦始皇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发布制命说："朕听说远古时期，人君有号但没有谥；中古时期既有号，死后还以其一生品行确定谥称。这样做，则是儿子品评他的父亲，臣下品评他们的君主，很无道理，朕不用这种办法。从现在开始，废除周代谥法制度。朕为始皇帝，后代皇帝以数字排列，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递无穷。"

皇帝称号确定后，还有一些代表国家属性的制度需要规定。首先，是确定秦朝在五德终始中的运位。按照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之

说,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体现在王朝历史上便是互相替代、轮转。来自齐国的学者向始皇建议说:“黄帝得土德,所以据记载当时出现了黄龙和地蚓;夏朝得木德,所以 当时有青龙来到城郊,风调雨顺,草木长得十分茂盛;殷商得金德,所以白银从山上流了下来;周朝得火德,所以当时有赤红色鸟飞临的符征。今天秦朝取替了周朝,是水德的时代。过去秦文公出外狩猎,捕获了黑龙,这正是水德的征兆。”始皇采纳了这一说法,颁布命令,将黄河的名字改为“德水”,宣布这是水德的正式开始。其次,是确定国家崇尚的颜色。由于水在北方呈黑色,所以决定色尚黑,衣服、旌旗、旌节等都用黑颜色。再次,是施政主张。因为水是阴性,而旧的说教认为“阴”在政治方面代表着刑杀,所以始皇确定了以刑法治国的施政总纲。第四,是确定数字计算单位。由于认为水的终数为六,所以取六为计数单位:符帖、法冠都定为六寸,车舆宽度为六尺,六尺叫作步,每辆车挂六匹马等等。第五,是在音韵方面,以大吕为尚。第六,是更改年首时间为冬季十月份,朝廷庆贺日是十月初一。

就这样,秦始皇在兼并六国的当年,便完成了称皇帝、定德运、易正朔等一系列带有王朝标志性的政治制度变革,揭开了中国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

(张 烨)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封禅书》

修筑万里长城

秦始皇灭六国以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族的南下骚扰、抢掠，动员了几十万人在大将蒙恬带领下，将战国时期秦国、赵国和燕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增补，连贯为一，在我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建成了一条横亘万里、气势雄伟的长城。它宛如腾飞的巨龙，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今朝鲜半岛），由西向东，绵延婉转，穿过戈壁草原，翻越崇山峻岭，一直奔向苍茫的大海。万里长城不仅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防御工程之一。

长城的修筑，大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各诸侯国拓展疆土、兼并战争日趋激烈的产物。当时，为了防御邻国的进攻，许多诸侯国都在具有军事意义的边界地区修筑长城。战国时期的齐、楚、燕、赵、韩、魏、秦、中山等国都曾修筑过长城。其中的燕、赵、秦三国，为了抵御匈奴、东胡等族的侵扰，保卫本国的安全以及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相继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内地的长城，秦统一以后大部分被下令拆毁了，而北边的长城则保留了下来，后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就是在这三国原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起来的，有的甚至直接利用旧城作为骨干部分。

燕国的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北京、河北、辽宁一带。战国后期，燕在北部边境修建长城，主要是用以阻挡分布于河北北部、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东胡等游牧民族的袭扰。当时燕国有一位名叫秦开的将军，被当作人质扣押在东胡部落，胡人在相处中对他很信

任。秦开回到燕国后,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建议燕王派兵袭击东胡,结果一下将东胡赶出千里之外。燕在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上谷(辖境在今北京延庆以西,河北张家口以东地区)、渔阳(辖境在今北京密云及附近地区)、右北平(辖境在今河北承德、天津蓟县及辽宁部分地区)、辽西(辖境在今河北迁县以东,长城以南,辽宁大凌河以西地区)、辽东(辖境在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五郡;同时,为了防范东胡势力再度南侵,在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柔县)、东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一线修筑了燕长城。

赵国的控制范围在今山西、河北一带,由于北部边界经常受到林胡、楼烦两个游牧部族的侵袭,赵武灵王下决心加强边防。经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后,赵国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多,进兵北上,击败了林胡和楼烦,占据了包括今山西省、河北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在内的大片地区,并在此设立了云中(辖境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地区)、雁门(辖境在今山西河曲、五寨、宁武等县以北,恒山以西,内蒙古黄旗海、岱海以南地区)、代(辖境在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的内、外长城间地和长城以外的东洋河流域)三郡;接着,征发民工修筑了赵国长城。这段长城东起于代郡所辖的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向西经内蒙古兴和、呼和浩特、包头、乌拉特前旗,再沿乌加河北岸继续向西,直达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

秦国原主要活动于陕西西部,与戎狄等部族杂居,社会经济较中原各国落后。战国中期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强盛起来,迅速向外扩张领土。到秦昭王统治时,在秦国北部活跃着强大的义渠之戎,对秦在西北地区的扩张构成很大阻碍。于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施计把义渠戎王骗到咸阳杀死,随后乘机起兵打败了戎族,灭掉义渠,并在新攻占地区设置了陇西(辖境在今甘肃东乡的洮河中游、武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礼县以北的西汉水上游及天水市东部

地区)、北地(辖境在今宁夏贺兰山、青铜峡、山水河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上郡(辖境在今天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三郡。随后,为防备西北部戎、狄的南侵,沿三郡北边修筑了一条长城。这条长城起自今甘肃省岷县城西十公里处,历经渭源、通渭、静宁,绕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再折向甘肃环县,经陕西省靖边,到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的十二连城止。

战国中后期,匈奴开始强盛,燕、赵、秦三国北部边界的长城地带成为与匈奴角逐的战场。虽然赵国名将李牧守边时英勇善战,使匈奴不敢进人赵国境内,但由于中原各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某些地段的控制权经常变化,因此秦、赵、燕三国所筑的长城,实际上并没能有效地抵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始皇平定关东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便有条件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付匈奴。而这时,匈奴的势力也进一步强大起来,兵锋越过黄河,到达鄂尔多斯高原,机动性较强的骑兵直接威胁着秦关中腹心地区的安全。于是,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带领三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向北驱逐匈奴,夺回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秦政府在这些地区分设了四十四个县,建置了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并且修筑了几十座城堡作为防御工事。此后,匈奴不敢大规模进犯,但仍偷袭骚扰。为了巩固北部边境,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蒙恬和另一位大将杨翁子领军渡过黄河,占据阴山,断断续续地向北推进。在所收复地区又增设了三十四个县。秦政府还用“谪戍”的办法,迁内地人民三万户移居河北(今内蒙古、宁夏一带)新建的边县地区,开垦土地,守卫边城。蒙恬、杨翁子统领数十万军民首先对新收复的沿黄河一线的赵长城进行修葺、补筑。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声势浩大的长城修筑工程全面展开。蒙恬等人受命率士兵和役夫、刑徒约五十万修筑长城,他们充分利用山河的自然之险,根据地形走势筑城,有些地段利用战

国时秦、赵、燕三国设在北部边境的旧有长城进行延补，有些地段则随着秦国新开拓的疆域向北推进，修筑新城，并且在险要之处，设置了一个个的屯兵要塞。

为了修长城，秦政府几乎把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了，一队队的役夫被迫赶赴边疆，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车被推着向北行进。在东西长达万余里的长城沿线，到处是开山凿石、肩挑畜拉、打夯砌砖的场景，工程一直持续到冬季土冻。转年春天，长城修筑工程再度全面铺开，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也被派到上郡（今陕西绥德县）和蒙恬等一起主持工程建设。

这样，经过了多年极其艰苦的努力，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万里长城终于建成了。秦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万里，雄踞于祖国的北方。至今在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河北、辽宁、吉林等地，还能找到秦代长城的某些遗迹，有些残存的土垣还有五六米高，断层清晰可辨。

万里长城的修筑，固然是以万千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无数生命为代价的，秦始皇残暴地不切实际地滥用民力也应予批判，但长城对于防御匈奴侵扰、巩固国家统一又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长城不仅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而且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

（徐勇　张炜）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匈奴列传》、《朝鲜列传》

《淮南子》:《人间训》

《晋书》:《地理志》

《通典》:《边防三》

《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文物编辑委员会)

开拓边疆

秦族原本是西戎中的一支，秦国的发展史实际就是一部开拓边疆、征服中原的历史。所谓开拓边疆，是指对先秦以来华夏族活动区域之外地区的拓展，这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而言的。秦人对边疆的开拓，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中界线，可以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对西北地区（今陕西、甘肃等地）戎族的征服，对西南地区蜀及巴、黔中等当时称为“西南夷”地区的开拓；后期是对所谓“陆梁地”（今广东、广西，秦人以岭南人多处山陆，性格强梁，故称陆梁）的开拓，和北逐匈奴，对北边特别是黄河河套地区的开拓。

秦族的建国是在西周末叶。春秋初，秦国在陕西境内诸戎中最为强大，文公、武公时，征服了邻近诸戎，并把诸戎的土地划为县邑，建筑道路进行统治。秦穆公时，兼并诸侯国十二个，开拓土地上千里，于是得以称霸西戎，秦国的领土，向西拓展至陕甘边境，向北拓至陕西北部。此后，秦国征服了陕西全境的诸戎，并进而征服甘肃东北及汉中一带的诸羌，从而奠定了秦朝西北地区的基本版图，使西北戎、羌等少数民族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秦对西南地区的开拓，主要是在惠文王时期。据记载，当时蜀地的各少数民族由蜀王统辖，秦惠文王打算伐蜀，但苦于崇山峻岭所困，没有道路可通，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命人凿刻了五头石牛，在牛尾放上金子，声称石牛可以便金，说要送给蜀王。蜀王十分高兴，派了五位大力士开辟山道，拉运石牛。结果，公元前316年，

秦将张仪、马司错率军沿着这条被叫作“石牛道”的路入蜀，在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击破蜀军，灭掉蜀国。同年，秦军又灭掉苴（今四川昭化东南）及巴（都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之后，秦设置了蜀郡（治所在四川成都）、巴郡（治所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嘉陵江北岸）和汉中郡（治所南郑，在今陕西汉中东），派遣兵吏，对当地居民进行管治。

秦惠文王时，封公子通于蜀，以张若为蜀国守，张若曾按照咸阳的城市格式，对成都进行了市政建设。

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了许多水利工程，成功地进行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使川西平原变成了丰腴的米粮生产基地。这些开发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黔中原本属楚国，后被秦将司马错攻占。秦黔中郡辖境相当于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和贵阳东北一部分。这样，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也纳人了秦国的版图。

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疆域之大达到空前程度，东面到达海滨，与朝鲜半岛接壤，西面到达甘肃临洮及羌水流域，南面抵至五岭以南所谓“北向户”地区，北面以黄河为边塞，从阴山延伸至辽东。全国共分设了三十六个郡，内史、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郡县制度的普及，增加了国家的凝聚力，地域网络取代了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诸侯国网络，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团圆的家庭。

秦统一全国后，并未停止开疆拓土的步伐，在南北两大战场摆开了对匈奴、百越进攻的阵势。

当秦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游牧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一带的北狄之族，已经发展为一个强大的种族——匈奴。匈奴占领了今内

外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并南逾阴山，渡黄河，侵入鄂尔多斯的原野，成为秦代北方的严重威胁。

秦始皇深深地感到来自北方的压力。公元前215年，他命令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上征伐匈奴。蒙恬将军能征善战，率领勇敢的士兵，第二年便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又乘势将匈奴赶过了阴山，从甘肃到内蒙沿黄河河岸设置了四十四个县城，重新设置了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并将大批罪犯充实到新建的县城中。蒙恬大军渡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向西驱逐了那里的戎族部落；接着，调集了各地大批罪犯、民工修筑了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山)，顺着黄河北至河套，东到辽东。这样，有效地防御了匈奴和西戎的侵袭。

始皇犹未松懈，命令蒙恬率大军长期屯驻上郡(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东南)；同时，开通了九原到咸阳的"驰道"，道宽五十步，路边种植青松，交通运输大为便利。后来，又不断迁徙民户充实西北，垦荒守边。

在与匈奴开战的同时，秦始皇也拉开了对百越和西南夷战争的序幕。秦代称东南沿海一带为百越之地，"百越"意思就是诸越，指越人的族属繁多。当时，浙江南部的叫瓯越，福建的叫闽越，广东、广西的叫扬越，分布在西南的后来汉代称西南夷。这些百越族，都椎髻徒跣，断发文身。当秦统一全国时，他们有的随畜转徙，有的耕田邑居，有的有君长统辖，有的则没有，彼此的文化水准也不一样。在秦帝国建立的时候，瓯越、闽越已在会稽郡统治范围，其余的越人居住地区仍没有纳入秦政权统治的范围内。

公元前214年，始皇下令征发逃亡抓回的罪犯、贫家出赘婿、商人为兵，南下五岭进取"陆梁地"。始皇派出了由尉屠睢指挥的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出击，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江华境)之寨，一军处番禺(今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之界，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军队兵不

卸甲，手不释刃。秦军一度曾被越人挫败，但最终还是击败了闽越的抵抗，以其地置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州）。南越同时也被征服了。秦在南越地区设置了桂林（治今广西桂林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南海（治今广州）三郡，并在各郡建筑了县城，从内地迁徙去了大批移民，与越人杂居，守据新开辟的领土。在进攻南越时，为了便利军事运输，史禄带人开凿了灵渠（在今广西省兴安县附近），沟通了湘江和桂江的支流漓江（也叫灵河）。灵渠的开凿，既解决了军事交通问题，巩固了对南越的统治，又利于农业灌溉，更重要的是贯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这对加强全国性的经济联系，加速南方地区的开发，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秦始皇时，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也在进行。以黔中地区为基地，秦将常頞率兵进攻了今日云南、贵州的西南夷居住地区，他先是在原有僰道（僰道现在今四川宜宾县境）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通往云贵地区的道路，由于这条道路较窄，约五尺宽，故称“五尺道”。道路一直通到了滇池（今昆明市西南），秦降服了滇王，在沿路的西南夷聚居地设立地方政府，委派官吏和驻扎军队进行统治。这样，云、贵西南地区也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

至此，秦王朝的开疆拓土宣告结束，帝国领土幅员辽阔，达到鼎盛，奠定了我国二千多年来领土的基本部分。秦开拓边疆，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张焯　郭建武）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张仪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

《汉书》：《贾山传》、《严助传》

《淮南子》：《人间训》

《华阳国志》：《蜀志》

统一度量衡

统一度量衡以及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都是秦政府在灭六国后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行，不仅使秦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而且对后来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因为战国时期政治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各诸侯国的度量衡制度存在着很大差别。

在长度方面，洛阳金村古墓中出土的战国韩国铜尺长 23.1 厘米，长沙发现的两件楚国铜尺长分别为 22.7 厘米和 22.3 厘米，番禺叶氏所藏的东周牙尺长 23 厘米，安徽寿县发现的楚铜尺长为 22.5 厘米，秦国的一尺约为 23.2 厘米。

在量制方面，秦国以龠、合、升、斗、桶（斛）为计量单位，龠为二进位制，合、升、斗、桶为十进位制。魏国以斗为计量单位。赵国以斗、升、分、益等为计量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计量单位，姜齐时升、豆、区、釜为四进位制，钟为十进位制；田氏代齐后，改为升、豆、区、釜五进位制，钟为十进位制。楚国的计量单位不详，已知楚铜量有两种规格——左器和右器，约为五进位制。

除计量单位及进位方面的差异外，即使是名称相同、比较通用的单位，各国之间实际大小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国家同一种量器之间也存在区别。根据有关实物资料测算，可知各国的实际量制为：

齐国：一升＝164 毫升

　　　一豆＝820 毫升

一区＝4100 毫升

一釜＝20460—20580 毫升

一钟＝205000 毫升

赵国：一斗＝1920—2306 毫升

一升＝211 毫升

一分＝9.6 毫升

魏国：一斗＝7140 毫升

秦国：一升＝200—202 毫升

另外，楚国铜量中的左器可能为五升量，容 1080 毫升，右器可能为一升量，容 200 毫升。

在衡制方面，周以寽、捋为单位。赵国以镒、釿为单位。楚国以铢、两、斤为单位。秦国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

各国各地区在度量衡制度上的这些差异，对于物资商品的交流和经济文化的联系，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已对本国的度量衡制度作过统一，后来一直沿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国刚刚灭掉六国统一了天下，秦始皇就立即颁布法令，基本按照商鞅变法时的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

规定的长度单位是：寸、尺、丈、引。经实测折合：一寸为 2.31 厘米，一尺为 23.1 厘米，一丈为 231 厘米，一引为 2310 厘米。

规定的量制单位仍为龠、合、升、斗、桶（斛）。

规定的衡制单位仍为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据统计，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山西的左云、右玉，江苏的盱眙，甘肃的秦安，山东的邹县、诸城，辽宁的赤峰，吉林的奈曼旗以及河北等地都出土了秦代标准的量器和衡器实物。

1963 年在山东邹县出土的一件陶斗量，称为“始皇诏陶量”，非常典型。它的口沿和底部各有一个“驺”字，外壁印有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诏书，字形规整，字迹清晰，容积误差很小。

《浦口汤泉小志》、《两周金文大系图录》等书著录的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大良造时颁发的标准量器。秦统一全国后，又在这一方升底部加刻了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使其继续作为标准器使用。商鞅铜台升的边上有这样一段铭文："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这说明商鞅把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实测它的容积为202.150立方厘米或198.574立方厘米。

秦权的发现有很多，上面都刻有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有的还增刻了秦二世的诏文。秦权分铜权和石权两种，是秦代通用的衡器，起"砝码"的作用，放在有刻度的等臂衡杆上，可利用杠杆原理测重。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政府为统一度量衡事，专门颁发诏书说："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由丞相隗状、王绾负责此事，而且在秦代所有正式通用的标准度量衡器具上都铭刻这次诏书的全文，证明了秦统治者对于度量衡制度的统一是非常重视的。《秦律》中甚至有因度量衡器不符合标准而处罚主管吏的法令。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主观目的在于便利征收赋税、防止官吏舞弊，但客观上方便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交流，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秦统一以前，各诸侯国所使用的货币质地、形状、大小、轻重都不一致，计算方法、单位也不统一，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蚁鼻钱和郢爰五种形式。

布钱：由农业生产工具镈演变而来。"布"就是"镈"的假借字。布钱可分为古布、空首布、平首布三类，古布即原始布钱，又称大铲布，出现较早；空首布也是铲形，上可安柄，又可分成平肩桥足空首布、尖肩尖足空首布和斜肩桥足空首布；平首布出现较晚，又可分

成平足方肩布、尖肩尖足布、圆肩桥形方足布和圆肩圆足布。布钱主要流通于韩、赵、魏三国，燕国也有使用。

刀币：由实用的刀具演变而来，又可分成古刀、尖首刀、明字刀和圆首刀。刀币主要流通于齐国，燕、赵、魏等国也有使用。

圆钱：又叫环形币，可能从古代的纺轮演变而来。圆钱又可分成两类，一类中间有圆孔，另一类中间有方孔。上面一般铸有两个字或六个字，主要流通于秦、东周以及赵、魏两国沿黄河一带地区。

蚁鼻钱：正面凸起，背面平。上有阴文，看起来很像人面，所以又被称为鬼脸钱。主要流通于楚国等南方国家。

郢爰：质地不同于其它货币，不是用铜，而是用金铸成，其外形没有固定，只依重量计算，较多见的形状是两端凹入的长方形金饼，铸造时一般是许多方在一起，使用时切开。每方正面都用铜铃印成小方格，格内通常印有“郢爰”以及“郢”、“陈爰”等字，因为很像一枚图章，所以又叫印子金。郢爰主要流通于楚国。

秦灭六国以后，各地原来流通的形形色色不同形制的货币，已经与统一的形势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品交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又下令在全国统一货币。

秦政府统一货币的措施主要包括：

整顿秦国的旧有币制，废除原有的圆肩足布等旧钱，一律改用方孔有郭圆钱；废除东方六国通行的布钱、刀币、蚁鼻钱等，同时禁止以珠、玉、龟、贝、银、锡做货币，把秦国的币制推行到全国；

把铸币权集中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手里，使货币的流通趋于规范；

规定货币分为两等，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以圆形方孔铜钱——“半两钱”为下币，单位为半两。其中上币一般只限于赏赐和大数目的支付，在日常生活及交易中使用的主要是下币。

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意义在于，把各种形态比较原始的货币统一于比较进步的圆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过去使用、换算上的困难，便利了各地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秦代的圆钱作为中国古代的货币形态，基本上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清朝灭亡才被废除。

秦政府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的同时，也试图对文字进行统一和整理。

在秦统一全国以前，中国古代文字因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在使用上存在着地区性差异，但并没有严重到互相不可认读的地步，而且逐渐有了互相统一的趋向。战国时文字流行的客观情况是：既有当时还遗存的古文、籀文（大篆），也有产生于战国中期、主要在秦国统治范围内流传通行的小篆，还有六国中存在的一些区域性文字（如吴、楚等地的鸟虫文，齐地的蝌蚪文等），而流行最广、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最为普及的是隶书，到战国末期，隶书已经在秦、齐、楚、三晋等地被广泛使用了。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下令以小篆字体为统一书体，废止“不与秦文合者”。为了推行这种统一的书体，秦始皇派李斯用小篆写成《苍颉篇》七章，赵高和胡毋敬也分别用小篆写成《爰历篇》六章和《博学篇》七章，作为教材和标准的文字范本。始皇时期留下的“泰山刻石”、“二十六年诏版”以及秦二世时期留下的“琅邪台刻石”等等，上面的铭文或刻款也都是小篆字体。

秦政府统一文字的历史作用与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李斯等人对小篆字体做了一些整理工作，使其比较地规范化了，而且小篆的确比古文、籀文（大篆）以及一些地方文字相对简化一些，秦始皇下令在全国通用小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有一定好处的。但秦统治者以自己的主观好恶来选用字体，不考虑其实用价值如何。因为小篆字体产生且主要流行于秦国，于是就被看成是至尊无上的，企图以行政

命令的方式强迫全国百姓通用小篆，而把更为简便进步的隶书同其他文字一起予以排斥，这在文化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是很大的。一方面，隶书字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被很好地整理和推广，在西汉时尚不能达到写法上的完全统一；另一方面，秦始皇、李斯等人企图使小篆神圣化的做法，已使小篆字体本身的进步走到绝路上，其影响所及，也使我国文字的发展进步出现了曲折，走过了一段弯路。

但是，汉字的不断简化进步，是任何封建帝王个人的意志所不能扼杀的。1975 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秦简，是私人用隶书写成的。墓主喜死于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上距秦统一六国不过四年。这就证明了，秦始皇、李斯等人推行的“书同文”政策，在原六国百姓中受到了抵制，隶书仍然在民间流传着。虽然秦始皇、秦二世两代统治者三令五申，不惜使用严刑酷法，但是以小篆字体来统一文字，实际上没有能实行多少年。秦灭亡不久，小篆就已有遭废弃之势。到汉宣帝时，使用篆字的人已经很少了。隶书字体逐渐取代小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徐　勇)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平准书》

《云梦秦简研究》

《居延汉简释文》

《汉书》:《艺文志》、《食货志》

《说文解字·叙》

《秦史稿》

《战国史》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某一天,在秦都咸阳市的广场上,燃起了焚书的烈火。这样的焚书之火,很快蔓延到全国各郡。大火中,秦以前的中国古典文献,除自然科学(医药、种树)及神学(卜筮)文献以外,全部化作黑灰。第二年,服务于秦政府的文化机关中的诸生,又有四百六十余人被活埋,七百余人被屠杀,无数的人被流放到边远荒僻的地区。这两件事,在历史上合称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统治的措施:首先是建立郡县制度,郡有叫作材官的军队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其次是对乡村农民继续实行什伍连坐法,并禁止了农民传统的冬季军事训练;三是收缴百姓手中的兵器,集中至咸阳进行了销毁;四是迁徙六国豪富于咸阳,集中管治。这些社会领域进行的措施似乎很够完善了,接下去,该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动手术的时候了。新政府要想从根本上巩固统治,必须肃清隐藏在政府机构中的残余旧贵族及其代表,乃至作为其政治指导原理的旧文化。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宫廷盛宴,高级官吏都在召宴之列。七十位博士首先向始皇致敬、祝寿,表示他们的忠顺。当时仆射周青臣致颂词说:"以前秦国的土地不超过千里,幸亏仰仗着陛下的神灵圣明,平定了天下,驱逐了蛮夷,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人。把各诸侯国改置为郡县,每个人都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危害,和平可以保持万代。从上

古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陛下的威力和盛德。"这段颂词，表面上恭维始皇，实际上是对投降的旧贵族的尖刻嘲讽。因为他所赞颂秦始皇的正是吞并六国，消灭旧贵族的功绩。

博士们听后，都感到十分羞愧，于是其中一位来自齐国的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讽刺作了一番回答："臣下听说殷朝、周期统治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臂膀辅翼。现在陛下统治着全天下，但子弟们却还是平民百姓，如突然出现田常、晋国六卿篡权夺位的祸患，朝廷大臣中又没人能够辅佐时，将依靠什么来解除危机呢？不学习古代的统治经验而能够长期存在的政权，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当着您的面阿谀奉承，以加重陛下的过错，不是忠臣啊。"这一段话，实质上是对郡县制度的批判，试图从始皇个人的利害关系的角度说服始皇，恢复封建的旧政治制度。

秦始皇果然有所犹豫了，他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群臣讨论。丞相李斯不得不代表其新兴的官僚商人政治集团说话了。他上书说："五帝的制度不是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三朝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一代，可是都凭着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这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形势变化了，情况不同了。现在陛下创成了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的丰功伟绩，这本来就不是这些愚钝的儒生们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讲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情，哪里还值得效法呢？以前诸侯并起纷争，用厚赏大量招纳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现在儒生们不学习当今的学问而学习古代的学问，以此来否定今天的社会，迷惑搅乱百姓的思想。所以，我李斯冒死罪进言：古时候天下分散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就是因为各诸侯国并立，有人称颂古代以否定当代，修饰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社会现实，人们都认为自己学派的理论最好，用它来否定皇上的新政策、新法令。现在不同了，陛下您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曲直而使全国都尊崇皇帝一人；但

是原先那些私家学派却在一起批评朝廷的法令制度，听说国家法令颁布下来，立即以各自学派的观点来议论它，回家时心中不满，出门后则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褒贬君主来博得名声，发表与朝廷不同的看法来显示清高，煽动下层民众来制造流言诽谤。像这样下去而不加以禁止，那么在上面君主的权威就要下降，在下面就会结成许多党派，所以，最好明令加以禁止。臣下请求陛下同意，除记载秦国历史的典籍外全部焚烧掉。除博士官所掌管的之外，天下私自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都要送到郡守、郡尉处一起毁掉。有敢于谈论《诗》、《书》的斩首示众，以古代否定当代的人连族诛灭。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同样治罪。命令颁布三十天后还有人不烧书的，罚他在脸上刺字并做筑城苦役，发配边疆。不在清除之列的，是医药、占卜、农艺等方面的书。如果有人想学习政治法令，可以请官吏为老师。"

在李斯看来，这些终日诵读孔子之书的诸生，师古而谤今，是一群动荡人心的政治反对派。为了绝灭这种复古思想的传播，李斯主张焚燔一切作为这种思想渊源的古典文献，面对于与思想无关的书籍，实际上允许其流传。

当下，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第二天，在各郡县到处点燃了焚书的大火。不到三十天，中国秦代以前的许多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这些书毁于七年后，即公元前 206 年项羽火烧咸阳之役)。

"焚书"事后，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旧文人依然在政府机构中，掌管着文化事业，而且经常散布对秦政权的不满情绪，为了肃清这些政治反对派，秦始皇又制造了"坑儒"的惨剧。

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为秦所用的旧贵族文人方士中有侯生、卢生两个人，他们看到当时的政治日益倾向于专制与独裁，预感到或许以后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就在一起谋划说："始皇的为人，天性凶狠残暴面刚愎自用，他出身诸侯，兼并了天下，踌

踌满志，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备员，不被重用。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办事，决策权在皇上那里。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树立权威，官吏们都害怕获罪，想保住俸禄地位，所以没有人敢于真正尽忠尽智。皇上由于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日益骄横，臣下小心翼翼地靠着说谎话过日子。秦国法令规定，一名方士不能同时上呈两种处方，如果处方试一次不应验，就要处死。主掌占候星象云气以测吉凶的人有三百，都是有学问的人，然而由于害怕触犯皇帝忌讳，不敢公开指出皇帝的过失。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始皇甚至用秤来称下面报来的奏牍，日夜都有定额，阅读不够一石重就不休息。作为皇帝，他贪图权势到这个地步，咱们不能再替他去寻找仙药了。"于是，相约一起逃跑了。

消息传到了皇宫中，秦始皇非常生气，拍案大骂道："我前些日子收缴了天下的书籍，不适用的都烧掉了；征召了大批文学、方术之士，想让他们振兴太平盛世，方士们说可以炼造仙丹寻找奇药。可现在韩终一去不返，徐市等人花费了的钱财数以万计，最终也没找到仙药，只是常常听到他们非法谋利的消息。对卢生等方士，我给他们的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诽谤我，企图以诬陷来加重我的无德。在咸阳的各地儒生、方士，我派人悄悄察访过，有的人竟然妖言惑众，搅乱民心。"他下令由御史们搜捕可疑的诸生进行拷问。诸生被迫互相告发，触犯禁令的共有四百六十余人。御史们命人在咸阳城外挖下大土坑，将这些儒生全部活埋了，并布告天下，今后有敢妖言煽动是非的，严惩不贷；同时，将其余有过失的诸生发配北边，中途饥寒病累死者很多。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有些看不下去了，向始皇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安抚好，儒生们都是些诵读诗书效法孔子的学者，现在您一律用重法制裁他们，儿臣担心天下将会因此而不安定。希望皇上认真考虑。"这句话

本来出自善意，说得也很得体，但秦始皇听后却很不高兴，命令扶苏远离咸阳到北边去做蒙恬部队的监军，不愿他留在身边。

这四百六十几个诸生，在当时的秦政府看来，都是些死有余辜的政治反对派，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当时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活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损失。然而，悲剧却并未在此停演，秦王朝对于旧贵族、旧文人，在这次大活埋、大流徙之后，接着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大屠杀。秦始皇后来又命令人假装冬季在骊山上种瓜，果实生出后，命博士、诸生们前往观看，事先埋伏广大批武士，待博士诸生来到后包围杀害，共有七百多人遇难。

秦二世统治时，召集博士诸生商议陈胜、吴广起义事，在朝廷上下令处死了数十名持有不同政见的博士诸生。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就是这样将为其所用的旧贵族文人视作敌人，用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消灭。

焚书坑儒，并不是秦政府蓄意谋定的计划，而是逐渐演进出来的，它是当时作为"官学"的法家学说对于"私学"儒家学说的排挤和迫害，是秦政府企图对过去的文化思想作一次彻底清算，然后从批判中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思想体系的措施。但是，秦皇的焚书坑儒，客观上只是对文化的摧残，而没有达到重新建立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史上，甚至在世界史范围内，秦代的焚书坑儒事件，都永远是一场可悲的丑剧。

（张　烨）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

《文献通考》:《学校考》

《秦集史》

秦始皇巡游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为了炫耀秦帝国的武功和威德，始皇在位期间共进行了五次长途巡游。第一次是视察西北边地；第二次是在东海、渤海边上巡游、封禅，游览洞庭湖；第三次是重游东海、渤海之滨；第四次是游历渤海西北部海滨；第五次，也是路程最远的一次，从长江中游，到入海口，到渤海边，到北部边陲，纵横跨越了几乎整个中国，其巡游规模之大，声势之盛，路程之远，都是空前的。秦始皇前期巡游的目的是视察各地，炫耀成功与威武；后期巡游则主要在于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生命规律是无情的，至尊至大的秦始皇最终也没能如愿以偿。

始皇称帝之前，仅离开过关中两次。一次是十三年（公元前236年），秦将桓𬺈进攻赵国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杀赵将扈辄，并将所降赵国士兵十万人全部斩首。始皇出幸河南，犒赏秦军。一次是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羌瘣灭赵，始皇驾御邯郸，尽坑杀原与始皇母赵姬家有仇怨者，而后，取道太原、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返归咸阳。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成功的得意不断鼓动着他那颗好大喜功的心，为了夸耀他的伟大，俯视广袤疆土上的黎黎黔首，他决定对全国进行巡游。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始皇首先北上，到达陇西郡（治所狄道在今临洮南），而后前往北地郡（治所义渠在今甘肃庆阳西南），出鸡头山东归，经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返归都城咸阳。陇西、北地原本是戎族聚居

地，是秦国西部边陲，始皇北巡，旨在视察、巩固西北边防。北归后，始皇鉴于道路交通不便，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建贯通全国各地的驰道。所谓驰道，就是天子驱驰的道路，路面宽五十步，路旁隔三丈种上一棵青松。驰道的建设，为秦始皇大规模的巡游提供了极大方便。

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即始皇受天命的第三年，他东巡郡县，御驾先是到达邹峄山(今天山东邹县的峄山)，始皇登山祭祀，刻下了他游巡的第一块记功石碑，颂扬其废除分封、设立郡县的功绩。然后，前往泰山(今山东泰安北)举行封禅大典。封，就是山巅之祭；禅，就是山麓之祭。封为祭上帝或祭天。祭上帝，一定要在泰山之巅，这是自古传下来的习惯。据说在秦始皇以前登泰山祭上帝的，已有七十二位帝王。古代帝王之所以要封于泰山，太概因为先秦的人眼界不出黄河腹部，以当时人的地理知识，泰山就是天下最高的山，泰山之巅当然最接近于上帝居住的地方，所以祭上帝必封泰山。从泰山下来，在山脚下的梁父山再祭，为祭地，就是禅梁父。封禅这种祭典，就是下帝与上帝会见的祭典。

当时，始皇带着大批官吏和齐鲁儒生博士来到了泰山之麓。他和诸儒生商议，要到泰山巅上去见上帝，开辟一条道路通到山顶，好让他的车子通过。诸儒生墨守陈规，以为古代圣贤进行封禅，车轮都用蒲草包裹，怕损伤了山上的土石草木；扫地而祭，用菹秸作席，建议始皇不必大举开山通路，以免伤了鲁国的地脉龙神。始皇不听那一套，认为诸儒生不合时宜，把他们全部斥退，不许参加典礼。开车道从泰山阳面直达山顶，始皇携臣僚登上巅峰，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同时刻勒了记功石碑，自我歌颂圣德："皇帝登临大位以后，制定了明确的法令、制度，臣下兢兢业业。就在二十六年，天下归于统一，没有什么地方、什么人敢不宾服。所以，亲自巡视远方黎民，登临这座泰山，东方周览极尽。随从群臣思慕伟绩，追述事业成功，颂赞秦国的无限功德。现在治世之道得以实施，各种生产

井然有序，皆有法式。政治英明、美好，传于后世子孙，今后将一直延续不变。圣明通达的皇帝，既已平定天下，仍不懈于政务，孜孜不倦，每天早起、晚睡，谋求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民众进行着谆谆教诲。圣旨经过各级官吏的传达，使远近地方得到治理，都实现了皇上的意愿。贵贱分明，男女讲求礼仪，和和顺顺，各自谨慎小心，遵于职守。皇帝的光辉照耀着四海内外，没有不清新洁净的地方，而且将流惠后世，造化无穷。百姓们一定要遵循诏示，永远接受告诫与禁制。”

封祭完毕，始皇从泰山阴面下山，遇到了暴风雨，躲在路边树下避雨，因此赐封这棵树为“五大夫”。下山后，又在梁父山举行了祭地礼仪。因为始皇在泰山中途遇雨，所以后来鲁国的诸儒就大造谣言，说他没有举行成封禅仪式，正是所说的那种没有封禅德行而想行其事的人。

封禅完毕，秦始皇就东游海上。沿着渤海湾东岸北上，过莱州半岛，一路巡行礼祠名山大川。到达之罘（今山东烟台北），登之罘山，立石刻铭，颂秦德。南行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南），大肆行乐，逗留时间长达三个月。始皇迁徙百姓三万户到琅邪台附近居住，并将春秋时越王句践所造的琅邪台重新修葺一新，再立石刻碑颂秦德，以鸣自我得意之情。石文为：“二十八年，皇帝开创基业，端整一切法度，这是世间万物的新纪元。彰明人事之宜，与天道相合，宛如父子般亲密。皇帝圣智仁义，宣明各种道理，东巡安抚东部地区以慰劳兵士、教诲百姓，封禅的大事隆重结束，于是亲临海上巡视。皇帝的功勋在于勤劳职事，实行重农抑商，百姓由此富裕。普天之下同心，顺从皇帝意志，对器械规定统一尺度，对文字书写进行统一。日月所照的万物，船车所载的东西，都因循自然法则，而没有不按旨意行事的。顺应天时有所举措，只由皇帝一人决定。修正、教习不同风俗的民族，到达了地的边际、水的尽头。皇帝忧心抚恤百姓，早晚无所懈怠。去除疑惑，制订法令，都能知晓用刑之道，遵守法

律。地方官吏分职治，各级官署治理政事，举措一定要恰当，公平而有规范。以皇帝的英明，亲自临察四方，使尊、卑、贵、贱有所分别，不得逾越；奸谋、邪恶之徒不被宽容，都弃恶从良；大小官吏尽心尽力，莫敢懈怠荒政；远近邪辟之人，改而专务严肃、庄重；端正、坦直、敦厚、忠诚的人，得以长期从事本业。皇帝的恩德长存，足以安定天下，诛祸乱，除灾害，为国兴利致福。根据时节安排事役，使各种生产发展，黎民百姓安宁，不再使用武力，六亲能够相保，寇贼从此除尽。百姓欢欣奉教，都知道守法规。天地四方之内都是皇帝的疆土，西面抵达沙漠地区，南面包括了岭南，东面兼有东海，北面远越大夏国（今中亚西亚）。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是臣民的地区。皇帝的功德超过了远古五帝三皇，恩泽甚至滋润着牛马。没有谁不感受皇恩，家家安心地生活在其土地上。

"秦王兼有天下，建立名号为皇帝，亲临东土安抚百姓，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巡狩，一起在海上参与商议。大家说：'古代的帝王，疆土超不过千里，诸侯们各守自己的封域，有的朝觐有的不朝觐，互相侵略暴乱，残酷征伐不止，仍然刻勒金石，自我记颂功德。古代的五帝三皇，知识教义不同，法令制度不明确，假借鬼神之威，以欺凌压迫远方之民，实在不称其名，所以也不能长久拥有天下。没等他们去世，诸侯即已背叛，法令得不到执行。如今，皇帝统一天下，全国设置了郡县，天下安定太平。祖宗之庙得以显耀，实行的是道义与德政，皇帝尊号完备。群臣在一起诵赞皇帝的功德，刻在金石上，作为永恒记述成功业绩的典范。'"

巡游琅邪山，秦始皇踏上了西归的道路。经过彭城（今江苏徐州），隆重斋戒祈祷，打算从泗水中打捞出西周沉人的国鼎，结果派出一千名泅水能手也没有在水中找见周鼎，只好作罢，改道从西南方向渡过淮水，到达衡山（大约是今安徽霍山），然后抵达南郡（治

所在今湖北江陵），从此处渡过长江，进入洞庭湖，登上湖中的湘山祠（今湖南湘阴北），正好遇上大风刮来，几乎无法回渡。始皇询问随从的博士："湘君是什么神仙？"博士回答说："据说是帝尧的女儿，帝舜的妻子，死后葬于此。"于是皇帝大发雷霆，命令地方官派三千刑徒把湖山上的树木统统砍光，使湘山裸露出了红壤，才算稍稍消了些胸中的愤恨。返回南郡后，开始北归，经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回到咸阳。

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始皇再次东游。车队行至河南阳武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时，韩国旧贵族张良派遣力士用铁椎狙击始皇，但误中了随行的副车。始皇非常生气，派兵追捕，没抓获刺客，于是下令天下郡县大规模收捕十天。御驾继续东行，登之罘山，又一次留下两块刻石颂功。一块碑文为："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二月，初暖的阳气正渐渐升腾。皇帝东游巡狩，亲登之罘，沐浴阳光，观赏大海。随从臣僚欣喜瞻仰，缅怀壮丽的事业，追述歌诵成功的历史。伟大圣明的皇帝治理天下，建立法规制度，使秩序、制度井然明朗；对国外的诸侯进行教诲，广泛施以恩惠，通晓以义理。六国国君不听教诲，贪婪、暴戾没有止息，残酷厮杀不已。皇帝爱惜百姓，派出军队前往征讨，奋扬秦国武德，为伸张正义而诛除暴虐，兵威所至，天下无不归顺，彻底平灭了强暴，拯救了百姓，平定了天下。广泛实行英明的法律，国家治理安定，永远成为典范。伟大啊！宇宙中的万物，都接受、顺从皇帝的领导。群臣赞颂功德，请求刻记在石碑上，表彰、垂范于未来。"

在之罘东观的另一块石刻全文为："二十九年，皇帝春日出游，巡行视察远方，一直来到大海之滨，于是登上之罘高山，沐浴在东升的朝阳之中，观看、远眺广阔壮丽的山河，随从臣僚无不思绪万千，追述至明的圣道。圣明皇帝制定的法律刚刚实施，对内清理陋习，对外诛灭强暴，武威远扬四海，振动四面八方，终于擒灭六国国王，兼并了天下，绝除各种灾害，使天下永远止息了兵戎之争。皇帝

英明盛德，经营治理天下，毫不倦怠，建立伟大的理论思想，完备设置宗庙器具，使所有东西都有章法、表识。在职的臣僚遵法安分，都各自熟悉自己的事务，政务没有疑阻；百姓改过从化，移风易俗，远近统一度量标准，这是空前杰出的成就。群臣常职既定，后代子孙因循，各守其业，长久接受、沿承圣明皇帝的治理办法。群臣赞颂美好德行，吟诵皇帝的伟业，请求在之罘刻石纪念。"

时间不长，始皇一行就转道向南来到琅邪郡，再往西北，经过恒山（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从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向南回到咸阳。

过了三年，始皇再度东游，到达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北），观览沧海。始皇命燕人卢生到海上寻找传说中的叫作羡门、高誓的两位仙人，又在碣石门刻石留念。碑文为："皇帝兴发军队，诛戮无道的国家，歼灭了叛逆之敌。大秦以武力殄息暴逆后，以文训道杜绝罪失，百姓都心悦诚服。论功行赏，赏赐涉及牛马，恩泽使土壤都变得肥沃。皇帝振奋武威，以德行兼并诸侯，使和平的曙光初照人间。拆毁关东诸侯旧城郭，掘通各国在河流边筑造的堤防，夷平险阻要害。地势既已平坦，百姓不再有徭役负担，天下人都得到安抚。男人们乐于田间耕作，女人们干好家庭事务，事事各有秩序。恩惠波及各种生息的动物，它们都自动前来充作捕猎对象，没有什么东西感到不合适的。群臣诵颂伟烈，请求刻勒此石，垂范后世。"

从碣石离开以后，始皇一行西行巡历北部边镇，从上郡（治所肤施在今榆林东南）返回咸阳。

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以占卜结果是游巡吉利，同时随着年岁的增长急欲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于是决定再次远游。十月癸丑日，大队车马从咸阳出发。始皇命左丞相李斯陪同出巡，右丞相冯去疾居京留守。始皇的二十几个儿子都想跟从游历，始皇只同意平时最宠爱的少子胡亥随行。人马浩浩荡荡向东南方向行进，十一月，到达了云梦（大致在今湖北省中南部），始皇在九疑山（今

湖南宁远县南)上远远眺望祭奠了远古圣人虞舜。之后，沿长江乘船东下，经过丹阳县(今安徽当涂东北)，到达钱塘江、浙江，由于江中浪太大，船队遂西行一百二十里，从余杭(今杭州市北部)狭窄水道前行，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登上会稽山顶，在山上的夏禹穴及庙祭祀了大禹。在山顶上，始皇遥望着浩瀚的东海，期待着海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的仙人能给送来仙药。等待了许久，不见有奇药奉上，始皇怅然若失，长叹不已。

在会稽山上，始皇仍像往常一样，刻石留念，颂扬秦德。碑文由丞相李斯执笔，用小篆写成。内容为："皇帝伟大英烈，统一天下，恩德永芳。三十有七年，亲自巡游天下，遍览远方。于是登上会稽山，察视地方及其风俗民情，百姓们庄严静待。群臣诵颂功绩，追述伟大的历史，雅符人情。秦皇圣人君临国家，始定刑名，广泛推行；初平法式，审定职任，作为长久制度。六国诸侯王专横背叛，贪婪残暴，统领着强大的敌军，暴虐恣行，倚仗兵力骄纵横行，屡屡发动战争，私下互相勾结、合纵，行为邪恶，对内巧掩奸诈之谋，对外进行侵略，开了祸乱的源头。我们奋发威武、正义，诛灭残暴，消灭了敌人。皇帝圣明广德，天下无处不受到恩泽。皇帝吞并六国后，总持朝政，远近得以治理澄清。世间万物顺其自然之理，各得其所。贵者和贱者的情形，都可被皇帝知晓；善良与邪恶在皇帝面前，都会黑白分别，得到合理处置。立教宣义，寡妻弃子而改嫁者，是叛背亡夫，不够忠贞；内外设令防禁，不许淫逸，使天下男女诚信、守节；如若夫在别处嫖居，杀了他也没有罪，男人们都要秉持大义；妻子弃夫而逃嫁他人，孩子失去母亲，母则有罪。这样，社会风气变得清纯了。大加治理、洗濯旧有风俗，天下人秉承圣风，经受了优良作风的熏陶，都遵守法度，和善安宁，互相勉励，没有谁不遵守政府法令。百姓品行端正、美善，人人乐于按照一样方式生活，永保太平。后人敬奉遵法，天下永久得到治理，就如车船一样永远不使它倾覆。随巡臣僚赞颂功烈，请求刻下此石，光芒永照人间。"

会稽之行没有获得仙药，始皇只好下令北归。路过吴（秦会稽郡治所，今江苏苏州），从江乘县（治所在今江苏句容北）渡过长江。之后，沿着海边北上，到达了琅邪。为了求得神仙奇药，从琅邪往北到今天山东省的最东端荣成县荣成山，再到之罘，派随行人员在海上射杀一条大鲛鱼，仍没有得到仙药。始皇满腔失望，下令沿着渤海西行返回国都。当车队来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古黄河渡口）时，始皇生病，日渐严重。七月丙寅日，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始皇病死，时年五十岁。车队继续前进，北上，从井陉（在今河北西部，邻接山西省）进入太原郡，再抵九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从秦修建的直道回到咸阳。至此，秦始皇巡游结束。

（张　炜）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封禅书》、《李斯列传》、《留侯世家》、《六国年表》

《秦史稿》

惑于方士

秦始皇兼并六国，一跃成为统治华夏大地的皇帝，随着疆土的扩展、地位的独尊，他心中的权威感和权力欲望迅速膨胀，自大、至尊以及渴求永远享受生命的意念也在不断升腾，于是他从迷信方士神仙之说发展到竭力寻求神仙长生不老之药。

神仙之说，起源于战国时代。战国末齐国的哲学家、阴阳学派的代表人物邹衍，把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五行”说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提出了“五德终始”说，成为使许多人信奉的理论，得到当时一些诸侯国王的赞赏。邹衍的学说主要盛行在燕国、齐国东部沿海地区，信奉邹学的是一批特殊的知识人士，他们后来进一步扩展理论，把研究的方向转向神仙鬼怪之事，形成了一个叫作“方士”的文化人群体，而且人数逐渐增多，利用神鬼之学来钻营牟利。当然，神仙之说的产生，也有其社会基础和土壤。这正是当时没落的贵族感到时代的压迫，而又无力反抗的反映。他们厌恶现实社会，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又逃不出社会，于是幻想在中国境外有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民，上不归上帝管，下不归天子和诸侯管，他们悠游于海上，居住在海岛，长生不死，不受任何权力的支配，过着极端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这种没落贵族、文人的奇想，在社会日益走向统一、专制的时代，的确对不少人有很大的引诱力。

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始皇是不知甚或不信神鬼之说的。到了他兼并六国，称皇帝确定相应制度时，采用了来自齐国的博士诸生的

建议，用邹衍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学说推演，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替周德，应是水德，下令开始执行水德。更变黄河名为德水，作为水德之始；同时严刑峻法，以适应水德主刑的特性。此时，秦始皇接受了阴阳之说。

秦始皇听信方士神仙之说欲求奇药，是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泰山封禅完毕后。始皇大队车马来到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南），修筑琅邪台以观东海，始皇深深地为大海烟波浩渺的茫茫景色所吸引，留连忘返。于是，齐国方士徐市等人纷纷上书陈说神仙之事。他们讲：“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距离海岸不远。自从齐威王、宣王及燕昭王以后，屡屡有人到海上寻找这三神山，但神仙人不愿外人接近，每每船到岛边就被风吹走了。不过，还是有人曾经到达了，见到各位仙人和长生不死药都在岛上，而且岛上动物以及许多东西都是白色的，宫殿是用黄金和白银做成的，船没到神山跟前时，远远望上去像是飘浮的云彩；等到靠近了，三座神山反而都在水中。船将靠岸，却被突如其来的大风吹走了，所以最终没能登上神山，但是齐、燕两国的国君仍然乐于不断寻求。”各家方士众口一词，描述得一个更比一个形象、逼真，甚至有人请求始皇亲自乘船上海登临神山。此时的始皇既已认定自己是上天之子，且刚刚与上帝对过话，于是他望着变幻莫测的大海，不由得相信了神仙的存在，渴望能得到长生不老药。

始皇起初真想自己带人去访寻神山，但又怕接近神山却被风吹得上不了岸。于是，他听取了徐市的意见，自己留在海边祭祀名山大川和传说中的八位神将，派徐市率领船队，载着数千名男女儿童出发，去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拜问住在岛上的羡门、高誓、宋毋忌、正伯侨等古仙人，求赐神药。

第二年，始皇再次东游之罘（今烟台北）、琅邪，仍没有人为他寻得仙人仙药。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始皇根据民间传唱的神仙歌谣，把腊月的“腊”改为“嘉平”，思慕神仙的愿望更为强烈。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改道前往渤海西北岸边的碣石(今河北昌黎北)观沧海,派遣燕人卢生率船出海寻找仙人羡门、高誓,同时又派出方士韩终、侯公、石生去寻求仙人的长生不死药。由于派出的方士一直没有送来好消息,始皇这时产生了些疑心,特地召见从海上回来的方士,考问、询察真伪,还惩处了几个没有应验诺言的方士。卢生从海上一无所获而归,听说始皇要见他,吓得魂不附体,惊慌中想了一个主意,他制作了一份阴阳图谶,参见始皇时,讲了些神鬼的故事,而后拿出编制的图谶,说是海上仙人所赐,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始皇一看,大为吃惊,"胡"是当时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恰恰在始皇之时北边的匈奴族强盛起来,占据了黄河河套地区,兵锋到达今天的陕西省西、北部一带,直接威胁着秦国国都咸阳的安全。始皇依照仙人指点,立即发布命令,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收取了河套一带地区,屯兵上郡(治所肤施是今陕西榆林东南)防备匈奴南下入侵。

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卢生进见秦始皇说:"臣等入海寻找灵芝奇药,但常常遇不见神仙,大概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妨害着神仙出现。陛下应微服出行躲避恶鬼,只有陛下彻底避开了恶鬼,真人才会来到。陛下所居的地方,人臣都知晓,这妨碍神仙的出现。所谓'真人',进水里衣服不湿,进火中不会被烧,在云气之上,与天地共存。现在皇上您忙于治理天下,不能恬静、淡泊处世。希望您所居止的宫殿不要让外人知道,然后不死之药大概可以得到。"始皇听后,如痴如迷,对卢生和侍臣说:"我很羡慕真人,今后我自称'真人',不再称'朕'。"于是,下令将咸阳城外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殿用甬道、复道连接,充斥以钟鼓、帷帐、美人等,始皇不时更变住所。行幸的地方,如果有人向外说出,即是死罪。有一天,始皇行幸梁山宫,从山上远远望见大路上行进着一支庞大的车骑队伍,始皇问身边的宦官是谁的车队,回答说是丞相的,始皇表示十分不满。事后,一名宦官将此事告诉丞相,丞相立即减损了车骑数量。始

皇得知丞相削减了车骑，大为恼怒，认为必定是那天在他身边的宦官泄露了消息，下令逮捕所有当时在场的宦官，全部杀了。从此之后，大臣们再没有人知道皇帝居止的地方了。只有朝会时，始皇才到咸阳宫裁决政事，向大臣交付任务。

方士卢生和韩人侯生见始皇真的做到了远离众人，便着急起来，担心始皇忽然召见询问何以神仙仍不降临，于是俩人密谋说："始皇的为人，天性凶狠残暴而刚愎自用，他出身诸侯，兼并了天下，踌躇满志，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备员，不加重用。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办事，决策权在皇上那里。皇上乐于用重刑杀戮树立威风，天下的官吏畏惧罪责，苟且保持俸禄，所以没有人敢于竭忠尽智的。皇上由于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日益骄纵，臣下以谨慎小心、欺罔他求得生存。法令规定，一名方士不得同时进奉两种方技，一种方技试后不应验，就要杀头。主掌占候星象云气以测吉凶的人有三百，都是有学问、见识的人，然而由于畏避始皇忌讳，不敢正面汇报他的过失。天下的事无论巨细都由始皇决定，始皇甚至用秤称各地奏章，一日一石重，日夜呈送，不够份量不停止，也不去休息。作为皇帝他贪婪权势达到如此地步，我们再不能为他寻找仙药了。"于是俩人悄悄逃离了关中。始皇闻讯，大发雷霆，气愤地说："我召集文学、方术之士甚众，原本想靠他们振兴太平社会，方士们提出要去寻求仙药。现在韩众一去没有消息，徐市等费用了巨万财物，最终也没获得奇药，只有他们奸谋求利的事情不断传来。卢生等人，我尊敬、赏赐他们都不薄，今天却诽谤、诋毁我，诬陷说我没有德行。"于是下令坑杀了四百六十多名犯有妖言惑众罪的诸生，将大批儒生谪发边地。

方士的许诺没有得到应验，但始皇脑海中的成仙愿望却有增无减。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落下一

块陨石，有人在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派御史前去查究，无结果，遂尽杀附近居民，用火烧掉了陨石。为此事，始皇许多天闷闷不乐，命令博士为他作《仙真人诗》，派人交给各地乐人演奏传唱。又有一天，有人奉归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游巡渡长江时投入江中的玉璧，说"今年祖龙死"。始皇深感不安，令人对此事占卜，得卦是游徙可以避灾求吉。于是他命令迁徙三万户百姓到北部边疆，同时决定再次到东南沿海游巡，寻找仙人仙药。

第二年岁首，始皇带着庞大的车队出发，到达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登山观东海，而后沿海岸线北上，到达琅邪、之罘。仍在海边寻仙的方士徐市等人因几年来花了巨额钱财，多次入海一无所获，害怕始皇惩处，遂撒谎说："蓬莱山的仙药能够得到，但往往船被大鲛鱼所扰，所以没能上去，请求陛下派遣善射武士同往，遇见大鱼则用连弩射击。"始皇夜梦与海神打仗，海神长得如人状，醒后问随行的齐国博士，博士回答说："水神是看不见的，大鱼蛟龙是他的军将。现在陛下尊敬、祭祀山川海神却仍有这样的恶神，只有除去恶神，善神才能来到。"始皇于是命令入海的人在船上带上捕捉大鱼的工具，而自己乘船使用连弩准备射杀大鱼，在之罘竟真的射杀一条大鱼。

大鱼虽然射死了，可还是连个神仙的影子都没见着。绝望中，始皇无可奈何地宣布沿海边向西行回家。满身疲惫，一肚快快，始皇心力交瘁，当车队行至半途便病死了。

不可一世的专制君主，就这样因为几个方士的谎言，整整十年苦苦追求仙药，至死无所觉悟。

(张　烨)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封禅书》

《汉书》：《郊祀志》

沙丘之变

沙丘之变是秦王朝的政治统治由盛变衰的重要转折点之一。秦二世上台后，倒行逆施，大肆杀戮，横征暴敛，挥霍无度，使秦政权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

沙丘之变的序幕是从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开始的，这次出巡的开始时间是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十月癸丑日，当时右丞相冯去疾留守京城咸阳，随同始皇前往的有左丞相李斯、上卿蒙毅和中车府令兼符玺令赵高等。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公子扶苏因直言劝谏，惹得秦始皇不高兴，因而被派到上郡去做蒙恬戍边部队的监军。小儿子胡亥很受宠爱，想去巡游，要求跟随同行，始皇答应了他。其他的皇子都没有跟着去。

秦始皇这次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至湖北云梦，又沿长江东下到达会稽山，然后渡江到达琅邪，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古黄河渡口），秦始皇就得了重病。出于极端的迷信，始皇派蒙毅沿原路转回祷告山川神灵，祈求保佑。

在继续行进途中，始皇的病逐渐加重，但他一直想长生不老，讨厌说“死”这个字，群臣没有一个人敢对秦始皇说死的事情。然而事实无情，始皇的病势有增无减，越来越重，他自己预感到活不了多久，临死前仍想传皇位给扶苏，于是留下一封加盖了御印的遗诏，令公子扶苏“把军队交给蒙恬管理，赶快到咸阳来参加葬礼，然后安葬”。信已封好，只差派使者送出去了。

七月丙寅日，始皇行至沙丘平台时，病情突然恶化而死。这时，

蒙毅尚未返回，遗诏和印玺都在中车府令赵高的手里。只有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和赵高以及五六个曾受宠幸的宦官知道秦始皇死了，其余群臣都不知道。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地去世，又没有正式确立太子，担心贸然宣布皇子们和全国其他地方会出现变故，引起动乱，所以对此事保守秘密，不发布丧事消息。他们把始皇的尸体放置在一辆既能保温又能通风的辒辌车中，让过去受始皇宠幸的宦官陪乘，每走到适当的地方，就像以前一样照常献上饮食，百官也像平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宦官就在车中假托皇帝降诏批签。

赵高过去曾当过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写字以及狱律法令等知识，胡亥很喜欢他。而赵高同蒙毅曾有过很深的怨恨，有一次赵高犯了大罪，秦始皇让蒙毅依照法律审讯他。蒙毅不徇私枉法，依律判处赵高死刑，剥夺他的官籍。但始皇却认为赵高办事勤勉尽力，又下令赦免了他，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因此赵高一直仇恨蒙毅，伺机报复。这时看到有空子可钻，赵高就趁机进行阴谋活动，他扣留了秦始皇赐给扶苏的诏书，暗中对公子胡亥说："现在皇上去世了，没有留下封诸位皇子为王的诏书而只赐给长公子扶苏一封诏书。长公子回来后，就要即位当皇帝，而您却连尺寸的封地也没有，这怎么办呢？"胡亥回答说："本来就是这样。我听说过，圣明的国君最了解臣子，圣明的父亲最了解儿子。父亲已经死了，既然没有留下分封诸位皇子的诏书，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又煽动说："不是这样的。当今天下的主动权掌握在您和我赵高以及丞相的手中，希望您能好好考虑决定。更何况驾驭群臣和向人称臣、统治别人和被别人统治，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吗？"胡亥还是有些犹豫地说："废掉兄长而立弟弟，这是不义啊；不服从父亲的遗诏而畏惧死亡，这是不孝啊；自己才能浅薄，依靠别人帮助而勉强继承皇位，这是无能啊。这三种做法都是大逆不道的，天下的人也不会服从，我自身要遭受祸殃，国家也要被毁灭。"赵高说："臣下听说商汤、周武杀死他的君主，天下的人都称赞为义举，不能算不忠的行

为。卫国的国君杀死他的父亲，而卫国却都称颂他的功德，孔子也记载了这件事，不能算不孝的举动。何况做大事的人不能拘于小节，积大德的人不能过于谦虚，每个地方各有各的风俗习惯，每个官员各有各的工作方法。如果顾忌小事而忘了大事，以后必然有祸害；关键时候犹豫不决，以后必然要后悔。果断而大胆地去行动，连鬼神都要回避，以后一定能够成功。希望您按我说的做。"胡亥沉重地长叹一声说："现在先王去世还没有发丧，丧礼也没有举行，怎么好用这件事去干扰丞相呢？"赵高说："时机稍纵即逝，来不及详细谋划！我就像背着干粮骑着快马一样，就怕耽误了时机！"

在赵高的策划和怂恿下，胡亥同意了他的建议，接着赵高又提出："如果不同丞相商议，恐怕这件事还不能成功，臣下请求替您去同丞相商议。"于是，赵高代表胡亥来拉拢丞相李斯，他说："皇上去世，赐给长公子扶苏一封诏书，命他赶到咸阳参加丧礼并立他为皇位继承人。诏书还没有送走。现在皇上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赐给长公子的诏书以及兵符印玺全都在胡亥的住所，确定谁当太子只在于先生您和赵高我的一句话而已。您看这件事该怎么办？"李斯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这可不是做人臣的所应当议论的事啊！"赵高说："先生自己估计一下才能是否比得过蒙恬？功绩显著是否比得过蒙恬？深谋远虑而不失误是否比得过蒙恬？在全天下享有的威望是否比得过蒙恬？同长公子关系更深并且得到信任方面是否比得过蒙恬？"李斯说："这五个方面我都比不上蒙恬，但您对我的要求为什么这样苛刻呢？"赵高说："我赵高本来是一个被施以宫刑的奴仆，有幸凭着熟悉狱法文书进入秦国皇宫，参与各种政事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见到过被秦王罢免的丞相和功臣能够将封爵传给下一代的，结果都是以被杀而告终。先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这些都是您所知道的。长公子扶苏刚毅而且勇武过人，信任手下的人而又善于激励武士，他即皇位以后必然会起用蒙恬为丞相，先生您最终也不能怀揣通侯的印退职归乡了，这是明

摆着的。我赵高受先皇帝的诏令教胡亥学习，让他学法律已经好几年了，从没见他犯过什么错误。他慈悲仁爱又老实厚道，轻视钱财又尊重士人，内心聪慧而不夸夸其谈，竭尽礼节而敬重贤士，秦国的诸位公子中没有人比得上他，可以立为皇位继承人。请您考虑好再定夺。”李斯说：“您还是回去吧！我李斯只奉行先主的诏令，自己的命运听从上天的安排，有什么可考虑定夺的呢？”赵高说：“平安可能隐藏着危险，危险也可能转化为平安。在安危转换的紧要关头不早作决定，又怎么能算是圣明的人呢？”李斯说：“我李斯，本是上蔡街巷里的平民百姓，承蒙皇上提拔让我当上丞相，封为通侯，子孙都得到了尊贵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因此先皇帝才把国家存亡安危的重任托给了我，我怎么可以辜负他的重托呢？为人臣的各守各的职分就可以了。您不要再多说了，别让我李斯也跟着犯罪。”赵高说：“我似乎听说圣人并不循规蹈矩，而是适应变化顺应潮流，看到表面情况就能知道本质的东西，看到一点迹象就能知道最终的结局。事物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理呢？如今天下的权力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手中，我赵高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了。况且从外地抵制朝廷的政策就可以称为捣乱，从下面抵制皇上的命令就可以称为反叛。所以秋天一降霜雪就会花草凋落，春天冰消雪化就会万物更生，这是自然界必然的结果。您为什么连这些也不能理解？”李斯说：“我听说晋国撤换太子，国家三世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夺王位，当哥哥的被杀死；商纣王杀害自己的亲戚，又不听人劝谏，国都被夷为废墟，社稷也没保住。这三件事都违背天意，所以才落得宗庙没人祭祀的下场。我李斯现在还是个人，怎么能参与这些阴谋呢？”赵高说：“上下同心协力，事业就可以长久不败；内外像一个人那样密切配合，事情就不会有差错。您如果听从了我的计策，就能长期保住通侯的封号，而且可以世代相传，那您就一定同乔松一样长寿，同孔子、墨子一样聪明。现在您放弃这个机会而不听从我的计策，一定会祸及子孙，这太让人寒心了。善

于为人处世的人能转祸为福,您可要想好怎么办啊 ”在赵高的一再怂恿和威胁利诱下,李斯终于屈服了,他流着眼泪仰天长叹说:“唉呀!偏偏遭逢乱世,既然不能以死尽忠,将向什么地方寄托我的命运呢!”于是李斯就听从了赵高的话。赵高便向胡亥回报说:“臣下是奉了太子您的明确命令去通知丞相的,李斯丞相哪敢不服从命令!”

于是赵高与胡亥、李斯一起策划,他们秘密换掉了始皇赐给公子扶苏的那封已封好的诏书,对外谎称李斯在沙丘接受了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封给长公子扶苏的诏书,列举扶苏、蒙恬的罪状说:“我巡视天下,祈祷各地名山大川的神灵保佑以延长寿命。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年多了,不能向前推进,士兵却伤亡很多,没有立下一点功劳,反而几次上书直接诽谤我的所作所为,扶苏因为不能解职回来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他作为儿子而不孝顺,赐给他剑用来自杀吧!将军蒙恬和扶苏一起在外边驻守,不能纠正他的错误,也应该知道他的想法,作为大臣而不尽忠,也赐他同时自杀吧,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副将王离。”他们把诏书封好后盖上皇帝的玉玺,派遣胡亥的门人捧着这封假诏书到上郡交给扶苏,再派李斯手下的人为监军去夺蒙恬的军权。

为了等待使者回来报告扶苏和蒙恬的消息,他们的出巡车队故意从北边转了一大圈,从井陉绕道九原郡再向咸阳折回。这时正赶上天气炎热,秦始皇的尸体虽然在辒辌车中,但已腐烂,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赵高等人为了掩人耳目,就下令随从的官吏往车里装一石有腥臭气的鲍鱼,让人们分不清尸臭和鱼臭。因为秦始皇平时性格怪戾,随行的官吏们没有人敢表示怀疑。

远在千里之外的扶苏、蒙恬,事先因信息不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发以后,扶苏毫无主见,对胡亥使者送来的伪诏深信不疑,大哭起来,进入内室,想马上自杀。蒙恬则表示怀疑并劝止扶苏

说："陛下在外地，没有立太子，派臣下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您担任监军，这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即自杀，怎么知道这其中没有奸诈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明确答复后再死也不晚。"但使者紧逼不放，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厚，对蒙恬说："父亲命令儿子去死，还有什么可请示的！"还是自杀而死了。蒙恬不肯自杀，却也不能扭转局面了。秦代实行的监军制度使蒙恬平时并没有调动军队的全权，而且戍边军中的一些将领如王离等人事先已被收买，所以使者很轻易地把蒙恬抓了起来，转移到阳周关押。

胡亥听到扶苏已经死了的消息，当下就想放掉蒙恬，但赵高不仅怨恨蒙恬兄弟，而且认为他们是自己篡权的最大障碍，想借机把他们铲除掉。这时蒙毅祈祷山川神灵后刚刚赶回来，胡亥听从了赵高的挑拨，就在代郡把蒙毅也囚禁起来。

政变成功，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他们带着秦始皇的灵车快速行进，从直道赶回咸阳，发布治丧的公告。安葬完始皇以后，太子胡亥就继承皇位做了二世皇帝。赵高被任命为郎中令，常在皇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实权。

胡亥、赵高等人通过阴谋政变上台以后，先后杀害了蒙恬兄弟以及一大批先朝大臣和公子，并实行严刑暴政，使得秦王朝的统治很快就摇摇欲坠了。

（徐　勇）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六国年表》

《三辅黄图》

《括地志》

《秦集史》

蒙恬戍边

蒙恬是秦代一位杰出的戍边将领，他虽然是世袭为将的，但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确实表现出了极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他的指挥下，秦政府不仅收复了河套一带广大地区，而且把匈奴的势力赶到了塞外。万里长城的修建，固然是以万千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无数的生命为代价的，但是蒙恬作为这项宏伟工程的主持者，能够根据地势起伏、山脉的自然走向指挥修筑，对于长城的建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蒙恬，祖上是齐国人，大约生于秦王嬴政即位前后，死于公元前 210 年。他的祖父蒙骜在秦昭王时由齐国入秦为将，因屡立战功，官做到上卿。蒙恬的父亲名叫蒙武，也是一位著名将领，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曾和王翦一起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楚将项燕。第二年，蒙武又率军进攻楚国，俘虏了楚王。他在后来南征百越等重要战役中，也都立有战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得以世袭做了秦国的将军，并且参加了统一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率兵进攻齐国，大败齐军，被授予内史的官职。

秦兼并天下，建立起帝国以后，因王氏、蒙氏两家功劳最多，威名广为流传，蒙恬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当时，在蒙古高原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南下，掠夺内地的人畜和财物，聚居在辽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胡人也不断袭扰边境，这对初建的秦王朝威胁甚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巩固北部边境，

秦始皇派蒙恬带领三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向北驱逐匈奴，他们长驱直入，横扫塞北，夺回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秦政府在这些地区分设了四十四个郡县，并且建筑了几十座城堡。蒙恬还同另一位大将杨翁子一起领军征讨，在西边控制了流沙一带，在北边打到辽河流域，在东边与朝鲜建立了结盟关系。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匈奴和胡人不敢大规模进犯，但仍有偷袭骚扰。为了加强防范，蒙恬受命率士兵和役夫、刑徒约五十万人修筑长城。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北方边城的基础上，筑起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一万多里的长城，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此前后，蒙恬继续领兵戍边，打击匈奴贵族，渡过黄河，占据阴山，断断续续地向北推进。秦在所收复地区又增设了三十四个县。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政府还迁内地人民三万户移居河北(今内蒙古、宁夏一带)地区。蒙恬率领大军饱经狂风烈日、雨雪寒霜，在外边戍边十余年，声威震慑匈奴。

秦始皇的长公子扶苏因对始皇和李斯等人所施行的某些政策持不同意见，几次上书议论时政，惹得始皇很不高兴，因而被迫远离咸阳，到蒙恬部队中做监军。秦始皇特别尊崇蒙氏，对他们非常信任和赏识，因而亲近蒙恬的弟弟蒙毅，提拔他做到上卿的职位，外出时就陪同秦始皇一起乘车，入朝时就侍奉在皇上跟前，常随左右，执掌机要。蒙恬在外担负军事重任，蒙毅经常在朝中出谋划策，被誉为忠信大臣，其他的文臣武将没有人敢与他们争宠的。蒙恬兄弟地位之显赫，甚至使丞相李斯也暗自担心地位受到威胁，蒙恬手握重兵并同对李斯有一定看法的扶苏在一起，更使李斯常怀顾忌。而此前，蒙毅也因执法不阿，得罪了中车府令赵高。

秦始皇曾多次出巡，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他又打算巡游天下，路经九原郡，直接到达甘泉宫。始皇试图开辟一条新路，就派蒙恬负责指挥打通山脉，填平深谷，修路架桥。但从九原郡到

甘泉有一千八百里远，工程浩大，一时没能修好。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跟随同行的有始皇最喜爱的第十八子胡亥，以及李斯、赵高等人。始皇因途中劳顿，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古黄河渡口）时就病倒了，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时病情突然恶化，临死前仍然想传位给扶苏，并对蒙恬托以重任。他留下遗诏，嘱扶苏"把军队交给蒙恬，赶快到咸阳参加葬礼，然后安葬"。但始皇死后，遗诏未能发出去。在赵高的策划和怂恿下，胡亥、李斯一起合谋篡改了始皇遗诏，他们一面派人将伪诏交给扶苏逼他自杀，一面派李斯的舍人为监军夺蒙恬的兵权，同时又收买了蒙恬的部将王离。扶苏见到诏书就大哭起来，想自杀。蒙恬劝止他说："陛下在外边，没有立下太子，让臣下指挥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您担任监军，这是关系到全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是来了一个使者，您就立即自杀，怎么知道这其中没有奸诈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明确答复后再死也不晚。"但在使者连连催促下，扶苏还是自杀了。由于秦代实行监军制度，蒙恬平时并无调动军队全权，而且戍边部队中的一些将领也被更换，所以蒙恬虽不肯自杀，使者也把他抓了起来，并押在阳周。

本来胡亥听说扶苏已经死了，就想放掉蒙恬，但赵高担心蒙氏再次显贵当权执政，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蒙毅赶回来时，赵高趁机献计表示对胡亥尽忠，想把蒙氏铲除掉，他挑拨说："臣下听说先帝想选举贤能立您当太子很久了，而蒙毅劝阻说：'不可以。'如果知道您贤能而反对册立，就是不忠诚而又蛊惑君主的行为啊。以臣下愚昧的意见，不如杀掉他。"胡亥听了赵高的话就下令把蒙毅囚禁在代郡。

胡亥返回咸阳自立为二世皇帝后，赵高更加得宠，他日日夜夜对蒙氏进行诬蔑诽谤，搜罗他们的罪过，检举弹劾他们。

秦二世的叔叔子婴不赞成杀掉蒙恬、蒙毅，进谏劝止说："臣下

听说过去赵王迁杀掉了最好的大臣李牧而起用颜聚，燕王喜暗中采用荆轲的计谋而背弃同秦国的盟约，齐王建杀掉忠诚的大臣而改用后胜的政策。这三位国君，都是因为改变了传统规范而失掉国家并且殃及到了他们自身。现在的蒙氏，是秦国的大臣和谋士，而主上却想一下子抛弃他们，臣下内心认为是不可以的。臣下听说考虑事情草率的人不可以治理国家，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人不可以用来保全国君。诛杀忠诚的大臣而起用没有节操品行的人，那是使朝中的大臣们不再相信皇上而使在外边作战的士卒们涣散斗志，臣下内心认为不可以这样。"但秦二世不听子婴的谏阻，派遣御史曲宫乘坐驿车前往代郡，杀害了蒙毅；又派人前往阳周，命令蒙恬说："您的过错太多了，而您的弟弟蒙毅犯有重大罪行，依法要牵连到内史您。"蒙恬还想向二世再申诉一下，对派来的使臣说："自从我的先辈开始，为秦国累积大功，建立威信已经有三代了。现在臣下带领着三十多万军队，我虽然被囚禁起来了，但是我的势力足够背叛朝廷。然而我自己知道必死无疑却仍坚守节义，是因为不敢辱没祖上的教导，不敢忘记先主的恩宠。从前周成王刚刚即位，还不能完全脱离小儿的背带和布兜，周公姬旦背着成王接受群臣的朝见，终于平定了天下。到了成王得了重病很危险的时候，姬旦就自己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到黄河里，祈祷说：'成王年幼没有见识，都是姬旦我当权执政。如果有罪过祸患，姬旦愿意承受惩罚。'并把这些祈祷的话书写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这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真诚可靠了。到了周成王能亲自治理国家时，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旦想要发动叛乱已经很久了，大王如果不戒备，一定会发生大的变故。'成王听了很生气，周公旦被迫出逃跑到了楚国 当成王到档案馆里审阅档案时，发现了周公旦当年指甲沉河时的祷告书，就流着眼泪说：'谁说周公旦想要发动叛乱呢？'于是杀掉了制造谣言的人而把周公旦请了回来。所以《周书》上说：'一定要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并反复审察。'现在我蒙恬的宗族，世世代代没有二心，而事情竟然演

变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这一定是奸臣在企图叛乱，从内部进谗言的缘故。周成王有了过失而能改正振作就使周朝终于兴旺昌盛；夏桀杀死了关龙逢、商纣杀死了王子比干而不思悔改，最终落得自己惨死国家灭亡。因此臣下说有了过失可以改正振作，听人劝谏可以察觉醒悟，反复审察各方面的意见，是圣明的皇上的治国原则。臣下说的所有这些话，不是用来乞求免于惩罚的，而是要用忠心拼死进谏，希望陛下为万千民众着想而遵循正确的路线行事。"但使臣拒绝了他的请求，说："我只接受诏令，不敢把将军您刚才所说的话讲给皇上听。"仍逼其自杀。蒙恬沉重地叹息说："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怎么竟然没有过错就要被处死呢？"过了许久，他才又慢慢地说："我蒙恬的罪过的确是该死。起自临洮一直连接到辽东，修筑长城挖掘壕沟一万余里，在这其中能没有截断大地脉胳的地方吗？这就是我蒙恬的罪过了。"于是吞下毒药自杀了。

蒙恬死后，被葬在今陕西绥德城附近的大理河畔。站在蒙恬墓前向东北眺望，大理河东岸城内雕阴山上有扶苏冢。绥德的百姓相传说，蒙恬生前治军有方，与所率士兵相处得很好，他被害死后，士兵们都怀念他，每人用衣襟盛一襟黄土，倒在他的坟堆上，这样居然堆起了一座黄土高山。

后人记述，蒙恬在戍边期间，还曾利用柘木以及鹿毛、羊毛、兔毛等对毛笔进行过改进。

蒙恬兄弟死后，秦二世、赵高等人又杀害了一大批先朝大臣，使得秦王朝内无贤臣、外无良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很快地崩溃了。

（徐勇）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白起王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匈奴列传》

《淮南子》:《人间训》
《论衡》:《祸虚》
《风俗通义》
《秦集史》
生华《蒙恬墓与扶苏冢》

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即明明是一头鹿，却硬要说成是一匹马。这是一个历史典故，用以说明秦相赵高的凶恶霸道。

赵高本是赵国王族的远亲，后来进入秦国宫廷中，管理各种事务二十多年。赵高兄弟几个人，都是生下来就被阉割而成为宦者的，他的母亲也因为犯法曾被判处了刑罚，所以赵高是世代出身卑贱的人。秦王嬴政听说赵高很有能力，而且精通刑狱法令，就提拔他担任了中车府令。赵高曾当过公子胡亥的老师，教给胡亥决断讼案方面的知识。赵高字也写得很好，不仅教过胡亥，还曾与李斯、胡毋敬等同时著书讲授，以小篆字体写了《爰历》六章，被秦政府采用作为教材。

赵高由于担任中车府令兼符玺令，得以经常跟随在始皇左右。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时，他也照例随同前往。当始皇病死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以后，赵高就趁机进行阴谋活动，他伪造了始皇给长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的遗诏，勾结胡亥和丞相李斯等人，一起策划了政变，立胡亥做了二世皇帝，赵高自己则被任命为郎中令。

为了进一步篡夺权力，赵高极尽挑拨、陷害之能事，利用秦二世首先逼死了扶苏和蒙恬、蒙毅，接着又杀害了一批先朝大臣和公子、公主，最后则找借口除掉朝廷重臣冯去疾、李斯、冯劫等人。此后，赵高被秦二世提升为中丞相，并加封安武侯。朝廷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赵高一个人决定，就连二世也被逐渐架空了。

赵高权势逼人，想要谋反，但又害怕群臣不服从他，就先设下计谋进行试探。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己亥日，赵高带来一头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这明明是鹿，为何说是马?"当场问左右的大臣，大臣们有的沉默，有的故意迎合赵高说是马，有的说是鹿。赵高后来就假借法律报复那些说是鹿的人。经过这件事以后，大臣们都很害怕赵高。

赵高以前多次说关东的"盗贼"成不了什么气候，后来项羽的起义军在钜鹿城下俘虏了秦将王离等人并继续前进，章邯等人指挥的秦军多次败退，上书请求增援，燕、赵、齐、楚、韩、魏等国的人都自立了王，从函谷关往东的地区，几乎全部背叛了秦朝官吏而响应诸侯，各路诸侯都率领军队向西边进攻。刘邦带领几万人已经攻陷了武关，派人来跟赵高私下谈判。赵高担心，二世知道了会生气，受到诛杀惩处，就谎称有病不去朝见皇上。

不久，二世也听到了起义军日益逼近的消息，派人去责问赵高。赵高更加恐惧不安，暗中跟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弟弟赵成商量说："皇上不听我的建议，现在形势危急，他想要把罪责推给咱们家族。我想另立皇帝，改立公子子婴。子婴为人仁爱谦下，百姓们拥护他。"于是就收买了郎中令作为内应，谎称有大盗，命令阎乐召集官吏发兵追捕，又劫持了阎乐的母亲，安置在赵高家里当人质。阎乐带兵冲进望夷宫去，逼迫秦二世自杀了。

阎乐回去禀报了赵高，赵高就召来了所有的大臣和公子，把二世自杀身死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本想自己当皇帝，把玉玺拿来佩戴在自己身上，但身边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拥戴他。他登上大殿时又恰好遇上地震，大殿好几次摇摇晃晃像要倒塌似的。赵高一方面迷信地认为上天不同意他做皇帝，另一方面也明白群臣是不会拥戴他即皇帝之位的，就对大家说："秦国本来是个诸侯国，始皇统治了全天下，所以称皇帝。现在六个诸侯国又各自立了王，秦国的地盘越来越小，却还保留着一个皇帝的空名，这不合适，应像过去

一样称王才合适。"于是立秦始皇的弟弟子婴为秦王，把玉玺交给了他，并且按照平民的标准把二世草草埋葬在杜南宜春苑中。

赵高立子婴当秦王，只是想利用他做傀儡。他先让子婴斋戒，到宗庙里去拜祖先，然后再正式即位。子婴很了解赵高的为人和用心，知道他早晚要作乱，就下决心除掉赵高。斋戒了五天以后，子婴跟他的两个儿子和宦官韩谈商议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了二世皇帝，害怕大臣们诛杀他，就假装按照道义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已经同楚国军队约定，灭掉秦宗室后让他在关中称王。现在他让我斋戒后去拜宗庙，这是想趁我到宗庙里去的时候杀害我。我推说生病不能前往，丞相一定会亲自来，他来了就杀掉他。"到了该去宗庙拜祖先的时候，赵高派人去请子婴，前后去了好几趟，子婴都假称有病不去，赵高果然亲自来见子婴，一面询问病情一面对子婴说："拜宗庙是国家大事，大王为什么不去呢？"子婴就把赵高召进斋宫里，命令预先埋伏的韩谈刺杀了他，并且分裂了赵高的肢体，杀死了他家三族亲属，在咸阳街上示众。飞扬跋扈的一代奸相赵高就这样终于落得个可悲的下场。赵高虽然被除掉了，但秦王朝毕竟已经元气大伤，无法挽救最终的覆灭。子婴做秦王仅四十六天，就不得不自缚到霸上向刘邦的起义军投降了。

（徐　勇）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六国年表》

《汉书》:《艺文志》

《秦集史》

《秦史稿》

大泽乡起义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七月，在今安徽境内，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起义的原因是因为秦朝的暴政，正如汉代政论家贾谊所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二世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阳城(今河南省阳城县)地方官接到朝廷的命令，要他征调九百名壮丁送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去防守边疆。这九百名壮丁由两个将尉带队，为便于管理，他们从壮丁队伍里选了两个帮手做屯长，一名叫陈胜，阳城人；一名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

队伍日夜赶路，走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遇大雨，只得扎营暂住，可雨偏偏几日不停。大泽乡名符其实，地势低洼，连日暴雨，四野已成泽国，根本无法行路。这支队伍上下皆心急如焚，因为日后走得再快，也不能按期到达渔阳。按照秦朝苛刻的法令，误期，就要砍头。如果明知误期，还要前行，无异于去送死。陈胜与吴广乃相与谋议："我们前行是死，逃亡是死，与其等死，不如兴大事，举

义兵，推翻秦朝暴政。”陈胜说：“天下人怨恨秦政已很久了。我听说秦二世是秦皇的小儿子，不该当皇帝，当立为皇帝的是长子扶苏，扶苏由于对秦皇直言相谏，秦皇让他带兵戍边。如今扶苏并无罪过，二世为了夺位，却将他杀害了。老百姓都知道扶苏是好人，不知道他已经死去。咱们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数次大功，又爱怜士兵，楚人都敬重他，如今有人以为他死了，有人说他逃走了。如果我们假称奉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之命，号召天下，攻打二世，将会有众多的人响应。”吴广也颇有见识，他甚为赞同陈胜的见解。

起义的决心已下，但陈胜、吴广都不能预测此事的吉凶，他们决定先算一卦。当晚，他们去找算卦先生，算卦先生见两人气宇轩昂，不是等闲之辈，从他们的问话里也听出了一些眉目，就说：“你们预卜的事能够成功，如果能请鬼神相助，那成功的把握就会更大。”

陈胜、吴广心中大喜。回营的路上，尽管脚下泥泞，两人还是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边细细琢磨着卜者“请鬼神相助”的话。陈胜说：“楚人信鬼神，我们如果假托鬼神的旨意，众人一定会相信我们。”吴广完全同意。于是，两人商量了办法，决定尽快行动。

第二天，两人找了一块白绸，用红笔在上面书“陈胜王”三字，然后，到一处无人看管的拦鱼网旁，放入网中一条大鱼的腹中；随后，又派人去那户渔家买鱼。伙夫剖鱼的时候，从鱼肚里发现了丹书布帛，觉得甚为奇怪。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大伙都前来观看。于是，“陈胜王”三字就印在众人心里。

此事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震荡还没有平静，陈胜又让吴广去营地旁丛林里的一个破祠堂里藏好，夜深人静的时候让他学狐狸叫。这天夜里，乌云密布，半点星光也没有，兵丁们在一片丘岗之上的营地里想着自己的凄惨命运，夜不能寐。忽然静夜里传来一声声的狐狸叫，再细听，狐狸好像在谈话，听到后来，大家都听清楚了，狐狸叫的是“大——楚——兴，陈——胜——王”。叫的声音虽然不

大，可这些兵丁听起来，却像是苍穹里的声声闷雷。联想到鱼腹之中的帛书一事，众人一夜惊恐，无法成眠。"大楚兴，陈胜王"又印在了人们心里。

白天，兵丁三三俩俩都在议论这两件怪事，大家也都观察陈胜，对他非常敬畏。陈胜和吴广商议，认为人心可用，就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杀掉两个将尉，正式举事。

吴广性格豪爽，讲义气，重友情，善于体察别人的心情，所以，与士卒关系甚为融洽，大家都愿为他效力。他乘将尉酒醉时，几次称与其等死，不如逃走，一方面博得众人同情，一方面激怒将尉。此计果然有效。将尉醉意朦胧，不辨真情，举鞭抽打吴广。他觉得仍不解气，又把剑抽了出来，欲震慑吴广。吴广心中窃喜，挺身而起，夺剑杀死将尉。陈胜从旁相助，又杀掉另一将尉。众人尚未从这一突然变故中清醒过来，陈胜、吴广登高向众人宣告道："我们如今遇大雨，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期赶到渔阳，失期我们都要被杀头，即使不斩，我们为秦朝在边疆卖命，也是九死一生。壮士不死便罢，死也要死得有个名堂。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人都是爹娘生的，我们就不能做王侯将相吗？凭什么不明不白地为别人送死！"

这时，全体兵丁都聚在四周，众人听罢，一齐喊道："我们听你们的吩咐！"

于是，陈胜、吴广就诈称奉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之命，顺应民意，要推翻秦朝的暴政。他们要全体兵丁袒露右臂，并为这支起义的队伍起了名号，自称"大楚"。

随后，陈胜、吴广组织大家在营外搭设了祭坛，召集全体壮士在坛前盟誓。坛前摆放两个将尉的首级。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盟誓毕，全体壮士一举占领大泽乡。

大泽乡的农民早就吃尽了秦朝的苦头，今日见有人领头举事，人人拍手称快，家家都拿出粮食来劳军。年轻的子弟们随手抓起家里的锄头、扁担当作武器，就加入到起义的队伍里来。一眨眼的功

夫，九百人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队伍迅速扩大，没有旗帜，陈胜、吴广就命士兵砍来许多竹子，以竹竿作旗杆，以竹梢作旗子。昔日平静的大泽乡，今日"揭竿而起"，诞生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

队伍扩大，百姓拥戴，使陈胜、吴广信心大增，刚举事时的不安心情随风而逝。于是，他们带队攻打蕲县(今安徽固镇西北)。蕲县是小城，城里的官兵听说楚国大将项燕的大军到了，兵无斗志，顷刻间，这个县城就被攻下了。

这是起义军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昔日耀武扬威的秦军如此不堪一击，大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县城一下，起义军的声名也就开始远播，借着这股声威和士兵的锐气，陈胜、吴广又命符离(今安徽淮北市东南)人葛婴带兵攻击蕲县以东，接连攻下五六个县城。陈胜、吴广又乘势带兵攻打陈县(今河南淮阳)。这时，"大楚"的名号已经远近皆知。这支起义军仿佛是在暗夜里点燃的一支火炬，不甘心忍受秦朝官吏欺压的农民，昔日六国政客、领主的子弟，不得志的武士、谋臣，纷纷前来投军，赵义军如滚雪球般迅速扩大，陈胜、吴广很快就拥有了六七百乘车，一千多匹坐骑，好几万士兵。

陈县的守令见陈胜、吴广来攻，早已望风而逃，只有守丞带兵守卫城门，守丞战死，陈胜、吴广率大军入城。

陈县是大城，占据了陈县，几万士兵得以休整。几天后，陈胜号令召集陈县的父老、乡绅、豪杰前来议事，陈县这些有声望的人士说："将军征伐无道，诛杀暴虐的秦国，恢复我们楚国，功劳之大，应该做楚王；而且您监临天下诸将，不当王就没有号召力，愿将军您立为楚王。"

在召集来议事的这班人中，有两个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素有名望，都是旧贵族、魏国名士，一个是张耳，一个是陈馀。秦灭魏几年后，仍在出赏金捉拿此二人，故二人隐姓埋名逃到陈县。陈胜及身边的人早就知道张耳、陈馀的声名，陈胜一入陈县，二人即

投到陈胜的门下，陈胜大喜，把他们当谋士看待。

议论到立楚王事，陈胜问他们两人有什么意见，张耳、陈馀原来都是魏国的贵族，秦始皇统一天下，使他们失去了昔日的一切，跌入社会的底层。如今，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恢复贵族地位，因此，对陈胜称王极力阻挠，发了一番议论："当今秦国无道，灭掉六国，杀害六国君王，加重劳役，使天下百姓疲惫不堪，财物都被榨取干净，害得人们活不下去，将军怒目张胆，挺身而出，万死不辞，为天下除害，这是大公无私、舍身忘死的大作为。可今天刚占领了陈县就当王，是在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私心。希望将军不要称王，赶紧率领大军向西边秦国首都打过去；同时，派人去立六国的后代，六国立，自己就有了更多的盟友，秦国就有了更多的敌人，兵力就强大，那就很快能占领咸阳，灭掉秦国，号令天下诸侯。诸侯原被秦国灭亡，将军又将其复立，他们对将军会心悦诚服，这样将军就可以成就帝业。如果现在就称王于陈县，天下豪杰就会认为将军有私心而人心背离，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陈胜不同意他们的说法，遂立为王，号"张楚"，即张大楚国之意。王既立，士兵经过了几天休整，上下同心，士气高涨，陈胜又开始调兵遣将，征伐秦兵。

陈王以吴广为假王，监督诸将西击荥阳（今河南荥阳），令汝阴（今安徽阜阳市）人邓宗带兵马向九江进攻，令魏人周市向北进攻魏地。张耳、陈馀不愿在这里当谋士，另有野心，陈馀向陈王建议道："大王的目标是西进咸阳，击败秦国，恐怕没有余力顾及河北。我过去曾经遍游赵国，知其豪杰和地形，希望能让我们带一支奇兵北进以占领原赵国的属地。"陈王听信他们的建议，派自己的亲信陈人武臣为将军，让张耳、陈馀做左右校尉，率三千人马去进攻赵地。

当时，各郡县的百姓都痛恨秦政的苛刻、严酷，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杀掉秦朝的官吏以为响应，楚地数千人的起义队伍不可胜

数，陈胜派出的几路大军都迅速扩大。但是，这时，陈胜的楚国却开始走向衰落，内部分裂，连吃败仗，诸王并立，形势急转直下。

武臣这支部队向北进攻，三千人的队伍很快扩大到几万人，连克数城后，攻下原赵国的都城邯郸。武臣不愿再与陈胜保持臣属关系，在张耳、陈馀的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随后，赵王的将相又劝告他不要西进击秦，而要乘机北攻原来燕国的属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使赵国南临黄河，北有燕代，这样，即使陈胜战胜秦国也拿赵国没有办法；如果楚国败于秦国，就要更加倚重赵国。赵王同意，派韩广去攻打燕国，谁知韩广也同武臣一样，也是一去不回，又自立为燕王。武臣、韩广拥兵自重，自立为赵王、燕王，这就削弱了陈胜的力量。

吴广进攻荥阳的部队发展也不顺利。荥阳当时正由李斯的儿子三川（河南洛阳）守李由镇守，吴广围攻很久，攻不下来，他请陈王再派兵增援。二世二年冬（公元前 208 年），陈王派陈人周文（又称周章）向西进军攻打咸阳。

周文在楚将项燕手下做过事，懂得一些兵法，他西进途中不断扩充队伍，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已有车千乘，兵数十万。这支部队虽然声势浩大，但却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秦将章邯。

章邯时任二世少府。当时，周文西进的声威使秦二世以至群臣惊恐万分，只有章邯异常冷静，他说："起义军兵力强大，来势甚猛，连征召临近各县的人从军也来不及了，在骊山做苦役的囚犯和奴隶有几十万，如果把囚犯的罪赦免了，把奴隶赦为平民，发给他们兵器，倒可以抵挡一阵。"二世就大赦天下，拜章邯为大将，章邯迅速组织起一支大军，同周文作战。本来，秦朝的苛政当时已搞得天怒人怨，人心背离，兵无士气，所以周文进军以来，一帆风顺，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由于章邯手下的士兵是脱离苦役、被大赦了的囚犯和兵士，这种从社会底层解脱出来的狂喜使他们士气高涨，这就如同给苟延残喘寿数将尽的秦朝又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支强

大的军队同周文一交手，就把周文打得落荒而逃。

周文失败，只得向陈胜求救兵，可陈胜手下已无兵可派，当时，各路起义军和地方豪强正在抢夺地盘，首领们正在忙于争当大王，早就忘了攻打咸阳灭亡秦国的事了。

继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以后，又出了齐王田儋、魏王咎。

田儋是齐国的旧贵族，他乘陈王派魏人周市收复魏地后进攻狄城（今山东临济）之际，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国的力量反击周市。周市抵挡不住，只得返回魏国。

咎原是宁陵君魏王的后代，咎最初在陈王处，周市收服魏地后，魏人要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周市坚持要立魏王的后代咎为王，可陈王不愿意让原来的贵族再做国王，周市让使者到陈王处跑了五趟，陈王才让咎返回魏国去做魏王，魏王咎拜周市为相国。

陈王无法派援兵，周文只能继续溃逃，逃到曹阳（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渑池（今河南渑池西），章邯大军紧随其后掩杀过来，部队溃散，周文自杀。

吴广手下的将军田臧等人谋议："周文战败，秦军很快就会赶来，我们围荥阳又不能攻破，秦军来到后，里外夹攻，我必大败，不如留一些部队继续围荥阳，派出精兵迎击秦军。吴广骄傲，又不会用兵，要成功，必须杀掉他。"于是，他们假称奉陈胜王的命令，杀掉吴广，将其首级献给陈王。陈王让使者赐给田臧楚国令尹印，使其为上将。田臧让李归等将领继续围荥阳城，自率精兵迎击秦军，双方一交战，田臧根本不是对手，当即战死，部队溃散。章邯又进攻李归等于荥阳城下，李归战死。

十二月，章邯大军击陈，陈王败走，到了下城父（安徽省蒙城西北），他的车夫庄贾将其杀害后投降秦国，陈县陷落。陈王手下的将军吕臣带领一队奴隶军杀了庄贾，反攻陈县，把陈县夺过来又将其变为楚地，继续抗秦。

至此，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以失败告终。推翻秦朝的使命只能靠别人去完成了。

大泽乡起义失败的原因除秦朝的军事力量尚强大、革命队伍内部不团结诸因素外，陈胜本人也负有无法推脱的责任。陈胜有为将的勇气，却无为将的气量、智慧。他在陈县为王，同乡的朋友来见他，不改乡村本色，身边的官员说他们没有规矩，有损大王的威望，陈胜就斩了几个同乡，于是老朋友都不再理他，这就脱离了他赖以依靠的普通民众；他当王后，甚为高傲，他的岳父来看他，他只是当一般宾客来对待，毫无敬意；他又不善于择人，他手下的两个主事之人，一个是朱房，一个是胡武，主管群臣，以严厉苛察为忠，两人根本没有雄才大略，反而弄得众叛亲离，无人亲附。这样陈王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门连凤）

参考书目：

《史记》：《陈涉世家》、《秦始皇本纪》

刘项起兵

吴广、陈胜相继去世，农民赵义军失去了两个领袖人物，但是，由于反秦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又有无数新的起义首领产生出来，其中刘邦、项梁和项羽，终于聚集起了推翻秦朝的强大力量。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 209 年）九月，沛县（今安徽沛县）人刘邦在沛县起兵；下相人项梁、项羽在会稽起兵。

刘邦，字季，是个庄稼人，为人大度，喜施舍。他虽说是个庄稼人，可从小就不愿种地，整日里游游逛逛。到了壮年，他做了泗水亭长，算是有了正事做。刘邦这个亭长由于适逢乱世，也无心好好做这个小官，他游戏人生，好酒色，常常到酒铺赊账喝酒，店主喜欢他豪爽的性格，年终总是将他的欠账一笔勾销。由于亭长常常押壮丁或民夫去咸阳，他得以看到秦始皇的威仪，他暗自喟叹："大丈夫就该如此！"从这时起，他越发不满自己的现状，有意和天下豪杰交往。

一天，县令家来了一位贵客叫吕公，沛县的豪杰、官吏都去道贺。这种事刘邦绝不会错过，他也去了。县里的文书萧何正在门口替主人收贺礼，见刘邦这个穷小子来了，成心为难他，高声叫道："贺礼不满一千钱的坐在堂下。"刘邦素来玩世不恭，他一眼看透了萧何的心思，他头一扬说："我送一万！"这个数在来宾的贺礼中算顶了天了，于是，满座皆惊。实际上，他一个钱也没有。吕公此时也站立起来，迎到门旁。吕公素好相面，他见刘邦气度不凡，甚为敬重，引他去上坐。萧何见状，跟在后面，说道："刘邦只会说大话，哪

儿真能送一万?"刘邦挺神气地走到上座,一屁股坐下,打着哈哈说:"一万钱算什么?记笔帐吧!"

刘邦谈笑间就压倒了众人的气势。吕公更加深信自己的眼力,因为他接触的人虽然不计其数,但从未遇到过如此大度之人,尽管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客人陆续退席时,吕公一再用目光示意刘邦留下。刘邦会意,继续痛饮,留在最后。吕公告诉刘邦说:"我年青时,就好相人,相人虽多,但没有一个似你这样的大富之相,我有一女儿,愿能许配与你。"刘邦大喜,就娶了吕公的女儿吕雉。

刘邦娶了亲,可不能老在家陪着媳妇。一天,他接到县里的命令,要他送一批民夫到骊山去,为秦始皇修建大墓。由于这是一桩苦差、死差,所以,在去骊山的途中,许多民夫都逃走了。刘邦估计照此下去,到了骊山,可能一个民夫也剩不下。在丰乡西边,刘邦独自喝过闷酒,对众人说:"你们到了骊山也是送死,我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都走吧,我也不回去了。"这些民夫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随刘邦,刘邦就带领这些人藏到芒县(属沛郡,今河南永城县)、砀县(属梁国,今河南夏邑县东南)之间的山野水泽之中。一些沛县的子弟知道刘邦的义举,都来投奔他。

陈胜起兵不久占领了陈县县城,其势浩大,震动天下,各地纷纷响应。沛县县令也准备率领沛县民众起义,以响应陈胜推翻秦朝的号召。文书萧何和管监狱的曹参对县令说:"您是秦朝的官吏,如果率众起义,沛县子弟认为您是背叛朝廷,恐怕会不听从您的命令。如果您召集逃亡在外的人,可以找到几百人,有这些人在您身边,别人就不敢不听了。"县令认为有道理,就让樊哙去召唤刘邦。

樊哙也是沛县人,靠宰狗卖肉为生,和刘邦分别娶了吕公的两个女儿。由于两人是亲属,彼此相见,甚为高兴。樊哙向刘邦叙述了县令的想法,希望刘邦尽快赶回县城,共举大事。

此时,刘邦已有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正当这支队伍匆匆行路,赶到沛县城下时,县令却变卦了。他看到这几百人甚为勇武有力,

唯恐有变，命令关紧城门，严加守备。他认为萧何、曹参提出召集逃亡之人回沛县起事，是居心不良，企图里应外合。县令要杀掉萧何、曹参，两人惊恐，慌忙逃跑，到城外去投奔刘邦。

刘邦听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和萧何商量了一番，便在一块绸布上写了几句话，用箭射进城中。绸布上写道："当今天下苦于秦政已经很久了，现在四方的诸侯起来反秦，城中的百姓如果帮助县令反抗四方的义士，无异于为自己树敌，小小的沛县怎能抵御天下的义兵呢？如此下去，必遭屠城的局面，父老乡亲都要遭殃。为城中百姓着想，不如杀掉县令，选子弟中可立为县令者立之，以顺应天下，如此则家家都可保完好！"

城中的父老因为刘邦曾救过他们的子弟，素来就敬重他，如今，见他从藏身之地返回，都欣喜异常。这份绢书暗中一传，父老乡亲都称有道理。于是，父老们找了一些勇武之人，率领他们共同杀死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入城，并要立他为沛公。刘邦说："如今天下纷乱，诸侯并起，如果我们择人不善，将一败涂地。我不怕事，但担心自己才能薄劣，不能保全父老子弟，这是大事，希望大家再选胜任之人。"萧何、曹参都是文官，懂得秦法，担心日后事败，按秦法族灭其家；况且，他们觉得论才能还得数刘邦，就劝刘邦不要推辞。父老们都说："我们占卜过，选沛公数您最吉，还是不要推辞了。"刘邦仍推让，可大家谁也不愿出头，最后，刘邦答应下来，做了沛公。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为凝聚人心，扩大声势，众人举行了隆重的起兵仪式：祭祀黄帝、蚩尤于沛公的堂中，以图吉利福祥；杀牲，以血涂于鼓。由于传说刘邦过去杀过的一条白蛇是白帝子，刘邦是赤帝子，故众人崇尚红色，四处飘扬的全是红旗。

随后，萧何、曹参、樊哙分头去召集沛县子弟，没有几天功夫，就来了二三千人，沛公带领这些人进攻胡陵、方与（县名，皆属山阳郡，今山东鱼台县西），回守丰乡。刘邦命雍齿守丰乡，自己又带兵

进攻别的县城。

此时，魏相国周市派人到丰乡对雍齿说："丰乡本是大梁（魏国）的土地，现在魏国已收复了几十个城，你如果以丰乡属魏，魏国将封你为侯，让你代魏国守丰乡。如果不从，魏国攻下丰乡，全乡都得遭到屠杀。"雍齿本来和沛公不和，早就不愿在沛公属下，况且，刘邦初起，也看不出有什么前途，而魏国兵多将广，其势正猛，如果指望晋身，还是得依靠魏国。于是，城头大旗一变，雍齿反戈为魏国守丰乡。沛公怒而带兵来攻，未下，又气又急，发病，又带兵返回沛县。不久，刘邦听说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沛县东南），就带兵去投奔他们，想请他们派兵攻丰乡。此时，秦将章邯的别将司马展北进进攻陈胜的楚地，开始进攻砀。东阳宁君、沛公顾不上打丰乡，赶快带兵西进，与司马展在萧县（今安徽萧县）西边作战，未胜，收兵回到留，再次攻打砀，三日才攻下来，又从砀聚拢散卒五六千人，转攻下邑（今安徽砀山）。攻陷后，沛公又带兵回到丰乡。这时，他听说项梁已起兵，在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就骑马带一百余人去见他。项梁拨给沛公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随沛公返回，再次攻丰乡。雍齿抵挡不住，逃到魏国。丰乡一攻下，沛公便有了稳固的立足之地。

在刘邦起兵的同时，项梁、项羽在会稽起兵。两人都是楚国人。项梁是楚将项燕之子，因为杀人，与哥哥的儿子项羽避仇躲到吴中（今江苏吴县）。在那里，项梁由于武艺高强，又通兵法，带出了一批武艺超群之人。项羽不听调教，少年时，学书，不成，半途而废；学剑，又不成，项梁怒。项羽说："学书，只能用来记记姓名；学剑，只能用来自己防身，不值得学。我要学带领成千上万人作战的本领。"于是，项梁教项羽兵法，项羽大喜。但他做事没有耐心，略知其大意，就不肯再深学了。他虽然学业不精，但才气过人，力大无比，天生是一个将领的材料，吴中的少年才俊都敬畏他。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七月，陈胜、吴广于大泽乡起义，

九月，会稽守殷通对项梁说："长江以西都起来反秦了，这正是灭亡秦朝之时。常言说，先动，即驾驭别人；后动，即为别人所驾驭。我想发兵举事，想让您和桓楚做我的将领。"当时，桓楚正逃亡在外，项梁说："桓楚逃亡，别人都不知他的去处，只有项羽知道。"项梁说罢，就出去告诉项羽持剑在外面等候。随后，项梁又回到室内，与会稽守坐在一起，对他说："请召项羽来，您亲自授意，让他去召桓楚。"殷通说："好！"项梁让项羽进来。一会儿，项梁对项羽说："可以行事了！"于是，项羽拔剑斩会稽守殷通头。项梁手提殷通头，佩带他的印绶。府里的官员、卫士、随从大惊，一片混乱。项羽乘乱杀死近百人，府中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趴在地上不敢起来。项梁乃召唤过去了解的可靠的官吏，告诉他们为了反抗秦朝暴政，所以才杀掉秦朝的守令。经过抚慰，人心初定。项梁带领平日跟他们练武的吴中子弟，占领了附近的县城。当地的百姓早就痛恨秦朝的暴政，人人心中大快，许多青年才俊纷纷前来投奔项梁。几天时间，就聚起精兵八千人。兵员已足，项梁便一一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平日熟知的贤能之士，各得其所，只有一人未被启用。他找到项梁，项梁说："不久前，某人去世，让你主办一件事，你未能办好，所以，不能任用你。"众人见项梁早就对人有仔细的观察，都被震慑住了。项梁自立为会稽郡守，立项羽为偏将。当时，项羽只有二十四岁。随后，项羽带着几百名士兵去攻打临近的县城。

当时，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召平为楚王陈胜攻击广陵，未能攻取，他听说陈胜王已败于秦国大军，秦兵很快又要打过来，就渡江假奉陈胜王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告诉他："江东现在已经平定，陈王命您赶快带兵西向攻击秦国。"项梁、项羽就率八千子弟兵渡江向西进发，准备先去收复广陵。这时，他们听说陈婴已经攻下东阳（属广陵，今安徽天长），就派使者去同他联络，准备和他联合起来一同西进。

此时，陈婴正在为队伍无首领面郁闷，见项梁派来使者，大喜，

认为项梁可担当大任。原来，陈婴是东阳县的一个文书，在任上的时候，素来言行谨慎，讲究信义，被城里的人称为忠厚长者。东阳少年响应陈胜王，杀掉县令，聚集起数千人，想找一首领，无人适合，于是找到陈婴。陈婴称自己没有能力，不能胜任，不愿出头，可几千人强立陈婴为长。一县之中，追随者达二万人。县城里原来的一些士兵也拥护他。人多势众，大家又想让陈婴为王。这时，陈婴的母亲出来阻拦了。她说："自从我到了你们家，未曾听说过你家祖上有大富大贵之人。今天，暴发而得大名，太不吉祥了，不如归附别人，事情成了，可以封侯；事情败了，可以逃亡，不至于被人指名点姓地搜捕，搞得世人皆知。"陈婴听了母亲的一番话，乃不敢为王。他见项梁的使者，就对众人说："项家世世代代做楚国的将军，在楚国人人皆知，今天要举大事，非项将军莫属。我们依靠楚国的名族，准能灭掉秦国。"众人听从他的意见，二万人尽属项梁。不久，又有英布、蒲将军以兵属项梁，使项梁手下的兵员一跃达六七万人。项梁将总部设在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当时，广陵(今安徽宿迁县东南)人秦嘉乘各地起义之机，自立为大司马，听说陈王已死，就立前楚国的贵族景驹为楚王，驻扎在彭城(今江苏铜山县)，想抗拒项梁。项梁对部将们说："陈王率先起义，作战不利，不知道现在何处，但无论如何，秦嘉不该背叛陈王另立景驹为楚王，这是大逆不道。"于是，率兵攻击秦嘉。秦嘉军败走，在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秦嘉与追击的项梁军打了一天，兵败，秦嘉死，军队投降，景驹逃走后不久也死了。项梁又合并了秦嘉的部队，驻扎在胡陵。正欲继续向西进攻时，秦国章邯大军来到栗(县名，在沛县旁)。项梁让将军朱鸡石、馀樊君去迎敌。馀樊君战死，朱鸡石败走胡陵。项梁就带大军进了薛城，杀掉朱鸡石，让项羽转攻襄城(今河南襄城)，襄城防守严密，经过苦战才攻下。项羽怒，将守城的士兵全部活埋。这时，项梁听说陈胜王已死，为了研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他召集楚国各方将领在薛城开会，刘邦也前来参加。

会议正要商议再立楚王的时候，一位七十岁的居鄛(今安徽巢县)人范增前来求见项梁。项梁见来者虽然年事已高，却头脑清晰，反应敏捷，便对他甚为敬重，毕恭毕敬地请他就立楚王事谈谈见解。范增也不客气，立刻讲了一番道理。他说："陈胜失败是必然的，关键是他在立楚王之事上失算了。昔日秦国灭六国，楚国最为冤屈，怀王死在秦国，楚人至今仍怜惜他，故楚国善观阴阳者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举事，不立楚王的后人而自立为楚王，就注定他的势运不会长久，因为不便于争取楚国人心。你今日起于江东，楚国的将领一窝蜂地追随你，就因为你家祖祖辈辈做楚国的大将，认为你能带领大家恢复楚国，立楚王的后人为王。"于是，项梁听从范增的意见，从民间找寻楚王的后代，结果在放羊的孩子中找到了楚怀王的一个叫"心"的孙子。因为大家仍怀念楚怀王，项梁就和众人商议立他为楚怀王，以顺应人民的愿望。怀王立，乃拜陈婴为上柱国，封给他五个县，与怀王一同驻都城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队伍休整了几个月，项梁、项羽又带兵进攻亢父(今山东济宁市南)，又大破秦军于东河(山东阳谷县东北)，并追击秦军。项梁又让沛公和项羽转攻城阳(今山东莒县)，攻下后，项羽再次屠城。随后，项羽、沛公又在濮阳东击败秦军，秦军退缩到濮阳城里，濮阳一时攻不下，项羽、沛公攻定陶(今山东菏泽县南)，也未攻下，又西去扩张地盘，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大败秦军，斩丞相李斯的儿子大将李由。李由当时任三川守，三川乃关中门户，地位极其重要。李由被斩，表明关中已经失去了主要屏障。

陈胜、吴广去世后，农民起义的势头一度受挫，刘邦、项梁和项羽起兵后，起义的势头又一次高涨起来。 (门连凤)

参考书目：

《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

李斯之死

李斯，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他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数十年活动经历，与秦王朝的兴建和衰亡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帮助秦始皇完成统一全国大业以及在文字著述、书法等方面，李斯都是有所贡献的；但是秦王朝作为一个残暴的短命王朝，使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到灾难性打击，并在历史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作为主要决策者之一的李斯是难辞其咎的。一生玩弄权术，不择手段地追求功名利禄，最终却死于赵高的谗言陷害，这就是李斯的悲剧。

李斯约公元前281年出生于一个“闾巷布衣”之家，年轻时曾在郡里做过管理文书的小官吏，他见到吏舍附近厕所中的老鼠在吃脏东西，经常被人、狗所惊吓，而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不用担心受到人、狗的惊扰。由此李斯感慨地叹息道：“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因不满自己“卑贱”、“穷困”的社会地位，李斯弃职跟从荀卿学习帝王治理天下的学问。他虽然在学术上对荀卿有所继承，但是其政治观点却与荀卿有很大差别，在思想体系上也不尽相同。在一次讨论“仁义”问题时，他们师徒之间就曾发生了争论。李斯认为：“秦国四世都打胜仗，兵力在四海之内最强，威名在诸侯中传播，并不是以仁义来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过是怎么便利就怎么去做罢了。”荀卿则对他进行批驳说：“你所说的便利，并不是真正便利的便利。

而我所说的仁义，才是有很大便利的便利。仁义的实质，是用来治理政治的。政治治理好了，民众就会与上层统治者亲近，拥戴国君，毫不犹豫地为君主去牺牲自己。秦国虽然四世都打胜仗，但还是经常恐惧天下各诸侯国联合起来颠覆自己，这是乱世的用兵方法，还没有建立起仁义的根本。现在你不寻求根本的仁义而求取表面的便利，这是世道所以混乱的原因。”

当时，七国争霸，战争不断。在战国七雄中，魏、韩、燕、齐、赵等诸侯国相继衰弱；李斯所在的楚国，虽然国大人多，也因为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在争霸斗争中屡遭挫败，同时国内的几次变法改革活动都没能获得成功，朝政大权被腐朽的旧贵族势力所把持。只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国势最为强盛，而且比较重视“客卿”的作用。

鉴于这样的形势，李斯学业完成之后，估计昏庸的楚王不足以成大事，东方六国都没有建功立业的希望，就决定西行到秦国去。他向荀卿辞行时说：“我听说一个人如果遇到机会不应该错过，如今各个诸侯国都在争取时机，游说的人掌握实权。现在秦王想吞并全天下，称帝而进行统治，这正是平民出身的人和游说的人四处奔走施展抱负的好时机。处在卑贱的地位而不想着去改变，就好像等见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的禽兽一般，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所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困苦的环境，却还非议社会而厌恶功利，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人的本愿。所以我将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李斯来到秦国，正好赶上秦庄襄王病死，面继位的秦王嬴政尚年幼。秦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当权，李斯遂投到其门下请求当“舍人”，他的才能很快受到吕不韦的器重，被任命为秦王的侍卫官——“郎”。当时吕不韦正主持编写《吕氏春秋》，李斯可能参与了此书的写作。此后，李斯利用其职务接近秦王之便，多次陈述自己的

政见，他对秦王嬴政说："平庸的人往往失去时机，而成大功业的人，在于他能够把握时机而且敢于下狠心。以前秦穆公称霸的时候，终于没有能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诸侯的人数还很多，周朝的威望还没有衰落，所以春秋五霸相继兴起，都还推尊周王室。自从秦孝公以来，周王室卑弱衰微下去，各诸侯国相互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了。现在诸侯服从秦国，就好像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能，像扫去灶子上的灰尘一样，就可以灭掉诸侯，成就帝业，实现天下统一，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极好时机。如果现在懈怠而不抓紧此事，诸侯一旦强盛起来，聚集在一起订立合纵盟约，那时虽然有黄帝一样的贤能，也不能吞并六国了。"李斯的主张正与嬴政兼并六国"成帝业"的志向相合，于是李斯被任命为长史，后来又当上了客卿。秦王嬴政听从了他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各诸侯国中的名士可以收买的，就送上厚礼加以收买；不愿被收买的，就用利剑刺杀他们。随后，秦王派精兵强将进攻，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公元前238年，嬴政加冕亲政，发生嫪毐叛乱。第二年吕不韦也因与嬴政的权力之争而被免相，迁往河南。由于吕不韦的门客多为客卿，所以秦国的一些宗室大臣乘机打击客卿。正好这期间韩国派水工郑国来秦为间谍，企图通过劝秦国修水渠消耗秦国力量，减轻对韩国的压力，但他的计谋被识破了。秦国的宗室大臣们更加紧要求秦王嬴政驱逐客卿，他们向嬴政进言说："各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事的，大都是为其宗主国来游说离间秦国的，请大王驱逐所有的客卿。"虽然李斯在嬴政与吕不韦的争权斗争中，一直持观望态度，此时仍不免受到影响，也被列入了驱逐的名单之中。

在被驱逐的途中，李斯决定孤注一掷，向秦王嬴政上书痛陈利害："臣下听说官吏们议论驱逐客卿，我私下认为过分了。以前穆公招揽人才，西边从戎找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

迎来了蹇叔，从晋国请来了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都不是在秦国出生的，而穆公重用他们，兼并了二十个诸侯国，因此得以在西戎称霸。秦孝公采用了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民众因此殷实兴盛，国家因此富足强大，百姓们愿意为国效力，诸侯们对秦国亲善服从，俘获了楚、魏国的军队，攻占了千里土地，至今社会安定国家强大。惠王采用了张仪的计策，攻取了三川地区，向西兼并了巴、蜀，向北接管了上郡，向南攻取了汉中，囊括九夷地区，控制了鄢、郢，向东发展占据了险要的成皋，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并进一步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服从西方的秦国，功业一直持续到现在。昭王得到范雎，废黜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使公室强大，杜绝了私门发展权势，蚕食诸侯的土地，使秦国奠定了统一天下大业的基础。这四位国君，都是依靠客卿建立的功业。由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而不接纳他们，疏远游士而不重用他们，就会使秦国既没有实际的富足也没有强大的威名了。

“现在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得到随侯珠、和氏璧这样的宝贝，戴着像明月一样的珠子，佩着太阿宝剑，乘坐着纤离马，挂着翠凤旗帜，使用着灵鼍鼓。这几件宝物，没有一样是秦国出产的，但陛下非常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必须是秦国出产的东西才使用的话，那么夜光玉璧就不能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制品就不能供您赏玩，郑国、卫国的美女就不能住在您的后宫之中，駃騠良马就不能喂养在您的马棚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您要追求眼前的快乐，满足自己观赏的需求而已。现在选用人才却不是这样，不问一个人能不能用，不论他的是非功过，凡不是秦国人的全都辞退，凡是客卿的全都驱逐。这样看来您所重视的是女色、音乐、珍珠、宝玉，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才和民众了。这可不是统一海内制服诸侯的气概啊。

“臣下听说土地辽阔粮食产量就多，国家广大人口数量就多，军队强大士卒就勇敢。因为泰山不排斥泥土，所以才能堆积得那么

高大；因为河流海洋不挑剔细小的溪流，所以才能汇聚得那么深广；因为成就王业的人不抛弃民众，所以才能显明他的德政；地不论东南西北，民众不分什么国家，一年四季五谷丰登，鬼神降下福泽，这就是五帝、三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现在您准备抛弃民众让他们帮助敌国，排斥客卿而使他们为其他诸侯国出力，使得天下的士人后退而不敢向西方来，停下脚步而不再进入秦国，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给敌人武器又送给强盗粮食'。

"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值得珍视的不少；不是秦国出生的士人，愿意效忠的众多。现在您驱逐客卿而使他们帮助敌国，损害民众而使仇人得到益处，在国内使自己受到了削弱而对外又与各诸侯国结下了怨恨，这样做要想使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啊。"

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在这里巧妙地列举了历史上由余、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客卿担任相国时为秦国立下的功劳，但是鉴于形势，他唯独没有提及曾为秦国立过大功，对李斯本人也有过大恩的吕不韦。《谏逐客书》辞意恳切，有很强的文字感染力，秦王嬴政被此文所打动，废除了"逐客令"，派人追到骊邑召回了李斯，并恢复了他的客卿职位，后来又提升他做了当时在秦国有很大权力的廷尉。

"逐客令"废除后，各国名士纷纷来秦，他们出谋献策，帮助秦王向东方六国用兵。李斯逐渐成为了客卿集团的核心人物，他继续执行了秦惠王时司马错和秦昭王时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并负责具体实施由大梁来到秦国的兵家学者尉缭提出的离间六国君臣之计。李斯借助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亲往韩国作说客，迫使韩王安向秦国献玺称臣并派韩国公子韩非入秦。

韩非来到秦国后向秦王上书建议"先攻赵后灭韩"，这与李斯等人"先灭韩"的主张明显对立。李斯在与韩非同学于荀卿时就自认为不如韩非，非常嫉妒韩非的才学，怕一旦"秦韩之交亲"，韩非受到重用，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他伙同姚贾在秦王嬴政面前极

力诋毁韩非有"弱秦"的阴谋。这时李斯已得到秦王充分信任，而嬴政对刚入秦的韩非虽然"悦之"，但还接触不多，未予信用，加上韩非有口吃缺陷，远不如李斯的巧言善辩，所以在李斯等人的合谋诬陷下，秦王同意将韩非关进监狱。韩非在狱中为了活命想上书秦王表明心迹，李斯则出于私心不敢让他上书，赶在秦王赦免韩非以前派人送毒药逼他自杀了。就这样，李斯在维护秦国的统一大业的旗号下，利用职权除掉了自己政治上潜在的对手。

秦用十年时间灭掉了东方六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摆在秦统治集团面前的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巩固统一，当时有实行分封制和实行郡县制两种意见。丞相王绾等进言说："诸侯刚刚被消灭，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如果不在那些地方封王，就无法加以镇抚。请封立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秦始皇把他的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说这样做有利。廷尉李斯则议论说："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然而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像仇人一样互相攻击，各诸侯国间彼此征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四海之内靠着陛下获得了统一，如果都划分成了郡县，用公家的赋税收入重重地赏赐各位皇子和功臣，他们就会很满足而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的人没有邪异之心，才是使国家安宁的好政策。分封诸侯没有好处。"秦始皇说："天下连年争战无休无止，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依靠祖先神灵的保佑，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那时再想求得安宁太平，岂不是很困难吗？廷尉说得对。"李斯的主张被采纳，他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秦始皇的武威盛德。齐人淳于越劝谏说："臣下听说，殷商和周朝统治了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臂膀辅翼。现在陛下统治着全天下，但子弟们却还是平民百姓，如果突然出现田常、六卿篡夺权位的祸患，朝廷大臣中又没人能够辅佐时，靠什么来救援呢？不学习

古代的统治经验而能长期存在的政权，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当面阿谀奉承以加重陛下的过错，不是忠臣啊。”秦始皇把这种议论交给已当上丞相的李斯处理，李斯认为淳于越的说法是荒谬的，废弃不用，并且决意把这次争论扩大化，用粗暴的专制手段压制不同意见，他迎合秦始皇“定于一尊”的独裁心理，上书说：“古时候天下分散混乱，不能统一起来，就是因为各诸侯国并立，有人称颂古代以否定当代，修饰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社会现实，人们都认为自己学派的理论最好，用它来否定皇上的政策法令。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曲直而使全国都尊崇皇帝一人；但是那些私家学派却在一起批评朝廷的法令制度，听说法令颁布下来，立即以各自学派的观点来议论它，回家时心中不满，出门时则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褒贬君主来博得名声，发表与朝廷不同的看法来显示清高，煽动下层民众来制造诽谤。这样下去而不加以禁止，上而君主的权威就要下降，下而百姓就会结成许多党派，最好加以禁止。臣下请求陛下同意，史官除记载秦国历史的典籍全部焚烧掉。除博士官所掌的之外，天下敢有私自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都要送到郡守、郡尉处一起毁掉。有敢于谈论《诗》、《书》的斩首示众，以古代否定当代的人连族诛灭。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同样治罪。命令颁布三十天后还有人不烧书的，罚他在脸上刻字并做筑城苦役，发配边疆。不在清除之列的，是医药、占卜、农艺等方面的书。若有人想学习政治法令，可以请官吏为老师。”秦始皇批准了他的建议，没收了《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以便使百姓愚昧无知，使天下的人无法用历史上的事来批评当今的朝廷。明确法制程序，制定律令条文，都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李斯主持制定的秦律，酷刑峻法，名目繁多，甚至规定：有敢于私自挟带书籍的人，处以族刑。他们实行的专制政策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保存到汉代的当时秦零陵县令的一封信中，就有责难李斯的内容。

李斯固然是古代文化的破坏者，但他也有某些建树，他曾受秦始皇之命，在秦统一后负责统一文字的工作，在他的倡议下，以在秦国流行的小篆字体为国文，通用全国。李斯本人也“号为工篆”，他的笔法秀丽圆润，“质而能壮”。他所作的《苍颉篇》等，都使用了小篆字体。

另外，在全国各地修建离宫别馆，陪同秦始皇到处巡游视察以及平定周边少数民族等方面，李斯都积极参与，出了不少力。

在秦始皇的长期宠信下，李斯位极人臣。他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都娶了秦国的公主，女儿们都嫁给了秦国的皇族子弟。三川郡守李由请假回咸阳时，李斯在家里设下酒宴，文武百官都前来给李斯敬酒祝贺，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李斯慨然长叹说：“唉呀！我曾听荀卿说过‘事情的发展不要过了头’。我李斯原来是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百姓，皇上不知道我才能平庸，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位置上。现在做臣子的没有人比我职位更高的了，可以称得上是富贵荣华到了极点。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开始衰落，我还不知道今后吉凶祸福会怎么样啊！”

有一次，秦始皇临幸梁山宫，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的随从车马前呼后拥，很不高兴。宦官近臣里有人把这件事暗中告诉了李斯，李斯以后就减少了车马数量。这件事说明了李斯行事谨慎。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李斯和赵高、胡亥等人陪同秦始皇巡游到会稽山，后又沿海边北上，到达琅邪山。这一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事后，李斯出于私心，与赵高合谋伪造了始皇书信，诈称李斯受始皇遗诏，立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二世皇帝，逼死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公子扶苏。此后李斯仍任左丞相，地位并没有提高，而赵高却当上了郎中令，实际操纵了政权。

秦二世和赵高当权之后，不仅大批杀害先朝的公子和大臣，而且刑法更酷，赋敛更重，越发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李斯企图挽救秦王朝的统治，多次想上书进

谏,建议变革,但遭到了秦二世的拒绝和申斥。这时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因不能阻止吴广等人攻占地盘,受到调查,派到三川去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朝中舆论也责怪李斯身居三公的高位,却让"盗贼"如此猖狂。李斯感到害怕,又把爵位俸禄看得很重,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就曲意逢迎二世的心意,想以此求得宽容。他上书对二世说:"贤能的君主,必定是既能全面掌握为君之道又能对下行使督责统治术的人。对下加以督责,大臣们就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卖命。这样臣子和君主的身份确定了,上下的关系准则明确了,那么全天下不论有没有才能的人都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国君卖命了。因此君主才能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能享尽极大的乐趣。贤能的君主,不可以不了解这些!

"申不害说过'占有天下而不懂得放纵情欲,就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枷锁'的话,这不是别的意思,就是讲不能对臣下进行督责,自身反而为天下百姓辛苦操劳,像尧、禹那样,所以称之为'枷锁'。如不能学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实施督责的政策,专心使天下为自己的享乐服务,而只是白白地费力操心,拼命为百姓干事,那就是百姓的奴仆,算不上拥有天下的帝王,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别人为自己卖命,就自己尊贵而别人卑贱;让自己为别人卖命,就自己卑贱而别人尊贵。所以他给人家卖命的人卑贱,人家给他卖命的人尊贵,从古代到现在,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有才能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尊贵;之所以厌恶没有才能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卑贱。而尧、舜是自身为天下百姓卖命的人,如因袭世俗的评价而尊崇他们,也就失去了所以尊贤的用心了,这可是大大的错误。把这样做也看作是一种'枷锁',不是很合适的吗?这是不能实行督责政策的过错。

"所以韩非说过'慈爱的母亲会养出败家的儿子,严厉的主人家中不会有强悍的奴仆'的话,为什么呢?这是能够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规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就要判刑。撒灰

的行为，本来是轻罪，却要处之以重刑。只有贤能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责轻罪。轻罪尚且严厉督责，何况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长久地处在被尊崇的地位上，长期执掌大权，独自垄断天下利益，其原因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而在于他们能够独揽大权而精于督责，对犯法的人坚决从重惩罚，所以天下的人不敢犯法。现在不制订防止犯罪的措施，却仿效慈母养成败家子的做法，那就太不了解前代圣贤的论述了。不能按圣贤治理天下的方法行事，除了给天下的人当奴仆还能做什么呢？这可太令人感到悲伤了！

"更何况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中任职，那荒诞放肆的乐趣就得中止；爱规劝讲道理的大臣在身边干预，浪漫无忌的念头就得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在世上受到表彰，纵情享受的乐趣就得放弃。圣明的君主能够远离这三种人，而独自掌握统治大权以驾驭言听计从的大臣，建立严明的法制，所以自身尊贵而势威权重。凡是贤能的君主，都必定会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除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才有尊贵的威势，他死了以后才有贤明的谥号。因此说贤明的国君专制独裁，才使权力不落人臣下手中，然后就能断绝通向仁义的道路，堵住游说者的口舌，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上眼睛塞住耳朵，任凭自己独断专行，对外不至于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对内不至于被批评劝谏的争辩所迷惑，因此才能卓荦独行为所欲为而没有人敢反对。像这样做了以后才可称得上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思想，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手段。学会了法制手段理解了统治思想而天下还会大乱，是从来没有听说的事。所以说'帝王的统治是简约而容易做的事'。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这样做。这样才算是很好地实行督责了，臣下就没有离异之心了，臣下没有异心天下就安宁了，天下安宁了君主就有了尊严，君主有尊严督责就能严格执行，督责严格执行就能满足许多需要，满足了需要国家就富裕了，国家富裕君主就可以享受得更多。

所以督责统治术一实行，您的欲望就没有不能满足的了。群臣和百姓们想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造反？像这样就是掌握了帝王的统治艺术，明白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就算是申不害、韩非复生，也不会超过了。”

秦二世看了非常高兴，于是更加严厉地实行督责，全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尽管李斯阿顺苟合，助纣为虐，赵高仍认为他是自己阴谋篡权的障碍。他对秦二世说，李斯不满足于现在的地位，有割地封王的企图，并且诬陷其子李由与陈胜、吴广起义军有书信往来。二世信以为真，立即派人进行调查。李斯听到了这个消息，意识到大祸将临，退避已不能保身，就上书秦二世揭发赵高的短处说：“臣下听说，大臣同他的国君并列，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小妾同他的丈夫并列，没有不危害家庭的。现在有的大臣代替陛下擅自赏罚，权力和陛下没有区别，这是非常不妥当的。从前司城子罕在宋国做相，自己掌握刑罚大权，用威权行事，一年以后就劫持了国君。田常是齐简公的大臣，爵位高到全国没人能比得上，其私人家里的财富和公家的一样多，他散布恩惠实施德政，下边得到百姓的爱戴，上边得到群臣的拥护，暗中窃取了齐国的权力，在庭院里杀死了宰予，又在朝廷上杀死了齐简公，控制了齐国。这些事天下的人都是很清楚的。现在赵高有奸邪过分的企图，险诈叛逆的行为，如同子罕在宋国为相时一样；他私人家里的财富，好像田常在齐国时那么多。他同时具有田常、子罕的叛逆行为而又窃取了陛下的威信，他的志向就像韩玘做韩王安的相时一样。陛下如不早打算，臣下担心他会发动叛乱。”二世没有听李斯的话，反而劝他不要怀疑赵高。于是李斯又进谏说：“不对呀。赵高这个人，以前是个低贱的家伙，不懂得道理，贪得无厌，求利不止，权位势力仅次于君主，但他追求地位和权力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臣下说是很危险的。”无奈这时秦二世已深信赵高，不但不接受李斯的请求，反而听信了赵高的谗言，下令

逮捕李斯，交由赵高审讯。

李斯被套上刑具，关在监狱中，仰天长叹说："唉呀，可悲啊！无道的昏君怎么能给他出谋划策呢？从前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这三位大臣，难道不忠吗？然而不能免于被害死，他们虽然尽忠而死但所忠于的对象错了。现在我的智慧比不上他们三人，而二世的昏庸无道超过了夏桀、商纣、夫差，我因尽忠而死，是应该的啊。况且二世的统治不是胡来吗？日前杀光了他的兄弟而自立为皇帝，还杀害忠臣而重用低贱的人，为修建阿房宫，在全国横征暴敛。我不是没有劝谏，而是他不听我的呀。凡是古代圣明的君王，饮食都有节制，车马器物都有控制，宫殿都有限度，增加费用支出而对民众无益的事情一律禁止，所以能够长治久安。现在他对自己的兄弟无情无义，不顾及会有报应；残暴地杀害忠臣，不考虑会有后患；大肆修筑宫殿，对天下百姓征收很重的赋税，花费钱财不懂得珍惜。有了这三方面的行为，天下的人就不会再听从命令。现在造反的人已占全天下的一半了，而他心中还没有醒悟，仍然任用赵高为辅佐，我一定会见到盗贼打进咸阳，朝廷将会变成野兽嬉游的地方。"

秦二世派赵高审理李斯，查问李斯和其子李由谋反的情状，把他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全逮捕起来。赵高拷问李斯，打了他一千多下，李斯忍受不住疼痛，自己冤屈地招供了。他之所以不自杀而死，是因为自负能言善辩，立过功劳，确实没有反叛之心，如能上书为自己辩护，希望二世能觉悟而赦免他；同时也想拖延时间，以便让握兵在外的李由及朝中的同情者设法相救。李斯在监狱中上书说："臣下担任丞相，治理百姓三十多年了。那时秦国的土地还很狭小。先王在位时秦国也不过有土地千里，军队几十万人。臣下竭尽绵薄的才智，谨慎地奉行法令，暗中派遣谋臣，资助他们金玉财宝，让他们到各诸侯国去游说，再暗中整顿军队，整治政治和教化，提拔作战勇敢的人当官，尊崇有功的文臣武将，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和俸

禄，所以终于得以胁迫韩国，削弱魏国，打败了燕国、赵国，扫平了齐国、楚国，最后兼并了六国，俘虏了他们的君王，拥立秦王为天子。这是我的第一条罪过。秦国的国土并不是不广阔，却还在北方驱逐胡人、貉人，在南方平定百越，显示秦国的强大。这是我的第二条罪过。尊重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用来巩固他们同秦王的亲密关系。这是我的第三条罪过。建立社稷，修缮宗庙，以显示君主的贤明。这是我的第四条罪过。更改尺子衡器上所刻的标志，统一度量衡标准，用统一的文字颁行天下，以树立秦王朝的威名。这是我的第五条罪过。修整驰道，兴建游览观光场所，以显示君主的志满意得。这是我的第六条罪状。减轻刑罚，减少税收，以便使君主赢得民众的心，让万民至死都拥戴国君。这是我的第七条罪状。像我李斯这样当大臣的，所犯罪过足够处死刑已经很久了，只是皇上希望我尽一点余力，才让我活到现在，请求陛下了解这些。"但是李斯的希望落空了，奏书呈上后，赵高指使狱吏丢掉而不交给二世。其子李由也在雍丘（今河南杞县）被起义军所杀。朝廷中的其他大臣则慑于赵高的淫威，不敢相救。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李斯被安上五条罪状，判处在咸阳街市上腰斩。李斯走出监狱时，同他的次子一起被押解着，他回头对次子说："我还想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追逐野兔，又怎么能办得到呢？"于是父子相对哭泣。三族内的亲人都被处死了。

李斯死后，秦国的大权全部落入了赵高手中，秦王朝的统治更加分崩离析，不久就灭亡了。

（徐　勇）

参考资料：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老子韩非列传》、《河渠书》

《韩非子》：《存韩》

《荀子》:《议兵》
《云梦秦简》
《苍颉篇》
《新序》
《汉书》:《艺文志》
《学古篇》

二世之死

二世皇帝，是秦始皇的第十八子，名胡亥。在始皇病死沙丘以后，他与赵高、李斯合谋政变，继承了帝位。这一年，胡亥二十一岁。秦二世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的残暴统治，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仅仅三年多时间，就使秦政权的统治基础彻底崩溃了，随着秦二世被杀死，秦王朝的丧钟也敲响了。

始皇被安葬在郦山墓后，二世宣布说："先皇帝后宫嫔妃中凡没有子女的，不能放她们出去。"残暴地下令把这些嫔妃全部殉葬。下葬已结束后，有人说工匠们制造了机关器具，他们对墓中布局及所藏宝物都知道，这样随葬贵重宝物的消息难免会泄露出去。于是当隆重的丧礼完毕，随葬宝物也已藏好后，二世下令封闭了墓道的中门，又把墓地最外面的一道门放下来，结果工匠们全部被封闭在墓道里边，没有一个人能出来。为掩人耳目，在墓上还栽种了草木，从外边看上去好像一座山。

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赵高担任了郎中令，执掌朝廷大权。十月戊寅，二世宣布对罪人实行大赦，但紧接着，在十一月就调这些劳动力去营建免国。秦二世还下诏增加始皇祠庙里用来祭祀的牲畜数量，以及各种祭祀山川的礼品，命令大臣们讨论推尊始皇庙号的事。大臣们都叩着头说："古时候天子的祖庙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即使是万代以后也不能废除。现在始皇的庙是至高无上的，全天下的人都要贡献祭品赋税，增加祭祀用的牲畜，礼品要全部具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先王庙有的在西雍，有的

在咸阳。按照天子的礼仪，应当单独用经多次酿制而且质醇的好酒祭祀始皇庙。襄公以下的庙都废除，仍然保留的共七座庙。各位大臣都依照礼仪进献祭祀，推尊始皇庙为皇帝庙的始祖。皇帝仍自称‘朕’。”

秦二世与赵高商议说：“我年纪轻，刚刚即位，百姓们还没有顺从。先皇帝巡幸视察各郡县，以显示他的强大力量，威势震服海内。现在我安然地住在皇宫不出去巡游，就会让人认为我无能，没有办法统治天下。”于是到春天，二世就仿效始皇东行巡视郡县，丞相李斯跟随着，到达碣石，又到了海边，沿海岸线向南来到会稽，在原先始皇所立石碑上都刻上字，碑石旁都增刻上随从大臣们的名字，认为这样可以使先帝的功业盛德更加明显。增刻的碑文为：“皇帝说：‘金石碑刻都是始皇帝所建造的。现在我承袭了皇帝名号，可是金石碑刻的文字中没有称始皇帝，以后年代久远了，就好像是后代子孙建造的，这样就不能称颂和发扬始皇帝的功业和盛德。’丞相臣李斯、臣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冒死罪进言：‘我们请求把诏书全文刻在石碑上，这样就记载明白了。我们冒死罪请求。’制书批复说：‘可以。’”

二世接着又去了辽东，然后返回咸阳。

二世在宫中闲着无事，就把赵高叫来一同商议，他对赵高说：“人活在世界上，就如同驾着六匹马的车从缝隙间飞过一样短暂。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了，想全部满足耳目方面的一切欲望，享受尽我所能想到的一切乐趣，使宗庙安宁而百姓归顺，永远占有天下，平安享我天年，这种想法能行得通吗？”赵高回答说：“这对于贤明的君主来说是能够做到的，而对昏乱的君主来说是应禁忌的。臣下请求说一句话，不敢回避遭到杀头的危险，希望陛下稍微注意一点。对于沙丘的密谋策划，各位公子和大臣都有怀疑，而这些公子都是皇上的兄长，大臣也都是先帝的旧臣。现在陛下刚刚即皇位，这些人的心里都有怨恨，不服气，恐怕他们会有变故。一想到这些，

臣下就提心吊胆，生怕会有不好的结果。陛下您又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安心享乐呢？”二世问：“那应该怎么办呢？”赵高趁机出主意说：“实行严峻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把犯法的和受到株连的人全都杀死，直至灭族，除掉重要的大臣而疏远您的骨肉兄弟，给贫穷的人一点财富，给卑贱的人一点恩宠，把先帝的朝廷旧臣全部铲除，另外任命陛下亲近和信任的人并让他们在您身边。这样就使一些人从心里对陛下感恩戴德，根除了隐患而杜绝了奸诈的阴谋，群臣没有谁不得到您的恩泽，承受您的厚德，陛下您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纵情享乐了。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二世采纳了赵高的建议，重新修订了秦律，申明法令。

不久，二世又暗中与赵高谋划说：“大臣们对我的做法都不服从，官吏们的影响力也还很强，还有各位公子必然要同我争权，我该怎样对付他们呢？”赵高说：“有些话臣下本来就想说而没敢说。先帝在位时的大臣们，都是连续好几代名望显赫的人物，建功立业世代相传已经很久了。我赵高生来卑贱，现在幸蒙陛下抬举，让我身居高位，管理宫廷事务。大臣们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表面上顺从我，实际上心里不服气。现在皇上巡视过了，何不借此机会查办郡县守尉中有罪的人，把他们杀掉，这样，在上可以使皇上的威严震慑天下，在下可以除去皇上一直看不上的人。现在的形势不能依靠文治而应取决于武力，希望陛下当机立断，不要犹豫，那么大臣们就来不及谋算了。圣明的君主招揽提拔那些闲杂人员，恩宠那些地位卑贱的人，赏赐那些经济贫困的人，接近那些被疏远的人，这样就能使上下归心而国家安定了。”这些话很对二世的心思，他连声说好。

于是二世根据他们重新修订过的法律判定许多大臣和各位公子、公主都有罪，把他们抓起来交给赵高，由他负责审讯法办，先后杀死了大臣蒙恬、蒙毅等人，并制造罪名进行株连，逮捕了中郎、外郎、散郎等近侍小臣，几乎没有人能免受处罚，许多公子在咸阳和

杜县被斩首示众，十个公主则在杜县被分裂肢体而处死，他们的家产财物全部没收归皇帝所有，受到株连被治罪的人不计其数。

公子高想外出逃命，又怕被株连灭族，就上书说："先帝活着的时候，我进宫就赐给我食物，出宫就让我乘车。皇帝内府中的衣服，先帝赐给我穿；宫中马棚里的御马，先帝也赐给我骑。我本应该陪同先帝一起死去却没有做到，这是我作为人子的不孝，作为人臣的不忠。不忠不孝的人是没有理由活在世上的，臣下请求让我陪同先帝一起死，希望能把我安葬在骊山脚下。只请求皇上可怜、体察我的心情。"胡亥见到他的这封奏书以后，非常高兴，叫来赵高让他看过后说："这可以说是窘急无奈了吧？"赵高迎合着说："现在大臣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的生死存亡，哪里还顾得上图谋造反呢！"于是胡亥答应了公子高的要求，赐给他十万钱安葬费。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里，最后议定他们的罪名。秦二世在处理完其他公子、公主之后，又派使臣对将闾说："你们不能尽为臣之道，应该判处死罪，官吏依法行刑来了。"将闾辩解说："宫廷的礼节，我从来不敢不听从掌管司仪的安排；在朝廷应有的位置上，我从来不敢有失礼节；在受命回答问题时，我从来没有说错过话，怎么能说不尽为臣之道呢？希望能知道犯了什么罪再死。"使者根本不容他分辩，说："我不能参加决策，只是奉皇帝的诏书行事。"将闾只好仰天大声呼喊了多次，说："天啊！我没有罪！"兄弟三个人都流着眼泪拔剑自杀了。这件事使整个皇族都感到震惊恐慌。

当时的法令刑罚一天比一天残酷，大臣们进谏的被认为是诽谤，大官吏们为保住禄位而屈从讨好，朝廷上下人人自危。百姓们的苦难就更深重了，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想反叛朝廷的人越来越多。

秦二世不想办法安抚百姓，却更加暴虐无道。他说："先帝因为咸阳朝廷的规模小，所以营建阿房宫。宫殿的室堂还没有建成，赶上先帝去世，只得让修建的人停下来，调到骊山去修墓。骊山墓的

主体工程已经结束了，现在放着阿房宫的事不去完成它，就是表明先帝办事有失误啊！”于是又下令开始建造阿房宫，同时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直道、驰道，对四边外族的进攻则采取了安抚、妥协的办法。二世还征召了五万名身强力壮的兵丁守卫都城咸阳，命令他们进行军事操练，还要饲养供宫廷里玩赏的狗马禽兽。这些士兵及狗马禽兽所需粮食、饲料很多，估计咸阳仓库里的粮食不够吃，二世就下诏从各郡县征调粮食和饲料，规定在咸阳周围三百里之内都不准吃打下的粮食，全部送交都城，并要求负责运送的人都自己另带干粮。

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二世统治下的秦王朝不仅赋税越来越重，兵役劳役无休无止，法令刑罚也更加严酷了，终于在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七月暴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多是由楚地征来戍边的士兵，陈胜自立为楚王，国号为“张楚”。他住在陈县，派遣部下到处夺取土地。山东各个郡县中的年轻人，因为受尽了秦朝官吏的压迫，都纷纷起来造反，杀掉郡守、郡尉、县令、县丞，以响应陈胜，并相继拥立了许多侯王，联合起来向西进攻，旗号都是讨伐秦王朝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

掌管传达通报的谒者从山东回来，把那里起义造反的情况报告了二世。二世听了很不高兴，把谒者关了起来交给执法官吏处罚。以后再有谒者回来，当二世问起时，就都回答说：“那只不过是一群盗匪，郡守、郡尉正在追捕，现在全部抓获了，不值得担忧。”二世很喜欢听这种假话。这时，武臣已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刘邦在沛县起义，项梁在会稽郡起兵。

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冬天，陈胜派遣的周文等人向西打到了戏水，兵力有几十万。二世听说后大为吃惊，与群臣商量说：“怎么办？”少府章邯说：“盗匪已打过来了，人数多势力强，现在来不及征发附近各县的人组织军队了。修骊山墓的刑徒很多，请赦免他们，发给他们武器去迎击叛军。”于是二世下诏大赦天下，派章邯

领兵为将，打败了周文的军队，周文败逃，被杀害。二世又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去帮助章邯攻打起义军，在城父杀死了陈胜，在定陶打败了项梁，在临济杀死了魏咎。楚地起义军将领被杀死了许多，受到了暂时的挫折。章邯又率军向北渡过黄河，到钜鹿攻打赵王歇等人。

秦军虽然在战场上暂时控制了局面，但朝廷内的斗争却日益尖锐了。赵高原来担任郎中令时，杀害的人和为了报私仇而陷害的人非常多，唯恐大臣们在入朝向二世报告军情时揭露他，就劝说二世："先帝登位治理天下时间很久，所以群臣不敢做非分的事、不敢进言异端邪说。现在陛下还很年轻，刚即皇位，怎么能跟公卿大臣在朝廷上议决大事呢？如果惩罚和奖励有不妥当的地方，就会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大臣们，这也就不能向天下人显示您的圣明了。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只让大臣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能看到他的面容，所以才自称为'朕'，朕就是征兆的意思。陛下不妨居住在深宫中，只和我及熟悉法律的侍中在一起，等着大臣们把公事呈报上来，等公文一旦呈上，咱们就可以研究后再决定怎样答复。这样，大臣们就不敢把疑难的事情呈奏给您，天下的人就会称颂您是圣明的君主了。"二世听从了赵高的主意，这以后就不再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深居在皇宫中，公卿大臣们很少有机会呈报军情大事，而赵高却常常在皇帝身边侍奉办事，这样一切事情都被赵高所操纵。

由于二世昏庸不理政事，各地起义的人更多了，关中军队被征发到东边去攻打起义军的人越来越多。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说："关东各地的盗贼纷纷起来造反，朝廷下令军队前往讨伐，杀死的人很多，但是还不能平息下去。盗贼那么多，主要是因为戍边、漕运、劳作的差事太苦了，赋税也太重了。我们请求暂时停止阿房宫的修建，减少戍边兵役和运输船役。"二世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们说："我听韩非子说过：'尧、舜用柞木做椽子，直接使用而不进行砍削加工，用芦苇茅草盖屋顶而不加修剪，即使在

旅店中住宿也不会有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了;冬天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粗米做饭,野菜做汤,用土碗吃饭,用瓦罐喝水,即使是看门人的生活标准也不会比这更清寒的了。大禹开凿龙门,疏通大夏水道,又疏导黄河淤积停滞的水,曲折地筑起许多道堤防,把水引入大海,他亲自拿着杵和锹干活,大腿上都没干净地方,小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手掌脚底都结满了厚茧,面孔漆黑,最终还累死在野外,埋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了。'然而人们之所以看重享有天下,就是为了能满足欲望,尽情享乐。统治天下、无尚尊贵的人,难道还要为别人操心费力,住连旅店都不如的房子,吃看门人吃的食物,干比奴隶还苦的活吗?这些事都是才能低下的人才努力去做的,而不是聪明的人所愿从事的。那些聪明人统治天下的时候,只是把天下的一切都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如果连给自己捞好处都不会,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尧、舜、禹地位尊贵,做了天子,却身处穷苦境地,为百姓去做牺牲,这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呢?所以我想恣心纵欲,永远享有天下而没有祸害。天子被称为万乘之主,应该有万乘兵车,我现在虽然做了天子,却还没有万乘的实际,我要建造千乘的车驾,设立万乘的徒属,让实际跟我的名号相符合。再说,先帝出身诸侯,兼并了天下,天下已平定,对外驱逐四边外族以安定边境,对内修建宫室来显示成功的得意。你们都看到了先帝的功业已经就序,面现在我即皇位仅仅两年时间,就盗贼纷起,你们不能去禁止,又想要终止先帝所要做的事情。这么做,首先辜负了宇宙的恩宠,其次也是对我不尽忠尽力,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身处高位呢?"于是下令把冯去疾、李斯、冯劫抓起来交给狱吏审讯,追究三人的其他罪过。冯去疾、冯劫看到秦王朝大势已去,二世已无可救药,就说:"身为将相不能受侮辱。"一起自杀了。李斯还想通过申辩求得二世的宽恕,但在赵高的陷害下,也被判处了死刑,腰斩在咸阳街市上。

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章邯等指挥秦军包围了钜鹿,楚地

起义军的上将军项羽率楚兵去救援钜鹿，双方展开激战。到这年夏天，章邯等因得不到增援，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屡次败退，二世派人去责问章邯，章邯害怕了，就派长史司马欣回咸阳去汇报请示。但这时二世实际上已被赵高所控制，赵高既不接见司马欣，对他的汇报和要求也不予答复。司马欣感到安全没有保障，就赶紧逃走，赵高派人去追捕而没追到。司马欣跑回前线见到章邯说："赵高在朝廷中掌权，将军您有功会被杀掉，无功也会被杀掉。"这时，项羽正加紧进攻秦军，在钜鹿城下俘虏王离，在这种情况下，章邯等人就率兵二十万人投降起义部队，秦王朝军事力量基本上瓦解了。

各路起义军的长驱直入，使赵高也害怕二世知道了会责怪自己，同时他也想借机谋反，除掉已成为傀儡的秦二世，夺取最高权力。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己亥日，赵高为了试探群臣的态度，就给二世献上一头鹿，硬说是一匹马。二世询问身边的大臣们，大臣们有的沉默，有的为了迎合赵高说是马，有的说是鹿。凡说是鹿的人都被赵高找借口加以迫害、打击。经过这件事后，大臣们都很害怕赵高。

二世也听到了一些起义军日益逼近的消息，但赵高谎称有病不去朝见，其他文武大臣也不敢向他讲实情。心中烦闷的秦二世梦见一只白虎咬了他的御车驾左边的骖马，他杀了那只白虎。醒来后他觉得奇怪，也很不愉快，就把太卜叫来，让算卦解梦。太卜卜得卦辞说："泾水水神在作怪。"就劝二世："陛下春秋两季郊外祭祀，供奉宗庙鬼神，因为斋戒时不虔诚，所以才会有这种恶梦。应该依照圣明君主的样子再虔诚地斋戒一次。"于是，二世就到上林苑中去斋戒。在上林苑中，二世整天游玩射猎，一次有个行人走进上林苑中，二世竟然亲手把他射死取乐。赵高就利用这件事让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出面弹劾，说是不知谁无故杀死了人，把尸体搬进了上林苑中，借以使二世丢脸，赵高则假意劝谏二世说："您作为天子无缘无故杀死没有罪的人，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啊，鬼神也不会接受您

的祭祀，上天将要降下灾祸，应该远远离开皇宫以祈祷消灾。”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话，离开皇宫又搬到望夷宫去居住、斋戒，他为了祭祀泾水水神，还把四匹白马沉到泾水里淹死。

秦二世在望夷宫刚住了三天，赵高担心他过问起义军的事，就抢先发动政变。

赵高和他的女婿阎乐、弟弟赵成策划杀掉二世。他们收买了郎中令为内应，并谎称山东各路的强盗打来了，假传二世的命令派阎乐带领官兵一千多人都穿上白色的衣服，手持武器突然来到望夷宫宫殿门前，把卫令仆射捆绑起来，喝问说：“有盗贼从这里进去了，为什么不阻止？”卫令说：“望夷宫周围戒备森严，盗贼怎么敢进入宫中？”阎乐不由分说斩了卫令，带领官兵径直冲进宫去，一边往前走一边射箭。二世听到动静上楼台观看，看到官兵拿着武器向宫里包围过来，非常害怕，忙招呼宫里的人抵抗，但宫里的郎官宦官们猝不及防，有的逃跑，有的格斗，格斗的都被杀死了，被杀掉的共有几十个人。郎中令迎接阎乐等人一同冲了进去，用箭射中了二世的帷帐。二世很恼怒地叫左右的人，而左右的人都被吓得不敢动手抵抗了，身旁只有一个宦官仍服侍着二世没有离开。二世跑到内宫中，问这个宦官：“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实情，竟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宦官回答说：“为臣不敢说，才得以保全住性命，如果早说了，我们这些人早就都被杀掉了，哪还能活到今天？”阎乐走到跟前历数二世的罪状说：“你骄横放纵，肆意诛杀，没有道德，全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你，该怎么办你自己心里清楚！”二世问：“我可以见丞相吗？”阎乐说：“不能见。”二世请求说：“我希望得到一个郡做个王。”阎乐不答应。二世又请求说：“我希望做个万户侯。”阎乐还是不答应。二世再次乞求说：“我愿意和妻儿去做普通百姓，跟其他公子一样。”阎乐拒绝他说：“我是奉了丞相的命令，为天下的人来诛杀你，你再提多少要求，我也不敢替你回报。”说完就指挥官兵上前，逼着二世自杀了。一代昏君就这样结束了生命，二世的尸体被按照平民

的规格，埋葬在杜南宜春苑中。

秦二世死后几十天，秦王朝就灭亡了。

（徐　勇）

参考资料：

《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李斯列传》、《六国年表》

《秦会要订补》

《汉书》:《王行志》、《楚元王传》

《说苑》:《辨物篇》

《秦集史》

《秦史稿》

刘邦入关亡秦

项梁起兵以来，连破秦军，又斩李由，他越发不把秦军看在眼里，日益显露骄色。营里的谋士宋义告诫他："打了胜仗后将领骄傲、士兵懈惰，准得失败。如今士兵已经开始懈惰，而秦兵气焰日盛，兵力还在不断增加，我替将军感到担心。"项梁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根本不把宋义的劝告当作一回事。他觉得宋义在身边太絮叨，就派他出使齐国，想再约齐国一同攻秦。

宋义赴齐国的路上，遇齐国赴项梁处的使者高陵君显。宋义问他："您是要去见武信君（项梁的号）吗？"高陵君说："对。"宋义说："我料定武信君必败。您慢走就能免于一死，快走就要一同遭殃。"高陵君跟宋义分别以后，在路上慢慢地磨日子，果然，他未到楚营，项梁就阵亡了。

秦兵连吃败仗后，为扭转颓势，秦二世调集大量部队支援章邯。秦军趁夜深人静时分，突袭楚军大营，大败楚军于定陶（今山东定陶），项梁战死。

当时，沛公刘邦与项羽正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听说项梁兵败身死，立即和吕臣一同率兵西撤，吕臣军驻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东，项羽军驻扎在彭城西，沛公刘邦军驻扎在砀（今河南夏邑县东南）。

秦将章邯已击破项梁军，认为楚地已无强劲的对手，不足忧虑，就渡过黄河，向北进攻赵国，又大胜。

秦军进攻的锋芒，使楚怀王大为惊恐，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楚怀王也由盱台（今江苏盱台县东北）移都彭城，并合并吕臣、项羽两家的部队，由其亲自率领，任命沛公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率领砀郡的部队；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国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几次派使者到彭城求救兵，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去救赵；命令沛公刘邦向西进攻秦地，争取入关，并与各方将领约定："先入关者为王。"

当时，秦国兵力仍很强大，经常乘胜向北进攻楚军各路部队。诸将畏惧秦兵，谁也不愿率先入关进攻秦国的都城。只有项羽怨恨秦兵击败项梁军，怒火中烧，急切地盼望能替叔父报仇。他向楚怀王请求，愿与沛公刘邦一同西进入关。楚怀王有心同意他的要求，可楚怀王手下的老臣都反对。他们说："项羽为人凶暴，过去他进攻襄城，破城后许多人都被他活埋了。凡被他攻陷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是残破灭绝。而且，我们几次向西进攻，陈王、项梁都失败了。由此看来，与其单凭武力西进，不如择一忠厚长者，挟'义'而西进，以告谕秦国父兄。秦国父兄受苦太久了，见长者到，不施暴，不劫掠，人心必然归附。项羽凶悍，不能让他去。只有沛公刘邦素来待人宽大，是忠厚长者，可以派遣。"于是，楚怀王不同意项羽西进，只派沛公刘邦向秦国进攻。

沛公刘邦西进途中，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遇到在那里起兵的彭越，两支部队合力攻秦，不利。刘邦率兵退回到栗（河南夏邑），遇到刚武侯，刘邦将他手下的四千人全并入自己的部队，再攻昌邑，仍未攻下。于是，刘邦率兵绕过昌邑，进攻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

高阳这地方有个信奉儒学的老先生名叫郦食其，虽有满腹经伦，可由于天下大乱，不愿出来作官，就在乡里做了里监门吏。他职位很低，但心高气盛，县里人都叫他"狂生"。他甚爱喝酒，人称"高

阳酒徒”。自陈胜、项梁起兵至刘邦率兵到来之前，已有几十名将领路过高阳。郦食其认为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成就大事，就藏匿不出。沛公刘邦进攻陈留的时候，沛公手下的一个骑兵是郦食其的同乡，他告诉郦食其，刘邦一再询问邑中有哪些贤士豪俊。郦食其说：“我观察了几十位起兵的将领，尽管刘邦待人傲慢，但他有雄才大略，我很愿意投奔他，只是没人为我介绍。你如果见了沛公可以告诉他：‘我有个老乡郦先生，是个读书人，六十多岁了，大高个，别人说他是个疯子，他自己说并不疯。’”骑士说：“沛公最不喜欢儒生，有戴着读书人帽子的儒生前来，沛公摘下人家的帽子在里面撒尿。与儒生谈话，他常常大骂，说他们没出息，我怎么能向他介绍你这个儒生呢？”郦食其说：“你就照我说的告诉他。”骑士就依样画葫芦地把郦食其的话告诉了沛公。

沛公来到高阳，心里记挂着郦食其，就让人召他来。老先生来到刘邦的内室，刘邦正靠在床上让两个女子替他洗脚。他见郦食其来，连身子都未欠一下。郦食其见状，也只是作揖不拜。郦食其说：“您打算帮助秦国打诸侯呢，还是打算帮助诸侯灭掉秦国呢？”沛公骂道：“真是书呆子，天下人吃够了秦国的苦头，所以，诸侯合力攻秦。你怎么还说帮助秦国打诸侯呢？”郦食其说：“您如果真想聚集义兵灭掉暴虐的秦国，就不该这么傲慢地接见年长之人。”刘邦自知礼亏，听老先生这么一说，脚还未洗完就赶快起身，整整衣服，请郦食其上坐，谢过先生后说：“敬请先生指教。”

郦食其坐定，从容谈起六国纵横抗秦的往事，沛公听得高兴，又请郦食其吃饭。沛公问：“您对我有何指教？”郦食其说：“将军手下兵马不足万人，都是纠合之众，散乱之兵，以这点微不足道的兵力去进攻强大的秦国，无疑于虎口掏食。依我看，不如先进攻陈留，陈留是天下要冲，四通八达，往来方便，没有险阻，城里又积存了许多秦国的粮食。我和县令交情不错，将军如果派我去劝降，有可能成功，他如果不听，那我就做内应，将军从外面进攻，一定能将陈留

打下来。”

于是，沛公派郦食其去劝降，自己带兵在后面埋伏，里外接应，很快就攻下陈留。此役胜得轻松，沛公大喜，封郦食其为广野君。陈留一攻下，刘邦部队的粮食补给就有了保障，又增加了兵员。他让郦食其的弟弟郦商为将军，带领陈留的兵马，同他一起进攻开封。开封未攻下来。刘邦又西进与秦将杨熊在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作战，未胜，又战于曲遇东（河南中牟东），大胜。杨熊败走荥阳（河南荥阳），秦二世派人斩杨熊。刘邦又攻颍阳（河南襄城东北），攻陷后，由于颍阳的人不愿服从沛公，刘邦就把他们全都杀了。

颍阳一带原是韩国张良打游击的地方。张良见沛公在此地作战，就带兵来投奔沛公。两军合力，很快又攻下韩国故地十余城。

沛公早就知道张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过去又有一段交往，此时再次相遇，刘邦不愿再放张良回到韩王成那里。刘邦让韩王成留守阳翟（河南禹县），张良随他南下。攻南阳郡，南阳郡守败走，据宛城（河南南阳）拒守。沛公见宛城坚固，不易攻下，就绕过宛城，欲西进攻秦。张良劝刘邦道：“您虽然想尽快入关，但眼下秦兵力量仍很强大，如果不攻下宛城，强秦在前，宛城在后，势成犄角，我们就将陷入绝境。”于是，沛公从别的道路率兵秘密返回。他让队伍更换了旗帜，黎明时分，围住宛城，里外三层，密不透风。南阳守想自尽，他的部下陈恢说：“现在还不到死的时候！”于是，陈恢出城见沛公，说：“我听说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咸阳者为王’。如今您为宛所牵累，宛是一大郡之都，郡内有几十城，人民众多，粮食满城，官员认为投降必死，所以都坚守不降。您如果整日进攻，必然有很多士兵战死；如果弃之西进，宛城的秦军必然尾随其后。前面的办法，将使您无法先入咸阳为王；后面的办法，又有受前后夹击而失败的祸患。我为您考虑，您不如与宛城的官员相约，若投降，封其守，让其继续为您守城。您带领宛城投降的士兵一同西进攻秦。后面诸城听说投降后可以封侯，将闻声争开城门等候您，那么，您进攻咸阳

将不战而胜，畅行无阻。”沛公说：“太好了！”于是，封宛城守为殷侯，受降；封陈恢千户。随后刘邦率兵西进，果然一路顺利，兵不血刃，秦国的官员争开城门迎接刘邦。

沛公率兵到达丹水（今河南淅川西南），高武侯鳃、襄侯王陵投降。又攻胡阳（今河南唐河西南），遇到番君的将军梅铜，同他一齐进攻析县（今河南西峡）、郦县（今河南南阳西北），两县的秦国守军全部投降。由于刘邦所率军队沿途不烧杀，不抢掠，秦国的人民都很高兴。这样的行动，也正应了楚怀王手下老臣的预想。秦国的人心悉数归附刘邦，这就不但壮大了沛公的声势和队伍，同时，促使秦国的军队迅速崩溃。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八月，刘邦进了武关。这时，赵高已杀秦二世，派人与刘邦联系，想和刘邦分别王关中。刘邦认为他可能有诈，没有答应。过了几天，秦王子婴又把赵高杀了，并派兵守卫峣关。刘邦想派二万人去攻击峣关秦军。张良向沛公建议：“秦兵的力量仍很强大，不可轻敌。我听说峣关的秦将屠者子、贾竖贪于钱物，您可派人到峣关左右的山上布满旗帜作为疑兵，让郦食其、陆贾携带重礼去劝降秦将。”沛公采纳了张良的计策。秦将看到山上布满刘邦军队的旗帜，认为抵抗没有获胜的希望，就接受了礼物，同意和刘邦军队联合，一同西进攻秦。郦食其、陆贾回来报告，刘邦很高兴，准备同秦将订立盟约。张良阻拦说：“这只是秦将愿意归附将军，恐怕士兵不能心服，不如趁其懈怠出兵攻击他们，一定能收出奇不意之效，大获全胜。”于是，刘邦又听从张良的建议，派大将周勃带领兵马绕过峣关，从东南侧面打进去。秦将由于准备投降，上至将军下至士兵谁也没有防备刘邦会派兵来攻。慌乱之中，周勃已杀死了秦将，营内顿时大乱。主将一失，部队如同散沙，死的死，伤的伤，其余全部投降。五万人的守军顷刻土崩瓦解。

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十月，刘邦的军队进了关，领先于诸侯来到霸上（今陕西西安东）。秦王子婴带着大臣前来投降，车是白

色，马是白色，形同戴孝。子婴脖子上套着绳子，手里拿着皇帝的玉玺、兵符、节杖，弯腰候在路旁。刘邦手下的将领大都是起义的农民，吃尽了秦国的苦头，纷纷主张杀掉子婴。刘邦说："最初，怀王让我西进入关，就是认为我能够宽容。人家既然已经投降，再杀掉他并不吉祥。"于是，收上玉玺、兵符、节杖，将子婴交给将士监管起来。

沛公遂入咸阳。将士们经过几番征战，如今大获全胜，顿时斗志松懈，见秦宫有无数的珍宝、玉器，纷纷争夺财物。沛公见秦宫华美无比，帷帐、犬马、宝物、妇女数不胜数，心乱神迷，想在宫里享受人间富贵。樊哙斥责沛公说："您要夺取天下，还不是要做一个富家翁？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秦国无道亡失天下之物，您要这些有什么用？请您赶快回到霸上，不要留在宫中，免得让天下人耻笑！"沛公不听。张良说："秦国无道，所以沛公您能够至此，您来这里是为天下除掉残贼。天下人受尽秦国的压榨，您应保持朴素的本色，以抚慰人民。今天，刚刚灭掉秦国，您就贪图安乐，这正是所谓'助桀为虐'，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从樊哙的劝告！"于是，沛公还军霸上。

十一月，沛公遍召关中诸县的父老、豪杰，向他们宣告："父老乡亲苦于秦朝的苛法已经很久了。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关者为王，我应当在关中为王。为此，我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偷盗的，按罪过的轻重办罪。除这三条之外，秦国的各种苛刻的法律、禁令一概废除。我们来这里是为百姓除害的，而不是来侵掠百姓的，我们不惊动官员和百姓，大家可以照常做事，不要恐慌。我如今还军霸上是要等诸侯来，约束他们。"随后，沛公又让人和秦朝的官吏到关中各县、乡、邑去告谕百姓。秦民闻之，大喜过望，争先恐后地拿着牛、羊、酒食慰劳沛公军士。沛公坚决推辞。他说："我们的仓库里粮食很多，不缺粮，肉也不缺，大家不要破费。"此话一传十，十传百，于是人人皆知。百姓以往在秦国的欺诈下度日，今日

来了一位仁慈的、体恤下情的将军，人人感激涕零，关中父老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门连凤）

参考书目：

《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郦生陆贾列传》

《汉书》:《高帝纪》

项羽破釜沉舟

秦将章邯杀掉项梁后，认为楚军已无实力，不足忧虑，就率大军渡过黄河攻击赵国。此时，赵国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在秦军的攻击下，赵国不堪一击，赵王弃国都逃到钜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围钜鹿，日夜进攻。章邯屯军城南，为防止赵军掠夺辎重，在路旁修筑起墙垣作甬道为王离输送粮草。陈馀当时率领从常山招来的几万人马驻扎在城北，在秦军的包围圈之外，张耳几次请陈馀救其突围，陈馀顾虑秦军气焰太盛，自己兵马太少，始终不敢跟秦兵交战。钜鹿城的危机日甚一日，万般无奈，赵王派使者逃出重围，找楚怀王讨救兵。

当时，楚、赵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不救赵，秦兵灭赵后，必如狂涛席卷而来，楚国将毫无招架之力。

可派谁为将去救助危赵呢？论作战勇武，公推项羽，可他的粗暴残忍，又令楚怀王和身边的老臣对其颇不信任。正当此时，项梁谋士宋义在赴齐国途中遇到的齐国使者高陵君显对宋义极力举荐。他见到楚怀王后说："宋义在秦军进攻武信君之前就告诉我武信君必败，两军尚未交战，就看出败亡的征兆，这才是真正懂得兵法。如果不是听从宋义的劝告，我早就赶到楚营了，今天，恐怕也身首异处了。"

于是，楚怀王请宋义来议事，一番谈话后，甚为高兴，遂决定由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一同率军前去救赵。诸将都属宋义率领，为此，大家送其雅号叫"卿子冠军"。

卿子冠军宋义率领救赵的大军到了安阳(在今山东省曹县东),他知道秦军势力浩大,不敢贸然前去交锋,就在安阳驻扎下来。项羽见宋义屯兵不前,甚为着急,就央告宋义:"我听说秦军包围赵王于钜鹿城内,形势甚为危急,我们应该赶快率兵渡河,我们和赵军里外合击,必能击败秦军。"宋义说:"你说的办法太鲁莽了,依我的意见,还是再观望一下。眼下,秦赵相斗,秦若战胜,必然疲惫,我可承其敝,以逸待劳,击败秦军;如果赵胜,我则可率兵而进灭掉秦国。所以,我们还是让秦赵分出个胜负再说。披甲作战,我比不上将军,可坐在帐蓬里进行谋划,你可就不如我了。"

为了防止项羽擅自行动,宋义向军中下了一道命令:"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者,如不听从命令,一律斩首。"

此时,宋义把他的儿子宋襄派到齐国去作相国,并亲自将其送到无盐(今山东运城县东),他还置办酒席,大宴宾客,灯红酒绿,好不热闹。可此时,部队已驻扎四十六日了,军中粮米所剩不多,天降大雨,士卒又寒又饥。项羽对宋义说:"我们奉怀王之命,应戮力攻秦,如今久驻此地,今年收成不好,百姓贫苦,军中无粮,士卒靠菜豆度日,我们应该尽快渡河,从赵国那里取得粮食,同其一道攻秦,可你却饮酒作乐,大会宾客,说什么要观望秦赵相斗,以承其敝。以秦兵之强大,攻新立之赵,好比以虎食羊,必然灭赵,赵灭则秦军势力将更加强大,有何敝可承!而且,我国军队刚刚战败,怀王坐不安席,国内之兵悉数归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你不怜惜士兵而徇其私,不是社稷之臣!"

宋义大怒,斥责项羽,项羽见宋义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且难以容人,一气之下,拔剑将宋义斩首。出帐后,他手提宋义头,对士兵们说:"宋义与齐国密谋反楚,楚怀王密令我将其杀掉,请大家不要多心!"

这突然的变故,把诸将都震慑住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本来,众人对宋义让大家在这里不明不白地驻扎、忍饥受冻就很不

满，这会儿，见项羽将其杀掉，心里都很高兴，于是诸将说："首立楚国者，是将军家，将军如今杀掉宋义，是诛乱，我们都赞成！"杀掉宋义，军中不能无统帅，诸将商议后，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随后，项羽派人去追宋义的儿子宋襄，将其杀掉；又派将军桓楚向楚怀王报告。怀王只好立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英布、蒲将军都属项羽指挥。

项羽杀掉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项羽稳定军心，率兵救赵。他先派当阳君英布、蒲将军率两万士兵渡过漳河，救钜鹿。两将军渡河后，占领了有利地势，断绝了章邯向王离军供应粮食的甬道，于是王离军也开始品尝缺粮的苦头。随后，项羽率领全军渡河。待全军渡过河后，他吩咐士兵，每人带上三天的干粮，凿沉船只，砸破饭锅，烧掉营舍，以示必死的决心。

沉船已毕，项羽率大军包围了秦将王离军，两军相遇，各不相让，秦军气焰嚣张，他们出兵以来，所向无敌，根本不把楚军放在眼里，如今见楚军破釜沉舟，认为他们背水设阵，不懂兵法，更加轻视他们。楚军已无退路，只有战胜王离军才有生路，所以楚军士兵个个英勇顽强，无反顾之心。双方的将领也是各怀必胜之心。王离是秦国的骁将，他出兵以来尚未遇到过真正的对手；项羽则发誓要替叔父报仇，战胜秦军。双方武艺高强，各怀绝技，各显锋芒，枪来鞭往，互不相让，三天里，打了九仗。毕竟是项羽略胜一筹，他率军彻底断绝了王离接济粮食的甬道，王离军没有粮草供应，体力不支，终于领教了楚军的厉害。他率军仓皇逃窜，项羽骑着乌骓紧紧追赶，一鞭将其打于马下，命士兵将其捆绑起来。秦将苏角死于乱军之中；秦将涉间见大势已去，不愿降楚，在军营里放了一把火，自己烧死在里面。

这一仗，楚军不但在秦军中打出了威风，在攻秦的诸侯军中也名声大震，当时，前来救赵的诸侯军有十几队兵马，他们顾忌秦军的威势，都不敢与其作战，楚军攻击秦军时，诸侯将都在壁垒上观望，他们看到楚军战士每个都是以一当十，项羽作战如入无人之

境，又听到楚兵进攻的呼声震动天地，他们这才发现天底下竟然还有比秦军更勇猛善战的部队，震惊得大气不敢出，伸出的舌头都忘了缩回去。

项羽击破秦军，召见诸侯将军，诸侯将军入辕门，都不敢站立仰视，一个个双膝跪地，爬着进去，每个人都对项羽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内心又非常惧怕，因为他们从披甲作战之日起，还未见过如此勇武之人。这一仗，使项羽不仅在楚军中是堂堂的上将军，在诸侯将军的心目中，也成了公认的上将军，大家公推项羽担当此任，都愿作他的属下，共同灭秦。项羽自恃功高，也不推辞。

接着，赵王歇和张耳出了钜鹿城，首先向诸侯上将军项羽拜谢，又去各营谢过救赵的诸侯将军。张耳与陈馀相见，责备陈馀不肯救赵，陈馀抱怨张耳疑心太重，争吵之下，陈馀解下印绶，推给张耳，张耳惊愕，但在别人的劝告下，他收取后不再推让。陈馀见状，带着几百个亲信离开赵国，到大泽之中去渔猎。昔日的两个好朋友变成了仇人。

王离全军覆没后，章邯军驻扎在棘原(在钜鹿南)，项羽军驻扎在漳南，两军相持未战。

此时，由于秦军数次退却，秦二世使人责问章邯，章邯恐惧，让长史司马欣当面去向二世解释。司马欣到了咸阳就去通报，可一连等了三天，不要说见二世，连赵高也见不到。这时，他得到消息，赵高不但不信任他，还准备加害于他。他惊恐万分，赶紧回营向章邯奏报。他不敢走来时的故道，从小路逃回，赵高果然派人从故道追赶，因为道路不同，总算免于一死。

司马欣回到营中见到章邯，对他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又说道："赵高掌权，下面的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如今，我们如果能战胜，赵高必然忌妒我们的功劳，我们不免一死；战败了，他惩办我们，也不免一死。胜也死，败也死，请将军您拿个主意吧！"

此时，陈馀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今天，将军为秦将已

经三年，十几万士兵在你的手下伤亡了。可是，起兵的诸侯不但未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赵高一直阿谀蒙骗二世，如今，秦国面临危机，他担心二世杀他，所以，想借杀掉将军，以推脱罪责。将军在外而日久，很难避免国内政敌的伤害，有功是死，无功是死，如今是天亡秦，不论愚智都知道，可将军您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之将，却以一己之独立面欲存将亡之国，这是多么悲哀之事！将军为什么不与诸侯合作，共同攻击秦国。如此今后还可以分封为王，这总比为昏君卖命，身首异处，灭门九族要好吧？"

章邯此时真是被逼到了绝境，前面是项羽这员要替他叔父报仇的猛将；国内是欲置他于死地的赵高，真是进退两难。他权衡再三，觉得在赵高手下，只能是自投罗网，况且，就是不死，秦国形势已是危在旦夕，与诸侯军对抗到底，也只能是苟延残喘，死路一条。与其为秦王朝殉葬，还不如投降楚军，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于是，他悄悄地派军侯始成去同项羽联络，欲订立盟约。由于章邯对项羽不十分信任，提出的条件要求太过分，未达成协议。

项羽命令蒲将军率领他的部队不分昼夜地渡过三户（漳水的一个渡口，在河南省临漳县），章邯又打了败仗，逃到汙水（在临漳县西）。项羽率全部军队，在汙水再一次大胜秦军。

章邯无奈，再次派使者见项羽，重新商讨订立盟约。项羽与军中的将领商议道："我们如今粮食所剩不多，如果再打下去，对我们也很不利，不如就同他们签约。"大家都同意。于是，项羽同使者约定日期，在洹水南殷虚（今河南安阳北）订立盟约。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七月，项羽同章邯、司马欣、董翳在约定地点签约。章邯总算有了一条生路。此时，他在赵高手下的千般痛楚一起涌上心头，他向项羽哭诉赵高的残忍，项羽好言劝慰。随后，项羽立章邯为雍王，把他留在楚营里；立司马欣为秦军上将军，带着投降的一二十万秦军走在队伍的前面。项羽自己带着章邯，率领楚军和诸侯的将士，浩浩荡荡向秦国进攻。

西进的部队到达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准备入关灭秦。最初,诸侯将士中不少人曾在秦国做过苦工,受过秦兵的凌辱。如今,秦军投降诸侯,诸侯将士见他们也有败在自己手里的一天,就拿秦兵当奴隶看待,让他们品尝一下被凌辱的味道,借以出出自己心中的闷气。秦兵过去扫荡天下,哪里受过这种待遇,于是,对章邯诸将不满,私下议论道:"章将军等人欺骗我们投降诸侯,我们如果能入关破秦,最好不过,如果失败,诸侯带我们东逃,秦国必定要杀死我们的父母妻子,如何是好?"诸侯将领听到他们的议论,报告了项羽。项羽就召英布、蒲将军商议道:"秦国投降的士兵人数不少,他们心里不服,如果进入关中他们不听命,那就危险了,不如全部杀掉,只留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一同入关。"二人同意,在一起细细地商议了行动计划,随后便分头去秘密布置。当晚夜深人静时分,诸侯军突然包围了秦军的营垒,迅速收了他们的兵器,在新安城南,二十万手无寸铁的投降的秦兵全部被杀死、埋掉。

项羽杀掉投降的秦兵,率军西进,一路几乎未遇到抵抗,很快就到了函谷关,发现有兵守关,不让通行,项羽派人一打听,才知道守关的是刘邦的部队,沛公已占领咸阳,竟然走到他的前面了,按照"先入关者为王"的约定,刘邦就该封王了,而且还派人守关,将他拒之关外。他顿时怒火中烧,入关的心情更加急切,他命当阳君英布攻下关口,自己随之入关,率军屯兵于戏西。项羽和刘邦的一场龙虎之斗已不可避免了。

(门连凤)

参考书目:

《史记》:《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张耳陈馀列传》

鸿 门 宴

楚怀王与诸将有约在先:先入关者为王。刘邦先于项羽入关,理应为王;可项羽兵多将广,又成为诸侯军上将军,也欲称王。一场龙虎之争已不可避免。刘邦屯军霸上,项羽屯军戏西,双方剑拔弩张,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时,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向项羽告发刘邦:"沛公欲在关中称王,使子婴为相,秦国的珍宝尽归其所有。"曹无伤认准刘邦不是项羽的对手,希望借此在日后称王的项羽那里邀功请赏。这就犹如火上浇油,使形势更为紧张。

项羽闻言大怒,下令用美酒佳肴款待士兵,准备第二天一早向刘邦部队进攻。

此时,项羽的部队有四十万,号称一百万,驻扎在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沛公的部队有十万,号称二十万,驻扎在霸上。两地间相距四十里。如果项羽的部队一发动,转眼就可到刘邦的营前,无论如何,刘邦也不是猛将项羽的对手。为了坚定项羽作战的决心,范增说:"沛公在山东(指崤山以东的六国)的时候,又贪财,又好色,如今入关,他不贪图财物,不亲近妇女,他的志向不小,如果我们今天不消灭他,他就是未来的天子,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今日的机会。"

项羽的一个叔父叫项伯,是楚国左尹,此时在项羽营里。他和张良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而张良此时正在刘邦营里。他不想让自己的朋友不明不白地死在项羽的攻击之下,深夜骑马急急驰入刘邦

营中，悄悄找到张良，告诉他大难即将临头，让张良赶快随他一同逃走。项伯所以通报张良，不单单因为二人是好朋友，因为项伯知道，张良也是个难得的人才，如果死在乱军中，甚为可惜。张良祖辈世代为韩国的丞相，秦灭韩，张良在博浪沙击秦始皇未果，后藏匿。陈胜起义后，张良亦聚万余人，起而响应，后遇刘邦。张良谋略过人，曾为别人出谋划策，不为人重视，可沛公甚为敬重张良，常用其策。张良觉得沛公能知晓他的谋略，于是就跟随在刘邦左右。后来项梁立韩王，张良任韩司徒。不久，沛公西进攻秦，令韩王留守阳翟。他心中惦念张良这个难得的谋士，说服了韩王，又带张良一同西进，一路上，屡次用张良奇策，才顺利入关。刘邦敬重张良，张良也感谢刘邦的知遇知恩，不愿只身逃走，他对项伯说："韩王让我送沛公入关，沛公今天有危难，我一个人逃走太不仗义，我不能不告诉沛公。"于是，张良入沛公帐内，把危急的情形告诉沛公。沛公大惊，说："这可怎么办？"张良问："谁为大王出主意，不让项羽入关？"刘邦说："鲰生告诉我说：'派兵守关，不让诸侯进来，秦国的土地可尽为大王所有。'所以，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张良问："大王估算一下，能不能抗拒项羽？"刘邦沉默良久，才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抵抗，这可怎么办呢？"张良说："请大王随我见项伯，告诉他沛公不敢对抗项王！"沛公问："你怎么和项伯有故交？"张良说："秦朝时，他同我一齐游历，他杀人后，我救过他一命，今天，面临急变，他来告我，以图还报。"沛公问："他和你谁年岁大？"张良说："他是我的兄长。"沛公说："你让他进来，我以兄长之礼待他！"

张良出去，邀项伯入帐，项伯即进帐见沛公。沛公见项伯进来，立刻起身，恭恭敬敬地请他坐上座，并吩咐属下摆上酒席。沛公又尊其为兄长，举杯为其祝寿，气氛甚为热烈。喝到兴头上，沛公与项伯又各自谈起自己的儿女。沛公得知项伯有一儿子尚未婚娶，立即提出把自己的女儿许给项伯的儿子，双方结为亲家。项伯见沛公也不是等闲人物，有这门亲家自然十分高兴，所以满口应承。接下来，

又是杯来盏往，张良在一旁为他们斟酒道喜。几巡酒下肚，彼此已经甚为亲近。刘邦说："我入关以后，秋毫无犯，慰籍官员和百姓，封存府库，一心一意地等待项王入关，只是因为防备盗贼和匪患，我才派兵防守函谷关。我日夜盼望项王到来，怎么敢反抗项王呢？愿亲家务必在项王面前替我分辩，我对项王忠诚，绝不敢忘记他的恩德！"项伯对沛公说："我一定为你解释，可你明天一早必须亲自来向项王谢罪。"沛公说："一定！"

项伯连夜赶回鸿门，见到项羽后，把到刘邦营里救张良又遇到刘邦及刘邦的一番话告诉了项羽，随后说道："沛公如果不先攻入关中，你能这么顺利地入关吗？今天人家有大功而你却攻击他，太不仁义，我看还是善待他为好。"项王沉默了一会儿，表示同意。

第二天天刚亮，刘邦就带着张良、樊哙等几个心腹和一百余骑到鸿门来见项羽。这一行人来到项羽的营中，见到项羽后，刘邦行过大礼，向项羽拜谢道："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于河南，我万万未想到能先于将军入关破秦，能在此地再次见到将军。如今，是小人从中挑拨，使将军对我有疑心！"项羽漫不经心地说："还不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说的。"

项羽听了沛公的一番表白，见沛公又甚为恭敬有礼，心境甚好。他留沛公饮酒，项王与项伯朝东坐了主位；亚父范增朝南坐；刘邦朝北坐；张良朝西侍侯。五个人只有项羽与项伯心境平和，沛公惊恐不安，范增、张良则各存心事。

范增早就预见到项羽最为强劲的对手是刘邦，曾劝项羽用武力屠灭他，如今，见事情出现如此变化，项羽竟然尽弃前嫌，举杯把盏地同刘邦叙起旧情来，一副心怀坦荡的样子，心中甚为焦急。他数次用眼神向项王示意，并先后三次举起佩在身上的玉玥示项王杀掉刘邦。项王会意，但没有一丝响应。

范增起身，到外面把项羽的叔伯兄弟项庄叫过来，对他耳语道："如今我们的心腹大患刘邦送上门来，这是天赐良机，我们应借

机杀掉他。可项王为人太厚道，不忍动手。你要人内居前祝寿，寿毕，为之舞剑，乘隙于坐上杀掉沛公。今日不动手，日后我们都得成为他的阶下囚。”

项庄遂人内祝寿，寿毕对项王说：“君王与沛公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可以助兴的，我愿为诸公舞剑。”项王说：“好。”项庄遂拔剑起舞。可项庄舞剑，剑锋却总在沛公的鼻尖前晃来晃去，吓得沛公面如土色，冷汗直流。这时，项伯已经看出名堂来了。他起身对项羽说：“一人舞，不如两人对舞，可以尽兴！”项王又说：“好。”于是，项伯也拔剑起舞，每当项庄剑锋刺向沛公，他就以身体蔽护，使项庄无隙下手。张良见状，立即起身至军门，找到樊哙。樊哙问：“谈得怎样了？”张良说：“情形甚为危急，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樊哙一听，火冒三丈，说：“太危险了，臣请人，与沛公同命！”樊哙即带剑持盾入军门。卫士阻止，樊哙用盾牌击倒卫士强行人内，面向西站在项王旁，怒目直视项王，头发直竖，眼角都要瞪裂了。项王按着剑问：“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张良抢先回答：“他是沛公参乘樊哙。”项王说：“真是一个壮士，赏他酒！”侍者给他一斗酒，樊哙拜谢，一饮面尽。项王甚爱壮士，见状，又说：“赏他猪肘！”侍者又给他一只生猪肘。樊哙蹲下来，把盾牌覆在地上，把生猪肘置于盾牌之上，拔剑切成几片，生吞下去。项王说：“好一个壮士，还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连死都不怕，饮酒算什么！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不可胜数，刑罚苛刻仍嫌不够，故天下的人都反叛他。所以，怀王与诸将约定：‘先破秦人咸阳者为王。’如今沛公先破秦人咸阳，秋毫无犯，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前来。他派兵防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盗贼出人与非常变故。劳苦功高如此，大王不但没有封侯之赏，反面听信谗言，要杀掉有功之人，这正是继续秦国灭亡之道，我认为大王不该如此行事。”项王面色尴尬，并不答话，只是说：“坐。”樊哙就坐在张良旁边。

樊哙的举动，把项庄震慑住了，无人再舞剑，大家继续喝酒。此

时，项王也开始想心事，气氛开始沉闷。又坐了一会儿，沛公起身上厕所，并呼樊哙一同出去。张良向项伯低声告辞，也跟了出去。

刘邦出来后，准备溜回自己营里，可他未向项王辞别，又觉得礼貌不够周全。他说："出来了，还未辞行，这可怎么办？"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家如同刀和菜板，我们如同鱼肉，都要被剁成肉泥了，还有什么好告辞的！"于是，沛公决定回霸上，令张良留下致谢。张良问："大王带什么礼物没有？"沛公说，"我带白璧一双，准备献给项王；玉斗一双，想献给亚父。因为他们发怒了，我未敢献，请你代我献给他们。"张良说："好吧！"

当时，项羽、刘邦两军相距四十里，刘邦决定抄近路回营。他不敢再坐车，只骑了一匹马，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握剑持盾随之步行。沛公对张良说："从此道到霸上营中，不过二十里，你估计我已至军中，再入内向项王致谢。"

沛公久不回来，项王让都尉陈平召唤沛公。此时，张良估计沛公已至营中，便随陈平回到帐中。张良对项王和范增说："沛公醉了，不能向大王辞行，为表示对大王的敬意，他让臣向大王奉献白璧一双，向大将军奉献玉斗一双。"项王问："沛公呢？"张良说："他怕将军的部下与他为难独自脱身走了，现在或许已到军营了。"

项王不介意，接过玉璧，放置于几上；亚父接过玉斗，放在地上，拔剑将其击破，说："唉！竖子不足与谋，日后夺项王天下者，必定是沛公，我们都得当他的俘虏！"

沛公回到营，立即杀掉曹无伤。

几天后，项羽率兵西入咸阳。他命人杀掉投降的秦王子婴；又放纵官兵焚烧秦国宫室，昔日金碧辉煌的阿房宫，变成一片火海，由于宫室广大，大火三月不熄。皇宫内的珍宝、妇女被项王和诸侯军悉数掠尽。

秦国终于灭亡，推翻秦国的两个主要角色在关中各自粉墨登场，但效果各不相同。沛公曾约法三章，秦民大悦，唯恐刘邦不为秦

王;如今,项羽之所为,秦民大失所望。此时,刘邦与项羽各自保存了实力,天下形势尚未决出分晓,但人心的向背已预示了日后天下将落于谁人之手。

(门连凤)

参考书目:

《史记》:《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

项羽封王

鸿门宴后，项羽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秦都咸阳。项羽是楚国的旧贵族，对秦始皇灭亡六国极端仇恨。项羽的军队入咸阳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屠杀咸阳的官员百姓，把秦王子婴就地斩首，冲入秦王朝宫殿中，将秦朝国宝劫夺一空，并把宫中美女尽数掳走，然后一把火点燃了咸阳，大火熊熊历三月而不熄，偌大的都城化为一片废墟。

这时，有一智者向项羽建议道："关中之地有山河险阻，四面有关塞险隘，其间土地肥沃，沃野千里，是建都以成王业的好地方。将军应该在这里定都。"项羽此时见秦王朝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重新建设工程浩大，加上他厌恶秦王朝的都城，心中怀念故乡，便想东归彭城。项羽不悦地回答说："富贵而不归故乡，就如同身穿锦绣半夜游玩，别人谁看得见呢？"这位智者见项羽不采纳自己的建议，心中十分不快，出来后批评项羽道："人们都说楚地人沐猴而冠，空有外表，没有远见，我今日方知果真如此！"有人把这话报告了项羽。项羽的自尊心受到侮辱，大怒，立即下令烹杀了那位智者。

项羽扫灭秦王朝，各路义军纷纷归到他的麾下，他踌躇满志，想自己称王，统治天下。他派人报告楚怀王，说秦朝已亡，天下已定，万机待理，意在楚怀王能许项羽称王。然而，楚怀王却说："应按照事先约定的办。各路将士曾经约定，谁先入关、灭掉秦王朝，就由谁称王。现在，刘邦率军先入关中，接受秦降，应由刘邦称王。"

项羽没有料到楚怀王竟然如此固执，如此不识时务，他手握重

兵,决不能允许刘邦压在自己头上。愤恨之余,他便想出计策,改楚怀王尊号为义帝,名义上尊王,实际上是架空楚怀王,为自己称王开辟道路。为了收买人心,他先对各路将领加官授爵,并鼓动人们说:"当初天下群雄并起,为了集中人心,不得已才拥立楚国国君的后裔,为得是讨伐暴秦,师出有名。然而,身穿铠甲,手执戈矛,冲锋陷阵,暴尸于野,浴血奋战三年之久,消灭秦朝安定天下的,是各位将军和我项羽,不是他义帝。义帝没有斩杀一兵一卒,没有丝毫功劳,不能为天下主。我提议,应该分割天下,由我们大家来称王!"

取得了众将的认可,项羽便着手分封。怎样安置刘邦,对项羽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依照事先约定,刘邦先攻入关中,当为王。鸿门宴上,刘邦惧怕遭项羽攻击,主动提出居项羽之下,似乎称王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项羽做贼心虚,怕诸将内心不服背叛自己,便暗中商议,得一妙策。巴蜀之地,道途险阻,秦朝时把山东六国的人们迁徙至此。项羽宣布:"巴蜀也是关中,沛公刘邦率军先入关中,应该封王于关中地区。"刘邦被封为汉王,据有巴、蜀、汉中之地,以南郑(今陕西南郑)为都。

刘邦受封的汉中地区,实际上是关中地区的西南部。为扼制和监视刘邦,项羽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秦王朝的三位降将于刘邦周围,使刘邦不得出关。章邯为雍王,占有咸阳以西之地,以废丘为都。长史司马欣,从前当过栎阳(今陕西临潼北)狱掾,曾经有恩德于项羽的叔父项梁,使项梁在栎阳狱中得以脱罪无事;都尉董翳,曾经劝告章邯使之降楚。所以,项羽封司马欣为塞王,占有黄河以西、咸阳以东地区,以栎阳为都;董翳为翟王,占有上郡(今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地区),以高奴为都。项羽迁封魏王豹为西魏王,迁于河东地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瑕丘人申阳,原来是赵相张耳的宠臣,曾抢先攻下河南郡,在黄河岸边迎接项羽,所以,申阳被封为河南王,以洛阳为都。韩王成仍旧称韩王,拥有原来的封地,定都阳翟(今河南禹县)。赵将司马卬率众进攻河南,屡建

战功，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占有河内地区，定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原来的赵王歇迁封为代王，占有代地，定都代。赵相张耳，素有贤士声名，随项羽入关，建有战功，受封为常山王，占据赵地，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当阳君英布，原本是楚将，随项羽出生入死，勇猛超人，被封为九江王，定都于六(今安徽六安)。鄱君吴芮，率领南方百越地区义军协助诸侯伐秦，并随项羽入关，被封为衡山王，定都在邾(今湖北黄冈)。义帝的柱国共敖，领兵攻南郡，屡立战功，被封为临江王，定都江陵(今湖北中部长江沿岸)。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燕将臧荼，随楚军救赵，后随项羽入关，被封为燕王，定都在蓟(今北京)。齐王田市改封胶东王，定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齐将田都，从共地救赵，后随军入关，被封为齐王，定都临淄(今山东淄博)。旧时被秦所灭的齐王建的孙子田安，曾攻下济北数城，带兵投降项羽，被封为济北王，定都博阳。田荣与项梁有矛盾，不肯与项梁合作，也没有兴兵伐秦，因此没有封爵。成安君陈馀，抛弃相印而去，没有随项羽入关中，然而他平素贤名远扬，有功于赵，故而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他。番将梅𫓶，建有功勋，封为十万户侯。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拥有九郡之地，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秦王朝既已扫灭，战争已经结束，各路义军首领都得封爵，便各就受封之地。项羽率大军回到彭城，派人将义帝迁出，让出彭城。项羽掩饰说："自古为帝，地方千里，必居于上游之地。"义帝被逼无奈，只得迁往长沙郴县。左右群臣见义帝被逐，知道事情不妙，便都渐渐离去。项羽并未就此罢休。他觉得义帝的存在妨碍自己称王称帝，便暗中派人密令衡山王吴芮和临江王共敖把义帝杀死于江南。

在上述封王中，有些人并不如意。项羽最初分封原来的韩王成为韩王，但后来他觉得韩王成没立军功，又改变主意不许他就国，

将他带回彭城，改封为侯，过了一段时间，干脆把韩王成杀掉了。原来的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而把臧荼封为燕王，韩广不肯离开燕地到辽东，结果被臧荼杀死，封地也被兼并。

当然，最不如意的要算田荣了。田荣是齐国的旧贵族，狄城人。田氏族在狄城势力很强大，又受人们拥戴。陈胜起义之初，派周市带兵进攻魏地，狄城守军拼死抵抗，久未攻下。田荣的堂兄田儋有意反秦，便假装要杀家奴，带着手下人和家奴去见县令，乘机把县令杀死，然后召集狄城的人们说："各地诸侯都已反秦自立，齐是古代封国，而我田儋又是田氏族人，应当称王！"于是自立为齐王，发兵迎击周市。周市的人马败走，田儋带兵东向攻伐齐国一带。秦将章邯在临济围攻魏王咎，情况十分紧急。魏王派人向齐求救，齐王田儋带兵救魏。章邯趁夜幕降临，让马匹口中衔枚，袭击齐魏军队，将齐魏军队击溃，田儋战死。田儋的堂弟田荣收拾残兵败将向东逃到东阿。齐国的人们闻听田儋战死，拥立以前齐王建的弟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国，田间为军帅，领导齐人抗拒诸侯。

田荣败走东阿，章邯紧追不放。项梁见田荣情况危急，便主动率军在东阿城下阻击秦军，把章邯打得大败。章邯兵败西走，项梁乘胜追击，齐地化险为夷。田荣见章邯退走，惊魂安定了下来，一看齐人拥立田假为齐王，没有自己的份，十分恼火，带兵东向攻击田假。田假不是田荣的对手，南逃楚地，相国田角逃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先前到赵国求救，便留在了赵国。田荣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自任相国，任命弟弟田横为将，平定了齐国。

项梁追赶章邯，但章邯的军队得到援兵，强大起来。项梁寡不敌众，派使者请求齐人和赵人派兵合击章邯。田荣受项梁之恩，此时却说："如果楚国人杀了田假，赵人杀了田角、田间，我就出兵！"楚怀王说："田假是我盟国的君侯，他走投无路来到楚国，我此时杀他不义。"赵国也不愿杀田角和田间。田荣派人对楚、赵两国的人说："手被毒蛇咬伤，就应斩去手；足被毒蛇咬伤，就应斩去足。不这

样做，就会危害全身。现今，田假、田角和田间对楚人和赵人来说，并不是手足之亲，为什么不杀掉他们？如果章邯得逞，不但大家要身受凌杀，而且还会被挖开祖坟呢！”楚人和赵人不肯杀田假、田角，田荣极不满意，始终不肯出兵。结果，章邯击败项梁，项梁被杀，楚兵向东败走。章邯遂渡过黄河，用大军围攻赵的钜鹿城，致使项羽破釜沉舟与章邯决战。因此，项羽痛恨田荣。

现在，项羽横扫全国，分封王侯，当然不会封赏田荣。田荣闻听项羽改封齐王市为胶东王，封田都为齐王，故意冷落自己，十分恼怒。他不肯让田市到胶东就封，还率领齐地的人们反叛项羽，迎击前来齐地就封的田都。田都力不能敌，败走于楚。田市左右的人对田市说：“项羽强悍暴躁，你应该赴封胶东，现在留下不走，将来项羽怪罪下来，后果难料。”田市很害怕，便逃往胶东赴任。田荣大怒，带人追击田市，将田市杀死于即墨。随后，田荣自立为齐王，向西进攻新封的济北王田安，杀了田安。接着，田荣将胶东、齐、济北三国封地合而为一，自称三齐之王。

田荣叛乱后，为扩大同盟，派人联络彭越，送给彭越将军大印，唆使彭越在梁地起兵反楚。陈馀没有受封为王，也不满意，暗中派张同、夏说二人勾结齐王田荣。他们向田荣说：“项羽为天下主宰，做事不能公正无私，把贫瘠土地封给六国后人，而把肥美的土地留给自己以及手下的亲信将领。不仅如此，他还把赵王歇改封到北方荒野的代地，真是欺人太甚。大王既已起兵反抗项羽，为天下鸣不平，希望大王派兵援助陈馀，允许陈馀带兵出击常山王，光复赵地，恢复赵王歇昔日的封地。这样的话，赵国也可以作为齐国的屏藩。”田荣一听有人随同自己叛乱，十分高兴，答应了陈馀的要求，派援军助赵。陈馀集中南皮三县的兵力，与齐军合击常山王，大破常山王张耳的军队，常山王逃往刘邦汉地。陈馀把赵王歇从代地迎回赵地，赵王歇遂立陈馀为代王。

这时，汉王刘邦已出奇兵攻占三秦地区，项羽急忙出兵讨伐刘

邦。楚军赶到时，汉军已把关中地区牢牢控制在手，扼关拒楚。项羽无奈之时，忽闻齐、赵联合反楚，大怒。项羽任命郑昌为韩王，率兵阻击汉兵；命萧公角率军攻击彭越，不料却被彭越斩杀。刘邦派张良到韩地侦察。张良知道韩王成已经被杀，便给项羽写信道："汉王刘邦由于失去关中王的爵号，有些不快，才出兵攻取三秦地区。不过，刘邦攻取三秦地区也只是为了实现灭秦以前的定约，先入关者为王。如今已经取得关中，并无其它愿望，决不出关东进。"张良在信中还刺激项羽说："齐王田荣和赵王歇准备合力灭楚。"这样一来，项羽也就没有心思西去攻击关中的刘邦，掉头扑向齐王田荣。项羽为增加兵力，向九江王英布借兵。英布称病，不肯出兵，只派了几千人应付项羽。

汉王二年(公元前 205 年)冬天，项羽亲率大军攻至城阳，田荣领兵前来会战。田荣战败，逃往平原，被平原百姓杀死。项羽挥师紧追齐兵，把田荣的降卒统统活埋。楚军所到之处，焚烧齐国城屋，掳获齐地妇女财物，一直攻到沿海。项羽的屠杀政策激起了齐地人民的不满，人们纷纷聚集起来抗击楚军。田荣的弟弟田横收得齐地散落的数万兵卒，占据城阳继续抗楚。项羽率军连年作战，一时难以平定楚地。

项羽兴义兵，继承陈胜、吴广未竟之业，最终扫灭残暴的秦王朝，功垂千古。但是，推翻秦王朝后，他大肆分封，企图恢复列国割据状态，恢复旧贵族的统治，这与当时的社会已不相适应。走向统一是天下大势，分封不可避免地导致彼此的厮杀和战乱。所以，项羽分封未已，天下战乱又起。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田儋列传》。

韩信拜将

韩信，祖籍淮阴，平民出身，少年时期家中十分贫穷。韩信不能读书，也没有什么好的品行。成年之后，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既不能当官，又不能种田做买卖。所以，他经常到熟人家里混饭吃，不管人家愿不愿意，硬是懒着不走。人们都很讨厌他。一次，韩信到淮阴郡乡下县南昌亭长家中混饭吃，一吃就是几个月。亭长虽说与韩信关系不错，但时间久了便也有些不耐烦。亭长的夫人干脆大清早提前烧饭，然后把饭端到卧室里去吃。到了吃饭时间，韩信赶到那里，人家早已涮洗完毕，韩信只好饿着肚子。如此反复多次，韩信看出亭长一家的心思，十分生气，便断绝了同他们的关系，从此不再来往。

韩信游手好闲，无聊至极，便到城北的淮水岸边去钓鱼，想以此谋生。淮水岸边有很多女人漂絮洗衣，其中有位老妇看韩信饿得可怜，就从家里带些饭来让韩信充饥。老妇人在岸边洗了数十天衣，韩信也就数十天没有挨饿。韩信十分感激，对这位老妇人说道："将来我有了出头之日，一定加倍报答您的恩情！"老妇听后却不以为然地说："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靠别人施舍过日子，我都替你难为情！我只是看你饿得可怜才给你带些饭吃，哪里指望你来报答呢！"

淮阴地方有些屠夫小子，为非乡里，横行霸道，谁都不敢招惹。一次，他们看韩信一副穷酸相，便侮辱他说："你虽然生得人高马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你是一个胆小鬼。"其中有一少年，扯开上

衣，走到韩信近前挑衅说："韩信，你若不怕死，就用你的剑把我刺死，然后偿命；你若怕死，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我就饶了你！"韩信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晕头转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两眼盯着那少年，半天没有说话。一会儿，他伏下身体，真的从那少年裆下钻了过去。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人们耻笑韩信是无能之辈、胆小鬼，韩信心中自有主张："跟这些无赖拼命，不值得！"

陈胜、吴广起义后，项梁渡过淮水准备起事。韩信听到消息，便带着自己那柄剑去投奔项梁。在项梁的手下干了一段时间，韩信表现平平，没有战绩。项梁的部队垮后，韩信又去投奔项羽，被项羽任命当卫士。韩信觉得自己机遇来了，屡次向项羽献奇策，以求重用。岂料，项羽乃一介武夫，对韩信毫不欣赏，韩信仍旧默默无闻。鸿门宴后，刘邦被封为汉王，前往汉中就封。韩信又从项羽手下跑到刘邦军中，寻求机遇。韩信担任粮仓管理员，因为参与了别人的犯法活动，被判死刑。同案的十三名犯人都已斩首，韩信排在最后，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抬起头望着监刑官，说："汉王不是要统一天下吗？天下没有统一，为什么要杀勇士？"监刑官是夏侯婴，他听了韩信的话甚为惊诧，再看韩信的状貌，相信此人不是等闲之辈，于是下令免他死罪，将他释放，召到帐下。夏侯婴同韩信一席交谈，更觉韩信非寻常之人，便报告了刘邦。刘邦把韩信召去，仔细地交谈了几次，没有发现韩信与众不同之处，也就随便安排韩信担任了负责粮饷的军需官。可是，萧何同韩信交谈了几次，发现韩信确实与众不同，是难得的将才。

刘邦率军开往南郑就封，部下官兵大多是中原人，思念故乡，不愿意到南郑去。就在开往南郑的途中，有几十员将领逃走了。韩信心中暗自盘算："夏侯婴、萧何已经推荐我多次，刘邦始终不肯重用我，干脆死了心吧！"于是也寻机逃走了。萧何听闻韩信逃走，来不及向刘邦报告，星夜兼程去追赶韩信。有人向刘邦报告："相国萧何也跑了！"刘邦十分生气。两天之后，萧何来见刘邦，刘邦既生气

又高兴，责骂道："你为什么逃走?"萧何忙解释说："我怎么会逃跑呢? 我是去追回逃跑的人。"刘邦问："你追的是谁?"萧何回答："是韩信。"刘邦不高兴地说："逃走了几十人，你都不去追，却偏偏追回那个韩信，到底为什么?"萧何解释说："逃走的那些军官都是平庸之辈，今日失去，明日可以复得。但是，韩信这样的人，在当今的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大王如想在汉中长期称王，韩信当然没有大用；如果想夺取天下，扫灭群雄，必用韩信不可，没有人能够同他相比。不知大王您是怎么打算的?"刘邦回答："我怎么愿意死守这汉中之地，我要扫灭群雄，我要兼并天下!"萧何说："这么说，韩信留下就有用处了。如果大王肯用韩信，他就会留下；如果不肯用他，早晚他还会逃走。"刘邦不情愿地说："好吧，看在你的情面上，我任命韩信为将。"萧何继续说："即使大王用他为将，他也不会留下当一员普通的将。"刘邦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那就派他为大将!"

刘邦打算把韩信召来，立即任命他为大将，萧何劝阻道："大王一向待人随便，不讲礼节，如今要用人为大将，如同召唤仆人一般，这怎么能行!依我看，应该选个良辰吉日，沐浴斋戒，在广场上筑起高台，准备好拜大将的仪式，如此才行。"刘邦同意了萧何的意见，萧何就做具体准备去了。

拜将仪式准备得轰轰烈烈，有些将领以为自己将要被任命为大将了，很是高兴，到了拜将这一天，一见是韩信被任命为大将，大家都感到意外。拜将典礼之后，韩信同刘邦坐到一起。刘邦问韩信道："萧相国屡次称赞将军有大将之才，将军有何安邦治国良策，请不吝赐教。"韩信说："在下不才，愿效犬马之劳。请问：大王想向关东发展，夺取天下，最大的对手是不是项羽?"刘邦回答："没错，是项羽。"韩信继续说："大王自己估量一下，从双方的兵力、武器的精良、作战的勇猛各方面比较，大王与项羽谁强谁弱?"刘邦半晌没有作声，韩信说："大王比不过项羽。不仅您自己这样想，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但是，我曾经与项羽打过交道，了解他的为人。项羽乃

天下英雄，他一声怒吼，人们都吓得胆战心惊。可是，他有致命的弱点，不信任别人，不敢把权力交付给手下有能力的将官。所以，项羽之勇乃匹夫之勇。项羽待人表面上十分谦恭和善，部下生了病，他同情部下，甚至流泪，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但是，当部下立了大功，应该封爵的时候，他却极端吝啬，刻好的大印抓在手中不肯放开，把大印的棱角都磨圆了，还不愿授予别人。这是妇人之道，小仁小义，不识大体。虽然项羽目前作天下的领袖，各路将领都服从他，但他不听别人的劝告，放弃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却衣锦还乡跑回彭城，足见他没有战略眼光。从人心方面看，他违背义帝与各路诸侯的约定，把自己的亲信封为王侯，冷落与他关系不好的人，各路义军对他这种自私行为忿恨不已。项羽逐走义帝，那些受封的王侯们也都赶回封地，把自己的君主赶跑，自立为王。项羽率军名义上是驱逐暴秦，然而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焚烧屠杀，无恶不作，老百姓都很痛恨他，内心不愿归附于他。所以，我认为项羽名为天下领袖，实质上失去了天下的人心。这样的人，虽然目前耀武扬威，很快便会衰弱下去。大王应该以项羽所为为鉴。凡是天下的贤人勇士，您就应加以重用，天下还有什么强大的敌人不能摧垮?大王不吝啬天下的土地，谁立军功，就把城邑土地封授给谁，还有什么人不肯卖力?大王率领着正义之师，让那些思念故乡的勇士们向东进军，还能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被击败？再说那三位秦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他们带着秦朝廷的军队出来作战已有数载，兵士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随着他们归降了项羽。项羽不信任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把降卒二十多万人活埋在新安城南，只剩下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没有被杀。秦地的父老兄弟想起此事咬牙切齿，痛恨项羽和那三个人。现在，司马欣、章邯、董翳三人被封在秦都故地，人民受胁迫敢怒不敢言。与他们相反，当年大王率军入关，废除秦王朝的苛政，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同关中人民约法三章，秦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本来大王应该封在关中，这是事先

约定的。但项羽背信弃义，硬是把大王封到汉中，秦地百姓无不因此怨恨项羽。现在大王起兵，只要派人给秦国故地送去一封文书，人们就会蜂起响应！"韩信一席长篇大论，说得刘邦目瞪口呆，惊叹韩信的韬略，大发相见恨晚的感慨，随即采纳了韩信的计策，准备袭击章邯。

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用韩信之计，从故道回军关中，袭击雍王章邯。章邯仓皇调兵迎击刘邦，兵败退于好畤；起兵再战，又败，退至废丘。刘邦平定雍地，向东至咸阳，百姓都归于汉。刘邦又率军围雍王于废丘，并派部下攻取陇西、北地、上郡，命薛欧、王吸二人领兵出武关，借王陵率军在南阳之便，以迎取刘太公和吕雉。项羽闻听消息，立即发兵在阳夏阻击汉军。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初，刘邦派大军向东方发动进攻。汉军来势汹汹，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先后降服于刘邦。韩王郑昌不肯投降，刘邦派韩信率大军伐韩，韩军战败，刘邦将韩地划分为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各郡，关外地区设河南郡，封授原来韩的太尉信为韩王。为进一步收买人心，刘邦颁布命令：凡有兵一万人，有地盘一郡的官将，愿意归服汉国者，可以封授万户侯；同时，下令整修河道，开放秦王朝遗留下来的苑囿供百姓采猎、种田。汉王的这些政策大得人心。

不久，汉军俘虏了章邯的弟弟章平。刘邦出关到陕地，慰问关外的百姓，下令废除秦王朝的社稷坛，改立为汉的社稷。随后，刘邦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过黄河，魏王豹领兵随刘邦一同攻击河内，俘虏殷王司马卬。刘邦遂挥师向南，渡过平阴津，入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住汉王所经过的道路，痛哭流涕，诉说义帝被项羽杀害的经过。刘邦闻听义帝被害，脱去袍服号啕大哭，捶胸顿足痛斥项羽，随后，为义帝大办丧事，亲自守丧三日，向天下散发文告称："天下共立义帝，奉之为天下的帝王。然而，大逆不道的项羽竟敢把义帝放逐到江南，又派人刺杀。现在，我要为义帝发丧，恪守臣节。诸

侯都应穿素缟衣服。我还要声讨项羽，率关中大军，联合河南、河内、河东三地的豪杰义士，攻伐那杀害义帝的歹徒，愿天下的正义君子响应，同诛共灭项羽！”

项羽此时正在北方讨伐叛乱的田荣，田荣兵败，逃至平原，被平原百姓杀死。齐人降楚，项羽率大军在齐地焚杀掳掠，激起齐地人民愤怒，齐人拥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在城阳（今山东鄄城）重举反楚旗帜。项羽虽然获悉刘邦率大军东伐，但由于正与齐人苦战，打算平定齐乱后再回军。不料齐人苦战，拖住了项羽的楚军。

刘邦趁此有利时机率大军东进，一举攻到楚都彭城。项羽获悉，匆忙从齐地撤军回救，从鲁地出胡陵，过萧县，与汉军大战于彭城灵璧之东，击败汉军，杀汉军士卒无数。被楚军追杀的汉兵逃到睢水边，走投无路，跳人睢水，溺死者数万人，睢水河面布满尸首。楚军在沛县俘虏刘邦的父亲和妻子，置于军中作为人质。

当此之时，那些刚刚归附刘邦的王侯，见刘邦的军队败逃，项羽杀来，又纷纷宣布脱离汉王，归附楚王。刘邦的妻兄吕泽领兵驻守下邑，刘邦战败后便率残卒会合吕泽，整编军队，向西退军，到达虞地。同时，刘邦派人赴九江，劝说九江王英布叛楚。刘邦说：“如能使英布起兵反楚，项羽一定会停止追击，去战英布。只要能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就能重振旗鼓，取得天下。”随何奉命为使劝英布反叛，英布听从，项羽便派大将龙且将兵伐英布。

刘邦向西败走的时候，派人寻找家人。当时，兵荒马乱，刘邦的家人避乱逃走，所以没有找到。刘邦不得已而去，在半途忽然遇到长子和长女，也就是后来的惠帝和鲁元公主，于是把他们载上战车同行。楚兵急追刘邦不放，刘邦嫌车上人多太重跑得慢，便将儿女推到车下。滕公当时跟随刘邦，不忍将惠太子和鲁元公主丢下，便把他们重新抱回车上，如此反复几次，滕公劝刘邦道：“眼下事态虽紧急，但也不能抛弃儿女！”刘邦这才停住手。

虽然项羽派龙且攻英布，刘邦的危机得以解除，但诸侯纷纷叛

汉，对汉军极为不利。这年六月，魏王豹请假回去探家，回到封国，马上改变态度，宣布与汉绝交，与楚联盟，并封锁了黄河西岸的临晋关，切断了汉军的归路。刘邦进退不得，就派郦食其去劝说魏王豹。郦食其到了魏王豹那里摇唇鼓舌，也没得出什么结果。无奈，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带兵攻魏，魏军把重兵设防在蒲坂一带，堵绝临晋关险要。韩信将计就计，故意在临晋关一带布置了很多疑兵，装作准备渡河的样子，迷惑魏军；同时，选精兵在夏阳附近，用木桶之类的容器捆绑成木筏，偷偷地渡过河去，偷袭魏国首都安邑。魏王豹猝不及防，急忙调兵抵抗，但为时已晚，被韩信打得大败，魏王豹作了俘虏。平定魏地，打通了从关中通往中原的道路，为日后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韩信从一员默默无闻的小卒成长为叱咤风云的战将，在后来刘邦统--天下过程中充分显露出英雄本色。时势造英雄。没有秦末的战乱，或许韩信还会是人们耻笑的无懒之徒。但是，韩信与那种游手好闲的人的区别在于，他胸怀壮志，不拘小节，为了远大前程可以忍辱负重。后来，他受封王侯，报答了那些帮助过自已的恩人，使他们都显贵一时。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淮阴侯列传》、《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

井陉、成皋之战

项羽分封不久，齐地田荣叛乱，项羽率大军北上击齐。趁楚都彭城空虚之机，刘邦率军攻击彭城。项羽闻讯，急带兵回救，将刘邦打得大败。刘邦西逃，忽闻魏王豹叛汉，便令大将韩信击魏。韩信佯攻蒲坂，暗渡夏阳，一举平定了魏地。

定魏之后，刘邦又派韩信和张耳二人率军向北攻伐赵王歇和驻守赵地的陈馀。韩信首先出兵伐代，在阏与消灭了陈馀的守军，活捉了代国相夏说。

灭代之后，韩信、张耳率几万军队进攻赵国。从代地入赵，井陉关是必经之路。赵王歇和陈馀闻听汉军将要攻赵，把主力军集中在井陉关。当时赵军号称有二十万人，军容甚壮。广武君李左车劝说成安君陈馀道："听说汉将韩信渡过黄河，俘虏魏王，活捉夏说，新近在阏与喋血一战，伤亡很重，刘邦派张耳作韩信的帮手，正在商议如何攻下赵国。这支队伍乘战胜之威疾速而来，其势锐不可当。兵书上讲，兵行千里，粮草便有供应不上的危险。一旦汉军粮草供应困难，就只能靠打些湿柴烧饭，士兵们难免不挨饿。井陉关形势险恶，两辆车不能并行，骑兵也不能排成行列。在这样的隘道中，大军绵延几百里，鱼贯而行，军需粮饷一定会远远抛在后面。因此，我们可以借地利之便，击败汉军。我请求拨给我三万精兵，抄山间小路拦截汉军的后勤补给。您留在这里率领大军深掘战壕、高筑营垒坚守阵地，不要出兵同汉军交战。在这种战局下，汉军向前不得攻克，向后不得退却，我带军拦住他们的退路，他们没有粮草军需品，

不用十天的功夫，韩信和张耳的人头便会悬在军垒之前！希望您认真考虑我的策略，不然的话，我军便有不测之虞。”

陈馀乃是一个不懂战略战术的儒生，他认为，正义的军队作战时不必用奇谋诡计便能战胜敌人。所以，他回答道：“我也读过这样的兵法，认为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可以同敌人一战。现在，韩信的兵马号称几万，其实不过几千人而已。他们不自量力，竟然跋涉千里来攻伐赵国，来到这里也定会精疲力竭。我认为现在的局势是，我们用数十万的兵力同疲惫不堪的少数汉军对阵，汉军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守城不出会贻误战机，今后若有更强大的敌军前来，我们还怎能战斗？况且，照你说的去做，守垒不出，其他诸侯会说我们胆怯懦弱，也会来攻伐我们了！”陈馀丝毫也没有把韩信放在眼里，拒不采纳李左车的计策。

韩信深知井陉关隘路乃兵家大忌，在进山之前就派密探前去赵国窃取情报。韩信获悉陈馀没有采纳李左车的战计，才放心大胆地带着部队向那狭长的隘路进军。离井陉口还有三十里，韩信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一天深夜，韩信选出二千轻骑兵，每人拿着一面汉军小旗，从小路出发了，到了可以看见赵军动静的山坡上，隐蔽起来等候攻击的命令。韩信指示率兵的军将说：“我军主力同赵军稍一交锋就佯装战败，赵军一定会全军出动追赶我们。此时，你们快速冲人赵军营垒，把赵军旗帜拔掉，插上我汉军的旗帜，夺取营垒，堵死赵军的归路！”

第二天清晨，大部队出发之前，韩信命部下军将给士兵发一点早餐，让士兵们垫垫肚子，并且告诉他们说：“今日攻破赵军，我军会餐慰劳大家！”将领们都不敢相信。韩信又同身边的将领们商议说：“目前，赵军占据有利地形，如果见不到我军的主将和主力部队他们是不肯轻易出来的。我们应该设下圈套，诱敌出战。”于是派一万人作先头部队，开出营寨，面对赵军，背靠河水，摆成了阵势。赵

军一见汉军摆成这种只能前进不得后退的阵容,大笑汉军愚蠢。

天色已经大亮,韩信登上战车,插上大将旗帜,擂响战鼓,大军浩浩荡荡开到井陉关前。赵军将士不把汉军放在眼里,求胜心切,立即冲出关门抗击汉军。两军相持一段时间,韩信、张耳假装战败,抛弃掉主帅的旗鼓,迅速撤退到排在水边的军阵之中。赵军一见汉军后退,倾巢而出,争先恐后地掠夺汉军的旗鼓,向汉军压了过来。

韩信和张耳带领的先头部队退到水边,与那里的主力部队会合,然后发起反攻。将士们奋勇当先,以一当十拼死而战,挡住了赵军的冲击,双方形成拉锯战,一时胜负难决。此时,隐蔽在赵营附近的汉军二千轻骑兵见赵军倾巢而出,迅速冲入赵军营垒。赵营中的士兵怎会料到韩信这一手,人慌马乱,被汉军打得东奔西窜。汉兵拔掉赵军的军旗,换上了汉军的军旗,死死守住井陉关口。

关口外的赵军原以为汉军不堪一击,未料与汉军相持不下,一时难决胜负,想收兵回营,回头一瞧,大本营早已被天降的汉兵占领,顿时军心大乱,将士四窜而逃。赵将虽竭力制止奔逃,斩杀逃亡士兵,然而无济于事。汉军两面夹攻,将士争先恐后,赵军死的死,降的降,成安君陈馀被杀,赵王歇被活捉。

韩信见胜局已定,于是传令军中:"一定要活捉李左车,不许伤害。谁捉到李左车,奖赏千金!"命令传下不久,就有人把李左车绑到韩信跟前。韩信立即跳下帅车,亲自给李左车松绑,请他坐上自己的战车,自己坐在下座,执弟子之礼同李左车谈话。

战斗结束,将士把俘虏、斩杀的首级、缴获的军械物资交上,同向韩信称庆。有人问韩信:"兵法讲,列阵时要右边背靠山,左边靠水。然而我们此次作战,将军却背水列阵,反其道而行。您事先告诉我们说,破了赵军再吃饭,当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现在果真是这样。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战术?"韩信大笑解释道:"这在兵法上是有依据的,只是诸位没有注意罢了!兵书中讲,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指挥的这些士兵平时没有受过我多少训练,我并

不十分了解他们的实际作战能力，如同俗语所说是‘指挥百姓去作战’。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把军队安置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绝境，使每个人意识到，只有拼命相拼才能活命，殊死作战才能取胜。相反，如果把军队安置在可进可退的有利地形，一遇危险士兵便逃，又怎么能与如此强大的赵军作战呢?”诸将听后惊叹不已，说:“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夺下井陉关，汉军不费吹灰之力平灭了赵国。事后，韩信向广武君李左车求教道:“在下想北伐燕国，东平齐国，请问阁下有何高见?”李左车虽胸怀成策，却谦虚地婉言谢绝说:“臣时常听人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言政。我现在既是败军之将，又是亡国之臣，没有资格同您讨论天下大事。”韩信听罢哈哈大笑，说:“阁下所言不然。我也曾听说，百里奚在虞国为官，虞国亡国了；然而他到了秦国，秦却成为诸侯中的强国。难道百里奚在虞国就愚蠢，到了秦国就聪明起来了?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的建议不被虞君采用而被秦君采用。假如当初成安君陈馀真的听从了您的建议，像我韩信这样的庸才，或许早就被您俘虏了!只是由于陈馀不听您的高见，才使我有幸聆听您的教诲。”随后，韩信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我是真心想听取您的高见，望不要推辞!”韩信是战场英才，深有谋略，却如此诚恳地征求意见，李左车深受感动，也就说:“我也曾听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纵使是凡夫俗子言语无知，圣人也要听听引为借鉴。好吧，我就随便谈谈我的看法，虽然不一定合适，也可供将军参考!成安君陈馀虽非百战百胜之将，但确实胸有韬略，只因一次差错，身死水滨，遗恨终生。从目前局势分析，将军巧用木筏渡黄河，突袭魏国，俘虏魏王豹，又在阏与捉住夏说，接着一战攻克井陉关，战胜赵国，不到一个上午打败二十万赵军。这几场大胜说得上威震天下，名扬四海。听说敌国的人们心怀恐惧，以为自身生命旦不保夕，都放下锄头，只图眼前吃些好的，顾不得日后，等待将军的攻伐。这局势确

实对将军十分有利。然而，汉军将士长途奔波，连年作战，十分疲乏。若用这支军队跋涉千里到燕国去作战，燕国城防坚固，士卒众多，恐怕一时难以攻下，或许会相持日久。到那个时候，汉军的弱点会完全暴露给对方，就会陷入被动，时间拖得愈久，粮草供应愈困难。到那地步，较弱的燕国不能征服，强大的齐国也就更难对付了。东方燕国和齐国的问题不解决，楚、汉战争的形势也就难见分晓。我以为，将军想远途伐燕的战略不太妥当，是用汉军的短处与燕军的长处相较量。"

韩信听后若有所思，继续问道："照先生的想法，应该如何才好呢？"李左车不慌不忙地答道："从眼下的形势来判断，不如命令将士解下盔甲放下武器，留守赵国，安抚百姓。这样一来，赵国百姓会感激汉军的开明，每天都会送来酒肉犒劳汉军。汉军休整后，大规模北进，开到通往燕国的大道上，整军待发。然后，派一个能言善辩的使者带上信札送往燕国，把汉军的神威讲给燕国国君，燕君必会恐慌万分，乖乖地归顺过来。燕国归降后，再派使者到齐国去，晓以利害。齐国即使有聪明人，在那样的形势下也不知如何才好，齐也只得顺应时势归降汉王了。燕齐归汉，天下大势也就豁然明朗了。用兵之道，重在虚张声势，先声夺人，刀兵相见乃是下策。"韩信听李左车说得头头是道，佩服地说："妙极了！"依照他的计策，将大军休整后开到燕国边界，派了个使者到燕国去。燕受到威胁，立即表示愿意归顺汉王。韩信派人报告刘邦，请求立张耳为赵王，镇守赵国。刘邦一听先后夺取赵、燕，很是兴奋，就封张耳为赵王。

在韩信征服赵、燕的同时，汉王刘邦率汉军主力正与楚王项羽苦战于荥阳和成皋一带。汉军驻守荥阳，筑起甬道，同时利用河上交通，运输粮食等军需品。为了断绝汉军的粮草供应，项羽屡次出兵侵夺汉军所运粮草。汉军粮食匮乏，刘邦深以为患，要求与楚讲和，中分天下，荥阳以西为汉王之地，以东为楚王之地。项羽也苦于连年征战，打算应允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劝阻道："汉军是可以打

败的。如果现在不抓住时机把刘邦除掉，恐怕会养痈为患，待他站稳脚跟，后悔也晚了！”项羽听取了范增的建议，拒绝了刘邦的要求，率主力急围荥阳。刘邦被团团围困荥阳城中，粮草断绝，孤立无援。部下陈平建议刘邦设法离间项羽同范增的关系，除掉范增，项羽也就容易对付了。刘邦采纳了陈平的计策。

一日，项羽派军使进入荥阳城内，刘邦派人盛宴招待。正当筵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负责招待的官员装作仔细端看项羽的使者，突然惊讶地叫道：“误会了，搞错了！我以为是范增将军的使者，原来不是，而是项羽的使者。”立即传令撤去盛宴，改换粗食淡饭。项羽的军使一见如此场面十分吃惊，匆忙赶回报告了项羽。项羽哪知这是刘邦设下的诡计，竟真的怀疑范增同刘邦有勾结，不再信任范增，逐渐夺去了范增的兵权。范增不知此中底细，对项羽的做法十分恼怒，最后忍受不住项羽的冷落，对项羽说：“天下大局已定，大王自己处理好了。我范增年老力衰，不能再为大王尽力，回乡养老算了！”项羽本来就不放心范增，现在见范增主动提出辞职还乡，也就顺势答应了。范增为项羽立下汗马功劳，征战多年，没想到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步，气愤难忍，立即打点行装回家，半途之中，郁积成疾，后背生出痈疮，暴病而亡。可惜范增乃天下少有的奇才，足智多谋，竟然被人诡计所害！

范增走后，项羽加紧围攻荥阳，形势万分危急。汉将纪信向刘邦提议：“情况紧急，荥阳难以守住。我请求装作大王以诓骗楚军，大王趁机逃出荥阳。”刘邦眼见山穷水尽，也就采纳纪信的计策。一天晚上，两军将士都已疲乏，突然荥阳东城门大开，走出许多如花似玉的女子，楚兵一见目瞪口呆。随后城中又出来二千甲士，楚军以为汉兵要突围而出，立即四面包围过来。这时，军将纪信穿王者袍服，乘黄屋车，从东门出来，假装汉王出降。楚兵信以为真，高呼万岁，一些楚将趁机掳掠城中放出的美女。就在此慌乱时刻，汉王刘邦带了数十快骑，从城西门冲出，直奔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

项羽闻听刘邦出降，赶到阵前仔细一看，只看到纪信，便问刘邦在哪里。纪信冷冷地说："汉王早已突围出城了！"项羽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纪信活活烧死。

刘邦逃出荥阳时，留下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共守荥阳城。周苛和枞公二人商议道："魏豹是叛降过来的人，这种人见风使舵，不会与我们共患难。"于是借机杀死了魏豹。尽管汉军守将殊死搏斗，但由于两军力量相差悬殊，荥阳城还是被楚军攻破了。项羽对周苛劝降道："我看你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不愿杀你，到我这边来吧，我任命你为上将军，封三万户侯！"周苛大骂道："呸！汉王待我恩重如山，纵死难报。想让我降你，那是痴心妄想！我劝你还是放明白些，早早投降汉王，也好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将成为阶下囚！"项羽是盖世的英豪，怎容得周苛如此辱骂，大怒，下令烹杀周苛、枞公二人。

汉王刘邦逃出荥阳后，向南入于宛、叶之间，得与九江王英布会合，集合零落的散兵，再次入守成皋。成皋地形险要，春秋时称"虎牢关"，乃兵家必争之地。汉王四年（公元前 203 年），项羽兵围成皋，刘邦寡不敌众，同夏侯婴从成皋北门渡河逃往修武（今河南西北部）。到修武后，收得韩信、张耳的军队，其他各路战将也渐渐汇聚过来，汉军复振。楚军攻下成皋后，准备继续向西进攻，遭汉兵阻拒，两军相持下来。

此时，彭越渡过黄河攻击楚的东阿，杀死楚将薛公，进逼楚军大本营。项羽闻后方告急，立即回兵东向击彭越。刘邦见项羽东归，想率军渡河南进，受郑忠劝谏，便留军于河内，派刘贾带兵东去助彭越，烧掉楚军的粮草。项羽先后击破刘贾，杀败彭越。

为争中原之地，刘邦领兵南渡黄河，第三次入据成皋，占领广武，取得敖仓的军粮。项羽平定东方的乱局，掉头西来，在靠近广武的地方安营扎寨。楚汉两军相持数月。

东方的彭越经过休整，再次由梁地起兵，攻击楚军后方，拦截

楚军粮运，项羽深为不安。他想尽快结束与刘邦的争斗，一时又难以取胜。盛怒之下，他命人制作了一个高腿的俎，把刘邦的父亲放在俎上，安置在汉军可以望见的高处，随后，派人告诉刘邦说："汉军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如不投降，楚军就烹杀刘太公！"

汉王刘邦一见项羽此时黔驴技穷，竟然想出这绝招，心中反倒有了底数。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使者说："我刘邦和项羽都是楚怀王的大臣，受命于怀王。怀王曾说：'你们二人相约为兄弟。'既然如此，我刘邦的父亲也是项羽的父亲。如果项羽一定要烹杀他自己的父亲，告诉他分给我一碗肉汤！"使者回报，项羽大怒，要杀刘太公。项羽的部下项伯劝阻说："天下局势尚不可预料，杀人之父，在舆论上影响也不好。争天下的人不为身家所累，杀死人父无济于事，还是另谋他策为好。"项羽一听觉得有理，也就没杀刘太公。

杀刘邦之父威胁刘邦之计未成，项羽便对刘邦说："天下战乱不宁，生灵涂炭，只因你我二人相争。我愿意同你单枪匹马决战，一人对一人，一决雌雄。不要因为你我二人祸害天下！"老奸巨滑的刘邦冷笑着说："我刘邦宁肯斗智，不愿斗力！"

无奈，项羽派勇士到汉军阵前挑战。刘邦不派人应战，安排部队中擅长射箭的楼烦人将挑战的楚兵射死。项羽再派，又被射死，连续三次。项羽大怒，亲自披甲上阵，前去挑战。楼烦人又要射箭，项羽怒目责叱，楼烦人吓得目不敢正视，手不能放箭，返身回到营垒，不敢再出。刘邦派人责问，方知因惧项羽而致，刘邦也很吃惊。

项羽靠近汉军阵前责骂刘邦，刘邦反唇指责项羽的不义行径。项羽怒不可遏，要与刘邦一战，刘邦不肯。刘邦历数项羽的罪状说："当初，我与你同受怀王之命，当时约定，先入关者为王，然而你背信弃义，依靠兵强马壮，把我封到巴蜀地区为王，这是你的罪状之一。你假传怀王圣旨，杀死卿子冠军宋义，夺了兵权，这是罪状之二。破赵之后，你应报告怀王，然而你非但不报告，反而擅自调集各路诸侯军入关，这是罪状之三。怀王曾有圣旨，入秦之后不许烧杀

劫掠，而你却焚烧宫殿，盗掘坟墓，私取国家财物，这是罪状之四。擅自杀害秦的投降皇帝子婴，这是罪状之五。你用欺诈手段，残酷地坑杀秦王朝的降卒二十万人，却封其将章邯为王，这是罪状之六。你任人唯亲，把亲信将官封在好地方，而把原来的齐王田市、赵王歇、韩王广驱逐到荒远地区，使他们的臣下纷纷叛逆，这是罪状之七。你把义帝逐出彭城，自己占据彭城，又兼并韩、梁、楚之地，贪婪自私，这是罪状之八。你胆大包天，派人暗杀义帝于江南，此举天理难容，这是罪状之九。你有上述九大罪状，天下共诛！我统帅仁义之师，为民除害，替天行道。像你这样的邪恶罪人，我要用刑余的罪人杀你，何苦亲自同你搏战！"

受刘邦一番臭骂，项羽恼羞成怒，让暗中埋伏的弩手向刘邦疾射。刘邦猝不及防，胸部受伤。为稳定军心，他却握住自己的脚说："这混蛋射中了我的脚趾！"

为免使楚军乘机攻汉，张良请汉王刘邦勉强起床，登上帅车，巡行三军，慰劳将士，以安士卒，然后，退回成皋养伤。伤势稍愈，刘邦便西行入关到栎阳，慰问父老乡亲，在栎阳停留四天，又回到前线，统军于广武，拉开了与项羽再战的序幕。

井陉之战和成皋之战是楚汉战争的两大重要战役，井陉之战使汉军夺取中原，而成皋争夺战使项羽的楚军疲于奔命，大大消耗了楚军的力量。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对楚军越来越不利了。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武涉、蒯通说韩信

楚汉战争愈演愈烈，双方一时难决胜负。在这种战争形势下，活跃着一位叱咤风云、决定战争结局的大将，他就是韩信。

井陉战后，韩信率汉军一举平定赵国，又用武力胁迫燕国归汉。刘邦率汉军主力与项羽的主力在河南连年苦战，得知韩信一路不断取胜，便从韩信手下调走部分军队以补充自己的力量，同时命令韩信夺取齐国，以震动项羽的后方。

刘邦与项羽相争于荥阳、成皋一带，汉军经常失利，刘邦准备放弃成皋以东之地，退守巩（今河南巩县）、洛（今河南洛阳）一带。谋士郦食其劝说刘邦道："我听人说，知天之道的人可以为天子，不知天之道的人不会成为天子。何为天？民是王者之天，而民又以食为天。粮食是争天下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敖仓（今郑州西北）是黄河与济水分流之地，重要的漕运枢纽，秦王朝的粮仓所在。楚军攻下荥阳，却不知要守住敖仓，只派了少数兵士屯守成皋，坐失地利。这是上天在帮助汉王。当前，屯守的楚军并不难攻破，汉军却要放弃如此重要的战略地带，这是失策！楚汉战争相持不下，天下不安，农不能耕，妇不能织，军备物资更显得至关重要。我建议，汉军应立刻再进兵夺取荥阳，夺取敖仓的米粮，守住成皋，堵住太行山险要，控制蜚狐口和白马津，让各地诸侯看清天下形势，他们便知道该归服谁了！现在，燕、赵已平，只剩东方齐国未攻下。齐王田广据有千里齐地，田间率二十万大军驻守历城。齐国背海面河，南靠近楚国。齐人奸诈善变，纵使派几十万大军进攻，也难知什么年

月能取胜。我提议，大王派我出使齐国，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劝说齐王，使他归服汉王。”一番话说得刘邦茅塞顿开，拍手称是，依从了郦食其的计策。

郦食其打点行装，带上礼品，立即千里迢迢赶赴齐国。到了齐国，齐王田广依礼相待，郦食其侃侃而谈。他装作十分关心齐国的样子问齐王：“大王知道天下的人心所向吗？”齐王说：“不知道。”

“如果大王知道天下人心所归，齐国还可保住，否则，齐国往后就危险了！”郦食其煞有介事地说。

齐王闻听此言，急不可待地问：“天下人心归向谁？”

“归向汉。”

“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呢？”齐王追问。

“当然有根据，”郦食其慢条斯理地说，“当年楚怀王还在的时候，与各路将军约好先入关使秦皇帝降服者为王。明明是汉王刘邦先攻入关中，然而项羽却背弃信义，硬是把刘邦逐到汉中为汉王。然后，项羽又把义帝流徙长沙，派人在半途将义帝害死。汉王听到这个消息万分悲痛，发誓除掉项羽，伸张天下正义。汉军攻克三秦地区，收编各路诸侯的军队，为那些亡国的贵族立下后嗣。如果有谁守城以降，汉王就封他为侯。汉王得到好处，与士兵共享；天下的公益，与百姓共乐，所以，各地英雄好汉都愿意为他效劳，归附的军队四海云集，响应的王侯远近有声。再看看那楚王项羽，沾上背信弃义的臭名，又有杀害义帝的大罪；别人的功劳过后他就忘记，别人的过错他却耿耿于怀；为他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不是他的亲信，他决不信任，所以招致天下叛离，英雄豪杰不愿为他卖力。由上可见，天下人心归向汉王，而不是楚王，其中道理妇孺皆知。现今，天下大势已经明朗，汉王平三秦，定赵、魏，连克三十余城，燕王望风而降，这简直如同黄帝的军队，非人力所能为，必是上天佑助！汉王占据敖仓的军粮，守住成皋要地，把住白马津，堵住太行山，胜利在望。天下人先投奔汉王的，可封为王侯；观望等待的，只能是自取

灭亡。所以，大王尽快归服汉王，还可保住社稷，如若不然，大祸即将临头了！”

郦食其一番奇谈，说得齐王头晕脑胀，不知天下局势的真正面目，完全信以为真，于是，依从郦食其的建议，准备归服汉王。他撤去三军的守备，终日同郦食其在一起饮酒作乐。

再说韩信奉了汉王之命统大军东下伐齐，大军行至平原（今山东平原）黄河渡口，正准备挥师渡河，忽闻汉王派郦食其到齐国劝降，已经说服齐王，打算罢兵西归。军中的说客范阳人蒯通对韩信说：“郦食其受汉王之命到齐国劝降，将军受汉王之命平定齐国，谁晓得汉王用得是什么计策？况且，郦食其一个平庸无能的书生，靠一辆马车和如簧之舌到齐国游荡，竟然劝说齐王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巧得七十余城；而将军统率几万大军，用了一年的苦战才得赵国五十余城。将军身为大将，立下的功劳反倒不如一个书生，岂不受天下人耻笑，哪里还有什么功劳！”受蒯通一番刺激，韩信觉得不能就此停手，号令三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向齐国压来。

齐王听从了郦食其的劝告，与汉和好，撤去了历山一带的防守部队。他正与郦食其酣饮，忽闻韩信率汉军大队人马占领历下城，进逼齐都临淄，大惊。齐王以为受了郦食其的欺骗，十分恼怒，对郦食其吼道：“如果你能阻止汉军攻齐，我饶你一命；如果不然，我把你煮死！”郦食其一见事情突变，心想劝阻汉兵是绝不可能的事，自己无论如何也难逃厄运，横下死心回答：“小谨者不大立，大德者不小让。事情是老子干的，敢做敢当，我决不劝阻汉军！”齐王大怒，立即下令烹杀了郦食其，然后率人向东逃往高密，同时派人向楚王项羽求援。

韩信率军攻克临淄，随后率军向东追击齐王田广。楚王项羽派大将龙且率二十万人马援救齐王田广。龙且赶到，与田广兵合一起，准备同韩信的汉军交战。

交战之前，有部下给龙且献计说：“汉兵深入齐国腹地，地形对

他们不利，他们必会奋力死战，勇猛难挡。齐楚两国士兵在自家土地上作战，眷恋家室，容易溃散潜逃。因此，我们应该高筑营垒，坚守阵地以围困汉军；同时，让齐王派人招抚那些逃散的部下，坚守城池。那些被汉军控制的地区，听说齐王还在，又有楚国大军的支援，必会叛汉归齐。到了那时候，汉军远离故国，粮草运输困难，从齐国又得不到补给，不战自败。"龙且是随项羽百战百胜的大将，虽听说韩信勇猛，但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回答部下说："我知道韩信那点武艺，要击败他算不了什么！况且，我的任务是援救齐国，消灭汉军，如果汉军不战而降，他们也不知我龙且的厉害。如果战胜了韩信，说不定楚王会把齐国的一半土地封给我，我怎能不战？"

楚汉两军在潍水一带拉开战幕，一在潍水西岸，一在潍水东岸。从兵力数量看，汉军人少，楚军兵多，汉军寡不敌众。韩信命士兵趁黑夜制做了一万多袋子，里面装上砂石，堵住上游的河水；到了白天，带领部分汉军渡河进攻，几个回合，便向后撤回。龙且高兴地叫道："我早就知道韩信是个胆小鬼！"率主力向河对岸冲了过去。韩信见时机已到，命士兵挖开上游的砂袋，滚滚的潍水汹涌而下，河中的楚兵淹溺而死者很多，渡过河的大半想退回去，但已不可能。韩信下令攻击，楚军人慌马乱，完全失去战斗力，被汉军全部围歼，龙且也在乱阵中被斩死。留在潍水东岸的楚齐军队见势不好，四散而逃。韩信率大军渡河追杀，一直追到城阳，剩下的楚军全都作了俘虏，田广被捉住斩杀。

汉王四年(公元前 203 年)，齐境全部平定。韩信自恃功高，派人告诉汉王刘邦说："齐人狡诈，变化莫测，是个屡降屡叛的国家。南面与楚相邻，楚王也不会坐失齐地。如不暂时立一个大将为齐王，齐地形势难稳。我请求暂时代理齐王之位，封为假王，以稳定战局。"

当时，楚王项羽把汉王刘邦围在荥阳，攻势甚猛，汉军的情况十分危急。韩信派的使者到了荥阳，把信札呈给刘邦。刘邦拆开信

札一看，勃然大怒，骂道："我被围困在这里，每日盼望你来救援，打退楚兵，你却要自立为假齐王！"谋士张良和陈平正在汉王一旁，一听汉王怒骂，知道事情不妙，立即暗中踩了汉王一脚。汉王一怔，停住了口。张良凑到汉王耳边小声说："目前大王形势不利，韩信拥兵在外声威显赫，在这种情形下，怎能不答应他封王的要求？干脆就封他为齐王，给他恩惠，让他守住齐国，攻伐楚军，否则，恐怕韩信要闹乱子。"刘邦听罢，立即醒悟过来，顺势笑骂道："大丈夫平定诸侯，功高当赏，封为真正的齐王才对，为什么要当假王！"立即派张良前往齐地，封韩信为齐王，同时调集他的部队攻楚。

项羽得报龙且战死，楚军救齐的部队全军覆灭，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的重要，赶忙派盱眙人武涉游说韩信叛汉。武涉到了韩信军中，摇唇鼓舌说："天下的人们苦于秦朝的暴政，人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大家相约协力灭秦。秦朝灭亡了，大家依照功劳的大小，封地称王，让士卒解甲归田，天下休兵。然而，汉王不满意自己的封地，又兴战乱，攻占了三秦地区，带兵出关东向，攻略其他王侯的封地。他的意图显而易见，要吞并天下，灭亡所有诸侯，否则不会罢休！汉王的贪心，永无止境。他的为人，不讲信义，唯利是图，这种人很难靠得住！他的性命几次落入项王手中，项王宽容他，给他生路。谁料他一旦逃脱，就违背约盟，兴兵攻伐。他是一个不可靠近、不可信赖的家伙。现在虽然他封你为齐王，但这是迫不得已，一旦他摆脱险境，立稳脚跟，便会找你算帐！刘邦今日不杀你，是因为项羽还在，刘邦还需要你。楚汉相争，谁胜谁负，你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如果你帮助汉王，汉王就得天下；如果你帮助楚王，楚王就得天下。项羽今日灭亡，你明日就会灭亡。你同楚王是故友，楚王很器重你，不如与楚王联合共击汉王。那样的话，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可做一个盖世的王侯。如果放弃现在的机会，误信刘邦，攻打楚王，恐怕算不得聪明人！"

韩信听完武涉一番话，回答道："当年天下乱起，我最先投奔项

羽，然而，他却让我当守卫宫室的戍卒，提出建议不肯听，献上妙策不肯用。万般无奈，我才离开楚军到了汉王那里。汉王把我当作一个人才，给我大将兵权，几万军队，汉王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自己的饭食给我吃，听我的计策，对我十分信任，才使我韩信有了今天。我如果背叛汉王，天理不容。纵然到死，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请你代为感谢项羽的好意。”婉言谢绝了武涉的劝说。

武涉走后不久，汉军中有一儒生蒯通，深晓天下大势，也到韩信跟前出谋献策。此前，他曾在刘邦手下，为刘邦谋事。他痛恨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想恢复山东六国的旧秩序，曾劝刘邦分封六国旧贵族为王。由于张良的劝阻，刘邦才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韩信越战越勇，在楚汉战争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蒯通又投到韩信这里。武涉走后，蒯通见有了时机，也向韩信跟前靠拢。他曾经学过相面术，据说能察知人的天性和命运，便想借此以说服韩信。他对韩信说：“我过去学得相面之术，能相出未来命运。”韩信一听，顿时有了兴趣，问道：“先生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贵贱寿夭呢？”

蒯通回答：“一个人或贵或贱，或寿或夭，通过观看其骨骼便知；或忧或喜，要看他脸上的气色；察其成败，则要看他的性情、对事情有无判断力和是否果断。依照上述三方面综合判断，定然万无一失！”

听蒯通讲得振振有辞，韩信便想探知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求问道：“太好了！请先生为我算算，看我未来如何？”

蒯通向韩信的周围巡视了一下，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露，请大王教周围的人退下，我再单独同大王详谈。”韩信斥退了周围的武将和侍从，厅内只剩下他和蒯通二人，便说：“别人都走开了，只剩下你我二人，先生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来。”

蒯通坐到韩信的近前，端详了一下韩信，慢慢说道：“从您的面相看，将来最高不过封侯，而且还有不测的危险；从您的脊骨来看，将来贵不可言。”

韩信不解地问："那到底怎么样，请先生仔细说来。"

蒯通说："反秦之初，各地英雄豪杰并起，抗击暴秦，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天下的有志之士便会云集而来。那时候，人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推翻暴秦，解救天下。当今的情形已经全然不同，楚汉两军相争，都想消灭对方，自己夺得天下称王，害得天下无辜百姓流离失所，伤亡遍野，生灵涂炭。楚王从彭城兴兵，无往不胜，把汉王围在荥阳，乘军事上的有利形势，席卷中原，天下震动！然而，楚王项羽的军队陷于京、索两地之间，久不能胜，难以继续向西推进。再看汉王刘邦，率领着几十万军队，占据了巩、洛一带，倚仗着那里的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楚军，连续向楚军发起反击，然而未得一寸土地。刘邦近来连吃败仗，被困于荥阳，又在成皋身负重伤，狼狈逃至宛、叶之间。楚汉双方打到如此地步，智者无法用其智，勇者无法展其勇。项羽一方虽据险死守，但内部军粮欠缺，军备物资贫乏。中原百姓连年受战争之苦，精疲力竭，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我估计，在当前的形势下，天下没有杰出的豪杰，不足以止此祸患！那么，这个天下杰出的英豪就是将军您了。项羽和刘邦二人的命运就掌握在您的手中：您替汉王出力，汉王就会胜利；您为楚王效劳，楚王就得天下。正是在这样紧要的时候，我才来到大王跟前，披肝沥胆，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大王。我认为，站在大王的立场上，目前最好的对策是采取中立的立场，既不帮助汉王，也不帮助楚王，同他们任何一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从而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所谓三足鼎立，就是三分天下，楚王项羽、汉王刘邦、齐王您同时并立。这样一来，楚王和汉王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他们都要听取您的意见。您可以依靠您的聪明才智，凭借手中强大的军队，占据东方强大的齐鲁之地，控制着燕国和赵国，出兵攻占楚汉两军不争之地，然后，顺应天下民意，出兵西伐，为百姓说话，阻止楚汉之间的争夺，天下百姓必会群起响应。这样的形势一旦出现，您可以指挥楚汉双方，削夺大国的土地，分封诸侯，人们便会感激您的恩德，俯首而听命！大王用

恩德抚慰诸侯，对他们以礼相待，那些诸侯们会相率到齐国来朝拜大王。古人云，天与不取，自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祸殃！请大王三思。”

韩信听得入神，思考了片刻，说道：“汉王待我恩厚，把自己的乘舆让我座，自己的衣服给我穿，自己的饭给我吃。我也听古人说，乘人车舆，要为人分忧；穿人之衣，要为人分难；吃人家饭，要为人卖命。我怎么可以埋没良心背叛别人呢？”

蒯通见齐王韩信仍不忘旧情，继续说：“大王自认为刘邦待己恩重如山，想要帮助刘邦成就大业，自己也好有个归宿，这是大错特错！想当初，常山王张耳和成安君陈馀，二人亲密犹如生死兄弟，后来因为陈泽事件，竟然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常山王张耳背叛项羽，斩项羽使者项婴之头投奔刘邦门下，刘邦借张耳的军队向东进军，在泜水之南杀掉陈馀。张耳同陈馀二人的交情可谓深厚，但最终还是弄得你想杀我，我想杀你，被天下人耻笑。原因何在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贪心永不会满足，情况变化莫测。现在，大王用良心道德同刘邦交往，难道你们的关系比当初张耳、陈馀的关系更深厚？想必不会，而您同刘邦之间的利害却要比陈泽事件严重得多。我斗胆而言，大王过分相信刘邦，这十分危险！从前，越国大夫文种和范蠡帮助句践十年生聚，十年苦熬，最后灭掉吴国，报仇雪耻，使句践称霸诸侯。可是，结局怎么样呢？范蠡流落异乡，文种想坐享江山，却反被逼得自杀身亡。古人云，狡兔死，猎狗烹。若说朋友之间情义，莫过张耳与陈馀；若论忠信道德，莫过文种、范蠡。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还听人们说，勇猛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那就让我来说说大王的功劳吧：渡西河，擄魏王，擒夏说，一战夺取井陉关，平赵国，服燕国，随即平定齐国，灭项羽二十万大军，斩龙且。就战功而言，大王天下第一，没人可以相比。这样的功劳，有震主之威，盖天下之赏。大王留在汉，汉王猜忌您；投奔楚，楚王也不会放心。如此情势，您能到哪里去呢？然而，您现在处于臣下

地位，我实在为您感到不安！”

韩信听得头晕脑胀，一时理不出头绪，便谢了蒯通的好心相告，说：“先生不要再往下说了，容我考虑考虑吧！”

几天过后，蒯通未见韩信有什么反应，便又求见韩信，摒去众人，向韩信进言道：“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能未兆而先谋；遇事能周密思考的人，能把握成败。若听取错误的建议，想不失败，那是很难的。一个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自己去思考，处理事情轻重得宜，极少失误，那他就是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别人的花言巧语无法搅乱他，闲言碎语也不会影响他，这是智者。如果一个人安于现状，满足于既得的官位，甘心情愿地做人家的奴仆，就会失去卿相之位，甚至失掉掌握君权的机会。聪明人当机立断，平庸人遇事迟疑不决。对细琐小事斤斤计较不能忘怀，会遗忘天下大事！进一步说，即使一个人很聪明，知晓天下大势，但如果不能英明果断，也难得成功。常言道，猛虎爪牙能伤人毙命，因犹豫不决反被人擒；蜂蚤弱小，但果断机敏，却使人生畏。千里马踌躇不前，比不上慢行的劣马；凶猛的勇士无所事事，反不如庸人有所作为。尧舜虽有智慧，但闭口一言不发，也不如又聋又哑打手势的人。上面这些例子都说明，成败的关键一是胸怀大局，一是英勇果断，缺乏哪一方面都不会成功。创业艰难，败业容易。机遇难得，容易错过。机遇呀，机遇，失去便永不会再来了，大王千万莫要错过呀！”

韩信有心割据一方，称雄天下；但他又怀念刘邦过去对自己的好处，不忍心背叛刘邦，首鼠两端，迟疑难决。反复再三，他还是感念刘邦的恩德，想到自己立了这么多战功，况且对刘邦问心无愧，刘邦是不会夺去自己齐王封爵的。思念至此，韩信拒绝了蒯通的献计。蒯通一看韩信不听苦心相劝，此事关系非同一般，稍有一点风声漏露出去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便佯装巫师疯疯癫癫以掩人耳目。

后来，汉王在与楚王的固陵战役中失利，采纳谋士张良之策，召齐王韩信参加垓下决战，一举击败楚军。项羽被击败后，刘邦乘

韩信不备，削夺了韩信的兵权。不久，韩信被夺去齐国，改封楚王，都下邳。

韩信到了自己的封国，寻找到当年在淮水岸边送给饭吃的妇人，送与她千金；找到那个给自己几个月饭吃而不能坚持到底的南昌亭长，赐给他一百钱，斥责说："你目光短浅，做事有始无终！"找到那个侮辱自己，让自己从胯下爬过去的歹徒，派他做了楚封国的中尉。韩信对身边的部下解释说："这是位壮士！当年他侮辱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不能杀他吗？不是我韩信不能，而是杀他会毁我的大事。否则，怎能有我的今天！"

韩信自恃聪明，但正如蒯通所言，他是小聪明，是所谓"小知者不大知"，否则，怎会落得"狡兔死，猎狗烹"的悲惨结局！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霸王别姬

汉军大将韩信统军破赵降燕战齐，异军突起，严重威胁项羽的大后方。项羽先派大将龙且率军救齐，企图与齐国联合击韩信，不料被韩信打得惨败，全军覆没。随后，项羽又派盱眙人武涉游说韩信，鼓动韩信叛汉王，韩信不从，项羽的期望再次落空。祸不单行，汉将彭越也在梁地积极活动，攻克城池，劫掠楚兵军备物资。

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决定先平灭彭越这一小股汉军，然后再全力攻击刘邦。他对大司马曹咎说："你留在这里，谨慎守住成皋，如遇汉军挑战，切莫出战。记住一条：不要使汉军东进！我此次带兵东伐，最多十五天必定打败彭越。待我平定梁地后，立即率军回到这里。"随后，项羽率楚军挥师东下，攻击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一战而克；又攻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外黄守军拼死而战，项羽猛攻数日而不能克，后来守军力不能支，终于投降。项羽因外黄人顽强抵抗，延长了他东伐的时间，大怒，下令外黄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都到城东集合，准备把他们就地杀死。

外黄城中有一少年，时年十三岁，听此消息十分惊骇，前往项羽处据理力争。他说："彭越用武力攻下外黄，外黄城中人心恐惧，迫不得已才顺从彭越，但人们心中想念着楚王，盼望楚王早日归来。谁能料到，如今大王来到外黄，却要把外黄城中成年男子全都砍杀，百姓见此情景，今后怎会心服大王？且不说外黄，由这里向东十几座城池，人们闻听大王攻城必杀，谁还敢投降，谁还会心服？人们怕被杀，必会死力守城，大王还怎能得到城邑，恐怕今后是难上

加难了！"十几岁的少年竟然说得项羽哑口无言。项羽钦佩少年的勇气和才智，撤回了屠杀的命令。自外黄挥师东进，楚军抵达睢阳，睢阳人闻听项羽军来，都争先恐后地出城投降，归附项羽。

项羽率大军离开后，大司马曹咎留守成皋。汉军闻听项羽离开的消息，屡次向曹咎挑战。曹咎遵守项羽的命令，坚持不出城迎战。为迫使曹咎出战，刘邦派人对曹咎百般侮辱，曹咎也是一员武将，怎受得如此欺凌，怒不可遏，一怒之下率军渡汜水攻击汉军。汉军早已作好充分准备，楚军正当渡河之时，汉军发起突然袭击。楚军猝不及防，被打得丢盔弃甲，四散逃命。大司马曹咎、长史董翳、塞王司马欣看到全军覆灭，无脸面再见项羽，拔剑自刎于汜水岸边。汉军劫获楚军全部军备物资。

此时项羽已得睢阳城，忽闻曹咎所统楚军全军覆没，大惊，立即率军返回，向汉军发起反攻。汉军攻到荥阳以东，围住楚将钟离昧，昼夜苦战。项羽率军赶到，汉军惧怕项羽的声威，沿险阻小路急忙退却。

成皋一战，汉军得到大批楚军物资，军械粮食充足。项羽率军东奔西走，楚军疲惫不堪，缺乏军粮。在这种局势下，汉王派陆贾为使者来到楚军，请求迎回刘邦的父亲刘太公，项羽不肯答应。陆贾回来后，刘邦又派侯公到了项羽那里，提出汉楚双方举行和谈，平分天下，鸿沟（今河南荥阳至淮阳一线）为界，鸿沟以西为汉地，以东为楚地，双方罢兵。项羽同意，遣返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刘太公、吕雉回到汉军中，将士高呼万岁。侯公功高，汉王封他为平国君，意思是说此人能和平邦国。汉王刘邦曾对别人讲："此人乃天下名士，所居之处，可以安国，故号为平国君。"奇怪的是，侯公接受刘邦的封爵，但自此后不肯再见刘邦。

项羽同刘邦缔结停战协定后，便罢兵东归，据守自己的地盘。刘邦也准备带兵西归，谋士张良和陈平向刘邦提醒道："如今汉王拥有天下土地大半，人心也都归汉。楚王正当兵疲粮尽之时，人心

背离，这是上天要灭亡楚王！当此之机，大王不发动攻击，反而放走楚军，正所谓养虎为患！依臣之计，应趁楚军乏力，发动攻击，可一战而胜！”汉王刘邦从不害怕别人说自己背信弃义，见有利可图，立即采纳张良等人的建议。

汉王五年(公元前203年)，刘邦率汉军尾随楚军至阳夏(今河南太康)之南，命令大军停止前进，派人通知韩信和彭越，约定共同合击楚军，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南)会战。依照约定，汉王率军按时赶到固陵，而韩信和彭越二人却没有如期来到。楚军向刘邦发起反击，大破汉军。汉王战败，退守壁垒。汉王困惑地对张良说：“韩信和彭越不肯依照约定击楚，使我被困于此，你说如何是好？”张良不急不忙地对刘邦说：“楚王将破，而韩信和彭越二人还没有受封土地，他们不肯前来灭楚，此乃情理当中的事！大王如能同他们二人共分天下，然后再让他们率兵灭楚，他们即刻便到。如果不能得韩信、彭越的支援，楚军猛烈攻我，局势的发展很难预测。依臣愚见，大王派人正式通知韩信，将陈地以东直至海边的土地封授给他，将睢阳以北到谷城之地封给彭越，韩信和彭越二人定会如约前来，楚军很快就会溃败！”汉王听后大悟，拍案而起道：“就这么办！”立即派使者分别赴韩信和彭越军中传达此意。

使者到了韩信和彭越那里，宣布了汉王给他们的封地。韩信和彭越都主动说：“请立即回禀大王，我们马上出发！”

当时，韩信率领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扑楚军。韩信是楚汉战争中除项羽外无人可比的猛将，他的行动迅速转变了战争形势。项羽虽勇，但难敌三面的进攻，终致全线溃败，退至垓下(今安徽灵璧南)。项羽败局已定，楚军大司马周殷率军叛楚，自舒城(今安徽杭埠河流域)发兵，攻破楚城池，带领九江之兵，随刘贾、彭越围楚王于垓下。

项羽率军在垓下修筑营垒，顽强抵抗。楚军兵少，军粮也将吃光，被汉军重重包围。项羽想率军突围，没有成功。一天夜里，项羽

正在营中休息，忽闻周围汉军营中楚歌四起，大惊。楚王军中多是楚人，听到那凄凉的楚歌，不由得思念故乡的亲人，为身临绝境而伤感。楚王忧虑地说："为什么汉军中有那么多楚人？难道楚地都被汉军占领了吗？"惊惧之余，也无睡意，起身在帐中饮酒解忧。楚王有一美女，名叫虞姬，随从项羽东征西战，甚得项羽宠爱。项羽还有一匹天下无双的骏马，名叫骓，日行千里。四面楚歌，项羽面对美人和骏马，不禁百感交加，慷慨悲歌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楚王反复吟诵几遍，虞姬作了一首诗以和楚王。虞姬歌道：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楚王伤感至极，流下两行热泪，无尽感慨尽在不言之中。项羽周围的将领们一见如此场面，纷纷落泪，一片抽泣之声。

项羽决定拼死突围。他骑上骏马，一马当先冲出营垒。身边的将士也都跟随项羽，八百多人趁着夜幕低垂，突破重围，向东疾驰。黎明时刻，汉军才发觉楚王竟然突围而出，刘邦急派骑将灌婴率五千轻骑火速追赶。项羽渡过淮水，突围出来能跟得上的只剩下一百余人。慌不择路，项羽一行到了阴陵，迷失道路，问一耕田的农夫，农夫故意哄骗说："向左走。"项羽依言而行，不料走人一片沼泽之

中，人困马乏，泥泞深陷，行走甚慢。汉军骑兵距离越来越近。

沼泽难行，项羽又带人掉头东行，到了东城，此时跟随项羽的只剩下二十八骑。汉军骑兵几千人已经追近。项羽预感自己身临绝境，难以脱身，对跟随的二十八位骑兵说："自从我项羽起兵，至今已经整整八年，经历了七十多次战斗，谁敢抵挡我，谁就被击败；我向哪里进攻，哪里必定攻克！自我作战以来，从没有打过败仗。然而今日，竟然被困在这里，这是老天要使我灭亡，并不是我作战无能！今日固然是死，但我要在死之前让你们看一看，我是怎样三次冲破包围，斩杀汉将，砍倒汉军旗帜！我要让你们知道，今天我死，是上天的旨意，并非我自己的过错！"

说罢，项羽把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分别向四个方向突围。这时，几千汉军骑兵把项羽围在中间，想突围出去，谈何容易！项羽振臂高呼道："冲啊，看我斩一员汉将！"四队骑兵疾驰而走，冲出重围，在山侧分三处集合。项羽大声吼叫着冲杀，汉兵闻声魂飞胆散，项羽所向披靡，汉军被斩杀一将。

汉军骑将杨喜见项羽要突围而出，哪里肯放，打马死死追赶。项羽发现背后有人紧追，回头猛喝一声，杨喜人马俱惊，不由得向后倒退数里而不能停！

楚兵突围后分别集中于三处，汉军不知项羽在哪一处，便将几千骑兵分为三部，各围一处。项羽见汉兵再次冲来，又打马冲杀过去，挥刀斩杀汉军一都尉，并杀汉兵数十人。项羽把骑士们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仅亡二人。项羽对部下们说："我说到做到，你们都看到了吧！"众骑士都十分钦佩，齐声道："看到了！"

项羽带着二十六个骑士退到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西岸，准备渡江东归。乌江亭长得到消息，准备好船只，等待项羽上船。乌江亭长对项羽说："大王，江东虽小，地方也有几千里，百姓数十万，足可以为一方之王，请大王赶紧上船，渡过江去。这里只有我这一条船，汉军追至也无法渡江。"项羽环顾四周，异常激动，狂笑道：

“天要亡我，我渡江何益！想当年，我项羽带领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西进，身负江东父老的厚望；而如今，只剩下我一人，没有一个江东子弟东归，辜负了父老乡亲的期望。纵使江东父老兄弟可怜我，拥我为王，我项羽有何脸面去见他们？我项羽心中有愧，愧对江东父老啊！”两行泪珠潸然落下。项羽对乌江亭长说：“我知道您是一位有德行的长者，我无以回报，只有这骑了五年的战马，它所向无敌，日行千里，就送给您吧！”

项羽把骏马交给乌江亭长，命部下放开马匹，手持短兵器与汉兵作最后决战。楚兵以一当十，置生死于度外，项羽更是怒不可当，杀死汉军数百人。项羽周身受伤十余处，拼战之中发现汉军的骑司马吕马童。项羽问道：“你不是我的故友吕马童吗？”吕马童见项羽认出自己，有些惭愧，转头对汉将王翳说：“这就是楚王。”项羽说：“汉王悬赏我的人头，得我头者，赏千金，封万户。吕马童，我们既然是故友，我最后这点好处送给你吧！”说完挥剑自刎。

众汉将一见项羽命亡，纷纷冲上前。王翳砍下项羽的人头，其他人争斩项羽的身躯，相互践踏砍杀而死者数十人。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项羽身体一部分。他们把项羽断尸献给汉王。汉王命合为一体，看见确是项羽的尸体，便把原来的封赏分成五份，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当年，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项羽死后，鲁地最后降汉。汉王下令以鲁公之礼把项羽葬于谷城（今山东平阳东阿），汉王刘邦亲临吊唁，哭项羽灵，方才离去。汉王还下令，不得杀害项羽的亲族，赐姓刘，封项伯为射阳侯，不知名者有桃侯、平皋侯、玄武侯。

秦末农民战争至此结束了。项羽作为一代枭雄，当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就作战的勇猛而言，无人能与他相比。然而，他毕竟失败了，留给人们无限的慨叹。司马迁对项羽的评论可谓人木三分，他说：“秦末暴政，陈胜起兵，

各地豪杰纷纷响应，项羽没有尺寸土地，乘机起于荒野之中，三年之间，竟统率各路义军灭暴秦。他威服诸侯，分封土地，号称霸王。项羽的威势虽然不长，然在当时风起云涌，谁人可比？后来，项羽背弃先人关为王之约，先失人心；怀念故乡，失去地利；逐杀义帝，触犯众怒。如此作为而要人不叛，怎么可能？他骄矜自大，自智疑人，贤能叛离；崇尚霸业，武力征服，五年光景，身死国亡。可悲的是，身死乌江之时，仍不能觉悟，不肯自责，说什么'天要亡我，非我之罪'，岂不荒谬！"

（张荣明）

参考资料：

《史记》：《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留侯世家》

刘邦登基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垓下会战项羽被彻底击败,并自刎于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至此,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胜利而宣告结束。十二月底,刘邦率群臣向北前进。经过韩信军队的统帅部定陶时,刘邦以突击方式收回了韩信的军权,正月,又发布诏令,更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邳县);封彭越为梁王,都于陶(今山东定陶);又派卢绾、刘贾率军击败占据江陵拒绝臣服的临江王共尉。刘邦还下诏说:"持续不断的战争已有八年之久,万民受害最烈。现在,天下大事已定,赦免死罪以下罪犯。"

汉五年正月,诸侯王和文武大臣联名上书刘邦,请求刘邦称皇帝:"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请求大王陛下:以前,秦为无道,天下共诛之。大王先入关中,得秦王子婴,平定三秦,功盖天下,以存亡定危,救败继绝,安定万民,功大德厚,又施恩惠于诸侯王有功劳的人,使他们能设立宗庙社稷。现在裂地分封已经确定,而位号相同,没有上下的区别。因此,大王盛大的功德,无法广布于后世。请求大王称皇帝尊号。"

面对诸侯王的上疏请求,刘邦推让说:"据说帝是贤者的称号,只是虚名并无其实,不能用。现在诸侯王都推高寡人,这怎么能相当呢?"于是,一帮诸侯王再次上奏说:"陛下起事于细微之中,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从僻陋的汉中之地而起,行威德,诛灭不义之人,立有大功,平定海内。大王的恩德已流布四海,诸侯王的王号已不

足道之，居皇帝之位非常适宜，愿大王以幸天下。”刘邦说：“诸侯王以为称帝号有便于天下百姓，可矣。”就同意了诸侯王的推戴。于是，诸侯王、卢绾等大臣三百余人，与博士叔孙通一起选择良辰吉日，定于二月甲午日，推拥刘邦上尊号。就在这一天，汉王刘邦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境）即了皇帝位，算是完成了登基典礼，取得了统治中国的名正言顺的法定地位。既然汉王刘邦称了帝，那么，王后吕后自然被尊称为皇后，太子刘盈被尊为皇太子，又追尊刘邦已经死去的先母为昭灵夫人。

刘邦被尊为皇帝，立即行使皇帝权力着手巩固自己庞大的基业。他发布的第一个诏书就是封吴芮和无诸为王，以稳定广大的南方。他下诏说：“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佐助诸侯，伐无道，诛暴秦，立有大功，诸侯共议立为王，而项羽却加以侵夺，去其王号，称为番君。现在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地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再下一诏说：“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亲自率领闽中的兵力佐助灭秦，项羽却废而不立为王。现封无诸为闽粤王，封以闽中之地。”

吴芮长期为官江南，深孚民望；无诸为越王句践之后，在闽越地区颇具号召力。刘邦封吴芮、无诸为王，为汉皇朝取得了一个稳定的南方，为以后对异姓诸侯王的斗争打下了基础，显示了刘邦政治上的深谋远虑。

刘邦在汜水之阳即皇帝位以后，就率领文武百官西至洛阳，决定以此为都城。五月，刘邦决定遣散士兵回家，以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下诏说：“诸侯子在关中的，免复十二年不征徭役，回归本土的，免复六年不征徭役。老百姓以前有的聚保于山泽之间，脱离了户口名数。现在，天下已定，应各归其县，恢复原来的爵位田宅，地方官吏应以文法教训辨告，不要笞辱他们。百姓因为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一律赦免为庶人。军吏卒逢大赦，无罪的，失去爵位

的，及爵位不及大夫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原来是大夫的，一律再加赐一级。凡爵位在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食邑，不是七大夫以下的，一律免复其身及家庭的徭役。”又说：“七大夫、公乘以上，都属于高爵。诸侯子及从军归乡的，很多有高爵。我曾数次下诏官吏，先给予他们田宅，有所求于官吏的，赶紧满足要求。有高爵的人，也属人君，皇上也为之尊礼，让他们久立吏前，很不足法。先前的时候，秦代民爵位至公大夫以上的，县令、县丞都为之亢礼。现在，我对于爵位并不轻视，官吏何以敢于如此！况且法律规定，以有功劳赏赐田宅，现在小吏未尝从军的，都已满足，而有军功的却反而顾不上，太背公向私了，守尉长官教训不善。现令官吏善待高爵，以称吾意。有不按诏书办事的，从重论处。”

刘邦登基后的这一诏书，对于社会生产的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为新建立的皇朝的稳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显示了作为开国帝王的非凡的政治远见。

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大置酒筵为文武功臣庆功，并对楚汉战争的胜败经验加以总结。高起、王陵以为，项羽失在不与天下同利，又嫉贤妒能。刘邦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总结说：“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萧何能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道；韩信能统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这三人，都是人中的英杰。我能信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取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只有一个谋士范增，算有点本领，项羽却疑而不用，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刘邦从用人路线方面总结了楚汉的成败原因，分析是相当有见地的，群臣皆服。

刘邦移驻洛阳以后，简派官员修缮宫室，加固城垣，打算长期以此为都城。这时候，齐地人娄敬被征发到陇西戍守，正好经过洛阳，见洛阳大兴土木，知道刘邦想长期以洛阳为都城。他放下小推车，穿着老羊皮袄，让同乡虞将军引见高祖，说有要事禀报。虞将军劝娄敬换一身新衣服，娄敬坚决不肯，他说：“我穿帛衣，就帛衣见

皇上;穿褐衣,就褐衣见皇上,不能再换衣服。"

虞将军引荐以后,刘邦答应召见,并问娄敬有什么话要说。娄敬问他:"陛下以洛阳为都,难道是想同周代比盛大吗?"刘邦说:"是这样。"娄敬劝刘邦说:"陛下取天下同周代并不一样。周代先祖后稷,帝尧封之于邰,积德累善十余代。公刘时避桀于豳。太王因为受到狄人攻伐,所以,离开了豳,迁居于岐山之阳,百姓争着相随。及文王被封为西伯,决断虞芮之讼,开始受天命称王,太公望、伯夷从海滨前来归附。至武王伐纣,不期而会于孟津者有八百诸侯,都说商纣可伐,遂灭了商。成王继位为王,周公之属为之傅相,乃营造洛邑。因为洛邑乃天下之中,四方诸侯纳贡述职,道里平均,有德者则容易为王,无德者据此也容易灭亡。凡是占据此地的,务必效法周代以德政招致天下诸侯,而不能凭借险阻,使后代骄奢淫逸以残害百姓。周代全盛时,天下和洽,四夷靡然向风,慕义归德,相附而臣事周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没有不归附的,都尽其贡职。到了周代衰败的时候,分而为两周,天下不从,周天子不能控制。并不是因为恩德菲薄,而是因为形势变化,力量弱了。陛下从丰沛起兵反秦,收卒三千人,以此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于荥阳,争夺成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于原野,哭泣之声不绝于耳,伤痍者未得康复,而想同周代成、康之时相比盛大,臣窃以为不相配。"然后,娄敬提出了在关中立都的建议。他说:"秦地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猝然事情紧急,百万大军可立待而成。借用秦人的故业,占据肥美膏腴之地,这就是人说的天府。陛下若入关而都之,关东虽乱,而秦的故地可以保全。与人打架,不扼住喉咙,控制背部,必然不能获得全胜。若陛下入关而立都,凭借秦代旧地,也就是扼住了天下形势的喉咙而控制住了后背。"

听了娄敬的一番分析,刘邦还不能贸然作出迁都的决定,乃决定召集群臣商议。因为群臣大多是关东人,都说周代立洛阳为都,

延续数百年，而秦都关中，则二世而亡，还是不如在洛阳建都。刘邦决定不下，决定召问谋士张良，听听他的意见。张良对刘邦说："洛阳虽然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靠黄河，南向伊洛，比较坚固，然而，地域太小，不过数百里，土地瘠薄，四面受敌，这是不利于用武的地方。而关中则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面积辽阔，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北有胡苑的利益，三面险阻为守，独以一而东向以控制诸侯。天下安定，可以因黄河、渭河的方便用漕运集天下粮草，供给京师；若诸侯有变，则可以顺流而下，足以供给。这真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所言是正确的。"于是，高祖刘邦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即日下令起驾西迁，定都关中。为了表彰娄敬建议迁都关中的功劳，刘邦还赐姓娄敬姓"刘"，并任命刘敬做了郎中，号为"奉春君"。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后九月，刘邦下令迁徙诸侯之子到关中，以巩固新都，并下令修建长乐宫。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时，刘邦住在栎阳(今陕西临潼)，五日一朝见太公，对其父极尽人子之礼。这时，太公的家令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皇帝虽然是儿子，然而是万民之主；太公虽然是父亲，然而是臣下，怎么能让人主来朝拜臣下呢?如此下去，威严必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后来，刘邦再去朝见太公时，太公居然执人臣之礼，到门口迎接，退着走。刘邦大惊，赶快下扶太公。太公对刘邦说："皇帝是万民之主，怎么能因我的缘故而变乱天下的秩序呢?"

五月丙午，刘邦下诏说："人之至亲，不超过父子，所以，父亲有了天下则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则尊归于父亲。以前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自披坚执锐，身率士卒，冒着危难平定暴乱，封立诸侯，息兵安民，使天下大安，这都是太公教导的结果。诸王、侯、将军、群卿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没有尊号。现在上太公尊号为太上皇。"

刘邦登基以后，厌恶秦朝苛酷的法律，烦琐的礼仪，一切简易为事。从他起兵的功臣，大都出身低微，对繁文缛节的礼仪知之甚少，不愿受到具体的约束，因而常常饮酒争功，喝醉了酒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击柱，相互斗打。这使得刘邦很厌恶。

长期追随刘邦的薛人叔孙通，原来是秦朝的待诏博士，对于礼仪非常精通，又很善于迎合当世的需要，他乘机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我愿征鲁地的儒生，与我的弟子共同制订一套朝廷礼仪规定。"刘邦平常对儒生文人非常看不惯，甚至拿儒冠当尿壶，但对群臣不知一点上下之礼也很厌恶，就问叔孙通："不会太难吧？"叔孙通回答说："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所谓礼就是因时世人情制定的。所以说，所谓夏、商、周三代之礼所损益可知的意思，无非是说他们并不一样。我想采择一些古礼和秦仪式掺杂而成。"刘邦又叮嘱说："可以试着办。务必简单易行，考虑我能实行的来制定。"

于是，叔孙通到鲁地去征召儒生三十余人，其中有两人死不肯来，还讽刺叔孙通说："公所事者已有十个主子，都是面谀以得亲贵。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还未葬，伤者还未起，又想兴礼起乐。礼乐之兴起，必定要等待积德百年才能实行。我们不忍心跟着你去干。公所为不合于古，我们不干。你走吧，不要污辱我们了。"叔孙通只能自嘲地说："你们真是陋鄙之儒，如此不知时变。"

叔孙通带领自鲁地征来的三十个儒生归来后，又加上刘邦左右好学之士和自己的百余弟子，在长安郊外搭起帐棚，进行演习。一个月以后，请刘邦前来观看。刘邦看了他们的礼仪后，说："我能为之。"随即下令群臣照此演习。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长乐宫落成，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举行群臣朝拜皇帝的大典。按照礼仪：天亮之前，由谒者治礼，依次引导文武群臣按爵秩高低进入殿门，廷中陈设着车骑步卒卫队，手执各色旗帜和兵器。司礼官一声传呼，殿下郎中立即夹陛

而立，每陛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军吏按照次序排列于殿下西边，面向东；文官自丞相以下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大行设九宾之礼，上下互相转告。一切准备就绪，刘邦乘辇车出房升殿，百官执帜传声喝警。接着，刘邦升上御座，大行引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员依照次序，一一向皇帝致贺。这样，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贺礼而后，百官伏地面拜。接着，皇帝赐酒，大宴群臣。群臣在殿上皆俯伏低首，依尊卑次序举爵为皇上祝寿。酒过九行，谒者宣布"罢酒"。朝拜之中，由御史执法，将不按礼仪行事的官员引去惩治，因而，宴会自始至终，无人敢喧闹失礼。朝会之后，刘邦情不自禁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并赐金五百斤，还将叔孙通的弟子全部任命为郎官。叔孙通将赏赐给他的黄金全部转赐给弟子和儒生，他们众口一辞地称颂叔孙通为"知当世之要务"的"圣人"。叔孙通这个"进退与时变化"的"圣人"，因为替刘邦登基制定朝仪，为封建皇权定大经大法，终于成"汉家儒宗"。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刘敬叔孙通列传》、《留侯世家》
《汉书》:《高帝纪》、《刘敬传》、《叔孙通传》、《张良传》

封王封功臣

汉二年(公元前 205 年)三月,刘邦东出函谷关,率诸侯之师五十六万人,千里奇袭彭城(今江苏徐州),获得胜利。不料,占领彭城之后,刘邦故态复萌,整日置酒高会。项羽一个反击,将刘邦打得大败,仅率数十骑突出重围,收兵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刘邦询问群臣谁可与之共成败楚大业,张良回答说:"九江王英布,是一员骁勇将领,与项羽有矛盾;彭越和田荣在梁地反叛项羽,应赶紧联络;大将之中只有韩信可以托以大事,能够独当一面。若能封此三人,则灭楚很容易。"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在楚汉战争期间,陆续分封张耳、韩信、彭越、英布、韩信、臧荼为王,争取到了更多的力量,为打败项羽创造条件。

最早受封的是韩王信。刘邦被封为汉王人据汉中时,韩襄王的孙子韩信从人汉中,劝刘邦东出函谷关以争夺天下。刘邦东出函谷关,即以韩信为韩太尉,并将项羽所封韩王郑昌包围于阳城(今河南方城),迫使其投降。汉二年(公元前 205 年)十一月,刘邦立韩信为韩王。

其次受封的是赵王张耳。张耳原被项羽封为常山王,因被陈馀打败,就投靠了刘邦。后来,张耳同韩信一起,兵出井陉口,大败陈馀和赵王歇,平定赵地。刘邦于汉四年(公元前 203 年)封张耳为赵王。

接着受封的是齐王韩信和淮南王英布。韩信破赵定齐后,势力剧增,要求刘邦立他为齐假王。刘邦不得已,派张良前去封韩信为

齐王，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又徙为楚王。英布追随项羽立有大功，项羽大分封，他被封为九江王。田荣反叛，项羽命英布率九江兵前去助战，英布以生病为由拒绝征召。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千里奇袭彭城，项羽命英布救援，英布再次以生病为由拒绝。因此，项羽对英布很怨恨。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十一月，刘邦遣随何到淮南，用计谋策动英布背楚投汉。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七月，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被封为王的，有彭越、臧荼、卢绾、吴芮。彭越本为盗于钜野泽，怨项羽分封不公，反叛项羽，率军往来于梁地，经常断绝楚军粮道，有功于刘邦。垓下会战前，刘邦约彭越击楚，彭越不从，刘邦不得已封他为梁王。臧荼原被项羽封为燕王，归汉后，刘邦仍封他为燕王。不久，臧荼反叛刘邦，攻灭臧荼后，刘邦封自己的同乡好友卢绾为燕王，以防守北部边境。吴芮原被项羽封为衡山王，不久，被项羽削去王号，称为番君。归汉后，刘邦封他为长沙王，以安定南方。

刘邦定都关中以后，汉六年（公元前201年），酬赏部下，决定大封功臣。然而，纠纠武夫，争功夺劳，岁月不决。后来，经过刘邦一番功人功狗的大辩论，群臣不敢再讲话，始行分封功臣。

萧何：刘邦故人，从起丰沛，为汉丞相，守关中巴蜀，给军食，不绝粮道，制定法令，设立宗庙社稷，帮助刘邦打败项羽，平定天下，被刘邦称为指挥"功狗"的"功人"，功劳最大，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为感谢萧何在自己服役咸阳时比别人多送斋钱二百文，刘邦再增封萧何两千户。

曹参：刘邦故人，从起丰沛。随刘邦人关破秦，被任为将军，并被封侯。后又随刘邦人据汉中。还定三秦后，以左丞相身份随韩信出征齐魏，平定各地。大小五十战，身创七十处，攻城略地，武功仅次于韩信，被功臣一致认为立功最多，应位居第一。封为平阳侯，食邑万户。

张良：刘邦重要谋臣。刘邦丰沛起事后，张良投靠刘邦于下邳西之留(今江苏沛县南)，被任为厩将。常为刘邦讲授《太公兵法》，甚得刘邦信任。汉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不克，刘邦决定弃之不顾西击武关。张良劝说："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又为刘邦设疑兵之计，攻克峣关。入据咸阳后，劝刘邦勿恋妇女珍宝，还军霸上。鸿门宴上，救刘邦于危困之中。刘邦入据汉中，张良劝他烧毁栈道，示项羽无东向争天下之意。刘邦还定三秦，张良致书项羽，告以齐赵反楚消息，引楚军主力攻齐。刘邦彭城败退，又是张良劝刘邦封英布、彭越、韩信。刘邦被围于荥阳，欲用郦食其议立六国后，张良劝其以"八不可"理由。韩信定齐，要求做假齐王，张良劝刘邦答应下来，争得一支最大的军事力量。刘邦固陵(今河南阳夏)之败后，张良劝刘邦迅速封韩信、彭越为王，最后，兵会垓下，打败了项羽。张良参与了刘邦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在最关键的时刻解救了刘邦的危急，被刘邦誉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和料事如神的足智多谋，被称为"汉初三杰"是无愧的。所以，刘邦对于这位大谋臣，待遇优厚，让他在齐地"自择三万户"作为封地。可是张良在名利面前非常达观，他说："上天让我与陛下会见于留。陛下用我的计谋，很幸运时时成功。我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刘邦即封张良为留侯，食邑万户。

陈平：刘邦又一重要谋臣。他的主要功劳是为刘邦出反间计离间项羽君臣关系，使项羽谋士范增怒而离项羽而去。有人上书告楚王韩信谋反，将军们请求武力击灭，陈平为刘邦设伪游云梦的巧计智擒韩信。刘邦封陈平为户牖侯，食邑五千户。

周勃：刘邦故人，从起丰沛。后一直跟随刘邦参加一系列战斗，从刘邦入关定秦，被任为将军。又随刘邦入据汉中，还定三秦。率军平定陇西、泗水、东海等郡，攻城略地，参加垓下会师，攻灭项羽。臧荼反叛，周勃随刘邦平定臧荼。有功封为绛侯，食邑八千户。

樊哙：刘邦故人，狗屠出身，从起丰沛。随刘邦一直攻入关中灭秦，并劝刘邦退出秦宫，勿恋妇女财物，还军霸上。鸿门宴上，以其勇壮，解救刘邦于危困之中。又以郎中身份，跟随刘邦入据汉中。随刘邦还定三秦，被任为将军，率军北取胡陵，参加垓下会师，攻灭项羽。又随刘邦平定臧荼之叛，并生擒韩信。被封为舞阳侯，食邑五千户。

夏侯婴：刘邦故人，为沛厩司御。常过沛泗上亭，与刘邦整日交谈，相知甚深。刘邦曾戏伤夏侯婴，夏侯婴因为替刘邦做假证词以开脱刘邦，被系狱一年余，受笞数百，而终不改口。刘邦起事丰沛，夏侯婴被任为太仆，因功被封为滕公。后随刘邦入关灭秦，又从入汉中。刘邦彭城东征，败于项羽，散儿失女，均为夏侯婴所救。随从刘邦平定臧荼，参与擒拿楚王韩信。被封为汝阴侯，食邑六千九百户。

灌婴：砀郡雎阳(今河南商丘)人，家境贫寒，以贩缯为生。章邯击杀项梁，刘邦还军于砀(今河南夏邑)，灌婴投靠了刘邦。一直跟随刘邦攻入关中灭秦，被任为郎中。又随刘邦入据汉中，随刘邦还定三秦并千里奇袭彭城。训练一支骑兵队伍，被任为将军，属韩信指挥，东向伐齐，败齐楚联军，杀龙且。参加垓下会战，率军追项羽至乌江。随后，率军渡过长江，平定楚军残部。以车骑将军身份随刘邦平定臧荼之叛。封为颍阴侯，食邑五千户。

郦商：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人，家境贫寒。陈胜反秦后，他聚众数千响应。刘邦进军陈留，他率众四千投奔。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率军平定北地上郡，后随刘邦与楚将钟离昧大战，因立有大功，受梁相国印。汉五年(公元前202)七月，随刘邦平定臧荼之叛，在易(今河北雄县)下大破燕军，因功晋升为右丞相。封为曲周侯，食邑四千八百户。

傅宽：刘邦率军攻关中时，他以魏国五大夫骑将的身份，在横阳(今河南商丘)投奔刘邦，被任为舍人。随刘邦入关中，灭秦。再

随刘邦入据汉中，被任为右骑将，屡立战功，后以曹参属将身份随韩信定齐，破齐楚联军，杀龙且。封为阳陵侯，食邑二千六百户。

靳歙：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在宛朐（今山东东明）投奔刘邦。跟随刘邦灭三川郡守李由，击秦军开封，转战蓝田，至霸上。随刘邦入据汉中并还定三秦，率军平定陇西六县。又随刘邦千里奇袭彭城。荥阳、成皋之战时，靳歙别率一军入楚后方，往来游击，断楚军粮道，以支援刘邦正面战场。参加垓下会师，并自率一军，进攻江陵，生俘不降的临江王共尉，平定南郡。封为信武侯，食邑四千六百户。

周昌：刘邦故乡沛人。周昌与从兄周苛皆为秦时泗水郡卒史。刘邦起事丰沛，击破泗水守、监，周昌、周苛前来投奔。一直跟随刘邦入关灭秦。刘邦为汉王，入据汉中，周昌、周苛从入，周昌为御史大夫，周苛为中尉。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六月，周苛守荥阳，被俘。项羽许以降则封万户侯，遭周苛痛骂，誓不降项羽，被烹杀。周昌坚守敖仓，以给汉军食，升为御史大夫。随刘邦破楚灭项屡有战功。与萧曹同时受封，封为汾阴侯，食邑二千八百户。

王吸：刘邦故人。从刘邦起事丰沛。后随刘邦入关灭秦，被任为骑郎将。从刘邦入据汉中，被任为将军。后一直跟随刘邦参加一系列战斗，立有军功，封为清河侯，食邑二千二百户。

召欧：刘邦故人。从刘邦起事丰沛。后随刘邦入关破秦，被任为骑郎将。再从刘邦入据汉中，被任为将军。随刘邦还定三秦，参加楚汉战争。因功被封为清河侯，食邑二千二百户。

薛欧：刘邦故人。从刘邦起事丰沛。一直跟随刘邦至入关灭秦，还军霸上，被任为郎中。再从刘邦入据汉中，被任为将军。后随刘邦大战楚将钟离眛，功多。封为广平侯，食邑四千五百户。

武虎：刘邦故人。从刘邦起事丰沛，被任为谒者。一直跟随刘邦参加灭秦战斗，至入关破秦，还军霸上。再随刘邦入据汉中，还定三秦，千里奇袭彭城，被任为将军。长期追随刘邦破秦灭楚平定天

下。封为梁邹侯，食邑二千八百户。

董渫：刘邦故人。从刘邦起事丰沛，被任为舍人。一直跟随刘邦破秦，入关中，还军霸上，被任为都尉。随从刘邦入据汉中，还定三秦，被任为将军。再随刘邦出函谷关，千里袭彭城，破楚，定天下。封为成信侯，食邑二千八百户。

陈濞：以舍人身份在砀参加了刘邦队伍，跟随刘邦入关灭秦，被任为刺客将。再从刘邦入据汉中，还定三秦，被任为都尉，与项羽激战于荥阳前线，率军断绝楚军粮道。封为博阳侯。

丁复：作为彭越的将军随从刘邦于薛（今山东滕县），并入关破秦，还军霸上。以楼烦将身份从刘邦入据汉中，还定三秦。军属周吕侯，率军大败楚将龙且于彭城，被任为大司马。又败项羽于叶，被任为将军。封为阳都侯，食邑七千八百户。

陈贺：以舍人身份投奔刘邦于砀，随刘邦入关灭秦，被任为左司马。再从刘邦入据汉中，还定三秦，被任为都尉。军属韩信，参加垓下会战，被任为将军。率军平定会稽、浙江、胡陵。封为费侯。

刘缠：即项伯。随项梁、项羽一起参加反秦斗争，被任为楚左令尹。与张良交好，鸿门宴上解救刘邦。后投汉。刘邦为报答项伯救命之恩，封他为射阴侯，还赐姓刘。

孔聚：以执盾投奔刘邦于砀，随刘邦入关定秦，被任为左司马。又随刘邦入据汉中，还定三秦，被任为将军。以都尉身份率军属韩信，三击项羽，立有战功。封为蓼侯。

刘邦已经封了大功臣二十余人，而其余的功臣因为争功夺劳，久久定不下来，就未能分封。刘邦时居洛阳南宫，从复道中望见将军们三三俩俩坐在沙土中窃窃私语，就问张良说："这些人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还不知道吗？他们在策划谋反。"刘邦大惊，忙问："天下刚平，人心思定，他们为什么要策划谋反呢？"张良分析说："陛下起自布衣，同这些人共同取天下。现在陛下已做了天子，而分封功臣全是故人和亲爱之人，遭到诛杀的全是平生怨恨和有

仇之人。现在军吏度量功劳，以天下不够人人都能得到封赏，担心受到怀疑或者平生之中有所过失遭到诛灭的下场。所以，他们相聚在一起，准备谋反。”刘邦很担心地问：“怎么办呢？”张良献计说：“陛下平生最憎恶的人，功臣们都知道的，以谁最厉害呢？”刘邦说：“雍齿与我有仇怨，而且数次使我窘迫，侮辱我，我想杀了他，因为他功劳多，所以不忍下手。”张良劝刘邦说：“那么就赶紧先封雍齿为侯，其余功臣就都不会再有疑心了。”于是，刘邦依计而行，设酒置宴，封雍齿为什方侯，食邑二千五百户，并下令丞相、御史赶紧排定群臣功劳，加以封赏。雍齿原是沛地的强豪，孔武有力，因为同刘邦素有仇怨，所以开始没有参加刘邦的队伍；参加了刘邦队伍以后，又曾据丰背叛刘邦，投靠魏国。所以，刘邦很怨恨他，常想杀了他。雍齿被封的消息传开后，功臣们高兴地说：“雍齿尚且被封为侯，我们这些人就没问题了。”一场已经处于酝酿中的叛乱，就此平息。随后，为安抚功臣，刘邦先后封功臣一百多人为侯，共分封功臣一百三十七人。

刘邦大封功臣，还与功臣剖符作誓，誓言说：“使黄河为带之长，使泰山为 石之固，封国永存，恩及子孙。”又将誓词写成丹书，藏于秘府，作为诚信；还同功臣杀白马歃血为盟，盟誓说：“非刘氏不得为王，若为王，天下共击之；非功臣不得封侯。”还将功臣列侯排定位次，将誓词、剖符和位次表藏于宗庙，列于官府秘籍。

汉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三月，刘邦临死之前，下诏书说：“我立为天子，帝有天下，于今十二年了，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同平定天下，共同安抚稳定天下。有功的人，大者封为王，中者封为列侯，下者也有食邑。大功臣亲属子弟，有的封为列侯，皆令自己设置家吏，收取租赋，女子则为公主。凡为列侯有食邑者，都赐给佩印，赏赐较小一点的住宅。士卒凡随从入汉中，还定三秦的，皆代代不服徭役。我对于天下的贤士大夫和功臣，可以说是无负了吧。”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留侯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曹相国世家》、《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汉书》:《高帝纪》、《萧何传》、《曹参传》、《张良传》、《周昌传》、《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异姓诸侯王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功人功狗之辩

刘邦分封萧何时，有一场功人功狗之辩。萧何是秦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因为办事认真，待人宽厚，才能超出同僚，被升为沛县主吏掾，即县令以下主事的官员。萧何是同刘邦一起反秦的最早的一批人之一，而且很早就同刘邦相友善。汉高祖刘邦起事之前，几次触犯刑律，全赖萧何从中庇护才得平安。刘邦为亭长后，又因其办事不细密，常出纰漏，萧何数次为他周旋，得以无事。刘邦曾率领一批民夫到咸阳服役，其中小吏一般都送给刘邦三百钱做路费，唯独萧何送刘邦五百钱。秦监察泗水郡的御史很欣赏萧何的才干，就辟萧何为卒史。监御史考核手下从吏的能力和功绩，萧何被评为第一。由于萧何治绩突出，监御史打算上奏朝廷，推荐萧何到秦皇朝中央做官。萧何坚辞不就，继续做他的小吏。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事反秦以后，刘邦也聚众数百人隐藏于芒砀山泽之间。得到陈胜、吴广起事消息后，萧何、曹参就劝说秦沛令举兵反秦，同时建议他招来刘邦徒众，以号令沛县父老，共谋大计。当刘邦、樊哙率众赶来时，秦沛令又反悔，关闭城门，拒不接纳，而且想杀死萧何、曹参。萧何与曹参秘密从城上缒下，逃至刘邦军中，后协助刘邦杀死沛令，起事反秦。此后，刘邦称沛公，萧何被任命为沛丞，负责行政和后勤事务，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是刘邦最有力的辅佐之一。

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十月，刘邦率军攻入关中，秦王子婴束手投降。进入咸阳以后，将领士兵纷纷跑到秦朝的府库中掠取金帛

财物，只有萧何置金帛财物于不顾，进入秦丞相、御史府，将秦朝的法律、文书、档案秘籍和图书全部清点接收，使沛公刘邦得以具知天下形势险要、户口多少、强弱分布、百姓疾苦，为以后取胜定天下打下了基础。

项羽攻入关中以后，火烧咸阳，残破城市，掠取秦宫的宝货妇女；之后，又擅自裂地分封，改变楚怀王同诸将"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将刘邦封在受大山阻隔的山坳里为汉王，以防止刘邦的势力扩大。汉王刘邦对项羽的分封不公、不讲信义大为震怒，准备发大军同项羽拼斗。周勃、樊哙、灌婴极力相劝，刘邦仍不能平息，萧何对刘邦说："虽在汉中恶地为王，难道不比死要强一些吗？"刘邦忙问萧何："你怎么能说是死呢？"萧何为他分析说："现在人众兵马不如项羽，必定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所谓'天汉'的说法，是称颂其美。能够诎于一人之下，而取信于万乘之上者，商汤、周武王就是。我希望大王能够到汉中做王，休养百姓招致贤人，同时收用巴蜀，然后可以还定三秦，这样，还是有希望获得天下的。"听完萧何的一番分析，刘邦极为赞成，大叫正确。然后，刘邦率领人马来到汉中，并任命萧何为丞相。萧何做了丞相以后，迅速简派官员，把巴、蜀地区控制起来，这个从战国以来备受称誉的"天府之国"成了日后刘邦同项羽作战的总后方，源源不绝的士兵、粮秣和军资在萧何的精心组织下送到了楚汉战争的前线，为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战略总后方的作用。萧何的分析和措施显示了他的政治战略眼光。

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治商贾，常从人寄食，别人都很厌烦他。陈胜、吴广反秦以来，韩信仗剑从军，参加了项梁队伍。项梁死后，韩信屡次向项羽献策，项羽不予理睬，韩信被迫投靠刘邦，因犯法当斩，正碰上夏侯婴，才免一死。上荐给刘邦以后，韩信被任为治粟都尉。萧何发现了韩信的才能，后来韩信感到无用武之地，愤而出走，又是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力劝刘邦立坛拜将，重用

韩信，使得韩信成为刘邦手下战功最著的军事将领，为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八月，刘邦开始进攻关中，萧何留守汉中，他全力经营巴蜀，征集兵源，筹集军资，源源不绝地保证了前线需要。汉二年（公元前 205 年），刘邦率军东出函谷关，千里奇袭彭城（今江苏徐州），萧何留守关中，以栎阳（今陕西富平）为临时都城，辅佐太子刘盈，制定法令规章，严明约束，建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使整个关中地区的社会和生产秩序走上了轨道，保证了刘邦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刘邦也给了萧何以治理后方的权利，凡后方军国大事，萧何上奏的一律批准，来不及上奏的，也予以认可，给了萧何以“便宜行事”的权利。刘邦在前线作战，几次几乎全军覆灭，全赖萧何在后方的筹措，不断征发兵士，保证了刘邦兵员和军资的补充，使刘邦能够败而复起。因此，刘邦将关中的军政大事放手交给萧何，使得萧何得以独立自主地展开创造性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能。

汉三年（公元前 204 年），刘邦和项羽在京、索（今河南京县）一线对峙，战争很艰苦、残酷，萧何兢兢业业保证了前线的供给。为此，刘邦数次遣使到关中慰问萧何。谋士鲍生对萧何说：“现在汉王暴衣露盖作战于前线，却数次派使前来慰问你，是在怀疑你啊！所以，你不如派遣自己的子孙昆弟族人能打仗的一律到前线作战，这样，汉王一定更加信任你。”萧何依计而行，汉王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垓下会战打败项羽之后，高祖刘邦西都洛阳。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置酒褒奖功臣，让臣下述说汉成楚败的原因。高起、王陵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战胜以后，就封赏臣下，与天下同利；而项羽则不然，功劳大的遭到嫉害，贤能的人受怀疑。这就是楚失天下、汉成天下的原因所在。”高祖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然后，对自己手下的大臣给予一番评价。他

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整治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馈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是人中英杰，我能信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取天下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萧何为楚汉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刘邦的评价是公正的。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登上皇帝宝座以后的刘邦，为酬赏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武将文臣，决定论功行封。但是文臣武将，因为争功，整日吵闹，甚至拔剑击柱，岁余不决。刘邦以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先封萧何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刘邦对萧何的封赏引起了将领们的不满，他们抗议说："我们这些武将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大小各有功劳。而现在，萧何并无汗马之劳，只是持文墨议论，没有参加战斗，而封赏反而在我们之上，原因何在？"面对纠纠武夫的傲气，刘邦毫不客气地加以驳斥。他问武将："你们知道打猎的事吗？"武将不明就里，回答说："知道。"刘邦又问："你们知道猎狗吗？"武将说："知道。"于是，刘邦奚落他们说："打猎的事，追杀野兽野兔的是猎狗，而指挥猎狗指示野兽踪迹的是猎人。现在你们武将攻城略地，只不过是如猎狗能得野兽罢了，是功狗；而萧何，如同指挥猎狗的猎人，是功人。而且，诸位只不过以一身随我征战，而多的也不过两三人，萧何却举宗数十人随我征战，功劳是不能忘的。"武将听了刘邦的这一番功人功狗之论，再也不敢讲话了。

功臣依次受封定赏以后，有一百多人获得侯爵。在排定上朝位次时，武将们又将曹参抬出来，借以用武将压文臣。他们认为，曹参攻城略地，身上受伤七十余处，立功最多，应位居第一。刘邦因为功人功狗之辩已经驳难了武将们一次，这一次排定位次就不想再驳难他们，没有说话，然而心里仍然以为萧何应功定第一。谒者鄂千秋已经窥测到刘邦的心意，就站出来为萧何评功摆好。他说：曹参虽有野战略地的功劳，这只不过是一时之事。皇上与西楚霸王项羽

相持五年，常常失军丧众，只身逃遁者就有好几次。然而萧何总能从关中调兵遣将加以增补，皇上并没有诏令宣召萧何调兵增补，有好几次都是萧何调数万兵马刚好补缺皇上的困绝。汉与楚相拒荥阳数年之久，军中无粮，都是萧何转漕关中，供给军食使不匮乏。陛下数次失去关东，都是萧何守住完整的关中以待陛下，此乃万世的功业。现在虽然失去曹参这样的武将百余个，对于汉并不太缺乏，汉虽得之也不一定就能成功。怎么能以一日之功而加于万世之功以上呢？还是应定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马上表示赞同，立即发布命令，将萧何的位次定为第一，同时允许他带剑上殿，入朝不趋。为了答谢鄂千秋在关键时刻对萧何功劳的正确评价，刘邦还晋封鄂千秋为安平侯，增加食邑二千户；同一天，又悉封萧何的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据代地反叛，刘邦亲征。被废为淮阴侯的韩信阴谋发动叛乱，吕后知悉后找萧何商量，萧何设计诈称陈豨已死，令群臣上殿庆贺，将韩信擒杀于长乐钟室，清除了汉皇朝的一大隐患。韩信拜将、发迹，由于萧何的推荐；韩信被杀，也出于萧何的谋划，故此，后世留下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评论。其实，萧何荐韩信和杀韩信，都是为了汉朝的利益，可以说，为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接到诛杀韩信的报告，立即遣使回到长安，宣布晋升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又命令一都尉率五百士卒作为萧何的卫队。大小官员都到丞相府向萧何表示祝贺，只有以种瓜为生的原秦东陵侯召平前来哀悼。他对萧何说：“您的大祸就自此开始了。陛下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没有被矢石的功劳而加封置卫的原因，在于现在淮阴侯韩信谋反刚刚被平定，陛下现在正怀疑您呢？为君置卫以保卫您，并不是真的宠封您，希望您辞让不受，拿出全部家财以佐助战事，那么皇上必定很高兴。”萧何认为召平说得对，就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欢心。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再次御驾亲征,萧何一如既往留镇京师。离长安后,刘邦不断从前线派使回到关中打听萧何的动静,使者回来报告说:“萧相国因为皇上率军亲征,乃安抚劝勉百姓,拿出所有资财以佐助国家军事,如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知道这件事后,说客劝萧何说:“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君位为相国而功定第一,不能再有所增加。君入关早,镇守时间长,非常得民心,已经十有余年了。关中的百姓都亲附您,您还在那里孜孜不息地争取民心。皇上之所以数次派使前来慰问您的原因,是怕您倾动关中。您何不多买田地,贱价借贷以自污呢?如此,皇上就可以放心了。”萧何采纳了这个建议,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刘邦平定英布反叛,返军长安。关中的百姓道路遮行,拦驾叫冤,控告萧何买民田宅数千万。回来以后,萧何谒见高祖,刘邦就把百姓控告萧何强买民田的上书全部交给了他,让萧何自己向百姓谢罪,以便妥善处理。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初,萧何见长安附近人多地狭,而上林苑中多空地,闲弃无用,就为老百姓向刘邦请求,交给百姓耕种,免除其税。刘邦听后,大发雷霆,说:“萧相国大量接受商贾财物,为他们请求我的上林苑。”就将萧何交付廷尉,带枷入狱。过了几天,有一个姓王的卫尉殿中执勤,上前问刘邦说:“萧相国有多大的罪过,使陛下系之大狱,给这么重的处罚。”刘邦说:“我听说李斯做秦皇帝的丞相,有善归主,有恶归己。现在,相国多受商贾财物,替他们请求我的上林苑,是想自己求媚于百姓。所以,我把他交付廷尉,押系监狱。”王卫尉对刘邦说:“如果政事真的有便于百姓而为之请政,这正是宰相的职分。陛下怎么能怀疑相国接受了商贾的财物呢?况且,陛下与楚相持数年,陈豨、英布反叛的时候,陛下亲自带兵前去征讨,当时相国坐守关中,如果相国有所动作,恐怕关西地区早就不属于陛下了。况且秦皇正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才丧

失天下的，李斯的错误做法，又何足效法？陛下怀疑萧相国太不应该。"一番话说得刘邦很不高兴。不过，就在当天，刘邦派使者持节赦萧何出狱。萧何当时已经年老，平素对刘邦就很恭谨，被赦出狱以后，徒跣入谢。刘邦对萧何说："萧相国不必这样。相国为百姓请苑而我不许，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则为贤相。我故意系相国入狱，不过是想让老百姓都知道我的过错。"

萧何为自己子孙的未来设想得也很周到，他置田宅必居于穷乡之处，治理家产不修治垣屋。他常说："后代子孙如果贤能，就应效法我的俭约，如果后代不贤，也别为有势力的人家所夺。"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刘邦死，其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萧何继续做相国，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夏，萧何病重，惠帝亲到萧何家探视，问他，假定他百岁之后，谁可接替他的相国职位。萧何说，知臣莫如主。惠帝问他，曹参怎么样。萧何连连称是，表示赞成，而不计较论功行赏时同曹参积下的个人成见。

作为西汉皇朝的第一位丞相，萧何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同刘邦相始终，参与了刘邦自起事到做皇帝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为汉皇朝的创建和巩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丰沛起义前，他数次救刘邦于困境之中，之后，参与策划丰沛起事反秦。在反秦战争中，他不离刘邦，赞襄帷幄，负责行政和后勤事务；打下咸阳，又置财货于不顾，先进入秦丞相、御史府，掌握全部法律文书、山川形势兵粮、险要档案材料和大批秘籍图书，为日后楚汉战争胜利打下了基础。随后，他又力劝刘邦入王汉中，提出抚民择将，还定三秦，东向争天下的正确战略构想。楚汉战争中，萧何抚定巴蜀，坐镇关中，制定法规，建立机构，征兵征饷，刘邦几次遭到失败处于困窘之时，都及时得到了萧何的补给救援。萧何的绝对忠诚几乎赢得了刘邦的绝对信任。萧何还有识人之明，他识韩信于卒伍之中，荐之于统帅之位，而且不因同曹参争功的成见力荐曹参继自己为相，保证了汉初正

确政策的连续性。就政治人格来说，萧何谦虚谨慎，自奉简约，从不居功自傲，不像韩信和彭越有野心。总之，从萧何一生来看，他无愧于“汉初三杰”之称。刘邦大封功臣，称许萧何为指挥功狗的功人，功劳远高于武将，可说是对萧何功劳的--种公允评价。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萧相国世家》

《汉书》:《高帝纪》、《萧何传》、《韩信传》

平城之困

蒙恬以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以后，因山筑城，因河为塞，修成著名的万里长城，又在北方屯驻庞大部队以阻止匈奴南进。于是，匈奴乃稍稍北徙。

秦末天下大乱，秦政府全部撤回了边防戍卒，北门大开，匈奴骑兵重新回到长城脚下，并再度侵入河套以内。楚汉战争期间，中原政权无暇北顾，匈奴在冒顿单于统治下，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兼并楼烦、白羊王，建立起空前强盛的奴隶制政权。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由于头曼喜爱后娶的阏氏（匈奴称妻、妾为阏氏）所生少子，遂将冒顿送往西边的月氏作人质，然后发大兵攻击月氏，试图借月氏之手将冒顿杀害。冒顿偷了月氏一匹“善马”逃了回来。头曼嘉其勇壮，命他统领一万名骑兵。冒顿乃创制一种鸣镝（响箭），用来训练他的骑兵。他下令：凡鸣镝发射而不跟着射其所射目标的，一律斩首；率骑狩猎时，凡不遵从他的规定发射的，一律斩首。不久，冒顿用鸣镝自射他的善马，凡不敢随着发射的，都被他杀掉。然后，他用鸣镝自射其爱妻，他又把不敢随他发射的人杀掉。后来，冒顿率众骑出猎，冒顿用鸣镝射自己喜爱的善马，骑兵们一起向鸣镝所射目标发射。有一天，冒顿随父出猎，冒顿突然以鸣镝射向头曼，骑兵也跟着发射，射杀了头曼。冒顿又把后母、弟弟及不服从的大族贵族杀死，自立为单于。

东胡听说冒顿立为单于后，派使者到匈奴，对冒顿说：“欲得头曼时的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宝马也，勿与！”冒

顿说："怎么能同邻国相处而偏爱一匹马呢？"就送给了东胡。过了不久，东胡又派使到匈奴，要求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冒顿征询臣下意思，群臣都说："东胡太无理，请发兵击之。"冒顿却说："怎么能同邻国相处而偏爱一个女人呢？"于是，就将自己所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东胡王愈益骄横恣肆。东胡同匈奴边界中间有千余里的闲弃之地，双方各居一边，为瓯脱边界。东胡派使到匈奴，对冒顿单于说："瓯脱闲弃之地无用，想占有了它。"冒顿征询臣下的意见。有的大臣说："这块闲弃之地，给了也行，不给也行。"冒顿单于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便给人呢？"将同意给东胡地的人全杀掉，上马号令全国："国中有后出者斩！"遂袭击东胡。东胡因为长期轻视冒顿，没有准备，被冒顿击灭。冒顿灭了东胡以后，又向西出击，攻走了居于河西地的月氏人，占领河西地区，向南兼并了楼烦、白羊王，占据了河南地，侵入燕、代，全部收复秦时蒙恬所攻夺的匈奴故地，占领汉边关河南塞至于朝那（今宁夏固原）、肤施（今陕西榆林）。当时，中原之地正处于楚汉战争时期，疲于兵革之事。所以，冒顿强盛一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北边各族，并严重威胁汉族北部边郡，建立起空前强盛的奴隶制政权。

冒顿单于将他所控制的广大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加以统治：一是单于庭，即单于直接统治的地区，是政治中心，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面对着代郡（今河北蔚县）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二是左贤王庭，它管辖的地区在匈奴东部，其南面对着上谷郡（今河北怀来）。三是右贤王庭，它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西部，其南面对着上郡（今陕西榆林），西面连着月氏和氐、羌。

单于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匈奴人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撑犁孤涂单于"意为"像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裁决了的

案件，口头报告单于，没有文簿、记录之类。左右贤王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地位、权力都高于右贤王。左贤王是单于的储副，故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左右贤王以下则是左右谷蠡王，左右谷蠡王亦各建庭于其驻牧之地。再以下则依次为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

冒顿单于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实质上是一个游牧的军事政权，带有很大的军事性和掠夺性。在这个政权之下，所有及龄壮丁都被编为骑兵，而所有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首长，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是合为一体的。匈奴单于自己统领军队并亲临战阵，左右贤王直至左右大当户也都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大者统领万骑，小者统领数千。这些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长共有二十四个，他们被称为万骑长。二十四个万骑长亦各自置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什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也是中下级带兵官，他们各以部众多少为区别权力大小及地位高低的标准。依照匈奴习惯，在作战中斩敌首级的赐一卮酒，并把所得的掳获物赏赐给他，俘虏得来的人口收为奴婢。因此，匈奴人作战时，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自谋利益。有利可得时，像鸟兽一样蜂拥而至；无利可图时，也像鸟兽一样四散而走，并不以为羞耻。

匈奴游牧军事政权之下，氏族首长被任命为什长、百长或千长，显贵世族或家族则垄断和世袭了万骑长或王、侯等高官要职。匈奴单于所在的挛鞮氏最为显贵，单于由挛鞮氏世袭，诸大臣也都由贵族世袭。挛鞮氏而外，还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这四姓是匈奴中最尊贵的。

匈奴保持着野蛮的风俗，父死子娶后母，兄死则弟娶其嫂；单于死，近幸臣妾从死殉葬的达数十百人；对于征服地区，则进行残暴掠夺，征服东邻乌桓之后，勒令乌桓每岁输送牛、羊、马，过时不缴，常常没收他们的妻子。匈奴还把被征服部落或部族的大量人口

强迫迁移，使他们直接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

冒顿单于崛起时，中原正处于刘项争霸时期。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行分封时，曾封韩国贵族韩成为韩王，后来又食言，干脆将韩成杀掉。同年八月，项羽又封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刘邦为汉王，韩襄王的孙子韩信从入汉中，劝刘邦东出关与楚争夺天下。刘邦东出函谷关，韩信被任命为韩太尉，率兵将郑昌包围于阳城(今河南方城)，迫其投降。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十一月，刘邦立韩信为韩王。楚汉战争结束后，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春天，刘邦将韩信北迁于太原，希望消除韩王信对汉中央的威胁，又使其抵御匈奴的南侵，一举两得。刘邦的迁国措施引起了韩王信的疑惧与不满。他决定将都城由晋阳(今山西太原)再移至距匈奴更近的马邑(今山西朔州)，以便随时逃入匈奴，对抗刘邦。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单于冒顿引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数次派出使者到匈奴请求和解。汉朝廷得到匈奴兵围马邑的消息后，立即发兵前往救援。汉军抵马邑后，侦知韩王信数次遣使去匈奴，就怀疑他背着朝廷与匈奴勾结。情况汇报到刘邦那里之后，刘邦致书韩信，责备他“专死不勇，专生不任”。韩信本来就对汉国不满，接到刘邦信后，认为危难之际刘邦对他不信任，害怕遭到诛杀，决定投降匈奴，配合匈奴骑兵袭击太原。

韩信投降匈奴以后，匈奴南侵的气焰更加嚣张。匈奴骑兵迅速南下，越过句注(今山西代县北)，攻到晋阳。汉朝的北部边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刘邦得到韩信叛降的消息之后，于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冬亲率大军北征。铜鞮(今山西沁水南)一战，大破韩信军，斩其将王喜。韩信逃往匈奴，他的部将曼丘臣、王黄立原赵国贵族赵利为王，收集韩信残部，盘踞原韩信封地，与韩信及匈奴共同谋划联合进攻汉朝。匈奴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领兵万余骑，与王黄等驻屯广武(今山西代县)以南，并发兵攻至晋阳，汉兵出击，匈奴屡屡败走。然

而，匈奴骑兵不久就又屯聚一处。汉兵乘胜追击，正赶上天下大雨雪，气温骤降，士卒们被冻掉手指的有十分之二三。

当时刘邦居停在晋阳，他听说匈奴冒顿单于在代北的山谷中时，准备进攻，就派人出使匈奴，以窥探匈奴虚实。冒顿单于将精壮的士兵和肥牛马藏匿起来，只让汉使者见到一些老弱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出使匈奴的使者前后有十余辈，他们回来后，都说可以对匈奴实施攻击。刘邦又派刘敬出使匈奴，刘敬回来后对刘邦说："两国打仗，一般应该夸大显示自己的强盛。现在，我到匈奴去，只见到一些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匈奴故意显示短处，目的是埋伏奇兵以获得大利。我以为匈奴不可击。"当时汉兵已经越过了句注，二十余万士兵已经出发。刘邦大怒，骂刘敬："齐虏！徒以口舌取官，现在又妄言胡说来败坏军事。"将刘敬捆起来押在广武。

刘邦率大军北进，先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大队兵马还未赶到，却被冒顿单于纵精兵四十万包围于平城白登山，史称平城之困。

陈平向刘邦献上秘计，派使厚送冒顿单于阏氏大量财物，劝她向冒顿进言。冒顿阏氏受了大量财物以后，就对冒顿说："两主不相困。即使得了汉地，单于最终也不能占有。况且汉主刘邦往往有神灵保佑，请单于细察。"冒顿单于曾与王黄、赵利约好了会兵的日期，而不见王黄、赵利的兵前来，怀疑他们俩同汉有阴谋，就将包围圈解开了一角。当时，正赶上天有大雾，汉朝派使节往来，匈奴骑兵竟然毫无知觉。于是，陈平组织强弓劲弩之士备好利箭，围成一个通道，护送刘邦由通道从解围的一角逃奔出来。后汉大军赶到，匈奴骑兵才解围而去。汉朝也罢兵而回，只是命令樊哙留下平定代地。

回到广武，刘邦为刘敬解了绑，说："我不听你的话，遂导致平城之困；我已经杀了前面出使匈奴的十辈使者了。"乃以二千户封

刘敬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南过曲逆(今河北完县)，刘邦感慨地说："壮哉县！我行天下，只见洛阳与此县人口众多。"就以曲逆改封陈平为曲逆侯。

刘邦北伐匈奴遭平城之困以后，匈奴更加紧了对汉朝北部边境的侵扰。汉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向刘敬请教对付匈奴的方略。刘敬为刘邦分析基本情况说：汉皇朝刚刚建立，天下初定，士卒苦于战事，百姓也没有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匈奴是一个武力强大的游牧民族，显然难以用武力战胜他。刘敬向刘邦提出了"和亲"的建议，劝刘邦将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为阏氏，另外奉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金、帛、絮、缯、酒、米、食物等，同时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汉与匈奴约以长城为界，北面游牧地带，归单于管领；南面"冠带之室"农耕民族由汉朝天子统治。汉匈双方各守边界，互不相扰。

高祖刘邦同意了这个建议，准备派遣长公主出嫁匈奴。吕后日夜涕泣，对刘邦说："妾只有太子和这个女儿，况且已经嫁了人，怎么能忍心弃之匈奴。"刘邦决定不下，刘敬的建议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陈豨反叛朝廷，与逃亡在匈奴的韩信合谋侵扰代郡。刘邦令樊哙率兵征讨，在收复了代、雁门、云中等郡县以后，即对匈奴采取守势，没有出塞追击。但是，由于当时投降匈奴的汉将较多，他们伙同匈奴一起，屡屡南下侵扰，汉北部边郡深受其害。

为了缓和北部边境的紧张形势，刘邦决定实施刘敬建议的对匈奴"和亲"政策。他命刘敬为和亲使者，将宗室女称为长公主嫁与冒顿单于为阏氏，同时赠送大量的絮、缯、酒、米、食物，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以"和亲"。

刘敬出使匈奴归来以后，向刘邦建议说："匈奴白羊、楼烦王，离长安近者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就可来到秦中。由于长期战

乱，秦中残破，人民少而土地肥沃。希望迁徙关东大族齐诸田、楚昭、屈、景等到关中，一来可以对付匈奴，二来可以对付关东广大地区，是一个强本弱末的好办法。”刘邦采取了这个办法，迁徙齐诸田和楚昭、屈、景、怀诸大族和豪杰之士到关中，共有十余万口。

刘邦为打击匈奴、加强北部边防，多次派出名将周勃、樊哙等，对叛逃匈奴的汉降将韩王信、陈豨、卢绾进行打击，并将韩王信和陈豨杀死。刘邦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恒封为代王，刘建封为燕王，以功臣宿将为辅佐，率大军进驻北部边防前线，对匈奴进行积极的防御。

平城之困后实行的“和亲”政策，尽管是在汉匈力量对比对汉朝不利的情况下实行的，带有某种屈辱色彩，但由于“和亲”政策的实行，使汉匈关系的主流一直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使汉匈两个强大民族之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使汉朝获得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人民有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

平城之困以后实行的和亲政策，在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都得到了继承。尽管惠、文、景时期，匈奴骑兵仍不断南下侵扰汉朝北部边境，但随着汉朝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力的不断强大，匈奴的威胁越来越轻，匈奴自单于以下乐于同汉朝开关市贸易，互通有无。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皇朝终于达到了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强盛时期。可以说，没有和亲政策带来的和平安宁，就没有强盛的西汉皇朝。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匈奴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陈丞相世家》

《汉书》:《高帝纪》、《匈奴传》、《刘敬传》、《陈平传》

贯高谋逆、陈豨反叛

贯高是赵国的丞相，曾长期追随赵王张耳。张耳死后，又继续做张耳的儿子张敖的丞相。刘邦把自己的长女鲁元公主嫁给张敖，希望赵国能成为拥护自己的一支重要力量。

汉七年（公元前 200 年）七月，刘邦北伐匈奴，受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解围归来时，路过赵国，驻留邯郸。赵王张敖执子婿之礼很恭敬，从早到晚亲自服侍刘邦，殷勤周到。刘邦却颐指气使，箕踞骂詈，态度十分粗暴傲慢。赵相贯高、赵午已经六十多岁，曾长期追随张耳，对刘邦非常不满，对张敖在刘邦面前的卑躬屈膝也很不满，埋怨他太孱弱无能，失去了作为一国之君的尊严。于是，他们鼓动张敖说："天下豪杰之士叛秦并起，能者捷足先登。现在，大王对高祖毕恭毕敬，而高祖却傲慢无礼，请替大王杀了他。"张敖对他们的谋划坚决拒绝，咬破手指发誓说："你们说得也太不对了。我们被秦亡国，只是赖高祖才得以复国，德泽恩及子孙，秋毫之末都是高祖带来的好处。希望你们再不要开口说这件事了。"贯高、赵午都不听张敖的话，他们商议说："我们的大王是宽厚长者，不愿背德。虽然我等没有受到侮辱，但是怨恨高祖侮辱了我们大王，所以才想杀了他，何必因此事牵连我们大王呢？若事情成功了，归功于赵王；若事情失败了，只不过我们以身系狱罢了。"

汉八年（公元前 199 年）冬，刘邦在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击溃韩王信余党之后班师回朝，路经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今河北柏乡）的行辕安排刺客藏在厕所的墙壁之中，准备在刘邦住宿时刺杀

他。刘邦经过这里，想在此处留宿，感觉心动，就问左右此处是何地，左右告诉他，此处叫“柏人”。刘邦以为不吉祥，说：“柏人者，迫于人也。”遂不宿而去。贯高等人的密谋没有实现。

汉九年（公元前198年）十二月，贯高的仇家得知这个密谋之后，就向朝廷告发。于是，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张敖和贯高等人。事情败露后，十余人争着要自刎，贯高大声怒骂：“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我们大王实在没有参与谋划，现在却一并被捕；如果你们都死了，谁来向皇上说明大王没有参与谋反呢？”

朝廷下诏，用囚车载张敖到长安治罪，并号令说，赵宾客群臣有敢随从张敖来京者，皆杀其宗族。贯高等与宾客孟舒十余人，自己髡钳为奴，作为赵王张敖的家奴，一起到长安来。狱官审讯时，贯高对簿公堂，申诉说：“只是我们这些人筹划的，我们大王实在不知道。”贯高被法吏鞭笞数千下，身上已没有可以再击的地方了，仍然不改口。吕后数次向刘邦进言，说张敖尚鲁元公主，不应有反叛之心，刘邦大怒之下，不听她的劝告。

廷尉审不出结果，就将贯高的话报告了刘邦。中大夫泄公与贯高是同乡，就对刘邦说，“我平素知道贯高这个人。这源于赵国士人重气节不容受辱，又好履行诺言而不顾生死。”刘邦就派泄公持节前去探问。泄公问贯高，赵王张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贯高对他说，从人情理而论，谁不爱父母妻子儿女呢？现在我三族都以论死，难道赵王能替代我的亲族吗？因为赵王确实没有谋反，只是我们这帮人干的。然后他详细地把整个谋划的过程述说了一遍。泄公将情况如实上奏，刘邦获悉真相后，赦免了张敖和贯高等人，并对贯高的重然诺轻生死十分赞赏，派泄公告知贯高。

贯高得知张敖已经赦免的消息后，对泄公说：“我所以受鞭笞全身而不能自死者，是想证明赵王实在是没有参与谋反。现在，赵王已出，我的责任已经尽到，可以死而无恨了。作为人臣而有篡上谋弑之名，我有什么脸面再来服侍陛下呢？纵然皇上不杀我，我能

于心无愧吗?”于是决然自杀。贯高死了以后,一时名闻天下。

张敖被赦免罪过以后,因为尚鲁元公主的缘故,又被封为宣平侯。刘邦对赵王张敖的宾客为主死节的行为很赞赏,凡是自钳为奴随张敖入关者,都任命为诸侯相和郡守等二千石高官。

陈豨,是宛朐(今山东曹县)人,曾经作为刘邦的特使,甚得刘邦信任。韩王信反入匈奴,高祖刘邦北击韩王信,遭平城之困,回来以后,将陈豨由郎中封为列侯,并任命他为代的丞相,同时又让他以将军的身份统领赵国、代国及北部边地的部队,显然是想让他为汉皇朝防守北部边境,显示了对他的极大信任。

陈豨年轻时,非常称慕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等到被任命为边地将军,陈豨多方招致宾客。陈豨待客礼贤下士,如同布衣之交一样,所以宾客众多。赵国丞相周昌到长安求见高祖,向高祖刘邦细说陈豨宾客众多,又擅兵于外,恐怕要出变故。于是,高祖就派人调查陈豨的宾客在代地干的不法之事,事情有很多牵连到陈豨。陈豨非常害怕,暗地里派人到叛逃匈奴的原韩王信的将军王黄、曼丘臣那里,准备联络匈奴以反叛汉朝。

汉十年(公元前 197 年)秋天,太上皇宴驾归天,高祖刘邦派人通知陈豨,让他进京。陈豨称病不从。九月,陈豨与王黄等人反叛朝廷,自立为代王,劫掠赵、代一带。

高祖刘邦得知陈豨反叛后,亲自率兵平叛。他下诏说:“我对陈豨非常信任。代地是急要之地,所以封陈豨为列侯,任命他为相国,是想让他防守代地,现在却与王黄等人起兵反叛! 吏民并无罪过,凡是能离开陈豨前来归附的,一律赦免他们的罪过。”到邯郸以后,刘邦很高兴地说:“陈豨不向南占据邯郸以大河为阻塞,我已经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赵相周昌上奏刘邦说:“常山郡二十五城而有二十城丧失,请斩杀守尉。”刘邦不从,他问:“守尉反叛了吗?”回答说没有。刘邦说:“只不过是力量不足,守不住罢了,无罪。”刘邦令周昌选择勇壮之士四人可任为将军的来拜见。刘邦骂道:“竖

子能做将军吗?”四人惭愧伏地不敢说话。刘邦封他们四人各食邑千户,并任命为将军。随从诸将都不服气,说:“我们这些人随从入蜀、伐楚,并没有得到普遍赏赐,现在却封四人食邑千户,有什么功劳?”刘邦斥责说:“这就不是你们这帮人所知道的道理了。现在陈豨反叛,赵、代之地都为他占有。我以羽檄征发天下兵马,没有前来会合的。现在我能依靠的,只有邯郸的兵马。我何必吝啬四千户的封邑,而不用来抚慰赵地的父老子弟呢?”然后,又派人寻找乐毅的后代,得其孙乐叔,封他为华成君。刘邦询问陈豨将领的情况,得知大多数都是以前的商贾,刘邦说:“我知道该怎么对付陈豨了。”就下令重金封赏以求购陈豨的将领,于是陈豨的将领纷纷叛逃陈豨。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冬天,高祖刘邦在邯郸指挥部队反击陈豨。汉兵斩杀陈豨的大将王黄、侯敞于曲逆(今河北完县)城下,又在聊城打败陈豨的另一将领张春的部队,斩首万余人。太尉周勃也从太原进入代地,平定了代地。十二月,高祖刘邦亲自指挥队伍进攻东垣(今河北石家庄)。陈豨的将军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十分恼怒。陈豨士卒大骂高祖,破城以后,刘邦将那些大骂的人全部斩首,并改东垣县为真定县。

周勃率军从太原出发,北定代地,攻占代国都城马邑,手下的士卒斩杀陈豨的将军乘马,并与韩王信、陈豨、赵利的军队会战于楼,大破陈豨的部队,俘虏陈豨的将军宋最和雁门太守,平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周勃率军再击陈豨于灵丘,大败陈豨的部队,斩杀陈豨并俘虏了陈豨的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平定代郡九县。至此,陈豨反叛被彻底平定。

陈豨反叛的时候,燕王卢绾也从东北方向参加了平定反叛的战斗。当时,陈豨派部将王黄到匈奴那里请求援兵。卢绾也派使张胜出使匈奴,目的是告诉匈奴:陈豨兵破在即,不要与之联合。张胜到匈奴以后,刚好碰上了逃亡到匈奴的故燕王臧荼之子衍。臧衍对张胜说:“你之所以在燕受到重用,是因为你熟悉匈奴事务。燕之所

以能够久存的原因，是因为诸侯屡次反叛朝廷，兵连不决。现在你们燕国却想灭陈豨，陈豨灭了以后，马上就轮到燕国灭亡了，你们也都会成了俘虏。你何不让燕王攻陈豨，而与匈奴联络？”张胜对臧衍这一套借匈奴、陈豨以自重的理论颇为赞同，就擅作决定，请求匈奴发骑兵攻击燕军。事情发生以后，燕王卢绾以为张胜已经投降了匈奴，就上书刘邦，请求族灭张胜。不久，张胜自匈奴归来，把详情报告了卢绾，卢绾也以为很有道理，就采纳了张胜的建议，秘密派亲信范齐到陈豨那里，共同密谋对抗汉朝。刘邦这个同乡同里同日而生，自小就很亲密的伙伴就这样背叛了刘邦，倒向了叛将陈豨和北方的敌人匈奴一边。

陈豨反叛很快就被平定，陈豨同卢绾的阴谋也未及实行。陈豨手下的裨将投降了刘邦，向刘邦报告了卢绾派范齐到陈豨那儿共同策划谋反朝廷的阴谋。刘邦马上派使者到燕，征召卢绾，卢绾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十分害怕，称病不从。刘邦又特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前去燕国，想迎接卢绾归来，同时验问卢绾左右，以查验卢绾同陈豨勾结的详情。卢绾更加害怕，藏匿起来，不敢与汉使相见。他对左右幸臣说：“非刘氏而王者，只有我与长沙王吴芮。往年春，汉朝廷族灭了淮阴侯韩信，夏天，诛杀彭越，这全是吕后的计策。现在皇上有病，事情全托付给了吕后。吕后这个女人，专门以诛杀异姓王和大功臣为能事。”所以决定继续称病。而此时，卢绾手下的人很多逃亡到汉朝廷，所以，阴谋一点点泄漏了出来。审食其得悉后，将搜集到的情报上报朝廷，高祖刘邦更加恼怒。后来，又抓住了匈奴的降者，说张胜现在匈奴，作为燕的特使联络匈奴，反叛朝廷。刘邦决定派樊哙率军攻燕。卢绾率领宫人、家属、宾客和骑兵数千人，撤退到长城脚下，希望等到刘邦病愈以后亲自到长安谢罪，以期得到刘邦的宽恕。不料，汉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五月，高祖刘邦病故。于是卢绾率领部众逃人匈奴。匈奴封卢绾为东胡卢王，但常为蛮夷之人所侵夺，常想归来，大约过了一年，就病死在

匈奴。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及其以后的异姓分封，绝大部分不是出自本心。分封以后，受封的异姓王，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中央集权以外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能不从维护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最后走上分裂和反叛的道路，结果，又不能不被平灭。贯高谋逆是如此，陈豨反叛是如此，卢绾败亡也是如此。它说明分封制度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谁处于受封的位子，也难免不与中央集权对抗。历史证明，分封制已经不能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了。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韩信卢绾列传》、《绛侯世家》
《汉书》：《高帝纪》、《卢绾传》、《张耳陈馀传》、《周勃传》

狡兔死，走狗烹

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以后，屡立战功，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封齐王。在楚汉战争中，盱眙人武涉、齐人蒯通都曾劝韩信拥兵自立，但韩信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没有听从。

垓下之战打败了项羽之后，刘邦在回军途中经过韩信的统帅部驻地定陶时，在韩信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突然收回了韩信的将印，剥夺了他的兵权；接着，又改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剥夺了他对连城七十、地广人众又有鱼盐之利的齐的封地，而改封的楚地，地处淮北，地方狭小，地瘠民贫，四面又无险可守。所以，面临的强敌项羽一破灭，刘邦就开始精心策划如何削夺韩信。而此时的韩信却还以汉的大功臣自居，考虑如何享受荣华富贵，还蒙在鼓里，而不知已经逼到身边的危险。

项羽手下的将军钟离昧，家在伊庐（今江苏连云港）。韩信在项羽手下时，与钟离昧很要好。项羽死了以后，钟离昧就逃到韩信那里。刘邦怨恨钟离昧，听说他藏在楚地，就下诏楚王韩信，让他逮捕钟离昧。但韩信碍于故人情面，拖延未予执行。韩信到楚地就任楚王时间不长，所以，巡行县邑的时候，往往陈兵出入。刘邦派到楚地的耳目就密报韩信陈兵出入，意在谋反。

汉六年（公元前 201 年），刘邦接到密告韩信谋反的上书，很惊恐，召集诸将谋划。将军们一致主张发兵讨伐，刘邦默然不应。后来，他问陈平，陈平说："上书告韩信谋反这件事，不仅外人无从知晓，就是楚王韩信自己也还蒙在鼓里。"然后，他又分析道："若真打

起仗来，您的兵力不如楚王韩信精良，而用兵的将领才能又不及韩信，这样的话，打起仗来，恐怕就危险了。”刘邦问陈平该怎么办，陈平献计说：“古时天子巡狩四方以会诸侯。南方有云梦泽，陛下可假说要游云梦泽，然后，在陈(今河南淮阳)会见诸侯。陈，在楚的西部边界，韩信若听说天子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一定以为无事而前来迎接。在谒见的时候，可以顺势将其擒拿，这只不过是一个力士就能干的事。”

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依计而行，向诸侯王发出游云梦，在陈大会的指示。将要至楚地的时候，韩信想发兵反叛，但又自以为无罪；想谒见汉王，又怕遭擒拿，犹豫未决。有人劝韩信说：“斩杀钟离昧，提着钟离昧的头谒见天下，天子一定高兴，祸患就可以免除。”韩信就去找钟离昧商议此事，钟离昧说：“汉天子之所以不攻击楚，是因为我在这儿。假若想捕杀我以献媚于汉，我今天死，公也会随之而亡。”钟离昧冲着韩信骂道：“公非宽厚长者！”然后自刎而死。韩信拿着钟离昧的头，谒见高祖刘邦于陈，刘邦命令武士逮捕韩信，载在后车上。韩信为自己呼冤叫屈，喊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就该死了。”高祖回头骂道：“人家说你谋反，这已很明白，你不要喊叫了。”因为说韩信谋反，实在没有证据，所以，将韩信载到洛阳以后，刘邦赦免了他的罪过，削去楚王的封号和封地，又封他为淮阴侯。

韩信自己也知道原因在于汉高祖害怕自己的军事才能，所以常常称病不参加朝会。韩信日夜怨望刘邦对自己不公，又耻于同绛侯周勃、灌夫之流居于同列。有一次，韩信经过樊哙的住处，樊哙跪拜迎送，言必称臣，很恭敬地说：“大王竟然肯到臣家来。”出门以后，韩信自嘲说：“想不到今生竟然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

刘邦任命阳夏侯陈豨为赵国的相国，并监领赵、代两地的兵权。莅任前，陈豨特来向韩信辞行。韩信屏退左右，拉着陈豨的手，仰天长叹说：“子可与言乎？我有话要跟你说。”韩信劝陈豨说：“公

之所居，是天下精兵所处的地方；而公，是陛下的宠信之臣。如果有人说公要反叛朝廷，陛下一定不相信；再有人告公反叛朝廷，陛下就要怀疑了；若有三辈人告公反叛朝廷，陛下必大怒而将兵讨伐。我趁此时为公从内里而起，天下可图。"陈豨素来知道韩信的才能，听信了他的话，表示愿意听从韩信的命令。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反叛。刘邦亲自将兵前去征讨，而韩信称病不从。韩信偷偷派人联络陈豨，告诉陈豨说："弟举兵而起，我一定帮助你。"韩信还同家臣商议，准备夜间诈诏赦诸官徒奴，发兵袭击吕后和太子。部署完以后，只等陈豨的密报一到，就要开始行动。

韩信舍人乐说得罪了韩信，韩信将其囚禁以后，想杀了他。乐说的弟弟上书吕后，告发了韩信要谋反的事。吕后很害怕，就召来相国萧何共同策划。二人商定，让人诈称从前线归来，报告说陈豨已兵败身死，让群臣上朝祝贺。韩信听到这一消息，惊惧得不知所措。萧何前来会见韩信，劝他说："你身体虽然欠安，但也应该强打精神上朝祝贺。"韩信听从了萧何的劝说，就前去上朝祝贺，一进宫门，就被吕后早已安排的武士缚住。韩信很快被斩于长乐宫悬钟之室。至其死时，韩信非常后悔地说："我后悔不听蒯通的话，今天反而为小女子所诈取而败，岂非天意！"韩信被杀后，还被夷三族。

高祖平定陈豨之叛回来以后，见到韩信已经死了，亦喜亦怜，就问吕后："韩信死时说了什么话？"吕后告诉他："韩信说悔恨不用蒯通的计谋。"高祖就下诏逮捕蒯通，问他："是你教淮阴侯韩信反叛我的吗？"蒯通坦然回答："是这样。竖子不用我的计策，所以造成自夷至此。假如他用了我的计策，陛下难道还能将他夷三族吗？"刘邦大怒，准备烹了他。蒯通高呼冤枉，他辩解说："秦朝失其纪纲，天下大乱，异姓并起，英俊鸟集。秦失其鹿，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盗跖的狗狂吠尧，并不是因为尧不仁义，而是因为尧不是他的主子。当是之时，我只知道有韩信，还不知道陛下您。况且天下之士集兵

执器而想做陛下所做的事的人很多，只不过是力量不够罢了。难道陛下能把他们全部烹尽吗？”于是，刘邦赦免了他的罪过。

韩信从一介寒士，参加秦末农民战争，后来受到刘邦赏识，交给他兵权，数年之中，纵横天下，攻城野战，屡立战功，为汉皇朝建立创下了独一无二的功绩，又裂地封王，满足了猎取功名富贵利禄的心理。他对刘邦还是拥护和忠诚的，他并不想反叛刘邦，他想封王也是为了满足功名富贵的愿望。不过，他在关键时刻，两次都以要挟手段逼迫刘邦封他为王，为他日后的覆灭埋下了种子。特别是，韩信拥有极高的军事才能，封有大片的土地，终究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巨大威胁。刘邦先夺其兵权，后又削去其王号，也是势所必然。不过，这种措施把韩信推到了反叛的道路上，将矛盾激化了。韩信的悲剧固然是他咎由自取，不过，刘邦的处置也不够恰当。这种政治悲剧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陈丞相世家》

《汉书》:《高帝纪》、《韩信传》、《蒯通传》、《陈平传》

彭越之死

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人。陈胜起义前，彭越常在钜野泽中聚集众人“为群盗”。陈胜、项梁起事以后，昌邑少年纷纷劝说彭越：“现在诸侯豪杰之士并起而叛秦，你也可以起事，效法他们。”彭越辞谢说：“现在正是两龙方斗时，姑且等待一下吧。”一年以后，聚集在钜野泽中的少年有百余人，他们一起投奔彭越，愿意以他为首领，起事叛秦。彭越不愿意做他们的首领，应众少年强烈要求，彭越才答应下来。彭越与众少年约定明天日出聚会，后来者斩。第二天日出的时候，有十余人晚到。彭越说：“我已经年纪大了，不想再起事，你们强烈要求我做你们的首领。现在我们约定了会见的时刻，却有这么多人迟到，不能全部诛杀，请杀最后来的那个人。”马上命令校长斩之，以肃军纪，设立祭坛，立下军规，以号令徒属。从此以后，众少年很害怕彭越，不再敢冒犯军令，甚至不敢抬头仰视彭越。彭越就带领这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走出钜野泽，向南发展，攻城略地，又收集诸侯散卒，队伍发展到一千余人。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刘邦围攻昌邑，彭越率兵助之。因昌邑未被攻下，刘邦遂向西转移，彭越率军退居于钜野泽中，收集魏的散兵游卒。钜鹿之战以后，项羽率军入关，分封诸侯，而彭越率领的这一支独立队伍因为没有归属，又未从项羽入关灭秦，队伍虽发展至万余人，仍然未得项羽分封，彭越对此十分不满。

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秋，因愤于项羽分封不公，齐王田荣首先反叛项羽，刘邦回到关中，楚汉战争爆发。为了争取同盟者，打击

项羽，刘邦派人赐给彭越将军印，让他攻击济阳（今山东定陶）的楚军。项羽令楚将萧公角反击彭越，被彭越打得大败。

汉二年（公元前 205 年）春，彭越与魏豹一起东向击楚，连连获胜，在外黄（今河南兰考）会见刘邦，率众三万余人归附了刘邦。刘邦对彭越大加褒奖，他说："彭将军收复魏地十余城，应马上立魏的后代为王。"西魏王豹是魏王咎的从弟，是魏的嫡系后代，刘邦决定立魏豹为魏王，任命彭越为魏相国，彭越获得了治理魏国的实权。彭越不但取得了官位，而且从刘邦那里得到了可以在东方以便宜行事的权力。由此，彭越率军攻占了原魏国的大部分地区。

后来，项羽由齐地回师反击刘邦，刘邦骄傲轻敌，毫无准备，项羽一个猛烈反击，刘邦几十万军队全被打垮，刘邦只率数十骑人马逃了出来，一直退到荥阳。项羽打败刘邦以后，彭越攻占的大部分地区，也被项羽占领，在楚大军面前，彭越率军退至黄河岸边。此后，彭越采取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袭击楚军，主要以破坏楚军的粮食补给线为主要任务，给项羽造成了巨大威胁。

汉四年（公元前 203 年）冬，项羽与刘邦对峙于荥阳一线，彭越趁机攻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外黄等地十七城。项羽得到彭越在梁地攻下大片土地，截断楚军粮食供给线的消息后，嘱咐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慎勿与刘邦作战，然后带兵东归，大破彭越。彭越占领的大片地方重新被项羽夺回，彭越领兵北走谷城（今山东平阴）。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秋，项羽南走阳夏（今河南太康），彭越率军杀回，攻下昌邑及近旁二十余城，得到粮食十余万斛，用来供给汉王刘邦军食。

汉四年（公元前 203 年），刘邦在荥阳一线遭到项羽猛烈攻击的时候，彭越攻占了原魏国的大片土地，刘邦曾派使要求彭越西进会合共同对付项羽，被彭越婉拒。彭越说，魏地刚刚平定，还不稳定，害怕楚军，所以离不开。刘邦对此大为不满。

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十月，刘邦率汉军主力追击楚军至阳

夏，派使者敦促彭越率军前来会合，结果，彭越、韩信都不来会合，项羽一个反击，大败刘邦于固陵。彭越、韩信都不来会合，刘邦就请教张良。张良为他分析说："齐王韩信被立为王，并非出于君王的本意，韩信自己并不自信。而彭越，梁地本来是由他平定的，功劳最多，开始，君王因为魏豹的缘故，所以，才拜彭越为相国。现在，魏豹死了没有后代，彭越当然也想称王，而君王不早做决定，人家当然不会来了。"张良建议刘邦说："与两人约定：打败楚以后，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土地，封给彭相国。从陈以东至海边，封给齐王信。如果君王能捐出这两块土地以许二人，二人马上就来。如果不这样的话，天下的大事怕还不好说。"听了张良的一番分析，刘邦大梦方醒，决定采纳张良的建议，马上派使者到彭越处，许以封王。使者到了以后，彭越就率领全部人马参加了垓下会战。结果，诸军合力共同打败了项羽。楚汉战争结束以后，刘邦依言正式封彭越为梁王，以定陶为都城，基本上领有了原魏国的大部分土地。

彭越被封为梁王以后，于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朝见刘邦于陈(今河南淮阳)。刘邦伪游云梦，逮住了韩信，彭越对韩信并无同情之心。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秋，陈豨据代地反叛汉朝。刘邦亲自率师前去征讨，至邯郸；同时派使者到梁，征梁国兵以进剿陈豨。刘邦的目的显然是想把彭越置于自己监护之下，以防止彭越趁此时反叛。彭越恐怕遭到刘邦暗算，就称病不从，只派了一个将军率兵赶赴邯郸，参加讨伐陈豨的战斗。刘邦见彭越未能亲自带兵前来会战，大为震怒，派人去责备彭越。彭越非常害怕，打算亲自到邯郸谢罪。彭越手下的将军扈辄建议说："君王刚开始不去会战，受到责备以后才去谢罪，去了就一定会被擒灭，不如发兵反叛。"梁王彭越并没有采纳扈辄的建议，而是继续称病。

梁国的太仆犯了罪激怒了彭越，彭越想杀了太仆。梁太仆就从梁逃奔出来到邯郸进见刘邦，向刘邦密报说梁王彭越与将军扈辄

合谋反叛。刘邦抓住这个把柄，派使者偷袭彭越，而彭越毫不察觉，被武士逮捕，押送洛阳加以囚禁。彭越被押以后，司法官进行审讯，结论是："反叛已经形成，有事实，请按有关法律处以死罪。"刘邦赦免了彭越的罪过，削去梁王封号，将其贬为庶人，并流放到蜀地的青衣(今四川临邛)。

彭越被贬为庶人以后，带着满腹的冤屈西行上路，行至郑(今陕西华县)，适逢吕后从长安来洛阳路经此地。彭越向吕后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并无罪过，实在冤屈，希望吕后能在刘邦面前为自己说话，只想回到老家昌邑做一个平民百姓。吕后假装答应了他的要求，与彭越一起回到洛阳。

吕后将彭越带回洛阳以后，却对刘邦说："像梁王彭越这样的壮烈之士，将他流放到蜀地，实在是为自己留下祸患，不如就此杀了他。"刘邦同意了她的要求，让吕后全权处理。吕后即刻命令彭越的舍人出来诬告彭越再次谋反，廷尉王恬开依照吕后的指令把彭越定成夷灭宗族的大罪。王恬开的上奏书送达刘邦，刘邦批准了这个定刑。梁王彭越被处死以后，骨肉被菹为醢，遍赐诸侯王。淮南王英布接到梁王彭越的肉醢以后，面如死灰，兔死狐悲之心油然而生。

梁王彭越的军事才干在楚汉战争中充分显露出来，经常神出鬼没地袭击项羽的军队，尤其是屡屡在关键时刻截断项羽军队的粮食补给线，极大地减轻了刘邦军队的正面压力，刘邦有好几次危机，都是由于彭越在楚军背后的攻击使项羽不得不抽出精锐赶赴东方面得到解救的。彭越归附刘邦并在楚军背后机动灵活地努力作战，使楚军陷入首尾难顾、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为刘邦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汉军系统中，独立指挥军队同项羽作战，并立下巨功的，首推韩信，次属彭越。不过，同韩信一样，彭越也是抱着富贵功名利禄，特别是兴宗耀祖、裂地为王的思想参加到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去的。随着其力量的发展和功劳的增加，政治野心和

要求不断膨胀，同他们的最高首领产生极大的矛盾。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受到围困，形势极其危急，要求彭越前去助战，彭越未能执行，刘邦已对其产生了不满。汉五年(前202年)十月，刘邦率汉军主力追击楚军，令韩信、彭越前去会战，彭越希望得到魏豹死后留下的王位，刘邦未能早做决定，彭越按兵不动，结果刘邦打了败仗。后来，虽然刘邦封了彭越为梁王，但是他已经做了日后除掉彭越的决定，而彭越此时毫无知觉。楚王韩信被削为淮阴侯，是刘邦消灭诸侯王的开始。所以，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反叛时，彭越称病不从刘邦，大概是从中悟出了什么，因此，彭越被贬为庶人。自始至终，虽然彭越并没有反叛，甚至没有反叛的想法，但他拥有的庞大封地和权力以及他的军事才能和军事力量，都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巨大威胁，这些人一日不除，天下就一日不宁。时距春秋战国不远，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从这点说，梁王彭越和楚王韩信一样，他们的悲剧是必然的。他们都不想谋反，结果都遭到诛杀。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项羽本纪》、《留侯世家》

《汉书》:《高帝纪》、《彭越传》

陆贾著《新语》

陆贾，楚国人，以客卿身份随从刘邦参加了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陆贾由于学富五车，能言善辩，所以，常在刘邦身边随从，多次作为使者出使诸侯。刘邦人关前，他奉命前去收买秦将，使秦军丧失警惕，为偷袭成功，破峭关灭秦立下功劳。楚汉战争期间，项羽俘虏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作为人质，陆贾被任为使者前往楚军军营，劝说项羽释放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刘邦刚刚平定天下，陆贾被任为使者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佗归附汉朝。陆贾到南越，赵佗非常傲慢，对陆贾不很礼遇。陆贾劝他说："足下是中国之人，亲戚兄弟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现在，足下违反自己的本性，放弃冠带礼仪，想以区区南越之地同天子抗衡，祸患马上就到。秦朝败亡，诸侯并起，汉王先入关中。项羽背叛约定，自立为西楚霸王。然而，汉王从巴蜀而起，诛灭项羽，五年之间，平定天下。此非人力所能为之，乃天意啊！天子不愿扰劳百姓，派我授以君王之印，剖符通使。足下应北面称臣。不然的话，天子发怒，掘烧你先祖的坟墓，夷灭你的宗族，派一偏将率十万兵士前来征伐，则越人必杀王投降汉朝，这是很容易的事。"赵佗赶紧谢罪，留陆贾居住月余，临行，又赏赐大量财物。由此，南越归附了汉朝。陆贾归来后，刘邦非常高兴，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

陆贾学富五车，信奉儒家学说，对于《诗》、《书》等典籍很有研究，常常在刘邦面前津津乐道地称引《诗》、《书》。刘邦听了很不耐烦，大骂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以为自己取天下，

全靠武力,并不靠儒家的礼义这一套。陆贾不客气地反驳刘邦说:“从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王都是逆取天下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才是治理天下的长久之策。以前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崇奉武力到极点的人,结果导致败灭;秦朝专任刑法而不变,终于覆亡。假如秦统一天下以后,效法先朝的圣王,实行仁义的政策,陛下还能得天下吗?”一席话说得刘邦哑口无言,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对陆贾说:“请为我著论研究秦朝为什么失去天下,我为什么能够得到天下,以及古往今来兴亡成败的道理。”陆贾就粗略叙述兴亡存败的道理,共有十二篇,每写完一篇,都上奉高祖刘邦,刘邦认为写得好,而左右群臣都高呼万岁。这些文章被称为《新语》。

陆贾《新语》共十二篇,分别是《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戒》、《思务》,构成一个严密的政治思想体系,反映了陆贾对社会发展演变、政事成败关键、社会政治措施等的看法。

《道基》:是陆贾《新语》的理论基础。顾名思义,道基是治道的根本基础。天生育万物,地抚养万物,而圣人加以成全。天有日月星辰、四时阴阳、风雨雷电、雪霜寒冬,生杀万物;而地有五岳、四渎、洿泽、水泉,养育万物。所以,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天地相承而气感相应。圣人正是根据天道来设定人道的。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宫室,后稷殖五谷,大禹疏江河,奚仲造舟车,皋陶立刑赏,中圣设庠序,后圣定五经,所以说圣人成万物。人,宽博浩大,恢廓密微,能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所以,圣人必怀仁仗义。谋事而不行仁义,没有不失败的;不加固根基而想立高大,没有不崩坏的。仁义是道的纲纪。学仁义的人明智,失仁义的人昏暗,背叛仁义的人灭亡。归结起来说,道是治乱的基础,圣人效法天道制定人道,仁义是道的纲纪。

《术事》:言古者,应合之于今;述远者,应考之于近。议论政事

的人，应当讲述五帝的功业，考察桀纣的败亡，必须考虑哪些可作为自己的借鉴。大道之要不必出于久远，关键是把握住根本而要有所成功。《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讲述的只是齐桓晋文十二诸侯的事，然而，已经足以观照兴亡成败之道。不过，圣贤行事成功合于道，愚昧的人背道而归于祸患。所以说，法则是万世不易的，纪纲是古今相同的。行事的人应当合乎规则，服药的人应当就其良方。读书不一定非要选自仲尼之门，服药不一定非要出自扁鹊之方。归结起来说，道是无所不在、古今相同的，行事只要合于道就行，不一定非要久远高妙。

《辅政》：居高处的，不能不求稳定；步履坚难的，用杖不能不求坚固。居高不稳则坠，拄杖不坚固则必仆倒。圣人居高位，则以仁义为巢穴；政事危殆，则以贤圣为拄杖，所以才能高而不坠，危而不仆。尧以仁义为巢穴，舜以禹契为拄杖，所以能居高位而安定，行政事而国稳固。秦以刑罚为巢穴，所以造成巢破卵毁的结局；以赵高、李斯为辅杖，所以有政倾国破的祸患。以贤圣为辅杖的，能成帝成王；以仁义为辅杖的，能成霸成强；以谗贼为辅杖的，则必然灭亡。归结起来说，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辅政的大臣，应当远小人，近忠直，才能安邦定国。

《无为》：道从根本上说，没有大于无为的。虞舜之时，弹琴歌诗，寂静似无治国的意思，淡漠似无忧虑百姓的心思，然而，天下大治。周公治天下，制礼作乐，师旅不兴，刑法不用，然而四夷宾服，九泽来朝。所以说，无为而无不为。秦始皇帝用车裂诛杀来制止奸邪，修筑长城防备胡越；蒙恬讨伐叛乱于外，李斯用法惩奸于内，结果是，事情愈烦，天下愈乱；法律愈滋，奸邪愈烈；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朝并不是不想安治天下，失去天下的原因在于举措太暴而用刑太酷。所以，圣王为政崇尚宽舒中和之治，百姓因此顺从而化。法令是为了诛恶而不是为了劝善。为政之道关键在教化，犹如近河的土地潮湿、近山的土地干燥一样。南面而臣天下的君王都是百姓效

法的对象，所以，举措动作万万不可失去法则。百姓群臣效法君王就如野草顺风而倒一样。孔子说，移风易俗，难道是由户而达的吗？只不过是先行之于身罢了。归结起来说，道的根基在仁义，实行起来莫大于无为。无为从君主做起，百姓才顺从而化。

《辨惑》：行善而不得善誉、行不善却得善誉的原因在于，观察议论的旁观者出现了谬误。君子应当正道而行，明知有屈辱也不应当逃避。直与曲不同形状，白与黑不同颜色，是天下显而易见的事。然而，众口之誉，可以以白为黑，以曲为直。秦二世之时，赵高指鹿为马，而群臣半言鹿半言马，二世不能相信自己而随从邪臣之说。马与鹿相差很大，当时却无法分别是非，更何况其他难于辨别的事呢？孔子相鲁，使齐人惧然而恐，归鲁四邑之地。然而，鲁定公受三家挟制，陷于众口之中，终归不能重用孔子。关键在于鲁定公内无独见之明而外受到奸邪之臣的迷惑，结果国败身辱，权归于三家。归结起来说，君主应当辨明诱惑，而用忠直之臣。

《慎微》：建大功业于天下的，应先修政于闺门之内；流名誉于万世的，应先从细微之事做起。伊尹负鼎屈就于有莘氏之野，修明道德于草庐之下，执农夫之作，怀帝王之道，然而终于佐助商汤克夏立商，除患征暴，海内大治，百姓安宁。修之于内，可以行之于外；行之于小，可以显之于大。邪臣蔽贤，犹如浮云遮日。现在上无圣王明主，下无贞正诸侯，只有诛锄乱臣贼子，忠良方正之士才能容于朝廷，设政施治。所谓道，关键在人的实行。孔子说，道之不行，意思是说人不能行道。所以，大道是可以实行而无所不能的。怀道而避世的人，不是忠臣。君子身处乱世应力行道德，行小善，绝小恶，从小处做起。

《资质》：资质美好能通达则为贵，才高盖世名闻则为能。楩柟豫章，是天下的名木，若因江河之道而来到京师，上为帝王之御物，下赐公卿百官，假若生于绝险山巅，官冥溪旁，不通舟车，商贾不至，工匠不窥，腐朽枯伤，还不如道旁的枯杨；而若生于大都广地，

接近巨匠名工，加以规矩修掣，则布于官堂，为宗庙之器。关键在于通与不通。人君没有不想求贤以辅佐的，然而，贤圣之士隐于田里而不能参预国家大事的却比比皆是。原因何在呢？主上不明了下情，忠贤之士逃于野，朝廷为奸党佞臣所充斥，结果，导致天下倾覆。归结起来说，资质美好、才能具备的人不是没有，关键是君主要进忠直，退奸佞，将贤圣之士引入朝廷，给他们通达显能的机会。

《至德》：想要建立强盛国家、开辟土地、招抚远方之民的，必须得民心；想立功业、流名誉、显荣华的，必须从自身做起。以道而行的人，众皆归之；恃刑而行的人，民皆畏之。归往则附于其侧，畏惧则逃离其地。所以，设刑立法，应不厌其轻；布德施恩，应不厌其重。这样，才能近者亲远者来。所以，君子治理天下，应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无诉讼，老幼不愁苦，近者不议，远者不听，邮亭无夜行的官吏，犬不夜吠，鸟不夜啼，老者屋堂休息，丁壮田野耕耘，在朝大臣忠于君主，在家儿女孝于双亲；然后兴赏罚，设庠序，这样，贤愚廉鄙就有了区分，上下长幼就有了差别，强弱互相扶助，小大相怀以恩。晋厉、齐庄、楚灵、宋襄四君尚威力轻用师，结果与邻国结仇于外，臣下怨恨积发于内，宋襄公死于泓水之战，其他三君死于臣下之手。鲁庄公收十二之税，一年之中以三时役使民力，封闭山林川泽与百姓争利，结果，贤臣出逃，奸臣叛乱，受到宋、陈、卫的侵伐。归结起来说，武力不足恃，无为才是治民的根本。

《怀虑》：目以视明，耳以听聪，口以别味，鼻以闻芳，手以持拿，足以行走，各受一性，不得两兼。若一物兼两用，则心思迷惑。执一统万物，虽寡必至众；若心思逸迷情欲散乱，虽处高必崩坏。安于静的祯祥，志气定的心平。战士不耕作，朝士不行商。想治理天下的君主应当闭绝利门，利门闭绝大道才能彰著，罢退武事，德治才兴。治产业则教化不行，政令不从。苏秦、张仪位尊身显，佩六国相印，欲连横制纵，结果，功业不成，中道而废。原因在于，国异辞，人异

意，情欲放逸而内无坚计。管仲相齐，则专心一意，无境外之交，亦无奇斜之心，所以，威行海内，化流诸夏。圣人为政，都是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槩以等万民，目的是为了同一治而明一政。归结起来说，君主应一心一意行仁政闭利门，绝不能有多种政策和思虑。

《本行》：政道治行以道德为上，以仁义为本。所以，位尊无德遭罢黜，财多无义受刑罚。古来覆亡之君，并不是匮于财、弱于力，然而，却不能自存自守，关键是身无道德之修养，天下没有行仁义的政治。所以，带璧玉，环佩服，藏珍宝，刻金雕镂，只不过可以向小人夸耀，并不是厚己的方法。兴高台之宫室，建百仞之城池，只是疲惫百姓之力，并不是扶弱存亡之道。因此，仁圣之君应当卑宫室而高道德，谨行仁义，不兴无事之功，不藏无用之器，目的是为了减少力役而减省百姓的贡献。归结起来说，君主应以道德仁义为本，杜绝骄奢淫侈而施恩于民。

《明诫》：君主明于政事可以及远，臣下笃于信义可以致大。安危吉凶出于身，兴衰成败验于行。尧舜之时，日月不变而兴；桀纣之时，星辰不易而亡。天道并无改变，人道却改变了。世道衰亡，并非天道所为，起于国君的施政措施，政治败坏于下，则天象显示于上。腐败的政治流布万民，则虫灾生于地下。所以，灾异恶气之变生于腐败丑恶的政治。圣明贤智的君主依天道而随时改变。冬天多麋鹿，十月无霜雪，寒暑气节已经错失。鸟兽草木都想按节气生长，更何况人类呢！圣人为政，效法天道之明，因用地道之利，推演万物之变，用之于为政。行善而鸟兽同悦，行恶则臣民共惊恐。圣君为政不得不明于天道诫告。

《思务》：为君子者应当广思博听，进退循法，动作合度，见闻众多，选择谨严，见邪知道正，观花知道实，然后，才能统一大道持定操守。凡人则不然，见一利而丧万机，求一福而致万祸。学者博通神灵之变化，知晓天地之开合，明了性命短长，所以，才能够手足不劳作，耳目不淆乱。圣人因天地的法则来制事，因世道之便利而设

定义理。所以，圣人为政不用同一道法都能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君主则不然，政治不效法天道与时变化，却说世道不好，不能用道德治理。现在的臣子不效法后稷周公，却说百姓无法治理。现在的学子不能昼夜不懈求学，不能循礼而动，却说世道不行。上至人君下至庶人，没有效法先世圣人的，为善者寡，为恶者众。善恶相从，祸福相随，关键要看人心所向，志气所行。归结起来说，君主应效法先圣明君，广闻博听，因天地之道，行仁义之治，才能治理天下。

陆贾的《新语》基本上属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他所讲的"无为"、"至德"之世，仍然属于儒家节用民力、薄征赋敛、施恩于民的范畴。在《新语》中，陆贾仍然把天下治理的关键系于君主一身。他在《新语》中讲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王道终始的理论，对于后来的儒学大师董仲舒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西汉建立初期，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和秦朝严刑苛法、赋敛无已的严重摧残，处于非常危困的境地。汉初君臣亲身受到秦朝弊政的祸患，对于秦朝赋敛无已、多刑寡恩的政治有切肤之痛，从政治上说，很讨厌秦朝那一套做法。但是，这个草莽集团，对于文化的作用也不可能给以正确认识，推翻了秦朝，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面对新的形势，陆贾的《新语》从天道与人道相应的角度，联系历史的兴衰替变，指出了君理天下应遵循的根本法则，提出了仁义为本、无为而治的思想，成为汉代初期整个政治的理论基础。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陆贾郦生列传》、《高祖本纪》

《汉书》:《陆贾传》

《新语》

高祖作《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就是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回到故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时所作的《大风歌》。短短三句即反映出一代开国帝王创业的艰难历程、成功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忧患与期待。

刘邦年轻时曾是个人见人怕的无赖之徒。他从来不愿耕种劳作、操持家务，相反却常常交结豪吏及各路朋友，放纵酒色，横行乡里，被其父视为不肖之子。即便做了泗水(今江苏沛县东)亭长，他无疑还处在社会的下层，但他并不安于本分。

秦朝徭役繁重，刘邦与成千上万的劳工被征到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修建宫殿。有一天，他看见秦始皇坐在御辇之上威风凛凛地出巡，心中不禁产生敬畏、羡慕之情，感叹道："唉！大丈夫就该如此啊！"从此，他做起了皇帝之梦。

秦始皇末年，刘邦以亭长身份往郦山(今陕西临潼县东)皇陵押送役徒。起程不久，役徒纷纷逃亡，刘邦估计到了郦山役徒就逃得差不多了。走到丰邑(今属江苏丰县)西面时，他索性停下来饮酒，将所送役徒都放了，并对他们说："你们都去自找一条生路吧，我也从这里逃命了。"役徒中有十几人自愿跟随刘邦，成了他最早的部下。以后，他们就躲进芒、砀(今安徽砀山县东南)的山泽、岩洞

之间。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路豪杰纷纷杀长吏以应,刘邦闻讯,乘乱迅速带领手下百余人赶回沛县,杀掉沛令,拉起一支队伍,投身到争雄的洪流当中,正所谓歌中"大风起兮云飞扬"。

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秋天,刘邦率军向关中进发,一路征战,连破秦军。第二年十月,他率军进至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刚刚当了四十六天秦王的子婴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大秦的御玺符节,在通往咸阳的轵道旁向刘邦投降。刘邦进驻咸阳,看到秦宫里无数的珠宝、美女,他非常想成为这里的主人,圆却皇帝梦。但是他知道时机远不成熟,即将面临的将是比秦王朝更大的敌人。

秦亡后,项羽以四十万大军的优势,撕毁"先人定关中者王之"的誓约,扬言要扫平关中。这时刘邦只有十万人马,显然不是对手,只好冒死赶赴鸿门宴,声明自己并无为王关中之心,其部才得以保全。后来,项羽分封诸王,立刘邦为汉王,辖巴郡、蜀郡、汉中,建都南郑(今属陕西南郑县),其地相当于今四川省大部、陕西省南部及湖北省西北部。同时,项羽三分关中,封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东北)。这样的分封,汉王刘邦自然不满,何况项羽又削夺了他的兵权,只让他带领三万人去封地。刘邦别无选择,只好率部进入汉中封国。为了迷惑项羽,他命人烧毁栈道,以示绝无东进之意。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刘邦借齐贵族田荣反楚之机,出击三秦,揭开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帷幕。这年八月,他率部经陈仓古道进入关中,击败雍王章邯,略定雍地;接着又迫使司马欣、董翳降汉,再度入主关中。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刘邦继续向东发展,短短几个月

时间就取得关内、关东大片地盘，势力迅速膨胀。四月，他调动五诸侯兵力共五十六万人东下，很快占领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项羽领三万精兵回救，大败汉军。灵璧睢水（今属安徽境内）之战，楚军杀汉军十几万人，睢水为之断流。楚军将刘邦层层围住。幸亏刮起西北大风，摧屋折木，飞砂走石，白昼如晦，楚军大乱，汉王才得以脱身，仅与数十骑逃遁。路过沛县，他叫人去接家室，哪知家室已逃亡，途中巧遇刘盈及鲁元公主。审食其领着刘父及吕氏等人抄小路而行，不料正好遇上楚军，项羽便将他们收在军中做人质。刘邦带着一对儿女坐车行进，被楚军紧紧追赶。情急之中，他推下儿女，只顾自己逃命，其部下滕公将他们又带着，终于没被追上，这是刘邦最为狼狈的一回。

这年五月，刘邦退至荥阳（今河南荥阳），收集诸路败军。萧何及时从关中派来增援部队，使刘邦得以重振军威，在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虎牢关）一带与楚军形成对峙局面。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楚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刘邦逐渐占了军事上的优势，屯军于广武（今河南荥阳县北）。一天，刘邦约项羽隔广武涧对话，历数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一箭射中刘邦胸部。尔后，项羽因处境日益不妙，主动讲和，与刘邦相约，以鸿沟（今河南荥阳境内）为界，均分天下，东楚西汉。缔约后，项羽引兵东去。刘邦听从部下的献策，决定乘胜追击。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调集各路大军将项羽困在垓下（今安徽泗县南），一举歼灭楚军，项羽自刎。

项羽已死，大局已定，刘邦在汜水（故道在今山东曹县北）之阳登上了帝位，这才真正圆了他的帝王之梦。在洛阳宫中，刘邦最为得意，把酒论英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然而，他心里清楚，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不仅能统治这些英雄，更重要的是统治了天下。

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由萧何主建的未央宫落成,整个建筑包括东阙、西阙、前殿、后殿、武库、太仓等,十分壮丽。刘邦非常高兴,在未央宫前殿大置酒宴,朝会诸侯群臣。首先,刘邦站起,双手捧着玉匣,为父亲太上皇祝寿,并说道:"当初大人常认为儿臣无赖,不能治产业,比不上仲哥。今天我的事业成就与仲哥比起来谁多呢?"自满之情,溢于言表。

楚汉战争中,因对付项羽的需要,刘邦分封了一些异姓王。战争一结束,这些曾帮他打天下的异姓王便成了他的心病。燕王臧荼、韩王信先后因叛乱被铲除。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已由齐王降为楚王、又由楚王降为淮阴侯的大将韩信因谋反罪被杀,并诛灭三族;夏,梁王彭越也因谋反罪被处以醢刑,诛灭三族;七月,最后一个对刘氏政权有威胁的异姓王——淮南王英布被迫反叛。英布向东吞并了荆王刘贾的封地,又北渡淮河进人楚国,楚王刘交逃命而去。刘邦立子刘长为淮南王,亲自率军剿叛,这是他最后一次领兵作战。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英布败逃,刘邦另派将领追击,自己因受箭伤从前线撤回。途经故乡沛县,刘邦停留下来,在沛县行宫举行盛大宴会,召集了所有的父老、故旧,开怀畅饮。他还派人找来一百二十名儿童,教他们唱歌。酒酣时,刘邦亲自击筑,引吭高歌,其词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百二十名儿童也跟着唱起来,如此重复数遍,歌声响彻云霄。刘邦仿佛忘掉自己是个帝王,一时兴起,竟然起舞助乐。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的歌声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刘邦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尽管树敌众多,但最终总是胜利者,这是帝王天下无敌的气魄;喜的是:我刘邦终于又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这次不再是"无赖",不再是逃亡者,而是开国皇帝、成就大业的人。忧的是:国家大局虽定,然而国内时有叛乱,边境又有匈奴为敌,创业已是不易,守成更难,如今我已老矣,体内又有伤,来日已不多,

每遇不测，仍需亲行，万岁之后，刘氏天下是否能保住？哪里寻求猛士守卫边疆？

当然，他与失败的英雄项羽不同。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完全是绝望的哀鸣。他以美人虞姬和唱，泪流满面，显得缠绵壮烈。刘邦唱《大风歌》后，也是泪流满面，体现出他回故乡的激动心情以及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刘邦临走时对沛县父老说：“游子悲故乡。朕虽建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仍然会思归于沛；况且朕自做沛公起，诛暴逆，拥有天下，当然要以沛作为沐浴之邑……”

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惠帝考虑到高祖想念和喜爱沛县，就以沛宫作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的一百二十名儿童重被召来，令他们演奏吹乐，后如有缺额，就及时补上。

在刘邦的故乡沛县，至今还存有“歌风台”遗迹，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吟诵。如宋张方平《歌风台歌》：“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一曲大风辞。才如信越犹葅醢，安用思他猛士为！”又李凤诗：“一剑西提与楚争，风云泼惨五年兵。归来四海成家日，犹自悲歌气未平。”

(程定飞)

参考书目：

《史记》：《高祖本纪》

《汉书》：《高帝纪》

《沛县志》：《古迹志》

分封同姓王

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对付项羽，不得不分封或保留一些异姓诸侯王，以便争取军事实力。这些诸侯王是：齐王韩信，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梁王彭越，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韩王信，都阳翟（今河南禹县）；淮南王英布，都六（今安徽六安市）；燕王臧荼，都蓟（今北京市西南）；赵王张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衡山王吴芮，都邾（今湖北黄冈县西北），后改封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项羽战败后，刘邦做了皇帝，为了稳固刘氏天下，便着手铲除这些曾立下汗马功劳的异姓王，同时不断地分封刘氏子弟为王。

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七月，燕王臧荼反叛，攻下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平叛，不久即将臧荼俘获。随后他另立太尉卢绾为燕王，并派大将樊哙平定代地。

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匈奴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韩都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投降，并领匈奴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占据晋阳（今山西太原）。同时，韩王信部将曼丘臣、王黄也拥立前赵国将领赵利为王，在白土城（今属山西）叛乱。次年，刘邦率领三十二万步兵迎击匈奴，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达七天之久，后经陈平重贿匈奴阏氏，才得以突围。后韩王信被击败，韩王废。刘邦封其兄刘仲为代王，都代。后来，匈奴兵侵代地，刘仲弃国，不战而逃，被削去王位，改封为合阳侯。

高祖八年（公元前 199 年），刘邦率军在赵国的东垣（今河北石

家庄市东)一带围剿韩王信残部。经过柏人(今属河北)时,赵相贯高密谋刺杀他,未遂。次年,赵相贯高事发,赵王张敖被废为宣平侯。刘邦立子刘如意为赵王。刘如意是刘邦爱姬戚夫人所生,刘邦认为他最像自己,故最为偏爱。

刘如意被立为赵王,但他年幼,赵国军政大权实际上由相国陈豨一手掌握。陈豨原是刘邦的宠臣,刘邦平定天下后,派他做了钜鹿(治今河北平乡西南)郡守。刘如意封为赵王后,他受命辅佐。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八月,陈豨因遭人诬陷而在代地反叛。刘邦命令太尉周勃及大将樊哙前往代地平叛;又将赵常山(今河北恒山)以北地区划给代国,立皇子刘恒为代王。刘恒是薄夫人所生,后来被迎立为帝,即汉文帝。

陈豨反叛本身并不重要,但它牵涉并影响到刘邦视为心腹之患的韩信、彭越、英布三员大将,结果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一一铲除。

韩信是刘邦手下最有军事才华的将领,刘邦说他能"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当年,萧何月下追回未受到重用的韩信,又力举他为大将,使他如鱼得水,给刘氏带来新的转机。韩信制定了平定三秦及东进策略,使刘邦重占关中。他自己领兵以少胜多,先后打下了赵地、代地、魏地,继而击败齐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垓下会战之前,韩信派人向刘邦说:"齐国是楚国近邻,如果不封立齐王的话,恐怕不能稳住齐人。"刘邦一听,这明显是要挟,十分恼怒。张良却劝刘邦趁此机会封韩信为齐王,让他独守齐国,并且出兵会战项羽。最后,刘邦很不情愿地封他为齐王。垓下会战,韩信率三十万大军参加,立功不小。刘邦看到大敌已去,就立即驰至韩信营垒,夺了他的兵权。战后分封诸王时,刘邦借故改封韩信为楚王,统辖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一些地区,建都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削弱了他的势力。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信巡行所辖州邑,因出入陈列兵仗,被人密告以谋反罪。刘邦没有采取众将用兵讨伐的

意见，听从了陈平的建议，假装巡游云梦泽(泛指长江以北地区)，要在陈(今河南淮阳)会见诸侯。韩信知道后，心里很不安，只好前来迎接，刘邦即命武士将他绑起来。韩信以为难免一死，就说："真是如古人所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他没有想到，过了十几天刘邦把他赦免了。刘邦不杀他，是怕其他诸侯造反。但刘邦削去了他楚王封号，改封为淮阴侯。

韩信被削去王号后，刘邦即将他原来的楚国封地分成两个王国，封其堂兄刘贾为荆王，辖淮河流域东部地区；封其同父异母少弟刘交为楚王，辖淮河流域西部地区。刘邦起兵后，留二哥刘仲及审食其侍奉刘父，刘交则与萧何、曹参等人一起跟随他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羽。刘邦即帝位后，刘交与卢绾成了他最信赖的内臣。与此同时，刘邦封立皇子刘肥为齐王，统辖七十余城，凡讲齐语的地区都归齐国。刘肥是刘邦微时与曹氏私通所生，是长子。

韩信屡降屡削，心里自然不满。早在陈豨被任命为钜鹿郡守，向韩信辞行时，韩信就暗中对他说："你所辖之地，天下精兵聚集，而你又是皇上的宠臣。如果有人说你反叛，第一次皇上不信；消息再次传来，皇上就怀疑了；消息三次传来，皇上一定会大怒而亲自带兵讨伐。以后为难之时，我会为你自京城起兵内应，如此则天下可图。"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叛汉，刘邦带兵镇压，韩信借口生病未随，并暗中派人到陈豨处联络。他又与家臣谋划，乘黑夜假传诏书，赦免各官府的犯人与奴婢，打算调他们袭击吕后、太子，以此内应陈豨。没想到一名被他囚禁的家臣的弟弟把这事告发了。正当他等着陈的回话时，吕后和萧何派人请他入宫，说是抓住了陈豨，请他参加庆功宴。韩信一进宫中就被缚住，马上就在长乐宫钟室里被处斩了。

彭越，昌邑(治今山东巨野东南)人，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他率领三万多人归附汉王刘邦。刘邦让他做魏相国，专掌兵

权，平定梁地。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与项羽在河南荥阳成对峙局面，彭越攻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等十几个城邑，扰乱了项羽的后方。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彭越又攻下昌邑附近二十多个城邑，将谷物十多万斛供给汉军。不过，他的独立性很强，很难驾驭。刘邦让他会师攻楚，他推辞说："魏地初定，楚人时时袭击，故不敢离开。"张良看出他的心思，建议刘邦封他为王，辖睢阳以北直至谷城（今山东平阴县西南东阿镇）。这样，彭越与韩信一样，很快出动了全部兵力会战楚师。击败项羽后，刘邦没有食言，封他为梁王，建都定陶。

陈豨反汉，刘邦带兵征讨，到邯郸向彭越征兵。彭越只派部将领兵前往，自己称病不动。刘邦大怒，派人斥责彭越，他心里害怕，想亲自谢罪；其部将扈辄劝他造反，彭越不听。他的太仆因过犯下死罪，就逃到高祖那里诬告彭越及扈辄谋反。刘邦立即派人将他逮捕，后降罪流放蜀郡。彭越向西被押到郑（今河南新郑），遇上吕后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赶往洛阳。彭越向她哭诉冤情，声明自己无罪，要求流放自己的故乡昌邑。吕后假意答应，将他带到洛阳。随后，吕后又让彭越家臣告他再度谋反。最后，一代猛将，被处以醢刑，夷灭三族，肉酱被送往其它异姓诸侯，以示警戒。

刘邦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淮阴侯韩信被杀，淮南王英布恐惧不已。七月，英布正在打猎时接到梁王彭越的已经发臭的肉酱，不禁毛骨悚然，便暗中派人侦察邻县动静，部署军队，以防不测。恰好这时，他的爱妾生病，常去医师家，而医师家与侍中赫贲家对门。爱妾多次去医师家，与赫贲一起宴饮，还接收了他的贵重礼物。一次，这位爱妾在英布面前说赫贲这个人很忠厚老成，英布怀疑她与赫贲淫乱，就要杀赫贲。赫贲逃到长安，状告英布谋反。相国萧何并不轻信，就派人去淮南了解真情。英布见赫贲去了长安，汉廷又来了使者，就索性杀了赫贲一家，起兵反叛，向东吞并了荆

王刘贾的封地，又北渡淮河，进攻楚国，楚王刘交逃至薛(今山东滕县南)。

刘邦再一次带兵亲征，同时立子刘长为淮南王。刘长是原赵王张敖所献美人生。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刘邦从讨伐英布前线回长安，途经沛县，作《大风歌》，封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刘濞原是沛侯，因破英布有功而受封。

同年，樊哙等人平定代地，斩陈豨。十二月，刘邦从陈豨降将口中获知，陈豨反叛时，燕王卢绾曾派人至代，参与叛谋。于是，他命辟阳侯审食其召卢绾来长安。卢绾畏惧，称病不朝。次年二月，刘邦命樊哙等人领兵征讨燕王卢绾，同时立子刘建为燕王，这是刘邦在世时所封立的最后一个亲王。

刘邦为了变天下为真正的刘氏天下，在楚汉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杀白马，与亲信大臣及宗室歃血订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他采取的策略是寻找时机，各个击破，所以那些异姓王被一一铲除，取而代之以同姓诸王。唯一没有被削去王号的是对他威胁不大的长沙王吴芮。

(程定飞)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魏豹彭越列传》、《英布列传》、《淮阴侯列传》

《汉书》：《高帝纪》、《韩彭英卢吴传》

《通鉴纪事本末》：《诸将之叛》

吕后残害戚夫人

吕后名雉，字娥姁，砀郡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她是刘邦的结发妻子，生惠帝刘盈及女儿鲁元太后（其夫张敖死，谥为鲁元王；其子立为鲁王，故称）。刘邦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即帝位后，她被立为皇后。刘盈即帝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

吕后为人刚烈，刘邦定天下后，她为巩固刘氏政权，清除异姓王，出力非小；诛诸侯如韩信、彭越等，她都是主谋。刘邦在发迹过程中及做皇帝后又收立不少姬妾、嫔妃，对此吕后十分怨怒。刘邦死后，她就将刘邦宠幸的、侍宿次数较多的嫔妃囚禁起来，不许出宫，并对她们进行惩罚，只有薄姬因侍宿极少，才得以出宫，跟着儿子刘恒去了代国。

吕后最为怨恨的是戚夫人。戚夫人是刘邦率部攻下定陶时所得，刘邦对她非常宠爱。她年轻貌美，自刘邦征战各地到初入关中，入蜀汉，然后定三秦，转战关东灭项羽，戚夫人一直在刘邦身边。甚至在吕后立为皇后以后，戚夫人伴宿刘邦的次数也最多，吕后对她十分妒嫉。

与戚姬相反，吕后却很少得到刘邦的宠爱。刘邦微时，其行为常被人看不起，吕后父吕公看中了他，将女儿许配与他。成家后，刘邦仍不走“正路”，不事耕种劳作，也很少回家；而吕后既要操持家务，又得领着儿女下地干活。刘邦在沛县（今江苏沛县）起兵后，将刘父、吕后托付给审食其、刘仲照料，自己就一心去打天下了。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刘邦在灵璧睢水之上（今安徽境内），以五十

六万大军反败于项羽三万精兵，最后仅以十余骑逃命。途经沛县，刘邦叫人去接家室，而刘氏一家已经逃亡，后来在途中幸遇他的一双儿女，但刘邦为了摆脱楚兵追击，几次将他们推下车去，只是几次都被夏侯婴救起，他们才得以活命。吕后、刘父及其家人由审食其等人护送，抄小路逃命，不巧正碰上楚军。从此，吕后等人就被项羽当作人质扣押在营中，直到高祖四年（公元前 203 年）九月项羽向刘邦求和，才回到刘邦身边。刘邦行军作战时，吕后常常留守后方，很少能见到刘邦，因此关系更加疏远。被立为皇后以后，刘邦对她依然是尊而不亲。

吕后对戚夫人怨恨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争立太子的问题，与吕后争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是戚夫人受残害的根本原因。

戚夫人生的儿子刘如意在高祖九年（公元前 198 年）封为赵王；吕后生的儿子刘盈早在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就立为太子，他是皇后所生，按理不存在废立问题。但是，刘邦最喜欢刘如意，认为他性格、气质、相貌都很像自己；而刘盈生性仁慈、软弱，刘邦认为他没有能力做皇帝。加上刘邦宠幸的戚夫人经常在面前苦苦相求，刘邦每每生出重立太子的念头来，好几次都几乎成了事实。

刘如意立为赵王时，刘邦就想立他为太子。一次廷议，文武大臣大多数都不同意废旧立新。御史大夫周昌廷争最强。刘邦问他理由，周昌本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非常愤怒，就结结巴巴地说："臣口不能言，然而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废太子，臣期……期……不……不奉诏。"刘邦欣然而笑，暂时放弃重立太子之事。吕后在东厢厅暗听到廷议，心里十分感激周昌，见到周昌，向他跪谢说："要是没有您，太子几乎被废了。"

当时赵王刘如意年仅十岁，刘邦对他的命运十分担忧，担心他在自己万岁之后不能保全，要是他做了太子，事情就会好多了。可眼下最主要的是要给他找个可靠的保护人。一天，刘邦内心不乐，轻声悲歌，群臣不知皇上为何如此。年轻的符玺御史赵尧走上前，

轻轻地问："陛下所以闷闷不乐，是不是因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又有隔阂，考虑万岁之后赵王不能保全自己呢？"刘邦说："正是。我私下担忧，不知能想出什么办法？"赵尧说："陛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赵王找一个德高望重的相国，这个人必须是吕后、太子、群臣平时所敬畏的人。"刘邦问："谁合适呢？"赵尧说："御史大夫周昌。"于是，刘邦立即召来周昌，对他说："我想麻烦周公，您就为我做赵王的相国吧。"周昌哭泣说："臣最初就跟随陛下，陛下为何要将老臣中途弃之诸侯？"刘邦说："我深知委屈您，然而我心念赵王。辅佐赵王，非公莫属。"

过了不久，刘邦对赵王放心不下，还是想立他为太子。吕后闻知，心里非常着急。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筹谋，皇上也相信他。何不求他想个办法？"吕后就让建成侯吕泽走访张良。吕泽对张良说："您身为皇上谋臣，如今皇上想更换太子，您怎么能高枕无忧，充耳不闻呢？"张良答道："当初皇上多次处于危急之中，幸而采用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已定，因为偏爱的缘故要更换太子，这是骨肉之情，即使百人进谏，又有何益？"后来，张良总算给想出一条妙计："皇上不能相招的只有四个人，这四人年纪老了，都认为皇上对人傲慢轻侮，所以逃到深山中，义不为汉臣。假如以太子名义修书一封，言辞谦逊，再准备好座车，派说客敦请，他们肯定出山。然后待之以贵宾之礼，让他们常随太子出入宫廷，这样对太子最有帮助。"吕泽便按计请四位老者。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英布反。高祖刘邦正生病，想派太子刘盈担任主将，前往讨伐。四老相互商量，认为太子领兵平叛很不利，就对建成侯吕泽说："太子领兵平叛，即使有功，地位不会超过太子，若是无功而回，恐怕就有祸患了。况且与太子出征的将领都是曾随皇上平天下的猛将。太子统率他们，无异乎以羊制狼，他们不会为太子卖力，这样太子自然无功而返。《韩非子》曰：'母爱者子抱。'如今戚夫人日夜侍奉皇上，赵王常常抱在皇上面前。皇上

又常说：'终不能让不像我的那个不才之子居于爱子之上。'很明显，皇上志在让赵王代替太子。你应该迅速请皇后找个机会对皇上哭谏，让皇上取消用太子领兵的打算。"吕泽当夜驰告吕后，吕后按四老之意哭诉一番，终于使刘邦改变主意，决定自己带病出征。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刘邦从前线撤回，身体每况愈下，更想更换太子。张良劝谏，不听。太子太傅叔孙通以死相谏："从前晋献公因骊姬之故，想废太子，立奚齐，结果使晋国内乱了数十年，为天下耻笑。秦朝就因为不早定扶苏，使赵高得以诈立胡亥，导致国亡，这是陛下亲眼所见。当今太子仁慈忠孝，天下皆知。陛下与吕后同甘共苦，怎么可以背弃！陛下一定要废嫡立少，臣请先伏诛，以颈血洒地。"其他大臣也纷纷劝谏，刘邦只好口头上表示不再重换太子，内心还想更换。

一次宴会开始前，太子侍候在刘邦身边，后面站着四老。四老都已是耄耋之年，须发如雪，衣着也与常人不同。刘邦感到奇怪，就问他们是什么人，四老回答：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正是刘邦找寻多年的四位高人。刘邦向他们为何要跟随太子，四老解释道："陛下轻视士人，喜于辱骂，我等讲求骨气，不愿受侮，所以躲进深山。太子为人仁义孝明，对士人恭敬有礼，天下无人不愿为太子效劳，我等当然跟随太子。"刘邦这才知道太于羽毛已丰，无法再更换了。

刘邦指着飘然而去的四老，对坐在身旁的戚姬说："我想更换太子，现在已太晚了。有他们四人辅佐，太子羽翼已丰，难以动摇了。吕后真是你的主人啊！"这时，戚夫人已泣不成声，刘邦心情也非常难过，对她说："你为我跳个楚舞吧，我为你唱楚歌。"他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痛哭流涕，刘邦慢慢起身离去。酒宴散了，留给她母子的将是一场不可逃脱的厄运。

惠帝元年(公元前 194 年)四月，高祖驾崩，太子刘盈为帝。吕

后掌握实权，她立即着手残害与她为敌的戚夫人，而赵王如意也成了太子之争的牺牲品。

吕后先命令永巷令将戚夫人囚禁起来。永巷本为宫女住所，因群室相连、排列如街巷而名，吕后用它来囚禁她认为有罪的嫔妃。接着，吕后派人去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想召回刘如意，以图加害。赵相建平侯周昌遵从高祖遗愿，对赵王悉心照料。他明白吕后使者的来意，好几次都将使者挡了回去，他对使者说："高帝生前将赵王托付给老臣，是因为赵王年幼。老臣窃闻太后怨恨戚夫人，欲召回赵王一并诛杀，故老臣不敢放赵王回都。况且赵王生病，不能奉诏。"吕后十分恼怒，但她奈何不了于她有恩的周昌，只好想出个调虎离山之计，即先派人将周昌召回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然后再次派人去召赵王。

惠帝刘盈心地善良，他并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他深知吕后痛恨戚夫人及赵王，赵王来长安凶多吉少，就亲自到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迎接。赵王来京后，惠帝与他一同出入，一同饮食起居。吕后时刻都想杀掉赵王，可又苦于没有机会。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惠帝清晨起得很早，出去射猎，而赵王年少不能早起相随，吕后探听到后，立即派人拿着鸩酒，逼刘如意喝下。天亮以后，惠帝打猎回宫，赵王已气绝身亡。

吕后毒死赵王刘如意后，就毫无顾忌地对其生母戚夫人进行残害。她命人砍去戚夫人手足，挖掉眼珠，灼烂耳朵，又逼她喝了哑药，然后，把她丢进厕所里，称之为"人彘"。过了数天，戚夫人在极度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下惨死。戚夫人还有气时，吕后把惠帝请来观看人彘。惠帝见后，一问才知道是戚夫人，大哭不已，因此而病，一病就是一年多。后来，惠帝派人告诉太后："这事非人所为。臣身为太后子，太后如此残虐，再也无脸治天下了。"从此，惠帝日日饮酒作乐，不再听政。

戚夫人与吕后争宠，争立太子，实际上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吕后费尽心机，终于保住了自己儿子的太子地位，她做了皇太后。然而，她对戚夫人的残酷报复实在是丧失人性，遭到了自己亲生儿子的谴责。惠帝终究软弱，身为天下之主，不忍母后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可以说他是笃于小仁而未识大谊，倘若惠帝英明，即应振作，借此机会夺回实权，施仁治，威德加于海内，亦不致于吕后专制、诸吕乱政！

（程定飞）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留侯世家》

《通鉴纪事本末》:《诸吕之变》

《汉书》:《高后纪》、《高五王传》、《周昌传》

封诸吕

惠帝刘盈在位七年驾崩，满朝文武、后宫群妃恸哭流涕；吕后只是干嚎，毫无悲哀表情。这一小小的细节被侍中张辟强看到。辟强是留侯张良之子，年龄才十五岁，却如同其父一般，智慧过人。他看出了吕后的心事，就对左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这么一个亲生儿子。惠帝驾崩，作为母后哭而不悲，您老知道是什么缘故吗？"老丞相问道："那是何缘故？"辟强答曰："这是因为惠帝英年早逝，又无亲生壮子，太后担心你们这班老臣，无心哭泣啊！您现在如果提议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统率南北诸军，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那么太后就心安了，你们这班老臣也就可以侥幸脱祸了。"于是陈平等人依辟强之计，禀奏太后。吕后果然大为高兴，此后哭悼之声就显得哀痛了。吕氏家族掌权，从此开始。

惠帝张皇后无子，太子是从后宫嫔妃所生子中抱养而立的，惠帝一死，假太子便做了皇帝。原先吕后长女鲁元公主嫁与张敖，其女又做了惠帝的皇后，是亲上加亲。吕后想让张皇后生子，但终不能如愿。于是，吕后命人将宫人之子抱来，由张皇后领养，冒充亲子，并将其生母杀掉。吕后又立吕禄之女为少帝皇后，借此加固吕氏根基。

次年，吕后称制，称高后元年(公元前 187 年)。凡号令皆出于吕后，她实际上行使皇帝的权力。

吕后称制后，就积极准备分封诸吕。她下令朝议封立诸吕之事，以此观察大臣们的态度。问到右丞相王陵时，王陵措辞激烈，坚

决反对。他说："高帝曾刑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封吕氏为王，岂不违背了高帝的心愿？"吕后极不高兴。问到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时，他们回答："高帝定天下，立刘氏子弟为王；今太后称制，立诸吕昆弟为王，无所不可！"听到二人说出这番话，吕后大喜。罢朝后，王陵指责陈平、周勃说："当初与高帝歃血订盟，二位难道不在场？现在惠帝崩殂，太后成了女主，想要立诸吕为王，你们非但不加劝阻，反而顺从其欲，曲意逢迎，违背了誓约，将来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周勃道出了他们的理由："眼下当面抵制、抗廷而争，我们不如您；至于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天下，您恐怕就比不上我们了。"王陵语塞。

吕后对违背其意志的人都要加以惩罚，位高权重的右丞相王陵自不例外。几个月后，吕后借口拜王陵为皇帝太傅，夺了他的相权。太傅职掌辅导皇帝施行政教，位极尊贵；但皇帝已是有名无实，身为太傅又能有何作为？王陵自知得罪了太后，便托病告老归田。吕后任命陈平为右丞相，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审食其自刘邦起兵就跟随吕后，深得吕后信赖。任左丞相后，他不问本职事务，专管宫内诸事，三公九卿所议大事最后多由他决断。

吕后将丞相职位安排停当后，就开始封诸吕，先追尊郦侯吕台的父亲为悼武王，以此作为封诸吕为开端。

吕后封诸吕的第一步是封诸吕为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四月，吕后封高祖的功臣、郎中令冯无择为博城侯——先封异姓为侯，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又封齐王刘肥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并将吕禄之女嫁给他；齐丞相齐寿为平定侯，少府阳成延为梧侯；长女死，赐谥鲁元太后，鲁元太后子张偃封立为鲁王。接着，吕后封吕氏家族：吕种为沛侯，他是吕后次兄建成侯吕释之子；吕平为扶柳侯，他是吕后妹吕媭之子。吕后在封吕氏为侯的同时，还封了另外一个异姓为侯，即南宫侯张买。张买是高祖的骑将张越人之子，后因诸吕事件受牵连被杀。

吕后封诸吕的第二步是封诸吕为王。她还是采用了迂回策略，先封惠帝后宫嫔妃所生的儿子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常山王、刘山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实际上她暗示大臣们提议封立诸吕为王。大臣们会意，只得上书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吕国割自齐国济南郡，都吕都（今山东菏泽一带），吕后立即应允。这时，建成侯吕释死，其嫡长子因罪被废，少子吕禄封为胡陵侯。

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常山王刘不疑死，其弟襄城侯刘山改名刘义，升为常山王。

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吕后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吕媭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侯的女人；另封吕媭子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更始、吕忿都是吕后侄子。

吕台死后，他的儿子吕嘉继位，但因骄恣不法，于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十月被废。吕后另立吕台弟吕产为吕王。然而吕国太小，其地位不能和刘氏子弟所据赵、梁等国相比。吕后很想封吕氏为这些要地之王，但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刘姓诸王。赵王刘友第一个遭殃。

刘友是高祖妃生子，原立为淮阳王，赵王刘如意被害后，他立为赵王。吕后逼刘友立吕氏女为王后，但吕氏王后并非刘友所爱。因此，吕王后就跑到吕后处告状，说赵王说过："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抛弃吕氏不爱，正犯了吕后的大忌，加上有此言语，使得吕后大怒。她立即召赵王进宫，时在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正月。刘友进京后，马上被幽禁在长安的赵王官邸。吕后既不召见他，也不准送饭给他吃，还派了卫士层层看守。有些大臣暗中送了些吃的，都被治了罪，赵王深知大难临头，饿极之中作歌道："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协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吁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没几天，赵王刘友就被活活饿死，死后按民礼葬于乱

坟之中。

同年二月，吕后徙梁王刘恢为赵王，目的是想封吕产为梁王。刘恢徙往赵国后，心怀不乐。吕后强立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擅权，所用官员皆是诸吕，刘恢同样失去人身自由。他有一个爱姬，被王后鸩杀。于是，他作歌四章，让乐工谱曲歌唱，其曲哀婉缠绵。听后，刘恢心里十分悲愤，六月，自杀。吕后知道后，骂他为了女人而背弃祖庙，便废除了其后人的王位继承权。

吕后欲立吕产为梁王，一时又不好开口，她希望大臣们能主动提出来。这时齐国一位说客帮了她大忙。

齐人田生在吕后执政时想外出游说，可苦于没有钱财，便借献策之机求助于营陵侯刘泽，刘泽给了他二百金。田生大喜过望，拿着金子返回齐国。第二年，他来到长安，租了一处豪华大宅。田生先让儿子结交侍奉吕后备受恩宠的宦官张卿。不久，张卿拜访“田府”。“田府”装饰豪华，室内张挂罗帷绫帐，又陈列着高级器具，其规格如同列侯。张卿一看，吃惊不小。酒酣时，田生屏退左右，对张卿说：“臣观察了百余所诸侯王宅邸，都归高祖时的功臣所有。如今吕氏，曾辅佐高祖取天下，向来忠心耿耿，她的功劳最大，又有太后之尊。太后年事已高，诸吕力量太弱，，她老人家打算立吕产为王，统辖梁国，可又不便开口，怕大臣们不同意。现在，你最为得宠，也为群臣敬重，何不私劝群臣同意封诸吕为王，然后禀奏太后呢？这样一来，太后必定高兴。要是诸吕为王，你老兄也少不了一份万户侯。你身为内臣，太后想要的东西，不赶快去办，恐怕祸将临头了。”张卿很赞同这个建议，就逐个私劝群臣。太后上朝，群臣就提议封吕产为梁王。这样吕产顺利地做了梁王，可他并没有去封国，而是留在都城做了皇帝太傅，成为吕后的得力助手。

吕后如愿以偿，赏了张卿千金。张卿送一半给田生，他不要，乘机对张卿说：“吕产封了王，大臣没有不服。如今营陵侯刘泽是刘氏宗族，又任大将，只有他会因未得封王而失望。你去劝说太后，划出

十几个县来，封他为王，他得了王号，就会高兴而去，如此吕氏地位就更加巩固了。”吕氏封诸吕，最担心的就是大将军刘泽。他是高祖的堂兄弟，汉初位居郎中，后因军功封为营陵侯，长期掌握着军权。吕后怕他在自己百年之后加害于吕氏诸王，听了张卿的建议，觉得有理，就封他为琅邪王。田生见刘泽封了王，就劝他火速起程去封国。一出函谷关，吕后就派人追赶，想铲除后患。但刘泽、田生一行已经走远，很快就到了琅邪国(都今山东诸城县)。

吕后封了吕产为梁王，还想封吕禄为代王。这年秋天，她派使者到代地，要迁代王刘恒为赵王。刘恒识破其意图，谢绝就赵，愿守代地(都今河北蔚县东南)边疆。吕后无奈，只好将目标放在赵国上。

这时，太傅吕产、右丞相陈平为了迎合吕后之意，上言说：武信侯吕禄(原为胡陵侯，后改封)乃上乘侯爵，位居侯爵第一，请立为赵王。吕后欣然相许，另追尊吕禄父吕释为赵昭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十月，吕后封立吕台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吕通弟吕庄为东平侯。原燕王刘建于高后七年(公元前 181 年)九月死，他只有美人所生子。吕后派人将他的庶子一一杀掉，这样，他无后人承继，封国被除。

吕后在病中仍不忘吕氏一族，她考虑到外孙、鲁王张偃年少，又早丧双亲，孤弱无助，就封张敖前姬两子张侈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以辅佐张偃，同时还封了吕荣为祝兹侯。至此，吕后分封诸吕完毕。

吕后封诸吕、废诸刘，目的在于以吕氏天下取代刘氏天下。其手段与当初高祖铲诸姓、立刘氏子弟如出一辙。可叹高祖未早防范，导致吕氏专权，刘氏子弟遭殃。

(程定飞)

参考资料：

《史记》:《吕太后本纪》、《荆燕世家》、《陈丞相世家》、《刘敬叔孙通列传》

《通鉴纪事本末》:《诸吕之变》

《汉书》:《高后纪》、《高五王传》、《王陵传》、《周勃传》、《周昌传》

诸吕之乱

吕氏家族是吕后一手扶植起来的。吕后深知，分封诸吕为王侯不仅引起刘氏子弟的不满，就连朝廷大臣也非常不服，只是迫于她的威势，这些人敢怒而不敢言；她死后，势单力薄的吕族肯定会受到刘氏子弟与朝臣的联合攻击。因此，在晚年，她设法让吕氏掌握了兵权，任命吕禄为上将军，统率北军；吕产为太傅兼将军，掌管南军。南、北二军在汉初即已成立，由全国挑选的精锐兵卒组成，驻守京师。南军负责守卫皇宫，北军负责守卫都城长安，它们都称为京师之兵。吕后病危之中，遗嘱吕产、吕禄："高祖平定天下后，曾与大臣们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如今吕家的人封了王，大臣们心中自然不平。我行将就木，而皇帝年少，臣下很可能要变乱。你们一定要牢牢掌握住兵权，守卫好皇宫；千万不要为我送葬，以免受制于人。"吕后死，吕产兼任相国，而吕禄女则被立为皇后。

诸吕用事擅权，担心群臣不服，就想铲除异己，但由于有陈平、周勃、灌婴这些老臣在，他们不敢动手。老丞相陈平心患诸吕，叹力不能制，恐怕祸事临头，故常常在家考虑对策，陷人深深的苦恼之中。一次，陆贾前去拜访，问他有什么苦恼。陈平说："陆生为我揣摩揣摩。"陆贾说："足下已极富贵，无所侈欲，然而心怀忧念，不过是忧患诸吕、少主罢了。"陈平说："不错，又有何办法呢？"陆贾分析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臣常想告诉太尉绛侯（周勃），绛侯与我戏言，不重视

我的话。君何不与太尉深相交结?”陆贾还为陈平策划了几条对付吕氏的计谋,陈平点头称是。不久,陈平用陆贾之计,送了大量金玉宝石为绛侯周勃祝寿,周勃也报之厚礼。从此两人携手,深相附结,吕氏力量就显得弱多了。

朱虚侯刘章办事果断,在高祖刘邦孙辈当中算是有魄力的一位。吕后封他为侯时,强迫他娶了吕禄之女为妻,他显得很满意,常常从妻子身上了解吕氏的动态。现在,刘章又从妻子口中探出了诸吕变乱之谋。为了避免刘氏子弟再度受到诛杀,刘章得知消息后,立即秘密派人飞驰齐国,通报了他的长兄齐王刘襄,劝他调兵西进,杀掉诸吕而自立;自己则坐镇长安,发动大臣以内应。

齐王刘襄接报后,便与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紧急密商,暗地部署发兵事宜。齐相召平闻知,坚决反对出兵。刘襄派人找召平,召平没有去,起兵包围了王宫。魏勃假装与他合作,骗他说:“齐国要想用兵,没有大汉朝廷的虎符合配还是不行。您发兵包围王宫,保护齐王,当然是好事。您还有其他事要办,不如让我来替您统兵护卫齐王吧。”召平起兵并非反齐,只想看住齐王,不让他领兵攻长安,以免引起大乱。他听魏勃一说,信以为真,就让魏勃统兵。魏勃当即撤去对王宫的包围,掉头包围了相府。召平叹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自杀了。齐王刘襄清除了障碍,任命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调集了国内所有军队,整装待发。为了增加实力,刘襄派祝午去琅邪(治今山东诸城县一带)与琅邪王刘泽联络。刘泽本来就痛恨诸吕当权,但自己已老,兵力又弱,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祝午到琅邪后,对刘泽说:“吕氏作乱,齐王计划西去救难,诛杀吕氏。齐王自认晚辈,年纪小,又不谙熟军事,愿意把齐国托付给大王。大王自高帝起即为将军,通晓兵法,惯于作战。如今齐王不敢离开军队,派我请大王赴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面商,并请您统率齐兵西进,讨平关中之乱。”刘泽毫不犹豫,立即驰奔临淄。一到临淄,刘襄就把他软禁起来,又命祝午赴琅邪,调发了

刘泽的兵力。

刘泽被欺骗，无法返回，便劝诱齐王说："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长子，溯其本源，大王就是高帝嫡长孙，应当继位。如今大臣们还在徘徊不定，不知立谁为帝。而我在刘氏家族中最为年长，大臣们必定要等待我参与决策。现在，我留这里已无益处，不如派我入京，与大臣们商议迎立大王事宜。"刘襄已夺了他的军队，就放了他。但后来在确立新帝的争论中，刘泽说了反对齐王的话，使他帝梦破灭。

刘襄部署停当，随即发兵西进。为了得到其他诸侯的支持，他发出了讨吕檄文，称："高帝平定天下后，封立刘姓子弟为王。悼惠王为齐王，悼惠王薨，孝惠帝派留侯张良使齐，立臣为齐王。孝惠帝崩，高后称制。她年纪已大，听从诸吕擅自废帝更立，又连着杀掉三个赵王，灭梁、赵、燕而封诸吕为王，分齐为四。忠臣进谏，太后惑乱不听。今太后崩，皇帝年少，尚不能治理天下，只得依靠大臣、诸侯。然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权，以强己势，劫持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刘氏宗庙因此而危。今寡人率兵入京，就要诛灭不当为王者！"

吕产等人得知齐王刘襄用兵，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面派遣颍阴侯灌婴前往讨伐，一面调集军队守卫皇宫，同时还加强了长安城的守备力量。这时不仅吕氏家族绝大多数人都在长安，少帝及其名义上的弟弟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以及鲁王张偃也都留在京都，这些封王因年少而没有去自己的封国。形势对吕氏极为不利，他们内怕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及其他元老大臣，外惧齐、楚之兵，同时还要提防灌婴倒戈一击。

灌婴原是高祖手下的大将，他并不满意诸吕专权，领兵阻击齐王刘襄是迫不得已。他率兵进至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时，寻思道："诸吕在关中掌握兵权，意在消灭刘氏而自立。今天我若是破了齐兵，还军京师，岂不给吕氏增添了资本。"于是他不再前进，留屯

荥阳，又派人告谕齐王及其他诸侯，愿与他们联合，静待吕氏变乱，然后一举诛灭。刘襄接到灌婴将军的约书，就把军队撤到齐国西部边境上，等待机会。

绛侯周勃见吕氏要变乱也行动起来。他是高祖的老臣，曾随高祖转战东西南北，功劳卓著。惠帝六年(公元前 189 年)，汉置太尉官，即以周勃为首任，掌握兵权。吕氏秉握权柄，周勃的权力受削，不能到军中执掌用兵大印。周勃首先要做的就是夺回兵权，尤其是南、北二军。他想到了曲周侯郦商。郦商也曾是高祖的重要将领，是谋士郦食其之弟。高祖起兵后，他率四千人归附，后因功封为曲周侯，任右丞相，故在朝廷中威望很高。郦商自己已年老多病，但他儿子郦寄与吕禄关系很密切。周勃便与陈平谋划，让郦寄前往吕禄处骗出兵权。郦寄受命前往，对吕禄说："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封立的有九王，吕氏所立的有三王，都是大臣商议的结果，事情已布告诸侯，诸侯也都认为合适。现在太后已崩，皇帝年少，而足下佩起王印，不急着回封国守护，反而仍然担任上将军，统兵留在京师，这就会被大臣、诸侯怀疑了。足下何不归还将印，将军队交给太尉掌握？再请梁王交回相国印，然后与大臣们盟誓而去自己的封国。如此，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就可高枕无忧而做方圆千里的国王了。这是万世之利啊！"吕禄受到齐王等人的威胁，很赞同郦寄的建议，准备交出将印，将兵权交与周勃，但他自己不敢作主。后来，吕禄告诉了吕产及其他吕氏长老，他们意见不一，一时难定。但是，吕禄还很信任郦寄，时常与之游猎。

一天，吕禄拜望其姑吕媭，告诉他交印让兵之事。吕媭大怒说："如果你作为将军而放弃统军之权，吕氏将无处藏身！"吕媭还将珠玉宝器摔到堂下，说："我何必再为他人守着这些东西！"意思是，吕氏不久就将遭殃了。这样，兵权还掌握在吕产、吕禄手里。

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九月十日，平阳侯曹窋作为代理御史大夫与相国吕产议事，郎中令贾寿急匆匆地走进来，对吕产说：

"大王不早去封国，现在想走，还能来得及吗？"贾寿刚出使齐国回来，就把灌婴与齐、楚合纵，打算诛灭吕氏的经过详述了一遍，说完，就催吕产急奔宫中。平阳侯曹窋听到一些话，看出形势不妙，立即飞马驰告陈平、周勃。周勃急奔北军营，却不得入内，他就令掌管符节的襄平侯纪通矫命北军迎纳。周勃进入北军后，又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服吕禄："皇帝已命令太尉统率北军，要求足下去封国。足下赶快交出将印，否则，大祸将至。"吕禄觉得郦寄不会骗他，就解下将印交给典客刘揭，将兵权拱手让给了周勃。周勃携印在北军大喊："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拥护刘氏的袒露左臂。"军中都袒露了左臂，表示拥护刘氏，愿听从太尉调遣。

夺了北军，尚有吕产控制的南军。丞相陈平接到曹窋密报。急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太尉。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曹窋告卫尉："不要让相国吕产进入殿门。"吕产这时还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吕禄已交出北军，仍想进入未央宫作乱，但已进不了殿门，只好在门前来回走动。曹窋担心控制不住，就驰告周勃。周勃也怕不能取胜，就没有公开声明要杀吕产，而是拨了一千精兵给刘章，对他说："急入宫中，保卫皇上。"刘章带兵进入未央宫，见吕产已在宫中，就采取行动。吕产见势不妙，赶紧就逃，很快被刘章追上，刘章当即杀了他。

刘章击杀吕产后，少帝命人持节慰劳他。他想夺下节信，谒者不肯，就跟着谒者同车行进，借着谒者所持的节信畅通无阻，乘机斩了长乐卫尉吕更始。回到北军见太尉，周勃兴奋地对他说："我们所患的就是吕产，今已被杀，天下就可安定了。"周勃又派人将吕氏男女全部逮捕，不管老少，一律处斩。第二天，吕禄被捕获，旋即处斩；吕媭被处笞刑而死。接着，燕王吕通被杀，鲁王张偃被废。

诛灭诸吕，太尉周勃等人便派遣朱虚侯刘章通告齐王刘襄等人。刘襄本想借讨伐诸吕之机，夺取帝位，不料诸吕尚未来得及变乱就被周勃、陈平等老臣智取，他只好罢兵。灌婴也从荥阳撤军而

归。这样，一场势在必发的战争被化解了。

（程定飞）

参考资料：

《史记》：《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齐悼惠王世家》

《汉书》：《高后纪》、《周勃传》、《陈平传》、《陆贾传》

《通鉴纪事本末》：《诸吕之变》

迎立代王刘恒

代，古国名，战国时属赵国，秦置代郡，辖今山西大同市以东、河北张家口市以西地区，治在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陈胜起义后，陈馀拥立赵王歇，赵王歇即命陈馀为代王，后汉高祖刘邦命令张耳、韩信攻赵，斩赵王歇、代王陈馀。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匈奴骑兵进攻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降匈奴叛汉。高祖亲自带兵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遭围。突围后，他留樊哙领兵平定代地，封兄刘仲为代王。第二年，代地再度受匈奴骑兵攻击，刘仲不能守，弃国而逃，被取消代王封号，改封为合阳侯。高祖十年（公元前 197 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在代地反叛，自称代王。次年，陈豨叛乱平定，高祖划出赵国常山（今河北恒山）以北地区归代国，立子刘恒为代王，定都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

刘恒是薄夫人所生，排行第四。高祖刘邦有八个儿子，在他驾崩前，其子封爵如下：太子刘盈、齐王刘肥、赵王刘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高祖驾崩后，吕后首先害死赵王刘如意。惠帝死，吕后称制，又先后将赵王刘友（原淮阳王）饿死、赵王刘恢（原梁王）逼死，而封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高后七年（公元前 181 年）秋，吕后曾派使者到代国，想将代王刘恒徙封赵王。刘恒考虑到赵国距京城较近，最容易受控制，相反，代国处于边疆，吕氏鞭长莫及，要比赵国安全得多；同时，他也知道吕后徙他为赵王是假，除掉他是真，所以坚决拒绝，

表示愿意为国长守边疆。刘恒幸免遇害。

惠帝死后，吕后即着手变刘氏天下为吕氏天下，汉室政权完全由吕后及其族人操纵，虽立有皇帝，却都年幼无知，而且易遭杀害。吕后先立惠帝的“太子”为帝，但他并非皇后所生，惠帝皇后是宣平侯张敖的女儿，无子，在吕后安排下，她假装有身孕的样子，等宫中有个美人生了儿子，就抱了过来，立为太子，同时杀了那位美人。太子继位为帝，稍大一些时候听说生母已死，而自己不是皇后所生，就说：“太后怎么能杀掉我的生母而称我是别人的儿子？我长大后，一定要报仇。”这话传到吕后的耳朵里，她很不安。为了消除隐患，就把这个小皇帝囚禁在永巷中，不久就将他折磨致死。此后，吕后立常山王刘义为帝，更名为弘。他也是惠帝后宫美人所生，年龄比前少帝更小。

吕后死，诸吕擅权，齐王刘襄起兵，准备扫除诸吕，重建刘氏天下。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等人联袂设计制服了吕氏之乱，斩杀了吕产、吕禄及所有的吕氏男女老幼，并劝退了齐兵。

扫除了诸吕，重立皇帝成了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周勃、陈平等老臣在一起密谋，认为：“少帝及淮阳王、常山王都不是惠帝的真儿子，吕后以计诈名他人之子，杀其生母，养于后宫，冒充张皇后所生；后来，又将他们立为皇帝及诸王，借以扩充吕氏力量。现在已夷平诸吕，如果让他们留下来，等他们长大当权时，我们这些人恐怕就要亡种灭族了。不如趁现在大好时机，选择一位最有贤德的诸侯王为帝。”有人提议：“齐悼惠王是高帝的长子，现在他的嫡子为齐王。从血缘关系来推，现在的齐王刘襄算是皇帝的嫡长孙，可以立为皇帝。”这时，上过刘襄一当的刘氏元老刘泽说话了：“吕氏就是仗着外戚的身份作恶的，他们害尽了功臣名将，差点毁了刘氏的天下。如今齐王的舅舅驷钧也是一个大恶人，要是立了齐王为帝，那就等于又出了一个吕家。”群臣都觉得此话很有道理，因而就把齐王刘襄搁在一边。有人想到淮南王刘长，但又觉得他年纪轻，不够

老成,其外祖母家也很不善。众人最后商定:"代王现在是高帝最大的儿子,为人仁爱、孝顺,又宽容厚道。太后薄夫人家为人谨慎、善良。再说,立长为帝本来就名正言顺,加上代王本人以仁义而闻名天下,立他最为合适。"陈平、周勃等人定下立代王刘恒后,便秘密派人火速赶赴代国,迎接新帝。

代王刘恒接报,十分意外,又怕其中有诈,不敢定夺,就问左右大臣及郎中令张武。张武等人议论说:"现在的朝廷大臣都是高帝时的大将,不仅善于用兵,还惯于使用诈谋。看来他们并非做了大臣就满足,只不过原先畏惧高帝与高后的威势罢了。如今,他们刚刚诛灭诸吕,血洗京城,口头上是迎接代王去,其实心里所想的并不那么简单。代王千万不可轻信,可先托病不去,以观事态的变化。"中尉宋昌进言说:"群臣之言差矣。秦末朝政腐败之时,各地诸侯、豪杰并起。当时自以为能得天下的人数以万计,然而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只有高祖一人。现在天下豪杰已断了做皇帝的念头,这是其一。其二,高帝封刘姓子弟为王,其封地犬牙交错,相互制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坚如磐石的宗族体系,刘氏势力的强大,已被天下所信服。其三,汉朝建立以来,废除了秦朝的苛政,制订了新的法令,对人民施行恩惠,使百姓安份守己,民心已难以动摇。再说,吕后凭自己的威势在诸吕中立了三个王,后来他们把持政权,独断专行,然而,周太尉仅凭一支假符就进入北军,一声召唤,将士们无一不袒露左臂,表示效忠刘氏,背弃诸吕,最后吕氏被扫除。这完全是天意所授,现在即使大臣们想作乱,百姓也不会为之所用,其党羽又怎么会死心踏地?刘氏势力,内仍有朱虚侯、东牟侯;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各诸侯国。而今高祖的子辈当中只剩下代王与淮南王,况且代王年又居长,更以贤德圣明、仁爱孝顺而闻于天下,故朝廷大臣顺应天下民心,迎立代王,希望代王不要有什么疑虑。"刘恒对这番话点头称是,但并没有决定去留。他禀告了薄太后,薄太后也要他慎重考虑,故仍然迟疑不决。

为了探明天意，刘恒命人占卜，以占卜的结果来决定去不去长安。结果，卜兆是一大条横向裂纹。卜辞是："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生命多么坚强，我将成天王，像夏启一样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刘恒对问卜者说："我已经是王了，还当什么王？"问卜者回答："卜辞所说的天王，就是天子。"刘恒这才有点相信，派了其舅薄昭到京城会见周勃等人。周勃详细地向薄昭说明了迎立代王之意。薄昭很满意，回代对刘恒说："完全可以信任他们。"刘恒大为高兴，笑着对宋昌说："果真不出你所料！"随即让宋昌坐在自己的车子上，张武等六人乘坐传车，一同起程，奔赴长安。

刘恒一行行至高祖陵墓时，停了下来，由宋昌换乘快车去长安观察动静。宋昌车到渭桥（今陕西西安市近郊），丞相以下的官员都已恭候多时了。他旋即返回，禀报代王。代王刘恒完全放下心来，马上也改乘快车，精神抖擞地来到渭桥边。群臣一见代王，立即跪下行拜见之礼。刘恒下车，向群臣答谢。

太尉周勃快步向前，对代王说："臣想单独对代王进言。"宋昌不满地说："如果是公事，不妨公开说；如果是私事，代王是不会接受的。"周勃二话没说，跪着向代王呈上大汉皇帝的玉玺及符节。刘恒不便当场接受，说："到了代邸再商量吧。"于是群臣簇拥着代王驱车前往代王邸。

到了代王邸，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一齐上前向代王拜了两拜，高声说道："刘弘不是孝惠帝的儿子，没有资格再做皇帝。我们特与阴安侯、顷王后、琅邪王以及宗室、大臣、列侯并食封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商议，一致认为代王如今是高皇帝的长子，最适合做高帝的继承人。恳请代王不要推辞，尽早登天子之位。"刘恒谦逊地说："侍奉高帝祠庙是件大事，我何德何能，怎堪此重任。希望大家再推一个合适的人。我实在不敢当。"群臣急了，都伏在地上不肯起来，恳求再三，刘恒西向而坐，推让数回。群臣上前，硬扶

他面南背北。陈平说："我等慎重考虑，代王侍奉高祖祠庙最为合适，天下诸侯及百姓也会这样认为。我等为社稷及刘氏宗庙计，决不敢有半点草率。还请代王接受大家的心愿！"说着，再次奉上玉玺和符节。刘恒不便推辞，就接过皇帝的玉玺并符节。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

刘恒做了皇帝时，少帝刘弘仍在宫里，群臣施行的是先立而后废的策略，避免了帝位之争，避免了刘氏子弟间的残杀。齐王刘襄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对刘恒说："诛诸吕，我无功。今请为皇上清宫室。"他就和太仆、汝阴侯滕公（夏侯婴）一起赶到未央宫，上前对少帝刘弘说："足下非刘氏，不当立。"说着，又命令少帝左右卫兵放下武器撤离。有几个卫兵不肯，刘兴居就逼宦官张泽下令，使卫兵全部就范。滕公随即将少帝载出皇宫。少帝在车上问："想把我送到哪里去？"滕公说："出宫就舍。"后载至少府邸，他们另派人到代邸通报刘恒，说："宫内已被清除。"一宫不能二主，清除宫内，实际上就是清除刘弘。

将少帝刘弘赶出宫后，群臣就为新任天子刘恒准备好皇冠、龙袍以及御车等必备之物。当晚，刘恒就在群臣的保护下进入未央宫。这时，端门还有十名持戟仪卫没有撤走。他们对刘恒等人说："天子在内，足下为什么要进入？"刘恒问太尉周勃是怎么回事，周勃说："他们并不知道陛下就是天子。"他上前对他们说明了情况，那些仪卫就放下武器撤走了。

刘恒进入大殿，登上天子宝座，当即召集群臣，连夜听政。也就在这天晚上，淮阳王、常山王及少帝等人被诛灭于各自的官邸。

为臣者，力保贤君；为君者，务求忠臣。高祖靠萧何、曹参、张良等谋臣，又有韩信、英布、彭越等良将，历尽挫折，夺取天下。得天下后，这些良将纷纷由功臣而成为叛逆之徒，最终遭杀身之祸；萧何、曹参等人也是不敢有所作为，兢兢业业，以身家性命为重。及至吕后称制、诸吕擅权，刘氏子弟多有所害，老臣、旧将如陈平、周勃等

人更是心安不得。吕后死，他们便联手合作，扶正固本，竭力推举贤明仁厚又无外戚背景的刘恒为帝。刘恒为帝后，全靠群臣辅佐，施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从此，天下得安，君臣无事。

（程定飞）

参考资料：

《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

《汉书》：《文帝纪》、《周勃传》、《郦商传》、《灌婴传》

《通鉴纪事本末》：《诸吕之变》

萧规曹随

萧何、曹参是汉初著名的两位丞相。

萧何，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通晓刑法律令，曾为沛县（今江苏沛县）县吏。陈胜起义后，他与曹参等人拥立刘邦为沛公。刘邦起兵后萧何常常随后督办军务，他办事认真，凡事都做得井井有条。刘邦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建议刘邦“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敬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避免了乱杀，稳定了关中局势。当时，诸将争先恐后地奔向秦朝府库，掠取珠宝财物，唯独萧何首先入秦宫，收取秦丞相府、御史府中的律令文书、山川图册、户籍簿等文献档案，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及当时的社会情况。

刘邦率军东进，出击三秦，萧何作为丞相，留守汉中（今陕西汉中市），取赋巴、蜀（今四川、湖北部分地区），保障军需。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刘邦转战关东地区，萧何坐镇栎阳（今陕西潼关县东北），管理后方户籍人口，征收粮饷并及时补给军队。他还多次征发关中壮勇，送往前线。刘邦在灵璧睢水（今属安徽）大败于楚军，几乎全军覆没；萧何从后方送来了一批新兵以及粮草、装备，汉军才得以重振旗鼓。萧何在置办军需后勤之余，制定了法令、规章，并建立了宗庙、社稷、宫室体系及各级行政机构。他所做的一切，总是能得到汉王的同意。

刘邦对他的才能十分赏识。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总结了汉家取胜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拥有萧何。刘邦说：“镇国家，抚百姓，

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论功行赏，萧何功劳最大，封为酂侯，位居列侯第一。

尽管得到刘邦的赏识，尽管对刘氏定天下的贡献最大，但萧何作为臣下，不敢有丝毫贪功自傲，行事十分小心谨慎。因为他早年即跟随刘邦，对刘邦的为人非常了解。刘邦做了皇帝后，萧何不仅要处处遵从皇上的旨意，还要顺从吕后的安排，稍有疏忽即会引起大祸。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萧何向吕后献计，诱杀了他最钦佩的、亲自向刘邦举荐的大将淮阴侯韩信。刘邦从进剿陈豨叛军的前线回来后，听说心腹之患已被铲除，就派人拜望萧何，将他由丞相升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派五百名士卒、一名都尉作为相国卫队。同僚前来祝贺，他毫无得意之色；相反，他接受谋士召平的建议，不但辞谢封赏，还将自己的全部资产献出，充作军费。他要向刘邦表示：自己毫无野心。

萧何患病时，惠帝刘盈前来探望，问及相国的接班人问题：“相国百岁之后，谁可接替？”萧何回答：“了解臣下的人莫过于陛下。”惠帝说：“曹参如何？”萧何回答说：“陛下已得到最好的人选，我死而无憾了。”

曹参与萧何一样，原都是沛县(今江苏沛县)豪吏，同时追随刘邦。起初二人关系很好，后来一人做了将军，一人做了丞相，关系渐渐疏远，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相知相识。

曹参文武全才，先做了将军，后做了丞相。灭秦、击楚以及平定叛军，他披坚执锐，取得赫赫战功，计攻占两个诸侯国、一百二十二县；俘二诸侯王、三个诸侯相、六个将军，另大莫敖、郡守、司马、军侯、御史各一人。刘邦论功行赏，他功居第二。

韩信被诛杀后，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曹参出任齐国相国。

惠帝继位后，废除了诸侯国设置相国制度，改任曹参为齐国丞相。做了齐相就要统管齐国七十余城邑。时天下初定，齐王刘肥又年轻，所有的大事都由曹参作主。曹参把齐国素有名望的长老、读

书之人全部召来，询问他们治国安民之策。这些数以百计的齐国儒生吞吞吐吐，众说不一，曹参也决定不了用哪一种治国方式。后来，他听说胶西郡(治今山东高密县东南)有位盖公，精研黄老学说，就派人持厚礼请进相府。盖公对他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贵在清静无为，清静无为，百姓必然自行安定。"曹参对盖公的话很感兴趣，于是，让出正堂，请盖公住在里面。从此，曹参就以黄老学说作为治理齐国的纲领。

曹参做了九年齐相，齐民安居乐业，都称赞他是贤相。汉初因受长期战争的影响，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采用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办法，给百姓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对汉初的人口及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好处。

惠帝二年(公元前 193 年)，萧何死。曹参闻讯，便告诉左右赶快打点行装，说："我将要做朝廷的相国了。"不久，朝廷果然来了使者，召他回京。

曹参在离开齐国之前，仍不忘他的无为之治。他对新任齐相说："你首先要做的事是把齐国的狱市变成奸人的寄寓场所。对于狱市这样的地方，要持谨慎态度，不要随意去扰乱。"他的意思是不行峻法、不施严刑、不使奸人因无处容身而作乱。新任的丞相问他："治理国家就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曹参说："狱市是善恶兼容的所在。如果你以严刑惩治奸人，奸人无处容身，也就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我常把这类事放在治国的首位。"

曹参的无为之治术，在继任相国后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他选择郡县官吏中质朴而不善文辞的忠厚长者做相国府的属吏，官吏中凡能言善辩者、苛求深究者、追求声誉者，总是被他撵走，而他自己则日夜痛饮醇郁的美酒。卿大夫以下官吏乃至宾客，见曹参不理政事，就登门拜访，欲进言劝告，这些人一到，曹参就拿出好酒，让他们大饮，他们想开口，曹参就催着喝酒，这些说客往往喝得大醉离去，无人能有机会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曹参的住宅后园靠近小吏的房舍。小吏们整天饮酒，欢呼歌唱。曹参的下属常常感到很不耐烦，却对他们管不着。下属们就请相国在后园中游赏，希望他来弹压。哪知曹相国听了小吏们的高歌、喊叫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叫属下拿来桌椅，摆开酒菜，也大饮起来，同时放声高歌，大声呐喊，呼应小吏。

在相国府中，曹参见到官吏有过失，从不渲染、指责。相反，他总是设法加以隐瞒、遮掩。所以，在他任期，相国府相安无事。

萧何在世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主要有：《九章律》，这是萧何以秦朝《六律》为蓝本，增加《户律》、《擅律》、《厩律》，合为九章；赋税制度，包括田赋、口赋、献费三种；徭役制度，有正卒、戍卒、更卒三种。至于其他杂项制度，更是不胜枚举。面对萧何定下的各种成规，曹参不加丝毫变动，奉行如一。在他出任相国的三年内，没有任何建议或措施提出。

汉惠帝对曹参不积极参预政事感到很奇怪，心生疑窦："莫不是轻视我吧？"于是，他找来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对他说："你回家时，试着问问令尊：'高帝刚刚离别群臣而去，当今皇上又很年轻。您身为相国，每天饮酒不止，从不向皇上上书言事，凭什么来考虑天下大事呀？'"曹窋回家后，就把惠帝的话以自己的口气说出来，规劝老父。曹参一听大怒，鞭笞曹窋二百下，训斥道："还不赶快进宫侍奉皇上，天下大事由不得你来问。"次日上朝时，惠帝责怪曹参说："为何要惩罚中大夫？那些话都是他替我劝诫你的。"曹参赶忙脱冠谢罪，说道："陛下圣明英武，然而比之高帝何如？"曹参紧接着说："依陛下看，臣与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君似乎比不上他。"曹参说："陛下所言极是。况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制度已非常明确。今天，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参等谨守职位，遵而勿失，不也是很好吗？"惠帝无言以对。《法言·渊骞》载："或问萧曹。曰：'萧也规，曹也随。'"这就是人们对曹参推崇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的总结。

争天下，取有为；得天下，取无为。这是汉高祖刘邦及其后继者对待臣下的真实心态。萧规曹随，亦即无为而治，它作为治国纲领而在汉初被最高统治者采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程定飞）

参考资料：

《史记》：《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齐悼惠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

《汉书》：《萧何曹参传》

南越称藩

我国古代的越族分布很广。在今浙江、福建一带的越族称为东越，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越族叫南越。汉族和越族之间很早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彼此友好相处，相互贸易。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越族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南越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等三个郡，并从内地迁徙人口与越人杂居。秦末农民起义时，南海尉任嚣正病重，他把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赵佗找来，对赵佗说："听说陈胜等人造反了，许多豪杰也都叛秦自立为王，南海虽偏僻，恐怕叛军也要骚扰到此，我想派兵断绝人越的各交通要道，坚守南海，以静观事态的发展。遗憾的是，我现在的病情加重。我想，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势易守难攻，南越之地南北东西数千里，又有中原人在此辅佐治理，完全可以自立为国。因郡中没有可与议大事者，所以才找你商量此事，希望你能担任此重任。"任嚣诈作诏书，把职位让给了赵佗。

任嚣死后，赵佗即起兵反叛，尽杀秦所置长吏，攻取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刘邦称帝后，感到天下刚刚平定，军队已很疲惫，需要休整，实在是无力征伐南越，于是对南越采取了羁縻政策。高帝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刘邦封赵佗为南越王，并派陆贾出使南越。

陆贾到南越后，赵佗见他时非常傲慢无礼，陆贾对他说："你是一个中原人，你家族的墓地也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现在你违反

天性，放弃中原的冠带，想以小小的南越与汉天子抗衡，恐怕你要大祸临头了。想当初秦失德政，诸侯豪杰并起，但只有汉王刘邦先人关，占据了咸阳。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臣服他，可说是最强大的了，然而汉王从巴、蜀起兵，横扫天下，最终消灭了项羽，五年之间，平定了海内，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天意啊！天子听说你在南越称王，但不去协助天下人诛罚暴逆，本要派兵来讨伐你，但考虑到天下百姓刚刚遭受了一场苦难，就打消了讨伐念头，而是派我来授你王印，剖符通使，你本应郊迎，北面称臣才对，然而却凭借这未开化的越地，如此地强横，天子若听说了，一定要掘烧你先人的坟墓，诛杀你的全族，派一偏将率十万军队伐越，那么越人很可能杀了你投降汉朝。”赵佗听了这番话，向陆贾道歉说：“我是在蛮夷之地呆得时间太长了，故有失礼仪。”他又问陆贾：“你看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更贤明呢？”陆贾说：“似乎是你更贤明一些。”赵佗又问：“我与皇帝比哪个更贤明呢？”陆贾说：“当今皇帝继承了五帝、三皇的事业治理中国，中国的人口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出一家，这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而你这里人口不过数十万，还都是蛮夷，土地也都是些荒山野岭，只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郡罢了，怎能与汉相比呢！”赵佗笑道：“因为我不是在中国起家，所以才在此称王，如果我一直在中国，怎见得功业不如汉呢？”

赵佗把陆贾留了下来，整天饮酒谈笑，相处了数月之久。赵佗说：“越国中没人值得跟他聊，你来了，才使我听了些不曾听到的事。”

最后，陆贾终于使赵佗折服，对汉称臣，受封为南越王。陆贾回报后，刘邦大悦，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

吕雉执政时，下令禁止卖铁农具给南越，马、牛、羊要卖，也只能卖雄性的，不能卖雌性的。赵佗对此非常愤怒，认为这是长沙王刘发想要兼并南越的阴谋，由此与汉闹翻。吕后五年（公元前183

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并发兵攻打长沙国，攻取数县后还兵。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南越再次攻打长沙国，汉派兵反击，正赶上暑疫，汉兵损耗很大。一年后，吕后去世，文帝继位，即命撤军。赵佗挟此兵威并加以财物方面的好处，使闽越、西瓯等国臣服，控制了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区，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汉文帝因刚刚继位，武力讨伐南越也力不从心，继续采取高祖时奉行的怀柔政策：先是为赵氏家族在真定的坟墓设置守邑，年年供奉，按时祭祀，并召赵佗的堂兄弟做官，赏赐大量的财物；随后，又派陆贾出使南越，给赵佗带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前些日子你曾给隆虑侯将军一封信，提出求访你在故乡的兄弟，罢免带兵攻打南越的两位长沙国将军，以此作为臣服的条件。为此，我已罢免了博阳侯将军，你在真定的兄弟，我已派人去慰问，并修好了赵氏家族的陵墓。前几天听说你在汉边疆地区挑起战端，涂炭生灵，长沙国因此遭受了很大的灾难。在此情况下，汉军只有为保卫边疆而战斗了，这难道对你南越就有利了吧？实际上，这样一来，一定会损失大量的士卒，造成许多优秀将官的伤亡，出现众多的寡妇、孤儿。这种得一失十的事，我是不忍心做的。我本想解决长沙国与南越的土地犬牙交错的问题，问底下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底下人说这是高皇帝想要隔开长沙国的缘故，因此，我就不好再改变这种状况了。现在我得到你的一点地也不足以使我更强大，得到你的一点财物也不足以使我更富有，你现在管辖的土地可仍由你治理。不过，你现在的称号是帝，两帝并立，必有一争，争而不让，仁者不为。因此，我愿与你捐弃前嫌，今后像以前那样通使往来。现派陆贾前去告诉你我的意思，你一定不要再为寇作乱了。"

赵佗看了信非常惊恐，叩头谢罪，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永为藩臣，纳贡尽职，并下令国中说："我听说两雄不能并立，两贤不能同时在世。当今汉皇帝是贤明的天子，从今以后，我要去除帝号。"

赵佗又给汉文帝复了一封信称："我本是越地秦故吏，幸得高

皇帝赐予玺印，封为南越王，让我为外臣，按时纳贡。惠帝继位。仍对我很仁义，赏赐甚丰。高后掌权后，任用奸臣，听信谗言，疏远蛮夷，下令不得给蛮夷越人金铁田器，马牛羊若给，也要给雄性，不得给雌性的。赵地偏僻，马牛羊都已老，无法进行祭祀。我觉得不事祭祀要有死罪，因此，先后派了三个人上书请罪，皆无回音。我又听说我父母的坟墓已被毁坏，家族兄弟已被诛杀，我底下的人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在此情况下，我才称帝，这并非是有意要危害天下。而高皇后听说后大怒，削了南越的属籍，断绝了来往，我怀疑这是长沙王毁我的缘故，因而发兵讨伐其边境地区。蛮夷中西有西瓯，很弱小，但也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军队不过数千人，也称王；西北有长沙国，其人民有一半是蛮夷，也称王。我因此才敢妄称帝号，聊以自娱。我拥有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将士百万有余，然而仍臣服于汉，为什么呢？就是不敢背叛先人高帝的缘故。我已在南越呆了四十九年，现已抱孙子，然而睡不安稳、吃不香甜，这是因未能很好地侍奉汉朝的缘故。现在皇上能怜悯我，恢复我的故号，与汉通使如故，我一定改号不再称帝了。”

陆贾回报后，文帝大悦，南越由此终于臣服，其地位已如诸侯一般了。

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对南越基本上都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尤其是汉文帝，终以怀柔之策使南越臣服，化干戈为玉帛，对巩固汉王朝的南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杨家友）

参考书目：

《史记》:《南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资治通鉴》卷十三

济北淮南王反叛

济北王刘兴居的祖父是汉高祖刘邦，父亲是齐悼惠王。齐悼惠王是刘邦未发迹时的外妇曹夫人所生，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立为齐王。他有九个儿子，其三子为刘兴居。齐悼惠王死后，长子刘襄继位，即齐哀王。吕后当政时，封哀王二弟刘章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牟侯，并调到京师宿卫皇宫。吕后先后割了齐国的济南郡给吕王吕台(高后兄之子)，琅邪郡给刘泽，引起了刘氏家族的不满，吕后死时，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吕产为相国，聚兵擅权准备政变。刘章从其妻(吕禄之女)那里知道了这一阴谋，即秘密派人向其兄齐哀王报信，让哀王率军向京师进发，而刘章与刘兴居准备在京师联络大臣为内应，里外夹击，诛诸吕氏，并立齐哀王为帝。

齐哀王起兵后，汉相国吕产等派大将军灌婴率军去镇压，但灌婴到了荥阳后即派人与齐王联络，准备共伐吕氏。在京师，吕禄、吕产欲夺权，被刘章与周勃等人所杀，众大臣共拥立代王为帝。刘兴居感到自己在诛吕氏时无功，就将吕氏所立少帝带出宫，迎文帝入宫。

文帝即位后，为感谢齐哀王、刘章、刘兴居等人的拥立之功，将吕后时所割齐国土地全归还给齐国，并增封刘章、刘兴居二兄弟各二千户，黄金千斤。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立刘兴居为济北王。当初杀诸吕时，因刘章兄弟功劳最大，众大臣许诺立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但文帝后来听说刘章、刘兴居本来是要立齐哀王为帝，于是对齐王及刘章兄弟二人大为不满，故意贬低他兄弟的功

绩，大封诸子时，就割了齐国的城阳、济北二个郡分封给刘章、刘兴居二人。刘兴居对此极为怨恨。一年后，刘章去世，正值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汉朝廷派丞相灌婴率大军前去与匈奴作战，文帝亲自到太原坐镇。刘兴居见京师空虚，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起兵反叛。文帝听说后，马上命撤军赶回长安，派柴武率军镇压，很快打败了济北王的军队，并将刘兴居俘获。刘兴居自知犯了死罪，自杀身死。济北国也被废除，疆土并入汉。

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经过赵国，赵王张敖献一美女，刘邦亲幸后，美人怀孕，赵王不敢再让其住宫中，就在外面为美人盖了一处住所，安置下来。赵相国贯高等人谋反事被发觉后，汉朝将赵王收捕，赵美人一家也受牵连被逮捕，美人对看守的官吏说："前些日侍幸皇上，现已怀孕。"官吏报告了上边。但当时刘邦正生着赵国的气，没有理会赵美人。赵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阳侯求吕后在高帝那里为美人说情，吕后因嫉妒，不肯替美人说情，辟阳侯也没有强争。赵美人生下刘长后因羞愤而自杀。官吏将刘长送给皇上，刘邦也有些后悔，就让吕后抚养刘长，并将赵美人葬到她的老家真定(今河北正定县)。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亲自前往平叛，打败了英布，立刘长为淮南王。

刘长对于辟阳侯不为其母强争而致使其母自杀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惠帝、吕后时还不敢发作出来，等文帝即位后，自认为高帝的儿子只有文帝与他二人了，除皇上外，他理所当然地位最尊，因此，开始骄纵起来，多次不奉法行事，文帝都宽恕了他。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刘长入朝，比以往更加强横，与皇帝出去打猎时共乘一辇，还总是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材比较高大，力气也很大，能举起大鼎。他觉得报仇的时机已到，就去找辟阳侯算帐，辟阳侯出来见他时，即用袖中暗藏的金椎刺辟阳侯，并命手下将其杀了。随后他到文帝那里请罪，说："我的母亲不应当因赵国反叛事被牵连，辟

阳侯本能说服吕后，但他不强争，这是一条罪；赵王刘如意母子无罪，吕后杀了他们，辟阳侯不争，这是二条罪；吕后以诸吕为王准备夺刘氏的天下，辟阳侯不夺，这是第三条罪。我只为天下杀贼臣，报母之仇，现向皇上请罪。”文帝考虑到他是为母报仇心切而杀人，没有治他的罪，赦免了他。

在京师期间，从薄太后、皇太子到诸位大臣都怕淮南王。淮南王从此更加骄横，回国后，不行汉法，出入比皇帝，自作法令，几次上书都有不逊之词，文帝感到自己不好说他，就让帝舅薄昭写一封劝谏信给他，说：“听说你很刚直也很勇敢，慈爱温厚，贞信果断，这是你的天资。然而你如今的所作所为，已与你的天资不相称。你多次失礼义违法度，皇上仁厚，不忍心惩罚你，你今后应该遵守法度，尽职尽责，以此报答皇帝的厚德，并应上书谢罪，就说：‘我不幸早失先帝，自幼成孤儿，吕后在世时，总是担心活不了多久。陛下即位后，我辜负了您的恩德，行事多不遵法度，现今想起来确实是我的过错，因此，心中恐惧，请陛下发落。’皇帝见此话一定很高兴，皇上与大王便能和好如初，请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速作决断，若再犹豫，则大祸降临，悔之晚矣。”

刘长接到此信很不痛快，文帝六年（公元前 174 年），命大夫但领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谋划，以四十辆辇车反于谷口（今陕西西安北），并派人出使闽越、匈奴，寻求支持。事情败露后，朝廷治拿有关人员，并召淮南王人京师。

刘长到了长安后，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人奏道：“刘长在封国内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节度，比拟天子建宫殿，擅自颁布法令，不用汉法，设置官吏时自行任命郎中春为丞相，并收聚汉朝及各诸侯国中的有罪逃亡者，把他们藏匿起来，为他们置家聚妻，赐予财物爵禄田宅，有的人被授爵位竟到了关内侯，给他们相当于二千石的俸禄。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谋反，要危害宗庙社稷，并互派使者到闽越和匈奴联络发

兵。事情败露后，长安尉奇等人前去逮捕开章，刘长将其藏起来不交人，并与前中尉简忌谋划，将开章杀死灭口，葬在肥陵，诓汉朝官吏说，不知道开章在何处，而后又做假坟墓，墓上写‘开章死，葬此下’。刘长本人曾杀无辜一人，令官吏杀无罪者六人，有犯死罪的逃亡者，刘长将其藏起来，却随便捕一无罪之人抵数。他还擅自判人有罪，无原告判十四人有罪，赦免死罪犯十八人，轻罪犯五十八人，赐关内侯以下爵位九十四人。前些日子刘长有病，陛下很担忧，派人赐枣脯给他，刘长竟不肯见使者。南海有反叛者，淮南王派官吏前去平叛，陛下派使者赏帛五十匹以犒劳官吏中的有功劳者，刘长却不想接受这些赏赐，说‘并没有辛苦有功的人’。南海王上书献璧帛给皇帝，简忌擅自烧了他的上书，不向上报告。要治拿简忌时，刘长不交人，谎称简忌病了。刘长所犯罪行，论法当斩，请皇上依法论处。”

文帝有些犹豫，让列侯吏二千石四十三人议论此事，结果，都认为应依法论处。文帝命：“赦刘长死罪，废王位。”有司奏请将刘长发送到蜀郡去，让其子、其母跟随居住，县里负责为其盖房舍，每日三餐，并配给劈薪、菜、盐、炊具、被褥。文帝命供应刘长食物，每日肉五斤，酒二斗。原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跟随居住。参与反叛阴谋的有关人员全部被杀了，刘长被遣送蜀地。

袁盎谏文帝道：“皇上一向骄宠淮南王，不为他设置严厉的丞相、太傅，所以才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而且淮南王为人刚烈，现如此摧折他，我恐怕他会逢雾露而病死。这样陛下就会有杀弟弟的名声，这可如何了得！”文帝说：“我是故意要让他受受苦，让他自悔，现在就追他回来。”

淮南王刘长在路上对侍者说：“我因骄纵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才到了如此地步。”于是不食而死。刘长所坐槛车是由各个县负责在本县内押送，然后转到下一个县，而这些县都不敢揭开槛车上的封条，到了雍县（陕西境内），县令打开了车封，这才向上报告了死

讯。文帝听说后哭了，对袁盎说："我没有听你的话，到底使淮南王死了。"袁盎说："淮南王已死，没什么办法了，请陛下自宽。"文帝问："这可怎么办呢？"袁盎说："只有杀了那些有罪之人才能向天下谢罪。"文帝于是命丞相、御史将那些不揭封条不侍候淮南王的各个县有罪之人全逮起来杀了，并以列侯葬刘长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帝八年(公元前 172 年)，文帝怜悯刘长，于是把他的四个儿子都封为侯，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

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民间有人作歌唱淮南王刘长："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说后说："当初尧舜放逐骨肉(即鲧和共工，皆是尧舜同姓)，周公杀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邪？"于是改封城阳王王淮南国故地，追谥刘长为厉王，为他置守园如诸侯的礼仪。

十六年(公元前 164 年)，文帝又怜淮南王刘长因行不轨，致使失国早夭，改封淮南王刘喜为城阳王，立刘长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杨家友)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十四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贾谊上《治安策》

贾谊是西汉前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是洛阳人，十八岁时即在郡内以文才著称，河南郡守吴公听说贾谊很有才华，便将其召到门下，甚是宠爱。文帝即位后，听说河南守吴公的政绩为天下第一，吴公又与李斯同乡，曾经跟随李斯学习，于是将吴公提为廷尉。吴公向文帝举荐贾谊，说他精通诸家之书，文帝召贾谊为博士。此时，贾谊年仅二十出头，是博士中最年青的一位。每当皇帝有诏令让博士们对策或议事时，各位老先生还没能说话，贾谊已全对出来了，其他人也都按他的意思对策，众博士不得不佩服贾谊的才华。文帝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不到一年，就把他提升为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汉朝建立已二十余年了，天下太平融洽，应该“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于是创造了一套仪法，文帝虽没采纳，但更定的各项 法令以及诸侯就国制，都是贾谊提议的。文帝准备重用他，让他居公卿之位，便让大臣们议论此事，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人都很嫉妒贾谊，在文帝面前诋毁他，说洛阳的那个人“年少初学”，欲要“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由此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委任他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对被贬出京师很悲愤、颓丧，在渡湘江时特作赋吊屈原，借以表达他的心情。

贾谊在长沙为傅三年时，有一种叫服的小鸟飞进他的屋子，停在一个角落里。服是一种不祥鸟，贾谊见后，联想到自己被贬到了这么一个偏远、潮湿的地方来，很是伤心，认为自己活不长了，又作了一首赋，感叹命运多舛，并以“德人无累，知命不忧”聊以自慰。

过了一年，文帝想起了贾谊，召他入京，贾谊到了后，文帝问他鬼神事，贾谊把鬼神是怎么一回事讲得清清楚楚，文帝听得很着迷。讲完后，文帝感叹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刘胜是文帝最小的儿子，很受文帝宠爱，派贾谊作太傅，说明文帝对贾谊很重视。此后文帝还经常就国家的政事征询贾谊的意见。

文帝初年，天下刚刚太平，中央政权还不是特别稳固，从外部看，主要是匈奴正处于强盛上升时期，经常侵犯汉朝边境地区，从高祖刘邦到文帝时期，汉朝都还没有力量解除匈奴在北部边境上的压力，在汉朝内部，各项礼仪法令制度还不健全，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诸侯王经常僭礼、非礼，比拟天子，有的甚至起兵反叛，图谋夺取帝位，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即先后反叛。在此情况下，贾谊多次上疏陈述政见，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贾谊在治安策开始说："我暗地里观察形势的发展，有许多事情让我感到痛心，但最感到难过的莫过于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安已治矣'，我却认为还远远没达到安定的局面啊！"贾谊随后分析了汉朝当时的形势，认为分封的诸侯国导致了天下不太平。他说："由于诸侯强盛，人民多次遭殃，朝廷也多次担惊受怕，这远非安上全下之良策，前几年亲兄弟（即淮南王刘长）要谋反，想当天子，亲兄之子（即济北王刘兴居）欲发兵西进，现在吴国（刘濞）又有不轨举动了。陛下正当春秋鼎盛时期，而且行仁义德政，尚且如此，真让人忧心啊！"

贾谊说："当初分封时，因各诸侯王尚年幼，中央为诸侯设置的太傅、丞相还能掌握局面，然而数年之后，诸侯王都已长大成人，血气方刚，朝廷委派的傅、相都称病而罢官，诸侯王自设官吏，这种情况下，淮南王、济北王要谋反也就不奇怪了，此时，再想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尧舜在世也不可能了。"

贾谊认为，现在是解决诸侯坐大、安定天下的好时机，若错过

了机会，必会导致骨肉间的自相残杀，天下重新陷入混乱之中。

他说："高祖时封了许多异姓诸侯国，多的辖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对他们应该说是很有恩德了，然而在十年时间里，反者九起。这些人反叛还可以托言是非亲的缘故，但同姓又怎样呢？像淮南王刘长这样的诸侯王，虽名义上为臣，实际上自以为是天子的兄弟，想在国内比同皇帝的制度，做天子应该做的事。如擅自封爵，赦免死罪，不行汉朝法令，甚至有人要乘黄屋（天子的车制）。如淮南厉王这样的人，下令他不听，召他来京他也不来，就算来了，也不能对他用法处置，若处罚了一个亲戚，天下就会哗然。陛下的大臣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强悍的大臣，不等他开口，匕首已插入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又有谁敢过问此事呢？因此说，封异姓的诸侯一定危险，封同姓诸侯一定会出乱子；异姓反叛的诸侯，汉朝已侥幸镇压下去了，而同姓诸侯欲谋不轨者，已有了例子，现又有了征兆。贤明的皇帝对此情况尚不能处理好，以后又将会怎么样呢？"

贾谊主张对有不轨行为的诸侯王必须用强硬的手段才行。他把"仁义恩厚"比作刀刃，"权势法制"比作刀斧，而诸侯王则比作牛身上的硬骨头，对付他们只能用刀斧，而不能用刀刃，否则"不缺则断"。

贾谊说："我总结了以前发生过的事，发现总是比较强大的诸侯先反叛。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贯高因赵，陈豨兵精，彭越用梁，英布用淮南，相继而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王二万五千户，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不单单是因为禀性有异，也是因为形势所迫。因此，要想让各诸侯王都忠心耿耿，就应该使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势弱；要想臣下不被杀，就应使他们像樊哙那样居侯位；要想天下太平，最好的办法是大量分封诸侯，但一定要使他们缺少反叛的力量，力量弱就容易使他们行仁义，封国小，他们就不存邪心，这样就能使天下的各种力量像自己使唤自己的手臂，手臂指挥手一样，没有不听从的。诸侯王不再有异心，对中央都唯命

是从，即使平民百姓，也能由此感到平安。”

贾谊提出，要“割地定制”，把齐、赵、楚等较大的诸侯国分别划成若干个小国，让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子孙都能分一块地为王，地分完为止，对地多而子孙少者，可以先立一国空着，等有了子孙再封进去，受封之人若因罪而黜，其地全部没收归中央。这种分封制度确立后，宗室的子孙全封为王，则“天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

贾谊又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形势，他说：“目前天下的形势就像是一个人得了脚肿病，只能平居不能屈伸，一二个指头动就很痛，如不及时医治，就会成为痼疾，以后即使有扁鹊这样的名医，也无能为力了。”

他说：“现在天下的事已经本末倒置了，天子本是天下之首，为上；蛮夷本为天下之足，为下。现在匈奴对汉朝百般侮辱侵犯，成为天下之大患，然而汉朝却每年向他们进贡金絮束缯。夷狄下命令，这本是主上所操持的事，天子纳贡，这本是为臣者的礼节。这样就是脚朝上，头居下。本末倒置如此严重而不能解救，难道能说是国家有明智之人吗？如果百人织布不能满足一个人的穿衣需求，想让天下无受冻之人是不可能的；在一个人耕田，但有十个人靠他养活的情况下，要天下无饥饿者也是不可能的。百姓感受到饥寒之苦，再想要他们不走邪路也不可能了。国家已很危险了，盗贼都在等待时机，然而献计的人还在说，天下安定，不可动摇。真是说大话啊！”

他说：“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管子》中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朝因灭四维十三年即亡国，现在四维不完备，因此，奸人心存侥幸，而百姓内心疑惑。如果现在定下各种制度，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就能世世常安，后世也能有所遵循，若制度还不立，就像船在江河中行驶而没有舵，遇到风浪就一定会翻船。”

贾谊在此后的大量篇幅里，主要就是阐述维护四维，即礼义廉耻的重要性。

梁王刘胜无子，从马背上摔下而死后，贾谊上疏，极力主张任命文帝二子淮阳王刘武为梁王，辖泰山以南的大县四十余城，徙文帝三子代王刘参为淮阳王，这样，“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国足以对付齐、赵二国，淮阳足以监视吴、楚，陛下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徙刘武为梁王，徙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当文帝封淮南厉王四个儿子为列侯时，贾谊估计文帝最后还得封他们为王，又上疏谏阻，认为封罪人之子很危险，他们随时有可能为父报仇，危害朝廷。

梁王刘胜坠马死后，贾谊总是觉得自己作为太傅不能负到责任，因此常常为此哭泣懊丧，一年后，即郁闷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四年后，齐文王死，他没有儿子，文帝想起了贾谊的话，就把齐分为六个小国，立齐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迁淮南王刘喜为城阳王，把淮南分为三个小国，立淮南厉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又过十年，文帝死，景帝即位。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反叛，向京师进发，但被梁王刘武所挡，并终于导致七国之乱的失败。到武帝时，淮南厉王的两个为王的儿子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被杀。这些都应了贾谊的预言。

(杨家友)

参考书目：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汉书》:《贾谊传》

《资治通鉴》卷十四、卷十五

缇萦以身赎父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班固的这首充满感情的叙事诗，非常简练地讲述了少女缇萦以身赎父，感动汉文帝，废除肉刑法的故事。

缇萦的父亲淳于意，齐国临淄人，为齐国太仓长，故又被称为太仓公，年少时即喜好医术，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受师于同郡阳庆，当时阳庆已七十多岁，没有子女，因此，教授时对淳于意毫无保留，将各种秘方医术全传给了他。淳于意学了三年后出师，他广游各诸侯国，从不以家为家，有时也不为病人治病，因此，许多病人恼恨他。

淳于意被文帝赦免了刑罪后，文帝诏问了他一系列问题。

文帝问：“你在医术方面有何特长？能治什么病？有医书没有？都是在哪里学的？学了几年？试验过医术没有？给哪些人看过病？看的是什么病？医治情况怎么样？”

淳于意回答：“我从少年开始即喜好医药，但使用的药方大多不灵验，到了高后八年，拜阳庆为师，阳庆对我说：‘把你的药方书都扔掉吧，那些都没有用，我有黄帝、扁鹊留下来的脉书，能看五色诊病，知人生与死，判断是否可治，还有药论书，很珍贵；我家里富裕，又很喜欢你，因此我要把这些禁方书都传给你。’听了此话，我觉得非常幸运，再三感谢，接受了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

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阴阳禁书等。读懂这些东西需要一年时间，第二年即试着使用，有的证明有效果，但还不精通，三年后，即正式为人治病，诊病决生死也有把握了。”

淳于意回忆道：“济北王曾让我去给他的那些侍者诊脉。诊到一个叫竖的女子时，当时看她没什么病，但我告诉永巷长说：‘竖伤了脾，不可再劳累，到了春天她就会吐血而死。’我问济北王：‘才人女子竖有何技能？’国王说：‘她的技能很多，当年从民间买她来时花了相当于买四个人的钱，难道她也有病吗？’我说：‘她的病很重，估计是要死的，’济北王召来了竖，见她脸色正常，便不以为然，也不把她卖了，到了春天，果然吐血而死。我是根据她流汗判断其有病的，爱流汗的人，表面上看正常，脸色毛发都很亮且有光泽，脉也正常，但实际上病却很重。

“淄川王病了，召我前去诊脉，对我说：‘呼吸困难，头病发烧，心中烦闷。’我用冷水敷其头，用针尖刺其脚上的阴阳脉，左右脚各三处，病很快就好了。他的病是因洗了头发，不等干了就躺下而引起发热的。”

像这样的例子，淳于意一共列举了二十五例，他说因病例太多，时间长了已不记得，因此，不能全部列举出来。

文帝问：“你所诊治的这些病，病名一样而诊断不同，有的病人死了，有的没死，这是为什么？”

淳于意回答说：“病名很多都相差不多，这是古人传脉法留下来的，懂医术的人能分辨出来，不懂医术的人认为都一样。”

文帝问：“你能根据病情判断是死是生，用药也很精通，那么诸侯王大臣里有找你看病的吗？齐文王病时，不找你诊治是何缘故？”

淳于意回答：“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派人来找我，但我不敢去。文王病时，我的家还很穷，想为人治病，又怕被地方官吏留住任职，于是离家出游，先后拜了几个师傅，把他们的医术全学了下来，后在阳虚侯国居住，侍候阳虚侯，阳虚侯入朝时，就跟随到了

长安，由此得以给一些人看病。”

文帝又问：“你的师傅阳庆是拜谁为师的？阳庆是否闻名于齐国和各诸侯国？”

淳于意回答：“我不知阳庆是跟谁学的医术，阳庆家境富裕，虽擅长医术，但不肯为人治病，因此，不为人所知。”

文帝问：“吏民中有要向你学医术的吗？你是否对他们毫无保留地传授？”

淳于意回答：“临淄人宋邑要跟我学，我教了他一年多的五诊疗法。济北王派太医高期、王禹来学习，我教他们经脉之学一年有余。临淄人唐安来学习，我教他诊脉、治咳等，虽没学成，他还是被任命为齐王侍医。”

文帝问：“你诊病定生死，没有失败过吗？”

淳于意答：“我给人治病，一定要先为其切脉，然后再治疗，对那些经脉不顺的人就不治，脉顺者才给治疗，若不精通诊脉，就很困难了，也往往要失败。”

文帝四年(公元前 176 年)，有人上书告了淳于意的状，淳于意被官府抓了起来，要被押解到长安去。他有五个女儿，都跟在后边哭，淳于意很恼怒，骂道：“生孩子也不生个男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个顶用的人！”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非常伤心，就跟着淳于意到了长安，并上书汉文帝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官吏，齐国人都称他廉洁公正，如今因犯法要遭受刑法。我感到很痛心的是人死了不可能再生，而刑法也不能再对其使用了，虽然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因此，我愿意做个宫婢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改过自新。”汉文帝见到这个上书后，被缇萦的孝行所感动，赦免了淳于意的刑罪，并下令废除肉刑法。

西汉的刑法较秦代为宽，汉统治者认为秦法太严是秦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刘邦开始，就首先废秦法，重新制订汉朝的法律。刘邦一入关，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由

于三章之法太过简单，几年后，萧何将秦法中可用的部分拿出来，并加增补，作律九章。惠帝、高后时期，萧何、曹参先后为相，倡导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很少用刑罪。汉文帝即位后，进一步推行德政，其时，主要的将相还大多是开国功臣，这些人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都力主宽厚，倡导无为而治，于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文帝还任命张释之为廷尉，各种刑罪都从轻发落，各种刑罚很少用，全天下的重罪者只有四百人。

汉文帝看了缇萦以身赎父的上书后，下令说：“今法有肉刑三种(黥、劓、刖)，但仍有犯法者，问题在哪里呢？并不是我的德行少，而是没有很好地教导啊！我感到很惭愧。训导不好，百姓才会犯罪，诗经上说‘恺弟君子，民之父母’，现在有人犯了罪，还未对其教化而刑罚已用上了，即使想弃恶从善，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我很怜悯他们。刑用了以后就要断肢体，刻肢肤，再也长不起来了，刑罚如此地使人痛苦，这怎么能说是民之父母的本意呢？要废除肉刑，用别的方法来替代刑罚。只要罪人不逃跑，服够刑期就可免为庶人，要把这一条改进法律里去。”

根据文帝的旨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改定了一套法律，基本上都比原先的刑罚轻了些，如原要割鼻子的，现只笞三百下；原当斩去脚趾的，笞五百；原应刺面的，改为去做苦工，等等。

(杨家友)

参考书目：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汉书》:《文帝纪》、《刑法志》

晁错上《削藩策》

晁错为人耿直，年青时跟随一位叫张恢的儒生学申商刑名之学，后以通文学做上了太常掌故。

汉文帝时，因天下已无人再研究《尚书》，不解其义，四处求通《尚书》者。后听说齐国有一叫伏生的人，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但已九十多岁了，召其进京已不可能。文帝便命太常派人带书前去求教。太常选中了晁错担当此任。晁错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回来后向文帝讲解了《尚书》大义，文帝对此很满意，先迁晁错为太子舍人，很快又迁其为门大夫、博士。

晁错曾为皇太子读书学习的问题上书文帝。他说："为人主者之所以能功名显赫传于万世之后，是因为懂得治国之术。有人说皇太子知道那些事没什么用，我却不以为然。以前的国君不能保宗庙而为其臣弑杀者，都是因不懂得治国之术。现皇太子读的书很多，但不知道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这又有何功效呢？希望陛下能选择前世圣人那些可用于今世的治国之术，教诲太子，使其明了大义。"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太子家令。晁错很快以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博得了皇太子的宠幸，号称"智囊"。

由于当时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屡次侵犯边疆地区，对汉朝压力很大。晁错为此上书文帝，分析局势，出谋划策，认为安边境、立功名，关键在于选良将；而用兵打仗，关键在于熟悉地形、训练士卒、兵器坚利等等。文帝对此又大加赞赏。

文帝命有司举荐贤良文学士，晁错也被举荐，文帝亲自策问这

些人。当时贾谊已去世，对策者一百余人没有比得上晁错的，只有他中了高第，由此升迁为中大夫。

晁错在文帝时即多次提出应削诸侯的地。他更定法令二十章，文帝虽没全部采纳，但对他的才华还是很欣赏的。皇太子对他更是言听计从，而袁盎等大臣则对晁错非常反感。

汉景帝即位后，任命晁错为内史，对晁错的各种建议总是痛痛快快地采纳，他更定了多种法令，幸倾九卿，众大臣无人能望其项背。丞相申屠嘉尤其嫉恨，总想找机会参他一本，置其于死地，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有一天他终于抓住了晁错的一个过失。内史府位于太上庙内墙外边的空地附近，府门朝东，进出很不方便。晁错就把围空地的墙(即太上庙的外墙)凿开一段，开出个南门来。申屠嘉认为这一过失足以奏请杀晁错，准备上奏，晁错听说后，马上先对景帝解释了一番。申屠嘉上朝奏事，奏晁错擅自凿庙墙开门，请由廷尉治他的罪。景帝说："那不是庙墙，而是庙墙外面空地里的墙，不至于因此而治罪。"申屠嘉回去后对长史愤愤地说："我应当先斩后奏。如今先请示了，反而误了事。"申屠嘉由此发病而死。晁错升迁为御史大夫后，更加积极地鼓吹倡导削藩政策。他多次奏请削有罪诸侯国四边的郡县以缩小诸侯国的地盘。其所上《削藩策》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晁错在《削藩策》中说："高祖刚平定天下时，因兄弟小，几个儿子尚年幼，于是大封同姓诸侯王，齐国辖七十余城，楚国四十余城，吴国五十余城，这三个诸侯国几乎占去了天下一半的疆土。吴王刘濞以前因其太子被皇太子所杀而与朝廷结怨，托病不来朝见，依法应杀，只因文帝仁慈，不忍处罚他，反赐给他几杖，允许他不再朝觐。朝廷的恩德如此之厚，吴王本应改过自新才是，但他反而更加骄横，在国内铸钱煮盐，招引天下的罪人阴谋作乱，现在削他的地他会反，不削也要反。削地他反得快，祸害要小些；不削地反得慢一些，祸更大。"

景帝让士卿、列侯及宗室议论，除窦婴外，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这一年，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先后削了楚、赵、胶西三个诸侯国的地，并最终下了决心要削吴国的地。

为了限制诸侯国的权力，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晁错更改了法令凡三十章，诸侯大哗。晁错的父亲听说后，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在朝当政，侵削诸侯，疏人骨肉，诸侯多有怨言，你这是为什么呢？"晁错说："本来就应如此，不这样做，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平安了，可我晁氏却危险了，我得快快离开你了。"回去后就喝药自杀了，说是不忍见祸加于身。过了十几天，吴楚等七国反叛起，果然是以诛杀晁错为名。

但直接致晁错于死地的人是袁盎。袁盎曾为吴相国，两人关系一直不好，晁错在，袁盎就避开；袁盎在，晁错也躲得远远的。两人没在一起说过话。晁错当上御史大夫后，以袁盎曾收受吴王财物的罪名将他贬为庶人。吴楚反后，晁错本想治袁盎的死罪，因丞相青翟等人反对，晁错有些犹豫不决。有人向袁盎报了信，袁盎跑到窦婴那里，要窦婴引他见景帝，说他知道吴王为何要反叛。窦婴在景帝那里替他说了话后，景帝召见了袁盎，问他："你曾做过吴相，现在吴楚反，你有何看法呀？"袁盎说："不值得为此担忧。"景帝问："吴王铸钱、制盐，招天下豪杰，为反叛做了充分的准备，怎么能说是不足为虑呢？"袁盎说："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可哪里招来了豪杰呢？如果有豪杰到了吴国，也应是辅佐吴王从善，而不会反叛了。现今吴国招纳的都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和铸钱的奸人，因此才出了乱子。"此时站在一旁的晁错说："袁盎的分析很正确。"景帝问："那你有何好主意呢？"袁盎说："请让左右之人退下。"景帝命众人退下，独留晁错在，袁盎说："我要说的话，为人臣者不应知道。"景帝这才让晁错也退下。袁盎说："吴、楚等国相互交换信件，说：'高皇帝以同姓子弟为王，各有封地，现贼臣晁错擅自打击诸侯，侵夺土地。'反叛即由此起。他们向西攻来也只是要诛杀晁错，恢复故

地罢了。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杀了晁错，派使者到吴、楚等七国，恢复他们的故地，这样，可兵不血刃地解决问题。"景帝听了这番话，沉默良久，终于心动，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不会因喜爱一个人而得罪于天下。"于是拜袁盎为太常，让他秘密准备动身到吴国去。

十几天后，景帝授意丞相青翟等人劾奏晁错："吴王反叛，欲危害宗庙，天下应共杀之。现御史大夫晁错建议：'数百万的军队委任群臣统率，很不让人放心，陛下不如亲自统率军队出征，由我来留守，徐、僮二县还未被吴国攻陷的地方可以给吴国。'晁错不好好地报答陛下对他的恩德，反而欲使陛下疏远群臣百姓，又要送城邑给吴国，失臣子之礼，属大逆不道行为。晁错应被腰斩，父母妻子兄弟无少长皆弃市处死。"景帝准奏，而晁错此时还蒙在鼓里。景帝派中尉去召晁错入朝，诓他乘车到了市中，将穿着朝衣的晁错斩于长安东市。

晁错死后，谒者仆射邓公从镇压吴楚叛乱的前线回京，上书景帝谈前线的军事问题。景帝问他："你从前方回来，听到晁错死的消息吴楚等国撤不撤军？"邓公说："吴国谋反已有几十年了，因削其地而发怒反叛，不过是以诛杀晁错为名而已。我恐怕天下士人以后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他为什么这么说，邓公说："晁错是因为担心诸侯坐大不好制服才请求削他们的地，以此来巩固中央，尊显京师，这是万世之利啊。然而计划刚开始施行，就遭杀害，这样一来，对内堵了忠臣的嘴，使他们不敢再说话，对外则替诸侯报了仇，解了恨，我觉得此事陛下做得不妥啊！"景帝听了长长地叹息道："你说得很对，我也很后悔。"

此后，景帝坚定了平叛的决心，调兵遣将，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吴、楚等国的反叛。随后，景帝又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诸侯国的权力，巩固中央政权的措施，使从汉初以来就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诸侯国到此时基本上被削弱下去了，对中央已不再构成大

的威胁。因此，应该说晁错力主的削藩、加强封建中央政权的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杨家友）

参考书目：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汉书》:《袁盎晁错传》

《资治通鉴》卷十五

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 154 年),以吴国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国发动了一次联合大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产生“七国之乱”的根源是汉王朝搞的同姓分封制度。刘邦建立汉王朝后,认为秦不分封同姓诸侯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于是大封同姓,先后立弟刘交为楚王、兄刘喜为代王、子刘肥为齐王、从父弟刘贾为荆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子刘如意为赵王、子刘盈为代王,刘恢先为梁王后为赵王,刘友先为淮阳王后为赵王,子刘建为燕王,从祖昆弟刘泽为琅邪王(文帝时徙为燕王),刘喜之子刘濞为吴王,这些封国几乎占去了旧时燕、赵、齐、魏、楚等国的全部疆土。

诸侯王在封国内就是国君,权力很大。王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有财政权,可在国内征收赋税。王国的疆土广大,人口众多,多数王国很富庶,如齐王刘肥有六郡,计七十三县;吴王刘濞有三郡,计五十三县,王国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在世时,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同姓诸侯王又大都年少,因此,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惠帝和吕后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诸侯王长大成人,国势日益强盛,他们就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与中央的矛盾越来越大,有的甚至觊觎帝王之位,西汉政治由此开始动荡,“七国之乱”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七国之乱”首发者为吴王刘濞。刘濞被封王时年二十,体壮有

气力，刘邦担心吴、会稽一带社会风气轻悍难治，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封王来镇抚，当时他的儿子都年少，就封刘濞为吴王。受封仪式后，刘邦召刘濞来给他相面，说："你的样子有反相。"心中很是后悔，然而封王仪式已经完毕，不好更改，便抚着刘濞的脊背说："汉家今后五十年内东南方有叛乱者，难道是你吗？天下同姓是一家，你要谨慎，不要造反！"刘濞叩首说："不敢。"以后刘濞自食其言，成为叛乱的首领。孝文帝时，吴太子到长安，在与皇太子赌博时，因对皇太子不恭，被皇太子杀了，其尸体运回吴国后，刘濞非常愤怒，说："天下都是刘氏的天下，在长安死就葬在长安，何必运回吴国安葬呢！"于是就又把太子尸体运回长安安葬了。刘濞由此对中央不满，称病不去长安朝觐。朝廷知道他是因太子被杀的缘故不朝，便将他派去的使者拿问。刘濞很惊恐，开始起了反叛的念头。后不久，吴王派使者到长安朝觐，汉文帝又责问刘濞称病不朝的事，使者回答说："吴王实际上无病，只是朝廷治拿吴国使者，吴王惊恐，这才假托有病，希望皇上能抛弃前嫌，让吴国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文帝释放了先前拘拿的吴国使者，并赐给刘濞几杖，允许他可不再朝觐，刘濞因此解脱了罪名，反叛的念头也暂时打消了。此后，吴国凭借丰富的铜、盐资源，加上各种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发展了四十余年。

"七国之乱"的直接导火索是汉景帝和御史大夫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早在文帝在位时，晁错就几次上书陈述吴国的过失，请求削吴国地，但文帝总是不忍心惩罚吴国。刘濞见朝廷软弱，越发强横起来。景帝即位后，晁错又劝说道："当初高祖刚平定天下，因兄弟少，几个儿子也还年幼，于是大封同姓诸侯王，齐国辖七十余城，楚国四十余城，吴国五十余城，这三国几乎占去了天下一半的疆土。吴王刘濞以前因太子被杀事与朝廷结怨，托病不来朝觐，依法应杀，只因文帝仁慈，不忍处罚他，反赐他几杖，朝廷的恩德如此之厚，吴王本应改过自新才是，他反

而更加骄横，在国内铸钱、煮盐，招引天下罪人阴谋作乱。现在削他的地他会反，不削也要反。削地他反得快，祸害要小些；不削地反得慢一些，祸更大。”景帝让各公卿、列侯及宗室议论此事，除大臣窦婴外没人表示不同意见。在此前后，景帝听从晁错的劝告，先后削了楚、赵、胶西三个诸侯国的地。

正当朝廷议论是否削吴地的时候，吴王刘濞已积极谋划反叛了，他看到同姓诸侯里只有胶西王刘卬好斗，同姓诸侯都怕他，就首先想把胶西王拉到自己一边来，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去对刘卬说：“现在皇上越来越任用奸臣，听信谗言，侵削诸侯，诛罚良臣重将，吴王有病，二十余年不能朝觐，经常怕皇上犯疑，处处小心谨慎，还怕不为皇上谅解，听说大王因卖爵事被削了地，可这个过失不至于被削地吧，因此，恐怕还不止是削地的问题。”胶西王问：“纵有此事，又能怎样呢？”应高说：“吴王感到有与大王同样的忧虑，因此，愿顺从民心，为天下舍身除患，大王意愿如何呢？”刘卬惊骇道：“我怎敢这样干，皇上虽然逼得急，但就是让臣死，又能怎样？”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侵夺诸侯，致使朝廷群臣怨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现正值彗星出，蝗虫起，天赐良机，正是出圣人的时候，吴王在朝内诛杀晁错，在外跟随大王的军队，所向披靡。大王若同意，那吴王就与楚王攻占函谷关，坚守荥阳、敖仓的粮食，抵抗汉兵，而对付皇宫则要仰仗大王了。大王若亲自出马，则天下唾手可得。吴王与大王分割而立，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胶西王终于被说动了，同意与吴国一同起事。应高回报吴王，刘濞恐刘卬犹豫生变，就亲自到胶西与刘卬定约。胶西群臣中有听说此阴谋者，劝刘卬说：“诸侯的地盘不抵汉的十分之二，因叛逆而惊扰太后，决不是什么好主意。现在侍奉一个皇帝还觉不易，若反叛事成，两主分立，那祸害就更大了。”刘卬不听，派使者约齐、淄川、胶东、济南四王共同起事。四王都答应了。

当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到吴后，吴王即率先起

兵，将二千石以下的汉吏都杀了。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也都跟着起兵。楚相国张尚、太傅赵夷吾谏楚王刘戊，被楚王诛杀。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赵王刘遂，被赵王烧死。齐王悔约，没有跟着起兵，坚守城门不出，胶西、胶东与淄川、济南共攻齐，围临淄。赵王刘遂发兵驻扎在西部边界，并派人与匈奴联络。

吴王命国中年十四到六十二岁的男子都从军，总共动员了二十余万人，并派使者到闽、东越，动员闽和东越也起兵反汉。吴王在广陵起兵，会合楚军后，一起攻打梁国，梁孝王虽极力抵抗，仍两败于吴楚联军，只好固守睢阳。

为平息叛乱，景帝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攻打吴、楚；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召窦婴为大将军，镇守荥阳，监视齐、赵军队。

在七国反叛的关键时刻，景帝听信谗言，杀了晁错。

当初，晁错为侵削诸侯更令三十章，诸侯哗然，其父听说后，劝他："皇上初即位，你在朝当政，侵削诸侯，疏人骨肉，诸侯多有怨言，你这 是为什么呢？"晁错说："本来就应如此，不这样做，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父说："刘氏平安了，可我晁氏却危险了，我要快快离开你了。"回去后就喝药自杀了，说是不忍见灾祸降临。过了十几天，吴楚等国反，果然就是以诛杀晁错为名的。

直接致晁错于死地的人是袁盎。袁盎曾是吴国相，晁袁二人关系一直不好，晁错在，袁盎就避开，两人竟没在一起说过话。晁错当上御史大夫后，以袁盎收受吴王财物的罪名将他贬为庶人。吴、楚反后，晁错本想治拿袁盎，因丞相等人反对，晁错有些犹豫。有人向袁盎通了信，袁盎跑到窦婴那里，请窦婴引他见皇上，解释吴王为何要反叛。窦婴在景帝那里替他说了话后，景帝召见了袁盎。景帝问他："你对吴楚反叛之事有何看法？"袁盎说："皇上可不必对此担忧。"景帝问："吴王铸钱、煮盐、招天下豪杰，为反叛做了充分的准备，怎么能说是不足为虑呢？"袁说："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可哪

里招来了豪杰呢？如果吴得到了豪杰，也应是辅佐吴王从善，不会反叛了。现今吴国招纳的都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和私自铸钱的奸人，因此才出了乱子。”此时晁错也在一旁，说：“袁盎的意见很对。”景帝问：“那你有何好主意呢？”袁说：“请让左右之人退下。”景帝命众人退下，独留晁错在，袁盎说：“我所要说的，为臣者不应知道。”景帝这才让晁错也退下。袁盎说：“吴、楚等国相互交换信件，说高皇帝以同姓子弟为王，各有封地，现贼臣晁错擅自打击诸侯，侵夺土地。反叛也由此起。他们向西开来也只是想要诛杀晁错，恢复故地罢了。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杀了晁错，派使者到吴、楚等七国，恢复他们的故地，这样，可兵不血刃解决问题。”景帝听信了袁盎的话，任命他为太常。十几天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晁错，并命袁盎出使吴国。

谒者仆射邓公就战事上书景帝，景帝召见他时问：“吴、楚听说晁错已被杀，是不是准备撤军呢？”邓公说：“吴国谋反已几十年了，要杀晁错不过是借口而已，我恐怕天下贤士今后再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他为什么，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坐大，才想要削弱他们，以维护京师的尊严。可计划刚开始实施，就被杀了，结果是对内堵了忠臣的口，使他们不敢再说话，对外则为诸侯报了仇。”景帝听后叹道：“你说得很对，我也很后悔！”

袁盎到了吴国，刘濞听说他来了，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不肯见他，而是要把他留在军中为将，袁盎设法逃了回去。

“七国之乱”最后被镇压下去主要靠的是周亚夫的谋略。一开始，周亚夫就对景帝说：“楚国军队比较剽悍，不宜与之正面交锋，可由梁国军队断其粮道，这样就好制服楚军了。”景帝同意了他的建议。而后，周亚夫又用赵涉之计，出其不意到了洛阳，使吴王欲偷袭周亚夫军的阴谋破产。

当吴楚联军猛攻梁国时，梁王几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没有理会。梁王告到景帝那里，景帝命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也未奉诏行

事；而是坚壁不出，同时派军队去堵吴、楚军队的后路，断绝其运送粮饷的交通要道。梁王见无援兵，命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弟张羽为将军拼死抵抗，终于挫败了吴军的攻势。吴军向西退，梁兵坚守城池，只好向周亚夫驻兵的方向开来，两军相遇后，周亚夫命军队坚守不出战，吴、楚军因断粮，许多士兵饿死，大败而去，周亚夫派精兵乘胜追击，又大败吴楚联军。吴王刘濞弃军 带几千精兵乘夜逃亡，楚王刘戊自杀。刘濞率残兵渡淮河到了东越，纠集散兵游勇，准备以东越为反汉基地。汉派人到东越以利相诱，东越人便杀了刘濞，将其头献给汉帝。吴太子刘驹逃往闽越。

吴、楚反叛前后历时三个月，以失败告终。

当胶西、胶东、淄川三王围攻临淄时，齐王派路中大夫到京城告急，汉景帝命路中大夫回报，要齐王坚守，说："汉兵现已打败吴楚军队了。"路中大夫回到临淄城外后，三国的军队已把临淄围了几层，无法入内。三国将领对路中大夫说："你到城下对齐王说汉已被打败，齐王若跟随三国起事可保平安。"路中大夫表面答应了，但到了城下，马上对齐王说："汉已发兵百万派太尉周亚夫击败了吴楚军队，现正带兵来救齐国，齐国一定要坚守，不能投降。"三国将立刻把路中大夫杀了。当三国军队初围齐时，因形势危急，齐王暗地里派人与三国接洽，准备与三国通谋，但还未约定，路中大夫就回来传了信，齐国大臣劝齐王不要与三国通谋了。很快，汉将栾布等带兵到齐击败三国军队，为齐解了围。后听说齐王当初与三国有谋，汉兵就准备伐齐，齐孝王害怕，服毒自尽了。

胶西、胶东、淄川王各自带兵回国后，胶西王太子刘德仍不死心，想趁汉兵疲惫进行偷袭，胶西王认为自己的军队已完了，根本不可能再去打仗，阻止了刘德的行动。

汉将韩颓当送信给刘卬说："本人奉诏诛杀不义之徒，降者赦免，不降者杀之，你怎么样？"并问他为何要反叛。刘卬辩解说："因晁错欲侵削诸侯，为诛杀晁错而起兵，现听说晁错已被杀，这才罢

兵回来的。”韩颓当驳斥说：“若因晁错不义，可上告天子，现擅自发兵，恐怕不只是为杀晁错吧”于是令他自杀，刘卬自尽。随后，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都被杀。

郦寄带兵攻打赵国，赵王坚守邯郸，郦寄久攻不下。栾布解齐围后带兵增援，引水灌城，城破后，赵王自杀。

济北王在事败后也要自杀，齐国人公孙玃为其到梁王那里游说，说动了梁王，梁王派人到京城为济北王说情，济北王由此幸免，被徙封于淄川。

平定了吴楚反叛后，景帝本准备为吴、楚续后，但窦太后不同意为吴立后，准许为楚立后，于是景帝将吴地一分为二，徙淮阳王为鲁王、汝南王为江都王，并立宗正刘礼为楚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

此后，景帝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取消诸侯王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又减缩王国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改丞相为相，掌王国政事；内史治民，与郡太守相同，直接听命于中央；取消御史大夫、廷尉等官，重要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样一来，诸侯王国虽仍在，但已与郡基本相同，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

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颁布了“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分割王国的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王国由此越分越小，力量越来越弱，而中央的直接辖区（郡县）日益扩大，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几年后，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又招纳宾客，暗造兵器，阴谋反叛。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武帝下令逮捕二王，二王皆自杀，两国被废为郡。武帝又制定了《附益之法》，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

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武帝为祭宗庙，要列侯献金助祭，

以所献酎金的份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废列侯一百零六人，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至此，诸侯国再也构不成对中央的威胁，同姓分封制度名存实亡，先进的郡县制终于战胜了分封制，封建中央集权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杨家友）

参考书目：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吴王濞列传》

卜筮者之言

卜筮者，又称日者。《墨子》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墨子要到北方的齐国去，路上遇到了日者，日者说："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他的劝阻，继续向北走，到了淄水后过不去了，只好返回。日者说："我说先生不能向北去吧。"把卜筮者称为日者即从《墨子》起，而《史记》则专门有"日者列传"。

古人信天命，帝王每逢有重大事情要决断往往求助于占卜，在选定帝王或帝王继位时也要占卜，周代此种风气尤甚，并专门设有太卜之官。汉文帝能坐上天子的宝座，也有占卜者的功劳，为此，文帝对卜筮者很是优宠，卜官由此又兴盛起来。

《史记·日者列传》主要是记述了卜筮者司马季主与宋忠、贾谊两人的对话，通过司马季主之口，反映了汉代卜筮者的情况。

司马季主是楚国人，在长安东市行占卜事。当时，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一天，贾谊对宋忠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是在朝廷中就是在卜医当中。如今我已见到了三公九卿朝士大夫，对他们怎么样已有所了解，现在不如去看看卜筮者的情况。"于是二人来到了长安集市，在各个卜摊中转游，当时天刚下过雨，路上行人很少，问卜的人更少，司马季主没什么事，就与三四个弟子谈开了天地日月阴阳吉凶等问题。宋忠、贾谊二人走过去行礼拜见，司马季主看这两人的相貌不同凡人，便以礼相待，让弟子让座。二人坐定后，司马季主接着先前的话题讲："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

宋忠、贾谊听后，觉得明白了许多道理，对司马季主肃然起敬，于是正襟危坐道："我们看先生的相貌，听先生的言辞，当今之世，无人能比，然而先生为何要居住在这样卑微的地方、从事这等卑贱的职业呢？"司马季主听了此话捧腹大笑，说："看二位大夫像是有道术者，怎么现在说的话如此的野陋！你们认为当今世上何人为贤？什么样的职业高尚？为何把长者看得如此卑贱？"

宋、贾二人说："高官厚禄是公认的高贵职业，贤明有才能的人都处在这一阶层里，先生现在不在此阶层里，因此说先生所处之地卑微。说的话不能被验证，做的事没有结果，取不该得的钱财，因此说先生的职业卑贱。卜筮者，是世人所看不起的人。世人都说：'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这种事情是我们感到羞耻的，所以说是卑贱的职业。"

司马季主说："二位坐着听我好好地讲一讲。世上能知道什么是贤什么是不肖的人其实很少。贤人是什么品行呢？应该是：直言正谏，谏三次不听则打住；他赞誉人不指望有回报，对恶人不留情面，不怕受打击，以利国利民为己任。因此，对不是他们所能担当的官职不当，不是他应得的俸禄不接受；见到行为不正的人，其地位再高也不尊敬他；有所得不为之欣喜若狂，有所失也不为之痛心疾者；不是他的罪过，虽遭受侮辱也不为之羞愧。"

司马季主接着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贤者，都应该为此感到羞愧了。这些人在上司面前只会说些谄媚之言，相互勾结，互相吹捧，以求一官半职。他们专心于私利，贪脏枉法，鱼肉百姓，与那些持刀抢动的恶人相比没什么两样。他们刚当上官时往往为了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而投机取巧，欺上瞒下，以无为有，以少为多，大肆挥霍，犯法害民，致使公府空虚。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不拿刀的盗贼，怎么能说是高贵贤明的人呢？

"这些人当盗贼起来了时却不能制止、消灭，蛮夷人不服但不

能使他们慑服；风不调雨不顺，收成不好也不能想出好办法来补救。如果是有贤才而不去做，就是对上不忠；若是无才能而是通过请托做了官，妨碍了贤者任职，就是窃位。

“而我们这些卜筮者，则一定是顺应天意，和于仁义，观察四时天象，在此基础上开始作卦占卜，占卜后再判断天地间所要发生的事，预告事之成败。以前的君主在登基前，一定要先占卜；人们在出门或回家前一定要看时日是否吉利；生孩子前也一定要占吉凶。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大治，越王勾践以八卦破敌图，称霸天下，由此可见，占筮有什么不好的呢？

“况且我们这些卜筮者总是在打扫干净座位、穿戴整齐后才开始谈事的，这是有礼者的一种表现。讲解鬼神时虽收点食物，但忠臣可以因此事上，孝子可以因此奉养父母，慈父可以因此养育子女，这是有德啊；虽收了百十钱，但有病者或许就痊愈了，要死之人或许又能活下去，灾祸因此可以躲过，做事因此而成功，嫁女娶妇或许就能生儿子，这是恩德啊，岂是几十个钱就值了的！

“如今的卜筮者，身无积蓄，用不着仓库存东西，搬迁时不用辎车，打点行装也不沉，但他们却能随时提供服务。他们不带多少东西，在各地周游占卜，即使是庄子当初出行也比不上，你们怎么能说不能干占卜这行当呢？

“你们看到那些能言善辩的人了吧？每当考虑一件事或谋划一个计策时，一定是这些人出主意，但他们却不能以一句话来说服人，所以‘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总是说先王怎么怎么成功的，以此来说服君主，激发君主的意志。再也没有比这更夸夸其谈的了，然而，若想使国家强盛，对上尽忠，只有这样才行。而今卜筮者为遇惑之人指点迷津，也不是能一句话就讲清的，故说‘言不厌多’。

“真正有贤才的人不与那些奸人、小人处在一起，因此，他们居处卑微之地以避开众人，为民预见吉凶，以免除灾祸，明白事理，多

获功利，从你们开始讲的那些话可知你们根本不了解这个道理。”

宋忠、贾谊听了这一席话后顿时感到若有所失，面无血色，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于是提着衣服站起来，再拜而辞，走起路来也觉得浑身乏力，出门后勉强上了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

过了三天，宋忠见到贾谊，俩人悄悄叹气说：“居位越高越危险啊。现在身居显赫之位，实际上失势的日子也不远了。卜筮者说的话不准，不影响他的收入，而我们为君主出的主意若没出好，则性命难保了，两者相比也相差太远了，你我将来是安是危，真不好预料啊。”

后来，宋忠出使匈奴，没有到达就返回了，被治了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时，刘胜从马上摔下死了，贾谊觉得自己没能尽职，抑郁而死，这都是因务华而不务实的结果。

（杨家友）

参考书目：

《史记》:《日者列传》

梁孝王骄纵

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次子，与其兄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

汉文帝有四个儿子，长子刘启即景帝，次子刘武，三子刘参，四子刘胜。文帝即位后，封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胜为梁王。第二年，改封刘武为淮阳王，十年后，梁王刘胜去世，孝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又改封刘武为梁王，因此，刘武在做梁王前已有十一年的国王经历了。

景帝即位后，因与梁王同母，对梁王非常优宠，梁王辖四十多个大县城，基本上是泰山以南的膏腴之地。景帝的赏赐更是不可胜数，国库中金钱成百上千万，珠玉宝器比京师还多，梁王在国内大兴土木，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百余里。他还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 年），梁王人朝时，景帝派使者持节乘驷马舆出迎；到了京师以后，也是宠幸无比，人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梁王还趁此机会请求留在京师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人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冬十月，梁王又来朝，当时景帝还未立太子，在与梁王宴饮时说：“我若去世了就传位给你。”梁王虽然知道此话不一定当真，还是非常高兴，赶紧道谢，窦太后也表示赞许。但当时还是詹事的窦婴反对，他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传位于子是汉朝的规矩，皇上为何要传位于梁王呢？”窦太后为此憎

恨窦婴，窦婴因病免职后，太后将他除了族籍，不许他朝请，梁王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当吴国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时，梁王未参与他们的阴谋和行动，吴楚联军首先进攻梁国，梁国虽几次受挫，但最终顶住了攻势，并打败了吴军，为中央平息七国之乱做出了贡献，梁王因此得赐天子旌旗。

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废栗太子，窦太后欲以梁王为嗣，梁王谒见窦太后时，与景帝一起坐在太后前面，太后对景帝说："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没听明白，出来后问袁盎等通晓经术的大臣们太后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袁盎等人说，太后的意思是要立梁王为皇太子。景帝问为什么，袁盎等回答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景帝问："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群臣都说："如今汉家效法周道，立子不立弟，当初宋宣公死，不立子而立弟，其弟死后，又把王位传于宣公之子，但宣公弟之子争王位，认为他应该继承父位，于是刺杀了宣公之子，宋国由此祸乱不断。我们请求见太后陈述此意见。"于是袁盎等人人见太后，问："太后说要立梁王为后，梁王若去世，那又立谁为后呢？"太后说："我将重立景帝子为后。"袁盎等人即以宋宣公不立子而导致祸乱五世不绝，小不忍则害大义等话劝太后，窦太后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命梁王回国，不再提此事。

梁王听说是因袁盎等人的劝阻才不立他为太子后，与羊胜、公孙诡商议，派人刺杀袁盎等。来人刺杀了袁盎后，其剑留在了袁盎身上。经查，知道此剑是梁国某官吏所造，由此事发，景帝派田叔、吕季主前往梁国逮捕公孙诡、羊胜，二人躲藏到王宫中，京师先后十几次派出使者到梁国，向梁国索要二人，梁国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在国内搜索了一个多月也未找到，后韩安国听说这二人藏在

王宫中，即入宫见梁王，哭道："臣等无能，羊胜、公孙诡至今未捕到，请赐臣死吧。"梁王问："为何要这样呢？"韩安国说："大王位列诸侯，但却听信奸臣邪说，犯法禁，天子因太后的缘故，才不忍心对大王用法。现在太后日夜哭泣，盼大王能改过自新，而大王至今未觉悟，如果太后不幸去世，大王还能依靠谁呢？"一番话说得梁王泪流满面，令羊胜、公孙诡自杀，将尸首从宫中抬了出去。

景帝因此事开始怨望梁王，梁王很惊恐，便派邹阳到长安见皇后之兄王信，对他说："皇后在皇上面前有宠，后宫里没有比得上的，而你却行事不谨慎，现在袁盎被杀之事马上要解决了，梁王可能被杀，这样太后将要在各个受皇上优宠的贵臣身上泄怒，因此，我很为你担忧。"王信问："那该怎么办呢？"邹阳说："你若能在皇上面前替梁王说情，使梁王解脱罪名，太后一定会感谢你，而皇后又被皇上宠爱，这样一来，你的地位就固若金汤了。你见皇上时，可以当初舜的弟弟象要杀舜，而舜为天子后，反封象于有庳的故事来说明兄弟之间本不应有什么恩怨。梁王的事可由此解脱。"王信见景帝后按邹阳的话说了，景帝的怒气才稍减了减。

窦太后因梁王犯事，怕梁王有死罪，因此不思饮食，日夜哭泣，景帝对此很是忧虑。田叔等人在梁国查明了情况回来后，在未见景帝之前即把有关人员的供词都烧掉了，空着手来见景帝。景帝问田叔："梁国真的有罪吗？"田叔说："有罪，而且是死罪。"景帝问他罪证在哪里，田叔说："请皇上以后不要再提梁国事了。"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如今若不杀梁王，就是不按汉法行事；若杀了他，则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皇上会为此优虑的。"景帝认为田叔说的话很对，便派田叔等人谒见太后，对太后说："梁王对杀袁盎等人的事一无所知，是羊胜、公孙诡等人的阴谋，这几人已被杀，梁王没什么事了。"窦太后听说这话，马上坐了起来吃饭，气也消了。

景帝的怒气稍消后，梁王上书请求朝觐。等入了关，梁王按其大臣茅兰的主意，乘布车，着降服，自比为丧人，只带两人，藏匿在

其姊长公主园中，汉派使者迎接梁王时，梁王已入了关，但其车骑却还在关外，不知梁王到哪里去了。使者回去报告了景帝、太后，太后一听便哭了，说："皇上果然杀了我的孩子。"景帝对此非常惊恐，而梁王却突然出现了，他脖子上挂着斧头，在皇宫外请罪，太后、景帝见他无事，喜出望外，于是母子三人又和好了。景帝命梁王带来的官员全部入关。但景帝从此对梁王越来越冷谈，再也不与梁王同乘车辇了。

景帝中六年初(公元前 144 年)，梁王来京师朝觐，请求皇上允许他留在京师一段时间，但景帝拒绝了他的要求。梁王回国后，总是闷闷不乐，一次打猎时，地方有人献了一头牛，其足长在背上，梁王见后很恶心，不久，发热病而去世。

梁孝王对其母窦太后非常孝顺，每次听说太后病了，即口不能食，居不安寝，欲留长安侍太后。窦太后也很是宠爱他，等听说梁王死了，窦太后悲痛欲绝，也不进食了，说："皇上果然杀了我的儿子！"景帝见此很是忧虑，不知如何是好，经与长公主商议后，决定把梁国一分为五，分别立梁王的五个儿子为王，即买为梁王，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五个女儿都食汤沐邑。把这个决定告诉窦太后后，太后才高兴起来。

梁孝王未死时，其财产不计其数，死了以后，其藏金还有四十余万斤，其它物品更是比比皆是。

梁孝王以其为景帝母弟，窦太后宠爱之至的缘故，聚敛钱财，招天下贤士，大兴土木，谋杀朝廷大臣，觊觎帝位，然而，他到最后也没有达到当皇上的目的。

(杨家友)

参考书目：

《史记》:《梁孝王世家》

《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武帝即位

汉武帝刘彻，原名彘，是景帝刘启的第九个儿子，景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156 年）七月七日晨生于猗兰殿。景帝后三年（公元前 141 年）正月，景帝刘启死后，甲子日，刘彻即位，时年十六，是为武帝。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这位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四年的皇帝，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和政策，为整个封建制度和中华民族的疆域奠立了基本的框架。重大的政治活动排满了他的年表，他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刘彘生母王夫人，名娡，扶风郡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平民王仲之女。王仲的妻子臧儿，是原燕王臧荼的孙女，嫁王仲之后，生男王信及两女。长女名娡即刘彘生母，次女名姁即广川王刘越生母。王仲死了以后，臧儿携带两女一男，改嫁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田氏，生下两个男孩即田蚡、田胜。王娡原嫁金王孙为妻，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俗，后来臧儿去占卜，卜者说她的两个女儿都有贵人相，日后必当发迹。金王孙是平民，跟着他当然不会显贵。于是，臧儿从金王孙处夺回王娡，然后送入还在做太子的刘启宫中。文帝死后，太子即位，是为景帝。景帝刘启对王娡十分宠爱，先封美人，不久就封为夫人。

王夫人娡生下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大女儿平阳公主，二女儿南宫公主，三女儿隆虑公主，男孩即刘彘。王夫人怀彘时告诉景帝，

说曾梦见太阳投入她的怀中，所以怀上了刘彘。当时人很认天命，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由“天”授予的，皇帝也是“天”之子，是由“天”派到人间来统治百姓的。所以，贵人必有贵兆。王夫人的这个梦引起景帝的重视，他说：“这是贵祥的征兆啊！”这个“贵征”日后还成为景帝选择刘彘为太子的重要因素。所谓“贵征”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事反映了王夫人工于心计，早早就为刘彘立太子造舆论。

景帝薄皇后是文帝母亲薄太后家女，景帝做太子时，由薄太后做主，娶她为妃。景帝即位以后，便立了薄妃为皇后。可是，薄太后未能生下儿子，便渐渐失去了景帝的宠爱。景帝初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薄太皇太后死去，薄皇后失去了靠山。初元六年（公元前151年），薄皇后被废，这样，后位出缺。

因为薄皇后没有生下儿子，所以，景帝即位以后的几年间也没有立太子。可是，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皇储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是国家的根本，是头等的政治大事。天下大命，悬于太子一身，预立皇储，是加强政治安定、平息皇族争端的重要手段。按照君位继统法，奉行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原则。可是，景帝嫡妻薄皇后无子，预立太子只能到庶出的诸子中去选择。

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特别喜爱自己的小儿子梁孝王刘武，不但赏赐极多，甚至还想行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让刘武接替皇位。景帝同这个同胞手足感情极深，一同进出甚至起卧。景帝本人也想废父子相继的继统法传位予弟弟梁王刘武，搞兄终弟及的一套。一次家宴上，酒酣之际，景帝从容地对刘武说：“我千秋万岁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你。”刘武虽口称辞谢，但内心里却很高兴。窦太后听了也很高兴。当时陪席的，还有管皇后与太子家事的詹事窦婴，他不赞成景帝这么做。于是，他敬酒劝阻说：“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父死子继，父子相传，是汉家朝廷的约定。陛下怎么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私有的东西传给别人呢？”此事只好作罢。窦太后也因此非常怨恨自己的这个内侄。窦婴本来就嫌官职轻卑，就此告病离职。窦太

后一怒之下，又将窦婴从宗籍中开除出去。

景帝生十四庶子：栗姬生临江闵王荣，河间献王德，临江哀王阏；程姬生鲁共王余，江都易王非，胶西王端；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唐姬生长沙定王发；王夫人生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宪王舜；王夫人生彘。在景帝庶出十四子中，彘排行第九，既非最长，亦非最宠。

按嫡长继统法，既然没有嫡子，那么庶出诸子之间就没有嫡庶贵贱的差别，有差别的是先天的年龄长幼之别。那么，预立皇储按年龄长幼的先天差别也能起到杜绝纷争，稳定政治，加强贵族之间内部团结的作用。庶出诸子应立最长者为皇储。在景帝的庶出诸子中临江闵王刘荣年龄最长，景帝初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四月，刘荣被立为太子，称栗太子。同一天，刘彘被封为胶东王，时年四岁。

预建太子，是为了防止争夺，消弭内乱，是为了君主专制的王位世袭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了从制度上巩固君主专制的统治。君主仍然是整个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君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自然也包括拥立皇储的权力。所以，立储的最终权力和最高权力还是在君主的手中。临江闵王刘荣虽被立为太子，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

刘荣的母亲栗姬本来最受景帝宠爱，刘荣又被立为太子，薄皇后以无子被废，后位出缺，照理，栗姬当被立为皇后。景帝也有立栗姬为皇后的打算，有病时曾叮嘱栗姬，说自己千秋百岁以后，要栗姬好好照看诸皇子，负起皇后的责任。可是栗姬心胸狭窄，妒心太重，就怒而不应，还出言不逊，提出无理要求，景帝很不高兴，对栗姬很失望，就把立后的事搁了下来。栗姬本来满怀着当皇后的心愿，现在景帝久不立她为后，心怀怨望，进而又失去了景帝的宠爱。

在景帝后宫立储争后的斗争中，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嫖起了关键作用。刘嫖是景帝同母姐，刘彘的姑母，下嫁堂邑侯陈午为

妻。窦太后非常宠爱这个女儿，不但赏赐给大量财物，而且让她经常出入宫闱。所以，刘嫖同景帝关系很亲密，她的话对景帝有很大的影响。由于长公主在宫廷中很有势力，所以后宫姬妾都巴结她，希望她能在景帝面前为自己美言引荐。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阿娇，她希望阿娇将来能做皇后，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就派人示意栗姬愿意同栗姬联姻。可是栗姬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怨恨长公主经常献美女给景帝，分掉了对自己的宠爱，又凭仗儿子刘荣已被立为太子，拒绝了长公主的要求。自此，长公主与栗姬结下了怨仇。

长公主想让女儿做皇后的心思并未打消。她重新估计了形势以后，又看中了刘彘，就向王夫人提亲。王夫人正在寻找政治靠山。为了利用长公主的势力和影响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一口答应。刘彘小时候很聪明乖巧。一次，长公主刘嫖把刘彘抱坐在膝上，问他："儿想娶个媳妇吗？"刘彘回答："想。"长公主左右侍女成群，她把侍女指给刘彘，刘彘都说不喜欢。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女儿阿娇问他："阿娇好不好？"刘彘笑着说："好，若能得阿娇为媳妇，一定盖一座金屋子给她住。"长公主很高兴。王夫人工于心计，刘彘又极乖巧，所以，长公主坚持要求景帝答应这门亲事，景帝就同意了。

长公主让阿娇同刘彘定亲以后，就积极展开多方面活动，促使景帝立王夫人为后，立刘彘为储君。此后，她常在景帝面前称赞刘彘聪明，说王夫人识大体，诋毁栗姬，说她挟邪媚道，不可为后。景帝本来就嫌栗姬妒心太重，心胸狭窄，加上长公主不断称美王夫人，觉得还是王夫人贤能，很看重刘彘，又想起了王夫人怀彘时梦日入怀的贵祥征兆。

为了争位中宫，王夫人展开阴谋活动，挑拨景帝与栗姬的关系，以打击栗姬。在得知栗姬失去景帝宠爱以后，王夫人暗中派人挑唆太行向景帝建议，应册立栗姬为皇后。太行掌管接待宾客礼仪之事，不明底里，以为此事责无旁贷，就去奏请景帝："子以母贵，母

以子贵，今太子母宜号为皇后。"景帝本来就对栗姬不满，现在见栗姬又派人来向他要后位，被激怒，厉声斥责，杀了太行，拿定主意，不让栗姬做后，废掉太子。景帝初元七年(前 150 年)春正月，景帝不顾太尉周亚夫、太子太傅窦婴的谏诤，废太子荣为临江王。

栗姬不但未捞上皇后的位子，反而砸了自己儿子的储位，自此甚至连景帝的面都见不上了，愈思愈怨，恚恨而死。

梁孝王刘武虽经窦婴劝阻未能成事，后来景帝又立了栗太子，但是想做皇帝的心并未去掉。他恃宠骄慢，使用天子的旌旗车驾，出入侔于天子，招延四方宾客游士豪杰，罗致力量，打造弓弩兵器数十万，野心勃勃。栗太子被废以后，刘武又加紧了谋取皇位的活动。

开始，先由窦太后出面，向景帝提出立刘武为嗣。景帝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甚至已经退职家居养病的大臣袁盎还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家里直到京师长安进言不可。这样，窦太后的提议未能通过。后来，刘武就自己上书景帝，要求将来由自己嗣位，也因遭到袁盎等大臣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景帝初元七年(公元前 150 年)春正月，栗太子荣被废。四月，王夫人被立为皇后。过了十二天，刘彘被立为太子。同时，景帝以为刘彘"圣彻过人"，将刘彘改名为彻，后世一般称汉武帝为刘彻。

中元二年(公元前 148 年)三月，废太子荣因违法自杀。夏天，梁孝王刘武因为竞争储位失败，非常怨恨袁盎等大臣，派刺客暗杀了袁盎和反对的大臣十余人。景帝查明案情，派田叔等为专使，追捕参与暗杀阴谋的羊胜、公孙诡等。羊胜、公孙诡等都是刘武的手下，是受到刘武指使的。刘武将他们藏匿在宫中躲避搜捕，后来，见无法包庇，又杀人灭口，迫令羊胜、公孙诡自杀。景帝因此对刘武很不满，逐渐疏远了他，窦太后再也无法庇护刘武。刘武虽然因窦太后的缘故被免了罪，但失去了景帝和窦太后的宠爱，郁郁不乐，中元六年(公元前 144 年)，抑郁而死。

至此，在扑朔迷离的宫廷争夺中，一个一个的竞争对手因为种种原因都失败了。刘彘被立为太子，并且在栗太子和刘武死后巩固了地位。

现在的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太子的教育问题也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汉初政论家贾谊早就说过："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太子正则天下定矣。"景帝本人好黄老刑名之学，他为刘彻物色的老师却是有名的儒家学者卫绾。卫绾升为御史大夫后，传《诗经》的鲁诗专家、汉初有名的儒家学者申公的弟子王臧又被任命为刘彻的老师。这样，刘彻在幼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刘彻即皇位以后，他发的诏书能很熟练地征引儒家的经书，也把儒家称美推崇的唐虞尧舜之世、文武成康之道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刘彻被立为太子以后，极得景帝宠爱。周亚夫因为击败吴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常常恃功自傲。有一次景帝宴请周亚夫，席上无箸，周亚夫心中很不高兴，面带怨色。当时刘彻在坐侍陪，宴席期间，一直盯着周亚夫看。周亚夫被看得实在坐不住，愤而离席而去。景帝问刘彻，为什么目不转睛盯着周亚夫看。刘彻说："此人可畏，日后必当作虐。"后来，周亚夫因儿子犯罪受到牵连，景帝命狱吏审讯，周亚夫立有大功，做过丞相，又是列侯，受到侮辱闭口不对。景帝便改命廷尉拘审周亚夫，周亚夫不甘受辱绝食五日而死。

太子刘彻十四岁时，廷尉奏请景帝审批一件凶杀案：被告是杀人犯，名叫防年，被杀者是防年的继母。因为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防年就杀了继母为生父复仇。对于这件凶杀案，廷尉定性为杀母罪，判防年大逆。景帝怀疑定性判决不准确，就问刘彻，征询他的看法。刘彻分析说："通常说继母如同生母，也就是说继母同生母毕竟不同，只是由于父亲娶继母为妻，她才同生母一样罢了。现在防年的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那么，防年就同继母情断义绝，已不存在母子关系。所以应按一般杀人罪判刑，不应判为大逆罪。"分析头头

是道，景帝大为赞赏，认为有理，就采纳了刘彻的意见，按一般杀人罪判防年弃市。大臣们也都称赞判决准确。景帝由此更加器重刘彻。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驾崩于未央宫。当天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武帝，时年十六岁。王夫人为皇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刘彻继位时，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显出了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样的形势下，即位了一位幼受儒术、兴趣广泛而又年轻力壮的少年天子。这位少年天子颇想有一番大作为，建番大功业，特别希望能达到唐虞成康的圣世治道。这样，想要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少年天子就同崇尚黄老无为、坚持黄老政治的祖母太皇太后窦太后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孝武本纪》、《绛侯周勃世家》、《梁孝王世家》

《汉书》:《武帝纪》、《文三王传》、《外戚传》

《汉武故事》

窦太后好黄老

窦太后，文帝皇后，景帝生母，清河观津（今河北衡水）人。吕太后时，窦太后以家世清白的良家女身份被选入宫中。后来，吕太后放出一部分宫女赏赐给诸侯王，每个诸侯王各给五名宫女，窦太后也在其中。因为窦太后的老家清河同赵国比较近，所以，愿意到赵国去，可以离家更近一些。她叮嘱负责安排的宦官说，一定要把我安排到去赵国的队伍中，后来，宦官忘了这件事，误把窦太后安排到去代国的队伍中。名单报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临行之时，窦太后哭着不肯去，心中十分怨恨那个宦官，在别人的劝说下还是勉强到了代国。到代国以后代王（即文帝，当时文帝仍为诸侯王）很宠幸她，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嫖。孝惠七年（公元前 188 年），又生下了景帝刘启。

代王王后生了四个儿子，在代王还未被群臣拥立为帝之前，王后就死了。诸吕之乱被平定以后，代王被周勃、陈平、灌夫诸大臣拥立为帝，是为文帝。文帝被诸臣拥立为帝后，公卿大臣屡次请求预建太子，以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因为窦太后所生的儿子刘启年龄最长，被立为太子，窦太后也被立为皇后，女儿嫖被封为馆陶长公主。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窦太后所生的小儿子刘武被封为代王，后徙梁，被称为梁孝王。自文帝元年（公元前 179 年）被立为皇后，到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去世，窦太后共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四十五年。

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黄帝为名，以道家之

“道”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的黄老学派。黄老之学的代表作《黄帝四经》，1973 年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被发现。黄老之学的政治思想奉行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尊崇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指导秦代政治的理论是法家思想，这种崇尚耕战、法治和集权的思想既帮助秦统一了中国，又由于它的极端发挥不知变通而使秦朝丧失了天下。

经过秦末农民战争推翻暴秦的统治之后建立的汉朝，面对的是残破的山河，荒芜的土地，死亡过半和流离失所的百姓，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重新选择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是崇尚繁文缛节实行礼治的儒家思想，也不是崇尚道法自然消极无为的老庄思想，更不是崇尚循名责实、急政苛暴的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这样，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道贵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心理需要，成为汉初以来的强大社会思潮。从最高层的统治者帝王到下层的百姓，无论是在位的官吏还是在野的平民，都很容易接受这种政治思想。

汉文帝崇尚黄老之学，在政治上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生活上崇尚俭朴，反对浮华。窦太后的老家清河一带齐赵地方本来就是黄老之学极盛的地方，汉初笃信黄老之学的将相名臣中，有很多出生在这一地区。窦太后不但自己特别推崇黄老之学，还强迫作为太子的景帝和窦姓之人都来学习黄老之术。汉景帝亦很笃信黄老之学，他继位以后，继续奉行“贵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黄老政治。汉初诸大臣也大多崇奉黄老政治，如曹参、陈平、汲黯等。

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和批判法家思想的强大社会声浪中，不但确立了黄老之学的指导地位，而且儒家学派的势力也逐步恢复壮大。文帝时，儒生贾谊就向文帝提出了诸如改正朔、易服色、巡

狩、封禅等事，遭到崇奉黄老之学的元老重臣的一致反对，文帝本人亦奉黄老之学，贾谊的建议未能实行，贾谊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廷。但是儒家思想和儒家势力仍然在一步步抬头。

景帝时，儒学同黄老之学产生了正面冲突。儒经博士辕固生同黄老学者黄生展开辩论，辩论的议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而王还是以臣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除桀纣是受命而王，不是以臣弑君。桀纣暴虐无道，已经失去了天下百姓的拥戴，而汤武正是顺了天下百姓的心愿讨伐桀纣的，受桀纣统治的百姓不服从其统治而归往汤武，汤武不得已才立为君王，这不是受天命而王是什么？"论证的路线显然顺着儒家从周公"以德配天"、孔子"仁政""德治"到孟子"王道""革命"的原则。黄生则反对说："帽子虽破终究戴在头上，鞋子虽新毕竟踩在脚下，原因在于有个上下等级的分别问题。桀纣虽然暴虐无道，然而终归是君上，汤武虽然圣贤，仍然是臣下。君王有了过失，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崇天子，反而因为他有过失而诛杀，这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反驳说："一定要像你说的那样，高皇帝伐无道诛暴秦得为天子，也是不对的了？"汉景帝只好出面说："吃马肉不吃马肝（因为马肝有毒），不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学者不争辩汤武革命，不能算是愚昧无知。"

窦太后好黄老，平素很看不起儒学和儒生，讨厌他们的浮华，空言太多，不务于实。她听说辕固生同黄生争辩"汤武革命"这件事后，就召问辕固生，问他对黄老之学的看法。辕固生竟然对窦太后说，那是家内奴仆看的书，气得窦太后勃然大怒，骂儒家的书是那些犯罪的人看的书，然后，命令辕固生下到猪圈中击杀野猪。景帝知道窦太后发了怒，偷偷地给了辕固生一把利剑。辕固生下到猪圈，刚好一刀就刺中了野猪的心脏，野猪应手而倒。窦太后这才消了气。

汉武帝即位以后，这位自幼即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即着手组织以儒者为宫廷及军政辅弼的高级领导层。他起用老师

卫绾为丞相，还封王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武安侯田蚡同汉武帝一样，也是个爱好儒术的人。建元元年(公元前144年)冬十月，汉武帝即下诏征举贤良方正之上探讨治国的大政方略，选拔有才能的人特别是儒生。各地前来对策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是学法吏之术和纵横家之学的。丞相卫绾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商鞅、韩非和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罢黜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

卫绾建议罢黜的对象，虽主要是法家和纵横家，但已露出了统制思想、禁绝百家而独尊儒术的苗头。黄老之学虽是从道家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但政治思想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家的理论，同法家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所以，黄老政治才被人评为"外有轻刑之名而内实杀人"。这样，打击的矛头实际上已经指向黄老之学。这是为崇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所不能忍受的。不久，卫绾就被罢除了丞相职务。

卫绾被罢相以后，汉武帝任命窦婴为丞相，窦婴也是个好儒术的人。在好儒术的窦婴、田蚡的引荐下，著名儒家学者申公的弟子赵绾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申公的另一个弟子王臧被任命为郎中令。窦婴、田蚡、赵绾、王臧这些好儒术的人，议论说应建立明堂、草拟巡狩、封禅，改定历法、服色等。武帝就请他们在长安城南设立明堂以朝诸侯，草拟演习巡狩、封禅，改定历法、服色。这班儒者又推荐他们的老师申公作指导。当时，申公年已八十有余，武帝对他很尊重，派使者带着很丰厚的礼物，用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进京。武帝任命申公为中大夫，让他做顾问指导赵绾、王臧。

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是这班儒者兴儒活动的一个最大障碍。这个新起的儒者集团借故检举好黄老的诸窦宗室，除掉他们的宗籍。这些人自然很不满，就跑到窦太后那儿去告状，说儒者打击黄老。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冬十月，赵绾向汉武帝建议，奏请诸

事不必请示东宫太后，要夺窦太后的权，这大大激怒了窦太后。她暗中派人查得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就去责问武帝。武帝压不过祖母，只好低头。结果，赵绾、王臧下狱自杀，窦婴、田蚡也被免去职务。儒者同黄老之学的斗争遭到重大挫折。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去。这样，好儒术的田蚡复出，当了丞相，大搞反攻倒算，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纳文学儒者以百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诏举贤良方正，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儒家学说最终战胜了黄老之学成为西汉的政治指导思想。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儒林列传》、《外戚世家》

《汉书》:《儒林传》、《外戚传》、《武帝纪》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黄老之学不像儒、法、墨等学派，一味禁止别家，它的宽容性较大。所以，黄老之学兴盛之时，其他学派并没有失去生存的余地。窦太后尽管打击了儒家，却并没有禁绝儒家。同时，窦太后毕竟年事已高，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操持。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汉武帝在学官中为儒家设立了五经博士。儒家的五部经典《易》、《书》、《诗》、《礼》、《春秋》，《书》、《诗》、《礼》文帝已立博士，景帝立《公羊春秋》博士，武帝立《易》博士。这样，儒家五经典全部立了博士。儒学势力仍然很大。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去。喜好儒术的田蚡复出，当了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招纳文学儒生以百数；紧接着，又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下令郡国荐举孝廉各一个。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诏举孝廉，且有定制、定员，可以使儒生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僚队伍，保证了官僚队伍的儒学化，推进了儒术的深化。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下诏诏举贤良文学。儒学大师董仲舒应诏对策，深得武帝赞赏，连发三策，策问天人性命之情，古今治乱之道。董仲舒连上三策应对，史称“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的末尾，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约生于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卒于元封、太初间，寿约九十岁，汉代经学大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董仲舒幼受《公羊春秋》，景帝时被立为博士，

弟子门人众多，传相授受，有的弟子甚至从未见过他的面。董仲舒求学，用力甚勤，三年未曾窥园，名闻学官，学士都愿以他为师。

“天人三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董仲舒思想的精华。

汉武帝下诏说：“朕继位以来，颇感任大而守重，因此夙夜不得康宁，惧怕有所缺失。因此，广泛延纳四方的豪杰俊秀，郡国诸侯也推选修絜博习之士，想知道大道的根本道理，高明理论的枢机之要。你们被举为前列，请精心致思，我垂听而问。”

然后，汉武帝出了他的题目：“听说，王帝三王之道，改礼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周代之乐莫盛于《勺》。圣王已没，而钟鼓之声未绝，却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有桀纣之行，王道大坏。五百年之间，当涂之士，守文之君，想奉先王之法而有益于当世的人甚多，然而大道日以仆灭，难道是因为他们操持有悖谬而失去了它的法统吗？还是天所降命根本上就无法复反，一定要到衰落之极才停止呢？呜呼！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难道无补于世吗？三代相受天命，它的符在哪里？灾异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性命之情，或寿长或夭折，或仁义或卑鄙，不知道它的道理何在。”

以上汉武帝向贤良提出了天地变化、人类发展、王朝兴替、人性人情的根本规律，实际上是自先秦以来人们一直探讨的“天人”关系的根本命题。应当说，问题提得相当有水平。然后，汉武帝又说：“我想使社会风流令行，刑轻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行何修才能使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及草木，三光得全，寒暑得平，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到方外，遍及群生？请你们不要有所隐瞒，从细说来，我将亲自观览。”

董仲舒上对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欲求天命与性情的根本道理，此非愚臣之所能及。从《春秋》来看，观天人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必先出灾害加以谴告；如果不知自省，再出

怪异以警惧；如果仍然不知，伤败就接着到了，以此来显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败乱。关键在强勉而已，若强勉行道，则恩德日起而大有功。《诗经》所说'夙夜匪解'、《书经》所说'茂哉茂哉'说的都是强勉的意思。"

接着，董仲舒开始正面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所谓道者，是治的根本，仁义礼乐是它的表具。所以，圣王已没，而子孙能安宁长久达数百岁的原因，在于礼乐教化之功。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所以，王者功成而作乐，乐是歌其恩德的。乐就是为了变民风、化民俗的。所以，声发于和而本于人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所以，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绝也。人君没有不想安存而恶危亡的，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关键在于任非其人，由非其道，因此，政治日以仆灭。周道衰于幽厉之时，并不是说周道坏了，关键在于幽厉行非周道。到了宣王，兴滞补弊，周道粲然复兴。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治乱之道的关键在自己，并不是天降命不可得反，而是操持悖谬失去了它的道统。

"我听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招致而自至的，这就是受命之符。天下之人同心归往，若归父母，所以，天瑞应诚而至。到了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叛，残贼良民以争地盘，废德教不用而专任刑罚。刑罚不正中则生邪气；邪气累积于下，怨恶则蓄积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错谬而生妖孽。这就是灾异所缘而起的根本。

"所谓命者，就是上天的命令；所谓性者，就是人生的本质；所谓情者，就是人的欲望。或夭或寿，或仁或鄙，是陶冶而成的，不可能一样纯美。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尧舜行德政则民仁寿，桀纣行暴政则民性鄙夭。关键在于上如何教化于下，如同陶瓦熔金一样。

"我案查《春秋》的章法，寻求王道之开端，得之于正。王者应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治，阴为刑

杀。阳主生育养长，阴处空虚无用之地。所以，上天任德不刑。王者承天意以行政事，所以应任德教而废刑罚。现在，废先王德教之官专任执法之吏以治民，难道不是任刑之意吗？虐政用于下，而欲想德教广被四海，实在难于成功。所以，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则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就不会有奸邪之气充斥于其间。这样才会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群生和合万民生殖，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天地之间共受润泽而获大丰美，四海之内皆闻盛德而归附，则王道终矣。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高位，操权势，有贵资，行高恩厚，知明意美，爱民好士，可谓谊主。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之物不来的原因何在呢？关键在于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犹如堤防，教化立则奸邪止，教化废则奸邪出，刑罚不能禁止。所以，古之王者治天下，必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都，设庠序以化于乡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所以，刑罚甚轻而民不犯禁，关键在于教化大行而习俗丰美。

“周之末世，大为无道，失去天下民望。秦继其后，并不能改正，反而加重，禁文学，弃礼谊，尽灭先王之道而为专恣之治，所以，立为天子仅十四岁而国家破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汉继乱秦之后，虽欲善治，也无可奈何。为政不行，应当改变而更化，才可施行。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也不能善治。所以，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治者，关键在于应当更化而没有更化。古人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已经七十余岁了，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然后可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遍及群生。”

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对策觉得很突出，就再下一策策问说：“据说虞舜之时，游于严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而周文王至于日不暇食，宇内亦治。难道帝王之道不是同条共贯吗？为什么劳逸相差如此悬殊？帝王之道其旨趣也有差别吗？有说良玉不用

雕琢，有说非文教无以辅德，两种说法不同。呜呼！朕继位以来，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然而，仍然阴阳错谬，氛气充塞，黎民未济，廉耻相乱，贤不肖混淆。而今子大夫待诏之七百有余人，所论世务而未济，考诸上古有不同，观之于今难施行，难道是拘牵于繁文系辞而不能驰骋纵论吗？还是出于道术不同，所闻殊方呢？请不要有所避隐，从根本道来。”

董仲舒再上一策，对说：“据说尧受命之时，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之臣，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尧崩，天下归往舜，舜知不可躲避，乃即天下之位，以禹为相，因此得以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智，残贼百姓，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贤用圣，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聚于朝廷，天下归往。当时，纣尚在上，尊卑错乱，百姓散亡，文王痛悼而欲安天下百姓，所以，日不暇食。帝王之条贯是相同的，然而劳逸相异者，关键在于所遇到的时世是不同的。孔子所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讲得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有良玉不琢，在于资质润美，不需刻琢，实在无异于达巷党人之不学而自知。然而，常玉不琢，则不成文章；君子不学，则不成其德。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极群下之智，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已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之远，悦德治，归礼谊，这就是太平之致。然而，功未加于百姓者，恐怕在于王心未加。愿陛下用其所闻，设诚于内而施行于方外，则于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忧劳万民，务求贤圣，这也就同尧舜的用心是一样的。然而，据说却未获贤圣，这原因在于平素劝勉贤士不够。平素不善养士而欲求贤，如同不琢玉而求文采一样是不可能的。而养士之大，莫过于太学。太学是养贤士的关键、教化的本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而竟然有无一应对诏书的，证明王道已经断绝了。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善养天下之贤士大夫，考问以尽

其材，则英俊可得。今之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帅。师帅不贤，则主上的恩德不宣，无法泽及百姓。今官吏不用教化，不奉主法，暴虐百姓，与奸勾结，贫穷孤弱，冤苦失职，很不合陛下之意。因此，怨气怒积于上，致使阴阳错谬，氛气充塞，黎民未济。这全都是长吏教训不明造成的。

"现在的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二千石子弟任为郎吏，加上訾选为郎，未必有什么贤能。官吏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因此，廉耻贸乱，贤不肖相混淆。愚以为使诸侯、郡守、二千石择吏民贤能的，每年贡举二人以供给宿卫，以观察大臣之能力。贡举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能尽心求贤。若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世易为，尧舜之美名可及。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董仲舒二次上对，汉武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索性再发一策，将继位以来思考的难题统统向董仲舒提出，问个明白。汉武帝发第三策问道："人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所以，朕要问天人之间的感应，上嘉唐虞之道，下悼桀纣之败，追问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三王之教所始不同，皆有所失，人又说久而不改者道也，意思难道不一样吗？请详细探究，反复道来。"

董仲舒第三次应对说："《论语》载：'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现在陛下幸而加惠，求道根本，自非愚臣所及。据我所知，天是万物之祖，所以能普遍包涵而无所遗漏，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所以，圣人法天立道，博爱无私。春天，是天生万物时节，而仁也是人君对百姓的爱护；夏天，是天长万物的时节，而德是人君对百姓的恩养；霜降，是天对万物的杀伐，而刑罚也是人君对百姓的惩罚。由此观之，天人相应，古今同道。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诸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所以，凡《春秋》所讥，必是灾害所加；凡《春秋》所恶，必是怪异所施。记载政治的过

错，兼记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与天地之变往来相应。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能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能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能节制。因此，王者必上承天意，以顺命；下明教化，以成性；正法度，别上下，以防欲。能修行这三项，则大本已举。人受命于天，有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五谷以食，桑麻以衣，服牛乘马，得天之灵，贵于万物。所以，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

"我听说，积小成巨，聚少为众。所以，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善积而名显，德彰而身尊。这就是寖明寖昌之道。积善在身，若身之日日以长而不自知；积恶在身，若火之燃油而人人不见也。善恶相随，若影形相从。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智隐伏，恶日显，国日乱，至于大败。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

"据我所知，乐而不乱、复而不厌的就是道。道是万世无弊的，弊是失了道才造成的。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并不是专门为了相反，目的是救溢扶衰，遭世而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夏代尚忠，殷代尚敬，周代尚文，在于继世救弊，需要用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古之天下亦犹今之天下，共处一天之下，而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无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本，泽被四海，以古准今，相差太远！是失去了古之道呢？还是有违于天之理？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可见吗？

"据我所知，天受大不取小；所以受禄者，不食于力，与天同意。已受大，又取小，连天都无法满足，何况人呢？而今，身宠居高位者，乘其富贵之资力，与民争利于下，民安如之？是故民日以大穷。富者奢侈，贫者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不乐生，则不避死，又安能避罪？所以，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得与民争利，然后利可均布，民可家足。这就是上天之理，也是太古治世之道。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祸患必至。"

鉴于当时思想不统一的情况，董仲舒在对策的末尾，还建议

说："《春秋》大一统之意，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学士师异道，大夫持异论，百家殊闻，指意不同，因此君上无法持一统；而法制数变，群下不知所守。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禁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了，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老百姓才知道所从。"

对策完毕以后，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应对十分赞赏，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在政治中表彰儒家，厉行察廉举孝，将一批儒生推进到官僚队伍中，实现官僚队伍儒学化，保证了儒学的独尊地位。

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冬十一月，汉武帝再下一诏说："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是五帝三王昌盛的根由。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下诏执事，务劝其兴廉举孝，绍休圣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而今至有阖郡不荐一人，因此，教化不下究，积行之君子不得上闻。二千石长官纪纲人伦，何以辅佐朕烛照幽隐，劝善百姓，崇乡党之教化？"

礼官、博士等有司建议说："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长官举孝廉，目的是为了教化元元百姓，移风易俗。不举孝子，不奉诏书，当以不敬论处。不察廉吏，是不胜任职务，当免官。"汉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下诏强令各地察举孝子廉吏。

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汉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公孙弘由布衣因儒术平步青云，直登三公之位。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公孙弘又代薛泽为丞相，登上官僚最高位。

公孙弘为丞相后，深得武帝信任。就在这年六月，汉武帝再下一《劝学诏》，继续尊崇儒术。武帝下诏说："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所以，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引进朝廷，令礼官劝学，讲义洽闻，举遗文，兴礼乐。请太常议定为博士置弟子员，以风化乡里，奖励贤才。"

于是，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人研究，拟定了详细的太学制度。这样，独尊儒术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证。太学制度规定："博士官为儒家五经博士，其他诸学不得教于太学。博士弟子，员数五十。博士弟子待遇，免去本人徭役。选举主办机构，太常衙门。年龄，十八以上。选试办法：由太常选择年龄十八以上仪表端正的，送太学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邑、官府属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行为端正的，逐级上报郡守、诸侯相，考察合格，随同上计官吏到京师太常衙门，人太学，得受业如同博士弟子。修学一年，凡通一艺以上，得补文学掌故；优秀俊异的，可补郎中。俊秀随时上报。不认真的，一年不能通一艺的，罢而不用。"

自汉武帝即位始的尊儒活动，至此赢得彻底胜利。儒术在中国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虽经佛道冲击而未改变，根子可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一系列的独尊儒术措施和活动。儒术虽经窦太后压制，但终于还是占了上风。经过立五经博士，举孝廉诏贤良，特别是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全面回答了汉武帝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确立了儒家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解开了汉武帝的疑难，正面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随后，武帝又重用儒生公孙弘，使他平步登公卿之位，对于士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公孙弘和孔臧等制定的太学制度，又在教育系统中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整个过程来看，兴学以教化百姓，是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求得思想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治统一，实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由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走向思想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点，已经由百家争鸣最终形成了君主专制主义的时代思潮而得到了证明。百家争鸣中，许多学派都希望罢黜他说，独尊己见。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并没有完成思想的统一，不但秦朝遭到覆亡的命运，而且法家理论威风扫地，无法承担官方思想的任务。黄老之学虽有窦太后提倡，结果也

回答不了历史提出的课题。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从“天人”相应，社会规律、自然规律演变的高度回答了这个问题，满足了汉武帝的要求，也满足了当时时代的要求。这个回答是有高度的。百家的罢黜、儒术的独尊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一个帝王、一个思想家决定的。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成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思想，也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主干地位，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某些独特传统。倡“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虽遭千灾万劫，终能维持统一。因而，独尊儒术为国家统一，民族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武帝用利禄的办法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压抑百家的发展，造成千人一面、万口一辞的一刀切现象，有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礼教严重限制了个性发展，压抑了人性。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

秦始皇“焚书坑儒”用武力消灭办法干预思想发展用之于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官禄利诱办法干预思想发展行之于后，两者都是用政治干预学术，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从历史来看，既破坏了学术，也损害了政治。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武帝纪》、《公孙弘传》、《儒林传》、《董仲舒传》

武帝设十三州部

武帝继位以后，大事兴作，尊儒兴学，开边拓地，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一方面，骄纵不法的豪强宗右侵害百姓，肆意兼并；另一方面，郡守二千石长吏失职、残暴，他们与富商豪强相互勾结利用，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武帝开始巡行郡国。到河东(今山西夏县)郡，郡太守根本没有想到武帝会巡行至此，因没有准备，办事不力被迫自杀；又巡行至陇西(今甘肃临洮)，陇西太守率卒往迎，汉武帝随从竟然不得饭食，陇西太守被迫自杀。随后，武帝又率骑从数万北出萧关，大猎于新秦中，发现新秦中地区竟然千里无亭徼，于是，武帝怒面诛杀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武帝以为百姓流离失所，全是官吏勾结强宗豪右作恶多端的结果。

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四月，封禅归来，武帝来到黄河决口处，命汲仁、郭昌率卒数万修治黄河，终于堵塞决口。事后，武帝作《瓠子歌》斥责河神不仁泛滥害民，表达自己思虑国计民生的焦虑心情，最后说“不封禅兮安知外”，反映出对不法地方官吏的不满。

元封四年(公元前 107 年)，关东出现流民二百万口，无籍、脱籍的有四十万。丞相、御史大夫公卿朝议，请求将流民迁徙到边远地区以谪戍边防。汉武帝勃然大怒，将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的公卿大臣送诏狱加以治罪，又下诏丞相石庆，斥责他说：“以前，黄河决口，泛滥十余郡，加面堤防，不能堵塞，朕甚忧之。所以，朕出巡四方，礼嵩岳，通八神，济淮江，历山海，问百姓疾苦。百姓都说是官吏

私求无已，征发无限，去者便，居者扰。后来，朕封泰山，考校闾里，得知官吏为奸恶于下，使朕未能承顺上天之意。委任有司，则官旷民怨，盗贼公行。现在流民愈来愈多，而官吏上计的文书却无更改。作为丞相，你不去绳责长吏，却请求迁徙兴动百姓四十万口。百姓何罪?”武帝以为，天下不治，百姓愁苦，盗贼公行，原因在于郡守二千石官吏作恶多端。

为了加强对地方长官的监察，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下令设立十三州部，每一州部为一监察区，设一刺史监察所在州部郡国，创立刺史制度。州部刺史的督察对象主要是所属郡国的守相二千石长吏，督察的范围是“以六条问事”，六条以外，则不问。这六条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戳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置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从这六条看，除第一条是针对不法的豪强宗右，其余五条都是以郡国守相二千石长吏为督察对象的。其监察范围涉及政治方面的不奉诏书，选举方面的用人不公，司法审判方面的以喜怒任赏刑，甚至还涉及到二千石长吏的子弟骄纵不法。

十三州部刺史的秩品并不高，仅为六百石，相当于一个中下等的县令，而权力极大，可以监察守相等二千石高官而无所顾忌。刺史每年八月巡行郡国，年终回到京师向中央汇报。刺史内隶于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还要受到丞相司直的监督。武帝对于刺史的选用非常严格，一般是通过辟举高第，或选现任官吏政绩显著、忠直高节者担任。

十三州部所监隶郡国及范围分别如下：

豫州刺史部：颍川、汝南、沛郡，梁国，共监三郡一国。

兖州刺史部：陈留、山阳、济阴、泰山、东郡，城阳、淮阳、东平国，共监五郡三国。

冀州刺史部：魏、钜鹿、常山、清河郡，赵、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国，共监四郡六国。

徐州刺史部：琅邪、东海、临淮郡，泗水、广陵、楚、鲁国，共监三郡四国。

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齐郡，淄川、胶东、高密国，共监六郡三国。

荆州刺史部：南阳、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国，共监六郡一国。

扬州刺史部：庐江、九江、会稽、丹阳、豫章郡，六安国，共监五郡一国。

凉州刺史部：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共监八郡。

益州刺史部：汉中、广汉、犍为、越嶲、益州、牂柯、蜀、巴、武都，共监九郡。

幽州刺史部：勃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涿郡，广阳国，共监九郡一国。

并州刺史部：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共监六郡。

朔方刺史部：朔方、北地、五原、西河、上郡，共监五郡。

交趾刺史部：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共监七郡。

十三州部以外的三辅、三河、弘农郡，由司隶校尉直接监察。

武帝所设十三州部刺史并无固定的治所，只是巡行郡国，年终回朝汇报，也没有固定的掾属和幕僚，仅从二千石府吏与从事中择得随员。元帝时，经丞相于定国上奏，开始为州部刺史设置随员，有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刺史开始有固定的掾属和幕僚机构。

成帝时，经何武、翟方进上奏，改刺史为州牧，提高秩品，由六百石提高到二千石，并开始拥有选举官吏的大权。哀帝时，州部刺史的督察范围由二千石守相扩大到六百石以上的长吏，并开始操纵朝政，把持选举，结党营私。许多刺史开始突破"六条问事"的范围，逐渐侵夺郡县的职权，掌握了一部分行政权力。

王莽代汉后对西汉制度颇有改变。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设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位等三公，刺史已不再是监察官，而是拥有统兵权力、位尊权重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个制度为光武帝刘秀所承用，刺史权力进一步扩大，开始参与地方政务，行使民事权，并取消武帝时期刺史、州牧年终回京奏事的规定，改为把出巡情况同州郡每年的上计一同汇报。州牧、刺史日益地方官化，州部也逐渐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另外，光武帝刘秀还允许州牧自辟掾属，东汉初年州牧掾属的设置和职掌也与地方官属吏相同。光武帝刘秀后来虽罢州牧、置刺史，恢复和加强刺史的监察职能，但刺史实际上已被固定为地方官，其主要职能已是处理地方政务。东汉的刺史拥有庞大的幕僚机构，其幕僚掾属已分别主管钱谷、兵马、选举等地方行政事务。明帝开始，刺史又获得领兵作战的权力。东汉中叶以后，刺史监察地方的职能逐渐丧失。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采纳太常刘焉的建议，以重臣出领州牧，州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正式成立，中国地方政治制度遂由郡县二级制一跃而成为州、郡、县三级制，监察官逐步演变为地方行政官成了中国地方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规律。

汉武帝创设的刺史制度，以秩卑的刺史而监察位高的二千石长官，可以保证刺史有举察之勤而无侵凌之衅，可以收到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效果，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称赞。不过，秩卑的刺史能监察位高的长官而敢无所畏忌，是因为它受到了最高权力皇权的支持。而正由于这一点，皇权不断赐予它更大的权力，它最终就不能不侵夺所监察对象地方长官的权力，终于成了一级地方行政机

构，形成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重大演变。

（张元城）

参考资料：

《汉书》：《武帝纪》、《沟洫志》、《于定国传》、《石庆传》、《何武传》、《翟方进传》、《王莽传》、《百官公卿表》

《后汉书》：《光武帝纪》、《百官志》、《刘焉列传》

《文献通考》

群臣进谏

汉武帝继位之后，全面改变西汉初期以来实行的“黄老无为”政治，实行“儒表法里”的“多欲”政治。他一方面尊儒兴学，立五经博士，设太学，征贤良，举孝廉，设乐府，辑佚书；另一方面，又重用酷吏，四处游历，开边拓地，设宫馆，建苑囿，祀神求仙，希图长生不老。因此，群臣时时向武帝进谏。不过，对于群臣的进谏，武帝虽表示嘉奖，很少有听从改正的。

武帝继位初期，喜好游猎。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武帝开始带领大批随从，出长安城游猎，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至长杨，东至宜春。八九月中，武帝常下诏陇西六郡良家子期诸殿门，以随从出游，武帝自称平阳侯。每晚夜间出发，天亮，至终南山下驰射鹿猪狐兔，甚至亲自与野兽搏斗，踏坏百姓稼禾。老百姓号呼痛骂，告入县官。随从诸骑展示皇帝舆物，才得解脱。武帝常带五天的食粮，以尽兴游玩五天，然后，回来朝见太后。因为惧怕太后，武帝尚不敢出游太远。丞相御史知道武帝常夜间出行游猎的消息后，就令右辅都尉在行猎近处设置了十二所离宫别馆，专供武帝打猎休息之用。

汉武帝以为路远劳苦，又为百姓疾恶，就令太中大夫吾丘寿王规划将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土地，划入上林苑，专供打猎之用；又让中尉和左右内史测量属县草田，以作补偿。当时东方朔正在旁边，就进谏武帝说：“南山，是天下险要之所，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陇以东、商洛以西的土地都是良田沃土。秦正是依靠此地得以称霸西戎，东并六国。山上富有玉石、金、银、铜、铁等矿藏，都

是百工所取、万民所仰之物，又富产秔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百姓得以富足无饥寒之忧。丰镐之间土地肥沃，号为亩值一金。现在，将这些地方规划为猎苑，断绝山泽之利，掠取百姓膏腴之地，上使国家所用之物匮乏，下夺百姓桑麻之业。况且，为狐兔虎狼群兽增开苑囿，却要坏人坟墓，毁人室屋，幼弱啼泣，耆老心悲。这实在不是强国富民之道，甚不可取。"

东方朔进谏以后，汉武帝升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禁中，并赐金百斤，然而，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照样规划设立上林苑。

武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嫁堂邑侯陈午。陈午死后，窦太主寡居，年已五十，宠爱男童董偃，出则执辔，入则侍内。因为公主的缘故，京师诸公加以礼遇，名称城中，号为董君。董偃又劝公主献出武帝喜爱的长门园，汉武帝很高兴，董偃也愈加受到公主的宠爱。

董偃想求见武帝，就让公主称病不朝。武帝前去探视，问公主有什么要求，公主说只希望武帝能驾临其家。馆陶公主病愈以后，武帝驾临其家。公主身穿贱役的衣服亲自为武帝服务。武帝说："想谒见主人翁。"馆陶公主赶紧谢罪："我无面目见皇上，有负于陛下，罪当死。"武帝下诏免罪。公主引见了董偃。于是，董偃名闻天下，游士多从。后来，董偃常常随从武帝游玩。武帝很高兴，就在宣室正殿为公主设酒宴款待，让谒者领董偃入内。

当时，东方朔为郎，执戟殿下，将戟扔在一边，上前进谏说："董偃有可斩之罪三，怎么能让他入内呢？董偃以人臣身份而与公主私通，一罪；败男女风化，乱婚姻之礼，破坏国家法制，二罪；陛下正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道之事，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声色之欲，行邪枉淫辟之道，是国家的大贼，三罪。"听了东方朔的进谏之词，汉武帝默然不应，过了许久，才说："我已经设好了酒宴，过了这次以后，我再改吧？"东方朔坚持说："不行。宣室是国家正殿，先帝设立的正处，不是法度政事不得入内。淫乱之事渐积而多，必生篡变。"汉武帝想了想，还是采纳了东方朔的谏

言，将酒宴改在北宫进行，把董偃由东司马门引入，并将东司马门改名为东安门；同时，赏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从此，汉武帝也不再宠爱董偃。

武帝继位以后，极尽声色犬马之欲，大兴土木以侈造宫馆楼台，社会风气日趋侈糜，百姓多离田亩。他曾从容地问东方朔："我想教化百姓，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东方朔趁机进谏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事，我不敢说。近如孝文皇帝之时，身衣弋绨，以韦带剑，莞蒲为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天下百姓望风而从，靡然成俗，昭然而化，而今陛下当政，以城中为小，起建章宫，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土木衣绮绣，狗马被缋罽；作俳优，舞郑女。陛下淫逸奢侈如此，而希望百姓独不奢侈，事情恐怕难以办到。"

东方朔虽然诙谐谈笑，然而屡屡加以直言极谏，武帝也常常听从。

武帝继位后，好儒术，很羡慕儒家称颂的唐虞禹汤文武之世，想行王道于世，因此，常常说"吾欲"云云，引起朝廷中好黄老之术的元老重臣汲黯的反对。汲黯，先祖有宠于卫国君主，世为卿大夫。汲黯以父任为郎，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继位以后，汲黯任为谒者。汲黯喜好黄老无为之术，对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很看不惯。又因为为人性情质直，常常当面直谏武帝，弄得武帝在群臣面前下不来台。

汲黯因为屡次直谏，闹得武帝很不高兴，不得留于朝中，被排挤出朝廷，任为东海太守。汲黯身体多病，常居屋内不出门。然而，汲黯治官理民，信奉清静而民自定，治理政事，责大指而不苛求细小之事，一年以后，东海郡大治，为人称颂，名声传入京师。于是，武帝召回汲黯，任他为主爵都尉。

汲黯当面对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法唐虞治世呢？"武帝勃然大怒，一怒之下就罢了朝。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但汉武帝也只是说，"汲黯也太憨了"，还称颂他"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汲黯，则相近了”。

汉武帝重用法吏之士张汤，于是，酷吏一个个走上政治舞台，使得汲黯非常不满。他常常与张汤展开争辩，对着武帝的面斥责张汤，说张汤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抑制天下的邪心，却乱改高皇帝的法度，必定自此后灭种。

汉武帝发大兵征伐匈奴，怀招四夷，而汲黯务求少事，常常谏言武帝，应当与匈奴实行和亲的政策。武帝不听，又将汲黯排挤出朝廷，任命他为右内史。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附，武帝征发车辆三万乘前去迎接。老百姓不肯出马，将马藏匿，马匹不够。武帝大怒，欲斩长安县令。汲黯直言极谏说："长安县令无罪，斩杀汲黯，民才肯出马匹。"浑邪王归附后，长安市中商人坐死者五百余人。汲黯到高门殿进谏说："匈奴断绝和亲，侵伐中国。今中国兴兵讨伐，死伤无数，费以万计。我还以为陛下得到胡人，会全部当作奴婢以赏赐从军死难的军士家属。今纵然不能得匈奴以谢天下百姓，却用深苦的法律杀死无知的百姓五百余人，窃为陛下不取。"汉武帝不听从汲黯的意见，批评汲黯说我好长时间听不见汲黯的声音了，现在又在妄发了。

汉武帝的多欲政治，由于弊端甚大，不但信奉黄老的汲黯很看不惯，就是"缘饰以儒术"的御史大夫公孙弘也觉得难以实行。武帝之时，为开边拓地，屡兴功作，造成国家财政亏空。北伐匈奴，南通西南夷，又征伐南越，东置苍海郡，北筑朔方城。公孙弘以为，劳师远征，使中国疲弊，去追求无用之地，实在不足取。他出使西南夷，回来后说西南夷一点用处也没有，武帝对他很恼怒。公孙弘又数次谏诤武帝，建议罢苍海郡，毁朔方城不用。武帝命近幸之臣朱买臣前去责难公孙弘，公孙弘无法对答，只得说自己实在太鄙陋，不能像汲黯那样犯颜极谏。

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政策在朝廷中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甚至游

说的学士、平民百姓也看到了它的大弊端。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他上书武帝,极言匈奴不可伐,谏诤武帝停止征伐匈奴。

主父偃说:"我听说,开明的圣主不厌恶直言极谏以扩大视野,忠诚的臣子应不怕重罚以直谏,因此,政事才能无遗漏,功业才能流百世。《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战务必求胜,穷极武事,没有不后悔的。秦始皇帝吞并六国,蚕食天下,统一海内,功劳超过了三代,曾想征伐匈奴,李斯进谏说:'不可。匈奴之人无城郭居室,无蓄积之守,像飞鸟一样迁徙,难以制服。若轻兵深入,粮食乏绝;运粮行事,远远不够,实不可行。得其地,不足为利;得其民,不可治理,实在无用。'秦始皇帝不听,使蒙恬领兵却胡,辟地千里。土壤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征发天下丁男北守黄河。暴兵露师十余年,死者不可胜数,仍无法逾河北攻。并不是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关键是形势不允许。使天下飞刍輓粟,从黄、腄、琅邪之郡运粮北方,三十钟才得一石。终于,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帷幕。百姓疲惫,天下开始反叛秦朝。高皇帝平定天下,略地开边,听说匈奴聚于代谷之外,准备出击。御史成进谏说:'不行。匈奴人像野兽一样集聚,像飞鸟一样逃散,击匈奴如同跟阴影搏斗,毫无所成,臣以为不可。'高皇帝不听,北伐匈奴,终于造成平城之困。所以,高皇帝后来很后悔,就派刘敬前去缔结和亲,天下才没有了干戈之事。兵法上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朝常在北方积众数十万人,虽覆军杀将,然而却不足以抵偿天下的耗费。匈奴人行盗侵略,是其天性,上自虞夏商周以来,就不加以督责,只是像畜养禽兽那样对待,不拿他们当人看。况且,战事长了就会发生变故,百姓疾苦则思虑变作。愿陛下仔细考虑,详尽观察。"

主父偃的上书递达武帝以后,立即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并任命他为郎中。后来,主父偃一年之中四次升迁。然而,武帝终究还是未采纳他停止征伐匈奴的谏诤。

由于武帝奉行开边拓地，大兴功作，重用酷吏的政策，社会矛盾很尖锐，加以天灾不断，社会局面出现严重的危机。同主父偃一同上书武帝，进谏武帝要注意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还有徐乐。他上书武帝说，现在天下已有土崩之势。

徐乐说："天下大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是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陈涉无尊位封地，也不是名门望族之后，没有贤能，也没有财富，然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原因何在呢？是由于百姓贫困而主上不抚恤，下怨恨而主上不知，风俗已坏而政治不修明。所谓土崩，就是指此。这才是天下的大患。什么是瓦解呢？七国叛乱朝廷就是。七国谋叛，号称万乘之君，战士数十万，财富倾动天下，然而，终归不能得尺寸之地，终于败亡。原因何在呢？关键是先帝的恩德未衰，百姓安土乐俗，叛乱的诸侯王得不到百姓支持。这就是瓦解。所以说，天下之患不在瓦解。土崩瓦解之势，是天下安危的关键，圣贤的君主应留意于此而仔细考察。

"前些日子，关东地区五谷数年不丰，百姓多穷困，再加上边境战事的压迫，百姓已经不安家园了。不安则易动，易动则是土崩之势的前兆。所以，圣主应当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明了安危治乱的枢机，修明政治于庙堂之上，将祸患消灭在未形的状态。"

接到徐乐的上书，汉武帝很高兴，立即召见，并任命为郎官，还感慨地说："你们原来都在哪儿了？我们为什么相见如此之晚呢？"对于徐乐的上书谏言，汉武帝是认真思考并接受了。因而，他在重用酷吏镇压百姓这一手以外，又注意了治水勉农、惩治不恤百姓的官吏、免除徭役、优抚高年等另一手，外施仁义以缓和矛盾。

同徐乐一同上书并受到汉武帝召见的，还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严安。他上书谏诤武帝不要太奢侈纵欲，致使百姓脱离农业，弃本逐末。

他上书说："现在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楼台竞相修饰，调五声，杂五色，重五味，在天下人面前摆显欲望。从民情来说，见到美

好的东西就想得到，这是教民以奢侈啊！奢侈纵欲而没有节制，则无法满足，老百姓就会背本趋末。因此，导致缙绅之士不怕诈变，带剑之人自夸能多杀人以为荣，世风不以为耻，当然奸宄日日生长。天下人民逐利无已，必然犯法者众。我希望皇上能制定制度加以节制，使贫富之人不相炫耀，平和他们的心灵。百姓心既平和，则本性趋于恬安，盗贼自会消除，刑罚自会减少，阴阳自会调和，四时才得其正，风雨才会适时，草木才能繁茂，五谷才能丰登，六畜才会蕃息，百姓不会夭厉，达到安和的顶点。”

同主父偃、徐乐一样，严安也受到武帝召见，并被任为郎官。然而，他谏诤武帝不要太奢侈腐化的建议并没有为武帝采纳，尽管汉武帝表现出了虚心纳谏的态度。谏言只是君主专制的补充和调节，能不能纳谏，不取决于进谏者，而是取决于君主，没有一种制度或规定来强迫君主必须纳谏。所以说，谏诤是君主加强统治的一种修补器和调节器。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汲郑列传》

《汉书》：《东方朔传》、《公孙弘传》、《汲黯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马邑之谋

平城之困以后，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实行同匈奴和亲的政策，每年奉送大量的絮、缯、酒、米等食物和金钱。然而，和亲政策并不能完全保证汉朝北部边郡的安宁。匈奴贵族屡屡背叛和亲，骄横恣肆，不断派骑兵南下侵扰，杀掠人民畜产，给北部汉族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破坏。

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冒顿单于骄横无理，遣使致书吕后，要求入主中原，并妻吕后。吕后大怒，欲出兵攻击，经季布劝说才止。

高后六年（公元前 182 年），匈奴侵扰狄道（今甘肃临洮）。第二年，匈奴再攻狄道，杀掠二千余人。

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扰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杀掠人民甚众。文帝遣丞相灌婴领车骑八万五千反击，匈奴右贤王被迫出塞。

文帝六年（公元前 174 年），冒顿单于致书文帝，希望修复汉匈和亲。当年，冒顿单于死，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妻老上单于。汉匈复修和亲。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 169 年），匈奴再寇狄道。太子家令晁错上书文帝，他分析："匈奴军事上有三大长技：一是马匹强，二是射技高，三是兵耐劳。汉朝军事上有五大长技：一是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匈奴不如；二是劲弩、长戟，匈奴不如；三是坚甲、利刃，列阵战斗，匈奴不如；四是材官箭矢，匈奴不如；五是下马战斗，匈奴不如。

安抚投降的胡人、义渠、蛮夷之属，赐以坚甲、利兵、强弓、劲弩和良马，险阻之地，可用以对匈奴；平易之地，则用汉军轻车、材官，互相配合，可制服匈奴。”晁错还建议文帝募民实边，因为远方之戍卒，一岁而更，不熟悉匈奴事务，容易被动挨打。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徙民边塞以对付匈奴。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发十四万骑大规模入侵，杀北地（今甘肃庆阳）都尉，杀虏人民畜产甚众，侦察骑兵甚至来到甘泉一带。汉文帝欲亲征匈奴，经太后劝阻才罢。文帝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出击匈奴。匈奴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

自此之后，匈奴骑兵连年侵扰汉北部边郡，杀虏人民畜众甚众，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辽东（今辽宁辽阳）一带受害最深，每郡达万余人。后二年（公元前162年），文帝致书匈奴老上单于，汉匈复修和亲。

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三万人侵入上郡（今陕西榆林），三万人侵入云中，杀掠甚众，边境烽火直达长安。文帝派周亚夫屯兵细柳（今陕西咸阳），刘礼屯兵霸上（今陕西西安东），以卫护京师长安。

景帝即位以后，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今河北蔚县）与匈奴和亲。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与匈奴和亲。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中二年（公元前148年），匈奴入燕。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匈奴侵入雁门、上郡，吏卒战死者二千余人。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匈奴攻入雁门，雁门太守冯敬战死。

就汉代前期的汉匈关系来看，总的来说，由于中原长期遭受战乱，人民疲惫，社会残破，国力不强，基本上处于守势，若匈奴骑兵不侵扰，汉朝也不发兵出击，汉匈之间维持和亲关系。和亲政策的实行，并不能保证汉朝北部边境的安宁。由于汉朝的容忍，双方没有发生影响全局的大规模战斗，和亲政策之下的汉匈关系，和平交

往是主流。和亲政策之下,中原汉朝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走向高涨。同汉朝交往中,匈奴人同汉族互市,得到了大量物资和必需的铁器等,并接受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匈奴越来越强盛。汉武帝即位以后,继续奉行和亲的政策,同时送给匈奴大量的财物,开通关市,允许双方边民之间的贸易。匈奴自单于以下,都愿意同汉朝和好,以便开展贸易,获得必需的物资。汉匈边民往来于长城之下进行交易。匈奴虽时有侵扰,然而规模都不大。

新继位的汉家天子,这位年少有为、雄心勃勃的帝王,对于汉匈关系中实行的屈辱的"和亲"政策是不满意的。汉武帝受到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唐虞成康的四夷宾服、德润四海的王道政治,不应该是道家的黄老无为政治,尤其不应该是和亲那样的头足倒悬,上下乖谬,上反居下,下反居上的局面。尽管给匈奴送去了公主和大量的财物,然而,匈奴仍不时侵扰边境,黎民不安,边防忧困。汉武帝对这种政策是不满意的。

他继位之初,就十分注意留心边事。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从抓获的匈奴俘虏口中得知,原居住在河西一带的月氏人,后被匈奴赶往西域,他们是匈奴的世仇,常欲报仇而苦于无人相助。于是,武帝招募张骞率一百多人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以共同对付匈奴,切断匈奴右臂,最后将其制服。然而,就当时情况看,一方面武帝即位不久,权力、地位未曾巩固、壮大,另一方面主张清静无为、奉行黄老政治的窦太后还健在,对于大事兴功立业很看不惯,同时,朝廷中大多数大臣都认为和亲政策切实可行,利大于弊。匈奴虽不断寇扰,但规模均不大,单于贪婪汉朝财物,经常往来长城下,希望同汉朝互通关市以多得货物,也不愿破坏和亲政策下的经济交往。所以,和亲政策这个主流,汉武帝一时还改变不过来。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来请和亲。武帝将这件事交让大臣集体讨论利弊,希望有人站出来反对和亲,主张出击。大行王恢是接近匈奴的燕地人,熟悉匈奴事务,他领会了武帝的意思,就

站出来反对和亲。他说，汉朝同匈奴实行和亲，然而不过数年，匈奴往往不守约束背叛和亲，不如发兵反击。王恢的建议遭到了朝廷重臣韩安国的反对，韩安国说："远徙千里作战，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况且匈奴兵马众多，迁徙无定像鸟兽一样聚散不已，很难制服他们。占有这些草泽之地不能算是扩大了国土，统治了这些游牧之民也不能增加国力，汉朝若远征千里与匈奴争利，必然士马疲倦，而匈奴以逸待劳，战斗起来肯定很不利。所以，出击不如和亲方便可行。"朝廷大臣一致赞同韩安国的和亲主张，汉武帝答应了同匈奴和亲。

汉武帝并没有放弃自己出击匈奴的主张，所以，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即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守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守雁门向匈奴示威。

马邑(今山西朔州)豪强聂壹因为经常同匈奴做买卖，通晓匈奴事务，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他通过大行王恢提出了出击匈奴的建议。聂壹说，汉准许同匈奴和亲，所以，匈奴人很轻信，可以以此利诱他们接近边塞，然后发伏兵奇袭，必能打败匈奴。

汉武帝召集群臣议论这件事，他说："朕饰子女配给单于，币帛文绣，馈送丰厚。可是，匈奴单于傲慢无礼，发兵侵盗边境无已，边境屡屡受警，朕甚闵之。现在朕准备发兵出击匈奴，大臣们以为如何？"

大行王恢立即发言，赞成发兵出击匈奴。他说："六国之时，代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原之兵，然而仍能养老抚幼，种瓜种树，不误农时，仓廪常满，匈奴不敢轻易侵犯。而现在，以陛下之威，海内一统，派遣子弟防守边塞，转运粮草，然而，匈奴仍然侵盗不已，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匈奴不畏惧汉朝造成的。所以，应当出击，给以惩罚。"

御史大夫韩安国站起来反对说："高皇帝在平城被强盛的匈奴骑兵包围七日，竟不得食。然而，解围回归以后，高祖并无愤怒之

心。圣人以天下为度量,不以个人私怒而伤天下之功。所以,派刘敬奉金千斤,结成和亲,至今五世受到它的益处。孝文帝时集天下精兵于广武常谿,然而并无尺寸之功,而天下的百姓没有不为之忧虑的。孝文皇帝知道兵威不是久远之计,结果还是恢复和亲之约。前代圣王的做法是应当效法的,还是不出击的好。"

王恢站出来加以驳斥:"时代不同,各因当世而宜。高皇帝披坚执锐,蒙雾露,沐霜雪,有几十年时间,而之所以不报平城之怨,并不是力量不够强大,而是想让天下的百姓休养生息。可是,现在边防屡次受侵,士卒死伤甚众,送葬之车相望于道,这是仁圣之士应感到悲痛的地方。还是应当出击。"

韩安国反对说:"利不十不易业,功不百不变常。古代人君谋划大事必遵照古人所做,发布政令必参照圣王语言,目的是表示慎重对待政事。自三代以来,对夷狄就不用正朔、服色,并不是兵威不足以制服他们,力量不够强大,而是因为绝远之地,不牧之民,不值得发动战争烦扰中原百姓。匈奴骑兵,素来轻快迅速骠悍至极,来如风,去如电,以畜牧为业,弯弓射猎,逐兽随草,居无常处,难以制服。如果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必然使边郡一带百姓长期废弃耕织,以便支持对匈奴的战事。由此来看,出击不如不出击。"

王恢说:"不然。昔秦穆公建都于雍,攻取西戎,并国十四,辟地千里,就是现在的北地、陇西一带。至秦时,蒙恬率军北击匈奴,辟地数千里,以黄河为边界,垒石筑城,植树为塞,匈奴人竟不敢南下饮马于河,至豪杰并起,撤掉烽燧以后,匈奴人才敢南下牧马。所以,匈奴只能用兵威制服,而不能用仁义来教化。现在,以中国之盛大,万倍的资财,拿出百分之一用来攻击匈奴,如同用强弓劲弩射击溃烂之疽,不会有什么疑问。如果能制服匈奴,则北边的月氏亦可臣服。所以说,还是出兵反击匈奴加以制服好。"

韩安国反对这种分析,他说:"用兵布阵,如同吃饱的人等待饥饿的人,政治修明的等待政治混乱的,定居休息的等待倦劳疲惫的

一样，接兵战阵才能打胜仗，攻城略地才能成功，这样常常可以不战而胜，这是圣人的用兵之法。劲冲的强风，及其衰落，连羽毛都吹不起；强弩之末，连鲁缟也穿不透。有盛必有衰，如同有朝必有暮一样。如果卷甲轻举，长驱深入匈奴，是难以建立功效的。如果纵队前进，容易受到两边夹击，而横队并行则后援难以为继。前进速度快了，粮草接应不上；前进速度慢了，往往丧失战机。这样算来，行军未至千里，而已人马乏食。这正如同兵书上讲的，是拱手送给敌人好处。出击匈奴还有什么其他巧妙的方法可以采用，我还不知道。不然的话，深入千里出击匈奴，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还是不如不出击的好。”

这时王恢献出了他的谋划巧计：“我所说的出击匈奴，本来就不是深入而击，而是要顺着单于的欲望，引诱他们来到边塞近地，我们预先挑选勇壮之士做好埋伏，谨慎选择险要之地作为埋伏地，一旦匈奴入了圈套，就可以实施拦截，并斩断其退路，从前后左右各个方面加以攻击，这样可以轻易抓住单于而无丝毫损失。”

汉武帝听了王恢的计谋，很高兴，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决定由马邑豪强聂壹引诱匈奴单于入汉边塞加以伏击，开马邑之谋。由此，汉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由和及战。

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六月，汉武帝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五将军共领兵三十万，在马邑设下了诱兵准备伏击匈奴。

聂壹佯作内奸，逃出边塞，告诉匈奴单于，说能斩杀马邑令、丞，献马邑城投降匈奴，这样，可以得到大量财物。匈奴军臣单于贪婪汉朝财物，信以为真，就同意了。到了约定的日期，聂壹从监狱中提出两个死刑犯斩杀以后将头颅高挂于马邑城头，告诉匈奴使者，说已经斩杀了马邑令、丞，将其头颅挂于城头，请快来受降；然后，又在城北边塞之外百余里内，散放畜群，制造和平假相，以诱骗匈

奴，而三十万大军则埋伏在附近的山谷中。

匈奴军臣单于得到情报，率十万骑兵，兴冲冲进军马邑。来到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路途沿边原野上到处是散放的畜群，奇怪的是居然没有放牧的人，顿生疑心。他下令进攻边防都亭，而雁门尉史刚好巡行至此，见匈奴进攻边亭，加以保卫，被匈奴战败，就投降了匈奴。雁门尉史知道汉军的计谋，将计划全盘告诉了军臣单于。单于大惊，全线撤兵。他说："我本来就疑心其中有诈，现在是上天让我抓住了雁门尉史，知晓真情，得以全军不灭。"因而，封雁门尉史为天王。汉军闻讯，追至边塞，而匈奴骑兵已经远去。马邑之谋，汉军兴师动众而去，结果计划失败，劳而无功。按照约定，马邑之战开始后，由王恢负责攻击匈奴辎重，现在王恢看到计谋失败，而匈奴兵强马壮，不敢出击。

马邑之谋失败后，武帝迁怒王恢，把王恢交由廷尉审理。王恢辩解说："按照约定，汉军与匈奴单于接战以后，再出击匈奴辎重。而现在计谋不成，匈奴人众，如果出击，必定打败仗。现在，虽然违反了军法，但是为天子保全了部队。"汉武帝不听，以为王恢首起马邑之谋，到时却不敢主动出击，不杀王恢，无以谢天下。于是，王恢自杀。

马邑之谋以后，汉匈关系正式破裂，自汉初以来实行的和亲政策由此断绝。匈奴骑兵连年侵扰汉朝北部边境，但是，匈奴人多贪婪汉朝财物，汉朝仍然开关市，双方保持着贸易往来。马邑之谋是汉匈关系的转折点，它虽然失败了，但揭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元光末年以后，大规模的战争就开始了。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匈奴列传》

《汉书》:《匈奴传》、《韩安国传》、《武帝纪》

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虽未成功,但揭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此后,终武帝之世,几十年之间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反击匈奴。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涌现出著名军事将领卫青、霍去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次大战役就是由卫青、霍去病指挥的,这三次大战役分别发生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史称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

卫青,字仲卿,生年不详,卒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武帝宠妃卫子夫的同母弟,出身卑贱。卫青父亲叫郑季,以县吏给事平阳侯曹寿,同平阳侯家的女奴卫媪私通,生下了卫青。卫青的同母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后受到武帝宠爱,卫青后来就冒姓了卫氏。

卫青少年时从平阳侯那里回到父亲郑季家,郑季让卫青放牧,而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把卫青当奴仆看待,根本不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兄弟。一次,卫青到甘泉服役,有一钳徒为卫青相面说,卫青有贵人相,将来应当官至封侯。卫青笑笑说:“作为奴婢所生之子,如果不受到笞打辱骂已经足够了,哪里敢想什么封侯的事呀!”

卫青长大以后,在平阳公主家做骑奴。后来,由骑友宫中骑郎公孙敖引荐,时时到建章宫当差。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春,卫青的同母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召入宫。陈皇后因嫉妒卫子夫,怕夺去了武帝对自己的宠爱,怨恨卫子夫。陈皇后暗中派人将卫青逮

捕，准备杀掉以泄私愤，经骑友公孙敖营救后幸免。汉武帝听说后，大为震怒，立即召见卫青，拜他为建章监，并随侍左右。后来，卫子夫得宠于中宫，被立为夫人，卫青亦因此而升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骑兵侵入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汉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今河北蔚县）；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今山西大同）。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在这四路军中，公孙敖、李广打了败仗，公孙贺无功而返，只有卫青率领的这一路，直捣龙城，斩首虏数百而还。卫青首战成功，深得武帝赞赏，自此日益受到重用。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匈之间第一次大战役爆发。这一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再次进攻汉朝的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杀辽西（今辽宁义县）太守，打败将军韩安国，虏去二千余人。

武帝决定避实就虚，派卫青率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卫青率军四万骑，从云中出塞，与匈奴右贤王率领的军队大战于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长城口），然后急转直下，直捣陇西（今甘肃固原），攻击匈奴。

这一次战役，汉朝军队获得重大胜利，击败并赶跑了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俘获匈奴几千人，夺得牛羊一百多万头，收复了秦时蒙恬所开辟的河南地，而汉军毫无损失。

捷报传到长安，汉武帝特别高兴，派专使到军中慰劳，并诏封卫青为长平侯，赐食邑三千八百户。

为加强河套地区的防务，汉武帝决定在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河南地设立朔方郡（今内蒙古杭锦旗）、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并修筑朔方城作为据点。汉武帝又从关东地区移民十多万到朔方一带屯田戍边。

河南地离长安千数百里，骑兵一二日即可到达，是悬在汉廷头上的一把利剑。这一次战役解除了匈奴骑兵对汉朝都城长安的直

接威胁，扭转了对匈奴战争的被动挨打态势，而且在接近匈奴的前线建立了一个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具有很大的政治、军事意义。

卫青收复河南地后，汉朝在这一地区设置朔方、五原郡，并修筑朔方城，使得匈奴非常忌恨，此后连续数年大规模进犯汉朝边塞，反复攻掠雁门、代、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河南、朔方一带。

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春，匈奴右贤王猛攻朔方，试图夺回河南地。武帝命卫青率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出朔方高阙山口，出击匈奴右贤王；命将军李息、张次公从右北平(今辽宁陵源)出发向匈奴攻击，以牵制匈奴兵力。卫青率四将军出汉边塞六七百里，乘夜神速掩袭匈奴右贤王王庭。右贤王毫无防备，正在饮酒，喝得酩酊大醉，没想到汉兵会如此神速，被打得措手不及，仅带随从数百仓皇逃走，丢 下部属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牲畜数十百万头，全部被汉朝俘获。为此，汉武帝很高兴，特意派遣使者，拿着大将军印，前往边塞迎接卫青，即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益封食邑八千零七百户，同时还封卫青的儿子卫伉为宜春侯、卫不疑为阴安侯、卫登为发干侯。卫青坚辞不受，他说出师获胜全赖皇上神灵保佑，诸校尉战士力战之功，皇上既然已经封了卫青，而儿子尚在幼年，并无尺寸之功却裂地受封，就失去了奖劝战士力战的本意。于是，汉武帝遍封诸将。

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 年)，汉武帝又命卫青率公孙敖、公孙贺、赵信、李广、苏建、李沮等六将军两次从定襄出发出击匈奴，消灭匈奴兵力九千余。苏建、赵信率三千骑兵遇上了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净尽，赵信投降匈奴，苏建只身逃回。议郎周霸说："自大将军出击匈奴以来，还未尝斩杀裨将。现在苏建丢弃部队只身逃回，可以斩杀苏建以立将军之威。"卫青不从，他说："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卫青决定上奏天子，让武帝自己决定，以表示臣下不敢自专之意。

在这一年的战斗中，霍去病作战勇猛，名冠全军，以军功被封

为冠军侯。霍去病是卫青姐姐卫少儿的儿子，生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卒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年少有为，精于骑射，他十六七岁时就曾跟随卫青出击匈奴。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被武帝任命为侍中，随侍左右。卫青出击匈奴，武帝任命霍去病为票姚校尉，让他跟随卫青再次出击匈奴。霍去病精选八百骑，奔袭数百里，出击匈奴，斩首捕虏两千余级，又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勇冠三军，被武帝封为冠军侯。

赵信原本是降汉的匈奴小王，重新投降匈奴以后，被封为白次王。他向匈奴伊稚斜单于提出建议，可将单于王庭转移到大沙漠以北，引诱汉军深入，这样可以以逸待劳，打败汉军。伊稚斜单于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汉匈之间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河西走廊一带。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打通河西走廊，打击匈奴右贤王，以切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发动了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战役。这次战役是由霍去病指挥的。这年五月，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军万骑自陇西出兵远征，过焉支山(今甘肃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沿祁连山峡谷西进，深入匈奴休屠王领地千余里，转战六日，在娄兰山下与匈奴展开白刃决战，大获全胜，杀敌人千余，并获得休屠王祭天的金人，给匈奴以沉重打击。汉武帝很高兴，为纪念这次胜利，把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当作大神供列在甘泉宫。夏天，匈奴侵扰代郡、雁门一带。这次，汉武帝采取了两翼作战的方针，命博望侯张骞率军万骑、李广率军四千骑从右北平(今辽宁凌源)出发，分道迎击匈奴左贤王，开辟东线战场；霍去病和公孙敖各率万骑分别从陇西、北地出发，开辟西线战场。结果，东线汉军失利，西线的公孙敖耽误了与霍去病会合的日期。于是，霍去病率部万骑快速挺进，渡过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折军南攻祁连山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领地，大获全胜，俘获单桓、酋涂王及裨小王七十余人，斩首级三万零二百，匈奴相国、都尉率众二千五百人投降。霍去病因之日益受到武帝的宠信和重用，地位几乎可

与大将军卫青相比了。

霍去病所率兵卒大都是经过选择的精兵强壮，故而敢于孤军深人，常常离开大军作为先头部队出击敌人，经常获得战功。

具有重大意义的祁连山之战，使得匈奴右部受到沉重打击，匈奴内部也由此发生了矛盾。这年秋天，匈奴伊稚斜单于因浑邪王居西部而屡次被霍去病军打败，损失了数万人和大批财物，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准备将他们召到单于庭，杀掉他们。二王很害怕，商量以后想投降汉朝，就派使者找修整长城边塞的大行李息联系。李息迅速报告了朝廷。汉武帝怕他们以诈降为名而奇袭汉边塞，就命霍去病带兵前去受降。因为意见不合，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其众四万骑来降。霍去病率军渡过黄河驻兵同他们相望。浑邪王属下小王见汉朝士马强盛怕投降以后被乘机消灭，纷纷遁逃。霍去病飞骑驰人匈奴大营，与浑邪王一起斩杀欲逃亡者八千人，稳住了局面。然后，派人将浑邪王单独送往长安，将降众带过黄河。武帝征发三万辆车前去迎接，又封浑邪王为漯阴侯，封裨小王四人为列侯，赏赐数十万，让降众保持原来的风俗习惯，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秦中(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一带，并专设五属国都尉管理他们的事务。

浑邪王率众内附以后，河西遂空，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武帝以其旧地设置武威(今甘肃民勤)、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分其地设置张掖、敦煌郡。至此，汉朝的防线大大向西推进，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破了对汉朝的包围，打通了与西域联系的河西通道，切断了匈奴右臂，巩固了第一次战役的成果。汉朝的西部压力至此解除，特别是陇西、北地、上郡一带的百姓负担得以大大减轻，武帝决定："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徭役。"河西一带，水草丰美，匈奴失掉河西，经济上也爱到了很大损失。匈奴人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河西战役后，匈奴仍不断发兵攻扰汉朝边境。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匈奴集合数万骑兵从东北面的右北平、正北面的定襄向汉朝反攻。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召集将领开会商议反击匈奴。他们说，赵信为匈奴出谋划策，将单于王庭转移到沙漠以北，常常以为汉朝军队不能越过大沙漠。武帝决定大量征发士卒，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加以消灭，从根本上打垮匈奴，解除祸患，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马匹十几万，步兵辎重数十万，自己准备衣装和马匹从军者又有四万，出击匈奴。这次战役，是汉匈战争中规模最大，征途最远，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

按计划，精锐骑卒都由霍去病统领，以专门寻找匈奴单于与之决战为目标。霍去病从定襄出发，抓住匈奴俘虏，匈奴俘虏说伊稚斜单于向东去了。于是，武帝改令霍去病出代郡，命卫青出定襄，约好日期在漠北会合共击伊稚斜单于。

卫青率领李广、公孙贺诸将出塞，抓获匈奴俘虏，得知伊稚斜单于去向，分兵李广令其从东路前进，到漠北会合，自己则亲率大军疾走千余里，渡过大沙漠，与单于决战。得到汉军越过大沙漠的消息，赵信对匈奴单于说："汉朝军队既然已经越过了大沙漠，肯定人马疲惫，匈奴可不战而胜。"伊稚斜单于将辎重远远地转移到北面，亲率精兵迎击汉军。卫青领兵出塞千余里，与匈奴军队相遇。时已黄昏，匈奴列兵布阵以待，卫青下令用武刚车自环为营阵，随后出动五千骑兵向匈奴战阵发起冲击，伊稚斜单于出动一万骑兵向汉军扑来。此时，大风骤起，沙砾扑面，两军错杂，不辨彼此，双方展开白刃战。卫青又派出两支轻骑，分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匈奴单于。伊稚斜单于看到汉军兵强马壮，越来越多，自知再打下去对自己更不利，便率领数万骑兵冲出汉军包围，飞驰逃走。卫青派轻骑连夜追赶，没有追上。匈奴部队全线溃散，四处奔逃。卫青指挥主力部

队乘胜追杀，斩获一万九千级。一直追到阗颜山的赵信城（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戈壁省翁金河东），屯留一天，补充军食粮草，然后烧毁匈奴一切储备，凯旋而回。

霍去病出代郡，深入匈奴领地二千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歼其精锐部队，俘获匈奴三个小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斩首七万余级。霍去病率军追赶匈奴残兵，越过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今贝加尔湖），宣扬军威，凯旋而归。回来后，汉武帝增封霍去病五千八百户。军士吏卒受到的赏赐也很多。

经过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尤其是第三次出击匈奴，越过大沙漠深入远征，打垮了匈奴主力，匈奴元气大伤。自此，匈奴向西方和北方转移，大沙漠以南不见了匈奴单于王庭。汉朝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军事威胁。在几次大战役中，汉军损失也很大，仅马匹就损失了一二十万匹。从此以后，汉匈双方均很疲惫，虽又多次发生战事，但无论就其规模、影响来说都远远不如这三次大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

卫青、霍去病战胜匈奴主力以后，汉朝的北方边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边郡和内地之间，邮亭驿站相望于道，联系大为加强。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水草丰美的荒凉原野上开辟了大片的耕地，种植着谷、麦、秫等作物。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水利技术等先进工具和技术，通过屯田的农民在边郡传播开来。自令居（今甘肃文登）以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也筑起了亭障。北方旧有的长城得到了大规模的修整，并建立起完整的边燧系统，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众多的吏卒亭台、屯田区、城堡和烽燧系统，既是汉朝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技术、文化的传播站，对于促进匈奴和相邻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卫青、霍去病舅甥，是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将领。卫青数次出击匈奴，斩获首虏五万余级，以军功食封万六千三

百户。霍去病数击匈奴，斩获首虏十一万级，以军功食封万七千七百户。跟随他们一同出战的将校，以军功封侯的人也很多。卫青出身卑贱，有大功而不自恣，为人谦和，仁善退让，诚实不欺，惜将爱卒，体恤下情，作战时指挥若定，有大将风度。霍去病因年少富贵，不恤士卒，但作战勇猛、果敢、坚决，动作神速，屡建奇功。他严于律己，不追求安逸，也不居功自傲。因为抗击匈奴有功，武帝要为他建造府第，他辞谢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卫青、霍去病有大功而不自傲，从不招致宾客为自己流传名誉，所以，他们能始终得到武帝信任。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霍去病因病亡故，时年二十四岁。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卫青亦卒。他们死后，汉武帝将他们的墓筑在茂陵旁边，霍去病的墓形状像祁连山，卫青的墓形状像庐山。

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出击匈奴，不但迅速将文景时代的积蓄消耗一空，而且不断造成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长期的战争使得大批青壮劳动力脱离社会生产，使得官旷民怨。为解决财政危机，又实行一系列财经政策，从发行白金皮币、盐铁官营到算缗、告缗、均输平准，不一而足，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这又迫使汉武帝采用酷吏酷法的办法来镇压农民暴动。终武帝之世，匈奴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汉武帝改革财政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高、惠、文、景四帝以来所推行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利用汉初以来六七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财富，实行“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多欲政治，试图创立古代圣贤帝王子泽万国、四夷宾附、恩及群生的美德伟业。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刚即位就下诏策问贤良方正古今治乱之道，天人之际关系；又征申公，让他同赵绾、王臧议论明堂、巡狩、改历法、变服色诸事。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无视朝廷不得互相攻击的法令，攻打东海。武帝以为，天子不能安排天下的秩序，救治万民，就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不顾太尉田蚡的反对，遣严助发兵解救，后又将东海举国迁往江淮之间。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因为闽越发兵攻打南越，武帝派王恢、韩安国率兵击定闽越。

同年，武帝派唐蒙以中郎将身份领兵万余人开西南夷。后来又修筑自僰道(今四川宜宾)到牂柯江(今北盘江)的道路。天气湿热，工程艰苦，数年不成。

这些兴功立业的活动，都需要雄厚的财政经济做基础。为了将东海安置在江淮之间，江淮一带广大地区骚动不安，花费巨大。修筑通西南夷的道路，数年不成，而花费巨亿，巴蜀两郡的全部租赋投入进去都不够用。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为了一举歼灭匈奴，武帝设计了马

邑(今山西朔州)之谋,自此,汉朝匈奴断绝和亲,开始了大规模的连年不断的北伐匈奴的战争。战争费用开支浩繁,不但汉初以来七十余年的财富积累迅速消耗一空,而且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在困难的时候,甚至前线作战的士兵的薪俸都开不出来。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大规模出击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弃地远遁,汉朝收回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置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修筑朔方城,转运粮草遥远,关东广大地区遭受其害,耗费数十百亿,国家府库并虚。

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决定实行卖官卖爵制,规定,凡臣民百姓有能向国家捐献奴婢的,可以终身免除徭役,为郎官的增秩;捐献羊的,可以为郎官。

此后,大将军卫青又以十余万骑连续四年出击匈奴,战士以斩首之功受到赏赐的黄金就有二十余万斤,汉朝军士马匹死的有十余万,兵甲漕粮和其他花费尚没有计算在内。国家财政长官大司农陈述说,国家府库已空,赋税枯竭,不足以供给战士。为解决财政亏空,汉武帝允许犯了罪的可以出钱赎罪;又设置武功爵十七级,值钱三十余万金。凡买武功爵的,可以优先补官,有罪者,可以减等。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出击匈奴,杀敌甚众,同年,匈奴发生内讧,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骑投降汉朝,汉朝出动车骑三万迎接。这一年的费用达到百余亿。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步兵数十万分道出击匈奴。关东广大地区又遭受特大水灾,百姓饥乏,离乡背井,社会动荡不安。武帝命各地打开国家粮仓赈济贫民,仍然不管用。冬天,关东灾民七十二万余口迁移到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庆阳)、西河(今内蒙东胜)、上郡(今陕西榆林)、会稽(今江苏苏州)等地就食。国家供给衣食,又贷种子、耕牛、农具等,用费以亿计。

国家财政的严重亏空,形成了一次次的财政危机。国家府库藏

钱消耗净尽，赋税枯竭，百姓也十分穷苦，而卖官卖爵，赎罪买复，终究不是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这等于饮鸩止渴。

国家财政已近于山穷水尽，而有的富商大贾不但不肯拿出钱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反而利用国家的困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滞财役贫，兼并农民的土地。汉武帝屡次下诏，让富人拿出钱来安置贫民，佐助边费，可他们没人响应。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卜式，以田畜为业。他上书武帝，表示愿意拿出家财的一半献给国家，佐助边费；后来，又献钱二十万用以安置流离贫民。汉武帝很高兴，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赏田十顷。武帝同时布告天下，令天下富人响应，以向国家献钱。可是，富商大贾无人响应，还纷纷藏匿财富。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危机，同时严厉打击富商大贾，张汤向汉武帝提出了发行白金波币、实行算缗告缗、垄断盐铁经营等建议。

武帝以前，西汉朝廷实行经济放任政策，国家允许私人铸钱，国家所铸钱币同私人所铸钱币可以同时流通使用。文帝时，诸侯王吴王刘濞以铸钱大发横财，富同天子，宠臣邓通也以铸钱致富，财过王者，吴、邓所铸钱币布满天下。由于铸钱利润大，盗铸、掺假的很多，钱币混乱。弃农采铜的人很多，影响农业生产。贾谊、贾山都曾建议国家垄断铸币权。武帝即位后，私人铸钱者很多。张汤建议，国家可以用多造货币，减轻货币重量的办法从商人手中拿出钱来，解决财政危机。当时，皇帝的禁苑多白鹿，内府多银锡。张汤建议，用白鹿皮造币，称为皮币，用银锡合金铸币，称为银币。皮币用白鹿皮制成，一尺见方，边缘绣绘五彩。国家规定，一张皮币值钱四十万，王室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皮币作为进献之物。皮币不在民间流通。这等于国家每发行一张皮币，就能从王侯宗室处得钱四十万。银币用银锡合金铸成，分为三品：上品重八两，圆形，其文刻龙，名叫白撰，面值三千；中品重六两，方形，其文刻马，面值五百；下品重四两，椭圆形，其文刻龟，面值三百。由于银币的面值大大超过其实际价值，私铸钱可以获大利，盗铸的很多。因为铸钱犯死罪而被

赦免的就有几十万人，自首的有百余万人，其中有不少郡守、诸侯相等二千石高官。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三月，汉武帝又命令郡国铸五铢钱。五铢钱内外边都有凸起的轮廓，铸造难度高，仿造不易。由于郡国有铸钱权，五铢钱多被掺以铅锡，私人盗铸的也有。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白金币废止。汉武帝又令京师铸赤仄钱，规定一枚赤仄钱顶五枚五铢钱，缴纳赋税必须用赤仄钱。一枚赤仄钱面值不及五枚五铢钱，盗铸的很多。

货币的不断更新，实际上是不断贬值，并没有解决财政危机，反而使币制更加混乱。为了禁止私人盗铸私钱、奸钱，国家又用严刑峻法来执行，犯罪的人很多，社会更加动荡。

为了直接从商人手中拿出钱来，张汤还向汉武帝提出了算缗和告缗的建议。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实行算缗和告缗。

缗，是穿钱的绳子。算，是计算钱的单位，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算缗的具体办法是：凡经商的人和高利贷者，不论是否登记为商人户籍，一律自报财产，根据财产定额交纳财产税，每二千钱纳税一算。经营手工业的，每四千钱纳税一算。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人，凡有轺车（单马小车）的，一辆纳钱一算，商人所有的轺车，一辆纳钱二算；有船的，船身五丈长以上，每船一算。

为了保证算缗的实施，又规定：凡隐瞒财产或呈报不实，罚戍边一岁，没收全部财产；有能告发的，奖励告发人被告者没收财产的一半。凡注册登记为商人户籍的及其家属，一律不得依附农业户籍买占用地，违令者没收田产。

此令一出，工商业主纷纷隐匿财产，或少报甚或不报以偷税漏税。为了惩罚商人，汉武帝决定放手发动告缗。武帝任命著名的酷吏杜周具体负责告缗运动，以惩罚商人隐匿财产之罪。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武帝又指示杜周，让他暗中派人指使杨可第一个出来揭发，点燃了告缗运动之火。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为了

奖励告缗，汉武帝下令，执行奖励的法令。杨可得到被告发者一半财产的奖励。

实行算缗，税率很高；发动告缗，奖额极大，人们纷纷告缗，而叛狱的又都是酷吏。所以，工商业主很快丧失抵抗能力，不堪一击，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分被告发破产，甚至一部分蓄积多而非经商的人也受到告发破产。

在告缗运动中，汉武帝获得了惊人的财富，抄没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产也很多。武帝将抄没的缗钱分给少府、水衡、太仆、大农诸官，同时由他们设置农官经营管理抄没的田地，租给农民使用，收取地租，成了公田。抄没的奴婢，分到皇家各苑林，用以养狗马禽兽。

告缗运动获得的大量财物，立即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它用没收财产的方法以充国用，实际是上一种白日抢劫政策。由于大商人往往兼具官僚身份，可以凭借特权逍遥法外，真正的商业经营者是无特权的一般商人，他们才是告缗运动的真正受害者。所以告缗运动没有任何生产意义和经济成就，商业却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告缗运动伤害到不经商而有蓄积的人，告缗以后，人们不敢蓄积财产，也不再从事经济生产以增殖产业，争于奢侈腐化，只想吃喝玩乐，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告缗的这种"乱民"政策，当然无法持续下去。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冬，武帝先在新秦中地区解除告缗。到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桑弘羊总理盐铁官营事业以后，另外开辟财源，告缗运动在全国结束。

在告缗运动的同时，汉武帝还积极开展盐铁官营事业。

盐铁业一直是古代两项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盐是人人必需之物，人不吃盐，就会浮肿，无力干活；铁乃户户生产必不可少，没有铁器生产工具，农民无法种地，手工业者无法生产，甚至家内妇女无法进行家务劳动。盐铁的生产，由于有着很大的消费市场，利润

高，生产规模大，所以，在手工业生产各部门中一直得到持续、稳定和突出的发展。但是，盐铁的生产，又不是家家户户都能进行。煮盐须靠海，冶铁须靠山，而海滨、矿山都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煮盐特别是冶铁需要较多的资金和较高的技术，也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

在汉初经济放任政策之下，封建国家并不直接进行盐铁业的生产和销售，更不去垄断，而是用征收山泽税的办法实现对山海湖泽的所有权。汉初规定，山海所出属少府，其收入供天子私奉用；如果地在王侯封区内，收入就供他们所有，不上缴国家财政。

由于汉初政府允许私人进行盐铁业的生产和销售，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盐铁业发展很快，资金、设备、规模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突破，在盐铁业中，出现了一批靠经营盐铁业发财致富的大盐铁商和大盐铁业主。蜀卓氏，祖先是赵人，曾以冶铁致富，秦统一六国后，将他们迁往蜀地。他们主动要求到地势僻远、靠近铁山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就山鼓铸，数年致富，家有僮千人。程郑，是由山东迁往临邛的，同样以冶铁致富，富比蜀卓氏。宛孔氏，由魏迁往南阳，以冶铁致富，家产数千万。齐人刁间，用奴虏进行渔、盐的生产和销售，家产也达数千万。

像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属于遵守西汉政府的法令，进行合法经营致富的，作奸犯科、违背国家法令致富的也很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郑当时保荐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业主孔仅到长安筹划盐铁官营事业。东郭咸阳、孔仅都以煮盐、冶铁致富，家产数千万，二人对于盐铁业的生产销售极其精通。汉武帝任命二人为大农丞，同时，让内朝宠臣桑弘羊参与策划盐铁事业，治理财经。这三个人以善于算计、精于理财、明于经商之道闻名，三人筹划盐铁官营，用以摧折富商大贾。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东郭咸阳、孔仅通过郑当时出面，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建议。郑当时建议，改变汉初以来盐铁税收入属皇帝私用，由少府掌管的陈规，将盐铁收入划归大农掌

管以佐助国用;同时,由大农负责全国的盐铁经营,在全国各地设置专卖机构,实行盐铁官营,禁止私人进行盐铁业的生产和销售。

盐铁官营的具体办法是: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生产资料和财物,凡违背国家法令敢于私营盐铁的,一律处以重刑,财物充官。实行盐铁业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统一经营。盐业,规定盐民一律不得使用自置的煮盐锅,必须使用国家统一配给的官器盐盆,盐民自己负担一切费用,生产出来的盐必须卖给国家,不得私自销售,由国家付给一定的工价。铁业,一律禁止私人鼓铸,由国家建立官营冶铁工场,除冶铁以外,还负责生产各种铁器制品。国家在全国各地建立盐铁机构,设立盐铁官,盐铁官的长官盐铁令、丞,级别相当于县令、长,直属中央领导,由中央任命。盐铁官设立后,统一由国家进行盐铁业的生产和销售,盐和铁器的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报皇帝批准。

汉武帝批准了这个方案,派孔仅和东郭咸阳乘专车奔赴全国各地宣传盐铁官营法令,取缔私人盐铁业,逐一设置盐铁官,建立盐铁专营机构,任命原来经营盐铁业致富的盐铁商为官,推行盐铁官营化。一时,富商大贾纷纷进入官僚队伍。

盐铁官营的推行,使国家很快获得大量财富。三年后,即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孔仅升为大农令,列于九卿;桑弘羊升为大农丞,全面负责国家财政。桑弘羊任大农丞后,创设均输、平准法,改善和推广盐铁官营,稳定货币,采取措施,改革财政。

汉代规定,各郡国每年须向中央政府缴纳地方土特产品,叫贡输或输献。在输献实行中,产生了许多弊端。道远的郡国把贡物运到京师,按市场价计算,还不足以抵偿所雇车船的运费;而贡物在长途运输中又容易损耗,这样,就更加大了费用。有些贡物在当地是上品,可到京师和各地同类产品一比,就变成了次品,老远运来很不合算。有的地方贡非所产,还要到远方购买以输献京师。郡国苦于输献,中央财政也受到很大损失。

针对贡输过程中的诸多弊端，参照商人、贩运贸易的经验，桑弘羊在被任命为大农丞的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创设了均输法。

均输法的具体方法是：在各郡国设均输官，由中央领导。地方郡国把应缴的贡物连同运输贡物所抵充的财政上缴额，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一定数量的、当地出产的土特产品就地缴给均输官，除极少数作为贡品上缴京师以外，其他产品则由均输官将它们运往需要这些物资的其他地区出售，以免除郡国将贡物长途跋涉运往京师因道里有远近差异产生的劳逸不均问题，所以叫"均输"。均输法实际上就是官营商业，是官家贩运贸易，是将贡物和其他产品商品化，用官商来代替和排斥私商。国家允许均输官用告缗得来的钱物作为底本去做买卖。

针对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混乱状态，桑弘羊经过观察分析，认为关键在于：一、货币的币面值同实际重量不一致，对人们私奸作伪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所以，私铸钱的很多。二、铸钱权不统一。允许地方铸钱，他们往往营私舞弊，钱中掺假，钱币轻重、厚薄、成分不一致，好钱劣钱并行，造成货币混乱。像张汤那样用货币减重的办法打击商人，弥补财政亏空，只能增加混乱。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自己的币制改革措施。具体办法是：一律禁止郡国铸钱，将铸钱权集中于中央，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货币和发行。地方郡国一律销毁以前的各种旧钱，熔成铜块上交中央，中央设立铜官掌握铸币的原料来源。中央统一铸造面值同实际重量相一致、质量好的新货币——五铢钱。国家规定非新造的五铢钱一律不得流通、使用。至此，中央收回并垄断了铸币权。

新币五铢钱，具体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属官钟官、辨铜，技巧负责铸造，审查成色和一般技术工作。由于新的货币是由上林三官合力铸造的，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

三官钱制作技术较高，质量较好，币面所记重量同法定实际重量一致，又吸收了旧五铢钱有周郭可防止私铸者盗铸的合理做法，是一种很成功的货币。私铸盗伪已很不易，工本太高，基本上无利可图，只有少数技术非常高的能工巧匠才能盗伪，国家又严厉盗铸，盗伪的已很少了。五铢钱将其他各种钱币从流通中排挤出去，结束了一直存在的混乱状态。这种高质量的五铢钱，直到南北朝民间仍然有使用的。

为了供给铸钱原料，切断盗伪者原料来源，国家还垄断了铜的冶炼，在出铜的地方设铜官，指挥罪徒、兵士和部分被征发的民工攻山采铜，一年之中常出动十万人以上；又在民间收集旧铜垄断铸币原料，这可说是桑弘羊实行币制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

盐铁官营实行以后，由于区域辽阔，地域分散，豪富大商的抵制，盐铁官由盐铁商但任，朝廷中一部分人的反对等，推行工作开展得不很顺利。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孔仅被免除了大农令职务，只保留盐铁丞职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孔仅又同御史大夫卜式一起上书，反对武帝算商船的法令，说商船要交缗钱，经商的人少了，使得货物减少，引起物价上涨。汉武帝一怒之下，将御使大夫卜式贬为齐王太子太傅，免除了孔仅保留的盐铁丞职务。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搜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孔仅负责的盐铁官营事业也全部由桑弘羊代理。桑弘羊上任后，对于盐铁官营和均输事业进行全面整顿并加以切实推广，并创立平准法。

桑弘羊在大农内设铁市长、丞，总管各郡国铁的生产、铁器的制造和销售，并设“斡官”总管盐铁的专卖收人。此外，还将地方划分为若干区片由中央向其派出大农部丞数十人以垂直领导各地方郡国的盐铁官。这样，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加强了对盐铁事业的领导和整顿，增设了许多新的盐铁官。两汉时期，全国共设盐官三十六，分布在二十七郡；设铁官四十九，遍及四十郡国。这些盐

官、铁官大部分都是由桑弘羊设立的。

在加强盐铁官营的同时，桑弘羊还进一步完善均输法并将均输法推向全国。在大农属下设专门管理均输事业的均输令、丞，同时，还向地方派出中央专使——大农部丞数十人分赴各地方。大农部丞一方面综理盐铁官营事业，主要任务是在各地广设均输官，并使他们直接受大农部丞领导。通过广设均输官的办法，中央政府将主要物资批发贩运的经营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除了排斥富商大贾外，还禁绝了其他机构经商的行为，改变了均输法创设之初地方机构纷纷经商，各自为主，相互竞争，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混乱局面，加强了中央财经实力，有利于财经的统一和稳定。

均输法全面推行后，均输官的设置遍于全国，大凡有土特产贩运出境的地方都有均输官设立，有的地方还以该地所产土特产品名称来命名均输官。蜀郡严道产木材，就称为木官；九江（今安徽寿县）多水产，设湖官；辽东（今辽宁辽阳）多畜产，设牧师官等。

西汉政府通过分布在各地的大农部丞和直接受其领导的均输官（还有盐铁官），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营商业网，垄断了天下货物的销售，控制了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将商业利润从富商大贾手中夺了回来，对于打击富商大贾起了关键作用。在这个官营商业网中，由于中央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的垂直领导，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对解决财政危机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在全面加强和推广盐铁、均输事业的同时，桑弘羊还创立了平准法。所谓平准法就是在大农属下设平准令、丞，在京师长安设平准官，建立平准机构。各地运来的贡物，均输官收购运往京师的物资，大农诸官掌握的物资，官营手工业生产的器物，都由平准官设立的专门的仓库来统一贮藏，调剂使用。此外，工官还制造了大批车船和器具，作为运输工具供平准官使用。

平准法的具体做法是：在京师长安，当市场上的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平准官就下令以较低价格抛售；反之，价格下降时，就收买

贮存，以此来稳定、平抑物价，所以叫平准。平准法用平抑物价来控制商品的交换和买卖，以便控制和垄断市场，抑制商贾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平准设于京师，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赚取购销差价，是坐商性质；均输遍于全国，调剂地区间物资供求，利润极大，是行商性质。均输、平准和盐铁一起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机构庞大、领导统一的官营商业体系。

这个庞大的商业体系的建立，为汉武帝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关东运往京师的粮食一年达到六百万石，太仓、甘泉国家仓库毕满，边郡仓库也有了余粮。各地均输官一年输往京师的布帛有五百万匹。这些巨额的财富支持了汉武帝继续执行的开边拓地、大事兴作的事业，并用以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危机，做到了百姓不用增加赋税而天下用饶给足的局面。

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发兵反击西羌侵扰，在上郡(今陕西榆林)、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西河(今内蒙东胜)、河西(今河西走廊)地区发卒六十万屯田；平定南越、闽越叛乱，在其地设置儋耳(今海南儋州)、珠崖(今广东琼山)、南海(今广东番禺)、合浦(今广东合浦)、苍梧(今越南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交趾(今越南河内)、九真(今越南中部清化、河静一带)、日南(今越南广治一带)等九郡；在西南夷地区设置武都(今甘肃西和)、牂柯(今贵州凯里)、越嶲(交四川西昌)、沈黎(今四川汉源)、汶山(今四川茂汶)、犍为(今四川宜宾)、零陵(今广西全州)、益州(今云南晋宁)等八郡；率兵十八万北巡朔方，泰山封禅，赏赐用帛即五万匹，钱金以亿万计，用的都是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的收人。

随着财政收人的日益宽裕，汉武帝的生活也日益腐化奢侈，他粉饰太平，迷信求仙，营造宫室，四处巡游，花费无数；为了骑着大宛产的汗血马上天，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发动了对

大宛的战争，财物大量消耗，国库再次空虚，财政再次危机。

为解决财政危机，天汉三年（公元前 98 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榷酒酤"的建议。榷酒酤就是酒类生产和销售由国家专营，私人不得再自由造酒卖酒。具体办法是：禁止私人造酒、卖酒，在地方郡国设立"榷酤官"，建立酿酒作坊，实行官酿官酤，以就地产销为主，而利润上缴大农，作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酒类的专卖专营政策也为汉武帝带来了很大的财政收入，支持了他在西域战争的进行并获得胜利，在边境建立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又在轮台实行大规模屯田。

在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不断出现的财政危机，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卖官卖爵、赎罪买复开始，到发行白金皮币，实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创设均输平准，最后实行酒类专卖，可以说都是财政危机的产物。就这些政策而论，卖官卖爵、赎罪买复，败坏了吏治，破坏了法治，是饮鸩止渴的政策；发行白金皮币，造成了货币的混乱状态，犯罪的众多和法令的严苛，使得社会更加动乱，对于财政危机的解除没有帮助；实行算缗告缗，实际上是白日抢劫，打击了商业的真正经营者，破坏了商业的正常发展，促使商人向官僚、地主靠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局面。

从总体上说，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专制性、垄断性官僚主义作风不能不说是对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一种破坏。如果说作为一项财政措施，它在当时是成功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从长远看，从发展生产和经济的角度看，其消极影响更大。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平准书》、《货殖列传》

《汉书》：《武帝纪》、《食货志》、《地理志》、《货殖传》、《张汤传》

《盐铁论》

相如著《子虚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著名文学家，汉代赋体文学代表作者，少年时好读书，又学击剑，父母爱之，称为犬子。司马相如求学以后，很羡慕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为相如。汉景帝时，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因为景帝不好文学辞赋，崇尚黄老，司马相如很不得意。后来，梁孝王率宾客游说之士枚乘、严忌、邹阳来朝，司马相如同这些爱好辞赋的人很投机，就称病免官，客游于梁。司马相如居梁数岁，著《子虚赋》盛赞诸侯之富强。

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家乡，因为家贫，竟然无以为业。司马相如平素与临邛 县令王吉相友善，王吉让他前来投靠，对他相当恭敬，每天都前去拜见。司马相如开初还见王吉，后来索性称病不见，而王吉对他愈益恭谨。临邛这个地方富商大贾很多，卓王孙家有僮客八百人，程郑家也有数百人。二人商议说："听说县令有一贵客，请为县令召见他。"县令王吉如期前往。卓王孙家到的客人有数百。中午时，派人前去请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称病不去，而王吉竟不动酒饭，亲自去请。司马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去，而举座尽倾。酒酣耳热之际，王吉举琴说："听说长卿好弹琴，请弹琴助兴。"卓王孙有女名文君，刚刚失去丈夫，也喜好音乐，故而，司马相如弹琴之时就以琴中之音挑动文君。司马相如到临邛，常从车骑出游，雍容闲雅，倾动县城。这时文君偷偷从窗户窥看司马相如，对司马相如一见倾心，惟恐得不到他。罢酒以后，司马相如派人重重赏赐卓文君的侍者，使她为司马相如从中加以沟通以向文君献殷勤。卓文君夜

间私会司马相如，二人立即坐车逃往成都。司马相如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卓王孙气得勃然大怒，发誓说："小女子太无材，我不忍杀了她，一文钱也不给。"有人劝告卓王孙，卓王孙就是不听。时间长了，卓文君很不高兴，就劝司马相如一同前往临邛，希图从兄弟处借贷一些钱为生。司马相如就同卓文君一道回到临邛，卖掉车骑，买一酒舍沽酒，让卓文君当垆卖酒，自己则为保佣杂作。卓王孙听说后，觉得很羞耻，大丢面子，遂杜门不出。卓王孙的宗族同人劝告说："现在文君已经失身于司马相如，相如已经对游宦很倦怠，虽然家比较贫穷，然而人材足可依靠，何必如此相辱！"卓王孙不得已，听从劝告，分给文君僮隶百人、钱财百万以及出嫁时的衣被财物。文君就同司马相如一同回到成都，置买田宅，成了富人。

武帝继位后，蜀郡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从武帝。武帝喜好文学辞赋，读到《子虚赋》，大为称赞，感慨地说："朕恨不能与此人同时。"杨得意告诉武帝，《子虚赋》是蜀郡人司马相如所作。武帝很高兴，立即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子虚赋》说的诸侯的事，不值得看，请让我写一篇天子游猎的赋。"

司马相如假设了三个人物：一为子虚，是楚国派往齐国的使者，盛赞楚国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畋猎歌舞之乐，以傲于齐国。子虚，就是虚言的意思。一为乌有先生，齐国的代言人，批评子虚不称楚王仁恩德义，却盛推云梦为高，奢侈淫乐，实不可取。然后，乌有先生更加极力夸饰各地的山川万物，说各地"吞若云梦者八九于胸中"。一是无是公，作为天子的代言人，先批评了子虚，又批评了乌有先生，最后极力夸张盛赞天子上林苑的广大富饶，畋猎之壮，歌舞之盛，目的是劝谏天子不要耽于游猎。这后一部分因为是夸饰赞美上林苑的，又被称为《上林赋》。《子虚赋》假借三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口，极力盛赞齐、楚、天子苑囿的广大壮美。

楚国派子虚出使到齐国，齐王悉发国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共同打猎。打猎归来，乌有先生问子虚，打猎高兴吗？子虚说，

高兴。又问，猎获得多吗？子虚说，不多。问他，为什么高兴呢？子虚说，高兴的是齐王想在我面前夸耀车骑之众，而我则对答以云梦之事。乌有先生问，能听听吗？子虚的回答，乌有的质疑，无是公的总结构成了那篇赋。

齐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畋猎于海滨，问子虚说：楚国也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像这样的吗？楚王打猎同寡人相比怎样？子虚下车对答说：我是楚国的鄙人，宿卫十余年，只是从游后园，不能遍观其大。听说楚有七个大泽，我见到的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叫云梦泽。云梦泽，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然后，子虚就开始夸耀山川如何参差，林木如何茂盛，土壤如何肥沃，矿藏如何富有，水产如何多采，地域如何广阔，野兽如何众多。然后，开始铺陈楚王畋猎之盛、旗帜伟丽、猎手勇猛、箭技精进。随后，赞饰楚王歌舞之盛，郑女曼姬如何若神若仙，场面之大声震数百里之外。听了子虚盛赞楚王畋猎之盛的一番话，齐王默然无以应对，所以，子虚先生很高兴。

听到这里，乌有先生斥责子虚说：你这种说法也太不对了。足下不远千里，来到齐国，齐王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出去畋猎，是想尽力有所猎获，使左右都很高兴，哪里是在夸耀啊！问楚地有无，是为了知道大国的风烈，先生的余论。而足下不称美楚王的厚德，却盛赞云梦之大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实在不足取。一定是像你说的那样，并非楚国之美，是在彰显国君的丑恶；若没有那样却这样说，又损害了你的信誉。然后，乌有先生开始称赞齐国地域的辽阔，东邻大海，南有琅邪，与肃慎为邻，以汤谷为界，吞若云梦者八九。接着，铺陈珍奇怪兽之众。

听了乌有先生所论，无是公笑着说：楚则失矣，齐亦未得。使诸侯纳贡，并不是为了财币，而是为了让诸侯述职。齐国列为东方藩国，却与肃慎私交，于道理讲不通。你们两人所论，不是务在阐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争言游猎之乐、苑囿之大，以奢侈相胜，这并不能发扬名誉，正好可以贬君自损。齐楚之事又何足道哉！你们不

知道天子的上林苑吗？

无是公用更加夸张的语言，将上林苑大大称赞了一番。先说上林苑之大，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流其南，紫渊径其北。接着，说泽薮广阔，水中动物极其丰富，空中飞禽齐集。然后，铺陈山崇高，岭险峻，林木茂盛，猛兽遍布，离宫别馆，弥山跨谷，珊瑚瑶玉，充斥其间。再讲奇果怪珍，植物众多。最后，大力铺陈天子畋猎的盛大场面，以江河为陆，以泰山为橹，车骑聚集，隐天动地，生擒貔豹，搏击豺狼，手格熊罴，绊络白虎等等。游猎之后，天子又置酒张乐，设歌舞，张帷幕。正在酒酣之际，天子茫然若有所失，慨叹说：唉，这也太奢侈了。于是，解酒罢猎，对有司说：可以开垦的土地，都让给百姓作为耕地，废罢离宫别馆，开放川林泽薮，发仓廪赈济贫弱，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

无是公评论说，终日暴露于外，驰骋畋猎，劳神苦形，车马疲惫，浪费府库财富，不顾众庶百姓，忘记国家政事，不是仁者应该干的事。由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苑囿却居九百，草木不得垦辟，百姓不得衣食。听了无是公的一番评论，子虚、乌有愀然变色改容，逡巡避席，说：我们这些人太孤陋，不知忌讳，今日见教，谨闻命。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呈武帝以后，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郎官。过了几年，汉朝开通西南夷，由于唐蒙用军兴法震动百姓，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去安抚。后来，司马相如又建议武帝开通西夷，并被武帝任命为中郎将出使巴蜀地区。司马相如到巴蜀，自蜀郡太守以下都到郊外迎接，县令负矢先驱，宠动巴蜀。卓王孙、临邛诸公争献牛酒以与司马相如相交欢。卓王孙很感慨，以为让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嫁得太晚了，分给卓文君大量财物，与儿子一样对待。

蜀中父老子弟和朝中大臣争言置西南夷无所用，事情本由相如而起，无法再进谏武帝，相如于是作《难蜀父老》，借蜀中父老之口，讲明置西南夷无所用，而自己则加以诘难，以讽谏天子，并且让

百姓知道天子的意思。文章说:“蜀中缙绅大夫二十七人发问:使三郡士民疲惫以开通夜郎道,现已三年而功业未成,士卒劳倦,万民不赡。现在又开通西夷,百姓力屈,恐怕不能完成。斟齐民以附夷狄,疲惫百姓以事无用,鄙人浅陋,不知道理何在。使者回答说:世间必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才有非常之功业。所谓非常,就是同常人不同。现大汉天下,封疆之内,冠带之伦,都获福祉,而夷狄殊俗之国,政教未加,流风甚微,尊卑失序,幼孤为奴,举踵思慕,愿归中国,若大旱之望甘霖。所以,开西南夷是为了博恩广施,中外提福,拯民于沈溺。百姓虽疲劳,又怎能据此以罢王事?”

武帝喜好游猎,曾经在长杨打猎,常常空手同野兽搏击。司马相如很为武帝担心,就上疏进谏说:“我听说同类之物中必有特殊高于一般物的,像力士有乌获,勇猛有贲育,人是这样,野兽也如此。天子好陵阻险,假如突然撞见高材的野兽,不及还辕,无法施巧,力不能用,岂不危险。即使得以万全无患,也不是天子应该接近的。居天子万乘之位不以安全为乐,却出于万分危险境地求欢娱,实在不足取。谚言说,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是怕瓦坠伤人。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愿陛下留意。”

司马相如曾同武帝一道经过秦二世的宜春宫,哀二世政道之失,上奏一赋以劝谏武帝。

汉武帝拜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司马相如见武帝喜好神仙之道,就为武帝作《大人赋》,想劝谏武帝。武帝看了《大人赋》以后,非常得意,飘飘然似有凌云之气,好像逸游于天地之间。

司马相如因病免职,家居茂陵。汉武帝得知相如生病以后,对所忠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请赶紧去将他作的书取来。去得晚了,书就不在了。”等所忠赶到的时候,司马相如已经病故,家中并无留书。问他妻子,回答说:“相如著书,常被人取去,家中无书,只是还未死时,留下一卷书,说若有使者前来求书,就将这卷书交给他。”最后留下的这一卷书是《封禅文》,文中司马相如颂扬了汉朝

恩德之盛，符瑞吉祥之多，其功业已经超过了周代；天下行封禅的有七十二君，然而，并无可考的特殊祥瑞，而汉朝建立至武帝，祥瑞臻至，应当及时行封禅大典，告成于天，劝告武帝早行封禅，以不要使天下士民失望。

司马相如死后五年，汉武帝开始祭后土。司马相如死后八年，汉武帝到泰山行封禅大典。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重用酷吏

汉朝建立后，汉初君臣都是从社会下层经过秦末农民战争登上统治宝座的。他们对于秦朝的酷刑苛政都有切肤之痛，君臣俱倡无为，从民之欲，顺流而与更始。萧曹而后，及至文景，国家无事，百姓自爱不轻易犯法，吏治修谨不喜严刑苛法。但是，随着社会各方面矛盾的积累和激化，也开始出现苛刻寡恩，执法不避贵戚，务求惩治豪强的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由等。

郅都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郅都曾随从景帝到上林苑，贾姬到厕所去，突然一个野猪闯进厕所。景帝用眼神示意郅都前去相救，郅都不听。景帝准备亲自去救，又被郅都阻拦。郅都说："去一姬，又有一姬进，天下并不少贾姬这样的人。即使皇上自己不看重自己，可是，让国家社稷怎么办呢?"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很高兴，赏赐给郅都金百斤。

济南瞷氏，有宗人三百余家，豪猾难治。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上任即诛杀瞷氏首恶，其余的都被吓服。郅都居任一年，济南郡道不拾遗。

郅都为人重气节，为政清廉，请托不听，执法严苛，不避贵戚。他常说："我背亲出仕，自当恪尽职守，以死为国家尽节，终无法顾及妻子儿女。"后来，郅都被任为中尉，列侯宗室都很害怕，不敢正眼瞧他，称郅都为"苍鹰"。临江王被控告有罪，到中尉府对簿公堂，求郅都借用刀笔给景帝写信，遭郅都拒绝。魏其侯窦婴派人偷偷送来，临江王得刀笔后，给景帝写了一封信，感觉受到了郅都侮辱，然

后自杀了。窦太后知道后，勃然大怒。景帝欲为郅都开脱，说郅都是忠臣。窦太后不允许，郅都被斩杀。

南阳人宁成以郎事景帝。宁成好盛气凌人，从不屈居人下。为小吏，必凌其上级；为长官，又苛指下属。郅都为济南太守，郡都尉见郅都犹如属下的县令见太守一样，至宁成为济南都尉，凌郅都出其上。郅都死后，长安附近宗室贵戚多横行不法。于是，景帝任命宁成为中尉，宗室豪强吓得人人惴恐。

汉武帝即位后，宁成调任内史。外戚纷纷攻毁宁成。因怕遭受重刑，宁成私刻符节关传逃出函谷关回到南阳。他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赚千万钱，不能算人。"宁成家居后，赁贷陂田千顷，转租给贫民耕种，役使数千家，置产数千万。在南阳，宁成役使百姓，号令权威甚至重于郡守。

周阳由以郎事文帝，景帝时被拜为郡守。周阳由亦好盛气凌人，不肯屈居人下。周阳由为郡守，视都尉如县令；为都尉，又凌太守，夺其治权。他治郡，必铲除豪强，执法严酷，骄暴恣肆。他喜爱的，必定歪曲法律开脱罪责；他憎恶的，也必定歪曲法律加以陷害。武帝即位后，周阳由仍为郡守，在二千石官中最为酷暴。后来，周阳由被任命为河东都尉，因为与太守胜屠公争权，互相告发，周阳由被弃市。

汉武帝即位初期，吏治修谨，酷吏有数。武帝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想效法儒家政治理想中唐虞成康四夷宾服、群生和乐、祥瑞臻至的盛世。所以，他即位以后，诏举贤良文学，议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复高年，恤孤独，省卫士，罢苑马等，各项事业搞得热热闹闹，想改变汉初以来奉行的黄老无为政治。可是，太皇太后好黄老，不喜儒家兴功烦民这一套，把这股势头压了下去。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崇尚黄老无为的前朝重臣汲黯甚至当面说他："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汲黯认为，唐虞之世纯用德治，施行礼乐仁义，耐心教民化欲，以臻太平。要达到这一

点，关键是君主克制私欲，不事兴作，虚静无为，正身率下，以仁义化民。而武帝多欲建功立业，张口闭口“吾欲”云云，是不可能真正对下行仁义化民的，所以说他“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武帝很不高兴，但没有发作。

在武帝的多欲政治之下，尽管武帝本人期望创造一个人人和乐的“唐虞治世”理想局面，但是各种社会矛盾都开始激化了。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为救东海，将东海举国迁到江淮之间，用费巨大，百姓骚动不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王恢、韩安国击定南越，又令唐蒙开西南夷，巴蜀一带百姓人心浮动。特别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后，汉匈断绝和亲，武帝下决心武力消灭匈奴。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朝廷中又发生了窦婴、田蚡党争案。武帝在实际政治中逐步提拔、重用一批法吏之士，一大批酷吏走上政治舞台，官僚队伍一步步酷吏化。重用酷吏的政策差不多贯穿了武帝的一生。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汉武帝任命法家张欧为御史大夫。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发十万卒治西南夷道，功费浩大，招募豪民垦田南夷，入粟县官。陈皇后因争宠斗妍，以巫蛊行妇人媚道阴谋败露，汉武帝让侍御史张汤治理这件案子，张汤大事诛连。汉武帝非常满意，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此后，汉代吏治进入酷吏时期，大批酷吏受到重用，张汤也成为酷吏总头目。

张汤，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张汤父亲为长安丞，因外出，让张汤在家看门，回来后，发现老鼠把肉拉走了，张汤父亲很恼怒，就鞭笞了张汤一顿。张汤掘开老鼠洞，逮住老鼠，找到吃剩下的肉，摆开狱桌，审问老鼠，治老鼠以偷盗之罪，然后将老鼠碎尸于堂下。张汤父亲看到张汤拷问老鼠的狱辞，非常老辣熟练，简直就像多年治狱的老狱吏一样，大吃一惊，就让张汤帮助写狱辞。汤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吏。汉武帝舅舅田胜为九卿时，曾罪系长安狱，张汤倾身事之。武帝即位后，田胜被封为周阳侯。为报答张汤，田胜向许多贵人引

见张汤。

宁成为内史时，以为张汤能干，就任张汤为内史掾，又向上推荐张汤，张汤被提升为茂陵尉。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后，以为张汤精明能干，又征张汤为丞相史。田蚡向武帝推荐张汤，张汤被汉武帝任命为侍御史，参预治理刑狱。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让张汤治理陈皇后巫蛊案。将张汤升迁为太中大夫，并让他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改制定律令。

赵禹，斄（今陕西武功）人，曾以令史事太尉周亚夫。后周亚夫为丞相，赵禹为丞相史。赵禹为人清廉倨傲，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有所请托，均遭赵禹拒绝。赵禹的目的是切实杜绝宾朋知交私请受托，一心一意为国尽节。赵禹名声很好，府中都称赞赵禹为政清正廉明。然而，好黄老的重臣周亚夫并不重用赵禹，他说："极知赵禹的才能无人可比，然而，他执法太深刻，不可以重用为大官。"武帝即位后，赵禹以法吏之士积功劳，被升为御史。武帝以为赵禹有才能，加以重用，再升为中大夫。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让中大夫赵禹、太中大夫张汤共同修改律令。经过这次修改，改变了汉初以来废除秦朝严刑苛法而约法省禁的局面，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株法，并增加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司法实践中亦开始实行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法律条文越来越繁密，也越来越严酷。见知故纵意思是发现有人犯罪而不检举告发，以故意纵容犯罪论处，而所监临之部主亦并坐连罪。缓深故之罪是指官吏犯了故意制造理由捕人与深害罪全都从宽、从缓处理。急纵出之诛指官吏释免罪人，可被怀疑为故意放走犯人，应严加诛伐。经过这次大修改，实际上一方面是严密法网，严酷刑法；另一方面又鼓励多杀，轻罪重罚，执法者可以枉法曲法乱捕乱杀，同时鼓励官吏互相检举告发。

张汤、赵禹受到汉武帝重用的同时，另一大酷吏义纵也步步高升。义纵，河东（今山西夏县）人。义纵少年时曾与张次公攻剽劫道，

杀人越货，参加暴乱团伙。义纵的姐姐义姁因为医术高明受到王太后宠爱，王太后问她家中是否有什么人愿意做官的，义姁说，有一个弟弟品行不好，不可做官。王太后告诉了武帝，武帝即拜义纵为中郎，又出外补上党郡中令。义纵做官，果断坚决，敢行暴害之政，无所含容，治县无逋逃之事，被评为第一。他升为长陵及长安县令，敢于依法严治，不避贵戚，曾逮捕太后外孙修成君的儿子中，汉武帝以为能干。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义纵升为河内都尉。义纵上任以后，马上族灭河内豪强穰氏一族，河内郡即道不拾遗。就在这一年，赵禹由中大夫升为中尉，列于九卿。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酷吏减宣因为治理主父偃狱崭露头角，受到重用，被升为御史中丞。减宣，杨（今山西洪洞）人，以佐史给事河东太守，将军卫青到河东买马，见减宣能干，将其推荐给武帝，武帝征为厩丞，减宣因办事利落，再迁为御史。武帝命减宣治主父偃狱，减宣穷事株连，执法深严，升为御史中丞。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缘饰儒术、专门顺从武帝旨意、奏事皆看武帝眼色、鼓吹皇权无限扩张的公孙弘被武帝任命为御史大夫，另一个同样善于揣测武帝心思的张汤被任命为廷尉。

张汤被任命为廷尉后，廷尉衙门培养出了王温舒、尹齐、杜周等大批酷吏。张汤善于揣测武帝心意，见武帝好文学、兴儒术、外儒内法，就征用博士弟子为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的经义来处理大案。张汤治狱唯上是从，只要武帝意欲治罪的，就交给执法酷刻的监吏重办，武帝意欲宽释的，就交给执法平和的监吏从轻处理；遇到定罪审判疑决不下的难案，必先奏报武帝，同时为武帝分析案情缘由，让武帝最后决定，判定以后，又把武帝判定的案例书于谳法契令以定为后式，以此来阐扬武帝的英明，所以，深得武帝欢心。

张汤为廷尉，内修私德，居官廉洁。对于投靠自己的宾客，张汤给以优厚待遇，对于故交子弟为吏的、宗族成员贫困的调护尤厚。

张汤还善于处理同下属的关系，凡所上章奏不合武帝意旨的，必定叩谢皇上，说自己错在不听下属的话以至于出错；而所上章奏得武帝肯定赞赏的，则说是由属下某某人所做。张汤扬人之善、掩人之过如此。所以，各方称誉张汤的很多，丞相公孙弘一再称美张汤。

对于武帝兴功作、攘四夷而又重用酷吏的做法，崇尚黄老无为政治的老臣汲黯很看不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汤为廷尉后，汲黯曾当着武帝的面斥责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导天下百姓的邪心，以安国富民，使囹圄出空，为什么还要乱改高皇帝的法度？我看你从此要灭种了！"在朝廷上，汲黯同张汤常常争论不休。张汤尖嘴利牙，巧言如簧，汲黯争论不过，大骂张汤："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这个张汤，要弄得天下人心惶惶了！"武帝信任张汤，反而认为汲黯摆老资格，不善于学习，落到了形势的后面，从此以后，日益疏远汲黯，继而又把汲黯赶出朝廷。酷吏政治的发展更少了阻碍。

宁成私刻关传符节逃出以后，家居致富。武帝想重新起用宁成为郡守，公孙弘反对说："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如狼牧羊，不能让宁成治民。"汉武帝改任宁成为函谷关都尉，约一年多，凡出入关的人都说："宁肯碰到母老虎也别碰上宁成发怒。"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义纵由河内郡调任南阳太守。宁成家在南阳，出函谷关时，宁成侧行送迎义纵，然而，义纵气盛傲慢，根本不理宁成。到任以后，义纵治宁氏重罪，破碎其家，连坐至宁成，宁成被斩杀。义纵为南阳太守，任用杜衍人杜周为爪牙之吏，并推荐给张汤，张汤任用杜周为廷尉史。因为治理边郡士卒逃亡案，击杀甚多，深合武帝意旨，杜周再升为御史中丞。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数次领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反击匈奴，定襄吏民乱败。于是，武帝调义纵为定襄太守。义纵到任以后，提出狱中犯重罪的一二百人，以及这些人的宾客子

弟私自入监探视的二百余人，合在一块穷治其罪，一日报杀四百余人，还说："为死罪的人找到解脱。"至此，定襄界内吏民不寒而栗，豪猾难治的奸民纷纷帮助官府捉拿罪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义纵得势的时候，大酷吏王温舒也越来越受到武帝重视。王温舒，阳陵（今陕西高陵）人，少年时曾用椎杀人，埋尸为奸；后来，以治狱为廷尉史，受到张汤重用，升为御史；因为督捕盗贼有功，杀伤甚多，再升为广平都尉。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时，专门选择郡中果敢豪猾之吏十余人作为亲信爪牙，调查并掌握他们的罪行，加以控制利用，放手让他们督捕盗贼，且按自己的意愿办事。手下官吏，凡能切实按王温舒旨意办事并使其满意的，虽有重罪亦不治理；如果不能迅速抓获盗贼并达到王温舒满意的，必灭其亲族。所以，甚至接近广平地界的齐赵盗贼都不敢靠近广平之地，广平获得道不拾遗的好名声。汉武帝知道后，提升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时，早已探明河内郡豪猾奸诈之家的情况。王温舒到任后，用任广平都尉时的方略部署下属，逮捕郡中豪猾之家，辗转相连，因连坐致罪的有千余家，然后，分别其罪，罪大的灭族，罪小的杀头。王温舒到任时，已是九月暮秋时分，为了加快报批速度，赶在立春到来之前执行处决，王温舒下令郡内私自准备五十匹马，安置在河内到长安的驿道上。所以，河内郡公文报批的速度极快，奏书不过两日，郡内已得到批文。斩杀的罪犯极多，至于流血十余里。郡中的人都感到奇怪，以为神速。到十二月底，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声。可是，王温舒仍嫌没有杀够，又到邻近旁郡搜求盗贼。到了立春这一天，按国家规定，已不得再杀人，王温舒顿足叹气，很遗憾地说："唉呀！要是冬天能再延长一个月，我的事就可大功告成了。"

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任命张汤治理淮南王、江都王谋反大狱。张汤重用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用《春秋》大义"大义灭亲"，穷事株连，立下汗马功劳，深得武帝信任。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丞相公孙弘病死。张汤因有功被提升为御史大夫。就在这一年,汉匈之间爆发第二次大规模的战役,匈奴浑邪王率众内附。财政亏空,西汉政府再次出现财政危机。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关东水旱为灾,贫民流失众多,打开国家仓库赈济贫民,仍然不够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朝廷将关东七十余万灾民安置到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一带,花费巨大。同年,汉匈之间发生第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国家财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汤向汉武帝提出了一系列搜钱的财政措施,从造白金皮币、盐铁官营到算缗、告缗,不一而足。丞相成了摆设,天下大事实际上取决于张汤。张汤日益亲贵,大受武帝信用。甚至张汤有病时,武帝还亲自前去探视。这一年的冬天,匈奴遣使到汉朝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讨论。博士狄山认为汉匈之间长期的战争造成了国库空虚,边民穷困,万民不安的局面,所以,赞成和亲。武帝征询张汤的意见,张汤说狄山是无知的愚儒。武帝便让狄山到靠近匈奴的边界去守障塞,结果,不过一个月,匈奴人就斩狄山头而去。张汤一时威震朝廷。

因为发行白金皮币、五铢钱,老百姓盗铸作伪严重,京师长安为害最烈,为了加强治理,汉武帝调定襄太守义纵为右内史,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义纵和王温舒上任以后,二人展开捕盗竞赛。王温舒密谋计划对义纵封锁消息,而义纵则必定败坏王温舒的计划,凌驾其上。王温舒、义纵的属吏也务以斩杀捕人为能事。

汉武帝曾巡幸鼎湖,病了很长时间。等病愈以后,武帝巡幸甘泉宫,见道路无人修整,勃然大怒,说:“义纵以为我一定会死,以后再也不能走这条路了吗?”心中对于义纵很怨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冬,武帝派人指使杨可发起告缗,而义纵不知是由武帝派人专门指使的,以为败乱百姓,就发派属吏逮捕指使杨可告缗的人,结果竟追到武帝头上。武帝让酷吏杜周来审理,杜周以废格诏书罪将义纵弃市。

在杨可告缗运动中,主持这场运动的大酷吏杜周越来越受到

重用，并成为酷吏中的一个主要代表。

对于张汤和武帝发行白金皮币，大农令颜异有不同看法，认为皮币定价太高，本末不相称，武帝很不高兴。颜异的宾客告诉颜异，政令初下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颜异撇撇嘴，没有说话。张汤则认为，颜异身为九卿之一，见国家政令有不方便的地方不上奏朝廷却在肚子里加以诽谤，犯了腹诽罪，将颜异处死。从此以后，公卿大臣只知阿谀奉承以讨得武帝欢心。

张汤越来越受到汉武帝的宠信，却与其他公卿大臣之间结下怨仇。仇视张汤的人暗中联合起来，私下搜罗整理张汤的罪行材料，阴谋陷害张汤。河东人李文同张汤有隙，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以后，就从文书奏章中搜罗可以陷害张汤的材料。

张汤有一个心爱的属吏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以后，就暗中指使别人告发李文的奸恶事，案子由张汤审理。张汤知道是由鲁谒居指使人干的，就处李文以死罪。后来武帝问起这件案子，张汤佯装惊奇地说："是李文的旧交怨恨李文告发的。"鲁谒居有病，张汤前去探视，亲自为鲁谒居摩足。赵国冶铸业发达，张汤向汉武帝提出的盐铁官营政策，使赵王受到排斥。所以，赵王对张汤很恼恨，就在暗中窥伺张汤的行为，而鲁谒居曾案治赵王，赵王心中很是怨恨。于是，赵王上书告发张汤："张汤身为国家三公重臣，下属鲁谒居有病，张汤竟然为他摩足，怀疑他们共同谋划大奸恶。"恰在此时，鲁谒居病死，事情牵连到鲁谒居的弟弟，被逮进监狱。张汤到监狱考察别的囚犯，想私下里寻找机会为鲁谒居的弟弟开脱罪责，表面上却装作不知道这回事。鲁谒居的弟弟并不知道张汤的用心，却很怨恨张汤。于是，他使人上书告发张汤与鲁谒居阴谋陷害李文一事。案子交给御史中丞减宣处理，减宣与张汤不和，就穷追其事。

有人盗掘孝文帝陵园埋下的随葬钱，丞相严青翟与张汤约好共同到武帝那儿谢罪。等到了武帝那里，张汤觉得丞相负责四时巡行陵园，应当谢罪，自己作为御史大夫不应承担责任。严青翟谢罪

后，武帝命御史来审查这件事。张汤准备用"见知故纵"的罪名来治丞相严青翟的罪，严青翟很害怕，而严青翟手下的三个丞相长史都同张汤矛盾很大，想方设法来陷害张汤。

丞相长史朱买臣同严助是同乡，靠严助引荐才得到了武帝重用，而张汤为小吏时曾跪伏在朱买臣等人面前。张汤为廷尉时，奉命治理淮南王反狱，穷事株连牵扯到严助，武帝本来不想杀严助，可是，张汤一再争执，严助遭杀，朱买臣心中很怨恨张汤。张汤升为御史大夫后，朱买臣因为有罪降职为丞相长史，进见张汤时，张汤坐在床上不动，非常傲慢无礼。朱买臣受到侮辱后，常欲杀张汤而泄愤。王朝、边通皆习法吏纵横之术，为人刚暴酷烈，曾分别官至右内史和济南都尉，后来降职为丞相长史。张汤数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职权，知道丞相三长史以前身份高贵不好使唤，所以经常摧折压迫他们。

得到张汤欲以"见知故纵"的罪名案治丞相严青翟消息后，丞相三长史合谋说："开始时张汤与丞相约好了前去共同谢罪，后来又反悔，出卖丞相，现在又想用宗庙受盗掘的事来整治丞相，这是想自己直接取代丞相。我们知道张汤的一些奸恶事。"于是，他们派人逮捕了同张汤关系亲密的田信等人，然后告发张汤，说张汤向皇上请奏的内容，田信却事先知道，以此囤积居奇经商致富，而得来的钱则与张汤共分。案子上奏给汉武帝，武帝知道后，就问张汤："我想干的事，商人每每先知道，看来是有人预先将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张汤不谢罪，却故作惊讶地说："肯定是有泄密的人。"武帝以为张汤心怀奸诈，竟敢当面欺骗自己，派八辈使者前去责罪张汤。张汤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这回事，拒绝承认，于是，武帝命赵禹前去责问张汤："你也太不明白事理了。经你审理的案子，不知道有多少人已被夷灭。现在别人告发你的材料都很充分，天子不愿逮你入狱，让你自己决定怎么办，又何必再多次对质。"于是，张汤向武帝写书谢罪，说："我张汤并无尺寸之功，以刀笔吏起身，蒙天子宠

爱提我到三公的高位上，没有可以用来抵当罪责的。然而，阴谋陷害我张汤的，是丞相三长史。"随后自杀。

张汤自杀以后，总其家产不值五百金，都是俸禄和武帝赏赐所得，别无其他。宗族子弟想厚葬张汤，被张汤母亲阻拦，说："张汤为天子大臣，遭恶言攻击而死，何必要厚葬呢？"用一牛车载棺下葬，并无外椁。武帝听说后，说："非此母不生此子。"于是派人尽杀丞相三长史，丞相严青翟自杀。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王温舒被任命为廷尉，关都尉尹齐则升迁为中尉。尹齐，东郡茌平人，以法吏之士积功劳，升为御史，曾在张汤手下办事，张汤屡次称赞尹齐公正廉洁果敢勇武，让他负责督捕盗贼，尹齐斩伐不避贵戚。后来，尹齐升为函谷关都尉，执法严酷的名声超过了宁成。汉武帝听说后，升尹齐为中尉。尹齐为中尉治理京师，成绩不善，被武帝废黜。武帝重新起用王温舒为中尉，调任尹齐为淮阳都尉。尹齐在淮阳都尉任上，诛杀甚多。尹齐死了以后，他的仇家甚至想把尹齐的尸首烧掉，还未等到尹齐下葬，他的尸首已不知去落。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起用赵禹为廷尉而复用王温舒为中尉。赵禹任廷尉后，在吏治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治狱力争平缓，而武帝则以为赵禹已经年老无用，将赵禹调任燕相。

王温舒为人少言多质，不善口辩，居任别的官职，整天昏昏欲睡，公事不办，而被任命为中尉以后则心花怒放。当义纵为内史时，王温舒惧怕义纵，未敢放手大加杀戮。义纵死后，尹齐以办事不力被罢官，王温舒被重新任命为中尉，于是放手恣治。王温舒平素已熟知关中风俗，对于豪强奸恶之吏很熟悉。他上任以后，把这些人全部起用。王温舒在郡中设置告密𤗲，鼓励人们告发，又专门设置邑落伍长来处理告奸的事。王温舒为人谄谀，很善于为有权势的人办事以讨得他们的欢心，而对于无权势的人则视如奴仆。有权势之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权势之家，即使是贵戚宗室，必定侵凌侮

辱。王温舒舞文弄法案治下户中的豪猾之家，用以警诫大豪强却从不去直接碰他们。王温舒治狱，凡被逮进狱中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大都烂死于狱中。王温舒手下的爪牙之吏被人们称为戴帽子的老虎。他做中尉期间，郡中中等以下的豪猾之家全都惧伏，而有权势的大豪强则四处张扬王温舒的好名声，称赞他治理的成绩。几年之间，他手下的爪牙之吏都因受权贵之家的调护而致富。

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伐大宛，下诏征发豪吏参军。王温舒藏匿其属吏华成，不执行诏书，有人告发王温舒接受贿赂等其他犯罪的事，立案审理以后，判罪至灭族，王温舒自杀。同时，王温舒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姻亲也因为其他罪名连坐灭族，共灭至五族。光禄勋徐自为说："真可悲呀！古代有罪连坐至灭三族，而王温舒犯罪以至于灭五族！"王温舒死时，家累千金。

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御史中丞减宣被汉武帝提拔为左内史。减宣任左内史期间，事无巨细，一切均由自己动手处理，官属令丞均不得擅自改动，凡有所违背的，一律以重罪治之。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减宣又被武帝任命为右扶风，其下属成信惹恼了减宣，藏匿在上林苑中，减宣命郿县县令指挥吏卒，擅人禁苑攻杀成信，又射中苑门。以此，减宣被逮进监狱，以大逆无道罪判灭族，减宣自杀。

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御史中丞杜周受到武帝重用，被任命为廷尉。杜周为廷尉，治狱的严酷同张汤大体相仿，可是比张汤更善于揣测武帝心思，看武帝眼色办事。武帝想排挤的，必定想法陷害；武帝想释免的，必定久系待狱让他的冤状一点一点地显示出来。有人不服，就问杜周："君为天下人断狱判案，不按三尺法行事，专门以皇帝的意旨来定案。断狱定案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杜周回答说："三尺法是从哪里来的？前边的皇帝所肯定的著为法律，后边的皇帝所肯定的定为法令，法令本来就是由皇帝的意旨肯

定的。法令哪里就一定要是以前的呢？”

到杜周为廷尉时，国家的事情越来越烦乱，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由汉武帝直接下诏逮治的案子越来越多，仅二千石官逮进狱中的，前后相因，竟然不下百余人。郡守和公府上报到廷尉的劾章，一年有千余份，而每份劾章，案件大者牵连到数百人，小的也涉及到数十人，远的千余里，近的数百里。狱吏审案之时，有不服劾章所告的，又被鞭笞掠拷被迫服罪。所以，凡是听说已被人告发了的，全都逃匿起来。直接由武帝诏狱逮捕的有六七万人，而酷吏转相增加又有十余万。

后来杜周被任命为执金吾，在其任上，发生桑弘羊、卫皇后宗族子弟犯法之事，杜周深挖穷追，用严刑酷法治之，受到汉武帝赞赏。汉武帝以为杜周为国家尽心尽力而无任何私心杂念，所以，又于天汉三年（公元前 98 年）提升杜周为御史大夫。

杜周开始为廷尉史时，只有一匹残马，后位至三公，家财累积至亿万。

自王温舒、杜周以杀伐为威、严酷为治受到武帝重用以后，郡守、都尉、诸侯相等二千石官纷纷加以效法。随后，出现大批酷吏，官吏队伍已酷吏化。蜀郡太守冯当暴酷摧折，广汉太守李贞擅长磔人，东郡弥仆以锯项为能事，天水骆璧必定巧立名目罗致成狱，京兆尹无忌、左冯翊殷周被人称为毒蛇猛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官吏百姓犯法的却越来越多，盗贼纷起，治不胜治。

武帝酷吏政治之下，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聚众数千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范生等。大的一群至数千人，小的也有数百人。他们自立官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器，释放死囚，攻杀太守都尉，传檄檄告县邑供奉饮食。

为镇压农民暴动，武帝命丞相长史、御史中丞着力督捕，然而无济于事，于是命光禄大夫范昆、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皇帝符

节，用虎符调发军队加以镇压。大股农民暴动队伍被斩杀的甚至超过了万人，给他们提供饮食遭连坐被逮杀的，又有几千人。队伍被打散以后，散兵游卒又集阻山川险要，根本没法治理。汉武帝又作了“沉命法”的极端酷法，法律规定：凡郡中有农民暴动而没被发现，发现了而没有杀尽的，自郡守尉以下至小吏皆罪至死。这样，地方小吏发现了农民暴动也不敢汇报，恐怕杀不尽而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不让他们上报，以上下藏匿来躲避“沉命法”。

在镇压农民暴动队伍过程中，又出现了武帝后期另一个大酷吏江充。江充，邯郸人，本名叫齐。他把善歌舞的妹妹嫁给了赵太子丹，这样攀裙带而发迹。江充后来同太子丹关系恶化，逃到长安告发丹的阴私，受到武帝赏识，被武帝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督捕三辅盗贼，监察三辅贵戚近臣。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太子的家使乘车马误入天子专用的驰道，正好被江充遇上。江充依法拘捕了太子家使，并没收车马。太子屡次向江充求情，江充不许，报告了武帝。武帝以为江充对自己忠心耿耿且又精明能干，把江充视为心腹加以重用。

征和元年（公元前93年），阳陵大侠朱安世在狱中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太仆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指使人在甘泉驰道下埋木偶，诅咒天子死。武帝命江充穷治其狱，杀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和卫青子卫伉也受牵连被杀。

江充向武帝报告说，宫中有蛊，天子有病就是它搞的鬼。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命江充和按道侯韩说专门查治巫蛊案。江充查获后宫惑行媚道的木偶作为诅咒武帝的罪证，向武帝汇报。武帝大怒，诛杀后宫及大臣数百人。江充从宫中穷挖滥掘，从卫皇后宫一直掘到太子宫，并掘出预先埋好的木偶，准备奏报武帝。太子性情仁恕温谨，非常恐惧，斩杀江充。武帝闻讯大怒，发兵围捕太子，太子畏罪自杀。自此以后，武帝才开始逐步反省，拒绝了桑弘羊戍边轮台的建议，并下了向全国臣民检讨的罪己诏，改变兴功拓地

的政策，吏治复归于修谨。

综观武帝一朝，尽管打着儒家的旗帜，实际政治中重用的是酷吏。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以后，一直到巫蛊之祸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轮台罪己诏，在武帝即位的五十四年中，有四十年是在搞酷吏政治。

马邑之谋以后，社会各方面矛盾开始激化，武帝起用赵禹、张汤改定律令，法律渐苛。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缘饰儒术的公孙弘被任为御史大夫，张汤被任为廷尉，国家事多，百姓穷苦，犯法者众，大批酷吏经过张汤廷尉衙门的培养纷纷登台亮相。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规模出击匈奴，国家财政山穷水尽，汉武帝张汤商议财政改革，张汤掌握了实际决策权，又用“腹诽法”杀大农令颜异，任王温舒为中尉，酷吏政治达到高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杜周为廷尉以后，法律越来越严酷，农民暴动纷纷而起，汉武帝又作“沉命法”，执法严酷的官吏开始转向保护自己，酷吏政治走向恶性循环并走向自己的反面。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江充受到武帝重用被任为直指使者，又专门让他查治巫蛊，终于酿成巫蛊之祸，酷吏政治的罪恶暴露已极。

武帝时代酷吏的大批兴起，主要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和镇压农民反抗，用酷暴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武帝时代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一个集中反映，是同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政策紧密相关的。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酷吏列传》、《平准书》

《汉书》：《酷吏传》、《张汤传》、《杜周传》、《江充传》、《食货志》、《刑法志》

汉通西南夷

秦汉时期，广大的西南地区，围绕着巴、蜀两郡的外圈，大约今天的四川西部、南部，贵州、云南以及甘肃边境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部落，被称为西南夷，又称西僰南夷。

在贵州西部地区，有几十个部落国家，其中夜郎最大。夜郎往西，在云南东部滇池一带，分布着几十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滇最大。在滇的北面，今四川西南部一带，分布着几十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邛都（今四川西昌）最大。夜郎、滇、邛都等部落多属濮族，人民结发为椎，从事农业耕作，有城邑聚落，过着定居生活，已进入阶级社会，并初具政权形式。

在滇的西面，今云南中部地区（今云南云龙）、昆明等，地方数千里，多属羌族。人民编发，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定居的地方，也没有君长，大体上处于原始部落时期。

嶲往东北，分布着几十个部落国家，其中徙（今四川天全）、筰（今四川汉源）最大。往东北，有几十个部落国家，其中冉駹（今四川茂汶）最大。冉駹往西，有几十个部落国家，其中白马（今甘肃成县）最大。徙、筰、冉駹、白马等，多属氐族，或定居耕作，或游牧迁徙，已进入阶级社会。

战国时期，西南夷地区就同内地有了往来。楚成王时，曾派将军庄跻带兵循长江而上，经略巴、黔中地区，来到滇池，收服其地，使属楚国。正当庄跻想回楚国归报时，秦国夺取了巴、黔中，切断了庄跻的归路。于是，庄跻在滇称王，率其众改变服饰，接受当地人的

风俗，统治了当地人民。

秦时，秦的势力发展到西南夷，曾派将军常頞从宜宾到昭通开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部落派遣官吏进行统治。汉初，放弃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但西南夷同中原之间仍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僰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进入到西南夷中，有的还经由夜郎浮牂牁江（今北盘江）转贩到南越地区。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秋，王恢击定东越后，派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在南越，南越人拿出蜀地特产枸酱来招待唐蒙。唐蒙很奇怪，惊问来自何处。南越人告从浮牂牁江而来，牂牁江江面广阔，一直通到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召问蜀地商人。蜀人告诉他，枸酱只有蜀地出产，是蜀地商人卖给了夜郎人。夜郎临近牂牁江，江面广阔，足以行船，夜郎人就浮牂牁江从水路将枸酱转卖给了南越。

唐蒙上书武帝说："南越王黄屋左纛，地方东西万余里，势力侔于天子，僭上无度。如果发兵从长沙、豫章到达南越，往往山险水绝，路途艰难，加上地势卑湿、天气暑热，很难成功。听说从夜郎可以浮牂牁江到达南越，可利用汉朝的强大，巴蜀的殷富，开通夜郎道，在那里设郡置吏，征精兵十万，然后乘船浮牂牁江而下，走水路出奇制胜征服南越。"

汉武帝很赞赏唐蒙的建议，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同时任命唐蒙为中部将，负责开通夜郎。唐蒙遂发巴蜀吏卒千人，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以通南夷。巴蜀一带子弟惊恐，父老忧患。武帝知悉后，又派司马相如为郎中将，前去责让唐蒙，晓谕百姓，安定人心。

司马相如晓谕巴蜀父老说："天子派中郎将唐蒙出使南夷，是为了宾服夷人，奉币帛加以安抚。而今中郎将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父老，又令郡县转粟运输，扰劳百姓，并不是天子的意旨。"然

后还报武帝。

当司马相如还报武帝时，唐蒙已经通过巴符关来到夜郎，见到了夜郎侯多同。夜郎侯多同问唐蒙“汉孰与我大”，自以为大，不知汉之富厚广大，非夜郎所能比。唐蒙厚送夜郎财物，晓谕以汉之威德，双方约定，夜郎为汉县，由多同子任县令，汉为置吏。夜郎附近众小部落国多贪婪汉朝丰厚的财物馈赠，以为汉朝距离遥远，路途艰难，不可能真的统属南夷，纷纷要求归汉。唐蒙还报，汉武帝遂以其地置犍为郡，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

接着，唐蒙征发巴蜀吏卒，修筑自僰道抵达牂柯江的道路。因为山路崎岖，天气湿热，运输不便，供应不足，工程艰巨，工程进行了两年，耗费亿万，筑路士卒饿死累死的很多，又不断有人逃亡，而道路终究未能修成。南夷各部落又时时反叛汉朝廷，杀害汉朝吏卒，而汉发兵反击，屡屡不能奏效。由于兴费巨大，巴蜀两郡的全部租赋仍然不足供用，于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官府。但巴蜀百姓仍为负担粮食运输所苦。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夏，汉武帝派遣博士公孙弘前去考察详情。公孙弘还报说，修筑通南夷的道路毫无用处。正巧此时西夷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通汉后得到许多财物，纷纷要求内附为臣，希望朝廷派官吏去。汉武帝征询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西夷邛、筰、冉駹与蜀接壤，道路易通，秦时就设置了郡县，至汉兴才罢。如果现在真能开通置县，其利益大大超过南夷。”汉武帝听了很高兴，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率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前去谕抚。邛、筰、冉駹的君长都请求为汉内臣，撤除边关。司马相如于是在其地置一都尉、十余县，使属蜀郡管辖。武帝大悦，不听从公孙弘的意见，继续开通南夷。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正当北筑朔方、东置沧海时，蜀地长老又盛言通西南夷有害无益，建议罢除。朝廷中反对声复起，御史大夫公孙弘等认为，西南夷与朔方、沧海都是无用之地，徒使

中国疲弊，百姓忧困，主张全部停止。汉武帝命幸臣朱买臣同公孙弘辩难，朱买臣盛言朔方之利，发十策，弘不得其一。公孙弘退而主张罢沧海郡，停止通西南夷事务，以便专力对付匈奴。于是，春罢沧海郡，秋罢西夷事务，仅置南夷、夜郎一都尉，令犍为郡筑城自保。

同年夏，张骞出使西域从大月氏归来。他向汉武帝报告说，在大夏看到蜀布邛杖，经询问，知是从身毒（古印度）贩来的，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是从蜀商手中购得的。由此推测，由蜀走身毒到大夏，必是捷径。武帝大喜，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别从冉駹、筰、徙、邛、僰等数道并出，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王然于等使者在滇一带活动了四年，滇王亦帮助汉使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使者各行一二千里，然而，北方受到筰阻拦，南方受到昆明、巂的阻拦，道路终未找到。特别是昆明一带，各少数民族部落皆无君长，以善于抢劫为能事，往往遮杀汉使，道路终未得通。

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王然于等使者回到长安，他们向汉武帝建言，滇乃西南夷大国，有统治价值。汉武帝重新经略西南夷事务，略通滇国。王然于等十余辈人出发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终究因为昆明等族杀害汉朝使者，抢劫汉使者财物，未能通往身毒。

因为昆明屡屡遮杀汉朝使者，汉武帝大怒，准备发兵攻伐昆明。因为昆明临广阔的滇池，汉武帝于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在上林苑中修建昆明池，简选士卒，以习水战。

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南越反叛汉朝。驰义侯奉武帝命，在犍为郡发夜郎兵以击南越。且兰君长惧怕远道出征南越，部中留下老弱遭人抢劫，遂率部众武装反抗，拒不出兵，并攻杀朝廷使者和犍为太守。同时，西夷邛、筰亦反，夜郎侯多同也投靠南越。汉武帝乃征发巴蜀罪人和八校尉兵，准备前去攻灭南夷。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南越已破，而汉八校尉兵尚未出发。汉武帝命中部将郭昌、卫广在还军途中，引兵击定且兰、邛筰。

夜郎、冉駹震恐，都表示臣服。夜郎入朝，武帝封为夜郎王，冉駹也请求朝廷为之置吏。于是，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相继设郡置县，行使直接统治。在且兰设置牂柯郡(治故且兰，今贵阳附近)，以邛都为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筰都为沈黎郡(治筰都，今四川汉源)，冉駹为汶山郡(治汶山，今四川茂汶)，白马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和县)。

乘击破南越和南夷的兵威，武帝命王然于讽谕滇王入朝。滇东北的劳深、靡莫相互依倚为援，阻拦滇王入朝，多次侵犯汉朝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秋，武帝仍命郭昌、卫广征发巴蜀士卒攻灭劳深、靡莫，滇举国投降，并请求由汉置吏并入朝汉天子。汉武帝赐滇王印，令其统率部众数万人，以其地置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至此，西南夷正式并入汉帝国版图。

汉朝通西南夷后，设置五郡，欲使其地相接以通大夏，每年派遣十余辈使者从西南夷出发，欲通使大夏，然而，都为昆明阻拦，财物被抢，使者被杀。汉武帝大怒，下诏赦京师亡命罪徒，使之从军，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派遣将军郭昌率领，出击昆明，斩首数十万，击定昆明。以后武帝又数次遣使，欲通大夏，然而终莫得通。

当时，汉武帝已经灭了两越，又平定西南夷，新设十七个郡。新设立的郡均按原来的风俗治理，不加以过多的改变，同时还不收赋税，而所设郡县官吏其官俸用具，都由附近郡县供给。这样，南阳、汉中一带因为要负担广大新设郡县的吏卒俸食和车马用具、其他用具，负担很重。而新设郡则往往反叛朝廷，攻杀汉所置官吏，朝廷屡屡征发南方郡吏卒出击，至一年万余人，费用巨大，全靠大司农支持，大司农因为调用均输、盐铁大利，始能给之。

汉通西南夷，尽管给广大汉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于西南夷地区也带有某种程度的侵略，但是，也给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带去了汉族人民先进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使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很快有了很大的进步。加

强了汉族人民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特别是,西汉政府在新设郡地区采取不收赋税,或象征性收一点赋税,却给大量丰厚财物的办法,以使西南夷地区少数民族主动请求归属汉朝统治,要求由汉朝廷为设郡县,这是一个成功的政策。

从解放后云南晋宁发掘的滇人贵族墓葬出土遗物来看,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滇国青铜制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西汉中晚期的滇国器物,即汉通西南夷以后,已经同贵州、广西出土的西汉器物基本相似了,在种类与形制上明显受到内地汉文化的影响。西汉末和东汉初期遗物,纯汉式器物已占重要地位。这是汉通西南夷后,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明证。总之,汉通西南夷,带去了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和文化,促进了西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开发,也促进了民族融合,是值得肯定的。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

《汉书》:《武帝纪》、《西南夷传》、《食货志》

张骞通西域

西汉时期，人们把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中亚或更远的地方统称为西域。不过，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从很早的时候起，西域地区就同中原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中就有关于西域地区一些情况的描述。西域同内地早就有产品交流，西域的玉石、马、骆驼等都进入中原，中原的铜器、贝币、丝绢等也进入西域。玉门关就是玉石由此入关的意思。

秦汉以前，居住在我国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古老民族如塞种人、月氏人、乌孙人等，开始由东向西不断迁徙，陆续来到新疆及以西地区。最早西迁的是塞种人。塞种人是原居住在敦煌一带的允戎族的一支，他们向西迁移到伊犁河地区。

秦汉之际，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的月氏人从河西走廊来到伊犁河流域，赶走了塞种人，占领了他们的地盘。塞种人被迫越过葱岭到达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还有一部分迁到了休循、捐毒(今帕米尔以北地区)一带。到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月氏人又被曾与他们共居于河西走廊的另一个游牧民族乌孙人赶走。月氏人大部分南迁，他们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一带，并赶走了大夏人，占据了大夏人原来占据的地方。乌孙人本来常受月氏人的欺侮，后来在匈奴的帮助下向西攻打并赶走了月氏人，占据了伊犁河流域。乌孙人的政治中心在阗池(今伊塞克湖)附近。这些民族开

始定居于西域地区，并成为当地势力强大的民族。

出玉门关、阳关去西域，主要有两条道。一条道出阳关，通过荒旷的大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经鄯善即楼兰（今新疆若羌一带），沿南山（指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北麓西行到莎车，为南道；另一条道出玉门关，通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以东至甘肃玉门关之间的戈壁滩），经过车师前王庭即姑师（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及尉黎（今新疆巴音郭楞），沿北山（天山）南麓循河西行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为北道。

葱岭以内，诸小国星罗棋布，在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傍南道诸国，有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莎车等。傍北道诸国，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黎、尉犁、焉耆、危须、山国、狐胡。南北道以西是葱岭诸国，有皮山、乌秅、西夜、子合、蒲犂、依耐、无雷、难兜。天山山后有姑师、劫国。自疏勒西越葱岭，可到休循、捐毒、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奄蔡（今顿河上游）。自莎车西越葱岭，可到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地区）、安息（今伊朗）、大夏（今兴都库什山西北地区）、罽宾、身毒等国。

西域南北道诸国，大都定居，居民以从事农业、畜牧业为主，有城廓庐舍。当地的农作物，除谷物以外，还有葡萄、胡瓜等。畜牧业则主要有驴、马、骆驼等。当地还出产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其居民已经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水草丰美，宜于放牧，居民大都过着游牧生活，风俗习惯大体上同匈奴一样。姑师一带，土地肥沃，农业比较发达。

天山南北诸国，就社会形态而言，当时大体上处于原始公社逐步解体，阶级社会刚刚成立或略有发展阶段。一般而言，人口都比较少，多数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人口最多的龟兹也只有八万人，最小的有几百人。各国机构简单，国王以下，设有简单的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士兵。

公元前2世纪初，崛起的匈奴将势力伸展到西域，在西域地区设置僮仆校尉，向各国征收很重的赋税。由于匈奴势力强大，往往只凭匈奴单于的一封信，西域各国就会缴纳赋税、财物等以满足匈奴人的要求。

中原同西域，虽然早就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路途的遥远，山川、沙漠的阻隔，复杂多变的气候，食物供给的困难，安全保障的缺乏等多种原因，造成了出使西域和西域同中原之间交往的困难。特别是国家和民族关系的紧张，尤其是战争等人为因素，更造成了西域同中原之间交往的困难。

匈奴强盛起来后，向东吞并了东胡人，向西赶走了月氏人，控制了河西走廊，向南吞并了楼烦、白羊王，占领了河南地，向北征服了丁零(今贝加尔湖一带)、鬲昆(今叶尼塞河和鄂毕河地区)。汉文帝时，又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并设置僮仆都尉，阻断了中原同西域的联系，隔断了中西交通。

汉武帝即位以后，留心边事，考虑采取可以用来对付北方强敌匈奴的措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投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原居住在河西敦煌附近的一个强大部落叫月氏，他们屡次遭受匈奴人的攻击，后来月氏王也被匈奴杀死，而且，匈奴单于竟然用月氏王的头骨作酒器；月氏人被迫西迁，对匈奴非常仇恨，常想报仇，但苦于势单力薄，无人援助。

得到这个消息，汉武帝很高兴。他希望能够联合月氏，以便共同对付匈奴。当时，汉人对西域的情况不熟悉，月氏人西迁以后的具体下落也不清楚。到西域去，还必须通过匈奴控制的河西地区，而匈奴人正与汉朝处于敌对状态。因而，派人出使西域联络月氏，是一件具有相当危险的事。汉武帝决定悬赏招募可以出使西域的人。张骞以郎应募出使西域。

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建元年间为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武帝召募出使西域。

张骞带着甘父等一百多人的大型使团，从长安起程，经陇西（今甘肃临洮）出使西域。但是，很不幸，他们出陇西不久就被匈奴骑兵俘虏而去。

张骞等人后来被押解到匈奴单于庭。匈奴单于问道："月氏在匈奴以北，而汉朝竟然想越过匈奴去联络月氏。越，在汉朝的南面，如果我们匈奴要越过汉朝去联络越人，汉朝能够答应吗？"匈奴将张骞等人全都扣留起来。匈奴单于还为张骞配妻成家，配给他一个匈奴人妻子，试图诱使张骞投降匈奴。然而，张骞从未丢失汉朝派他出使西域的使节，寻找着能逃出来的机会。张骞在匈奴过了十年半囚徒式的生活，终于趁匈奴人防守疏忽的机会逃了出去。

逃出来后，他继续出使西域。在西行的途中，经常没有食物吃，就靠随从甘父射猎充饥。西行几十天，越过葱岭，来到大宛。大宛国王早就听说，汉朝很富裕，很广大，想和汉朝通使。所以，见了张骞很高兴。张骞向大宛王说明了出使的目的，并答应大宛王，等回国以后，一定送给他丰厚的酬谢。大宛王派专人将张骞送到康居，再由康居送到大月氏。

张骞虽然到了大月氏国，可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月氏人已占有了大夏故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户口殷盛，居民安居乐业，又因为汉朝毕竟距离太远，他们已经不再想向匈奴报仇了。张骞从大月氏到大夏，观光留住了一年多，始终也未能达到与大月氏联盟的目的，只好回国。回国途中，为了躲开匈奴的拦截，未走原路，而是沿着南道诸国回国，试图通过羌族地区回到中原。但是，很不幸，他们又被匈奴人捕获。在匈奴被扣留一年多以后，匈奴军臣单于死去，匈奴贵族之间产生了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张骞趁此混乱机会，携同匈奴妻子及甘父一道于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逃回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出发时一百多人的大型使团，回来时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个人了。这次出使虽

未达到联合月氏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却详细地了解了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回来以后，张骞详细地向汉武帝作了报告。汉武帝拜张骞为太中大夫，任命甘父为奉使君。

根据张骞的报告，大体上知道：

大宛国，在匈奴西南，汉朝正西，离汉长安城约万里。大宛人是土著民族，从事农业，种植稻、麦，产葡萄酒，又多产良马，良马出汗似血，据说是天马之子，称汗血马。大宛有城廓室屋，大小属邑七十余城，有居民数十万，军队善于操戈骑射。

大宛东北约二千里，有一个游牧国家叫乌孙。乌孙人同匈奴风俗习惯差不多，逐水草而居，过游牧生活。乌孙国有控弦之士数万。他们为匈奴所羁属，时服时叛。

大宛西北约二千里，有康居国（在今锡尔河流域）。康居也是一个游牧国家，有控弦之士八九万人，南则羁属月氏，东则附属匈奴。

在康居西北约二千里，有奄蔡国。奄蔡人和康居同俗，也过着游牧的生活，有控弦之士万余，其地邻接北海（今里海）。

大宛西北约二三千里，就是大月氏。大月氏居住在妫水以北。大月氏也是一个游牧国家，逐水草而居，风俗习惯同匈奴差不多。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人。他们因为受到匈奴人的欺压，向西迁徙，赶走了大夏人，占据了大夏故地。

从大月氏向西行数十里，有一个大国叫安息。安息是一个强盛的农商国家，出产稻、麦和葡萄酒。地方数千里，有大小属邑数百。安息国之民善商贾，利用车、船贩运货物，远达数千里。安息国使用金属货币，币面上有国王头像，还有自己的文字。

由安息西行数千里，有条支国（今伊拉克）。其地临西海（今波斯湾），气候暑热湿润，他们从事农业种植，产稻，还有一种大鸟卵，大如甕。条支人擅长魔术。条支国人口众多，各地都有小君长统治，是安息的属国。

在大宛西南约二千里有大夏国。大夏国在妫水以南，有城廓室

屋，与大宛同俗，善于经商。人口约有百余万，都城在蓝氏城。蓝氏城中，陈列有各种各样的货物。在这些商品中，还发现有汉朝蜀郡的特产邛竹邛杖和蜀布，据说是由身毒国买来的。

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居民土著，风俗习惯同大夏大体相同。当地气候湿势，人民乘象战斗。

张骞向汉武帝建议，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而大夏则在汉朝西南一万二千里。据此推测，身毒所处的位置必然离汉朝蜀郡不太远，而且必定有商路可通。由汉出使到大夏去，从羌族控制地区经过，道路艰难，羌人很厌烦。从北边去，则容易为匈奴人所俘获。而如果从蜀郡出发，道路又近，又无祸患。

汉武帝听说大宛、大夏、安息等都是大国，风俗习惯同汉朝差不多，而且多奇物，他们又很贪婪汉朝财物，只要用怀柔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诱使他们入朝进贡。那样，汉朝不仅可以广地千里，而且可以扬威于四海。于是，汉武帝又派张骞出使西南夷，寻求通往西域的新路。张骞同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从蜀、犍为（今四川宜宾）出发，数道并发，出冉駹（今四川茂汶）、筰（今四川汉源）、徙（今四川天全）、邛（今四川西昌）、僰（今四川宜宾）等，探求通往身毒国的新路。结果，由于为西南少数族人所阻拦，汉朝的使者被遮杀，终究未成。

张骞归来后，多次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由于他在匈奴多年，出使西域历经艰难，所以具有丰富的沙漠地区地理知识，能为大军辨别水草之地，使大军行动不致困乏。因从军有功，张骞被封为博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霍去病率大军从陇西出发，过焉支山（今甘肃中部一带），沿祁连山峡谷西进，深入匈奴休屠王领地千余里，转战六日，在娄兰山下与匈奴白刃决战，杀敌八千余，得战利品甚多，包括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率军再击匈奴，渡过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折军南下，进攻匈奴休屠王、浑

邪王领地，大获全胜，俘虏单桓、酋涂王及裨小王七十余，斩首三万余级。匈奴单于怪罪休屠王、浑邪王，要杀掉他们。于是，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人投降汉朝。汉武帝在河西地区设置武威、酒泉郡，控制了河西走廊。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规模击击匈奴，深入漠北，大获全胜。自此以后，大沙漠以南不见单于王庭，匈奴主力向西转移。

汉武帝屡次召问张骞，向他探询大夏等国的情况，有意再次联络西域，一方面想罗致异物，扬威边陲；另一方面是为了制服已向西转移了的匈奴。张骞又向汉武帝建议，联络乌孙以对付匈奴。

张骞被扣留在匈奴的时候，就听说匈奴西部有一个大国叫乌孙，乌孙国王号昆莫。最初昆莫的父亲难兜靡率其部众同月氏共居于敦煌附近。后来，月氏人杀死了难兜靡，乌孙人就依附了匈奴。当时，昆莫年幼，为匈奴单于收养。昆莫长大以后，屡立战功。月氏人后来西迁，昆莫向单于请求发兵以报父仇，单于就把他父亲的旧部交给他管理。于是，昆莫率部西击大月氏。大月氏人战败，西走大夏，昆莫就率众居住下来，不再依附于匈奴。匈奴几次发兵进攻都被昆莫击败。乌孙成为这一地区的强国。

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重重赏赐乌孙，可把他们招到河西故地居住，然后，汉朝派遣公主，同乌孙结为兄弟以和亲，就可以斩断匈奴右臂，而西部的大夏诸国亦可招致而来。汉武帝很赞赏这个建议，于是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被汉武帝任命为中郎将，率领一个三百人的更加庞大的使团再次出使西域。汉朝给每人配备西匹马，让他们携带牛羊万头和大批的币、帛等，浩浩荡荡向西域进发。

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以后，汉朝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匈奴主力逃往大沙漠以北，大沙漠以南已经基本上不见匈奴骑兵了。张

骞此次出使西域，中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很顺利地到达乌孙。而此时的乌孙，国内正闹着纠纷。六十岁的乌孙老王昆莫想把王位传给长孙岑陬，但次子很不满意，就起兵反对，国内大乱，乌孙部众也分为互不统属的三个部分。

张骞向乌孙王昆莫传达了西汉政府的旨意，希望乌孙能回归故地，汉朝愿意将公主嫁给他，双方结为兄弟以和亲。昆莫已无法控制部众，不能专制国中，考虑到汉朝离乌孙太远，大臣们平素已畏服匈奴，且又离匈奴太近，很害怕，所以，不想再迁徙了。这样，张骞想联络乌孙，请其回故地以共抗匈奴的目的没有达到。不过，乌孙看到汉使气派很大，礼物丰厚，答应派专使带几十匹马到汉朝答谢。

张骞在乌孙，又分别派遣随从的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进行活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岁余，张骞死去。张骞死了一年以后，张骞派出去的副使先后完成任务，同各国所派的使节一道回到汉朝。中原同西域的外交关系正式建立并日益繁密。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间长达十几年，行程万余里，中间曾两次被匈奴扣留，历尝艰险，辛苦备至，终于完成出使西域加强联系，孤立匈奴的任务。张骞出使西域，对待西域诸国，无论强弱大小，一律平等相待，实行和平友好的政策。张骞为人宽厚，毅力刚强，他以诚实获得广泛信任，深受西域各国各族的喜爱和欢迎。张骞死后，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节，仍然打着张骞的旗号。

张骞出使西域，以亲身实践和实地考察恢复了多年被匈奴阻断的中原同西域的通道，掌握了西域地区的真实情况，改变了原先对西域情况模糊不清的认识，使过去对西域的传说和零散的记载，得到进一步证实和订正。《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向汉武帝提供的报告写成的。

张骞出使西域，拓开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东西通道，并同帕米

尔高原以西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被司马迁高度评价为“凿空”。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朝赴西域的使者络绎不绝，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出使西域的多达十余辈，少的也有五六辈。大批使者前往西域，远道的要八九年时间，近道的也要几年时间才能回来，其中很多是打着使者旗号到西域从事贸易的商人。西域各国来到汉朝的也很多，其中也有很多商人。汉武帝很高兴，带着他们出巡海上，并参观各地的仓库府藏、奇戏、怪兽，并加以重重的赏赐。

随张骞到汉朝的乌孙使者回到国内后，汇报说汉朝富裕广大，应加强同汉朝联系。乌孙很重视同汉朝的关系。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通使以后，准备发兵攻打乌孙。乌孙人很害怕，派使者到汉朝请求和亲，并献良马千匹作为聘礼。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配备侍御官属数百人和丰盛的嫁妆，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武帝又把楚王戊的孙女解忧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女冯嫽持汉节行赏赐于西域各地，深得敬信，号称冯夫人。汉朝同乌孙结为和亲以后，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抗击匈奴的一个重要伙伴。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大宛列传》

《汉书》:《西域传》、《张骞传》

贰师伐大宛

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匈奴人手中逃出来，越过葱岭，到达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大宛。大宛，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都城在贵山城(今列宁巴纳德或卡散赛)。大宛人是土著族人，从事农业、牧业，种植稻、麦，多产葡萄酒，尤以产良马著名，马出汗似血，故名汗血马，据说是天马的后代。大宛有居民数十万，军队善于操戈骑射，有城廓室屋，大小属邑七十余城。

汉武帝即位以后，爱求神成仙，四处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和长生不老之方，喜占卜算卦。汉武帝喜爱宝马，他曾看到卜筮之书上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很相信。张骞通西域后，西域使者随汉使来到中原，多献西域特产良马，汉武帝以为占卜书得到了应验，所以很高兴，特别喜爱西域产的良马。乌孙献良马后，汉武帝曾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得到大宛产的汗血马，觉得更加雄健，便将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将大宛马命名为"天马"。

汉武帝很喜爱大宛产的汗血马，而方士又鼓噪说，骑着汗血马能登昆仑山上天成仙，可以会见西王母，因而，汉武帝派使者相望于道以求汗血马。大宛远在葱岭以西，距汉遥远，虽知道汉朝是东方富庶的大国，也经常看到汉朝来往中亚的使节，但他们处于匈奴人的支配之下，更害怕匈奴。因而，他们对待汉朝的使节远远不如对待匈奴的使节来得尊敬。汉朝的使节不出币帛财物就得不到食物，不拿钱买马就得不到坐骑，大宛甚至还同匈奴约定共同遮杀汉朝使者，抢劫其财物。

从大宛归来的汉朝使者纷纷向汉武帝进言，说大宛还有良马藏在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马尔哈马特），不愿让汉朝的使者看见。武帝得知还有更好的马藏在贰师城，特别高兴，就派使者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到大宛，以求购贰师城的宝马。

大宛人则认为，汉朝离大宛路途遥远，若从大盐泽（今罗布泊）来，很少有成功的；若从北面来，有匈奴人阻拦寇盗杀掠；若从南面来，又水草乏绝，没有城邑，往往一辈来使数百人，而死者过半。所以，汉朝不能大规模发兵西域，断不能把大宛怎么样，而贰师城的马，是大宛的宝马，不能卖给汉朝。于是大宛就拒绝了汉使求购贰师城汗血马的要求。汉朝使节大怒，乱骂一顿，将金马椎碎而去。大宛贵族很气愤，认为汉朝使节太轻视大宛，就让东边的郁成国在汉使回去的路上截杀了汉使，并劫夺了汉使的财物。

大宛不但不准求购汗血马，而且还遮杀汉使，汉武帝大怒。曾出使过大宛的姚定汗说，大宛兵弱，如果发汉兵三千人，用强弓劲弩射之，就可以打下大宛。汉武帝也曾派浞野侯赵破奴率七百骑兵击杀楼兰王，大破楼兰，觉得攻打大宛也不会太难，就听信了姚定汗的话。此时武帝宠爱李夫人，想给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创造一个以军功封侯的机会，便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意欲此行必取贰师汗血马。

汉武帝是个贪色无厌、喜新厌旧的皇帝。协律都尉李延年曾为汉武帝表演歌舞，边舞边唱："北方有绝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听了极为色馋，叹息说："善！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佳人吗？"武帝大姐平阳公主告诉武帝，延年有妹即是。武帝召见，果然妙丽善舞，深得武帝宠爱，于是纳为夫人。武帝想让李广利封侯，但苦于没有机会。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发属国六千骑兵和郡国青壮兵丁数万人前去攻打大宛，以夺取贰师城的汗血马。过了大盐泽后，当道的小国因为汉使往来频繁，接

待困难,很讨厌汉使,今见大军前来,纷纷坚守城池,不肯供给汉朝军队食物。这些城池,一时又难以攻打下来,能攻打下的,就补充点吃的,攻不下来的则数日撤离。等攻到郁成,兵士仅剩下千人,又很饥饿疲乏。攻打郁成城,郁成发兵抗拒,伤亡的人又很多。贰师将军同左右亲信商议说,连郁成都攻不下来,更何况大宛国的都城呢? 于是,决定引兵而还。

此一次西征大宛,往返两年,等回到敦煌,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二的兵士了。贰师将军派人上书说:"因为道路太远,又缺乏食物,并不是士卒怕打仗,而是受不了挨饿。现在,军士人数少,攻不下大宛,请求暂且罢兵,等到增加军队再去攻打大宛。"

得到贰师将军兵败的消息和所上的请罢兵书,汉武帝大怒,派专人将贰师将军的部队拦截在玉门关,传达命令说:"军有敢入者,斩之。"贰师将军李广利很害怕,就将部队留驻在敦煌。

夏天的时候,武帝派浞野侯赵破奴率两万军队北伐匈奴,结果全军覆灭。朝廷中很多高级官员都主张停止出兵攻打大宛,以便集中兵力攻打匈奴。武帝则认为,既然汉朝已经出兵攻打大宛,如果连大宛这样的小国都打不下来,那葱岭以西的大夏、安息一类的国家必定逐渐看不起汉朝,大宛的良马再也弄不到手,甚至乌孙、轮台那样的小国家也会随着为难汉朝的使者,那样,太让外国轻视汉朝。于是,武帝根据错误的轻重惩罚了那些扬言攻打大宛为不当的大臣邓光等人。

武帝决定增兵再攻大宛,释放狱中囚徒从军充当侦探或尖兵以袭击敌军,又征发郡国恶少年和边境骑兵。经过一年多的部署,从敦煌起兵时,部队就有了六万人,私人带着粮食行李跟随部队出征的人还不算在内。送粮草的牛有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骆万数。兵器、弓箭颇为齐备。领兵的校尉就有五十多人。天下骚动不安,人们争言相告汉天子要讨伐大宛。大宛国都城城内没有水井,用水要从城外引进。汉朝就随军带上会治水的工匠,准备将大宛城下的水

道改掉走向，并从原水道穿地穴攻城。增派十万人到酒泉、张掖以北，并设置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休屠（今甘肃民勤）两县卫护酒泉，以保护后方，防备匈奴乘机侵扰并作为战争后备队。为充实兵力，同时为部队提供粮草运输，还大量征发社会上七种身份低下的人令其参军。这样，汉朝士马浩浩荡荡，车马人众接连不断一直达到敦煌。为准备在攻破大宛以后选取良马，还为部队专门配备了两名会相马的人为驱马校尉和执马校尉。

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贰师将军李广利带着庞大的队伍第二次出征大宛。沿路各小国慑于汉朝的巨大兵威，纷纷打开城门出来欢迎，并拿出粮食供奉汉军。到达轮台时，轮台人不屈服，结果，没打几天就毁灭了轮台。从轮台往西，一路顺利攻到大宛王都。

攻到大宛王都时，汉军部队还有三万人。大宛军队出来迎击汉朝军队，被汉朝军队击败。大宛军队退入城内守卫城堡。贰师将军本想先攻占郁成，但怕军队滞留而使大宛人产生诈变，决定先打下大宛。汉军派水工决开水源，改变水的流向，断绝城内用水，并穿地道攻城，以困扰大宛。包围大宛都城并攻打四十多天后，大宛人很害怕。大宛高级官员商量说："因为国王毋寡隐藏了好马，杀死汉朝使者，才招致汉军远征大宛。现在把国王杀死，献出宝马，让汉军解围。如果汉军还不解围，就奋战而死，也不为晚。"这时，大宛都城的外城已被汉军攻破，并俘获了勇将煎靡，大宛人更加惊恐。于是，大宛人杀了国王，提着国王毋寡的头去见贰师将军李广利，表示愿意献出宝马，任凭汉军选取并供给粮食，然后汉军撤围；不然的话，就把宝马杀死，坚守到底，而康居的救兵也快到了，到时内外夹攻汉军，请贰师将军李广利考虑选择。

贰师将军听说大宛城内已找到汉人穿井汲水，城内的粮食也不少，作为罪魁祸首的大宛王毋寡，已被杀头，再不撤围，等汉军疲乏时，康居必然前来相救，那时汉军必打败仗，就接受了大宛提出

了条件。大宛人放出宝马,任凭汉军选取,拿出粮食,供养汉军。汉军挑选了好马数十,中等以下的马二千匹,立大宛贵人中对汉人比较友好的昧蔡为大宛国王,与他们订立盟约后班兵回朝。

贰师将军由敦煌西面出兵的时候,因为队伍庞大,不便就食,就将队伍分成两支,由南北两路前进。校尉王申生和原大鸿胪壶充国统领的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经过郁成,郁成人不肯供给粮食。王申生的部队同贰师将军的大部队相距不到二百里远,依仗大军兵威很轻视郁成,就发兵猛攻。郁成人窥知王申生的队伍不大,一个早晨发兵三千加以猛袭,将其攻杀,只有几个人逃了出来。贰师将军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成城,郁成人投降,国王却逃到康居。上官桀率军一直追到康居。此时,康居人已经听说汉朝军队占了大宛,就将郁成王交给了汉军。上官桀派四个骑士把郁成王押解到贰师将军李广利那儿去,在路上,他们怕发生意外,上邽地方来的骑士赵弟就挥剑斩杀了郁成王。

贰师将军率军班师回朝,所经过的小国听说大宛已被汉军攻占,纷纷打发自己的子弟跟随来汉朝贡,进见汉天子,后来,这些人都被汉朝扣留作了人质。班师队伍回到玉门关时还有一万多人,一千多匹马。此次征伐大宛,并不是军粮不够,战死的人也不多,主要是因为将吏贪财物,不知道爱惜士卒,克扣侵吞军饷,因此死亡的人很多。汉武帝因为远涉万里征伐获胜,太不容易,也就不再追问他们的过失,并颁下诏书加以嘉奖。诏书说:"匈奴虽迁到大沙漠以北,但仍和附近几个小国策划断绝大月氏派来的使者,拦截残害汉朝使者。危须国以西的那些国家和大宛互相约定杀汉朝使者和身毒国派往汉朝的使者,阻隔东西交通要道。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师问罪,取得讨伐大宛的胜利,取得郁成王、大宛王的首级。珍贵奇异的物品,列于汉家宫殿。因此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封地千户。"又封斩杀郁成王的上邽人赵弟为新畤侯。军官吏拜为九卿的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俸禄官的一百多人,一千石俸禄以下的官一千多

人。因为犯罪受惩罚而去从军的，一律赦免其罪过。兵士赏赐四万钱。

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前后两次，历时四年而告结束。汉朝征服大宛以后，为了确保通往西域的商路，汉政府又把长城的西端再一次延长，从敦煌以西一直通到大盐泽，同时又在轮台、渠黎设置护西域使者校尉，率领田卒数百人，实行屯田，以供给和保护往来的各国使者。

贰师伐大宛，取得了大宛的汗血马，李广利封了侯，汉朝军威播扬于西域，基本上达到了汉武帝的目的。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后，汉武帝很高兴，他还做了几首《天马歌》加以纪念，其中第二首得意地说："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贰师伐大宛，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大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沿途诸国也受到骚扰，汉朝也受到极大的损失，并不像汉武帝自己在诏书中所说的具有那么大的正义性。李广利远师征伐大宛，出关时有士卒六万多人，回来时仅剩下一万多人，其它损失还不算在内。为了支持战争，天下骚动，百姓不安，当时的人就批评它"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民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盐铁论·西域》)，是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灾难的一次行动。

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威震西域，汉武帝便想利用此兵威来彻底解决匈奴的问题，试图加以坚决消灭，因而命贰师将军率军连续出击匈奴。

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五月，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三万骑出酒泉远征匈奴，在天山山麓与右贤王大战，斩首万余级。

天汉四年(公元前 97 年)，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二次出击匈奴。李广利领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将兵万余同李广利会合合击匈奴。匈奴且鞮侯单于领精兵十万在余吾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同李广利部大战十余日，双方不分胜负。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春,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三次出击匈奴。李广利领兵七万出五原(今内蒙古包头)郡,在羊句山战胜匈奴大都尉卫律,并乘胜追至范夫人城。而此时,汉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大政治变动。有人告发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诅咒皇上并同李广利一起阴谋策划立李夫人生的儿子昌邑王为太子。刘屈氂被斩首,李广利的妻子儿女也被收监。部属们纷纷劝李广利投降匈奴,李广利不听。他想用多杀匈奴的办法来立功赎罪,于是,率军北进至郅居水,与匈奴左贤王大战。部属们不满李广利冒险邀功,谋议兵变,军心浮动,将士疲倦,匈奴乘机调发精兵加以突袭,获得成功,李广利兵败投降。

李广利投降后,匈奴单于很重视他,还将女儿嫁给他为妻。卫律害怕单于重视李广利会失去对自己的宠信,就乘单于母亲有病的时候,指使巫医对单于说:"以前出兵前祭祀,常说要用贰师将军的头祭祀社稷,现在为什么不用呢?"结果,贰师将军李广利被收捕,并被杀头作为祭祀之用。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大宛列传》

《汉书》:《西域传》、《匈奴传》、《李广利传》、《刘屈氂传》

李广之死

李广，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号称“飞将军”。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秦时破燕名将李信的后代。

李广家世代相传骑射之术，而李广臂长如猿，尤其精于骑射。他为人质直，口不善言，与人闲居，常以射壶为戏，画地为军阵，进行练习。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匈奴人大举侵犯汉朝边界，侵人萧关（今甘肃固原），李广以良家子参军抗击匈奴。因为善于骑射，杀首虏多，李广被文帝任为皇帝侍卫队的中郎，秩八百石。

李广精于骑射，随从文帝出行，常冲锋在前，打猎时，拚力格杀猛兽。文帝赞叹说：“真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假如生在高祖时代，以军功受封为万户侯，又何足道哉！”

景帝时，李广被任为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以骁骑都尉的身份随从太尉周亚夫参加平叛。李广英勇善战，夺下了叛军帅旗，一时名冠三军。因为私底下接受梁王授给的将军印绶，犯了朝廷法令，平叛归来后，没有受到赏赐。

汉景帝以李广勇猛善战，任命他为上谷（今河北怀来）太守，李广屡次与匈奴力战。典属国公孙昆邪劝汉景帝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负其能，屡次与匈奴决斗，恐怕他出了事，就没有这样的人才了。”于是，汉景帝调任李广为上郡（今陕西榆林）太守。

匈奴侵人上郡，景帝派亲信宦官到边郡，随从李广领兵抗击匈奴。一次，宦官带数十骑随李广出外，欲立功名、纵马驰骋，离开李

广,路上遇见三个匈奴人,想抓住他们,却被匈奴人射杀殆尽,宦官也被射伤。回来后,李广说:“这三个人一定是匈奴射雕的。”于是,率骑士百人前去追击。三个匈奴人没有骑马,步行出走有几十里,很快被追上。李广射杀二人,生擒一人,正欲回归,突然发现数千匈奴骑兵。匈奴骑兵以为李广百人是诱敌之兵,赶紧上山布阵。

李广所领骑士百人很惊恐,想纵马逃跑,李广制止说:“现在,我们离开大部队几十里远,以百余骑士想逃跑,马上就会被匈奴追杀。如果停在这儿不动,匈奴人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引诱他们的小股部队,绝对不敢袭击我们。”

李广下达命令,说:“前进!”离匈奴人骑阵不到二里,又下命令,说:“下马解鞍!”骑士们都很害怕,李广镇定自若:“敌人以为我们要走,现在我们下马解鞍,就是表示我们不走,使他们更加坚定我们是引诱他们的。”匈奴骑兵很害怕,不敢出击。一骑白马的将领出来整顿骑阵,李广上马领十余骑将其射杀。然后,还归队伍,下马解鞍,又让马儿卧倒,进行休息。

天色近晚,匈奴骑兵见李广不走,很奇怪,更不敢随便出击。到半夜,匈奴人以为汉兵就埋伏在周围,准备发动进攻,就撤兵而走。

后来李广被调任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庆阳)、雁门(今山西右玉)、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太守,一直任边郡太守。

在西汉抗击匈奴的边郡太守中,李广和程不识都很出名。在出击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列阵无部曲,不严整,就水草丰美的地方驻屯,使人人得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为主,幕府省文书,然而,也未尝遇害。程不识行军列阵非常严整,正部曲,列队伍,击刁斗,治军纪甚严,军士很不方便,匈奴人也不敢进犯程不识。

程不识和李广俱为边郡名将,匈奴更害怕李广,士卒都愿意跟随李广,不愿意跟程不识。后来,程不识以敢于直言极谏被景帝任命为太中大夫。

汉武帝即位后,左右的人都称赞李广为名将。于是,武帝调任

李广为未央卫尉。当时，程不识为长乐卫尉。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为防备匈奴进袭，卫尉李广以骁骑将军屯守云中，中尉程不识以车骑将军屯守雁门。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设下马邑（今山西朔州）之谋，企图一举歼灭匈奴。结果，计谋外泄没有成功。在马邑之谋时，李广以骁骑将军属韩安国指挥。从此以后，汉匈中断和亲，匈奴时常侵犯汉朝边郡，汉朝也组织兵马开始反击，揭开了大规模反击战争的序幕。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卫青、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四位将军分别出击匈奴。

李广领兵出雁门反击匈奴。由于李广兵力太少，寡不敌众，被匈奴人打败，李广受伤被俘。匈奴单于早就听到过李广的威名，于是，他下令说："如果能抓住李广，一定要活的。"匈奴骑兵抓住李广后，由于李广受伤，就把他放在两匹马中间驮着他走。前行十余里，李广佯死，斜眼看到旁边有一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宝马。李广跳下马，将匈奴少年推下来，飞身上马，策马扬鞭迅速逃跑。匈奴骑兵数百人追击，李广取下匈奴少年的弓箭射杀追骑，跑了出来，找到余部，回到汉朝。

因为打了败仗，又被匈奴人生擒活捉，按照朝廷的法律，应当判死罪。不过，朝廷允许李广拿钱赎罪，成了平民百姓。

罢官以后，李广同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到蓝田南边的山中打猎。晚上，随从一骑到田间饮酒，回来的时候被喝醉了酒的霸陵尉呵止在亭下。随从说："是前将军李广。"霸陵尉拦住他们不放行，说："现在的将军尚不允许夜间出行，更何况是以前的将军。"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骑兵攻人辽西（今辽宁义县），攻杀太守，打败驻屯将军韩安国。韩安国希望回内地，汉武帝却任命他为更远的右北平（今辽宁凌源）太守，韩安国心情抑郁，病数月而死。汉武帝遂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要求霸陵尉一同前

去，到军队而斩之，上书给武帝陈述自己的罪过，武帝不但未加惩罚，反而表扬了李广一顿，说："将军是国家的爪牙，就应该发怒则千里而怵，施威则万物皆伏，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正是我所希望的。请你赶快起程，盛秋之日到达右北平上任。"李广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匈奴人称他为"飞将军"，数年之间，不敢靠近他的边界。

李广出外打猎，见到隐伏在草中的石头，以为是猛虎，举弓射之，射中石头而深没箭头，靠近一看，才知是石头。李广任郡太守，凡听说郡中有老虎，必亲自射杀。在右北平时，李广出外射虎，射死了老虎，亦终为虎所伤。李广射猎，即使情况紧急，非在数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所以，李广将兵，数次受到困辱。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武帝召回李广，任命他为郎中令。同年，李广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击匈奴。这次出击匈奴，随从诸将很多人因杀敌立功而受封为侯，而李广军队则无功劳，亦不能受封。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李广以郎中令领兵四千骑出右北平攻打匈奴，博望侯张骞领兵万骑与李广同时出发，分道合击。前行数百里，遇到匈奴左贤王，李广四千骑被左贤王四万骑团团包围。汉军士卒都很害怕，李广命令儿子李敢领兵数十骑自冲匈奴，出其左右而还，报告李广说："敌人容易对付。"士卒才安定下来。李广命令士卒马头向外环绕一圈，围成骑阵。匈奴骑兵进攻猛烈，箭如雨下，李广的部队死者过半，且箭矢将尽。李广命令骑兵持弓不发，自身用大黄弓射杀匈奴左贤王裨将，匈奴人的攻势才稍停下来。到傍晚，士卒害怕，面无人色，而李广毫不惧怕，意气自如，于是，李广以勇气名冠军中。第二天，李广组织部队进行力战，而博望侯张骞救军亦到，匈奴撤围而走。汉朝军士疲惫，亦无力追击。李广军士死伤殆尽。

军队罢归以后，按照军法，博望侯张骞耽误军期，按令当死，允

许赎为百姓。李广部队虽杀敌甚多，然死伤亦众，功过相抵差不多，不应受封赏。

李广的从弟李蔡与李广一起做过汉文帝的侍郎，景帝时，积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时，李蔡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左贤王，以军功受封为乐安侯。至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李蔡又代公孙弘为丞相。李蔡为人很差，名声亦远远不如李广。然而，李广终不得封侯食邑，做官亦不过九卿。李广手下的军士吏卒也有好多因军功封侯的。李广很是不解，他就找一个望气之士叫王朔的，问道："自汉朝反击匈奴以来，屡次大战，我未尝不在其中，而校尉以下，才能远远不及我以军功封侯的却有几十人。我并不比别人差，然而，却并无尺寸之功得以封侯食邑，怎么回事？是我的面相就不当封侯呢？还是命该如此？"王朔问他："李将军你想一想，有什么悔恨的事吗？"李广说，为陇西太守时，羌人叛乱，曾诱降八百多人，诈而同日杀之，直到现在仍很后悔。王朔告诉他："祸患最大的莫过于杀害已经投降的人，这就是你不能封侯的原因。"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规模出击匈奴。李广数次要求参加，汉武帝以为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老了，不同意。在李广屡次要求下，过了好久，汉武帝才同意了，并任命李广为前将军，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征。

出塞以后，大将军卫青抓获匈奴俘虏，审讯后知道了匈奴单于的所在地，准备派精锐之士直捣匈奴单于。可是，卫青却让前将军李广随从右将军赵食其从东道出发，走东道曲折而又迂远，且水草较少，也不适宜部队通过。李广向卫青要求随先头部队出发，他说："我为前将军，大将军却让我从东道出发。自结发以来，我就一直同匈奴战斗，直到现在，才有了这么一次可以直接同匈奴单于较量的机会，愿意作为先头部队率先与匈奴决战而死。"大将军卫青曾接受过武帝的私下告诫，也认为李广已经老了，不要让他直接同单于作战，怕他不行。又由于公孙敖刚刚失去爵位，以中将军身份随卫

青出击匈奴，卫青想让公孙敖与自己一起进攻单于，以立功封侯，所以，就改派前将军李广从东道出发。李广知道这些情况，一再向大将军卫青要求。卫青不答应，命李广火速返回部队，率部出发。李广很恼怒，不谢而行。李广的部队同赵食其的部队会合以后从东道出发，由于没有向导，迷失了道路，耽误了同大将军卫青会合的日期。

卫青同匈奴单于激烈战斗之后，将匈奴打败，可是未能抓住单于。等到返回大沙漠以南，才遇到了李广、赵食其的部队。卫青派人责问李广、赵食其部队迷失道路、耽误军期的事，准备向汉武帝汇报。李广未对，卫青派长史严词责令李广到大将军幕府对簿。李广说："军士无罪，是由于我迷失了道路才误军期的。我亲自去对簿。"到大将军幕府，李广说："我李广自结发以来与匈奴战斗七十多次，现在有幸随大将军出兵与匈奴单于战斗，而大将军却派我部绕东道走，又迷失道路，耽误军期，岂非天意哉！我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终不能再面对刀笔之吏以受侮辱。"于是，拔刀自刎。

李广为人清廉，对待士卒很好。李广为二千石官四十余年，终其死，家中无多余的财物，得到赏赐之物辄分赐给部下，饮食也同士卒在一起。李广领兵出外，到了危困境地，无水处得水，所有的士兵都喝了，李广才喝；有饮食，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吃了，李广就不吃。他虽然不善说话，兵士却很爱戴他，愿意听他调遣。

李广拔刀自尽，军吏士卒痛哭失声，老百姓知道的，老少都为之涕泣以示尽哀。李广以忠实取诚信于士大夫，司马迁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指的李广的这种风格吧。

（张元城）

参考资料：

《史记》：《李将军列传》

《汉书》：《李广传》

苏武不辱使命

苏武，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将门家庭。其父苏建，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以校尉身份随大将军卫青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出击匈奴，以军功封平陵侯。苏建多次随从卫青出征，并做过卫尉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太守。

苏武少时以父任为郎，后升任为栘中厩监，替武帝掌管马厩。

马邑之谋以后，汉匈断绝和亲，双方都不断扣留对方派出的使节，先后有十几批。卫青、霍去病连续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匈奴主力被击垮，但是，汉朝也受到极大损失，无力进一步出击，双方均精疲力尽，呈胶着状态。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且鞮侯单于在多次内乱之后即位，他怕汉朝趁机派兵攻击，表示愿意同汉朝和好，放回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节。作为回报，汉武帝亦将扣留的匈奴使节全部送回，并派苏武以中郎将身份，持使节出使匈奴。苏武领受使命，带着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一百多人出使匈奴。苏武见到且鞮侯单于，向他表达了希望汉匈和好的意愿，并赠以丰厚礼物。且鞮侯单于非常傲慢，很轻视汉朝。

正当苏武等待回汉朝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昆邪王姊子缑王，随从浞野侯赵破奴攻打匈奴，兵败投降。缑王同卫律手下的人虞常商议，想趁且鞮侯单于出外打猎的机会，杀掉卫律，并劫持匈奴单于的母亲到汉朝请功。虞常同张胜过去是朋友，虞常便将计划告诉了张胜，张胜给了一些财物，表示支持。

后月余，匈奴单于出外打猎。虞常准备发难，但在前一天被人

告发，缑王战死，虞常被活捉。单于让卫律处理这件案子。

张胜唯恐虞常把自己供认出来，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苏武。苏武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牵连到自己，作为汉朝使节，让匈奴作为犯人审问，太污辱朝廷了，要立即拔剑自杀以报答汉朝，被张胜、常惠阻拦，未得成功。

虞常受审，供招了汉使张胜。匈奴单于很气愤，召来贵族商议，准备杀掉汉朝使节。大臣认为，与其将汉朝使节杀掉，不如将他们全部扣留下来，逼迫他们投降。苏武他们便被匈奴扣留了下来。

为逼迫苏武投降，单于派卫律准备审讯苏武。苏武对常惠说："如果我被受审，人格受到侵犯，使命受到污辱，即使让我活着，我有何脸面再回汉朝？"于是，拔剑自刺。卫律大惊，上前抱住了苏武，并赶快请医生，在地上挖坑，里面生上火，把苏武放在上面，轻轻扣敲脊背。过了好半天，苏武才慢慢苏醒过来。

感于苏武壮烈的气节，常惠等失声痛哭。匈奴单于也对其壮烈气节十分钦佩，派人探望苏武病情，把张胜关进牢房。

几天以后，苏武伤势痊愈，匈奴单于派人劝说苏武投降。审判虞常时，又把苏武叫去，试图威胁苏武，逼他投降匈奴。虞常被判斩首以后，审问张胜。卫律说："汉朝使节张胜谋杀单于亲信大臣，应判死罪，如果愿意投降单于可赦免死罪。"张胜投降了匈奴。

卫律对苏武说："汉朝通使犯了谋杀罪，你也应当受连坐治罪。"苏武争辩说："我本来就没有参预他们的阴谋，又跟张胜没有亲属关系，不应该连坐到我。"

卫律举起宝剑，比比划划，欲刺苏武，苏武昂首挺胸，不为所动。卫律只好用富贵引诱苏武投降，他说："我也是由汉朝投降匈奴的，单于很看重我，封我为丁灵王，拥有数万下属，牛羊满山，荣华富贵如此。如果你今日投降匈奴，明日也会像我一样荣华富贵。要不然，你白白死在草原，有谁知道呢？"

苏武无所表示。卫律继续说："你如果听从我的，投降匈奴，咱

俩就结拜为兄弟；否则，你以后再想见我，恐怕不可能了。”

苏武气极，冲着卫律大骂：“你身为汉朝的臣子，却不顾恩义，背叛朝廷，投降匈奴，我还见你干什么？单于信任你，让你判人生死，你不主持公道，却在汉朝匈奴之间制造不和，挑起争端，包藏祸心。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投降，却来逼我，想让匈奴汉朝之间大动干戈，匈奴的灾难就从这件事开始了。”

卫律将实情一一回报单于，单于更加敬重苏武，更想让他投降，于是，把苏武幽禁在一个破地窖里，不给食物，不给水喝。当时雨雪交加，渴了，就吃飘进来的雪片，饿了，就用毡毛充饥。就这样，苏武数日不死。匈奴人以为神奇，认为有神明保佑他。

后来，匈奴单于决定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行前，给了苏武一群公羊，说等公羊生了羊羔就可以放他回汉朝；并把常惠等人分别开来，加以监禁。

苏武一个人到北海放牧，粮食不够吃时，就掘开老鼠洞，用里面的草籽充饥；白天，杖节放牧，晚上睡觉也抱着使节，使节上的旄毛几乎脱落净尽。

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於靬王带着人马到北海打猎。苏武帮助他们修理弓箭，编结猎网。於靬王很喜欢苏武，就送给苏武一些衣服食品。

过了三年多，於靬王病死，死前，留给苏武一些马匹牲畜、衣服帐篷等。到冬天，丁令人又把苏武的马匹牛羊全部偷走。

这时候，苏武以前的好友李陵来到了北海。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九月，汉武帝派李陵带兵侦察匈奴虚实。李陵率五千步兵，从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发，被匈奴三万骑兵团团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李陵箭尽援绝，兵败被捉，投降了匈奴。后来，匈奴单于知道了李陵同苏武是好朋友，就派李陵到北海来劝说苏武投降匈奴。

李陵为苏武置酒设乐，边饮边谈：“单于听说我同你关系不错，

特意让我来劝劝你，愿虚心以相待。你想再回汉朝是不可能的，独自在这空旷无人的草原上受苦，是没人知道你的气节的。”

李陵又把苏武一家的遭遇，告诉了苏武。苏武的哥哥苏嘉随武帝外出，不小心碰坏了车辕，怕武帝治罪，自刎而死。苏武的弟弟苏贤奉命追捕犯人，没有追到，也吓得服毒而死。苏武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年轻的妻子也早已改嫁。家里现在只剩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两个妹妹，十几年又过去了，他们是死是活，现在也不清楚。

然后，李陵又劝苏武说：“人生如早晨的露水一样短促，何必这么久久受苦呢？我刚投降匈奴时，忽忽如疯狂一样，自己感到对不起汉朝，母亲又被关在监狱里，我又何尝想投降。可是，现在武帝年事已高，糊里糊涂，法令经常变更。大臣无罪被杀的有好十几家，弄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你现在还为谁考虑呢？还是听我的劝告，投降匈奴吧。”

苏武沉思一会儿，对李陵说：“我们父子没什么功劳，却受到皇帝封赏，有的当了将军，有的受封为侯，都为皇帝身边近臣。为报答汉朝，就是肝脑涂地，也是应该。现在若能杀身效国，或受斧钺而诛，也是心甘情愿的。做臣子的对待国君，就应该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做儿子的为父亲而死，没什么遗憾的。你不要再往下说了。”

过了几天，李陵和苏武在一起饮酒，又对苏武说：“子卿，你一定要听我的劝告啊！”苏武正言厉色地回答说：“我苏武早就准备死了。大王你如果一定要劝我投降，那咱们就结束今天的欢乐，让我死在你的面前！”

苏武不称李陵名字，却叫他“大王”，李陵知道苏武决心已定，无法再劝告，很惭愧，感慨地说：“唉，你真是不可污节的义士啊！我和卫律背汉投降，才是天大的罪人。”

李陵离开北海后，不好意思出面再见苏武，就让妻子给苏武送去几十头牛羊。

后元二年（公元前 87 年），李陵又一次来到北海，这次是为了

告诉苏武，说汉武帝已经死了。苏武很悲痛，冲着南方号啕大哭，直至哭出血来。

汉武帝死了以后，汉昭帝即位，当时，匈奴在位的是壶衍鞮单于。

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汉朝、匈奴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希望和平、安宁成为汉匈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匈奴贵族争权夺利，内部分裂，很不团结，也无力同汉朝打仗，希望和好。汉昭帝时期，霍光当政，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经济，也决定同匈奴和好。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汉匈双方议和，恢复了和亲和正常往来。汉朝多次要求匈奴将苏武等人放回，匈奴不想让苏武回来，就推辞说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派使节到匈奴去。常惠就向看守人提出，要求见汉朝使者。夜里，常惠同看守人一起来到汉朝使者驻地，把苏武在匈奴的遭遇和下落告诉了使者，还教给了使者营救苏武的办法。

汉朝使者对匈奴单于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从北方飞来的大雁。大雁的腿上系着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信，信上说苏武没有死，正在北海牧羊。为了汉匈和好，希望将苏武放回。"

匈奴单于听了，大惊失色，看看左右大臣，个个目瞪口呆，不知道汉朝使者为什么这么清楚苏武的情况。单于见无法隐瞒，只好如实对汉朝使者说："苏武等人确实活着。"

苏武就要回汉朝了，李陵为他置酒送行，说："现在你还归汉朝，在匈奴扬名，为汉朝立功，就是古书上记载的英雄人物，也比不上子卿你啊！李陵虽然是笨拙胆怯之人，但是，汉天子如果能宽大一点，不杀我老母，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永远也不敢忘记汉朝的大恩大德。想不到汉朝竟杀我全家，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回汉朝呢？我说这些，无非是让你知道我的心情罢了。"李陵边歌边舞，泣下数行，然后跟苏武告别了。

匈奴单于召会苏武旧日部属，随同苏武回来的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已年过花甲须发尽白的苏武，手持汉节，回到长安。苏武出使匈奴，去时属员一百多人，十九年才回到长安，其间，死的死，降的降，回到长安的随从只有常惠等九人。

苏武出使匈奴不辱使命，回来后，汉朝廷封他为典属国，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所。汉宣帝时，封苏武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把苏武在匈奴生的儿子苏道国接回汉朝；后来，还把苏武的像画在未央宫麒麟阁，把苏武称为“中兴名臣”。

苏武出使匈奴，前后十九年，经受种种威胁利诱，艰难困苦，最终不辱使命。苏武崇高的气节，高尚的情操，坚韧不拔宁死不屈的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仰，他真正体现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张元城)

参考资料：

《汉书》:《苏武传》、《匈奴传》

李陵败降匈奴

李陵，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李广之孙。

李陵少时以郎侍中，为建章营骑监。李陵精于骑射之术，宽厚爱人，礼贤下士，名声很好。武帝以为李陵有李广之风，曾让他率八百骑兵，深入匈奴领地两千里，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视察地形，未见匈奴人而还。李陵回来后，武帝以其勇猛果敢任命他为骑都尉，让他率勇敢之士五千人，在酒泉、张掖教练骑射之术，以便对付匈奴。

太初二年（公元前 103 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西征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地区），又派李陵率五校兵随后出发。刚刚出关，贰师将军就因兵败退回来了。汉武帝命令李陵率领精锐骑兵五百人从敦煌出发，过盐水泽，把贰师将军接回来，随后李陵屯留张掖。

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远征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见李陵，想让他为贰师将军李广利负责运输粮草以为后勤。

在武帝召见李陵时，李陵向汉武帝提出请求，说自己所领屯守边地的士卒，都是荆楚一带的勇士和剑客，力大能扼虎，发矢必中，希望自己能领一队兵马，到兰干山以南吸引单于兵力，以减轻贰师将军队伍的压力。

汉武帝说："将领们都不愿受别人领导吧？我此次发兵，分兵较多，不能给你骑兵。"李陵答应，可以不要骑兵，愿意以少胜多，领步

兵五千人直捣匈奴单于王庭。

汉武帝为李陵的壮烈之气所感动，就答应了李陵的请求，同时派强弩都尉路博德领兵在半道接应。路博德以前曾被任命为伏波将军，也不愿意作为接应李陵的后队。路博德上奏武帝，说现在正是秋天，是匈奴马肥人壮的时候，不宜同他们开战，请求与李陵留到春天，到时再加上酒泉、张掖的骑兵五千人合击匈奴，定能奏效。

看到路博德的上书，汉武帝大怒，以为李陵先前口出豪言壮语现在又反悔，所以才让路博德上奏缓击匈奴。汉武帝下诏路博德，说匈奴人已经侵入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地区，让他马上带兵出发到西河保护钩营道路；下诏李陵，让他九月出发，到达东浚稽山(约在图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西边的龙勒水上，派兵巡逻侦察匈奴情况，如果遇不到匈奴人，就沿着浞野侯赵破奴走过的路线到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休整士马。

于是，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从居延出发，北行三十日，到达浚稽山安营扎寨，同时，将所过山川地形绘成图，派陈步乐骑马送回。陈步乐见到汉武帝，向汉武帝具体陈说了李陵宽厚爱人，兵士都愿意为他出死力战斗的情况，汉武帝听了很高兴。

后来，李陵步卒五千被匈奴单于精骑三万包围。李陵将部队驻扎在两山之间，用战车围成营垒，然后，引将士出外布成战阵，前边的士卒持盾、戟，后面的士卒持弓弩准备射敌。

李陵下令说："听到鼓声，一齐出击；听到锣声，马上停止。"

匈奴骑兵看到汉朝军队人数较少，直扑营寨而来。汉军将士千弩齐发，匈奴骑兵纷纷应弦而倒，向山上退去。李陵率士卒马上追击，击杀匈奴数千人。

匈奴单于战败之后，大惊失色，马上从附近地区调来八万骑兵同李陵战斗。李陵指挥士卒，边战边退，南行数日，退到山谷中。

战斗中，李陵下令杀死随军家属，以示血战到底。汉军士卒，受伤三次的载车，受伤两次的驾车，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又杀敌三

千多人。

李陵率部队边战边向东南撤退，沿着龙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旧道前行，走了有四五日，到达一片沼泽地。

匈奴人利用沼泽地丛生的芦苇荡，从上风头放火攻烧李陵部队。李陵也命令士卒放火烧苇，隔断上风头芦火前进的路线，挫败了匈奴人的这一火攻计谋。出了沼泽地以后，向南行，到达一座山下。匈奴单于率骑兵占领山头，然后命令自己的儿子率骑兵突袭李陵。李陵将匈奴骑兵引到树林中，发挥步卒特长，击杀匈奴数千人。又用连弩机发箭击射匈奴单于，匈奴单于下山逃走。

抓住匈奴俘虏审问以后，李陵得悉，匈奴单于以为面对的一定是汉朝的精锐士卒，根本无法取胜，这样一天天的被引着向南走，南边恐怕有汉军埋伏好的大部队，如果战斗不利，就准备撤走。可是，单于手下的将军不同意。他们认为，匈奴单于亲率精兵数万竟然连汉军几千步卒都战胜不了，让汉朝也太瞧不起匈奴人了，主张猛力发动进攻，往南走几十里就是平地，如仍不胜，再撤走。

匈奴骑兵又向李陵步兵猛烈地发动了轮番进攻，李陵所率步卒情况更加危急，甚至一天打好几十次仗。战斗中，李陵部队又使匈奴伤亡两千余骑。

看到战斗失利，匈奴单于准备撤走。李陵的部队中却出了叛徒。军侯管敢因为受到校尉的侮辱就投降了匈奴，他向匈奴单于报告说，李陵部队并无后援，而且箭矢将尽，只有李陵亲自指挥的士卒和韩延年指挥的士卒各有八百人还能战斗，如果用骑兵加以猛烈冲击，李陵的部队就完了。

匈奴单于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就派精锐骑兵向汉军猛烈冲击，并大声呼喊，让李陵、韩延年投降。李陵的部队在山谷中，而匈奴骑兵在山上，箭如雨下，李陵部队损失很大。

冲出山谷，向南前进，还未到鞮汗山，李陵部队箭矢净尽。士卒纷纷砍下车的辐条持在手中作为武器，军官则拿短刀，部队退入山

谷中。

当时，李陵步卒还有三千人。匈奴单于派骑兵截断了他们的后路，将他们团团包围在峡谷中，然后，从山上往下砸石头，汉军士卒死伤太多，已无法继续突围。

黄昏以后，李陵一人身穿便衣出寨观察。他不让士卒跟随，对士卒说："谁也不要跟着我，大丈夫一人也可以得到匈奴单于！"

过了很久，李陵归来，他叹息着说："唉，打了败仗，我们都活不成了。"士卒们纷纷劝他投降，然后再找机会跑回汉朝，被李陵拒绝。

李陵下令尽斩旌旗，埋藏珍宝，让士卒分散突围，然后，又长叹一声，说："如果我能有箭矢数十，就足以由此逃脱。"李陵分给士卒各二升粮，让他们持一片冰，下令说，如果能够突围出去，就到遮虏障会合。

在半夜突围中，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只有四百多人突围出去，逃回汉朝。

李陵边塞战败的消息传回朝廷，汉武帝想让李陵为汉朝战斗而死，所以，把李陵母亲及家人接到宫中，后来听说李陵投降了匈奴，认为是汉朝的奇耻大辱。大臣中也是一片声讨李陵之声。汉武帝征询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很为李陵抱不平。

司马迁认为："李陵侍奉母亲很孝顺，与士大夫交往很诚信，常常为国家之事奋不顾身，有国士之风。李陵率领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战胜匈奴数万骑兵，横行匈奴国中。匈奴举国围攻李陵，李陵率卒转战千里，矢尽道穷，而士卒持空拳，冒白刃，甘愿为李陵力战而死。像李陵这样能得士卒深爱愿奋不顾身冒死力战，连古代的名将也比不了。李陵虽然战败，然而，李陵士卒打败杀死了这么多敌人，功劳也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李陵虽在穷败之中投降匈奴，他一定会找机会立功赎罪的。"

汉武帝则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

归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以诬罔罪判处司马迁腐刑。

过了一年多，汉武帝又有点后悔。他觉得，假如李陵有后援的部队，也不至于兵败被俘。于是，他就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去接救李陵。公孙敖没将李陵接回来，却将李陵教练匈奴骑兵的传闻报给汉武帝。汉武帝一怒之下，处死了李陵全家。

汉朝的使节到了匈奴，李陵发问："我率步卒五千横行匈奴，因为没有救援才打了败仗，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汉天子，使他杀我全家。"汉朝的使节就把实情转告了李陵。李陵马上派人杀死了为匈奴教练骑兵的汉朝人李绪，从此，断绝了再回汉朝的念头。

匈奴单于特别钦佩李陵的壮烈气节，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做妻子，又封李陵为右校王，立另一投降匈奴的汉人卫律为丁灵王。匈奴单于非常信任、爱待他们，对他们很尊宠。

卫律原本是匈奴人，但在汉朝长大，同协律都尉李延年关系很好。李延年推荐卫律做了汉朝的使节，让他出使匈奴。等要回来时，李延年犯法破家，卫律害怕受到牵连同时遭祸，就投降了匈奴。匈奴单于很重视卫律和李陵。他常常把卫律带在身边，事事同他商议。有大事的时候，单于才去找李陵。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单于为苏武的壮烈气节所感动，想劝他投降，但不为所动。匈奴单于知道李陵同苏武的关系后，就派李陵专门到北海(今贝加尔湖)去劝说苏武，苏武坚决拒降，李陵未能成功，有感于苏武的气节，李陵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汉朝。

汉昭帝即位以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都同李陵关系很好，就派李陵的旧日知交任立政等人出使匈奴，希望李陵能回到汉朝来。任立政等人到匈奴以后，匈奴单于设酒宴招待他们，并让李陵、卫律陪坐。酒宴中，任立政无法同李陵私下交谈，就用眼神、动作来示意李陵，希望他能回来。

后来，李陵、卫律设宴招待任立政等人。席间，李陵、卫律都用匈奴人的装束打扮。酒酣之际，任立政大声说给他们听："汉天子已

大赦天下，中原安乐，新天子年轻少壮，霍光、上官桀辅政。”

李陵默然不应。过了一会儿，他摸着自己的匈奴人发式，对任立政等人说：“我已经改穿匈奴人的服装了。”

趁着卫律走开的机会，任立政再劝李陵：“少卿，你又何苦呢？霍光、上官桀向你问好。”李陵也问候霍光、上官桀。任立政劝李陵回汉：“请少卿回归故乡，不愁荣华富贵。”李陵却很担忧，说回去容易，但怕再受侮辱。

卫律回来了，他听到了李陵的一些尾话，劝李陵说：“真正贤能有为的人不为一个国君服务。范蠡遍游天下，由余由戎入秦，现在人们说起来也不觉得别扭。”

等卫律走了以后，任立政等问李陵是否有意回去，李陵回答说：“大丈夫不能再次受到侮辱。”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匈议和以后，匈奴准备让苏武回归汉朝。

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坚贞不屈，不辱使命，李陵为他摆酒饯行。席间，李陵对苏武说：“如果汉朝天子不杀我老母，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绝对不会忘记汉朝廷的大恩大德。想不到，汉天子杀我全家，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回中原呢？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酒席以后，边歌边舞，与苏武泣别而去。

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元平元年（公元前73年），病死在匈奴。

（张元城）

参考资料：

《汉书》：《李陵传》、《司马迁传》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龙门。龙门属夏阳(今陕西韩城),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开凿,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形势险要。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自序》中将自己的始祖一直追述到传说中颛顼帝的时候。那时,南正重被任命掌管天事,火正黎被任命掌管地事,以后重和黎的后代就一直掌管天文和祭祀的大事。到周朝宣王的时候,重、黎的后裔不再掌管天地了,而做了司马的官职,他们即以“司马”为自己的姓氏,司马氏世代主管记载周朝的历史。周惠王、襄王之间,司马氏来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随会逃到魏国,因而司马氏又进入了少梁。少梁到后来改名为夏阳。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宗族便分散到各处,有的去了卫国,有的到了赵国,有的定居在秦国。在秦国的一支是司马迁的嫡祖,其八世祖司马错曾力挫张仪之议,伐蜀有功,做了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在武安君白起手下为将,在长平之战中与白起一起坑杀过赵国的降军,返秦后又和白起一同在杜邮被秦王逼迫自杀。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当过秦朝的铁官。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毋怿,做过汉朝的市长。司马毋怿的儿子是司马喜,只有五大夫空头爵位。司马喜的儿子是司马谈,司马谈为太史令,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世代为史官,但司马迁父子却都以此为荣,把修史看作一种崇高的职业,并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此。

司马谈有渊博的学问，他曾跟从唐都学习天文之学，随从杨何学习《易经》之学，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唐、杨、黄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司马谈推崇黄老思想，而对其他的学说都持批评的态度，因担心学人不通晓先秦诸子百家的意旨而师法邪说，曾著《论六家要旨》，详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学说的要点及其优劣：

"《易大传》认为，普天之下，一个目标而有众多的思路，同一归宿而有相异的途径。那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天下的学派，只是所遵从讲述的有不同的途径而已，他们各有精当与不精当的地方。

"阴阳家，认为一年的四季、八方位、十二星次和二十四节气是各有月令的，顺之者则昌盛，逆之者则败亡。实际上却未必如此。所以说阴阳家让人束手束脚而多有畏惧。至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是天道的常法，不按顺序则天下就没有了纲常法纪，他们所讲的春夏秋冬四时的基本顺序，是不可以丢弃不顾的。

"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作为法则，六艺的经和传的字数以千万计，几代人都不能完全通晓其学说，一个人一生都无法穷尽其礼仪，所以说儒家是重视广博而缺乏扼要，辛劳多而功效少。但他们胪列的君臣父子之礼，规定的夫妇长幼的尊卑区别，就是其他各家也不能不承认其正确。

"墨家，也讲崇尚尧舜，是主要称赞尧舜的俭朴无华生活和品德，他们给死人送葬，桐木棺三寸厚，哭号声也不得尽哀。教授丧礼，必以此为百姓的表率。若天下人都像墨家这样，那尊卑贵贱也就没有区别了。时代在变化，业绩也不必雷同，所以说墨家讲节俭却又难以遵行。但强调农本，节省费用，就会使家富而人足，这是墨子学派的长处。

"法家，不重视血缘关系的亲疏，不强调社会地位的差别，是非准则一律依法来决断。如此行事，则亲亲尊尊的恩义就要泯灭了，法家的方法只可是一时的措施，而不可长期使用，所以说其学说过

于严厉而缺乏恩德。至于强调君尊臣卑，明确本分职守而不得逾规越矩，这是其他学派也不能改变的。

“名家，纠缠于琐碎细节，使人不能返回到事物固有的真情，专以名称来判断，所以说名家让人拘于名数而易失掉真实。至于其循名责实，参照比较以验证不误，是不可不明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其内容容易实行，其言辞难以知晓。道家的学说将虚无作为本体，以顺乎自然作为功用。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也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真情；不争万物的先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则又无法则，因时宜而成就业绩；有尺度又无尺度，据事物而决定兴废，所以道家讲圣人不取机巧，只是顺应时事的变化。虚无是道的常规，顺其自然是君主统治的纲要。群臣同至，让他们各自自我表白，其中实迹与名声相符者可称为端，不符者可称为款。名实不符的空话不听，奸邪就不会滋生，贤与不贤自然分明，黑白也会一目了然。关键在于君主如何用人，用人得当则何事不成！这样便合乎大道，混混沌沌，幽深莫测，光照天下，又回到那不可名状的自然境界。人之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得以倚托的是形体。精神过用则会衰竭，形体过用则会疲惫，形体与精神分离则人会死去，死者不可再生，离者也不能再复合，故此圣人非常重视精神和形体。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本体，形体是生命的载具。不先确定精神和形体以位次，而空谈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便是无从说起。”

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供职，他利用史官的职务之便，广搜古史，博采旧闻，准备写作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他的学问和思想对司马迁影响很深。

司马迁年幼时曾在黄河边、龙门山南耕种放牧，十岁时在父亲的督促训练下开始诵读先秦时流行的“古文”书籍，二十岁时开始到各地游历。他南下江淮地区，登上会稽山，探游过大禹进过的洞穴；去过九疑山，瞻仰了大舜的墓地，泛舟观览了沅水和湘水的风

光；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在曲阜讲习过儒家的学业，考察了孔夫子的遗风旧事，到邹县的峄山亲自演练了乡射仪礼；路经蕃县、薛县和彭城，多次遇上困厄的逆境，后经梁楚返回长安。司马迁做了郎中官，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区，又巡视了邛、筰、昆明等地，走遍了大西南，了解了少数民族很多的风土人情。司马迁的漫游，使他的心胸开阔眼界扩大，不仅搜罗了大量的书籍以外的遗闻旧事等实地材料，也考察了山川形势、风土民俗等自然和社会风情，为他以后著述《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武帝到泰山举行汉家的封禅大典，而太史令司马谈被滞留在洛阳，没能前往参与其事，因此发恨将死。司马迁恰好西行返回，在黄河洛水之间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抓着他的手落泪说道："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司马谈临终前对儿子的谆谆嘱托，表现了一位史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把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儿子的身上，这使司马迁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低头垂泪应允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元封三年（公元前 107 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上疏认为旧的历法坏废，应该制定颁布新历。夏五月，武帝命司马迁等人在夏历的基础上编制改定了汉家的历法《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之首，这就是一直流传后世的阴历。十一月一日，冬至，天历改用太初历。

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记得父亲的遗志，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传世不朽的史著。本年，司马迁编纂有关历史之献，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时隔数年后，正当司马迁的历史著作草创未就之时，他便遇上了飞来的李陵案横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贰师将军押运辎重，李陵瞧不起这位裙带将军，羞为其后援，请求自率一队人马出击，用少击众，以分散匈奴单于的兵力。武帝赞赏他的壮勇，便准许了，但没拨给他骑兵。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到浚稽山，与单于遭遇，杀匈奴兵数千人。单于军队退而复围，李陵军虽经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兵败，李陵最后也投降了匈奴。李陵与匈奴作战处距边塞有一百多里，边塞将李陵军失败的消息上报朝廷，武帝希望李陵能战死，后听说他已投降，非常愤怒，众臣僚数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壮勇，此时却异口同辞诋毁李陵。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为安慰武帝的焦躁心情，另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极力为李陵辩白。司马迁说："李陵对父母孝顺，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以赴国家的危难，有国士的风范。如今出兵偶遇不幸，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妻小的大臣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真让人痛心！李陵自己虽是陷于失败，而他所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节，应该是要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于汉室。"不料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所说的是诬陷欺骗，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游说，于是把司马迁押入牢狱，后又处以极其残酷耻辱的腐刑，腐刑也就是宫刑。这次横祸不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对司马迁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

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只是因为《史记》尚未完成，他才忍辱负重地坚持活了下来，发奋著书。

司马迁出狱后，担任中书令，他的故交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用古代贤臣的道义准则要求他。司马迁给任安复信中，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情和志向：

“事情很难用几句话对世俗的人们讲清楚。鄙之先人没有过封赐铁券丹书的功绩，掌管文献历史与天象历法，地位和占卜算卦的相近，本来就是君主所戏弄的对象，被看成乐工戏子一样地畜养着，也为世俗所轻视。假令我伏法受死，就如同九牛失去一根毫毛，和捏死一只蝼蚁没什么两样，而世人也决不会将我同那些为节操而死的人相提并论，特以为是智穷罪大，难能逃脱，最终落得一死罢了。什么缘故呢？平时自己所树立的形象就让人这么去想。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死的方式和目标各不相同而已。最要紧的是不让祖先受辱，其次自身不受辱，其次脸面不受辱，其次语言辞令上不受辱，其次屈节受辱，其次剃去毛发铁圈束颈受辱，其次毁坏体肤折断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腐刑受辱。《礼记》上说：‘刑不上大夫’，正是讲士人的节操不可不磨砺自守。猛虎在深山，所有野兽都惊恐不安，而一旦落入陷阱牢笼之中，便摇尾乞怜向人求食，这是因为长时间威逼束缚它逐渐形成的。所以就是在地上画个圈作为牢狱，士人也决不进人，砍削木头当作狱吏，也决不和他面对回答提问，这是抱定了宁死不屈的气概。如今手脚相交，披枷索，袒露体肤，挨笞杖，囚禁在高墙之内，当此之时，见到狱吏就磕头触地，面对刑徒便惊恐地心跳不已。这是为什么？也是长期威逼束缚造成的。到了如此地步，还口说不受辱，不过是强撑脸面罢了，哪还有尊贵可言！况且西伯周文王，为一方诸侯之长，还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为秦国丞相，身受五种刑罚；淮阴侯韩信曾是楚王，在陈地被枷上桎梏；彭越、张敖

都是面南称孤道寡的王，都被逮捕入狱；绛侯周勃诛灭作乱的吕氏外戚，权势超过春秋时的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魏其侯窦婴是大将，被换上赭色囚衣而身披刑枷；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卖身做过朱家颈套铁圈的奴隶；大臣灌夫在居室囚所备受屈辱。这些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名声闻于邻国，及至获罪落入法网，都不能下决心自杀。人处在牢狱之中，古今一样，哪能不受屈辱！由此说来，勇敢和胆怯，是由权势决定的；强壮和懦弱，是由地位造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那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在面对刑罚之前自尽，渐渐到了刑杖相加的时候，才想到了自裁，岂不太晚了！古人所以不轻易对大夫动刑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人之常情莫不是贪生恶死，顾及双亲，眷恋妻小，至于那些激于理义的人却不这样，另有不得已的缘故。如今我十分不幸，早年失去父母，没有兄弟之亲，孤苦伶仃，少卿您看我对妻室儿女的态度怎么样？并且勇士不一定为节操而死，懦夫倾慕勇义而奋发努力的人何处不见！我虽怯懦软弱欲偷安苟活，也还懂得选择生死的标准，何至于自己陷身牢狱之中受到屈辱呢？那些奴仆婢女还能守节自杀，何况我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气受辱苟且偷生，困居粪土污秽之中尚不愿辞去，是恨自己心愿还没完全实现，以辞世后自己的著作不能流传后代为耻辱。

"古时富贵而名声早已磨灭的人，多的数不清，只有卓绝异常的人才能流芳后世。周文王遭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厄而撰作《春秋》；屈原被流放，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方著《国语》；孙膑两腿被去掉膑骨，《兵法》编排修成；吕不韦被贬居蜀地，《吕览》流传于世；韩非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出名；《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古代圣贤抒发愤懑之情而所写作。这都是他们思想上忧郁，又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后人了解自己的志向。至于左丘明失去双目，孙膑折断双脚，终究无法起用，只好退而著书立说，抒发自己的愤懑，希望留下些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心

迹。我私下不自量力，近来运用拙笨的文辞，收罗天下许多早已散失的轶闻旧事，对这些事实加以考订，探求成败兴衰的道理，共编成一百三十篇，也想以此来研究上天与人世的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规律，成为一家之言。文稿草创尚未完成，就遭上了这场灾祸，痛惜此书不成，我所以身受极刑而没有怨色，倘若著成此书，要将它藏在名山，传给志同之人，散布于通都大邑。如此才能抵偿我先前受屈辱的旧债，即令万死，也无可悔恨！"

司马迁编纂的史书，网罗天下散失的逸闻旧事，陈述帝王之业兴起的轨迹，求源本而明结局，探察兴衰间的变化，编排考订史实，略古而详今，简略追述夏商周三代，详细纪载秦汉当时历史，上自轩辕黄帝记起，下止于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年间，凡三四千年历史。书中十二本纪，是以帝王为中心而提纲挈领地编排的大事记；十表，为同时代而家世不同或年代参差不明的王侯将相的年表；八书，记载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包括了礼乐的增损、律历的改变、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祭祀、天人关系、经济的发展；三十世家，与帝王大事记相配合，叙述了诸侯国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和传记；七十列传，详载各种社会人物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活动，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后世称为《史记》。书中有十篇缺佚，只存目录而无原文。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才逐渐流传出来，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追述其外祖父的史著，方公布于世。到了王莽的时候，司马迁的后人封爵为"史通子"。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历史学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论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史记》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

史。在八书中，分别概述自黄帝至汉武帝以来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凡天文、地理、兵律、经济无所不述。在纪、传中，它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人们的社会活动：本纪不仅为皇帝作，也为失败的英雄项羽和掌握实权的女主吕后作；世家不仅载贵族，也记载没有爵位的孔子和农民造反领袖陈涉，且把陈涉起义与商汤灭夏、武王革命相提并论；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哲学家、文学家、地主、商人以及如日者、游侠等社会各色人等立传，展现给读者以当时社会的全景风貌。《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在传记文学和散文方面，有着突出的历史意义。《史记》中许多列传，用生动的语言和鲜明的形象，细致刻画了不同特点的人物，恰如明人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史记》中许多文章质文并茂，语言丰富，采用了不少民谣和谚语，通俗易懂，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不愧像鲁迅赞美的那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阎爱民）

参考书目：

《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书》:《司马迁传》

《资治通鉴》卷二十、卷二十一

武帝平两越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南越王遵守与汉朝皇帝所定的规约,不敢擅自兴兵,派人上书求救于汉朝,汉武帝赞许南越的忠义,为此发兵救援,派大行王恢出兵豫章,大农令韩安国出兵会稽,合击闽越。

在先,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闽越,分布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广西的岭南广大地区;东瓯,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越人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闽越和东瓯地区设置闽中和会稽郡进行直接统治。但时间不久,便逢农民大起义,闽越君长无诸和东瓯首领摇率部众参加秦末反秦起义,楚汉相争,又助汉军击楚。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被封为闽越王,以冶为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摇被封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世人称为东瓯王。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招闽越从叛,闽越未肯,而东瓯从叛。及七国之乱被平定,东瓯又受汉朝节制,在丹徒杀死了兵败后前来投奔的吴王刘濞。刘濞的儿子刘驹逃到了闽越,因怨恨东瓯杀害其父,时常怂恿闽越攻打东瓯。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攻打东瓯,东瓯派人告急于汉朝,武帝派中大夫庄助征发会稽兵自海道往救。汉军未到,闽越闻讯率军退走。东瓯为避免再受侵扰,请求举国内迁,于是居于江淮之间和当地汉人杂居。秦时在南越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之争时,原秦朝南海郡龙川令真定人赵佗

乘机自立为南越王。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高帝派陆贾出使南越,承认赵佗为南越王,南越臣服于汉朝。吕后时,汉对南越实行铜铁等器物禁运,赵佗于是自称为帝,脱离汉朝,并发兵进入长沙王属县。汉文帝时,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劝说赵佗与汉恢复旧有关系,赵佗答应去掉帝号,并向汉朝称臣进贡,而在其国内,仍自称为帝。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 137 年),赵佗孙赵胡继为南越王。武帝前,汉中央政权对诸越势力鞭长莫及,越族各部间不断争伐,汉朝无力顾及,汉武帝即位后,国力强盛,才开始用兵加以控制。

当时,汉军尚未越过五岭,闽越王郢已发兵据守险要之地。其弟馀善与闽越丞相、王族相聚谋划说:"王因不请示汉朝擅自发兵攻打南越,所以引来汉朝天子的兴兵问罪,汉军兵强人多,我们即使能侥幸取胜,也挡不住以后的再来进犯,最终必亡国而止。如今杀王以向汉朝天子赔罪求和,天子听而撤兵则国能保全;不听,再力战不迟。即使不能取胜,再逃入海岛之中也不晚。"众人赞同,随即杀掉了郢,派使者将其头呈献大行王恢的军前。王恢说:"所以出兵者,是为诛杀闽越王。如今王头已送至,赔罪,不战而殒其性命,这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于是先勒兵不进,将消息转告大农令韩安国,并派使者持闽越王头飞报汉武帝。武帝下令两将撤兵,因无诸之孙繇君丑未参与郢之乱谋,派使臣立丑为越繇王,后又立馀善为东越王,共同治理闽越。

汉武帝派庄助将讨伐闽越之事晓谕南越,南越王赵胡叩头说:"皇帝为了我而兴兵讨伐闽越,虽死而无以报陛下大德!"派太子婴齐进长安宿卫,并对庄助说:"国家新遭战乱,使者您先行一步,待我日后打点好行装,也要进京朝见天子。"及庄助离开南越后,南越大臣都劝阻其王说:"此次汉朝兴兵伐郢,也是用以威吓南越。而且先王过去说过:'侍奉天子以不失礼为准。'总之,不可因汉使的好话而入朝晋见,去则难回,有亡国的危险。"于是南越王胡声称患病,最后,也没去长安晋见皇帝。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赵胡派其子婴齐入京师宿卫,婴齐在长安娶邯郸樛氏女为妻,生子兴。赵胡死后,婴齐为南越王,在国内去掉帝号,上书汉朝请求立樛氏为王后,兴为王太子。汉朝几次派使臣劝谕婴齐入朝晋见天子,婴齐贪图在国内生杀随意,害怕入朝后按汉家之法比之为内地诸侯王,受到朝廷的节制,所以声称患病而不肯入朝晋见。婴齐死后,太子兴即位,其母樛氏为太后。

太后樛氏在成为婴齐之妻前,曾经和霸陵人安国少季私通。汉武帝派安国少季为使者前往南越,劝谕南越王、王太后入朝,比为内地诸侯王,还令辩士谏大夫终军协助他做说客,勇士魏臣等人帮助他决策,另派卫尉路博德率兵屯驻桂阳以待使者归来。南越王兴年少,王太后又是中原人,安国少季出使到南越后与太后再次私通,南越国中不少人知晓此事,多不以为然,和太后离心离德。太后担心引起祸乱,也想倚汉朝的国威加强自己的地位,多次规劝南越王和群臣内迁,并通过使者上书汉朝天子,请求朝廷按内地诸侯王的地位对待,三年一次进京朝见皇帝,拆除边关。汉武帝下诏许可,赐给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和其他内史、中尉、太傅的官印,以示朝廷任命,其余以下官吏皆由王国自行设置;废除过去的黥、劓等肉刑,采纳汉朝的刑法,与内地诸侯王地位一样相等,使者们留驻镇抚南越。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大治行装,为内迁作准备。南越丞相吕嘉年岁已老,为三朝丞相,其宗族中为官者有七十多人,家中男子尽娶王女为妻,女子都嫁与王族子弟为妇,又与苍梧越中王联姻,在国内威望很高,甚至超过南越王。南越王上书请求内迁,吕嘉多次劝阻不听,因此怀有叛心,常称病不见汉使臣。汉使臣留意到吕嘉的动向,但因势单未敢动手。南越王、王太后也担心吕嘉等人会先行发难,打算倚恃汉使臣之权,诛杀吕嘉等人,于是设酒宴宴请汉使臣,南越大臣们陪坐。吕嘉弟为将,率

兵居于宫外。酒过一旬，太后对吕嘉说："南越内迁，于国有利，而丞相扬言不便，想干什么？"想以此激怒汉使。汉使臣持兵杖犹豫不决，最终未敢动手。吕嘉见情形异常，拂袖而出。太后恼怒，上前打算操长矛刺杀吕嘉，被南越王所制止。吕嘉出宫，在其弟所率士兵的保护下回到了府中，称病不出，不肯见王及汉朝使者，暗中与南越大臣们图谋叛乱。南越王一直没有诛杀吕嘉之意，吕嘉也知道，所以数月没有发动反叛。

汉武帝闻听吕嘉拒不听命，南越王、王太后又孤弱势单，派去的使臣怯懦缺乏决断，又因南越王、王太后已归附汉朝，只有吕嘉为乱，不足以大兴征伐，打算派庄参率二千人前往南越。庄参认为为和好前往，几个人就足够，为动武前往，二千人也无济于事，推辞不可。汉武帝撤换庄参。原济北相韩千秋慷慨陈言："以区区南越之地，内又有王、王太后响应，独有丞相吕嘉为害，愿带三百勇士，必斩吕嘉之头以回报皇上。"于是汉武帝派韩千秋与南越王太后之弟樛乐率两千人前往。进人南越境内后，吕嘉等人借此发动反叛，传令国中："王年少，太后是中原人，又与使者淫乱，只欲内迁，尽持先王庙中宝器进献汉天子以自媚；内迁需众人从行，至长安后将被虏卖为奴仆。他们只求得保全自己一时之利，不为赵氏社稷的千秋万世考虑。"吕嘉和他的弟弟率兵攻杀南越王、王太后和汉使者，派人通知苍梧越中王及其郡县，立明王婴齐长子赵越之子赵建德为王。韩千秋军队进人南越地，攻破几座小城邑，越人让开大道并提供食物。韩千秋等二千人到达南越首府番禺外四十里之处，遇南越大军，遂被消灭。越人将汉使者的节杖用匣封好，置于边塞，以便以后虚辞赔罪，又发兵把守要害之地。

春，三月四日，汉武帝闻知南越反叛，认为韩千秋虽然无功，也是兵锋之冠，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樛乐姊为南越王太后，首愿归汉，封樛乐子广德为龙亢侯。

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出兵桂阳，顺湟水而下；楼船将

军杨仆出兵豫章，赴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兵零陵，向离水；甲为下濑将军，逼苍梧，所统军队都是罪徒，乘楼船而进，共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另统巴、蜀之地罪人，并征发夜郎兵，沿牂柯江而下，都在番禺(今广东广州)会师。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将军杨仆进人南越地，攻陷寻狭、石门，挫败越军前锋部队，留下数万人待伏波将军路博德赶到后一同进发，楼船将军居前，进抵番禺。南越王建德、丞相吕嘉据城固守。楼船将军屯兵城东南，伏波将军屯兵城西北。傍晚，楼船将军大败南越军，纵火烧城。伏波将军则设置营垒以招容投降者，来降者又被放回使之再招降别人。楼船将军奋力攻烧，大批敌人被赶入伏波将军营垒中投降，第二天清晨，城中其余守军也全部投降。南越王建德、丞相吕嘉趁深夜逃到海上，伏波将军派兵紧紧追赶，校尉司马苏弘抓获南越王建德，越郎都稽抓获吕嘉。当时戈船将军、下濑将军军队和驰义侯所征发的夜郎兵尚未到达，南越已被平定。汉朝在其地设置儋耳(今海南儋州)、珠崖(今广东琼山)、南海(今广东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合浦(今广东合浦)，以及交趾、九真、日南(后三郡在今越南北部与中部地区)九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汉军班师，汉武帝加封伏波将军食邑的户数，又封楼船将军杨仆为将梁侯，苏弘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南越自赵佗称王始历经五代，至此九十三年而亡。

当初，东越王馀善上书，请求率兵八千跟从楼船将军杨仆进击吕嘉；军队行至揭阳，以风大浪急为由，停兵不前，首鼠两端，并暗中派人出使南越；及汉军攻克番禺，仍不引兵前来。杨仆上书请求顺便率兵进攻东越。汉武帝因士兵疲倦而未许，令各校尉屯兵在豫章、梅岭待命。东越王馀善闻知楼船将军杨仆上书请求讨伐东越，汉军又在边地屯兵，于是反叛，发兵阻截汉军，封东越将军驺力等人为吞汉将军，进兵白沙、武林、梅岭，杀汉朝三校尉。当时，汉派大农张成、原山州侯刘齿统率驻屯军队，东越兵来不敢出击，临阵退

避，二人都因畏懦被处死。东越王馀善自称“武帝”。

汉武帝打算再起用杨仆为将讨伐东越，但因其矜伐前讨南越之功，所以先下诏书申斥，指明他有虚报战功、纵敌、不恤将士、顾家失期、欺瞒君上等五过，以抑其骄气：“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否？”杨仆得诏书，惶恐不安，表示愿尽死赎罪。武帝于是命楼船将军杨仆出兵武林，横海将军韩说出兵句章，中尉王温舒出兵梅岭，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兵若邪、白沙，合击东越。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汉军进入东越境内，东越平素已有兵驻守要塞地区，此时又派徇北将军驻守武林。杨仆军中士卒钱塘人辕终古阵前斩杀东越徇北将军。原东越衍侯吴阳率本地士兵七百人倒戈于汉阳，反攻东越军。东越建成侯敖与越繇王居股联合杀掉东越王馀善，率其部众投降。东越被平定。武帝封辕终古为御儿侯，吴阳为卯石侯，居股为东成侯，敖为开陵侯；又封横海将军韩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刘福为缭荌侯，东越降将多军为无锡侯。武帝因闽地形势险阻，当地越人反复无常，恐为后世留下祸患，下诏令诸将将当地越人全部迁徙到江淮之间与汉族杂居，闽地遂成废墟。

越族的生产和文化虽然比汉族要落后得多，又为“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但他们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司马迁说：“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汉武帝平两越，及其后汉政府采取的“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加速了汉族的先进经济和文化在越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使得越族地区的开发迈开了更快的步伐。越族在与汉族的交融中，共同促进了汉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繁盛，其中汉武帝平定两越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阎爱民）

参考资料：

《史记》:《南越东越列传》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资治通鉴》卷十七至二十一

《通鉴纪事本末》:《武帝平两越》

武帝击朝鲜

汉朝时期的东北边地(今辽东、吉林西南至朝鲜北部)生活着高句丽、朝鲜、涉貊等古朝鲜的部落。早在殷周时期,这一带就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往来。《史记》上有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的记载,说武王消灭了殷纣王以后,将殷的贤臣箕子封为朝鲜王,而且还享有不向周朝称臣的特权。传说箕子带领很多人去了朝鲜,定居下来。箕子还教授当地人民以中原的礼仪制度和先进的农田耕织技术,并且设立了简单的律法。战国之际,北方的齐国和燕国都与朝鲜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和贸易往来,燕国国势全盛时,曾攻占了真番和朝鲜等部,燕在其地设置官吏,修筑要塞。秦始皇灭燕以后,朝鲜地区属秦辽东郡外徼,秦长城一直修到浿水(今清川江)。秦末大乱,齐、燕、赵等地有不少人民流亡去朝鲜地区定居。

汉朝建立,因朝鲜地区边远难于防守,又重修辽东边塞,以浿水为界,朝鲜为汉朝燕国的属地。汉高帝、吕后铲除异姓王,燕王卢绾反叛,逃入匈奴,燕国混乱,燕人卫满纠集民众千余人亡命东走出塞。他们头盘椎髻,改着朝鲜服饰,渡过浿水,移居于朝鲜。以后卫满又借着移民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势力,攻灭了原来的朝鲜王准,自己做了朝鲜国王,建都于王险城(今平壤)。当时正值汉惠帝和吕太后之时,天下初定,朝廷修养生息,力求边地宁静,汉辽东太守与卫满相约:汉朝承认朝鲜为藩外属国,朝鲜则应确保汉朝边地的安全,不得使塞外其他小国和部落骚扰汉的边境,而且他们如果愿意人朝朝见汉天子,朝鲜也不能加以阻拦。此事上报朝廷后获得

批准。后来卫氏朝鲜利用汉朝藩外属国的政治优势，凭借着兵威和财力，以或打或拉的手段吞并了周边许多小的部落，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国力开始强盛。真番、临屯等较大的部落也都臣服于卫满，卫氏朝鲜的国土方圆达到数千里。

卫满的孙子卫右渠在位时，常常招诱汉族人到朝鲜去，人数很多，右渠即位后也一直不曾遣使朝见汉天子。汉武帝元朔初年（公元前 128 年），涉貊君主南闾率部众二十八万归附汉朝，汉在其地设苍海郡，因受卫氏朝鲜的干扰，不久又撤消了。后来朝鲜半岛南部 的辰韩国上书汉朝欲人朝见天子，也被右渠拦阻不放。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武帝因此事派涉何出使朝鲜，劝谕朝鲜王右渠遵守旧约，不得招诱汉人，不得阻碍半岛上其他小国朝汉。但右渠拒不奉诏，双方关系开始恶化。涉何返回，至溟水，命人刺杀了护送他返汉的朝鲜裨王长，随后渡河，驰人边塞，向汉武帝报功说："杀朝鲜将。"武帝因涉何有杀将的好名声，也就不再深究此事，并任命他为辽东东部都尉，着手进行对朝鲜用兵的准备。朝鲜因怨恨涉何，首先发兵进攻辽东，杀死了涉何，遂使双方兵戎干戈相见，边地战事频起。

这年秋天，汉武帝招募天下罪囚为兵，开始大规模征讨朝鲜，命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地渡渤海出击，又命左将军荀彘率军五万出辽东，水陆两路合击朝鲜。

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汉军进人朝鲜境内，朝鲜王卫右渠发兵据守险要，抗拒汉军。汉军的进攻开始时多次受挫，左将军部下的卒正多率辽东兵贸然出击，结果遭到惨败，多只身逃回，以军法处斩。楼船将军杨仆率齐地士兵七千人从海上乘船在朝鲜登陆，首先赶到王险城下。右渠开始是坚守城池不出，但很快便探知到杨仆军的人数不多，又远道而来，疲惫不堪，随即纵兵出城猛攻，杨仆军大败，纷纷逃人山中躲藏。十几天以后，杨仆才渐渐将逃亡各处的散兵游勇收拢集结，伺机而动。左将军荀彘率大军进攻溟水以西

的朝鲜守军，也未能取胜，受阻于浿水一带。

汉武帝因二将接连出师不利，派卫山倚仗兵威出使朝鲜，恩威并施，劝谕右渠投降。卫右渠自度难以与汉军长久相敌，便决定拜见汉使求降。卫右渠向汉使叩头赔罪后表示："原本朝鲜是愿意归降的，但因担心自己会被杨、荀二位将军杀害，所以未降，今见天子信节，请求再降。"降约达成，朝鲜王卫右渠派太子随使者入朝向天子请罪，并献上五千匹马，又赠军粮给汉军。朝鲜王太子启程前往长安，随行的有一万多人，而且是全副武装。将要渡浿水时，汉使及左将军担心朝鲜太子这么多的人马可能会发生突变，于汉军不利。他们便对朝鲜太子说："你们既然已经归顺了朝廷，就不应该再这样携刀带剑的了。"朝鲜太子也怀疑使者和左将军的举动不是出于诚心，他们在半道上要挟诈杀害自己，因此不再准备渡河，率自己的部众返回，双方和议破裂。卫山将情况上报汉武帝，武帝恼其办事不利，诛杀了卫山。

招降失败，荀彘率部击败浿水的朝鲜守军，进军至王险城下，兵围城西北。杨仆也率军前往会合，屯兵于城南，二军合击右渠。左将军荀彘平时身为侍中，深得武帝的宠信，其所率燕、代地士兵又强劲凶悍，因此士气骄横，目中无人。楼船将军杨仆所率齐地兵卒前已有过失败的羞辱，作战时常心怀恐惧和惭愧，总希望能不战而屈敌人之兵。荀彘军队的攻城非常猛烈，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内部发生动摇，一些贵族大臣们背着国王秘密派人出城与杨仆军队商量投降事宜，双方使者你来我往，一时尚不能作最后的决断。荀彘几次与杨仆约期同时攻城，但杨仆正等待着朝鲜方面如约投降，所以并不急于攻战。后来荀彘也秘密派人与朝鲜商量招降之事，但朝鲜大臣们对荀彘不信任，不愿谈此事，他们只希望能够向杨仆的军队投降。荀彘认为杨仆前有兵败之罪，今又与朝鲜私下求和，求和又未见朝鲜投降，怀疑杨仆有反叛的图谋，只不过是未敢发动而已。由于左将军与楼船将军之间在攻城和招降问题上不能协调一

致，双方又互相猜疑和不信任，以致于王险城久攻不下。

汉武帝因二将不和，兵事拖延不决，又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整饬，并授予他相机处置的权力。公孙遂到达朝鲜，荀彘对他说："朝鲜本该早就能攻下，如今久拖不下，都是楼船将军几次会战不至造成的。"荀彘又将自己对杨仆的怀疑也谈了出来，认为现在不解决杨仆，恐怕会造成大害，如果杨仆反叛，再与朝鲜军队兵合一处，其后果不堪设想。公孙遂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公孙遂以节杖召杨仆来左将军营，假称商议军事，借机逮捕了杨仆，收编了楼船将军的军队，并将此举上报汉武帝。武帝因公孙遂阵前随意逮捕大将，派人又诛杀了他。

左将军荀彘合并了杨仆的军队，随即加紧进攻王险城。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朝鲜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朝鲜国相路人、韩阴，将军王唊出城投奔汉军，路人死在了道上。这一年夏天，尼谿相参派人刺杀了朝鲜王卫右渠，也率部投降了汉军。但不久朝鲜大臣成己又聚众占据王险城抗击汉军。荀彘派卫右渠的儿子卫长、路人的儿子最前往劝谕朝鲜民众停止抵抗，并且杀掉了成己，朝鲜终于被平定。

武帝击朝鲜后，封朝鲜降将尼谿相参为澅清侯，韩阴为萩且侯，王唊为平州侯，卫长为几侯，最为涅阳侯，以示安抚。而此次征战的汉军将领却都获罪，无一因功封侯。使者卫山、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已被杀；左将军荀彘被征回京后，以妒嫉争功、军机处置不当之罪在闹市被处死；楼船将军杨仆也因其不待左将军到达后就率先进攻王险城，导致军队伤亡逃散过多，论罪当死，杨仆以钱财赎罪，被免为庶人。

汉朝灭卫氏朝鲜后，汉武帝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今平壤）、临屯郡（今江陵）、真番郡（今信川）和玄菟郡（今咸兴），在朝鲜半岛北部实行直接的统治。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朝鲜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朝鲜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西汉末年扬

雄记录全国各地方言，朝鲜和燕便属于同一方言区，许多口语都近一致。东汉史学家班固谈道，原先朝鲜经济比较原始，商品经济不发达，民风还很古朴，自武帝在此设郡之后，内地大批贾人前往，使得"俗稍益薄"。律法由过去简单的"设禁八条"，增繁到六十多条，政权机构的作用也突出了。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些都是进步的表现。

（阎爱民）

参考资料：

《史记》:《朝鲜列传》

《通鉴纪事本末》:《武帝击朝鲜》。

武帝惑于神怪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 133)冬十月,方士李少君以“祠灶却老”的方术受到汉武帝的召见。“祠灶”就是祭祀灶神,李少君宣称通过祠灶,可以达到延年不老的目的。

先前,战国时期的齐燕地区出现了一批好讲神仙方术的神仙家学派。到秦汉期间,神仙家被称作方士,他们宣称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仙人与不死之药都在此处,而方士自己有一种可以与鬼神往来的方术,因而可与仙人相遇,获取不死之药。一些帝王对寻求神仙术乐之不疲,秦始皇就曾为求神仙和不死仙药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和人力。汉武帝即位后,对鬼神祭祀尤为敬重,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他对方士们的方术始终兴趣不衰。李少君曾是原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没有家室,常瞒着自己的实际年龄和出生地到处游荡。人们听说他能把朱砂变成黄金,懂得长生不死仙术,纷纷解囊相求。他不治生业,生活却富饶有余,一些人对他羡慕不已。李少君巧于奇言怪语,有时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也能被他说中。一次,他参加武安侯田蚡举行的宴会,席上有位九十多岁的老者。李少君声称他曾与老者的祖父一同到某地游猎,这老者为少儿时,曾跟随祖父出游,还记得这个地方,因而点头称是,席上满座听后惊得目瞪口呆。李少君见汉武帝时,武帝有一古铜器,便向他询问铜器的来历。李少君看后说此物为齐桓公十年时陈列在柏寝之台的器物。随后人们仔细查看古铜器所铸刻的文字,果然是齐桓公时器物。宫中人大为惊奇,认为李少君是神人,至少有几百岁了,不

然他怎么那么清楚齐桓公时的东西？

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祭祀灶神，可以使事物发生神变，朱砂可变成黄金，使用这种黄金做成的饮食器具，可以使人长寿，能见到蓬莱的神仙，然后再到泰山举行封禅大礼，就可以不死，黄帝就是这样成为了仙人。臣曾游历海上，见过安期生，他吃的巨枣有瓜那么大，安期生是仙人，有一千多岁，他常往来于蓬莱仙岛，时隐时现。"武帝对李少君的鬼话深信不疑，亲自祭祀灶神，派方士去海上寻求蓬莱仙岛和安期生等仙人，并让人炼丹砂药物，希望能变化出黄金来。不久以后，黄金没炼出来，李少君却先得病死去，他的把戏不但没有被揭穿，反使得汉武帝真以为他是化为仙人而去了，没有真死，并派黄锤、史宽舒学习他的方术，以期求得神仙。从此后，齐燕之地大批方士纷纷上书谈论荒诞离奇的神仙之事。

亳县人谬忌上书请求祭奉太一神，他认为在诸天神中最尊贵的就是太一神了，武帝于是在长安东南郊立太一祠。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齐人少翁自称会鬼神之术，受到汉武帝的召见。时值武帝的宠妃王夫人死，武帝对她非常想念，少翁便表演了一次他的鬼神之术。他在半夜于帏帐中点上烛灯，开始招鬼。武帝在别的帏帐中远远遥望鬼影，真如王夫人形状，但不能就近观看。武帝看后非常惊奇，遂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很多，并以客礼相待。少翁劝武帝修建甘泉宫，中有台室，画天、地、太一诸神像，像下陈放各种祭器，说这样便可以与天神相通了。过了一年多时间，天神也没迎来，少翁技穷无奈，暗中写好帛书，给牛吃下，然后声言："此牛腹中有奇物。"杀牛得到帛书，奏说此为天神所赐。帛书的内容非常怪诞，但武帝还是认出帛书是出自少翁的手笔，追问其事，少翁不得已承认是自己作伪。武帝愤怒之下将少翁杀掉，并将此事秘而不宣。

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汉武帝在鼎湖宫病重，医术、巫术什么都用上了，但病情仍不见好转。游水发根上疏推荐上郡巫，说

此人原本得过一场大病，后鬼神附体，因而以巫为业。武帝召其在甘泉宫祭祀，及病情加重时，派人向神君寻问。神君附体在上郡巫身上说：“天子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大病，病情渐轻时，可与我在甘泉相会。”武帝听说能与神君相通，非常高兴，疾病不知不觉也好了大半，于是他又移居到甘泉宫。及身体完全康复，武帝在寿宫为神君大摆酒宴以示崇敬。但神君终不可得对面相见，只能闻听神君的声音，闻其所言，与普通人的声音没什么两样，时去时来，来时常有风声伴随。上郡巫在室内帷帐中，有时是白天神君附体说话，但更多的是在晚上附体。武帝如想进到屋中，都必须沐浴去垢后方能进人。武帝又在寿宫、北宫树立羽旗，摆设贡具，显示对神君的尊礼，凡神君所言，都命人抄录下来，取名为《画法》，其中内容，世人常听巫觋们述说过，没有什么特殊的，唯独武帝内心欢喜。上郡巫所行的事都很诡秘，外人不得而知。

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二月，乐成侯丁义向汉武帝推荐方士栾大，说栾大与文成将军少翁同师。武帝正对诛杀少翁之事后悔不已，现在又得栾大，自然是非常高兴。栾大先前曾侍奉过胶东王刘寄，甜言蜜语，鬼花样也多，又敢说大话，而且说起来表情自然，让人不能不信。栾大说他曾往来于海上，见过安期、羡门等仙人，仙人认为他身分低贱，不肯相信，而且胶东王也不过是个诸侯，不值得传与方术。他的老师说过：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可以被堵住，不死的仙药也可寻得，仙人也能见到。但他自己不愿落得少翁的结局，不想谈论方术了。武帝求神心切，谎说少翁是自己吃马肝被毒死的，并告诉栾大，如能修好其师的方术，我还有什么值得爱惜不肯赏赐予你的！栾大听后，又自高身价说：“吾师非有求于别人，都是别人有求于吾师，陛下必欲和他相见，就应让他的使徒尊贵，并和陛下结成亲属，待以客礼，然后才能和仙人通上话。”为了让武帝相信他的方术，栾大又当场表演了“斗棋”的小魔术，使棋子能自相触及。当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和没有炼成黄金之事忧虑，非常乐于

相信栾大的话，于是拜栾大为五利将军，不到两月时间又连拜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并封爵乐通侯，食封二千户；还赐给深宅大院和一千多奴仆，皇家所不用的车马、帷帐、器物也送给栾大，武帝以此让栾大的地位尊贵。武帝又将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栾大，让他成为自己的亲属，陪嫁有十万斤黄金，并亲自驾临五利将军之家。平日派往其家送东西慰问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其他人自武帝姑母窦太主、将相以下，也纷纷前往五利将军家。武帝又派使者身着五彩羽毛衣裳，手持“天道将军”玉印，夜里站立在白茅上；五利将军栾大也穿上五彩羽衣，站在白茅上，接受玉印，以示行客礼。所以刻玉印为“天道”，为取天子引导天神之意，希望借此能把天神引到武帝面前。栾大常在夜晚于家中迎神，神仙虽没迎到，但各种鬼把戏却玩得很纯熟。栾大见武帝后短短的时间，连佩六印，富贵震动天下，齐燕沿海地区的无赖之徒莫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很多人都声言握有密方，能招来神仙。

六月，汾阴出土了一个古鼎。河东太守将此事上奏。武帝派人验证无假后，将古鼎迎到甘泉宫，作为宗庙和上帝的祭器，群臣纷纷祝贺。

齐地方士公孙卿得知武帝对汾阴出土的古鼎很有兴趣，趁机编造鼎书，通过武帝的宠臣上奏，称此鼎为黄帝所造。武帝非常高兴，召见公孙卿，公孙卿说鼎书得自于申公，申公是齐人，已化仙而去，曾与安期生有过交往，受黄帝的旨意，留下这份鼎书。申公说，汉家当复兴黄帝时的盛世，汉家圣者，应当在高祖皇帝的孙子和曾孙之间。宝鼎一出，圣者就可与神相通，可以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过去只有黄帝真正登上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汉家君主也应效法黄帝封禅，这样就能成仙升天。当年黄帝在首山采铜，于荆山下铸鼎，鼎铸成，有龙垂胡须下临人间，黄帝乘龙与群臣后宫七十多人一同登天。武帝听了公孙卿的话，十分向往，感叹道：“真如黄帝那样，我会把丢弃家室如同脱只鞋那么容易，没有什么可以牵挂

的!"武帝遂拜公孙卿为郎,让他在太室山等候神仙的到来。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五利将军栾大还是没能迎下神仙,于是声称要入东海寻访其师,但事到临头又不敢下海,转道去泰山求神仙。汉武帝此时已对他的鬼话不完全相信了,派人跟随加以验证。栾大的方术大都虚假不实,又妄言见到了他的师傅,派去的人如实上报。武帝终于发现自己又上当受骗,将栾大以腰斩之刑处死。但武帝对神仙的兴趣并未因此而减少。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在河南等候神仙的公孙卿上报说在缑氏城上见到了仙人的足迹,还有个像野鸡似的东西在城上飞来飞去。春,汉武帝亲自前往观看,因以前有受骗的教训,便警告公孙卿不要走少翁和栾大的老路。公孙卿确实比这二人更圆滑些,他把仙人的到来说成不是一朝一夕能见到的事情,而且飘忽不定。仙人非有求于人主,而人主却有求于仙人,如果道路不宽敞,神仙是不会下凡的。公孙卿还诡辩说:"神仙之事似乎怪诞不可信,要积累岁月,日久天长才能见到真神。"武帝相信了他的话,命令各郡国清整街道,修缮宫观、名山、神祠,以待日后神仙的降临。

以前,司马相如病重将死时,仍不忘上书劝武帝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武帝为其言所感动,当时有很多人都希望天子能举行封禅大典。后又在汾阴挖得宝鼎,汉武帝与公卿儒生开始商议封禅之事。但封禅事以前极为少有,礼仪无从知晓。秦始皇时曾搞过一次封禅大典,史载其"封藏皆秘之",世人不得而知,也无从参考,所以武帝要儒生们参照《尚书》、《周官》、《王制》等书草拟出封禅礼仪。儒生们争吵了好几年也未将礼仪拟成。武帝寻问内史儿宽,儿宽告诉武帝说:"封禅是帝王的盛节,只能由圣主自己裁制,不是臣下可以办到的。"武帝听后以为然,亲自制定大典礼仪,并以儒家理论加以解释。武帝将自定的封禅祭器让群儒观看,不少儒生认为与古不合,不能使用。武帝恼怒,干脆把这些儒生罢免不用。

汉武帝为首次举行封禅大典,特将年号改为"元封"。武帝据先

兴军威、后解兵甲、然后再封禅的古义，率军出巡。自云阳北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到朔方，又临北河。随从铁骑十八万，旌旗绵延千里，以此威振匈奴。炫耀兵威后，武帝方率军回京，在上郡的桥山祭祀了黄帝陵，在须如将军队遣返原处。武帝向群臣问道："我听说黄帝没死，但却有他的坟，这是怎么回事？"公孙卿对答说："黄帝已仙化升天，群臣思慕他，便将其衣冠埋葬，那黄帝坟不过是个衣冠冢。"武帝听后感叹，希望将来自己变成仙人升天后，群臣也应将自己的衣冠葬在茂陵。回到甘泉宫，武帝祭祀了太一神。

春正月，武帝巡行缑氏，礼祭了中岳太室山，随从礼官报告说，在山下听见了有如阵阵的"万岁"之声。武帝非常高兴，传令禁止人们砍伐这山上的草木，以山下三百户人家为太室的祭奉户。武帝又沿海东巡，礼祭了八神。当地齐人上疏谈论神怪和方术的人数以万计，但大多虚妄不实。武帝增发船只，令那些说海中有神山的人入海去寻蓬莱诸仙。武帝东巡时，专门候神的公孙卿持节先行，到东莱，公孙卿声言在晚上看到了一个巨人，有好几丈高，待临近巨人，他就不见了，留下很大的足迹，如野兽形迹。武帝赶到观看巨人足迹，起初还不相信，这时听群臣议论说曾见一牵狗的老者又忽然不见了，因而确信巨人就是仙人。武帝留宿在海边，不断派方士和使者去寻求仙人，共有一千多人，但依然没有结果。

夏四月，汉武帝回到泰山附近的奉高，正式开始举行封禅大典。封禅实际分为"封"和"禅"两种典礼。"封"是帝王要到泰山顶筑土为坛以祭天，向天报告成功；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离天最近了。"禅"是到泰山脚下梁父或其他小山去祭地，向地报告成功。两项典礼合称"封禅"。汉武帝首先在梁父山礼祭了八神之一的地主，后从南路上泰山，令侍中和儒者头戴皮弁，身着缙绅，武帝亲行射牛礼，"封"泰山下东方，礼仪如同祭祀太一神之礼。封土坛四周宽各一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埋有玉牒文书，书的

内容世人不得而知。封礼行后，武帝又和侍中并带着霍去病的儿子霍子侯登上泰山山顶，还有封礼，但其礼仪别人不得而知。第二天，从泰山北路而下，在泰山东北脚下的一座小山肃然山举行"禅"礼，礼仪如同祭后土神之礼。封禅完毕，武帝来到泰山脚下古时候留下的明堂，接受群臣的上寿祝贺，非常满意，下诏改年号为"元封"，又规定了以后每五年一修封的制度。

泰山封禅后，依然是天晴日丽，这似乎是上天预示的好兆头，武帝乘兴东巡到海边，希望能借着封禅的吉庆遇上方士们所说的蓬莱诸位神仙，甚至打算亲自乘船入海去寻找。这当然很危险，很多大臣苦谏不听，最后还是东方朔所言说得武帝点头称是。东方朔说："仙方得之自然，不必急求。若是人主有道，不忧不得；若是无道，就是遇到蓬莱仙人也无益。希望陛下回宫静候，仙人将会自来。"武帝这才打消了亲自入海的念头，但仍沿海岸北到碣石，走辽西，历北边，到九原，五月，回到甘泉，这一圈走了一万八千多里。

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春正月，公孙卿上奏说在东莱山又看见神人了，而且看样子神人是想要见天子。武帝立即前往缑氏城，拜公孙卿为中大夫，又赶到东莱住下，好几天什么也没看见，后来才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足迹，武帝相信这是神仙留下的，又派方士们入海求神仙，寻找灵芝仙药，派出去的方士有一千多人。当时天下大旱，武帝出巡无名，于是到东莱的万里沙神祠中去祈神求福，途经泰山时又举行了祭祀。夏四月，回到京城。

当时武帝灭南越和东越不久，越人勇之上言："越人有祭鬼习俗，祭祀时可见鬼形，有时还很有灵验。过去东瓯王敬鬼，活了一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所以衰败没落了。"武帝便令越巫祭祀上帝、百鬼，又采用越人的鸡卜方法占问凶吉。

汉武帝对公孙卿所说的神仙足迹那老一套已有些厌倦了。公孙卿担心会落得少翁和栾大的下场，便通过卫青上言为自己辩解。公孙卿说："神仙本来是可以见到的，但皇上每次前往匆忙，所以不

能遇到。今陛下可修建楼观，摆放脯枣，做好接待准备，这样神仙才肯到来，而且神仙也喜欢住楼观。”武帝相信了公孙卿的话，下令在长安修建蜚廉桂观，在甘泉修建益延寿观，摆设各种迎神器具，派公孙卿在此恭候仙人；又兴建通天台，以便招来各路神仙。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冬十月，汉武帝巡行到泰山。十一月一日，冬至，武帝在泰山东北的明堂祭祀上帝。东巡至海边，查验那些派出入海寻神山的人及求神仙的方士，没有一个是有结果的，但武帝仍不甘心，还是增派人员人海寻仙。十二月一日，武帝在泰山脚下的高里举行“禅”礼，祭祀了后土神；接着抵临渤海，期待着神仙的到来和寻到蓬莱仙境。春，武帝无可奈何地回到京城，开始修建建章宫。建章宫东有凤阙，高二十多丈；西有唐中，为方圆数十里的虎兽圈；北修有人工湖，叫太液池，湖中有高二十多丈的渐台和取名为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的人工岛，象征海中神山和龟鱼之类；南有玉堂、璧门等；另外还建有神明台、井干楼，各高达五十丈。各处都修有辇道相连。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正月，汉武帝又东巡海边，再次查验求神仙之事，还是没有一个人能寻到神仙；等到四月，又去泰山修封禅之礼。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三月，汉武帝去泰山续修封禅。方士们等候神仙、入海寻仙山的终究没有一个有结果，而公孙卿还是以见到了神人的足迹为托辞欺蒙武帝。武帝对方士们的说法愈来愈厌倦了，但心犹不死，仍然期望有一天能遇上真神。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正月，武帝巡行至东莱，临大海，再次打算亲自乘船入海寻求神山，群臣苦劝不住。恰此时天气骤变，海上刮起大风，浪高波急，一连十多天楼船都不能出海，武帝这才抛弃了亲自入海的念头，率群臣返回。三月，武帝去泰山续封禅。寻求神仙的强烈渴望和接连不断的希望破灭，促使武帝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对大臣们说：“我即位以来，办了很多狂悖之事，使天

下百姓忧愁穷苦，后悔不及，今后凡是损害百姓浪费财富的事情一律撤除。"大鸿胪田千秋说："方士们谈论神仙之事的很多，但都没有明显的成绩，应该将他们全部罢免放逐。"武帝认为他提的意见很好，把那些方士与候神仙者全部罢免遣散了。以后武帝常常感叹："自己以前太愚昧，受了方士们的欺骗。天下哪有什么神仙，都是一些虚妄的妖言。只有注意饮食服药，大约可以减少疾病求得些长寿而已。"这是武帝对自己一生乞求神仙的深刻总结。两年以后，汉武帝病逝于盩厔五柞宫。

汉武帝对神仙的向往，对方士的迷信，对鬼神的祭祀，耗去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汉武帝晚年能有所醒悟，知迷而返，又胜过秦始皇一筹。

（阎爱民）

参考书目：

《史记》:《封禅书》

《汉书》:《武帝纪》

《汉武故事》

《通鉴纪事本末》:《武帝惑神怪》

巫蛊之祸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秋冬之交的一天，长安发生了一携剑男子欲闯皇宫的事件。当时汉武帝在建章宫远远望见这一男子正往中龙华门里走，因其行迹可疑，便命卫兵逮捕此人。这人见势不好，弃剑而逃，卫兵们没有追上。汉武帝恼怒，杀掉了负责宫门警卫的门候，调动三辅的骑兵入上林苑围捕，又关闭城门搜索，但没有结果，十一天后长安才恢复正常秩序。此事之后，巫蛊之祸便开始了。

所谓巫蛊，是指男女巫师在下神时诅咒并将木偶人埋于地下，当时人认为这样可以加害于他人。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公主、皇后、太子及很多人都因此而败亡。

朱安世是阳陵人，被朝廷所追捕，一直亡命在逃。丞相公孙贺有个儿子公孙敬声为太仆，仰仗着自己的母亲卫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骄横奢侈不守法度，擅自动用了北军的一千九百万钱，后事情败露，敬声被捕入狱。当时汉武帝正为抓不到朱安世而焦急，公孙贺因而上奏自请去追捕朱安世，以此来赎敬声之罪，武帝允许了。不久，公孙贺果然抓到了朱安世，朱安世听说丞相抓他是为了替自己的儿子赎罪，便笑着说："丞相就要祸及家族了！"遂在狱中上书，揭发公孙敬声曾与卫皇后之女阳石公主私通，并在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恶言诅咒皇上。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正月，公孙贺被捕入狱，审讯证实后，父子俱死在狱中，其家族皆被诛灭。武帝任命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封为澎侯。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原来是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宾客，因得罪赵国的太子刘丹而亡命潜逃，进长安上书揭发了刘丹的许多违法丑事，刘丹因而被废除了赵太子之位。武帝召江充入宫晋见，江充容貌魁伟，衣着华丽，很有些与众不同；谈论政事，又深得武帝欢心，备受武帝的信任，武帝任命他为直指绣衣使者，让他督察皇亲国戚及亲近大臣中的越制奢侈行为。江充检举弹劾无所避讳，武帝认为他是忠心正直。江充曾跟随武帝去甘泉宫，正碰上皇太子刘据的家使所乘的马车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驶，便将车马没收入官。太子得知后，派人向江充道歉说："不是吝惜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知道，此事都是我平时对下属管教不严的结果，希望江君能原谅这一次！"江充不听，还是将此事上报了武帝。武帝非常赞赏，认为作为大臣就应该像江充这样行事，于是对他更加重用，江充威名震动京师。他与太子间也因此事产生了很深的隔阂。

闰四月，卫皇后之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的弟弟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都因受巫蛊之牵连而被处死。武帝与卫皇后及太子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初，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生了戾太子刘据，武帝非常喜爱，太子之母卫子夫后来被立为皇后。太子长大之后，性情仁和谨慎，武帝嫌他缺乏才能，不像自己。以后武帝所宠爱的王夫人生了刘闳，李姬生了刘旦、刘胥，李夫人生了刘髆，所以武帝对皇后和太子的宠爱逐渐淡漠，皇后和太子内心也常感到不安。武帝发觉后，对皇后的弟弟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制度均属草创，四方夷狄又骚扰中原，我如不变更完善各项规章，后世就无法度可循；如不出兵征讨夷狄，天下就不能安宁，为此就不得不要烦苦百姓。后世如果还像我这样干，是重走秦朝覆亡的老路。太子敦厚稳重好静，必能安定天下，不让我担忧。要寻求能够守成的君主，没有比太子再好的。听说皇后和太子内有不安之意，不知真否，你可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大将军卫青听后叩头感谢。皇后听到转告后，除去头饰向武帝

赔罪。

太子常劝谏武帝不要兴师动众征伐四夷，武帝笑着对他说："我把劳苦担当起来，把安逸留给你，这不挺好吗？"武帝每次出巡，总把大事托付给太子，宫内之事托付给皇后。他们所处理决断的事情，武帝回来后，拣要紧的向武帝汇报，武帝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有时连问也不问。武帝用法严酷，任用的多是酷吏，太子为政宽厚，常令重审案件以从轻处置，虽然深得百姓人心，但执法的大臣们都很不高兴。皇后担心时间长了会惹恼武帝，常劝诫太子将案卷留下听从武帝自己发落，不该擅自自己从宽处分。武帝听说后，赞赏太子的作法，而对皇后却不以为然。群臣中的宽厚长者都归心于太子，而严酷用法者却诋毁他。当时奸臣结成党羽，所以对太子的赞誉少而诋毁多。卫青死后，不少大臣因太子不再有外戚作靠山，加上又私下揣摩武帝喜欢少子刘弗陵，所以争相陷害太子。

晚年的汉武帝与皇子们关系疏远，连皇后也很难见到皇帝。一次太子拜见皇后，很长时间才出来，黄门宦官苏文向武帝报告说太子与皇后宫的宫女嬉戏。武帝便把太子宫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太子后来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对苏文恨之入骨。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宦官常偷偷打探太子的过失，然后添枝加叶夸张地报告给武帝。皇后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让太子禀报武帝诛杀苏文等人。太子说："只要谨慎无过，何必怕苏文等人；皇上英明，不会相信邪佞之言，不用过于忧虑。"一次武帝身体偶有不适，让常融去召太子。常融谎报说："太子听说陛下有病面有喜色。"武帝默然不语。及太子来到，武帝仔细观察，发现太子有哭泣的泪痕，表面上却装出说笑的样子。武帝很奇怪，就故意心不在焉地询问，得知了实情，于是杀掉了常融。皇后平时做事也很谨慎，避嫌自防，虽然长时间不被宠爱，却还是能被武帝礼遇。

当时很多方士、神巫都聚集在京师，大都是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各种法术，无所不为。女巫们来往皇宫之中，教给宫女们逢凶

去难的巫蛊之术，各屋中都埋下木偶人祭祀。宫女之间因嫉妒而相互咒骂时，便常常告发对方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是大逆不道。武帝大怒，所杀后宫宫女及大臣有数百人之多。此后武帝自己心里也常疑心重重，一次武帝白天昏昏入睡，梦见有好几千个木头人持木杖要打自己，一吓便惊醒了，自觉得了大病，精神恍惚，头脑健忘，为此武帝非常苦恼。当时江充认为自己与太子和皇后卫氏家族有宿怨，又见武帝已年老，担心武帝死后自己会为太子所杀，便心生奸诈，说武帝的病根是巫蛊作祟，以借机陷害太子和皇后。武帝于是命江充负责清查、审理巫蛊之案。江充带着胡巫在长安城中到处掘地三尺，寻求木偶人，逮捕那些施行巫蛊术诅咒和夜里祭祀的人。他令胡巫在预先埋下木偶人的地方暗作标记，然后让胡巫再来当众视鬼，并就地掘出木偶人，接着便抓人刑讯，用烧红的铁钳灼烤被抓之人，强迫他们服罪。百姓们被迫转相诬告进行巫蛊，官吏们就上奏说他们大逆不道，从京师、三辅连及很多郡国，因巫蛊罪牵连被杀的前后有好几万人。

当时汉武帝年老多疑，常常无故怀疑周围的人用巫蛊术诅咒自己，被怀疑的人不管有无此事，不敢申诉冤枉。江充看准了这点，便进而提出要到皇宫中去清查巫蛊。他让胡巫檀何对武帝说："皇宫有蛊气，不除之，皇上的病还是好不了。"于是武帝便派江充进入宫禁之内，拆毁皇帝的御座，掘地求蛊；让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江充等人先从那些后宫中被武帝冷落的妃子处查起，然后依次查看皇后宫和太子宫。他们在地上横挖竖掘，一片狼藉，太子、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江充声称在太子宫中挖出的桐木人尤多，而且还有帛书，内容悖逆不道，应当奏报皇上。太子被逼，忧心恐惧，问太子少傅石德该怎么办。石德也担心自己身为太子的师傅会与太子一同被杀，因此对太子说："以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氏家族的人都因巫蛊获罪，如今胡巫和使者们从地下挖出了木偶人，不知是胡巫为了陷害而预先放置

的，还是原先真有，你自己已不可能向皇上解释清楚了。我看只有假传圣旨逮捕江充等人，彻底查清他们的奸诈。皇上卧病在甘泉宫，皇后和您派人去多次问候请安都不知道确切情况，皇上现在是死是活尚且难说，而奸臣又如此逼迫，您难道不记得秦始皇太子扶苏的事情吗！”太子刘据听后犹豫不决，不敢擅自举动，打算亲自向武帝赔罪解释。但江充对太子的逼迫特别急，太子又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便不得不采纳石德的主张。七月初九，太子派自己的门客装扮成皇帝的使者，逮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服从诏令，被当场杀死。太子亲自赶到现场斩杀江充，骂道：“贼奴！先前你败坏了赵王父子的关系还不够，现在又来败坏我们父子的关系！”太子又把那些胡巫们在上林苑中用火烧死。

太子派舍人无且持符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通过长御倚华奏明皇后，调出宫中车马运载弓箭手，发放武库中的兵器，又调发长乐宫的守卫军队。长安城人心骚动，传言太子已造反。苏文逃归甘泉宫，向武帝报告了太子的举动。武帝认为太子是一时恐惧，又忿恨江充等人，所以才有变乱之举，便派使者去召太子前来。使者不敢前往，回报说：“太子谋反已确定无疑，还要杀我，我是逃回来的。”武帝闻听大怒。丞相刘屈氂获知太子谋反，拔脚而逃，连丞相的印绶都没来得及带走，派丞相府的长史急速赶往甘泉宫向武帝告变。武帝问丞相在干什么，长史回答说：“丞相想封锁消息，尚未敢发兵。”武帝发怒说：“事情纷扰到如此地步，还说什么封锁消息！丞相难道没有周公的气魄，周公不是把管叔和蔡叔都杀掉了吗？”于是武帝赐给丞相加玺诏书，命令扑灭叛乱，凡捕杀反叛者，必有奖赏；以牛车为掩体，避开短兵相接，以免杀伤太多；坚闭城门，别让反叛者逃走。太子也召集百官宣令说：“皇帝在甘泉宫病重，可能有什么不测，奸臣们想乘机作乱，所以才有这样的非常举动。”武帝闻知，从甘泉宫移到城西建章宫坐阵，下诏调发三辅附近各县兵丁，由丞相统一调遣指挥，太子派使者假称圣旨赦免长安中都牢狱

中的囚徒充军，命石德、张光等人分别统领；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节前去调发长水和宣曲的胡人骑兵来长安会集。汉武帝也派侍郎马通去调胡人骑兵，正遇上如侯，马通告诉胡人如侯的符节是假的，不能听从。杀了如侯后，马通率领胡人骑兵进人长安。武帝又调水军士兵交与大鸿胪商丘成统领。

太子乘车来到北军军营南门外，发给护北军使者任安符节，令他调动军队出战。任安恭敬地接受符节后，返回军营，但闭门不出。太子无奈，率军而去，驱赶着几万市民来到西门城下，与丞相刘屈氂的军队相遇。双方大战开始，直打了五天五夜，死伤好几万人，鲜血流人路旁的沟中，民间都说太子是造反，所以众心不附太子，转而投向丞相的人越来越多。战至七月十七日，太子兵败，向南逃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率部把守城门，他认为太子与皇帝毕竟有父子之亲，不想逼迫太急，于是太子得以夺门出逃。刘屈氂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他说："司直是二千石级的官，应当上报请求后再处置，怎能擅自斩杀！"武帝闻知大怒，派人责问暴胜之："司直放跑反叛者，丞相杀他是奉法行事，你为什么要阻止？"暴胜之畏惧自杀。武帝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回皇后的玺绶。皇后自杀身亡，黄门苏文等人用小棺木装殓，草草埋在桐柏，皇后卫氏家族被灭绝。武帝认为任安是个奸滑老吏，见双方动武，骑墙坐观成败，然后再依从胜者一方，有二心，与田仁同被腰斩处死。凡出入过宫门的太子宾客，全部处死；追随太于出兵的，以谋反之罪灭族；被胁迫的军吏士兵，一律流放到敦煌郡。马通因杀如侯，封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随马通抓获石德，封为德侯；商丘成力战擒获张光，封为秺侯。因太子尚逃匿在外，开始在长安各城门驻扎军队防范。

太子逃出长安后，向东跑到湖县，藏匿在泉鸠里一户人家之中。主人家贫，常靠贩卖鞋子来供养太子一家。太子有熟人在湖县，听说他的家中富足，便派人去找他，结果被官府发现。八月初八，兵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难于再次逃脱，随即进入屋内，插上门，自缢

身亡。士卒山阳人张富昌急忙踹开门，新安令史李寿赶上前抱住太子，将其解下，但人已毙命。跟随太子逃亡的两个皇孙也同时遇害。

巫蛊之祸并未因太子刘据的自杀而结束，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内者令郭穰又上告丞相刘屈氂的夫人也从事巫蛊活动诅咒皇帝，并且刘屈氂还与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起祭神祈祷，打算立昌邑王刘髆为帝。调查验证后，定为大逆不道罪。六月，将刘屈氂游街示众，在东市腰斩处死，其妻小在华阳街枭首示众，并将李广利妻小也逮捕入狱。李广利当时正率军与匈奴作战，闻讯后，便投降了匈奴，所率的七万人马也全军覆灭。武帝闻知，又灭了李广利的宗族，巫蛊之祸的影响甚至远及汉朝边地。

开始武帝对太子反叛事件愤怒不已，连年不断地穷治巫蛊之案，诛杀尤多，群臣人人恐惧；后来经调查核实，才渐渐知道吏民间相互告发的巫蛊诅咒案件多不是真有其事，太子也是因惶恐无以自明才杀了江充，并无真的谋反之心。田千秋紧急上书，托梦言而为太子鸣冤。田千秋说他曾梦见一个白头老翁告诉他说："儿子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只不过当受杖笞之罚。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算得上什么罪？"武帝听后醒悟，召见田千秋说："父子之间的事情，外人是很难说什么的。只有你指明了其中的不当之处，这是高皇帝庙中的神灵托梦让你来告诉我，你应当成为我的辅佐。"当时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命人族灭江充的全家，将苏文在横桥上烧死，原在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尸体上的人，先被任命为北地太守，现在也被族灭全家。

经过巫蛊之祸，武帝的皇后、太子和太子的三子一女都同时遇害，武帝暮年遭此家庭惨祸，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他可怜太子无罪而死，专门修建了思子宫，又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天下人知道后也很悲伤，以至很多年后还有人诈称是卫太子（因为太子母亲姓卫，故称），蛊惑人心，以求富贵。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武帝死了六年以后，有一男子乘

小黄牛车到未央宫北门，自称是卫太子，公车将此事上奏。昭帝下诏令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一同去辨认真假，长安城中吏民围观者有好几万人。右将军率兵戒备皇城下，以防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前来辨认的，没有人敢断定这个卫太子是真还是假。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到后即命吏卒将此人抓起来。有人对他说："此人是真卫太子还是假卫太子尚难断定，应等等再说。"隽不疑说："各位为何这么担心卫太子！以前卫灵公的太子蒯聩违父之命逃亡在外，后回国，而新君辄拒而不纳，孔子著《春秋》对此事加以肯定。现在的卫太子得罪于先皇武帝，即便逃亡不死，今来自投，也是罪人！"遂将此人押入牢狱，汉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对隽不疑的做法非常赞赏。后经过审问，果然是他人奸诈冒称卫太子。这人本名叫成方遂，夏阳人，后移居湖县，以卜筮为业。有个卫太子原先的舍人曾找成方遂问卜，对他说，你的相貌和卫太子差不多。成方遂听后遂冒称自己是卫太子，想借此能求得富贵，不想最后却丢了性命。

巫蛊之祸，不仅是汉武帝的一场家庭惨祸，也是封建国家的一场内乱，短短时间内，上至皇后、太子、公主及公卿百官，下至兵吏百姓无辜牵连被杀达十数万，当时政治黑暗、统治之腐败前所少有。作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其迷信愚昧猜疑残忍的一面，不但给自己的家庭，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场悲剧。

（阎爱民）

参考资料：

《汉书》：《戾太子刘据传》、《公孙贺刘屈氂传》、《江充传》

《通鉴纪事本末》：《巫蛊之祸》

赵过推行代田法

西汉建立后，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极为残破。汉初到文景时期，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和休养生息政策，屡次下诏督促各级官吏以发展农业为当务之要，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前后，社会安定，国家没有大的征战之事。除非遇上水旱灾荒，一般年景百姓还能够生活得家给人足，生产的东西多了，官府通过税收和卖爵赎罪等途径蓄积了巨额的财富，城乡仓廪尽满，国家府库充足。京师长安国库的铜钱达到数百万之多，穿铜钱的绳子都朽烂了，散落堆积，都无法再计算。太仓的粟米陈陈相因，一存就是许多年，多余的只能露天堆放，很多粮食都腐烂不能再吃了。西汉建立时，马匹很少，连皇家都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而这时却不像以前了，街巷田野到处可见成群的马匹，骑母马的都要受到人们的嘲笑，不许参加各种聚会。社会财富大大地增多了。武帝即位后，借着社会富庶国力强盛的时机，开疆辟土，南征北伐，平两越，击朝鲜，通西南夷，展开对匈奴的连年战争，大小战役多得数不可数，军费开支多得无法计算。武帝又喜欢大兴土木，寻求神仙不死之药，宫廷开支浩繁，文景时期所积蓄的财富，几乎被消耗殆尽，百姓的赋役负担空前加重，失去土地的流民到处都是，生产凋敝，社会穷困，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严重局面，农民起义不断发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汉武帝清醒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对以往所作所为后悔不已。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对群臣表示：“自今以后，凡有伤害百姓之事，糜费天下财力之举，一概撤

除!”后来,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等上奏,请求征发戍卒和百姓到边远的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去屯田,构筑亭障,逐步扩建成控制西域的据点。武帝认为轮台屯田将耗费巨额资金,扰害百姓,废而不用,宣称以后不愿再听到这类建议。他下诏强调说:“当务之急,在于去除苛暴之政,禁止擅征赋役,全力发展立国之本的农业。恢复养马者免徭役的法令,以补充马匹的缺乏,保持基本的武力防备力量就行了。”于是不再兴师动众,集中精力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武帝首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自己已将施政的方针转移到休养生息使民众富足这方面来;不久,又任命精通农业的赵过为搜粟都尉,主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称为“代田”的新耕作方法。

代田法是赵过在关中地区农民精耕细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种连年稳产高产的生产技术。所谓“代田”,就是“一亩三圳”的耕作方法:把田地翻耕整平后,开挖出圳和垄,即分出田间的沟和埂,一亩地中区分成六等分,以三分为圳,三分为垄,圳垄相间,故称为“三圳”。圳宽一尺,深一尺,垄也是宽一尺。播种时,将种子撒在圳中,这样,幼苗长在沟里,既能减少对叶面的风吹日照,又能减少沟中土壤的水分损失,增强了禾苗的抗风耐旱能力,促进了农作物的茁壮生长。以后再结合中耕除草,逐步将垄土锄下培壅苗根,等到作物长成的盛夏之际,垄土全部培于苗根,作物根深秆壮,就能经受风旱的侵袭,获得高产。这种方法耕作的土地比不开圳垄的“漫田”每亩可增产一斛左右,经营好的可以达到二斛。第二年再播种时,则在原来的垄处开圳,圳处留垄,相互位置调换一下,照样种植。这样圳垄每年交替更代,轮番使用地力,可以不必休闲而起到休耕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谓“代田”的含义。这种方法使庄稼获得稳产高产,又能保证地力的恢复,充分利用土地。

赵过在推广代田法过程中,注意采用科学的方式,不是盲目地一哄而起。他首先在皇家离宫旁的空地上进行代田实验,每亩收获

的谷物比别的田地多出一斛以上，证明这种耕作方法确实能够增产，然后他再集中各地的令长和三老、力田等乡官以及乡民中的种田能手在一起，学习新的耕作方法。等到他们先学会弄懂后，再回到各地向广大农民普及。

为了配合这套新的耕作方法，赵过还改进了许多农具，并由大农拨派能工巧匠专门制作。当时不少地区耕牛十分缺乏，汉武帝连年征战，除去征用大量马匹外，许多耕牛也被征为军用，如贰师将军李广利二次征大宛时，便带去十万头牛。耕牛的缺乏，使很多农民不能赶在雨后有利时机及时整地。有位退职的县令建议赵过组织人力拉犁，赵过接受了他的建议，奏请武帝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手，教给农民相互换工以人力拉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大致人多的一天可耕三十亩，人少的也能耕十三亩，很多田地被及时开垦出来。为了提高耕牛的犁田效率，赵过还推广了新的牛耕方法——二牛三人的耦耕方法。二牛各挽一犁，二人在后执犁，一人在前导牛，两犁并排并耕而进。当时二牛三人之力，可耕种五顷土地，平均每人可耕一百六十亩以上，大大超过了以前一家耕种百亩的水准。另外，赵过还发明了三犁共一牛的耧播新技术。这种方法，只需一牛挽犁，一个执犁，三犁并进，一牛一人可以耕种田地百亩。这种三犁共一牛的犁具也叫耧车，挽耧、下种深浅一致，出苗整齐，行距均匀，便于通风，接受阳光比较充足，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当然，这种有效的耕作技术也是因为耕牛的缺乏而逼出来的。在少牛的情况下，人耕与牛耕的并行，使得代田法的推行更为广泛。代田法在河东、弘农、三辅等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一直推广到边城居延。它节省劳力增产粮谷，深受民众欢迎。

代田法是在大田面积上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求得增产，而在后来成帝时出现的“区田法”则是要求在小面积上精耕细作少种多收，走上了园艺化的道路。二者全面反映了西汉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

区田法是农学家氾胜之总结关中农民丰产经验而提出的耕作方法。它把耕地分为上农区、中农区和下农区三部分，上农区掘土方深各六寸为一区，每区相间九寸，一亩地可掘三千七百个区。耕种时，首先深翻土地，施足底肥，调和土壤，增强其蓄水保肥能力，使作物根系得以充分发育；其次选择良种实行浸种点播密植，不同的作物安排不同的密植程度，下种深浅、盖土厚薄也各自不一，以确保通风透光和顺利出芽；最后是加强中耕灌溉，随时松土锄草，保持适当的湿度，进行合理的浇灌。这种园田化的耕作技术可以不择地段，不拘作物，通过深耕、足肥、勤灌和精心管理就可以在较小面积上获得高产。据说一户小农家庭男女两个劳动力，只需耕种十亩土地，便足够全家多年的消费了。但这种耕作方法也有它的不足，就是花费工力太大，无法多种地，不能大力推广。所以，在西汉时期，代田法要比区田法影响要大得多。

汉武帝晚年改变穷兵黩武政策，恢复休养生息，为农业生产的复苏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赵过的推广代田法，社会生产技术进步了，农民们便能克服自然条件给生产造成的困难和限制，不但中原一带的荒地渐次开垦，就是西北一带边远的不毛之地也被开垦出来。到了昭帝的时候，失去田地的流民又逐渐回到土地上，耕地增加了，社会财富也增多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得到了缓和，为宣帝时出现的中兴局面打下了物质基础。

（阎爱民）

参考资料：

《汉书》：《食货志》

《齐民要术》：《种谷》

汉武帝下罪己诏

汉武帝在位期间，开疆辟土，南征北战，使得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但由于长年的用兵，军费开支之大和人民负担之重也是自汉朝立国以来所未有的。武帝即位不久，派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打击两越，江淮地区百姓为此劳役繁重；后又派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巴蜀之民疲惫不堪。彭吴奉命开通涉貊、朝鲜道，设置沧海郡，燕齐之间人们怨声载道。及马邑之谋后，汉军与匈奴开战，战事连年不断，各地都要共同为此负担庞大的兵徭费用，数额之大，前所罕见。如元朔年间，卫青率兵出击匈奴，夺取河南之地，武帝征发十万民众修筑朔方城，所需漕粮转运遥远，连山东地区都受其劳，费用达数十万至百巨万，国库都因此空虚。以后四年，卫青率十万之众连年打击匈奴，光对有功将士的赏赐就达二十多万斤黄金，另外汉军士兵马匹死亡十余万，兵甲漕粮转运也需巨额费用。后来霍去病出兵匈奴大获全胜，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之众归降，汉军调三万乘战车迎接，赏赐浑邪王部众及汉军有功将士，当年费用又为百余万。武帝前后用兵四十多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军费开支多不可计。除了战争的费用外，武帝还喜欢巡游，大兴土木，迷信鬼神，寻求神仙和不死之药，多次封禅泰山，宫廷的开支也异常庞大。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武帝至朔方阅兵，耀军威于匈奴，巡行一万八千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就达百万匹，钱金以万计。为使方士栾大入海求得仙方，武帝嫁公主与栾大，仅陪嫁就送了十万斤黄金。各方面的开支耗尽了文景以来积蓄的财富，空

前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武帝时期天灾人祸不断。农民因水旱蝗等灾而致死流亡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元光年间，黄河两次决口，水患遍及十数郡。元鼎年间，山东连年歉收，又遭水雹等灾，饿死者数千人，逃亡的越来越多。元封年中，仅关东地区受灾流民就达二百万。流民的大批存在，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加上地方官吏横行暴虐，各地农民不断地起义和反抗，铤而走险。到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武装起义遍及东方各郡，大群的有数千人，他们攻下城池，夺取武库兵器，放出监狱死囚，斩杀、羞辱地方官吏；小股的以数百计，攻掠乡里，拦截道路。武帝曾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中央官员到郡县督察镇压，农民起义依然蓬勃发展。武帝又改派光禄大夫范昆、原任九卿的张德及暴胜之、王贺、江充等为直指使者，他们身穿绣衣，手持斧钺，握生杀大权，有权处置那些镇压起义军不力的地方官员，对起义者更是大肆屠戮，有时一郡被杀的就达一万多人，连给起义者提供过饮食的农民也决不放过，牵连被杀的又有数千人。官吏们以多杀为能事，杀人少的还要受到处分。济南人王贺为直指使者，捕杀魏郡的起义者，多所宽免，被以奉使不称职而罢官。王贺自慰道："我听说有存活千人性命之德，其子孙将来会有封爵，我所活者有万余人，后世子孙该兴盛发达了吧！"屠杀政策并不能消弥农民的反抗，起义者又化整为零，分散到山林川泽中活动。为了督促官吏对起义者的镇压，武帝后来颁布了严厉的"沉命法"，规定凡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农民和发现后捕杀不能达到规定指标者，地方各级主管官吏都得处死。然而这样一来，地方小吏害怕被杀，发现农民起义也不敢上报，郡守、国相担心自己受牵连也不愿他们上报，所以上下蒙混，逃避责任。农民起义越来越多，汉王朝社会危机四伏。正如无终人徐乐早就向武帝提出的警告那样，天下正面临着如陈胜举众造反的"土崩"之势。

武帝晚年多病，总是疑神疑鬼，怀疑吏民和自己周围的人用巫

蛊魔法诅咒自己，派江充负责清查，终于发生了一场统治王朝空前的内乱——巫蛊之祸，包括皇后、太子及公卿在内的数万人被杀。事后武帝自己也追悔不及，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挫伤。

武帝晚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断的个人挫折，促使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终于有所醒悟。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三月，武帝对大臣们说："朕自即位以来，办了许多昏悖之事，使天下民众忧愁穷苦，后悔不及。自今凡有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物的事情，一律撤除！"不久，武帝便接受田千秋的建议，遣散了候神求仙的方士，表示不再受方士们的欺骗了。后来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上奏说："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以东有可以灌溉的农田五千顷以上，可派遣屯田士兵前往，广种五谷，设置三校尉分别监管，由张掖、酒泉分别派遣骑假司马开路侦察。在百姓中招募身体健壮果敢之人前往屯田处，广开农田，设置亭障，连城往西，以此威慑西域各国，辅助乌孙。"武帝为此上奏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过去的征伐深表悔恨。他说："先前有关部门上奏要求增加人头税每口三十钱，以增加边防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的负担；现在又请求派士卒屯田轮台。轮台远在车师国以西一千多里。先前开陵侯率兵攻打车师时，虽然胜利了，但由于路途遥远缺乏粮食，死在道上的士兵就有几千人，何况轮台更在车师以西！早先朕不明智，因有人上书说：'匈奴将马匹前后腿捆起来丢在城下，扬言：汉人，我舍给你们马。'另外，汉朝使者被匈奴长期扣留不放，所以就派贰师将军出兵，打算加强汉使自身的地位和威信。古时候，君王与卿、大夫们商议仍不能决定的事，就靠占卜决定，卜兆不吉就不去做。先前，朕将那封有匈奴缚马腿以辱汉人的奏书让丞相、御史、二千石官员、各位大夫、郎、文学以及各郡国都尉等普遍传阅，他们大都认为：'匈奴自缚马腿，很不吉祥！'也有人认为：'匈奴想以此显示其强大，实际上越是不富足的人才越爱向别人显富。'方士、太史、星象家、望气者以及太卜、占卦者们也都认为：'大吉，匈奴必破，时不

再来。'又说：'遣将北伐匈奴，必在鬴山克敌。卜卦所示，诸将之中，派贰师将军最吉。'所以朕才亲自派遣贰师将军向鬴山进发，诏命他不要深入。如今看来，计谋、卦兆全都与事实相悖。重合侯捕获匈奴的探子，探子却说：'捆马腿是匈奴对汉军的一种诅咒。'匈奴常说：'汉朝极大，但汉人不耐饥渴，为捕捉一只逃跑的狼，往往走失千只羊。'往日贰师将军战败，将士们被俘死伤逃散，朕心中常为此悲痛。现在又请求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和修筑亭障通道，这是在骚扰劳苦天下，不是让百姓富裕的办法，朕不愿再听到这类的建议！大鸿胪等人又建议招募囚徒，护送匈奴使者返回匈奴，他们只要能刺杀单于为汉报仇，就可以获得封侯之赏。这种事情连春秋五霸都耻而不为，更何况我们大汉呢！而且匈奴对投降的汉人总是仔细搜身，查问所了解的情报，哪有行刺的可能！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除禁苛暴之举，废止滥征杂税，着力发展立国之本农业，恢复养马者免除徭赋的法令，以补充马匹的缺乏，确保基本的武备能力就行了。各郡国二千石官员各上一份繁养马匹解决边地守备办法的报告，与年终考核报告一同交上。"

于是武帝不再出兵，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将施政方针转移到休养生息使民众富足方面来；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主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了被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方法以及许多方便灵巧的新农具，既省工力又能增产粮食，受到农民们普遍欢迎。

武帝的罪己诏和改正错误的措施，使得残破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开始得到缓和。两年后武帝死去，他所顾托辅佐昭帝的霍光等人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方针，度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开始了"昭宣中兴"的局面。作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功业卓著，又多年独断专行，能在垂暮之年主动检讨自己，改正前非，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方针，返回到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上去，实属难能可贵。司马光认为：汉武帝穷奢极欲，

滥刑重敛，在内广建宫殿，对外征伐四夷，迷信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穷苦，群起造反，其所作所为在很多方面与秦始皇都相差无几，然而秦朝亡了国，汉朝仍能长久，其原因之一就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所以汉武帝虽有秦始皇之亡国暴政，却无秦始皇的亡国之祸。

（阎爱民）

参考资料：

《汉书》:《食货志》

《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卷二十二

苦心立嗣

皇位继承人问题，不只是皇帝的家庭事务，也是封建王朝关系重大的“国本”问题，多少叱咤风云的英君雄主，常被此搞得焦头烂额，费尽心机。

汉武帝被立为太子，其姑姑馆陶公主出过很大力气，武帝便娶了馆陶公主之女陈氏为妃。武帝即位后，陈氏被立为皇后。皇后后宫专宠，但婚后十多年未能生育，为此花费多达九千万钱问医求子，仍未有结果。因为无子，武帝对她的宠爱逐渐减弱。一次，武帝路过其姐平阳公主家，喜欢上了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卫子夫，公主将卫子夫送入宫中，恩宠无比。陈皇后对此非常恼怒，好几次险些把卫子夫整死，这使得武帝对她更为不满。不久，女巫楚服等人教陈皇后埋木偶人诅咒、并想以巫术骗取武帝欢心的事件败露，武帝穷治其狱，杀掉了相关连的三百多人，楚服被砍头示众，陈皇后被废，贬居在长门宫。

卫子夫在宫中，先后生了三个女孩，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又生了个男孩，取名为据，武帝二十九岁才有了儿子，非常高兴，这年三月，便立卫子夫为皇后。七年后，刘据又被立为太子。太子长大后，性情仁慈谨慎，武帝认为他缺乏才能，不太高兴。太子之母卫皇后年长色衰，不太被武帝所宠爱了。武帝其他宠妃也陆续有了男孩，王夫人生了刘闳，李姬生了刘旦和刘胥，李夫人生了刘髆。太始三年（公元前 94 年），小皇子刘弗陵出生，弗陵之母是河间人赵婕妤，住在钩弋宫，怀孕十四月才生了弗陵，弗陵号称钩弋子。这

时武帝已经六十多岁了，很喜欢这个刚出生的小儿子，对别人说：“我听说过去尧也是怀胎十四个月后才降生的，想不到今天钩弋子也是这样。”于是将其母居住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

以前，卫皇后和太子因宠爱日衰，内心常有不安之意。武帝发觉后对太子的舅舅大将军卫青说：“太子敦厚沉稳，一定能使天下安定，不使我担忧。想找守成的君主，没有比太子再合适的。听说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不知是否真的，你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这样，武帝与皇后、太子间仍相安共处。太子常劝武帝不要总是到处征伐，武帝笑着说：“我担当这些劳苦，把安逸留给你，这不很好吗？”武帝每次出巡，总把政事托付给太子，把宫内之事托付给皇后，对他们母子非常信任。汉武帝多重用用法严酷的官吏，这些人对宽厚仁慈的太子常常不满，因此在大臣中对太子称赞的少而诋毁的多。大将军卫青死后，不少人认为太子已不再有强有力的外戚作靠山，又私下揣摩武帝偏爱少子，所以争相陷害太子。加之武帝晚年多病，内心总是疑神疑鬼，对周围的亲人也常猜疑，终于导致了江充构陷太子和皇后的巫蛊之祸的发生。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被迫假传圣旨，捕杀了江充等人，发兵攻占长安要害部门，与丞相刘屈氂的军队大战数天，后太子兵败逃走，卫皇后自杀。不久，太子在京兆湖县被围捕时也自杀身亡。后来武帝逐渐发现官民在巫蛊案中相互揭发的情况，多不是真有其事，纯属江充等人制造的冤案，太子仅仅是因惧怕不能辨明自己的冤情才起兵杀了江充，并无谋反之意，武帝开始有些后悔。恰在此时，高寝郎田千秋紧急上书为太子鸣冤，他说：“做儿子的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只不过应受笞杖之罚。天子的儿子过错杀了人还算得了什么大罪过！我曾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白头老翁让我这样说。”武帝接到上书后醒悟过来，召见田千秋，对他说：“父子之间的事情，别人很难说什么，只有你指明了其中的不对之处，这是高皇帝庙中的神灵让你告诉我，你应当做我的辅

佐。"马上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又传令屠灭江充全家,并将以前陷害过太子的宦官苏文烧死在横桥上。至于在湖县泉鸠里围捕太子时用兵器伤害太子尸体的那个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此时也被诛灭了全家。武帝怜悯太子无辜而死,精神恍惚,怀念不已,于是建造思子宫,又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寄托自己的哀思。

武帝诛灭了江充等人全家,为太子申了冤,却又引来了马何罗行刺武帝未遂事件。马何罗为侍中仆射,在宫中担任侍卫,他与江充关系很好。太子刘据起兵时,马何罗的弟弟马通奋力死战,立功受封为重合侯。后武帝诛灭江充的宗族、党羽,马何罗兄弟惧怕受到牵连,因此谋划刺杀武帝。当时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观察到他们的行动有些反常,内心开始有所怀疑,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与他们一同进出大殿,以防出现变故。马何罗兄弟也发现了金日磾在注意自己,很长时间未敢动手。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夏六月,武帝到林光宫居住。这一天,金日磾身体偶有不适,留在宫中官员值班住处歇息。马何罗、马通和小弟马安成假称奉旨深夜出宫,一块杀掉了皇帝使者,调发军队。转天清早,武帝在宫中尚未起床,金日磾正要上厕所,见马何罗从宫外急匆匆进来,内心一动,马上来到武帝休息的大殿内,在内门坐下。一会儿,马何罗袖藏匕首从东厢房走来,见金日磾在此,脸色骤变,快步奔向武帝的卧室,打算闯进去。由于慌张,撞在殿内的宝瑟上,摔倒在地。金日磾趁势上前抱住了马何罗,高呼:"马何罗谋反!"武帝从床上惊起,左右侍卫起来,拔刀上前打算杀死马何罗。武帝担心伤了金日磾,止住了侍卫。这时金日磾也已奋力将马何罗摔在殿下,侍卫们冲上去将马何罗擒获,穷治其狱,连同党羽都被处死。

巫蛊之祸后,皇位继承人的选立成了问题。太子死时,其三子一女也同时遇害,只有一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孙子刘病已,武帝虽然哀怜太子,对这个皇曾孙却并不怎么关心。武帝除了太子刘据以外,还有五个儿子,但作为皇位继承人来说,武帝对他们都不大满

意。王夫人所生齐怀王刘闳，不幸早死于太子之前，身后又无子嗣，也就无从考虑。李夫人所生昌邑哀王刘髆，巫蛊之祸后，刘髆的舅舅贰师将军李广利曾与丞相刘屈氂谋划推立刘髆为帝，被人告发，并且还指控他们从事巫蛊诅咒皇帝，受到武帝的严厉制裁，刘髆不久也病死了。李姬生燕刺王刘旦和广陵厉王刘胥。燕王刘旦博学经书杂说，聪明善辩，喜欢天文星占术，又好声色射猎等事，招揽各地游士。及太子刘据败亡后，刘旦自认为论排行该为太子，因而上书请求入京宿卫，武帝恼怒，将其使者斩于北门。后刘旦又因藏匿逃犯，被削去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因此而厌恶刘旦。刘旦的弟弟广陵王刘胥有勇力，力能举鼎，敢空手与猛兽搏击，但和他哥哥一样，行为不守法度，过失很多，所以武帝都不立他们俩为太子。当时，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的儿子刘弗陵年仅几岁，身长体壮，很有智慧，武帝常说："这孩子像我。"又觉得他的降生与其他的儿子不一样，内心尤为喜爱，打算立他为太子，可忧虑他岁龄太小，他年轻的母亲会以太后的身分专权乱国，所以武帝很长时间对立太子之事犹豫不决，武帝直到死前不久，才决定让大臣来辅佐少子弗陵为嗣，并除掉其母钩弋夫人。武帝考察群臣，认为只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靠，能担当此任，于是让人画了一张周公抱着周成王受诸侯朝拜的图画送给霍光。没过几天，武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除去头饰叩头赔罪。武帝命人将她带下去，送到掖庭监狱治罪。钩弋夫人回头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武帝，武帝对她说："快走，你不能够活着！"终于被赐死。不久，武帝闲坐时问左右侍从外面对钩弋夫人之死有什么议论，左右回答："人们说：既然要立她的儿子为嗣，为何还要杀掉他的母亲？"武帝说："对啊，这样的事不是像你们这样愚笨的人能懂得的。古往今来，国家所以出现乱子，都是由于君主年龄小而其母后尚在轻壮之年，女主专权骄横，纵恣淫乱，没有人能够约束她。你们没听说过吕后的事情吗？所以我不得不先除掉其母。"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武帝在盩厔五柞宫病重,霍光哭着问道:“皇上如有不测,谁可以继承帝位?”武帝说:“你还不明白前些天送给你的那幅画的含义吗?立少子为帝,由你效法周公来辅政!”霍光叩头谦让说:“我不如金日磾!”金日磾则说:“我是匈奴人,不如霍光,而且这样做也会让匈奴轻视汉朝。”二月十二日,武帝才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当时年仅八岁。转天,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三人受遗诏辅佐小皇帝;同时又任命了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霍光出入宫禁二十多年,出宫奉陪武帝乘车,进宫在武帝周围侍奉,小心谨慎,未曾有过过失。其为人沉静审慎,每次出入殿门,止步总是在固定的地方,郎、仆射暗中做记号,然后观察,竟然不差尺寸。金日磾在武帝周围目不斜视,几十年如一日,给他宫女,他不敢亲近;武帝打算将她女儿纳入后宫,他不肯,如此忠诚谨慎,特别使武帝感到奇异。金日磾的长子是武帝的弄儿,武帝很是喜欢。后来长大了,行为不谨慎,在殿下与宫女们嬉戏,正巧被金日磾看见,金日磾很厌恶儿子的轻浮,竟把他杀了。武帝知道后非常生气,金日磾叩头赔罪,把杀死儿子的原因讲明。武帝很悲哀,流下了眼泪,内心十分敬佩金日磾。上官桀开始受到武帝的信任是因他有力气,武帝一次出巡,遇上大风,御车难行,便将车上的盖伞卸下交给了上官桀,风虽然特别大,可上官桀总是拿着车盖伞紧随车后;后来又下起了大雨,上官桀又赶上前举着盖伞为武帝遮雨,因而武帝对他的勇力非常惊奇。上官桀后来任未央宫的马厩令。武帝曾卧病在床,好了后,去马厩看马,见很多马都瘦了,非常恼怒,对上官桀说:“你以为我会再也不能见到马了吗?”打算将他交给吏卒治罪。上官桀叩头道:“我得知圣体不安,日夜忧虑,心思实在是不在马上。”话还没说完,眼泪就流下来了。武帝认为他是爱自己的,因此更加亲近,任命为侍中,逐渐又升为太仆。这三个人都是武帝平时所喜欢信任的大臣,所以特托以后事。二月十四日,武帝死于五柞宫,享年七十

一岁。转天，太子刘弗陵即皇帝位，他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阎爱民）

参考资料：

《汉书》:《武五子传》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燕盖谋逆

"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这首凄凉的哀歌是燕王刘旦所作。刘旦与盖长公主图谋夺取帝位，事情败露，王国被废，身将受死，他自杀前作歌哀叹燕国的命运。

燕王刘旦为汉武帝妃妾李姬所生。巫蛊之祸后，太子刘据及其三子一女被杀，太子之位空虚，齐怀王刘闳又早死，刘旦自认为论排行顺序当被立为太子，于是上书请求入宫担任宿卫。武帝大怒，将其使者杀死在北门。后又因藏匿逃犯，被削夺三县。武帝后来立了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盖长公主是武帝的女儿，也是刘旦、刘弗陵的姐姐。

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87 年）二月，武帝病情加重，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任命霍光等人辅佐少主。十四日，武帝死于五柞宫。转日，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昭帝，当时只有八岁，由盖长公主在宫中负责供养，掌握实权的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武帝刚死，昭帝就赐给诸侯王们加玺的报丧书信。燕王刘旦得到丧信后不肯哀哭，说："书信的封泥小于诏书的规格，京师恐怕有什么变故。"派亲信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人到长安，以询问守丧礼仪为名暗中打探朝廷内部事情。王孺见到执金吾郭广意，向他问武帝死亡的病因，新立皇帝是哪位妃子的儿子，今年几岁，郭广意述说大家当时在等待来自五柞宫诏书之际，宫中喧嚷皇帝驾崩，各位将军共同立太子为皇帝，年八九岁，埋葬武帝时，小皇帝没有临

丧。王孺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刘旦，刘旦说："武帝弃群臣而去，死前没留下什么话。现在盖长公主又见不着，这种现象非常奇怪。"又派中大夫至京城，请求为武帝在各郡国立庙供奉。当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褒扬赏赐刘旦三十万钱，增加封邑一万三千户，但立庙之事未准。刘旦忿忿地说："本当我是皇帝，用不着别人来赏赐！"开始与宗室成员中山哀王的儿子刘长、齐孝王的孙子刘泽等人串通，诈言武帝生前曾给过他诏书，自己可以管理民事、整顿军队。郎中成轸对刘旦说："大王失去了帝位，只能奋起力争，不可坐而等待。只要大王起兵，燕国之中就是妇孺也会奋臂追随大王。"刘旦说："以前吕太后时，立假称为惠帝儿子的刘弘为皇帝，诸侯拱手侍奉他八年。吕太后死，大臣诛杀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人这才知道刘弘不是惠帝的儿子。我是武帝的长子，反而不得立，上书请求为武帝在郡国立庙，又不听，恐怕所立的小皇帝不是刘氏的后代。"刘旦即与刘泽等谋划，搞了一份欺诈的书信，声称："小皇帝不是武帝的儿子，是大臣们共同拥立的，天下之人应同起讨伐。"派人送往各郡国以动摇民心。刘泽计划回临淄，与燕王同时起兵，杀掉青州刺史隽不疑。刘旦则招徕各地强人，征敛铜铁制造兵器；又多次检阅他的兵马，征发百姓大规模狩猎，以此演习军队，待机会合适时起兵。

郎中官韩义等人多次规劝刘旦，刘旦不听，反而杀死劝阻的韩义等十五人。碰巧瓶侯刘成得知了刘泽的阴谋，将此事告诉了青州刺史隽不疑。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6年)八月，隽不疑将刘泽逮捕，并上奏朝廷。朝廷派大鸿胪丞审理此案，供状牵连燕王刘旦。昭帝下诏，因燕王与皇帝为至亲，不再追究，但将刘泽等人全部处死。

最初，霍光与上官桀关系很密切。霍光每次出宫休假，总是由上官桀代替霍光入宫处理朝廷事务。霍光的大女儿嫁与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为妻，生了个女儿，刚五岁，和昭帝的年龄正相般配，上官安打算通过霍光把女儿嫁给昭帝。霍光觉得他们太小，没有答应。于是上官安便转求昭帝的大姐盖长公主促成此事。他先找到

了盖长公主儿子的门客丁外人，盖长公主与丁外人私通，上官安和丁外人关系又不错，上官安鼓动丁外人说："我的女儿容貌端正，如果能借长公主之力人宫为皇后，以我们父子在朝为官，再加上有皇后这层关系，什么事办不成功！此事成否就在足下了。汉家的惯例，常以公主嫁给列侯，到时足下还怕不能封侯吗？"丁外人听后非常高兴，就将此事告诉了盖长公主。盖长公主认为有道理，便以昭帝的名义下诏召上官安的女儿人宫为婕妤，任命上官安为骑都尉。始元四年(公元前 83 年)三月，立上官氏为皇后。这一年上官安又升任车骑将军。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六月，昭帝封上官安为桑乐侯。上官安非常得意，也越来越骄横。一次昭帝在大殿中赏赐上官安，并设酒招待，上官安回来后对宾客们说："刚和我的女婿喝酒，真痛快！"早将君臣之礼置于脑后。

上官桀父子权位日隆，非常感激盖长公主，便为盖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请求封侯，霍光不允许；又为丁外人求光禄大夫之职，借机让丁外人能被昭帝召见，霍光又不允许。盖长公主因此怨恨霍光，而上官父子也因多次为丁外人求官爵遭到拒绝而感到惭愧。另外，上官桀的岳父所宠爱的太医监充国擅自闯人大殿，被下狱论死，盖长公主用二十匹马为充国赎罪，才得以减免死刑。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深深怨恨霍光而感激盖长公主。早在武帝时上官桀已为九卿，地位在霍光之上，后来父子二人同为将军；皇后又是上官安的女儿，霍光不过是皇后的外祖父，却独断朝政，因而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御史大夫桑弘羊因创立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为国家获得了大量财富，自矜其功，要为自己的子弟求得官职，不能如意，也怨恨霍光。燕王刘旦自认为是昭帝兄长而没能立为皇帝，常常心怀怨恨，所以盖长公主、桑弘羊和上官桀、上官安父子都与刘旦通谋，打算借此除掉霍光。

刘旦这时趁机加紧活动，他前后派孙纵之等十几批人携带财宝良马，贿赂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上官桀等又让人假冒

燕王的名义上书说："霍光离开长安校阅诸郎及羽林军，路上擅自清道禁止路人通行，又派太官先行准备膳食，僭用天子之礼。"又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二十年不降，回来后才任命为典属国，而大将军的长史杨敞没什么功劳，却被任命为搜粟都尉，大将军又擅自增选自己府中的校尉，专权纵恣，可能会有异常举动。我愿归还燕王符玺，入宫保卫陛下，注视奸臣动静。"上官桀趁霍光出宫休假的机会上奏昭帝，打算利用自己在宫中临时决事的机会，将此事向群臣公布；桑弘羊则负责与大臣们一同议定将霍光罢免。上书奏报后，昭帝不肯发下查办。第二天，霍光听说后，上朝时停在画室不敢入殿晋见。昭帝询问："大将军为何不在？"上官桀答说："因燕王告发他的罪状，所以不敢前来。"昭帝传诏召见大将军，霍光到后叩头请罪，昭帝说："将军请戴好冠吧，朕知道那个上书是假冒的，将军没有什么罪。"霍光问道："陛下何以知道上书是假的呢？"昭帝回答说："将军去广明校阅诸郎军队，是近期的事；自选调校尉至今不到十日，燕王怎么会知道？而且将军想要谋反，也不需用什么校尉。"这时昭帝只有十四岁，周围的人都为他的准确判断所震惊。上书的人果然已心虚逃走，朝廷搜捕很急。上官桀等人非常害怕，对昭帝说："这件小事不值得去穷究。"昭帝不听。以后上官桀的党羽再谗毁霍光，昭帝就怒斥说："大将军是忠臣，是先帝嘱托辅佐我的人，敢有谗毁者要被治罪！"此后上官桀等人不敢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了，只是在暗中加紧准备。他们计划让盖长公主设酒宴邀请霍光，霍光来后用伏兵杀掉，然后再废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为新帝。燕王刘旦与上官桀等人书信来往频繁，刘旦许诺事成之后封上官桀为王。他又联络各郡国的豪杰上千人，准备起兵。刘旦将此事告诉了国相，国相对他说："大王以前与刘泽合谋，事未成功就被发觉了，其原因是刘泽平日喜欢自我夸耀和欺凌别人。我听说左将军上官桀一向轻率，车骑将军上官安又年少骄纵，恐怕他们会和刘泽一样不能成功，又怕他们在事成之后反而会谋害大王。"刘旦不以为

然，他说："前些日子一男子来到皇宫门前，自称是原来的皇太子，长安城中百姓都去观看，喧哗骚动多时不能制止。大将军霍光害怕，出动军队列阵以待，以防意外。我是先帝的长子，天下人都知晓，难道还怕有什么人反对？"不久，刘旦对群臣说："盖长公主已报信说，朝中所担心的只有大将军和右将军，现在右将军已去世，丞相又有病，大事必能成功，不久就会证明了。"令群臣整饬行装，准备进长安坐龙床。

这时上官安另有自己的打算，想把刘旦骗到长安后也杀掉，废昭帝而立上官桀为皇帝。有人问："那上官皇后怎么办？"上官安说："追逐麋鹿的猎狗，难道还顾及着小兔？而且依靠皇后的关系得到尊贵的，一旦皇帝意有所移，宠幸别的妃嫔，那皇后的娘家亲属就是再想做平民百姓也都不可能了。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不久盖长公主一个舍人的父亲燕仓知道了刘旦、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告诉了大司农杨敞。杨敞一向谨慎怕事，没敢声张，推说有病没有上朝，将此事告诉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将情况上报。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 80 年）九月，霍光命搜捕燕王下属孙纵之及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捕后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同诛杀。盖长公主闻讯后自杀身亡。燕王刘旦知道了消息，非常害怕，对国相说："事情败露了，马上起兵吧？"国相说："左将军上官桀已死，百姓们都已知道了，不能再起兵了。"燕王刘旦忧愁烦闷，寝食不宁，估计很难会得到朝廷的赦免，最后在万载宫摆设酒宴，与宾客、群臣、妃嫔诀别。席间，燕王起身唱起了自己所作的"归空城兮"的哀歌。唱罢，燕王的华容夫人起舞，也唱道："发纷纷兮寘渠，骨藉藉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歌舞凄凉哀惋，在坐的人都欷歔抽泣。不久，朝廷的赦令到了，燕王读罢，叹气道："唉！只赦免燕国的官吏百姓，唯独不赦免我。"将王后妃妾召到明光殿，说："我做的事罪当灭门！"准备自杀。大家劝解道："倘若只削去王国有幸免死，也未可知。"恰在此时昭帝的使者也到了，带来

了给燕王的加玺书信。信中说："过去高皇帝统一天下，立子弟为藩国以拱卫社稷，后吕氏阴谋大逆，刘氏天下险些丧失，依仗绛侯周勃等人讨灭乱贼，尊立孝文皇帝，安定了刘氏宗庙。樊哙、郦商、曹参、灌婴等人身冒枪林剑雨，追随高帝扫平天下。当此之时，头如蓬草，辛苦至极，然而得到的奖赏不过是封侯而已。如今宗室子孙毫无风吹日晒的辛苦，却封地而称王，分财而享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你我为骨肉之亲，如同一体，你竟与外姓他族危害社稷，亲近不该亲近的人，疏远不该疏远的人，有悖逆之心，无忠爱之义。假如先人有知，王有何面目见高帝之灵！"刘旦读后，将燕王符玺交托给医工长，又和燕国国相、二千石官吏辞别："侍奉天子不能谨慎忠义，该去死了。"随即用绶带自己上吊身亡，王后姬妾随刘旦自杀的有二十多人。昭帝下诏赦免燕王太子刘建死罪，免为平民；赐给刘旦一个恶谥叫"刺王"。刘旦被立为燕王凡三十八年，最后身败国除。

（阎爱民）

参考资料：

《汉书》：《武五子传》

《通鉴纪事本末》：《燕盖谋逆》

霍光废立

霍光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其父霍仲孺先前在平阳侯家供事时，与侯家侍女卫少儿私通，生下霍去病。后仲孺娶妻成家，又生了霍光，很多年没再与卫少儿、霍去病母子联系。后来，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成了汉武帝的皇后，霍去病因是皇后的外甥而地位显贵；长大后，才知自己生父为霍仲孺。后霍去病在出击匈奴时，到河东郡专程看望了生父；回军时，又将同父异母弟霍光带到长安，霍光那时十多岁，被任命为郎。霍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在武帝周围供职二十多年，小心谨慎，不曾有过什么过错，深受武帝的信任。武帝临终前，立少子刘弗陵为皇太子，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效法周公辅佐幼君，实际上将政权交给了霍光。皇太子即位，是为昭帝，年仅八岁，朝政由霍光定夺。

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 74 年)四月十七日，汉昭帝死于未央宫，享年二十四岁，没有留下子嗣。当时，武帝的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尚健在，大将军霍光同群臣讨论推立新皇帝问题，大多数人都主张立广陵王为帝。广陵王本来就因为行为放纵不轨，武帝不立他为太子，所以霍光内心非常不安。这时一位郎官上书说："以前周太王废掉长子太伯而立少子王季，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只要适宜为君，就是废长子立少子也未尝不可。广陵王不可以承继帝位。"上书正合霍光心意，便把这个上书转给丞相杨敞等人观看，并提拔该郎为九江太守。当天，霍光便以皇太后的名义派遣代理大鸿

胪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前往迎接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来京，准备立为皇帝。霍光又报知皇后，调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

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在王国时素来狂妄骄纵，行为没有节制。武帝丧期中，刘贺仍然游猎不止，一次到方与县打猎，不到半天的功夫就跑了二百里。这次朝廷征他进京，他在路途上仍不忘游乐。到济阳时，刘贺还派人去寻求一种鸣声圆长、终日啼叫不绝的长鸣鸡，并且在道上买了一些积竹杖。过弘农时，又让手下的一个奴才用衣车拉上掠来的女子。中尉琅邪人王吉于途中上书告诫昌邑王说："我听说商王武丁在为父服丧期间，有三年沉默不语的美德。如今大王因国丧被征为新君，应该日夜哭泣悲哀才好，注意不要搞一些兴师动众的其他无关事情！大将军霍光仁爱、勇智、忠信，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侍奉武帝二十多年，未尝有什么过错。武帝在弥留之际将辅佐幼主的重任托付给他。大将军抱持幼主于襁褓之中，主持朝政，天下安定，就是古代贤臣周公、伊尹也不过如此。如今皇帝去世没有子嗣，大将军一心考虑谁可以承奉祖先宗庙，因而援立大王为君，其仁厚之量何其大哉！我希望大王对待大将军要敬重，政事全由他来主持，大王只是拱手南面称帝而已。希望大王留意我所说的，时常记住！"

昌邑王刘贺到了霸上，大鸿胪到城郊相迎，昌邑王让昌邑国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陪乘，快要到广明、东都门时，龚遂说："按礼法，奔丧者望见国都就应哭丧，前面已是长安的外城门了。"昌邑王说："我咽喉痛，不能哭。"昌邑王车队到了未央宫东阙门下，龚遂又提醒道："大王哭吊的帐所在城阙外驰道以北，到帐所前，有南北行道，骑马也就是几步远了，大王应在那里下车，向城阙西面伏哭，尽哀后才可止住。"昌邑王说："好吧。"到了后，哭哀如礼仪所要求的那样。六月初一，刘贺即皇帝位。

刘贺继承帝位后，依然荒淫无度，而且把原昌邑国的官员全部

征到长安，予以破格重用。为昭帝服丧期间，他每天同亲信饮酒作乐，斗虎戏豹，经常乘上车东奔西跑，没有个守丧的样子。霍光对此忧愁烦闷，向自己的亲信大司农田延年询问该怎么办。田延年说："将军您为国家的柱石，既然明白此人不可为帝，为何不向太后建议，另选贤者呢？"霍光说："现在我是想这样做，不知古代曾有这样的先例否？"田延年说："伊尹为殷商丞相，废黜商王太甲以安定宗庙社稷，后世人们称道他为忠。将军您若能这样做，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于是霍光引荐田延年在宫中供职，暗中又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准备。

据说，刘贺外出游玩，光禄大夫鲁国人夏侯胜拦住他的乘舆上前劝道："天气久阴却不下雨，这是有臣下图谋君主的征兆。这时陛下出宫，要往哪里去？"刘贺不高兴，说夏侯胜是妖言惑众，捆起来交给有关部门惩处。宫吏们将此事报告了霍光，霍光没有马上处理，找到张安世责备他泄露了废立的计划，张安世极力辩白，说自己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此事，于是便召来夏侯胜寻问究竟。夏侯胜说："《洪范传》中说：'君主的行为不当，上天的惩罚常是久阴无雨，这时就会有人以下犯上了。'我不敢明言，所以说'有臣下图谋君主'。"霍光、张安世听后非常惊讶，因此更加重视经学之士了。

霍光、张安世决议行动后，就派田延年将计划报告了丞相杨敞。杨敞又惊又怕，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唯唯诺诺而已。田延年起身去更衣室更衣，杨敞的夫人急从东厢房出来对杨敞说："这是国家大事，现在大将军已经决定了，派九卿来报与你知道，你不马上答应，与大将军同心协力，却还犹豫不决，恐怕动手之前先要把你杀了！"这时田延年更衣后回来，杨敞夫妇向田延年保证："一定听从大将军的教令。"

六月二十三日，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官员、大夫、博士等到未央宫。霍光说："昌邑王昏庸淫乱，恐怕会危及国家，该怎么办？"群臣听后都大惊失色，没人敢说话，只是唯

唯喏喏而已。这时田延年离开席位上前，手按剑柄厉声说道："武帝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大将军，将汉家的天下也交给了大将军，这是因为大将军忠贤，可以安定刘氏的宗庙社稷。如今人心鼎沸，社稷将倾，汉家皇帝相传谥号常用'孝'字，就是为能长久拥有天下，让宗庙中的祖先永远能得到祭祀，如果汉家的宗庙祭祀断绝，大将军虽死，还有什么脸面去九泉之下见先帝呢？今日所议，不可迟疑，群臣中有拖延不答应的，请让我用此剑斩了他。"霍光这时又起身说道："九卿责备我是对的，天下骚动不安，我理应受到责难。"参加商议的大臣们没人敢有异议，都叩头表示："万民的性命全在大将军一人之身，我们全听大将军的命令！"

霍光当即率领群臣一同谒见皇太后，详细陈述昌邑王不可承继皇位的情况。太后乘车来到未央宫承明殿，下令各宫禁门卫不得放进原昌邑国的官员。这时昌邑王刘贺入殿朝见太后返回，乘辇车打算回到未央宫中的温室殿。中黄门的宦官分别把守殿门，刘贺刚进来，殿门就关闭了，他的随从和群臣被拦在外面。刘贺吃惊地问道："这是干什么？"大将军霍光跪下说："皇太后有诏，不许昌邑国的官员进入。"刘贺说道："有事慢慢说，何必这样吓人！"霍光派人将昌邑国的官员全部驱逐到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骑兵将他们包围，逮捕了二百多人，全部送交廷尉诏狱。霍光又令原先昭帝的侍中和宦官看守刘贺，嘱咐他们："谨慎看守，如果他突然死亡或者自杀，都会使我有负天下，背上杀害君主的恶名。"刘贺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废黜，对周围的人说："我原来的群臣随从犯了什么罪过，大将军怎么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一会儿，皇太后下诏召见刘贺。刘贺听说太后召他，才感到害怕，就问道："我有什么罪过，太后要召见我？"这时皇太后盛装坐在武帐之中，左右侍卫数百人都手持兵器，期门武士则手握铍戟排列在殿下，群臣们依次上殿，然后召昌邑王刘贺上前趴伏听诏。霍光与群臣联名奏劾昌邑王罪状，列举他在为昭帝服丧期荒淫无礼行为不轨的举动，指出："社

稷重于君主,陛下不可以承继帝王世系,供奉祖宗宗庙,为万民之父母,该当废黜!"皇太后下诏说:"可以。"霍光立即令刘贺起身行礼接受太后的诏令。刘贺说:"我听说有'天子有敢于谏诤之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该失去天下'之语。"霍光说:"皇太后已下诏将你废黜,怎可还自称天子!"于是抓住他的手,解下皇帝的玉玺绶带,交与皇太后,然后扶刘贺下殿,出金马门,群臣跟随送行。刘贺向西辞拜,说:"我太愚蠢了,不堪承担汉家的大业!"乘坐皇帝的副车回到昌邑国在京官邸。霍光陪同,一起前往,告罪说:"大王自绝于天下,我宁可辜负大王,也不敢有负于社稷!希望大王能自爱,我不能再在左右侍奉了。"说罢,流泪而去。接着,皇太后又下诏令刘贺回归昌邑,赐给汤沐邑二千户,原来王家的财物都发还给刘贺,废除昌邑王国,改为山阳郡。原昌邑国群臣因辅导失度,陷昌邑王于邪恶,霍光将逮捕的二百多人全部诛杀。这些人被押赴刑场时,在街市上大叫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后悔未能先行动手除掉霍光。刘贺从被立为皇帝到被废黜,仅二十八日。

昌邑王被废,新君的选立成了问题,武帝的子孙中,广陵王刘胥前已不用,燕刺王刘旦谋反被诛,他的儿子也不在考虑之中,霍光与张安世等大臣一直商议不决。丙吉致书霍光说:"将军侍奉武帝,受命辅佐少主,肩负天下重任。昭帝早逝,没有子嗣,海内忧恐,希望马上能有新的嗣君。发丧之时,以大义立昌邑王为帝;但所立非合适人选,将军又以大义将其废黜,天下没有不对此敬佩的。当今社稷、宗庙、苍生之命运都在将军此时的决断。我私下探听众人的议论,考察他们所谈论的诸侯王、宗室在列位者,没有谁能得到百姓称赞的。先前武帝遗诏令由其外祖母家转入掖庭收养的武帝曾孙刘病已(即刘询),我在郡邸狱见到他时还很小,到现在已有十八九岁了,通晓经术,有很好的才能,行动安稳,气质温和。希望将军详审大义,并参照卜兆看是否合适。可先让他入宫侍奉太后,以此褒扬,使天下人昭然而知,然后再决定拥立的大计,此为天下之

大幸!"杜延年也知道刘病已的品德好,劝霍光、张安世立他为帝。

刘病已是武帝前太子刘据的孙子。当初,卫太子刘据娶鲁国史氏之女为良娣,生子刘进,随母姓被称为史皇孙。史皇孙娶涿郡人王翁须为夫人,生子刘病已,称皇曾孙。皇曾孙生下刚几个月,就发生了巫蛊之祸,卫太子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妻妾都被杀害,只有皇曾孙尚活着,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也被关在郡邸狱中。当时任廷尉监的鲁国人丙吉,受命审理巫蛊案件,丙吉心里知道卫太子没有谋反事实,特别可怜皇曾孙年幼无辜,挑选谨慎厚道的女囚胡组和郭徵卿,让她们用奶水喂养皇曾孙,又把他们安排在宽敞干燥的地方。丙吉每天两次前去探望。

巫蛊之案连年不决,皇曾孙险些被武帝杀掉。那时武帝有病,常住在长杨宫和五柞宫,望气者说长安监狱中有天子之气,武帝派使者分别登记长安各监狱的犯人,不论罪行轻重,一律杀掉。宦官谒者令郭穰夜里来到郡邸狱传达诏令,丙吉闭门不纳,说:"皇曾孙在此。其他人无辜处死犹不可以,更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一直僵持到天明,使者也没能进去。郭穰回宫报告,并上奏弹劾丙吉。这时武帝也有所醒悟,说:"这是天意所使。"因而大赦天下。被关在郡邸狱中的囚犯,只是赖丙吉的保护,才得以不死。

大赦后丙吉对郡守丞谁如说:"皇曾孙不应该再在狱中了。"让他给京兆尹写封书信,将皇曾孙及乳母胡组一同送到京兆尹那里去。京兆尹不愿收留他们,又被送了回来。后来胡组囚期已满,该释放回家了,但皇曾孙舍不得离开乳母,丙吉用自己的钱雇胡组留下,与郭徵卿一同抚养皇曾孙,数月以后,才让胡组离去。后主管府藏的少内啬夫对丙吉说:"供养皇曾孙没有明文诏令。"丙吉只得用自己俸禄所得米肉月月供给皇曾孙。皇曾孙大病一场,好几次险些丧命,丙吉命乳母小心护养,并为皇曾孙寻医求药治疗,多有恩惠。丙吉听说皇曾孙的祖母史良娣还有个哥哥史恭及老母贞君,便用车拉着皇曾孙送到史恭家,贞君可怜皇曾孙的孤苦伶仃,亲自看养

他。后来有诏书将皇曾孙归宫中掖廷收养，并令宗正将皇曾孙的名字编入宗室籍册之中。当时的掖庭令张贺原曾为卫太子刘据的家吏，顾念卫太子对他的旧恩，所以供养皇曾孙非常用心，并用自己的私钱供他念书。皇曾孙长大后，张贺打算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当时汉昭帝刚行过冠礼，身强体壮。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为右将军，协同大将军霍光辅政，闻听哥哥称誉皇曾孙，还想把孙女嫁给他，生气地对张贺说："曾孙是卫太子的后代，有幸以平民身分得到天子的衣食供养，已经就够可以了，别再提你嫁孙女给他的事了！"张贺只得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张贺听说暴室啬夫许广汉有个女儿未嫁，便设酒宴请许广汉。酒酣耳热之际，张贺从容而言："皇曾孙于皇帝为近亲，纵使他人才低劣，也可封爵为关内侯，你可将女儿嫁给他。"许广汉许诺。转天许广汉的妻子听说后，非常生气，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破落的皇曾孙。许广汉又让人重新说媒，广汉妻子终于答应了。张贺用自己的家财为皇曾孙出聘礼。皇曾孙因有了许广汉兄弟和祖母史氏家的依靠，生活才有了安定。他天资不错，又勤奋好学，曾跟随当时有名的东海人澓中翁学习《诗经》。他也喜欢斗鸡跑马，任侠闯荡。由于长年生活在社会下层，对乡里的奸邪欺诈、吏治的优劣得失，无所不晓。他曾多次游历皇陵，走遍三辅各地，曾在莲勺县的盐池被人困辱了很长时间。他尤其喜欢去杜、鄠二县，并常住在下杜城。每年春秋宗室成员在宫中聚会时，他也跟随其中人宫晋见昭帝。

待丙吉致书霍光推荐皇曾孙后，元平元年（公元前 174 年）七月，霍光召集丞相以下大臣确定皇帝人选，随后又与丞相杨敞等上奏皇太后说："孝武皇帝曾孙刘病已，年十八岁，曾从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身行节俭，仁慈爱人，可以为孝昭帝后嗣，奉承祖先宗庙，为万民之主。臣等冒死罪上奏！"皇太后下诏准可，霍光派宗正刘德到京城尚冠里刘病已的住所，让他沐浴，并换上所赐的御衣，太仆用轻车将他迎到宗正府。七月二十五日，刘病已到未

央宫晋见皇太后，先封为阳武侯，随后，群臣奉上皇帝玉玺绶带，刘病已即皇帝位，是为汉宣帝。宣帝拜谒高皇帝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春，宣帝论定策拥立之功，增封大将军霍光食邑户一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张安世以下增封者十人，封爵关内侯者八人。大将军霍光请求归政于宣帝，宣帝谦让不受，政事还是先奏明霍光处置，然后才上报宣帝知晓。从汉昭帝时，霍光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皆为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统领胡越骑兵；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西两宫的卫尉。霍氏其他宗亲和外亲子弟分别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等职，亲党连结，在朝中盘根错结，势力相当大。宣帝即位后，霍光每次朝见，宣帝都谦卑相待，极为敬重。宣帝即位之初，谒见汉高帝宗庙，大将军霍光乘车陪同，宣帝内心畏惧不安，有如芒刺在背，后由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宣帝这才心绪怡然，从容不迫。

霍光前后主持朝政二十年，废立过两个皇帝。从废黜昌邑王到拥立宣帝即位期间，汉朝二十七天没有皇帝，因有霍光坐镇，天下安定不乱，这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封建王朝时代非常难得。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春，霍光病逝，宣帝及太皇太后亲自临丧。霍光死后，宣帝才开始亲自主持朝政。三年后，因霍氏宗族骄纵不法，霍光妻毒死宣帝许皇后事发，霍禹、霍山等图谋废黜宣帝，被处死，霍氏家族被夷灭。

（阎爱民）

参考资料：

《汉书》：《霍光传》

《通鉴纪事本末》：《霍光废立》

盐铁会议

汉昭帝时期，承武帝奢侈、征伐之后，社会凋敝困乏现象依然，一时间难以改变。谏大夫杜延年为此向辅政的大将军霍光进言："近来连年歉收，失业流民未尽回归故土，应该重修孝文皇帝之时清明政治，昭示天下，以俭约、宽和为本，上顺天意，下和民心。如此，年景才会有所改变。"霍光采纳了他的意见，表示要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既定政策。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二月，在霍光的授意下，朝廷下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各地推举上来的贤良、文学们一起举行会议，向他们询问民间感到疾苦的事情和推行教化的纲要。贤良、文学们一致希望能撤消国家对盐、铁、酒的专卖，废除均输官，政府不应该与天下人争利，然后再示以俭节之政，教化之事才可兴盛。御史大夫桑弘羊对此加以诘难。他认为，盐铁等物的专卖是国家的大业，依靠它可以制胜周边的四夷，是使边地安定的根本，不能废弃。于是一场关于盐铁专卖问题的争论在这次会议上激烈展开了。

起初，汉武帝为了解决长期对匈奴用兵和赈济灾民而造成的财政枯竭问题，接受了大农盐铁丞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实行了盐铁的国营；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推行"均输"、"平准"的新法，即由政府官员将各地贡品就近转运贩卖，再买当地特产转卖，如此辗转贩运，最后把京城所需各地特产集中到长安，以避免长途直接运输的损耗。这些措施在当时实行后，国家府库充实，资用丰饶，社会

经济生活也相对稳定。朝廷既在经济上得到了好处，又在政治上抑制了地方诸侯王、豪强和大工商业者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不久，由于盐铁官营和官府操纵物价，缺乏市场竞争，也带来了农具制造质量低劣，物价尤其是盐价昂贵的弊端，许多人吃不起盐，只得淡食；买不起农具，只能木耕手耨，引起社会多方面的不满。在这次盐铁会议上，以各郡国来的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为另一方，围绕着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利弊，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如何对待匈奴的侵扰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时双方的观点都有记录在案，几十年后，汝南人桓宽根据会议的记录和尚健在的一位亲身与会儒生的介绍，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详细记载了当时会议双方争论的情况。

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们便以"为民请命"为己任，提出了取消盐铁官营的政策，他们说："我们听说，治理人民的方法，应该在于防止滋生享乐放纵的根源，发扬人们本有的道德品性，抑制工商业，以开仁义之心，不要引导人们去追求财利，只有这样，教化才能振兴，风俗才可改变。而如今各地都在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政策，与民争利，败坏了忠厚朴实的风气，养成了贪得无厌的弊俗，因此老百姓从事农业的人少了，热衷于工商业的人多了。外表华丽的东西，本质常会衰败；工商业兴盛了，农业就要衰落。工商业发展了，则百姓贪图财利；农业发展了，百姓就诚实俭朴。百姓诚朴，生活也就富足；百姓奢侈，饥寒也就随之而来。希望朝廷能废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政策，以便限制工商业，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是妥当的做法。"

桑弘羊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匈奴背叛不臣服，屡次暴掠边地。防备它们骚扰，就会使内地的士兵常常疲于奔命；不加防备，他们又会进犯不已。先皇武帝忧虑边地百姓长年遭受祸乱，苦于匈奴抢劫掳掠，所以在边地建城筑堡，整修烽火台，驻军屯田以加强防

御。因为边防费用不足，才实行了盐铁官盐、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政策，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补充边防费用不足。现在你们想把这些措施废掉，对内会使国库空虚，对外会使边防费用缺乏，让守卫在边地的军队忍饥受寒，那样我们将用什么来供给他们呢？废除这些措施，是很不妥当的。”

文学们说：“孔子说过：‘诸侯与士大夫这样的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所以对于财富，天子不应谈论其多和少，诸侯不应谈论其利和害，大夫不应谈论其得和失，而是要用仁义去教化人们，以德治去安抚百姓。这样就会使近处的人们亲近，边远的人们也心悦诚服。故而善于克敌制胜的人不必用战争去取胜，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动用军队，善于指挥军队的人不必以兵阵迎敌。只要朝廷努力修明政治，就可使敌不战自退；圣明的王者实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何必耗用军费呢？”

桑弘羊说：“匈奴勇猛狡诈，扰我边塞，肆无忌惮，入犯中原，杀害朔方等郡县官吏百姓，野蛮无道，早就该出兵讨伐他们了。如今皇帝陛下广施恩惠，既哀怜黎民生活不富足，又悯惜将士长期荒野征战。诸位既然很难披挂上阵，抱扫灭匈奴之志，却又欲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等政策，破坏边防费用的供给，扰乱对匈奴的战争，毫无忧虑边防之心，这恐怕在道义上有些说不过去吧！”

文学们说：“古人崇尚德政而鄙视武力。孔子说过：‘远方之人没有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招来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稳地住下来。’现在却抛弃仁义道德，一味迷信武力，出兵征伐远边之人，屯田驻军来防备他们。长年陈兵边塞，无终止地向边地驻军运送粮食，这使得边疆将士饥寒交迫于外，中原百姓劳苦不堪于内。建立盐铁官营，设置谋利的官员筹措边防费用，决不是什么好办法，所以还是应将它们废除为好。”

桑弘羊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开辟发展农工商业的途径，沟通物资的有无，通过市场解决各方面的需求，招徕四方士民，聚集

各种货物。农夫、商人、工匠都可以在市场上各得所需，交换贸易后各自返回。《易经》上说：'货物流通交换，百姓就不会懈怠。'因此，工匠不生产，农具就会缺乏；商业不流通，宝货的供应就没有；农具缺乏，粮食就不会增产，宝货不能供应，财政就不足。所以，实施盐铁官营，推行均输，正是为了流通货物，调节供给急需，废除它们，是不行的。"

文学们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百姓就会敦厚，以财利引导百姓，民俗就会轻薄，人们就会背弃仁义而热衷财利，就会为财利来往奔走于市场。《老子》说：'贫穷的国家好像是财富有余，实际上并不是财富多，而是民众的欲望多，焦躁不安地急于求利而已。'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崇尚农业，限制工商业，以仁义防范百姓的欲望，充实粮食财货。市场上商人不交易无用的东西，手工工匠不生产无用的器具。商业只是用来流通积滞的货物，手工业也只是生产些工具器械，这些都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业。"

桑弘羊说："《管子》讲过：'国家有沃土而百姓吃不饱，是由于农具器械不充备；有丰富的山海物产而民众缺乏财钱，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陇、蜀二郡的丹砂、木漆、牦尾、鸟羽，荆、扬二州的皮革、兽骨、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箭竹，燕、齐二地的鱼、盐、毛毡、皮袄，兖、豫出产的漆器、丝绸、葛布、麻布，都是人们养生送死的必需品，而这些物产都需要靠商业来沟通，靠工匠加工制成。所以古代圣人发明船桨使能在水上运输，使用牛马通达陆路交通，直至到达边远地区，深入偏僻的地方，流通万物，便利百姓。正因如此，先皇武帝设置了铁官以增加农具的供应，建立均输官以富足人民的资财。盐铁、均输政策是万民所拥护的，依靠它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废弃它是不可以的。"

文学们说："国家有沃土而百姓吃不饱，是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有丰富的山海物产而民众缺乏钱财，是由于过多制作那些奇巧奢侈物品而不致力于百姓必需品生产的缘故。这如

同河川之水装不满漏底的酒具，山海之源也供不足常年流淌的山间小溪一样。商王盘庚迁移国都，舜将黄金埋藏在深山，我朝高皇帝不准商人做官，为的是遏止贪鄙的习俗，培养诚朴的风气。排斥困辱商人，堵塞求利的门路，尚且仍有人为非作歹，更何况朝廷又带头牟利呢？《公羊传》上说：'如果诸侯好利，大夫就品质鄙劣；大夫品质鄙劣，士就会贪财；士贪财，百姓就要为盗了。'盐铁官营是开了谋利的门路，给百姓设下了犯罪的阶梯。"

桑弘羊说："过去郡国诸侯各用当地特产作为贡物运往京城，来往烦杂，多数质量低劣，有的物品本身价值还抵不上它的运费。因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以调配运输，便于远处交纳贡物，所以叫做'均输'。在京城设立物资贮存仓库，收集各地货物，物价贱时就买进，物价贵时就卖出，以此平仰物价。这样官府掌握实物，商人也不能牟取暴利，所以叫做'平准'。有了平准，则百姓不失其职；有了均输，百姓相互间的劳逸就会比较均等。平准、均输是为了平抑物价而方便百姓，并不是开启牟利的门路，诱导民众走上犯罪的阶梯。"

文学们说："古时向百姓征收赋税，是征收他们所擅长生产的东西，不强求他们不擅长生产的东西，农夫交纳其收获，妇女交纳其纺织品。现在，舍弃他们生产的东西，反而索取他们难以生产的物品，百姓被迫将自己的东西贱卖出去，买进官府所要物品上交。近来有的地方官吏命令百姓生产布絮，恣意刁难，强行收购。官吏所收之物不仅是齐、阿的丝绸，蜀、汉的麻布，还要一般百姓也制作这些东西。官吏奸邪，低价收购，农夫加倍受苦，女工双重出税，我们没有看到均输有什么'均'的！官府又政令乱出，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万物搜罗一空，使得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商人从中牟取暴利。官吏自己经商，就会与奸商勾结，乘机囤积居奇，以待市场急需时高价出售。奸吏恶商贱买贵卖，我们没有看到平准到底'平'在哪里！古代的均输是来调节劳役和方便贡品的转运，不是为了牟取财

利而收购万物。”

桑弘羊说：“山海之产由国家管理，人们就不能去争夺；货物有平价制度，人们对价格就没有疑虑。国家规定平准法，人人都能满足欲望，即使三尺儿童到市场买东西，也不会有人欺骗他。现在你们主张废除盐铁官营和平准政策，就会使豪强富商控制山海的物产，独得其利。他们安居闾巷，遥控市场，物价高低全在他们张嘴一说，贵贱没有标准，端坐家中收取暴利而成为豪强，这是助长了豪强势力，抑制了弱小平民，将财物送到强盗手中。如果养强抑弱，那么百姓间的平等就会消失，就好像田地里杂草盛了五谷就要受到伤害一样。”

文学们说：“山海是财物的宝贵源泉，铁器是农民最重要的工具。农民使用农具锄掉杂草，锄掉杂草田地就会得到开发，田地开发了就能五谷丰收。山海被开发利用，百姓的吃用就会充足，百姓充足，国家就会富裕，国家富了，再用礼义教化百姓。人们路上相遇就会相互谦让，做工经商也不会相互欺诈，人人诚朴相处而不为利益相争。秦、楚、燕、齐各地，人们气力不一样，土质软硬不相同，农具的大小弯曲就要应情而宜。地区不同，风俗也异，各有各的习惯。现在朝廷硬要统一而论，就不能使铁器因地而宜，农民使用很不方便，农具不便就会疲于劳作而杂草不除；杂草不除，庄稼不长，人们生活就会贫困。煮盐铁的地方，大都依山靠水，接近铁矿、炭场，地方遥远，工作艰苦，郡中服役的很多人受不了这样的劳苦，借债出钱雇人代役。郡县中的铁官有的按人口收铁，而且是压价收购，平民百姓按地区远近出钱雇人运送盐铁，既麻烦又费钱，为此而困苦不堪。”

桑弘羊说：“过去肩水都尉彭祖奔丧归来时，讲到朝廷制订的盐铁法令，内容非常严明。冶铁的役卒与囚徒穿衣吃饭，俱由官府供给，打造铁器，资用虽多，并不妨害百姓的利益。或许有的官吏不好，朝廷的禁令不执行，因而给百姓带来烦苦。朝廷实行盐铁官营，

不单是为了得到些收入，也是为了发展农本之业，限制私人工商末业，分解割据势力，禁止奢侈堕落，杜绝兼并之路。古时名山大泽不分封，因为分封了就会使诸侯得利。山海、湖泽的物产，是天下的财物，都应该归朝廷少府掌管，但皇上并不把这些占为私有，归大司农管理，以帮助百姓。那些谋财的奸诈之徒，喜好霸占山海资源，以图暴富，以微利役使百姓，所以反对这种现象的议论很多。铁器和兵器，对国家有很大的用处，不宜私人经营。”

文学们反驳说：“肩水都尉所说的事，只可使用一时，是权宜之计，不可久行其事而延续后世，这也不是圣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诗经》上说：‘可悲呀！不师古代圣贤，不行康庄大道，唯听浅薄之言。’这是诗人讽刺那些不懂得王道而善于弄权谋利的人。武帝攻打九夷，平定百越，屡次兴兵，粮食缺乏，所以只得设置农官，国家统一铸钱，并且允许大商人用粮食买官爵，来解决急需的军队供给。如今皇帝陛下承受着大规模战争后带来的愁苦，养育着疲惫的百姓，此正是安抚民众的时候。你们这些公卿大臣应该考虑如何安定百姓，为国兴利去害，以仁义辅佐皇帝，建立宏图大业。皇上即位至今已有六年，公卿大臣们没有请求裁减那些无关紧要的官吏，罢黜奸诈谋利之徒，这些人把持大权太久，民众就会深深怨恨朝廷。如今皇帝陛下行圣德，布恩泽，下诏让各郡国贤良、文学乘公车到京城议论五帝三王治国之道和六艺教化之法，述说安危利害的关系，皇上用意非常明显。可现在你们公卿大臣的议论没有抓住主旨，此所谓守了小节而丢了大体，见了小利而忘了大利。”

桑弘羊说：“文学们一说起治国，比唐尧、虞舜还要有本事；谈论起仁义，比秋天的天空还要高远，然而是徒有华丽的言辞，却没有实际的效用。从前，鲁穆公之时，公仪休为相，子思、子庚为卿，然而鲁国北边被齐国侵夺了领土，退至泗水为界，南面畏惧楚国，西面顺从秦国。孟轲在魏国，魏军兵败于齐国，上将军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又西败于秦国，领土被占领，疆域被削减，丧失了黄河东西

两岸大片土地。孔子的七十二门徒，离父母，抛妻小，背负行李追随其师，不耕而学，把天下搞得更乱了。所以说玉石的碎末装满箱，不算有珍宝，《诗》、《书》装满箱，也不算懂得治国之道。关键在于能安定国家，有利民众，不是只说一大堆好听的空话就行了。"

文学们说："虞国不用百里奚的计谋亡了国，秦穆公用了他的计谋而成就了霸业。不任用贤人，国家就要灭亡，想让国家不衰落那怎么可能？孟子到魏国，梁惠王问他关于'利'的问题，孟子以'仁义'回答，因政治主张不一样，孟子没有被任用就离开了，他有很高的才能，没有说出来。所以有粮不吃，免不了要挨饿；见贤人不重用，国家免不了要衰落。商纣王之时，王族内有微子、箕子贤人，其外有胶鬲、棘子贤臣，为何商朝不能存在下去呢？这是因为贤人的意见不被采纳，他们的劝告也没人听取，虽有贤人，这怎能有助于国家的治理呢？"

桑弘羊说："所谓才优德高的文学，他们的智谋应能阐明先王治国的方法，然后可以用其才能实行先王治国之道。所以居家为民时应为人们师表，在朝为官时应为当代典范。可像你们这些文学，谈治国只会称颂尧舜，论实际办法只是以孔子、墨子那一套为准则，把政事交给你们又干不好。贤良文学们留恋过去的治理之道，却又不能在现在实行；说得好听，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讲得很有道理，实际情况却是另一样。你们衣冠与老百姓不同，行为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你们这些所谓合乎标准中选的人，不过是偶然地遇到了机会，幸运地受到推举而得以滥竽充数罢了，恐怕不是要求选拔的那种真正优秀的人才，本来就不该浪费时间与你们谈论治国的问题。"

文学们说："上天有日月星辰是来光照世人的，天下设公卿是为了治理国家的。所以说公卿是天下人的表率和榜样，对上有辅佐圣明君主的责任，对下有实现圣贤教化百姓的义务；和谐阴阳，调节四季；安抚百姓，培育后生；使诸侯和睦相亲，没有怨恨，使四夷

归顺,国家没有叛逆的忧虑。这是公卿们应尽的职责,也是贤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就如同有伊尹、周公、召公那样的三公之才,像太颠、闳夭那样的九卿之人。如果说我们文学不符合圣主的选拔标准,那么,如今你们这些执政的公卿们也未必称得上有美好的道德吧!"

桑弘羊听了文学们的话很不高兴,脸都变了色,不作回答。

会议中,丞相史和御史们也不时加人其中的争论。丞相史说:"谈论国家大事,评论执政的好坏,为什么不慢慢讲道理说服,而非要急迫到这种程度!桑弘羊大夫拒绝取消盐铁官营,并不是有私心,而是考虑到国家的费用和边境上军费的支出。贤良、文学们严肃争辩,要求取消盐铁官办,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回到古代,按仁义办事。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又怎能坚持古代的方法而反对今天的措施呢?儒生们以古非今,必定有改进的办法,如果你们有能力安定国家,使远方之人归顺臣服,让边地没有忧患,赋税可以给你们全部免除,更何况取消盐铁官营和均输政策呢?所以重视法术的儒生,贵在谦虚和忍让,以道义服人。现在你们辩论时气势汹汹,没有公西赤、子贡的言辞,只见到浅薄无理的样子,真是闻所未闻。大夫言辞有过失,你们也是如此,还不向大夫请罪!"

贤良、文学们都激动地离开席位说:"我们固然学识浅陋,很少能到官场大庭上来,你们说我们言论狂妄和身分不相称,与执政的公卿作对,可药酒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所以,有直言强辩的人,是国家的福气;有花言巧语阿谀之人,是国家的盗贼。山林中常听到的是大风之声,富贵人家常听到的是奉承之言,管理着万里江山的朝廷中,每日听到的都是恭顺的话,现在却听到了我们的直言争辩,但这是公卿们治病的良药针石啊!"

桑弘羊说:"瞎子的嘴能说黑白,然而却不能用眼睛去辨别;儒生的嘴能谈论国家的治乱,却没有治国的真本事。坐而论道不去实

贱，那牧童也会说自己有乌获那样大的力气，逢须那种小人也会说自己具有尧舜的美德。假如说的话要符合实际，那儒生还怎么担忧不能治国平乱，盲人又怎么担忧分不清黑白呢？孔子说过：'话不轻易出口，是怕说了自身做不到而感到羞耻。'所以，品质卑劣仅能说大话、能说不能做的人，君子认为这样的人是可耻的。"

贤良们说："能说不能做的人是国家的宝贝，能做不能说的人对国家有用，又能说又能做的人则是君子，二者无一的是牧童和逢须那样的人，言论传天下、仁义布四海的人是周公。自己嘴上说的，就要亲身去做，怎能像那些拿着俸禄而不尽其职责的行尸走肉一样默不作声呢！如果这样，那官吏们没有什么忧患和耻辱可言了。如今不崇尚仁义而贪图小利，只考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来扰乱众人的意志，君子虽贫贱，也不肯这样去做。苦口药酒对治病有利，逆耳忠言是治理国家的良药。公卿们诚能使国家强盛并能克制自己，听从我们文学的肺腑之言，不滥用职权，撤消设置的弁利之官，利益归于百姓，躬行周公之道，那样天下就能达到治理，也会带来颂扬之声，我们这些儒生哪里还会为治国平乱而担忧呢？"

在辩论中采取持中立场很少表态的丞相田千秋在会上也发了一次言，他说："我听说郑长者曾讲过：'君子的脸色要一本正经，要避免粗暴和怠慢；说话要注意修辞和语气，不能粗鄙谬误。'所以，说话要有根据，行为要有准则，这才是官府所希望见到的，如果像剑客一样论争，如赌徒那样狡辩，盛气凌人地相互斗嘴，固持己见不相谦让，官府是不会采纳你们的意见的，你们这些贤良文学也会背上不谦逊的名声。我真诚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做。公孙龙说过：'争论是为了讲清道理，所以不能固持己见。坚持自己意见时，要充分考虑对方的看法，这才能很好地辩论问题。争辩时互不相让，就显得太卑劣了。'如今我们官员缺乏仁德，妄拿国君的俸禄，也没有办法纠正自己的过失。朝廷抬举你们这些贤良、文学进京议事，到了你们做了高官治国安民的时候，也未必能见到你们会有谁拿出

什么解决百姓疾苦的好办法！”

盐铁会议上双方的争论紧张而激烈，到了最后会场上的气氛反而静得像无人一般。公卿大臣们神色不悦，于是宣告会议结束，并向汉昭帝上奏说：“贤良文学们不懂得朝廷的大事，说到底就是认为盐铁官营不好。现请求取消各地的酒类专卖和长安附近的铁官。”奏章得到了昭帝的认可。会议后，汉昭帝又召见了来京的贤良文学，都赐予列大夫的职位。盐铁会议是结束了，但有关对匈奴的政策和法治等问题的争论又在会后继续了一段时间。

盐铁会议是对汉武帝时期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尤其是盐铁官营政策利弊的激烈争论。贤良文学们强烈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措施，揭露了这些方面的许多弊端，要求节约政府开支，减轻赋税徭役，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但由于事关官府的大宗财政收入，掌握实权的大将军霍光仍保留了盐铁官营的主要政策，只是取消了酒类的专卖和裁减了部分地区的铁官。虽然贤良文学们的有些主张并不切合实际，但他们节约开支、与民休息的意见还是受到了重视，这对昭宣时期经济的恢复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盐铁会议的争论对当时政治的开明、读书士人的议政参政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双方都有一些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精辟的分析和意见。当时参加过会议的汝南人朱子伯告诉他的同乡《盐铁论》一书作者桓宽说：“开盐铁会议之时，贤良文学从四面八方来到京城，茂陵的贤良唐生、鲁地的文学万生等六十多人聚集在朝堂上，阐述六经的内容，议论天下太平的根本方法。智者施展其谋略，仁者表明其措施，勇者显示其果断，辩者表达其言辞。一个个理直气壮、刚直不阿地在公卿大臣面前侃侃而谈，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也相当可观了。”这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大批在野士人的入朝议政，在当时的官场上是非常少见的，可惜的是这种做法以后没能坚持下来。所以桓宽感叹说：“我观察盐铁会议，公卿与贤良文学的争论，意见截然不同，各有自己的见解。有的崇尚仁义，有的注重权势

财利，这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阎爱民）

参考书目：

《汉书》:《食货志》
桓宽《盐铁论》

昭宣中兴

昭宣即指汉昭帝和汉宣帝。昭宣在统治的三十八年(公元前86年 公元前49年)中，由于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汉王朝的兴盛局面得以延续了几十年，在历史上称之为“昭宣中兴”。

汉昭帝是在“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形势下继位的，其时年仅八岁。武帝临终，恐日后女主专权，特将昭帝之母钩弋夫人赐死，且令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幼主。昭帝在位前后共十三年，其政策与上述诸人、尤其是身兼大司马、大将军的霍光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元平元年(公元前73年)四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昭帝即病死。由谁来接替皇位，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昭帝无后，仓促之中霍光等决计让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继位，尚未登基便招来有些大臣的反对，于是改迎刘贺继位，六月受皇帝玺绶，七月便被霍光等废黜。最后选中刘询来继皇位。刘询是武帝的废太子刘据之孙，刘据被害时，刘询刚出生数月，其父刘史也被处死，刘询被送至民间收养。因此，他与诸子不同，他周围没有心腹幕僚。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六月刘贺被废后，刘询继位，其时他十八岁，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初期仍由霍光辅佐，虽然宣帝对霍光的专权“若有芒刺在背”，但在为政方针上二人并无分歧，其统治政策基本上是昭帝时代的继续，保持着为政以宽的精神，使得“民安其

业”,社会进一步稳定,生产得到发展。

昭宣两帝何以使武帝末期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局面得以扭转,尖锐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生产力得以发展,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其原因主要是霍光在辅佐昭宣二帝时,忠实地执行了武帝死前规定的政策,即“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轻徭薄赋”政策实际上是汉武帝提出的。征和二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上书汉武帝,要求在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负担,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并为此积极物色可靠的执行人,只可惜他未等到政策实施便病逝。昭帝继位后,在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辅佐下,积极提倡农耕,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生产得以发展。昭帝刚刚继位,还是个八九岁的孩子,秉政者就让他“亲耕籍田”,虽然只是“往试耕为戏弄”,但它是带有重视农业意义的举动。始元二年(公元前86年)又下令免除了全国的田租。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宣布:凡制度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只准按规定收租。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昭帝又一次“耕于上林”。昭帝在位的十三年间,始终重视农业生产,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死前还下诏宣布:“天下以农桑为本。”

除减免田租外,昭帝对其他各赋税也不断宣布废除或减免。如汉代的口赋是普通劳动人民的较重的负担,它规定,七岁至十四岁的人不根据土地的多少一律纳口赋。昭帝在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至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连连下诏减口赋税。其它杂税如“马口钱”等也被减免和废除。

宣帝时继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他在当政时期曾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税,据统计,仅减免“田租”或“租赋”就有六次之多。宣帝时还将公田借给贫民耕种,并且贷给种子、食物。其他一些杂税及徭役也较轻省。昭宣二帝施行的政策是一致的,比起

武帝的繁重征发来，老百姓要好过一些，武帝末年的凋敝状况有了很大改变。

为了推行“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的政策，而不是继续推行武帝前期的那种加重赋税、严刑峻法、兴师动众、好大喜功的政策，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霍光以昭帝的名义，命令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召集六十多名贤良文学在朝廷举行了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们对桑弘羊进行了猛烈围攻和抨击，因为作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在推行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政策上与霍光是唱反调的。在这次辩论会上，贤良文学的观点是符合其时执政的霍光的意图的，他们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甚至影响到宣帝的政策。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轮台诏令”提出的“明休息，思富养民”的方针得以付诸实施。它使得昭宣时期政府实行的种种措施，基本上是以“安民”为中心，千方百计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鼓励发展生产，并与匈奴保持和亲友好的关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昭宣二帝对吏治十分重视。霍光辅政，竭力恢复汉初的传统政策，“修孝文时政”。比起昭帝，宣帝更为重视吏治。因为宣帝刘询生下来几个月时，就因巫蛊之祸受株连，父亲被处死，他被送到乡下，后来遇赦免罪，才归掖庭供养。由于他长时间生活在民间，深知民事之艰难，所以特别注重吏治，对地方官的选拔尤其谨慎小心。选拔刺史、太守，特别慎重，一定要由大臣推举，他亲自召见考察，询问其治安之术，方委以重任。宣帝对官吏的赏罚极为分明，为政清廉者给予褒奖。比如颍川太守黄霸，因为“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宣帝下诏褒奖其为“贤人君子”，并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至于宫中选拔公卿大臣，则多是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择优录用，上面提到的颍川太守黄霸很快就被擢升为御史大夫。为此，在宣帝时涌现出一批良吏，他们执法公平，即或是豪门贵族犯法者，也敢于依法惩办；恩威并施，即不仅用刑罚，更重要的是重教化。他们合人心，

为政宽简，对于稳定封建统治，安定人民的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向当政的桑弘羊等人提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的警告，并且指出单靠暴政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恶果，像株连酷刑，“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不仅老百姓深受其害，更重要的是它会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昭帝曾颁布特赦令。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比如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下诏改定“首匿法”，宣布“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宣帝时还专门设置廷尉平一官，帮助廷尉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且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宣帝还常常亲临未央宫的宣室殿，亲自审理重大刑狱。以后，涿郡太守郑昌曾上疏，请删定刑律，不过，未能实现。昭宣时代通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对于这近四十年的历史，历代的史学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向就曾称赞说：“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风俗通·正失篇》），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辞，但也不可否认“昭宣中兴”是封建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的时期。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昭、宣帝以及霍光等封建统治的当权人物有关，但是将中兴的局面完全归结于帝王将相们的政策、措施，也是有失公允的。昭宣中兴的出现也是建筑在全社会的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繁荣稳定、生产力发展，还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而昭帝、宣帝及霍光等人则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完成了他们各自的历史使命而已。

（王岱英）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霍光废立》

林剑鸣《秦汉史》上册

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册

李洁萍、尹承琳《中国历代帝王志》

赵充国平羌

赵充国，汉朝著名将领，字翁孙，陇西郡上邽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后来移居金城郡令居县(今甘肃永登西北)，为良家子弟，娴习骑射，好读兵书，通晓边情，初为皇帝警卫部队羽林军士兵。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赵充国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进攻匈奴，因突围有功，被任命为中郎。汉昭帝时他由大将军护军都尉升至后将军，兼任水衡都尉。昭帝死后，赵充国参预大将军霍光等废立皇帝之事，即废黜刚即位的昌邑王刘贺，拥戴汉武帝曾孙刘询为帝。为此，赵充国被封为营平侯。宣帝本始年间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任后将军、少府。匈奴多次进犯汉域，赵充国率兵驻边抵御，匈奴上畏之撤退。

赵充国平羌之事，发生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至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五月。

羌，古族名。汉朝时分布于湟水一带(今甘肃、青海、四川交界地带)，部落众多，通称之为“西羌”。羌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主，少有农业，自秦汉即为中原之边患，又与汉族相融。

西汉初，湟水附近羌人附属匈奴。汉武帝在河西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以后，隔断了羌与匈奴的往来，羌人还被迁出四郡，不允许他们居住湟水一带。汉宣帝即位时，特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义渠安国本是西羌人，其祖父和父亲相继在汉朝为官，他承袭父辈的地位，并升为光禄大夫。西羌较大的部落之一先零的酋长，派人来见义渠安国，提出请汉朝允许羌人在一定的

时节可以渡过湟水，到汉民不耕种的土地上放牧。安国奏报朝廷。后将军赵充国听之，即劾奏安国"奉使不敬"。汉宣帝召回安国，并拒绝羌人的要求。而后羌人自行其事，强渡湟水，边塞郡县难以禁阻。

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时，先零酋长联合大大小小羌族酋长二百余人，他们彼此消除旧日仇恨，交换人质，结盟立约，一起反叛汉朝。赵充国在回禀宣帝咨询时说："羌人之所以易于制服，是因为诸羌各有酋长，经常相互攻击，四分五裂。三十多年前，西羌曾造反，就是先消除彼此间的旧日仇恨，结盟共同进攻令居，与汉朝对抗，历时五六年才平定。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先零酋长封煎等出使匈奴，匈奴也派使臣传告诸羌，说：'汉朝贰师将军部队十余万人，投降了匈奴。你们羌人受汉朝奴役极苦。张掖、酒泉本来是你们的地方，土地肥美，我们联合起来把这些地方夺过来。'可以说，匈奴企图与羌族联合对抗汉朝，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情了。前不久，匈奴在西方被困，很可能再派使臣到羌中，与其勾结。臣担心羌族反叛不止于此，而且要联合其他部族，我们应该及时防患于未然。"一个多月以后，羌侯狼何果然派人到匈奴去借兵，打算进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线。赵充国认为："狼何势不能单独作出此计划，很可能是匈奴的使臣已经到羌中，先零、罕、幵等羌族已经消除旧日仇根，订立盟约，联合对抗汉朝了，等到秋高马肥时，必定起来叛乱。应该派遣使臣去巡察边防部队，预先做准备，还要敕示诸羌，阻止他们消除旧日仇恨，彼此联合，揭露他们的阴谋。"

丞相和御史两府研究了赵充国的建议后，报告皇上，请再派义渠安国行巡诸羌，传达旨意，了解情况，区别善恶。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三月，义渠安国再次到达羌中，召集了先零诸酋长三十余人。安国认为这些人特别桀骜狡黠，全部把他们斩杀了，接着让军队出去袭击这些部落，又杀了千余人。于是，过

去已经降服的诸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既害怕又忿怒，无所信服和依靠，就侵掠右邻右舍，背叛汉朝进犯边塞，攻打城邑，杀除官吏。安国以骑都尉身份，领三千骑兵，驻扎边境，防御羌人。当他到达浩亹时，遭到敌人袭击，车辆、辎重、武器均损失惨重。安国撤退至令居，并将此情况上报朝廷。

当时的赵充国已年逾七十。宣帝认为他太老了，派御史大夫丙吉去问他谁适宜担任平羌统帅。赵充国回答："没有谁能超过老臣我的了。"皇上问："将军如何估计羌敌的情势？要用多少人去削平羌敌？"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情势难以在遥远的地方推测，臣愿疾奔金城，将绘有地图的作战方略呈报圣上。羌戎不过是小种族，违反天意背叛汉朝，不久就会灭亡。愿皇上将此事交给老臣，请不用为此担忧。"皇上笑着说："好吧，就依你说的办！"汉朝大军即发往金城。四月，赵充国受命统帅大军，准备进击西羌。六月，赵充国到达金城，待部队满万余人马时，打算渡湟水，唯恐遭受敌人的堵截，即刻连夜派遣三支小分队，先行衔枚暗渡，过河后即抢修阵地工事，到天亮时阵地筑好。大部队旋即安全地全部渡过河。

汉军安营不久，羌敌数十百骑兵前来，出没在军营附近。赵充国说："我们部队长途跋涉，人马疲倦，不宜驰骋追击。羌敌骑兵骁勇，难以制服，而且我们还要提防他们搞诱引之计。打击敌人应以全歼为目的，不可贪图小利。"他下令部队不可以随意出击，同时派人侦察四望峡，发现那里没有敌军。赵充国连夜率领部队上了落都山。他召集诸校司马说："我们知道了羌族是不善用兵的，如果他们派几千人扼守四望峡，我们的部队怎么好进入呢？"

赵充国带兵有方。他总是远远地派出侦察兵以谋军机；行军时必定作好与敌人打遭遇战的准备；宿营时必定要把工事修筑坚固；尤其是能慎重行事，爱护士兵，先计谋而后打仗。因此，部队西行到西部都尉府后，每日犒劳军士，军士们都急切地想有所作为。敌人连番挑战，充国仍坚守不出。有一天，抓到一个俘虏，说羌人酋长相

互报怨:"告诉你不要造反!如今天子派遣赵将军来,虽年纪已八九十岁了,可善于打仗,眼下即使想找他决一死战,可是又怎么能办得到呀!"

罕、幵的酋长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来向汉都尉告密说:"先零准备造反。"几天以后,先零果然造反了,雕库部落有不少人也在其中。都尉扣留雕库作人质,赵充国则认为雕库无罪,并遣送他回去,让他告诉诸羌酋长:"汉朝大军只诛杀有罪的人,大家要明明白白地与罪人分离,不要追随他们一起灭亡。天子告之诸羌人:犯罪的人如能捕杀别的罪人,免除他本人的罪,并论功劳大小赏赐钱财有别,同时把他所捕杀罪人的妻子、财物,全部归他。"赵充国欲以此番宽威招降罕、幵及其他被胁迫追随造反的羌人,分化敌人,破坏其阴谋,当羌敌疲惫涣散的时候,就进攻它。

这时候,宣帝已从内地向边郡派出了六万增援部队。酒泉太守辛武贤奏报朝廷说:"边郡的部队都驻扎在南山,北面空虚,这种形势不可长久。等到秋冬的时候再发动进攻,这是敌人还远在境外时所用的计策。如今敌人朝夕骚扰我边塞,给这些地方造成困苦,汉朝的马匹又不耐寒冬,不如七月上旬准备好粮草,部队分别从张掖、酒泉出发,共同攻击鲜水一带的罕、幵羌族,就是不能全歼,也可夺得他们的畜产,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而后退兵。等到冬天大军再出征,敌人肯定会吓得魂飞胆破。"天子把这份奏报下发充国,让他发表意见。充国认为:"一匹马驮三十天的粮草,就是米两斛四斗,麦八斛,还要驮衣装、兵器,如此重载是很难进行追击的。此外,敌人发现大军进攻,会后退,逐水草,进山林。我军要追击深入,敌人会扼守前后险要,以断绝我军的粮道,必定有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的危险。辛武贤认为可以夺取敌人的牲口、妻子儿女,这恐怕是一纸空话,并不是良好的计策。先零首先造反,其他部落是被迫胁从。依臣的拙见,不计较也不公开罕、幵愚昧之过失,先行对先零进行讨伐,以慑服罕、幵,使之悔过从善,再赦免他们的罪过;还要选

派了解羌人风俗习惯的好官吏到那里去，进行抚慰，争取和睦共处，这才是保全军队、确保胜利、安定边疆的计策。"

宣帝召集大臣们商议赵充国的意见，大臣们一致认为："先零的军势强盛，又依仗着罕、开的协助，如果不先打败罕、开，就不可能对先零有什么意图。"宣帝听信了这种意见，就任命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又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并颁发御旨，采纳和表扬他的建议；同时，宣帝下诏指责赵充国说："现在四处都在忙着运输军备，百姓深受烦扰。将军率领着万余重兵，不早趁着共有水草的便利，去夺取敌人的畜产和粮食，却要等到冬天，敌人都储备好粮草，躲藏到深山中，有险可依，将军的士兵，则会手脚皴裂生冻疮，这时候去打仗怎么会有利呢？将军不念国家此番出兵花费有多少，只想在时间上取得持久的胜利，除了将军又有谁不乐意这样做呢！如今，我命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率领军队，在七月出击罕羌，将军要率领你的部队同时出动，不得再有迟疑。"

赵充国阅后上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说他已按照皇上先前的旨意，遣送开的酋长雕库回去宣扬天子的宽威，罕、开及其所属羌人都知道天子的圣明，如今是先零羌杨玉率兵盘踞山林险要的地方，伺机进犯，罕羌并没有来犯。我们要把先零放在一边，而先攻打罕羌，这是放纵罪恶，乱杀无辜，是一处发难，两处受害。当然这绝非皇上的本意。上书中还写道："臣看到兵书上说'攻不足者守有余'，还说'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目前开羌打算进取敦煌、酒泉，我们应该使兵马进入戒备状态，以迎战前来之敌，以逸击劳，这才是取得胜利的办法，而现在担心两郡的兵力少，不足以防守，就调出军队去进攻，这是不等着敌人就我，我却被动地去就敌的办法，愚臣认为是不妥当的。先零羌为了造反，与罕、开解除旧日仇恨，结盟立约，然而其内心不会不害怕汉军到来，使罕、开背离它。臣认为，先零早就打算着在汉攻打罕、开时，前去解救其危难，以巩固盟约。如果先打罕羌，先零必定援助它。如今敌人的马匹正肥壮，

粮草也充裕，我们若发动进攻，恐怕难以伤害他们，却正好使先零得以施德于罕羌，巩固它们的盟约，更加联合一致。其精兵合起来有二万余人，更多的小部落慑于威力而附和它们，像莫须这样的小部落就不得轻易脱离它们了。这样，敌人的兵力愈来愈多，要讨伐之就需要比现在多数倍的兵力。臣担心国家的忧患要延续十多年，不是两三年可以免除的了。依臣的意见，先消灭了先零，罕、幵及其他羌人则不用发兵即可收服。如果先零灭亡，罕、幵依然不服，等到正月再进攻它，既符合原定计划，又合乎时宜。现在就发兵进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赵充国这份上书六月二十八日递上去，七月五日就下达了御旨，皇上准从赵充国的意见。

赵充国率领部队来到先零所在地，敌人在此长期屯聚，懈怠松弛，望见汉朝大军，扔下车辆辎重，企图渡过湟水逃遁。敌人后退的道路狭窄，赵充国在后徐行驱赶。有人说："有利的追击应该快速，这么行走太慢了。"充国说："此乃穷寇，不可追逼得太紧，慢慢地追，它会不顾一切地逃走，追逼得太急了，它会回过头来拼命。"结果，在追击中敌人溺水而死的有好几百，投降的、被斩首的有五百多，缴获马、牛、羊十余万头，车辆四千多。部队进入罕羌所在地，赵充国下令，不许焚烧村落房屋，不许在田里割草放牧。罕羌听了，高兴地说："汉朝果然不打我们。"酋长靡忘派使者来说："愿意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赵充国上报皇帝，答复未到之际，靡忘来归顺，充国设酒筵招待他，仍让他回去宣扬汉朝的宽威。护军以下的将领们都反对充国的作法，说："这类反叛的敌人，不可以擅自放他回去。"充国说："诸位只是贪图在法律上保全自己，不是忠心为国家打算。"话音未落，皇帝的御旨到了，正是准许赦免靡忘，以赎罪论处。后来，罕羌竟未动兵就顺服了。

不久，皇上下令破羌，强弩将军到边塞，在十二月与赵充国合力进攻先零。当时羌人投降的人已有万余，充国估计先零快要垮台了，计划把骑兵撤回，屯田以待先零自行垮台。写好的奏折还未上

报，就见到皇上下令进军的御旨。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有所惧怕，托人来劝充国，说："如果受命出兵，其结果是损兵折将，以致倾覆国家，那么，将军坚持自己的意见还可以；如果只不过是当前打仗的利与害问题，又有什么值得争执的呢？有朝一日，不符合皇上心意，派来御史指责将军，将军的性命难保，还谈什么安邦定国呢！"充国听后十分感叹地说："这些话是多么不忠心啊！想当初要采纳我的建议，羌敌何以闹到这个地步？先前让推荐适宜去羌地巡察的人，我推荐辛武贤，丞相、御史却再派义渠安国，结果使安抚羌族的事情败坏。再有，金城、湟中谷子一斛八钱时，我向耿中丞建议说：'买进三百万斛谷子，羌人就不敢动了。'耿中丞请示买进一百万斛谷子，而实际上只买进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度出使时，还动用了近一半。我的两个建议都没能实现，所以羌人才敢于造反。这可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事情已过，可不必再提。可现在战事持久不得解决，四邻小国有波动，相互影响引发动乱，纵使有明智的人，也没有办法妥善处理，令人忧虑的何止羌族呀！我决心坚持己见，对于圣明的君主，是可以进谏忠言的。"

于是，赵充国送上关于屯田的奏折，说："臣所率领的军官、官吏、士兵和马牛，所用粮草甚多，战事持久下去，徭役不息，恐怕出其他变故，给皇上添忧虑，实在不是原本决定的朝廷策略。羌人易以计策收服，难以用兵消灭。所以愚臣认为攻击羌人是不妥当的。估计从临羌以东至浩亹，原先羌人耕种的土地和公田，还有没有开垦过的土地，大约有二千顷以上，这一带的邮亭，已多半毁坏了。臣曾派士兵入山砍伐木材，约有六万余根，都堆放在河边。臣希望把骑兵撤回，留下步兵一万零二百八十一人，分别驻扎各要塞，待春暖冰河解冻，木材可顺流而下，用来修缮邮亭，疏浚沟渠，修建湟峡以西的桥梁七十座，使交通一直通达鲜水左右。同时从事农耕，每人田赋二十亩。四月青草滋生时，调动郡城骑兵和胡骑部队各千人，到这里放牧，同时为屯田者进行巡逻护卫，农牧收获运入金城

郡，增加其储备，可节约大笔开支。当前大司农所调配的粮食，足够万余人一年的食用。送上部队屯田地区和需用器具的簿册，请皇上审核批准。"

皇上回信问道："依将军之计策，敌人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歼灭？战事什么时候得以解决？研究妥再回奏。"

赵充国回报皇上说："据臣所知，帝王的军队不受残破而获取胜利，是由于贵在战略而贱视交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的风俗习惯虽不同于礼义之邦，可他们的避害就利、爱护亲戚、害怕死亡，是与汉人一样的。如今敌人丧失了肥沃的土地和茂盛的草原，因为逃奔远地而异常凄苦，虽是骨肉至亲，却彼此叛离。这种情况下，圣上班师撤退，停止军事行动，留下万人屯田，这是顺天时，合地利，可以战胜敌人。即使敌人未即刻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一个月之内，战事肯定可望解决。羌敌正在瓦解，先后投降者已有一万零七百余人，接受我们教育返回的情况也有七十起，此乃不用动武即可使羌敌瓦解的办法。臣慎重陈述罢兵屯田好处十二条：九支步兵，官兵万人留下屯田，守卫边防，种田取食，既有威，又有德，这是第一条。由于屯田排挤了羌人，他们不得返回肥沃之地，贫困使他们愈加分裂，这是第二条。当地居民得以和士兵同样种田，不至于影响农业生产，这是第三条。军马一个月的食用，大约相当种田士兵一年的食用，撤回骑兵可以节省大量开支，这是第四条。到春天，士兵循湟河水道运谷子到临羌，以示羌人，耀武扬威，可产生制止敌人向我进攻的重大影响，这是第五条。用闲暇时间，把先前堆积着的木材运出去，修缮整治邮亭，充实金城，这是第六条。出兵作战，冒险行事，侥幸取胜，不出兵作战，却让反叛的敌人逃窜到寒苦的地方去，遭受霜露、疾病、冻疮之患，我们可以得到坐取胜利之势，这是第七条。免除历经艰难险阻追击敌人而造成伤亡之害，这是第八条。对内我们无损于威武，对外不给敌人钻空子的机会，这是第九条。不惊动河南部的

大幵部落，免除它发动叛乱之忧虑，这是第十条。修建湟河中的桥梁，直通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这是第十一条。大量费用既可节省，老百姓的徭役也可减息，可以戒除意外的变故，这是第十二条。罢兵屯田可得十二条好处，出兵交战丧失十二条好处。请把这个建议公布于大臣们，以斟酌采择。”

皇上又回信说：“所谓‘一个月内可望解决’是说今冬吗？还是说什么时候？将军为什么唯独不考虑我们大批军队撤回后，敌人会把青壮年纠结起来，袭击骚扰我种田人和屯兵、又来杀掠边民，这要采取什么方法阻止呢？请将军深思熟虑再奏。”

赵充国再次上书说：“据臣所闻，军事以计谋为本，多计谋的战胜少计谋的。先零羌的精兵，现在所剩不过七八千了，土地丧失，远逃在外，四分五裂，饥寒交迫，反叛为降者不绝。愚臣认为羌敌的崩溃，指日可待，最迟不过明春，所以说一个月之内可望解决。臣考虑到，北方从敦煌到辽东一万一千五百多里的边防线，各要塞有将士几千人把守，敌人多次大举进犯都不能有所危害。如今骑兵虽撤回，但敌人看得见屯田精兵上万人。从现在算起，满三个月，敌人的马匹变得羸瘦，肯定不敢把妻子儿女丢弃在别的部落中，跋山涉水，远地而来进犯，更不敢带妻子儿女这些累赘，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依臣愚见，敌人会自行瓦解，正是我军不战而敌人自灭之计策。至于小股敌人骚扰，有时杀害边民，这原本是不可能完全禁绝的事。臣知道，战斗没有绝对获胜的把握，就不可轻易地动手交战；进攻没有肯定占领的把握，就不可轻易地兴师动众。如若出兵，虽不能消灭先零，但能够禁绝敌人一切小规模的侵掠，那么出兵还可以。现在，同样情况下，要放弃坐取胜利的办法，采取冒险的行动，发兵交战，最终得不到好处，徒然使自己的人马劳顿，不可以这样在羌敌面前行事。再者，大军出击，不可返回，湟中又不可空虚，这就要再征发差役，愚臣认为这样不妥当。臣独自想过，如果遵命出塞，率领大军远征，把车辆和武器散布漫山遍野，纵然没有寸尺战

功，却可以幸免被猜疑，而且事后也不会受责难。然而，这是不忠心的人臣利己之行为，决不是圣上社稷之福。”

赵充国每次奏报，宣帝总要召集众臣商议。最初，同意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后来有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皇上降旨质问那些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都叩头认罪。丞相魏相说：“臣很愚蠢，不懂得军事利害。后将军多次提出的军事计策都很有道理，相信他的计策肯定会行之有效的。”于是，皇上给充国复信，表示采纳并嘉奖他的计策。与此同时，破羌、强弩将军多次上书力主进攻，以致两种计策同时施行。皇上命令两将军和中郎将赵卬领兵出兵。结果，强弩将军收降敌人四千余人，破羌将军斩首两千级，中郎将赵卬斩首和收降共两千多人，而赵充国一边收降也有五千余人。宣帝下诏各路兵马班师撤回，只有赵充国的部队留下屯田。

第二年五月，赵充国上奏，说：“羌兵原本有五万，在战争中被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死湟水中和饥饿而死者五六千人，估计逃脱者与煎巩、黄羝两部落一起逃亡的，不过四千人。羌族靡忘等保证自己肃清残余。请准许撤退屯兵。”皇上准奏。赵充国整顿军队回归。好友浩星赐前来相迎，对赵充国说：“很多人都认为，破羌、强弩将军领兵出击，斩杀和俘虏众多，致使羌敌崩溃。然而有见识的人认为，敌人情势穷困，即使不出兵，也必定会自己降服的。将军去拜见皇上，应该归功于二将军出兵，说‘非愚臣所及’。这样，将军才不致有所闪失。”充国回答说：“我年事已高，爵位已极，怎么能够为了避嫌而隐瞒当时的真实情况，欺骗圣上呢？军事行动乃国家大事，要为后世所取法。老臣不趁残年，向皇上说明军事利害，臣若突然死去，又有谁来说这些话呢？”终于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行事，皇上很同意他的计策，让辛武贤回酒泉仍任太守，赵充国仍任后将军。

这一年秋天，羌族若零、离留、且种和儿库，共谋斩杀了先零大酋长犹非、杨玉的首级，联合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等酋长，率领煎

巩、黄羝部落的四千余人，归顺了汉朝，汉廷封若零、弟泽两人为帅众王，其余的皆为侯、为君，开始把金城作为归降的羌人居住的"属国"。汉宣帝下诏书，让推荐护羌校尉的适当人选。当时赵充国正在患病，听说四府共推辛武贤的小弟辛汤，他即起身上奏，说："辛汤嗜酒，不可以让他去管理外族的事务，不如任用辛汤的哥哥辛临众。"当时辛汤虽已领符节受命了，汉宣帝还是命令改派辛临众。后来辛临众因病免职，五府重复推荐辛汤继任。辛汤数次酗酒，醉骂羌人，羌人又反叛了汉朝，果然不出赵充国所料。破羌将军辛武贤深恨赵充国，上书告中郎将赵卬泄漏宫中机密，宣帝将其交付法办，赵卬自杀。

（王韵华）

参考书目：

《汉书》：《赵充国传》

《通鉴纪事本末》：《赵充国破羌》

呼韩邪归汉

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汉武帝展开对匈奴的战争,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伤亡、损失惨重,势力大大削弱,汉帝国北方边患大为缓解。匈奴单于常有与汉和亲之意,未能实现,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汉边境的骚扰。汉武帝后期,特别是李广利、李陵两名将战败投降匈奴后,匈奴势力又见强大。始元二年(公元前 85 年),匈奴派右贤王与犁污王率领四千人马进攻张掖,结果被汉军打败,犁污王被射杀。匈奴谋求向西扩张,多次攻打乌孙。本始二年(公元前 72 年),匈奴再次攻打乌孙,乌孙向汉求援。汉征调十五万骑兵,与乌孙五万兵联合迎击,掳获三万九千余人,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七十余万头。这年冬天,匈奴单于亲自率军出战,恰逢天降大雪酷寒,人马多半冻死。次年,北边丁零、东边乌桓,乘虚进攻匈奴,乌孙又还击,使匈奴人马被杀各数万。这是西汉时期汉匈战争以来最后一次大战,结果匈奴惨败。其间匈奴属国纷纷起兵,脱离匈奴的羁绊。从此,匈奴走向衰弱。

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匈奴的人口和牲畜锐减。冒顿单于曾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由于战事损耗了一半。整个战争中匈奴人畜伤亡、散失,可说不可胜数。战败的匈奴还丧失了土地,尤其是水草丰盛、冬温夏凉、适于游牧的河西祁连山和河套北面阴山两地区,不得不退居漠北。这里是连天大沙漠,寒苦少水草,加上天灾人祸袭击,匈奴人畜更为减少。地节二年(公元前 68 年),匈奴地区大饥荒,人畜死亡十分之六七。游牧地区减少,人畜锐减,使匈奴社会经

济严重衰退，国力大衰。

这时期，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混乱，相互倾轧。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由于单于继承问题，内讧频仍。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执政大臣郝宿王刑未央派人召集诸王前来商议，决定后继单于人选问题。诸王未到达时，虚闾权渠单于的颛渠阏氏与其弟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右贤王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继位后，十分凶恶，竟把刑未央等杀死，而任用都隆奇，又尽把虚闾权渠单于的子弟近亲黜免，以自己的子弟取而代之。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稽侯珊既不得继位，又被排斥，逃亡到左地他的妻父乌禅幕那里。

握衍朐鞮单于暴虐嗜杀，引起族内普遍的不满和反对。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左地的贵族和乌禅幕乘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随即调动左地兵将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内失民心，外乏援助，无力抵抗，遂自杀身亡。左大且渠都隆奇逃亡到右贤王处，其民众皆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进人单于庭，得到匈奴的统治权。数月后，呼韩邪即行罢兵，命各归故地。可是，这一年冬天，都隆奇和右贤王共立握衍从兄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并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兵败出走。屠耆单于回归，任命其长子都涂吾西不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二人留居单于庭。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屠耆单于让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领二万骑兵屯驻东方，以防备呼韩邪。这时西方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合谋，共谗右贤王，扬言他要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把右贤王父子杀死，后知其冤枉，又把唯犁 当户杀死。呼揭王恐惧叛逃，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之，即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至此，连同屠耆单于和呼韩邪单于，形成

了“五单于争立”局面。随即五单于彼此混战。屠耆单于率兵东击车犁单于，派都隆奇攻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北，逃往西北，与呼揭单于合，约有四万人。乌藉、呼揭各免去单于号，共同拥立辅佐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之，亲率四万骑兵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失败，向西北逃去。第二年秋八月，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弟右谷蠡王等西击屠耆单于，杀其屯兵万余人。屠耆单于即领兵六万前来攻打呼韩邪。结果，屠耆单于兵败，自杀身亡。于是，都隆奇和屠耆的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逃亡降归了汉朝。车犁单于投降了呼韩邪。冬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和其父呼遬累乌厉温敦看到匈奴如此紊乱，率其民众数万人也归顺了汉朝。乌厉屈封为新城侯，乌厉温敦封为义阳侯。同时期，李陵之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把他们捕获斩杀，重返单于庭。此外，这时期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在西边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左贤王呼屠吾斯在东边自立为郅支单于。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闰振单于率众东击郅支单于，结果战败被杀。郅支势力渐强，又去进攻呼韩邪，呼韩邪败北，郅支单于占据单于庭。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处境窘迫，左伊秩訾王为他出谋划策，劝他称臣归附汉朝，取得汉朝的支援，这样匈奴才能安存。呼韩邪单于就此事询问诸大臣，大臣都说：“不行。匈奴从来崇尚武力，威名惊震诸部族。现在兄弟相争，哥哥死了，还有兄弟，虽死威名在，子孙还可以做首领。汉朝虽强大，尚且还未能兼并匈奴，为什么要违反古代制度，对汉称臣，卑辱先单于，为诸国耻笑呢?即使暂时得以安存，又怎么能够做各部族的首领呢?”左伊秩訾王说：“话不能这么说。一个国家有时强，有时弱。现在汉朝正强盛，乌孙等国家都臣服了汉朝。我们自且鞮侯单于以来，日渐衰弱，没有复兴，虽然勉强支撑着，可没有一日安定。现在投靠汉朝则安存，不投靠汉朝则危亡，要想安存，没有比投靠汉朝更好的办法了。”诸大臣久议不决，呼韩邪还是听从了左伊秩訾王的计策，带领部下南

行至汉边塞外，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朝。郅支单于听说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朝。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冬十二月，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五原塞（今内蒙包头西北），请求来年正月进长安朝见天子。

第二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贺。汉宣帝以贵宾之礼，隆重接待，派遣车骑都尉韩昌远道迎接，并在呼韩邪途经的七郡，每郡道旁安排两千骑兵充当仪仗和护卫。在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呼韩邪单于拜谒汉宣帝，按照诏书称藩臣而不唱其名。宣帝颁给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及盭绶，赐以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箭四支，棨戟十支，车马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丝纱、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仪完毕，单于先行到长平下榻休息。皇帝来到长平阪，颁诏宣称，会见时单于可不用下跪，其左右当户、群臣都可以列席。届时，各部族的君长、王、侯全部到渭桥迎接，单于在隆重的迎接中抵达长安城。皇帝在建章宫举行盛大宴会，款待单于，还请他参观了各种珍宝。二月，单于一行准备返回。汉廷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领一万六千骑兵和边郡士兵千余，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杭锦后旗西），还令董忠等驻扎塞外，保卫单于；同时，调拨谷米和干粮三万四千斛，援助匈奴。呼韩邪单于临行前自己请求，愿留居光禄塞（今包头市西南）下，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保卫汉的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乌拉特中后旗北）。汉朝接受了他的请求。这就是呼韩邪单于第一次朝汉的经过。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来朝汉，与第一次一样，受到优渥的接待和赠赏。二月，呼韩邪单于返回。

当初呼韩邪单于朝汉时，郅支单于以为他势力虚弱，归汉后不会返回了，就引兵西移，企图攻占右地。与此同时，原从属呼韩邪的屠耆单于的小弟，也逃奔右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伊利目与郅支交战，被郅支所杀，其五万余兵马被吞并。郅支听说汉朝出兵和谷

来援助呼韩邪，于是就留在右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难以统一匈奴，就尽力向西域扩张。从坚昆以东至单于庭七千里，南至车师五千里，均在郅支势力控制之下。

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呼韩邪单于又一次上书汉廷，说明匈奴民众的困乏。汉朝从云中、五原郡调拨谷子二万斛给呼韩邪单于。

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郅支单于自以为距离汉朝道远，又怨恨汉朝拥护呼韩邪而不帮助自己，因而困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又遣使去汉要求索还侍子。汉廷商议后，遣卫司马谷吉送侍子回坚昆。郅支单于恼怒，竟然杀死谷吉等人。他自知负于汉，又见呼韩邪日渐强大，害怕袭击自己，打算再西移。此时，康居多次被乌孙所困，郅支以为有机可乘，遣使联合康居共击乌孙。郅支军队西进，途中很多人遇风寒而死，所余不过三千人。到了康居，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郅支也将女儿许给康居王。郅支数次借调康居军队攻击乌孙，攻陷赤谷城（今伊斯色克湖南岸），杀戮百姓，驱抢畜产，致使西部五千里之地空虚不居。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呼韩邪单于所属人丁兴旺，塞外牲畜遍野，单于认为足以自卫，不再畏惧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不久，汉依从单于的意愿，准他北归单于庭。

郅支单于借康居力量打败乌孙后，以大国自居，不再对康居以礼相待，杀康居王的女儿、康居的贵人和百姓数百人，把他们的四肢砍下来，投入都赖水里。郅支还征发康居的百姓为他修筑郅支城，每日五百人服役，花费了两年的工夫。他遣使到阖苏、大宛诸国去，强迫它们进贡，这些国家不敢不依从。汉朝三次派使者来，要求把谷吉等的尸首运回去，郅支不但不答应，还困辱使者。郅支骄慢、叛逆，为汉朝所不能容忍。他四处扩张，残害百姓，颇不得人心。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镇守乌垒城的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人甘延寿和他的副校尉山阳人陈汤，聚兵四万余人，在西域十多个国

家帮助下，一举攻陷郅支城，郅支单于被创伤重而死。四年春正月，郅支首级送到长安。五年，呼韩邪单于听到郅支被杀的消息，既高兴又害怕，上书表示"愿入朝见"。

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朝汉，自言愿为汉家女婿，与汉和亲。汉元帝将后宫宫女王嫱赐给呼韩邪，单于甚为欣喜。上书表示，愿代汉保障边塞，从上谷以西到敦煌，请汉撤去边备和驻塞吏卒，以便天子人民休养生息。天子召集群臣商议，群臣多认为可以允许；唯有郎中侯应了解边防之事，认为不可以允许。在回答皇上询问时，他详细阐述理由，指出匈奴的天性，是"困则卑顺，强则骄逆"，交出边防是很危险的。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下诏"勿议罢边塞事"，并遣使口谕单于，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

王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长江沿岸）人，民家姑娘。汉元帝即位时，王嫱被选进宫，为普通宫女，进宫数年不得见皇帝。听到选宫女出塞的消息，她主动"请掖庭令求行"。汉元帝批准了王昭君的请求。

这一年冬，昭君随同呼韩邪单于前往漠北单于庭。临行前，在为呼韩邪举行的盛大饯别宴会上，昭君容貌丰美，雍容大方，使汉宫为之生辉。汉元帝赠送王昭君锦绣、杂帛等各种纺织品一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和黄金、图册，以及其他贵重礼品，并颁发诏书，改年号"建昭"为"竟宁"，以庆贺郅支伏诛和呼韩邪入朝和亲，祝愿长久安宁。昭君入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不久，生一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即昭君婚后三年，呼韩邪单于病故，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按照匈奴的习俗要娶昭君为妻。昭君曾上书要求归汉，汉成帝令她"从胡俗"。于是，昭君又作了复株累若鞮单于的阏氏。后来王嫱生有二女。

呼韩邪单于归汉后的五六十年间，汉与匈奴之间出现了一个"边城晏闭，牛羊布野"的宁和局面。呼韩邪死后，自复株累若鞮单

于以下，单于多次朝汉，或遣侍子入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匈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四年（公元前25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匈奴搜谐单于入朝，未入塞病死。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入朝。自黄龙以来，单于每次入朝，汉朝都照例赠送一次比一次更丰厚的锦绣、缯帛、衣、絮等物，以慰接之。这种和睦关系到王莽执政期间，开始被破坏。

（王韵华）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匈奴归汉》

林幹《匈奴史》

纪庸《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

王克骏《王昭君》

恭显用事

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三月,汉宣帝重病卧床,即安排后事,任命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位大臣受遗诏辅政。冬十二月,宣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奭即位,为汉元帝。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二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初元二年(公元前 47 年),乐陵侯史高总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萧望之是名儒,与周堪同是元帝的老师,天子格外信任他们,常与之商议朝纲大事。望之又推荐刘更生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史生能文敏才,曾为谏大夫;金敞是金日磾的侄孙,为人正直。如此,四人同心协力辅佐汉元帝,劝皇上循古制匡正国事,皇上很听从他们的意见。史高不过是充其位而无所尽职,所以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欲结党营私,对付萧望之等。史高开始与两个宦官弘恭、石显勾结起来,形成恭显专权。

弘恭、石显在宣帝时为宫中内侍,霍氏族诛后,二人始受重用,随身伺候皇帝,掌管大臣们的奏章和其他公文。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后多病,且才能远不如宣帝,事无大小,委托恭、显裁决,恭、显权贵倾朝,百官多阿附之。恭、显与车骑将军史高互为里表,往来密切,参与秘事,独断专横,处处与萧望之等作对。

萧望之等察知许、史两家放纵,恭、显擅权,十分忧虑,向皇上进谏,指出中书是政事之本,国家枢机,应该通明公正行事,请皇上

罢黜中书宦官，上法古制不近刑人的遗训。元帝久而不决，高、恭，显更加忤逆，还把刘更生改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举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人郑朋欲巴结萧望之，上书给元帝，告发车骑将军史高派人到郡国敲诈勒索，还诉说许、史两家子弟的罪过。周堪见到奏章后，请示元帝让郑朋暂留金马门，等待皇上召见。郑朋又给萧望之写信，把望之比作周公、召公、管子、晏子，表示愿效劳望之。望之接待了他，后来了解到他是邪恶小人，拒绝再见他。郑朋即怨恨起望之等，转而投靠许、史，推诿上书一事是周堪、刘更生教他干的。侍中许章把郑朋引见给元帝。郑朋回来后扬言："我见到皇上，揭发了前将军五小过，一大罪。"此外，还有一人与郑朋一样污秽，叫华龙。他原想投奔周堪等，未被接纳，也与郑朋搞到一起，都成为恭、显等的走卒。

弘恭、石显二人处心积虑要除掉萧望之等，令郑朋、华龙趁萧望之出去休沐之日，向皇帝呈递奏章，告发萧望之等结党营私，欲罢车骑将军史高，排挤许、史两家。元帝见状交弘恭查处。望之对他们说："外戚占居高位，骄奢不法，臣欲匡正国家，根本没什么邪念。"恭、显向元帝奏报，说："望之、堪、更生结为朋党，相互称举，数次诬陷大臣，诋毁离间皇亲国戚，极欲独揽大权。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刚即位，还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胡里胡涂地答道："可。"后来元帝有事召见堪、更生，得报"下狱了"，大为吃惊，说："不是让廷尉查问吗？"并责怪恭、显，二人叩头谢罪。皇帝责令赶快把他们放出来。恭、显急忙派人去找史高谋划对策。史高进见元帝，说："皇上刚即位，天下还不知陛下的威德。先把太傅少傅下狱审查，想必是有罪过。现在不问清有无罪过，就要放他们出狱任职，会引起众口议论。不如罢黜他们的官职，以免出尔反尔。"元帝下诏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念"傅朕"之德，赦免其罪；周堪、刘更生贬为平民。没过多久，在这一年的四月，元帝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兼给事中；还想召回周堪、刘更生，打算

安排为谏大夫，恭、显得知后连忙阻拦，结果都做了中郎。元帝仍很信任萧望之，欲让他充任丞相。恭、显和许、史两家子弟、侍中等都妒忌望之等，并共谋置他们于死地。这时候，刘更生为解除危机，托他的一个亲戚出面，上书给元帝，指出目前地震星变等灾难，都是恭、显等人所致，请皇上罢黜宦官，重用望之等，这样才能避邪免灾、天下太平。这份书奏，恭、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他们请皇上追究，果不出他们所料，于是，把刘更生逮捕下狱，后免为平民。

这时候，萧望之的儿子也上书，为其父先前无辜遭受处罚而诉讼。大臣们奉命商议此事，回奏说："萧望之的罪过是明摆着的，并没冤枉他，现令子上书为他辩解，有失大臣的体统，是对皇上的不敬，应该逮捕下狱。"恭、显深知萧望之素来高节，不忍屈辱，就对皇上说："望之先前有幸不受罪，又赐爵位，还不思悔过，反倒心怀怨恨，教子上书，归咎皇上。他自以为是皇上的老师，终不得受罪。不把望之下牢狱，克服其不满情绪，圣朝就无法施以恩厚。"元帝说："萧太傅性格刚烈，怎么肯就狱？"显等说："人命至重，望之不过是语言薄罪，皇上不必过多担忧。"元帝又认可其奏报。

冬十二月，恭、显得到皇上认可后，迅速派出执金吾车骑包围萧望之的住宅，来使召其受审。萧望之问其门生朱云该怎么办。朱云重视名节，劝他自尽。于是，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做过将相，如今年逾六十了，还得坐牢狱，忍辱苟生，不亦鄙乎！"然后饮毒药自杀了。元帝听到萧望之死耗，大吃一惊，拊手说："我说他不肯就狱的，现在果真如此！"召来恭、显责备他们逼杀了萧望之。恭、显佯装惊慌，频频叩头谢罪。皇上见状，责骂他们几句也就算了。恭、显如此欺君，陷害忠良，元帝无所醒悟，终不能诛杀恭、显，致使他们专权更加肆无忌惮了。

萧望之自杀后不久，恭、显又打算谋害周堪，还未得下手，弘恭即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元三年（公元前 46 年），元帝又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其弟子

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石显嫉恨周堪、张猛等,屡屡诬陷诋毁他们。刘更生担心他们受危害,自己虽已罢官,仍直言上书,奏章长达数千言,引经据典,进谏元帝仿古明圣铲除朋党,诛杀佞邪。石显见此书,与许、史更加怨恨刘更生等,伺机报复。

这一年,多有天灾,显和许、史之流都说这是周堪、张猛用事所致。元帝还是信任周堪,但由于流言蜚语,又有所疑虑。当时长安令杨兴以其才取信元帝,在元帝面前曾称誉周堪。元帝想他会赞誉周堪的,就问他:"朝臣多有说光禄勋不好,究竟怎么样呢?"杨兴这个人本性刁猾,他猜疑皇上是不信任周堪了,就顺势说:"周堪非但不能为朝臣,就是退居乡里也不可以。臣知道很多人说先前周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罪应诛杀。臣前日所以说堪不可诛杀,是为国养恩德,并非真崇尚周堪。"元帝又说:"既然如此,现在该怎么办呢?"杨兴回答:"愚臣以为可以赐他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不让他再掌管朝政。这是圣上不忘恩师之良策。"杨兴退下后,元帝仍是疑惑不定。正在这时候,又有城门校尉诸葛丰上书告周堪、张猛之罪过。

元帝初年,诸葛丰由侍御史升为司隶校尉,他为人刚直而鲁莽,不畏权贵,常持节捕捉奸邪,对周堪、张猛多有赞美之言。有一次,有一案情牵连许章,诸葛丰上奏许罪过,又擅自追捕许,致使许驱车闯入宫中。元帝认为诸葛丰专擅无礼,又不忍心将他下狱,降为城门校尉。为此,诸葛丰不反省自己,倒是怨周堪、张猛不为他伸冤。他致书二人,未见回音,于是,上书告堪、猛之罪过。元帝则认为他不顾前言,毁誉恣意,只是怜他年迈,不忍加刑,免其为平民。此时,元帝想这么多人告发堪、猛,必是他们贞信不立,不治不妥,虽叹惜他们的才能,还是将他们迁出京都,降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元帝不能明察善恶,辨别是非,自然不能劝善惩恶,赏罚分明。石显之流愈加放肆地党同伐异。

前长沙太傅贾谊的曾孙贾捐之与杨兴为好友。捐之常言石显之短处，所以总不得官位。杨兴以其才能有幸出任长安令，捐之请杨兴为他美言，推荐他出任京兆尹。杨兴夸耀捐之文笔妙天下，若为尚书令，那可比五鹿充宗强多了。五鹿充宗正是石显的同党。捐之说："京兆系郡国之首，尚书为百官之本，你我二人得之，天下大治。"捐之又欲攻击石显，杨兴却说："石显正值显贵，深为皇上信用。我们欲进见，必从我计。"于是，捐之与兴商议，先联合举荐石显，以其美德，请赐爵关内侯；又引举显的兄弟为诸曹，然后再推荐杨兴为京兆尹。对兴、捐之合谋利用石显权势谋取官职，石显早有所闻，抢先向皇上告发他们的密谋，兴、捐之被关人牢狱，由石显发落。结果贾捐之官梦未圆，却落个身首异处；杨兴失长安令，成了囚徒。

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又发生了地震和日食。元帝指责那些先前把天变相归咎于周堪、张猛的大臣，他们都叩头谢罪。元帝下诏任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猛为太中大夫，兼给事中。但是，石显仍管尚书，而且尚书五人，都是同党。周堪孤单一人，难以对付他们。由于石显作梗，周堪不得见皇上，有事还得石显代奏，事事由其决定。周堪郁愤成疾喑，不能言语，不久便故去。接着，张猛遭石显的诬陷，又被逮捕。张猛不肯受辱，于公车前自杀。

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东郡有个师从梁人焦延寿学易的人，名为京房。他精通经书，又十分憎恨石显等人专权，时常利用被元帝召见讲经议事之机，进谏元帝举贤锄奸。这时期，中书令石显专权，与尚书五鹿充宗为奸，二人用事。有一日，京房与皇帝交谈。房问皇帝："周朝的幽、厉两君王，何以危亡？任用的是什么人？"元帝说："两君王不明智，任用奸佞，所以危亡。"房说："幽、厉知其奸佞，为何还任用他们？"元帝说："把他们视为贤人了。"房说："那么，当今何以知其不贤呢？"元帝说："从先朝的乱世危亡而知。"房说："如此看来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乱。那么，幽、厉为何不求贤而专用

不贤，自取危乱呢？"元帝说："临乱君主，多不善明辨贤恶，否则，怎么会有乱世君主呢？"房说："齐桓公、秦二世同样明晓幽、厉之过，然而他们一个重用竖刁，一个重用赵高，致使纲政日乱，盗贼四起，他们怎么不以幽、厉为戒，有所觉悟呢？"元帝说："唯有明主才能有所觉悟啊！"此刻，京房免冠叩头，说："春秋年间事故变异，以示万世之君。陛下即位以来，地震星变，水蝗灾害，到处饥疫，盗贼不绝，如此状况是乱、是治呢？"元帝说："当然已是极乱！"房说："当今朝廷任用什么人？"元帝说："我以为还有幸不是那些乱世的不贤。"房说："臣以为不然，恐怕后人看我们，如同我们看古人呀！"元帝略有所思，说："当今致乱者是谁呀？"旁说："皇上圣明，能够自己察觉知晓的。"元帝说："实在不知晓，若是知晓，何以任用呢？"京房不敢明示，只请皇上在最信任的，能参与大事运筹帷幄的，掌管天下百僚的人中间明察。京房指的是石显。皇上心里也明白，对房说："知道了。"京房告辞退去。然而，后来并未见到皇上对石显等有所触动。枉费京房一番苦谏，真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

相反，石显、五鹿充宗等嫉恨京房，向皇上建议，让他远走，去为郡守。元帝果然以京房为魏郡太守，还让他以考功法治郡。京房离都月余至陕，竟被下狱。究其原因，是因岳父张博而受牵连。张博系淮阳王刘钦的舅舅，曾从房学易经，并将女儿嫁为房妻，京房每次进见皇上，回来必与张博述说其情况。张博又转告淮阳王刘钦，且言朝中无贤臣，让房为王作求贤奏章。石显察之，告发京房与张博合谋，诽谤朝政，归恶天子，欺诈诸侯王等，把他们都逮捕下狱，后服刑弃市。御史大夫郑弘素与京房友好，他曾赞同京房与元帝谈论幽、厉事。在京房弃市后，弘受诛连被罢官，黜为平民。还有中丞陈咸敢于直言，多次抨击石显；槐里令朱云是萧望之的门生，与咸志同道合，结为好友，结果他们都被石显同党治罪下狱。

石显专权，更是狡黠取宠。石显施诡计，密奏皇上，说宫中有所征发，不论早晚，如若夜间宫门关闭，耽误征发，请陛下诏准令开

门。皇上准奏。石显就常夜出入宫中，遇闭门，即传诏开门。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告石显"矫诏开宫门"。元帝则付之一笑，还把上书给石显看。石显忙下跪，假惺惺地说："陛下过于宠信小臣，群下无不嫉妒，欲加害于我，唯有圣上知我。愚臣微贱，不能以一身躯称快万群，任天下怨恨。但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而无怨！"元帝听他这番话，又垂怜他，不只劳勉石显，还给予厚厚的赏赐。

石显趋炎附势，专营权术。当初，冯昭仪得宠，而其父冯奉世及子冯竣都是公卿大臣，官位显赫。石显倚势献谀，举荐竣的弟弟冯逡入侍帷幄。天子召见，欲赐侍中。可是，逡见到元帝，却告石显专权误国，皇上大怒，使他为郎官。石显听了，自有快意，同时与冯氏亦结下怨根。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御史大夫位缺，朝臣多举荐冯逡兄大鸿胪野王，称他行能第一。因石显与冯氏有嫌隙，所以当元帝就此事问石显时，他说："九卿无过于野王。但是，野王系冯昭仪亲兄，臣恐怕天下后世会认为陛下徇私，专门重用后宫亲戚。"元帝听后不悟其实意，却言其善，另任太子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

这一年五月，汉元帝驾崩，太子骜即位，为汉成帝。成帝尊母后王氏为皇太后，封母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王氏欲独揽大权，王凤奏请成帝，徙显为长信太仆。石显权势已去。于是，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等条奏石显及其一党罪恶。成帝令石显与妻子徙归故郡。显忧闷不食，途中害病死去。其党牢梁、陈顺等罢官，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

(王韵华)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恭显用事》

王氏专权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太子宠爱的司马良娣死了。太子悲痛万分,宣帝命令皇后招选美人送入太子宫,特别是要选那些能使太子欢愉的人。元城的王政君就是在此时被选中入宫的。王政君是御史王贺的孙女。这一年,王政君生了一子,宣帝很喜欢这个孙子,就亲自为其取名为骜,字太孙,成为嫡皇孙。宣帝死,元帝继位,王政君成为皇后。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四月,立刘骜为太子。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元帝死于未央宫。六月,刘骜即位,是为成帝。即位之初,成帝就任命其舅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成帝又封其舅父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封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关内侯的爵位。

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因天气出现黄雾,成帝召公卿大夫就此事畅所欲言,不要有所避讳。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向成帝说:"这是阴盛侵阳之气。高祖时期有规定,非功臣不能封侯,而太后的几个弟弟都是无功为侯,这是外戚中未曾有过的,故上天对此有异议。"王凤对此有些畏惧,上书乞骸骨,提出辞职,成帝不准。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夏,成帝召集一些以往能直言不讳的公卿大夫,前往白虎殿议事。这时,成帝已委任政事给王凤处理,前往议事的大臣对此多有异议,谷永说:"现在四方平静,蛮夷宾服,皇上可万万不能失天下心。"

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六月,成帝加封他的舅父们。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因五人同日加封,所以当时被称为"五侯"。

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刘向看到王氏权位太盛太大,就上书成帝,他列举春秋至汉代以来的福祸事例,分门别类,写成十一篇,称作《洪范五行传论》。成帝知道刘向是精忠之臣,之所以上奏折,也是因为王凤等几兄弟之事。然而,成帝最终也没有剥夺王氏的权力。

河平四年(公元前 25 年)三月,琅邪太守杨彤所辖的郡中出现灾害。丞相王商按制度查问。王凤为杨彤求情,王商不同意,并且上奏折,要求罢免杨彤。王凤因此怨恨王商,指使频阳人耿定上书,说王商与其父亲的收房女婢私通;而且其妹淫乱,奴仆杀死了她的情夫,怀疑这是王商教唆的。成帝认为这只是些私生活的过错,不足以危及一个大臣,王凤却坚持搞掉王商。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一向能言巧辩,他又上书极力诋毁王商。有司也奏请皇上下诏收王商入狱。成帝一向器重王商,知道张匡所言有些过分,就制止说:"不用惩办了。"王凤仍固执己见。河平四年(公元前 25 年)四月,成帝下诏书收回了王商的丞相印绶。

阳朔元年(公元前 24 年)冬,大将军王凤擅权,成帝也只能谦让于他。光禄大夫刘向的小儿子刘歆,有奇才。成帝召见他,他诵读诗赋,成帝特别赏识他,想封他为中常侍。等到让他穿上官服,正式任命之时,左右大臣都说,还没通知大将军。成帝说:"这样的小事,还用告诉大将军。"左右大臣都叩头力争。于是,成帝将此事告诉了王凤,王凤反对,此事只得作罢。

王氏子弟分别任公卿、大夫、侍中、诸曹等,占据朝廷中显赫的位置。杜钦见王凤专权太厉害,就告诫他说:"愿将军像周公一样谦逊,减少一些如秦朝时专权的穰侯一般的威风,放弃武安侯一样的欲望,别使范雎之流有机可乘。"王凤不听,仍自行其事。

成帝无子嗣，身体又不好。成帝的侄子定陶王来朝，太后和成帝遵照先帝之意，厚待他，并想留他在京师，不再回封地。成帝说："我没有儿子，你就留下侍奉我吧。"由于成帝有病，定陶王就留下来了，早晚侍奉皇上，成帝很亲重他。大将军王凤心中不悦。这时正好发生日食，王凤借故说："日食是阴盛之象。定陶王虽是亲属，按理应当在藩国。现在留在京师，不正常，所以上天不悦，应当遣定陶王归国。"成帝对王凤无可奈何，只能同意了。定陶王辞行之时，与成帝二人相对而泣。

京兆尹王章一向忠正刚直，虽是王凤一手提拔的，却不赞成王凤专权，也不攀附王凤。他上书奏请成帝，说："日食是王凤专权、欺主所造成的。"成帝召见他，继续询问此事，王章答道："天道聪明，扶善惩恶。现今陛下无嗣，招定陶王以承宗庙，对于国家十分重要，上顺天意，下安百姓，这是正事好事，应有祥瑞，岂会有灾？之所以发生灾变，是因为大臣专权。大将军借日食之故，遣定陶王归国，是想使皇上孤立，得以专权，这不是忠臣之举。现如今大小政事均由王凤定夺，他不自省，反归咎他人。王凤诬罔不忠，已不只是一次了，前丞相王商是重臣，国家的柱石，人正直，又不肯随附王凤，于是遭王凤谗害。这些事陛下您都亲自见了，足以想见其他陛下所没见到的事情。不应让王凤长久专权，应该让他回封地，选忠良代替他。"

王凤罢免了王商，赶走了定陶王，成帝心中久存不平，听了王章之言，顿时感悟，并采纳了王章的意见，说："你能否为朕寻找一个贤良之臣。"王章推荐了琅邪太守冯野王。此人忠信耿直，而且足智多谋。成帝做太子时，就听说了野王的名气，所以也希望让野王取代王凤。

成帝每次召见王章，都支开左右，当时只有侍中王音在一旁听着，知道了王章所言的全部内容，并将其告诉了王凤。王凤听说后，很担忧害怕，杜钦劝王凤称病。王凤上书乞骸骨，措辞很悲哀。太

后听说后，为之落泪，不思饮食。成帝自幼就依靠并亲近王凤，也不忍心废掉他，就下诏安慰王凤并让他仍然理事。

为了安抚王凤，成帝派尚书拟奏章弹劾王章，说王章有大逆之罪，勾结冯野王，诬陷张美人。廷尉以背叛天子罪将王章打入死牢。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冬，王章死于狱中，其妻子被遣往合浦。从此，公卿见到王凤，都不敢正视他。

冯野王听说王章之事，甚感不安，不久就称病与妻子回杜陵就医。于是，王凤免了野王的官职。

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四月，侍中太仆王音因在王章一事中为王凤立下了功劳，所以被封为御史大夫。王氏权力愈来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自王氏门下。五侯争相奢侈，宾客满门，沽名钓誉。

刘向对陈汤说："如今外戚权势日盛，已到如此地步，慢慢必会危及到刘氏天下。我有幸为刘氏的后人，几代蒙汉朝厚恩，又身为汉室遗老，历事三主，皇上视我为旧臣，经常召见并很优待我，我不说，由谁来说呢！"刘向进谏成帝，说："我听说为人君者没有不想安稳的，然而常常有危险；没有不想长存的，却常有亡国之患，其原因在于失去了驾驭臣子的方法。大臣擅权，没有不为害的。臣子作威作福，害国害家。现在五侯骄奢，肆意妄为，假公济私，倚仗东宫太后之尊，借甥舅之亲，专权恃重，逆者遭诛杀，顺者登堂入殿；排挤宗室，孤立和削弱公族，害怕他们与己分权。历数上古至秦汉，外戚显贵专权，没有达到王氏这般程度的。王氏、刘氏不能并立，如臣下有泰山之安，则君王就有累卵之危。明君应防患于未然，亲近宗室和直言纳谏之臣，疏远外戚，不授以权柄，都遣回封地。这样既可成全太后之意，保住王氏爵禄，又可使刘氏汉朝长安。否则，只能给后代造成忧患。"成帝说："我会考虑的。"然而，最终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秋，王凤病了，成帝数次亲临探望，握

着王凤的手流着泪说："将军病了，你看让平阿侯王谭接替你怎么样？"王凤摇头哭着说："王谭虽是我的至亲，然而行为奢华过份，不能为百姓表率，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臣愿以死保举他。"王凤将死之时，又上书皇上，举荐王音代替自己，并说王谭等五人必不可用。成帝明白，因为当初王谭不肯听命于王凤，而王音则恭敬王凤，卑恭如子，所以王凤举荐他。这一年八月，王凤死了。九月，王音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让王谭领城门兵。安定太守谷永认为王谭失去了职权，就劝王谭辞让，不接受城门之职。从此，王音、王谭失和。

鸿嘉元年(公元前 20 年)六月，成帝封王音为安阳侯。

鸿嘉三年(公元前 18 年)，王氏五侯争相奢华。成都侯王商称病，想避暑，从皇帝那里借住明光宫，而后，又在长安城里挖河，引进沣水于府中，在其中行船。成帝看到这些，心中恼恨，忍下来没说。后来，成帝出游，路过曲阳侯王根的府第，见园中的土山渐台等极像皇宫的白虎殿，大怒。王商、王根二人欲自行黥、劓之刑，向太后谢罪。成帝听说，更加生气，就派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为什么知道成都侯王商等奢侈不轨，隐匿不报，并下诏训斥了王音。同一天，成帝下诏，让尚书将文帝时诛杀将军薄昭的情况禀报上来。王音请罪，王商、王根、王立等背着斧子谢罪，很久才作罢。成帝只是想吓唬他们，其实无意杀他们。

鸿嘉四年(公元前 17 年)，平阿侯王谭死了。成帝很懊悔免掉王谭职务，而没让他辅政，于是就再次让成都侯王商任领城门兵一职。

太后的兄弟八人，只有其弟王曼死得早，没有封侯，所以太后很可怜他。王曼之子王莽自幼为孤儿，也没有封侯。永始元年(公元前 16 年)，在王凤和太后的保举下，成帝拜王莽为黄门郎，官升射声校尉。五月，封王莽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永始二年(公元前 15 年)正月，安阳侯王音死。

三月，成都侯王商任大司马、卫将军。红阳侯王立领城门兵，位

居特进。这年十一月，王商因厌恶陈汤，就奏请皇帝说："陈汤胡言黑龙冬天出来是皇上几次微服出游的结果。"成帝下诏，念陈汤以前有功，只贬为庶民，遣送到边疆。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十二月，南昌尉梅福上书成帝，直吐忠言，将古比今，劝皇帝广开言路，不能授外戚以权柄，如果等到外戚权势凌驾于君主之上时，就可能来不及防范。成帝没有采纳他的进谏。

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十一月，卫将军王商因病免职。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正月，王商又出任大司马、卫将军。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七月，红阳侯王立举荐陈咸做光禄大夫、给事中。丞相翟方进奏书皇上："陈咸以前做九卿时，是因为贪邪而被罢免的，不应再受推举做朝臣。"并弹劾王立"选人不切实际而只重交情"。皇上下诏，免去陈咸之职，不准弹劾王立。

十二月，成帝封王商为大将军，不久，王商死。他的弟弟红阳侯王立接替他辅政。王立受贿，保举太守李尚做高官，被丞相司直孙宝发现。皇上罢免了王立，改任其弟曲阳侯王根任大司马、骠骑将军。

安昌侯张禹请求赐封平陵的肥牛亭这块地给自己。曲阳侯王根坚决反对，他认为此地正好是平陵的寝庙的出入必经之地，应当改赐张禹其他地块。成帝不准，最终还是将肥牛亭赐给了张禹。王根因此嫉恨张禹受宠，屡次诋毁他。成帝却越发厚爱张禹。每次张禹生病，成帝都驾车亲自登门探望，并来到张禹床前。张禹在叩头谢恩之后，引见他的小儿子进见皇上，皇上就在张禹床前拜其子为黄门郎、给事中，并特别指定张禹为天子师，每逢国家有大的政事，成帝一定与其商议定夺。

当时，社会上很多人以及一些官吏上书说，天灾皆由王氏专权所致，皇上也信以为真，但又不敢肯定。成帝驱车到张禹府第，支开左右，亲自问张禹，并把官吏和百姓所言都告诉张禹。张禹知道自

己年纪已大，子孙又弱小年轻，加上与曲阳侯王根一直不和睦，恐怕遭王根怨恨，所以就对成帝说："《春秋》一书上将日食、地震等归咎为诸侯相杀，蛮夷入侵。灾变的原因，不必深究，陛下只有理好政事，以善政回应天象，与臣下共享福喜，才是正理。不要听那些不成熟的人造谣惑众。"成帝一向信任张禹，所以再也不疑心王氏。后来，曲阳侯王根及王氏子弟听说张禹所言之后，都很惊喜，开始亲近张禹。

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正月，蜀郡的岷山出现山崩，壅江连续三天江水枯竭。刘向极其痛切地说："昔日岐山山崩，三川水竭，幽王死了，因为岐山是周朝的发祥地。汉朝的发祥地在蜀汉，现在这些地方出现山崩水竭，汉朝一定快亡了。"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月，王根因病免职。王根举荐了王莽接替他的职务。王莽成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他继伯父、叔父后继续辅政，走上了代汉自立之路。

王氏自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辅政专权，到王莽就任大司马之职，专权达二十余年。

(任淑艳)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

成帝荒淫

汉成帝，名刘骜，字太孙，生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是汉元帝刘奭之子，其母是元帝的皇后王政君。

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四月，刘骜被立为太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骜逐渐嗜酒行乐，元帝认为他不才无能，晚年想另立山阳王刘康为太子。王皇后和刘骜的舅父、阳平侯王凤都很担忧，又不知有何办法。大臣史丹是皇帝的近臣，有机会侍奉皇帝于榻前。一次皇帝独寝时，史丹跪在元帝床前哭诉说："刘骜已立为太子十余年了，其名位已被百姓所接受，若改立他人，公卿大臣必以死相争，我愿冒死进谏。"元帝被他的话所感动，就仍然定刘骜为太子，未作改变。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汉元帝死于未央宫。六月，刘骜即位，是为成帝，沿用竟宁年号，翌年改年号为建始。

七月，丞相匡衡上书说："婚姻为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衰，无不缘于此，愿陛下明察得失盛衰，选用有德者，严戒声色。"

成帝做太子时，就以好色闻名。他继位后的第二年，皇太后就广招天下女子纳入后宫。

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对王凤说："按照礼制，皇上应娶九女，只有这样才能多有子嗣，以敬重祖上。有了贤淑的后妃，才能有贤明的君主，制度才有威严，君主才有长寿之福。现在皇上年富力强，仍没有子嗣。将军作为辅政，应该建立九女制度，广求有淑女之品质者，

不一定是要相貌和才能出众，这才是最重要的。”王凤禀报太后，太后认为没有先例，王凤又不能自己立此法度，也只有因循旧制。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十二月，出现日食，夜里，地震波及未央宫。成帝下诏，让平日敢于秉正直言的公卿大臣前来议事。杜钦及太常丞谷永都上奏说，天地之所以有此灾变，都是因为后宫女宠太盛，互相嫉妒，争宠于皇上，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立子嗣。

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四月，出现日食。成帝又召见公卿百官，言明不要有所忌讳，尽管铺陈一切过失，并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禀奏，说他进行了占卜，天象不利于子嗣。

这段时期，许皇后独受恩宠，后宫其他人难得进见皇帝。因为许皇后曾生有一男一女都夭折了，所以，宫中内外都担心皇上无子嗣。为此杜钦、谷永和刘向等人都向成帝提及子嗣之事。成帝借此削减了许皇后宫中的开支，并广泛地召幸其他嫔妃。

许皇后闻听此事，上书成帝表白：“现行制度只要不偏离汉制就行了，未必非要相同，请陛下明察。”成帝将谷永、刘向所言有关灾变皆与后宫有关的话告诉了许皇后，并说：“官吏拘泥于古制，也不是什么过错，况且矫枉必过正，古今同理。皇后若能秉德谦逊，也能为后宫嫔妃们做一典范，使之有标准可依呀。”

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二月，成帝开始喜欢微服出游，带着期门郎和奴仆约十余人，或者乘车，或者骑马，出人于城郊，远至附近的诸县，自称是富平侯家的人。

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二月，博士行大射礼。有一群野鸡飞到院中，而后又先后集中在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的府第，最后又集中在未央宫承明殿的屋顶上。后来，成帝派人召王音来宫中，询问此事。王音借机向成帝说：“陛下已即位十五年了，仍没有子嗣，却天天驾车出游，对此失身份之举，四方流言比京师严重。外有出游之害，内有疫病之忧，天象屡次出现异常，是想让人有所改变，皇上始终不改。皇天尚且不能感召陛下，臣子又有什

么办法，只有冒死吐真言。现在皇上应当克己求贤，顺乎天意，继嗣可以立，灾变可以消除。”

许皇后和班婕妤都曾经很受皇上宠幸。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一次成帝在后庭中游玩，想与班婕妤同乘车辇，班婕妤推辞说：“我翻阅古代图书，贤明君主都有名臣立在左右，只有夏、商、周三代的亡国之君才有嬖妾陪侍两旁，皇上今天想与我同乘车辇，这不与三代的末主近似了吗？”成帝觉得此话有理，也就作罢了。太后听说了此事，高兴地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班婕妤的贴身侍女李平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封为婕妤，赐姓卫氏。一次，成帝出游，路过阳阿主家，看上了歌舞伎赵飞燕。赵飞燕是因家境贫寒被送到阳阿主家学习歌舞的。成帝召她进宫，虽未授名号，只作宫女，却备受宠爱。她有个妹妹，叫赵合德，姿色更加出众，赵飞燕就向成帝推荐，于是，成帝又将赵合德召进宫来。左右人见了她，都啧啧称赞其美貌，只有宣帝在位时任披香博士的淖方成在成帝背后唾弃说：“这是祸水呀，必定灭火。”

不久，赵氏姐妹均被封为婕妤，其显贵程度超过整个后宫，许皇后和班婕妤都失宠了。

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许皇后的姐姐许谒（平安刚侯的夫人）在家中设祭坛，想靠巫祝挽救许皇后的颓势。赵飞燕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竭力谗陷许皇后和班婕妤，她向成帝说：“许谒诅咒后宫，亵渎皇上，都是许皇后和班婕妤怂恿的。”十一月，许皇后被废，打入了昭台冷宫，她的姐姐许谒被处死，其亲属被遣归故里。成帝为此事拷问班婕妤，她说：“臣妾听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臣妾入宫后，谨身修正，尚且不能蒙福，行巫祝之术又能有什么希望。假如鬼神有知，将不受逆臣之诅咒；如其无知，诅咒又有何用？所以臣妾不做那样的事。”成帝喜欢她的回答，就赦免了她，并赐黄金百斤。赵氏姐妹专横跋扈，班婕妤恐怕夜长梦多，就请求到长信宫侍奉太后，成帝准许了。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正月,成帝想册封赵飞燕为皇后。皇太后嫌她出身低微,认为立她为后,就坏了祖宗的法度。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做侍中,受赵氏之托,频繁往来于太后宫中,为赵氏讲情。太后仍然没有答应。同年四月,成帝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以提高赵家的地位。太后看到成帝如此一意孤行,就只好同意了。谏大夫、河间刘辅上书说:"昔日武王、周公等都顺应天地,严戒色欲,现今皇上放纵情欲,倾心于卑贱之女,还要让她为天下之母,不惧怕苍天,不愧对众人,没有比这再大的迷惑了。俗话说,朽木不可以为柱,人婢不可以为主,如果这样,必有祸而无福。臣私下伤心,不敢不冒死进谏。"奏折递上后,成帝派御史逮捕了刘辅,并打人掖庭监狱。大臣们都不知什么原因。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师丹、太中大夫谷永等一起上书说:"刘辅以前做县令,被选为谏大夫,这一定是因为他的言行表现出他的秉直真心,才得到如此提拔,谁意几日之间竟被打人监牢。臣等以为刘辅身为宗亲,又为官谏臣,新提拔上来,不知朝廷之礼,所以触犯朝廷忌讳,不应构成大过。如果杀掉这样敢于进直言的忠臣,会令群臣震惊,失去忠直之心。实在不应该把他打人掖庭监狱。"于是,成帝改定刘辅人共工狱,免死罪。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六月,册封赵飞燕为皇后。从此,成帝却减少了对她的宠幸。她的妹妹赵合德受到成帝的极端宠幸,封她为赵昭仪,住在昭阳殿,成帝耗费巨资,用朱红色粉饰庭院,殿中用赤黑漆涂饰,汉白玉台阶,四壁有黄金镶嵌,陈列着蓝田璧、明珠、翠羽等名贵饰品,这在后宫是前所未有的。

赵皇后住在宫中,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她极力想生一个皇子来挽回失去的地位,然而成帝长期不到她的宫中。因此,她开始与侍郎、宫奴等私混。成帝听说此事,很气愤,想严办。赵昭仪却向皇上说:"臣妾的姐姐性情刚烈,不会做那种事。这是有人诬陷她,施的是离间计。"因为成帝宠幸赵昭仪,也就相信了她的话,言称再有

人说皇后此类坏话，就杀掉。此后，再无人敢言了。

赵氏姐妹因没有皇子，所以就想尽办法处置掉那些怀孕的嫔妃。成帝则一味迁就赵氏姐妹，特别是赵昭仪。成帝曾向赵昭仪许诺："朕保证不让天下任何人能在赵氏以上。"

光禄大夫刘向把古书中的贤妃贞妇的故事编为《烈女传》共八篇，又著了《新序》、《说苑》共五十篇，禀奏皇上，言明得失，陈述法度，皇上虽同意他的看法，但只是常常慨叹，并未采用。

成帝沉湎于与赵氏姐妹饮酒享乐，太后与其舅父们十分担忧，但作为至亲又不好劝说。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他们推举凉州刺史谷永借天象异常之事，对皇上进行劝谏。谷永感到有太后等人撑腰，就大胆进谏皇上："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亡国丧宗庙，其原因都在于妇人成群且沉湎于酒。秦所以经过两代仅十六年而亡，是因为太奢华。这两样陛下兼而有之。建始、河平年间，许皇后和班婕妤之显贵，超过前朝，宠幸达到极至，无人能比。现在的后起者超过她们十倍，骄纵亲属，授其权柄，扰乱政事，诛杀忠良，以掖庭狱和炮烙残害人命。陛下不顾至尊之位，却沉溺于一般的贱事。公卿百官不知陛下所在何处，已有数年了。百姓以财力为根本，财力枯竭则百姓反叛，从而导致皇朝衰亡。因此，明君都擅于扶本，不敢穷奢极欲。陛下现在刮民财，不爱惜民力，听信奸臣之计，大兴土木，改建昌陵等，耗费超过了秦始皇当年修建骊山墓所用，使人民饥馑流浪，死于道旁，数以百万计。愿陛下将夏、商、周三代与秦朝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检查自己的行为。汉朝经历九代百九十余年，都遵先祖法度，安国兴邦。唯独陛下背其道而行之，纵欲妄行，身心强壮，却无子嗣。身为汉业的继承人，把祖宗的功业搞到如此地步，这难道不是辜负他们吗?现在，国家和宗庙的安危祸福皆系于陛下一身，陛下若真心感悟，抑恶扬善，情况很快就会好转。"

成帝阅后大怒。卫将军王商秘密地让谷永逃走了。成帝派御史缉拿谷永，御史没有追到谷永，就回来了。此时，皇帝已怒气全

消,也很懊悔。

一次,成帝与张放以及赵侍中、李侍中等一同饮酒,大声谈笑。有张屏风,上面画着商纣王酒醉与妲己放纵淫乐的情景。成帝指着画问久病初愈的侍中、光禄大夫班伯说:“商纣无道,已到了这种程度吗?”班伯答道:“古书记载他只是听信妇人之言。所有坏事都莫过于此。”成帝又问:“假若不如此,此画何意?”班伯说:“沉溺于酒,是一切淫乱之源。”

张放等人觉得扫兴,就离开了。后来,成帝的舅舅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授意丞相、御史追究张放的过错,于是丞相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等启奏太后,说张放怂恿皇上奢淫无度,不加以制止,请罢免张放回封地。成帝不得已,就派张放作了北地都尉。后来,张放的母亲敬武公主生病,皇上下诏让张放回来探母。数月后,又改张放为河东都尉。成帝喜欢张放,但迫于太后及大臣们的压力,只能哭着与之分别。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七月,天象出现异常。成帝召集谋臣们议事。北地太守谷永奏道:“为王者应承天意,行德政,方能百姓安定,天下祥瑞,否则灾变不止,这是天地之常理。”

中垒校尉刘向也呈上奏折,并绘了一张天象图,想借天象的变化,阐明时事兴衰、长短之理,成帝看了,却始终也没采纳。

到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成帝四十四岁时,仍无子嗣。于是成帝和太后决定立成帝的侄子定陶王为太子。二月,举行了册封太子的仪式。太子定立后,成帝更加荒淫无度,嗜酒淫乐。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一日清晨,成帝起床后感觉手脚麻痹,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不久就死于未央宫。时年四十五岁。

民间都认为应该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召来王莽等人寻问成帝发病前后的起居情况。因为成帝死前一直留宿赵昭仪宫中,赵昭仪感觉事情不妙,就自杀了。

汉成帝注重仪表,有穆穆天子之容,而且情性宽厚,博览古今,

然而沉溺于酒色，造成赵氏姐妹扰乱朝政，外戚专权，最终因酒色过度而亡。

（任淑艳）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成帝淫荒》
张一兵、李福亮《历代名妃》

成哀危机

西汉成帝、哀帝在位期间，朝政败坏，皇帝荒淫，王氏、丁氏和傅氏及嬖幸董贤相继把持朝政，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加上连年的天灾，人民大批流亡，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社会动荡不安，西汉王朝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汉成帝刘骜早年为太子之时，就以贪酒好色闻名天下，以致于元帝一度要废黜他的太子之位。即位后，成帝更是无所顾忌，流连于杯中之物，沉溺于后宫之中，广选姬妃，宠幸赵飞燕姐妹，骄奢淫逸无度。哀帝刘欣即位，又好男色，宠幸董贤，无所不至。皇帝荒淫，朝政大权则交由外戚或宠臣执掌。成帝时，外戚王氏专权，前所未有。成帝生母元后王政君有同父兄弟八人及堂弟王音等，成帝即位后，母舅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权，其余活着的舅父王崇、王谭、王商、王根等都相继封侯。王凤执政十一年后死去，推存王音继续执政。王音八年后死去，又由王商接任。四年后王商因病去职，继由王根掌权。五年后王根又推荐其侄王莽秉政。成帝在位期间，朝政始终操在王氏兄弟叔侄手中。王氏一门担任二千石以上高官的就有二十多人，封侯的有九人，荣显至极。成帝的侄儿哀帝即位，哀帝的祖母傅氏和母家丁氏掌权。傅太后的侄子傅喜、傅晏都官至大司马，封高武侯和孔乡侯，傅商封汝昌侯，傅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郑恽的儿子郑业封为阳信侯。郑氏、傅氏封侯者共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哀帝母亲丁后的叔父丁望为左将军，丁宪为太仆，丁后的哥哥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

丁氏封侯者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也有十几人。傅氏和丁氏短短一二年间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哀帝虽然约束着外戚势力的发展，使丁氏和傅氏的权力远远比不上王氏在成帝时期的程度，却宠信嬖幸董贤，朝政同样也是非常腐败。

皇帝荒淫，外戚幸臣专权，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无所不为。成帝征发民役，在数百里广阔范围的南山地区圈占农田，设置猎场，纵放各种飞禽走兽，以捕猎为乐，其奢费程度使得当时随行的文人扬雄感叹不已。成帝为自己在平地营建延陵，堆土为山，征发上万农民服役，昼夜不停，远从东山取土运来，其价格竟和谷物相当。繁重的劳役，使得“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一日之储”，上下俱困，怨声载道。哀帝也是挥霍无度，赏赐嬖幸董贤，动辄千万，国库为之几空，董贤死后，被抄家财就达四十三万万钱之巨。上行而下效，皇帝以下的贵族官僚也是争相豪奢。外戚王凤当权时，郡国守相、刺史都出其门下，珍宝贿赂，四面而至。王凤五弟同日封侯，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奴仆成百上千，歌舞酒宴，走马驰狗。王氏兄弟又大修宅第，堆土为台，引水为池，院内有洞门、高廊、阁道相连，望不到边。宅院建筑规模甚至与皇宫不相上下。官僚贵族生活越是豪奢，他们掠夺土地的欲望也就越是强烈。成哀时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占田数百顷是常见的现象，多者甚至跨郡连县达数千顷。成帝外戚红阳侯王立一次就侵占所谓“荒田”数百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由农民租种垦植为良田，王立将这些田地又转手高价倒卖给皇家，从中牟取暴利。丞相匡衡在其封国利用地方图籍划界的错误，多占田地四百顷，巧取地税上千石。被认为是谨慎忠厚的丞相张禹，为子孙买地达四百顷，而且都是泾、渭一带上等的肥田，年老，又向成帝索求平陵县肥牛亭的好地，为自己建造坟墓所用。

成哀时期，自然灾害也连年不断，最主要的是河决之患，给民众带来深重苦难。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接连大雨

四十多天，长安百姓惊惧，传言大水将至，纷纷准备携家逃难，甚至连皇帝都打算爬上城墙避水。四年秋，东郡又接连大雨十几天，黄河金堤、馆陶决口，洪水肆虐于兖州、豫州及平原、千乘、济南等地，共淹没四郡、三十二县、十五万顷农田；水深最深处达三丈，冲坏官亭、房屋四万多座，百姓为避水灾居于山丘高地者近十万口。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秋，黄河又在平原决口，大水冲入济南和千乘，毁坏很多民宅。鸿嘉四年(公元前 17 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大水泛滥，淹没县邑三十一座，冲毁官亭民宅四万多所。元延元年(公元前 12 年)，北地太守谷永上疏指出："往年被于水灾的有二十一郡国，今年百川沸腾，江、河决口，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百姓因之失业流散。"

连年的天灾，加上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使广大民众困苦不堪，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成帝时期因饥饿疾病倒毙街头的人就以百万数。哀帝建平年间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看到孝成皇帝之时，外戚把持朝政，纷纷推荐自已的亲信以充塞朝廷，妨碍贤人的仕进之路，天下浊乱，奢侈无度，百姓穷困，因而日食就发生了十次，彗星也出现了四次，这些上天所显示的危亡征兆，是陛下亲眼所见，如今的情况怎么反比以前更加严重呢?现在百姓有丧失财产的'七亡'之苦：阴阳不协调，水旱灾害频发，是第一亡；官府加重赋税徭役，是第二亡；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不已，是第三亡；豪强大族蚕食兼并土地没有限度，是第四亡；烦苛徭役造成农桑失时，是第五亡；乡村聚落警鼓常鸣，不论男女皆要出力围截盗贼，是第六亡；盗贼劫掠，抢夺财物，是第七亡。如果只有这'七亡'，百姓尚能苟活，然而还有'七死'之灾：被酷吏打死，是第一死；刑律严酷，是第二死；无罪受到冤陷，是第三死；意外遭遇盗贼，是第四死；仇人相互残杀，是第五死；荒年饥饿难熬，是第六死；瘟疫疾病流行，是第七死。人民有'七亡'而无一项所得，要想国家太平，实在困难；人民有'七死'而无一条生路，要想无人铤而走险，刑罚不用，实在是办

不到的。这难道不是公卿大臣、郡守、诸侯国相们贪赃枉法、残害无辜所造成的吗？如今民以糠菜充饥，衣不蔽体，父子、夫妇不能相保，真是令人心寒鼻酸！”在这种悲惨的境遇下，大批农民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仅哀帝建平年间，百姓因饥饿而流离逃亡的就有数十万。另有不少人则揭竿而起，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成哀时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刑徒暴动接连不断，此伏彼起。

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前后，长安附近的南山地区有傰宗领导的数百人的起义，他们占据山险，四处出击，长安都为之震动。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茬平人侯毋辟兄弟五人率众暴动，攻打官府，捕捉官吏，自称“将军”。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率领一百八十多人暴动，铁官徒是官营冶铁工场的工奴和罪犯，他们杀掉官长，夺取兵器，也自称“将军”，先后转战九郡。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郡的一批被处重刑、披戴刑具的“钳徒”发动暴动，首领郑躬自称“山君”，他们夺取武器，身穿官服，攻打官府，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儒生樊并等十三人组织起义，杀死陈留太守，释放囚徒，自称“将军”。同年还有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多人起义，与樊并的义军相呼应，他们组成大军，转战十数郡国，先后杀死东郡太守、汝南都尉等重要地方官吏。这些不断的起义和暴动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大大动摇了西汉王朝统治根基。

为了缓和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统治集团的一些人物打算通过一些政治改良来挽救衰落的王朝。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针对土地兼并激烈和奴婢买卖严重的问题，提出了限田、限奴婢买卖的主张。经朝廷商议，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官吏占田都有限制，不许超过三十顷；奴婢占有数额也各有不同的标准，又重申商人不得占有土地的禁令。诏书下达后，一时间田宅和奴婢价格猛跌，限田议好像很有成功的希望，但很快遭到了掌握重权的外戚丁氏和傅氏的强烈抵制。哀帝自身本来决心也不大，规定公布不久，他就赏

给宠臣董贤土地两千顷，这样师丹的限田方案也随之破产了。

汉代流行“天人感应”的学说，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的现象和变异是上天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态度。如果朝政清明，变异就被认为是祥瑞的表现；如果朝政腐败，变异则被认为是上天灾异的警告。在成帝时期，一些大臣借着众多的水旱、地震、山崩、日食等自然现象，以此为陈述灾异的手段，规劝朝廷改革弊政，罢黜外戚和宠臣，但没起到什么作用。一部分人对西汉王朝也丧失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方士甘忠可依据五德终始学说，编造了一部十二卷的《包元太平经》，公开说汉朝的天运已尽，如果要避免厄运，必须重新接受天命，以此劝成帝改制。但成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以诽谤皇朝妖言惑众的罪名将他关进监狱，甘忠可病死狱中。哀帝即位后，其弟子夏良贺又重新提出再受命的主张。哀帝看到王朝危机四伏，别无旁法，便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接受了夏良贺的建议，更改年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表示汉朝重新受命于天。但这套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加上夏良贺等人又谋划夺取相位，至八月，哀帝便将夏良贺等下狱处死，又重新恢复了“建平”的年号，仅二月时间，改制闹剧便草草收场。

限田议和改制思潮，并没有挽救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哀帝死后，王莽乘机控制了政权，西汉王朝也在风雨飘摇中行将改朝换代了。

(阎爱民)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至二十七

董贤嬖幸

中国古代把同性恋好男色者称为有“断袖之癖”，这个典故便是源自西汉时期汉哀帝和他的宠臣董贤之间的故事。司马迁说过：古代以色相取得帝王宠幸的，“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董贤便是以男色得宠于帝王的幸臣之一。西汉的皇帝大多有好男色的癖好，汉高祖有男宠籍孺，惠帝有闳孺，文帝有邓通，武帝有韩嫣，恩宠一时，而哀帝对董贤的宠幸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董贤原为太子舍人，哀帝刘欣即位，随太子东宫官属升迁为郎。董贤并没有什么才能，年纪又轻，但外表漂亮，仪态动人，脸上时常泛着喜悦之色。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二月，董贤在大殿下传报时辰，为哀帝远远望见，不觉为其仪貌所倾倒，顾盼多时，向左右寻问，知是原来的舍人董贤，即派人叫来相见，当时拜官为黄门郎，又征调其父云中侯董恭为霸陵令，提升为光禄大夫。从此，董贤为哀帝宠幸，关系异常亲近，董贤的权位也日重一日。哀帝为了让董贤能常在自己身边，又任命其为驸马都尉，在宫内侍卫。哀帝出宫，董贤陪乘；哀帝回宫，董贤身边侍侯，形影不离。哀帝在一月之内赏赐给董贤的钱财累至巨万，尊贵震动朝廷。董贤常和哀帝同榻而卧，一次二人昼眠，哀帝醒来，欲起，但衣袖压在董贤的身下，董贤还在睡觉，哀帝怕弄醒他，便将自己的衣袖剪断，抽身而起，其对董贤恩宠到如此地步。这便是开首所说的“断袖之癖”一词的由来。董贤性情柔和，对哀帝极尽妩媚之态，从而保持自己的权

位不衰。每次哀帝赐其洗沐，他便不肯出宫。哀帝身体多病，董贤又以侍候哀帝医药为名长住宫中。因他长时间难归家里，哀帝特准许其妻自由来往宫禁，可留宿于董贤在宫中的休息之所。哀帝又将董贤的妹妹纳入后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董贤兄妹及夫妻朝夕轮流陪伴于哀帝左右，他妻子和妹妹得到的赏赐也达到数千万。不久，董贤的父亲董恭又升为少府，赐爵为关内侯，享有封邑，接着又由少府升到了卫尉。其弟董宽信也做官到执金吾，连他的岳父也升官至将作大匠。哀帝下诏，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城修建府第，宅院中有前后两重殿，中间洞门相连，其中的大柱长槛皆以绨锦为衣。从武库的兵器到上方的珍宝，哀帝赐给董贤的东西应有尽有，连董贤家的奴仆也都受到了皇帝的赏赐。哀帝甚至将本来是帝王丧葬御用的棺梓和金缕珠衣，也命东园官署打造，准备预先赐给董贤。他又令为董贤在自己预造的义陵旁修建墓园，以便死后也不分离，墓园建造得极为壮观。

哀帝打算给董贤封侯，但一时又找不到借口，因为按汉朝的惯例，无功者不得封侯。恰在此时，待诏孙宠、息夫躬等人告发东平王刘云的王后祠祀诅咒皇帝，官府究治，哀帝便令孙宠等人再加上董贤的名字共同上疏告发东平王的奸事，以此为借口封董贤为高安侯，食封千户。

哀帝宠幸董贤，朝政败坏，引起一些正直大臣的反感和不满。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正月，丞相王嘉上疏哀帝，批评说："陛下过去在藩国时，喜好《诗》、《书》，崇尚俭节，征至京城，所过沿途百姓称颂美德，这是天下万民真诚拥戴之心所致。即位之初，改易帷帐，除去锦绣，乘舆仅以绨缯为围。该为生父共皇修建寝庙，哀怜天下百姓，思念用度不足，以大义割舍私恩，因命暂且停建，直到最近才始动工。可是，陛下如今却在为驸马都尉董贤于上林兴建官寺，又为他修建壮丽府第，开门对着皇宫北阙，引王渠水入府内园池，派使者监督施工，工程甚至超过了皇家宗庙的建造；董贤的母亲病

了，陛下派长安官府的厨官于道中提供祈祷所用饮食，路途所过行人皆得饮用；为董贤打造用器，造好，再造皇家所用，特将打造精巧的先赐给董家使用，各地贡献给宗庙和天子、太后、皇后三宫用品，也莫不先给董家使用；董家宾朋婚庆喜事及其亲戚走动，百官皆得出钱财助兴；皇家赏赐，恩及董家僮隶奴婢，多达十万钱之巨；为赏赐董贤，派出皇家使者监视征购货物，市场商贩震动，路上行人喧哗，群臣惶恐困惑。诏书撤消皇家御苑，却赐给董贤土地两千多顷，国家限田制度因此而败坏。奢僭放纵，阴阳变乱，灾异众多，谣言四起，百姓惊恐，天意如此，不能自行消止。陛下平素仁智谨慎，如今怎么招来这么多的讥讽。我有幸居于相位，内心悲伤，不能尽效愚忠之信，如果能身死有益于国家，则不敢怜惜己身。希望陛下谨慎自己独享的乐趣，考察众人所共同疑虑之事！过去，文帝的宠臣邓通，武帝的宠臣韩嫣，骄贵失度，贪欲无边，终于导致罪过，乱国亡身，不得善终。正所谓'过分的昵爱就是害'！陛下应该以前事为镜，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性命。"哀帝览奏，对王嘉大为不满。

不久，谏大夫渤海人董宣也上书说："天和人同心，人心高兴则天意开解。二月十六日长虹犯日，近来又连阴无雨，这是天下有忧结之事未解，百姓有怨望未能平息所致。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与陛下不沾丝毫亲属关系，不过是仗着漂亮的面孔和阿谀的巧言得以荣身尊贵，陛下却对他赏赐无度，府库尽空。以三宅之地为其建为一府，犹以为少，又复取暴室之地以增广面积。董贤父子傲慢，颐使天子的使者；将作大匠为其修建府第，值夜吏卒都受皇家赏赐；墓祭祖先，董氏亲族聚会食用竟由朝廷太官供给；海内贡奉之物，本为奉养君主所用，如今却尽归董贤之家，这岂符合天意和民心！上天不可久负，如此厚待董贤，反是要害了他。陛下真想可怜董贤，应该谢罪于天地，解仇于海内，将董贤免官遣归封国，收回其所用皇家的乘舆和器物，如此才可保全他们父子性命。"

哀帝不为奏章所动，又假借不久前死去的傅太后留下的遗诏，下诏加封董贤二千户封邑。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并上疏劝谏道："高安侯董贤，佞幸奸臣，陛下极尽爵位以尊贵他，倾尽财物以使他富足，自损至尊身份以使他荣宠。主威已降，府库也空了，犹恐宠幸不足。财物都是民脂民膏，以往孝文皇帝打算造一露台，因珍惜建台所需的百金费用，便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再去建造。如今宠董贤却慷国家赋税以施私人恩惠，一家而受千金，自古以来，宠信大臣也未有如此，传闻四方，天下怨恨。乡谚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我常为此而寒心。"哀帝见奏，对王嘉愈加怨恨，遂将其投入牢狱，逼迫致死。

十月初六，哀帝任命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册命上说："命你为三公，作为汉家辅臣，今后要全心全意，纠正时弊，诚实公允。"当时董贤才二十二岁，虽然身为三公，却常在宫禁内侍奉哀帝，主管尚书事务，为皇帝私人秘书长，百官奏报都通过他上达哀帝。董贤的父亲董恭由卫尉又升为光禄大夫，弟弟董宽信接替哥哥为驸马都尉。董氏一门亲属都为侍中、诸曹等职，权势超过了哀帝的外亲丁氏和傅氏家族。

丞相孔光以前为御史大夫时，董恭曾在孔光手下当过御史，这时他的儿子董贤已为大司马，与孔光并列为三公。哀帝故意让董贤私下前往拜访孔光，以观察孔光的态度。孔光非常谦恭谨慎，知道皇帝的目的是要尊宠董贤，听说董贤要来拜访，孔光预先派人在门前警戒，自己整理衣冠，亲自到大门外等待，望见董贤的车队后才退入门内。董贤进中门，孔光入小门，董贤下车后，孔光便赶上前拜见，迎送非常恭谨，不敢以宾客对等之礼相待。哀帝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刻拜孔光的两个侄子为谏大夫、常侍。从此，董贤的权力几乎与君主相等了。哀帝甚至还有将天下让与董贤的念头。

董家的权势炙手可热，董贤的父亲董恭非常仰慕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中郎将萧咸的人品，便托萧咸的女婿中常侍王闳去萧家

说亲，想娶萧咸的女儿为自己儿子董宽信的媳妇。萧咸惶恐不敢应承，私下对王闳说："董贤为大司马，册命文上有'允执其中'的话，这乃是尧把帝位禅让给舜时所用的语言，不是册命三公时该说的话。老一辈的见到此语无不心生忧惧，与董家结亲哪是我们平民家所能担当得了的！"王闳聪明有谋略，听了萧咸的话，内心也就明白了，于是回报董恭，转达了萧咸自谦鄙薄不敢高攀之意。董恭叹息道："我家怎么得罪了天下人，让人们如此畏惧！"内心很不高兴。后来哀帝在麒麟殿酒宴，招待董贤父子和他们的亲属，侍中、中常侍在旁坐陪。哀帝喝得有些醉意，两眼直视着董贤，笑着说："我打算效法尧舜的禅让，怎么样？"王闳在旁起身答话道："天下乃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私有。陛下继承宗庙，应当传给刘氏子孙，万代无穷。皇统大业至为重要，天子不可有戏言！"哀帝听后很不高兴，一言不发。周围的人都很惶恐，将王闳赶出宫去。过了一段时间，王闳又上书哀帝劝谏道："我听说君主设立三公，是效法日、月、星辰三光，居三公之位的应是有贤德之人。《易经》上说：'鼎足断，里面的食物就会流出'，以喻三公所任非其人。过去文帝宠幸邓通，不过是任命为中大夫；武帝宠幸韩嫣，也就是对他多些赏赐而已，都没有让他们处于重要的职位。如今大司马、卫将军董贤，既无功于汉朝，又与陛下无丝毫亲属关系，更没有美名高行影响世俗，却连年得以提拔，位列三公，鼎足而一，统领禁兵，无功封侯。父子、兄弟横蒙拔举，赏赐财物，府库几空，万民闻之喧哗，路上窃窃私语，这实在是不合天下人心。以往褒神蚖变成人形，生下褒姒，扰乱周朝，我实在是担心陛下会因过失受到讥讽，董贤因小人不知进退而遭受横祸，这不是垂青后世让人效仿的做法！"哀帝虽不听王闳的劝谏，却也不怪罪他，并且打消了禅让的念头。

董贤的新府第建成，非常牢固，但院大门却无故而坏，董贤内心十分不快，认为是不吉之兆。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汉哀帝在未央宫病死。太皇太后王政君闻讯后迅速赶到了未央宫，收取

了皇帝绶玺，在东厢房召见大司马董贤，询问关于丧事的调度安排。董贤心中忧惧，回答不出，只是免冠不停谢罪而已。于是王太后说："新都侯王莽以前曾以大司马的身份处理过先帝的丧事，熟悉这类礼仪，我想让王莽来帮助你。"董贤听后连忙叩头称是。太后派使者迅速召来王莽，王莽按太后的旨意令尚书弹劾董贤，说他在哀帝生病期间不能亲奉医药，禁止他出入宫殿司马门。董贤此时不知举措，只是到宫门谢罪而已。王莽派谒者持太后诏令在宫门前向董贤宣读说："高安侯董贤年少，不通事理，任大司马不合众心，收回其印绶，罢官归家。"董贤感到绝望，当天便和妻子一同自杀身亡。家人非常惶恐，连夜埋葬。王莽怀疑其诈死，令人掘开董贤棺椁，至狱中验尸，随后又草草埋在狱中。不久，王莽又奏告董贤父子骄奢淫逸，纵恣僭越，请将其家产没收充公，凡因董贤的关系而做官的人一律罢免，董贤父董恭、弟董宽信及家属流放合浦，其母另行遣送故乡钜鹿。长安城中百姓闻讯喧哗，一些人前往董府假作哀哭，实际上想盗拿府中的财物。官府拍卖董氏家财，计有四十三亿钱之巨。

汉哀帝刘欣目睹成帝时皇室无权，事决于外戚王氏的情形，即位后欲效法武帝和宣帝的作法，节制外家势力，屡杀大臣，加强皇权，以图重振西汉王朝，然而自身却惑于男色，董贤弄权，使得朝政日坏。哀帝死后，王莽控制了政权，西汉王朝也行将灭亡了。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哀帝时西汉王朝的衰败，"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是不无道理的。

(阎爱民)

参考书目：

《汉书》:《佞幸传》

《资治通鉴》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王莽篡汉

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 45 年)。成帝时期，太后的兄弟借甥舅之亲相继封侯，独揽大权。王氏子弟极尽奢华，互相攀比，只有王莽没有同流，因其父王曼死得早，没有封侯。王莽折节恭俭，勤身博学，在外广交名士、儒生，在家孝敬母亲、照顾寡嫂、抚养侄子。他曾经拜沛郡人陈参为老师，学习《礼经》，博得了名士大臣们的赞誉。阳朔三年(公元前 22 年)，他的伯父王凤病了，他衣不宽带，蓬头垢面，侍奉于左右数月，深得王凤欢心，王凤临死时，把王莽托付给成帝和太后关照。

阳朔三年(公元前 22 年)，成帝拜二十四岁的王莽为黄门郎、射声校尉。

不久，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禀奏皇上，愿将他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与此同时，长乐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名士，也都为王莽美言，于是成帝认为王莽很贤良。

永始元年(公元前 16 年)五月，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官升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常伴皇帝左右的大臣，时年三十岁。

从此，王莽更加谦恭，疏散家财赈济贫困者，而且广泛结交了很多将、相、公卿、大夫以提高声望，这些人不断向成帝推荐王莽，为他游说，他的名望几乎盖过了他的伯父和叔父。

王莽曾经私下买了一个奴婢做侍女，有人听说了询问此事，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子元无子，我听说他特别想要儿子，就为他买下了这奴婢，为其生子。"王莽沽名钓誉真可谓不失时机。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月,大司马王根久病,数次上书乞求辞职,大司马一职需有人接替。任九卿的淳于长,是代大司马一职最有希望的人选。而王莽也早已垂涎大司马之职,十分嫉恨对手淳于长,于是暗地里打听有关淳于长的一些情况。王莽在照顾病中的曲阳侯王根时,借机向王根说:"淳于长见将军久病,特别高兴,自以为能代替您当辅政了。"还说了一些淳于长如何骄逸之言。王根听了很生气,示意王莽把这些话禀报太后,并说淳于长与长定贵人的姐姐私通。太后听了,大怒,说:"既然如此,快去禀告皇上。"王莽又上奏成帝,成帝考虑到淳于长是太后的外甥,只罢免了他的官职,没有治罪,把他遣回了封国。后来,淳于长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四下活动,成帝怀疑他有大逆不道之举,就将其下狱。后淳于长死在狱中。

成帝认为是王莽率先发现了淳于长的不轨,很赞赏他的忠直。王根就推荐王莽接替了大司马之职。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就任大司马,继他叔父和伯父之后做了辅政。这一年王莽三十八岁。王莽为了名声和地位能超过他的前辈,更加克己不倦。一次,他母亲病了,公卿大夫都派夫人前来探望。为了表现他的俭朴,王莽让其夫人穿着简陋的服饰去迎接,来人开始以为是奴婢,当知道她就是王莽夫人时,惊讶之余,都称赞王莽的勤俭和贤德。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成帝死于未央宫。同年四月,汉哀帝即位。王莽的权势受到了哀帝外戚的威胁。五月,太皇太后下诏让大司马王莽回封国,以避开哀帝外戚。王莽无奈,只得上书皇帝乞求辞职。哀帝顾忌到已形成的王氏势力,便故作姿态,马上派尚书令奉诏请王莽复理朝政,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等向太后表白:"皇上听说太后的诏书,很悲痛,大司马不复出,皇上不敢听政。"太后乃命王莽继续处理朝廷事务。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六月,皇上在未央宫设酒宴。因傅太后是哀帝的外戚,所以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与太皇太后的座位并肩而设。王莽见到了,责成内者令把傅太后坐位改设他处,并说:“傅太后乃藩妾,怎么能与太皇太后并尊?”傅太后听说后,大怒。王莽又故伎重演,再次要辞官。哀帝害怕也厌恶王莽咄咄逼人之势,就顺水推舟,七月,批准了王莽的辞呈,赐他黄金和安车驷马,免职回封国。

王莽回到封国南阳,闭门思过。经过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沉重打击,他更加认识到权力的重要。为了能东山再起,他不失时机地收买人心、炫耀功德。他的儿子王獲杀了一个奴婢,王莽训斥他,并命他自杀了。就这样,王莽在封国蛰居三年,替王莽上书鸣冤的官吏和百姓数以百计,反复奏明王莽的功德。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哀帝只好准许王莽回京师侍奉太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哀帝死。由于哀帝无子嗣,而哀帝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早已死了,所以由太皇太后王氏全权处理后事,她马上到未央宫,拿走了御玺,召集公卿大臣推举大司马人选。公卿大都认为王莽贤良,原来就是大司马,只因避丁、傅外戚才居南阳,况且是太皇太后的近亲,所以大司徒孔光以及全朝百官都推举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二人认为,成、哀二帝无子嗣,应当选亲近的宗亲辅佐年幼的嗣君,而不应让外戚大臣掌权,要亲疏错落,这样才是治国之道。然而,太皇太后不听劝告,仍决定用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从此,王莽掌握了军政大权。

大司徒孔光是当时的名儒,三朝丞相,太后也很敬重他,天下人也信服他,王莽极力笼络孔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七月,提升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对于孔光一向不喜欢的人,王莽都将其治罪除掉。甄邯顺着王莽的意思上书太后,弹劾何武、公孙禄相互举荐之罪。二者都被罢免了官职。

红阳侯王立,虽不在位,但却能向太后随意进言,使王莽感到

很受限制。所以王莽授意孔光上书禀奏王立的罪过，弹劾王立"明知淳于长犯大逆之罪，还受其贿赂，为其说话，贻误朝政"，请遣王立回封国。太后不准，王莽就说："现在汉室衰败，两代天子无嗣，太后单独辅政，实在可怕。即使尽力公正治天下，尚且怕天下不服，现在如果因私情违背大臣的意愿，乱从此起呀。现在先让王立回封地，等安定后再召他回来。"太后无奈，只能照办了。

王莽就是如此挟持上下，攀附者提拔晋升，逆忤者则遭诛杀。他以王舜、王邑、甄邯、甄丰等为党羽和爪牙，连他们的儿子也都受到了重用。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九月，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平帝，由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掌政。王莽的权势日盛，孔光担忧自己将来的出路，上书乞求退休，王莽禀奏太后将其改任为皇帝的太傅，授以四辅、给事中等官职。

王莽惯于用谦逊的语言掩盖心中的欲念，每次他想要做什么，总是示意其党羽为其鼓噪、活动，一旦太后或皇帝批准了，王莽又垂首哭泣，坚决推辞，对上用以迷惑太后，对下用来邀买众人。

王莽为自己代汉铺平了道路，又开始为自己能顺利地粉墨登场制造理论根据。汉代，"天人感应论"很盛行，君权神授的思想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王莽想仿效《尚书》中关于越裳氏献白野鸡给周天子之举，授意益州官员让西南少数民族自称越裳氏献上一只白野鸡。而后，王莽禀奏太后下诏，将白野鸡奉到宗庙里。大臣们特别是王莽党羽盛赞是王莽功德，赢来了吉祥之兆，声称大司马安邦有功，应重赏，赐号"安汉公"，增加封户，晋升爵位。太后召集尚书商讨此事。王莽却上书说："这是我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共同贡献，只要封赏他们就可以了，不要加封我。"甄邯等奏请太后下诏书，陈明："王道无偏无倚，既然有安宗庙之功，就不能因为是近亲而不予以褒扬。"王莽又数次上书坚决推

辞，并称病不起。太后只好尊重王莽的意思，封赏了孔光等四人。然而，加封四人后，王莽仍称病不起，大臣们又上书太后说，王莽虽然推辞，然而朝廷应该奖赏分明。于是，太后下诏，王莽为太傅，封号安汉公，加封了二万八千户。王莽只接受了封号，推辞了增加的封户，并说："愿天下百姓都富足了，然后再受封赏。"由于太后一再坚持，王莽就建议太后封赏汉宗室及大臣。三十六人为列侯，二十五人赐爵位。王莽此举博得了广泛的拥戴。

王莽看到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又厌政，就授意公卿启奏太后："太后年事已高，不适宜亲理小事。"太后只好下诏书："从现在起，只有封爵一事由我亲理，其他事由安汉公带领四辅定夺。"王莽的权力已与皇上只差一步之遥了。

王莽吸取了哀帝外戚的教训，恐怕平帝的外戚与之争权，就让太后封平帝的母亲为中山王后，赐平帝舅父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不得入京师。

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四月，郡国出现旱灾和蝗灾，青州最严重，百姓流浪。王莽为博得更广泛的拥护，表示自己勤政爱民，带头捐田三十顷，钱百万，让大司农给灾民。公卿都仿效他献田捐粮，又在长安城中建房屋二百区给灾民居住。每遇到水、旱灾荒，王莽就素食。他的左右禀告太后，太后派人告诉王莽，安汉公忧国忧民，但是为了国家要爱护身体。

王莽为了巩固他的权力，想让他的女儿作平帝的皇后。他命令有司将所有名门、世家、列侯家中合适的女子拟名单上报。王莽看到王氏女子几乎都在入选之列，唯恐她们与自己的女儿相争，就上书太后说："我王莽无德，小女也不才，不能与其他众女子一起入选。"太后信以为真，下诏说，王氏女儿是朕之外戚，不在入选之列。诏书下达后，庶民、郎吏、儒生等频频上书，日达千人。公卿大夫则在朝上朝下跪请太后，说："安汉公功德堂堂，现在要立皇后了，唯独不让他的女儿入选，能服天下人吗？我们愿意让安汉公之女为大

下母。”

王莽又派人到各部公卿和儒生那里，表明心迹，所以上书者更多了。太后不知所措，只好按公卿意思同意选王莽之女。王莽却说：“应该博选众家女子。”

元始三年（公元3年）春，太后派人去面视王莽之女，回来禀报说，安汉公之女有德有貌。太后下诏，聘王莽之女为平帝的皇后。

王莽之子王宇不赞同王莽隔绝平帝与其母卫氏，就与他的老师吴章和妻兄吕宽合谋，想利用王莽好鬼神的特点，用血喷洒王莽府门，促使王莽让卫氏入京师。但事情败露了，王莽将王宇捆绑人监，逼其服毒而死。王莽借此事诛杀了卫氏外戚，并牵连异己。他借太后诏旨，令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以及汉元帝的妹妹敬武长公主自杀，并把平时不依附自己的人都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

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王莽之女人未央宫，册封为皇后。

元始四年（公元4年）夏，太保王舜以及官吏和百姓八千余人上书太后，恳请加封安汉公。有司也奏请为王莽增加封地并加封“宰衡”称号，官居上公职，王莽百般推辞。太师孔光等说：“封赏本不足以表彰安汉公的功德，安汉公推辞正是他的贤德所在。”并再三派人请王莽别辞让。王莽为了篡汉，对下不惜作出各种姿态以提高声誉，对上则想尽办法取悦太后。王莽知道太后讨厌深居宫中，就让太后经常乘车到四郊巡狩，赐百姓钱粮，广施恩惠，年年如此。深得太后的欢心和赏识。

元始四年（公元4年），大臣们上奏折说，昔日周公摄政七年，制度才定，现在安汉公辅政四年，就大功告成，应当让“宰衡”位居诸侯之上。太后准奏。

因为王莽不接受增加封地的赏赐，而上书太后的人达数十万，一些诸侯、宗室的人叩头说，应当极赏安汉公。王莽表示，乐于尽力制定典章制度，一旦完成，就辞职回家。大臣们很受感动。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太后下诏加王莽九命之锡，即“加

九锡”。这一年王莽五十岁。

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年幼，周公居摄。现在平帝年少，也应当让安汉公像周公一样行天子事。”群臣都附和刘庆的说法。

平帝日渐长大，对于王莽不准卫后入京师的事，心存怨恨。

十二月，王莽借腊日进椒酒时，在酒中下了毒，平帝饮后，死于未央宫。王莽令天下领六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吏都服丧三年。

太后召集大臣们商议帝位继承人的事。宣帝有曾孙数十人，王莽讨厌他们已成年懂事，就推说不能够传位于兄弟，选了宣帝的玄孙、广戚侯刘显之子、年仅两岁的刘婴立为继承人。同月，有人在孟通一个井中发现一块白石，上面写着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将此事禀告太后，太后断然说：“不能这样办。”太保王舜对太后说：“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只是想任摄政以加重权力。”太后心中不情愿，但又无能为力，只能准了。太后下诏：“刘婴年幼，不能行天子事，安汉公已辅政三朝，与周公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现在由安汉公居摄，代行职权。”

从此，王莽居摄，着天子服，面南朝臣，一切都按天子之礼行事。大臣们称他摄皇帝。

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正月，即按天子的气派举行了祀天典礼，并让官吏记下他的言行。同年三月，立刘婴为太子，号孺子。

居摄元年（公元6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张绍合谋起事反王莽，被王莽派兵剿灭了。大臣们反复宣称：刘崇等之所以敢谋反，就是因为王莽的权力还小，应提高他的权位，震慑全国。

五月，太后下诏：王莽在见太后时，可自称“假皇帝”。十二月，群臣奏请，称安汉公的官府为摄王殿，住所称为摄王宫，太后批准了。

初始元年（公元8年）九月，王莽的母亲功显君死了，王莽按照天子吊祭诸侯之礼服丧服。

王莽自感威德日盛，已博取了天下人之心，开始谋划做真皇帝

了。

由于王莽一直借助符瑞为其代汉服务，这便成了某些人钻营的敲门砖。梓潼人哀章在长安学习，一向品行不好，他见王莽居摄，就制造了一个铜箱子，书写了两幅题签，一张写上“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张写上“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意思是王莽应做真天子，皇太后应照天意行事。然后，他把此物送到高帝祠庙，交给了仆射。仆射上报了此事，王莽随即到高帝宗祠取回了这一象征接受统治权的铜箱子，而后戴着王冠到太后宫中说：“汉高皇帝秉承天意，将天子之权授予我，我很惶恐，但又不能违命，我只有接受天命和高帝神灵的旨意，做真天子，国号定为‘新朝’。”王莽下了代汉立新的诏书。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之后，率公卿捧着新制的皇太后御玺，送给太皇太后，并去掉了汉朝的国号，同时下诏书给孺子婴：“从前上天帮助你的先祖，已历经十二代统治二百一十年，现在天命的历程轮到了我，就像殷朝的后代称臣于周，这是天命。”将孺子婴封为安定公，过着幽禁的生活。

王莽作为外戚，靠沽名钓誉起家，凭借其叔父、伯父等王氏外戚多年来形成的权势，到达了权力的顶峰，最终代汉自立。

（任淑艳）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

曹相成译注《王莽》

孟祥才《王莽传》

王莽改制

王莽自居摄到代汉自立之后，仿照《周礼》进行了改制。改制包括土地制度、货币制度、六管制、官吏行政制度等几方面内容。

居摄二年（公元 7 年）五月，王莽下令，在通用的五铢钱以外，加铸三种货币，一是重十二铢、面值五十的大泉，另两种是面值五百的契刀和面值五千的错刀，四种货币并用。规定从列侯以下，不准私藏黄金，如能将黄金送交御府，可以得到很多的酬金，然而没有兑现。这是第一次币制改革。

始建国元年（公元 9 年），王莽下诏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废除五铢及契刀、错刀等货币品种，改铸直径六分、面值一的小泉，与面值五十的大泉二品通货一并流通。为了保证新币推行，发布禁令，禁止私藏铜和碳，以防止私铸钱币。五铢钱携带和使用方便，加上人们私下传说大泉要废除，所以百姓都不肯携带大泉，偷偷使用五铢钱。王莽为此下文告："所有私藏五铢钱，并说大泉要废除者，流放到极远的地方去。"同时派谏大夫五十人往各郡督铸新币。

四月，王莽颁发诏书，依照《周礼》记载的井田制，实行"王田"、"私属"制。规定：天下田均称"王田"，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将男丁不过八口而田满九百亩者的余田分给亲属乡邻，无田者，按照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新制度授田。他在诏书中指出，土地兼并使农民丧失土地而沦为佃农，处境悲惨，只有一夫一妇田百亩的土地制度，才是理想的制度；有反对井田制、无视法律、惑乱民众者，流放到极远的地方，以示惩罚。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的国师公刘歆上奏:"周代设一种官职,专门从事市场管理,禁止工商业者从事非法交易,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收进滞销物品,提供缺货的物品,以保证生产者不受损失,进行市场平衡。"王莽按照刘歆的建议,发布诏令,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管"制度。

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取工商业税,负责管理粮、布、帛、棉、丝五种生活用品的购销和物价平衡。长安分为东、西两市,设令,其他各市设长。令和长均兼作五均司官,称作"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在每季度的中间月份,考核标准物价,若物价高于标准价格,则抛售物资,价格若低于平均物价,则听任买卖。推行五均的城市称为五均市。

赊贷由政府办理贷款。赊指借钱给居民作非生产性消费之用,不收利息,但必须如数归还。如居民遇有丧葬、祭祀等,就可以向钱府丞赊钱,前者三个月还款,后者十天还款。贷指想经营工商业又无资金者,可向钱府丞贷款,月息百分之三,年息十分之一。

诏书还规定,盐、铁、酒由政府专卖,钱币由国家制造,禁止私铸钱币,名山大泽也由国家统一管理。再加上对工商业进行管理的五均和赊贷,统称"六管"制度。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王莽第三次发币制改革的诏令:"为了使百姓使用便利起见,按轻重大小,发行多种货币。"把货币分成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就是指使用五种不同的材料造币,六名就是货币的六种名称,二十八品则是货币的交换比值,即泉货六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统称"宝货"。由于"宝货"在流通中换算不便且繁琐,所以人们只通用大泉和小泉两种,私自铸钱的现象无法禁止。为此,只能加重刑罚,一家铸钱,邻里五家连坐,罚他们到官府作奴婢。官吏和百姓外出要带布钱作为通行证的副证,若不携带,饭馆、旅店不准食宿。公卿大

臣要凭布货进殿门，从而推广新币的流通。不久，由于百姓怨声太大，王莽宣布只留大泉小泉两种，其余全部废除。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王莽重新授爵位。由于地图和户籍还没有规划好，只有授予象征封国的茅土，称为“授茅土”。分封依照《禹贡》分为九州，分封一千八百名诸侯。封爵依照周朝制度分为五等。公爵的封地叫一同，享万户居民，纵横一百里；侯、伯爵封地叫一国，居民五千，纵横七十里；子、男爵封地称一则，居民九百，纵横五十里。还设附城，最大的居民九百，纵横三十里，依次逆减分五个等级。接受茅土的有公爵十四人，侯爵九十三人，伯爵二十一人，子爵一百七十一人，男爵四百九十七人，附城一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的儿女受封的八十三人。由于封爵没有兑现封土，只能靠从官府领取几千钱的月俸禄维持生活，所以一些诸侯迫于生计甚至受雇于人。

中郎区博奏请王莽说：“井田制虽是英明帝王的制度，但已被废弃很久了。现在人民尚未嫌弃现行土地制度，要违反民意，复古井田制，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如果没有上百年的酝酿，也不可能实行。”王莽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所有私人占有或朝廷封赏的王田，都允许出卖，不要用法律去限制。有私自买卖平民者，暂时不作追究。”“王田”、“私属”制破产了。

同时，王莽重申了六管制度，并立法令条款来加以保证，对上公以下凡属蓄养奴婢者，一律征税，每个奴婢出钱三千六百。纳言冯常对六管制度发表了一些异议，王莽大怒，免去了他的官职。王莽还设置了负责执法的左刺奸和右刺奸，选派能干的官吏和诸侯分别督察各地，处理有关事务，职权相当于刺史。

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正月，王莽召见被任命为荆州牧的大司马司允费兴，询问他到任后的计划，费兴说：“荆州和扬州，以前大多依靠山林湖泽，靠捕捞、采林为业，六管制度的推行，把山林湖泽都收归国有，并收税，从而损害了人民的权益，加之连年干旱，百

姓穷困潦倒。所以,我到任后就减免他们的赋税,贷放农具。"王莽十分生气,免掉了费兴的官职。

十一月,由于违犯私藏铜炭禁令者太多,废除了该项禁令。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下诏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废除了大泉、小泉两种货币,改用货布和货泉两种通货,货泉长一寸重五铢,面值一,货布长二点五寸,宽一寸,重二十五铢,面值二十五。规定私自铸钱和只用货布者,收入官府做奴婢。居摄二年(公元7年)到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先后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这一年,王莽数次下诏改革行政区划和官制。在行政区划上,将距离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四五百里以内的地方叫作内郡,以外的地方叫作近郡,位居边界或要塞的地方叫边郡,总计一百二十五郡;分别对某些主要郡、县的官吏设置和辖区数量、名称作了详细规定。有些郡的名称甚至年年变动,以至该郡的官吏和人民都记不清变动的情况,终于又恢复原来的名称。

王莽按照《周官》和《王制》的记载设置了相当于太守的卒正、连帅、大尹,相当于都尉的属令、属长,同时设置了州牧和部监,职位相当于上大夫。公爵作州牧,侯爵作卒正,伯爵作连帅,子爵作属令,男爵作属长,将官位与爵位合二为一,并且实行世袭制。

由于"授茅土"迟迟不能兑现封土,诸侯和一些官吏拿不到俸禄,纷纷非法牟利,有些郡大尹、县宰的家里积有上千斤黄金,王莽下诏书,没收那些官吏家产的五分之四,用于边境军需。

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颁布了官吏俸禄制度,规定官吏俸禄分十五个等级,最低一级年俸六十六斛,依次递增,总数不定,可根据所在郡县收入自定,这就使官吏搜刮合法化了。

天凤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下文告,命太史推算出三万六千年的历法大纲,每六年改一次年号。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关东闹灾,出现人吃人的局面。王莽派遣大夫分途告诉百姓把草木煮成胶状充饥。胶既不能吃,又浪

费了人力物力。于是王莽下文告："虽然普遍开放了粮仓，也难以赈济灾民。权且开放全国山林湖泽，凡属能够采取山林湖泽的产物而又符合季节时令规律的，应当听任他们，不必缴纳捐税。到地皇三十年恢复原状。"

一次，王莽召集大臣询问捉拿盗贼之事，大臣们都说："盗贼如同行尸走肉，他们触犯天条，活不久了。"只有原左将军公孙禄说："义和鲁匡设立六管制度，弄得工商业者走投无路。明学男张邯和地理侯孙阳搞井田制，使得民众丧失土地产业，应当处死他们以慰国人。"又说"新朝忧患不在匈奴，而在国内"。王莽听后大怒，让武士们把公孙禄推下去。王莽稍稍镇静后，还是采纳了公孙禄的一些建议，把鲁匡降职为五原郡卒正。

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冬，各处盗贼几万人数次进攻城邑，并杀死了一些二千石以下的官吏。王莽由此看到人心的背离，只得考虑派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人分途到全国巡察，同时，下诏废除了井田制度、不准买卖奴婢制度、山林湖泽税和六管制度，收回登上皇位以来所有不利安民的诏令。

王莽改制触及到了当时社会重大问题，同时也触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这些原本拥护王莽的人，也转而反对改制。王莽在改制的同时，对周边少数民族频繁发动战争，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最终导致改制失败。

(任淑艳)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

曹相成译注《王莽》

孟祥才《王莽传》

绿林赤眉起义

王莽在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篡夺了皇权，建立了新朝，为了巩固其统治，推行了恢复井田、不得买卖奴婢、实行币制改革及五均六管制等一系列的改制措施。但是，改制很快失败了。因为这一系列改制非但没有缓解汉末以来尖锐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反而使之激化，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王莽为了缓和内部矛盾，又挑起了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战争的频仍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劳动人民为求生存，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王莽新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酝酿已久，早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时就开始了，这之后在北部边境地区也不断出现零星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不断由边郡蔓延至内郡，越燃越旺，终于形成了燎原大火。

在王莽新朝末年诸多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两支起义军势力最为强大。一支是发端于湖北当阳县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的起义军，号称绿林军，它的活动范围是湖北、河南、陕西等省；另一支是发端于山东莒县的赤眉军，它的活动范围是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及河南、陕西、甘肃等地。与此同时，还有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他们到处捕杀官吏，镇压豪强，同样给王莽政权以沉重打击。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发生大饥荒，许多人到野地挖草根度日，食不果腹，被迫无奈，纷纷扶老携幼外出逃荒。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兄弟，为人正直公道，经常为穷人办事，深受灾民的拥戴。在广大农民被逼得卖儿鬻女走投无路的情

况下，大家一致推举王匡、王凤兄弟为领袖，聚众数百人，揭竿而起。不久，南阳（今河南南阳）的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县）的王常、成丹等人也率众来归，他们联合起来劫富济贫，除霸惩恶，这支队伍很快便发展到七八千人。由于他们以湖北当阳县的绿林山为根据地，故被称作绿林军。

新朝地皇二年（公元21年），绿林军在云杜（今湖北沔阳西北）附近集中兵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干净、彻底地歼灭了企图进犯的官军二万多人，夺得全部辎重，接着乘胜攻占了竟陵（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钟祥）等地。从此绿林军威震中原，各地起义军纷纷前来参加绿林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万多人，声势日盛一日。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一带发生瘟疫，起义军死亡过半，于是绿林军决定分兵转移。王常、成丹率一路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为"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率主力军北入新市（今湖北京山东），称为"新市兵"。与此同时有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人起兵响应，称为"平林兵"。后新市兵与平林兵联合，向北发展，顺利地进入河南桐柏山区，欲攻南阳，并择时进取关中。

正当起义的燎原之烈火燃遍全国各地之时，西汉王朝的一批破落贵族，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产和地位，同时也企图在农民起义的大好形势下恢复旧日汉朝政权，也纷纷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来。当时因犯法逃匿的西汉宗室刘玄加入到平林兵中，舂陵（今湖北枣阳县东）的破落贵族、大地主兼大商人的刘縯、刘仲、刘秀三兄弟见到农民起义军的声势锐不可当，王莽政权垮台的命运已不可逆转，也打起了反对王莽的旗号，组织了七八千人的武装，号称"舂陵兵"。这支武装力量在与王莽官军的对战中受到重创，刘氏兄弟的士气受挫。地皇三年（公元22年）岁末，下江兵转战到河南，与新市兵、平林兵会师，这给连连受挫、士气不振的舂陵兵带来新的希望。刘氏兄弟亲自去拜访起义军首领王常，要求起义军给予帮助。

下江兵全力支援了他们。就在这年的除夕晚上，王常与刘氏兄弟利用官军戒备松懈和胜利后的骄傲情绪，率领斗志旺盛的起义军，突然袭击，获得了大胜。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初一，起义军又一次获胜。紧接着刘氏兄弟又带兵西进，击溃了莽军严尤、陈茂率领的主力军，包围了宛城，当地群众纷纷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绿林军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达十多万人。

随着农民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起义军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便更好地统一起义队伍。起义队伍中的没落贵族刘玄、刘縯都早有做皇帝的野心。刘縯依仗舂陵兵的实力，专横跋扈，自称柱天将军，企图夺取起义军的最高领导权。刘玄虽是只身投入绿林军，势单力薄，但是他利用起义军对刘縯的不满情绪，取得了部分农民起义将领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全力拥护刘玄称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刘玄在众多的起义将领的支持下，在淯阳(今河南新野北)称帝，改元"更始"。自此，新市、平林、下江等各路起义军，以及刘縯兄弟的武装，统一称为汉军，刘縯、刘秀都成了汉军的首领。

绿林军建立了政权后，连续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队伍发展很快，武器也得到了补充，汉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于是绿林军兵分两路继续向莽军发动进攻，其主力军进攻宛城，准备攻下宛城，以此向西夺取关中，挺进长安；另一支则由王凤、王常、刘秀等人率领，乘严尤军新败，颍水以南官军十分空虚的有利时机，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进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绿林军的节节胜利，使王莽新朝大为震惊，王寻、王邑征集各地精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大军，向绿林军猛扑。这年三月，王莽的百万大军包围了昆阳。当时昆阳城外莽军号称百万，列营数百，包围数十层，昆阳城内则只有绿林军八九千人，众寡悬殊。莽军求胜心切，用冲车撞城，掘地道攻城，向城内密集射箭，形势对绿林军来说是极为严酷的。但是这一切丝毫动摇不了城

内绿林守军坚守昆阳城的决心。众将士临危不惧、周密策划，决定由王凤、王常守城，刘秀率十三人乘莽军不备，连夜突围出城，到外地调集援军。援军一到，便立即在距莽军四五里的地方摆下阵势，给莽军来了个措手不急。在与莽军的交战中，绿林军愈战愈勇，每个起义军战士都是以一当百、所向无敌。紧接着由刘秀率领三千名敢死队员，从昆阳城西的水上猛攻莽军的中军，杀死了莽军主帅之一的王寻。与此同时，城内的绿林军也乘势向外杀出，起义军里应外合，喊杀声惊天动地。腹背受敌的莽军见此阵势，丧魂失魄，阵脚大乱，争相逃跑，互相践踏，乱作一团。王邑仅带了几千名洛阳兵狼狈逃回洛阳。昆阳之战使莽军损兵折将，主力军受到重挫，同时敲响了王莽新朝的丧钟，是推翻王莽王朝的决定性的一战。

昆阳战后，绿林军内部发生了分裂，更始帝刘玄在新市、平林起义军将领的支持下，杀死刘縯，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北攻洛阳；一路则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进长安。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九月，起义军攻下长安，在长安市民和一部分莽军起义士兵的支援下，将王莽杀死在渐台。起义军将王莽的头割下送至南阳，悬挂于南阳市。至此绿林军经过六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王莽新朝的统治。

王匡攻下洛阳后，刘玄迁都洛阳。刘秀在刘縯被杀后采取了以屈求伸的策略，取得了刘玄的信任。在洛阳定都后，刘玄派刘秀到河北镇慰州郡。刘秀趁机以河北为根据地，镇压起义军，发展独立武装，积极为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作准备。更始二年(公元 24 年)春，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刘玄一入长安就大封汉室，重用旧贵族，终日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对此，一部分绿林军的起义将领大为不满，至于下步将如何举动，更始帝毫无主张，招致了“关中离心，四方怨叛”的后果。刘玄此时又将绿林军将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杀害，并准备向王匡、张卬等下毒手。王匡等率领部分绿林军杀出长安，与赤眉军联合作战。

赤眉军起兵于山东一带，最初为两股：一股是海曲(今山东莒县东)人吕母为反对县宰发起的农民起义。天凤元年(公元14年)，吕母的儿子因犯小罪为县吏所杀，吕母为替儿子报仇，将自己的几百万家产散尽，接济穷人，并声明不图其偿还钱财，只要他们替儿子报仇雪恨。于是吕母即以反对官府乱杀人为号召组织起几千人的起义军。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他们攻人海曲，杀死县官，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吕母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另一股力量是由樊崇为领袖领导的。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一百多名贫苦农民，在莒县举行起义。他们杀官吏，打土豪，夺回被地主霸占的财物，以后转人泰山(今山东泰安)活动。其时，青、徐(今山东东部、江苏北部)一带闹饥荒，农民以树皮草根为食，已是走投无路，纷纷参加樊崇的队伍，一年之间，起义军激增至一万多人。这时，山东各地还有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组织和领导的几支起义队伍，他们看到樊崇勇敢善战，纷纷前来投靠他。这样由几支起义队伍汇成了一支拥有几万人的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向王莽政权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从此这支队伍就活动在青州、徐州一带。在作战中，为了和王莽的兵士相区别，每个人把眉毛涂成赤色，因此被称为“赤眉军”。他们打击官府，严惩豪强，士气愈来愈高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王莽派廉丹、王匡率领十几万大军向樊崇领导的起义军进行猛烈反扑，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赤眉军与王莽的官军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以东)激战一场，莽军大败，王匡狼狈逃窜，廉丹试图顽抗，结果连同其他二十多名部将一起被赤眉军杀死。赤眉军乘胜追击，攻下无盐，又消灭了王莽军一万多人。赤眉军的这次大胜，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王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赤眉军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东方广大地区都控制在起义军的手中，这对推动农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迅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对于最后推翻王莽政权也起了很大作用。

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绿林军攻下洛阳,刘玄定都洛阳后,赤眉军樊崇遣使与刘玄联系,一则对绿林军推翻王莽政权表示祝贺;二则表示愿意与之合作。但是刘玄等人却以极其冷漠的态度相待,拒赤眉于千里之外。刘玄的冷淡大大刺伤了赤眉军,在更始二年(公元 24 年)刘玄迁都长安时,赤眉军宣布与更始政权决裂,决计进攻关中,分两路对刘玄进行讨伐。一路由樊崇、逄安率领从武关(今河南陕县西)进发;一路由徐宣、谢禄等率领从陆浑关(今河南伊川)进发。更始三年(公元 25 年)正月,两路赤眉军到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东北)会师。赤眉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农民,所以一直保持着朴实的农民作风和良好的纪律,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没有文书、旗帜、部曲、号令,反映了他们之间朴素平等的关系。但是为了与刘玄对抗,当赤眉军这支与敌人对战中迅速扩大的队伍到达华阴(今陕西华阴)时,大家一致认为也应该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他们像绿林军一样,也找来一个西汉宗室后裔、十五岁的放牛娃刘盆子为皇帝,并建年号为"建业"。赤眉军进入关中时,更始政权中农民出身的将领王匡、张卬率军造反,与赤眉军合作。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七月,赤眉军攻下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刘玄投降了赤眉军,不久被绞死。赤眉军进驻长安,颇得人民的拥护。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却是十分艰巨的,一方面,革命成功后,缺乏新的继续向前的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处在地主豪强内外夹击的境地。关中地区的地主豪强组织武装,藏匿粮食,起义军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长安城中几十万大军的吃饭问题。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春,长安城粮食供应断绝,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不得不退出长安转移到安定北地(今甘肃境内)。赤眉军在西进的途中,逢大雪,又遇到隗嚣的袭击,只得重返长安。这时长安已为刘秀的部属邓禹所占,经过激战,赤眉军打败了邓禹,重新占领长安。关键时刻,又遇上关中闹灾荒,一派白骨蔽野、城郭皆空、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几十万赤眉军粮绝炊断,无奈只得又一次撤出长安,引兵东进。这时刘

秀以逸待劳，已经做好围剿赤眉军的部署。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初，赤眉军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一带与刘秀部冯异遭遇，大败，紧接着又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陷人刘秀早已设置的重围。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樊崇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勇士完全丧失了斗志，向刘秀乞降，刘秀只答应免他一死，为了活命樊崇把十余万赤眉兄弟送上了绝路。以后樊崇等曾企图再次起兵，事终不成，被杀。浴血奋战十几年的一支农民起义大军最后被刘秀击溃。

历时十年，席卷了黄河、长江流域的绿林赤眉起义失败了。但是起义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使农民武装从小到大，从局部发展到全中国，终于用暴力推翻了王莽政权的腐朽统治。

(王岱英)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光武中兴》、《光武平赤眉》

《绿林赤眉农民起义资料选注》

刘泽华、杨志玖《中国古代史》(上)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

《中国古代史常识》

昆阳大捷

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绿林军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发生一场激战,历史上称为“昆阳之战”,或称为“昆阳大捷”。这场以绿林军的大胜、王莽官军惨败而告终的大战,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著名战役。这场战争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敲响了彻底埋葬王莽王朝的丧钟。

绿林军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威震全国,各地农民纷纷前来加入,起义队伍在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已经发展到十余万人。在起义军节节胜利、王莽政权日趋土崩瓦解的时刻,建立起农民政权,是摆在起义军而前的当务之急。然而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起义军内部意见极不易统一。野心勃勃的刘缜一心为自己夺取领导权登上皇帝的宝座制造舆论,还乘机拉拢王常,要他支持恢复刘氏政权。新市、平林两部分的起义将领却坚决反对刘缜做皇帝,却看中了汉宗室势孤力单、怯懦寡断的刘玄,因为这样的皇帝易于控制。当时起义将领们还未能摆脱封建正统观念思想影响,于是决定立刘玄为帝。此时刘缜看到自己称帝无望,就改变策略,极力阻挠,假意说目前建立政权容易引起与赤眉军的冲突,对联合反莽极为不利,待推翻王莽政权以后再立帝也不迟。支持刘玄的起义将领看穿了刘缜的阴谋,果断地拔剑击地说:“对自己所做的事持怀疑态度,一定不能成功。今天这个决定,不允许有第二种想法。”这样在立帝的问题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二月一日,绿林军在淯阳(今河南新野)设坛,刘玄即帝位,改年号为“更始”。

在接受群臣朝拜时，刘玄自知无能，既紧张又羞愧，汗流满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如此，从此，绿林军的新市、平林、下江等各路起义军，以及不过几千人的刘氏兄弟的武装就统一在以刘玄为首的更始政权领导下，刘縯、刘秀虽被任命为汉军的将领，但是实权实际上仍在农民将领手中，刘縯的阴谋被挫败。

更始政权建立后，绿林军又连续取得几次大的胜利，不断发展，武器装备也得到补充，士气高涨。这种情况下，绿林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是其主力部队，进攻宛城，打算把宛城作为向西进取洛阳、关中的根据地；另一路由王凤、王常、刘秀率领北上，乘莽军严尤新败，颍水以南的敌人十分空虚的有利时机，攻占昆阳、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城（今河南郾城南）等地，以保障主力军顺利进攻宛城。

绿林军于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三月攻下了昆阳。昆阳、定陵、郾城三地，以昆阳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城市虽小，但是很坚固，且与宛城之间形成犄角之势，便于互相支援，如能将昆阳牢牢掌握在手，就相当于在宛城的东北面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这样既便于牵制严尤在颍川的部队，又可以阻击住洛阳的王莽军南下增援宛城。总之，占领昆阳对绿林军来说，无论是进退，还是攻守，都是至关重要的。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震撼了王莽朝政，严尤、陈茂战败后，十万莽军龟缩在颍川不敢出战，宛城被围，昆阳失守，洛阳正在受到威胁。王莽又听到绿林军立刘玄为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为惊慌，决心与绿林军决一雌雄，下令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大军向绿林军开战，同时为壮军威还携带了凶猛异常的野兽老虎、斑豹、犀牛、大象等来参战。在王邑、王寻的率领下，四十二万大军、辎重、车马、野兽浩浩荡荡，千里不绝地向洛阳进发，妄图一举消灭绿林军，将起义军的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中。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五月，这支庞大的队伍与严尤、陈茂的兵团会

合在颍川，直接威逼昆阳。

面对王莽的“百万”大军，昆阳城内的绿林守军仅有八九千人，一时未免有些惊慌，有的将领甚至被吓得面无人色，有的将领忧虑随军的妻儿，主张不如一哄而散，以免全军覆没。但是最后他们还是统一了认识，认为在兵力少、粮食缺，而敌人强大无比的情况下，唯一对付他们的办法，便是通力合作，顽强抵抗，这样还有成功的可能，一旦分散逃离，便是不攻自破，难以保全；一旦放弃了昆阳，不消一天的时间，就会全军覆没，大家必须肝胆相照，誓死同归。绿林军决心与王莽大军决一死战。他们面对着来势凶猛的敌军，采取了让一步的策略。王邑的先头部队到达昆阳城城北时，只见连营数百里，看不到殿后部队。情况极其危机。绿林军决定由王凤、王常守城，另派刘秀、宋佻和李铁等十三人在王邑、王寻尚未站稳脚跟的时候，乘其不备从南门出城，突到郾城、定陵一带，调集起义军前来增援昆阳，准备里应外合夹击敌人。

很快，王邑、王寻已有十余万人抵达昆阳城下，将昆阳城层层包围起来。曾经领教过起义军厉害的严尤向统帅王邑建议说：“昆阳城虽小，但是很坚固，不易攻破，况且昆阳又不是主力军所在之处。不如甩开昆阳，直接包围攻打宛城的绿林的主力军，如果我们打败了绿林的主力军，那么昆阳城便不攻自破了。”严尤的分析显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当时王邑采纳了这个建议，昆阳的战势很可能向着不利于绿林军的方面转化。但是骄纵的王邑哪里肯听，他倚仗着人多势众，一心想血洗昆阳。他说：“我从前带兵围攻翟义(东郡太守，曾举兵反抗王莽，莽派王邑攻打之)，虽然打败了他，但因为没有活捉他，而受到不少责难。而今，我身统百万大军，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昆阳城都攻不下，还怎么显示出我的威风呢！”接着又吹嘘说：“等着吧，我一定要把昆阳城攻破，并且血洗全城。那时我们百万大军，将踏着鲜血，向宛城挺进，前队唱歌，后队舞蹈，多么开心。”于是王邑、王寻倾全力攻昆阳城。小小的昆阳城被包围得里

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兵营百余座，云车十余丈，战鼓咚咚，号角声声，数十里外都听得见，令人胆战心惊。他们用楼车撞，挖地道攻，一时间，昆阳城内箭矢如雨，其势凶猛异常。

这时，昆阳城内的绿林守军在积弩乱发，矢下如雨的情况下，头顶门板，奋力抵抗。在莽军猛烈攻击下，绿林军中的起义首领王凤，被王莽军气势汹汹的气焰吓倒，竟然要求向王邑投降。骄纵的王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自以为胜利在握，对绿林军丝毫不放在眼里，因此拒绝了王凤的求降。这时严尤又向王邑提出建议，按照《孙子兵法》所说，包围城市，一定要留一个缺口，我们也应给昆阳城留一个缺口，给绿林军留下一条逃跑的生路，这样我们或者可乘他们逃出城外的时机消灭他们，或者让他们逃到宛城方面以后，宣扬我军的声威，给绿林军造成恐怖，以便动摇其军心。这样既可以不攻而夺昆阳城，又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向宛城方面进军。王邑还是拒绝采纳严尤的建议，一意孤行，继续对昆阳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这时昆阳城内的起义军与昆阳城中的老百姓联合作战，打退了莽军的强攻。小小的昆阳城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硬是坚持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骄纵昏庸的王邑陶醉于莽军徒有其表的军容与阵势，仍在洋洋得意地等待着收复昆阳城，他根本看不到他的队伍因为一次次地受挫，兵士们的士气在下降，形势正在向与他的估计相反的方向发展。

刘秀等十三人冲出昆阳城后，直奔郾城、定陵。郾、定两地的将领中有人贪恋两城的财物，打算留下一部分兵士专门看守掠到的财物。刘秀则坚决主张放弃郾、定两地，把全部兵力拉去参加昆阳之战，他对这里的将士们说："我们这次出击，如果打败了敌人，大功告成，那么我们将能得一万倍的金银财宝；但是，如果我们被敌人打败，连脑袋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金银财宝！"刘秀征集了两地的全部兵力约一万人之多，迅速向昆阳进军。

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六月一日，郾、定地区各路起义军同时

向昆阳进军，刘秀率领一千多名精锐的步、骑兵，作为援军的先头部队最先到达，在距王邑兵团四五里处布下阵势，准备在莽军的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一向骄横的王邑哪里将这千把人放在眼里，他只派了几千人前去迎击刘秀。没想到这一千名起义军在刘秀的指挥下，个个英勇奋战，连战连胜，斩杀莽军数千人，给王邑来了个下马威，莽军悻悻然败走。城外的绿林军首次交战，便获大胜，大大地鼓舞了起义将士的士气，愈战越勇，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莽军又被斩杀近千人。莽军连吃败仗，伤亡惨重，士气一落千丈。此时，绿林军的主力军已经攻下宛城，刘玄移都宛城，但是消息尚未传到昆阳。刘秀其时并未获此消息，不过他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动摇莽军的军心，就有意制造了假情报，宣称绿林军已经拿下宛城。他一方面将此消息尽快让昆阳城内的守军兄弟们知道，另一方面又故意将此假情报“失落”于莽军手中。这一攻占宛城的假情报，使得莽军惊慌失措，几十万大军层层叠叠包围着的小小昆阳城，一个月的时间竟然都不能如愿攻破；而有重兵防守的宛城重镇，居然被起义兵攻下，两相对比，莽军将士的士气如何不低落？捷报传入昆阳城内，城中的绿林军与全城的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情绪更加激扬。由此，昆阳之战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向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面转化。

刘秀不失时机，挑选了三千名勇士，组成了一支敢死队，迂回到昆阳城的西边，沿着护城河，猛攻王邑的中军大营，并将出击的时间选在拂晓，在敌人刚刚熬过炎热的夏夜，贪凉酣睡时，乘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果然不出所料，当刘秀的三千名勇士如天兵般突然出现在王莽军的中坚大营附近时，只有少数士兵懒懒散散地刚起床，大部分的士兵还在甜蜜的梦乡。王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匆忙应战，为了防止混乱，特别下令，各军坚守阵地，没有将令，不得随意行动。

一场激战打响了，莽军一接触到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的绿

林军，就招架不住了，略向后撤，起义军紧紧逼进。加之莽军有令在先，没有命令，各营不敢互相支援，霎时间，阵势大乱，在混战中王寻在阵前被起义军杀死。昆阳城中的守军此时也擂鼓而出，莽军在前后夹击中，像潮水般垮下来。战场上呼声惨厉，惊天动地，莽军兵败如山倒，在四处逃窜中互相践踏而死，再加上战死的，百里之遥尸体遍地。在绿林军的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突然雷雨大作，这使溃不成军的莽军更加混乱，王邑、王寻带来的猛兽也挣脱羁绊纷纷逃奔。莽军在这种情况下被活活淹死一万多人，河流为之堵塞。王邑见此惨景，丢下溃不成军的人马，和严尤、陈茂只带了少数残兵败将，踏着自己士兵的尸体，仓皇逃命。他们骑马狂奔，渡过滍水，向北逃回洛阳。绿林军获大胜，昆阳之战在起义将士的欢呼声中胜利结束。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昆阳大捷"。昆阳大捷之后仅三个月，新莽王朝就被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所代替。昆阳大捷对推翻王莽新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岱英）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光武中兴》

张侠《昆阳之战》

刘泽华、杨志玖《中国古代史》

《绿林赤眉农民起义资料选注》

王莽之死

大约在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王莽挑起了对匈奴的战争；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在以后的五六年内，起义的浪潮便波及全国。当起义的烈火四处燃起时，王莽却深信厌胜法术——铸威斗能对付农民起义。王莽亲自跑到常安（即长安）的南郊主持盛大的铸斗典礼。所谓威斗是用五石铜铸造的一个长二尺五寸，状如北斗一样的东西。王莽视此物为厌胜起义者的神物，以至将其视作权力的象征，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宫中，威斗必伴其左右。就在王莽铸就威斗之时，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大军在东方和南方形成了燎原之势。威斗的神力不攻自破。王莽决心用残酷的手段将农民起义军淹没在血泊之中。他搞起了全国一体军事化，下令增设许多将军，并要求所有地方官一律兼任军职，让他们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军。岂不知，这一将全国变为一座大军营的举措，首先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一片混乱。随着王莽的一声令下，封拜行政长官为军事长官的使者便不绝于途，给交通、食宿及各种供应都造成很大困难，驿站车马供不应求，使者们在路上随便抢夺百姓的车马，再加上他们狐假虎威，随意敲诈勒索，搞得沸反盈天，鸡犬不宁，这就更加重了王莽政权的危机。此时，一个骗子告诉王莽说，京都有“土动象”，一定要大兴土木，方可免灾。王莽又一次听信了谎言，认为只有通过大兴土木，才能镇压声势越来越大的农民起义，地皇元年（公元 20 年），在长安以南上百顷的土地上建筑九庙，供奉祖宗神灵。九月他亲临城南主持奠基仪式。为了筹措这项建筑经费，他

竟然采用了卖官鬻爵的办法。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花费数百万巨款，征集了十多万役夫，长年累月辛苦劳作，上万役夫惨死在工地。九庙盛举本身就极不得人心，它不仅不能帮助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反而是火上浇油，使烈火越燃越旺。在工程即将完工之时，钜鹿又爆发了马适求领导的农民起义，汉江地区的新市、平林的起义军则越战越勇，波及面越来越广，起义的烈火逼近了王莽统治的腹地长安和洛阳。

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绿林军拥立刘玄为皇帝，改年号为更始。绿林军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四月，王莽派最得力的爪牙王邑与王寻率兵四十多万在河南试图与绿林军决一死战。王莽军四十多万人与被围困在昆阳城（今河南叶县）内的八九千绿林军将士鏖战一个多月，最后，王寻作了农民起义军的刀下鬼，王邑则带了数千名长安兵失魂落魄地逃回洛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昆阳之战以王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敲响了王莽新朝的丧钟，自此后，王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关中一隅。此时的他犹如关在笼子里的困兽，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昆阳之战后，刘秀等人将王莽鸩杀汉平帝的事情公布于众，以此说明王莽从来就不是刘汉王朝的忠臣，而是一个犯了篡杀大罪的巨奸大憝。这宣传顿使王莽陷人了四面楚歌的境地，终日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他的神经接近错乱，甚至吃不下饭，仅靠饮酒和食鳆鱼来维持时日。这年的秋天，陇西成纪的地方官隗崔兄弟一起逮捕了王莽任命的最高地方长官大尹李育，并推他们的侄子隗嚣做大将军，攻城略地。他们还发布檄文，痛斥了王莽的倒行逆施，这更使王莽腹背受敌，难以招架。与此同时，王莽新朝的另外一些地方实力派也纷纷扯旗反叛，如钟武侯刘生起兵汝南，王莽的足智多谋的两员大将严尤、陈茂也倒向了刘生。王莽的文臣武将纷纷投降，他机关算尽，各种骗术均已失灵。山穷水尽之时，他又演了一出闹剧：居然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陈述他应符命做皇帝

的始末。他对着茫茫的苍天号啕不已："既然皇天让我做皇帝，为什么不帮助我殄灭起义军！"更为可笑的是，王莽下令老百姓每天早晚两次聚在一起仰天大哭，并且专门派官吏督人做粥招待聚众哭者。凡在这次哭天闹剧中表现得极度悲戚并能诵读王莽的告天策文的人，通通被任命为郎官。几天之内，仅仅因为哭得符合标准而得到郎官的就有五千人之多。

哭得无论多么感人，也丝毫不能感动上天，也不能抵抗住各路起义军的迅猛、凌厉的攻势，挽救不了王莽的命运。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在广阔的泾渭平原，起义军的战马驰骋，战旗飘扬，一场彻底埋葬王莽新朝的激烈战斗正在进行着。王莽为了延宕灭亡的时日，拼命地挣扎。他把京师最后保留着的数万士兵，交给了他任命的以"虎"为号的九员大将统率，并在长安以东设置了最后的防线，以顽抗进攻京师的起义军。为了防止这些为他卖命的将士倒向农民起义军，他们的妻子、儿女通通被扣留在宫中做人质。尽管在这时宫中还堆积着二十多年王莽横征暴敛得来的大量财物，仅黄金就有六十多万斤，其他的金银财宝、布粟锦绢更是堆积如山，不计其数，但是死在临头的王莽仍然十分苛刻，对这批为他卖命的将士，每人只赏了四千钱。本来，这批将士就不愿为这个濒临灭亡的不得人心的新朝卖命了，现在，王莽竟扣留了他们的妻儿作人质，还守着大堆的金银财宝不肯多出一点血，越发激起了将士们对王莽的怨恨。因此，九"虎"将士们到达华阴（陕西华阴县）一线，与起义军一接触，就不战而逃，一败涂地。九"虎"中二位将军自杀，四位逃跑不知去向，其他几位"虎"将军，收拾起残兵败将，退保京师仓（陕西华阴县灌水注入渭水处）。其时，关中的起义军首领邓晔正打开武关，迎接绿林起义军的先头部队入关。更始政权的丞相司直李松率三千人抵达湖县（今河南灵宝县北），与邓晔会合，联合进攻京师仓，未克。于是邓晔任命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带领数千人向北进发，渡过渭河，进入北长安市境界。李松派他的助手偏将军韩臣

等，向西推进到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攻击王莽的波水将军窦融，韩臣追击窦融直逼长门宫。此时，李松、邓晔率领起义军主力已经抵达华阴，京都长安已经被层层包围，愈战愈勇的起义军士气正昂扬，纷纷争着要第一个攻进京都。

被包围在长安城中的王莽，手中几乎已经没有可用之兵了。尽管如此，他困兽犹斗，为了抵抗起义军的进攻，不得不临时拼凑一支队伍。他发布一道赦免令，将监狱中的囚犯释放出来，发给他们武器，且杀猪饮血，强迫囚徒们发誓效忠新朝：如果做出不利于新朝的事，神鬼将降罪。这些曾被王莽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囚犯们，怎么可能为王莽去卖命？因此，当王莽的岳父史湛将军带领着这批刚刚被武装起来的囚犯渡过渭水桥与起义军交战时，囚犯们便一哄而散，不打自逃，有的干脆调转矛头，杀向王莽军，史湛将军狼狈逃回城中。

起义军很快攻打到长安城下，在城外将王莽的妻子、父亲、儿子以及其先祖的坟墓全部挖开，掘其棺椁，焚其尸骨，扬其骨灰；愤怒之下，又将王莽劳民伤财修建的九庙、明堂、辟雍付之一炬，霎时间城外火光冲天，大火映红了整个长安城。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初一，起义军攻破长安城的宣平门，拥入城中，新朝大司徒张邯首先被起义军斩杀。新朝大司马王邑率领王林、王巡等将领在未央宫北门与起义军血战一整天。黄昏时分，几乎所有的官邸、府第都被起义军占领，只有皇宫还被王莽的党徒们据守着。九月初二，长安城里青年朱第和张鱼，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聚集起成群的市民，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中来，直接参加了消灭王莽官军的战斗。他们直扑未央宫北门，并纵火焚烧宫门，趁王莽及其党徒一片混乱，用斧头劈开敬法殿小门，冲进了皇宫。他们高声呼喊着："叛贼王莽，怎么还不来投降！"大火迅速蔓延到后宫承明殿。承明殿是王莽的女儿、汉平帝的皇后黄皇公主的住处，她见此情景，叹息说："我还有何脸面再见汉王朝家人？"纵身投

入火海而死。起义军占领了一座座宫殿，同时大火仍在蔓延着。

这时王莽身着赤青色衣服，佩带玺韨，手握虞帝匕首，逃到未央宫宣室殿避火，天文官手捧栻(占时刻之用)战战兢兢地站在王莽身旁，为他占卜时刻方位，不断地报告。此时王莽活像一头发了狂的猛兽，绕着桌案兜圈子，最后终于找到了斗柄显示出的最吉祥的方位坐下。面对着漫天的烈焰和外面不时传出的起义军的冲杀声，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上天照顾我，汉军也奈何不得我。"九月初三凌晨，王莽的群臣，眼看宣室殿难以据守，就拖着王莽出宣室殿经白虎门，逃至四面环水的渐台。王莽此时怀抱符命、威斗，与群臣及千余名卫士企图凭借周围的池水，作最后的挣扎。日夜血战的王邑已经疲惫不支，他率领的兵士也死亡将尽，尽管如此，仍然与其于王睦尽力保卫着王莽。

起义军杀至宣室殿，不见了王莽，于是大呼："叛贼王莽在哪里?"宫中一美人告说王莽逃往渐台。起义军追至渐台，将其层层包围。起义军与死守渐台的王莽党徒展开了一场殊死激战。强弩对射，矢如雨下，相持了大半天。待到王莽党徒们矢尽援绝，无力抵抗之时，起义军将士们一跃而起，争先恐后地渡过池水，冲向渐台。在此，双方又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王邑父子及王莽最后一批忠实爪牙在最后的肉搏中纷纷丧身。黄昏时分，王莽的守军彻底被粉碎，王莽则逃至渐台的一间小屋里躲藏起来。这时商县人杜吴第一个冲进了王莽藏身的小屋，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之后，取下了王莽的绶带，扬长而去。杜吴恰好碰上一个叫公宾就的校尉，此人是东海(今山东郯城县)人，学过《礼经》，认识皇帝的绶带，他抓住杜吴忙问绶带主人在哪里，杜吴指点给他后，公宾就跑进屋去割下了王莽的脑袋。随即起义军众兵蜂拥而上，顿时，王莽的尸体被割成碎块。公宾就提着王莽的头，将其献给了大将军王宪。

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九月初六，李松、邓晔率起义军进入长安，赵萌、申屠建等也接踵而至。这时王宪拿着皇帝的玉玺印信不

肯缴出，且又淫乱宫女，还背着刘玄皇帝建立天子仪仗，罪不容赦，于是被逮捕、诛杀。之后王莽的头被送到更始政权临时首都宛城，悬挂于街市示众。愤怒的民众将王莽的人头踢来踢去，有人甚至将王莽的长舌割下吃掉了。

（王岱英）

参考书目：

《汉书》:《王莽传》

《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

孟祥才译注《王莽传》

刘秀经略河北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是以河北地区为根据地的，因此，刘秀经营河北是他扫平群雄、一统天下的基础。

刘秀字文叔，汉朝宗室，是西汉景帝的后裔，其高祖父刘敞时失去了封爵，曾祖父刘外曾任郁林太守，祖父刘回曾任钜鹿都尉，父亲刘钦曾任南顿县令。刘钦娶湖阳富人樊重女儿为妻，生有三个儿子：刘縯、刘仲、刘秀。刘秀父亲早死，兄弟三人由叔父刘良抚养。刘縯字伯升，性情刚毅，慷慨大度，对王莽篡汉，常愤愤不平，时刻想恢复汉王朝刘氏的统治，因此平时不注意积聚财富，任侠好士，倾身结交天下雄俊之士。刘秀身高七尺三寸，美须眉，鼻高口阔，一表人材，平时勤奋地从事农业生产，刘縯对刘秀的行为很不以为然，经常讥笑刘秀，把刘秀比做汉高祖的二哥刘仲。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京师求学，师事中大夫许子威，学习《尚书》，略通大义。

刘秀的姐姐嫁给了新野的邓晨。有一次，刘秀与邓晨一起去拜见高士蔡少公，蔡少公通晓图谶，在交谈时曾说刘秀当为天子。有人说："那大概是指国师公刘秀吧！"刘秀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又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在坐的人都大笑，邓晨内心很感高兴。

宛人李守爱好星历、谶纬，是王莽的宗卿师，他曾经对儿子李通说："刘氏当再次复兴，李氏当为辅弼。"王莽改制失败，各地纷纷起义，新市、平林起义爆发后，波及南阳，李通的堂弟李轶对李通说："现在各地反叛，汉当复兴，南阳地区的汉宗室只有刘伯升兄弟豁达大度，爱民容众，可以共同谋划大事。"李通回答说："我也是这

个意思。"这时正好刘秀在宛地卖谷，李通派遣李轶前去迎接刘秀，见面后详细交谈了有关谶文的事，共同谋划后决定：李通在立秋时郡内兵士比试那天，设法劫虏前队大夫甄阜和属正梁丘赐，用他们的名义号令兵士起义，李轶、刘秀回舂陵举兵响应。刘縯召集当地豪杰大姓商议说："王莽暴虐无道，百姓四处流离，再加上枯旱连年，各地郡发生了反叛，这正是上天灭亡王莽的时机，应趁此机会恢复刘氏基业，定万世太平。"众豪杰都认为有道理，于是派遣亲信宾客到各县发动起义，刘縯决定舂陵诸子弟由自己统率，自成一部。开始，诸子弟都很害怕，纷纷躲藏，议论说，刘伯升要害我们，等到看见刘秀绛衣大冠，一副忠厚模样，才又惊奇地说："这是一个厚道人，可以为他效劳。"大家安定下来，有七八千人参加了起义，刘縯自称柱天都部。起兵这一年刘秀二十八岁。可是李通那边起兵还没有发动就被官府发觉，李通只得逃跑了，他的父亲李守及家属受株连被杀死了六十四人。

刘縯、刘秀兄弟率领的舂陵兵与新市、平林起义军会合，几次打败了王莽的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建立了政权，拥立刘玄为皇帝，建元"更始"。后来，起义军发生内讧，刘縯被杀，刘秀也受嫉忌，这时，刘玄打算派亲信大将去经营河北，大司徒刘赐进言说："刘氏子弟中唯独刘秀可大用。"朱鲔等人参与谋害刘縯，对刘秀不放心，劝刘玄不可放刘秀走，刘玄狐疑不定，刘赐进一步劝谏，刘玄才让刘秀代理大司马，持节北渡黄河，镇守安抚河北各州郡。

刘秀到河北后，所经过的郡县，对郡守二千石、长吏、三老以及各官府属吏进行考察，有才能有政绩的给予提升，不称职的、贪赃枉法的降职，平反冤狱，废除王莽所实行的苛政，恢复汉朝官名。吏民喜悦，都纷纷携持酒肉迎接慰劳，刘秀丝毫不受。

南阳人邓禹听说刘秀去河北，一个人渡河追赶刘秀，在邺这个地方追上了刘秀，刘秀试探地对邓禹说："我有权任命官吏，你远道而来，是想人仕为官吧？"邓禹说："我不愿做官。"刘秀说："那你有

什么打算?"邓禹说:"我愿为您效力,使您威德加于四海,建立功业,垂名后世。"刘秀很高兴,把邓禹留在身边,同吃同住,经常彻夜长谈。邓禹曾对刘秀说:"更始虽建都关西,而山东还没有平定,赤眉、青犊等起义军势力强大,动以万数,刘玄才能平常,又自作主张,诸将多是庸人,参加起义只不过是为夺取一些钱财,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贪图一时快乐,没有一个是忠良明智、有深虑远图、想尊主安民的人。历观古代贤圣兴盛,最主要的是天时和人事两方面,现在从天时来看,更始政权建立后灾异屡次出现;再看人事,帝王大业不是凡夫庸人所能成就的,现在形势很明显,您虽然建立了藩辅之功,但恐怕难以成就功业。您威德并重,立有大功,为天下人所尊服,军队齐整,赏罚严明,一向注重信誉,为今之计,不如招揽英雄,顺从民意,建立汉高祖的功业,拯救万民于水火,忠心为国,天下是不难平定的。"刘秀听了邓禹的议论大为高兴,命令左右亲随称邓禹为邓将军,有事与邓禹共同商议决定,每任命官吏,调兵遣将,几乎都征求邓禹的意见,其结果也都能使用得当。

刘秀自从兄长刘𬘭被杀后,每独居时便不喝酒吃肉,夜里也常因此而伤感落泪,枕头常有斑斑泪迹。刘秀的主簿冯异曾单独叩见刘秀进行宽慰,乘机进言:"更始政权政治紊乱,百姓无所依靠,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现在您独占一方,应该派遣官员到各地郡县进行安抚,布德施惠。"刘秀采纳了冯异的建议。耿纯到邯郸谒见刘秀,看到刘秀的官属及统兵法度与其他人都不相同,于是和刘秀结交。

王莽时期,长安有一个自称是成帝的儿子刘子舆的人被王莽杀死。邯郸有一人叫王郎,以占卜算命为职业,谎称自己是刘子舆,自立为皇帝,建都邯郸,传书各地州县。在很短时间内,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的广大地区都望风响应。

更始二年(公元 24 年)正月,刘秀因为王郎势力强大,乃向北转移,想夺取蓟州。王郎向各地发布文书说:"谁能逮捕刘秀,封赏

十万户。”已故广阳王的儿子刘接在蓟中起兵响应王郎，城内混乱，谣言四起，一日数惊，传言邯郸使者已到，二千石以下官吏都要去迎接。刘秀听说后不敢久留，急忙向南辕转移，早晨晚上不敢进入城市和村庄，吃饭也只是在路边随便吃点东西。行至饶阳，没有东西吃，刘秀自称是邯郸使者，进入官方设立的传舍，传舍的吏员刚刚送上吃的，刘秀的属员因为饥饿，纷纷上前抢夺，传吏产生了怀疑，击鼓数十通，假说邯郸的一位将军到。刘秀属员都大惊失色，刘秀也大吃一惊，坐上车想赶快逃走，忽然又想到难以逃脱，就又慢慢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假装镇静地说："请邯郸来的将军进来相见。"过了很长时间后才慢慢离开。传舍的官吏又设法传话给城门守卫，闭门不让刘秀等人出城。门长说："天下事难以预料，怎能关闭长者呢？"刘秀得以出南门，顶风雪，冒严寒，昼夜兼程，想脱离王郎的控制区，由于天气寒冷，刘秀等人的手脸都冻裂了。行至呼沱河，没有船只，守候的吏员回来报告说："前面有河无船，无法通过。"刘秀派王霸到河边看一看，王霸怕大家恐慌，想到河边再想办法，于是便谎说河里已结厚冰，可踏冰而过，大家都很高兴，刘秀也高兴地说："果然是候吏说谎。"便率大家继续前进，走到河边，河水竟真的结了厚冰，王霸保护众人过河，刚走过去几个人冰又解冻了。走到南宫，又遇上大风雨，刘秀等人进入路边的一座空房，冯异抱了一些木柴，邓禹点着火，刘秀把湿衣服脱下放在火上烤干，冯异又出去弄了一些麦饭给刘秀暂时充饥。

刘秀率领众人继续前进，走到下博城西，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正巧路旁有一位身穿白衣的老人，给刘秀指路说："努力向前，离这里八十里地是信都郡，为长安城守。"刘秀一行急速赶到信都郡，当时各郡国都投降了王郎，唯有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坚守不降。任光正忧虑孤城难以守住，听说刘秀到来，大喜，吏民皆欢呼万岁，邳彤也从和戎赶来相会。当时有些人建议让信都军队护送刘秀回长安，邳彤对刘秀说："吏民很长时间以来通过歌谣思念

汉室，所以更始皇帝建尊号得到了天下人响应，三辅地区的人们清理宫室，打扫街道进行欢迎。现在王郎假借汉室名义，利用有利形势，驱集乌合之众，在燕赵地区得以发展，但没有固定根本，您统率两郡军队奋起讨伐，还用担心打不败王郎吗！今天放弃这个机会而回归长安，不仅凭空丢失了河北，而且惊动三辅地区，堕损威信，恐怕不是上策。如果您没有讨伐王郎的意思，信都的军队也难以会合，您一旦西去，邯郸势力巩固，民众不会远离故乡，背弃现成的主人而不远千里追随您，势必离散逃亡。"刘秀听从了邳彤的劝告，打消了回归长安的念头。

刘秀看到两个郡的兵力太弱，打算联络城头子路、刁子都的军队，任光认为不行，于是征发附近各县丁壮男子，得精兵四千。刘秀拜任光为左大将军，信都都尉李忠为右大将军，邳彤为后大将军，仍任和戎太守，信都令万脩为偏将军，都封为列侯。留南阳人宗广兼领信都太守，让任光、李忠、万脩领兵随从，邳彤率一支军队为前部，任光书写檄文各处散发，檄文说："大司马刘公率城头子路、刁子都军队百万从东方来，进击反虏。"又派骑兵进人钜鹿界内，吏民看到檄文，相互转告，扩大了影响。刘秀在一个傍晚进入当阳地界，为虚张声势，多设灯火，遍野皆是，当阳守将开城投降；随之进攻费县，费县也很快投降。昌城人刘植聚集军队数千人占据昌城，也据城投降了刘秀，刘秀封刘植为骁骑将军。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家属老幼举族随行，在育迎接刘秀，刘秀拜耿纯为前将军。刘秀又率军攻下了曲阳。各支军队会合，共有数万人，又北上进攻中山。耿纯担心宗族中有怀二心的，命令从弟耿䜣乘夜间回家，焚烧了家族的房舍，断绝家族成员的归路。

刘秀发檄文给周边各郡，要求会合进攻邯郸，许多郡县发兵响应。此时真定王刘杨起兵依附王郎，有军队十余万，刘秀派刘植游说刘杨，刘杨投降了刘秀，刘秀暂时留居真定，又娶刘杨外甥女为妻以结好刘杨，接着又攻下了元氏城和防子城。随即进攻鄗，击杀

了王郎大将李恽。此时王莽大将李育屯守柏人，汉兵不了解情况发动进攻，前部偏将朱浮、邓禹被李育打败，辎重丢失，刘秀在后面听说，收集了朱浮、邓禹的散卒，与李育在郭门大战，李育大败，刘秀又夺回了丢失的辎重。

南郑人延岑起兵占据汉中，汉中王刘嘉降服了延岑，有军队数十万。校尉贾复见更始政权政治混乱，对刘嘉说："今天下未定，而大王您安心守卫所占有的地方，这些地方能否保守住呢？"刘嘉说："你说的是大事，这些事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大司马刘秀在河北，到那里你一定能有所施展。"刘嘉便写信给刘秀推荐贾复和南阳人陈俊，贾复与陈俊在柏人谒见了刘秀，刘秀封贾复为破虏将军，陈俊为安集掾。

刘秀舍中儿违犯法纪，被军市令祭尊杀死，刘秀大怒，命人逮捕了祭尊。主簿陈副进谏说："明公您常想整顿军队，严明军纪，今祭尊执法无所顾忌，才能使教令得以推行。"刘秀放了祭尊，让祭尊任刺奸将军，对诸将领说："你们要防备祭尊，我舍中儿犯法，祭尊尚敢杀死，你们如违犯法度，他一定不讲情面。"

有人劝说刘秀，认为守柏人不如夺取钜鹿。刘秀于是率军队攻取了广阿。刘秀指着地图对邓禹说："天下郡国如此大，现在只得到十分之一，你以前曾说，我如果忧虑天下就不难平定，是根据什么说的？"邓禹说："现在海内混乱，人人渴望明君，就好像孩子思慕慈母，自古以来，兴盛者在于德薄厚，不在于一时强弱大小。"

蓟中战乱之时，耿弇与刘秀散失，到昌平依附父亲耿况，劝说父亲耿况进击邯郸。正好王郎派军队进攻渔阳、上谷，北方各地疑惑不定，多数人准备归顺王郎，上谷郡功曹寇恂、门下掾闵业劝耿况说："邯郸王郎突然兴起，难以相信，大司马刘秀是刘伯升弟弟，尊贤下士，可以归从。"耿况说："邯郸势力正盛，以上谷兵力难以抗拒，怎么办才好？"寇恂回答说："现在上谷城池坚固，府库充实，精兵万骑，应仔细选择去就，我请求去联络渔阳太守彭宠，计划各发

精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到刘秀处由刘秀调遣使用。”

安乐县令吴汉、护军盖延、狐奴县令王梁也劝彭宠归依刘秀，彭宠同意，但有些属吏想依附王郎，彭宠一时拿不定主意。吴汉来到外亭，遇到一个儒生，便招呼到身边一块吃饭，问其见闻，儒生说：“大司马刘秀，受到我所经过地区的普遍称颂，邯郸王郎称帝，实际并不姓刘。”吴汉听了大喜，随即假借刘秀名义写了一封信，说是寄给渔阳的，让儒生拿着送给彭宠，并让儒生把所听到的传闻都告诉彭宠。正好这时寇恂来联络，于是彭宠发步骑三千人，让吴汉担任长史，与盖延、王梁共同统领，进攻南方的蓟县，攻杀了王郎的大将赵闳。

寇恂回到上谷，与上谷长史景丹及耿弇率兵将南下，与渔阳军队会合，沿途攻杀王郎大将、九卿、校尉等将士三万多人，平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等二十二个县。前边紧接广阿，听说广阿城中有许多军队，景丹等人停止前进，问是哪里的军队，对方回答说是大司马刘公，诸将大喜，随即进军城下。城中开始听说两郡军队为邯郸而来，都很害怕，刘秀亲自登上西城楼问是何处军队，耿弇在城下拜见，刘秀随即让耿弇进城。耿弇把发兵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刘秀，刘秀把景丹等人全部接进了城，笑着说：“邯郸将帅几次说我调发了渔阳、上谷军队，我也假说调发了，可事实上两郡军队真是为我而来，看来真是要与诸位士大夫共同成就功名了。”随即把景丹、寇恂、耿弇、盖延、吴汉、王梁都封为偏将军，回领本部人马。加封耿况、彭宠为大将军，又加封耿况、彭宠、景丹、盖延为列侯。

吴汉为人朴实厚重而少文采，关键时刻有时辞不达意，可是勇敢有智略，邓禹几次向刘秀推荐，刘秀逐步亲近重视吴汉。

更始政权派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讨伐王郎，不能取胜，刘秀率军赶到，与谢躬合军包围钜鹿，一个多月没有攻取。王郎派军进攻信都，当地大姓马宠等人开城迎进，更始派军队攻破信都，刘秀派李忠回信都代理太守。王郎派倪宏、刘奉率数万军队救援钜鹿，

刘秀迎战于南䜌，没有获胜。景丹等派出突骑进攻，倪宏军队大败。刘秀赞扬说："我听说突骑是天下精兵，今天见其参战，真是乐不可言。"

耿纯对刘秀说："长期围困钜鹿，士卒疲惫，不如汇集精锐大军进攻邯郸，如果击杀王郎，钜鹿可以不战而归服。"刘秀听从。四月，留将军邓满围钜鹿，刘秀统军进攻邯郸，连战皆胜。王郎派谏大夫杜威向刘秀请求投降，杜威谎称王郎确实是成帝后裔，刘秀回答说："就是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何况是假称刘子舆的呢！"杜威请求封王郎为万户侯，刘秀回答说保全他性命就可以了。杜威愤怒离去。刘秀率军急攻二十多日，五月甲辰，王郎的太傅李立开城门迎进汉军，刘秀夺取了邯郸，王郎乘夜逃走，被王霸赶上杀死。刘秀没收了王郎的各种文书，其中有吏民与王郎的往来信件，内里诽谤刘秀的有数千件，刘秀看也不看，在大会诸将时全部烧毁了，并对众将说："让那些曾有所反复的人安心吧。"

更始政权派使者立刘秀为萧王，让刘秀罢兵，与立功的诸将回归长安，并派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诸人都分赴任所上任。

刘秀居住在邯郸宫，有一天在温明殿睡午觉，耿弇进去，直至床前请求密言，对刘秀说："吏士死伤甚多，请求回上谷增兵。"刘秀说："王郎已灭，河北大致平定，还增兵干什么？"耿弇说："王郎虽破，天下用兵仅仅是刚开始，现在使者从西方来，要求罢兵，不可听从。铜马、赤眉之属起义军数十支，拥有军队数十万，所向无敌，圣公刘玄认识不到，不久一定失败。"刘秀坐起来说："你乱说，我杀死你。"耿弇说："大王厚待我，如同父子，所以敢披心沥腑进言。"刘秀说："我是和你开玩笑，你有什么尽管说罢。"耿弇说："百姓怨恨王莽，思想刘氏，听说汉兵兴起，欢喜无限，好像孩子脱离虎口归依慈母。现在更始为天子，而诸将在山东专权擅命，各自为政；贵戚在都城纵横无忌，掳掠自恣，百姓不满，反而又思慕王莽时期，由此可知

更始政权必然失败。您威名素著，以仁义征伐四方，天下可传檄而定，您应以天下为重，努力夺取，不要让别人得到。"刘秀听从了耿弇的谏言，以河北没有平定为理由，不遵从更始政权召回的命令，从此与更始政权正式分道扬镳。

这个时期长安更始政权政治更加紊乱，四方背叛，将领专权。刘永、公孙述、李宪、秦丰、张步、董宪、延岑、田戎各据一方，自置将帅，攻占郡县，成为地方实力派。另外又有许多自立旗号的农民军，如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合起来有数百万人，各据一方。刘秀打算先平定农民军，任命吴汉、耿弇为大将军，持节率领幽州十郡突骑。幽州牧苗曾听说，暗地下命令各郡不听刘秀的调遣。吴汉率领二十骑先到无终，苗曾到路旁迎接吴汉，吴汉随即逮捕并杀死了苗曾；耿弇回到上谷，也逮捕杀死了韦顺、蔡充。北方各州震惊，都发兵听从刘秀的调遣。

这年秋天，刘秀在鄗进攻铜马农民军，吴汉率突骑在清阳与刘秀会师，兵马甚为雄壮。吴汉把兵簿全部献给了刘秀，所有军务都进行请示，不敢自专。刘秀对吴汉日益信任重用。刘秀又提升偏将军朱浮为大将军、幽州牧，治所设在蓟城。当时铜马军由于食尽，在夜间撤退，刘秀紧追不舍，在馆陶追上了铜马军，双方交战，铜马军大败。正在收降铜马军，高湖、重连等农民军从东南来与铜马军会合，刘秀军又与援军大战于蒲阳，打败并收降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军，首领都加封为列侯。可是刘秀军的将领对农民军首领不信任，降者心里也不安定。刘秀心里明白，命令各投降将领回营管理部属，自己轻车简从到各营巡视，投降的将领大受感动，私下议论说："萧王对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尽心效忠。"于是都诚心降服，刘秀把投降者分给诸将统辖，军队增加到数十万。赤眉军的一部分和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等农民军在射犬，刘秀率军队进攻，打败了各支农民军；接着南征河内，河内太守韩歆投降。

冬，刘秀将北征燕赵地区，又考虑到赤眉军必定攻破长安，想乘机吞并关中。先取何方，一时拿不定主意，乃封邓禹为前将军，从自己部从中分出精兵两万，随邓禹入关，并让邓禹自己在军中选择可与共事的副手。当时朱鲔、李轶、田立、陈侨统领一支兵马，号称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同守卫洛阳，鲍勇、田邑驻守并州。刘秀因为河内郡险要富裕，想作为根据地，因而想在诸将中选一合适的将领留守河内，一时难以决定选谁合适，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说："寇恂文武兼备，有统治百姓驾驭众将的才能，此人是最合适的人选。"刘秀便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行使大将军职权。刘秀对寇恂说："从前高祖让萧何留守关中，我现在让你守河内，希望你供给粮草，统率训练人马，防御其他军队的入侵，不要让敌人北渡黄河。"又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魏郡、河内的军队驻守黄河岸边，以防御洛阳军队的进攻。刘秀亲自送邓禹到野王，邓禹率军队西去，刘秀自己领兵北上，寇恂征集粮草，制造器械以供军需，军队征伐在外，供应一直没有短缺。

汉光武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春正月，邓禹进军至箕关，击破河东都尉军，进围安邑。

夏四月，刘秀北上进攻尤来、大枪、五幡等农民军，在元氏、北平两次打败了农民军，又在顺水北再次大战，却被农民军打败。刘秀与军队失散，自投高岸，路上遇突骑王丰，王丰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刘秀，刘秀才得免于难。散兵集聚归守范阳，军中不见了刘秀，有人传说刘秀已死，诸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吴汉说："大家努力，萧王兄子在南阳，我们不用担心无主。"众人都很恐惧，好几天才逐步安定下来。几支农民军虽战胜，却畏惧刘秀威名，乘夜间退走。刘秀的军队追赶到安次，连续作战几次，终于打败了农民军，农民军退入渔阳。刘秀归营后，派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位将军继续追赶。陈俊对刘秀说："贼军没有辎重粮草，应该命令轻骑走在贼军前面，让百姓坚壁清野，断绝贼军的食物来源，这样不战而敌军

自破。"刘秀同意陈俊的意见,派陈俊率轻骑绕到农民军前面,看到百姓保壁完整的,命令继续固守;放散在田野的自己掠取收藏,农民军到了以后,一无所得,只得散于四方。刘秀对陈俊说:"困散这些贼军,你的计策起了决定作用。"

冯异驻守黄河北岸,与洛阳隔河相对,曾致书李轶,陈述利害祸福,劝李轶归附刘秀。李轶深知长安更始政权已处于危险之中,但想到自己曾参与谋杀刘𬙂,内心有所顾虑,于是给冯异回信说:"我与萧王首谋兴复汉室,现在我守卫洛阳,您镇守孟津,都据守险要之地,真是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希望您转达萧王,我愿进献计策以佐国安民。"李轶自和冯异书信往来后,不再与冯异交战,因此冯异乘机北上攻取了天井关、上党两座城池,又向南攻占了河南成皋以东十三个县,收降军队十余万。武勃率一万多军队进攻叛降冯异的各处,冯异与武勃战于士乡,冯异打败并杀死了武勃,李轶闭门没有救援武勃。冯异看到李轶守信诺,把详情报告了刘秀,刘秀给冯异回信说:"李轶奸诈多谋,别人不能得他的要领,现在把他的来信告诉各地守尉,对他进行警备。"众将领对刘秀公布李轶的密信感到奇怪,朱鲔听说此事后,派人刺杀了李轶,从此洛阳守军人心离散,很多人投降了刘秀。

朱鲔听说刘秀北征,河内地区空虚,派遣苏威、贾强率兵三万余人渡巩河攻温,朱鲔亲自率领数万人进攻平阴以牵制冯异。消息传到河内,寇恂立即率军队迎击,并派人通知所属县发军队会合于温。军吏劝阻寇恂说:"现在洛阳军队渡河,前后不绝,应等到各处军队会集才可出征。"寇恂说:"温是河内郡的藩蔽,失掉温则河内也守不住。"于是率军队急速向温进发,次日与苏茂军大战,冯异的援军与各县军队正好赶到,寇恂命士兵在城上擂鼓呐喊,声称刘公兵到。苏茂军队听到喊声大为震动,寇恂率军乘机奔袭,大败苏军。冯异也渡河进攻朱鲔,朱鲔退走。冯异与寇恂追赶到洛阳,绕城一周退回,洛阳军民震恐,昼夜关闭城门。

冯异、寇恂将战况报告刘秀，诸将齐来庆贺，并劝刘秀即皇帝位。马武先进言说："天下无主，如有圣人乘机而起，大势一定，就是孔子为丞相，孙武为大将，也不能改变现实。失去现在的机会后悔就来不及了，大王您执意谦退，如何对得起宗庙社稷？应暂且回蓟即帝位，然后再讨论征伐。那样击贼也就名正言顺了。"刘秀有些吃惊，对马武说："将军怎能说出这种话，这可是要杀头的。"刘秀率军队回到蓟，又命令吴汉率耿弇、景丹等十三位将军追击尤来等农民军，斩杀一万三千多人，一直追到浚靡才返回，农民军余部退入辽西、辽东，被当地乌桓人、貊人击杀略尽。

刘秀从蓟回到中山，诸将又上尊号，刘秀仍没有听从，走到南平，诸将再次恳请，刘秀对诸将说："寇贼没有平定，现在四面受敌，怎能如此迅速地正号位呢？"耿纯进言说："天下士大夫抛亲离乡，跟随大王攻城略地，亲冒矢石，其目的是攀龙鳞，附凤翼，成就自己的志向。现在事业即将成功，天人也已相应，可是您滞留时日，违背众人意向，不正号位，我担心士大夫望绝计穷，可能要产生离异之心，不会长久地在此受苦，大众一散，就很难再聚合，时机不可错过，众心不可违逆。"耿纯的言辞甚为诚恳激切，刘秀深受感动，说："一定认真考虑。"

行军至鄗，刘秀召来冯异询问四方情况，冯异说："更始政权必定失败，承继宗庙社稷，在于大王，应该遵从众议，时机不可再失。"正好这时刘秀长安太学时的同学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献给刘秀，其中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再次上奏说："受命之符，应该遵从，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伐纣出现的白鱼之兆，怎能与此相比？今上无天子，海内混乱，符瑞相应，昭然著闻，应承应天意，以符众望。"刘秀命令有关部门在鄗南千秋亭设置坛场，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

秋七月己亥，光武帝命吴汉率领建义大将军朱祐等十一员大

将在洛阳包围了朱鲔，围困数月，由于朱鲔坚守，没有攻下。光武帝知道廷尉岑彭曾经任朱鲔的校尉，令岑彭前去劝说朱鲔投降。岑彭来到洛阳城下，朱鲔站在城上，岑彭为朱鲔陈述了利害得失。朱鲔说，大司徒刘縯被害时，我曾参与谋划，又曾劝谏更始皇帝不要派萧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投降。岑彭回营详细地告诉光武帝，光武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现在如肯投降，可保官职爵位，更谈不上诛罚了。河水为证，我决不食言。"岑彭又回去告知朱鲔，朱鲔从城上放下一个绳索说："如果言而有信，可乘此索上来。"岑彭抓住绳索打算攀上去。朱鲔看到岑彭诚心诚意，于是答应投降。辛卯日，朱鲔自缚与岑彭一起到了河阳，光武亲自为朱鲔解开绳索，与朱鲔相见，又令岑彭晚上送朱鲔回城。第二天一早，朱鲔与苏茂等率军队出降，光武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冬十月癸丑，刘秀车驾入洛阳城，幸南宫，定都于洛阳。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春正月庚辰，封全部功臣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都食封四县。博士丁恭议论说："古代封诸侯不过百里，目的是强干弱枝，所以如此是为治理天下，今诸侯食四县，不合乎法制。"光武帝说："古代国家灭亡，都是因为无道，没有听说因功臣封地多而亡国的。"

光武帝都洛阳后，在洛阳建立了高庙，四时合祀高祖刘邦、太宗文帝、世宗武帝，在宗庙右边建立社稷，在城南建立郊兆。政权设施初具规模。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光武帝纪》、《邓禹列传》、《寇恂列传》、《冯异列传》、《耿纯列传》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通鉴纪事本末》：《光武中兴》

光武镇压赤眉军

西汉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步形成绿林、赤眉两支大的起义军。刘秀原是绿林起义军的一个将领，后自成一军，势力强大后，转过来镇压农民起义军。赤眉军就是在刘秀残酷镇压下失败的。赤眉军的发展壮大到最后失败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王莽天凤五年（公元 18 年）春，琅邪人樊崇在山东莒县起义，开始只有一百多人，由莒进入泰山。起义者因樊崇勇猛，纷纷归服，只一年的时间，发展到一万多人，樊崇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也率众起义，聚集了数万人，都来与樊崇会合。各支起义军会合后一起进攻莒，没有攻下，转而入青州、徐州之间活动。

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夏四月，王莽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去讨伐山东地区的起义军。在起义军逐步强大的时候，起义军内部相互约束，“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其中最尊的称号为“三老”，次为“从事”，再次为“卒史”。听说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来镇压，为了不与王莽兵士相混淆，起义军都用朱色染了眉毛以与官军相区别，故后世称“赤眉军”。王匡、廉丹率军队共十多万人，军纪极坏，烧杀掠抢，所经过的地方流传歌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王莽军队与赤眉军交战，被赤眉军打得大败溃逃。

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冬十月，更始政权派使者招降赤眉军。樊崇等人听说汉室复兴，便留下军队，自己率领将帅二十余人随使者到了洛阳，更始政权把樊崇等人皆封为列侯。樊崇等人虽

有封号，却没有具体职务和封邑，而留下的士兵有些人散离和叛变，于是樊崇等人从洛阳逃回本营。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樊崇等人率赤眉军进入颍川，将部队分为两部，樊崇与逄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赤眉军在颍川虽每战皆胜，但由于远离家乡，没有根据地，都疲惫厌战，有些士兵日夜忧愁哭泣，想返乡东归。樊崇等人考虑到如果东归，军队必须有一部分离散，不如西攻长安。于是樊崇、逄安从武关，徐宣等从陆浑关两路向长安进发。更始政权派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等人据守河东、弘农来阻挡赤眉军西进。

刘秀料到赤眉一定要攻破长安，便任命邓禹为前将军，率精兵一万入关。汉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春正月，赤眉军两路在弘农会师，更始政权派遣讨难将军苏茂抵御，被赤眉打得大败。赤眉军各路聚集，声势强大，分一万人为一营，共三十营。三月，更始政权派遣丞相李松率军队与赤眉军在蓩乡交战，李松大败，兵士死伤三万多人。赤眉军北上转移到湖城县，又由湖城进至华阴。当时军中有齐人巫师，经常举行仪式祀城阳景王，曾胡言乱语说："景王大怒说：'当为县官，何故为贼！'"军队士兵惊动，有人进说樊崇："今将军拥百万之众，向西进攻皇帝都城却没有尊号，名誉上仍是贼人，难以持久，不如立汉宗室，扶义诛伐，以号令天下，自然天下遵从。"樊崇等人认为有道理。进军至郑，樊崇等人商议说："现在接近长安，应当寻找刘氏宗室成员尊立为帝。"

原先赤眉军经过式的时候，掳掠已故式侯刘萌之子刘恭、刘茂、刘盆子三人，三人自愿跟从赤眉军。刘恭少年时期学过《尚书》，曾跟随樊崇等人去洛阳投降更始政权，被更始政权再次封为式侯，任命为侍中，留在了长安。刘茂与刘盆子留在军中隶属于右校卒史刘侠卿，主管牧牛。樊崇等人打算立皇帝，求军中景王的后代，得到七十余人，其中刘茂、刘盆子和前西安侯刘孝为景王近亲支属。樊崇等人听说古代天子领兵称为上将军，于是把"上将军"三个字写

在纸条上，又制两个空纸条一起放在笥中，在郑北设置坛场，祭祀城阳景王，军中长官三老、从事都会聚在一起，让刘盆子等三人在中间站立，以年龄大小依次从笥中取纸条。刘盆子年龄最小，最后取纸条，结果刘盆子拿到了写有“上将军”的纸条。各将领都向刘盆子称臣，朝拜。刘盆子年仅十五岁，披散着头发，赤着双足，穿一件破衣，上面尽是汗渍，敞着怀，见众人向自己拜见，恐惧得差一点哭起来。刘茂对刘盆子说：“藏好纸符。”刘盆子却揉成一团丢掉了。樊崇虽因勇敢被众人尊为首领，然而却不识字；徐宣过去曾任狱吏，通《易经》，于是诸将推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杨音以下皆为列卿、将军。刘盆子虽被立为皇帝，仍一天到晚依从刘侠卿，有时想跑出去和其他牧儿游戏，刘侠卿常生气地加以制止，樊崇等人也不再去朝见。

秋八月，赤眉军到达高陵，张卬等人投降。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更始皇帝刘玄单骑出厨城门逃走。式侯刘恭因为赤眉军立自己弟弟为皇帝，便自缚进诏狱，听说刘玄败走才出狱见定陶王刘祉。刘祉为刘恭去掉了枷索，共同追赶刘玄，直追到渭河岸边才追上。右辅都尉严本害怕刘玄逃走赤眉军杀掉自己，把刘玄带到高陵，率军队名义上为刘玄宿卫，实际上是软禁了刘玄。更始政权的将相大臣都投降了赤眉军，唯有丞相曹竟不投降，持剑拼杀而死。

冬十月，赤眉军传出信说：“圣公如果投降，可封为长沙王，超过二十天，不再受降。”刘玄派刘恭到赤眉军请降，赤眉军让谢禄前去受降，刘玄跟随谢禄，以罪犯的身份把印绶交给了刘盆子。赤眉军把刘玄放在院子里要处死，刘恭、谢禄为刘玄求情不准。把刘玄押出去处死时，刘恭从后面追上来说：“我确实极力求情，没有获准，我只有先死在你面前，以表忠心。”遂拔剑要自杀。樊崇等人急忙上前制止，并赦免了刘玄，封刘玄为畏威侯，刘恭再次请求，终于封刘玄为长沙王。从此，刘玄常依从谢禄居住，刘恭也尽力对刘玄进行维护。

刘盆子居住在长乐宫，三辅各郡县、营长派遣使者贡献的东西，兵士竟擅自剽夺，军纪也开始败坏，经常暴掠吏民，因此居民坚壁固守。百姓不知所归，听说邓禹西进不断取胜而且军纪严明，都扶老携幼投依邓禹军。归降邓禹者日以千计，人数号称百万。邓禹每到一地，就停车持节安抚慰劳前来投依的民众，百姓老幼围绕车旁，感戴邓禹，因此，邓禹名震关西。

诸将豪杰都劝邓禹直攻长安。邓禹说："不然。现在我人数虽多，能打仗的人却很少，前进没有可以仰仗的物质，后面也没有粮草供给。赤眉军新占长安，财粮充实，锐气正盛，不可抵挡，况且赤眉群贼没有长远之计，财谷虽充实，但变乱万端，难以长期坚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谷饶畜多，我们先在此地休整，借这个地区筹集粮草，休养士卒，以观其弊，然后图谋进取。"于是率军队北进至栒邑。所到之处，各地军队、郡县都开城归附。

三辅地区居民为赤眉军暴掠所苦，反而思念刘玄，想把刘玄营救出来。张卬等人深为此事忧虑，让谢禄勒死了刘玄，刘恭乘夜间去收藏了刘玄的尸体。光武帝诏命邓禹把刘玄葬在霸陵。

光武因关中没有平定，邓禹又久不进兵，写信责备说："司徒你如同尧，赤眉贼如桀，长安吏民惶惶终日，无所依归，应乘机进军讨伐，镇抚西京，维系百姓之心。"邓禹仍坚持前议，转而进攻上郡诸县，扩充军队，积蓄粮草，军队归至大要。积努将军冯愔、车骑将军宗歆守卫栒邑，二人争权互相攻伐，最后冯愔杀死了宗歆，又回头进攻邓禹。邓禹派使者报告光武帝，光武帝问使者："冯愔所亲爱的是谁？"使者回答说："是护军黄防。"光武考虑到冯愔、黄防二人不能长久和睦，势必发生矛盾，告诉邓禹说："擒缚冯愔的一定是黄防。"于是派尚书宗广持节前往收降。过了一个多月，黄防果然逮捕了冯愔，并收服冯愔的军队。更始政权旧将王匡、胡殷、成丹等人也都到宗广处投降。

腊日，赤眉军设乐大会。酒会还没有开始，群臣便互相争吵搏

斗，而士兵则跳越宫墙，斩关闯入，抢掠会上酒肉，互相斗殴。卫尉诸葛稺听说后，带兵进入，格杀一百多人，才平定下来。刘盆子惶恐，日夜啼哭，随从属官都很可怜他。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正月，刘恭看出赤眉军必定失败，暗地里教弟弟刘盆子归还印绶，练习辞让的语言。及正旦大会时，刘恭先说："诸位共立我弟为帝，仁德深厚，立了一年，混乱越来越严重，实在不能有所成就，恐怕死也没有益处，愿退为平民，再选求贤达之士，请诸君省察。"樊崇等人谢罪说："这都是我们的罪过。"刘恭再次请求，有人说："这难道是你式侯的事吗？"刘恭只得提心吊胆地离开。刘盆子下了御座解去印绶，叩头说："现在虽设官定职却仍和以前一样，但四方怨恨，不再信从归向，这都是没有选择合适的皇帝所导致的，我愿让位于贤圣。如果一定要杀死我而搪塞责任，我也难以逃脱。"说着痛哭流涕。樊崇以及参加大会的数百人没有不哀怜刘盆子的，大家都离开了座位顿首说："我们做得不对，辜负了陛下，从今以后不敢再放纵自己了。"于是抱起刘盆子，戴上印绶。刘盆子实在没办法。会结束，诸臣各回营闭门自守。三辅议论纷纷，称颂天子聪明，百姓争着回归长安，市里人都住满了。过了二十多天，赤眉军又出来抢掠，和过去一样。

长安城中粮食吃尽，赤眉军收载珍宝，纵火烧了宫室，在市里任意杀掠，长安城内无人行走。赤眉军退出长安西去，号称百万，攻略城邑，自南山进入安定、北地。邓禹率军队向南进发到了长安，驻军昆明池，拜谒了高庙，收了西汉十一位皇帝的神主牌位送到洛阳，又巡视了园陵，置派吏士进行守护。

九月，赤眉军想西攻上陇，隗嚣派将军杨广迎战，打败了赤眉军，又追到乌氏、泾阳，再次打败赤眉军。赤眉军败走阳城、番须时，遇上大雪，兵士很多被冻死，又返回长安，挖掘西汉诸帝陵墓，盗取了埋葬的宝物。邓禹派遣军队在郁麦和赤眉军交战，结果被赤眉军打败，邓禹只得由长安退守云阳。赤眉军再次进入长安。邓禹率军

队袭击长安，正好碰上谢禄援军赶到，邓禹战败退走。当时延岑屯兵杜陵，赤眉军将领逢安进攻，延岑取得胜利，赤眉军死伤十多万人。

赤眉军将领廖湛率军队十八万人进攻汉中王刘嘉，双方大战于谷口，赤眉军失败。刘嘉亲手杀死了廖湛，随即到云阳驻扎解决粮草问题。刘嘉妻兄新野人来歙，是光武帝姑母的儿子，光武帝命邓禹招抚刘嘉，刘嘉由来歙联系投降了邓禹。邓禹自从冯愔叛乱，威名有所损降，军队又缺乏粮食，与赤眉军几次作战都没有取胜，归服的人不断叛离。赤眉军和延岑在三辅地区活动，当地郡县豪强大族拥兵割据，邓禹不能平定。光武帝派遣偏将军冯异取代邓禹进行讨伐。光武帝亲送冯异到河南，对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更始之乱，再加上赤眉军和延岑的骚扰，百姓承受涂炭之苦，无所依从。你现在奉命讨伐不轨之徒众，各地方投降的人，让其将帅来京师，遣散部众小民，让他们归就农桑，拆毁营壁堡垒，使他们无法聚众滋事。征伐并不是让你略地屠城，主要是平定安集百姓。其他将领并不是不善于作战，而是好掳掠，你最能驾驭将士，一定要注重严明军纪，不要为郡县所苦。"冯异顿首接受教谕，率人西去，所到之处，布德施信，各地盗贼纷纷归降。司马光就此事评议光武帝说："过去周人颂扬周武王的德政时说：'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是说王者之兵，志向只是布陈威德以安民，观光武帝之所以夺取关中，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实在是上策啊！"

光武帝又下诏书征还邓禹说："慎重，不要与穷寇争锋，赤眉军无粮，必定东来，我们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定能取胜，不用忧虑，不要再轻易进兵。"

这时三辅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剩下的人常聚为营堡，实行坚壁清野。赤眉军掳掠也得不到粮食，于是东归。军队此时还有二十多万，东归时随时离散。光武帝又派遣破奸将军侯进等人率一支军队驻守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

等驻守宜阳，占据赤眉军东还的必经险要之地，告诉诸将说："贼军如果东归，可将宜阳之军到新安会师；贼军如南走，可将新安之军到宜阳会师。"冯异与赤眉军相遇于华阴，双方对峙六十多天，交战数十次，收降赤眉军将士五千余人。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正月甲子，刘秀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邓禹惭于受任之后无功，几次率饥疲之军与赤眉军作战，每战都失败，于是率领车骑将军邓弘等人从河北到湖城，要与冯异联合进攻赤眉军。冯异说："我与贼军相拒几十天，虽俘虏一些将领，但贼军众多，可先以恩信引诱，难以立即用兵。皇上让诸将驻扎渑池，占据东方战略要地，而让我在西边进攻，一举取胜，实在是有充分把握的计策。"邓禹、邓弘不听从冯异的意见。邓弘与赤眉军大战一天，赤眉军假装失败，放弃辎重退走，车辆上装满土，在上面撒一些粮食。邓弘军士兵饥饿，争相夺取，赤眉军乘机杀回，邓弘军大乱溃败，邓禹与冯异合兵救援，赤眉军稍退。冯异看到兵士饥饿疲倦，要让士兵暂且休息，邓禹不听，又与赤眉军交战，被赤眉军打得大败，死伤三千多人，邓禹率二十四个骑兵逃回宜阳。冯异弃马步行，上了回谿阪，与部下回营聚集逃散的士兵，再次坚壁自守。

闰月，冯异与赤眉军约期会战，选一部分壮士穿上与赤眉军相同的服装埋伏在路旁。天亮后，赤眉军派一万人进攻冯异前部，冯异出小量士兵救援，赤眉军看到冯异势弱，便全力进攻，冯异也指挥军队全力迎战。太阳偏西，赤眉军锐气渐衰，这时，冯异的伏军突起，衣服与赤眉军相同，赤眉军无法识别，于是惊恐溃散，冯异率军追击，又在崤底大败赤眉军，俘虏赤眉军男女八万人。光武帝下玺书慰劳冯异说："起初垂翅回谿，终能奋翼渑池，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在论功行赏，奖励你的功勋。"

赤眉军余部向宜阳进发。甲辰，光武亲率六军，严阵以待，赤眉军忽然遇到大军，一时惊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派遣刘恭向光武乞求投降。刘恭问光武帝："刘盆子将百万之众投降陛下，陛下如何

对待?"光武帝说:"免你们不死好了。"丙午,刘盆子以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多人肉袒出降,送上得到的传国玺绶,光武将军队聚集在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阵容整齐。赤眉军此时尚有十多万,光武帝令县厨赐给食物,第二天一早,将兵马布阵在洛水旁边,让刘盆子君臣观看。光武帝对樊崇说:"你们后悔投降吗?我现在让你们回营,率军队鸣鼓交战,决一胜负,不想以强压服你们。"徐宣等人叩头说:"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进行了计议,要归降圣德,想到百姓只可与乐成,难以与图始,所以不敢告诉军士。今天能够投降,就好像脱离虎口归依慈母,实在是欢喜无限,没有任何可恨的地方。"光武帝说:"你也可谓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了。"接着又说:"你们所做所为有很多不道德之事,所经过的地方把老弱都杀死,溺社稷,汙井灶。但有三个方面的善政:攻破城邑,行遍天下仍守故妻无所改易,是一善;立君主能立汉宗室,是二善;其他贼军立君,急迫时都弑君持其首级投降,反以此作为自己功劳,你们却能完整地交付给我,是三善也。"戊申时,回到宜阳,光武帝令樊崇等人与妻子会合,都居住洛阳,赏赐给田宅。后来樊崇、逢安谋反被杀,杨音、徐宣善终于乡里。光武帝怜悯刘盆子,任命为赵王郎中,后来因病眼睛失明,赏赐给荥阳均输官地,让刘盆子食官地税终生。刘恭为刘玄报仇,杀死了谢禄,自缚进狱,光武帝赦免未诛。光武称帝后三年终于平定了赤眉起义军。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盆子列传》、《邓禹列传》、《冯异列传》

《通鉴纪事本末》:《光武平赤眉》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一

光武帝扫平中原群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感叹说："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的确如此，刘秀即皇帝位时，全国仍处在各种势力纷争时期，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先后消灭了赤眉农民军和刘永、张步、董宪、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最后才平定天下，统一了中国。

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冬十月，已故的汉宗室梁王刘立之子刘永到了洛阳，更始政权仍封刘永为梁王，都城设睢阳。

更始二年（公元 24 年）冬，梁王刘永在封国起兵，招集诸郡豪杰，任命沛人周建等人为将帅，攻下了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八城，又派遣使者任命佼强为横行将军，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张步为辅汉大将军，督领青、徐二州，各方连兵一处，成为东方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

汉光武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十一月，刘永在睢阳称帝。起初，更始政权任命王闳为琅邪太守，张步占据琅邪郡抵御王闳上任，王闳到郡招降得到赣、榆等六个县，聚集军队与张步交战，没有取胜。后张步接受了刘永的官号，在剧整训军队，派将领攻占了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郡。王闳力量敌不过张步，便到张步处与张步相见，张步严阵以待，见了王闳怒气冲冲地说："我有何罪，你前一段全力进攻我。"王闳手握剑把说："太守奉朝廷之命，而你却拥兵抗拒，我只是进攻乱臣贼子，怎说过分呢？"张步顿时改变了态度，下跪谢罪，设宴招待，尊王闳为上宾，让王闳掌管郡事。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四月，虎牙大将军盖延督率驸马都尉马武等四位将军进攻刘永，打败并把刘永包围在睢阳，原更始政权的将领 苏茂反叛，杀死淮阳太守潘蹇，占据广汉而臣服于刘永，刘永任命苏茂为大司马，封淮阳王。

秋八月，盖延围困睢阳数月，终于攻占睢阳，刘永逃往虞，虞人造反，杀死了刘永的母亲和妻子，刘永率部下数十人逃到谯。苏茂、佼强、周建三人合军共三万多人援救刘永，与盖延在沛西交战，被盖延打得大败，三人退保湖陵。苏茂后又逃归广乐。盖延平定了沛、楚和临淮。

这时，光武帝派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出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青、徐群盗听说刘永兵败，都惶恐请降，张步派遣掾属孙昱随伏隆上书朝廷，献鳆鱼。冬十一月，光武任命伏隆为光禄大夫，再次出使，任命张步为东莱太守，与新任命的青州牧、守、都尉一起东去，准许伏隆任命县令以下官吏。

建武三年(公元27年)二月，刘永封董宪为海西王。刘永听说伏隆到了剧，也派遣使者到剧封张步为齐王，张步贪图王位，犹豫不决。伏隆警告张步说："汉高祖曾与天下定约，非刘氏不王，现在可受封十万户侯。"张步想留下伏隆，共同保守二州，伏隆不同意，要求回朝廷复命，张步于是囚禁了伏隆而接受了刘永的封号。伏隆暗地里派人上书刘秀说："臣奉命出使，措置不当，被凶逆囚禁，虽处在困危之中，决心置生死不顾。这里吏民知张步反叛，内心不顺服，愿朝廷选择时机进攻，不要因为我而有所顾虑。我如能活着回到朝廷，被有关部门处死，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死于贼寇之手，父母、兄弟将托付给陛下照顾。愿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无所终止。"光武帝看到伏隆的奏书，召见了伏隆的父亲、代理大司徒伏湛，流着泪将奏书交给伏湛说："伏隆真可说有苏武的节操，我一定尽力营救。"不久张步杀死了伏隆。光武帝此时正考虑北方渔阳战事，南征梁、楚，因此张步得以占据齐地十二个郡。

夏四月，吴汉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等七位将军在广乐包围了苏茂，周建招集了十多万人救援苏茂，吴汉迎战周建，交战不利，坠马摔伤了膝盖。回到营地，诸将对吴汉说："大敌当前，而您受伤不起，军心将受影响。"吴汉听后裹伤而起，杀牛犒劳将士，士气倍增。天亮，苏茂、周建出兵包围吴汉军，吴汉率军奋勇迎击，大败敌军，苏茂退回湖陵。这时，睢阳人据城反汉迎接刘永入城，盖延率兵包围了睢阳，吴汉留杜茂、陈俊驻守广乐，自己率军帮助盖延围困睢阳。

秋七月，盖延包围睢阳一百天，刘永等人突围而出，准备去鄼，盖延追赶甚急，刘永部将杀死刘永携首级投降汉军，苏茂、周建逃到垂惠，共同拥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佼强逃到西防据守。

建武四年(公元 28 年)秋七月丁亥，光武帝到谯，派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包围刘纡、周建所在的垂惠。董宪部下将领贲休献兰陵城降汉，董宪听说后自郯进军包围兰陵，盖延和平狄将军庞萌在楚，请求救援兰陵，光武帝嘱咐说："直接进攻郯，则兰陵围自解。"盖延因兰陵危急，便先去救兰陵，董宪回师迎击而假装败退，盖延等人进入兰陵城，第二天，董宪率大军再次包围了兰陵，盖延等人恐惧，突围而出，去进攻郯城。光武帝责备说："原先让你们进攻郯，是为了出其不意，现在再去攻郯，敌军计议已定，兰陵之围怎么能解呢?"盖延等人攻郯果然没有攻取，而董宪却攻下了兰陵，杀死了贲休。

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二月，苏茂率五校兵到垂惠援救周建，马武被苏、周联军打败，败退时经过王霸军营，大呼求救，王霸对马武说："贼兵强盛，我出救两人必定都失败，你自己努力吧!"于是闭营坚守，军吏皆不满，要出去援救马武，王霸说："苏茂军精锐众多，我军士卒心怯，这样必定失败。现在闭营固守，显示不去救援，敌人必然乘胜轻进，马将军见我不去救援必定加倍努力，这样，苏茂军队久战疲劳，我乘机而出，才能取胜。"果然苏茂、周建倾巢而出进

攻马武，双方交战许久，王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王霸知道士气高昂，便开营后门，出精骑袭敌军后背，苏茂、周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马武、王霸各归营寨。敌军再次聚集挑战，王霸坚守不出，与士兵宴会取乐，苏茂军向营内放箭，箭如雨点，射中了王霸坐前的酒樽，王霸安坐不动，军士们都说："苏茂军前日已被打败，现在出战，必定取胜。"王霸说："不对，苏茂军远来，粮草不足，利在速战，所以屡次挑战，想取一时之胜，我们闭营休息，就是兵法上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妥善的作战方法。"苏茂、周建求战不得，只得率军回营，其夜，周建侄儿周诵反叛，闭城不让苏茂、周建进入，苏茂、周建只得逃走，周诵献城投降汉军。周建在逃跑的路上死去，苏茂逃至下邳与董宪会师，刘纡投奔了佼强。

汉平敌将军庞萌，为人谦虚平和，光武帝甚为信爱，经常称赞说："庞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的人。"任命他与盖延共同进攻董宪，当时诏书只下给了盖延而没有给庞萌，庞萌怀疑盖延在武帝面前谮毁自己，于是率军袭击盖延，取得胜利后又与董宪联合，自称东平王，驻屯在桃乡之北。光武帝听说后大怒，亲自率军伐庞萌，在给其他将令的信中说："我经常以庞萌为社稷之臣，各位将军能不耻笑我这句话吗？这个老贼应当族诛，你们各人整顿军队，会师睢阳。"

六月，董宪与刘纡、苏茂、佼强离开下邳回到兰陵，让苏茂、佼强帮助庞萌围攻桃城。光武帝在蒙城听说后，便留下轻重物资，亲自率军轻装日夜不停地奔赴桃城，走到亢父，有人说，百官疲倦，可暂且住一宿，光武不允许，又行了十里地，住宿在任城，离桃城只有六十里。天明，诸将请求继续前进，庞萌等人也率军队挑战，光武命令诸将不得出战，让士兵休息，养精蓄锐，挫敌军锋芒。此时吴汉等人驻扎在东郡，光武又派使者征召吴汉等人。庞萌等人惊恐地说："汉军数百里日夜兼程，以为他们来到即交战，可是却坚守任城，让我们到他城下，实在不能前去。"便用全部军队进攻桃城。桃城守军

听说御驾亲征，众心益固，庞萌等人攻城二十多天，军队精疲力尽，仍不能攻下桃城。吴汉、王常、盖延、王梁、马武、王霸等来会师。光武这才率众军前去援救桃城，结果大败敌军，苏茂、佼强乘夜逃遁，去依附董宪。

秋七月丁丑，光武由沛到湖陵，董宪与刘纡集合全部军队共数万人屯驻昌虑，董宪招抚五校余部，与他们一起据守建阳。光武又进军至蕃，距离董宪驻地只有一百多里地。诸将请求进攻，光武帝不许，知道五校兵因缺乏食物不能久持，所以命令各部坚守。不久，五校果然退走，光武帝亲临城下，四面进攻，仅三天便大败敌军，佼强率军投降，苏茂逃跑投奔张步，董宪与庞萌退保郯。刘纡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结果被部下军士高扈杀死，高扈杀死刘纡后投降了汉朝。吴汉紧跟着包围了朐。

冬十月，张步听说耿弇领军将到，命大将费邑驻军历下，又派一支军队驻屯祝阿，还在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严阵以待。耿弇渡过黄河先进攻祝阿，从早晨开始攻城，未及中午面攻占了祝阿城。耿弇故意让开一角，让守军得以逃奔钟城，钟城守军听说祝阿城已被攻破，十分恐惧，便全部溃散，只留下一座空城。费邑让弟弟费敢分一支军守巨里。耿弇率军先进逼巨里，严令军中将士加紧修造攻城器具，向部下宣称三日后当全力进攻巨里城，又暗里放了一些俘虏，让他们逃回历下将进攻日期告诉费邑。费邑果然到耿弇进攻那天亲率精锐军队三万多人来救巨里，耿弇知道后大喜，对诸将说："我之所以修造攻城器具，是想诱使费邑到巨里来，放下野地军队不攻击，又攻城干什么呢？"随即分三千人围巨里，自己亲率精兵上冈阪，居高临下与费邑军交战，取得全胜，在战场上杀死了费邑。巨里城中军士恐惧，费敢带领余部投归张步。耿弇没收了敌军的全部积聚，又派军队攻取了周围地方，连平敌军四十多营，终于平定了济南。

此时张步驻军于剧，派弟弟张蓝率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

合兵一万多人守临淄。西安和临淄距离四十里，耿弇进驻画中，在两城中间。耿弇看到西安城小而固，张蓝军队精壮，临淄城虽大而容易进攻，就告诉各将领："五日后合兵进攻西安。"张蓝听说后，日夜防守，到了第五日半夜时，耿弇命令将士饱食一顿，天明到达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人提出异议，认为如进攻临淄，西安必然出兵救援，进攻西安，临淄则不能救援，不如进攻西安。耿弇说："不对，西安听说我们进攻，日夜警惕，又怎能救援别人，我们进攻临淄是出其不意，敌军必然惊慌失措，我们一天之内保证能攻取临淄，攻占临淄，西安孤立，又与剧隔绝，必定逃跑，这就是所谓的击一而得二。如果进攻西安，不能马上攻克，屯兵坚城之下，将士一定死伤很多，即使能攻取，张蓝率军队还归临淄，合兵一处，势力强大，我们深人敌地，后方无法转运粮草，旬月之间，不战而自困。"于是合力进攻临淄，仅用半天时间，攻占了临淄城，张蓝听说后心里害怕，率军队逃归剧。

耿弇又下令军中不得掳掠，等张步到来再掠取财物，以激怒张步。张步听说耿弇进军，大笑说："尤来、大彤十余万人，我很快击败了他们，今天耿弇比尤来、大彤兵少，又很疲劳，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便和三个弟弟张蓝、张弘、张寿及以前的大彤军首领重异合兵，号称二十万，进军临淄城东，要进攻耿弇。耿弇上书光武帝说："我军占据了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来进攻，长途跋涉，军队疲惫，他如进我们便引诱他到来而进击，他要退走，我们便尾随而攻击，我们依营而战，精锐超过张步一百倍，又以逸待劳，以实击虚，十天左右的时间便可获得张步首级。"耿弇先到淄水，与重异相遇，突骑要进攻，耿弇担心挫其前锋，可能导致张步不敢前来，故意示弱以骄张步军士，领军退归小城，在城内布置完备，派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分据城下。张步气盛，直攻耿弇军营，与刘歆等人交战，耿弇登上王宫坏台观察，看到刘歆与张步交锋，便率精兵在东城下拦腰横冲张步军阵，大败张步军。飞箭射中耿弇大腿，耿弇以佩刀

砍断露在外边的箭杆，左右随从没有人知道。到天黑时，双方收兵，第二天一早，耿弇率兵出营，此时光武帝在鲁，听说张步进攻耿弇，亲自率军队前来救援，尚未到达，陈俊对耿弇说："张步兵力强盛，可暂且闭营休整军队，等待皇上到来。"耿弇说："皇上马上就要到来，我们作为臣子的应当杀牛滤酒招待皇上和百官，怎能把消灭贼虏的事留给皇上呢？"于是出兵大战，自黎明一直战斗到天黑，再次大败敌军，杀伤无数，尸体遍野，沟壑皆满。耿弇知道张步失败后要逃跑，预先布置左右翼埋伏以等待，夜静时，张布果然领军逃遁，伏兵突起，拦腰纵击，一直追到钜昧水上，八九十里内尸体遍地，又夺得辎重二十多辆。张步回守剧，兄弟各分兵离散。

过了几天，光武到了临淄，亲自慰劳军士，群臣大会，光武帝对群臣说："过去韩信攻齐破历下，为汉开基，今天耿将军进祝阿以立功显名，两者都在齐国西界，功劳相仿，而韩信是袭击已降的军队，耿将军战胜的却是劲敌，因此，成功难于韩信；再者，田横烹郦生，后来田横投降，高祖曾下诏卫尉不以仇人对待，张步以前曾杀害伏隆，如果张步来投降，我当下诏给大司徒伏湛放弃旧怨，这事也与高祖赦田横相类似。耿将军前在南阳，建议经营河北的计策，许多人不同意，落落难合，终于成功，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光武率众进驻剧。耿弇跟踪追击张步，张步投奔平寿，苏茂率军一万多人赶来救援，苏茂责备张步说："南阳军队是精锐之师，耿弇是善战之将，耿茂假意后退，大王怎能去进攻他的营地？既然呼唤我来，又怎么不等待我到来再战呢？"张步说："已经失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光武帝派遣使者告诉张步、苏茂，谁如果能杀死对方投降，就封谁为列侯。张步杀死了苏茂，到耿弇军营肉袒请降。耿弇让张步到光武帝处，自己率军队入城，树立十二个郡旗鼓，让张步的士兵原籍是什么郡就到哪一面旗下集合。张步军队尚有十几万，辎重七千余辆，耿弇把张步军队都遣散归乡里。张步的三个弟弟都自缚入所在地的监狱，光武帝都一一赦免，封张步为安丘侯，与妻子居住

洛阳。

当时只有琅邪尚未平定，光武帝迁陈俊为琅邪太守，陈俊一上任，盗贼全部逃散了。耿弇又率军队到城阳，收降了五校农民军余部，齐地全部平定，于是率军队回到京城。耿弇为将，共平定四十六个郡，屠城三百，没有遭受一次挫折。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吴汉等将攻取朐，斩杀了董宪、庞萌，江淮、山东地区全部平定。诸将率军队归还京师。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光武帝纪》、《张步列传》、《耿弇列传》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一

《通鉴纪事本末》:《光武平齐》

光武帝平定陇蜀

刘秀重建汉政权，扫平中原群雄以后，在关陇地区还存在隗嚣、蜀中存在公孙述两股割据势力，光武帝又动用数十万军队，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平定了这两个地区，统一了全国。

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23年)秋七月，成纪人隗崔、隗义，上邽杨广等人起兵响应更始政权，拥有军队数千人，进攻平襄，杀死王莽政权设置的镇戎大尹李育。隗崔的侄儿隗嚣喜好经书，在当地很有名气，隗崔等人共推隗嚣为上将军，隗崔为白虎将军，隗义为左将军。隗嚣又派使者聘请方望为军师，方望劝说隗嚣立汉高祖庙于邑东，己巳，祀高祖、太宗、世宗。隗嚣等人都向汉宗庙称臣，并杀马设誓要共同辅佐刘氏宗室。传檄文周围各郡国，历数王莽罪恶。军队迅速发展到十多万，隗嚣率军击杀王莽雍州牧陈庆、安定大尹王向，逐步占据了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州郡。

起初，茂陵人公孙述为清水县县长，以才能闻名当地，迁导江卒正，治所设在临邛。汉兵兴起，南阳人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占据汉中以响应汉军，杀死王莽政权庸部牧宋遵，军队发展到数万人。公孙述派使者把宗成等人迎接到成都，宗成到成都后掳掠暴虐。公孙述杀了宗成，吞并了宗成的军队。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春二月，更始政权征调隗嚣及其叔父隗崔、隗义等人，隗嚣准备应征。方望认为更始政权成败未定，不同意隗嚣去长安，隗嚣不听方望的劝告，方望就给隗嚣写了一封信辞别而去。隗嚣等人到了长安，更始政权任命隗嚣为右将军，隗崔、隗义

仍为原称号。

夏四月，更始政权派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一万多人经营蜀汉地区，公孙述派遣弟弟公孙恢在绵竹进攻李宝和张忠，打败并赶走了他们。公孙述自立为蜀王，建都成都，当地臣民归服，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又即皇帝位，号“成家”，改元“龙兴”，任命李熊为大司徒，其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徒。

隗嚣等人降归更始政权不久，隗崔、隗义想回归故郡，隗嚣怕连累自己，报告了刘玄，结果刘玄诛杀了隗崔、隗义。刘玄因感念隗嚣忠于自己，任命隗嚣为御史大夫。第二年夏天，赤眉军入关，三辅地区一片混乱，传说光武帝在河北即皇帝位，隗嚣劝说刘玄归政于光武帝叔父、当时担任国三老的刘良，刘玄没有听从。诸将想劫持刘玄东归，隗嚣也参与了谋划。事情败露后，刘玄派使者召隗嚣，隗嚣假称有病不进见，和宾客王遵、周宗等人率军守卫府邸，刘玄派执金吾邓晓率兵将包围了隗嚣府邸。隗嚣闭门坚守，到黄昏时，率数十骑突围逃归天水。隗嚣再次招集旧部，占据原来的地域，自称“西州上将军”，三辅地区到关陇避难的士大夫多依归隗嚣，隗嚣也礼贤下士，倾身交接。他把平陵范逡作为师友，任命前凉州刺史、河南人郑兴为祭酒，茂陵人申屠刚、杜林为治书，马援为绥德将军，杨广、王遵、周宗、行巡、王捷、王元皆为大将军，安陵人班彪等人为宾客。隗嚣由于交接名流而名震西州，闻名于山东地区。

起初，平陵人窦融父子几代都在河西为官，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窦融与更始政权右大司马赵萌关系密切，借助赵萌的关系请求去河西，赵萌把窦融推荐给了更始政权，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当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均、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都是河西地区的英俊之士，窦融与他们关系深厚。更始政权失败后，窦融与梁统等商议说：“现在天下大乱，我们一时还不能确定归附谁，河西地区在羌胡包围之中，不同心协力就不能自守，权力相同就无法相统率，应当推举一人为大将军，统领

五郡。”最后商定推举窦融代理河西五郡大将军，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窦融居住属国，仍兼任属国都尉，设置从事，监察五郡。

建武三年（公元26年）十一月，光武帝对太中大夫来歙说：“今西部州郡没有归附，公孙述称帝，路途遥远又多关隘，诸将正在经略关东，思索经营西州的方略，一时还不知怎么办，你看应该怎样？”来歙回答说：“我曾经与隗嚣在长安相遇，这个人在刚起时曾以兴汉为名，我想遵从您的意思写一封信给他，他一定归降，隗嚣归降，公孙述就成灭亡之势，不难对付。”光武帝认为有道理，就让来歙出使于隗嚣。隗嚣因于汉有功，又曾接受邓禹代表光武帝授予的官职爵位，他自己的心腹之人也劝他通使京师，隗嚣于是去长安奏事。光武帝用接待另一国家首脑的特殊礼仪规格接待了隗嚣，为表示尊重，谈话时只称字号，慰藉特别厚重。

延岑自在四川失败，辗转逃亡，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二月，又聚集军队进攻顺阳，光武帝派遣邓禹率军迎战，打败了延岑。延岑去汉中投依公孙述，公孙述任为大司马，封汝宁王。

十二月，公孙述聚兵数十万人，在汉中广蓄粮草，又建造十层楼船，刻许多天下各地牧守的印章，派遣将军李育、程乌统率数十万人马到陈仓和吕鲔相聚，侵犯长安三辅地区。冯异迎战，大败公孙述军。李育、程乌逃回汉中，冯异回军又击败吕鲔，吕鲔手下将士投降冯异的甚多。

在冯异同公孙述军队交战时，隗嚣派兵帮助冯异立了功，派遣使者报告光武帝，光武帝亲自写信给隗嚣，说：“我很愿意与将军结交，你南拒公孙述，北平定羌人之乱，所以冯异西征，只数千人就能在三辅地区立足，如果没有将军的帮助，咸阳则已为他人所有了。如果公孙述的军队到汉中，三辅地区要借重将军的军队，两者可以旗鼓相当，果真如此，实在是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从今以后，要经常书信往来，不要听从别

人离间的语言。"后来，公孙述数次派遣军队出击，都被隗嚣与冯异合力击败。公孙述随即对隗嚣进行拉拢，派遣使者把大司空、扶安王的印绶授给隗嚣，隗嚣杀掉了来使，出兵进攻。公孙述军队因此不再向北出击。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正月，光武帝使来歙持节送马援归陇右。隗嚣与马援同吃同住，并向马援问起东方之事，马援说："前一段到朝廷，光武帝接见数十次，每次接见都进行长谈，常常昼夜不停。其才智勇略，非任何人所能比拟，而且为人坦诚，无所隐伏，心胸博大，重大节，和高祖相似，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人所及。"隗嚣问："你认为哪些方面和高帝相同?"马援说："和高帝不一样，高帝无可无不可，而现在的皇上好吏事，行动有节度，又不喜欢饮酒。"隗嚣心里有些不高兴，说："如你所说，不是各方面都超过高帝了吗?"

二月，岑彭攻取夷陵，田戎逃到蜀地投靠公孙述，岑彭俘虏了田戎的家属、将士数万人。公孙述封田戎为翼江王。岑彭谋划伐蜀，只是因夹川地区粮草太少，水流湍急难以运输，于是留威虏将军冯骏驻军江州，都尉田鸿驻夷陵，领军李玄驻夷道，自己率军屯津乡，处荆州要会之处，传喻少数民族投降者上奏皇帝封其首领。

起初，窦融等人听闻光武帝威德，决定东向依从汉政权，派遣长史刘钧等人携带书信去洛阳。在使者出发以前，光武帝也派使者携带招抚窦融的书信来河西。双方使者相遇于路上。汉政权的使者随即与窦融使者一起回了洛阳。光武帝见了刘钧十分高兴，行礼设宴招待，随即让使者返回，赐窦融玺书，劝窦融审时度势，封窦融为凉州牧。

十二月，隗嚣矜己饰智，常常自比于西伯周文王，与诸将商议想称王。郑兴说："过去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殷商；周武王八百诸侯不谋而会，仍不敢讨伐纣王，还兵等待时机；汉高祖征伐数年，仍然以沛公行师。今您令德虽明于四方，却没有宗周的

传继，威略虽然振作，却没有汉高祖的功绩，现在要举办不可办之事，只是加速祸患来临。"隗嚣于是停止。

这个时期汉政权驻关中的将领纷纷上书认为蜀可以攻取。光武帝把这些上书送给隗嚣，让隗嚣进攻蜀以显示忠诚信义。隗嚣上书强调三辅地区力量薄弱，又有刘文伯在旁边，不宜此时图谋蜀地。光武帝看出隗嚣持两端，不愿意天下统一，稍微降低了对隗嚣的礼遇，行使君臣的礼仪；又因隗嚣与马援、来歙关系密切，几次派遣二人往来，劝隗嚣人朝，许以高官重爵，隗嚣连连派使者谦恭地解释，言讲自己没有功德，等到四方平定，将退住乡里隐居。光武帝又派遣来歙劝说隗嚣遣子人侍，隗嚣听说刘永、彭宠都被汉政权消灭，便派长子隗恂随来歙到了朝廷，光武帝任命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

隗嚣手下大将王元以为天下成败未定，不愿专心归服汉政权，劝隗嚣说："过去更始政权建都长安，四方响应，万民景仰，可以说天下太平了，可是一旦分崩，将军几乎无处存身，现在南有公孙子阳，北有刘文伯，全国各地称王称公者十余人，而要听从儒生之说，放弃千乘之国的基业，羁居危国而求安全，这是很危险的。天水地区完整富裕，兵强马壮，我请求带一支兵马为您守函谷关，这是万世一时也。如果不如此考虑设想，就暂时蓄养马匹，训练士卒，据守关隘，长久坚持，以待天下之变，经营王业不成，也可称霸一方。最主要的是鱼不可离开深渊，神龙失势，与蚯蚓相同。"隗嚣心里赞成王元的计议，虽遣子人洛阳为质，仍利用统治地区的险要，打算专制一方。

申屠刚不同意此种行为，劝谏隗嚣专心事汉，隗嚣不听从，于是很多游士中的长者悄悄地离开了隗嚣。

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春正月，光武帝因苦于长期战争，而隗嚣遣子人朝，公孙述远据边陲之地，于是对诸将说："暂且不考虑这两个人的事吧。"让诸将回洛阳休养，分部分军士到河内，几次致书

公孙述、隗嚣，告以祸福利弊。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三月，公孙述让田戎出江关，招集旧部，打算攻取荆州，没有攻下。光武下诏书给隗嚣，想从天水地区征伐蜀。隗嚣上书说："由于白水险阻，栈阁坏绝，无法进兵。公孙述性情严酷，上下都担心忧虑，等到他恶贯满盈的时候，形成一呼百应之势才可进攻。"光武帝看出隗嚣终将不为自己所用，于是商议进行讨伐。

夏四月丙子，光武帝巡行到了长安，拜谒祖宗园陵，派遣耿弇、盖延等七员大将从陇道伐蜀，先派中郎将来歙奉玺书赐给隗嚣。隗嚣再次多方找理由，很长时间犹豫不决。来歙愤怒地斥责隗嚣说："皇上因为您知道得失兴亡，所以用手书表示心意，您为表示忠诚，派遣长子去洛阳为质，现在又想听信奸人诱惑之言，走毁家灭族的道路。"他打算上前刺隗嚣，隗嚣起身入内，部下兵卒要杀来歙，来歙慢腾腾地拿着节杖上车走了。隗嚣派牛邯率兵围住了来歙，大将王遵劝谏隗嚣说："来歙虽单车远来出使，可他却是皇帝的表兄啊，杀死他对汉不是什么损失，可对我们来说可是灭族之祸。过去宋国杀死楚使，遭到析骸易子的祸害，小国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当今皇帝，并且更重要的还有您长子的性命攥在他们手里！"来歙平时为人讲信义，言行一致，往来游说，重视信诺，西州的士大夫都信任尊重，现在都替他说话讲情，因此得免死东归。

五月，隗嚣发兵反叛，派王元据守陇坻，伐木堵塞往来的道路，汉诸将与隗嚣交战，大败，各率兵撤退，隗嚣紧紧追赶，马武选精骑拒后，杀死隗嚣数千人，汉军才撤回。十二月，汉诸将到下陇，光武帝下诏让耿弇驻军漆，冯异驻军栒邑，祭遵驻军汧，吴汉等退驻长安。冯异的军队还未到栒邑，隗嚣乘胜派王元、行巡二人率军二万多人下陇，让行巡夺取栒邑，冯异率军急进想先占领栒邑，诸将说："敌军势大又乘胜而来，不可与争锋，应该占领有利地形，慢慢考虑进取的方略。"冯异说："敌兵侵犯边境，占了小便宜，便想深入，如果他们占领了栒邑，三辅地区动摇不稳，那样攻者不足，守者有余。

现在先占据城池，以逸待劳，不是单单与他们争夺栒邑城。”于是，偷偷进了城，进城后关闭城门偃旗息鼓。行巡不了解情况，急速前进。冯异趁行巡意想不到骤然在城内击鼓升旗，率军杀出。行巡军受惊散乱而逃，冯异乘势追击，大破行巡军。祭遵同时在汧大败王元军。此地豪强首领耿定等人全部背叛了隗嚣投降汉政权。光武帝下诏给冯异，让冯异进军义渠，击破卢芳将贾览、匈奴奥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等郡都投降了汉。

窦融和河西五郡郡守训练兵马，上疏请求会师进攻隗嚣，光武帝对窦融的行动大为赞赏，窦融等将兵入金城，进击隗嚣党羽先零羌封何等人，取得胜利，依河立营，军威甚壮，等候光武车驾。当时大军尚未出动，窦融仍率军返回本郡。光武帝看到窦融重信诺，立场鲜明，更加赞赏，派人修理窦融父亲坟墓，用太牢之礼进行祭祀，几次派遣使节赠送给窦融四方贡献珍异之物。梁统又恐怕众人疑惑不定，与隗嚣断绝关系，丢掉隗嚣所给的将军印绶。

原先，马援听说隗嚣欲与汉分裂，几次写信警告责备隗嚣，隗嚣看到马援的信，十分恼怒，隗嚣发兵反叛，马援上书光武帝，要求光武帝召见，陈述灭亡隗嚣的方略。光武帝于是召见了马援，马援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谋划。光武让马援率突骑五千，往来游说隗嚣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人以及羌人豪强，向他们陈述祸福，以离间隗嚣支党。

隗嚣曾上书谢罪说：“吏民听说大军突然到来，惊恐自救，我不能禁止，兵虽有大胜，但我不敢不遵守臣节，亲自追还了军队，古代虞舜侍奉父亲，大杖则逃走，小杖则承受，臣虽然不明智，也不敢忘此义，现在我听从朝廷处治，赐死则死，加刑则受刑，如能有机会改正，我将死而不朽。”有关部门认为隗嚣言语傲慢，请求诛杀在朝为质的儿子，光武帝不忍心，再次派遣来歙到汧，赐给隗嚣书信要求隗嚣遣次子入朝。隗嚣知道光武帝看出了自己的假意，便派使者使蜀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七年(公元31年)春三月,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并派军队声援隗嚣。秋,隗嚣率马步军三万侵犯安定,到达阴槃,冯异率诸将迎击;隗嚣又命别的将领进攻祭遵,都没有取胜而回。

光武帝决定亲征隗嚣,预先约窦融军队会师的时期,因遇大雨,道路冲断,又因隗嚣退兵,光武帝中止进军,令来歙以书招降王遵,王遵投降,拜为太中大夫,封为向义侯。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来歙派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直接袭击略阳,斩杀隗嚣的略阳守将金梁。隗嚣大惊说:"汉军真神速啊!"光武帝听说来歙得了略阳,十分高兴地说:"略阳是隗嚣所依恃的险阻,也是隗嚣的腹心,腹心已坏,整制其肢体就容易了。"吴汉等将领听说来歙得了略阳,争着急速去会师。光武帝认为:"隗嚣失去了所依据的要塞城池,势必用全部精锐来进攻,旷日持久而攻不下,士卒疲惫,我们可乘他危机时进攻。"于是派人把吴汉等人追回。隗嚣果然全力要夺回略阳,派王元拒守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据守鸡头道,牛邯驻军瓦亭。隗嚣亲率剩余的军队数万人包围略阳,公孙述派遣李育、田弇率军协助,斩山筑堤,提高水位,用激水灌略阳。来歙与部下将士固死坚守,箭用尽,就拆房屋断木以为兵器。隗嚣全力进攻,累月没有攻下。

夏闰四月,光武帝亲自率军征隗嚣。光禄勋郭宪劝谏说:"东方刚刚平定,陛下不可远征。"并拔佩刀斩断车前杆来进行阻挡。光武帝不听,率军西进到漆,诸将多数认为王师应持重,不应该深入险阻之地。光武帝犹豫不决,召马援问计。马援分析战况,以为隗嚣将帅已具有土崩瓦解的趋势,如果进军一定能够成功,又在光武帝面前用谷米摆成当地的山川形势,指示各军所进攻的战线,往来情况,十分明了,光武帝看了以后说:"敌军都在我目中了。"第二天一早,开始进军,行止于高平、第一,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人、小月氏等少数民族骑、步军数万,粮草辎重五千余辆车,与光武军相会。当时军队还在初创立阶段,诸将朝会礼仪制度还不整齐严肃,窦融先

派遣从事问朝见的礼仪，光武帝听说后十分欣赏窦融的做法，并向文武百官宣告，置酒高会，给窦融以特殊的礼遇。

光武帝指挥各军共同前进，分兵几路上陇，让王遵写信招降牛邯。牛邯见信前来投降，拜为太中大夫。隗嚣的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个、军队十余万接连投降，隗嚣带领妻子逃奔西城依附杨广，田弇、李育守上邽，略阳解围。光武帝慰劳来歙，班次在众将之上，与众将绝席，又赏赐来歙妻子缣一千匹。

光武帝又进军上邽，下诏书告诉隗嚣说："如果束手来降，父子得以相见，保证不出意外，如果一定要学英布，也只好听之任之。"隗嚣始终不投降，光武便诛杀了隗嚣的儿子隗恂，让吴汉、岑彭率军包围西城，耿弇、盖延围上邽。

十一月，杨广死，隗嚣已到穷途末路，手下大将王捷在戎丘登城对汉军呼喊说："为隗王守城者，都宁死无二心，请你们停止攻城，我自杀以明志。"说完自刎而死。

当初，光武帝嘱咐吴汉："诸郡的兵士存在只是耗费粮食，如果有人逃跑，又扰乱军心，应该全部罢遣归家。"吴汉等将领贪图人多势大，并力进攻隗嚣，就没有遣散郡县兵士，粮食一天天减少，吏士疲于劳役，很多人逃亡，岑彭引谷水灌西城，城还有一丈多没有淹没，正好王元、行巡、周宗率领西蜀救兵五千多人，从高处突然来到，鼓噪大喊说："百万之众都已来到。"汉军大惊，尚未排成阵势，王元等人冲破包围圈进行死战，因而得以入城，把隗嚣接出城回到冀。吴汉军粮草用完，只得焚烧了辎重，率兵下陇，盖延、耿弇也随之撤退，隗嚣命军队尾随追击汉军。岑彭率军拒后，诸将才得以全军东归，唯有祭遵军屯汧没退。吴汉等人再次屯兵长安，岑彭回到津乡。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又为隗嚣所据有。

建武九年（公元 33 年）春正月，颍阳成侯祭遵病逝于军，光武帝诏冯异并领其军。这时隗嚣又病又饿，只得吃发了霉的粮食，愤恨而死。王元、周宗立隗嚣少子隗纯为王，总其兵将据守冀，公孙述

派遣大将赵匡、田弇帮助隗纯，光武帝让冯异率军讨伐。

公孙述派遣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率数万人进攻江关，击败冯骏等军，攻取了巫以及夷道、夷陵，据守荆门、虎牙，横跨长江水建起浮桥、关楼，又立攒柱断绝水道，跨山建立军营堵塞陆路，抵御汉兵。

夏六月，光武帝让来歙监护诸将屯驻长安，太中大夫马援为副手。来歙上书光武帝说："公孙述由于陇西、天水作为藩蔽，因此能延命将息，现在这两个郡荡平，公孙述势迫智穷，应该精选兵马，储积粮草。由于西州刚刚平定，军民疲惫饥饿，若用财谷相招集，那么民众就可以聚集。但是我知道国家费用不止一项，用度不足，也有不得已的地方。"光武帝认为来歙的上书有道理，下诏书在汧积谷六万斛。八月，来歙率领冯异等五位将军讨伐天水的隗纯。

建武十年(公元 34 年)，夏阳节侯冯异等人与赵匡、田弇交战一年，赵匡、田弇全战死，仍没有打败隗纯。汉军诸将打算先撤回休整，冯异坚持不动，于是共同进攻落门，没有攻取。夏天，冯异病逝于军中。

原先，隗嚣大将高峻拥兵据守高平、第一，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人包围了高平、第一，一年没有攻下。光武帝要自己亲征，寇恂进谏说："长安在路程中地处中间，接应各处都很方便，安定、陇西都感到震动忧怯，这样，从容地居于一处，可以制于四方，现在兵马疲惫，四方地势险阻，不是十分安全，前年颍川反叛，深可引以为戒。"光武帝不从，率军进驻汧，高峻仍没有打败。光武帝派遣寇恂前去招降，寇恂携带玺书到第一，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出来会见，言辞、礼节都不屈服。寇恂大怒，要杀死皇甫文，诸将劝谏说："高峻有精兵万人，都有强弩，掩护西边陇道，连年攻不下，今想招降而诛杀使者，恐怕不行吧？"寇恂不听劝告，杀死了皇甫文，让副使回去告诉高峻："军师无礼已经死了，如果想投降，马上投降，不想投降，就固守。"高峻惶恐害怕，当天开门投降。诸将都来庆贺，并问寇恂说：

“杀其使而降其城，这是为什么呢?”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是为高峻出谋划策者，今作为使者辞意不屈，说明没有降心，保全他则他自以为得计，杀死他则高峻丧胆，所以投降了。”诸将都说:“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冬十月，来歙与诸将攻破落门，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与隗纯一起投降，王元投奔蜀。光武帝把隗嚣的后代迁到京师以东，后来隗纯与宾客想逃入北方少数民族中，走到武威被逮捕并被杀死。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三月，岑彭屯军津乡，几次进攻田戎等人，不能取胜。光武帝派遣吴汉率领诛虏将军刘隆等三位将军，统率荆州兵六万多人，马五千匹，与岑彭在荆门相会。岑彭装制战船数十艘，吴汉因诸郡船手多费粮食，打算罢遣他们，岑彭认为蜀兵强盛，不能罢遣，双方争执不下，上书光武帝请求指示。光武帝回书给岑彭说:“大司马(吴汉)习惯用步骑，不了解水战，荆门之事，完全以征南公事为重就是了。”

闰月，岑彭令军中征募攻浮桥的军士，谁先登上去受上赏，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出。当时东风特大，鲁奇乘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可是由于欑柱有反杷钩，鲁奇船不能离开，鲁奇乘势进行殊死战斗，用飞火把焚桥，风大火盛，浮桥、关楼焚烧崩塌。岑彭全军顺风并进，所向无敌，蜀兵大乱，溺水而死者数千人，杀死了公孙述大将任满，生擒了程汎，田戎退保江州。

岑彭上书推荐刘隆为南郡太守，自己率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直进入江关，下令军中所经过地方不得掳掠，因此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都携带酒肉迎接慰劳，岑彭又推辞不受，百姓大喜，都争先开城门投降。光武帝下诏让岑彭代理益州牧，所攻下的郡都兼代理太守，如果出界，就把代理太守交付给后将军，可以选任官属代理州中长吏。

岑彭到江州，看到江州城坚固，储存粮食又多，难以立即攻取，留下冯骏包围江州，自己领兵乘机直向垫江，攻占平曲，没收城中

粮米数十万石，吴汉留在夷陵，将粮食装在露桡上跟进。

夏，公孙述任命王元为将军，让王元率领军环安据守河池，六月，来歙与盖延等率军进攻王元、环安，取得大胜，攻克了下辨，乘胜前进。蜀人十分恐惧，派遣刺客行刺来歙，来歙身受重伤，在临死前召来盖延，盖延见状，伏身悲哀，不敢抬头。来歙大声斥责盖延说："虎牙将军怎能这样，我遇到刺客，无法再报效国家，故叫来你，想把军事托付给您，你反而像小孩子一样啼哭，刀子虽扎在我身上，我难道就不能命令士兵杀你吗?"盖延停止哀哭，接受来歙的嘱托。来歙自己写给光武的表章说："我在夜深人定的时候，被敌人偷偷刺中要害，我不敢爱惜自己，只是恨自己不称职，为朝廷留下羞耻。治理国家以得贤才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正直，可任以要职，愿陛下考察；再者我的兄弟不成器，最终恐怕要获罪，望陛下哀怜，经常给以教训督察。"写完投笔拔刀而死。光武听说后大惊，看了遗表，流泪不止，任命扬威将军马成代理来歙的中郎将职务。

光武帝亲自统军征公孙述，秋七月，到达长安。公孙述派其将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统率大军据守广汉和资中，又派遣侯丹率二万余人拒守黄石。岑彭让臧宫率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抵御延岑，自己分兵浮江而下回江州，然后从都江逆流而上，袭击侯丹，取得大胜，又日夜兼程急行军二千余里，一举攻取武阳，接着派精骑袭击广都，离成都只有几十里，势如破竹，所至敌军皆逃散。起初，公孙述闻汉兵在平曲，故派遣大军迎击，等到岑彭到了武阳，绕到延岑军队后边，蜀郡人们都很震惊害怕，公孙述更是大惊，以杖击地说："怎么如此神速呢?"

延岑统大军驻守沅水。臧宫人多粮少，转运粮草跟不上，降卒都想散离叛乱，当地郡邑都再次聚集坚守，观望成败，臧宫想撤退，又担心延岑反击。这时光武帝派遣谒者将兵到岑彭军中去，有马七百匹，臧宫假传皇帝命令留下帮助自己，日夜进兵，沿路多设旗帜，登山鼓噪呼喊，右边是步兵，左边是骑兵，夹住船队进发，呼喊

声震动山谷。延岑想不到汉军突然而至，登山远望，大为震恐，臧宫借机大举进攻，大败延岑军，杀死淹死一万多人，沉水因此变浊。延岑逃奔成都，其军队全部投降，臧宫获得全部军马珍宝，又乘胜追击败军，军队投降的有十几万。臧宫军到达阳乡，王元率军投降。

光武帝给公孙述写信，陈述祸福，以丹青表示自己的信义，公孙述看信叹息不止，把信让亲信传看。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都劝公孙述投降，公孙述说："废亡兴胜，是命运安排，哪里有投降的天子呢？"左右都不敢再说什么。常少、张隆都忧虑而死。

光武帝回到长安。冬十月，公孙述派刺客假称是逃亡的奴仆，投降岑彭，夜里刺杀了岑彭。太中大夫监军郑兴统领其部下，等吴汉到达而交给吴汉。岑彭治军严整，所经地方秋毫无犯，邛谷王任贵听说岑彭有威信，远离数千里派人迎降，正赶上岑彭被刺杀，光武帝把任贵奉献的财物全部赐给岑彭的妻子，蜀人为岑彭立庙，四时祭祀。十二月，吴汉从夷陵率军三万人溯江而上，征伐公孙述。

建武十二年（公元 36 年）春正月，吴汉在鱼涪津打败公孙述的将领魏党、公孙永，包围了武阳，公孙述派遣子婿史兴救援武阳，吴汉迎敌，打败了史兴，进入犍为地界，诸县城都坚守不降，光武帝下诏吴汉直接进攻广都，占据公孙述的心腹要地。吴汉进军攻取了广都，又派遣轻骑烧毁了成都市桥，公孙述将帅恐惧，许多人叛离。公孙述虽然诛灭叛离者家属，仍不能禁止。光武帝一定要公孙述投降，又下诏书劝谕公孙述说："不要因来歙、岑彭受害事自疑，现在自来投降，宗族可以保全。"公孙述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

秋七月，冯骏攻下江州，俘获了田戎。光武帝告诫吴汉说："成都尚有十余万敌人，不可轻敌，要坚守广都，等待敌人来攻，不要与敌人争一时胜负，如果敌人不敢来，你可转移逼迫他来进攻，等到他精疲力尽，才可进攻。"吴汉乘有利条件，自率军两万进逼成都，离城十几里，在江北扎营，架设一浮桥，让副将威武将军刘尚率一万多人驻扎江南，两营相离二十多里地。光武帝听说后大为吃惊，

去信责备吴汉说："几次去书劝诫千条万端，怎么临事勃乱，你既轻敌深人，又与刘尚分开立营，事有缓急，难以互相顾及。敌人如果用军队牵制你，以大军进攻刘尚，刘尚被攻破，你也必定失败。可庆幸的是还没有出事，赶快引兵回广都。"诏书还未到达吴汉处，九月，公孙述果然让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率十几万人，分成二十多营进攻吴汉，让别的将领率一万多人威胁刘尚，让双方不能相援救。吴汉与谢丰大战一天，失败，进人围墙之内，谢丰进而包围了吴汉。吴汉召集诸将激励说："我与诸位逾越险阻，跋山涉水，转战千里，才深人敌人腹心，来到城下，现在与刘尚两处被包围，两军不能联结，其后果不堪设想。我想偷偷地率军队到江南与刘尚合军，合力抵御敌军，我们如果同心合力，各自为战，可立大功，如果不如此，必败无疑。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都认为只有如此，令士兵吃好，喂饱马匹，养精蓄锐，闭营三日不出战，多树旗帜，使烟火不绝，到第三天夜里，偷偷引兵出营，与刘尚合军，谢丰等人没有发觉。第二天，谢丰分兵据守江北，自己率军进攻江南，汉军全部出动迎战，自早晨开始，混战到午后，大败谢丰军，杀死了谢丰、袁吉。吴汉率军回到广都，留下刘尚抵御公孙述，把作战情况上报光武帝，在上表中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光武帝回书说："你回到广都，甚为合适，公孙述一定不敢忽略刘尚进攻你，若先进攻刘尚，你从五十里外的广都用全部军队赴援，正赶上两军战斗疲倦之时，必定能打败公孙述。"从此，吴汉与公孙述在广都、成都之间进行八次战斗，吴汉八战八胜，驻军于成都城郭之中。臧宫攻取了绵竹、涪城，杀死了公孙恢，又攻取繁、郫，与吴汉军会合于成都。

公孙述被困急，问延岑说："应该怎么办？"延岑说："男子应该死中求生，怎能坐以待毙呢？财物容易积聚，不应过分爱惜。"公孙述于是把储存的金银布帛拿出来，召募敢死之士五千余人分给延岑，延岑在市桥假设旗帜，鸣鼓向吴汉挑战，而暗地派奇兵偷偷绕到吴汉军背后袭击吴汉。吴汉被攻坠人水中，拽住马尾得以出水。

吴汉军只剩七日粮食，暗地里准备船只，打算撤退。蜀郡太守张堪听说后，立即前往见吴汉，陈说公孙述必败，不应撤退。吴汉听从了张堪的计策，以显示自己兵弱而诱敌。

冬十一月，臧宫驻军咸阳门。戊寅，公孙述亲自率军数万人进攻吴汉，让延岑抵御臧宫，双方大战，延岑三战三胜，自黎明战至中午，军士都没有吃饭，双方军士都很疲惫。吴汉让护军高午、唐邯率精锐之师数万进攻，公孙述军队大乱，高午直奔敌阵刺公孙述，把公孙述脸上刺了一个洞，被军士用舆车载入城。公孙述把军队交给了延岑，当夜死去。第二天，延岑献城投降。辛巳，吴汉杀死公孙述妻子，并诛灭公孙述整个家族，又杀死延岑整个家族，焚烧了公孙述宫室，并让兵士大肆掠夺。光武帝听说后大怒，谴责吴汉，又责让刘尚说："城投降三天，吏民服从，老弱万余口，而放任兵士纵火，叫人听说后真为之酸鼻。刘尚是宗室子孙，曾经担任吏职，怎么忍心做这种事？俯仰天地，看到放生幼鹿，啜羹不饮，二者哪一个更仁呢？如此行为失去斩将慰问人民之义。"

光武帝平定蜀后，下诏赠曾劝公孙述投降的常少为太常，张隆为光禄勋；又征聘不接受公孙述职务的费贻、任永、冯信等人，正好任永、冯信病死，费贻应征出仕，后来官至合浦太守。光武帝看到公孙述旧将程乌、李育有才干，都加以提升任用，于是西土都心悦诚服，全部归心于汉政权。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光武帝纪》、《隗嚣公孙述列传》、《邓禹列传》、《冯异列传》、《窦融列传》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三

《通鉴纪事本末》：《光武平陇蜀》

偃武修文

自古以来，创业难，守成更难。夺取天下以后，怎样才能巩固政权，是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花费不少精力进行研究的。不同的统治者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有很大差异。光武帝刘秀扫平群雄，统一中国以后，偃武修文，退功臣，进文吏，巩固了东汉政权，给后代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为集中军权，光武帝下诏废除了一些地方军队。诏书说："天下郡国都有军队，兵多而精，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乡种田。"轻车、骑士、材官、楼船是汉高祖刘邦时命天下郡国在平原、山地、河泽等地区编制的地方军队。光武帝把这些部队复员，既有利于节约开支，又为恢复残破的农村经济提供了生产人手，并且集中了军权，一举数得。

复员地方军队后，光武帝又对京城卫戍军队进行了整顿。光武帝在京师设南北军：北军为京城警卫，把原来的胡骑、虎贲二校合并成五营，设北军中侯一人，秩六百石，取代原来的中垒校尉，统率北军营垒的五营京城卫戍军。南军为宫廷禁卫军，设光禄勋一人，中二千石，统率殿门内的宿卫军；卫尉一人，中二千石，统率殿门外的宫门卫士。南北军是东汉军队主力，重大的军事行动、皇帝宿卫、京城治安都由这两支军队担任，朝廷举行重大典礼或仪式，也任用这些军队充当仪仗队。这两支军队的调动使用权由皇帝掌握。

光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夏四月，吴汉平定西蜀，班师回洛阳，

光武帝大规模犒劳将士，分封功臣，增加功臣封邑，共有三百六十五名功臣更改了封号，增加了封邑，又分封外戚、恩泽侯四十五人。其余各功臣封邑各有等级差别，已经去世的功臣有的分封了他的子孙，有的分封了他的旁系亲属或庶出子孙。

光武帝经历了长期战争，厌倦了军事生活，又深知由于长期战争，国家经济遭到巨大损耗，人民饱经离乱之苦，思想休养生息，因此，自平定陇蜀以后，没有紧急军情，就不再谈论军队战争之事。有一次，皇太子向光武帝问起攻战之事，光武帝回答说："过去卫灵公向孔子请教战阵之事，孔子不回答，这也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事。"邓禹、贾复等了解到光武帝想停止争战，注重文治，不想让功臣聚集在京城，也都丢开武功兵甲，致力于儒家经典。光武也想保全功臣爵禄，担心这些功臣担任职事官有过失而失去爵邑，罢除了左右将军等武职。耿弇等人都上交了大将军、将军的印绶，以列侯归家，光武帝都加以特进的空衔，让他们参与朝会。

邓禹平时注重个人修养，为人敦厚细密，有十三个儿子，邓禹都让他们学一技之长，平时注重整顿门风，教养子孙，所制订的许多家法门规为后世所效法，在经济上只食用封邑，不再从事其他盈利性的生产。

贾复为人刚毅正直，重志节，以列侯归家后，闭门修养，不轻意过问外事。朱祜等人向光武帝推荐贾复可以担任宰相，光武帝正注重让三公负责处理一般政事，对功臣一概不用。一般情况下，讨论国家大事也只是吸收邓禹、李通、贾复参与公卿会议讨论。光武帝对他们三人也格外亲近关怀。

光武帝虽然不给功臣军政大权，但对功臣却能关心爱护，恩赏备至，待遇优厚，功臣小的过失也往往加以原谅和赦免；远方进贡的物品，光武帝有时情愿自己不吃不用，也要遍赐功臣列侯；同时经常警诫功臣要珍重自爱，不要触犯法律。他曾下诏告诫功臣说："人心要知足，不要只顾一时的快乐而放纵自己，忘记了法纪刑罚。

你们功劳很大，要考虑封爵代代相传，因此要小心谨慎，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一日大意。"因此功臣都保全了爵禄。范晔曾评论说："光武用高秩厚礼，报答功臣，严峻的法制，责成职事官吏，整个建武时期，封侯一百多人，只有几个人参与国政，分担了国家的忧患与快乐，其余都受到优待，保全了爵禄，并把封爵传给了后代。"王夫之评论光武帝对功臣的态度说："光武帝没有赋将帅以宰辅的重任，诸将帅也各自安心而不作非分之想，光武的用意是非常深远的。自古以来，君臣能交尽其美的，也只有东汉这个时期为盛啊！"

光武帝在治理国家时，摒除功臣武将不用，却重视广泛征求文人儒士，吸收他们从政，在即位之初，即注意罗致、任用散布各地的士人。如卓茂，西汉元帝时期入长安太学，学习《诗》、《礼》及历法算术，称为通儒，性情宽仁恭爱，西汉末入仕任密县县令，王莽篡权后，隐居不仕。光武帝继位后进行访求，曾下诏说："前密令卓茂，注重个人修养，志节淳固，能为别人不能为之事，名声为天下之冠，应当受天下重赏，以前武王伐纣，封赠比干之墓，表彰商容的故里，是值得效法的。现在特任命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给几杖、车马和衣服一套，絮五百斤。"张堪十六岁时去长安太学学习，因品学兼优被誉为神童。光武帝早年就对张堪很有好感，后来来歙向光武帝推荐张堪，光武帝召见后把张堪留在身边，任为郎中，不久又提升为传达诏命的谒者，吴汉征伐公孙述，又任命张堪为蜀郡太守，成都攻下，张堪马上进城，检阅府藏，命人查寻公孙述宫中珍宝，一笔笔列成清单上报朝廷，丝毫没有归己，对新征服的地区进行安抚慰问，使蜀人都安心归服，而自己离任时，身上仍穿一身布衣，乘坐一辆断了辕的马车。光武帝听说后，感叹良久，后来任命张堪为渔阳太守。张堪在边境地区率领百姓抵御匈奴，开垦土地，百姓得以安定，逐渐富裕，纷纷歌颂张堪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帮助光武帝稳固了占领地区的统治。光武

帝为选拔更多的文人入仕,帮助治理国家,开始改革完善利于文人儒士参政的制度。

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光武恢复和健全了刺史制度,设立刺史督察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吏。全国除京师和京畿地区设司隶校尉外,其他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他们按照皇帝的命令,每年八月出巡所辖区域,按照朝廷规定的六条标准查访各地,平反冤狱,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每年年底回京师向朝廷汇报。皇帝根据刺史的汇报情况对地方官升降和赏罚。光武帝把原来归太尉、司徒、司空主管的赏罚之权划归刺史,并规定刺史每年举茂才一人。西汉时期刺史没有固定治所,光武帝为刺史设置固定治所,并明确规定,刺史在任职期间虽父母去世也不许请假回家。刺史人选大多都是严明正直的文士。刺史的设立有利于皇帝独揽大权,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光武帝为形成文人主政,对中央机构也进行了改革,逐步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了尚书台的权力。仲长统评论光武帝这一改革时说:"光武皇帝心里愤恨西汉后期君主失去权力,大臣专命,矫枉过正,朝政不再交给臣下,虽然仍设三公,但不给实际权力,把具体政务交给尚书台处理。从此以后,三公的职务,只不过是虚设罢了。"光武帝时在宫内设置尚书台,是一个主要的政务机关,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都是六百石官吏。尚书令辅佐皇帝,总典纲纪,对政务无所不统。为提高尚书令地位,光武帝特地下诏,在朝会时,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显示位尊权重。尚书仆射主要负责开启文书,并负有监察和谏诤的职责,如尚书令不在,可率领尚书奏事。尚书六人,分别主管全国的公卿、官吏、民政、外交、盗贼、狱讼等具体政务。尚书下设左右丞、侍郎等属员,皇帝有什么事便命身边左右亲随告知尚书,尚书根据皇帝的意见起草诏书,下发给主管部门或地方官府,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上奏的文书也要先交给尚书,尚书转达

皇帝或保存。国家一般事务也由尚书台报告皇帝，听从皇帝的处理意见。这样光武帝通过尚书台亲自管理全国官吏和天下政务。尚书虽出入王命，位尊权重，但官职低下。光武帝按照他的用人原则和标准选用的尚书台官员多是他认为可靠而又德才兼备的士人，如前期的伏湛、侯霸、冯勤等人。

伏湛在西汉时为博士弟子，王莽时曾任绣衣执法，光武帝因伏湛为名儒旧臣，任命为尚书，让伏湛负责典定制度。光武帝出征则经常让伏湛留守京师，总管各级官吏，后来又让伏湛取代邓禹为大司徒，封为阳都侯。伏湛对于东汉初期政事制度的建立多所贡献。

侯霸笃志好学，西汉成帝时曾任太子舍人，精通《穀梁春秋》，光武帝任命为尚书令。他明习西汉典章故事，对西汉制度进行参考损益，在此基础上修订了东汉一些制度，后来代替伏湛为大司徒，封关内侯，在位期间，明察忠诚，奉公守法，最后病死在任上。

冯勤善于算术，曾为姚期属员，以有才能著称，后来姚期把冯勤推荐给了光武帝，被任命为尚书，因任事精细勤快而受到光武帝的赏识，称为佳吏。冯勤主持分封功臣为列侯。冯勤根据功劳大小，封地肥瘠远近，统筹考虑，分封得又合理又妥当，功臣都很满意。冯勤后逐步升迁为尚书令，又被任命为司徒。他忠诚恭敬，被普遍认为称职。

为了推行文治，吸收更多的文人儒士参加政权，光武帝很注意罗致山林隐士，以礼相待，尽力访求，唯恐有所遗漏，用安车蒲轮进行特征。这种征求隐士的车经常在山林中相望于道。有些隐士入仕辅佐，有些始终不肯入仕。刘秀对不入仕的隐士也不强迫，能正确对待，如严光、薛方、逢萌、周党、王霸等人。

严光是会稽余姚县（今浙江余姚）人，与刘秀在长安太学读书时是同学，年轻时就很有名望。光武帝做皇帝后，严光隐居不出，光武帝派人画了严光的图像到处寻访。有一次，齐国有人上报光武帝说："有一个男子，披个羊皮袄在大泽旁垂钓。"光武怀疑是严光，派

使者备安车去礼聘，经了解果然是严光。使者三次往返，严光才同意去洛阳见做皇帝的老同学。光武帝看到故友远道而来，十分高兴，特地把严光安置在北军官舍居住，待以贵宾之礼，命太厨早晚进奉佳肴美馔。有一天，光武帝亲自去看望严光，走到时严光还在睡觉。光武帝轻轻抚摸着严光的肚子说："子陵啊，不能帮助我治理国家吗？"严光开始假装睡着不答理光武帝，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说："人各有志，何苦逼迫我呢！"光武帝叹口气说："子陵，我竟然请不动你吗？"严光仍不答应，光武帝叹息着离开了。不久，光武帝又把严光请入宫中，两人叙述旧情，谈论学问，整整谈了一天，光武帝很随便地问严光："我现在比从前如何？"严光回答说："陛下比以前稍有长进。"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坚持不任职，又回到富春山，继续隐居，以耕读为生。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再次特征严光入仕，严光仍然不肯，活到八十岁，老死于山林。

和严光差不多同时的周党是太原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人，西汉末年也曾去长安游学，光武帝征他入仕，任为议郎，因病免职，和妻子隐居渑池。刘秀再聘他出仕，周党没有办法，只得穿了短布单衣，戴着用谷树皮做的便帽出见前来征聘的尚书。朝见光武帝时，周党跪在地上，不报姓名，只陈述自己不愿出仕，愿守志隐居。光武帝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博士范升看不惯这些隐逸之士的行为，上奏说："周党等人，蒙受陛下厚恩，使者三次征聘，才肯应聘，见陛下又不行臣下之礼，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为君主死节，只会沽名钓誉。臣想考考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治国本领，如果没有真实本领，只是盗窃虚名，应治他们大不敬，虚妄之罪。"光武帝把范升的意见交给公卿议论，因为当时存有这种想法的不止范升一人。光武帝下诏说："自古以来，即使明王圣主时期，也会有不归顺的士人，伯夷、叔齐不食周王朝粮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人各有志，何必强求。赐给他帛四十匹，让他回家去吧！"

东汉初期，逢萌、王霸、井丹等人与严光、周党相似，也始终不

肯入仕，终老于山林。

光武帝为实行文治，采取各种措施选拔人才，征聘文人入仕，这些士人主张用文德教化社会，对东汉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光武帝偃武修文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重视教育。王莽更始时期，天下混乱，典籍散落，许多文人儒士怀抱典籍，遁迹林薮。光武帝是士人出身，爱好经术，所到之处，往往下车就先访求儒雅之士。政权稳定后，许多文人儒士来到京师，希望光武帝重儒兴学。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桓荣等人会集洛阳，光武对这些人以礼相待，接受他们的建议，恢复和完备了西汉武帝时期的博士制度，五经立十四博士，立精通经学的儒士为博士，以自己所长教授学生。其中，《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家博士，《尚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礼》立大、小戴两家博士，《春秋》立严、颜两家博士；又在洛阳设立太学，召收学生随博士受业。进入太学学习的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称诸生。太学生学习期间，要严格遵守太学的礼仪制度，开始先专一经，学习一年后进行考试，成绩优秀的可以入仕为官。光武帝经常驾临太学，或慰问学生，或与博士辨析经义。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光武帝再次驾临太学，让博士辩论经义。《尚书》欧阳博士桓荣身服儒衣，温文尔雅，经义解得清晰而有条理，态度谦虚平和，论驳有据，不以辞胜人，而是以理服人，参加论辩的博士，都很佩服桓荣的讲论。光武帝对桓荣十分赏识，给予特别的赏赐。光武帝兴致很高，又命诸生击磬吹管，敲钟打鼓，演奏《雅》《颂》之乐。光武帝回宫后下诏让桓荣进宫为太子讲经，提升为太子少傅。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二月，光武帝去泰山封禅，并兴建了明堂、灵台、辟雍和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为国典。光武帝自以为国家进入了治世，偃武修文取得成功。

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勤于政事，每天黎明早朝，太阳偏西

才罢朝，多次召集公卿、郎官、将领讲论儒经义理，常常半夜才休息。皇太子看到光武帝终日勤劳，不注意休息，找机会进谏说："陛下有夏禹、商汤的明智，缺少黄帝、老子修身养性的福分，恳望您保养精神，清心安宁。"光武帝回答说："我自己喜欢如此，不感到疲劳，虽然成就大业，却时刻谨慎唯恐有办不好的事，所以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措没有过失。不用功臣而进用文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虽然行道不完全如古代，也可以算以文治世。"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光武帝纪》、《邓禹列传》、《贾复列传》、《卓茂列传》、《张堪列传》、《伏湛列传》、《桓荣列传》、《逸民列传》

《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卷四十四

楚王英之狱

东汉光武帝刘秀共有十一个儿子。其中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阜陵王刘延、中山王刘焉为郭圣通皇后所生，楚王刘英为许美人所生，汉明帝刘庄、东平王刘苍、广陵王刘荆、临淮公刘衡(早夭)、琅邪王刘京为阴丽华皇后所生。刘秀在世时他的儿子们相安无事，待到刘秀归天刘庄继承皇位之后，广陵王刘荆、楚王刘英便开始觊觎皇位。汉明帝刘庄为了铲除隐患确保皇位，先是除掉了同母弟刘荆，后来又兴师动众将楚王刘英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制造了东汉历史上著名的楚王刘英之狱。

楚王刘英之狱，说到底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们为争夺皇位和保住皇位而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为了弄明事情的原委，还要从刘秀娶阴丽华和郭圣通说起。阴丽华是南阳郡新野人，长相极美。刘秀到新野闻其貌美，遂心悦神往。后刘秀到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感叹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娶阴丽华为妻，实现了夙愿。刘秀打下江山做了皇帝后本想立阴丽华为皇后，但阴丽华考虑到自己并未生儿子，便一再谦让，以正妻身份而居贵人之位。郭圣通是真定郡大姓郭昌之女，美丽而又贤惠。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转战来到真定，得到了郭昌的支持，刘秀亦因此而娶郭圣通为妻。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也就是在刘秀做皇帝的那一年，郭圣通为刘秀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强。母因子贵，再加上刘秀也希望进一步得到地方豪强对其政权的支持，因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便立郭圣通为皇后，立刘强为

太子。以后刘秀又陆续有了十个儿子，为使他们荣华富贵而与太子又有所区别，刘秀皆赐予他们公爵之位。

阴丽华虽然没做皇后，但刘秀对她一直极为宠爱，特别是在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她为刘秀生下皇子刘庄以后，刘秀对她更是另眼相看了。刘庄也聪明伶俐，甚得刘秀喜欢。建武十五年（公元 39 年），刘秀在朝廷上处理各地占田不实之事，看到有一个官吏的奏章上有“颍川、弘农郡的占田情况可问，而河南、南阳郡的占田情况不能问”的字样，刘秀问原因何在，官吏们不敢回答。年仅十二岁的刘庄在帏帐后面答道：“河南乃皇城所在之地，多有朝官大臣之家，而南阳乃父皇老家所在之地，多有皇亲之家，所以这两处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下面的官吏也不敢追问。”刘秀听到刘庄分析得头头是道，为自己有这样聪明的儿子而高兴万分，心中亦产生了立其为太子之意。与此同时，刘秀为对阴丽华的宠爱与日俱增，而对郭皇后由此产生的嫉妒之情心怀不满。建武十七年（公元 41 年），刘秀终于废除郭圣通皇后之位而立阴丽华为皇后。对此，大臣们有一些非议之辞，认为郭皇后并无失德之举，只因宫中小事便行废立，不好向天下人解释。刘秀为堵住大臣之口，便将郭皇后亲生之子刘辅由右翊公提升为中山王，封郭皇后为中山王太后，这样大臣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但将刘辅升为中山王，其余的皇子们还是公爵，自然也有意见，为将事情摆平，刘秀又将其他儿子（太子刘强和早夭的刘衡除外）全部封为王。郭皇后被废之后，作为太子的刘强深知自己已失去了其父刘秀的重视，故曾多次向刘秀表示自己愿意辞去太子之位回去奉养母亲。刘秀顺水推舟，在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发出了如下的诏令：“《春秋》之义立子从贵，刘庄乃阴皇后之子，理应继承皇位，特命东海王刘庄为太子，令太子刘强为东海王。”刘秀在将刘庄与刘强的位置互换之后，便解决了爱子刘庄未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刘强做皇太子，大家的意见不大，因为他既是嫡长子，同时德行也不错。现在刘庄凭着其母阴丽华得宠和自己的

小聪明，摇身一变成了太子，其它诸王心中就有点愤愤然了，他们想既然刘庄能当太子，那么他们也有继承皇位的权力。这样，由于刘秀中途更换太子，便埋下了后来皇子们争夺皇位的隐患。

西汉时历经分封诸王的叛乱，已经认识到给予下面诸王过多的特权会对中央集权形成威胁，并直接影响到皇位的安危。所以，汉武帝曾制定了左官律、附益法等一系列限制诸王特权的禁律。东汉初期政务繁忙，再加上封王年龄不大，还未滋生其它政治野心，故没将这些禁律付诸实施。随着刘秀几位儿子的长大成人，特别是刘庄做了太子之后，他们便利用法律疏漏的空子大力扩展自己的实力，这时刘秀所封诸王皆留住京师，他们想方设法竞修名誉扩大影响，并广招宾客罗致党羽，为以后在政治上的进取创造条件。刘秀非常敏感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十分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们会为争夺权力而刀枪相加。在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刘秀重申西汉的附益之法，宣布如有人阿曲附益王侯定以重法处置。但是，皇子们并没有把附益之法放在心上，继续我行我素，有的封王甚至利用宾客做出了越轨的事情。寿光侯刘鲤是更始帝刘玄的儿子，与沛王刘辅关系密切。刘鲤对以前刘盆子杀死他的父亲怀恨在心，为报杀父之仇，建武二十八年(公元 52 年)夏天，刘鲤利用沛王刘辅的宾客将刘盆子之兄刘恭杀死。刘秀由此事意识到儿子们羽翼已成，如不予剪除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刘秀将沛王刘辅关人牢狱之中严加审问，并命令各州郡追杀诸封王的宾客，最后竟然捕杀各封王宾客一千多人。由此可以看出诸封王的势力已经相当可观。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刘秀再也不敢将儿子们放在身边了，到建武二十八年(公元 52 年)秋天，除将太子留在京师外，将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等全部遣送回各自的封国。经过沛王刘辅事件，各封王的宾客丧失殆尽，就连随便进人京师的权力也没有了，封王势力在这次事件中遭到了沉重打击。

中元二年(公元57年),英雄一生的刘秀离开了人间。随着刘秀的去世,所封诸王与太子刘庄的矛盾便公开化了。诸王在参加刘秀的丧礼时不甘居太子之后,与太子同席行礼举哀,诸王的随官出入皇宫时也与中央大员无什么差别。主持丧事的太尉赵熹从这些小事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在丧礼大典上不能将太子与诸封王在礼法上区别开来,以后的事情将十分复杂。他横剑殿前,严肃面孔,将太子置于最前,将诸王扶下殿堂,以表明尊卑有分;再将各王国官员置于地方官员之列,以示中央地方之别;行礼毕又让各封王回到自己在京的住所,不见命令不准随便上朝,然后又加强门卫,以防不测事情的发生。刘秀的丧礼完毕之后,太子在大臣们的主持之下即位。历史上称他为汉明帝。

刘庄虽然顺利地做了皇帝,但有的封王意见很大,特别是刘庄的同母弟山阳王刘荆对此更是耿耿于怀。刘荆自恃其有才能,通文法并且长相酷似刘秀,故以为自己应当做皇帝,而对皇父刘秀未把他安排为接班人心怀不满,所以葬礼上他哭刘秀也不显悲痛,并想利用朝政混乱之机鼓动东海王刘强造反,以便混水摸鱼。他伪造了一封大鸿胪郭况写给外甥东海王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先帝处事不公,您东海王并无罪过竟遭废斥。更可怜的是郭太后无故被废,全国上下无不为此痛哭流涕。这一切都是因为有阴皇后和太子刘庄的缘故。现在正是起兵报仇的良好时机,只要您能集合起两个封国的力量,可得百万雄师,以此击败刘庄就像泰山压鸡子那样容易。当年高祖刘邦以亭长身份起事即立万岁之业,何况您的身份是光武帝的长子,因此起事必定成功。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为抽刀痛杀之时就不要做温顺的羔羊,不然时机错过,恐怕连羔羊也做不成了。君主崩亡之日就是强者夺天下之时,愿您迅速起事以成高祖刘邦之业。"这封书信文辞犀利,气势非凡,称得上是一篇好作品,但它并没有打动东海王刘强的心。刘强是无缘无故被刘秀从太子位上赶下来的,他知道即使自己老老实实,新登基的汉明帝亦

对他怀有戒心，假若有一点把柄被人抓住，汉明帝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所以刘强在接到这封信之后，慌恐之下立即将送信人和信件全部送交朝廷。经过审理，真相大白。由此，汉明帝知道东海王刘强老实胆小不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对东海王大加奖赏，而对皇座有觊觎之心的刘荆是汉明帝的同母弟，汉明帝难以对他动杀罚之念，只好将此事作为一个秘密不让外传。刘荆在政治野心暴露之后，决心破釜沉舟一干到底。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西羌造反，刘荆十分希望国家会因此而发生变故，自己好从中渔利，于是，便秘请会看天望星气者密谋策划造反事宜。汉明帝在侦知此事之后，立即改封刘荆为广陵侯，并遣送回封国。但刘荆并没因此打消做皇帝的念头。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刘荆准备起兵造反，起兵前找来相面的说："我的状貌颇像先帝，先帝三十岁就得天下，我今年亦到三十岁，起兵可以吗?"相面的知道谋反乃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事情，事关自己的命运，故马上向有关官吏报告了此事。汉明帝立即采取措施，命令刘荆不得管属其封国的官吏和人民，只能食用租税，由广陵国相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刘荆事实上成了一个被软禁的囚徒，他看着自己前途黯淡无望，便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自杀身亡。至此，汉明帝在他做皇帝的第十年，终于除掉了对皇位最热心的政敌同胞弟弟刘荆。

在广陵王刘荆之后，楚王刘英又向汉明帝之皇位进行了挑战。刘英乃刘秀之许美人所生，许美人不受宠爱，刘英亦不被重视，虽然被封为楚王，但十个封国之中楚国最小。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刘英反叛的性格，他年轻时就乐于结交游侠、宾客。但他从沛王刘辅、广陵王刘荆事件上看到锋芒毕露就会遭到打击，故他多年不露对政治的欲望。为了进一步伪装自己，刘英极力和汉明帝搞好关系，后来汉明帝喜好佛教，他也在爱好黄、老之余，在贵族中率先斋戒祭祀浮屠，以示自己清静无为。但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尊严、享乐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他。广陵王刘荆事件后不

久，刘英便暗地结交天下名士笼络各方人才，准备造反夺取皇位。东汉是一个谶纬迷信盛行的朝代，大家把谶言纬书视为真理。为了给自己做皇帝制造社会舆论，刘英命方士们制做金龟、玉鹤，刻写文字以为自己做皇帝的符瑞，命渔阳人王平、颜忠作图谶以为自己做皇帝的预言，同时还超越权限，在封国之内设置诸侯、将军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刘英的谋反行为很快便被人在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告知朝廷。汉明帝为了将这次谋反事件扼杀于摇篮之中，立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废除楚王刘英的王位，派人将刘英押送至丹阳泾县(今安徽宣州)软禁起来，刘英至丹阳后绝望自杀；二是派司徒邢穆严办刘英谋反案件。汉明帝对这次谋反事件极为愤怒，发誓要杀尽一切与此有联系的人。专办此事的官吏也不敢怠慢，连续几年穷究此案，凡是与刘英有联系的亲戚、侯王、豪杰、官吏，不管有无谋反行为皆予逮捕。先后有一千多人因此案被处死和流放，还有数千人被关进监狱之中，形成了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大案。被牵连进此案中的人有许多是无辜的。如吴郡太守尹兴只因在刘英处有他个名字，吴兴及其属官五百多人便被严刑拷打，重刑之下有被惨打致死的，有屈打成招的，但查来查去并不能找到他们的谋反证据，最后只好赦免了这些人，但仍把他们禁锢终身，不能再人仕途。还有隧乡侯耿建、郎陵侯臧信、濩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也是被方士颜忠、王平诬陷而人监狱的。狱吏只信颜忠、王平的一面之辞，并不信这四侯的辩解，他们是有苦难言，如不是侍御史寒朗冒死为他们说情，他们是必死无疑了。后来汉明帝在寒朗的进谏之下，也考虑到刘英之狱涉及面太广，受冤屈的人太多，便亲自到洛阳监狱释放了一千多名证据不足的人。新任楚郡太守袁安也对此案认真复查，又将楚郡监狱中关押的四百余家无辜者予以释放。尽管如此，还是有数千人因刘英之狱而被杀、被囚。这充分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残酷性。

通过楚王刘英之狱，汉明帝将不安分的封王及其党羽全部收

拾干净，从此以后所封诸王再也没人敢觊觎皇位了。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皇后纪》、《光武十王列传》

《资治通鉴》卷四十一至四十五。

度田事件

汉武帝时候，土地兼并现象就已经十分严重，哀、平之世更加剧烈。王莽推行“王田法”，企图运用国家的权力，让大地主、大商人拿出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以缓和因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危机。但是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王莽的土地政策流产，不久便爆发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土地问题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农民起义的目标是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夺回被地主侵占的土地，结果是，王莽的腐朽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农民并没有获得土地，大地主的经济势力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削弱。因为农民爆动发生后，大商人大地主纷纷组织起来，统率宗族宾客，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例如王郎起义发生后，刘植便与他的弟弟刘喜、从兄刘歆，统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保守昌城（今河北丰南西北）。耿纯与从弟耿䜣、耿宿、耿植，统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占领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县城。刘秀的舅舅樊宏则联合宗族亲属挖堑筑垒以自守，投靠他避难的有上千家。以光复汉朝为己任的刘秀知道这些地方武装是他的同路人，而这些地主武装也乐于依附刘秀作靠山。他们纷纷参加刘秀军事集团，追随他四处征战。刘秀在河北时，刘植、耿纯便带上自己的武装加人刘秀的队伍；刘秀西征陕西，王丹率领宗族献二千斛小麦作军粮，邓禹便委任他做地方官吏。可见西汉末年的大地主并不是像秦末地主那样被“扫地出门”，逃避山林，他们以自我武装的方式，保住了自己的土地财产。农民

起义失败后，豪强地方的势力进一步膨胀，成为统治农村的政治势力。

刘秀本人是西汉宗室支裔、南阳豪强地主。他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都出身于官僚世家。其外祖父樊重是名震南阳的豪富，为创立东汉基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大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所以东汉政权建立后，刘秀对豪强地方采取极其优容的政策，在政治上选拔他们为官，在经济上保护他们的利益。官僚地方兼并土地的现象极为严重，如刘秀的大将马援以屯田为名，占有上林苑中大片土地；吴汉率军在外征战，他的妻子则在后方购置田产。那些皇亲国戚如南阳樊氏、阴氏，更不甘心落后，一个个成为田连阡陌、奴婢成群的大地主。

作为豪强地方的政治代表，刘秀不想触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鉴于王莽改制失败的教训，他也不敢染指豪强地主的土地财产。但是财政收人的匮乏，迫使他不得不去触动一下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有的地主被杀死，土地所有权转归他人，有的人挣脱封建束缚获得了人身解放，也有少量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对此，东汉政府需要把土地占有情况和人口数字进行清理登记，以便征收租税赋役。另外豪强地主为逃避赋税，往往隐瞒自己占有的土地和人力数量，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人。为了加强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增加国家的赋税收人，刘秀决心对此进行一番认真的清查清理。建武十五年(公元 39 年)，刘秀下诏，令各州、郡官吏清丈土地、检查户口，这就是所谓"度田"。

刘秀的诏令下达后，地方官吏并未完全照章办理，他们对农民和地主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有些豪强地主拥有武装，地方官吏害怕他们，不敢认真清查；有些豪强地主以钱财贿赂地方官吏，勾结作弊，让他们帮助自己隐瞒田产和依附人口。当时的官吏大都是豪强地主，他们不愿意如实丈量土地、呈报人口，损害本阶层的利益。对于农民，地方官吏的态度就不是这样了，不仅不放过

他们一小块土地，就连里落房舍也丈量在内。结果是“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发生了骚乱。

刘秀发现地方官吏度田中的舞弊行为，多亏他的聪明儿子刘庄的提醒。度田开始后，各州郡都派人到中央汇报度田情况。刘秀召见陈留郡派来的官吏时，看到他手中的木牍上写着两行字，道是“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追问他，他不肯明讲，却抵赖说这木牍是从长寿街上拣来的，惹得刘秀大为恼火。当时，刘秀的儿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年方十二岁，被封为东海公。他正站在帷帐后面看刘秀办理公事，提醒刘秀说：“这是临来时郡守叮嘱他的话，让他比照别郡度田的数量向您报告。”刘秀还不明白，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呢？”刘庄说：“河南是都城，近臣多；南阳是帝乡，贵戚多，田宅超越制度，不可以作为标准。”刘秀令武士们责问陈留吏，他不得不如实承认汇报作弊的情况。刘秀得知地方官吏度田不实，乃分派使者调查考实，终于发现了他们的舞弊行为。

刘秀决心以强硬的手段推行度田政策，他首先以“度田不实”的罪名严厉惩治舞弊的官吏，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郡太守十余人下狱处死，而后重申严格检查田亩和人口，加紧度田。结果，各地纷纷发生武装反抗。其中既有农民反对地方官吏虚丈田亩、多收租税的斗争，也有豪强地主为隐瞒土地人口，反对度田的斗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攻打官府，杀死地方官吏，官兵前来镇压，便作鸟兽散；官兵离开以后，又聚集在一起。这些反抗以青、徐、幽、冀四州为甚，给东汉王朝以极大的震动。

面对这种局势，刘秀不得不作出让步，他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把捕到的叛乱首领迁到其他郡国，授与土地房屋，使之安居乐业，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县的联系。刘秀同时发布命令，让参与武装反抗的人“自相纠擿”，五人联手杀死一叛乱者，则免此五人

之罪；地方行政长官因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或因害怕叛乱而弃城逃跑者，皆不加追究，仅以捕获叛乱者人数之多少为考核官吏成绩的标准，只有隐瞒藏匿叛乱者才算犯罪。各级官吏加紧收捕，叛乱者逐渐解散。度田之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经过这次叛乱，刘秀再也不敢用强力推行清查土地人口的政策，但他又不肯彻底放弃度田的做法。此后地方官吏仍负有清丈土地的职责，度田不实的事仍经常发生，当然刘秀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把他们杀头示众，只是马马虎虎，给点处分就算完事。到明帝时，仍有官吏上疏言地方官度田失实事，说："如今许多地方发生牛疫水旱，垦田数量比以前减少，可是官吏为谎报成绩，想让度田之数比从前增加，不种之地，亦令农人交租。"度田在形式上虽已成为东汉朝廷定制，但它既没有真正解决豪强地主隐瞒土地人口的问题，也没有达到增加政府财政收人的目的。

刘秀处理土地问题的尝试失败了，但他解决其他经济问题的措施却取得了很大成功，从而保证了东汉前期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是释放奴婢。西汉中期以后，编户农民大量破产，其中不少人沦落为奴婢，导致奴婢人数增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及政治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董仲舒曾经提出过限制奴婢数量的主张，汉哀帝时师丹打算实施限奴的计划，但由于贵族、官僚地主的反对而成为一纸空文。王莽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到头来适得其反，官奴婢的人数却比以前大大增加。在绿林、赤眉起义中，不少奴婢挣脱枷锁获释，但战乱和饥饿又使不少穷困的农民卖身为奴或被掠卖为奴。刘秀称帝以后，便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吸取了西汉政治家限奴失败的教训，用政权的力量，强制大地主大商人释放奴婢。自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到建武十四年（公元 38 年）的十几年里，他共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命令，三次颁布禁止虐杀奴婢的命令，主要内容是：一、因贫困卖身为奴者，主人应释放之。如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二、王莽时没为奴婢而不合乎西汉法律者,免为庶人。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令:"王莽时吏人没人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三、青、徐、凉、益四州吏民因饥饿、战乱、被掠卖而沦为奴者,免为庶人。如建武七年(公元31年)"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建武十年(公元34年)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陇蜀平定前后连续三次发布诏令:益、凉二州之民凡被掠卖为奴者,"一切免为庶人"。四、禁止虐杀奴婢。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三次下诏,宣布凡杀死奴婢者不得减罪;有敢灼炙奴婢者,按法律处罚,且免受灼炙的奴婢为庶人;革除奴婢射伤人弃市的法律;同时还重申"卖人法"、"略人法",禁止掠卖人口。

应当指出,刘秀的上述诏令有很大局限性,从被释放者的身份看,仅限于那些原来是"吏民"的人;从时限看,仅包括王莽当政后沦为奴婢的人;从地域看,主要是限于在刘秀的政敌长期统治的区域内沦为奴婢的人。但不能否认,这些诏令使大量奴婢获得解放,对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安抚流民。流民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西汉中期这个问题便已出现,西汉末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而日趋严重。两汉之际的战争更造成大量农民破产,他们逃离家乡,成为流民。流民的大量出现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他们不著户籍,政府无法对其征收赋税徭役。他们被逼近死亡的边缘,往往会铤而走险,聚众起义,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东汉王朝不敢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没办法消除产生流民的根源,但他们采取了一些改良性的补救措施,使流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这些措施是:一、赐民爵位。秦汉时期,凡遇皇帝即位、庆典或巡幸某地,往往赐民爵位一级或二级,其中东汉赐爵次数最多。爵位是人们政治等级的标志,与人们的经济利益也有联系。一般说,

只有较高级的爵位方可获得政治、经济特权，通过普通的赐爵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级别，汉明帝又下令，凡赐爵超过第八级“公乘”者，须分爵位给子弟。所以汉代被赐予爵位者不过是得了个虚名，不能获得什么权利，但这项措施对于稳定自耕农的社会地位，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二、假民公田。所谓假民公田就是把国有的荒地、园囿及山林川泽租给或赋予流民耕种。汉高祖时，萧何请求将上林苑中的荒地分给贫民耕种，此为假民公田之开端，后历朝实行，尤以宣、元之世为多。东汉明、章、和三代，假民公田接近二十次。国家或将土地租借给贫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或将土地授予贫民耕种，收入较低——与国家向自耕农征收的田租额差不多——的田租。这样做，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条件，对解决流民问题有积极作用。三、赈济贫民。东汉是中国历史上赈济贫民次数最多的朝代，用这种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但是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消除流民的反抗情绪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是减轻赋税。东汉初年，经济凋敝，国家财政困难。增加对农民的剥削，势必激化矛盾，失去民心；不增加政府的收入，又难以保证战争的供给和政府的财政开支。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刘秀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政策。所谓开源就是尽量想办法增强政府的财力。度田是开源的一个办法，但此举彻底失败，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开源的另一个办法是组织军队屯田，令军士在战争间隙时间开荒种地，储备军粮，此举获得了成功。所谓节流就是压缩政府财政开支。主要办法是裁并郡县，省减吏员。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刘秀下达精简机构的命令，共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并了四百多个县，约占当时刘秀实际控制县数的三分之一；同时裁汰冗官，“十置其一”，减少大小官吏数万人，政府财政开支大大减少。在此基础上，刘秀宣布，废除王莽时实行的十一之税，恢复西汉三十税一的旧制。这种做法得利最多的是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但它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对于收揽民心、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具有重要的作用。

刘秀度田之举虽然失败了，但他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良措施却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因此东汉之初的光武、明、章三代，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东汉时，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农业生产部门发展十分迅速。与西汉相比，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

当时，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出现了一头牛拉的短辕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田地上耕作，比起西汉时二牛拉的长辕犁来是一大进步。这时已普遍使用全铁制犁铧，比战国以来沿用的 V 型犁，刃端角度缩小，坚固耐用，起土省力，可以深耕。此外，铁制农具种类逐渐增多。如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中见到的曲柄锄，是用于中耕锄草的工具，实物在洛阳烧沟等地均有出土。四川绵羊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铁制钩镰，是专门用来收割谷物的大型工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随着铁制犁铧的出现，牛耕技术进一步向边远地区推广。从陕西绥德县东汉王得元墓石室画像和米脂县东汉墓室门画像石上的牛耕图来看，陕北高原上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土地年年增辟，从此牛耕技术在江南地区迅速推广。在作物种植技术方面，西汉后期出现的区种法和浸种法，在东汉时期迅速得到推广。东汉初年，不少地区发生牛疫，导致耕作效率下降，垦田面积减少，政府明令推广区种法，以这种精耕细作的方法达到了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从崔寔的《四民月令》来看，封建地主的田庄里，种植作物时十分重视时令节气，重视除草施肥，知道根据不同的土壤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肥力。粮食加工的技术也有提高，在不少东汉墓葬中，出土了陶制的手摇风车、磨

盘等明器。从文献记载来看，东汉末年西北地区已普遍使用水碓。水碓是利用水流推动木轮，使之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杵臼或脚踏石碓舂米省力，而且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东汉时，水利灌溉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政府不仅组织修复、扩建了许多已经湮废的陂塘，而且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对于黄河的治理，成绩尤为显著。

陂塘是利用自然地势修建的水库，是古代农田水利的重要设施。汝南地区的鸿隙陂是一座古老的陂塘，西汉成帝时，关东水大，陂中水常溢出为害，政府乃下令废弃。后来这一带时常发生干旱，粮食歉收，民失其利。东汉初邓晨为汝南太守，令管理水利的官吏都水掾主持修复。修复后的陂塘达四百余里，灌溉田地数千顷，汝南以此而富饶。后来鲍昱又加扩建，溉田更多。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在那里修治阳旧渠，开垦良田三万多顷。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也修治了不少旧的陂塘，开辟了不少良田。另外像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郡的芍陂、会稽郡的镜湖，都是著名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是春秋时楚国兴修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后代又进行过修复。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寿县发现了东汉兴修芍陂的遗址，在那里出土了铸有“都水官”字样的铁锤，看来这个水利工程是地方官府主持修建的。

东汉前期，各地都开挖了一些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以及赵、魏、河西、江南地区，都“穿渠灌溉”，有些地区还新开辟出稻田。

黄河的治理，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古代黄河经常泛滥，给下游地区人民造成沉重灾难。汉武帝时进行了一次大治理，水患有所减少。至西汉后期，黄河失修，公元1世纪初，堤决于魏郡(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河道南移，改从千乘(今山东高青北)入海。由于没有堤防约束，河水横冲直撞，泛滥成灾，下游几十县受害。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工程家王景、王吴主持下，征用农民几十万人，先

用"堰流法"修了浚义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间修渠筑堤，使河、汴分流，黄河在堤防约束下顺流入海，汴渠得以安全漕运。王景亲自测量地形，指挥开凿山石，截断沟涧，疏决雍塞，建造水门，最后终于治理成功。在此后的八百年中，黄河没有改道，水患大为减少。

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政府公布的垦田和人口数字均比西汉后期低些，但由于度田失败，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人口数量不少，若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当时的实际垦田数和人口数肯定不会少于西汉。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东汉时期的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有了进步，同时还出现了新的手工业部门。

由于铁制农具普及，钢铁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总结当地冶铁生产的经验，发明了水力鼓风机，当时称作水排。这种机械的原理是利用河水的冲击力推动水轮，通过转动装置使鼓风皮囊张缩，给冶铁炉加氧。水排的发明是冶铁技术的一大进步，欧洲人到公元12世纪才掌握了这项技术。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够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与战国时期相比，叠铸的方法有了较大改进，由那时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一次浇铸。这样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节省了原料。冶铁效率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促使铁器普遍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除生产工具以外，像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刀、剪、锅、钉子、灯等等，也都用铁做成。东汉时，在冶铁业作坊中，已经使用煤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发现了羼有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气煮盐，比使用一般柴火煮盐，产量提高一倍左右。

东汉时期纺织工业有了较大进步。人们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驰名全国，襄邑(今河南睢县)

和齐地(今山东临淄一带)的纺织工业也很发达。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就曾说:"齐地人世代工刺绣,只要是女子没有不会做的;襄邑以织锦为俗,愚钝的女子手也都很巧。"当时周边的少数民族也都掌握了纺织的技术,如在新疆民丰县出土了织造匀细、花纹规整的杯纹罗和颜色鲜艳、组织细密的毛织品,东北地区的挹娄等族已能织麻布、缣布和绵布。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多以賨布为贡品,巴郡蛮夷也以幏布为贡品。南方越人所织之布,令光武帝亦见而好之。总之东汉时的纺织业,技术精湛,产品种类繁多,分布区域明显扩大。

造纸是东汉新出现的手工业部门。造纸技术起源于西汉,不过那时还是造纸工艺的探索时期,造纸没有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东汉和帝时,尚方令、宦官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从此纸开始代替价值昂贵的缣和过于笨重的竹木简,成为最普通的书写材料。造纸手工业由此发展起来。

手工业的其他部门,如漆器业、陶瓷业,东汉时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漆器以益州、蜀郡、广汉郡的产品最为有名。两地工官监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的手工艺品。当时漆器生产作坊中分工十分细密,有素工、髹工、上工、漆工、画工、清工等,他们各自掌握一道工序,需要经过所有工序才能完成一件漆器产品。东汉时瓷器的烧制温度有所提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已经十分接近后代的青瓷。

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东汉时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西汉后期以来,豪强地主、官僚地主经商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除建立田庄,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外,也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东汉末人仲长统就曾说他们"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当时高利贷资本也很活跃,桓谭说,富商大贾很多都放高利贷,中产家

庭的子弟帮助他们经营,就像奴仆一样勤劳,他们的收入相当于封国国君的税收额。北方的许多城市,商业都很发达,其中最大的城市是洛阳和宛(今河南南阳)。此外,内地与西域及边疆其他地区的商业贸易也很频繁,“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时,长江流域、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太湖、钱塘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

(李　泉)

参考资料:

《后汉书》:《光武帝纪》、《刘隆列传》、《刘般列传》

《全后汉文》卷四十七崔寔《四民月令》

桓谭不信谶纬

谶是用诡秘的隐语向人们暗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宗教预言。这种古老的迷信在春秋时期便产生了。《史记·赵世家》说秦穆公在梦中见到了上帝，上帝告诉他晋国将发生大乱，五世不安，其后代将要称霸，“秦谶”自此产生。秦始皇时出现了许多这样的谶语，如“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陈胜起义时鱼腹丹书“陈胜王”，都是人们假借神的名义发出的预言。这些谶语用文字记录下来，被称作谶记，谶记有的附有图画，称作图谶；为了显示图谶的神秘性，往往作一些特殊的装饰，或者染成一种特殊的颜色，所以又称作符箓或符命。纬对经而言，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作出的解释。纬书是在儒家经典神圣化以后才产生的，比谶晚得多，据史籍记载看，大概不早于成帝年间。纬与谶原不是一回事，但当谶、纬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时，二者则合为一流，无法区别了。

谶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西汉哀帝、平帝之际，它是西汉神学经学的分支与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它完全继承了董仲舒所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董仲舒以神学解释经义，符命和灾异是其神学思想的两大支柱。一方面，他用符命为天赋王权、君权神授提供神学依据，从而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维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他又把灾异作为批评朝政的掩饰，防止君主拒谏饰非，任意妄为。董仲舒企图用这种理论调和专制政体内部的各种矛盾，以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平

衡。汉武帝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灾异乃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大臣以此批评朝政，皇帝以此责难公卿。解释灾异要靠神学的预言，谶记由此而获得发展的契机。以个人名义解释灾异、制作预言要冒很大风险，因为预言一旦不能应验，就会给敌对的方面留下口实把柄，引来杀身之祸。聪明的神学家们便依傍经典、托名圣人，以孔子或上帝的名义宣传谶语。于是纬书应运而生，谶纬成为一物。哀平之际，社会矛盾加深，西汉政权病人膏肓。社会各个阶层均因看不到政治出路而骚动不安，人们纷纷进行乞求神灵、制造预言的神学活动，用宗教迷信活动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愿望。许多儒生背离正统经学，转而造谶纬，借经说谶，借谶言政，这便助长了谶纬神学的发展。谶纬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后，便不再像解释灾异的经学家那样引经据典，含蓄隐讳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是以更加世俗、离奇的形式，直接利用神的名义发表政见，因而它容易借助社会舆论，起到宣传鼓动作用。

西汉末年的纬书中，指斥“人主自恣”、“后党擅权”、“女谒乱公”、“佞臣持位”的言论比比皆是，并且直言不讳地预言：“汉历中衰”，天下大乱，西汉政权面临末日。人们对西汉政权普遍失去信心，纷纷翘首等待社会变动。这样的社会潮流终于将王莽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列。他不再像汉哀帝那样受这股潮流的左右，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符命，使之成为篡夺政权的工具。平帝元始元年(公元 3 年)，他讽喻益州官吏，令塞外蛮夷贡献白雉，结果被封为安汉公。元始四年(公元 6 年)，他便公开征召擅长图谶的人到都城，将谶纬钦定为官方学问，给以合法的地位。第二年有人献一块白石头，说是掘井时挖出来的，上有丹书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从此符命大兴。居摄三年(公元 8 年)，宗室刘京上书说：有人做梦见到天公的使者，告说“摄皇帝当为真”；梓潼人哀章造作铜匮，里面放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王莽在紧锣密鼓的符命声中，一步步向政权最高层迈进，最终登上了皇帝的

宝座。他即位后的第一年便派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布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主要内容是说王莽当取代汉家而有天下。

王莽编造符命篡夺刘家政权的做法给了他手下的大小政治家们以启示，他们亦如法炮制，以编造符命为手段，捞取一官半职。符命不能帮助王莽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不久他的统治发生了比西汉后期更加严重的危机，于是预言王莽垮台的谶语应运而生，更有人领悟了这样的道理："既然王莽可以编造符命篡权，我为什么不可以编造符命取代王莽呢?"刘秀便是最早领悟这个道理的人。《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就是说，刘秀继承了汉代火德的正统，应该在汉朝经历了二百八十年的时候成为天下之主。虽然刘秀并非单靠着符命的力量夺得政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关于符命的种种说法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拼命抢夺的旗帜，是争取舆论、俘虏群众的最廉价、最有成效的工具，所以刘秀决不肯轻易放弃它。刘秀即位后，马上"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来又令尹敏负责校订图谶，清除其中为王莽政权制造舆论的成份，保留下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从哲学的角度审视，谶纬比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更为粗糙、荒诞，更加缺乏理性思维的因素，使神学向着世俗疏略的方向发展了一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谶纬很容易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他们谋求权利的工具，加剧社会危机，破坏社会秩序。所以，在两汉之际谶纬神学风靡一时的时候，也有些进步的思想家、有见识的政治家对它提出非议，乃至严厉的批评。例如刘秀让尹敏校订图谶时，尹敏就说："谶书并非圣人所作，其中很多错字别字，类似于世俗之辞，恐怕会贻误后生。"郑兴坚持正宗儒学传统，以经书说灾异。光武曾因郊祀之事问他说："我要以图谶行事，如何?"郑兴说："臣不读图谶。"光武道："你不读图谶，肯定以为图谶是错的?"郑兴见势头不好，诚惶诚恐地说："臣有很多书没读，并不非议图谶。"光武的怒气这才稍稍消了些，但以后郑兴仍是我行我

素，谈论政事，引经据典，文章温文尔雅，从不援引图谶。与尹敏、郑兴生于同一时代，公开对图谶提出非议、批评的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桓谭。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柏山）人，大约生于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前后，卒于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他的父亲在成帝时做太乐令，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汉政府规定，高中级官吏任期满三年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作任子。桓谭在很年轻时便由此途做了郎官。他博学多识，遍习五经，注重理解文章要旨，而不像当时的经学博士那样逐章逐句对经文进行繁琐的解释。他文章写得好，特别爱好古文经，多次找刘歆、扬雄讨论经文疑义。他喜欢音乐、歌舞，最善于鼓琴。他不讲究服饰穿着，常戏弄批评庸俗的儒生，因而常受他们排挤、诋毁。到了哀帝、平帝之际，桓谭仍做位低秩微的郎官。哀帝傅皇后的父亲傅晏和桓谭很要好，桓谭告诫他应遣散宾客，务求谦和。傅晏听从桓谭的话，果真避免了不测之祸。大司马董贤听说桓谭有才能，想和他结交，桓谭先写书信给他，告之辅国保身之术，董贤不能采纳，桓谭便不和他往来。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天下的读书人，无不争着颂扬王莽的"美德"，制造符命讨好王莽，以求升官，只有桓谭严守道义，默然无言。王莽不肯重用他，只让他做了个掌乐大夫。更始政权据长安时，他被任为太中大夫。

东汉政权建立后，刘秀召他来朝，准备录用，但他的上疏不合刘秀的口味，所以没有被授予官职；后得大司空宋弘推荐，被任命为议郎给事中。桓谭借此职位上书刘秀，指陈时政。他提出三点建议：其一，选拔贤才，任而不疑。他说："国家的兴衰，全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又决定于辅佐。辅佐贤明，则才智之士充满朝廷，制定的政策便合乎实际。辅佐庸劣，其议论必定不合时宜，办事也会过错百出。每个国君都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不少人政治不上轨道，原因就在于对贤才的态度不一样。"桓谭举楚庄王与孙叔敖的对答为

例,借孙叔敖之口说:"有的君主骄慢士人,说士人离开我就不能富贵;有的士人则骄慢君主,说国家离开我就难安定生存。有的君主直到失去国家还不明白,有的士人虽饥寒仍不上进。君臣不合,国家大计就难确定。"桓谭提出应根据社会风俗行施教化,根据以前的过失确定防范的对策,威德兼施,文武并用,这样就可治理好国家。其二,严格刑罚,划一法度。他说:"任何刑法禁条,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奸诈的行为,不可能合乎所有人的意愿,只要对国家的好处大些就可以了,只有诛杀恶人,才能造福于好人。对于那些经官府处理后而又私自报仇者,严加惩处,社会便可安定。可以组织那些明习法律的人,修定律条,统一法度,颁布于全国,这样就不会有人滥施刑罚,造成冤狱了。"其三,重农抑商,使人们致力于农业生产。刘秀看了桓谭的上书,没加理会。

当时刘秀正迷信图谶,遇到疑难问题往往靠图谶解决。桓谭再次上疏说:"一般人都忽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而重视奇说异闻。我看古代圣王的记述,都是以仁义正道为根本,没有虚妄怪诞的事情,关于天道和性命,孔子认为很难讲清楚,平时很少谈论,所以就连他的高足子贡等,都没有听到孔子讲这方面的道理。而后代那些知识浅薄的儒生,又怎么能通晓这方面的道理呢?如今那些卖弄小聪明的人,搞方技术数的人,对于经书任意增饰发挥,假托圣人之名制作谶记,用来欺骗迷惑那些有贪心邪念的人,就连君主也受他们的牵连而犯错误。对于这种神学迷信怎么能够不贬斥抛弃呢?我听说陛下您曾毫不留情地驳斥方士们声言以丹砂变作金银的骗术,那是何等英明!而今却听信采纳谶记,又是多么不明白!谶记所言之事虽然有时候能与事实相合,那就如占卜一样,只是偶尔言中罢了。陛下您应该听听别人的议论,拿出自己的意见,摒弃那群小人的谬说,阐述《五经》的正理,不去理会那些人云亦云的庸俗的谶语。"此外桓谭还建议刘秀轻爵重赏,招贤纳士,尽快使天下平定。刘秀看了他的奏疏,更加不高兴。

后来刘秀下达诏令，让群臣到灵台议事。刘秀对桓谭说："我想以图谶裁决此事，你看怎么样？"桓谭沉默了好久才说："我没读过谶记。"刘秀问其原因，桓谭又极力批评图谶不合于经典。刘秀大怒说："桓谭诋毁圣人，目无王法，拖下去把他杀头示众！"桓谭吓得不住地磕头，额上鲜血直流。过了很久，刘秀才消了气，下令将桓谭贬为六安郡丞。

桓谭经常写文章论说当世之事，集合在一起共二十九篇，题书名曰《新论》。他把书献给刘秀，刘秀大为称赞，据章怀太子李贤说，《新论》的篇名是：一《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徵》，六《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其中除《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为一篇以外，其余皆分为上、下篇。据说《琴道》篇桓谭只写了开头的一章，汉明帝让班固续补成篇。《新论》大约亡佚于唐末或两宋之交，今有清人严可均、孙冯翼等不同辑本流行于世。

在《新论》中，桓谭称颂王霸政治，认为"王道纯粹"，"霸道驳杂"，二者都是好政治。能否实现王霸之治，关键在于君主是否善于"择人"，若像王莽那样但以"世姓"选择将帅，则必定会失败。若能起用"贤智人才"，国家自然会兴盛起来。他提出的治国方略是：先消除人民的祸患，使他们丰衣足食，然后教以礼仪、威以刑诛，这是西汉以来王霸相杂的传统的治国方法。在认识论方面，《新论》提出判定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于"考验"，人的认识要达到神、巧的程度，必须通过实习操作。在这里明显地透露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因素。《新论》中反对鬼神迷信、谶纬神学的思想也很突出。

他首先揭出谶纬的老底，指出谶记出自《河图》、《洛书》，有时出现一些不常见的预兆迹象，人们无法解释，于是就有人妄加猜度，写成谶记，而且托名是孔丘所作，这真是荒谬之至。而后他又用事实说明玩弄符命不过是自欺欺人。他说："王莽好卜筮，迷信鬼

神，用于祭祀的费用难以计数。但他不好好治理国家，因而天下大乱。等到四处兵起，无法自救，乃跑到南郊祷告，捶胸大哭，请求皇天保佑，大兵攻入宫中，他逃到渐台下，还抱着符命书，拿着威斗，真正是糊涂到极点了。”他指出王莽失败的原因在于“为政不善”，符命根本救不了他的命。

从上述观点出发，桓谭在《新论》中进一步对灾异鬼神迷信提出批评。他说：“灾异变怪这些现象常常出现，世世代代都是一样。如果出现在明君、贤臣、智士、仁人当政的时候，他们通过改善政治，便可消除灾害。相反，在衰乱之世，君臣骄淫失政，一般人也多有邪心恶行，违背天道，这样便无法消除灾异了。”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认为只要推行善政德治，神妖都无能为力。这就削弱了天鬼的权威，动摇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进一步对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提出批评，说世上并没有什么仙道，所谓仙道不过是那些好奇的人假造的。他说：“圣人从来不讲养性成仙，现在一般的人却想长生不老，真正是糊涂到底了。”他认为，人与植物、动物一样，有出生就有生长，有生长就有衰老，有衰老就有死亡，这就像四时代谢一样。搞歪门邪道，想改变这个规律，那是徒劳无益的。刘子骏相信方士的话，认为人若能闭目塞听，抑制嗜欲，便可长生不老。桓谭指着院中一棵枯老的大树说：“那大树无耳目，也没情欲，但最后还是枯朽了，人又怎么能靠抑制情欲而避免衰老呢？”在桓谭看来，明智的人不会相信神仙方术的谬说，只有愚妄的人才相信长生不老的谎言。

在此基础上，桓谭进一步论证了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他说：“人的精神依赖于形体，这就像火依赖于点燃的蜡烛一样，蜡烛燃完了，火也不能单独存在于虚空中。蜡烛点燃而有烛火，但火种并不能使蜡烛灰烬复燃；人老形体枯槁，精神也不能使之泽润。人死之后，精神形体都不复存在，如同火、烛俱尽一样。”桓谭比较客观地论证了精神与形体的关系，批评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

的唯心主义观点，因而他反对神仙方术的斗争带有一般反对宗教迷信的意义。他突破了前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用精气解释精神现象的局限，对于东汉初年著名思想家王充产生了影响。当然桓谭的形神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他认识到精神与人的生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没有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他用烛火关系说明精神与生命的关系，虽然直观形象，但这种简单类比的方法并没有揭示精神与生命关系的本质，不能说明精神乃是人的一种属性。这样的简单类比给有神论者提供了可乘之隙。到了南北朝时，南朝和尚僧祐便借助桓谭的譬喻作神不灭论的宣传，说既然人的精神与形体的关系犹如火与薪的关系，薪燃尽后火可以传至另一薪上，那么人的精神、灵魂亦可在一个躯体死亡后传到另一个躯体上。虽然僧祐的说法是对桓谭学说的曲解，但从此可以看出用薪火关系比喻形神关系是不甚恰当的。

建武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桓谭被贬为六安郡丞，他心中郁郁不乐，还没有走到六安郡，半道上就病死了，时年七十余岁。他一生除著有《新论》二十九篇，还著有赋、诔、书、奏，共二十六篇。后来，这些文章大都亡佚了。元和年间，汉章帝到东方巡观，到达沛地后，专门令使者祭祀桓谭的坟墓，当地人都引以为荣。

王充评论桓谭及其《新论》说："《新论》讨论世间之事，分辨是非，揭露虚妄之言，伪饰之词，无不证据凿凿，可为定论。和司马迁、扬雄相比，桓谭应在他们之上。"他认为《新论》褒扬善良，贬斥邪恶，就意义看，与《春秋》同为一类。

桓谭去世的第二年，光武帝刘秀也寿终正寝了。嗣后，明帝令东平王苍正定《五经》章句，而以谶为依据，章帝根据《河图会昌符》的说法，令曹褒撰次礼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由于君主的提倡，谶纬成为风靡一时的学问，发展到极盛时期，《后汉书·张衡列传》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明帝）、肃宗（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东汉前期的三位帝王之所

以这样大力扶植谶纬迷信，无非是想让它成为正宗神学，如同当初董仲舒学说那样，起到稳定汉家统治的作用。在两汉之际社会动乱的年代里，谶纬符命曾经充当过刘秀招揽群众、夺取政权的工具和旗帜，但是东汉社会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以后，谶纬不仅不能稳定社会统治秩序，反而会给当政者带来不少麻烦与混乱，成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破坏社会秩序的手段。比如尹敏趁受命校正图谶的机会，编了一条“君无口，为汉辅”的谶语混入纬书中，希望借此而升官。当年起兵反对王莽时，刘秀曾经接受过李通“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但这一次他却不能再接受尹敏的谶语了，因为这样做势必蹈王莽的覆辙，导致吏治混乱。明帝时楚王英作符瑞、造图谶，明帝即认为其图谋不轨而予以严厉镇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意识到，董仲舒宣扬的伦理纲常，对稳定统治有益无害；而谶纬则不是这样，它既能成事，也可败事。因而他们一面大力宣传谶纬，一面对其严格控制，不让它成为政治野心家蛊惑人心的手段。这样一来，谁也不敢任意编造符命、灾异反对现存政权，只能用谶纬和五经比附来为现存政权服务了。既然文人、政客们不能靠符命、谶记获得实际的利益，那他们宣传谶纬的热情也便渐渐消逝。当时人心思定，没有人再想编造一条符命宣扬汉历中衰，也没有人想编一条符命让社会再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动乱，因而谶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衡对谶纬迷信进行大胆的抨击，并提出了禁绝图谶的建议。

张衡生于建初三年（公元 78 年），卒于永和四年（公元 139 年），是东汉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以为图谶虚妄，不合圣人之法，于是上疏顺帝说：“事前发出预言，事后求得应验，有些聪明人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谶书。谶书刚刚产生的时候，很少有人去理会它，汉取代秦，靠的是兵力强盛，当时并没有人宣扬图谶。后来像夏侯胜、眭孟等人，虽然是以道术而成名，但他们的著述中，并没有一句谶言。刘向父子负责校订秘府之

书，将其分作九流，也没有发现谶纬之书。到了成帝、哀帝以后，方有谶纬之书出现。这些书或与经书、史事不合，或自相矛盾，比如《尚书》说尧使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成功，尧乃诛杀鲧，而用禹治水，但《春秋谶》却说'共工治水'。一般谶书都说黄帝伐蚩尤，而《诗谶》却说'蚩尤战败，而后尧受命'。《春秋元命苞》中竟然有战国时人公输班、墨翟，又提到汉朝时才设置的益州。一卷书中自相矛盾的事有好几件，圣人的著作不会是这样子，这肯定是那些虚伪之徒为欺惑世人、捞取好处而杜撰的。以前侍中贾逵曾从谶书中摘出互相矛盾的事三十多件，那些谈论谶书的人都无法解释。王莽篡位，为汉之大祸，但河洛、六艺之书为什么不预先提醒人们加以戒备？因为六艺等书已写成定本，无法篡改，后来人只好附会六艺，制作谶记，这类图谶的产生不会早于哀平之际。永元年间清河人宋景用历纪预言水灾，假称见自'玉版'，后来他丢弃家业，躲入山林，可这话始终没应验，他没了办法，只好拿前代已成之事，作为验证。可是像永建（顺帝）废而复立之事，却不能先知。这种人明明是欺世盗名，以求势位，但政府却不加禁止与追究。"张衡对谶纬迷信的产生原因、发展历史、社会危害作了揭露说明以后，乃提出建议，把所有图谶之书都收藏起来，加以禁绝，以剔除典籍之瑕玷，堙塞投机人仕之路。

章帝以后的政府虽然没有明令禁绝图谶，但君主不再肆意抬高谶纬的社会地位，臣下也无人靠宣传、制作图谶人仕升官，谶纬干预现实政治的属性消失了；与正宗经学亦渐渐离异，成为儒生、方士们附带传习的学问。如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景鸾少学经书，治《诗》、《易》，"兼受河洛图谶"；任安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研究、传习图谶的人已不再是那些热衷政治、贪图势位的人，而是山林隐士一流人物，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的"绝志世外"的廖扶，"隐于壶山之阳"的樊英，"依林阻为室，独宿无侣"的公沙穆，都是稳居的方士兼谶纬专家。他们不是像两汉之际的人

那样用谶纬影射政治，干预政治，而只是用来预卜个人吉凶。这标志着作为社会思潮的谶纬迷信已经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李　泉）

参考资料：

《后汉书》：《桓谭列传》、《张衡列传》

桓谭《新论》

班超出使西域

汉武帝时，西域内附，那里共有三十六个小国，汉武帝设置使者、校尉统领监护之。汉宣帝时改置都护，元帝时又增设戊己校尉二人，屯田于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东）。哀帝、平帝时，西域分裂为五十五个小国。王莽称帝，与匈奴关系恶化，西域也随之瓦解，与新朝断绝关系而归附于匈奴。匈奴贵族在西域横征暴敛，西域各国不堪忍受，到刘秀称帝以后，纷纷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并敦请刘秀派都护统领各国。当时中原各地尚不十分安定，刘秀顾不上考虑域外之事，所以没有答应。西域各国乃互相攻击。在今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以北的地区，鄯善兼并了小宛、精绝、戎庐、且末诸国，于阗则占据了渠勒、皮山之地。准噶尔盆地以南的车师国也灭掉了周围的一些小国。以后这些小国又纷纷自立。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蒙古草原大旱，匈奴发生内乱，后来一部分匈奴人南迁归附东汉，是为南匈奴；一部分匈奴人向西北迁徙，是为北匈奴。北匈奴占据天山以北的草原和天山以南的沙漠田，玉门关以外的地区，都是北匈奴的天下。汉明帝即位之初，匈奴胁迫西域诸国寇掠凉州的河西各郡县，焚烧边邑，杀掠甚众，乃至于河西边邑大白天都不敢打开城门。后来，东汉政府想打开通往中亚的商路，决心从天山南北驱逐匈奴势力。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奉命统帅大军进击匈奴，占领伊吾庐，设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同时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的势力。车师内附于汉，天山东麓之匈奴势力一扫而光。伊吾庐乃通过吐鲁番进人天山南麓的西域北道

的钥匙，东汉政府在这里建立起军事据点，迈出了进入西域地区的第一步。不久于阗等国即派王子来洛阳入侍汉帝，西域与内地断绝关系六十五年后，重新互通往来。东汉政府知道，单纯的军事进攻，虽可以击败匈奴，但却无法控制广大的西域地区。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采取政治的怀柔手段，派遣使节，加强政治渗透。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奉命出使西域。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班彪之子，班固之弟，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 32 年），卒于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班超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虽不拘于小节，但却很能干事，在家常干那些最重最苦的活，而从没有什么怨言。他口才很好，善于辩论，涉猎书传，最喜欢读《公羊春秋》。永平五年（公元 62 年），有人告发班固私改国史，班超奔赴京城，上书给明帝，为兄辩冤。明帝看过班固写作的《汉书》后，赏识他的才学，召他到京师，授以校书郎官职。于是班超和母亲一起，跟随哥哥来到洛阳。因为家中贫穷，班超不得不靠为官府抄书来维持家庭生计。这项工作很艰苦，有一天，班超停止工作，把笔扔到一边，叹道："大丈夫没有其他志向谋略，尚且想效仿傅介子、张骞，在外域立功，以取封侯，怎么能常常劳顿于笔砚之间呢？"周围的人都笑他，班超说："小子怎么能知道壮士的志向呢？"后来有一个善于相面的人对班超说："其他人都不过是些布衣儒生，只有你当封侯于万里之外。"这更增加了他立功外域的决心。时间长了，明帝问班固："你的弟弟在干什么？"班固说他在为官府写书，以奉养老母。明帝乃任用班超为兰台令史，后来又因犯了错误而免官。

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窦固出击匈奴，任命班超为代理司马，带领一支人马攻击伊吾，战于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大胜而归。窦固认为他很有才能，推荐他与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他们首先到达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鄯善王广对他们很有礼貌，但后来忽然懈怠了。班超对手下的人说："你们感觉到鄯

善王对咱们的态度改变了吗?这一定是因为匈奴的使节来了,他心中犹豫,不知道服从谁好。"班超把侍候他们的鄯善人找来,诈他说:"匈奴使者已来了几天,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那人很害怕,把实情告诉了他。班超把那人囚禁起来,把自己手下的三十六人全都叫到眼前,和他们一起吃酒;酒吃得差不多了,乃激发他们说:"咱们来到西域,为的是立大功,求富贵,现在匈奴使者刚来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如果鄯善人押送我们到匈奴,恐怕我们的尸体要喂豺狼了!大家看该怎么办?"他手下的人都说:"在这危险的地方,是死是生听您安排。"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趁天黑放火进攻敌人,敌人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必定害怕,咱们可乘机全部消灭他们,鄯善王也会被吓住,这样咱们就成功了。"众人都说:"和从事商量商量吧!"班超发火说:"是死是活在此一举,从事乃文俗之吏,听说后必定害怕,一旦泄密,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众人说:"好,就听你的!"待到初夜时分,班超便带着吏士奔赴敌营。正赶上刮大风,班超令十人带着鼓藏在敌营后边,让他们看见火光,便鸣鼓大呼。其余的人都拿着刀枪弓箭埋伏在敌营门两边。班超顺风放火,前后呼叫,匈奴人惊慌地乱逃,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吏士们杀匈奴使者随从三十余人,其余的百余人全被烧死。

第二天班超把这事告诉郭恂,郭恂很吃惊,接着就变了脸色。班超知道他的意思,举起手说:"您虽然没有参与,但我不会把功劳归于自己。"郭恂这才高兴起来。班超于是召鄯善王来,将匈奴使者首级给他看。整个国家的人都为之震惊。班超开导抚慰他们,并将王子作为人质带到洛阳,窦固见了很高兴,举奏班超的功劳,并请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佩服班超的胆识,对窦固说:"有班超这样的勇士,哪里还用另选别人?现在就任命他为司马,让他继续立功。"班超再次奉命出使西域,窦固想给他增加兵士,班超说:"我带领那三十多个人就够了,如果事情不顺利,多了反而是累赘。"

当时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国王广德刚攻破莎车国(今新疆莎车一带),称雄于天山南道,匈奴则派遣使者监护其国。班超第二次出使西域,先到达于阗。广德对他们不大理睬。他很信神巫,神巫说:"天神正为您接纳汉使而发怒,您须赶快取汉使的宝马献给我。"广德派人向班超要马,班超知道了内情,就假装答应他,让神巫自己来取。不一会神巫赶来,班超将其头砍下送给广德。广德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诛杀匈奴使者的事,十分惶恐,于是杀死匈奴来使,向班超投降。班超赏给他大量财物,用好话安抚他们。

当时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国王建乃匈奴人所立,他倚仗匈奴人的势力,占据天山北道攻破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杀死国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第二年春天,班超抄小路来到疏勒,在离兜题居住的槃橐城九十里的地方住下来,派吏士田虑前去降服他,说:"兜题不是疏勒人,这里人一定不听从他的命令,他若不肯投降,便捉住他。"田虑去见兜题,兜题瞧不起田虑,没有投降的意思,田虑乘其不备,前去劫持兜题,将他捆起来,兜题的侍从都吓跑了。班超闻讯赶来,召集疏勒将士吏卒,诉说龟兹的罪状,另立疏勒原国王哥哥的儿子忠为王,疏勒人很高兴。从此疏勒和龟兹结下了怨仇。

明帝见西域几个大国归附汉朝,乃设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当时以陈睦为都护,耿忠为戊校尉,屯田于车师后部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关宠为己校尉,屯田于车师前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西南),屯田的兵士各有数百人。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匈奴动员两万多骑兵,反攻车师后部,七月,围耿忠于疏勒城。八月,明帝驾崩。不久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龟兹便乘汉朝办理丧事之机,攻杀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及其吏卒。而匈奴车师亦围攻戊己校尉。自此,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完全被匈奴人摧毁。班超孤立无援,乃据守槃橐城达一年多时间。章帝即位后,派酒泉太守段彭击破车师、匈奴,迎还戊校尉耿忠,宣布罢戊己校尉,亦不再派遣都护,且

下令让班超撤回。

班超准备回国，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说："汉使抛弃我们，我们必定再次为龟兹所灭，实在不忍心看着汉使离去！"说完抽刀自杀。班超行至于阗，于阗国王侯以下皆号哭说："我们依赖汉使像依赖父母，你们可不能走啊！"很多人拥上前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他行走。班超怕真的走不了，又很想实现原来的志向，于是返回到疏勒。疏勒自班超走后，已有两城投降龟兹。班超捕斩反叛者，疏勒重新安定下来。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下令撤回伊吾屯田的兵士，班超留住于阗，安抚诸国，而伊吾之地重新为匈奴人占据。

这时，匈奴人完全控制了天山北道诸国。南道诸国虽仍归属东汉，但通往中原的道路已被匈奴人截断。而且南道的于阗和疏勒之间，还有一个莎车。这样，匈奴在塔里木盆地已明显占据优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班超打算首先清除其根据地附近匈奴人的势力，以便站稳脚跟；然后征服梗阻南道交通的莎车，由西向东打通南道；最后以南道诸国的人力物力，消灭北道诸国的匈奴势力，从而实现对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全面统治。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之兵一万人攻破姑墨国石城（新疆温宿西）。姑墨国隶属于龟兹，是匈奴在北道最西的一个据点，其地接近南道的疏勒。消灭姑墨，便解除了匈奴对南道诸国的威胁，第一步计划完成之后，班超便想乘势攻击莎车，平定诸国。他上疏章帝请求增加兵力，说如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皆愿意归附，欲并力攻破龟兹，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仅为百分之一耳。他说："我在西域已历五年，很了解这里的情况，莎车、疏勒土地肥广，牧草丰盛，不用费中国的兵粮。这里人都愿归附汉朝，以夷狄攻夷狄即可。"他分析了种种有利条件，请求章帝准许发兵。章帝看了班超的奏疏，表示赞同。平陵人徐干与班超有共同的志向，乃上疏愿前往帮助班超。建初五年（公元80年），章帝令徐干为代理司马，率千人赶赴西域。

在此以前，莎车以为班超人少势弱，无法奈何它，公开归附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徐干带人赶到后，班超乃率领他们击败番辰，斩首千余级。此后班超又上书章帝，建议安抚乌孙，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建初八年(公元83年)，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卫侯李邑护迎乌孙使者，赐给乌孙大小首领很多锦帛。李邑到于阗后，正赶上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继续前进，于是上书章帝，说西域不可征服，又诋毁班超，说他拥爱妻、抱爱子，在外享受安乐，无忧国之心。班超闻之，叹息良久，乃送走妻子。章帝知道班超忠诚，乃严厉责备李邑说："若班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为什么都与他同心协力?"下令李邑到班超手下，听从调用，并通知班超，若李邑适于在外做事，就把他留在你手下。班超没有这样做，而是派李邑带领乌孙王子返回京城。徐干劝他说："李邑诋毁你，你不该放他回去。"班超说："问心无愧，哪怕别人说坏话? 贪图个人快意留下他，还算什么忠臣?"

次年，朝廷派和恭等人率八百兵士增援班超，这样班超手下共有汉兵一千八百人，展开了征服塔里木盆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他首先调发疏勒、于阗之兵，从东西两面进攻莎车。莎车自知不敌，乃暗中贿赂疏勒王忠。忠反叛，占居乌即城，班超另立一疏勒王，率兵攻忠。忠求救于康居，康居派兵来援。班超率兵与康居人相持半年难以取胜。班超乃派人送大量财物给月氏王，令月氏王劝康居退兵。康居兵退，班超很快攻下乌即城，把忠带回疏勒王城。过了三年，忠又与康居、龟兹勾结，密谋反判，派人到班超那里诈降，班超假装答应他，忠大喜，轻骑去见班超。班超即于酒席上缚忠而斩之，乘势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于是天山南道重新开通。

第二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兵二万五千人再次进攻莎车，而龟兹王则调发附近温宿、姑墨、尉头诸国之兵五万人救援莎车。班超把将校和于阗王召来商量说："如今我们兵少难以抵抗，只好撤兵，晚间鸣鼓为号，各奔东西。"他故意把俘虏的龟兹人放走，让他们将

消息传给龟兹王。龟兹王闻之大喜，亲率大军，分东西两路埋伏，班超秘密召集各部军队，鸡叫时驰赴莎车军营，莎车兵惊惶奔逃，班超率军追赶，杀五千余人，获得大量马匹财物，莎车投降，龟兹亦不敢来犯。从此班超威震西域。

莎车既定，南道于是开通，但北道的龟兹、焉耆二国仍倚匈奴为后盾，不肯归附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率兵北征匈奴，六月间，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铭功，凯旋而还。次年五月，窦宪又派阎槃率两千骑兵，击溃游牧于天山东麓的匈奴人，取得伊吾之地，匈奴人对西域的威胁得以解除。这时葱岭以西的月氏国，欲乘东汉与匈奴大战之机，染指塔里木盆地。在此以前，月氏因助汉军攻车师有功，请求娶汉公主，班超拒绝，遣还其使者，月氏王由此怨恨班超，派其副王谢率兵七万，浩浩荡荡越过葱岭，企图与北道诸国联合消灭班超的势力，取代班超在塔里木盆地统治。班超人少，兵士们都很害怕。班超说："月氏人跋涉数千里翻越葱岭而来，无法运输军需，我们只要收割完谷物，坚守城池，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因饥饿而投降。"不久，月氏人果然乏粮。班超断定他们必向龟兹求救，就派几万兵士预作埋伏。一天月氏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去龟兹国，汉兵突然出击，将他们全部杀死。月氏副王谢大惊，忙派人向班超请罪，请求放他们活着回国。班超答应了他的请求。月氏国大受震动，从此年年贡献财物。

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窦宪又派耿夔出居延塞，进军五千里，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俘虏北单于母及名王以下四千余人，从此北匈奴继续向西迁徙，到达里海、黑海之北，与以前西迁的匈奴人合流，蒙古高原遂为鲜卑人所占领。北道龟兹、姑墨、温宿等国没有匈奴人作靠山，纷纷投降东汉。和帝任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徐干为长史，屯驻疏勒；另外重新设置戊己校尉，率兵五百人驻车师前部，置戊部侯居车师后部。这时西域之地除焉耆、尉犁、危须三国因为以前曾攻杀西域

都护陈睦而心怀二意，其余各国均已归附。

永元六年（公元 94 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及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大军到达尉犁国界，即派使者告诉焉耆、尉犁、危须的国君说："都护来此，是想镇抚三国。你们要想改过自新的话就应当派首领来迎接。等赏赐王侯以后，我们便回去。"焉耆王广派左将北鞬支迎接班超。班超指责北鞬支说："你虽是匈奴人，但国家大权掌握在你手里，都护到来，国王不及时来迎，都是你的罪过。"有人建议班超杀了他。班超说："此人权大，今尚未进入其国而先杀了他，彼国必然设防，怎么能到达他城下？"于是放他回去。焉耆王广乃与众首领一起到尉犁国进见班超，奉献珍物。焉耆国有苇桥，很险要，广令拆去它，阻止汉军入国。班超从其他道路渡过，七月间来到离焉耆国都二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广大惊，想令其国之人全都退到山中抵抗。焉耆国左侯元孟曾经到过洛阳，乃偷偷派使者把这件事告诉班超，超即斩使者，表示不相信。班超约定日期，大会诸国国王，声言给以重赏。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北鞬支等三十多人如期到来，焉耆国国相腹久等人则逃亡到秦海（今博斯腾湖）中去了，须危王也没有前来。班超怒斥广等，令军士缚广、汎而斩之，又下令军士抄掠、杀死焉耆人五千多，俘获一万五千多人，得牲畜三十多万头，立元孟为焉耆王。班超留住半年，抚慰焉耆等国人。

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班超第一次出使西域，到和帝永元六年（公元 94 年）平定焉耆，其间共经历了二十二年时间。经过二十二年出生入死的战斗，班超最终完成了一统西域的宏愿，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归附汉朝。永元七年（公元 95 年），和帝下达诏书说："以前匈奴占据西域，寇掠黄河以西，永平末年，城门昼闭。后来虽派将士出征，但焉耆等国仍不顺从。班超到达那里，出入二十二年，诸国全都归附。不用中国的将士、财力，使得远方之国归心，为以前死去的将士报了仇，以功行赏，封班超为定远侯，食用一千

户人家的租税。”

自征服天山南北以后，东汉的政治势力继续向西扩展，不久便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与安息(今伊朗一带)发生了外交接触。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其属吏甘英为聘问大秦(罗马)的使节。甘英一行到达了条支，来到波斯湾海岸边。甘英欲渡海前往，安息西界的船人对他说：“海面太宽，往来者赶上顺风要三个月才能渡过，若赶上逆风，就得行两年。所以入海的人都带三年的粮食，结果有不少人死在海上。”甘英无奈，只好折回。船人的话显然是无稽之谈。据说，大秦国王早就想和汉朝通使往来，但安息人怕大秦与汉直接往来，影响他们向大秦出售汉朝的丝织物，所以千方百计阻止双方的使节通过此地。甘英一行虽然没有到达大秦，但他是第一个出现在波斯湾的中国外交使臣，对于开辟中西交通路线是有贡献的。

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患病，颇思念故土。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他上书和帝，请求回国，疏中写道：“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可谓英雄垂暮之语。他的妹妹班昭也上疏说班超年老多病，难以再为国家效力。和帝答应他们的请求，征班超回国，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班超终于回到洛阳。班超不惑之年出使西域，在那里度过了三十一个年头，七十一岁时才返回故乡。回到洛阳后的第二个月，他便溘然长逝了。

班超获准离开西域后，由戊己校尉任尚接替他为都护。任尚见到班超，向他请教治理西域的方法。班超说：“前来西域的吏士，都不是孝子顺孙，大都是因犯罪或有过错调到边疆的，西域人也不是都和我们一心。您的性格过于严厉急躁，水太清则无大鱼，为政太苛察则下属不拥护。您应宽容简易，不要计较他们小的过错，只坚持大纲即可。”班超走后，任尚对亲信说：“我以为班君会有奇策，听他谈的都是些平常的话。”任尚担任都护不几年，西域就发生了叛乱。

汉和帝死后，西域诸国想乘机摆脱东汉的统治，乃出兵攻任尚于疏勒。东汉政府得到报告后，一面派段禧接替任尚担任都护，一面调发河西四郡羌、胡兵五千人由梁慬统帅前去增援。梁慬、段禧之兵合起来共八九千人，乃与龟兹王白霸协力保守龟兹。不久龟兹国内也发生反叛，民叛其王，与温宿、姑墨合兵，围攻龟兹城。后来龟兹民变虽然剿平，但今甘肃西南部的先零羌叛乱，切断了通往西域的大道。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及屯田吏卒全部撤回，以后的几十年里，没有再委派都护，西域摆脱东汉政府管束达十余年。

东汉政府放弃西域后，游牧于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北匈奴残余势力，又乘机占领伊吾之地，并重新奴役西域诸国，且连年人寇凉州地区诸郡。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奏明安帝，派遣长史索班率千余人，收回伊吾，招抚诸国，车师前部、鄯善皆来归降。几个月后，北匈奴与车师后部联兵攻杀索班，赶走车师前王，占据天山北道。鄯善告急，向曹宗求救，曹宗请政府出兵五千人进击匈奴，以雪索班被杀之耻，且可重新控制西域。执政的邓太后乃召集班勇等人到朝堂讨论此事。

班勇字宜僚，是班超的小儿子，他从小就有父亲的风范。安帝时西域都护及屯田吏卒撤回时，他曾以军司马之职，和哥哥班雄一起出敦煌郡，迎接他们归来。在邓太后召集的讨论会上，公卿大臣都以为经营西域费用太大，得不偿失，主张关闭玉门关，断绝与西域的联系，只有班勇主张收复西域。

班勇首先回顾了自汉武帝以来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历史，指出只有安抚西域，才可解除匈奴的威胁，保证边境安宁，而西域叛乱的原因，主要是治理西域的人失策，对当地人有所侵害。他不同意曹宗大规模出兵西域的意见，主张恢复敦煌故有屯驻军三百名，置西域副校尉，驻守敦煌。另派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屯驻楼兰（今罗布泊一带），西扼焉耆、龟兹之咽喉，南壮鄯善、于阗人之心胆，北可抵

御匈奴，东可护卫敦煌。当时，卫尉、廷尉、司隶校尉、太尉掾等许多高级官吏都反对班勇的意见，提出这样做是否可以保证匈奴不再为害边郡？西域各国使者纷纷前来求赏赐，费用不是太大了么？班勇说："中国境内置郡守县令，也不能保证无造反之人，何况外夷。设兵驻守边地，是为削弱匈奴势力，减轻危害。这虽然要耗费一些财物，但把西域之财全给匈奴人，增加他们的力量，对我们来说损失将比这要大得多。"邓太后认为班勇讲得有道理，但只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敦煌郡之屯兵，设西域副校尉居敦煌，没有派兵进驻楼兰。其后，匈奴联合车师，经常向内地侵扰，河西之地大受其害，于是关闭玉门关之议重起，班勇的意见被搁置一边。

延光二年（公元 123 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说，失去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向当政者提出三条对策：出兵三千人，从蒲类海一带出兵扫荡北匈奴残余势力，并借鄯善之兵，收复车师后部，是为上策。派军司马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新疆吐鲁番东），此为中策。收抚鄯善诸国人，徙入玉门关内，是为下策。尚书陈忠也说，若听任匈奴在西域发展势力，则河西之地必定很危险，到那时，救援河西的费用难以估算，比起经营西域的费用来，要大百倍以上。安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屯驻西域。

这年夏天，班勇率缓刑之士五百人，前往柳中屯扎。他们到达鄯善后，因鄯善王归附，大加奖赏。龟兹王犹豫一阵以后，也率领姑墨、温宿二国国王向班勇投降，班勇乃调发各国士兵万人来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收复了车师前部。

第二年，班勇又调发敦煌、张掖、酒泉三郡之兵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之兵进击车师后部，大获全胜，斩车师后部王及匈奴使者之首，送至京师。永建元年（公元 126 年），班勇派人诛斩位于车师以东的东且弥国的国王，立新王。这样，车师一带六国全部归附于汉。

这一年冬天，班勇调发诸国之兵，进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

走,其部众二万多人投降。单于从兄被俘,班勇令新立的车师后部王亲手斩之,使车师和匈奴结下仇隙。匈奴北单于亲自率万余骑入攻车师后部,班勇令假司马曹俊驰往援救。单于逃走,曹俊追击,斩其首领骨都侯。最后这股匈奴残余势力也迁徙至西方。从此车师之地再无匈奴人踪迹。当时整个塔里木盆地一带,只有焉耆未除。

永建二年(公元 127 年),班勇上书请求进攻焉耆。东汉政府派遣敦煌太守张朗带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班勇调发诸国兵四万人,分作两路,班勇从南道,张朗走北道,约定日期,到达焉耆。张朗在此以前曾犯过罪,这一次想邀功赎罪,所以在预定日期以前就到达了焉耆国境,派兵进击,俘虏焉耆两千多人。焉耆国王遣使投降,张朗入城接受投降后归来。班勇因后期到达而入狱,后卒于家中。

自此以后,西域诸国再次内附,但乌孙及葱岭以西的国家与汉朝断绝了关系。东汉的势力退出了中亚,限制于葱岭以东的地区。同时,东汉在西域亦不再设置都护,仅派遣长史,其声威远不及班超时代煊赫了。

永建六年(公元 131 年),顺帝以为伊吾之地肥沃,靠近西域,匈奴人常占据此地以寇掠河西,于是下令再次在这里屯田,置伊吾司马管理屯田事务。此后,东汉政府腐朽,国势日衰,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西域诸国失去统一的约束力,又如前代一样,放纵恣肆,相互侵伐。汉桓帝元嘉二年(公元 152 年),于阗攻杀西域长史王敬。永兴元年(公元 153 年),车师后部进攻屯田的兵营。灵帝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西域长史张景最后一次远征疏勒,无功而还。此后,东汉政府在西域的统治遂告结束。

(李　泉)

参考资料:

《后汉书》:《班超列传》、《西域列传》、《南匈奴列传》

马后抑外家

和其他朝代相比，东汉时期参与政治的皇后、皇太后最多，这些女性掌权后，大部分都重用其娘家的兄弟子侄，加强他们的权势，从而形成外戚专权。但也有参与政治时极力压抑其娘家兄弟子侄的权势者，这人就是马皇后。

马皇后是东汉开国功臣马援的女儿，明帝立为皇后，章帝时为皇太后，参与政治几十年，参政后时时注意压抑其娘家的权势。

马皇后身高七尺二寸，美发方口，知书识礼，能诵《易》经，平时好读《春秋》、《楚辞》，特别喜爱《周礼》和董仲舒的著作。光武帝时选入太子宫，能奉事阴皇后，和其他宫女也能和睦相处，对人待物礼数周到，上下和气，受到异于他人的宠爱，明帝即位，封为贵人。

明帝永平三年(公元 60 年)，有关部门上奏明帝、阴太后，请求立皇后，明帝没有说什么，阴太后说："马贵人德行为后宫之冠，就立马贵人为皇后。"

马皇后册立后，更加严肃、谦虚，好读书，平时常穿练一类的粗丝制做的衣服，衣裙也不加装饰，每逢初一、十五诸妃子、贵人、公主朝见皇后、皇太后，看见皇后衣服粗糙，以为是特别好的绮纱，走到近前一看，都不觉发笑。马皇后却说："这种丝特别适宜染色，所以我才穿他。"群臣奏事中有难以处理的事，明帝就说给皇后，试验皇后的才智，马皇后每次都分析得合情合理。但她从没有以私事干预朝政，明帝因此对皇后又宠又敬，始终不衰。

马皇后前母姐姐的女儿贾氏也选入宫中，生皇子刘炟，明帝因

马皇后没有儿子，命马皇后养育刘炟，对马皇后说："人不一定都自己生儿子，只是顾虑对别人儿子不能精心爱抚养育罢了。"马皇后对刘炟尽心抚育，操劳尽力超过自己亲生。后来刘炟被立为太子，太子对马皇后也十分孝顺，母慈子孝，感情深厚，始终没有丝毫隔阂。马皇后常以皇帝儿女不多，推荐左右宫女，唯恐他们得不到宠爱，后宫宫女有进见的，便加以安慰接纳。如果明帝对哪一位宫女有所宠爱，马皇后总是设法加深明帝与这位宫女的关系。

明帝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去世，太子刘炟即位，是为章帝，尊马皇后为皇太后。明帝去世后，马太后亲自撰写了《显宗起居注》，并把其中有关自己兄长马防参与侍奉明帝治疗疾病的事迹全部删去了，章帝知道后请求说："舅父为黄门郎，朝夕在父皇面前侍奉医药达一年之久，既没有褒奖，又不记述其辛勤劳苦之事，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马太后回答说："我不愿让后世知道先帝亲近皇后外家，所以不记述此事。"

马太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黄门郎马防、马光，在整个明帝时期没有加官进职，章帝即位，任命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马光为越骑校尉。马廖兄弟倾身下士，愿意与各种人结交，各种有身份的士人也积极接近马氏兄弟。第五伦上书章帝说："我记得《尚书》中说：'臣下作威作福，既有害于家，也是国家凶险的前兆。'近年阴光烈皇后虽然天生友爱，但仍注意抑制自己外家，不给他们权势，其后梁氏、窦氏之家都曾做过非法之事，明帝即位后，诛杀了许多人。自此以后，洛中再没有权威。书信一类的请托之事全部断绝，明帝曾告诫几家外戚说：'苦身对待士人，不如全心报国，戴盆望天，不能两相兼顾。'现在马氏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我私下听说卫尉马廖用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马防以钱百万，私下赠送三辅地区的衣冠之士，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都给予赠送；又听说腊日给在洛中的士人每人五千钱。越骑校尉马光，腊日祭祀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我认为这不符合经义，心内惶恐不敢不报告朝廷。陛下

如果因亲戚之情要厚待他们，应该根据情况安慰他们。我今天说这些话，实在是想上忠于陛下，下保全太后全家。”

建初二年(公元 77 年)夏四月，章帝想封各位舅父爵位，太后不允许。正好这个时期天大旱，有人上书认为天旱是不封外戚的缘故，有关部门要求根据旧典进行分封。太后下诏说：“凡是上书谈论此事的，都是想谄媚我以求富贵。过去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雾漫天，没有听说天降雨以相应。外戚贵盛，很少不受祸覆亡的。所以先皇帝小心防范舅氏，不让他们据枢要之位；又曾强调我的儿子不应和先帝的儿子地位相等，现在有关部门为什么要以马氏比附阴氏呢？卫尉阴兴，天下人都进行称颂，宫省的御者到他家去，走到门口，他出门迎接连鞋都来不及穿，像蘧伯玉一样敬谨。新阳侯阴就虽然刚强，做了一些有乖常理的事，但有方略，善于谈论，整个朝廷没有谁能比得上他。原鹿贞侯阴识，为人勇猛诚信。这三个人都是天下一时之选的臣僚，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马氏和阴氏相比差得太远了。我没有什么才能，昼思夜想，常担心破坏了先皇后遗下的法教，因此即使小的过失我也不放过，经常不停地进行督促改正。可是亲属仍经常犯法，治丧起坟超越制度，我没有及时发觉，是我经常的告诫没有起作用而又耳目不灵。我为天下之母，而身穿大练衣服，吃饭不敢求美味，我身边左右的人只穿布帛，也不用熏香一类的饰物，目的是以身作则，我以为外家亲戚看到后，当感念而约束自己，可是他们只是说：太后平素就好节俭。前一段经过濯龙门，见到我娘家问候起居的人，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川流不息，仓头仆人身穿绿褠，领袖正白，回头看我的驾车人，和他们相差很远。我虽然对娘家人没有谴责，但断绝了给他们的平时用费，希望使他们反省，内心感到惭愧，但他们仍松懈怠惰。知臣莫若君，何况是对自己的亲属，我怎能上辜负先帝的本意，下亏损先人的德行，再次承袭西京败亡的祸难呢？”

章帝看了太后诏书深为感叹，再次向太后请求说：“汉兴，舅父

封侯就像皇子封王一样，太后诚然要严守谦虚，但怎能让孩儿不对三位舅父加恩呢？况且卫尉马廖舅父年高，两校尉马防、马光舅父都患有疾病，如果他们一旦去世，将使我长期有刻骨之恨。请允许我赶紧选吉日封拜，不要再拖延时日。"太后回答说："我反复考虑，思想两全其美，难道只是想获取谦虚的名声而让你忍受不对外家施恩的遗恨吗？过去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兄长，丞相條侯说：'高祖有约，没有军功不能封侯。'现在马氏于国家无功劳，怎能与阴太后、郭太后中兴之太后外家相同呢？我经常看到富贵人家，禄位重叠，结果就像再实的树木，树根受伤。人之所以愿意封侯，是想上奉宗庙祭祀，下求温饱，现在我娘家祭祀则是受太官的赏赐，衣食则是靠朝廷的余资，这难道还不充足，而一定要得一个县的封土？我已经详细考虑，不必再有所顾虑。况且至孝的行为，以使双亲心安为最上等，现在几次出现灾异，谷价提高数倍，我为这些日夜忧虑惶恐，坐卧不安，您想先封外戚，违背慈母拳拳之心吗？我性情一向刚直急躁，胸中有气，不可不顺，孩子未冠以前，诸事由父母做主，已冠则成人，可以按自己的志向努力，皇帝是人君，我因你父亲去世没有超过三年的原因，对我的家族实行专断。如果阴阳调和、边境清静，你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我到那时将含饴弄孙，不再过问政事。"章帝听了太后的训诫，才打消了分封诸位舅父的念头。

马太后又诏谕三辅官吏说："马氏家族及其亲戚如有属托郡县，干扰吏治，按法律制裁上报。"太后母亲去世，起坟稍高，超过了礼仪规定，马太后专门指出此事，她哥哥马廖等人立即加以削减。太后亲戚中如有人谦虚朴素，行为符合道义，马太后立即给予奖励抚慰，赏以财物官爵；如有细小过失，则先示以严厉的脸色，然后进行批评谴责；如果有人奢侈过度，不遵从法制，便削去他的属籍，让他们回归乡里。广平王、钜鹿王、乐成王，车骑朴素，没有金银的装饰，章帝告诉了太后，立即每人赐钱五百万。于是宫廷内外都向往

教化，被服如一，诸家外戚小心敬畏，超过了永平时期。马氏家里安置织布、养蚕的房间，马太后数次前去看视，以此作为自己的娱乐。她平时经常与章帝在一起谈论政事以及子弟们的教育培养，教小王们学习《论语》和经书，向他们讲述平生事迹，终日在雍容和谐中度过。

马廖忧虑章帝行政有始无终，特地上书劝成德政，其中说："过去元帝罢除服官，成帝节俭，身穿浆洗过的衣服，哀帝罢去乐府，可是侈奢的举措没有停息，以致走向衰乱。这是因为百姓看实践而不听从言论，所以移风易俗，改革政治，必须注重根本。左传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击剑的伤痕；楚王喜欢细腰女子，宫中许多女子为束细腰而饿死。'长安也曾流传歌谣说：'城中喜欢高结髻，各地人结髻高达一尺；城中喜欢宽眉，各地的人把眉画了半个额；城中喜欢肥大袖子，各地的人就用一匹布做袖子。'这种传言虽如同游戏之词，却切中事实，说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以前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后来虽然制定了却没有很好施行，有些官吏不尊奉制度，实际也是从京师开始的。现在陛下安于简朴，出于内心圣性，事实上如果此事有始有终，那么四海都将歌颂圣德，传名于天地之间，也可通于神明，百姓归心向化，又何况再用政令强制推行呢？"太后采纳了这个意见。

建初四年（公元 79 年）夏四月，有关部门依据旧制，请求章帝分封诸位舅父，章帝看到各地丰收富裕，四方边疆平安无事，在癸卯这一日，封卫尉马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马防为颍阳侯，执金吾马光为许侯。太后知道此事后说："我年轻时，只是羡慕青史留名，为实现这种志向甚至不顾生命，现在虽然年老，仍然警诫自己不要贪多务得。因此日夜警惕自励，思考降损自我，希望遵守此道、不辜负先帝，也经常教育化导兄弟，共同成就这个志向，想着在自己瞑目之日，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事，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在老年时期这个志向竟无法实现，到死的时候又有遗恨呢？"马廖兄弟知道后都极

力推辞封爵，愿意接受关内侯的封爵，章帝不答应。马廖兄弟最后不得不接受封爵，又上书辞让官位，章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五月丙辰日，马廖兄弟三人都以特进归家，不再担任具体职务。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皇后纪》、《章帝纪》、《第五伦列传》、《马援列传》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通鉴纪事本末》:《马后抑外家》

窦氏专恣

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 77 年)十二月,章帝纳窦勋女为贵人。窦贵人受到章帝宠爱,其母亲是东海恭王的女儿沘阳公主。第二年三月癸巳,窦贵人被立为皇后。

建初八年(公元 83 年),皇后的哥哥窦宪被任命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并在宫省机要部门任职,赏赐丰厚,家中积蓄甚多,兄弟二人都喜欢交接宾客。司空第五伦上疏说:"臣看到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掌禁兵,出入宫省机要之地,正处盛年时期,又能谦让乐善,这实在是容易交结士人的好条件,但是出入贵戚之门的人,多数是犯有罪过、遭到禁锢的人,很少有遵守法度、安贫乐道的士人,士大夫中的无志之徒,互相标榜,云集其门,这将是骄奢淫逸产生的根源。我希望陛下,中宫严格约束窦宪,让他们闭门自守,不要轻易交结士大夫,防患于未然。让窦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没有丝毫隔阂,这是我根本的愿望。"

由于窦宪倚恃皇后的声势,诸侯王、公主以及阴氏、马氏诸外戚对窦宪都很畏惧。窦宪曾以很低价格强买沁水公主的田园。沁水公主是明帝女儿,章帝之妹,嫁给了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子高密侯邓乾。沁水公主迫于窦宪的威势不能不答应其要求。后来章帝经过这所田园,指着田园问窦宪,窦宪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章帝了解真相后大怒,召来窦宪谴责说:"你仔细考虑一下前一段强夺公主田园的时候,与赵高指鹿为马有何区别。我反复考虑此事,真叫人吃惊。过去在永平时期,常叫阴党、阴博、邓叠三人互相纠察,

所以各位豪强外戚没有敢犯法的。可是现在以公主之贵，你尚敢侵夺，何况一般平民呢？国家遗弃你窦宪，就好像扔掉死鸡烂鼠一样。"窦宪这才大为恐惧，他的妹妹为此毁服谢罪，章帝很长时间才消了气，让窦宪把田园归还沁水公主，虽然没有治窦宪的罪，但也不再给予重任。后来司马光评论此事说："君主对于臣下，可怕的是不知道臣下奸邪，或者知道了又赦免臣下的罪过，这样比不知道更为严重。因为奸臣为奸做恶而君主不知，他们心里还有些担心害怕，而已经知道不治罪，奸臣就知道君主没有什么可怕，则更加放纵而无所顾忌。因此知善而不能信用，知恶而不能去除，是君主应该深为警诫的。"

元和三年（公元 86 年）三月，太尉郑弘几次奏陈窦宪权势太盛，言辞甚为苦切，窦宪对郑弘很是憎恨。郑弘上奏窦宪的党羽尚书、洛阳令杨光为官贪残，书呈了上去，掌管文书的吏员是杨光故旧，就把郑弘上奏之事告诉了杨光，杨光报告了窦宪，窦宪反而上奏章帝说："郑弘作为大臣，泄漏机密。"章帝不明内情，斥责了郑弘，夏四月丙寅，又把郑弘免职。郑弘自己到廷尉处受审，章帝下诏赦免了郑弘。郑弘请求告老归家，章帝不许。郑弘病重时上书章帝说："窦宪是奸恶之人，其罪恶充塞天地，海内之人不论贤愚都对他疾恶憎恨，普遍认为，窦宪不知用何术迷惑了君主，以前的王氏之祸将出现在眼前，已明显可见。陛下处天子尊位，负有保万世之祚的重任，而信用谗佞之臣，不考虑存亡之机，我虽命在顷刻，但临死不忘忠于朝廷，愿陛下诛杀像四凶那样的有罪之人，以顺民心。"章帝看了郑弘的奏书，赶紧派医生去诊视郑弘的病，可是等医生走到，郑弘已死。

章和二年（公元 88 年）春正月壬辰，章帝在章德前殿去世，太子即位，为和帝，年仅十岁，尊皇后为皇太后。三月，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侍中在宫内掌管机密，出外宣示诰命；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环并为中常侍，兄弟都在机密要害之地。窦宪的宾客崔

驷写信劝诫窦宪说:"《左传》说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容易骄奢,出生于高贵家庭的人容易傲慢,出身于富贵而不骄纵傲慢的人是没有的。现在您刚处位尊禄厚的地位,文武百官都在观察你的行为,怎能不时刻想着如何才能永远受到众人的尊誉呢?过去冯野王以外戚居要位,被称为贤臣;近期阴卫尉克己复礼,最终多受福禄。许多外戚受到当时的讥讽,给后世留下罪过,都是因为盛满而不知抑制,位崇而仁德不符。汉朝兴盛以来,直到哀帝、平帝,外戚二十家,保全身家的不过四人。"

庚戌,窦太后下诏,以原来的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所有政务都告知邓太傅。窦宪因为邓彪重义谦让,先帝所敬重,为人仁厚随和,所以尊崇他。太后对窦宪无所不从。邓彪在位,只不过注重个人修身,而不能对朝廷有所匡正。窦宪性情果敢急躁,与人即使有很小的过节也必然报复。永平时期,谒者韩纡曾经审理过窦宪父亲窦勋案件,窦宪得势后命令宾客斩杀了韩纡之子,用人头到窦勋坟上祭祀。秋七月,匈奴南单于上言请求汉出兵共同讨伐北匈奴。太后准备答应。正好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来吊唁,太后召见了几次,窦宪担心刘畅分夺自己的权力,派遣刺客在屯卫之中刺死了刘畅,而又嫁祸于刘畅弟弟利侯刘刚,命侍御史与青州刺史联合审问刘刚等人。尚书韩稜认为,刺客在京师,不应该舍近问远,以免被奸臣耻笑。太后得知后大怒,严厉地责备了韩稜,但韩稜仍坚持己议。太尉宋由的幕僚何敞对宋由说:"刘畅是宗室的肺腑之人,受茅土之封的藩臣,来吊唁国忧,上书等待回报,身在武卫之地,遭受如此残酷下场,执法的官吏不知到哪里讨捕凶犯,凶犯没有踪迹,主使之人谁也不知道,我在朝廷股肱大臣府中职掌督捕盗贼,打算亲自到案发地点了解案情,可是二府的执事认为,过去的惯例,三公不直接参与过问盗贼之事,公然放纵奸慝,不认为是自己过失,我请求单独审理此事。"宋由答应了何敞的请求。二府听说了何敞的行动,都派遣主管此项事务的人随从。

经过审理，真相大白，太后大怒，把窦宪关在了后宫，窦宪害怕被诛杀，请求击伐匈奴以赎死罪。冬十月乙亥，窦宪为车骑将军北伐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春，窦宪将征匈奴，三公、九卿都到朝堂上书劝谏太后，认为："匈奴没有侵犯边塞，而无故派军队远征，浪费国家资财，求取成功于万里之外，对国家社稷不利。"太后不听谏阻。窦宪率军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败匈奴军，单于逃走，窦宪追击，直至私渠比鞮海，斩杀名王以下一万三千余人，获取人口甚多，杂畜一百多万头，各部头领投降的前后八十一个部落二十多万人。窦宪出塞三千多里，登上燕然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记功，记述了汉朝威德而回。

窦宪曾让门生携带自己的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有所请托，郅寿不买帐，立即将窦宪门生送进监狱，前后几次上书，揭露窦宪骄恣，引王莽的行为作为国家的鉴戒，又在朝会时讥刺窦宪征伐匈奴、兴建宅第的事，正言厉声，言语激切。窦宪大怒，诬陷郅寿强买公田，诽谤朝廷，把郅寿逮捕入狱，要杀死。何敞上书说："郅寿是机密近臣，以匡救国家为自己职责，若沉默不语，其罪应当诛死；现在郅寿坚持正议以安国家，难道是为自己私事。我所以冒死罪而言，不是为郅寿。忠臣为国尽节，视死如归，我虽不了解郅寿，只是揣度他的内心而求所安，实在不想让圣朝诛杀所谓犯有诽谤罪的人，以伤国家安定的局面，堵塞忠直之路，遗留给后人无穷的讥刺。我参与机密之政，如说了不应说的话，罪过明显，应该入牢狱，死在郅寿之前。"奏书上达朝廷，郅寿得以免死，流徙合浦，没有成行而自杀。

秋九月庚申，窦宪进位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封窦宪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坚持推辞封爵，诏书答应了。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这时诏书规定窦宪位次在太傅之下，三公之上，大将军属吏长史、司马的品秩为中二千石。

窦宪的弟弟执金吾窦景指使宾客奴仆侵渔百姓，强夺财货，篡

取罪人，掠夺妇女，商贾见了他们到处躲藏，如避寇仇，有关部门的官员因惧怕他们的权势而不敢举奏。袁安上书弹劾窦景擅自征发边界军队，惊恐吏民，二千石官吏不遵照朝廷信符，而只相信窦景的一纸文书，这样违犯国家制度应该诛杀；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谀贵戚窦氏，不举奏弹劾，请免官案罪。朝廷扣压了袁安的奏书。

尚书何敞上封事说："过去郑国武姜宠幸共叔段，卫庄公宠幸州吁，宠爱而不教诲，最终成为凶戾，由此看来，如此宠爱，就好像人饥饿而让其食毒药，正好是毒害他们。大将军窦宪，在章帝初去世时，国遭大丧，许多公卿上奏，想让他典掌国事，窦宪坚持谦虚退让，坚决辞退高位，勤勤恳恳，天下人听说后，无不欢喜。今只一年多，章帝去世的大礼尚未完成，猝然改变章帝之政，兄弟专权朝廷，窦宪总领三军，窦笃、窦景掌握宫卫之权，兄弟们侵渔虐待百姓，奢侈无度，诛杀无罪之人，只求肆志自快，如今议论纷纷，都认为共叔段、州吁又生于汉朝今天。我观察公卿怀持两端，不敢极言直谏，是认为窦宪如能勤奋向上，坚持不懈，则自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劳，如窦宪等人陷于罪孽，他们自取陈平、周勃顺从吕后的权宜之计，始终不因为窦宪等人的吉凶担扰。我真诚希望有两安之计，上不使太后有损于文母的称号，陛下有誓泉的讥讽，下使窦宪兄弟长保富贵。驸马都尉窦环，几次请求退位，抑制家中权势，可以听从他的意见，这实在是国家、宗庙至关紧要的大事，也是窦氏之福。"当时济南王刘康，依倚尊贵，骄纵无忌，窦宪为陷害何敞，禀告太后让何敞出任济南王太傅。刘康有违失，何敞就及时谏诤，刘康虽不能听从，但由于平素敬重何敞，也还能保持友好相处的关系。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六月，和帝下诏封窦宪为冠军侯，窦笃为郾侯，窦环为夏阳侯。窦宪没有接受封爵。

窦宪远征匈奴有功，威名更盛，以耿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典掌文章之事，各地刺史、郡守、县令多出其门，竞相赋敛吏民，贿赂窦氏以固其位。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举奏窦

宪党羽为二千石及其有联系的官员，免官、贬低品级的多达四十多人，窦氏兄弟十分痛恨袁安、任隗。但袁安、任隗平时品行高尚，窦宪抓不住把柄，也没有办法陷害他们。尚书仆射乐恢纠察举奏不避权贵，窦宪等人也忌恨。乐恢上疏说："陛下年纪尚轻，继承大业，诸位舅父不应干预国政，使人感觉天下为私有。现在比较适宜的办法是：皇上以义割爱，臣下以谦自退，这样四位舅父也可长久保持爵位、封土和尊荣，皇太后也永远不会因有负宗庙而惭愧，这才是上策。"书上奏后，没有被接受，乐恢借口有病辞职回长陵居住。窦宪强令乐恢所在的州郡长官逼迫乐恢饮药自杀。于是朝臣震惊，望风承旨，不敢有所违抗。袁安看到皇帝幼弱，外戚擅权，每次举行朝会和进见皇上，或者与公卿大臣谈论国家大事，都痛哭流涕，皇帝和大臣都信任依赖袁安。

冬十月，和帝下诏书让窦宪与自己在长安相见。窦宪到了长安，尚书以下的官员议论想行跪拜之礼，称呼万岁。尚书韩稜不同意，正色说："与长上者交往不要媚，与低下者交往不轻慢，礼仪没有人臣称万岁的制度。"原先议称万岁的人都感到惭愧，放弃了原议。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窦宪，韩稜在朝廷上举奏了王龙，王龙因违制被罚为城旦。

窦宪请求朝廷派使者立北单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为单于，袁安不同意，上书争辩。后来朝廷竟听从了窦宪的意见。

和帝永元四年（公元 92 年），庐江人周荣被袁安辟为司徒府幕僚，袁安举奏窦景和与窦宪争论立北单于事都是周荣起草的奏书。窦氏的宾客、太尉掾属徐齮深深憎恶周荣，威胁周荣说："你为袁安心腹之士，举奏窦氏，窦氏的悍士刺客布满城中，你要小心防备。"周荣回答说："我不过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孤苦的书生，得以备位宰士，纵然为窦氏所害，也甘心情愿。"并告诫妻子说："我如果突然遭遇横祸，不要殡葬，希望用我的腐尸使朝廷觉悟。"

夏四月丙辰，窦宪回到京师。夏六月，发生了日食。丁鸿上书

朝廷说:“西汉时诸吕掌握朝廷大权,皇位嗣统几乎转移,哀帝、平帝末年,庙不血食,祭祀停止,所以虽有周公与周王的亲属关系,而没有德行,不得行其势。现在大将军虽然注意约束自己,不敢僭越等级,可是天下无论远近,都胆怯地承其旨意,刺史、二千石被任命之初,都要去大将军府谒见拜别,等待回音,虽然得到了朝廷的印符,接受了尚书台敕文,也不敢去上任,有的等待大将军府回音达数十天。臣下这种背王室向私门的行为是因为皇上威权削弱,臣下权力太强盛了。世间人道相悖乱,天上必有效验,虽然是隐谋,但神明知其内情,垂下表象告诉君主。事情在初时禁止容易,发展到不可收拾时再挽救特别困难,一般人都忽视微细之时以致使发展壮大,有恩不忍心再教诲,重义不忍心割舍,事发生以后才会明了,所以天意不可不刚毅,不刚毅则三光不明,君主不可不强大,不强大则地方宰牧纵横,应该趁天象有重大变化时,改革政治以匡救失败,用来承应天意。”

窦氏父子兄弟同时为卿校,充满朝廷,穰侯邓叠,邓叠弟弟步兵校尉邓磊及母亲元氏,窦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父亲长乐少府郭璜相互勾结,元氏、郭举经常出入宫禁中,郭举深受太后宠爱,他们共同图谋不轨。和帝了解了他们的阴谋。这个时期,窦宪兄弟专权,和帝和内外臣僚无法亲自接触。和帝认为,朝臣上下都亲附窦宪,唯独中常侍钩盾令郑众,为人谨慎机敏而又有心计,不亲附窦氏豪强,便和郑众定计诛窦宪。当时窦宪统兵在外,和帝担心窦宪为乱,于是隐而未发,等待时机。正好这时窦宪与邓叠班师回京,清河王刘庆甚受和帝亲爱,经常入宫省住宿停留,和帝想得到《外戚传》作为参考,对左右的人不放心,不敢使用,令清河王私下向千乘王要,夜里单独让清河王人内。庚申日,和帝驾幸北宫,命令执金吾、五校尉率兵屯卫南北宫,迅速逮捕了邓叠、邓磊、郭璜、郭举等人,皆下狱诛死,其家属流放合浦;又派遣谒者仆射收回窦宪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与窦笃、窦景、窦环皆回封国。和帝因为太

后的缘故，不愿意公开诛杀窦宪，特先选拔严明的诸侯国相督察他们，窦宪、窦笃、窦景到封国后都迫令他们自杀。

当初，河南尹张酺数次按法律惩治窦景，等窦氏兄弟死后，张酺上书说："当窦宪等人受宠贵盛之时，群臣阿附唯恐不及，都说窦宪受先帝顾命，怀有伊尹、吕望之忠，后来把邓夫人比做文母。现皇帝严威行使，又都说窦宪应当死，不顾及前后所言矛盾。我看到夏阳侯窦环存有忠善之心，常有尽节事上的心意，检察约束宾客，不曾违犯法律。我听说王政对骨肉行刑，有三宥之义，宁过厚不求刻薄，今有人议论要为窦环选严能国相，恐怕国相对窦环管制迫切，窦环必定不能保全，应稍加以宽宥，崇尚厚德。"和帝感念张酺的意见，窦环因此得以保全，其他窦氏宗族宾客因窦宪权势为官的，皆免官归故郡。当初，窦宪娶妻，天下各郡国都送礼庆贺，汉中郡也应派使者去庆贺。户曹李郃劝谏郡守说："窦将军是外戚，不注重修养德行礼仪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很快会到来，愿您一心忠于朝廷，不要与窦氏交往。"太守不听，一定要派使者，李郃劝阻不住，请求自己充当使者，太守答应了。李郃在路上停留不前，以观其变，走到扶风时窦宪回了封国，凡与窦宪有交往的都受牵连免官，唯汉中太守没有牵连进去，保住了官位。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章帝纪》、《皇后纪》、《窦融列传》、《南匈奴列传》

《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卷四十七

《通鉴纪事本末》:《窦氏专恣》、《两匈奴叛服》

白虎观会议

建初四年(公元79年),由汉章帝直接主持,在洛阳白虎观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经学讨论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是汉代经学、谶纬迷信与政治联姻的产物。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经典被抬到了神圣的高度,只许信奉,不许怀疑。从此,经和经学与汉朝政治联姻,起着统治思想的作用。不过,五经大部分是春秋以前的作品,与汉代政治并不完全合拍;经学作为一门学问,内容庞杂,也并不都能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以武帝以后,当政者着力培植经与经学中那些能够直接服务于封建政治的东西。于是便有不少儒生致力于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把现实社会的哲学、政治、伦理观点乃至行为规范全部纳入经义之中。政府为了宣扬经义,每经皆置博士。同一经的不同派别,亦分别设置博士。经师们为了干禄荣身,一方面严守师训家法,确保本派系传习有人,一方面标新立异,务求出人头地,这就使得经学内部派系之争、经义之争十分激烈。另外,又有一些不达时务的儒生,改不掉"好是古非今"的老毛病,拿经书批评现实政治,甚至要据守经义对抗皇帝诏书。因此,怎样才能使经与经学更好地为王权服务,是儒术独尊后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汉宣帝于石渠阁召集经学讨论会,令各派人物讲述五经异同,以解决经书中的疑难问题。但这次会议讨论的全是些枝节问题,对于每个问题亦皆缺乏充分的逻辑分析和理论

阐释，最终以宣帝制诏予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结果并没有把各个学派的人纳入同一经学体系中，建立一统的正宗统治思想。哀、平之际，社会矛盾加深，传统今文经学内部派系分立的局面没有消除，新的学说又成长起来。新的学说有两种，一是古文经学，它是对今文经学的反动；二是谶纬神学，它是董仲舒公羊派儒学与神仙方术、世俗迷信结合的产物。王莽时期，这三个学派并行不悖，已成鼎足之势。王莽充分利用今文经学作好夺取政权的舆论准备，利用古文经学提供社会改良的历史依据，利用谶纬神学作为舆论工具。由于新朝历时短暂，王莽没有来得及做统一经学的工作。

东汉政权 建立后，光武、明帝、章帝继续奉行王莽的兼收并蓄政策，对经学三大派别各取所需，并加扶植。这样一来，各个派别都想依靠政权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势力，压倒其余两派。因而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较以前更加激烈。

东汉初年，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的矛盾异常尖锐。西汉中期以来，今文经学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学者众多，势力最大。王莽虽然把古文经立为官学，但今文经学家仍然瞧不起它，将其视为异端。王莽倒台后，今文经学乘势对古文经学发起攻击，逼迫它与政治、官学离异。但古文经学这时已有了根基，和刘歆当年与太常博士争立学官时不同，不再是一击即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光武帝采取了分别扶植的办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王莽更始之际，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典籍散佚，及先武中兴，爱好经书，未及下车，便先访求儒雅之士，探求散佚的文书典籍。以前各地儒生大都携带书籍，逃往山林之中，这时无不带其书籍，来到京城。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人，先后起来。于是政府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共立了十四位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严、颜二家，统归太常领辖。"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东汉初年所立的博士全属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仍未

进入官方学校。不过，应刘秀之召前来京师的儒学大师中，古文经学家却不少，前述七人中，陈元、郑兴、杜林、卫宏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由此可见，古文经学派学者甚众，且很受政府重视。后来，光武帝认为应该提高古文经学的政治地位，下令增设《左传》博士，但由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两派共同反对，不久便又作罢。虽然如此，东汉初年几位皇帝还是努力扶植古文经学。汉章帝就曾为此下诏命令选拔高才生，专门学习《左传》、《穀梁传》、《古文尚书》、《毛诗》，以扶植微学，广存异说。可见，古文经学虽然没在官方学校中取得一席之地，但它的社会地位仍较高，影响亦颇大。

刘秀起事之初，便打起光复汉室的旗号，以此赢得社会各阶层支持，而后力挫群雄，揽有天下。但他只是刘邦的支裔，按宗法制度及皇位继承的惯例，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符命帮了他的大忙。他当年的老朋友颍川人强华曾先献上《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他的一班心腹见机而作，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符命，应该响应，一来为报答天神，二来可塞群望。"在此之前，大臣多次劝刘秀称帝，刘秀都没有答应，而且故作吃惊，表示自己没有这样的打算。这一次有符命在，他心里踏实了，所以没有推诿，就举办了登极典礼。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比宗法制度、皇位继承制度更具有权威性。他在称帝的祝文中又一次引《谶记》道："刘秀发兵捕不逐，卯金修德为天子。"并表白说这是天的安排，所以一定要马上照办。刘秀称帝以后，继续利用图谶稳定自己的统治。他令人剔除谶纬书中不合己意的部分，而后宣布于天下。刘秀以谶纬神学为精神支柱，文士儒生趋炎附势，争学图谶，遂使谶纬神学成为风靡一时的学问。谶纬神学源于《春秋》公羊学，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便以其近水楼台之势，大谈图谶，用以提高本学派的政治地位。古文经学受此股潮流裹挟，也想附于骥尾，抬高自己的身价。

尽管谶纬神学备受各家青睐，刘秀也极力用政权的力量抬高

它的政治地位，但它始终不能上升到正统的地位，取代经学的职能。因为谶纬大都是些语义含混、模棱两可的语言，同一句谶语，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公孙述引谶文“废昌帝，立公孙”，“西太守，乙卯金”，说自己可以做皇帝；而刘秀却解释说公孙指的是汉宣帝，“乙卯金”是说“乙未岁授刘氏”。西汉末年以来，有人靠谶语升官，有人作符命反叛，这使得刘秀及其子孙，不敢放弃经学而将国家命运全部托付给谶纬神学。而且，自谶纬之学产生之日起，便有些睿智的思想家视其为异端邪说，从扬雄、桓谭到王充，都曾从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尽管当政者极力压制这样的揭露和批判，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以谶纬取代传统经学，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

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谶纬神学都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就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三家学说都以儒家经书为本，靠解释经义、附会圣人而立说，所以这个共同的基础只能存在于儒家经典中。要寻得这个共同的基础，就须对“经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解释经义，又离不开章句的训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章帝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思想背景，汉章帝的诏书讲得很明白。他说：“三代时化导人民，便以教育学习为主，汉朝建立后，褒显儒术，置五经博士。其后学问愈加精博，学派之分愈显明。孝宣皇帝以为离圣人的时代已甚久远，而学问不厌广博，于是又增立大小夏侯《尚书》、京氏《易》。到建武年间，又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这都是为了扶植微学，尊崇推广道义。建武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的诏书说，五经章句烦多，应该讨论减省。到（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长水校尉樊鯈上奏说，先帝的规划，应当及时施行。可使儒生们共正经义，以使学者们各自有所遵循。孔子说：‘只学习不讲解，令人担忧啊！’又说：‘学问广博而志向诚笃，切磋讨论而认真思考，便可做到仁。’你们努力去做吧！”

据《后汉书·杨终传》说，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是《春秋》学专家校书郎杨终。他说："宣帝曾召集大批儒生，在石渠阁讨论正定五经，当今天下太平，学者们都有条件成其事业，但那些死守章句的鄙琐之人，破坏经书大义。应该像当年宣帝石渠会议一样，制订出一个统一的原则。"章帝听从了杨终的意见，下达了召开白虎观集会的诏令。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有政府的文职官员，如太常、博士、大夫、议郎、郎官，也有太学学生和一般儒生。名字可考的，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人。其中有古文经学家，也有今文经学家。他们虽分属不同学派，但在以谶纬与经书相附会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如贾逵是传古文《左传》的大师，和今文《公羊传》的传人李育对经书的解释不一致，可他们都善于引谶纬以证己说。贾逵说："图谶上说刘氏为尧之后裔，五经家都没有办法证明，只有《左传》上有明文记述。"所以他极力主张将《左传》立为官学。李育治学，则是"多引图谶，不拘理体"。丁鸿说："《春秋》上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弑君三十二人，灾变不是凭空生出的，都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所以《后汉书》评论他是"高论白虎，深言日食"。杨终是经史学家，他曾受诏删节《史记》，同时也作过称颂汉代嘉瑞的诗十五章。班固是史学大家，学术观点倾向于古文经学派，他所作的《典引篇》，也引述图谶的说法，极力证明汉继尧后，承袭天统。总的看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不管是官僚还是学者，是经学家还是史学家，属今文学派还是属古文学派，全都是受谶纬熏炙、赞同经谶合流的人。

这次会议讨论问题的程序是：章帝先令五官中郎将魏应把需要讨论的问题告诉大家，各派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后由侍中淳于恭汇集上奏，而后章帝亲自到会场评断裁决。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四十四个问题。即：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考黜、

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瑞贽、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上述问题几乎包括了封建上层建筑的各层面，而特别突出了制度方面的规定。会议讨论的内容作有详细的记录，后来班固将会议记录加以整理，编辑成书，称作《白虎观通德论》，或称《白虎观通义》，亦简称《白虎通》。

从《白虎通》来看，白虎观会议的核心内容是阐扬"三纲"说。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通常说的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词不见于儒家经典，但孔子对君权、父权早有论述。他认为，君不君、臣不臣，直接危及政权的巩固，而父不父、子不子则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因而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政治的根本问题，认为尊尊、亲亲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对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从此这种理论便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实践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实际上，君权、父权、夫权属于三个性质不同的范畴，靠着不同的力量维系。君臣关系属政治范畴，靠封建等级制度维系；父子关系属血统范畴，靠血缘关系维系；夫妻关系属家庭范畴，靠伦理关系维系。这三对范畴既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西汉时期，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能很好地说明、处理三者的关系。东汉初年，刘秀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首先是强化君权，仲长统曾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下任，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力被削弱，皇帝独揽大权。其次加强父权。对于社会下层来说，父权是维持个体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对于君主来说，通过父权分封宗室子弟，使之效忠皇室，是保持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再次是强调夫权，不使后宫、外戚参与国家政治。当然，刘秀最重视的还是强化君权，他的种种做法，终极目的是要强化君权。

白虎观会议对君权的神圣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白虎通》开宗名义说:“天子是一级爵位,这个爵位为什么被称作天子呢?这是因为王以天地为父母,是天的元子。”就是说,天子这个爵位是上天赐给的,“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它是普天下爵位中最高的一级。天子以下的爵位分两个系统,一是按公、侯、伯、子、男划分的诸侯系统,一是按公、卿、大夫划分的官僚系统,这些爵位都归天子掌握,臣下不得自封。天子为什么又称帝王呢?《白虎通》说:“对上称天子,表明是以此爵位奉事上天;对下称帝王,表明其地位至尊,用以号令臣下。”

《白虎通》又说,天子所以能够拥有最高的权力,是因为它是“有土之君”,天下的土地都是它的私有财产。他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臣下。在太平盛世,分封亲属以表示与他们共同拥有这些财产;中兴征伐,有大功者亦受封,用以褒奖功绩;盛德之士亦应受封,表示尊重道德。对于没有受封的臣子,则赐之以俸禄。臣下的爵位、封地、俸禄都是天子所赐予,所以君臣之间便结成了一种主从的关系。君主对臣下拥有赏罚之权,臣下必须无条件地效忠君主。

白虎观会议在强调君权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父权。父权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它虽然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明确人们之间的血统,而在于规定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原则,以解决由此而引起的矛盾与纷争。同时,它可以加强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在受到政治、经济两条绳索束缚之后,再套上一条血缘关系的绳索。这对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君权和父权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来看,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白虎观会议首先强调君权与父权的统一性。《白虎通》说:“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其意义是相同的。臣下奉事君上,就像儿子奉事父亲一样。”而后,《白虎通》又将君权凌驾于父权之

上，说“不以父命废王命”，又说：“父亲杀死儿子，父亲要被判处死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之间人最可贵，人都是天之所生，秉承父母之气而有了生命，接受君上的教养而成长，所以做父亲的不能擅杀其子。”在这里，《白虎通》宣扬的是君权至高无上的思想，它要求人们在父权与君权发生矛盾的时候，放弃父权服从君权。

白虎观会议并没有将上述思想贯彻到底。因为自西汉时起，统治集团便宣扬以孝治天下。西汉诸帝之庙号除高祖外，皆冠一孝字，东汉的君主秉承此传统，且推而广之，将孝道施及诸父、母后之党。这次会议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社会现实，《白虎通》中隐约透露出君权屈从于父权的思想。它说：“国君为什么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三老，像对待兄辈一样对待五更呢？因为国君要展示自己孝、悌的品德，为天下人作出榜样。即便是天子，也一定有比他更尊贵的人，因为他有父亲；一定有在他前面的人，因为他有兄长。”这就是说，君主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他生活在宗法血缘关系网中，就需承认父权的力量。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顾及宗法关系，遵从祖宗之法和现实的伦理规范。所以《白虎通》又说：“天子在宗庙里分封诸侯，表示自己不是独断专行，而是按祖宗的成法办事，并把自己做的事告诉祖先。”“天子派遣将军须在宗庙里举行仪式，表示自己不敢专断。为什么一定要在宗庙里呢？因为法度是祖上制订的。”这种尊祖的观念，无疑是父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白虎通》承认君主受父权、族权的制约，这与它宣扬的绝对君权的思想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是汉代社会矛盾的反映。一方面，自战国、秦以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君权日渐加强，另一方面，作为分封制理论基础的宗法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尽管分封王侯在汉代已徒具形式，但宗法制度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方面，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汉代的君主们明明知道它会削弱君权，但也不能够废除它。

《白虎通》中的《三纲六纪》篇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

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通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里的“三纲六纪”主要是强调两种关系，一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君臣政治关系，二是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父子、夫妇、兄弟、宗族、姻亲等血缘关系，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纲，其次是纪。什么叫纲纪？它说：“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处理上述关系的伦理规范称作五常。《白虎通·性情》篇说：“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五常和三纲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核心思想。

从《白虎通》来看，白虎观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树立、完备神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体系。

首先，白虎观会议对宇宙的形成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白虎通·天地》篇说：宇宙间开始先有了“太初”，然后又有了“太始”，“形兆”生成，其名曰“太素”。这种“形兆”与“太素”混混沌沌，既看不见它，也听不到它，后来发生分离，有了清浊的差别，有了三光之精，形成了世界万物。由三光之精和五行的作用，逐渐产生了“神明”、“道德”、“文章”。它又引《易·乾凿度》对上面的话作了解释，说太初是气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本质的开始。总的说来，《白虎通》认为，在太初之前，世界是不存在的，太初生出了气，然后才有了万物，有了人类社会。它歪曲了“气”的宇宙生成论，对世界的形成作了唯心主义的说明。

白虎观会议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将人格之天理性化，赋予天以镇服、治理人世的威严和权力，同时利用当时流行

的谶纬迷信观念，将君主抬到了神人的地位。《白虎通·天地》篇说："什么是天呢？天就等于说是'镇'。天居于高处，治理下方，镇服人类。"在这里，《白虎通》既没有否认天的人格特性，又给天涂上理性的色彩。这种义理之天比起完全人格化的上帝之神，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天是超越社会的主宰者，天子是天之元子，天子的主权是天所赐，这是白虎观会议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白虎通·爵》说："国君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乃是上天之子。帝王的品德有优有劣，为什么都称作天子？因为他们都是接受上天之命治理人世的。"

既然天子的权力是天给予的，那么天子就应当对天负责，按天意行事。天子要用最隆重的仪式祭天，而且祭天是天子一人的特权，其他人不得染指。天子在从事征伐、巡狩等重大活动以前，要以极隆重的仪式向天神报告。《白虎通·封禅》说："朝代改换后，国君为什么要到泰山封禅？这是因为他要向天报告。开始接受天命的那天，应改变制度以报答上天。天下太平，成功后封禅，是向天报告太平。君主秉承天的意志治理人世，要向天报告，向天负责，接受天的检查和指示。"这是对董仲舒天人学说的发展。

白虎观会议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董仲舒说，国家政治有了失误，天则用灾害予以谴告，谴告后不知悔改，天就用怪异惊惧之，仍不知改变，则降下灾祸。后来，这种思想与其说成为神学理论的核心，不如说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臣下用这种理论谏诤乃至指责君主，君主也以此作为罢免高级官吏的借口，而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纷纷求助于这些学说。面对天人感应学说造成的混乱，白虎观会议上对此问题作了一元的解释，说天降符瑞、灾异，主要是对天子一人而发，与其他人无大关系。《白虎通·封禅》说："天下太平，符瑞就会出现，这是因为君主秉承天的意旨治理人世，阴阳调和，万物得序，美气充塞，所以便产生了符瑞。"就是说符瑞之生，应于天子一人。同样，天降灾异，也是针对

天子一人的。《白虎通·灾变》篇说:“天之所以降灾变,是用此譴告人君,令其觉悟,悔过而修德,深谋熟虑。”天子只对天帝负责,天帝只规范天子一人之行,这样既显示了天子的神圣性,又避免了大臣之间用天意作为相互攻击的工具。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准则和伦理规范,是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工具,因而也是白虎观会议神化的重要对象。首先,《白虎通》依据董仲舒的神学理论,将阴阳、五行神秘化,《五行》篇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为什么叫‘行’,是取天行气之意义。”又说天是最大的阳,土是最大的阴,火木为阳水金为阴,合起来是三阳三阴。而后,《白虎通》便根据这种理论解释“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共是六人,一阳一阴谓之道,以阳来统率阴,正好是三阳三阴,谓之三纲。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所以后者应服从前者。

白虎观会议对于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用以说明封建纲常的合理性。比如《白虎通·日月》篇说:“太阳日行一度,月光日行三十又十九分之七度,为什么太阳运行慢,月亮运行快?因为按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君应该舒适,所以行动慢;臣应该操劳,所以行动快。”又说:“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运行,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日月五星对天来讲为阴,所以右行,就像臣对于君一样。”对于名称,白虎观会议也作了神秘解释,《白虎通·号》篇说:“皇兼有君、美、大的意思,号称为皇,即煌煌然人莫敢违之。帝就是谛,象征着人们顺承;王就是往,言天下人所归往。”对于日常生活琐事如衣服之类,白虎观会议也作了荒谬的解说,《白虎通·衣裳》篇说:“狐死后头必向着他的巢穴,可以表明君子不忘其本,所以天子的衣服用狐之白皮,诸侯用其黄皮,大夫用苍皮。羔羊十分逊顺,所以士以羔皮为裘,以此来区别尊卑。”由此可以看出白虎观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比起西汉的石渠阁会议来更加细琐,其论证的手法,也比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方法更

加神秘和无聊。这是东汉经学的章句烦琐学风在神学上的反映，也是统治思想更加苍白无力的表现。

总的说来，白虎观会议总结了两汉经学的成果，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神学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吸收了谶纬迷信思想，建立起宗教神学体系，成为东汉王朝的正宗哲学。同时这次会议又围绕着三纲五常构建了一套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在东汉时起到了法典的作用，后来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进步，《白虎通》所努力构筑的粗糙的神学体系逐渐解体，其理论形态被完全毁弃，神秘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一类的思想理论无人继续传习，但是这套理论所要论证、维护的纲常名教——三纲五常、君权至高无上、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等等说教——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政治家、思想家对它进行实践、发挥、补充，以至使它成为“百王不易之道”，成为不容任何人怀疑的信条。

（李　泉）

参考资料：

《汉书》:《董仲舒传》

《后汉书》

《白虎通义》

王充著《论衡》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卒于永元年间（约公元 100 年前后），一生经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朝，享年七十余岁。

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他的祖上因为立有军功被封于会稽阳亭，但仅仅一年的时间便被削去封地，贬为平民，此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以务农植桑为业。王充的祖父王汎勇武任侠，与当地人不能相合。当时正值西汉后期农民大起义的时代，连年灾荒，社会动荡，他与不少人结下了怨仇，因怕为仇人所害，带领全家迁到钱塘县，以经商为生。王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历来有任侠使气的传统，到王蒙、王诵更加厉害。他们在钱塘结怨于豪强大家，不得不徙家至上虞。

王充小时候和孩童们一齐玩耍，从不欺侮别人，孩子们喜欢捉雀、捕蝉及玩耍游戏，而王充不肯参加，常常一个人在那里念书。王充从六岁开始读书识字，他举止庄重，性格深沉，对人有礼貌，有远大的志向。他儿时便熟习《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后来游学洛阳，曾到国家办的太学中学习，又曾拜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班彪为师。他博览群书，且不像当时的经学家那样死守章句。因家贫无钱买书，他常到洛阳书肆中，阅读待售之书。他天质聪颖，披阅一过，便能记诵，由此得以博通各家各派的学说。成年后，王充曾任过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太守府列掾、功曹，全是地位较低的下级属吏，后来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而辞归乡里，以教书为生。元和三

年(公元86年),王充六十岁时因为人所陷害,不得已携带家眷,避难于扬州。扬州刺史董勤征聘他为州从事,不久转为治中,两年之后,辞官归乡。他的朋友谢夷吾向皇帝上疏,推荐王充,称誉其才学。汉章帝专门下诏让地方官府送他来京师,当时正赶上王充生病,故未能成行。汉和帝永元年间,王充病死于家中。

王充出生的那年,正值赤眉起义失败;而他死后几年,东汉后期农民起义的序幕方才揭开。王充的一生,正处于新王朝初建,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但由于东汉政府的放纵和扶植,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有所膨胀,他们大量兼并土地,招纳依附农民,建立起田庄。同时他们操纵选举、干预政治,造成吏治混乱,影响了政治的稳定。王充三十一岁那年,汉朝帝下诏说:"现今选举不实,邪佞之人未能免去,有权势的人家请托纳贿,贪钱的官吏肆意而为,百姓愁苦怨愤,却无处申诉。"王充六十二岁时汉章帝的诏书则说:"当今富好之人肆行贿赂,而官吏贪赃枉法,致使有罪者得不到惩治,无罪的人却受到极刑。"东汉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背后孕育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些眼光敏锐、思维深邃的知识分子走到了社会历史的前列,他们揭露社会矛盾,抨击腐败政治,希图消除社会危机,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王充便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士阶层的代表人物。

西汉以来,自然科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天文学理论上,除盖天说仍占重要地位外,浑天说、宣夜说正在兴起。天文学方面的理论和材料,给王充的天体理论提供了依据。当时在人体解剖、医疗理论方面也有重要的成就。《黄帝内经 • 素问 • 脉要精微论第十七》就说:"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春秋纬 • 元命苞》也说:"头者,神之所居","气之府也";"脑之为言在也,人精在脑"。这就打破了传统的心是思维器官的看法,认识到人的精神存在于头脑中,思维活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这是人体研究方面的重大发展。王充的人死无知、不能为鬼的无神论理论,正是在医学

知识进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王充生活的年代，谶纬迷信思想最为炽盛。谶纬迷信自西汉后期起影响国家政治，后来王莽把它当作篡夺政权的舆论工具。在新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南阳豪强地主集团也编制了《赤伏符》，为刘秀称帝制造舆论。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刘秀，刘秀乃下定起兵的决心。刘秀称帝，得益于谶纬迷信者不少，他在位期间，便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宣布图谶于天下"，用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之。对于博览群书、通晓百家，且正值而立之年的王充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的"疾虚妄"、"求诚实"的口号便是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的指斥与抗争。王充五十三岁那年，汉章帝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诸儒集会于白虎观，以讨论五经之异同。这次会议，不仅发挥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而且把谶记纬书提高到与经书同等的地位，当作正宗统治思想。这对于王充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据学者们研究，王充的《论衡》一书大部分篇章写于章帝时期，这与当时的思想背景是有关系的。

王充一生共撰写了四部著作：《讥俗节义》十二篇；《政务》若干篇；《养性》十六篇；《论衡》八十五篇。前三种书均湮没失传，只有《论衡》一书流传至今。《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善于论说，其立论好像是诡辩，是异端邪说，但最终还是言之有理，均落到实处。"他认为俗儒死守章句，并不能得文章真谛，于是关起门来，深入思考，与亲戚朋友的往来也断绝了。门前窗上壁上放的全是刀笔，最后终于写成《论衡》一书。《论衡》一书的《招致》篇已佚，今仅存八十四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文学批评著作，是研究王充思想的最可靠的资料。

《论衡》八十五篇的题目及主旨如下：

1.《逢遇》。才高德厚者未必富贵，才德俱下者未必卑贱。关键在于机遇。

2.《累害》。旨在批评"升官者谓之善，贬退者谓之恶"的世俗见

解，以为“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恶者未必非善”。

3.《命禄》。才德俱佳者未必富贵，智行俱劣者未必贫贱。王充无法解释，将其原因归之于“命”。

4.《气寿》。人之强弱寿夭，由人所禀受的“气”决定，禀受的气不足，便会弱、夭。

5.《幸偶》。人的操行有贤愚，祸福有幸与不幸，做又有是非，受赏受罚则有偶然与必然。

6.《命义》。人的操行善恶，由性决定；祸福吉凶，由命决定。

7.《无形》。人之形体无法变化，年寿不能增加，人化为虎、禹化为熊、成仙不死之说皆为虚妄之辞。

8.《率性》。人性之善恶可以变化，关键在于教化。“率”乃诱导之意。

9.《吉验》。“人禀贵于天，必有吉验于地。”

10.《偶会》。“天人感应”说列举的现象乃是事物间的偶然巧合，“适偶相遇，非气感也”。

11.《骨相》。人之性命受之于形体，由骨法决定。否定“天命谓之性”的说法。

12.《初禀》。人初生时禀自然之气，长大后便有富贵之命，以此反对“修己行善”，天使其富贵的说法。

13.《本性》。讨论人性问题，赞同人性有善有恶之说。

14.《物势》。人、物皆自生，并非天地故意生出，“五行相生相克”乃虚妄之说。

15.《奇怪》。世人好奇怪之说，儒生因此而穿凿造作。

16.《书虚》。专门揭露、批评书传中诡谲虚妄之言。

17.《变虚》。讨论关于“天变”的问题。

18.《异虚》。讨论关于灾异的问题。

19.《感虚》。批评精诚感动上天的说法。

20.《福虚》。批评行善得福的说法。

21.《祸虚》。批评为恶则天降灾祸的说法,指斥"天人感应"为妄说。

22.《龙虚》。指出关于龙的种种说法的虚妄。

23.《雷虚》。指出雷为天怒乃虚妄之言。

24.《道虚》。批评仙道之说,认为凡有生命之物,有生必有死。以上九篇合称"九虚",即指陈九种虚妄不实的说法。

25.《语增》。论世俗语言的增饰夸张。

26.《儒增》。论儒书中增饰之文。

27.《艺增》。艺指六艺,即六经。此篇讨论经书中增饰夸张之处。

以上合称"三增",批评各种增饰夸张的现象。

28.《问孔》。此篇列举十六件事,指陈孔子言论中的矛盾。有人以为此篇乃后人伪作。

29.《非韩》。此篇为批评《韩非子》之作。

30.《刺孟》。此篇列举孟子言行中自相矛盾处多条。有人以为此篇为后人伪作。

31.《谈天》。讨论有关地形方面的问题。

32.《说日》。用非神秘主义的观点解释各种天象。

33.《答佞》。昏庸之君不能知贤,不知贤则不能知佞。

34.《程材》。讨论如何衡量人的材能、行操。

35.《量知》。论儒生文吏的学和知。

36.《谢短》。讨论儒生、文吏各自的短处。

37.《效力》。此篇论才、力,文吏以处理事务为力,儒生以学问为力。

38.《别通》。讨论关于通人的问题。通人即博通古今之人。

39.《超奇》。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书传撰写奏疏者为文人,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胜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鸿儒乃超之又超者,故论其"超之

奇”。

40.《状留》。论贤儒(鸿儒)迟留难以仕进的状故。

41.《寒温》。寒温乃天地节气,非人所为。

42.《谴告》。以大量事实驳斥当时流行的天以灾异谴告人君之说。

43.《变动》。批评政治得失引起天道变动的说法。

44.《招致》。此篇已佚。

《论衡·自然》称以上四篇为“四疑”,可见《招致》也是以批评神学迷信思想为主旨的。

45.《明雩》。用祭祀的方法求雨,乃无益之举。雩,祭祀以求雨的仪式。

46.《顺鼓》。久雨击鼓以求晴叫做顺鼓,王充批评这种做法。

47.《乱龙》。言设土龙以求雨之事。此篇赞同董仲舒的观点,与其他篇观点不合,有人以为是后人伪作。

48.《遭虎》。驳斥功曹为奸,导致虎食人之说。

49.《商虫》。驳斥部吏为非导致虫灾的说法,指出天道自然无为,吉凶皆是偶然。

50.《讲瑞》。谈关于符瑞的问题。

51.《指瑞》。天地间常有吉凶,并非人的行为招致。

52.《是应》。批评俗儒崇古而短今,言瑞应则厚前而薄后。主张以实而定之。

53.《治期》。国家兴起昌盛并非德行所成,衰落废亡也并非德行所败,昌衰兴废,皆决定于天时。

54.《自然》。“天地无知”,“天地无为”,天道自然,而物自生自为。此篇集中表达了王充的自然观。

55.《感类》。阴阳不和,灾变发生,这或是前代留下的祸患,或是气使之然,贤圣引此自责,恐惧畏慎,是不应该的。

56.《齐世》。上世之天与下世之天同,上世之民与下世之民同,

即所谓“齐世”。此篇为称誉汉朝之作。

57.《宣汉》。宣者显也。说汉有圣帝，天下太平，汉胜于周。

58.《恢国》。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

59.《验符》。谈论有关符瑞的事。

以上四篇皆颂汉之作。

60.《须颂》。帝王建立鸿业，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明，万世乃得闻。

61.《佚文》。述佚失的古文《尚书》等书，故曰“佚文”。

62.《论死》。说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提倡薄葬。

63.《死伪》。以事实说明人死为鬼说的虚妄。

64.《纪妖》。讨论“妖祥之气，吉凶之瑞”的种种现象。

65.《订鬼》。人死精神不能为鬼。鬼乃人思念存想所致。人病则忧惧，忧惧则出鬼。

66.《言毒》。谗夫之口，其毒酷甚。

67.《薄葬》。圣王之业，以薄葬省用为务。

68.《四讳》。俗有四种忌讳，王充逐一驳之。

69.《时谏》。批评岁时迷信。

70.《讥日》。批评时日迷信。

71.《卜筮》。卜筮不可信，有神灵、问天地乃俗儒所言。

72.《辨祟》。世俗信祸祟，王充力辨其妄。

73.《难岁》。批评关于岁星(太岁)的迷信。

74.《诘术》。诘难方术迷信。

75.《解除》。汉代阴阳家称禳凶恶为解除。王充认为解除、祭祀、巫祝均无用，凡事“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

76.《祀义》。凡祭祀，主人自尽恩勤之意，鬼神未必欲享之。

77.《祭意》。意与上略同。

78.《实知》。批评儒者圣贤生而知之的说法。

79.《知实》。举十六事说明圣人并非先知先觉。

80.《定贤》。论何为贤者,以桓谭为汉代贤人之典型。

81.《正说》。前儒不知事情首尾,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以讹传讹,所以"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82.《书解》。讨论古人作书的问题。

83.《案书》。评论六略各书之旨趣。

84.《对作》。此篇乃《论衡》的自序,说明写作的动机和目的。

85.《自纪》。此篇乃《论衡》最后写成之篇,可视为全书跋语,述家世生平及志趣。

王充在《论衡·自纪》篇谈到他著书的目的时说:"我痛恨庸俗的人情世故,所以作《讥俗》之书;怜念人君治理国家,不能制定合适的政策,冥思苦想,看不到发展趋势,所以作《政务》之书;又痛伤伪书俗文,都不诚实,所以写《论衡》之书。"《论衡》一书,纵论天地间的自然之物、自然现象、古往今来的社会问题、政治得失、人性伦理、历史观念,其主旨在于批判一切"虚妄"之说探求"诚实"之理。《论衡》一书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观。王充明确表示自己的天道观以道家理论为依据,虽然违背儒家之说,却合于"黄老之义",说黄老学派"论说大道,得其实矣"。事实上,王充的天道观受荀子思想影响最为显著,《自然》、《物势》篇所表达的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正是发展了荀子《天论》的思想。王充认为,天和地一样,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所构成的。自然界中万物生长灭亡的发展变化,都是天地所含的元气的聚和散的结果。《论衡·自然》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因为万物禀受元气的厚薄精粗各有不同,所以它们的形体性质也就有了差别。

王充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世界万物一样,也是禀受天地所含的元气而生成的。《论衡·物势》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像鱼生于水中,虮虱生在人身上,都是由气生成。"《道虚》篇则说:

"人,物也;物,亦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他认为,人与物之区别,人之可贵处在于人有知识智慧;人之所以有知识智慧,是因为人禀受了气中最精细的部分,即所谓"精气"、"元精"。精气本身没有知觉,它融于血脉中成为血气,而血气又依附于形体。《论死》篇说:"人含五常之气,所以聪明智慧,五常之气所以存于人身上,是因为人有五脏,五脏不伤,人就有智慧,五脏有病人就神智不清,人死五脏腐朽,五常之气无所倚托,人就没了知觉。"他认为精神不能离开人体独立存在,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哲学论题,对正确说明形神关系做出了贡献。

王充反对世界起源问题上的天命目的论。董仲舒说天是人的曾祖父,天有意识地降生万民,同时生了圣君治理他们,生了万物供他们使用。王充在《物势》篇中说:"儒者认为天有意识地生人,此乃虚妄之言。天地之间的气相合,人自然生出来,就像夫妇之气合,子女自然生出一样。天不能有意识地生人,也不能有意识地生成万物。天地之气合,物自然生出来。"他认为人有意志,天乃无意志的自然之物,二者也不可混为一谈。

王充的自然观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他看来,任何事物、现象、过程都是自然产生、自然终结,没有什么原因和条件,也不需要什么原因和条件,这就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同时给神秘主义思想留下活动的地盘。

二、无神论。王充对汉代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各种神学迷信,一一进行分析、批评。《论衡》全书八十四篇,批判神学迷信的占了半数以上。举凡神学目的之论、天人感应之说、谶记纬书、神仙方术、灾变怪异迷信、卜筮、时日禁忌等各种形式的迷信,都没有逃过王充批判的眼光。

自董仲舒以后,汉代正宗思想家都说天子乃天之子,天子受命于天;纬书上更编造出尧之母与赤龙相感而生尧、刘邦之母梦与龙遇而生刘邦的故事,说刘邦为天子,乃上天的安排。王充指出万物

皆“因气而生”，同类之物方能交接，龙与人异类，怎能相感生人?纬书又说圣君受天命时，天会生出祥瑞来。王充批评说：“天道自然无为，若能生出祥瑞，便是有为，就不成其为天道了。那些所谓祥瑞，不过是人事与自然现象的巧合罢了。”在这里，王充实际上批判了天子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的理论，击中了汉代神学的要害。

“谴告说”乃汉代神学之重要内容。董仲舒说，国家政治若有失误，天就要降下灾异谴告人类。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谴告说成为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攻讦的工具，也成为君主转移矛盾欺骗世人的手段。王充看到了这一点，他批评说：“世道衰落，朝廷上下互相非难，灾害时常发生，于是就有人制造谴告之言了。”“天既然能谴告人君，也就能够选择人君，天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尧舜那样的人君呢?如今选择昏庸之君，失道废德，随时谴告，天为什么这样不怕劳苦?”王充指出，说人之精诚可感动上天，天又以灾变谴告人类，全是无稽之谈。

王充对鬼神迷信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说：“人和物都是由气生成，物死不为鬼，人死为什么独能为鬼？人的精神须依赖形体发生作用，人血气枯竭，精气就会灭亡，精气灭则形体腐朽，形体成为灰土，又怎么能成为鬼呢？人死精气散之，不能为鬼，也没有知觉，于是便不能害人。因为没有知觉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是不能加害于人的。”他指出：“鬼神观念是人患病时，因有恐惧感而胡思乱想产生的。墨家信鬼神又倡薄葬是自相矛盾，只要让人们明白死后无知，不能为鬼，厚葬之风自然可以禁止。”

王充对世俗迷信也作了批判。他指出卜筮根本无法预知吉凶，因为人们可随意解释卜筮的结果。雩祭求雨，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天之阴阳自有其时。禳灾、祭祀、巫祝皆为无益之事，祭祀仅可作为纪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当然王充对神学的批判并不彻底，他主张“神道设教”，赞同保留某些宗教仪式，在《感虚》、《商虫》等篇中，还明显地留有天人感应神秘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性命论。王充认为，人和物一样，都是禀受元气而生的。虽贵为王侯也不例外。但人和物究竟不同，庶民和王侯也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那是因为人有性和命。

在人性论方面，王充对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相混论均不赞同。他按照品德高下将人分作三类，认为中等以上的人性是善的，中等以下的人性是恶的，中等的人性是善恶相混的。他认为人性有善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下一样，才高的不可能低下，才劣的也不可能居高，说性无善恶，就像说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荒唐。他以为人性与人才一样，极好的（善）和极差的（恶）较难改变，而中人之性是容易变化的。改变人性的手段是教育和学习。《论衡·本性》篇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他又举例说，文吏自幼习笔墨，不闻仁义之语，长大为吏，舞文弄法，徇私害民，他们的人性不全都是恶的，所以为恶是因为所学习的东西违背了圣人之教的缘故。王充认为上等的人和下等的人很少，绝大部分是中人。即便是生来就属性恶之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其性变善。《率性》篇说，性恶的人心就像木石一样，但木石尚可为人所用，何况人心并不是木石呢？总的看来，王充承认人之性均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尽管他曾说过天生的极善极恶的人是不可改造的。

《论衡》中谈到命的地方很多，举凡人的寿夭、贫富、贵贱、吉凶皆归结为命。在王充看来不管是王公还是庶人，是圣贤还是下愚，只要是人就都有命。人的寿命为什么有长有短？他说禀得坚强之性者，气丰厚而身体坚强，寿命就长；禀得软弱之性者，气单薄而身体羸弱，寿命就短，这就是"寿夭之命"。人的贫富贵贱又是什么决定的呢？《论衡·命义》篇说："天布施元气而众星布施精气，众星之气包含在天施的元气之中，众星有尊卑大小的不同，所施的精气也就不同，人禀受不同的精气而生，含此精气而长，于是得到高贵之气则高贵，得到低贱之气则低贱。"王充将人的一切差别皆归结为

所禀元气的不同，这种方法实在过于简单粗疏。当他用气说明人的自然属性时，多少带有一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但当他用气说明人的社会属性时，便不能不陷人神秘主义的窘境，得出与神学命定论近似的结论。

王充认为，人的性与命都禀气而生，但它们却不是一回事。《命义》篇说："操行善恶，是由性决定的；祸福吉凶，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行善得祸，是因为性恶而命吉。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二者不相一致。性可以通过学习改变，而命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也不可逃避的。有的人命当贫困，但却勤劳致富，结果富至而人死；有的人命当卑贱，但却以才能取得尊贵，结果贵至而被免官。修养身心，端正言行，并不能取得福祉；从心谨慎，力戒骄纵，也不能避免祸患。一切都是由命来决定，人本身无可奈何，任何超社会的力量也无法干预。"王充要人们安于命运的摆布，放弃任何主观努力，这种消极的思想是不可取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又可以发现王充命定论思想的积极方面：王充是从无神论观念出发，为驳斥神学目的论而阐扬元气命定论的。当时的神学迷信认为，人的高贵低贱、富足贫穷、长寿早夭、进升废退等等都是由品德善恶引起的，是上帝依据人的德行对人作出的赏罚。由此进行逻辑推演，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富贵发达之人都是善人，穷困位卑之人都是恶人；一个人只要积德行善，便可富贵，如若作恶，便会贫贱，但是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就曾列举与此结论矛盾的现象，且发出"余甚惑焉"的慨叹。王充在《命义篇》中对此作了更加详尽的批判，在他看来，神学家们提出的上天扬善抑恶、赏善罚恶之说绝对不能成立，他找不到批判的武器，不得不用气的命定论取代神学目的论。

四、认识论。自儒家的圣贤迷信观念建立后，不少人认定圣人生而知之，说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纬书上更编造了许多神怪故事，证

明圣人神而先知。王充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认为正确的判断和预见，是根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揆端推类”）、透过迹象探索本质（“案兆察迹”）而得到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王充指出，人要获得知识首先须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即眼见、耳闻、口问。离开这些途径，圣人也不能获得任何知识。圣人的知识也是靠学问得来，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圣人性聪敏，见得多、听得多，所以其知识渊博。众人知识浅薄，见圣人博学多识，便感到神奇，以为圣人生而知之。王充还指出，人的认识能力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人的眼看不见十里之外，耳亦不能闻百里之外，说明人的感觉器官要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离娄眼虽明亮，但不能看清帷帐里面的东西；圣人虽然聪敏，但不能站在墙西仅据声音便知道墙东边的人的职业外貌，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还会受到外界自然条件的限制。

王充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感觉经验的阶段，要通过思考使之深化提高。《论衡·薄葬》篇说：如果以外部的表面现象评定事物的是非，只相信看见、听见的外部现象，而不考察审核其内部实质，这便是用耳目论事，不是以“心意”论事了。以耳目论事，往往只看到虚假的表面现象，看到虚假的效果，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判断是非，不能只靠耳目，必须进行深入的思考。墨子一派学者不用思维来判断事实，只相信耳目闻见，所以有时虽然效验很明显，但实际上并不合于事实。王充虽然不能够正确地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但却看到人的认识必须经过这样两个过程，认识到人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

王充强调学用一致，重视效果。他批评死记硬背、崇尚空谈的学风，指出人云亦云，祖述师说，这种事连鹦鹉都能办到。他强调学习知识要融会贯通，并能应用。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由此观点出发，他激烈批评儒生们“好信师而是古”的学风，认为他们对圣贤之言不加辩难，不予深究，使得虚言怪语得以流行。据此，

他十分强调效验，说只有考察事情的前前后后，弄清它的效验，而后才能判定是非。他又说，评论一件事，如果违背事实，不注重效验，即便你话说得再多再好听，大家也不会相信。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上还停留在朴素直观的水平上。他意识到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感性认识的阶段，但却不能正确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所以有时片面强调感觉的作用，有时又片面强调理性的价值。他看不到人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他的认识论也存在形而上学的缺陷，甚至由此走向不可知论。

五、历史观。汉代的儒生大都厚古薄今，他们说古人身材高寿命长，今人个子小寿命短；古人质朴易教化，今人浅薄难治理。这就是说，人类无论是在体质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逐步退化的。王充反对这种说法。《论衡·齐世》篇说古人今人都是禀受元气而生成，"元气纯和，古今不异"，人的形体为什么会有不同呢？王充认为人的体质不会退化，道德也不会沦丧。有人见古人茹毛饮血，后人饮井食粟；又见古人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居于宫室，以布帛为衣，便说古人质朴，今世文薄。王充认为这是历史的进步，崇古论者所称道的是古代的落后状况，非薄的是进步文明。王充尖锐批评了尊崇唐虞三代，鄙视汉代的思想，说两汉胜过了周代。汉代的疆域比周大得多；经济比周发达，"以盘石为沃田"；社会秩序稳定，"四海混一，天下安宁"；周边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到汉代都接受了先进文化。这些基本上与历史事实相合。他特别辩解说："并不是因为我生当汉世，就故意称颂当代，以求献媚于上。我是审核事理，考定事实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古代学者大都信奉英雄史观，认为社会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圣君贤臣，古时圣贤多所以天下大治，后世圣贤少所以天下常常大乱。王充予以反驳，说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天地历数，不决定于人君的贤愚。《论衡·治期》篇说："昌盛以后必有衰落，兴起以后必有废

替。兴盛并非德行所致，而衰废也与德行无关。盛衰兴废，皆天时所致。世道的治乱，在天时而不在政治；国之安危，在历数而不在教化。国君是否贤，政治是否清明，对治乱都没什么影响。"王充力图用自然的原因说明社会的安危、国家的兴衰，从而否定当时流行的圣贤主宰社会、决定兴衰的英雄史观，这样他就由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不能揭示社会治乱的规律及其原因。

王充在世时，他的著作仅在东南吴会一带流传，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后来有人将其带到中原地区，遂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说："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指许昌)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太平御览》第六○三卷引袁山松《后汉书》也说："王充所著《论衡》，北方未有得之者。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经蔡邕、王朗之手，《论衡》得以在中原地区流传，并以异书、奇书的姿态受到历代学者青睐。《论衡》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论衡》促使东汉后期学术风气发生变化。王充的时代，神学经学已经走了下坡路，它的荒谬、繁琐、无聊、矛盾百出，使不少学者感到厌烦，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试图重新振兴经学，但却更加暴露出它的内部矛盾与谬误。王充的《论衡》像一把利刃，刺中了神学经学的要害，引发了学术界离经叛道的倾向。蔡邕引《论衡》以助谈论，王郎读其书人称才能长进，可见当时学者普遍厌弃神学，对异端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孔融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这种言论受《论衡·物势》篇"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之说的影响甚为显著。类似这样的"非礼"的言论后来愈生愈

烈，至魏晋时遂发展为轻慢礼法、蔑视名教的社会思潮。王充开汉代思想批判的风气，后来王符、仲长统承此学风，转向为政治批判。王充堪称东汉社会批判思想的开创者。《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韩愈并称三人为三贤，都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论衡》吸收先秦以来无神论思想之精华，将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无神论理论体系，在中国无神论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魏晋的无神论、范缜的神灭论及后代的各种无神论理论，无不受其影响。可以说，王充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最深刻、影响力最大的无神论者。章太炎在《检论》中评价王充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鲜有能逮者。"

再次，王充对天神崇拜、世俗迷信有摧陷廓清之功，为魏晋玄学开辟了道路，《论衡》的许多篇章，为汉魏间新思潮及玄学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料。

（李　泉）

参考资料：

王充：《论衡》

《后汉书》：《王充列传》

班固著《汉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 32 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 92 年）。其七世祖班壹，生当秦汉之际，避乱于雁门郡之楼烦（今山西宁武），有马牛羊数千群，以多财而为边地之雄豪。五世祖班长，官至上谷太守。高祖班回以茂才为长子县令。曾祖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至上河农都尉，考课连年第一，被召回京师任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其女被选入宫为婕妤。况生三子，长子班伯，通晓《诗》、《书》、《论语》，成帝时出任定襄太守，后入朝为水衡都尉、侍中；次子班游，博学多才，曾与刘向共校秘书，官至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三子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哀帝时出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西汉末年，谷永曾说"建始、河平（皆汉成帝年号）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班氏不仅是官宦世家，西京显贵，而且世传诗书，家学渊源深远。班稚生子曰彪，彪即班固之父。

班彪字叔皮，幼年时与从兄班嗣共同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儒生们纷纷从远方赶来相会，著名学者扬雄等人也曾登门拜访。班嗣虽修习儒学，但最推崇老庄之术。班彪则尽心于"圣人之道"，于经书造诣颇深。在他二十岁那年，刘秀称帝，当时隗嚣割据于陇西，公孙述称帝于益州，其余割据者大的连接州郡，小的占据县邑。隗嚣问班彪说："周亡后战国并争，天下分裂，好几代才安定下来。现在的形势和当初是否很相似？不知道天下会落在哪一个人手里。"班彪说："周朝的废兴，与汉代根本不同。周行五等爵制，

诸侯权大，本弱枝强，所以后来便有纵横征战之事。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上专政，大臣不能世代掌权。到了成帝，把政权给了外戚，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甚短，导致王氏专权窃位。危机自上而起，人民没受损伤。所以王莽称帝后，人民不服，中外骚动，人心思汉。当今割据的豪杰都没有当初七国那样世代经营的大业，而人心又都思念汉朝，结局不是明摆着的么？"隗嚣说："先生您论周、汉形势不同是对的，至于您听见那些愚民习惯于称刘氏姓号，便说汉家复兴，可就不妥当了，当初秦失其鹿，刘邦逐而得之，那时的人难道知道以后会有个汉朝？"班彪不同意隗嚣的说法，又不敢正言反驳，于是便写了一篇文章，名曰《王命论》，说刘氏承唐尧之位，神母夜号，上天降下符瑞，可见王者兴起，自当天授，并非智力可以求得。隗嚣看了，终究不能觉悟，班彪怕以后受牵连，乃奔赴汉西，投靠大将军窦融为从事。窦融对班彪十分敬重，班彪乃帮他出谋划策，为刘秀抗拒隗嚣。后来窦融被征调到京城，刘秀问他："你上的奏章，是谁参与讨论写作的？"窦融说全是班彪所写。刘秀早就听说班彪有才能，于是亲自召见他，后来司隶校尉推举他为茂才，授以徐县县令。

班彪有才气又好作文章，专心研究史籍。司马迁《史记》记述史事仅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后来不少人缀集时记，进行续作，但多鄙俗不堪，放在《史记》之后，简直就是狗尾续貂。而扬雄、刘歆之作，虽然水平不低，但他们褒美新朝，观点大谬，不可任其流传后世。于是班彪采集前代遗事，整理比较不同的材料，写成了《史记后传》百余篇，并对古代史学的发展、史书的得失进行了一番评论，班彪的评论说道：

"从《诗》、《书》来看，唐虞三代都设有史官，各诸侯国也都有史书，所以孟子说：'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鲁定公、哀公时候，鲁君子左丘明论集《春秋》之史，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集不同的史事，名曰《国语》，共二十一篇。从此《乘》、《梼杌》湮灭，只有《左传》、《国语》广为流传。还有记述黄帝以来公侯卿

大夫的史书，名曰《世本》，计十五篇。记述战国史事的，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初太中大夫陆贾记楚、汉相争之事，作《楚汉春秋》九篇。武帝时司马迁采集上述诸书的史料，记述上自黄帝下迄武帝间的史事。司马迁记下汉代之事，这是他的功绩，但他记汉代以前的历史，疏略之处很多，其议论浅薄而不确当。他评论学术，则崇尚黄老而鄙薄五经；叙述货殖，则轻视仁义而羞于贫穷；道说游侠，则鄙视守节而重视俗功。这是他的最大缺点，难怪他后来受到极重的刑罚。但他善于叙事说理，雄辩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文采与事实相称，堪称良史之才。如若他能遵从五经的观念，与圣人见解相同，那就无可挑剔了。百家之书也有可取之处，像《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现在的人可以靠它们知道古代，后代人可以靠它们知道前代，这是圣人的耳目。司马迁写帝王之事称本纪，写公侯传曰表曰世家，卿士特出者曰列传。但他却把项羽列入本纪，陈涉写入世家，淮南、衡山为宗室之王，却降至列传。从细微处看，其体例并不一致。像这样一部大著作，从古到今，贯穿经传，内容可以说是至为广博了。文字多，头绪多，以一人之精力，不可能修改到前后整齐划一。我本人所作的后篇，审慎地考核其事，力求使文字整齐，不作世家，仅写纪、传而已。”

班彪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作过认真研究，对于《史记》的体例体裁、史料来源、叙事才华、治史态度、历史观点均作了评论，肯定了司马迁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史记》的某些缺点。尽管他以儒家卫道士的口吻，尖刻地批评司马迁的异端思想，以至引起后代不少史家的非议，但他对史书撰写方法的评论，可以说是颇有见地的，这是他写作《史记后传》的心得之谈，也是班固写作《汉书》的指导思想。

班彪写作的《后传》今已不存，其内容大部分被班固写作《汉书》所袭用，如《汉书》的元帝、成帝本纪，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还

可看出《后传》原文的痕迹。

班彪曾受司徒玉况征辟，任其属官。他上书光武帝，建议简选名儒任太子太傅，为刘秀所采纳。后司徒举其为廉吏，出任望都县长。建武十年(公元34年)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二岁。他一生还著有赋、论、书、记、奏事总共九篇，今均失传。班彪生有二子，其长子就是班固。

班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九岁便能诵诗赋、写文章，十六岁时到洛阳人太学读书，历时八年之久。他不仅熟习儒家经典，而且对于诸子百家学说，也进行了广泛深人的探讨。班固不专习一家之学，也不死守章句，以领会文章的意义为目的。他性情宽厚温和，从来不以才高而骄傲，所以受到当时学者的赞誉。班彪死后，班固离开太学，回到家乡扶风安陵，为其父守丧，并着手整理他父亲写作的《史记后传》。永平元年(公元58年)他开始摆脱前代史家续补《史记》的窠臼，断代为史，编撰《汉书》，这一年他才二十七岁。

班固为什么一改《史记》通史成规，写作断代史书呢?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历史观念有直接关系。其一，建武、永平之际，是东汉统治相对稳定、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了解前一朝代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史记》乃通史之作，它所记述的大都是汉代以前的史事，东汉初年当政者所急需了解的近代的统治经验，它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加以总结。班固舍弃古代史事，专门记述汉朝事迹。总结西汉一代的统治经验，是东汉初年政治统治的需要，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其二，《史记》内容之下限至于武帝太初年间，随着时代的演进，续作者日益增多，褚少孙、刘向刘歆父子、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人都曾经搜集资料，作过续补。建武年间，班彪因对这些著作均不满意，又进行了全面改作。对于班彪所续之书，班固仍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十分详备的程度。而且，对于《史记》的观点及体例，班固也

不完全赞同。所以他不再像以前的学者那样，仅仅局限于续补《史记》，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观念看法，重新编撰一部史书。其三，东汉初年，“汉承尧运”、“协于火德”之说已为统治阶级所公认。如果依照前人成规，续编汉史，不但不能宣扬“汉德”，而且势必像司马迁将高祖的本纪编排在“百王之末”，置于秦始皇、项羽之列一样，把光武帝的本纪也编排在王莽之后，与刘玄、刘盆子为同列，这是当时统治集团所不能允许的。这样的形势迫使他摆脱旧传统，开创新体裁。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曾自述其编撰《汉书》的目的说：“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可见他是为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而断代为史的。

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在家编撰《汉书》已历五个年头，忽而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明帝下令逮捕班固，将其囚禁在京兆郡的监狱中。他的弟弟班超怕他受郡吏拷讯，没机会把话讲明白，于是奔赴洛阳，上书给明帝，替他辩白。这时地方官吏也把班固的书稿送到了京师。明帝看过之后，很赏识他的才学，便召他到京城的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代皇家书藏图书的地方，设令史六人，秩皆百石，负责保管国家图书典籍，校定秘书。班固任此职后，有机会阅读国家各种图书秘籍，为他写作历史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他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共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第二年便升任为郎，负责校雠秘书。他又撰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事迹，写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后来这些著作成了东汉的当代史——《东观汉记》的一部分。这几项工作完成后，明帝就令他在兰台写作《汉书》。从此班固便集中精力，以著述为业，继续从事撰写西汉一代历史的工作。

班固不仅是一位史学家，而且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自从任

郎官后，他与皇帝的关系日渐亲近。当时京城洛阳营建宫室，修筑城池，颇增烦费，关中年老而有声望的人都希望迁还故都。班固见前代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人都曾以文辞讽劝君主，于是写成《两都赋》，盛赞洛阳之美，以批评迁都的言论。当时章帝年方弱冠，习儒术，好文章，很欣赏班固的文才，常常让他到宫中讲读书籍，有时竟连日继夜。皇帝外出巡视时，他便献上赋颂；朝廷有大事需要讨论，便让他向公卿大臣提问题，在皇帝面前参与辩论。建初三年（公元78年），四十六岁的班固升任玄武司马。这是一个秩比千石的中级官职，负责守卫玄武门，与皇帝较为亲近。第二年，汉章帝召集诸儒于白虎观集会，讨论五经异同，用皇帝的名义制成定论，班固以史臣、近臣、名儒的身份参加会议，负责记录。会后他将记录的内容加以编排整理，撰成《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一书。建初七年（公元82年），除八篇表和《天文志》外，《汉书》的其余各篇均已杀青定稿。经过二十五年的不懈努力，班固终于写成了这部千古传诵的史学名著。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任命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班固随军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窦宪令班固作铭，刻石记功，宣扬汉朝威德。第二年北匈奴遣使求和，欲效仿呼韩邪单于，朝见天子。窦宪上奏和帝，派班固暂时代理中郎将的职务率数百骑出居延关迎接。当时正值南匈奴大败北匈奴，班固行至私渠海（今蒙古杭爱山南），听说漠北大乱，乃返回京师。窦宪以外戚专权，引起和帝不满，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剥夺了窦宪的兵权并逼他自杀，班固也因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免官。班固家教不严，他的子侄辈大都不守法度，地方官吏叫苦不迭。洛阳县令种兢曾受过班固家奴的侮辱，遂乘机报私仇，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一生著有《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到南北朝时尚存四十一篇。而今这些文章大部

分已佚失，只有《汉书》全文流传至今。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组成。《汉书》则分为帝纪、表、志、传四个部分。全书共一百篇，后人分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到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一)帝纪。

帝纪是西汉一代的编年大事纪，共十二篇。《史记》原作"本纪"，《汉书》改称"帝纪"。

《高帝纪》、《惠帝纪》、《高后纪》、《文帝纪》、《景帝纪》五篇乃据《史记》各本纪写成。《史记》无惠帝本纪，其事见于《吕太后本纪》中，《汉书》析出独自成篇。与《史记》相比，《汉书》各帝纪在体例和内容上有如下改进增补：一、《史记》本纪记事，对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不甚重视，有时标明年、月，有时则只标年而无月。《汉书》帝纪于记事之前，必标出年、月，乃至于日，月日不可确考者，亦必标出季节，故其时间线索更明晰，记事之纲领性更强。二、《汉书》帝纪内容较《史记》本纪详细，且增人大量重要诏令，因而史料价值更高。如《高帝纪》五年灭项羽后，便增入分封韩信、彭越的诏令，大赦天下的诏令，诸侯劝刘邦即帝位的上疏，分封吴芮及粤王的诏令，以及常为史家引述的罢兵归田、"复故爵田宅"、"以有功劳行田宅"的诏令等。再如文帝元年三月，《史记》仅记赐鳏寡孤独等"布帛米肉各有数"，而《汉书》则详录文帝之诏书。《史记》文帝七年至十三年夏，六年间事缺而未记，《汉书》不仅记其间之大事，且具录二十年赐民租税之半的诏书、置三老孝悌力田的诏书，此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三、增记日月食及异常的自然现象，水、旱、蝗等自然灾害。

《史记》中有《孝武本纪》，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确写过武帝的本纪，但最迟到元、成之际，此篇已经亡佚。据说是当时汉武帝读过他个人的本纪后很不满意，乃令人毁去，后来元、成

之际人褚少孙将《封禅书》略加整理补入以充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武帝本纪》。《汉书·武帝纪》据帝纪体例重新写作，内容较以前各帝纪条理、翔实。

《昭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哀帝纪》、《平帝纪》六篇乃新增之帝纪。司马迁之后续补《史记》者肯定作过诸帝本纪，班彪写作的百余篇《史记后传》亦有帝纪，但他们写的诸帝纪是何面目、班固采用了他们书中的哪些内容今均不可考，但《汉书·元帝纪赞》说："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才艺。"元帝去世距班固出生有六十五年，元帝时做侍中的人不可能看到班固长大成人与他谈论元帝的事情，所以东汉人应劭说上文中的"臣"是班彪自称，其外祖金敞曾作元帝侍中。又《成帝纪赞》说"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明明是班彪的口气，因为他的姑母在元帝时为婕妤，即鼎鼎有名的班婕妤。据此应劭肯定说："元、成帝纪皆班固父班彪作。"应劭的说法虽然有些武断，但我们说《汉书》上述六篇帝纪乃班固以其父之作品为蓝本而撰成，恐怕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二）表。

表共八篇，可分三类。《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六篇为一类，分别谱列各类王侯之世系。与《史记》汉初诸表相比，分类更加合理，标列更为清晰。《百官公卿表》一篇为一类，记录秦汉官制演变和汉代公卿的任免。《史记》虽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但仅记丞相、将军、御史大夫的任免，并未涉及官制。《汉书》此表增记九卿任免，表前长篇序文叙述秦汉官职名称、品秩、职责、统属及其演变，是研究秦汉官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古今人表》一篇为一类，此表将汉代以前的人物分作九等。依时代顺序分等标出，乃《汉书》所独创。

据《后汉书·列女传》说，《汉书》的八篇表出自班昭之手。班昭一名姬，字惠班，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固生前，《汉书》的八篇表

题目虽已拟出，形制也已确定，但却没有写成。班固卒后，和帝下令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中继续写作《汉书》八表，并且几次召她入宫，令皇后、贵人拜他为师，号曰“大家”，因班昭的丈夫姓曹，所以后人亦称其为曹大家。每当外地贡献奇异之物时，皇帝则令班昭作赋作颂。邓太后临朝称制时，班昭还曾参与朝政。当时《汉书》方才公布，一般人都读不通，扶风人马融乃拜伏阁下，跟班昭学习《汉书》。班昭曾作《女诫》七篇，后来广为流传，她一生著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十六篇，后均散佚。班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

（三）志。

班固所写西汉历史称《汉书》，其中篇名不能再称书了，所以他只将《史记》的“书”改称曰“志”。《汉书》的志共有十篇。分别是《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

范晔曾称赞《汉书》“文赡而事详”，颜师古称它“宏赡”，王鸣盛也说它“记事详赡”。记事详细具体，是汉书的突出特点，也是它的一大优点。这个特点在其十志当中表现得很充分。《汉书》十志取法于《史记》的八书，但其规模宏大，对于政治、经济、制度、天文、地理、思想、文化等方面均有系统的记述，比起《史记》的八书来，记述的范围扩大了，内容也更加丰富而完备。

从内容来看，《汉书》十志中有六志来源于《史记》八书。《律历志》乃据《史记》的《律书》、《历书》写成，它实际上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律”的，“律”是一种用竹管或金属管做成的定音或候气的仪器，用若干长短不同的管可分出高低不同的音调，并以此作为乐器音调的标准。这一部分主要讲五声八音等乐理知识及度、量、衡等方面的规定。另一部分是关于“历”的，讲述历法方面的知识及古代历制。古时乐律有十二，阴阳各六，阳称律，阴称吕，《吕氏春秋》开始以律与历相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所以《汉书》将律、

历合为一志。

《礼乐志》乃据《史记》的《礼书》、《乐书》扩展而成。“礼”不只指礼仪礼节，而且泛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伦理道德规范。乐主要是指乐歌舞蹈。班固说：“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就是说，乐舞可以用来加强内心修养从而使人们之间关系和乐；礼制可以用作外部强制来区分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异。因此他将礼、乐合为一书。此志讲述礼、乐理论较少，而重在叙述其发展历史，其中主要是叙述西汉各朝制礼作乐之事，亦提及东汉光武、明帝时之礼制。文中所记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的奏疏，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郊祀志》乃据《史记·封禅书》写成，主要记述历代有关祭祀、封禅、神怪迷信、神仙方术及五德之运等方面的内容，所记以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一朝为最详。

《天文志》乃据《史记·天官书》写成。天文知识部分主要依据《天官书》，同时吸收了汉代的科学成果。“天变”部分新增的内容居多，主要记西汉各朝日食、月食、异常星相，同时记及自然灾害、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和农民反叛的事件，对研究汉代自然、社会史均有重要价值。

班固卒时《天文志》尚未写出，后来由马续补成。马续字季则，马严之子，马融之兄。他自幼聪敏好学，七岁能通《论语》，十三岁明《尚书》，十六岁治《诗》，博学群书，对《九章算术》亦有研究。马续的弟弟马融曾跟班昭学习《汉书》，马续则补写了《天文志》。

《沟洫志》源于《史记·河渠书》，但比《河渠书》内容丰富详赡，它记述了战国以来的水利建设，对汉代治理黄河的情况记载尤其详细，所载治河对策亦甚多，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乃古代治水理论上的重要文献。

《食货志》源于《史记·平准书》，但多所创新。《平准书》仅记载汉初的经济状况，而《食货志》系统记述了西周至王莽末年农业、商

业发展的情况及经济制度、政策，为研究古代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它是《汉书》当中最有价值的篇章之一，也是古代经济文献中的名篇。

《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乃《汉书》所首创。《刑法志》记述西周以来的刑法沿革，西汉一代有关刑法的奏疏、诏令，亦述及商周赋税制度、兵制等。《五行志》在十志中所占篇幅最大，记述春秋以来的自然灾害、反常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其中虽然充满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丰富的科学史料。《地理志》是我国政区地理著作。它先述古代九州划分、山川分布、各地土质，次述汉代行政区划沿革、各郡户口、山川方位、城邑关塞、名胜古迹及全国垦田面积，末述各地区经济文化、风土人情、方物特产、人文地理等，所以说它也是我国较早的历史地理著作。《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写成，它反映了西汉政府藏书的基本情况，论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渊流变和是非得失。后来刘歆的《七略》失传，其基本内容赖此志得以保存下来。它是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为研究古代学术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传。

《汉书》传共七十篇，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类传、合传，共五十九篇。其中记述秦汉之际重要历史人物的四篇，分别记述了陈胜、项羽、张耳、陈馀、魏豹、田儋、韩王信、韩信、彭越、英布的事迹；记述同姓诸侯王的有八篇，凡记刘邦兄弟、从兄弟、侄辈为王者四人，刘邦之子封王者六人，文帝子为王者三人，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武帝子为王者三人，宣帝子为王者六人，此类人物《史记》多归人《世家》，《汉书》将《世家》并人列传，遂为此类同姓王立八篇合传；记述西汉一代官吏、武将、文人学者等人物的传记四十五篇，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传一篇，《王莽传》一篇。

第二类是类传，共七篇。《儒林传》一篇记儒家学者二十七人；

《循吏传》一篇记奉法循理的官吏七人;《酷吏传》一篇记为政严酷的官吏十三人;《货殖传》记春秋至汉代著名工商业者十二人;《佞幸传》记君王的宠臣、弄臣七人;《游侠传》记行侠仗义之士七人;《外戚传》记皇后及帝王嫔妃共二十五人。

第三类是杂传。其中有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记三篇,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其性质相当于边疆地方史。有《叙传》一篇,相当于全书的总序或后记,作者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写作动机、撰写过程及全书的篇目。

《汉书》记事详赡的特点,在列传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其一,在《史记》列传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篇目。把《汉书》与《史记》对照,新增加的汉武帝以前人物的传记有:王陵传、吴芮传、蒯通传、伍被传、贾山传、李陵传、苏武传。另外,《史记》没有给张骞立传,只是在《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之后附带加以介绍,《汉书》特立《张骞李广利传》,详细介绍张骞生平及两次出使西域的情况,给了这位开创中西交通道路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史记》只是在《儒林列传》中给董仲舒写了一个几百字的简短小传,而《汉书》特为董仲舒立一专传,介绍他的生平、言论,使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儒学大师的思想理论。

其二,在《史记》原有的传记中增补新的材料。如《汉书·萧何传》中,增入项羽入关,屠烧咸阳,违约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大怒欲攻项羽,萧何劝止,刘邦乃西入汉中这一段重要的史实。《韩信传》中增入韩信率兵击魏王豹前,与郦食其讨论魏王使何人为将的一段话;虏魏王后,又增入韩信使人向刘邦请求增加兵员,以便进击燕、赵、齐,断绝楚之粮道的一段话。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史料。此外,在王陵、刘交、刘安、李广、卫青、公孙弘等人的传记中,也都增加了一些不见于《史记》的新材料。

其三,与《史记》相比,《汉书》的人物传记中收录了更多的对策、谏言、奏疏、文章、书信等,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文献。《汉书

·董仲舒传》全文照录了他的“天人三策”，为研究董仲舒的思想提供了最重要、最可靠的材料。《贾谊传》中收录的《治安策》，乃是西汉前期解决封国问题的重要政论文章。其他如晁错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路舒温的《尚德缓刑疏》，邹阳的《讽谏吴王疏》，枚乘的《谏吴王疏》，公孙弘的《贤良策》，也都分别全文载人各人的本传中，这些文章，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文献。再如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研究他们父子二人学术观点、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因班固将其收人《司马迁传》而得以流传至今的。

其四，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的记载更加详细。在史书中以专篇记述少数民族历史和邻国历史，始于司马迁的《史记》，而班固则出色地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且有所发展。班固搜集到许多新资料，把这些传记写得更生动、更充实。他扩充了《大宛列传》的内容，将其改写为《西域传》，叙述我国新疆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记述了匈奴人对西域的征服、统治，以及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对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中亚古国的历史也作了记述。对于《史记》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诸传记，班固也都作了补充，《西南夷传》增加史料接近一半，《匈奴传》内容增加了五分之三。这些不仅是研究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材料，也是研究中亚地区古民族史的重要文献。

其五，武帝太初以后人物的传记，由于综合了众家续补《史记》的作品，同时运用了大量档案资料，所以较之太初以前的人物传记，内容更为翔实。如《王莽传》写王莽的发迹、新朝的建立、社会危机的逐步加剧直至新朝灭亡，全文长达四万字，内容曲折详尽，堪称一部新朝史。

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个把历史和文学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杰出的史传文学作家。《汉书》列传中的人物，也和《史记》差不多，上至王侯将相、大小官吏、文人儒生、谋士说客，下至游侠之士、商

贾士人，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班固对其中许多人物的刻画描写都相当成功。

《汉书》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表达文章的主题，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如《贡禹传》照录贡禹上疏质问元帝的话："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猪犬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肥大，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邪？"《鲍宣传》引鲍宣的话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严延年传》中则借严延年母亲之口斥责他"多刑杀人，欲以立威"。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深刻揭示当时的社会问题或人物的本质。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苏武传》。在这篇传记中，班固着力描写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德，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塑造其英雄形象。李陵与苏武的一段对话，则更深刻地反映出两人不同的内心世界，反衬苏武形象的高大。李陵多方劝导，欲令苏武投降匈奴，但苏武丝毫不为所动，最后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李陵内心受到震动，乃喟然长叹："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最后写李陵送苏武回国的一段话，更富有感染力："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陨。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李陵英勇善战，不得已投降匈奴，但仍时常怀念故国，思念亲人，读后催人泪下；苏武正气浩然，誓死如归，读后又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其次，《汉书》列传在叙写人物重要言论行为的同时，也注意通

过生活琐事的摹写，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精神面貌。如《陈万年传》说，陈万年善于巴结上司，贿赂外戚，所以做了高官。一次他生了重病，把儿子陈咸叫到床前，叮嘱教诲，说了半夜话。陈咸直打瞌睡，头碰到了屏风上。万年大怒，拿起棍来要打儿子，并说："老子教训你，你反而困觉，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这个样子？"陈咸叩头谢罪说："您说的话我都明白，大意是要我学会巴结人。"万年哑口无言。文章不长，但一个逢迎拍马、媚事权贵的官僚的丑态，被揭露得淋漓尽致。《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做官前后不同的精神面貌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平实自然，但却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会稽人朱买臣家贫，好读书，常一边担着柴，一边读书，妻子感到羞辱，把他臭骂一顿，和他离了婚。一天妻子和新丈夫在扫墓时遇见了饥寒交迫的朱买臣，唤他吃了顿饱饭。几年后朱买臣随上计吏到了京师，上计吏都当乞丐对待他。后来他虽做了太中大夫，但不久又被免官，他不得不常找看守会稽郡官邸的人寄居、讨饭吃。不久时来运转，汉武帝任命他做了会稽太守，朱买臣仍旧穿上旧衣服，怀里揣着官印来到会稽郡邸。当时上计吏正相聚喝酒，没人理睬他。朱买臣故意将官印的带子露出一截来，守邸者去拉带子，见到官印，很吃惊，告诉大家。上计吏醉了，一个个大叫"是假的"。守邸者强拉几个人去看。他们看了以后，惊呼道："是真的！"满座惊骇，赶忙把朱买臣请到中庭拜见。朱买臣衣锦还乡，又故意羞辱他的前妻，致使其自尽。区区几件小事，就把当时的世态炎凉，士官僚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列传的编目方面，《汉书》也做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史记》列传大体以传主时代顺序编排。但类传人物多，时间跨度大，《史记》仍力图以时间先后排列，结果显得编目十分混乱，如《刺客列传》竟置于吕不韦、李斯二传之间，《循吏列传》则置于淮南衡山与汲郑二传之间。有些时序不明的杂传更难以安排，如《匈奴列传》置于李广、卫青霍去病传之间，尚有可说，但将《大宛列传》置于《酷吏列

传》之后，则无任何道理。《汉书》的编排则较整齐，它先编专传、合传，编排时以时代先后为序，次编类传，而后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传，再编外戚、元后、王莽三传。又《史记》篇目名称很不一致，有的以姓标，有的以字标，有的以官名标，《汉书》则一律以姓或姓名为标题，使得篇名比较整齐。

如果说《汉书》在编撰体例、方法上比《史记》有了进步的话，那么在历史观点上，它则比《史记》有了明显的退步。

首先，班固相信神意史观，用它指导《汉书》的编撰。《后汉书·班固传》收录了班固所写的《典引篇》，他说尧是古代最有德行的帝王，他禅位给贤臣，后来历经虞、夏、商、周，此位终于传给了"汉刘"。由此他作出结论，说刘氏"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就是说，刘姓的天下是上天授予的，是运数使然。在《汉书·郊祀志》里他说得更露骨："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汉书·高帝纪》中，班固增入一些神异的记载，神化刘邦，在文末的论赞中又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意思是说，汉是尧的后代，又同属火德，汉朝的建立，是天的安排。这是典型的神意史观。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班固接受了董仲舒、刘向父子的思想，用阴阳五行灾异学说附会人事。他专门创立《五行志》，将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刘向、刘歆、谷永、李寻等神学大师们用天人感应的观点解释星相和异常的自然、社会现象的言论集中在一起，加上自己的意见，编排成篇。他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写成专传，且全文载录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学说的天人三策。《刘向传》中载录其五篇上疏，四篇属于推阴阳言灾异之作。他接受了董仲舒的神学观点和两汉之际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朝着谬误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其次，班固宣扬正统观念，并用它说明解释社会现象。他从那

些下流神学家所编造的谶记纬书中拣来一些杂言碎语，抛弃史学家尊重史实的严肃治学精神，无端地编抛出一个自尧起经历三代直至汉刘的传授系统，并给它贴上金字标签，名曰“天统”、“天之正统”，这样一来，汉政权就神圣尊贵得很了，不仅一般诸侯王、国君不能与之同处一个系统中，就连秦始皇帝，也不过是闰位，不在此正统之中。司马迁作通史，将汉“续百王之末”，列于秦王项羽之后，在班固看来这是极不妥当的，所以他抛弃通史传统断代作史。既然汉是正统，那么项羽便不能入于纪，陈胜只配存于传，王莽篡汉，更是罪恶滔天，只能入传而殿后。《汉书》的体系是他以正统史观为指导思想构建起来的。

班固用正统观念说明历史，也用正统思想对待学术问题。班固以正宗儒家自居，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实司马迁并没有把黄老之学看得比儒家六经更重要，只是没有把儒家放在独尊的地位上，但在班固看来，这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了。班固对汉武帝有微辞，独对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备加称誉，他为正宗儒学大师董仲舒、刘向等人立传加以表彰，在《艺文志》中把儒家“六艺”置于篇首，鼓吹它是“政治之成法”。在序文和赞语中，他时常引述儒家经典，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用正宗儒学家的腔调品评人物、评价史事。

班固用正统观念对待政治问题，充当了封建集权政治的辩护士。他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歌颂了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品德和反抗暴力专制的无畏精神，说郭解“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汉书·游侠传》却批评游侠破坏封建法度，罪不容诛，说郭解“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们谋求生活资料的手段，主张自由竞争，鼓励人们致富。班

固在《货殖传》中除照录《史记》原文外，所增加者仅元帝以后人物事迹四百余字，但从中可看出他宣扬政治上的等级制度，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严加控制。在其他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班固对那些犯颜直谏，有损君王尊严的人持批评的态度，对于荒淫昏庸的君王如汉成帝却美化赞誉，和司马迁对专制君主的揭露、嘲讽相对照，其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士的面孔便暴露无遗了。傅玄批评他"论国体，则饰王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范晔也说"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班固的历史观点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他承认社会历史处于变易之中，并用这种观点观察社会问题，说明历史现象，尤其是在寻求历史变易的原因时，更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观点。比如贾谊《过秦论》说，假若子婴有庸主之才，得中等人物为辅佐，秦朝也不会灭亡。司马迁引此文以论秦朝历史，显然他也赞成这种观点。班固批评贾谊、司马迁"不通时变"，认为秦积弊已久，必定灭亡，即便有周公为辅佐，也是无济于事的。他强调时、势的作用，不赞同夸大个人作用的说法，其观点也是比较正确的。

《汉书》讲势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是由"国势"决定的；刘邦兴起甚速，成功容易，乃是因为正赶上秦政弊端百出，"其势然也"；汉初诸侯王骄淫失道，是因为"沉溺放恣之中，居势然也"。这些分析都是比较合理的。总之，班固能够从一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分析历史事变的原因，具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因素。在说明历史事变的原因时，《汉书》也比较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它说，西汉兴起，是由于刘邦"顺民心"，废秦苛政；文景之治的出现，是由于他们恭俭利民；武帝滥用民力，穷兵黩武，遂使西汉盛极而衰；昭、宣关心"民所疾苦"，与民休息，乃出现中兴局面；此后各帝，渐失民心，终于导致西汉灭亡。整个西汉盛衰的历史，都和民心向背紧密联系。班固接受了先秦、西汉儒家学派的重民思想，用它来说明一个朝代兴盛衰亡的历史，这在中国

史学史、思想史上是一次明显的进步。另外,《汉书》也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食货志》开篇便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他认为能否做到"食足货通"乃是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自古以来,朝代更替,历史变化,和经济政策、经济状况都有密切关系,这也是一种进步的、有价值的历史观点。

《汉书》断代为史,虽然割断了汉与前代的历史联系,难以做到"通古今之变",但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一个朝代社会的各个断面,便于及时地保存和整理前一朝代的史料,所以这种史书体裁被后代史家广泛采用。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如《汉书》者,究两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在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当中,除《史记》和《南史》、《北史》以外,其余全部沿用了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而且《汉书》的一系列编纂方法,也为后代史家所承袭。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说: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一变而成为班固的断代史,司马迁之书富于变化,而班氏之书有固定的格式和法度。司马迁之书写法圆通灵活而神奇莫测,班固之书体例方正不苟而智虑谨严。所以司马迁的写法后人无法摹仿,而班固根据司马迁所创体裁制成一定义例,乃成为后人写作的模式,历代史家沿袭不变,就如同"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班固的史学成就,无论是历史编撰学还是历史哲学,都难忘司马迁之项背,但《汉书》的体例、写法及史学思想对封建史家的影响,却远比《史记》大得多、深远得多。

(李　泉)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后汉书》:《班彪列传》及附《班固列传》、《列女传》

邓氏专权

邓氏，名绥，是东汉和帝刘肇的皇后。她出身名门，精明强干，颇识法度，在和帝病死之后，先后扶植殇帝、安帝继位，以太后身份称朕临朝，号令己出，大事独断，实际掌权达十七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专权太后之一。

邓绥是东汉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出生于功臣显宦之家。她的祖父邓禹是汉光武帝朝的名将，也是最先鼓动刘秀“立高祖之业”，并出生入死为刘氏打天下的勋臣。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继位后，为了表彰和纪念中兴汉室的功臣，选出了二十八名有杰出贡献者，为他们画像并陈列于南宫云台中，史称“云台二十八将”，邓禹便是二十八将之首。他官至太傅，封高密侯。邓绥的父亲邓训，是邓禹的第六个儿子，他不好文学，而志在理政牧民，明帝初，官拜郎中，元和年间，升护羌校尉。邓绥的母亲阴氏，是光武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的亲侄女。邓绥有兄弟五人，分别名邓骘、邓京、邓悝、邓弘、邓阊。她排行老三，是家里的独生女儿，所以备受家人钟爱。邓绥从小聪慧过人，善解人意，年迈的祖母最喜欢她。她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祖母为她修剪头发，因年老眼花，无意中剪刀划破了她的前额，邓绥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左右仆妇、婢女见她额上有血，未免惊问，她却说：“不是我不知道疼痛，实在是因为太夫人垂怜于我，我若是呼疼，反而会伤了老人的好意，所以只好忍住。”小小年纪已能如此体察人心，实属难得。

邓训为官方正，持家甚严，诸子都严加训导，课读诗书。邓绥也

深受熏陶，她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热心女红，却志在典籍，六岁便能读史、作篆书，十二岁通《诗经》、《论语》。每当兄长们诵读经传时，她总是在旁边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要求解答。母亲阴氏看到她那副认真的样子，便打趣地说："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学针凿，却专心读书，难道还想当女博士不成?"邓绥理解母亲的劝诫，便白天学做女红，晚上挑灯读书。家里人看她如此好学，都戏称她曰"诸生"。父亲邓训见女儿知书达理，对她也另眼看待，不论大小事务，常常要同邓绥商议。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邓绥按例应被选入宫，恰巧这时邓训病卒，便守孝在家，三年之中，邓绥思念父亲，终日泪流满面，容颜憔悴，不食盐菜，哀毁异常，以致于人不相识，大家都称赞她是个孝女。邓绥曾梦见自己两手摸天，在荡荡正青之中似有一种乳状的东西，乃仰首舐饮。邓绥醒后自以为奇异，便召占者询问，占者说："尧曾梦到过登天，汤曾梦到过舐天。这都是帝王之盛事，吉不胜言。"又有相面者见邓绥容颜，也极口夸奖，称为成汤骨相。家人闻言，私相庆贺，不过不敢声张。邓禹在世时，常自叹曰："我统兵百万，未尝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旺的子孙。"邓绥的叔父邓陔也曾说："兄长邓训为谒者时，修石臼河，岁活数千人，天道有知，家必蒙福。"当然，这些传闻都是邓氏临朝后，其家人为其附会出的种种吉兆，目的是为邓氏的当权寻找一点"合理性"。

永元七年(公元95年)，邓绥孝服已满，十六岁的她出落得丰容盛鬓，广额修眉，肌肤莹洁，婷婷玉立。这年，宫中又选美女，邓绥得入汉宫。她仪容姝丽，姿质超群，令左右佳丽俱无颜色。和帝一见倾心，不久就封为贵人。和帝时的后宫定制，为皇后、贵人、美人、宫人、采女五级。邓绥入宫不久就得封贵人，地位仅次于皇后，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和帝皇后阴氏的嫉恨。阴氏亦出身外戚大家，她是阴丽华近亲，其曾祖阴识乃是阴丽华的胞兄。阴皇后才色俱佳，入宫最早，承宠最隆。自邓绥入宫后，和帝移情于邓氏，她渐渐感到自

己的正宫地位受到了威胁，对邓氏心怀恚恨，处处想找碴儿整治情敌。邓绥深知宫廷斗争之险恶，但她并没有像一般的嫔妃那样，仰仗皇帝的恩宠争风吃醋，勾心斗角，而是靠着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以静制动，“恭肃小心，动有法度”，巧妙地躲避着阴皇后的攻击。平时谒见阴氏，她必小心伺候，毫不仗势矜持，与其他妃妾交往，克己谦和，即使对待宫中的采女、杂役，也备加关怀，毫不倨傲，因此她深得众心，德称日盛，阖宫悦服。有次她染病在床，和帝怜惜她，令邓氏家属人视医药，许自由往来，不限时日。邓绥反屡次陈请道：“宫禁甚重，若使外家自由出人，上使皇上破例弛禁，下使我家有仗势之谤，上下交损，妾实在不愿这样。”和帝见她如此劳心曲体、深明大义，不由赞叹说：“别人都以家人能入内庭为荣，贵人反以为忧，力加阻抑，实在难能可贵。”于是对邓氏除宠爱之外又加了几分敬重。邓绥越受宠就越深自抑损。每当六宫宴会，诸妃妾竟加修饰，簪珥衣服，焕然一新，独邓贵人淡妆浅抹，不事粉饰。平时所穿衣饰，偶与阴皇后颜色相同，便马上回宫换掉；若与阴后同时进见皇帝，不敢与之并行，不敢正坐；每承帝问，总是先看看阴后的脸色，唯恐与皇后同时答言，混淆尊卑。所以，尽管阴氏煞费苦心，却找不到邓绥的半点差错。恼恨之下，阴皇后竟与其外祖邓朱“共挟巫蛊道”，想咒死邓贵人。和帝得知此事，大怒，立即派专人严究巫蛊案，并废掉阴后，打人冷宫，册立邓绥为皇后。这一年是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邓氏二十二岁。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专制社会，邓绥贵为皇后，必然恩及母家。和帝几次欲封邓骘兄弟官爵，但都被严于律己的邓皇后婉辞谢让。故终和帝一世，邓骘仅为虎贲中郎将，邓悝等人仅为黄门侍郎，邓家权势并不煊赫。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正当盛年的和帝刘肇突然染病身亡，留下二子，一个身患痼疾，一个刚出生百余日，均为宫人所生。年仅二十五岁的邓绥只得走出帷幕，出面支撑朝廷大局。当时，首要的问题是选立嗣皇。邓绥考虑再三，认为皇长子刘胜虽年已八岁，但

身体不健全,难以继承皇位;皇幼子刘隆虽在襁褓,但总会长大,而且皇子越小越容易控制。于是她否定有些大臣主张立刘胜的意见,果断地迎立刘隆为太子,随之即皇帝位。邓氏被尊为皇太后,改年号为延平。由此,邓太后怀抱幼主,临朝称制,开始了独掌朝纲的政治生涯。她首先将和帝朝元老太尉张禹进为太傅,司徒徐防进为太尉,光禄勋梁鲔擢为司徒,争得了朝廷重臣的拥戴;又以皇帝幼弱,令张禹留在宫中,以备不时顾问;鉴于自己年轻,不便常见大臣,将胞兄邓骘擢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公,使其往来宫禁,联络内外;然后,厚葬和帝于顺陵,安置其妃妾侍封园寝,遣送诸王就国;大赦天下,减免贡赋,以安民心。可以说邓氏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崭露头角,处置从容,举措得当。

延平六年(公元106年)八月,刘隆夭亡,邓太后急召邓骘入宫密商继统之事。他们预料还会有人主张迎立刘胜,便不商诸大臣,而由邓太后拟诏册立和帝的侄子刘祜为嗣帝。当夜,邓骘便持符节,用王青盖车密迎刘祜入宫,先授长安侯然后继帝位。这就是汉安帝,年号改为永初。因安帝年仅十三,未能亲政,仍由邓太后执掌朝政。鉴于前朝外戚窦氏揽权势盛,终被诛杀的教训,邓绥尽力在任用官员上不偏不倚,甚至有意贬抑外家。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政治环境中,她以女人之身统驭天下,毕竟有诸多不便,所以,不得不较多地依靠娘家人为左右臂膀,这样,邓氏兄弟势所必然地要跻身廊庙,插手朝政。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除邓京已去世外,邓骘官拜车骑将军,邓悝升城门校尉,邓弘为虎贲中郎将,邓阊为郎中,邓太后又增封骘为上蔡侯,悝为叶侯,弘为西平侯,阊为西华侯,食邑各万石。长兄邓骘定策迎安帝有功,加邑三千户,骘坚辞未受。另外,邓氏又封生母阴氏为新野君,以万户供汤邑。此后,邓氏累世宠贵,族人愈来愈多地加官进爵,封侯者二十九人,封公者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朝

廷已基本上为邓氏族人所垄断。

邓氏临朝之际，正值东汉王朝的多事之秋，在内忧外患交相侵袭的艰难困境中，作为当权者最忌优柔寡断、处置失当。所以邓绥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号令自出，大事独断，军政大权绝不旁落。临朝伊始，她就连下几道诏令，整清内政，稳定局势。主要内容有：赦免建武以来得罪被禁锢之人，复为平民；禁止官民铺张浮华、大搞祭祀，指出“鬼神难征，淫祀无福”，规定非陵庙大祭，朝夕一肉一饭，不得妄加；减节宫内服御珍善华靡之物，郡国贡物悉减其半，斥卖上林苑鹰犬，蠲省离宫别馆米炭；遣归宫婢，各令婚嫁，安置宗室老弱病残，坐事没官者恢复其自由；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等官，执法奉公，检劾外戚宾客中的奸猾不法之徒，整治“假借威权”的邪风。

在封建正统者的眼里，邓太后大权独揽是“牝鸡司晨”，乃亡国之兆，因此，邓氏的临朝遭到过强烈的反对。但她毫不为之所动，反而对那些阻碍、歧视她执政的人，采取了极其强硬的镇压政策。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司空周章认为太后立安帝而不立刘胜，是贪权固位；内重宦官郑众、蔡伦，外倚胞兄邓骘是使宦官外戚交结弄权。对此，周章愤激难持，密结僚友，谋划诛杀邓骘兄弟及郑、蔡诸人，并拟废去邓太后及安帝，改立刘胜。但事尚未发，泄漏机关，邓氏闻告，立即罢免周章之职，周章自忖难脱厄运，服毒自杀。安帝刘祜少年时倒还聪慧敏捷，然而长大后，却多有失德之举，直到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安帝已二十六岁，邓太后对他仍不放心，不肯让他亲政。郎中杜根认为皇帝春秋已盛，早就应该亲掌国政，便上疏太后，要求归政安帝。疏中言词激切，惹怒太后，她不能容忍杜根蔑视女性临朝的偏见，下令收押杜根，并将其装人缣囊，在大殿上乱杖打死，弃尸城外，但杜根并未气绝，在荒野里慢慢苏醒过来，逃奔湖北宜城山中，隐名埋姓，当了酒家伙计。直到邓太后死去，杜根才又被重新起用。还有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联结同列奏请太后归政，被收监治罪。邓太后久持政柄，不仅受到以上诸人抵制，就连邓

氏宗族内部也有人持反对态度。邓绥的堂兄越骑将军邓康，担心太后专权时间太长，宗族盈满，物极而衰，导致灾祸临头，所以也多次劝太后恬退深宫，颐养天年。邓氏不听，邓康便佯称有病，避家不朝，实际上是想以掼乌纱帽，胁迫太后归政。邓绥对此十分恼恨，干脆下令罢除邓康官职遣送出京，并削除他的邓氏属籍。倘若邓康不是邓氏支裔，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全。自此以后，大臣们都钳口不谈归政之事。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是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的时期之一，而邓氏当权的二十年间，恰恰又是这一时期的高峰。自安帝继位以来，每年都有地震发生，再加上水旱虫蝗、风雹山崩猛烈地袭击着贫困的农村，百姓饥馑，民心惶惶，几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这对于邓氏来说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延平元年(公元 106 年)，邓氏刚刚上台，就遇特大水灾，她果断地命令郡守级官吏都要到灾区实地考察，核实灾情，减免灾区租税。次年，又有十八郡遭地震之灾，四十一郡大水为患，二十八处受风雹袭击，邓太后忧心如焚，寝食不宁，殚精竭虑，一一处置：她首先策免了赈灾不力的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以示惩戒；又召见三公，明申旧令，严禁奢侈浪费，缩减宫廷及各级官府用度；谕令以昔日游猎之地及郡县公田分配给农民耕作；又照准御史中丞樊准的建议，禁苛暴，止擅赋，劝农桑，遣使持节抚慰安置灾区民众，采取这些措施后，仍不能为生的，分期分批迁往荆州、扬州等富裕地方就食。这些处置缓和了紧张局势，挽救了大批灾民性命。此后，每遇天灾，邓太后都要亲颁诏令，选派得力官员赈救灾荒。在她的苦心经营下，东汉的社会经济才不至于在严重的天灾人祸袭击下陷人崩溃，有时甚至还能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邓氏临朝期间，东汉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四方诸夷乘机叛乱，北方有匈奴、鲜卑的侵扰，西方有羌人的暴动，东方有“海盗”张伯路聚众生事，南方有“蛮夷”的骚乱。边地烽烟四起，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四川、陕西发生了羌人大起义，

来势凶猛，郡县官吏抵挡不住，不得不连章奏闻。邓太后命车骑将军邓骘率兵征羌，羌乱稍平。邓骘出屯汉阳，不料未过一年，羌人又起，邓骘防备不及，被打得大败，羌人乘胜南入益州，攻杀汉中太守董炳，进而劫掠三辅，势焰极盛。邓太后得报，一面玺书劳勉出征军队，命其继续平定羌人之叛；一面将其兄召还，同时遣五官中郎将迎拜为大将军，百官候望于道。及班师回京，邓太后大会群臣，赐邓骘束修乘马，宠恩显赫，光震都鄙。邓骘无功而返，还得加官进爵，可见邓氏表面标榜公正，其实骨子里仍是偏袒手足。对此，朝廷上下竟无人提出异议，邓氏威福，可见一斑。此后，诸羌时叛时服，叛多服少，成为东汉王朝的最大边患。邓氏兄妹不断调兵遣将，剿抚并用，迭经周折，终于将西羌暴动平息下去，而国库存银，几近告罄。事后，邓太后又诏令赦免战败为俘的羌人，接纳凉州豪杰为掾属以安抚他们。对其他边地的战事，邓氏亦采取了抵御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逐一平定。

邓氏早年即以好学著称，入宫之初，又学习了天文、算术。当皇后时，著名的女文史家班昭奉命入宫续修史书，同时担任后宫妃妾的教师，因她丈夫姓曹，宫里人都尊称她为“曹大家”。邓氏非常敬佩班昭学识，便跟着她认真学习经传。临朝后，她白天处理军国大事，晚上常常读书到深夜，从中吸收治国经验。这使她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眼光不断得到提高，并养成了崇尚学术、注重教化的品格。永初四年（公元110年）二月，邓绥下诏广选博学之人，大史家刘珍及博士、议郎等五十余人中选，在南宫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又诏令内廷侍臣于东观受读经传，让他们学成后，再教授宫人，一时间，宫廷上下，朝夕诵读，充满了文化学术气氛。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又令召集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女四十多人，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开设学邸，选聘师傅，教授经书。她自己还亲自监试，威爱兼施，并诏敕堂兄邓豹、邓康说：“我所以征集群子，让他们读书，实在是因为当今时俗浅薄，巧饰虚

伪泛滥，儒家五经衰缺，若不引导子弟读经，恐怕儒学将会绝断。因此想褒崇圣人之道，以挽救时俗。”可见，邓氏不仅注重从政治上控制朝政，也懂得在意识形态领域明确舆论导向，使之有利于自己的掌政当权。

邓氏临朝期间，并不像其他专权太后那样独宠外戚，而是常兼用宦官，并注意延揽外廷人才，从而获得比较广泛的统治基础。邓氏信用的宦官主要有郑众、蔡伦。二人原为和帝的近侍。和帝在位前期，窦太后称制擅权，窦氏外戚威福自恣，郑众“一心王室，不事豪党”，为人比较正派，和帝与他密定计策诛杀了窦氏，蔡伦亦参与其中，事后，郑、蔡二人因功封侯，郑众还被和帝擢为大长秋，参与政事，传达诏令。史家多认为，东汉“中官用权，自众始焉”，把郑众视为宦官干政的第一人。蔡伦在和帝时已为中常侍，且其人颇有才学巧思，他用树皮、麻布、鱼网等物为原料造纸，光洁平滑，时称“蔡伦纸”，使我国古代的造纸术大大提高。和帝死后，郑众、蔡伦依旧得到邓太后的宠用。平心而论，邓氏的信用宦官，并非亲近昵小，而比较注重才德。但是，她的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助长了宦官势力，东汉后期出现的几次宦官专政，其端倪实在和、安两朝，邓氏也难以尽辞其咎。

邓太后为了“济度百姓，以安刘氏”，多次下诏，擢选人才。永初五年（公元 111 年）十一月，她在求贤诏书中说：“为政的根本，在于用人得当，褒扬贤能之士，是先圣先哲的定制。朝廷很希望多得忠良正直之臣，以避免政务偏失。”当时，在朝廷里聚集了不少人才，如被誉为“关西孔子”的杨震，善抚西域诸族的班勇，勇于刺举、不避权贵的虞诩，聚徒授学的经学家马融，擅长天文历法的发明家张衡，女文史家班昭，还有何熙、李郃、陈禅等，都是一时之选，均受到邓太后的重用。

太后当权日久，虽自己有所顾忌，邓骘兄弟也颇敛抑，但外戚威势还是日盛一日，至永初年间，已是朝廷内外，无不曲承。永初四

年(公元 110 年),邓母新野君阴氏病逝,棺殓时用长公主赤绂,特赠东园器、玉衣绣衾。司空张敏亲自持节护丧,葬礼隆重,极备哀荣。不久,太后弟邓弘又病死,安帝和太后亲往吊丧,大鸿胪持节灵前。太后封弘二子为西平侯和都乡侯,又封早已死去的邓京的儿子邓珍为安阳侯,兼职黄门侍郎。在此后的三年中,邓悝、邓阊也相继弃世,二人长子得袭父爵。永初五年(公元 111 年),平望侯刘毅上书安帝,请求令史官修著《长乐宫注》和《圣德颂》,以记注太后德政,安帝从之。此举便带有明显的谀媚成份。

邓太后尽管独揽朝政,但总的看来,她颇能勤政爱民,没有做过失德的荒唐之事,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从维护刘家汉室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对待手足兄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不得已而用之,并未对他们滥行封赏或纵容犯法。与其他临朝太后相比,她对外家约束是相当严厉的,所以邓氏子弟不敢仗势骄纵。有一次,邓骘的儿子邓凤,接受了镇守辽东的大将任尚赠送的几匹好马,被别人知道了,邓骘十分惶恐,竟将妻子和儿子的头发剃光,穿上罪人的衣服在家等候治罪。邓氏执政期间,还几次亲理案狱,辨明曲直。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夏,她到洛阳监狱审核案犯,其中有一人本来没有杀人却屈打成招,已被判死刑,秋后执行,当时已奄奄一息,由吏役抬到邓太后面前。太后见他勉强抬头四望,欲语又止,感到其中必有隐情,便和颜悦色地询问,得知此人实属冤枉牵累,便将他无罪释放,而将糊涂断案的洛阳令逮捕关进监狱,以抵其罪。邓氏的这些做法,应当说是很明智的。这也是邓太后能够得到大多数臣民拥护的重要原因。

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邓太后已积劳成疾,身患重病。她抱病强起,召见侍中、尚书和朝中大臣,传旨大赦天下,留下遗诏:"朕以无德,托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离大忧。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元元厄运,危于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万乘为乐,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违人负宿心,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自谓感彻天

地，当蒙福祚。而丧祸内外，伤痛不绝。顷以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存亡大分，无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在遗诏中，邓氏既总结了自己临朝以来的风风雨雨，又提请百官恪尽职守，辅佐汉室，表现出她在撒手人寰之际，仍不能放心地将朝政交给安帝。不久，邓太后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一岁，与和帝合葬在顺陵。

在中国历史上，女主临朝称制并不罕见，这种现象历来颇受人们非议，邓氏自然也为不少人所诋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东汉中期皇帝庸弱、国基不稳的条件下，邓氏的临朝专权起到了支撑汉室、安定民心的作用，东汉王朝在邓氏的苦心经营下，减缓了分崩离析的过程。事实上，邓氏的才、学、识比名义上的皇帝刘祜要强得多。邓氏死后，安帝重用宦官，宠依外戚，朝政越搞越糟，便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应把邓氏的专权与历史上那些不顾国家兴亡，只知作威作福的弄权太后视作一类。《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她“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这个评价，应当说是比较恰当的。

（王　云）

参考资料：

《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和帝纪·安帝纪》、《邓训列传》及附《邓骘列传》

《资治通鉴》卷四十八至五十

《通鉴纪事本末》:《两匈奴叛服》

李闰、江京诛邓氏

李闰和江京都是东汉安帝朝的宦官。安帝在邓太后死后，得以亲政。他喜狎群小，庸碌无为，遂使李、江勾结安帝乳母王圣，朋比为奸，诛杀邓氏外戚，剪除异己势力，干预政务，紊乱朝纲。

汉安帝刘祜，本是汉和帝之弟清河王刘庆的儿子，若无特殊机遇，他是无资格登上皇位的。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和帝病死，事出突然，未立嗣子。当时，皇长子刘胜虽已八岁，然身患顽固的慢性疾病，不便继承皇位，皇幼子刘隆仅出生百余日，尚在襁褓之中。和帝皇后邓绥权衡利弊，将皇幼子立为皇帝，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然而，百日幼皇，不耐风寒，登基仅八个月便染病而亡。邓氏只得在和帝近亲支属中选择新的继承人。清河王刘庆与和帝乃手足兄弟，且情深意厚，他的儿子刘祜从小聪明伶俐，有早慧之名。于是邓太后定策，迎刘祜入宫为和帝嗣，并扶植他登基，这就是安帝。安帝年甫十三，仍由太后临朝执政。安帝少小聪慧，长大后却很不争气，喜欢逢迎，亲近昵小，行为多有失德之处，因而逐渐受到太后嫌弃。到元初年间安帝已经二十多岁，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但邓太后对他不放心，丝毫没有要归政于他的迹象，依旧纲乾独断，称制如故，因此刘祜心中很不安。安帝的乳母王圣，是个贪婪虚荣的女人，她见太后冷淡安帝，久不归政，担心突然有一天刘祜会被废掉，自己的荣华富贵变成泡影，暗中与安帝的近侍、中黄门李闰商议对策。他们派人随时伺察太后的脸色和行止，一有风吹草动，就急忙通知安帝，叫他做好防备。王圣、李闰疑神疑鬼，弄得安帝也提心吊

胆。刘祜自幼便与他们亲近，自然把他们当好人看，以为他们是为自己好，所以，对他们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小黄门江京，当初曾跟随邓太后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骘去清河王府第迎接刘祜入宫继位，自以为有拥立之功，追随安帝左右，极力献谀贡媚，也深得宠信。李闰、江京、王圣很想仿效前朝宦官郑众辅佐和帝的故事，取悦安帝，窃居高位。他们三人经常在安帝面前播弄是非，编排邓氏的坏话，诋毁太后是贪权固位。久而久之，安帝便对邓太后产生了不满情绪，怨恨太后对他刻薄寡恩。但此时邓氏稳掌朝纲，威福正隆，安帝心中虽是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建兴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驾崩，安帝终于得以亲政。李闰、江京之辈极力邀功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邓氏。恰巧后宫有一个宫女，因为从前做错事情受到太后的责罚，怀恨在心。她长期在宫内当差，也略微窥得安帝与邓氏不睦，此时见太后已死，便诬告太后兄弟邓悝、邓弘、邓阊，说他们三个曾经附和尚书邓防，查寻前代废立典章，图谋废掉安帝，拥立和帝长子刘胜继位。邓悝三兄弟早在太后去世之前就已先后谢世，只有长兄邓骘还活着。宫人不告邓骘而只诬三个已死去的人，实在是钻了死无对证的空子，又利用了安帝对邓氏的不满心理，借刀杀人，公报私仇。明眼人很容易地就能看出这是栽赃陷害。然而此事却为李闰、江京诛灭邓氏势力提供了借口。

宫人诬告邓悝兄弟时，李、江等人从旁边添枝加叶，渲染演义，不由安帝不信。他们又乘机鼓动安帝，扑灭邓氏族人，清除异己分子，以便把军政大权统统握在自己手里。安帝本来就缺乏明智，又加上长期以来心怀怨望，被近侍们一番挑唆，便怒火中烧，新帐旧帐一齐清算。他马上责令有关部门上奏章揭发邓氏兄弟的大逆不道的罪行。当天，安帝便批准奏章，下诏废去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阊子西华侯邓忠，邓京子安阳侯邓珍的爵位，全部贬为庶人。邓氏宗族在朝为官者，一概罢免，

勒令出京，徙归原籍河南新野。上蔡侯邓骘本应连坐，因为以前他未参议邓防等人的废立之谋，故从宽发落降为罗侯，当即迁出京师使就封国。尚书邓防为此案首犯，罢除官职，与妻子家人一起流放边关，充当戍卒。然后，安帝又派人查抄邓氏田产、房屋、资财，没入官府。地方官吏见邓氏失势，便墙倒众人推，纷纷仰承安帝鼻息，落井下石，逼迫威吓邓家子弟，迫使邓广宗、邓忠等人自杀。只有邓弘的两个儿子广德、甫德兄弟，因为与安帝的阎皇后有中表亲谊，才得以保住性命。阎皇后的母亲是邓弘的妻妹，广德、甫德是阎后的表哥。当年邓太后就是看在这层关系上，才把阎氏立为安帝皇后的。

再说邓骘见家族被诬蒙难，无从申诉冤屈，又得知王圣、李闰等人蛊惑安帝，肆意构陷，料想将来凶多吉少，一时忧愤并交，索性不吃不喝，饿死了事。儿子王凤见父亲断食，也自己绝粒，父子俩人同时毕命。邓骘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武阳侯邓遵，还有将作大匠邓畅，得知同族坐谋逆大罪，例在不赦，吓得心绪不宁，辗转百思，找不出避除灾祸的办法，想到或早或晚会被逮至牢狱，遭受酷刑折磨，身心受辱，还不如自己了断干净利落，皆服毒自杀。只有越骑校尉邓康，先前因屡劝太后归政被邓氏削去属籍，徙往封国夷安（河南开封附近），现在却因祸得福，为安帝征用，官升太仆。至此，邓氏一门横死的横死，流放的流放，家破人亡，陷入没顶之灾。邓太后尸骨未寒，便遭到如此残酷的报复，这是她生前所万万想不到的。

除邓氏宗族外，凡是被邓太后重用的官员、宦官也受到打击。这时，郑众已死，蔡伦尚为长乐宫太仆，安帝诛杀邓氏的同时，命令蔡伦自己到廷尉自首，等候治罪。蔡伦恃才自珍，不愿蒙受逮系之辱，乃关闭宫门，沐浴整衣，饮鸩而死。正直敢言的太尉杨震屡受佞小构陷，竟致屈死。一时间是非颠倒，枉直莫辨，人心惶惶。

在这种情况下，朝野百官畏惧李闰、江京，仰阿安帝，惟求自保

身家性命，竟无人敢犯颜进谏，澄清黑白，只有大司农朱宠痛感邓骘无罪遭祸实属冤枉，阉竖播弄是非，扰乱朝政，正直之士不能钳口不言，于是他甘冒一死，叫人用车拉着棺材，自己脱去上衣，负荆上书，奏书中说："和熹皇后邓氏，有圣善之德，称得上汉家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协力辅佐皇室，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他们功成身退，屡屡谢绝皇帝给的封赏，这在前代外戚中是无以伦比的。他们有这样的功德，理应受到上苍保佑，而今却横遭小人陷害，朝廷不细加审查，无确凿证据，便抄斩邓氏，使邓家罹此大难，一门之中，竟有七人死于非命，至今尸骸流离，不得安葬，冤魂含屈，不得弥撒，实在是上逆天意，下乖民心。愿陛下下令收殓尸骸妥善安葬，抚养邓氏遗孤承延其家血脉，以谢冤死之亡灵。臣知道此书一上，冒犯圣上，罪该致死，但愿陛下能俯纳臣言，臣即使碎尸万段也无遗恨了！"朱宠的奏书，情真意切，句句在理，安帝读罢也不禁动容，感到自己对邓氏的处罚太重了，有心照准朱宠奏章，抚慰邓氏遗属。不料这时有人弹劾朱宠，说他曾党附邓氏。昏庸的安帝竟下诏免去朱宠官职，将他遣归故里。但邓氏被诛，确有冤枉，所以不断有人为其鸣不平，社会舆论也倾向邓氏，指斥李闰、江京利口陷人，扰乱朝廷。民众们还纷纷吁请公卿百官，代其上陈章奏。安帝见不抚邓氏民心难平，这才不得已下诏谴责郡县官吏逼死邓广宗兄弟，又令将邓骘、邓凤等人的棺柩，还葬其祖茔洛阳城北的北芒山，并派使者前往致祭，在邓家祠堂中允许用中牢之礼来祭祀，邓氏遗属及宗亲允许还居京师。这样，安帝总算是对邓氏的蒙诬被祸做出了一点补偿。

安帝除掉邓氏，得以报复前嫌，终于亲掌国政，更改年号，以永宁二年（公元121年）为建光元年，大赦天下，以示庆贺。李闰、江京灭邓有功，并升任中常侍，李闰加封雍乡侯，江京加封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江京又兼大长秋。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陈达等宦官，都依附李闰、江京，互作党援。安帝乳母王圣被封为野王君，她继续与李、江勾结，狼狈为奸。安帝碌碌无为，终日纵情声色，不求

治国安邦，但求保全皇位，依旧信用群小，致使李闰、江京之流得以干预朝政，由此形成了东汉历史上第二次宦官专权局面，东汉王朝也随之进入了腐朽没落的阶段。

（王　云）

参考资料：

《后汉书》:《安帝纪》

《通鉴纪事本末》:《嬖佞废立》

《资治通鉴》卷五十

杨震之死

东汉最著名的经学世家之一是杨氏家族。杨氏自杨震开始，四世为三公，并且都以清白廉洁著称，影响深远。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出身于汉代的一个官僚世家。其八世祖杨喜，为西汉开国功臣，追随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曾参与乌江之役，因战功被封为赤泉侯。杨震高祖父杨敞，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女婿，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与大将军霍光共同辅政，以谨慎著名。昭帝死，昌邑王继位，淫乱无道，霍光和另一大臣张安世决定废昌邑王，另立新君，形成决议后，霍光让大司农田延年报告杨敞，杨敞深感事关重大，一时吓得汗流浃背，说不出话来。杨敞的夫人很有胆识，得知消息后，趁田延年出去更衣的时候，对杨敞说："废立皇上是国家大事，大将军主意已定，让九卿来告诉您，您不马上答应，表明与大将军意见不一致，犹豫不决，恐怕大祸要临头了。"杨敞听了夫人的劝诫，才表示同意，并和霍光共同废了昌邑王，拥立了宣帝。宣帝即位后一个多月，杨敞死，谥为敬侯，儿子杨忠承袭了爵位，因杨敞有拥立之功，益封三千五百户。杨震父亲杨宝，秉性善良。据说，杨宝九岁时，一次去华阴山北，在路上看见路旁一只为老鹰抓伤的黄雀，被许多蚂蚁所包围，生命垂危，杨宝上前拾起带回家中，放在一个箱子里，到处采集黄花，精心喂养，黄雀一百多天后伤好，羽毛丰满，杨宝便把它放生了。黄雀飞去的当天晚上，杨宝梦见一位黄衣童子来拜见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受伤后您以仁爱之心拯救了我，我非常感激。"于是拿出四枚

白环送给杨宝说："让您的子孙如同白环，世世洁白，都居高位。"杨宝长大后，致力于儒家经典，精通《尚书》，西汉哀平时期，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杨宝隐居不仕，以教授为业。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公车特征杨宝、龚胜、龚舍和蒋诩，杨宝不受征聘，逃隐他乡。光武帝建立东汉，以杨宝有高节，公车特征，杨宝以年老多病，未受征聘，老死于家乡。

杨震自幼好学，师事太常桓郁，受学欧阳《尚书》，《尚书》在东汉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东汉传授儒经重师法家法，而桓氏是欧阳《尚书》的嫡传，桓郁的父亲桓荣亲受欧阳《尚书》博士九江朱普，桓荣以明经博学著名于东汉初期，光武帝特命桓荣入授太子（即东汉明帝），由欧阳《尚书》博士升迁为太子少傅，爵关内侯。桓郁承继家学，曾入宫授章、和两位皇帝经书，仕官至太常。桓氏既是经学世家，父子又为三代帝师，是东汉前期显赫的经学大师。杨震师从桓郁，勤奋好学，以明经著名于当时，儒生中常说"关西孔子杨伯起"，把杨震比作孔子，足见赞誉之高。

杨震为精研经书，客居于湖城县，边读书边教授，州郡多次召辟他入仕，他都假装生病而不应。由于父亲早死，杨震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租借一块土地耕种，以奉养老母。许多人以他老暮仍不入仕，不以为然，劝他入仕，而杨震却坚持自己的志向，专心于学，直到五十岁时才出仕州郡。

大将军外戚邓骘听说杨震仁贤，召辟为府吏，又作为茂才推荐给朝廷，逐步升迁为荆州刺史，不久又升为东莱太守。在杨震赴东莱上任的路上，经过昌邑时，他任荆州刺史时推荐的茂才王密正任昌邑令，王密听说举主路经自己的管辖区，特去拜见，晚上又怀揣十斤黄金要送给杨震，杨震见了很不高兴，说："我了解你，你为何不了解我。"王密说："深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此事。"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十分羞愧，告辞而去。

杨震由东莱太守调为涿郡太守，在各地任官都是廉洁奉公，不受任何形式的馈赠，子孙经常食无鱼，出无车，疏食步行。杨震的一些故旧长者劝杨震为子孙治些产业，杨震不肯，对劝说者说："使后代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留给他们这个称誉，不是留下很丰厚的遗产吗？"

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杨震征入朝廷，担任九卿中的太仆，不久又迁为太常。这个时期，东汉政权政治日趋紊乱，官吏的选举多名不符实，杨震却坚持事实求是，秉公选举，他向朝廷推荐杨伦等五人，都是经明行修的儒士，到朝廷后都根据所学拜为经博士，杨伦等人任博士期间，都能发扬光大本家学业，受到儒士们的普遍赞誉。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杨震取代刘恺为司徒。第二年，执政的邓太后病死。邓太后在世时，临朝称制，驭下甚严，曾专门下诏书给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诏书说："以前的外戚及宾客，假借威权，恣行无忌，有些甚至危害朝廷，形成祸患，今后皇室姻戚及宾客违反宪禁，要严加治罪，不许包容，我的亲属犯罪，照常究治。"因此，邓太后执政时，宦官外戚不敢为非作歹。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朝政宽忽，内宠开始骄横，乳母王圣倚仗对安帝有哺育之功，缘恩放肆，为所欲为，其女儿伯荣经常出入内宫，接受官员贿赂，违法乱政。杨震担心母女二人败坏朝政，毅然上疏劝谏安帝："我听说为政以得贤为根本，治国以除秽为要务，所以尧舜时期，俊杰在位，四凶流放，四海宾服，天下归心。可是现在，却是佞臣嬖幸充斥朝廷。乳母王圣，出身微贱，因遇千载难逢之机，得哺育圣上，虽有养育的劳苦，但前后给予许多赏赐，已是她劳苦的数倍报答，可是她贪得无厌，无视纲纪，外交属托，干涉朝政，扰乱天下，损辱朝廷名誉，玷污日月。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古有明训，妇人不得干预政事，应急速使阿母王圣出宫，让其居于外舍，并断绝其女儿伯荣与她的往来，这样才能上下俱美。愿

陛下割舍眷恋不舍的私心，专意于国家大事，谨慎于封赠爵位，减少各地贡献，省去不必要的徭役征发，使贤人君子在位，平民百姓无怨言，效法古代圣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兴盛。”杨震上疏到了安帝手中，安帝却拿给王圣等人传阅，于是，这些佞幸之臣皆怨恨杨震。伯荣骄横淫奢，肆无忌惮，与已去世的朝阳侯刘护的族兄刘环先是私通，后来又结为夫妻，刘环倚仗伯荣之势得以承袭刘护的爵位，并升官为侍中。

杨震担心佞幸横行，祸害朝廷，再次上疏劝谏安帝说：“高祖曾与大臣定约，非功臣不得封侯，成为历代遵循的制度，侯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防止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可是诏书封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环为朝阳侯，承袭刘护的爵位，而刘护的亲弟弟刘威健在，却没有承继。历来制度是封有功，爵有德，但刘环没有其他功劳，只是因为娶了阿母王圣的女儿，一时之间，位至侍中，又封以侯爵，不遵循旧制，不符合经典，舆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应借鉴以往，遵从成规。”结果杨震的上疏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杨震代刘恺为太尉，安帝的舅父、大鸿胪耿宝把宦官中常侍李闰的哥哥推荐给了杨震，杨震没有用，耿宝又亲自谒见杨震，对杨震说：“李常侍是国家倚重之人，想让您辟用其兄，我只是传达皇上旨意。”杨震坚持原则，对耿宝说：“如果朝廷令三公府辟召此人，应该由尚书传达皇上敕令。”仍坚持不辟用，耿宝怀恨而去。皇后兄长执金吾阎显，也曾经把自己的亲信故旧推荐给杨震，杨震也没有接受。而司空刘授听说后，却把耿宝、阎显推荐的人辟为属官，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加以提升。由于这些事，杨震更受到佞幸和权贵们怨恨。

正在此时，安帝下诏书派遣使者监督为王圣扩修府第，大肆铺张，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迎合皇帝，寻机煽动，滋生事端，朝廷出现混乱不稳的趋势。杨震深感忧虑，再次上疏说：“古代九年耕种，必定有三年的储蓄，所以尧时虽遭洪水，人民没有受饥

饿之苦，而现在灾害滋生，迅速蔓延，百姓空虚，不能自养。再加上蝗虫出现，羌人抢掠，边境不宁，战争不息，兵甲军粮不能供给，国库蓄藏匮乏。种种事实表明，目前不是国家安定的时期。可是看到诏书要为阿母王圣扩建府第，把津城门内两处府第连在一起，整整占了一条大街，雕刻善饰，穷极工巧，工程浩大，施工紧急，费钱巨亿，劳民伤财。周广、谢恽兄弟与国家没有亲属关系，只是依附近幸奸佞之臣，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县，倾动大臣，宰司假借旨意，召辟海内贪污之人，接受他们的贿赂，甚至犯有重罪、判处臧锢、弃市的囚徒也得以显位，受到重用，真是黑白颠倒，清浊同源。天下议论纷纷，舆论大哗，都认为财货上流，为朝廷招来讥刺。我曾记得我老师教诲说：官府取之于民，不可竭泽而渔，百姓财尽则怨恨，力尽则叛乱，百姓怨叛，则再无法进行驱使，所以百姓不足，君主又如何能足。万望陛下认真思考。"杨震激切的谏诤并没有打动安帝。樊丰、谢恽等人见安帝不听从杨震的劝谏，更是无所顾忌，竟假传诏书，调拨大司农掌管的国库钱粮、将作大匠掌管的工徒材木，建造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杨震借前一年十二月地震，再次上疏说："我蒙朝廷恩典，备位台辅，不能奉宣教化，调和阴阳，以至于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我听老师说：地是阴精，当安静承阳。发生地动的原因是由于阴道太盛，实际是宦官、近臣专权用事的表象。陛下因为边境不安定，自甘菲薄，处处节俭，宫殿围墙倾斜，只不过用柱子支撑一下，没有任何兴造，想让天下都知道政治清明的源流。可是有些亲近幸臣，却不同心合力，与朝廷一致，骄奢逾法，动用大批工徒，扩修府第，卖弄威福，行路之人，议论纷纷，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地动发生在城郭，就是因为此事。再者，冬无雪，春无雨，百姓焦虑不安，而这些人却缮修不止。这确实是致灾的原因。愿陛下发奋图强，废弃骄奢之臣，杜绝妖言来源。地震是上天对陛下的警诫，愿陛下留意，不要让臣下久专威福。"

杨震前后所上谏言，越来越激切，切中朝廷弊端，安帝有些不高兴，而樊丰等人对杨震皆满腔怨恨，侧目而视，因为杨震是当时名儒，一时还不敢加害。正在这时，河间有一位叫赵腾的人直接到朝廷上书，批评朝政得失。安帝大怒，把赵腾逮捕入狱，所定罪名是罔上不道。杨震得知后，上疏营救："尧舜之世，在朝廷上设立谏鼓谤木，引导人们进谏政治得失。殷周的贤明君主，遇到小人口出怨言，则自我反省，更加谨慎，以增修其德，圣贤君主这样做，目的是广开言路，博采众言，使下人得以尽情言论，以便自己耳聪目明，不受雍蔽。现在赵腾因批评朝政而得罪，和手刃格斗有所不同，望陛下原谅赦免，保全其性命，以引导下民进言。"安帝没有因杨震切谏而省悟，赵腾最后竟因进谏被诛，伏尸街头。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春，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借安帝出巡之机，竞相用国家府库钱财扩修府第，杨震的属官高舒召将作大匠府吏追究此事，得到了樊丰等人假造的皇帝诏书，准备待安帝东巡回来上奏，樊丰等人听说后，十分恐惧，正好太史报告说星宿运行不正常，樊丰等人先下手为强，上书谮毁杨震说："自赵腾死后，杨震就对朝廷不满，同时因为杨震是邓氏故吏，对朝廷处治邓氏兄弟也深怀怨恨。"原来邓太后死后，王圣与宦官李闰诬陷邓太后弟弟邓骘等人曾想废安帝，立平原王刘得，安帝为王圣、李闰的谗言所迷惑，把邓氏家族分别给予了处罚，樊丰等人为陷害杨震，故意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以增加安帝的不满。安帝东巡回到洛阳，暂时居于太学，听从樊丰等人谗言，夜里派遣使者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杨震于是闭门谢客，不与外界往来。樊丰等人不肯罢休，又请大将军耿宝上奏安帝，说杨震为朝廷大臣，不服从朝廷处治，心怀怨恨。安帝下诏将杨震罢职，让其回归故里。杨震走到洛阳城西几阳亭，慷慨而激愤地对儿子、学生说："报国而死是士大的职分，我蒙圣恩居于上位，嫉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憎恶幸臣女宠而不能禁止，有何面目再见日月，我死以后，用一般杂木做个棺材，布帛裹住身子

就可以了，不要归祖坟，也不要设祭祀的祠堂。”说完以后饮药自杀，死时年七十多岁。

弘农太守移良遵从樊丰的意旨，派属吏扣留了杨震的丧车，让棺材露天放在路旁，贬谪杨震的几个儿子在驿站传递文书，行人目睹都为杨震伤感流泪。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顺帝即位，诛杀了樊丰、周广等人，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朝廷追讼杨震的冤案，朝廷大臣都盛称杨震对朝廷忠心耿耿，顺帝下诏书任命杨震二子为郎官，赠钱百万，按正常礼制把杨震改葬于华阴潼关亭。由于杨震为政深得民心，远近的百姓都赶来会葬。

据说，杨震改葬前十几天，有一些一丈多高、羽毛五色的大鸟飞到杨震棺材周围的树上，又慢慢下地走到杨震棺材前，肃然站立，眼泪涌出，打湿了地面，人们抚抱它们，也不惊怕逃避。当地官员把此事报告了朝廷，又赶上这个时期灾异连续不断地发生，顺帝有感于杨震死得冤枉，又碰巧有这些特异现象，特下诏策说：“已故太尉杨震，忠贞正直，匡辅时政，为奸佞之臣所不容，多方构陷，变乱善恶，上天警告，灾异屡作，多次卜筮，都是因杨震冤死的缘故。我自己德薄，故不隐瞒过失，令太守丞以中牢祭祀杨震，杨震如灵魂不灭，可来受享。”由于杨震改葬时有大鸟临葬，于是有人在杨震墓前立了石鸟像。

杨震有五个儿子。长子杨牧，官至富波相；孙杨奇，灵帝时为侍中。灵帝有一次从容地问杨奇：“我与桓帝相比如何？”杨奇回答说：“陛下与桓帝相比，犹如虞舜与唐尧相比。”灵帝听了很不高兴，说：“你好像光武时期的强项令董宣，不愧是杨震的子孙，你死后也一定有大鸟临葬。”后来杨奇外放为汝南太守，献帝时为侍中卫尉，曾随从献帝西迁，李傕、郭汜之乱时因策反李傕部将宋晔、杨昂反叛李傕，李傕势力遭到削弱，献帝得以东还。献帝定都许昌后，因杨奇策反之功，追封杨奇子为阳城亭侯。

杨震少子杨奉，杨奉子杨敷，都笃学博闻，精通家学欧阳《尚

书》,杨敞早死,其子杨众能传先人学业,以谒者仆射随汉献帝入关,逐步升迁为御史中丞。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被封为蓩亭侯。

杨震中子杨秉,少传父业,精通欧阳《尚书》,兼明京氏《易》,博学多通,常隐居教授,四十多岁才开始出仕,先后任侍御史、州刺史,任城相、仕宦时期计日受俸禄,余下的不入私门,以廉洁著称,后官至太尉,夫人早丧,终身不再娶,自称有三不惑,即不为酒、财、色所惑。杨秉子杨赐,孙杨彪,都承继家学,笃学博闻,入仕皆官至太尉。

自杨震至杨彪,四世为太尉,德业相继,为东京名族。

《后汉书》评论说:“杨震官至太尉,正道而行,主持公道,不计个人身名,真可谓有大臣之节操,知道自己承担的职责。后世承业积德,累世为宰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看来是可信的。”

(马亮宽)

参考资料:

《汉书》:《杨敞传》

《后汉书》:《杨震列传》、《桓荣列传》、《宦者列传》

《资治通鉴》卷四十至四十四。

阎氏威福

阎氏即指东汉安帝刘祜的皇后阎姬。她姿容俏丽，却生性嫉妒，野心极大。在宫中十二年，勾结宦官，残杀情敌，废黜太子，图谋仿效前期窦、邓两太后，纲乾独断，久专朝政。无奈她无德无能，弄巧成拙，被十九名内庭宦官一朝诛灭。

阎姬是河南荥阳人。祖父阎章，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任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阎章的两个妹妹被明帝选入内宫，立为贵人，阎氏成为外戚之家。阎章精力过人，通晓先朝典章制度，按说应被提拔重用，但明帝恐外戚势盛为患，故而有意贬抑，所以阎章不仅不被擢升，反而被外调为步兵校尉，成为京师卫戍部队一名中级军官。阎章的儿子阎畅，就是阎姬的父亲，在女儿入宫之前，担任侍中之职，可以出入宫廷，侍从安帝左右。阎姬有一姨母嫁给当朝太后邓绥的弟弟邓弘，这样，阎、邓两家就有了亲谊关系。元初元年（公元 114 年），阎姬在朝廷例选中以外戚之女的身份中选，从此进入安帝后宫。阎姬生长在显贵之家，容貌姣媚，又粗通文墨，可以算得上才色双全，因此，一入宫，就被平庸好色的安帝看中，大获恩宠，很快立为贵人。在此之前，安帝最喜欢的嫔妃是李夫人，她已为安帝生育了皇长子刘保。安帝曾经打算立李氏为皇后。自从阎姬进宫，刘祜寻到新欢，夜夜专宠阎贵人，渐渐地冷落了李夫人，立她为皇后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当时安帝还未亲政，一切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邓氏手中，由于阎氏与邓太后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再加上独承帝眷，宠冠后宫，所以，在元初二年（公元 115 年）被立为皇

后。

阎姬嫉妒心特别强，虽已被立为皇后，仍不满足，怕安帝旧情复萌，再宠李夫人。尤其是她自己一直不怀孕，生不出儿子来，很担心安帝立刘保为太子，倘若那样，李夫人母以子贵，说不定会把皇后的桂冠夺走。因此，阎姬把李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便起了杀心。她利用安帝沉迷女色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弱点，诬告李夫人不安本分，与外朝官员勾结，有谋逆之心。李夫人被这个罪名吓得魂飞魄散，竟服毒而死。阎姬逼死了情敌，还想连刘保一同害死，只是由于邓太后的出面保护，皇子刘保才免遭毒手。从此以后阎姬一直缠着安帝，叫他不要忙着册立太子，哄着安帝说，等身为正宫皇后的她生出儿子来立为太子，才名正言顺。安帝正迷恋于她，处处迁就，立太子之事便拖了下来。可是，一直等了五六年，阎姬仍没有生出一男半女来。刘保已年满六岁，阎氏还想再拖下去，无奈邓太后年事渐高，身体也不好，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东汉王室选定接班人，频频催促安帝册立太子。这样，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四月，刘保终于被立为皇太子，配备东宫官属，选择师保，教他读书。阎姬一百个不乐意，可又没有办法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由他册立，但内心充满忧恨，害怕有朝一日刘保得继皇位，要向她报杀母之仇。所以，阎氏处心积虑地想害死太子。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因病去世，刘保失去了唯一的靠山。阎皇后认为机会来到了，就一步步实施谋害太子的计划。这时，刘保年仅七岁，还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平时只是与乳母王男和掌管御厨的宦官丙吉较为亲近。安帝在邓太后去世后宠用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人，他们自恃诛杀邓氏外戚有功，擅作威福，干预朝政，安帝的乳母王圣也小人得志，骄横跋扈，对此，王男、丙吉二人看不过去，言语行止当中不免流露出不满。阎皇后看准这个空子，用小恩小惠拉拢江京、王圣、樊丰，怂恿他们构陷王男、丙吉心怀怨望、诅咒圣上。结果，安帝不分青红皂白，将王男、丙吉判成

死刑，打入牢狱，双双毙命，又将两人的家属流放边疆。太子刘保眼见乳母无端被杀，心中难受，常常暗自流泪叹息。阎姬见太子忧郁寡欢、若有所思的样子，深怕他记恨在心，将来算帐。江京、王圣等人也心怀鬼胎，惶恐不安。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想找一个清除后患的万全之策。最后，江京、王圣想出一条毒计——挑拨太子和皇帝的关系，借安帝之手废掉太子。当他们向阎姬说出他们的计策时，她竟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就赏给江、王二人每人五百两黄金、两匹彩缎。第二天，就由阎姬出面，按计行事。这天晚上，安帝驾临皇后住的长秋宫，阎姬使出浑身解数百般温柔，哄得安帝心醉神迷，接着又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频频落泪。安帝对她宠爱无比，不愿叫她受委屈，见她那副伤心的样子，忙问发生了什么事。阎氏见安帝上钩，便抽抽答答地说："太子乳母王男和厨监丙吉以前曾设巫蛊诅咒陛下和臣妾，被大长秋江京告发后下狱处死。不料现在又有人告发说太子也曾参与同谋，东宫的属官们也帮着太子策划此事。"安帝本来遇事就缺乏明断，在枕席风下，就更加糊涂。听了阎氏的话，他不辨真伪，连声责骂太子不孝。次日，江京、王圣也说皇后之话不假。安帝更加确信不疑，立即召集公卿百官讨论废黜太子的事。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阎后等人陷害刘保。太子还不到十岁，早失生母，又丧乳母，身边没有一个亲近之人，孤寂无助，怎么可能谋害皇帝皇后呢？朝臣们意见不一，形成了两大派别，在太子废立问题上争论不休，各不相让。以安帝的舅舅大将军耿宝为首的一派，包括阎姬的四个兄弟阎显、阎景、阎耀和阎宴等外戚。他们贵为列侯，又掌握羽林禁军，很有势力，这些人从自己家族的利益出发，迎合皇帝、皇后旨意，主张废掉刘保；以太仆来历为首的一派，包括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等人，都是比较正直的大臣，他们认为太子年幼，即使王男、丙吉真的要谋害皇上，也不会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商量，所以说太子参与谋逆，一定是小人们的捏造。阎皇后见有人反对废掉太子，更是加紧与江

京、王圣、樊丰勾结，广造舆论，在安帝面前又哭又闹。结果，以耿宝为首的外戚获胜。延光三年（公元 124 年）九月，安帝下诏将太子刘保废为济阳王，软禁在北宫德阳殿西钟下。太仆来历不甘罢休，邀集同僚十余人一齐来到鸿都门前请愿，力陈太子无过被废，实属不当，吁请皇帝收回成命。安帝闻知，恼恨异常，竟派中常侍到鸿都门宣读诏书，斥骂来历等人"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喧哗"，又指责他们来鸿都门请愿是为了沽名钓誉，以获忠直之名，并威胁说："若执迷不悟，当显明刑书。"此诏怒气冲冲，声色俱厉，许多人被吓住了，一个个悄悄离去，只有来历一人，坚持抗议到底，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仍独居在鸿都门前，几天几夜不肯离去。安帝又气又恼，派近侍告诉掌管文书奏章的尚书们，叫他们写奏章弹劾来历。众尚书不敢违抗，又明知来历素来耿直，没有罪行，几个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尚书仆射陈忠勉强上了一本，参劾来历官职近要，却带头违抗皇帝，有失人臣重礼。安帝见了奏章，抓到了整治来历的借口，便把他的官职爵位一并削去，连他的母亲武安长公主也被牵连，不准再进皇宫，也就是安帝不再承认有这门皇亲国戚。从此，来历关门闭户，伏居在家。亲朋好友都不敢替他求情，朝野内外，则更无人为太子喊冤。就这样，阎皇后终于得遂心愿，她打算等安帝死后，选立个小皇帝，学着前朝窦、邓两太后的样子，临朝听政。

就在太子被废的这一年，东汉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袭，全国共发生了二十三次地震、三十六次洪水冰雹。老百姓流离失所，饥号转徙。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帝刘祜不知惕励治国，反而纵情声色，懒得过问朝政。这年春节一过，他便游兴大发，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携带着千娇百媚的阎皇后和大小嫔妾，还有阎显兄弟及一班宦官，兴致勃勃地到南方游玩。一路上煊赫繁华，旌旗如云，沿途郡县官吏忙得翻天覆地，拼命搜刮百姓，供奉龙驾。三月份，到达了宛城（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安帝忽然感到身体不适，饮食无味，忽冷忽热。阎后忙传御医诊治，可是，几服药下去，病情一点也不见

好转。眼见皇帝病情加重，已经不能巡幸江南，便调转车驾往回赶。才走到叶县，安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死在乘舆之中，连一句遗嘱也没留下。阎姬一见安帝驾崩，慌了手脚，号啕大哭。他的哥哥阎显和江京等人急忙摆手，叫皇后别哭，然后低声说道："皇上在外驾崩，倘若消息传回京师洛阳，废太子济阴王刘保还在宫廷之内，如果被在京的大臣们拥立登基，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阎姬一听，心中害怕，连忙止住眼泪，急切地询问有什么好办法。阎显兄弟和江京、樊丰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效法秦朝宦官赵高在秦始皇病死沙丘后，伪装尸车秘不发丧的故事，先不向外透露皇帝驾崩的消息，等车驾回宫后，暗中选立新天子，再办丧事。于是由阎皇后出面，向随侍人员谎称皇上染病，不便坐立，不再坐御辇而改乘卧车。他们把安帝遗体放在卧车内，一路兼程返奔洛阳，每天照样有妃嫔大臣们问候起居，一日三餐侍奉膳食。这样鬼鬼祟祟地赶了四天四夜，才回到了京师。阎皇后为障人耳目，还假惺惺地派遣司徒刘熹去洛阳郊外的皇家宗庙去祷告、保佑安帝康复。到了晚上，宫中便传出丧报，说皇帝晏驾了。阎显、江京等人随即叫阎姬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令，一面召集王公大臣操办丧事，一面派人迎接济北惠王刘寿之子北乡侯刘懿进京为皇嗣。刘懿年仅两岁，是汉章帝刘炟的孙子，论辈份应与安帝是叔伯兄弟。阎姬不能容忍刘保继位，但又苦于自己膝下无子，为了实现其临朝执政、长期掌权的野心，自立为皇太后，又不顾辈份悖谬，立同辈的幼童刘懿为安帝嗣子，继承帝位，这就是汉少帝。废太子刘保听说父皇病死，跌跌撞撞地赶到停放灵柩的章德宫，想进去哭悼亡父，不料却被阎太后派人挡住，不允许他进殿。这个在孤寂压抑中长大的孩子，只得在殿门外面远远地看着安帝的梓宫哭奠。

年幼无知的少帝，完全被阎太后摆布于股掌之中，只不过做了名义上的皇帝。少帝刚继位，阎太后便提升其胞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位列上卿，掌握军队，并得以出入宫廷，与其妹共同揽权擅政。

阎显其人，与他妹妹一样，权势欲很大，缺乏政治才能，且品格低下，素来热衷于请托贿赂，结党营私。安帝死之前，他仗着妹妹阎姬位居正宫，已官至执金吾，掌管巡察京畿治安。当时以忠直著称的杨震位居三公之首，德高望重，阎显为了自己的升迁顺利，极力交好杨震，并将自己的私亲推荐给他，希望能得录用，不料被杨震义正辞言地拒绝了，弄得他十分难堪。他与阎姬、江京等人定策禁中，不立安帝的儿子刘保，而迎立北乡侯刘懿，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他自己手下的吏员崔瑗，见他的作为有失众望，替他寒心，几次都想劝说他改立济阴王刘保，捕诛江京、樊丰等干政太监。但阎显自揽权以来，终日沉醉在作威作福的满足之中，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根本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崔瑗见状，只好作罢。

阎显插手朝政的时候，安帝的母舅耿宝还在大将军任上，此人也是个不甘寂寞的角色，他的妹妹耿氏是清河王刘庆的王妃，也就是安帝的嫡母。靠着这层关系，耿宝在安帝亲政后以皇舅的身份跻身廊庙，得封为大将军。大将军为全国最高军事领袖，位高权重，所以被阎显嫉恨。此时，尚有樊丰、王圣等人盘踞宫中，自以为是安帝旧宠，无人敢管，狂妄乱行，这当然也成为阎氏兄妹的障碍。阎显为了踢掉这些绊脚石，独揽军政大权，便秘密地同阎太后商量，除掉耿宝、樊丰。阎姬最忌恨的是王圣，她整天地端着安帝乳母的架子，飞扬跋扈，不把阎氏放在眼里，这就侵犯了阎太后的权威。所以哥哥一找她商量，正中她下怀，巴不得立刻把这些人置于死地。阎显毕竟要狡诈一些，他没有让阎姬直接下诏罢黜政敌，而是绕了个圈子，先叫太后擢拔冯石为太傅，进刘熹为太尉，升李郃为司徒。这三个人才能平平，现在竟得位居三公，心中十分感激阎氏的恩荣，阎显又频繁出入三人府第，极力笼络，结为至交，然后，请冯石、刘熹、李郃联名上奏朝廷，弹劾耿宝、王圣、樊丰结党营私，惑乱朝廷的罪行。阎太后立即下诏，将耿宝贬为亭侯，逼他服毒而死；将王圣及其女儿流放过雁门关；逮捕樊丰及其爪牙谢恽、周广，下狱治罪，不

久，就把他们拷打致死。这样，朝廷内外，再也无人与阎氏为敌。随后，阎太后又大力擢拔外戚，封阎景为卫尉，掌管宫门警卫，主掌羽林禁军；阎耀为城门校尉，掌领京师城门的屯兵；阎宴为执金吾，掌督巡京畿治安。至此，阎氏兄弟都手握重兵，职要权重，威福自恣。

外戚势力垄断朝廷、权倾内外，阎太后以为自己终得如愿以偿，可以久专国柄，为所欲为了。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即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十月，小皇帝刘懿感冒风寒，得了重病，眼看命在旦夕。阎显、江京和太后密谋，准备再故伎重施，少帝死后隐秘不丧，暗中再选一个宗王之子继承帝位，以便阎氏继续执政。不料，在此关键时刻，以前为邓太后重用的中常侍孙程破釜沉舟，联络其他宦官共十九人，突然发动了宫廷政变，阎氏兄妹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急，结果孙程起事成功，江京及阎显兄弟四人全部被杀，阎太后被废罢，囚于离宫，一年之后，染病而死。

孙程等十九个宦官诛灭外戚势力，拥立废太子刘保登基，这就是汉顺帝。顺帝为报答孙程们的功劳，将十九人全部封为列侯。从此宦官势力达到了极盛，为下一轮外戚宦官争夺国柄埋下了引线。

阎氏兄妹志大才疏，无德无能，不思提拔贤才辅佐治国，却硬要独霸龙床，又擅作威福，这无疑是玩火自焚。最后，竟然被十九个刑余阉竖一朝剪灭，可见阎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为已招致了天怒人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们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只是阎氏不是灭于正直公卿之手，而是灭于一小撮太监之手，这实在是历史对他们的最大的嘲讽。

（王 云）

参考资料：

《后汉书》:《安帝纪》、《顺帝纪》、《皇后纪》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

《通鉴纪事本末》:《嬖幸废立》

孙程灭阎氏

孙程，字稚卿，东汉涿郡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人），和帝朝入宫为宦官，历事和帝、安帝、顺帝三朝。他在阎氏外戚专权之际，受到排挤，不得伸志。但他不甘久居人下，抓住幼皇夭亡、新主未立的时机，联络平时交好的十八个太监，骤然发动政变，一举诛灭阎氏，功封列侯，声名显赫。

早在邓太后执政时，孙程为其当差并见信于太后，被提升为中黄门，成了邓太后的近侍之一。那时邓氏居住在长乐宫，孙程与蔡伦等人长期在长乐宫服侍太后，久而久之，从感情上比较亲近邓太后。邓太后死后，宦宫江京、李闰和乳母王圣大受安帝信用，他们蒙蔽安帝诬陷邓氏，使之一门七人横死，宗族连坐，家破人亡。随后，李闰、江京又利用安帝的宠信，仗势诛杀异己，孙程为邓氏旧人，自然也在排斥之列。为此，他内心十分愤懑，看不惯李、江之流的作为。

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四月，安帝死于南巡途中，阎皇后与其兄阎显及江京、樊丰等人秘密定策禁中，不让安帝唯一的儿子废太子刘保继位，而改迎安帝的叔父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刘懿入宫登基。阎氏自立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升阎显为车骑将军，出入宫掖，参与朝政。江京、樊丰定策有功，也得以议政，趾高气扬。这年十月，年仅两岁的小皇帝身染重病，眼见就要断气。江京、阎显为了能够继续专权，屏退外人偷偷和阎太后商量，计划在刘懿死后，秘不发丧，暗中征选其他亲王的子弟来京即位，以防大臣们拥立被废的太

子刘保登基。几天后，小皇帝死去，阎太后立即下诏紧闭南北宫门，让自己的兄弟阎景、阎耀率羽林军屯守宫城，严密封锁幼皇死讯；同时，从宫中派出使者，悄悄地去外地迎接济北王的儿子和河间王的儿子，在他们中选一个易于控制的继承帝位。那几天，皇宫上下神秘紧张，惴惴不安。

在刘懿病重之时，中常侍孙程也在窥视时势，设想未来。他深知自己为阎氏所嫌，倘若他们再次选立幼主把持朝政，自己一辈子也别想有出头之日，只能提心吊担地过日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受到江京等人的暗算。他思前想后，昼夜难眠，实在不甘心在别人的屋檐下缩头缩尾地度过一生。最后，他下决心破釜沉舟地干一场：抓住皇位易人的大好时机，暗中集结反阎氏势力，迎立废太子济阳王刘保为皇帝，把江京、阎显这帮死对头一概除掉，然后稳稳当当地谋取高位，出人头地。打定了主意，孙程便去软禁刘保的北宫德阳殿，找到随侍废太子的谒者兴渠，对他说："济阳王本是安帝的嫡亲儿子，并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却被先帝误听阎太后一伙的谗言，废黜在这里。现在小皇帝身患病，恐怕活不了几天了，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将济阳王迎入皇宫即位？果真如此，就可以马上搬倒阎显、江京。我看事情一定能成功！"兴渠为太子府属官，主人被废，他也受连累，巴不得能改变恶运，现在一听孙程密谋迎废太子即位，真是大喜过望，连连点头说："这个计策太好了，咱们赶快行动。"孙程回到住处，立即联络平时关系亲密的宦者，暗中进行准备。中黄门王康，原来曾是太子府的掌事太监，太子被废，他心中不平，常常愤愤叹息；在长乐宫掌管御膳的太监王国素来就与孙程要好，结成莫逆之交。孙程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王康、王国，二人都甘愿效劳，又积极地出谋划策，帮助孙程联系徒众，一两天内，他们又联络了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汎、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孟、苗光十六人。他们都是内宫的中黄门，有比较丰富的宫廷阅历，办事较有经验，这样就形成了以孙程

为首领的十九人政变集团。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十一月二日,小皇帝已经死去了四五天,虽然阎氏紧闭宫门封锁消息,但怎么能瞒得住久住宫廷、善察颜色的孙程一伙。这时,阎氏派去迎接宗室亲王子弟的人员还未回宫复命,因为济北王和河间王的王府均在外地,使者来去需要一定的时日。孙程、王康见时机到来,紧急召集手下到废太子居住的德阳宫西钟下,霎时间十九人会齐,孙程要大家各自剪断一截白上衣,对天盟誓,决不背约,然后又仔细地商量了行动方案,决定十一月四日晚间动手。四日晚上,夜深人静,十九个宦官各自手持利器,一齐闯入章台门直奔崇德殿。这时,江京、李闰及党羽刘安、陈达四人正在殿中值班,猛然见一人群太监闯了进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江京还想仗着这几年积下的威势,大声呵斥几句,可是一句话还未说完,就被孙程抽刀上前,一下砍掉了脑袋。剩下的三人一看大事不好,吓得魂飞魄散,本能地转过身来向大殿深处逃去,可心慌意乱,脚下踉跄,没跑几步,就被王康等人追上,一刀一个先杀死了刘安、陈达,李闰吓得瘫倒在地,抖作一团,哀求饶命,众人还想结果了他,孙程急忙上前拦住,示意同伙不要杀他,然后他把手中的短刀搁在李闰的脖子上,厉声说道:“今天我们要迎立济阴王,你必须服从,休得动摇,否则,立斩不饶!”李闰赶忙连声称是。孙程不杀李闰,是想利用他来压服江京的党羽,省得手下人大动干戈,以免落下诛杀同类的坏名声。原来李闰在宫中混迹多年,为人颇有权术,很会驾驭别人,宦官宫女甚至一些外朝官员都很畏服他。孙程见李闰连声应承自己,便叫旁边的人把他从地上拉起来,然后一同来到德阳宫,把刘保接出来,簇拥着他登上了御坐,宣布即位。这就是汉顺帝,年仅十一岁。接着,孙程传布诏令,命尚书仆射以下的官员全部跟随皇帝的御驾,到南宫云台。孙程等人留守宫门,警备内外。

这时,身为车骑将军、手握重兵的阎显正在太后宫中,听说废太子已被拥立登基,大惊失色。他与其妹一样,是个在关键时刻上

不了台面的人。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只急得双眉紧蹙，在大殿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他身边的太监小黄门樊登，见他手足无措的样子，提醒说："请将军速发兵卒守住宫门，再调羽林军进宫平叛。"阎显这才如梦方醒，急急草就太后诏书，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进宫。阎太后亲自授给冯诗官印、绶带和兵符，许以高官厚禄，说："你若能斩杀济阳王首级，我封你为万户侯；若是能斩杀李闰首级，封你为五千户侯。"冯诗拜领而出。阎显觉得冯诗兵力太少，又特别派樊登与冯诗同行，叫他们去外庭召集臣僚。哪知冯诗见阎氏将败，也不肯卖力，他阳奉阴违，一出内庭大门，就抽出剑来，猛然砍死樊登，随后扬长而去。这时候，阎显的二弟卫尉阎景闻知宫廷有变，马上召集了五百名兵卒进入盛德门。恰巧孙程也传达顺帝诏令命尚书郭镇统率羽林军出宫捕杀阎景。本来郭镇正病卧在床，闻顺帝诏立刻抱病而起，率领正在值勤的羽林官兵去捉拿阎景。阎景带兵欲进宫平叛，郭镇奉诏正出宫捉奸，双方正好在盛德门相遇。郭镇一见阎景，大声命令道："阎卫尉下车听诏！"边说边跳下马来，手持天子符节，欲宣读诏书。阎景不肯下车，反而怒气冲冲地喝问："此诏从何而来？"说着就拔剑刺向郭镇，郭镇眼疾手快，一下闪过，随后也拔出佩剑，大喝一声："着！"刺向车中，阎景正被刺中前胸，一个斤斗从车上跌下来摔在地上。郭镇手下的士兵立即上前，各持长戟叉住阎景，使他动弹不得，然后绳捆索绑，关进大牢。阎景的五百名士兵早吓得各自逃散。当天夜里，阎景因伤势很重，流血过多，死在狱中。

经过大半夜的血战，阎氏兄弟和江京、李闰等人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彻底失败。

第二天一大早，顺帝派掌管皇室名籍的宗正来到阎太后居住的长乐宫，要她交出代表皇权的玉玺金绶。阎氏见大势已去，只得一一交出转呈顺帝。顺帝得到这些御国之宝，立即搬进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符节逮捕了阎显、阎耀、阎宴，一并送入牢狱，判处死刑；

又将阎太后驱出长乐宫，迁往离宫居住。阎姬在这里冷落孤寂，回想前事，又忧又惭，经常梦见刘保的生母李氏和其他被冤死的人前来向她索命，终日惊恐不定，不久就病魔缠身，一年之后，即永建元年（公元126年），一命呜呼，死在冷宫。顺帝不念旧恶，将她与安帝合葬于恭陵，赐谥号为"安思皇后"。在古人看来，所谓"思"就是做事情想问题不周全的委婉说法，所以顺帝给皇太后的谥号多少是含有贬义在里面的。

顺帝在十九个太监的拥戴下消灭外戚集团，得以继承皇位。其实，这个长年遭受贬抑的少年皇帝，对风云莫测的宫廷斗争充满了恐惧，失去了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在这场政变中他毫无自己的见解，只不过充当了宦官们打击政敌的有力武器，所以，即使在登基之后，也逃不脱受人摆布的命运。

孙程等人诛灭阎氏外戚，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汉王室的长治久安，更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取阎氏、江京而代之，自己爬上权力之巅，享受荣华富贵，攫取高官厚禄。阎氏刚刚倒台，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请求封赏。顺帝不敢怠慢这些"有功之臣"，赶快颁布诏书，一面命令开启南北宫门，撤销屯驻的卫兵，一面大行封赏，犒劳"有功"的宦官：封孙程为浮阳侯，食邑万户；封王康为华容侯、王国为郦侯，分别食邑九千户；封黄龙为湘南侯，食邑五千户；封彭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食邑各四千二百户；封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汎为临沮侯、马国为广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隽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食邑各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食邑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食邑一千户。这样，十九个参与起事的太监全部得封列侯，随后，顺帝又按其功劳大小，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玉帛。如此滥封滥赏，优宠宦官，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久，孙程竟然又被提升为骑都尉，得以掌握军权。十九侯参决朝政，宦官势力大炽于朝廷。这充分说明，东汉的宦官已不是只供皇帝、后妃驱使的

内庭家奴，而是“手执王爵，口含天宪”的一支势炎熏天的政治力量了。

孙程上台后，继续打击敌对势力，原来受阎氏擢拔重用的冯石、刘熹、李郃三人，皆被定以阿附权贵的罪名，罢免三公之职，改由拥戴顺帝的朱宠任太傅，桓常任太尉，朱伥任司徒。中常侍张防不是孙程同党，此人颇善钻营，随侍顺帝身边，顺帝也很看重他，张防利用能够亲近皇帝的优势，经常狐假虎威，搞一些请托贿赂的事情，遭到司隶校尉虞诩劾奏。张防见到劾章，急忙跑到顺帝面前哭诉，说虞诩加诬于他，求皇上替他作主。顺帝偏袒自己的近侍，不过问张防劣迹。虞诩气愤不已干脆自己到监狱里去，表示耻于与张防同朝。张防乘机反扑，指示手下人连续四次拷打刑逼虞诩。孙程见顺帝如此宠着张防，心里很不受用，更担心他一旦得势会凌驾于自己之上，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和党羽张贤急忙去见顺帝，要求逮捕张防，赦放虞诩。顺帝还想回护张防，推说要考虑考虑，孙程连忙利用虞诩在外朝享有的忠直之名，联络虞诩的儿子和其他同情的官员，终于说动顺帝，将虞诩从牢中放出来，把张防流放边关充军发配，与张防素来要好的尚书贾郎等六人也以阿附结党之罪受到贬谪。事后，孙程又上书说虞诩劾倒张防有大功，应予褒奖。顺帝便重新起用虞诩，提升为尚书仆射。孙程这一番活动，其实是一箭双雕，既借助虞诩及外朝官员搬掉了争夺帝眷的张防，又在张防拷逼虞诩的时候出面相救，给人以主持公道的好印象，减少大臣们对他干预朝政的反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孙程每次上言，顺帝总尽量采纳，不愿得罪于他。十九太监见顺帝如此没有主见，处处受制于人，更加张扬跋扈。他们常常在大殿上争争嚷嚷，呵叱左右，无所顾忌，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时间长了，一向软弱的顺帝也觉得宦官太放肆了，心中渐渐滋生了抵触情绪，言行之间不免也流露出来。善察龙颜的外朝官员尽力投合皇帝心意，接连上书弹劾孙程等人身为皇宫阉奴，却擅自干预国政，实是悖逆不臣，如果让他

们长期留在宫中，必致祸乱无穷。顺帝接到这些奏章，正中下怀，颁发诏旨，免除孙程等十九人官职，立即出宫各就自己的封地居住；后来又把孙程徙封为宜城侯，让他到远离京师的湖北宜城就封国，孙程心中怨恨，赌气将侯爵印绶和封书全部退还给顺帝使者，表示宁可不要爵位也不去偏远的宜城。然后，他偷偷逃回京师洛阳，又常常往来于山川之中，顺帝怕他在外闹事，赶快派人找到了他，恢复其浮阳侯爵禄，让他到浮阳食邑。

永建三年（公元128年），顺帝忽然心血来潮，又追念起孙程十九人的拥立之功，下诏将他们全部征还入京，并升孙程、王道、李元三人为骑都尉。这样，十九太监重又盘踞宫内，继续干预朝政。阳嘉六年（公元132年），孙程染病不起，顺帝为示恩宠，又加封他为奉车都尉，负责掌管皇帝的御用车马，还允许他自择僚属。这是一般人不易获得的特殊荣誉。不久，孙程病死，顺帝又追赠他车骑将军印绶，并赐谥号"刚侯"，还派近侍持天子符节监理丧事。孙程死前，曾上遗言书，要求顺帝将他的封国传给他的弟弟孙美。顺帝答应了这个请求，另外又把他的养子孙寿封为浮阳侯，从他的原封地中划出一半给孙寿。第二年，顺帝又下诏允许宦官们的养子袭封爵位。从此，宦官收养干儿子继承财产和爵禄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东汉后期盛行一时的宦官大收养子之风，就是由此而造成的。这无疑助长了腐朽势力，使更多的投机分子出现在东汉政治舞台上。十九太监中的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六人都早于孙程死去，剩下的十几人为了窃取更高的权位，纷纷贿赂顺帝的乳母山阳君宋娥，同时极力排斥打击异己力量，结果被新崛起的中常侍曹腾、孟贲等人挫败，最后又被顺帝诏令出宫，数年以后几个人先后死在封国。

封建时代皇宫内庭与封建官场同样腐朽、黑暗，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正义性可言。孙程扑灭阎氏也不例外，十九太监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

代表着正义，而是由于愚昧横暴的阎氏已经大失人心。他们的行动，暗合了朝野众庶不满阎氏、同情太子的心理，再加上阎显兄妹的庸碌无能，应变无策，使他们得以“东风压倒西风”。历史事实也表明，孙程一伙的上台只不过把国家政权从外戚手里转移到了宦官手里，这种转移根本没有对东汉王室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加速了东汉乱亡的进程。

（王　云）

参考资料：

《后汉书》:《顺帝纪》、《皇后纪》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

《通鉴纪事本末》:《嬖幸废立》

梁氏沉浮

东汉中期有一个最为贪残淫侈的外戚，在他大权在握、炙手可热时，皇帝稍微不满，说了一句近似玩笑的话，他竟敢用药毒死皇帝，另立新君。这个外戚就是梁冀。

梁冀出生于东汉的一个官僚世家，从其高祖父梁统开始，直到他本人，家族几次沉浮，每次沉浮几乎都与皇帝宗室有关系。

梁冀高祖父梁统，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字仲宇，性情刚毅，喜好法律，更始时期为酒泉太守，更始政权灭亡后，与窦融在汉西地区割据自保，任武威太守，为政以严猛著称。

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河西地区归服东汉政权，光武帝加封梁统为宣德将军，梁统曾随光武帝征隗嚣，胜利后封梁统为成义侯，兄梁巡、从弟梁腾为关内侯。建武十二年（公元 36 年），梁统等人被召到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为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其四子皆拜为郎官，后又出任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梁统任职期间重视法治，很有政绩，吏民畏惧敬爱，死于九江太守任上，其子梁松承袭了爵位。

梁松少年时以父任为郎官，后娶光武长女舞阴长公主为妻，升任为五官中郎将，梁松博通经书，又精通历朝典章制度，受到光武帝的宠爱。光武帝死，受遗诏辅政。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梁松迁任太仆，由于数次以个人私事写信请托州县，被发觉后免官，心怀不满，常怨望朝廷，永平四年（公元 61 年）冬，写匿名书信诽谤朝廷，事发后被逮捕入狱，死于

狱中，封国废除。

梁松的弟弟梁竦是梁冀曾祖父。梁竦少习孟氏《易》，青年时为儒经教授，因受梁松牵连，与弟弟梁恭一起被谪发九真。后来朝廷允许回归本郡，梁竦从此闭门自养，诗书自娱。

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 82 年），章帝纳梁竦二女，封为贵人，小贵人生皇子肇，窦皇后无子，收养肇为己子，次年，肇被立为太子。梁氏家族因外孙被立为太子，私自庆幸。窦氏家族听说后嫉忌厌恶，窦皇后要让自己的娘家独擅威权，嫉忌梁氏两贵人，不断在章帝面前进谗谮毁，梁氏二贵人逐渐被疏远，终于被诛杀。窦氏家族又写匿名书陷害梁竦为恶逆，章帝下诏让汉阳太守审理梁竦，梁竦被下狱后，死于狱中，家属再次谪徙九真。审理时词语牵连到梁松妻子舞阴公主，舞阴公主也被徙到新城，朝廷派使者进行监守。在宫内则严格保密，没有人知道太子即后来的和帝是梁贵人所生。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闰八月辛巳，窦太后死，梁松子梁扈让其从兄梁檀奏记三府说："汉家旧典，崇贵母氏，而梁贵人生育皇上，却没有得到尊号，请求对此加以审议。"太尉张酺详细问明了情况，被和帝召见时，向和帝报告了梁檀上奏的具体情况，和帝很受感动，而且悲痛了很长时间，问张酺应该怎么办，张酺回答说："春秋之义，母因子而贵，汉兴以来，皇帝都封赠母系外戚，所以，大汉历代皇帝母系家族没有不显贵的。我认为应封赠尊号，以安太后圣灵，录用诸位舅父，用来显明亲属关系。"和帝悲痛地说："除了你，谁能为我想得如此周到。"正在此时，已故梁贵人的姐姐、南阳樊调的妻子梁嫕上书追讼此事："我的嫡亲妹妹被纳宫中，封为贵人，为先帝所宠幸，生育了圣上，后为窦宪兄弟谮毁，蒙受冤枉；我父亲梁竦冤死牢狱，尸骨都未能掩埋；高年衰颓的老母与孤弱的弟弟，远徙万里。唯独我得以逃避，隐匿草野，常恐受害，没有机会表诉上达圣听。现在陛下亲政，窦宪兄弟因罪伏诛，海内万物各得其宜，我才敢趁此机会表述全家之冤。我听说，太宗文帝即位

后，母亲薄氏家族得受尊荣，宣帝即位后，外家史氏家族得以复兴。而我家虽有薄史两家与皇室同样的亲近关系，却没有享受应该享受的恩典，实在使人哀伤。父亲既然冤死，不可复生，母亲年过七十，和弟弟梁棠等人，在边远人烟罕至之地，不知生死。万望陛下哀怜，让我收葬父亲的朽骨，使母亲、弟弟回归本郡。这样，陛下对梁氏就有天大之恩，梁氏生死存亡全依赖陛下一人。"和帝看了奏书被深深感动，让中常侍、掖廷令验问梁嫕，梁嫕所言证据确凿，因此得到和帝的接见，详细陈述了梁氏一家被害的来龙去脉。和帝留梁嫕在宫中住了一个多月才让出来，赏赐衣物、钱帛、奴婢、住宅，价值千万以上，由于梁嫕素有节操，和帝更为敬重，加号梁夫人，并提升樊调为羽林左监。樊调原是光武帝舅父樊宏的曾孙。

九月甲子，和帝下诏追封梁贵人为皇太后，谥号恭怀，和帝亲临送葬，百官参加；追封梁竦为褒亲愍侯，派遣使者迎丧改葬，葬于梁太后陵墓帝边；又征还梁竦妻、子，封梁竦子梁棠为乐平侯，梁雍为乘氏侯，梁翟为单父侯，官位具为特进，赏赐宅第、奴婢、车马、钱物等以巨万计，恩宠待遇光于当世。梁氏自此开始兴盛。

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乘氏侯梁雍死，其子梁商袭爵。梁商少年时以外戚拜为郎中，后迁为黄门侍郎。永元三年(公元91年)，顺帝选梁商女儿进内宫，梁商也随之升迁为侍中、屯骑校尉。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正月乙巳，正式册立梁贵人为皇后，四月，梁商加位特进，不久又拜为执金吾。

阳嘉二年(公元133年)三月，封梁商子梁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进谏说："君主都喜爱忠正之上而厌恶谗谀之人，谗谀者受宠

让十余次，顺帝才答应了。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四月戊寅，以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梁商推辞，假称有病一年不起。顺帝使太常桓焉拿着任命的策书送到梁商家里，梁商只得到朝廷接受任命，从此掌握了朝政大权。

梁商经学出身，少年通韩诗，博通众书传记，天资聪敏，昭达万情，举措优雅，质朴诚实，不为华饰，在处世交往方面，以孝友忠信著称，在朝廷和府邸，庄重严肃，严而不酷，威而不猛，对人待物，宽和爱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舍己助人，平时轻财重义，不为积蓄，因此朝廷倚重，百官敬服。梁商任大将军后，注重选拔人才，虚己进贤，辟用巨览、陈龟为掾属，李固为从事中郎，杨伦为长史。一时府中多俊杰，京师传诵，称为良辅，顺帝甚为倚重。每有灾荒，梁商便出自己财物加以赈济，并且不暴露自己姓名。他对自己家属约束甚严，也不因自己权大干涉法律，但是性情过于谨慎懦弱，少威仪，不果断，不能整肃朝廷。李固曾奏语梁商，提出整顿朝廷，严肃纲纪，梁商不能接受。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梁冀由执金吾调任河南尹。梁冀生性嗜酒，逸游自恣，在职暴虐纵欲，多行非法之事。与梁商关系密切的洛阳令吕放曾把梁冀的不法行为告诉了梁商，梁商听说后责诫了梁冀。梁冀迁怒于吕放，派人找机会在路上刺杀了吕放，害怕父亲得知真情，又嫁祸于吕放的仇人，请求朝廷任命吕放的弟弟吕禹继为洛阳令，让吕禹把这家仇人全部诛杀掉灭口，并株连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十二月，大将军梁商因宦官、小黄门曹节有宠于皇帝，专权用事，让其子梁冀、梁不疑与曹节交友，而其他宦官嫉忌梁商受宠，设法进行陷害，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人与左右合谋，谮告梁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说他们打算征请其他皇子，企图废立，要求把梁商收捕，审问定罪。顺帝对此事还算明智，对张逵等人说："大将军父子为我所亲，腾、贲是我所爱，必定无此

事，肯定是你们嫉妒他们。"张逵等人知道顺帝不听自己的话，心里害怕，一不做，二不休，假传诏书在宫省内逮捕了曹腾、孟贲。顺帝听说后大为震怒，命宦官李歙立即释放曹腾、孟贲，并逮捕了张逵等人，审理时杀掉了。审理时牵连一些在位大臣，梁商害怕牵连过多，冤枉了好人，上疏说："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所以赏不过分多，刑不过分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太平。我听说审问中常侍张逵等人，词语牵连许多人，大狱一起，往往牵连许多无辜，这样不利于顺迎和气，致于兴平，宜尽早结案，减少捕人。"顺帝听从了梁商的意见，只惩罚了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

永元六年(公元141年)八月，梁商病重，临死前告诫梁冀等儿子说："我活着时无益于朝廷，死后不能再耗费国家钱财，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类，于朽骨何益，百僚劳扰，纷华道路，只不过增加一些尘垢罢了。虽然有礼制规定，有时也可以从权，目前边境不安定，盗贼不息，岂能再损伤国家？气绝之后，尸体用车载到冢舍，立即殡敛，殡敛完后马上下葬，殡葬仪式应一切从简。孝子应遵循父志，不要违背我的遗志。"他死后，顺帝亲自临葬，诸子想遵从梁商临死前的嘱咐，朝廷没有听从，极尽奢华，赐给东园秘器、银镂、黄肠、玉匣；下葬时，赐轻车、介士，皇后亲自送葬，顺帝临幸宣阳亭，瞻望车骑，表示哀悼。

梁商死后，梁冀承袭了乘氏侯爵位，由河南尹升为大将军，弟梁不疑由侍中迁升河南尹。对于梁冀继父任大将军，宋朝司马光曾加以评论，他把顺帝与西汉成帝加以比较，他说："成帝时不能选任贤俊，委政舅家，可以说是闇昧糊涂，但尚知道王立没有才能，遗弃不加重用。顺帝把国家权力放给后族，梁冀顽劣残暴，在平时已有充分表现，而让他继承父亲职位，后因悖逆不道，荡覆了汉朝江山。和成帝相比，顺帝昏闇更甚。"

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八月丁卯，朝廷派杜乔、周举、周栩、冯羡、魏邵、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别巡行各州郡，其职责是表彰贤

良，发现、荐举忠正勤于政事者，惩治贪残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通过驿站迅速上奏，墨绶以下的低级官吏全权处理。杜乔等八人接受任命后分巡各地。张纲走到洛阳都亭把乘坐的车轮埋入土中，慨然说："豺狼挡路，安问狐狸！"于是上书劾奏梁冀兄弟，奏疏说："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以外戚蒙受恩典，居阿衡之任，却只知贪污受贿，骄恣纵欲，重用谄谀无耻之徒，残害忠贞贤良之臣，实在是罪不容诛，应加以大辟之罚。"接着列举梁冀无视皇帝之罪十五条，都是臣子所切齿痛恨的。奏书送上去后，京师大为震动。但当时皇后、梁氏宗族及姻亲布满朝廷，顺帝虽知张纲所言忠直，却无法实行。杜乔巡行至兖州，上奏朝廷，荐举泰山太守李固治政为天下第一，朝廷征李固为将作大匠。八个使臣所劾奏的人大多是梁冀及宦官的亲党，他们互相包庇援救，都被搁置一边，没有治罪。侍御史种暠对此十分愤恨，再次举奏，廷尉吴雄、将作大匠李固也上奏说："八使所纠察劾奏的，应立刻审理，进行处罚。"顺帝重新把八使奏章下到有关衙门，命令考正被举劾官吏的罪恶。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顺帝死，太子即位，是为冲帝，冲帝年仅两岁，尊梁皇后为皇太后，梁太后临朝听政。九月，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朝廷下诏书举贤良方正之士，策问地震之事。皇甫规对曰："顺帝初期勤于政事，重视用纲纪制约四方，社会几近安定，后来奸佞专权，纳贿卖爵，门下宾客到处横行，天下扰乱，民众从乱如归，官民财富俱竭，真正到了国贫民穷的地步。陛下聪明仁智，刚开始摄政，选拔忠贞之士、改革政治，全国都感到太平在望。但是目前灾异不断，寇贼纵横，恐怕也是奸臣专权的结果，其中宦官中常侍弄权更是无所顾忌，应立即黜退，扫除其党羽，没收其财产，以平息人民的怨恨，承应上天的警戒。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也应该谦虚，注重志节方面的修养，用儒术指导自己，减少游娱方面的活动，削减府第无益的装饰。君如舟，民如水，大臣好像乘舟的人，大将军兄弟如同舟上掌舵摇桨者，如果尽心同力，使百姓生活安定，

就是福，如果怠惰松弛，将被波涛淹没，实在需要谨慎小心。如果大臣道德和爵禄不相称，就好像挖墙基来增高墙，难道能计算功效，使墙安固吗？各种奸猾、酒徒、戏客，都应加以贬退，以便惩戒不轨之徒。应让梁冀等人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梁冀知道了皇甫规的对策后，十分仇恨，把皇甫规对策定为下策，拜为郎中。皇甫规假装有病，辞官回归故乡。州郡听从梁冀旨意，好几次要把皇甫规置于死地，皇甫规虽没遭害却废弃在家十多年。

冲帝在位几个月病死，梁太后因扬州、徐州地区反叛力量强大，打算把诸侯王都召集到京师再发丧。太尉李固力谏，陈述利害。梁太后听从李固的劝告：当天下午发丧。

朝廷征清河王刘蒜和渤海孝王刘鸿之子刘缵到京。刘蒜父是清河恭王刘延平，刘延平和刘鸿都是乐安夷王刘宠之子。清河王刘蒜为人庄重，举止皆有法度，公卿皆倾向于立刘蒜为帝。梁冀不听从群臣的意见，与太后在禁中册立刘缵，梁冀持节用王青盖车把刘缵接入南宫，先封为建平侯，同一天即皇帝位，年方八岁，是为质帝。刘蒜回归封国。梁太后把政事托付给三公，李固的政见太后多数能采纳，黄门宦官做恶犯法的一律赶出后宫，天下都认为政治有希望安定，而梁冀却对这种局面很忌恨。

十一月，永昌太守刘君世，为贿赂梁冀，专门用黄金铸一文蛇，准备送给梁冀，益州刺史种暠得知后将刘君世逮捕，通过驿传上奏朝廷，梁冀得知后非常怨恨种暠。正在这时，巴郡人服直聚集数百人造反，自称“天王”，种暠与巴郡太守应承征讨不能取胜，吏民死伤甚多，梁冀便抓住此事陷害种暠、应承，要地方官逮捕种、应二人。李固上疏为种暠、应承二人辩诬。太后看了李固奏书，赦免了种暠、应承，只是罢免了官职，把刘世君铸造的金蛇归于大司农，梁冀要从大司农杜乔处借出来看一看，杜乔没有答应。梁冀小女儿死，让公卿参加会葬，唯独杜乔不去参加，梁冀对杜乔怀恨在心。

质帝年少而聪慧，对梁帝的专权跋扈感到不满。本初元年（公

元 146 年)，在一次朝会时，他看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到后，对质帝大为不满，唆使左右亲信在煮饼中放进毒药进献给质帝。质帝吃了以后，肚子开始疼痛，赶紧派人召太尉李固。李固赶到后问质帝得病原因，质帝当时还能说话，对李固说："吃了煮饼，腹中闷，有水尚能活。"这时梁冀也在旁边，说："恐怕要呕吐，不可喝水。"话没说完，质帝就去世了。李固抚摸着质帝尸体痛哭了一场，查问侍候质帝的医生，梁冀担心毒死质帝的阴谋泄露出去，对李固更加仇恨。

质帝死后，大将军梁冀召集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共同会议立嗣君之事。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以明德著名，又是皇室最亲近支派，应立为嗣君，朝臣也都认为清河王最合适。可是宦官中常侍曹腾曾经去谒见刘蒜，刘蒜没有给予礼遇，因此憎恨刘蒜。

当初，平原王刘翼因受安帝乳母王圣与宦官江京谮毁，被贬归河间，其父亲请求分出蠡吾县给刘翼，封刘翼为蠡吾侯，顺帝答应了此事。刘翼死后子刘志嗣位，梁太后打算把妹妹嫁给刘志，征刘志走到夏门亭，正好质帝死，梁冀因与刘志结成了亲戚关系，想立刘志为嗣君，群臣议论纷纷，对立刘志表示不满。梁冀并没有因为群臣反对而改变主意。曹腾听说后，夜里去见梁冀说："将军累世为皇室外戚，掌握朝廷大权，宾客众多，纵横内外，其中很多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过错。清河王严明，如果继位，不久您就要得祸，不如立蠡吾侯，可以保持长久的富贵。"梁冀十分同意曹腾的意见，第二天，再次大会公卿，梁冀态度凶狠，言词激切，坚持立刘志。自胡广、赵戒以下为梁冀所震慑，连连说："一切听从大将军的。"只有李固、杜乔坚持立清河王的原议。梁冀态度蛮横，厉声宣布罢会。李固打算用公卿的舆论说服梁冀，再次写信给梁冀，梁冀对此更为恼火，劝说梁太后将李固免了职，以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梁冀为使，持节用王青盖车迎

刘志入南宫，当天即皇帝位。刘志这年十五岁，梁太后继续临朝听政。

七月，大将军府掾朱穆劝诫梁冀说："明年天时要有阴阳胜负方面的变化，愿将军专心朝廷公事，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小人，为皇帝设置师傅，选求忠贞笃学小心谨慎之士，将军与这些人一块进宫，参与政事，为皇上讲解儒经，师事贤人，效法古代，这样就如背倚南山，坐镇平原，谁还能倾动。议郎、大夫本来是由精通儒术的高行之士担任，今居此位者多不称职，九卿之中也有些人不称职，愿将军仔细考察。"接着推荐了种暠、栾巴。梁冀没有听从朱穆的谏言，也没有任用种暠、栾巴。

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太尉胡广被罢职，光禄勋杜乔任太尉。自从李固被免去太尉职位，内外丧气，群臣惧怕梁冀，都侧足而立，唯杜乔正色立朝，不取悦谄媚梁冀，于是朝野都寄希望于杜乔。

七月，因梁冀册立桓帝的功劳，朝廷下诏书增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封梁冀弟梁不疑为颍阳侯，梁蒙为西平侯，梁冀子梁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封中常侍刘广等宦官皆为列侯。杜乔进谏说："古代明君，都以用贤、赏罚为要务；失国的君主，难道是朝廷没有贞节干国之臣、典诰经国之篇吗？只是因为得贤臣而不用其计谋，读韬书不能用书中有关教化的原理，闻善言不信其大义，听谗言不能明审其实质。陛下以藩王即皇帝位，不急于聘请贤能，而先封左右近臣，梁氏一家和宦官，都是无功受封，如此滥封，有乖常理。有功不赏，为善就失去希望，行奸不责戒，为恶就更加肆无忌惮，所以有刑罚而人不畏惧，封赠爵位而不能奖励人上进。这样下去，不仅是政治紊乱，而且要丧身亡国，不可不慎重对待。"杜乔的上书并没有打动桓帝。

八月，桓帝立梁冀妹妹为皇后，梁冀想让桓帝用厚礼聘迎，杜乔依据旧典，不遵从梁冀意旨；梁冀让杜乔荐举汜宫为尚书，杜乔

因汜宫犯有贪赃罪而没有举荐，因此梁冀对杜乔日益不满。九月，京师发生地震，杜乔以灾异册免，以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宦官唐衡、左悺等人又共同在桓帝面前谮毁杜乔说："陛下即位前，杜乔与李固抗议，认为陛下不堪奉汉宗祀。"桓帝听说后也怨恨杜乔。

十一月，清河刘文与南郡刘鲔交通，妄言清河王应当为皇帝，打算共同立刘蒜。事情暴露后，刘文等用非法手段劫持清河相谢暠，对谢暠说，当立刘蒜为天子，以谢暠为三公，谢暠不从，大骂刘文，刘文刺死了谢暠，官府逮捕杀死了刘文和刘鲔。有关部门劾奏刘蒜，把刘蒜贬为尉氏侯，迁徙于桂阳，刘蒜自杀。

梁冀借此诬陷李固、杜乔，说李固、杜乔与刘文、刘鲔相交通，应逮捕治罪。梁太后素知杜乔忠贞，不准许，梁冀只好把李固逮捕下狱，许多正义之士赴朝廷为李固辩冤，太后下诏赦免了李固，李固出狱，京师市民皆踊跃欢呼万岁，梁冀听说后把李固再次逮捕，害死在狱中。

梁冀又使人威胁杜乔说，早知趣就死，妻子可得保全。杜乔不肯。第二天，梁冀派人到杜乔家，没有听到哭声，于是告知太后，将杜乔逮捕入狱，杜乔也死在狱中。

和平元年(公元 150 年)正月，梁太后下诏归政于桓帝。二月，梁太后死，三月葬梁太后，增封大将军梁冀万户，加以前所封共三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每年收入五千万，又加赐赤绂，地位比长公主。孙寿是一个淫奢的女人，长得漂亮，又善于穿戴打扮，娇里妖气，走路作折腰步，扭扭捏捏，故作姿态，生性钳忌，能制御梁冀。梁冀对孙寿又宠又怕，夫妻二人狼狈为奸，竞相奢侈，为示人奢华，二人对街为宅，互相比赛看谁盖得房子华丽；搜集各地金玉珍异之宝，修饰房屋，充藏内室，又广开园圃，采集珍异花草，筑造假山假水，放进许多奇禽驯兽。梁冀和孙寿共同乘辇车在园圃终日嬉游娱乐，人求见梁冀多不得相见。有些人为见到梁冀，

用重金贿赂守门者，守门者因此得千金以上。他又在洛阳周围州县建立许多林苑，在河南城西专门建立兔苑，周围数十里，檄文各地调发生兔，做上记号放进苑中，如有人在其中逮一只兔子就处以死刑。曾经有一位西域商人不知这些禁忌，误伤了一只兔子，转相牵连，被处死了十几人。

梁冀在洛阳城西另建宅第，接纳市井无赖与一些亡命之徒，掠取良人，全部变为奴婢，多达数千人，取名为"自卖人"。梁冀听从孙寿的话，罢免了一批梁氏宗族的官吏，表面上是示人谦让，实际上是为尊崇孙氏家族，孙氏宗族、亲戚冒名为侍中、九卿、列校、郡守长吏者十多人。这些人在位贪赃纳贿，骄横淫奢，用各种方式聚敛财富，他们派私客到各地调查当地富人，然后捏造罪名把这些富人逮捕入狱，用刑拷掠，让罪人家属出钱自赎，出钱少者就把罪人处死或流徙远方。扶风有一个人叫士孙奋，家里富裕而生性吝啬，梁冀要向他借钱五千万，士孙奋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告诉士孙奋所属郡县，说士孙奋母亲是他家看守贵重物品的婢女，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金逃跑了。于是士孙奋兄弟被逮捕，死在狱中，梁冀把全部财产没为己有，价值一亿七千多万。梁冀还派遣门客周游四方，有的远达塞外，寻求各种珍异物品。而门客凭借梁冀势力横行各地，敲榨抢掠，夺人妻女，殴击吏卒，引起各地的公愤。

梁冀与孙寿把掠夺来的财富，尽情挥霍，同时又各自寻欢作乐，互相嫉忌，争风吃醋。梁冀父亲在世时曾把一个叫友通期的美女献给了顺帝，后因发现友通期有过错，顺帝又把它归还给了梁商，梁商将其嫁出，梁冀派人把友通期盗回，安排在别处住宅中，金屋藏娇，甚至在父亲刚死的热丧中，也去与友通期鬼混。此事被孙寿探知，乘梁冀外出时，孙寿带一些仆人把友通期抓回家中，裁发刮面，绳捆鞭打，还要上书告发此事。梁冀害怕，央求岳母出面调解才算了事。后来梁冀恶性难改，仍与友通期私通，并生有一子，孙寿知道后派人杀死了友通期及其儿子。孙寿本人也不安分。梁冀有

一个监奴,名叫秦宫,逐步由梁冀提拔为太仓令。秦宫经常出入孙寿住所,被孙寿看中,二人勾搭成奸。秦宫得到梁冀、孙寿二人宠爱,威权大震,许多官吏有事常先去拜谒他。梁冀一家生活就是如此淫侈糜烂。

侍御史朱穆原是梁冀故吏,了解梁氏内幕,曾上书梁冀说:"将军位为公卿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一旦为恶,四海倾覆。最近官民匮乏,加上水虫为害,京师各个官府衙门,费用增多,下诏书各地调拨,多至原来的十倍。这些财富皆来源于民间,官府对下民使用榜掠酷刑,强迫他们凑足数额。公赋苛重,私敛更为严重,各地郡守长吏,选拔时不重视品德,他们在位搜刮民财,贪得无厌,对待百姓如同寇虏,借口公用,实饱私囊。他们掠夺时常假借您的名义,使您得罪天下,与百姓结怨,官吏百姓都痛恨将军。自从永和以来,纲纪开始破坏,人怀怨望,仅四五年间,财空户散,百姓生离散之心,各地反叛,此起彼伏,几乎酿成大患,多亏顺烈皇后为政清静,内外同心协力,最后才勉强平定。目前,百姓贫困,比永和时期更为严重,可是朝廷上下内不能团结百姓,外不能守国久安。将相大臣,都是国家首脑,应该体会国家艰难,撤换不称职的各级地方官,减省修建宅第园池的费用,拒绝郡国各种私下的奉送与贡献,对内示以清白,对外澄清人们的各种怀疑,使奸邪之吏失去倚恃,监察之臣有权尽其职守,纲纪制度全面实行,远近清明统一。如此您将身尊功显,遗德无穷。"朱穆的苦谏梁冀没有接受。

梁冀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为巩固自己权势,与宦官互相勾结,任命宦官、亲属、宾客为州郡长官,朱穆又为此进行苦谏,梁冀仍不醒悟,回答朱穆说:"照你所说,我是一无是处了。"由于平素尊重朱穆,也没有过多地怪罪。

梁冀曾写信给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陈蕃没有理会。梁冀的使者曾诈称其他客人求见陈蕃,陈蕃了解真相后大怒,把梁冀使者当场打死,为此陈蕃被降职为修武县县令。皇子有病,下令各州

县搜集珍贵药品。梁冀派宾客带着自己的书信到京兆地区买牛黄，京兆尹延笃发书逮捕了梁冀宾客，说："大将军是皇上外戚，而皇子有病，必然送呈药方，怎能让宾客借此机会外出千里求利呢?"于是把宾客杀掉了。梁冀知道后心里着愤不能明言，有关部门遵照梁冀意旨，追究延笃，延笃被免职。

元嘉元年(151 年)正月，群臣朝贺，梁冀带剑入朝，尚书张陵大声斥责，让朝廷卫士羽林、虎贲夺去梁冀所带之剑，梁冀被迫下跪谢罪，张陵不答应，随即劾奏梁冀，请求廷尉按法治罪，朝廷下诏罚梁冀一年俸禄赎罪。百官对张陵肃然起敬。梁冀弟弟梁不疑曾经推举张陵为孝廉，对张陵说："当初举你孝廉，等于自己惩罚自己。"张陵回答说："您不认为我不成器，提拔了我，今天伸国法来报答私恩。"梁不疑听后面有愧色。

梁不疑好读经书，喜欢与士人交往，梁冀对梁不疑有些嫉忌，把梁不疑由河南尹调为光禄勋，而让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仅十六岁，容貌丑陋不堪，根本穿戴不起官服来，为河南尹后路人见了无不偷偷发笑。梁不疑深为兄弟不和睦感到可耻，让出河南尹辞官归家，与弟弟梁蒙闭门自守。梁冀不愿让人与梁不疑交往，暗暗派人变换服装到梁不疑门前守候，记录与梁不疑来往的人。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被任命，过梁不疑门口，进去看望了一下梁不疑，梁冀得知后立即让有关部门上奏说马融在位时贪浊，又以其他事诬谄田明，结果把两人都处髡笞的刑罚，远徙朔方。

桓帝欲褒崇梁冀，使中二千石以上官员一起讨论对待梁冀的礼制。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认为："冀道德功勋可以比与周公，应赐以山川、田地和附庸。"黄琼独排众议说："梁冀从前有迎立新皇帝的功劳，增邑一万三千户，其子梁胤也给予了封赏，现在诸侯都按封户多少为制度，不再用里数作为限制，梁冀可与邓禹相比，食邑四县。"朝廷接受了黄琼的建议，有关部门做了具体规定，上奏说："梁冀入朝不趋，上殿带剑穿履，

谒见皇上不称名，礼仪比萧何；把定陶、阳城全部余户加在一起增为四县，与邓禹相同；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与霍光相同，以酬报梁冀的功勋。朝会时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朝，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百世法。”梁冀仍然认为这种礼遇规格太低，心里很不高兴。

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十二月，朝廷封梁不疑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之子梁桃为城父侯。

延熹元年（公元158年）五月甲戌，发生了日食，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告诉桓帝，日食是由于大将军梁冀的过错。梁冀听说后，让洛阳令把陈授逮捕入狱进行拷问，不久死在狱中。桓帝因此对梁冀产生了不满。

十二月，京兆尹陈龟调为度辽将军，梁冀与陈龟原有矛盾，梁冀寻找机会谮 毁陈龟，说陈龟沮毁国威，邀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因而把陈龟调回，以种暠为度辽将军，陈龟于是辞职回归故里，后来又被征为尚书。此时梁冀更加暴虐无道，陈龟上书奏言梁冀罪恶，要求诛杀梁冀，桓帝没有答应。陈龟自知早晚要为梁冀所害，绝食七天而死。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六月，梁皇后倚仗姐姐为太后，哥哥为大将军的威势，极其奢靡，恣行无忌，与以前任何皇后相比，威势都大得多。她专宠嫉忌，其他宫妃不得进见桓帝。太后死后，桓帝对梁皇后宠幸渐衰。梁皇后由于没有儿子，常常嫉恨别的宫妃的儿子，经常把其他宫人生的儿子设法害死。桓帝虽然畏惧梁冀，不敢向皇后发怒，却逐步疏远皇后，梁皇后因此忧愤，七月病死，谥号懿献皇后，葬于懿陵。

梁氏一家，前后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二个大将军，夫人、女儿食邑者七人，娶公主为妻者三人，仕官为九卿、将军、京兆尹、列校的五十七人。梁冀专威擅权，凶狠残暴日益严重，宫廷内部的事，了如指掌。四方的征调和各地对朝廷的贡献，都是先捡

好的送给梁冀，差一些的送给皇帝。吏民送礼到梁府请求仕官、免罪的人，来来往往，连续不断。百官迁升和召见，都先到梁府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受命。吴树为宛令，上任前向梁冀告辞，梁冀有宾客布置在县界，嘱咐吴树给予照顾。吴树说："小人奸邪，尽可诛死，将军以皇上亲戚，处上将之位，应该尊崇贤善，以补朝廷阙失，自到府中侍坐，没有听到称赞一位贤能长者，而托付的人都不怎样，实在不敢从命。"梁冀听了很不高兴。吴树到县后，诛杀了梁冀作恶多端的门客数十人。后来吴树升迁为荆州刺史，上任前去辞别梁冀，梁冀设宴招待，在酒里下毒药毒死了吴树。辽东太守侯猛被任命时没有去拜谒梁冀，梁冀借口其他事把侯猛腰斩了。郎中袁著，十九岁，看到梁冀骄纵凶狠，十分忿怒，直至朝廷上书弹劾梁冀，要求其辞职，其奏疏说："四时运转，功成身退，高爵厚宠很少不因此获灾者，今大将军功成位极，可引以为大戒，应该效法前朝丞相薛广德，致仕修养，如果不抑威权，将无法保全自己。"梁冀听说后派人去秘密逮捕袁著，袁著为免遭残害，变易姓名，假装病死，做了一个假身买棺殡葬，梁冀探知真相后，千方百计逮住了袁著，将其活活打死。

郝絜、胡武平时好发表言论，与袁著是好朋友，两人曾经联合奏书三公府，推荐海内高士，却没有去拜谒梁冀，梁冀因袁著迁怒郝絜、胡武，下令中都官逮捕两人，杀死了胡武，并诛杀胡武全家六十多人。郝絜逃亡，知道最后难于逃脱，便带着棺材奏书梁冀，书送到梁府后，喝药而死，家属得以保全。

安帝嫡母耿贵人死，梁冀找到耿贵人的侄子林虑侯耿承，索要耿贵人的珍玩，耿承没有给他。梁冀恼羞成怒，把耿承全家十多人全部杀死。涿郡崔琦因文章为梁冀所欣赏，为警戒梁冀，崔琦写了《外戚箴》、《白鹄赋》进行讽谏，梁冀看后大怒，崔琦说："古时管仲相齐，乐意听从讽谏之言；萧何佐汉，专门设置书写自己过错的吏员。今将军累世为台辅，职务相当商代名臣伊尹、周代名臣周公，没

有听说有什么德政，老百姓生活困苦，不能结纳忠贞良臣设法补救，反而打算钳制士人言论，蒙蔽皇上，莫非想取而代之吗？”梁冀当时无言以对，只是把崔琦罢遣归家，后来又逮捕杀死。

梁冀执政二十多年，威行内外，皇帝不能主政，也不能亲近大臣，桓帝成人后心里常因此愤愤不平。陈授被梁冀杀死，桓帝对梁冀更加不满。邓太后堂侄邓香妻宣生有一个女儿叫邓猛，邓香早死，宣带女儿改嫁梁纪，梁纪是孙寿的舅父，孙寿看到邓猛美貌引入皇宫，封为贵人，梁冀想认邓猛为自己女儿，让邓猛改姓为梁。梁冀担心邓猛姐夫、议郎邴尊阻挠此事，派遣刺客刺杀了邴尊，又想杀掉邓猛的母亲宣。宣与宦官中常侍袁赦为邻居，梁冀派遣的刺客登上袁赦的房顶，想从房顶进入宣家，结果被袁赦发现，敲鼓喊人并告知了宣，宣立即到皇宫内告诉了桓帝。桓帝大怒，去厕所时单独把小黄门史唐衡召到面前，问左右亲近之人哪些与梁冀不和。唐衡回答说，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与梁不疑有矛盾，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常私下怨恨梁冀骄横，只是不敢说。于是桓帝召单超、左悺入室，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制朝廷，胁迫内外，公卿以下，都遵从他们意旨。现在想诛杀梁冀，你们有什么意见？”单超等人回答说：“梁冀实是国家奸贼，早就该诛死，我们这些人愚劣懦弱，不知皇上有什么打算？”桓帝说：“选择适当时机，你们秘密图谋。”单超等人说：“图谋梁冀并不难，只恐怕陛下心中犹豫不定。”桓帝说：“奸臣胁迫国家，应当被诛杀，又有什么可犹豫的。”于是又召徐璜、具瑗，五个人共同商定了诛杀梁冀的计谋。桓帝又啮单超胳膊出血盟誓。单超等人对桓帝说：“陛下现在计谋已定，不要再给别人说起此事，以免引起怀疑。”

梁冀果然对单超等人有所怀疑。八月丁丑，让中黄门张恽入宫廷值宿，以防其变。具瑗命人以擅自进入内宫、图谋不轨的罪名逮捕了张恽。接着桓帝驾临前殿，召诸尚书进殿，宣布梁冀罪状，让尚书令尹勋持节率领丞、郎以下都拿兵器守卫宫门，把各种符节收起

来送到宫内，让具瑗率领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共一千多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围困梁冀府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回梁冀大将军印绶，改封比景都乡侯。梁冀及妻孙寿当时皆自杀，梁不疑、梁蒙在此以前已死；梁氏、孙氏中外亲属全部下狱，为斩草除根，无论老幼全部杀死；又诛杀与梁氏关系密切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郎因为阿附梁冀，减死一等，免去全部官职；梁氏故吏、宾客黜免者三百多人。朝廷一时为空。由于此事从内宫仓猝发起，使者交驰，公卿失度，都不知如何是好。官府市里如同锅里的开水，沸沸扬扬，好几天才安定下来。百姓听到梁冀被诛，都欢庆不已。没收梁冀财富，折价变卖，合计三十余万万，补充国家开支，减免天下一半租税，把梁冀的苑囿散分给贫民，录封尚书令尹勋以下诛梁冀有功者数十人。

（马亮宽）

参考资料：

《后汉书》：《安帝纪》、《顺帝纪》、《桓帝纪》、《梁统列传》及附《梁冀列传》、《李固列传》

《资治通鉴》卷五十至五十四

《通鉴纪事本末》：《梁氏之变》

清议之风

清议之风，是指士人群体在东汉末年掀起的一场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批判宦官政治的社会风潮。

东汉王朝自中期以后，政治日益黑暗。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君主昏庸、外戚专权，特别是宦官乱政。东汉宦官势力自和帝时开始兴起。和帝初年，外戚窦宪曾一度专权。宦官郑众帮助和帝除掉了窦宪，和帝为了酬谢郑众封其为鄛乡侯，并与他谋划国事，宦官从此便走上了干预朝政之路。汉殇帝时的宦官可以兼任中央若干部门的职务，宦官们由宫内走上了朝廷，活动范围大为扩展。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下令不出房闱之间，多由宦官传其政令，宦官俨然成了太后的化身，权力急剧上升。后来，宦官孙程以立顺帝之功被封侯，宦官曹腾以立桓帝之功被封侯，宦官单超等以诛杀梁冀之功被封侯。顺帝曾钦命宦官可以养子袭爵，桓帝曾钦命宦官可以行三年之丧制度。这表明原来被人看不起的奴仆阉竖，在封建礼法上已经和那些高贵的文官武将们可以平起平坐了。桓帝、灵帝时期，宦官的权势走向顶峰。地方的郡守、县令多是他们的党羽，朝中有一部分官僚也与他们息息相通。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有回山海之势，呼吸有变霜露之能。人们如对其阿谀逢迎，则可有高官厚禄；如对其稍有触犯，则有灭族之祸。由于宦官们不学无术、无德无识，所以在他们操纵下的国家政治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愈加混乱不堪。

自西汉中期以后，士人就成为官僚群体的基干和后备军。进入

东汉后，士人的数量和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特别是到了汉质帝时期，执政的梁太后曾下令从大将军到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要送子弟到京师的太学就读，使太学生一下子就增至三万多人。这些太学生和一些朝野内外的士大夫，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士人群体。他们大都具有儒家所讲的那种“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精神，所以，当东汉政治被昏庸的帝王和专横的外戚宦官搞得一塌胡涂时，他们便勇敢地站出来充当社会的良心，用品评人物、编歌谣、上奏章等方式对这些黑暗现象展开了批判。由于这个批判多表现为以社会舆论的形式对政治进行评论、议论，故后人称之为清议。

严格说来，清议首先开始于士人群体对其内部人士的自我评价。东汉主要实行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而执行此项制度的官员又多是根据基层对某个士人的舆论评价来予以举荐。所以，那些在野的士人和太学生们为了早入仕途，便想方设法在对己有利的社会舆论上做文章。一开始，士人们是用编歌谣的办法来标榜他们的学问与品行的。如说周举(字宣光)是“五经纵横周宣光”，说戴凭(字侍中)是“解经不穷戴侍中”，说杨政(字子行)是“说经铿铿杨子行”，说许慎(字叔重)是“五经无双许叔重”，说井丹(字大春)是“五经纷纶井大春”，说冯衍(字仲文)是“道德彬彬冯仲文”，说杨震(字伯起)是“关西孔子杨伯起”，说任安(字定祖)是“居今行古任定祖”，说郭宪(字子横)是“关中觥觥郭子横”，说戴良(字子高)是“关中大豪戴子高”。这些歌谣，将那些被歌颂士人的名声高高鼓起，朝廷下来的官员也多据此作为选官的根据，将有关士人荐举上去。后来，士人们又发现了一条迅速出名的捷径，那就是获得名人的好评。于是，士人们又纷纷走开了结交名人的路子。如太原郡寒士郭泰，学业有成后虽满腹经纶，但社会上并没有多少人称许他。郭泰只好远游京师寻找知音，他首先认识了当时河南尹李膺的宾客符融。符融虽未做官，但已是知名的士人了，他与郭泰相会之后极为

叹服，评价郭泰是“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并且将郭泰介绍给了李膺，李膺以师友之礼接待了郭泰。郭泰由此名震京师，当他回归乡里之时，竟有数千名官员和儒士相送。郭泰成名之后，便以品评人物为业，经他识拔的人才大都进入了仕途。如东郡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刘儒与郭泰相识后，获得了“口呐心辩，有珪璋之质”的评价，随之被察孝廉、举高第、三迁郎中。郭泰虽然品评士人，但其言论从不涉及朝政，不对国家政治作危言高论，所以他生当宦官专权之世却无生命之忧。以郭泰为代表的品评之风，可以视为清议初期的内容，其主要表现是士人群体内部的相互标榜。

随着东汉政治日趋黑暗，士人们渐渐从自我品评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他们开始把舆论转移到抨击外戚、宦官，歌颂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官员方面。清议由士人干利射禄的工具，变成了社会批判的有力武器。

那些在野的士人们，仍然是用编歌谣的办法来议论政治。外戚梁冀在桓帝初年诛杀正直官员李固、杜乔，却提拔起来了阿谀逢迎的老滑头胡广，士人们对此愤愤不平，唱起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歌谣。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征发壮丁镇压羌族叛乱，人民痛苦不堪，于是，士人们编出了“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的歌谣，以表达人民的反对战争之情。桓帝时宦官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权势遮天，士人们又编出了“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的歌谣，以抨击宦官专权。汉灵帝的母亲贪得无厌，聚敛钱财，士人们又编出了“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的歌谣，以讥刺汉灵帝之母是财迷。这些歌谣虽然都是对个别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但它们寓意深刻，充分说明了东汉士人们由关注自身开始关注社会了，清议的内容也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具有社会批判意味了。

与在野的士人相比，太学生们比较集中，又都活动在东汉的政治中心洛阳，所以他们的清议有着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在一些国家大政问题上敢于联合起来上书请愿。东汉末年，太学生们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有两次。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刚直不阿的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到任后听说宦官赵忠在埋葬其父时违犯了等级制度，用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玉匣，于是命令官吏打开赵忠之父的坟墓暴尸于外。汉桓帝不但不对朱穆维护封建的纲常进行褒奖，相反却站在宦官赵忠一边，将朱穆革职拿问罚作刑徒。此事传开后，太学生们群情激奋，决心营救朱穆。以刘陶为首的数千名太学生立即上书请愿，为朱穆鸣不平。他们在上书中说："朱穆是真正的忧国忧民之人，他在做冀州刺史时无日不在清除邪恶。宦官的兄弟爷们在下面对老百姓如狼似虎，他们遭受惩罚是理所应当。不料由于朝中宦官作梗，将有功之人变成了刑徒。当今宦官气焰嚣张，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行赏可使奴隶成富翁，行恶可使善人为强盗。就在这宦官横行之时，朱穆奋起与他们斗争，这完全是为了重整纪纲、维护皇上的尊严。有鉴于此，我们这些太学生们愿意代替朱大人服刑，请皇上将朱穆释放。"这次上书行动，是东汉士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宦官政治展开揭露和批判。他们揭露宦官在中央窃持权柄代行王政，在地方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并表露了他们对汉桓帝袒护宦官的不满之情。士人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汉桓帝也不能不考虑一下他们的呼声，便赦免了朱穆。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们向平息羌族叛乱有功的将领皇甫规索贿未成，即诬告他用钱买得羌人假投降，不但无功而且有罪，皇甫规被罚作刑徒。事情发生后，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人又联合上书为皇甫规诉冤，最后以皇甫规释放而告终。太学生们在一次次的上书请愿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将清议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们不再在一些鸡毛蒜皮、无关大局的小事上作文章，而是敢于就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议论。他们已不再像原来那样靠编一些顺口溜式

的歌谣来对政治旁击侧击，而是敢于正大光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运用实际行动扶正去邪，维护纲纪。

在清议之风中弹出了最强音的，无疑是那些已经入仕且高居庙堂之上的士人官僚。他们依据儒学理论，对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问题、征讨羌族叛乱问题和外戚宦官专权等问题展开了议论。

黄巾起义前，东汉曾发生了近七十次农民起义，帝王和宦官集团皆主张武力镇压。一些士人官僚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主张整顿吏治，安抚地方，用怀柔政策杜绝各地的反抗。这可以左雄和陈蕃的奏章作为代表。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上了一个奏章，其中谈到："自汉朝开国发展到今天，吏治愈益凋敝，巧伪欺诈盛行，官员们以杀人为贤良，以遵章办理为低劣，以搜刮民财为能干，以严谨修身为无能，对人民随便动刑，任意杀戮。监察人员对此也不知检举。这才是天灾屡降、社会大乱的根源。我认为对那些不遵从王法的官员，要绳之以法，禁锢终身。"左雄的奏章已经初步反映了士人们要求澄清吏治的呼声，但东汉社会吏治腐败至此，并非一二士人的奏章可以解决的，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汉桓帝延熹年间零陵、桂阳地区又爆发了起义，朝廷议定武力讨伐。尚书陈蕃上书极力反对此举。他说："高祖刘邦创业以后，天下万民平等，皇上待之全如赤子。今零陵、桂阳二郡的人民，也是陛下的赤子。导致他们造反的原因，完全是当地官员贪虐残暴所致。应该让有关部门检举惩治那些残害百姓的官员，然后选择为政清廉者赴任。这样可以不劳王师，而乱民自消。"总起来看，东汉士人大都经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之类思想的教育，大都主张为政清廉，主张用整顿吏治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而宦官集团多是没有文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根本不理会士人们的那一套；再加上宦官在中央窃持权柄，所以士人官僚要澄清吏治的思想根本得不到贯彻执行。因此，吏治愈加腐败，社会矛盾也愈加激化，终于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斗争白热化之后，士人为了维护封建统

治，也不顾得再讲什么澄清吏治了，披挂上阵便开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场。

东汉末年，西北边境地区的羌人不断举行起义。以段颎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主张武力平息，以张奂、皇甫规为代表的士人主张恩抚招降。皇甫规在一次给皇帝的上书中指出："羌族叛乱，皆由于边将不能对其实行安抚政策所致，平日无事也去侵暴人家，人家只好造反。战争起来之后，边将们又多谎报战功大发战争之财。这种对羌政策实在应该改变一下了。"皇甫规又进一步将对羌战争和国内问题联系起来，他说："由于朝廷对羌族一味武力镇压，军费开支已逾百亿，大大超过了人民的正常负担，逼得他们群起为盗。"实事求是地讲，皇甫规等士人的议论有的确实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在东汉末年经济不振、天灾盛行、人民屡屡造反的情况下，对外确实不应该有什么大动作，否则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但是，他们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宦官集团的段颎等人对羌族人民实行连年征杀，使无数的战士拼死于战场，使广大人民奔走于运输粮饷，用去军费二百九十亿之巨，相当于东汉六年的租税收入。这使得东汉经济迅速崩溃，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加速了社会危机的到来。

外戚和宦官专权是东汉末年重大的政治问题，故士人们清议的焦点亦多集中于此。外戚梁冀专权时，御史张纲就上书汉桓帝主张罢免他。张纲说："梁冀兄弟仗恃着外戚身份而居高官，他们资质粗野，只知贪婪好货陷害忠良，根本不能赞助皇上教化人民。梁冀等人罪行通天十恶不赦，对他们应该施加刑罚彻底清除。"单凭张纲的一纸奏章当然不能除掉梁冀，但当梁冀独霸朝政之时，它却代表了社会舆论要求清除国贼的正义呼声。梁氏灭亡之后，宦官势力异军突起。他们在经济上对人民巧取豪夺，在政治上结党纳派、打击忠良、卖官鬻爵，是东汉政治上的一股恶流。士人们不屑与这些阉竖为伍，故运用社会舆论对宦官集团展开了猛烈攻击。汉桓帝延

熹二年(公元 159 年),大封清除梁冀有功的宦官为侯,白马县令李云上书皇帝坚决反对这个举动。李云在上书中说:"梁冀为非作歹,罪当诛杀。宦官们帮皇上杀掉梁冀其实就像杀掉一只鸡那样容易,他们并没有什么功劳,但却有封侯之赏,这岂不违背了高祖非功臣不能为侯的规定吗?皇帝所为真是有点太不像皇帝的样子了。"也许是李云的奏章太尖锐了,汉桓帝恼羞成怒将他处以死刑,清议在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士人官僚并没有因为李云的死而消磨他们抨击宦官的斗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批判宦官政治。针对宦官们在地方上遍置子弟渔肉百姓的现状,杨秉在桓帝延熹六年(公元 163 年)上了一个奏章。其中谈到:"按照汉朝祖制宦官子弟不得为官,但现在此制破坏,宦官子弟宾客布满州郡,他们在下面胡作非为,搞得士人愤怒,人民愁苦,请陛下遵从祖制罢斥宦官子弟。"也许是宦官的人在下面搞得太不像话了,汉桓帝竟然批准了这个奏章。士人的清议在此又见成效,有五十多名在地方上的宦官党徒被免职罢官。士人们在取得了打击基层宦官势力的胜利之后,又把清议的矛头指向了皇宫中的宦官,想把宦官从国家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延熹六年(公元 163 年),朱穆直接就此事向汉桓帝进言:"按汉家制度皇帝身边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负责皇上秘书事宜;设黄门侍郎一人,掌传递大臣奏章和皇上命令。这些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的人选皆用有族望的士人,不用宦官。只是汉安帝时邓太后以女主身份执政,这些官职才全用宦官,导致宦官霸占政权,势倾人主。此与祖制不符,请陛下遣退宦官,重新启用士人做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职。"朱穆的议论意味着士人们想把宦官锁进深宫只管皇帝的日常起居,从而夺回士人们昔日在皇帝身边做秘书工作的权力。如果此项愿望实现,那么宦官专权问题将会得到基本的解决。但桓帝已经习惯了把宦官作为自己皇权的左膀右臂,根本不喜欢士人们在他跟前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朱穆的议论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在对宦官政治的议论、批判中，士人们认识到仅仅靠清议是不能清除宦官势力的，于是他们便把清议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一些掌权的士人官僚，如司隶校尉李膺、太尉杨秉、廷尉冯绲、太司农刘祐及地方官员成瑨、刘瓆、张俭、黄浮等人，在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和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对宦官大开杀戒，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宦官党羽。宦官们不甘心已经到手的权势被士人们夺去，更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和残忍反击士人的武力进攻。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在宦官们的活动之下兴起第一次党锢之狱，将李膺等二百多名朝野内外的士人全部禁锢起来，剥夺了他们为官执政的权力。

在清议的主体力量遭到宦官沉重打击的时候，东汉的士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们把清议的中心内容由批判宦官政治转移为褒扬党人，以新的形式继续与宦官进行顽强的斗争。士人们称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褒扬他们是当世宗师；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褒扬他们是人中精英；称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褒扬他们能以德行引导众人；称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为八及，褒扬他们能引导众人效法前面的三君；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乡、王章为八厨，褒扬他们能以财产救济别人。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人大多是为皇帝和宦官所逮捕的党人，他们在皇帝与宦官眼里都是结党营私、诽谤朝政的罪人，但士人却给了他们崇高的荣誉，这显然是在与皇帝和宦官对着干。士人们将清议的中心内容由批判政治转为内部的自相推崇标榜，这说明清议在遭到皇帝与宦官的武力镇压之后，已经转入了低潮。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即位，政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士人出身的外戚窦武做了大将军，陈蕃做了太傅，李膺、杜密等人也重新出山，形势对士人极为有利，故清除宦官的清议之风再度兴起。陈蕃于此关头给执政的窦太后上了一个意气昂扬的奏章，其中谈到："现在

京师嚣嚣，道路喧哗，皆言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专断大权，附从他们者升官，背忤他们者遭殃。一朝大臣在宦官淫威之下，如河中之木，无是非正直之心，只顾贪图俸禄。今天不除掉这些宦官，他们必生变乱，倾覆社稷。请太后将为臣奏章宣示左右，以使天下人皆知我陈蕃对宦官痛恨之甚！”窦太后缺乏政治头脑，并没有接受陈蕃诛杀宦官之建议。但宦官们却从中嗅到了士人的意向，他们先发治人，于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发动政变杀死了窦武、陈蕃等士人的首脑人物；于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狱，杀害士人一百多名，流放、免官、禁锢士人六百多名，逮捕太学生一千多名。第二次党锢之狱，使东汉士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残酷的镇压之下，士人们的清议被迫终结。

东汉的汉议之风，虽然最终淹死于宦官镇压的血泊之中，但它却充分体现了东汉士人群体的存在和他们强烈的参政、议政勇气，在中国士人生活史上留下了异常光辉的一章。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陈王列传》、《党锢列传》、《郭符许列传》、《宦者列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党锢之祸

东汉政权自和帝以后长期为宦官外戚轮番把持。到桓帝、灵帝时期政治十分黑暗，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宦官专权也达到了顶峰。宦官集团窃持国柄，陷害忠良，排斥异己，凶残暴虐，激起了朝野士人的强烈愤懑。一批正直有为的官员和太学生们联合起来，抨击朝政，指斥阉竖，结果被诬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灵二帝在宦官的挑唆之下，先后制造了两次大狱，把这些挺身抗争的所谓“党人”们，或逮捕，或流放，或禁锢终身，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党锢之祸”。

汉桓帝刘志，本是宗王之子，建和六年(公元 147 年)，他只有十五岁，被梁太后和大将军梁冀迎立为皇帝。梁冀专横跋扈，桓帝只是个傀儡。刘志长大后不愿再受梁氏摆布，偷偷与身边的宦官单超、徐璜等秘密定策，剪除了梁氏外戚的势力。单超等五个宦官因功同日封侯，从此，宦官插手朝政，又成专权之势。他们左右桓帝，在朝中打击排斥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到处安插自己的子弟、亲属和党羽。桓帝时期各级官吏的任免权几乎全部为宦官集团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正常入仕途径被阻隔，本来是官吏后备军的太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报国无门，而朝中的一些正直官员们屡受排挤，心怀激愤，于是他们和太学生们联合起来，声息相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一方面大兴“清议”之风，“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朝政”，借助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抨击宦官；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采用各

种政治手段打击邪恶势力。

桓帝元兴三年(公元153年),宦官赵忠的父亲死了,赵忠把他归葬到老家冀州安平(今河北冀县),葬礼隆重,超出常规。当时的冀州刺史朱穆闻听此事,命郡县官吏查验明白。郡吏知道朱穆为官刚正严明,不敢怠慢,赶快发掘赵坟,出棺验视,里面果然有玉匣、木偶等僭越陪葬品。朱穆下令逮捕了赵忠的不法家属。赵忠不仅不肯认错,反而向桓帝哭哭啼啼地告黑状,说朱穆擅自发掘其父坟墓,无故逮系家属。桓帝大怒,竟下令将朱穆撤职,关进宫内做苦工的左校署去服役。这一颠倒黑白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来到皇宫请愿抗议,并上书为朱穆诉冤,还表示甘愿代替朱穆服劳役。桓帝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将朱穆赦免,但削职为民,放归故里南阳。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平定羌人叛乱有功的名将皇甫规敲竹杠,索取贿赂,遭到拒绝,徐、左二人便捏造罪名,说皇甫规侵吞军饷,也要将他关进左校做苦工。太学生们在张凤的带领下再次到皇宫门前请愿,并联合了一些官员共同上书,最后皇甫规也得到赦免。这两次太学生为主体的反抗宦官势力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在朝官员当中也出现了一批不畏强暴、严惩宦官的硬骨头。如北海相杜密、河东太守刘祐都剪除了所属县令长中的宦官党羽;洛北相腾延还把劫掠行旅的宦官爪牙处死并暴尸街头;掌管全国军政的太尉杨秉、掌管全国监察的司空周景也巧妙地利用职务之便奏免了宦官集团中自将军、牧守以下五十余人的官职。

在同宦官势力作坚决斗争的官僚士大夫群中,被推为领袖的是李膺和陈蕃。他们的人品和风貌都深受众人的敬仰,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河南襄城)人,出身于历代世宦之家。祖父李修位至三公,是汉安帝朝的太尉。父亲李益,曾做过赵国相。

李膺性情孤傲，不愿随意与人交往。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能文能武，最初被推举为孝廉，为司徒胡广看中，荐举他做了官，先后担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等职。当时北方的游牧部族鲜卑经常侵犯东汉边塞。李膺颇有武略，又被起用为护乌桓校尉，他身先士卒，打仗不避矢石，几次大破鲜卑军，所以鲜卑人都很惧怕他。后来李膺因公事受连累，削职回家，居住在纶氏(今河南登封)，设馆教书，跟着他学习的门徒常在千人以上，名声远播，受到社会的推崇，人们都争着与他交往，而他又不肯轻易与人结交，所以凡是能够受到他接见的人，众人都称之为“登龙门”。有个叫荀爽的人去谒见李膺，因为为他驾了一次车，回家后高兴地说：“今天才能为李君驾车了！”李膺成了当时最受人敬慕的名士。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鲜卑人再次大举侵犯云中郡(治所在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桓帝听说李膺有才能，再次起用他并授与度辽将军的称号。他一到边境，鲜卑人慑于他的威望，都望风归服，自动放还所抢掠的人口财物。从此李膺的名声更是大震边关。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李膺任河南尹，成为掌管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年，宛陵(今河南长葛县)的世家大族羊元群由渤海郡罢官回家。这个人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卸任时把官衙厕内的精巧的饰物都带了回来。嫉恶如仇的李膺上奏皇帝，要求依法惩治羊元群。羊元群赶紧用钱买通宦官，结果，桓帝听信宦官诬陷李膺有罪的谗言，反而将他罚做苦工。后来，司隶校尉应奉上奏章为他求情，向皇帝讲清了事情的真相，李膺才得以免罪，归家为民。过了一段日子，李膺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他上任后，依然保持着执法不避豪强的耿直性格。当时为桓帝所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个弟弟叫张朔，他倚恃兄长的威势当上了野王县(今河南沁阳)的县令，该县离京城不远，属于司隶校尉的稽查范围。张朔贪暴残忍，无恶不作，甚至残杀孕妇取乐。他听到李膺出任司隶校尉的消息，知道自己罪恶累累，李膺不会放过，吓得丢掉官帽，逃到哥哥张让家，藏进支撑房梁

的空心大柱子里。李膺亲率吏卒到张让家搜捕，最后，劈开大柱子抓获张朔，审查核实了他的罪行后，立即依法处死。张让心中怨恨，便向桓帝诉冤。桓帝把李膺召来责问他为什么不先奏后斩，李膺回答："过去孔子做鲁国司寇，上任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今天我已到任十天了，才杀了张朔这个坏蛋。我正担心因为办事拖沓而犯错误，没想到因为办事快而获罪，我知道自己惹祸了，请陛下再给我五天时间，等我把罪犯的后台揪出来惩办，那时死也情愿了。"李膺的话有理有据，有智有勇，软中带硬，说得桓帝无以为答，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过错，司隶校尉有什么不对呢？"把他打发走了。从此以后，宦官们都有所收敛，平时也规矩多了，有的甚至在节假日也不敢出宫门。桓帝见这群张牙舞爪的家伙忽然间变得这么老实，很是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宦官都哭着叩头说："怕李校尉。"李膺一贯坚持除暴抑恶，毫不留情地打击宦官势力，这一方面招致了宦官集团的仇恨，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朝廷官员、在野名士和太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以他为榜样，奉他为"天下模楷"。李膺实际上成了"党人"和太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人。他的祖父曾做过河东郡（治所在山西夏县西北）的太守。陈蕃十五岁的时候，自己住在一处房子里，里里外外都荒芜零乱，他从不加以整理。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薛勤来看他，问道："你这小家伙为什么不洒扫庭院接待宾客呢？"陈蕃却回答说："大丈夫生活在世，应当以扫除天下为要务，哪能只关心一间屋子呢？"薛勤听了很惊奇，认为他有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小看。

最初，陈蕃在本郡做小官，因为他廉明勤谨，被举为孝廉，升为郎中。不久，因为母亲去世，他弃官回家守丧。丧期满后，刺史周景征用他为属官，陈蕃心有定见，不会附阿上司，因而辞官回家。后来，经太尉李固上奏举荐，朝廷征陈蕃为议郎，掌皇帝的顾问应对，得以参预朝政，不久，又升任为乐安太守（治所在山东广饶县）。当

时，李膺出任青州刺史，成为陈蕃的上司。郡县官吏都知新刺史执政威严，听到他到来的消息，害怕被查出劣迹，许多人纷纷自动引退，唯独陈蕃心地坦荡，留在任上。陈蕃治理乐安，注意招引贤才，惩治不法之徒，政绩颇著。这时，正是外戚梁冀任大将军，权倾天下的时候。梁冀曾派人给陈蕃送信，想走他的门子办些私事。陈蕃的属吏们知道他性情廉直，不阿权贵，不敢进去通报。梁冀的使者要了个花招，不再提请托徇私之事，而只诈称请求谒见太守。陈蕃问明情由不由大怒，下令差役们狠打梁冀使者，不一会儿，这人竟然死在棒下。由此，陈蕃犯罪被关进左校服苦役。役刑满后，他又渐渐被起用提升，历任大鸿胪、光禄勋、尚书仆射、太中大夫等官。这期间，他因刚直不阿、性情严峻而屡屡开罪于当权官僚和宦官集团，遭到多次罢免。尽管宦海沉浮，充满坎坷，但陈蕃秉性不改，持正如故。

宦官苏康、管霸在桓帝即位初期就受到信用，他们阿谀逢迎，陷害忠良。李膺等几位正直的朝廷要员都因为他们而逆忤了圣旨，得罪了皇上，遭到贬斥。陈蕃借着朝会的机会，几次为李膺等人辩白，请求桓帝宽赦他们，但桓帝始终不听。陈蕃痛愤奸佞离间，忠臣蒙冤，气得涕泣交下，不能自已。又有宦官赵津、恶霸张汎，奉趋宦官，触犯刑律，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秉公执法，分别将他们处死。宦官们见爪牙被斩，怀恨在心，指使人上奏桓帝，诬陷刘瓆、成瑨，致使二人被问成死罪，关押入牢。陈蕃素知这两个太守品学兼优，颇有好名，又敢于直言，见他们受诬系狱，不忍袖手旁观，于是联合职高位重的大臣刘矩、刘茂共同为刘瓆、成瑨的事向皇帝进谏，无奈这时的桓帝为阉竖所惑，拒不纳谏。结果刘、成二人被逼死在狱中，朝廷内外都为此愤愤不平。宦官们却因陈蕃每每与之作对，对他恨之入骨，但碍于他声望很高，一时还不敢轻易害他。陈蕃不畏强御，不屈不挠地同宦官势力作斗争，受到朝野正直之士的拥戴，无形之中他也成为“党人”势力的核心人物。

桓帝在位的后期，宦官与官僚士大夫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营垒更加分明，斗争也更趋尖锐激烈。虽然以陈蕃、李膺为首的正义力量，一直都勇敢顽强地坚持斗争，但昏愦庸碌的汉桓帝却袒护近侍，成了宦官们的保护伞和挡箭牌。宦官集团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次次地避开"党人"们的锋芒，并进行猖狂反扑，终于使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发生了两次党锢惨祸。

第一次发生在桓帝末期。当时，河内郡(今河南武陟)有个巫师叫张成，此人以神仙方术迷惑众人，与宫内宦官关系密切，连皇帝都颇相信他的占卜之术。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张成通过宦官得知朝廷将颁布大赦令，宽免死囚。他为了沽名钓誉，使更多的人信服自己，便故意唆使儿子杀人。当时刚上任不久的河南尹李膺，立即命令属吏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不久，果然桓帝下达了大赦诏书，李膺十分气愤，不顾大赦令已下，依旧斩杀了罪犯。这一下，激起了宦官们的空前仇恨。他们叫张成的徒弟牢修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此书一上，加上宦官们从旁添油加醋，大肆攻击，激起了桓帝的怒火，他下令布告天下，逮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王畅等二百多人被收押，他们在狱中，脖子、手臂和脚踝都被加上"三木"刑具，蒙盖头脸，遭受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人屈服。李膺骨头很硬，也很有智谋，他的供词都尽量牵扯进大批宦官子弟和党羽，宦官们怕惹火烧身，不敢深究下去。在京城搜捕党人的同时，宦官们还派爪牙到各地，用重金悬赏捉拿逃亡的党人，弄得全国上下，骚动不安。

这样一起牵连甚广、震动朝野的大案，按常规应当由太尉、司空、司徒共同审核，才能最终定案。当时的太尉是陈蕃，他对这场官司的内幕和起因都十分明了，知道这是阉宦们小题大作，故意迫害忠直之士，所以他坚决拒绝受理此案，并进谏桓帝说："今天所逮捕入狱受刑的人，都是有声望有才能的人，他们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

担忧，给他们十代人的优容还不够，怎么能够无缘无故地逮捕拷打他们呢？”陈蕃自始至终不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使这件案子不能了结。与此同时，外戚窦武也上书，强烈要求赦免党人。窦武是桓帝窦皇后的父亲，为人正派，节俭廉朴，饱读经史，结交士人，女儿被立为皇后，他官拜城门校尉，负责掌管京师洛阳十二城门的屯兵，有权有势。但窦武并不仗势求荣，而是严于律己，约束窦家子弟。他还常常把宫中赏赐的钱物分送给太学生们，在灾荒之年，也常常接济贫寒百姓。他见桓帝听信谗言，严捕党人，十分痛心，便以国丈的身份上疏，为李膺他们求情。他在疏中指斥宦官欺瞒皇帝，肆意干政，长此下去，必有赵高之变；李膺、杜密等人都是“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却被奸人牢修诬告，致使二百多人入狱，这样做，会使“天下寒心，海内失望”；皇上应当“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奏章递上去后，窦武恐怕桓帝不肯采纳，又假称身体有病，将城门校尉的官印也交还朝廷。接着，又有尚书霍谞等人，上表请求释放党人。迫于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桓帝不得不发布了赦免党人的诏令，将他们从牢狱中释放出来，但同时又规定，这些党人们只能各归故里，禁锢终身，不准再入仕为官，并把他们的名单记录在案，以便随时稽查。

到此，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这样勉勉强强地平息下去，太尉陈蕃也因回护党人而丢掉了高官。桓帝的这种处置，虽然给党人留下了一线生路，却十分明显地袒护宦官集团，这就使得阉宦们更加有恃无恐，邪恶势力继续膨胀。尽管如此，惨遭迫害的党人们却更加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敬仰。党人范滂出狱归家，家乡人迎接他的车辆竟多至数百辆。名将皇甫规自认为是西部豪杰，而名字却没有被列入党人名单，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耻辱。在京做官的景毅，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由于名单上漏掉了景顾的名字，所以父子均未受到牵连，景毅却叹息道：“我是敬慕李膺的贤名，才派儿子跟他学习。现在怎么能暗自庆幸，苟安富贵呢？”于是，他主动要求免去官

职回居故里。景毅的举动受到了人们的称赞。这一时期，尽管党人的黑名单还掌握在官府手中，但全国各地对他们的推崇却达到了高潮。人们继续品评人物，列出种种名号，对党人们加以彰扬：陈蕃、窦武、刘淑被称为"三君"，"君"指能够统领众人，受到社会共同敬仰的人；李膺、王畅、杜密、荀翌、刘祐、魏朗、赵典、朱寓被称为"八俊"，"俊"指才干品貌卓然超群的人；郭泰、范滂、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能够影响于人的人；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是指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引人敬仰的人；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乡、王章为"八厨"，"厨"是指能以自己的财物救济别人的人。以上这些，是党人中各类人物的典范，名声很大。在这种社会舆论的推崇之下，党人们反对宦官专权的情绪有增无减，虽然他们被禁锢在乡间故里，但仍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地党人道义相通，互相激励，并没有被政治高压政策所吓倒。这预示着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面。

永康六年(公元 167 年)，桓帝刘志死去。因为他没有儿子，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定策，迎立宗王之子、十三岁的刘宏人即皇位，这就是汉灵帝。窦氏沿袭前朝故事，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升窦武为大将军，掌握全国最高军权，又起用在党祸中遭罢免的陈蕃，让他以太傅身份录尚书事，即掌握全国最高行政权。陈蕃与窦武一文一武，共同辅政。他们两人都痛恨宦官专权，早就想剪除这股恶势力。有次朝会，陈蕃悄悄地对窦武说："中常侍曹节、王甫几个，自桓帝时就弄权干政，骚乱内外，百姓们怨声载道的根源就在这里。现在不诛杀这几个败类，以后必然更难办。"窦武连连点头，深自赞许。于是二人同心协力，趁着手中有权的大好时机，开始行动。首先，他们起用了名列"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掌管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尚书台；又提升志同道合的刘瑜为侍中，掌承灵帝的起居侍卫，冯述为屯骑校尉，负责京师的安全警备；然后，又陆

续征召禁锢在家的李膺、杜密、刘猛、朱寓、荀翌、陈寔等人，分别授以各种官职，进入中央权力机构，从而削弱宦官势力的影响；同时在地方上也选拔安插一些党人主持州郡，撤换了一批宦官爪牙。一时间，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联合在一起，占据了朝廷内外的许多重要职位，形成了东山再起之势，宦官势力一度有所收敛。所以这一个时期，从外观上看起来，东汉政权有了一些起色，这是陈蕃、窦武及党人们努力的结果。然而实际上，这里潜藏着十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时灵帝年少无知，遇事毫无主见，且不掌握实权；窦太后性格怯懦，优柔寡断，外朝的事她托付给了父亲和陈蕃，内庭之中却离不开几个贴身的太监，侯览、曹节、王甫、管霸等大宦官都很受信用。这几个人奸邪歹毒，诡计多端，他们百般阿谀，殷勤侍奉窦太后，哄得太后封给他们爵禄，又勾结灵帝的乳母赵娆及后宫中掌管各项差事的女官们，左右灵帝，秽乱内宫，染指朝政，陈蕃、窦武与窦太后商讨国务常常要受到他们的干扰和掣肘。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到永康二年(公元168年)五月，陈蕃实在不愿再苟且下去，就劝窦武说："往日萧望之(汉元帝时的大将军，反对宦官专权)死于宦官石显之手，前不久朝臣李固、杜乔又遭灭族之祸。当今灵帝乳母及后宫女官，日夜迷惑太后，又与宦官们串通一气，为非作歹，应当赶快退绝这帮人。我是想为大将军您除害，还望三思。"窦武也深知近百年来，宦官势力与外戚势力一直如同水火，每一个皇帝在位期间，两大势力都要争个你死我活，现在若听任宦官盘踞内宫，养痈为患，必将有一天窦氏外戚要遭殃。于是，他进宫向窦太后建议说："按照规矩，宦官们只限于做内宫琐事、听使唤、守门户、发放财物而已。而今他们却不安分，参与政事，握有重权，其爪牙遍布各地，尽干贪暴残忍的事，弄得朝野不宁，人心鼎沸。应当赶快将他们诛灭才是。"可是窦太后不同意诛杀得太多，尤其不肯诛杀她最得力的中常侍曹节。窦武无奈，只把管霸、苏康等几个太监杀掉了。陈蕃认为这样做还很不够，一心想将掌权的太监全部杀光，特别是

仗势弄权的曹节，非去掉不可。他以太傅的身份亲赴宫阙，叩请太后斥退曹节，将其诛灭。陈蕃这时已是两朝元老，德高望重，并且还有恩于窦太后：当年桓帝选立皇后时，很想册立他所宠爱的田贵人，而不愿立窦氏，多亏陈蕃犯颜上谏，力劝桓帝选立出身比较高贵的窦氏，这样窦氏才得立为皇后。陈蕃以为，凭着自己的德望和对窦氏的旧惠，太后会采纳他的意见，他侃侃论道："臣知道言不直行不正，则上欺苍天下负人望，然而冒险直言则必遭小人忌恨，导致死难临头。我宁肯被杀也不敢欺天负人。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都在议论宦官侯览、曹节和赵夫人及后宫女官乱政的事，附和他们的人才得升迁，忤逆他们的人就遭迫害。如今满朝文武，就像河流中的木头，随波逐流，以保全禄位。不久前杀掉苏康、管霸，不仅活着的人高兴，就连地下的冤魂也要含笑。可是，时日不久，宦官又被宽容重用，若不赶快剪灭，必致发生变乱，危及社稷。"然而，窦太后此时已深受近侍们迷惑，竟然拒不采纳陈蕃的忠言。随后，窦武又几次奉劝太后，请诛曹节，可太后犹豫不忍，事情就拖了下来。

到了这年八月，小太监郑飒狡猾善变，胡作非为，被窦武抓了起来。郑飒的供词牵扯进了曹节、王甫等几个大太监，窦武决定乘此机会，将掌权干政的太监们一起除掉。他命人写好奏章送进宫去，以为这几个阉竖只不过是狗仗人势，有权无力，只要窦太后准了奏章，就可轻易地除掉他们，因此，处理完公务就回家休息，等待好消息去了。没想到这件至关重要的奏章送到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后，被太监朱瑀接到手里，他平时就与曹节、王甫相亲善，也知道外庭官员不满他们的窃弄国柄，所以对窦武的奏章格外关注。他趁四下无人，打开了奏章，才看了几行就又惊又怒，暗自骂道："太监们有罪的当然可以杀，可是我们有什么罪！怎么竟要将我们满门抄斩？"朱瑀心里一气，想出一条歪计，他大呼小叫地喊到："陈蕃和窦武要奏白太后，废掉皇帝谋立新主，这还了得！"一下子，宦官们的仇恨情绪全部被他激了起来。当晚，朱瑀纠集了一伙身强力壮的太

监，歃血为盟，一定要除掉陈蕃、窦武，随后就报告曹节、王甫。宦官们抢先下手，连夜劫持了灵帝和窦太后，叫灵帝发布诏书捕捉尹勋、窦武和陈蕃等人，又从长乐宫中夺走太后玉玺，将太后软禁在南宫云台。曹节派人手拿灵帝诏书前去捉拿窦武，窦武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夺门而出奔入军营，集合了数千士兵，射杀了前来追捕他的宦官使者，屯兵在都亭之下。王甫见状也召集了一批军卒屯居朱雀门，与窦武对峙。王甫一边攻打，一边喊话瓦解窦武军心，最后，窦武抵挡不住兵败自杀。陈蕃闻变，带领八十名青年学子持刀入宫，路遇王甫，被王甫指挥兵士团团包围，惨遭杀害。随后，宦官们又搜捕陈、窦两家宗亲，或杀或押或流徙远方。公卿百官之中，凡是曾经受到过陈蕃、窦武举荐的尽行黜免。

这场宫廷喋血之后，党人失去了两个重要的核心人物，势力受到惨重打击，而宦官集团更加嚣张，曹节、王甫等依次加官进爵，横行宫中，把灵帝玩于掌股之上。但他们还不满足，因为党人们还没有被赶尽杀绝，一有机会还会起来跟他们做殊死的斗争。宦官们寻找机会，在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再次举起了屠刀，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这次党祸是由宦官爪牙朱并上书诬告党人张俭引起的。张俭是“八及”之一，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西北）人。他从桓帝末年起担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负责督察该郡东部各县，掌狱诉缉捕之职。大宦官侯览的老家恰在张俭督察范围内的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其家属横行不法，残害百姓，还曾经大起坟茔，被张俭上书检举，并派人毁其家坟。为此，侯览对张俭恨入骨髓。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张俭再次上书朝廷，揭露侯览家属的罪行，要求依法将其诛杀。不料张俭的上报公文转到了侯览本人手里，他看了之后，又恨又怕，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报复张俭。张俭有个同乡叫朱并，此人品行不端，奸邪善钻，曾遭到过张俭的废弃，心中充满怨恨。侯览便利用这一点，指使朱并上书朝廷，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联络结

党，私立名号，谋图颠覆社稷。灵帝在宦官的摆布下颁发诏令，捕捉张俭。曹节想借此案将李膺、范滂等党人一网打尽，就要求灵帝批准追捕天下党人。灵帝年仅十四岁，对复杂晦暗的政治斗争不甚了了，便问曹节："党人有什么罪恶？为什么要捕捉他们？"曹回答说："他们相互勾结联合，图谋不轨。"灵帝又问："党人图谋不轨？图谋不轨又是什么呢？"曹节说："图谋不轨就是想夺取国家政权。"灵帝一听，便批准逮捕党人。当时李膺在陈蕃、窦武被杀后就被贬斥在家，他有个同乡得知朝廷要大规模捕捉党人的消息后，赶快给李膺送信，劝他立即逃走，李膺慨然答道："临死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生死由命，还往哪里逃呢？"说罢，自己投赴诏狱。范滂在家乡听到消息，自动与老母诀别，从容随捕吏就监。杜密、王畅等一百多人陆续被捕。在狱中，党人们屡次遭受严刑拷打，李膺、范滂及其他几十人均惨死在酷刑之下。在搜捕党人时，有些地方官为了迎合上司，邀功请赏，故意扩大搜捕范围，除了党人的宗族、亲属、门生、故吏之外，又牵连进许多无辜的老百姓，使他们遭受迫害。整个案件中，先后死亡、关押、流放、罢官禁锢的达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公元 172 年），窦太后被宦官们幽禁在南宫已经两年。这期间灵帝曾感念窦氏对他的扶植之恩，几次想去看望太后，都被宦官们阻拦，曹节、王甫忌恨窦武以致对旧主子都落井下石，毫不顾及旧情。窦太后在冷宫中悔恨交并，忧郁成疾，不治而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上贴出匿名传单："现在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侯览借机多杀党人，在朝公卿尸位苟禄，无人敢发忠言。"曹节、王甫气急败坏，急忙跑到灵帝跟前诉冤，灵帝诏令掌管京城治安的司隶校尉刘猛从严缉查，搜捕写传单的人。刘猛同情党人，不愿缉捕传单作者，便故意拖拖沓沓，一个多月过去了，案子还没有眉目。宦官们见刘猛不卖力气，心内着急，几天一催，后来，就弹劾刘猛玩忽职守，先是降职使用，继而又将他关进左校署服役。曹节、

王甫不肯罢休，又抓捕了一千多名太学生严加审讯，审来审去，最终也没有查出传单作者是谁。

又过了几年，永昌太守曹鸾见朝政越来越腐败，众官都庸碌无为，便上书为党人诉冤，认为这些社会贤能和朝廷股肱遭受禁锢，蒙受屈辱，实在不合天意。曹鸾的用意是劝皇帝解除党锢，选贤任能，重振朝纲。但这一奏章，再次激怒了宦官，结果，曹鸾被逮入牢狱，拷打致死。灵帝又下诏州郡，重申党禁，责令地方官抓捕一切与党人有瓜葛的人，甚至连门生故吏的父子兄弟也要免官禁锢，不准重新起用。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士子几乎捕获殆尽。这次党祸比起第一次来，时间更长，受害范围更广，惩治也更严酷。

在第二次党祸期间，各阶层民众不顾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依然同情支持受迫害的党人。如张俭被朱并诬告后，离家出逃，受到许多人的掩护，他投奔到谁家，谁家都甘冒风险容留他、资助他。有一天，他逃到了东莱（今山东掖县），藏到了李笃家里，县令听到风声，率吏卒前来捕捉，李笃泰然迎出门外，对县令说："张俭名重天下，人们都敬仰他，他并没有犯罪却被逼逃亡。即使您能轻易地抓住他，可是怎么能忍心呢？"县令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竟叹了口气带着吏卒们转身回去了。随后，李笃又护送张俭出关到塞外，使他脱离险境，免遭于难。汝南世家大族袁氏，四世三人官至三公，声名显赫，袁绍利用家族的声望和各种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救助遭党祸牵连受难的人，使许多人减轻了痛苦。

到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第二次党锢已持续了十多年，灵帝刘宏虽已长大成人，但他昏庸侈迷，为了保住帝位，极力讨好宦官，先后提拔张让、赵忠等十个太监为中常侍，让他们掌管文书，传达诏令，甚至无耻地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以十常侍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唆使灵帝盘剥百姓大兴土木。为了聚敛财富，他们竟叫灵帝在皇城的西园开设了卖官场所，将公卿以下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公开拍卖，其荒唐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十常侍们

还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个个大修宅第，其富丽堂皇的程度足可与皇帝的宫室相媲美。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州郡，横行不法，祸害百姓。东汉王朝已经黑暗腐朽到了极点，各地人民不堪忍受，终于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大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震动全国，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灵帝身边有一个名叫吕强的太监，颇有一些眼光，他担心那些长期以来遭受迫害禁锢的党人们，会趁着天下大乱的机会卷土重来，说不定还会与张角的黄巾军联合起来推翻朝廷，于是向灵帝陈明利害，建议赶快解除党禁，免得腹背受敌。灵帝想了想，确实感到害怕，便下达诏令赦免党人，并允许流放在外的党人家属回故乡居住。为了消弥党人的愤懑情绪，灵帝又大行韬晦，授给一些党人官职，让他们参与镇压农民大起义。这样，东汉统治王朝内部的这场长达十年的争斗，在黄巾军大起义面前暂告中止。

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失败而告结束。但众多的忧国忧民、充满理想、不畏强暴、申张正义的党人形象，却深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重气节、轻生死的品格风貌，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后来人。但是，他们毕竟悲壮地失败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王　云）

参考书目：

《后汉书》：《党锢列传》、《桓帝纪》、《灵帝纪》、《陈蕃列传》、《窦武列传》

《资治通鉴》卷五十三至五十六

桓帝祸国

汉桓帝是东汉王朝的第十任皇帝。他在位期间，生活上穷奢极欲，政治上亲近宦官、残害忠良，把东汉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汉桓帝刘志，生于本初元年（公元 132 年），死于永康元年（公元 167 年）。他的祖父刘开是汉章帝的庶子，被封为河间王。他的父亲刘翼是刘开的庶子，被封为蠡吾侯。刘志本是东汉皇族较为疏远的一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制的惯例，汉质帝死后，说什么也轮不到刘志做皇帝。但东汉王朝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却将刘志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东汉初期的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朝君主为政清明，国家呈现出大治景象。汉章帝于三十一岁时病死。即位的汉和帝年龄太小，由其母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窦宪为大将军。从此，国家大权落入外戚窦氏手中。汉和帝长大成人之后，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依靠宦官郑众等人除掉了窦宪集团。谁料想国家政权从外戚之手又落入了宦官的魔掌，皇帝还是没有实权。从此，外戚和宦官就像两条毒蛇一般缠绕着、撕咬着东汉国家政权，你来我往，刀光剑影。他们控制着皇帝的废立和国家的大小事务，为了自己的利益胡作非为，把东汉政局搞得一塌胡涂。汉和帝、汉殇帝、汉安帝、汉顺帝时期的东汉王朝，就是在这动荡不安的黑暗之中度过的。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十八岁的汉顺帝立自己宠爱的梁贵妃为皇后，让贵妃之父梁商做大将军。几年后梁商病死。还没等埋葬梁商的尸体，顺帝便封梁商之子梁冀为大将军，封梁冀之弟梁不疑为河南

尹。从此,东汉政权便落入外戚梁冀集团手中。

梁冀本是一个纨绔子弟,平日里不知读书,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只知道和一群狐朋狗友喝酒、赌博、驾鹰、走狗、骑马、斗鸡。就是这样一个无赖仗着他妹妹是汉顺帝的皇后,便做了大将军。别看梁冀不学无术,玩弄权术却非常内行。汉顺帝死后,尚在襁褓之中的汉冲帝即位,梁冀之妹以太后身份临朝,梁冀辅政,执掌国家大权。谁知好景不长,汉冲帝很快夭亡。梁冀为继续把持政权,力排众议,又立八岁的刘缵为皇上,是为汉质帝。汉质帝幼而聪慧,看不惯梁冀的骄横专断,有一次曾对朝臣们说:"梁冀乃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到此话后怀恨在心,知道汉质帝一旦亲政并非自己所能控制,便派人在汉质帝所食用的煮饼中下了毒药,将汉质帝活活毒死。朝臣们慑于梁冀的权势,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汉质帝死后,正直之臣太尉李固等人有感于朝政混乱,建议立年龄已是成人且德行又好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以重振朝纲。奸诈的梁冀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刘蒜正直严明,如他立为皇帝,自己的末日也就为时不远了。但究竟立谁为帝,一时也找不到最佳人选。恰巧此时梁太后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蠡吾侯刘志,刘志巴不得攀上梁家的高枝,急匆匆来到了京城。梁冀的眼光马上盯到了刘志身上,他想若立刘志为帝,自己便可以大舅哥的身份继续执政,富贵仍可长保。在讨论立新帝的公卿大会上,他提议立刘志为帝,遭到了李固等人的坚决反对。梁冀一看,文的不行来武的,厉声喝道:"就立刘志,罢会!"于是,十五岁的刘志登上了皇帝宝位。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

汉桓帝深知自己的皇位来自于梁冀,对于梁冀必须百依百顺,否则,吃毒饼而死的汉质帝便是他的下场。于是,正直的良心泯灭了,汉桓帝走上了助纣为虐的道路。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汉桓帝为了答谢梁冀的拥立之功,增封梁冀食邑三千户,增加梁冀举荐官员的名额,并封梁冀二弟一子

为万户侯。对于汉桓帝的滥赏滥封，太尉杜乔深感不妥，上书言道："古代的明君皆以用贤和赏罚为要务。而今梁氏一门并无多大功劳，却裂土封之。这样不仅会伤政为乱，而且还会导致丧身亡国，一定要谨慎啊！"汉桓帝只知讨取梁冀的欢心，对于杜乔的正义之言毫无采纳之意。

十一月，有人想拥立刘蒜为皇帝。事情败露后，梁冀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想利用这件事整倒朝廷正直之臣李固和杜乔。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李固和杜乔与刘蒜串通谋反，将他们投入大狱。李固、杜乔都是官至太尉的朝廷大员，连梁太后都一再为他们说情。对于他们的冤屈汉桓帝是不会不知道的，但只因几个宦官对他说："陛下以前即帝位时，李固、杜乔皆坚决抗议，认为您的德行不配做皇帝。"汉桓帝心里便埋下了仇恨李、杜的种子，他任凭梁冀处置他们，丝毫不加干涉。最后，李固、杜乔被梁冀残酷地害死于狱中，并暴尸于城北郊野。李、杜之死梁冀是刽子手，但汉桓帝也可以说是帮凶。李、杜惨死后，群情激奋，人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他们收取尸骨，并把愤怒的言词射向梁冀。汉桓帝对人民的情感不理不睬，于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三月亲临梁冀府第，对梁冀表示支持。

和平元年（公元 150 年）春天，梁太后身体欠安，汉桓帝也已十八岁多了，于是梁太后归政于汉桓帝。归政不久，梁太后便病死了。亲政以后的汉桓帝十分明白：梁冀经过多年的经营，满朝文武尽是他的势力，要长保自己的皇座，还要继续讨好梁冀。汉桓帝又增封梁冀食邑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待遇同长公主。对于梁冀在各个方面的胡作非为，他大开方便之门。梁冀把持朝政、陷害忠良，他视而不见；梁冀穷奢极欲、贪赃枉法、杀人越货、欺男霸女，他充耳不闻。为了进一步抬高梁冀的地位，元嘉二年（公元 152 年），汉桓帝命令朝中二千石以上的大员们商讨到底应该给梁冀以什么样的礼遇。那些阿谀奉承的大臣们纷纷建议：梁大将军之功勋如同周公，应该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梁大将军有立帝之功，其封邑

可扩大为四县，如同东汉第一功臣邓禹；梁大将军可以入朝不趋、带剑上殿、谒赞不名，礼仪如同西汉第一功臣萧何；赏赐给梁大将军的金钱、奴婢、采帛、车马、衣服、甲第等，规格可以如同西汉中兴功臣霍光。对于这些，汉桓帝不加犹豫地肯定下来，并表示要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则。就这样，作为一代奸臣的梁冀，仅仅因为汉桓帝对其感恩戴德，便被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从此，梁冀凶恶日甚，专擅国家之权柄。

汉桓帝在和梁冀狼狈为奸的同时，自己在处理国家政事方面，也自然而然地沾染上了梁冀的恶劣习气。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为政清廉的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冀州地区的贪官污吏闻听朱穆前来赴任，有四十多人吓得赶紧逃窜。朱穆到任后，对那些没有逃走的贪赃枉法者给予了严厉的处决，使一州的吏治状况迅速好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朱穆发现宦官赵忠有僭越封建礼制的行为。赵忠的父亲死了，归葬于冀州安平，在埋葬时使用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玉匣。朱穆为了维护封建礼制的严肃性，命令下属挖开赵忠之父的坟墓，并打开棺材，暴尸于外。汉桓帝听到宦官赵忠的告状以后，不仅不为朱穆维护封建礼制的尊严叫好，反而为朱穆的行为大发怒火，罢了他的官并判为刑徒。此事发生以后，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深感不平，他们冒死上书替朱穆求情，书中言道："朱穆忧国忧民，赴任之际志在清除邪恶。那些宦官贵宠的亲属们在下面竞为虎狼，吞食小民，无恶不作。朱穆所为，是伸张国家大法。朱穆无罪，我们甘愿脸上刺字、脚戴镣铐，代替朱大人服刑！"汉桓帝看了这个奏章之后，心中虽然感到不快，但刘陶等人所言句句义正辞严、无可挑剔，再加上这是数千人的呼声，也不能不考虑一下民心问题，便赦免了朱穆。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它说明汉桓帝在如何为政、治国上，并无正义可言。他一开始就对宦官小人言听计从，这为他以后信任宦官、害国害民留下了张本。

汉桓帝虽然自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就已亲政，但由于梁冀

自汉顺帝时就做了大将军，朝廷内外盘根错节都是梁的势力，故当梁冀威行内外之时，他只好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并干一些助纣为虐的勾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不满意傀儡皇帝的地位。特别是梁皇后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病死，又没为他留下什么继承人，他在感情上便开始疏远梁冀。梁皇后死后，汉桓帝又宠爱上了梁贵人。这个梁贵人原来姓邓，在入宫之前父亲就死了，梁冀之妻见她长得漂亮，便将其收为干女儿，改姓梁，然后献给了汉桓帝。现在她果然得宠了，梁冀夫妻极为高兴，但又惧怕知情人暴露了她的身份，派刺客去刺杀梁贵人的生母和姐夫，没想到刺客被活捉。这件事使梁贵人大为伤心，向汉桓帝哭诉了自己的身世，并要求惩办梁冀。汉桓帝听罢心中大怒，下定了除掉梁冀的决心。但他手中并无直接调动的一兵一卒，要干掉手握实权的梁冀，只能依靠身边的心腹宦官。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八月，汉桓帝和一些与梁冀有仇的宦官歃血为盟，对梁冀及其集团发动突然袭击，梁冀猝不及防，只好自杀。入宫为帝十三年，现在已经是二十八岁的汉桓帝终于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

铲除了梁冀，朝野内外无不拍手称快。按理说汉桓帝如果有治国之才，这正是他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但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向好的方向转化，相反，汉桓帝倚仗着自己无限的权势，愈加胡作非为，朝政更加混乱不堪。汉桓帝首先论功行赏，封参加消灭梁冀的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为县侯，单超食封两万户，其余四人食封万户；封宦官尹勋等七人为亭侯；封宦官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宦官侯览虽未参与诛梁之事，但因他曾贡献出五千匹绢，亦赐爵关内侯。随着汉桓帝对这些宦官的加官晋爵，原来铲除梁冀集团所空下的政府位子，便由宦官集团迅速地充塞进去。国家政权从外戚手中落入了宦官手中。这些宦官一个个志满意得、横行不法，势力倾动朝廷内外。汉桓帝除掉了梁冀一只虎，又放出了无数吃人的狼。面对着汉桓帝的胡封乱赏，面对着宦官们的狐假

虎威，一些正直之士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忍心看到国家再度陷入黑暗。白云县令李云上书言道："梁冀恶毒满天下，皇上将他正法实属应该，这就如同杀死一只鸡那样容易。不料你竟对参与其事的宦官个个裂土封侯。假若汉高祖刘邦的在天之灵知道了此事，能愿意吗？西北边境上的将领连年拼死作战而不得封侯，听到此事能不寒心吗？您这样乱封官爵、宠幸奸佞小人，使贿赂公行、政治日益黑暗，还像个皇帝的样子吗？"李云的奏章言词激烈，处处戳到了汉桓帝的疮疤，汉桓帝恼羞成怒，下令将李云打入宦官的牢狱之中严刑拷打。弘农郡官员杜众十分崇拜李云仗义执言，痛恨汉桓帝不分黑白，上书表示："我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见又有人来触自己的龙鳞，愈加愤怒，将杜众也一并打入监牢。此事发生后，正直的官员纷纷挺身而出，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等人上书为李云、杜众求情，希望能把他们的生命从虎狼之口抢夺回来。看到他们的奏章，汉桓帝不仅没有半点反省，反而暴跳如雷，他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大不敬，决意要给这些不驯服的官员一个下马威。他立即下令免去陈蕃、杨秉的官职，削减沐茂、上官资的俸禄，将李云、杜众杀死狱中。在残酷摧残正直官员的同时，桓帝提升宦官单超为车骑将军。但单超好运不长，不久便病魔缠身，一命呜呼。

在汉桓帝的纵容之下，宦官们到处抢占田产、欺男霸女，气焰极为嚣张。老百姓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给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们送了一些绰号。说左悺是权能回天的"左回天"，说具瑗是骄横无双的"具独坐"，说徐璜是无人敢欺的"徐卧虎"，说唐衡是流毒遍天下的"唐雨堕"。这些大大小小的宦官让他们的兄弟亲戚为官一方，像强盗一样敲诈勒索，为所欲为，而昏君汉桓帝对他们的无耻行径统统给予包庇纵容、撑腰壮胆。宦官侯览和段珪皆在济北县附近买置田产，并纵容其仆役宾客抢劫行人，干尽了杀人越货的勾当。济北地方官滕延决心为民除害，逮捕侯、段宾客数十人，并处以极刑，陈

尸路边。侯览、段珪施出小人伎俩予以反扑，他们跑到汉桓帝跟前哭哭啼啼，要求严惩滕延。汉桓帝听到自己的奴才受欺，心中顿感不快，于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以多杀无辜罪，免去滕延官职并送上法庭。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大将皇甫规平定了羌人的叛乱，论功当封侯。但皇甫规为人正直，不耻与宦官来往。宦官徐璜、左悺借此事来索取贿赂，被他断然拒绝。徐、左索贿不成，便陷害皇甫规是用钱买得羌人的假投降，并无军功可言。皇甫规愤然上书："宦官们说我是用钱货买得羌人假投降，实属诬蔑！如我用的是私钱，我家中不富，哪能拿出那么多？如我用的是公钱，帐簿具在，请详细检查可有此项支出？"世上本无用钱买降之事，汉桓帝虽查来查去亦查不出什么踪迹，根本无法给皇甫规定罪。但皇甫规奏章中堂堂正正的言语恰似对汉桓帝的批判，使汉桓帝总感不快，所以他终以羌人之乱又起为罪，将皇甫规免为庶民，罚作刑徒。面对昏君执政、奸人逞凶、功臣变为阶下囚的状况，群情不平，有官员和太学生三百多人为皇甫规鸣冤叫屈，汉桓帝只好赦免了皇甫规。如无他人搭救，皇甫规屈死在宦官陷害、桓帝乱判之下，是确定无疑的了。

对于宦官集团的人不学无术而又充斥于各级政府机关，正直的士大夫们早就心中不平了。现在宦官们又无德无行、横行霸道，士大夫们愈加义愤填膺。他们决心起来与宦官斗争，清除东汉政治上的这股邪恶势力。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作为一国之君的汉桓帝犹豫片刻便将自己这个决定性的砝码投到了宦官集团一边，使士大夫们在斗争中丢盔卸甲，败下阵来。正义遭到了摧残，邪恶却得以张扬。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初，太尉杨秉首先处治宦官侯览，开始了对宦官集团的打击。侯览之弟侯参做益州刺史期间贪婪残暴，获取赃款数亿计，用金银锦缎装饰的豪华马车就有三百多辆，其它财物不可胜数。杨秉命令下属将侯参捉拿京城审讯，侯参自知罪行当死，故于途中畏罪自杀。杨秉为彻底铲除侯览，随即上书言道："侯

览之弟罪行深重，已自取灭亡。我恐怕侯览因其弟弟事而怀恨在心，为防不测事情的发生，建议对侯览不要再加亲近，要迅速斥退、送回老家。”汉桓帝看罢奏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想：“侯参罪当诛死，我已无话可说。侯览虽与此事有关，依照法律也应治罪，但他对我忠心耿耿，必须加以保护。”于是汉桓帝便派宦官对杨秉的奏章吹毛求疵，批评杨秉：“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管，三公管外，御史管内，今天你越职奏言内官之事，是何居心？”杨秉当即对曰：“按照我们汉朝的制度，三公之职无所不管。”理屈辞穷的汉桓帝不得不免去了侯览的官职。此事发生后不久，司隶校尉韩缜又揭发了宦官集团的一些罪行：宦官左倌与其兄太仆左称，在地方上聚敛为奸、放纵宾客、鱼肉乡民；宦官具瑗之兄沛国相具恭大肆贪污。面对着宦官集团的一件件犯罪事实，汉桓帝也不好直接出面袒护了，只好处理了一些罪行确凿的宦官集团成员。汉桓帝时期，士大夫在和宦官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几件小事并不能说明汉桓帝从此就变成了一个明君，相反，他在短暂的迟疑之后，很快便投入了宦官集团的怀抱，成了这个腐朽势力的总领班。

延熹八年(公元 165 年)三月，士大夫们从三件事上再次向宦官集团发起冲击。北海郡太守羊元群贪赃枉法、声名狼藉，被罢去太守职务，罢官归家之日他又将太守官府劫掠一空，太守府厕所有个设计奇巧的窗子，他也装在车上拉回家中。管属北海郡的河南尹李膺为政清廉，一身正气，决心将羊元群绳之以法。羊元群见势不妙，急忙向宫中宦官大肆行贿。宦官单超的弟弟单迁为官山阴太守，因犯罪被送进监狱，廷尉冯锟为了取得犯罪口供，将单迁拷打致死。宦官苏康、管霸在其家乡随意兼并别人的良田美业，所在州郡的地方官慑于他们的权势对此敢怒而不敢管。大司农刘祐决心惩治他们的不法行为，命令有关地方官员按照国家的法令，将苏、管二人兼并的田业统统没收充公。在正义官员的冲击之下，宦官集团的人纷纷落马，士大夫们大有将他们赶尽杀绝之势，他们为了本

集团的生存着想，想方设法进行反击。不过，他们反击的手段异常卑鄙。他们先是造谣中伤，说李膺、刘祐是诬陷好人，说冯绲是滥杀无辜，接着使出惯用手法到桓帝面前哭诉喊冤。汉桓帝看到自己这些心爱的奴才们几乎个个都成了士大夫们攻击、收拾的目标，心中怒火顿时燃烧起来。理智本来就不多的汉桓帝想到这些也就不管什么国家、法律、正义如何了，不分青红皂白地传出圣旨：将李膺、冯绲、刘祐削官为民，罚作刑徒。就这样，因为桓帝的昏庸无道，士大夫与宦官斗争以失败告终。这时，一贯主持正义的老太尉杨秉也于这年五月去世，朝中无人主持公道，宦官们的气焰更加嚣张，士大夫们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特别是身为刑徒的李膺等人环境更是恶劣，随时都有被宦官迫害致死的危险。值此危险之机，正直的陈蕃出任太尉之职。陈蕃为了保住士大夫中的精华，曾几次向汉桓帝说李膺等人是冤枉的，应该官复原职，其言词恳切甚至痛哭流涕，但汉桓帝丝毫不为之所动。面对汉桓帝的顽固不化，应奉上书言道："冯绲以前为国家征讨荆蛮，功勋卓著；刘祐任司隶校尉，正气凛然；李膺威振幽、并诸州，其惠政远播辽东。现在边境地区多处发生骚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陛下赦免李膺等人，以备边境发生不测之事。"汉桓帝看了应奉的奏章，不免倒吸了几口凉气，心想："宦官虽然伺候得我舒舒服服，但终究不能率兵杀敌，李膺等人虽然不听话，但我还有用着他们的时候。"汉桓帝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中，只好赦免了李膺等人。

李膺被赦免不久，便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专管纠察京师官吏不法行为的，按理说权力挺大，但此时皇帝昏庸、宦官横行，司隶校尉不执法便罢，如若执法便要和这些混帐家伙较量，弄不好就要栽倒在他们手中。对于这些，李膺已顾不得多想，为了铲除邪恶、重振朝纲，他要充分行使司隶校尉的职权。此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张朔为官期间对老百姓的搜刮如狼似虎，贪残无道，甚至做出了剖杀孕妇的兽行。张朔听说严厉的李膺出任

司隶校尉，惊吓万分，县令也不敢做了，急忙逃回京城藏匿于其兄张让的夹壁之中，希望用宦官的宅院和权势保住自己的性命。李膺很快便侦知了张朔的下落，并亲自带人从张让的家中将张朔抓进了大狱。经过审讯，张朔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李膺担心日久生变，故而审讯完毕便对张朔开刀问斩。宦官张让做梦也没想到凭着自己和皇帝的亲近关系竟救不了其弟的性命，心中又是难过又是愤怒，于是便跑到汉桓帝那里将心中的冤屈哭诉一场。汉桓帝听罢哭诉，愠怒油然而起："李膺啊李膺，看来上次让你做刑徒并没改变你的脾气，还是这样的桀骜不驯，今天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免得以后再生是非。"汉桓帝立即召见李膺，问道："你为何不先请示我，就杀死了县令张朔？"李膺由此听出了汉桓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本意，乃愤然回话："以前孔子为鲁司寇，第七天便诛杀了少正卯，我今到任已有一旬才将张朔正法，与孔于相比行动真是慢极了。我自知有罪，请陛下再给我五天时间，抓出幕后的元凶，然后回来任皇上惩罚。"李膺的话引经据典、无懈可击，汉桓帝实在无法给李膺定罪，只好对张让说："此乃你弟之罪，司隶校尉并无过错。"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但它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每逢士大夫和宦官斗争处于关键时刻，汉桓帝总想做宦官的守护神，而对于士大夫们却总是鸡蛋里挑骨头，寻机给予无情的打击。

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是汉桓帝时期士大夫们和宦官集团斗争最激烈的一年。如果说以前汉桓帝对于支持谁还徘徊过，那么从这一年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到宦官阵营里去了。因此，宦官势力大振，士大夫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宛县富商张汎用金钱交通宫中宦官，因而无所顾忌、横行不法。地方官员成瑨将其收捕狱中，还没等处理完毕就碰上了汉桓帝下大赦诏令。成瑨感到张汎罪行严重，如放虎归山，恐怕还要为害一方。于是虽遇大赦，仍然将张汎及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杀头问罪。宦官赵津家在晋阳县，平常贪婪残暴，恣意作虐，为一县之心腹大患。太原郡太守刘瓆命令属下将赵

津捉拿归案，也于皇帝的大赦诏令颁布之后将其杀死。宦官侯览家在防东县，平时其家属亲戚残害百姓，罪恶累累。侯览母死归葬防东，其坟墓规模巨大、豪华，僭越礼制。山阳郡太守翟超命督邮张俭侦办此事，张俭随即上书桓帝状告侯览。侯览利用伺候皇帝之便，将奏章截留在自己手中。张俭忍无可忍，命令捣毁侯览建造的宅院和坟墓，没收其财产。宦官徐璜的侄子徐宣，曾向原汝南太守李暠之女求婚遭拒绝，遂怀恨在心。不久徐宣做了下邳县令，决意报此耻辱。徐宣带着兵士冲入李暠家中，将李暠的女儿强行抢走，予以戏弄凌辱之后又残忍地以箭射死。面对徐宣令人发指的兽行，东海郡相黄浮义愤填膺地说："徐宣乃国家虎狼之贼，如今日取其头，明日我死亦瞑目了！"遂将徐宣依法杀死并暴尸于野。这几件事情发生之后，宦官集团意识到士大夫与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如士大夫成为刀俎，他们将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宦官们虽然个个罪孽深重、臭名昭著，但也要做困兽之斗。宦官们还是直接走汉桓帝的路子，首先状告成瑨、刘瓆于大赦之后杀人是违抗圣旨；然后状告翟超、黄浮胡作非为，滥杀无辜。实事求是地讲，封建社会里皇帝的大赦是为了收买民心、平息社会矛盾；成瑨等人所为也是为了铲除邪恶、平息社会矛盾，与桓帝的大赦殊途同归，并无根本冲突。况且成瑨等办的是该办之事，杀的也是应杀之人，对他们进行嘉奖方为上策。至于黄浮等纯粹是为民除害、依法办事，本无半点罪过可言，只要弄明事情真相也就可以了。但汉桓帝却不是如此想的，他只听信宦官的一面之词，便对这些暗里作恶多端、明里谦卑恭顺的宦官滴下了同情的眼泪，而对那些品行端正、刚直不阿的官员们却怒火中烧："你们在下面欺杀善良，还拿我的大赦诏令当废纸，使我浩荡皇恩不能遍洒人间，我定要治你们的重罪。"汉桓帝主意拿定便立即付诸行动，命令有关部门将成瑨、刘瓆打入死囚，将翟超、黄浮剃成光头，戴上镣铐，去服劳役。汉桓帝这个颠倒黑白的荒唐旨意下达之后，引起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太尉陈蕃上书极言这些人无罪受

冤应予释放，但汉桓帝对此置之不理，决心一意孤行地继续保护宦官、打击士大夫。

东汉的士大夫们大都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献身精神，他们虽然屡遭汉桓帝和宦官们的摧残，但铲除邪恶伸张正义的信念在他们心中仍一如既往。特别是司隶校尉李膺，他在汉桓帝对士大夫们屡兴大狱的情况下，仍然掷出了痛击宦官的投枪。河南有一个叫张成的方士，会看天、论地、占卜凶吉，和宫中的宦官过从甚密，汉桓帝有时也要向他占上几卦。在和宦官与桓帝的交往中，他探知不久将要有大赦诏令颁布，回家之后便令其儿子将仇人杀死，渴望借大赦良机逃脱惩罚。案发之后，李膺督促人马缉捕凶犯，不料皇帝的大赦诏令也随之而下。眼睁睁到手的逃犯就要逃之夭夭，嫉恶如仇的李膺心中充满悲愤："此时杀凶手定会触怒龙颜，自己反成罪人；但杀人不偿命，天理难容，于法不通。我李膺活在世上就是追求天理公道、人间正义，为了实现此志我甘愿冒杀头之祸！"李膺根本没有理会什么大赦诏令，将张成之子审判完毕即绑赴刑场斩首示众。此事发生之后，宦官们暗暗得意："以前处置的士大夫都是些地方官员，现在可以借机搬倒他们在上层的首领，向士大夫发动全面进攻了。"宦官们教唆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说李膺等人厚养京城的太学生，又联系各郡的学生，组成死党，在下面诽谤皇上，扰乱社会风俗，欲图谋不轨。汉桓帝本来就对李膺无视自己的大赦诏令心中愤然，现在听说李膺在下面与士大夫结党成派评论朝政就更火上加油了。别看汉桓帝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也懂得李斯讲过的大臣在下面结成党派君主之权势就会从上面降下来的道理。为了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汉桓帝决不允许社会上存在一个民心所向、批判朝政的士大夫团体。汉桓帝当即命令逮捕所谓的党人。当命令下到太尉陈蕃处时，陈蕃对于全国的正直官员和士大夫就要陷入囹圄的危局忧心如焚，急忙上书劝阻："皇上今欲逮捕之人，都是誉满海内外的忧国忧民之臣，对他们不能这样做！"陈蕃拒

不执行桓帝的命令。汉桓帝见正常渠道不能贯彻他的旨意，迅速命令宦官集团出动人马，将李膺等二百多人关进了宦官控制的黄门北寺狱。陈蕃再次上书桓帝，为李膺等人鸣冤叫屈，要求无罪释放。汉桓帝只高兴大臣们像宦官那样顺着自己，哪能容忍陈蕃三番五次对抗自己，于是给陈蕃扣上了举荐非人的罪名，罢免了他太尉的职务。陈蕃免职以后，其他大臣惧怕引火烧身，没有再敢为党人说情的了。朝里朝外都成了宦官们的天下，东汉的政治生活陷入一片黑暗。汉桓帝放手让宦官们拷打李膺等人，准备定刑之后全部干掉。李膺他们头上手上脚上三处镣铐锁戴，头上还要蒙以布袋在烈日下暴晒，受尽了人间折磨，但他们就是不承认自己结成什么党派，实在逼急了，就说一些宦官子弟是自己的同伙。宦官们看打击士大夫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害怕再审下去会弄出什么与己不利的事来，乃劝说桓帝赦免党人。汉桓帝见奴才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便于永康元年(公元 167 年)将这批人释放出狱。但汉桓帝已经恨透了这些士大夫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决不允许这些人再出来与己作对，于是下达命令，这批人出狱之后政治上禁锢终身，永世不得做官。有人由此也许会联想到秦始皇的坑儒之举，其实这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秦始皇的坑儒是从维护国家的统一出发，而汉桓帝禁锢党人则是为了投宦官集团之所好，其所打击摧残的党人都是一身正气的栋梁之才，可以说汉桓帝的举动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汉桓帝在政治上是如此的昏庸，在其它方面亦无可称道，干尽了乌七八糟的坏事。他置国家艰难、人民困苦于不顾，自己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汉桓帝曾先后立过三个皇后、十多个贵人，但这些女子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淫欲，又广采民间美女五六千人置于后宫之中，供其玩乐。这些人服饰华丽，饮食精美，每天都要无谓地用去国家的大量钱财。当时，任光禄勋的陈蕃对此忧心忡忡，上书言道："这几年宫中耗费太大，为此政府对老百姓赋敛太重，已使他们处于饥寒交迫、无法生活的地步。俗话说强盗不经过有五女之家的

门户，这是因为他们女孩子多家里太穷的缘故。现在后宫之女已逾数千，这不是名符其实的贫国吗？”陈蕃的奏章情真意切，汉桓帝不便反驳，只好遣出宫女五百人摆摆样子，以示自己接受意见。但从五千人的庞大宫女群中弄出五百人来，无异于从老牛身上去掉几根毛，于事无多大补益。

汉桓帝好玩女人，还好外出游乐、骑马、射猎，寻找宫廷中没有的生活刺激。梁冀当政之时，桓帝白天游荡，晚上就夜宿梁氏府第，享受着下人进献的娇妾美姬。梁氏死后，桓帝外出就干脆住在宦官的私宅之中，和宦官们群宿群奸。东汉京城的洛阳郊外本来就有西苑、上林苑、平乐苑等几处供皇帝游乐的场所，但汉桓帝仍嫌其狭小不能纵横驱驰，故又圈占大量民田兴建了鸿德苑、显阳苑和鸿池等游猎场所，然后就是不分季节地与狡兔、野兽竞力。大臣陈蕃上书劝止说：“皇帝打猎，季在仲秋，一是为了习武健身，二是为了弄点祭品孝敬祖先。如果逾越此境，则为肆意放纵。现在国家贫穷，已经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困境。当此之时，陛下应该尽心竭虑，图国振兴，哪能整天耀武扬威、纵马行猎呢？”陈蕃的奏章可谓晓以大义、指明利害。但汉桓帝却把这些肺腑之言当成耳旁风，不加理睬，继续奔驰于野兽场上，什么国家大政，什么人民疾苦，一切的一切似乎皆与自己无关。

汉桓帝政治上昏庸，生活上又如此放纵，处处不合儒家的学说，大臣们也总是用儒家的理论来劝谏他、限制他。他渐渐地厌烦了汉武帝时期便确立的汉家统治思想——儒学，希望从别的方面找点精神慰藉，恰逢此时道教兴起、佛教东来，汉桓帝的眼光马上盯到了这两种新兴的宗教上。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正月和十一月，汉桓帝开始派宦官左悺和管霸祭祀老子，后来竟发展到在宫中建立场所祭祀黄帝、老子和浮屠。汉桓帝所为，牵涉到儒学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事情非同小可，所以地方官员襄楷上书言道：“听说陛下在宫中祭祀黄帝、老子和浮屠，我有些看法向您谈一

下。这些宗教以清虚为本，崇尚无为，好生恶杀，节制欲望，祛除奢侈。今陛下不去嗜欲，杀罚不当，已经违背了这些宗教的宗旨，难道还能获得它们的保佑吗？今陛下所幸淫女艳妇尽天下之丽，所食皆甘肥饮美穷天下之味，这些行为皆与您信奉的宗教背道而驰，您为什么还要信奉黄老、浮屠呢？”襄楷的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桓帝的行动与信仰之间的矛盾，汉桓帝恼羞成怒，命人逮捕襄楷，对其严加惩处。就这样，道教与佛教经汉桓帝之提倡，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东汉王朝的思想统治亦如政治形势一样，呈现出一派混乱局面。

汉桓帝信奉黄老道教，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由于他整日里醉生梦死、欢情纵欲，很快便病人膏肓，永康元年（公元167年），也就是他三十六岁的时候便寿终正寝了。他留给其继任者的是贫穷不安的国家，是摇摇欲坠的江山。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孝桓帝纪》、《梁统列传》、《蔡邕列传》、《李杜列传》、《陈王列传》、《党锢列传》、《宦者列传》

《资治通鉴》卷五十三至五十六

灵帝倾覆东汉

汉灵帝刘宏是东汉王朝的第十一任皇帝。他在位期间对宦官集团言听计从，对士大夫们无情打击，生活上贪婪无度，穷奢极欲，是将东汉王朝推向灭亡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暴君。

汉灵帝能荣登皇位，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汉桓帝虽然有过三位皇后、十多位贵人，外加宫女数千，但都没有为他生下个儿子，于是汉桓帝死后选谁做继承人又成了难题。最后，汉桓帝末任皇后窦皇后的父亲窦武选中了渎亭侯刘宏。刘宏的祖父与汉桓帝的父亲是亲兄弟，所以刘宏与汉桓帝血统不远，算是汉桓帝的侄子。于是，刘宏便被窦武等人拥上了皇帝的宝座，即汉灵帝。汉灵帝从十三岁称帝，到三十四岁死去，共执政二十二年。

汉灵帝即位不久，东汉政治史上便发生了两件大事。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大将军窦武和新任太傅陈蕃欲联手清除宦官势力，不料反被宦官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窦武和陈蕃处以死刑。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宦官集团乘胜前进，诬蔑李膺、杜密等人结党为乱，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诛杀士大夫一百多人，流放、免官、禁锢六百多人，逮捕太学生一千多人。宦官们将国家的政治推进了最黑暗的境地。也许是近墨者黑的缘故，由于长期和宦官生活在一起，汉灵帝满心里认为只有宦官才是信得过的好人，所以他在以后的为政生活中也走上了汉桓帝亲近宦官、摧残忠良的老路。

宦官们虽然在汉灵帝初年就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夺得了实

权，但他们并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到什么奖赏，他们决心把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到手中。为达此目的，宦官王甫在汉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身上打起了主意。刘悝曾因犯法被贬为侯，他央求王甫帮忙恢复王位，答应事成之后酬谢五千万钱。汉桓帝临死时念及同胞之情，恢复了刘悝的王位，王甫在事实上并未起什么作用。但王甫却窃此功为己有，向刘悝讨要谢钱。刘悝知道王甫未帮忙，自己又有点吝啬，就是不肯往外拿钱。王甫看刘悝没将他放在眼中，心中仇恨，使出了最恶毒的杀手锏。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王甫唆使同伙诬告宫中有人准备立刘悝做皇帝。年龄十八岁、做皇帝已有五年的汉灵帝深知皇位的重要性，他决不允许别人染指这个属于他的禁区。闻听刘悝要当皇帝，他顿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命令将刘悝及有关人员一百多人全部处死。人头落地之后，汉灵帝以为宦官们忠诚可嘉，将王甫和曹节等十二个宦官封为列侯。有了汉灵帝的另眼相看，宦官们如虎添翼，放心大胆地干起了贪污受贿、暴虐百姓的罪恶勾当。

汉灵帝既然已经把自己置于宦官的行列中，对于士大夫们也有了几分怒气。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汉灵帝大赦天下，但独独没有赦免被禁锢的那些党人。永昌太守曹鸾气愤不过，要求赦免党人。他在上书中呼吁："这些人或者年高德重，或者壮年有为，应该让他们执掌大权、辅佐朝廷，不料，他们却遭受屈辱久被禁锢。现在连那些试图谋反的大逆不道者都在赦免之列，党人有什么罪，为何不予宽恕？"汉灵帝发现有人对其政治进行非议，气愤异常，立即命令将曹鸾关进大狱予以击杀并且下诏各地继续追查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之内的亲戚是否还有做官的，如果发现，立即免官禁锢。就这样，汉灵帝长大之后，自己又亲手对士大夫来了个大扫荡，进一步扩大了宦官们所搞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东汉京城发生了一系列的灾变现象，先是地震，后是母鸡打鸣，接着又有一块颇像龙样、长十余丈的黑

气坠入宫中温德殿东庭中。如果按照董仲舒等人创立的天人感应学说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发生，都是因为国君有失政之举，上天特意下达警告。朝中士大夫们觉着这是规劝灵帝走上正路的大好时机，纷纷上书言政。大臣杨赐上书说："这是因为皇帝亲近小人与宦官所致，今后应退去奸佞之臣，征辟有为之士。"议郎蔡邕给灵帝上了个奏章，其中说："这些灾变是亡国之征兆，皆由陛下奶妈赵娆骄横专断、胡作非为所致。陛下今后宜远小人、近君子，这样灾变自可消失。"然后又指明朝中谁是小人谁是君子。最后，蔡邕恐怕汉灵帝泄露了奏章的内容，又写道："如果陛下有漏言之举，则臣下就有杀身之祸，请陛下保守秘密。"灵帝看完了这个奏章，似乎是有点良心发现，感叹朝政的混乱、蔡邕的忠诚，但也没有把这个奏章当成多大的事，就把它放在一边方便去了。宦官曹节乘机偷看奏章，将其中的内容透露给了有关人员。这样，蔡邕马上成了众矢之的，倒霉的日子也随之而来。宦官程潢等人诬告蔡邕是公报私仇，蓄意诽谤朝臣。汉灵帝闻听此言，也不感叹蔡邕的奏章了，立即命令将蔡邕送进洛阳大狱，经过审讯，判处蔡邕死刑，且死后暴尸。后经正直宦官吕强仗义直言，汉灵帝才免蔡邕一死，将其充军边疆。

像李膺那样的士大夫们已经是该杀的杀、该禁锢的禁锢，已无什么力量。但像蔡邕那样的士大夫还会不断出现，他们熟读儒家经书，有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志，动不动就要随意指点朝政，汉灵帝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臣下，他要另辟蹊径，培养一批唯命是听的官僚。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正式设立鸿都门学，这些学生皆由中央官员和地方大吏推荐，必须和党人无丝毫牵连。这些学生不学儒家经典，不研经国济世之学，专攻内容浅薄、形式华丽、歌功颂德的汉赋，或练习古篆、鸟字等雕虫小技。这其中虽也有个别货真价实者，但多是请人捉刀代笔、趋炎附势的无能之辈。他们于鸿都门学毕业之后，或外放刺史、太守，或入朝做官、拜侯封爵。培养点文学人才本无可非议，但汉灵帝试图以此来压抑、剥夺士大夫们

的人仕之途，无异又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官场上邪恶逞凶、贤良难寻。尚书令阳球上书言道："从来没听说过竖子小人凭作点文赋写几个字，就能窃居高官。现在太学、东观毕业的士大夫足够给您宣明圣化的了，请皇上罢去鸿都门学。"汉灵帝对此置之不理，鸿都门学照办不误。

在汉灵帝的纵容包庇之下，宦官王甫、曹节等人在朝中窃持权柄，威风凛凛，众人无不畏惧，就连在边境上屡立战功的段颎也讨好他们，成为宦官的党徒。王甫、曹节的亲戚为政一方的遍布天下，且非贪即暴，残害百姓。王甫的养子王吉为沛相，为政歹毒，多杀无辜。他所杀之人皆碎尸于车上，标明罪状，游行各县。夏天里尸体都腐烂了，他仍用绳子串着死人骨头游遍全郡才肯罢休。他为官五年，杀人逾万，将沛地变成了屠场，百姓为之惊恐万分。当时任尚书令的阳球气愤异常，曾立下誓言："如果我阳球做司隶校尉，一定杀尽这些混帐东西！"不久，阳球果然出任司隶校尉，他便开始实践自己的诺言。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宦官王甫指使手下人在京城出卖朝廷财物，得钱七千余万据为己有，京兆尹向阳球告发此案。阳球直接向汉灵帝面告王甫等人的罪恶。汉灵帝没想到奴才成了家贼，不能再护着了，只好听阳球处理。阳球果断地处死了王甫、王吉等人，并将王甫碎尸数块陈列于城门，旁边大书"贼臣王甫"四字，以示其罪不容诛。杀完王甫等人，阳球又把矛头指向曹节，准备把作恶多端的宦官清除干净。看到了王甫的尸首，宦官们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们惊恐之余想到了反攻。曹节告诫诸位宦官："我们内部可以自相残杀，但决不允许外面的狗来舔我们的血汁。这两天谁也不准回家，在宫里想办法。"回到皇宫，曹节便向汉灵帝诋毁阳球，说阳球是一个酷吏，任司隶校尉很不合适。汉灵帝本来对阳球有一定的好感，但听了伺候自己多年的老宦官的话，马上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很快便将阳球的职务改为卫尉，剥夺了他纠察官吏的职权。阳球诛尽宦官的愿望未能实现于心不甘，又联合朝中大臣刘郃、刘

纳、陈球等人谋划对宦官发起新的冲击。不料，阳球的小老婆将消息泄露给了他的宦官爸爸程璜，程璜考虑到宦官集团的整体利益，也就不管女婿如何了，将此事告知曹节。曹节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诬告阳球等人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宦官们的告状就是汉灵帝行动的指南，他立即下令将阳球等人处以死刑。就这样，由于汉灵帝的插手，东汉士大夫这次对宦官的搏击又以失败而告终。阳球等人壮志未酬身先死，空留遗恨赴黄泉。

汉灵帝将那些敢于和宦官作斗争的士大夫们收拾殆尽，对宦官却愈加亲近。对此，一般朝廷官员是敢怒而不敢言。为官清廉忠诚的宦官吕强对此深为担忧，他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向汉灵帝上书，对其做法提出批评："宦官曹节人品低贱，依靠谄媚才获得宠爱，其罪行犹如秦朝之赵高，车裂他亦不过分。陛下久不觉悟，不但不对他施以刑罚，反而还封爵加赏、委以重任，这是国家阴阳失调、田野荒芜、政事不理的根源，愿陛下改之。"吕强的奏章并没有打动顽固不化的汉灵帝，相反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宦官们设想到祸起萧墙，为了扑灭后院之火，立即将矛头对准吕强。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宦官们给吕强捏造了三大罪状：一是与党人相勾结，非议朝廷；二是数读《霍光传》，欲对当今皇上行废立之事；三是吕强兄弟有贪贿之行。在汉灵帝这里，无端的造谣确实能中伤无辜的好人，因为他不辨真假与善恶。汉灵帝当即下令逮捕吕强。吕强自知已经没有辩解的余地了，于是自杀身亡。临终前他气愤地说："大丈夫要尽忠国家，就不能和狱吏讲理。我死之后天下必将大乱！"

吕强说的天下大乱的预言很快便应验了。由于汉灵帝为政荒谬，宠爱的宦官横征暴敛、搜刮民财，人民贫困交加、无以为生，不得不喷发出反抗的怒火。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而对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纷纷为汉灵帝出谋划策。郎中张钧上书言道："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人民之所以归附张角，其原因就在于张让、赵忠等宦官让其亲

戚宾客为官一方，侵掠百姓，人民之冤无处倾诉，这才铤而走险，聚众为寇。今天应该杀死这些作恶多端的宦官，悬首示众，然后布告天下，以谢国人。这样，即使不用大军征剿，造反之人也会自解自消。”按理说，农民起义烈火已迫在眉睫，汉灵帝看了张钧的奏章，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为政之得失了。但他丝毫没有悔过之意，阅罢奏章即将此宣示诸位宦官。宦官们一开始弄不清汉灵帝用意何在，还以为要加罪于他们，纷纷跪地求饶，并表示愿出家财以助军费。看了奴才们的表演，汉灵帝心花怒放，对他们劝慰有加、亲近如初。而对于张钧却破口大骂：“这人真是狂徒！你看看中常侍们难道有一个不好的吗？”宦官们有了汉灵帝这句话垫底，心里就充实多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向张钧展开进攻，诬蔑张钧曾学过黄巾道教，与张角是一伙的。汉灵帝言听计从，命人将张钧打死于狱中。张钧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没有清除宦官。士大夫们见此路不通，为了整个地主阶级不为张角所推翻，又向汉灵帝提出了另一种建议。地方大员皇甫嵩提出：“此时应该开放党禁、赦免党人，让他们轻装上阵为国立功。”汉灵帝对这个建议倒是挺赞赏的，因为他知道宦官只能伺候他吃喝玩乐，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武功夫，还要靠那些党人士大夫，再加上他也害怕党人与张角联合起来推翻他，便对皇甫嵩计策欣然从之，大赦天下党人，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命河南尹何进负责京师军事，命卢植讨伐张角，命皇甫嵩、朱儁讨伐颍川黄巾军。

汉灵帝虽然命令何进、卢植等人调兵遣将镇压黄巾起义，但也不是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而是经常派些宦官去监视、牵制他们。宦官们乘机大敲竹杠，将军们进退两难。北中郎将卢植与张角部队交锋后接连得手，杀虏起义军一万多人。张角率部退至广陵城（今河北威县东）固守，卢植筑起围墙，挖成深壕，对广陵严加包围，然后制云梯准备攻城。在此时刻，汉灵帝派宦官左丰来军队视察。有人劝说卢植给左丰送点礼，以便让他在皇上那里美言几句，而卢植却以为堂堂将军不须巴结宦官，便例行公事地接待了左丰。左丰

空手而归，心中极为不快，回来便对汉灵帝说卢植的坏话："张角在广陵本来很容易打败，但卢植却偃旗息鼓、浪费时间。"汉灵帝闻听此言大怒，命令将卢植撤职问罪，卢植差点死于狱中。士大夫们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为汉灵帝卖命的。

经过地主士大夫们的残酷镇压，黄巾起义终于被扼杀于血泊之中。汉灵帝如果有识见，就应借机拉拢士大夫，进一步为己所用。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命令宦官赵忠主持封赏事宜，让宦官对士大夫们评头论足。这下可方便了宦官，他们纷纷借此公报私仇、从中取利。皇甫嵩曾镇压了冀州地区的黄巾主力，本应得到重赏。但因为皇甫嵩在河北路过宦官赵忠之家时，发现其宅院豪华无比，逾越等级制度，曾奏请没收其家产，再加上宦官张让曾暗里勒索他五千万钱而严遭拒绝，由此得罪了赵忠和张让这两个最得宠的宦官。他们二人合伙整治皇甫嵩，说皇甫嵩累战无功、花费甚多。结果可想而知，皇甫嵩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奖赏，反而还被免去将军职务，削去食封户六千。朱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傅燮，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功当封侯。但因为他曾在军中上书一封，其中说："黄巾虽盛并不足以国家之忧，真正的忧患在于宦官弄权、忠臣不进，愿陛下对奸佞宦官速行杀戮，则忠臣自进，国家有望。"由此得罪了宦官赵忠一伙，他们并不想对傅燮搞什么奖赏，但又震于傅燮的威名，如不封赏对天下不好交待，于是便向傅燮谈封赏的条件："如果你不再攻击我们宦官，万户侯是不难得到的。"傅燮对此严词拒绝："有功不封，这是天命，我决不低三下四请求你们的赏赐。"傅燮没妥协，自然没有什么封赏，最后给了个汉阳太守之职赶出了京城。由于宦官们翻云覆雨、颠倒黑白，真正带兵作战的将领无人封侯，宦官张让等十二人却因讨伐张角"有功"被封为列侯。无功者受赏，有功者或罪或囚或望侯兴叹，士大夫们对宦官集团恨之入骨，而对汉灵帝愈加失望了。

汉灵帝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可在搜刮钱财方面却很有本事。东

汉朝廷有两个管理财政的机构，一是由大司农掌管的国家财政，二是由少府掌管的宫廷财政，两套机构泾渭分明、不相混淆。汉灵帝贪得无厌，竟把聚敛之手伸向大司农府，命令本应交大司农府的相当一部分地方赋税，转交由宦官控制的西园。这仍不够其挥霍，于是又做起了卖官鬻爵的无本生意。元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在西园正式设立卖官所，向社会拍卖官职。不管德行、才能如何，只要肯出钱就有官做。如果当时没钱，也可以讲价之后先上任再加倍付钱。买官的人都清楚，别看买官时花了钱，但官职一旦到手就可以搜刮老百姓，用不了多久，这钱就会成倍地赚回来，所以买方市场极为旺盛。汉灵帝仅卖地方官一项挣的钱，就堆满了西园的仓库。汉灵帝见钱眼开，又私下命令左右人员将卖官范围扩大到朝廷的三公、九卿。三公他定价一千万，九卿他定价五百万。有个名叫崔烈的官员原居九卿中的廷尉之职，德行不错，应升三公，但又惧怕时间长了被别人买去，于是巴结汉灵帝的奶妈程夫人，交了五百万钱，果然如愿以偿。拜职那天，崔烈趾高气扬，汉灵帝却有点不太高兴，他恬不知耻地对别人说："我真后悔对崔烈太客气了，不然可以赚一千万钱。"后来，正直的人鄙薄崔烈，认为他拿钱买三公，身上充满了铜臭气。其实，崔烈在这方面又哪能和汉灵帝相比呢？崔烈只不过刚刚沾了铜臭的边，而汉灵帝则是铜臭的根源，是真正的铜臭冲天。卖官之余，汉灵帝又开辟了第三条聚财渠道。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汉灵帝规定各地在每年进贡给他的法定贡品之外，再加一笔导行费，意为用这笔钱引导着其它贡品滚滚而来。面对积如丘山的金钱，汉灵帝又发愁了，他害怕自己这样胡作非为，会有做不成皇帝的一天，如果真有此事这些钱不就变成人家的了吗？汉灵帝深深懂得狡兔三窟的道理，他要搞金钱分流，分别存放。他在西园建造了个高大的万金堂，里面盛满金银财宝，以便就近取用；他在河间老家广买田园高建宅院，以备做不成皇帝时回去享福；他在亲近宦官的家中各寄藏金钱数千万，以备不虞之需。汉灵帝为自

己的富裕无比、安排精当而暗暗得意，他不会想到，正是由于他无耻地捞钱，才使国家政治更加黑暗、刘家江山因此而倒塌；他更不会想到，强烈的金钱欲望，已使一个高贵的天子变成了可怜的守财奴。

汉灵帝好财也好玩，他玩起来不惜代价。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汉灵帝决定再修建两处新园林。大臣杨赐知道这是既费土地又费金钱的败国之举，遂加谏止："我们汉朝先帝建有鸿池、上林两座园林，后来帝王又添了五六处园林，这些完全够陛下驱驰游猎之用了，想不到你又要驱赶百姓、荒废良田、畜养禽兽、再修园林，这实在与帝王应该保护人民的道理不相符合。"汉灵帝将此奏章交由大臣们讨论，有两个善于察颜观色的大臣说道："以前周文王的园林有百里之大，可大家还嫌其太小，这是与民同乐的缘故。只要您能与民同乐，修建园林与政无害。"汉灵帝实在想不到臣子们竟然把自己的荒唐行为论证得如此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心中高兴万分，遂下令开工修建这两座园林。尔后就是踏遍新园旧园的青山绿水，逐遍山林野处的飞禽走兽。总是打猎，灵帝不免感到单调乏味，所以又变着法子玩起来了。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他将后宫变成市场，使宫女们贩卖其中，或讨价还价、争争吵吵，或鸡鸣狗盗、你打我闹，整个市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汉灵帝脱去朝服打扮成商人模样游荡其中，与摊贩们时而相互调笑，时而共饮美酒佳肴，遍尝帝王所享受不到的商贾之乐。汉灵帝玩的花样翻新极快，不久又玩起了毛驴和狗。他在西园亲自驾驶着四条毛驴拉的车子，手挥皮鞭叭叭作响，毛驴车风驰电掣般地奔跑，他在车上乐得开怀大笑。汉灵帝特别喜欢玩狗，为了表示对狗的喜爱，他想方设法提高狗的地位，他给狗戴上朝官的进贤冠和标明品级的绶带到处游荡。本是兽类的狗，经灵帝恩准成了和朝廷大员一样的宠物。在此汉灵帝已经是人兽不分了，希望如此荒唐的帝王能分辨出人间的善恶，那真是缘木求鱼。

儒家学者认为帝王游玩不可过度，一旦过度就会使人心狂神荡、损害国家，汉灵帝就是一个玩乐起来不顾国家的心狂神荡之徒。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朝廷南宫发生了火灾，烧坏部分宫殿。此时，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国家面临着战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但汉灵帝却不考虑这些，他要使自己的宫室比烧前更加豪华，下令尽快维修，并铸造铜人以壮其观。此项经费无处筹措，他听取宦官张让、赵忠的建议，老百姓每亩土地加征税收十钱。乐安太守陆康知道，这笔税收对于屡遭天灾兵燹的老百姓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样肯定会激化矛盾，有再次造反的危险，于是上书谏止。他说："世界上哪有夺民财物以做无用铜人的道理，这纯粹是自蹈亡国之辙！"也许是因为陆康的奏章太犀利了，汉灵帝气愤无比，命人用囚车将陆康拉来京师问罪。收拾了陆康，宫殿和铜人工程便开始了，一切事务由宦官全权负责。为使工程早日完工，汉灵帝颁下诏令命各州郡往京城送木石材料。对于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宦官们又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宦官，只好以微价卖给宦官。由于宦官们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宫室几年都没修成。汉灵帝认为这是钱少的缘故，又命令各级官员出钱资助修宫。这下苦了那些为政清廉的官员，他们拿不起这笔钱，又不忍心搜刮老百姓，只好辞职不干，但汉灵帝又不允许他们罢官，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了。司马直被汉灵帝任命为钜鹿太守，痛心地说："我身为人民父母官，却反过来要割剥老百姓之血肉以满足上边的欲望，这样做我实在于心不忍！"故以身体多病为由辞官，但遭到了汉灵帝的训斥。司马直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赴任去，半路上怎么也想不通此事，于是上了一封极陈当世之失的奏章，然后吞药自杀了。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汉灵帝的南宫终于修好了，它比以前更加雄伟壮观。汉灵帝徘徊于南宫内外，时而抚摸一下金光闪闪的大铜人和大铜钟，时而瞅一下宫门外能吐水的奇兽和蛤蟆，心中得意非凡："有人把我比作和桓帝一样的昏君，这又如何，我不是照常

荣华富贵吗?"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没有被黄巾起义推翻的汉灵帝,终因自己荒淫无度而病死于南宫嘉德殿,时年三十四岁。汉灵帝死了,他并未带走费尽心机聚敛的亿贯家财,却将中国历史真正送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汉灵帝死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军阀对宦官的大屠杀,接着又是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汉灵帝在世时豢养了宦官这只猛虎,死后又放出了军阀这个恶魔。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孝灵帝纪》、《陈王列传》、《党锢列传》、《宦者列传》

《资治通鉴》卷五十六至五十九

山雨欲来风满楼

据不完全统计，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到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 183 年)这段时间里，东汉各地便发生了六十七次农民起义。东汉中期以后，发生这么多的农民起义，首要原因就是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剥夺了农民的衣食之源。还在东汉初期，京城洛阳和光武帝刘秀老家南阳的豪强地主便开始兼并土地了，他们田宅逾制，但地方官员却对其无可奈何。此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汉章帝时外戚窦宪凭借权势，强买民田，甚至把沁水公主的田园也贱买过来。汉章帝气愤地痛骂窦宪："今天连公主的田地你也敢夺，下层小民就更不在话下了。"汉桓帝前期外戚梁冀权倾朝内外，亦借机兼并土地。梁冀的兼并之法更为恶劣，他将西至弘农、东到荥阳、南到鲁阳、北到河淇方圆千里(今河南部分地区)的山川土地干脆画了一个指示线，也不管这是国家的还是农民的，统统圈为己有，一个铜子也不花费。梁冀死后，宦官专权，又冒出了一支兼并土地的生力军。宦官苏康一有机会就霸占天下的良田美业、山林湖泊。宦官段珪和侯览在济阳老家，强买豪夺百姓的田业以塞自己无穷之欲，仅侯览一人就夺人宅院三百八十一所、良田一百八十一顷。侯览的哥哥侯参做益州(今成都地区)刺史时，看谁家富有就诬陷谁大逆不道，然后占人田产和财物。那些虽不为官但腰缠万贯的商贾们，在兼并土地的浪潮中也是不甘落后。据东汉末年思想家仲长统记载，这时的商人们往往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成群、徒附万计。这满野的膏田也是来自兼并，不过他们的兼并主要是运用经济

手段，乘人之危，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慢慢夺取。还有那些官僚们，对土地也是孜孜以求。东汉思想家张衡对他们揭露得入木三分，说这些人一旦为官即田宅并兼。大将吴汉在前方打仗，他的老婆就在后方强买民田。各种各样的地主都向农民伸出了贪婪之手，他们把兼并的土地建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庄园，在里面过着鸡鸭鱼肉臭而不可食、清醇美酒败而不可饮的腐朽堕落的生活。而广大农民则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迫为富人服役，过着生前勤劳辛苦、死后尚有暴骨之忧的悲惨生活。

东汉农民在受土地兼并之苦的同时，还深受国家腐败政治的煎熬。东汉中后期的帝王们是政治腐败的总根源。汉桓帝先是纵容梁冀为非作歹，后是信任宦官打击忠良，制造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将天下的士大夫们禁锢起来，使朝野内外剩下的都是宦官及其党徒。汉灵帝更加昏庸无道，除信任宦官、纵奴行凶外，又干起了卖官鬻爵的罪恶勾当，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帝王品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品质优良者有可能使国家政治清明，品质低劣者则必然使政治走向腐败和黑暗。桓、灵二帝的昏庸，直接导致了东汉宦官集团的形成，宦官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宦官由此成为扰乱国家政治，并使其走向腐败之域的推动者。帝王们变成了强盗，也随之丧失了约束基层官吏不法行为的良心和兴趣，整个社会吏治在失控状态下迅速败坏。汉顺帝时，罪犯们可以钱赎罪，最后这些钱财全部被郡县官吏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据东汉官员刘宠讲，在汉桓帝时各地的郡守县令竞相肆虐，他们就像野兽那样吞食人民，在他们的盘剥之下，原来富裕的经商者变成了穷冤之魂，原来的贫穷者变成了饥饿之鬼。李盛做巴郡(今重庆地区)太守，为官贪婪，任意提高赋税以搜刮民财。老百姓被他逼得痛苦万分，编下歌谣控诉他横征暴敛的罪行：“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

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像李盛这样的官员在东汉末年成千上万，广大人民在他们的敲诈之下，过着比死还要痛苦的生活。东汉政治的日趋腐败，必然会导致官逼民反的结局。

由于当地官吏和地主豪强对居住在西部的羌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羌族人民曾发动了三次规模巨大的起义。第一次发生在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至元初五年（公元 117 年），第二次发生在顺帝永和四年（公元 139 年）至永嘉元年（公元 145 年），第三次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 159 年）至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为了镇压羌族起义，东汉朝廷强行征召内地青壮男子去战场上厮杀，这就极大影响和破坏了他们家乡的农业生产。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就非常形象地唱出了内地农民心中的痛苦和愤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内地农民不仅要负担沉重的兵役，还要承担巨额的军费开支。镇压这三次羌族起义，共支出军费三百七十四亿之多，这笔钱无疑要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无辜的人民又是出人又是出钱，他们眼睁睁地被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垮了。有一叫陈龟的官员在给朝廷的上书中，留下了当时老百姓被战争折磨的惨象，他说：“当时的战士身死沙场，家里人的命运亦系于马鞍之上。有的农户全家死亡，有的只剩下孤儿寡母。战争已使人民穷得野无青苗、室如悬磬。他们看上去还有气息，但其实已如枯朽之木。”不难看出，东汉农民的命运已沦落到生不得生、死不得死的状况，如此环境，欲其不反，怎么可能呢？

东汉后期的老天爷好像也故意与人民作难。频繁的自然灾害不时地降临人间，这对于受尽折磨的老百姓无疑又是雪上加霜。汉和帝初年，连年水旱，地无收获，凉州地区受害最重。和帝永元六年（公元 94 年），久旱无雨，秋收无望，人民饥困，济水、河水流域人民流亡。永元七年（公元 95 年）春夏大旱，谷贵如珠。永元十二年（公

元100年),天气大旱,人民流离失所,困于道路。和帝、殇帝相交之际,东州地区又遭水荒。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各州郡发生大规模饥荒,一石米价格二千钱,老弱相弃于道,发生人吃人的悲剧。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京师、并州、凉州有雨雹之灾,人相食。永初四年(公元110年),青、冀二州饥民大流亡。汉顺帝时期亦是灾情屡见,人民家贫户空,一年不如一年。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荆、扬二州人多饿死。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京师等地大旱,民相食。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三十个郡国发生蝗灾,黄河溢水,使百姓穷困潦倒。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司隶、冀州地区大饥荒,人民相食。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隶、豫州地区严重饥荒,死者逾半,甚至有全家灭绝者。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河内、河南地区大饥荒,人民无以为食,河内地区的人老婆吃丈夫,河南地区的人丈夫吃老婆。从西汉到东汉,人民受到的都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熏陶和教诲,精神文明程度已有相当水准,他们本不至于做出人吃人的事情,但政府的腐败已不能组织人民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故才出此下策。但人民并不愿意做野兽,他们是人,要过人的生活。离秦朝不远的人民深深懂得要达此目的,就要像陈胜那样揭竿而起。于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之火便燃烧起来了。

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毕豪率众起义,揭开了东汉农民战争的序幕。起义军攻人平原县(今山东德州),俘获县令刘雄,震动周边各郡县,但起义不久为东郡太守镇压。

永初三年(公元109年),爆发了张伯路领导的滨海农民起义。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义军攻打沿海九郡,杀死了不少郡守县令。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张伯路又联合平原的刘文河所部起义军,假称使者,攻入厌次城(今山东今县),杀死不少官员和士兵,然后转攻高唐(今山东禹城附近)。他们烧官府、毁监狱,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基层权力机构。几支农民起义军共聚高唐,各首领自称将

军，共推张伯路为领袖，起义军大有继续发展之势。朝廷急忙派青州刺史左雄和钦差大臣王宗率数万兵马镇压，起义军被迫退居海岛。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伯路东山再起，率部袭击东莱郡，由于众寡悬殊，被左雄击败，在退还辽东时又为当地地主所惨杀。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宁季率领数千人在河南郡的朝歌发动起义。他们攻杀政府官员，屯兵数年，所在州郡对此束手无策。后来新任朝歌县长虞诩向义军派出奸细，使用种种阴谋诡计，才将这支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汉阳郡的杜琦、王信率众起义，他们与少数民族联手攻破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县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后为汉阳太守派人刺杀。第二年，王信所部也被朝廷大员唐喜所追杀。

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苍梧、郁林、合浦地区（今广西边远地区）的农民亦发生大规模起义。与此同时，豫州地区（今河南）的数万名饥民亦爆发起义。

汉顺帝时期，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愈加扩展。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青州、冀州、扬州地区的农民普遍发动起义，东汉东部地区陷入瘫痪。镇压农民起义发家的左雄急忙给朝廷献出计谋："老百姓一人犯法全族都要杀灭的刑罚太严酷，应当废除。"但汉顺帝对此不加理睬。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以海岛为根据地的农民起义军大规模进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地区），曾杀死章、鄞、鄮三个县的县长。也是在这一年，章河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袭扬州地区四十九个县，杀伤大批官吏。

阳嘉三年（公元134年），益州（今四川）地区的农民也燃起了反抗烈火，他们抓县官、杀列侯，将地主、豪吏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江夏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攻入邾县（今湖北黄冈），杀死县令。

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蔡伯流率领九江(今安徽、江苏近长江以北)地区数百人起义,他们攻击广陵、九江地区,烧毁城郭,杀死江都县长,但不久为徐州刺史招降。也是在这一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羊珍率众二百余人起义,他们击杀官吏烧毁官府,并勇敢地攻击太守府,羊珍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周生、马勉率领九江、丹阳地区的起义军攻没所在郡县。

顺帝永和年间,在荆州(今湖北)和泰山地区还爆发了两次农民起义,他们屯兵数年,当地官员无可奈何,后为李固瓦解。

汉顺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是张婴领导的广陵地区的农民起义。这支起义军有数万人之多,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起义后十多年的时间里,转战于扬州、徐州境内,多次杀死刺史、二千石以上的大官,成为朝廷多年征剿不灭的义军。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朝廷不得不派出清官张纲为广陵太守来专办此事。张纲发现用硬刀子杀不死起义军,只好向义军宣传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只软刀子击中了张婴等人,他们自动向张纲投降了。

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扬州、徐州地区又爆发起义,义军攻夺城邑,杀死官吏。

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范容、周生领导扬州、徐州地区的农民再次起义。朝廷派御史中丞冯赦、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率兵镇压,被起义军打了个大败,尹耀、邓显命归黄泉。这年是九江地区农民奋起反抗的一年。十一月,徐凤、马勉又率领九江地区人民起义,他们在当涂山安营扎寨,徐凤称无上将军,马勉称皇帝,并且置百官建年号,正式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然后派兵进攻合肥。面对范容、周生和徐凤、马勉这两支遥相呼应的起义军,前来征剿的官军穷于应付,接连失败。一直到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九江都尉滕抚才将这两股农民起义烈火扑灭。

广陵太守张纲死后,原来投降于他的义军领袖张婴遭受排挤,

被迫于永嘉元年(公元 145 年)正月再度起义,袭杀堂邑、江都两县县长,并攻占广陵。此年十一月,历阳人华孟自称黑帝,率众起义,占领九江郡城,杀死太守杨岑。广陵、九江两郡全掌握在起义军手中。朝廷惊慌万分,急忙升滕抚为中郎将,命其率领各州郡数万兵力扑向义军,将这两支起义军镇压下去。

汉桓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也是中国农民奋起抗争的时期。汉桓帝在位二十年,农民起义即达三十多次。

桓帝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陈留人李坚率众起义,他自称皇帝,后被官府杀害。

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长平人陈景自号黄帝子,并辟置官署,另立政府。南顿(今河南项城)人管伯自称真人,亦筹划武装起义事宜。陈景和管伯的起义,皆为朝廷扼杀于摇篮之中。

和平元年(公元 150 年),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裴优自称皇帝,发动起义,后被官军捕杀。

永兴元年(公元 153 年),黄河溢水,漂流人民数十万户,特别是冀州地区灾害更重,人民起义者甚多。

永兴二年(公元 154 年),蜀郡人李伯说自己是汉朝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图谋举事,被官军杀害。

桓帝永兴二年(公元 154 年)冬,公孙举和东郭宝在泰山、琅邪(今山东临沂)地区率众三万余人起义,他们多杀官吏,取得一连串胜利。汉桓帝急忙于永寿元年(公元 155 年),设置泰山、琅邪都尉官,专门负责镇压起义军,但连年不克。起义军继续扩大战果,向周边的青州、兖州、徐州发动冲击,使东汉朝廷惊恐万状。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镇压羌族人民起义的刽子手段颎被任命为中郎将,负责征剿这支起义军。起义军与段颎展开殊死血战,公孙举、东郭宝壮烈牺牲,剩下的人为了保存火种退隐山区。延熹三年(公元 160 年),不屈的起义军果然又在劳丙和叔孙无忌的率领下再举义旗,并消灭了前来镇压的都尉官侯章。朝廷又命中郎将宗资率军围

剿义军，莒地一战，义军损伤严重。但起义军仍凭借险要的地势继续与宗资周旋，宗资再也无计可施。朝廷只好又委任皇甫规为泰山太守，继续围剿起义军。皇甫规改武攻为文攻，将叔孙无忌等三千多人招降。

延熹五年（公元 162 年），南方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长沙、零陵农民七千多人扬起造反大旗，攻人桂阳（今湖南南部、广西北部）、苍梧（今广西梧州地区）、南海（今广东东部）、交趾（今越南北部）四郡。起义军声势浩大，交趾刺史、苍梧太守望风而奔，两郡落人起义军手中。朝廷急令盛修募兵讨伐，但连吃败仗。此时，豫章郡艾县（今江西修水县）农民六百多人亦揭竿而起，他们攻打长沙诸地，夺取益阳县，杀死县令，实力愈来愈强。桓帝命令马睦和荆州刺史刘度前来镇压，被起义军打了个大败，马、刘二人抱头鼠窜。桓帝再命度尚为荆州刺史，继续镇压起义军。度尚用兵三年，将这两支起义军血腥镇压。

延熹八年（公元 165 年），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荆州兵，因憎恨兵役持久、兵饷不丰，在朱盖的领导下造反了。他们与胡兰所领导的桂阳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进攻桂阳，桂阳太守弃城逃跑。起义军攻克桂阳后，众至数万，兵锋乘胜直指零陵，将太守陈球包围于城中。汉桓帝急忙拿出他的王牌度尚，升其为中郎将，率幽州、冀州、黎阳、长沙、乌桓兵二万六千人奔救零陵。起义军因作战经验不足，战败于零陵城下，余部转人苍梧地区，继续战斗。

同年，渤海地区盖登率众起义，盖登自称太上皇帝，使用玉印、玉珪、玉璧、铁券等禁用物品，并设置官署，建立政权，不久即为朝廷镇压。第二年沛地戴异亦称太上皇，准备聚众起义，由于机密泄露，惨遭杀害。

汉灵帝即位以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烽火继续蔓延。灵帝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九江地区爆发农民起义，坚持奋战数月之久，后为新任太守陈球镇压。建宁三年（公元 170 年），济

南农民起义，攻打东平陵，震动京师。

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人许昭在句章(今浙江宁波)地区起义，他自称大将军，尊其父许生为越王。起义军攻城夺地，众至万人，与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激战三年后失败。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益州地区发生农民起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蔡邕上书说："自年初民众起事已达三十多次，他们攻取郡县、杀伤官员，无日不有。"

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黄穰领导的庐江(今鄂豫皖交界地区)的农民与少数民族联合起义。起义军人数多达十多万人，接连攻取四个县城，坚持战斗数年。后为庐江太守陆康镇压。此年，苍梧、桂阳地区又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们人数众多，声势非凡。后为零陵太守杨璇以顺风扬灰战术击败。几乎与此同时，陇西人宗建在枹罕(今甘肃临夏)起义，他自称河首平汉王，建立独立政权达数十年之久。汉灵帝到死也未除掉这支起义军。

这些起义虽然大都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但起义者不怕杀头、不怕镇压、前赴后继的反抗精神，却日益高涨，它必将汇成一股冲天烈火，焚烧掉腐朽的东汉王朝。中国人相信"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意思是说月亮周围出现了光环就要刮风，础石温润了就要下雨。东汉后期的众多起义，已经造成了暴风前的"光环"、大雨前的"浓云"，它昭示着一场扫荡东汉王朝的疾风骤雨即将到来。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孝安帝纪》、《孝顺孝冲孝质帝纪》、《孝桓帝纪》、《孝灵帝纪》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至五十七

黄巾起义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旨在推翻东汉腐朽统治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这次大起义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产物。

东汉末年，皇帝荒淫，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天灾流行，老百姓在这些虎狼的吞噬之下难以生存，故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这些起义或由于力量太小，或由于组织不善，几乎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农民起义的几十次失败，使冀州钜鹿（今河北宁晋县南）人张角猛醒过来，初步认识到农民要取得起义的成功，就必须统一思想、严密组织、充分准备，不然还会重蹈失败之辙。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张角在黄巾起义前很长的时间里便开始了活动。

张角深知儒家学说是不能作为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的，因为他的基本思想是君尊民卑、教民安服，与农民起义背道而驰。但在汉灵帝的专横统治之下，又不便创立一种新的学说发动起义，因为那样会过早地暴露自己。张角经过考察，选择了黄老道教。这是一种新兴起的宗教，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信奉，就连已经死去的汉桓帝为了长生不老，还多次派人祭祀黄帝和老子。汉桓帝信奉黄老，无疑预先给张角的传道布教撑起了保护伞。

张角用“太平”二字作为本教派的名称，用“中黄太一神”作为本教派的最高神灵，然后自称“大贤良师”，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涯。当时，社会上疾病流行，人民痛苦不堪，张角便以治病为途径，使太平道教迅速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张角治病的方法完全是简单的神

教，他先让病人跪拜在中黄太一神之前忏悔自己的过错，然后让徒弟们给病人念念咒语、撒点符水。也许是精神方面的作用，有许多病人经此治疗竟然痊愈了。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地宣传着太平道教的神奇威力，生活于苦海中的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救星，千千万万的人开始相信太平道教，向往太平道教，不远千里地来加人太平道教。张角看到发展太平道教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出了他的八大弟子奔向四面八方，广为宣传，广收教徒。张角和弟子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主要以《太平经》作为本教派的主要经典，宣传中重在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展现未来社会的光明。他们说，当今社会有的人霸占着良田美业，聚集了天底下的金银财物，自己用不完，宁肯任其腐烂，也不借给穷人，这些人可真是仓库中的大老鼠啊！他们描写的未来太平社会是：无有天病，无有地病，阴阳协调；无有帝王，无有盗贼，百姓安居。张角等人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揭露，百倍地增加了老百姓对统治者的愤恨；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展示，又千倍地鼓起了老百姓斗争的勇气。广大人民在太平道教的熏陶之下，已经认识到只有砸烂黑心的汉灵帝一伙，那光辉的太平盛世才会到来。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豫州八州的农民约有几十万人团聚在张角太平道教的旗帜之下。张角又将他们化分为三十六方，大方十多万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作为首领。这样，松散的太平道教便转化成了一个有严密指挥系统的军事组织，原来分散的农民也转化成了有宗教思想武装的战士，太平道教形成了一个有思想、有组织的强大军事集团。起义前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已经大功告成了。

为了周密地组织起义，张角亲自潜人京城洛阳考察，看到的是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和劳动人民的满腔悲愤，他感到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张角发出号召："代表朝廷的苍天已经死亡，我们应当让代表广大农民的黄天升起，黄天升起的时间就在甲子年的甲子日，那时将是天下大吉的日子。"向太平道的各方渠帅发出

了起义的计划和号令，各方都进入了起义前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角欲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战略。他先让大方渠帅马元义集合好荆州和扬州地区的数万人马，准备到时赶往邺城（今河北磁县南），以便就近攻打京城洛阳。然后又派马元义多次进京，联络京城信奉太平道的宦官封谞、徐奉及其他有关人员为内应，以便届时从京城内外同时发难，一举攻克洛阳。一切都在按照张角的计划行动着，起义之箭已经挂在了拉满弦的弓上，只待一声令下就要射向东汉朝廷。

就在起义即将到来的时候，太平道教内部出了叛徒。张角弟子济南人唐周投机叛变，向汉灵帝上了一封告密书，将张角的起义计划及马元义等人的活动情况向朝廷透露无遗。汉灵帝本来对张角传播太平道教也略知一二，但并未认识到太平道会造反，还认为张角是在以善道教化天下呢！所以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当司徒杨赐上书提出先将流民遣送回家然后逮捕太平道首领时，汉灵帝对此不予理睬。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当大臣刘陶等人再次提出张角党徒不可胜数，必须逮捕张角的建议时，他又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现在，灵帝看到了唐周的告密书，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清醒过来的汉灵帝立即采取措施对付即将爆发的农民大起义：他首先逮捕、车裂了马元义，将这一地区的起义总指挥搞掉；接着又逮捕、杀害了洛阳城内信奉太平道的宦官和群众一千多人，解除了心腹之患；然后命令各地官员捕拿张角及其他太平道首领，向张角发起了全面进攻。因为唐周的叛变，打乱了张角的起义部署，使太平道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仍然按照原定的甲子日起义，势必形成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张角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连夜派人通知各方提前起义。随着张角命令的下达，起义峰火八州并起，迅速燃遍全国各地。张角和其弟张宝、张梁在冀州地区树起造反大旗，波才、彭脱等在豫州地区揭竿而起，张曼成在南阳地区挂帅起事，东郡（河南濮阳南）也有卜己领导的义军，

此外扬州、广阳(今北京)等地区也响起了农民震天的怒吼声。东汉农民压抑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了,他们头上裹着黄巾(故被称为黄巾军),手里拿着武器,奋不顾身地攻打官府。起义地区的官吏或被杀身亡或狼狈逃走,半个月的时间,东汉北部的大半地区便为起义军所占有。

黄巾起义迅猛发展的态势,强烈地震动着东汉朝廷。汉灵帝为了扑灭黄巾起义之火,急忙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在洛阳周围的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施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设置都尉,增驻重兵,以确保京城安全;二是接受大将皇甫嵩的建议,解除党禁,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调动一切力量奔赴镇压起义军的战场,并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和官中的马来奖励军队,以鼓舞士气;三是调兵遣将镇压各地的起义军,汉灵帝命令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儁前去镇压颍川地区的黄巾军,命令北中郎将卢植前去镇压冀州地区的黄巾军。这样,起义不久的黄巾军,刚刚肃清了本地的地主军队,还没来得及集结,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组织,便被汉灵帝派出的鹰犬分割了。起义军只好各自为战,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面对着东汉朝廷精兵强将的镇压,各地黄巾军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奋起抵抗。

在洛阳东南的豫州地区黄巾军特别活跃,这里有波才领导的颍川起义军、彭脱领导的汝南起义军和陈地(今河南淮阳)的黄巾军。波才起兵占领颍川郡之后,兵锋直指京城洛阳,对东汉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威胁。汉灵帝急忙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领四万人马,分成两军,杀奔而来。朱儁首先与波才交锋,被波才打了个大败。波才率军乘胜追击,又将皇甫嵩所部包围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城中。黄巾军人数众多,作战勇猛,长社小城指日可下。不料,由于波才军事经验不足,依草结营犯了兵家之大忌,被皇甫嵩乘晚上的大风纵火焚烧了起义军的军营,起义军反胜为败。接着朱儁所部卷土重来,汉灵帝又派来了增援的曹操部队,起义军受

到内外夹击，虽然有数万战士战死疆场，也未能摆脱失败之厄运。波才突出重围，撤到阳翟（今河南禹县境）后，又被追杀。不久，汝南、陈国、东郡的黄巾起义军也被镇压于血泊之中。

张角领导黄巾军在钜鹿誓师起义后战果辉煌，他与张宝、张梁兄弟三人各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并分别率领人马向官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很快便占领了冀州的大部分地区，大有南下、西进攻取洛阳之势。汉灵帝对此惊恐万分，在将皇甫嵩、朱儁派往颍川的同时，将北中郎将卢植派往冀州，镇压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军。卢植与黄巾军接战之后连连得手，几仗下来便杀虏起义军一万多人。张角改变战略，率起义军固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以便凭借坚城待机而动。卢植让士兵垒筑围墙、制作云梯、开挖壕沟准备攻城，张角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没想到卢植与宦官发生内讧，宦官们诬告卢植坐待观望不肯尽力，汉灵帝也对卢植久久不能战胜张角大为恼火，用囚车将卢植锁拿京师问罪。汉灵帝再派东中郎将董卓负责冀州军事。董卓是一介武夫，并无多少韬略，来到冀州后不久，便被张角领导的起义军打得丢盔卸甲，成为起义军的手下败将，被汉灵帝革职拿问。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六月，皇甫嵩完成了镇压颍川、汝南等地的黄巾起义任务，汉灵帝急令他赶往冀州与起义军对阵。这时，黄巾军首脑张角因病去世，冀州起义军分而为二，一支由张梁率领驻扎于广宗，一支由张宝率领驻扎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东）。皇甫嵩率军气势汹汹地扑来，首先遇到了张梁领导的广宗起义军。皇甫嵩屯兵坚城之下，一时也无计可施。但他毕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老手，见硬攻不行便休兵一天另寻战机。起义军连日战斗疲劳过度，再加上看到敌军一日未攻，便放松了警惕。深夜，皇甫嵩凭着夜色的掩护将其部队运动到广宗城下，天刚破晓就向起义军发起猛攻。沉睡中的起义军仓猝应战，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事起突然，始终不能扭转被动的形势。血战至吃早饭时，三万多黄巾战士壮烈牺牲，主帅张梁也战死疆场。剩下的五万多黄巾

战士誓死不当俘虏，毅然跳下水流湍急的清河随水而去。广宗的黄巾战士就这样悲壮地失败了。得胜之后的皇甫嵩大施淫威，他把天公将军张角从坟墓中挖了出来，开棺戮尸之后又残忍地将其头颅割了下来送往京师邀功请赏。广宗起义军的失败，使下曲阳地区的黄巾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十一月，皇甫嵩率领官军浩浩荡荡地杀奔下曲阳。张宝率领起义军与官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最后张宝战死，无数起义军惨遭杀戮。下曲阳的起义军亦被皇甫嵩镇压下去了。

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张曼成领导的南阳地区的起义军也是较有战斗力的一支。张曼成自称神上使，率领数万战士与南阳太守的军队展开激战，在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杀死太守褚贡，取得了很大胜利。之后，张曼成以宛城为根据地四面出击，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南征北杀，战果累累。不料，新任南阳太守秦颉在六月对宛城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张曼成猝不及防，壮烈牺牲。起义军另推赵弘为帅继续战斗，在赵弘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再次占领宛城。此时，朱儁已经将颍川、汝南地区的起义军剿杀完毕，又被派往南阳地区。六月，朱儁联合了荆州刺史徐璆及南阳太守秦颉的一万八千精兵包围了宛城。起义军顽强抵抗，朱儁连攻两个月，宛城岿然不动。心急火燎的汉灵帝对朱儁日益不满，心生撤换之意。如不是司空张温说临军换将乃兵家之大忌的话，朱儁也要走卢植的老路。朱儁在前方也多少听到了些朝中的动静，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急忙督促军队加紧攻城。十月，宛城终于被朱儁攻了下来，黄巾军首领赵弘也被他们杀死。朱儁心中得意非凡，做开了晋官加爵的美梦。没想到他刚刚离开宛城，那些没被杀尽的黄巾战士推举韩忠为帅，于宛城上空再展义旗。朱儁气急败坏，从班师回朝的路上立刻杀了一个回马枪，又一次将宛城包围起来。朱儁让一部分官军在宛城西南筑起土山佯攻西南方向，他则乘起义军主力奔救西南之机率精兵五千突袭宛城东北角，宛城的

第一道城墙被他攻破。起义军只好退守到里面的小城。此时起义军胜利无望，主帅韩忠向朱儁乞求投降。朱儁已是胜利在握，根本不理韩忠的请求。韩忠只好率众死拼，战事又呈胶着状态。朱儁撤掉对小城的围困，诱使韩忠突围。韩忠果然上其圈套率兵出战。这样，黄巾战士由于求生心切人心涣散，战斗力大为下降。起义军在混战中被官军追杀一万多人，其余的散逃四方。韩忠投降，被南阳太守秦颉击杀。那些突围出去的数万黄巾战士以不屈的精神又站了起来，第四次占领宛城，这些起义军的统帅是孙夏。面对斩不尽、杀不绝的黄巾战士，朱儁不敢松气，马上又带兵包围了宛城。不久，宛城被攻破，孙夏率众退至西郊的精山(今南阳市山)，朱儁也尾随而至。起义军与来镇压的刽子手们在精山展开激战，大都壮烈牺牲，孙夏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精山战役之后，南阳地区的黄巾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起义了。

南阳地区黄巾军被东汉政府镇压，标志着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已经结束。黄巾起义的勇士们虽然没有实现以“黄天”取代“苍天”的壮志，但他们那种为推翻东汉朝廷的腐朽统治而浴血搏击、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孝灵帝纪》、《皇甫嵩朱儁列传》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张鲁的五斗米道

在东汉末年的道教中有两个流派，一个是流行于中国北部的太平道，一个是流行于巴蜀、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前者掀起了一场意欲推翻东汉朝廷的黄巾大起义，后者则直接导致张鲁在汉中建立了近三十年的割据政权，两者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张鲁的祖父张陵。张陵原住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汉顺帝时游学来到巴蜀地区(今四川)，曾在山清水秀的蜀郡鸣鹤山(位于四川仁寿县)钻研道学。张陵悟道之后即自称太清元元，并亲自创作道书开始传道，学道之人只要交给他五斗米的酬金，即可做其徒弟，因此，人们就把张陵传播的这种道教称为五斗米道。张陵后死，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中年去世。张衡之妻也懂五斗米道，她在丈夫死后开始走上层路线来扩大五斗米道的势力。张衡妻将当地土著人的一些宗教融合到五斗米道里面，使五斗米道更加扑朔迷离。她利用传道的机会认识了当时的益州刺史刘焉，并使刘焉对己心悦诚服。再加上她颇有几分姿色，为刘焉所喜爱，由此成为刘焉的密友。在刘焉的支持下，张衡妻与其子张鲁大胆地收徒传教，使五斗米道在益州地区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汉灵帝光和年间，有一个叫张修的人也在益州东北部的汉中地区传授五斗米道。从张修传教的内容看，这个人可能是张陵的学生，但他又充分吸收了太平道的一些成份。张修是利用治病的方式传播五斗米道的。张修认为人们得病是因为犯了某种过错，所以

他治病的方法主要是让病人思过、悔过。其治病的第一步是先让病人在静室中回忆有什么过错;第二步是让其门徒为病人祷告;第三步是在三个简册中写上病人的姓名及悔罪之意,分别把这三个简册置于山、埋于地、沉于水,以示告知诸位神灵赦免病人。由此法治好病的人只须拿五斗米即可。通过这一系列的神道治病,果然有许多病人大有起色,人们对此赞叹不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五斗米道。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张角领导的太平道在东方起义。这年七月张修亦率领五斗道徒在汉中地区起义,他们攻打郡县,焚烧官府,有"米贼"之称。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张修亦遭到官府镇压,他在汉中地区待不下去了,便逃到益州刺史刘焉那里躲藏起来。张修虽然离开了汉中,但汉中地区经过他多年的经营,五斗米道已有了很深的群众基础。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命归西天。之后,东汉便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此时,已做了益州牧的刘焉急欲扩张自己的势力。汉中郡位于益州的东北方,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刘焉对其垂涎三尺。为了夺取汉中,刘焉启用了五斗米道的力量。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焉委任益州五斗米道首领张鲁为督义司马、汉中五斗米道首领张修为别部司马率兵进攻汉中。张鲁、张修进军神速,不久便击杀汉中太守苏固,占领了汉中地区。刘焉乘机命令断绝汉中通向关中地区的斜谷阁险道,杀死朝廷使者,在益州、汉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此时,五斗米道虽然依附于刘焉,但也为其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张鲁、张修都是五斗米道的首邻,都是司马,孰先孰后很难说清楚。攻下汉中不久,两人在争夺五斗米道和汉中的最高座次上发生了矛盾。张鲁一不做二不休派兵袭杀了张修,将张修的士卒和信徒全部收归己有。由于张鲁之母和刘焉的那种特殊关系,刘焉也就认可了他的这个举动。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对于软弱无能的刘璋,张鲁可就不像对刘焉那样俯

首贴耳了,他日益不满在刘璋手下的附庸地位,经常做出些抗拒刘璋的事情。对于桀骜不驯的张鲁,刘璋气愤异常,很想惩治一下他,但又鞭长莫及,只好拿张鲁在益州的亲属出气。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璋杀死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张鲁借机断绝了和刘璋的一切联系,独霸汉中。刘璋不甘心失掉汉中地区,马上派出军队征剿张鲁,不料被张鲁打了个人仰马翻。就这样张鲁彻底摆脱了刘璋的控制,成了名符其实的汉中王。

还在张修活着的时候,张鲁、张修就利用五斗米道来治理汉中地区了。张修死后,张鲁进一步强化五斗米道在其独立王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命令汉中地区的居民都要加入五斗米道,外来居民也不得有所例外。凡初入道者称作"鬼卒",卒是五斗米道的最基本群众。入道时间较长并虔诚地信仰此道者称做"祭酒",祭酒各领一部分部众,是五斗米道的基层官员。领有部众较多并管理若干祭酒的称作"治头大祭酒",他们是五斗米道的高级官员。张鲁自称"师君",凌驾于众多治头大祭酒之上,是五斗米道的最高教主。就这样,张鲁用师君、治头大祭酒、祭酒、鬼卒这一套宗教体系,取代了东汉原来的统治机构,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张鲁居于这个体系的顶端,具有教主和皇帝的无上权威,并通过这个体系下达他的各种旨意,来治理汉中小王国。

张鲁建立的政权其实是个小国家,为了维持这个小国的生存,也需要一定的经济作后盾。为此,张鲁命令初次加入五斗米道和前来治病的人都要交纳五斗米。以后这种制度便扩而大之并固定下来,凡是汉中地区的居民每年都要交纳五斗米。从现有的材料看来,还没有发现张鲁向人民再征收什么额外的苛捐杂税。这与东汉政府相比较,剥削还是比较轻的。

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张鲁也没有废除刑罚。犯有小过者,即令其修路一百步之远,然后赦免其罪。对于犯法者,注重以教化为主、刑杀为辅,即"三原而后行刑",也就是对初犯者再三进行教育,

只有那些屡教不改者才对他们施以杀戮。张鲁受了阴阳家和儒家的影响，认为春天、夏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杀人会违背天意，故其主张春夏禁杀，只在秋冬行刑。在道教的《太平经》中有设立酒禁的设想，张鲁将此付诸实施，严禁人们酿酒和饮酒，这有利于节约粮食和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动乱。

为了给过往行人提供方便，张鲁还命令各位祭酒在自己辖区内的路边上设置义舍，义舍内有充足的用品，以供行人食宿。因为人们都是五斗米道的信徒，深信偷拿或过多食用义舍物品都会导致鬼神的怨恨而百病缠身，所以人们以吃饱为止，不敢过多地食用和偷窃。

在张鲁的治理之下，汉中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与东汉其它地区到处是烽火连天相比，可谓是世外桃源了。就连巴郡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脱离刘璋，归附张鲁，所以张鲁的地盘曾一度扩展到巴郡的部分地区。

张鲁在汉中做了几乎三十年的土皇帝后，中国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割据下去了。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乘赤壁取胜之勇率兵攻占刘璋的益州，对汉中地区也心怀觊觎，曾派人劝张鲁投降于他。赤壁战后的曹操无力南下，率军指向潼关以西关中、陇右一带(今陕西、甘肃及青海的部分地区)的割据势力，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将马超、韩遂等割据者全部平定。第二年，曹操率领大军来到汉中以东的阳平，准备消灭表面上臣服朝廷，实则自立为政的张鲁。这样，张鲁便面临着三种选择：或者是归附刘备，寻找依靠；或者是投降曹操，取消独立王国；或者是举兵抗敌，拼个鱼死网破。张鲁迫于曹操人多势众，一开始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准备举国降曹。张鲁之弟张卫坚决不同意，张鲁可能也心存侥幸，让张卫率领数万士卒连山筑起十余里的长城，准备据关坚守。由于地势险要，阳平城易守难攻，曹操虽令士卒从山上城下两方进攻，但死伤无数毫无战果，并且军粮也快用完了。就在曹操准

备班师回兵之时，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战事相持不下的格局。山上的一部分曹军士兵，由于夜间迷路误入张卫军营之中，张卫的士兵以为曹军攻上来了，纷纷惊慌逃窜。曹操就如此阴差阳错地占领了阳平城。阳平城丢失以后，汉中城已经无险可守，张鲁准备投降。其谋士阎圃劝他说："我们此时降曹乃战败投降，并无功可言；如果与曹再相持一个阶段，然后自动投降，功劳也许会大一些。"张鲁听从阎圃之议，率军进入山势险峻的巴中地区。撤退时有人要烧毁汉中盛宝货的仓库，给曹操留下一座空城。张鲁为给自己留下退路，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宝货仓库乃国家之有，岂可轻易毁坏。"于是，将仓库封藏完毕，然后撤离。曹操进城后见到完好无损的仓库，便知道了张鲁的投降之意，便派出与张鲁接洽的使者。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张鲁继续割据，或者归入刘备，或者归入曹操，如再继续独立只有死路一条了。张鲁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宁为曹公奴，不为刘备客。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十一月，张鲁率众投降曹操。曹操任命张鲁为镇南将军，封爵襄平候，张鲁五个儿子也被封侯拜爵。以张鲁投降曹操为标志，他建立的五斗米道政权亦宣告结束。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刘焉列传》

《三国志》:《张鲁传》

《华阳国志》:《汉中志》

张衡发明地动仪

张衡，字平子，是中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许多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尤以科学发明著称于世。

张衡之家说起来还是挺有名气的官僚家庭。据说他的祖先曾做过晋国的大夫，他的曾祖父是王莽时的大地主，祖父张堪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著名功臣之一，曾官至蜀郡（今成都地区）太守和渔阳郡（今河北蓟县地区）太守。张堪为官清廉，去世时并未给后代留下多少财产。张衡的父亲将家庭定居于南阳郡西鄂县（今南阳县北石桥镇）。张衡之父未及入仕便离开了人间，张家的门庭因此衰落下来。张衡小时候家庭生活比较清苦，幸亏他祖父生前的好友经常接济他们，才使得生活维持下来。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张衡丧失掉追求学问的信心和勇气，他利用一切机会刻苦学习，到十五六岁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学问根基。为了开阔眼界寻求名师，张衡在十七岁时便离开家乡出外游学。他先来到了西汉京城长安一带的三辅地区进行考察，在这里饱览了无数历史名胜，为其以后写《西京赋》积累了许多素材。张衡游完长安地区后又来到了京城洛阳，在这里他最关心的是怎样使自己的学问有所长进。为此，张衡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他非常渴望能在太学里聆听一些学问大家的讲课，但因他家道中落，没有人愿意荐举他进太学。张衡决心使自己的学问更上一层楼，在进不了太学的情况下他仍在洛阳留住下来，然后遍访太学及京城的名师大儒，走上了一条极为艰

难的自我求师问道的治学之路。张衡辛勤攻读，四五年后便精通了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并掌握了礼、乐、射、御、书、数六门技艺，成为小有名气的学者。张衡的才华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地方官员曾荐举他为孝廉，有关官府也曾征辟他为官。也许是张衡考虑到自己学未有成，故一一拒绝了人们想让他踏人仕途的好意，继续留在京城深造。不久，张衡认识了任黄门侍郎的鲍德。鲍德十分赏识张衡的才华，张衡也极为敬重鲍德的为人，两人由此结为密友。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鲍德出任南阳郡太守，张衡亦追随鲍德来到南阳做了郡太守属下的主簿，处理些日常文书工作。张衡身为基层官吏，心里想的却是国家大事。当时东汉开国已近百年，人们长期生活在安定的环境之中，骄奢淫逸之风日益严重。张衡十分担心这种奢侈之风会葬送国家政权，于是潜心构思，用十年时间写成了著名的《西京赋》和《东京赋》，以讥讽权贵们但知今日取乐不知国家将倾的颓废生活。其赋文辞奔放、寓意深刻，马上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张衡亦因此而奠定了他文学家的地位。汉代是盛行文人作赋的时期，谁的赋写得好就会受到人们的推崇，如司马相如、班固等人就是因为赋写得好而闻名于世的。当时的大将军邓骘看了张衡的作品后，认为张衡是天下难得的奇才，故多次征召张衡做官。张衡因为邓骘是外戚，不愿与其为伍，故累召不至。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鲍德因政绩卓著而升任大司农，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张衡并没有跟随鲍德进京做官，而是回到了老家宛城继续研究学问。与以前对比，张衡此时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移，他以前的兴趣集中在儒家经典和文赋写作，现在则是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哲学、天文、历算等学问。不久，他在这几方面就有了比较深的造诣，其名声也逐渐传到了汉安帝那里。永初四年(公元111年)，汉安帝特征张衡进京，先拜郎中，五年后升为太史令。优越的研究环境使张衡如鱼得水，从此便开始了他科学研究的生涯。

东汉时期的太史令已经不再有编写史书的任务，主要负责观察天象、修订历法等事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对宇宙结构和天体的运行有精深研究。当时，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存在着盖天、浑天、宣夜三种学说。盖天说主张天圆地方，地在下天在上，天像一个大锅盖着大地；浑天说主张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宣夜说主张天是充满气体的无际空间，日月星辰就漂浮在气体中。经过认真研究，张衡采用了浑天学说，但认为这种理论尚有改进和验证的必要。张衡写出了《灵宪》这部著名的天文学著作，进一步论述浑天理论。在这部书中他认为：天体不像鸡子，而是圆如蛋丸，是一个球体；天体是运动的，它围绕南北两极转动如车轮；周天 $365\frac{1}{4}$度，也就是太阳绕地球转一年所需的时间；出现月食并非天灾，那是因为月球自身不会发光，在天体运行中地球挡住了太阳射向月球的光线，使月球无法反射阳光的缘故。为了验证浑天说的正确性，探索天体运行的奥妙，张衡又创作了能再现天体运行的浑天仪。浑天仪主体是一个用精铜制作的球体模型。浑天仪围绕着贯通南天极和北天极的天轴旋转。球面上标有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及其它恒星的位置；还有赤道圈和黄道圈，二者成二十四度夹角，分列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把圆周分作 $365\frac{1}{4}$度。在球体的外面还有地平圈和子午圈两个圆环。为了使浑天仪运动起来，张衡将若干组齿轮与其连接起来，然后用计时漏壶的水流力量推动齿轮运转，使浑天仪一昼夜恰好转动一周。这样，张衡便把复杂的天体运行规律，非常巧妙而又形象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据说张衡曾在密室中试验浑天仪的准确度，他令人通过观察浑天仪运动报出的何时某星至何位置的数据，与当时天文台灵台实际观测的数据完全相合。经过张衡对浑天学说的深入研究和具体验证，浑天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相信。后来，张衡还发明了一种能自动报日历的瑞轮蓂荚，可惜其制作方法

已经失传了。

东汉时期是我国发生地震的频繁期，大小地震接连不断，几乎年年都有地震。据统计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至汉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全国较大的地震就有二十五次之多。地震发生后，或地裂涌水淹没民舍，或房屋倒塌压死人命，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为了及时测知震区的方位，使国家能够迅速组织对灾区的援救，张衡又把他的研究兴趣从天文学领域转移到地震学领域。经过多年的研究，能够测知地震方位的地动仪，终于在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被制作出来了。地动仪用精铜制成，外观形似大酒樽，上下两头直径略小，中间直径略大(约有八尺)，上面是鼓起的盒盖，地动仪的有关部位还装饰着篆文、山、龟、鸟、兽等美丽的图形。地动仪中央有一直立的都柱，在其周围有八条通道与外面的八条龙联结起来，这八条通道上都设有灵敏的机关。在地动仪的外壳上附有八条倒立着的龙，这八条龙分别按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排列，各与仪器内通道的机关联在一起。八条龙口中各含一铜丸，下面对着龙头的是八只张开嘴的蟾蜍，时刻准备着承接那要掉下来的铜丸。每逢地震发生时，都柱便会因震波的作用而发生倾斜并因此而触动指着地震方向的通道机关，机关再触动与其连接的龙口中的铜丸，使铜丸落至下面的蟾蜍口中，发出叮当震耳的声音，观察者由此知道何方发生了地震。这便是张衡地动仪的工作原理，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认为这台地动仪会有多么灵验。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一天，张衡地动仪正西方向龙嘴中的铜丸落人蟾蜍口中，这说明西面发生了地震，但京师洛阳的人们丝毫也没感到地震的发生，于是人们都怪罪张衡的地动仪，说本没地震面它却错报有震，看来由它报震不怎么可靠。几天之后，距京城千里之远的陇西地区来使奏报说陇西发生了地震。由此，人们无不叹服张衡地动仪的精妙准确。从这以后，皇帝也命令史官观察地动仪的动静，并据此记录地震发生

的方向。据《后汉书》记载，张衡在制作地动仪的同时，还制作了一种能测定风向的仪器候风仪，可惜因为记载过于简单使我们无法了解候风仪的内部构造和工作原理。

张衡是一位科学家，他的各种发明创造无不体现了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当时社会上充斥的却是充满妖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谶纬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谜语式预言，但在一些方士的鼓吹之下，统治者对此深信不疑。为了破除这种迷信之学，张衡从一个科学家的立场出发，于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给汉顺帝上了一个奏章，其中谈到："汉高祖打天下靠的是南征北战，那时无人讲谶无人信谶。只是到了汉哀帝、平帝时因为朝廷衰微，方有些虚伪狡猾之徒编制出谶纬之书。这些东西完全是方士们的信口胡说，并不是什么圣人之言。因此，恳请皇上传布命令禁绝谶纬的传播流行。"由于种种原因，张衡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汉顺帝采纳。但张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由于张衡才华出众、为人正直，深得汉顺帝的赏识，阳嘉二年(公元133年)，五十六岁的张衡由太史令升任侍中。侍中俸禄二千石，出人宫廷内外侍从于皇帝的左右，其实就是皇帝的顾问。按理说，张衡居于如此重要的职位，在政治上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但因为当时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所以张衡在侍中任上三四年的时间也无有什么重大建树。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由于宦官陷害，张衡离开京城出任河间(今河北雄县地区)国相。在此为官三年，他严整法度，清除奸党，使上下肃然、政治清平，充分显示了他政治家的才华。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张衡又被调回朝廷任尚书，在此任为官一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了。

张衡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科学家。当时的人们就这样称颂他："数术穷天地，制作侔教化。"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将他和王充相提并论说："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学思想，张衡的发明推进了科学知识。《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的两大创造，王充与

张衡是东汉文化界的两个伟人。”郭沫若先生亦称赞张衡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张衡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也占有异常光辉的一页。他所制作的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水力发动的较为准确的模拟天体运行的仪器。鉴于他对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国际天文学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特意命名为张衡山,以表示对这位科学家的永久纪念。至于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其先进性在世界科学史上更是不容置疑的。它独领风骚一千多年,一直到十三世纪在波斯才出现了类似的仪器。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衡是世界地震学研究的最早创始人。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张衡列传》

张润生等《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

王兆彤《张衡》

刘洪涛《中国古代科技史》

蔡伦发明造纸术

据文字学家研究，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便发明了象形文字，到商朝中国的文字便走向成熟了。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事情和交流思想的语言符号，文字被发明以后，人们就一直探索书写在什么物体上最为合适。经过漫长的试验，人们找到了纸这种文字载体。在纸的发明创造中，东汉的蔡伦功劳最大，所以后人便认为是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或者把文字烧制在陶器上，或者把文字刻画在岩壁上，这些做法都是极为麻烦的。到了殷商时期，随着奴隶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文字的书写材料有了极大改观，人们或者把记载的内容铸造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写在龟甲、兽骨上。在铸造与刻写有关文字时既费人力又费物力，必须由政府才能承担这项事务，所以极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一直到西周也无多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将文字直接写在竹简或木简上。这虽然比刻写在甲骨和铸造在青铜器上方便多了，但简片狭小，容纳文字数量不多，写成一部书需要用很多的竹、木简，数量之多必须车载斗量，无论阅读还是携带都极不方便。于是，人们又试着将文字书写在丝制的缣帛上，缣帛固然轻便，但价格昂贵，又非一般人所能随便使用。人们又开始朝思暮想地寻求一种既轻便又实惠的书写材料。西汉时劳动人民普遍用麻做衣服，为将麻弄软，先在水中沤麻，然后剥下来浸泡、锤打、漂洗，在处理麻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那些残留在席子上的麻丝干燥后就会变成薄薄的纤

维纸，人们便在这种麻纸上写字。不过，麻纸的质量比较粗糙，还不太适宜于书写。对造纸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最终则是由蔡伦完成了这一关键性的任务。

蔡伦，字敬仲，东汉时期桂阳(今湖南省耒阳县)人。可能因为家境不好，在汉明帝永平末年被送进皇宫做了宦官。蔡伦聪明伶俐，为人处事极得上下的欢心，故汉章帝建初年间就做了宦宫中的小黄门，成为皇帝的亲随。汉和帝即位以后，蔡伦更是扶摇直上，官至中常侍，经常参与国家政事。蔡伦为官尽心尽力，敢于直言谏上、匡正过失。后来，汉和帝又让其兼任尚方令，负责制造皇室所用的兵器及其它器物。蔡伦精于各种手工技艺，他的技艺精湛而不落俗套，他监制的刀剑诸器物无不精工坚实，深得皇室人员的喜爱，同时也成为社会上效法制作的榜样。不久，蔡伦又迷上了造纸这一行，他决心解决宫廷及社会上的用纸问题。

经过不知多少次摸索试验，蔡伦终于解决了造纸的一系列难题。原来造纸的原料多是用麻，麻未经使用即拿来造纸，这对于古代来说是个不小的浪费。再者单纯用麻会使纸质粗糙不便书写。蔡伦经过研究，扩大了造纸原料的范围，将废麻、破布、烂鱼网、树皮等统统拿来造纸。这一方面可以变废为宝，降低造纸的成本；另一方面将多种原料揉和在一起，可以使纸张厚薄均匀、韧性加大。西汉时期的造纸工艺极为简单，还说不上是在自觉地使用多种方法来造纸，造纸工艺尚处于萌芽状态。蔡伦为了提高纸的质量，总结出了一套严格的造纸工艺。其过程的第一步是先将废麻、破布、烂鱼网、树皮等造纸原料放入水中浸泡；第二步是将浸泡后的原料粉碎、冲洗；第三步是将碎洗后的原料加人草木灰水人锅蒸煮，以草木灰中碱的因素除去原料中的各种杂质；第四步将蒸煮后的原料漂洗干净捣成纸浆；第五步用细密的竹帘或纱网捞取纸浆；第六步将捞取纸浆形成的纸张弄平、上光、烤(晒)干。经过这些繁琐而精细的工序，真正的纸张便被制作出来了。元兴元年(公元105年)，

蔡伦将他制作的纸正式进献给和帝，汉和帝看到质地精美的纸张备加赞扬。从此以后，蔡伦的造纸方法迅速地传播开去，使中国进入了真正的造纸时代。由此看来，蔡伦是将中国的造纸技术由不自觉地粗制粗造状态提高到自觉地讲求精密工艺的关键人物。所以，我们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或者说他是中国造纸术的创始人，都不算过分。

汉安帝初期邓太后执政，因为蔡伦技艺卓越又长久侍奉皇帝，太后于元初元年(公元 114 年)封他为龙亭侯，食邑三百户。不久，蔡伦又升至长乐宫太仆，专管太后的车舆和马匹。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邓太后病逝，汉安帝亲政，蔡伦的厄运也随之而到。汉章帝时期窦皇后专宠但无有儿子，汉安帝的祖母宋贵人亦得到章帝的宠爱且生下儿子被立为太子。窦皇后对此嫉妒万分，遂诬陷宋贵人用巫术诅咒她。汉章帝乃废太子，囚宋贵人。窦皇后又命当时的小黄门蔡伦办理此案，在蔡伦的拷打之下宋贵人屈打成招，最后饮药自杀。亲政后的汉安帝决心报蔡伦毒打祖母之仇，立即命令蔡伦到廷尉处服罪。蔡伦自知难过此关，便沐浴整衣之后服毒自杀了。如按他十岁入宫，从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 75 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是四十六年，那么蔡伦死时应为五十多岁。

蔡伦的生命虽然就这样结束了，但他的造纸术却被人们继承、发扬和光大。造纸由原来处理麻的副产品成为一门独立的行业，越来越多的造纸作坊在全国各地诞生。随着造纸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人们书写文字不再使用简牍和缣帛，纸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青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书写材料的这一历史性变革是由蔡伦来完成的。从此，中国用纸印刷的各种书籍日益增多，中国文化又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由此看来，蔡伦发明造纸还是中国文化前进的动力之一。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公元六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地区的人们

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使用着不同的书写材料。古代印度人把文字写在白桦树皮和大叶棕榈树的叶子上，古代苏美尔(今叙利亚地区)人把文字刻写在泥版上，古代埃及人把字写在一种水草上，古代欧洲人则把文字写在羊皮上。毋庸置疑，这些材料对于文字的书写和保存都有许多不便之处。书写材料质量低劣，极大地限制着世界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时期，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时期。随着唐朝与阿拉伯世界联系的加强，唐朝的一些工匠和战俘把经过改进的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在阿拉伯人征服亚、欧、非一些地区的过程中，又把中国的造纸术传播到这些地区。由此，世界范围内完成了由各种土制书写材料向纸的变革。

(徐明文)

参考书目：

《后汉书》:《章帝八王传》、《宦者列传》

张润生等《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

刘洪涛《中国古代科技史》

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名张机，以字行世。他是我国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他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一书，确立了我国中医学治疗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中的基本原则直到今天还为医务人员所遵循。正是因为张仲景对中国医学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医圣”。

张仲景完全应该在封建的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遗憾的是在范晔写的《后汉书》中并无他的传记。因此，我们只好通过《伤寒杂病论》自序及其它有关资料来窥探张仲景的事迹和医学思想了。

张仲景是东汉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邓县穰东镇）人，约生于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 150 年），卒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广泛吸收百家学问，尤其酷爱医学。为了进人医学之门，他曾拜南阳郡著名医生张伯祖为师。在张伯祖的指导之下，张仲景刻苦学习，不久便全部掌握了其师的医术。从张伯祖处出师之后，张仲景已具备了较高的医术水平，开始在家乡行医治病。据《太平御览》记载，张仲景有一次遇到了著名的文学家王粲，当时王粲只有十七岁，年轻气盛风华正茂，谁也不以为他有病。张仲景却从王粲的气色上观察到他已有病在身，便对王粲说：“您已患有疾病，现在服用五石汤治疗还能治好，现在如果不治以后必将转化为顽症，在您三十岁之后眉毛会脱落，恐怕还会有性命之忧。”王粲觉着这是张仲景在炫耀自己的医术，况且也没感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就没听张仲景的忠告。在王粲四十岁的时候，果然

应验了张仲景的预测，王粲先是掉去眉毛，半年之后便死去了。从王粲的病状来看，他患的可能是麻疯病。张仲景能在其病发之前二十多年就能诊断出来，说明他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了。张仲景凭着自己精湛的医术，为百姓诊病治，深得广大人民的好评。据明朝《嘉靖邓州志》记载，由于张仲景名声极好，在汉灵帝时曾被举孝廉，开始做官，后来官至长沙太守。但经近人研究，历任长沙太守并无张机或张仲景的记录。看来，张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一事还有待继续研究。不过从有关的材料来看，张仲景一生行医治病的区域主要在南方的两湖（湖北和湖南）一带，与当时在北方齐鲁地区行医的华佗并称于世。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华佗以擅长于外科治疗著名，张仲景则以精于内科治疗而为人们所颂扬。

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张仲景发现社会上在医学方面存在着许多亟待澄清解决的问题。从《伤寒杂病论》自序来看，这些问题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问题之一是贵族阶层对医学不重视。张仲景说，那些豪门权贵们平常一点也不留神医学，不从事医疗学术的研究，不知道医术发达之后可以上疗君亲之体，下治百姓之病，中保自己康健长生。他们只知道竞逐荣华富贵，奔走于高官之门，根本不知道身体是根本其他为枝叶。他们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也不懂得，待到被邪气侵扰、病患缠身之后，又惊恐不知所措，卑躬屈节地去找一些巫医、庸医诊治，结果自然是过早地命归黄泉。张仲景对贵族们轻视医学既深恶痛绝又深感惋惜，他曾发出了如下的感叹："这可真是一个蒙蒙昧昧、举世昏迷而不知觉悟的时代。"为了批判贵族对医学的轻视，唤醒贵族对医学的重视，促进医学的发达，张仲景决心写一部书来阐明这些问题。

问题之二是深受病痛折磨的下层老百姓，需要医学知识的普及。东汉末年的灵帝、献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不断，这无疑助长了疾病的流行。特别是汉献帝建安年间几乎年年都有瘟

疫发生。贫穷无知的老百姓根本无法抵御疫病，疫病发生的地方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就连张仲景家族的二百多口人，进人建安纪年还不足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被疾病夺去了性命，并且大部分是死于伤寒病。面对疫病肆虐、百姓成片死亡的残酷事实，张仲景的心在颤抖，他想拯救那些被疾病纠缠的人民，但一人之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老百姓学习医学知识，战胜各种疾病，张仲景决定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再加上自己行医治病的实践心得，写一部医学书籍为社会服务。

问题之三是社会上庸医众多，需要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批判。就在疫病流行的时候，社会上还有许多医术不佳、医德不高的庸医在坑人骗人。这些庸医不钻研古代流传下来的医学经典，只知死守家法，结果医术越来越低劣。他们看病时只凭花言巧语地吹嘘，和病人相处片刻还没等弄清病情，就开方下药。医生切脉的规矩本来是先用中指按住手掌后动脉的关部，再用食指按寸部，无名指按尺部；但庸医们敷衍了事，“按寸不及尺”。手之经脉与足之经脉相互连通，医生看病时必须手足都观察，但庸医们却“握手不及足”。医生看病必须详查左手的人迎部、脚脊的趺阳部和手腕后的寸关尺部，但庸医们却从来不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医生诊病必须长时间地号脉和仔细观察病人的面部气色才能定案，但庸医们却号脉不超过五十下，寸、关、尺三部浮、中、沉的九种情况都未查知，甚至连病人的鼻子和前额的气色都不察看，就胡乱定病下药。这些庸医们必然又给病魔缠身的老百姓带来新的痛苦和负担。为了批判庸医们的不良行径，提高整个医学界的医德和医术水平，张仲景感到有必要将自己多年探索的医疗经验写成书公诸同行。

问题之四是中国的医学理论，需要根据当时的水平加以整理和总结。中国医学源远流长，传说远古的神农氏就亲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黄帝曾撰写《内经》创立中医学理论，与他们同时的医学高手还有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等。中古时代有著名

的医生长桑君和扁鹊。汉代有名医公乘阳庆和淳于意。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中国医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理论体现在东汉以前的《内经》、《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等医学经典著作中。这些著作对于东汉医生的医疗实践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庸医们死守各自的家法，不知广泛吸收这些经典的精华，这就有必要在批判庸医的同时，认真整理总结这些古代医学经典，给广大医生创造吸收古代医学遗产的捷径。再者张仲景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对伤寒病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前人的成就，这就更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著作，从而发展前人的医学理论。

基于以上原因，张仲景认真研究，博采众长，终于写出了流芳千古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共十六卷，分成伤寒病和杂病两部分，后人由此分成两部书，一部是论述伤寒病的《伤寒论》，一部是论述杂病的《金匮要略》。

张仲景对中国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他的《伤寒论》中论述外感发热病的诊断、治疗时，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辨证是指如何辨明病症，为此张仲景提出了重在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诊病的八条纲领。凡是病势沉伏、恶寒、厥冷、脉象沉迟弱而无力者称为阴症，凡是兴奋、充血、发热、脉象洪大有力者称为阳症；凡病症发生于体表者称为表症，凡病症在内部者称为里症；病情具寒性倾向者称为寒症，病情呈热性倾向者称为热症；凡病毒滞留于体内而精气虚弱者称为虚症，凡邪气充实但精力足可抵御者称为实症。在八纲之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凡寒症、虚症、里症一般是阴病；凡热症、实症、表症一般是阳病。运用八纲来辨识疾病属性（属阴属阳）、确定病变部位（在表在里）、区分邪正消长（是虚是实）、弄清病态发现（是寒是热），就可以全面认识疾病，有的放矢，以便采用合理的治疗方法。论治是指经辨证诊断以后的对症治疗。为了使治疗取得最佳效果，张仲景创立了针对不同病情施行治疗

的汗、吐、下、消、和、温、清、补八种方法。汗法是指对病在表者，用麻黄汤之类的药物给病人发汗而排毒；吐法是指对病在上者，用瓜蒂散之类的药物促使病人呕吐从而排除腹中的毒物；下法是指对病在下者，用大、小承气汤之类的药物促使病人排泄肠胃中的病毒；消法是指对病在上下之间（即中）者，用泻心汤之类的药物消除病毒；和法是指对病在表里之间者，用大、小柴胡汤之类的药物解病人体内的病毒；温法是指对病性属寒者，用四逆汤之类的药物驱除病人身上的寒气；清法是指对病性属热者，用白虎汤之类的药物去热；补法是指对病体虚弱者，用炙甘草汤之类的药物补养病人的身体。张仲景所创立的以上辨证论治的八纲八法，既是对中国古典医学的总结和发挥，也是他多年行医实践的经验之谈。辨证论治原则在对中医理论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对中医治疗过程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使医生们有了普遍遵循的规则。由此，中国医学结束了它的草创时期而步入了成年阶段。

在《金匮要略》关于杂病的部分中，张仲景首先论述了人体的脏腑、经络原理和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防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然后又论述了各种内科杂病、妇科、儿科等四十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匮要略》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在以前的行医实践中，张仲景就十分注意搜集、运用经方给人治病，为此曾获得了经方大师的称号。张仲景在写《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对如何处方用药的论述。他在这本书中，共使用药物二百一十四种，配成药方三百七十五例。为了使用这些药方不出差错，张仲景在书中严格规定了各味药的数量及药物的煎法、服用和禁忌等。经过历史的检验，张仲景的这些药方都是极为有效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既是东汉中医学理论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中药学理论在当时发展的最高水平。

张仲景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医学家，他除有《伤寒杂病论》流传至今外，还写有《黄素药方》、《辨伤寒》、《疗伤寒身药方》、《评病药

方》、《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著作。尽管这些书现在已亡佚了，但如此众多的著作充分说明张仲景荣膺“医圣”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徐明文）

参考书目：

《伤寒杂病论》

《太平御览》卷七二二

明朝《嘉靖邓州志·方技传》

阙勋吾等《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译注》

张润生等《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

刘洪涛《中国古代科技史》

华佗行医治病

华佗又名华旉，字元化，东汉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约生活于汉冲帝永熹元年（公元 145 年）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之间。华佗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到今山东省东南部和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游学，经过刻苦学习，不久便精通了数种儒家经典，成为沛国有名的学者。当时的沛相陈珪和太尉黄琬听说华佗精通儒家经典，曾分别想用举孝廉和征辟的办法让华佗入仕做官。但华佗看到当时社会上疾病流行，百姓因此而痛苦不堪，便毅然放弃仕途，踏上了学医行医之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他精研医学经典，广泛学习民间偏方验方，大胆探索试验，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华佗约与张仲景同时，从有关资料来看两人并不认识，张仲景活动于两湖（湖北和湖南）地区，以内科高深而著称；华佗则主要活动于齐鲁及周围地区，以擅长外科而驰名于世。

华佗对中国医学最大的贡献在外科，他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施行剖腹手术和全身麻醉的医生。华佗认为，在疾病结积于病人身体之内而针灸药物又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必须动手术用适当的器械将病患部分清除下来。但动手术对于病人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保证手术顺利完成，华佗发明了一种叫麻沸散的麻药。这种麻药可能由曼陀罗花、生草乌、香白芷、当归、川芎、天南星等药物配制而成，病人在饮用后短时间内便如醉死。待麻药发生作用后，华佗根据患病的部位实施手术，如病在肠中他便开肚出肠，对病患部分予以清理，然后缝合腹部，涂上消毒药膏。手

术做完了病人尚未清醒，丝毫感觉不到手术之苦。经他做过的手术，四至五天伤口就能愈合，一个月的时间疾病就会痊愈。有一次华佗在行医途中遇到一推车夫病倒在路边，病人腹疼剧烈，两腿弯屈，声音细弱。华佗诊断车夫患了肠痈（阑尾炎），于是便给车夫喝了麻沸散，迅速实施手术治疗，割去了车夫的阑尾，挽救了车夫的生命。还有一次一个有身份的士人身体不舒服请华佗诊治，华佗经全面观察，发现病人总体状况不宜动手术，便对病人说："您患的病已人身体深处，必须开刀破腹治疗，然而您的状况不好，术后只能再活十年。此病不影响您的寿命，您还是忍受病痛为好。"但这位士人实在不堪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最终还是要求华佗实施了手术治疗。病人眼前的疾病很快便消失了，但在手术后的第十年还是死了。这说明华佗为病人动手术是在对患者全面权衡之后才决定下来的，决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动手术。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华佗在外科手术和运用全身麻醉术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后来《三国演义》的作者便安排了华佗为关羽动手术刮骨疗毒的故事情节，使华佗高超的医术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据近人研究，华佗用麻沸散成功地进行手术治疗，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一大创造。日本的医学家华冈青州曾在1805年为病人用曼陀罗花做手术麻醉剂，被人视为是医学上的创举，其实他要比华佗晚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

在内科诊断方面，华佗的医术也是相当精湛的。他善于通过察看病人的气色发现病情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一次，盐渎（今江苏省盐城县）人严昕与几个朋友邀请华佗喝酒。华佗到来后发现严昕脸色不正常，便问道："您身体感觉怎么样？"严昕回答："与平常一样，并无什么异常现象。"华佗说："从您的脸色来看您已患急病，请不要多喝酒。"宴会结束后严昕急忙驾车回家，不料途中病发，头晕目眩摔下车来，被人弄回家去的当夜便病死了。有一个叫梅平的下级军官因病被除名，他急忙向广陵（今江苏扬州）老家奔去，在离家二

百多里的时候投宿于一亲戚家中。华佗偶然遇到这位下级军官，略微观察后便对他说："您如果早碰见我情况还不会如此糟糕，现在您已病入膏肓，速请回家与亲人相见，不然将要死在外面。"事情与华佗预测的差不多，这位病人五天后便去世了。华佗还善于通过脉象来诊断病情。一次，官为督邮的顿子献在病愈之后请华佗为其诊视身体，华佗在号脉以后嘱咐他说："您的身体还很虚弱，很可能会病情复发，请注意不要太劳累了，特别是不可进行房事，不然必死无疑。"顿子献之妻听说其夫病已痊愈，便从百里之外前来探视。顿子献没听华佗的忠告之言，自恃病情已好，至夜晚与其妻极尽男女之欢。事过三天，顿子献果然旧病复发一命呜乎。

华佗在准确地诊断病情之后，十分注意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一次，病人儿寻、李延前来让华佗看病，病状俱为头痛发烧。但华佗给两人开的药却不相同，儿寻是用泻下药，李延是用发汗药。旁边人不明白为何病状相同治法却相异，华佗解释道："儿寻头痛发烧是因内部伤食所致，故用泻药治之；李延头痛发烧是因外部感冒所致，故用发汗药治之。"经其治疗，儿、李第二天同时病愈。一般医生给人治病除开方吃药外大多是再加精神安慰和鼓励，华佗在有的情况下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个郡太守病了，请华佗诊视，华佗认为此人之病需让其发怒方可治好，于是在使太守生气上打主意。华佗先是收了太守很多钱物但不给其治病，后是不告而别，并在走时留下书信一封痛骂太守。太守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捉弄，令人追杀华佗。太守之子知道内情，使追杀之人空手而回。太守越想越生气，盛怒之下吐出黑血数升，其病竟然也因此而痊愈。

针灸术是中国医学所特有的一门功夫，华佗经过深入研究，使用针灸治病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华佗针灸用穴少而准，疗效高。"针"是指用针刺治疗疾病。病人如需针刺治疗，华佗也不过是在一二处下针，事先和病人讲明应当在某处有何感觉，下针后病人

说感觉一到他便收针，病也随之痊愈。“灸”是指用艾叶烤灼穴位以治疗疾病。病人如需用灸法治疗，华佗也不过在一二个地方施行，每处烤灼不过七八次，病患便除。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神经性头痛病，病发时心乱目眩，只要经华佗针刺治疗，头痛会随时消失。据《华佗别传》记载，华佗曾路遇一个因两脚有病不能行路的病人。华佗给他号脉之后让其脱去衣服，先在背部点穴数十处，接着又在每穴用灸法烤灼各七次，病人便能用两足行走了。由此看来，华佗是经常使用针灸术行医治病的。据说华佗还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用夹脊穴，现在临床上仍常应用，被称为华佗穴。华佗不但自己精通针灸术，而且还敢于揭露庸医乱针害人的不道德行为。一次，一个叫徐毅的病人请华佗看病，对华佗说：“昨天请医生针刺胃管之后，便咳嗽不止，欲卧不能。”华佗听罢立即指出：“此医下针并未刺中胃管，而是误刺了您的肝。后果是当日食量大减，第五天就要您的命。”徐毅果然死于庸医的乱刺之下。值得庆幸的是，华佗的针灸术后来为他的彭城（今徐州市）弟子樊阿继承下来并有所创新。医生们都认为在背部和腹部之间不可随便下针，实在需要下针，进针不准超过四分深，否则病人会有生命危险。但樊阿在病人背部下针竟深入一至二寸，在胸部巨阙穴下针亦深入五至六寸，病人不但没有生命之忧反而针到病除。

华佗是一位医术全面的医学家，他不仅精通外科、内科，而且对于妇产科和小儿科方面的疾病也很有研究。有一个姓李的将军其妻病得厉害，请华佗前来看病。华佗号脉以后说：“病人是怀孕伤了胎，而胎儿没有去掉。”李将军说：“伤胎是真，但胎儿已经生下来了。”华佗坚持认为死胎未去，李将军以为华佗没看准病，华佗只好离去，碰巧李妻病情转好，事情暂时过去了。一百天后李妻病情复发，再次请华佗诊视。华佗号脉后说：“脉象显示病人腹中尚有死胎，一定是怀有两子，第一个生产后出血太多使第二个没有生下来，病人和别人都不知道此事，遂使胎儿死于腹中。胎儿死后血脉

不能复归，故使病人多疾疼痛。现在给病人服用汤药再配合针刺，死胎就会生下来。”给病人服药、针刺后，病人虽有生产感觉但不见胎儿出来。华佗说：“此胎死太久，已经干枯，不能自出，应该让人拿出来。”照华佗之法办理，果然从李妻身上取下一个手足完具的男性死胎。此例说明，华佗对于妇女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都极为清楚，遇到疑难病症也能诊治，这在视妇女生育为神秘的中国古代，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是极为可贵的。对于治疗小儿科疾病，华佗也极为拿手。东阳(今山东平原县西)有个两岁的小男孩得了痢疾，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华佗诊视后说：“小孩母乳虚冷，儿得母寒导致疾病。”于是给小孩服下了四物女宛丸，十天以后疾病痊愈。

东汉时期由于条件所限，人们食用的食品不太卫生，故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很多人腹内都长有寄生虫。华佗对这种常见病也极为重视，想方设法配制打虫的药方，以治疗寄生虫病患者。一次，华佗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食道堵塞、很想吃饭但不能下咽的病人。华佗为其诊断以后说：“前面路边有个卖大饼的人家，你可到那里买来蒜泥和食醋混合成三升左右喝下去，病当自好。”病人照此办理，立刻吐出像蛇样的寄生虫一条。病人拿着寄生虫前往华佗家致谢，看到他家北墙壁上挂着几十条这样的寄生虫。看来华佗是经常为病人诊治此类疾病的。广陵太守陈登胸中烦闷，面红不食，请华佗诊治。华佗为其号脉后说：“您腹中有寄生虫数升，这是因为贪食腥物所致，不治恐怕内生毒疮。”华佗乃为其做汤药二升，分两次服用。服药不久太守便吐出三升多寄生虫，病痛也立即消失。

华佗擅长治疗疾病，也注重强健身体防止疾病，为此他强调养生。华佗的养生之道有两条，一为体育锻炼，二为服用适宜的药物。华佗对于体育锻炼有自已的一套理论和绝招。他说：“人的身体必须劳动，但不能使其疲劳。身体经常运动有利于食物消化、血脉流通，使疾病不易发生，这就好像经常旋转的门轴不会腐朽一样。”华佗锻炼身体的绝招为根据导引术的原理，仿照虎、鹿、熊、猿、鸟经

常运动的动作，设计了名为五禽之戏的运动体操。华佗体会到坚持像这些禽兽那样活动身体，既可以健身又可以去病。特别是每当身体不快之时，起做一禽之戏，使身体发热出汗，然后擦上药粉，身上即感轻便且食欲大振。华佗的弟子广陵人吴普坚持按照华佗创制的五禽之戏锻炼身体，到九十高龄时还耳聪目明、牙齿完好。这说明五禽之戏实为强健身体的有效锻炼方法。关于用药物养生，华佗有自己独特的药方，其弟子樊阿曾向他求取益人健身的药方，华佗送之漆叶屑一升、青粘屑十四两组成的药方，并说久服此药可去蛲、赤、蛊三种寄生虫，可利腹中五脏，可轻便人之身体，可使人头发不白。樊阿久用此药，果然身体健康活到一百多岁。华佗的这些养生术已为后人所继承下来，成为我们中华医学宝库中的优秀瑰宝。

华佗以其高超的医术在社会上行医治病，为人民解除病患之苦，深受广大人民的敬爱。他的声名也渐渐传到东汉丞相曹操那里，曹操为治疗自己的头痛病便把华佗请了去，华佗只用一根银针就很快治好了他的头痛，这给曹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料，由于曹操政务繁忙劳累过度，头痛病再度复发并日趋加重。曹操为保住自己的老命，便强请华佗做了他的侍医，专门负责其身体健康。于是华佗由一个游荡江湖的名医，变成了曹操的医官。为官固然生活优裕，但缺乏自由和为老百姓治病的环境，这与华佗的性格和学医的宗旨格格不人，华佗便以妻病为由离曹回家。后来，曹操屡次命令华佗回去，皆为华佗所拒绝。曹操为此而大怒，将华佗收归狱中准备杀头。曹操的谋士荀彧曾为华佗讲情，他说："华佗的医术实在高明，他可以挽救很多人的性命，请丞相务必宽恕他。"但曹操一意孤行，最终还是把华佗杀了。华佗被监禁以后，自知曹操不会轻易放过他，便在狱中写成医书一卷，准备把自己医学方面的精华留给世人。书写完之后他无法送给自己的弟子和亲属，只好把他送给管理犯人的狱吏，并说这本书可以救活无数人的生命。但是，狱吏由

于惧怕曹操的刑法而不敢接受此书。华佗对曹操的淫威痛恨万分，对自己的成果难以传于后世而伤心哀叹，激愤之中将书稿付之一炬。就这样，曹操无端地杀害了这位伟大的医学家，也扼杀了他许多有价值的医学成就，给中国医学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千百年来华佗的事迹为人民所传颂。为了缅怀、纪念这位在外科、内科、针灸、妇科、养生学等众多医学领域有独到贡献的医学家，人们把华佗与扁鹊、张仲景并称为中医的三大祖师。

（徐明文）

参考书目：

《三国志》:《华佗传》

《后汉书》:《方术列传》

阙勋吾等《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译注》

张润生等《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

刘洪涛《中国古代科技史》

马融、郑玄遍注群经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在东汉时期很激烈。今文经学的最大弱点是妖妄和烦琐。今文经学家对经文的解释，支离蔓衍，浮词虚语，章句烦琐，经说杂乱。相反，古文经学通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是一种简单明了、思想犀利的学术。两种经学比较，今文经学之弊显而易见，所以，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发展很快。尤其是到东汉末年，它虽然未立学官，却已成为私学的主流。马融和郑玄就是这一时期古文经学的两位大师，他们遍注群经，取得了很大成就。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系马援族孙。其父马严是一位工匠。马融貌美，善辞，有俊才，从师于名重关西、隐于南山的京兆挚恂，博通经籍。挚恂对马融的才气颇为欣赏，遂招为女婿。

永初二年（公元 108 年），大将军邓骘听说马融很有名气，欲召为舍人。谁知这并非融之所好，没有即刻去应召。此时正值边事战乱，饿死了许多人。马融也被饥饿困扰着，他悔而叹息地对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生贵于天下，现在因为一点小事，就白白地死了，这并不是老庄所主张的。因此，他终于前去应邓骘之召，后又拜为校书郎中，到东观典校秘书。这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一些俗儒浅薄之士，认为应该兴文德，废武功，不要再练兵打仗了，给叛乱者以可乘之机。马融深有感触，认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不可偏执一端。

元初二年（公元 115 年），马融上《广成颂》以讽谏，奉劝邓太后

重整朝纲，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劝农事，重武道，文武并重，使百姓能安居乐业。不料，马融的进谏触怒邓氏，被软禁在东观，十年不得升迁。后来他借口兄子丧欲自劾以归，太后听后大怒，认为马融羞薄诏除，邀功请赏，下令禁锢他。太后死后，安帝即位，召还马融为郎署，重新在讲部，为河间王厩长史。适逢安帝东巡泰山，他又上《东巡颂》，安帝认为这是一篇奇文，随召拜为郎中。到北乡侯即位，马融因病离职，为郡功曹。

阳嘉二年（公元133年），马融被任为议郎，后为从事中郎，又调任武都太守。正值西羌少数民族发生叛乱，征西将军和护羌校尉胡畴前去征伐，不能平息。马融知其将败，遂上疏欲亲自率兵平叛，没有获准。后又上书认为西戎北狄，终必叛乱，要朝廷想办法防备，果然不久陇西羌、乌桓均发生叛乱，被马融言中。桓帝时，马融为郡太守，因事得罪梁冀，梁冀即上奏马融在南郡犯有贪污罪，被免官，流放朔方，不久被赦免，再次封为议郎，重新在东观著述，后因病去官。

马融一生才高博洽，为当世通儒，跟从他学习儒家经典的有近千人，涿郡卢植、北海郑玄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马融善鼓琴，好吹笛子，达生任性，不拘泥于儒家的礼节，衣食住行均比较讲究，常常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他教授门徒，也有自己的特点，嫡传弟子四百余人，入室受教者只有五十多人，其他人均由其弟子依次相传。他遍注群经，可以说，古文经学派到了马融的时候，才有了自己统一的训诂和经义。但是，马融当初应邓氏之征召，不能守于饥贫，又遭梁冀弹劾，写了大将军《西第颂》谄媚于梁氏，因此颇为正直之士所看不起。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马融病死家中，终年八十八岁。有意思的是他生前素骄贵，死后却遗令薄葬。

马融曾从班固受学，博通今古文经学。他曾欲训《左氏春秋》，后来看到已有贾逵、郑众之注，他认为贾逵之注精而不博，郑众之

注博而不精，如果把两家注合在一起，则可既精且博，所以也就没必要再重注了。因此，他只著有《三传异同说》。马融对《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均有详注。此外，他还著有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共二十一篇。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八世祖郑崇为尚书仆射。郑玄年轻时为乡啬夫，后常去学官，不愿为吏，其父对此很气愤，但未能阻止其求学之欲望。后来他到太学受业习经，师事京兆第五状元生，开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山东一带没有值得师法的学者，就西人关，经由涿郡卢植引荐，师事马融。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没见老师一次面，只是跟从马融的高业弟子学习。郑玄日夜诵读，孜孜不倦。有一次马融会集弟子们考论图纬，听说郑玄擅长《九章算术》，即召见于楼上，郑玄也因而得以当面请教平时诵读时遇到的疑义，问毕辞归。马融对其门人说："郑生现在离我面去，我的学术可以东传了。"

郑玄在外游学十余年才回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千人。党锢之祸起，郑玄与同郡四十余人均被禁锢，于是潜心经业，杜门不出。灵帝末年，党禁平息，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大名，随即征辟他，地方上不敢违逆何进，私下却曾胁迫过郑玄，不得已才让郑玄前去。何进对郑玄礼待甚优，但郑玄不受朝服，布衣相见，住了一夜就逃走了。这时他已六十岁，弟子从远方而来者已达到数千人，后来将军袁隗表以侍中荣誉，因为父丧没有接受。当时北海相孔融对郑玄很敬佩，命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修"通德门"，广开门衢，加宽道路，给郑玄以殊荣。董卓迁都长安，大臣们举郑玄为赵相，道路不通未至。正值黄巾军占据青州，郑玄因避乱流落到徐州，徐州牧陶谦以师友之礼对待他。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郑玄从徐州回高密的路上，碰到黄巾

军数万人，见到郑玄皆跪拜，相约不入高密县境。后郑玄病重，以书信告诫其唯一的儿子益恩，述其家道贫寒，仍诵读不辍，劝益恩要勤力务农，无恤饥寒，要甘于贫寒，不坠其志。当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派人邀请郑玄，大会宾客，郑玄最后一个到场，被请至上座，他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朗目，容仪温文尔雅。袁绍的宾客多豪杰且都有才气，看到郑玄，认为他并非通人，竟相发问，互相辩难。郑玄一一答对，言出有据，都是平日所听不到的新见解，大家莫不佩服。当时汝南应劭也归顺袁绍，他眉飞色舞地对郑玄说："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如何？"郑玄笑着说："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应劭自惭形秽。袁绍于是推举郑玄为茂才，表为左中郎将，他都辞而不就。公车征他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到之处，长吏迎接，他都不以为然，称病请回乡里。

据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郑玄梦见孔子，令其起床，认为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醒后，以谶合之，知道自己已活不长了。不久郑玄即卧床不起，恰值曹操袁绍官渡之战，袁绍命令其子袁谭派人逼迫他随军，不得已，抱病前去，走至元城县，病情加重，就在这一年的六月病死，享年七十四岁，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从业受教者千余去送葬。

郑玄长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被视为纯儒，齐鲁之地皆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官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均著名于世。乐安国渊、任嘏，当时年龄尚小，郑玄却认为渊必为国家器重，嘏有道德，都分别给以提携，两人以后均有所成就，为郑玄所言中。

郑玄子郑益恩，孔融在北海时，曾被举为孝廉。到孔融被黄巾军围困时，郑益恩前去解围，战死，有一遗腹子，郑玄认为其手纹很像他自己，便取名为郑小同。

郑玄门人合撰他平时答诸弟子问《五经》，按着《论语》之先例，作《郑志》八篇。郑玄虽师从马融，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遍注群经，对《周易》、《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

《中候》、《乾象历》均有详注。另外，他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答临孝存周礼难》，共一百多万言。

马融、郑玄是今古文经学皆通晓的通儒，但马融更倾向于古文经学。马融注《周礼》，决不用今文经说，专以古文经。而且他与今文经学家常有争辩。同时，马融认为今文经学有严密的师承关系，而古文经学则没有今文经学所标榜的严密的师承关系。马融《尚书序》说，《逸书》十六篇，绝无师说。

郑玄与马融不同，可谓汉代经学最后一位大师，他既不是今文经学家，也不是纯粹的古文经学家，而是兼今古文学且融会成一家，后世流传的几乎都是他注解后的经学，汉学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这兼具今古文学的郑学。

东汉时期的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以发难，郑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了慨叹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正因为郑玄通悉今文经说，才能抓住其弱点从而击中其要害。由此可见郑玄是兼通今古文经学的一位通人。再如《仪礼·士冠礼》有"主人纷而迎宾。……礼如阼"之句，郑玄注曰古文"纷"为"结"，今文"礼"作"醴"，即对经文中的"纷"字采用今文经，而"礼"字采用古文经，同时在注中标明相应的异字。郑玄所笺注的《毛诗》本为古文经，但他的注释中也采用今文经鲁、齐、韩三家之说。如在《商颂·玄鸟》一诗中对商的祖先契诞生的解释，毛传认为是其母简狄与天帝祈于郊禖而生契，郑玄则依今文经说，认为是玄鸟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可知郑玄择善而从，绝无偏执，没什么门户之见。

郑玄之注《毛诗》与著《毛诗谱》，系感时事而发，其义知声音之道与政通。郑诗谱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宏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郑玄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

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郑笺宗毛，而间用三家说，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自汉以后经学宗郑，说诗者莫不主郑笺。但是，郑氏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

郑玄所精者在三礼，他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而注内叠出今文。所以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小戴礼记》经过马融、卢植特别是郑玄作注后，其地位超过《大戴礼记》，独占《礼记》之称，而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

郑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所以马、郑注《尚书》均兼采今古文。但是因为一则今文经学历时长久必然要发生变化，二则文字长时间流传中也容易作伪。所以，在注《尚书》时，马融、郑玄均尊古文，而抑今文，但两者又稍有不同，其程度是马重而郑轻。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立学虽数百年，徒党遍天下，仍免不掉被古文家抨击，其势渐衰，永嘉之乱后三家皆亡。至东晋而伪古文经《尚书》传出来，伪古文经假托孔安国之名，年代虽比较马郑更古些，篇目却较马郑为多，加之马郑不注逸书，伪古文经则遍注，故其后孔安国注《尚书》与郑注《尚书》并行，郑学逐渐衰落，唐以后，伪孔立学官，而郑氏《尚书》亡。

郑玄自序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书在绝笔之年。郑氏注易，也是依据三礼以证易意义之广大，无所不包。据礼证易，来观察阴阳术数，实远胜之。郑注如嫁娶祭祀朝聘，也都是合于礼经，其余的虽阙而不完备，后来的儒家学者能隅反而意补之，也属于颛家之学。晋以后郑注《周易》都立了学官，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注易，江左用王弼注易。到隋时，郑氏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玄所注《周易》遂亡。另外，郑玄还引老子自然思想以注《周易》，使其发生重大变化，魏晋时期的三玄之学，《周易》是基础，可见郑玄的影响之巨大。

郑玄注经在广采各家之说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

个人的学术特色。如前所说，他在《六艺论》中自述，在注《诗》时，宗毛为主，但是，其意义隐略不清楚处，则更表明，加以发挥，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就用自己之研究心得，使可识别。

郑玄注经还摒弃了旧有的逐字逐句进行解说的章句形式，以“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为宗旨，所以注释相当精练，其字数往往比经文还少，比如《礼记》中《学记》、《乐记》两篇，经六千肆佰玖拾伍字，注五千五百叁拾贰字。《祭法》、《祭统》、《祭义》三篇，经柒千肆佰陆拾字，注五千五百贰拾叁字，都是注少于经。郑注广博、精深而简约，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学大师。

郑玄师事马融，其经说多本之于其师，但并不盲从，在许多地方都与马融的经说有异。如《尚书·尧典》“修五礼”，马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郑曰：“五礼，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也。”“教胄子”，马曰：“胄，长也，教长天下之子弟。”郑曰：“国子也。”可见郑玄不拘于一师之说。因此，范晔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陈寿誉郑玄名冠华夏，世为儒宗。郑玄以其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时人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郑学有自己的学说体系，学术价值相当高，所以传后世之汉学者惟郑学，魏晋以降，经学的主流就是郑学。那曾经兴盛一时的各家经说，反倒因后继乏人逐渐衰落。清人皮锡瑞说，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于当时多门户之见，见郑君宏通博大，无所不包，纷纷从其说，不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流行后，原来《周易》之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汉代旧有的师法、家法至郑注一出，可说是被一扫殆尽，因此皮锡瑞称此时为经学小统一时代。郑玄不靠官方的权力来统一

经学，以其经注博大精深，赢得了天下的归宗。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相比，由于它主要在民间传习，政治色彩较淡而学术气息较浓，不大讲灾异、图谶、微言大义之类重在为现实服务的内容，而注重经义的训诂和典章制度的考证，因此在学术上逐渐超过了今文经学。

（宋月华）

参考书目：

《后汉书》:《马融列传》、《郑玄列传》

《经学通论》

《先秦两汉儒家教育》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董卓之乱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皇子刘辩嗣位，是为少帝。少帝年仅14岁，何太后临朝听政。皇弟刘协时年9岁，被封为勃海王，后改封陈留王。何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外戚开始把持朝政。

何进对汉灵帝以来的宦官专权十分不满，他暗中计划杀掉把持五营校尉军的宦官头子蹇硕，清除宦官势力。为增强力量，他拉拢重用袁绍、袁术兄弟。袁绍字本初，袁术字公路，出身世代官僚地主家庭。袁氏从袁安起四辈都有人做“三公”，人称“四世三公”。袁家声势显赫，门生故吏遍天下。凭借这样的家庭，袁绍很快升任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东汉设置西园八校尉，袁绍任左军校尉。袁绍支持何进诛除宦官，于是，何进任命他为司隶校尉。袁绍的堂弟袁术任虎贲中郎将。同时，何进还征聘了有智谋的士人何颙、荀攸、郑泰等二十余人。当时，宦官头子蹇硕控制着守卫京师的精锐部队——西园八校尉。他见何进掌权，心里很不安稳，便给宦官赵忠、宋典等人写信说：“大将军何进兄弟控制朝政，现在他与其亲信谋划要把先帝左右和宦官们一网打尽，只是因为我统领禁军，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应该关闭城门赶快将何进等人捕杀。”蹇硕手下有一名宦官叫郭胜，与何进是同郡人，他站在何氏一边，便与赵忠等人商议，不听从蹇硕的提议。郭胜还把蹇硕的信送给何进看，何进立即将蹇硕逮捕处死，把他的军队全部划归自己掌管。

袁绍见何进已控制了军队，便建议何进当机立断，迅速动手剪除宦官。何进同意袁绍的意见，又去劝说何太后。何太后却认为宦官制度，自古有之，不能轻易废除，不同意诛杀宦官。何进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思，便打算杀掉一批平日为非作歹的宦官，打击宦官的气焰。袁绍说："宦官最亲近太后和皇帝，他们凭借这个条件，出纳王命，如不将他们彻底诛除，必为后患。"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及何进的弟弟何苗多次接受宦官的贿赂，知道何进要杀宦官，也从中阻挠，使何进不能顺利采取行动。事情被一拖再拖。

袁绍还是催促何进赶快动手，他建议多召集各地的军事将领，让他们率军向洛阳进发，以军事力量来威逼何太后。袁绍还提议召并州牧董卓进京，何进同意了。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是当地的土豪。他居住的地方与羌人相邻，年轻时曾到羌人地区游历，同羌人的豪帅结交，后任凉州兵马掾，领兵巡守边塞。董卓性情粗猛，膂力过人，善于骑射，为胡羌所畏。桓帝末年，他随中郎将张奂攻打汉阳的羌人，屡立战功，被提拔为郎中。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被派往河北，接替卢植镇压起义军，因战败被治罪；不久又出任中郎将，带兵攻打在西北地区反叛朝廷的边章、韩遂。中平四年，韩遂、马腾联合向洛阳进攻，董卓和皇甫嵩将他们击退，受到朝廷表彰，董卓的声望和地位越来越高。中平六年，朝廷召董卓进京任少府，董卓不愿意交出军队，便以部下不让他离开为借口，拒绝去洛阳就职，朝廷对他也无可奈何。灵帝病重时，任命董卓为并州牧，让他把军队交给皇甫嵩管辖，董卓还是拒绝交出兵权。灵帝下诏责备董卓，董卓依仗手中有军队，毫不在乎，并把军队驻扎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以观时变。这时，他接到何进请他进京诛杀宦官的命令，董卓立即率兵出发，同时向朝廷上书说："宦官张让等人，利用皇帝的宠幸，扰乱天下，

现在我率大军到洛阳，一定要抓捕他们，清除奸邪。”为了震慑宦官，何进还命令太山太守王匡派一支精锐的弓箭手向洛阳进发；东郡太守桥瑁屯兵成皋，武猛都尉丁原火烧孟津。然而，何太后仍然不答应诛杀宦官，何进的弟弟何苗也劝何进慎重行事，与宦官讲和。在这关键时刻，何进也犹豫不决了。这时董卓的军队已到达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何进派谏议大夫种邵前去会见董卓，让他暂缓进军。董卓不听，继续前进，到达了距洛阳不远的河南（今洛阳东北）。

袁绍担心何进改变主意，焦急地对他说：“现在与宦官的矛盾已经很明显了，将军为什么还等待，不早做决断呢？事久生变，否则将会出现窦武被害的惨剧！”何进又坚定了诛杀宦官的信心，并任命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

就在董卓即将到达洛阳之时，宦官抢先一步，对何进下了毒手。原来，何进诛杀宦官的计划因何太后固执己见，久拖不决，逐渐泄露出去，宦官决定先下手为强。八月的一天，宦官张让、段珪等趁何进入宫晋见何太后时设下埋伏，当何进出宫时，他们突然袭击，在嘉德殿前将何进杀死。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璋在宫外闻讯后急速领兵救援，但宫门紧闭，不能入内。这时虎贲中郎将袁术也带兵赶到，与吴匡一起攻打皇宫；宫内的宦官们手持武器，严密防守，双方相持到傍晚。袁术见攻不下来，就放火焚烧南宫九龙门和东西二宫，以此逼迫张让出降。张让等人又胁持何太后、少帝、陈留王及大臣逃到北宫。袁绍率兵追到北宫，先在朱雀阙下抓住宦官头目赵忠，将其斩首；又冲入北宫，然后将北宫门关闭，下令捉拿宫中所有的宦官，不论老少，一律处死。一时间宫中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有二千多人被杀，有些没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误杀了。在混乱中，张让、段珪等带着少帝、陈留王等数十人逃出，到达小平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时，张让见大势已去，投河自杀。

当袁绍在宫中大杀宦官的时候，董卓的军队已逼近洛阳。行至城西的显阳苑时，董卓远远见到洛阳城内火光冲天，知道已发生变故，便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在北芒阪，他与被张让劫持出宫的少帝及陈留王等相遇。少帝见一支军队匆匆赶来，以为是追兵杀到，吓得哭泣不止，大臣们拦住董卓，说："皇帝在此，有诏令你撤兵！"董卓说："你们做为国家的大臣，不能匡正王室，才导致皇帝在外流亡，还敢说什么撤兵！我是来救驾的！"说着，董卓走到少帝跟前，与他交谈，少帝说话却含糊不清，语无伦次。董卓很失望，只好向陈留王刘协询问祸乱的经过，陈留王回答得很具体，自始至终没有遗漏。董卓十分高兴，认为陈留王有才能。董卓还知道陈留王是董太后养大的，而自己又与董太后同族，于是产生了废少帝立陈留王为帝的念头。当天，董卓与少帝等一起返回洛阳宫中。

董卓刚到洛阳时，步骑兵不过三千人。他感到兵力单薄，恐怕不能为远近慑服，便想了一个办法：每隔四五天，就让军队夜里悄悄离开洛阳，次日早晨又鸣鼓摇旗，浩浩荡荡返回洛阳。不知底细的还以为董卓的增援部队到达呢。不久，董卓又将何进与何苗以前统领的部队划归自己管辖。为了增加军事力量，董卓收买了吕布。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人，骁勇善战，骑射超群，是骑都尉丁原的部下。灵帝死后，丁原受何进征召，带兵进人洛阳，任执金吾。丁原为人直率，作战勇敢，董卓打算除掉丁原，兼并他的军队，便指使吕布将丁原杀害。吕布因此受到董卓的赏识，任中郎将，封都亭侯。董卓还让朝廷罢免了司空刘弘，由自己接任，把持了朝政大权。

董卓对少帝不满意，有一次，他对袁绍讲要改立皇帝。袁绍不同意，说："汉家君临天下已四百多年，恩德深厚，万民拥戴，当今皇上正年轻，对天下没有什么过失，你打算废立，恐怕众人都不会同意！"董卓一听，恼羞成怒，他手按剑柄，大声对袁

绍说："你这小子竟敢如此放肆！天下的大事都由我决定，我想做的，谁敢阻拦！你以为我董卓的刀还不够锋利吗？"袁绍也勃然变色，说："天下的英雄难道只你一个董卓吗？"说罢，拔出佩刀，横在胸前，径直走了出去。董卓因新到洛阳，而袁绍是名声显赫的大族，董卓有所顾忌，没敢杀害袁绍。袁绍也感到再也不能与董卓共事了，便离开了洛阳，逃奔了冀州。

董卓决心废掉少帝。九月的一天，董卓召集文武百官，他昂首说道："现在的皇帝无能，不能遵奉祖宗的基业管理国家，我要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改立陈留王为帝，你们看怎么样？"大臣们都惧怕他，没有人敢发表意见。董卓又高声说："过去霍光定废立之策时，田延年按剑，现在有谁胆敢反对这个计划，一律按军法处置！"尚书卢植劝阻董卓不要这样做，董卓大怒，要杀卢植，经人求情，才没有动手。于是，董卓废掉少帝，封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接着，董卓又将何太后毒死，自任相国，把持了朝政大权。

董卓是个性情残暴、心狠手毒的家伙，他贪婪无比，把持朝政后，全国的军队、国库的珍宝都由他随意支配。他曾大言不惭地说："我的相貌，尊贵无比！"暴露了他想当皇帝的野心。他专横跋扈，侍御史扰龙宗向董卓汇报事情，没有将佩剑解下，董卓大怒，当即将其击杀。当时，洛阳城内的皇亲贵戚之家都很富足，家里拥有许多金银财宝，董卓放纵部下士兵冲入宅舍，抢夺财物，奸污妇女，弄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有一次，董卓的军队到洛阳东南的阳城，当地百姓正举行社祭，他下令把在场的男子全部杀死，把头砍下捆在车辕上，把妇女装上车，说是"攻贼得胜"，呼喊着回到洛阳城。男子的头被焚烧，将妇女赏给将士做婢妾。

董卓的暴行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抗，许多人都准备起兵讨伐董卓。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了一份朝廷三公给各州郡的文书，

陈述董卓的种种罪恶，说："我们现在被逼无奈，无法自救，盼望各地兴义兵，解救国家的危难。"

初平元年（190）正月，函谷关以东的各州郡都起兵讨伐董卓，袁绍被推为盟主，自号车骑将军。当时的形势是：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扎在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冀州牧韩馥留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负责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驻扎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其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都驻扎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后将军袁术驻扎在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各路军队都有数万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

面对声势浩大的关东同盟军，董卓感到在洛阳难以支持，便想将国都迁到长安。公卿大臣虽不愿意，也不敢违抗。二月二十七日（丁亥），献帝在董卓的威逼下离开洛阳西迁长安。临行时，董卓抓捕了许多洛阳城中的富豪，妄加罪名将他们处死，家庭财产全部没收，死者不计其数。董卓还强迫洛阳地区数百万居民向长安迁徙，命令军队在后面监督驱赶。一路上，马踏人踩，互相拥挤，百姓苦不堪言，不断有人死去，尸体堆满了道路。董卓在毕圭苑中留守，他命令军队将洛阳城中的宫殿、官府和民宅全部烧毁，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变为一片废墟，鸡犬不留。董卓还让部下挖掘历代皇帝的陵寝和大臣的墓地，搜罗珍宝。大批文书、典籍也在迁都时被损坏，昔日繁华的洛阳遭到了空前的洗劫。

董卓迁都长安后，讨董同盟军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同盟军人马虽然有十余万，但都惧怕董卓，谁也不敢首先发起进攻，每天只是喝酒聚会。献帝离开洛阳后，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包围洛阳了，彼此猜忌，进而互相攻打，逐渐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

初平二年四月，董卓抵达长安。这时他已任太师，地位在各公卿大臣之上。他在朝廷上说一不二，态度蛮横狂妄。他大封自

己的亲戚为官，其弟董旻为左将军，侄子董璜为中军校尉，都执掌兵权；就连董卓侍妾刚生下的儿子也都被封为侯爵。董卓的车马服饰都与皇帝一样。他随意召呼三台① 公卿、尚书以下的官员到自己府中奏事。董卓还在郿县（今陕西眉县东北）修筑了巨大的坞壁，城墙高厚都是七丈，号称“万岁坞”。在坞内存放了足够三十年吃的粮食和大量金银财宝。他自称：“大事成功，我可以雄据天下，不成，靠这些东西也可以养老了！”

董卓性情残暴，杀人不眨眼，部下稍有差错，就被立即杀死。有一次，他在郿坞举行宴会，将抓到的数百名起义军当场杀害。先割断舌头，砍掉手脚，再挖去眼睛，最后扔进滚烫的大锅中煮，有的人没断气，在案几前不停地翻滚抽动，惨不忍睹。参加宴会的大臣们吓得浑身战抖，手中的餐具都掉在地上，董卓却谈笑风生，神情自若。董卓还废掉汉代以来的五铢钱，改铸小钱，造成物价腾贵，一石米达数万钱，百姓痛苦不堪。

董卓凶残无道，激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人们无比憎恨他。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即“董”字，十日卜即“卓”字，意为董卓快些死去。许多公卿大臣都想除掉董卓。卫尉张温曾与司徒王允共同谋划诛杀董卓，但事情泄露，张温被杀。越骑校尉伍孚无比憎恨董卓，决心亲自杀死他，为天下除害。一次，他暗藏佩刀去见董卓，谈话结束，董卓起身送他时，伍孚突然拔出刀向董卓刺去，没有刺中，董卓拼命抵抗，他的左右亲信赶到将伍孚砍倒在地。伍孚忍着剧痛，大声喊道：“我恨不得将你这个奸贼剁成数段，以谢天地！”话没说完，便死去了。

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尚书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瓒等人也密谋杀掉董卓。吕布自帮助董卓杀了丁原后，被董卓视为心

---

① 三台：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

腹，并与吕布结为父子。董卓自知许多人痛恨他，出行时让吕布紧随左右护卫。然而，董卓脾气暴躁，一次，吕布因小事不合董卓心意，董卓拿起手戟就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躲闪及时，才未被刺中。吕布又连忙道歉，董卓才息怒。从此吕布心里憎恨董卓。吕布还与董卓的一名侍女私通，生怕董卓知道，心里很不安稳。吕布与王允关系一向很好，吕布见到王允时，向他讲述了自己险些被董卓杀死的事，王允表示同情，便将乘机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了吕布，并让他做内应。吕布有些犹豫，说："我们有父子之情，这该怎么办?"王允说："你姓吕，他姓董，你与他没有骨肉关系，现在考虑生死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董卓向你掷戟时，有什么父子之情!"吕布无言答对，只好应允。

初平三年四月，献帝患病初愈，在未央殿大会群臣。董卓身穿朝服，乘车进宫。从军营到皇宫的道路上都布满了警卫，道路两旁，左边是步兵，右边是骑兵，保卫十分周密。吕布跟随董卓在前后护卫。按照预定方案，王允让尚书仆射士孙瑞把写好的诏书交给吕布，吕布让同郡人骑都尉李肃与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卫士，守卫在北掖门内等待董卓。董卓刚一进门，李肃举戟便刺，董卓衣内有铠甲，没有刺入，只伤了他的手臂，跌到车下。董卓大吃一惊，赶忙回头喊："吕布在哪里?"吕布说："现奉皇帝诏令，讨伐你这个贼臣!"董卓大骂道："臭狗！你胆敢如此!"吕布应声举矛直刺董卓，这一枪击中了要害，董卓当场毙命。吕布命令士兵砍下董卓的头。这时，主簿田仪及董卓的私奴上前扑向尸体，又被吕布杀死。接着，吕布从怀中取出诏书，向乱作一团的官兵们喊道："皇帝下诏，只讨董卓，其他人一概不问!"官兵们听后都镇静下来，立定不动并高呼万岁。

董卓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长安城，百姓们欢欣鼓舞，拥上街道，又唱又跳。许多男女士人卖掉衣服及珠宝首饰，买来酒肉互相庆贺。大街小巷被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董卓的弟弟董旻、董

璜以及留在郿坞的董氏宗族，都被他们的部下杀死。董卓的尸体被拉到长安街头示众。当时天气渐热，董卓身体肥胖，肚内的油脂流到地上，看守尸体的人做了一个大灯捻插在董卓的肚脐上点燃，亮光通宵达旦，一连烧了好几天。王允、吕布诛杀董卓立了功，朝廷任命王允为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二人共同执掌朝政。

（孙立群）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59、60
《后汉书》:《何进传》、《董卓传》、《吕布传》、《袁绍传》
《通鉴纪事本末·宦官亡汉》

群雄割据

骄横不可一世的董卓于初平三年（192）被王允、吕布诛杀了。然而，国家并没有安定，动乱仍在继续。这时，东汉皇帝有名无实，成为权臣手中的傀儡，而各地的州牧郡守豪强大族纷纷拥兵自守，割据称雄，并互相攻打，争夺地盘。

在关中地区，董卓死后，王允、吕布把持了朝政。王允以谋划诛杀董卓有功，颇为骄傲，刚愎自用，使部下群臣渐渐疏远了他。吕布也不甘示弱，到处夸耀自己杀董卓的功劳。但在王允眼里，吕布不过是一员武将，不愿意他干政。于是，王允与吕布发生了矛盾。王允打算解散董卓的部下士兵，而民间又盛传王允要杀死所有的凉州人，使董卓的部下都惶恐不安，部将李傕更是害怕。他想遣散所率的军队，自己逃回家乡。讨武校尉贾诩劝他说："如果你放弃军队，孤身逃命，只需一个亭长就可以把你捉到，不如齐心合力，攻打长安，为董卓报仇。事情成功，可以拥戴皇帝匡正天下；如不成功，再逃也不迟。"李傕同意了，于是率数千士兵向长安进发。在沿途，他招兵买马，抵达长安时，军队已达十余万。他与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等会合，向长安发动进攻。王允、吕布在城内坚守。攻城到第八天，吕布的部下叛变，开城门引李傕军队入城，吕布抵挡不住，带领数百名骑兵突围逃走。王允被抓住杀害。李傕等控制了汉献帝。李傕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郭汜任后将军，樊稠任右将军。他们都和三公一样开府，设置僚属。他们三人与原来的三公合称六府，都参与官

吏的推荐和选举。李傕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争相提拔自己的亲信为官，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大发脾气。朝廷只好按照李傕第一、郭汜次之、樊稠再次的顺序任用他们推荐的人选。三公所推荐的却没有任用的机会。李傕、郭汜、樊稠互相猜忌，各存异志，都想独揽大权，他们经常夸耀自己的功勋，贬低别人。他们之间几次都将发生武力冲突，只是被人劝阻，才表面平息，但矛盾最终还是爆发了。

兴平二年（195）春，李傕借与樊稠商议军情之机，暗地派人将樊稠杀死。李傕除掉樊稠后，又打郭汜的主意，他经常请郭汜吃饭，有时还留郭汜在自己家中住宿。郭汜的妻子担心郭汜上当，也怕他爱上李傕家的侍女，便想了一个办法离间他和李傕的关系。一次，李傕派人给郭汜送来一些食物，郭汜妻说："外面来的东西，恐怕有问题，我得看看。"说着从食物中挑出些豆豉，对郭汜说："这些是毒药，不能吃！"她又说："一群鸡中容不得两只公鸡，我实在不明白您为什么这样相信李傕。"听了妻子的话，郭汜恍然大悟，开始对李傕有所提防。一天，李傕又请郭汜吃饭，郭汜喝得大醉，他怀疑酒中有毒，连忙喝粪汁使自己呕吐。从此，李傕、郭汜闹翻，各自率兵攻打对方。尽管献帝派侍中、尚书去调解他们的矛盾，但无济于事。三月，李傕派兵包围皇宫，将献帝劫持到自己军营中；郭汜则将朝廷大臣扣压。一连几个月，双方不停地攻打，死者数以万计。

六月，李傕的部将杨奉打算谋杀李傕，不料计划泄露，便率部下背叛了李傕。李傕的势力逐渐衰落。不久，镇东将军张济从陕县来到长安，调解李傕与郭汜的矛盾，并迎献帝前往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经过反复调解，李傕同意与郭汜讲和，并以相互交换女儿作人质。

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和李傕、郭汜的火并，遭到很大破坏。董卓刚死的时候，三辅地区的百姓还有数十万户，由于战乱和饥

荒，身体强壮者四散逃命，老幼病弱者无法生活，有的自相残杀，甚至靠吃人肉度日。两三年间，关中地区人迹断绝。

在李傕、郭汜互相攻打的时候，东方的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原地区是各支军事力量争夺的中心。董卓迁都后，关东同盟军随之解体，各路军阀展开了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初平二年七月，袁绍夺取了冀州。冀州牧韩馥在讨伐董卓的时候，负责粮草供应，他见各地军事力量纷纷投奔袁绍，心中嫉妒，暗地里减少对袁绍的粮草供应，想离散他的军队，袁绍对韩馥十分不满。这时，韩馥的部将麴义叛变，韩馥率兵讨伐，反被麴义打败。袁绍乘机与麴义联合打击韩馥。袁绍的谋士逢纪建议乘机夺取冀州，他说："将军要干大事业却依靠别人供应粮草，这不能长久，如果不能占据一州为根据地，将不能保全自己。"袁绍说："冀州兵强马壮，而我的军队又饥又乏，战斗力差，如果不能打败他们，我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逢纪说："韩馥是一个庸才，咱们可以秘密与公孙瓒联络，让他攻打冀州，韩馥必然惊慌恐惧，这时，您再派有口才的人去为他陈述福祸得失，韩馥在危急之中，肯定会将冀州让出。"袁绍同意逢纪的建议，就给公孙瓒写信，让他去打韩馥。公孙瓒，字伯珪，当时任奋武将军。公孙瓒率军到达冀州，表面上声讨董卓，实际上偷袭韩馥。韩馥仓促应战，被打败。袁绍抓住时机，派荀谌、高干等人游说韩馥。荀谌对韩馥说："请您自己分析一下，宽厚仁义，为天下人归附，您比得上袁绍吗?"韩馥说："比不上。"荀谌接着说："袁绍是当今的豪杰，您在三方面都比不上他，却长期在他之上，他必然不甘心屈居将军之下，冀州物产丰富，地位重要，袁绍若是与公孙瓒合力攻取，您立刻会陷人危亡境地。不过，袁绍毕竟是您多年的旧友，又曾结盟讨伐董卓，现在有一个办法请您考虑：如果您把冀州让给袁绍，他必然感谢您的厚德，而公孙瓒也无力与袁绍

抗争；这样您既能得到让贤美名，又能保全自己像泰山那样安稳。”性情怯懦的韩馥被荀谌这番滴水不漏的话说动了，他同意把冀州让给袁绍，并宣布辞去冀州牧，派儿子把印绶送给袁绍。这样，袁绍没用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冀州。

公孙瓒见袁绍独吞了冀州，大为不满，决定出兵讨伐袁绍。他率军驻扎在盘河（今山东乐陵东南），上书朝廷，罗列袁绍罪状，然后，向袁绍发起进攻。冀州境内的许多县城都背叛袁绍响应公孙瓒。袁绍感到恐慌，想缓和与公孙瓒的矛盾，便把自己的勃海太守的印绶授予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可是，公孙范到任后，又背叛了袁绍，带领勃海郡的军队协助公孙瓒攻打袁绍。

初平三年正月，袁绍与公孙瓒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南二十里处展开激战。公孙瓒部下有三万人马，锐不可当。袁绍命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在两侧埋伏了一千名弓箭手，公孙瓒见麹义兵少，产生了轻敌思想，他命令骑兵突袭，麹义的士兵以盾牌掩护身体，坚守不动，等双方相距只有十几步时，麹义一声令下，军队发起反击，埋伏在两侧的弓箭手也一齐发箭，呼喊声震天动地，公孙瓒的军队一下子被冲垮了，大败而逃。他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被杀，一千余人战死。麹义率领军队追到界桥，公孙瓒集结军队反扑，又被打败。麹义紧追不舍，一直杀到公孙瓒的大营前，拔掉了营门大旗。公孙瓒率军仓皇溃逃。

公孙瓒没在冀州获得地盘，反被重创，便向幽州发展势力。初平四年十月，他杀了原幽州牧刘虞，占领了幽州。当时，幽州流传着一首童谣：“燕南垂，起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认为这是指易城（今河北雄县西北），于是他把易城做为大本营，在这里修建堡垒和楼观。公孙瓒依仗军事力量，不体恤百姓，他心胸狭窄，为人记过忘善，陷害名士，压抑贤才，甚至连多看他一眼的小事，也要进行报复。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士人，他说：“士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富贵，即便让他

们富贵了，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感谢。”公孙瓒宠信的都是些商贩和庸俗之人，甚至与他们结为兄弟或互相通婚。幽州被他搞得一团混乱，民不聊生。

兴平二年（195），已故幽州牧刘虞的从事鲜于辅准备率领军队攻打公孙瓒，为刘虞报仇。燕人阎柔与鲜于辅素有交情，被推任为乌桓司马。他带领数万名胡汉军队在潞水（今北京密云）以北与公孙瓒委任的渔阳太守邹丹会战。阎柔获胜，斩杀邹丹及其部下四千余人。刘虞的故友乌桓峭王也带领由乌桓人和鲜卑人组成的七千余名骑兵与袁绍的部将麴义联合，共同进攻公孙瓒。在鲍丘（今北京密云西南）大败公孙瓒，斩杀二万多人。这时，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也纷纷起兵征讨公孙瓒。公孙瓒屡战屡败，士气大减，只好退回易城。

公孙瓒为了防御进攻，在易城周围挖掘了十道又宽又深的濠沟，在沟中堆了许多土丘，每座土丘都有五六丈高，又在土丘上面建起高楼，由士兵把守。在中央有一个高达十丈的土山，供公孙瓒自己居住。高楼的门用铁做成，十分坚固，7岁以上的男子不准人内，只有姬妾与他同住。文书、报告都用绳子吊上城楼。他还命令一批妇女练习大嗓门，使声音能传数百步，以便向其它城楼传达命令。公孙瓒住在高高的城楼上，既没有亲信，也疏远了宾客，他的谋臣猛将都渐渐离他而去。公孙瓒也很少外出作战，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过去在塞外驱逐胡人，在孟津打败黄巾军，以为天下指日可定，谁知到了今天，战乱才刚刚开始，看来天下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不如让士兵休息，努力耕作，度过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兵法有言，百楼不攻。现在我建造这么多的城楼，又储备了三百万斛的粮食，以此足可以静观天下形势的变化了。”

袁绍连年出兵攻打公孙瓒，都没能攻克，他给公孙瓒写信，想与他抛弃前嫌，再度联合。公孙瓒不予理睬，反而加强防备，

他对部下说："当今四方龙争虎斗，形势瞬息万变，没有人能围在我城下，一坐好几年，袁绍不会把我怎么样！"袁绍得知公孙瓒的态度，大为恼怒，他向易城增派兵马，大举进攻公孙瓒。随着袁绍攻势的加强，只是一味防御的公孙瓒渐渐支持不住了。他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将领求援，并准备亲自率领部队出城应战。

建安四年（199）春天，黑山军首领张燕与公孙续率领十万军队，分三路向易城赶来，援救公孙瓒。公孙瓒派使者前去接应，并给公孙续带去一封密信，让他率五千精兵到城北低洼地埋伏，以点火为号，公孙瓒带兵出城，前后夹击袁绍的围城部队。哪知送信人被袁绍的军队抓住，搜出了这封信。袁绍将计就计，按期点火。公孙瓒以为援军已到，急忙率军出城，结果进入袁绍伏兵的包围圈。经过一场恶战，公孙瓒大败，退回城中。袁绍抓住时机，命令军队挖掘地道，一直挖到公孙瓒住的城楼下面，然后用木柱支撑，又将木柱点燃，大火一下子将城楼烧塌。公孙瓒陷入绝境，万般无奈，将自己的姊妹、妻子缢死，然后引火自焚。袁绍又占领了幽州，成为北方势力最大的军事集团。

袁术在董卓专权时，避祸逃离洛阳到达南阳。他的部将孙坚杀了南阳太守张咨，率军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与袁术会合。从此南阳成为袁术的根据地。袁术刚到南阳时，有户口数百万，但他骄奢淫逸，征赋无度，百姓痛苦不堪，纷纷外逃。后来他与袁绍发生矛盾，二人各自拉拢党羽，互相图谋。袁术与荆州牧刘表不和，便勾结公孙瓒，袁绍与公孙瓒有矛盾则与刘表联合。当时，地方势力大多依附袁绍。袁术愤恨地说："这些小人不跟随我却跟随我们家的败类，不会有好下场！"他还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不是我们袁氏的子孙！"袁绍得知后大怒，表示要进行报复。

初平四年正月，袁术进军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向北方

发展势力，遭到袁绍与曹操的联合抗击。袁术大败，带领余众退至九江（今安徽凤阳南），扬州刺史陈瑀率兵抵御，不许袁术入境。袁术退守阴陵（今安徽凤阳西南），集结军队又向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陈瑀大为恐惧，逃到下邳（今江苏邳县南），袁术占领了寿春。他自称扬州刺史，成为割据淮南的军事集团。

与中原战乱不已的局面相比，辽东地区相对安定。公孙度在这里建立了割据政权。公孙度，字升济，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年轻时，曾任玄菟郡的地方官。当时，玄菟太守公孙域有个儿子叫公孙豹，18岁时早逝，公孙度与公孙豹同龄，乳名也叫豹，所以公孙域很喜欢公孙度，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并推举他当了尚书郎，后升任为冀州刺史。董卓专权时，又被任命为辽东郡太守。公孙度到任后，为官清正，不畏豪强，依法处死郡中豪门大姓百余家，震惊了全郡。他还向东征伐高句骊，向西攻打乌桓，扩大了势力范围。公孙度对亲信柳毅、阳义说："汉朝的末日就要到了，我要在这里和你们一同建立王国。"他分割辽东郡的一部分设置辽西郡和中辽郡，各设太守，并渡海占领了东莱等县，设置了营州刺史。公孙度自称辽东侯、平州牧。

公孙度在辽东声望很大，远近闻名。中原地区的士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前往投靠。其中有北海（今山东昌东西）人管宁、邴原、王烈等，他们都以节操高尚闻名于世。公孙度听说他们来到辽东，非常高兴地欢迎他们，并为他们准备住处。当时，前来避难的人大多住在郡城南郊，唯独管宁住在北郊，表示他不想再返回家乡。后来人们逐渐在他周围落户，不过一个月，就形成了村庄。邴原到辽东后，仅一年之中追随邴原迁居辽东的就有数百家。王烈在辽东亲自传授农具的使用，并组织农民进行耕种。

这期间，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还有：

陶谦在彭城，占据着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

刘表在襄阳，占据着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在绵竹，占据着益州（今四川）。

孙坚、孙策在吴，占据着江东。

群雄割据，战乱不已，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袁绍与公孙瓒争夺荆州，连续作战两年之久，军队疲惫不堪，粮食都吃光了，到处抢掠百姓，以致田地里连青草都难以见到。建安元年(196)，献帝东还洛阳，只见宫殿都被烧毁，百官劈开荆棘，仅靠着残垣断壁居住，又饿又乏。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自己出去采摘野菜，有的官员饥饿而死，有的被士兵杀死。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悲惨，许多人背井离乡，纷纷向江南、辽东等地迁徙。这情景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孙立群）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60、61

《后汉书》：《袁绍传》、《袁术传》、《公孙瓒传》、《王允传》、《吕布传》

《三国志》：《公孙度传》、《李傕传》、《管宁传》

兖州之争

在汉末群雄割据天下的龙虎之争中，有一支军事力量脱颖而出，令人刮目相看，这就是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其父曹嵩是汉末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曾任司隶校尉、大司农等职。灵帝卖官时，他以巨款买到太尉的官职。曹操自小为人机警，有谋略善权术，喜欢行侠仗义，行为放荡，不受礼教约束，不经营产业家产。因此，当时人认为他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只有梁国人乔玄和南阳人何颙很器重他。乔玄对曹操说："天下将大乱，不是杰出的人才将不能拯救，能安定天下的，恐怕就是你了。"何颙看到曹操，感叹道："汉家将亡，能够重新安定天下的，一定是此人。"许劭善于评价人物，曹操前去拜访，征求对自己的评价。许劭说："你在天下大治时可以成为一个能臣，在天下大乱时则会成为一个奸雄。"曹操大喜而归。

熹平三年（174），曹操以孝廉的身份被推举为郎，做了洛阳北部尉。他一上任，便在衙门左右各悬十余枚五色大棒，申明禁令，凡有违犯法令者，不避豪强，一律用棒打死。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被曹操棒杀，使京师的治安大为好转。熹平五年，曹操又出任顿丘县令。黄巾起义时，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皇甫嵩、朱儁镇压颍川黄巾军，后迁任济南国相。在所辖的十多个县中，许多县官都依附达官贵戚，贪赃枉法，曹操奏免了其中的八人，使这一地区风气井然。后来曹操又被任命为东郡太守。

当时，权臣专断朝政，贵戚横行不法，曹操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志向，取悦于权贵，过去已多次触犯过他们，恐怕会连累全家，便托病不就，在家乡城外盖了一所住宅，春夏读书，秋冬射猎，倒也自在。中平五年（188），成立西园新军，设西园八校尉，曹操被任命为典军校尉。

董卓专权时，曹操被任命为骁骑校尉，曹操认为董卓是一时强盛，最终一定要失败，拒绝合作。他改换姓名，逃离洛阳，路过中牟县时，因行迹可疑，被亭长送往县衙门。这时县令已接到董卓抓捕曹操的命令，县里只有一个功曹知道送来的人是曹操，认为现在社会混乱，不应拘捕天下的豪杰，便在县令前说情，把曹操放了。

曹操到达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分散家财，募集了五千士兵，并于初平元年，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关东同盟军。曹操的军队屯驻酸枣，当时各路军队多拥戴袁绍，只有鲍信对曹操说："现在谋略超群，能拨乱反正的，就是您了。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才，尽管现在很强大，终究要失败。"讨伐董卓的军队虽然很多，但袁绍等各部队都畏惧董卓的军事力量，谁也不敢先行进攻。曹操说："我们兴义兵，诛除暴乱之人，如今大军已经集结，诸位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假如董卓倚仗皇室，占据洛阳，向东进军，尽管他凶残无道，也一定会被我们打败。如今他烧毁宫殿，强迫天子迁徙，全国震动，不知道该跟随谁，这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灭亡董卓的时机，一战就可以平定天下。"于是，曹操率兵向西进发，准备攻占成皋。行至荥阳汴水，与董卓部将徐荣的部队相遇，双方交战，曹军战败，曹操被流箭射中，所骑的战马也受了伤。他的堂弟曹洪将自己的马让给曹操骑，曹操不接受，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不可没有您！"曹操只好上马，曹洪步行跟随，趁黑夜逃走。徐荣见曹操虽然兵少，但能奋战一天，认为酸枣不容易攻破，也率军后撤。

曹操退回酸枣，见到各路军队十余万，每天只是喝酒聚会，没有人敢与董卓开战，曹操责备他们，并建议说：“你们如能听从我的计划，就请袁绍率领南阳军队进驻丹水、析县，攻人武关，以威胁三辅地区。各支军队都高筑垒壁，坚守不战；再布置疑兵，显示出天下大军汇集的形势，然后名正言顺讨伐叛逆，这样可以很快平定局势。如今我们虽称义兵，但犹豫不敢前进，使天下人失望，我真为大家感到羞耻!”然而，张邈等人不采纳曹操的建议，曹操的兵力也很少。于是，曹操与部将夏侯惇等到扬州去召募新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曹操四千余人，可是途经龙亢时，发生兵变，叛变的士兵在夜里烧了曹操的营帐，四处逃散，剩下的只有五百余人。后来在铚（今安徽宿县西南)、建平（今河南永城西南）又募得一千多人，再度北上，驻扎在河内郡。

当时，袁绍也屯军河内。袁绍见到曹操后，就问：“如果我们讨伐董卓不能成功，你看什么地方可以发展势力?”曹操反问道：“你有什么具体打算呢?”袁绍回答说：“我南面占领黄河，北面占据燕代，联络乌桓，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就可以成功了吧?”曹操明确表示：“如果凭借山川之险，占据一方去发展势力是很不够的，我要任用天下有才能之人，用合乎时宜的办法来引导他们，大业就一定能成功。”

袁绍为发展势力，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做皇帝，曹操坚决反对，他说：“董卓罪恶滔天，我们大家兴义兵，讨董卓，远近没有不响应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正义，现在皇帝幼弱，被奸臣控制，如果你们想再立新帝，天下怎么会安定呢？你们向北，我自己向西进军了。”由于刘虞坚决不同意称帝，袁绍的计划没有实现。济北相鲍信向曹操建议说：“袁绍利用盟主的资格，垄断权力，专谋私利，必将发生变乱，成为第二个董卓。要想抑制他，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应暂时先去河南以南发展势力，等待形

势变化。”曹操赞同这个意见。当时，十多万黑山军在于毒、白绕、眭固的率领下，进攻东郡，太守王肱无力抵抗，曹操就率军进入东郡，在濮阳打败了黑山军的白绕部。袁绍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

初平三年（192）春天，曹操驻军顿丘，于毒等进攻东武阳。曹操却命令军队西行入山，进攻于毒等的大本营。部下将领都要求援救东武阳，曹操说：“让叛贼知道我们西行，如果他们回来救援，那么东武阳的包围不救自解；如果他们不回来，我们一定能够攻下他们的营寨，而他们肯定不能攻下东武阳。”于是，率军出发。于毒听说后，果然放弃东武阳回救大营，曹操乘机进军内黄，打败黑山军眭固部及南匈奴单于于夫罗。

这时，青州黄巾军势力发展很快。初平二年，青州军大举进攻勃海郡，在东光遭到公孙瓒的迎击，青州军失败，伤亡很大。第二年，青州军向兖州进军，首先攻下了任城（今山东济宁），杀死任城相郑遂，接着进攻东平。兖州刺史刘岱准备出兵还击，济北国相鲍信劝阻他说：“如今青州军有百万之众，百姓都十分恐慌，士兵也没有斗志，不能与他们交战。可是，青州军没有军需物资，只靠抢劫来维持，我们不如保存实力，固守城池，敌军求战不得，攻城又不下，他们的力量一定会削弱。到那时，再挑选精锐部队，把守关口要塞，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刘岱不听，率军出战，结果被青州军杀死，兖州一时无主。

曹操的部将陈宫对曹操说：“现在刘岱已死，州中无主，与朝廷的关系也已断绝，我想去说服州中的主要官员，同意由您主持州中事务，以此作为资本，进而夺取天下，这是霸王大业。”接着，陈宫对兖州的主要官员说：“如今天下分裂而州中无主，曹操是一代英才，如果迎接他做州牧，必然能够使百姓安定。”鲍信也说服大家接受这个意思。于是，曹操开始兼任兖州牧。

曹操到任后，便率军到寿张东攻打青州黄巾军。黄巾军勇敢

精悍，曹操则兵力单薄，未能取胜。鲍信被黄巾军杀死。鲍信是曹操的故友，鲍信死后，曹操非常伤心，悬赏寻找鲍信的尸体，但没有找到，只好刻了鲍信的木像，下葬时，曹操放声大哭。黄巾军经过与曹操的昼夜激战，中了埋伏，遭受很大损失，也退出了兖州，向济北方向撤退，曹操紧追不舍。黄巾军给曹操写信说："过去你在济南，毁坏神坛，这与我们黄巾军信奉的太乙是相同的。你似乎是懂道的人，现在却迷惑了。汉行已尽，黄家当立，这是天的运行，不是你的才力所能阻止得了的。"曹操见信后，一面大声斥骂，写信通知黄巾军，指出投降的出路；一面设伏兵，与黄巾军昼夜激战，黄巾军被迫投降。曹操得到士兵三十万，男女百余万口。曹操从中挑选出精锐，组成了"青州兵"。曹操的军事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

曹操在兖州刚立足，就遭到袁术的进攻。初平四年（193）初，袁术因受到刘表的逼迫，率军进入陈留，移驻封丘。黑山军中的一支和南匈奴于夫罗都归附了袁术。当时曹操驻军鄄城，率军迎战。正在这时，刘表杀了袁术的部将孙坚，切断了袁术的粮道，曹操乘势击败袁术，袁术退居淮北。曹操打败袁术后，于初平四年（193）还军定陶（今属山东）。秋天，又发动了对徐州的攻势。

当时徐州是陶谦的势力范围。陶谦字恭祖，丹阳人，曾任幽州刺史，黄巾起义时，任徐州刺史。董卓之乱时，他没有参加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被升任徐州牧。初平四年夏，曹操的父亲曹嵩在琅邪避难，曹操派人把他接到兖州来。曹嵩在途中被陶谦部将张闿截击，曹嵩被杀，一百多车财物被抢。曹操非常憎恨陶谦，便于秋天发动了对徐州的进攻，接连攻克十余城。到达彭城时，与陶谦的军队展开激战。陶谦战败，退守郯县。

以前由于京师洛阳一带遭到董卓之乱，百姓都向东迁徙，大多投奔徐州。徐州地区百姓富裕，粮食丰足。这次曹操打入徐

州，在泗水旁杀了几十万男女老幼，泗水为之不流。曹操没能攻下郯县，便引兵向南攻克虑县、睢陵、夏丘，所过之处全部遭到屠戮，鸡犬不留，故城废墟行人断绝。陶谦向青州刺史田楷告急，田楷派平原相刘备率数千士兵前去救援。陶谦又增拨丹阳郡兵士四千名归刘备指挥，还推刘备为豫州刺史，屯驻小沛。这期间曹操的粮草也告尽，于是率军回兖州。

兴平元年（194）四月，曹操第二次征陶谦。他派司马荀彧、寿张县令程昱留守鄄城，自己亲率部队出征，一直打到琅邪、东海，返回时，在郯县以东击败刘备的军队。陶谦恐惧，打算逃回丹阳。正在这时，兖州境内发生了反对曹操的叛乱。曹操闻讯后，急忙撤军，回救兖州。

这次叛乱是陈留太守张邈发动的。张邈年轻时，好游侠，与曹操、袁绍关系都不错。袁绍当上了讨董联军的盟主后，接人待物态度傲慢。张邈严厉地批评过袁绍，袁绍极为恼怒，让曹操去杀张邈。曹操不服从，说："张邈是亲近的好朋友，有什么过错应当宽容，如今天下尚未安定，怎么能自相残杀呢？"曹操第一次进攻陶谦时，决心死战，告诉家人说："我如果不能生还，你们就投靠张邈去。"后来曹操归还见到张邈，两人相对落泪。然而，曹操出任兖州牧以后，势力不断壮大，张邈害怕终有一天为曹操所灭，心里很不安稳，尤其是前任九江太守边让曾因讥讽曹操而遭杀害，连妻子、儿女也被杀死。边让才华出众，声望很高，使兖州地区的士大夫无不感到恐惧。陈宫性情直率刚烈，心里也疑虑不安，就与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及张邈的弟弟张超一起策划背叛曹操。陈宫对张邈说："如今天下分裂，豪杰纷纷崛起，您拥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又处于四方必争的冲要之地，完全可以成为人中的豪杰，反而受制于人，这不是太鄙陋了吗？如今曹操率大军东征，州中空虚，吕布是个能征善战的壮士，如果将他请来，共同主持兖州事务，观察天下的形势，等待时局变

化，这真是您施展才能的机会。”张邈听从了陈宫的意见。

当时，曹操派陈宫率兵留守东郡，陈宫便秘密迎接吕布担任兖州牧。吕布到达后，张邈派他的亲信刘翊告诉荀彧说：“吕将军来帮助曹刺史进攻陶谦，应该赶快供给他军粮。”众人都疑惑不解。荀彧知道张邈将要背叛曹操，立即布兵防守，并急忙召集在濮阳的东郡太守夏侯惇前来援救，吕布乘机出兵，占据了濮阳。当时曹操把所有的军队都带去进攻陶谦，留守兵少，而大部分将领、官吏都与张邈、陈宫合谋反对曹操。夏侯惇赶到以后，当天夜里就诛杀了几十个参与叛变的人，形势才稳定下来。

当时，兖州属下的郡、县全都响应吕布，只有鄄城、范县、东阿县没有动摇。陈宫准备亲率军队攻取东阿，派氾嶷攻取范县。程昱是东阿人，荀彧对他说：“如今全州都已背叛，只剩下了这三个城，陈宫又要以重兵攻打，如果我们不牢固地团结，齐心合力，这三个城必定动摇。您在东阿声望很高，应该前去进行安抚。”于是程昱前往东阿。途经范县时，他劝说范县县令靳允说：“听说吕布已将您的母亲、弟弟、妻子都抓了起来，做为孝子不可不动心。当今天下大乱，英雄纷纷崛起，一定有能人安定天下，聪明人应慎重选择，跟对主人，就能昌盛，跟错主人，就将败亡。陈宫背叛曹操，迎立吕布，许多地方都响应，这似乎能有所作为，然而您看吕布是个什么人？他粗暴不讲情义，又刚愎无礼，不过一匹夫而已。陈宫等人与他联合，只是互相利用，他们兵马最多，终究不会成事。曹操谋略出众，是天才人物。您一定要坚守范县，我守住东阿，就可以立下田单败燕收复齐国那样的大功。这要比您违背忠义跟随恶人而与家人共亡好吧？请您仔细考虑！”程昱的话，言真意切，打动了靳允，他流着眼泪说：“我不敢有二心。”这时，吕布的部将氾嶷已率兵进入范县，靳允便设计与氾嶷会见，用伏兵将氾嶷刺杀，部署军队，坚守县城。程昱又派遣一支军队截断黄河上的仓亭津渡口，使陈宫率军到达

后，无法渡河。程昱来到东阿，东阿县令枣祗已率领民众在城墙上坚守。就这样，鄄城、范县、东阿得以保全，等待曹操。曹操率军回来后，拉着程昱的手说："若不是你尽力我就无处可归了。"于是推荐程昱为东平相。

吕布率兵攻打鄄城，没有攻克，就向西移驻濮阳。曹操说："吕布得到一州，却不能占据东平，截断亢父（今山东济宁南）、下泰山之道，乘险袭击我，而是退屯濮阳，我料定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了。"四月，曹操率军围攻濮阳。曹操在濮阳以西将吕布的一支军队击溃，还未及回撤，吕布赶来援救，双方展开激战，自清晨一直打到太阳落山，不分胜负。为改变僵局，曹操招募壮士突击敌阵。司马典韦带领应募的壮士冲到阵前。吕布命令弓弩手发箭，一时箭如雨下，典韦很镇定，根本不看，对壮士们说："等敌人距我们十步的时候再告诉我。"壮士们说："已经十步了。"他又说："距离我们五步的时候再告诉我。"说话间，吕布的军队已到眼前，壮士们惊呼："敌人已经到了！"典韦持戟，大喊而起，带领壮士们向敌人冲击。他们英勇无比，吕布军队仓皇后退。这时天色已晚，曹操率军回营。典韦立下战功，曹操提升他为都尉，命他平日率领亲兵，在大帐左右负责警卫。

不久，曹操再次攻打濮阳，在濮阳大姓田氏的帮助下，曹操得以入城，并烧毁了城东门，表示自己不再退回，经过与吕布军队交战，曹军大败。吕布的骑兵捉住了曹操，但他们不认识曹操，问道："曹操在哪里？"曹操说："前面骑黄马逃走的人就是曹操。"吕布的骑兵听了，赶忙将曹操释放，向骑黄马的人追去。曹操从东门的大火中突围而走。回到营中，他亲自慰劳军队，鼓舞士气，命令赶快制作攻城器具，再次进攻濮阳。曹操与吕布相持一百多天，吕布粮尽，曹操也因军队乏粮，双方各自退兵。九月，曹操回到鄄城，吕布率军到达乘氏县，被乘氏县人李进击败，向东退到山阳。

这年冬天，曹操来到东阿县。袁绍想与曹操联合，但让曹操把家眷送到邺城居住，袁绍这是以强者身分让曹操送人质。此时，曹操丧失了兖州的大部分地区，军粮也已用尽，正处在困难之时，便准备答应袁绍的建议。程昱不同意曹操这样做，他说："我以为您这是临事畏惧，如果不是，您为什么考虑得这样不周全！袁绍有吞并天下的野心，但他的智谋不能使他的愿望实现，您愿意做他的下属吗？您以龙虎之威，可以做当年刘邦手下的韩信、彭越吗？现在兖州虽然残破，但还有三座城在您控制下，战士还有万人，以将军的神武，还有荀彧、程昱等人的帮助，霸王之业一定能够成功，希望您慎重考虑！"曹操采纳了程昱的意见，没有将家眷送往邺城。

兴平二年（195）春天，曹操再度与吕布交战，争夺兖州。正月，曹军在定陶击败吕布。四月，又在巨野大败吕布，斩杀吕布部将薛兰等人，占领了乘氏。这时传来了徐州牧陶谦病死的消息，曹操想乘机先夺取徐州，回来再攻打吕布。荀彧对曹操说："从前，高祖刘邦保关中，光武帝据河内，都是先牢牢地巩固根据地以后，再控制天下，进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坚守，所以虽有失败，但仍能完成统一大业。将军本来是在兖州起兵的，平定山东之乱，百姓无不心悦诚服。兖州地势重要，如今虽已残破，但还易于自保。这正是将军的关中、河内，应先使兖州巩固。现在您已经打败了李封、薛兰，我们便乘机派兵收割成熟的麦子，节衣缩食，储备粮草，就可以一举打败吕布。如果徐州攻不下来，将军您将回到哪里去呢？"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打消了东征的念头。他让部下全去收割麦子，在营中的不到一千人。这时，吕布、陈宫率领万余人前来进攻。曹军难以守住营寨，形势非常危急。曹操决定设计破敌。在营寨西边有一条大堤，南面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曹操将一半士兵埋伏在堤后，将另一半士兵暴露在堤外。当吕布的军队临近时，命令轻装部队挑战，双方交

战后，才命令伏兵从堤后杀出，步兵、骑兵一齐冲锋，吕布大败，当夜向徐州方向撤退。曹军攻下了定陶并平定其他一些县城。张邈随吕布前往徐州，他的弟弟张超带领家属退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八月，曹操包围了雍丘，到十二月，将城攻下，张超自杀。张邈在得知雍丘被围的消息后，想到袁术那里请求援助，在途中被部下杀死。至此，曹操重新占领了兖州。这年冬天，朝廷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陶谦传》、《袁绍传》、《张邈传》

曹操迎献帝

兴平二年（195），曹操全部控制了兖州。以此为根据地，他开始了诛灭群雄，统一北方的事业。

这时，国家虽然被地方势力割据，但汉王朝的正朔仍在，汉献帝仍然是合法的王朝统治者。因此控制汉献帝是扩大政治影响，进而发展势力的重要手段。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刚任兖州牧时，治中从事毛玠就对曹操说："现在天下分裂，皇帝西迁，百姓不能从事生产，饥饿流亡，政府没有一年的储蓄，百姓不得安定，这是难以长久的。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士民众多，但都无长远考虑，不是建树牢固基础的人。出兵打仗要符合道义，守住地位要靠经济力量，应该奉天子以令不臣，发展农业以保障军需，这样霸王之业可以成功。"当曹操占据兖州后，便把这一建议付诸实现了。

自董卓死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为争夺关中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到兴平二年（195）有人出面调解，他们暂时讲和。但为献帝去处，又发生分歧。郭汜想让献帝去高陵，大臣们都认为应该去弘农，最后献帝同意去新丰。郭汜又阴谋胁迫献帝向西，在郿县定都。侍中种辑得到消息，秘密通知杨定、董承、杨奉，让他们到新丰会合。郭汜见阴谋败露，抛弃军队，逃入终南山。不过，郭汜的党羽夏育、高硕等继续策划劫持献帝西行。杨定、董承将献帝接到杨奉营中躲避，并击败夏育。十月初五，献帝到达华阴，想东归洛阳。李傕、郭汜听到献帝东归，便共同率军追

赶，想劫持献帝。十二月，献帝到达弘农。李、郭追到，与董承、杨奉的军队相遇，一场大战，把董承、杨奉等战败，许多文武官员及士兵被杀。献帝等一行人，抵达曹阳（今河南陕县西南）。董承、杨奉等假装与李傕等联合，暗中却派人到河东郡请河东白波军首领李乐、韩暹及匈奴右贤王去卑帮助作战，把李傕等打败，带着献帝继续东行。李傕重整旗鼓，又来进攻，再次将杨奉打败，死亡人数比在弘农东涧还多。杨奉等慌忙北渡黄河，用牛车把献帝迁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太守张杨、河东太守王邑向献帝奉献粮食和衣物，献帝和百官的生活才得以维持。建安元年（196）七月，献帝在杨奉、韩暹护送下，回到洛阳。

许多人所以热衷于争夺献帝，是因为控制了献帝，便可以获得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在献帝逃往河东的时候，袁绍的谋士沮授就向袁绍建议说："将军的祖先几代都是国家大臣，世传忠义。如今天子流离失所，宗庙也残破毁坏，各州郡虽表面号称义兵，实际上互相倾轧，并无忧国忧民的意图。如今您已基本上平定了冀州，兵强马壮，应该西向迎接汉献帝，把他迁到邺城，这样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积蓄力量讨伐不服从朝廷的叛逆。天下有谁能与您对抗？"但谋士郭图、淳于琼却反对说："汉王朝的没落，为时不久，如今要使它复兴，不是太困难了吗？现在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聚集徒众，企图争夺天下，这正是'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时机。如果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一举一动都要向他上表请奏，服从他，则我们的权力减轻；违背他，则要蒙受抗拒王命、违反圣旨的罪名，这不是好办法。"沮授说："现在迎接天子，既符合君臣大义，又是最有利的时机，如果不早日下手，必定会有人抢先。"袁绍考虑再三，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

在袁绍放弃迎献帝的时候，曹操却计划如何把献帝弄到自己身边。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许县与部下商议此事，不少人认

为："山东尚未平定，韩暹、杨奉等人自认为护驾有功，骄横凶暴，不会很快制服他们。"荀彧说："以前晋文公迎纳周襄王，各国一致推举他为霸主，汉高祖为义帝服孝，使天下人心归附。自从天子流离在外，将军首倡义军，是因山东局势混乱，未能远去迎驾。现在皇帝返回旧京，但洛阳残破，忠义之士希望能保全根本，百姓也怀念旧王室，为之悲伤。如能在这时迎奉天子，以顺民心，是最合乎时势的行动；用忠于王室的态度使天下心悦诚服，这是最正确的策略。坚守君臣大义，招揽天下英才，是最大的德行。如果这样做，虽然四方有反叛朝廷的，但他们有什么作为？至于韩暹、杨奉，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如果不及时行动，将来会后悔莫及。"

荀彧的话正合曹操的心意。于是他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向西，到洛阳迎接献帝。但曹洪受到董承的阻击，不能前进。当时，在朝廷当权的人物中，以杨奉的军队较强，但他与董承、韩暹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议郎董昭是曹操的好友，他以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信说："我与将军互相倾慕，只听到对方的名声，便已推心置腹。现在您在艰难中救出天子，护送他回到洛阳。辅佐朝廷的功劳，盖世无双。现在各地恶人猖狂，国家不安，天子的责任重大，这更需要大臣辅佐，所有贤明之士都要努力，才能清除君王道路上的障碍，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办到的。将军应在朝廷主持事务，我做为外援。现在我有粮草，将军有兵马，互通有无，足以相济。"杨奉接到信非常高兴，他对将领们说："曹操的军队，近在许县，有兵有粮，这正是国家所依靠的。"于是上表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为费亭侯。

这时，在朝廷的韩暹与董承发生了矛盾。韩暹自恃护驾有功，专横霸道。董承十分厌恶他，便私下召请曹操。曹操亲率大军赶奔洛阳，朝见献帝。韩暹自料不是曹操的对手，逃出京城。献帝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参与朝政。曹操的目的是

挟天子以令诸侯，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汉献帝呢？于是他把董昭请来，问他："现在我已到洛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董昭说："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京朝见天子，辅佐王室，这是春秋五霸的功业。但是，这时的将领们，都各怀异志，未必听从您的指挥，留在洛阳辅佐朝政，有许多不便，只有请天子移驾到许县这个办法最好。然而朝廷多日流亡在外，最近刚回到洛阳，远近都希望快些安定。如今再要迁都，恐怕不符合民心，希望将军作出利多弊少的选择。"曹操说："这正是我的想法，只是杨奉在梁县，离我们很近，听说他兵士强悍，会不会找我的麻烦？"董昭说："杨奉没有外援，所以他愿意与将军结交，任命您为镇守将军，封费亭侯的事，都是杨奉的本意，应该及时派遣使者，带着重礼表示感谢，使他安心，并告诉他说：'洛阳缺乏粮食，想让皇帝暂时移驾鲁阳，鲁阳靠近许县，运粮较为便利，可以免去粮食匮乏的忧虑。'杨奉有勇无谋，一定不会怀疑。"曹操说："这个主意好。"立即派遣使者去见杨奉。杨奉果然相信了，于是曹操便把献帝迁到许县，改许县为许都。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开始总揽朝政。

当曹操将献帝迁到许县后，杨奉才发觉上当，出兵企图阻拦，已经来不及。冬天，曹操出兵攻打杨奉，杨奉战败，向南投奔袁术，曹操占领了梁县。袁绍见曹操将献帝接到许县，十分后悔。他想让曹操把献帝迁到鄄城，鄄城离冀州较近，便于他控制朝廷。曹操予以拒绝。献帝下诏书指责袁绍："你地广兵多，但专门自树党羽，不见你出师勤王，只见你擅自互相讨伐。"袁绍亏理，只得上书自责。献帝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太尉低于大将军。袁绍见自己地位不如曹操，非常恼怒，他说："曹操几次要死的时候，都是我救了他，他今天竟然挟天子对我发号施令！"坚决不接受任命。当时，曹操实力不如袁绍，感到害怕，便请求把自己担任的大将军一职授予袁绍。曹操任司空，代行车

骑将军职务。

曹操迎献帝都许，使他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权。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后汉书》：《献帝纪》

《三国志》：《武帝纪》、《袁绍传》

徐淮大战

曹操迎献帝到许，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当时北方的袁绍是他的劲敌，曹操还不敢贸然与之交战。建安二年（197）初，袁绍正在北方进攻公孙瓒，谋士郭嘉建议曹操乘机向东攻打吕布，说："如果袁绍攻打我们，吕布又支援他，这就要成为大害了。"荀彧也说："如不先击败吕布，我们就不容易攻占河北了。"曹操说："你们分析得很对，我担心的是袁绍派人到关中，与西南的羌、胡联合，又与南面的蜀、汉勾结，而我只凭借兖、豫来对抗天下六分之五的地区，这该怎么办呢?"荀彧说："关中的军事将领有几十位，却不能统一，唯有韩遂、马腾最强，他们见崤山以东地区战争不止，一定各自拥兵自保，应对他们施以恩德，进行安抚，派使者去与他们联合，这样做虽不能长久安定，但足以维持到您平定崤山以后。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如果让他去处理此事，您就不必忧虑了。"曹操同意荀彧的意见，让侍中钟繇兼任司隶校尉，督关中诸军。钟繇到长安后，写信给马腾、韩遂等人，对他们讲清利害关系，马腾、韩遂表示服从。

这年春天，曹操亲率大军讨伐张绣。队伍到达淯水（今河南南阳南），张绣自知抵抗不住，率部众投降曹操。没多久，张绣又反叛曹操，他率军对曹操发动袭击，攻入曹操淯水旁的营垒。曹操仓促应战，被流箭射中，将士死伤很多，曹操的典军校尉典韦奋力作战，以一当十，身上数十处受伤。张绣部下冲上来

时，他双手抓住两个敌人将他们杀死，最后战死。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也都战死。曹操退到舞阴（今河南泌县西北），张绣率军追到，被曹操击败。张绣奔穰城，投靠刘表去了。

在舞阴，曹操听到典韦的死讯，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派人从小道取回了典韦的尸体安葬。曹操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说："我接受张绣的投降，没有扣留他的人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我知道为什么失败了。从今以后，不会再遭到这样的损失了。"

曹操自舞阴回到许县，南阳、章陵诸县又叛变，投降张绣。曹操派曹洪去平叛，结果失利。这年十二月，曹操亲自南征。到达淯水后，他流着眼泪祭祀年初阵亡的将士，随行将士都深受感动，士气大振，迅速将张绣击败，攻占了湖阳，又夺回了宛、舞阴等县。

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准备第三次进攻张绣。谋士荀攸劝阻说："张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而，张绣是游军，完全依靠刘表供应粮草。刘表不能长期供应，二人势必分裂，不如暂缓进军，等待变化，促使他们分裂；操之过急，他们必然会互相救援。"曹操没有采纳，进军包围了张绣驻扎的穰城。围攻了两个月，没有攻下。这期间，袁绍想把献帝迁到离自己近的地方，他派使者游说曹操，说许都地势低洼潮湿，洛阳已经残破，最好将国都迁到鄄城。曹操拒绝了这个建议。谋士田丰劝袁绍说："迁都的计划既然不能实现，就应该早日进攻许都，奉迎天子，然后利用皇帝的诏书，向全国发号施令。这是上策。不这样，最终会受制于人，后悔也没有用了。"袁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正在这时，袁绍部下有士兵投奔曹操，向曹操说了田丰劝袁绍袭击许都的事，曹操便从穰城撤军，返回许都。张绣闻风，在后面追赶。五月，刘表派军队支援张绣，驻扎在安众（今河南镇平东南）企图切断曹操的后路，曹操给荀彧写信说："我到达安众，一定要打败张绣！"到达安众后，曹军前后受敌，于是在夜

里开凿险道，假装要逃跑。刘表、张绣率军追赶，曹操设下埋伏，命令骑兵步兵前后夹击，打败了张绣、刘表的军队。后来荀彧问曹操："您以前就料定敌人必败，根据什么？"曹操说："敌人阻止我退兵，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我因此知道可以获胜。"

张绣追击曹操时，贾诩阻止他说："不能去追，追要失败。"张绣不听，与曹操交战，大败而回。贾诩又对张绣说："赶快去追，再战必胜。"张绣说："我没听您的，才落得如此地步，现已失败，怎么还要去追？"贾诩不做解释，只说："兵势变化无常，赶快追击！"张绣一向信服贾诩的话，就将散兵集合在一起，追击曹操，与曹操交战，果然得胜而归。张绣又问贾诩："起初，我用精兵追赶曹军，而您说必败，以败兵击胜军，而您说必胜，结果全如您所预料，原因在哪里呢？"贾诩说："这很容易明白，您虽然善用兵，但不是曹操的对手。曹军刚开始撤退时，他必然亲自率军断后，所以我知道您必败，曹操向您进攻，既没有失策之处，力量也没有用尽，却一下子率军撤退，一定是他们内部发生了变故。他已击败您的追兵，必然轻装速进，而留下其他将领断后，其他将领虽然勇猛，却不是将军的对手，所以，您虽然用败兵去追击曹操，也必能获胜。"张绣对贾诩的分析十分佩服。

建安四年秋天，袁绍为了牵制曹操，派使者去拉拢张绣，张绣打算答应袁绍，贾诩却高声对使者说："请回去替我们谢谢袁绍，他与兄弟袁术都不能相容，还能容天下的英雄吗？"张绣非常惊恐。他悄悄地问贾诩："如果是这样，我们应当依靠谁？"贾诩说："不如依靠曹操。"张绣说："袁强曹弱，我以前又与曹操结过怨仇，怎能归附他呢？"贾诩说："正因为如此，才应当归附曹操。曹操尊奉天子以号令天下，这是应该归附他的第一条理由。袁绍强盛，我们以较少的兵力去归附他，不能得到重视，而曹操势单力薄，得到我们必然十分高兴，这是应当归附他的第二条理由。凡有称霸天下之志的人，一定胸怀大志，一定会抛弃私

怨，向四海表明他的恩德，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三条理由，请将军不要疑虑。"

张绣终于被贾诩说动了。这年十一月，张绣率军向曹操投降。曹操非常高兴，对贾诩说："为我取信于天下的就是你。"曹操设宴款待张绣，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并为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

在曹操与张绣反复较量的同时，也与袁术、吕布进行了周旋。

袁术自初平三年（192）割据淮南后，一直抱有称帝的野心。他认为，民间流行的一句谶语："代汉者当途高"中的"途"与自己的名字相应，并认为袁氏祖先出于古代陈国，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黄色，汉是火德，赤色，以黄代赤是五行运转的顺序，于是产生了称帝篡位的打算。这年冬天，献帝被挟持离开长安，袁术认为时机已到，便与部下商量："现在刘氏王朝衰弱，海内鼎沸，我家世代做高官，老百姓都归附我，我想应天顺民，称皇帝，不知诸位意下如何？"众人都不说话，只有主薄阎象进言道："过去周朝自始祖后稷传到文王，累积恩德，功勋卓著，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但仍然臣服于殷朝。虽然您家世代显赫，但还没有像周朝那样兴盛，汉朝虽然衰微，但还没有像殷纣王那样暴虐！"袁术听了阎象的话默然不语。

袁术的老部属孙策听到消息后，也反对袁术称帝，他给袁术写信说："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时说'殷有重罚'，商汤与周武王虽有圣德，假如当时夏桀、商纣王没有失道之过，也没有理由逼他们下台。当今天子并没有恶行，只是年龄幼小，被强臣所胁迫，这与商汤、周武王的时代不同，而董卓贪残淫逸，野心极大，他也未敢废黜天子，天下人没有不痛恨他的。您怎么能效法他而且又做得过分呢？"孙策还说："您家中五代都是朝廷的名臣，辅佐汉室，荣誉恩宠，无人可比，理应

效忠守节，报答王室，这是周公、召公的美业，是天下人所期望的。称帝之事，从古到今都十分慎重，岂能不深思熟虑!”袁术以为孙策一定会拥护自己，没想到孙策是这种态度，他大失所望，因忧伤沮丧而生病。孙策也与袁术断绝了关系。

当曹操迎献帝到许都后，袁术称帝的欲望更加强烈，他于建安二年正月，在寿春称帝，自称“仲家”。他设置了公卿百官，在郊外祭祀天地。沛国相陈珪与袁术自幼为友，袁术将陈珪召来做官，陈珪没有答应，并写信给袁术说：“你阴谋不轨，以身试祸，还想让我做你的附庸，我宁死不从。”

袁术为了与曹操抗衡，打算拉拢吕布，便派使者韩胤把自己称帝之事告诉吕布，还想为自己的儿子迎娶吕布的女儿。吕布答应了，让女儿随韩胤到寿春。陈珪担心袁术与吕布联合，祸乱更大，就去劝吕布，说：“曹操奉迎天子，辅佐朝政，您应该与他同心协力，共商大计。而你与袁术联姻，必然招来不义的名声，将有累卵之危!”吕布也想起当初袁术不肯接纳自己的旧怨，便后悔了，这时他的女儿已随韩胤上路，吕布派人把他们追回来，拒绝了婚事，并把韩胤押往许都。到达后，韩胤被杀死。

曹操抓住时机，任命吕布为左将军，亲自写信给吕布，对他大加慰勉和拉拢。吕布大喜，立即派陈珪的儿子陈登带着书信前去谢恩。陈登见到曹操，指出吕布是一个有勇无谋，轻于去就，反复无常的人，应该尽早对他下手。曹操说：“吕布狼子野心，确实很难与他长期相处，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的虚伪。”曹操与陈登谈得十分投机，他任命陈登为广陵郡太守。临别时曹操握着陈登的手说：“徐州的事情，就委托给你了。”陈登回到徐州后，暗地联络部众，作为内应。

陈登去见曹操时，吕布让陈登请朝廷任命自己为徐州牧，但没有实现。陈登返回后，吕布大怒，拔出戟猛击桌案，对陈登喊道：“你父亲劝我与曹操联合，拒绝袁术的婚事，如今我连当徐

州牧的要求都被拒绝，而你们父子却都升了官，我是被你们出卖了！你在曹操面前，怎么替我说的？”陈登不动声色，从容地说：“我见到曹操说：‘对待将军就像养老虎，必须让他吃饱，否则就将会吃人。’曹操却说：‘你说的不对，应像养鹰一样，让他饿着才听话，如果让他吃饱，就会展翅高飞了’。”吕布听罢，明白了陈登的意思。

袁术对吕布绝婚、杀韩胤的做法十分愤怒，立即派遣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联合，带领数万军队分兵七路进攻吕布，直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吕布当时只有步兵三千，战马四百匹，他担心抵挡不住，便对陈珪说：“是由于你的缘故才把袁术的军队招来，你看该怎么办？”陈珪说：“韩暹、杨奉与袁术只是暂时的联合，不会长期维持，我儿子陈登预料，他们好像一群鸡，不能同时在一个鸡笼里。”于是他向吕布献策，写信给韩暹、杨奉说：“二位将军为天子护驾，而我亲手杀死董卓，都为国家立了大功。如今你们为什么与袁术一起做叛贼呢？不如大家合力打败袁术，为国除害。”吕布还许愿，打败袁术后，将袁术的军用物资全部给他们。韩暹、杨奉见信后很高兴，当即改变主意，与吕布联合，于是吕布主动发起进攻，当快到张勋军营时，韩暹、杨奉的部下同时倒戈，呼喊着向张勋军队冲杀，张勋慌忙逃命，吕布赶到，斩杀了十名袁术的将领，其余被杀伤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吕布与韩暹、杨奉会合，并向寿春进军。到达钟离后，留下一封辱骂袁术的信，然后撤军到淮河北岸。袁术亲率五千军队赶到淮河南岸，吕布的骑兵在北岸大声嘲笑，返回徐州。

袁术在与吕布的火并中，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曹操见有机可乘，便于九月宣布袁术的罪状，率军东征袁术。袁术闻讯，命令将领桥蕤据守蕲阳抵抗曹操，自己却弃军逃跑。曹军打败了桥蕤的守军，并斩杀了桥蕤。袁术逃到淮北，当时旱灾严重，土地

荒芜，百姓生活困苦，袁术从此衰落下去。

在曹操进攻袁绍和张绣的时候，吕布乘机在徐州扩大势力。他打败了屯驻小沛的刘备，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儿女；曹操派夏侯惇去增援刘备也被打败，吕布再次与走投无路的袁术联合。征讨吕布，平定徐州成了曹操的头等大事。建安三年，曹操准备亲自攻打吕布，他与诸将领商议此事。不少人认为："现在刘表、张绣在后，如果远征吕布，恐怕有危险。"荀攸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刘表、张绣刚受打击，势必不敢再有所举动。吕布骁勇，又依仗袁术的相助，如果让他纵横于淮河、泗水之间，必有许多豪杰响应他，现在应乘他刚刚背叛朝廷，众心不齐，发兵进攻，一定能将他打败。"曹操认为荀攸的意见很好。这年九月，曹操率军出发，十月，曹军攻下彭城。广陵太守陈登率郡兵作为曹操的先锋，进抵下邳，吕布亲自率军，多次与曹操交战，全遭失败，只好退守下邳城，不敢出战。

曹操包围了下邳，给吕布写信，向他分析利害。吕布恐惧，打算投降。陈宫劝阻吕布说："曹操远道而来，不可能在此停留过久，将军如果带领军队屯驻城外，我带领剩下的军队守城，如果曹操进攻您，我就在背后打击他；如果曹军攻城，您就在外援救。不出一个月，曹操的粮食吃光，我们一起反击，就可以打败他。"吕布同意了陈宫的意见，打算留陈宫和另一将领高顺守城，自己率兵出城，截断曹军的粮道。吕布的妻子对吕布说："陈宫与高顺一向不和，将军一出城，他们俩必然不同心协力地守城，如有变故，将军到哪里立脚？而且曹操待陈宫很好，陈宫还背叛曹操投靠我们，你对待陈宫并没有超过曹操，就把全城交给他；别妻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我还能做将军的妻子吗？"妻子的话使吕布打消了出城的计划，他偷偷派部下许汜、王楷到袁术那里求援。袁术气愤地说："吕布不把女儿给我送来，理应失败，为什么又来找我？"许汜、王楷说："您现在不救吕布，是

自取灭亡。吕布一败，您也该倒霉了。”袁术于是整顿军队，声援吕布。吕布担心袁术因为自己不嫁女儿，而不发兵救助，便用绸缎将女儿身体裹住，绑到马上，夜里亲自送女儿出城，被曹操的守兵发现，用箭射他们，无法通过，只得又退回城中。

曹操包围下邳两个多月了，还未能攻下，将士们都十分疲惫。曹操也打算撤军。谋士荀攸、郭嘉说：“吕布有勇无谋，现屡战皆败，锐气已衰。三军以将为主，主将锐气一衰则军队斗志全无，现在我们应乘吕布锐气没有恢复，陈宫智谋未定的时候，发动猛攻，一定能够打败吕布。”于是，曹操决开沂水、泗水淹灌下邳。又过一个月，吕布开始支持不住，他决定向曹操投降。陈宫说：“现在投降，就好像以卵击石，不会有好结果！”十二月二十四日，吕布的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将陈宫、高顺抓住，率军队投降了曹操。吕布带领亲兵退守到下邳城的白门楼上。曹军发动进攻，吕布见大势已去，只好下楼投降。

吕布被押到曹操面前，他自信地对曹操说“从今以后，天下可以平定了！”曹操说：“为什么这样说？”吕布说：“您所忧患的不过是我吕布，现在我降服了，如果让我统帅骑兵，您统帅步兵，天下还愁不定吗？”他又对在曹操身边的刘备说：“玄德，你现在是座上客，我是俘虏，绳子把我捆得太紧，你难道一言不发吗？”曹操笑着说：“缚龙不得不紧！”他下令给吕布松绑，刘备上前制止说：“不可，您没看见吕布当年跟随丁原和董卓的事吗？”原来，吕布是丁原的部下，他杀了丁原投靠董卓，又杀了董卓投靠王允。曹操想起了吕布反复无常的件件往事，同意了刘备的话。吕布又气又恼，两眼圆睁，对刘备喊道：“你这个大耳朵的家伙，最不可信！”

曹操下令将吕布、陈宫、高顺一起绞死。曹操念陈宫是他起兵时的旧部，不但没有诛连家属，还给予很好的照顾，把陈宫母亲接来赡养到去世，把他的女儿嫁出去。

曹操平定吕布，占领了徐州，解除了东西方面的威胁。这时，在淮南的袁术已陷入孤立的困境。

袁术称帝后，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后宫嫔妃就有数百人，一个个身穿华丽的服装，吃珍馐佳肴，而对部下士兵的饥饿困苦却毫不关心。他大肆挥霍，不久，便将储存的各种物资用尽，无法维持，便烧毁宫室，去投奔驻在灊山的陈兰、雷薄，但遭到陈兰的拒绝。袁术走投无路，手下的士兵也纷纷散去。袁术成了孤家寡人，他想把皇帝的称号送给袁绍。袁绍的儿子袁谭想把袁术接到青州，要从下邳经过，曹操闻讯派兵进行拦截。袁术无法通过，只好退回寿春，他十分气愤，郁闷成病。建安四年六月，在寿春的江亭发病，呕血而死。

至此，曹操打败了吕布、袁术，降服了张绣，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成为与袁绍抗衡的重要力量。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袁绍传》、《吕布传》、《刘先主传》、《袁术传》

官渡之战

在曹操战胜张绣、吕布、袁术，夺得了徐、淮大片土地的同时，袁绍也扩大了势力。建安四年（199）他打败了公孙瓒，占领了幽州，使他控制的地盘囊括了冀、青、幽、并四州，成为黄河以北最大的军事集团。袁绍对曹操控制献帝及在黄河以南扩张势力十分忌恨。他想与曹操一比高低，便挑选了十万精兵，万匹战马，打算进攻许都。谋士沮授不同意袁绍急于与曹操决战，他说："近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出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中又无积蓄，不宜出兵。应当搞好农业生产，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同时，派遣使者把讨平公孙瓒的消息上报天子，如果上表受阻，就告曹操隔断我们和朝廷的联系，然后进兵黎阳，逐渐向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多造战船，修缮器械，分遣精骑去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不得安定，而我们则以逸待劳，这样可以坐定天下。"郭图、审配却主张与曹操决战，他们对袁绍说："以您用兵的神武，统率北方的强兵，讨伐曹操，易如反掌，何必那样费事！"袁绍不听沮授等人的劝阻，采纳了郭图、审配等人的意见，把军队分为三部分，派沮授、郭图、淳于琼各统一军。

曹操早就预料与袁绍必有一战。建安二年，他曾打算讨伐袁绍，但当时实力不够强大，便向谋士荀彧、郭嘉问计。荀彧、郭嘉向曹操分析了曹袁双方的形势。郭嘉说："当年刘邦的力量不敌项羽，这是您知道的。刘邦战胜项羽靠的是智谋。如今袁绍有十败，您却有十胜。袁绍虽然强大，却不会有什么作为。袁绍礼

仪繁杂，您接人待人顺其自然，这是在处世之道上胜过他。袁绍出兵是叛道，您却是尊奉天子，顺应天下，这是在道义上胜过他。桓灵以来，政令失于松弛，袁绍却以宽济宽，因此松松垮垮，您厉行法治，使上下守法，这是在治理上胜过他。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疑忌，用人好起疑心，只信任亲戚子弟；而您用人不疑，唯才是举，不问远近亲疏，这是在气度上胜过他。袁绍计谋多而决断少，常失掉机会，您制定了政策立即执行，可以应付各种变化，这是在谋略上胜过他。袁绍喜高谈礼仪，沽名钓誉，那些华而不实之士多投奔他，您诚心待人，不虚情假义，正直有远见，有才干之士都愿意为您所用，这是在品德上胜过他。袁绍过于计较小事，而您对眼前小事，有时忽略，但对于大事，却考虑得十分周全，这是在仁义上胜过他。袁绍手下的大臣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您却管理部下有方，谄言诽谤行不通，这是在明智上胜过他。袁绍是非不分，您对正确的鼓励，对错误的正之以法，这是在文治上胜过他。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知道兵法的要领，您却能以少克众，用兵如神，这是在武力上胜过他。”鉴于当时吕布在徐州颇有势力，为防止吕布与袁绍联合，荀彧、郭嘉建议曹操先击败吕布，然后再与袁绍较量。经过几年激战，吕布被杀，袁术病死，徐、淮全部平定，曹操对战胜袁绍充满了信心。

袁绍将要攻打曹操的消息传到许都，不少将领感到害怕，曹操却说：“我知道袁绍的为人，志向大而智谋少，外表严厉而内心胆怯，猜忌刻薄而缺少威信，兵多而调度无方，将骄而政令不一，他的土地虽广粮食虽多，却是给我准备的。”名士孔融对战胜袁绍缺乏信心，他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智士为他谋划，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奔走效劳，有颜良、文丑这样的勇将为他统领兵马，恐怕难以战胜吧？”荀彧说：“袁绍兵虽多而法令不严，田丰刚直但冒犯上司，许攸贪婪而不会处事，审配专权却没有谋略，逢纪果断但刚愎自用。这几个人彼此

不能相容，必定要发生内讧，至于颜良、文丑不过是匹夫之勇，一战便可将他们擒获。”

这年八月，曹操进军黎阳，派臧霸率一支军队进入青州，保卫东方，派于禁屯驻黄河边上。九月，曹操派兵到达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与袁绍隔水相望。

袁绍为了分散曹操兵力，派使者拉拢张绣，张绣没有答应，反而率部投降了曹操，受到曹操欢迎。

袁绍又派使者向荆州牧刘表求援。刘表只在口头上答应，但一直不发援兵，他也不帮助曹操。他的部下韩嵩、刘先极力劝刘表，应在袁、曹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归附一方，并建议他应以荆州归附曹操，刘表拒不采纳。关中的将领们见袁、曹正在争雄，都保持中立，观望成败。此时凉州牧韦端的从事杨阜从许昌返回关中，众将领问他，袁绍与曹操谁胜谁败？杨阜说："袁绍宽容而不果断，喜欢谋略而迟疑不决，不果断就没有威信，迟疑不决就错过时机，目前虽然强大，但最终不能成就大事业。曹操有雄才远略，遇事当机立断，毫不迟疑，法令统一，士兵精悍，任人唯贤，受他聘用的都各尽其力，一定能成就大事业。”

曹操深知关中地位重要，派诏书侍御史卫觊前去镇抚。当时有许多逃亡在外的民众返回关中，将领们纷纷将他们收留做私兵，卫觊得知这一情况，便给荀彧写信说："关中土地肥沃，以前遭饥荒战乱，百姓流亡到荆州的有十万余家，现在听说故乡安定了，都盼望回乡，但回乡后无法自谋生业，军事将领们都争相招揽他们做私兵。由于郡县贫弱，不能与他们相争，将领们的势力大为增强，一旦发生变动，势必成为后患。我的意见是，把过去分散到民间的盐务管起来，设置使者监督买卖，用此项收入多买犁与牛，如有民众回乡，就借给他们耕牛，鼓励他们勤劳耕种，积蓄粮食，使关中富裕繁荣起来，流亡到外地的百姓闻讯后，一定争着返回故乡。这样可以削弱军事将领的力量，官府和

百姓可以强盛，这是强本弱敌的好事。”荀彧把卫觊的建议向曹操汇报，曹操同意这样做。关中地区从此受到朝廷的控制，对曹操不再构成威胁。

曹操为了避免与袁绍决战时不分散精力，还出兵打败了刘备，将刘备的妻子俘虏，部将关羽也被俘。原来，刘备起兵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地盘，他先后依附陶谦、吕布，建安三年又依附曹操。建安四年，朝廷中以献帝丈人车骑将军董承为首的一些人密谋推翻曹操，刘备也参与了策划。不久曹操发现了董承的企图，及时破获了这个叛乱集团，董承被杀，刘备逃到下邳，打起了反曹的旗号。为了解除后患，曹操才出兵打败了刘备，占领了下邳，刘备逃奔青州，归附了袁绍。

建安五年正月，袁绍向各州郡发布了讨伐曹操的檄文。此文出自他的主簿陈琳之手。文字尖刻，说曹操是“赘阉遗丑”，“好乱乐祸”。袁绍与部将商量进攻曹操，谋士田丰说：“曹操现在打败了刘备，许昌已不再空虚了，而且他又善于用兵，变化莫测，军队虽少也不可轻视，现在不如采用持久战，将军具有地理上的优势，拥有众多士兵，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挑选精兵，出其不意，袭击他们，使他们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业，而我们不辛劳，他们却疲惫不堪，不出三年，我们就可稳操胜券。现在您放弃决胜之策，贸然与曹操决战，如果不能如愿，后悔也来不及了。”袁绍不仅不听从田丰的建议，还认为田丰的劝谏，不仅冒犯了他，还使军队士气沮丧，将田丰戴上刑具关押起来。

二月，袁绍率军开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在这里设置了战斗指挥部。他得知曹操派东郡太守刘延驻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于是派大将颜良率兵，渡过黄河，夺取白马，扫清南下的障碍。刘延在白马坚守，颜良来势汹汹，守城士兵死伤很多。曹操在官渡闻知此事，想出兵北救刘延，军师荀攸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我们兵少，还不能与袁绍正面抗衡，必须分散敌人的

力量才能打败他们。如果您领兵向延津作出将要渡过黄河抄袁绍后路的姿态，袁绍必然分兵向西来阻截，然后我们派轻兵突袭白马，攻其不备，一定可以将颜良擒获。”曹操同意这一建议，亲自领兵向延津进发。袁绍听说曹操渡河，马上派部将文丑率兵向西增援，袁绍则亲率大军在朝歌（今河南淇县）驻扎，准备对曹操进行正面打击。曹操立即分兵向白马火速进军，离白马只有十几里地时，颜良发觉，大吃一惊，仓促应战。曹操派关羽、张辽二员战将前去挑战。关羽英勇善战，远近闻名，被俘后，曹操一直想收留他，但关羽没有久留之意。张辽问起原因，关羽叹息说："我深知曹公厚待我，但是我受刘将军的恩情，誓与他共死，不能背叛他。我虽不能久留，但要找机会立功报效曹公，然后离去。”此次曹操派关羽解白马之围，正是他立功的时机。关羽抖擞精神，策马前冲，将颜良斩杀于万众之中。袁军大乱，纷纷溃败，白马之围解除。

曹操解白马之围后，将当地百姓随军队向西南迁徙，袁绍认为这是进攻曹军的机会，打算渡河追击。沮授劝阻说："军事上的胜负变化，应仔细考虑。现在大军远在黄河以北集结，最好的办法是派文丑屯驻延津，另分一支军队进攻官渡，如果我们获胜，大军再下也不晚。如果贸然出兵，与敌人决战，成功固然是我们的愿望，失败了我们就不能归还了。”从用兵上讲，沮授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孤傲自负的袁绍听不进去，执意要率大军渡河。沮授非常失望，在临渡河时候，他望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水，无限伤感地叹道："首领志气骄盈，将士贪图功利，悠悠黄河，我们还能回来吗?”沮授借口身体有病，打算辞职，袁绍没有答应。

袁绍率军到达延津以南，命令文丑为前锋，向曹军发动攻击。曹操则在酸枣北面的南阪下筑营，他派人登高观察袁军的动静，了望哨向曹操报告说："已发现袁军骑兵五六百!”过了一会

儿又报告说："骑兵比以前增多了，步兵不可胜数！"曹操镇定地说："不用再来报告了。"接着，他命令骑兵卸鞍放马，把辎重车辆堆放在道路上。许多将领说，敌人骑兵多，不如将辎重车运回，守卫大营，只有荀攸领会曹操的用意，他对将领们说："这是用来引诱敌军的，怎么能运回呢？"曹操回头看看荀攸，会意地笑了。这时文丑与刘备率领的五六千骑兵先后赶到。众将领感到情况危急，催曹操下命令上马迎战。曹操却不慌不忙地说："还不到时候。"又过了一会儿，袁绍的骑兵越来越多，他们看见曹军的军用物资堆满道边，便争先恐后地抢夺，乱成一团。这正中曹操计谋，他纵身上马，当即下令："出击！"部将带领士兵冲入敌阵，袁军大败，在混战中文丑被杀。袁军溃逃后，曹军追出三十里，斩首数千，并收回了全部辎重。文丑与颜良是袁绍手下的名将，他们二人被斩杀，使袁军的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白马延津之役，为曹操取得官渡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月，曹操将军队撤回官渡坚守。袁军则进至官渡北面的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与曹军隔水相持。沮授又向袁绍建议："北边军队虽多，但强劲果敢不如南边，南边军队粮食少，军资也不如北边，急战对南边的军队有利，持久对北边的军队有利。应该用持久战的办法消耗曹军的实力，不应急于和曹军决战。"袁绍对沮授打持久战的建议根本听不进去。八月，袁绍把军营向前推移，靠沙丘扎营，东西几十里，曹操也分布营垒与袁绍相对。在这段时间中，曹操的后方又出了问题。先是汝南黄巾首领刘辟等背叛曹操，响应袁绍，袁绍见有机可乘，忙派刘备率兵援助刘辟。一时间，周围郡县纷纷起来响应。袁绍还派人拉拢阳安都尉李通，授予他征南将军的职位，起兵反曹。李通坚决不干，他手按剑柄责斥来人说："曹公明智，必然能得天下，袁绍虽然强盛，终将要成为他的俘虏！我誓死不变心！"李通一怒之下杀了使者，把袁绍送来的印绶上交了曹操。李通虽然没背叛曹操，

但刘备在他的后方，许都以南的汝、颍地区频繁活动，搞得人心不安，曹操对此颇感忧虑。部将曹仁建议说："南方都知道您正在与袁绍相持，目前还顾不上南方的事情，刘备以强兵胁迫，他们背叛您是难免的。不过，刘备刚刚带领袁绍的部队，不那么得心应手，现在出击，可以打败他。"于是，曹操派曹仁率骑兵进攻刘备，刘备兵败溃逃，曹仁收复了叛变的各县。

刘备回到袁绍军中，暗中打算离开袁绍。于是，他劝说袁绍与刘表联合，并愿意前去游说，这样，刘备带着他原来的部队再到汝南，与当地首领龚都联合，有部众数千人。曹操派部将蔡扬前去进攻，被刘备杀死。当时的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

九月，曹操出兵与袁绍交战，没有取胜，又退回大营坚守。袁绍见曹军不出战，便命令士兵在曹操军营外修筑高台，堆起土山，向曹营发射箭矢，曹营将士行走都要用盾牌遮挡身体。曹操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他派人赶造了一种霹雳发石车，攻击力很强，将袁军的壁楼全部击毁。袁绍挖地道攻击曹操，曹操则命令士兵在营内挖掘长沟截断袁军地道。袁绍的进攻虽然没捞到什么便宜，但曹操兵少，粮食也快用光，士卒疲惫，老百姓也不堪忍受繁重的赋役，纷纷逃亡，归附袁绍，形势极为严峻。曹操很忧虑，打算退回许都。他给荀彧写信征求意见。荀彧回信说："袁绍的兵马全集中在官渡，要与您决胜负，您以至弱抵抗最强，如果不能战胜敌人，就会一败涂地，眼下是夺取天下的关键时机。再说，袁绍不过是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任用人，凭借您的神武明智，再加上顺天应人，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现在您的粮食虽少，也没有像当年楚、汉在荥阳、成皋相持那样。当时刘邦、项羽都不肯先退兵，认为先退就会吃亏。您只以袁绍十分之一的兵力，扼制了袁军的咽喉，使他不能前进，过半年，事情就要起变化了，这正是出奇制胜的时机，可要把握住呀！"荀彧的信给曹操很大鼓舞。古今无数战例证明，战争中有利形势和主动权的

获得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曹操一方面命令部队坚守官渡，不丢城池；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军粮补给问题。他安慰运粮的战士说："再过十五天，我为你们打败袁绍，就不再辛苦你们了。"

这时，曹操得到一个消息，袁绍有几千辆运粮车到达官渡，荀攸对曹操说："押运粮草的韩猛勇敢却轻敌，我们应该派人袭击他。"于是曹操派偏将军徐晃和史涣前去拦截韩猛，将韩猛押运粮草的部队打散，并将粮草烧毁。

十月，袁绍又派车运送军粮供应前线的部队。这次袁绍派了他的得力将领淳于琼带领的一万多士兵押送，停宿在袁绍大营以北四十里处的故市、乌巢。沮授向袁绍建议说："应加强防范，再派一支部队守在外围，用以防止曹操的抄掠。"袁绍不听。袁绍的另一个谋士许攸分析了当时对阵形势，认为曹军兵少，而且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官渡，后方必定空虚，他向袁绍建议："现在应该派出一支轻兵，趁夜色掩护，直奔许都，把许都拔下，将献帝抢在手中，到那时我们就可奉迎天子来讨伐曹操，曹操不是被擒获，就是首尾难顾，疲于奔命，我们可以一举夺得战争的胜利。"袁绍向来自以为是，对许攸的建议也没有听从。他固执地说："我就是要在这里把曹操擒获。"许攸见他如此傲慢无知，十分生气。正在这时，有一个消息传来，许攸在邺城的家族犯了法，被留守在邺城的审配抓住关押起来。许攸大怒，偷偷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许攸字子卿，足智多谋，曹操早就有所耳闻，他听说许攸前来投奔，非常高兴，马上起身，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好，就赶出营帐迎接。他拍着手笑着说："子卿远来，我的事情一定可以成功了。"曹操请许攸入座后，许攸对曹操说："袁绍兵力强盛，您如何对付？现在还有多少粮食？"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知道曹操没有这么多粮食，就说："这不可能，您再重说。"曹操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说："看来您是不想

打败袁绍了，为什么不说实话！”曹操见许攸欺骗不过，只好说：“刚才我说的都是玩笑话，其实只可坚持一个月了。这可怎么办呢？”许攸说：“您孤军独守，既无外面援助，军内粮食又尽，这是万分危急的时刻。袁绍现在有一万多辆粮草、辎重在故市、乌巢，驻军防守不严，如果您派轻兵，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烧毁他的积聚，不过三天，袁绍必败无疑。”曹操大喜，当即采纳许攸的建议。他让曹洪、荀攸留守大营，自己亲率五千精兵，打着袁军的旗帜，为防止发出声响，兵士嘴中叼着小木棍，把马嘴绑上，每个士兵还抱一捆干柴草，乘夜从小道向乌巢进发。路上，遇到袁军盘问，他们就说：“袁公担心曹操袭击我们的后路，特意派我们前去加强防守。”袁军信以为真，一路未受阻拦。曹军很快到达屯粮处。曹操一声令下，士兵迅速将柴草点燃，向粮囤扔去。刹时间，烈焰升腾，火光冲天，袁军毫无防备，乱作一团。这时天已大亮，淳于琼出营仓促应战，被曹军击败，又退回营中。

曹军袭击淳于琼的消息传到袁绍那里，他没有派兵增援淳于琼，反而认为正是攻下官渡的好时机，他对儿子袁谭说：“趁曹操攻打淳于琼，我率兵攻下他的大营，让他没有归路。”于是命令大将高览、张郃等进攻官渡。张郃说：“曹操率精兵攻打淳于琼，一定会取胜，淳于琼一败，事情就不好办了，我请求先去解救他。”谋士郭图支持袁绍进攻官渡。张郃又说：“曹操的营垒坚固，不易攻克，如果淳于琼被捉，我们就要变成俘虏了！”袁绍考虑了一下，只派出少数军队去救淳于琼，仍派主力部队攻打曹营。

袁军派出的骑兵到达乌巢，曹操的部将们说：“敌人的骑兵渐渐地逼近，请派兵抵御他们。”曹操说：“敌人到了背后再告诉我！”士卒拼力死战，终于将袁军打退，淳于琼被斩首，乌巢积聚的粮食全被烧掉，而袁军的主力攻打曹操大营也没能攻克。战

败的消息传来，袁军将士非常恐慌。郭图见自己的计谋失败，心中忌恨张郃，他向袁绍谗毁张郃，说："我军失败，张郃高兴。"张郃又气又怕，便与高览一起投降了曹营。曹洪怀疑不敢接受，荀攸说："张郃的计谋不被采用，他是一气之下来投奔咱们，这有什么怀疑的！"于是，接受了张郃等人的投降。

张郃、高览的投降，使袁军更加不稳，人心惶惶。曹操乘机发动全面进攻，袁军全面崩溃。袁绍和儿子袁谭只带八百骑兵逃到黄河以北。在这次大战中，曹操消灭了袁军主力七万多人，并缴获了袁军逃亡时丢弃的大量辎重、图书、珍宝等。

袁绍的谋士沮授被曹军活捉。曹操与沮授原来是好友，曹操想收留他，对他说："袁绍没有谋略，不用你的计策，现在天下动乱不安，我正需要与你同谋大业。"沮授说："我的叔父与弟弟的性命都在袁绍手中，如果您看得起我，就把我杀掉，这也是我的福分。"曹操叹息道："我若早得到你，天下大事就不用担忧了。"曹操赦免沮授，并给他优厚待遇，但不久沮授企图逃回袁绍军中，曹操只好把他杀掉。

袁绍逃到黄河北岸的黎阳，进入部将蒋义渠的军营，握着他的手说："我现在把脑袋托付给你了。"蒋义渠退出大帐，让袁绍发号施令，袁军残部渐渐聚集起来。

当初谋士田丰因劝谏袁绍而被关押，袁绍失败后，有人对他说："这次你一定会被重用了。"田丰说："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猜忌，不理解我的一片忠心，我因数次劝谏而得罪了他，若是他胜利而高兴也许能赦免我，现在他一败涂地，妒性必然发作，我没有活的指望了。"谋士逢纪忌恨田丰，他向袁绍说田丰的坏话："田丰听说您败退，高兴得拍手大笑，说这在他预料之中。"袁绍大怒，终于将田丰杀掉。

袁绍退回邺城后，并不甘心失败，再度集结青、幽、并三州人马，企图与曹操决战。建安六年四月，袁绍将军队开至黎阳，

曹操毫不示弱，自官渡北上迎击。他派轻骑兵，将袁军招引至仓亭（今山东阳谷东南），然后发动攻击，大破袁军。转年正月，曹操再次击败袁绍。五月，惨败在曹操手下的袁绍又惭愧又愤怒，积郁成疾，吐血而死。

官渡之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战例之一。曹操在这次战斗中，能虚心听取谋士的意见，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抓住要害，火烧乌巢军粮，导致敌军大乱，取得战争的全胜。相反，袁绍却刚愎自用，清高孤傲，不能接受正确意见，有识之士纷纷离他而去，终遭覆灭下场。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说》、《袁绍传》、《荀彧传》、《郭嘉传》

《后汉书》:《袁绍传》

《资治通鉴》卷 63

《通鉴纪事本末·曹操篡汉》

孙氏占江东

在北方群雄割据，争斗不已的时候，一支军事力量在江东崛起，这就是对南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孙氏集团，其代表人物是孙坚及其子孙策、孙权。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春秋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年轻时任县吏，黄巾大起义时，正任下邳丞的孙坚被朱儁推举为佐军司马。他带着乡里少年和招募来的千余名兵士与朱儁共同镇压起义军，因作战有力，被提升为别部司马。中平三年（186）孙坚随同车骑将军张温到凉州平定了地方势力边章、韩遂的叛乱。中平四年，孙坚被任命为长沙太守，封为乌程侯。汉灵帝死后，董卓专权，为虐四方，各州郡纷纷起兵征讨，孙坚也带兵北上，途中杀了与他做对的荆州刺史王睿和拒绝供应军粮的南阳太守张咨，力量逐渐强大。到达鲁阳（今河南鲁山）后，与袁术相见，袁术上表任孙坚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

孙坚善战有谋略。初平元年（190）冬天，孙坚正与部下在鲁阳城东饮酒聚会，突然发现董卓的军队逼近，情况十分紧急。孙坚却镇静自若，命令军队不要轻举妄动。后来，董卓的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起身，率领军队入城。将领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担心引起部队慌乱，互相拥挤，使大家都无法入城。"董卓的骑兵见孙坚军队严整，很有秩序，不敢进攻而撤退。初平二年二月，孙坚率军屯驻在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以东，被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他收集残部

进驻阳人（今河北汝阳东北）。董卓派遣东郡太守胡轸率五千步骑兵攻打孙坚，并任命吕布为骑督。胡轸与吕布不和，孙坚利用他们的矛盾，向胡轸发动进攻，胡轸招架不住，吕布也不来解救，结果胡轸大败。他的部将、著名战将华雄被孙坚斩杀。军事上不断获胜，使孙坚的名声越来越大。这时有人对袁术说："假如孙坚占领了洛阳，你就不能再控制他了，这好比除掉了狼而得到了虎。"听了这话，袁术感到疑虑，便不再供应孙坚军粮。孙坚闻讯，连夜去见袁术，他为袁术分析形势说："我现在这样奋不顾身，上为国家讨伐逆贼，下为您报家门私仇。我与董卓没有个人怨恨，而您却听信旁人的挑拨，对我猜忌，这是为什么？"袁术被孙坚问得哑口无言，深感惭愧，立即下令恢复调发了军粮。

董卓想拉拢孙坚，打算与孙坚结成儿女亲家，还让孙坚把他子弟中想作刺史、太守的名字写下来，由他推荐任用。孙坚拒绝了董卓的拉拢。他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灭掉他的三族，昭示天下，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他结亲！"孙坚继续向洛阳进军，到达距洛阳九十里的大谷时，董卓亲自率军迎战。孙坚的军队锐不可挡，将董卓击败，进到渑池。接着，孙坚又将吕布打败，进入洛阳。他派人维修打扫皇帝宗庙，并在城南一井中打捞到汉朝的传国玺。不久，孙坚又从洛阳撤军，仍屯驻鲁阳。

初平三年，袁术与刘表争夺荆州，任孙坚为先锋，刘表则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邓之间连续作战。三月，孙坚将黄祖打败，黄祖渡过汉水，退保襄阳。孙坚紧追不舍，将襄阳包围。不料，孙坚在一次出行时，被黄祖的士兵用暗箭射死，终年37岁。

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统领部众。孙策字伯符，喜欢交结士大夫，江淮地区士人都拥护他。舒城人周瑜与孙策同岁，英武豪迈，二人关系极为密切。

当时，袁术在淮南很有势力，孙策便去投靠他。孙策流着眼泪对袁术说："我的父亲从长沙出发讨伐董卓，与您在南阳相会，同盟结好，现在不幸遇难，没能完成功业，我感谢您与我父亲的交情，愿意为您继续效力！"袁术虽然十分器重年轻的孙策，但他不肯将孙坚原来统率的士兵交给孙策。袁术说："我已任用你的舅父吴景为丹阳太守，你的堂兄孙贲为都尉。丹阳是个出精兵的地方，你可以去那里依靠他们招募人马。"孙策于是将母亲接到曲阿，依靠舅父吴景，在当地募兵，得到数百人。不久，孙策去寿春，再次见袁术，袁术才把孙坚的旧部千余人还给孙策，并上表推荐孙策为怀义校尉。有一次，孙策部下一名犯了罪的骑士逃人袁术大营隐藏在马厩中，孙策得知后，派人进去当场将骑士处斩，然后他到袁术大营中表示谢罪。袁术说："我和你一样，痛恨那些叛变的兵士，你为什么要谢罪？"从此以后，袁术的军队都更加害怕孙策。

袁术起初答应孙策为九江太守，后来他却改用丹阳人陈纪。袁术准备进攻徐州时，要求庐江太守陆康提供三万斛米，陆康不给，袁术大怒，派孙策去进攻陆康。他对孙策说："我以前错用陈纪为九江太守，常常感到懊悔，如果你这次能战胜陆康，庐江郡就归你所有了。"孙策听信了袁术的话，向陆康发动进攻，取得胜利，占领了庐江郡。但是袁术又出尔反尔，任自己的部下刘勋为庐江太守，使孙策对他更感到失望。

这时，曾在孙坚手下担任校尉的丹阳人朱治见袁术德政不立，便劝孙策返回故乡，占据江东发展势力。当时孙策的舅舅吴景正与樊能、张英等人作战，历时一年多，还未能取胜。孙策便借机向袁术说："我愿意帮助舅舅去进攻横江，取胜后，我就回家乡招募人马，可以得到三万军队，然后我来辅佐您平定天下。"袁术想，江东地方势力很强大，孙策不一定能战胜他们，于是同意了孙策的请求。孙策带着千余名步兵数十名骑兵自寿春出发，

沿途招募军队，到达历阳（今安徽和县）的时候，已有五六千人。当时，周瑜的叔父周尚任丹阳太守，周瑜率兵迎接孙策，并援助他军费和粮草，孙策非常高兴，很快攻克了横江、当利。樊能、张英败走。

这时，江东地区有不少割据势力，如扬州刺史刘繇、吴郡太守许贡、会稽太守王朗等。孙策要立足江东，必须打败他们。刘繇字延礼，伯父刘宠曾任太尉，哥哥刘岱任兖州刺吏。刘繇虽任扬州刺史，但治所寿春为袁术所占，刘繇只好渡江到曲阿（今江苏丹阳），赶走袁术所置丹阳太守吴景，在沿江一带设兵把守。孙策欲占据江东，首先要打败刘繇。于是，他首先进攻刘繇设在牛渚的营地，取得成功，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当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都拥戴刘繇为盟主，薛礼据守秣陵城，笮融屯驻秣陵县南，都被孙策打败。孙策还打败了刘繇在梅陵的军队，又攻下了湖孰、江乘，最后在曲阿与刘繇决战。当时刘繇的同郡人太史慈从家乡前来看望刘繇，太史慈勇猛有才干，正赶上孙策进攻曲阿，有人劝刘繇任用太史慈为大将，刘繇不答应，只让太史慈干侦察巡逻的事。有一次，太史慈只带一名骑兵外出巡查，在神亭与孙策突然相遇。当时，孙策身边有十几名骑士，都是当年孙坚的旧将，如辽西人韩当、零陵人黄盖等人。太史慈策马上前，举枪便刺，孙策急忙闪过，回手就是一枪，正中太史慈的坐骑。在两骑相错时，孙策夺得太史慈插在背后的手戟，而太史慈也抢到孙策戴的头盔。正在这时，双方的骑兵赶到，对峙了一阵子，各自散去。不久，刘繇出兵与孙策交战，刘繇不是孙策的对手，战败逃往丹徒。孙策占领了曲阿。孙策到江东后，严肃军令，士兵不得掳掠民间的任何财物，深受百姓欢迎。打败刘繇后，孙策一方面慰劳赏赐将士，一方面发布宽大命令，通知各县，“凡是刘繇、笮融部下前来投降的既往不咎，愿意从军的，免除家庭赋徭役，不愿从军的，也不勉强。”这一政策颇得人心，

不过十天，应募者从四面涌来，很快募到二万余名战士、一千余匹战马，孙策威震江东。

袁术见孙策势力不断壮大，想把他笼络住。兴平二年（195）冬天，袁术上表推荐孙策代理殄寇将军。孙策的部将吕范对孙策说："现在将军的事业日渐兴盛，兵马越来越多，不过军纪还不够完善，我愿意暂时担任都督，帮助将军进行治理。"孙策说："你本人已经是名士了，手下统率众多军队，又立有战功，怎能让您屈居低职，管理军中的小事呢？"吕范说："不然。我现在离开家乡来投靠您，不是为了妻子儿女，是想为国家出力，这就好像同乘一条船漂洋过海，出了任何一点故障，都可能身葬大海。我这样做，不仅为了将军您，也是为了自己呀！"吕范回家后，换上武将服，向孙策报到，孙策正式任命了他。从此，孙策军中纪律严明，法令整齐划一。

孙策用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如张纮为正议校尉、张昭为长史。孙策很信任他们，经常让他们一人留守后方，一人随自己出征。广陵人秦松、陈瑞等人也常常被孙策请来参与决策。孙策对张昭十分敬重，待他以师友之礼，文武之事，全由张昭决断。张昭经常收到北方士大夫的信，称赞张昭的政绩。孙策知道后，高兴地说："从前管仲相齐，大小事都由他作主，齐桓公终成五霸之首。现在，张昭贤明，我能用他，最后的功名还不是都属于我吗？"

刘繇被孙策打败后，从丹徒逃到会稽郡，派豫章太守朱皓进攻袁术的部将诸葛玄，诸葛玄退守西城。刘繇沿江而上驻军彭泽，又派笮融帮助朱皓进攻诸葛玄，笮融设计杀害了朱皓，刘繇领兵讨伐笮融，笮融战败，逃人深山，被当地百姓杀死。

建安元年（196）春天，袁术打算自称皇帝。孙策听到消息后，写信责备袁术不该这样做。袁术开始以为孙策一定会拥护自己，没想到遭到孙策的反对，他很生气，不听孙策劝阻，执意称

帝，孙策便与他断绝了关系。

孙策继续在南方扩大势力。他准备攻取会稽郡。会稽守将严白虎等人各有部众数万人，在要道布兵把守，众将领都想先进攻严白虎等。孙策说：“严白虎等人是一群强盗，没有大志，很容易捉到他们，”孙策率军渡过浙江，攻取会稽，与郡太守王朗在固陵交锋，均未能取胜。他的叔父孙静对孙策说：“王朗凭借城池的坚固，很难一下子攻克，距此地以南几十里的查渎防守薄弱，应从那里突破，进入王朗的后方，这正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术。”孙策听从了这个建议。夜里，他让士兵到处点燃火把，派疑兵迷惑敌人，同时派出了一支轻兵向查渎进发，袭击王朗的后方。王朗闻讯后，惊恐万状，忙派前丹阳太守周昕率兵迎战。孙策又打败周昕，周昕被杀，王朗仓皇逃走。孙策紧追不舍，王朗见大势已去，只好向孙策投降。孙策打败王朗后，自任会稽郡太守。

建安二年夏天，曹操派人携带诏书，任命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命令孙策与吕布、吴郡太守陈瑀共同讨伐袁术。孙策带兵出发，行至钱唐时，吴郡太守陈瑀阴谋袭击孙策，暗中勾结祖郎、严白虎等，让他们做内应。孙策察觉后，立即派遣部将吕范、徐逸进攻陈瑀。陈瑀战败，单枪匹马投奔了袁绍。孙策在南方名声日益增大。曹操想拉拢孙策，便上表推荐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袁术与孙策绝交后，想联合力量扼制孙策。他任周瑜为居巢县长，临淮人鲁肃为东城县长。周瑜与鲁肃认为袁术目光短浅，成不了大事，都拒绝袁术的任用，渡过长江投奔孙策。孙策非常高兴，任周瑜为建威中郎将，鲁肃把全家搬迁到曲阿居住。袁术见周瑜、鲁肃离他而去，非常恼火，秘密派人联络丹阳豪强祖郎等人，让他们鼓动山越人，与孙策作对。孙策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率军去征讨祖郎，将他活捉。孙策对祖郎说：“你以前袭击我，

曾砍中我的马鞍，现在我建军队，兴大业，想抛弃旧怨，唯才是举，希望你不要害怕。”祖郎连忙叩头谢罪，孙策让人为祖郎松绑，任命他为门下贼曹。接着孙策又率兵到勇里攻打太史慈，也将他生擒。孙策亲自为太史慈松绑，对太史慈说：“我早就听说你性格刚烈讲义气，是天下的智士，只是你所依附的刘繇不是明主，我和你是知己，不要担心，我们一起共创大业吧！”太史慈被任命为门下督。

正在这时，扬州牧刘繇在豫章死去。他部下有万余人，继续坚守，孙策打算兼并豫章。

建安四年冬天，庐江太守刘勋因为袁术士兵众多，无法供应粮草，他派遣堂弟刘偕到上缭，向当地豪强征集粮草。豪强们没有满足刘偕的要求，刘偕向刘勋报告，率兵前来攻打。

孙策对刘勋势力强大十分担忧，不过他假装讨好地对刘勋说：“上缭的豪强也多次进攻我郡，我想打击他们，无奈路途遥远行动不便，上缭是个富饶的地方，请您出兵讨伐他们，我愿意作外援。”孙策还用昂贵的珠宝、精美的葛布贿赂刘勋。孙策这一招，使刘勋飘飘然然，许多人也向刘勋庆贺，只有部将刘晔持否定态度。刘勋问他原因，刘晔说：“上缭虽小，但城坚池深，易守难攻，不会很快攻下，我们的军队被困在城外而后方空虚，孙策如果乘机袭击我们，我们将陷入困境。如果您一定要进攻上缭，灾难就会降临。”刘勋不听劝阻，执意进攻上缭。刘勋率军队到达海昏时，当地豪强望风而逃，只剩一座空城，刘勋一无所获。这时，孙策率兵向西进攻黄祖，走到石城，听说刘勋正在海昏，孙策忙派堂兄孙贲、孙辅率八千士兵前往彭泽，自己和周瑜率二万人袭击刘的大本营皖城（今安徽潜山）。攻克后，俘虏了袁术和刘勋的家眷以及部属三万余人。孙策任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让他带三千士兵，守卫皖城；把其他被俘虏的人都迁往吴郡。刘勋得知皖城被攻克的消息，急忙回救，到达彭泽时，受到

孙贲、孙辅的截击，刘勋大败，向黄祖求援。黄祖派其子黄射率五千水军援助刘勋。这时孙策率兵赶到，刘勋又遭败绩，向北投奔曹操去了。

孙策打败刘勋后，收编了刘勋的士兵，俘获了千余艘船只，增加了军事力量，又向黄祖发起进攻。十二月，进军到沙羡，刘表派遣侄子刘虎和部将韩晞率五千士兵援救黄祖。十二月十一日(甲寅)，两军大战，孙策将黄祖击败，韩晞战死，黄祖逃走。黄祖的家眷及六千艘战船被孙策缴获，士兵被杀死、淹死的达数万人。

孙策乘胜进军，直取豫章。豫章太守华歆深知孙策善用兵，自己不是对手。这时孙策派虞翻前来游说，华歆说："我久在江南，常想北归家乡，孙将军一到，我便离去。"并写了迎接孙策的书信，派人送到孙策军前。孙策随即进军，华歆打开城门，头戴葛巾，迎接孙策。孙策非常高兴，他对华歆说："你德高望重，为远近人心所归，我年轻幼稚，应当向您行弟子之礼。"于是，孙策按照弟子的礼节拜见华歆，将华歆尊为上宾。

孙策分割豫章郡，另立庐陵郡，任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庐陵太守。至此，孙策已经控制了扬州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南方重要的军事力量。

建安五年夏初，孙策向西进攻黄祖，广陵太守陈登乘机引诱严白虎的余部，准备在孙策的后方起事。孙策急忙率军回击陈登，驻扎在丹徒，等待粮草。当初，孙策曾杀死吴郡太守许贡，许贡的门徒藏在民间，等待时机，打算为许贡报仇。孙策好打猎，他骑的一匹骏马，非常矫健，跑起来随从的马根本追不上。一次，他带着几名卫士外出打猎，他的马快，跑在前面。突然，许贡的三个门客，从路边闪出，他们见到孙策，举箭便射，孙策躲闪不及，一支箭正射中前额，顿时血流满面，跌下马来。这时，后面卫士赶到，经过一阵搏斗，许贡的门客全被杀死。孙策

伤势严重，他自知不久人世，便将长史张昭等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道："中原正在大乱，形势还不明朗，以吴、越的人力，据守三江险要，足以坐观成败。请诸位好好辅佐我的弟弟！"接着，孙策又将孙权叫来，把印绶交给孙权，对他说："率江东之众，在两军阵前一决胜负，与天下豪杰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保守江东，我不如你。你要自重呀！"四月初四（丙午）年轻的将军孙策去世，时年26岁。

孙策之死，使全军将士无比悲痛，年仅18岁的孙权伤心地大哭不止，不能处理军政大事。张昭对孙权说："现在是你哭的时候吗？"又说："做为后代，贵在能继承先人的遗志，完成大业，现在天下动荡，群雄逐鹿，你怎么能因哀戚而不问政事，动匹夫之情呢？"他帮孙权换好服装，把他扶上马，让孙权去巡查军营，稳定人心。周瑜从巴丘率兵赶回奔丧，后留在吴郡，担任中护军，与张昭共同主持军政事务。当时，孙策虽然已经占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等郡，但那些险要偏僻地区，尚未完全归附。流亡到江南的士人，思想没有稳定，持观望态度，与孙策、孙权并未建立起稳定的君臣关系。但张昭、周瑜等人认为可以与孙权共同完成大业，于是尽心竭力地为孙权效力。

十月，曹操得到孙策死的消息，想乘机出兵讨伐，侍御史张纮劝道："乘人办丧事进行讨伐，是违反古代道义的，如果不能攻克，就会使关系恶化，不如与他们和好。"曹操听从了张纮的建议，上表推荐孙权为讨虏将军，并任会稽太守。

孙权身边的重要大臣除了张昭、周瑜外，还有鲁肃。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人，他经周瑜介绍，受到孙权的赏识。有一次，孙权单独留下鲁肃，与他合榻对饮，孙权问："如今汉室倾危，我想继承父兄遗志，建立齐桓、晋文那样的功业，你有什么好主意？"鲁肃回答说："据我所料，汉朝王室

已不能复兴，曹操也不能很快被消灭。我认为，只有先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变，如果能乘曹操在北方用兵，无力南下之时，消灭黄祖，进讨刘表，将长江一带全部控制，这样能建立帝王之业。”孙权非常赞成鲁肃的建议。张昭认为鲁肃年轻，看不起他，孙权却很重视鲁肃，赏赐给他许多财物。

孙权决心在江南继续开创事业，他整顿军队，将部下兵力较少而能力差的重新编排、合并。别部司马吕蒙，训练军队有方，军容整齐，孙权非常高兴，为他增兵，加以重用。

功曹骆统劝孙权尊敬贤才，多多接纳各地士人，虚心接受下级的意见；要关心部下的生活，鼓励他们发言，以考察他们的志向和能力。对这些很中肯的建议，孙权都采纳了。

建安七年，曹操打败袁绍后，进一步发展势力，便写信给孙权，要求他送子弟作“质任”。孙权召集僚属商议对策。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决，周瑜则反对送任子。他说：“现在，将军继承父兄的基业，拥有六郡的地盘与人力，兵精粮足，将士听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有什么必要去送人质呢？一送人质，就要受制于曹操，最多不过是个封侯的待遇，有十几个仆从，几辆车，几匹马，这哪能与割地称王相比呢？我看不要急于送人质，从容地观察一下形势再说。”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当时在场，她很赞赏周瑜的意见，并让孙权把周瑜当成兄长。孙权没有向曹操送人质。

建安八年，冬十月，孙权率军征讨江夏太守黄祖，大破黄祖水军，黄祖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据城不出。孙权围城多日，未能攻克。正在这时，孙权接到丹阳、豫章、庐陵等地山越起兵反抗的消息，便领兵退还，让部将分别率兵讨伐山越，平定了山越的反抗。建安十二年，孙权再次出兵进攻黄祖。这一年，孙权的母亲吴夫人病危，临终时将张昭等人召至跟前，嘱托后事后去世。

建安十三年，巴郡人甘宁投靠了孙权。甘宁字兴霸，少有气力，好游侠，远近闻名。起初，他带着奴客八百人投奔刘表，刘表不懂军事，又无远见，甘宁看出刘表难以成就大业，于是打算投奔孙权。当时，刘表的部将黄祖屯兵夏口，甘宁无法通过，只好在黄祖那里呆了三年，黄祖并不重用甘宁，甘宁十分不满。后来他利用机会投到了孙权一边，周瑜、吕蒙都向孙权推荐甘宁，孙权对甘宁非常重视，就像跟随自己多年的旧臣一样。

有一次，甘宁向孙权献策说："现在，汉朝日渐衰弱，曹操迟早要篡夺大权。荆州控制着长江上游，是水陆交通要道，刘表是个平庸之人，无深谋远虑，其子还不如他，不能继承基业，您应该尽早采取行动，攻取荆州，不要落在曹操后面。要夺取荆州，应先进攻黄祖，黄祖现在年迈昏花，缺乏钱谷，左右贪纵，吏士心怨，战船武器废坏，农业荒废无收成，军纪散漫。您率军出征，一定能战胜黄祖，然后，大张旗鼓地向西进荆州，再向巴蜀发展。"孙权对甘宁的建议很重视，张昭却不以为然。他问甘宁："现在吴地并不稳定，如果大军西征，恐怕会发生变乱。"甘宁见张昭不图进取，愤愤地说："国家将萧何那样的重担交给你，你留守后方，却担心出乱子，这怎么能效法古人呢？"孙权对甘宁表示支持。他举杯向甘宁敬酒，说："兴霸，今年出征讨伐，就像这杯酒，已交付给你。你尽管去制定策略，一定要打败黄祖，立下功勋，何必在乎张长史的话呢！"

接着，孙权亲率大兵西征黄祖。黄祖用两艘大战船封锁江口，每只船上有一千人，不停地向外发射箭只，飞矢如雨，孙权的军队无法前进。孙权的偏将军董袭和别部司马凌统担任先锋，各率敢死队一百人，每人身披两副铠甲，乘船不顾一切地冲上前，董袭用刀砍断黄祖固定战船的棕绳，战船失去控制，孙权迅速率大军前进。黄祖又命令都督陈就率水军迎战。孙权部将吕苑勇猛无比，冲上去与陈就厮杀，将陈就杀死。孙权军队士气大

振，水陆并进，攻下了夏口，黄祖逃出，被追上杀死。此战，孙权终于打败了夙敌黄祖，进一步增强了势力，巩固了江东。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孙坚传》、《孙策传》、《孙权传》、《张昭传》、《甘宁传》、《太史慈传》、《周瑜传》、《鲁肃传》

《资治通鉴》卷65

《通鉴纪事本末·曹操篡汉》

三顾茅庐

在汉末割据天下的诸路豪杰中，刘备是一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人，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后家世没落。刘备幼年丧父，家境贫苦，与母亲一起靠卖鞋织席为生。15岁时，刘备曾与公孙瓒受学于同郡名士卢植，他好交结豪侠，当地许多青少年同他要好。灵帝末年，刘备在中山富商张世平、苏欢的资助下，组织了一支武装。黄巾起义时，他带领队伍镇压起义军，立功被任安喜（今河北安国西北）县尉。刘备起兵还得到了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关羽和同郡人张飞的支持，他与关、张关系密切，同榻而寝，情同手足。后来，刘备又结识了常山人赵云，认为他有勇有谋，赵云也成为刘备得力的战将。

董卓之乱时，刘备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关东同盟军，出战不利，率众投奔了中郎将公孙瓒。公孙瓒让他协助青州刺史田楷守卫青州，加强对袁绍的防御。

兴平元年（194），占据兖州的曹操东征徐州，徐州牧陶谦大败，向田楷求援，田楷与刘备一同前往救助。当时刘备有军队数千人，陶谦又给刘备增加了四千军队。于是刘备便脱离开田楷，投奔陶谦。后来，曹操因部下张邈、陈宫叛变，不得不从徐州撤兵，陶谦荐举刘备为豫州刺史，屯驻小沛。这年冬天，陶谦病重，他的别驾麋竺说："除了刘备，谁也不能安定徐州。"陶谦死

后，糜竺带领官民迎接刘备担任徐州牧。刘备不敢担当此任，说："袁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人任三公，为海内所归，你们可以把徐州让给他。"下邳人陈登则劝刘备说："袁术骄豪，不是治理乱世的明主，我们可以为你召集步骑兵十万人，上可以辅佐天子，拯救百姓，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自守，这是个好时机，您应该接受我们的请求。"北海相孔融建议刘备不要放弃机会，否则后悔莫及，经过一番推让，刘备接受了印绶，领徐州牧。

袁术对刘备任徐州牧十分不满，便于建安元年（196）春天率军攻打刘备，争夺徐州。刘备派张飞守下邳，自己率军到盱眙、淮阴一带抵抗袁术。两军相持一个多月，互有胜负。下邳相曹豹，是已故徐州牧陶谦的旧部，与张飞不合，张飞一怒之下把他杀死，造成下邳城中大乱。袁术给吕布写信，劝他袭击下邳，并答应供应军粮。吕布大喜，率军东下，与刘备部下许耽勾结，许耽打开城门，迎吕布入城。张飞没有防备，兵败退走。刘备的妻儿都被吕布俘虏。刘备听到消息后，急忙率军回救，与吕布交战，也吃了败仗，只得收拾残部，向东攻取广陵（今江苏清江），又被袁术打败，只好退守海西。刘备连遭败绩，军队士气低落，军粮断绝，甚至自相残杀，食人肉充饥，幸亏富豪糜竺出资财援助，刘备才没有全军覆灭。为保存力量，刘备向吕布求请投降，吕布答应了，任他为豫州刺史，吕布要刘备与他一起进攻袁术，派他屯驻小沛。

九月，袁术派遣部将纪灵率三万步骑兵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吕布率兵赶到，纪灵自知不是吕布对手，便撤军回营。过了几天，纪灵派人请吕布，在营中他摆下宴席，招待吕布，也请刘备参加。宴席上，吕布对纪灵等人说："玄德，是我的弟兄，现在被你们围困，我特地来解救他。我不愿意与人争斗，而喜欢解斗。"他让士兵在营门竖立一支戟，对众人说道："如果我一箭

射中戟的小支，你们就各自收兵，如果射不中，你们可以继续战斗”。说罢，他运足气，拉满弓，一箭射去，正中小支，众人大吃一惊，不由得欢呼起来。纪灵说：“将军真是天威！”刘备、纪灵按照约定，各自撤军，不再开战。

不久，刘备召集了一万多军队，力量又强大起来。吕布得知后，认为对自己不利，便出兵攻打刘备，刘备败走，投奔了曹操。曹操器重刘备，任刘备为徐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有英雄之志，现在不早些把他们除掉，必然会有后患。”曹操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说：“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是您兴义兵，为百姓除暴，诚心诚意地招纳俊杰，还惟恐他们不来，现在却要杀掉刘备，这会使您落得谋害贤才的恶名，会使仁人智士人人自危，另择主人，您还与谁一起平定天下！”曹操认为郭嘉分析得很好，于是，给刘备增拨了军队、供应粮草，让他驻扎小沛一带，与吕布对抗。

建安三年四月，吕布又与袁术联合，派中郎将高顺与北地太守张辽进攻刘备。刘备抵挡不住，曹操派将军夏侯惇援救刘备，被高顺打败。九月，高顺攻下沛城，刘备随曹操返回许都，曹操荐举他为左将军，出则同车，坐则同席，关系十分密切。建安四年，曹操亲自东征，擒杀吕布。

然而，刘备对在曹操身边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并不满意。这时，朝廷中以献帝的丈人车骑将军董承为首的一些人正密谋推翻曹操，刘备也参加了。曹操不知道刘备的活动。一天，他请刘备喝酒，谈论天下英雄。曹操说：“如今天下的英雄只有你和我，袁绍之流是算不上数的。”当时，刘备正在吃东西，一听此话，以为曹操知道了自己参预密谋，不禁浑身颤抖，手中的筷子都掉在地上。可巧，此时天上正响过一阵惊雷，刘备乘机说：“圣人说：‘迅雷风烈，使人变色。’此话不假呀！”说罢哈哈大笑，以此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事后，刘备加紧了与董承等人的密谋。

其实，精明的曹操对刘备还是有戒备的，他常派人到刘备住处观察动静。刘备对张飞、关羽说："我在这里种菜是为了躲避曹操的耳目，曹操必然怀疑我，这里不可久留。"

不久，袁术北上，曹操决定派兵拦截袁术，刘备要求承担这一任务。于是，曹操让将领朱灵与刘备一道南下迎击袁术。当刘备离开许都之时，程昱、郭嘉、董昭等人都劝阻曹操："不能让刘备外出！"曹操也感到后悔，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来不及了。袁术北上不成，又退回寿春。曹操命令刘备率军返回许都，朱灵班师回朝，刘备却拒不执行，他杀死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镇守下邳，自己率军驻扎在小沛，公开与曹操作对。曹操派司空长史刘岱、中郎将王忠讨伐刘备，没有取胜。

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谋杀曹操的阴谋泄露，曹操将董承及参预其事的王服、种辑杀死，并夷三族。当时，袁绍率兵南下，正要与曹操决战，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曹操率兵东征徐州，刘备以为曹操全力以赴对付北面的袁绍，不会东来，放松了戒备，被曹操打败。徐州失守，他去青州投奔袁谭，又北上投奔袁绍，曹操接着又攻克下邳，关羽被俘。

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派刘备袭击曹操后方。于是刘备率领一支军队在许都以南汝、颍区不断骚扰，搞得人心不安，曹操感到忧虑。部将曹仁建议曹操趁刘备在南方立足未稳，迅速出击，可以将刘备击破。曹操派曹仁进攻刘备，一举将刘备打败。

刘备回到袁绍军中，建议袁绍与刘表联合，他愿意充当说客，实际想脱离袁绍。

建安六年，刘备率一支人马投靠荆州牧刘表。刘表亲自到郊外迎接刘备，用上宾的礼节招待他。刘表又给刘备增加了一些军队，让他屯驻新野。

刘表，字景升，是东汉末年名士。董卓之乱时，他也参加了关东同盟军，此后在军阀混战过程中，他有时联合袁绍与袁术争

夺；有时支持张绣攻打曹操，官渡之战时，他又采取中立态度。刘表接人待物，外表儒雅，而内心多疑忌。刘备前来投靠，他虽然热情接待，但不予重用，刘备见刘表既不图进取，又不能礼贤下士，心中十分郁闷。一转眼，刘备在荆州住了好几年，还没有找到发展势力、实现抱负的机会。有一次，刘表与刘备会见时，刘备起身上厕所，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由于不骑马不行军，大腿的肌肉都松软了，身体也胖了起来，刘备不禁感慨万端，潸然落泪。刘表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刘备说："我过去身体不离鞍，大腿消瘦有力，现在不再骑马，腿肉长多了，日月如流水，不觉人已经衰老，而功业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心中悲伤。"的确，刘备起兵后，没有固定地盘，四处奔命，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寄人篱下，志不得伸，他的悲伤也在情理之中。怎样壮大力量，摆脱困境呢？刘备感到必须找一位足智多谋的人辅佐自己。荆州地杰人灵，有不少才华出众的人物。为此，刘备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寻访。

刘备先向襄阳名士司马徽访询人才，司马徽说："一般的儒生俗士，是不识时务的，能认清当前形势的，是那些俊杰之士，我们这里有卧龙、凤雏，就是这样的俊杰。"刘备问："卧龙、凤雏是谁？"司马徽说："就是诸葛亮和庞统。"

不久，诸葛亮的好友徐庶来新野投奔刘备。徐庶原名徐福，少年时好击剑，想做个侠客，后来替人报仇，杀人逃走，才改名徐庶，避乱到荆州后，与诸葛亮结为好友。他也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并对刘备说："诸葛亮是卧龙，将军是不是想见他呢？"刘备很想见到诸葛亮，就对徐庶说："你与诸葛亮是好友，就请你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由我请是不会来的，我看只有您亲自去拜访他，才能召唤他来。"刘备为了访到贤才，便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隆中去请，头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便是家喻户晓的"三顾茅庐"。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县（今山东沂水）人，他的父亲诸葛珪，汉末任太山郡丞。诸葛亮年幼时，父母去世，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当时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他带着诸葛亮及弟弟诸葛均赴任。但不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并带来了一支军队，诸葛玄势单力薄，只得弃官而走。他与荆州牧刘表是老朋友，于是带着诸葛亮等来到荆州。刘表安置了他们。几年后，诸葛玄去世了，诸葛亮就在襄阳（今湖北襄樊）以西二十里的隆中定居下来。这时的诸葛亮无家资财产，他的生活除依靠亲友的接济外，还要自己耕种。诸葛亮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他刻苦研读，不断充实自己，他非常留意社会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当时，荆州比中原地区相对安定，不少中原地区的士人都在这里避乱，如博陵的崔平州，颍川的徐元直、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名士。诸葛亮与他们结为好友。有一次，诸葛亮对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三人说："如果你们三位去做官，可以当上刺史、郡守。"可当他们问起诸葛亮的志向时，他只是笑而不答。诸葛亮怀有远大的抱负，他常常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春秋齐国名相，辅佐齐桓公时，实行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成为五霸之首。乐毅是战国燕国名将，功勋卓著，远近闻名。诸葛亮在隆中耕读，实际上是期待明主，以便施展才干，治国安邦。他的好朋友都了解诸葛亮的志向。

建安十二年，经徐庶介绍，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了年仅26岁的诸葛亮。刘备让左右随从暂时回避，诚恳地对诸葛亮说："汉王朝已经衰败，奸臣把持朝政，我不度德量力，打算伸张大义于天下，完成统一大业，可是才智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成，不过我的雄心壮志未减退，你有什么好计谋吗？"诸葛亮见刘备态度诚恳，便向刘备分析了天下的形势，以及实现统一的战略方针。他说道："自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同袁绍相比，虽然名声小士兵少，但他最后

以弱胜强打败袁绍，这不仅依靠天时，更由于他善于运用计谋。现在曹操已有百万大军，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在不能与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贤能之士都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东吴联合，而不能吞并他们。荆州地区北有汉水、沔水，南方直通南海，东面连接吴郡、会稽郡，西边可通巴郡、蜀郡，是用武之地，然而荆州牧刘表却不知道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这真是上天赐给将军的好机会，不知您是否有这个想法？"

"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汉高祖刘邦就是凭借它完成了事业。但益州牧刘璋软弱、昏庸，北面还有张鲁与他为敌。益州虽然资源富饶百姓众多，刘璋却不知道如何治理，安定百姓，那里的智能之士都希望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您思贤如渴，招揽天下英雄，如果能占有荆州和益州，据险防守，联合西边的戎族，安抚南边的夷越，对外与孙权结盟，对内修明政治，局势一旦有变，就可命令一名得力的将领，带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南阳）和洛阳进攻，您自己则率领益州的军队出秦川，直捣中原。到那时，老百姓一定箪食壶浆欢迎将军，如果能够这样，将军的统一事业就可成功，汉朝王室可以复兴了。"

诸葛亮这个著名的《隆中对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从客观实际出发为刘备指明了发展力量、实现统一事业的方针和策略，显示了诸葛亮卓越的才华。刘备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他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诸葛亮答应了他的要求。

诸葛亮一到军中，立即帮助刘备整顿、扩大军队。当时刘备仅有数千人马，无法出征，刘备也很忧愁。诸葛亮建议刘备将那些没有登记户籍的游民搜罗起来，挑选强壮者充兵。刘备用这个办法，在很短时间里就使军队扩大到数万人。刘备与诸葛亮志同道合，二人情谊越来越深，以致引起与刘备情同手足的弟兄关羽、张飞的不满。刘备对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如鱼得水，

你们今后不要再说不满的话了。”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使自己的力量很快发展起来。后来，他占领益州，形成了与曹操、孙权的鼎足之势。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先主传》、《庞统传》

《诸葛亮文集》

平定乌桓

在曹操的戎马生涯中，曾参与多次重大的战争。官渡之战后，他发动的平定乌桓之战颇引人注目，这场战争是怎么引发的呢？这要从曹操平定河北说起。

建安五年（200），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建安七年五月，在邺城死去。袁绍虽死，袁氏集团在河北仍有一定势力。袁绍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袁绍的后妻刘氏偏爱袁尚，经常在袁绍面前称赞袁尚。袁谭是长子，袁绍曾想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但由于刘氏反对，袁绍改变了初衷，把袁谭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并让他离开邺城，去担任青州刺史。谋士沮授不同意袁绍这样做，他对袁绍说："袁谭是您的长子，应当作继承人，而您却把他排斥在外，灾祸将由此开始！"袁绍振振有辞地说："我想让儿子们各据一州，看看他们的实际才能。"于是，他又让次子袁熙任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袁谭与袁尚虽是亲兄弟，但不团结，都想压倒对方。袁绍部将对他们各有支持者。辛评、郭图拥护袁谭；逢纪、审配则拥护袁尚。袁绍死后，大家都认为袁谭是长子，应立他继承袁绍，审配等人担心袁谭掌权后会受到报复，便伪造袁绍的遗命，拥立袁尚为继承人。袁谭从青州赶回邺城，见不能接替父亲的职位，便自称车骑将军，屯驻黎阳。袁尚只给袁谭少量的人马，还派逢纪去监督袁谭，袁谭大怒，杀了逢纪。

这年九月，曹操率军渡过黄河，进攻黎阳。袁谭向袁尚告

急，袁尚担心黎阳失守，冀州不保，便留审配守邺城，亲自率军去救袁谭，与曹军对抗。袁军与曹操数次交战，都遭败绩，只好撤兵回到邺城，曹操占领了黎阳。接着，曹操又马不停蹄地追到邺城，袁军在邺城坚守，不出城交战。曹操无奈，将邺城周围的麦子收割，充做军粮。众将领都要求攻打邺城。郭嘉对曹操说："袁绍生前喜爱这两个儿子，但谁也没被立为继承人，现在他们的势力相当，各有党羽，如果进攻太急，他们就会互相援助，如果暂缓攻打他们，他们就会争权夺利，不如现在南下荆州，等待他们发生变化，那时再出兵攻打，可以一举而定。"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留贾信驻守黎阳，自己率军回到许都，准备南下征讨刘表。可是，曹军刚到达西平（今河南西平西）就接到袁谭、袁尚火并，袁谭派人求救的消息。

原来，曹操撤军后，袁谭对袁尚说："我的部队铠甲不够精良，所以被曹军打败，现在曹军撤退，我想趁他未渡过黄河以前，派兵追杀，这是不可错过的好时机呀！"然而，袁尚却怀疑袁谭，以为他另有打算，既不给他增兵也不给换铠甲，袁谭大怒。郭图、辛评乘机挑动袁谭带兵攻打袁尚，结果被袁尚击败，率军退回南皮。袁尚紧追不舍，袁谭又逃到平原，被袁尚紧紧包围。袁谭无计可施，便派辛评的弟弟辛毗到曹操那里求救。

辛毗赶到西平向曹操讲明了袁谭求救的要求。曹操与部将商量对策，不少人认为，现在刘表很强，对曹军威胁最大，应该先平定荆州。至于袁谭、袁尚不必担忧。而荀攸则认为，刘表坐守江、汉之间，没有征伐四方的志向。而袁氏占据四州之地，有军队几十万，应该趁他们兄弟相争，力量不能集中的时机，夺取河北。郭嘉也主张出兵援助袁谭，攻打邺城，削弱袁氏。郭嘉还说："现在的敌人没有比占据河北的袁氏更强大的了，平定河北，可以使军威大威，震动天下。"曹操听从了荀攸、郭嘉的建议，决定出兵援助袁谭。

十月，曹操进军到黎阳，袁尚听到曹军渡河，非常害怕，解除了对平原的包围，撤回邺城。袁尚的部将吕旷、吕翔背叛袁尚投降了曹操。

建安九年二月，袁尚再度出兵平原攻打袁谭。部将审配、苏由留守邺城。曹操抓住时机，迅速出击，直捣邺城。守将苏由出城投降了曹操。曹军将邺城四面包围，筑土山，挖地道，向邺城发起了进攻，由于城墙坚固，未能攻克。五月，曹操在城的四周挖了一条长达四十里、深二丈、宽二丈的壕沟，引漳水灌入沟中，完全断绝了邺城与外界的联系。城中粮食用尽，一多半人因饥饿而死。七月，袁尚得知大事不好，急忙率主力一万多人回救邺城，被曹操拦击，袁尚溃败而逃，投奔幽州的袁熙去了。

袁尚被击败后，邺城的守军斗志全无，只有审配顽固抗拒，叫喊着给士兵鼓气，但人们已完全不相信他了。

审配的侄子审荣任邺城东门校尉，八月初二（戊寅）审荣乘夜打开城门，放曹军入城。审配在城中拼死抵抗，被曹军生擒。辛评的家眷都关押在邺城监狱中，辛毗赶去解救他们，但早被审配杀死。曹军士兵将审配押到曹操大帐中；辛毗怒不可遏，用马鞭猛抽审配的脑袋，大骂道："奴，你今天死定了！"审配依然很蛮横，瞪着眼说："狗东西，正是由于你们这些人，才使曹操攻下冀州，我恨不得杀死你，你敢把我怎么样！"不一会儿，曹操走进大帐，看了看满不在乎的审配，开口说道："那天我巡视围城的部队，看到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弓弩手？"审配说："我还恨太少，没有把你射死！"曹操想缓和一下气氛，也想给审配一条活路，就说："你效忠袁氏，也是不得已而为呀！"谁知审配一点不领情，始终没说一句求饶的话，曹操只好下令将审配杀死。

在曹操围攻邺城时，原已归降曹操的袁谭又背叛曹操，攻取了河北不少地方。曹操给袁谭写信，责备他违约，与他断绝了婚姻关系。原来，在袁谭向曹操求援时，曹操为宽慰他，与袁谭结

为亲家，让袁谭的女儿嫁给儿子曹整。现在，他又把袁谭的女儿送回，并出军讨伐袁谭。

建安十年正月，曹操进攻南皮，袁谭迎战，曹军伤亡惨重。曹操想暂缓进攻，议郎曹纯劝道："现在我孤军深入，难以持久，如果不一鼓作气将敌人打败，一后退就会丧失军威。"曹操听从了曹纯的劝告，上前线亲自擂动战鼓，指挥将士猛攻敌军，终于攻陷南皮。袁谭仓皇出逃，被曹军追上斩杀。袁谭的亲信郭图也被杀。

接着，曹操又率军北上，攻打幽州的袁熙。袁熙因部下焦触、张南叛变，出战失败，与袁尚一起投奔辽西郡的乌桓。焦触自称幽州刺史，胁迫各郡县长官都背叛袁氏，归顺曹操。焦触等被封为列侯。曹操在占领幽州后，又对并州发动了攻势。

在曹操攻下邺城后，并州刺史高干为了避免遭到打击，曾表示愿归顺曹操。袁尚、袁熙逃往乌桓后，乌桓出兵进攻犷平（今北京密云东北），曹操亲自率军援救，犷平解围，乌桓退至塞外。高干听说曹操与乌桓交战，又背叛曹操，企图乘曹操北上，偷袭邺城。曹操派部将乐进、李典截击高干。高干拒守壶关（今山西长治东南）。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亲自率军征讨高干，包围壶关。三月，壶关被攻下，高干逃往平阳（今山西临汾南），向南匈奴求救，遭匈奴单于拒绝。高干只好又南奔荆州投靠刘表，途中被上洛都尉王琰抓住斩首，并州全部平定。

这样，曹操经过五年艰苦战斗，终于全部占领了冀、青、幽、并四州，结束了北方常年战乱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然而，曹操并没有满足，为了彻底消灭袁氏残余势力，统一北方，他决定北征乌桓。

乌桓也叫乌丸，是东胡族的一支。汉初，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余部退保乌桓山。东汉初年，刘秀曾封大小首领八十余

人为侯王，并设置乌桓校尉管辖。东汉中期，分布在辽西、辽东、右北平的乌桓结合起来，称为“三郡乌桓”。东汉末年，乌桓势力强大起来，他们不时南下侵扰，一些汉人制造事端也往往求助乌桓的支持。中平四年（187），中山太守张纯，背叛朝廷，就借助乌桓辽西部大人丘力居的力量。丘力居死后，他的侄子蹋顿继位。蹋顿有武略，受到各部的拥护，成为三郡乌桓的首领。袁绍与公孙瓒作战时，也利用乌桓的力量攻打公孙瓒。打败公孙瓒后，袁绍以朝廷名义赐予蹋顿、峭王、汉鲁王等乌桓首领印绶，并封他们为单于。

袁绍死后，曹操攻打袁尚时，三郡乌桓继续支持袁氏，他还乘天下大乱之机，掠取汉朝百姓十万多户。建安十年，曹操占领邺城后，袁尚、袁熙逃入乌桓，企图借助乌桓力量与曹操抗衡。乌桓蹋顿多次进入边塞寇掠，想帮助袁绍收复失地。曹操为了消灭袁氏集团的残余势力，决定平定乌桓。

然而，征讨乌桓并非易事。建安十二年二月，曹操专门召集文武官员讨论此事，不少人都表示担心，他们说：“袁尚不过是个亡虏，乌桓人贪婪不讲情义，怎么会被袁尚利用？如果我们深入乌桓地区，在荆州的刘备必然劝说刘表袭击许都，万一发生变故，后悔就晚了。”郭嘉与他们的意见不同，他说：“曹公虽然威震天下，但乌桓倚仗距离我们遥远，必然不作准备。我们乘他无备来个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取胜。而且袁绍在河北颇有影响，袁尚等人尚在，如果我们舍掉乌桓而南征，袁尚就会依仗乌桓的帮助卷土重来，也会使蹋顿产生觊觎中原之心。那时青州、冀州还会有丢掉的危险。而荆州的刘表不过是个清谈客，他自知才能比不上刘备，对刘备怀有戒心，重用了怕不能控制，轻视刘备，刘备也不会真心实意帮助他。因此，即使我们虚国远征，您也不必担忧。”曹操听从了郭嘉的意见，决定出兵远征。

曹操欲征讨乌桓，必须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他组织人力开凿

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自呼沲入泒水，大体在今河北青县至天津静海独流之间的南运河；泉州渠相当于今天津海河至天津宝坻境内的潮白河，与渤海相通。这两条河道的开凿，便利了军粮运输，也有利于农业生产，对河北、天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率大军到达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郭嘉对曹操说："兵贵神速，现在到千里外袭击乌桓，辎重多，难以迅速前进，而且敌人听到我们出兵的消息，必然有所准备，不如留下辎重，派轻兵昼夜兼程赶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曹操留下辎重，轻装前进，很快到达无终（今天津蓟县）。在无终，曹操得到了名士田畴的大力支持。

田畴，字子泰，好读书，善击剑。董卓之乱时，他不满朝政，弃官不做，带领宗族和徒附数百人，进入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避难。数年中，百姓归附他的有五千余家，远近闻名，很有威望。袁氏父子曾多次请田畴出山，授予他将军称号，都遭拒绝。田畴十分痛恨乌桓对内地的侵扰，想讨伐乌桓，但力量又不够。曹操率军到达无终前，就派人请田畴，田畴的好友邢颙对田畴说："自黄巾起事以来，海内沸腾，百姓流离。现在听说曹公法令严明，老百姓无不厌恶战乱，乱到极点就该安定了。"田畴很赞赏邢颙，对曹操的邀请欣然应允。他的部下说："以前袁绍仰慕您的名声，曾五次礼聘，您一直拒绝，现在曹操的使者一到，您就急忙前往，这是为什么？"田畴笑着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田畴随使者来到曹操军中，被任命为蓨县令，随军驻扎在无终。

曹操计划沿海边进军，攻乌桓。但这年夏天，无终一带雨水不断，靠近海边处，地势低洼，道路泥泞，行军困难，乌桓又把守险要小路，曹军不能前进。曹操很忧虑，便问田畴如何进军。田畴说："这条路每到秋夏季节经常发大水，浅处走不了马车，

深处又行不了舟船，这种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旧北平郡的治所在平冈县，过去可以从这里经过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到达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但这条路自建武年间以来已经塌陷，断绝了近二百年，不过还有小路可以通行。现在乌桓以为我们会从无终进军，不能前进就会撤兵，因而放松戒备。我们应该马上改变方向，出卢龙塞经过白檀（今河北滦平北）险阻地段，进入他们没有设防的区域，路近而行动方便。乘敌人不备发动攻击，可以不战而擒获蹋顿。”听了田畴的分析，曹操非常高兴，连声说：“太好了！”于是下令返回无终，并派人在路旁立上木牌，上写：“当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待秋冬，再行进军。”用以迷惑敌人。乌桓的探子看到后，回去报告蹋顿，认为曹军已经撤军，放松了防御。

曹操命令田畴率领他的部众作向导，登上徐无山，越过卢龙塞，凿山填谷，修筑道路五百余里，经过白檀、平冈（今河北平泉），直奔乌桓的大本营柳城。八月，当曹军到达距柳城只有二百里的白狼堆时，乌桓才发现。

乌桓首领蹋顿连忙召集袁尚、袁熙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各自率领数百骑兵迎击曹军。八月，曹操登上白狼山，突然与乌桓的骑兵相遇，乌桓军队来势凶猛，军力强盛。当时，曹军的车马辎重都在后面，身披铠甲的将士很少，左右都很恐惧。曹操却不慌张，他登高远望，发现敌军虽多，却阵容不整，便命令张辽率军迎战。经过激战，乌桓军队溃败。曹军紧追不舍，乌桓首领蹋顿及各部首领都被斩杀，胡、汉兵民投降者有二十多万人。

袁尚、袁熙及辽东单于速仆丸带领数千名残兵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有人建议曹操立即出兵，将他们消灭。曹操却胸有成竹地说：“我正好让公孙康杀袁尚、袁熙，就不麻烦兵士了。”九月，曹操率大军南撤，公孙康果然如曹操所说，并不想收留袁氏

兄弟，而是想杀死他们，为朝廷立功。于是他先在马厩中埋伏下士兵，然后请袁尚、袁熙进来，他们还未来得及坐下，公孙康一使眼色，伏兵立即上前将袁尚、袁熙抓住，当场杀死，速仆丸也一同被杀。公孙康把他们的人头送交了曹操。有的将领问曹操："您已经退军了，公孙康还将袁尚、袁熙斩首，这是为什么？"曹操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尚、袁熙，我若急于攻打，他们就会联合抵抗，如果我暂缓进攻，他们就会自相残杀，是形势必然使他们这样做。"

曹操从柳城回师时，正值天寒大旱，二百里内无水，军队又缺乏粮食，只好杀了几千匹军马充饥，凿地三十余丈才见到水，行军非常艰苦。军队返回后，曹操下令查找当初劝阻他出兵征讨乌桓的人，人们不知道其中的缘故，都很害怕。等找到那些劝阻他出兵的人后，曹操都重重地赏赐了他们，说："我这次征讨乌桓，实在危险，虽然取胜，却很侥幸，这是上天的保佑，以后不能经常这样做。你们当初的建议，才是万全之策，所以要奖赏你们，以后还要请你们提相反的意见。"

平定三郡乌桓之后，曹操把被乌桓掠去和逃亡到辽东地区的十多万百姓带回内地，还从中挑选乌桓的一些骑兵编入自己的军队，加强了军事力量。

曹操在占领河北后，又打败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战乱的局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袁绍传》、《郭嘉传》、《荀彧传》、《田畴传》、《公孙康传》、《荀攸传》、《乌丸传》

《资治通鉴》卷 65

《通鉴纪事本末·曹操篡汉》

赤壁之战

曹操打败袁绍，平定乌桓之后，于建安十三年初返回邺城。曹操并没有满足北方的统一，他雄心勃勃，准备挥师南下，一举统一全国。曹操知道，滚滚的长江是他平定南方的巨大障碍，为了适应在水上作战，他修整了玄武池，用以训练水军。

六月，朝廷撤除三公的职位，恢复丞相名称，曹操任丞相，进一步总揽朝政。

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荆州，揭开了举世闻名的赤壁大战的序幕。

荆州牧刘表听说曹操发兵，惊慌失措。这时，他重病在身，家庭内部又矛盾重重，更使刘表一筹莫展。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按惯例，刘琦是继承人。起初，刘表也喜欢刘琦，但刘表的后妻蔡氏将侄女嫁给刘琮，蔡氏喜欢刘琮，常在刘表面前说刘琦的坏话。蔡氏的弟弟蔡瑁、刘表的外甥张允等人也拥护刘琮，致使刘表转变态度，倾向于立刘琮了。刘琦被疏远后，心中很郁闷，他几次向诸葛亮求计。诸葛亮都避而不答。刘琦知道诸葛亮不愿介入家中矛盾，便想出一个办法：他特意将诸葛亮请到自己的后花园，一起上了楼阁，又让人撤掉扶梯，然后诚恳地对诸葛亮说：“现在我们上不着天，下不挨地，你的话，只有我一人听到，可以讲了吧？”诸葛亮见刘琦很真诚，便开口

说道：“你知道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的事吗！”[①] 刘琦想了想，顿时理解了诸葛亮的意思，是让他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外面去发展势力。于是，刘琦请求出任江夏太守，屯驻夏口（今湖北武汉）。

这时，曹军已逼近荆州，刘表日夜焦虑，病情加重。刘琦从江夏赶回襄阳看望父亲，蔡瑁、张允生怕他与刘表相见，触动父子感情，刘表可能立刘琦为继承人，就对刘琦说：“你父亲派你镇守江夏，责任重大，现在你却擅离职守，父亲见到你一定会生气，加重病情，这可不是孝敬之道。”他们拦住刘琦，不让他进门与刘表相见，刘琦无奈，含泪离去。

不久，刘表病死，刘琮被拥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已到达新野，刘琮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便投降了曹操。刘琦见荆州已失，投奔了江南。

这时，刘备正带着一支军队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屯驻。他得知刘琮投降的消息，曹军已经到达宛城，离樊城不远了。刘备知道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挡曹操的上万大军，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刘备率领陆军，经襄阳，奔江陵，同时派关羽率一万水军，水路撤退，到江陵会师。刘备路过襄阳时，许多百姓都跟随刘备撤退，人数达到十几万，不少人扶老携幼，行动很慢，一天才走几十里路。有人劝刘备不要管老百姓了，加快速度撤退吧！刘备不答应，他说：“要成就大事业，须有民众的支持，既然他们都愿意跟随我，我怎能忍心丢开他们不管呢？”

曹操见刘备撤退，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时他得到消息，江陵不仅战略位置重要，还藏有大量军用物资。他唯恐刘备先到，便亲自率领五千骑兵，以一天一夜行三百多里的速度追赶刘备。当

① 申生：春秋时晋献公太子。晋献公宠爱骊姬，想让骊姬的儿子奚齐继承王位。申生受排挤，无奈，自缢身死。重耳是申生的弟弟，为避难，出逃在外，献公死后，他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

刘备到达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时，曹操的骑兵追上了。刘备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只带着少数人突围逃走，他与妻子也被冲散了。张飞带着二十余骑兵断后，他过了一条河后，将桥拆毁，曹军追到，张飞手持长矛，大声喝道："我乃张翼德，谁敢前来决一死战！"曹军都知道张飞作战勇猛，谁也不敢上前应战，刘备得以脱身。这时，赵云在混乱中，奋不顾身地保护刘备的妻子，历尽艰险，终于脱险。

刘备清点所剩人马，继续南逃。由于通往江陵的道路已被曹军截断，他们无法再去江陵，转向汉水方向撤退，同由水路撤退的关羽会合。这时，江夏太守刘琦也率一万多士兵前来接应，他们一同前往夏口。与此同时，曹操顺利地占领了江陵。

曹操初战告捷，又收编了刘琮的部队，士气大盛。他决定乘胜进军，扩大战果。于是，他一面集中水陆两军，沿江东下，准备消灭刘备；一面派人向江东的孙权下战书，声称将率军八十万南下与孙权决一胜负。

刘备和孙权面对咄咄逼人的曹操，要么孤军奋战，很可能被曹操各个击破，要么联合起来共同抗曹，也许能将曹操打败。刘备、孙权集团中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联合抗曹的必要性。

刘表刚死的时候，鲁肃就向孙权建议说："荆州与我们相邻，江山险固，沃野万里，百姓富足，如果占领荆州，就奠定了帝王的基业。现在刘表刚死，他的两个儿子不团结，军中将领也各有打算。刘备现在依附刘表，但不被重用。如果刘备与刘表的部将同心协力，上下一致，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结盟友好。"孙权同意鲁肃的建议，就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荆州观察形势。

鲁肃到达夏口，就听说曹操军队已到达荆州，刘琮投降，刘备南撤的消息。鲁肃急忙赶奔当阳长坂，见到了刘备。鲁肃问刘备："现在您想到哪里去？"刘备无可奈何地回答说："苍梧太守吴巨是我的老朋友，我想投奔他那里去。"鲁肃说："吴巨是个凡

夫俗子，地处遥远的边郡，即将被别人吞并，怎么能依附他呢？我们孙将军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豪杰都归附他。现在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成就事业。我为将军打算，最好派人到江东与孙权联合，共建大业。”刘备听后非常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子瑜的朋友。”诸葛子瑜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他避乱江东，担任孙权的长史，于是诸葛亮与鲁肃成为朋友了。刘备采纳鲁肃的计策，进驻鄂县的樊口。

这时，曹操将要从江陵顺江东下，情况危急。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我愿意去见孙将军，向他求救。”刘备同意了，便让诸葛亮和鲁肃一同去拜见孙权。

当时孙权正屯兵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观望成败。他也有与刘备联合抗曹的打算，只是还没最后决定。诸葛亮见到孙权，直率地对孙权说：“现在天下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备也在荆州发展势力，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灭掉不少对手，又南下攻克荆州，威震四海，在曹操大军面前，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逃到这里，希望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采取相应对策。如果能以吴越的军队与曹操抗衡，不如及早与曹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抵抗，为什么不早些解除武装，向他称臣？现在您表面上服从朝廷，而心中犹豫不决，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如果您还不当机立断，大祸就要临头了。”

孙权听罢，反问诸葛亮：“假如真的像您说的那样，刘备为什么不向曹操称臣呢？”诸葛亮说：“田横，只是齐国的一个壮士，尚且守义不屈。[①] 何况刘备是汉家皇室后代，天下士人对他的仰慕，如同流水归大海。即使大事能成功，只能说是天意，怎么能屈居于曹操之下呢？”孙权听后，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我不能把江东土地和十万大军送给曹操，受他的控制，我决心

① 田横：秦汉间田齐人。刘邦称帝后，他不愿称臣，率五百余人，逃入海岛。刘邦使人召之，田横不从，最后自杀而死，英才盖世。

已定，抗击曹操！除了刘备以外，也没有能够抵挡曹操的人。但是刘备刚刚打了败仗，还能够抗击曹操吗?”诸葛亮说：“刘备虽然在长坂战败，但现在陆续回来的战士和关羽、刘琦的水、陆精锐部队加起来还有二万多人。曹操的军队虽多，但远道而来，已经很疲惫，就像一支飞到尽头的箭，连穿透薄绸子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是兵法所禁忌的。而且北方人不善于进行水战。另外，荆州的民众归附曹操，是迫于兵势，并不是心服。现在将军如果能派猛将统领数万部队和刘备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失败后，必然退回北方，到那时，就可以形成鼎足之势，成败之关键，就在今天!”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分析，十分高兴，便去与部下进一步商议对策。

这时孙权接到了曹操写来的信，信中声称率领八十万大军，在东吴与孙权决一胜负。孙权把这封信给部属们看，他们无不惊惶失色。长史张昭等人说：“曹操就像豺狼猛虎一样，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发布命令，我们如果抵抗他，事情就会更不顺。而且将军可以抵抗曹操的条件，就是长江，现在曹操占据了荆州，刘表的水军、战船都为他所有。曹操水陆并进沿江而下，我们与他的力量相差太大，无法比拟。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投降曹操。”

张昭是孙权集团中的老臣，他的话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只有鲁肃没说话，孙权感到为难。他起身去厕所，鲁肃追到廊檐下，孙权知道鲁肃的意思，握着鲁肃的手说：“你想说什么?”鲁肃说：“我看刚才他们的议论，只是想贻误将军，您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大事。如果要说投降曹操，我投降可以，您却不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投降了曹操，他会把我交给乡党评议，按品级定我的名位，起码还能做一个下曹从事，以后还可以逐渐升官。可是将军您投降了曹操，想要得到什么归宿呢？希望您及早确定大

计，不要听他们的议论！”孙权叹了一口气，说：“他们的建议太让我失望了，现在你说的办法，正与我的想法相同。”鲁肃为了促使孙权早下决心联刘抗曹，建议将主战的周瑜召回。当时，周瑜正在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周瑜回来后，在大会上向孙权分析了曹军的弱点，他说：“曹操名托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又凭借父兄的功业，割据江东数千里土地，兵精粮足，诸位英雄乐于为您效力，这正是横行天下，为汉朝扫除邪恶的大好时机。现在曹操前来送死，怎么可能会投降他？依我的分析，现在曹操南下，后方并不稳定。马超、韩遂在关西是曹操的后患。曹操擅长指挥陆军骑兵，却舍弃鞍马，改用他不习惯的船舰与我们较量，这是舍长就短。现在正是严寒季节，军马缺草料，给养不足；还有曹操驱使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他们水土不服，必然会发生疾病。以上几点都是用兵所忌讳的，而曹操却冒险进兵，这正是打败曹操的机会。请将军给我几万精兵，我保证为将军打败曹操！”周瑜的话使孙权情绪振奋起来，他愤愤地说：“曹操这个老贼，打算废汉篡权已经很久了，只是畏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现在，那几个英雄都已被消灭，只有我尚存，我与曹操势不两立，抵抗曹操，非常符合我的心意！”说着，拔出宝剑，砍去奏案的一角，厉声说：“诸位将领官吏们，谁再言投降，就和这奏案一样！”

这天夜里，周瑜又去见孙权，说：“众人只看见曹操信中说水、陆军八十万而惊恐不安，不去弄清虚实，就主张投降，这太无道理了。据我计算，曹操所率领的军队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这些人对曹操心怀狐疑，并不信任。曹操带着疲惫的军队，指挥三心二意的部众，人数虽多，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要五万精兵，一定能够打败曹操，请将军放心！”孙权听罢，十分感慨地说：“你的话很符合我的心意，张昭等人只顾自己，令我失望，只有你和鲁肃与我的态度一致，这真是上天安排你们来辅佐我

呀！五万军队我一时很难备齐，已选出精兵三万，战船、粮草和军械也已办好，你同鲁肃、程普先出发，我随后调发部队和物资粮草，做你的后援。你能打败曹操，就同他决战，如果不顺利，就回来同我会合，我与曹操进行决战。”

接着，孙权任命周瑜为左督，程普为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兵三万，随同诸葛亮溯江而上，到樊口与刘备会合。这时，曹操正逼近刘备。刘备兵少势单，非常焦急，巴不得诸葛亮与孙权的军队快些到来。他每天都派士兵到江边去等候。

这一天，士兵终于看到了周瑜的船队，赶忙报告了刘备。刘备派人前去慰劳，周瑜对慰劳的人说：“我现在有军务在身，不能擅自离开，我希望刘备能屈尊前来相见。”刘备忙乘一条船去见周瑜。刘备见到周瑜后，问道：“今日我们两家共同抗击曹操，实为正确决策，不知将军带来多少人马？”周瑜说：“三万。”刘备说：“可惜太少了。”周瑜胸有成竹地说：“这就足够了。你就看我如何打败曹操吧！”刘备想请鲁肃等人一起聚会交谈，周瑜说：“他们也都有军务在身，不能随意离开，你若想见他们，可以另外去拜访。”刘备对周瑜认真的态度既惭愧又高兴。刘备也拨发军队交周瑜统领。

周瑜率联军向前推进，与曹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西南，一说在今湖北蒲圻西北）相遇。

曹军的情况果然不出诸葛亮、周瑜预料的那样，许多士兵初到南方，因水土不服，患了疾病。十月十日，联军与曹军在赤壁江中展开大战，曹军失利，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周瑜则在江南安营扎寨，准备再战。

曹操因初战失利，不敢轻易而战。这时，已是冬天，他将战船首尾相连用铁链锁住，打算过了冬天再进攻东吴。

周瑜却想速战速决，打败曹操。他几次派兵挑战，曹军只是防守，并不出战。周瑜十分焦急。部将黄盖不仅作战勇猛，还善

用计谋。他见曹军把战船用铁索相连，便向周瑜建议说："现在敌众我寡，长期相持，对我们不利，必须想办法，攻破敌军。曹军正把战船连在一起，可以用火攻，击败曹军。"周瑜同意了。为了接近曹军，纵火烧船，周瑜与黄盖安排了诈降计。先由黄盖向曹操写了投降书，派人送到江北曹营。降书说："黄盖在江东受孙氏厚恩，担任将帅，待遇不薄。可是，从天下大势来看，用江东六郡有限的兵力，抗拒中原的百万大军，实在是以卵击石。江东的将吏，都知道不可以与您交战，只有周瑜、鲁肃固执偏见，不知深浅。现在黄盖真心实意地归顺曹公。周瑜统帅的军队，是非常容易打败的，等到双方交锋的时候，我愿意担任前锋，将见机行事，报效曹公。"

曹操接到降书后，起初有些怀疑，但见信上说的符合情理，便相信了，并派人把受降的时间和信号通知黄盖。

十一月十三日（甲子），是黄盖"投降"的日子。这天早上，红日东升，江面上晨雾消散，极目远望，江北旌旗猎猎，战船一字排开，黄盖已准备就绪，扬帆起航。他带领数十艘大船，船上装满浸着油液的干柴，外面用帷幕裹好，上面插上旗帜；又在每艘大船后面拴上一些操纵灵活的小船。当时，正刮着东南风，船只很快驶过江心，直奔曹操军营。曹操的将士走出船仓、军营观看。距北岸还有二里多远的时候，黄盖命令各只大船上的士兵点火。顿时，大船成了火船，黄盖和士兵迅速跳上小船，退回南岸。着了火的大船很快与曹操的船只相碰，大火一下子连成一片。火烈风猛，岸上的营寨也被烧着。顷刻间，曹操军营成为一片火海。曹军大乱，拼命逃跑，很多士兵被火烧死和淹死。这时，周瑜率领联军乘船赶到，擂起战鼓，向曹军发起攻击，曹军更加混乱，彻底崩溃。曹操率领残余部队，经华容道（今湖北潜江西南）向江陵逃去。途中泥泞，道路不通，又刮起大风，曹操行军困难，他命令士兵背草垫路，马才得以通过。许多士兵因饥

病交加，无力行走，被人马践踏，陷人泥中而死。

刘备、周瑜率军紧追不舍，曹操逃到南郡。他惊魂未定，见攻打南方无望，便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驻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镇守襄阳，自己带军队退回北方。在赤壁大战中，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操，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诸葛亮传》、《周瑜传》、《张昭传》、《鲁肃传》

平定关陇

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一时无力南下，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关陇地区。关陇包括关中、陇右和汉中。从地理位置上看，关陇地区比较偏远，易于割据。马超、韩遂就利用这一地势和曹操南下用兵之机发展了自己的力量。

马超的父亲马腾和韩遂于灵帝末年在西州起兵。初平三年(192)，他们带兵到长安，献帝封韩遂为镇西将军，驻扎金城(今兰州西北)，封马腾为征西将军，驻扎郿（今陕西眉县东）。后来马腾想扩大地盘，攻打长安，没有成功，又退回凉州。袁绍死后，他的部将高干、郭援与匈奴南单于联合，向河东发展势力。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领兵镇守关中，攻打他们，并给马腾、韩遂写信，请他们派兵支援。马腾派长子马超带兵支援钟繇，打败了郭援和南单于。朝廷封马腾为前将军、槐里侯，屯兵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曹操南征荆州时，又任马腾为卫尉，以马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马腾死后，马超统领了部众。

马超、韩遂对朝廷表面顺从，暗地却与地方势力勾结，发展力量，割据自守。赤壁之战后，曹操注意到了马超、韩遂的潜在威胁，决定讨伐他们，平定关陇。

建安十三年正月，张鲁占领了关中。三月，曹操命令司隶校尉钟繇攻打张鲁，并派夏侯渊前去增援。实际上曹操的主要目的是以攻打张鲁为名，观察马超、韩遂的反映。正如部下高柔所说：“我军向西进发，必经关中，马超、韩遂会怀疑是攻打他们，

必然互相煽动，起兵反抗。”

马超、韩遂等得知曹操向西出兵的消息，果然以为曹操要袭击他们，便联合了关中的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支军事力量，约十万多人，反叛朝廷。他们集结在潼关一带，阻止曹操进军。曹操立即派安西将军曹仁率军西征，由于马超等已做好战斗准备，士气正盛，便命令曹仁坚守营寨，不与他们交战。

八月，曹操亲自出马，率大军到达潼关，与马超等夹关对峙。当时，不少部将都说：“关西的士兵善于使用长矛，一定要挑选精锐部队做先锋，否则抵抗不住。”曹操胸有成竹地说：“作战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不在敌人手中。他们虽然善于使用长矛，我们将使他们的长处无法施展。”这时，关中联军部队纷纷到达潼关。每听到一支部队到达的消息，曹操都面露喜色。部下都很奇怪，询问缘故，曹操说：“关中地方很大，如果他们各自据险坚守，我们逐一征讨，没有一二年的功夫是平定不了的，现在他们都集中起来了，人数虽多，但没有人统一指挥，互相不服，我可以一举消灭他们，比起逐一征讨要容易得多，所以我心中高兴。”

曹操见马超的联军都集中在潼关一带，一方面向他们发动军事攻势，摆出要正面攻打潼关的架势，牵制马超的联军；暗中却派徐晃、朱灵率精兵四千人从蒲阪津（今山西永济西）西渡黄河，在黄河以西安营扎寨。接着，曹操亲自率兵从潼关向北渡过黄河，避开马超，与徐晃会合。曹操的行动出乎马超等人的预料，他们急忙派兵追赶，曹操正指挥部队渡河，见追兵赶到，仍然镇定地坐在折凳上指挥，渡河的士兵也没有慌乱。追兵越来越近了，他们向曹军射箭。许褚急忙把曹操送上船，船工中箭身亡，许褚左手举起马鞍为曹操抵挡乱箭，右手用力划船。马超在岸边紧紧追赶，校尉丁斐看到情况危急，把军队中的牛马放掉，

马超的士兵见到牛马乱奔，都忙着去抢，军队乱成一团。曹操乘机安全渡过黄河。

曹操过河后，没有停步，立即渡过西河，沿河作甬道向南推进。曹操这一避实就虚，从侧面攻击马超的战术，打乱了马超的计划，迫使他们放弃潼关，把队伍集中到渭水南岸的渭口防守。

马超急于与曹军决战，曹操却不急不躁，设置了不少疑兵，迷惑马超，暗中派士兵到渭水边，搭造浮桥，又在夜里经浮桥渡过渭水，在南岸修筑营垒。马超闻讯，率兵攻营，被曹操打败。马超见曹操不好对付，便向曹操提议休战，被曹操拒绝。

九月，曹操军队全部渡过渭水，马超几次挑战，曹军坚壁不出。马超无计可施，再次向曹操提出割地求和。贾诩认为，可以假装答应马超，然后利用阵前讲和的机会，乘机离间马超与韩遂的关系，待他们力量分散后，再消灭他们。曹操接受了贾诩的建议。

于是，双方约定在阵前单骑会面。会面那天，曹操派五千骑兵，分十行排列，铠甲在阳光下闪烁，十分威武。曹操和韩遂都不带随从，来到阵前相见。他俩本是老朋友，见面时分外亲热，他们不提军事，只说当年京都的往事与老朋友的情况，不时拍手大笑。马超等人远远望去，心中疑惑。韩遂回营后，马超问道："曹操说了些什么？"韩遂漫不经心地说："没说什么。"马超等人对韩遂产生了怀疑。过了几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了一封信，信中故意圈改涂改了许多地方，如同韩遂改动似的，信中还说："你参加起兵，是别人逼的，希望你早点过来。"马超看了这封信，对韩遂更加怀疑了。

不久，曹操突然发兵进攻马超，由于马超对韩遂有戒心，二人行动不能配合，结果大败。成宜、李堪被杀，韩遂、马超逃到凉州，杨秋、梁兴分别逃奔安定、蓝田。关中大部分地区被曹操占领。

十月，曹操从长安出发，包围了安定。杨秋无力抵抗，向曹操投降。曹操保留了他的爵位，仍让他驻守原地。梁兴在蓝田顽固坚守，拒不投降。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派夏侯渊把他打败。

曹操在渭南之战中，打败了马超的联军，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战后，一些将领问曹操："起初马超等人据守潼关，渭北没有防备，我军不从河东进攻冯翊（今陕西大荔）反而集中于潼关，几天后才渡河而西，这是什么道理呢？"曹操回答说："起初敌军据守潼关，渭北敌人虽然不多，但我们如果大军出兵河东，敌军势必增兵把守各处渡口，我们渡河取西河就困难了。所以我故意把兵力集中在潼关，把敌军全部吸引到潼关；西河的防备就更空虚了。这样，徐晃、朱灵二将军就轻易地攻取了西河。然后，我军北渡黄河，敌军无法与我们争夺西河的原因是因为有徐、朱二将的军队在那里。接着，我军又渡过渭水，修筑营垒，不理睬敌人的挑战，使他们骄傲自大。连营垒也不修筑，我还答应他们提出割地要求，使他们放松了戒备。而我们则集中兵力发动突然袭击，这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用兵之道千变万化，因时因地而异，不能墨守成规。"

这年年底，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爆发了田银、苏伯起义，曹操担心后方不稳，便留夏侯渊镇守长安，自己率兵从安定返回邺城。在曹操东返时，参谋州军事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吕布那样的勇猛，与羌人胡人关系很好，您撤军后，如果不严加防备，陇右地区又要被马超占领了。"曹操撤兵后，马超虽然重新纠集羌人、胡人进攻陇右的各郡县，许多郡县都被马超占领，只有汉阳郡的治所冀城（今甘肃甘谷南）还在坚守。马超带兵一万多攻城，杨阜等人全力帮助凉州刺史韦康守城。马超围攻冀城八个月，也未能攻下，但城中粮食即将用尽，情况十分危急。韦康派别驾阎温出城，向夏侯渊求援，但阎温被马超的军队捉住。马超将阎温捆绑起来，带到冀城下，命令阎温向城中守军

喊“东方没有救兵”，以瓦解军心。阎温却向城中高喊：“大军不过三天就到，你们要努力坚守！”城中守军倍受鼓舞。马超又气又恼，将阎温杀害了。

几天过去了，救兵仍然没有到达，城中情况更加恶劣。韦康打算投降，杨阜极力阻止，韦康不听，打开城门迎接马超。可是，马超一进城，就把韦康杀了。马超自称征西将军、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这时夏侯渊率援军赶到，马超出城迎战，夏侯渊作战失利，只得暂时撤兵。虽然马超攻克了冀城，打败了夏侯渊，内部并不稳定，一些部将秘密策划讨伐马超。杨阜在为妻子安葬期间，离开冀城，找到他的表兄、抚夷将军姜叙，对他说：“马超虽然强大，但不讲道义，弱点很多，容易对付。”姜叙决定与杨阜共同行动，他们又联络了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等人，还派人到冀城，联络了梁宽、赵衢、庞恭等人作内应。

建安十八年（213）九月，杨阜、姜叙按照事先的约定，在卤城（今甘肃甘谷附近）起兵，赵昂、尹奉等占据祁山。马超闻讯，立即率兵出城攻打杨阜，杨阜与马超大战，杨阜身上五处负伤，还坚持指挥守城，马超见一时不能将卤城攻下，想退回冀城，谁知他的部下梁宽、赵衢等人已在城内起事，关闭了城门，把马超的妻子、儿子都抓起来杀了。马超进退不得，又带兵进攻祁山，赵昂坚守了33天，马超没能攻下。在关键时刻，夏侯渊派部将张郃带五千兵军队火速增援赵昂，自己率大军紧随其后。张郃从陈仓绕小道赶到渭水，逼近了马超的军营。马超没想到曹军这么快到达，赶忙派兵迎战，结果惨败。这时，夏侯渊的大军也已到达，马超无力抵抗，就逃往汉中，投奔张鲁去了。

夏侯渊打败马超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韩遂发动了进攻。这时，韩遂在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和氐王千万联合起来，并纠集了羌、胡部族一万多骑兵，对抗曹军。夏侯渊先领兵打败了韩

遂，韩遂撤退，夏侯渊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距离韩遂的驻地仅二十余里。将领们对攻打韩遂有不同意见，一些人建议先进攻兴国的氐人，再攻打韩遂。夏侯渊则认为，韩遂的军队精锐，兴国城防坚固，很难一下子把他们打败，不过，韩遂的骑兵大多是长离地区的羌人，如果攻打长离羌人，他们必回去解救，这样，就能动摇韩遂的军心。大家都同意夏侯渊的看法。于是，夏侯渊亲自带兵攻打长离，韩遂在部下的请求下，带兵援救，正中夏侯渊计谋。双方大战，夏侯渊一举将韩遂击败，并乘胜包围了兴国，氐王千万逃到了马超那里，他手下的官兵都投降了夏侯渊。

曹军在关陇地区先后平定了马超、韩遂集团以后，还平定了割据关西三十年的宋建。

宋建是枹（fú）罕（今甘肃临夏东北）人，他乘汉末大乱时，在凉州起兵，自称“河首平汉王”，设官吏，改年号，以皇帝自居。建安十九年（214）十月，夏侯渊率军包围了枹罕，仅用一个多月，就将枹罕攻下，将宋建斩首。接着，夏侯渊又派张郃率军，渡过黄河，进人小湟中（今青海西宁北），河西的羌人全部归降夏侯渊，陇右地区平定了。

曹军打败宋建后，又向占据汉中的张鲁发动了进攻。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亲率军队攻打张鲁。氐王窦茂在途中抵抗，被张郃打败。这时逃至西平的韩遂部下见大势已去，就杀了韩遂，向曹操投降。

七月，曹操以张郃为先锋，从散关出武都。大军到达阳平关时，张鲁打算投降曹操，可是他的弟弟张卫不肯，率部下数万人占据险要关口抵抗，还在山上筑了十余里的城墙。起初，曹操听从武都投降的人说：“张鲁容易被击败，阳平城外的南、北山相距很远，无法防守。”他相信了。到了阳平关，发现地形完全不同。攻打阳平山守军时，山势险峻难攻，士兵伤亡很多，曹操很

焦急，感慨地说："靠听别人的话办事，很少能令人满意。"于是，曹操决定暂时撤军，他让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将攻山的士兵带回军营。撤军时，正值夜间，漆黑不见五指，前面军队迷失方向，误入张卫的军营。张卫的士兵以为曹军前来偷袭，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曹操乘机发动进攻，张卫无力抵抗，趁夜逃走。曹操占领了阳平关。

张鲁听说阳平关已被曹操攻陷，准备投降，功曹阎圃说："现在因为受到曹操攻打而投降，必然受到曹操轻视，不如投降朴胡，与曹操相抗，然后再归顺他，这样还有功可言。"张鲁同意了，于是率众进入巴中。临行时，张鲁的部下要烧掉仓库和带不走的物资，张鲁说："我本来想归顺曹操，只是没有实现，现在离开这里，不是恶意对抗，仓库物资本是国家所有，不要烧毁。"张鲁派人把仓库封好后，就离开了。曹操到达南郑（今陕西汉中）后，对张鲁的作法非常赞赏，知道张鲁的心情，便派人前去联络。经过谈判，张鲁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经过几年的征战，曹操终于控制了关陇地区。这是继曹操平定乌桓后，取得的又一重大的军事上的胜利，有效地巩固了曹操政权。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马超传》、《杨阜传》、《张鲁传》、《韩遂传》

淮南之争

曹操虽然在赤壁之战中惨遭败绩，但是，他并不甘心，仍然做南下的准备。为夺取淮南，他与孙权进行了反复争夺。

曹操吸取赤壁战败的教训，知道要征服南方，必须依靠水军。赤壁之战后，他便在谯（今安徽亳县）造了许多轻舟，训练水军，为水战作准备。建安十四年（209）七月，他亲率水军，自涡水进入淮河，在淝水登岸，驻扎在合肥，并派人修整芍陂，在当地屯田。后因曹操去关中征讨马超、韩遂，才推迟了这次军事行动。

建安十七年，曹操平定关中之后，又开始对东吴采取军事行动。出征前，他让阮瑀给孙权写信，对孙权进行恐吓，同时也提出，如果归附，将继续让孙权治理江南，并给予高位和重爵。孙权拒绝了曹操的威胁和利诱。十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转年正月，曹操进攻濡须口（巢湖入长江口处），攻破孙权设在长江西岸的军营，俘获了孙权的都督公孙阳。孙权闻讯后，赶忙率领七万士兵抵抗曹军。一次，双方交战，孙权把曹军包围，发起进攻，曹军有三千人被俘，数千人落水溺死。曹操兵败回营，损失惨重。孙权几次挑战，曹操也不出战。

还有一次，孙权乘船接近曹操营寨，众将领认为这是来挑战，应该出击，曹操说："我看孙权是来观察我的部队情况。"命令军队严加戒备，弓弩不得发，孙权沿着曹操的防线巡视了五六里，从容退去。曹操见孙权军容齐整，武器精良，感慨地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刘景升（刘表字）的儿子如猪狗!"孙权同曹操相持了一个多月，曹操在军事上进展不大。这时已是春天，孙权给曹操写信，说："春天雨水多，你应该撤军。"还写道："你不死，我不会得安宁。"曹操把信的内容告诉众将领，说："孙权说的是实话，不是欺骗我。"四月，他率军队回到邺城。

曹操为加强淮南地区的经济力量，减少战争时运粮之苦，命令屯驻皖县（今安徽潜山）的庐江太守朱光大规模开垦土地，种植稻田。吕蒙向孙权建议："皖县土地肥美，如果稻谷成熟，全被他们收获，归附曹操的人必定增多，应该早日除掉它。"孙权觉得有理，便亲自带兵，攻打皖城，朱光领兵防守。吴军将领计划堆土山，添置攻城器械。吕蒙说："制造攻城设备和堆土山，需要好多天才能完成，那到时，不仅敌军的城防更加巩固，而且援兵也将到达，攻城将会更困难了。而且我军乘雨多水大而来，如果在此滞留时间过长，雨季过后，大水退走，我们撤兵就困难了。依我看，皖城并不十分坚固，我军士气高昂，从四面同时攻城，很快便可攻克。"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一天拂晓，吴军对皖城发动了进攻，吕蒙率领精锐部队冲在前面，他亲自擂鼓，激励战士勇敢杀敌，经过激烈战斗，皖城终于被攻克，朱光被俘获。几天后，曹操大将张辽率兵从合肥来救，中途听说皖城已失，只好退回。孙权任吕蒙为庐江太守。

七月，曹操领兵亲征孙权。曹操数次对孙权用兵，都没有取胜，不少人信心不足。当曹操进军时，参军傅干出来劝阻，他说："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这两个地方是难以用武力降服的。"曹操不听，派张辽、李典、乐进等人带七千人马，进驻合肥，与孙权军队对峙。不久，传来夏侯渊占领陇右的消息，曹操打算乘胜攻打汉中的张鲁，便率军向西。临行时，他向部将们交待了对付孙权的办法，还交给护军薛悌一封密信，并在信封

上写“敌人来攻，再打开看”几个字。

转年八月，孙权果然率领十万军队进攻合肥，这时，曹操正在汉中。薛悌便和张辽等人一起把信拆开，只见信中写道：“如果孙权军队到达，张辽、李典带军前去进攻，乐进率军坚守，护军不要参加战斗。”原来，张辽、李典、乐进虽然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将，但彼此不够团结，此次征讨孙权，曹操派护军薛悌协调他们的关系，为使他们互相配合，曹操给他留下一封临战时再拆的信。

看了曹操的信，众将领都有些疑惑。孙权的军队号称十万，可曹军守卫合肥的仅七千人，为什么曹操还让出击呢？张辽经过思考，领会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曹公远征在外，等待救兵是来不及的，所以指示我们在敌军未集结之前主动出击，削弱其锐气，安定军心，然后再守城，就容易多了。”乐进等人都不表态，张辽气愤地说：“胜负成败在此一战，诸位如果还有疑虑，我将独自出战。”李典虽然与张辽不合，却感慨地说：“这是国家大事，怎能以私人的恩怨而忘掉公义呢？我们愿意随你出战。”于是，他们挑选八百名勇士。第二天一早，张辽与李典率领将士向敌阵发动攻击。张辽身披铁甲，一马当先，带头冲入敌阵，连斩孙权的两员大将，一直攻到孙权的大旗下。孙权惊慌失措，众将领也慌了手脚，赶忙向高处退却，张辽大声喊叫着，让孙权下来决战。孙权开始不敢动，后来见张辽带的军队并不多，才逐渐镇定下来，调集军队把张辽包围起来，张辽见势不好，赶忙带领士兵杀出一条路，冲出重围，撤回合肥。在这次战役中，张辽英勇果敢，重创了孙权军队，实现了曹操信上的要求。

孙权包围合肥十多天，没有攻克，士气有些消沉，只好撤兵。张辽乘势追击。他在高处看到孙权军队大部分已撤退到逍遥津岸，只有孙权和部分将领还留在北岸，便率领步骑猛冲过去。甘宁与吕蒙等人奋力抵抗，凌统带领亲兵保护着孙权冲出包围，

又返身杀回去与张辽奋战。他身边的战士都战死了，自己也受了伤。凌统奋力拼杀，牵制了曹军，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他估计孙权已无危险，才突围回营。

孙权乘马来到逍遥津的桥上，看到桥的南部有一丈多长的桥板已被拆去，亲近监（官名）谷利急中生智，让孙权坐稳马鞍，放松缰绳，他在后面对准马狠抽一鞭，战马猛然跳起，四蹄腾空，一下子跃过河，贺齐率三千人在南岸迎接，孙权幸免于难。

孙权登上大船，在船舱中设宴饮酒，贺齐从席间走出，流着眼泪说："今天，您差点儿遇难，部下都非常惊恐，希望您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孙权很受感动，他走上前亲自为贺齐擦眼泪说："很惭愧，我一定把这次教训刻在心上。"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招降张鲁，占据汉中后，又对孙权进行了征讨。这年十一月，曹军经合肥到达谯郡。转年正月，曹操进军至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孙权在濡须口修筑城墙，准备坚守。曹操向孙权发动进攻，孙权战败。转年三月，曹操回撤，留下伏波将军夏侯惇，统帅曹仁、张辽等驻守居巢。孙权则留平虏将军周泰守护濡须口。孙权见连年战争，双方都有损失，便派督都尉徐详到曹营求和，曹操答应了，并派使者回访，于是曹、孙双方暂时休战。

曹操对淮南地区数次用兵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他最终没能渡过长江。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孙权传》、《吕蒙传》

《资治通鉴》卷 67

汉中之争

赤壁之战后，刘备、曹操都各自发展力量，汉中成为他们的必争之地。汉中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无论谁占据汉中，都可以给对方构成很大威胁。为此，刘备、曹操为争夺汉中进行了反复较量。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打败了关陇地区的马超、韩遂以后，便亲率大军进攻汉中的张鲁。张鲁慑于曹操的军事力量。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

在张鲁决定向曹操投降的时候，丞相主簿司马懿向曹操建议："刘备靠计谋打败了刘璋，蜀人并未真心归附他，他却远征江陵，这是不可失掉的机会。现在，我们攻克了汉中，益州震动，此时进兵，刘备势必瓦解。"刘晔也说："刘备是杰出的人物，办事有章法但是缓慢，他得到蜀地时间不长，蜀人还不相信他，我们则攻克汉中，蜀人受到很大震动。乘势发兵，定能取胜。如果迟迟不采取行动，等到蜀人安定，再加上刘备身边有擅长治国的诸葛亮和勇冠三军的关羽、张飞，我们就很难打败他们了。"曹操却说："人苦于不知足，我们何必得陇望蜀？"他不采纳司马懿、刘晔的建议。七天后，有从蜀地来投降的人说："蜀中百姓不服刘备，一天发生数十次骚乱，守将虽然以斩杀来镇压，仍然安定不下来。"曹操问刘晔："现在还能进攻刘备吗？"刘晔说："现在蜀地已初步安定，不能再进攻了。"曹操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率领张郃、徐晃等守卫汉中，自己带兵回到邺

城。

在张鲁投奔巴中时，黄权对刘备说："失去了汉中，等于割去了蜀的四肢。"刘备也深知汉中重要的战略位置，于是任命黄权为护军，镇守汉中。

建安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又向刘备建议说："曹操收降张鲁，占据了汉中，而不乘势直取巴蜀，只留夏侯渊、张郃驻守汉中，自己却急速北返，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的智谋不够，而是内部有矛盾，后方不稳定的缘故。依我看，夏侯渊、张郃的才能不如我们的将领，现在向曹军发动进攻，一定能取得胜利。占领汉中后，应该广开农田，积蓄粮食，等待时机，采取行动。搞得好，可以将曹操彻底打败，恢复王室；其次，可以蚕食雍、凉二州，开辟疆土；再次，也可以坚守要塞，与曹操长期相峙。这是天赐良机，不要失掉。"刘备同意法正的计策。于是，留诸葛亮守成都，他亲率军队进入汉中，派张飞、马超、吴兰等屯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他率主力屯驻阳平关。曹操见刘备出兵，赶忙增加军队，派都护军曹洪迎战。他自己也坐镇长安，指挥作战。

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曹洪向吴兰发起进攻，张飞在固山防守，他声称要切断曹军的后路，曹洪有些犹豫不决，骑都尉曹休说："张飞若真的断我军后路，应当派军队隐蔽行动，现在他大造声势，很清楚，他并不这样做。我军应趁敌人没有集结时，迅速出击吴兰，吴兰战败，张飞自然退走。"曹洪听从了这一建议，向吴兰发动进攻，吴兰战败被杀。张飞、马超兵力不足，只好撤退。

与此同时，刘备正在阳平关与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人对峙。张郃驻守在广石，刘备率兵进攻，未能攻下，便忙写信给诸葛亮要求迅速增调益州的军队。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它的存亡，关系到益州的存亡，没有汉中，

就没有益州。这是家门口的祸患，发兵还有什么怀疑的？”当时，法正正在刘备军中，于是诸葛亮上表，任命杨洪代理蜀郡太守。

刘备与夏侯渊在阳平关相持了一年多，双方都没有得手。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率军在定军山下扎营。定军山是汉中西面的门户，如果失守，汉中就难保了。因此，夏侯渊全力迎战。刘备派俘虏将军黄忠出战夏侯渊。黄忠，字汉升，是著名老将。他早年在刘表手下任中郎将，刘备南定荆州四郡时，他投靠了刘备。后随刘备入蜀，屡立战功，他虽然上了年纪，但英勇不减当年。在与夏侯渊交战中，黄忠身先士卒，率领战士冲向敌阵，曹军大败，夏侯渊被斩杀。

夏侯渊是曹军名将，他作战勇猛，所向无敌，在平定关陇的军事行动中，多次立功，很受曹操赏识。夏侯渊虽然多次打胜仗，但他只会恃勇逞强，缺少谋略。曹操经常告诫他：“作为将领也应该有胆怯的时候，不能单凭勇猛，将领应当以勇敢为根本，但在行动时要依靠智慧和计谋，仅依靠勇敢，不过是匹夫之勇。”可是夏侯渊没有重视曹操的告诫，在定军山犯了轻敌的错误。他在军营周围围起鹿角栅栏，以为刘备的军队不敢来犯，放松了警惕，结果兵败被杀。

夏侯渊死后，军中无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督军杜袭和司马郭淮将散乱的士兵集合起来，对大家说：“张郃将军是国家的著名将领，刘备一向惧怕他。现在情况危险，只有张将军才能转危为安。”于是，张郃被推举为军中主帅。张郃很有军事才能，众将士都服从张郃指挥，军心安下来。

第二天，刘备打算渡汉水进攻曹军，曹军众将领认为寡不敌众，想在汉水边列阵抵抗。郭淮说：“这样做是向敌人示弱，很难取胜。不如在离汉水远些的地方摆下战阵，吸引他们，等他们渡河至河心的时候，我们再出击，一定可以打败刘备。”按照郭淮的办法，曹军摆好战阵。刘备见河对面的曹军战阵齐整，心里

犹豫，没有让军队渡河。

曹操得知汉中战场失利的消息，于三月从长安出发，经斜谷，迅速赶赴阳平前线。刘备对曹操的到来不以为然，说："曹公虽然亲自前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一定要夺取汉中。"他让军队把守险要之处，曹军多次挑战，蜀军始终不与曹军交锋。

有一次，曹军往北山脚下运米，黄忠带兵去夺取，去了很久，不见回转。赵云带兵去查看接应，途中正与曹操的大队人马相遇。赵云仅有几十名骑兵，情况十分危急，但他毫不惧怕，勇敢地冲向曹军，曹军慌忙后退，但很快又集中起来。赵云不敢恋战，且战且退，撤回军营。这时曹军追到，赵云既不出战，也不退却，而是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摆下"空城计"。曹军怀疑有埋伏，不敢进攻，只好撤退了。这时，赵云又让士兵擂起战鼓，虚张声势，只用强弩在后面射击曹军，并不追赶。曹军非常惊慌，拼命逃跑，互相践踏，不少人落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军营，察看了战场，称赞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啊！"

曹操和刘备相持了一个多月，曹军未获进展，军中粮食逐渐紧张起来，很多士兵逃跑了。曹操也感到再坚持下去意义不大，于是想放弃汉中。有一次，他在军事会议上规定口令为"鸡肋"。部下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只有主簿杨修整理起行装来。大家惊奇地问："这是为什么?"杨修说："'鸡肋'，就是比喻丢掉了可惜，要吃又没有什么肉。曹公用鸡肋比汉中，就可以知道他要撤军了。"果然，到五月，曹操就放弃汉中，带兵返回长安。

刘备占据汉中之后，乘势派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北上，进攻房陵（今湖北房县），杀了房陵太守蒯祺。又派副军中郎将刘封从汉中沿沔水而下，进攻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上庸太守申耽投降，势力更加扩大。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

刘备、曹操的汉中之争，以曹操撤军而告结束，刘备夺取了汉中，扩大了地盘，实力大增，为他建立蜀汉奠定了基础。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先主传》、《赵云传》、《黄忠传》、《夏侯渊传》

关羽失荆州

赤壁大战以后，荆州七郡（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实际被刘备、孙权、曹操三家分别占领。曹操战败，虽然被迫撤出江陵，但还占据着南阳郡和南郡的北部，立为襄阳郡。孙权占据的是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刘备则占领了荆州南阳郡。

建安十五年（210）刘备感到自己的土地太少，就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见孙权，要求孙权把荆州全部交给自己管理。周瑜向孙权上书，不让他把荆州让给刘备。周瑜说："刘备是一代枭雄，而且有关羽、张飞这些熊虎之将辅佐，他们一定不会长久屈居人下，为我所用。我认为应当把刘备接到吴郡（今江苏苏州），为他建造豪华、舒适的住宅，送给他美女和玩物，消磨他的意志，把他同关羽、张飞分开，让他们各驻一地，然后挟制他们，攻占他们的土地，这样大事可成。如今，您想多割让土地给刘备，使他们三人聚在一起，恐怕会像蛟龙得到云雨，终究不会再留在水中了。"吕范也劝孙权将刘备扣留。鲁肃却主张把荆州借给刘备，他说："曹操威力强大，目前我们刚占领荆州，民心还没有归附咱们，把荆州借给刘备，让他安抚民心，又给曹操多树一个敌人，这是上策。"孙权也认为，曹操正在江北威胁南方，正应该广召英雄豪杰，没有听他们的建议。

不久，周瑜去京口见孙权，主张出兵巴蜀。他说："现在曹操新败，内部不稳定，他不能很快与我们交战。我请求与奋威将

军孙瑜一起率军西进，先攻取巴蜀再吞并张鲁，并与西北的马超联合，然后同将军据守襄阳，向曹操发动攻势，这样就可夺取北方。”孙权同意周瑜的建议。周瑜返回江陵做出兵的准备，但途中得了重病，医治无效。周瑜在临终前给孙权写信说：“周瑜短命，不足可惜，只是志向未能实现，深为遗憾。现在曹操正在北方，时常侵犯边境，刘备寄寓荆州，有养虎之患。天下形势动荡不定，正是大臣和将士们奋发之日。鲁肃为人忠烈，临事不苟，可以接替我的职务。”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病逝，终年36岁。孙权得到消息后，非常悲痛，说：“周瑜有王佐之才，现在忽然短命而死，我依靠谁呢?”孙权以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领兵，以程普为南郡太守。

鲁肃依旧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孙权同意了。

建安十九年，刘备夺取了益州，势力明显增大。孙权感到刘备占据益州固然可以北出河南，进击曹操，但也可以顺江东下，直取东吴。于是，他想收回荆州。在刘备占据益州的第二年，孙权派中司马诸葛瑾向刘备索还荆州。刘备不同意，他说：“我准备夺取凉州，凉州平定了，我再把荆州全部给你们。”孙权大怒说：“刘备这是有借无还，不过是找借口拖延时间罢了。”于是他派吕蒙率军夺取荆州三郡。

吕蒙先给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写信，长沙、桂阳很快归服，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拒不投降。刘备得到消息后，亲自率兵东下，驻扎在公安，派关羽为前锋争夺三郡。孙权则到达陆口亲自坐镇指挥，派鲁肃率军驻扎益阳，对抗关羽。

鲁肃准备与关羽当面对话，众将领恐怕出意外，劝鲁肃不要去。鲁肃说：“今天的事，最好的办法是开导关羽。刘备负心，关羽不敢谋害我的性命!”于是，他约关羽会面。双方部队在百步之外排列。鲁肃责备关羽不归还三郡。关羽说：“在乌林战役中，刘备亲自参战，全力破敌，难道徒劳，连一块土地也得不

到？你还想收回吗？”鲁肃说：“不对！起初我在长阪与刘备会面时，他被曹操打败，部下还不到一校人马，计穷虑竭，精神不振，那时他未想到会有今天。我们主上可怜刘备无处安身，才援助他，帮他解决了困难，而刘备却只顾私利，忘记了过去，现在他已得到了益州，又要吞并荆州，这样的事情凡夫俗子都不忍心做，何况赫赫有名的刘备。”鲁肃的话使关羽无言以对。

正在这时，传来曹操出兵汉中的消息，刘备担心丢掉益州，便派使者向孙权请和。双方商定，以湘水为界，分割荆州。湘水以东的长沙、江夏、桂阳归属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归为刘备。

分割荆州仅是刘备、孙权暂时妥协，他们都不满足这种结局，都想寻找时机扩大地盘。当时，襄阳、樊城等地在曹操手中。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便命令关羽向襄、樊发动了进攻。襄、樊是曹操阻止刘备、孙权北上的战略要地，曹操特地派他的族弟、镇南将军曹仁在这里驻守。为加强防卫，曹操又增派平寇将军徐晃增援曹仁，驻扎在宛城。听到关羽出兵的消息，曹操又派左将军于禁和庞德率兵前往助守，于禁在樊城北面驻扎。

关羽发兵时，樊城地区连降十余天的大雨，汉水暴涨，溢出堤外，樊城被洪水包围，于禁的军营被水淹没，他率军撤至高处避水，关羽乘大船猛攻，于禁无处可逃，只得率众投降，只有庞德带领一部分军队继续顽抗。水势越来越大，部下不少人都投降了，庞德抵抗不住，想乘水船逃走，结果船被水冲翻，庞德被俘。关羽想让庞德投降，遭到拒绝。他斥责关羽说：“魏王统帅百万大军，你家刘备不过是个庸才，怎能与魏王对抗！我宁可做国家的鬼，也不做你们这些贱人的将领！”关羽大怒，杀了庞德。

接着，关羽向樊城发起进攻，城墙在洪水冲击下，不断坍塌，守城士兵惊恐不安。有的将领对曹仁说：“靠我们的力量很难改变局面，应该趁关羽还没有完全把樊城包围，夜里乘船撤

退。”汝南太守满宠坚决反对，他说：“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关羽之所以不敢急于北进，是顾虑我们攻击他的后路，如果我们弃城逃走，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应该在这里坚守。”曹仁也感到责任重大，不能撤退。于是斩白马与将士盟誓，决心齐心合力，保卫樊城。这时，城中将士仅有数千人，洪水离城墙仅有几尺高，关羽断绝了樊城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孤立樊城，关羽又派出一支军队包围了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芳等都投降了关羽。

这时，徐晃的援军赶到，他让士兵射箭书通知曹仁，鼓励他们继续坚守。曹操也亲自带兵从洛阳南下，驻扎在摩陂（今河南郏县），声援徐晃，并先后派十二营士兵前去支援。曹仁见援兵已到，守城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刘、曹关系紧张，使孙权感到有机可乘，他给曹操写信，表示愿意讨伐关羽，为曹操效力，实际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在信中，孙权还要求曹操为他保守机密，以防关羽有所防范。

曹操看信后，与部下商议，多数人认为应当保密，董昭却主张表面答应保密，暗中将信泄露出去，他说：“我们可以答应孙权为他保密，但暗中把消息泄露出去。关羽知道孙权出兵的消息，必然撤兵，与孙权交战，这样樊城便可解围。同时，我们还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替孙权保密，必定使孙权得志，这不是上策。再说，樊城被围的将士不知道将要获救，担心粮食不够，心中会惶恐不安，如果一旦发生意外，危害就更大了，况且关羽争强好胜，自以为他占据的公安、江陵二城防守坚固，绝不会轻易撤兵，因此，还是把内情泄露出去，对我们有利。”曹操接受了董昭的建议，立即命令徐晃将信用箭射入樊城和关羽军营中，被围在樊城的将士见信后，士气倍增，更坚定了守城的决心。关羽见信后，疑心是曹操搞的离间之计，面对指日便可攻下的樊

城，不愿轻易撤兵；而对孙权他也不怎么信任，他对是否撤兵犹豫不决，想等可靠消息。不久，果然传来孙权出兵袭击后方的消息，关羽只好撤兵南救江陵。

孙权派吕蒙袭击关羽。吕蒙，字子明，赤壁大战时，随周瑜、鲁肃大败曹操。在对待刘备的态度上，吕蒙主张夺回荆州，吞并刘备。早在鲁肃接替周瑜屯守陆口时，吕蒙就曾指出："现在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是熊虎，不可不防。"他还向鲁肃提出了对付关羽的五条密策，但鲁肃没有采纳。吕蒙又向孙权建议："我们应该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由征虏将军守南郡，潘璋守白帝，蒋钦率水军在江上巡游，我率兵攻打襄阳，如果这样，何必再惧怕曹操，依赖关羽呢？而刘备、关羽奸诈狡猾，反复无常，不能把他们当作心腹。现在关羽所以不敢向东用兵，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还在，如果不趁现在东吴强大夺取荆州，一旦势力转弱，再想用武力夺取，就困难了。"孙权接受了吕蒙的建议，派吕蒙驻守陆口，寻找机会袭击荆州。

关羽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虽然北攻襄阳，但对孙权可能发动袭击，还是有所防备的。在公安、南郡还留下相当数量的军队。吕蒙为了麻痹关羽，给孙权写信，建议说："关羽讨伐樊城，而在后方留下很多部队，这是怕我袭击他。我近来常患病，您可以治病为名，把我调回建业，关羽得到这个消息，一定撤出后方部队，增援襄、樊前线。这时，我军沿江西进，昼夜兼程，袭其空虚，南郡一定可以拿下，关羽可以擒获。"孙权同意吕蒙的计策，于是吕蒙声称病重，孙权便公开发布命令，将吕蒙召回建业治疗。

吕蒙回到建业后，陆逊来看望他。陆逊，字伯言，21 岁时便在孙权手下任职，是一位有眼光的年轻将领。他见到吕蒙后，说："关羽高傲自大，盛气凌人，他现在一心想北进，对我们并不在意，如果他听到你有病离开前线，一定更不加防备，这时出

其不意地袭击他，很容易打败他。请你与孙将军策划一下。”陆逊的想法与吕蒙不谋而合。吕蒙心中暗喜，但他表面却不动声色。吕蒙见到孙权，孙权问道：“谁能接替你呢?”吕蒙说：“陆逊思虑周密长远，才能出众，可以担任重要职务。他的名声不大，关羽不会注意他，有利于我们下一步行动。”于是，孙权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接替吕蒙驻守陆口。

陆逊到陆口后，马上写了一封信，恭维关羽，信中说：“您在樊城之战中，俘获于禁，远近无不佩服您的功勋。但是，曹操是一个狡猾的人，不会轻易罢休，恐怕要暗地增兵，以求一逞。此外，取胜以后，常会产生轻敌思想，希望将军全面考虑问题，以获全胜。我是一个书生，有幸与您相邻，愿意把想到的话告诉您，不一定合适，请您参考。”

关羽看罢陆逊的信，觉得陆逊对自己很谦恭，没有多大的本事，便对后方更加放心了，还将军队撤出一些增援前线。陆逊将关羽撤兵的消息及时报告了孙权，孙权立即亲自率军沿江西上，派吕蒙为前部，直奔江陵公安。为了迷惑关羽的巡逻哨兵，吕蒙将战船全部改装成商船，士兵们隐藏在船仓中，招募一些平民摇橹，昼夜兼行，把关羽设置的岗哨，都给活捉了。一直到兵临城下，荆州守军才发现。

当时，关羽派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士仁留守后方。糜芳因南郡军营失火，受过关羽的处罚。关羽北征襄樊后，糜芳、士仁负责粮草供应，有时供应不上，关羽便大怒，说：“回去后，一定治罪。”糜芳、士仁都很害怕。吕蒙得知这一情况，便让骑都尉虞翻给士仁写信，讲明利害关系，劝他投降。士仁对关羽的高傲和轻视自己很不满意，便投降了吕蒙。接着，吕蒙又让士仁劝说据守江陵的糜芳，糜芳也开城投降了。

吕蒙进入江陵后，对关羽及部将的家属加以优待和安抚。他还下令：“不得骚扰百姓和向百姓索要财物。吕蒙手下的一亲兵，

与吕蒙是同乡，从一百姓家里拿了一个斗笠盖在铠甲上，违犯了军令，吕蒙并没有因为士兵是自己的同乡而宽恕他，流着眼泪将这个士兵斩首。此事对军队影响很大，士兵再也不敢随便夺取百姓家的财物了。吕蒙关心百姓的生活，经常派亲信慰问，抚恤老人，给病人送药，给饥寒的人送粮食、衣服。关羽官府中的财物、珍宝全部封仓，等候孙权处理。吕蒙这些笼络人心的做法，受到民众的拥护。

关羽在撤军回救荆州途中，得到公安、江陵失守的消息，感到形势不妙，派人去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请刘封、孟达发兵援助，刘封、孟达以上庸新定为由，拒绝支援。

关羽南撤之后，曹仁手下的将领都说："应趁关羽身陷困境，派兵追杀，将他擒获。"赵俨不同意，他说："孙权趁关羽进攻襄樊的时机，偷袭关羽的后方，他担心我们乘关羽回救江陵时进攻他们，所以向我们表示和好，愿意为我们效力。孙权不过是想借助事变从中渔利罢了。如今关羽势力孤单，我们应该保存他，让他去与孙权相争。如果对关羽穷追不舍，会命孙权改变态度，这对我们很不利。曹操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考虑。"曹仁同意赵俨的意见，下令停止追击关羽。曹操得知关羽撤兵的消息，也赶快派人送来不许追击的命令，道理和赵俨说的一样。

关羽在南撤途中，多次派人到江陵打听消息。吕蒙每次都热情款待使者，允许他们在江陵自由活动。关羽的部下将士见到使者都上前询问，还有人托他们给亲人捎带书信，使者返回营中，关羽部下将士都知道自己的家人平安无事，因此都无心再战了，不少人还逃回江陵。

关羽军队士气不振，又无援兵，他只好向西退守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孙权见关羽已是山穷水尽，便派使者进城诱降。同时派朱然、潘璋守住关羽的退路。关羽先伪装投降，把幡旗做成人像立在城墙上，乘机突围逃走。士兵大都散去，仅有十余名

骑兵跟随关羽。十二月，关羽和儿子关平在章乡（今湖北当阳北）被孙权的军队活捉，后被杀死，时年60岁。于是孙权占据了荆州。

孙权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后，地盘增加了许多。曹操希望看到的孙、刘对立的局面实现了，他立即上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占荆州、杀关羽，对刘备却是相当大的打击。刘备发誓要为关羽报仇。孙、刘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关羽传》、《鲁肃传》、《陆逊传》、《吕蒙传》、《孙权传》、《诸葛亮传》。

曹魏屯田

东汉末年，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许多原来经济繁荣的地区因战乱而残破不堪。长安经过董卓之乱和李傕、郭汜的破坏，几乎成为一座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东汉都城洛阳几经战乱洗劫，变成一片焦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与流徙。冀州在顺帝时有户籍人口近五百万，曹操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统计人口仅得三十万，在当时还算是大州。东汉时，人口最高数字达到五千六百万，到三国时，魏蜀吴的总人口也只有一千六百余万。人口锐减，使无主荒地增多，粮食奇缺。有的军队没粮食吃，便到处抢掠。袁绍的军队在河北没有粮食，只好吃树上的桑椹；袁术的军队在江淮不得不靠捕食河中的蛤螺充饥。由于没有军粮，不少军队甚至不战自败。曹操经略四方，发展势力，也苦于粮食不足。

可见，解决军粮问题，将流散的人口与荒芜的土地结合起来，是克敌致胜，立于不败之地的当务之急。曹操手下一批谋士部将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丞相主簿司马朗曾向曹操提出恢复井田的建议。他认为，现在百姓离散，无主土地很多，应把这些土地作为公田，重新分配。当时，正值动乱时期，国家尚未统一，行公田显然不合时宜，因而曹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建安元年（196），枣祗、韩浩提出了屯田的建议，主张政府把流民组织起来，用军队的方法进行管理，以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曹操接

受了这个建议，发布了著名的《置屯田令》。令文说：“安定国家的办法，在于兵力强盛，粮食充足。秦人因为重视发展农业而统一了全国；汉武帝因为实行屯田而平定了西域，这都是前代人做出的好榜样啊！”曹操首先在许县招募流民实行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获得了成功。

在曹操推行屯田的过程中，他手下的几位谋士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枣祗、韩浩、任峻、国渊、毛玠等。枣祗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东）人，曾任东阿令、羽林监，实行屯田后任屯田都尉。他是曹操兴立屯田的首功之臣。曹操为了表彰他的功勋，于建安六年发布了《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令文说：“已故陈留太守枣祗，忠贞有才能，起初与我共举义兵，征讨四方。后来袁绍在冀州，也想得到枣祗。但枣祗一直没有离开我，我让他担任东阿令。吕布之乱时，兖州背叛，只有范、东阿完在，这又是枣祗以兵据城的功劳。后来军队缺乏粮食，只靠东阿供给，这是枣祗的功劳。到打败黄巾，占领许县，得到了不少军事物资，他又主张兴立屯田。我采纳了，任他为屯田都尉。屯田当年，大获丰收，以后继续推广，满足了军粮供应。消灭叛乱势力，平定天下，振兴王朝，是枣祗建立了这个功勋。”枣祗死后，曹操非常怀念，特地为其子封爵。

韩浩是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人，掌管禁军，封列侯。在曹操推行屯田之前，曾让部下讨论，韩浩力主屯田，与枣祗齐名。

任峻是河南中牟人，官至长水校尉，封都亭侯。他对曹魏屯田也有过突出贡献。曹操出征时，他常居守以供军需。曹操推行屯田后，任典农中郎将，数年连获丰收，仓廪皆满。可以讲，屯田的成功，首倡者是枣祗、韩浩，具体实施者是任峻。

国渊对屯田的贡献是使这一措施制度化。他在任峻之后总管屯田事务，在总结了屯田推行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后，

国渊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帮助曹操制定了《屯田法》，使屯田得以更广泛的推广。毛玠担任尚书仆射，主管选举，是曹操重要的谋臣。他对曹操势力的发展提出过重要建议。曹操占据兖州时，他对曹操说："现在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百姓失业，流离失所，饱受饥寒；国家没有积蓄，人民怨声载道，这种局面难以持久。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兵多势强，但他们是没有长远打算，也没有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人。进行战争主持正义者必然获胜，要广开财源，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这样霸王之业必能成功。"毛玠向曹操提出的政治、经济两条建议非常重要，对曹操占据政治上的主动权，扫平群雄，统一北方有重大作用。而"修耕植，蓄军资"的最好办法就是屯田，毛玠的主张与屯田的推行是一脉相承的。

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主要是招募没有土地的流民，每 50 人编为一屯，由屯司马指挥从事农业生产。屯司马的上级是郡县的典农官，大郡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县设典农都尉。典农官有单独的管理系统，中央设大司马统一领导，与郡守、县令没有互相统属关系。

参加屯田的农民称为"屯田客"或"典农部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一般情况下没有徭役和兵役负担。在屯田开始实行时，曹操与部下讨论收租的办法。大多数人认为采用"计牛输谷"的办法比较好。按照这个办法，没有耕牛的由政府提供，每年不管收成如何，用政府几头牛，就交多少租。这个办法实行后不久，枣祗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收租按官牛的头数交，丰收不增加租谷，遇到水旱灾害，农民收获量少，还要按牛的头数交租就不妥当了。他主张应按产量分成的办法收租。曹操仍坚持原来的方案，而枣祗一再提出反对意见。曹操见枣祗很坚决，就让部下再次讨论。枣祗非常自信，仍然坚持他的意见。曹操经过反复考虑，觉得枣祗的建议有道理，便采纳了枣祗的方案。

按产量分成收租的方法称“分田之术”，具体办法是：屯田客用官牛耕种的要交纳收成的六成，耕种者得四成；自备耕牛的，收成官私平分。实行屯田，使许多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回到了土地，安定了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曹魏通过屯田获得了大量的粮食，为征战群雄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屯田，就没有曹魏统一北方，雄居三国之首的强盛局面。不过，屯田是建立在对农民沉重的剥削和严格的束缚之上的。农民一旦成为屯田客，便按照军事组织管理，不得随便离开土地，成为国家佃农。因而，在屯田实行之初，便受到农民的反抗，屯田客常常逃亡，摆脱官府的控制。建安五年，发生过屯田客吴灵领导的起义。建安十六年（211），在太原又爆发了由商曜领导的大规模反抗斗争。建安二十年，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发动起义。这些起义对曹操震动很大。部下袁涣对曹操说：“老百姓安土重迁，不能强迫他们改变；愿意参加屯田的就吸收，不想参加的也不要强迫他们。”曹操接受了袁涣的建议，使屯田客与政府的矛盾有所缓和。

曹操在推行民屯的同时还推行军屯。赤壁之战以后，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曹操一时无力南下，在和孙权对峙争夺淮南时，为解决军队长期驻守，军粮供应问题，开始实行军屯。在曹魏兴立军屯的过程中，仓慈、司马懿、邓艾起了重要作用。

仓慈在淮南兴立军屯时任绥集都尉，是较早出现的军屯官员。司马懿是在魏文帝时开始展露其政治、军事才华的。他非常重视军屯，曾向曹操建议：“现在国内有二十万人不耕种，这不是治国的好现象，虽然他们当中有些是军人，也应且耕且守。”“且耕且守”，即指军屯。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实行军屯，大见成效。魏明帝时，司马懿驻军于宛（今河南南阳），也让军队屯田。后调至西线防御诸葛亮，又在长安大兴屯田，在关东因灾旱缺粮时，他调运长安的存粮五百斛，解决了京师洛阳的缺粮困

难。在他的倡导下，淮南、淮北军屯的规模最大。为保证军屯的水利灌溉，这一地区开凿了淮阳、百尺等水渠，军屯土地连成一片，粮食连年丰收，仓廪相望。

邓艾是推行军屯的实干家。他曾为襄城典农部民，后为都尉学士，因为口吃不便，改任稻田守丛草吏。司马懿很赏识邓艾，派他主管屯田。他亲自到淮南、淮北地区考察，指出，这一地区土地虽然肥沃，水利灌溉却不足，要大规模屯田，应该开河修渠，引水浇灌。这样做既可以发展屯田，又有利于漕运。邓艾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了《济河论》，阐述了他对兴办军屯的见解。他说："过去打败黄巾时，依靠在许都屯田，安定了四方。现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主要战场在淮南，若用兵，需要大批军粮，仅运粮的人就占士兵的一半，功费过大。"怎样解决军粮问题呢？邓艾提出了在淮南、淮北军屯的具体方案，即：在淮北屯驻二万人，淮南屯驻三万人，用十分之二的人轮休，可以保证有四万人且耕且守。淮河地区土地肥沃，每年可以有五百万斛的收获，六七年间，可以积累三千万斛的军粮，足够十万军队五年食用，凭借如此雄厚的军粮储备，对东吴作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司马懿接受了邓艾的建议，并按照他的方案组织实施。在淮河地区大规模实行屯田。为保证水利灌溉，引黄河水与淮水、颍水连接，受益田地达二万顷。兴办军屯取得了显著成绩，淮河流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许多流徙在外的农民重返家乡，从寿春到洛阳，民屯军屯连成一片。到曹魏后期，淮河地区屯田的军民超过三十万，成为曹魏重要的粮食产地。

曹魏实行屯田是战乱时期安置流民，使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的得力措施。屯田解决了军粮的来源问题，为曹魏政权的巩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不过，当局势稳定，战争减少之时，屯田的那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就不合时宜了，不仅屯田农民无法忍

受，一些政府官员也蚕食土地，攫为己有；甚至让屯田农民承担兵役、徭役。到曹魏后期，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屯田制便被废除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任峻传》、《毛玠传》、《仓慈传》、《邓艾传》

《晋书·宣帝纪》

曹操唯才是举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证明，得人才者得天下。曹操事业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不拘一格地录用人才。

曹操对人才的重要性有较深刻的认识。建安三年（198），袁术军中发生叛乱，曹操问司空椽属何夔："你相信这件事吗？"何夔回答："袁术无信人顺天之实，而希望得到天人之助，这是不可以得天下的，失道之主，连亲戚都背叛他，何况左右部下！依我看，袁术军中发生叛乱，不是很自然的吗？"

由于曹操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探求各种人才。官渡之战后，他尽可能多地延聘冀、青、幽、并四州的名士做官，一方面使人心归附，另一方面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由于曹操唯才是举，广招贤才，许多士人都慕名投奔了曹操。

荀彧是颍川大族荀淑之孙，聪明好学，被人称为"有王佐之才"。起初他在袁绍手下任职，后来发现袁绍心胸狭窄，不能成就大事，便于初平二年（191）投靠了曹操。曹操与荀彧交谈后，心中大喜，说："这真是我的张良呀！"曹操非常重视荀彧，他常年在外征伐，将后方军政大事都交给荀彧管理。荀彧足智多谋，多次帮曹操渡过危险，转败为胜。官渡之战时，曹袁相持不下，而曹军势弱，军粮又将尽，曹操也有些动摇，打算退回许都，便写信与留守的荀彧商量，荀彧立即回信，清醒地分析了形势，认

为这时恰似当年刘邦、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先退者将失败”，鼓励曹操坚持下去，不能退兵。在荀彧的劝阻下，曹操坚定了取胜的信心，又用许攸之计，袭击乌巢，火烧军粮，终于大破袁绍。官渡之战后，曹操一再上表称赞荀彧，说：“天下所以安定，荀彧的功勋卓著。”

曹操信任荀彧，荀彧也尽心竭力地帮助曹操，他为曹操推荐了许多人才，都被曹操重用。

郭嘉与荀彧同郡，他才华出众，很有眼光。起初投奔袁绍，后发现袁绍处事不明，优柔寡断，尤其袁绍不会用人，使有识之士无法施展才干，便离开了袁绍。当时，曹操的重要谋士戏志才逝世，曹操给荀彧写信，让他推荐能谋划军国大事的奇士，荀彧便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与他谈论天下大事，郭嘉果然谈吐不凡，曹操高兴地说：“使我成就大业的，一定就是此人！”郭嘉也很高兴，他说：“这真是我的主人。”曹操任命郭嘉为司空祭酒。郭嘉随曹操征伐四方，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战吕布、败袁绍、斩袁谭、讨乌桓，他的许多建议均被曹操采纳。曹操说：“只有郭嘉最知道我的心思。”征乌桓后，郭嘉不幸病故，年仅38岁。郭嘉之死，曹操非常悲伤，他感叹道：“哀哉奉孝（郭嘉字）！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他亲自上表献帝，请为郭嘉增加封赏。曹操还给荀彧写信，表达自己悲痛的心情，信中说：“郭嘉没有活到40岁，我们在一起共事了11年。许多危险痛苦都是一起渡过的，他通达事理，对世事看得透彻。我很想把身后的事业托付给他，哪里想到突然失去了他，真叫人悲痛伤心！”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遭到大败，他惋惜地说：“如果郭奉孝在，不会使我落得如此地步！”

曹操对荀彧的侄子荀攸也非常器重。他与荀攸谈话后，非常高兴，说：“荀攸不是普通的人，我能与他商议大事，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他先任命荀攸为尚书，不久，又任命荀攸为

军师。

曹操对于投靠他的人，只要政治上拥护他，有治国用兵之术，都热情欢迎。沛国人许褚勇猛过人，聚集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守壁垒，割地自守，在淮水、汝水、陈、梁一带名声很大。后来，许褚率众投靠了曹操，曹操见到许褚，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樊哙！"当即任许褚为都尉，跟随许褚的少年勇士们，都被任命为侍卫武士。一些敌对势力的人，只要有才能并转变态度，他也照样录用。陈琳是写文章的高手，官渡之战前，他替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罪恶，甚至连曹操祖辈也极力攻击，说曹氏是"赘阉遗丑"。等到袁绍失败后，陈琳投降了曹操，曹操对他说："你以前替袁绍写檄文，只该攻击我本人就够了，为什么要骂我的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派他与阮瑀一同担任主管撰写奏章的纪室。后来陈琳为曹操起草了不少文件。

赤壁之战后，曹操统一南方的计划受挫，为了巩固政权，准备再度出兵。曹操决定大量招集人才，他于建安十五年（210），下了第一道《求贤令》：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有不是得到有才能的人和他共同治理天下的呢？他们得到人才时，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侥幸碰到的吗？是当政的人去访求罢了。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是迫切需要寻求贤才的时候。如果一定要从廉洁高尚的人中间选用，齐桓公怎么能称霸于世呢？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姜子牙那样身穿粗布衣服、胸怀韬略，而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蒙受'盗嫂受金'的污名却很有才能而未被我们了解的人吗？你们应该帮助我发现那些地位低下的和选拔被埋没的人才。只要有人才就应该推举出来，使我能够任用他们！"

曹操的求贤令，是对汉以来任官重道德标准的挑战。他让毛玠、崔琰主管官吏的选用，许多有才干之士进入了曹魏政权。

建安十九年，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贤令，着重阐述了用人要重才能不应求全责备的道理。令中说：

“有良好品德的人，不一定有所作为；能作为的人，也不一定有德行。陈平难道有纯厚的品行？苏秦难道守信用吗？然而，陈平能协助汉高祖夺取天下，苏秦救助了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有才能的人即使有些短处，但怎么能废置不用呢！主管官吏选举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和遗漏，政事也不会被耽误了。”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又下了第三道求贤令，即《举贤勿拘品行令》。令中说：“从前伊挚、傅说出身微贱，管仲是齐桓公的仇敌，后来，都因重用他们而使国家兴盛。萧何、曹参原来是县吏，韩信、陈平曾经蒙受不光彩的名声，有被人讥笑的耻辱，但他们终于能成就王业，名传千年。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德才很高的人被埋没在民间？对那些作战果敢英勇、奋不顾身的人，有的可以担任将军、郡守。甚至背着不光彩的名声，被人讥笑的行为，或者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你们都要把所知道的推荐出来，不得有所遗漏。”这道命令，曹操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做官，这是对东汉末年以来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作为选官标准的猛烈冲击。

在曹操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贯彻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他善于搜罗人才，在曹操周围集中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士，其中有门第高贵的大族，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也有出身细微者，如刘放、孙资；还有拥护他的地方豪强，如许褚、李典。有不少昔日的政敌，归降后又被录用，如于禁、乐进、张辽、徐晃等人。他们佐命立功，成为曹魏名将。曹操身边，人才济济，“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荀彧传》、《郭嘉传》

《曹操文集》

曹丕代汉

黄初元年（220）十月二十九日（辛未），洛阳城郊繁阳亭搭起了一座高坛。文武大臣及周边部族的首领、使者数万人穿戴齐整，列队排开。在欢呼声中，34岁的曹丕登上高坛，接受了皇帝的印绶，然后点燃大火祭祀天地山川。至此，东汉王朝寿终正寝，魏国建立了。曹丕即魏文帝。

曹丕是怎样取代东汉建立曹魏的呢？

首先是曹操为他创造了称帝的条件。自曹操于建安元年（196）迎立汉献帝都许，任大将军司空，实际上已控制了朝政大权。他借朝廷的名义发布各种诏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了有利地位。曹操连年征战，不断取得胜利，他的地位越来越高。建安十三年，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被封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又晋爵为魏王，立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皆称公主。这时，曹操虽然比汉献帝还低一等，但实际上，汉献帝已成为曹操手中的傀儡，国家大权全由曹操把持。

曹操控制汉献帝，把持朝政，受到了各地军事集团的攻击，曹操与他们进行了反复较量，终于统一了北方，与孙权、刘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仅如此，曹操还与汉王室内部的反对派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建安四年，曹操正在官渡与袁绍决战，车骑将军董承得到献帝和伏皇后的密诏，要他暗杀曹操。董承拉拢将军王子服，王子服害怕，不敢参与。董承说：“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都是

我的心腹，有什么可怕的？”王子服这才答应。但是，董承等人企图谋反的消息被曹操发觉。建安五年正月，曹操果断地镇压了董承一伙。建安十九年，献帝伏皇后与她的父亲伏完及兄弟企图谋害曹操，也被曹操发觉，伏皇后和参与阴谋的家属都被诛杀。

曹操晚年地位更加巩固，反对派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了。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纪、太医令吉本等又策划谋害曹操。他们乘曹操在邺城，由吉本的儿子吉邈进攻镇守许昌的丞相长史王必，企图杀死王必，控制献帝，然后以献帝的名义进攻曹操。他们事先买通了王必的好友金祎作内应。王必没有准备，大营被攻破，王必肩头中了一箭，他急忙跑到金祎家躲避，金祎家里的人以为是同伙来了，便问：“王必被杀死了吗？这回大事就要成功了。”王必一听，知道金祎已叛变，就退到南城。转天，王必带着伤与典农中郎将严匡反攻，吉邈等溃散。十天后，王必因箭伤严重身亡，曹操下令将抓获的叛乱分子全部斩首。

这年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发动叛乱，曹操命令屯驻樊城的曹仁前去平叛，曹仁将宛城包围，不到三个月，宛城被攻克，侯音被处死。

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任西曹掾的魏讽，乘曹操出征汉中的机会，勾结长乐卫尉陈祎，阴谋进攻邺城。但他们内部不稳，临出发前陈祎害怕了，跑到曹丕那里去自首。魏讽等人被诛杀。

经过这一系列的与反对派的激烈斗争，曹操扫除了取代刘氏的障碍。然而，曹操始终没有称皇帝。其实，曹操并非不想当皇帝，只是他看到天下的形势，称帝条件还不具备，急于称帝只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建安十五年，曹操特地写了《让县自明本志令》，阐明自己的志向，表示自己没有代汉自立的野心。其中说：

“董卓作乱时，我组织义兵反对他。起初只有几千人，后到扬州重新招募，也不过三千人。以后，我担任兖州牧，击败了三

十万黄巾兵，接着又打败了在九江郡称帝的袁术，使袁术走投无路，发病死去。袁绍占据河北，兵力强盛，按实力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想到为国献身，为名传后世，终于打败了他，又斩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刘表自以为是皇帝的同族，他占据荆州，窥测方向，我又平定了荆州。我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顶点，已经超越过我的愿望了。现在说这些话，好像自我夸耀，但为了使别人无话可说，所以才毫不隐讳地说出来。假若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啊！

“或许有人见我势力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这类事，恐怕他们私下议论，说我有不逊之志，企图称帝。这种妄加猜测，使我常常感到不安。齐桓公、晋文公所以直到今天还受称赞，因为他们虽然兵势强大，还能拥戴周天子。胡亥杀蒙恬时，蒙恬说：‘自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受秦朝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余万，论我的力量足以背叛，然而我知必死还要坚持君臣大义，就是因为不敢玷辱祖先的教诲啊。’每当我读书到此处，没有一次不感动得流泪的。然而想让我放弃所统率的军队，回到武平侯国（曹操曾被封为武平侯），这实在是不行的。为什么呢？我确实担心放弃了兵权，就会被人谋害。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为国家着想，我不能追求虚名而遭受祸殃。我的封地有四县，享受三万户的租税，天下还没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邑，是可以退让的。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二万户交给国家，只享受武平县一万户的租税，以此减少别人对我的诽谤，也可以减轻我的负担。”

曹操在令文中反复表白自己并没有称帝的野心，言辞恳切，用心良苦。这虽然是他为缓和与政治反对派的矛盾，减少对立情绪而采用的一种手段，但也说明曹操有宽阔的胸怀，能够以大局为重。

与曹操对峙的孙权却极力鼓动曹操称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

月，孙权给曹操写信，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曹操的话再次表明了他不打算称帝的态度。然而，这时的东汉王朝确实早已名存实亡，曹操常年把持高位，代汉似乎顺理成章。臣下请曹操称帝呼声也日益高涨。侍中陈群说："汉朝自安帝以来，朝政日衰，到现在仅剩下一个名号而已，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归汉朝所有了。汉朝期运早已尽，历数早已终，所以桓、灵时一些宣扬谶纬的人都说：'汉行气尽，黄家尚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您的功德崇高，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您，连正在江南的孙权都向您称臣，这是天意在民间的反应，殿下应该正式登基称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夏侯惇也说："天下都知道汉朝国运已尽，可以取代了。自古以来，能为民除害，为百姓归附的，便可做天下之主。现在殿下征战三十多年，功德著于黎民百姓，为天下人心所归。您称帝既应天，又顺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从曹操掌权后的实际情况看，陈群、夏侯惇的话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曹操考虑再三还是没有答应称帝。他说："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显然，曹操把建立曹氏王朝寄托给自己的后辈了。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故，终年66岁。

曹操虽然没有当皇帝，但他不断扫除了反对派势力，稳固地控制了朝政，为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创造了条件。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其兄曹昂在随曹操征伐张绣时战死，故曹丕成为嫡长。建安十六年，曹丕任五官中郎将，转年立为魏王太子，正式成为曹操的继承人。曹操死后，曹丕嗣为魏王、丞相。这时，朝廷中要求曹丕取代东汉的呼声很强烈。曹丕也清楚，取代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东汉政权毕竟是正统王朝，曹丕要名正言顺地称帝，必须得到大族名士的支持，满足大族名士在政治上攫取特权的要求。于是，曹丕在

称帝之前颁布了选用官员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尚书陈群提出来的。他认为，汉朝任用的官员，并没有把人才都选举出来，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规定：在州和郡设中正官，由政府选择有才德、能够鉴别人才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依据所管辖地区的人物和家世，定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中正官把人才的品级情况上报政府，吏部要根据中正所定品级来决定入仕者的职务。按九品中正制的内容看，它体现了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但是，由于世家大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政府往往让他们担任各级中正官，这样他们在定人才品级的时候，往往不是根据品德、才能优劣，而主要依据家世门第的高低。于是世族士人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政府各级部门，而将寒门地主排斥在外。这一制度实质上是曹魏政权对世家大族妥协的结果。从此，世族地主成为政权中的特权阶层，世家大族自然支持曹丕代汉称帝了。

曹丕称帝后，继续执行了曹操制定的大政方针，并采取一些措施，加强统治，稳定内部。黄初三年九月，他下诏禁止妇人参政。诏令说："妇人参政，是国家动乱的根源。从今以后，大臣有事不得向太后上奏，后族之家不得担任辅佐朝政的大臣，也不得变相封爵。这一诏书要传给后代，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

曹丕对诸侯王采取严厉控制的措施。当时，诸侯王都只有封国的空名而没有实力。各王国只有百余名老兵作警卫，远离京师，又不允许诸侯王到京城朝见皇帝，并在各诸侯国设置防辅和监国等官员，以监视诸侯王的行动。他们虽然有王侯的名义，而实际上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想作平民百姓都不能。诸侯王在曹丕的严厉管束下，都非常紧张。曹丕在位六年，曹魏政权比较稳定。

曹丕在位期间，曾数次出兵伐吴，但没有成功。黄初五年八

月，他亲自指挥水军，沿蔡河、颍水进入淮河，到达寿春（今安徽寿县)。九月，抵达广陵（今江苏清江)。吴军为抵抗曹军，早已做了精心准备，他们从石头城到江乘数百里地区竖立起木桩，上面包苇席，做成假城池和了望楼；又在长江上布下许多舰船，往返巡逻。曹丕抵达长江后，望着波涛汹涌的江面，不禁感叹道："尽管我有铁骑成千上万，却毫无用武之地，看来无法取胜吴国了!"他在江边停留了多日，终因长江天堑险要，吴国防守严密，只得下令撤兵。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文帝纪》、《曹植传》、《武帝纪》

夷陵之战

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攻占荆州，关羽被杀，孙刘联盟破裂。刘备下决心要夺回荆州。转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了曹魏政权。刘备认为，这时以继承汉统的名义称帝，有利于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和影响。群臣部下也纷纷上书，请求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便于221年四月，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刘备称帝后，决意夺取荆州。同年七月，他亲率五六万大军，东征孙权。对刘备的东征，蜀汉内部有不同的意见。翊军将军赵云说："国贼是曹操而不是孙权，如果先灭掉曹魏，孙权则自然归服。如今曹操虽死，其子曹丕篡汉，我们应趁民心对曹魏不满之时，尽早夺取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迎接王师。因此，不应置曹魏而不顾，先与孙权开战。两国一旦开战，将不会很快结束，这不是上策。"大臣中持这种意见，向刘备劝谏的人很多，但刘备听不进去，他执意攻打孙吴，夺取荆州。

孙权占领荆州后，与刘备关系恶化，便主动靠近曹魏。曹丕称帝后，孙权立即派人前去祝贺。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孙权对部下说："以前刘邦也接受过项羽的分封，当汉王，这是权宜之计。现在曹丕封我为吴王，有什么不好呢？"于是接受吴王封号，定年号为黄武。七月，刘备亲自率军进攻孙权。孙权为保荆州不失，把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今湖北鄂城），加强防备并任陆逊

为大都督，率领朱然、潘璋、韩当、孙桓等大将及战士五万人，西上迎战。

刘备为了增强军事力量，特地派人到阆中（今属四川）请张飞到江州（今四川重庆）会合。张飞虽然英勇善战，雄壮威猛，仅次于关羽，但性情粗暴，对部下动辄鞭打。刘备曾告诫张飞说："你刑罚过严，杀人太多，又让处罚的人不离左右，这是取祸之道。"可是，张飞不听刘备的劝说。这次张飞领兵出发时，帐下将领张达、范强乘机将张飞杀害。他们带着张飞的头颅，投奔孙权去了。

刘备得到张飞被杀的消息，十分震惊，继续领兵东进。孙权见刘备气势汹汹，为避免恶战，派使臣向蜀汉求和。孙权的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劝他停止用兵，刘备不听。

蜀汉的先头部队在将军吴班、冯习的带领下，首先打败了驻守在巫县的吴军，然后进兵秭归。当刘备从秭归领兵出发时，治中从事黄权谏阻说："吴人强悍善战，而我们的水军顺长江东下，进易退难，我愿意率军为前锋，陛下应在后方坐镇。"刘备不听，以黄权为镇北将军，让他统率长江以北的各路蜀军。同时，亲率大军沿长江南岸向吴进发。黄初三年（222）二月，蜀军到达猇亭（今湖北宜都北），东吴将领纷纷请求出击。陆逊认为，蜀军来势很猛，硬打恐怕吃亏，说："刘备率军东下，锐气正盛，而且居高临下，据守险要，难以马上进攻，即使攻破，也难以获得全胜。如果出击不利，影响大局，问题将会很严重。现在我们应该奖励战士，广泛征求破敌方案，等待形势变化。蜀军现在是沿山行军，大部队的声势无法施展，只能在树木和山石之间消耗力量，我们应等待时机，抓住蜀军的弱点，打败他们。"吴军将领们不理解陆逊的意图，还认为陆逊畏惧蜀汉的军队，对他心怀不满。

陆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他命令吴军退

出山地，将几百里的崇山峻岭让给蜀军，把部队集中在猇亭地区。刘备则没有料到陆逊的这一招，他见各路进兵顺利，便下令从巫峡、建平直到夷陵附近，设立了数十座军营，任命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督，吴军则坚守阵地，不与蜀军交战。双方从正月开始，直到六月，仍僵持不决。刘备寻找机会与吴军开战，派部将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扎营，引诱吴军前来攻打。吴军将领都要求出击，陆逊说："这一定是刘备的诡计，先观察一下再说。"刘备见吴军不出击，计谋没有成功，便把埋伏在山谷中的八千伏兵撤了出来。

这时，天气渐热，蜀军兵力分散，运粮困难，又找不到与吴军决战的机会，士气开始低落。由于水军无法前进，刘备把水军移到陆上，在山林中安营扎寨。陆逊向孙权写信，分析了战争的形势。信中说："夷陵是军事要地，是国家的关口，夷陵虽然易得，也容易丢失。一旦丢去，不单是损失一个郡的土地，而且整个荆州都让人担忧。现在争夺夷陵，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刘备违背天常，不守护自己的巢穴却胆敢自己前来送死。我凭借大王的灵威，以顺讨逆，大败敌军就在眼前，这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当初我担心刘备会水陆并进，现在他们舍弃舟船，从陆路进发，随处扎营，观察他的军事部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愿您高枕无忧，不必惦念。"陆逊进一步加强防守，使蜀军欲战不得，进退两难，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闰六月，陆逊决定向蜀军反攻。一些人疑惑不解，说："发动进攻，应在刘备立足未稳之时，现在蜀军已深入了五六百里，与我们对峙了七八个月，占据了要塞，加固了防守，此时发动进攻，不会顺利。"陆逊说："刘备是一个狡猾的敌人，经历多，见识广，他的军队开始集结时，各方面考虑得很细致，我们无法向他发动进攻。如今蜀军已驻扎了很久，始终没有得到进攻的机会，将士疲惫，斗志消沉，已无计可施，现在正是我们进攻敌人

的好机会。”陆逊首先向蜀军的一个营垒发动进攻，结果战斗失利。但陆逊却从交锋了解到了蜀军的弱点，想出了打败蜀军的办法。他命令战士每人带一束茅草，到达蜀营外，放火攻击蜀军营寨。火借风势，很快将蜀军营寨烧毁。接着陆逊率领各路军队全线出击，用同样的办法，连破蜀军营寨四十余座，蜀将冯习、张南和胡人首领沙摩柯等人被杀，蜀将杜路、刘宁走投无路，只好投降。

刘备率领残兵败将，登上夷陵西北的马鞍山，部署军队，依险据守。陆逊紧追不舍，命令各路军队从四面围攻。蜀军抵挡不住，一败涂地，一万多人被杀。刘备带领少数人马，乘黑夜冲出重围，逃归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蜀军的舟船、器械、水陆军的物资，一时损失殆尽。蜀军的尸体塞满长江水面，顺流东下。刘备既惭愧又失望地说：“我竟然被陆逊战败羞辱，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当初，吴军将领孙桓，另外在夷道攻打蜀前锋，被蜀军包围。孙桓向陆逊求援，陆逊没有出兵，将领们说：“孙桓是大王的同姓，如今被围受困，为什么不去救他?”陆逊说：“孙桓在军中深得人心，城牢兵足，不必忧虑，等我的计划成功之后，我们不救孙将军，对孙将军的包围也会自行解除。”陆逊大胜蜀军后，包围孙桓的蜀军果然争相逃走。后来孙桓见到陆逊，说：“原先确实埋怨你见死不救，现在才知道你指挥军队真有办法。”

刘备战败，逃到白帝城后，在长江北岸的黄权因道路断绝，无法返回蜀汉，只好投降了曹魏。蜀汉有关部门的官员请求扣押黄权的妻子、儿子，刘备说：“是我对不起黄权，不是黄权对不起我，是我没有接受他的劝告。”仍同以前一样对待黄权的家属。

刘备逃到白帝城之后，吴军将领徐盛、潘璋等主张乘胜追击。孙权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认为曹魏对东吴虽然表示友好，暗地里却不怀好意，如果进攻蜀汉，曹魏很可能乘机袭击东吴，

不宜深入蜀境，便建议孙权下达退军的命令。刘备失败的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大为震惊。他叹息说："如果法孝直（法正，字孝直）不死，一定能够劝阻主上东征，即使东征，也不致遭到如此惨败。"

黄初三年九月，魏文帝曹丕以孙权不送质子，不听命令为由，亲率大军南征孙吴。面对曹魏的进攻，孙权忙调兵遣将；派建威将军吕范指挥五路军队前去迎战；同时，又派使臣到蜀汉求和。刘备左思右想，既担心孙权继续前进，又担心曹魏打败孙吴后，对自己更不利，便答应了孙权的要求。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尽管调集了大量兵力，在数量上超过了吴军，但由于陆逊采取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正确方针，破坏了蜀军的速战速决的计划，造成了蜀军疲劳、士气低落的局面，最后遭到惨败。刘备用兵失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曹丕也指出了刘备用兵的错误。他说："刘备不懂军事，哪有连营七百里能够和敌人对峙的！在杂草从生、地势平坦、潮湿低洼、艰险阻塞等处安营的军队，一定会被敌人打败，这是兵家的大忌。"

刘备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不仅没有夺回荆州，反而使蜀汉的元气大伤。他忧心忡忡，身染重病。黄初四年三月，刘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派人去成都将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来安排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干胜过曹丕十倍，必能安定国家，成就大业。假如嗣子刘禅还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德，你可以取而代之。"诸葛亮流着眼泪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贞之节，至死不渝。"刘备又告诫刘禅："我死之后，你与丞相共同处理政务，对待他要像父亲一样。"四月，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病逝，终年73岁。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刘先主传》、《张飞传》、《陆逊传》

诸葛亮治蜀

黄初四年（223）四月，刘备死后，17岁的太子刘禅即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从这时起，诸葛亮便按照刘备临终时的嘱托，尽心竭力地辅佐刘禅，治理蜀国，直到五丈原病逝，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备死后，蜀国力量虚弱，内部又不稳定，必须进一步加强吴蜀联盟，才能共拒曹魏。邓芝对诸葛亮说：“如今皇上年幼弱小，刚刚即位，应派使臣到吴再次申明和好的愿望。”诸葛亮说：“我对此事考虑好长时间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到了。”邓芝问：“这人是谁？”诸葛亮说：“就是你呀。”于是派邓芝以中部将的身份出使东吴。

十月，邓芝到达东吴。这时，孙权还臣服曹魏，所以犹豫不决，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便给孙权写信说明来意：“我这次来，也是为吴着想，并非单为蜀汉。”孙权不好推辞，接见了邓芝。孙权对邓芝说：“我早就愿意与蜀和好，但是蜀君幼弱，国小势薄，一旦为魏国所败，我也自身难保了。”邓芝说：“吴蜀两国占据四州之地，您是当世的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人杰。蜀国地势险要，可以固守，吴国有长江天堑的阻隔。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唇齿相依，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与魏鼎足而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您如果归附于魏，曹丕一定会要求您朝拜，还会要求太子去做人质，如果不服从，便以讨伐叛逆为借口，发动进攻；蜀也会顺流东下，到那时，江南之地可就不再归您所有了！”

邓芝的分析非常透彻。孙权沉默了很久，才说："你讲得很对。"于是和魏断绝关系，与蜀汉和好。

诸葛亮联吴计划的成功，使蜀汉的边境安定，获得了稳定发展国力的机会。

诸葛亮执政期间，精简官员，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整顿。他特别强调以法治国。他随刘备入蜀后，就把限制打击不法豪强、官吏做为治蜀的重要任务，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反对，纷纷要求诸葛亮放松刑罚。蜀郡太守法正也劝诸葛亮效法汉高祖，多行恩德，放宽刑罚禁令。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时，暴政虐民，逼得人们起来造反，汉高祖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宽刑弛禁的办法，这是好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则不同，刘璋暗弱，自刘焉以来，就法令不明，刑罚不严，蜀土人士，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之道，逐渐被破坏。对他们给以高位，官位高了，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到顶，他们反而轻慢无礼。这就造成了许多弊端。现在我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行法与恩赐相辅而行，上下秩序才能正常，这才是治理国家的要领。"

为了有效地以法治国，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有《法检》两卷、《科令》两卷、《军令》三卷等，还有《蜀科》。这是诸葛亮同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人共同制定的。

诸葛亮厉行法治，突出表现在他赏罚分明，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如李严（后改名李平）和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出兵北伐时，李严主持粮运，时逢雨季，路途艰险，军粮运输困难，李严为推卸责任，派人到前线假传刘禅旨意让诸葛亮撤军。诸葛亮退兵之后，他又故作吃惊，责问道："军粮很充足，为什么要退兵呢？"诸葛亮回来后，查清了李严弄虚作假、贻误战机的错误，上书刘禅将李严削职为民，流徙梓潼郡。

长水校尉廖立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第二，应当掌管朝政。他用恶语攻击诸葛亮任命的官吏，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将其免官。由于诸葛亮办事公道，受他处罚的人都心服口服。如李严、廖立得知诸葛亮病死的消息后，都很悲痛，李严竟发病而死。

诸葛亮在处罚违法乱纪者的同时，对那些有才能或有功之臣，也予以重用。张嶷出身低微，但很有才能，诸葛亮便提拔他为越巂太守。王平原为士卒，且识字不多，但他执行命令坚决，实践经验丰富，在街亭之战中立了功，诸葛亮便提拔他为将军。蒋琬本是荆州的一个缮写文书的小吏，随刘备人蜀后，任官为政清廉，办事有章法，受到诸葛亮的重视。归终时，向刘禅推荐，让蒋琬做自己的继承人。诸葛亮用人还能打破地域界限，对蜀中人士和外来人士都同样对待。

诸葛亮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北伐曹魏时，他领兵屯驻汉中，安排儿子诸葛乔和其他将领子弟率领一部分士兵在山谷中押解转运军需物资。这个工作很艰苦。诸葛乔原是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儿子，后来过继给诸葛亮。诸葛亮为这件事，便特意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信，说："诸葛乔按理可以回到成都去，但是现在诸将子弟都在转运军中物资，大家应该同甘苦、共荣辱，所以我命令他带领数百名士兵和诸将子弟一起在山谷中转运物资。"

诸葛亮执政期间，还对机构进行了整顿，精简官职，开源节流。他十分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他向百官下达文告说："所谓参与朝政，署理政务，就是要集众思广忠益。如果因为一些小隔阂而彼此疏远，就无法听到不同意见，事业就会受到损失；如果经过反复商计，有了正确的结论和办法，就如同丢掉了破鞋获得珍珠美玉。然而，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只有徐元直在听取各种意见时不迷惑。还有董幼宰，我们共事七年，见到事情办得不周到，他反复提意见，有时竟往返十次之多。如果大家能做到

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像董幼宰那样勤恳认真，我就可以减少过失了。”

诸葛亮还说：“过去我交结崔州平，他多次指出我的优缺点，后来又交结徐庶，得到许多启发和教诲。先前同董和商量事情，他每次都能直言。随后又与胡伟度共事，他多次劝谏，使我避免了很多失误。我虽然生性愚昧，见识浅陋，对他们给我的教益不能全部吸收，然而与这四位的关系始终很好，这也可以表现我对直言是不会猜疑的。”

街亭失败后，诸葛亮除了处罚主要责任者马谡外，还引咎自责，请求贬去三等，并把自己的过失向全国公布。诸葛亮对部将们说：“我们在祁山、箕谷，军队比敌人多，但是不能取胜，反而被敌人打败，这毛病不在兵多少，在我一个人身上。现在我打算精简兵将，严明赏罚，检查缺点，研究将来改进领兵的方法；如果不能改进，虽然兵多又有什么益处呢？从今以后，凡是忠虑于国的，都要指出我的缺点。这样，事业可定，敌人可灭，不用多长时间就可大功告成了。”这段话表明了诸葛亮敢于承认错误、严于责己的精神。

诸葛亮为治理好蜀国，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终日操劳，不得休息，甚至亲自校对公文。丞相主簿杨颙很担心诸葛亮身体。一次，他径直入内，劝说诸葛亮：“处理政事，各有专责，上下级的工作不能混淆。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的是王公，执行命令、亲身去做事情的是士大夫。丙吉不过问路上杀人的事，却担心耕牛因天热大喘气；陈平不知钱谷之数，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国政务，却亲自校改公文，终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劳累了吗？”丙吉是西汉宣帝时丞相，一次他外出见路上有人殴斗，死伤者横于道路，他过而不问。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民人殴斗，死伤归长安令、京兆尹来管。”陈平是西汉文帝时的丞相，一次文帝问他国家一年收入多少钱谷，他说：

"问钱谷之事，有治粟内史。"杨颙用这两个例子来劝说诸葛亮少管一些具体事务，应放手让下面的人去干。对杨颙的关心，诸葛亮深表感谢。杨颙去世，诸葛亮哭泣了三天。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任人唯贤，虚心纳谏，严于律己，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刘璋统治时的种种弊端。同时诸葛亮也认识到，要使蜀国强大，具备与魏、吴抗衡的能力，还必须发展经济，安定人民的生活。为此，诸葛亮做了许多努力，使蜀国的吏治比较清明。

他要求各级官吏重视农业，不要耽误农时，妨碍农民耕作和收割；要减轻赋税。《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诸葛亮说："诸葛亮作为丞相，安抚百姓，昭明法度，裁减官吏，制定合于时宜的制度，开诚心，布公道，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虽然有仇，也一定奖赏，触犯刑律不负责任的人即使是亲友也一定处罚。为善不论多么轻微，都要获得奖赏，作恶不论多么细小，也要受到贬责。"

诸葛亮在以法治国的同时，也认识到，要使蜀国强大，必须搞好生产。夷陵之战后，蜀国虚弱，诸葛亮一方面积极改善与东吴的关系，一方面务农植谷，闭关息民。诸葛亮为解决北伐曹魏所需的军粮，还在汉中一带屯田，并派汉中太守吕义兼任督农，负责军粮供应。

诸葛亮对水利事业也很重视。都江堰是蜀国规模最大的水利灌溉网，是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命脉。诸葛亮认为都江堰是农业的根本，是国家的资源，专门设置堰官精心管理，还派1200名壮士常驻堰区专门保护和维修，提高灌溉能力，使它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蜀国的盐铁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有的地方已能用火井（天然气）煮盐。诸葛亮曾亲自去临邛，观察一口火井，这口井宽五尺，深二三丈，后用盆盖井上，煮盐得盐。据说，蜀国有诸葛盐井十多口。可见诸葛亮对盐业的关心。

蜀国的仁寿有铁矿山，诸葛亮曾在此冶炼、铸造兵器。他还采金牛山铁铸剑。地方官吏蒲元是炼钢能手，他在斜谷为诸葛亮制造兵器时，发现当地水质不符合淬火要求，专门派人去成都取水。他给诸葛亮打造了三千把刀，为了试验刀刃的锋利程度，用竹筒装满铁珠，用刀砍筒，竹断珠裂，被称为“神刀”。蜀国手工业中，织锦业最为发达，锦江、锦里都因锦而得名。诸葛亮积极鼓励种桑养蚕织锦，使蜀锦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诸葛亮曾把锦作为与吴交聘的礼物，魏、吴的锦也多是蜀国生产的。蜀锦成为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诸葛亮说：“现在民贫国虚，能战胜敌人的物资，全依靠锦了！”后来，魏灭蜀，府库还存有锦、绮、綵、绢各二十万匹。

经过诸葛亮的精心治理，蜀国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已具备了与魏吴抗衡的能力。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才华，使他成为古往今来家喻户晓的人物。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诸葛亮传》、《廖立传》、《李平传》

《诸葛亮文集》

七擒孟获

蜀汉南部的益州（今云南晋宁）、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牂牁（今贵州黄平）、越嶲（今四川西昌）等郡，统称为南中地区，这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刘备死后，这里发生了反抗蜀汉的叛乱。先是益州郡豪帅雍闿趁刘禅刚继位的机会，发动武装叛乱，杀死郡太守正昂。诸葛亮又派办事干练的张裔为益州太守，雍闿挑拨蜀汉与当地民众的关系，说："蜀汉政府要向你们征收胸前都是黑色的乌狗三百头，螨脑三斗，三丈长断木三千根，你们能办到吗？"还说："张府君（裔）像葫芦瓜，外面光泽里面粗糙。"并把张裔抓起来，送往东吴，以求得孙权的支持。孙权遥任雍闿为永昌太守，并任刘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永昌郡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兵封锁边界，坚守城池，抗击雍闿。雍闿不能进入永昌郡，便派同郡人孟获煽动各地夷人纷纷叛乱。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也起兵响应雍闿。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这时，刘备刚死，内部不稳，诸葛亮感到军事力量不足，没有立即发兵平定叛乱。他抓紧时间，发展生产，安定百姓，同时争取和平解决南中叛乱问题。他让李严给雍闿写信，劝雍闿停止叛乱活动，遭到雍闿的拒绝。他在回信中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现在天下分裂，三国鼎立，使我们不知所归。"

诸葛亮见雍闿如此顽固，决心用武力平定叛乱。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南中。诸葛亮出发时，参军马

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询问破敌之策，马谡说："南中依仗地形险要偏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我们击败他们，明天他们还要反叛。用兵的道理应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要注意征服他们的心。"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

蜀军兵分三路向南中进发。诸葛亮率主力从西路进攻越巂郡。另一路由马忠带领，由僰（音骏）道（今四川宜宾）向东南攻打牂柯郡。第三路由庲降都督李恢从中路向叛乱中心益州郡方向进攻。

诸葛亮率军进入越巂郡的时候，高定派军队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定作（今四川盐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等地筑垒防守。诸葛亮到达卑水以后，停止前进，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高定急忙将各处军队调集到一起，诸葛亮趁叛军立足未稳，突然袭击，将其打败，杀死高定，占据了越巂郡。与此同时，东路军的马忠也打败了朱褒，平定了牂牁。同年五月，诸葛亮渡过泸水（金沙江），进入益州郡。这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闿被高定的部下杀死。孟获代替雍闿为首领，继续率兵反抗蜀汉。孟获在南中地区很有威信和影响，诸葛亮为安定人心，稳定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决定采用"攻心"战术，命令军队在与孟获作战时只能生擒，不许杀害。孟获与诸葛亮一交战，便被活捉了。诸葛亮为了使孟获的心服，特意让士兵列成阵势，让孟获观看。诸葛亮问孟获："这样的军队怎么样？"孟获回答说："以前我不知道你军的虚实，所以被你用计打败。现在我看了你军的阵势，不过如此，如果你放我回去，给我机会再战，我是能够取胜的。"诸葛亮听后哈哈大笑，下令将孟获释放。

孟获回去后，集合部众，又来挑战，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孟获还不服气，诸葛亮又把他放了回去。就这样，一捉一放前后有七次。当最后一次诸葛亮又要放孟获的时候，孟获感到诸葛亮确

实比自己智谋高强，他不愿意再与诸葛亮较量了，便率部众归服了诸葛亮。孟获对诸葛亮说："您真是天威；南人不再反叛了！"

诸葛亮降服孟获以后，继续带兵南下。李恢、马忠也向益州推进。七月，三路军队在滇池（今云南晋宁东）会合。南中叛乱被平息。

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对这一地区采取安抚政策。为加强统治，把原来的四个郡，增改为越嶲、建宁、永昌、云南、牂牁、兴古六个郡，仍然重用当地原来的官吏为官。如永昌太守王伉、越嶲太守龚禄，原来都是南中地区的官吏；建宁太守李恢、云南太守吕凯，不仅在南中任官，还是当地土著，这些人在民众中都有一定影响，对于稳定政局都能发挥作用。有些人对诸葛亮这样做不理解，诸葛亮说："如果留外地人为官，则要留驻军队。军队留下，粮食供应就发生困难，这是第一个不容易做到的。现在这些夷人刚刚经受创伤，父兄多有死伤，若留外人任官而不留驻军队，定有祸患。这是第二个不容易做到的。另外，这些夷人多次叛乱，杀害官吏，他们自知有罪，与我们隔阂很深，若留外地人为官，难以被他们信任，这是第三个不容易做到的。我现在要不留军队，不转运粮食，同样可以使法令、纲纪得到贯彻，让夷人汉人都安定下来。"

诸葛亮不仅任本地人在当地为官，还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的少数民族豪绅到成都蜀汉中央政权任职。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孟获的同族孟琰官至辅汉将军，爨（音窜）习官至领军将军。诸葛亮这样做缓和了蜀汉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诸葛亮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民族聚集地区，保留他们原来的组织，承认民族首领、酋长，并加赐新封号。如世代统治昆弥川（今洱海地区）的龙佑那被正式封为酋长，并赐姓张氏。牂牁郡夷帅火济，曾协助蜀汉军队破孟获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为了加强对南中的控制，诸葛亮把当地少数民族中的强壮男子编为军

队，连同其家属一万多户一起迁到蜀中。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汉军队中的一支精锐力量。诸葛亮还将部曲制度推广到南中。他把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羸弱男子分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有人不愿意依附大姓，诸葛亮便鼓励大姓出金帛收买他们，作为家部曲。对拥有部曲的大姓予以优待，他们可以世代袭官。这样，不少大族都拥有了部曲，成为蜀汉政权的支持力量。

诸葛亮也很重视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他积极推广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派人教当地少数民族使用牛耕。诸葛亮还注意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许多少数民族离开山林，到平原居住，建立村落，促进了社会进步。诸葛亮还在南中设置协铁官，经营管理盐铁生产。派人传授手工业生产技术，动员人力，修复了断绝许久的牦牛道（从今四川雅安到西昌），在沿途设立亭驿，方便商旅往来。

由于诸葛亮在南中地区推广和抚政策，不仅平息了大姓发动的叛乱活动，还改善了蜀汉政府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南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诸葛亮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诸葛亮传》

《华阳国志》卷4

《诸葛亮文集》

兄弟相煎

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正当曹丕在鼓乐声中举行登基大典时，有一个人却在暗地里伤心地哭泣，他就是曹丕的弟弟曹植。曹丕是在战胜了曹植等兄弟之后登上王位的。曹氏兄弟围绕王位进行激烈的较量，深刻地反映了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曹丕与曹植是同母兄弟，其母卞氏。曹丕比曹植年长五岁。在曹操诸子排行中，曹丕次于刘夫人所生曹昂，居第二。但曹昂在建安二年征张绣之役中，为掩护曹操而战死。曹操悲痛不已，只好在诸子中再择继承人。当时，曹丕在诸子中年龄最大，又是正室的卞夫人所生，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制度，曹丕最有希望成为太子。然而，曹操用人强调“唯才是举”，在诸子中，他最喜爱少子曹冲。曹冲聪敏过人，五六岁时，已经有成年人的见识和智慧了。一次，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象的重量，询问群臣众人，都想不出办法。曹冲却想出了主意，他说：“可以把大象放到船上，然后在船身贴水面上刻上记号，把象牵上岸后，将石块等重物称过分量放到船上，当船身的记号与水面相平时，那么船上所载物体的重量就是大象的重量。”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曹冲不仅聪明、伶俐，而且宽仁大度，见到犯罪受刑的人都前去探询，了解其中是否有冤情，对平时勤勉而偶有过失的将吏，曹冲经常替他们向曹操陈述，请求宽刑。经曹冲讲情而免遭杀戮的有几十人。曹操多次在群臣面前夸

奖曹冲，有传后于他之意。然而，曹冲仅活了13岁，在建安十三年就死了。曹操十分悲痛。曹丕劝慰曹操，曹操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兄弟的大幸。"可见曹冲若在，王位不一定落到曹丕手里。曹丕当了皇帝后，还常说："假若仓舒（曹冲字）在世，我也不会有天下。"

曹冲死后，曹操最为欣赏的是曹植了。曹植自幼聪明，才华英发，十余岁就已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对曹植的文才，曹操起初不太相信，以为是别人代笔。他曾经问曹植："你是不是请人写的?"曹植回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您可以当面考试，我何必请人代写呢?"建安十五年，曹操趁邺城铜雀台刚刚落成的机会，率诸子登台，令他们各自作赋。曹植援笔立成，写得极为出色。曹操十分惊异，对曹植更加赏识了。每当曹操问以军国大事，曹植都能应声而答。曹植与一批名士如杨修、丁仪、丁廙、贾逵、王凌等人关系很好。他们都利用接近曹操的机会鼓动曹操立曹植为太子。为使曹植成功，他们积极为曹植出谋划策。他们忖度曹操的心思，常常就一些问题预先给曹植作好答词，每当曹操向曹植提问时，曹植都能迅速回答。

曹操对曹植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可定大事，很想立他为太子。他多次带曹植南征北伐，经受实际锻炼。曹植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在给杨修的信中表示："要为国家效力，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曹植的受宠，全被其兄曹丕看在眼里。曹丕虽然在文才上略逊于曹植，但也是个颇有志向、文武双全的人。他4岁开始学习骑马射箭，弓不虚发，还擅长剑术，常随父亲曹操出征，武艺更加精强。一次，在酒席间，他以甘蔗为兵器，与擅长搏击、能空手夺刀的勇将军邓展演练，只数个回合，便三次击中邓展的胳臂。邓展不服，重新交手，曹丕一击正中邓展的额头，众人大吃

一惊，无不佩服曹丕高超的武艺。曹丕也喜爱文学，8岁便能写文章。他的《燕歌行》，情景交融，文笔优美，是我国古代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在曹操眼里，曹丕和曹植各有所长，只是更偏爱曹植罢了。曹丕见曹植得宠，自然不甘心，他与身边的亲信密谋策划，排挤曹植。建安十六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朝廷上许多官吏都依附在曹丕门下，曹丕的府第前常常宾客满座。支持曹丕为太子的有贾诩、崔琰、毛玠、邢颙、吴质、桓阶、卫臻等。他们根据《春秋》立嫡以长之义，力主立曹丕为魏王太子。

为了与曹植争位，曹丕经常派人打听曹植及其亲信的活动，并收买曹植府中的人，让他们到曹操那里去告密，使曹操知道了杨修为曹植作答词等事情，引起曹操对杨修和曹植的不满。与颇有心计的曹丕相比，曹植在政治斗争方面显得幼稚、不成熟，尤其他常常意气用事，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使曹操很生气，逐渐失去了对他的好感。有一次曹操离邺城外出，曹植酒后在一个随从的怂恿下，违反禁令，私自打开司马门而出，在只允许王公行走的驰道上跑了一趟。曹操得知后大怒，立即下令杀了随从，并数次发布命令斥责曹植，说："最初我认为子建（曹植字）是诸子中最可以定大事的。""自从临淄侯曹植开司马门私出后，使我另眼看待他了。"还有一次，曹仁被关羽围困，曹操打算派曹植带兵解救曹仁，谁知曹植酒后大醉，不能从命，使曹操非常恼怒。

曹植疏阔的人生态度，接连的过失，导致了他在争夺太子位时失手。而曹丕却处处小心谨慎，利用各种机会取悦曹操。一次，曹操出征将行，曹丕与曹植都在路边送行，曹植称颂曹操的功德，预祝出师得胜，出口成章，文辞高妙，左右将领都凝神倾听，曹操也很高兴。曹丕的才思不如曹植，在那里默默不语，怅然若失。这时他的亲信吴质悄悄告诉曹丕："等父王出发时，你

流涕就是。”曹操临行时，曹丕一边哭着一边跪拜，曹操及左右将士也都叹息。于是不少人都认为曹植华而不实，论诚心不如曹丕。曹丕为了争到太子位，曾向老谋深算的太中大夫贾诩问计。贾诩说，要宽厚仁德，奉行仁人志士简约勤勉的精神，兢兢业业，不要违背做长子的规矩。曹丕听了他的话，时时注意约束自己，深自砥砺，使曹操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而曹植依然我行我素，曹操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不过，曹操还是欣赏曹植的才华。究竟立谁为太子呢？曹操有些犹豫不决。一天，他屏退左右，就立太子问题单独询问贾诩，贾诩只是微笑，并不回答。曹操说：“我与你说话，你不回答，这是为什么？”贾诩说：“我正在思考着一件事，因此不能马上回答。”曹操问：“你想什么？”贾诩说：“我在想袁本初、刘景升父子的事呢。”曹操大笑。于是立谁为太子的事在曹操心中最后定了下来。袁本初即袁绍，刘景升即刘表，他们都因废长立幼而引起诸子纷争。贾诩虽然没有明说，但曹操一听便明白了贾诩的意思。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终于被立为魏王太子，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逝。噩耗传出，文武百官哭作一团，人心惶惶，担心有变。这时兵部尚书陈矫大声说：“先王驾崩，天下惶恐，太子应当节哀，先即王位，以安民心。否则一旦发生意外，国家就危险了。”有人提出，按规定诸侯王崩，太子继位，必须有皇帝的诏书，陈矫厉声地说：“现在是非常时刻，不能按常规办事！”亲曹丕的大臣华歆立即进宫逼献帝下诏，封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领冀州牧。于是曹丕顺利地登上了王位。十月，汉献帝退位，曹丕代汉称帝，建立了魏国。曹丕的成功，对于曹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意味着曹植不仅丧失了曹操在世时皇子的特权，而且要在昔日的政敌、今天的至尊的控制下渡过艰难的后半生。瞻望前途，凶多吉少，曹植忧心忡忡，不寒而栗。在曹丕举行登基大典时，曹植不禁痛

哭流涕。曹丕得知后，愤恨地说："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竟敢有人痛哭！"

曹丕称帝后，为保住王位，对曹植及他认为有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兄弟们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他先将支持曹植的丁仪、丁廙收捕入狱。曹植知道中领军夏侯尚与曹丕关系密切，便托夏侯尚向曹丕说情。尽管夏侯尚再三恳求，曹丕还是将丁仪、丁廙杀了，并诛连其族中所有男子。孔桂、杨俊也因与曹植关系密切而被杀。

为防止意外，曹丕让兄弟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曹植很想祭奠一下曹操再走，曹丕不批准，他只得离开京城，回封地临淄。曹彰在曹操时多次随父出征，屡立战功，希望得到曹丕的任用，但曹丕有意疏远他。曹彰很不高兴，没等曹丕下令，便交出了自己统领的军队，回封地中牟去了。

黄初二年（221）曹丕将诸弟鄢侯曹彰、宛侯曹据、鲁阳侯曹宇、谯侯曹林、赞侯曹衮、襄邑侯曹峻等十余人一律晋爵为公，只有曹植没有晋封。非但如此，曹植在临淄也不能安稳度日，曹丕派亲信对他严厉监管。曹植动辄违犯规定，昔日与他赋诗唱和的朋友们也纷纷离他而去。曹植心情郁闷，只得终日饮酒。然而，监视他的灌均却向曹丕诬告，说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信以为真，马上派人将曹植带到京师，并召集群臣讨论治罪方案。有人提出"可削爵土，免为庶人"；有的主张"暴之朝肆"，处以极刑。曹丕的母亲卞太后忙出来阻止，她哭着对曹丕说："你兄弟曹植平时就饮酒疏狂，他自恃胸中有才，行为放纵，但念及你们是同胞兄弟，就存下他一条命吧。你若宽恕了他的罪过，我死后也就瞑目了。"曹丕这才下诏"舍而不诛"，但贬曹植为安乡侯，随后迁为鄄城侯。

一些人见曹丕、曹植关系紧张，便乘机讨好曹丕诬告曹植，使曹植的处境更加艰难。黄初三年，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

诬告曹植，曹植又被召到京师。明明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曹丕却又让群臣议罪，然后又假装“慈悲”，从宽处理。对曹丕及其亲信吹毛求疵、颠倒黑白的做法，曹植虽然极为不满，然而只能忍气吞声，不敢申辩。黄初四年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到京师晋见曹丕。曹植自思曾有过错，想借朝拜曹丕的机会当面谢罪。曹丕得知后，派人拦住曹植，既不让他朝拜，也不接受谢罪。卞太后担心曹植自杀，对着曹丕痛哭。这时曹植已披头散发光着脚，背着铁锧（一种刑具），来到了阙下。曹丕见到曹植后，仍扳着脸，神色严峻，不同曹植说话，也不让他穿鞋戴帽。曹植跪在地上哭泣，卞太后见曹丕对亲兄弟如此无情，十分生气，曹丕这才让曹植穿好衣服。

曹丕为发泄对曹植的忌恨，还曾当场让曹植作诗，达不到要求就要将曹植处死。一次，曹丕把曹植叫到跟前，对他说：“以前先王在世时，你常常向别人夸耀显示你的文章，我怀疑是你找人代笔写的。现在我限你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如能做到，就免你一死，否则从重治罪，决不宽恕。”曹植说：“请命题。”曹丕说：“我和你是兄弟，就以此为题，但不许有‘兄弟’字出现。”曹丕的话音刚落，曹植便开口吟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充满感情的诗句，打动了曹丕，他也禁不住落下眼泪。这时卞太后从殿堂后而走过来说：“你作为兄长为什么要这样逼弟弟呢？”曹丕慌忙说：“我们虽是兄弟，但是国法不可废弃。”

在曹丕不断打击迫害下，曹植身心极不自由，一言一行都有人监督指点，大小事都需要请示京师。名为王侯，实同囚犯。他有志不能伸，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失掉了做人的一切乐趣和意义。黄初七年，曹丕病死，其长子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起初曹植以为自己是曹叡的叔父，处境可能会有所改善。因而一再上书陈情，要求为年轻的皇帝出谋划策，施展政治才干。魏明帝表

面上对这位皇叔表示尊敬，在物质待遇上也予以一些照顾。然而骨子里还是继承曹丕的那一套，对曹植极不信任。曹植很想同曹叡推心置腹地叙谈一番，希予启用，但都石沉大海，没有音讯，这使曹植十分失望。曹植晚年，极其孤单凄苦，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曹植的志向，抱负都像泡沫一样破灭了。他失去了做人的一切乐趣。太和六年（232）十一月，曹植忧愤而死，终年41岁。

曹丕不仅迫害曹植，对其他兄弟也极力限制和防范。曹丕称帝后，他虽然将众兄弟封爵，但实际都是徒有空名而无实地。每个封国只拨给百余老兵，诸侯王外出游猎不得超过三十里，各诸侯王也不得私自聚会。又设防辅监国之官对他们进行监视，这些人常向曹丕汇报，诸侯王在封地如同被软禁，甚至想当普通老百姓也不成，致使曹氏兄弟人人自危，处在恐怖之中。

曹彰被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曹彰是卞太后第二子，他武艺高强，刚毅勇猛，臂力过人。一次外地献给京师一只猛虎，异常凶猛，虽然装在铁笼子里，但人们还是不敢走近观看。曹彰却一下子抓住老虎的尾巴，老虎动弹不得，搭着耳朵一声也不敢吼，众人无不佩服曹彰的神勇。曹彰作战勇敢，北伐代郡时，带领部下百余人，冲出重围。曹操听说后，高兴地说："我黄须儿大有用处！"曹丕也说："以曹彰的雄壮威武，吞并巴蜀，如苍鹰衔死鼠那样容易。"在曹丕、曹植太子之争中，曹彰站在曹植一边。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重，曾召驻守长安的曹彰到洛阳，曹彰抵达后，曹操已死。他便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曹植说："先王召我，是想立我。"他又问曹操的随从："先王的玺绶在什么地方？"曹彰的举动对曹丕刺激很大，他十分忌恨曹彰，决心除掉他。黄初四年六月，曹彰进京朝见，曹丕与他在卞太后宫中下围棋，边下边吃枣。曹丕事先让人在一部分枣中下了毒，他自己挑无毒的吃，曹彰不知，随手拿着

吃，很快中毒。卞太后见状，急忙给曹彰找水喝，可是，曹丕早已命人将所有瓶罐砸毁。卞太后光着脚跑到井边，仍无法打水。时间不长，曹彰便被毒死。曹丕本想再害死曹植，卞太后气愤地斥责他："你已经杀了任城王曹彰，不许你再杀东阿王！"曹彰之死，对曹植打击很大，他满怀悲愤之情写下了《赠白马王彪》这首诗。

曹氏兄弟为登上皇帝宝座同室操戈，争斗不已。曹丕得势后，为防止诸弟争权，千方百计限制、防范他们；对有才干的曹植、曹彰更是置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曹魏政权没有出现地方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但也造成了皇室孤立无援的弊病，使司马氏集团得以发展势力，进而篡夺了曹魏政权。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文帝纪》、《曹植传》、《曹彰传》、《华歆传》、《贾诩传》

《世说新语·尤悔》

魏明帝奢靡

曹魏黄初七年（226）夏天，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曹叡当时21岁。他继位前，一直住在东宫，专心读书，与文武官员很少见面，当皇帝后，群臣都想一睹他的风采。等了几天，曹叡单独接见侍中刘晔，两人谈论了一天。刘晔出宫后，众人忙问："新皇帝怎么样？"刘晔回答说："是秦皇、汉武那一类的人，只是才干、风度比不上他们。"事实证明，曹叡只是在奢侈上与秦皇、汉武相似，而在雄略上比他们相差甚远。

曹叡特别热衷土木工程。他刚刚即位，就在邺城给母亲甄氏修建墓园。司徒王朗前去视察工程进度，见当地百姓生活贫困，而工程仍旧进行，便上书劝阻说："我这次奉命北行，在往返途中，发现许多徭役都应该免除，希望陛下多留心政事，以战胜敌寇。您如果有远大的志向，就应该省略眼前的享受。而今建始殿前面，足够用以百官朝会，崇华殿后面足够内宫使用；华林园、天渊池足够摆设筵席，游乐欢宴。不妨先建成宫廷外的门阙，修筑好城池，其余的工程待年景好时候再兴建。现在应该专心劝民耕田，并加强军事训练，待人民富裕，军队强大，敌人自然会前来归服。"曹叡不接受王朗的意见，还下令在洛阳修建曹氏宗庙。太和三年（229）十二月，宗庙落成，曹叡把高帝曹腾、太高曹嵩、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四人的牌位从邺城迎来供奉。

太和六年九月，曹叡前往摩陂，整修许昌皇宫，兴建景福

殿、承光殿。不久，又在洛阳兴建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成总章观，高十余丈。又命令马钧监造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为建造这么多的土木工程，曹叡征调了大批农民到洛阳服役，使得土地无人耕种，大片荒芜。司空陈群上书劝阻，说："古代大禹继承唐尧、虞舜的昌盛事业，还居住在低矮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而现在刚刚结束战乱，人口很少，与汉文帝、汉景帝相比，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之边疆战事不断，将士劳累辛苦，如果再出现水、旱之患，国家的问题就更令人担忧了。从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沿途大量兴修馆所，耗费人力，太祖知道他这是使民众疲惫。而今陛下大发劳役，这也是吴、蜀所愿意看到的。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要问题，愿殿下考虑！"曹叡却说："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应该并行，等到把敌人消灭之后，只须罢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兴土木呢？"曹叡不听陈群劝告，继续兴修宫殿，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只管自己舒适，只关心自己的宫殿楼台，势必导致朝廷倾覆，国家灭亡的灾难。"中书侍郎王基、侍中高堂隆等人也上书直言极谏。曹叡才略有收敛。

曹叡在宫中，整日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仿效文武百官的数目，自贵人以下至负责打扫的宫女有数千人。他还挑选能读书识字的六名美女担任女尚书，让她们审阅、处理朝臣的奏章，认为可行的就代替皇帝批准。曹叡还常常乘坐马钧设计制作的指南车，随意游幸，遇到中意的美女，即拉上车，带到宫中。由于曹叡贪图女色，肆淫不止，虽已到壮年，还未得子。于是，廷尉高柔上书说："《周礼》规定，天子可以有后妃以下120人，嫔妃的仪规已经够盛大的了。然而我听说现在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陛下子嗣不昌盛，这恐怕与皇宫妃姬太多有关吧。我认为您可以选择少数端庄贤淑的美女留在宫中，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使陛下得以休息静养，清心寡欲，如

此，才能多子多孙。”但是，曹叡并没有按照高柔说的去做，依旧无节制地纵欲，致使终生无子。他死后，由养子曹芳继位。

曹叡异想天开，想铲平北芒山，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卫尉辛毗劝谏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现在陛下要逆自然而动，既违背了天理，又耗费人力，百姓无法承担。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之害时，而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曹叡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数次上书，用历代节俭的事例劝诫曹叡各项工程务必简约节省。他说：“如果不估量民力承受的能力，只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陛下应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如果一味贪图享乐，只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会招致国家灭亡的灾祸。

杨阜还上书，打算裁减宫女中不受宠幸者。于是叫来御府官员询问后宫人数，官员遵守旧令，说：“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责打这个官吏一百棍，斥责说：“国家不和九卿有秘密，反而和你们这些小吏有秘密吗?”杨阜仗义直言，连曹叡都有些惧怕他。

针对曹叡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的做法，散骑常侍蒋济、中书侍郎王基、尚书孙礼等人都上书劝阻。曹叡虽然不能全部接受他们的直言进谏，却都能宽容他们。

青龙三年（235）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曹叡问侍中高堂隆：“为什么发生灾祸？在礼仪上有祈求福祥、祛除灾变的意义吗?”高堂隆说：“《易传》说：‘上不俭，下不节，灾火烧其宫室。’还说：‘君王筑高台，天火为灾。’君主一心只知道修饰宫殿，不了解百姓生活贫苦，家财空竭，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火从高殿燃起。陛下宜关心政事，以答天意。”还说：“现在应该遣散民役。宫殿的建制，务必从简节约，内足以避风雨，外足以

讲礼仪便可。把火灾处打扫干净，不要随便施工，那就一定会有好的征兆出现。”高堂隆引经据典，反复劝说曹叡要以国事为重，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曹叡对杨阜等大臣的话听不进去，依旧大修宫殿。八月，下诏再度新修崇华殿，改名九龙殿。开渠引谷水流经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缎包裹井栏，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还命令著名的工艺师马钧制作“水转百戏车”，在水力推动下，车上形态各异的木人分别做击鼓、吹箫、跳绳、击剑、捣米、推磨、斗鸡等各种动作，非常精巧。

曹叡性情严厉急躁，对那些负责监督修建宫殿而没有如期完工的官员，亲自召来责问，有的官员还未陈述完原因，他便下令推出斩首。他扬言：“我最关心的就是宫殿是否按时完工，督办此事的官员，一定要尽心尽力。”高堂隆及王肃等大臣不断上书，劝谏曹叡。高堂隆在上书中说：“现在大修宫殿，造成士民失业，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国费用几乎相等！老百姓不堪忍受，都抱有怨怒的情绪。建造陋室居住，是尧、舜、禹留下的风范，修筑玉台琼室，是桀、纣对上天的冒犯，如今宫室修建过盛，慧星在天空闪烁，这就是上天发出的警告。”高堂隆多次的直言，使曹叡很不高兴，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地追求奢侈。

景初元年（237）曹叡下令将设在长安的钟簴、橐佗、铜人、承露盘迁移到洛阳。在搬运中，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几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阳，只好留在霸城。又向民间大量征集黄铜，铸成两个铜人，称为“翁仲”，矗立在皇门司马门外。又熔铜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置在宫内。还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大山。民工不够用，便命令三公九卿、文武官员都去运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及各种花草，还把山禽杂兽放人山中。曹叡无休止地滥用民力，引起许多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上书指责曹叡。司徒军议掾董寻说：

"建安以来，战争不断，人民死亡无数，有的已经绝户，幸存尽是些孤寡老弱。即使是现在宫中狭小，应当扩大，也要看看时机，不应妨碍农业生产。何况制作那些毫无用处的器物？陛下让官员们搬运泥土，修建对国家毫无用处的园林，弄得面目肮脏，衣冠不整，丢尽国家的脸。"董寻还表示："我这样劝谏，肯定会被杀，这样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算什么？"

高堂隆义正辞严地说："将要亡国的君主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担心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现在天下凋敝衰败，民无存粮，国无储备，外有强敌，军队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却大兴土木，州郡骚动不安，万一敌人入侵，谁将替国家舍身救命？"高堂隆的话触动了曹叡。他对中书监令说："看高堂隆的奏章，我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也上书说："武皇帝的时候，后宫每餐不过一盘肉，不用锦绣的衣服，不坐镶花边的垫子，所用的器物也没有丹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为子孙后代造福，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到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家财政，量入为出，恐怕还来不及，如果还不停地征发劳役，奢侈糜费，国库将会枯竭。"

尽管一批忠言直谏之臣不断地规劝曹叡，曹叡还是整日沉迷于奢侈的淫色之中，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虽说正值壮年，却已骨瘦如柴，疾病缠身，景初三年正月，在洛阳病故，年仅36岁。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明帝纪》、《王朗传》、《高柔传》、《辛毗传》

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解除了后顾之忧，并从南中调发了不少人力物力，增加了蜀汉财政力量，便加紧操练军队，准备北伐曹魏。

黄初七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即位，是为明帝。大臣曹真、陈群、司马懿等辅政。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认为，这正是北伐曹魏的好时机。第二年春天，诸葛亮率军北伐，驻扎在汉中。以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守成都，负责丞相府的各项政务。临出发前，诸葛亮向刘禅上表，陈述出兵北伐的原因，并对朝廷中的执法、用人、纳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安排。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首先对刘禅提出了希望：

"先帝开创的统一大业在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三分，我们益州贫弱，这真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众大臣在内毫不懈怠，忠贞之士在外舍身奋战，他们都是为了追念先帝的优待，而报答陛下。您应当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作志士们的朝气，不要轻看自己，说些不合情理的话，以致堵塞大臣对您的忠谏。宫廷和相府都是一个整体，赏罚褒贬，不应有什么区别，如果有违法乱纪或尽忠立功的人，应交有关部门评断赏罚，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法治，不应当有所偏向和私心，使朝廷内外执法不统一。"

接着，诸葛亮对用人做了安排。写道：

“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善良诚实，志向忠贞，因此，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无论大小，都要同他们商量，然后施行。这样一定能够弥补缺漏，获得更多的好处。将军向宠贤良公正，精通军事，过去试用他的时候，先帝称赞他很有才能，因此，大家推举他为都督。我认为，军中的事，都要和他商议，这样定能使军队团结，优劣人才安排得当。亲近贤臣，疏远小人，是前汉所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是后汉衰败的根源。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和我谈论此事，总是叹息痛恨桓、灵二帝。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坚贞忠良，能够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信任他们。这样，蜀汉的兴盛，就为期不远了。”

在《出师表》的最后，诸葛亮谈了北伐的目的：

“我本是个布衣平民，在南阳种田，只想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不求在官场中扬名。先帝不嫌我低贱，亲自屈驾三次到草庐中看望我，向我询问天下大事，我因此非常感激。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我军遭到挫折，在败军之际承担重任，在危难时刻接受使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自从接受托付以来，我日夜忧虑，唯恐辜负先帝的期望，损伤先帝的知人之明。

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率军深入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安定，军力充足，应当激励和率领三军将士，向北平定中原。我愿意竭尽全力，去铲除奸凶，复兴汉室，返回旧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效忠陛下的职责。”

诸葛亮的《出师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治国思想，表达了他统一中原的决心，也倾注了对后主刘禅的忠心和期望。《出师表》与《隆中对》一样，成为后人久传不衰的名篇。

魏明帝曹叡听说诸葛亮进驻汉中，想率军出击，打败诸葛亮。散骑常侍孙资劝阻说：“以前武帝征讨占据汉中的张鲁，在

阳平之战中，历尽艰险才取胜。后来又亲自率军救出夏侯渊的军队。他曾多次说：‘南郑（今陕西汉中）真像天上的监狱，中间的斜谷道简直是五百里石穴。’武皇帝用兵如神，深知蜀兵在崇山峻岭之间，不易征讨，因而加以容忍。如果现在发大军征讨诸葛亮，不但道路艰险，还要调集大量军队和物资，容易引起天下骚动，耗费巨大，这的确需要陛下深思。不如派大将据守各险要之处，威力足以使敌人震恐。这样可使边境安然无事，将士得以养精蓄锐。几年以后，魏国强盛，吴、蜀二国必然衰弱下去。”魏明帝见孙资的话有道理，便没有出兵。

建兴六年（228）春天，诸葛亮决定出兵北攻曹魏。出发前，他与部下将领商议进兵之策。丞相司马魏延说：“听说镇守长安的夏侯楙胆小而无谋略，请给我五千精兵，从褒中（今陕西褒城）出发，循秦岭而东，到子午谷后折向北方，不过十日，可直抵长安。夏侯楙听说我军到达，必然弃城逃走，长安城就剩下御史、京兆太守了。等魏军在东方集结起军队，还要二十多天的时间，而您率大军从斜谷必已到达长安。这样，长安以西可以一举而定。”

诸葛亮用兵谨慎，他认为魏延的主张太冒险，不如稳妥地从平坦道路出兵，先攻下陇右，再拿下关中。他拒绝了魏延从近路进攻长安的计划。

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曹魏。为了迷惑曹军，诸葛亮扬言由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出兵，去攻打郿城（今陕西眉县北），派老将赵云、邓芝带领一支军队作为疑兵，据守箕谷。诸葛亮则率领六万军队，自汉中西出祁山。

蜀军准备充分，兵强将勇，号令明肃，势如破竹。

魏军起初以为刘备死后，蜀汉数年中不会有军事行动，便放松了防备；现在突然听到诸葛亮出兵伐魏，朝野恐惧。在蜀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位于陇右的天水（今甘肃甘谷东）、南安（今甘

肃陇西东)、安定（今甘肃泾川北）等郡相继叛魏，响应蜀军。在天水的冀城，魏将姜维到诸葛亮军前投降，诸葛亮高兴地收留了他。形势对蜀军十分有利。

蜀军出兵后，魏明帝曹叡亲自到长安坐镇指挥，朝廷大臣不知如何是好。曹叡说："诸葛亮本来依据山险固守，现在亲自前来，正合乎兵书所说招敌前来的策略，一定能打败诸葛亮。"他先派大将军曹真率军据守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防御赵云；又派右将军张郃率五万军队出长安向西，阻击诸葛亮率领的主力军。

诸葛亮在西城得到魏军到来的情报，忙派参军马谡、裨将军王平等为前锋率军到达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迎战魏军。

马谡，字幼常，很有才气和抱负，喜欢兵法，谈起军事道理头头是道。刘备在世时觉得他夸夸其谈，临终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你要对他多加考察！"但诸葛亮没有理会，仍然很器重马谡。这次迎击魏军，诸葛亮又派他为先锋。然而马谡自以为是，骄傲轻敌，不听诸葛亮要他守住街亭的部署；又拒绝副将王平的劝阻，军事行动混乱无章。他放弃城池不守，远离水源，上山驻扎，犯了兵家大忌。张郃指挥魏军将马谡的军队包围，切断水源。蜀军缺水，饥渴难忍，士气低落，魏军乘机发动进攻，蜀军大败，街亭失守。

街亭失守，使蜀军失掉了进攻的据点，作战形势逆转。这时，据守箕谷的赵云也作战失利。诸葛亮感到蜀军不易继续进攻了，便下令撤军返回汉中。在回师中，将西县的千余家百姓迁往蜀汉。不久，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又归附曹魏。这样，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在汉中，诸葛亮依照军法，下令将导致战争失败的马谡下狱处死。他十分看重与马谡的友情，亲自为马谡吊丧，痛哭流涕，对他的子女进行安抚，还像过去一样对待他们。部将蒋琬对诸葛

亮斩马谡有意见，对诸葛亮说："过去楚晋交战，楚国杀了将领得臣，晋文公很高兴。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而斩杀智谋之士，难道不惋惜吗？"诸葛亮流着眼泪说："孙武所以能无敌于天下，是因为他执法严明，现在天下分裂，蜀魏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废弛军法，靠什么去讨伐敌人呢？"

诸葛亮按军法斩马谡后，又上书刘禅，要求自贬三等。他在自贬疏中检讨了自己用人不当，考虑事情不周，主动承担了责任。

有人建议诸葛亮再次发兵，攻打曹魏。诸葛亮认为应先整顿军队，不急于发兵。他说："我军在祁山、箕谷的时候，都多于敌军，但没有打败敌军，反而被敌军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现在我打算精减兵将，严明赏罚，检查过失，改变策略，用于将来；如果不这样，虽然兵多又有什么用呢？从今以后，凡一心为国家出力的将士们，只要多多批评我的过错，这样大事就可以安定，敌人就可以消灭，胜利就在眼前了。"

诸葛亮认真总结了第一次伐魏失败的教训，抓紧时间整顿军队，厉兵讲武，准备再次出兵伐魏。

建兴六年冬天，曹魏大将曹休率魏军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与吴军交战，被吴军打败。西线不少魏军前往增援，关中一时空虚。诸葛亮趁此时机又领兵数万北伐，他率大军从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出发，包围了陈仓。

陈仓地处渭水北岸，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魏将曹真派郝昭守备，诸葛亮派郝昭的同乡靳详劝说郝昭投降，被拒绝。于是，蜀军发起进攻，用云梯、战车攻城，魏军顽强防守，发射火箭将云梯烧毁，战车也被魏军用石磨砸坏；蜀军又挖掘地道企图冲入城内，魏军则挖横沟予以截断。战争不分昼夜地进行了二十多天。这时，魏国又派大将张郃、费曜等率军援助郝昭，魏军士气更旺。而蜀军的粮食却发生了困难，诸葛亮感到难于继

续进攻，便下令撤兵，返回汉中。在退师途中，魏将王双率兵追击，诸葛亮将其打败，王双被杀。

建兴七年春天，诸葛亮又发动了第三次北伐。他派部将陈式攻打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将雍州刺史郭淮领兵前去救助，诸葛亮亲率军队迎击，郭淮退走，诸葛亮追至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北）。蜀军占领了武都、阴平二郡。因诸葛亮夺取二郡有功，后主刘禅又下诏恢复了他的丞相官职。

同年四月，吴王孙权在建业称帝，国号为吴，改年号为黄龙。孙权派使者到蜀汉通报此事，并希望吴蜀两国平等往来。蜀汉许多大臣认为承认孙权的皇帝地位，不符合蜀汉正统的名分，主张与孙权断绝盟好关系。诸葛亮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曹魏是主要敌人，对孙吴应该继续友好，以便集中力量北伐曹魏。他说服了众大臣，派卫尉陈震为使者到东吴，祝贺孙权称帝，孙权很高兴。双方约定："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对方有难，当全力救助。"这样吴蜀联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建兴八年六月，魏大司马曹真向明帝上表，要求在军事上采取攻势，发兵伐蜀。他说："蜀汉多次入侵，请下令由斜谷出兵讨伐，各将领分几路同时并进，可以大胜。"魏明帝同意，命大将军司马懿自南阳溯汉水西上，出西城（今陕西安康西）进入蜀境，曹真则由子午谷南下，与司马懿在汉中会师，其他将领有的从子午谷，有的从武威攻打蜀汉。

诸葛亮得知魏军来攻，率军至城固、赤坂（今陕西洋县），等待进击魏军。同时命令魏延率一支轻骑军自河池（今甘肃徽县）出祁山，西入羌中（今甘肃南部）袭扰魏军后方。并派李严领兵二万人，赴汉中增援。

魏军在进军途中，正值大雨不停，连降三十多天，各处山洪暴发，道路断绝，军队被困，进退两难。曹魏内部一些反对向西

用兵的大臣如陈群、华歆、杨阜、王肃等人纷纷向明帝建议撤兵，先集中精力治理内部，安抚百姓，待时局有利时再出兵伐魏。在群臣的劝阻下，曹叡只好命令曹真、司马懿等撤军。

在这期间，蜀将魏延正西进羌中途中。魏征西车骑将军张郃听到魏延到来，恐怕他从背后攻打，便急忙退守上邽（今甘肃天水），并急派费曜、郭淮冒雨阻击魏延，但没有成功。魏延到达羌中后，与羌人和好相处，并招兵买马，扩大力量。十一月，魏延在返回汉中时，与魏将费曜、郭淮战于阳溪（今甘肃渭源东北）。起初，魏军将魏延包围，正待他们冲击魏延军营之际，诸葛亮的援兵赶到，从背后攻打魏军，魏延乘机突围，魏军败退。

蜀军连年征战，需要大量军粮、物资，蜀道多山，艰险难行，诸葛亮设计了一种适宜在山路行走，推拉轻便的独轮小车——“木牛”来运输军粮。

建兴九年春天，诸葛亮率领八万军队第四次北伐。此时，魏军西线指挥曹真病重，曹叡命令屯驻南阳的大将军司马懿指挥西线作战。司马懿到达长安后，派费曜率兵守卫上邽，派张郃赶赴祁山，阻截蜀军，自己亲率主力西进。诸葛亮闻讯后，派王平带一部分军队继续攻打祁山，自己率主力迎战司马懿。诸葛亮先打败了郭淮、费曜的魏军，占领了上邽。司马懿迅速进军，企图夺回上邽。诸葛亮在上邽以东迎头拦住了司马懿率领的主力军，准备与其决战。然而，足智多谋的司马懿并不急于和诸葛亮决战，他占据东山，凭险坚守，拒不出战，想拖垮蜀军。诸葛亮无计可施，便派军队收割了当地的麦子，司马懿仍坚守不与交战。诸葛亮无奈，又用退兵的办法引诱魏军。司马懿见蜀军撤退，便率军追击，追到西城，诸葛亮猛然调转军队欲与司马懿交战，司马懿又急忙登山扎营，拒不交战。部将贾栩、魏平几次请求出战，司马懿都不允许。魏军将领认为司马懿惧怕诸葛亮，讥笑地说：“司马公害怕蜀军像害怕老虎一样，难道就不怕天下的人笑话

吗?"在众将领一再请求下，司马懿不得不决定出击诸葛亮，他派张郃率一支人马从蜀军后方袭击蜀军，司马懿亲率主力从正面攻击蜀军大营。诸葛亮则派魏延、高翔、吴班等各率一支军队迎战，魏军大败，司马懿退回大营，再也不敢出战了，诸葛亮几次挑战，司马懿均置之不理。

正在两军相持之际，参军马忠等人来到西城，传达了刘禅要诸葛亮撤军的命令。诸葛亮以为朝廷出了大事，赶忙将军队撤回汉中，司马懿见蜀军撤退，急派张郃率军追击，张郃以为"军法上说，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现在为什么要追击蜀军呢?"司马懿则认为蜀军是粮尽而退，军心不稳，现在追击可以获胜。张郃只得领兵追击蜀军，进至木门谷，与蜀军交战。蜀军埋伏在高处，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张郃被蜀军射死。

诸葛亮回到汉中，发现刘禅并未下令撤军，而是负责后勤供应的李严因为没有把粮草运到，假传圣旨以掩饰自己的过失。诸葛亮查清此事后，上书刘禅将李严免官为民，流徙梓潼郡。

诸葛亮连年北伐，使蜀汉的人力和物力受到很大损失，人民无法承受。诸葛亮决定暂不出兵，努力发展生产，休整、训练士兵，积聚力量，准备再战。为了解决军粮的运输问题，诸葛亮又设计了新的运输工具"流马"，将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的交通要道斜谷口。并在斜谷修建粮仓，大量储备粮食。

曹魏也在积极备战。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北伐常因缺粮退兵，他一定大量储备粮食，三年以内不会发兵。于是上表明帝，建议从冀州移民，耕种上邽、天水、南安等地的荒田，动用军力修复京兆郡的郑国渠、白渠。开凿成国渠，引汧水、洛水入渠，再筑临晋陂调节渠水。司马懿的建议被采纳。经过两年施工，渠与陂均建成，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魏国的防御力量也增强了。

蜀汉经过三年的准备，实力大增。青龙二年（234）诸葛亮

率十万大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战争。

这年四月，蜀军出斜谷口，到达渭水之南，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扎下营寨。起初，司马懿屯驻在渭水之北，当他得到诸葛亮到达郿县的消息时，急忙召集部将商议对策。许多将领都认为应驻扎在渭北防御蜀军，司马懿却认为："老百姓和我们的积聚都在渭南，这是必争之地。"于是率军连夜渡过渭水，背水立营抵御诸葛亮。他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兵，依山东行，确实可怕，如果向西前往五丈原，将领们就没事了。"不久，诸葛亮果然在五丈原安营扎寨。双方在渭水南岸形成对峙的局面。

诸葛亮前几次出兵，都由于运粮跟不上，使北伐未能成功。这次他分出部队实行屯田，屯田的士兵与渭水之滨的农民杂处，准备长期屯驻。

蜀汉大举伐魏之前，曾派使臣到东吴约孙权同时大举伐魏。孙权应允了。五月，当魏军集中力量防守西线时，孙权率兵十万向曹魏东方重镇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西北）发动进攻。同时派陆逊、诸葛瑾统率万余人进入江夏、沔口，直指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人淮河，进攻广陵、淮阴。魏明帝曹叡得到孙权出兵的消息，命令诸将加强防守，并亲自领兵东征，以解新城之围。孙权原以为魏军大都在西线与蜀军作战，东方空虚，没想到曹叡亲自率大军迎战，恐怕难以取胜，便将军队撤回江东。进击江夏的陆逊军只斩获千余人，不久退回武昌。吴军撤退后，东方逐渐平定。在西线，司马懿与诸葛亮正相持不下。曹魏大臣建议曹叡到长安，亲征蜀军。曹叡说："孙权已经退走，诸葛亮必然破胆，司马懿的大军足以制胜，我没有忧虑了。"

这时在渭水前线，诸葛亮与司马懿已相持了一百多天。当曹叡率兵迎击孙权时，曾派秦朗率两万步骑兵前去援助司马懿，并命令司马懿"坚壁拒守，消磨蜀军的锐气，使诸葛亮进退两

难，待粮草用尽，必然撤兵，到那时再追击。这是以逸待劳的全胜之道。”

司马懿遵循这个方针与诸葛亮相持，不主动出战。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均不予理会。眼看时间在拖延，诸葛亮非常焦急。一次，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和首饰，送给司马懿，讽刺司马懿像女人那样胆小怯懦，以此激怒司马懿。司马懿非常恼怒，上表曹叡请求出战。曹叡派卫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重申不许与蜀军交战。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节符来前线，魏军更不会出战了。”诸葛亮说：“司马懿本来就无心作战，他所以要向魏明帝请战，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是向部众表示敢于用武而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能打败我们，难道还用到千里之外去请战吗?”

司马懿拖延时间的战术果然奏效。诸葛亮欲速战速决，却抓不到战机；后方朝廷也让他牵肠挂肚，而司马懿却按兵不动，胸有成竹。

诸葛亮派使节到司马懿军中，司马懿不打听蜀军的军事情况，只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使者回答：“诸葛亮宿兴夜寐，凡是二十杖以上的责罚，都要亲自决定，所吃的饭不过几升。”司马懿对部将说：“诸葛亮进食少而事务繁多，还能活多久呢?”

因过度劳累，诸葛亮果然病倒了，病情日益严重。消息传到成都，后主刘禅马上派尚书仆射李福赶到五丈原慰问，并询问国家大事。李福与诸葛亮密谈了好长时间才离去。没过几天，李福又返回来见诸葛亮。诸葛亮吃了一惊，不禁寻思：“李福去而复返，是不是看出我的病将不起，为世不久？李福一定是问我死后的接替者。”于是对李福说：“我知道你返回来的意思了。近来我们虽然整天谈话，但仍然谈不完。你要问的人，蒋琬合适。”李福道歉说：“日前确实不曾询问此事，所以又返回来。再请问蒋

琬之后，谁可承担重任？”诸葛亮沉思后慢慢说道：“费祎可以接替他。”李福又问费祎以后怎么样，诸葛亮闭目沉思没有回答。李福只好告别。

诸葛亮的病情恶化。他在临终前，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等人安排了死后退军的调度。命令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在他后面，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军队便自行出发。数日后，诸葛亮在五丈原的军营中与世长辞了，终年54岁。诸葛亮死后，长史杨仪、护军姜维等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部署，秘不发丧，整军后退。司马懿听说蜀军撤退，急忙率军追赶，姜维与杨仪回军鸣鼓，向魏军进攻，司马懿以为中计，急忙退回军营。于是，蜀军从容退去。进入斜谷后，才为诸葛亮发丧。司马懿犹豫不决，不敢追击蜀军，当地百姓都当作笑话传开了，他们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司马懿听说后，笑着说：“我能料到生，哪能料到死呢！”

蜀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刘禅为了纪念诸葛亮生前的品德和功绩，封赐诸葛亮为忠武侯，并依照诸葛亮的遗愿，将其葬于汉中定军山，以表示他念念不忘北伐曹魏，统一中国。

诸葛亮竭尽全力，连年出兵，北伐曹魏，均无功而返，究其原因，第一是国力不强。蜀国偏居益州一隅，人口不足百万，而魏国领有十州之地，土地人口均数倍于蜀，诸葛亮虽精心准备也未能取得最后胜利。第二，蜀国北伐路途遥远，运输粮草困难重重，而魏军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更使诸葛亮数次因粮草不济而退兵。第三，诸葛亮用兵谨慎，稳扎稳打，不敢出奇兵突袭曹魏。诸葛亮事必躬亲，操劳过度，英年而逝，也导致北伐中断。诸葛亮北伐虽然没有取得大的胜利，但是他连年出击，解除了西北面的后顾之忧，将战争引向敌区，取得了以攻为守的效果。

诸葛亮北伐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示。人们对这位志在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给予很高的评

价。正如杜甫在诗中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诸葛亮传》、《马谡传》、《明帝纪》、《后主传》

高平陵政变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十二月，明帝曹叡病重，他自知将不久人世，而他膝下能继位者仅是8岁的养子曹芳。他想在临终前把辅政之事安排好，便任命燕王曹宇等人辅政。

当时，在朝廷掌大权的是刘放、孙资。他们在曹操时同时担任秘书郎，曹丕称帝后改称秘书为中书，任命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二人掌管机要。明帝时更被宠信，每当朝廷议论国家大事，曹叡常让他们来断决是非。刘放、孙资专权引起不少朝臣的不满，刘放、孙资阴谋报复，把曹宇视为眼中钉。

曹宇性情温和，对辅政之事表示谦让。一天，曹叡问刘放、孙资"燕王正该如此吗"？刘放、孙资见有机可乘，便说："燕王实在是自知不能承担重任，所以才这样。"曹叡说："那谁来承担呢？"当时只有魏宗室曹爽在曹叡身边，刘放、孙资乘势推荐曹爽，并建议召回司马懿，让他参加。曹叡问曹爽："你能承担这样大事吗？"曹爽很怯懦，紧张得汗流满面，说不出话来。刘放暗中踩他的脚，在他耳边悄悄说："快说以死奉社稷。"这样，曹爽、司马懿辅政。刘放、孙资排挤曹宇的目的达到了，但不久，曹叡感到曹爽没有才能，还是让曹宇辅政为好。曹宇与曹叡自幼友好，彼此了解，于是，他打算收回以前的任命。刘放、孙资听说，立即入宫晋见曹叡，请求不作变动。这时，曹叡病情严重，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刘放说："最好请陛下亲写诏书。"曹叡说："我浑身无力，不能提笔了。"刘放便爬上床，握

着曹叡的手，勉强写下了诏书。他们拿出宫，高声宣布说："有诏书免去燕王曹宇等的官职，不得在宫中滞留。"曹宇等人大吃一惊，含泪而去。曹爽被任命为大将军。

景初三年正月，司马懿回到洛阳，入见生命垂危的曹叡。曹叡拉着他的手说："我强忍着不死是等待你，我把后事托给你了，你和曹爽共同辅佐曹芳，我死无遗憾了。"接着，把齐王曹芳叫到床前，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你要看清楚，不要记错。"还让曹芳上去，紧抱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赶忙叩头，当天，曹叡死去，曹芳即位。

曹芳虽然称帝，但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切政事均由曹爽、司马懿处理。曹爽、司马懿各率军三千轮流值班，住宿宫内。曹爽缺乏政治军事才能，只是凭借皇族子弟，才被任命辅佐幼主，而司马懿却在资历、经验方而都远远强于曹爽。起初曹爽对司马懿很崇敬，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不敢独断专行。

但是，时间不长，曹爽就产生了排挤司马懿、独揽大权的念头。他与一批急于富贵，趋炎附势的名士关系很好。其中有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人。曹叡在位时，厌恶他们浮华不实，都不予重用。曹爽辅政后，则把他们引为心腹，让邓飏、丁谧任尚书，毕轨任司隶校尉，李胜任河南尹。他们担心司马懿势力增长，劝曹爽赶快除掉司马懿。丁谧让曹爽说通曹芳，发布诏书，改任司马懿为太傅。太傅是皇帝的老师，官职虽在三公之上，但无实权。

然而，曹爽一伙打错了算盘。司马懿并非等闲之辈，他是一位善于谋略，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是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世族官僚出身。祖父司马俊任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为京兆尹。司马懿少时博学，聪明果断，有胆识，南阳太守杨俊断言他是"非常之器"。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司马懿被迫出任丞相府文

学椽，不久转为丞相主簿。曹操被封为魏王后，司马懿又转为太子中庶子，辅佐曹丕，常为曹丕献计献策，深为曹丕所倚重。曹丕称帝后，司马懿的地位逐渐提高，先后任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参与朝政决策，每次商量计谋，他都有奇策，成为朝廷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曹丕率军征吴，他有时留守洛阳，有时出镇许昌，为稳定后方，保证前方军需物资供应起了重要作用。黄初七年（226），曹丕死，曹叡即位，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受遗诏辅佐朝政。司马懿任骠骑将军，兼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驻军宛城（今河南南阳），数次打败东吴对襄阳的进攻。太和五年（231），司马懿被调到西线，全面负责对蜀汉的战争。他与指挥北伐的蜀丞相诸葛亮反复较量，坚持以守为攻的拖延战术，使诸葛亮北伐的计划受挫。青龙三年（235），被提升为太尉，主管曹魏军事。景初元年（237），辽东太守公孙渊自称燕王，与曹魏对抗。第二年，司马懿率军四万远征辽东，他采用声东击西诱敌出击的战略，打败公孙渊，平定了辽东。司马懿从辽东回师不久，魏明帝曹叡病死，齐王曹芳即位，他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

从司马懿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才智超群，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的政治家，是曹魏最有才干的人物，相形之下，曹爽就逊色多了。曹爽在让司马懿任太傅，削夺他的权力的同时，还让弟弟曹羲任中领军，曹训任武卫将军，曹彦任散骑常侍。其余各弟都以列侯身份侍从，出入宫廷禁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司马懿改任太傅后，曹爽自以为得计，虽然外表还对司马懿恭敬有礼，但各项主张都擅自决定。他还将吏部尚书卢毓调离，而让何晏接任。何晏等人依仗曹爽的势力，对迎合、顺从他们的人升官晋职，违抗他们的则被罢黜辞退。朝廷内外都看风向行事，不敢违背曹爽一伙的意志。

对曹爽结党专权，司马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要打败他们，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他暂时忍让。正始八年（247），他称病

不参与朝政，退职居闲，暗中却组织力量，伺机反扑。

曹爽等人见司马懿退却，自以为得计，更加无所顾忌，大量提拔亲戚党羽，多次更改制度。曹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与皇帝相同，皇宫的珍宝玩物被他拿到家里，将宫女拉到家里做歌舞乐伎，在地下修筑宫室，四周装饰得非常华丽，经常与心腹在里面饮酒作乐。他的弟弟曹羲为此深感忧虑，多次哭着劝阻曹爽，但曹爽不听。曹爽兄弟几个人经常一起出去游玩，司农桓范对他说："您掌管朝政，掌管城内禁兵，兄弟们不宜同时出城。如果有人乘机关闭城门，又有谁在城内接迎呢？"曹爽毫不在乎地说："谁敢这样做！"

司马懿虽然告病回家，曹爽对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一次，李胜调任荆州刺史，他便让李胜以辞行为名前去察看。

司马懿一见李胜到来，便明白了来者的用意。他故意装作病重，让两个婢女搀扶着出来见李胜。说话的时候，他装成神态不清的样子，换衣服时，把衣服掉在地上。他又指嘴说渴，婢女端来粥，他不用手拿就喝，弄得身上全是粥。李胜说："大家说您的中风病复发，没想到您的身体这样糟！"司马懿气喘嘘嘘地说："我年老病重，死在旦夕。你到并州任刺史，并州靠近胡地，你要加强戒备，恐怕我们不能见面了。我把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托给你吧！"李胜说："我是回家乡，不是并州。"司马懿装作听不清，说："你刚到过并州？"李胜又说："我是到荆州。"司马懿说："我年老耳聋，头脑不清，没听明白你的话，现在，你做荆州刺史，正可以建功立业。"李胜告辞后，把相见的情况告诉曹爽，说："司马公形神离散，只剩下一口气，不必再担忧了。"曹爽听了非常高兴，不再对司马懿戒备了。其实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正在加紧策划扫除曹爽的方案。这时，他的儿子司马师担任中护军，掌握了一部分军队，朝廷元老重臣蒋济也暗中支持司马懿。

嘉平元年（249）正月，曹爽同兄弟曹羲、曹训、曹彦和皇帝曹芳一起去洛阳城外祭扫曹叡的陵墓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在城内发动政变。他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命令，关闭各个城门，率兵占领了武库，同时派兵出城扼守洛水浮桥，阻止曹爽入城。还命令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占领曹爽军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占据曹羲军营，解除曹爽兄弟们的武装。接着向皇帝曹芳上书，宣布曹爽的罪行，说："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遗诏，败乱国典，在朝廷内自比君主，在外则独揽大权，破坏军营，各种重要官职都安排他的亲信，连殿中的宿卫也用他的亲信。他目无君主，有篡夺君位之心。我不得不采用兵谏的办法，为国除害。"

司马懿把奏书送到城外，曹爽接到后，没有告诉曹芳。他焦急万分，不知所措，只好派兵构筑工事，做防御准备。这时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大司农桓范从洛阳逃出，劝曹爽带皇帝到许昌，调集外地军队和司马懿作战。曹爽犹豫不决。桓范对曹羲说："事情已经很明了，像你们这样门第的人想过贫贱平安的日子已不可能了。不过，你们和皇帝在一起，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谁敢不应？"曹羲一言不发，桓范又说："现在动身去许昌，用不了多长时间，许昌有武库，可以武装军队，不担心签发征调。"最后，曹爽把刀扔到地上，说："司马懿是为了夺我的权，我投降了，仍不失为富贵人家！"桓范见曹氏兄弟如此无能，十分伤心，哭着说："曹子丹（即曹真，曹爽父）是好样的，怎么生下你们这样如猪如牛的兄弟！我为什么竟和你们一起遭受灭族之祸呢？"

曹爽等人交出兵权，宣布投降，回到洛阳家中。司马懿马上派兵包围了曹府并在府宅四角搭高楼，日夜派人监视。不久，司马懿下令将曹爽兄弟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全部处死，并诛灭三族。曹爽等人被杀后，曹魏的军政大权被司马懿控制。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曹爽传》、《明帝纪》

三曹、七子造新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时期的诗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诗人，继承了汉代现实主义的精神，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传世佳作，开创了诗歌发展的新阶段。

“三曹”指曹操及其儿子曹丕、曹植。“七子”即建安七子，他们是：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和应玚。

曹操不仅是这一时期的政治领袖，著名军事家，也是建安新诗创作的带头人。他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多才多艺，虽然戎马一生，但喜欢写诗，“登高必赋，及为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汉末战乱给社会造成的混乱和人民的痛苦，抒发了自己思贤若渴，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曹操的诗歌创作是与他本人的政治、军事活动紧密结合的。

初平元年（190），曹操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关东同盟军，但是各路军阀观望不前。董卓迁都后，同盟军随之解体，开始了长期的军阀混战，造成百姓大量死亡和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曹操目睹这一社会现实，感慨万端，写下了《蒿里行》这首名诗。诗中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在这首诗中，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

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揭露和斥责了自私自利、相互火并的军阀，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正义感。曹操的这首诗用词精炼，把这时期社会混乱的来龙去脉，都浓缩在短小的篇幅内，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曹操的这首诗被人称为“汉末实录”是恰如其分的。曹操描写这一时期政治事件的诗还有《薤露》。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写了《苦寒行》。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建安九年，曹操夺取冀州后，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干投降曹操，曹操仍让他做并州刺史。建安十年，高干听说曹操将北征乌桓，于是，乘机叛变，据守壶关（今山西长治东南）。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自邺城北上太行山，征讨高干。这首诗便写于行军途中。诗中对军旅生活的艰苦作了形象的描绘，曹操写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路途的艰辛，自然环境的恶劣，战争的残酷，使曹操感到迷惘；思乡的愁绪也一再困扰着他。“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但是曹操终究没有退却，他决心战胜困难，扫灭群雄，统一北方。他终于取得胜利。曹操在《苦寒行》中，既写了行军的艰苦，又写了在困难面前自己强烈的思乡情绪，感情直挚，毫不掩饰，读来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率军北上，开始了对乌桓的战争。七月到达无终（今天津蓟县），因大水，道路不便，由田畴做向导，出卢龙塞，直捣柳城。经过与乌桓塌顿单于的激烈战斗，大获全胜。九月，曹操胜利回师，在归途中，曹操写下了著名的《步出夏门行》四首，其中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观沧海》重点写茫茫沧海，洪波涌起，吞吐日月的壮观景象，并借景咏怀，诗中写道：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先用朴素的语言，描写了登山所见到的景物：一望无垠的大海，海边竦立的山岛，岛上繁茂的草木，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图画。接着把笔锋一转，写出在萧瑟的秋风中，洪波涌起的壮观海景。旭日、明月、繁星都在海涛的喧嚣中若隐若显，或出或没。诗人通过对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大海的咏叹，表现了自己的博大胸怀和丰富想象力。后人评论这首诗有"吞吐宇宙气象"![1]

再看《龟虽寿》。如果说由于社会的原因，建安时期的不少诗文，总有一种悲伤、消极的情绪，那么，曹操的《龟虽寿》则是洋溢着奋发向上、不信天命、积极乐观的名作。诗云：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写这首诗，是在北征乌桓取得胜利之后，这时，北方已基本统一。曹操一面为胜利感到振奋和鼓舞，一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大业未竟，任重道远，应当不断进取，再展宏图。然而，这年曹操已经53岁了，为了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写下了这首《龟虽寿》。

在这首诗中，曹操指出，传说中的神物"神龟"和"腾蛇"虽然长寿，但终究有"竟时"和变"土灰"，说明死亡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然面，曹操并没有惧怕死亡。紧接着他用高亢的语调唱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人生表达了自己富有特色、不同凡响的见解。曹操用志在千里的

---

① 沈德潜：《古诗源》。

“老骥”比喻“壮心不已”的烈士，借以抒发自己远大的抱负和宽广的胸怀，显示了志士不甘衰老的奋发气概。后世无数英雄豪杰从曹操的诗句中受到了鼓舞，汲取了力量。

大约在赤壁之战后，曹操又写了《短歌行》二首。其中第一首“对酒当歌”最为有名。也许是因为曹操兵败赤壁，他统一全国的计划受挫，自己又年事已高，因此感到壮心难酬吧，曹操在诗中流露出对人生短暂的深沉感慨，他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是曹操并没有消极，他在诗中，用深沉的诗调道出了自己思贤若渴的真挚情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在诗的最后，曹操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显然，曹操不遗余力地招纳人才，是为了效法周公开创“天下归心”的局面。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事业。

纵观曹操流传至今的二十余首诗，不少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诗感情充沛，真实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特别是他的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①

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也都是写诗的高手，他们都有传世佳作。

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代汉建魏称帝，是为魏文帝。他好文学，著述很多。最有代表性的诗是《燕歌行》。《燕歌行》共二首，其中第一首写得最为出色。诗云：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

① 沈德潜：《古诗源》。

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语言明媚清丽，感情细腻委婉。诗中把寒冷的深秋景色与思妇缠绵哀伤的情绪，十分和谐而又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这位女子对客居在外的丈夫的深切思念。情景相互交融，感情缠绵悱恻，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燕歌行》是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植聪明过人，才华横溢。他的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被称为“建安之杰”。

曹植的诗作现存80多首，其中不少佳作。如《七哀》诗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诗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这是一首闺怨诗，大抵是曹植后期的作品。曹植是一位悲剧色彩的人物。曹植年轻时聪敏过人，深受曹操的宠爱，曾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后因任性而行，不拘小节，饮酒无度，以及曹丕等人的挑拨，失去了曹操的信任，失去了成为曹操接班人的机会。曹丕称帝后，对曹植进行了一系列打击迫害。曹植从这时一直到魏明帝太和六年（231）时41岁死，一直过着屈辱的生活。在这十余年中，他三徙封地，六易爵位，不准与亲戚往来，不得参与政事。这首《七哀》诗就是在这种不幸的境遇下写的。该诗表面上是写一个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哀怨与不平。细读全诗，会发现这首《七哀》诗既是写实，又在字里行间隐含着讥讽，两者结合得自然得体。全诗语言朴素优美，委婉自然，读来情真意切，令人深思。曹植的《七哀》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哀婉动人，韵味无穷。

曹植以诗寄托自己政治上的不幸和哀思，除了《七哀》诗以外，还有《杂诗》第四首“南国有佳人”、第五首“仆夫早严驾”、《美女篇》等，其中《赠白马王彪》是曹植后期的代表作。该诗在“原序”中写道：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去洛阳朝觐文帝曹丕。到京师不久，曹彰突然死去。曹彰与曹植友情很好，在建安年间太子之争中，他明确地站在曹植一边。曹彰有可能是曹丕下毒致死的，这对曹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七月，曹植与曹彪要返回封地，却被迫不能同行，这更使曹植悲恨交加，于是“愤而成篇”，写下这首长达 80 句、400 字的五言长诗。《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他在诗中写了返回封地时，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在成皋附近赶上了前行的曹彪，希望能与他同行，但是却遭到了监国使者的阻拦。曹植悲愤交加，痛斥那些离间骨肉的人，写道：“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然而在谗佞小人和专横的曹丕面前曹植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哀叹自己的命运不济：“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真实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和残酷的虐杀，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充分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全诗叙事简洁，层次清楚，感情既愤激又悲痛缠绵，极富感染力，是建安诗歌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悲愤哀伤构成了曹植后期诗歌的基调。然而，他前期的作品却是积极向上的，如在《白马篇》中写一位青年壮士，英姿勃发武艺高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位青年正是曹植自己的写照。

建安时期，除了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的诗各具特色外，“建安七子”的诗也有不少好作品。

王粲在建安七子中诗歌的成就最高。王粲（177 – 217）字仲

宣，自幼聪颖，少年时为大文学家蔡邕所重视。董卓之乱时，他南下投靠荆州刘表，他以途中见闻写下了《七哀诗》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首诗是汉末动乱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诗中，王粲斥责那些嗜武的军阀为“豺虎”。通过对“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描写，形象地显示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状，语言生动，感情真挚，表达了作者对人民深切的同情，读来令人感到无限的哀思。

在建安七子中，陈琳以文笔优美、犀利称著当时。他的诗歌虽然不多，但《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这首诗通过修筑长城官吏和役夫、丈夫和妻子的对话，反映了繁重的徭役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人民对暴政强烈不满的情绪。这首诗的对话，非常生动、感人。一位远离家乡服徭役的丈夫给他的妻子写信，告诉她，由于修筑长城工程浩大，回家已无望，便让妻子趁年纪尚轻改嫁，“便嫁莫留住”，要“善事新姑嫜（公婆），时时念我故夫子。”役夫既让妻子改嫁，又希望妻子对自己常念不忘，可见，他对妻子的情真意切，内心充满了矛盾。而妻子却驳斥了丈夫：“君今出言一何鄙。”她不愿意背弃丈夫，独自寻找幸福。“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表现了她对丈夫坚贞不移的爱情。读后催人泪下。

徐幹的代表作是长诗《室思》，描写一位妇女，想念身在远方的丈夫，真实生动地描绘她那孤寂愁闷的生活和难以排遣的忧伤，殷切的盼望和痛苦的失望。诗歌注重细节的描写和形象化语言的运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刘桢存留下来的诗不多，但感情色彩浓烈，侧重抒发个人的

种种情怀，风格遒劲，仗气爱奇。他的《赠从弟》（第三首）很有代表性。诗中说：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这首诗通过对山上松柏的描写，勉励堂弟要像松柏那样，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高洁的情操。

在建安诗人中，除了“三曹”“七子”外，繁钦的诗也很有名。他的《定情诗》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叙说了自己恋爱及失恋的过程。语言委婉清新，显得格外亲切动人。这是一首成熟的女性失恋诗，它真实地反映了负心男子的行为给纯朴姑娘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其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建安时期，在众多的诗人中，还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她叫蔡琰。

蔡琰，字文姬，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自幼聪明，多才多艺。她精通音律，一天夜里，蔡文姬听到隔壁的父亲弹琴，突然，琴弦断了一根，文姬走过去，对父亲说：“是第二根弦断了。”果然没错，蔡邕很惊奇，但他不动声色地说：“你这是偶然猜对的。”为了检验文姬的听力，蔡邕等文姬回到自己屋后，又弹起琴来，这次他故意弄断了一根，文姬马上又告诉父亲“这是第四根弦”。还是没错，蔡邕见文姬如此聪明，赞不绝口。蔡文姬的书法也很好，据说，她的书法传给钟繇，钟繇传给卫夫人，卫夫人传给王羲之。

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命运却十分不幸。16岁时，她嫁给河东人卫仲道，后来，丈夫病故，她没有孩子，回到母亲家居住。董卓之乱时，她被胡骑劫掠至南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滞留匈奴十二年。曹操与蔡邕一向友好，他同情蔡邕没有后代，便派遣使者用重金将蔡文姬赎回，又嫁给屯田都尉董祀。曹操很欣赏蔡邕父女的文才，他问蔡文姬：“听说

夫人家原先有许多书籍，你还记得有哪些吗?”蔡文姬说：“过去父亲曾送给我四千多卷书籍，因流离涂炭，全都丢失了，现在凭着记忆还能写下四百多篇。”文姬请曹操给她纸和笔，全部书写下来，没有遗误。

蔡文姬亲眼目睹了汉末社会动乱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无比伤心。她拿起笔，写下了著名的《悲愤诗》。

这首诗共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我国诗史上第一篇妇女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作者在诗中真实地描绘了在汉末动乱中的悲惨遭遇，尤其对妇女的不幸的叙述非常生动，催人泪下。诗中写道：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接着，作者写她在胡地的生活。当她被曹操赎回，又要抛弃亲生儿子时，心情既矛盾又痛苦，精神所受到的巨大创伤使她近乎失常：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本来返归故土，脱离在胡地被侮辱被蹂躏的生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与自己的亲骨肉相离别又是那样使人心碎，尤其

儿子劝母亲留下的那几句话，句句刺痛着母亲的心。在回国与别子这一矛盾的激烈冲突中，作者虽然选择了前者，但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她肝肠欲断，神情恍惚，精神几乎崩溃了！文姬犹豫再三，终于抛却儿子，踏上了归途。然而家乡的情况竟是满目凄凉："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面对这一切，文姬"茕茕对孤景"，感到失望和孤独。她虽然"托命于新人"，但她担心由于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再遭不幸，于是，又陷入了难于解脱的痛苦之中，只有慨叹"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了。

蔡文姬的这首诗，虽然叙述个人遭遇的不幸，但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首诗语言浑朴、自然，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人物语言极富个性，如儿子对文姬临别时说的几句话，形象逼真，十分感人。

《悲愤诗》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建安诗坛上的一支奇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建安诗人关注社会，珍视人生，他们以自己的真诚和智慧创作了大量诗歌，开创了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文帝纪》、《王粲传》、《蔡邕传》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讨山越联夷洲

孙权于建安五年（200）继承父业，占据江东，229年正式称帝，建立吴国，252年病逝。在孙权统治江东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实行联蜀抗魏的策略，开展军事、外交活动，不断扩大地盘，保持了比较强盛的国力。孙吴时期，江南得到了开发，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

江南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足，自然环境优越。但在汉代，这里的经济比中原落后，大部分地区还实行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此外，劳动人手不足也阻碍了孙吴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变东吴落后的面貌，增强军事力量，孙权对境内的山越进行了征讨，迫使他们出山，以补充劳动力和兵源。越人是秦汉时代百越的后裔，主要散居在丹阳、豫章、庐陵一带的深山险地。他们因躲避官府的剥削，逃往山林，以血缘关系群居，形成“宗部”或“宗伍”，其首领称“宗帅”。山越人强悍好武，勇于作战，依仗山险，极难战胜。孙策向江南发展势力，就不断向他们发动进攻。孙权统领军队后，把镇抚山越作为己任，多次派兵征讨山越。

建安八年，孙权出兵江夏，西征黄祖。黄祖败退夏口，闭城坚守，孙权一时无法攻克。这时，鄱阳、乐安等地的山越纷纷起兵反抗。孙权见后方不稳，只得退兵东归。到达豫章郡时，孙权分派部将讨伐山越。派征虏中郎将吕范率兵平鄱阳、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率兵讨乐安（今江西德兴）。又派骁勇之将到山越群

居难以治理的县镇守，以建昌都尉太史慈兼管海昏（今江西永修）县事务。别部司马韩当为安乐长，周泰为宜春（今江西庐陵）长，吕蒙为广德（今属安徽）长，他们分别率兵征讨山越，将山越宗帅斩杀，强迫山越人出山定居。从此以后，孙权多次派兵征讨山越。比如：会稽山越首领潘临多年来一直与政府作对，陆逊招兵买马，进入深山将潘临打败，收为部曲三千余人。曹操为了牵制孙权军事力量，曾与山越勾结。丹阳山越首领费栈就接受了曹操的印绶，作为内应。建安二十二年，孙权命令陆逊前去征讨。陆逊针对山越支党多，活动分散的特点，趁夜将部队潜入山谷，鸣鼓而进，山越人四处逃散，被迫出山。陆逊将其强壮者补充部队，老弱者列为编户农民。

黄初七年（226），丹阳、吴郡、会稽三郡的山越又起兵反叛孙权，孙权将三郡反叛最激烈的地区划为东安郡，任全琮为太守。全琮到任后，严明赏罚，对山越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嘉禾三年，孙吴对山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主持这次战事的是大将诸葛恪。起初，诸葛恪认为，丹阳山路险阻，山民又多强悍，虽然以前征讨，只是空得一些外县平民而已，其余都藏在深山密林，不能全部擒获，便请求到当地任职，使山越出山，三年可得甲士四万。许多人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围数千里，山高谷深，山越住在山中，不曾进入城邑，遇到官吏便奔跑躲藏起来。他们在山中自己冶炼铜铁，铸造兵器，喜好武艺，崇尚气力，熟悉地形，战则蜂拥而上，败则如鸟飞鼠散，自前世以来，一直没能制服他们。连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也为他担心。诸葛恪却很有信心，一再表示能够取胜。于是孙权任命他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让他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诸葛恪到达丹阳后，给四郡长官写信，命令他们严密防守疆界，对已经归服的山越平民，设屯居住。然后又派遣部将，率兵

据守险要地带，只修筑防御工事，而不与山越交战。等到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地里一点也不留。山越原来的粮食已经吃光，新稻又没收到，平民设屯聚居，也无法抢掠，饥饿难忍，纷纷出山归降。诸葛恪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去恶从化，就应当抚慰，对迁居到外县的，不要猜疑拘捕他们。"山民知道官府只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纷纷迁居平原，前后达数万人。孙吴政府将其中四万多人编入军队，增强了军事实力。

孙吴时期，通过征讨山越，除了补充兵源外，还获得了大量劳动力。此外，这时由于北方战乱频繁，人民纷纷逃亡，有的向西流入陇右，有的向北流人辽东，但大量人口南下到荆扬地区，仅关中人民流入荆州的就有十万多家。大量北方人民的南下，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对江南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孙吴政权为控制人口，保证粮食供应，在占据江东，发展势力的过程中，也实行了屯田。建安八年，孙权接替其兄领兵不久，即开始屯田。这时，21 岁的陆逊曾任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之后，随着山越迁居平原的增多，屯田的规模越来越大。

黄武初年，魏文帝曾率兵到吴边境观察形势，伺机挑战。由于东吴严密防守，魏军无功而返，战争形势趋于缓和。但吴国粮食非常紧张，陆逊建议孙权命令各将领广开田地，增加粮食产量。孙权回答说："你的建议很好，现在我与太子亲自下田，做天下表率，并将给我驾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虽然不及古代的帝王，也是想和大家一起劳动。"在孙权的积极倡导和督促下，屯田在长江中游两岸及南方各郡普遍推广起来。

嘉禾三年（234），诸葛亮大举伐魏，魏军主力调往西线应敌。东吴趁虚北上，未料魏明帝亲自率水军东征，吴军未至寿春而退兵。这时吴国由于连年备战，民困于役，粮食仍感不足。孙权于嘉禾四年派兵数千在江北屯田，以皖城为中心，建立了一个

颇具规模的江北屯田区。后来，诸葛恪在丹阳郡山区讨伐山越，获胜后，收编精兵万余人，于嘉禾六年带领他们在庐江、皖口屯田，面积进一步扩大。秋天收获时，男女遍布田间，一派繁忙景象。江南的毗陵（今江苏常州）是江南规模最大的屯田区。赤乌年间（238－251），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带领大批男女，会佃于毗陵。这些劳动力主要来源于新归附的丹阳山越。

东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军屯主要分布在长江防线两岸宜耕地区，以及内地州郡驻军营地的附近。在没战争的情况下，东吴的士兵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是一种全军皆农的制度。凡有吴军驻屯之地，即是军屯所在之区。东吴对长江两岸及东南沿海一带的驻军，采用都督制的军事编制形式，即首先划分都督区，都督之下再分别置督，督要各有一定地理范围的防区。在内地，则由将军、校尉领兵。各级将领在防区内组织士兵及其家属进行屯田。

民屯主要分布在东吴的腹心地区即丹阳郡、吴郡、会稽郡一带。管理屯田的有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职官。参加民屯的农民一般只需种田，不承担其他劳役。大规模的屯田为东吴政权建立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也促进了山越与汉族的融合。用征伐的办法迫使山民迁居平原是东吴推行屯田制的前提。山越与汉民一起当兵屯田，不仅瓦解了依靠宗族形式维系的民族共同体，而且使自己的民族特征逐步消融，与汉族日益融为一体。

在屯田的带动下，东吴的水利事业也有所发展。黄龙二年，孙权命人修筑东兴堤，以阻止巢湖水，变害为利。后来又兴修了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吴国还开凿运河以便灌溉和交通之利。孙权曾征发民工在建业开凿东渠，渠宽五丈，深八尺，将玄武湖之水引入秦淮河。赤乌八年（245），孙权派三万人在句容开凿破岗渎运河。运河从句容通至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境），

可以将三吴地区与都城建业联结起来。

与战乱频仍的北方相比，东吴是相对安定的，这一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东吴时，太湖沿岸和钱塘江流域已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永兴（今浙江萧山）的稻田，一亩可产米三斛。东吴的手工业也有明显的进步。纺织业中葛布、麻布的生产非常出名。制瓷业中，青瓷制造技术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提高。为了长江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孙吴大力发展造船业。政府专门设典船都尉，监督造船。东吴造船技术高超，大海船长达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可载六七万人，还可装载货物一万斛。

巨大的海船可以长途航行。嘉禾二年（233）贺达等率兵万人，乘船至辽东。赤乌五年（242）聂友和陆凯带领三万士兵，远航到达珠崖、儋耳（今海南岛）。孙权还派船队到夷洲，夷洲即今日台湾。早在汉代时，就和会稽郡人有往来。黄龙二年（230）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名士兵，乘大船前往夷洲，打算俘获当地民众以增加劳动力。船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沿海岸航行到福州、泉州，然后横渡台湾海峡，到达夷洲，将那里的几千居民迁到大陆。

从此，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不断发展。吴国凭借性能良好的大海船，还到达高句丽（今朝鲜）、扶南（今柬埔寨）和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国王派使臣来吴，并带来乐人及当地特产。孙权还派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与天竺建立了联系。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吴主权传》、《诸葛恪传》、《陆逊传》

诸葛恪淮南用兵

吴太元元年（251），70岁的孙权体弱多病，而太子孙亮年仅10岁。孙权考虑到太子年幼，便召集大臣，商议将来由谁辅政。侍中孙峻说："诸葛恪的才能和器量都可以作为辅政大臣，可将宫中大事托付给他。"诸葛恪字元逊，东吴大臣诸葛瑾之子，蜀相诸葛亮之侄。他曾任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率兵平定山越，屡立战功。孙权知道诸葛恪才干出众，但又嫌其刚愎自用，恐日后酿成大祸，有些犹豫不决。孙峻说："诸葛恪虽有短处，可论才识和名望，当今朝臣无人与之相比，不选他又能选谁呢？"孙权考虑再三，最后听从了孙峻的建议，于是召诸葛恪入朝晋见。诸葛恪临行时，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现在政局多遭不幸，遇事你必须考虑十次再做。"诸葛恪不高兴地说："从前季文子三思而行，孔子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而你却让我思考十次，这分明是看我诸葛恪才能太低劣了吧！"吕岱无言以对，别人都认为他失言。诸葛恪到建业后，在内室见到了孙权。孙权半躺在床上，身体非常虚弱，对诸葛恪说："我已病入膏肓，恐怕再难见到你了。现在，我把朝廷大事都交给你，望你谨慎处之！"诸葛恪泪流满面，说："我们都受陛下的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不要过多地考虑外面的事情，安心休养，早日康复。"孙权下诏以诸葛恪为大将军，兼太子太傅，孙弘兼任少傅。各部门决断大事均由诸葛恪决定，惟有生杀大事需奏明孙权。孙权还命人为诸葛恪建造府第，制定了百官拜见诸葛恪的礼仪和秩序。

神凤元年（252）夏四月，孙权病逝。诸葛恪与孙弘同受遗命，处理后事。孙弘与诸葛恪关系一向不好，孙弘首先知道孙权已死的消息，他打算封锁消息，伪造诏书，除掉诸葛恪。侍中孙峻发现此谋后，赶忙报告了诸葛恪。诸葛恪决定先下手为强，定下诛杀孙弘之计。一天，诸葛恪请孙弘前来商议事情。孙弘不知是计，按时赴约，在谈话中，诸葛恪突然变色，向孙弘喝问道："你为何隐瞒陛下噩耗，居心何在？"孙弘没有准备，张口结舌，诸葛恪一挥手，从屏风后冲出士兵，将孙弘在座位上杀死。

诸葛恪为控制朝政，不想让宗室诸王占据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于是将齐王孙奋迁至豫章（今江西南昌），琅邪王孙休迁至丹阳（今江苏南京）。

起初，孙权曾修筑东兴堤（今安徽巢县东南）以拦截巢湖水，后来进攻淮南，反而因巢湖内的船只不利而失败，于是废弃大堤不再修筑。这年冬天十月，诸葛恪征发民工重修大堤，左右两端连接大山，在山与大堤之间修建了两座城，各留千人把守，派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然后率军返回。

魏国得知孙权已死的消息，想乘吴国内部尚未稳定之际，出兵伐吴。十一月，魏军兵分三路进攻东吴。王昶进攻南郡，毌丘俭进攻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七万大军攻打东兴。诸葛恪闻讯后，忙率四万军队日夜兼程救援东兴。胡遵等人命令魏军架浮桥渡水，陈兵于大堤之上，然后分兵攻打两城。城建在高峻险要之处，一时攻不下来。诸葛恪派冠军将军丁奉和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锋，从山的西面攻上。丁奉对将领们说："现在各部队行动迟缓，如果敌人占据险要地形，就难以取胜了，请带人快速前进！"于是命令各部队让开道路，丁奉亲自率领部下三千人快速突进。当时正刮北风，丁奉扬帆行船，仅用两天就到达东兴，随即占据了徐塘。当时漫天飘雪，十分寒冷。胡遵等人正在饮酒聚会，丁奉见魏军前锋部队人少，对部下说："现在正是杀敌立功

受赏的时候!”他命令战士脱下铠甲，丢下长矛大戟，仅带着头盔、短刀和盾，爬上堤堰。魏军发现他们后并没有立即出战，还大笑不已，认为不用费劲便可击败这些衣着单薄的吴军。谁知吴军爬上堤堰后，立即奋勇攻击，杀声大作。魏军见势不妙，惊慌而逃。他们争先恐后地抢渡浮桥，浮桥断裂，魏军纷纷落水，数万人被淹死。吴军缴获了大批车辆、牲口和军事物资，胜利凯旋。

此战吴军大获全胜，魏军惨败而归。然而，魏国光禄大夫张缉对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获得了胜利，但他用不了多久就要被杀。”司马师问:“这是什么原因?”张缉说:“他们声威震慑君主，功劳超过全国所有的人，想要不死，还可能吗?”

建兴二年(253)二月，吴军从东兴凯旋，诸葛恪因功被封为阳都侯，兼任荆、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诸葛恪自以为吴国强盛无比，产生了轻敌思想，他想再次对魏国采取军事行动。朝廷大臣认为频繁出兵会使军队疲惫不堪，都异口同声地劝谏诸葛恪。诸葛恪却刚愎自用，不听劝阻。中散大夫蒋延坚持自己的意见，与诸葛恪争辩，诸葛恪十分恼怒，命人把他推搡出去。为此事，诸葛恪还起草了文书晓谕众人说:“凡是敌对国家都想互相吞并，就如同仇人之间欲消灭对方一样。有仇敌而使之发展，灾祸不在眼前，而是留给了后人。所以，要从长远考虑。现在，我们之所以能与魏国对抗，只因为曹操时期的军队到今天已经老弱不能打仗了，而后备兵源还没跟上，现在正是敌人力量衰弱还没有强盛起来的时机。再加上司马懿先诛杀了大将王凌，他随后又死去，他的儿子年少却把持魏国大权，虽然有足智多谋之士却得不到重用。现在出兵伐魏，正是他们的厄运到来之日。圣人善于抓住时机，今天就是机会，假若顺从众人之情，苟且偷安，认为凭借长江之险就可平安无事，不去考虑魏国全面的情况，而只看现在的形势就轻视其以后的发展，这是我深感遗憾的。现在我

听说有些人认为百姓还很贫穷，想要停止军事活动，让百姓安心生产，这是不知道考虑大灾大难而喜欢做些皮毛小事。最近我又读家叔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阐述的与敌人竞争的计策，无不为之喟然长叹！夜不能寐。我想的就是这些，如果一旦我死去，志愿不能实现，让后世的人们知道我的忧虑，也可引起人们的深思。”人们对诸葛恪的见解虽然不同意，但慑于他的权势，没人再提出异议了。

丹阳太守聂友与诸葛恪平素关系不错，他写信劝阻说：“先帝本来有对抗曹魏的计划，但没有施行；敌人自远方来送命，我们一举就打败了他们，这难道不是祖先、神灵和社稷的福分吗？现在我们最好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伺机而动。您想乘胜出击，时机还不成熟，我内心实在感到不安。”诸葛恪对好友还算客气，他在自己的文章后面附了几句话答复聂友说：“您的话虽然有道理，然而没有看到大道理，您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就明白了。”

卫将军滕胤也劝诸葛恪说：“我认为，现在国家刚刚结束大规模的征伐和工程，又要征召军队去作战，人民疲惫不堪，敌人也有所准备，如果此次出征不能取胜，就会使前功尽弃，而且招来责备。不如按兵不动，待机而发。出兵打仗是件大事，只有依靠众人的力量才能成功，众人如果不愿打仗，您一个人怎么能成功！”诸葛恪说：“别人说不可出兵，那是因为没有远见，苟且偷安；然而你也认为他们是对的，我还有什么指望？曹芳昏暗幼弱，政权把持在司马氏手中，魏国的老百姓必然离心离德。如果我依靠国家的资财，乘刚取得胜利的声威，将会无往而不胜！”诸葛恪拒绝了众人的劝阻，征发州郡二十万军队再次进攻魏国。

四月，诸葛恪率军进入淮南，包围了新城（今湖北房县）。魏太尉司马孚率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掌朝政的大将军司马师问虞松：“如果东西战场都有战事，将士们斗志涣散，如何是好？”虞松说：“从前周亚夫固守昌邑城而吴、楚军队不战自败。有些

事情表面看很弱，实际却很强，不可不详察。现在诸葛恪率全部军队进攻我们，却停下攻打新城，他们是想吸引魏军与之决战。如果他不能攻克新城，我军又不与之决战，军队的士气必然低落，定会自动撤军。蜀国的姜维在西方与诸葛恪相呼应，他们没有运粮部队，只以抢掠我方军粮为生，是不能长久作战的军队。他现在认为我们全力在东方作战，西方空虚，所以长驱直入我方境内。如果命令关中地区各路军队赶赴前线，打他个出其不意，姜维一定会败走。”司马师说：“这个主意好！”于是命令郭淮、陈泰率领关中的魏军攻打姜维，援救新城的军队按兵不动，让吴国继续围攻。西方魏军行至洛门（今陕西武山东），姜维粮尽，只好撤军。

这期间，吴军加紧攻打新城。城中士兵有三千人，由扬州牙门将张特指挥。由于战斗激烈，守军生病伤亡的人数超过一半。诸葛恪又让士兵堆筑土山猛烈攻城，新城危在旦夕。张特急中生智，对吴国军队喊道：“我已无心再战了。然而，魏国法律规定，城池被围困超过百日而救兵仍未至者，虽然投降，其家属也不连坐治罪；我自被围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城中本来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超过一半，现在还有一半人不愿意投降，我要回去劝说他们，看看他们意向如何，明早把结果告诉你们。我先把官印给你们作为我的诚意。”说着，张特把官印扔出城外。吴军将领听信了他的话，连官印都没去拿，就收兵了。张特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到了夜晚，他用拆掉房的木材将攻破的城缺口堵筑了两层。第二天早晨，他对吴军喊道：“我们不投降，决心战斗到死！”吴军极为愤恨，继续攻城，但未能攻克。

当时，正值酷暑，天气炎热，吴国士兵因过度疲劳和饮水不洁，造成腹泻和瘟疫流行，绝大多数人染病，死伤遍野。军官向诸葛恪报告士兵得病的人太多，诸葛恪认为他们撒谎，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说了。新城久攻不下，诸葛恪感到羞耻，心中越发烦

恼，常常大发脾气。将军朱异在军事策略上与诸葛恪有不同意见，诸葛恪一气之下，便将朱异的兵权收回，责令他返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提出军事计策，诸葛恪都不采纳，蔡林见诸葛恪如此高傲，便投降了魏国。

魏国观察到吴国士兵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于是发出援兵，解新城之围。七月，一无所获的诸葛恪实在无力再战，便率军退却。一路上，那些受伤的士卒不断死去，有的被丢在路边或扔进水沟，令人惨不忍睹。还有不少士兵被魏军抓住。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哀痛悲叹之中。然而，诸葛恪却若无其事。他还跑到长江的岛上住了一个月，还计划在浔阳地区开发田地。朝廷几次下诏让他回京，他才慢腾腾地返回。诸葛恪此次出师淮南，劳而无功，损失惨重。回到建业后，他不仅不检讨自己的过错，反而把中书令孙嘿召来，厉声问道："你们这些人怎么竟敢多次随意起草诏书！"孙嘿十分恐惧地告辞出来，托病辞官返回家乡。

诸葛恪出征后，朝廷新任命了一批官吏，诸葛恪说，这些官员没有经过他同意，不予承认。于是，这些官吏一律被撤职，再重新任命。他对百官大臣，动辄斥责，随意处罚，被他召见的人无不胆战心惊。诸葛恪还更换了宫中的宿卫军，全部选用他的亲近之人。他不吸取淮南用兵的失败教训，又命令军队加紧训练，准备攻打青州、徐州。诸葛恪这一系列违背民意、骄横专断的做法，使朝臣和百姓大失所望，怨声四起。

魏国汝南太守邓艾分析了诸葛恪的所作所为，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大臣们都观望动摇，吴国的名宗大族都有自己的家兵部曲，依仗自己的势力可以不服从政府的命令。诸葛恪刚执掌国政，既没有取得君主的信任，又不注意抚恤上下臣民；只是一味发动对外战争，虚耗民力，死伤数万人，结果大败而归。对诸葛恪来讲，必将有灾难降到他头上。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深受君主器重，但君主去世后，他们也遭败亡，更何况诸

葛恪的才能远不及这四位贤人，他又不知忧患，其败亡指日可待！”

邓艾的分析符合实际情况。诸葛恪不得人心，朝臣对他日益不满。武卫将军孙峻，也是受遗诏辅政的大臣之一，但诸葛恪轻视他，经常对他斥责、侮辱。孙峻怀恨在心。他见人们对诸葛恪怨恨不满，便在孙亮面前构陷诸葛恪，说他要发动政变。孙亮对诸葛恪也早已不满。原来，诸葛恪是原太子孙和的妃子张氏之舅，后在宫廷争夺太子位的斗争中，孙和失宠，孙亮继位，诸葛恪辅政，张妃曾派侍从陈迁到建业问候皇后，并向诸葛恪致意。临行时，诸葛恪对陈迁说：“回去替我告诉张妃，将来我一定使她胜过别人。”这话后来传入孙亮耳中，孙亮很不高兴。诸葛恪又打算将国都迁到武昌，并派民工修整武昌城。民间都传说诸葛恪将迎立孙和。这使孙亮很担心，生怕危及自己的皇位，他见孙峻说诸葛恪图谋不轨，便信以为真，二人便合谋诛杀诸葛恪。

建兴二年冬十月的一天，孙峻与孙亮共同宴请诸葛恪。赴宴的前一天晚上，诸葛恪精神恍惚，烦躁不安，彻夜难眠，总有不祥预感。第二天，他强打精神，乘车来到宫门外。这时孙峻已在帷帐之中设下伏兵，担心诸葛恪不进去而暴露计谋，便故意试探地说：“您如果贵体欠佳，可以等以后再来，我去禀告皇上。”诸葛恪回答道：“没关系，应当赶快拜见主上。”二人正要进宫，只见一队人马急速赶到诸葛恪跟前，太常滕胤，散骑常侍张约、朱恩从马上跳下，他们见孙峻在旁，没有讲话，便从怀中掏出一封密信，诸葛恪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今日设宴非同寻常，恐有事故发生。”诸葛恪又把密信交给滕胤看，滕胤劝诸葛恪返回。诸葛恪却满不在乎地说：“那帮小子能干些什么？我不怕！只担心酒食中有毒。”于是命人回府拿来平时饮用的药酒，携带入宫。张约也陪同诸葛恪入宫赴宴。

诸葛恪进入宫内，带着剑走上殿，拜见过孙亮，随即坐下．

不一会，酒菜摆下，诸葛恪疑心酒中有毒，迟疑不肯饮用。孙峻看出诸葛恪的心思，便笑着说："太傅疾病未愈，不便饮酒，如带有平常饮用的药酒，请随意饮用。"诸葛恪这才放心，取出自带的酒喝了起来。

酒过数巡，孙亮年少不胜酒力，先起身进入内宫。孙峻见孙亮退席，便假装去厕所，到厕所后脱去长衣，穿短装重新入席。诸葛恪猛然抬头，只见孙峻着短装佩利剑，满脸杀气，不禁大吃一惊。只听孙峻大喊一声"有诏令立即收捕诸葛恪"！说罢，拔剑向诸葛恪刺来。诸葛恪急忙躲闪，顺手拔剑，但没拔出；孙峻急步上前，一剑将诸葛恪砍死在地。张约在旁，急忙用刀去砍孙峻，正中孙峻左手。孙峻忍痛反击，又将张约右臂砍断。此时，众武士一齐冲上殿，孙峻用手制止说："所杀者只有诸葛恪一人，现已死，你们快将刀剑收起。"众武士遵令收起兵器，将诸葛恪尸体拉了出去。

诸葛恪被杀的消息传到家中，他的两个儿子忙用车拉起母亲，准备逃往魏国，孙峻派人追赶并杀掉了他们。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和他的三个儿子也在公安县被杀。诸葛恪的外甥张震、朱恩也都被诛灭三族。

诸葛恪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用兵淮南，无功而返，到头来落得个可悲的结局。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诸葛恪传》、《孙权传》、《孙亮传》

魏灭蜀

蜀国在诸葛亮死后，后主刘禅按照诸葛亮临终时的遗嘱，以蒋琬为辅政大臣，先任尚书令，领益州刺史，后迁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字公琰，是继诸葛亮之后的又一位有作为的大臣。他起初为州中小吏，后随刘备入蜀，任广都县长。刘备到广都，见蒋琬不理政事，时常喝得醉醺醺的，想加罪处罚。诸葛亮劝刘备说："蒋琬是国家的栋梁，不是百里之才。"后来，蒋琬被任命为尚书郎。诸葛亮任丞相后，蒋琬作为助手，协助诸葛亮处理政务。诸葛亮北伐时，蒋琬留守成都，处理丞相府事，负责筹划军备，供应前方。诸葛亮常说："公琰托志忠雅，是和我共同赞助王业的人。"

诸葛亮死后，蒋琬接替了诸葛亮的职位。他才干出众，办事稳妥，逐渐在朝廷中树立了威信，稳定了蜀汉政局。

中军军师杨仪见蒋琬出任首辅，内心不平。他认为自己的资历、功劳、才能都在蒋琬之上，而未能当上首辅，因而经常流露出怨恨情绪。军师费祎劝慰杨仪，杨仪忿忿不平地说："当初丞相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如果率众投靠魏国，哪能落得这样下场。现在想来，真令我后悔莫及！"费祎将此事报告刘禅。刘禅担心杨仪叛乱，便将他罢免，废为庶民。杨仪不服，又上书诽谤，言辞激烈，被朝廷下令收入监狱，后杨仪在狱中自杀。

蜀汉延熙九年（246）冬，蒋琬病故。刘禅以费祎为大将军，

辅佐朝政。费祎，字文伟，也是个很能干的人，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对宫中的事不大过问。而在宫中担任侍中的陈祗私心很重，他与受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互相勾结，将黄皓提拔为中常侍，成为宫中掌权的宦官头目，于是黄皓开始干预朝政，操弄权柄。

费祎的助手是姜维。姜维本是曹魏战将，诸葛亮北伐出祁山时，投奔蜀国。后多次立功，深受信任。他自认为熟悉西北情况，只要联络那里的少数民族，便可攻占陇西。他多次要求出兵伐魏，费祎不同意，他对姜维说："我们这些人的才能与诸葛亮差得太远了，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我们怎能做到？还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至于北伐，还是等待能人吧！我们不能指望侥幸取胜，如果一旦失败，后悔就来不及了。"费祎怕姜维势大难制，限制他的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人。

延熙十六年，魏国的郭修与姜维交战，被姜维打败后投降。姜维将他带回成都，刘禅没有弄清郭修是否真心归降，便任命他为左将军。郭修表面感恩戴德，内心却策划谋反。他几次想刺杀刘禅未遂，终于在一次宴会上将费祎杀死。费祎死后，姜维继任大将军。他自以为军事力量强盛，不听劝阻，多次北伐曹魏。

延熙十七年，姜维率军攻打陇西，从狄道进军攻克河关和临洮。曹魏派将军徐质前去迎战，蜀将张嶷被杀，姜维只好撤军。第二年七月，姜维又要出兵，征西将军张翼不同意，与他在朝廷上争辩起来。张翼认为："国家弱小，人民贫苦，不宜滥用兵力。"姜维不听，并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与张翼共同进军，包围了狄道。魏国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为安西将军，与征西将军陈泰协力抵抗姜维。为增强力量，又派太尉司马孚为后续部队。陈泰进军至陇西后，迅速占领了狄道东南的山岭，夜里突然举起许多火把，击鼓鸣号，姜维没想到魏国救兵到来如此之快，十分惊恐，而狄道城中的守军都欢呼跳跃，士气大振。在魏军内外夹击下，

姜维率军败走，驻守在钟提（今甘肃临洮南）。

魏军不少将领认为姜维兵败势衰，不会再出兵了。但邓艾却说："姜维虽然兵败洮西，士兵伤亡惨重，但他们仍有再度出兵的实力，不可大意。"果然，第二年七月，姜维再次出兵祁山，但他得知邓艾已有防备，便撤兵返回，从董亭（今甘肃武山南）直奔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邓艾闻讯后，立即占领了董亭以北的武城山，拦截姜维。姜维与邓艾争夺险要之地未能成功，便趁夜渡过渭水向东而行，邓艾又率军赶到段谷，截击姜维。姜维战败，士兵四散逃奔，伤亡无数。蜀国君臣都埋怨姜维。姜维上书谢罪，自求贬职。然而，姜维并未能接受教训，延熙二十年冬天，姜维听说魏国抽调关中兵力奔赴淮南，便乘机再度出兵，他率领数万人出骆谷，到达沈岭（今陕西周至南）。当时，沈岭之北长城一带积存粮食很多，而守兵少，魏将司马望、邓艾拒守不出。姜维远道而来，军粮供应不足，万分焦急。

姜维自任大将军后，每年出征，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蜀国军民愁苦不堪，怨声载道。

蜀国不仅对外作战不利，内政也逐渐腐败。当时，宦官黄皓与侍中陈祗勾结，把持朝政。他还想撤掉姜维大将军的职务，控制军权。姜维也十分厌恶黄皓，他密奏刘禅，要求杀掉黄皓。刘禅却回答说："黄皓不过是供我役使的小臣，你不必介意！"姜维见黄皓党羽众多，又得到刘禅宠信，自己在朝中凶多吉少，不如远而避之。他要求去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屯兵种麦，再也不敢回成都了。从此，在刘禅的纵容下，黄皓等人为所欲为，蜀国政治日益昏暗。

吴国皇帝曾派五官中郎将薛珝出使蜀汉。回来后，吴主向他询问蜀国得失，薛珝回答说："主上昏乱暗弱而不知自己的过错，臣下只图安身免罪而不思进取，入其朝听不到忠直之言，经其野见百姓都面带菜色。我听说燕雀处于堂屋之上，子母相乐，自以

为安乐无比，突然之间屋栋被焚，而燕雀仍然怡然自得而不知祸之将至，这正是蜀汉目前的情况。”

蜀汉朝政日益衰败，而曹魏力量却不断增强。这时，司马昭控制了魏国大权，整顿军队，准备战争。景耀五年（262），司马昭要出兵伐蜀，不少大臣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司隶校尉钟会赞成。司马昭说：“自平定寿春以来，已经六年平安无事了。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敌国。吴国土地辽阔而地势湿洼，在那里用兵较为困难，不如先平定巴蜀，然后再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这就像春秋时晋献公先灭虢国后取虞国的形势。蜀国士兵共计九万，守卫成都及防卫其他地区的约四万人，其余的战士不过五万人。现在把姜维牵制在沓中，使他不能向东用兵。我们可直接向骆谷进军，通过他们的空虚地带去袭击汉中。以刘禅的暗弱无能，蜀国百姓定会惊恐不安，这样，蜀国就必然灭亡。”魏国加紧了伐蜀的准备。

这时，在沓中的姜维发现魏国在关中练兵，有伐蜀的迹象，立即上表报告刘禅，建议他派重兵防守阳安关（今陕西勉县西）和阴平（今甘肃文县）。刘禅问黄皓，黄皓求神弄鬼，假借巫鬼的旨意，说魏国不会前来进攻。刘禅听信了他的话，于是将姜维的建议搁置一旁，朝中大臣对边境的危急情况毫无所知。

景耀六年八月，司马昭果然派三路大军伐蜀。征西将军邓艾率军从狄道（今甘肃临洮）、甘松（今甘肃迭部东南）向沓中进攻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军从祁山进军，攻打阴平附近的武街、桥头，截断姜维的后路；钟会率领十万魏军主力，分别从斜谷、子午谷进军，攻打汉中。刘禅得知魏军伐蜀的消息，连忙派廖化率军去沓中，作姜维的后援；派张翼等领兵去阳安关口协助防守。但援军还没有到达前线，钟会的大军就已经攻下汉中。

汉中是诸葛亮生前长期驻守的地方。钟会为争取人心，派人专门上定军山祭扫诸葛亮墓。还下命令，严禁部下在诸葛亮墓周

围放马、砍柴，以示对诸葛亮的敬意。

与此同时，魏军在阴平与蜀将傅佥发生激战，傅佥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抵抗 不料部下蒋舒投降，开城门迎接魏军，傅佥战死，阳安关陷落。

姜维在沓中得知汉中失守，连忙避开邓艾，向阴平（今四川文县）撤退。魏军紧追不舍，在强川口双方激战，姜维败走。他又听说诸葛绪已经占据了桥头，准备截击他，便从北面绕过诸葛绪到达了阴平。在阴平，他聚集军队，与从成都北上的廖化、张翼、董厥等援军会合，据守剑阁。

蜀军撤离阴平不久，邓艾率军到达这里。他挑选精锐军队想同诸葛绪一同经江油（今四川江油北）直奔成都，诸葛绪不答应，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截击姜维，而向西进军不是给他的命令，于是率军奔向白水（今四川青川东北），与钟会会合。钟会想独揽军权，秘密报告朝廷诸葛绪畏敌不敢前进。诸葛绪被押送回京治罪，钟会全部掌管了军队，然后向剑阁进兵。

剑阁又名剑门山，由小剑山和大剑山组成，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姜维把军队布守在险要之地，钟会多次进攻不能取胜，而且运粮小路既危险又遥远，军粮供应发生困难，钟会想引兵撤回。这时，邓艾给他写信，建议说："蜀军已遭受挫折，我们应该乘胜前进，如果从阴平出发，沿小路经德阳亭直奔涪县（今四川绵阳），此地距剑阁百里，离成都三百余里，在这里出奇兵冲击其腹心之地，剑阁守军必定回撤，那么在涪县的兵力就很小了，我军一定能够攻克涪县。"钟会接受了邓艾的建议，于是率军从阴平出发，经过七百里荒无人烟的崎岖小路，逢山开路，遇谷架桥，粮食供应不上，将士吃不饱饭，邓艾鼓励大家坚持。遇到危险山坡，邓艾就用毡毯裹住自己，滚下去，在他的带动下，将士们都不畏艰险，攀着树木崖壁，鱼贯而进，终于到达江油。据守江油的是蜀将马邈。他见魏军突然到来，大吃一惊，自知不

是对手，便开城投降了。接着魏军又向涪县进发，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退守绵竹（今四川绵阳西南），邓艾乘胜追击，并写信劝诸葛瞻投降，说："如果投降，一定上书请求封你为琅邪王。"诸葛瞻大怒，下令将使者斩杀，决心与邓艾死战。邓艾派儿子邓忠、司马师纂分别从左右两路发动进攻，诸葛瞻顽强抵抗，将他们打败。魏军撤回大营，对邓艾说："攻不破敌人。"邓艾大怒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什么攻不破的！"严厉斥责邓忠、师纂，要将他们推出斩首。邓忠、师纂回军再战，终于大破蜀军。诸葛瞻战死。他的儿子诸葛尚年仅十几岁，感叹道："我父子身蒙国家重恩，没有早些斩杀黄皓，使他败国害民，生有何用！"说罢，跨上战马，冲入敌阵战死。

魏军攻克绵竹后，很快逼近成都。蜀汉没有料到魏军这么快就兵临城下。刘禅已无兵可调，无将可战。百姓人心骚动，纷纷逃进山林湖泽。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认为蜀与吴是同盟国，可以逃奔吴国；也有人认为南中地区险峻悬绝，易守难攻，应向南撤。光禄大夫谯周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寄居别国而为天子的，如果去吴国，只能称臣。从政治形势来看，魏国肯定能吞并吴国，而吴国不能吞并魏国。与其称臣于吴，不如现在就称臣于魏，免得将来再受一次耻辱。至于南撤，应早作安排，现在大敌已近，人心不稳，一旦车驾南行，恐怕要发生不测之变，更谈不上到达南中了。"有人提出："现在邓艾大军已经不远了，恐怕不接受投降，怎么办？"谯周回答说："现在吴国还没有降服于魏，形势使他不得不接受，接受了也不得不以礼相待。如果陛下投降魏国，魏国肯定裂土分封，他们如果不这样做，我就自去洛阳以古义同他们相争。"人们都赞成谯周的意见。刘禅仍想南撤，犹豫不决。谯周又上书说："南方夷蛮地区原来没有赋税徭役，还屡次反叛，自从丞相诸葛亮用武力降服他们，才顺从朝廷，现在如果去南中，外要防御强敌，内要承担朝廷各种开支，这些费

用没有别的来源，只有依靠夷蛮负担，他们必定反叛！”

在谯周的一再劝说下，刘禅终于决定投降魏国，派侍中张绍等人带着印玺去见邓艾。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反对投降，他愤怒地说：“即使我们无计可施，无力可守，面临灾祸，也应父子君臣背水一战，为国家捐躯，这样才无愧于地下的先帝，为什么要投降！”刘禅不听，刘谌不愿看到蜀汉灭亡，便跑到祖庙痛哭，先杀了妻子，然后自杀。

侍中张绍在雒县（今四川新都北）见到了邓艾，代表刘禅向邓艾表示投降。邓艾大喜，复函欢迎。刘禅又派人去前线要姜维向钟会投降，当蜀汉将士接到投降命令时，许多人义愤填膺，拔出刀猛砍山石。刘禅还派尚书李虎将户籍档案送交邓艾，共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口，军队十万二千，军吏四万人。不久，邓艾率魏军抵达成都。刘禅带领太子诸王以及群臣六十多人，按古代国君投降的仪式，反绑双手，拉着棺材，来到邓艾军前请降。邓艾上前将刘禅松绑，下令将棺材烧毁，表示接纳。刘禅投降以后，姜维及廖化、张翼、董厥等人也率部队投降了钟会。

刘禅作为亡国之君，客居洛阳，受辱敌国，却怡然自得。有一次，司马昭与刘禅一起宴饮，故意为他表演蜀国歌舞，旁人看后都为之伤感不已，而刘禅却嘻笑自若。司马昭对贾充说：“人没有感情竟然到这种程度！即使诸葛亮还在，也不能辅佐他长治久安，何况姜维呢！”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刘禅：“你还思念蜀国吗？”刘禅说：“在这里很快乐，我不思念蜀国。”跟随刘禅入魏的蜀臣郤正听说这件事后，非常失望，对刘禅说：“以后司马昭再这样问您，您应该含着眼泪回答：‘祖先的坟墓都远在岷、蜀，我常常望西而悲，没有一天不思念。’然后闭上眼睛。”不久，司马昭果然又来问刘禅，刘禅便将郤正教给他的话重复了一遍。司马昭说：“你说的怎么和郤正说的一样？”刘禅睁开眼睛，惊慌地说：“这是他教我这样说的。”左右人听了，都哈哈大

笑。

蜀汉自221年刘备称帝，到263年刘禅亡国，共四十三年。

蜀汉灭亡后，邓艾在成都居功自傲。他对蜀国士大夫说："诸君多亏遇到我，所以才有今日，如遇到东汉初年吴汉那样的人，你们恐怕早已被杀了。"他给司马昭写信，建议乘胜伐吴，并规划了伐吴的各种准备工作。司马昭怀疑邓艾有专权之心，便派监军卫瓘转告邓艾，"做事应当报请，不要按己意实行。"邓艾很不满意，他认为自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谋划，不应该遭到指责。

其实，真正有叛离之心的是钟会。姜维已有所察觉，想促成他作乱，就假意劝钟会："听说您自淮南之战以来，算无遗策，现在又平定了蜀国，威德震世，百姓无不颂扬您的功劳，主上却畏惧您的谋略，您还想安生吗？何不效法陶朱公范蠡泛舟湖上，远避是非，以保全自己的功名性命呢！"钟会说："您说得太远了，我不能离开。"姜维见他热衷功名，便说："其他事情就凭您的智慧和力量了，用不着我多言了。"钟会见邓艾在灭蜀战争中功劳显赫，并独断专权，便想除掉他。他和卫瓘一起密报邓艾企图谋反。钟会善于摹仿别人的字体，他在剑阁拦截了邓艾的奏章、上表，改写了其中的话，使言辞狂悖傲慢，居功自傲。同时又毁掉司马昭的信，重新再写，以使邓艾生疑。这样一来，司马昭果然以为邓艾图谋不轨，便下令用囚车将邓艾押送回京。途中，邓艾被卫瓘杀掉。

邓艾死后，钟会在西南地区势力大增。他见时机已到，决心反叛，准备让姜维做先锋率兵五万出斜谷，自己统帅主力随后，先占领长安，然后进军洛阳。然而，司马昭早就料到钟会要谋反，并知道他不好对付，便亲率十万大军屯驻长安，同时命令中护军贾充领兵入斜谷。钟会发现司马昭对他有了防备，急忙下令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帜，为防止部下反叛，钟会把入蜀魏军

将领都关押起来，准备把他们杀掉，但是没等钟会动手，他们联合起来攻打钟会，被关押的将领也乘机逃回自己的部队，率兵伐讨钟会。在战斗中，钟会、姜维都被杀死。司马昭牢牢地控制了魏国大权。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邓艾传》、《钟会传》、《姜维传》、《后主刘禅传》、《费祎传》、《蒋琬传》、《谯周传》

玄学之兴

在魏晋思想发展史上有一件大事，便是玄学的兴起。魏晋玄学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玄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清谈玄学成为魏晋士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显露学识，展示风度的重要方式。

魏晋玄学是从清谈开始的。而清谈又是从东汉末年的清议发展而来的。所谓清议，是汉末民间品评人物、议论朝政的一种社会舆论。东汉末年的政治黑暗，激起知识分子和正直官僚的强烈不满，他们常常在一起上议朝政，下议卿士，不断抨击朝政弊端，揭露宦官丑行。后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党人太学生运动。但是，党人太学生遭到宦官集团的残酷镇压，经过两次党锢之祸，许多党人太学生被屠杀。在恶势力的严逼下，批评朝政的清议日渐消沉，而以推崇老庄自然为特色的清谈应运而生，许多士人追求自然，蔑视礼教，以口谈玄虚和消极避世取代积极进取和热情参政。

汉末名士郭林宗是由清议向清谈转化的代表人物。他善于保全自己，巧妙地躲过了党锢之祸。他的言谈、举止很受人们拥戴，是清谈名士的楷模。进入魏晋以后，政治斗争非常激烈，许多士人惨遭杀害。于是清谈玄远，以避灾祸，成为士人的强烈愿望。在这种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了。

玄学的创始人是何晏、王弼。

何晏（190——249），字平叔，南阳人，汉末外戚何进之孙。他少以才华知名，后随母改嫁曹操，为曹收养，并娶曹操女金城公主，官至尚书。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剪除曹爽集团，何晏作为曹氏集团的重要成员，亦遭杀害。何晏被杀之前，已预感到大祸将至。面对正在崛起的司马氏和软弱无能的曹爽，他忧心忡忡，为摆脱恐惧的阴影，便向老庄思想寻求精神寄托。他好老庄之言，善谈《易经》、《老子》，著有《道德二论》、《无名论》和《论语集解》等书。

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自幼聪慧，天才过人，十几岁就精通《老子》，深受前辈称赞。何晏虽然比王弼年长三十多岁，但很敬重王弼的才华，与他关系密切。王弼官至尚书郎。何晏被杀后，王弼也被免职，不久病死，年仅 24 岁。王弼的著述很多，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

何晏、王弼作为玄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他们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提出了"贵无论"。主张用道家的"无为"取代儒家的"有为"，认为笃守道家的"无为"，回避政治斗争，既能够保持自己的操节、精神的自由，还能保身免祸。在他们的倡导下，形成了以探讨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同时讨论本末、有无等范畴的玄远之学，即玄学。对于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何晏、王弼依据"贵无论"学说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在他们看来，名教是"有"的表现，"自然"是"无"的本来状态，君主只要恪守自然无为，就可以上顺宇宙本根，下顺百姓自然之性，从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可见，"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即是用道教观点解释儒学，把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揉合为一体。"名教本于自然"这一玄学观点的提出，也与何晏、王弼所处的政治环境有直接联系。当时，曹氏与司马氏争权夺势，日趋激化。这一主张便是希望各政治集团

解除争斗，双方和睦相处，君主要顺应自然之道，实行无为而治。而臣下也不要犯上僭越。然而，何晏、王弼精心设计的这一理论并没有消弭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矛盾。249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终于发动军事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何晏等一批正始名士惨遭屠戮。

司马氏把持曹魏朝政以后，独断专横暴虐，排斥异己，杀戮士人，士人无不感到恐惧。而司马氏为掩人耳目，大力标榜“名教之治”，宣称“以孝治天下”。嵇康、阮籍等名士对司马氏不满，但又无力进行反抗，只好在清谈玄学中寻求心理的平衡。嵇康、阮籍在论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时，与何晏、王弼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自然是广袤无边的宇宙，天地万物都存在于这一整体之中，它们是统一的，没有区别的。自然还是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也应该如此。圣人应该根据自然的规律来处理政事，使名教与自然相一致。只是后来社会风气变坏，造成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嵇康、阮籍出于对司马氏当政和虚伪的礼治不满，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嵇康公开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要效法老庄，不斤斤计较名利得失，只求自在和逍遥。阮籍还以辛辣的笔锋嘲讽了那些虚伪的礼法之士，说他们是钻进裤裆里的虱子。然而，在司马氏的严密控制下，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是不能实现的。嵇康被杀身亡，阮籍郁闷而死。不过，嵇康、阮籍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从政治上看蕴含着极为深沉的时代忧患感，这个口号是以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及痛苦、矛盾、彷徨的心理为背景的。这种心态既表现为他们对名教的激烈否定，又表现为他们对自由的执著追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名教和自然是难于合一的。他们的自我意识既不能在名教中得以实现，又不能在自然中找到寄托，执著的追求只能加重内心的痛苦，顽强的抗争迎来的是杀身之祸。

西晋元康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八王之乱”便在这时爆发。现实政治的变化对玄学思想发生了影响。裴頠、郭象为改变社会风气，对玄学进行了改革，分别提出了“崇有”和“独化”的理论。裴頠（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博学多才，善识名理，时人称之为“言谈之林薮”。晋惠帝时官至尚书左仆射。在“八王之乱”中，不依附贾氏，为赵王伦所杀，年仅34岁。其主要著作为《崇有论》。

裴頠将当时社会风气衰颓归结为玄学“贵无论”所致，进而提出了“崇有”之说。他认为，名教本身就是本体，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无”这个范畴是完全不必要的，应该崇有而不能贵无。裴頠反对在名教之外去寻找一个自然或无为作为名教的本体。他指出，贵无派歪曲了老子学说，老子讲“无为”、“静一”，是为了反对当时浮华的弊端，使人心情平和，教人谦下退让，是作为君子道德修养而提出的，并没有本无的意思。裴頠认为，绝对的“无”是不可能生长出任何东西来的，万物的产生和存在，是自生自长出来的。自生的本体是“有”，“有”才能哺育万物。所以“无”的概念只是在没有了“有”以后的“遗者”，是不能与“有”相提并论的。

裴頠还用实例进一步阐明崇有说。他指出：心不同于事，心是制裁，决定事物的；匠人不同于器具，匠人是制作器具的。不能因为制裁万物的心本身不是事，制作器具的匠人本身不是器具，就说心和匠人的作用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欲钓深水里的鱼，光是躺着是不行的，欲射高墙上的鸟，光是坐着也不可能得到。而应该在鱼食和弓箭上下功夫。照此看来，凡是促成万物的都是“有”，“虚无”对人们来讲是毫无用处的。

与裴頠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玄学家郭象则提出了“独化论”。郭象（252——312），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好

老子说，曾任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太府主簿。反映他思想的著作是《庄子注》。郭象在综合分析贵无、崇有各派思想利弊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他不同意“无”能生“有”，也反对“有”为造物主，派生一切。他认为，万物生长都是自然的，有各自规律的。他举例说，你的身体也是自然生成的，不是属于你所有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身体属于你所有，即自己能支配或生或死，或美或恶，但是人在实际上是不能支配自己的，因为人的形体是由“气”所决定的，“气聚而生”，“气散而死”。

反对他生，反对造物主是郭象玄学思想体系中的一条主线。郭象的“独化论”意在调和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魏晋时期，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玄学家都追求整体性的和谐，以消除矛盾。比如，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主观上是希望把“有”与“无”有机地结合为一体，而客观上人们却从他们的玄学体系中得出了贵无贱有的结论。裴頠在批评“贵无论”的同时提出“崇有论”，也是以追求整体的和谐为目标的，不过裴頠的理论重点是放在作为存在整体的“有”上，并没有对个体的和谐进行深入研究。郭象的“独化论”则不仅回答了有无之辩中的许多难题，而且把个体的和谐与整体的和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和谐的整体观提供了优于各家的证明，把玄学思想推向了高峰。

进入东晋以后，玄学逐渐走上与儒家、佛学合流的道路，进而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行程。能够代表这一时期玄学思想的是张湛。

张湛字处度，是东晋中期的玄学家。他崇老庄，解玄理，精养生，著有《列子注》和《养生要集》。他在继承前代玄学家的基础上，改造并发挥了玄学，构成了别具一格的玄学体系，成为东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玄学。张湛的玄学思想也是玄学发展的终

结。在他之后，玄学与佛学逐渐合流。

张湛的玄学思想是要把何、王的“贵无论”与郭象的“独化论”从理论上统一起来，形成了独特的“贵虚论”。张湛概括贵虚的涵义是：“群有以至虚为宗。”“至虚”并非客观实体，而是对群有自然生化的承认与顺应。“至虚”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到，俨如老子的“道”。所以张湛说：“至虚无物，故谓神谷。”为了和物的消散状态的“无”相区别，张湛又称“至虚”为“至无”。在张湛看来，只有这样的“无”才能成为万物的主宰，万物生化也必然依赖至虚的作用。所以，不是从“无”中生出“有”，而是依恃“无”的作用，“有”才能产生。他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便是极力调和二者的关系，主张“任自然而顺名教”，即在遵守名教的前提下任性情之自然。他反对蔑视礼法，也不同意用名教束缚性情。

张湛的“贵虚论”代表了东晋当权名士的思想情绪。这些人一方面要享受荣华富贵，声色逸乐，追求精神的高雅超迈，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朝纲，稳定东晋政局。如晋元帝的主要谋臣王导过江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大名理而已。但是宛转关联，妙趣横生，各个方面无所不涉及。谢安身为朝臣，却悠闲自在，大有超脱世俗之志。王羲之批评他：“今当乱世，人人应当奋力报效国家。可是目前清谈玄虚，荒废公务，文章浮华，妨害要事。”谢安回答说：“秦始皇重用商鞅那一套，结果不到两代就亡国，这难道也是清谈带来的祸患吗?”

这些人身为东晋权臣，虽有治国兴邦之志，但又于清谈之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与张湛的人生论大致相近。

魏晋特定的社会环境，产生了玄学思潮。玄学，作为高度抽象思辨的哲理，在它形成和发展中凝聚了无数知识分子的才华和智慧。魏晋士人通过各种形式的清谈活动，不断发展、丰富、深化了玄学理论，并形成了不同的玄学流派。魏晋士人热衷清谈玄

学，常常废寝忘食，如痴如醉。

东晋时殷浩、庾亮、王导、桓温等人一起清谈，由王导和殷浩二人辩论，其他人观战，一直谈到三更时分，也未分胜负。王导十分高兴地说："刚才谈的那些内容，怎样争论的，我都忘了。你们的发言修辞，引喻相譬，都尽了最大努力，当年正始名士清谈，正是这样啊！"清谈给士人生活带来了无穷乐趣。王澄以才高自傲，对一般人看不起，但很佩服卫玠的清谈。有一次，卫玠讲演玄理，王澄前去聆听，卫玠讲到高妙之处，王澄听得入了神，竟接连三次跌倒在座位上。后来，人们把这件事编成了歌谣："卫君谈道，平子（王澄字）三倒。"还有一次，谢尚听著名清谈家殷浩讲演，殷浩的讲演思想深刻，条理清楚，妙语连珠，精彩异常。谢尚听得入神，不觉汗流满面，殷浩看了，用从容的语调对仆人说："取手巾与谢郎拭面。"清谈虽说其乐无穷，但辩论起来还是高度紧张的，既劳心又劳神，体力弱者很难支持。卫玠身体素来多病，他曾与乐广清谈，乐广说话简练，意思费解。卫玠不明白乐广所说的一个"因"字，百思不得其解，结果患病不能起床。乐广闻讯后，特地派人向卫玠作了解释，卫玠才得痊愈。然而，卫玠过度迷恋清谈，完全不顾身体。有一次，他在王敦家遇到著名清谈家谢鲲，二人兴奋不已，整整谈了一夜，王敦也一夜奉陪。卫玠身体一直不好，其母常禁止他清谈。这次卫玠忘乎所以，过度劳累，病情加重，不久去世。

迷恋清谈的士人不顾身体，还不顾场合，甚至在服丧、订亲、婚礼时遇到清谈好友也要谈上一通。如车骑将军谢玄能清谈，善名理，他的父亲谢奕死后，谢玄服丧。名僧支道林得知后，特地赶到谢家，一直谈到傍晚才离去。有人在路上见到支道林，问他："先生从何处来？"支道林答道："今天与谢玄痛快地谈论了一场刚刚回来。"清谈家羊孚之弟羊辅将与王永言的女儿成亲，王家想看新女婿，羊孚便陪弟弟来到王家，在王家正遇到

王永言的父亲及姐夫殷仲堪。殷仲堪也是清谈家。于是羊孚和殷仲堪便以《庄子·齐物篇》为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热烈讨论，双方观点取得了一致。西晋太尉、大清谈家王衍之女嫁给了裴遐，婚后三日，王衍召集诸婿来家清谈。大玄学家郭象也赶来助兴，并首先向裴遐挑战。郭象言辞犀利，富于雄辩；裴遐则从容不迫，徐徐道来，二人各具风采，难分高低，使听客大饱耳福，在座的人无不称赞。

魏晋士人清谈玄学大多是在辩论中进行的。辩论的方式有两种。一为驳难式，即先由一人提出自己的论断，然后征求对手的意见，双方展开辩论。辩论每进行一个回合叫“一交”或“一番”。辩论双方往往要经过轮番交锋，反复诘难，方能决出胜负，理屈词穷者为败方。名僧支道林和殷浩在简文帝司马昱家中清谈，双方经过“四交”后，支道林宣告失败。在辩论中，有时双方相持不下，便让听众判断胜负。在驳难中，有一种方式是在听众面前自己设问，自己答辩。何晏、王弼在一次辩论时，王弼发难，将何晏的理论驳倒。在座的人都认为何晏已经失败；而王弼意犹未尽，他又自设辩论的双方，反复争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有时辩论的双方旗鼓相当，经过多次交番也不分胜负，甚至通宵达旦，还有的拖了很长时间。桓玄与殷仲堪辩论，起初二人难分伯仲，一年后，他们再次辩论，只一二回合，桓玄就告失败。桓玄自叹才思大不如前，而殷仲堪却带着几分捉弄地说：“这是你转入悟解的表现。”

在清谈玄学的辩论中，如果败北的一方不服气，可以另请高手助阵，继续辩论。一次，殷浩、孙盛、王濛、谢尚等在简文帝司马昱家里辩论。孙盛作《易象妙见于形》论，他振振有辞，意气飞扬。在座的人都不同意孙盛的说法，但又没有好的道理说服他。司马昱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于是派人请来擅长辩论的刘真长。刘真长来到后，先让孙盛陈述一遍自己的

观点，孙盛自知不敌刘真长，只是粗略地复述了一遍，已不像先前那样盛气凌人了。刘真长听后，从容不迫地发表了二百多句的诘难演说，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孙盛哑口无言，满座同时鼓掌大笑，称赞不绝。清谈辩论时，气氛有时很紧张，甚至恶语相交。孙盛和殷浩在一次辩论中，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左右人送来饭菜，他们顾不上吃，冷了再温，温了又冷，他们边说边挥动麈尾，麈尾毛都脱落在食物中。天渐渐黑下来，他们还是不吃不喝，争辩不已。最后二人互不服气，对骂起来，殷浩对孙盛说："你别作强吗，我会穿起你的鼻子！"孙盛也不让步，说："你没见过决鼻牛吗？当心别人会穿透你的面颊！"

这里说的麈尾是魏晋士人在清谈玄学时喜欢挥舞助兴的物品。麈是鹿的一种，其尾毛很漂亮。人们用它制成了上圆下方的形状，并有缕缕垂丝，清谈时上下左右摇摆，以表现清虚飘逸的意境和潇洒脱俗的风度。许多清谈家都喜欢麈尾。王导把麈尾挂在床前，清谈时取下便用。王濛每次清谈都要先举起麈尾，能一口气谈出八百字的高论。王衍有一把心爱的玉柄麈尾，每次提柄，手与柄同色，风度不凡，深为谈客羡慕。由于麈尾与清谈密不可分，所以麈尾也就成了清谈的代名词。支道林谈到他清谈时，就说"贫道捉麈尾三十年"。

魏晋时期，清谈玄学盛行一时，成为士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玄学的风行，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观念和传统文风，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的新局面，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时期。

（孙立群）

参考资料：

《三国志·何晏传》
《晋书·裴颜传》
《庄子注》
《世说新语》

嵇、阮之死

魏晋之际，有七位名士性趣相投，常在竹林中聚会，饮酒畅谈，人称“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嵇康、阮咸、刘伶、山涛、向秀、王戎。不过，这七人的家庭背景、个人品行、性格脾气各异。尤其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不断杀戮异己，实行高压政治，直接涉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导致了竹林七贤的分化。分化后七贤有两种人，一种人以王戎、山涛为代表，他们见曹魏朝政日衰，大势已去，不失时机地投靠了司马氏，后来成为西晋王朝的佐命功臣。王戎，字濬冲，官至中书令、光禄大夫、司徒，权势显赫。入仕后，他聚敛无度，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仍不满足。王戎十分吝啬。他虽然很富有，在洛阳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但他常常与夫人用牙筹计算，生怕吃亏。他家有好李子，出卖时唯恐别人把种子留着栽种，便用锥子将李子核钻破再出卖。山涛字巨源，投靠司马氏后，深受信任，曾任冀州刺史，后任吏部尚书、侍中。

另一种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包括阮咸、刘伶、向秀。他们不愿同司马氏合作，但采用的方式不同，结局也各异。从家世上看，他们与曹魏王室关系比较密切。阮籍字嗣宗，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在曹操身边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军师祭酒多年，是曹操的重要谋士。阮籍 3 岁丧父，得到曹氏父子的照顾。阮咸是他的侄子。嵇康字叔夜，比阮籍小 14 岁，博览群书，知识宏富，善书法，尤妙于草书。他的古琴演奏技巧闻名于时。他

的妻子是沛王曹林（曹操子）的女儿。凭借宗室姻亲的身份，嵇康被征为郎中，拜中散大夫。阮籍、嵇康对曹魏王业抱有很大热情，愿意为之施展自己的才华。

然而，魏明帝曹叡死后，继位的齐王曹芳年幼无知，辅政大臣曹爽虽为曹魏宗室，但属庸碌之辈，没有真本事。而另一位辅政大臣司马懿则老谋深算，足智多谋，高平陵政变就说明曹魏集团已不是司马氏的对手。在正始年间（240——249），阮籍、嵇康等人目睹了司马懿与曹爽明争暗斗，他们忠于曹魏皇室，而对曹爽、司马懿两个集团都不感兴趣，早年的功名心大减；不肯投靠任何一个集团，以保全自身。阮籍整日在家闭门读书，或不加节制地饮酒，嵇康则喜欢打铁，以此为乐。

随着司马氏力量的崛起，阮籍、嵇康的社会处境越来越险恶。尤其是高平陵政变以后，司马氏实际上控制了魏国政权，他们对阮籍、嵇康这样与皇室有关系的人，更加密切注意和防范。其实，阮籍、嵇康虽然对司马氏很反感，但没有力量进行反抗，他们只是想在险恶的环境中保全自己。他们说话非常谨慎。王戎与嵇康在山阳同住了二十年，从未看到嵇康有喜愠之色。阮籍更是谨慎。有一次，他随叔父到兖州，兖州刺史王昶闻其才名，请与相见，阮籍却终日一言不发。王昶很感慨，认为没法摸清他的心思。阮籍说话虚玄高远，从不品评人物，涉及是非。为了保全自己，他们热衷于服药饮酒，清谈玄学；向往隐逸的生活。同时也不断写诗，写文章批判"礼法之士"，实际影射司马氏集团。由于阮籍、嵇康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他们的品格、才学深受推重。司马氏为了收揽和安抚人心，极力拉拢他们。

景元二年（261），司马昭杀了魏帝曹髦，代位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他担心自己落下"弑君"的恶名，很需要舆论的支持，于是加紧了对嵇康的拉拢。他让竹林七贤之一、已经投靠他的山涛出面，以山涛将转任散骑侍郎，吏部郎出缺为名，请嵇康自代。

嵇康只要一上任，社会舆论将减少对司马昭的谴责。嵇康对司马氏的用意很清楚，他坚决不接受邀请，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作为对山涛，也是对司马氏的答复，在这篇长达1700多字的文章中，嵇康举出种种理由说明自己不出仕的原因，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

文章一开始，嵇康便开门见山地对山涛说，你让我出仕，可知你并不了解我。你好像厨师一样，不好意思独自割肉，还要找一个外行人帮忙。接着嵇康指出，老子、庄周是我的尊师，他们都身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都是贤达之人，他们都安心卑位。我要像他们那样，坚定志向，不会改变。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列举了九条不能出仕的理由，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了司马氏的拉拢。这九条理由是：第一，睡觉喜欢晚起，不能按时上朝。第二，爱好弹琴出游，野外钓鱼，而做官不能随便活动。第三，端坐时间一长，手脚便麻木；身上多虱，需不断抓骚，穿上官服，久坐不动，无法忍受。第四，向来不喜欢写文章，而当官要处理公文书，写答复书信。第五，不喜欢吊丧，而习俗以此为重。第六，不喜欢与俗人共事，宾客盈座，声音嘈杂。第七，心不耐烦，而政务繁杂忙乱。最后两点，尤其不能忍受，一是常常非难汤、武而鄙视周、孔，恐为世人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遇有不平事，便仗义直言。显然，以上九条，不仅是不能出仕的理由，还流露出嵇康对司马氏的指斥，尤其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态度，更是直指企图实行“汤武革命”，代魏自立的司马氏。该书表面与山涛绝交，实际与司马氏绝交，使嵇康与司马氏的关系恶化了。

第二年，嵇康为好友吕安蒙冤鸣不平，再次得罪了司马氏。吕巽与吕安是兄弟。他们都与嵇康相识，吕巽是个虚伪下流的家伙，他见吕安妻子貌美，就动了邪念，将她灌醉奸污了。吕安得知后，又气又恼，打算向官府告发，于是找嵇康商量。嵇康听

后，也很气愤，但考虑到这是一件“家丑”，不宜张扬，就劝吕安忍耐。没想到吕巽却反咬一口，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暗地向司马昭诬告吕安在家不孝，打了母亲。吕巽当时在司马昭手下任职，司马昭听信了，便将吕安流徙远方。

这件事使嵇康受到极大震动，他感到不安。吕安是在他的劝说下才隐而不发，息事宁人的，结果反受其祸，他为吕安深感不平，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他无比憎恨伪君子吕巽，愤怒之下，他写了《与吕长悌（吕巽字）绝交书》。他在信中说：“我和你以前是朋友，后来又认识了你的弟弟吕安，他年少而聪慧，我为你有这样弟弟感到高兴。但你却无情无义，干了那种事，吕安想要告发你，被我阻拦了。我还告诉你，要同他亲近和睦。我这样做为了你家的名声，使你们兄弟和好。而你当时也答应我，不加害吕安，并当面起誓。可是，你却自食其言，秘密告发吕安，使他被抓，这都是由于吕安听信了我的缘故，没想你却包藏祸心。”信中最后说：“吕安被判罪，你应负主要责任，我现在神志恍惚，不知该说什么了。我要郑重告诉你，今后我不再与你交往！”这篇书信充满了对无耻之徒吕巽的蔑视。因为吕巽的后台是司马昭，嵇康斥责吕巽，宣布与之绝交，同样意味着向司马氏绝交。这说明司马氏对嵇康的拉拢已彻底失败，他们图穷匕首见，就要举起屠刀了。

与嵇康刚烈的性格相比，阮籍的反抗性比较软弱。他虽然不愿意同司马氏合作，对政治问题也非常谨慎，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但是，他不敢同司马氏公开决裂，正面对抗。司马氏抓住了阮籍的弱点，自高平陵政变后，就一直让阮籍在司马氏手下任职。他先后任司马懿的属吏太傅从事中郎，司马师死后，又任司马昭的大将军从事中郎。后来又封关内侯、散骑常侍。阮籍深知，政治上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所以他不敢轻易推辞司马氏的委任，只是在任期间敷衍了事，不尽其责。阮籍甚至还曾两

次向司马昭主动要求官做。一次，他要求做东平太守，对司马昭说："曾游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物。"司马昭自然高兴，他以为这是阮籍愿意在政治上效劳的表示，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阮籍骑着驴去上任，直接进入东平太守衙门，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人把衙门的围墙拆掉，使内外相通相望，接着又精简各种政令。但他仅呆了十几天，又骑着驴离开了。阮籍的举动使司马昭不解。还有一次是他要求当步兵校尉，后人称他为"阮步兵"。然而，他看中的仅是步兵营中有一位善酿好酒的厨师，而且那里藏有美酒三百斛。他到任后，整日与刘伶痛饮，也不认真干事。

阮籍对司马氏若离若即、玩世不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司马氏对他的戒备心理，司马氏为收揽人心，也容忍阮籍。在司马昭大堂上，一般官员都毕恭毕敬，而阮籍可以在那里箕踞啸歌，酣饮自若，司马昭也不责怪。其实，司马昭只是故作姿态而已。随着他们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取代曹魏时机的成熟，他们需要阮籍公开表态，真正参加到他们行列中来。司马昭曾打算替长子司马炎求娶阮籍女，这种联姻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此事若成，阮籍自然成为司马氏集团的一员。不料阮籍得知后，以酒做掩护，大醉六十日，使司马昭无法开口，只好作罢。

但是，阮籍无法摆脱的事情终于到来了。景元四年（263），司马昭自封为晋公，位相国，加九锡，并策划由公卿大臣"劝进"，然后再受封。阮籍被指定写《劝进文》。阮籍还以酒搪塞，跑到朋友家痛饮，迟迟不动笔，当催要文章的使者赶到时，他正在饮酒，使者即刻就要将文章带走。阮籍既无法推脱，又不敢不写，只好由人扶着，当场书写完毕。这篇文章，是阮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违心写成的。他虽然以自己的妥协，消除了司马氏的怀疑，保住了性命，但是阮籍内心十分痛苦，精神支柱从此坍塌了。写完《劝进文》不久，他就去世了。

嵇康对司马氏毫不妥协，他不仅憎恨伪君子吕巽，也十分讨

厌那些卖身投靠的无耻之徒。如钟会依附司马氏后，很受赏识，他甘做鹰犬，看主子眼色行事，多次找嵇康谈话，企图从中播弄是非。嵇康早有准备，发言玄远，从不评品人物的是非，使钟会无机可乘。嵇康的道德、文章、仪表风度都出类拔萃，钟会对他既敬畏又忌恨。有一次，他带着人来到嵇康的住处，嵇康正在门前柳树下打铁，他见到钟会，没有理他，而钟会自命不凡，不肯屈尊，一直等着嵇康开口。嵇康却旁若无人，继续打铁，钟会只好无趣而返。临走时，嵇康突然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愤愤地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的高傲态度，大煞了钟会的威风，他更加仇恨嵇康了。

嵇康如此难以驾驭，终于惹怒了司马昭。他以嵇康与吕安案有牵连为名，将嵇康投人监狱。钟会见报复的时机已到，便罗织嵇康的罪名，上告司马昭，他说："毌丘俭起兵时，嵇康就要响应，只是由于山涛劝阻才未成事。现在嵇康言论放荡，诽谤经典，作为帝王，对此不容忍，应该除掉他们，以淳风俗。"钟会又说："嵇康是卧龙，不能让他得势，您现在担忧天下出事，嵇康是最危险的人物。"司马昭听信了钟会的谗言，便下令将嵇康处死。消息传出，京师太学生大哗，人们非常景仰这位品德高洁的正直诗人，三千人联名上书，要求赦免嵇康，并请求让嵇康到太学当老师。然而，太学生的活动无济于事。嵇康临刑前，从容镇定，坦然自若，他要来一张琴，当场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弹毕感叹地说："早先我的朋友袁孝尼曾要求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总是不肯教他，以后再也听不到《广陵散》了！"然后从容就义。嵇康被杀时年仅40岁。嵇康的刚直，终于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之下，而阮籍的迂回，也没有摆脱悲剧的结局。至于阮咸、刘伶、向秀等人，他们为躲避司马氏的迫害，或以酒为伴，终日狂饮，以解脱内心的苦闷，或潜心探求"自然"与"名教"的玄理，藉以求得精神世界的平衡。

竹林七贤的分化与阮、嵇之死，是知识分子在封建高压政制面前的缩影。

（孙立群）

参考资料：

《晋书》：《山涛传》、《王戎传》、《阮籍传》、《嵇康传》、《钟会传》

《世说新语》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指这时魏晋士人特有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在思维方式、举止言谈、道德、情操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特征。他们思想解放，蔑视礼教，行为洒脱，谈吐新奇；他们企慕人生，崇尚自我，热爱自然，追求自由。魏晋风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魏晋士人除了热衷于清谈玄学外，还对服药、饮酒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东汉末年以来，政局多变，士人普遍感到凶吉难测，朝不保夕。他们在诗中常常感叹岁月如梭，人生短促，生命可贵。由于前途渺茫不可预测，只能让眼下生活得自在。当时，许多人都相信服用寒食散可以长寿，于是服药之风便盛行起来。此外，据说服药可以美姿容，刺激性功能，增加生活的蜜度和乐趣。

带头吃药的是玄学创立人何晏。他身为皇室贵族，虽然享受荣华富贵，但因卷人曹氏与司马氏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内心充满了恐惧。为了充分享受人生，他常常服药。他喜好打扮自己，搽脸的白粉从不离手，走路也顾影自怜。他服寒食散后，心胸开朗，体力转强，颇有神效，于是流传开来，服药的人越来越多。

发明寒食散的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医学著作中有“侯氏黑散”和“紫石英方”，这两个配方与寒食散的配方近似。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一书中具体记载了“五石更生散”的主治、配方和用法。寒食散的主要原料为紫石英、白

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所以寒食散又名五石散。这种药久服可以强壮筋骨，益寿延年。不过，与大多数药物都有副作用一样，寒食散也是一种毒性极大的药。服用此药必须冒很大风险。服用寒食散以后，药中的毒性便会发作，产生巨大的内热，必须依照一套极细微而繁琐的程序将药毒性和热性散发掉，方能达到药效。在散发过程中，稍有不慎，便会中毒，轻者身残，重者丧命。散发得当是服药成败的关键。当时还有一种帮助散发的药叫“解散方”。按一般步骤，服药后首先要喝热酒，而且必须是上等的好酒，每天喝数次，使身体处于微醉状态，以诱发药的毒力和热力，绝对不能饮冷酒和劣质酒，否则性命难保。西晋人裴秀就是服寒食散后喝冷酒而丧命的，死时年仅 48 岁。其次，饮酒后身体发热，应立即用冷水洗手脚，待酒力发作时，再用冷水洗身，这样可使药的毒性、热性较快地散发。洗浴之后要迎风梳头，切不可穿过多过暖的衣服，同时还要大量吃冷饭。再次，服药后一定要散步，不能卧床不动，即使病重体弱不能下床，也要由人搀扶着强行散步。所以，生活不能自理及无人照顾者不能吃药。

服用寒食散虽然充满危险，但这时许多士人却毫不在乎，大吃特吃，身心受到极大痛苦和折磨。皇甫谧通百家之言，因患半身不遂，犹手不释卷，后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让他赴京任官，皇甫谧无心入仕，便上疏陈述理由，其中谈到他因吃寒食散散发不当所造成的巨大痛苦。他说：“服用寒食散后，因为没有散发好，受尽了折磨，至今已七年了。我在隆冬季节，光着身子吃冰块，暑天心中烦闷，又咳嗽不止，像得了瘟疫，又像得了伤寒，浑身浮肿，四肢酸痛。”皇甫谧服药后不仅身体饱受摧残，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情绪坏到极点，心中郁闷、烦躁，几次欲持刀自杀，幸被家人发现劝阻。不过皇甫谧深受寒食散的毒害后，便潜心钻研该药的性能特点，搜集服药人的种种反应，并为一些人治

好了服用寒食散的后遗症，成为著名医师。服用寒食散后伴有不同程度的药物反应和后遗症，在政治斗争激烈时，一些人便用吃药为掩护，逃避灾祸。八王之乱时，王戎劝齐王冏不要揽权太多，齐王冏大怒，要杀掉王戎，王戎非常害怕，便假装吃药后堕入厕所中，才避免了杀身之祸。陈敏作乱时，诈改诏书，任命贺循为彤阳内史，贺循不愿意与陈敏合作，便服寒食散，披头散发，裸露身体，以示不能任职，陈敏这才不逼迫他。

服药之风起自魏晋，但到南北朝时仍很盛行，南朝人房伯玉一口气吃了十余剂五石散，浑身发冷，夏天也穿厚衣服，善治病的徐嗣伯为他诊断后，劝他说："你身上有内热，应该在冬天往身上浇冷水。"到了冰天雪地之时，徐嗣伯让人按住房伯玉，脱下衣服坐在石头上，用二十桶冷水浇身，房伯玉冷得浑身打战，奄奄一息。他家里人都哭着请徐嗣伯快住手，徐嗣伯根本不听，还让人拿着棍子站在房伯玉身边，谁再劝阻就打谁，又浇了一百桶冷水。再看房伯玉，开始有了知觉，背上也有了热气。过一会儿，他坐起来，说："太热了，请给冷食吃！"徐嗣伯给他端来冷水，他一口气喝了一升。从此，房伯玉疾病痊愈，不怕寒冷，冬天还穿单衣裤，身体更强壮了。

虽然服药极其痛苦又危险，但散发得当也可使人神情开朗，产生妙不可言的快感，所以服药者还是大有人在。服药之风虽然可称为魏晋风度，但它是病态社会的表现，就士人而言，是他们内心失去平衡，而企求长生，图快乐心态的反映。

与服药相类似，亦可称为魏晋风度之一的便是饮酒。

饮酒之风盛行于东汉末年。这时政治动荡，战争频繁，许多人用酒来冲决心头的郁闷和痛苦，在酒后那神志恍惚的意境中去寻找人生的乐趣，连曹操也写诗吟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悲凉的诗句。魏晋以后，饮酒之风大盛。著名的竹林七贤个个都是饮酒的

能手。性格刚烈的嵇康不愿与司马氏合作，追求身心的自由，他声称："浊酒一杯，弹琴一曲，这就是我一生志愿！"阮籍为了躲避司马氏，以酒作掩护，司马昭曾想与阮籍联姻，阮籍竟大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找不到机会，只得作罢。阮籍醉酒后，常常随意驾车，不问道路，直到走不通了，才哭着返回。他的侄子阮咸不愿与人交往，只知自我弹唱酣饮。竹林七贤中饮酒最凶的是刘伶了，他常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跟随，告诉随从说："我死了便就地掩埋。"刘伶的妻子对他酗酒无度十分担心，常常劝他断酒，甚至把酒泼掉，把酒壶摔坏。刘伶见妻子恳切，便说："你说的对，只是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对鬼神发誓才行，你去准备些酒肉来吧。"妻子为他准备好，刘伶便跪下发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原来刘伶略施小计，不仅吃了一顿酒肉，而且还郑重表白，"我刘伶就是为了喝酒才来到人间的！"

魏晋时期，许多人酗酒是为了远离政治，保全自己。八王之乱时，杨淮见王纲不振，朝政日衰，自己的才干无法施展，便纵酒逍遥。东晋初年，阮裕被大将军王敦起用，很受信任，但阮裕看出王敦有夺权野心，便终日饮酒，以酒废职。这时不少人以饮酒来麻醉自己。他们的内心往往十分痛苦。顾荣任齐王司马冏大司马主簿，发现司马冏擅权骄恣，怕自己被牵连，便终日酗酒昏睡，不理政事。他给友人写信说："我常常担心灾祸降临，一见刀子与绳索，就想自杀，但别人不知道！"

在魏晋饮酒之风盛行之时，一些放达之士也掺杂在饮酒大军之中。他们不顾一切地大饮其酒，只图享乐，以至丑态百出，与那些心理苦闷之士大相径庭。有一次，阮咸与好友饮酒，不用杯子，围坐在大盆边共饮，这时群猪跑来，也在盆边喝，他们不轰赶，却与猪一起喝个不停。西晋元康年间，有"八达"，即光逸、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个个嗜酒如

命。毕卓在吏部任职时，常因醉酒耽误公事。他得知同僚家中有好酒，便在一天夜里偷偷潜入人家盛酒的房子里痛饮，被人捉住捆绑起来，天亮后一看，原来是毕吏部，同僚立即将毕卓松绑，二人又在酒瓮之间畅饮，直到大醉。毕卓曾向人宣称他的生活理想是："得到一艘盛着数百斛酒的大船，四时甘鲜果品放在船两头，我一手拿着蟹螯，一手端着酒杯，拍拍打打漂浮在酒船中，便足够了结这一辈子了！"有一次，"八达"中的毕卓、胡毋辅之、阮放等七人披头散发，光着身子，在屋里连续饮酒数日，光逸最后赶到，守门人不让他进去，光逸按捺不住，焦急地在门外便脱光了衣服，从狗洞中向屋里窥视，并大喊大叫，胡毋辅之听到后，吃惊地说："别人不可能这样，一定是光逸来了。"于是急忙让光逸进屋，这八个人继续不分昼夜地痛饮。

魏晋时期服药、饮酒之风的流行，对服饰和举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人们穿衣讲求肥大、宽松。穿这种衣服与服药有直接关系。因服药后身体发热，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表面上穿宽大的衣服是萧洒、高逸的表现，其实是吃药的缘故，后来，不吃药的人也仿效，穿起宽大的衣服来了。服药后皮肤易破，不仅穿衣服要大，而且不能穿新衣服，要穿旧的。衣服也不常洗，所以身上长了虱子，当时身上有虱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够风度。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理由之一是说，身上多虱奇痒，而穿上官服，坐着不动，不能挠，那将是十分难受的。不过，有不少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心安理得地捉虱子。东晋人顾和任扬州从事，值正月初一朝会时，他把车停在州府门前，周𫖮拜访丞相王导，从顾和跟前经过，顾和正在捉虱子，头也不抬，态度安然。十六国时，桓温北伐入关，著名士人王猛衣冠不整地去见桓温，他纵论天下大事时，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魏晋时期还有一种风尚是赤身裸袒，这也与吃药有关系。因为吃药以后要喝热酒，然后用凉水洗浴全身，所以裸体冷浴，裸体卧石便习以为常。另外，这时在观念上对裸体并不过分惊讶。汉末以来，饮酒至兴奋时，便有脱掉衣服，以增加热烈气氛的习惯。在宫内和富豪之家，也常以裸体取乐。汉末名士祢衡曾当众裸袒，以蔑视曹操。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祢衡看不起曹操，几次讽刺他，曹操打算羞辱祢衡。在一次朝会上，由祢衡击鼓。按规定，击鼓人应先脱下旧衣换上新衣，可是祢衡出场后，神态动作与众不同，他先击了一通鼓，鼓声悲凉，音节高妙，令在座者慷慨。在众人劝阻下，他才停止击鼓，却走到曹操面前，先脱下裤子，再脱去其余的衣服，裸身而立，然后又慢慢地一件件地穿上新衣，接着，又毫无表情地击了一通鼓，转身而去。祢衡这意外的动作，反常的表情，出乎人们的意料，都看呆了。曹操也很尴尬，只好笑着对众官员说："我本想羞辱祢衡，没想到祢衡把我羞辱了。"

后来，随着服药饮酒的流行，裸袒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刘伶常常酒后在屋中脱衣裸形。有人讽刺他，刘伶却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辞地说："我以天地为房屋，屋室为衣裤，诸君为何跑人我的裤中来?"这时，不少贵族子弟也竞相裸袒，他们自以为得大道之本，动辄脱得一丝不挂。东晋人王忱嗜酒无度，一饮连月不醒，有时裸体外出。有一次，王忱岳父的亲戚家办丧事，他带着一批人去吊唁，岳父哭得正伤心，王忱与去的十几个人却披发裸体而人，围着岳父绕了三圈便离去了。在裸袒之风流行之时，有些贵族子弟竟以放达为幌子，干卑鄙下流事，甚至有人当众露出性器官，奸淫妇女，成为社会丑恶现象。

服药、饮酒与宽衣裸袒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这些行为固然有展示个性，甚至愤世嫉俗的意义，但这些行为所反映的均是人格的扭曲和变态，在他们内心深处是巨大

的痛苦和愤慨。至于那些贵族子弟东施效颦式的放达更与萧洒飘逸的魏晋风度风马牛不相及了。

能体现魏晋风度的重要标志是一系列新观念的出现。魏晋时期，由于儒家独尊地位的动摇，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时的知识分子向内发现了自我，向外发现了山水之美，由此引起了他们在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道德观等一系列观念形态上的变化。这些新观念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魏晋风度。

这时期，士人们强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桓温与殷浩齐名，一次，桓温问殷浩："你比我如何?"殷浩说："我与我打了许久交道了，宁愿继续做我!"这里，殷浩坦然地对自我作了肯定。这时不少人注重自我的舒适，追求一种无拘无束，不受他人干预的生活。许多人我行我素，行为乖僻，任情使兴。孙统喜欢游山玩水，每到一处，非玩痛快不可，有时在回来的路上突然感到游兴未尽，便折返回去再欣赏一番。他们交友也是如此。王子猷家在山阴，一天夜里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他在睡梦中醒来，打开门，一面喝酒一面欣赏漫天洁白的雪景，忽然从内心涌出一种说不出的彷徨情绪，他想起了好朋友戴道安，决定前去看望，于是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的奔波，天亮时才赶到戴家门前。可是他却不进门，又乘船返回。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王子猷说："我是乘兴致而去，现在兴致已尽，所以回去了，何必要见戴道安呢?"

魏晋士人在社交活动中，无拘无束，喜欢用怪诞的行为、不俗的语言表现自我。他们不矫情作态，故作谦抑，而是勇于大胆肯定自己的长处。比如大司马桓温来到建康，问刘惔说："听说会稽王清谈进步很大，是这样吗?"刘惔说："的确如此。不过他终究是第二流中的人物。"桓温说："谁是第一流的呢?"刘惔

说："正是我们这辈人！"简文帝做抚军时，问殷浩："你认定自己比裴頠怎么样？"殷浩说："我本来就胜过他。"他们还常常故作惊人之举，以显示自己。当时每年七月七日有暴晒书籍及衣服以防虫蛀的习惯，不少人家便借此机会把华丽的衣服和丰富的藏书拿出炫耀，阮咸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可晒，就用竹竿挑着一条大裆布裤子挂在门前。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阮咸回答："不能免俗，只好跟着大家学罢了。"东晋人郝隆更是别出心裁，别人晒书，他却在太阳底下脱下衣服晒肚子，当别人问他时，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晒书！"

魏晋士人喜欢夸耀自己的作品来表现自己。孙绰作《天台赋》，请范荣期看，他说："您将我的作品投到地上，就会发出金石落地的美妙音响。"范荣期则不以为然地说："这种金石之声总不至于产生音乐旋律吧。"东晋名士刘惔与好友王濛久别重逢，王濛称赞刘惔清谈水平提高很快，刘惔却仰起脸来往天上看，王濛不明白刘惔的意思，刘惔说："我的水平根本没有提高，就像天空那样，生来就是这样高远的。"

魏晋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他们注重对个体人格的追求，珍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特征，而不是群体类同的规范。如桓玄问太常卿刘瑾："我比谢安怎样？"刘瑾回答说："您高，谢太傅深。"又问："我比你的舅父王子敬怎样？"刘瑾回答："楂、梨、桔、柚，各有各的美味。"这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追求，而不必以他人规范自己。在价值取向上，他们视"我"高于一切，而将功名、钱物等身外之物放在次要地位。殷浩说："官职本来是腐臭物，所以将要得到时会梦见棺材和尸体，金钱本是粪土，所以将要得到时会梦到秽污。"张翰则更明确地说："人生一世最宝贵的是适意。怎么可以离开家乡几千里去做官以博得名和利呢？"

魏晋士人认识到了自我，他们在生活中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

的情感，尽情地表达喜、怒、哀、乐。此类事例甚多。

阮籍邻居家有一个女子才色俱佳，未嫁而卒。阮籍与她无亲无故，也跑去痛哭，尽哀而去。阮籍邻居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常常在酒垆边卖酒。阮籍和王戎经常去她家打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睡倒在这个女人身边，起初她的丈夫很怀疑，经过长期观察，才知道阮籍没有别的意思。

王戎的儿子万子死了，山简来探望他，见王戎过度悲哀，说："小孩子不幸死去，为什么这样悲伤？"王戎说："圣人可以忘情，下等的愚人没有感情，最富于感情的正是我们这些人。"山简为王戎的话所感动，大哭了一场。

谢安对王羲之说："人到中年，不免伤于哀乐。每次与亲戚朋友离别时，常常好几天心情难过。"王羲之说："晚年光景，自然如此。"

阮籍还有一种表示自己感情的方式，他会使青眼和白眼两种眼色。青眼是全神贯注的目光；白眼是将黑眼球上翻，他对所憎恶的政府官员或礼法之士往往报之以白眼。阮籍的母亲去世了，嵇喜前来吊丧，阮籍翻起白眼，不予理睬。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后，挟琴提酒来拜会，阮籍马上报以青眼。

魏晋以后，随着精神领域玄庄之风的盛行和人的意识的觉醒，士人的审美观也发生了新变化。他们酷爱山川自然之美，视游山玩水为人生的一大乐趣。许多人将庄园修建于青山绿水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对人的品评与自然山水之美结合起来，用自然山水之美比拟人的才情风貌。比如，王武子、孙子荆各自称赞自己家乡的山水和人物，美好无比。王武子说："晋阳地方土地宽阔平坦，水流清澈，味淡而甜，那里的人物廉洁坚贞。"孙子荆说："中都地方山势巍峨雄伟，水流有声而波浪汹涌，那里的人物光明磊落而才华超群。"

人们形容嵇康：身高七尺八寸，容貌风度十分清秀，见到他

的人都赞叹地说："萧萧飒飒像一阵风高高地扬起，多么清爽！"也有的说："飒飒地像松树下的风，从高处慢慢地向下吹。"山涛说："嵇康的为人，昂然像孤松般独立，喝醉了酒的时候，巍峨像一座玉山将要崩塌。"王戎形容王衍说："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不是世俗之人。"庾子嵩评论和乔："像浓密茂盛的千丈松树，虽高大雄伟，也有节结，可用来构建大厦，是栋梁之材。"当时人称赞夏侯玄明明朗朗如一轮明月入怀中，赞叹王恭容貌秀丽，清朗如春月柳。

这时人们评论人所关注的是气质才情、风神仪容构成的个性之美，认识到人的美感魅力与内在气质有密切关系。魏晋士人不仅发现了山川自然之美，还发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之美，并将二者巧妙地结合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魏晋风度。由于个体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审美新观念，不仅反映在对人物的品评中，还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始了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

（孙立群）

参考资料：

《晋书》：《皇甫谧传》、《裴秀传》、《王戎传》、《刘伶传》、《顾荣传》、《嵇康传》、《阮籍传》

《世说新语》

晋武帝分封诸王

分封制由来已久。西周时已行此制，秦灭六国，推行郡县制，分封制始被废除。刘邦建立西汉，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以为不行分封是重要原因之一，遂大封宗室、功臣，冀其藩卫朝廷。但受封王侯不久就成尾大不掉之势，威胁中央集权，至汉武帝施行“推恩令”以后，封国势力才被削弱下来。此后直至东汉、曹魏，受封的宗室诸王都是有封国之地、食封国之租而无治封国之权，不能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

魏末，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进行了十多年的权力角逐。魏明帝死前，托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齐王曹芳继位，司马懿先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不久受到曹爽排挤，转为没有实权的太傅。此后，以他俩为代表的两派势力彼此防范，明争暗斗，到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突然发动高平陵政变，杀曹爽及其党羽，司马氏集团才占了上风，控制了朝政。此后十余年，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任宰相，掌握中央禁军，把魏帝当成傀儡，军国大事概由自己决断。尤其是在司马昭“辅政”时期，他日与亲信党徒谋划篡位，竟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就在这权势如日中天之际，他不禁要思索，曹魏为什么会衰落？司马氏是如何兴盛起来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曹魏没让宗室皇亲出镇各地，缺少拱卫中央政权的屏藩，当外姓人篡国夺权时，没有可以用来保卫国家的可靠力量。有鉴于此，司马昭开始酝酿分封制，以防司马氏已有的权势遭到异姓人

侵夺时无人奋起抗争。他让心腹裴秀拟定分封制度，并于咸熙元年（264）颁布，名为“五等爵”制。

所谓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其食邑等级，郡公二万户，县公一千八百户，以下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大国子、次国子、男等各个级别依次减二百户，至男爵食邑四百户。当时，司马昭的支持者自骑督以上皆有爵位，受封者达六百多人。

咸熙二年，司马昭病死，子司马炎继其王位，并在这一年代魏称帝，建立晋朝。为了与帝王之仪相符，司马炎在原来的五等爵之上增加了王爵，使爵位变成了六个等级。诸王除被降为陈留王的曹奂是异姓外，其余均是司马氏宗室成员，当时共二十七人。司马炎把他们当作拱卫中央、控制天下的支柱。宗室成员封公、侯的也不少。异姓功臣爵位最高的为公爵，如石苞、贾充、裴秀等十一人均封为公。

诸王权力很大，他们在自己封国内拥有自己的军队。食邑二万户的大国置上、中、下三军，有兵五千人；食邑一万户的次国置上、下二军，有兵三千人；食邑五千户的小国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甚至诸王入京任朝官，也有自己的私兵。汝南王司马亮被武帝召入朝，任侍中、抚军大将军等要职，不仅统领了中央禁军中的冠军营、步兵营、射声营、长水营等，而且配置了五百步兵、一百骑兵的私人卫队。这种情况在后来有了进一步发展，任京职的诸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私人武装。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在外戚杨骏被诛后，任侍中，不仅掌管了杨骏原来的卫兵（步兵三千、骑兵一千），而且朝廷准许他拥有二千五百人的步兵和五百人的骑兵作为私人武装，经他一再辞让，才减为一千步兵、一百骑兵。

任公、侯的人既有宗室稍疏远些的成员，也有异姓功臣，但与诸王相比，他们的权势小得多。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拥有私人武

装，但人数甚少，仅一军，一千人。至于公、侯以下的伯、子、男诸等级则更受限制，无权置军队。

诸王在封国内还拥有选官权，即他们的下属职官及封国内各县县令、县长，均由他们自己选拔，不须中央指派。齐王司马攸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考虑，曾建议暂缓实施藩王自选封地内长吏的规定，以免藩王权力膨胀，武帝没有采纳。

宗室诸王在自己封国内虽然拥有这般权势，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威胁中央集权，因为当时王国最大者不过拥兵五千，单靠几千兵力图谋不轨是成不了气候的。真正使诸王得以为所欲为的原因，还在于晋武帝让他们担任朝廷要职，或在朝中典掌禁军，或在地方军事要地出任都督，从而一个个成为对朝政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如安平王司马孚是武帝叔祖父，被授予太宰、大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位高权重；义阳成王司马望，任典掌禁军的中领军；下邳王司马晃初为南中郎将，泰始九年（273）改任使持节、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都督兼刺史，这意味着益州的军事和民政大权全在他一人手中了。彭城王司马权任北中郎将，都督邺城守诸军事。陇西王司马泰任游击将军，出任兖州刺史。扶风郡王司马亮持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正如《晋书·八王传序》所说："受封的同姓王公外出则持符节代表天子发号施令，荣任都督、州牧之职；入朝则踏进中枢要地，居宰臣之位。"可见晋武帝把维护国家的稳定、巩固司马氏"家天下"统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宗室诸王身上。

晋初分封后，许多藩王没有到自己的封国去，而是留在京城任朝官，他们留恋京城的繁华和生活的奢靡。然而，咸宁三年（277）七月，卫将军杨珧向武帝上疏认为，将宗室成员封为藩王，目的在于让他们坐镇各地，拱卫中央，而现在王公贵族多留京城，镇守要塞边疆的人基本上是异姓将领，对皇室来说，异姓官员毕竟不如宗室成员亲近，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武帝也深有同

感，乃下诏让诸王回各自的封国，并将那些担任都督的藩王的封地改在他们的都督区内，于是，扶风王司马亮改为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为赵王，督管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在徐州的东莞王司马伷改封为琅邪王；在关中的汝阴王司马骏改封扶风王。原太原王司马颙改为河间王，原汝南王司马柬改为南阳王。全国各处军事要地，多数安排了藩王坐镇。

每当有大的军事行动，诸王往往出任一方统帅。晋初，东吴尚未灭亡，时常骚扰边境。吴左、右大司马施绩、丁奉就曾先后进攻江夏（治所在武昌，即今湖北鄂城）、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义阳王司马望被任命为大都督诸军事，率中央禁军步骑二万前去抵抗。其后，吴主孙皓又派兵趋寿春（今安徽寿县），司马望再度受命统二万步兵、三千骑兵防守淮北。他所肩负的重任于此可见。

西晋灭吴之役，率军数万出涂中（今安徽滁县东南）的是琅邪王司马伷，他截断了吴都附近吴军彼此的联系，使之首尾无法相救，并渡江连克吴都附近各重镇，俘获吴将蔡机，斩首及降服的吴军人数达五六万，受到武帝嘉奖。

在对北方尤其西北少数民族的反晋斗争进行镇压的军事行动中，诸王也常常身当重任。咸宁元年（275），鲜卑树机能侵扰关陇一带，朝廷任命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汝阴王司马骏为征西大将军，率众出征。司马骏命部将文俶督领凉、秦、雍诸军同时并进，迫使树机能率部众请降。不久，司马骏又征讨北胡，斩其首领吐敦。他因功屡受嘉奖。这种以诸王戍守边疆、独当一面的状况，反映了晋武帝对他们的高度信任和依赖程度。晋武帝死后，天下渐乱，宗室诸王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更为突出了。然而，诸王中能征善战、一心辅佐朝廷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或是庸才，或是为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卑劣之人。由于他们在征战

过程中的拙劣表演，西晋后期天下变得越征越乱了。我们从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在关中的所作所为中可以见其一斑。

元康元年（291），原镇守关中的秦王司马柬死后，朝廷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当时，西北边疆的匈奴、氐、羌等许多部落纷纷内迁，关中一带少数民族人口多达几十万。坐镇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司马伦不考虑如何安置各族民众，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却肆意对内迁少数族人敲诈勒索，不仅掠夺他们的财物，而且将他们中的许多青壮年掠为奴婢，加以奴役或转卖。这种暴行激起了各族民众的反抗。元康四年（294）五月，匈奴人郝散率众在谷远（今山西沁源）造反，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两年后，其弟郝度元在关中联合马兰羌、卢水胡卷土重来，攻杀了北地郡（治所在今陕西耀县）太守张损，击败冯翊郡（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太守欧阳建。一时关陇地区形成声势浩大的反晋浪潮。善于搜刮民脂民膏的司马伦此时却手足无措，无法扑灭越烧越旺的起义战火。

晋廷见此情景，不得不召司马伦回朝，调太子太保、梁王司马肜前往关中，出任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指望他去扭转晋军在那儿的败局，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

司马肜不是一个公正清廉、善理国事的封疆大吏，朝廷把镇抚关陇的重任放在他肩上，不但没有稳定那里的局势，反而激化了原有的民与官的矛盾。本来司马伦搞乱关中，与其心腹孙秀的出谋划策有关。司马肜离朝前去接替司马伦的职位时，中书监张华建议说："赵王与孙秀在关中民愤太大，你虽然无权处置赵王，却有权杀孙秀。杀了孙秀，等于清算了赵王的一半罪过，一定能赢得民心。然后你再去平息氐、羌人的反叛就易如反掌了。"司马肜口口声声表示同意，到关中后，他却变卦了，不但没有收斩孙秀，使之得以随赵王入京，而且又广树党羽，让那些奸佞卑劣之人担任各种要职，重新采用司马伦治理关中的一套手段。参军

王铨感叹说："关中各官衙均有梁王的亲信任职，国家的法律在这里就很难行得通了。"司马肜却称自己是廉洁奉公的人，并以自己用衣服缝补公家的马车车棚为证。王铨反驳道："朝野都指望你举荐贤才，远离小人，不以权谋私，而你所作所为与此正好相反。所谓以衣补车，不足称道。"司马肜听了十分惭愧。

司马肜到关中上任后，其残暴程度比司马伦有过之无不及，仅三个月，就逼反了更多的少数民族部众。元康六年（296）八月，郝度元击败了雍州刺史解系，秦、雍一带的氐、羌人纷起响应，推氐族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自称皇帝，率众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有众七万。

朝廷见司马肜在关中镇压起义毫无起色，不得不于当年十一月调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前去协助征讨，受司马肜节度。周处是东吴名将周鲂之子，文武双全，勇猛刚毅，曾任晋朝御史中丞，职掌纠劾违法犯罪的官吏。由于性情梗直，对有罪的王公贵戚，他从不退让，大胆弹劾，司马肜就曾受到周处的纠劾。当周处受朝廷派遣前来关中征战时，司马肜认为打击报复的机会来了，此时，他考虑的不是朝廷的安危，而是个人的恩怨。

齐万年听说周处人关中，说："周处能文能武，如果他个人有决断权，那将势不可挡；如果他受制于人，则必将败在我们手中。"果然，司马肜必置周处于死地。他强令周处为前锋，率五千人马前去攻打拥有六万之众的齐万年，而且，交战前，周处部下连饭都来不及吃，司马肜便催促出战，还不让卢播等人为后援前去接应。结果，双方战于六陌（今陕西乾县东），周处力战而死，晋军大败。朝廷为此而责怪司马肜指挥失当，却没有撤他的职。

中书令陈準、中书监张华指出，像赵王、梁王这样的王室贵戚镇守地方要害之地，不会为求功名而奋力进取；也不会因怕治

罪而不敢退却。由他们领兵打仗，士卒再多也无济于事。事实正是如此。元康九年（299）正月，晋廷不得不另派积弩将军孟观率中央宿卫兵与关中的官兵一起，去攻打齐万年，并征梁王还朝，让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接替他镇守关中。晋廷只信任王室成员，让他们出镇各要地，而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很好地守卫一方，不能成为朝廷的“屏藩”，这是把分封作为晋朝立国长久之计的晋武帝所始料不及的。

武帝分封，意在加强以司马氏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系，对于封国损害中央利益的倾向曾给予一定限制。如咸宁三年（277），中山王司马睦违反西晋中央禁令，大量荫庇逃避政府赋税的人员，作为自己的私属，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受到弹劾，被贬为丹水县侯。这表明，朝廷在经济上对诸王作了一定的限制，使之不至于损害朝廷的财政收入。但这种限制措施与其给予诸王较多的政治特权的政策是相矛盾的，随着诸王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经济实力也必然大增，使封国得以摆脱中央控制，甚至反过来威胁中央，这从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可以得到印证。分封不但没有强化司马氏政权的统治，反而使之走向了衰落。武帝一死，分封所造成的恶果便接踵而生，倘若武帝地下有知，也将会后悔不已的。

（陈益民）

参考资料：

《晋书》：《文帝纪》、《武帝纪》、《职官志》、《地理志》、《梁王肜传》、《周处传》

九品中正制利弊之争

西晋司马氏出自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的世家大族。自楚汉之际的殷王司马卬以下，司马家族世代出高官名人，尤其到三国曹魏时期，温县司马氏已成为朝野瞩目的士族。司马朗（字伯达）、司马懿（字仲达）兄弟八人（另六人分别字叔达、季达、显达、惠达、雅达、幼达），被时人誉为“八达”，其中仲达尤为突出，从出任曹操的文学掾，一步步晋升，位至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等高官，并最终控制了曹魏政权，再经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其孙司马炎的苦心经营，司马氏终于取代魏帝，建立了西晋。

司马氏既然是汉代以来的高门大姓，必然会建立一个以世家大族为统治核心的政权，并以保护士族利益为其制定各种统治政策的前提，即把维护和扩大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作为其实施各种统治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九品中正制便是世族地主拥有政治特权的一种体现。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地设置中正，由他们依据士人的家世门第和道德才干定出品级，作为中央吏部确定士人官职高低的根据。九品中正制建立于曹魏时期，当时中正由各郡长官推举德才兼备，且在京任官的本籍人担任，他们把士人评定为九个品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把被评定的人的材料（包括其家世情况、德才状况、品级等）用黄纸写定，呈报朝廷，朝廷再以此为依据任官。士人品

第每三年清理一次，官职与品级紧密相联，卑品的人升官，其品级也上升；高官降级，其品级也随降。与此相应，士人品级上升，官职也会很快晋升，品级下降，官职也会下降。曹魏的这一套规则被西晋全部照搬，而在实施过程中，晋朝这一制度的随意性更大，中正个人意志在品评士人时，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西晋九品中正制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中正官的人选被世家大族把持。中正已不一定由各郡长官举荐，往往是世族指定；中正也不一定需要德才兼备，只要一心维护世族利益即可。二是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至于士人的才干和德行，已不受重视。三是中正官的个人爱憎左右着士人的品级评定。人们的家世情况、权势大小、贿赂多少、关系亲疏等，都成了影响中正品评的条件。四是上下品区别分明。原来九个品级，逐渐被笼统地分为上下两级，即原来的一二品，被视为上品，三品以下则均为下品。

九品中正制保证了世家大族累世富贵。中正根据家世、权势定品级，品级高，可以得高官，做了高官，便有一系列特权。在政治上他们可以左右朝政。当时的朝廷重臣，大多数是世族出身。琅邪人王祥，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裔，在西晋官至太保，封为睢陵公，朝中每有大事，武帝都派侍中任恺等前往王祥府中咨询。陈国人何曾，历任侍中、太尉、太保，他父亲在曹魏时任太仆，封阳武亭侯。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羊祜，祖上九代皆任州郡长官。镇西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祖父为魏尚书仆射，父亲为幽州刺史。太原人王沈，是汉代匈奴中郎将王柔的后人，官至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世族出身的重臣不仅自己官位显赫，他们的子孙也仍保持高官厚禄，坐致公侯。尚书令裴秀之子裴濬，无功位至散骑常侍，他死后，弟弟裴頠袭爵位，由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裴濬之子裴憬因呆傻无爵位，裴頠上疏极言自己家世显赫，宜赐爵位，于是朝廷封裴憬为高阳亭侯。

豪门大姓的子孙犯法，也往往得到宽免。何曾之子何遵、何劭接受了原南县县令袁毅的贿赂，受到有司弹劾。晋武帝特下诏，为他们开脱罪责，诏书称："太保何曾与袁毅是世交，何遵等接受他的一点礼物，不足为怪，不得治他们的罪。"

在经济上，九品中正制也为世家大族谋利给予了方便。晋《占田法》规定，官僚可以依官品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即一品官五十顷，二品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官占田十顷。还可以按官品的不同荫庇不同数量的佃客，一、二品官各荫五十户，以下递减，至八、九品官仅荫一户。上品与下品的差别如此之大，九品中正制使世家大族多居上品，其所获得的经济特权是显而易见的。

中正的意志，关系到一般士人地位的沉浮。王衍年轻时在故乡琅邪担任中正，郡吏孙秀求他给自己评定一个好品级，王衍本想拒绝，经堂兄王戎相劝，王衍才答应。此后孙秀竟飞黄腾达，最后成了赵王司马伦身边的红人。当然，王衍、王戎后来也因此而沾了光。当司马伦篡位称帝时，孙秀大权在握，昔日与他有仇怨的人都被杀害，王衍、王戎则免于一死。位至太宰的何劭死后，中正袁粲前去他家吊丧，但受到何劭子何岐的冷遇。袁粲出来后说了一句对何岐而言分量极重的话："我今年将评定何岐为下婢子品！"也就是说，要定他为下下品。当时出自权贵之家的人没有品级定得这么低的。幸而何劭同乡王诠劝说道："何劭活着时，何岐仗势作恶多端，那时你不定他为下品，现在何劭死了，你却急于降何岐为下品，恐怕别人会说你这个中正欺软怕硬了。"袁粲这才作罢。由上述事例可见，中正既受制于权贵，又对普通士人的升迁及官僚的降级起着很大作用。

九品中正制度下，寒素之人很难进入上品，成为大官。但有些寒士确有才干，凭自己的能力赢得世人敬重，从而地位上升。但他们的职位与其家世在当时来说总是存在难以填平的鸿沟，总

会招来一些人的非议。燕国人霍原被尚书吏部郎李重举荐到司徒府任职，燕国中正刘沈便提出异议，认为霍原出身寒素，不应出任高官。司徒府没有理会刘沈，刘沈又上告到中书省，中书省让司徒府再对此事进行议论。经过辩论，以霍原曾得到原来幽州的大中正及中书监的举荐，应同意霍原进入司徒府，并确定为二品官。

许多人看出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纷纷要求改革用人制度。敦煌人段灼，能说善辩，其家族为陇右大姓。但他在朝中没有权贵撑腰，任议郎多年，不得升迁。他愤然上疏，指出："现在中枢机构要选人入才，总是很盲目。按九品中正制寻访士人入仕，仅问中正官的意见而已。因此，据有较高官品的人，不是王公贵族的子孙，就是当权大官僚的兄弟。这两种人占据朝廷要职，贫寒人家的杰出人才，哪有不被埋没的呢！"

始平王的幕僚李重与段灼有同感，他也曾上疏说，九品中正制是适应汉末以来的形势所产生的。当时天下大乱，士人流散各地，没有稳定的居地，军府中有许多郎吏，都邑中聚集了众多的豪右，已分辨不出谁是人才，人才在何处。九品中正制作为品评士人等级高低的标准，有助于当时甄别人才。现在天下已定，仍实行那种定士人为九品的繁复办法，就难以像以前那样选到真正的人才，因为繁复的选举过程中，许多中正官已把个人利益置于其内，导致"任非所由，事非所核"，礼让风气日衰，而华竞之风盛行。李重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推行"土断"，以人们现有的居住地为准，定其户籍门第，然后严格推行贡举之法，减少士人品级，则士人的品级高低自然而然就显露了出来。

尚书左仆射刘毅对九品中正制的抨击，更是入木三分。他认为此制是"损政之道"，其弊病在于：第一，中正官总是凭个人好恶评定士人品级，不考虑士人的才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该定上品的成了下品，该定下品的反成了上品，"优劣易地，首尾

倒错”。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会想方设法去贿赂中正，或请托与中正关系密切的人去打通关节。第二，有权势者能得到上品，并使其后人也跟着沾光，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第三，把“品”（门第）、“状”（德才）作为品评标准，难以实现品评的公正性。一方之士多者数千，并已有不少人迁往他乡，中正不可能了解他们，因而只能“采誉于台府”，或“纳毁于流言”。另外，“品”与“状”往往难以统一，门第高的人未必有才，有才的人未必门第高。总之，九品中正制，“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刘毅感慨说：“古今之失，莫大于此！”

尽管晋武帝也称赞刘毅等人言之有理，但他不想废除九品中正制，因为这一制度与他所代表的门阀士族的利益息息相关。可是，这一制度的弊病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大臣卫瓘和司马伦也提出要废除此制。他们主张让各郡县士人在他们现在的居住地参与荐举，不必考虑其原籍，避免那种客居他乡却仍由原籍中正评定品级的状况。这样，同住一地的人彼此较熟，士人好坏分明，“举善进才，各由乡论”，既可以扩大进贤之路，又可以勉励进贤之公心，对朝政很有裨益。

终武帝之世，九品中正制一直没有被废。惠帝继位后，由于世家大族依然把持朝政，改革选举制的呼声日趋微弱，加之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反晋斗争相继爆发，朝纲大乱，当政者更没心思考虑革除弊政的问题了，以致不少寒人空作感叹而无可奈何。高平人王沈就特为此作《释时论》，讥刺时弊。文中称：“自古以来，许多成霸王之业的人发迹于自己的奋斗；不少卿相也是出自贫贱之家，门第高低、权势轻重，在人们走向成功的过程中不起什么作用。而现在，朝廷大官多为世袭，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贫寒的人一直贫寒，富贵之家一直富贵。为了得到较高的品级和官职，许许多多士人奔集于权贵之门，寻求提携。世道实在是不

公!”像王沈这样的寒人虽然发牢骚，却无法改变这种现实，在世家大族掌握朝廷大权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参政，不能直接对各种政事施加影响，因而摆脱不了九品中正制对他们的希求愿望的束缚。当时吴郡人蔡洪像王沈一样，也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名为《孤奋论》。据说当时读之者莫不感叹。但这也仅仅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同情而已，这类寒门出身的士人最终仍难以位至上品。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隐士颇多，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门第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与高官厚禄无关，只好匿迹山野，清闲寡欲，不过问世务。

九品中正制不仅使西晋的门阀政治达到极盛，也深刻地影响到后代。东晋南朝时的官场上，士族与庶族对立分明，他们不共处，不联姻，谱牒百氏之学盛行，豪门世家竞相以自家郡望夸耀。史称，三公（司徒、太尉、司空）之子，蔑视朝廷百官之家；由世族把持的黄门侍郎和散骑侍郎，凌骂于郡守县令之上。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遗毒之深了。

（陈益民）

参考资料：

《晋书》:《何劭传》、《王戎传》、《李重传》、《段灼传》、《刘毅传》、《卫瓘传》

《文苑·王沈传》

西晋灭吴

魏灭蜀汉的第二年（264）七月，吴主孙休得急病而死。吴国外有曹魏军队的威胁，内有交趾（今两广、越南北部）一带的反叛，国人无不期待一个英明之主即位，以振国威。左典军万彧曾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当过县令，与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非常要好，他在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面前盛称孙皓之贤明英武，足堪大任，因而在濮阳兴等人的主持下，23岁的孙皓继位登基了。

孙皓即位不久，国人就大失所望。他性情残暴，又好酒色，非但不能振兴吴国，而且加速了国内的分崩离析。濮阳兴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个君主，但悔之晚矣，他与张布不久便死在孙皓的屠刀下。

为了灭蜀，曹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当蜀汉灭亡后，魏国需要重新积蓄力量，一时还难以迅速灭吴，这使得东吴有了暂时偏安一隅的机会。暴君孙皓也能肆无忌惮地继续自己的统治。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魏相国司马昭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软硬兼施，既极力夸耀魏国兵势之盛，又建议东吴看清时势，早日罢干戈，与魏结好，以免江东受战火蹂躏。信中说："我们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平定了蜀汉。朝臣纷纷提议乘胜进击江东，分兵三路直捣吴都，十天半月之间，就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但念及平定蜀汉时，伏尸蔽地，血流遍野，我们实在不忍心让吴国百姓也罹此大难。望你以蜀汉为鉴，屈己以宁

四海，与我国结欢弭兵，共为一家，则泽布吴会，惠及中原。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动用干戈了!”

这封信出自荀勖之手。当时，司马昭想通过此信表达魏军兵威之盛，并掩盖自己暂时不想攻吴的本心。他让许多文臣分别拟稿，经过比较，采用了荀勖所作。孙皓得信后，派光禄大夫纪陟回报，称自己“思与贤良共济世道”，愿与魏国结好。司马昭高兴地对荀勖说：“你的文笔太好了，使吴人思顺，真胜过十万大军呵!”

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因禅代之际，内政不稳，他也顾不上攻吴，边境的守备都很松懈。吴主孙皓此时却昏昏然了，以为不存在战争的危机。甚至刚出使北方归来的五官中郎将丁忠建议出兵袭取弋阳郡（今河南淮河以南一带），孙皓也蠢蠢欲动，向群臣问计。镇西大将军陆凯指出：“北方刚兼并蜀汉，遣使向我方要求止息兵役，并非畏惧，而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我们不可盲动，靠侥幸是难以取胜的。”车骑将军刘纂则说：“若对方的防备确有破绽，我们为什么不趁虚而入呢？现在应多派几个探子，多掌握一些他们的情况，为出兵作准备。”孙皓尽管最终没有马上出兵，但不再派使臣与晋交往，他心里已没有了危机感，对西晋表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

孙皓因迷信“望气者”的说法，以为“荆州有王气，破扬州并给建业宫带去不吉利”，便在西陵督步阐的建议下，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还派人把荆州界内的大臣、名士的坟墓全部捣毁，他怕这些坟墓的风水好，可能导致墓主的后人起来与他争夺皇位。他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许多荆州人的不满。而随他迁到武昌来的许多大臣、庶民是扬州人，他们不愿远离家园，也反对孙皓长期在武昌呆着。当时武昌城内流传这样的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反映了人心所向。加之武昌土地贫瘠，人们的粮食主要依靠扬州漕运，运粮之

船逆流而上，给扬州之民增添了极大的负担。在一片反对声中，孙皓迁都仅仅一年，便不得不于东吴宝鼎元年（266）十二月迁还建业。

孙皓的统治极为荒唐残暴。为了满足淫荡欲望，他规定二千石大臣以下将吏家若有女儿，每年须填表上报其名，至十五六岁时参加拣选，没被选中的人，才允许出嫁。尽管孙皓的后宫多达数千人，他仍派太监巡视各州郡，采择不已。

孙皓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苑囿，连二千石一级的官员都要加人上山伐木的行列，当时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左丞相陆凯、中书丞华覈等屡加劝阻，孙皓不听。

吴建衡三年（271）正月，因有人投孙皓所好，故意说得到了预测未来的"谶纬之书"。书中称："天帝的黄旗紫盖出现在东南，最终成为天下之主的人，必定是现在统治荆州、扬州的君主。"孙皓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命"，便在这数九寒天里，率大军从牛渚矶（今安徽当涂北）渡江西行，还带上自己母亲、皇后、儿女及宫嫔数千人乘车同行，说是要到洛阳去统治天下，以顺应天命。沿途大雪纷飞，道路非常难走，士兵们不仅要穿戴盔甲，携带兵刃，每一百人还要负责拉一辆大车。士兵们又冻又累，不少人死在途中。军中后来竟传开了这样的话："如果前面遇上敌军，我们就倒戈一击了。"晋武帝听说东吴有大的军事行动，急忙命令义阳王司马望率领中央禁军步兵二万、骑兵三千屯驻寿春（今安徽寿县），准备迎击。吴主孙皓得知前方有大军挡道，自己的部众又怨气冲天，怕继续前进不会有好的结局，这才下令撤退。孙皓的行为就是这样莫明其妙，他不顾气候条件，不考虑对方的军事实力强弱及兵力部署状况，便贸然率大军前往晋都洛阳，并让数千后妃作陪，使人琢磨不透他究竟是去打仗，还是去游玩。

当孙皓在建业醉生梦死时，晋武帝则已开始筹划灭吴大计。

泰始五年（269）二月，他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今湖北襄樊）。荆州是个战略要地，占领了这里，再顺流攻江东则容易得多。武帝选羊祜经营荆州，其为攻灭吴国做准备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羊祜字叔子，出身名门，祖父曾任汉朝南阳太守，父亲官至魏上党太守。著名学者蔡邕是他外祖父，司马师的夫人羊徽瑜是他叔伯姐姐。他为人刚毅，文武之才兼备，司马昭密谋篡魏时，他任相国从事中郎，参与机要。后又迁任中领军，统领宫廷宿卫军，执兵权之要。西晋建立后，他仍然身居显位。

羊祜刚到襄阳时，军中没有百日之粮的积蓄。羊祜从长远利益着想，没有马上投入兵力与吴人争城掠地，而是组织人力大量垦荒种粮，还在五个形势险要的地方建立城堡，防止吴军袭击，尽可能多地控制上等土地，使晋军的粮食积蓄越来越多，足可支付十年之需。

羊祜对吴人主要采取怀柔策略，尽量争取人心。他从不搞欺诈及袭击行为，即使与吴人交战，也是堂堂正正地与对方约定作战时间，届时才开战。对战俘予以优待，对敌方阵亡者为之殡敛。曾有部将抓到两个儿童，羊祜将他们送回他们父母身边。后来这两个儿童的父亲带领自己的部众前来归顺了。吴将邓香攻掠夏口（汉水与长江交汇处），被晋军活捉，羊祜没有处死他，反而放他回去。邓香深为感动，也带自己的人投降了。吴将陈尚、潘景在人晋地侵扰时被杀，羊祜厚加殡敛，并让其家属来迎丧，还以礼相送。晋军攻入吴境，如果收割了吴人的稻谷作军粮，羊祜也命令按收割量的多少计价，用绢匹偿还。诸如此类的事情使羊祜赢得了吴人的敬重，人们提起他，不说名字，而称“羊公”。

坐镇乐乡（今湖北江陵东）的东吴大将陆抗深知羊祜对吴人施以仁德影响的厉害，一再告诫部下：“对方专行仁德，我们专行暴虐，则我军最终会不战自败。今后我们不要为锱铢小利而出

兵骚扰，只要保住疆土完整无缺即可。”从此，双方战事大大减少，各不相犯，牛马跑入对方境内，只要向对方打个招呼即可取回；狩猎时，如果发现抓获的动物先被对方打伤，也将它送归对方。羊祜与陆抗之间也彼此不猜疑，陆抗曾送酒给羊祜，羊祜毫不迟疑地喝了起来；陆抗有病，羊祜派人送去上等好药，有人劝陆抗小心谨慎，别上对方的当，陆抗则说：“羊祜岂是用毒药害人的小人！”吴主孙皓得知两国在荆州相互友好，大为不满，特派人前去责问陆抗，陆抗答复说：“我不这样做，显得我方穷兵黩武，使对方的仁德更加深入人心，于国家有害无益。”

这种表面的友好往来，终究遮掩不住吴晋之间的尖锐对立。晋泰始八年（272）发生的吴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叛吴事件，引起了吴晋间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步阐因对孙皓统治不满，在孙皓征他回都城时，他怕遭到不测之祸，不听调遣，举兵反叛，派人向晋求援。时孙皓命陆抗率军三万前去讨伐，晋武帝也命羊祜出兵五万赴援步阐。陆抗先至西陵，令部下修筑延绵几十里的营垒，围困西陵，使之与外界隔绝，援兵难以接应步阐。众吴将认为，凭着三军士气正盛，足可一鼓作气攻克西陵，不须围着该城筑造那样多壁垒，白白耗费人力物力。而陆抗指出：“西陵城防坚固，粮谷充足，并非短时间内就可攻克。一旦北方援兵到达，我们背腹受敌，若毫无准备，必然失败。”诸将不以为然，尤其宜都太守雷谭，要求迅速出兵攻占西陵，言辞特别恳切，陆抗为了服众，便同意雷谭率军作一次强攻的尝试，结果失利而还。众人这才接受陆抗的命令，对西陵严加围困。

为了分散吴军兵力部署，羊祜分兵三路进攻。一路为水军，由巴东监军徐胤率领，攻东吴建平郡（今长江三峡一带），以便从长江上游顺流东下，构成对陆抗守军的威胁；一路由晋荆州刺史杨肇率领，直奔西陵，援救步阐；第三路由羊祜自己亲自率领，进攻陆抗原来镇守的军事要地江陵，欲行“攻其必救”的策

略。而陆抗的对策是，派部分兵力分别拦截徐胤和羊祜，尤其是让江陵督张咸固守城池，更多的人马仍留在西陵城外攻城。许多将领认为不可置江陵于不顾，应回师救援，陆抗分析说："江陵城固兵足，不易攻破。即使晋军攻克该城，也不易守住。西陵位处江陵上游，又与当地土族人联系密切，这个军事要地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杨肇抵达西陵附近后，陆抗指挥部下内围西陵，外抗晋军，激战月余，杨肇大败而逃，羊祜也因攻江陵不利，撤退北走。西陵最终被陆抗攻克，步阐及其手下大将均遭杀戮。晋武帝闻讯后对羊祜十分不满，将他降职为平南将军。

咸宁初年，羊祜又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他认为攻灭吴国，一定要借助长江上游居高临下的优势，以水军为主顺流东征。因而在此之前，他已上表请让胸有奇谋的王濬出任益州刺史，准备攻吴之具。王濬在蜀中征召一万余人大造船只，许多大船长达一百二十步，载二千余人。上有楼台，楼台四周可骑马往来。这样大规模地造船，惊动了镇守荆州的一些吴将。吴建平太守吾彦派使者带着从长江上游漂流下来的木柿，驰赴建业，向孙皓报告说："晋军一定在准备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进攻我国，应迅速增兵建平，建平守住了，晋军就无法从水路攻吴。"但孙皓不听。

羊祜多次建议伐吴。咸宁二年（276），他再次上疏说："江淮之险不如蜀中剑阁，吴主孙皓之暴虐过于蜀汉后主刘禅，东吴百姓目前遭受的困苦也超过蜀汉百姓，而且现在晋军之强盛，也非昔日可比。面对如此有利的形势，我们为什么不水陆并进，一举灭吴呢！"武帝虽欲尽快一统全国，但朝中反对马上出兵者大有人在，而且因西北地区不断发生少数民族叛乱，朝廷尚有后顾之忧，支持伐吴的人仍属少数。羊祜感慨地说："天下不如意的事，总是十居七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果灭了吴，西北少

数民族之乱自然会平息，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咸宁四年（278）十一月，羊祜带着未能亲眼目睹吴国灭亡的遗憾，抱病而终。临终前，还向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并把尽快伐吴的希望寄托在中书令张华身上，说：“你一定要完成我的宿愿啊！”另外，他荐举了同样力主出兵吴国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去都督荆州。因此，两年后东吴被平定时，晋武帝感慨地说：“此羊太傅之功也。”

羊祜死后，朝中为是否出兵伐吴争论不休。以太尉贾充、秘书监荀勖为首的一些人反对伐吴，认为晋军暂时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吞并吴国。以中书令张华、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及龙骧将军王濬等为首的一些大臣则力主迅速攻吴。王濬上疏称：“吴主孙皓荒淫残暴，扰乱国政，这正是我们出兵的极好时机，倘若孙皓忽然死了，吴人另立一个贤明之君，则再想灭吴就困难了。我在益州造船已经七年，船只长期不用，日渐朽坏，也是不能不重视的事情。我们不可再坐失良机了。”

正当主战的呼声占上风时，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突然遣使来报，吴人沿边境各地均已戒严，似有北攻的势态。一时朝中又掀起延期到下一年攻吴的议论。王濬派往洛阳上奏章的何攀指出：“从形势看，孙皓决不敢率军北攻，我们正应该趁对方处处戒严、精神过于紧张的时候出击，一定能取胜。”镇南大将军杜预也从荆州派使者送去奏章，也认为现在东吴正全力保住长江下游，以苟延残喘，根本顾不上空其国都，出兵北向。杜预的奏表上达朝廷后，几十天没有回音，他便又上一表，进一步指出：“自咸宁五年（279）秋季以来，我们要攻吴的风声早已传到了东吴，倘若我们中止行动，而吴人趁隙迁都武昌，修缮长江沿线各个壁垒，将江南居民南移，使我军既难攻克他们的城池，又在野外抢掠不到粮食，则延期到明年攻吴，必会无功而返。”这份奏章到达时，武帝与张华正下围棋，张华当即推开棋盘，对武帝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残暴，诛杀贤良。现在出兵讨伐，

正是最好的时机，不能再犹豫了。”武帝由此最后下定了尽快伐吴的决心。他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为诸路大军筹措并运送粮草军资。武帝又任命贾充为大都督，督统伐吴各路人马。贾充认为伐吴为时尚早，怕出师不利，不愿受命，并以自己年岁太高相辞。而武帝非让他出征不可，说：“你要是不肯受命，我就得亲征了。”贾充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征，屯驻襄阳，节度各路人马。

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朝发兵二十万，分六路大举攻吴。这六路的布置是：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趋涂中（今安徽滁县东南），安东将军王浑趋江西（今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今湖北鄂城），平南将军胡奋趋夏口（今湖北武汉），镇南大将军杜预趋江陵（今湖北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军自巴、蜀顺长江而下。

诸路人马中，王濬、唐彬所率水军是主力。咸宁六年（280）正月，他们从成都出发，直捣丹杨（今湖北秭归东南）。在此以前，吴人为防备晋军进攻已作了多年准备。他们在长江三峡各险要地段设置了一道道铁链，横在长江之上，阻挡上游来的船只；又在水中暗置了许多一丈多长的铁锥，船只一旦碰上，必然会出现船底漏水以致沉没。然而，王濬早有了对付这些障碍的办法。他命人制作了几十个长宽百余步的大木筏，上面安置了许多穿铠甲、持兵器的稻草人，远远一看，很像是载满士兵的船只。让善于游泳的人撑着木筏先行，碰上铁锥时，铁锥即穿刺在筏上，被筏带走。又在船前安上长十余丈、浇上了油的大火炬，一遇到铁链，只要点着火炬，不一会儿，铁链便被融化断开。这样，王濬的船队在江上很快冲破了阻碍，攻克丹杨，俘吴丹杨监纪盛。二月，王濬挥师连陷西陵、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诸城，斩杀东吴将士极多，吴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宜都太守虞忠、监军陆晏均成了俘虏。吴平西将军施洪等眼看抵抗不住晋军

攻势，也缴械投降。

当王濬进攻乐乡时，杜预率领的大军也已逼近江陵。杜预先遣精兵八百人趁夜色悄悄渡过长江，在巴山（今湖北松滋北）燃起一堆堆大火，并虚张声势，在那一带插上许多旗帜，感到已有千军万马占据了江防要地。吴人非常纳闷，感叹说："晋军简直是飞过长江的，让人不知不觉就占领了我们的要害之地。"吴军由此惶恐不安，斗志大大削弱。杜预又命牙门将周旨等率军埋伏在乐乡城外。乐乡城中的吴都督孙歆出战王濬，遭到失败。当他率败兵逃回乐乡时，周旨也带伏兵装扮成吴军士兵，尾随入城。然后在孙歆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其活捉，悄悄押回杜预营中。晋军将士对杜预的谋略都很赞赏，称他"以计代战一当万"。

王濬攻下乐乡后，未见孙歆，以为他已战死，便向朝廷报捷，称自己已砍下孙歆的首级。没想到捷报到达朝廷不久，孙歆被杜预派人押送到了洛阳。这事在朝中引起哄笑，成为当时的笑话。

驻守江陵的吴督将伍延在晋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假装请降，却把精兵埋伏在城上的矮墙后，准备等晋军人城时，发动突然袭击，以便以少量兵力趁乱取胜。但杜预识破了他的计谋，没有受降，发兵猛攻，很快夺下了江陵城。由于杜预足智多谋，吴人对他既怕又恨，因而在江陵城内外长有结块的大树上削去部分树皮，题上"杜预颈"几个字；又在狗脖子上系着剖开的葫芦瓢。原来杜预脖子上长了一个较大的肉瘤，吴人借此侮辱杜预。江陵城破之后，杜预把所有参与做这种事的人处死，以泄心头之愤。其中被冤枉而死的人有不少，在这件事上，他是干得过于残忍了。

武帝在频频得到捷报后，再次下诏，命令：王濬、唐彬继续顺流东下，与已经攻克江安的胡奋及逼近武昌的王戎会师，共同攻克夏口、武昌，然后直扑吴都建业；杜预则挥师南下，平定

荆州以南的各州郡；大都督贾充应从襄阳移屯项县（今河南沈丘）。

这样，王濬、唐彬在得到杜预补充的一万七千名士兵后，又与胡奋联兵，攻破夏口，尔后带着胡奋补充给他们的七千士兵，在王戎部将罗尚、刘乔的配合下，攻克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等投降。过了武昌，唐彬又得到王戎补充的六千士兵，这样，王濬、唐彬率领的水师总人数多达八万，战船满江，兵甲耀目，气势极盛。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仍有人大泼凉水。当杜预主持长江中上游诸军首领会议时，有人说："东吴立国已数十年，根基牢固，不是一次出兵就能将其攻灭的。现在正值春雨连绵时节，不便于我们行军宿营，应该收兵回朝，等明年冬季再大举攻吴。"杜预则认为，现在兵威已震，对东吴已是势如破竹，决不应中止军事行动。他指令众将继续攻吴，直趋建业。

此时坐镇项县的贾充也大唱停止进攻的调子。他本来就反对在这个时期攻吴，只因武帝强迫他挂帅出征，才勉强受命。博士秦秀对贾充的才识了如指掌，他听说贾充出任伐吴的大都督，曾私下说："贾充只有一点舞文弄墨的小才，让他出任伐吴大军的主帅，一定会败坏军国大事。我将哭着去为出征将士送行。"别人劝阻说：主帅虽无能，但吴国灭亡是必然的，你去哭泣送行，影响军队士气，皇上不会饶恕你的。秦秀这才没去丢贾充的面子。

在晋军节节胜利的时刻，贾充果然看不清形势，他向武帝上疏说："张华是力主伐吴的人，真应该千刀万剐。吴国岂是这么容易被平定的？现在江淮间正是阴雨潮湿的季节，军中疾病流行，应尽快召还众军，以后再考虑灭吴大计。"中书监荀勖也附和贾充，建议腰斩张华，停止攻吴。武帝不愿接受他们的建议，说："尽快灭吴是我的主张，张华只不过与我想法相同而已。"杜

预听说贾充要求班师回朝，急忙遣使回京，向武帝禀报：攻灭吴国指日可待，切不可中途而废。就在贾充屡申东吴不可平定之际，诸路晋军却正胜利进军，捷报频传。

王濬、王浑、司马伷各自率领的军队离建业越来越近，一向不以国事为重的荒淫皇帝孙皓这才惊慌失措。他命丞相张悌督统丹杨太守沈莹、副军师诸葛靓率吴军主力三万人前去迎战。这支队伍到达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沈莹提议驻扎于此，他说："晋军在蜀地训练水师，准备船只已有多年，而我们长江沿线各要镇长期没有戒备，加之过去独当一面的名将现在均已故去，必定阻挡不住晋军的进攻。晋军水师迟早会到达牛渚，我们借这里的险要地势与之决一死战，若取得胜利，则长江西岸的晋军都会被镇住，那样的话，还可能趁势夺回长江中上游的控制权。我们如果不守住这里，而是直接渡江西行，一旦失败，国家的覆亡就不可避免了。"张悌不同意他的看法，感慨地说："东吴将亡国，这是老少皆知的事情。我们守住牛渚，一旦晋军到来，我军早已丧失了斗志，根本无法与之抗争。现在只有渡过长江，去与对方进行决战，败了，我们同赴国难而死，值得；胜了，可赶走江北晋军，并趁势回师攻晋军水师，必将打败他们。"于是，张悌率军渡江，先围王浑部将张乔于杨荷桥，继而与晋将张翰、周浚对阵。吴军最初取得小胜，但随后在冲击对方军阵时失利，一处战败引起各部人马依次崩溃，将帅制止不住，加之张乔在后面夹击，吴军最后大败于板桥。当时，诸葛靓率五六百人向外突围，他特意去迎张悌，但张悌不肯离去，坚持要以身殉国。诸葛靓没办法，挥泪而去。才走百余步，他再回头时，张悌已被乱军杀死。

王浑力克三万吴军，兵势极盛，扬州别驾何恽劝他乘胜跨过长江，直捣建业。但王浑却信心不足，不肯奋兵独进，而按兵停留在江北，坐等王濬的到来。这时，武帝又下一道诏令，让王

濬到达建业附近后要受王浑的节度。但这道诏令尚未传递到王濬手中，王濬的军队便已到达了三山（今江苏南京板桥镇附近）。王浑派人与王濬联系，让他到江北与自己共商攻城之计，而王濬不予理会，他对来人说："船队现在顺风顺水，不能停住，正应直趋建业。"

王濬率领的八万水师浩浩荡荡直逼吴都，方舟延绵八里，旌旗满江，威势甚盛。吴主孙皓急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一万余人前去迎敌。但一向惯于水战的东吴水师这时却已军心涣散，节节胜利、步步进逼的晋军的强大攻势，早已使东吴兵卒魂飞天外。张象深知在这种情势下要与晋军抗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未作任何抵抗，便率军向王濬缴械投降了。这样，建业城外没有了足可抵抗一阵的吴军，建业城门实际上也就向晋军洞开，只等王濬等人城了。

尽管形势如此不妙，刚从武昌撤回建业的吴将陶濬仍指望奇迹的发生。他认为，晋军的船只都很小，只要发兵二万，乘大船迎战，即可挡住他们的攻势。于是，孙皓授予他全权处理此事的标志：符节和斧钺，让他迅速组织起一支大军，准备次日出战。可是，当天晚上，这些如惊弓之鸟的士兵便四散而逃，使陶濬手下没多少人马可用了。就在孙皓愁眉不展之际，他左右的将士纷纷挥舞着刀剑，大声呼喊"愿为陛下去决一死战"，孙皓大喜，随即把府库中的金银财宝悉数取出，赏给他们。但这些人得到财宝后，没有去为孙皓卖命，而是纷纷溜之大吉，使孙皓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眼看实在无兵可用，他只好接受大臣薛莹、胡冲等人的意见，分别遣使到王濬、王浑、司马伷军中，表示投降。

因王濬率先抵达建业，进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城西，当时紧靠长江），孙皓便备齐亡国之礼，带诸子及朝中百官向王濬投降。吴国传了四主，历时五十七年，至此灭亡。

王浑先破东吴三万精兵，使吴都不再有强劲的守备力量，为晋军水师直趋建业城下打开了畅通之道。而王濬到达三山时，不等王浑前来会师，便径自攻入建业，夺得头功。王浑既惭愧又愤恨，便频频上疏，称王濬违诏不受自己节度，宜治重罪。王濬则申辩说，当时自己尚未接到要求自己受王浑节度的诏令，而且西风正紧，正应该趁势进攻敌城，不便停留。另外，东吴既已请降，就没必要再与王浑商议联军攻建业事宜。王濬的理由是充足的，王浑虽有扫清长江西北、灭吴三万精兵之功，但他因胆怯而错过时机，使他人夺得头功，只能怨他自己。而他争功不止，颇为时人所讥。

吴国灭亡之后，晋武帝改元太康。他赐给被押送到洛阳的孙皓一个带有欺辱性的爵号："归命侯"。又召集文武百官及周边各族各邦使者，举行盛大朝会，连国子监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一盛会。吴主孙皓当着这样多人的面，被迫前来拜见武帝。尽管成了亡国之君，孙皓仍表现出不肯屈服的样子。武帝说："我安排好这个座位等待你来拜见已经很久了。"孙皓答道："臣在江南也设了这样一个座位等待陛下去朝拜呢！"贾充曾一再反对迅速攻吴，当他又一次将主张班师、停止攻吴的奏章派人送达朝廷时，王濬夺得建业、俘虏孙皓的捷报也同时到京。贾充为此而深感惭愧，不得不回京请罪。武帝因他是开国元勋，仍让他担任太尉。此时，面对俯首称臣的孙皓，贾充也想当众表现一下，揭揭孙皓之短。他问："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面皮，这是对什么人用的刑？"孙皓反唇相讥："臣子对君主不忠，甚至谋杀君主，就要受这种刑罚！"贾充听了哑口无言。原来昔日司马昭试图篡魏称帝时，贾充曾亲自下令刺死魏帝曹髦，犯有弑君之罪。他最不愿别人提起此事，而孙皓偏要当众出他的丑，使之十分难堪。

孙皓在洛阳再也不能摆帝王威风了，他受到屈辱，精神痛苦

不堪，被俘至洛阳的当年十二月，他便一命呜呼了，这个残忍荒淫祸国殃民的暴君，最终得到了他应有的结局。

（陈益民）

参考资料：

《三国志·孙皓传》

《资治通鉴》卷79－81

《通鉴纪事本末·晋灭吴》

《晋书》：《羊祜传》、《王濬传》、《张华传》、《杜预传》、《荀勖传》、《贾充传》、《王浑传》

石崇王恺争豪

西晋司马氏政权是以世家大族为其统治支柱的，不仅司马氏本身是门第显赫的望族，任中央和地方重要官员的人，也多出自世族。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处于垄断地位，在经济上也被赋予了种种特权，这样的待遇和环境，使他们志盈心满，骄横跋扈，贪得无厌，穷奢极欲，纷纷以富豪相尚，形成谁最铺张奢侈、谁就最受推崇的腐败风气。石崇与王恺争豪斗富，便是当时统治阶层生活奢靡腐化的典型事例。

贵戚豪右之所以竞相骄奢淫逸，与晋武帝司马炎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在东吴未平定、天下还不安稳的西晋初年，武帝尚能"厉以恭俭，敦以寡欲"，尽量约束自己的言行，以树立励精图治的形象。称帝的第一年，他便下诏要弘扬俭约之风，连乐府的歌舞百戏和游乐器具也被禁断了，给他拉车的御牛原用昂贵的青丝作为穿牛鼻的绳，也改用青麻。建国初，有司奏请建造规模宏大的宗室七庙，他嫌役重扰民而未批准；泰始五年（269），西平（治所在今青海西宁）人麹路登朝击打"登闻鼓"，申诉民间劳苦，有司认为他诽谤朝廷，给"太平天下"抹黑，奏请处以极刑，而武帝说："致使民间诉苦，这是我的过错。"他没有惩处麹路。诸如此类小事，说明武帝在其统治初期确有"制奢俗以变俭约，止骄风而反淳朴"的表现。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是武帝在其统治地位尚未稳固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争取国人景仰和支持的行为。随着天下日趋稳定，尤其是在东吴被平定之后，

武帝不再有内外不安之虞，他的贪婪奢侈、荒淫无耻的本性便完全表露出来。贵族官僚也正是在他的放任、纵容和支持下，演出了一幕幕骄奢贪鄙的丑剧。

武帝非常热衷于聚敛钱财。他曾问司隶校尉刘毅："你看我与汉代哪个皇帝相似?"刘毅答道："与处于衰世的东汉桓帝、灵帝差不多。"武帝听了很不服气，说："我有平定东吴、一统天下的业绩，比桓、灵二帝还是强得多吧!"而刘毅指出：桓帝、灵帝时虽有卖官鬻爵现象，但卖官爵所收的钱都入了国库；武帝也卖官职，却把得到的钱装进了私人的腰包。由此说来，武帝还不如桓、灵二帝呢！武帝听了刘毅的说法，颇感惭愧，便"王顾左右而言他"，说："桓、灵在位时，听不到这样的直言，我现在有你这样的直谏之臣，终究与桓帝、灵帝不同。"

武帝对纸醉金迷生活的追求，在他统治后期日甚一日。且不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用以祭祀祖先的宗庙有多么气派，仅看他那豪华宫殿中某些希罕的装饰物，就足以令当时人大开眼界。一次，因病怕风的朝臣满奋进宫见武帝，他看到北面的窗户好像缝隙很大，不禁直打冷战。武帝见他这副模样，哈哈大笑起来，并告诉他，窗户上安装了国外进贡的透明刻花玻璃，看上去有很多缝隙，实际上却密不透风。满奋听了很不好意思，说："小臣就像江东怕热的水牛，看见月亮也以为是见到了太阳，直喘粗气，实在是少见多怪。"

武帝生活荒淫也是出了名的。泰始九年（273）七月，他下诏选择公卿以下至平民百姓家的女儿以备后宫，挑选未完，不得出嫁。当时，宦官乘坐专车奔赴各州郡，广选美女。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等高级官员的女儿，均入了后宫妃嫔之列，至于州郡长官及其他名门望族之女，入后宫者更是不计其数。每当选美使者到来时，年轻女子往往弄脏弄破衣饰，将容貌扮丑陋，以避免被选

上。那些已经入选宫中的人，也往往悲痛欲绝。如胡奋之女胡芳入选后宫，被强行带到殿中时，曾嚎啕大哭。当时在一旁的人非常紧张，担心她这一哭闹会给她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急忙劝阻说："别哭了，皇帝听到后对你没好处。"胡芳却说："我现在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皇帝！"她父亲胡奋对女儿入宫也不胜悲哀。他原有一子，早已夭折，身边只剩这个女儿。对他来说，女儿入宫，离自己而去，与丧亡没多大区别，因而含泪长叹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没见阎王，仅有的两个孩子，却是男孩入了九泉之下，女孩到了九天之上。"

尽管嫔妃如云，内宠盈庭，武帝犹不满足，平吴之后，又把吴后主孙皓的数千名宫人纳入了自己宫中，以致拥有的嫔妃宫女总数多达万人。如此庞大的妃嫔队伍，使武帝睡觉前无所适从，不知让谁"侍寝"合适。于是，他乘坐羊车，任由小羊拉着自己在后宫转，羊停到哪个妃子住处，他便在哪个妃子处"宴寝"。对于近万名宫人来说，在这犹如地狱的地方，只有为晋武帝生下儿子，才可能有出头之日，否则，将长期幽闭深宫，随时间的流逝而人老珠黄。因此，当武帝的羊车入宫时，那些宫嫔们就竞相在自己的住所门上插翠竹叶，并往地上洒盐水，引诱羊拉着车上门。由于武帝极意于声色，使身体日益虚弱，不复关心政事，以致贾充、杨骏之流得以"怀奸志以拥权"，"包祸心以专辅"，朝廷政治自然是日益腐败了。

武帝的贪婪、豪奢和淫逸，为大批世族地主所效仿。巧取豪夺，广占田宅，聚敛钱财，成为地主官僚们的普遍行为。而武帝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大加纵容和庇护。晋律规定，官吏以权谋私、仗势枉法者要受到降职、免职、甚至禁锢终身的处罚。而对武帝继位起过较大作用的尚书令裴秀，因与安远护军郝诩交往密切，要为郝诩谋求私利开方便之门，受到监察部门的弹劾，但武帝置之不问。其后，司隶校尉李熹又揭发裴秀指使骑都尉刘尚为

自己侵占官府稻田，要求予以惩治，武帝下诏说，裴秀是朝廷要员，又为皇室建立过功勋，“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也就是说瑕不掩瑜，不应治罪。但为了使人心服，武帝把刘尚当作替罪羊，依刑律治了罪。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立进令刘友、吏部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及尚书仆射武陔等，都曾广占官田，被李熹弹劾后，武帝只是把官品最低的刘友当作罪魁予以惩治，说他“侵剥百姓，使朝廷一些大官也受到影响”，而山涛、司马睦、武陔等高官贵戚均免于处罚。武帝在处理此案的诏书末尾还装腔作势地附上这样一句话：贵戚群僚都应守法，因为我不会总把免子惩罚的恩典赐给你们的。但这种不痛不痒的劝戒，丝毫没能阻止官僚贵戚们的违法行径，那些贪婪之徒已深知武帝对他们的犯罪永远是“宽宏大量”的。

外戚羊琇，世族出身，曾为司马炎称帝立过汗马功劳。晋朝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中护军，典掌中央禁军。由于位高权重，加之与武帝既有亲戚关系，又深受其敬重，所以，羊琇横行不法，恣意妄为，多次犯罪而执法部门对他无可奈何。职掌监察的司隶校尉刘毅纠劾他罪应至死，不可赦免，而武帝又派人来说情，并暗示刘毅不必追究此案，刘毅不得已，答应了，而他的助手都官从事程卫忍无可忍，坚持要治羊琇的罪，他亲赴护军营，拘捕了羊琇的僚属，严加拷问，收集到了羊琇所犯各种罪行的许多证据，然后据理力争，让刘毅继续申诉，迫使武帝免了羊琇的官。但是，没过多久，羊琇便官复原职。

武帝的纵容，使官僚贵戚得以肆无忌惮地违法犯罪。当贪鄙之风真到了影响朝廷大政、国泰民安的地步时，武帝也不能不在执法“严明”方面有所表示了。如中山王司马睦将封国内八个县的七百余户逃避政府赋税徭役的人荫庇起来，作为自己的佃客或私属。咸宁三年（277），冀州刺史杜友上疏，要求惩处司马睦。当时，武帝正在积蓄人力物力，准备伐吴。如果各地的王侯都大

大超过朝廷规定的标准荫庇人口，将极大地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兵员人数，不利于讨伐东吴的军事行动的进行。因此，武帝不得不作出对司马睦的惩罚决定，将他由中山王贬为丹水县侯，以警戒他人。然而，时间仅过三年，东吴刚被平定，司马睦就恢复了王爵，受封高阳王。可见武帝即使惩罚某一贵戚，也是暂时性的贬谪，轻易不会按刑律规定的免职、禁锢终身等条文去做。正因为如此，他即使对有罪的官僚贵戚不满，作出要进行惩罚的表示，也不过是隔靴搔痒，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这从王济与武帝的一次对话中也可得到印证。

王济是武帝的女婿，极为贪婪豪奢。武帝在颁定王济的爵位前，对大臣和峤说："我打算先狠狠斥责一通王济贪得无厌，然后再赐给他爵位。"和峤答道："王济性子急，恐怕你难以让他认错。"果然，当武帝严厉数落王济后，问他是否感到惭愧，他梗起脖子说："我聚敛一点布匹粮食，就遭他人诽谤。他人能使我与陛下的亲戚关系变得疏远，我却不能使这种关系变得更亲近，我只为此感到惭愧！"武帝听了，竟默然无语了。

由于豪奢成风，不少世族官僚的奢靡程度与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兼三公之位的何曾，不仅车帷服饰和庭院住宅穷极绮丽，饮食之精也"过于王者"。他吃蒸饼时，如果饼在蒸熟后上面没有出现十字形裂纹，他就不吃。每天的饮食费用多达一万钱，而他仍时常对着丰盛的食物，直呼"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武帝宴见他时，他也不吃宫廷厨师做的美味佳肴，认为调不起他的胃口。由于骄奢过度，曾遭司隶校尉刘毅等人的劾奏，武帝借口他是朝廷元老，不让追究，才使他免于治罪。

尽管何曾身为宰相，性情豪奢，却没有宰相所应具备的气度。人们给他写信，如果所用的纸张偏小，他就叫助手不给回信。都官从事刘享曾劾奏他过于铺张奢侈，他后来便假心假意召刘享进自己的相府任僚属，让人感到他似乎雍容大度。实际上，

他是为了寻机报复。刘享入相府后，何曾常借一些小事对他进行杖罚，为此而颇受世人讥刺。因何曾名声太坏，所以死后朝廷礼官在议谥时，有人就指出："何曾身兼三公之位，却不能为人表率，骄奢过度，屡受有司劾奏。近世以来，极少宰辅大臣会像他这个样子。他活着的时候，极尽奢靡，死后如果仍受褒崇，则意味着朝廷好坏不分，众王公贵人都将效仿他的行径了。《谥法》上说：'对名不副实的人应谥作缪，骄横跋扈的人应谥作丑。'何曾平生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相符，应该称他为'缪丑公'。"这一说法在当时朝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武帝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让他们继续过着骄奢的生活，不得不出面干预，否定了这一谥号。

何曾之子何劭也颇有父风，他的衣物和游乐之具，多得成堆。饮食必尽四方珍肴，天天以二万钱作为饮食的费用，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乃父，当时人议论说，皇帝饮食也未必比他强。然而，山外有山，吏部尚书任恺之豪奢又超过了何曾父子。史称，他极尽天下珍馔，厚自奉养，一顿饭花费了一万钱，犹说没有可下筷子的地方，后来竟是因越等级使用皇帝专有的"御食器"而被与自己争权的贾充抓住把柄，并在对方不断进谗言的情况下，失去了武帝对自己的信任，被免官。

再看王济。武帝曾来到他家，见他安排前来侍奉的婢子达百余人，每人都身着艳丽的绫罗服饰，手捧各式各样的食品，盛食物的器皿全是当时非常罕见的琉璃器。在品尝那些珍馔佳肴时，武帝发现一种煮熟的小猪味道非常鲜美特别，便向王济询问其中缘故。王济得意地答道："这种猪是用人奶喂养的，被屠宰后又用人奶蒸煮，这道菜叫做蒸豘。"武帝得知他如此豪奢，并且有意在自己面前摆阔，心里十分不满，进餐未完便拂袖而去。

王济还挥金如土，当时洛阳人多地少，土地价格特别昂贵。王济喜好玩马，特意花重金买了一大片地作射马场，并在场地四

周用钱填成场界，时人称这条界为“金沟”。武帝的舅舅王恺有一头被十分珍重的牛，牛角牛蹄均被擦拭得锃亮，名为“八百里驳”。王济便去与他打赌，看谁能一箭射死此牛，赌注多达一千万钱。

有的贵族官僚既豪奢又吝啬。司徒王戎在全国许多地方购置了园林、土地和用以舂米的水碓，但他视财如命，昼夜都在用计数用的牙筹计算着财产数量，绞尽脑汁琢磨招财进宝之方。因为贪财，所以非常吝啬。女儿出嫁，竟要向他借钱。由于借去的几万缗钱很长时间没有归还，他便牢骚满腹，以致女儿回家省亲时，看不到他的笑颜。直至女儿归还了所借之钱后，他才待女儿如初。他的侄儿结婚时，他送去一件单衣以致贺，待婚礼结束后，他却又索回了这件衣服。家里种有好李树，他时常把李子拿出去卖，但又怕别人得到李树种子，便给所有李子的核上钻个眼。诸如此类事情，使王戎时常为人们所讥笑，人们称吝啬是他的膏肓之疾。

官至侍中的和峤也是如此。他“家产丰富，拟于王者”，却吝啬至极，一心聚敛钱财。当时，杜预一心钻研《左传》，王济喜好玩马，和峤则见钱眼开，因而杜预评论说，他自己有“《左传》癖”，王济有“马癖”，和峤却是有“钱癖”。

在官僚贵族奢靡比阔的众多事例中，石崇与王恺争豪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石崇父亲石苞曾参与司马氏篡魏的密谋，为西晋的开国功臣，官职累迁至大司马、司徒。死后，武帝亲自主持哀悼活动，并在举行葬礼时一直将石苞的灵柩送出皇宫的东掖门，这在当时的大臣中，是少有的礼遇。作为功臣之子的石崇，凭恃父亲的地位，很容易获得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但他没有完全仰仗于此。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石苞临终前，将家中财物分给诸子时，唯独不给石崇，说：“此儿虽小，凭他的机敏，足可以自己

搞到财富。”真是知子莫过于其父，石崇后来果然变成了有名的富豪。其致富途径不外乎有两条：一为巧取豪夺。他在荆州任刺史时，行为不检点，时常带人抢劫远来的客商，发了不少不义之财。他知道自己作为功臣之子，即使犯罪，也能得到武帝宽免，因而总是无所顾忌地劫夺民众的财物，据为己有。二是交结权贵。贾谧专权时，一些贵戚豪右及奔竞之徒竞相攀附，结成所谓“二十四友”，石崇也在其中，每逢贾谧的外祖母广城君出行时，石崇总是站在道路左侧恭候，望尘而拜，故深得贾谧等权臣信任，由此得到不少好处。

石崇家中妻妾奴婢成群，财物堆积如山。屋宇宏丽，装饰豪华，连厕所都布置了绛蚊帐，并有十多个衣着盛装的婢女手持香囊随时侍候。凡客人上厕所，解完手出来时还换一身新衣服，所以，客人一般都不好意思进那里去。位至三公的刘寔曾去石崇家，当他准备上厕所时，还误把厕所当成了卧室，不敢进去，不得不到别处去找厕所了。

石崇如此豪奢，一些皇亲贵戚如王恺、羊琇等并不服气，总想与之一比高低。尤其王恺，身为武帝舅父，家世显赫，家产丰富，历任龙骧将军、射声校尉、后军将军等职，他自视为天下首富，不把石崇放在眼里。而事实证明，他要比过石崇，并非易事。从一开始，便有三件事使他颇为烦恼。第一件事是，将豆子煮熟需要较多时间，而每当石崇请客喝豆粥时，能很快煮好，端上宴席，这在他王恺来说是办不到的。第二件事是：冬天地里不长韭菜，而石崇能在寒冬腊月吃上新鲜细嫩的韭菜，王恺不知其奥妙何在。第三件事是，每次王恺、石崇各自乘牛车出游，返回洛阳时，俩人就要比试一下看谁先入城，而石崇的牛总是跑得飞快，远远赶在前面进城。王恺非常纳闷，便买通石崇左右的人，探问以上三件事的缘故。石崇的下属说：石崇知豆子难煮熟，便预先煮好，碾成豆末，需要时只须将其与大米合起来一煮，很快

便成了豆粥。所谓冬天的韭菜，则是捣烂韭菜根，掺入麦苗后做成的。至于牛跑得快与慢，原因不仅在牛本身，驾车人的驭牛技术如何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王恺得知这些秘密后，如法炮制，终于在这几方面超过了石崇。为此，石崇非常恼火，把手下的泄密者杀掉了。

为了争豪，石、王两家都极尽铺张奢靡之能事，恣意挥霍财富。王恺让家人用糖浆代水洗锅，石崇家则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出门，做了四十里长的紫丝步障，夹道遮蔽，石崇则做成五十里长的锦缎步障，胜他一筹；石崇用只有后妃住所才可使用的椒泥涂抹房屋墙壁，王恺便用色泽鲜明、非常稀罕的赤石脂抹墙。双方绞尽脑汁表现豪奢，都试图胜过对方。

武帝时常暗中帮助王恺。他曾赐给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多，枝条繁茂，世所罕见。王恺拿给石崇看，向他炫耀自己的珍宝。没想到石崇举起手中的铁如意就砸，将珊瑚树打得碎了一地。王恺见状大怒，厉声斥责，认为石崇是因嫉妒而打碎了那件珍宝。然而，石崇毫不在乎地说："别着急，我还给你就是了。"他让手下的人把自己的珊瑚树全搬了出来，其中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条杆茂密，光彩耀目，至于可与王恺那株珊瑚媲美的，为数更多。王恺看得眼花缭乱，自愧不如石崇拥有的珊瑚之美，也惊诧石崇拥有的华丽珊瑚怎么会如此之多。

石崇、王恺斗富不仅表现在挥金如土方面，还反映在他们的残忍行径中。王恺宴请贵戚时，总是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女伎吹笛稍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将她处死。武帝的女婿王敦生性残忍，曾到王恺家赴宴。王恺让美女给众客人劝酒，规定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就要杀死劝酒的美人。有的客人怕美女无辜而死，即使不善饮酒也勉强喝干杯中酒。而王敦相反，故意不饮酒，美女悲惧失色，他却傲然不视，致使美女被王恺杀死。而石崇在杀婢取乐方面，与王恺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客不饮酒，

他也杀行酒的美人，有时一连斩杀好几人，他竟然面不改色。

对于王恺、石崇的争豪行径，当时人深恶痛绝。王恺死后，朝中给他议定的谥号为“丑”，可见他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丑陋。石崇在被人处死前，曾说要置他于死地的人是看中了他的万贯家产，执刑的人问：“你既然知道财宝会招致祸害，为什么不早把财产散给他人呢？”石崇听了哑口无言。

门第显赫、地位尊贵的人，当时大多骄横跋扈、肆意违法，他们的权势，足以使许多行政、执法官员望而生畏，虽有执法之心却乏惩处之力。尽管如此，仍有个别不畏强暴的铁面官吏，敢于站出来与之斗争，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县令张辅便是这样一条铁汉。他所在县有一个叫庞宗的，任职强弩将军，出身于关中有名的大姓。他广占田地，横行不法，甚至他的僮仆倚势欺人，被欺者也敢怒不敢言。百姓怨气冲天，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多年来，地方官事事都得让他三分，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按理来说，强弩将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庞宗何以能这样骄横呢？原来他夫人赵氏的族人赵俊是皇后杨艳舅家的人，担任了统领中央禁军的中护军。杨艳母亲是天水人赵氏，死得早，杨艳是靠舅舅家的人抚养大的。她的祖先有四世曾任汉朝的三公，父亲杨文宗在曹魏时，也担任了通事郎，袭上辈爵位为封蒋亭侯。由于杨艳出自关中的世家大族，又聪慧美丽，被选为司马炎之妻，西晋建立后，成为皇后。为了报答舅家的养育之恩，她让舅家的赵俊担任了朝廷要职，并将赵俊兄赵虞的女儿纳入武帝的后宫，入夫人之列。赵俊官高权大，又是双料的皇亲国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亲友仗势横行，就不足为怪了。

张辅为了打击豪强大族的势力，先把庞宗手下的两个横行霸道的僮仆逮了起来，处以死刑。按规定，当时的一品官才可占田五十顷（一顷等于一百亩），而庞宗官品不高，却占了比一品官可占田数多几倍的田亩。因此，张辅第二步便是从他侵占的大量

田地中，没收了二百顷，分给穷苦百姓。此举使那一带的豪强大姓大为震惊，百姓则个个拍手称快。后来，张辅调任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县令，在那儿又对太尉陈准的家僮横行不法予以打击，将其收斩，赢得广大民众的赞誉。

像张辅这样敢于与世族豪强势力相抗的人，当时极少，因为这样做随时可能遭到报复。张辅后来即受到那些仇视他的人的诬陷，以致不得不向人申辩："我只知道为官要尽职尽责，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我的所作所为可以表明，我不过是个公而忘私的'国之愚臣'而已！"

豪族奢靡骄横与民众饥寒交迫形成了鲜明对照，腐败的世风，不仅使普通百姓及寒门庶族满腔愤慨，而且在世族内部，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不满，为国家长此下去必招来祸乱而担忧。开国元勋裴秀的堂弟裴楷、裴绰，即与那些夸豪骄横的世族士人不同。石崇曾在一次宴会上因自己是功臣之子，且很有些才气而趾高气扬，担任长水校尉的裴绰却不买他的帐，不仅不奉承，还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使石崇大为恼怒，几乎要上疏请罢裴绰的官。裴楷是皇帝左右颇受信任的人，但他不在乎权位，曾任散骑常侍，却主动要求离京出任河内太守，后升任侍中，不久又主动请求改任河南尹。他也不屑于与那些奸佞、豪奢之徒交往。贾充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却敢对武帝说："贾充在朝，天下难治。"外戚杨骏权重，裴楷也对他表示蔑视。别的世族都在想方设法聚敛财富，裴楷却相反，常把自己的财物施舍给贫困人家。他甚至到当时地位显赫的梁王、赵王的府中，要求他们送给自己数百万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赈济贫寒之家。有人讥讽他，他却说："损有余以补不足，有什么不妥！"

正因为世风日下，贫富分化，才显得裴楷"损有余以补不足"的行为很特别，与当时豪门大姓竞相聚敛钱财的状况格格不入。面对这种腐败、黑暗的现实，那些愤世嫉俗的庶族士人不能

不通过某些途径来表示自己的愤恨了。撰写针砭时弊的文论，便是他们泄愤的方式之一。当时，吴郡人蔡洪写的《孤奋论》、高平人王沈写的《释时论》、南阳人鲁褒的《钱神论》、庐江人杜嵩的《任子春秋》等，均属此类。尤其是《钱神论》，论说“孔方兄”（钱）在社会上的“神通”，入木三分地讽刺了当时世族地主殚精耗神追求金钱的丑态。文中说：“人们把钱看得亲如兄弟，称之为‘孔方’。人失掉它就贫弱，得到它则富豪。它没有翅膀却能飞，没有脚却能跑，可以让脸色严肃的人露出笑容，让默不作声的口张开说话。钱多的人总是排在前头，钱少的人须呆在后面。处在前头的人能当长官，落在后面的只可作仆人。当长官的富足有余，作仆人的穷困潦倒。

“钱没有德行却深受人们尊崇，没有权势却得到人们热情的拥戴，具有冲开皇宫大门、帮人直达皇帝身边的能量。钱可以化险为夷，可以使死人活过来，可以使尊贵的人变得卑贱，可以使活人死去。因此，人们之间发生纠纷，无钱不能打赢官司；官职久未升迁，无钱不能晋级；人与人结下怨仇，不用钱就不会和解；要想有个好名声，不花钱就得不到。洛阳城中的贵族，朝廷执政的大官，爱这孔方兄，到了狂热得不能自制的地步。”

寒人的这类愤世之作，对当时豪门大姓的争豪斗富、追求享乐，无疑是有力的鞭挞，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共鸣。许多人早已预感到了国家因为腐败而一步步走向衰落，但可悲的是，豪强地主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仍我行我素，在既害国家、也危及自身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最终导致了反对晋王朝统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总爆发。

（陈益民）

参考资料：

《晋书》：《武帝纪》、《刘毅传》、《胡贵嫔传》、《裴秀传》、

《李熹传》、《程卫传》、《高阳王睦传》、《王济传》、《何曾传》、《秦秀传》、《任恺传》、《王戎传》、《张辅传》、《裴楷传》、《鲁褒传》

《世说新语》:《语言》、《汰侈》

齐献王争立

高平陵事变后，曹魏的大权完全落入了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手中。当时司马懿已年过七旬，久病在身，自知难以久在人世，便把篡魏的希望寄托在诸子身上。他权重于魏帝，非但不必天天朝见魏帝，每有军国大事，魏帝还要亲临他的府中咨询。洛阳城中有他立的庙，与皇家宗庙一争高低。在注重礼教的封建社会，这也是僭越等级的。他权势显赫，魏帝先后不得已而拜他为丞相、相国、郡公，他却不受命。他不想过早地让人议论自己有篡位的野心，打算让儿子去做代魏称帝的事情。

司马懿共有九子，其中长子司马师最受他赏识。嘉平元年(249)发生的高平陵事变，就是司马懿单独与司马师策划的。直至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司马懿才告诉次子司马昭。司马昭得知后，心情紧张，一夜没睡好觉，司马师则相反，起居一如往常，镇定自若。而且，他平时即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当他号令一下，那些隐匿在民间的壮士纷纷聚集到他门下，很短的时间里就组织起了三千人的私人武装。加之他任中护军，统领中央禁军，在事件爆发时，他将禁军及私人武装布置在司马门内外，对司马氏控制局势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司马懿在嘉平三年(251)去世时，特意指定由司马师辅政，任抚军大将军。

随后的几年中，司马师又以大将军、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之职总揽朝政。年岁渐长的魏帝曹芳不堪忍受司马师专权，于正元元年(254)一月与中书令李丰、张皇后父亲张

缉（时任光禄大夫）等大臣密谋，策划让太常夏侯玄代替司马师执政。夏侯玄父亲是魏初功臣夏侯尚，母亲是曹魏皇族之女。他若上台，必然对专权的司马氏不利。由于走漏了风声，司马师捕杀了李丰、张缉及夏侯玄等，并株连三族，又先后废黜了张皇后和魏帝曹芳，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

次年，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又在寿春（今安徽寿阳）举兵反对司马师，率军六万西进，司马师亲率步骑十余万迎战，将叛军镇压。司马师的眼睛旁原来长了个肉瘤，出征前刚动过手术，在这次讨伐过程中因一度受到敌方冲击，精神过于紧张，以致眼病恶化，暴卒于许昌。

司马师原本无子，其弟司马昭把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他。司马师死时，司马攸年仅10岁，由司马昭继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等职，辅佐朝政。按封建礼教传统，王位继承是以父死子继的程序进行，司马师虽非帝王，但他已执掌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所有军国大事都取决于他，无帝王之名，却行帝王权力之实。因此，他的职位的继承形同皇位继承。司马攸既然被过继给了司马师，照理说应该由他继承司马师的权力。但他年岁太小，不仅没有辅政能力，而且在司马氏尚未篡魏称帝的情况下，让这样一个小孩代表司马氏执掌朝廷大权，必然难以控制局面，一批忠于曹魏、与司马氏对立的大臣就会趁虚而起，消灭司马氏。另外，司马昭是司马攸的亲生父亲，由他接替其兄的职务，在司马氏集团内部取得了一致意见。

司马昭自正元二年（255）继任宰辅至咸熙二年（265）死去的十一年间，加紧了篡魏的步伐。他先出兵镇压了因不满他专权而在淮南反叛的诸葛诞，继而攻杀了魏帝曹髦，另立15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为帝。并逼曹奂拜自己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最受尊礼的大臣的九种器物），为逼帝“禅让”做准备。景元四年（263），他又发兵十八万攻灭蜀国，使自己在朝中

的地位更加崇重，魏帝亲自下诏承认晋公可以相国身份总管百官。不久，又让他进爵为王。他的亲信把持了朝廷各要害部门，这些人不时地鼓动百官“劝进”，为司马昭名正言顺地改朝换制造成适当的氛围。

司马昭在准备篡位的同时，也开始选择自己的晋王王位继承人。司马炎是他的长子，理应由他继承王位。但被过继给司马师的司马攸才识在司马炎之上，深受司马昭喜爱，而且司马昭因自己以弟弟的身份继承了司马师的职位，所以不止一次地抚摸着晋王座位说：“天下是景王（指司马师）打下来的，我百年之后，这就是桃符的座位！”司马攸小名叫桃符，当时被封为舞阳侯。司马昭每每向人流露出让他继承晋王位的意思。

司马炎虽然才识不如弟弟司马攸，但他把司马昭身边深受信用的大臣全拉到了自己一边，让他们为自己说话。司马昭的司马裴秀，曾从征诸葛诞，参与谋略策划；魏帝曹髦被杀后，又与司马昭一起议定对策，立常道乡公曹奂；后来又受晋王命改定官制，是司马昭的重要谋臣。司马炎拉拢了裴秀，让他借相面术为自己作宣传，于是裴秀到司马昭面前说：“中抚军司马炎名望高，又有一副不像人臣的仪表，非同寻常啊！宜立为世子。”司马昭又问声望很高的山涛，山涛说：“司马炎年长，司马攸年幼，废长而立幼，违背礼制。国家的混乱，常常是因这样的事导致的。”司马昭的心腹何曾、贾充等，也异口同声地赞扬司马炎，眼见这样多大臣为司马炎说话，司马昭只好改变自己的主意了。

司马炎不仅得到大臣相助，而且也得益于他身边的出谋划策的人。司马师的夫人有个堂弟叫羊琇，从小与司马炎一起长大，俩人关系甚密。羊琇工于心计，常为司马炎出主意。他很仔细地分析了司马昭处理政事的主导思想，掌握了其对各种时政的思想倾向，推测出他所关心的问题，然后让司马炎对这些问题详加考虑，提前做好应答司马昭提问的准备，使他在与司马昭谈论时务

时，能够对答如流，且显出很有见识的样子。司马昭非常高兴，以为此子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才，遂于咸熙元年正月正式确定他为世子。

司马昭尚未称帝，他的亲信则已把他当皇帝看待了。三公是百官中等级最高的官，除了皇帝外，他们不必向任何人下拜。而身为三公之一的何曾每次入见相国司马昭，却用进见皇帝的礼节下拜，表示敬意。司马昭也把自己视同天子，戴上了皇帝专用的垂有十二旒的冠冕，树起了天子的旗帜，仪仗也完全等同于帝王之仪。然而，这个距皇位仅差一步之远的权臣，还没来得及篡位登基，却忽然得病而死，时年 55 岁。

司马昭临终前，怕司马炎容不下司马攸，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善待司马攸，司马炎慨然应允。

司马炎篡魏称帝、建立晋朝后，封司马攸为齐王，对他还算尊崇，让他掌握部分军权，参与议定国家大事，官职由卫将军迁骠骑将军，又转镇军大将军，后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太子太傅、司空等职。但到了武帝晚年，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武帝共有二十六子，其中皇后杨艳所生仅三人，并且长子司马轨年仅两岁即夭折。次子司马衷遂以年长被册立为太子。然而，司马衷智力低下，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不能料理，将来继承皇位、治理国家就更成问题了。朝中许多大臣对此忧心忡忡，屡劝武帝另择贤明。武帝一度产生了动摇，曾与皇后杨艳商量是否另选太子，杨皇后坚决不同意，说："依照礼制，选择太子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嫡长子，而不必考虑他是否贤明。这一规定绝对不可破坏。"武帝自此不再提废黜太子之事，也不愿听别人议论太子不聪明，千方百计为太子树立威严。谁敬奉太子，武帝就大加信用；谁说太子不堪入承大统，武帝就与之疏远甚至将其贬黜。于是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向武帝谄媚的人极言太子聪慧超群，忧国忧民的大臣则认为太子愚黯，于国不利。

与有争议的司马衷相反，齐王司马攸则名望甚高。他自幼博览群书，善于写文章，时人非常赞赏他的才思。加之他承嗣司马师，本来就几乎继司马昭之后执掌朝政，因没竞争过司马炎而屈居郡王之位。他如果继武帝之后即皇位，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他的突出的才干与司马衷的愚蠢形成了鲜明对照，凡是真心为朝廷未来的振兴着想的人，无不对他推崇备至，期待着他来取代司马衷的位置。

司空卫瓘知道太子根本没有理政能力，屡欲进言而未敢说。有一次，晋武帝在陵云台举行宴会，卫瓘假装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来到武帝座前跪下，对武帝说："臣有话要讲"，武帝问："你想说什么?"卫瓘一再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摸着武帝的座位，叹息说"此座可惜!"武帝明白卫瓘说这话的用意，便故意打岔说："你真是喝醉了吧?"叫人将他扶了下去。卫瓘见武帝不听劝告，自此不再提太子之事。

太尉贾充是个很惯于见风使舵的人。他原来追随司马昭，在篡魏的阴谋中起过较大作用，所以司马昭临终前，特意对司马炎说："知你者莫过于贾充，你一定要重用他。"司马炎建立晋朝后，贾充果然成为他身边的重臣。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贾充极尽谄媚取容之能事，想方设法迎合司马炎的旨意，还把女儿贾荃嫁给当时官职甚高、参预朝政的齐王司马攸，使自己成了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人比较刚直，他们看不惯贾充在朝中搬弄权势，便趁关中鲜卑人叛乱不息的时候，向武帝进言，让贾充离京赴关中，任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平息叛乱。武帝正为关中不安定而忧虑，正在考虑出镇关中的人选，经任恺等人一说，立即表示赞同。

贾充为自己被忽然调离朝廷，不能再在朝中弄权而沮丧。在将要起程之际，他的僚属皆来到城外的夕阳亭为他饯行，中书监荀勖也在其中。荀勖是个颇有文采而人品较差的人，他与左卫将

军冯𬘘长期巴结贾充，逢迎武帝所好，颇受武帝信任。贾充一旦离京，荀勖和冯𬘘会感到势力太单薄，很难继续专权。因此，荀勖在为贾充饯行的宴席间，悄悄对贾充说："贾公身为国家宰辅，却被一两个小人物给算计了，真是莫大的耻辱。现在要推辞诏命不去关中是困难的，如果能将女儿嫁给皇太子，那么，留在京师就不成问题了。"贾充大喜，赶紧派人贿赂皇后杨艳，让她劝武帝为太子纳贾充女贾南风为妃，还让太尉、太傅荀𫖮为此事帮忙。荀勖、冯𬘘也在武帝面前盛称"贾充女才貌双全，若入东宫，一定能辅佐太子"。武帝也正想为痴呆的太子找一个有才干的女子为妃，遂同意了这桩婚事。这样，贾充得以借此机会留京，仍居本职，不复西行。当时舆论普遍对他们的这种勾当不满，视贾充、荀勖等人为奸佞之人。

对贾充来说，晋武帝死后，无论继皇位的是司马衷还是司马攸，都不会影响他已有的权势，因为这二人都是他的女婿。然而，由于武帝希望群臣支持册立自己的亲生儿子司马衷，而不是弟弟司马攸，这使得贾充不能不表明自己支持司马衷的态度。齐王司马攸的妃子贾荃是贾充的前妻李氏所生，李氏是魏中书令李丰之女。李丰于嘉平六年（254）与魏帝曹芳密谋以太常夏侯玄取代司马师的执政地位，谋泄被杀。其女受牵连被流徙边远地区。贾充又娶城阳太守郭配之女郭槐为妻，生贾南风。司马炎建立西晋时，发布大赦令，被流放的李氏得以回京。武帝为此特批贾充可置两个正妻。因郭槐大闹，贾充没敢让李氏恢复正妻的地位。贾荃为齐王妃后，再次要求贾充赶走郭槐，迎还李氏，贾充借口自己是宰相，言行须作为海内准则，没有答应贾荃的要求，还把李氏安置在别处，从不与之往来。其实，贾充只是为了不冒犯皇室，因为李氏的父亲是司马氏的"罪人"。李氏虽得到宽免，但她内心必定痛恨司马氏，贾充何不趁此向人表现一下他对"罪人"家属的冷酷呢！贾充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势，

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冒万一将来某一天有人追究他收容“罪人”女儿那样的险。在郭槐之女贾南风成为司马衷之妃而武帝又坚持要让司马衷继承皇位之后，贾充更不顾齐王妃贾荃的再三请求了。为此，贾荃忧愤而死。

河南尹夏侯和曾指望贾充在决定太子人选上主持公道，他说：“司马衷与司马攸都是你的女婿，亲与疏相同，你应该建议选择他们两个人中的贤者。”贾充笑而不答。这事后来传到武帝耳中，武帝大怒，将夏侯和降职为光禄勋，也剥夺了贾充的兵权，但贾充的地位依旧不变。

中书令和峤刚直不阿，素有“森森如千丈松，有栋梁之用”的美誉。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看法。武帝常想听到像荀勖、荀顗等人夸赞太子聪明之类的话，而和峤见过太子后，总是说：“皇太子圣质如初！”每次言及国家大事，和峤都要大谈对嗣君的忧虑，以致武帝后来不再与他商议自己驾崩之后的事情。按规定，中书令与中书监每天是乘同一辆马车入朝的，由于和峤鄙视身为中书监的荀勖的所作所为，他总是气势逼人地独占了车上的两个座位，使荀勖不得不天天另乘一辆车入朝了。

与和峤、任恺交往甚深的张华，也对贾充、荀勖、冯统等人看不顺眼，时常在武帝面前否定、驳斥他们的一些建议，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议论是否尽快伐吴这件事。张华自幼孤贫，当过牧羊童，家世寒微，很难与出自望族的贾充、荀勖等人相比，荀勖每以自己的门第来贬损他。然而，张华博闻强记，有高才卓识，深得武帝赏识，官至中书令。武帝有心伐吴，在与大将羊祜商量后，向朝中征询意见。以贾充、荀勖等人为首的许多大臣反对马上出兵，认为东吴立国既久，难以攻克，须继续等待时机，而张华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出兵，被武帝任命为度支尚书，筹划各种伐吴事宜。众军进攻之初，尚无捷报传至洛阳，贾充即认定晋军必不能胜，强烈要求“腰斩张华以谢天下”，荀勖也同声附和，

在朝中制造张华误国的声势。直至晋军攻下吴都、孙皓投降，贾充等人才面有愧色，哑口无言。但他们仍视张华为眼中钉，嫌他在朝中碍事，一直在寻找机会让他出镇外地。

朝中许多大臣在议论谁当太子合适的问题。武帝希望主要大臣中有更多的人支持他选定司马衷，曾问张华："在我身后谁继承皇位合适？"而张华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苟合取容，他说："要论既有德才，又是亲骨肉，我认为齐王司马攸最合适。"武帝听了很不高兴，贾充等人趁机进谗言，排斥张华，武帝遂在太康三年（282）正月改任张华为都督幽州诸军事，离京前往幽州（今河北北部、京、津及辽宁大部分地区）。

齐王司马攸向来厌恶荀勖、冯𬘘等人的奸佞行径，荀勖、冯𬘘也知道如果司马攸将来登基，将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在扬太子、抑齐王的过程中，为达到个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荀勖眼见齐王的声望日高，颇感焦虑，便向武帝进言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继承不了皇位。"武帝很惊讶，忙问原因，荀勖说："朝廷内外的人都倾心于齐王，认为他贤明，太子到那时能继位吗？陛下如果下一道诏令，命令齐王离京回封国，满朝大臣准会争相出来阻止的。陛下若不信，可以试试。"冯𬘘也说："陛下早就打算让所有藩王回自己的封地去，而他们总是留恋京城不肯离去，现在应该从最亲近的藩王做起，而最亲近的藩王莫过于齐王。"

武帝相信了这两个人的话，于太康三年下了一道诏令，命齐王为都督青州诸军事，返回他的封国。诏令一下，果然引起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子）、征东大将军王浑、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及两个驸马王济、甄德等，都站出来进行阻止。王浑在疏奏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让齐王回封国，带个都督青州的虚号，没有镇守一方的军队可指挥，远离朝廷，不再参政，未免太不重兄弟手足之情了，有违文帝（指司马昭）临终前对陛下的嘱托。"武帝最怕别人说他不重兄弟之情，碍于

面子，他不便对老臣王浑发作，而年轻一些的人进行劝阻，就难免使他发怒了。

王济、甄德这两个人不仅自己泣请武帝留齐王在朝，还一再让他们的夫人常山公主和长广公主到武帝面前说情，惹得武帝怒吼道："朕让弟弟司马攸回封国，是朕家中之事，关你们什么事！甄德、王济故意鼓动妇人来哭啼，是向活人哭丧还是别的意思？"王济因此被降职为国子祭酒。

皇后杨芷的叔父杨珧与荀勖来往密切。太康三年（282），太尉贾充死后，荀勖推荐杨珧为太子太傅，辅佐东宫，使他们的小帮派不因贾充死去而势力削弱。杨珧在排斥齐王攸的过程中非常卖力，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一向为齐王所信用。他们恨杨珧与荀勖等结成帮派，曾密谋用刀捅死他。杨珧得知这一消息后，吓得不敢迈出家门，便派人告发羊琇图谋刺杀大臣，为齐王攸出力。羊琇自幼与武帝一起长大，曾为武帝即位发挥过很大作用，平时深受武帝信任，任典掌禁军的中护军达十三年之久，但他在齐王的问题上栽了个跟头。武帝得到杨珧的告状后，不顾多年的情谊，将他降职为太仆。羊琇为此而愤恨不已，不久竟一病不起，死在家中。

齐王将行，武帝命掌管礼仪的太常议定将赐给的物品。而太常中的博士没有议论应赐之物，却上了一封劝留齐王的奏章，极言齐王有如此之才，与武帝有如此之亲，不应远出海隅。武帝见疏大怒，斥责他们答非所问，不回答应赐给离去的齐王什么褒崇物，却对朝政横加异议。遂免去太常郑默和国子祭酒曹志的官职，将博士秦秀、刘暾等罢官入狱，以示惩处。

武帝的态度如此坚决，以致百官中再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反对逼齐王离京了。齐王攸知道武帝完全听信了荀勖、冯统的谗言，心中愤恨不已，不久便病倒了。武帝派御医前去诊治，而御医迎合武帝的意愿，故意说齐王没病。齐王病情越来越重，武帝

却不停地催他起程。齐王没办法，只好强打起精神入朝向武帝辞行，武帝见齐王的举止仍保持平时的样子，更确信他是没病装病。直到他两天后躺在病榻上吐血而死，武帝才吃了一惊。

武帝因齐王是被自己逼死的，内心有愧，不禁落下了眼泪，而站在一旁的冯纨冷言冷语地说："齐王徒具虚名，而朝中百官皆归心于他，对皇太子十分不利。现在齐王自己得病而死，这正是国家的福气，陛下何必那样伤心呢！"武帝听了，收住了眼泪。

齐王死后，其子司马冏愤愤不平，但又不敢指责武帝，便把愤恨发泄在御医身上，称御医误诊其父的病。武帝随即下令将御医斩首，让他们成为替罪羊，以示齐王之死与己无关。

齐王一死，太子司马衷的地位就牢不可动摇了，没人敢再说废立太子之事。而晋王朝由盛而衰的悲剧正发源于此。司马衷愚黯无知，从他后来即位登基之始，到公元306年死去的十七年间，他空居皇位，所有朝政都由他人代理。皇权旁落，引起司马氏家族内部的激烈争斗，每个试图把司马衷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挟天子令诸侯"的藩王，都在不择一切手段扫清自己登上权力之巅的道路上的障碍，由此演出了一幕幕同室操戈、血肉横飞的惨剧。汉主刘聪后来向被俘的晋怀帝提出"卿家骨肉相残为什么如此之甚"的问题，即是对司马氏家族的奚落，同时也点明了晋王朝衰败的根源。古人感叹说，武帝死后如果继位的是齐王攸而非太子衷，晋王朝或可避免"八王之乱"。此说虽过于绝对，但齐王攸在位要远远强于太子衷，则是毫无疑义的。

（陈益民）

参考资料：

《晋书》：《景帝纪》、《文帝纪》、《武帝纪》、《齐王攸传》、《裴秀传》、《山涛传》、《荀勖传》、《贾充传》、《冯统传》、《和峤传》、《卫瓘传》、《王浑传》、《王济传》、《羊琇传》、《杨珧传》

贾后弄权

贾后名叫贾南风，晋权臣贾充之女。贾充在司马氏篡权夺位、建立晋朝的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他曾建议司马昭派僚佐巡行四方，探察各方镇将领对司马氏代魏的态度，并亲赴淮南，了解到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对禅代，乃向司马昭献计召他回朝，不从则出兵讨伐。不久，诸葛诞的势力即被司马昭剪除。魏帝曹髦恨司马昭图谋不轨，亲率殿中的宿卫、奴仆攻打司马昭所在的相府，相府的宿卫兵不敢与皇帝交战，四散而逃。贾充时任统领中央禁军的中护军，他迅速指挥部下抵抗，杀了魏帝，保护了司马昭。因此，贾充深受司马氏信用。西晋初，他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尚书仆射，以后又升迁尚书令、侍中，仍掌握军队。

贾充权势煊赫，自然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向他谄媚，荀勖、荀勖、冯紞等皆与他结党。武帝欲娶大臣卫瓘之女为皇太子司马衷的妃子，贾充的亲党却四处活动，欲使贾充之女为太子妃。他们贿赂皇后杨艳，请她劝说武帝，荀勖、荀勖、冯紞等人也盛称贾充之女才貌绝世，如果纳入东宫，必能辅佐太子。武帝听从了他们的劝说，泰始八年（272）二月，正式册拜贾南风为太子妃。

贾妃精明狡诈，太子司马衷则是个傻子。他曾在御苑华林园听见蛤蟆叫声，竟问左右的人："这个叫唤的东西是为官府鸣叫，还是为私人?"左右的人不知如何回答好，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好说："在官府的田里鸣叫是为官，在私人的地里鸣叫是为私。"

还有一次，他听说在灾荒和战乱中有不少百姓饥饿而死，却问："那些将要饿死的人为什么不喝肉粥呢！"这样一个愚蠢无知的人，却被立为太子，成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这使朝中许多大臣感到忧虑。侍中和峤就曾委婉地说："皇太子太淳朴厚道，现在世间到处是尔虞我诈，恐怕太子将来难以处理皇家大事。"武帝没有答话。朝中许多大臣希望废太子，另立更聪慧的人。大臣卫瓘就曾当着武帝的面抚摸着皇帝宝座说："此座可惜！"意指司马衷不配继位。恨得贾充咬牙切齿，他对女儿说："卫瓘老奴，差点败坏了我家大事！"贾妃为了扭转朝臣对太子的看法，暗与武帝串通，首先对东宫的大小官员进行威吓。皇太子智商如何，东宫官属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有一天，武帝突然宴请东宫官属，当着他们的面写下较难决断的疑案，密封后送入宫内让太子作答。贾妃另外请人解答了该文案，让太子抄写一遍后，递出宫外。武帝拿着引经据典作了圆满答复的案卷，遍视在座群臣，那意思当然不言自明：你们看见了吧，太子很聪明，以后你们决不可在外说太子不聪明之类的闲话！整天和太子在一起的官员不在外传言太子愚昧，外朝其他官吏难得与太子接触，当然也不敢乱说有关太子的事了。

武帝还试图迫使主要大臣尊奉太子司马衷。有一次，他对侍臣和峤、荀顗、荀勖说："太子近来入朝，我看很有长进，你们几个人可以一起去看看，他现在可以初步处理一些政事了。"这三人奉旨去见太子，回来后，荀顗、荀勖迎合武帝的心意，盛称太子"明识弘雅"，确如武帝说的才干大有长进。但和峤不肯逢场作戏，他如实对武帝说："太子的能力依然如故。"使武帝大为扫兴，马上拂袖而去。尽管如此，和峤每当与武帝谈及国家大事，总是说嗣君的人选令人忧虑，而武帝每到此时总是不答话。后来，武帝干脆不再与和峤谈论将来的大事。这些事也为贾妃所知，贾妃由此而对和峤怀恨在心。

贾妃生性妒忌，心狠手辣。她极力阻止其他宫女接近太子，有个宫人怀了孕，贾妃竟用戟将腹中的孩子刺死。武帝得知此事，非常恼怒，曾打算将她废黜，经皇后杨芷及杨珧、荀勖等劝说后才息怒。太子衷在纳贾南风为妃之前，武帝曾让后宫才人谢玖到东宫“侍寝”，怀了孕。贾南风被纳为妃子，对谢氏非常妒忌。谢氏怕招来祸害，请求返回武帝的后宫，生下了愍怀太子司马遹。由于贾妃残忍刻毒，谢玖生子后一直没敢带儿子上东宫去，以致过了三四年，司马衷犹不知自己早有了一个儿子。

武帝皇后杨艳在商议太子的婚事时，曾力劝武帝选贾充女南风为太子妃。杨艳死后，堂妹杨芷继为皇后，在武帝欲废贾妃时，她考虑到太子是堂姐之子，太子妃如果被废，太子的地位也可能会受冲击。因此，她力劝武帝改变主意，说：“贾充是社稷功臣，贾妃作为她的亲女儿，应宽免她的过错。况且她年岁还小，不应与她计较太多。”然而杨氏对贾妃有恩，贾妃却不报之以德，反而猜疑杨芷，以为她在武帝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心里充满怨恨。

太熙元年（290），武帝病重，杨皇后及担任车骑将军的杨骏为了使杨家控制朝廷，大树亲戚党羽，让他们取代原来的许多公卿职位。武帝病情稍有好转，见朝中大官多换成了杨骏的党徒，非常恼火，他向中书省下了一道密令，让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佐朝政。杨骏不知诏令的内容，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剥夺，急忙向中书监华廙索要诏书，看后没有归还。不久武帝病情加重，杨后趁机让武帝同意以杨骏一人辅政。武帝已不能说话，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杨后便招来中书监华廙和中书令何劭，让他们写下武帝的“遗诏”：任命杨骏为太傅、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诏成，杨后当着华廙、何劭的面呈给武帝，武帝有气无力地看着，说不出话。两天后，武帝驾崩，由太子司马衷即位，朝政被杨骏专断。杨骏的外甥段广、张劭都成了皇帝的近

侍，中央禁军也掌握在杨骏的亲党手中。

随着司马衷称帝（即惠帝），贾南风也成了皇后。对于她所怨恨的人，只要时机成熟，她是要报复的。司马衷一即位，贾妃就鼓动他向和峤发问："你过去说我料理不了国家大事，现在情况怎样？"和峤非常畏惧，一个劲地赔罪，称："我过去说的话未起作用，这真是国家的福气。"和峤死于元康二年（292）。此前，贾后怨恨已久的杨氏家族及卫瓘等，均被贾后设谋杀害，和峤是否因担心杀身之祸忧惧而死，不得而知。

贾后杀杨骏，是在杨骏已完全控制了朝廷大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她权力欲极盛，又长于谋算，常想干预朝政，因受到杨骏的抑制而愤愤不平，加上原来就对杨皇后不满，由此产生了清除杨家势力的念头。宦官董猛在东宫多年，跟随贾后时间长，为贾后所信用，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一向为杨骏所轻视，对杨骏深恶痛绝。他们几人串通一气，密谋除掉杨家势力。贾后让李肇去许昌，鼓动汝南王司马亮起兵讨伐杨骏，司马亮胆怯，不敢答应。李肇又到荆州，与楚王司马玮联络，司马玮欣然同意。于是，司马玮请求入朝。杨骏知司马玮勇猛，怕他坐镇一方不好控制，也希望他入朝，以便约束，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永平元年（291）二月，司马玮入京。三月，贾后让惠帝下诏，诬称杨骏谋反，免去他原有的官职，发兵夜攻杨骏府第。为惠帝近侍的段广是杨骏的外甥，他极言杨骏不可能谋反，但受贾后等人鼓动的惠帝不听。

当时，由东安公司马繇率殿中宿卫兵四万人攻杨骏，楚王司马玮领兵驻守宫城的司马门。在相府中的杨骏听说发生兵变，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太傅主簿朱振建议："应尽快烧毁皇宫正南面的云龙门，以胁迫宫中交出作乱的首谋，并打开皇宫东面的万春门，调东宫及皇宫外的宿卫兵拥皇太子入皇宫，平息政变。否则大祸将难以避免。"杨骏在此危急关头却犹豫不决，不知如

何是好。他左右的群官见形势不妙，一哄而散，纷纷自寻逃路。尚书令武茂当时还坐在杨骏身边，正要离去的侍中傅祗回头对他喊道："皇帝下落不明，你还安安稳稳呆在这儿干啥？"于是，武茂借口去寻找皇帝，也匆匆忙忙离去。

杨骏的亲信左军将军刘豫带兵前来救护杨骏，他在相府门前碰见贾充的姨侄裴頠，便问："杨太傅在哪儿？"裴頠骗他说："我刚看见太傅乘车从西掖门往西出发了。"刘豫信以为真，不知该怎么办。裴頠趁机从皇帝那儿弄来了取代刘豫左军将军之职的任命书，领兵屯驻在皇城东面的万寿门，于是，隔绝了杨骏与军队的联系。

在皇宫中的皇太后杨芷见父亲杨骏即将陷于绝境，急忙将写有"救太傅者有赏"的布帛绑在箭上，射向城外，指望城外的营兵前来救援。但杨骏原来名声就不好，在他的势力正在被消灭的时候，谁会去救他呢！

没过多久，殿中宿卫兵就控制了杨骏的相府，他们到处纵火，并分一部分人爬上高墙楼阁，居高临下放箭，使杨骏手下的兵无法迎战。杨骏东躲西藏，最后在马厩中被乱兵杀死。

杨骏弟弟杨珧、杨济及党徒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等，都被收斩，株连三族。当时死了几千人，有的完全是被冤枉而死的，如东夷校尉文鸯，本不是杨骏的党徒，只因平日与东安公司马繇关系不好，竟也遭杀身夷三族之祸。

贾后操纵诛杀杨骏的政变之后，还特意命李肇等人将杨骏的所有私人信件付之一炬，以免武帝委任杨骏为顾命大臣的遗诏落人他人手中。接着，她开始同杨太后算帐，称杨太后参与了杨骏图危社稷的阴谋，并以"飞箭系书，要募将士"为其罪证，要求惠帝下诏对她和她母亲庞氏治罪。惠帝不愿这样做，他让群臣商议。中书监张华认为应该保留杨芷的武帝皇后称号，把她安排在离宫别馆中度过余生。而贾皇后鼓动一些朝臣坚持说：应该废太

后为庶人，幽禁在金墉城。经过争论，贾后操纵的一派占了上风。惠帝无可奈何，只好认可。而贾后并不就此罢休，她又让人上疏，称："杨骏谋乱被杀，他的家属都应收斩。杨骏妻庞氏之所以没被杀，是为了使杨太后得到慰藉。现在杨太后既被废为庶人，庞氏也应该接受死刑判决了！"惠帝主张留庞氏一条生路，让她与杨芷一起度日。贾后上下活动，让一些朝臣不断上疏，迫使惠帝接受其说。杨芷闻讯大惊，她剪发叩头，向贾后上表，自称小妾，请求贾后饶庞氏一死。贾后不予理睬。庞氏终于在杨芷的号哭声中被处死。随后，处在精神崩溃中的杨芷还未得到喘息机会，贾后又对她下毒手了。贾后令人强行带走了杨芷身边十几个侍女，禁止供给杨芷饮食，将她活活饿死。

杨氏集团被诛灭了，但贾后这时还不敢贸然执政。遂用威望较高的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共同辅政。司马亮与卫瓘知司马玮"不可大任"，建议让他与其他在京诸王皆返回各自的封国。司马玮对此大为不满。当年六月，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与卫瓘、司马亮不和，便通过李肇向贾后进谗言，谎称他俩将废黜皇帝，另立他人。贾后便鼓动惠帝下诏，让司马玮收斩这两个人。事后，贾后马上翻脸，诬称司马玮矫诏专杀二公，又将他收斩。从此，贾后夺得了朝廷实权。

贾后专权后，也大量培植自己的势力。贾后的堂兄贾模，从车骑司马升为散骑常侍，没过两天又迁为侍中；表舅郭彰，出任尚书、右卫将军；外甥贾谧，官至秘书监、侍中。贾谧与郭彰非常专横跋扈，时人称之为"贾郭"，宾客盈门，势力强盛。尤其贾谧，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皇帝的近侍黄门侍郎即曾被他囚禁。生活奢侈，衣食住行的豪奢程度足与皇帝相比。一批豪右贵戚竞相追随其后，与之结党。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牵秀、左思、刘琨等二十三个颇有名望的人都攀附他，成了他的座上宾，他们自称二十四友。贾模相对来说没有那

么专横，表面上还时常表现自己不屑于权势，但他的实际权力依然很大，凡与他有宿怨的人，多遭他的陷害，所以朝廷百官对他也很敬畏。

贾家亲戚权势煊赫，高居显位，但未必有治国之才。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开始物色有才干而不致于对贾家构成威胁的人来协助理政。裴頠博闻广识，思想敏锐，有“言谈之林薮”之誉，且是贾家的亲戚（贾充是他的姨父），被任命为尚书令。张华才能卓越，名望甚高，但出身庶族，不会有“逼上之嫌”，被委以中书监、侍中等要职。裴、张二人在朝廷屡经变乱之后出来主持朝政，深感责任重大，乃以拯治天下为己任，尽心辅政，加上贾模也是个工于心计、鉴识较深的人，他与裴、张二人一起同心匡扶朝廷，使天下趋于安宁，史称：数年之中，“虽当暗主（惠帝）虐后（贾后）之朝，而海内晏然”。

尽管国家安定了几年，但贾后弄权，也给朝廷带来了潜在的危机。贾后生有四女，无子。在中国封建社会，皇位继承是按父死子继的传统进行的，皇后无子，而别的妃嫔生了皇子，那么，继承皇位者往往是那妃嫔之子。贾皇后即面临这样一种局面：惠帝仅有谢玖所生一子司马遹，并且已立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太子。贾后对谢玖与太子非常忌恨，将他们分隔开来，久不得相见。太子对贾氏家族权势过盛也深感不平，怨恨之意形于言表。贾谧兼任常侍，在东宫给太子讲课，太子对他骄横专权颇为不满，而他也对太子毫无敬重之意。他曾与太子下棋，蛮横无礼，当时在座的成都王司马颖厉声喝道：“皇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你贾谧怎能如此藐视他！”贾谧随即向贾后告状，贾后便将成都王调离京城，派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去当平北将军。贾后知太子怨恨贾家，顾虑将来太子继承皇位于己不利，于是谋废太子。

贾后诈称自己怀孕了，不久，暗取妹妹的儿子韩慰祖入宫，

伪称是自己生的，想以他取代太子司马遹。左卫率刘卞深受太子信用，他见太子地位岌岌可危，暗向中书监张华建议："东宫有宿卫的精兵一万多人，只要你发一命令，我们就可以趁太子人朝处理政事时，轻而易举地废黜贾后。"可是张华没有同意。裴頠虽是贾后亲属，但对贾后乱政也深感忧虑，他向张华、贾模建议废黜贾后，立淑妃谢玖为皇后。张华对贾后专权也颇为不满，曾著《女史箴》加以讽谕，贾后不听。贾模也知贾后谋废太子会激起公愤，将给贾氏全家族带来危害，曾屡加劝谏，而贾后非但不听，反而指责他诋毁自己。尽管如此，张华、贾模不同意废立皇后，他们担心事发后各地藩王会趁机起兵前来争权，朝内不同派别也会纷争不已，国家将陷于混乱。他们还寄希望于劝谏贾后。

贾后执意要废太子。左卫率刘卞被她贬为雍州刺史，不久被逼自尽。屡加劝阻的贾模被她冷落，失去权势，忧愤而死。张华、裴頠等人的谏言也毫无作用。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诈称惠帝有病，召太子入中宫。太子进宫后，贾后没露面，派婢女把太子引入一个房里，端上酒，强迫他饮。太子向来不会饮酒，不肯饮，婢女便传话说："这是皇帝赐给你的酒，你不肯饮，是怀疑酒中有毒吗?"太子不得已，饮酒三升。喝完大醉，神智不清。贾后早已让文人潘岳写了一份草书文稿，文字大意是：陛下和皇后应尽快自尽，如不自尽，我将动手除掉你们。我与谢妃已定好了日期，到时将同时下手。这篇文稿被一个婢女送来，要太子尽快抄录一遍，说陛下等着要。太子已醉得头晕目眩，分辨不清文中内容，糊里糊涂地抄了一遍，从而入了贾后加罪于他的圈套。

贾后将太子抄录的字幅呈给惠帝，惠帝于是召集百官，拿字幅给大家看，说："太子写下这样的话，应赐死。"群臣心里明白这是冤案，但不敢表态，惟张华、裴頠指出其中有诈，坚持为太子辩护。贾后见此情形，便向惠帝建议免太子一死，但必须废

他为庶人。于是，司马遹被废黜，幽禁在金墉城。其母谢氏也遭到严刑拷问，并被杀害。西戎校尉司马阎缵为司马遹的遭遇打抱不平，带着给自己预备的棺材进京上疏，认为太子不应落到这种地步，宜重选师傅，对他加以挽救。贾后与惠帝不予理睬。永康元年（300）正月，司马遹又被押送到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囚禁。

太子被废，群情激愤。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曾在东宫任职，深受太子恩惠。此时他们与殿中郎士猗密谋废黜贾后，迎司马遹复位。考虑到张华、裴頠一心只求稳定，难以结盟发动政变，而任右军将军的赵王司马伦握有兵权，且觊觎朝权，司马雅等人便与司马伦的嬖人孙秀联络。司马伦原来为了晋升高官，曾极力向贾后谄媚，为贾后所信任。此时司马雅等人向孙秀指出："贾后诬陷皇太子，激起众怒。许多大臣将发动政变。赵王向来与贾氏集团关系密切，一旦事起，赵王也不能免祸了。不如先动手剪除贾氏势力。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个为国除害的好名声。"孙秀将此事转达司马伦，为其所接受。司马伦联络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等，让他们在宫中为内应。

司马伦即将举兵，孙秀又进言：太子聪明刚猛，复位后必不会受制于人，何况赵王曾追随贾后，即使为太子复出立下功勋，仍难免杀身之祸。不如延期举事，等贾后杀太子后再兴兵。司马伦采纳其计。孙秀于是放出风声，扬言殿中有人欲废皇后，立太子。贾后当时派出许多亲信耳目，到民间打探人们在太子被废后的动静。当她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司马伦与孙秀又行反间计，劝贾谧等人早除太子以绝众望。这年三月，贾后便矫诏派黄门孙虑携带毒药前往许昌，要毒死太子。太子不肯服药，孙虑便用药杵击打太子，太子大声呼救，声闻于外，但没人能救他。惨死时，他年仅 23 岁。太子死了，贾后又露出一副猫哭老鼠的假慈悲相，装模作样地称："司马遹不幸死亡，我为他的夭

折而悲伤，也为他因思想迷乱，误入歧途而被废为庶人感到痛心。他虽然死了，但毕竟是王者子孙，如果不用藩王的礼仪来埋葬他，我会更悲痛的。”贾后如此表白，无非是想让人知道她对太子并无恶意，太子之死也与她无关。然而，当时洛阳城里盛传这样的童谣：“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前至三月灭汝家。”南风即贾后，黄沙指太子，鲁国是贾谧的封国，这首童谣指的是贾后、贾谧等为乱，残害太子司马遹。这说明当时朝野人人皆知害死太子的幕后策划人是谁，贾后的表演是掩盖不了事实的。

太子死后，赵王伦即以除天下大害、为太子报仇为借口，串通梁王肜、齐王冏及右卫佽飞督闾和等，约定永康元年四月初三日夜里举兵。到了那一天，司马伦以皇帝的口吻向统领宫殿宿卫兵的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发布命令：“贾皇后与贾谧等人杀了我的太子，现在我命令你们带兵进宫，废黜皇后。服从命令的人事毕赐爵关中侯，不服从命令者株连三族。”一时禁卫兵皆应声听命。司马伦又矫诏打开了皇宫门，陈兵宫城内，并令齐王带三部司马一百余人，撞开贾后所在的宫殿门，杀贾谧等。众兵将来到贾后面前，贾后惊问齐王：“你来干什么？”齐王答道：“我奉诏令前来收捕皇后。”贾后说：“诏书应当由我这发出，你从哪儿得到诏令！”她见形势不妙，遥向惠帝呼救，而惠帝已受制于人，根本救不了她。贾后无可奈何，便问谁是这次政变的主谋，齐王答道：“赵王伦和梁王肜。”其实，赵王、梁王、齐王在贾后专权期间，百般谄媚逢迎贾家亲党，如同贾氏走狗，而现在，他们反而将贾后变为阶下囚。贾后后悔不迭，叹息说：“系狗的绳子应系在狗脖子上，而我却系在了狗尾巴上，今天落到这步田地，岂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她被废为庶人，幽闭于金墉城。贾氏家族及其党羽皆被诛杀，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等名臣也遇害。不久，赵王伦矫诏命尚书刘弘带上泡有金粉的酒赐贾后

死。贾后干预朝政整整九年，至此身亡。

（陈益民）

参考资料：

《晋书》：《贾皇后传》、《贾充传》、《杨骏传》、《愍怀太子传》、《张华传》、《荀勖传》

《通鉴纪事本末·西晋之乱》

八王之乱

公元291年至306年，爆发了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打破了自三国鼎立结束后的短暂平静局面。晋朝宗室诸王相继拥兵自重，争夺朝权，使中央集权徒具虚名，西晋的统一开始走向分裂。这称兵作乱的八王是：汝南王亮（司马懿第四子、武帝叔父）、楚王玮（武帝第五子）、赵王伦（司马懿第九子、武帝叔父）、齐王冏（武帝侄子）、长沙王乂（武帝第六子）、成都王颖（武帝第十六子）、河间王颙（惠帝从叔）、东海王越（惠帝从叔祖）。其实，这只是“八王之乱”中的主要角色，真正卷入这场大乱的宗室诸王远不止这几个人，像东安王繇、梁王肜、淮南王允、吴王晏、淮陵元王漼、新野王歆、东平王楙、东莱王蕤、范阳王虓、南阳王模、东瀛公腾等，都在这场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争斗中亮相并对时局变化起过程度不同的作用。导致西晋灭亡有诸多因素，而“八王之乱”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是西晋王朝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中的标志。

“八王之乱”是从贾后与外戚争权开始的。晋武帝死后，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因他呆傻，朝政完全决断于太后杨芷及太傅、大都督杨骏（杨芷之父）。惠帝的皇后贾氏是个权力欲极强而又处事果断的人。杨骏深知一旦让她得势，自己就难以专权了。因此，他派自己的外甥段广、张劭担任惠帝的近侍，天天陪伴惠帝，防止贾后及他人在惠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要向全国发布的诏令，在惠帝过目后，须呈送杨太后及杨骏，经他们认可

了才能发布。掌握中央禁军的军官，也基本上是杨骏的党羽。因此，贾后虽欲干预朝政，却受到杨骏的抑制而不能得逞。

永平元年（291）初，贾后与黄门董猛、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等密谋，召受杨骏排斥而出镇许昌的汝南王司马亮入京剪除杨家势力，然而，司马亮怕势单力薄，斗不过杨骏，未敢应允。镇守荆州的楚王司马玮也得到贾后派李肇送来的密报，司马玮才21岁，年轻气盛，又想入朝弄权，便欣然同意参与贾后的密谋。当年二月，司马玮联络担任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淮南王司马允一起进京。

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三月八日夜，贾后等人鼓动惠帝下诏罢黜杨骏，并命楚王司马玮及东安公司马繇等领兵攻打杨骏的府第，将他杀死。尔后，在司马繇主持下，大杀杨氏党羽，死者数千人。左仆射荀恺与太子少师下邳王司马晃也迎合贾后旨意，力主废黜杨太后，贬为庶人，幽禁在金墉城。不久，又在贾后授意下，其党徒将杨太后害死。

汝南王司马亮是武帝的叔父，武帝死前就已委他以重任，让他与杨骏共辅朝政。杨骏擅权时，他避处许昌，至杨骏被诛后，才复入朝出任太宰，与太保卫瓘共辅朝政。司马亮本是无能之辈，早年征讨诸葛诞叛乱，兵败被免官；后在平定关中氐羌人反叛时，又因畏惧不进、坐失战机而罢职。自从入朝辅政后，他怕人心不服，自己威望太低，便大搞封赏，以换取人们的支持。一时获侯爵的督将多达一千零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劝谏道："变乱之后，无功的人也能获得奖赏，这样下去，人人都会希望发生变乱，则国家永无安宁之日了。"司马亮不听。得赏者中不少是他的亲戚朋党，如无功而忽升为少府长官的夏侯长容，就是他的姻亲，时人对此颇多非议。

杨骏被诛后，楚王玮担任了卫将军、北军中侯，下邳王晃任尚书令，秦王柬任大将军，东安公繇为尚书右仆射、右卫将军，

进爵为王，东平王楙原与杨骏往来密切，本应治罪，因他与司马繇交往情笃而免罪，此时被任作抚军大将军。这些藩王在朝中的势力的膨胀，引起了司马亮的不安。这位大权在握的太宰于是借口司马楙曾追随杨骏、司马繇则在征讨骏时畏畏缩缩，罢免了他们两人的官，遣司马楙回封国，司马繇因为对此发牢骚而被贬谪到了带方（今朝鲜凤山一带）。

排斥司马楙和司马繇，只是司马亮抑制诸王势力发展的开始。楚王玮生性刚愎，又自恃功高，握有兵权，非常横行霸道。司马亮便与卫瓘商量，欲夺其兵权，让临海侯裴楷接替他的北军中侯之职，楚王对此大为不满。司马亮与卫瓘随后又决定让包括楚王在内的在京诸藩王返回各自的封国去，以避免他们干预朝政，这更使楚王等人怨愤。楚王的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劝楚王交结贾后以对付司马亮和卫瓘。当时，贾后正为这二人妨碍自己干政而怀恨在心，公孙宏、岐盛通过贾后的亲信积弩将军李肇，向贾后矫称司马亮等有废立皇帝之心，贾后遂决定利用楚王的力量发动政变。永平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下了一道给楚王的密诏，内称："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瓘图谋废立皇帝，楚王速去传令淮南王允、长沙王乂、成都王颖领兵把守皇宫各门，防止变乱，同时免去司马亮、卫瓘的官职。"楚王遂连夜部署了自己所掌握的军人，并矫诏动员京城内外的禁军"助顺讨逆"。他派公孙宏、李肇带兵围攻司马亮的府第，清河王司马遐带兵去收捕卫瓘。司马亮的帐下督李龙建议发兵抵御，司马亮不同意。过了一会儿，相府的围墙上便出现了不少前来攻打的士兵。司马亮非常惊讶，说："我没有谋反之心，怎会发生这样的事！"长史刘準认为这必定是个阴谋，府中人才济济，仍可与他们对抗，但司马亮还是犹犹豫豫，未同意起兵，结果被李肇等逮捕，遇害。司马遐带兵攻卫瓘时，卫瓘手下的人也主张以兵相抗，卫瓘认为自己无罪，不同意拒捕，竟与司马亮结局相同，遭杀身之祸，子孙

九人也同时被杀。

楚王得势，岐盛劝他乘机诛灭贾后的势力，自己独掌朝政。楚王犹豫不决。贾后知楚王权势已盛，自己将很难控制他，在与太子少傅张华密谋后，决定以专杀大臣的罪名除掉他。天亮后，他们就让惠帝派殿中将军王宫向众将士宣布："楚王矫诏，擅杀大臣。"已受楚王节度的诸军将士听到这一消息，纷纷离去，楚王孤立无援，被惠帝派来的人逮捕，处以死刑。楚王死前连呼冤枉，但没人救得了他。他的亲信公孙宏、岐盛也被诛连三族。

司马亮、卫瓘、司马玮等死后，朝廷大权便落人了贾皇后手中。贾后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出任要职，同时起用名士张华与裴頠、裴楷、王戎等并掌机要。由于诸人尚能同心辅政，七八年间，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尤其是中书监张华和尚书令裴頠，二人才干出众，处事公道，努力整顿朝纲，对朝野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如赵王司马伦在关中任都督时，与亲信孙秀扰乱社会秩序，激起民变，被征还朝。孙秀劝赵王卑躬屈膝巴结贾后，博得贾后信任。赵王趁机先后要求担任录尚书事、尚书令，均被张华、裴頠阻止，不能参预朝廷机密。

但安宁局面未能一直保持下去。由于贾后处心积虑陷害太子司马遹，导致了朝中又一次大乱。贾后自己无子，太子司马遹是妃子谢氏所生。因太子不满贾后家族的人专权，贾后恐日后受制于他，遂设圈套废黜了太子。此事激起了禁军的不满。右卫督司马雅暗与右军将军司马伦联络，让他发兵除掉贾家势力，恢复太子名号。司马伦满口答应，内心却另有打算。他想借此机会揽权，至于太子，他不但不想救助，而且还欲置之于死地。他故意向外泄露一些军人想救太子的密谋，使贾后坐卧不安，以借贾后之手杀太子。贾后为了断绝人们对太子所抱有的希望，果然匆匆派人杀死了太子。

司马伦见夺取朝中大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即邀梁王肜、齐王

冏共同起事，于永康元年（300）四月初三夜里矫诏大杀贾氏党羽，几天以后又杀了贾后。为报宿怨，司马伦还处死了名臣张华和裴頠，时人深为之惋惜。

司马伦掌握了朝廷大权，自封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当年曹丕代汉称帝、司马炎代魏称帝时，都是先兼任朝廷的军政要职，完全把持朝政，然后逼皇帝禅位，自己取而代之。曹操、曹丕曾任汉献帝的相国，司马昭、司马炎在魏末也曾任此职。西晋建立后，“相国”的正式官衔没有设立。而司马伦再度自命为相国，其觊觎皇位的野心是显而易见的。

司马伦开始为自己继位登基做准备。他强行应召海内知名人士人朝做官，任命前平阳太守李重、荥阳太守荀组为左、右长史，东平人王堪、沛国人刘谟为左、右司马，尚书郎束皙为记室，淮南王的幕僚荀崧、殿中郎陆机为参军。这些人均是有才华、有名望的人，司马伦试图通过拜他们为相国僚属，显示自己深得人心，因为有这么多名流拥戴他。然而，这些名人并非个个都愿同流合污，如李重，尽管司马伦一再强迫他接受任命，但他称病不出。当司马伦派人强拉硬拽让他受命时，他竟为此忧愤成疾，没几天就死掉了。束皙也是不愿应召，称病回归故乡讲学去了。

司马伦又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封为王侯，担任朝廷要职。亲信孙秀也被任命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总揽内外大权。其他追随司马伦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赏。司马伦还将相府的兵卒从一万增至二万，加上另外隐匿未公布的兵卒人数，他的私人卫兵多达三万余人，这在当时，没有哪个藩王可比。

司马伦一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对那些异己力量严加防范。淮南王司马允（武帝之子）当时任骠骑将军、侍中，都督扬州江州诸军事，领中护军，他对司马伦僭越等级的行为非常不满，遂称病在家，暗中积蓄力量，图谋除之。司马伦对他很不

放心，欲夺其兵权，便让他“升迁”太尉，此职表面上很受尊崇，实际上无实权。司马允对这一任命不予理会，司马伦便借口他违命，斥他为大逆不道，并逮捕了他属下的官员。司马允大怒，率自己麾下七百余兵卒前去攻打相府，沿途还有不少人加入了这一行列。司马允手下的人全是从淮南精选出来的剑客，个个武艺高强，司马伦手下的人虽多，却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就被杀死了一千多人。淮南王指挥士众围困相府，射向府内的箭密集如雨，几乎使司马伦丧生。司马伦之子司马虔当时任侍中，正在皇宫内的门下省，他得知相府情况紧急后，赶紧派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兵四百出宫，诈称皇帝下诏表示支持司马允，要司马允受诏。司马允不知有诈，没作防备，在接受这一假诏命时，被伏胤刺死。随他攻打相府的人其后也多遇害，死了数千人。

此后，在京诸王均受到司马伦猜疑，被先后调离京城。元王司马植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接替淮南王，出镇寿春（今安徽寿县），还未出发，又被扣留，因为有人告发他参与了淮南王发动的兵变。没过多少天，司马植就死了，史称是“忧惧而终”，其实很可能是被司马伦杀死的。吴王司马晏也因参与了淮南王进攻司马伦的行动，被收捕，靠朝中许多大臣救护才免于一死，但被贬为宾徒县王。对司马伦专权颇为不满的齐王司马冏，被加以平东将军的官衔，调往许昌镇守。

永康二年（301）正月，司马伦认为称帝时机已成熟，便通过孙秀布置心腹控制诸军，让义阳王司马威伪造禅让诏书，并逼取了惠帝的皇帝印玺。遂举行登基大典，改元建始。被冠以“太上皇”之名的惠帝则被幽禁在金墉城，完全失去了自由。原皇太孙司马臧被废为濮阳王，不久被杀。

为了争取支持，司马伦开始滥行封赏。这一年，各地举荐的贤良、秀才和孝廉，不用考试即可拜官；各地来京汇报工作的吏员，及国子监 16 岁以上的太学生，都被任命了官职。各地在职

的郡守和县令皆封侯，郡县的僚属也都晋升进级。司马伦的亲戚党羽更是任高官、受大封，长子荂被立为皇太子，其余三子分别封为京兆王、广平王、霸城王，都担任侍中，握兵权。亲信孙秀官至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义阳王威升任中书令，张林为卫将军，其余党羽皆为卿将，超越等级升官的人不计其数，以致司马伦原来的随从奴仆也有了爵位。魏晋时期，皇帝左右的侍中、散骑常侍一类官员，帽上都插有貂尾蝉饰，因而貂蝉成为了权势地位的象征，任此职务的人必须拥有。可是，由于司马伦任命的侍从官太多太滥，国库中储备的貂尾不够用，以致于用狗尾代替貂尾，于是，“貂不足，狗尾续”成了当时人的笑料，狗尾续貂的成语也由此而生。不仅帽上装饰如此不规范，当时的官印也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在一般情况下，朝廷各级官员都有标志自己权力大小的印章，这类印章按其官职大小而有质地的不同(分金、银、铜三种质地)。而司马伦任命的官员突然增加那样多，朝廷原来铸造的官印远远不够用，以致出现了一些“白版之侯”，即那些只颁给了书有官名的木板而没有正式金属官印的官员。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那些在司马伦幕下任职的官吏深为鄙夷，并普遍认为司马伦当权的日子长不了。

事实果然如此。在许昌的齐王早对司马伦不满，他暗与王盛、王处穆二人密谋诛之。当时司马伦对齐王很不放心，特意派心腹张乌到许昌探察齐王动静。齐王恐密谋泄露，赶紧派军司管袭杀了王处穆，其后又收斩了管袭。张乌在许昌未发现什么异情，即返回洛阳汇报说，不必提防齐王，他没有异心。

永康二年三月，齐王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了，他们传檄各地，号召共伐司马伦。一时成都王颖、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及冀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等都起兵响应。唯独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见到齐王派来的使者后，不仅不响应，还将其拘捕，送交司马伦。随后，又应司马伦之召，派大将张方

率关右精兵赴援京师。张方的队伍才到华阴，司马颙听说以齐王冏和成都王颖为首讨伐司马伦的军队兵势强盛，估计司马伦难以与之抗衡，又急忙遣部将李含、席薳追赶张方，传令举兵响应司马冏。

这样，以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三王为主的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京师大震。司马伦急忙调兵遣将，分兵数路前去抵御。上军将军孙辅、折冲将军李严领兵七千出延寿关，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统兵九千出堮阪关，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率师八千出成皋关，共同迎击以齐王为首的南面来的军队。由孙秀之子孙会督统的士猗、许超，率宿卫兵三万迎击以成都王为首的北面来的军队。另有司马伦之子司马馥、司马虔率兵八千，作为各路兵马的后援。

张泓等人率军在阳翟（今河南禹县）与齐王统领的军队接战数次，屡屡获胜，杀数千人。又乘胜进逼颍阴（今河南许昌），临颍水列阵，齐王纵兵猛攻，但无功而返。只是由于孙辅等人所带领的军队在夜里无故自相惊扰，擅自逃回洛阳，使张泓陷于势单力薄的境地，加之他的副将孙髦、司马谭等继而被齐王打败，张泓才不得不退兵了。

成都王率领的军队人数多达二十万。其前锋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刚到黄桥（今河南淇县西），即被孙会、士猗、许超等打败，损失八千余人。成都王欲退保朝歌（今河南淇县），部下卢志、王彦劝道："我军失利后，如果退缩，必然导致军心涣散。应趁敌军获胜轻敌之际，遣精兵出其不意，长驱直入，必获全胜。"成都王接受了这一建议。此时，刚打胜仗的士猗、许超与孙会一起被司马伦授以持节称号。由于他们三人彼此轻视，不相统摄，使军中出现号令不一的状况。成都王派赵骧与王彦率军八万迅速推进，司马伦也调遣孙会、刘琨领兵三万，与许超、士猗合兵抵御。士猗等人骄傲轻敌，在溴水被对方打得大败，军

士四散而逃。于是，成都王渡过黄河，直逼洛阳。并派赵骧、石超等去阳翟协助齐王攻张泓，张泓兵败投降。

孙会、许超、士猗逃回洛阳后，与孙秀密谋下一步对策。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司马漼趁其不备，发动兵变，在三部司马的接应下，带七百余人攻入皇宫，杀孙秀、许超、士猗等人，幽禁司马伦，迎惠帝复位，改元永宁。原追随司马伦的文武官员皆四散奔走，没人敢留在官署中，为司马伦出战的将士也纷纷放下了武器。

河间王司马颙没赶上与司马伦的军队直接对阵，但他公开宣布了站在齐王、成都王一边，壮大了反司马伦的阵营的声势，因而与齐王、成都王一起受到惠帝嘉奖。

惠帝下诏处死司马伦父子及其党羽，百官中凡为司马伦任用的人皆被免职。成都王、河间王、齐王率领各自的军队先后人京，史书上所谓“三王起兵”，持续了六十余日，至此告终。前后仅战死的人就达十万之众。

齐王以“首倡义举”之功，被封为大司马，辅政，各种仪典仿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辅佐曹魏时的规格等级，凌驾于皇帝之上。成都王担任了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河间王被任命为侍中、太尉。其他参与起兵的王公皆晋级加封。

齐王自恃功高，独揽朝廷大权。成都王知其兵多势盛，一时不敢与之争权，但又不愿屈居其下，遂请求归藩，回封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新野郡王司马歆向齐王进言：“成都王与你同建功勋，你要么让他留在都城辅政，将他控制起来，要么就夺掉他的兵权，使他对你构不成任何威胁。”齐王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东莱王司马蕤是齐王之兄，他在齐王辅政后，请求开府，即成立自己的将军府署，齐王不同意。东莱王很恼火，便在永宁元年（301）六月，与左卫将军王舆一起密谋废黜齐王。不料密谋

泄露，王舆被处斩，株连三族；东莱王被废为庶人，不久也被杀死。

惠帝仅有的一子司马遹已被贾后害死，武帝之子二十六人，也多已死亡。成都王为武帝第十六子，按继位次序，他有可能继惠帝之后登基。但齐王试图使自己专权的状况永远持续下去，他不希望看到成都王成为皇位继承人。太安元年（302）五月，在他操纵下，立已故清河王司马遐（武帝之子）的长子、时年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己则担任太子太师，以便长久地控制朝政。

齐王居相位后，颇为骄奢。许多有识之士劝他居安思危，甚至建议他激流勇退，在功成名就之际“长揖归藩”，回自已封国安居，委朝权于他人，但齐王不听，仍我行我素。一些人知道长此下去必然引发新的动乱，于是纷纷隐退。孙惠在进言后辞疾而去，吴人张翰借口思念故乡的菰菜、鲈鱼鲙，亦离朝返归故里。吴人顾荣任大司马主簿，欲辞职不干，又怕齐王问罪，便终日饮酒，有意不料理大司马府的公务。他还请友人冯熊委婉地向齐王的长史葛旟提议说：“主簿总管府中各种杂事，非酒鬼所能胜任，应该让顾荣转任闲职中书侍郎。”葛旟征求齐王的意见后表示同意。顾荣上任新职后，不再像以前那样狂斟滥饮、昏醉不醒了。但有人提醒他：“你原来整天醉醺醺的，现在怎么清醒了呢？”顾荣怕被齐王识破自己借酒避祸的本意，不得不重新纵酒了。他曾给故乡友人写信说：“我在齐王府中任职，总是担心灾祸的降临。每当看见绳索和刀剑，我就有自杀的念头，试图摆脱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有谁能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呢！”

尽管齐王一意孤行，但还是不断有冒死进谏的人。主簿王豹致信齐王，指出：“自惠帝继位以来，曾担任宰相的人不少，但无一人能有善终。你处在这一位置，也将难保长久安宁的。现在，河间王盘踞关中，成都王据有魏国故地（今河北中部、南

部），新野王横跨长江、汉水间，这三王各拥强兵，占有要害之地；你独据京师，挟震主之威，也时时伴随着危机。应该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的王侯归成都王管治，黄河以南各王侯则归你统摄，你们二人共同辅佐朝廷。这样，你就可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了。”长沙王司马乂也见到了此信，他对齐王说：“王豹小子在我们司马氏骨肉兄弟间挑拨离间，你何不在宫门外打死他呢！”齐王便以播弄是非、不忠不义之罪用鞭子将王豹打死，王豹死前愤怒地说：“我死后，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门上，我将会看见人们前来攻打齐王的。”

翊军校尉李含与齐王府中的参军皇甫商、右司马赵骧等人有宿怨，深恐他们会仗势谋害自己，便单骑出奔河间王。到达关中后，他矫称带有皇帝密诏，促使河间王连夜召见自己。他向河间王建议：“你应该下檄书给在京城的长沙王，让他讨伐齐王，同时又让齐王预先知道此事，促使他先下手杀长沙王。长沙王死了，你就可以齐王滥杀骨肉同胞为借口，号召四方共同起兵讨伐他。他被除掉后，你让成都王辅政，自己也可以掌握朝中的大权。”河间王曾依附司马伦，为此而受到齐王的怨恨。因此，他接受了李含的建议。

永宁二年十二月（303），河间王发布檄书，罗列齐王的种种罪状，声称已勒兵十万，将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等共会洛阳，并让长沙王解除齐王的所有官职，迎成都王代替齐王辅政。齐王得到檄书后大惊，急忙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司徒王戎、司空东海王越建议他让权隐退，而从事中郎葛旟怒斥道：“自汉魏以来，没有一个掌朝廷大权的王侯在卸职后能保住身家性命，再有谁敢提这种建议就斩首！”于是，齐王决定发兵迎战。

此时，被河间王任命为都督的李含统领张方等诸路人马正向洛阳进逼。李含率大军屯驻在阴盘（今陕西临潼北），张方带领二万人马为先头部队，进至新安（今河南渑池东），离洛阳仅一

百余里。他们传檄书给长沙王，让他讨伐齐王。当时，齐王正遣董艾袭击长沙王，长沙王急率左右一百余人驱车入皇宫，关闭诸宫门，奉天子以攻大司马府。齐王派人持驺虞幡（皇帝的使者所持有的专门旗帜）到各处宣扬长沙王矫诏作乱，号召人们共同起来除掉他。长沙王也针锋相对，他派人高呼："大司马谋反，继续追随他的人将被株连五族!"双方在城内展开了一场大战，飞矢如雨，火光冲天。连战三日，齐王的部众失败。大司马长史赵渊见局势不妙，便囚禁了齐王，向长沙王投降。

齐王被押至宫殿前，惠帝念及他迎自己复位之功，想赦免他。而长沙王不理会，叱令左右将齐王推出阊阖门斩首。接着，清除齐王同党，皆夷三族，又死了二千余人。朝廷大权自此落入了长沙王之手。

河间王原以为齐王强，长沙王弱，长沙王必死于齐王之手，然后他可以借口齐王滥杀无辜，号召四方举兵进京，铲除齐王，并趁势废黜惠帝，另立成都王，他自己则出任宰相。没想到长沙王竟然战胜了齐王，独掌了朝政，自己在这次战乱后未捞到什么好处。因此，他又开始酝酿除掉长沙王的密谋。他暗使担任了河南尹的李含与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一起去刺杀长沙王，由于密谋被泄露，长沙王收斩了李含、冯荪、卞粹三人。

在河间王号召讨伐齐王时，成都王也派出了军队。长沙王之所以敢在京城与齐王相抗、并最终取得胜利，与河间王、成都王等几路大军兵临城下、迫使齐王分兵迎敌的功劳是分不开的。齐王死后，长沙王独擅朝政，成都王当然也像河间王一样，大为不满。他也曾派刺客前去刺杀长沙王，因被长沙王的左常侍王矩识破而未果。于是，他再次与河间王合作，同时举兵向洛阳，决心以武力剪除长沙王势力。

太安二年（303）八月，河间王任张方为都督，领精兵七万，自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向东推进，成都王派陆机、石超等督

兵二十万，自鄴城向南攻洛阳。

长沙王遣皇甫商率一万余人驻守宜阳，抵御张方，被张方击败。九月，张方攻入京城，焚毁清明、开阳二门，杀死杀伤对方一万余人。双方在京城内外争战激烈，相持不下。

陆机是江东华亭（今上海松江西）人，他被成都王任命为前锋都督，受他节制的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并不服气，因而陆机很难指挥自如。十月，牵秀败于都城东阳门外，随后陆机又败于建春门外，损失了大将贾崇等十六人。宦官孟玖深受成都王宠信，他与陆机有旧怨，因而在陆机兵败后进谗言，说陆机暗与长沙王勾结，怀有二心，而牵秀等将领也作伪证，谎称实有其事。成都王大怒，下令收斩陆机。陆机任朝官九年，在司马家族自相残杀中几经磨难，曾差点儿丧命。有人早就劝他回故乡华亭去避祸，他不肯，还想在朝廷的大乱局而中干出一番事业。可到头来竟背上了一个叛逆的罪名，他感到莫大的悲哀，临刑前，仰天长叹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这年八月至十月，河间、成都二王的军队与长沙王部众在洛阳附近连战三个月，彼此损失惨重。长沙王想早日停战，便派王衍等名臣前去劝说成都王念及兄弟手足之情（长沙王与成都王均是武帝之子），停止军事行动，并以双方共同辅佐朝政作为罢兵条件，而成都王不答应。他复信说："尽管陆机督统的军队被你长沙王打败，但我派出的石超在温县（今河南温县西）的南而又打了胜仗。在战场上你并未占上风。"他声称自己"武士百万，良将锐猛"，对方若不"投戈退让"，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张方也继续攻战。长沙王情急之下，挟持惠帝出战，张方部下见到皇帝在阵中，未敢进击，结果被长沙王打败，死五千余人。张方退至十三里桥。他部下建议连夜逃走，张方却认为用兵贵在出其不意。他趁夜色漆黑重新逼近洛阳，在离城七里的地方筑起营垒。长沙王见状，率军前去攻打，失败而还。张方又把洛

阳城东的千金堨（水堰）中的水全放跑了，使洛阳缺水，连舂米的水碓也无法利用。长沙王急忙下令扩大服兵役和劳役的人员的范围，王公贵族家的奴仆及原来一品官以下不用服役的、家里有 13 岁以上男子的，都必须服劳役或兵役，这样，通过别的途径，缓解了城内缺水、缺粮及兵员不足等紧迫问题。由于长沙王奉天子发号施令，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仍对守城诸军有较强的控制力。

成都王在几个月的攻战中，损失六七万人，却未取得胜利，不免有些焦躁不安了。张方也见洛阳久攻不下，以为一时难以大获全胜，便准备撤军回长安。然而就在此时，洛阳城内发生兵变，使时局发展出现了转机。永安元年（304）正月，东海王越见战斗持续时间如此之久，洛阳早已成了孤城，恐难于坚守，遂与殿中将领拘捕了长沙王，将他幽禁在金墉城，并开城求和。城内宿卫兵见城外军队兵势不盛，不愿讲和，密谋救出长沙王，重与成都王开战。东海王怕长沙王复出于己不利，想杀了他。黄门郎潘滔劝他不要自己动手，以免激起公愤，可以借张方之手杀之。于是东海王密招张方押走长沙王，将其处死。群龙无首，长沙王的军队由此而纷纷缴械投降，成都王遂入城控制了朝廷。惠帝不得已，拜他为丞相，由他掌握朝中大权。殿中宿卫兵均换成了成都王的人。随后，成都王留石超镇守洛阳，自己回老巢邺城去了。

二月，成都王废齐王拥立的皇太子司马覃为清河王，自立为皇太弟，成为“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还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河间王也担任了太宰、大都督等要职。

成都王司马颖掌权后非常专横，用人也不当，以致大失人心。这年七月，东海王越与右卫将军陈眕、长沙王故将上官已等谋议伐颖，由东海王出任大都督，率高密王略、平昌公模、吴王晏、豫章王炽、襄阳王范及司徒王戎、右仆射荀藩等，共同奉惠

帝北征邺城。东海王传檄四方，前来响应的军队络绎不断。当他们进至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时，已有十万之众。先期从洛阳逃回邺城的石超，此时受司马颖之命，率军五万前去迎战。他行军迅速，在汤阴（今河南汤阴）对“王师”突然袭击，大获全胜，惠帝受伤被俘，随征的百官侍御四散而逃，东海王也逃回了自己的封国。司马颖为自己的胜利而得意，特意改元建武。

早在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三王讨伐司马伦时，安北将军王浚就按兵不参与他们的行动，司马颖怨之。司马颖专擅朝政后，任命和演为幽州刺史，让他找机会刺杀王浚，未成功，和演被杀。司马颖遂矫诏征召王浚入邺，王浚知其心怀叵测，拒绝听命，并在东海王奉帝讨颖失败后，兴兵伐邺城。他联合鲜卑人段务勿尘、乌桓人羯朱及东嬴公腾（司马越之弟），先后击败颖将王斌、石超，乘胜攻人邺城，司马颖仓皇带帐下十余骑，挟皇帝南奔洛阳。王浚等人攻人邺城后，大肆劫掠，尤其是鲜卑兵，带走的不仅有大量财宝，还有大批妇女。后因军中禁止携带妇女，他们又将这些女人全部处死，当时被淹死在易水中的人数就达八千余。

当东海王奉帝北征时，河间王即派张方领兵二万赴援司马颖，后得知司马颖获胜，河间王就命张方镇守洛阳。司马颖被王浚等击败后，挟惠帝逃至洛阳。因张方手握强兵，专制朝政，司马颖原有的权势完全被他剥夺。建武元年（304）十一月，张方挟惠帝、司马颖及豫章王司马炽等西迁长安。到长安后，司马颖被贬黜归第，由豫章王当皇太弟。河间王则以太宰之职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朝权，张方也升任中领军、录尚书事。

对于张方挟帝西迁、河间王独掌朝政的状况，关东各王侯十分不满，范阳王虓与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等人共推东海王越为盟主，以迎帝东还为借口，起兵西进。永兴二年（305）八月，东海王率步骑三万从徐州进至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范阳王

虓率军自许昌进驻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当时，许多藩王既都督一方诸军事，又兼领该地区的行政长官（刺史）之职。范阳王官居都督豫州诸军事，他也想兼领该州刺史。东海王自以为是盟主，便下令调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以使范阳王兼任豫州刺史。而刘乔予以拒绝，认为这不是天子之命，还发兵攻许昌，并遣长子刘祐在萧县的灵壁抵御东海王军，使之无法西进。

以东海王为盟主、关东诸王公为核心的联军所遇到的麻烦还不止于此。成都王西迁长安后，其原来以邺城为中心的地盘被东海王之弟平昌公司马模占据，成都王原来的部将公师藩也想拥有这一地区，便以拥护并声援成都王为号召，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先后攻杀了晋朝阳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张延、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冯熊等。经广平太守丁绍及范阳王派去的苟晞并力救援，将公师藩赶走，平昌公司马模才得以有暂时的喘息机会。

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是个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十分重要的地区。当时任兖州刺史的东平王司马楙由于贪得无厌，肆意搜刮民财，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范阳王一直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趁民众怨声载道之机，让苟晞接管兖州，调东平王来都督青州诸军事。东平王拒不受命，他与刘乔联合，公开撕毁了与东海王等人所订立的举兵西进盟约。以东海王为盟主的诸路西征军尚未与关中河间王的军队交锋，便先纠缠在关东的纷纭战乱中。

河间王对关东诸王结盟举兵非常忧虑，在得知结盟的军队在东方遇到阻碍后，他又转忧为喜。于是，他任命成都王司马颖为镇军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让他带领一千名士兵前去争取公师藩的势力，夺取河北。又任命刘乔为镇东将军，石超、王阐等为其后援；同时还让张方担任大都督，统精兵十万，去与荆州刺史刘弘、彭城王司马释等各路人马会师许昌。

刘弘不希望战乱发生，他试图劝说双方罢兵，但没有结果。

经过权衡得失，他倒向了东海王一边。尽管如此，河间王一方的兵势依然很盛，很快把范阳王赶出了豫州。范阳王迫不得已，派刘琨向王浚求援，借来八百精锐骑兵，加上冀州将士五千人，这才顶住了河间王一方的进攻。并在随后的反攻中，杀王阐、石超，渡过黄河，迫使刘乔退出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范阳王又分兵东击东平王，将他赶回封国。接着，他派刘琨、田徽与东海王联兵攻打退守谯县（今河南亳县）的刘乔父子，刘祐战死，刘乔逃奔平式。东海王进屯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后，王浚又派部将祁弘率鲜卑、乌桓骑兵前来助战，使东海王兵势更盛。张方、司马颖见局势不妙，仓皇逃回了长安。

面对逆转的形势，河间王害怕了，他想与东海王讲和。因张方是西迁惠帝的罪魁祸首，河间王便杀了他，送首级给东海王请和，东海王不答应。祁弘等率骑兵继续西进，连败河间王军，于永兴三年（306）五月攻人了长安，大肆烧杀抢掠后，迎惠帝东归。六月，惠帝至洛阳，改元光熙，由东海王辅政。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河间王在东军人关时，单骑逃人了太白山（今陕西郿县）。成都王也自华阴逃奔新野（今河南新野南），当年八月，奔至朝歌，被顿丘太守冯嵩擒获，押送到邺城。十月，长史刘舆将其缢死。

（陈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82—86

《通鉴纪事本末·西晋之乱》

《晋书》：《武帝纪》、《惠帝纪》、《后妃传上》、《宗室传》、《宣五王传》、《八王传》

五胡内迁

五胡内迁是导致西晋王朝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曾引起不少汉族士大夫的忧虑和不安，对中原汉人固有的生活环境是个不小的冲击。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大量边远少数民族人口涌入中原，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为整个华夏族人的发展进步起了促进作用。

所谓五胡，主要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主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原来多居于今中国东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广大区域中，居无常处，过着游牧生活。其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远远落后于中原汉族。

汉代以来，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影响，边远各少数族逐渐向中原迁徙，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对少数族人来说，内徙中原，与汉民杂处，可以改变他们的落后生产方式，学会农耕及其他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利于他们摆脱原来处于氏族社会的落后状态，迅速跨人封建社会。而对于中原少数封建士大夫来说，“胡人”的涌人却如洪水猛兽，似乎他们到来后，汉人定居区域内所发生的一切灾祸均与他们有关。那么，他们内迁后，究竟与内地汉民、尤其汉族地主阶级发生了什么联系呢?

汉末以后，北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中，许多豪强地主为保护自家利益，建立起一个个坞堡，这些坞堡外可防御侵扰，内可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自曹魏至西晋前期，北方社会相对稳定，坞堡也成了一座座富足的庄园。为了进

一步发展庄园经济，庄园主大量吸收迁人内地的少数族人为佃客，成为依附于庄园地主的劳动者。晋武帝为了增加国家租赋收人，曾禁止私自招募佃客，试图让他们中更多的人成为担负国家租赋的编民，而不是免除向国家交纳租赋的私家佃客。但这一禁令没起什么作用，仅以太原为例，当时那里的汉族地主以匈奴人为佃客的很普遍，有的甚至拥有数千名匈奴佃客。

少数族人受到汉族世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少人还像牲口一样被贩卖。羯人石勒年轻时，就曾与一批同伴从并州（今山西中部）被贩卖到冀州（今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沿途每俩人戴一副枷锁，受尽了欺凌和折磨。

少数族人在内地受到歧视，遭到沉重压迫，心中自然会对汉族统治阶级充满仇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反抗的怒火就必然要爆发了。

少数族人反抗晋王朝统治的斗争，首先兴起于西北地区。泰始五年（269）二月，因鲜卑族数万人归降内附，居雍（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凉（今甘肃河西及兰州一带）间，晋朝特分雍、凉、梁（今陕西南部）三州，设置秦州（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任命荆州刺史胡烈为秦州刺史。不久，还调扬州刺史牵弘为凉州刺史，分别管理各自辖区内的少数族人。

胡烈、牵弘皆是久经沙场的大将。胡出身将门，魏车骑将军胡遵之子，兄长胡奋也以战功官至都督荆州诸军事。魏末，胡烈随钟会伐蜀，任征蜀护军，攻城略地，立有功勋。钟会反，胡烈受命为右将军，与监军卫瓘起兵攻杀之。晋初，胡烈出任荆州刺史，镇襄阳，多次与吴人交战，曾击败吴右丞相万彧的大举进攻。牵弘也是久历战阵的人，魏末任陇西太守，晋初迁扬州刺史，与吴人对峙多年，吴军大将丁奉曾败在他手下。晋武帝考虑到西北少数族人内迁越来越多，长期以来又受到统治者的沉重压迫，一旦作乱，很难控制，遂选胡烈、牵弘两员大将出镇西北。

然而，抚民安边，不是光靠武功就能解决问题的。大司马陈骞指出："胡烈、牵弘均是有勇无谋的人，并且刚愎自用，不是安边保国的材料，由他们坐镇一方，必将带来后患。"武帝不听，他认为陈骞在进谗言。陈骞无可奈何，退朝后暗自叹息，认定胡、牵二人必定治理不好边疆。

果然，胡、牵二人试图靠武力镇服各自州中的少数族人，结局却适得其反，越是镇压，反叛的怒潮就越高涨。泰始六年（270）六月，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率部众侵扰陇右，胡烈与之激战于万斛堆（今宁夏固原），兵败被杀。当时，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司马亮派部将刘旂前去救援，而刘旂畏惧不前，坐视胡烈战败而不救，为此，司马亮与刘旂均被免职。

胡烈死后，朝廷任命司隶校尉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杜预为秦州刺史。石鉴与杜预有宿怨，此时便想趁机泄私愤，强迫杜预带兵与兵势正盛的鲜卑人交战。杜预精通兵法，知道这样出战等于去送死，便坚决拒绝出兵，他说了九条理由，大意是胡人兵强马壮，又刚刚大胜晋军，士气正盛，而晋军兵力不足，军资粮食也少，目前难以取胜。应该先着力于积蓄力量，待明年春天再进军。石鉴见杜预不服从自己的命令，非常恼怒，立即派御史将杜预关人囚笼，押解回京治罪。其实，杜预所言非常正确，而石鉴不听，坚持要马上进攻树机能，但攻战时日不短，终不能胜。

泰始七年（271）四月，北地胡与鲜卑秃发树机能联兵攻金城（今甘肃兰州东），牵弘出兵迎战，被群胡围困于青山（今甘肃环县西），兵败被杀。武帝这才懊悔不听陈骞之言，致使西北大乱。

汝南王司马亮因镇抚关中不利，被免官，由汝阴王司马骏继任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司马骏比较善于带兵打仗，在军中很有威望，他到关中后，对少数族人的征战形势有所

改观。泰始十年（274）八月，他在金城一带打败凉州羌胡的侵扰，斩其首领乞文泥。其后又征讨北胡，攻杀了胡帅吐敦。晋西域戊己校尉马循在这一时期也很活跃，屡与鲜卑人接战，咸宁二年（276）七月，斩杀四千余人，俘虏九千余人，该部鲜卑首领阿罗多等力屈，向晋投降。

咸宁三年，升任征西大将军的司马骏受命派七千人马前往凉州。鲜卑首领树机能、侯弹勃等赶在他们到来之前，劫掠凉州的佃兵。司马骏急调平虏护军文俶督统凉、秦、雍三州的各路人马步步为营，向鲜卑人进逼。经过一场大战，树机能等战败，不得不率自己统领的二十个部落向晋投降，并将儿子送人晋营作为人质。安定、北地、金城诸郡的杂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一时都向晋军请降，内附诸胡多达二十余万人。

可是，战场上暂时的胜利，终究解决不了尖锐的民族对立和阶级矛盾，降服的胡人今日投诚，明日又叛，反反复复，使西晋朝廷疲于应付。咸宁四年六月，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今甘肃武威）与树机能的同伙若罗拔能交战，兵败而死。

晋武帝早有出兵灭吴之心，但由于西北各族人民不断造反，多年未能完全镇压，使他还有后顾之忧，下不了攻吴的决心，尽快平定西北，成为他时常让百官议论的话题。咸宁五年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更增添了武帝的忧虑。仆射李熹提议说："陛下如果能给刘渊一个将军的官衔，让他率匈奴五部西征，那么，灭树机能指日可待。"这一建议遭到大臣孔恂的反对，他说："李公所言，不能解决边患。"李熹大怒，厉声说："匈奴人那么慓悍，刘渊又精通兵法，由他们奉圣旨西征，哪会遇上敌手！"而孔恂不紧不慢地答道："刘渊若平定凉州，杀死了树机能，我想凉州将会有更大的灾难。他一旦占据凉州，摆脱了我们的控制，我们就对他无可奈何了。蛟龙腾人云雨中，就不再是水池中的小东西。"朝中许多大臣固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儒家教条，

总是把少数民族视为异己势力，排斥、压制甚至打击他们，晋武帝也不例外。因此，李憙让匈奴人服从晋廷指令去打鲜卑人的建议，未被采纳。

“谁能为我平定陇右呢?”武帝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一问题，朝中群臣却一个个缩手缩脚，不敢应命。唯独来自兖州的司马督马隆自告奋勇，他对武帝说：“陛下若信任我，我可以去讨平树机能。”武帝说：“你真能平定西北的话，我可以委你以重任。不过，我想听听你有什么高见。”马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陛下得让我全权处置西征的各种事情。我将招募三千名壮士，陛下不必过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干什么的，只须提供最精良的铠甲兵仗。我率他们西去，不愁敌人不灭。”群臣纷纷表示异议，认为此前晋军西征的人数不少，均未达到目的，马隆只是区区一员小将，不过是夸夸海口，不可相信。武帝力排众议，同意马隆的建议，拜他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由他自己招募了三千五百人，配备了三年的军资，起程西征。

马隆率军渡过温水后，屡与鲜卑人接战。鲜卑人围追堵截，却一直战胜不了这支军队。在地势宽阔处，马隆让部下将战车组成营垒，使对方无法攻破；在地势狭窄处，他们又在战车上设置小木房，加强了自身的防御能力。这支队伍且战且走，攻无不克，转战千里，抵达武威后，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率上万人的部众前来投降。这年十二月，马隆又联合西北的胡人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展开一场大战，大获全胜，杀了树机能，平定了凉州。自从马隆率军西行后，朝廷很久没得到他们的音讯，许多大臣以为他们已战死。当马隆杀死树机能的捷报传到京城后，武帝抚掌大笑，他对群臣说：“如果我最初听信你们这帮人的建议，不叫马隆出征，那末，秦、凉之地从此就要丢掉了。”

在晋廷忙于西北的战事期间，北部的并州（今山西北部至东南部）也不时地发生少数族人的造反。泰始七年正月，不堪忍受

晋朝统治者欺压的匈奴右贤王刘猛率部众反叛，逃出塞外。这年十一月，刘猛率军骚扰并州，被并州刺史刘钦击败。但刘猛仍活动频繁，侵扰不休。武帝派何桢持节都督路蕃、胡奋等前去征讨，何桢感到晋军兵力寡弱，难与刘猛的强悍部众抗衡，便一面命路蕃、胡奋彼此声援，向刘猛发起进攻，一面采取分化瓦解手段，诱使刘猛手下的左部督李恪刺杀刘猛。这样一来，随刘猛造反的匈奴人很快即被镇压，并且在官军的严厉管制下，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未敢再反叛。然而，这种局面很难维持长久，当匈奴等族的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又会举起义旗的。

在塞北一带的鲜卑人自魏末以来，一直向中原的朝廷臣服，但到了这时，也开始向晋人挑战了。咸宁二年（276）二月，他们攻入并州，被晋监并州诸军事胡奋赶走。此后，他们的攻势不断，引起晋廷极大的不安。次年正月，晋廷不得不命征北大将军卫瓘率大军前去征讨，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边疆少数族人不断向内地迁徙，并且勇猛顽强地反抗晋朝统治者的欺压，他们的队伍在长时期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一些晋朝官僚对于这种势态深感忧虑，害怕这些“戎狄”有朝一日会成为内地的主人。太康元年（280），侍御史郭钦上疏称：“戎狄强悍，历来是个祸害。现在虽然臣服于晋朝，一旦陛下驾崩，烽火顿起，胡骑从平阳（今山西临汾）、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奔袭到都城北面的孟津，用不了三天时间。而且，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今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大部分地区）一带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戎狄的天下。现在应该趁晋军灭吴之后的兵势，遣谋臣猛将带兵强迫迁入内地的戎狄返回边疆，以绝后患。”但他的建议太不现实，要强行把已经与汉族人民相融合了的少数族人驱赶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内迁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岁月，人数众多，散居各地，与汉民杂处，已难以分清你我了。

晋元康年间，由于统治者对少数族人的残酷压迫，引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抗斗争，匈奴人郝散、郝度元，氐人齐万年等，先后成为使晋朝统治者头痛的起义首领。尽管他们最终被晋朝接二连三调遣的大军所镇压，但少数族人的反抗斗争没有止息，并且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起义。

在这种形势下，元康九年（299），太子洗马江统老调重弹，作《徙戎论》，主张把戎狄全部迁还他们的故地。文中说：

“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来是帝王建都的地方。而现在关中百余万人口中，戎狄竟占了一半，他们天性粗悍勇猛，内迁后又长期受到歧视，当然会一再反叛。只要他们在关中，关中就不可能不乱。应该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诸郡（今陕西大荔至甘肃镇原一带）的羌人，迁往他们的老家先零、析支等地（在今甘肃和青海）；把扶风、始平、京兆诸郡（陕西渭水两岸）的氐人迁出陇右，置于阴平、武都之界（今甘肃成县至文县一带）。使戎人与汉民不杂居，不能为害。”

“并州的匈奴人，人口之盛，超过西戎，弓、马之强，也甚于氐、羌。他们要作乱，则并州非朝廷所有了，也不可小视。”

江统的呼吁，喊出了当时部分官僚急于消除戎狄之患的心声。他们诅咒“胡人”内迁，把“胡人”的反叛归咎于其邪恶本性，而不是从西晋朝廷的反动统治中寻找原因。由于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看不到自己所依附的统治机器给少数族人所造成的罪恶，以致最终找不到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钥匙，所提出的“徙戎”建议，终究解决不了严酷的现实问题，也是实现不了的一种幻想。

（陈益民）

参考资料：

《通鉴纪事本末·羌胡之叛》

《晋书》：《武帝纪》、《杜预传》、《扶风王骏传》、《马隆传》、《刘元海载记》、《匈奴传》、《江统传》

李氏建成汉

西晋后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给晋王朝带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晋朝统治阶级屡次派大军镇压，但收效甚微，起义的烽火愈烧愈旺。在众多的流民武装中，氐人李特、李流等人率领的队伍影响最大，它不仅没被晋王朝镇压下去，最终还建立了独立于晋王朝之外的政权。

李特字玄休，祖籍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李特的祖先与同族人迁往汉中杨车坡，信奉张鲁的五斗米道。曹操攻克汉中后，李特的祖父率五百余家氐人归附，被任命为将军，迁居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北方人称他们为“巴氐”。西晋初，李特的父亲担任了东羌猎将，统领羌人，李特也在地方州郡做过小官。

晋惠帝继位后，朝政日趋腐败，镇守各地的藩王也越来越骄横，尤其是先后出任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的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自恃位高权重，在关中为所欲为，欺压民众，对于关中各少数民族的压榨尤为残暴，以致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元康六年（296）五月，匈奴人郝度元联合冯翊（今陕西长安以东、渭水下游）、北地（今陕西中西部富平、耀县一带）的马兰羌、卢水胡起事，连败官军，影响迅速扩大，秦雍一带的氐人、羌人也纷纷起兵响应，他们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转战关中各地，晋王朝为之大震。晋朝派出大批人马前去镇压，一时战乱纷纭，关中各族民众受到极大侵扰。加上当时大旱和水灾

交替发生，疾病流行，关中粮食紧缺，一斛米的价格高达一万钱，从而导致关中各族流民大量迁徙他处，寻求生路。其中，天水、略阳、扶风、始平、阴平、武都等六郡（今甘肃东部到陕西中部一带）的各族民众十多万人迁至巴蜀益州（今四川）和梁州（今陕西西南部）一带，李特、李庠、李流兄弟几人也率氐众七千余人流徙到了绵竹（今四川德阳）。

益州刺史赵廞是巴西人，与李特、李庠等有老乡关系。他见天下已乱，颇有割据益州的野心，便拉拢李特等率领的流民，开仓分粮，赈济他们，因而得到这些氐族人的支持。成都内史耿腾对流民在蜀地的势力扩大极为忧虑，他向朝廷上疏称："来自西北的流民个个慓悍强壮，蜀人则非常懦弱，主客力量不均，易导致大乱，应该把在蜀地的流民统统遣返其故土。"赵廞对耿腾的这一建议大为不满，朝廷则认为言之有理。于是，晋廷决定让耿腾出任益州刺史，全权处置益州军政大事，而调赵廞入京，去担任侍奉皇后的大长秋之职。赵廞是贾后的姻亲，此时贾后已被杀，他担心自己入京后会被当作贾氏党羽处死。而且，让耿腾接替他的刺史之职，他也颇不甘心，因而决定举兵违抗朝命。当时蜀郡的治所在成都少城，益州的治所设在成都太城，赵廞尚未离开太城，耿腾便欲前往该城上任。功曹陈恂劝他别操之过急，先留在少城静观事态发展，既防备赵廞反叛，又警惕流民作乱。耿腾不听，执意前去州治。他率众刚到太城西门，即遭到赵廞的袭击，当场被杀。受朝廷委任前来出任西夷校尉之职的陈总，也在南安鱼涪津被赵廞攻杀。接着，赵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公开反晋。李特的弟弟李庠率四千余骑锐卒前来归附，被赵廞任命为威寇将军，委以扼守汉中入蜀之道，以防朝廷发兵进攻的重任。李庠招集六郡壮士一万余人，准备北行。

李庠通晓兵法，骁勇善战，作战时不用旗帜调动队伍，只用手中的长矛便指挥自如。正因为他有才干，又率领着一支强悍的

军队，引起了赵廞的嫉妒。加之长史杜淑、司马张粲进言说："将军刚起兵，便把防守边地的重任交给戎狄之人，这是很危险的。"赵廞以为然。他趁李庠进见时，有意询问对方对时局的看法。李庠说："现在天下已乱，晋王朝不再有复兴的希望。明公应把拯救陷于苦难中的民众为已任，应天时，顺人心，平定天下，不应仅以割据蜀地一隅为满足。"这番宏论颇有见地，而赵廞却以这不是臣子该说的话，指斥他大逆不道，下令将他处死，并杀了他的宗族子侄三十余人。

赵廞的这一做法激起了六郡流民的愤怒，他们在李特的率领下，汇聚绵竹，达七千余人。永康二年（301）正月，李特率军夜袭赵廞派往益州北部防御晋军进攻的长史费远军，焚烧兵营，使那支一万多人的队伍死伤十之八九。李特乘胜攻克成都，迫使赵廞仓皇出逃，在途中被他的随从杀死。

当初赵廞违抗朝命，杀死耿腾时，朝廷就调令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督统牙门将王敦、广汉太守辛冉等七千余人入蜀，讨伐赵廞。当朝廷得到赵廞已被平定的捷报后，下诏拜李特为宣威将军、李流为奋威将军，并要罗尚把有功的流民名单上报朝廷，加以封赏。但掌管此事的辛冉试图独吞平乱之功，他没有按朝廷的指示据实上报，使许多有功的流民愤愤不平。

将流民遣归故里，是晋王朝三令五申的事。罗尚在永康二年三月入蜀后，即着手遣返流民。他派人四处张贴布告，限令流民七月份必须离去。流民到梁州、益州一带已有较长时间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当地的佃客，自食其力，听到州郡下达的命令后，一个个愁眉不展，他们不愿重返饱经天灾人祸的贫困故里。而且正值水涝，地里的收成甚微，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盘缠行资，无法北徙。李特见此情况，便屡派天水人阎式去见罗尚、辛冉等人，请求放宽时限，但未获同意。

罗尚、辛冉等人非常贪婪残暴，蜀郡当时盛传这样的说法：

尚之所爱，非邪则佞；
尚之所憎，非忠则正。
富拟鲁卫，家成市里；
贪如豺狼，无复极已。

他们狼狈为奸，不仅不断催逼流民上路离去，还大量搜刮甚至抢夺流民的财物，辛冉就曾主张把所有流民首领统统杀死，以夺取他们的钱物。罗尚还特意传令梓潼太守张演，要他在流民必经的各个要道上设关置卡，强取他们的宝物。因此，流民除了奋起反抗，已别无选择了。

梁、益二州的流民得知李特兄弟屡请延期进行遣返之事，非常感激，纷纷汇集到他们身边来。李特兄弟便在绵竹设立大营，安顿各地来的流民，并继续与官府商谈从宽对待。辛冉见有人胆敢不服从命令，非常恼怒，便在各个通衢要道张贴告示，悬重金奖赏捉拿李特兄弟的人。李特等顺水推舟，他们派人把告示改写成："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等家或氐、叟族的首领头颅一个者，赏一百匹布。"由此更激起六郡流民对罗尚、辛冉的痛恨，他们纷纷归附李特，旬月之间，李特便聚众二万多，弟李流也有众数千。

到这年十月，李特再次派阎式请求放宽遣返时限，罗尚见流民已聚集成一股不小的势力，怕激起民变，便假惺惺地表示可以考虑宽限时日。而辛冉对罗尚的"优柔寡断"非常不满，他与犍为太守李苾商量后，擅自派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领步骑三万前去袭击李特的流民大营。罗尚见状，只好派督护田佐带兵予以协助。

李特对于对方的偷袭早有准备。当晋军悄悄进入大营时，李特安然躺在自己的大帐中，毫不在意。等到晋军有一半人进入了大营，李特突然发令，顿时伏兵四起，杀声震天，把晋军打得大败，田佐、曾元、张显都死于乱军之中。当罗尚见到李特派人送

来的田佐等人的首级时，叹息说：“辛冉急于求成，反而助长了流民的气势，以后再想制服李特就难了。”

李特从小就胸怀大志，气度非凡，为时人所重。后与流民迁徙入蜀，来到剑阁，沿途所见山川地势，使他不禁发生感叹：“蜀汉后主刘禅据有这样富饶险峻之地，却屈节向人投降，真是个庸人啊！”当晋廷催逼流民返乡甚急时，李特兄李辅却从略阳入蜀，对李特说：“现在中原已经大乱了，我们不应该离此而去。”李特自此有了雄踞巴蜀之意。在官府一再逼迫流民返乡的情况下，李特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和广大流民的利益而与官府作斗争，赢得了流民的信任。他率领流民首次与官府作战而获大捷，使自己的声望更高，被六郡流民共推为镇北将军。从此他全力投入到荡平巴蜀的斗争中去了。

绵竹大捷后，李特即进攻在广汉的辛冉，屡败其军。罗尚遣李苾、费远带兵前去救援，但这二人畏惧不敢进。辛冉无奈，突围逃奔德阳，广汉被李特占据。接着，李特乘胜攻成都。罗尚非常恐慌，写信给阎式，请他劝李特罢兵。阎式回信说：“我们曾再三请求延期遣返流民，以避免在水涝季节远行，并准备更充足的行资，而你们最终不听。鹿被虎逼上绝路，尚且要用角抵虎作最后一搏，何况人呢！流民们实在不愿意伸着脖子等你们用刀来砍，才走上了对抗的道路。现在你后悔，已经晚了。”

李特任命其兄李辅为骠骑将军，弟李骧为骁骑将军，长子李始为武威将军，妹夫李含为西夷校尉，任回、李恭、上官晶等一批有才干的人为将帅，阎式为谋士，使这支队伍的组织状况趋于健全。李特又与蜀民约法三章，整肃军纪；还赈济贫困，礼贤下士，从而受到蜀民的称颂。罗尚自从入蜀后，既贪婪又残暴，肆意欺压广大民众，所以，当李特起兵后，益州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即罗尚），反更为祸。”

李特的军队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支持，因而在与罗尚的屡次作战中，节节胜利。罗尚不得不沿着郫水筑墙造栅，建起绵延七百里的一座座营垒，与李特军相峙，并派人外出去搬救兵。太安元年（302），河间王司马颙派督护衙博、广汉太守张征带兵前去救援，南夷校尉李毅也领兵五千助战，罗尚以为可以大举反攻了，也派出督护张龟从繁城（今四川繁县）进攻李特。面对晋军三路进攻，李特分兵迎敌，他命次子李荡和幼子李雄袭击衙博，自己则迎战张龟，很快将这两路来犯之敌打败，李荡还乘胜进至巴西郡，郡丞毛植降。李荡再追击逃到葭萌（四川广元西南）的衙博，收降了他的所有残兵败将。在这种形势下，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改元建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其后，李特又组织兵力进攻张征，张征知自己难与李特硬拼，便依据险要地形，与他相持多日。当时李特与李荡分处在两座大营中，张征看准李特营中较空虚，派步兵走山路前去袭击，李特奋起反击，却作战不利，被围困在险峻的山岭中。李荡得到急报，急忙率军去救援，但山道狭窄，难以冲破敌人的重围。李荡便身披重铠，手持长矛，大声呼叫着冲在前头，率众与张征的部下展开殊死搏斗，终于击败张征，救出李特。李特见部众连日作战，非常疲惫，打算暂停进攻，休整队伍。而李荡和司马王辛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连续作战，张征的部下伤亡惨重，元气大伤。我们应该乘此时机一举将他们全歼。否则，待张征收集亡众，重整旗鼓，我们要战胜他就有困难了。"李特接受了这一建议，挥师再次攻张征，将他包围。张征拼死杀出重围，逃奔不远，又被李荡的水陆两军合力追上，死于乱军之中。

李特在攻打张征的同时，还派弟弟李骧率军屯驻成都东北几十里的毗桥，以防备罗尚出击。罗尚几次出兵，都被李骧打败，加之李流率领的军队已推进到成都的北面，这使罗尚深感不安，

他派部将张兴来到李骧营中诈降，以刺探营中虚实。当时李骧手下只剩两千余人，张兴发现有机可趁，连夜溜回成都，向罗尚禀报。罗尚于是挑选了一万精兵前去夜袭。李骧措手不及，匆忙率众一边抵抗，一边撤往李流的营中，在李流的协助下，发起反攻，反将罗尚军击败，斩俘了对方十之八九的士兵。

李流已进逼成都，李特也在先后打败梁州刺史许雄率领的援军及罗尚的水军后，兵临成都。成都有大、小二城，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投降，罗尚退守大城，势力孤单，不得不向流民军求和。

然而，到太安二年（303）二月，形势却发生逆转，晋朝廷派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率军救援罗尚。罗尚原已派奸细打入义军内部，刺探军情，暗中与那些已向李特投降的坞堡地主串通一气，密谋里应外合，打垮流民大军。当他们得知朝廷派来救兵的消息后，便商定了共同举事的时间。

对于许多坞堡的地主武装陆续归附李特，李流早有警惕，他曾劝李特说："我们的粮食、财物不足，许多士兵被安排到各坞堡去就食。对于那些坞堡的主人，我们不可以过于信任，应严加防范，最好把各郡县的士族大姓家的子弟扣为人质，幽禁在我们控制下的广汉，以防不测。"但李特不以为然，他说："现在我们取胜的大局已定，当务之急是安定民心，不能乱猜疑人，以免引起分裂。"他对战局过于乐观，失去了应有的警惕。以致在他派兵前去抵御朝廷调来的孙阜的军队时，罗尚从成都大城率大军突袭李特营，各坞堡的地主武装也同时响应，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李特与对方苦战了两天，败退到新繁；待他收集余众，重新与罗尚的大军接战时，已力不从心，转战了三十余里，再度失败，与兄弟李辅、李远等同时遇害。

李特一死，一些归附了的地主坞堡武装纷纷反叛。为控制局势，李流继任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与李特子李荡、李雄等

分别固守东营和北营。

太安二年三月，罗尚派督护何冲、常深等分别领兵攻李流，涪陵（今四川彭水）的豪强药绅也起兵与之呼应。李流便让李荡、李雄抵御药绅，自己带兵迎战常深。而何冲乘隙进攻北营，营中的氐族首领苻成、隗伯等见势不妙，倒戈反叛。在这紧要关头，李荡的母亲罗氏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士众抗击。她的眼睛被隗伯刺伤，血流满面，而斗志不减。尽管营垒几度面临攻破的危险，但在她的督战下，一直坚持到李流率军回来之时，保住了大营。李流、李荡将来犯之敌击退，并乘胜攻到成都城外。不幸的是，李荡在冲锋中被对方掷来的矛刺中，当场身亡。

朝廷见屡次出兵仍未能镇压流民起义，颇为着急，再度调遣大将前去督战。当时，宋岱统领的三万荆州水军来势汹汹，已抵达垫江（今四川合川），前锋孙阜攻破德阳，正逼近流民大营。流民军内部又因李特、李荡的死而军心不稳，不少人对作战的前景抱有悲观情绪。因此，李流的斗志也发生了动摇，以致当李含劝他向朝廷请降时，他即表示了赞同。五月，他将自己的长子李世及李含子李胡送往朝廷派来的孙阜军中，作为人质。

李含的另一子李离当时在梓潼（今四川梓潼）任太守，听说父亲主张投降，大为不满，急忙奔还成都附近的大营，与同样不赞同投降的李雄、李骧商量对策。李雄是李特第三子，字仲儁，从小就以刚毅果断闻名乡里，为有识之士所器重，有人曾这样评价："李氏诸子中惟仲儁非同寻常，终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当李流准备率军向政府投降时，李雄意识到广大流民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所换取的战果可能付诸东流，因而屡次劝谏李流，但李流不听。经与李离、李骧等密商，李雄决定：发兵袭击孙阜营，如果李流、李含反对，就将他俩扣押起来。

于是，李雄召集众流民，向他们慷慨陈词："我们在益州血战了两年，朝廷早已恨之入骨，一旦束手就擒，必然成为任由他

们宰割的鱼肉，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现在只有同心同德，共闯难关！”众人皆表赞同，愿随李雄去袭击孙阜军。不久，他们便打败了孙阜。前锋既败，在垫江的宋岱又适逢此时病亡，荆州来的军队便撤了回去。李雄凭他的勇气和机智，在流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李流为自己原来的怯懦感到惭愧，便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雄。

太安二年六月，李雄率师攻罗尚，迫使他退保成都大城。接着，李雄渡江攻杀汶山太守陈图，占据了成都西北几十里的郫城（今四川郫县），为包围成都做准备。

一度与政府军合作攻打流民军的各巴蜀大姓见局势发生变化，怕李雄报复，纷纷南逃宁州（今云南一带），或东奔荆州，不走的也结坞自保，屯积粮食，一时田野空空，使流民陷于缺粮的境地，又面临着一次空前严峻的存与亡的考验。

然而，这种状况没持续多久，便出现了转机。罗尚的参军涪陵人徐辇要求出任汶山太守，未得到应允，心里十分恼恨，便趁出使长江西部的时候，投降了李流。他劝说青城山（在今四川灌县西南）的大姓范长生将自己坞堡中的粮食拿出来支援李流。范长生与徐辇是同乡，他听从了徐辇的建议。流民军得到他支援的粮食，士气重新高涨起来。

九月，李流病死。李雄继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以郫城为治所。为了尽快夺取成都，他派人向罗尚诈降，让罗尚发兵攻郫城，自己为内应。罗尚信以为真，即派隗伯前去夜袭。隗伯按先前的约定，看到城上的举火信号便令部下登城。这时，他们突然遭到李骧的伏击，死伤不计其数。李骧乘胜追击败兵，直至成都城下。李骧让人装扮成罗尚的部下，对城上大喊“已攻克郫城”，骗开了成都少城的大门。当义军进去之后，罗尚才发现上当，急忙退保成都大城。隗伯逃跑不及，被义军抓获。

李雄一面加紧围攻成都，一面派李骧攻克成都南面一百里的

犍为郡治所武阳（今四川彭山），杀太守龚恢，截断通往成都的粮道。军中无粮，罗尚知道无法守住成都，便留牙门张罗守城，自己从水路悄悄往东出逃。他一走，张罗便开城投降，迎李雄入成都。自此，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成了李雄的控制区域。

由于益州诸大姓对流民军怀有敌对情绪，或出逃，或结坞自保，使攻克成都后的李雄军队仍面临缺粮的危机。而且，他们随时可能遭到坞堡地主的攻击。为了在整个益州站稳脚跟，李雄开始寻求当地大姓的支持。隗伯本是巴蜀氐人中的一个重要首领，在李特、李流等起义后加入了这一行列。但后来反叛，李雄的母亲罗氏被他刺伤眼睛，李雄的哥哥李荡也在平叛中阵亡。此后隗伯又追随罗尚，与义军为敌。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被李雄抓获后，本该处以极刑，但李雄饶恕并重新起用了他。李雄还考虑到范长生是益州有名的大姓，社会地位很高，并且精于道术，为许多信仰道教的民众所推崇，因而请他出山为王，向他表示自己甘愿称臣。范长生坚辞不肯。李雄的这些举动在巴蜀本土的各族民众中影响很大，他们感到李雄很有成就一番大事的气度，于是纷纷归附于他。

晋永兴元年（304）十月，李雄被众将领推戴为成都王，改元建兴。他废除了西晋法律，另行约法七章。公元306年春，范长生从他居住的西山来到成都，被李雄尊称为“范贤”，拜为丞相。范长生劝李雄称帝。这年六月，李雄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成”，改年号为“晏平”。成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自李特开始的流民起义经过五年的奋斗，终于获得了成功，使巴蜀一带自此脱离了西晋王朝的控制，在中原地区日趋于大乱之际，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陈益民）

参考资料:

《晋书》:《李特载记》、《李流载记》、《李雄载记》、《罗尚传》

《资治通鉴》卷83—85

《通鉴纪事本末·成李据蜀》

张昌横跨五州

继李特在益州领导的流民起义爆发之后，张昌领导的荆州流民起义，又给晋王朝带来了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张昌是义阳郡（今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的“蛮”族人。他身材魁梧，力气过人，喜好谈论攻战之术，担任过平氏县（今河南桐柏西北）小吏。因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他对民间疾苦有着较深的感受，对晋朝腐败统治极为痛恨，常有与朝廷相抗、干一番大事的志向。他曾预言自己将来定会出人头地，同僚们听了都笑他痴人说梦话，而他不在乎，一直等待着揭竿而起的时机。

新野王司马歆当时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荆州。他为政苛刻，待人残暴，在当地名声极坏，为“蛮夷”各族民众所怨恨。那时，李特、李流领导的巴蜀流民起义势力不断壮大，在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昌趁此机会，也开始积蓄力量，准备起义。他悄悄离开平氏县，诈称募兵讨伐李流，组织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并避免了政府的怀疑。

太安二年（303），为了镇压巴蜀流民起义，朝廷下诏在荆州征发壮丁，去与流民军作战。这道诏令是壬午那一天发布的，因而被征发的壮丁称作“壬午兵”。当时，皇室内部骨肉相争，闹得朝野不安，加之晋朝统治者长期以来进行的残暴统治，使广大民众早就盼望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变革，推翻西晋王朝。因此，当朝廷在荆州征发壬午兵时，人们并不愿去为晋王朝卖命。即使被强征人伍，他们也多半在半途逃亡。为此，晋朝廷不得不催令各

郡县长官加紧征兵并解送益州，这些兵员如果在沿途经过的地方停留的时间超过五天，当地的行政长官就要被撤职。于是，各郡县长官都亲自出来驱赶壬午兵上路。那些既不愿西行、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们实在忍无可忍，便纷纷在途中屯聚反叛，以武力对抗朝廷。一时许多地方出现了大大小小规模的造反队伍。

但这些零星的造反队伍力量太分散，形不成真正能与官军抗衡的气候。当时的形势，迫切需要一位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出来统一指挥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反晋力量。眼见起兵时机已成熟的张昌，便在江夏郡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的石岩山举起了反晋旗帜。他改名李辰，号召不愿受朝廷欺凌的穷苦大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时，大批逃避兵役的壮丁、那些各自为战的小股造反队伍，都纷纷前来投奔。这年，江夏郡粮食丰收，也吸引了从别的地区前来“就食”的流民，他们到江夏后深受地方官吏的欺压，也怀着深深的怨愤参加了张昌的队伍。

晋江夏太守弓钦为了扑灭起义之火，迅速派出了官军前去讨伐，但被张昌打得大败。官军的失败，更促使了张昌的队伍的发展壮大，他乘势进攻郡城，迫使弓钦亲自出马迎战。但一交锋，弓钦的军队便土崩瓦解，根本不是起义军的对手。弓钦迫不得已，仓皇带着家眷逃奔了沔口。这样，张昌声威大振，在江、汉一带纵横驰骋，力量越来越大，很快又在随郡西部打败了奉新野王司马歆之命前来镇压的骑督靳满，从而控制了整个江夏郡。

为了使自己的队伍更具有号召力，张昌决定利用宗教迷信制造有利于农民军的舆论。他说：“即将会有圣人出现，成为人民的救世主。”对长期处于苦难之中的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早已盼望一个改变这个黑暗世界的“圣人”的出现，拯救自己离开苦海。张昌正是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没过多久，他就把山都（今湖北襄樊西）的县吏丘沈抬了出来，改其姓名为刘尼，对外宣称刘尼是汉代帝王的后裔，是“圣人”。张昌奉他为天子，自

己任相国，兄张味为车骑将军，弟张放为广武将军。还在石岩山建造宫殿，用竹子编成大鸟，披上色彩斑斓的丝绸，并在旁边放置许多碎肉，引来山中各种鸟类前来啄食。然后把竹鸟称作从天而降的凤凰，说成群的鸟聚集到凤凰身边是百鸟朝凤。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中之王，据说只有在天下太平、帝王出世和登基的时候才会出现。张昌为了让人相信自己发动的起义感动了天地，因此招来了凤凰之瑞，"圣人"出世之说就更为人们深信不疑了。为此，他改元"神凤"，依汉朝制度，确定了服色、祭礼天地的礼仪等；给他的起义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张昌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大批民众。但张昌并不满足于此，他又造舆论说："长江以南到处都有人造反，政府会调集大军将这边的人斩尽杀绝的。"一时人心惶惶，长江和沔水一带都出现了成群结伙的造反者，他们把张昌看作自己利益的代表，相继前去投奔，旬月之间，张昌便聚集了三万多人，其中还包括不少士族人家。

为了与官军相区别，也为了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鼓舞士气，吸引更多的劳苦大众，张昌的部众全用红布包头，脸上粘长毛，显得非常慓悍勇猛，因而晋统治者污蔑他们是"绛头毛面"的"妖逆"。

新野王司马歆曾试图趁张昌兵势不盛、立足不稳之机，调集大军将其剿灭。他向朝廷上表，请求允许自己发兵。然而，正在朝中专权的长沙王司马乂与成都王司马颖有矛盾，而司马颖与司马歆关系密切，司马乂早就猜疑他们俩有谋害自己、抢夺朝权的野心，此时，他也怕司马歆以征讨张昌为名，与司马颖联合起来作乱，因而拒绝批准他出兵。从事中郎孙洵对司马歆说："今日纵敌，必然留下数世的后患。明公既然肩负镇守荆州的重任，向朝廷打过招呼后即可发兵，何必一定要得到朝廷的批准呢！"司马歆听了表示同意，准备出兵，但他的心腹王绥说："张昌是个

微不足道的小贼，只须派一员偏将就足可平定，大王不必为此违背诏命，亲自出征。”司马歆最后听从了王绥的建议。

但眼见造反队伍迅速壮大，新野王内心仍是焦虑不安的，他频频向朝廷告急，称：“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率领的徒众数以万计，舞刀弄枪，锋芒毕露，所向披靡，请朝廷发大军救援。”晋廷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发兵以稳定江沔一带。长沙王司马乂让惠帝下诏，命镇西将军、河间王司马颙派雍州刺史刘沈带州兵一万人及镇西将军府的五千兵卒出征，讨伐张昌。但此时司马颙正觊觎朝中大权，对司马乂专擅朝政极为不满，心中一直在盘算如何除掉他，因而对朝廷要他出兵的命令视同耳边风，根本不予理睬。刘沈怕朝廷怪罪，没有理会河间王的阻止，自己领州兵一万人前往汉、沔之间，但到达蓝田（今陕西蓝田西）时，河间王夺去了他的兵权，迫使他仅带四百人返回雍州。

张昌的势力越来越大，朝廷又征调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刘乔和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等前去镇压。当时，刘乔屯兵汝南（今河南息县），刘弘、赵骧、羊伊等自方城（今河南南阳东北）进兵宛（今河南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晋兵队伍庞大，来势凶猛，而张昌毫无惧色，他从容指挥，分兵三路迎敌。第一路，由将军黄林为大都督，率军两万攻豫州，但进军不顺利，前锋李宫在汝水被刘乔部将李杨打败。黄林又进攻弋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光山西），因太守梁桓固守城池而未攻克。第二路，由将军马武率军进攻武昌郡（治所在今湖北鄂城），攻破武昌，杀晋南阳太守刘彬。第三路，是在马武获胜后，张昌集中诸路优势兵力围攻宛城，打败了拥有八千精兵的赵骧，杀羊伊，迫使刘弘退保梁县（今河南商丘）。张昌乘胜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新野王仓促应战，未能挡住张昌的凌厉攻势，很快兵败被杀。

太安二年六月，刘弘组织大批人马试图夺取方城，又被张昌

击败。七月，张昌派部将陈贞、陈兰、张甫等南攻长沙、湘东、零陵、豫章等郡（今湖南、江西的北部），兵锋所向，未遇敌手，晋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纮、豫章太守阎济、武昌太守刘根等先后被义军杀死。张昌的另一部将石冰东攻扬州、江州，打败扬州刺史陈徽后，扬、江二州各郡望风归顺。临淮人封云也响应石冰起义，从阜陵攻杀到了徐州。

短短三个月，张昌就控制了荆、豫、江、扬、徐五州之境，这些地区的西晋官吏或逃或降，朝廷已无力在这些地区发号施令。张昌任命了一批起义将士为各州、郡、县的官吏，建立起了自己的“汉”政权。

由于起义军没有政治经验，军队纪律也不严明，使得他们在各地没能建立起巩固的政权基础，难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晋朝统治者重新调集精兵强将前来进行大规模镇压时，起义队伍便开始瓦解了。

自从刘弘退到梁县及新野王司马歆被杀后，都督豫州诸军事的范阳王司马虓便试图把荆州纳人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派长水校尉张奕前去督管荆州。不久，朝廷任命刘弘兼领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等职，让他加紧围剿张昌。刘弘回到荆州，张奕不肯接受他的节度，领兵相抗，刘弘大怒，发兵讨伐，将张奕杀死。然后，他督领能征善战的南蛮长史陶侃、参军蒯桓、牙门将皮初等合力攻竟陵，豫州刺史刘乔也同时派将军李杨、督护尹奉等率军攻江夏。同年八月，经过连日苦战，起义军遭到重创，尤其是在与陶侃的对阵中，义军死伤一万余人，被迫投降的也有上万人。张昌逃匿于下儁山（今湖南岳阳东）。

张昌失败了，但起义的烽火没有马上被熄灭。刘弘在给朝廷的疏奏中就这样说道：“今张昌奸党初平，而张昌本人未被擒获，益州、梁州过来的流民又随时可能聚集闹事，只要有人煽动，很快就会形成沧海横流之势。”当时，在荆州的流民有十余万户，

钱粮匮乏，多揭竿造反，刘弘不得不采取柔抚手段，分一部分田地给他们耕种，并让他们中的一些能人担任某些官职。还废除了岘、方二山的湖泽中不得捕鱼的规定，让百姓自由捕鱼，尽量使民众摆脱走投无路的绝境，减少他们造反的可能性。

在刘弘、刘乔等镇压荆州流民起义的同时，扬州地区的豪强地主也在加紧进攻张昌的部将石冰统领的起义军。太安二年（303）十二月，晋议郎周玘联合前南平内史王矩在江东起兵，共推晋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并发动江东其他豪族地主武装，进剿起义军。他们攻杀了石冰任命的吴兴太守区山及其僚吏。石冰派遣的部将羌毒率军万人抵抗周玘，也兵败被杀。

石冰见局势紧张，便率军从临淮趋寿阳，使驻扎该城的都督刘准惶恐不安，幸而度支陈敏善于用兵，他分析说："这些造反的人都是被逼反的，为乌合之众，很容易打败。"他带了一支精锐队伍前去迎战，与石冰频频交锋，从寿阳战至扬州，又从扬州打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大小三十余战，最后在周玘等人的协助下，打败了石冰，石冰逃往徐州，与封云会合。陈敏随后追击，进逼徐州。永兴元年（304）三月，封云的司马张统见局势不妙，竟杀害了封云和石冰，向晋军投降，徐、杨二州的流民起义才最终失败。

在镇压石冰、封云起义的过程中，江南豪强起了骨干作用。周玘为名将周处之子，周家又世代为江东大姓，因而周玘在吴人中很有号召力。他首先在江东举兵攻石冰，掀起了一股围剿狂潮。在扬州、徐州被平定后，周玘即以所谓的"唱义"之功，受到江东士人的赞赏。顾氏为吴郡四大姓之首，也是众望所归。当时扬州管辖十一郡，除淮南、庐江二郡在江北外，其余九郡均在江南。顾秘被众豪强推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这意味着江南镇压起义的地主武装已全在他的统御之下。

在会稽郡，出自山阴（今浙江绍兴）大姓的贺循也组织了一

支人马响应周玘、顾秘等人的号召。起初，石冰派兵赶走了晋会稽相张景，让投诚的晋宁远护军程超接替张景之职，并任命其长史宰与为山阴县令。贺循起兵后，石冰的大将抗宠率几千人驻守在郡中的学堂内，成为贺循平定会稽的主要障碍。贺循借周玘、陈敏等在建康一带打败了石冰的时机，给抗宠送去檄书，进行威逼利诱，抗宠见时局不利，不得不撤军离去，使贺循得以兵不血刃就进占了山阴城。程超、宰与皆降，会稽郡的起义至此也被平息。

永兴元年秋天，张昌被晋军捕获，英勇就义。

（陈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85

《晋书》：《张昌传》、《惠帝纪》、《新野王歆传》、《刘弘传》、《周玘传》、《贺循传》

王如杜弢称雄荆湘

荆、湘一带汇集了大批来自关、陇的流民。亲自带兵镇压了张昌起义的刘弘，在他出任都督荆州诸军事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劝课农桑，宽刑省赋”的措施，不仅使当地居民受惠，也使大批流民得到安置。人们对刘弘的做法心悦诚服，一个个安居乐业，不思为乱，原来极不稳定的荆州出现了暂时平静的局面。

然而，刘弘死后，朝廷派高密王司马略继任都督荆州诸军事，情况便很快变得很糟了。司马略是司马懿弟弟司马馗之孙，从小养尊处优，自然是狂妄不羁了。他曾任安北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为了独自控制整个青州的军政大权，他逼走了刺史程牧，夺其职权。在州中他为所欲为，民愤极大，以致永兴三年(306)三月爆发了惤县（今山东蓬莱）县令刘柏根起义。刘柏根拥众数万，自称惤公，借助宗教迷信鼓动士众，被晋朝廷骂为“妖贼”。向来对朝廷不满、以膂力过人而有“飞豹”之称的士人王弥，也率家僮响应，担任刘柏根的长史。他们攻城略地，很快打下了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司马略无力抵抗，逃奔聊城。朝廷派王浚前去镇压，才杀了刘柏根，赶走了王弥。

司马略如此无能，却又被晋怀帝任命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荆州。荆州因他的到来又陷入了混乱。尽管刘弘之子刘璠继承父志，为维持江、汉间的稳定局面尽心尽力，深受民众拥戴，但他的官职只是顺阳内史，权力有限，无法扭转司马略搞乱的局势。结果，来自关中的流民王逌联合当地的叟人郝洛，聚众数

于，在冠军举起了反晋义旗。司马略派参军崔旷督统皮初、张洛等大将前去讨伐，被王逌击败。司马略又派左司马曹摅督促崔旷等人进攻。两军即将进行大战，崔旷因胆怯而临阵脱逃，使曹摅失去后援。曹摅兵败被杀。司马略连丧大将，不免惊悸焦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部将韩松自告奋勇，对出战队伍重新作了周密部署，督领崔旷等人再度进攻王逌，经过一番苦战，才最后迫使王逌投降。

司马略死于永嘉三年（309）。紧随其后来荆州任长官的是山简。山简是大臣山涛之子，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等中央要职，也是一个靠门第而不是靠能力高居显职的人。他嗜酒如命，喜好游乐，被朝廷任命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后，来到襄阳（今湖北襄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从不把如何治理好地方放在心上。荆州大姓习氏家族有非常好的花园水池，是个进行歌舞宴乐的好地方。汉高祖刘邦的谋臣郦食其是陈留高阳乡（今河南杞县）人，好饮酒，曾自号“高阳酒徒”，以表现自己的洒脱情趣。而山简也颇热衷于追求一种所谓飘逸潇洒的风度，并时常以饮酒来表现这一点。他每每来到习家的园林池畔，便摆起酒席，开怀酣饮，直至酩酊大醉，还把那里的园池命名为“高阳池”。当时人特意编了一首歌谣讥讽山简：

山公去何处，径往高阳池。
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勉强能骑马，倒著白头巾。
举鞭问随从：“何如并州儿？”

由这样一个终日昏醉的人出任荆湘诸州的军事长官，不可能给当地带来安宁。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因而一到襄阳，他就把名望甚高、深得民心的刘璠挤走，强迫他离开荆州，进京去担任越骑校尉，以免荆州民众拥戴他做当地的军政长官。山简的这一做法，引起荆州民众的极大不满，他们痛恨山简之类的豪族

横行霸道，不恤民生，怀念刘弘、刘璠父子在荆州的业绩。当刘璠离开时，流民首领侯脱、路难等还相率卫送，依依不舍。

当时，匈奴人刘渊率领的反晋大军已与晋军交战多年，队伍不断壮大，对晋廷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各地的流民因屡受朝廷的驱逐迫害，纷纷起兵，与刘渊的军队形成呼应。永嘉三年十一月，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等郡流民数万家群起攻杀长吏，焚烧城邑，随后归附了刘渊的部下王弥。晋廷认为流民散处各地是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屡次下诏，命令将流民遣返乡里，由此引起了流民更大规模的反抗。

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人王如，当时流徙于宛（今河南南阳），他与其他来自雍州的流民不愿返回正闹饥荒、残破不堪的关中，而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发兵逼他们上路，并限定了离开的时间。永嘉四年（310）九月，王如联合流民中的壮士，趁夜黑袭击山简和杜蕤，将两支晋军打得大败，占领了宛城。杜蕤加强兵力反攻，山简也派督护王万协助，与王如大战于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再次失败。山简无奈，退往夏口（今湖北武汉黄鹄山）。王如进而攻克襄城（今河南襄城）。于是，他自称大将军、司雍二州牧，攻掠于汉水、沔水间。新平（今陕西永寿到甘肃泾川一带）人庞寔、冯翊（今陕西黄龙以南、渭河以北）人严嶷、京兆人侯脱等各自起兵响应王如，攻诸城镇，斩杀地方令、长。流民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

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当时已是军事力量最强盛的政权。刘渊手下拥有刘聪、刘曜、王弥、石勒等一批悍将，让晋军望而生畏。刘渊死后不久，刘聪取得了汉王位，继续发兵进攻晋都洛阳，并派石勒渡河趋南阳，大有兼并王如之势。王如一面发兵万余人驻守襄城防御石勒，一面与试图北上赴援洛阳的山简、杜蕤及荆州刺史王澄等激战。

王如进逼襄阳，山简派部将赵同出战，但屡遭败北，不得不固守襄阳城。此时，赴援京师的王澄已率师进至宜城（今湖北宜城东南），离襄阳仅一百余里。他不知前面的战况如何，便派专使前去襄阳与山简联络。这个使者被严嶷部下捕获，严嶷了解到使者前往襄阳的目的后，便设下一个圈套。他让人假装刚从襄阳来，然后问："我军攻克襄阳了吗？"来人答道："昨天早晨就已攻克了，山简已被我们抓获。"严嶷有意让王澄的使者听到这次对话，并让看管他的人故意放松警惕，使王澄的使者得以逃回宜城。王澄听到襄阳陷落、北方的路线被截断的消息，便撤还原驻地。不久，王澄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襄阳实际上没被攻破。王澄深感惭愧，便借口长史蒋俊运粮不及时，将他作为替罪羊杀了。此后，王澄终未能再组织人马北上。困守襄阳的山简也狼狈不堪，自身尚且难保，更不用说发兵救援洛阳了。

王如驻守襄城的一万士众抵挡不住石勒的进攻，被其兼并。石勒进至宛城北面的山上，虎视眈眈地与王如的军队对峙。因王如、侯脱等人统领的军队彼此呼应，气势也很盛，石勒未敢贸然进攻。可是，王如与侯脱不久发生了矛盾，王如为了借石勒之手除掉侯脱，派人送给石勒许多珍宝车马，表示要与之结为兄弟，并劝他攻侯脱。石勒大喜，他暗想只要剿除侯脱，王如的势力就单薄多了。于是，石勒连夜发兵攻宛城，与侯脱激战了十二天，终于攻破城池。当时，严嶷得知侯脱处境危急，亲率救兵赴援，到达宛城时，该地已为石勒所有，侯脱已被收斩。严嶷陷于石勒的大军围困中，不得不投降，自此石勒兵势更盛。

石勒继续挥兵南进，攻克了襄阳及长江西岸三十余所壁垒，荆州的官军在他的猛烈进攻下迅速崩溃。石勒留部将刁膺驻守襄阳，自己亲率三万精锐骑兵回过头来攻击王如。这支队伍先趋襄城，以便寻找进攻机会。王如知道石勒的用心，也派弟弟王璃率骑兵二万五千迎接石勒，诈称犒军，实欲发起突袭。但石勒先发

制人，挥师将王璃所率骑兵全部歼灭。王如的兵势因此役而元气大伤。

不仅如此，王如还面临更为严重的现实：他所在的地区连年粮食欠收，以致他的军队粮草奇缺、军心动摇；加之起义军首领之间产生了矛盾，彼此相攻，大大削弱了各自的战斗力。当晋军再度进讨时，起义军再也没组织起有力的抵抗，王如在部众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晋朝荆州刺史王敦投降。王敦将他安置在堂弟王棱的麾下。

王如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在与王敦的诸部将比试射箭时，屡次发生争斗，王棱对王如这个败军之将如此狂妄大为不满，下令对他进行杖罚。在此之前，王敦曾有对朝廷不忠的迹象，受到了王棱的劝谏甚至指责，因而对王棱怀恨在心。当他得知王如受到王棱的处罚后，即派人劝王如杀掉王棱。王如正欲发泄满腔怒火，欣然应允。他趁王棱宴饮时，请求舞剑为乐，王棱表示同意。王如便拔剑起舞，像"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样，不时地把剑锋指向王棱。王棱非常恼怒，厉声呵斥，面王如依然如故，当王棱命令左右的卫兵前去制止时，王如已飞步上前，用剑刺入了王棱的胸膛。有人迅速把王棱被杀的消息报告了王敦，王敦故作惊讶，并立即派人逮捕王如，将他斩首示众。

王如投降王敦后，其部众并未全部向晋军缴械，其中由李运、王建率领的三千余家流民队伍从襄阳转战到了汉中。晋梁州刺史张光派参军晋邈率军前去抵抗，但晋邈收受了李运、王建等人的贿赂，双方商定不以武力相拼，由晋邈说服张光，将流民安置在汉中。张光听从了晋邈的劝说，把流民安置在成固（今陕西成固）。然而，晋邈垂涎于流民的财物，欲夺为己有，便对张光说："李运那帮人在成固不好好耕田种地，经常弄枪舞棒、打造器械，可能会图谋不轨，我们应该发动袭击，将他们全部消灭。"张光表示赞同。建兴元年（313）五月，汉中又起战火，晋邈率

军袭击了流民军，杀李运、王建。王建的女婿杨虎（《晋书》因避皇家名讳，改作“杨武”）招集余众奋起抵抗，使张光、晋邈一举消灭这支流民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双方在厄水相持。此时，汉中的氐族首领杨茂搜率领的一支劲旅成为张光与杨虎共同争取的对象，谁取得这支队伍的支持，谁就可能获胜。杨茂搜要儿子杨难敌援助张光，而杨难敌向来与张光有矛盾，他在向张光索要丰厚的酬金宝货时，张光不给，加之杨虎在给了杨难敌大量财宝后，告之流民的财物多数被张光的军队夺去了，要想发财，攻打流民不如攻打张光，因此，杨难敌决定表而上援助张光，暗中却与杨虎联合。当张光再次出兵与杨虎作战时，派长子张孟苌及晋邈率军在前，杨难敌在后，两军一交战，杨难敌便与杨虎合作，两面夹攻，大败晋军，张孟苌战死，其弟张援率众赴援时，也中流矢而死。张光收兵逃回州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固守。因连丧二子，张光悲痛不已，加上长时间遭杨虎、杨难敌的围攻，精神过度紧张，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南郑。这年十一月，杨虎占领了整个梁州。因他的势力仍较单薄，建兴二年（314）正月，他率军投奔了成汉李雄。

王如领导的雍州流民在宛城起义后不久，湘州（治所在临湘，即今湖南长沙）还爆发了以杜弢为首的巴蜀流民起义，规模之大，超过了王如起义。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有才学，被举为益州的秀才。李特在益州起义时，杜弢避乱来到南平郡（治所江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受到太守应詹的赏识，后又到长沙郡的醴陵（今湖南醴陵）担任了县令。

散布在荆、湘一带的巴蜀流民既受地方官府的欺压，又与当地居民不断发生纠纷，便在蜀人李骧的带领下，于永嘉五年（311）正月举起造反旗帜，攻杀县令，屯聚东乡（今湖北江陵西）。杜弢与南平太守应詹一起，带兵前去讨伐，将李骧打败。

接着，荆州刺史王澄又派成都内史王机率大军攻李骧，李骧处境窘迫，不得不请降。王澄假装同意受降，却又趁李骧的部众不备，出兵袭击他们的住地，杀死杀伤无数，并将他们的妻儿分赏给官兵，其余八千余人全被投入长江中淹死。王澄的暴行激起了荆、湘的巴蜀流民的愤怒，他们纷纷揭竿而起，很快有四五万家之众。

永嘉五年五月，蜀人杜畴、蹇抚率流民军活动于湘州一带。晋湘州刺史荀眺认为所有巴蜀流民都有谋反之心，扬言要将他们全部杀掉。杜弢也是蜀人，当然也属“杀尽”之列。于是，他在广大流民的拥戴下，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成为流民军首领。

杜弢首先挥师攻长沙郡，刺史荀眺支撑不住，弃城逃奔广州，但被杜弢追及擒获。晋广州刺史郭讷派始兴太守严佐、荆州刺史王机两面夹攻杜弢，湘州也在荀眺出逃后，由安成太守郭察代行刺史之权，组织人马攻杜弢，但这三路官兵均被杜弢击败。流民军在杜弢的正确指挥下，南破零陵（今湖南零陵北），北击宜都（今湖北宜昌）、巴陵（今湖南岳阳），东攻武昌（今湖北鄂城），击毙了长沙、安成、宜都、邵陵等郡的太守及衡阳内史，被斩首的县令更多，荆、湘一带燃遍了斗争烈焰。

晋军加强了对杜弢的围剿。为了保存实力，杜弢趁征南将军山简被王如打败退守夏口的时机，谎称向山简投降，山简正被流民起义扰得晕头转向，得到杜弢的请降表示后当然高兴，他马上任命杜弢为广汉太守。不久，山简死，杜弢继续率军征战各地。此时荆湘一带的反晋斗争不断扩大。天门郡（治所在今湖北天门）的“夷”人袁遂起兵驱逐了王澄任命的太守杜曾，接着打败了王澄派来讨伐的毋丘邈，自号“平晋将军”；原新野王司马歆的牙门将胡亢聚众反于竟陵（今湖北钟祥），自称“楚公”，并邀杜曾出任竟陵太守；山简的参军王冲举兵反于豫州，自号“荆州

刺史"；不久，杜曾借助王冲的军队击杀了胡亢，自领其众，称"南中郎将"。王澄夹在诸多反叛队伍中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早在惠帝末年，官至尚书令、司空、司徒的王衍见天下大乱，已预感到西晋王朝难以维持长久。为了保护王氏自家利益，他向当时执掌朝廷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建议："全国战乱不止，朝廷必须依靠各方镇平息大乱，应该选能文能武的人出镇各地。"司马越表示同意。于是，王衍让弟弟王澄出任荆州刺史，堂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并对他们俩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险固，青州有大海作为依凭，你们俩出镇这两个要害之地，我留在朝中，这样，我们王氏家族就有三个立足之地了。"在王澄、王敦离京前往方镇以前，王衍问他们有什么方略使自己牢牢坐镇一方，王敦答道："这事不好说，只能随机应变，等大事临头时再作决断。"而王澄条陈自己的策略，千变万化，显示出他擅长谈兵的特点，当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称叹。然而，他到荆州后并没有什么使该地安定的高招，既骄横刚愎，又残忍暴虐，还沉溺于饮酒博戏，当流民起义遍及荆州各地时，他才发现自己已成了孤家寡人，组织不起得力的镇压力量。他在荆州呆不住了，恰好这时初镇江东的琅邪王司马睿召他去任军谘祭酒，他便放弃了荆州，前往江东。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永嘉初年，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他本来坐镇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因中原大乱，他接受王导的建议，移镇建康（今江苏南京），积蓄力量，以便洛阳一旦失陷，他可以据江南与扰乱中原的"戎狄"抗衡。司马睿到江东后，一面拉拢当地的名门大姓，争取他们的支持，一面大量安置从中原逃到江南避难的北方士民，吸收了不少人才。永嘉之乱后，司马睿已有独保江南的志向，不断派兵平定南方各地的反叛者，包括原江州刺史华轶及周

鄹、孙弼等江南士人先后发动的反叛。因荆、湘一带民众的反叛斗争规模越闹越大，司马睿又派征南将军王敦督统武昌太守陶侃、历阳内史甘卓前去征讨，还让军谘祭酒周𫖮去荆州替代王澄，担任刺史。

周𫖮一到荆州，便遭到建平郡（治所在今四川巫山县）流民傅密的进攻。傅密还迎来杜弢的军队，共同攻打周𫖮，周𫖮固守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县南），处境十分狼狈。陶侃派部将朱伺、吴寄率大军前去救援，将流民军逼退。杜弢见武昌空虚，即挥师东进，陶侃非常紧张，急调朱伺、吴寄昼夜兼程赶回武昌，将前去进攻的流民军打败，杜弢退往长沙。陶侃派人向王敦报捷，王敦评论说："如果没有陶侯，荆州就要丧失了；周𫖮刚到荆州就被杜弢打败，他怎么能当刺史呢？"于是，王敦上表朝廷，让陶侃出任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三郡。

陶侃刚打败杜弢，颇为得意，随即移师攻杜曾。杜曾当过新野王司马歆的镇南参军，后官至南蛮司马。他骁勇善战，冠于三军，并能身穿铠甲游泳，时人对他无不敬畏，而陶侃乘胜而来，颇为轻视杜曾。司马鲁恬分析说："与敌作战，必须先对比一下双方的战将。现在你麾下没有一人在勇武方面能与杜曾匹敌，切不可轻易进逼他呵！"陶侃认为鲁恬的话灭自己的威风，长敌方的气势，根本不听。建兴元年（313）十月，他进兵将杜曾围困在石城（今湖北钟祥）。当时杜曾已兼并了王冲的部众，兵势正盛，拥有许多骑兵，而陶侃派去包围石城的军队全是步兵。杜曾悄悄打开城门，派骑兵突破陶侃的军阵，再从其背后发起猛烈攻击，陶侃军大败，许多士兵被赶下了河。接着，杜曾联合陶侃的部将王贡，先后在沌阳（今湖北汉阳）、沔口（今湖北汉口）打败了陶侃的部将郑攀、朱伺两支军队，陶侃被迫退往涢中。陶侃部下有个叫张奕的，本是中原人，元康年间被迫服兵役西征，来到巴蜀。他见荆湘一带流民起义不断，也带了三百人造反，准

备投奔杜弢，但被陶侃抓获。陶侃欲将他们杀掉，经兄子陶舆劝说，才赦免了他们，将他们编入陶舆的属下。尽管如此，张奕仍在寻找造反的机会。此时，他见陶侃兵败欲逃，故意说："贼兵将至，我军现在撤退必然导致溃败。"陶侃为此而犹豫不决，杜曾的部众追到了跟前，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水战，起义军在船上用长钩钩住陶侃所乘的大船，几乎要捕获陶侃，陶侃急忙跳上一只小船，并在部将朱伺的力战下，才保住了性命。张奕则趁乱投奔了起义军。经此一败再败，陶侃对杜曾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说："此人不死，荆州不得安宁。"

王敦因陶侃连战连败，表奏琅琊王，免除陶侃的官职，让他以平民的身份领兵征战。陶侃很不服气，与甘卓一起继续督统水陆大军十几万人前去进剿起义军。尽管舟舰盈江，旌旗蔽日，但起义军毫不畏惧。建兴二年（314）三月，杜弢派部将王真袭击林障城（位于今湖北汉阳），屡与晋军激战。起义军在船上安了桔槔，这是一种可以活动的大吊杆，一头用绳子绑上重物，当敌船靠近时，吊杆在转动中，用重物撞击敌船。起义军用这种工具击沉了晋军的许多船只。陶侃率领的水军屡遭挫折，一度陷于困境，靠勇冠三军的兄子陶舆的救援才摆脱险地。然而，陶舆不久战死，陶侃捶胸顿足地哭道："损失了我家最珍贵的宝物！"陶侃再度失败，逃奔滠水，幸遇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周访救援，才又免于一死。周访是东吴大将周纂的后代，谙熟兵法，善于征战，尤其在水战方面表现突出。他在与杜弢的水军交战时，曾让部下使用顶端带歧叉的长竿，使对方船上的桔槔不能发挥作用，从而多次取得胜利。

此后，陶侃与起义军交战多次，彼此各有胜负。由于晋军不断增兵，而起义军却兵员大减，损失很大，形势开始向不利于起义军的方向发展。陶侃因镇压起义军有功，又官复原职。

建兴三年（315）春，晋廷进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督中

外诸军事，集中兵力进剿杜弢。杜弢感到难以继续抗衡，便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本不同意，经应詹的劝说才应允。他派原南海太守王运前去受降，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然而，前去进剿起义军的一些将领不肯罢休，仍攻打杜弢的军队，试图立功邀赏。杜弢不胜愤慨，重举义旗。他杀了王运，分兵两路出击：一路由杜弘、张彦率领，进攻豫章（今江西南昌）；一路由王真率领，攻武昌。杜弘、张彦率领的军队杀了晋临川内史谢摛，占领了豫章。但不久，王敦派督护缪蕤在周访的节度下进攻张彦，将其打败。张彦在败逃中被周访率领的部众杀害。尽管起义军遭到较大损失，但晋军赢得并不轻松，主将周访的两颗门齿也被流矢射缺。而且，他们不得不撤军，与起义军隔水相对，否则难以挡住起义军的反击。

张彦死后，杜弘率军回湘州。继而进逼王敦所在的湓口城（在今江西九江），周访急忙回师救援，把起义军打退，进而围攻庐陵。起义军劫走晋军的粮草，迫使周访退往巴丘山（在今湖南岳阳）。周访在得到补充的粮廪后，才再次包围庐陵，杜弘不得不率众突围，逃奔临贺。

由王真率领的三千精兵沿武陵江顺流而下，直趋武昌。沿途吸收了许多少数族人，使队伍迅速壮大。他们拦截了给官军运粮的船只，切断其粮食运输线。陶侃考虑到与起义军硬拼难以取胜，急忙派部将郑攀、陶延带兵悄悄进至起义军所在的巴陵（今湖南岳阳），趁其不备，进行夜袭，获得了胜利，王真逃回湘城。不久，因起义军内部不和，引起军心不稳，加之陶侃拉拢王真，促其投降，大大削弱了杜弢军队的战斗力。终于在晋军的进攻下，杜弢大败于长沙，并死于逃跑途中。

在此以前，王敦曾因堂兄王澄时常对自己傲慢无礼而怀恨在心，当王澄离开荆州，途经王敦所在的豫章，前往建康担任司马睿的军谘祭酒时，王敦捏造出王澄与杜弢暗中勾结的罪名，将他

杀了。王澄的亲信王机怕也遭杀身之祸，便带门客奴仆一千余人前往广州。他父亲曾任广州刺史，深得民心，因而王机到广州后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州将温邵带兵亲自去迎接他。此时的广州刺史郭讷非常恼怒，派兵攻温邵，反被温邵打败。郭讷又派王机父亲生前的属吏领兵出击，这些人也倒戈反叛。郭讷无可奈何，只好让出刺史之位。

王机因势力单薄，怕王敦派兵讨伐自己，便与占据临贺的杜弘联合，并召温邵、交州人刘沈等一起反晋。此时，陶侃刚镇压杜弢的军队，准备到江陵去履行荆州刺史之职。荆州是个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地方，经济上也较发达，史书上称：因为这里"兵强财富，地逼势危"，所以怀野心的镇将"称兵跋扈，无代不有"。陶侃功勋卓著，又坐镇这样一处要地，这不能不引起颇有野心的王敦的嫉妒。王敦字处仲，是王览之孙，晋武帝的女婿。他生性残忍，野心勃勃，在尚未做大官时，就有人这样评论说："处仲已露出了凶恶的蜂目，但还未发出豺狼的嚎叫声。他将来要么是吞噬别人，要么是被别人吞掉。"当他督统陶侃、甘卓、周访等几路人马讨平杜弢后，他由都督征讨诸军事晋升为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有了自选州郡官员的大权。中原已经陷落，坐镇江东的司马睿已有称帝的迹象，而王敦不是一个甘愿屈居他人之下的人，在国家已乱的形势下，他也颇有专制朝廷之心，把荆州控制在自己手中，是将来问鼎朝政的重要一步。因此，他不愿让功臣陶侃再任荆州刺史，于是，调陶侃去任广州刺史，让堂弟王廙接任荆州刺史。

陶侃到达广州后，即出兵击杀了刘沈、温邵，又打败了王机。王机在出逃的途中病死，杜弘则在遭到陶侃阻击后，向王敦投降。

在陶侃受命去广州之前，他的部将马儁、苏温、郑攀对这一调动不满，而且也不愿随陶侃去广州。他们上书要求留陶侃在

荆州，王敦不同意，于是马俊、郑攀等举兵反叛，投奔了杜曾。

晋愍帝早已派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杜曾等便迎第五猗为荆州刺史，抵制王廙来任此职。愍帝死后，第五猗也不愿服从司马睿的号令，遂与杜曾联合，有兵数万。他们围攻平南将军荀崧所在的宛城多日，因周访派兵会同襄城太守石鉴救援，杜曾等才撤军。建武元年（317）九月，王敦令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陵江将军黄峻等讨伐第五猗和杜曾，在女观湖被杜曾击败，赵诱、朱轨被杀。杜曾乘胜赶走王廙，进至沔口，威震江沔。

司马睿令周访进讨杜曾，双方又激战多次，难决胜负。后周访进至沌阳，以逸待劳，与杜曾大战，终于将他打败。杜曾退往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大兴二年（319）五月，周访又派人悄悄斩山开道，袭击杜曾，再次将他打败。原投诚的晋将苏温、马俊见局势不妙，遂收捕杜曾和第五猗等，向周访投降。杜曾、第五猗先后被杀，持续九年的荆湘流民起义至此被平息。

（陈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87－89

《晋书》：《刘弘传》、《高密王略传》、《山简传》、《王如传》、《石勒载记》、《张光传》、《杜弢传》、《王澄传》、《周颉传》、《陶侃传》、《杜曾传》、《王敦传》

刘渊反晋

当南方流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北方各族人民也点燃了反晋的熊熊烈火，其中最负盛名的反晋人物是匈奴族人刘渊。

匈奴是北方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秦汉时期即已陆续内迁，不断与汉族融合。汉高祖刘邦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嫁宗室女为匈奴冒顿单于之妻，单于成了汉朝刘氏皇室的外甥。汉朝还与匈奴互约为兄弟，因而冒顿单于的有些子孙改姓了刘氏。东汉时，一部分匈奴人迁居并州（今山西一带）。随着他们的人口不断增加，魏王曹操为了便于管理，将其中的刘姓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最大，有一万余户，居于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部帅是刘豹。与刘姓匈奴相邻的，还有呼延、卜、兰、乔、郝等姓的匈奴部族，但均不如刘姓匈奴的势力大。

刘渊（字元海）是刘豹之子，在匈奴人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汉化程度深，幼年师事上党（今山西襄垣东）儒生崔游，学习《诗》、《书》、《易》等经书，博览《史记》、《汉书》等史籍，尤其喜读《左传》、《孙吴兵法》，对书中内容熟若指掌。不仅如此，他的志趣也很高，要成为文武全才，而不是一介书生或武夫。他坚持习武，身体强健，武艺超群。他说：“我很瞧不起西汉名臣随何、陆贾和周勃、灌婴，因为随、陆没有征战武略，周、灌没有治国文才。”晋武帝和王济都很赞赏他的文武才干。

刘豹死后，刘渊继任左部帅。晋武帝改匈奴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刘渊也改任北部都尉。尽管作为匈奴贵族，他与西晋统治者

的关系非常密切，但被晋朝统治者猜疑、歧视甚至压抑的情况也是一直存在的。曾有人敬慕刘渊的文武才干，先后建议让他挂帅征讨东吴和平定关陇地区鲜卑族人的反叛，均被朝廷否决，原因是他是匈奴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匈奴贵族的文化程度未必比汉族官僚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决不会高于汉族官僚。他们愤慨地说：“过去我们的先人与汉朝人约为兄弟，彼此平等相待。而现在，单于虚有其名，下属的诸侯王也如同编户平民。”他们的不满情绪，导致了造反密谋的酝酿。

匈奴族的劳动人民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为沉重。他们像奴隶一样被汉族官僚肆意驱使、贩卖，对晋王朝的统治充满了仇恨，因而在一些失意的匈奴贵族鼓动下，多次起兵造反。泰始七年（271），右贤王刘猛率众反晋，侵扰并州，被监军何桢镇压。元康四年（294），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杀长吏，战斗了三个月，兵败降晋后被冯翊都尉杀害。其弟郝度元又于元康六年（296）联合冯翊、北地的马兰羌、卢水胡再度起兵，杀北地太守张损，先后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和雍州刺史解系，引起关陇一带氐羌族人的同声响应。尽管这次起义不久也告失败，但此后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浪潮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尤以匈奴人的反晋势力对晋朝构成的威胁为大。

早在惠帝继位初年，专权的杨骏为了争取地方知名人士的支持，曾拜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年，由于相继发生多次匈奴人的反叛，刘渊被朝廷免了职，这更加深了他与朝廷之间原有的矛盾。

此时，司马氏诸王之间的内战越演越烈，永兴元年（304），已夺得中央权力、升为皇太子的成都王司马颖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以对付别的藩王的武力进攻，他任命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随自己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留在并州的匈奴

左贤王刘宣（刘渊的堂祖父）见天下已乱，司马氏骨肉相争正酣，南方流民起义相继兴起，预感到这是推翻晋王朝、振兴匈奴族的天赐良机，便聚众准备起事。他派人潜入邺城，把密谋告诉了刘渊，刘渊也早已看出这是举兵称雄的好机会，便找借口要求回并州，而司马颖不同意。刘渊派人转告刘宣，让他组织匈奴五部及其他部族，准备起兵，以援助司马颖为名而行反对司马氏之实。

这年七月，司马颖在打败以东海王司马越为首的诸路兵马后，又遭到幽州刺史王浚、东嬴公司马腾的军队的猛烈进攻，邺城岌岌可危。刘渊趁机提出把匈奴五部的兵力调来与王浚、司马腾作战，司马颖信以为真，便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八月，刘渊回到了匈奴五部聚集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他没有率部众去救援司马颖，而是举起了反晋大旗，被部下尊为大单于，前来投奔的人不绝于道，二旬之间，聚众五万，建都离石（今山西离石）。

司马颖的振武将军王育一向很敬重刘渊，见刘渊离开邺城后迟迟不归，便向司马颖表示愿意去催促。这王育是个以讲义气和有胆识著称的人物，他出身贫寒人家，从小给别人当牧童。因他放羊时过于专心读书识字，丢失了几只羊，不得不上街卖身以赔偿。同郡的许子章很赏识他的个性，便为他赔偿了羊价，还带他回自己家，供给他衣食及读书的费用，把他培养成了很有学识的人。后来，他被京兆太守杜宣录用为主簿。不久，杜宣因受排挤，被降职为万年县令。杜陵县令王攸来到万年，杜宣没有出城迎接，王攸发怒说："以前你是太守，我得敬重你。现在你与我一样，都是县令，你不出来迎接，难道还想与猛鹞对小雀一样对待我吗？"王育在一旁听了，拔刀厉声喝斥："我府君无罪降职，犹如日食月亏，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你见人家被贬职就敢侮辱他，是不是以为我手中的刀太钝了？"要不是杜宣死死抱

住王育，王育就杀了王攸，这件事使王育名声大振，时人非常赞赏他。

王育来到刘渊营中，催他出兵援救司马颖。此时邺城已被王浚、司马腾联合鲜卑人攻破，司马颖挟惠帝逃奔洛阳。刘渊考虑到自己既已表示要带兵救援司马颖，就不应自食其言。在王育的催促下，他准备让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前去讨伐鲜卑人。而刘宣等人一再劝他不要为虎作伥，应该联合鲜卑、乌丸等族共同对付摇摇欲坠的晋王朝。刘渊听后改变了主意，他认识到这是称王的极好机会，说："称王称帝并不是命定的，谁主持正义，谁就能号令天下。我现在统领的队伍与晋军相比，无不以一当十，推翻晋王朝，犹如摧枯拉朽。我应该成为高山峻岭，而不是山丘土堆!"他不仅回绝了王育转达的赴援指示，而且劝王育留在了自己的军中，任命为侍中、太傅。

为了争取广大汉族人的支持，刘渊宣布要为刘汉灭亡雪耻，消灭司马氏晋朝。他追尊三国蜀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祭祀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将自己与汉代刘氏皇族牵扯在一起。永兴元年（304）十月，他迁都左国城，仿刘邦曾称汉王的旧例，自称汉王，建国号为"汉"，改元元熙。

刘渊是个很注重吸收人才的人，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中有文韬武略的人，他都尽量加以重用，前面提到的王育被刘渊争取过来，便是一例。当然，不是每个人才都能轻易被收到他的帐下来。刘渊为左贤王时，曾召匈奴后部人陈元达与自己共事，陈元达未应命。刘渊称汉王后，有人对陈元达说："你过去回绝了刘公的邀请，现在可能要遭殃了。"而元达笑道："我知道他的为人，不过三日，必有喜讯传来。"那天傍晚，刘渊征召元达为黄门郎的驿书果然到达。元达在刘渊及其子刘聪后来的征战中，屡次献计献策，并且敢于诤谏，为刘氏父子立下了很大功勋。此外，像羯人石勒、汉人王弥等风云人物，后来都成了刘渊

的部下，也是刘渊广为收罗人才的例子。

司马颖逃奔洛阳后，司马腾被任命为平北将军。他在并州时时感到刘渊对自己是个很大的威胁，便派大将聂玄前去讨伐，但聂玄被刘渊打败。刘渊乘胜进军，把司马腾赶出了并州。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再次派司马瑜等率军攻刘渊，在离石一带大战四次，结果每战皆败。刘渊乘胜追击，司马腾无力抵抗，不得不向鲜卑人求援，鲜卑酋长拓跋猗㐌派骑兵数千赴援，才使司马腾免于一死。

就在这个时期，北方又出现新的反晋力量。成都王司马颖被打败后，废去了皇太弟称号，被遣归府第，不得再预政。河北人对他的际遇深表同情，因而于公元305年夏天聚集在他原来的部将公师藩麾下，反对当时把持朝政的司马越、司马腾等。公师藩自称将军，有众数万，向邺城进攻，沿途连连攻克郡县，杀死晋朝的阳平太守、汲郡太守等。此时坐镇邺城的宁北将军司马模惶恐不安，因为公师藩正在步步逼近，而邺城内也有人准备倒戈响应公师藩。幸而广平太守丁绍与范阳王派来的兖州刺史苟晞率军赴援，才保住了邺城。公师藩又转战平原、清河等郡，杀太守王景、冯熊等，但不久败于苟晞，被杀。

在公师藩称将军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人石勒和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汲桑从马牧（在今山东茌平）率数百骑前去投奔。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刘灵也聚众起事，自称将军。光熙元年（306）三月，又有东莱惤县（今山东黄县西南）县令刘柏根的起义，东莱豪族出身的王弥率家僮响应，攻城掠地，连败官军。刘柏根失败后，王弥逃入广山继续战斗。

公元306年秋，广武侯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原并州刺史司马腾则因难以在并州继续与刘渊抗衡，调离该地，前往邺城担任都督邺城守诸军事。刘琨刚到并州，刘渊即派大将军刘景前去袭击，但未能阻止刘琨，刘琨入据晋阳（今山西太原）。

面对北方各地反晋力量不断发展，晋王朝疲于内争外斗的形势，刘渊的侍中王育、刘殷指出：“殿下不应该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并州这一块小地方，而应该四处出兵，先看准时机铲除刘琨，平定河东，再挺进关中，定都长安，然后可以挥师以风卷残云之势攻下洛阳，成就帝王之业。”刘渊听了大喜，采纳了他们俩人的建议，开始四出征战。

尽管刘琨时常派奸细打入刘渊的部众中，离间其不同族属的人，并且在晋阳招徕、安顿流民，组织他们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吸引了不少各族士民，但由于刘渊的强大兵力的不断侵扰，并且刘琨也无法有力地统御属下的庞杂民众，使他很难对刘渊构成真正的威胁。往往一天之中，从各地甚至包括刘渊的队伍中投奔到晋阳的人数有好几千，而离去的人也不绝于道，数量与来者接近。在多数时候，刘琨只是困守着晋阳这座孤城，无力向外扩张。城中百姓到城外农田里去进行耕作，都要随身携带盾牌和刀枪，牵上配有马鞍、弓箭的战马，否则难保自己的安全。晋阳多次遭到围攻，有一次被围困多日，造成粮食紧张，城中军民人心惶惶。刘琨无可奈何，便在月夜登上城楼发出长啸，让人产生凄凉之感，后又吹起胡笳，让围城的士兵产生思乡之念，这才使刘渊的军队自动地撤退离去。

随着刘渊的势力的发展，他成了北方最强大的反晋首领，与晋军的交战中屡次获胜。与此相反，其他几支反晋队伍则屡遭挫折。永嘉元年（307）八九月间，汲桑数次被苟晞打败。他曾斩杀司马腾，当他落难逃到乐陵（今山东乐陵南）时，被原来跟随司马腾从并州东迁的并州大姓田兰、薄盛杀死。石勒在汲桑失败后投奔了上党的胡部大（胡人一部之长）张訇督、冯莫突。因张訇督、冯莫突兵少难以独立，在石勒劝说下，他们一起于这年十月投奔了刘渊。纵横于青、徐一带（今山东东部、南部及安徽北部）的王弥、刘灵也遭到晋军的围剿。王弥一度有众数万，于永

嘉元年二月攻杀了长广、东牟二郡的太守。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公车令鞠羡为东莱太守，率军前去征讨，也被王弥击杀。但后来，王弥被镇守青州的苟纯打败。苟纯是青州刺史苟晞之弟，苟晞以残暴狠毒闻名，被人称作“屠伯”，而苟纯之凶狠又超过其兄，以致民间流传着“小苟酷于大苟”的说法。他们还惯于征战，曾一起镇压了拥众五六万的顿丘（今河南濮阳北）太守魏植率领的流民起义。王弥是个很有文武韬略的人物，也打败过苟晞，但最终败在了苟纯手下。与此同时，以“力制奔牛、跑及奔马”著称的刘灵，虽驰骋赵、魏，称雄一时，也败于晋征虏将军王赞之手。王弥、刘灵失败后无处可安身，王弥便邀刘灵一起去投奔刘渊，他说：“晋兵仍很强大，以你我之力尚难与之抗衡，现在只有去以刘渊为靠山。过去我在京城时与他有交情，他现在称汉王，晋军对他无可奈何，我们应该去投奔他。”刘渊得知王弥也来投奔，大喜过望，他引用刘邦对韩信说过的话说：“我得到将军，如鱼得水。”

刘渊吸收石勒、王弥到自己麾下后，队伍更加壮大。他便发兵四处征战。永嘉二年（308）正月，他派刘聪等十将南下攻取太行（今山西晋城南），派石勒等十将东出攻赵、魏（今河北南部）。他们在各地与官军发生激烈战斗。石勒攻入冀州，与幽州刺史王浚交锋，王浚派鲜卑人文鸯将石勒打退。石勒挥师南下，进攻南阳。刘渊又指挥刘聪、刘曜、王弥等攻入汲郡（今河南新乡、汲县、辉县、修武一带），对晋都洛阳构成威胁，经晋军全力抵抗，刘渊占领了顿丘（今河南濮阳、内黄、南乐、范县一带）、河内（今河南沁阳、武陟一带）二郡的一些地方。王弥还东攻青、徐、兖、豫四州之境，所向披靡，后又进克许昌，挺进洛阳，司马越急调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卫京师。这年五月，王弥在洛阳城南的伊水北岸击败官军，遂入屯洛阳城南的津阳门外，京师为之大震。在此之前，凉州刺史张轨也派了北宫纯等人

率凉州兵马赴援京师，当王弥兵临城下之际，北宫纯挑选了百余名勇士突袭王弥军阵，获得成功，王弥急忙带领乱了阵的军队东撤，在七里涧被晋将王秉率领的军队追及，再次被打败，不得不渡河北走。北宫纯又率军乘胜攻打在河东郡（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南部地区）的刘聪，将其击败。当时京师一带的人对凉州来的将士非常赞赏，编了这样一首歌谣夸赞他们的勇猛慓悍：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凉州鸱苕，寇贼消；

鸱苕翩翩，吓死人。

尽管晋王朝借助凉州兵马暂时保住了京师，但在并州、冀州一带却无力阻止刘渊的进军。而且，刘渊挥师南攻京城的危险依然存在，晋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防备手段及卫戍军队。永嘉二年七月，刘渊攻克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平阳太守宋抽弃城逃回京师。刘渊继续南进，河东太守路述试图阻挡，力战阵亡。为了使南征更方便，刘渊把都城从左国城迁至蒲子（今山西隰县）。这时，慑于刘渊威力的上郡（今陕西北部）鲜卑陆逐延、氐族酋长单征等，率部众前来投奔，使刘渊气势更盛。九月，石勒、王弥围攻邺城，晋征北将军和郁弃城出逃。为了确保洛阳的安全，晋廷分兵把守京城附近各军事要地：豫州刺史裴宪驻扎白马（今河南滑县），防备王弥；车骑将军王堪屯驻东燕（今河南延津东北），以防石勒；平北将军曹武屯守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以备刘渊从蒲子南下。在此之前，东海王已带兵驻守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与裴宪、王堪两军成犄角之势。这看似严密的防线，并不能真正使洛阳摆脱危机的阴影的笼罩，刘渊手下精兵强将如云，早已使官军失去了斗志。

这年十月，刘渊在平阳称帝，改元永凤。他下令各路人马继续攻晋。十一月，石勒、王弥、刘灵、刘曜等率众三万攻魏郡、汲郡和顿丘，百姓望风归附者五十余垒，石勒等选其强壮者五万

人为军士。他们再次攻下邺城，在城西北的三台杀魏郡太守王粹。

因蒲子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刘渊于永嘉三年（309）正月迁都平阳，他认为平阳是唐尧旧都，是振兴王业之地，而且史书上说汉代刘氏帝室是唐尧后裔，刘渊可以借此进一步宣扬自己是刘汉帝室的继承人，以加强自己的号召力。

三月，刘渊又发兵攻晋。他任命石勒为安东大将军，攻克巨鹿（今河北晋县西南）、常山（今河北正定），众至十余万人，威震河北。当时，晋左积弩将军朱诞向刘渊投降，他透露了洛阳守备薄弱的情况，劝刘渊直接进兵洛阳。刘渊大喜，即任命朱诞为前锋都督，并让灭晋大将军刘景任大都督，率军攻黎阳（今河南浚县西南），进而攻克延津，打败王堪。刘景下令将俘虏的军民三万余人全部淹死在黄河中。前线的战况传给刘渊后，刘渊对刘景滥杀无辜的行为非常愤怒，说："我所要剪除的是晋王室司马氏，普通百姓有何罪过，也遭此大难？"他降了刘景的职。

刘渊还任命王弥为征东大将军，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让他与石勒、刘聪合力攻壶关（今山西黎城东北）。刘琨遣护军韩述、黄秀前去救援，但二人先后被刘聪、石勒攻杀。壶关是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司马越为了不让刘渊控制这一要塞，急忙派遣淮南内史王旷督统施融、曹超等大将率军数万人赴援。王旷一渡过黄河，便决定长驱直入，施融劝道："我军虽然人多气盛，但毕竟是孤军深入，应该充分利用地形变化，依凭河流稳步前进，以免让对方依靠险要地形袭击我们。"王旷怒斥道："你想给我这支强大的队伍泼冷水吗？"施融见他根本不听自己的忠告，不禁暗自长叹："敌方善于用兵，而王旷根本不懂兵法，看来我们是必败无疑了。"当这支军队行至太行山中的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一带时，与刘聪的军队相遇。双方经过一场大战，王旷军大败，施融、曹超皆阵亡。刘聪乘胜攻克屯留、

长子二县，杀死官兵一万九千余人。晋上党太守庞淳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不得不献壶关降汉。

但汉军并非每战必胜，有时也遭惨败。永嘉三年八月，幽州刺史王浚派部将祁弘与鲜卑段务尘联络，召来十余万骑鲜卑兵，在飞龙山（今河北石家庄西南）大败石勒，汉军被杀一万余人。九月，刘渊子刘聪又遭惨败。刘聪是奉命与王弥等一起去进攻洛阳的，他们最初所向披靡，连战连胜，在浚仪（今河南开封）击败前来抵抗的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然后长驱至宜阳，平昌公司马模遣淳于定率军从长安前去讨伐，也被刘聪击败。刘聪因屡次胜利而骄傲轻敌，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后发动夜袭，大败刘聪军，刘聪逃回平阳时，刘渊为这次失利而特意穿了一身白服装以示哀悼战死的将士，并亲自出城迎接这支败归的军队。

朝廷以为汉军失败后，不会马上再来进攻。没想到这年冬天，刘渊又遣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进攻洛阳。他们在打败城外围的守卫部队后，进屯洛阳城西面的西明门。晋将贾胤、北宫纯等率千余人发起夜袭，击杀了汉征虏将军呼延颢。刘聪大怒，移师到城南的宣阳门，并命刘曜屯驻城东上东门外，王弥屯驻城西的广阳门外，刘景屯驻城北的大夏门外，四面围攻洛阳。为了取胜，刘聪竟然前往嵩山祈祷，请求天神地祇相助，留部将呼延朗督统宣阳门外的驻军。东海王司马越决定趁虚而入，他派参军孙询等率劲卒三千出宣阳门，袭杀了呼延朗，把驻扎在那里的军队打得四散而逃。王弥见洛阳城坚固，一时还难以攻克，在刘聪从嵩山驰还后即向他建议退兵，此时刘聪又接到了刘渊召他还师的指令，才不得不率军返回平阳。

刘聪返回平阳时，王弥留在兖州、豫州一带积蓄力量。这年十一月，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诸郡的流民纷纷起兵杀郡县长吏，随后全归附了王弥，王弥从中吸收了二万多将士。

永嘉四年（310）二月，王弥以三万兵士会合石勒军，共攻徐、兖、豫州。他们袭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兖州刺史袁孚战败后被部下杀死。其后，石勒乘胜进攻仓垣，杀了王堪。又北渡黄河，连陷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这些地方分布在今河北东南、山东西北），收降了九万余人，俘获晋汲郡太守胡宠。接着，石勒又挥师再渡黄河，南攻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太守裴纯弃城南奔建邺。这样，晋都洛阳的东北面已没有什么力量作为屏障了，洛阳岌岌可危。

这年七月，刘渊在平阳病死。尽管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未能亲眼见到晋王朝的垮台，但他所开创的蓬勃向上的局面，已为刘汉灭西晋奠定了基础。就在他去世后不到一年，汉军终于攻克了洛阳，俘走晋怀帝，实现了刘渊打垮西晋司马氏的宿愿。洛阳失陷后，西晋王室在颠沛流离中苟延残喘，维持了数年，最终没有免于被刘汉攻灭的命运。

（陈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85—87

《晋书》：《孝怀帝纪》、《刘元海载记》、《石勒载记》、《新蔡王腾传》、《南阳王模传》、《刘琨传》、《王弥传》、《荀晞传》

石勒驰骋中原

在西晋末年诸多反晋人物中，石勒无疑是最为活跃、最令官军生畏的虎将。他以自己杰出的才干、敢斗敢闯的勇气赢得了部下的敬仰，也使晋朝军队在他面前一败再败。刘氏汉国之所以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推翻西晋王朝，置司马氏君臣如掌中玩物，是与石勒四处征战立下的汗马功劳分不开的。

然而，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在其年轻时，却并不得意，而是屡遭磨难，备尝艰辛。他本名訇，出身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的羯族人家庭。羯人尚武，石勒从小就受到习武风气的熏陶，善于骑射。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做羯人部落中的小头目，石勒年岁不大就时常代父亲统摄其部众，并以自己的出众体魄、胆识和武艺赢得许多人的佩服。晋朝宰相王衍也早已发现石勒不同寻常。石勒14岁时曾与同乡结伴到京城贩卖物品。京城毕竟与偏僻的武乡不同，那繁华的街市，衣着绚丽的贵人，无不使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感慨、叹息，石勒站在东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那缤纷华贵的一切，不禁仰天发出了悠长的啸声。魏晋时的文人雅士好以长啸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趣或心境，或清高脱俗，或清悠凄凉，或兴奋高昂。石勒在上东门的长啸，无疑包含着他不满现实的感受及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现实的自信。石勒长啸，恰好让经过上东门的王衍听到了，他回头对左右的人说："我看刚才那个发出长啸的胡儿是个胸怀大志的人，说不定将来会成为我们国家的祸患。"他急忙派人前去捕捉，因石勒溜得快而免遭大难。

随着石勒年龄的增长，他的英雄气概愈益表现出来，一些年长者称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前途无量，劝同邑的人敬重他，但由于石勒仍处在社会下层，多数人笑话他故作姿态，不可能有发迹之日。只有雇佣他耕作农田的郭敬、宁驱对他了解较深，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长期供给他食宿。

由于少数民族长期受到晋朝统治者歧视和压迫，也由于连年灾荒，当并州出现饥荒时，大批少数族人流亡他乡就食，石勒也在其中。他曾去雁门（治所在今山西代县西）谋生，后来返回阳曲投靠宁驱，适逢晋北泽都尉刘监正搜捕逃难回乡的人，以当作奴隶卖掉，从中获利。石勒在宁驱的保护下，躲过了这一劫难。但这样藏匿也非长久之计，他不得不另谋出路。当他准备去投靠纳降都尉李川时，途中遇到了阔别多时的郭敬。石勒对他言及自己饥寒交迫之苦，四处奔波之艰，不禁感叹欷歔。对于石勒的处境，郭敬也无可奈何，只能把随身携带的一些食物送给他暂时充饥。郭敬还对石勒说："在朝廷推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情况下，你投奔纳降都尉，也未必能摆脱困境。"石勒感到此言有理，便打消了投靠他人以求庇护的想法，准备靠自己的努力寻求活路。就在这时，晋建威将军阎粹向并州刺史司马腾提出的一个建议，又把石勒推向了深渊。阎粹说："如果我们把在并州的各少数族人逮起来，押往冀、青、兖等州（今河北南部及山东大部分地区）贩卖，既可从中得利，又可为那几个州的军队送去兵员，还可消除这些人在我们并州造成的混乱。"司马腾大喜，即派部将张隆、郭阳抓获了大批"胡人"，押往东方，当时年仅20余岁的石勒也在其中。他们每俩人戴一副枷锁，行动极为不便，同时还不断受到押送者的凌辱，有的人在半路上就被折磨死了。石勒一路上也吃尽了苦头，幸而押解人中的郭阳、郭时是郭敬的亲戚，临行前，郭敬即千叮咛万嘱托，请他们沿途照顾石勒，因而尽管石勒也多次受到张隆的虐待，但能熬过饥饿疾病的磨难，是

与郭阳、郭时的帮助分不开的。

石勒青年时期的经历对他的后半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后来刚毅勇猛的行动中，而且从他冷酷无情的个性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对司马氏王朝的无比愤恨，使他百折不挠，必欲置晋朝统治者于死地而后快。可是，在他摧毁一座座西晋统治者盘踞的堡垒的时候，他把原来西晋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锋刃所向，不仅是汉族地主阶级，也往往危及广大汉族民众的生命。当我们从史籍中看到成千成万的中原士民倒毙在他的军队的铁蹄下时，我们不能不对晋朝统治者推行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导致如此恶果而愤然、切齿。

石勒来到冀州，被卖给茌平（今山东茌平）人师懽为奴。他在农田耕作时，常与别的奴隶谈论用兵之道。师懽得知后，感到石勒很不寻常，便免去了他的奴隶身份，允许他自由进出庄园。与师懽家毗邻的马牧场，有同样来自并州的汲桑在那儿牧马，石勒因善于相马而与汲桑混得很熟。

石勒后来跑到武安临水（今河北磁县）去给人家帮佣，在外被邺城的巡逻骑兵逮住。幸而有一群鹿从旁边经过，这些骑兵竞相去追赶，使石勒得以趁机逃脱。从此以后，石勒深深感到在这个乱世上即使安分守己，也难以平安度日。他开始酝酿造反。在汲桑的支持下，他挑选了一批骏马，召集王阳、支雄等十八人组成一个小团伙，号称“十八骑”。他们劫富济贫，出没于山野水泽之间，逐渐成为当地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

永兴元年（304），司马颖在兵败邺城、被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挟持到长安后，被革去了“皇太弟”称号，以“成都王”之名禁锢在家。邺城由平昌公司马模坐镇。永兴二年七月，对晋朝统治深感不满的司马颖原部下公师藩，打着拥护司马颖的旗号，举兵反晋，纵横于赵魏之间，攻杀郡县守令，并向邺城进军。石勒见公开反晋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汲桑一起，率数百名

牧人骑马前去参加公师藩的队伍。公师藩见石勒打仗勇猛，任命他为前队督，让他一起进攻邺城。

眼看邺城要被攻破了，广平太守丁绍和范阳王派遣的兖州刺史苟晞分别率援兵到了，城内司马模也令将军冯嵩出兵，三路夹攻，将公师藩打败，公师藩只得暂且退兵，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转攻平原、清河等郡（今山东西北部）。不久，公师藩被苟晞攻杀，汲桑与石勒藏匿在马苑中才免于一死。此后，汲桑自立门户，称大将军，率领山野贫民，攻打郡县，并把被官府关押的囚徒解救出来，吸收为兵。石勒是他的前锋，因屡立战功而担任了扫虏将军，这“扫虏”意为扫除西晋统治阶级，表现出对当政者的蔑视。

自从东海王司马越挥师攻入长安、迎惠帝还洛阳后，成都王司马颖逃离了关中，潜至朝歌（今河南淇县）。光熙元年（306）九月，顿丘太守冯嵩逮住了他，送往邺城。不久，范阳王司马虓的长史刘舆将他杀死。次年五月，汲桑和石勒以讨伐司马越、司马腾，为司马颖复仇为名，向邺城进军。石勒任前锋都督，先打败冯嵩，扫清了进攻邺城的障碍。坐守邺城的司马腾起初对起义军的兵势不以为然，说：“老子在并州呆过七年，刘渊的军队围困了我多少次，可从未攻破我的城池。汲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贼，何足挂齿！”当起义军兵临城下时，司马腾这才手忙脚乱了。他在邺城聚敛了许多财物，但因为吝啬，他以前总是舍不得赐与部下。直至汲桑大军来临，邺城危在旦夕，司马腾才忍痛赐给每个将士数升米、丈余布帛，但广大将士并不为他卖命，因而邺城很快被攻破，司马腾率轻骑出逃时被杀。

汲桑和石勒占领邺城后，又进兵乐陵（今山东博关），杀幽州刺史石尟，又打败前来救援的五万“乞活军”。其后与苟晞相持于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阳平（今山东莘县）一带，历时数月，经过大小三十余战，双方不分胜负。东海王司马越怕苟晞

战败，又调遣大军为其后援，屯驻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苟晞部下有了后援，士气大增，终于打败了汲桑和石勒，乘胜攻下邺城。汲桑损失部众一万余人，不得不逃奔马牧，不久被杀，石勒则逃往乐平（今山西昔阳西南），准备投奔反晋著名首领刘渊。

上党（今山西长治）有一支数千人的反晋队伍，首领是张訇督。刘渊曾多次召他联合起来反晋，他不听。石勒先投靠了张訇督，取得了他的信任，然后给他分析形势，建议他投靠刘渊。石勒问："刘单于召你共同灭晋，你不同意，难道说你有足够的力量独立么?"张訇督回答说不能独立。石勒又说："你既然无法独立，就应该找靠山。如今刘单于势力最大，投靠他是上策。"于是，张訇督的部众成了石勒投奔刘渊的见面礼，刘渊很高兴，任命他为辅汉将军。

乐平也有一支两千人的反晋武装，首领是乌丸人张伏利度，他也多次拒绝刘渊的联合建议。为了争取这支队伍，石勒自告奋勇，假装得罪了刘渊，逃出来投靠张伏利度。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在这支队伍中很卖力气，时常率将士出征，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使伏利度的部众对他非常崇拜。石勒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后，便在一次宴会上，趁伏利度不备，令人将他抓了起来，并当着他的部众大声问道："我们这些人是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而聚集在一起的。干大事应该有合适的首领，你们看我与伏利度谁适合当首领?"众人一致认为石勒更善于带兵打仗，理应为首。于是，石勒夺了伏利度的权，率领这支队伍回归了刘渊。刘渊为此而升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

永嘉二年（308）正月，刘渊派石勒、刘聪各率十员大将分两路出击，石勒这一路东攻赵（今河北赵县、临城一带）、魏（今河北磁县、临漳、广平一带）。尽管石勒最初一度在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被晋幽州刺史王浚打败，但后来在其他地方的进

军势如破竹，连战连胜。九月，他与王弥合力攻邺城，晋征北将军和郁弃城出逃。十一月，他与刘灵带兵三万进攻魏郡（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汲郡（今河南林县、新乡一带）、顿丘（今河南濮阳、内黄、范县一带），杀魏郡太守王粹，还在望风归附的百姓中精选了五万强壮的人入伍，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石勒的军队军纪严明，无人敢侵扰百姓，因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欢迎。

石勒非常重视延揽人才。永嘉三年（309）春，他进攻巨鹿（今河北晋县西南）、常山，部众发展到十余万人，他从中挑选了一批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君子营，充分发挥他们在征战过程中提供智谋策略的作用。他还以刁膺、张敬两位能人当自己的助手，夔安、孔苌为亲信，支雄、呼延莫、桃豹等为大将，组成一个得力的指挥集团。尤其是他选择张宾当自己的谋主，更使自己如虎添翼。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人，父亲曾做过中山太守。张宾从小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他广泛地涉猎了多种经书史籍，学识渊博，志向宏远，时常感叹说："我的鉴识和谋算水平不比张良低，可惜没遇上汉高祖那样的明主。"永嘉初年，石勒为刘渊的辅汉将军，挥师征战河北各地，所向披靡，赫赫声威闻名远近，引起了张宾的注目。张宾说："当今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竞相逐鹿中原，就我所知道的这些人物中，石勒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他虽是胡人，但将来一定会做成一番大事业。"于是，张宾提剑来到石勒的军营门前，大声要求石勒召见，石勒当时对他并不在意，只是觉得他投奔自己的热情很高，便收留在帐下。在随后的征战中，张宾的才干渐渐显露出来，只要按他的智谋行事，没有不获胜的时候，这使石勒既惊奇又高兴，他拜张宾为谋士，并常对人说："助我干成一番大事者，非张孟孙莫属。"

石勒不仅自己才干超群，而且有了一班谋士和武将，并能让他们个个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因而他的威名与日俱增，并州北

部山区的各少数族人纷纷前来归附，使他的军队成为刘渊属下最得力的队伍之一。

永嘉三年夏，石勒与刘聪、王弥攻壶关（今山西黎城东北），石勒率七千人为前锋。当时的形势是，并州的多数地方已为刘渊所有，晋军仅困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到壶关一带的少数孤城中。用晋并州刺史刘琨的话说，就是“到处都有成千成万的胡人，漫山遍野，官兵只要一出城，必然受到骚扰；只要举目四望，必能看见贼寇。”尽管如此，他们之所以还能在并州站住脚，就因为壶关仍在其控制之下。壶关是晋阳通往冀州及都城一带的重要关口，其地山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并州的晋军主要通过这里保持与东面南面各州的联系。一旦这里失守，晋阳就会成为孤立无援的城市，难以持久地守住。因此，在得知汉军进攻壶关的消息后，坐镇晋阳的刘琨急遣护军黄秀等前去救援，在京城的东海王司马越也急调淮南内史王旷率军数万赴援。但黄秀在到达壶关之前，即被石勒攻杀，王旷也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被刘聪击败。石勒乘胜直捣壶关，晋上党太守庞淳无力相抗，献关投降。

这年八九月间，石勒率军攻人冀州，一度被幽州刺史王浚联合鲜卑段务尘大败于飞龙山（今河北石家庄西南），不得不退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随后他重整旗鼓，再度进攻那些原未攻克或已攻克而又反叛的城堡壁垒，很快攻陷三十余座，所到之处无不望风而降，遂进克信都（今河北冀县），杀冀州刺史王斌。朝廷急派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从洛阳率军前去讨伐，石勒回师迎击，将其击退，裴宪败逃淮南，王堪退保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石勒继续南下，渡河攻陷白马（今河南滑县）。白马是黄河南岸的要津，与黄河北岸的黎阳津相对应。朝廷曾在此置重兵防御石勒，给石勒的进军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当石勒攻下这一军事要地后，即坑杀了俘获的士民三千余人，以发泄其心

头之愤。

永嘉四年初，石勒与王弥的三万余众会师，东攻徐、豫、兖诸州。他先后攻杀兖州刺史袁孚和车骑将军王堪，然后再次挥师渡河入冀州征战，收降了九万余人。当他重新渡河时，荥阳太守裴纯因无力抵抗而逃奔建邺（今江苏南京）。石勒又与刘聪合兵攻河内郡，陷武德，杀晋冠军将军梁巨，并坑杀投降的官兵一万余人，河北诸壁垒坞堡闻之大惊，纷纷向石勒请降。

石勒还与刘聪、刘曜率大军包围了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晋河内太守裴整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向京城求援。朝廷派征虏将军宋抽前去救援，但这支援军遭到石勒拦截，宋抽战败身亡。怀县城内的一些人见城池难以继续坚守下去，便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将裴整抓了起来，送往汉军营中投降了。

正当石勒全力攻晋之时，汉国发生内讧，延缓了攻晋斗争的进程。永嘉四年七月，刘渊去世，由子刘和继位。刘和对弟弟刘聪手握十几万强兵、权势太重很不放心，即位没几天便派兵攻刘聪，结果兵败被杀，刘聪即王位。

永嘉四年十月，刘聪命刘粲、刘曜等率师四万攻洛阳，当时石勒被任命为并州刺史、汲郡公，从重门率二万骑兵前往大阳（今河南三门峡北）与刘粲会师。他们打败了东海王司马越府中的“清才”裴邈，然后分兵两路向京城推进。但石勒在仓垣被晋陈留太守王讃打败，攻京城的行动因此而暂时受阻。于是，石勒挥师南攻襄城郡（今河南襄城、郏县、舞阳一带），以控制洛阳南面的区域，使洛阳陷于汉军包围之中，襄城太守崔旷试图抵抗，被石勒攻杀。

当时王如、侯脱、严嶷等正率起义的流民活动于南阳、襄阳一带，石勒在长时期的征战中，兵势越来越盛，他逐渐产生了雄据江、汉，独立于刘汉国之外的念头。尽管他的谋臣张宾一再劝谏，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不听。他先兼并侯脱、严嶷之众，打

败王如，继而威胁长江以南。已移镇建邺的琅邪王司马睿为了确保江南的安全，派王导率大军前去抵抗，石勒因军粮运输跟不上，加之他的部众不适应南方的气候，病倒的人在半数以上，他不得不回师北走了。

由于石勒纵横于中原，所向披靡，给洛阳施加了极大压力。司马越率兵二十万前去讨伐，但途中病死，由太尉王衍继续统领这支军队。当他们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时，遭到石勒围歼。接着，石勒与王弥、刘曜攻克洛阳，俘走了晋怀帝。

当他们合力攻洛阳时，王弥率领的军队冲在前面，他没有等刘曜到来便先入城，从而立了攻克洛阳的头功。刘曜因王弥不等待自己而大为不满，两人之间有了隔阂。进城之后，王弥纵兵大掠，刘曜加以禁止，不起作用，他便将王弥的牙门将王延逮起来杀了，以儆众人。王弥大怒，发兵攻刘曜，双方在洛阳城内自相攻杀，死亡一千余人。王弥的长史张嵩劝王弥说："我们同心协力战斗，为的是推翻晋王朝。现在刚夺取晋都洛阳，我们就同室操戈，还有何面目去见留在平阳的主上呢！将军虽然为攻克洛阳立下了头功，但刘曜是刘聪的堂兄，你不能不让他几分呵！"王弥这才收兵，亲自到刘曜营中致歉。

王弥是个有远见的人，他认为平阳地处偏僻，不利于统治全国，便建议刘曜保护洛阳，让刘聪从平阳迁都于此。他说："洛阳居于全国的中心，周围有山河之险，历来为帝王之都。况且迁都到此，不必再耗费人力物力营建宫殿，一切都是现成的。"然而，刘曜不听，放火将洛阳焚为废墟，然后撤回平阳。王弥极为愤怒，骂道："混蛋，丝毫没有帝王的大志！"他没有随刘曜北去，而是引兵东行，屯驻项关，并接受刘暾的建议，派左长史曹嶷率军前往自己的老家青州召兵买马，以图独立。

石勒与王弥均有称霸一方的雄心，并且都视对方为自己称雄的强劲对手，因而在把西晋王朝的有生力量消灭之后，他们之间

开始了明争暗斗。

曹嶷入青州后，与苟晞、苟纯展开了激战，双方多次交锋，曹嶷的兵众越来越多，最终打败了苟晞，并有其众。苟晞单骑出逃，收集散兵与王瓒屯驻仓垣。此时，豫章王司马端（晋武帝之孙）从京城逃至仓垣，苟晞即立他为皇太子，置行台，并移屯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还派大将王瓒驻守东南面的阳夏（今河南太康）。

苟晞自从立了皇太子司马端后，位至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更加骄横暴虐了。他家的奴婢近千人，任由他驱使。时值大乱，一些晋朝臣子指望苟晞平定天下，恢复王业，但苟晞足不出户，整天沉溺在歌舞酒色之中，并且理政严苛，刑杀无度，前辽西太守阎亨上书劝谏，竟被他斩首。他的从事中郎明预正在家养病，闻知此事，非常愤慨，也乘车前去进谏，苟晞竟指着他的鼻子大吼："我想杀谁就杀谁，关你什么事，竟然抱病坐车来这里骂我！"苟晞如此专横，大失人心，其部将温几等相继率军反叛，使他日渐孤立。石勒得知这一情况，于永嘉五年（311）九月迅速进军阳夏，擒获王瓒，继而攻陷蒙城，活捉了苟晞和司马端。司马端从被立为皇太子到被俘，仅两个月。

王弥因派部将曹嶷东攻青州，自己身边的兵力大大削弱。他得知石勒擒获苟晞后，为石勒的兵力越来越强而感到不安，便假心假意地给石勒送去一封贺信，信中还建议："让苟晞做你的左膀，我做你的右臂，你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石勒读完信，发出了一声冷笑，他对张宾说："王公职位之高与我相当，却说这样低三下四的话，一定是心怀鬼胎。"张宾分析说："我看王公早有称王于青州之意，之所以迟迟未敢独立，就因为你在他的附近，他怕你与刘聪到时候对他两面夹攻，使他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他想吞并你，但还没找到合适的时机。你应趁现在他身边兵力稍弱的机会，设计将他诱杀掉，否则，曹嶷一旦率军与他会

合，你要战胜他就非常困难了。”石勒表示赞同。

王弥部下刘暾预感到王弥处境危险，便建议尽快把曹嶷调回，藉以攻杀石勒。王弥同意了，他派刘暾前往青州送信。但刘暾在途中被石勒的巡逻兵捕获，搜出了信笺。石勒见信大怒，杀了刘暾，并命令部下不得泄露刘暾被捕之事，因而王弥对此事一无所知。

当时石勒正与晋将陈午相攻，王弥也与晋将刘瑞相持不下。王弥派使者向石勒救援，石勒本想一口回绝，张宾急忙暗示石勒同意出兵，待众人离去后，他兴奋地对石勒说：“真是天赐良机啊！陈午只是区区小寇，不足为患；王弥是人中之杰，今日不除，必成祸根。应该出兵赴援，伺机行事。”石勒于是置陈午于不顾，回师击刘瑞，将其击毙。王弥以为石勒相信了自己上次在贺信中推奉他为主的假话，心中暗暗高兴，对石勒不再防备。当石勒邀请他赴宴时，他没听长史张嵩的劝谏，欣然前往，结果在宴席上被石勒挥剑刺死。

刘聪听说石勒杀了王弥，非常气恼，他责怪石勒专杀大臣，有无君之心。但他又怕石勒反叛，不得已而认可了石勒兼并王弥部众的行动。

鉴于石勒兵势之盛，刘琨试图争取他反叛汉国。石勒昔日被掠卖为奴，离开并州之后，与母亲王氏失散。刘琨即派人把王氏送到石勒军中，同时带去一封信，称：“将军用兵如神，所向无敌，之所以纵横天下而无立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功业，原因在于没有依附一个明主。现在晋帝授予你侍中、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等职，让你弃暗投明，望你接受。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戎人为名臣建功立业则大有其人。请三思。”石勒虽感谢刘琨派人送来王氏，但对他劝降晋王朝则不予理睬，石勒回信说：“建功立业，非迂腐的儒生所说得清的。你为晋廷当说客，我这夷狄之人实难听命。”永嘉六年

(312) 春，石勒屯驻葛陂（今河南新蔡北）一带。葛陂是一处周三十里的湖泊，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为鲖水、富水等注入淮河。石勒在此积蓄粮草，营造舟船，准备大举进攻建邺。琅邪王司马睿很紧张，动员江东各路人马会集寿春（今安徽寿县），由扬威将军纪瞻都督，前去抵抗。适逢大雨连绵，数月不止，葛陂一带方圆数百里地洪水凶猛，不仅使石勒的军队惊慌失措，而且粮草供给短缺，疾病流行，许多士兵因饥饿或病疫死亡，加之江东军队即将到来的传闻日甚一日，征讨石勒的檄书接踵而至，石勒不得不召集众将商议对策。

右长史刁膺主张委曲求伸，先假意向江东晋军请降，待他们退兵后再作下一步打算。石勒听到此话，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发出了一声长啸。中坚将军夔安见状，便提出将军队带到地势高的地方去，先避开泛滥的洪水。石勒摇摇头，对夔安说："将军连洪水也害怕，未免太胆怯了吧!"这时，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名战将站了出来，拍着胸脯请战，说："趁江东各路人马还未聚集的机会，我们三十余人每人带三百名步兵，分三十路去夜袭对方，夺取他们的城池，用他们的军粮补充我军。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不怕死，今年之内就一定能攻破建邺，平定江南，活捉司马氏家族的狗崽子们。"石勒赞赏他们的勇气，但还是摇头说，他们有勇无谋，只知道拼命。他回头向张宾问计，张宾说："请降是下策，石将军已与晋军交战这么多年，对方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了，你岂能自动送上门任人宰割呢！留在此地是中策，这段时间没完没了的大雨，使我军在这一带无法进行有效的征战，留在这里时间越长，对我们的损失越大。上策是率军北上，占据地势险要的邺城，以那里为根据地四出征讨，只要平定了中原，就再无人可与你争锋了。至于撤军的方式，可让军中辎重径直北撤，让大军轻装向寿春推进，使晋军紧张一阵，待辎重走远了，大军再徐徐撤回。别怕晋军追击，他们本来是怕我们进攻的，一旦听

说我们撤走了，定会暗自庆幸，根本顾不上出奇兵来追击。”石勒听了，摸着胡须连声说：“妙！妙！”他起身斥责刁膺献了一条下策，将他降职为将军，升张宾为右长史，并在军中尊称他为“右侯”。

石勒依张宾计北行，至棘津渡河时，与晋将向冰打了一仗，将其击败，遂据有其粮食兵仗，长驱直奔邺城。驻守邺城的将领是刘琨的侄子刘演，他率众准备迎战，不料部将牟穆等知道不是石勒的对手，率数万人投降了石勒。刘演只好退守城西北的三台。石勒手下众将请求强攻三台，张宾再度指点迷津，说：“三台非常坚固，刘演也还有几千兵卒，短时间内我们难以消灭他们。但邺城在我们控制之中，即使我们不攻三台，那里的守军也很快会溃败的。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幽州的王浚、并州的刘琨，现在应准备与那俩人作战，而不是与刘演。当今天下大乱，一个只知转战四方而没有自己的巩固地盘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应该先选定一处形势险要的地方，站稳脚跟，然后四处征战，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称霸天下。”石勒对这一计划颇为赞赏，于是选定襄国（今河北邢台）作为根据地，他的霸业从此开始了。

石勒一面上书给刘聪，极言他们镇守襄国的重要性，以征得他的支持；一面派兵攻掠冀州各郡县，抢夺粮食并扩充兵力。在襄国东北不远的苑乡，驻扎着得到王浚支持的游纶、张豺率领的数万之众，他们粮储丰富，石勒派夔安、支雄等七将前去攻掠，很快攻破了苑乡外围的各个壁垒。王浚派部将王昌联合鲜卑人段就六眷、末柸等率兵五万前去讨伐石勒。当时襄国尚未筑好城堡，城内兵少粮尽，又无救兵，出战的将士屡遭败绩，石勒便决定与对方进行一场决战。他依照张宾的计谋，对鲜卑人的挑战不予理会，闭门不出，以示怯弱。同时在城门的壁垒上悄悄凿出二十几个通道，称“突门”，从城外看不出，当鲜卑军队来到城北时，尚未排好军阵，石勒便亲自在城头擂响了战鼓，孔苌等勇将

便率领兵卒从各个突门冲了出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鲜卑人的军阵，活捉了末柸，就六眷等率众溃逃，不得不向石勒请和，自此鲜卑段氏不再与王浚联合，王浚势力大为削弱。不久，原来依附王浚的乌丸族人也反叛，投降了石勒。司州冀州一带在石勒的控制下，渐趋平静。

石勒欲消灭王浚，夺取幽州，他向张宾问计。张宾说："王浚虽然口头上说是晋朝藩臣，但实际上也心怀称王之志。将军现在声威震于海内，你站在谁一边，谁就能在逐鹿中原中获胜。王浚一定很愿意得到你的匡扶。你应该假意向他称藩，取得他的信任，再找机会消灭他。干大事业的人就得能屈能伸。"石勒于是派人给王浚送去大量珍奇宝物，并送交一份推崇他为天子的奏本，内称自己出自戎狄，时值天下大乱，为了自救，才纠合一些人流窜于冀州一带。现在晋朝的国运已到了终点，海内没有君主，明公德高望重，为帝王者非公莫属，我石勒愿为你的前驱，诛暴除乱云云。

石勒的这一番恭维，使王浚感到飘飘然，但他还是不放心地问来人："石公为当今豪杰，雄踞赵国故地，怎么向我称藩、推我为主了呢?"使者说："称王称帝取决于历数，不是靠智谋和武力争取来的。石将军英才超群，拥有雄厚的军事势力，他并非不想称王，只是考虑到自己出自胡人，恐天下人不服。"接受了石勒贿赂的王浚的心腹枣嵩也进言说不必多疑，于是，王浚遣使回报石勒，对他的拥戴大加赞扬。当王浚的使者来到石勒营中时，石勒下令将所有劲卒精甲藏匿起来，让使者只看见一些老弱的士兵和空空的仓库。石勒还以拜受帝王诏令的礼仪向北面拜受王浚使者带来的回信，甚至王浚赠给的一件麈尾，石勒也故意显得不敢拿在手里，将其悬挂在大厅的墙壁上，敬之如神，每天早晚都要叩拜，口称："我虽然看不见王公，但看到王公赐给的麈尾，就如同见着了王公。"使者回幽州后，陈述自己所见所闻，说石

勒现在兵力寡弱，真是全心全意依附王公。王浚信以为真。

当时，王浚的司马游统镇守范阳（今河北定兴南的固城镇），他暗中背叛王浚，派使者向石勒请降。石勒杀了使者，送之于王浚，以表忠诚，取得了王浚的进一步信任。

王浚（字彭祖）是个非常凶狠残暴的人。他为政苛刻，搜刮百姓的财物无度，且纵容部下广占山泽、盗掘冢墓，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许多人投奔了辽西鲜卑。他部下一些有识之士一再进谏，竟然或被免官，或遭杀戮。燕人霍原是当地的知名士人，王浚把自己要称帝的打算告诉了他，试图求得他的支持。但霍原一声不吭，根本不屈节奉承，王浚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王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幽州士民的愤怒，他们骂道："幽州城门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

王浚内失民心，外无鲜卑、乌丸等部族的支持，石勒感到发动袭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他在作出开始行动的决定以前，仍很犹豫，他担心刘琨及鲜卑人、乌丸人趁虚袭击自己后方。张宾看出了他的疑虑，说："将军不必多虑，鲜卑、乌丸与王浚的关系已经破裂，他们不会成为王浚的外援。刘琨虽与王浚同为晋臣，但二人结怨很深，王浚曾因刘琨侵削幽州的地盘、吸引幽州的民众前去投奔而与之屡次相攻。只要写封信向刘琨请和，表示愿为他征战王浚，他一定会拍手称快的。"石勒听了这些分析，高兴地说："我所想不到的，右侯都为我想到了，我还有什么疑虑呢！"

晋建兴二年（314）三月，石勒出轻骑袭击幽州，将至蓟城（今北京西南），王浚的部将请求出兵抵御，王浚却喝斥道："石公是来拥戴我称帝的，有谁再敢说出击就推出斩首！"他还命令设宴等待石勒的到来。石勒到达城下后，喝令守门的将士打开城门，然后先驱赶数千头牛羊入城，军士跟在后面，口头说是以牛羊作为贡品，实际上是让这些牲口堵住街巷，防止王浚派兵袭

击。待石勒的部众登堂逮捕王浚时，王浚才如梦初醒，他气得对石勒破口大骂："胡奴竟敢欺骗老子，真是太猖狂了！"但谩骂已无济于事，石勒下令将他押回襄国斩首，并把他麾下的精兵一万余人全部杀死，以绝后患。

石勒在司、冀、幽三州站稳了脚，汉主刘聪感到很难对他发号施令了。为了继续维持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笼络住石勒，他封石勒为"陕东伯"，有权决定征伐大事。此后，石勒继续攻打中原那些没有归附的势力，将战败投降的人口陆续徙往襄国，从而使他的根据地日益扩大。

晋建兴四年（316）冬，石勒开始向黄河中下游的最后一个劲敌刘琨发起攻击。他先包围乐平太守韩据于坫城（今山西昔阳西南）。刘琨命将军姬澹率众十余万前去救援，自己则带兵抵达广牧，作为后援。

面对姬澹所率大军的到来，一些将领劝石勒深沟高垒，暂避其锋芒，等消磨了他们的斗志后再迎击。而石勒指出，对方人数虽多，却是乌合之众，号令不一，可以一鼓作气将其击败。如果我们临阵后退，让他们长驱直人，则我方必然不战自亡了。于是，石勒设下一个伏击圈，然后带轻骑前去诱敌深人，姬澹求胜心切，在不顾一切的追杀中陷人了包围圈，被石勒军打败，损失的铠甲战马上万。留守并州的李弘听说前方作战不利，即以并州之地向石勒投降，使刘琨进退失据，不得已而逃奔幽州，投靠鲜卑人段匹磾去了。

正当石勒在外征战正酣之际，汉都平阳却发生了内乱。晋太兴元年（318）七月，汉主刘聪死，子刘粲继位。外戚靳準鼓动刘粲诛杀大臣，引起朝中混乱。接着，靳準谋杀了刘粲，自称大将军、汉天王，遣使向晋朝称藩。他还强迫一些有名望的人出任他手下的官职。原金紫光禄大夫王延为时人所敬重，靳準欲任命他为左光禄，他却厉声骂道："你这反贼，还不赶紧杀了我，把

我的左眼悬挂在西阳门，看看相国刘曜带兵进城来杀你；把我的右眼悬挂在建春门，看看大将军石勒前来置你于死地！”靳準大怒，立刻下令杀了王延。

十月，刘曜自长安抵达赤壁（今山西河津西）称帝，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与之合力攻靳準。

但石勒与刘曜面和心不和，都想让平阳城内的人归降自己。石勒进军迅速，攻克了平阳小城，将归附的氐、羌、羯等族十余万落东迁往自己的地盘。平阳城内的靳準眼看无法与石勒、刘曜抗衡，便派卜泰来到石勒营中请和，石勒将卜泰送往刘曜帐中，向他暗示平阳城内的人愿意归降自己，而不是他刘曜。但刘曜与卜泰私下达成协议，他让卜泰回平阳招那些匈奴人投奔自己。卜泰回城后，与乔泰、马忠等将领攻杀了靳準，推尚书令靳明为盟主。靳明再派卜泰前去向刘曜投降，并奉送上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传国六玺”。石勒闻之大怒，增兵攻平阳，靳明连战连败，率士民一万五千余人逃奔刘曜，刘曜杀了靳明及所有靳氏男女，率众西行，徙都长安。石勒则焚毁平阳宫室，带兵东归，并派左长史王修去向刘曜献捷。

晋太兴二年（319）春，王修东归，刘曜派郭汜与他同行，前去任命石勒为太宰，领大将军之职，进爵赵王。但随同王修出使而留在粟邑做官的曹平乐，此时对刘曜说：“大司马石勒派王修来此，表面上是来效忠。实际上是为了观察殿下的兵力强弱，以图兼并您。”当时刘曜的军队确实疲惫不堪，兵势不盛，他怕王修把这一情况向石勒报告后于己不利，便火速派人追回郭汜和王修，取消任命石勒为太宰的决定，杀死王修。王修的副使刘茂侥幸逃回了襄国，向石勒汇报，石勒怒火中烧，咬牙切齿地说：“刘氏基业，皆孤所为，今既得志，便欲相害。赵王、赵帝，孤自为之！”他诛了曹平乐三族。从此，石勒与刘氏汉国正式决裂，他的队伍开始成为与刘汉、东晋共争天下的势力。

（陈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86－91

《晋书》：《石勒载记》、《新蔡王腾传》、《刘琨传》、《王弥传》、《苟晞传》、《王浚传》

永嘉之乱

晋怀帝司马炽自从光熙元年（306）继位之后，就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东海王司马越专横跋扈，各方镇不听号令，流民起义风起云涌，刘氏汉国不断侵袭，纷繁的事情令他提心吊胆，使之时常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哀叹司马氏晋室的衰微。

司马炽是在把持朝政的司马越的阴影中继位的。早在齐王司马冏专权时，因惠帝之子已死，清河王司马覃（惠帝的侄子）被立为皇太子。成都王司马颖专制朝廷后，废黜太子覃，河间王司马颙表颖为皇太弟。惠帝与司马颖、司马炽被河间王的部将张方挟持到长安后，河间王废黜司马颖，立司马炽为皇太弟。东海王司马越挥师攻入长安，把惠帝等人迎还洛阳，司马越以迎驾之功，位至太傅、录尚书事。不久，惠帝中毒身亡，有人说是司马越害死的。司马炽在司马越的主持下，以皇太弟身份继皇位。

惠帝的皇后羊氏因自己是司马炽的嫂嫂，按辈分说，司马炽继位后，羊氏不能成为皇太后，所以她曾主张让前太子清河王司马覃继位，但未成功。司马炽在皇位上，将朝政完全交司马越处置，司马越不希望“神姿岐嶷，慧智早成”的司马覃替代司马炽，以免妨碍自己专权。然而，有的大臣仍在做着恢复司马覃太子之位的努力。吏部郎周穆，既是司马覃舅父，也是司马越的姑妈之子，他建议司马越像西汉霍光废昌邑王贺、立汉宣帝询那样，废黜晋怀帝，立清河王覃，但司马越厉声喝道：“这岂是你

可说的话！”他命令左右推周穆出去斩首。永嘉元年（307）冬，前北军中候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司马覃为太子，事情败露后，司马越囚司马覃于洛阳金墉城，不久将他杀害。

尽管司马越维护了怀帝的皇位，但怀帝不堪忍受司马越的专横，他要亲理万机，司马越对此大为不满，便率朝廷主力出镇许昌，使洛阳城防十分空虚。永嘉二年三月，他移镇鄄城，以防刘渊进攻汲郡。四月，王弥攻下许昌后，进逼洛阳，引起朝廷的恐慌，而司马越仅派五千人前去救援。要不是凉州刺史张轨派去的督护北宫纯奋力作战，洛阳难免失陷。其后，司马越又移屯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与驻守那一带的监完、王堪两军成犄角之势。因朝中大臣多议论司马越拥重兵在外，不顾京师安危，司马越便率军移至离京近一些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驻扎。

永嘉三年（309）三月，司马越怀疑朝中大臣对自己不忠，与怀帝有什么密谋，遂带兵入京，准备清除异己，杀一儆百。中书裴王敦私下与人议论说："太傅专擅权威，而每当他上表要封某人为官时，尚书台的官员仍按朝廷原来的规定加以限制，他这次回京，一定会杀几个人的。"果然，司马越一进城，便派部将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捕深受怀帝信任的王延、何绥、高堂冲及缪播、缪胤兄弟，推出斩首。当甲士入宫抓人时，缪播、缪胤正在怀帝身边，而怀帝无力救他们，只得握住他们俩的手，流着泪说："哪个时代都有奸臣贼子，我现在也遇上了，真是太可悲了！"

司马越还撤换了在宫中宿卫的武官及卫兵，派亲信何伦任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统领宿卫宫廷的士兵。这样，怀帝周围尽是司马越的人了。

司马越乱杀大臣，大失人心，怀帝更是痛心疾首，他决心寻找一个能除掉司马越以匡扶朝廷的人，与司马越矛盾很深的苟晞被他看中。

苟晞，字道将，凶悍善战，任兖州（今山东西南部）刺史时，先后攻杀刘柏根、汲桑、公师藩等各自率领的起义军，并在河北打败了石勒，威名甚盛，时人把他比作白起、韩信，朝廷还任命他都督青兖诸军事。然而，司马越手下的潘滔对司马越说："兖州是战略要地，让苟晞这个有雄心大志的人坐镇该地，时间长了，可能会侵害阁下的威势，您应该自己亲自控制兖州，以防患于未然。"司马越表示赞同，便迁苟晞的官职为都督青州（今山东东北部临淄一带）诸军事、青州刺史。苟晞非常恼怒，便借口潘滔肆意诬陷好人，要求将他斩首，司马越不听。苟晞于是向各地发布檄书，称："司马越身为宰相，把国家搞得大乱，为了主持正义，我不能袖手旁观。凡有志于清除国贼、共尊王室的人，请跟我起兵！"

苟晞与司马越势不两立，怀帝自然高兴，他屡次派人催苟晞尽快组织人马西征。永嘉四年（310）秋，因刘聪派刘曜、石勒等率军攻破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杀晋征虏将军宋抽，俘河内太守裴整，再度进逼洛阳，晋怀帝惊慌失措，发羽檄征召各方镇的人马赴援，他对前去传令的使者说："你尽快转告各方镇，早日出兵，现在到都城来，都城还有救，再迟就来不及了。"苟晞不仅接到了羽檄，还拿到了皇帝委他以督统关东诸军迅速出征的重任的密诏，但由于青州一带也遭反晋起义军的骚扰，也因多数方镇按兵不动，没有赴援京师，苟晞只是发了一道号召各军镇"扶助皇室、宣力本朝"的檄书，造了一阵声势，没有真派兵西进。

征南将军山简、荆州刺史王澄得到皇帝的诏命后，倒是忙乎了一阵，迅速带部众前去救援，但在途中受阻于"称藩于汉"的王如，未能北进。

由于无人赴援，京师形势孤危，不少大臣建议迁都以避其难。身为尚书令、司徒、司空的王衍为了安定众心，故意卖掉了

自己的牛车，以示自己将固守都城、不准备出逃的决心。然而，很快他就变卦了。

太傅司马越身穿戎服，入宫见怀帝，说要带大军征讨石勒，并镇守兖州、豫州一带，作为都城的外援。怀帝欲加以阻止，说："汉军已逼近城郊，朝廷震恐，人无斗志，全倚赖你破敌，你哪能率大军远行，置都城于不顾呢！"司马越却说："假如我幸而打败了贼兵，则国威可振。我不能在京城坐失良机。"他不顾怀帝的挽留，以行台随军，并带走朝廷的精锐部队四万多人，东屯项县（今河南沈丘）。都城的王公贵族见留在城里毫无安全保障，随时可能遭到汉军的袭击，纷纷随军东行，其中就有身为宰相的王衍。

都城已无多少守卫人马，由司马越部将何伦、李恽统领。何伦等纵兵抢掠公私财物，侵辱公主，杀害贤士，无恶不作，竟陵王司马楙曾与司马越有隙，此时与怀帝密谋后带兵攻何伦，不克，离城出逃。怀帝左右没有能人，他不得不再次派殿中校尉李初等携带密诏，去召苟晞讨伐司马越；还派殿中中郎刘权前往幽州，敕王浚与苟晞共同举兵。苟晞回信称，自己已率军抵达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前锋王讚也正进军项县，将迫使司马越交权归政。另外，还派扬烈将军阎弘带步骑五千前往洛阳护卫皇家宗庙。

就在怀帝与苟晞不断派人联络的过程中，司马越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他派巡逻的骑兵巡游于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带，果然抓住了他们的使者。司马越非常恼怒，便派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刺史，与徐州刺史裴盾同时讨伐苟晞，但裴盾等战败。

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于项县。众人共推王衍为元帅，而王衍在这兵荒马乱、反晋烽火遍及各地的时节，害怕成为一军之首，不敢受任。他推举楚王司马玮之子襄阳王司马范任元帅，司马范也不敢当。王衍只好与其他几个大臣一起，共同

统领这支队伍，并奉司马越的灵柩前往司马越封国。

四月，石勒率轻骑追击这支送灵的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追及并将其包围，晋将钱端率军抵抗，败亡。晋军溃不成军，随军的王公士民也乱作一团。石勒命部下进行围射，乱箭如雨，陷于围困中的十几万军民无一逃脱，尸首堆积如山。王衍与襄阳王范、任城王济、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敳等，均被俘虏。石勒将他们召至大帐中，让他们说说晋朝衰亡的缘故。这帮王公大臣中，只有司马范一人神情镇定，毫无惧色，大声呵斥："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罗嗦的！"其他人全是贪生怕死之徒，他们一一向石勒陈说晋朝败亡之由，尤其是身居宰辅之任多年，善长清谈的王衍，在石勒面前卑躬屈膝之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为了能免于一死，在述说了朝廷祸败根源后，一再表白自己从来对做官抱非常淡漠的态度，在朝中不参预决策，朝廷祸乱频仍，与自己无关。他还盛称石勒是当今最杰出的人物，应该称帝登基。石勒听了极为愤怒，他冲着王衍说："我闯荡天下多年，什么人没见过！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你名闻四海，从小入朝做官，久居宰辅之位直至现在，怎能说没参与机密呢？祸害天下的人，正是你王衍！"他下令将以王衍为首的所有被俘王公处死，王衍临死前叹息说："我们当初如果努力匡扶朝廷，今天决不会落到这种下场啊！"

石勒还劈开司马越的棺材，焚烧了他的尸体，说："扰乱天下者，正是此人，我现在为天下人报仇。"

留在京城的何伦、李恽听说司马越死了，带上司马越妻裴氏、子司马毗及皇族四十八王离京东奔，随之出逃的士民也数以万计。但他们行至许昌东北的洧仓时，遇到石勒的部众，司马毗和四十八个藩王等均死于乱军中，仅何伦与李恽侥幸逃脱。

都城中怀帝孤立无援，苟晞上表请迁都仓垣，他派从事中郎刘会带数十只船、宿卫五百人及一千斛稻谷，前去迎帝。怀帝欲

东迁，而左右公卿犹豫不决，未成行。不久，城中出现饥荒，人相食的情况屡有发生，百官十之八九流亡出走。怀帝终于下定决心东迁，但连起码的卫兵和车马都不具备，他不禁黯然神伤，感叹说："身为皇帝，却连马车都没有，可悲啊！"他于是派司徒傅祗前往河阴（今河南孟津北），修好几条船，以从水路东迁。当怀帝在数十个朝臣陪同下步行出西掖门，将去河边时，在城内铜驼街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不得已又退回宫中。

汉主刘聪得知石勒已歼灭晋军主力，立即命令前军大将军呼延宴带兵二万七千，攻打洛阳。在洛阳附近与晋军连续作战十二次，每战必胜，杀晋军三万余人，进至洛阳城边。这年六月，王弥、刘曜又先后率军抵达洛阳城下，他们分别从城南的宣阳门和城西的西明门发起进攻，很快便破城而人，纵兵大掠。怀帝从华林园悄悄开门出逃，欲奔长安，被刘曜的骑兵追及。

刘曜在洛阳焚烧宫室，逼辱妃嫔，滥杀百官士民，遇害者达三万余人。其后，他率军回平阳，带走了晋怀帝。中原士民无不为之流涕，但这又能怨谁呢？西晋宗庙成为废墟，皇族成员被诛杀殆尽，帝王被俘蒙尘北去，完全是由司马氏统治残暴及内部纷争造成的恶果，岂能怨天尤人？

怀帝一去，中原无主，便相继出现了一个个行台。所谓行台，就是在京师以外设置的台、省（尚书台、中书省）的临时代理机构，代表中央全权处理军政大事。魏末司马师讨伐诸葛诞，曾让朝中台省大臣随军出征，由此产生了行台。东海王司马越自都城出屯项县时，也以行台随军。行台的出现，意味着中央的台省已虚有其名，控制行台的大臣，实际上成了总揽朝纲的最高权威。因此，当洛阳陷落、怀帝播迁之后，冒出了那么些行台，不少坐镇一方的大臣在企望成为乱世盟主。

首先，司徒傅祗在河阴建了行台。傅祗是个较有才干的人，他在晋武帝时做过荥阳太守，那时黄河、济水经常泛滥成灾，他

便率百姓建造了一座“沈莱堰”以蓄水，调节水流量，使兖、豫二州多年免遭水患，受益不浅的老百姓特为他立碑颂德。“八王之乱”中，他历任朝中要职，深受人们的敬重。赵王司马伦专断朝政时，曾强迫他出任中书监，以收人心。王戎、陈準等大臣说：“有傅公执政，我们就不用担心朝政混乱了。”这样一位声望甚高的人物，在怀帝被俘之后，当然会以扶助朝廷、力挽危局为己任了。当洛阳危在旦夕、荀晞上表请求迁都仓垣时，傅祗受怀帝派遣到河阴准备船只。但洛阳很快陷落，一国之主成了刘氏汉国的阶下囚。傅祗感到群龙无首，必然无法与汉军对抗，收复失地必将成为泡影，因而他以司徒兼大都督诸军事的名义，作为盟主，设立行台，号召各方镇晋将起兵奔赴河阴，并特意让儿子傅宣及尚书令和郁到各地去征集“义兵”。可是，傅祗自己没有多少兵力，号召力很小，未能召来多少人马。

随后在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出现了另一个行台。当刘曜、王弥进攻洛阳时，朝廷的中枢大臣、司空荀藩和侍中荀组兄弟俩，带领百官逃往密县，他们传檄四方，推势力尚很雄厚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向各个方镇发号施令。但司马睿当时远在江东的建邺，荀藩等欲以他为靠山是很不现实的，因此，他们设立的行台也只是一个空架子。

刘曜攻克洛阳后，大杀王公贵族，太子司马诠也遇害。他弟弟豫章王司马端逃奔屯驻仓垣的荀晞，幸免于难。荀晞得到司马端，如获至宝，随即奉他为皇太子，设立行台，自领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等职，并移屯蒙城。

荀藩等见荀晞拥立了皇太子，他们不甘落后，也把自洛阳逃至密县、年仅 12 岁的秦王司马邺捧了起来，并把行台南迁到许昌。荀藩还承制任命拥有数千流民起义队伍的天水人阎鼎为豫州刺史，以加强他控制下的行台势力。

这年七月，幽州又冒出一个行台。大司马王浚也立了一个皇

太子，并广置众官，自任尚书令。王浚试图号令各地方镇，以自己立的皇太子的名义，任命司马睿为大将军，荀藩为留台太尉，荀组为司隶校尉，但他们并不接受任命。他们自己还想号令天下，岂甘心屈居他人之下呢！

在这国破家亡之际，这些晋朝大臣仍在争权夺利，置个人私利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有人在个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便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太尉、南阳王司马模当时坐镇长安，他的部将赵染想当冯翊太守，未能如愿，在司马模派他去抵抗汉军的进攻时，他向对方投降，被刘聪任命为平西将军，与安西将军刘雅率两万骑兵进攻长安，刘粲和刘曜带大军随后跟进。赵染攻破潼关（今陕西潼关北），杀晋将吕毅，继续向前推进，司马模抵挡不住，投降后被刘粲杀死。刘聪任命刘曜为车骑大将军、雍州牧，镇守长安。

永嘉五年九月，石勒率军进击驻守阳夏的王讃，将其擒获，继而袭击蒙城。荀晞虽是善于用兵的人，但由于身居要职后骄横跋扈，导致众叛亲离，加上军中疾病、饥饿的影响，他的部众的战斗力大大降低，在石勒的进攻下，很快溃不成军。荀晞及他立的皇太子司马端被俘。石勒为了庆祝胜利，对自己的死对头荀晞大加侮辱，任命他为左司马，同时在其脖子上套上一条铁链，就像拴住自己的狗一样。荀晞不堪忍受，与王讃密谋反叛，谋泄，被石勒处死。

在南阳王司马模被刘粲杀死时，他的从事中郎索綝正担任冯翊太守，闻讯后，与安夷护军麹允、频阳县令梁肃等一起逃奔西北的安定郡，索綝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学伍子胥去讨救兵报仇。"当时，长安以西仅雍州刺史麹特、新平太守竺恢等少数晋臣固守城池，坚持与刘粲的汉军对抗。安定太守贾疋及氐、羌各族酋长均打算送人质给刘粲，表示屈服。索綝等人在西奔途中，遇到将作为人质的贾疋之子，便强行把他拽回安定郡的治所

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并力劝贾疋致力于复兴晋朝，贾疋表示同意。于是，众人共推贾疋为平西将军，率师五万进攻长安。扶风太守梁综与麴特、竺恢等也起兵十万响应。

汉河内王刘粲面对晋军的反攻，便出屯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派刘曜、刘雅及赵染率军迎战。刘雅、赵染攻新平（今陕西彬县）的竺恢，不克，索綝率师驰援，与刘雅、赵染进行了大小一百余次战斗，将其击退。刘曜又率长安的精锐步骑与贾疋战于黄丘，再度失利，刘曜身中流矢，退保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贾疋乘胜进击，攻杀了汉梁州刺史彭荡仲。刘曜逃回长安。麴特等也在长安附近的当地人协助下，打败刘粲，刘粲逃回汉都平阳。这样，长安四周尽为晋军所有，关西地区的郡县纷纷归附。

将行台设在许昌的荀藩等人手下无兵，完全靠阎鼎带兵保护。阎鼎是天水郡（治所冀县，今甘肃谷东）人，他手下的部众多是来自关西的流民，他们在中原战乱频仍的形势下，常思念回归故土。由于石勒正活动于豫州一带，对许昌构成很大威胁，而关中地区大部分已被贾疋等人收复，阎鼎遂决定挟秦王司马邺西人长安。司空荀藩、司隶校尉荀组、中领军华恒、中书令李昕及司徒左长史刘畴等，都是中原一带人，他们不愿西人关中。但他们无力阻止阎鼎，便在半途逃跑，阎鼎派人追赶，没赶上，仅杀李昕、刘畴几人。当阎鼎到达蓝田时，贾疋带兵前来迎接，将司马邺迎人雍城（今陕西凤翔南）。永嘉六年（312）九月，刘曜因抵挡不住贾疋的进攻，不得不驱掠长安士民八万余口逃奔平阳，秦王司马邺又从雍城迁入了长安。

怀帝司马炽被押送到平阳后，犹如汉主刘聪的笼中之鸟，刘聪有意羞辱他，任命这位晋朝皇帝为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还拜他原来的侍臣庾珉、王儁、辛勉为光禄大夫。但辛勉坚辞不受，说：“我身为晋臣，岂能接受汉国官职！”刘聪派黄门侍郎乔

度带着放了毒药的酒前去逼他，没想到辛勉大喊一声："大丈夫不能为苟延几年性命而卑躬屈节！"他夺过毒酒就要往嘴里送，把乔度吓了一跳，乔度急忙制止说："我们主上只是想试试看你是否真的宁死不屈，看来你的确是位高风亮节之士。"刘聪非常赞赏辛勉的贞节品格，特为之建造房屋，每月送去粮食美酒，而辛勉均不接受。

与守节之臣相比，司马炽自己倒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他接受刘聪任命的虚职，向刘聪自称为"臣"。刘聪为了表示恩典，不久又升司马炽为仪同三司，改封会稽郡公。早在司马炽为豫章王时，刘聪通过王济拜见过他，三人一起吟诗作赋，射箭取乐，司马炽赏识刘聪文武双全，曾送给刘聪一件柘木制作的弓和银砚台。说起这些往事，刘聪问司马炽是否还记得，司马炽连忙说："臣下岂敢忘怀，可惜那时不能早识龙颜。"刘聪又与他谈及晋衰汉兴，感慨万分，问道："你们司马氏家族为什么骨肉相残那样严重呢？"司马炽不好回答，便称这是"天意"，说："天意让大汉国兴盛，臣家兄弟骨肉相残，就是为了给陛下龙兴扫通道路。如果臣下家族内部和睦相处，陛下怎能得到天下呢！"

尽管司马炽一直低三下四，但还是摆脱不了被奴役、被宰割的命运。永嘉七年（313）正月，刘聪在朝中举行盛大宴会，汉国朝官无不出席。酒宴间，刘聪竟强迫司马炽身着只有卑贱的下人才穿的青衣，像仆人一样依次给百官斟酒，庾珉、王儁在场见此情景，不胜悲哀，君主之辱，就是臣子的耻辱，他们二人忍不住起身放声痛哭。刘聪很不高兴，便借口庾珉、王儁谋反，将他们俩杀死，并用毒酒害死了司马炽。

刘汉军队四处攻伐，无疑是永嘉年间北方广大地区战乱不断的重要原因，但西晋统治阶层内部为权力地位而相互抵触甚至攻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晋怀帝处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纵有平复天下之心，却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力。时人荀崧评

论说："怀帝是个才干比较杰出的人，如果处在承平之世，一定能成为守成的明主。遗憾的是，他继惠帝之后即位，当时天下已经大乱，朝中又有东海王司马越专权，以致于他在不像周幽王、周厉王那样昏庸暴戾的情况下，也遭到国破身死之难。实在是太可悲了！"

（陈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87

《通鉴纪事本末·西晋之乱》

《晋书》：《怀帝纪》、《荀晞传》、《王衍传》、《清河王覃传》、《东海王越传》、《缪播传》、《石勒载记》、《傅祗传》、《贾疋传》、《辛勉传》

陈敏叛晋

庐江人陈敏是个颇有才干的人。他通过郡中荐举，到都城担任了尚书仓部令史，掌管粮食入库储藏等事务。他职位不高，却总是怀着出人头地的野心，时时在找寻着升迁的时机。八王之乱的后期，他看出晋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随时可能崩溃，因而极力通过干一些引人瞩目的事情，使自己得以晋级，并逐渐扩充自己的势力，当他感到朝廷无力控制自己时，就要公开闹独立了。在西晋后期，朝廷命官公然对抗中央、割据一方者，陈敏可以说是较早的一个。

早在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共同讨伐赵王司马伦时，陈敏就感到不宜久留在京师。当时三王与司马伦在京师对峙六十余日，城内仓廪空虚，粮食短缺，陈敏借口到南方去调运粮食，离京出任合肥度支，不久又迁广陵度支。

广陵（治所在今江苏淮阴）是隶属徐州的一个大郡。陈敏在这里调集粮食时，掌握着一支人数庞大的运粮队伍。永安元年（304）三月，流民起义首领张昌派部将石冰进逼扬州，陈敏与江东大姓周玘等联兵进剿，将石冰等率领的流民军镇压。陈敏因功晋升为广陵相。

陈敏自认为谋略过人，已有割据江东的打算。他父亲得知他有这样的野心后，大惊失色，骂道："你一定会给我们全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而陈敏不予理会。

其时东海王司马越正组织关东各路人马西攻长安，他任命陈

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邀他迅速带兵及粮草北上会师。豫州刺史刘乔不听东海王调遣，发兵相抗，陈敏带兵北上后，即与东海王一起进攻刘乔，没想到在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被刘乔之子刘祐打得大败。陈敏暗想中原战事正紧，恰好是自己割据江东的好机会。遂向东海王请求让自己回江东去招兵买马，作为后援，东海王表示同意。

陈敏南行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后，就不听东海王的号令了，自己独树一帜，扩充实力。正在此时，东海王的参军甘卓为躲避中原战乱而弃官回归故乡丹杨（今安徽当涂东北），途经历阳。甘卓曾是吴王司马晏的常侍，而司马晏又是惠帝的弟弟，陈敏感到甘卓可以加以利用，便盛情款待，与之结交，让他谎称自己带来了"皇太弟"司马晏的指令——拜陈敏为扬州刺史。陈敏还与甘卓结为亲家，娶甘卓女儿为儿媳妇。

陈敏手握强兵，原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广等，均已被他赶跑。由于江东士人对陈敏割据普遍很反感，陈敏便想诛杀一些对自己不服的人，以树立自己的威严。江东大姓中的要人之一顾荣当时已违心接受了陈敏委任的右将军之职，他劝谏陈敏说："将军勇略冠于当世，又拥兵数万，有战船无数，足以平定江东。但要像孙吴那样立国长久，还得有士人的支持，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诛杀江东有名望的士人，那你将很难成就一番大事。"陈敏感到言之有理，便威逼江东大姓四十余人出任将军、郡守。绝大多数人不敢抗命，只有会稽人贺循、吴郡人朱诞二人坚持不接受他的任命。贺循为了使陈敏对自己失去兴趣，故意显出不堪任事的样子，走路一瘸一拐，手握不住笔，还服用"寒食散"。这是一种有毒性、服用后使人的体内发热的药物。贺循无病而服用这种烈性药，引起很强的药物反应，时常披头散发，袒胸露臂，使陈敏最终放过了他。陈敏的弟弟陈昶看出许多江东士族并非真心实意地追随陈敏，主张将他们全部杀掉，陈敏没有同意。

陈敏开始经营江东。他派陈昶领精兵数万驻守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弟弟陈恢率将军钱端南攻江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赶走了江州刺史应邈；弟弟陈斌则挥师向东。很快陈敏便据有了整个吴越之地。他非常得意，让部下推举自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并自己给自己颁发了"九锡"（皇帝颁发给大臣的九种礼物）。还声称自己已接到皇帝的诏命，将沿长江、沔水、汉水而上，入关中迎回惠帝。

将惠帝挟持在关中的河间王正想向人们表示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得知陈敏反叛后，即派张光率步骑五千前往荆州，讨伐陈敏。当时，陈敏任命弟弟陈恢为荆州刺史，率军攻武昌（今湖北鄂城）。晋荆州刺史刘弘令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驻夏口（今湖北武汉），南平太守应詹率水军作为后援。张光也接受刘弘节度，与苗光和襄阳太守皮初共同迎敌。然而，在这个时候，有人却挑拨离间，试图除掉陶侃和张光。

陶侃祖上是鄱阳（今江西波阳东）人，后徙居庐江郡的浔阳县（今江西九江），与庐江郡人陈敏算得上是半个老乡。他被刘弘委任为江夏太守、鹰扬将军，率军前去抗击陈恢，随郡内史扈怀却向刘弘进谗言说："陶侃与陈敏是同乡，一定有交情，让他手握强兵，坐镇江夏这样的大郡，一旦反叛，荆州的东大门将失去，荆州也就危险了！"幸而刘弘有识人慧眼，他说："陶侃的忠诚不用怀疑，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还不比你清楚？"他又给陶侃加上督护的官职，让他全力迎敌，不必有后顾之忧。

那时，东海王司马越正与河间王司马颙对峙，都想控制朝廷大权。河间王挟惠帝以号令天下，拥重兵固守关中；东海王则联合关东各路人马，宣称要攻入关中迎惠帝东归洛阳。刘弘已宣布自己站在东海王一边。由于张光是河间王派来的人，南阳太守卫展便进言说："张光是河间王的心腹，刘公既然表示支持东海王，就应该杀了张光，以表明与河间王誓不两立的态度。"而刘弘一

口回绝，他说："河间王有罪，与张光有什么关系？我不能为了使自己免祸而乱杀人！"卫展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刘弘善于用人，因而人们也愿意在他指挥下奋勇杀敌。陶侃让擅长水战的朱伺制造战船，并将许多运输船改装为战舰，加强了水军实力。与陈恢接战后，陶侃屡战屡胜，将其赶走。随后又与皮初、张光、苗光等一起进逼长岐，与陈敏的大将钱端对峙。张光与苗光分别领步兵和水军设置了一个埋伏圈，皮初则带兵前去诱敌深入，三人合作，将钱端打得大败，自此陈敏不敢出兵西临荆州。

东海王得知陈敏反叛，江东大姓都依附于他，便让军咨祭酒华谭写信给顾荣，劝他弃暗投明。信中说："陈敏据江东反叛，猖狂不了多久。江东士族向来为朝廷所重用，现在却委身于奸党，岂不感到羞耻？惠帝已被东海王迎回洛阳，朝廷的混乱已经结束，中央禁军很快就会前往江东清剿乱党，届时你们还有何颜面见来自中原的人士？"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人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陈敏授给的官职，他们看到此信后，倍觉惭愧。于是，顾荣、周玘、纪瞻等人挑头，密谋起兵。他们悄悄遣使约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征东大将军刘準发兵临江，自己则为内应。于是，刘準挥师东进，周玘等人也起而响应。

永嘉元年（307）二月，刘準派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陈敏急忙调弟弟陈昶及将军钱广领精兵数万前去抵御，驻守乌江，另一弟弟陈宏驻扎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周玘与钱广是同乡，他暗中把钱广争取了过来，要他刺杀陈昶。钱广便派手下亲信何康等前去陈昶帐中，谎称送一封急信。当陈昶毫无防备地低头看信时，何康迅速拔刀一挥，砍下了陈昶的头。紧接着，他厉声在军中吼道："陈敏已在州中被杀了，现在谁敢乱动，将诛连三族。"他的话镇住了在场的所有士兵。然后，他吹响随身带去的号角，通知隐蔽在军营外等候消息的钱

广，自己刺杀陈昶成功，钱广便迅速入营，控制了陈昶的部众，并率领他们向建邺（今江苏南京）进发，推进到城南的朱雀桥南，与陈敏的军队隔水对阵。陈敏把精兵坚甲交给甘卓，命他讨伐钱广，甘卓领命而出。

陈敏弟弟陈处对顾荣等人很不放心，建议杀了他们。陈敏没有同意。顾荣怕陈敏怀疑自己有密谋活动，特意去拜见陈敏。陈敏气急败坏地对他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你不去外面守卫，跑到我这里来干啥？"顾荣趁机离去。他与周玘一起来到甘卓营中，劝他说："如果陈敏能成就一番大事，我们倒值得协助他。但从目前形势看，他没那个能耐。他最终会失败的。而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官职和俸禄，一旦他失败，政府军把我们的首级递送到洛阳去，上面题写着'逆贼顾荣、甘卓之首'，那岂不是万世之辱！"甘卓犹豫再三，最后同意反叛陈敏。他假装有病，借口让女儿来服侍自己，把她从陈敏家中接了出来。然后截断朱雀桥，把河中的船只也全部收集起来，置于河南岸。

陈敏听说甘卓也反了，不禁大怒，随即亲自率领一万余人去攻打甘卓等。但到城南的河边，朱雀桥已断，又没有船只，无法渡河。只听对岸的军士大声呼喊："顾丹杨（荣）、周安丰（玘）均已起义，你们还为陈敏卖命干什么？"这一叫喊，使陈敏部下军心大乱，顾荣又出来挥动手中的羽扇，要他们各寻生路，一时陈敏的部下四散而逃，陈敏无法控制局面，不得不单骑北逃。

陈敏逃窜到江乘（今江苏句容北）时，被追兵抓获，他的家属也被收捕。尽管这年正月朝廷已废除了"夷三族"的酷刑，但因为陈敏被朝廷认为罪大恶极，不仅他个人被押到建业斩首，他家亲族也被悉数处死。陈敏死前，想想自己竟被顾荣、甘卓等名士所蒙蔽，不禁感叹道："这几个人害了我，使我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他还痛心地对弟弟陈处说："我不听你的劝告，没有杀掉顾荣等人，以致留下祸根，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对不住你

啊!”陈敏在会稽一带的弟弟陈斌等，也先后被攻杀。他没想到他与他的家族的结局应验了他父亲的话：“灭我门者，必此儿也。”

代刘準镇守寿春的平东将军周馥把陈敏的首级送到了洛阳。朝廷为了表彰江东名士平叛的功绩，任命顾荣为侍中，纪瞻为尚书郎，东海王还特意召周玘为参军。江东的名门大姓自东吴灭亡后，很少有人到中原的朝廷去做大官，一方面是由于西晋朝廷对他们很歧视，另一方面是因为江东士人普遍不愿尽心尽力与朝廷合作。陈敏之乱被平定后，顾荣等名士并不太想去朝廷任职，只是因怕上面怪罪，才勉强北行。当他们行至徐州时，听说中原越来越乱，便迟疑不进了。东海王司马越对他们这样畏畏缩缩非常恼火，他给徐州刺史裴盾写信说：“如果顾荣等人再观望不前，你就把他们强行带到洛阳来。”顾荣等人实在不愿继续前行，便在裴盾没注意的时候，悄悄溜回了江东，朝廷委任的职务，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陈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86

《通鉴纪事本末·陈敏之叛》

《晋书》：《陈敏传》、《甘卓传》、《顾荣传》、《贺循传》、《周玘传》、《刘弘传》、《张光传》、《陶侃传》

西晋灭亡

永嘉之乱中，洛阳失陷，大批王公士民仓皇出逃。年仅12岁、后来成为皇帝的司马邺，也在这逃难的人流中。

司马邺字彦旗，吴孝王司马晏之子，晋武帝之孙。因秦献王司马柬（武帝之子）死后无子嗣，司马邺被过继给他为嗣，袭封秦王。他9岁时即担任了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之职，地位非常显赫。但在国破家亡的动荡时期，他也不免于逃难奔波之苦。洛阳被汉军攻占后，他逃到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遇见舅舅荀藩、荀组等人。荀藩、荀组均是朝廷重臣，在怀帝被俘、中原无主的时候，他们感到有必要设立行台，以协调复兴晋朝的行动。

当时在密县与荀藩共商大计的晋朝大臣还有中领军华恒、河南尹华荟、司徒左长史刘畴等，逃亡到密县附近的中书令李昕、镇军长史周顗及司马李述等，得知密县设立了行台，也前来会合。然而，这帮人手下都没有军队，虽然他们公推拥有较大势力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向四方发号施令，但司马睿远在建业（今江苏南京），不可能给他们设立的行台提供安全保障。考虑到密县离已攻占洛阳的汉军太近，荀藩等人决定把行台南迁到许昌，以手握强兵的阎鼎为依靠。

当时，安定太守贾疋率军收复关中许多地方，并把刘曜围困在长安城中。贾疋字彦度，是武威人，从小有大志，又善于征战。为人们所景仰，尤其是许多武士，皆愿为他效力。他一向以朝廷号令为重，反对割据势力。南阳王司马模坐镇关中时，不听

专断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调遣，不肯受制于人，欲独霸关中。他任命儿子司马保为西中郎将，出镇上邽（今甘肃天水），遭到秦州刺史裴苞的抵制。司马模派帐下都尉陈安攻裴苞，裴苞逃奔贾疋所在的安定郡，得到贾疋的迎接。在此之前，贾疋因反对贪婪残暴的雍州刺史丁绰而受到丁绰诬陷，使司马模对贾疋产生反感。当贾疋迎接裴苞后，司马模更为恼怒，他派军司谢班前去讨伐，将贾疋赶走。贾疋联合氐、羌等族的步骑发起反攻，杀死了谢班，重入安定。刘粲、刘曜攻入关中、杀死司马模后，贾疋又开始为匡复晋室而努力，与刘粲等相抗，最终打败刘粲，并包围了长安。

关中向来是帝王建都之地，阎鼎欲挟带秦王司马邺西入关中，拥立为皇太子，以号令天下。他的部下多为关陇一带人，也愿意西行。尽管荀藩、周顗等人因是中原人，不愿入关中，但阎鼎强迫他们同行。荀藩等人不得已，便在途中逃走了。阎鼎带司马邺入关中后，被贾疋迎入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并在刘曜连战连败逃回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后，从雍城迁入长安。

永嘉六年（312）九月，贾疋等人拥立秦王司马邺为皇太子，设行台于长安，贾疋自为征西大将军。年底，贾疋在与胡人彭天护作战中，兵败被杀。司马邺左右的人又推始平太守麹允领雍州刺史之职，为盟主。麹允是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人，他与原金城太守游楷皆出自世家大族，家中资产多不胜数，当地流传这样的话："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阎鼎入关中拥立秦王为皇太子后，任太子詹事，执掌大权，京兆尹梁综与他争权，被杀。时任始平太守的麹允和抚夷护军索綝也欲专权，便借口阎鼎专杀大臣，有无君之心，对他发起进攻，阎鼎逃至雍城，被氐族首领窦首杀死，适逢贾疋也被胡人害死，麹允遂掌大权。

再说东方的几个行台，已是倒的倒，垮的垮，没有了号召

力。荀晞被石勒攻灭，他所立的行台随之消失，被他拥立的皇太子司马端仅在尊位上坐了七十天，便成了俘虏。在河阴（今河南孟津北）建立行台的傅祗，因手下无兵，在刘粲的进攻下，不仅未能号令四方，而且自身难保。69岁的傅祗不久便因焦虑，疾病交加而暴卒。死前，他为自己匡复朝廷的大志未能实现抱憾不已，特写下一份言辞慷慨激昂的字幅，字迹力透纸背，激励二子傅宣、傅畅继续奋斗。但傅宣等最终只能维持残局而已。未随司马邺西入长安的荀藩、荀组兄弟，停留在开封，无兵无势，勉强支撑着他们建立的行台，被司马邺委以督摄该地区的职务。在幽州的王浚虽然也设置了行台，但各地晋臣不予承认，他所委任的职位，许多人不接受。因此，当时真正有一定号召力的行台，只有在长安的那一个。

永嘉七年（313）四月，怀帝在平阳遇害的消息传至长安，麴允、索綝和梁芬等拥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改元建兴，麴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索綝为尚书右仆射、领太尉，梁芬为司徒，由他们三人主持军国大事。

愍帝一即位，便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他任命南阳王司马保（司马模之子）为右丞相，都督陕西诸军事，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左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二王像西周成王时的周公旦和召公一样“分陕而治”，共辅朝政，所寄予的重任是不轻的。建兴元年五月，愍帝计划让司马保领秦、凉、梁、雍诸州的兵卒三十万汇集长安，让司马睿从江东带精兵二十万直趋洛阳，同时命令幽州的王浚和并州的刘琨起兵三十万进攻平阳，诸路大军合计八十万人，若同时并举，收复中原、攻灭汉国是大有希望的。然而，这只是愍帝的一厢情愿，手握强兵的方镇大帅未必听从他的调遣。受愍帝派遣、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江东的殿中都尉刘蜀，就未能请动司马睿，后者借口说，江东尚未平定，自己没有站稳脚跟，顾不上北伐。愍帝无力调动司马睿，其他几个地方的军队也

不会有统一协调的行动，因而愍帝名为君主，实际上却指挥不了那些拥兵自重的大臣。

尽管司马睿不欲北伐，但江东力主北伐者仍大有人在。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祖逖即是如此。祖逖少有大志，曾与刘琨同为司州主簿，同床共被，半夜听到鸡叫声，便踹醒刘琨，说："这是不吉利的声音！"于是挥剑起舞，史称"闻鸡起舞"，表现出他的勤勉奋发的精神。渡江南下后，他多次主张北伐，收复中原。建兴元年，司马睿只得给千人之粮，布三千匹，不提供兵员和铠甲兵器，由他自行解决。祖逖遂率部曲百余家，北渡长江，在江中央，他击楫发誓说："我祖逖如不收复中原就决不再渡长江，像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他言辞慷慨，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感奋。遂屯淮阴（今江苏淮阴东南），冶铸兵仗，召募了二千余人，然后继续北进。

洛阳陷落后，刘曜、石勒滥杀汉民，激起了北方汉族人民的反抗，出现了许多互不统属而与汉军力战不止的队伍，如新郑有自称荥阳太守的李矩，洛北石梁坞有魏浚，浚死，族子该领其众，以河东太守名义与刘曜相抗。乞活帅陈午拥众五千，据浚仪（今河南开封）与石勒相拒。另外，河南郭默、魏郡邵续、广平刘遐，以及坚持在并州战斗的刘琨，均与刘、石交战不已，甚至塞外的鲜卑段匹磾、慕容廆、拓跋猗卢等，也尊奉晋朝，与汉国为敌，因而对刘氏汉国来说，要荡平所有障碍、完全控制北方广大地区的局势，决非易事。对晋朝来说，这本是极好的收复失地的时机。但是，由于晋帝的号令对各支反汉武装缺乏权威性，调动不了他们，而各支武装又彼此独立，甚至相互攻杀，大大削弱了他们之间的力量，使刘聪、石勒尽管多次吃过败仗，却未真正遇上使之生畏的敌手。

祖逖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中原，尽力团结其他抗战武装，李矩、郭默、赵固、上官巳等相继接受了他的节度。他与石勒交锋

多次，石勒部下不少人前来归附，中原百姓也很欢迎祖逖北伐，时常提供石勒军队的动静情况，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石勒竟不敢出兵在黄河以南区域活动。

祖逖取得了较大的战果，但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北渡黄河横扫冀朔。以并州、冀州为后盾的刘汉军队暂时没向南扩展，却集中力量西攻长安，一度引起关中恐慌。

建兴元年（313）九月，刘曜、赵染等率众数万进攻长安，愍帝派麹允迎战，将其击败。但他随后在黄白城屡遭败绩。升任都督征东大将军的索綝急忙带精兵赴援，使长安非常空虚。十月，赵染对刘曜说："就趁麹允、索綝率大军在外、长安空虚的机会，奔袭长安。长安陷落，麹允的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刘曜便以赵染为前锋大都督，率精骑五千袭击长安。赵染在渭阳打败晋军，杀晋将王广，乘胜杀至长安外城，愍帝逃奔射雁楼躲避战火。经过一场激烈撕杀，赵染俘获千余人，退屯逍遥园。晋将麹鉴自阿城率众五千援救长安，赵染才引兵撤退。麹鉴挥师前去追击，至零武（今宁夏贺兰西北），与刘曜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曜屡战屡胜，不禁骄傲自满起来。麹允趁他轻敌的机会，发起突然袭击，大败汉军，汉冠军将军乔智明阵亡，刘曜不得不撤回平阳。

次年六月，刘曜、赵染再度进攻长安。他们俩分别屯驻在渭汭和新丰。所到之处，大量抢掠麦子。索綝自长安率军攻赵染，赵染不把对方放在眼里。长史鲁徽对赵染说："对方知道彼此兵力悬殊，一定会拼死相抗，我们切不可轻敌，应该摆好军阵，做好充分的准备，再与对方较量。"赵染却说："司马模那样强大，我打败他就像折断一根朽木。索綝小子有什么能耐，能沾污我的马蹄和刀刃！我要先擒获他，再回来吃饭。"他不听劝告，于清晨率数百骑攻索綝，结果大败而回，懊悔不迭地说："我不听鲁徽之言，以致于此，回去还怎么见他呢?"于是，他杀了鲁徽，

鲁徽临刑前愤恨地说："你刚愎自用导致失败，却迁怒于他人，杀害忠良，还有何面目呆在世上！我死后如果有灵魂，一定要让你不得好死！"刘曜得知赵染的行为后，感叹道："赵染心眼太小了，犹如泥淖中的马蹄印，容不下一条一尺长的鲤鱼。"

刘曜、赵染继续攻长安，在冯翊与麹允展开大战，麹允起初兵败，后来夜袭汉将殷凯兵营，将其杀死。刘曜只好回师攻河内太守郭默，将其围困在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夺其粮食八十万斛。城中粮尽，郭默便向刘曜表示，如果能得到对方的粮食供应，他就献城投降。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将妻儿送刘曜营中作人质。刘曜信以为真，即给郭默送去一批军粮。当郭默得到粮食后，重新固守城池，与刘曜继续战斗。刘曜大怒，杀郭默妻儿，再度发起猛攻。郭默欲投奔李矩，却冲不出去。适逢刘琨派人率五百骑赴援长安，因道路阻隔，未能前进，便向东撤退，路过李矩营，李矩请他们与汉军接战，尚未开始战斗，汉军士卒见对方是强悍的鲜卑兵，非常胆怯，没有交战就乱了阵，争相逃跑，郭默这才得以与李矩会合。

就在刘曜与郭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汉主刘聪派人责备说："当务之急是除掉司马邺和刘琨两个劲敌，现在司马邺所在的长安竟然平安无战事，刘琨也在并州各地游荡，不时地威胁平阳。你应该先攻他们，郭默不过是区区小寇，派一员偏将就足以对付，何劳你对他兴师动众！"刘曜于是还军屯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

建兴三年（315），刘曜自盟津渡过黄河再度攻入黄河南部区域，将魏该驱赶到一合坞，又在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歼灭李矩部将李平。李矩无力抵抗，遣使请降。刘曜兵势甚盛，又对长安发起进攻。但在长安附近遭到对方顽强抗击，无法前进，不禁感叹："司马邺仍有很强的实力，一时还难以将其消灭。"于是收兵撤退。

这年夏天，刘曜又进攻上党郡，在襄垣击败刘琨的部众。他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但刘聪遣使告诫说："长安的司马邺是我们的首要敌人，应先攻长安。"刘曜于是再次挥师大举进攻长安。

刘曜先攻掠北地郡（今陕西耀县、富平一带），继而攻克冯翊郡的临晋（今陕西大荔），冯翊太守逃奔万年。刘曜兵势很盛，关中许多县邑望风归附。愍帝任命麹允为大都督，在外迎敌，任命索綝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守卫长安。麹允因为兵少势弱，自黄白城移屯灵武，不敢主动出击。愍帝因处境危险，屡次向司马保征兵，而司马保左右的人说："毒蛇咬了手指，就应砍断手臂以保全生命。我们现在面临强敌，应该截断长安通往陇西的道路，以保护我们自己。"从事中郎裴诜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尖锐地发问："蛇已咬我们的头了，我们难道把头也砍下来吗？"司马保不便于明确表示自己将置长安于不顾，先保自身，便命令胡崧为前锋都督，准备赴援长安，但同时又让他等到散在各地的人马到齐之后，再出发。因此，在长安危在旦夕的时刻，司马保实际上是袖手旁观，没有出兵介人刘曜与司马邺之间的争斗。长安外无援兵，内乏粮食，自百官至于庶民无不陷于窘迫之中。麹允建议带愍帝西迁到南阳王司马保那儿去，但索綝怕南阳王控制皇上后，会左右朝廷，削弱自己已有的权势，不赞同麹允的建议。

建兴四年（316），刘曜加强了在关中的攻势。七月，他包围北地郡治，太守麹昌遣使向麹允告急，麹允亲率步骑三万前去救援。当这支援军到达离城几十里的地方时，刘曜命令部下绕着城烧起大火，使浓烟冲天蔽日，几十里外都能看见。接着，刘曜派奸细混人麹允的军中，向麹允谎报说："郡城已经陷落，被焚烧得差不多了，救援为时已晚。"麹允得知这一虚假的情报，未派人前去核实，便下令撤退。当撤至磻石谷时，被刘曜的骑兵追及，麹允部下溃不成军，四散而逃。几天之后，北地失陷，麹昌

突围奔回长安，麹允才知中了刘曜的计。他见到历尽艰辛、从重围中逃奔出来的麹昌时，表情十分尴尬。

麹允自从担任朝廷重臣后，为了争取百官的合作与支持，大量颁授爵位，带侍中、常侍及将军之号的人很多，然而，真正一心一意与他同舟共济的人却不多，国家危难之际，那些朝廷大臣们仍在勾心斗角，因私害公。如麹允因关中危乱，频向安定太守焦嵩告急，焦嵩却迟迟不发救兵，说："得等到麹允完全陷于困境时，我再发兵援助。"

八月，刘曜在横扫渭水之北各城镇后，直逼长安，长安城中一片混乱，不断有使者到各地去求援。一时新平太守竺恢、平东将军宋哲及镇西将军焦嵩等，皆出兵奔赴长安。散骑常侍华辑也率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之兵屯驻长安城东的霸上。诸路人马虽已至长安附近，却均不敢进击刘曜军，因此，长安依然处在危急中。

一年前受司马保之命入援京师的胡崧，此时才真正行动了，他在长安西四十里的灵台与刘曜相遇，打了一仗，取得了胜利。照理说，他应乘胜进军，前去加强长安的防御。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考虑到一旦打败刘曜，则晋朝国威复振，麹允、索綝的权势会更盛，对他的主子司马保窃取大权不利。于是，他率长安以西各郡之兵屯驻渭水之北，坐观成败，不久又退至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

刘曜没受到诸路援军的干扰，可以全力攻长安，很快占领了长安外城，麹允、索綝带兵退守长安小城。因内外隔绝，城中乏粮，死亡和逃跑的士兵日益增多。连愍帝也挨饿了，每天只能吃上用仓库里留存的酒曲碾碎煮成的稀粥。愍帝眼见无法再维持局面，哭着对麹允说："外无援兵，内无粮食，我只有忍辱投降，尽快结束士民受苦受难的局面。"十一月，他派侍中宗敞去向刘曜送交投降书。

就在宗敞要出发时，索綝悄悄留住了他，改派自己的儿子前去与刘曜会面，说："现在城中还有足以维持一年的粮食，要将其攻克决非易事。你如果能任命索綝为车骑将军，封为万户郡公，索綝可以向你献城投降。"就在这将要亡国的时刻，索綝还在为保持自己的权势算计。不过这回他打错了算盘，刘曜杀了索綝之子，派人将尸首送回，并让其转告索綝："你如果认为那边仍兵强粮足，就勉强守住城池；如果认识到粮竭兵微，就尽早请降。否则，一旦我威风一振，恐怕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遭殃了！"

十一月十日，宗敞正式送达降书。次日，愍帝乘着羊车，口衔奉献给刘曜的玉璧，带着棺材，出城投降。西晋至此灭亡。

群臣随愍帝出降，其中只有御史中丞吉朗一人因不愿成为亡国奴而自杀。愍帝与群臣一起被押送到平阳，向汉主刘聪叩头下拜。麹允不堪其辱，伏地痛哭，刘聪一怒之下，将他关进监狱。麹允随即在狱中自杀。索綝则因对自己的君主不忠，被刘聪斩首示众。

愍帝司马邺在平阳受尽凌辱。刘聪任命他为无权势的光禄大夫，封为怀安侯。他日常的一举一动，均在刘聪派的人监督之下。公元317年10月，刘聪率百官外出打猎，让司马邺身着戎服、手执长戟作为前导。堂堂晋朝皇帝，竟成了给他人开道引路的区区小将，他心里那苦涩滋味就别提了。当他走在前面引路时，引来了许多百姓围观，其中有一些老人，过去曾为晋臣，见到此情此景，不禁欷歔流涕，感叹不已。

刘聪还在光极殿大摆宴席，像过去侮辱怀帝一样，强迫司马邺为众人斟酒，以看看那些在场的晋臣有什么反应。原晋朝尚书郎辛宾无法抑制悲愤之情，起身抱住司马邺放声号哭，刘聪见状，大声喝道："过去庾珉等人因这样的事被杀，难道还不足以为戒吗？"他当场下令将辛宾推出斩首。

宴席散后，刘聪上厕所，又叫司马邺站在一旁拿马桶盖，司

马邺只能忍气吞声，按命令行事。

在此前后，江东的司马睿和中原的李矩、郭默、赵固等仍奉司马邺为君，号召各地起兵攻刘汉。赵固、郭默等一度攻入汉国的河东郡，当地有三万余人归降。赵固等人还扬言，要活捉刘聪的太子刘粲，以赎回愍帝。刘聪虽然派兵打败了赵固等人率领的军队，但对于人们老打着要赎回司马邺、复兴晋室的旗号煽动作乱，与自己为敌，非常厌恶，遂决定处死司马邺，以使那些晋朝遗民死了那条心。

这年十二月二十日，司马邺在平阳遇害，年仅 18 岁。

（陈益民）

参考资料：

《通鉴纪事本末·西晋之乱》

《晋书》：《阎鼎传》、《麴允传》、《祖逖传》、《索綝传》、《刘聪载记》

太康文学之兴

司马炎篡夺了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司马炎即晋武帝。晋朝初建，武帝下诏广开言路，要大臣们直言时政，批评得失，表示要纳谏。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都是谏官。傅玄上疏请武帝要分别士农工商，尊从儒学，兴办学校。皇甫陶也疏请武帝注重农耕，发展生产，使天下足食足兵。经数年积蓄力量，晋军终于灭掉了吴国，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持续百年的割据和战乱，统一了天下。这一年改年号为太康元年（280）。

西晋建立后仍旧实行门阀制度，任命官吏依然推行九品官人法。段灼上书给武帝，指出弊端，他说："如今朝廷台阁选官用人，闭塞耳目，九品选材，唯问中正。所以进人上品者，不是公侯贵族子孙就是权势豪门子弟，蓬门荜户的贤俊怎么会有出头之日呢?"尽管西晋初年朝廷政策并无重大改革，政治上腐朽衰颓气象并无改善，但是，由于长期分裂和混战，民众已经饱受战乱之苦，民心渴望统一，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所以在灭掉了吴国之后，西晋比较顺利地进入了安定发展时期，出现了太康之治的局面。

就在太康年间，也出现了文学的兴盛繁荣，一批文人才士活跃在文坛，诗文词赋之作丰富多采，古代文学的发展进人魏晋时期中太康文学的阶段。

由于司马氏晋朝政权得于篡夺曹魏，没有经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冲击，豪门士族继续执政掌权，奢华靡丽的风气盛行不衰，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文学上也出现了追求形式华美的倾向，讲究辞藻华美、对偶工整、音韵和谐，轻视文学有补于世的社会作用。建安时期具有阳刚之美的慷慨悲歌，渐被轻艳柔美的阴柔之作代替，浮华靡丽的文风兴起，重教化、尚朴实的精神衰落了。对这样的文风，在西晋初期就进行过讨论。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庾峻。

庾峻字山甫，自幼好学，有才华，善思考，晋武帝时任秘书监、御史中丞、封侍中、谏议大夫，他经常在宫中为武帝侍讲《诗经》。他曾和中庶子何劭讨论《风》、《雅》的正变之义。庾峻针对社会上趋进争竞的风气、浮华靡丽不修名实的文风著论批评。

西晋初年也有鄙弃这种文坛风习，居贫不仕的隐者，著名的人物是皇甫谧。皇甫谧字士安，向有"书淫"之称，晋武帝多次降诏敦促，逼迫他出来做官，皇甫谧坚决不肯应征，他上表向武帝借书，武帝送了一车书给他。太康三年皇甫谧去世，始终不仕。他写作了大量的诗赋诔颂文章，著成《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及《玄晏春秋》等书。皇甫谧曾为左思《三都赋》作序，称赋的写作要领，文必极美，词必尽丽。他的弟子挚虞名声甚高，挚虞才学通辨，著述不倦，写作有《思游赋》、《太康颂》等作品。他对古今文章类聚区分，著有《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集》三十卷，这两部著作从文章文体的性质、源流人手进行论述，词理惬当，论其得失平允，在文学的文章流别研究上有重要地位，专就文学中的文体辨学术，考源流，具有划时代意义。

太康年间在地位和声望上颇高，有文坛领袖之誉的是张华。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张华自幼孤贫，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年轻时便作《鹪鹩赋》抒怀谕志，作得很好，甚受阮籍的赏识推许，称赞他有"王佐之才"，从此他名声

鹊起。晋朝建立后历官黄门侍郎、中书令、散骑常侍。当时以博闻多识，知识渊博著称，四海之内无事不知，熟谙历代典章制度，时人比之子产。武帝准备灭吴的计划遭到群臣反对，只有张华和羊祜赞成并支持武帝伐吴，完成统一大业。张华十分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对推荐识拔贤才文士孜孜不倦，陆机、陆云、左思等太康文学巨匠，都曾经得到他的称誉和帮助，对太康文学的兴起起到了倡导和推动作用。在八王之乱中张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身后家无余财，只有文史书籍堆满室中。陆机兄弟名重江南，不服中原文士，只对张华钦敬，待如师尊，张华死后陆机为作诔文，并作《咏德赋》悼念他。张华著有《博物志》十篇传世。其诗词藻浮丽，向有“女儿情多，风云气少”之评。

活跃在晋初文坛上的太康文学主将，便是为人称道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即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和左思。

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祖父陆逊、父亲陆抗是东吴名将。吴国亡后，在太康年间陆机、陆云兄弟到洛阳，陆氏兄弟文名冠天下。陆机是太康时期一位重要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他写作的《文赋》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他一生写作的诗赋文章计有三百多篇，可惜散失了很多，后人辑的《陆士衡文集》只保留有一百七十余篇。陆机的诗极富光彩，入洛之前多是国破家亡感慨之作，入洛后的一些篇什寄寓了人生仕途的悲哀，情真意切，一些拟古诗醇厚质朴，有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对偶精当，字句工整、洗炼，以工巧细腻华美为人称颂。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他的主张对创立新的诗风产生过重大影响。陆机的赋胜过他的诗，他继承了汉末以来多作抒情小赋的传统，短小清新，如《叹逝》、《感时》、《思亲》；也有咏物的，如《漏刻赋》、《瓜赋》、

《鼓赋》；名传千古的是他以赋论文的作品《文赋》。陆机之文较其赋更有气势，《汉高祖功臣颂》主旨论述刘邦之得天下由于知人善任；《吊魏武帝文》前有序，后有文，盛赞曹操功业，并表示深沉的愤懑和痛惜；《辨亡论》总结了吴国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全篇模拟贾谊《过秦论》，才气纵横，文思浩荡，文词华美，绚丽多彩，是晋代骈文的名篇佳作，寄托了陆机的故国之思。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语言凝炼，引喻切当，见解精辟，颇显示文思之精妙。系统阐述创作论的《文赋》，是陆机文才高深有素、研精覃思之作，他论述"作文之利害"，关键是在"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要文章通畅明达，就必须体察外物，开启文思；同时学习典范，丰富和汲取营养。《文赋》的核心是论述构思，他主张虚静专一，发挥想象力，然后布局谋篇，修辞炼句，达到文和意的完美。陆机强调"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要反映千姿百态的对象就要因宜适变，灵活地变化和运用技巧。《文赋》还表现了陆机重视创新，不能陈词滥调不知变通，不仅收百世阙文、采千载遗韵，而且要谢朝华、启夕秀。陆机对创作中最难于捉摸的灵感问题也作了探讨。关于文学创作中的精深独到见解，不是才高识广、能诗善文的人是体味不出的，《文赋》对后世的启发引导作用甚大，刘勰作《文心雕龙》、钟嵘著《诗品》，都得力于《文赋》。陆机在史学上亦有建树，著有《晋纪》和《洛阳记》等书。陆机入晋后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在八王之乱中被诬杀。

陆机弟陆云，字士龙，少年时与陆机齐名，然文章的华彩不及其兄，文理和持论却颇精到。陆云曾任清河内史，故人称陆清河。据说陆云生性爱笑，兄弟二人初到洛阳去见张华，陆机先至，张华问陆云何在？陆机说陆云有笑疾，自己不敢贸然来见，不多时陆云来到，见张华风姿不俗，用帛绳缠束着胡须，大笑起来不能自已。张华曾云"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十分爱重陆氏

的声名。陆云写作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陆云《与兄平原书》凡数十通，多数都是讨论作文论学之事，只是内容比较琐碎，没有统系，无关宏旨，价值和地位不及陆机的《文赋》重要。陆云之弟陆耽也有清誉，兄弟三人都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自幼聪颖，号为神童，曾任河阳令、著作郎、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潘岳轻浮躁进，谄事权贵贾谧，甚至望尘而下拜，诬构愍怀太子的文字据说便是出自潘岳手笔。一批文士攀附贾谧，号称贾谧二十四友，以潘岳为首。他年轻时写作的《射雉赋》生气勃勃。其后仕宦之路不得意，一直沉为下僚，他写作了《闲居赋》、《秋兴赋》，多有怨愤之气。在任长安令时写作了《西征赋》，这篇名作形式上仿班彪《北征赋》、曹大家（班昭）的《东征赋》，体制宏大，征引广博，文采富丽，只是笔端仍凝聚着驱不散的愁绪哀情，具有凄惋的风格。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专权，潘岳曾得罪过司马伦宠臣孙秀，被诬陷而夷灭三族。潘岳文才富赡，诗文艳丽，在晋初文坛上与陆机齐名，并称为“潘陆”，同为太康文学杰出代表人物。他的诗、赋作品语浅情深，真挚动人，抒发哀情的《哀永逝文》、《怀旧赋》、《寡妇赋》皆脍炙人口，《悼亡诗》三首尤为著名。《哀永逝文》是他安葬爱妻时所作，山河惨淡，心境寂寞，楚楚动人。出自对亡妻的怀念，《悼亡诗》更是笔触细腻，缠绵悱恻，委曲深婉。潘岳一生依附权贵贾氏，最后随贾氏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招致杀身灭门惨祸。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太康文学讲究形式美的特色，而且声情并茂。其内容单薄寡弱，大多为抒发愁思情怀、哀伤凄婉之作。潘岳的作品具有清绮哀艳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来的感情深沉真挚、流露自然，尤为卓绝。后人辑录他的作品有《潘黄门集》。

潘尼字正叔，是潘岳之侄，他和潘岳均以文章出名，性格却

相反，潘尼恬静笃实，不肯争兢趋进。著有《安身论》、《乘舆箴》等文章。

另一位杰出文学家是左思，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他出身于寒门，没有社会地位，少年时学过书法，通阴阳之术，长得其貌不扬，文才却很出众。他的妹妹左芬也读书好学有文名，被晋武帝纳入宫中。在他随妹入洛阳之前写作过《齐都赋》，为其处女作。左思著名作品是《三都赋》和《咏史诗》。他为了写作《三都赋》下过一番苦功夫，左思曾拜见张载，访问蜀地岷、邛之事，构思十年，门庭各处都放置纸墨，冥思苦想，殚精竭虑，每得一佳句便即书写下来。当初他写作这篇赋时，陆机曾经讥笑他不自量力，原来陆机也有意想作这样的赋，听说左思在写便抚掌大笑，作书给陆云说，此间有伧父（指北方人）欲作《三都赋》，等他写成，只当用以覆酒瓮耳。但在左思完成《三都赋》后，陆机看过很是佩服，遂辍笔不作，打消了再作的念头。《三都赋》刚写成问世，时人有褒有贬，互有毁誉，左思拿给张华，张华对他说："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推重，应当经过高明之士推崇。"左思遂征询于皇甫谧，皇甫谧见其文大为叹赏，遂为他作叙，于是原先非难者改口称赞，由此左思名重京师，《三都赋》引起轰动，豪门贵族争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三都赋》仿汉代大赋，长达万余字，宏丽典雅，铺张扬厉。写作行文字斟句酌，文词优美。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左思对汉赋的夸张失实提出了批评，主张作赋也要重视真实性，他认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但是，汉代大赋兴盛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撰写这类京都大赋已成颓势，左思之后几成绝响，没有人再写这类出色作品了。左思的诗写得很好，《咏史诗》八首堪称佳品。他的五言咏史诗突破了传统写法，开创了咏史诗新面貌，借古人古事以咏怀抒情，或表示"铅刀贵一割"，希望施展才能和抱负；或抒"白首不见招"的感愤。左思出身寒族，在门

阀等级森严的制度下，仕途发展无望，建功立业之志难酬，受压抑的愤懑情绪奔流渲泄。有的诗歌颂了段木干、鲁仲连、荆轲等人的清正操守，不慕富贵，不求闻达，表达了“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理想，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性。可以看出他的咏史诗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故而受到钟嵘《诗品》的赞扬，说是具有“左思风力”，《咏史诗》用语质朴，又奇伟迭出，在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左思的咏史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同是一代诗风的代表，有开启先路的模范作用，对后民影响是巨大的。当然，有些诗句也表现了沉沦感伤的消极情调。除《咏史诗》之外，左思的《招隐》二首和杂诗，也别具一格，活泼可爱。

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均博学多才。张载字孟阳，其父张收任蜀郡太守，太康初年他省父到蜀地，路经剑阁，领略了剑阁雄险，蜀道艰难，他有感于蜀人恃险好乱，写作了一篇铭文以诫世人，后来晋武帝命人将铭文镌刻在剑阁山上。他还写有《榷论》、《濛汜赋》等文章，得到傅玄等人的叹赏推重。张载起家佐著作郎，补任肥乡令，历任著作郎、太子中舍人、乐安相、弘农太守。他看到西晋立国后政治腐败，世道混乱，便告病回家。张协字景阳，与兄张载齐名，任过秘书郎、华阴令、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中书侍郎、河间内史。后隐居草泽，不过问世事。他写作了《七命》，文章工整秀丽，为世人称誉。张亢字季阳，才华不如二位兄长，但也擅长著文，并通晓音乐律历。

进人永嘉时期之后，随着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兴起，西晋灭亡，文学成就不如太康文学光彩夺目。在诗坛上玄言诗盛行，理过其辞，缺少诗意，值得称道的是永嘉诗人刘琨、郭璞。刘琨善叙战乱，多感恨之词，发出报国的悲愤之声。可惜只存留有三首，充满了英雄失落的感慨，功业未就出师未捷的叹恨之情，感人至深。郭璞的游仙诗虽然也有玄言的成分，但却有较浓厚的抒

情色彩，且富于形象性，语言豪壮俊爽，艺术性较高，是永嘉平淡中之佼佼者，《诗品》称之为“中兴第一”，体现了哲理与艺术完美的统一。郭璞的赋也有特色，仍沿续着小赋的特点。总之，永嘉文学随国家战乱已现低落。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张华传》、《傅玄传》、《陆机传》、《潘岳传》、《左思传》、《张载传》

《中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

《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题解》

《中国文学理论史》

陈寿著《三国志》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陈寿自幼好学，从师于同郡的谯周。

谯周是一位史学家，汉献帝建安六年（201）生，卒于晋武帝泰始六年（270），活了70岁。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南部西北）人。幼年时家道孤贫，他废寝忘食地读书，以博学多才闻名，曾在蜀汉丞相诸葛亮属下任劝学从事，大将军蒋琬领益州刺史，谯周转任典学从事，主管一州学务。后主刘禅被立为太子，以谯周为仆，转任家令、中散大夫，后迁升光禄大夫，虽然不参与国家政务，但有些重大事件，后主常向他咨询。魏国派钟会、邓艾领兵伐蜀，邓艾偷渡阴平，蜀汉君臣惶惑无计可施，有人主张蜀与吴和好，可以逃奔到吴国；也有人认为南中七郡地势险要，应当南下退守。谯周劝后主投降魏军，后主遂听从了谯周建议，归降了魏国。因为劝降的功劳，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对谯周劝降的行为，人们有许多讥议。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累次下诏征召谯周，谯周便在泰始三年应召到洛阳。泰始五年陈寿担任本郡中正，公务完毕后向谯周告别还乡，谯周曾向陈寿说恐怕活不了多久了，转年冬便去世了。谯周著有《古史考》十五篇，以及《法训》、《五经论》等文章百余篇，他对陈寿的学问影响很大。

陈寿师承谯周，勤于学习，研讨《尚书》、《春秋》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尤其精通《史记》、《汉书》，他聪明

颖悟，机敏有见识，文才富赡。起初应本州之命担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观阁令史。后主宠信宦官黄皓，这黄皓是个奸邪小人，专权逞威，大臣们都逢迎他，依附权势，陈寿不肯趋炎附势，为此屡被谴责降职。陈寿的父亲去世了，在服丧期间陈寿患病，使婢女为他调制丸药服侍，有客人见了说他有悖礼教，为此受到乡人的訾议。晋统一了蜀汉之后，陈寿察举为孝廉，任本郡中正。

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四川便有了很大发展，益州地区物产丰富，人材济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与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都是博学多闻之士，写作了《巴蜀耆旧传》，记载四川地区的历史。陈寿认为其书不够完备，难以留传千秋万代，于是，并入了巴郡、汉中，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散骑常侍文立，原先也是蜀汉官员，精通《毛诗》、《三礼》，很有学识，便上表推荐陈寿，并向晋武帝进呈了《益部耆旧传》一书。晋武帝认为书写得好，作者很有才学，遂任命陈寿为著作郎。晋军平定了吴国，统一天下，结束了鼎立纷争的局面。国家一统，社会安定，使陈寿得以安心从事于史学著述。他便搜集征访三国的史书，为三个国家分别撰写历史，著成《魏书》三十篇，《蜀书》十五篇，《吴书》二十篇，合计六十五篇，号为《三国志》。此后，陈寿又著成《古国志》五十篇，记述古代历史。他的著作格调很高，品评公允，词藻典雅优美，在当世颇受好评。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都是学识渊博的晋朝大臣，很喜爱陈寿的著作，赏识陈寿的才学见识，认为司马迁、班固的史学才能不过如此。以后陈寿出任平阳侯相。张华上表朝廷，令陈寿整理编次蜀汉丞相诸葛亮遗作，陈寿奉命厘定了《诸葛亮故事集》二十四篇。他再次入朝任著作郎。曾经参加平吴战争的镇南将军杜预，也精通《春秋》与三传，推重陈寿的史才，上表荐举陈寿为散骑侍郎，朝廷下诏任他为侍御史。陈寿依据文献记载和

历代的因革兴废，论述了各朝代的官职情况，写成《官司论》七篇，上奏给朝廷。此外，他还撰写了《释讳》、《广国论》等文章。中书令张华请求朝廷让陈寿兼任中书郎，陈寿撰写《魏书》时记述一些史事令荀勖不满意，荀勖忌恨张华而牵连到陈寿，不愿陈寿在朝廷中做官，便奏请朝廷使陈寿到外地出任长广太守。陈寿的继母在洛阳故去了，有遗嘱命就地安葬，因此陈寿未将继母的灵柩运回原籍，与父亲的尸骨合葬，为这事受到一些人的讥讽责备。几年后，被任为太子中庶子，后又兼任散骑常侍。惠帝即位后，对司空张华曾说："陈寿的才学世间不可多得，应当让他担任实职，不要长时期兼职。"张华便上表想荐举陈寿位列九卿，掌握实权，参预政务，而这时八王之乱发生了，赵王司马伦与孙秀为实现野心，诛杀大臣，张华遂遇害而死，陈寿也被排斥，不久死于洛阳。时在惠帝元康七年（297），享年65岁。张华有心要进行晋朝历史的编修，有意使陈寿执笔，担当重任，曾经向陈寿表示："我将要把《晋书》的修纂托付给你。"这个愿望却未能实现。

陈寿去世以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上表给朝廷："昔年汉武帝曾经颁下诏书说：'司马相如病势沉重，可遣使将他著作的书籍文章全数取来。'臣等以为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所作的《三国志》，言词通达，富有劝善戒恶之用心，辨明是非得失清楚，有益于教化。虽然文字艳丽不如司马相如，而质直胜过他。请准予录写后收藏保存。"于是朝廷下诏指示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中录写《三国志》，将这部不朽著作收入朝廷保存。

三国时期，魏、蜀、吴各国分别撰写过本国的历史。魏文帝黄初年间，卫觊、缪袭撰著魏国历史。明帝太和元年（227）开始设置了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称作著作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王沉与荀觊、应璩、阮籍、孙该、傅玄等继续撰著魏史，最后由王沉著成《魏书》四十四卷，书中有许多地方因为避讳的

缘故，影响了内容的真实。魏灭亡后，京兆人鱼豢著有《魏书》五十卷，这是私人修撰的魏史，与官修者不同。

蜀汉的修史活动较少，不如魏、吴，蜀国亡后，原东观郎王崇撰著有《蜀书》。

吴大帝孙权太元元年（251 年），命丁孚与项峻撰著《吴书》。少帝建兴元年（252），韦曜与华覈、薛莹、周昭、梁广等一同撰著《吴书》。孙皓在位时，命薛莹继续撰吴史，孙皓又设置了左国史、右国史的官职，专掌修史，薛莹与华覈分别担任过左、右国史。又有周处曾任左国史，升任东观令，周处也写过《吴书》。韦曜著作《吴书》未成便被孙皓杀死。

晋武帝泰始年间，司马彪著有《九州春秋》，一州为一篇，合为九卷。

晋灭吴之后，陈寿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开始写作《三国志》，对魏、蜀、吴三国原先的史书收集采用，作为他写作的依据，约在太康六年前后完成。书著成后，颇受当时人的好评，称赞他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这时夏侯湛正在著《魏书》，见到了陈寿所作的《三国志》，自认为不如陈寿，便毁了自己著作而罢手。

陈寿所著《三国志》，是记三国鼎立时期比较完整的史书，有本纪、列传两大体系，陈寿文笔简洁，记事翔实。蜀汉灭亡时他已经 31 岁，他的一生一半时间在蜀汉，一半时间入晋朝，有许多历史事件是亲自经历，也有的是耳闻于当事人，魏陈留王曹奂比陈寿还要晚死五年，可以说陈寿见闻真切，这是有利条件。但是，由于作史的年代太近，有些史料尚未面世，史书有的内容在写作时便有资料缺乏的困难。比如曹魏的屯田，乃是魏国的重要措施，他只在《武帝本纪》中略说几句，虽然使这一类大事没有湮没，却记述极不详细。蜀汉建国没有正式史官，记载历史不系统，资料贫乏，虽然他本人就是蜀人，也仅写了十五卷，不如

魏、吴丰富，即使他对零篇散文也注意采用，但仍然有些地方“史失其事，故不为传”，没有依据只好不写。又由于距时代太近，大量的史料未经整理，各方面资料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陈寿在写作时便没有写“志”和“表”两部分。虽然名称是《三国志》，其实并没有史书中的“志”。

由于著史的时间距离记述的朝代太近，国与国之间、家族之间、个人之间，政治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写史时产生困难，议论褒贬很难下笔，有人说：丁仪、丁廙兄弟在魏国有盛名，陈寿便对其儿子说：“可送给我千斛米，便为尊公作一篇佳传。”丁氏之子不给，陈寿竟然不为丁氏立传。又有人讲，陈寿的父亲曾任马谡的参军，马谡失守街亭被诸葛亮斩首，陈寿之父也被牵连受了髡刑，所以陈寿为诸葛亮作传时，说诸葛亮不长于将略，没有应敌制胜之才；又说诸葛瞻只是工于书法，名过其实。为此，陈寿受到议论和批评。对陈寿索米之说，后人也莫衷一是，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刘永济都信其有；清代的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钱大昕皆辨其必无，潘眉专门作《三国志考证》，说丁氏兄弟官位不高，又无功绩可言，当时著名文士徐干、陈琳、杨修等人都无传，何况丁氏，不为其立传本无足怪。这种不如个别人心意的事总避免不了。

陈寿作当代之史，不能不有所隐讳，特别是对当朝统治者，不得不顾忌。晋朝是司马氏建立的，武帝司马炎便是司马懿的孙子，对于“死诸葛惊走生仲达”之类事，就有贬损司马懿之嫌，陈寿即便知道也不便写进史书。又如魏高贵乡公曹髦之死，载入皇太后的诏令，历数其罪状，却看不出是司马昭授意将他杀死的。陈寿为晋朝避讳，不得不这样曲意回护。

再有正统问题。司马氏取代了曹氏，晋朝承受魏国的禅让，承认晋是正统，首先必须以魏为正统，蜀汉与吴只是偏霸。正统所在的魏，在写作体例上必须与蜀、吴有所区别，所以《魏志》

有本纪，记述帝王；蜀、吴只有列传。表面上看，陈寿尊崇了魏，贬低了蜀、吴，但是陈寿将三国各自为书，分开来写，实际上表示了三国鼎立，不相统属，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形的。就是《蜀志》与《吴志》中的帝王，名义上是传，其实也是按本纪的写法，编年叙事的。从而可见陈寿处理写作体例时的良苦用心。以后却因此出现了正统之争。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开始提出异议，后人也对陈寿提出指责，南宋朱熹以后，人们多赞同习凿齿，非难陈寿。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在《总目提要》中，针对《三国志》评价明确地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时，晋朝已经南渡，类似蜀汉，为偏安政权争正统，顺而且易；陈寿是西晋时人，晋武帝承袭魏国的帝统，否定魏是正统也就是否定了晋，如果以蜀汉作正统，逆而且难，不能一概而论。

《三国志》记述史事简洁，文笔洗炼，固然是其长处，深得好评。同时，却又过于简略，失记和不详的地方有很多。朱明镐作《史纠》论《三国志》有四项缺失：不志历学，一缺也；不传列女，二缺也；不搜高士，三缺也；家乘国志未及广采，四缺也。朱明镐所说固然有道理，但是，陈寿遗漏失记的史事比这些还重要。钱大昕在《三国志辨疑序》中说，此书被人看重，关键在于“叙事之可信”，又说：史官记载历史，事件久远了议论才会公允，时代近了见闻才能确实，三国介于汉、晋之间，汉、晋的历史有违误失记的，往往赖《三国志》纠正。钱大昕认为，除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外，只推重此书；陈寿的史才胜过范晔、欧阳修。

《三国志》不仅叙事简要，内容可信，而且议论也有见地，褒贬公允。评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对曹操用人唯才是举和豁达大度作了肯定，评论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

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评诸葛亮"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都可以说是中肯深刻，评价恰当。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有着很高的价值。因其务求简洁、洗炼，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均有遗漏，令人深感遗憾。正因为如此，叱咤风云的人物不如《史记》所写的那样有声有色，显得暗然无华。就在陈寿作《三国志》之后约一百三十年，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主要是拾遗补缺，增加内容，丰富史事。因此，裴松之的注，成为《三国志》不可缺少的补充资料。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东晋灭亡时他已经49岁。他8岁学通《论语》、《毛诗》，20岁任殿中将军，历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令、尚书祠部郎、治中从事史。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政权之后，他历官零陵内史、国子博士、中书侍郎。　　　　　，受到刘裕夸赞。因为陈寿《三国志》简略　　　　　为该书作注，裴松之收集资料，充实史事，　　　　　周详完备。在元嘉六年（429）成书，进呈　　　　　赏识，称他的注是不朽的著作。其后，裴松　　　　　任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致仕，元嘉二　　　　　岁。他还著有文论及《晋纪》、《宋元嘉起居　　　　　可惜早已经亡佚了。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比原书增多三倍，他开创了为史书作注的新途径。他不仅用了注释的方法，而且用了增补的注法，使原书内容更加丰富多采，详尽地补救了原作的缺载和简略。注

文征引的古书多达一百五十九种，汉、魏、西晋时期的著作，大部分他都参考并使用了，大多数书在后世都已经失散亡佚了，依赖裴松之的注才使我们对那些书的大概有所了解。

裴注的内容，包罗万象，可以分为八类：

一、关于文字的解释，对字音、字义、地理、名物、典故等分别作注。这种作注的方法，前人经常使用，裴松之作注目的在于增广事实，这些并不是他主要的注意之处。

二、补充《三国志》记载简略之处。对陈寿记述的重要历史事件及过程、人物事迹，不够详细清楚的，裴松之广征博引，加以补充。这一类注文最多，是他用力最勤的部分。比如他引用王沈《魏书》中文字，补充曹操在许昌实行屯田的事。

三、补充遗漏之处。陈寿原书不仅记载简略，而且有些重要史实和人物事迹完全遗漏，裴松之搜集资料重新补写，使历史过程得以完备，甚至有的内容后来都被列为《三国志》正文。足见价值之高。如引用《魏略》补充了孔桂、贾洪等人的传记，补写了马钧的事迹等。

四、考辨讹误。对陈寿记载有误的地方，裴松之或引用他书、或推理举证，考证并分析原书的讹误；同时，他还附带着考辨其他史书记载的失误。

五、对各家记载不同之处作论证。三国时期风云变幻，历史事件与人物众多，各家记载往往不同，裴松之一一比较研究之后，提出自己意见，辨明孰是孰非。没有掌握大量资料以及高深的分析判断，是不容易做到的。

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评论。裴注不仅补充事实，而且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自己的评论，也有些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评论。如贾诩劝李傕攻打长安的评论、曹操听任关羽去投刘备的评论、诸葛亮斩马谡的评论等。这类注文反映了史家的看法，能启发读者兴趣，并供研究者参考。

七、对陈寿的批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陈寿原书作了总评价，肯定了他叙事优美、正确，是一部佳作，同时也指出其简略脱漏的不足，对原书记事不当、编纂不当、评论不当的地方，也悉心指明。

八、对其他史家的批评。裴松之征引各家著作，也常作品评指正，对这些著作既有总评，又有某些内容方面的批评，也有对某些议论的批评。如对《后汉纪》、《江表传》等书皆有评论。

裴松之还记述了他亲身见闻的材料，如他分辨《典论》刊石放置的处所、孙怡并不是孙权族人等，纠正了记载的错误，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裴松之可以说是注《三国志》的功臣，读《三国志》不可不读裴注已成为定论，注文与正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尽管后世有人批评裴注有繁芜的弊病，但并不减低其价值。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华阳国志·陈寿传》

《晋书·陈寿传》

《宋书·裴松之传》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中国史学史论集》

司马睿建东晋

司马睿字景文，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觐之子，咸宁二年（276）生于洛阳，15岁时嗣位琅邪王，元康二年（292）封员外散骑常侍，迁左将军。这时发生了宗室诸王之间的残杀，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失败，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司马睿惧祸，想逃离京城，当时京师戒严，禁止宗室大臣出京，司马睿在雷雨之夜逃出京城。这时各处关津要隘严密盘查，司马睿走到河阳（今河南孟津）被把守渡口的官吏扣押，恰好从人宋典从后赶来，便用马鞭抽打司马睿的坐骑笑道："舍长，官府禁止贵人，你如何也被拘留呢？"官吏被骗，司马睿才得脱身。其后，东海王越任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八王之乱的战火使西晋统治陷人危机，惠帝永兴元年（304）李雄称成都王、刘渊称汉王，割据一方，加速了西晋崩溃。怀帝永嘉元年（307），司马睿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守建业。

早在司马睿到江南之前，就有庐江人陈敏胸怀雄心大志，想乘中原大乱割据江东，便委任江东有地位声望的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想取得名宗大族的支持建立基业。江东原是三国时吴国旧土，顾、陆、朱、张等宗族都是江南首望，以武称雄的义兴周氏也是很强的地方势力。陈敏既非强宗大族，又无声望地位，华谭说他只是"仓部令使，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竟然想学孙策、孙权！南方士族不肯让这样的人在此称王，羞于和寒贱庶族的陈

敏合作，周玘、顾荣、甘卓等人背叛了他。陈敏得不到南方士族的支持和认可，站不住脚，终于失败。

司马睿一向与王导交好亲近，很器重王导见识不凡，司马睿出镇下邳时，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徙镇建业后，王导随他到了江南。王氏是北方著名士族，司马睿是南来北方人的领袖，司马氏又是灭掉孙氏东吴的敌对统治者，能否在江南建立基业，司马睿的施政措施成为关键。

司马睿初到建业，江南士族不愿合作，一月有余，士族庶族无一人来谒见，司马睿深感忧虑，王导也认为形势严重。这时王敦来谒见琅邪王司马睿，王导便劝王敦出力，一同拥戴司马睿建功立业。三月上巳节这天，琅邪王亲自观禊，巡视祭祀活动，他乘坐肩舆，摆列仪仗，王敦、王导等一般豪杰人物前拥后呼，骑马随从，甚是威严。吴中地区士族领袖纪瞻、顾荣，暗中窥视到中原人物声势显赫，遂一同在道旁参拜。纪氏、顾氏素有声望，此举表示了对北方士族的崇敬。王导又借机献议："北方丧乱分裂，王业正是草创时期，得到民心拥护乃当务之急。顾荣、贺循都是声望极高士族，这二人若肯来，就不愁他人不来了。"于是王导亲自走访贺循、顾荣，从此，吴人归心，司马睿任顾荣为军司马，纪瞻为军谘祭酒，贺循为吴国内史，卞壶为从事中郎，周玘为仓曹属，王敦、王导、周顗、刁协都任为心腹。王导又向司马睿建议礼贤下士，存问风俗，尊重吴人及其生活礼俗，提出"谦以待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方针。原先司马睿常因酒误事，接受王导劝告，便戒掉了饮酒。

顾荣字彦先，祖父顾雍在吴国曾任丞相，顾氏是江东著姓。晋灭吴后，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到洛阳，号称"三俊"，八王之乱后还吴。纪瞻字思远，为江南名士，司马睿亲到他家，和他同乘而归。于是又援引了一批江南俊杰。虽然如此，司马睿仍然心怀惴惴，曾对顾荣说："寄居在人家国土，心里常常惭愧不

安。”顾荣下拜答道：“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必介意在什么地方，请陛下不要因为北方遭适迁都洛阳而有顾虑。”支持司马氏统治江南。

永嘉年间天下大乱，只有江南稍安定，中原民众纷纷渡江南迁避乱，王导劝司马睿收用南渡的俊杰之士，刁协、王承、庾亮等人都被任用。江州刺史华轶，是华歆的曾孙，拒不接受琅邪王司马睿的命令，又联络豫州刺史裴宪一起对抗，司马睿遣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扬烈将军周访合兵攻灭了华轶。

司马睿的参佐属官许多人贪图安逸享受，不尽职尽力，玩忽政务，录事参军建议：“洛阳太平时期，朝中人士都认为小心奉职，恪守政令是庸凡俗气，认为高傲放纵是优雅，这样的风气流行熏染，以至国家丧败。现在的属僚官员承袭西晋残留的弊病，自恃门望自高自大。前车已覆，后车又循其故辙。请从今天起，有临到使他做事而称病逃避的，一律免去官职。”

建兴元年（313），晋怀帝被前赵俘虏，死于平阳。晋愍帝即位，封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诏司马睿与南阳王右丞相司马保率军在洛阳会合。其后又遣殿中都尉刘蜀催促司马睿及时出兵。司马睿因为江南平定未久，无暇北伐，此时杜弢的叛乱搅得江南不得安宁。建兴三年（315），周勰又起兵报复伧人（对北方人蔑称）杀父之仇，东吴故君孙皓之孙孙弼也在广德起事。孙弼被镇压下去，司马睿用王导建议，任用周札、周莛，安抚周勰，平息了事变。随后陶侃平定了杜弢之乱。这时南阳王司马保占据长安以西地区，发展势力，不肯出兵，晋愍帝在长安孤立无援，八月，汉刘曜领兵攻长安，建兴四年十一月，长安陷落，愍帝被掳。

建兴五年三月，司马睿称晋王，建元建武。十二月，愍帝被害。转年，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江南，司马睿即皇帝位，是为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改年号太兴元年（318）。

三月壬申（二十六日），元帝公布施政纲领，下诏书："昔之为政者，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故我清静而人自正。其次听言观行，明试以功。……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宽众息役，惠益百姓。"这是王导一手制定的"镇之以静"治国方针，针对西晋华而不实，清谈误国的弊病，制止社会动乱，提出务实的政策，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

四月，加封大将军王敦为江州牧，骠骑将军王导为开府仪同三司。六月，在朝廷设置了谏鼓、谤木，允许人们议论国事，提出批评建议。七月，再次下诏："令二千石俸禄的各地令、长，遵奉典章制度，严明法纪，抑制豪强，存恤孤独，查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要互相检察，不得以私害公。长吏有奉公执法而不被提升任用者，有贪污劣迹却因有财有势不被处罚者，若不检举，要受故意放纵、掩蔽善政的处罚。有此情况而不知者，要受昏暗不明的责罚。"对西晋以来豪强势家依仗着特权不遵法度，招纳荫户，以及吏治腐败等弊病，提出整顿。官长要以身作则，申明法纪；要调查核实户口，增加国家掌握的户数，保证朝廷征收的赋税额。

王导协助元帝制定的镇之以静政策，在政治上"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在安定社会、稳固统治、一致对付北寇的大前提下，把南北士庶各阶层人物，集拢在朝廷周围。王导请来顾荣、贺循等一批江南名族人朝做官，参与政务。并且对少数不满起而造反的人物，也采取宽容政策。义兴豪强周玘，是除三害的周处后人；他曾经三定江南，宗族强盛，众望所归，引起晋元帝疑忌。周玘对中原南来人士执掌大权，自己未被重用而怀恨，便以诛讨王导、刁协为名起兵造反。王导认为周氏造反与镇静政策不相容，主张平乱。事变平息后，因周氏世代受吴人推崇，故不加深究，安抚如初。对非豪门望族普通人，王导也注意笼络。一次王导宴请宾客，人人喜颜欢笑，只有临海一位客人任颙和几个胡人

情绪不好，王导借故到任颙身旁说道："公出来参政吧，临海（今浙江临海东南）再没有比公更高的人才了。"任颙大喜。又走到胡人面前弹指说："兰阇，兰阇。"褒奖胡人，众胡人笑逐颜开，于是四座尽欢。对南渡人士，王导也鼓动他们为东晋效力。桓彝初到江南，见朝廷微弱，对周顗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才来此地保全性命，不想朝廷如此孤立单弱，怎么办才好?"忧心忡忡，十分担心。桓彝去见王导，王导纵论当世国家大事，使桓彝深受鼓舞，回去便对周顗说："方才见到了当世管仲，再没有可忧的了。"过江的北方人士，每当闲暇，在新亭（今江苏南京南）相聚饮酒，周顗在座中长叹："风景与中原无二，只是举目所见，终不是故乡山河!"满座之人都相对垂泪，惟独王导顿时严肃地说："我们正应该一同为王室尽力，收复中原，怎么能像楚囚相对哭泣呢!"众人止住哭泣，向王导谢过。

为了不损害江南士族经济利益，避开本地豪强势力，以免冲突，求得安宁，王导带头在山海之地建立庄园。北方流民大量过江，对流民的安置关系到东晋统治的安危，东晋朝廷采取了侨立州、郡、县的办法，即在南方设置与北方同样名称的州、郡、县，来容纳安置北方人士。这些侨州、侨郡、侨县大多数设在地广人稀或离京师稍偏远之地，委派官员管理，以期与南方人士相安无事，共同开发江南。

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以攻为守政策。一方面鼓励尚留在北方的晋朝残余势力尽忠王室，在北方与敌周旋；一方面宣称北伐，鼓舞人心士气，牵制敌军。东晋建立之初，实在没有实力向北反攻，政权草创时期，稳固政权是当务之急，北伐只是表示一下姿态，祖逖立志北伐，誓师请命，晋元帝只能给他极有限的支持，完全靠祖逖自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营造甲杖。

晋元帝在江南站住脚，建立政权，都是出自王导的谋划，王导与王敦，一文一武，对东晋朝廷的开创和稳固，发挥了很大作

用。晋元帝在即皇帝位时，便请王导与他共坐御床，当时民间也流传歌谣，说是“王与马共天下”。元帝立其子司马绍为皇太子，司马绍颇具文武才干，与庾亮、温峤为布衣之交，后来都成为东晋名臣。其后，元帝见王氏权势太重，便策划分王氏之权，信任并重用刘隗、刁协，为后来王敦起兵埋下了祸根。

王导执政后，派遣八部从事去巡视扬州各地，当时扬州管辖丹杨、会稽、吴、吴兴、宣城、东阳、临海、新安八郡。各部从事巡视毕一起见王导，分别陈述各地长官的是非得失，只有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遂问他，顾和道：“明公辅佐政务，宁可使网漏吞舟，何故要采访和听纳一些传闻、使用察访和纠察的办法呢?”王导深以为是。自从元帝启用了温峤，又任命刁协为尚书令，荀崧为左仆射。刁协性情刚烈，与刘隗都被元帝信任，这两人都想矫正时俗弊端，常常与王导政见不同，招致王氏的忌恨。为抬高朝廷威望、压制豪强势力，也引起南北士族的不满，凡是刻酷细碎的政策出台，就都认为是这两人的建议。元帝招集公卿百官议论朝政得失，御史中丞熊远上疏说：“胡贼占据中原，不能派兵征讨，失之一；群臣不以未复仇为耻辱，一心图安逸谋酒食，失之二；选官用人，不计真才实学，只论资格门第，认为尽职办事的是俗吏，奉法执法是苛刻，礼数周到是谄媚阿谀，拖延昏庸是高洁，放荡不羁是通达，骄傲误事是简雅，失之三。所以社会风俗败坏，国家万机待理。各部主管官吏，顺从者就是好官，违抗者便遭贬黜，怎么会有明辨是非、敢于谏争的臣子呢？举贤才不出世家大姓，用刑罚不及权势豪门，造成任用的人才没有济世才略，奸狡欺诈的人受不到惩处。若这些政策不改，而求救乱世、保太平，不是太难了吗!”

此前，元帝认为天下大乱，想取悦人心，收揽人才，各州举荐的秀才、孝廉，不用考试，都被署任了官职，产生了诸多弊端。这时，尚书陈頵也说：“现在应当逐渐恢复和循用旧体制，

考试经策。”元帝听从了这些建议，下诏：“被荐举的人科考不中，不合格，推荐的刺史、太守免除官职。”于是，各地举荐的秀才、孝廉都不敢来，来到的也托病不敢应试，三年之间没有人来应试。元帝想把已到者，无须参加考试都委任官职，尚书郎孔坦建议不可开侥幸的先例，应当延期执行考试选才。元帝听从了建议，允许孝廉七年后开始考试。

太兴三年，在北方的晋朝残余势力，割据的藩镇，已经相继被前赵攻灭，南阳王司马保也在内乱中被杀，东晋王朝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唯一稳固统治地区，也成为士族与百姓投奔的所在。王敦总督东晋征讨等军事，督率各地的刺史、将军，先后平定了江州的华轶、湘州的杜弢、荆州的杜曾，王敦的权势越来越大。在他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兼管州郡之后，整个东晋的地方官吏自刺史以下，都由王敦选拔任命。他手握重兵，掌管杀伐，居于长江上游控制了下游，对京师建康形成遥控的形势。王敦唯一忌惮的周访去世后，王敦更加肆无顾忌，元帝对此深感忧虑，对王敦的疑忌与戒心与日俱增，更加倚重刘隗、刁协牵制王敦，与其对抗。后来终于引起王敦以讨伐刘、刁为借口而举兵，与朝廷发生冲突。

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大部分土地沦陷。晋元帝乘坐镇江南的时机，依靠王氏，联络南方士族，任用北方南下士族，建立了政权，立稳了脚跟。但他不仅没有能力北伐中原，收复失地，驱逐各少数民族政权，就是其内部也不断产生各种矛盾，有许多政策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草创时期刚完成，随后相继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国家形势一次又一次出现危机。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元帝本纪》、《王导传》、《王敦传》

《资治通鉴》卷 86－91

祖逖北伐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今河北涞水北）人。祖逖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父祖武，曾经做过上谷太守。祖逖兄弟六人，都有才干。祖逖性格豁达放荡，不拘小节，十四五岁时还不知读书求学，却轻财仗义，有侠肝义胆，慷慨豪放，很有气节。在家乡时经常假借兄长的名义散发谷帛，周济贫困的民户，因此宗族乡党都尊重他。长大之后祖逖刻苦为学，博览群书，留心古今成败的事件。他来往于京师，见到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有匡时救世之才。其后祖逖侨居于阳平（今山东大名东），时年已是24岁。阳平郡征辟察举为孝廉，司隶又征辟举荐秀才，祖逖皆不应举。

祖逖与刘琨是同窗好友，同任司州主簿，二人感情亲厚，同被而眠，同案而食，互相劝勉。每当夜半听到鸡鸣，祖逖便蹴醒刘琨，说道："这可是催人奋进之声。"同刘琨急速起身，在庭中起舞，练武强身，当时传为"闻鸡起舞"的佳话。祖逖、刘琨都有英雄气概，每当谈论起当世之事，兴奋不已，有时夜半起坐，互相勉励：若一旦天下有事，豪杰争雄，我们两人应当相避于中原，待机建功立业。

后来祖逖受征辟任齐王司马冏大司马椽，后又任长沙王司马乂骠骑祭酒，转任主簿，累迁太子中庶子、豫章王从事中郎。跟随晋惠帝讨伐司马颖，朝廷大军在荡阴失败，退回洛阳。到惠帝西奔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竞相征召祖逖，祖逖皆不就征，东海王司马越当权，以祖逖为典兵参

军，济阴太守，祖逖因为为母服丧而未到任。

匈奴族首领刘渊起兵，北方大乱，各地割据势力称兵争雄，刀兵四起，中原地区陷入战乱，黎民涂炭。很多士族大家纷纷避乱南渡，祖逖也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迁徙到淮泗地区。在南迁途中，祖逖让出自己的车马，乘载同行的老少弱病人，自己徒步而行，携带的衣粮药品与众人共用，受到乡亲爱戴。祖逖机警多谋，又有勇略，甚受拥护，同行的老少民众都以他为核心，推举他为行主。到达泗口（今江苏铜山境）后，司马睿派人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又征召他为军谘祭酒，遂率宗族众人居住在丹徒的京口（今江苏镇江）。

西晋怀帝、愍帝被掳，中原沦陷，西晋已然覆没，祖逖深痛社稷倾覆，时常怀抱振兴王室、规复中原的志向。祖逖豪侠仗义，广招宾客义徒，许多人都是横暴勇武、桀骜不驯之徒，祖逖待之如子弟一般。当时扬州地区闹饥荒，这些人常常盗窃甚至攻击劫掠富户，有时这些人被官府捕获，要绳之以法，法办肇事的人，祖逖常常设法解救他们。舆论对他很有訾议，为此常批评指责他，祖逖我行我素，全不在意。

这时期，晋元帝刚在江南建立基业，立稳脚跟，还来不及谋划北伐，恢复中原的事。祖逖进言说："晋室之大乱，不是因为君上无道引起下民怨怒而叛乱，乃是由于藩王争权，自相残杀，遂使戎狄之族乘机起兵，祸乱中原。如今北方的遗民饱受毒害之苦，人人都有奋击自救之志，大王果真能够命将出师，使像我一样的人统帅去恢复中原，各地郡国的豪杰必定闻风响应。"元帝志在自保，偏安江南，缺乏北伐中原的雄心大略。粮储物资缺乏，兵力单弱，也没有恢复中原的力量。但不能挫伤祖逖的志气，便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他千人的军粮，三千疋布，不给铠甲兵杖，命他自行招募兵士，制造军器。

祖逖受命后，率领部曲百余家渡江北进。在浩瀚的江面上，

船到中流，祖逖望着奔流的江水，击楫发誓：“祖逖不能扩清中原而再横渡，有如此江！”表示有去无回、誓死恢复中原的决心。于是，祖逖率部曲屯驻淮阴（今江苏淮阴东南）在当地起炉造兵器，又招募了勇士二千人，随后又向北进发。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祖逖到达芦州（今安徽亳县东）。起初，中原丧乱之后，流民张平、樊雅各自聚众数千人据守谯郡（今河南夏邑北），建立坞壁，自为坞主，以武装自保。司马睿被任为丞相后遣行参军桓宣前往游说，张平、樊雅都愿归降。祖逖屯兵芦州后，命参军殷乂去见张平、樊雅，殷乂自高自大，看不起张平，见了张平的房舍，他说：“可作马厩”，见到陈列的大镬，说是“可铸铁器”。张平说：“这乃是帝王之镬，天下清静太平的才会用它，奈何毁了它！”殷乂道：“卿未必能保住头，何必爱惜这一个镬呢！”张平大怒，立刻杀了殷乂，并部署部下加强防卫。祖逖得知殷乂被张平杀死，便领兵攻张平，一年的时间竟未能攻下。这一地区又有董瞻、谢浮、于武等十余股武装，各自拥有部下数百，都统属张平管辖，于是祖逖诱使谢浮斩杀了张平。元帝嘉奖祖逖的功劳，使人运粮接济他，因为道路遥远军粮运输困难，祖逖军中严重缺粮，祖逖便进驻太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樊雅此时仍据守谯城，与祖逖对敌，樊雅率兵夜袭偷营，直杀入祖逖营垒，祖逖指挥左右将士拼死力战，才击败敌军。祖逖不能取胜，便向南中郎将王含请求援兵。桓宣此时任王含部下参军，王含便令桓宣率兵五百援助祖逖。祖逖对桓宣说道：“卿的信义已在对方闻名，如今请您再替我说降樊雅。”桓宣领命，带着两个随从匹马去见樊雅，向樊雅说：“祖豫州方要荡平刘聪、石勒，收复中原，想依仗卿为援助，前者殷乂轻薄傲慢得罪了卿，非祖豫州的本意呀！”樊雅听从桓宣劝说，归降了祖逖。

这年六月，晋王司马睿传布檄文，讨伐石虎，遣次子琅邪王司马裒率领精兵三万，水陆并进，直捣敌境，晋兵受祖逖节制指

挥。但是，不久便将司马裒召回建康。

太兴元年（318），愍帝被害，晋王司马睿在建康即皇帝位，建立东晋。同年汉主刘聪去世，刘粲即位，不久靳准杀死刘粲，相国刘曜与石勒领兵讨伐靳准，攻灭靳准后，刘曜与石勒分据北方。

太兴二年，祖逖攻蓬陂（今河南兰封）坞主陈川。陈川自称宁朔将军、陈留太守，当初祖逖攻击樊雅时，陈川遣部将李头领兵帮助祖逖作战，李头作战有功，祖逖待他很好。祖逖捉获了樊雅的骏马，李头极想得到这匹良马，又不敢明言，祖逖觉察到便将马赠与李头，李头很感激祖逖的恩德礼遇，常常叹息说："若得此人为主，虽死无恨。"不料这话传到陈川耳中，愤怒之下杀了李头。李头部下冯宠等便一齐来降祖逖，这使陈川更加恼怒，便纵兵大肆掠夺豫州诸郡民户和财物。祖逖命将军卫策领兵在谷水邀击，将陈川军掳获的人与物全部截回。陈川大为恐慌，便以浚仪（今河南兰封）叛降石勒。祖逖领兵进击陈川，攻打蓬关，后赵石勒派石虎率兵五万救援陈川，双方交战互有胜负。石勒又遣部将桃豹领兵到蓬关，迁徙陈川部众五千户到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留桃豹守卫陈川故城。

太兴三年六月，祖逖部将韩潜领兵与后赵将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桃豹居西台，韩潜居东台，在同一大城，桃豹从南门出入放牧，韩潜便在东门出人，对峙四十日。祖逖用布袋装上砂土像是粮米，令千余人搬运到台上，又使数人担米在路边歇息，桃豹手下军士赶来，便丢下粮担逃走。桃豹军中饥荒已久，得了米担，以为祖逖军中丰衣饱食，大为恐慌。后赵部将刘夜堂用千头驴子为桃豹运粮，又被祖逖派韩潜、别将冯铁邀击，尽数夺去。桃豹军中缺粮，而且军心已乱，便连夜撤走了。祖逖计谋成功，一面令韩潜进兵驻扎封丘（今河南封丘），一面使冯铁守卫二台，祖逖坐镇雍丘（今河南杞县）。祖逖军侦骑捉获了濮阳（今河南

濮阳西南）百姓，祖逖厚待并释放了他们，所以都感戴祖逖的恩德，乡里五百家民户都来归降。石勒又遣精锐骑兵万人攻击祖逖，又被杀败。祖逖屡次邀击后赵军，后赵边镇戍守的士卒也纷纷逃归祖逖，后赵边境防地日益艰难。

这时期，晋朝还在北方的镇将及地方长官，各自为战，不相统属，而且还内战不休。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祖逖遣使人去为他们和解，向他们晓以利害，指示祸福，于是，这些人都表示愿受祖逖节制。是年七月，元帝下诏加封祖逖镇西将军。

祖逖在军中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严于律己，不蓄家产，不积财物，从善如流，虚心听纳。在驻防地区劝课农桑，不误农时。祖逖亲自带领子弟下田耕作，负薪担柴。又因为两国边境经常争战，死人无数，祖逖派人收葬枯骨，掩埋尸骸，亲自为亡灵设祭致奠，边境的百姓无不为之感动，故而深受军民拥戴。祖逖又善于招抚接纳新归附的军士和民众，即便是疏远低贱的人也结以恩义，故边境上无论远近亲疏都乐于归附。逐渐地黄河以南都成为晋朝国土。祖逖曾经设酒宴招待乡里耆老集会，老者在席间感激流泪说："我们老了，又遇到父母，即便死了也不悔恨了。"于是作歌唱道："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得到父老们的盛赞歌颂。

河上诸坞壁先有任子在后赵作人质的，不敢公然叛赵，祖逖便制定政策，听任他们两属，不强迫逼使他们归降。祖逖又不时地派遣游军假作袭击，表明这些坞壁并未归附于晋，这般坞主都感祖逖恩德，后赵有什么谋划举动，便密告祖逖，对后赵军情活动祖逖了如指掌。后赵在边境处处被动，河以南地方的坞主，多半叛后赵而归附晋。

祖逖练兵讲武、积草屯粮，为进取河北的计划作准备。后赵主石勒深感忧虑，在攻下幽州后，石勒为祖逖的祖父、父亲重修

坟墓，安置了两家民户为其看守坟冢。又命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县地方官修整祖逖之母的坟墓，并借此机会致书祖逖，要求双方通使及互市。

祖逖见晋元帝不图进取，实无恢复中原之心，对自己北伐之举毫无热心，不予支持。而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扫灭敌寇，恢复中原。既不能有二心而动摇意志，又不愿边境无辜百姓受害，便对后赵的要求不作答复，而听任双方互市。自从开市通商，边境军民获利丰厚，公与私，官与民都获得利益，祖逖部下人马大有发展。祖逖部下牙门将童建杀害新蔡内史周密后投降后赵，石勒斩了童建，将首级送还祖逖，捎信说："叛逃的将吏，我深为痛恨。将军的憎恶，便是我所憎恶。"祖逖十分赞赏石勒的举动。从此，后赵人叛归祖逖的，祖逖都不收纳，又传令禁止诸将不准侵犯掠夺和残害后赵边民。双方边境之间，相对平静，军民都稍得休兵息战。

四年七月，元帝任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坐镇合肥。戴渊实际上掌握了北伐与边防军政的处置大权。祖逖知戴渊是吴人，江南士族领袖，虽然素有才学人望，却缺少宏谋远略，不是收复国土、翦灭强寇的帅才，如今却来统帅自己，祖逖心中极为不快。又探得朝廷中王敦与刘隗、刁协结怨为仇，晋元帝谋划依靠刘、刁排挤王氏，内乱的苗头已经十分明显。祖逖深为即将发作的祸难忧心忡忡。东晋朝廷当权者的作为令他极为失望，他知道自己处心积虑谋划多年的北伐难以实现，沦陷的大好河山无日可归，感伤激愤不已，遂患病。

祖逖发病后，命人送他的妻儿老小到汝南的大木山下（今河南上蔡西南）。当时中原的百姓都以为祖逖就要进兵占据武牢，而他却将家小安置到险阨的地方。有人出面劝阻，祖逖拒而不纳。祖逖心中忧虑愤慨，而不断经营规划，努力进取的雄心却不

已，继续积极筹划，他修缮了武牢城，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在军事上乃是四望之地，周围开阔，便于防守。祖逖又恐怕南边没有坚城，必将被敌兵攻袭，于是使其侄汝阳太守祖济、汝南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率领军卒民夫构筑堡垒。筑垒尚未完成，祖逖病情加剧。

九月，祖逖死于雍丘，终年56岁。豫州人士，无论男女老幼，如同死了亲人一样痛哭流涕，谯郡、梁国各地方，民间为他立祠四时祭祀，以表示怀念。东晋朝廷封赠祖逖为车骑将军。

王敦兵力雄厚，握有长江中游重兵，早就怀有野心，听说祖逖病故，遂益加肆无忌惮。倾覆晋帝的行动开始逐步实施。

十月，元帝任命祖逖之弟祖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继续统领所部将士。祖约的异母兄长、光禄大夫祖纳深知祖约的为人，便向元帝密奏"祖约有野心，一旦有权有势，恐怕日后作乱。"元帝不纳。时论也认为祖纳有忌妒之心。祖约人非其才，他没有抚绥控御的才能，不受将士亲附。当初范阳人李广避乱来依附祖逖，见祖约的性情志向、待人接物异于常人，对亲近的人说："我们为躲避北方战乱，远来投靠祖豫州，希冀保全宗族人口，现在观察祖约的所作所为，有人不可测的心胸志向。我们应当尽早自作打算，不要又陷身于不义的举动。你们不可因为目前的利益而忘记了长久的打算。"于是带领子弟十余人回乡去了。后来祖约果然参与了苏峻之乱，失败后去投靠后赵石勒。石勒既鄙薄祖约的为人，又素来忌恨背叛的臣子，石勒部将程遐劝说除掉祖约，祖约及其宗人亲属百余人都被杀害。

当初，祖逖有一胡人奴隶名叫王安，受祖逖厚待，并放他归赵返乡，这时充任后赵将军。诛杀祖氏时王安救护下祖逖的庶子、十岁的道重，将道重隐藏起来假扮作沙门，保留下了祖逖的后代。至后赵灭亡，祖道重才回归东晋。

因祖逖已经去世，后赵屡次侵犯襄城（今河南襄城）、城父

(今河南襄城)，围攻谯郡，豫州刺史祖约难以抵御。便退守寿春(今安徽寿县)。后赵遂攻取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北)，梁、郑之间再度燃起烽火，引发刀兵之争。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祖逖传》、《祖约传》

《通鉴纪事本末·祖逖北伐》

王敦之乱

梁州刺史周访击灭了横行数年的杜曾，平定了叛乱。当初，王敦深感杜曾难制，曾向周访许诺："若擒获杜曾，当奏请朝廷任你为荆州刺史。"到此时，王敦忌妒周访的威名，对任荆州刺史之事感到很为难，部下从事中郎郭舒建议："荆州是用武之地，形势重要，若委任别人，怕将来尾大不掉。公应该自己担任，周访仍为梁州刺史足可以了。"王敦听从其言。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六月，下诏加封周访安南将军，仍任梁州。周访大怒，王敦亲写书信解释，并馈送玉环、玉碗表达厚意。周访将礼物摔在地上，说："我不是贪财小人，可以拿珍宝讨欢心。"周访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发展农业，训练士卒，守令有缺额周访便自己委派，然后才上奏朝廷。王敦虽然不满但又惧怕周访，无可奈何。

太兴三年八月，周访去世。周访是中兴名将，善于抚纳，将士们都肯为他出死力，又智勇过人，远近无人不服。周访知道王敦野心勃勃，终为晋室祸害，私下常常切齿痛恨。周访在世，王敦不敢轻举妄动。

当初司马睿受命镇守江东，依靠王敦、王导奠定基础，王氏尽心辅佐，晋元帝也信任重用，王敦统管军事征伐，王导执掌朝政，王氏子弟及心腹都担任显官要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王敦雅好清谈，口不言财色，素有盛名。其后，王敦自恃有功，宗族强盛，便骄横放纵起来，因为握有兵权，威焰极

盛。王敦遂想专权控制朝廷，以便取而代之。元帝惧怕王氏权势过大，憎恶王敦跋扈，便培植亲信，任用刘隗、刁协为心腹，削弱王氏权力，王导也渐渐被疏远。王敦对此愤愤不平，与元帝的嫌隙越来越深。

王敦征辟沈充为参军，沈充又举荐了钱凤，这二人既会乖巧取媚，又凶狠狡诈，知道王敦有野心，便为王敦出谋划策，很受宠信。王敦上疏替王导诉冤，语气怨恨，王导见了便封还给他，王敦又派人呈奏给朝廷。当夜元帝召见左将军、谯王司马承，拿出王敦奏疏，说道："王敦因往年的功劳，地位和官职很高了，而欲望不止，竟然如此讲话，此事如何对待？"司马承说："陛下没有早日制裁他，所以才有今天，王敦必然要生出祸患。"

刘隗为元帝谋划，派心腹到各地镇守，牵制王敦。适逢王敦上表请以宣城内史沈充代替甘卓为湘州刺史，元帝向司马承说："王敦的奸谋已露，我将要成为惠帝第二了。湘州的位置在上流控制三州交会之地，想请叔父去那里。"司马承道："臣奉诏自当尽力。然而湘州自经蜀寇作乱，民生凋敝，我到任须要三年才可以整饬好武备，若等不及日期，即使拚出一死，也是无益。"

十二月，下诏任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司马承路经武昌，王敦设宴款待司马承，王敦道："大王乃文雅谦恭之士，恐怕不是将帅之才。"司马承说："公未必知道，铅刀岂没有一割的用处。"宴罢王敦对钱凤说："他不知惧怕反而学豪壮之语，足见他没有武略，不会有什么作为。"于是听任司马承走马上任。当时湘江地区残破荒凉，官民处境都很艰难，司马承以身作则倡导俭约，尽心尽力安抚百姓，颇有声望。

四年七月，元帝再作部署，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雍并豫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名为讨伐胡寇，其实是作为京师辅翼，防备王敦。

刘隗虽然在外地，朝廷的机要大事，任免官员，元帝都与他秘密商议。王敦对此很反感，便致书刘隗："近来承圣上重用足下，现在贼人未灭，中原沦陷，我想与足下尽力王室，共同平定海内。若顺利则晋室兴复，若有挫折则天下永无希望了。"刘隗回答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拒绝了王敦。王敦收到书信，怒不可遏。

元帝改任骠骑将军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因为王敦的缘故，也疏远疑忌王导。御史中丞周嵩上疏，劝元帝不可损害以往的厚恩，招致将来的祸患。元帝深有领悟，也不去为难王导。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任郭璞为记室参军。郭璞善于卜筮，又因为才高位卑，豪放不羁。他已看到王敦必将作乱，自己难免遇祸，很是忧郁。大将军陈述去世，郭璞哭得异常悲痛，说："现在死去，焉知非福呢?"王敦因为和朝廷离心，便招揽羁留有名望的人安置在幕府，除郭璞之外，还任羊曼、谢鲲为长史。羊曼是三国时名将羊祜的侄孙，谢鲲也是精通《老》、《易》的名士。二人终日酣饮沉醉，故王敦也不委派给事情做。王敦准备起事，对谢鲲说："刘隗奸邪，要危害社稷，吾想翦除君侧之恶，如何?"谢鲲道："刘隗果然是祸首，然而却是城狐社鼠。"意思是说掘狐恐怕毁坏了城垣，熏鼠恐怕连累了社庙。王敦怒道："君庸才，岂识得大事!"

是月戊辰（十四日），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上疏陈述刘隗罪状。沈充也在吴兴（今浙江湖州）起兵响应。王敦来到芜湖，又上表陈刁协罪状。元帝大怒，乙亥（二十一日），下诏指斥王敦放肆狂逆，是可忍孰不可忍！要亲自率军诛讨大逆，有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王敦兄光禄勋王含乘小船逃往武昌。

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大将军此举似有所为，不

是肆意妄为吧?”周𫖮道:“不然。君主当然不是尧舜,怎能没有过失。臣下怎么能举兵以威胁?这样的举动,怎能说不是作乱?王处仲傲慢暴戾,目无君上。他的野心哪有止境。”

王敦初起兵,派使者告知梁州刺史甘卓,约他一起东下,甘卓应允了。到王敦登船进发而甘卓却按兵不动,并使参军孙双来劝阻王敦。王敦吃惊道:“甘侯怎么变了!不过是顾虑我危害朝廷罢了,我如今只除奸凶,若能成功,要让甘侯居三公之位。”孙双回报,甘卓仍疑而不决。有人劝说:“暂且假意应许王敦,等王敦到了京师再讨伐他。”甘卓说:“昔年陈敏作乱。我就是先顺从他而后图灭他,人们议论说我惧怕、反复,今日若再那样,怎么说得清。”甘卓使人把王敦之意告知顺阳太守魏该,魏该说:“我所以起兵抵抗胡贼,正是要尽忠王室,王公向天子动武,我不应该参与。”回绝了甘卓。

王敦又派人游说谯王承,请他来出任军司,司马承囚禁了使者,与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舂陵太守易雄一同起兵讨伐王敦,一州之内都起而响应,只有湘东太守郑澹不从,被司马承派兵击灭。

司马承遣主簿邓骞去襄阳劝说甘卓,邓骞说道:“刘隗虽然失去民心,但非有害于天下,大将军因为私怨,举兵对抗朝廷,这正是忠臣义士尽节的时刻。公受任为一方大臣,奉辞伐罪,乃是齐桓、晋文的功业。”甘卓答应再慎重考虑。参军李梁劝甘卓坐观成败,大将军起事成功将军不失一方之权,不成,朝廷必以将军代他,何必以一战决生死。邓骞对李梁说:“襄阳并非能够自保之地,若大将军击败刘隗,还兵武昌,防守石城(今湖南岳阳南),断绝荆湘粮运,将军怎么办?主动权在人家手中,还以坐观为上策,从来未闻。况且做臣子的,国家有难坐视不救,怎么算是义呢?”甘卓仍然犹豫不定,邓骞又说:“现在既不为义举,又不受大将军檄文,这必然致祸。有人以为彼强我弱感到为

难，如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留守的不过五千，而将军的将士已成倍于他，以将军的威名，帅部下精锐以顺讨逆，岂是王含所能抵御的？王敦援军逆流而上，势难再敌。将军取武昌如摧枯拉朽，还有何顾虑呢？武昌既平定，镇抚二州，这是吕蒙攻败关羽的谋略。如今不采用必胜之策，坐以待亡，不可以说是智。”

与此同时，王敦怕甘卓在后方有变，又派参军乐道融来邀，一定要与他一同东下。乐道融虽为王敦做事，却对其悖逆很气愤，于是劝说甘卓：“主上亲自主持朝政，任用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并非专任刘隗。王氏揽权已久，一见分去其权，便认为失了势，背叛国恩，举兵对抗朝廷。国家待君高厚，若与王敦同谋，岂不违负大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远成为宗族的耻辱，不可惜吗？为君打算，不如假意应许他而急速掩袭武昌，大将军部下闻知必不战自溃。将军大功告成矣。”甘卓很不情愿跟从王敦，听了乐道融之言，遂下定决心，说：“这正是我的本意。”于是，甘卓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发布檄文，揭露王敦叛逆罪状。甘卓又遣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章前往朝廷，命罗英到广州约陶侃一同进兵。戴渊在江西，先得到了甘卓书信，呈上朝廷，朝中都呼“万岁”。陶侃得信便令参军高宝领兵进发。武昌城中王敦守军传闻甘卓大军到来，都四散奔逃。

王敦遣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领甲士二万攻长沙。长沙城池损坏，又缺物资储备，人心惶惶，有人劝谯王承南投陶侃，或退守零陵，桂阳，司马承誓死守城，不久，部下司马虞望战死。甘卓遣参军虞冲偕邓骞到长沙，致书司马承，劝他固守，将出兵沔口截断王敦归路，则湘州之围自解。司马承复信请他火速援救，甘卓不听。

元帝征召戴渊、刘隗入朝保卫建康。刘隗到达京师，百官迎接，刘隗昂首阔步，高谈阔论，意气自若。及入见元帝，与刁协

劝元帝尽诛王氏，元帝不准，刘隗始有畏惧之色。

司空王导带从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等宗族二十余人，每天到朝中待罪。周顗将要入朝，王导呼道："伯仁（周顗字），以百口性命烦累卿！"周顗直进朝堂，昂然不顾。见到元帝后，说王导忠诚，尽力解救王氏族人。元帝听纳了其言。周顗喜饮酒，大醉了才出朝门，王导还守在门外，又呼周顗，周顗并不答言，向左右戏言："今年杀了诸贼奴，取斗大金印系在肘后。"出朝后又上表章申明王导无罪，言词极恳切。王导不知，甚是恨他。元帝命还给王导朝服，召见他，王导叩头说："逆臣贼子，何朝没有，不想现在竟然出在臣的家族。"元帝执其手说道："茂弘（王导字），正要托付卿重任，这是什么话。"

三月，元帝以王导为先锋大都督，加封戴渊骠骑将军，下诏："王导大义灭亲，可用我任安东将军时的节杖，假节都督诸军。"任周顗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又令王廙前去晓谕王敦退兵。王敦不从，却将王廙留在军中任用。元帝以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王敦大军将到，元帝使刘隗驻军金城，周札守石头。元帝亲自披挂甲胄巡视各军。又命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令各率兵马尾随王敦大军之后。

王敦兵到石头，准备攻打刘隗，杜弘献计说："刘隗的军士敢死之士甚多，不易攻克，不如攻打石头，周札对部下没有恩惠，士兵不为他效命，攻之必克。周札一败则刘隗不攻自逃了。"王敦命杜弘为前锋攻打石头，周札果然不敢抵抗，开城门放杜弘入城。王敦占据了石头，叹道："我再也做不得盛德之事了。"

元帝命刁协、刘隗、戴渊夺回石头，王导、周顗、郭逸、虞潭等三路出兵迎战，刁协等军都被杀败。太子司马绍闻讯，便要亲自率将士决战，登上战车将要出发，中庶子温峤紧握马缰劝谏："殿下是国家的储君，为天下怎可冒险！"抽剑斩断鞅绳，太

子只好恨恨作罢。

王敦得胜，拥兵而不进朝见驾，放任士卒劫掠，宫中及各省官吏逃散，只安东将军刘超及侍中二人守护在元帝身边。元帝脱去戎装，望着朝服说道：“想得到我的位置，何不早说。何至于这样残害生灵！”又遣使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就此息兵，天下还可共享太平；如其不然，朕要让贤。”

刁协、刘隗入宫见元帝，在太极殿阶，元帝执二人之手，呜咽落泪，令其速速逃命。刁协道：“臣要守节一死，决无二心。”元帝道：“事已危急，不可不行。”便传令拨给二人人马，让他们各自为计。刁协年老，不堪骑马，素常待人没有恩惠，招募的随从都弃他而去，行至江乘（今江苏句容北）被人杀害，将首级送给王敦。刘隗出奔后赵，后来死在了那里。

元帝令公卿百官到石头见王敦，王敦向戴渊说：“前日之战，还有余力否？”戴渊道：“岂敢有余，只是力不足罢了。”王敦又问：“吾此举天下以为如何？”戴渊答道：“看见形迹的说是逆，体谅诚心的说是忠。”王敦笑道：“卿可谓会说话。”又对周顗说：“伯仁，卿辜负了我。”周顗答道：“公以武力犯朝廷，下官亲率六军，不能成事，使官军失败，以此负公。”

随后，天下大赦。任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辞让不受。当初西晋覆没，四方都向元帝劝进，王敦想专权，忌元帝年长难制，想别议另立旁人，王导不从。及王敦攻克建康，对王导说：“不听我言，几乎灭族。”

王敦看到太子有武略，为朝野人士向往，想诬陷太子不孝废黜太子，便大会群臣，问温峤：“皇太子有何德可以称道？”声色俱厉，温峤从容而答：“钩深致远，不是浅局所量。以礼来看，可说是孝了。”众官员都认为不错，王敦的阴谋未得逞。

护军长史郝嘏等劝周顗回避王敦，周顗说道：“我身为大

臣，朝廷丧败之时怎么可以在草间求生，投奔外邦呢!”王敦参军吕猗曾任过台郎，性情奸邪谄佞，戴渊任尚书，憎恶这个属下。吕猗便向王敦进言除去周顗、戴渊，王敦素忌二人之才，认为此言有理，便从容问王导：“周、戴极有声望，登三司之位该没有疑问吧?”王导不语，又问：“若不任三司，只应当做令、仆吗?”王导又不答。王敦道：“若不是这样，只好杀了。”王导仍一言不发。王敦遂命部下收捕周顗、戴渊。事前王敦曾对谢鲲说：“我要任用周顗为尚书，戴渊为仆射。”这一天，又问谢鲲：“近来人心如何?”谢鲲道：“明公此举虽然要保存社稷，然而外界悠悠之言实在未体谅公的高义。若果真能举用周、戴，则人心帖然平服了。”王敦怒道：“君粗心也！二人不识抬举，我已收捕他们了。”谢鲲愕然，自知失言。参军王峤劝王敦不可杀戮名士，王敦大怒，要斩王峤，吓得众人不敢再说话。周顗被捕，路经太庙，大呼：“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祇有灵，速杀王敦!”押送士卒用戟刺伤其口，血流到脚，依然神态自若，观看的人都悲不自胜。周顗及戴渊遂被杀于石头城南郊。

元帝使侍中王彬去慰劳王敦，王彬素与周顗友好，先去哭祭周顗，然后去见王敦。王敦见他容颜凄惨很是奇怪，便问原故，王彬道：“方才哭伯仁，情不自禁。”王敦怒道：“伯仁自己招致杀戮，而且待你也平常，你何必哀痛哭他?”王彬道：“伯仁乃忠厚长者，兄的亲友在朝中虽不算正直，也不肯循私。大赦之后反而施极刑杀人，所以伤感。”说罢勃然而起，数说王敦：“兄抗拒朝廷，杀戮忠良，图谋不轨，就要祸及满门了。”语气慷慨，声泪俱下。王敦大怒，厉声说道：“尔悖逆竟至这样，以为我不能杀你吗!”这时王导在座，很为王彬担惊，便劝王彬谢罪，王彬不肯，说：“脚痛不能跪拜，况且这有什么可谢罪的。”王敦道：“脚痛比得过颈痛?”王彬毫无惧色，终归不肯下拜。后来王导料理中书省文案，见到周顗救自己的表章，哭道：“我虽不杀伯

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辜负了良友。”

这时沈充攻克吴国（今江苏苏州），杀内史张茂。起初，王敦听到甘卓起兵的消息甚是惊怕，使侄王卬回襄阳说服甘卓：“君此举出于臣子尽节，并不责怪君。吾家事情急迫，不得不如此，想来很快便可回师襄阳，与君重结旧好。”甘卓多疑少决，屯兵猪口，滞留了数十天不敢进兵。王敦既得了建康，便遣朝使持驺虞幡驻节甘卓军中。甘卓听说周、戴已死，流泪向王卬言道：“吾忧虑的正为今日之事，只要圣上、太子平安，吾在王敦上游，并不敢危害社稷，我径自攻占武昌，王敦被逼必然劫持天下，绝四方之望，不如回襄阳再作打算。”遂即撤兵。都尉秦康与乐道融百般劝阻，甘卓不听，乐道融日夜哭谏无效，忧愤而死。甘卓烦躁焦虑，举动失常，本来宽厚随和的性情变得强硬顽固，脾气全变。

王敦任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宰，加封王导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并更换百官及诸军将领，迁转罢免职务的上百人，有的朝行夕改，王敦为所欲为。王敦准备回转武昌，谢鲲劝王敦朝见天子，使君臣释怨，人心悦服。王敦怕有意外，不肯入朝。四月，王敦返回武昌。

当初谯王承起兵，宜都内史周級使侄周该与他联络，王敦部将魏乂猛攻湘州，司马承派周该与部下从事周崎秘密出外求援，被敌军逻卒捕获，魏乂逼周崎向城中喊话，说“大将军攻克建康，甘卓回转襄阳，外援已绝”，周崎假意应允，及到城下，大呼：“援兵不久便到，努力坚守！”魏乂即刻杀了他。又拷问周该，周该至死不吐一言。

魏乂日夜攻城，王敦又送来得到的朝中台官书写的奏疏，令射入城中。城中确信朝廷已失陷，无不怅惘长叹。相持了近百天，刘翼战死，士卒死伤遍地，难以坚守。魏乂攻破长沙，司马承等被俘。魏乂用槛车押送司马承与易雄到武昌，先后将他们杀

害。

魏乂搜捕邓骞，乡人都为他担心，邓骞笑道："这是想利用我。他新得湘州，杀死很多忠良，所以找我稳定人心。"遂去见魏乂，魏乂一见大喜，任邓骞为别驾。

甘卓家人都劝他提防王敦，甘卓不听，令士兵都分散去耕田，有人劝谏他便发怒。襄阳太守周虑受王敦密令，便诈称湖中有鱼，劝甘卓率遣部下都去捕鱼，乘府中空虚，周虑领兵袭击，在寝室中杀了甘卓，将首级传送给王敦，同时杀了甘卓诸子。王敦派从事中郎周抚督沔北诸军事，代甘卓镇守沔中。

王敦志得意满，残暴傲慢更加厉害，四方的贡品都进了王敦府邸，文武大臣都出自他的门下，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言听计从，又以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连这些人都大兴土木营造宅邸，侵夺田产，挖掘古墓，抢劫掠夺。朝野无人不恨。

七月，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十月，王廙死去，王敦任用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守淮阴。王含都督沔南诸军事，领徐州刺史。王谅为交州刺史，使王谅捕杀交州刺史修湛和新昌太守梁硕，修湛被诱杀，梁硕起兵包围王谅于龙编。

十一月，元帝忧愤过度，重病不起。闰月，元帝去世。司空王导受遗诏辅政。元帝恭俭有余，明断不足，恢复中原的大业没有完成而祸乱从内部兴起。太子司马绍继承帝位，是为明帝。

明帝太宁元年（323），王敦见国家新近有丧事，嗣君刚继位，明帝又是勇武之君，便急于图谋篡位，讽谕朝廷征召自己入朝。明帝亲手书写诏书召王敦。四月，赠王敦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王敦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以王导为司徒，他自领扬州牧。王敦要行篡夺，王彬苦谏险些被杀。

明帝畏惧王敦的威逼，想任用郗鉴作为外援，封郗鉴为兖州

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王敦忌郗鉴，上表推举郗鉴任尚书令。八月，明帝下诏征郗鉴回朝。王敦党羽劝王敦杀了郗鉴，王敦不从，郗鉴回到朝中，遂与明帝谋划讨伐王敦。

王敦之侄王允之刚成年，王敦爱他聪明机警，常让他跟随左右。一次王敦夜间饮酒，王允之推辞酒醉先去安眠，王敦与钱凤商议篡夺之事，王允之全听在耳内，就在床上大吐。钱凤走后，王敦果然持灯照明来看他，见允之躺在污秽中，才不怀疑。恰逢其父王舒封为廷尉，允之请求省视父亲，回去后便把王敦与钱凤的逆谋告知王舒，王舒遂启奏了明帝，暗作准备。王敦为增强王氏宗族权势，迁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河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周氏是吴中著名大族，会稽内史周札一门五侯，功勋卓著，王敦对周氏甚是忌惮，周嵩因为其兄周顗之死，对王敦心怀怨恨。太宁二年正月，王敦诬陷周嵩等谋反，杀了周嵩，又指使沈充在吴郡杀尽周氏子侄，派兵攻杀了周札。

五月，王敦已经病势沉重，矫诏封王应为武卫将军，做自己的副手。因王敦之病日益加重，钱凤遂询问王敦："倘若一旦有不测，后事将要交付王应吗?"王敦道："非常之事，须非常之人才能做，王应年少，岂堪任大事。我死之后，解除武装，大家分散，归顺朝廷，保全门户，这是上策；退回武昌，收兵自守，归属朝廷，不废朝贡，是中策；乘我还在世，全军东下，希图万一之侥幸，这是下策。"钱凤对党羽说："公的下策，乃是上计。"遂与沈充定下计谋，俟王敦一死，即作乱。因为宫中宿卫兵士很多，便奏请朝廷减兵休整。明帝遣侍中陈晷等去探视王敦。明帝身穿便服，亲自到芜湖察看王敦营垒，为讨伐王敦做准备。

元帝生前信任温峤，招王敦憎恶，明帝便任温峤为左司马，温峤假意同王敦周旋，又与钱凤亲近，赞誉钱凤，常说："钱世仪精神满腹。"逢丹杨尹一职出缺，温峤向王敦进言："京畿咽喉

之地，公应当自己选才任用，恐朝廷用的人不如意。”王敦以为然，问温峤何人合适，温峤道：“我看无人可及钱凤。”钱凤又推让温峤，温峤假意推辞，王敦便在六月上表荐温峤为丹杨尹，并且使他侦伺朝廷动静。温峤担心去后钱凤搬弄是非，便利用王敦为他饯行，温峤起身劝酒，轮到钱凤，钱凤未来得及举杯，温峤便装醉用手板击落钱凤帻巾，恼怒地说：“钱凤是什么人，温太真劝酒敢不饮！”王敦以为他真醉了，便两相解劝。温峤临行与王敦洒泪告别，又几次折回来，难舍难分。温峤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温峤与朝廷关系甚密，和庾亮有深交，不可信任。”王敦道：“太真昨日酒醉，有一些声色相加，何必就来进谗言。”不纳钱凤之言。温峤一到建康，将王敦的阴谋全部告知明帝，请朝廷预作准备。又与庾亮共商讨王敦的计划。王敦闻知大怒，说：“我竟被小人物欺骗了。”又与王导寄书，说要生擒温峤，亲自拔去他的舌头。

明帝决定讨伐王敦，加封王导大都督、领扬州刺史，命温峤、卞敦守石头，应詹守朱雀桥，郗鉴、庾亮、卞壶为将军。又下令征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人卫京师。司徒王导知王敦病重，便率王氏子弟为王敦举哀，人们以为王敦真的已死，精神为之振奋。于是尚书省发诏，条列王敦罪恶。

王敦见诏极愤怒，病情加剧，不能再亲领三军，将要出兵之前，召郭璞卜筮，郭璞说：“无成”，王敦一向疑心郭璞暗助温峤、庾亮，听说卦凶，便问郭璞：“你再筮我寿数多少。”郭璞道：“据前卦，明公若起事，不久必有祸殃；若往武昌，寿不可测。”王敦大怒说：“你寿数多少？”郭璞说：“命丧今日日中时分。”王敦遂命人杀了他。

王敦令钱凤、邓岳、周抚领兵三万攻京师，王含道：“这乃是我家的事，我应当亲自去。”于是改任王含为元帅，以诛奸臣

温峤为名发兵。七月，王含率水陆大军五万杀到江宁南岸，温峤移兵北岸，烧断朱雀桁。王含不能渡河。明帝亲自率军攻击，听说桥已断，大怒，温峤道："如今宿卫兵力单弱，征台的兵马未到，若贼军冲来，宗庙犹怕难保，何必爱惜一桥。"

司徒王导修书给王含，晓以利害。郗鉴又劝明帝不可急于交战，明帝下令招募壮士。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领甲士千人乘夜间渡河，在越城击败王含，杀其前锋将何康。

王敦得到败报，大怒："我兄老婢耳，门户衰败，大事去矣。"挣扎着要起身，却已支持不住。于是对舅父羊鉴及王应说："我死后王应即刻即帝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料理丧事。"不久，王敦便死了，时年 59 岁。

王应隐瞒王敦死讯，用席裹尸外面涂蜡，埋在厅中，却与诸葛瑶等人日夜纵酒淫乐。

明帝使沈桢前去劝说沈充反正，许给他司空之职，沈充不从，并出兵攻建康，宗正卿虞潭因病回会稽，此时便在余姚起兵讨伐沈充，前安东将军刘超、宣城内史钟雅也一同攻沈充，义兴人周蹇杀了王敦署任的太守，平西将军祖约驱逐了王敦署任的淮南太守，纷纷响应朝廷。

沈充领万余人马与王含会合，司马顾飏向沈充献计："掘开栅塘用湖水灌京城，借水势用水军攻城，是上计；合东西方兵力进攻，以众攻寡，是中计；诱杀钱凤后归降朝廷，是下计。"沈充一概不听。

不久，刘遐、苏峻率一万精兵赶到建康，明帝连夜召见，赐赏将士。沈充、钱凤想趁援兵远来疲劳，夜里袭击，便在当夜渡河杀来，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迎战失利，沈充、钱凤兵到宣阳门，拔掉栅栏准备交战，刘遐、苏峻领兵从南塘横击，大破敌军。刘遐又在青溪击败沈充。寻阳太守周光领千余人来援王敦，先求见王敦，王应推辞说王敦患病，周光心中疑惑："我远

来而不能见，公怕是死了吧。”急忙见其兄周抚，道：“王公已死，兄何必同钱凤作贼?”众人无不愕然。

王敦死讯传开，王含等烧掉营寨连夜退兵。明帝下诏大赦，有免胁从者，唯王敦死党不赦。并令庾亮督率苏峻等追击沈充，温峤督率刘遐等追击王含、钱凤。

王含要奔荆州，王应要往江州，王含不从，遂逃往荆州，被王舒派兵将王含父子沉江毙命。钱凤逃到阖庐洲，被周光斩了，将功赎罪。沈充走迷了路，误投到旧部将吴儒家，被吴儒斩下首级送往建康。王敦的尸体被掘出，斩下头颅，与沈充首级一并挂在南衍示众。因讨灭王敦之功，王导与文武将官都被封赏。

王敦反叛司马氏，又与南方士族大姓为敌，遂被南北士族联合起来扑灭了。东晋初年这一场内乱，使东晋元气大伤。晋明帝司马绍勇武果敢，很有作为，可惜没有活多久，成帝即位后又暴发了内乱。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王敦传》、《温峤传》

《通鉴纪事本末·王敦之乱》

苏峻之乱

东晋明帝司马绍明敏有决断，即位时正是王敦逞凶作乱，将要谋逆篡夺政权的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依靠文臣武将，拨乱反正，遂平定了王敦之乱。

太宁三年（325）闰八月，明帝便晏驾了，终年只有27岁。当他病重时，召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杨尹温峤接受遗诏，辅佐太子。太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因他还在幼年，九月，皇太后临朝称制，命司徒王导录尚书事，庾亮为中书令，掌权辅政。皇太后庾文君乃是庾亮之妹，自然亲近信任庾亮，庾亮遂主持政务。王导自从辅佐元帝，以宽和得人心，采取镇之以静政策，获得广泛支持，及庾亮执政，重法制，严裁断，颇失人心。

明帝遗诏中褒扬加封大臣，其中没有祖约与陶侃，二人都怀疑是庾亮删除了遗诏，公开表示不满。祖约乃是祖逖之弟，自以为名位辈分不让郗鉴、卞壶，却不豫顾命，而且祖约上表章请示之事，多数都未被允准，所以对朝廷与执政大臣极其不满。

历阳内史苏峻，字子高，少年时是书生，有才学，18岁举为孝廉，永嘉之乱时苏峻聚集数千家，结垒自保，在豪杰中以强盛著称。南渡以后，因平定王敦之功封历阳内史，邵陵公。苏峻渐渐威望显露，有精兵万人，甲杖器械精良。此人很有号召力，在历阳（今安徽和县）招纳亡命之徒，力量渐强盛。苏峻日益骄

横，其军队供给依靠朝廷，漕粮船运络绎不绝，稍不如意，苏峻便恼怒不满，颇为跋扈。庾亮为防备祖、陶、苏三人，便在咸和元年（326），任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王舒为会稽内史，作为外镇声援，又修石头城作准备。

丹杨尹阮孚看到太后临朝，由舅族执政，便对人说："如今江东创业并未长久稳固，主上年幼，时局艰难，庾亮年少，威信德业都未树立，依我看要出乱子了。"

司马氏宗室见权力在外戚手中，也不服庾亮，产生怨恨。南顿王司马宗失去职权，怨恨庾亮，他又与苏峻交好，庾亮便想除掉他，司马宗也想废黜专权的庾亮。这年十月，御史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庾亮遂命右卫将军赵胤去收捕司马宗，司马宗被冤不肯束手就擒，领兵抵抗，被赵胤杀了。并贬其族改姓马氏，三个儿子被废为庶人。牵连到太宰西阳王司马羕也降封弋阳县王，太宗正虞胤降职外调任桂阳太守。司马宗是宗室近亲，司马羕是明帝的保傅师长，被庾亮一朝翦除，舆论为此不平。司马宗之死，成帝不知，一日问庾亮："常日的白头公在哪里？"庾亮回答说因谋反被杀了，成帝哭着说："舅说人作贼便杀了，人说舅作贼又该怎么办？"庾亮面目失色。司马宗党羽卞阐逃奔苏峻，庾亮用军符命令苏峻交出卞阐，苏峻将卞阐藏匿起来拒不交人。

二年十月，庾亮担心苏峻在历阳终将作乱，想下诏征他入朝，征询王导意见，王导认为苏峻必定不奉诏，不如暂且包容。庾亮不听，在朝堂上奏："苏峻狼子野心，终要作乱，现在召他，纵然他不顺从朝命，引起祸患犹浅，若再过几年，就难控制。"朝臣无人敢有异议，只有光禄大夫卞壶争辩说："苏峻拥强兵，历阳逼近京师，路程不足一日，一旦有变，极容易造成闪失，应当深思。"庾亮不从。卞壶料此举必败，急忙寄书温峤，说明庾亮召苏峻实在是加速祸乱，自己与王导无能为力，让温峤劝阻庾亮。温峤得信后也多次致书劝阻，庾亮一概不从。

苏峻闻讯召自己入朝，遣司马何仍求见庾亮，说："讨贼的外任，无论远近惟命是从，至于入朝内辅，实在不敢承当。"庾亮不听，并召北中郎将郭默为后将军，其弟庾冰为吴国内史，带兵以防意外。于是再下诏召苏峻，以美言称赞并任苏峻大司农、加封散骑常侍，位特进，命其弟苏逸代他统领部众。苏峻上表章说："当年明皇帝亲自拉着臣的手，让臣北讨胡寇，如今中原未靖，臣怎么敢便求安逸？请求补任青州管界的一处荒郡，以施展鹰犬之用。"庾亮仍然不准。苏峻无奈，只好治办行装准备上路，心里仍很犹豫。参军任让对他说道："将军请求到一荒郡还不准许，事情已经严重，恐怕没有活路，不如部署兵马自守。"阜陵令匡术也劝苏峻反抗，苏峻遂决心拒不应命。

温峤得此消息，便想即刻领兵入卫建康，三吴诸郡也想出兵，庾亮一概不准，回书给温峤："我担忧西部边界，胜过历阳，足下不可越过雷池一步。"朝廷遣使人劝谕苏峻，苏峻道："台下执政说我要反，岂能得活呀！我宁可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过去国家危急，不是我怎能转危为安！狡兔既死，猎犬宜烹，即便拼出一死也要报复主谋之人！"

苏峻知道祖约也怨恨朝廷，便派参军徐会联络祖约，请他一同讨伐庾亮。祖约大喜，其侄祖智、祖衍也赞成。谯国内史桓宣陈说利害，劝阻不听，遂与祖约断绝关系。十一月，祖约遣侄祖涣、妹婿许柳领兵会合苏峻，苏峻兵势更盛。

朝廷急诏卞壶领右卫将军，王舒行扬州刺史，虞潭督三吴诸郡军事，作军事部署。尚书左丞孔坦、司徒司马陶回劝说王导："趁苏峻未到，急速截断阜陵麻湖，把守江西当利诸口隘（今安徽和县西南渡口），我众敌寡，可一战而胜。若苏峻不来，可去逼近历阳。现在不先发兵，苏峻必来到，苏峻来了就会人心惧怕，难以取胜。时机不可错过。"王导以为然，但庾亮不听。十二月辛亥（初一日），苏峻使大将韩晃、张健袭取姑孰（今安徽

当涂），获得盐米物资，张健又攻于湖（今安徽当涂南），杀于湖令陶馥，进逼慈湖（今安徽当涂北）。这时庾亮才后悔。壬子（初二日），宗室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投奔苏峻。庚申（初十日），京师戒严，庾亮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历阳太守，又命左将军司马流率兵防守慈湖，庾亮又命其弟庾翼以白衣（没有官职）率领数百人守石头。

宣城内史桓彝想起兵援朝廷，不顾兵力薄弱，进兵芜湖，苏峻部将韩晃击败桓彝，遂进攻宣城（今安徽宣城），桓彝退守广德（今安徽广德）。徐州刺史郗鉴准备带兵赴难，朝廷下诏令他防备北寇，不准入援。

三年正月，温峤领兵来救建康，进军寻阳（今江西九江西）。韩晃攻慈湖，司马流怯懦，将出战时惊慌得吃饭竟找不到嘴巴，遂兵败被杀。

其后，苏峻率祖涣、许柳率兵二万，自横江渡江，在牛渚（今当涂西北江边）登岸，进军陵口（牛渚山东北）。朝廷兵屡次失利。

二月，苏峻兵到覆舟山。陶回向庾亮献计："苏峻知石头有重兵戍守，不敢领兵直进，必奔向小丹杨（今江苏南京南），从南路步行进犯，可埋伏兵马邀击，苏峻可一战成擒。"庾亮不纳。苏峻果然从小丹杨而来，因迷路，夜里行军一片混乱。庾亮得知，深悔不听陶回之计。苏峻大兵压境，百姓纷纷逃往东方避难。

朝廷命卞壶都督大桁东诸军事，与侍中钟雅率郭默、赵胤等各军与苏峻人马在西陵大战，朝廷人马大败。之后苏峻攻青溪栅，卞壶领诸军阻挡不住苏峻军进攻，节节败退，苏峻乘风纵火，朝廷台省官署和营房寺衙，一片火海，烧得灰飞烟灭。卞壶背痈未愈，苦战而死，两个儿子也随父阵亡。丹杨尹羊曼守云龙门，与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一齐战死。庾亮率诸将在宣

阳门列阵，兵将未成队列便弃甲四散逃走。庾亮眼见大势已去，与其弟及郭默、赵胤等逃奔寻阳。临行，庾亮注视钟雅说："以后之事全托付你了。"钟雅道："栋折榱崩，大厦将倾，谁的过错!"庾亮道："事已如此，不要再说了。"

苏峻部下士卒进入宫城，侍中褚翜抱成帝到太极殿，王导与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闿一起拥护着成帝，刘超、钟雅侍立左右，太常孔愉身穿朝服守护宗庙。朝官逃散一空，殿堂一片萧然。苏峻部下军士要入殿，褚翜挺身喝道："苏冠军来见至尊，军人怎得侵犯!"众军士不敢上殿，冲进后宫，大肆抢掠。苏峻部下在京师为非作歹，抢劫掠夺，令人肩挑人扛往蒋山运送财物。都城士女连衣服也剥光抢去，只好用破席苫草遮体，没有席草的坐在地上用土遮身，百姓哀号之声震天动地，城中穿戎服军衣的多被杀害。宫库中有布二十万疋，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疋，其他财物甚多，都被抢掠挥霍一空。太仓官只有用大火烧剩下的数石米供给御膳。

苏峻受诏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宽宥之列。王导有声望，还让他任本官；封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苏峻自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封有功部下许柳为丹杨尹，马雄为左卫将军，祖涣为骁骑将军。弋阳王司马羕来见苏峻，称述苏峻功劳，遂委任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

苏峻派兵攻吴国内史庾冰，庾冰不能抵御，弃郡奔往会稽，苏峻令人搜捕得很紧，一个门卫小卒领庾冰上船，用席遮盖，顺水行舟，每逢遇到盘查，便用杖敲打着船说："何处寻庾冰，庾冰就在此。"人们以为是醉话，不去疑心，庾冰才得脱身。苏峻任侍中蔡谟为吴国内史。温峤知建康失守，悲痛不已。

庾亮到寻阳，宣太后诏旨，封温峤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封郗鉴司空。温峤说："今天应以灭贼为急务，没有功劳先封官，将何以昭示天下!"不受。温峤与庾亮是布衣之交，素

来推重庾亮，庾亮虽遭失败奔逃，温峤不改其旧，分拨将士交庾亮统领。

三月，苏峻屯兵于湖。

四月，庾亮、温峤准备起兵反攻，讨伐苏峻，因道路断绝，不知建康消息，适逢范汪来寻阳，说道苏峻贪暴横行，朝廷危急如倒悬，应及时进兵。庾亮与温峤互相推让盟主之位，温峤从弟温充说："陶征西位重兵强，应当共同推举他。"温峤遂使督护王愆期到荆州，邀陶侃共赴国难，陶侃因为不预顾命怀恨，答道："我是疆场外将，不敢越职。"温峤屡次劝说不动，便顺从陶侃语气派人对他说："仁公且守卫荆州，我要先进兵了。"使者已出发两天，平南参军毛室从外地回到寻阳，听说此事便见温峤劝说："凡举大事，贵在'和'字，应与天下共事。应火速追回书信改写，说必要与他一同进兵。追赶不及便另派信使。"温峤顿时醒悟，即刻派人追改书信。陶侃果然应允，遣都护龚登领兵来会合。温峤已有士卒七千，于是公布祖约、苏峻罪状，宣布讨伐叛逆。

陶侃又后悔出兵，派人追龚登撤兵，温峤再次致书陶侃，申明大义，晓以利害，王愆期也劝陶侃说唇亡齿寒，恐怕将来难为苏峻所容。陶侃深为感动，立即登船亲自出征。这时其子陶瞻战死后灵柩运回，陶侃不顾私情，星夜率兵启程。

郗鉴在广陵城孤兵少，又逼近胡寇，得诏书后，誓师赴国难，将士军心振奋。遂派长史夏侯长从小路来见温峤，说道："听说贼军想挟持天子到会稽，应当行立营垒，守住要害，防止敌军转移。同时断敌粮运，坚壁清野，贼军攻城不能下，野无所掠，东去之路被截断，必然自溃。"温峤赞同其计。

五月，陶侃领军到寻阳，人们纷纷传说陶侃要杀庾亮以谢天下，庾亮甚是担惊，后听从温峤之计，去见陶侃叩拜谢罪。陶侃一见大惊，急忙阻止庾亮下拜，庾亮引咎自责，很诚恳坦率，陶

侃顿时消释旧怨，同庾、温一同向建康进发，将士四万，旌旗七百里，金鼓声传闻不断。

苏峻得知西方起兵，从姑孰回军守卫石头，分兵去抵御陶侃等各军，随后逼成帝迁往石头。司徒王导争论无效，成帝哭泣着上车而去，宫中一片哭声。当时天下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步行跟随，拒不乘骑苏峻给的马，苏峻十分恼恨。苏峻用仓室作为行宫，每天都来恶言恶语。苏峻令左光禄大夫陆晔守护留台，把居民都赶进后苑，派匡术守卫苑城，提防百姓有意外举动。

司徒王导秘密传令使三吴地区官民起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任庾冰行奋武将军，领兵一万出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众都起兵响应，蔡谟将吴国内史一职又让给庾冰。

苏峻闻报东方又起兵，便遣部将管商、张健、弘徽率兵抵御。管商等进攻吴郡，焚吴县（今江苏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北）、嘉兴（今浙江嘉兴），又焚余杭（今浙江余杭）。虞潭等各军与之交战互有胜负，被阻挡不能前进。

陶侃、温峤驻军茄子浦。温峤认为自己军士习于水战，苏峻军长于陆战，不敢轻易交锋，传令将士有上岸者斩。恰好苏峻派兵护送米万斛给祖约，祖约派司马桓抚等来迎接。毛宝率领千人为温峤前锋，得此消息传令部下："兵法说军令也可以因故不从，岂能够见敌人可击而不上岸攻击呢！"便擅自率兵袭击桓抚，杀死敌兵上万，缴获了全部军粮，祖约因此军中缺粮。温峤即刻荐举毛宝为庐江太守。

陶侃上表荐王舒监浙东军事，虞潭监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杨州八郡诸军事，由郗鉴节制调遣。郗鉴率军渡江，雍州刺史魏该也领兵赶到，与陶侃会合。

随后，陶侃等舟师直趋石头，到达蔡洲（今南京西南江中）。

陶侃屯兵于査浦（江南岸，秦淮河入江处），温峤屯兵沙门浦。苏峻登上烽火楼，望见陶、温大军军容强盛，船桅如林，面露惊慌之色，对侍从说："吾本来就知道温峤能得人心。"

庾亮派都护王彰攻苏峻部将张曜，反被杀得大败，庾亮出师不利，便向陶侃谢过。陶侃答道："古人有三败，君侯才两次。不过形势危急，不宜屡次失利。"庾亮部下司马殷融见陶侃请罪说："是将军做出的事，殷融不能制止。"王彰见陶侃说："是王彰自己所为，将军并不知情。"陶侃点头言道："昔日殷融是君子，王彰是小人；如今王彰是君子，殷融是小人。"

宣城内史桓彝得知京师失守，慷慨流泪，进兵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当时各处州郡多半归降苏峻，有人劝桓彝也应当暂且与苏峻通使，以救眼前。桓彝认为受国家厚恩，义不降贼，至死不改。桓彝命将军俞纵守兰石（今安徽泾县西南），苏峻遣大将韩晃攻兰石，俞纵渐渐招架不住，部下建议撤退，俞纵说："我受桓侯厚恩，当以死相报。我不负桓侯，就如桓侯不负国家。"遂力战而死。韩晃进兵攻桓彝，六月，城被攻破，桓彝被俘遇害。

各州郡人马刚到石头，便想决战，陶侃说："贼军正在气盛，不可交锋，等待时机可用计策破敌。"其后，屡次交战无功，监军部将李根建议修筑白石垒（石头城东北），以防苏峻军冲击，夜间连夜修筑，天方破晓已经筑成。陶侃使庾亮率二千人守垒，苏峻率步骑兵万余人四面攻打，不能攻克。陶侃用孔坦之计，令郗鉴与将军郭默回去守京口，建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分苏峻兵势。祖约见苏峻被东西夹击，便遣祖涣、桓抚掩袭湓口（今江西九江西），以断温峤等军后路，陶侃准备亲自迎敌，毛宝道："义军仗恃着公，公不可轻动，毛宝愿去迎战。"祖涣、桓抚一路进兵，攻谯国内史桓宣，毛宝领兵来救援，被祖涣杀败。毛宝中箭，穿透大腿钉在马鞍上，毛宝命人踏住马鞍才拔下箭来，血流

如注。带伤率兵还击，救出桓宣。毛宝反攻祖约，攻克合肥戍后才奉温峤之命回转石头。

祖约部将暗中与后赵勾结，应许做内应，后赵将军石聪、石堪领兵攻寿春（今安徽寿县），七月，祖约军溃败，祖约逃奔历阳，石聪等掳走寿春二万余户居民。

苏峻起兵依恃祖约的支援，苏峻心腹路永、匡术、贾宁见祖约失败，恐怕大事难成，劝苏峻杀尽司徒王导等大臣，重新委派心腹。苏峻一向敬重王导，不答应，路永等人遂有二心，王导令参军袁耽暗地劝诱路永，使他归顺朝廷，九月，王导携带二子与路永一起逃出，奔往石头。

陶侃、温峤与苏峻两军长期相持，苏峻分遣诸将东挡西杀，战无不胜，使陶侃、温峤军士气沮丧，人人谈虎色变，都说："苏峻狡黠多谋，又有胆量，兵将骁勇，所向无敌。若论天命，苏峻自然会最终灭亡，要论人事，不易除他。"温峤闻言大怒："诸君怯懦，怎么反称誉贼人！"因屡战不胜，温峤心里也惧怕他。

温峤军粮用尽，向陶侃借贷，陶侃不觉着恼，说道："使君以前说不忧没有良将、军粮，只是要我当盟主而已。如今屡战皆败，良将何在？荆州与胡虏、蜀贼接壤，要防意外。若再没有军粮，我便要回去了，以后再想良策除贼吧！"温峤又苦苦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义。毛宝向温峤说："下官能留住陶公。"于是毛宝前去说服陶侃，以往年陶侃平定杜弢之乱为喻，说行兵作战有进无退，敌军并非不可战胜，也一样怕死。并请令说："公可以试给我兵将，上岸断敌物资粮储，若不能立功，任公去留。"陶侃允诺，升毛宝为督护，命他领兵行事。竟陵太守李阳又劝陶侃，才分米五万石给温峤军。毛宝领兵偷袭烧掉苏峻在句容（今江苏江宁）、湖孰（今江宁东南湖孰）屯积的物资。苏军缺粮乏食，陶侃遂放弃撤走的打算。

苏峻部骁将张健、韩晃猛攻大业垒，垒中缺水，守军甚至用粪汁解渴，守将郭默惜命，寻机突围而走，留下兵将坚守。郗鉴在京口闻知郭默离开大业，军士无不惊慌，参军曹纳劝郗鉴放弃京口，退守广陵（今江苏扬州）。郗鉴召集部下，当众斥责曹纳，表示决不退却。

大业、京口甚是危急，陶侃要亲自领兵赴援，长史殷羡献计："我军不习步战，救大业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猛攻石头，大业之围自解。"陶侃从其计，督率水军直攻石头。庾亮、温峤、赵胤率步兵一万从白石（今安徽含山西南）南进，向苏峻挑战，苏峻率八千人马迎敌，先遣其子苏硕与将军匡孝分兵冲击赵胤军，赵胤被杀败退走。苏峻正在慰劳将士，望见赵胤被杀退，便乘酒醉昂然说道："匡孝能破敌，我还不如他吗？"遂舍弃大军，率领亲兵四骑向北追杀，却未能冲入敌阵，便想回奔白木陂（建康城北十五里），不料坐骑跌倒，陶侃部将彭世、李千将矛投来，苏峻落马，被斩下首级，尸体被乱刀脔割。苏峻一死，三军皆高呼"万岁"。苏峻人马顿时溃败。

苏峻死后，司马任让等拥立苏峻之弟苏逸为主，闭城坚守。苏硕为报仇，发掘庾亮父母坟墓，剖棺焚尸泄愤。韩晃得知苏峻死讯，领兵奔回石头。管商、弘徽攻庱亭垒兵败，管商投降庾亮，残余将士都归了张健。

温峤设立行台，发布告通知各地，凡原官二千石以下都令其奔赴行台。

咸和四年正月，光禄大夫陆晔及弟陆玩劝说留守的苏峻部将匡术献出苑城，归降朝廷，百官遂推举陆晔督宫城军事。陶侃命毛宝守南城，邓岳守西城，渐向苏逸取围攻之势。

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与建康令管旆谋划，奉安帝出逃，事机泄露，苏逸令任让带兵入宫收捕刘超、钟雅，成帝抱持二人悲啼："还我右卫、侍中！"任让命手下夺走二人，刘超、钟雅遂

被杀。

冠军将军赵胤遣部将甘苗攻历阳，祖约见大势已去，便乘夜率左右数百人逃奔后赵。部将牵腾遂率众出城投降。于是江北肃清。

苏峻虽死，苏逸兵力仍然不弱，与苏硕、韩晃合力攻打台城，焚烧了太极东堂与秘阁，毛宝领兵登城防守，射死敌军上千。韩晃向毛宝高叫："君以勇敢出名，何不出城一斗？"毛宝答道："君是有名健将，何不入城一斗？"双方攻守，各不相让。

二月初一日，各军合攻石头。建威长史滕含击败了苏逸，苏硕率领勇士数百渡过秦淮河迎战，被温峤杀败，苏硕被杀。韩晃形势更加孤立，便率领余部奔曲阿（今江苏丹阳）依就张健。逃离石头时因城门处窄小，士卒争相逃命，抢着出城，践踏而死的上万人，诸军俘获了苏逸、任让、西阳王羕、彭城王雄等人。

朝廷大军进入石头，将军曹据抱成帝到温峤坐船，群臣朝见成帝，叩头请罪，一片哭声。苏逸已经被杀，成帝传诏斩了西阳王及其二子一孙。陶侃与任让有旧交，便为他求情，成帝道："是杀了我侍中、右卫的人，不能饶！"遂将任让斩首。

苏峻部将张健疑心弘徽有背叛之意，便杀了弘徽，与韩晃、马雄等带领舟师奔往吴兴（今浙江湖州），军中大小二万余口，携带的金银珍宝不可胜数。途中被追击而来的扬烈将军王允之击败，张健与韩晃等轻装逃向故鄣（今浙江长兴西南）。郗鉴所派参军李闳紧追不舍，在平陵山（今浙江溧阳西）歼灭其军，张健等被杀。苏峻残部遂被讨平。

建康经过这一场战乱，军民死伤无数，建康居民很多家破人亡。皇家宫阙化为灰烬，成帝只好以建平园为宫。温峤见京师这样残破，想迁都豫章；三吴地区的文武豪强都要求移都会稽，争执不下。司徒王导说道："孙权、刘备都说'建康王者之宅'，古帝王都不因为丰俭迁都，只要务本节用，不愁不能兴复。北寇窥

伺江东，一旦显示衰弱，后果难料。不如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因此不再议论迁都。

朝廷以褚翜任丹杨尹。当时战火之后，民生困苦，市井凋残。褚翜招集逃亡民众，京师渐渐安定。

当年三月，成帝论功封赏文武将帅，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郗鉴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始安郡公，其余受封爵位者甚多，死于国事的都被赠谥。

朝议留温峤辅政，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老臣，应留朝辅政，坚决要求回镇。庾亮请罪，几次三番要到山海为民，成帝不允，庾亮便请求出任外镇效力，遂任为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

庾亮以外戚辅政，引发了大乱，晋朝的内乱使元气大伤。终晋朝之世，各地藩镇强盛，武力对抗朝廷的事件时有发生，最终难免毁于军人之手。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庾亮传》、《陶侃传》、《苏峻传》

《通鉴纪事本末·苏峻之乱》

庾氏经略中原

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刚刚平定了苏峻之乱，温峤便于四月去世了。年底又发生了郭默的叛乱，豫州刺史庾亮联合陶侃又平定了郭默之乱。到咸和九年六月，陶侃也故去了。庾亮被加封为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遂移镇武昌（今湖北鄂城）。

陶侃功高位重，在藩镇多年，部下兵强将勇，庾亮对陶侃敬畏几分，陶侃一死，庾亮便成为兵力强盛的藩镇，控制着长江中游，拥有重兵。虽然庾亮出镇在外，但仍然左右朝廷的政权，庾亮与在朝廷中辅政的大臣王导常常意见相左，想起兵废黜王导，郗鉴不肯答应，王导也表示并不贪恋高官显位，庾亮只好作罢。王导内心实在不服庾亮，每当西风刮来吹起尘土，便举扇遮蔽，说："元规（庾亮字元规）尘污人。"

是年十一月，后赵石虎杀死石弘，自立为天王，夺取了后赵政权。咸康元年（335）四月，后赵石虎的游骑深人到历阳（今安徽和县）一带，建康为之震动。石虎能征惯战，不断向四方用兵，发动战事，但是，后赵已失去了往日的强盛。咸康三年，慕容皝称燕王，建立前燕。张氏割据河西，建有前凉。而东晋经过几年的恢复，也有起色，庾亮遂有收复中原之意。

咸康五年三月，庾亮上表朝廷，荐举桓宣为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该地侨居着众多的北方人士，襄阳兵士素以善战闻名，庾亮以之作为北伐的前哨基

地。庾亮又表荐其弟庾怿为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令庾翼为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江陵。使征虏将军毛宝与西阳太守樊峻率领精兵一万戍守邾城（今湖北黄冈西北）。建威将军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进入沔中。庾亮素来嫌恶陶称轻浮狡诈，在谋废王导时陶称首鼠两端，心怀二意，庾亮便在陶称前来谒见时杀了陶称，之后又任陈嚣为梁州刺史，前往汉中，并命参军李松领兵进攻成汉的巴郡（今四川江北）、江阳（今四川泸县）。四月，李松攻克江阳，生俘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解送到建康。

庾亮部署已定，准备亲自统率十万大军进驻石城（今湖北钟祥），作为进入长江、沔水流域诸军的后援，于是上疏朝廷，要兵伐后赵。成帝召集朝中大臣商议，丞相王导建议成帝准其出兵，太尉郗鉴认为“军用物资不足，不可大举用兵”。太常蔡谟说：“不辨形势，不分强弱而轻举妄动，必将无功而返。目前之计不如养兵等待时机。时机的可否系于胡虏的强弱，胡虏的强弱系于石虎的能力。自从石勒起兵，石虎便是骁将，百战百胜，平定了中原。石勒死后，石虎挟制嗣君，内杀朝中将相，外讨边防镇将，一举攻下金墉，再战擒住石生，平定石聪、郭权如拾芥。由此观察石虎有没有能力？有人认为前者胡寇攻襄阳未克，说他无能。论战争不能以一城的得与失来判定优劣。而且那次石遇所率领乃是偏师，桓宣也只是边将，所争夺者不过是边疆土地，有利则进，不利则退，无关大局。现在庾征西名重位显，自领大军征战，石虎必然率全国之兵以决胜负，怎么可以和襄阳之战相比呢？庾征西若与他交战，比石生如何？如要守城，比金墉如何？欲在沔水阻击，比大江如何？要对敌的石虎，他比苏峻如何？石生乃猛将，统帅关中精兵，庾征西兵力胜不过石生。金墉险要坚固，刘曜曾经率十万大军不能攻克它，庾征西的城防也胜不过金墉。而且那时洛阳、关中都起兵攻石虎，如今各地都归石虎支配

调遣，势力倍增。石生敌不过石虎之半，而庾征西要胜其倍，我深感疑惑。苏峻远不及石虎强盛，沔水不及长江险要，大江挡不住苏峻，却想凭藉沔水挡住石虎，此又令人疑惑。昔日祖逖经营北伐数年，终归没有得到便宜，那时候胡寇只是据有河北，只及现在疆土的四分之一，祖逖不能敌其一而庾征西却要敌其四，这又令人疑惑。然而这些都是论庾征西进兵已到沔北之后，还未考虑征途的艰难。自沔水以西水急岸高，激流百里，若胡寇不学宋襄公仁义，在我军未及列阵便发动攻击，将会如何呢？如今我朝与胡寇，水陆形势不同，作战条件与长处有异，胡寇若敢来送死则我军敌之有余；弃江远征，以我之短攻敌之长，恐怕不是良策。”朝臣多数人赞同蔡谟之论，于是成帝下诏，不准庾亮移镇。

是年七月，王导去世。当初，王导与庾亮共同举荐丹杨尹何充，王导曾对成帝说过："臣死之日，请陛下任用何充，则社稷无忧。"于是成帝便任用何充为吏部尚书。及王导去世，朝廷征召庾亮为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入朝执政。庾亮志在北伐，坚决辞让。朝廷便任用何充为护军将军，庾亮之弟庾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庾冰承担了重任，处理政务日夜操劳，又注意礼待贤士，提拔人才，得到朝野一致称赞，认为是贤相。

八月，郗鉴也去世了。朝廷任用蔡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这时候，左卫将军陈光请求伐赵，朝廷命陈光攻打寿阳，蔡谟认为寿阳城虽小却很坚固，我军攻势未动而敌援兵即刻便到，得之于敌不足为损，失利则敌军气焰更盛。于是，陈光攻赵之事遂作罢。

当年陶侃在武昌时，人们都认为江北有邾城，建议分兵戍守，陶侃一直不允，劝说的人接连不断。陶侃带领部下渡江射猎，召集将佐们言道："我凭藉险要抵御胡寇，靠的乃是长江。邾城隔在江北，内无依恃，外临胡族，晋人贪财好利，欺凌胡

人，必然引起少数民族人引来胡寇进犯，这里乃是引发祸乱的策源地，并不能防御敌寇。当初吴国戍守此城用了三万兵士，现在纵然有兵前来戍守，也对江南毫无益处。一旦有可乘之机征讨胡虏，此地也并不是最好的进兵据点。”庾亮镇守武昌，令毛宝、樊峻来戍守邾城。赵王石虎对晋军驻守邾城甚感厌恶，便任命夔安为大都督，率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五将军领兵五万，进犯荆州、扬州北部边境作为疑兵，以二万精锐骑兵攻打邾城。毛宝向庾亮求救，庾亮认为邾城城防坚固，没有及时派兵增援。

九月，石闵在沔阴击败晋军，晋将军蔡怀被杀，夔安、李农攻陷沔南，后赵将军朱保又在白石（今安徽含山西南）击败晋军，杀死郑豹等五员晋军将领，晋义阳将军黄冲、义阳太守郑进投降后赵。后赵张貉攻克邾城，晋军战死者达六千人，毛宝、樊峻突围出走，在江中溺死。夔安挥军入侵江夏（今湖北安陆），包围石城（今湖北岳阳南）。竟陵太守李阳迎击，击破后赵军，斩首五千余级，遏制后赵军攻势，夔安才退兵，掠走汉水以东七千余民户。

庾亮不断上疏想移镇石城，闻知邾城陷落，东晋为之震动，北伐计划方才辍止，并上表谢罪。又令庾怿为豫州刺史，镇守芜湖。自从邾城陷落以后，庾亮便一病不起，咸康六年正月，都亭文康侯庾亮去世了。

晋廷以何充为中书令，管理政务；以庾翼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代庾亮镇守武昌。当时人们怀疑庾翼年少，难以继承其兄的重任，庾翼尽心尽力治理，军令严明，几年的时间，使长江中游地区公私富足，表现出超人的才干。豫州刺史庾怿送给江州刺史王允之美酒，王允之觉察酒内有毒，便用犬试验，果然犬被毒死。王允之密奏朝廷。成帝责怪庾怿说：“大舅（庾亮）已乱天下，小舅又要那么干？”庾怿十

分惶惧，咸康八年二月，庾怿饮鸩服毒而死。

庾翼，字稚恭，自少年时便有雄心大志，苏峻作乱时，庾翼时年22岁，便以白衣率领数百人戍守石头。庾翼常以驱除胡寇、收复中原为己任，慷慨激昂，形于词色。庾翼又留心时政，荐举人才，尤其注意当务之急所需要的将帅之才。琅邪内史桓温，乃是桓彝之子，娶南康公主为妻，桓温豪爽有志气，未成年时庾翼就认为他必成大器。曾经向晋成帝赞誉："桓温有英雄之才，不要当作凡人看待，将来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杜乂、殷浩当时才名盖世，只有庾翼并不看重，曾说："这种人应该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了，然后再商量他们适合干些什么。"庾翼在任的治绩，远近闻名。

庾翼、庾冰兄弟以舅氏身份执政，顾虑新君一立，便会使亲戚关系疏远，常劝成帝说："国家有强敌，宜立年长的君主"，何充则主张父子相继，庾冰不从。晋成帝死后，其弟司马岳继承帝位，是为康帝。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受顾命辅佐朝政。

康帝建元元年（343）七月，后赵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来投降庾翼。庾翼无时不在为取蜀灭胡经营策划，他派遣使人东约燕王慕容皝、西约前凉张骏，联络后赵东西两侧的割据势力，约定日期一同伐赵。朝廷中许多大臣不想用兵，只有庾冰、桓温、谯王司马无忌赞同。这时后赵军攻前燕，被慕容皝杀败，后赵军伤亡数万。庾翼经过几年准备，便上疏请求北伐中原。上表荐桓宣为都督司雍梁三州及荆州四郡诸军事、梁州刺史，进兵趋向丹水（今河南淅川西）；桓温为前锋小督，率兵进入临淮（今安徽盱眙）；庾翼率四万大军准备北进，征发所管辖的六州奴及车牛驴马以供军用。此举触动了六州士族私利，惹得怨声载道。

八月，庾翼想移镇襄阳，恐怕朝廷不准，便上奏说移镇安陆

（今湖北安陆）。康帝和朝中大臣都遣使人来劝阻，庾翼不听，违抗诏命向北进发，来到夏口又上表朝廷，请移镇襄阳。于是，庾翼受命为都督征讨诸军事，另使庾冰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及豫州四郡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守武昌，为庾翼的后继援兵。庾翼统率士卒四万，聚齐众将领，列阵阅兵，亲自授给部下将领弓箭，当众发誓："我此次出师，犹如此箭"。晋军将士振奋，士气很高。

建元二年四月，庾翼遣梁州刺史桓宣进攻后赵将领李羆，在丹水（陕西、河南间丹江以北）被李羆击败，桓宣被贬为建威将军。桓宣既遭失败，又被贬官，又惭愧又愤慨，竟在八月去世了。庾翼命长子方之任义城太守，代替桓宣统领所部兵士。庾翼又任司马应诞为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为梁州刺史，戍守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后赵骑兵五六百人出樊城（今湖北襄樊）攻掠晋朝边境，庾翼命冠军将军曹据领兵追击，在挠沟（今湖北襄阳北）以北击破后赵骑兵，杀伤过半，缴获战马上百匹。庾翼招抚南渡人民，建立了客馆，设立典客参军一官，专门负责招揽人才，并安顿前来归附的民众。

这时康帝已经病势沉重，庾冰、庾翼想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嗣，中书监何充建议扶立皇子司马聃，康帝听从了何充之议，立司马聃为皇太子。九月，康帝死去了，司马聃继承帝位，是为穆帝。因为争立皇帝的事，庾冰、庾翼深恨何充，庾氏与何充之间结下了怨。褚裒之女是康帝皇后，因为是帝室外戚，为了避嫌，免人讥讽，褚裒坚持请求归藩，遂受命出任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因朝中无人，便于十月太后召庾冰入朝辅政。庾冰此时已经患病在身，便向朝廷辞谢。至十一月，庾冰病故。

庾翼北伐的计划在此刻陷入困境，国有新丧，朝中无人支持北伐，其兄庾冰又已去世，失去了直接的后援，难以率兵进取中原。国事、家事的不利，迫使他只好暂时搁置起北伐的计划。庾

翼留长子方之为建武将军戍守襄阳，因方之年少，便任命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辅助他。安排妥当之后，庾翼遂领大军回到夏门。

朝廷下诏，任庾翼再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庾翼辞去豫州刺史，再次上疏请求移镇乐乡（今湖北江陵西南），朝廷仍然不准。庾翼雄心不已，仍旧在镇所讲武练兵，训练士卒，营造军械，又在当地屯垦耕作，积谷囤粮，以图后举。

穆帝永和元年（345），庾翼因北伐始终不能够顺利进展，忧愤成病，疽发于背。病重时上表举荐其子爰之行辅国将军职务、荆州刺史，委任庾爰之继承未竟事业。七月，都亭肃侯庾翼去世。

庾翼死后不久，部将干瓒、戴羲等作乱，杀死将军曹据，庾翼长史江彪、司马朱焘、建武司马毛穆之、将军袁真领兵平定了叛乱，诛杀了叛将。

庾翼一死，朝廷召集大臣商议荆州的后事。朝臣们都认为庾氏诸人世代在西方居藩镇之位，军民拥护，深得人心，应当依从庾翼生前的请求，以庾爰之代替其父职位。何充建议说："荆楚之地，是国家西方门户，户口百万，可称富足。但是北方接近强大的胡虏后赵，西方与成汉政权近邻，地势险要异常。一方藩镇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吴国时陆抗所说的'存则吴存，亡则吴亡'，就是指此而言。如此重任怎么可以让一个白面少年承担呢？桓温英雄武略过人，有文武才干。西方重任的人选，无人可比桓温。"有人议论说："庾爰之肯避让桓温吗？如果庾爰之以武力阻止代任，如何是好？"何充道："桓温足可以制服庾爰之，诸君不必担忧。"

八月，朝廷下诏以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温遂前往荆州接任。庾爰之虽然有其父风范，终归年少，果然不敢与桓温相争。

朝廷又命丹杨尹刘惔监沔中诸军事，领义成太守，代替庾方之。随后将庾方之、庾爰之迁徙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任职。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庾亮传》、《庾翼传》、《庾冰传》

《通鉴纪事本末·江左经略中原》

桓温北伐

殷浩连年北伐，损兵折将，虚耗物资，引起朝野一片怨恨。桓温利用这一形势，攻倒了殷浩，朝廷将殷浩废黜为庶人，桓温成为东晋唯一强大的军事支柱，从此桓温左右东晋政局，控制了内外大权。

桓温字元子，是宣城太守桓彝的儿子，在襁褓中就因为骨相不凡，啼声响亮，受到温峤的称赞，遂起名字为温。桓温 15 岁时其父遇害，桓温立志复仇，18 岁时仇人江播去世，桓温伪装吊祭的宾客，杀死江播的三个儿子，报了父仇。他的好友刘惔曾经赞誉他："眼如紫石棱，须作蝟毛磔，是孙仲谋、晋宣王司马懿一流人物。"桓温曾任过琅邪太守、徐州刺史。桓温与庾翼交好，常以安邦定国、收复中原互相勉励。庾氏志在进取，多年苦心经营北伐的事业，庾翼留心选拔和延揽人才，曾向明帝举荐桓温有雄才大略，不比常人，将来必定建立匡复社稷的功业。庾翼死后，其子年轻，朝廷也不愿庾氏世代镇守上游，使将西部的重任交桓温继承，任桓温都督荆梁四州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

永和二年桓温出兵入蜀，灭掉了成汉李势政权，桓温晋升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后赵石虎死后，发生内乱，桓温准备乘机出兵北伐，便率军到达武昌，不料引起朝廷的震动和疑忌，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急忙致书桓温，劝他罢兵，桓温只好收兵归镇，对朝廷的猜疑、听信谗言，极为不满。殷浩被废黜流放

后，桓温便立即着手部署北伐之事。

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统率步骑四万从江陵（今湖北江陵）出发，分兵三路，水军自襄阳（今湖北襄阳）溯汉水进入均口（今湖北光化），至南乡（今河南淅川东南）；步兵自淅川（今河南淅川东）向武关进击，直指关中。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领兵出子午谷（今陕西长安与洋县间）攻秦，作为策应。三月，桓温令别将率兵攻打上洛（今陕西商县），俘获了秦荆州刺史郭敬，遂后进兵攻破了青泥（今陕西兰田南）。司马勋攻掠秦西部的边境各地，配合桓温主力作战。前凉政权的秦州刺史王擢领兵攻打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响应桓温。

秦主苻健派遣太子苻苌、丞相苻雄、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北平王苻硕率兵五万，驻防峣柳愁思堆（今陕西蓝田东南）抵御晋军。四月，桓温大军与秦兵在蓝田发生大战。秦淮南王苻生乃是苻健之子，勇武非常，单枪匹马冲入晋军阵中，冲进杀出几十次，杀死桓温部将应诞、刘泓及将士极多。桓温督率全军奋力拼杀，才将秦军击败。桓温之弟将军桓冲又在白鹿原（今陕西骊山西、灞水东）击败秦丞相苻雄的军队。桓温取得蓝田、白鹿原大捷后，转战而前，向关中进军，来到灞上。秦太子苻苌等后退到长安城南，苻健率领留守的老弱兵卒固守长安小城，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将全部精锐士卒三万交给大司马雷弱儿带领，与太子苻苌合兵一处，拒战桓温。

桓温未用多少时日便进兵到达关中，一时间兵锋甚锐。三辅地区的郡县都派人表示归降，桓温安抚百姓，告谕居民各安其业，晋兵所到处不得扰民。民众牵牛担酒，争相迎接慰劳晋军，男女士民夹道争观晋军军容，年迈的老者垂泣着说：“不曾想今日又见到了官军。”

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王猛，字景略，少年时贫贱，卖畚为生，却异常好学，熟读兵书战策，倜傥有大志，不屑于细

务琐事，常受俗人轻视耻笑，隐居在华阴山中。这时王猛身披褐衣来见桓温，一面高谈阔论天下大事，一面扪虱神态自若，旁若无人。桓温对他深感惊异，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率领雄兵十万仗义讨贼，为百姓扫除凶暴，而三秦豪杰却没有人来投诚，这是什么缘故？"王猛道："公不远千里，深人敌境，离长安咫尺之遥却不肯渡过灞水，百姓不了解公的意图心思，所以怀有疑虑，故而无人前来。"桓温默然无语，慢慢感叹道："江东无人可以与卿相比。"于是署任王猛为军谘祭酒。

桓温人关指望着当地麦熟好做军粮，不料秦人割倒了麦子，坚壁清野，使桓温大军缺粮。晋兵又与秦丞相苻雄在白鹿原交战，秦军背城一战，拼死争斗，晋兵失利，伤亡万余人。桓温准备退兵，赐给王猛车马，委任他为督护之职，邀王猛一同南归。王猛回山请示其师，王猛之师对他说道："你与桓温岂能并世称雄。在这里同样可以富贵，何必远去。"王猛遂不肯南下。六月，桓温迁移关中民户三千余户返回南方。

桓温退兵撤出关中，秦将呼延毒叛秦，领部下一万随晋兵南下。秦太子苻苌等率秦兵尾随追击，直到潼关。桓温军屡次失利，伤亡被俘士卒上万。桓温屯兵灞上时，顺阳太守薛珍劝桓温领兵直逼长安，桓温不从。撤兵时薛珍带领偏师不仅安然而返，而且颇有斩获。退兵后薛珍便在众将面前夸耀，自恃勇武，指责桓温过于持重。桓温大为恼怒，遂杀了薛珍。

九月，桓温北伐退兵后，穆帝遣侍中黄门到襄阳慰劳桓温。桓温之母孔氏去世，桓温上疏请求解职送丧，朝廷不准，赠给孔氏临贺太夫人印绶，颁赐谥号为"敬"，并派侍中吊祭，遣谒者监护丧事。一月之间，使者八次来临，十分荣耀。

姚襄降晋后，一直辗转徘徊于淮河流域。十一年四月，姚襄的部下都劝他返回北方，姚襄听从了部将建议，领所部北去，姚襄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五月，姚襄进攻外黄（今河南杞县），

适逢晋守将冠军将军高季去世，姚襄被晋边防诸将击败。姚襄收集残部，兵势复振，遂占据了许昌。

十二年二月，桓温上奏朝廷，请求移都洛阳，修复晋先帝陵园。桓温连上十余道奏疏，朝廷不允。进封桓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命他讨伐姚襄。

五月，姚襄策划入关，便转攻洛阳，经一月时间竟未能攻克。长史王亮劝姚襄不可损威劳众，守着洛阳孤城，应当回到黄河以北，另图发展。姚襄认为洛阳战略位置重要，先占据洛阳，然后创建大业，不听王亮的劝告。此时，桓温领兵征讨姚襄，遣督护高武据守鲁阳（今河南鲁山），命辅国将军戴施屯兵河上，亲自领大军随后进发。桓温路经金城，见年轻时任琅邪太守，所种的柳树都已长成十围粗细，不禁慨然兴叹："树木尚且如此，人又如何不老！"率军过了淮泗，进入北部边境，与诸将和僚佐登上平乘楼，极目远眺，北望中原，感慨万千，浩然长叹道："竟使得神州陆沉，百年基业化为废墟，王夷甫诸人难辞其咎！"记室袁宏道："气运有兴有废，未必全是诸人的过失。"桓温怒形于色，对众人道："昔日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吃料豆十倍于普通的牛，但负重物、行远路还不如一头瘦牛。魏武帝一到荆州，立刻杀了大牛犒劳将士。"

八月，桓温大军已到伊水（洛阳南），姚襄撤出洛阳围城军队，在伊水以北抵抗桓温。桓温摆开阵势攻击姚襄，他亲自披挂甲胄督战，晋兵勇猛进攻，姚襄被杀得大败，数千人阵亡，姚襄领残兵越过洛阳北山向西逃去。晋兵追之不及。杨亮从姚襄军中逃出来投桓温；桓温便问他姚襄是怎样的人，杨亮答道："姚襄器宇轩昂，精明果敢，是孙策一流人物，而雄武有过之。"秦洛阳守将周成降顺晋军，桓温进入洛阳。桓温驻于太极前殿，不久迁到金墉城，拜谒了晋列朝先帝的陵墓，修复毁坏之处，分别委派了陵令管理。桓温准备撤兵、上表举荐镇西将军谢尚来守洛

阳，暂时命颖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率二千人戍守洛阳，护卫山陵。遂后迁移归降民户三千余家到江、汉之间。于是带着降将周成班师而回。

这时，东晋疆域到达山东、河南，与前燕接界，不久，燕主慕容儁迁都邺（今河南临漳），双方展开争夺河南之战。

穆帝升平五年（361），二月，燕河内太守吕护遣使降晋，东晋封吕护为冀州刺史。吕护策划招引晋军袭取燕都城邺。三月，燕太宰慕容恪领兵五万，冠军将军皇甫真领兵一万，一同讨伐吕护。吕护率兵坚守城池，慕容恪便构筑长围，围困野王（今河南沁阳）达数月，吕护派部将张兴出城交战，失利被杀，城中日益困难。燕将皇甫真告诫部将："吕护将要逃窜，必然选择薄弱之处，我部士卒老弱，应当加紧防备。"七月，吕护粮食耗尽，果然率领精锐士兵向皇甫真防地突围。因燕兵早有防备突围受阻，慕容恪又领兵杀来，吕护兵马死伤将尽，只好丢下妻子逃奔荥阳。十月，吕护叛晋又归降燕，燕人赦免了他，任他为广州刺史。

是年五月，东晋穆帝去世，无嗣，琅邪王司马丕继位，是为哀帝。九月，桓温准备北伐救援吕护，命徐兖二州刺史范汪出兵，因误期，被免为庶人。

晋哀帝隆和元年（362），燕国谋划攻取洛阳，派吕护屯兵河阴（今河南孟津东）。东晋为守卫河南，命庾希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县），龙骧将军袁真为西中郎将、监护豫司并冀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汝南（今河南汝南）。二月，吕护攻洛阳，三月，河南太守戴施留陈佑守洛阳，出奔宛。洛阳守将陈佑告急。五月，桓温令庾希与竟陵太守邓遐率领舟师三千，援助陈佑共守洛阳。

桓温再次上疏，请迁都洛阳，并且奏请自永嘉之乱以来流落到南方的民户，一律北移，充实河南地区。朝廷畏惧桓温，不敢

公然表示异议，然而北方萧条，土地荒芜，民心猜疑不安，虽然明知不宜迁都，没有人敢出头谏阻。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疏陈述不可迁都，他认为："元帝建立基业，并非只凭天时人心，实际上赖万里长江才划江而守。丧乱六十余年，河南萧条荒芜，士民流落江南已经几世，生存者老幼都有，死去者坟丘成行。人们虽然思念北方故乡，但不能不顾眼下的哀切。若迁都北去，东晋诸帝在南方的五陵即将又被抛弃。桓温此举，诚为国家长远着想，然而重返故乡的欢乐遥远，趋于死亡的忧虑急迫。因为民众扎根江左几十年，一朝连根拔起，驱赶到空荒之地，跋涉万里，道路艰难，离别祖坟，抛弃生业，田宅不能售出，舟车无从得到，舍安乐之家园，到纷乱之乡土，不少人将死于路途，溺于江川。这些都是仁者应当哀矜，国家应当深虑的。臣的愚计认为，应当遣有威望资历的将帅，先镇守洛阳，扫平道路，安抚河南。待漕运已通，开垦积蓄已丰厚，豺狼远窜，中原小康，然后可以商议迁徙。"桓温见到孙绰表章，大为不悦。朝廷上下又忧又怕，要派遣侍中前去制止桓温，扬州刺史王述说："桓温只是要虚张声势，威胁朝廷罢了，并非真的要实行，只管听之任之。"桓温主张迁都的事果然不了了之。于是，朝廷改授桓温都督并司冀三州，桓温推辞不受。

七月，晋军援兵赶到，吕护退守小平津（今河南孟津北），被流矢射死，燕将段崇也北撤到野王。晋将邓遐进兵到新城（今洛阳南）。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屯汝南，运送五万斛米接济洛阳。因燕兵已退走，十二月，庾希便从下邳退回山阳（今江苏淮安），袁真从汝南退回寿阳（即寿春）。

兴宁元年（363）四月，燕兵再次入侵，宁东将军慕容忠攻打荥阳，太守刘远出奔鲁阳（今河南鲁山）。五月，晋朝以西中郎将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庾希都督青州诸军事，准备抗御燕兵。这时燕兵攻下密城（今密县），刘远逃往江

陵。十月，燕镇南将军慕容尘出兵攻长平（今淮阳），晋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取了许昌。

二年二月，燕军向晋发起攻势，太傅慕容评、龙骧将军李洪向河南攻城夺地，大举进犯。四月，燕将李洪进攻许昌、汝南，在悬瓠（今汝南）击败晋军，晋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逃奔寿阳，陈郡太守朱辅撤守彭城。败报传来，大司马桓温派西中郎将袁真等率军抵御燕军，亲自率领舟师驻扎合肥，作为接应。燕军攻克许昌、汝南、陈郡，将万余户居民迁往北方，由镇南将军慕容尘屯驻许昌。八月，燕太宰慕容恪准备攻取洛阳，先派人招纳士民，洛阳附近各地的坞壁都归顺了燕。随后，慕容恪派司马悦希驻军盟津，豫州刺史孙兴驻军成皋。

燕军逼近洛阳，洛阳守将冠军将军陈佑部下士卒不满二千，又粮尽援绝，陈佑自度守不住洛阳，便以救援许昌为名放弃洛阳。九月，陈佑留沈劲带领五百人守卫洛阳，遂领兵东去，闻知许昌已经陷落，便奔往新城。留守洛阳的沈劲乃是沈充之子，沈充死于作乱，名声不好，沈劲立志立功雪耻，因为是罪犯家属，30余岁仍不能进入仕途，这时朝廷命吴兴太守王胡之出任司州刺史，王胡之便举荐沈劲，请求解除对沈劲的禁锢。朝廷准许后，王胡之却因病不能赴任。因洛阳危急，沈劲请派往洛阳守将陈佑部下效力，沈劲奉诏补任冠军长史，自己招募了壮士千人赶到洛阳。他作战勇武，屡次以少胜多，击败燕兵。

三年正月，桓温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二月，陈佑放弃洛阳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司徒司马昱与大司马桓温在洌洲（姑孰江中洌之山）相会，一起商讨军事行动挽救河南危局。正在这时哀帝去世，商议作战计划遂告中止。哀帝没有后嗣，琅邪王司马奕继帝位。

燕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一齐攻打洛阳，燕晋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三月，洛阳被攻克，沈劲被俘，不屈而死。慕容恪向洛

阳以西发动进攻，直到崤、渑地区，关中震动，苻坚亲自率领秦军驻守陕城（今河南陕县）防备燕军。燕国以慕容筑为洛州刺史，镇守金墉；吴王慕容垂为都督荆扬洛徐豫雍益凉秦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统领一万兵士，镇守鲁阳。

晋海西公司马奕太和元年（366），燕军攻势依然不衰，十月，抚军将军慕容厉进攻晋太山太守诸葛攸，诸葛攸不能抵挡，奔往淮南，慕容厉攻陷了兖州诸郡，在各地委派了郡守县令。十二月，晋南阳督护赵弘献出宛城降燕，南阳太守桓澹退守新野。

二年四月，慕容尘侵袭竟陵（今湖北钟祥），晋竟陵太守罗崇击退燕兵。五月，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与罗崇反攻宛城，攻克宛城后，赵弘逃走，燕守将赵盘退回鲁阳。桓豁命轻骑追击燕军，在雉城再败燕军，擒获赵盘。桓豁留兵马戍守宛城。九月，晋廷以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

太和四年三月，桓温上疏，请准与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京口地区是中原人民避乱南迁的聚居之处，这里的部队号称北府兵，勇敢善战，桓温时常赞赏说："京口的酒可饮，兵可用。"很不愿意郗愔在京口。郗愔看不透事机，致笺给桓温，声称要共同辅佐晋室，并请令率兵出征。这正好招致桓温嫉恨。郗愔之子郗超任桓温的参军，取其父信笺偷看后大为吃惊，便毁了原信笺重新改写了一封，陈述自己并非将帅之才，不堪征战，请求得一处闲地任职以颐养老病之身。桓温见此信大喜，立即让郗愔改任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桓温自领徐兖二州刺史。

四月，桓温率领步骑五万伐燕。参军郗超向桓温建议："伐燕征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漕运不通，供给困难。"桓温不听。六月，桓温大军到达金乡（今山东金乡），由于天旱河道干涸无水，桓温令冠军将军毛虎生凿井钜野（今山东钜野北）三百里，

引来汶水汇入清水，桓温率舟师从清水进入黄河，船舰首尾相连，百里不绝。郗超又进言说："清水入河，难通漕运。若敌军避而不战，运输又断，这是危道。不如以现有兵马，全力直趋邺城。对方惮怕公的威名，必然闻风溃败；如果交战，也可以一决胜负。敌军若在邺筑城坚守，在这盛夏季节难以成功。百姓分布在四郊野外，都在我军范围之内，易水以南各地都会归降。只是此计有些轻进冒险，胜负难料，恐怕明公持重，不便采用。不如屯兵于黄河一带，待物资储备充足，来年夏天进兵，虽然拖延时间，却可以期望成功。排除这二种策略，提兵北上，进不能速战速决，退必然动作迟缓。敌军乘此形势拖到秋冬，水量更少。而且北方寒冷来得早，三军军衣单薄，将又被时令困扰，不单是军中无粮的困难。"桓温又不肯听。

桓温遣建威将军檀玄攻打湖陆，攻克了城，俘获燕宁东将军慕容忠。大军随即水陆并进，以邓遐、朱序为前锋，桓温率大军继后。

燕主慕容暐闻桓温大军来攻，命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领步骑二万在黄墟（今河南民权）迎战，慕容厉军大败，慕容厉单骑逃脱。燕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太守徐翻献郡城降晋。晋前锋邓遐、朱序又在林渚（今河南新郑北）杀败燕将傅颜。慕容暐再遣乐安王慕容臧统领诸军抵御晋兵，慕容臧难敌晋军，遂派遣散骑常侍李凤向秦国求救。

七月，桓温屯驻武阳（今山东朝城西），燕原任兖州刺史孙元率领家族乡里人起兵响应桓温。桓温进兵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东），慕容暐与太傅慕容评大为惊慌，商议要奔往和龙（今辽宁朝阳）。车骑大将军吴王慕容垂道："请准臣出兵一战，若不能取胜，再走不迟。"慕容暐遂命慕容垂代慕容臧为南讨大都督，带领征南将军慕容德等将领，率兵五万迎战桓温。同时慕容暐又遣散骑常侍乐嵩到秦请求救兵，许下重赂，割让虎牢以西土地

给秦。

秦王苻坚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臣们都认为"昔年桓温攻打我国，兵临灞上，局势危急时燕国不来救我；如今桓温伐燕，我们为什么要救他？况且燕国不对我称藩，不肯做秦的属国，我们何必救燕。"散朝后王猛向苻坚密奏说："燕虽然强大，慕容评却不是桓温的对手。倘若桓温灭燕得了山东，进而夺取北方、西方，那么陛下的大势去矣。如今之计不如与燕合力击退桓温，桓温撤走，燕国也大伤元气，然后我乘其困弊而取之，不是更好吗？"苻坚深表赞同。八月，苻坚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率领步骑二万救燕，进兵颍川（今河南许昌）。同时使散骑侍郎姜抚出使燕国通报。

燕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封孚、尚书郎悉罗腾等都随慕容垂出征，封孚问申胤说："桓温兵强将勇，借水路乘胜直进，如今我军只在高岸上逡巡，并不与敌交锋，看不出克敌制胜的迹象，军情将会怎样呢？"申胤言道："看桓温现在的声势，似乎能够有一番作为，然而我看他必难成功。为什么呢？晋室衰微，桓温专权擅政，晋朝大臣未必都和他一心，所以桓温得志，大臣们并不情愿，必然要借故阻挠败坏他的大事。而且桓温骄傲，恃着兵力众多，不善于随机应变，大军深入本来有可乘之机，反而徘徊不进，不交锋取胜，想指望持久相持坐取全胜。一旦粮草不济，必不战自败。"

桓温任用归降的燕人段思做向导，悉罗腾与晋军交战时生擒了段思。桓温又令部将李述领兵到赵、魏之地，悉罗腾与燕虎贲中郎将染干津又击斩了李述。桓温几次失利，军中士气低落。桓温先期使豫州刺史袁真进攻谯（今安徽亳县）、梁（今河南商丘），开凿石门（今河南荥阳北）以开通水上运输，袁真攻克了谯、梁，但未能凿通石门，水运之路未能开通。

九月，燕军开始反攻，范阳王慕容德领骑兵一万、兰台治书

侍御史刘当领骑兵五千驻守石门，豫州刺史李邽领本州兵五千截断晋军粮道。慕容德令将军慕容宙率一千骑兵为前锋，率先进击，与晋军遭遇，慕容宙以二百骑兵挑战诱敌，其余骑兵分成三处设伏。挑战骑兵未与晋兵交锋便退走，晋兵追击遭受埋伏，被杀得大败，伤亡惨重。

桓温多次交战受挫，粮食储备用尽，又闻知秦国救兵就要来到，晋兵军心涣散，桓温遂决定退兵。下令焚毁舟船，丢弃了辎重甲杖，从陆路撤退。桓温命毛虎生为都督东燕四郡军事，领东燕太守，率军驻守。晋军从东燕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撤兵，一路上凿井而饮，走了七百余里路程。这时燕诸将要追击晋军，慕容垂道："桓温刚刚撤退，必然严密戒备，用精锐在后掩护，不如暂缓追击。对方庆幸我军没有追赶，必定昼夜急行军，等敌军力尽气衰，防备松懈，那时攻击敌军必可取胜。"于是率领八千骑军远远尾随晋兵之后。桓温果然命晋军兼程赶路，几天后慕容垂传令诸将火速追击，在襄邑（今河南睢县西）赶上了晋军。慕容德令四千铁骑先已埋伏在襄邑东涧中，遂与慕容垂前后夹击晋军，又大破晋军，斩首三万级。秦将苟池又在谯邀击桓温，晋兵损伤上万。孙元据守武阳抵御燕兵，也被燕左卫将军孟高击败。

这次战役，桓温几乎全军覆没。十月下旬，桓温收拾残兵屯扎在山阳（今江苏淮安）。桓温对丧师惨败深感耻辱羞愧，便归罪于袁真，上奏朝廷废黜袁真为庶人，又罢免了将军邓遐的官职。袁真不甘心做替罪羊，认为桓温诬陷，心中不服，上表陈述桓温的过失，朝廷置之不问，袁真遂以寿阳叛晋降燕。东燕诸郡难以坚守，桓温遂任毛虎生领淮南太守，驻守历阳（今安徽和县）。

十一月，晋丞相司马昱与桓温在涂中会见，商议再次北伐，并任桓温世子桓熙为豫州刺史。十二月，征发徐州、兖州的大量

民夫修筑广陵城（今江苏扬州），桓温遂移镇广陵。桓温伐燕失败后又征发人役，大兴工程，当时又发生疫病流行，使壮丁死伤累累，百姓一片怨声。

五年三月，袁真病死，部将朱辅扶立袁真之子袁瑾继承职位，保守寿阳。桓温令督护竺瑶、矫阳之攻打寿阳，燕、秦都派兵援助袁瑾，燕兵先到，在武丘（今河南沈丘东北）被竺瑶击败。八月，桓温亲领二万人马征讨袁瑾，袁瑾固守寿阳，桓温令构筑长围围困城池。简文帝咸安元年（371）正月，秦将王鉴、张蚝领援兵二万赶来，桓温令淮南太守桓伊、南顿太守桓石虔领兵迎战，秦军被击败。不久，桓温攻克寿阳，袁瑾、朱辅被擒，与族人数十人被押赴建康斩首。

桓温北伐想建立大功，收复中原的志向却最终未能如愿。东晋史学家孙盛写作《晋春秋》，对桓温北伐之事如实记载，毫不隐晦桓温的失败。桓温见了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北伐之战在枋头诚为失利，但是何至于就像尊公所说的那样？如果让这样的史书流传，可要小心君的家族。"威胁孙家小心灭门之祸。孙盛之子惶恐谢罪，请求改写。孙盛年纪已大，在家闲居，他素来治家极严，其诸子跪地哭求，请他为家中百口性命着想，改写史书。孙盛十分恼火，不肯答应改写。孙盛诸子背着他修改了书中内容。孙盛事先写了副本，并流传到国外，到孝武帝在位时，搜访图书，寻求典籍，从辽东人手里得到了副本，所记内容与东晋流传的有所不同。遂使《晋春秋》有两种本子存世。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穆帝本纪》、《桓温传》

《通鉴纪事本末》：《江左经略中原》、《桓温伐燕》

《中国历代战争史》

桓温废晋帝

晋穆帝即位不久，庾冰、庾翼先后去世，执政大臣便议定由桓温继任荆州刺史，坐镇长江中游重镇。丹阳尹刘惔赞赏桓温才略不凡，却又看出桓温怀有政治野心和权力欲，遂劝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自己镇守荆州，司马昱不从，刘惔又自告奋勇要担任荆州刺史，司马昱仍然不听，刘惔说道："不可让桓温呆在形胜之地，他的职位官号也不能过高。"不久，朝廷任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永和二年（346）十一月，桓温出兵伐蜀。蜀道艰险，征途遥远，桓温兵力又少，深入敌境作战，人人都为伐蜀之战担忧，只有刘惔认为桓温必能成功。有人问他缘故，刘惔答道："从赌博可以看出，桓温善长赌博，不胜不赌，赌则必要得胜。只是怕灭蜀之后，桓温最终要挟制朝廷。"次年，蜀主李势兵败，向晋军投降，成汉政权覆没。

永和四年，朝廷封赏伐蜀功臣，想把豫章郡封给桓温，尚书左丞荀蕤劝阻说："将来桓温若是收复中原，又该如何封赏呢？"于是朝廷加封桓温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桓温灭蜀之后，威名大震，朝廷也感到惧怕。司马昱依恃殷浩与桓温抗衡，由于殷浩北伐失败，损兵折将，耗尽储备，引起朝廷上下一片怨愤。殷浩被废为庶人，桓温消除了竞争兵权和军事实力的对手，成为朝廷军国大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永和十年（354），桓温兵伐关中，到达灞上，因粮尽退兵。永和十二年，桓温奉命讨伐叛晋的姚襄，在伊水击败了姚襄，姚襄被迫北迁。升平元年（357），镇西将军谢尚也死去了，升平二年，安西将军谢奕、北中郎将荀羡先后去世，能够征战统兵的将领凋谢已尽，晋朝只有依靠桓温支撑大局。升平四年，加封太尉桓温为南郡公，其弟桓冲为丰城县公，其子桓济为临贺县公。升平五年五月穆帝驾崩，司马丕即位，是为哀帝。兴宁元年五月，加封征西大将军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桓温遂手握军政大权。

桓温极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建树，他十分赞同王导执政时期倡导的镇之以静政策，便上疏朝廷，陈述应当施行七件措施。在陈七事疏中指出：一要禁止朋党私议；二要省并官职；三要增加办事效率；四要奖励忠心秉正的官员；五要据实褒贬赏罚；六提倡学业；七设史官，修《晋书》。桓温所陈七事很有见地，并且得到了执行。不久，朝廷赐给桓温羽葆鼓吹，并准许设置属官：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员。

桓温任用王坦之为长史、王珣为主簿，郗超为参军。桓温对郗超、王珣很推重，极为信任，每事必要和二人商议谋划，当时桓温府中流传着这样的话：“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王珣是王导之孙，和谢玄都做桓温府中椽属，桓温重二人之才，曾经说：“谢椽年到四十必能拥旄杖节为元帅，王椽壮年当作黑头相公，都是难得的人才。”果然日后这两人都成为将相栋梁。

兴宁二年五月，加封大司马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一向被高门士族轻蔑地看作“楚人”，呼作“老兵”，而且桓温尚武，故桓温以将帅自居，不愿入朝参政。执政的司马昱文才有余，谋略不足，桓温深知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与己不会有妨害，便上疏辞而不赴。七月，又下

诏征召桓温入朝。八月，桓温到达赭圻（今安徽繁昌西），朝廷令尚书车灌阻止桓温，桓温遂在赭圻筑城居住，坚决辞掉录尚书事职务，遥领扬州牧一职。

兴宁三年，桓温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与司马昱商讨北伐之事，却在这时，哀帝司马丕死去，因无子，同母弟司马奕继承帝位，就是晋废帝。太和三年（368）加赠桓温特殊礼遇，爵位在诸侯王之上。太和四年，桓温率大军北伐前燕，因未能速战速决，漕运不通导致缺粮，遂兵败枋头，失利退兵。

桓温生性俭朴，不讲排场，不尚奢侈，然而却是雄心勃勃，对权势名声有无休止的欲望，他曾经对亲近幕僚们说："若要寂寞无闻地度过一生，将被文帝、景帝耻笑。"因为文帝司马师、景帝司马昭是司马氏篡魏建晋的列祖列宗，这话吓得众人不敢作声。桓温又曾经抚摸着枕头叹息说："男儿纵然不能流芳百世，也应当遗臭万年！"立志要做一番非凡的事业。桓温原本想北伐胜利，收复中原，建功立业之后迫使朝廷授予九锡的赏赐，不料枋头失利，威名顿时受挫。太和六年，桓温在收复了寿春之后，便问参军郗超："这足以洗雪枋头的耻辱了吧？"郗超答道："没有"。当天深夜，郗超便向桓温献策，请他废黜晋帝，别立新君，效法伊尹、霍光的做法，树立威望，显示权势，震服人心。桓温早有雄心，对郗超之计深以为然，遂与郗超商议定下计谋。因为晋帝司马奕素来谨慎，没有显著的过失，只有深宫内院床笫之间的事，是宫闱隐私，容易诬陷，于是宣扬说：司马奕在藩邸时就患有痿症，不能生育，嬖爱之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与内宫侍寝，田氏、孟氏二美人生育了三个男孩，将要立为储君，司马氏的江山就要被外姓人夺去了。

谣言在民间到处传播，一时间人们对传闻难辨真假。当年十一月，桓温准备从广陵返回姑孰，先屯兵于白石，随后回到建康，讽谕褚太后废掉司马奕，另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太后

无奈，只得听从桓温安排。

桓温召集百官，在朝堂商议废立之事。废立皇帝事件在晋朝从未发生过，没有典章仪式等制度可以遵循，百官都惶惑无计，桓温也很焦虑，不知如何是好。尚书王彪之看到事已至此，便对桓温言道："这件事只好依仿前代。"于是命人取来《霍光传》，借鉴当年汉代霍光废立君主的先例，不多时拟定了礼仪制度，宣读了太后的旨意，废司马奕为东海王，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任帝位。桓温使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取皇帝玺绶，司马奕身穿白帢单衣，步行下西堂，乘坐犊车出神虎门。百官送驾，拜别旧主，纷纷歔欷落泪表示惜别，由侍御史和殿中监率领禁兵百人护送司马奕到东海王府第。送旧之后，开始迎新，桓温率领百官准备下舆车法驾，到会稽王府第迎接司马昱入宫。司马昱在朝堂更换服饰，下拜接受玺绶，即皇帝位，是为简文帝。改年号为咸安元年。桓温为防备发生变故，分派兵士守卫宫城各地。桓温有足疾，行走不便，简文帝下诏桓温可以乘舆车上殿。桓温撰写了呈词，想对简文帝解释废立君主的本意，简文帝召见桓温后泪流满面，十分悲伤，桓温战战兢兢十分不安，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

司马氏宗室中，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艺，长期带兵，具有武略。桓温对他非常疑忌，想废黜司马晞，便与王彪之商议，王彪之道："武陵王是晋帝近亲，职位尊贵，没有明显的罪过，不能因为猜疑嫌恶就废黜他。公若想建立圣明的世道，应当尊崇王室，才能和伊尹、周公媲美。这是大事，要仔细慎重。"桓温不悦。桓温上表弹劾武陵王："司马晞招纳凶徒，其子司马综骄矜残忍。袁真叛逆事件与他有瓜葛。近日来他父子猜疑恐惧，必将成为作乱的祸根。请罢免司马晞官职，以王位归藩。"简文帝自然听从，并一起罢免了世子司马综、梁王司马逢等人的官。桓温令魏郡太守毛安之率领本部兵士在宫中守卫，以防有变故。

当初，殷浩去世时，桓温派人携带书信并来吊祭，殷浩之子殷涓既不答书又不去见桓温道谢，桓温大不高兴，而殷涓却与武陵王司马晞过从交游。广州刺史庾蕴一直和桓温有嫌隙，桓温憎恶殷氏、庾氏宗族强盛，便想除去他们。桓温使其弟桓祕强逼新蔡王司马晃到朝廷去出首，说与司马晞父子、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太宰椽曹秀、舍人刘强、散骑常侍庾柔等人谋反。简文帝明知是桓温要诛锄异己，诬陷诸人，却无可奈何，只会流泪。桓温将诸人都收捕后交付廷尉治罪。其后，桓温又派人杀害了东海王的三个儿子及其母亲。不久，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禀承桓温之意奏请朝廷，诛杀武陵王。简文帝下诏："悲伤感叹，惶惧不安，不忍听闻，更何况说要处死之事呢！重新详议。"实际上是为司马晞求情，不情愿翦除宗室亲人。桓温再上表坚决要杀掉司马晞等人，言词极为严酷激切。于是简文帝亲手写诏给桓温，说道："若是晋室帝祚有灵，还有长久天命，公便应当奉行前日的诏书；如果晋室大运已经失去了，请让我避贤让位。"司马昱以让出江山社稷坚持意见。桓温见诏，冷汗直流，面目变色，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固执下去，便做出让步，奏请废黜司马晞及其三子，家属随同流放到新安郡。于是，简文帝下诏，免新蔡王司马晃为庶人，流放衡阳。殷涓、庾倩、曹秀、刘强、庾柔都被合族诛杀。广州刺史庾蕴也被迫饮鸩自尽。庾蕴之兄庾友任东阳太守，其儿媳是桓豁之女，故桓温特赦了庾友。庾希听说宗族遇难，与其弟会稽王参军庾邈及儿子庾攸之逃到海陵荒山野水中。

桓温诛杀了殷氏、庾氏，威势显赫，不可一世。侍中谢安见了桓温遥遥下拜，桓温吃惊地问："安石，卿何必如此？"谢安道："没有君拜于前，臣子拜揖于后的道理。"

随后，天下施行大赦，增文武百官官位二等。桓温返回白石，上疏请求回归姑孰。随之简文帝下诏，桓温进位丞相，大司

马如故，留在京师辅政。桓温坚决推辞，仍旧请求还镇。便从白石回到姑孰。

此时，前秦苻坚任用王猛，攻灭了前燕慕容暐，国势强盛。苻坚听说桓温废立晋帝之事，对群臣说道："桓温前败于灞上，后败于枋头，不能思过自贬以向百姓谢罪，而又废掉君主自逞意志。60岁的老叟，竟然还这样干，将如何在四海容身？谚语说'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这不就是说的桓温吗！"

十二月，大司马桓温上奏："废黜流放的罪人，在远方也不可以治理百姓。东海王应当依从昌邑王的故事先例，在吴郡建筑府第居住。"太后下诏说："将东海王废为庶人，于情有所不忍，可特封为王位。"桓温又奏："可以封为海西县侯。"朝廷采取折中办法，封司马奕做海西县公。桓温威震朝廷内外，简文帝虽是帝王之尊，只有拱手沉默的份儿，时常担心再遭被废黜的厄运。司马昱自幼留心书籍，好读书谈玄，尘土满席也毫不在意，却没有治理国家的才干。他结交了刘惔、王濛、韩伯等一班谈客，身边却没有治国安邦的人才，因此谢安认为他是惠帝一流人物，只是文才清谈胜过惠帝而已。因为天象反常，荧惑星逆行进入太微宫，简文帝心里甚是厌恶，一天对郗超说："命的长短，我本来不放在心上，是否又要发生近日的事情了？"郗超知他惧怕废黜，便说道："大司马桓温正谋划内要稳固社稷，外要恢复发展，至于非常事件，臣以家中百口性命担保，决无其事。"及郗超紧急请求归省其父郗愔，简文帝对他说："回去向尊公致意，国家之事竟到了这种地步，都是我不能以道义匡扶，深感愧疚，非语言所能表达。"吟咏庾阐的诗句道："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吟罢泪下沾襟，涕泣不止。

郗超因为受桓温信赖的缘故，朝中大臣都对他惧怕三分，谢安与左卫将军王坦之曾经一起去见郗超，正当中午，未能进见郗超，王坦之便想回去，谢安劝他说："你为了性命，就不能忍耐

片时么!”

咸安二年三月，简文帝遣侍中王坦之召大司马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再次推辞。四月，又将海西公迁徙到吴县西柴里居住，命吴国内史刁彝负责保卫防守，又派御史顾允监察，防备海西公有意外举动。六月，庾氏起兵报仇，庾希、庾邈与原青州刺史武沈之子武遵，招聚兵卒，乘夜间进入京口城，晋陵太守卞眈猝不及防，便越出城逃到曲阿。庾希占据京口，诈称受有海西公的密旨，诛讨桓温。京口距京师不远，又是兵家用武之地，位置极其重要，引起建康惊乱，城内实行戒严，卞眈调集诸县兵士反击庾希，庾希兵败，关闭城门固守。桓温又派东海内史周少孙领兵讨伐，七月，攻破京口，庾希、庾邈被擒，同亲属党羽都被斩首。

这时，简文帝已患重病，急召大司马桓温入朝，一日一夜连发四道诏书，桓温推辞不来。简文帝便立长子司马昌明为皇太子，次子司马道子为琅邪王，留下遗诏:“大司马桓温依照周公居摄故事。”当时太子年方10岁，桓温依周公辅成王故事全权执掌国政，遗诏又说:“少子可辅佐便辅佐他，如果不可，君自可取代他。”侍中王坦之见遗诏这样写，便拿着诏书入宫，在简文帝面前毁了诏书，说道:“天下，是宣帝、元帝建立的天下，陛下怎么能自己做主让人呢?”简文帝遂使王坦之改写诏书:“国家大事一切禀从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当天，简文帝便死去了。

太子年幼，大臣们都疑惑着，不敢便立太子为嗣君，有人提议请大司马桓温来朝决定。尚书仆射王彪之正颜厉色地说:“天子驾崩，太子就应当为君，怎能容大司马有异议!倘若当面向他咨问，反要被他责怪。”于是在朝堂议定，太子司马曜即皇帝位，这就是孝武帝。接着发布崇德太后旨意，因皇帝还在幼年，又在国丧期间，令桓温依照周公辅佐成王故事，摄理国政。王彪之说道:“这事非同寻常，大司马必定坚决辞让。这样一来，使

国政停滞，延误先帝安葬，我不敢奉命。请收回诏令。”遂使此事没有实行。

桓温满心期望简文帝临终时把帝位禅让给自己，不料想只落得辅政的结果，愿望未实现，很是愤怒。桓温疑心是谢安、王坦之所为，心中怀恨，这时谢安又奉诏来召他入朝，桓温仍坚辞不赴。

十一月，彭城人卢悚假借有法术，自称作大道祭酒，信奉他的信徒有八百多家，卢悚策划起事作乱，想借废帝的名义作号召，便派他的弟子许龙到吴县。一天清晨，来到海西公的门前，声称有太后的密诏，迎接海西公去兴复帝王大业。海西公起初信以为真，想随他前去，听了保姆的劝阻才没有成行，许龙极力劝他说：“大事就要成功了，怎么能听信女人的话呢！”海西公说：“我有罪居住此地，幸而得到宽宥，怎敢妄动。况且太后有诏书，就应该由宫廷属官送来，为什么单单使你来？你必定想作乱！”遂喝令左右拿住他，许龙才被吓跑。不久，卢悚果然聚众作乱，带领三百人在清晨攻打广莫门，诈称是海西公回来了，接着又从云龙门冲到殿廷，抢掠了武库中的铠甲兵器。守卫皇城的官兵听说废帝回来，不知真假，又惊又怕，愕然不知所措。游击将军毛安之闻讯，急忙领兵直进云龙门，奋力与卢悚拼斗，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也领兵赶来，与毛安之合力剿杀，卢悚等数百人都被杀死。经过这次事件，海西公非常担心横祸临头，终日饮酒解忧，恣情声色，生下男儿也不让他成活，当时人们都十分哀怜他。

孝武帝康宁元年（373），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朝，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去到新亭迎接。京师人心惶惶，传说桓温必将杀掉王、谢，夺取晋帝的皇位。王坦之心里甚是惊怕，谢安镇定自若，神色坦然，对王坦之说道：“晋朝帝祚的存亡，决定于此行。”桓温已到，百官都在道旁下拜，桓温排列着武士，警卫森

严。接见朝中百官，有声望、官职高的人都怕首先遭祸，吓得面目变色，战抖不止，王坦之冷汗沾衣，倒持着手板，惶惧不安。谢安从容到席前就座，向桓温言道："谢安听说诸侯若是有道，将士守卫在四邻边境，明公何必在幕壁后面布置人呢?"桓温被他说破，只好笑道："只是不能不这样做。"遂命左右武卫退去，与谢安谈笑了很久。郗超常为桓温出谋划策，是桓温的主要谋士，一次谢安与王坦之去见桓温，桓温使郗超隐藏在帐幕中偷听他们谈话，恰好一阵风来吹动帐幕，露出郗超，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这时期，天子年幼，朝廷衰弱，外有强臣，仗着谢安与王坦之尽心竭力，忠诚地辅佐卫护，才使晋室安然度过危机。

三月，桓温患病，经常幻视幻听，烦躁不安，在建康停留了十四天后返回姑孰。

桓温病情不断加重，便讽谕朝廷请求九锡的荣典，屡次使人去京师催促。谢安、王坦之故意拖延，使袁宏起草加九锡文，袁宏撰写完毕交给王彪之过目，王彪之很赞赏他写的文词优美，又怪他卖弄，遂说："卿固然是大手笔，可是，这种东西怎能拿给人看呢!"谢安见了他起草的文章，便提出修改，因此十多天还不能定稿。袁宏便去请教王彪之，王彪之说："听说桓温病势日益沉重，必然支持不了多久，你可以再稍拖延一下。"

桓温病情毫不见起色，其弟桓冲便向桓温询问，日后谢安、王坦之应该如何任用，桓温道："彼等人不用你来安排。"桓温之意认为，自己在世，王、谢必不敢有异议，一旦自己死了，王、谢不是桓冲所能制，若害了他们，对桓冲更无益处，而且会大失人心。

七月，南郡宣武公桓温去世了。

因为世子桓熙才智有限，桓温死前令桓冲代他统领部下。桓温死后，桓秘便与桓熙、桓济图谋杀掉桓冲。桓冲得到密报，知

道了谋杀阴谋，不敢入府探视桓温，桓温一死，桓冲先命力士拘捕了桓熙、桓济，然后为桓温发丧。桓祕被废弃，桓熙、桓济被流放到长沙。朝廷下诏依仿汉霍光和安平献王之礼安葬桓温，又赐给衮冕及朝服、棺木，赐钱二百万，布二千疋，腊五百斤。桓冲宣称遵照桓温遗嘱，以桓温5岁的少子桓玄承袭了南郡公封号。

其后，朝廷加封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扬雍交广五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守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寻阳。桓冲代桓温统领部下镇守姑孰之后，对晋室尽忠竭力，有人劝他杀掉大臣，专权执政，桓冲不从。桓温在世时一些目无朝廷的做法，桓冲并不仿效，生杀大事，都要上报朝廷后才执行。

谢安看到皇帝年幼，最强有力的元老辅臣桓温又已去世，便请出崇德太后临朝听政，借以削弱桓冲的权势，逐步将权力收归朝廷。

太元二年（377）十二月，临海太守郗超死去了。郗超作为桓温亲信党羽，为他出谋划策，因为他父亲郗愔忠于晋室，故尔郗超所做的许多事不让父亲知道。郗超病危时，取出一箱书信交给门生，嘱托说："我父年迈，我死后，老父若哀伤影响寝食时，便呈交此箱。若不然便焚掉它。"果然郗愔痛子，悲伤过度患了病，门生便将箱子呈交郗愔。其中都是与桓温来往的密信，秘密商议策划的计谋。郗愔见了勃然大怒，骂道："这小子早就该死。"

太元十一年十月，废帝海西公司马奕也在吴县去世。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桓温传》、《谢安传》、《郗超传》、《王坦之传》、《穆帝本纪》、《海西公本纪》、《简文帝本纪》、《元四王传》

《通鉴纪事本末·桓温废立》

王恭反晋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做皇帝时年仅10岁，亲政以后也有些作为，到中年便沉溺于酒色，把国事交给琅邪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是孝武帝同母兄弟，也是个嗜酒之徒，兄弟二人同其所好，日夜以饮酒歌舞为事，又好亲近老妇、女尼、笃信浮屠佛教。左右的亲信小人争弄权柄，公开行贿敛财，卖官滥刑，政治一片混乱。朝廷中有识之士都深感忧虑。

太元十四年（389），尚书令陆纳望着富丽堂皇的宫阙仰天长叹："好一座帝王宅第，就要被不肖子孙败坏了！"左卫领营将军许荣忧心忡忡，便上疏给孝武帝，指责朝中文武官员门品杂乱，贿赂公行，酒色为害，劫盗猖狂等等诸多弊政。奏疏递上去却石沉大海。中书侍郎范宁、徐邈是孝武帝信任大臣，屡次进忠言，规谏朝政得失，孝武帝也感到司马道子权势倾动中外，内外官员多半出自司马道子私门。侍中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是个谗佞小人，以谄媚司马道子得宠，王国宝扇动朝官，巴结道子，使司马道子进位丞相、扬州牧，假黄钺，赠殊礼。护军将军车胤反驳说："这是周成王尊崇周公的礼遇，如今主上当阳年壮，非成王可比，道子位居相王，岂能为周公。"车胤就是出身贫苦、囊萤读书、以寒素博学闻名的名士。范宁尤其憎恶外甥王国宝阿谀、心术不正，劝孝武帝贬黜他。王国宝闻讯，便请求司马道子的宠臣袁悦之，通过女尼支妙音传递书信给太子的母亲陈淑媛，并说"国宝忠诚谨慎，应被亲信"。此事被孝武帝知道了，十分恼怒，

以其他事为借口杀了袁悦之。王国宝为此甚是惊怕，便与道子一同进谗言诬陷范宁，范宁被排挤出朝，去做豫章太守。临行时他上疏说："现在虽无战乱，却仓库空乏，徭役繁重，民众劳困不堪，以至于有生儿不能养育，鳏夫寡妇不敢嫁娶。臣恐怕社稷之忧，厝火积薪，不足为喻也。"

太元十五年，司马道子更加骄横，恣意妄为，与孝武帝饮宴时酣醉，失礼不敬。孝武帝见他权势过大，渐渐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便想选派有时望者为藩镇，在各地带兵，拱卫朝廷，用以牵制司马道子。孝武帝询问太子右卫率王雅说："我想任用王恭、殷仲堪，你意下如何？"王雅道："王恭风骨神气简贵，性情严正。仲堪做事谨慎，以文义著称。然而二人都是偏颇狭隘，自以为是，而且才干不足，若委以方面重任，天下无事时足以守职胜任，若天下一旦有事，必定成为发生祸乱的原由。"孝武帝不纳其言。是年二月，任命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九月，以侍中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十七年十一月，又任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

殷仲堪虽有声誉，资历威望却浅，到任之后，好行施小恩小惠，军政大事反而疏略。南郡公桓玄在江陵，殷仲堪对他很是恭敬畏惮。桓玄乃是桓温之子，袭爵南郡公，桓氏两世镇守荆州，桓玄又豪横，荆州士庶民众惧怕桓玄超过殷仲堪。一次征虏参军胡藩路过江陵，拜见殷仲堪，劝说道："桓玄的志向难测，因没有职务常常怏怏不快，你崇敬优待他太过分了，恐怕将来要出乱子。"殷仲堪不以为然。胡藩便私下对内弟殷仲堪部下功曹罗企生说："殷侯倒戈授人，予人以柄，必定要有祸殃。君不早谋去就，后悔可来不及了。"

这一年孝武帝立皇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司马道子改封会稽王。

二十年三月，司马道子更加专权，嬖爱倡优赵牙及钱塘小吏茹千秋，这二人都以谄媚行贿为门路，道子任赵牙为魏郡太守，茹千秋做了骠骑谘议参军。赵牙为道子建筑东府，造土山、开水池，大兴土木，工程花费上万。孝武帝曾经到其府第，见如此奢侈，对道子说："府内有山这很好，只是修整装饰得太过于豪奢了。"孝武帝走后，道子对赵牙说："君王若是知道这山是人力造成的，你必死无疑。"赵牙毫不在意，道："有公在，赵牙怎么会死。"从此营造的规模更大。这茹千秋卖官弄权，聚敛财物几亿，博平县令闻人奭上疏揭发其罪恶，孝武帝更加戒备道子，只碍于太后极宠爱道子，不忍心废黜他。孝武帝想抑制道子势力扩张，便提拔任用亲信之人，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让他们在朝廷内外担任要职，防范道子。司马道子也拉拢王国宝，以及王国宝从弟琅邪内史王绪为心腹。于是朋党形成。孝武帝、会稽王弟兄也失去了往日友爱之欢。太后看到这情形，常常为他们和解，中书侍郎徐邈也劝解孝武帝要学习古代帝王兄弟友爱，消除议论，对外为了国家大计，对内安慰太后之心。孝武帝听从了解劝，依旧委任道子执政。

二十一年，孝武帝酒后戏言，在后宫被宠姬张贵人谋害。会稽王道子昏庸荒怠，太子司马德文又是个痴傻之人，对孝武帝之死竟不追究，白白送了命。

太子即皇帝位，是为晋安帝。司马道子进封太傅、扬州牧，假黄钺，朝廷内外一切事务都须禀告道子发落。起初，王国宝依附道子成为一党，王国宝骄恣放纵，横行不法，屡次被御史中丞褚粲纠劾。国宝曾经修建了一座斋室，仿照宫中建筑，与清暑殿一模一样，孝武帝知道了甚是憎恶，王国宝心里害怕，便讨好求媚孝武帝而疏远了道子，孝武帝宠信和昵爱王国宝使道子大怒，便在内省官署当面指责王国宝，愤怒中竟用剑掷向王国宝，旧日的情分全尽。到孝武帝驾崩，王国宝见风使舵，又来依附道子，

与王绪一起奴颜婢膝讨好道子，道子被他迷惑，把这二人当作心腹，这二王便参予掌管朝廷大权，很有势力。

王恭入朝参加孝武帝山陵葬礼，经常正色直言，道子对王恭也惧怕三分。罢朝后，王恭对其子弟叹道："榱栋虽新，便有黍离之叹。"《黍离》乃是《诗经》中的一篇，说的是西周亡后，周大夫经过宗庙宫室，遍生禾黍，彷徨不忍离去而作此诗。王恭感叹晋室江山就要丧在这般新权贵之手。王绪劝说王国宝，借王恭入朝的机会，请相王司马道子埋伏武士杀了他，王国宝不肯。道子也想内外和解，于是和王恭推心置腹，表示坦诚，指望消除旧日之怨，而王恭每当谈论时政，就正颜厉色，毫不宽容缓和。道子见王恭态度不可和谐，遂产生了图谋的心意。

有人劝王恭乘入朝带兵诛杀王国宝，王恭顾虑王国宝同党豫州刺史庾楷兵马强盛，不敢发动。王珣对王恭说道："国宝虽然早晚是祸乱，但是罪恶并没有显露，现在事先发动，必然使朝野失望，况且带兵在京师天子脚下私自发动，谁不说这是作逆呢？王国宝若不肯悔改，罪恶传闻天下，然后顺民心除他，不怕不成功。"王恭认为此言有理，便暂时作罢。

十月，孝武帝葬于隆平陵。事毕王恭将还镇，临行前对道子说："主上居丧，百官听命于冢宰，请大王亲理万机，纳直言，放郑声，远佞人。"王国宝等人闻言更加嫉恨。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左仆射王珣任尚书令，王国宝为左仆射，加封后将军。会稽王道子将东宫兵士全数拨给王国宝统领。四月，王国宝、王绪，劝道子裁减王恭、殷仲堪的兵权，削弱外地藩镇的兵力。这项措施引起朝内外汹汹不安，王恭等人各自缮甲勒兵，上表请求北伐。司马道子传诏，以盛夏出兵防害农时为由，令各地罢兵，解除戒备。

王恭见朝中奸党已下手，便遣使人前往荆州与殷仲堪商议讨伐王国宝。桓玄因为仕途不得志，想借助殷仲堪兵力自己出人头

地，便劝说仲堪，道："王国宝素来与诸君作对，惟恐置诸君于死地不快，如今执掌大权，与王绪一唱一和。王恭是天子之舅，未必敢加害他。君是先帝提拔，越居方镇重任，人们心里都以为你不是方伯之才。对方若要征召你去做中书令，任用殷觊来做荆州刺史，君如何处置？"殷仲堪道："我为此忧虑已久，用何计应付呢？"桓玄说："王恭疾恶如仇，君应当暗地与他约定，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东西方一起举兵。桓玄虽然不肖，愿率领荆楚豪杰做先锋。这可是齐桓、晋文的勋业呀。"晋阳之甲指的是战国时晋赵鞅兴晋阳甲士，以清君侧为名，逐荀寅士吉射，地方长吏不满朝廷而举兵之称。殷仲堪听罢此言认为不错，便与雍州刺史郗恢、从兄南蛮校尉殷觊、南郡相江绩商讨谋划，殷觊说："做人臣应当各守职分，朝廷的是非，岂是藩臣可以制裁的！这事不敢参与。"殷仲堪再三邀他举事，殷觊怒道："我进不敢同，退不敢异。"江绩也争辩再三认为不可，殷觊怕他遭害，便为其和解，江绩言道："大丈夫何必以死相威胁，我江仲元年已60，还没有死的好地方呢！"殷仲堪也服他坚定正直，只好任用杨佺期代替他的职务。朝廷得知后，即征召江绩为御史中丞。殷觊称服用寒食散后散发，辞官不做。仲堪去探望他，对他说："兄之病实在令人担忧。"殷觊道："我的病不过是身死，你的病却要灭门。要多保重、自爱。不必挂念我。"郗恢也不肯随他起兵，殷仲堪见诸人反对，心里犹豫不决，恰好王恭使人来到荆州，殷仲堪便应允起兵。王恭得信大喜，随后上表朝廷，声讨王国宝罪状，举兵讨伐。

当初，孝武帝倚重并信任王珣，及孝武帝暴死，王珣未能受顾命辅政，一旦失势便沉默不再参政。王恭的表文传到朝廷，京师戒严，道子问王珣："二藩造反，卿知道吗？"王珣说："朝政的得与失，王珣没有参与。王、殷的发难，怎么会知道！"王国宝十分惶惧，急忙派遣数百人戍守竹里，夜间风雨大作，戍卒

逃散一空。王绪又劝王国宝矫作相王的命令召王珣、车胤，除去有时望的大臣，挟制朝廷发兵讨伐二藩。王国宝答应后，待王珣、车胤来到，王国宝不敢动手加害，反而向王珣问计，王珣说："王、殷素来与卿并无深怨，所争的不过是权和利而已。"王国宝问："将把我当作曹爽吗?"王珣道："这是什么话！卿即便有曹爽之罪，王恭岂是宣帝那样的人?"王国宝又转向车胤问计，车胤道："如今朝廷派兵，王恭必据城固守，京口攻不下，上流荆州兵杀来，君怎么办?"王国宝极其惧怕，遂上疏请求解职，到阙下待罪。既而又后悔不该如此，诈称有诏恢复原官。司马道子昏庸懦弱，只求息事，便把罪过推给王国宝，遣骠骑谘议参军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交付给廷尉。不久，王国宝被赐死，王绪被斩于市。道子又遣使人见王恭，对过失深表谢罪。王恭遂罢兵退回京口。

殷仲堪当时虽应许了王恭，却犹豫不敢发兵东下，得知王国宝已死，才上表章举兵，遣杨佺期屯兵巴陵。道子以书信制止，殷仲堪便收兵回去了。

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年方16，却有才干，向道子说王恭、殷仲堪终究必为后患，请他早做准备。道子封元显征虏将军，将卫府和徐州的文武将吏都交他统领。

司徒左长史王廞，是开国元勋王导之孙，因为母丧居住在吴国（今江苏苏州），王恭讨王国宝时，便委任王廞行吴国内史，在东方起兵作为策应。王廞便令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进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今江苏宜兴）招募士卒，后聚兵上万。不久，王国宝等已死，王恭罢兵还镇，便令王廞去职，仍去服丧。王廞起兵之际，诛杀异己很多，仇家遍布，其势已不能中止。王廞大怒，拒不接受王恭之命，一面遣其子王泰领兵攻打王恭，一面寄书信给司马道子，揭露王恭罪恶。道子正对王恭施行姑息笼络，便将王廞的书信送给王恭。五月，王恭遣司马刘牢之率五千

人马击杀了王泰，又与王廞战于曲阿（今江苏丹阳），王廞军大败溃散，王廞单骑逃脱，虞啸父被捉，念其祖上有功，被免为庶人。

隆安二年，会稽王道子忌惮王、殷的逼迫，朝廷反而受制于外藩，便思谋对策，谯王尚之与其弟司马休之有才能，道子引为心腹，尚之建议：“现在藩镇强盛，宰相权轻，要在外地树立心腹作为藩卫。”道子便命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四郡军事，作为外援。道子日夜与司马尚之商讨，侦伺各地的动静。

七月，桓玄请求出任广州。道子素来忌桓玄，不想让他久居荆州，遂满足他的要求，任桓玄都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桓玄接受任命却不肯赴任。

豫州刺史庾楷因为道子割去豫州四郡让王愉管辖，心中不平，上疏争地，认为“江州在内地，而豫州北界胡寇，不应使王愉分去四郡削弱豫州兵力。”朝廷不准，庾楷为此大怒，遣其子庾鸿去游说王恭：“司马尚之兄弟又执掌了权力，超过王国宝，想借朝廷威力削弱方镇，鉴于前事，将有不测之祸，应及早图取。”王恭深以为然，便告知殷仲堪与桓玄，仲堪、桓玄应许起兵并推举王恭为盟主，议定日期一同向京师进发。当时朝廷内外相互怀疑，尖锐对立，关津要隘盘查很严，殷仲堪用斜绢书写书信，纳入箭杆中，插上箭头用漆漆了，通过庾楷送达王恭。王恭展开绢书，折皱变形，分辨不出是否殷仲堪亲笔，怀疑是庾楷假造的；而且他认为去年殷仲堪就违约，不肯如期发兵，这次必然按兵不动。于是便先期独自起兵。司马刘牢之劝谏说：“将军乃是天子之舅，会稽王是天子叔父，都是国家的亲戚重臣，会稽王当国秉政，前者为将军杀戮了宠爱的王国宝、王绪，又送来王廞书信，已经对将军低头认错了。不久前对王愉的任命，虽然不算恰当，也不是大过失。割去庾楷四郡给王愉，对将军有何损害？

晋阳之甲，怎么可以屡次发动呢?”王恭不听，上表朝廷请求讨伐王愉、司马尚之兄弟。

司马道子闻讯，先使人游说庾楷：“昔年我与卿情同骨肉，卿如今弃旧交，结新援，忘记了王恭以前凌侮的耻辱了吗？若委身依附他，使王恭得志，必认为卿是反复无常的人，怎么会信任亲近你。身首难保，何况富贵!”庾楷怒道：“王恭昔年赴山陵，相王又忧又怕，无计可施，我得知情况紧急，即刻率兵支援，王恭才不敢发作。去年的事变，我也是整军待命。我奉事相王没有相负之处。相王不能抵抗王恭，反杀了王国宝与王绪，自此之后，谁敢再为相王尽力？庾楷决不能让家人百口给人屠杀。”此刻庾楷已响应王恭檄文，正在征调兵马。消息传到朝廷，引起震惊，京师内外戒严。

司马元显向其父道子言道：“以前不讨伐王恭，故而有今日之难，今天若要再从其所欲，您的祸事可就不远了。”道子不知该如何是好，便将事权委任给元显，只管饮酒去了。司马元显聪明机警，临事果断，吹捧他的人都说他有明帝的遗风。

殷仲堪得知王恭举兵，自以为去年延误了日期，便急忙整顿兵马催促进发。仲堪素来不懂军事，便把军务全部委任南郡相杨佺期兄弟。杨佺期率领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率军随后，仲堪亲自领兵二万相继出发。杨佺期也是北方人士，因为渡江南来较晚，婚宦失类，被士族看不起，一直受排挤，也想借事变以施展抱负。八月，杨佺期、桓玄突然兵到湓口（今江西九江西）。

王愉没有戒备，慌忙逃奔临川，桓玄派偏将追获了王愉。

九月辛卯（初二)，司马元显出任征讨都督，节制各军，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领兵征讨王恭，谯王司马尚之领兵征讨庾楷。己亥（初十)，司马尚之在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大破庾楷军，庾楷单马逃奔桓玄。司马道子发布任命，任司马尚之为豫州刺史，其弟司马恢之为骠骑司马、丹杨尹，司马允之为吴国内

史，司马休之为襄城太守。乙巳（十六日），桓玄在白石（今安徽含山西南）杀败朝廷兵马，与杨佺期一同进兵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司马尚之退走，司马恢之所领水军覆没。丙午（十七日），道子屯兵中堂，元显守石头；己酉（二十日），王珣防守建康北郊，谢琰屯兵宣阳门，防卫京师。王恭平素凭藉才情、地望，傲视一切，自高自大，在杀了王国宝之后，更是威风八面，神气十足。依仗着北府兵名将刘牢之为爪牙，却只把他看作帐下效力的部将看待，刘牢之自负有将才，对此深感耻辱，怀恨在心。司马元显得悉此情，便遣庐江太守高素潜往京口，游说刘牢之背叛王恭，许他在事成之后，即把王恭的官位名号授给他。随身带去司马道子给刘牢之的亲笔信，陈明祸福形势，劝降刘牢之归顺朝廷。刘牢之对其子刘敬宣道："王恭昔年受先帝大恩，现在是帝舅，却不能辅佐拥戴王室，屡次向京师举兵。吾不敢断定王恭的志向，大事成功之日，还能屈在天子、相王之下吗？吾想投归朝廷，以顺讨逆，如何？"刘敬宣答道："朝廷虽然没有成王、康王的德政，也不至于有幽王、厉王的罪恶。王恭依持兵强，蔑视朝廷。大人与他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然共事不长，却情意友好，如今讨伐他，有亏于情义。"刘牢之不以为然。此事被参军何澹之知道了，便告知王恭。何澹之与刘牢之一向有仇怨，王恭因此不信。王恭置酒设宴，宴请刘牢之，当着佐吏宾客众人，拜刘牢之为兄，将京口的精兵坚甲，全部交付给刘牢之调遣。王恭本意以心换心，表示用人不疑，坦诚相待，谁知却把刀柄交给了被重利收买的叛将手中。王恭命帐下督颜延为前锋，随刘牢之出兵。刘牢之率军走到竹里，斩了颜延投降朝廷。刘牢之遣其子刘敬宣、其婿东莞太守高雅之回军袭击王恭。王恭本不是行兵布阵、临敌交锋之才，刚刚督率人马出城炫耀兵威，被刘敬宣纵骑兵横击，冲杀过来，王恭兵马被冲乱，溃不成军，王恭急忙回城，高雅之已经占据城池，关闭城门，王恭进城不得，策

马单骑逃奔曲阿。王恭不惯乘马，髀肉磨破，坐不住雕鞍，曲阿人殷确，是王恭旧部下，便用船载着王恭准备去投桓玄。走到长塘湖（今溧阳北洮湖），遇到商人钱强，钱强与殷确有私仇，便向湖浦尉告发了他们。湖浦尉得信便带人捉住王恭、殷确，押送京师。

马司道子闻知捉到王恭，即将押到，便想当面斥责王恭。这时，桓玄等已经率兵到石头，威胁京师，司马道子怕再生变故，便在建康的倪塘斩了王恭。王恭信奉佛教，临刑时还在念诵佛经，自己梳理须鬓，神态自若，毫不惧怕，他总结失败教训，对监刑官说："我暗于信人，以至如此下场。推原我的本心，岂是不忠于社稷！但愿后人知道我王恭。"王恭五个儿子及其弟王爽、侄王和以及亲信孟璞、张恪等都被杀害。

王恭早年从会稽归来，王忱去看望他，见他坐一竹簟，便向他索要，王恭便把所坐的竹簟送给王忱，自己坐在草荐上，并没有多余之物，"身无长物"的美谈盛传一时。王恭死后，果然家无财帛，唯有许多书籍而已。

图灭了王恭，刘牢之便做了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代替了王恭。

杨佺期、桓玄屯兵石头，殷仲堪到达芜湖（今安徽芜湖），司马元显从竹里驰回京师，发动京师士民数万人防守石头。杨、桓等人上表朝廷替王恭辩冤，要求诛杀刘牢之。刘牢之率北府兵劲旅赶到京师，驻军新亭（今江苏南京南）军容强大，杨佺期、桓玄见了为之失色，遂退兵蔡洲（今南京西南江中）。

左卫将军桓修向道子献计，以重利诱杨佺期、桓玄罢兵，于是道子任桓玄为江州刺史，召郗恢为尚书，以杨佺期代郗恢为雍州刺史，桓修任荆州刺史，贬殷仲堪去任广州刺史。

十月，殷仲堪得诏书，大怒，不肯罢兵，桓玄等利用殷仲堪的兵马，不得不附和仲堪，便在寻阳结盟，一齐表示不受诏书，

联名上疏为王恭申诉，要求杀刘牢之、司马尚之；并申述殷仲堪无罪，为什么独被降黜。朝廷深怕刀兵再起，便罢免桓修，把荆州还给殷仲堪，下诏好言安慰，以求和解。殷仲堪等接受诏书后各还本镇。

王恭刚刚在湖浦被捕时，遇到湖孰令戴耆之，他是王恭旧时故吏，王恭求告说："我有一庶子未成人，在乳母家，卿代我送去寄养在桓南郡处。"戴耆之遂送王恭庶子到夏口，桓玄抚养他长大。等到桓玄讨伐司马道子父子，入朝掌握了朝政，上表为王恭申诉，朝廷下诏赠王恭为侍中、太保，谥为忠简。王爽封赠太常，王和及儿子王简都是通直散骑郎，殷确为散骑侍郎，并下令腰斩了湖浦尉及钱强。王恭的庶子昙亨，在义熙年间任给事中，保存了王恭的一线血脉。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王恭传》、《桓玄传》、《司马道子传》

《通鉴纪事本末·伪楚之乱》

桓玄建楚

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是大司马桓温的庶子，桓温死后桓玄承袭爵位南郡公。因为当时舆论说桓温有不臣之迹，要篡夺晋朝天下，所以在仕途上桓玄受压抑，很不得志，23岁才封作太子洗马。一次桓玄去见司马道子，正值道子酣饮大醉，见到桓玄便瞪着眼睛对众宾客说："桓温晚年想做逆贼，是吗？"桓玄惊恐得失魂落魄，伏在地上冷汗直流。从此桓玄越发不安，对道子切齿痛恨。太元末年，桓玄出任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曾无事闲游，登高遥望震泽（今江苏荻塘河），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不久弃官不做，回到荆楚。

荆州刺史殷仲堪对他又敬又怕，桓氏在荆楚多年，桓玄雄壮豪迈，早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司马道子当权，宠信王国宝，政治败坏，王恭谋划起兵讨伐王国宝，桓玄极力怂恿殷仲堪响应。隆安二年（398），司马道子诛杀王国宝，平息事变后，桓玄便请求出任广州刺史，司马道子也不愿他久在荆楚之地，便允其所请。桓玄接受任命却不起程赴任。这一年，王恭又与庾楷起兵讨伐江州刺史王愉和谯王司马尚之兄弟，殷仲堪以为王恭起兵必能成功，便拨给桓玄五千兵马，与杨佺期为前锋。自己率兵随后出发。兵到湓口（今江西九江西），王愉逃奔临川被桓玄军捉获。桓玄进兵石头，这时王恭部将刘牢之背叛王恭归降朝廷，王恭被杀，庾楷战败，投奔桓玄军中。不久朝廷和解罢兵，下诏以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贬黜殷仲堪

去任广州刺史。自然殷仲堪不肯善罢甘休，殷仲堪依仗桓玄等人帮助，桓玄等人又需仰仗殷仲堪的兵马，不能不联合，便在寻阳结盟，推桓玄为盟主，拒不接受朝廷的任命。于是朝廷将荆州还给殷仲堪，下诏好言和解，平息事变。桓玄得了江州，又被推做盟主，更加骄横。这杨佺期为人也骄横自大，他乃是汉代名臣杨震之后，因为过江晚，婚宦失类，遭人歧视，桓玄也常把他当作寒士对待。杨佺期对此十分恼恨，便秘密劝说殷仲堪，在结盟坛所袭杀桓玄，除去后患。殷仲堪忌杨佺期兄弟勇健，恐怕杀了桓玄之后，再不能控制杨佺期，所以便坚决制止，于是，各还本州。桓玄知道了杨佺期的阴谋，心中便存下吞并杨佺期的念头。桓玄屯兵夏口（今湖北武汉附近），请来始安太守卞范之任长史，作为谋主，朝廷的诏中唯独不赦免庾楷，桓玄便委任庾楷为武昌太守。

隆安三年四月，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任扬州刺史，以庐江太守张法顺为谋主。十二月，殷仲堪恐怕桓玄跋扈难制，便和杨佺期结亲，相互援助。杨佺期屡次要攻灭桓玄，都被殷仲堪止住。桓玄形势孤立，力量薄弱，担心终究被殷、杨所灭，便请求朝廷增加辖地范围。司马道子父子也想离间殷、杨、桓之关系，增其怨恨，下诏将杨佺期督管的四郡给桓玄，又任桓玄之兄桓伟代替杨佺期之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果然十分恼怒，杨广准备抗拒桓伟，不肯受代。殷仲堪不准，委任杨广出任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杨佺期之弟杨孜敬先时任江夏相，桓玄袭取江夏并召杨孜敬为谘议参军。

适逢后秦姚兴侵犯洛阳，杨佺期整顿兵马声称援救洛阳，想与殷仲堪一同袭攻桓玄，殷仲堪虽然表面上结好杨佺期，而内怀疑虑之心，便劝止杨佺期出兵，担心仍不能禁止，又遣从弟殷遹屯兵北部边境遏制杨佺期。杨佺期既不能独自出兵，又难测殷仲堪用心，只好罢兵。

殷仲堪缺乏谋略，多疑少决，谘议参军罗企生对其弟遵生说："殷侯仁而无断，最终必定遭难，我蒙受知遇之恩，论义气又不能走，将来必死。"

桓玄也做军事试探，声称援救洛阳，准备率军西征，先寄书给殷仲堪说："佺期受国恩而放弃山陵，是天下罪人。我今亲率大军直向金墉。"并要求殷仲堪收捕杨广。殷仲堪想双方保全，免动干戈，便回书："君自沔水进兵，不得令一人过江。"桓玄只好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这一年荆州大水泛滥，平地水深三丈，殷仲堪赈救饥民，仓库空竭。桓玄见是良机，便乘人之危兴兵。这时巴陵（今湖南岳阳）有积谷，桓玄先派兵袭取了巴陵。梁州刺史郭铨上任路经夏口，桓玄诈称朝廷之命派郭铨做自己的前锋，授给他江夏兵马，使郭铨督率各路军进兵攻殷仲堪。同时密报其兄桓伟作为内应。桓伟接到密信，惶遽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便带着密信去见殷仲堪商量，殷仲堪遂扣押桓伟作人质，令桓伟写信给桓玄。桓玄见信后说道："仲堪为人没有决断，总是疑虑成败得失，为儿子担忧。我兄必然安然无恙。"

殷仲堪命殷遹领水军七千到西江口，被桓玄部将郭铨、苻宏击败，桓玄屯兵巴陵，粮草不缺。仲堪又遣杨广及侄道护领兵出击，也被桓玄杀败，桓玄乘势进兵零口（今湖北沙市东）离江陵只二十里。殷仲堪急召杨佺期援救，杨佺期说："江陵无食，何以对敌，可来共守襄阳（今湖北襄樊）。"殷仲堪要保全境土，不肯弃州退走，便谎称"近来收集粮食，已有储备。"杨佺期领八千人马来到江陵，殷仲堪只能用饭充军饷，杨佺期见状大怒，并不和殷仲堪会面，便与其兄杨广率兵向桓玄进攻。桓玄见杨佺期人马锐气正盛，下令退往马头（江陵江边）。次日，杨佺期率军急攻郭铨，杀得郭铨人马四散，郭铨几乎被擒。此时桓玄援兵赶到，杨佺期部下战斗多时已经人困马乏，遂被杀得大败，杨佺期

独自逃回襄阳。殷仲堪见大势已去，遂出奔酂城（今湖北光化北）。桓玄令部将冯该追击杨佺期与杨广，二人都被追获遭杀害。杨佺期之弟思平，从弟尚保、孜敬逃入蛮族聚居地区。殷仲堪闻知杨佺期已死，带领数百人要逃往长安，投靠后秦姚兴，行至冠军城（今河南邓县西北）被冯该追获，返回途中走到柞溪（今湖北江陵北），殷仲堪被逼迫自杀。

桓玄兼并了荆、雍二州，上表朝廷请求二州之地，四年三月，下诏以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中护军桓修为江州刺史。桓玄继续上疏要江州，朝廷正忙于全力镇压孙恩之乱，不敢违背其意，于是诏桓玄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又领江州刺史。桓玄便把雍州刺史交给其兄桓伟，朝廷无可奈何。桓玄的权势，这时足以和其父桓温彼时相埒，不久遂有篡夺晋室之谋。

桓玄树立心腹，招兵聚粮，兵力渐强，屡次上疏要去讨伐孙恩，带兵东下，朝廷畏其别有用心，请神易送神难，不准桓玄所请。其后孙恩军逼近京师，桓玄以勤王为名，调兵遣将准备出军，再次上疏朝廷。适逢孙恩被击退，桓玄只得奉诏解严。五年十二月，桓玄上表请委任桓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镇襄阳，派大将皇甫敷、冯该戍守湓口，迁移沮、漳（今湖北保康、荆山一带）少数民族二千户到江南，建立武宁郡（今湖北荆门北）。招集流民建立绥安郡（今湖北荆门西北）。朝廷征召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桓玄都留而不放。

桓玄自以为已经占有了晋国的三分之二，雄据长江上流，欲望膨胀，多次使人为自己上符瑞，愚弄舆论，谎言欺众。又致笺给司马道子："孙恩贼军逼近京师近郊，因风不能前进，因雨不能升火，因粮尽所以退去，并非战败力屈。昔日王国宝死后，王恭不能乘此威势入朝执政，足见其心并非怨恨于明公，却说他不忠。现在朝中的权贵大臣，有谁具有清流时望足以称道呢？不能

说没有贤者，只是不信任他罢了。以往的一朝一夕，积成了今天的祸乱。在朝诸君，都畏祸不敢说话，桓玄在远方任职，所以才披露这些事实。”公然指责司马道子执政以来昏庸。司马元显见了，极为担惊，张法顺对元显说：“桓玄凭藉家世资望，又为人雄豪，在他吞并了殷、杨，统辖了荆楚之后，阁下控制的地盘只有三吴之地了。孙恩作乱东方，三吴又被蹂躏，朝廷与地方凋敝空虚，桓玄必然乘机以逞野心，我深感担忧。”元显问：“那怎么办呢?”张法顺献策：“桓玄才得荆州，人心未附，顾不上别的图谋，不如乘此时机使刘牢之为前锋，阁下率大军随后，攻取桓玄。”元显点头称是。适逢武昌太守庾楷想结好元显，有密使到来，表示若征讨桓玄，愿作内应。元显大喜，派张法顺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与刘牢之商议。刘牢之面露难色，怕事情难成功。张法顺回去建议元显，刘牢之有贰心，不如召入朝中杀掉，否则要败坏大事。元显不听，于是传令整建水军，修造船舰。

元兴元年（402）正月，下诏公布桓玄罪状，以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谯王司马尚之为后部，领兵讨伐桓玄。

司马元显想杀尽诸桓氏，中护军桓修是骠骑长史王诞的外甥，王诞很受元显宠信，反复解释桓修等人与桓玄志向心意全不同，并非桓玄一党，元显只好作罢。张法顺向元显献计：“桓谦兄弟常作上流的耳目，应当除奸，杜绝为害。而且事之成败，系于前军，刘牢之反复无常，万一有变，祸败立见分晓。可命令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表示他没有贰心，如果不肯接受命令，就要早谋对策。”元显道：“现在除了刘牢之，无人可敌桓玄。大事方开始便诛杀大将，军心不稳。”执意不听张法顺建议。

东方三吴地区遭受孙恩之乱，造成饥荒，漕运物资接济不上，桓玄又截断了水运，禁止江上运输，商旅也断绝了，京畿地区粮食物品匮乏。桓玄原认为朝廷忧患正多，未必有余力征讨自

已，正可以养兵等待时机；及朝廷大军即将出动，桓玄接到从兄太傅长史桓石生的密报，才大吃一惊，便想聚兵修城保卫江陵。长史卞范之谏道："明公英雄，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大失人心，若出兵攻打京师，朝廷兵马土崩瓦解指日可待，怎么可以等敌军入境，自己坐困呢？"桓玄听从此言，留桓伟守江陵，上表章传布檄文，公布司马元显罪状，发兵东下。檄文传到京师，元显惊慌不已。二月，安帝在西池为司马元显出征饯行。元显登船后却停而不发，不敢启航前行。

桓玄率兵从江陵出发，心中总是顾虑重重，常怕大事难成，一路上盘算退兵西还的计划。大军过了寻阳（今江西九江西）还不见官军踪迹，桓玄大喜，将士们士气也振作起来。庾楷的密谋败露，被桓玄囚禁起来。

司马元显胆怯，不敢与桓玄交锋，便使朝廷下诏，遣齐王司马柔之持驺虞幡，命令荆、江州罢兵，司马柔之才遇到桓玄前锋将士便被杀了。桓玄到达姑孰（今安徽当涂），令大将冯该攻打历阳（今安徽和县），襄城太守司马休之闭城坚守。桓玄军截断洞浦，焚毁了豫州的船舰，豫州刺史司马尚之率领步兵九千在浦上列阵，遣武都太守杨秋驻守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杨秋投降了桓玄，司马尚之部队溃散，尚之逃到涂中（今安徽滁县），被桓玄军捉获。司马休之交战失败，弃城逃走。

刘牢之一向憎恶司马元显，担心桓玄灭亡了，元显益发骄横专权。同时刘牢之忧虑自己功业名声越盛，不为元显所容。他思量以自己的才干武略，兵强将勇，借桓玄除去执政大臣，再寻找机会击灭桓玄，故此不肯出兵与桓玄交战，驻守在溧洲（今采石北江中）。参军刘裕请求出击桓玄，刘牢之不准。桓玄使刘牢之族舅何穆劝说牢之道："自古以来，有震主之威、不赏之功而能够保全自己的，有谁？越国文种、秦国白起、汉朝韩信，都为明主称臣尽力，功劳成就之日，还不免被杀，何况被凶愚之人任用

呢？君如今无论战胜还是战败，都难免灭族之祸。不如翻然改图，长保富贵。古人射钩斩祛，尚能原谅，何况桓玄与君并无仇怨呢？”刘牢之很动心，派人与桓玄联络。刘牢之外甥何无忌与刘裕苦苦谏阻，刘牢之不听。其子刘敬宣又谏劝说道：“国家已经衰微，天下的重任落在大人与桓玄身上。桓玄凭藉父桓温、叔桓冲的威望功勋，占有荆楚全境，割据晋国的三分之二。一旦放纵他雄心得逞，欺凌朝廷，那时候桓温威势已经形成，恐怕就难对付了。汉末董卓之乱，将要重现。”刘牢之怒道：“我岂是不知，今日取桓玄易如反掌，但是平了桓玄之后，叫我奈何骠骑元显？”

三月，刘牢之命刘敬宣去见桓玄，请求投降。桓玄私心要除掉刘牢之。表面却与刘敬宣表示亲近，召敬宣饮宴欢聚，又陈列书籍名画请敬宣一同观赏，安抚并取悦刘敬宣。刘敬宣受其蒙蔽并不知觉，桓玄部下将佐莫不相视而笑。桓玄又委任刘敬宣为谘议参军。

司马元显将要发兵，闻知桓玄已到达新亭（今江苏南京南），急忙弃船退守国子学。辛未（初三日），司马元显领兵在宣阳门外列阵，准备迎战，自己军中却已惊乱，传说桓玄人马已到南桁(秦淮河桥)，元显见军队不战自乱，便不敢应敌，想带兵还宫，桓玄先已派人随在溃退朝廷人马之后，此刻拔刀高声呼喊：“放下武器!”官军乱作一团，顿时崩溃。元显骑马逃回东府，只有张法顺一人跟随在后。元显向其父道子问计，道子唯有哭泣而已。桓玄遂克建康，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收捕元显送到新亭，把他缚在船头数说其罪恶，元显分辩说：“都是被王诞，张法顺所误。”

壬申（初四日），桓玄命恢复隆安年号。安帝使侍中前往乐安渚慰劳桓玄。桓玄进人京师，声称奉诏解严。朝廷下诏以桓玄总领百官，执掌朝政，加封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

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桓玄又任桓伟为荆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仆射，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杨尹，大封桓氏及功臣。当初桓玄起兵时，王导之孙侍中王谧奉诏去见桓玄，桓玄对他亲热优礼，很有好感，便封王谧为中书令。新安太守殷仲文乃是桓玄姐丈，行知桓玄攻克京师，便弃郡来投奔桓玄，任为谘议参军。刘迈在荆州曾得罪桓玄，这时也前去谒见桓玄，桓玄问："你不怕死，还敢来呀！"刘迈答道："射钩斩袪，与刘迈之事正好三件。"桓玄沽名钓誉，见他把自己比作古代贤主，很高兴，也委任为参军。又下令大赦，改年号为大亨。

癸酉（初五日），有司官员奏："会稽王道子贪酒放纵不孝，该当弃市。"桓玄表示宽大，使朝廷降诏迁司马道子到安成郡（今江西安福），在建康市斩了司马元显、东海王彦璋、谯王尚之、庾楷、张法顺、毛泰等人，桓修替王诞苦苦求情，免死流放岭南。

随后桓玄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果然大怒，言道："才开始便夺我兵权！"刘敬宣请求回去劝谕刘牢之接受任命，桓玄应许。刘敬宣见到其父，便劝他袭攻桓玄，刘牢之犹疑不决，遂移兵屯扎班渎（今南京北）。刘牢之私下问爱将刘裕："如今我想北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依就高雅之，再举兵匡复社稷，卿能随我去吗？"刘裕道："将军拥有精兵数万，却望风投降。桓玄新近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心您全都失去了，岂能到得了广陵？刘裕要回京口服丧去了。"何无忌暗地询问刘裕："我将如何行事？"刘裕道："我看刘将军必不能免祸，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若守臣节，我与你共为桓玄效力，不然的话，你我同心除掉他。"

刘牢之召集部下将佐，商议割据江北讨伐桓玄，参军刘袭说道："不可为的事情莫大于造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元显），如今又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

说罢扬长而去。将佐属吏纷纷随之走散。刘牢之甚是惊慌，命刘敬宣到京口迎接家眷，到日期不见归来，刘牢之以为事情已经泄露，被桓玄杀害了，便率领部曲亲兵向北逃走，行至新洲，刘牢之深感绝望，自缢而死。刘敬宣赶来，其父已死，他来不及哭奠，即渡江逃奔广陵。牢之部下将吏殡殓了刘牢之，将灵柩运回丹徒。桓玄得知刘牢之已死，命人砸毁棺木，斩下首级，暴尸于市。

桓玄辞让丞相和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总摄百官。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都逃往洛阳，向后秦求救。

四月，桓玄辞去录尚书事，出居姑孰，朝廷重大事务都来向他请示，小事则由尚书令桓谦与卞范之处理决定。自隆安年间以来，政治败坏，刀兵四起，民众厌恶战乱，渴望安定。桓玄初到京师，黜退奸佞，选拔贤俊，很受拥护，京师士民欢欣，冀求得到安稳的生活。不久，桓玄奢侈豪横的本性复发，使朝廷政令无常，朝官中朋党互起。桓玄权势极大，凌侮朝廷，裁减皇宫的乘舆用具和贡品，连皇帝也不免饥寒，渐渐人心失望。三吴地区饥荒严重，户口减少过半，会稽郡十去三四，临海、永嘉等地居民死、走一空，富室豪门都身穿绫罗，怀抱金玉，闭门守着钱财饿死。桓玄命赈济会稽灾民，这时百姓们分散在山林江湖采集野物求生，内史王愉派人将百姓招集回来，来既不多，又不按时发放，道路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八月，桓玄又使朝廷加封，因平元显之功封豫章公，因平殷、杨之功封桂阳公，加上本封南郡。其后，桓玄把豫章封给儿子桓升，桂阳封给侄子桓俊。

十月，桓玄大肆诛杀北府兵旧部将领，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与弟季武，都遭到杀害。刘袭之兄冀州刺史刘轨忿桓玄倒行逆施，便邀北来的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

等人，一起攻占山阳（今江苏淮安），想起兵攻桓玄，事未成功，只得出奔逃走，将军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都前来跟从，准备出奔北魏，走到陈留以后，中途分手，刘轨、司马休之、刘敬宣出奔南燕，袁虔之等出奔后秦。

十二月，桓玄使御史杜林到安成去看守会稽王司马道子，杜林来到安成后，便秉承桓玄之意，用毒鸩死道子。死时年方 39 岁。

元兴二年二月，桓玄被封为大将军。并又杀了冀州刺史孙无终。桓玄上表要统帅各军扫平关、洛，收复中原，随后又讽令朝廷下诏阻止，于是声称“奉诏而止”。桓玄开始令人装饰修造物品，先命人造轻便船只，装载珍玩书画等物。人们不解其故，桓玄说：“服玩书画应该常在身边，因为兵凶战危，胜败难料，倘有意外，也应该让它轻而易运。”闻者无不暗笑。

八月，桓伟死去，命桓修代任荆州刺史，从事中郎曹靖之劝说桓玄：“桓谦、桓修兄弟一内一外掌权，权势太重。”桓玄遂命桓石康为荆州刺史。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骑常侍卞范之劝桓玄及早受禅，并私下撰写了九锡文及册命。桓玄自然首肯，随即改授了朝臣官职，以桓谦为侍中，王谧为中书监，桓胤为中书令，加封桓修抚军大将军。册命桓玄为相国，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

新野人庾仄，是殷仲堪一党，荆州刺史桓伟已死，新刺史桓石康未到，庾仄起兵袭取了襄阳，赶走了雍州刺史冯该。很快庾仄部下发展到七千人，扬言“征讨桓玄”。桓石康赶到荆州，发兵攻打襄阳，庾仄战败，逃往后秦。

十月，桓玄上表要求归藩，又使安帝写诏挽留他，指使人诈称钱塘临平湖开，江州甘露降，让百官庆贺符瑞。他想前世都有隐士，现在没有是个耻辱，寻找到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命人供给他物资用品，让他到山林中去隐居，然后让

朝廷召他做著作郎，叫皇甫希之坚辞不就，由朝廷下诏旌表，号称“高士”。这套把戏岂能欺骗民众，人们都叫他“充隐”，是个被利用的冒牌货。桓玄又要废除钱币使用谷帛，又想恢复肉刑，没有既定政策，时常变更回改，最终什么也没能实行。桓玄又卑鄙贪婪，士人有好书法绘画或美丽宅园，一定要逼人赌博赢到手，尤其喜爱珠玉，一刻也不肯离手。

十一月，朝廷降诏楚王桓玄行天子礼乐，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不久，卞范之写好禅让诏书，使临川王司马宝逼迫安帝书写。之后，兼太保、领司徒王谧奉皇帝玺绶禅位给楚。安帝迁出皇宫，居住到永安宫。随即把晋朝列帝在太庙的神主都迁到琅邪国。何皇后与琅邪王司马德文一同迁居司徒府。位置都已经腾出，只待桓玄来填补，于是百官都到姑孰劝进。

十二月庚寅朔日（初一），桓玄在九井山北筑坛，祭告上天。壬辰（初三日），即皇帝位。即位的册文中许多内容菲薄晋室，指斥晋朝，有人提出异议，桓玄道：“谦逊礼让的文字，只可以公示小民，怎么可以欺哄上帝呢！”桓玄下令天下大赦，国号为楚，改年号为永始。起初准备改年号为建始，右丞王攸之说，建始是西晋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的伪号，遂又改永始。桓玄把南康的平固县（今江西赣县东）封给安帝，称为平固王。司马氏诸王都降封为公、侯。其后又迁移安帝到寻阳。命人将桓温的神主摆进太庙，立其妻刘氏为皇后。至此，桓玄篡夺了司马氏晋朝政权，建立楚国。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桓玄传》、《刘牢之传》

《通鉴纪事本末·伪楚之乱》

刘裕灭桓玄

桓玄兼并了殷仲堪、杨佺期之后，带兵讨伐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兵进建康，逼迫晋安帝退位，禅让了江山，桓玄称皇帝，建立了楚国。桓玄登基之后，心里常常不安。元兴三年（即桓玄楚永始二年）二月，已丑朔日（初一）夜间，江潮澎湃，涛水涌人石头，冲淹民居，死伤人无数，水声与人的惊叫哭喊之声震天，喧哗鼎沸。桓玄听了不禁心惊，以为是有人造反。

桓玄穷奢极欲，宴会上设伎乐，造了金根车、大辇，可容三十人乘坐，用二百人扛抬。又喜欢游猎，有时候一天几次出宫，桓玄身躯肥大，乘马不便，造了徘徊舆，安装上转动机械，舆车可以回旋。为了修缮宫室，桓玄迁居到东宫，尔后大兴土木，严厉督工赶造，劳民伤财。他好行小恩小惠，亲自到听讼观审理囚徒，不管罪行轻重，许多罪犯都被免罪释放。甚至有阻拦皇帝的车驾乞讨的，也可以得到赏赐。然而他处理政务的才干却有限，不注重纪纲轨范的治理，却留心小事，各地奏报文书积压了许多，而往往纠缠一些细务，或亲手点一名值日官，或亲自选拔一个令史，以至于诏令圣旨纷纭，各部官员应接不暇。桓玄又好自作聪明，有关官员奏事时，一字不规范，言词有谬误，被他发现便受惩罚。尚书回奏诏书时误把“春蒐”写成“春菟”，从左丞王纳之以下，凡关涉到的官员，都被降职贬黜。因为桓玄性急暴躁，传呼召见时都必须速到速答，当值的官员都把马系在各省官署门前，时刻做好准备，禁城内人喧马嘶，嘈杂混乱，没有朝廷

的秩序和体统。治下的百姓叫苦连天，对新朝怨恨愤怒，想作乱的人十有八九。

老将益州刺史毛璩，曾与桓玄的父辈共事，桓玄遣使加封毛璩散骑常侍、左将军。毛璩拒不受命，扣押了桓玄派来的使者。桓玄任命桓希为梁州刺史，王异驻守涪城（今四川三台西北），郭法守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师寂守巴郡（今四川重庆），周道子守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防备毛璩。毛璩向四方发布檄文，列桓玄罪状，派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领兵击败桓希各军，然后率军进驻白帝城。

桓玄任命桓弘为青州刺史，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刁逵为豫州刺史，镇守历阳（今安徽和县）。桓弘因为公事遣青州主簿孟昶到建康。桓玄见到孟昶很赏识其才干，对刘迈说“寒士中得一尚书郎，卿与他同乡，一定相识吧?”刘迈素与孟昶关系不好，答道：“臣在京口，没听说孟昶有过人之能，只听说他父子常常互相写文赠诗而已。”桓玄大笑，想任用孟昶做尚书郎的事也就作罢。孟昶知道后怨恨不已，回转京口与刘裕相见，刘裕对孟昶言道：“草野间将有英雄奋起，卿一些不知吗?”孟昶说：“今日英雄有谁？必然就是你了。”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刘裕之弟刘道规、魏咏之、檀凭之、诸葛长民、河内太守辛扈兴、振威将军童厚之等人，相与合谋起兵，要推翻楚国，讨伐桓玄。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从小家境清贫，少有大志。在刘牢之部下任北府兵将领，在镇压孙恩之战中屡建战功，素以勇敢善战著称。桓玄入建康执政时，曾派刘裕东征卢循，击败了五斗米道徒众。那时何无忌便劝刘裕在会稽起义，刘裕认为桓玄尚未篡位，而且会稽距京师遥远，难以成功；待桓玄篡逆之心显露，在京口举事为好。刘裕借口创伤发作，与何无忌回转京口，暗中联络志士共举大事。

当时青州刺史桓弘镇守广陵，刘道规任中兵参军，孟昶任州主簿，刘裕便令刘毅会合刘道规与孟昶，在江北聚众，杀桓弘袭取广陵。诸葛长民时任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便使诸葛长民杀刁逵占据历阳。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都在建康，使他们聚众攻桓玄，作为内应，约定日期一起发动。

孟昶之妻周氏很有财富。孟昶回家对妻子说明心意道："刘迈在桓公面前毁谤我，使我一生不能出头，我决定要做贼了。望卿许我尽早离婚，日后若得富贵，再相迎不晚。"周氏道："君有父母在堂，想做这等不寻常的事业，妇人怎么能劝阻。事不成功，我也要在服罪中奉养公婆，决无离别之意。"孟昶悲怆不已，起身而去。周氏追到堂前夫妻对坐，周氏说："观君的举动，并非只是与我商量，莫不是想用财物？"指着怀中婴儿道"若此儿可卖，也不怜惜。"遂倾尽财物交给孟昶。孟昶弟孟顗的妻子，是周氏的从妹，周氏骗她说："昨夜之梦非常不祥，家中绛色之物应当全拿出去厌胜。"孟顗妻信以为真，遂将绛色织物全部缝做了军服。

何无忌在深夜躲在屏风后面起草檄文，其母是刘牢之姐姐，见他举动诡秘，便登在凳上偷看，哭泣道："我不及东海吕母。你能这样，我又有什么恨事！"询问何无忌一起同谋之人，何无忌说有刘裕，其母尤喜，劝慰儿子举事必能成功，桓玄必败。

这天，刘裕假托游猎，与何无忌集合义士，同谋者何无忌、魏咏之，其弟魏欣之、魏顺之、檀凭之，其从子檀韶、檀祗、檀隆、檀道济、檀范之，刘裕弟刘道怜、刘毅，其从弟刘藩、孟昶，其族弟孟怀玉、向弥、管义之、周安穆、刘蔚，其从弟刘珪之、臧熹，其从弟臧宝符、从子臧穆生、童茂宗、周道民、田演、范清等二十七人，愿跟随起义者百余人。次日一早，京口城门开放，何无忌身穿传达朝廷诏命的服饰，诈作朝廷使者，居前而入，义兵随后一齐入城，齐声呐喊，守卫吏士都被惊散，不

敢抵抗，遂即斩了桓修。桓修部下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赶来，刘裕登城向他们说道："郭江州（郭昶之）已奉安帝车驾在寻阳反正，我等受密诏诛除逆党，现在贼桓玄的头已被割下，难道诸君不是大晋的臣子吗？"刁弘等相信了这番话，遂收兵退走。刘裕等袭取了京口，急需一位主簿掌管事务，何无忌遂举荐刘穆之，刘穆之欣然受命。

却说孟昶，这一天劝桓弘出城打猎，天尚未明，城门开放让打猎者出城，孟昶、刘道规、刘毅率领壮士五六十人一拥而入。桓弘正用早饭，毫无防备，被孟昶等人斩了首级。义兵随后过江。刘毅等来到京口，又诛杀了刁弘。

刘毅之兄刘迈在京师，举义前刘裕使同谋者周安穆到建康报告刘迈，刘迈表面上应付酬答，内心很惶惧，周安穆觉察出不妥，唯恐事机泄露，便飞马返回京口。在这时，桓玄任用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想赶紧离开京师到郡上任，船尚未开，当夜便收到桓玄来书："北府情形如何？卿见刘裕近日说些什么？"刘迈以为桓玄已经知道起兵的计划，一早便去禀报。桓玄得知京口起义消息，大吃一惊，当即封刘迈为重安侯，继而怪罪刘迈没有逮捕周安穆，让他逃去，遂杀了刘迈。又命人诛杀了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人。桓玄急召桓谦、卞范之商讨抵御刘裕之策，桓谦等说："赶快派兵击灭。"桓玄道："不然，敌兵锐气正盛，必以死相拼。若派水军，不足以对敌，如果有闪失，则敌方士气更盛，大事便坏了。不如屯兵覆舟山（即玄武山）待敌。对方空走二百里，没遇到敌手，锐气受挫，到覆舟山忽然遇到大军，必然惊怕，我军按兵列阵，不要交锋相杀，对方求战不得，自然逃散，这才是上策。"桓谦等坚持要急速发兵，桓玄才派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上攻打义军。

义军推刘裕为盟主。以孟昶为长史，守卫京口，檀凭之为司马，应募从军的彭城人，全部交给郡主簿刘钟统领。刘裕率领二

州义军一千七百人驻扎竹里（今江苏句容北），向四方发布讨伐桓玄檄文，扬言益州刺史毛璩已经平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安帝在寻阳反正，镇北参军王元德等率部下占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民已经占领历阳。

桓玄自从听到义军起兵消息，又忧又怕，有人劝解说："刘裕乌合之众，兵力微弱，岂能成事。陛下何必忧虑过甚。"桓玄道："刘裕足称一代英雄。刘毅家无檐石之储，却摴蒱下赌一掷百万，是个不要命的家伙。何无忌酷似其舅刘牢之。这些人一起举事，怎么能说不会成事？"

刘裕克复京口后，任朱龄石为建武参军，随义兵南下。三月戊午朔日（初一），刘裕军与桓玄所派吴甫之兵马在江乘相遇，双方摆开阵势将要交战，朱龄石请求刘裕："我世受桓氏厚恩，不想以刀兵相向，请准许我在军后。"刘裕重其义气便答应了。吴甫之乃是桓玄部下骁将，带领的都是精锐士卒。刘裕手执长刀大呼，直冲敌阵，义军奋勇厮杀，官军大败，吴甫之被斩。刘裕进兵罗落桥（今江苏江乘南），皇甫敷率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领一军，檀凭之交战失利被杀。刘裕奋不顾身率兵杀进敌阵、皇甫敷指挥部下将刘裕围在核心，刘裕背倚大树而战，皇甫敷扑向刘裕，大吼："你想怎么死？"拔戟要刺，刘裕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皇甫敷胆战心惊，不觉手软，恰好刘裕部下赶到，一箭正中皇甫敷面额，跌倒在地，刘裕挺刀上前，皇甫敷道："君有天命。我死后子孙托付给君了。"刘裕斩了他。日后果然抚养其孤儿。

桓玄闻报二将战死，甚是惊怕，便召有道术的人推算来厌胜。又问群臣："朕将要败吗？"吏部郎曹靖之回答："民怨神怒，臣实在担忧。"桓玄道："民也许要怨恨，神为何怒呢？"曹靖之说："晋氏的宗庙漂泊江滨，大楚的祭祀上不及祖宗，这便是神怒的缘故。"桓玄问："卿为何不谏？"曹靖之说："辇上的君子都

认为是尧、舜之世，臣怎么敢说话。”桓玄默然不语。于是遣桓谦与游击将军何澹之屯兵东陵（建康覆山东北），后将军卞范之屯兵覆舟山以西，大军合计二万。

己未（初二日），刘裕将士饱餐已毕，余粮全部丢弃，进兵覆舟山以东，令老弱者登山，张旗帜作为疑兵，传令将士几路并进，布满山谷。桓玄军逻卒回报："刘裕军士布满四方，不知多少。”桓玄更加忧惧，遣武卫将军庾赜之领精兵支援各军。桓谦部下士卒许多是北府人，素来畏伏刘裕，遂失去斗志。刘裕与刘毅率领将士分为数队，冲进桓谦阵中，刘裕身先士卒，将士们殊死战斗，无不以一当百，杀声震天动地。此刻东北风很急，义军借风势纵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霎时烈焰冲天，战场上鼓声不绝，人呼马啸，声传数十里，京师为之震动。桓谦等军大败。

桓玄虽然接连派出兵马抵御义军，而逃走的主意早已拿定，暗中使领军将军殷仲文在石头备下船只。接到桓谦等人的败报，桓玄带着亲信数千人，扬言说是参战，带儿子桓升、侄桓俊出离南掖门，正行之间恰遇前相国参军胡藩，上前牵住马缰劝谏道："现在羽林射手还有八百，都是多年旧部。西方人士受桓氏几代之恩，如今不带领他们一战，丢下这些人想往哪里去呢？”桓玄并不答话，只扬起马鞭指天，遂后打马而走，西去直奔石头，与殷仲文等乘船顺江南逃。桓玄在船上终日不肯进食，左右献上粗饭，桓玄难以下咽，桓升便为他抚胸，桓玄悲不自胜。

刘裕率义军进入建康，王仲德抱着王元德幼子方回迎候刘裕，刘裕在马上抱过方回，与王仲德相对而泣，后追赠王元德为给事中，委任仲德为中兵参军。刘裕驻扎在桓谦故营，遣刘钟占领东府。庚申（初三日），刘裕屯兵石头城，建立留台百官处理政务。命人在宣阳门外焚毁了桓温的神主，另做了晋帝的新神主供奉在太庙。随后刘裕传令诸将追击桓玄，使尚书王嘏率百官去奉迎安帝车驾。又下令诛杀在建康的桓玄宗族。刘裕使臧熹人宫

收取图书、器物，封闭府库。其中有装饰黄金饰物的乐器，刘裕问臧熹："卿是不是想要此物?"臧熹严肃地答道："皇上被逼到外地，将军首建大义，为王家效力，我虽然不肖，实在对乐器不感兴趣。"刘裕笑道："只是句戏言耳。"

壬戌（初五日），桓玄委任的司徒王谧与众官员商议，推戴刘裕领扬州刺史，刘裕坚持不受，于是以王谧为侍中、领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王谧推举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邪内史，孟昶为丹杨尹，刘道规为义昌太守。

刘裕刚到建康，万机待理，便将各项重大事务都委任刘穆之处理，在仓促纷乱之际，办理得有条不紊，表现出惊人才干，刘裕十分高兴，遂倚重为心腹。一举一动都向他谘询，刘穆之尽心尽力，办事周详允当。近年来政务废弛，纲纪混乱，豪强势家欺凌百姓，民众穷困。继而司马元显政令失误，桓玄虽然想改革弊政，立下的科条繁杂众多，执行者无所适从。刘穆之斟酌时宜，根据实情随时纠正，刘裕以身作则，百官都尽职守法，不过旬日，风气大有改观。

初起义时，诸葛长民到豫州误了日期，未能发动起事。刁逵拘捕了诸葛长民，打入槛车送交桓玄处置，走到当利（今安徽和县东南），而桓玄已经失败，押送的士卒打破槛车放出诸葛长民，一齐直趋历阳。刁逵见势不妙，弃城而逃，被部下捉住，在石头斩首，子侄老少都被杀了。刘裕任用魏咏之为豫州刺史，镇守历阳，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

当初，刘裕地位低下轻浮无行，上流人士都不和他交往，惟独王谧待他很好，认为他将来必有作为。刘裕曾与刁逵摴蒱赌博，没有按时还钱，被刁逵缚在拴马桩上，王谧见了，责怪刁逵并释放了刘裕，代他还了赌帐。为此刘裕深恨刁逵，感激王谧。

桓玄逃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西），江州刺史郭昶之供给器物

用品，补充兵力。辛未（十四日），桓玄逼安帝随他西去。留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与郭昶之守湓口。此刻，刘毅领何无忌、刘道规等诸军也追击而来。

丙戌（二十九日），刘裕声称受安帝密诏，以武陵王司马遵承制，总领百官行使权力，并实行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准宽宥。出奔南燕的刘敬宣、高雅之想谋杀南燕主慕容德，推戴司马休之为主。高雅之邀刘轨同谋，刘轨不肯，这一阴谋渐渐泄露，刘敬宣等南逃，南燕人捕杀了刘轨，追杀了高雅之。刘敬宣、司马休之走到淮泗一带，得知桓玄失败，便来归。刘裕任刘敬宣为晋陵太守。四月，以司马休之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

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桓石康迎入城内，桓玄重又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从奔逃之后，桓玄怕威望不高，政令难行，于是加重刑罚，部下对他更加怨恨，与他离心离德。殷仲文提出劝谏，桓玄怒道："诸将不遵法律，天文又不利，所以还都故土。小人纷纷议论胡说，只可以猛，不可以宽。"荆楚各郡闻知桓玄出奔，有上表问候的桓玄一律不接受，令他们上表祝贺迁移新都。

当初王谧是桓玄的佐命功臣，桓玄篡位受禅时，王谧亲手解下安帝的玉玺绶带。待桓玄失败，众人以为必杀王谧，刘裕却特意保全了他。刘毅在朝会时，曾经询问王谧玺绶在何处，王内心更加不安，便逃往曲阿，刘裕致笺告诉武陵王，又迎他回建康复位。

桓玄之侄桓歆招引氐族首领杨秋进犯历阳，魏咏之率诸葛长民、刘敬宣、刘钟各路人马一同击败敌军，杨秋被杀。

桓玄的防线，重镇湓口首当其冲，增派武卫将军庾雅祖，江夏太守桓道恭领数千兵助何澹之共守湓口。何无忌、刘道规兵到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何澹之等率领舟师迎战，何澹之日

常所乘坐的大船，羽仪旗帜很多，攻击目标明显，何无忌对诸将说："贼军主帅必不乘此船，想诈我军，应当首先攻击它。"众将说："何澹之不在船上，攻击得手也无益处。"何无忌道："敌我众寡悬殊，难保全胜。澹之不坐此船，兵力必弱，我军用精锐攻击必能缴获该船，得此船，我军气盛而敌军气沮，乘胜攻击必破敌军。"遂派精兵攻击这艘主帅座船并缴获了它，然后传呼："已捉到何澹之了！"何澹之部下闻听主帅被擒，不知真假，一片惊乱，何无忌军将士也不知真假，士气大振，乘锐气直攻何澹之军，杀得敌军大败。桑落之战，两军船舰交锋，战斗异常激烈。胡藩所乘战船被烧，胡藩全副铠甲跳入江中，潜在水里走了三十余步才得登岸。何无忌攻克湓口，进占寻阳。

桓玄虽遭桑落失败，已经着手聚集荆州兵马，不到一月，又有二万人马，楼船、甲杖器械齐备。其后，桓玄主动出击，领兵挟持安帝一起东下。以苻宏为前锋，同时派散骑常侍徐放先行一步，劝诱刘裕罢兵，许以高官显位。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孟怀玉等率兵自寻阳西上。五月，与桓玄大军在峥嵘洲（今湖北鄂城东）相遇。刘毅等兵不满万人，桓玄所部战士数万，将士们畏敌军强大，想退回寻阳，刘道规说："不可，敌众我寡，如果退缩反给敌军造成追杀机会，即便回到寻阳，也难守住。桓玄虽然有英雄的虚名，其实很怯懦，又已经遭受失败，军心并不稳固。两军决战，将勇者胜，不在兵多。"便指挥部下首先出击，刘毅等领兵随后跟进。桓玄心理上心虚胆怯，失去制胜的气概，常令轻便小舟在大舰旁游荡，以备失败逃走，遂影响全军士气低落。两军刚刚交战，刘毅乘风纵火，争先冲锋，桓玄军大败溃逃，烧掉辎重连夜撤兵。郭铨率兵投降了刘毅。

这时，桓玄旧部将刘统、冯稚等招聚了四百人袭破寻阳城，刘毅遣建威将军刘怀肃率军平定了寻阳事变。

桓玄败后，挟持安帝单船西走，将何皇后与王皇后留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此时殷仲文也在桓玄船上，看桓玄大势已去，便背叛桓玄。以收集散兵为名乘船到巴陵，奉二皇后奔往夏口（今湖北武昌），遂回到建康。

五月下旬，桓玄同安帝到江陵。冯该劝他整顿军队东下再战，桓玄不从，想出奔汉中依就桓希。当时人心离散，号令不行。次日夜里，城内已乱作一团，桓玄与亲近心腹百余人骑马奔出城，在城门侍卫与乱兵在黑暗中挥刀砍杀，桓玄幸好未被砍中，部下相互砍杀尸横遍地。桓玄飞马狂奔，跑到船上。身边亲信散走一空，只有卞范之跟随而来。

桓玄要往汉中，毛璩之侄屯骑校尉毛修之诱桓玄入蜀，桓玄信从其言，遂启程入蜀。这时宁州刺史毛璠死去，毛璩使从孙毛佑之与参军费恬率领数百人护送毛璠灵柩回江陵，这天行走到枚回洲（今江陵南），正与桓玄一行相遇。毛佑之、费恬挥兵迎击，箭如飞蝗，桓玄嬖人丁仙期、万盖用身体遮护桓玄，都中箭而死，益州督护冯迁上前举刀要砍桓玄，桓玄拔下头上玉导给他，道："你是什么人，敢杀天子！"冯迁道："我杀天子之贼！"挥刀斩了桓玄，桓石康、桓俊、康颐之都被杀了，活捉了桓升，送到江陵被斩。

安帝的车驾反正，封毛修之为骁骑将军，其后宣布天下大赦，被逼从逆者一律不再追究。安帝奉先帝神主入太庙，刘毅等传送桓玄首级，在大桁示众。

刘毅见杀了桓玄，以为大事已定，不再急于追剿，又遇到大风，船只不能前行。桓玄死了将近一旬，各路军还未到齐。这时，桓谦藏匿在沮中（今湖北当阳附近），桓振躲在华容浦（今湖北监利）。桓玄旧将王稚徽戍守巴陵，派人报知桓振说："桓歆已攻克京邑，冯稚又克复寻阳，刘毅诸军都在中途败退。"桓振大喜，便招聚残部二百人，去袭取江陵。桓谦也聚众响应。闰五

月已丑（初三日），攻陷江陵，杀死守将王康产、王腾之。桓振到行宫去见安帝，跃马挥戈，直到阶下，喝问桓升何在，听说已死，便怒目圆睁质问安帝："臣家有什么亏负国家，竟这样屠灭！"琅邪王司马德文急忙上前道："这岂是我们兄弟之意呀。"桓振要杀安帝，桓谦苦苦劝阻，安帝才免遭杀害。壬辰（初六日），桓振为桓玄设祭举哀。

癸巳（初七日），桓谦等带领群臣见安帝，将玺绶奉还安帝，说道："主上效法尧禅位于舜，如今楚祚不能长久，百姓又归心于晋了。"于是以琅邪王司马德文领徐州刺史，桓振都督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谦复任侍中、卫将军，加江豫二州刺史。安帝左右都是桓振的心腹。在江陵算是桓氏拥戴安帝，建立了朝廷。

桓振少年时轻薄无行，桓玄不把他当子侄看待。这时桓振叹息说："公昔日不早任用我，以致失败。若公在世，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也。如今孤单地困在这里，哪里可以安身呢？"遂纵情酒色，动不动便杀人。桓谦劝他东进作战，自己守江陵。桓振素来看不起桓谦，不肯听从桓谦建议。

刘毅出兵巴陵，杀了王稚徽。何无忌、刘道规进兵马头攻破桓谦，进兵龙泉（今江陵东南）攻破桓蔚。何无忌乘胜直取江陵，刘道规劝道："兵法说屈伸有时，不可一味冒进。桓氏世代在西楚，小民都肯为他尽力，桓振勇冠三军，难与他争锋。暂且养兵蓄锐，慢慢想对策。"何无忌不听，遂领兵攻江陵，桓振率军在灵溪迎战，冯该领军会合桓振，杀得何无忌大败，战死千余人，退回寻阳，与刘毅等上表请罪。刘裕命刘毅节制各军，免去青州刺史。桓振命桓蔚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四川毛璩部将柳约之、罗述、甄季之从白帝城进兵枝江（今四川枝江东），得知何无忌兵败，遂退兵。不久，罗述、甄季之患病，柳约之诈降桓振，寻机会袭杀桓振，不料机密泄露，柳约

之被杀。

六月，毛璩派兵攻陷汉中，斩了桓希。刘敬宣在寻阳聚粮修船，何无忌虽失利，兵势仍然强盛。桓玄侄桓亮进犯豫章（今江西南昌），被刘敬宣击败。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再次出兵西进，到夏口，桓振遣冯该守东岸，孟山图守鲁山城（今湖北汉阳），桓仙客守偃月垒，合计有万人。刘毅攻鲁山城，刘道规攻偃月垒，何无忌率水军遏制江中。自辰时到午时，双方一场大战，二城溃败，生擒孟山图、桓仙客，冯该退往石城（今湖北钟祥）。

十二月，刘毅再克巴陵。其部队军令严明，蜀地民众安定不惊，刘裕再任刘毅为兖州刺史。桓振命桓放之屯兵西陵（今四川宜都西北），被文处茂击败。

义熙元年（405）正月，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攻襄阳，桓蔚退往江陵。江陵遂成被包围之势。己丑（初七日），刘毅等各军到马头，桓振挟持安帝出屯江津（今湖北江陵南），遣使者请求割据江、荆二州，奉送天子回朝。刘毅不准。辛卯（初九日），鲁宗之在柞溪击败桓振部将温楷，进驻纪南（今江陵北）。桓振留桓谦、冯该守江陵，亲自领兵迎战鲁宗之，大破鲁宗之军。此时，刘毅已在豫章口（江陵东）杀败冯该，桓谦弃城而逃，刘毅攻入江陵，擒杀了卞范之。桓振得胜回城，望见城中起火，知江陵已经陷落，失去了立足之地，部下兵将溃散，桓振逃往涢川（今涢水）。

刘毅克复江陵后，乙未（十三日），诏令军中重大事务委任刘毅处理，随后实行大赦，惟桓氏不在内，改年号为义熙。并分封征讨有功诸将。当月，刘怀肃追斩冯该于石城，桓谦、桓怡、何澹之等桓氏残余旧部，出逃后秦。

二月，备法驾到江陵迎接晋安帝，刘毅、刘道规留镇夏口，何无忌奉安帝东归。安帝回到京师，大封起义诸将，刘裕、刘毅、何无忌、刘道规、魏咏之等人都封得要职。其后桓玄余党桓

亮、苻宏等，聚兵扰乱郡县，被刘毅、刘道规、檀祇等分别讨灭，平了桓氏残余势力的抵抗。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桓玄传》、《毛璩传》

《宋书·武帝本纪》

《通鉴纪事本末·伪楚之乱》

孙恩起义

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是早期出现的道教流派之一，东汉人张道陵在蜀地创立，在巴蜀地区盛行，信徒很多。汉顺帝在位时，琅邪人宫崇曾经献“神书”，后来掀起黄巾大起义的张角就曾学过这部“神书”。东汉末年，张修曾利用天师道在巴郡起义，张鲁利用它割据汉中建立政权。到魏晋时期，天师道在东南沿海一带广泛流传，三国时琅邪道士于吉，便很出名。于吉立精舍、烧香、读道书、施符水治病，吴会人士多信奉他。西晋初年，司马懿的第九子赵王司马伦最早封为琅邪郡王，在琅邪受风气影响便信奉天师道。他手下有一小吏，名叫孙秀，是琅邪土著人，以文才很称司马伦之意，受到嬖爱和宠信，后来成为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司马伦部下大将张林也是天师道信徒。在八王之乱时，司马伦、孙秀宣扬妖邪之说，诈作宣帝司马懿的神语，在芒山另修了司马懿的庙宇，扇惑人心。又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命亲信在嵩山诈称仙人王乔，司马伦与诸王互相残杀，造成了西晋的大祸乱。

东晋时期，江南天师道依然盛行不衰，琅邪地区仍是风气最盛之地。孙恩便是琅邪人，字灵秀，乃是孙秀的族人。孙氏世代信奉天师道，他的叔父孙泰，也是天师道信徒，起初向钱塘人杜子恭学道教法术，渐渐出了名。孙泰狡诈有才干，善于诱惑百姓，一些愚民敬之若神，纷纷竭其财产，供献出子女，祈求福庆。三吴地区的士庶多信仰他。由于受到南方士族王珣的厌恶，

孙泰被流放到广州。孙泰在广州依旧传道惑众，广州刺史王怀之还让他暂时摄理郁林太守的职务。太子少傅王雅与孙泰交好，便向东晋孝武帝举荐孙泰，称孙泰知养性之方，孙泰又被召回做官，升迁为辅国将军，新安太守。孙泰借王恭举兵对抗朝廷的机会，以讨伐王恭为名招聚兵马，积存财物，蓄意谋反。孙泰又结交权贵，专擅朝政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都与他交厚。有识之士忧虑孙泰将要作乱，只因司马道子父子的缘故，无人敢说话。晋安帝隆安二年十二月，会稽内史谢輶告发了孙泰图谋不轨的阴谋，孙泰父子七人都被司马元显诱杀。

祸事发生后，孙泰之侄孙恩逃往海上。三吴地区的信徒大众，依然迷惑不悟，都传说孙泰是蝉蜕登仙，尸解而去，故而继续接济供给逃到海上的孙恩。孙恩招聚亡命之徒得百余人，伺机准备报仇。

隆安三年，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下令，征发东部三吴等地各郡免除奴隶身份为客户者，号称“乐属”，迁徙到京师地区安置，以充兵役。此令公布后，东南沿海各地引起骚动，不仅广大客户叫苦连天，士族大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也极为不满。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当政，引起来不少混乱，已经大失人心，这时司马元显夺了其父大权，少年得志，性情又刻苛，刚愎自用，更引起朝野上下一片怨恨。乘东南地区人心慌乱不满，孙恩发动了武装叛乱。

孙恩率领亡命徒众自海上出击，攻克上虞（今浙江上虞西），杀了县令，随后奔袭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内史王凝之，是著名书法家、号称书圣的王羲之之子，王氏也世代信奉天师道，王凝之更加迷信虔诚，与孙恩同教却是政治对头。此时他既不出兵作战，又不戒备防敌，却整日在道室里稽颡膜拜，跪在地上诵经念咒。其属官请他出兵攻打孙恩，王凝之道：“我已请大道相助，借鬼兵守卫各关津要道。有鬼兵数万，贼不足忧也。”等到

孙恩兵马已临近会稽，王凝之才准许出兵，孙恩已经到了郡城之下，不久，孙恩攻陷会稽，王凝之逃走被追兵捉住，父子数人都遭杀害。王凝之之妻谢道蕴，乃是东晋名门之女，谢奕的女儿，闻城破后敌寇杀来，镇定自若，带侍婢出门抽刀杀敌数人，力尽被捕。

天师道的徒众，信男信女及铤而走险的客户贫民，不满东晋法令的望门世家，纷纷投奔孙恩，很快发展到数万之众。各地教徒首领闻风响应，会稽谢铖、吴郡（今江苏苏州）陆瑰、吴兴(今浙江湖州）丘尪、义兴（今江苏宜兴）许允之、临海（今浙江临海东南）周胄、永嘉（今浙江温州）张永，以及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西）等八郡，都暴动起事，杀害官吏响应孙恩，十来天的功夫，兵众达到数十万。东晋的地方长官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秘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都被杀害。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隽、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仓皇出逃。三吴地区承平日久，官吏军民只知道享太平图安逸，不习作战，各郡、县的守兵望风奔溃，毫无抵抗之力。

孙恩占据了会稽，自称征东将军，其党羽号称“长生人”。孙恩下令，百姓有不同心起事的，连婴儿也不留活命，会稽的民众因此被杀的十有七八，死人不计其数。杀死晋朝县令等官员后，强迫他的妻儿食肉，不肯食者往往遭肢解残杀。孙恩部下所到之处，抢掠财物，焚烧房屋，砍伐树木，填塞水井，给各地造成极大毁坏。各地起事的首领率领信徒部众相继到会稽聚会，有婴儿拖累不能上路的妇女，婴儿被投入河中，并祷告说：“祝贺你先登仙界，我随后就来与你一同成仙。”十分迷信水解成仙的愚惑。孙恩给晋安帝上表章，揭露会稽王司马道子与世子元显的罪行，请安帝诛杀二人。

晋安帝自从即位以来，朝廷政务混乱，朝廷的权力也日渐削

弱。石头城以南的地方都被荆州、江州占去，以西都是豫州的地盘，京口和江北都归属刘牢之和广陵相高雅之节制。朝廷政令能够施行的区域，惟有三吴地区而已。及孙恩起事，三吴八郡都被孙恩占有，京畿周围各县盗贼蜂起，孙恩的党羽也有潜伏在京师建康的，形势的恶化使人心浮动，惊慌不安，建康城内外施行戒严，时刻都在防备着发生不测。安帝下诏，加司马道子黄钺，代天子征讨，以司马元显领中军将军。又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领兵讨伐孙恩，镇北将军刘牢之也发兵征讨孙恩。

十二月，谢琰率兵击杀了许允之，击破丘尫，与刘牢之军辗转作战，不断取胜。谢琰遣司马高素相助刘牢之，进兵浙江。安帝下诏以刘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刘牢之部下参军刘裕奉命带领数十人探察敌情，与孙恩部数千人遭遇，刘裕毅然迎击，手下士卒都先后战死，刘裕跌落在土岸下，敌兵逼近，刘裕奋力挥刀砍杀数人，跃上土岸，大呼追杀，适逢刘敬宣领兵前来接应，遂大破敌军。

起初，孙恩闻听八郡响应，心中甚是喜悦，高兴地告诉他的信徒："天下没有可忧的事了，我要与诸君穿戴朝服进建康了。"其后，闻报刘牢之带兵临近浙江，孙恩又说道："我割据浙江，也不失作勾践。"不久，得知刘牢之率军过江，于是说道："孤不羞于逃走矣。"孙恩传令驱赶男女二十余万口向东逃走，恐官军跟踪追击，一路上抛弃钱财宝物，丢弃妇女、儿童。刘牢之部下兵将争着拾敛，孙恩得以逃脱，又逃人海岛。高素击败了孙恩余党，斩了孙恩委任的吴郡太守陆瑰、吴兴太守丘尫、余姚令沈穆夫。

吴中地区遭受孙恩破坏，百姓盼官军如天旱盼甘霖，待刘牢之等放纵士兵残暴抢掠，士庶民众大失所望，郡城的百姓逃避一空，月余才渐渐有回来的。朝廷担心孙恩卷土重来，便任命谢琰

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诸军事，率领徐州文武部下戍守沿海一带。

谢琰乃是淝水之战击败前秦苻坚的名将，资历威望素著。镇守会稽后，却不能安抚绥靖地方，又放松武备，疏于防范。诸将都劝谏说："贼人近在海浦，时刻都在窥测形势，应当施行仁义，给予他们自新之路。"谢琰不听，说道："苻坚百万之众，尚且送死于淮南，孙恩小贼，败死人海，怎么还敢再来！若贼人果然再出兵，是上天想灭亡他们。"隆安四年五月，孙恩侵犯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犯邢浦。谢琰遣参军刘宣之击败敌军，孙恩退走。不几日，又进犯邢浦，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官军失利，孙恩乘胜进兵，攻打会稽。诸将都认为应当持重，严密设防，布置水军于南湖，分兵设伏以待敌军。谢琰不听，孙恩兵到城下，谢琰尚未进食，言道："应当先消灭此贼而后进食。"遂传令整军，跨马出战。广武将军桓宝为前锋，领兵冲锋陷阵，杀伤敌兵甚多，当地地形复杂，多水塘小路，弯曲狭窄，谢琰军士只能鱼贯而行，孙恩军遂攻其侧翼，从舰船上调集了弓箭手，箭如雨发。谢琰军前后被隔断，队伍大乱。谢琰率兵到千秋亭，又被杀得大败。谢琰被帐下都督张猛暗算所杀，其二子谢肇、谢峻一同遇害，桓宝战死。吴兴太守庾桓恐怕郡城百姓再起而响应孙恩，杀了男女数千人。孙恩军转而侵犯临海。孙恩转战各地，谢琰被杀，使朝廷大为震惊，急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领兵抵御。十一月，高雅之与孙恩在余姚交战，高雅之战败，逃往山阴，部下死伤十有七八。安帝只得下诏以刘牢之都督会稽五郡兵马，领兵攻孙恩，孙恩再次人海。于是，刘牢之东进屯驻会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防备孙恩。

五年二月，孙恩再度侵犯浃口，攻打句章（今浙江鄞县西）。刘裕防守句章，孙恩攻之不克，刘牢之率军出击，孙恩又退往海上。三月，孙恩北上攻海盐（今浙江海盐北），刘裕领兵紧随其

后，在海盐故地筑城，屡次击退孙恩进攻。孙恩见海盐城难攻。便转攻沪渎（今上海北）。五月，孙恩攻陷沪渎，杀袁山松。然后渡海突然直攻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部下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声势浩大。京师建康震动，朝廷下令戒严，冠军将军高素守石头城，辅国将军刘袭立栅截断淮口，丹杨尹司马恢之戍守南岸，冠军将军桓谦防守白石，左卫将军王嘏屯兵中堂。又急忙征调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领兵入卫京师。

刘牢之领大军自山阴出兵，邀击孙恩，刘牢之军未曾赶到而孙恩领兵已经过去，于是刘牢之令刘裕自海盐入援。刘裕部下兵不满千，倍道兼行，与孙恩一同赶到丹徒。刘裕兵少，又远来疲劳，丹徒守军又无斗志；孙恩自恃兵多将广，便率将士鼓噪呐喊登上蒜山（今江苏镇江西）。这时丹徒城内外的居民纷纷前来观战助威，刘裕率所部兵马出击，勇往直前，杀得孙恩大败，投崖、投水死的甚多，孙恩狼狈逃回船上。孙恩虽被挫败，仍然恃其兵多人众，不久再整人马直向京城。东晋后军将军司马元显屡战失利，会稽王司马道子别无良策退敌，只知道向蒋侯庙祈祷。孙恩军渐渐逼近京师，京城官民十分惊恐。此时谯王司马尚之率领精锐劲旅赶到，屯兵于积弩堂。孙恩的楼船高大，行驶迟缓，几天后到达白石。孙恩本来以为东晋各路军分散，京城空虚，想掩其不备，攻下建康，继而闻知司马尚之已领兵赶到建康，刘牢之已经还兵京口，孙恩到新州（今南京北大江中）后，便不敢再进兵，渡海奔向郁州（今江苏灌云西北）。孙恩遣别将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后北走郁州。宁朔将军高雅之攻打郁州，被孙恩击败，高雅之也被活捉。八月，朝廷下诏以刘裕任下邳太守，讨伐孙恩。刘裕与刘敬宣合兵赶到郁州，屡战屡胜，孙恩军伤亡逃散不计其数，兵力逐渐衰弱，便舍弃郁州，沿海南下。刘裕领兵尾追，寻机截击。十一月，刘裕追击到海盐、沪渎，再次大破孙恩，俘获斩杀以万计。孙恩失利后，不得已远窜人海。

桓玄自从攻杀了杨佺期、殷仲堪，控制了长江中游重镇，荆州、江州都在他掌握之中，兵马强盛。桓玄屡次上疏要朝廷准他提兵东进讨伐孙恩，朝廷恐怕他别有用心，始终不允他出兵。这次孙恩人马逼近京师，桓玄整顿军马，假托勤王为名，实际上想寻找机会进军京师，便借口讨伐孙恩再次上疏，适逢孙恩败走，桓玄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元兴元年（402），司马元显讨伐桓玄失败，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先后被杀，桓玄带兵入京，自称太尉、扬州牧，在朝中专权。三月，孙恩进犯临海，临海太守辛景预有准备，遂击败了孙恩部众。此时孙恩掳获的三吴地区男女民众死亡殆尽，孙恩深感已是穷途末路，难以施威，又怕被官军擒获，便跳海自杀了。其党羽、姬妾从死的成百人，称之为“水仙”。五斗米道中，素有尸解（刀兵水火之解）成仙之说，一些信徒受到教中水解成仙的麻痹，甘做了牺牲品。孙恩残部尚有数千人，便又推举孙恩妹夫卢循为主。东晋太尉桓玄想安抚东南各地，便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采取招抚政策。卢循虽然接受了朝廷任命，仍然拥有武装，时常向周围郡县侵掠，施暴不已。

自从孙恩初时入海，屡次掳掠的男女人口达几十万，其后与官军争战不休，战争中被杀、溺水而死、流离失所困顿而亡以及被转卖的人不计其数，到孙恩死时，只有数千人存活下来。孙恩攻杀谢琰、袁山松，陷广陵，横行东南，前后几十次交锋作战，杀害百姓也有数万。孙恩以天师道惑众起兵，杀害了江南王、谢、顾等士族大姓不少，平民百姓更是深受其害。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安帝本纪》、《赵王伦传》、《谢琰传》、《孙恩传》

《通鉴纪事本末·卢循之乱》

卢、徐南征北战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孙恩失败投水自尽之后，部下余众尚有数千，这些人都是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既笃信教义，又不肯散去，便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主，继续横行海上，四处抄掠。东晋太尉桓玄志在篡夺东晋政权，便在朝中杀戮了不少大臣，诛锄异己，树威专权，无暇对卢循用兵，采取了安抚之策，署任卢循为永嘉太守，以谋取东海沿海地区的暂时安定。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是名士司空从事中郎卢谌的曾孙。范阳的卢氏是当时名门望族，地位声望都很高。在北方战乱和沦陷后，卢氏曾在少数民族政权做官，卢谌就被迫在后赵任过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河崔悦、北地傅畅、颖川荀绰、河东裴宪，都是出身于门第郡望很高的士族名士，在后赵官位也很显赫。但是他们以为在胡人政权做事是耻辱。卢谌常对儿子说："我死后只称是晋司空从事中郎。"在北异族政权统治机构中出仕仍被士人所看不起。这些失势士族与下层地位卑微者通婚，更形成婚宦失类，卢循所处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如往昔了。

卢循生来聪明敏慧，善于写草书、隶书，精通弈棋。卢循娶了孙恩之妹，后来孙恩起事，与卢循通谋，孙恩性情苛酷残忍，卢循时常规劝他，保护了不少人免遭杀害。元兴二年正月，卢循遣其姊夫、司马徐道覆侵犯东阳，二月，被建武将军刘裕击败。八月，卢循又转攻永嘉（今浙江温州），刘裕再次击败卢循，斩

其大帅张士道，追击到晋安（今福建福州)。卢循窘急，只好航海南下，到达番禺（今广东广州)，进犯广州。元兴三年十月，逐走刺史吴隐之，卢循自掌广州政务，自称平南将军，并派遣使人向朝廷贡献物品，争取朝廷的承认。同时又命徐道覆攻占始兴(今广东韶关)，捉住始兴相阮腆之。这时期，朝廷刚刚平定了桓玄之乱，义熙元年（405）安帝复位，无暇顾及地方事务，更没有力量远征广州，兴师问罪，便采用权宜之计，任卢循为广州刺史、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从此得以在广州立足，有了根据地，而且广州地区富足，正可以发展壮大。

时令将近端午，民众的习俗过节食粽子，卢循派人送给刘裕用益智包裹的粽子，名叫益智粽，讥讽刘裕智穷计短；刘裕也礼尚往来，回报卢循续命汤，讥刺他命不长久。卢循委任前琅邪内史王诞为平南长史，在他手下任职，王诞一心要北归，便向卢循请求说："我本来不娴于军旅，在这里也是无用。原来一向被刘镇军厚待，若能够北归，必然蒙刘裕的倚重，利用公私各种机会，来报答您的厚意。”卢循欣然同意。此时刘裕致书给卢循，让他送还原广州刺史吴隐之，卢循不允。王诞又劝说卢循："将军现在扣留吴公，于公于私都不利，当年孙伯符岂不想留华子鱼？只是因为一境之内容不得二君罢了。”于是卢循放吴隐之与王诞一起北归。

这时，南燕主慕容德已经去世，其侄慕容超继位。义熙四年，刘裕出兵大举攻伐南燕。徐道覆闻知刘裕北伐的消息，便劝卢循袭取东晋京城建康，卢循不从。徐道覆亲自赶到番禺，劝说卢循道："我等长住岭外传宗接代，岂有这样的道理？只是因为刘裕难敌之故。如今刘裕北伐南燕，大军耽搁在坚城之下，没有得胜而归的日子。我们乘机出兵，使用思乡恋土的敢死之士，掩袭何无忌、刘敬宣之徒，战而胜之易如反掌。朝廷常把君当作心腹之患，不乘此机会取胜而谋求暂时的苟且偷安，不是长策。若

刘裕平定南燕之后，休整兵马加强武备，多则一年，那时用一纸玺书征召君，刘裕屯兵豫章（今江西南昌），遣将帅统领精锐之师过岭，将军虽有神勇恐怕也不能抵挡。今天的机会万万不可错过。如果首先攻克建康，倾覆其根本，刘裕即便南还，也无能为力了。君若不认同此议，我就要带领始兴的兵马直指寻阳（今江西九江西），自己去干了。”卢循很不愿意这样举动，而又没有更高明的见解和谋划来说服徐道覆，只好听从徐道覆的计划。

起初，徐道覆派人到南康山砍伐造船的木材，运到始兴后贱价卖掉，始兴人贪图利益，争相购买，因此船材大量积存而人们却没有疑心。到这时，徐道覆命人按卖券索取，无人可以隐匿。于是召工匠全力装修，旬日之间大船造齐。卢循进兵长沙（今湖南长沙），徐道覆进兵南康（今江西赣州）、庐陵（今江西吉水东北）、豫章（今江西南昌）。卢、徐分兵两路北上。

义熙六年二月，卢循与徐道覆军势如破竹，当月，南康、庐陵、豫章等地守官弃城而逃，望风奔窜，于是徐道覆乘船沿赣江顺流而下，舟船蔽江，军容强大。朝廷闻报，大为震惊，此时刘裕攻燕没有消息，安帝下诏紧急征调刘裕回师。

当徐道覆顺赣江进兵时，镇南将军何无忌自寻阳出兵抵御，其长史邓潜之谏道：“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闻听卢循的兵船强盛，又居于上游，顺流而下，势不可挡。我军应在南塘守城以待，敌军必然不敢舍弃我军而远下攻击。我军养精蓄锐，等敌军师老兵疲，然后攻击，这是万全之策。如今若要一战而决胜负，万一失利，后悔无及。”参军殷阐地说：“卢循率领的将士，都是三吴之地的旧贼，身经百战犹有余勇，始兴溪子，素来精通拳法善于格斗，不可轻敌。将军应当屯兵豫章，征调兵马，兵马集齐之后交战，也不为晚。若以现有兵将轻易进击，日后必要后悔。”何无忌认为大敌当前，有战而已，决不能退缩。三月，与徐道覆大军在豫章遭遇。徐道覆派兵士数百登上西岸小山，手持强弩射

击，此刻西风猛烈，何无忌所乘舰船小，被风飘向东岸，徐道覆乘借风势驾大船逼攻，其船很多是多层船楼的大舰，高大坚固，何无忌所率官军阵势全乱，大败溃逃。何无忌见形势危急，厉声叫道："取我苏武节来！"手持节杖督战，徐军蜂涌而至，云集围攻何无忌座船，何无忌手握节杖被杀。晋军惨败，何无忌战死的消息传到建康，朝廷上下一片惊慌，大臣们商议，想奉安帝北走依就刘裕，既而得知敌军尚远，才没有出走。

刘裕北伐以来，攻城略地节节胜利，遂包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又得到南燕尚书郎张纲修造的攻城器械，于义熙六年二月攻克广固，俘获了南燕主慕容超，送到建康斩首。刘裕接到朝廷军情急报和诏书，便留下将领分兵驻守，亲自带兵南返。刘裕行军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用船载运辎重，率领精锐部队由陆路南下，走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得到何无忌兵败身死的消息，担心京城有失，便传令将士卷甲兼程行军。这一天率部下数十人赶到淮河，便向行人探听朝廷消息，行人说："贼军尚未到，刘公若回来便无忧了。"刘裕遂放心，便准备渡江，此时江面风急浪高，部下都面露难色，刘裕说："若上天救助国家，风便会自止，如其不然，船翻身死又有什么可怕。"即刻下令登船，船离岸后风却止住了。顺利过江后，刘裕回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大军还在后面，不能急速赶到，便在京口募民为兵，同时修造船舰以供使用。四月初，刘裕回到建康。此时江州已经陷落，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各自率兵入卫京师。

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在姑孰（今安徽当涂），得知卢循起事的军报，准备领兵抵御，不料患了重病，身体将要痊愈，便传令将士整装待发。这时接到刘裕书信："我往日与妖贼多次交战，知晓其应变之能，妖贼新获胜利，不可轻视其锋芒。要整顿军备后，你我一同进兵。"又使刘毅之弟刘藩前去制止。刘毅十

分恼怒，以为刘裕目中无人，轻视自己，对刘藩言道："以往只是因为灭桓玄之功推戴他，你便认为我真的不及刘裕?"遂不听劝阻，率领舟师二万出发迎敌。

徐道覆击败何无忌后，再克寻阳。卢循自始兴出发后，攻湘中各郡，直指长沙。荆州刺史刘道规领兵迎战，兵败城陷，卢循进兵巴陵（今湖南岳阳），准备向江陵推进。徐道覆得到探报说刘毅军将到，便派人飞马报知卢循，称："刘毅甚盛，大事成败系于这一战，应合力摧垮刘毅。若此战获得捷报，江陵不足为忧。"卢循接信后即日由巴陵出发，东下寻阳，与徐道覆合兵一处，沿江东进。五月戊午（初七日），两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江中）相遇，双方展开激战，刘毅军被杀得大败，丢弃船只上百艘，将士们登岸从陆路逃生，余众都被卢循俘虏，丢下的辎重物品多如山积。

起初卢循兵到寻阳，得知刘裕已经回南的消息，还不相信，击败刘毅后急忙审问俘虏，证实了刘裕确已回到建康，卢循与其党羽部将相视失色。卢循想退回寻阳，攻取江陵，占据江、荆二州之地对抗朝廷官兵，徐道覆认为应乘胜直进，力争不已。卢循犹豫了几天，才同意徐道覆的主意，进兵建康。

朝廷闻知刘毅兵败，人心汹汹，惊慌不安，此时北伐大军刚刚回来，将士伤病累累，能投入战斗的战士不过数千，刘裕除了招募兵士外，悬出与京口起义者相同的奖赏，又征发民夫修筑石头城。一些文武官员议论，认为应当分兵把守各个关津要道，刘裕驳斥说："贼众我寡，若分兵防守，则要探明敌人虚实。而且，一处失利，便会使三军士气沮丧。如今聚兵石头城，随机应变，随需要可以调赴各处，既可使敌军难测我军虚实，又可以兵力不致分散。"

卢循将士十万，舟车百里连绵不断，楼船高达十二丈，声势十分浩大。战败逃回建康的人无不说敌军强盛，谈虎色变。孟

昶、诸葛长民想奉安帝过江，刘裕不从。先时何无忌、刘毅出兵，孟昶料定他们必败，事实果然不出他所料。这时，孟昶又说刘裕必然不能抵抗卢循，还真有许多人相信他的预测。龙骧将军虞丘进驳斥孟昶，认为这个失败论者大谬不然。中兵参军王仲德向刘裕进言："明公身为国家柱石，又新建立灭燕的大功。贼兵只是乘虚而人，如果我不战而自己先遁逃，势同匹夫，怎么还能号令三军，立威震物呢？若有逃避的打算，我决不与这样的人共事！"刘裕点头称是。孟昶仍坚持并屡次申明他的主张，刘裕对他说道："今四方重镇失利，强寇逼近京师，人心慌乱。若一旦迁驾，便土崩瓦解，岂能到得了江北？即便到江北，也不过拖延岁月。如今我军将士虽少，足可与敌一战。若能成功，君臣都可以转危为安；假若厄运降临，我定要横尸朝门，以遂我以身许国的夙愿，决不会窜身草野苟全性命。我计已决，卿不必再说了。"孟昶恼恨不听他的计划，而且料定必然失败，便请求一死。刘裕怒道："卿且容我一战，再死也不迟。"孟昶见刘裕坚决不从他的策划，留下一道表章后服毒自杀了。

五月己丑（十四日），卢循兵到淮口，东晋朝廷下令戒严，命琅邪王司马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屯兵中皇堂，捍卫京城。刘裕驻军石头城，分派诸将分头防守。刘裕之子刘义隆年方4岁，刘裕令谘议参军刘粹辅佐他，镇守京口。刘裕见建康百姓纷纷到江边，远远地观看敌船，感到很奇怪，便问参军张劭，张劭言道："若主将没有返回，民心惊怕，奔逃还来不及呢，还能在这里来观望？现在百姓不再惊恐害怕了。"刘裕对左右将佐说："敌军若在新亭（今江苏南京南）直趋而进，其锋锐不可挡，我军应暂且回避，胜败如何难测。若迂回到西岸停泊，则必败无疑。"

徐道覆志在生死决战，请卢循命令全军从新亭到白石（今安徽含山西南）一齐焚毁战船登陆，分兵数路齐攻刘裕。卢循求稳，想用万全之计不肯破釜沉舟，便向徐道覆说："我大军未到，

孟昶便望风自杀，以总的形势而言，对方溃乱指日可待。如今要一战定胜负，冒险求成功，既不是必胜之道又伤亡士卒，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变化。”徐道覆见卢循临事多疑，多疑则少决断，叹息说：“我最终要被卢公所误，大事必将无成。若是让我能够为英雄奔走效力，天下不足定也！”

刘裕观敌料阵，观测敌军动向，遥望卢循大军初时移向新亭，刘裕回顾左右，面露惊慌神色，接着见卢循船队又回泊蔡洲（今南京西南江中），刘裕面现喜色。这时东晋兵马也陆续赶到。刘裕为防卢循派兵侵袭，听从虞丘进之计，伐树在石头淮口建立栅栏，修缮越城，筑起查浦、药园、廷尉三座营垒，各处防守。

卢循将重兵埋伏在南岸，命老弱残兵乘船向白石，扬言要全军从白石登陆。刘裕留参军沈林子、徐赤特戍守南岸，截断查浦，告诫并命令他们坚守勿动。刘裕与刘毅、诸葛长民领兵北上御敌。沈林子进言：“妖贼放出的风声，未必确实，应周密防备。”刘裕道：“石头城险要，而且淮口栅栏坚固，留卿在后面坐镇，足以守住。”

庚辰（二十九日），卢循果然焚烧查浦，进兵到张侯桥（今南京南）。徐赤特要出兵迎击，沈林子道：“敌军扬言要往白石进兵，却屡次到此挑战，用心已经明显。我军人少，众寡不敌，不如坚守，等待大军。”徐赤特不听，遂领兵出战，卢循伏兵齐发，徐赤特被杀得大败，只一只船冲出重围奔往淮北。敌军乘胜来攻，沈林子与将军刘钟据守栅栏拼死力战，朱龄石又带兵赶来增援，才杀退敌军。卢循攻栅寨不利，船舰又被暴风水浪打翻，将士死伤无数。于是，卢循率领精锐主力转攻丹杨（今江苏江宁）。刘裕急率军赶回石头，斩了徐赤特，出兵在南塘（今秦淮河南岸）列阵。

卢循进犯各县抢掠，并无大收获，便对徐道覆说：“师老兵疲，不如回寻阳，全力攻取荆州，便占据了天下三分之二，慢慢

地再与建康争衡吧。”七月庚申（初十日），卢循自蔡洲还军寻阳，留部将范崇民领五千人据守南陵（今安徽繁昌西北）。甲子（十四日），刘裕令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州太守刘钟、河间内史蒯恩、中军谘议参军孟怀玉等领兵追击卢循，被阻击于南陵，不能前进。

八月，刘裕大规模整建水军，遣建武将军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领兵三千，从海道奔袭番禺。诸将都认为："海路艰难、遥远，难以一定到达，而且分兵会削弱力量，攻番禺也不是当务之急。"刘裕不听，命令孙处："大军在十二月之交必破妖寇，卿到达番禺，先倾覆其巢穴，使敌军逃走时失去归宿。"

割据蜀地的谯纵派人联络后秦攻晋，并委桓谦为荆州刺史率兵二万攻打江陵，后秦姚兴遣前将军苟林率骑兵会合桓谦，合攻江陵。

自从卢循领兵东下，荆州便得不到建康消息，荆州刺史刘道规命司马王镇之率檀道济、到彦之领兵人援建康，在寻阳被秦将苟林击败，卢循便署任苟林为南蛮校尉，并让苟林乘胜攻取江陵，扬言说卢循已经攻克建康。此时，桓玄的余党在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到处活动，仍然很有势力，桓谦与大将谯道福也带领部众进犯江陵，与苟林会合，苟林屯兵于江津（今湖南江陵南，临江），桓谦兵扎枝江（今湖北枝江东），二支兵马企图夹攻江陵城。荆楚地区原先就是桓氏势力范围，当地士民很多人怀有二心，谋做桓谦的内应。江陵形势十分险恶。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在江陵，镇定地安抚部下，稳定人心。刘道规召集将士当众宣告："桓谦现在离此不远，听说诸位有些人很想离此就彼。晋朝派到此地的文武将官，足可以济事破敌。若有愿意离去者，决不禁止。"随即在当夜大开城门，直敞到天明。于是众人都被震服，没有人出城投敌。此时雍州刺史鲁宗之领数千兵从襄阳赶来增援。刘道规部下有人劝说，鲁宗之此刻到来，其心不可测，怕发

生意外，刘道规却坦然不疑，亲自出城迎接鲁宗之，鲁宗之及其将士都很高兴。刘道规使鲁宗之留守江陵城，将心腹重地交付给他，亲自率领诸军攻打桓谦。诸将领佐吏都说："大军远离攻桓谦，难保必胜；苟林近在江津，伺机而动，若来攻城，鲁宗之未必能固守。倘若有闪失，大事便坏了。"刘道规言道："苟林愚腐怯懦，想不出奇计妙策。他认为我不会离城远去，必不敢来攻城。吾攻取桓谦必能取胜，苟林迟疑不决之间，我便已经返回。桓谦一败则苟林吓破了胆，还敢来找死？况且鲁宗之独自守城，难道还支持不了几日？"刘道规命刘遵领一支兵为游军，亲自率军水陆并进，飞驰枝江攻桓谦。桓谦率水陆军迎战，于是两军大战枝江，檀道济冲锋陷阵，桓谦军大败。桓谦败逃中被追杀。刘道规还兵再攻苟林，苟林败退，被刘遵追兵杀死于巴陵。桓谦、苟林兵败身死，江陵士民给桓谦的书信，全部缴获，刘道规将书信全数烧掉并不开视，于是江陵城中人心安定。江陵之战，赖刘道规智勇兼备，才转危为安。

此时，江州刺史庾悦派遣鄱阳太守虞丘进为前锋，屡次打败卢循军，并且攻占了豫章，截断了卢循军的粮道。

十月，刘裕率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冠军将军刘敬宣，从建康出兵南下讨伐卢循。

卢循已经退回寻阳，遣徐道覆率军三万西进攻荆州，突然兵临破冢（今江津东），这时鲁宗之已回襄阳，又纷纷传言卢循已攻陷京师，派徐道覆来任刺史，江陵形势顿时紧张，江、汉地区士民感激刘道规焚烧书信的恩惠，再也没有二心。刘道规领兵到豫章口迎战徐道覆，前锋失利，这时其部将刘遵率游军从阵外横冲过来，徐道覆军乱了阵形，溃败下去，阵斩万余人，其余兵卒被赶下河淹死的极多，徐道覆几乎全军覆没，单船逃回湓口（今江西九江西）。

王仲德得知刘裕大军将到，进攻南陵。十一月，王仲德与刘

钟合力攻击南陵，卢循部将范崇民放弃南陵退走。

卢循留守广州的将士，没有防备海道，不料官军从海上杀来，建威将军孙处乘大雾弥漫，挥兵从四面进攻广州。广州城池坚固，数千守军防守，官军放火烧掉了敌船后四面攻城，当天便攻下了广州城。卢循之父乘小船逃往始兴，孙处进城安抚民众，诛杀了卢氏余党，如期克复了广州。随后分派沈田子等诸将收复临近各郡。

刘裕大军驻扎雷池（今江西彭泽东北），卢循声东击西，放出风声，扬言不攻雷池，将要沿江而下。刘裕料定卢循的本意志在一战，又担心敌人败后，或许在京江入海，遂遣王仲德领船舰二百只在吉阳（今江西吉水东北）截断水路。十二月已卯（初一日）刘裕进兵大雷（雷池人江口）。庚辰（初二日），卢循、徐道覆带领数万大军，向刘裕发动进攻，无数舰船蔽江而下，前后不见首尾。刘裕全部出动轻舰，率领诸军齐力攻击，又分派马步军埋伏在两岸，预先准备下火器。两军船舰相交，展开一场大战，刘裕命将士用强弩射击，借风力与水势扼制卢循军攻势，卢循攻击受阻，命舰船全部停泊西岸，刘裕西岸的伏兵使用火攻，霎时火光冲天，浓烟四起，卢循的战舰烧成一片火海。卢循军大败，逃回寻阳。

卢循退往豫章，途中在左里沟（今鄱阳湖人江口）建立栅栏阻断道路。丙申（十八日），刘裕兵到左里受阻，卢循部下将士拼死奋战，刘裕亲自挥动指挥旗督战，不料旗杆折断，旗子落在水中，部将都认为是凶兆，刘裕笑道："往年覆舟山之战，旗杆也折了，现在又这样，贼兵必败。"指挥兵将猛攻栅寨，卢循守军抵挡不住，卢循见势不妙，便驾船逃走，其部下被杀及落水而死的数万人。卢循遭到惨败后，收敛残兵散卒，尚有数千人，便径直退回广州，徐道覆也领败军退守始兴。刘裕取得左里大捷后，收纳投降兵士，胁从者不问，令刘藩、孟怀玉率轻装骑兵追

击，并委任建威将军褚裕摄理广州刺史，刘裕便回转建康。

义熙七年正月，刘藩与孟怀玉等诸将追击卢循至岭表。二月，孟怀玉克复始兴，斩徐道覆。三月，卢循边撤退边收容残兵，到达番禺后遂率兵围攻广州，孙处战守二十多天。沈田子向刘藩建议："番禺城虽然坚固险要，却是贼众原来的巢穴，现在卢循围攻多日，也许会发生内乱，况且孙处兵力单弱，难以持久坚守，若一旦失守，贼党又盘踞广州，气焰又会高涨了。"于是刘藩遣沈田子领兵救番禺。四月，沈田子击败卢循，斩杀万余人。卢循败逃，沈田子与孙处紧追不舍，先后在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西）、宁浦（今广西横县西南）击败卢循。后来因孙处患病，晋军才停止追击。卢循奔往交州（今越南河内东）。

交州刺史杜瑗去世后，朝廷便任其子杜慧度为交州刺史，任命的诏书还未到达，卢循便领兵杀来，袭破了合浦（今广东合浦），直取交州，杜慧度率领州府文武将吏抵御卢循，在石碕，卢循屡遭失利，部下仍有三千之众，作乱的九真太守李逊的余党李脱，聚集了当地少数民族五千余人接应卢循，卢循的声势复又振作，领部下再攻龙编南津。杜慧度闻听卢循增兵后又来进攻，便将全部家财犒赏将士，与卢循交战，遣步兵夹河岸射击，用火攻焚烧卢循军舰船，船舰起火，卢循溃不成军。卢循见如此惨败，料想难以脱身，不如早作打算，决心自裁，便先毒死妻子，又召成群的姬妾，问道："谁愿意从我一起死?"多数姬妾都说："鼠雀尚且偷生，让我们去死实在太难了。"也有的说："官人尚且要死，我们岂愿贪生。"卢循下令，将不愿死的姬妾全部杀掉，然后卢循也投水自尽。杜慧度领兵肃清了卢循余党，从水中捞起卢循尸体后砍下头来，连同其父、其子、李脱等函装了七颗首级送往建康。

卢循、徐道覆乘刘裕倾全力灭燕之机起兵，转战南北，纵横

数州，经历十六个月，给东晋朝廷造成极大威胁，终于因为军事上的失误，根据地被捣毁，落得一败涂地。然而自孙恩至卢循，利用宗教发动起义，横行数载，也在历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卢循传》、《何无忌传》、《刘毅传》

《宋书·武帝本纪》

《通鉴纪事本末·卢循之乱》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九卷第十三章

刘裕灭南燕

南燕主慕容超，字祖明，乃是慕容德之侄，慕容德兄慕容纳的儿子。前秦攻灭前燕时，任慕容纳为广武太守，慕容纳弃官后居住在张掖。慕容德跟随苻坚南征东晋，遗留金刀一把在家便出征去了。淝水战后，慕容垂在山东起兵复国，前秦苻昌收捕并诛杀了慕容纳及慕容德诸子。慕容纳之母公孙氏因年迈免死，慕容纳之妻段氏身怀有孕未被处决，囚禁在郡狱中。狱吏呼延平是慕容德旧属下，为报恩便带着公孙氏、段氏逃到羌族居住区生下了慕容超。慕容超10岁时祖母故去，公孙氏临终时将金刀传授慕容超，嘱咐他日后见叔父以金刀为证。以后慕容超逃入后凉，假装癫狂以免祸。慕容德建立南燕，听说慕容纳有遗腹子在，便派遣使者察访，携慕容超一起逃到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慕容超呈上金刀，陈述了祖母遗言，叔侄相会。慕容德无子，便立慕容超为太子，慕容德死后，东晋义熙元年（405）慕容超继承帝位，改年号太上。封慕容钟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慕容法为征南将军，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慕容镇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封孚为太尉，鞠仲为司空，潘聪为左光禄大夫，封嵩为尚书左仆射。慕容超新登大位，怕宗室亲戚掌权难以控制，便任慕容钟为青州牧，段宏为徐州刺史，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在朝中参决政事。封孚向慕容超进言，反对他命宗室出藩及公孙五楼在内辅政。慕容超力图排除旧的权势，树立新权贵，以巩固皇位，委任公孙五楼等为心腹，自然不愿慕

容钟在朝中，故慕容钟、段宏与新贵公孙五楼构成嫌隙。

当初慕容超自长安奔广固时，兖州刺史慕容法怀疑他身份有假，结下怨恨。及慕容德去世慕容法又不来奔丧，慕容超派人责怪他，慕容法常惧怕祸事临头，因此便与慕容钟、段宏密谋造反，不想事机不密，被慕容超察觉，便征慕容钟入京师，慕容钟装病不赴，慕容超便清除其一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被杀，仆射封嵩被车裂，西中郎将封融逃奔北魏。慕容超又遣慕容镇攻青州（今山东益都），慕容昱攻徐州（今山东莒县），韩范攻梁父（今山东泰安南）。徐州刺史段宏也逃往北魏，慕容凝谋杀韩范，想袭攻广固，韩范发觉后攻打慕容凝，慕容凝逃奔后秦姚兴，慕容法也出奔北魏。慕容镇攻克青州，慕容钟从地道逃出投奔后秦。

慕容超即位不久便发生变故，他迅速平定了内乱，稳定了政治局面，但是诛杀宗室大臣，引起朝野恐慌。慕容超又想恢复肉刑和九等选举法，朝臣议论纷纭，遭到很多人反对，乃停止。义熙三年，慕容超当初只身潜逃到广固，至今母亲、妻子还在长安，姚兴以此相要挟，要求慕容超称藩并索求太乐歌舞诸伎，若不答应以上条件，也可以遣送吴地人口千人。慕容超便召集群臣商议，左仆射段晖议道："当今陛下承袭社稷，不宜因为私人亲情而降低尊号，而且太乐诸伎都是前世的伶人，不可以送给人。应掠夺吴地人口送去为是。"尚书张华说道："倘若侵犯掠劫吴地边境，必然与邻国结怨。我往彼来，兵连祸结，对国家不利。昔年孙权看重黎民性命，屈己以臣服于魏。何况陛下的先慈在后秦，理应暂时降尊号，以申明至孝之情。通权达变才合正理。韩范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昔日曾与姚兴同在前秦共事，可派遣他出使。"慕容超大喜，遂令韩范为聘使前往后秦。到长安后，韩范果然不辱使命，以言词据理申辩，说动姚兴，答应送还慕容超母亲、妻子。不料节外生枝，投奔后秦的慕容凝向姚兴进言，说

燕王称藩是为了母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不能白白还他母、妻。姚兴遂改变主意，索要太乐伎。慕容超便遣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到长安，送给姚兴太乐伎一百二十人。姚兴大喜，请张华饮宴，饮酒奏乐，后秦黄门侍郎尹雅对张华说道："以前殷商将亡，乐师归周，今大秦兴盛，燕国来朝。兴废的兆头，在此可见。"张华道："自古帝王为道不同，总归要期于成功。所以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如今女乐西来，必然由余东归。这不也是祸与福的征兆吗！"这由余之事，乃是典故，说的是春秋时由余在戎，戎王闻秦缪公贤明，使由余入秦观之，秦缪公与由余交谈，认为由余是贤人，便送女乐给戎王而留下由余。由余为秦谋划伐戎之策，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称霸西戎。姚兴闻言大怒："你小国之臣，竟敢顶撞天朝之士！"张华逊谢致词："我奉使之初，本心确实愿意与贵国交欢，上国之臣污辱我国君社稷，我身为臣子怎么能不对答？"姚兴不语，于是送还慕容超母、妻。

义熙五年，慕容超逐渐改变了与东晋邻边和好政策。正旦之日接受百官朝见，听到秦乐之声、音律、歌舞都不完备，后悔不该将乐伎送给姚兴，南朝向来以衣冠礼乐著称，遂有心掠夺东晋边界，于是派大将斛谷提、公孙归率骑兵入寇东晋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俘捉东晋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肆劫掠人口财物，挑选了男女二千五百人，送到太乐学习歌舞音乐。这时期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总揽朝政，其兄公孙归为冠军将军，叔父公孙颓为武卫将军，都在朝中官居显要，王公内外大臣无不惧怕，谄媚讨好公孙五楼的都做了高官，当时谣传："欲得侯，事五楼"。慕容超奖赏侵掠宿豫之功，封斛谷提等人为郡公、县公。慕容镇谏阻说："公孙归等人与邻国结仇，发动战争残害百姓，不可封赏。"惹得慕容超大怒，从此大臣们都不敢讲话。

其后南燕又遣公孙归领骑兵三千人入寇济南郡（侨置于淮

北）俘虏太守赵元，掠去男女百姓千余人。东晋自彭城（今江苏铜山）以南，民众都建立坞堡聚居一处自卫。东晋又诏并州刺史刘道怜镇守淮阴（今江苏淮阴东南）以防备入侵。刘裕自从讨伐并平定了桓玄，这时朝廷中桓氏余党基本肃清。刘裕见晋室衰微，实在难以维持统治，便想取而代之，立功中原，北伐南燕，用以增加本身的勋望，逐渐形成登上帝位的阶梯。是年三月，刘裕上表请求出师北伐，以丹杨尹孟昶监中军留守。

四月，刘裕领水陆大军出征，舟师从京师出发，由淮河入泗水，向北进发。五月，兵到下邳（今江苏邳县东），刘裕下令留下船舰辎重，率步兵进军琅邪（今山东临沂），大军所过之处都筑城堡留兵驻守，步步为营，向北进逼。有人向刘裕说："燕人塞断大岘（今沂山）守住险要，若再坚壁清野，我大军深入不仅无功，而且将要难以回归，怎么办?"刘裕说："我思虑很久了，鲜卑人贪婪，不作长远打算，进贪图掳掠缴获，退可惜禾苗，一定以为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故而鲜卑人不过是进则据守临朐，退坚守广固，必然不能守险清野，我敢为诸君保证。"鲜卑人设置的梁父、莒城二个戍所都放弃，守军撤走。

刘裕大军北伐的军情传到广固，慕容超便召集大臣商议，大将公孙五楼献策："晋兵轻进利在速战，不可急于与敌交锋。应当截断晋军，坚守大岘，阻敌进军，拖延时日，挫其锐气，然后遣精锐骑兵沿海南下，断绝其粮道，另外派遣段晖率兖州之军东进，腹背夹击，这是上策。命各地守令依险固守，烧掉不必要物资，割掉粟苗，坚壁清野。敌军远来缺乏物资，求战不能，旬月之间，不怕不被我生擒活捉，这是中策。纵敌深入，使晋军越过大岘，我军迎战，这是下策。"慕容超不从，说道："今年岁星在齐，从天道推论，必然不战而胜。敌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其势不能持久，只要引诱晋军过了大岘，我军以铁骑冲击，不怕不能破敌。怎能先割掉禾苗，显示软弱呢。"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

见慕容超出此下策，便苦苦谏阻，慕容超执意不听。贺赖卢私下对公孙五楼说："若一定要坚持这样决策，灭亡不远了。"太尉桂林王慕容镇道："陛下认定骑兵利于平原作战，也应当出大岘迎敌，倘若战而不胜，还可以退守。不宜纵敌越过大岘，自己放弃了险固地势。"慕容超不听，出朝后慕容镇向韩谆说道："主上既不迎战退敌，又不肯迁移民众坚壁清野，却引敌军进入腹地，坐待敌军攻打围困，酷似当年的刘璋啊。今年国家灭亡，我必然一死，卿为中华之士，又要做楚囚了。"慕容超听到这话，勃然大怒，将慕容镇收捕下狱。

大岘山道路险恶，一名破车岘，穆陵关就在山上。大岘山西北便是临朐，是广固南面的屏障。刘裕率晋军过了地势险要的大岘，燕兵并未出击迎战，刘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将领不解其意便问："公未见敌军而先自喜悦，这是为什么?"刘裕言道："我军已经越过险阻，将士们深入敌人腹地有拼死作战的斗志，有余粮在地里，我军没有匮乏之忧。敌虏已经人我掌握之中了。"六月己巳（十二日），刘裕兵到东莞（今山东沂水）。慕容超已经先派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率领步骑军五万屯扎临朐，闻知晋兵已过大岘，慕容超便亲自带领步骑四万来到临朐，临朐东南一里，有巨蔑水（今弥河），争夺并且控制巨蔑水，成为两军会战前的首要目标，慕容超对公孙五楼道："应先占据水源，晋兵到来而无水，也就不战自乱了"。遂命公孙五楼率骑兵占据巨蔑水。晋军前锋孟龙符已到川源，便率军进击公孙五楼，杀败燕军，公孙五楼退走。刘裕以战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护卫着中军，列成方阵整队进兵，用战车扼制南燕精锐骑兵的冲击。与燕兵在临朐以南相遇，两军展开激战，直杀到日已偏西，还没决出胜负。参军胡藩向刘裕进言："燕兵全军出战，临朐城中留守兵力必然薄弱。不如派遣奇兵从小道取城，这乃是韩信破赵的战术。"刘裕闻听此言有理，便遣胡藩及咨议参军檀韶，建

威将军向弥秘密率兵绕出燕军背后去攻临朐，扬言是出奇兵自海道杀来了。晋军直奔临朐，向弥顶盔贯甲率先登城，晋兵遂后杀进城中，攻克了临朐。慕容超闻报临朐失陷，大惊，单马到城南来依就段晖，刘裕乘势指挥晋军奋力攻击，将燕军杀得大败，斩段晖等大将十余人，俘杀燕兵无数。慕容超逃回广固，下令迁徙城郭内居民进入小城。战斗中缴获慕容超玉玺、御辇及豹尾等物，所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刘裕乘得胜之势追击直到广固，下令猛攻广固城。丙子（十九日）晋军攻克了广固大城。慕容超率领部众坚守小城。广固城池坚固，防守严密，一时难以攻下，刘裕命修筑长围围困小城。围子高三丈，开挖壕堑三道。招抚投降和归附的燕人，选拔贤士俊杰，使汉人和少数民族欢欣鼓舞。晋兵这时期利用齐地的粮食物资仓储，而不必自江南运输，便下令停止江、淮的漕运。

慕容超战败，被围困广固城，无计可施，便派遣尚书郎张纲到秦乞师，请姚兴发兵救助。又从狱中赦出桂林王慕容镇，任为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慕容超召见他，向他谢罪，并向慕容镇问计，慕容镇道："百姓万众之心，系于陛下一人。如今陛下亲自统率六军，败逃而回，以致群臣离心，士民丧气。听说秦人自己尚有内患，自顾不暇，恐怕不能抽出兵力来援。我军逃散回营的士兵还有数万，应当多出金帛散给将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还可决一死战。若上天助我必能破敌，万一失利，虽死犹荣，比起闭门不出，坐以待毙，不是要好吗！"司徒乐浪王慕容惠道："不然。晋兵乘得胜的气势，士气倍增，我们以败军之卒去对敌，不是太难了吗！秦国虽然与夏国赫连勃勃相对峙，不足为患。而且秦与我分别据有中原，其势如同唇齿，怎么会不来相救。但是，不派遣朝中大臣则不能得到重兵相助。尚书令韩范一向被燕、秦两国看重，理应遣他到秦请求救兵。"慕容超听从此议，便派韩范入秦求救。

七月，东晋朝廷加封刘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文武将吏已经人心离散，这时南燕尚书垣尊及其弟京兆太守垣苗越出城来降，刘裕便任命为行参军。

有人向刘裕进言："南燕张纲有巧思，若得到了张纲，让他制造攻城器具，广固必能攻下。"此时正好张纲自秦回燕，从长安途经太山，太守申宣便拘捕了他送到刘裕军中。刘裕命人带张纲升坐在楼车上，使人绕城高呼："赫连勃勃大破了秦军，没有援兵相救了。"城中燕人闻言无不惊慌失色。每当江南发来援兵或遣来使者到广固，刘裕事先暗中派兵于夜间去迎，转天，张旗鸣鼓浩浩荡荡地开到军营。北方民众久在异族统治下，生活困苦，长期企盼晋朝恢复中原，收复故土，如今见晋军强盛，便纷纷携带武器背负粮食来投奔晋军，每日数以千计，晋军包围广固更加严密，南燕大臣张华，封恺也都被晋兵擒获。慕容超见外无援兵，内无良策，便遣使到晋营，请求割让大岘以南之地，南燕对晋称臣为藩属。刘裕不答应。

后秦主姚兴接到南燕求救，派遣使人对刘裕说："慕容氏与秦邻好，现在晋攻燕紧急，秦已经派遣铁骑十万屯兵洛阳，晋军不退，我军必当长驱直进。"刘裕招来秦使说道："回去说与姚兴；我克复燕国之后，息兵三年，要攻取关、洛。现在要自己送上门来，便速速来吧！"不为后秦恐吓所动，刘穆之闻听有秦使到来，便驰马来见刘裕，而秦使者已经走了。刘裕便将所说的话告诉刘穆之，刘穆之责怪刘裕说："常日事无大小，必定给我参预谋划的机会。此事应当慎重，详细商议，为什么如此草率便答复了秦使？明公的话不足以威慑敌国，却足以惹怒他，倘若广固攻不下，羌寇又杀来，不知何以对待？"刘裕笑道："这是兵机，非卿所能解，故尔不相告知。兵贵神速，秦国若认为能来援救，必然怕我预先知道，怎么能容事先遣使传话呢？我料定秦使之言，是自己张大恫吓之辞。晋军不出兵攻伐，已经有很长时间

了，羌人见我伐齐地，已然心存惧怕，自保不暇，何能救人呢？”

八月，南燕大臣封融也到晋军投降。

起初，后秦主姚兴已经遣卫将军姚强率步骑一万随同韩范发兵洛阳，会合姚绍之军合力援救南燕。后秦军与夏兵交战，被赫连勃勃杀败，姚兴便派人追姚强兵回转长安。韩范见秦军不能救燕，仰天长叹道：“天灭燕国呀！”南燕尚书张俊自长安归来，便降了刘裕，并向刘裕进言：“燕人所依恃者，认为韩范必能招来秦师。如今能得到韩范并晓示燕人，燕人必然归降。”刘裕遂上表任韩范为散骑常侍，并修书招请韩范。长水校尉王蒲劝韩范奔秦，韩范说：“刘裕起自布衣，灭桓玄，复晋室，建立功业。现在兴师伐燕，所向无敌。这乃是天命所授，不是人力能为的。南燕灭亡了其次便轮到秦了，我不能再次受辱。”于是归降了刘裕。刘裕见韩范来降，大喜，便与韩范一同巡城，城中燕人望见韩范已在敌营，秦国救兵已经没有指望，人心离散群情沮丧，失去斗志。有人劝慕容超诛杀韩范全家，慕容超因为韩范之弟韩绰尽忠报国，心无二意，遂将韩绰连同韩范一家全部赦免。

十月，南燕段宏也从魏逃出来投刘裕。

这时，能工巧匠已按照张纲的设计指点，造齐了攻城器械，非常新奇巧妙，所造的冲车，上面覆上屋板，蒙上皮革，坚固灵便，城上的弓矢火石全部失去了威力。张纲又造了飞楼、悬梯、木幔之类，远远的居高临下，十分厉害。慕容超见张纲所造的攻城器械威胁极大，杰出的才能为敌人利用，大为恼怒，悬吊并肢解了张纲之母。

十二月，南燕灵台令张光借口天象有变劝南燕主慕容超出城降晋，慕容超誓不降敌，亲手杀了张光。

义熙六年正月甲寅朔日（初一），慕容超在广固城上登上天门接受百官朝贺。乙卯（初二）慕容超与心爱宠姬魏夫人一起登上城楼，了望晋军营寨连绵不断，旌旗蔽空，十分强盛；二人相

对握手哭泣。韩绰劝谏说："陛下遭遇堙厄之运，正应当努力自强不息，以壮士民斗志，却反而作儿女子哭泣之态。"慕容超忙擦去眼泪，表示谢过。尚书令董铣再劝慕容超归降，被囚禁起来。

二月，南燕大将贺赖卢、公孙五楼开挖地道出击晋兵，晋军坚不可摧，冲击不动，只得退回城内。广固被围数月，城门长久关闭，缺粮少盐，城中军民男女患腿脚软弱浮肿，难以行走的过半，出城投降求生的相继不断。慕容超与军民共甘苦，也患了脚弱浮肿，只能乘辇登城，尚书悦寿委婉劝说慕容超道："如今是上天助寇为虐，我军将士疲劳凋瘁，奋力独守穷城，外援已经绝望，天时、人事都已经清楚了。时运历数都有终极，即便是圣贤尧、舜也要避位。陛下怎么可以不思量变通之计呢?"慕容超闻言长叹道："废与兴，命也。但是我宁可奋剑而死，不能衔璧而生。"誓死决不投降。

丁亥，刘裕传令各军四面大举攻城，有人议论："今天是往亡日，不利出师打仗。"刘裕道："我往彼亡，有什么不利!"指挥各军猛烈围攻，守军竭尽全力，势难再坚守，悦寿遂打开城门迎纳晋军进城。慕容超闻报城门陷落，城已不保，便率领左右亲近侍卫数十骑越出广固城突围而走，被晋军追到擒获。刘裕见慕容超押到，便责他不降之罪，慕容超神色自若，一言不发。因为当初刘敬宣曾出奔到后燕，慕容超与他有故旧之交，便将老母托付刘敬宣。

刘裕恼恨广固城久攻不下，想下令屠城，杀尽城中少壮男丁，将妇女分赏兵士。韩范劝谏说："晋室南迁，中原鼎沸，百姓水深火热，士民哭告无援，只好依附强者。后燕立国，既然是君臣的名分，必须要为他尽力。广固的民众都是汉人，衣冠旧族，先帝的遗民，现在王师吊民伐罪行仁义之师，而要尽数坑杀他们，让这些遗民归往何处去呢？只恐怕西北的百姓，不会再有

出头的指望了。”刘裕的怒火平和下来，为日后长远之计，遂采纳了韩范之言，然而还是斩了王公以下三千人，籍没了他们的家族上万口，夷平了广固城隍庙。派人押送慕容超到建康，被斩首街市。慕容超终年26岁，在位六年。

慕容德在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建立南燕，登上皇帝位，至慕容超传了二世，共十一年。

刘裕北伐南燕之战役，自义熙五年四月十二日出兵，六月中旬大战临朐，歼灭燕军主力，继之，攻克广固大城，围攻小城，直到义熙六年二月初旬才攻下全城，南燕灭亡，共历时十个月，在战斗中野战两个月，攻城战却用了八个月，可以说是很艰苦的。刘裕水陆车兵约十几万众，东晋主要作战兵力都调集参加灭燕，后方兵力空虚，故卢循、徐道覆乘机起兵，企图推翻东晋统治，给东晋政权形成极大威胁。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慕容超载记》

《宋书·武帝本纪》

《通鉴纪事本末·刘裕灭南燕》

刘裕灭后秦

东晋刘裕诛杀了刘毅之后，即计划伐蜀，义熙九年（413）他力排异议，任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兵入蜀平定谯纵，于是东晋势力又达到汉中等地。

义熙十年，刘裕图谋代晋称帝，又顾忌晋宗室强大藩镇，便策划除去握有重兵的司马氏诸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刘裕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作防备。义熙十一年正月，刘裕一面部署建康防卫，一面自建康发兵，亲自征讨司马休之，攻打江陵。三月，击溃司马休之，攻克江陵，司马休之及亲属左右出奔后秦，刘裕遂以刘道怜为骠骑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刘裕对刘道怜虽然信任倚重，却认为他贪鄙无才，乃任谢方明为骠骑长史、南郡相，辅佐刘道怜主持军政事务。五月，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人去见河西王沮渠蒙逊，宣示朝廷的威德。沮渠蒙逊派使人回报，并上表章，表示晋军“如果想澄清中原，愿意作为右翼，驱除戎虏”。借以孤立后秦，为伐秦预作准备。

当初刘裕北伐南燕之后，就有定关、洛，灭后秦之意，因发生卢循、徐道覆起兵的变故，伐秦的计划暂时搁置。现在西部事务已告解决，刘裕遂决心攻秦，面这时，后秦主姚兴去世，其子姚泓嗣位，兄弟相杀，关中扰乱，伐秦的时机已然成熟了。

后秦姚兴统治后期，国势已渐渐衰败，仇池杨氏和夏赫连勃勃、沮渠蒙逊、乞伏炽磐相继而起，互相攻伐，尤以夏王赫连勃

勃的侵扰，使后秦北部边境常在威胁之中。姚兴病重之际，又发生了宫廷事变，姚愔、姚弼夺嫡争位失败。义熙十二年姚兴去世，长子姚泓继承皇位，改年号永和。姚泓字元子，虽然当初被立为太子，却生来文弱，博学善谈论，尤好吟诗作文，身体又多病，为政讲求仁恕之道，反对严刑酷法，为人也宽厚礼让。姚绍曾经在姚弼夺嫡争位的斗争中出谋划策，成为姚弼的羽翼，姚泓继位后不计前嫌，委任姚绍掌握兵权，使姚绍很受感动，尽心辅助。李闰羌人党容反叛，姚泓遣抚军将军姚赞平定叛乱。北地太守毛雍叛乱，姚绍擒杀了毛雍。此时镇守李闰的姚宣有野心，弃李闰南移，占据邢望。李闰的羌族人又发动叛乱，姚绍击破了羌人，并怒杀了姚宣。不久，并州、定阳、贰城的胡人叛乱，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征东将军姚懿在平阳击破曹弘。此后，仇池公杨盛起兵，攻陷祁山（今西和），逼近秦州（今甘肃天水）。姚泓遣后将军姚平援救秦州，杨盛退兵，姚嵩与姚平领兵追击。姚赞率陇西太守姚秦都、略阳太守王焕领禁兵参战，却又被杨盛杀败，姚嵩、姚秦都、王焕战死。姚赞到秦州，杨盛遂退兵保守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

屡屡入寇的夏国赫连勃勃也大举入侵，攻上邽（今甘肃天水），陷阴密（今甘肃灵台西），生擒秦州刺史姚军都，坑杀秦将士五千余人。勃勃进兵再侵雍州（今陕西西安西北），后秦征北将军姚恢放弃安定（今甘肃固原），奔往新平，安定人胡俨、华韬等率众抗拒姚恢，恢单骑逃回长安。镇西将军姚谌也弃城东走，勃勃遂占据雍州，抄掠郿城（今陕西郿县东北）。秦州，雍州乃是姚氏故乡，起家发祥之地，不能放弃。姚绍与征虏将军尹昭、镇军将军姚洽率领步骑五万征讨勃勃，姚恢领精锐骑军一万相继跟进。兵至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俨闭门抗拒，献安定城归降秦军，姚绍率兵追击勃勃，于马鞍坡击败夏军，直追杀到朝那（今平凉西北）。仇池杨盛又遣其侄杨倦入侵长蛇（今陕西陇

县西南)，平阳民人苟渴在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叛乱，姚泓遣镇远将军姚方、恢武将军姚难讨伐，却被杀败。姚谌讨擒苟渴。姚泓又命辅国将军敛曼嵬、前将军姚光儿攻杨倦于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杨倦奔往散关（今宝鸡西南大散岭上)。而夏赫连勃勃又遣赫连提南侵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被秦军击退。

姚兴死后的数月之内，内乱屡起，四邻交逼，秦兵往来征战，不得休整。不久，晋太尉刘裕率领大军开始伐秦。

义熙十二年三月，刘裕发布诏书，便声称“今当奉辞西旆，有事关河”，宣布准备伐秦。八月，以刘穆之留守摄政，率大军自京师出兵，九月，兵到彭城（今江苏铜山)。

刘裕命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率步军自淮淝向许昌、洛阳为前锋，先攻漆丘（今河南商邱东北)、项城（今项城东)。命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领水军自汴水人河，攻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命冀州刺史王仲德督率前锋各军开钜野人河。另派新野太守朱超石、守朔将军胡藩趋阳城（今河南登封西南)，策应前锋军作战。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为奇兵，牵制关中的秦军。刘裕自领大军跟进自钜野人河，会师洛阳。

九月，王镇恶，檀道济领兵进人秦境，所向克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降王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檀道济，秦各地守将望风而降，只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檀道济攻破城池，擒获并杀了董遵，遂进兵许昌，擒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领兵自汴人河，秦兖州刺史韦华降晋。

许昌失守后，秦东平公姚绍急返长安，向秦主姚泓献策：“晋军已过许昌；安定势孤道远，很难援救固守，不如迁徙诸镇户（迁人重镇的民户）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即便晋、夏交相侵人，还不至于有大害。如其不然，晋攻豫州，夏攻安定，将如何处置！时机已这样了，应速作决断。”左仆射梁喜说道：“齐

公姚恢有威名，岭北人都怕他，安定镇军民已与夏人有深仇，必然死守决无二心，勃勃终不能越过安定远来侵犯京师。若放弃安定，夏国人马必到郿、雍。现在关中兵马足可抵御晋军，不可先削弱自己。”姚泓听从了梁喜之言。吏部郎懿横又向姚泓密奏："齐公姚恢有功勋，陛下龙飞继承大统，没有丰厚赏赐给以报答。如今令他外则致之死地，内则不预朝权，安定人自认为孤远危险，被夏寇侵逼，十家有九家想南迁内地，倘若姚恢率精兵四万直向京师进发，不是给社稷造成危害吗？应将他征还朝廷，以安慰其心。”姚泓道："姚恢若怀有野心，征召他入朝却正好加速祸乱。”又不从。当初姚泓即位时，使姚恢杀安定太守吕超，姚恢犹豫很久才下手，姚泓便怀疑姚恢有阴谋，姚恢也因此疑惧不安，暗中加强武装戒备。安定遂成为隐患。

当月，晋将北兖州刺史王仲德率水军入河，击败秦兵于东郡凉城，将攻取滑台（今河南滑县），作为刘裕主力大军之侧翼。北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城北走，王仲德进入滑台，恐惹起与魏军冲突，宣称："晋军本来想用布帛七万匹向魏借道，不想魏守将弃城急忙退去了"。魏主拓跋嗣闻讯、遣叔孙建、公孙表自河内（今河南沁阳）向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领兵渡河，斩了尉建，抛尸于河。呼王仲德部下军士责问侵犯缘故，王仲德使司马竺和之与魏将对话，说："刘太尉使王征虏自河入洛，清扫晋帝山陵，并不敢侵犯魏国。魏守将自弃滑台而去，王征虏借空城以休整军队，很快便要西进，于晋魏修好并无妨害，何必扬旗鸣鼓示威呢？”拓跋嗣又使叔孙建去责问太尉刘裕。刘裕谦词解释："洛阳乃是晋的旧都，而羌人占据着，晋很早便想修复山陵。桓氏宗族，司马休之等都是晋朝蠹贼，羌人却收留他们，为害晋朝。现在晋将讨伐他们，想向魏借道，不敢有对魏不利举动。”魏人为防备晋军，使命素以勇武著名的河内镇将于栗磾，在河上筑垒。刘裕修书给他，称呼他"黑矟公麾下"，于栗磾好使黑

矟以自标榜，故刘裕以此相称。王仲德水军因此不能北进，而魏亦不敢轻易对晋用兵，晋军便得以顺利西进。

十月，秦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荥阳（今河南荥泽西南）二城投降，王镇恶、檀道济会师，晋军进到成皋（今河南汜水）。秦征南将军陈留公姚洸镇守洛阳，见情形危急，便遣使到长安求救。姚泓命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三千救成皋，武卫将军姚益男领步军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并州牧姚懿屯兵陕津（今茅津）作为声援。

宁朔将军赵玄劝姚洸不可出战，应集中各戍地兵马固守金墉，以待援兵。金墉守住，晋军必不敢越城西进。姚洸部下司马姚禹秘密与檀道济通谋，主簿阎恢、杨虔都是他一党，都嫉恨赵玄，便向姚洸进言："殿下英武，雄才大略，受镇守一方的重任，却要守城显示懦弱，不是要被朝廷责怪吗?"姚洸也认同此理，于是命赵玄领兵千人守柏谷坞（今偃师东南洛水以南），广武将军石无讳戍守巩城（今河南巩县）。不久，成皋、虎牢守军都降晋，晋兵长驱直人，石无讳到石关（今偃师西山），不战奔回。晋龙骧司马毛德祖与赵玄战于柏谷，赵玄战死。姚禹越城降晋。晋军逼进洛阳，姚洸出城投降。俘获秦兵四千余人。有人建议全部坑杀降卒，檀道济道："现在正要吊民伐罪，不能滥杀。"全部释放遣散了降卒。因此，汉及少数民族民众，都很感激，纷纷归降晋军。阎生、姚益男进军途中听到洛阳失守信息，不敢东进。

晋军既已攻克洛阳，司空高密王司马恢之奉诏修缮并拜谒晋先代帝王五陵。刘裕任冠军将军毛修之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戍守洛阳。刘裕乘得胜之威，遣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为将来篡夺晋朝的阶梯。而在这时，西秦乞伏炽磐也派兵逼秦上邽，遣使者见刘裕，愿攻秦效力。刘裕封其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就在外面强寇入侵的情况下，秦内部发生叛乱。秦并州牧姚

懿乃是姚泓胞弟，司马孙畅劝说姚懿袭取长安，杀东平公姚绍，废秦主姚泓，而代之。姚懿听从此计，分散谷物给河北民众以收买人心。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劝阻，姚懿大怒，笞杀了二人。姚泓听说姚懿造反，急召东平公姚绍商议对策，姚绍说："姚懿性情鄙薄，见识短浅，阴谋必出自孙畅，只要派使者急召孙畅，姚懿便失去主见。再命抚军将军姚赞据守陕城，臣到潼关节制诸军。若孙畅奉诏而来，臣便遣姚懿带领人马一同抵御晋军；孙畅若不接受诏命，便申明罪行讨伐他。"姚绍按计行事，派姚赞与冠军将军司马国璠、建义将军蛇玄屯兵于陕津，武卫将军姚驴屯兵于潼关。

姚懿听从孙畅的谋划，举兵叛乱，并且自称皇帝，发布檄文，准备运匈奴堡（今山西临汾西南）存粮给镇户民众。宁东将军姚成都拒不从命，击败了姚懿部将王国，派人责备姚懿乘国家危急而生野心，发布檄文到各地，号召讨伐叛逆。姚懿调发各城兵士，只有临晋数千户响应。姚成都率兵镇压了临晋谋反者，镇人郭纯等也起兵围攻姚懿。东平公姚绍进入蒲阪（今山西永济北），捉住姚懿，诛杀孙畅等。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义熙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姚泓在前殿受百官朝贺，因内外危迫，国势艰难，君臣相对而泣。这时，征北将军齐公姚恢率领安定镇户三万八千户焚烧掉庐舍，自北雍州奔往长安，姚恢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传布檄文，声称要"除君侧"，杨威将军姜纪领兵归顺姚恢，建节将军彭完都弃阴密奔回长安。姚恢到达新支，姜纪建议姚恢："国家的重兵大将都在东方，京师空虚，公急领精兵袭取，京师必克。"姚恢不听，南下攻郿城。镇西将军姚谌被杀败。长安震动，京师人心恐慌。姚泓飞马召姚绍，并遣姚裕及辅国将军胡翼度屯兵沣水西。扶风太守姚儁等都降顺了姚恢。东平公姚绍接到急报，率各路兵马西还，与姚恢军在灵台（今长安西）相持，姚赞留宁朔将军尹雅守

潼关，也带兵赶回。姚恢部众见各路人马四集，都很恐惧，部将齐黄等背叛姚恢投降朝廷。姚恢领兵攻姚绍，姚谠从背后杀来，前后夹击，姚恢等大败，杀了姚恢及其三个弟弟。姚泓痛心国家存亡关头还骨肉互相残杀，哭得十分伤心，命以公礼为姚恢下葬。

是月，刘裕留其子义隆守彭城，率领大军西进。

二月王镇恶不待刘裕大军便进兵渑池（今河南洛宁西），遣毛德祖袭击蠡吾城（今河南洛宁西），擒获秦将尹雅，尹雅杀死晋兵看守后逃走。王镇恶等领兵直取潼关，檀道济、沈林子自陕县以北渡河，攻下襄邑堡（今山西平陆境内），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东。檀道济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阪，不克。晋别将攻匈奴堡，被秦将姚成都杀败。

正当晋军全力西进，战争紧张之际，当月辛酉（十九日）晋荥阳守将傅洪以虎牢归降魏，晋军后方受到威胁。而秦主姚泓也调兵遣将，全力抗晋。以东平公姚绍为太宰、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督领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五万守潼关。又遣别将姚驴援救蒲阪。晋军得知军情有变，沈林子对檀道济说道："蒲阪城坚兵多，急切间难以攻克，强攻则伤亡必多，相持又拖延时间。王镇恶在潼关势孤力弱，不如与王镇恶合兵，全力争潼关，若得潼关，尹昭不攻自溃了。"

三月，檀道济、沈林子到潼关。姚绍领兵出战，被晋兵杀得大败，斩获上千人。姚绍退守定城（今潼关西），占据险要防守，对诸将道："檀道济等兵力不多，孤军深人，我分兵断其粮道，可坐擒敌军。"于是遣姚鸾屯扎渑池人关的大路以断绝晋军粮道。姚鸾命尹雅出兵，在潼关以南与晋兵交战，尹雅被擒。初四日夜，沈林子率精锐劫营，姚鸾被斩，杀秦兵数千人。姚绍又遣姚谠屯兵河上以断水道，沈林子领兵攻击，姚谠战败，退回定城。秦将薛帛以河曲（今山西永济至平陆一带）降晋。潼关遂形成相

持局面。

刘裕领水军从泗水入清河，将要溯河西上，先派使者向魏借道。此时，秦主姚泓也派使者到魏求救，魏主拓跋嗣便召集群臣商议，都说："潼关险要，刘裕以水军攻打很难，若登岸从北面攻击，势必要方便容易，刘裕声称伐秦，其心难测。况且秦是我婚姻之国，不可不救。应当发兵截断河的上流，不要让晋军西进。"博士祭酒崔浩说道："刘裕久有图秦之心，如今姚兴已死，姚泓懦弱，国内祸难不断，刘裕趁其危急而伐之，志在必得。若我军遏制上流，刘裕忿恨暴戾，必然登岸北上入侵，是我们代秦受敌。现在我国外有柔然入寇边境，国内饥荒缺粮，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发兵向南方则北方的入侵更厉害，救北方则南方又危险，这不是良策。不如借给他水道，听任刘裕西进，然后屯兵堵塞其东进道路。假使刘裕得胜，必感我假道之德；不胜，吾不失救秦的名声，这才是万全之策。况且南北民俗不同，假使国家放弃了恒山以南，刘裕也必不能用吴越之兵，与我争夺河北地域，怎能成为我国之患呢？为国家谋划，只顾及社稷的利益，岂能顾一女子！"议论者还是认为："刘裕西行入关，则担心我断其后路，腹背受敌；刘裕北上，则姚氏必然不肯出关助我，晋军之势必然是声击西而实击北也。"拓跋嗣为防晋兵北上，便命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又遣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率领步骑十万屯扎河北岸。庚辰，刘裕领兵顺河西进，任命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防备魏军。

当初，刘裕命令王镇恶等，若攻克洛阳，要待大军到后一起进兵。王镇恶等乘胜直趋潼关，被秦兵阻住不能前进，日子一久军中缺粮，人心慌乱，有的将领便想放弃辎重，撤回洛阳，沈林子按剑发怒道："许昌、洛阳已经平定，关右就要收复，战事成败决定于前锋，岂能沮得胜之气，弃垂成之功！况且大军距离还远，贼军气焰正盛，即便撤军也难得时机。"阻止了撤退的打算。

王镇恶派人快马返回向刘裕请求粮草援兵，刘裕招呼使者，打开船北侧窗户，指着河岸上魏军说道："我曾经命令诸将不可冒进，如今轻率深入。你看岸上的情形，我如何能派兵增援?"王镇恶等见后援无望，便亲自到弘农（今河南陕县）劝说百姓，百姓纷纷支援晋军，争相送来义租粮草，民众的"义租"，使晋军缺粮得以缓解，前锋军的形势转危为安。

刘裕船队顺河西进，魏人数千骑兵沿河北岸跟随晋军西行，晋军在南岸牵挽船只逆流而上，风高水急，常有船漂泊到北岸，往往被魏人杀害。刘裕派兵攻击魏军，才登岸则敌军已退走，晋军一退敌军复来。四月，刘裕遣白直队主丁旿率领将士七百人，战车百乘，战车上设置彭排树立一杆白毦。渡到河北岸，离水百余步，摆成卻月阵，护卫船队，命宁朔将军朱超石率二千人接应，带大弩百张，魏兵不解是什么用意，按兵未动，魏人见营阵已经列好，于是包围晋军营阵，长孙嵩领三万骑兵助攻，四面肉搏强攻，弩也无济于事，当时朱超石还带有大锤及矛很多，便截断矛为三四尺长，用锤锤击，一矛就洞穿魏军三四人。魏兵不能抵挡，被杀得奔溃而逃。死的兵卒无数。临阵杀了魏将阿薄干。魏兵退回畔城，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又击败魏兵，斩获数以千计。魏主拓跋嗣闻之，悔恨不听崔浩之言。下令不再阻遏晋军西进。刘裕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终于使从水路进兵方案得到实施。

这时，姚绍守住定城，檀道济等不能前进。姚绍又遣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领兵三千屯扎在河北的九原（今山西平陆境内），阻断河道固守，想截断檀道济的粮援。沈林子率军邀击，击破秦兵，斩姚洽、姚墨蠡、唐小方，三千秦兵几乎杀尽。沈林子屡破秦军截粮之兵，便派使人禀明刘裕："姚绍气盖关中，如今兵屈于外，国危于内，恐怕命不长久了。"果然，姚绍闻知姚洽等败死，愤恚异常，发病呕血，

将兵权交付姚谠便去世了。姚谠代替主将领兵，秦军兵力还称强盛，便领兵袭击沈林子，沈林子又击败了秦兵。

刘裕到达洛阳，巡视城防，嘉奖毛修之修葺之功，重加赏赐。

五月，晋齐郡太守（今山东临淄）王懿降魏，并上书说："刘裕在洛阳，魏军应发兵断绝其归路，可以不战而胜。"魏主拓跋嗣称善。这时崔浩在旁，拓跋嗣便问崔浩，并谈及当世大事，说道："刘裕伐姚泓，果然能获胜吗？"崔浩答："能胜。"接着说道："昔日姚兴好图虚名，而少实用。其子姚泓懦弱多病，兄弟相杀。刘裕乘其祸乱，又兵精将勇，怎能不胜。"拓跋嗣问："刘裕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道："胜过慕容垂，慕容垂凭藉父兄的勋望，恢复燕国功业，国人归顺，如同夜虫就火，故容易立功。刘裕奋起于寒微，不藉尺土之封，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平卢循，所向无敌，不是他才能过人，怎能这样？"拓跋嗣道："刘裕既已人关，不能撤退，我用精骑直捣彭城、寿春，刘裕将如何行动？"崔浩说："如今西有夏人，北有柔然，窥伺时机入侵，陛下既不能亲统六军，那么虽有精兵，却无良将，长孙嵩长于治国，短于用兵，非刘裕敌手。兴兵远征，不见有利，不如静以观变。刘裕伐秦而归，必篡夺晋室。关中民族杂居，风俗剽悍，刘裕想用南方教化之法施用于关中，无异于解衣包火。虽然留兵镇守，人情未洽，人心好恶不同，这就成为敌人可乘之隙。请陛下按兵息民，坐观形势变化，秦地最终必为我国所有。"拓跋嗣听罢笑道："卿预料得如此周详。"崔浩继续说道："臣曾经评论近世的将相名臣，王猛治国，是苻坚的管仲；慕容恪辅佐幼主，是慕容玮的霍光；刘裕平定祸乱，是司马德宗之曹操。"魏君臣谈论到半夜，遂决定了对刘裕假道伐秦的政策。

七月，刘裕至陕。沈田子、傅弘之率奇兵已人武关，秦戍守将史都弃城而逃，沈田子等进屯青泥（今陕西蓝田县蓝关），姚

泓急忙命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带兵屯峣柳关（即蓝田关）抵御晋军。

八月，刘裕到达阌乡（今阌乡西）。沈田子将攻峣柳，刘裕本来以这支兵为疑兵，将士只千余人，便遣沈林子领兵前往援助。此时，秦主姚泓本想亲率兵马抵御刘裕，恐沈田子袭击背后，就想先击灭沈田子，然后，倾全国兵力东进迎战刘裕。于是领步骑数万人直奔青泥。晋将傅弘之担心众寡不敌，沈田子道："用兵贵在出奇制胜，不在人多势众。况且现在众寡悬殊，敌军紧紧包围则我军无路可逃。不如乘其立足未稳，率先攻击"。遂领兵马先进，傅弘之随后跟进。双方交战，晋军被包围数重，沈田子激励士卒："诸君远道冒险，为的就是生死决战，建立封侯的功业就在今日！"晋军奋勇拼搏，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缴获了秦主御用乘舆等物，姚泓奔回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灞桥附近）。这时沈林子援军亦到，遂一同追击，关中郡县多暗中联络，归降晋军。

八月辛丑（初二），刘裕到达潼关，任朱超石为河东太守，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会合薛帛，共攻蒲阪。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合兵迎击，晋军战败，徐猗之战死，朱超石退回潼关。秦东平公姚赞遣司马国璠引魏兵紧随刘裕大军背后。王镇恶以大军在定城长期受阻，便请令率水军自河入渭，直取长安。刘裕应允，王镇恶领水军进发。这时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今陕西朝邑东蒲洋口）领兵西援长安，王镇恶随后追击。秦主姚泓率兵从灞上还军，屯兵石桥（长安城北面东侧第一门洛门的东北）接应各军，镇北将军姚强与姚难合兵驻扎泾上（泾河入渭水处附近），抵御王镇恶，王镇恶命毛德祖出击，攻破秦军，姚强战死，姚难奔回长安。晋兵直取长安，绕出秦军潼关、定城防线之后，姚赞遂自定城退守郑城（今陕西华县北）。刘裕从潼关率大军进逼。姚泓命姚丕守渭桥（今西安市北，即中渭桥），胡翼度屯守石积，姚

谠屯守灞东，亲自屯兵消遥园，(今西安西北)，防卫长安。

王镇恶乘蒙冲小舰，溯渭水而进，行船水手都在船内，秦人只见船进，不见行船之人，都惊以为神。壬戌（二十三日）清晨，王镇恶船到渭桥，令将士饱食后，全副武装登岸，后登者斩。将士登岸后，王镇恶下令弃船，渭水水流湍急，很快船只顺水漂走，片刻不见了踪影。此时姚泓秦兵尚有数万之众，王镇恶晓谕兵将："我等家在江南，这里是长安北门，离家万里，舟船衣粮都已经顺流漂走。现在如果战胜则功名成就，不胜则尸骨不返。别无他路，你等努力吧！"王镇恶身先士卒，众将士奋勇争先，杀奔秦军，在渭桥大败姚丕军。姚泓领兵来救，被败兵冲动，互相拥挤，践踏，溃不成军。姚谌等战死，姚泓匹马逃回宫中。王镇恶率军从平朔门进入长安，姚泓与姚裕等数百骑兵逃奔石桥。姚谠得知姚泓失败，领兵赴援，部下却溃散逃命，胡翼度投降晋军。

姚泓见大势已去，准备出城投降，其子佛念年方 11，不肯投降，登上宫墙自投而死。癸亥（二十四日）姚泓带妻子、群臣到王镇恶营垒请降。王镇恶号令严明，安抚百姓。九月，刘裕至长安，王镇恶到灞上迎接，刘裕慰劳说："成就我霸业者卿也！"

刘裕收取了秦国的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等送往建康，其余的金银珍宝缯帛财物都颁赏给将士。秦国王公大臣平原公姚璞、并州刺史尹昭、东平公姚谠及宗族百余人投降，都被杀掉，将姚泓送往建康，斩首市井。后秦灭亡。

刘裕于义熙十二年八月自建康出发北伐，至义熙十三年九月灭秦，前后经历一年又一月，乘后秦衰败之弊，尚且经过艰苦征战，才告成功。姚苌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建国，传姚兴、姚泓三位国君，计三十四年而亡。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宋书·武帝本纪》

《晋书·姚泓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刘裕灭后秦》

《中国历代战争史》

刘裕代晋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是一位较有才干的君主，东晋国势稍有振作。孝武帝到中年沉溺于酒色，朝中大权渐渐控制在其弟司马道子之手。孝武帝醉日多，醒时少，因酒后一句戏言竟断送了性命。一次在后宫与宠姬张贵人饮酒，张贵人年近30，孝武帝借酒玩笑说："年长色衰，人老珠黄，论年纪你要被废黜了。"张贵人妒恨怨怒之下，竟乘醉谋杀了孝武帝。司马曜时年35岁，正当壮年。

司马道子昏庸惑乱，竟然不追究此事，遂奉孝武帝长子司马德宗继承帝位，是为晋安帝。司马德宗生来痴呆，自幼口不能言，不辨寒暑冷热，饮食起居都得要人照料，焉能料理朝廷军国大事？司马道子执掌朝政，国家日趋衰败。

隆安三年（399），天师道徒孙恩起兵。攻州破郡，声势浩大，京师震动。朝廷命刘牢之领兵镇压孙恩，刘牢之部下参军刘裕屡立战功。

元兴元年（402），桓玄举兵讨伐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率军进入建康。转年，桓玄篡位，夺取了东晋政权，建国号为楚。元兴三年，刘裕与刘毅、何无忌、刘道怜等起兵讨伐桓玄，桓玄败死，晋安帝复位。义熙元年（405），刘裕有安定社稷、恢复晋室江山之功，加封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义熙二年，论匡复社稷之功，进封刘裕为豫章郡公，抚军将军刘毅为南平郡公，右将军何无忌为安成郡公。刘裕回镇丹徒。

义熙四年，刘毅等人不愿刘裕入朝执政，便商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坐镇京师；也有人提议刘裕在丹徒遥领扬州刺史，将京师事务交给孟昶。遂使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条建议向刘裕谘问。皮沈先去见刘裕记室参军刘穆之，备述了朝臣的商议结果，刘穆之假作如厕，秘密传书刘裕说："皮沈之言不可从。"刘穆之陪同皮沈来见刘裕，刘裕暗地征询刘穆之看法，刘穆之说道："晋室失落政权已久，天命已移，公起义兴复了晋室帝位，功高位重，眼下的形势容不得谦让做个镇将。刘毅、孟昶诸人与公都是布衣起家，共建大业，虽然一时推重公，并不心服，彼此势均力敌，最终必将相互吞并。扬州是国家根本，不能让给别人。以前把扬州刺史授给王谧乃是权宜之计，如今若再授人，便要受制于人。权柄一失，再难收回，将来的危险就难测了。现在朝议既然这样，应该考虑妥善答复。直接说我任扬州，不好措辞难以出口，只有这样说：'此事关系重大，容我暂时入朝，与诸公同议。'公到了京师，当着公的面，他们必定不敢越过您再授给旁人。"刘裕听从刘穆之建议，按所言行事，回京师争扬州刺史。于是，朝廷征拜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仍任徐兖二州刺史。刘裕回到朝廷，牢牢控制住京师。

五年，刘裕率军北伐，灭掉南燕。当刘裕北伐时，东晋的精兵强将都随他出征，乘此机会，卢循与徐道覆起兵反晋，攻州破郡，横行江南，镇南将军何无忌在豫章兵败被杀，东晋朝廷甚为恐慌，急召刘裕还师。刘裕接到征召之命，即日班师南返。抚军将军刘毅上表朝廷，准备率军讨伐卢循、徐道覆，刘裕寄书给刘毅称："我往年常与妖贼交战，了解其战术变化，妖贼刚刚取胜之后，兵锋不可轻视。应整军预备，待我回去你我一同进兵。"又遣刘毅从弟刘藩劝阻刘毅。刘毅大怒，对刘藩说道："我因为灭桓玄之功推让他罢了，你便以为我不及刘裕吗！"掷书在地。

遂发兵攻击徐道覆军，结果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战败。

刘裕带兵赶回建康，在京师外围击溃了卢循、徐道覆大军，六月，授给刘裕黄钺，掌握征伐之权，不久平定了卢、徐之乱。

东晋建国以来，依靠豪门大姓、世家贵族的支持维持统治，南方和北方的权门势家迭掌政权，到末年已经陷于政治混乱，土地和财富的兼并越来越严重，以强压弱，以富凌贫，两极分化和贵贱的对立日益加深，百姓流离失业，孙恩、卢循的起兵就是结果。桓玄很想做一番变革，却没能实行。刘裕出身寒微，又亲身参加了镇压各地的暴乱，对时政有清醒的认识。刘裕当政，便开始着手变革，缓和国内矛盾，遂发布政令，抑制豪强，安定社会。会稽余姚人虞亮藏匿亡命千余人，刘裕杀了虞亮，并且罢免了会稽内史宗室司马休之。其后，刘裕被改封为太尉、中书监。因为各地方权豪把持政权，选举的秀才、孝廉都是出自权势之家，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刘裕改革选举弊端，依照旧制举行策试，选拔真才，给予寒族士子进身之路。刘穆之举荐了谢晦处理太尉府事务，刘裕任命谢晦为参军。谢晦迅速审理了大量刑狱积压案件，正确无误。刘裕即署任谢晦为刑狱贼曹。一时间，刘裕身边人才济济。

刘毅有意扩张势力，请求兼督江州，朝廷允准之后，原江州刺史庾悦府中的文武将吏三千人都归入刘毅府中。

八年四月，朝廷任命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毅不满意，上表说荆州民户不过十万，资财贫乏，广州有出产丹漆的利益，要管辖广州。于是使刘毅加督交、广二州。刘毅性情刚愎，胸怀雄心大志，自认为起义灭桓玄、兴晋室的功劳，与刘裕不相上下，不甘心情愿去镇守荆州做个一方藩镇。刘裕平素未曾读书，刘毅却常常附庸风雅，故尔朝士中有清望者多半归心刘毅，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与他交情很厚，刘毅便上奏请任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修之为南郡

太守，用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刘毅到京口（今江苏镇江）辞拜陵墓，刘裕与他在倪塘相会，宁远将军胡藩向刘裕说："公认为刘卫军能长久位居公之下吗？"刘裕默然沉思了很久，才反问道："卿以为如何？"胡藩道："统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胜，刘毅当然服你。至于涉猎传记，谈论吟咏的事，刘毅很以雄豪自许，所以缙绅官宦，白面书生多半归心于他。恐怕最终不能居公之下，不如借会见之机制服他。"刘裕道："我和刘毅都有复晋之功，现在刘毅的过错没有显露，不能自相谋算。"

九月，刘毅到达江陵（今湖北江陵），任用自己的部下更换了许多地方官。到任时又带走豫州旧属下文武官员、江州的士卒万余人随他西上。刘毅到任后患病，很是沉重，郗僧施等人担心刘毅若是一死，其党羽部下要遭祸，便劝刘毅请求朝廷，让他的从弟兖州刺史刘藩来做副手。刘裕见他处处戒备，不断增强力量，终究要和自己势不两立，便想及早下手。于是假称允许了刘毅请求。九月，刘藩入朝到建康，刘裕立刻派人收捕刘藩与谢混，说他们图谋不轨，赐死在狱中。随后上表讨伐刘毅，发布以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为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刘裕部下参军王镇恶请令愿为前锋，率兵出发。刘裕兵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命王镇恶为振武将军，与龙骧将军蒯恩带领百只战船先行进发，临行时告诫二将："如果可以攻击敌军，便进击；不能攻击，焚烧掉敌船，在水边扎营等待大军。"王镇恶领水军昼夜兼程前进，扬言说是刘藩领兵前来。

十月，王镇恶军到豫章口（今江陵东南），离江陵二十里，舍船登岸，蒯恩军在前，王镇恶军随后，又传令每船留二名兵士，在岸上树立旗帜，安放战鼓，吩咐说："估计我军将要到江陵城，便擂鼓，虚张声势，好像大军在后面。"又另派一支兵烧掉敌方泊在江边的战船。王镇恶领兵直奔袭取江陵城，吩咐前军

士兵："若有人盘问，就只说是刘兖州（指刘藩）到了。"果然江边的守军及附近居民安然不动，毫无觉察。离城只距五六里，遇到刘毅部将朱显之，问道："刘兖州何在?"王镇恶部卒答："在后面。"朱显之来到队伍后面并未见刘藩，却见军士扛担着攻城器械，心中起疑，此刻望见江边船只起火，鼓声齐鸣，才知并非是刘藩的人马，便纵马飞驰回城报信，赶快下令关闭各城门。王镇恶也挥军飞奔而进，城门未及下关拴牢，王镇恶军便冲进城去。在城内两军展开格斗。王镇恶领兵攻打金城，城内兵渐渐不支，纷纷逃散，王镇恶令兵士挖穴攻人金城，派人将讨伐刘毅的诏书、檄文以及刘裕的亲笔信出示给刘毅，刘毅一把火烧掉并不观看，与司马毛修之等督率将士奋力抵抗。刘毅部下从东方随来的士卒与王镇恶所带的官军，多是亲戚故旧，边格斗边谈话，知道刘裕亲自来了，震慑的威力使刘毅部下丧失斗志，到夜晚，已经死伤逃散所剩无几了。刘毅左右亲兵关闭了东西阁门，还在顽强抵抗，王镇恶怕黑暗中自相伤害，便领兵撤出战斗，从三面围住金城，开放南面。刘毅疑心南面有伏兵，到半夜时分才率亲兵三百人开北门突围而出。刘毅逃到城外，人困马乏，便投奔牛牧寺。当初桓蔚战败，逃奔到牛牧寺，僧人因为保护掩藏他而被杀，到此刻，寺中僧人拒绝刘毅道："昔日亡师容留桓蔚，被刘卫军所杀，今天实在不敢容留人。"刘毅叹道："为法自弊，竟至于这样的下场!"遂自缢而死。次日，居民发现尸体后报告王镇恶，将刘毅尸体斩首示众，其子侄也都被杀，刘毅之兄刘模逃往襄阳（今湖北襄樊），被鲁宗之杀了。

十一月，刘裕到江陵，杀了郗僧施，赐王镇恶为汉寿子爵位，下令宽租税，减调役，省刑罚，礼待名士，荆州人民欢欣鼓舞。

与刘裕等人一同起义的诸葛长民，很有才干，却行为不检点，骄纵贪婪，不恤政事，掠夺珍宝美女，营建宅第，残虐百

姓。因为多不法行为，怕被刘裕治罪；他又见一同起兵的功臣，这时都受到刘裕的嫉恨，心中甚是不安。刘裕征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守府事。此刻刘毅被杀，诸葛长民更加惊怕，对亲信心腹人说："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事就要临头了。"一次，他屏退左右，询问刘穆之："外界纷纷传言，都说太尉与我不和，为什么这样呢?"刘穆之道："太尉溯江而上远征，将老母幼子托付给您，有什么不和!"诸葛长民心中稍觉安定。其弟诸葛黎民劝说长民："刘毅被杀，也是诸葛氏的不利，不如乘刘裕未归图取他。"长民犹豫不决，叹息道："贫贱常想富贵，富贵必蹈危机。今日想做个丹徒布衣，也做不成了。"诸葛长民寄书给冀州刺史刘敬宣："刘毅自取灭亡，现在异端将要杀尽了。世道多难，你我要相与共图富贵。"意在联络刘敬宣，相互支持对抗刘裕。刘敬宣回书称："下官自义熙起义，忝任三州七郡，常怕福过灾生，思虑避盈满以免祸，取富贵之道，实不敢当。"拒绝了诸葛长民的劝诱，并且使人将诸葛长民的书信送呈刘裕。刘裕本来就疑忌诸葛长民，此时决心除掉他。

九年二月，刘裕传令自江陵东还，运载辎重的船只不断开出，刘裕的行期却每每推迟，在约定的日期并未到达，诸葛长民和百官在京师新亭恭迎刘裕几次都是空等。至月末，刘裕轻舟直入，秘密回到建康。三月初一日晨，诸葛长民得知消息，大吃一惊，急忙赶往刘裕府中相见，刘裕令壮士丁旿埋伏在帐幔之后，引诸葛长民入室，屏去随从闲谈，二人说不尽的知心话，诸葛长民甚是喜悦，丁旿突然跳出，在座位上拉杀了诸葛长民。刘裕命人捕捉诸葛黎民，黎民骁勇过人，与刘裕差来的武士苦斗而死。其弟大司马参军诸葛幼民、宁朔将军诸葛秀之都被杀害。

十年，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是司马氏宗室重臣，在江陵深得江汉民心，拥兵镇守京师上流。刘裕视宗室强藩为将来成就大事的障碍，便想翦锄宗室势力，司马休之首当其冲。司

马休之之侄谯王文思在京师，喜好结交侠士，招纳武人，刘裕十分憎恶。三月，有司官员奏文思擅自捶杀命官，朝廷下诏诛杀其党羽，宽宥了文思。随后将文思押往江陵交司马休之管教。刘裕本意是想除去文思，司马休之只是上表请废黜文思的爵位，并寄书给刘裕陈词谢罪，刘裕甚是不悦。为防司马休之先发制人，刘裕任命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预作防备。

十一年正月，刘裕决定武力削除荆州。首先在京师逮捕司马休之之子文宝、侄文祖，赐死在狱中，遂后领兵西征。司马休之上表朝廷，揭露刘裕的野心和翦锄宗室的阴谋。

三月，刘裕兵到江陵。雍州刺史鲁宗之自料难为刘裕所容，便与司马休之结盟，率其子竟陵太守鲁轨带兵到江陵会合。

刘裕寄秘信招诱司马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韩延之很重义气，誓死不肯归顺刘裕，因为刘裕之父名翘字显宗，韩延之更改自己字为显宗，改儿子之名为翘，表示决不臣属刘氏。

刘裕令檀道济、朱超石领步骑军出襄阳。江夏太守刘虔之兵屯三连，修桥屯粮等待檀道济军，檀道济未到，鲁轨袭杀了刘虔之。刘裕又命其婿振威将军彭城内史徐逵之，率领参军王允之、蒯恩、沈渊子出兵江夏口，又被鲁轨在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击败，徐逵之、王允之、沈渊子战死。此时刘裕大军泊在马头（今安徽怀远东南），得到兵败消息大怒，即日渡江。刘裕督率将士登岸，鲁轨与司马文思领兵四万，临峭岸列阵。因为岸崖陡峭，又由敌军把守，刘裕部下将士难以登岸，刘裕亲自顶盔贯甲准备强攻，诸将都上前劝阻，刘裕更加恼怒，太尉主簿谢晦抱持刘裕不放，刘裕抽出剑来指着谢晦怒吼："我杀了你！"谢晦劝道："天下可以没有谢晦，不可无公。"建武将军胡藩领游兵在江湾，刘裕传呼胡藩强行登岸，胡藩面有难色，刘裕传令军法从事要斩胡藩。胡藩用刀头砍劈峭岸，仅能容下足尖，便踏穴腾身跃上岸去，随后跟上的将士渐渐增多，一上岸便奋力拼死苦战，荆

州兵抵挡不住，往后退却。刘裕指挥将士展开攻击，司马休之溃不成军，与鲁宗之奔往襄阳，鲁轨留守石城（今湖北钟祥）。江陵遂告平定。四月，刘裕传令进兵追击。

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部下的参军司马道赐，是司马氏宗室中的远枝亲属，闻知刘裕攻打司马休之，便谋杀了刘敬宣，企图占据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响应荆州，不久便被刘敬宣部下文武佐吏平定了叛乱，司马道赐被杀。

五月，刘裕部将赵伦之、沈林子攻破石城，司马休之、鲁宗之领兵来援，城已陷落，便与鲁轨逃奔襄阳。来到城下，鲁宗之部参军李应之闭门不纳，司马休之等不能入城，只好与鲁宗之父子、谯王文思等一起出奔后秦。鲁宗之素来得人心，在危急中居民争相护送他出境，王镇恶领追兵直赶到边界才回军。

刘裕既已平荆州，加封为太傅、扬州牧，又特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八月，刘裕回到建康。十二年八月，刘裕留其子义符、左仆射刘穆之留守，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后秦，借北伐树立威信，建立大功，为最终篡夺晋朝铺平道路。十一月，刘裕乘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遣左长史王弘回转建康，讽谕朝廷请求九锡的荣典。这时期刘穆之执掌留守的重任，而旨意决策都由刘裕亲自决定，自北方传达。刘穆之素知刘裕疑忌心极重，诛除异己毫不留情，自己身居留守而无实权，因此心情郁闷，惶惧不安，遂发病。十二月，朝廷降诏，以刘裕为相国、宋公，备九锡之礼，爵位在诸侯王之上。刘裕假意辞让不受。十三年九月，刘裕攻破长安，俘获后秦主姚泓，灭了后秦。司马休之等人逃往北魏。十月，晋廷下诏，宋公刘裕进位为王，增加封地十郡。刘裕再辞不受。十一月，刘穆之病死。刘裕见朝廷中没有可信赖托付之人，而且内歼敌寇，外灭强国，威望已经树立，也急于返回朝廷，准备夺取东晋政权。十二月，刘裕从长安出发南返。

十四年六月，太尉刘裕接受相国、宋公、九锡的诏令，国内

施行大赦，尊崇他的继母萧氏为太妃，任命军谘祭酒孔靖为宋国尚书令，左长史王弘为仆射，从事中郎傅亮、蔡廓为侍中，谢晦为右卫将军，右长史郑鲜之为奉常，行参军殷景仁为秘书郎。

十二月，刘裕想起流传的谶语说："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便想到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传位给了安帝，尚缺少一帝之数以应谶语，刘裕为了满足二帝之数，便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安帝左右侍者秘密策划，要下毒毒死安帝，另立琅邪王司马德文。安帝司马德宗是个白痴，傀儡，他的同母弟司马德文却与他不同，有悟性，笃信佛教。因为安帝不慧，司马德文常在安帝左右侍奉，冷热饮食起居都照顾得很周到，对其恭敬谨慎很有好评。司马德文时刻不离安帝左右，王韶之在很长时间找不到机会下手。适逢司马德文生病，移出宫外居住，王韶之赶紧乘机下手，缢死了安帝。刘裕声称奉有安帝临终遗诏，拥戴司马德文即皇帝位，是为晋恭帝。

转年（419）改年号元熙，恭帝立褚氏为皇后。随后征召刘裕入朝辅政，又重申前命，刘裕进封为王，以海陵、新蔡等十郡增加宋国的封地。八月，刘裕将宋国都城迁到寿阳（今安徽省寿县），任命刘怀慎为前将军、北徐州刺史，镇守彭城（今江苏铜山）。十月，刘裕以其子刘义真为扬州刺史，控制京师重地。十二月，赐给刘裕特殊礼遇，戴十二旒的王冕，建天子旌旗，乘坐金根车，驾六匹马的威仪，又进封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刘裕步步向帝位迈进。

晋司马氏宗室中有才能、有声望的人，均被刘裕除掉。司马楚之折节下士，其叔父司马宣期、兄司马贞之都死了，从祖司马休之逃奔了后秦，他便想聚众复仇，招集了上万人屯据长社（今河南长葛西）。刘裕指使刺客沐谦前去刺杀司马楚之，司马楚之待沐谦甚好，沐谦想下手又无机会，便在夜里装病，知司马楚之必来探视，趁机行刺。司马楚之果然亲自拿着汤药前来，情深意

厚，沐谦很受感动，不忍下手，便从席下拿出匕首，说出实情，并留在司马楚之身边做了卫士。司马氏宗室有很多人都逃亡到河南，司马文荣率领千余户迁到金墉城以南，司马道恭带领三千人在城西，司马顺明带领五千人迁居陵云台，司马楚之后来也迁到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以后都归降了北魏。

二年四月，刘裕受诏入朝辅政，命其子刘义康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因义康年幼，便任命刘湛为长史辅佐他。六月，刘裕来到建康，准备最终完成禅代之事，登基做皇帝。傅亮秉承刘裕密旨，请恭帝禅让帝位，起草了诏书，请恭帝写诏，恭帝强颜欢笑，欣然对左右侍从说："桓玄篡位时，天命已经更改，由刘公重又延续了晋朝将近二十年，晋朝天下早就失去了，现在禅让江山又有什么可怨恨的?"于是在赤纸上书写诏书，公布天下，禅让了帝位。恭帝逊位后迁居琅邪王府邸，宋王刘裕奉表章逊让，恭帝已经出宫而去，于是陈留王刘虔嗣等文武官员二百七十人，以及宋国的群臣属下，一同上表章劝进。刘裕还表示谦让，太史令骆达又陈奏天文星象，符瑞吉兆数十条，宣示天命所在，群臣百官又坚持请求，刘裕才答应接受帝位。

在南郊设坛，用柴燎之礼告天，宣告策命，刘裕登上皇帝宝座，刘裕便是南朝宋的开国君主宋武帝，建立了宋朝。改元为永初，封晋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食邑一郡。刘裕又封赠了祖先父母、亲属宗室，功臣宿将，立刘义符为太子，封诸子为王，刘义真为庐陵王，刘义隆为宜都王，刘义康为彭城王。

当初刘裕扶立司马德文为帝时，一心要使晋室绝后，以便自己夺取帝位，每当恭帝的妃嫔怀孕生下男孩，刘裕便指使恭帝褚皇后之兄侍中褚淡之、太常褚秀之千方百计将婴儿杀害，或者威逼利诱宫人暗地下毒，务使恭帝断绝子嗣。一年后，刘裕迫不及待，便夺位禅代。司马德文被封零陵王，居住在秣陵（今江苏江

宁)。永初二年，刘裕感到留着晋朝逊帝，人心不死，终为祸根，便命张伟携带药酒去毒死司马德文。张伟行在中途路上，反复思量，毒死故主落得千载骂名以求生，不如做个晋室忠臣而死，便饮药自尽身亡。司马德文虽脱过这次厄运，深怕大祸临头，终日在忧愁恐惧中度日，褚皇后形影不离，紧紧随侍在他身边，同居一室，饮食服用都由褚皇后亲手调制，时时防范，严密戒备，故尔刘裕差去谋害司马德文的人，难以找到机会下手。是年九月，刘裕使褚皇后之兄右卫将军褚叔度、褚淡之去看望褚后，借兄妹在别室叙话的机会，兵士跳墙入室，强逼司马德文服毒自尽，司马德文不肯饮药酒自杀，说道："佛教教义说自杀的人不能再投胎为人身。"于是，被兵士用被掩捂，窒息而死，终年 36 岁。

刘裕出身寒族，凭藉着北府兵灭桓玄，平卢循，北伐南燕、后秦，他的谋略才能和盖世武功，使他走上政治的巅峰。他坐皇帝不到三年便去世了，他一手建立了宋朝，开创了宋朝初年的发展与稳定。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安帝本纪》、《恭帝本纪》、《刘毅传》、《诸葛长民传》

《宋书·武帝本纪》

《通鉴纪事本末·刘裕篡晋》

侨置与土断

西晋统一全国以后，只经过了短时期的安定，便陷入战乱，晋惠帝时期爆发的八王之乱，断送了西晋的统治，也使广大民众再次经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少数民族武装的兴起，敲响了司马氏西晋政权的丧钟，刘渊汉政权的迅速崛起，兵锋的锐利，摧毁了西晋朝廷，先是晋怀帝被掳，继而建兴年间愍帝被俘，西晋遂宣告灭亡。

司马睿在南方建立政权，延续司马氏晋朝的统治，这就是东晋。

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异常残酷，被称作"汉狗"、"汉贼"、"头钱价汉"，本来战争已经使广大汉族人民深受创伤，再加上异族统治的欺凌盘剥，更使得汉人难以生存。饱受战争摧残和民族压迫的民众，何处是生路呢?

这一时期，张轨占据凉州，保境自守，仍然尊奉晋朝，是汉族人的地盘，凉州又处于西北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社会比较安定，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说是战乱纷争的北方只有凉州相对地平静无事。于是，不少汉族人士逃往凉州求生。

鲜卑族慕容氏在东北地区建立前燕，慕容廆击败了企图兼并它的入侵者，效仿汉人政权立国建制，发展生产，户口大增，也有不少的汉人投奔前燕谋求生路。

广大汉人最主要的流向，便是南方。东晋政权在南方建立，那里仍然是晋朝的天下，南方地域广阔，州郡众多，足可以安身定居。南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足可以安家立业，维持生计。所以北方人士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方，躲避战乱，逃离异族统治地区。“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的民众逃到南方的超过半数。

自从八王之乱以来，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以外，都外逃避难，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也凭仗着武力强迫人民迁徙。北方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是从刘渊起兵开始，特别是永嘉七年洛阳陷落以后，人民避难逃亡的潮流不可遏止，向东北、向西北、向南方大量迁移。

中原人士流亡南下，在东晋出现过几次高峰。

永嘉元年（307）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例如祖逖率领家族乡人南渡就在这时。

永嘉七年（313）洛阳失守，石勒大军南进到葛陂（今河南新蔡北），又一次大量北方人南迁。

永和五年（349），梁犊起义，后赵石虎死后，内乱爆发，桓温出兵北伐前秦和前燕，败退时许多人民南迁，桓温并迁关中、洛阳数千家到南方。

太元八年（383）苻坚伐晋，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再度分裂，中原人民相率南渡。

义熙年间刘裕北伐南燕、后秦，义熙十二年（416）收复的关中地区又告丧失，刘裕死后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极多。

所以东晋时期南渡人民数量是很大的，仅侨置的南徐、南兖、南豫、雍等几州，户数达到十八万，人口数达九十六万。

东晋政权刚刚建立时，尚不稳固，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一面联络南方士族，取得南方民众的支持和承认，一面招纳北方南下的士族和民众，“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即选取南渡士

人，帮助他合力建设偏安政权。因此，司马睿得到南方士族顾荣、纪瞻等人的合作，又收罗了南渡北方士族，逐步奠定了政权基础。司马睿从南渡人士中征辟任用了属官百余人，当时称之为“百六掾”，任命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谘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壸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頵为行参军，前太傅掾庾亮为西曹掾，起用了一大批原西晋的官员参政。北方士族和南方的士族相结合，重建晋朝统治。

北方人南下避难的主要地区有三处，长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

长江下游地理位置极重要，东晋建国选定的都城就是三国时吴国的京师建康，京畿属于丹杨郡，所以丹杨郡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在建康以东附近的三吴地区，即吴郡（今江苏苏州）、义兴（今江苏宜兴）、吴兴（今浙江湖州）地区，都是原江南吴人聚居的地方，南方士族在这里最有势力。南渡的北方士族不能在这些地区立足，侵害南方士族的利益，只有选择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地方去“求田问舍”，求得生计。距离建康较近而且吴人士族势力薄弱的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临海郡（今浙江临海东南）等地，最为理想，上层士族如王、谢等门第郡望很高的大族多居于这些地方。中层士族或门第稍次者，不能在新都近旁立足，便选择距京师不甚远又地广人稀之地，如京口晋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下层阶级的民众，社会地位低下，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集团，难以和当地吴人抗衡，大部分分散杂居在吴人生活的地域。

长江中游的南来士族，多是来自中原南阳（今河南南阳）、新野各地，其地位不如王、谢大族，就近过江后居留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南郡一带。江陵是中游重镇，荆州的治所，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位置也很重要。至于次等士族和雍州、秦州等地流民，多数栖止于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

另外，关、陇各地流民也大量涌入长江上游，在汉中、成都等处定居下来。

流民的安置是急迫而且关系重大的问题。西晋初年，由于灾荒严重，齐万年造反，使大批西北地区的流民进入西南四川等地，因为未能妥善安置，流民受到压迫欺凌，引起变乱，流民领袖李特、李流、李雄起兵反叛，攻州夺县，杀害驱逐官吏，在蜀地建立独立政权——成汉。这教训是深刻的，处理不当，西晋流民起义事件将会重演。

东晋仍然实行西晋以来的州、郡（国）、县三级体制。只是由于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才出现特殊的行政建置，在地方实行侨州、郡、县制度，以妥善安置南渡的中原士庶。

实行这一制度，是因为南来的北方人在观念上认为侨居南方，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想象着终有一天会收复中原，重返故土；同时也是为了不使南北士族衣冠失序，仍然保持原有的郡望门第，标榜旧有的门阀，以辨身份高低，地位的尊卑贵贱。所以虽然是侨居在异地，却仍然保留着中原的州名、郡名和县名。北来士族在侨置的州郡县，也可缓和与南方士族的矛盾，避免冲突。

东晋设立侨州郡县，始于元帝太兴三年（320），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便在建康立怀德县安置琅邪国（今山东半岛东南）的流民。在这以后，侨州达到几十，侨郡上百，侨县多达几百个。侨州郡县分布的中心在扬州、荆州两大地域，即集中在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扬州附近和中游中心荆州附近。扬州的侨州郡县多数设置在丹阳晋陵、广陵（今江苏扬州）等郡；荆州的侨州郡县则多数设置在江陵、南郡、襄阳各处。

如中原的司州（今河南一带），永嘉以后沦陷，被汉赵刘聪占据。元帝在徐州侨置了司州，司州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北）人流入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便侨立了弘农郡。此外，又在武陵

郡的上明（今湖北松滋西）侨立了河东郡（原郡在今山西一带），统辖安邑、闻喜、永安、临汾、弘农、谯、松滋、大戚八个县。永和五年（349）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又设置了河南郡。

再如兖州（今山东一带），全境沦为后赵石勒辖地。流民过江后，元帝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置兖州，明帝任郗鉴为兖州刺史，寄居在广陵，侨置了濮阳、济阴、高平、太山等郡。后来改称南兖州。

其他如豫州（今河南湖北一带）侨立于江淮之间，雍州（今陕西一带）侨立于襄阳等等。

侨置的郡县本来是因为北方人口流动到南方设立的，以籍贯相同的民众设置与北方名称相同的侨州、郡、县，但事实上，同一州郡的人南渡后并非处在一地，于是出现了同名的侨置州郡，如济阴郡、阳平郡，都有南北二个。另外，也有不同州郡的人口侨居在同一地区的，也仍然按照其旧有的籍贯，于是出现了几个侨郡县共治一地的情况。如成帝咸康四年（338），京口一地成为魏郡、广州、高阳、堂邑各侨郡的共同治所。因此，东晋时期“双头州郡”的现象并不罕见。所谓双头州郡，就是两个州郡治所同在一地，一个官长兼任两地刺史或郡守，如梁州与南秦州合治南郑，巴西郡与梓潼郡合治涪县（今四川绵阳东）。

东晋末期刘裕北伐，收复的山东、关中等地州郡，为了不致和在南方侨置的州郡名混同，便在州郡地名上加“北”字以示区别。后来这些地方再度沦陷，结果这些加“北”字的州郡又侨置于江淮之间，于是旧有的侨州、侨郡地名上加“南”字来区别。再加上东晋的疆域不时有伸缩，地方建置有增有减，经常变化。

南方原有的州郡县划分，或以山、或以水划分界线，常有犬牙交错的现象，在原州郡县界内再划出侨置的州郡县，使得侨州郡县与实州郡县界线更复杂难以区分，更由于战争、政局的变动，隶属关系的变动，州郡县分合无常，造成极为复杂的状况，

就连生活在离此时很近的史学家沈约也搞不清楚。

因为北方人口大量涌人南方，带来了中原各地高度的文明，发达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勤劳朴实的作风等，也为南方的开发和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

王导执政时提出“俭以足用”政策，实行“镇之以静”方针，使基础不稳、帑藏空虚的东晋朝廷逐渐扭转了困境，获得稳固的发展。在战争频繁情况下，王导等人建议设置学校，设立史官，制订各项制度，使政权初具规模。沿着这条路线，经过南北人民的共同开发，凭藉南方土地资源的富足，慢慢出现了“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局面。到孝武帝时，局势比较平定，天时正常，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原先晋陵郡人烟稀少，没有河塘沟渠，田地荒芜。元帝太兴四年张闿任晋陵内史时，开曲阿新丰湖，兴修水利，灌溉田地八百余顷，年年丰收。孔愉任会稽内史时，修复旧陂，灌溉农田。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相应发展，“不耕之夫，动有万计”，弃农从事工、商业的人非常之多。

北方侨民在这些地区也形成了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居住在晋陵郡的流民产生了战斗力很强的著名的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击败苻坚，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和刘裕起兵灭桓玄等战役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出现了谢玄、刘牢之、刘裕等著名将领。居住在襄阳侨置的雍州的侨民，也形成了一个武力集团，庾亮、庾翼、桓温、桓玄，都依靠这个集团有所作为，直到梁朝梁元帝、萧詧等人建功立业，都与这个集团有关。

在侨置郡县中，朝廷对北方侨民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只要注籍侨州郡县户口，就可以获得优抚，免除调役。在当时，兵役、劳役和国家租调是农民的沉重负担，侨民获得免除调役，激发了劳动积极性，也吸引了北方庶民的南渡。世家大族在南方建立并发展庄园别墅，吸收部曲、佃客。许多流民进人南方，也不得不

依附世家大族来获得耕种的土地，这种荫户或称客户的大量出现，自然影响朝廷税收，因为势家豪族荫附的人户，即佃户、部曲等，不向政府呈报户口，政府对这些人口无法控制，也不向政府服役纳税。

侨州郡县制度的实行，使“版籍为之混淆，职方所不能记”，即各地界线不清，户籍混乱，给朝廷和地方的管理造成困难，徭役的征发，租赋的征收都带来麻烦。同时，世族大姓乘机挟藏户口，朝廷财赋收入严重受损。又由于北方侨民已经有了安定生活，从事生产，朝廷认为过去实行的优抚等政策，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为了财阜国丰，便取消了优抚政策。鉴于以上诸原因，遂施行了土断政策，即将行政和地域合并为一，把侨寓的户口编入所在郡县。

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开始施行土断。咸康七年（341）四月再次土断，晋成帝下诏：“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从王公到庶民，就所在地落实户籍。这次施行黄籍、白籍两种户籍，是为了使北方侨民保留着将来收复故土后，还有恢复原籍的可能。黄籍是正统的土著居民，立黄色的户籍，北方侨民另立白色的户籍。

哀帝兴宁二年（364）三月初一日，又严厉实行土断，大阅户人，这就是“庚戌土断”。这也是最著名的第三次土断，实际主持这次土断的是掌握朝廷大权的桓温，重点是查实隐匿不报的户口，打击隐瞒荫附客户的世家大族。如东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违犯不得藏户的禁令，隐匿五户，桓温上表指控司马玄犯禁，被收付廷尉治罪。当时王彪之任会稽内史，推行土断之后，查出隐匿户口收归官府的多达三万余口。这次土断执行严厉，成效显著。经过这次土断，使财阜国丰，国力增强。

随后，安帝义熙八年（412）再行土断。自庚戌土断以来，时间一长，弊端又生。该年十一月，刘裕袭杀了刘毅，在江陵发

布文告："江州、荆州凋敝残破，百姓困乏，受劳役困扰，贫穷无财。仍然刻剥征收，不加减免。近来因为军事征战，来到江、荆二州，越发现民生困苦。自今凡租税调役，全部以现有实际户籍为准。地方守令得利，不供国家急需的，一切免除。州郡县各级官吏，都要依据尚书省定的制度查实户籍。"紧接着，义熙九年（413），因为山川湖泽都被豪强占夺，百姓砍柴捕鱼都得交钱纳税，刘裕下令禁断，随后上表："自永嘉之乱，流民托身淮海，来到南方，朝廷有匡复计划，人民有思返故土之心，尚不及安定民众，治国宁民。及大司马桓温实行庚戌土断，使南北人民安居乐业，才使得财阜国丰。从那时至今，又经过数年，制度渐被废弛，户籍杂乱，人口流动，有损王化，影响国计民生。侨民居住南方已经几代，先人坟茔已然成行，父母之邦就是自己求生的桑梓之地。终生生活之地应当敬爱。请依准庚戌土断政策的科条，继续施行。"于是，依地界施行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侨民、居住晋陵的不断之外，其他许多侨置的郡县多被合并或裁撤。

这是刘裕当国主政施行的土断，开始时，势家大族会稽四姓中的余姚豪强虞亮，因为藏匿流亡人口千余人，被刘裕处了死刑，引起极大震动，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土断得到雷厉风行的贯彻。经过这次土断后，直到南朝，仍然发生过多次土断。从此，流民和土著的差别渐渐缩小，乃至消失。

东晋推行土断，撤销侨置州郡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持财政收入，便于管理和征收赋税，征发劳役。土断的结果，有些南方的郡县转为侨州郡管辖，使侨置的州郡有了实际辖地。如义兴郡本来属扬州，因南徐州所属的许多侨郡县和义兴郡接界，因此就把义兴郡改属南徐州管辖。于湖县本属扬州丹阳郡，以后变成淮南郡的治所，当涂县属淮南郡，便在于湖县境内侨置了当涂，这时于湖反而被侨置的当涂县代替了。这样不仅没有彻底撤除侨置郡县，反而把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设置搞乱。

东晋的多次土断，使北方侨民和南方土著民众统一编籍，消灭差别，侨置的州郡县经合并裁撤也相应减少，政府掌管的户口人口增多了，征调的对象增加了。同时北方侨民取消了优抚待遇，使政府征发徭役有了充足来源，租调赋税收入激增，所以出现了“财阜国丰”现象。但是，民众的负担沉重了，田租增加，劳役沉重，范宁曾说：“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生儿不敢养活，鳏夫不敢娶，寡妇不敢嫁。”而且征发兵役也厉害，庾翼北伐时，征发江、荆六州奴及车牛从事运输，引起百姓怨望。晋末司马元显征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称“乐属”，充兵役，导致了三吴地区大乱，孙恩造反起兵。东晋对民众的榨取奴役，使得民不聊生，更兼豪强大族欺压侵夺，下层民众困苦不堪。

从西晋八王之乱开始，大规模兴起于永嘉年间，此后不断出现的民众流动状况，导致了东晋侨置州郡县的出现。东晋一朝的兴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活动，都与之紧密相关。因为侨州郡县设立发展又引起土断政策实施，这是东晋的特殊现象，但是却是极重要的现象，历来被人们关注。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成帝本纪》、《地理志》

《宋书·武帝本纪》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六朝史》

葛洪炼丹

东汉时期道教有了很大发展，早在公元2世纪道教的经典《太平经》便已经成书。顺帝在位的时候，于吉的弟子宫崇曾经向朝廷进献《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此后太平道、五斗米道都广泛传播，信徒众多，形成组织很庞大的民间道教组织。灵帝中平元年（184）二月，太平道首领张角发动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七月，汉中张修领导的五斗米道也起义响应，在严厉镇压之下起义失败。然而道教的影响和传播仍然盛行不衰，道教的宗脉也世代相传，在融进了神仙方术、巫术幻术、采药炼丹、占卜星相、谶纬内学等等多种内容之后，更加丰富多采，气象万千。三国魏晋时期，更是在社会上层流行，神仙长生，不死成仙的风气越发炽盛。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位道教史上和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葛洪。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杨句容（在今江苏）人。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死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活了81岁。他出身于宦宦之家，其祖上在西汉末期曾经担任荆州刺史，王莽篡位时，弃官后与东郡太守翟义一起起兵讨伐王莽，被王莽击败，遇赦免死。王莽担心他宗族强盛，终是后患，便将其流放到琅邪。葛洪这位祖先的儿子浦庐，因为起兵辅佐光武帝刘秀有功，东汉初年封为车骑将军，后升迁骠骑大将军，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在开国初年，浦庐之弟文随他征战，屡立战功，浦庐便上疏为弟弟请功，朝廷认为葛文是私自随兄从军，不

在军籍名册，不准论功行赏。浦庐申辩说："弟与我一同冒矢石作战，伤痕满身，损坏了右眼，我弟没有得到尺寸报答我却享受高官厚禄，于心怎安?"上表朝廷请求将封赐转封给弟弟。汉朝廷为成全他的义气，故而特许了他的请求。葛文不得已接受了爵位，就在博望里府第为葛浦庐营造宅舍，又分出地租收入和俸禄，供养从征的部下。葛浦庐劝阻他也不听。葛浦庐想，这不是更加重国人负担吗？于是假托外出，遂渡江到南方，在句容安了家。在那里葛浦庐领着子弟躬耕种地，读书以度日。葛文累次使人迎接其兄，葛浦庐始终不肯回去。葛文又使人守护其兄在博望里的宅舍，期待着其兄返回，以至几世无人去居住。

葛洪的祖父葛系，学问渊博精深，文才之高，一时无以伦比，具有经世治国之才。在吴国做官，历任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县令，人朝后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

葛洪之父葛悌，以仁孝友爱闻名，行为正直，博览群书。在吴国出仕，历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刚被任命为会稽太守时，晋军顺流而下，大举攻吴，吴国西部边境陷落。朝中选拔文武人才，朝野一致推举葛悌，于是转任为都督五郡军事去出征。大都督命他统率亲兵五千去戍守防地。晋灭吴统一全国，葛悌任郎中，不久升为大中大夫，以后历任大中正、肥乡县令。该县居民二万，刑狱清静，秩序井然，是州内治绩突出的县分。葛悌清正廉明，不受秋毫馈赠，使用纸笔都是自费。后因病辞官，朝廷又下诏任用为吴王郎中令，迁升邵陵太守，死于官任上。

葛洪便是葛悌的第三子。葛洪出生较晚，很受双亲的娇惯，没有及早督促他读书学习。13 岁时他父亲去世了。他失去父亲教诲，家境又贫苦，饥寒交迫。葛洪起早睡晚耕田割草，艰难地

度日。葛洪好学，因为屡遭战乱失火，家中先人的书籍荡然无存，农田耕作之余无书可读，便背着书箱步行去借书，往往在一家难以借到全部的书，需要东抄西借。葛洪努力地砍柴卖柴，买来纸笔，在田边棚内，夜里就着柴火抄写。因为常常缺乏纸张，每张纸都写满正反两面，旁人都辨认不出字来。因此缘故，不能及早涉猎更多的学问。到 16 岁，才开始读《孝经》、《论语》、《诗经》、《易经》。因为贫困，不能远出寻师访友，造成他孤陋寡闻，见识短浅，书中的大义有很多不能通。但是他贪于广泛的博览，对各种书籍无一不是反复阅读研究。他曾经披阅过的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乃至短文、杂文等文章，将近万卷。葛洪并不聪明，也无记性，又少文才，意志也不专一，知识印象淡薄，难免有疑惑不解的内容。但是，在他著述写作的时候，还是有知识给他引用。毕竟他做不成纯儒，当不了传授学生的老师。对河图洛书谶纬之学，他看一遍就算了，不十分留意。不喜欢星相书，以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一类书。认为读这些书很苦，枯燥乏味。后来学习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只是粗略知道大概，也不去深入研究。他认为这些都是由人支配的事务，应该出于情愿，没有必要为它辛劳费力，倒不如阅读子书有益处，于是又放弃了。他没有过多的欲望和爱好，甚至不知棋盘有几道，赌博有些什么名堂。葛洪为人木讷，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不好荣利，不喜与人交游。有时为了寻书或请教书中大义，却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不得不止。随社会风俗变迁，服饰用品不断流行新花样，有时风行宽领大带，有时流行紧身长袖，有时长衣拖到地面，有时短装盖不住脚，葛洪却自守常态，不随世俗改变，穿戴着又旧又脏的冠履，即使破了也不在意。故尔乡人都称他是抱朴之士，所以葛洪便以抱朴子为号。

葛洪身体瘦弱多病，贫穷置办不起车马，又不堪徒步远行，常常闭门度日，家中衣不蔽寒，食不果腹，房屋漏雨，庭生荆

棘。因为他不愿与人周旋，吊丧探病人等一些交往，难免不周到，常被人讥笑责怪。世人喜欢说长道短议论人，葛洪不肯随声附和，为此受到一些人厌恶。有权势的人见他不能趋炎附势，也说他傲物轻俗。

因为他好学博览，遂以儒学知名。然而葛洪最好的是神仙导引养生之法。他从祖葛玄，在吴国时学道得仙，号称“葛仙公”。吴地奉行的是孙权在位时期，李宽从蜀中传来的五斗米道，葛仙公将他炼丹的秘术传授给弟子郑隐。葛洪去向郑隐学道，将炼丹等法术全部学到手。以后葛洪又从师南海太守鲍玄（即鲍靓），鲍玄曾经遇见仙人阴长生传授给道诀，这阴长生也是信奉五斗米道。老师鲍玄很看重葛洪，就把女儿嫁给他为妻。鲍玄本来是大儒士，晚年学道，仍旧不停地讲授《礼记》、《尚书》等儒家经典，葛洪师承了鲍玄的学业，受其师影响，接受了儒学、道学的双重内容，此外还研究了医术。

太安年间，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伐石冰。顾秘邀葛洪为将兵都尉，葛洪便募集了数百人，与各路军一起进发。葛洪领兵攻击石冰别将。葛洪少年时曾经学射。又学习刀盾与单刀双戟，以及七尺棍术，可以人白刃夺大戟。在战斗中，曾经箭射敌军追击骑兵，射死二人一马。击败敌军后，败兵丢弃的钱帛堆积如山，珍宝遍地，各路军都放纵士兵拾取财物，车推人挑乱作一团。只有葛洪约束部下，传令不准擅自离开队列，兵士有拾取财物的斩首示众。士兵无人敢放下武器。果然敌军数百伏兵一齐杀出，拾取财物的将士惊慌失措，人和马都驮着重物，不能应战，顿时大乱，被杀得死伤无数。葛洪所领士兵肖然不动，击退敌兵，挽救了崩溃的各军。在以后的战斗中葛洪又斩了敌军小帅，杀败敌军。葛洪被任为伏波将军。按常例赏得布百匹，葛洪分给将士，送给贫穷的故友，余下的十匹也换成酒肉，犒赏了部下，一时传为美谈。石冰之乱平定后，葛

洪不论功赏，一心仍想着读书。据刘向《别录．艺文志》记载，共有书一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自魏朝以来文化兴盛，书籍比以往又增多一倍，自己未见的书太多了。江南书籍很不完备，想去京师洛阳寻访奇书，正值北方发生战乱，只好中途折回，心里无比的遗憾。流落在大江南北很长时间。

葛洪见天下大乱，准备避乱到南方，适逢故人嵇含任广州刺史，便请葛洪担任参军。及嵇含遇害，葛洪遂在广州滞留了多年，广州的官长多次邀请并任用他，葛洪都推辞不就。后来回到了故乡，不肯再应征辟。当时东晋元帝司马睿为丞相，征辟葛洪为丞相府掾，以平贼之功，赐爵关内侯，于句容食邑二百户。咸和初年，司徒王导召葛洪补任州立簿，转任司徒掾，迁升谘议参军。史学家干宝是葛洪亲近的密友，举荐葛洪的才学足以承担修纂国史之任，葛洪被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坚决推辞不肯就任，因为年纪已老，想去炼丹祈求长寿。听说交阯出产丹砂，便请求出任句漏县令。元帝认为葛洪资望高，却去做小县令，不许。葛洪说："并非为了荣耀，因为那里有丹。"元帝才允准。葛洪带着子侄一齐上路，到达广州，刺史邓岳挽留他，不允他离开，葛洪只好留在罗浮山炼丹。邓岳上表补葛洪为东官太守，葛洪坚辞不就，邓岳遂任命葛洪之侄葛望为记室参军。葛洪在罗浮山数年，优游山林，闭门修养，一面不停地著述写作，完成了很多传世的著作。后来忽然有一天寄书信给邓岳说："我当要远行寻师，近期便要出发。"邓岳得信，急急忙忙赶来话别。而葛洪坐到正午，昏昏沉沉好似睡觉一般死去了。邓岳赶到，已迟了一步。看他的颜色如同活人，身体柔软，抬起尸体装殓入棺，尸体很轻，如同一件空衣，世人都认为葛洪是尸解成仙了。

葛洪属丹鼎道派，师承关系是：左慈传葛玄，葛玄传郑隐，郑隐传葛洪。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属安徽）人，是东汉末年著名方士，据说在天柱山中遇神人传授他金丹仙经，因避战乱来到

江东。他的弟子葛玄，字孝先，就是葛洪的从祖，左慈传授他《太清丹经》三卷和《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葛玄兼通医术。葛洪的老师郑隐，不仅通晓五经儒学、仙道炼丹术，对九宫推步算数学、谶纬学、天文学，都很精通。同时向郑隐学道的有五十余人，葛洪家里贫穷买不起丹药，又瘦弱干不动重活，却异常勤快，洒扫庭院，拂拭床几，磨墨执烛，为老师缮写书籍，赢得老师的欢心和信任。丹鼎派道教把烧炼金丹弄得很神秘，选择门徒和传授丹经十分郑重其事，要举行秘密仪式，在马迹山中立坛歃血盟誓，郑隐向葛洪传授了《丹经》和《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枕中五行记》等符书，以及不用文字记载的口诀等。其余人甚至有连书的封面都不得一见的。炼丹的口诀只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否则，不知口诀即便得到了丹方也无法烧炼。极端的神秘化限制了炼丹术的传播，葛洪颠沛流离于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数百名道士，对金丹神液和一些符书竟没有一人知道。

魏晋以来士大夫服散食药成风，寒食散就是很流行的一种，人们相信服药或者养生能使人长寿，对服食丹液、学仙修道成为神仙而长生不死，却深感疑惑。葛洪根据前人的记载，证明成仙是可信的，而且是可学的，依靠药物和数术使人内疾不生，外患不入，从而达到肉身不朽、长生不死。葛洪说：丹，烧之越久，变化越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入地中不朽，服用这两种东西可以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二物称为还丹金液。好比用铜青水溶液涂在脚上，常在水中脚便不会腐烂，就是铜的性质传递给了肌肉，服食金丹效果更好，金是性质极稳定的金属，当时人们对金就有认识，“真金不怕火炼”，金的性质传给人身，容易使人接受。丹本是指丹砂，后来经过神仙方士的烧炼和宣传，便具有了“还丹”的意义。凡是草木焚烧即成灰烬，丹砂烧之却成了水银，积久又还成丹砂，这远远胜过草木，故而能令人长

生。葛洪还说："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这种"假外物以自坚固"虽然源于古代医学的实践，却又成为服食金丹的理论。

汉魏以来的金丹术士认为自然界天然的金银之外，还可以人工制作，这种炼金术称为"黄白术"，黄指金，白指银。由贱金属铅、汞或矿物丹砂制作金银，也是丹鼎道派方术的一个重要内容。葛洪在著作《抱朴子内篇》中有一篇专门论述"黄白"之术的文章，并且说制作的金银集中了各种药物的精华，比天然的金银还要好。

葛洪还认为服食金丹仙药可以使人长生成仙，仙药也有上中下之分，神仙因服药不同也有上中下等级之别。他说："朱砂为金，服之成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服药修炼的不同，成仙的等级也不一样，待遇也自然不同。"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他又举出不同的称谓，"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

葛洪还提出长生成仙循序渐进的办法，他说："先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在《抱朴子》一书中他详尽记述了服之可以长生成仙的仙药和炼丹的秘方，如在《金丹篇》中，它涉及的药物有铜青、丹砂、水银、雄黄、矾石、戎盐、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赤盐、曾青、慈石、雌黄、石流黄、太乙余粮、黄铜、珊瑚、云母、铅丹、丹阳铜、淳苦酒等二十二种。记述了九丹及各种丹法。《仙药篇》记载了多种矿物、植物，介绍了丹药的服食方法。《黄白篇》中记有数种烧炼方法。

葛洪继承和总结了前人的炼丹术，而且他躬自实践，亲手采集药物，烧炼丹药，把书上的记载，口耳相传的口诀运用到实际制作中去。他的实践活动，又丰富了他的理论。他把这些记录下

来，写成《抱朴子内篇》一书，形成道教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方术的总结。

葛洪炼丹是科学技术与实验的重要活动，尽管宗教唯心主义占主导地位，剥去其神秘和迷信的外衣，仍然会发现其不同寻常的意义。他论述物类变化，说人工变化可以替代自然，这是一种巨大的创造。比如铁矿石冶炼成铁，固然需要复杂的技术与操作，去其杂质后铁仍然是铁。葛洪认为有些东西可以人工制造，用镜可以取火，用药物可以人造雨、人造冰、人造雪，甚至可以“冬起雷”，风雨雷电都能人工制造。

古代炼丹术是实验化学的先驱，葛洪炼丹在化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东汉晚期的《周易参同契》一书是所谓的丹经之祖，但其中缺乏炼丹的具体方法和实验。葛洪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做了详密记述和论证，这是前无古人的。他记录了实验和观察，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他概括出来的名言“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就是将丹砂（硫化汞）煅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使汞（水银）和硫磺化合，又生成硫化汞的过程。它完全可以用现代化学反应方程式来表达。他又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曾青就是硫酸铜，用曾青涂铁，就是使铁和硫酸铜起化学反应，铁取代硫酸铜里的铜，其表面便附有一层红色的铜，这个化学置换反应过程也是可以用现代化学方程式来表达的。同时可知葛洪是亲手实验得出的结论。这些在魏晋时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此外人们还发现葛洪最早使用了“金丹”这个名词，他讲的炼丹处所极似现在的实验室，他说的六一泥，最早记录在《抱朴子》书中，用戎盐、胡粉等七种材料合成（六加一为七），使用它既可用为密封不使漏气，又可作垫的绝缘体，并且有时六一泥也参加化学反应。葛洪讲：“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也完全

符合丹砂矿与金矿共生的实际情形。

葛洪炼丹活动的实践与著述总结，第一次具体详细地记录了炼丹的药物、方法和实验。第一次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和道教史料。对宗教和化学发展史有巨大贡献。

炼丹术往往与药物学和医学分不开，古代人们就相信服食人参果、何首乌、茯苓、蟠桃、龟以及松脂、松叶的长生功效，葛洪对这些药物也做了记载和总结，并且记述了不少的事例来说明。药物的作用，虽然道家夸张为"不死"，实际上确实可以令人"长生"，延年益寿，祛病健身。丹砂可以镇惊安神，慈石可以治疗惊痫、消痈肿，雄黄可以治寄生虫和皮肤病等等，葛洪写有医学专著《金匮要方》和《肘后救急方》，在医学上贡献不容忽视。而且他强调良医治病，反对巫祝迷信害人。

葛洪反对道教的祝祭祈祷，不屑于道徒的符咒、厌劾等法术，认为那是末流邪道，尽管他记录了不少符箓，他认为不过是禁辟恶鬼、疫气、虎狼五毒的手段，是入山修炼防身的法术而已。他也见过极多五花八门的幻术，他却不肯用来炫耀骗人。

此外葛洪对道教理论也有所建树，对玄、道和一，都有很多论述。并且讲了许多内修与反修的理论，也宣扬了神秘主义的因果报应思想。

葛洪奠定了官方道教的理论和仪式。他曾经镇压过起义军，站在官方道教的立场上，把民间宗教视为异端，认为是引起犯上作乱的祸根。对利用宗教起义的张角等痛斥为"妖道"、"邪道"。他的主张在士大夫阶层很有影响，五斗米道之所以在士族阶层传播。实得力于葛洪对五斗米道的改革。西晋时期盛行玄学，五斗米道主要在庶族中传播。五斗米道若要取得士族信仰，必须与儒学相结合。葛洪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用五斗米道和儒教合一，取代玄儒合一。他的老师郑隐、鲍玄都是儒道结合，他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他写作《抱朴子》，内篇讲神仙方药、养生延年，

属道家；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的是非，属儒家。就在论道家的时候，也将儒家的仁义忠孝等内容渗透进去，提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把儒家思想标准作为成仙得道的先决条件。于是儒与道紧密结合，为士大夫既做官又成仙拆除了障碍。因此东晋时期开始，士族信仰五斗米道者骤增，如王羲之，几代都信奉此教，也因此之故，孙恩、卢循利用五斗米道起事，给东晋统治造成极大威胁。葛洪主张人世，注意经世治国，这又表明融道入儒。归根结蒂，在世界观的支配下他仍认为道为本，儒为末。

葛洪博学多才，除了弘扬道教、发展炼丹术及医学方面之外，在天文、军事上均有著述。他对后世道教影响是巨大的，地位便可以和三张（张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丹鼎道派在葛洪手中，发展到了成熟完备阶段，葛洪炼丹成为道教在两晋时期重要标志。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葛洪传》、《鲍靓传》
《抱朴子》:《内篇》、《外篇自叙》
金正耀:《道教与科学》
葛兆先:《道教与中国文化》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法显西行求法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频仍，儒、释、道并盛争长。两汉之际由印度传人的佛教，此时亦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原内地与西北地区乃至中亚各国之间的佛教交流较前更加频繁，西行求法者日益增多。其著名者，在前有曹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东）人朱士行，誓志捐身，远迎《大品》；于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今陕西西安西北），西渡流沙（今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历尽艰辛，行万余里，辗转至大乘经典集中之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得《放光般若》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后力排阻挠，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遣弟子将梵本送回洛阳。又历十年，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放光般若》经本始在陈留仓垣（今河南开封境内）水南寺由他人译出。又历十三年，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放光般若》译本方经考订，校为定本。时距朱士行西行出关求法已四十三年之后。而其本人则终生羁留西域未返，80岁而故。是为西行求法第一人。再后则有赴天竺（古印度）寻求戒律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僧人法显。

释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幼时家境颇为富有。兄弟四人，然体弱多病，兄三人早夭，父亲担心他亦遭此命运，3岁时便让他在江陵寺中挂名僧籍，度为沙弥，意托佛祖庇佑，平安长成。嗣后，法显果真在家身患重病，几乎送命，父母只得将其送进寺中求治。病愈以后，法显不肯回家，仍留寺中，正式出了家。10岁时，其父亡故。叔父欲逼法显还俗

回家，以撑家业。法显回答："我本来并不是因为父亲在才出家的，而正是要远离尘俗，这才皈依佛门的。"叔父见他志坚意决，也就不再勉强他了。不久，其母又丧。法显处理完丧事，仍回寺中，至20岁时受比丘戒。法显在寺中修行，"志行明洁，仪轨整肃"，专心研读佛教经律，经常慨叹律藏传之未全，译之多误，遂萌生前去佛教发源之地天竺亲取真经之念，矢志日坚。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法显会同僧侣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自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出发，前往天竺。时河西走廊一带，民族割据，各自为政，行旅颇为不便。再加山高路险，更多艰难。法显一行越过陇山，至鲜卑人乞伏氏治下的西秦国（治金城，今甘肃兰州），在此度过"夏坐"，坐禅修学三月。安居结束，继续西行，到达鲜卑人秃发氏治下的南凉国（治西平，今青海西宁东），此后过养楼山至北凉国都张掖，时因当时内乱道路不通，法显一行在张掖羁留，并受到北凉王段业的款待。

隆安四年，法显等在张掖与另一批西行僧人智严、宝云、慧简、僧绍、僧景等五人相遇，因志同道合，双方都非常高兴，便共行"夏坐"。"夏坐"后，相携西进，秋间来到敦煌，受到太守李暠的供给。法显等五人与宝云等相别先行，随即进人了漫漫无际的流沙之中。位于敦煌以西，天山以南的这片大沙漠，东西长约八九百公里，南北宽约五百公里，整片全是流动着的沙丘荒漠，经常热风卷着黄沙滚滚而来，遇则皆死，没有一人能够生还。流沙之中，不仅渺无人烟，而且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极目四顾，但见风沙茫茫，无法确定所去方向，只有看着太阳起落来标定东西，沿着死人枯骨以判认路线。面对如此艰险，法显毫无畏惧，认定法缘，牢记使命，跋涉前行，"直过险难"。先是越过了流沙的东部，进至西域南道的鄯善国（治今新疆若羌），后又转向西北至西域北道的乌夷（今新疆焉耆），在这里与宝云等僧

人再度会合。其后再度分为两路：智严、慧简、慧嵬为求行资东返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法显等则受乌夷的苻公孙资助，折向西南，重又进入广袤的流沙荒漠，克服重重险阻，直进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隆安五年初，法显一行到达于阗。慧景、道整、慧达由此先行西进至竭叉国（今新疆喀什）。法显等则留待于阗，观看佛诞节的佛像游行庆典仪式。嗣后，僧绍一人随胡僧南去罽宾国（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法显等则继续西进至子合国（今新疆叶城），随即南行进入葱岭（泛指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在于麾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过夏安居。此后折向北行至竭叉，与慧景等会合。会合后，法显等由此西行，翻越了终年积雪的葱岭，进入北天竺境内，开始了云游天竺、礼圣取经的历程。

元兴元年（402），法显一行抵西北天竺陀历国（今巴基斯坦北达的斯坦附近），此国僧众，皆奉小乘。法显等继续往西南前行，但见山路艰危，壁立千仞。他们攀越过昔人所开凿的通路、梯道七百多处，又蹑悬索过河，所经之处，“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来到乌苌国（今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区），此国寺庙五百，皆小乘学。法显等在此“夏坐”安居。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行前往那竭国（今阿富汗东北贾拉勒阿巴德），“供养佛影、佛齿及顶骨”。是年秋，法显等又自乌苌国出发南下，经乌苌近郊宿呵多国、竺刹尸罗国（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犍陀卫国（今巴基斯坦西北喀布尔河沿岸一带），至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弗楼沙国起塔建寺供养“佛钵”有僧七百余人。宝云、僧景供养佛钵后即随自那竭国赶来的慧达一并回国。慧应则于佛钵寺“无常”（病故）。于是，法显一人起身前往那竭国的醯罗城，礼拜供养“佛顶骨”，接着北行至那竭国都城瞻礼城南石室中“佛影”。并与因病羁留在此的慧景以及看护慧景的道整

会合。

元兴二年初，法显、慧景、道整自那竭国往南翻越小雪山，突遇风雪暴起，慧景冻得浑身打颤，不能行动，他对守护在身边的法显等说："我怕是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都死在这里。"说完就冻死在茫茫风雪之中。法显悲痛至极，抚摸着慧景渐渐僵硬的身体哭号着："本图不果，命也！奈何！"接着就"自力孤行"，翻过小雪山，来到罗夷国（今巴基斯坦拉基）。并在此"夏坐"安居。后南下至西天竺跋那国（今巴基斯坦中部印度河西之腊江腊尔），东行渡新头河（今印度河）至毗荼国（今巴基斯坦乌奇）。毗荼国佛法兴盛，兼奉大小乘教。当地僧侣对于外国僧人法显的到来，感到既惊奇又钦佩，都说："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求佛法！"至此，法显已行经西北天竺十国，这十国多奉小乘佛教，只有接近中天竺的两国（罗夷国、毗荼国）是大小乘教兼奉。是年秋，法显进入佛教发源之地的中天竺，印度佛教的中心地区恒河流域。

元兴三年，法显经摩头罗国（今印度马土腊），行东南至僧伽施国（今卡瑙季西北），在龙精舍"夏坐"。然后东南行经罽饶夷国（今卡瑙季）、沙祇大国（今瓦腊纳西以北一带）、拘萨罗国（今印度北部拉普提河南岸塞特马赫特地区）、蓝莫国（今尼泊尔南境）至释迦牟尼诞生地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和逝世地拘夷那竭城（今印度北部哥拉克普尔边之卡西亚）瞻礼膜拜。后往东经毗舍离国（今印度北部木札法普尔地区），渡恒河至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今印度北部巴特那），此原为阿育王的都城。此后，法显沿恒河西行，历迦尸国波罗捺城（今印度北部瓦腊纳西）、拘睒弥国（今印度阿拉哈巴德西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法显遍历中天竺各国，瞻礼了多处佛陀遗迹，并听说了有关南天竺达嚫国（今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情况和大石山五层伽蓝的传说。在中天竺，法显每到一地，凡与佛祖生前

活动有关的一木一石，一塔一舍，他都瞻礼参拜，凡与神有关的传说，他都详细记录，始终沉浸在一种肃穆庄严至诚至悲的心境之中。王舍新城（今北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的耆阇崛山，是释迦曾长期坐禅、说法的地方，法显登耆阇崛山，以香花供养，“慨然悲伤，收泪而言”，自叹“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旋即诵《首楞严经》，并在此停一宿。拘萨罗国舍卫城南的祇洹精舍，是释迦长期讲经说法的地方，法显来此瞻礼，感慨万千：“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夷，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而法显所至，如同在西北天竺时一样，也引起了中天竺各国僧人的惊叹。当他们得知法显来自汉地，都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认为是前所未有之事。

义熙元年（405），法显再度回到巴连弗邑。法显西行，本为求法，但所游历的地区，尚无写本佛经。印度佛教自古是重记诵口传的。北天竺诸国更是“师师口传，无本可写”。相比之下，中天竺地区佛教却较为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梵文经律被传习。为了实现求法夙愿，法显在巴连弗邑一住就是三年。他克服了语言文字上的重重障碍，一如西行途中跋山涉水的意志和毅力，一面学习梵语梵书，一面搜求佛教经典，“躬自书写”。三年间，他抄得律本六部，其中戒律有：《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律抄》七千偈；佛典有：《杂阿毗昙心》六千偈、《綖经》二千五百偈、《方等泥洹经》五千偈、《摩诃僧祇阿毗昙》。夙愿既偿，法显于是准备回国。而此时他唯一的同伴道整却羡慕天竺“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再想想自己的国家“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对比之下，差距如此悬殊，道整于是表示“愿不生边地”，居然留在天竺不再回国了。而法显却始终不改“欲令戒律流通汉地”的初衷，毅然“独还”。

义熙四年，法显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他沿恒河取道东天竺经

瞻波国（今印度东部巴加尔普尔），再至在海口的多摩梨帝国（今印度东部塔姆卢附近）。见此地寺广僧众，佛法亦兴，为了写经和描画佛像，法显在多摩梨帝国又住了两年。

义熙五年冬，法显自多摩梨帝国海口搭乘商船离开天竺抵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时狮子国也盛行佛法。法显来到王城北面的无畏山寺参禅，但见该寺僧众五千，香火鼎盛，寺内立有青玉佛像二丈多高。面对如此场景，法显心中升起浓浓的愁思。他想到自己离开汉地多年，身处异域他乡，所接触的全都是别国的人们，所看到的又全不是旧时的山川草木。从长安出发，到张掖结伴，同行十余人，这么些年来，有的半途回国了，有的却长留不归，更有的客死异域，眼下，“顾影唯己”，法显“悲慨”不已！法显在玉佛前伫立良久，忽然，他看见有商人在以物供佛，仔细一瞧，所供之物竟是“晋地一白绢扇”，睹物思乡，法显不由地“凄然泪下满目”！尽管法显思乡之情是如此强烈，他却始终没有忘却自己的使命。在狮子国，他又得见了一些在出国前从未见到过的佛经律藏，为了将这些“汉土全无”的经律带回国去，他又在狮子国留住两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四部经本。

义熙七年秋，法显带着西行多年求法所获满载而归。他搭乘大商船泛海东行，途遇大暴风将船打漏进水，商船失去航向。在茫茫的大海上任风飘流近三月，飘至南海盛行婆罗门教的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在此停留了五个月。

义熙八年四月，法显改乘另外的大商船北上，当时预计五十天左右可抵广州。法显遂于船上度夏安居。不料航行月余，半夜里又遇上狂风暴雨，船上诸婆罗门认为载沙门不行，商量把法显留在海中一个小岛上以避灾邪，幸得商船施主仗义反对，法显方才得免于难。商船在海上飘流了七十余天，几乎断绝了粮食和淡水，只得打苦涩的海水做饭。“任风随流”三个月后，七月十四

日，船终于靠了岸。法显等人在海上历尽艰险，长时间一直担惊受怕，就连靠了岸也还是未卜吉凶。及至看到岸边那熟悉的藜藿菜，才恍然明白自己回到久别的祖国“汉地”。但没有看见人，也不知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法显随即乘小船驶入滩涂“寻村”、“觅人”，终于找到了两个猎人。经询问，才知到了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南岸，也才知此地“统属晋家”，已为东晋控制范围。于是派人去长广郡（今山东崂山县北）联络。太守李嶷遂将来自海上、持经像的法显迎回郡治。

义熙八年秋，法显离青州南下，经彭城（今江苏徐州）度冬。次年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度夏。“夏坐”结束后，法显原本打算到长安去，但听说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已自长安南下至建康（今江苏南京），“遂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由京口来到建康，与佛驮跋陀罗及随其同来的宝云共住道场寺，开始着手共同翻译法显带回的梵文经典。时为义熙九年秋。

义熙十二年十一月，法显等始译《摩诃僧祇律》，至义熙十四年二月译出，凡四十卷。义熙十三年十月，法显等始译《大般泥洹经》，至义熙十四年一月，校定完毕，凡六卷。在此期间和此后数年，又先后译出《杂阿毗昙心》十三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杂藏经》一卷、《方等泥洹经》二卷，共佛教经律六部六十三卷，并撰写《佛国记》（又名《历游天竺记》、《佛游天竺记》）一卷，详述西行求法之经历。值得一提的是，《大般泥洹经》的翻译，是大乘《涅槃经》的初译，当时，法显等“大集京师义学之僧”二百五十人，由禅师佛驮跋陀罗手执梵本，宝云传译。其出经之场面是相当隆重的。法显在建康约住了四五年，译事告一段落后，西去荆州（今湖北江陵），“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卒年未详，其时当在东晋义熙十四年（418）至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间。

法显西行求法，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自魏

朱士行之后，虽然西行求法者不乏其人，但在法显之前，他们的行履多半止于西域，及天竺者殊少。即便是与法显同一时期西行而往天竺的少数僧人，要么遇着雪山沙漠半途而返，要么带着遗憾身死异国他乡，间或到了天竺，也就乐居不归了。而像法显这样历尽艰辛，矢志不移，有始有终，并且抄得和携带大批梵本经、律来归者，实为“古之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者。”不仅如此，作为心存“令戒律流通汉地”远大志向的一代高僧和译师，他在天竺求法期间不但习经、研经、搜经，而且学习梵语梵书，归国后又在有生之年以高龄之身翻译大量佛经、戒律，这是确非前人及同世僧侣所能比。特别是六卷《泥洹经》的译出，首次把佛教的“佛性”论思想介绍到了中国，以及四十卷《摩诃僧祇律》的译出，丰富了汉译《律藏》的内容。对于此后佛学的深人传播和戒律的逐步完善，影响深远；法显西行求法，在中外古代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法显西行，自隆安三年（399）始发，经西域，于元兴元年（402）人天竺境内，云游境内各国，义熙五年（409）离多摩梨帝国，经狮子国、耶婆提国泛海回国，至义熙八年（412）登青州牢山北岸，止于义熙九年（413）南下建康。首尾计十五年，行经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九国，古代天竺二十二国，以及狮子国和邪婆提国，凡三十三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自己西行求法的沿途经历写成《佛国记》一卷。书中详述十五年间对各国的佛迹宗教、地理文化、民情风俗的所见所闻，它对后来西行求法的僧人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经过实地考察、而且记载详实的介绍西域、天竺各国的游记，《佛国记》对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研究中亚细亚以及南亚古代文化历史的珍贵资料文献，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目前世界上有英、法、日等多种文字译本；法显西行求法，又是人类探险史上的一次壮举。

法显自陆路西去天竺，取海途东返晋地，前后达十数年，此为前人所无。他抱着求法的坚定志向，或以区区数僧之旅，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古代，徒步横贯千里流沙，攀越万仞葱岭；或只身一人，随同商船飘洋过海，不避险难，将自己的生命投向“必死”的旅途，去实现那“万一”的希冀。虽历尽艰辛，九死一生，然勇猛精进，坚贞不渝，被后世视作为法舍身探险的先驱，给后来的僧人以极大的鼓舞。正因如此，千百年来，法显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其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和国界的限制。

（赵小石）

参考资料：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 2、卷 3、卷 7、卷 8、卷 13、15

梁·慧皎：《高僧传》卷 3《法显传》、卷 4《朱士行传》

《晋书·地理志》

日·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

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

"左思奇才"

左思，字太冲，山东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左氏家族是战国时齐国公族左公子的后代，因而姓左。左思的父亲左熹字彦雍[①]，出身于小吏，后以其才能擢为殿中侍御史、太原相、弋阳太守等官职。左思的母亲早丧。有一妹左棻，亦以文才出名。

左思少年时代曾学过钟繇、胡昭的书法，并学过鼓琴，但都没有学成。左思的父亲对友人说："思儿通晓理解的知识，不及我小的时候。"这句话对左思的刺激很深，从此他发愤苦读，勤学不辍，终于成为博学能文之才。左思的相貌很丑，口才也不怎么好，不好交游，但文章写得很好，"辞藻壮丽"，很见功夫。

左思的生卒年，史无明载。只能以其妹左棻的入宫时间，大体上推知左思的生年。《晋书·后妃传》记载，左棻从小好学，文章写得好，名气仅次于左思。晋武帝司马炎闻知左棻的文名，就于泰始八年（272），把左棻纳入后宫。左棻入宫时的品秩是美人，后拜为修仪。她是以文名被纳入宫，应比以美色选入后宫的少女年长一两岁。她的入宫年龄大约在 18 岁左右，此时左思至少 20 岁。以此推断，左思大约生于曹魏嘉平四年（252）或稍前一点。

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左思 19 岁时，写作《齐都赋》，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这是左思的处女作。《齐都赋》全文已佚，

① 左思父名，《晋书·左思传》为左雍，今据 1931 年洛阳出土《左棻墓志》改。

现仅能据类书辑得数句佚文。

泰始八年，左思完成《齐都赋》的写作之后，计划再写一部描绘魏、蜀、吴三座都城的大赋《三都赋》。这时，妹妹左棻被招纳入宫，左思举家搬到京城洛阳居住。到洛阳后，左思随即开始了写作《三都赋》的材料收集工作。为此他曾拜见过熟悉蜀地情形的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为了能广博地收集资料，他还主动要求做了能接触皇室图书的秘书郎。左思写作《三都赋》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整整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进行构思。写作期间，他在家里的门庭中，屏风边，甚至厕所内都放着纸和笔，想好一句便及时写下来。这就足见左思在创作《三都赋》过程中所下的一番苦功夫了。

与左思同时代的文坛名流陆机，也曾经有写作《三都赋》的想法，后来听说左思正在动笔写，便以嘲笑的口吻写信给弟弟陆云说，这里有个家伙，也想写《三都赋》，等他写成了就当作盖酒瓮的纸吧。后来，左思的赋写成，陆机读了之后，十分叹服，自认为无法超过他，就不准备再写《三都赋》了。

《三都赋》，长达一万多字，是由《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篇独立而又互有关联的赋组成的。《三都赋》走的是汉代大赋的老路，宏丽巨衍，铺张扬厉。在赋中通过三个假设人物——东吴的王孙、刘蜀的公子、曹魏的先生之间的叙谈，将三个名都——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蜀都成都、魏都邺城（今河南临漳）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从经济到政治，从历史到地理，乃至于风土人情和特产等等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如写成都山川的险要，"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写成都织锦业的盛况，"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写成都特产龙眼和荔枝，"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写成都的天然气，"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其他如建业龙盘虎踞的雄姿，邺城铜雀台之壮观，都写得颇有气势，落笔

不凡。

《三都赋》写成之后，并没有立即引起世人的重视，但左思颇为自信，认为这篇赋已不亚于班固、张衡的水平。后来，左思把《三都赋》呈送司徒张华。张华看后指点左思说，《三都赋》可与张衡的《二京赋》齐名，然而你的文名未重于世，难以引起世人的重视，还需请高明之士推荐一下才行。于是，左思携稿造访太子中庶子皇甫谧征询意见。皇甫谧是当时文坛名士，阅后，对《三都赋》极为称道，慷慨为之作序。接着，中书著作郎张载为《魏都赋》作注，中书郎刘逵为《吴都赋》、《蜀都赋》作注，他们对《三都赋》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后来，尚书郎卫权又在他们三人《序》、《注》的基础上，为《三都赋》作《略解》，进一步褒扬《三都赋》是"言不苟华"、"良可贵也"。经过这些高明之士和文坛宿儒的作序作注，左思名扬京师，《三都赋》也盛重于时，"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左思除了《三都赋》以外，还有《咏史》诗八首，也表现了他非凡的文才。在诗歌发展史上，把"咏史"作为诗题的始于班固。班固的《咏史》诗，仅咏一事（即缇萦救父），其特点是，联缀史传，文辞质直。建安时代，曹植、王粲均有"咏史"之作，虽然文采超过班固，但写法依然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专咏一事。左思的《咏史》诗则打破了传统的写法，不专咏一人一事，不呆衍史事，而是借古人古事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不平，开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

《咏史》八首表现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反映了左思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的思想变化过程。其中有青年时代的浪漫幻想，有在现实中碰壁的感慨和理想受到现实嘲弄后的愤懑不平；有由立功到立言即与官场决裂，"绝意仕宦"、"专思著述"的转变。读左思的《咏史》八首，对左思的了解可胜过读《晋书·左思传》。

左思入洛之初，年轻博学，风华正茂，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能一展才华，能报效国家。左思的《咏史》之一即写于此时。诗中借史事展示了他的才华和积极要求建功立业的志向。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诗中有"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之句。"江湘"指的是江南的东吴政权，"羌胡"指的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据此来判断，当时割据东南的孙吴与占据凉州一带的羌胡均未平定，故左思才能怀有统一和安边的理想。《晋书·武帝本纪》载，咸宁五年（279）平凉州，泰康元年（280）降孙皓。由此可见，《咏史》之一应是写在入洛之后和咸宁五年以前（272——279）。这正是左思才气勃发，充满幻想的时候。

左思要求建功立业的理想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自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以后，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门阀政治。到西晋初期又出现了世族独占上品的现象。左思出身寒门，在仕途上是难以腾达的，虽然因妹妹的关系与晋武帝攀上了亲戚，但左棻是以文才被选入宫的，并未受到晋武帝的宠幸，所以，在现实中左思感到备受压抑，壮志难酬。《咏史》诗的后七首，就都抒发了左思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如《咏史》之二，就激烈抨击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在这首诗中，左思通过贴切的比喻，比兴的手法，用“涧底松”去比喻怀才不遇的寒士，以“山上苗”去比喻垄断高位的门阀世族，形象地揭露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现实。接着左思又指出这种现象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诗中用汉代的金日磾、张汤的世居高位与冯唐的白首屈于郎署的史事作证明，以古喻今，来指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

左思另外几首《咏史》诗，大约是中年或中年以后的作品。这些诗歌颂了段干木、鲁仲连、许由、荆轲等历史上的高节之士，嘲讽了世族权贵和趋炎附势之徒，表现了左思鲜明的个性、高旷的襟怀、急切用世的心情和力拨流俗的精神。

左思的《咏史》诗，语言质朴而又造语奇伟。他的诗歌用语的一大特点是喜用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如“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等诗句，均出语豪迈，大气磅礴。左思的《咏史》诗，讽喻社会深刻而精当，具有建安文学“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特点。此特点被钟嵘在《诗品》中誉为“左思风力”。

大约在永熙元年（290），左思还创作有一首《娇女诗》。据《左棻墓志》碑阴记载：左思夫人翟氏，左思有子女四人，长子名髦字英髦，长女名芳字蕙芳，次女名媛字纨素，次子名聪奇字骥卿。《娇女诗》所写的两个女儿即蕙芳与纨素，从诗中的描写看，蕙芳当时大约十三四岁，纨素大约10岁左右。《娇女诗》别具一格，把两个小女儿的天真活泼，写得情亲可爱，跃然纸上。这显示了左思具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它对唐代杜甫的同题材的诗歌有明显的影响。

左思一生并未任过重要的官职。张华做司空的时候，他做过张华的祭酒。贾谧做秘书监时曾举荐左思做秘书郎。左思曾为贾谧讲过《汉书》。晋惠帝永康元年（300），贾谧因参与谋废以至谋害太子被斩，贾氏亲党皆被收捕。这一年的三月十八日，左思

的妹妹左棻也死去了。这两件事对左思的震动很大，促使他下了辞官归隐的决心。这一年左思退居洛阳东郊宜春里，开始了"专思著述"的隐居生活。

在隐居期间，左思创作了《招隐》二首，是咏归隐生活的。另外，还有《杂诗》一首，末两句云："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慷慨"，似有晚年追悔壮年误入仕途之意。

《左太冲集》中还有一篇《白发赋》，也是左思后期的作品，这篇赋显示了左思创作风格的变化，由咏物的大赋一变而为抒情的小赋。《三都赋》走的是杨雄、司马相如的路子，《白发赋》继承的是东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写得活泼而风趣。这也反映了左思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齐王冏欲征左思为记室督，左思以病为由，坚辞未就。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作乱京师，"入京大掠，死者万计"。左思置身世外专事写作的隐居环境被破坏，只好举家迁往冀州，数年后病逝。左思的卒年，大约在晋惠帝永兴三年（306）左右。

左思的作品留存下来的不多，仅有赋三篇，诗十四首，大多数作品都是靠《文选》和《玉台新咏》得以保存下来的。据《隋书·经籍志》载，左思原有文集三卷。这些文集大约在宋代已散佚，丁福保编的《左太冲集》是靠《文选》、《玉台新咏》及类书编辑面成的。

左思留下来的作品都是名作，几乎篇篇皆好，特别是《咏史》诗，更是划时代的杰作。他的诗一扫当时绮靡华艳的诗风，在太康诗人中是鲜有其俦的。他的诗感情充沛，笔力雄迈，语言朴实，风骨娇健，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太康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

历代文人对左思的诗歌，特别是对他的《咏史》诗评价是比

较高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刘勰把《咏史》诗评价为奇才写出的出类拔萃之作。钟嵘在《诗品》中也把左思的诗列为上品，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并将《咏史》诗当作"五言之警策"。明人胡应麟评价左思的《咏史》诗是"造语奇伟，创格新特"的"千古绝唱"。清人沈德潜称左思是"笔力雄迈"、"自制伟词"的"一代作手"。

左思的《咏史》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使"咏史诗"摆脱了"质木无文"的原始发展阶段，进入了咏史与咏怀结合，抒情言志的成熟阶段。左思在"咏史诗"上的贡献，犹如谢灵运之于"山水诗"，陶渊明之于"田园诗"，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左思这种题名咏史实则咏怀的表现手法，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朝范云的《咏寒松》，初唐王勃的《涧底寒松赋》，唐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等，都是取法左思的。到了唐代，那种"概括本传，不加藻饰"的咏史诗手法，已为唐人所不取，而左思开创的"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表现手法已成为"咏史诗"的正宗，并且在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上又有所前进。总之，左思是靠其诗作的个性与才气而独步文坛并霑溉后人的。

（范大章）

参考资料：

《晋书·左思传》

《左思别传》，《世说新语》注引

《左太冲集》

《左棻墓志》，赵万里撰集《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卷1

陆侃如：《左思评传》

开凿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佛教的传播紧密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民间信仰佛教者日多，公卿名士赞誉佛教者日众，各朝皇帝也多推崇佛教，出现了“士庶竞造寺庙，相竞出家”的景象。随着佛教的盛行，开凿石窟营造佛像遂成为时尚。

敦煌石窟

两汉时期，佛教沿西域商路东传，从南北两路：南路经于阗、楼兰传至敦煌；北路经龟兹、高昌传至敦煌，然后再从敦煌传入中原。敦煌遂成为佛教兴盛的要地。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世居敦煌的月支僧竺法护在敦煌译经；竺法乘在敦煌建立寺院，延僧讲学。此时，敦煌佛教已初具规模。

晋惠帝永熙元年（290），著名书法家司空索靖在敦煌东南四十多里的断崖上题壁号“仙岩寺”。

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禅僧手持锡杖，云游来至敦煌附近。黄昏时分，落日的红光照耀着敦煌东南的三危山，乐僔禅僧看到山顶上射出万道金光，而且金光中有千佛的形状。感于佛光的显现，他决定在三危山对面断崖的岩壁上修凿一个洞窟，建造佛像，以弘扬佛法。这就是敦煌莫高窟石窟群落之滥觞。在此之后，又有个法良禅师在这里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二个洞窟。敦煌早期石窟是西域式穹庐顶过渡到覆斗藻井顶的殿堂窟和纵长人

字坡顶的殿堂窟，南北两壁有汉式阙形龛。从早期石窟的形制看，敦煌石窟一开始便是西域石窟与中原宫阙建筑结合的新形式。

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沮渠安周西奔高昌，北凉政权又延续了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苦行禅修之风盛行。昙摩密多在敦煌建立精舍，教授禅道，“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在敦煌、酒泉、高昌一带建石塔和洞窟，均以弥勒像为主尊，以适应修禅观像的需要。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成周公万度归挥戈西进，征鄯善，破焉耆，平龟兹。渔阳公尉眷出击伊吾，几年之内平定了西域，“五十余国朝献与魏”。后来尉眷镇戍敦煌，在此期间，恰逢北魏文成帝复兴佛法，因而敦煌建窟之风又盛。这一时期的洞窟呈长方形，前有人字坡前厅，后有中心方柱，四面环通可供人们右旋绕塔巡礼观像，形成了典型的敦煌特色。

北魏太和九年（485），穆亮出任敦煌镇都大将，孝昌年间（525——527），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他们从洛阳来到敦煌，带来了中原的佛教艺术。太和改制以后龙门、云冈石窟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造型风格，这时传到了敦煌，并对敦煌石窟造像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敦煌建造的一批新洞窟，其主要式样是中心柱窟和殿堂窟。

西魏大统元年（535），元宝炬称帝，敦煌进入西魏时期，东阳王元荣继续统治瓜州。这一时期建造的石窟，发愿文中有大统四年、大统五年墨书题记，并有王公贵妇供养像出现，这可能是东阳王所修建的大窟。在东阳王时期的洞窟里，不仅出现了典型的清瘦型画像，而且道家神仙思想的题材也进入了佛窟，这反映了艺术上佛道结合的新思潮。

西魏恭帝四年（557），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政权，是为孝闵帝。建平公于义自中原出任瓜州刺史，在敦煌大倡佛教，修造了

一批石窟。窟型逐渐从中心柱窟过渡到覆斗藻井殿堂窟，显现了中原风格的影响。

敦煌石窟从前秦建元二年开始建造，其后经过北朝的北魏、西魏和北周，这一百六十多年中，共形成了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三个早期石窟群落，其中以莫高窟的规模为最大。

敦煌石窟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建筑、雕塑、壁画。三者是互相结合的统一整体，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

石窟建筑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僧房，即禅窟，主室两侧有小禅室，是僧侣坐禅修行的地方；一种是塔庙，平面作长方形，前部有“人字坡”屋顶，横梁两端有木质斗拱承托，完全摹仿中原木构建筑，后部有中心方柱，这是早期洞窟的主要形式；一种是佛殿，即覆斗藻井窟，正壁开龛造像，是信徒礼拜供养之所。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由于敦煌地处砾石地带，又多卵石，质地疏散，故佛像多改雕为塑，外敷彩色。这种彩塑与那些用大块石头从外向里逐渐加工雕琢而成的石刻佛像不同，是用湿润、软和易于操作的泥土自内而外逐渐加工而成。因此，手法细腻，连肌肉的运动和五官的表情都表现得很明显。早期的塑像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佛、菩萨像，其中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中心柱四面宣扬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等所谓“四相”、“八相”等内容。北魏时期的佛像，一般都有侍从菩萨，一如封建帝王，“左辅右弼”之制，组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北周时期增加了佛弟子，一铺像最多达五身。塑像均为彩塑，造型生动，表现出一种庄严、和谐的美。

同雕塑相比，壁画则表现了更加丰富多采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部分。

早期洞窟的壁画，一般都是有一定的整体规划的，大抵顶部画装饰图案：藻井、平棋、椽间自由图案等；石窟四壁的腰部画

佛像和主题性故事画；其下画小身供养人行列；四壁上端绕窟一周画天宫伎乐；四壁下方画金刚力士；其余壁面密布千佛，组成一个庄严神圣的佛国世界。

云冈石窟

北魏兴安元年（452）十月，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十二月，便下诏复兴佛法，恢复六年前（446）太武帝拓跋焘灭佛时所焚毁的佛塔寺院。当时的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有名僧师贤，太武帝灭佛时曾“假为医术还俗”行医。文成帝对师贤极为尊重。当师贤重新出家为僧时，文成帝亲自为他落发。在师贤的主持下，曾为文成帝凿一石像，又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座，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兴安二年（453）凉州僧人昙曜被召入京，文成帝奉以师礼。昙曜告诉文成帝，要在京师平城西三十多里处的武周山北崖，开凿石窟五所，内雕刻佛像各一，以弘扬佛法。石窟开凿完毕后，佛像高者七十尺，次者也有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云冈石窟群开凿最早的“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中的主佛像在造型上具备当时帝王的形象特征，分别对应北魏最早的五个帝王：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昙曜五窟的规模宏大，平面呈椭圆形，正中均有一巨佛，或立或坐，占有很大位置。佛像的脸型丰圆，刚健雄浑，是云冈早期洞窟雕刻艺术风格的代表。

北魏延兴元年（471），孝文帝拓跋宏5岁继承帝位，由他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临朝称制。十五年后，孝文帝亲政，他为了给祖母文明太后祈福而开凿了方塔洞。这个洞窟建造得庄严华美，平面近似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四十五尺。塔柱每层四面雕有佛像。上层四角又各雕九层出檐小塔驮于像身上。洞壁上雕满了大大小小的佛、菩萨、罗汉和飞天等造

像。窟顶雕刻有三十三天神像及各种骑乘。在东、南、西洞壁中下部和塔柱四面，都刻有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故事。另外还有手执乐器而凌空遨翔的飞天，头顶重物却神情欢洽的侏儒，彩色鲜艳而错落有致的莲花等等，整个洞窟显得富丽堂皇。

云冈石窟从昙曜开凿五窟开始兴建，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基本完成，其间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建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落。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曾描述过云冈石窟的壮观景象："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龙门石窟

北魏太和七年（483），新城县功曹孙秋生等二百人集资在洛阳城南二十五里处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石像，这是龙门石窟兴建的开始。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并"改服"、"易姓"，推行汉化政策。同时继续倡导佛教，结纳高僧，使洛阳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外国僧侣称誉洛阳为"佛国"。

太和十九年（495），龙门古阳洞开始开凿。洞内刻有"古阳洞"三字，洞外刻有"古精理阁"四字。洞的后壁中央凿刻有释迦牟尼的坐像，衣裙披垂于座的四面。佛的坐像以莲瓣为台，以火焰纹为饰，显示出佛的庄严圣洁。大佛的左右有菩萨立像，两旁还有石狮子，使佛的形象更显得崇高。在洞壁的四周，刻有许多浮雕和小龛。在一尊菩萨像的上端还凿出了一个具有北魏房屋建筑特征的屋形龛，筒瓦屋顶，飞脊的两端有鸱尾翘起，屋檐下有斗拱，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

古阳洞是北魏王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一个洞窟，有许多造像题记。石窟造像经过多年的发展变化，到这时几乎全部民族化了，于是出现了汉民族传统习惯的造像题记。这些造像题记都是碑刻书法作品，如"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氏碑"，便是

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珍品。

北魏景明元年（500），宣武帝元恪继位，为给其父母孝文帝元宏和文昭皇太后高氏修功德，开始建造宾阳中洞。永平年间（508——512），中尹刘腾又启奏为世宗宣武帝造一座石窟。孝明帝元诩继位后又开凿了一座洞窟。这样，前后历时二十三年（500——523），宾阳三洞建成，“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成为龙门石窟中最富丽堂皇的佛洞之一。

宾阳中洞，穹庐顶，马蹄形平面，前庭宽广，布局严整。在洞口两侧，各有一粗手大脚的力士，怒目圆睁，一手握拳，一手推掌，示人以威。洞内共有十一尊大佛，后壁中央是本尊释迦牟尼的坐像，座高二十五尺有余。本尊的面相清秀略长，高髻长鼻，大耳垂肩，双眉作弧形而略扬，两目如下弦之月，嘴唇稍厚而嘴角向上，表情温和而隐作微笑。本尊前额镶嵌着摩尼宝珠，左手屈三指，食指朝下指着地狱，右手五指并拢，意为普渡众生至西方极乐世界。在本尊的两侧，还有右侍阿难和左侍迦叶。洞中佛像形象肃穆庄重，衣纹折叠较规则而又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型艺术的特征。

在圆穹形的洞顶上，有精美别致的藻井图案，正中是一朵盛开的大莲花，莲房裸露，子粒饱满，周边为宝石、钱币花纹组成的流苏，构成一莲花宝盖。旁边还有小莲花和十个伎乐、供养天人。天人挺健飘逸，迎风飞翔。

洞口两壁的下层雕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分别雕刻着以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冯氏为中心的几十个人物组成的礼佛行列场面。浮雕上的人物形象逼真，衣帽各异，是极好的生活风俗画，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另外，在龙门石窟中，还有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8）开始凿刻的老龙洞，正光四年（523）开始凿刻的“魏字塔”，孝昌三年（527）前后开凿的莲花洞（后改为伊阙洞），以及凿刻着北齐

时的一百四十多个古药方的药方洞。

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段，均受到处于激烈变革的北魏社会生活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它显著的民族化特点。如，龙门的维摩变造像，贯穿北朝一代的始末，现存实例凡一百二十九铺，这在国内石窟寺体系中尚属仅见。这种现象，反映了北魏统治阶层对风靡一时的《维摩诘经》的高度重视。洞窟造像中的维摩，正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某些士大夫清谈家典型形象的转移摹写。再如，古阳洞、宾阳洞、火烧洞、莲花洞、石窟寺和路洞等处的造像，其服饰均已突破云冈石窟较早阶段以前的右袒式或通扇式佛装的束缚，全部改为褒衣博带的冕服。佛装的这种改变，是北魏服饰汉化的反映。

太和以后龙门石窟雕刻中面貌清瘦、褒衣博带、性格爽朗、风神飘逸的风格，代替了北魏早期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的风格，并且对全国各地的石窟造像风格产生了影响。景明三年（502）前后，天水麦积山石窟的雕塑和壁画，为“秀骨清像”风格所统一，面带笑容的佛像，潇洒风流的菩萨已不是神的形象，而是中原士大夫和南朝闺秀的写照。延昌二年（513）前后，永靖炳灵寺石窟雕刻中的菩萨脸型细长面略方，眉目疏朗，鼻长嘴翘，“秀骨清像”已发展到极致。北魏晚期的天梯山石窟也出现了清瘦的飞天，额广颐窄，潇洒秀丽。总之，龙门造像的这种“中原风格”促进了石窟艺术的进一步民族化，在佛、菩萨形象中，在故事画中，出现了中原汉装或南朝名士的形象，出现了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在静的境界里增添了动的情趣，突破了西域佛教艺术规范，形成了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范大章）

参考资料：

《魏书》：《释老志》、《高宗纪》

《昙曜传》

郦道元：《水经注》

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王羲之临池学书

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思想家诸葛亮，文学家刘勰，书法家颜真卿的故里。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这里还诞生了一位名满天下的人物，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以至被后人奉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出身贵族。王姓是东晋初“王、谢、郗、庾”四大名门望族之一，王羲之的祖父王正，官尚书郎；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从父王导、王敦更是东晋早期赫赫有名的重臣。王羲之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其性情、修养的形成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叔父王廙都十分喜好书法，这对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并在书法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王羲之7岁。从这时起，王羲之开始在父亲的教导下，临帖练字。起初，王羲之练字从师东晋早期女书法家卫夫人，但长进不大。有一天，他在父亲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叫《笔说》的书，便取出阅读，爱不释手。当他正读得起劲的时候，父亲进来看见了：“你年纪还小，看不懂，等你长大了再拿去看。”王羲之却回答说：“早知道有这本专门谈论写字的书，我的字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写得平平淡淡了。如果要等我长大了再看，岂不耽误了我练字。”父亲听小小年纪的王羲之话说得在理，便高兴地让儿子把书拿去读了。

从此，王羲之按照《笔说》所述方法，在父亲的指点下，博

采众长，认真临摹前代书法名家的字帖。王羲之听说东汉书法家张芝练字非常勤苦，有“临池习书，池中尽墨”的美传，连家中所用的布帛，都是先在上面练字，然后才染黑的。王羲之深受启发。他想，如果我也像张芝那样勤学苦练，未必就不能超过他。于是，他每当风和日丽的日子，就早早来到他家南面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旁，在塘边的一块大青石块上“临池挥毫”。小水塘原来水色蓝绿相间，明净如镜，清澈见底，王羲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水里洗笔涮砚，终于“池中尽染”。

王羲之练字十分用心，为写好一个楷书的“永”字，他苦攻十五年，潜心揣摩其中的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等各种基本笔法。晋怀帝永嘉六年（312），10岁的王羲之书法已顿挫生姿。随着年龄的长大，他的书法技艺也日臻完美。他取众书家之所长，草书师张芝，正书师钟繇，又遍习蔡邕、梁鹄、张昶等书，精研体势，损增古法，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创造了一种妍美流便、俊逸神妙的新体书。青少年时的王羲之已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非凡的才华。

王羲之“临池挥毫”，刻苦练习，不仅使他的手书笔势洒脱，气势磅礴，而且字字劲健，力透纸背。一次，王羲之去看望一位好友，友人不在，他见书房置有木工新制成的方桌，台面光滑洁白如纸，且书案又有磨好了的一砚新墨，于是书瘾大发，遂取笔舐墨，在那张新制成的桌面上急书，因兴之所至，片刻就写满了台面，即罢笔归家。不一会儿，他好友的父亲回家，一见新台面上写满了字，很是生气，并骂是谁大胆妄为，随即喊人将字擦去，可是桌上的字却怎么也擦不下来，甚至用水也抹不掉。王羲之的朋友回家后，急忙制止，并请来木工，让他将王羲之的手书雕刻下来，结果发现，王羲之留下的墨迹已渗透到台面板三分的深度。由此，后人称王羲之写字能入木三分。成语“入木三分”即源于此。

王羲之少时便品学过人，故深得从父王导、王敦及当时极有名望的尚书左仆射周颢的赏识。当时的太尉郗鉴听说王导的侄子王羲之才气非凡，很是羡慕，加上王家诸公子个个有才有貌，便派门生到王导家来挑选女婿。王导的侄儿们，听说太尉要派人来选婿，个个衣冠整齐，恭恭敬敬地并坐在厅堂，都显得非常拘谨。唯有王羲之一人非但不更衣整冠以迎，反而独自袒腹仰卧在东厢之床，若无其事地食其胡麻饼。门生回到太尉府，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郗鉴，郗鉴当即拍案，决定了女儿的终身大事："我要选的正是这样的佳婿。"

王羲之做了郗鉴太尉的女婿后，开始步人官场。初为秘书郎，后来出仕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及长史。按照他的门第和才望，本来可以在朝廷中担任要职，朝廷也三番五次地征召他做侍中、吏部尚书等官，但他都辞而不受。只做过定远将军、江州刺史及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地方官，故世人又尊称王羲之为王右军、王会稽。

王羲之为官时，东晋王朝政治动荡不安，各豪门大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当时，朝廷主要掌权者庾亮兄弟及殷浩、桓温等人，都企图通过北伐立功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王羲之认为，东晋政权虽受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但主要危险在于上层统治者内部的不和及对百姓压迫的严重。王羲之与当权者政见不合，对上层之间的权势之争不感兴趣，但他为官几十年对书法的爱好却始终如痴如醉。他常常因为练字，过了吃饭时间都不知道。一次，王羲之正在写字，王夫人不愿耽搁他的时间，便做好了他爱吃的馍馍和蒜泥，让书僮送到书房，书僮几次催他吃，他连头都不抬，继续挥笔作书。书僮只好去请王夫人来劝他吃饭。王夫人到书房一看，只见王羲之手里拿着一只蘸满墨汁的馍馍，正往嘴里送，弄得满嘴都是墨，原来他在吃馍馍时，眼睛里看的是字，脑子里想的也是字，错把墨汁当蒜泥吃起来。

王羲之的官位一直不高，字写得却登峰造极。一次，他见一老婆婆沿街卖扇，却无人问津。王羲之怜其艰辛，于是上前对这位老婆婆说："婆婆，你这竹扇上既无画又无字，难怪卖不出去，我给你写个字吧。"老婆婆见状不禁大急："好好一把扇子，让你写得乱七八糟，这下更卖不出去了。"王羲之连忙安慰："婆婆别急，你只要说上面的字是王右军写的，就是一把要一百钱，也不愁卖不出去。"老婆婆半信半疑，只有一试，结果一箩竹扇真的一会儿就卖得精光。老婆婆非常高兴，但就是不解："这个王右军莫非是神？"其实，王羲之的书法早已四方闻名，人们都把他写的字看成宝贝一样，只不过老婆婆不知道罢了。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与一班诗文同好谢安、孙统、孙绰、李充等四十二人到山青水秀的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行"修禊"礼，以祓除晦气。其时众人共饮酒赋诗二十六首，最后由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非常著名的《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全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字精妙。日后，王羲之想再写得好一些，但"书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王羲之对自己的这幅字十分珍惜，并作为传家之宝，直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手里时，已经是唐代了。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迷恋之极，对其佳作更是不肯放过，他曾多次召辨才进京，厚礼相待，但均没能把《兰亭集序》弄到手，后只得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乔装客商而赚得《兰亭集序》。对此，唐太宗曾作过一首诗："我爱兰亭损玉体，倾心远拜洗砚池。一心苦书理朝政，一字千金毕生功。"并摹仿王羲之的手笔书写在黄缎子上，挂于宫中。唐太宗还令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赵模、诸葛贞、冯承素等当时的书法名家摹写副本，以赐近臣，于是遂有《兰亭集序》摹本散落人间。而真本则在唐太宗驾崩时，被当作了殉葬品。

《兰亭集序》的艺术成就极高，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

书”。《兰亭集序》用笔跌宕起伏，有藏有露，中侧互用，变幻莫测。结构欹正多变，章法有疏有密，一气呵成。通篇字形宽窄相间，错落有致，恰似行云流水一般，“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

晋穆帝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因与当时任扬州刺史的王述有矛盾，不愿再受王述的管辖，称病辞去官职，隐居会稽。王羲之辞官后，遂与当时诸名士优游自适，“穷诸名山，泛沧海”。王羲之的许多传世佳作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留下的。如王羲之的小楷帖《黄庭经》就是极负盛名的一幅书法。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山阴有个道士酷爱书法，听说王羲之已辞官定居会稽，故一心想要王羲之帮他抄一本《道德经》，但他知道王羲之从不肯替人抄写经书。当他打听到王羲之有爱鹅癖好后，特地养了一群又肥又大的白鹅。王羲之听说道士养了一群好鹅，特地跑去观赏，并执意要道士将那群鹅卖给他。道士一口答应，只要求王羲之为他抄一本《道德经》，王羲之欣然提笔为道士抄了半天经文，然后高兴地“笼鹅而归”。王羲之抄写的《道德经》，后因传之再三，变成了《黄庭经》。为此，唐朝大诗人李白曾作过这样一首诗：

镜湖流水漾清波，楚客狂士逸兴多，

山阴道士若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因此，王羲之写的《黄庭经》亦俗称《换鹅帖》。小楷《黄庭经》书写稳重端庄，质朴秀美，丰腴含蕴，古意盎然。王羲之的楷法师从汉末魏初的大书法家钟繇，但钟繇的楷书尚有不少隶意，王羲之学钟而汰减隶意，字态严谨整齐，字形大小不一，笔锋清俊韵雅，间架方整均匀，一变古楷法之风格，别具风范，成为后世独步书坛的楷书导师。故世有“初学《黄庭》，恰到好处”之说。隋智永，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均有临本。

王羲之备精众体，对章草、今草、真书、行书，无不专长。今草体《十七帖》，因帖首有“十七”二字，故名之。《十七帖》

长一丈二尺，一百零七行，九百四十三字，其中书有《逸民帖》、《龙保帖》、《丝布草衣帖》、《服十帖》、《胡桃帖》等。此帖草法的精神，完全师从了张芝的墨飞笔舞，但在飞舞之间，矜持笔姿，处处显出他的超逸和俊美。墨笔不仅有张芝的出神入化，还有王导的肥瘦停匀，王廙的平稳健和。笔法离方遁圆，结字从容衍裕，章法形密势巧，虽没强调草书的欹侧之态，字与字之间牵连甚少，然气度恢宏，浑穆高蹇，极为淳雅，是王羲之草书中的珍品。唐太宗李世民曾将此帖定为朝弘文馆习书的范本。

王羲之的另一帖《快雪时晴》，以草笔为之，似真犹草，似草还真，实为行楷体之妙笔。其书取今草之神，魏楷之韵，及他本身秀俊老练的笔姿，汇为一幅千古不朽的名作。元代大书法家赵子昂，对此帖绝为拜崇。清代乾隆皇帝得此帖则视为瑰宝。这位古稀天子，曾将此帖及王羲之的又一帖《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合称为"三希墨宝"，并特为之建筑"三希堂"，宝藏这三件稀世之珍。清代书学理论家包世臣曾评述："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后世学书人立极。"

王羲之的真迹现已无存，然摹本、刻帖却极为丰富。除前文涉及的楷书《黄庭经》，行书《兰亭序》、《快雪时晴》及今草体《十七帖》等佳作外，另小楷书种还有《乐毅论》、《曹娥碑》、《东方朔画像赞》等等；行草书种有《平安、何如、奉桔三帖》、《丧乱、二谢、得示三帖》、《上虞帖》、《哀祸、孔侍中帖》、《远宦帖》、《寒切帖》、《姨父、初月帖》、《行穰帖》、《都下帖》等等。王羲之书法赖以相传，应当主要归功于我国历史上的三位帝王，即梁武帝萧衍、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徽宗赵佶。梁武帝搜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手书有一万五千纸以上，唐太宗有王羲之手书三千六百纸，宗徽宗有二百四十三纸。今天所见王羲之手迹，主要就是唐摹宋刻。但王羲之书法诸帖的摹本，也有很大一部分早已流失出我国大陆，有的流到了国外，有的流到了台湾，有的摹本

则已被毁。如《丧乱、二谢、得示三帖》，随唐代鉴真和尚东渡带去日本，现存日本国宝室；《哀祸、孔侍中帖》亦在中唐时流入日本；《远宦帖》、《快雪时晴帖》等，现存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帖《游目帖》原存日本广岛，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原子弹，今存书影。

晋穆帝升平五年（361），一代“书圣”王羲之离开人世。王羲之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楷书行草书的演进上贡献巨大，使得这些书体完全摆脱了篆隶书的影响，并趋于成熟和完美。特别是王羲之的行书和今草，对后代书家影响甚深，整整统治了中国书坛一千多年。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历来甚高。梁武帝萧衍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李世民专著《王羲之传论》称誉王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陈小立）

参考资料：

《晋书·王羲之传》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

唐·张怀瓘：《书断·王羲之》

明·方孝孺：《书林藻鉴》

清·王鉴皓：《金庭王氏族谱》

顾恺之点睛传神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北倚长江，南滨太湖的晋陵（今江苏无锡），出生了一位后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理论家和留有画迹的大画家，他就是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乳名叫虎头，故世人又称他为顾虎头。顾氏，原为江南显族。顾恺之的曾祖父在东晋做大官；祖父名毗，字子治，在晋康帝时为散骑常侍，主管规谏和表诏，后又当上了光禄卿，主掌宫殿掖门户；父亲名悦之，字君叔，曾为扬州别驾，历尚书右丞等官。优裕的家境，使顾恺之自幼就受到较充分的教育，加之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才气超凡，所以到了青少年时代，就已成为一位学识甚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了。他擅长文学，工诗赋，多艺能，美书法，尤妙绘画。

六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当时全国各地盛行修建庙宇，膜拜礼佛。晋哀帝兴宁二年（364），有个叫慧力的和尚，在当时的首都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建造了一所名叫瓦官寺的大庙。庙落成后，寺内和尚设会请当地的士大夫进庙鸣钟击鼓，名为弘扬佛法，实则请人捐钱。但前来捐钱的人，捐资都不超过十万。一天，顾恺之来到寺内，挥笔在缘簿上写下捐钱一百万。在场的和尚们看了一个个目瞪口呆，望着面前这位穿着很不起眼的年轻人，都认为他是在说大话。顾恺之却充满自信地说："请在庙内准备好一堵素白的墙壁，我自有募钱的办法。"一个多月后，顾恺之在刚刚砌好的一堵白壁上画了一个佛教传说中的人

物——维摩诘。维摩诘像画得非常工细。将要画完时，顾恺之叫来庙里的和尚，一面给画像点眼睛，一面说："第一天进庙看壁画的人，每人要捐十万钱给寺里，第二天捐五万，第三天捐助数由你们随意定好了。"等到画像公开展览时，瓦官寺的庙门都快被人挤破，看画的人都为顾恺之准确地传达出了维摩诘委身在俗的"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历代名画记》）拍手叫绝，并慷慨捐资。没多久，捐资数就超过了一百万。

瓦官寺壁画，在京城引起了轰动，使顾恺之这位士族门第出身的无名小辈，有了一定的名气，并很快得到大司马桓温的赏识。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到晋海西公太和二年（367年）期间，20岁左右的顾恺之被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

桓温是晋明帝的女婿，一生征战东西，灭成汉，攻前秦，取洛阳，战功赫赫，威权甚大。桓温虽是位手握兵权，震慑一方的大将军，但对诗文书画却甚感兴趣，特别是对顾恺之这位早熟画家，更是宠爱有加。

东晋王朝，仅保有江南半壁之地，政权几乎全依赖于豪门大族的势力才得以维持。所以，当时豪门权贵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士大夫为避免祸害，往往采取"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顾恺之则选择了一条与众有所不同的处世之道。他一方面凭借他士族门第的出身和桓温的器重，在官场上周旋于当时的豪门权势人物之间，并且深得他们的赏识。另一方面，他又从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更不介入政治斗争，而是充分利用官场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潜心于艺术研究。顾恺之的艺术创作态度、风格及性格行为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当时人称"顾虎头身怀三绝"，即："才绝、痴绝、画绝"。

所谓"才绝"，是指顾恺之聪颖博学，擅长文辞，他所著的《顾恺之文集》虽已失传，但文集中的精彩篇章和论断，仍为后人所传诵。如他的《观涛赋》：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洪流。

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并激波而扬涛……隽美宏阔的文辞，生动地描绘了江浙地区的优美景色，是赋如画，画在赋中，赋现画影，美不胜收。顾恺之的文学作品还有《虎丘山序》、《筝赋》、《风赋》、《冰赋》和《水赞》等等。

顾恺之的“才绝”，还表现为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和成功。东晋是我国书法艺术最繁荣和最高峰的时代，书家辈出。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和羊欣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人。顾恺之也是当时有名的书家。他经常和羊欣一起探讨书法艺术，他留下的书法手迹具有王献之的笔意。他还曾写过一部叫《书赞》的著作，可惜已失传。但从书名推测，它是一种评论魏晋书法艺术及诸书法家的著作。

所谓“痴绝”，是对顾恺之“大智若愚”的性格行为而说的。顾恺之的“痴绝”，大体可分“好谐谑”和“痴黠”两类。“好谐谑”指他生性诙谐。如他喜欢吃甘蔗，但和常人吃法不一样。一般人都从根部吃起，他却总是从尾梢吃起，别人问他何故？他说：这叫“渐人佳境”。因为他好诙谐，当时的人都愿意和他交往，并大多非常喜欢他。“痴黠”是顾恺之为适应复杂的现实环境，而选择的一种自我保护、自我掩饰的处世态度。有一次江州刺史桓玄拿了一片柳树叶送给顾恺之，并告诉他说：“此叶能使蝉藏身，你拿了别人也看不见你”。顾恺之接过树叶，遮住视线，这时桓玄故意把尿撒在他身上。顾恺之非但没有责备对方，还连忙说：“这不怪你，我用树叶遮住，你是看不见我的。”顾恺之这种“痴黠”的处世态度，在他一生中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所谓“画绝”，是指顾恺之在绘画上具有许多绝妙之处。他画人物，常常是各部分都画好了，就留下眼睛不画，有时一搁就是几年，而一旦点上眼睛，人物的神采气质随即跃然而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画？他说：人的躯干四肢，不是最主要的。画像传神，关键在眼珠上。顾恺之在为三国时魏的诗人嵇康的一首

四言诗作画时，对如何表现诗中“手挥五弦”和“目送飞鸿”两句，曾揣摩多时说：“表现‘手挥五弦’比较容易，但表现‘目送飞鸿’就很难。”顾恺之在绘画中抓住“目送”这个难点，不断探索尝试，使其“点睛”技艺又有提高，人物画达到了“点睛传神”的境界。

顾恺之“点睛传神”的绘画绝技，从师于西晋著名画家卫协。相传，卫协的《七佛图》画成后，画上的人物都没有点眼睛，观者觉得十分奇怪，问卫协这是为何？卫协说：我不点睛，是怕其腾空而去。顾恺之继承了卫协的画法，创造了以“传神”为中心的绘画风格。他曾给当时著名人物裴楷画像，端详许久，他在裴楷的颊部添了三根须，生动地描摹了裴楷“隽朗而有识具”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他画比他稍早的名流谢鲲，把这个不拘礼法，崇尚自然的人物，加岩石作衬景。别人问其原因，他说：“谢鲲自己讲过，在朝廷做官，我不如其他人；但纵情名山大川，我是超过其他人的。”顾恺之的这幅谢鲲画像，置人物于岩石中，也十分传神。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大司马桓温去世。桓温的死对顾恺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顾恺之才27岁，突然失去桓温这个大靠山，深感忧虑。他在祭拜桓温墓时，曾写下这样两句诗：“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衣？”当时有人问他祭吊时有没有流泪，他回答说：“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桓温死后，顾恺之又被荆州刺史殷仲堪收作参军，并深得信赖。在殷仲堪处，顾恺之一如既往，醉心于他的绘画艺术。他曾主动提出要给殷仲堪画幅像。但殷仲堪因父亲病时，整日侍奉，日夜哭泣，以致哭瞎了一只眼睛，故怕画出来难看，便不让顾恺之画。顾恺之却说：“您不必为眼睛有毛病而担心，我可以把您的瞳孔画得明亮些，上面再轻涂一层淡墨，如似浮云遮月，岂不很美吗？”顾恺之在“点睛传神”上作了新的尝试。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殷仲堪被桓温的儿子桓玄逼杀，顾恺之又寄迹于桓玄门下。他在桓玄处时，画过不少精品，可惜都已失传。他曾把一橱自己认为画得最好的画，加封题签后寄存在桓玄那里。桓玄却开橱把画偷了，然后把橱封好归还给顾恺之。顾恺之见封题如初，但橱中的画已失，知道是桓玄搞的鬼，但对这位当时权倾内外的人物又得罪不起，只好装痴卖傻："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桓玄兵败被杀，顾恺之非但没受株连，还升了官，做了散骑常侍，直至晋安帝义熙三年（407）离开人世。

顾恺之一生沉醉于绘画艺术，创作了许多佳作。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中所录，计十七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录，计二十九件三十八幅。当然，以上两书所录画迹，仅是顾恺之作品的一小部分，如他年轻时所画的极有名气的瓦官寺维摩诘像及中年以后所作的至今流传有绪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及《列女仁智图》等均未被《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收人。

顾恺之绘画的题材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擅长人物、肖像、历史故事等，而且对山水、花卉、飞鸟走兽等也无不兼长。他的山水画有《庐山图》、《云台山图》等，花卉画有《笋图》、《竹图》等，飞鸟走兽画有《凫雁水鸟图》、《虎啸图》等。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潘天寿先生称："顾恺之既可以说是我国山水画、花卉画的远祖，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画家中全能的画圣。"可惜，顾恺之的作品真迹，今已无传，留下来的只有几种后代人的摹本，包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等，其中《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二作品，最能反映顾恺之的画风，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顾恺之的绘画成就。

《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根据诗人张华写的《女史箴》创作的。

《女史箴》全文三百二十四字，当时人认为这是一篇“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作。文章内容中，列举了一些历史人物做例子。如汉元帝时的冯婕妤，为保护元帝安危，舍身挡熊；汉成帝时的班婕妤，为劝成帝少近女色，多理朝政，拒绝与他同辇游玩；等等。画幅采用长卷形式，根据文章内容逐段描绘，并将文章分段写在每段画的前面。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原为清内府所藏，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为英军所掠。全图现存九段，画面各类人物的动态描写和表情刻画，入微传神，各有特征。如舍身挡熊的冯婕妤，面对“玄熊攀槛”，挺身趋前，神情坦然，与汉元帝及左右贵人惊慌失色，形成鲜明对照。拒绝与汉成帝同辇游玩的班婕妤，侧身旁立，目不斜视，仪表肃穆，她身后另一妃，虽站立不动，但两眼远望辇中，似在考虑应否与皇帝同辇，犹疑不定，与班婕妤的神态又成鲜明对照。

《女史箴图》是最接近顾恺之绘画风格的一幅画，全图用笔采用了细挺而又柔秀的铁线描，舒展自然，韵感强烈，尤其是“点睛传神”，使人物气质跃然画面。在设色上，大体只用了墨、朱、紫、赭数色，人物脸部用朱色点唇及晕染双颊和上眼睑。在人物造型上，注重写实和匀称，尤其是妇女侧身立像的造型，苗条清秀，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秀骨清像”的时俗。后来的评论家对顾恺之的线描、设色评价极高。元汤垕的《画鉴》评价顾恺之的线条如“春蚕吐丝”，设色“敷染人物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曾见过《女史箴图》摹本的北宋鉴赏家米芾，在他著的《画史》中称赞此画：“笔彩生动，髭发秀润。”

《洛神赋图》是根据建安时期的杰出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而创作的。曹植年轻时一直非常爱慕甄氏，可曹植的父亲曹操却做主把甄氏嫁给了他的哥哥曹丕。曹丕继承皇位后，甄氏就当上了皇后，但不久受冤屈去世。后来，曹植入京朝谒，曹丕将甄氏的遗物“玉缕金带枕”赠予曹植，曹植悲痛不已，在返回自

己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甄氏，于是作了一篇《感甄赋》，以抒发自己的思恋之情。后来，甄氏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将篇名改为《洛神赋》。

《洛神赋》也是采用长卷形式，将文章中的情景分段画出。画卷从曹植与侍臣们驾车东归，初见洛神起，以一系列鲜明的形象，画出了一幅哀怨缠绵的连环图画。卷首画曹植在“日既西倾，车殆马烦”之际，站在洛水边，忽然遥遥望见一个美丽绝世的女神，倏忽地出现于岩石之畔，这位女神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恋人。顾恺之以生动的笔致，将这位丽人画得婀娜多姿，含情脉脉，回眸顾盼，飘飘若仙，表现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无限情意，特别是“回眸”一笔，将曹植恋人的柔情、忧伤等意态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下一段，画上女神已驾上飞行的云车，在六头奔驰着的神龙引导下，飞向远方。女神身后龙马相随，旌旗飘扬，形成了全卷的高潮。

画卷后段，描绘洛神既去，曹植坐船追踪，最后回到岸上，面对燃烛，“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最后不得不坐上马车返回封地。一路上仍回头怅望，显出懊丧而又留恋不舍的神态。

《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完整地体现了原著的主题思想，同时在艺术构思、意境创造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都表现得非常完美。后代的画家、评论家对此有极高的评价。《晋书·顾恺之传》说顾恺之的画：“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历代名画记》说：“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尤其是对顾恺之绘画注重“传神”的评价之高，真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慨。《画断》说：“顾公远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神妙无方，以顾为最”。《论画体工用榻写》说：“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

得其妙理”。《宣和画谱》也说：“恺之，世以为天才杰出，独立无偶，妙造精微。”

顾恺之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深远。历代师承或祖述顾恺之画法，摹写其画迹的有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隋朝的董伯仁、展子虔，唐朝的阎立本、吴道子，以至宋朝的李公麟，等等。

顾恺之不但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画家，而且在绘画理论上的成就，也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在我国绘画史上，他是留有绘画理论专著的第一人。他留存下的著作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三篇，均被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所录。顾恺之绘画的核心是强调“传神”，围绕这个核心，顾恺之提出了“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绘画方法。他认为作画前，画家首先应认真观察对象，达到对对象外貌与性格、神态、情绪理解统一的境界，这一艺术构思过程，就是所谓“迁想”。只有做到“迁想”，才可能生动准确地刻画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反映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实现“传神”的效果，这就是“妙得”的含义。至于刻画人物精神状态的具体方法，他认为：“神”要通过“形”来表现，而“形”又必然要寓于一定的“神”。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画得生动。在“以形写神”的过程中，顾恺之又特别调强“形”的准确性，认为“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

顾恺之的画论，体系庞大，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潘天寿先生称其“精深洪远，无大不包，无微不至”。我国魏晋以后丰富多采的绘画理论，几乎都可以在顾恺之的画论中找到“源头”。特别是他画论的精髓——“传神论”，为中国绘画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陈小立）

参考资料：

《晋书·顾恺之传》

《无锡顾氏宗谱》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陶渊明向往桃花源

陶渊明，字元亮。入宋后更名陶潜。东晋江州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晋哀帝兴宁三年（365），诞生在一个已经败落的贵族世家里。

据陶渊明在《命子》中的自述，他的先世是帝尧陶唐氏的苗裔，中经虞、夏、商、周、秦、汉，而至东晋，历朝名臣迭出，光荣相继。据说，夏朝勤政保国的御龙氏、商朝辅翼天子的豕韦氏、周朝管理民政的司徒陶叔、汉代追随刘邦开国建功的愍侯陶舍、协助汉景帝处理万机的丞相陶青，这些功业彪炳的人物，都是他杰出的祖先。浔阳陶氏就是这个世族的一个分支。魏晋时代最讲究阀阅出身，矜夸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当时的社会风气。陶渊明为自家编撰了这么一个源远流长而实难考信的谱系，说明他早年也未能免俗，但他的主要用意并非炫耀，而是自勉。追溯祖辈的历史，是为了跟踪前人的足迹。

陶渊明真正可考并对他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系，应从曾祖陶侃算起。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与丞相王导齐名，以煊赫的武功成为南国长城。官至太尉，八州都督，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卒赠大司马。在东晋名臣中，他是功业最隆、气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位。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关于他勤政爱民、恭谨有礼的佳话。另外，自东晋开国以来，朝廷权贵大抵以争权固宠为能事，州府镇将则以防区为其世袭领地；而陶侃却在晚年给朝廷上书，请求辞去本兼各职，归老林泉。曾祖的业绩与品格对陶

渊明的影响颇大。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早死，不知名。从陶渊明对他的赞语中，约略可以知道，他的性情恬淡虚静，把功名看得很轻。

对陶渊明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他的外祖父——东晋名士孟嘉。他是陶侃的女婿，出身江南著名的世族家庭。当时荆、江、豫三州刺史庾亮，器重他的人品学问，征辟他为主持儒学的劝学从事。雄鸷霸道的征西大将军桓温（“大丈夫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这句名言就是桓温说的）对他也待之以礼，特聘他为自己的参军，后又升授长史（类似于秘书长）。他一生“行不苟合，言无矜夸”，时贤都公认他是三公之材，可惜刚逾“知命”之年即过早逝世。

这些品格高尚的先祖，作为陶渊明精神上的楷模，伴随了他一生，对于他的性格的形成和处世态度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陶渊明在七八岁的童稚时代即不幸丧父，家境日益贫困，但他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书记载，陶渊明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经典的教育，曾系统地研读过《六经》和《论语》等书。他虽不曾亲聆父亲的教诲，他却有幸朝夕得到慈母的指点。他的母亲孟氏夫人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陶渊明生活在社会风尚和学术思潮由“习尚老庄”逐渐向崇尚儒术转变的时代，他的故乡江州又是当时经学研究的重要中心，在他 15 岁到 25 岁的十年中，《三礼》专家范宣和“儒博通综”的范宁先后在江州豫章郡提倡经学，设帐授徒，开办乡校。流风所及，“江州人士，并好经学”。陶渊明自然也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

除了儒学的《六经》，他也研究过道家的学说。《道德经》、《庄子》、《列子》、《淮南子》等书，也是他常置案头的读物。

此外，他还读了不少文、史以及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东晋王朝在淝水之战中获胜。这一年陶渊明19岁。转年举行过冠礼，他就算是成人了。按照当时士族社会的惯例，该是确定生活道路的时候了。青年时代的陶渊明希望遵照孔子先师的遗训，通过入仕来施展其“大济于苍生”的抱负，但是这个愿望在当时却难以实现。

陶渊明未能及时入仕，一方面是因为门祚衰落，难以受到上层贵族社会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弱冠逢世阻”，也就是一成年便没遇到好世道。淝水大捷之后，外患稍解，内乱继起。乘胜开拓中原的谢安，在昏聩的孝武帝的无端疑忌与奸邪之徒交相诽谤中抑郁去世。接着，名将谢玄、谢石等又相继凋零。孝武帝的同母弟司马道子执掌政柄。一代名相谢安的陨落，标志着东晋王朝一段比较清明的时代的结束。孝武帝是个沉溺酒色的昏君，司马道子也是个整日昏醉的酒徒，两个酒鬼朝夕以酣歌为事。司马道子及其徒党弄权纳贿，卖官鬻爵，将朝政搅得乌烟瘴气。陶渊明在风华正茂的年岁，碰上了这般倒霉的政局，使他选择了宁愿在田园守穷，也不愿与司马道子之流为伍的道路。在希望入仕而不能入仕的日子里，陶渊明也有过“独善其身”的想法。《感士不遇赋》中有“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的诗句，这就说明“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两种人生道路，他都考虑过。

大约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陶渊明模仿《庄子》的寓言，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文中以简洁的文笔描绘了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必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性格与风貌。“五柳先生”是陶渊明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所以时人早就看出这篇文章并非寓言，而是陶渊明入仕前生活的“实录”。仔细品味文中故作放达的乐观自得，其实有一种对现实无可奈何而自我解嘲的味道。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29岁才涉足仕途。这一

年，江州刺史王凝之征聘他为州府祭酒。祭酒，是别驾祭酒的简称，在江州刺史府中主管诸曹兵、贼、仓、户、水、铠等职事，并有权代表刺史巡察所属郡县，这是一个为人歆羡的好职位。陶渊明由于母亲年老而家贫供养不周，加上别驾祭酒这个职位也可以使自己小试牛刀，便接受了王凝之的征辟。但到职后不多日，就令人难解地辞职归家了。

陶渊明这次辞职与他的上司王凝之有关。王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是个昏庸之辈，他不仅在政治上毫无建树，而且还附和昏聩的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崇道佞佛，大煽迷信宗教之风。他崇奉五斗米道到了愚昧的程度，祷祀鬼神，不吝财贿，炼丹服药，妄想飞升。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也俗不可耐，连他的夫人谢道蕴都瞧不起他。谢夫人归宁，向他的叔父诉苦说："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篇》）性格刚直的陶渊明无法降心屈志与这样的上司合作，只好托故辞官了。辞官不久，州府又征召他为主簿。州主簿是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员，在僚佐之中地位比较高，而事务又不像祭酒那么繁剧。但陶渊明有了上回的经验，便辞谢了。

这次辞官后，陶渊明又回到了柴桑县上京故居，闲居了六七年。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十月，陶渊明应屯军夏口（今湖北汉口）的江州刺史桓玄的征辟，重返仕途，这次出仕在桓玄幕府中担任什么职务，已无史可征。但他曾替桓玄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呈递奏疏，可见其职位是颇为可观的。

隆安四年（400）春，桓玄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盘，自封为荆、江二州刺史，在江陵建立霸府。桓玄上表朝廷，要求确认，同时要求同意他率兵东下镇压孙恩起义。这时，陶渊明被派赴建康，就是呈递这封奏疏。

在建康候旨的日子里，他真切感受到了国势的危殆：石头城

以南全被荆、江二州镇将所据，大江以西皆为豫州刺史所专，建康以东的京口及江北的广陵则由北府兵将领控制，皇帝困居建康城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政局糜烂，国家溃败，但身为首辅的司马道子依然整日昏醉酣卧，其子司马元显作威作福，生杀由己，聚敛无厌，富逾帝室。种种事实使陶渊明看清了，从建康的权臣到州郡的方伯，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扩展自己的地盘，攫取更大的权势，没有一个是真正将国家的安危、生灵的涂炭放在心上的。这对他孜孜追求的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是个沉重的打击。

陶渊明肩荷着失望的重负，在五月初离开建康溯江西归。经过这番出使，陶渊明清醒了许多。他看清了桓玄根本不是什么安邦兴国的人物，指望依托此人实现自己"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自己参加桓玄幕府的举动非常后悔，暗暗下定了"投冠归旧墟"的决心。

隆安五年（401）冬，孟老夫人病故。陶渊明自江陵奔丧返回柴桑，就此脱离了桓玄幕府，结束了第二次出仕。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正月，东晋下诏讨伐桓玄。桓玄则抗表传檄，领兵东下。三月，攻人建康，夺取东晋王朝军政大权，杀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这时陶渊明在家乡开始了躬耕生活，实践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的夙愿。元兴二年（403）春，他作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诗中写出了他第一次躬耕的体验。他对孔子"忧道不忧贫"之类的遗训产生了怀疑，喜忧参半地迈出了躬耕自资的第一步。

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陶渊明又应镇军将军刘裕的聘请，远赴京口，入其幕府任参军。但因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几个月后便又托故离职了。

陶渊明自京口返回柴桑后，建威将军刘敬宣又征辟他为幕府参军。由于此时讨伐桓玄的战争尚未结束，士人有参佐本州戎幕的义务，而刘敬宣又是北府兵名将刘牢之的儿子，颇有贤名。因

此，陶渊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征聘。几个月后，刘敬宣被抚军将军刘毅倾轧去职，陶渊明的第四次出仕也就自然终止了。

在赋闲家居的日子里，陶渊明经常为维持生计而苦恼。他两次结婚生下的五个孩子需要养育，而种田的收益却不敷用度。为了解决全家老小的供养问题，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经担任太常卿的叔父陶夔的推荐，出任彭泽县令一职。出乎他的意料，县令的职事非常繁剧，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公事。特别是催交军粮，摊派夫役的命令，都是十万火急，不准延搁；但这里的百姓长期遭受战争的蹂躏，早就是“男不被养，女无匹对”，根本无力承担沉重的役调送迎。陶渊明一向同情百姓，而现在却要他违背本心为官府役使、催逼百姓，这使他内心痛苦不堪，感到“深愧平生之志”。十一月间，郡里派了一名督邮来彭泽作年终巡视。督邮是郡府负责督察检核县务的官，位轻权重，非常跋扈。县吏告诉陶渊明，按照惯例，你应先去拜见他。陶渊明非常反感，“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解去印绶，辞官归田，彭泽令只做了八十多天。离开彭泽时作《归去来辞》以见志。

陶渊明十三年的仕途生活，自辞彭泽县令就结束了。他本来怀有“大济苍生”的强烈愿望，从29岁至41岁，时而出仕，时而归田，不断探寻着实现理想的机遇，然而，五次出仕，均以失败告终。仕途的污浊，政治的黑暗使他厌恶和绝望，于是，他毅然与仕途决绝，坚决走上了归田的道路。

晋安帝义熙二年（406）春，陶渊明开始了躬耕自资的生活。他最主要的田产，是祖上遗留下来的“南亩”庄田。那里有一座大宅院，盖着八九间草屋。屋前有桃李，屋后有榆柳，四周遍植桑树。这就是陶家唤作“园田居”或“古田舍”的田庐。

陶渊明脱离了“误入尘网十三年”的仕途道路，在简朴的田园生活中感受到了“复得返自然”的乐趣。新春伊始，他就不失

时令地起早摸黑，率领妻儿僮仆到南亩去垦荒拓地，播种栽植。经过全家的辛勤劳动，居然出现了“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的成绩。

对于一位年逾不惑的士族文人来说，开始整天整天地从事农务劳动，是非常辛劳的。但陶渊明更关心的是维护他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他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中表达了他不怕辛劳，坚持躬耕自资愿望的决心。

陶渊明归田之后，耕作之余就读书、写诗，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传诵千古的《归园田居》五首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了他田园生活初期的感受。

但平静的田园生活并没有过几年，义熙四年（408）六月，园田居不慎失火，八九间草屋化作灰烬，环绕住宅的林木也烤炙成枯木朽株，一门老小无家可归，只得寄身在门前小溪的船上。

义熙六年（410），卢循起义。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一带成为战场，战祸延续了五六个月，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另外，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也接踵而来，助纣为虐。陶渊明陷入了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的困境。尽管他相信“力耕不吾欺”，以为只要努力耕作就会有好的收成；尽管他年年“躬耕未曾替”，从来不敢稍有懈怠，但他的生活还是不断地走着下坡路，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就是这种境况的真实写照。他是靠着亲友的不时周济，才勉强没断了炊烟。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艰难竭蹶之中，但他躬耕自资的志向从未动摇，更没有向统治集团妥协。当陶渊明生活日趋困窘的时候，也正是刘裕集团加快篡晋步伐的时期。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刘裕剪除了与他争权的对手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势力，又通过北伐，消灭了南燕、后秦，恢复了北方部分河山，从而提

高了威望。在晋宋易代的前夕，陶渊明的一些朋友，纷纷投靠刘裕，争着做攀龙附凤的“佐命功臣”。刘裕集团对陶渊明也曾多次罗致。义熙九年（413）和义熙十四年（418），刘裕曾以东晋王朝的名义两次征辟陶渊明为著作郎。对于这个等闲之辈求之不得的职位，陶渊明均谢病不就。数十年的丰富阅历，他乱也看够了，篡权也看够了。他清醒地看到，东晋王朝中边皆朽，固然无可救药，但由刘裕来改朝换代，也无非是以暴易暴。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损毁自己的人格，去粉饰血染的皇冠。自然，他拒绝与刘裕合作，是要付出代价的。最起码的是全家老小都要跟随他含辛茹苦，忍饥挨饿。陶渊明曾在《饮酒》之九中，摹仿屈原《渔父》的笔意，假托一位好心的田父上门劝仕而自己予以拒绝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决不再仕的决心。这首诗大概就是拒绝了最后一次征召时所作的。

义熙十四年，陶渊明54岁，写了一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以屈原、司马迁式的悲愤心情，倾诉了他五十四年来立志行善，艰苦自励，反而遭遇种种的困苦和灾难的愤懑。火灾、虫灾、风灾、水灾，交互而至，夏饥冬寒，经常威胁着自己。他这个临变而守常的人，虽然也说：“在己何怨天”，但他毕竟是对天道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正产生着剧烈的变化。

陶渊明弃官归隐，其本意是通过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来避开尘世的纷扰，从而实现独善其身的理想。但长期艰辛不懈的劳动，不但没有能换来一家人的温饱，反而陷入饥寒交迫的困窘之中。当初怀着激情所设想的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之梦，被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现实击得粉碎。这促使他开始思考辛勤劳动而不能自养的深层原因。另外，他从躬耕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深切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从自身生活的贫困，更加认识到无地少田农民的悲惨处境；同农民的接近，使他清楚

地看到天灾人祸造成的农村极端的残破，这些都迫使他寻求贫困的社会原因和探求新的社会理想。他向往着能有一块人人劳动、和乐安宁、丰衣足食的乐土。

陶渊明不满黑暗的现实，很早就曾追求理想的社会。但由于生活经历的限制，那时他头脑中的理想社会，还仅限于对古代传说中黄（帝）唐（尧）盛世的回忆。虽然他早就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寄生性的重敛和争权夺势的战乱是造成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但他对圣君贤相的理想社会模式仍抱有幻想。

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称帝，建立了刘宋王朝。这个重大事变的刺激，使陶渊明终于明白了传统的圣君贤相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这时，他酝酿多年的理想社会的图景——桃花源，完全成形了。他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描绘了这片理想的乐土。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邀）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邀请）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不值得）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旧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陶渊明在这里描绘了"桃花源"理想社会。这是怎样的一个

社会呢？这里的生活是富裕、和乐而安宁的；这里人人参加劳动，所得全归自己；这里的人们平等相处、热情好客。这是一个没有战乱、没有国家君臣、没有改朝换代、没有赋税徭役的自由、美好的新世界。

陶渊明所向往的桃花源社会理想是他半生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间接地反映了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虽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它却包含着人类对理想社会追求的合理成份。正因为如此，它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后，以“桃源”为题的文学创作层出不穷。如唐代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北宋王安石的《桃源行》等名作。另外，北宋王禹偁的《录海人书》，记渔民海上奇遇；南宋康与之的《昨梦录》里，记杨氏兄弟奇遇的故事，都仍在继续发挥着这种桃花源式的幻想。由此亦可见陶渊明所描绘桃花源理想的巨大魅力。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秋天，陶渊明在贫病交攻之下，身体越来越衰弱。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九月中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自祭文》一篇。他对待死的态度很自然，很洒脱达观，能不喜不惧。居然模仿汉乐府《薤露》、《蒿里》等挽歌的诗体，描写自己被送葬入土的光景，并且没有一般挽歌凄凉黯淡的情调，实在是豁达至极。在《自祭文》中，陶渊明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对自己生平没有丝毫的悔恨，对于人间世界没有丝毫的留恋，可以泰然自若地归去了。

元嘉四年十一月，陶渊明阖目长逝了，终年63岁。亲友们依照他的遗愿，以俭朴的仪式安葬了他。生前友好共谥他“靖节先生”。

（范大章）

参考资料：

《晋书·陶侃传》
《宋书·陶潜传》
萧统：《陶渊明传》
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
清·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十卷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
《古典文学资料汇编·陶渊明卷》

范晔著《后汉书》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范晔的祖上是东晋的世家大族，祖父范宁曾任豫章太守，父亲范泰做过御史中丞、振武将军、国子祭酒。范泰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很好，撰有《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和文章集。范泰有五个儿子，范晔排行第四，出继给伯父范弘之，承袭了武兴县五等侯的封爵。

范晔自幼好学，广博涉猎经史之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善长隶书，通晓音律。17 岁时就被征辟为州主簿。刘裕发迹后，范晔便投到刘裕部下，任相国掾，后投靠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任冠军参军，转任右军参军，补任尚书外兵郎，后出任荆州别驾从事史，不久召他任秘书丞。其父去世，丁忧去职，服丧期满后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跟随檀道济出兵北伐，北征结束后任司徒从事中郎，后迁升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432）冬季，彭城太妃逝世，下葬的前夜，宾僚故吏聚集在东府，范晔之弟范广渊当时任司徒祭酒，这天正好当班值日，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住宿在范广渊处，夜里饮酒酣醉，并打开北窗听挽歌取乐。刘义康大怒，贬范晔出任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从这时起他开始著作《后汉书》。在郡数年之后，迁为长沙王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封宁朔将军。范晔之兄范暠任宜都太守，范晔之母随范暠在宜都，元嘉十六年其母故去。病重时向范晔报信，范晔没有及时赶去探视，奔丧临行时又

携带妓妾同行，被御史中丞刘损参奏，弹劾他不遵礼教，轻薄无行。宋文帝爱惜他的才学，没有降罪。守孝期满，范晔任始兴王刘濬的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刘濬镇守扬州，未亲政理事时，委托范晔处理政务，不久迁升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刘义康因为执政日久，威权越来越大，宋文帝与刘义康之间嫌隙越来越深。元嘉十七年，刘义康被解除司徒之职，改授都督江、广、交三州诸军事，出镇豫章。

鲁国人孔熙先博学多才，胸怀大志，任员外散骑侍郎，因为不被权贵赏识，长期得不到升调。当年他父亲孔默之任广州刺史时因贪赃受贿犯了法，赖彭城王刘义康的袒护救助，免除罪责，待刘义康被贬黜，孔熙先决心报答救父之恩。孔熙先想结交朝廷大臣，邀他们共同辅助刘义康，便选择可以鼓动的对象。因范晔才高志大，非常自负，对不能一展抱负而心怀不满，便想联络范晔，孔熙先却一向不为范晔看重，没机会进言劝说，孔熙先费尽心机，想通过范晔的外甥谢综结交范晔。谢综深得范晔信任，孔熙先曾经与谢综相识，便首先笼络谢综。孔熙先家财富足，在和谢综兄弟赌博游戏时故意输给谢综等人财物，遂来往密切，情投意合。谢综便将孔熙先引荐给范晔，孔熙先又屡次输给范晔很多财物，范晔既贪其财宝，又爱惜孔熙先的文才，孔熙先能言善辩，又尽心竭力要结交范晔，二人遂亲密异常，结成莫逆之交。起初，孔熙先旁敲侧击，讽谕暗示，企图说服范晔，范晔不为所动。随后孔熙先便极力陈述，反复劝说。范晔素来闺门不守礼教，被人议论，所以门第虽高，而王室不肯与他通婚姻，孔熙先便借此激劝范晔："丈人若认为朝廷相待恩义深厚，为什么不与丈人通婚？是因为门户不相当吗？人家以猪狗相待，丈人却想为朝廷尽死力，不是太愚惑了？"范晔默然不语。

此时范晔与沈演之都被宋文帝赏识，常常一同被文帝接见。范晔若是先到，必要等沈演之来了一起入宫；沈演之先到，曾经

被独自召见，范晔又为此怀怨。范晔长期担任刘义康府中僚佐官职，一向相待很厚，到范晔被贬任宣城太守时，情义便疏远了。谢综任刘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刘义康镇守豫章。谢综还朝时便向范晔表白刘义康心意，消除怨隙，请求和解。范晔既听从了孔熙先的劝说，遂有拥立刘义康为帝之意。为试探朝廷的意向，于是范晔向宋文帝进言："臣历观前代两汉的历史，诸藩王妖言诅咒，对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应明正典刑，给予处罚。刘义康的奸心逆迹，远近皆知，而至今没有治罪，臣深感疑惑。而且异端长久存在，加深祸乱根源，骨肉之间，人们不便多言，臣受朝廷厚恩，故冒死披露。"文帝并未听纳。

孔熙先素来善长天文星象学，便借天象散布说："宋文帝必因为骨肉相残，遇害而晏驾丧命。江州应当出天子。"认为刘义康有天子之分。谢综之父谢述也受刘义康礼遇，谢综之弟谢约又是刘义康之婿，也都愿为刘义康效力。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孔熙先交给他六十万钱，让他在广州招募兵士，周灵甫拿到钱一去不返。大将军府史仲承祖过去受到刘义康信任，屡次奉命到京师暗中联络心腹，准备拥立刘义康，听说孔熙先有此心意便相互联络，交往密切。丹杨尹徐湛之，是刘义康外甥，受宠爱胜过其子弟，仲承祖因这缘故结交徐湛之，告诉他拥立刘义康的密谋。仲承祖南下，传达刘义康心意，向萧思话和范晔解释嫌怨。

又有法略道人，起先受到刘义康供养；又有王国寺法静尼经常出人刘义康府邸，因为感激刘义康旧恩，也为刘义康奔走，与孔熙先来往。法略道人还俗，改名孙景玄，任臧质宁远参军。孔熙先精通医术，会诊脉治病，法静尼的妹夫许耀任队长，在朝廷殿省担任值宿守卫，因得病经过孔熙先诊治，药到病除，许耀遂答应做内应。豫章人胡遵世，与法略道人交好，也参与了密谋。法静尼南下去见刘义康，孔熙先遣婢女采藻随行，让她带去信笺，陈说图谶天命。法静回来，带来刘义康馈赠孔熙先的铜匕、

铜镊、袍段、棋奁等物品，孔熙先担心泄露机密，毒死了采藻以灭口。徐湛之向范晔献计："臧质见识不凡，必然能够赞同大事，这样可得健儿数百。臧质与萧思话交情深厚，二人都受过大将军眷顾，必能同心协力。萧思话的武装不比臧质弱。我郡中文武官吏、侦探逻卒也不下千人。大可不必为兵力不足担忧，只是不要失去良机。"并且粗略地作了安排，事成后徐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为左卫将军，其余人也都作了安置。凡是素来不肯依附刘义康的敌对者，在另外簿册上，列入将被处死的名单。孔熙先又让其弟孔休先拟好了将要发布的檄文。

孔熙先认为举大事，拥立刘义康为帝，应当刘义康有所表示，于是范晔作了一篇刘义康给徐湛之的书信，并向同党出示。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到任所出朝镇守，文帝在武帐岗为他们饯行，范晔等人约定这天起事。因时间紧迫，约期不能划一行动，未能发动。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朝廷，告发了范晔等人拥立刘义康，密谋造反的计划。

文帝接到告密，下令收捕谋反诸人。当天晚间，先传呼范晔与朝臣在华林东阁会集，安置在客省之内。事前逮捕了谢综与孔熙先兄弟，已经审讯认罪招供。这时文帝在延贤堂，派人责问范晔。事情发生得突然，范晔很惊怕，却不肯低头认罪。文帝重又派人问范晔："卿与谢综、徐湛之、孔熙先谋反，诸人已经招认，人证见在，还不从实招承！"范晔道："如今皇家宗室如磐石之固，即使能够侥幸发动谋反，方镇便会来讨伐，岂能逃脱覆灭。况且臣官高任重，晋升官职自然不难，怎会冒灭族危险？请朝廷据理明察，臣不会有造反阴谋。"文帝又遣人责问："孔熙先就在华林门外监押，难道你要当面对质吗？"范晔说："孔熙先诬陷攀扯臣，臣又当如何？"孔熙先听说范晔不肯服罪，报告殿中将军

沈邵之说："诸方面布置，檄书文告，都是范晔所作并一手制定，为什么如今这样抵赖。"文帝出示了范晔手迹，范晔只好详细陈述了事情原委，并说："早就想奏知朝廷，因逆谋还未彰著，又希望能消弭平息，所以拖延至今，辜负了国恩，罪恶重大，甘受诛戮。"

当夜，文帝使尚书仆射何尚之去探视范晔，问他："卿为什么竟做出这样的事情？"范晔反问："君指的是什么事？"何尚之道："卿自己应当明白。"范晔说："外人传说庾尚书憎恨我，思量起来与他并没有结怨。谋反之事，听孔熙先说起过，看轻他是个小儿，并未介意。现在突然受到指控，才觉得有罪。君正在以道义辅佐盛世，使天下人不受冤屈。弟被处死之后，还希望君能够察照我的心迹。"次日，武士解送范晔交付廷尉。范晔入狱，问丹阳尹徐湛之现在何处，这才知道是被徐湛之告发。孔熙先满口招承，坦然认罪，文帝大为惊奇。转面责备前任吏部尚书何尚之："让孔熙先年近三十还做散骑郎，哪能不逼他做贼！"

范晔在狱中，与谢综和孔熙先分别关押，范晔称有病请求移到考堂，想接近谢综等人。获准移动之后，与谢综只有一壁之隔，范晔遂隔壁问："当初被捕时，怀疑是谁告发的？"谢综说不知，范晔道："乃是徐童。"徐湛之小名仙童。范晔在狱中作诗道："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懵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范晔原来以为入狱便被处死，而文帝追查此案，拖了二旬，范晔遂产生求生之望。狱吏戏耍他说："外面传闻范詹事或许要长期监押。"范晔听了又惊又喜，他一心牵挂不朽杰作《后汉书》尚未完成，还有十篇志尚待他编写。在狱中他给诸甥侄写了一封书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抒发才学志向和修史著书的抱负。

当年十二月，范晔与弟广渊，其子蔼、遥、叔蒌，孔熙先及其弟休先、景先、思先，孔熙先之子桂甫，桂甫之子白民，谢综与弟谢约，仲承祖、许耀，并牵连在内的许多人，都被押赴市井处斩。稍疏远的亲属也被流放到边远地方。范晔被杀时年纪48岁。

关于范晔谋反被杀，见于正史的记载。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李慈铭、陈沣等人，对范晔之死提出不同见解，替范晔申辩不白之冤，说他是遭诬陷被害的。陈沣作了一卷《申范》的文章，只凭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王鸣盛讲：“范蔚宗之恃才傲物，取憎群小，……共诬以重罪而杀之。”（《十七史商榷》卷29）范晔恃才傲物，确是事实，他行为放纵，不守封建礼法，不仅得罪了一些达官显贵，甚至连皇帝也没放在眼里，以致引来杀身之祸。

他看不起流俗官僚，与权臣不睦，曾经撰写过一篇《和香方》，借药名、药性讥骂权贵，朝廷中有权势的人物庾炳之、何尚之、沈演之、羊玄保、徐湛之、慧琳道人都被骂在里面。东晋南朝时期佛教盛行，宋朝武帝、文帝也信佛，而范晔认为虚妄，他常常宣传“死者神灭”，并想作一篇《无鬼论》驳斥谬论。直到他临被杀之前，还对人说：“寄语给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他的傲气任性和不同流俗，必然招致憎恶。何尚之就是处心积虑、早有害他之心的人，他诬蔑范晔“志趣异常”，请宋文帝把他远远派往广州，免得在朝廷生事，因为杀了他反落得诛杀大臣的名声，有伤皇化。宋文帝知道范晔善弹琵琶，能作新曲调，很想听他弹奏，屡次示意，范晔假装不明白，始终不肯为文帝弹奏。一次在酒宴上文帝很高兴，对范晔说：“我想高歌一曲，卿可弹奏。”范晔奉旨，文帝唱完了，范晔也止弦不弹了。范晔的才学很受宋文帝赏识，他的自负和傲气，特别是与刘义康关系很深，也引起宋文帝的猜忌，从而埋下了祸根。范晔自己也承认疏

狂招祸，却以为本心实在没有谋反之意。但是，其甥谢综与孔熙先谋反，范晔“轻其小儿”知情不举，应是什么罪过？刘义康很有才干，范晔认为他是大有作为之君，想辅佐他从而一展抱负，也是可能的。

在范晔著《后汉书》之前，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已经有很多种，由朝廷组织编修的《东观汉纪》，是历朝史官接续撰写的，书成于众手，早期的班固、中期的刘珍、晚期的蔡邕所做的贡献最大。《东观汉纪》卷数多，内容丰富。除此以外，纪传体的东汉史书有：三国时期吴国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华峤的《后汉书》；编年体的有：晋薛莹的《后汉纪》、张莹的《后汉南纪》、袁宏的《后汉纪》等。另外还有袁晔《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王粲《汉末英雄记》等。可以供范晔参考并采用的资料很丰富。范晔认为前代史书不够理想，连班固的《汉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的立意很高，要汲取前代史学家的经验，扬长避短，写出一部最完美的史学著作。他著《后汉书》的计划很周详，准备完成十篇本纪、八十篇列传和十篇志三部分，并且写出叙例。

范晔从元嘉九年开始写作，陆续完成了本纪和列传的撰写。《后汉书》的列传具有时代特色，范晔根据东汉的社会特点创设了一些新传目，比如《宦者》、《党锢》传，鲜明地突出了东汉宦官专权、残害忠良、侵害百姓、对反对暴政的太学生和正直官吏迫害镇压的历史面貌，把宦官擅政、党锢兴狱的缘由始末，论述得清楚通畅。因为政治黑暗，斗争严酷，许多人隐而不仕，洁身自好，东汉时形成一种风尚，范晔便设立了《逸民传》反映时尚，表彰逸民隐士。又有些人不甘同流合污，操行气节为人称道，范晔特地立有《独行传》，记述这些人的行为。东汉时期，除了儒学治经为主的学术活动以外，诗赋也极发达，人才辈出，

文学的兴盛不能没有反映，《儒林传》已经不能包容概括学问之道，范晔于是创立了《文苑传》，与之并立。隐士的高风得到表彰，贞女的亮节也不容忽视，范晔看到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注意到妇女的聪明才智，遂创立了《列女传》记述妇女的事迹。这些类传的设立都被后代史学家著史时采用，范晔的开创之功是巨大的。

东汉时期，多次出现太后临朝的局面，为表现“权归女主”的特殊现象，范晔设立了《皇后本纪》与帝王并列，又因为东汉时盛行方术，图谶迷信很盛行，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也普遍发展，为反映这种社会状况，他又设立了《方术传》。范晔因时制宜，为全面、详尽、真实地记载历史，独出心裁地创立传目，为后代人著作史书所遵循和效仿，对史籍的编纂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表现出范晔超人的史才和高明的史识。

范晔著史还非常注重历史评鉴，他写的论赞自认为是得意之笔，他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论赞是作者对于历史、社会、事件、人物的评价和见解，他使用四字为句的形式作论赞，放在每篇纪、传之后，表述自己的品评看法，起到正得失、明鉴戒的作用。

因此，《后汉书》结构严谨慎密，内容丰富多采，记载史事翔实可靠，叙述历史繁简得宜，文字优美通畅。它的价值自然超过了以前各种东汉历史著作，自范晔《后汉书》著成，其他各家著作逐渐被取代淘汰，而归于散亡。

尽管范晔心胸不凡、计划周密，立志完成一部体大思精，超过前人的史学著作，但是最后却没有实现，他的被杀，使原计划中的“志”书部分，没有来得及作完。范晔自己写作纪、传两部分，委托谢俨收集志书的资料，有不少内容准备在志中表述，例如，《后妃纪》中有“僚品佚事，在《百官志》”的话；《东平王

苍传》中有“语在《礼乐舆服志》”之言；《蔡邕传》里也有“事在《五行志》”的交待。他想把东汉一代政治、经济、礼乐制度、典章文化等诸方面的内容作出全面记载。在狱中他给诸甥侄的书信中，还说：“欲遍作诸志”，班固《汉书》中有的他要全部写，对此范晔信心十足，胸有成竹。最终其志未酬，留下了千古遗憾，否则《后汉书》将是一部完备优美的断代史著作。

因为《后汉书》没有志，是一大缺憾，梁朝人刘昭在为《后汉书》作注时，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进书里，并且也作了注。刘昭注《后汉书》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偏重于补充历史事实。后来他的注文绝大部分散失了，现在只剩下了八篇志中的注文。

继续给《后汉书》作注的是唐朝的章怀太子李贤，他注《后汉书》重在训诂，解释说明字句。但是李贤注书不是一手所成，他召集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等多人共同参与。李贤从被立为太子到被废为庶人，时间仅有六年，因此，诸人学识高下不一，最后又未及整理划一，有些地方显得杂乱疏漏，甚至有的部分尚未完成。

宋朝人熊方见《后汉书》具备纪、传并补了志，没有史表，认为补作了史表才称得上体例上完整，便补写了《年表》十卷。

宋代真宗在位以前，《后汉书》在传抄和刊刻时都还没有把续的志合并进去，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朝廷下诏刊印历史著作，孙奭建议把刘昭注补的续志三十卷合进书中一并刊印，他的建议被采纳，从此以后，刻印《后汉书》就都把续志附在纪、传之后。

到清代，有许多学者对《后汉书》作了大量的校正订补工作，著名的有钱大昕、钱大昭、周寿昌、李慈铭、惠栋等人。王先谦收集采用了唐宋以来各家的成果，作了《后汉书集解》，是注解《后汉书》的集大成之作，有很高的价值。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宋书》：《范泰传》、《范晔传》、《何尚之传》

《后汉书》与《狱中与诸甥侄书》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石勒灭前赵

汉刘粲汉昌元年（318）六月，汉主刘聪病重，他自知不久于人世，急着考虑后事的安排，征大司马刘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皆录尚书事，又受遗诏辅政。二人深感责任重大，执意不肯拜任。刘聪改任曜为丞相、雍州牧，勒为大将军、幽冀二州牧。石勒还是没有受命。刘聪又以上洛王刘景为太宰，济南王刘骥为大司马，昌国公刘颢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事、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诸人轮流裁决尚书奏事。人事工作刚安排就绪，刘聪就咽气了。不久，太子刘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武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改年号汉昌，葬刘聪于宣光陵。刘粲本来就是一条好色的恶棍，他早就对他父亲刘聪的漂亮后妃垂涎三尺，只是不敢下手。刘聪一死，他暗中十分高兴，尽情占用了后宫的一切。靳太后、武后、王后这时都不满20岁，刘粲整天和她们鬼混在一起，不理政事。

靳准知道刘粲不成大器，与他的两个女儿靳太后、靳皇后一起唆使他杀了太宰刘景、大司马刘骥、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逞、太师刘颢、大司徒齐王刘劢等人。朱纪、范隆逃往长安，投奔了刘曜。这时，刘汉的军队主要被刘曜掌握，刘粲以曜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仍镇长安。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刘粲自己又回到后宫美女群里作乐去了。

靳准假借诏命，任用族弟靳明为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掌握了皇宫及京城的卫戍部队。九月，靳准想除掉刘粲，谋于王延。延不从，急急忙忙去向刘粲告密，途遇靳康，将其捕获，囚禁起来。靳准怕夜长梦多，提前举事，勒兵升光极殿，喝令甲士绑了刘粲，数落他的罪恶，推出朝外砍了。刘氏男女，不论老少，全都驱赶到平阳东市斩戮。又掘永光、宣光二陵，斩刘聪尸，焚烧了刘汉的宗庙。靳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署置百官，组建了自己的政权。他自知势单力薄，欲联合东晋为援，于是派人带信给晋司州刺史李矩说："刘渊，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晋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幽没。辄率众扶侍梓宫，请以上闻。"矩驰表于元帝司马炎，司马炎派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还晋。靳准打算任命王延为左光禄大夫。延破口大骂道："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眼置西阳门，观相国（刘曜）之入也；右眼置建春门，观大将军（石勒）之入也。"靳准怒，挥刀杀了王延。

刘曜得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金殿）政变，率师自长安东赴平阳。同时，石勒率兵五万进据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古城庄）北原，讨伐靳准。靳准几次出兵挑战，石勒闭城不战，以挫汉兵锐气。

十月，刘曜在赤壁（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光初，以朱纪为司徒，呼延晏为司空，又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为赵公。

石勒攻平阳，刘曜使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屯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庙前村北古城），与石勒共讨靳准。

十一月，靳准使侍中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于石勒。勒囚泰，送于刘曜。曜对泰说："先帝（刘粲）末年，实乱大伦。司空（靳准）举事，立有大功。若早迎大驾，朕当尽将政事相委托，更何况乎免死！卿为朕入城，转明此意。"卜泰回到平阳，将刘

曜的话转告靳准。准自以为杀了刘曜的母兄，他不会善罢甘休，呻吟良久，没有答应。十二月，左右车骑大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相与杀靳准，推尚书令靳明为主，遣卜泰奉传国玺降汉。石勒闻知此事，大怒，进军攻靳明。明出战，大败，于是闭城固守。

这时，石虎又率幽、冀之兵赶来平阳城下，与石勒一起攻城。靳明屡败，遣使向汉主刘曜求救。刘曜知平阳不保，派刘雅、刘策迎取靳明。明率一万五千人归附了汉。刘曜西屯粟邑，收捕靳氏男女，不论老少全都斩尽杀绝。又派人到平阳将他母亲胡氏的遗骸迁葬于粟园，号阳陵，把平阳一座空城留给了石勒。石勒纵火焚烧了平阳宫室，使裴会、石宪修复永光（刘渊）宣光（刘聪）二陵，又收葬了刘粲及宗室臣僚百余口，然后留兵戍守平阳，班师回襄国去了。

前赵刘曜光初二年、后赵石勒元年（319）二月，石勒派左长史献捷于汉，汉主刘曜使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加殊礼，出警入跸，如曹公辅汉故事。拜王修及副使刘茂为将军，封列侯。王修的舍人曹平乐随修出使至粟邑，刘曜把他留在朝中供职，他对刘曜说：“大司马这次派王修等人来，外表至诚，内则欲窥大驾虚实。待其回去复命，将会袭取大驾。”这时，刘曜士卒疲惫，相信了曹平乐的话，于是将郭汜追还，捕杀了王修。三月，副使刘茂逃回襄国，向石勒诉说了王修的死状。石勒大怒，喝道：“吾事刘氏，竭尽人臣之职责。他的基业，都是因为吾南征北战才能如此，今既得志，便翻脸相图。赵王、赵帝，吾自称为，何须由他摆布！”于是下令尽诛曹平乐父母、兄弟及妻妾子女。刘曜怕石勒来攻，由粟邑西还长安，并建都于此。

六月，刘曜立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冬，石勒左右长史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等劝勒称尊号，勒不许。十一月，将佐复请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汉昭烈帝刘备在蜀、魏武帝曹操在邺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太守皆为内史，准《禹贡》复冀州境，以大单于镇抚胡汉各族。石勒赞许，戊寅，即赵王位，依照春秋时期列国纪年，称元年。为别于刘曜前赵政权，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

先前，石勒因世道离乱，律令繁多，命法曹令史贯志起草了一部简便易行的《辛亥制度》，前后仅有五千字的篇幅，施行了十多年。他即王位后，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掌握法律；以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领门臣祭酒，专主胡人诉讼。立严禁，禁止胡人不得凌侮汉族知识分子，号胡为国人。遣使巡行州郡，劝课农桑。朝会始用天子一样级别的礼乐，任汉士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不久又加官为骠骑大将军、侍中、开府，赐爵中山公。其他臣属，各进位受爵不等。

后赵六年（324）正月，后赵司州刺史石生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临阵斩尹平，掠五千余户而归。从此，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二郡居民历遭战乱，民不聊生。

后赵七年（325）三月，北羌王盆句除归附了前赵。后赵将石佗自雁门出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袭击盆句除，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头而归。前赵刘曜遣中山王刘岳追击，曜亲提大军屯于富平，为岳声援。岳与石佗大战于黄河之滨，斩石佗，后赵兵死者六千多人，刘岳又将后赵的俘获物全部夺走。

五月，后赵将石生屯洛阳，攻掠河南，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军屡遭败仗，军队给养匮乏，不得不派人请求归附前赵刘曜。刘曜使中山王刘岳率兵一万五千人奔赴孟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荆、司二州兵自崤、渑而东，打算与李矩、郭默会

师，共攻石生。刘岳攻克孟津、石梁二戍，斩获后赵守兵五千多人，进围石生于金墉（洛阳城西北小城）。后赵中山公石虎率领四万人自成皋关，与岳战于洛水西岸。刘岳于混战之中，被流矢射伤，大败，只得率军退保石梁。石虎命令军士凿挖深堑，树立鹿栅围困石梁，使前赵军内外隔绝。刘岳兵众饥困，杀战马为食。石虎又分兵击败呼延谟，谟被杀。前线军队接连失利，刘曜十分愤怒，于是亲提大军救刘岳，石虎率骑三万迎战。前赵前军将军刘黑击石虎将石聪于八特阪（今河南新安东），大破后赵军。这时，刘曜屯军石金谷（今河南洛阳东北）。一天深夜，军队忽然无缘无故发生了炸营，士兵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个惊恐呼叫奔跑，溃不可遏。刘曜不得不退屯渑池（今河南洛宁西），夜间，军中又起暴发惊溃，于是撤军回长安去了。六月，石虎攻拔石梁，生擒刘岳及其将佐八十多人，氐、羌兵三千多人，尽送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这些降卒到了襄国后，人人思归，后赵恐其为乱，于是将他们全部坑杀。石虎又攻王腾于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捕杀了王腾，坑其士卒七千多人。前赵连吃败仗，损兵折将，刘曜十分哀伤，回到长安，回想起部下将士被坑杀的惨状，愈不自安，于是率百官，尽着白服，到长安城东郊，祭奠阵亡将士，哭了七天，才被随从抬回城中，不久，哀愤成疾。这时，东晋颍川太守郭默又被石聪击败，丢弃妻室家小，逃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去了。司州刺史李矩部下将士阴谋叛降后赵，李矩无力阻止，也率众南逃。沿途间，士卒纷纷开小差，部队越走越少，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到了鲁阳，李矩忧愤成疾，不久就病死了。李矩的长史崔宣率其余两千人投降了后赵。于是，司、豫、徐、兖等州地域，率皆归属于后赵，后赵与东晋隔淮水为界。

后赵太和元年（328）七月，后赵石虎率众四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西人，击前赵河东，沿途五十多县不战而降，遂

把军队推进到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前赵刘曜大怒，誓与石虎决一死战，他派河间王刘述发氐、羌之众屯守秦州，以备西部张骏、杨难敌，自将中外精锐水陆诸军救蒲坂，自卫关北渡黄河，兵势十分强盛。石虎慌惧了，引兵东退。刘曜挥师追击，八月，及于高候，大破后赵军，临阵斩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数以亿计。石虎逃奔到朝歌。刘曜在大阳（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南渡黄河，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堤，引洛水灌城。又分兵攻汲郡、河内，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相继投降了前赵。前线失利的消息传到后赵的国都襄国，朝野上下大为震动。

十一月，后赵石勒欲亲提大军救洛阳，僚佐程遐等固谏，说："刘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大王不宜亲动，动则难保万全。"石勒大怒，按剑叱斥道："滚！滚出去！"遐等胆战心惊，夹着尾巴退出了宫廷。石勒在殿内走来走去，待胸中怒气稍解，复又把徐光召来，说："刘曜乘一战之胜，围守洛阳。庸人之见，皆谓其锋不可挡。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急，以我初锐攻击，可一战而能擒他。若洛阳失守，刘曜必拼死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而来，吾之大势将去！程遐等人不欲吾行，卿以为如何？"徐光回答说："刘曜乘高候之势，不能进临襄国，而去攻金墉，这是其无能的表现。大王亲征，以威略临阵，彼必望旗奔败。平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石勒哈哈大笑，说："光言是也。"于是使内外戒严，有敢再谏阻者斩。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其众会师荥阳，中山公石虎进据石门，石勒自统步骑四万在大埸（今河南滑县西南古黄河畔）渡过黄河。直扑金墉。步骑分道，浩浩荡荡，石勒与徐光乘马并肩行进，勒对徐光说："刘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徐光连连点头赞许。

十二月，后赵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兵两万七千。石

勒见无前赵守兵，欣喜若狂，激动不已，不由地仰着脸张开双臂，举手指天，然后双手捂着脑门子，兴奋地喊道："天啊！"指挥军队卷甲衔枚，诡道兼行，出于巩、訾之间。

这时，前赵主刘曜十分麻痹，天天与嬖臣饮酒赌注，不管士卒死活。左右的人有的劝阻他，提醒他警惕后赵军的反攻，刘曜十分生气，喝道："敢以妖言惑众，砍了！"探马侦知石勒率军过了黄河，驰报刘曜。刘曜这才慌了神，匆匆忙忙召集部众商议，增兵戍守荥阳，切断黄马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黄河南岸）通道。不久，在洛水巡逻的前哨部队与后赵的先头部队遭遇，擒得羯卒，送到洛阳。刘曜亲自提审俘虏，问道："大胡（石勒）是否亲自来了？有多少人马？"羯兵说："赵王亲自来，军势十分强盛。"刘曜听罢，吓得脸色都变了。于是撤金墉之围，在洛阳城西布阵，军队十多万人，南北散列十多里。石勒望见愈是高兴，回头对左右的人说："可以庆贺我了。"遂率步骑四万人洛阳城。

后赵集中兵力击敌要害。中山公石虎引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前赵中军；石堪、石聪等各率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前赵前锋，大战于西阳门。石勒身贯甲胄，自阊阖门出，夹击前赵军。刘曜从小就嗜酒成性，末年尤甚。将战，饮酒数斗，他常骑的赤马又踢又咬，不肯行进，无奈又换乘一匹小马。临出军营，复又饮酒斗余。来到西阳门前，寻就平地列阵。这种地形阵势对后赵骑兵攻战十分有利，石堪因而乘之。率精锐骑兵直冲敌阵，前赵兵大溃。刘曜酒意正浓，昏昏沉沉，拨马退走，马陷石渠，坠于冰上，浑身被创十多处，有三处击中要害，倒在冰上，不能动弹，被石堪俘虏，石勒遂大破前赵兵，斩首五万余级，下令："所欲擒者一人而已，今已俘获。诸将士可抑锋止锐，纵敌归命之路。"刘曜被解赴到石勒面前，他见到石勒，不由得想起了在重门与石勒盟誓的情景，问道："石王还记得重门之盟否？"石勒

让徐光对他说："今日之事也是天意。还有什么可说的？"不久，石勒班师凯旋，使征东将军石邃将兵卫送刘曜到襄国。刘曜枪伤严重，躺卧在马车上，石勒让太医李永随车同行。到襄国后，将刘曜软禁在永丰小城，给其妓妾，严兵困守。又遣刘岳、刘震及随从男女穿着整洁的服装去看望刘曜。曜见众人，很是高兴，说："吾谓卿等久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吾到今日。相比之下，我杀石佗，多感惭愧！今日之祸，也是自有应得。"众人留宴永丰小城，畅叙思念旧情，至晚而去。石勒让刘曜写信给他的太子刘熙，谕令他早日投降。刘曜却谕告刘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不得因吾动摇自己的意志"。石勒看罢，十分厌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愈益感到刘曜可气，于是把他杀了。

后赵太和二年（329）正月，前赵太子刘熙得知父亲刘曜被俘，惊恐万状，与南阳王刘胤谋西保秦州。尚书胡勋说："今虽丧失君主，疆土还算完整，将士也没有叛变的，应齐心协力，抗拒石赵。若力不能敌，再退保秦州不晚。"刘胤惧石勒兵众强势，早就想西逃，听到胡勋的反对意见，大怒，喝道："你想阻止众人的主张吗？"当场命士兵把他推出殿庭砍了。刘熙、刘胤率百官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诸征、镇也都弃其所守，纷纷向西逃走，关中大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降于后赵。后赵遣石生率洛阳兵众西人关中，接管长安城。

八月，前赵刘胤得知长安陷落，想夺回长安，率众数万自上邽东进。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等郡的少数部族纷纷起兵响应。刘胤屯军在仲桥，石生在长安城外围布防，后赵中山公石虎又率骑二万赶赴关中，救援石生。九月，石虎在义渠（今甘肃庆阳西南）大败前赵军人，刘仓皇逃往上邽。石虎乘胜追击。枕尸千里。上邽城溃，石虎活捉了前赵太子刘熙、南阳王刘胤及其将、王公、卿校以下三千多人，并将他们斩尽杀绝，把免于死罪的台省文武官吏和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

千多人一并迁徙到襄国；关中五郡的屠各曾与后赵为敌，石虎将他们驱赶到洛阳，坑杀了五千多人。至此，前赵亡，立国仅十一年。

后赵灭前赵后，疆域广拓，国势强盛。太和三年（330）三月，君臣请石勒即皇帝位，石勒这才自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刘氏为王后，世子石弘为太子；子石宏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封秦王；石斌为左卫将军，封太原王；石恢为辅国将军，封南阳王；以中山公石虎为太尉、尚书令，进爵为王；虎子石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石宣为左将军；石挺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为河东王，石堪为彭城王。以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前郎中令裴宪皆为尚书，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其他文武官吏，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封拜。

后赵群臣执意请求石勒正尊号。九月，石勒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平，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太子石弘为皇太子，文武僚佐各有封进。

后赵建平三年（332）正月，后赵帝石勒与群臣举行盛大宴会，满座文武，频频举杯，盛赞主上石勒神武英明，石勒酒酣耳热，望着徐光，问道："自古以来多少帝王，朕可与何等君主相比？"徐光拱着手回答，说："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帝刘邦，后世没有能和您相比的。"石勒笑笑说："人岂能没有自知之明，卿说得太过分了！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与光武帝刘秀，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曹操）、司马仲达（司马懿）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听罢石勒这一席言，无不佩服，皆顿首欢呼万岁。石勒虽识字不多，喜欢让诸生为他诵读史书，时常根据自己的见解评论古今得失，闻者莫不悦服。曾

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刘邦封立六国后裔，吃惊地说："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张良谏阻，这才舒了一口气，说："多亏有此人谏阻。"石勒文武韬略比起刘曜，不知强多少倍，后赵灭前赵，也是自然的事情。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石勒载记》、《刘曜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石勒灭前赵》

石虎凶残无道

石虎，字季龙，从小就死了父母，成为孤儿，石勒的母亲王氏收养了他。他与石勒的关系实际上是叔侄关系，因他又是王氏的养子，与石勒又有一层兄弟的关系。西晋永嘉五年（311），石勒被人掠卖为奴，与母亲王氏及年纪尚幼的石虎相失。后来，石勒燕赵起兵，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晋并州刺史刘琨为了讨好他，把王氏及石虎送到襄国。这时，石虎已经17岁了，他性情十分残忍，常用弹弓弹人，成了军中人人憎恨的祸害。石勒对母亲王氏说："这小子凶暴无赖，使军士杀了他，恐败坏吾家的名声，不如我们自己除掉他。"王氏说："快牛为犊子时，多能破车，你可稍稍宽忍些。"石虎长大后，练得一身武功，跑马射箭，勇冠当时。石勒任他为征虏将军，每屠城邑，斩尽杀绝，很少有漏网的。然驭众严而不烦，没有敢违犯条令的，指授攻讨，所向无前。从此，石勒又喜欢上他了。

后赵建平元年（330）二月，石勒封子石宏为大单于。中山王石虎愤愤不平，回到家里，私下对儿子、齐王石邃说："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仰成，以吾身当矢石，二十多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攻克十三州。成大赵基业的人，是我啊！大单子的职位应当归我，今天却授给了一个黄吻婢儿，想起来让人心里堵得慌，不能寝食。待主人归天之后，不能再留下这些遗种。"

太子石弘好属文，性情儒雅。中书令徐光对石勒说："皇太

子仁孝温恭，中山王凶暴多诈！陛下一旦有个好歹，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应渐夺中山王权，使太子早参朝政。”石勒点点头，有心这样做，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这时石虎的勋业、威势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建平三年（332）四月，右仆射程遐对石勒说：“石虎勇悍又有权术，除陛下之外，他谁也瞧不起。加上他的残忍，长久担任将帅，威震内外，他的儿子们已渐长大，都掌握着一定的兵权。陛下在，当然显不出他，但日后恐非是少主的臣属了。应及早除掉他，确保江山不移。”石勒说：“今天下还未统一，太子幼弱，还须由强臣辅弼。石虎也是骨肉至亲，又有佐命功勋，正应该委以伊、霍一样的重任，何至于像您说的那样做事呢？您正是恐怕不能以帝舅的身份擅掌大权，吾也让您参预顾命，不要过于忧虑。”程遐见石勒不听自己的意见，反而误会了自己，感到有些委屈，两眼扑簌簌地落泪，说：“臣所考虑的，完全是为您着想，您却以私计拒绝，忠言怎么能听得进去呢？石虎虽说皇太后恩养大的，但不是您的亲生儿子，他虽有些功劳，您给他的恩荣，足以酬谢他了。而他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难道这能有益于将来！若不除掉他，臣但见宗庙不血食了。”勒不听。

程遐退出宫室，将石勒的话转告给徐光。徐光说：“石虎对我们二人常常恨得咬牙切齿，恐非但国危，亦将为家祸了。”一天，徐光到宫中值班，他瞧准石勒独自闲暇的机会，对石勒说：“今国家无事，而陛下神色好像有些不快，这是为了何事？”勒说：“吴、蜀未平，吾恐后世不以吾为受命之王呀！”光说：“魏承汉运，刘备兴于蜀，汉朝怎么算是不亡呢？孙权在吴，犹如今天的司马氏。陛下占据长安、洛阳二都，平荡八州，帝王正统，不在陛下，又能在谁呢？况且陛下不忧虑腹心之病，却忧虑四肢。石虎借陛下威略，所向即克，而且他的本性不仁，见利忘义，父子并据权位，势倾王室，对于自己不满意的事，常耿耿于

怀。近来在东宫陪皇太子饮宴，有轻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万年之后，没有人能制服他。”石勒默然不语。从此，始让皇太子亲理政事，又使中常侍严震协助他，唯征战，断斩大事须呈报石勒定夺，由此严震的权势大起来。石虎的家门前冷清得可以张设雀罗，因更是怏怏不悦。

后赵石弘延熙元年（333）六月，石勒抱病不起，中山王石虎入侍宫中，假造诏书，禁止群臣及宗室亲戚入宫，使内外隔绝，石勒病情如何，外部无从知道。他又作假诏，召秦王石宏、彭城王石堪回襄国，想剥夺他们的兵权。石勒神志清醒了些，睁开眼睛，望着站在床边的石宏，吃惊地说：“吾使你居藩镇，正备今日，有人召你来？还是自己要求来的？有召你来的人，应当按诛！”石虎慌了神，忙说：“秦王思念陛下，暂且回来看看，现在应让他回镇。”却仍把石宏留在宫中，不使他回镇。过了几天，石勒又问石宏回去了没有，石虎撒谎说：“受诏即遣，现已在半道上。”这时广阿县境，蝗虫成灾，石虎借口灭蝗，暗中使其子冀州刺史石邃率兵三千游弋于蝗灾区，随时与石虎内外响应。

七月，石勒病重，临终前，遗命诸子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不要学晋朝司马氏兄弟相互残杀。中山王（石虎）要好好辅弼太子，免得将来人们说三道四。”不久，石勒病死。石虎劫持太子石弘临轩，逼他收捕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下廷尉，召石邃率兵入宿卫，朝廷文武吓得四处逃散。石弘十分恐慌，自陈劣弱，提出让帝位给石虎。虎不冷不热地说：“君终，太子立，这是常礼。”弘哭哭涕涕，一再推让，石虎怒吼道：“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义，何必哭泣！”石弘无奈，只得即帝位。石虎又利用他的名义，威逼他杀了程遐、徐光，在夜间将石勒潜葬于山谷，又备礼仪，虚葬于高平陵。

八月，石弘以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国，总摄内外军政。石虎立妻郑氏为魏王后，子石邃

为魏太子，加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次子石宣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河间王；石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安乐王；石遵为章武王。石勒文武旧臣皆补散任，虎之僚属亲党尽署台省要职，以镇军将军夔安领左仆射，尚书郭殷为右仆射。更名太子宫为崇训宫，徙太后刘氏以下居此，意思是让这些不驯顺的人多接受些教训。又选石勒宫女、车马、服御漂亮好玩的，全都移入丞相府。

石勒的妻子刘太后对养子石堪说："先帝刚晏驾，丞相遽相凌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复长久，您有何打算?"堪说："先帝旧臣都被疏斥，军旅不复由人，宫省之内，没有可用的人。臣请奔兖州，扶南阳王（石恢）为盟主，据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宣太后诏于牧、守、征、镇，使各举兵以诛暴逆，这样也许能成功。"刘氏说："事情紧急，马上行动。"九月，石堪乔装改扮，轻骑奔袭兖州（治廪丘），不克，南走谯城（今安徽亳县）。石虎派其将郭太追获石堪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城父集），送襄国，把他吊绑起来，用烧火的铁棍炙烙皮肉，惨刑致死。刘氏谋泄，也被石虎废杀。

十月，后赵河东王石生在长安，石朗在洛阳，各举兵讨伐石虎。虎留太子邃守襄国，率领步骑七万攻石朗于金墉。金墉溃，擒石朗，石虎先让人把他的手、脚剁掉，然后又斩首。接着，又西进长安，以梁王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石生遣将军郭权率鲜卑涉璝众二万人为前锋拒敌，石生率大军继发，屯军于蒲坂。郭权大破石挺于潼关，挺及左长史刘隗战死，石虎逃奔渑池（今河南洛宁西），士卒溃败，枕尸三百多里。鲜卑兵暗与石虎通谋，临阵倒戈。石生遇变，张皇失措，单骑逃奔长安，郭权收集散众退屯渭汭（今陕西渭河入黄河处）。石生又怕长安不保，躲到鸡头山里去了，将军蒋英据守长安。石虎率军攻破长安，斩蒋英。石生部下将士发动兵变，杀死石生，投降了石虎。郭权逃往陇右去

了，石虎凯旋襄国。

后赵延熙二年（334）三月，石虎出兵，平定秦陇，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又幽禁秦王石宏，将异己势力基本上清除。

十月，石弘捧着皇帝玺绶亲到魏王宫，请求禅位于石虎。虎嘲讽地说："帝王大业，天下的人自当有议论，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石弘哭着回到宫里，对太后程氏说："先帝种真是不能再遗留下来了。"这时，尚书奏言："魏台（石虎）请依唐、虞禅让故事。"石虎又改口气说："石弘愚暗，居丧无礼，不可以君临万国，应当废黜，怎么能说是禅让！"十一月，虎遣郭殷持节入宫，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对群臣说："庸昧不堪纂承大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群臣莫不流涕，宫人恸哭。群臣又到魏台劝进，虎说："皇帝是盛德的称号，不敢当，暂且可称居摄赵天王。"又下令将石弘、程太后、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幽禁在崇训宫，不久，尽将他们杀害。

石虎称尊，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称疾不贺，石虎一连几次召他，这才来见石虎。他阴沉着脸对石虎说："弋仲常谓大王命世英雄，既然把臂受先帝重托，辅弼少主，怎么反而夺了人家的帝王尊位呢？"虎说："吾难道愿意如此！只是顾怜石弘年少，恐难了家事，故代他行事而已。"心里虽怪弋仲直人快语，然察其诚实，也不加罪于他。

石虎以夔安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晞为尚书左仆射，魏郡申钟为侍中，郎闿为光禄大夫，王波为中书令。文武封拜各有差，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后赵石虎建武元年（335）九月，赵王石虎自襄国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

建武二年十一月，石虎大造邺宫室，建太武殿及东、西宫，十二月竣工。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南北六十五步，东西七十五

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能容纳卫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珰、银楹、珠帘、玉璧，穷极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帐顶冠以金莲花。又在显阳殿后，建造九座宫院，选士民美女人宫，服珠玉，披绮縠者有一万多人。教宫人占星气、马步射。置女太史及杂伎工巧，皆与外朝相同。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执羽仪，鸣鼓吹，每次游宴，都让这支美女仪仗跟随。这年，后赵大旱，一斤金才值二斗粟，百姓嗷然。而石虎用兵不息，百役并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载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一钟掉人河中，募集三百名水手人河打捞，系以竹絙，用牛百头，还有辘轳，这才把钟拉出来，装人万斛之舟，运抵邺城。又采用尚书解飞的建议，在邺城南，投石于河，架设飞桥，功费达数千万亿，桥竟不成。役夫饥甚，无法再继续施工，这才罢休。

建武三年（337），太保夔安等五百多人入宫，请石虎称尊号。石虎为了增加太武殿的声势气氛，让成公段做庭燎。庭燎装置上下盘，上盘置燎，人站列下盘。这天早朝，文武齐列太武殿，庭燎尽燃，内外一片通明，群臣一个个跪倒，朝请宝座上的石虎。这时，庭燎失去平衡，滚烫的灯油向群臣劈头盖脸灌下，二十多人当场炙死。一心想称尊号的石虎，正在高兴的时候，碰上了这桩倒霉事，心里十分厌恶，挥刀将成公段拦腰砍成两截。不久，石虎称大赵天王，在邺城南郊祭天，立其妻郑氏为天王皇后，太子石邃为天王皇太子。

太子石邃，小名阿铁，素骁勇。石虎很是喜欢他，常对群臣说："晋朝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灭，故使朕得至如此。如朕，怎么能有杀阿铁的道理呢？"既而石邃骄淫残忍，好妆饰美女，斩其首，将血洗去，放置盘上，让宾客观看。又与尼姑交亵，然后把尼姑杀了。与牛羊肉一起下锅炖煮，与宾客共食。河间公石

宣、乐安公石韬皆有宠于石虎，石邃疾之如仇。石虎荒耽酒色，喜怒无常。他让石邃处理尚书奏事，每有请示，怒加呵斥："这些小事也值得来说！"有时不请示他，又遭斥责："为何不请示我？"边骂边用竹板捶打，石邃一个月甚至要挨三次揍。他私下对中庶子李颜等人说："官家（石虎）难侍候，吾欲行冒顿杀父之事，卿随从我吗？"颜等伏首，不敢吭声。七月，石邃称疾不视政事，偷偷地率领文武官吏五百余骑来到李颜的别舍宴饮，席间对李颜等人说："我欲到冀州杀河间公，有不从者斩。"众人跟他出得门来，行走数里，一个个四处逃散，李颜叩头固谏，石邃这才昏醉而归。他的母亲郑氏听说了这件事，偷偷派身边的人谴责石邃。邃大怒，挥刀把谏者砍了。这时有一位天竺僧人佛图澄在邺，受到石虎的礼敬。佛图澄看出了后赵帝王父子之间的矛盾，对石虎说："陛下不宜数往东宫。"石虎正要去东宫视疾，忽然想起佛图澄的话，半道返回。既而双眼圆瞪，大喊道："我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呀！"于是命所亲信的女尚书去看望石邃。石邃佯装唤她到跟前来说话，突然抽出宝剑刺死了她。石虎大怒，派人收捕了李颜等人，经过一番审讯，李颜据实招出石邃所言所为。石虎杀李颜等三十多人，幽禁石邃于东宫，不久又宽释了他，引见于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然后转身走出。石虎让唤住他，说："太子应朝中宫，怎么这样匆匆离去。"邃不言语，头也不回，径直回宫去了。石虎大怒，废邃为庶人。当天夜里，杀了石邃及其妻张氏，并男女二十人，同埋于一棺，诛其宫臣支党二百多人，废石邃母亲郑氏为东海太妃，立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太后。

建武五年（339）七月，石虎以石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

建武六年三月，石虎以秦公石韬为太尉，与太子石宣隔日轮流处理朝事，专决赏刑，不复启奏。司徒申钟谏阻说："赏刑是君主大政，不可以让别人代理，这关系到防微杜渐，消逆乱于未

然的问题。太子的职责在于料理一些生活问题，不应参与朝政。石邃的教训不远。而且二政分权，没有不致祸的，爱子的方法不对，实等于害了他们。”石虎不听。中谒者令申扁以能言善辩，受到石虎、石宣父子的亲昵，因使典机密。石虎不省政事，将朝政交给石宣、石韬，而宣、韬皆好酣饮畋猎，因此，官吏升降、生杀大权都由申扁操纵。申扁每出入宫廷，九卿以下莫不望尘而拜。太子詹事孙珍患有眼病，向侍中崔约求诊治良法。崔约开玩笑地说：“用尿汤浸泡就可痊愈了。”珍说：“眼睛怎么能让尿浸泡?”约说：“你的眼睛那么深，正可使浸溺于尿中。”孙珍听了，十分生气，把这话告诉了石宣。石宣在其兄弟中间，长得一副典型的胡人相貌，眼窝深深，听了这话，大怒，下令诛杀了崔约父子。于是，公卿以下也都害怕孙珍。

建武八年（342）十二月，石虎儆台观四十多所于邺，又营长安、洛阳二宫，役者四十多万人。又欲自邺起阁道至襄国。并且穷兵黩武，命州郡三五发卒，诸州军造甲者五十多万人，船夫十七万人，被水淹死、虎狼所食者有三分之一。加上公侯、牧宰竞营私利，百姓失业愁困。官逼民反，贝丘（今山东临清南）人李弘聚众起义，被石虎残暴镇压，参加起义的几千家农民，尽被斩尽杀绝。

石虎畋猎无度，每天晨出暮归，把政事全交给了石宣、石韬。石虎宠爱石韬，石宣很是嫉恨，想方设法削弱诸公的势力。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想巴结石宣，劝他说：“今诸侯吏兵超过限度，宜逐渐裁省，以壮大根本。”石宣让张离启奏石虎说：“秦、燕、义阳、乐王四公，听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余兵五万，悉配东宫。”这番话得到了石虎的认可，于是诸公人人怨愤，兄弟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青州上言：“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之间移于城东南，还有一千多只狼狐的足迹跟随，足迹把地面踏成了一条小沟。”石虎

听罢，高兴起来，说："石虎，就是我呀！自西北移向东南，天意使我平荡江南。命诸州兵明年全部集中到邺，吾将亲统六师以奉天命。"又传下制命："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斩。"民至鬻子以供军需，犹不能给，逼得无法，只好上吊自缢，以至于自缢于树者相望。

石虎、石宣又无故诛杀大臣。领军王朗曾对石虎说："盛冬雪寒，皇太子使人伐宫材，漕运于漳水，役者数万，怨声载道，陛下应乘出游之机，予以制止。"石虎听从了，却得罪了石宣。石宣大怒，总想寻找机会杀掉王朗。建武十年（344），石宣借口彗星出现，应杀姓王的大臣消灾，要杀王朗。石虎顾惜王朗，却把中书监王波腰斩，并杀其四子，这才了事。

石虎又在黄河灵昌津（即延津，在今河南汲县东古黄河上）建桥，用工五百多万，而桥不成，怒，于是斩杀建桥的技术工匠而罢。

建武十一年（345）正月，石虎以平乐公石苞代镇长安，征发雍、洛、秦、并等州十六万人建造长安未央宫。

虎好猎，晚年体态肥胖，不能跨马，于是造猎车千乘。猎车安装转椅，旋转自如。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为猎场，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好牛好马的，御史求之不得，皆诬以犯兽，被处死者有一百多人。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治洛阳宫。还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公侯七十余国皆为九等，大发民女三万人，分为三类，各配充皇宫、东宫和王宫。太子、诸公又私自采选民女近万人，郡县务求美色，多强夺人妻，杀其夫及夫自杀者三千多人。民不聊生，荆、楚、扬、徐等州的农民逃的逃，散的散，户口几将尽光。石虎却认为是地方守令治政无方，诛杀了五十多人。金紫光禄大夫劝谏，虎大怒，让武士把他拉杀。

建武十二年（346）五月，阴雨连绵，石虎因尚书朱轨不修

道路，将他逮捕入狱。蒲洪劝阻石虎，说："陛下既有襄国、邺宫，又修长安、洛阳宫殿，将以何用？缴猎车千乘，圈定方圆数千里以养禽兽，夺人妻女十余万口，以实后宫，圣帝明王之所为，难道一定是这样的吗？今天以道路不修，欲杀尚书，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才得见晴。刚有二天晴日，虽有鬼兵百万，也不能消除这道路上的泥泞，何况人呢？政刑如此，又能让天下的人、后来的人怎样看呢？愿您止劳作，罢苑囿，出宫女，赦朱轨，以不负众望。"石虎虽不高兴，也不治罪于他，遂罢长安、洛阳作役，而竟诛朱轨。

建武十三年（347），石虎据有十州之地，聚敛金帛及外国所献珍异，府库财物，不可胜计，犹不满足，尽掘前代陵墓，取其金宝。和尚吴进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压其气。"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袤数十里。申钟、石璞、赵揽等上书，陈述天文错乱，百姓凋敝。虎大怒，说："若使苑、墙早上建成，我就是晚上死了，也没什么遗恨了。"催促张群使燃烛夜作。忽然，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

九月，石虎命太子石宣到滏口（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祈福于山川，因行游猎。宣乘坐着高大的车，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六军戎卒十八万人，浩浩荡荡出自金明门（邺城西门）。石虎从其后宫升凌霄观观望，笑着说："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

石宣每外出围猎，早上，在他的住处周围百里外，列人为长围，从外向内，驱赶禽兽；临近黄昏，聚集于他的住所，然后使文武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石宣与姬妾乘辇临观，兽尽而止。或有禽兽逃掉，惩罚守围者。士卒饥冻死者万余人，所过三州十五郡，地方资储尽被耗费殆尽。石虎复又使石韬游猎，石韬也像石宣一样，残害士卒与百姓。

建武十四年（348），石虎宠爱石韬，想让他取代石宣为太子，因石宣年长，一直犹豫不决。石宣做事，多忤石虎心意。石虎怒气冲冲地说："真是后悔没有立石韬。"石韬因此更加骄纵，在太尉府造宣光殿，梁长九丈。石宣见而大怒，斩杀工匠，截梁而去。韬怒，增至十丈。石宣闻知，对亲信杨杯、牟成、赵生说："凶竖傲愎竟敢如此，你们若能杀了他，吾入西宫称帝后，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给你们。韬死，主上必临丧，吾乘机杀他，没有不成功的。"杨杯等许诺了。

八月，石韬夜与僚属宴饮于邺东城东明观，因宿于佛精舍。石宣使杨杯等缘猕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第二天早上，石宣奏上，石虎哀惊气绝，良久方苏。将出临其丧，司空李农谏阻，说："害秦公者不知何人，贼在京师，主上不宜轻出。"石虎这才没有出宫，严兵发哀于太武殿。石宣往临石韬丧，不哭，裂着嘴直"呵呵"，让人揭布敛观尸，大笑而去。石宣想嫁祸于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把他们逮捕，投入了监狱。

石虎怀疑石宣杀了石韬，想召他入宫讯问究竟，又恐他不敢来，于是诈称其母杜氏因过度哀伤致病，石宣信以为真，入朝中宫，石虎乘机把他扣留在宫中。建兴人史科知道石宣的阴谋，把石韬如何被杀的事告诉了石虎。石虎派人去逮捕杨杯、牟成，二人都已畏罪潜逃，仅抓获了赵生，经过审讯，赵生供认不讳。石虎更加悲怒，把石宣囚禁在席库内，用铁环穿其颔，放置在铁笼里。又取过杀害石韬的刀箭，亲舐其血迹，哀号震动宫殿。他决心为石韬报仇，凌迟处死石宣。于是积柴于邺北，树标其上，又在标尖上架设辘轳。武士把石宣押至柴堆下，使石韬的亲信宦人郝雅、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然后牵之登梯。郝雅以绳贯其颔，辘轳绞上，把石宣送到标尖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肠，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火焰冲天。石虎从昭仪以下数千人登中台观看。火灭，取来分置诸门交叉路口，避鬼邪。又杀石宣妻子九

人。宣的小儿子年仅有几岁，石虎向来喜欢这位小孙子，抱着他哭泣，想宽赦他，而大臣们不听，就怀中夺过来，小儿张着小手，拽着石虎的衣带大叫，带子都快扯断了，就是不撒手，大臣们硬是把他抱走杀了。石虎每想起这个小孙子，十分哀怜，不久，就病倒了。又废石宣的母亲杜后为庶人，诛宣党僚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肢解，弃之漳水。废撤东宫，饲养猪牛。东宫卫士十多万人皆谪戍凉州（今甘肃兰州西北）。

九月，石虎与群臣在太武殿东堂议立太子，说："吾想以纯灰三斛，自洗腹肠，为何专生恶子？年过20，就想杀父。今子石世年方10岁，等到他20岁时，吾已老了。"于是与大臣张举、李农定议，令公卿上书请立石世为太子。大司农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施礼，说："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说："莫是忠臣，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朕意，可告知他明白。"遂立石世为太子，刘昭仪为后。

后赵太宁元年（349）正月，石虎即皇帝位，改年号太宁，诸子皆进爵为王。

冠军将军姚弋仲至邺，求见石虎。虎病，弋仲见虎，扯着嗓子嚷开了，说："儿死愁邪？何为而病？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习，使坐于为逆，既然为逆而遭诛，又有何可愁的？且汝久病，所立儿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乱，当先忧此，请勿忧贼。"

四月，石虎病重，以彭城王石遵为大将军，镇关右；燕王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诏辅政。

刘后恶斌辅政，恐不利于太子，与张豺谋计，想除掉他。这时石斌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刘后派人去见石斌，谎称石虎病情转好，让他不必马上到邺，可留在襄国畋猎游玩。石斌性好猎，嗜酒，遂游猎，又纵酒。刘氏与张豺因又假作诏书，斥责石斌无忠孝之心，免官归第，使甲士五百人严守。石虎病情稍有好

转，出朝堂，临西阁，龙腾中郎二百多人列拜于前。虎问："何求?"齐声说："圣身不安，宜令燕王（石斌）入宿卫，典兵马。"有的还说："乞为皇太子。"虎说："燕王不在宫内吗？可把他召来。"左右的人说："王酒醉病发，不能入宫。"虎说："可用车辇迎至，当付玺绶。"但没有人敢去迎接石斌。不久，石虎感到头目昏眩，入宫去了。张豺使弟弟张雄矫诏杀了石斌。

刘氏又矫诏以张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统叹道："大乱即将到来，活着也没多大意思。"遂服药自尽了。

不久，后赵暴君石虎死了，太子石世即位，尊刘氏为皇太后，临朝称制。从此，后赵各种矛盾激化，最终酿出了一场大乱。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石季龙载记》

晋·陆翙：《邺中记》

《通鉴纪事本末·赵魏乱中原》

冉闵残胡

冉闵，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他的父亲冉瞻，在石勒破陈午时，被俘获。石勒把他送给石虎做养子，因赐姓石，故冉闵又叫石闵。他骁勇善战，多策略，石虎很是喜欢他，待之如亲孙一般。因此，在石虎死后，他逐渐成了后赵军政重要人物，直至取代后赵。

后赵太宁元年（349）四月，石虎忧怖病死，年仅10岁的太子石世即位，而朝政却由太后刘氏操纵。从此，后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权力之争，相互残杀，展开了一场混战。

太保张豺在石虎病重期间，帮助刘氏母子杀了石斌，保住了帝位的继承权。石虎一死，丧事未毕，他就迫不急待地着手清除自己的政敌，与太尉张举谋诛司空李农。张举向来与李农关系要好，将张豺的谋杀计划偷偷告诉了李农。农逃奔到广宗（今河北威县东），率乞活数万家保上白。太后刘氏派张举统帅宿卫诸军围上白。这时，彭城王石遵在河内，听到石虎死丧的消息，姚弋仲、蒲洪、刘宁及征虏将军石闵、武卫将军王鸾等一起劝说石遵道：“殿下年长贤明，先帝也有意以殿下为嗣，正因为晚年昏惑，被张豺蒙骗。今女主临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师宿卫空虚，殿下若公开揭露张豺罪恶，鼓行进讨，谁还不开门倒戈迎接殿下呀。”石遵依从了众人的建议。

五月，石遵自李城举兵，直趋邺城，洛州刺史刘国率洛阳之众往会。讨伐张豺的檄文传到邺，张豺大惧，驰召上白之军还保

邺都。不久，石遵军于汤阴（今河南汤阴西南），戎卒九万，石闵为前锋。张豺将出战，邺城的耆旧、羯士纷纷扬言：“彭城王来奔丧，我们应当出城迎接，不能为张豺守城啊！”逾城而去，张豺挥刀乱砍，却不能止。张豺的弟弟、镇军大将军张离见邺城不能守，于是率领龙腾武士两千人，斩关迎接石遵。刘氏惧，召张豺入宫，面对着他悲哭不止，说：“先帝梓宫未殡，而祸难至此。今嗣子冲幼，托于将军，将军将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消弭兵事吗？”张豺惶惧不知所措，嘴里只是“唉，唉”，于是下诏，以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黄钺、九锡。石遵到了安阳亭，张豺惧而出迎，石遵命士卒逮捕了他，遂擐甲曜兵，自凤阳门入邺。升太武前殿，来到石虎灵柩前，捶胸顿脚，号啕大哭，然后退至东阁。斩张豺于平乐市，灭其三族。又假借刘氏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说：“嗣子冲幼，先帝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于是石遵即位，罢上白之围。以石世为谯王，废刘氏为太妃，不久又杀了他们母子二人。李农也归附了石遵，遵仍使他为司空，以武兴公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

这时，沛王石冲在蓟（今北京西南），闻知石遵杀了石世，自立为皇帝，对他的僚佐说：“石世受先帝之命，却被石遵无理废杀，真是罪大恶极。令内外军队做好一切准备，我将亲自讨伐他。”于是留宁北将军沭坚戍守幽州，率众五万自蓟南下，传檄燕、赵，所在云集。行至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市郊东故城），众十余万，军于苑乡。石冲收到石遵的书信，劝他息兵。石冲看罢，对众将说：“都是自家兄弟，死者不可能生还，为何还要自相残杀呢？我想撤军了。”将军陈暹站出来说：“石遵篡弑自尊，构成弥天大罪。即使大王北还，我也要南行，待平定京师，擒捉石遵，然后奉迎大驾。”冲不得已，复又进兵邺。石遵又派人带信给冲，让他不要动武，冲不听。石遵于是派石闵及李农等率精

兵十万讨伐，两军大战于平棘（今河北赵县东南），石冲大败，逃至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被俘获，赐死，坑其士卒三万多人。

先前，石遵李城举兵时，对石闵说："好好干，事成之后，立您为太子。"遵称帝后，自食其言，改立石衍为太子。石闵自恃功高，欲专朝政，石遵不听。石闵素骁勇，屡立战功，胡汉宿将都惧怕他。他又笼络殿中将士，皆奏请为殿中员外将军，却受到石遵的抑制，因此，众人全都怨怒石遵。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劝遵稍夺石闵兵权，遭石闵的嫉恨，孟准等人又劝石遵除掉石闵。

十一月，石遵召集义阳王石鉴、乐平王石苞、汝阴王石琨、淮南王石昭等入宫，会议于他的母亲郑太后面前，说："石闵不臣之迹渐著，今欲诛杀他，如何？"郑氏说："李城举兵，无棘奴（石闵字）岂有今日。他不过稍有些骄纵，怎可马上杀掉他！"石鉴出宫，派宦者杨环驰赴闵处告密，闵遂劫持李农及右卫将军王基密谋废遵，使将军苏彦、周成率甲士三千人执遵于南台。遵正在与宫女下棋，见周成来，知道宫中发生了政变，问道："反者是谁？"回答："义阳王石鉴当立。"又说："我尚如此，鉴又能称帝几时？"说罢起身要走，众人一拥而上，绑缚至琨华殿杀死，并杀郑太后、张后（石遵妻）、太子石衍，大臣孟准、王鸾及上光禄张斐。

石鉴即位，以武兴公石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司空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重新改组了后赵政权。

石鉴虽处尊位，而军队大权由石闵、李农把持。他不甘心做傀儡，于是使平乐王石苞、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在夜间袭击石闵、李农于琨华殿。不克，禁宫大乱。石鉴见事变不能成功，害怕起来，假装不知，并使人乘夜间混乱之机，在西中华门杀了李松、张才，又杀了石苞，开脱了自已。

当石闵、李农控制朝廷时，石虎的儿子、新兴王石祇镇守襄国，与姚弋仲、蒲洪等联合，移檄中外，欲共诛石闵、李农。闵、农以汝阴王石琨为大都督，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骑七万分讨石祇等。

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在邺城密谋，欲设计除掉石闵、李农。事败，尽被闵、农的士卒斩杀。后赵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联结羯士三千人，埋伏在禁宫旁边的胡天。这里是火祆教祀天的场所，石闵、李农出入宫室，多由此经过。他们想乘石闵、李农入宫的机会，中途打劫。为了鼓动士气，伏都又率三十多人赶往铜雀台，想把皇帝石鉴挟持过来，一块战斗。石鉴胆小，怕事情不成反受牵连，不肯下台，对伏都说："卿是功臣，若事成，我将重重报答您。"于是，孙伏都、刘铢率众攻石闵、李农。不克，屯守凤阳门（邺城南墙西头第一门）。石闵、李农等原在东掖门，是皇城东南角上的一座门，当他们受到攻击时，一边阻击，一边打开邺城北门广德门，绕道到西门金明门，攻孙伏都的后路。众人来到城下，见城门紧闭，于是找来大木，将门撞开，遂呼叫着入城。皇帝石鉴见事情失败，又怕石闵杀他，于是派人驰召石闵、李农，说："孙伏都谋反，卿当迅速讨伐。"闵、农攻斩伏都等，平息了这场变乱。这场混战的战场是邺城的街头巷尾，待战斗结束后，自凤阳门到琨华门（琨华殿前门），横尸相枕，流血成渠。石闵为了尽快恢复邺城社会秩序，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

接二连三的变乱，石闵已觉察到都与石鉴有关，于是将石鉴软禁在御龙观，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率众数千人看守，每天用绳子把饭食吊上去，送给他吃。又下令城中说："近日孙、刘构逆，支党伏诛，善良的人没有一个人参与变乱。从今以后，与官府同心者，留；不同心者，各任其所。城门卫士不复相禁。"于

是，方圆百里内的汉人纷纷入城，胡羯蜂拥而出，几乎把城门填实。石闵知道胡人和自己不一心，于是下令戮胡，布告内外，汉人杀得一胡人头，并把人头送至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全都升任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石闵亲率汉人诛杀胡羯，不论贵贱、男女、少长，全都斩杀，死者二十多万。又把这些尸首全扔到城外，为野犬豺狼所食。石闵还下书给四方州镇的汉人将吏，命令他们按照邺城的做法，诛杀所辖区域内的胡人，或有高鼻多须被滥杀的就有一半。

冉魏永兴元年（350）正月，石闵想彻底清除石氏势力，假托谶文有"继赵李"字句，改国号"卫"，易姓李氏，年号青龙。后赵太宰赵庶、太尉张举、中军将军张春、光禄大夫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将军张季及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汝阴王石琨奔冀州，抚军将军张沈据滏口（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张贺度据石渎，建义将军段勤据黎阳，宁南将军杨群据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滠头，蒲洪据枋头，众各数万，分别与石闵为敌。

当邺城一片混乱的时候，后赵将王朗、麻秋自长安移师洛阳，随时准备接应邺中的后赵皇帝。石闵囚禁了石鉴，使人送书给麻秋，命其戮胡，麻秋杀王朗部下胡人一千多人，王朗逃奔襄国。麻秋率众归邺，中途被蒲洪的儿子蒲雄截获，用为军师将军。王朗到襄国不久，就伙同汝阴王石琨及张举率众七万攻邺。面对数十倍敌军的进攻，石闵沉着应战，仅率一千多名骑兵，出战于邺城北。石闵手持两刃矛，左右冲杀，所向摧陷，斩首三千级，石琨等大败逃窜。石闵与李农又乘胜讨张贺度于石渎。

闰月，石鉴在邺宫，乘石闵出征的机会，暗中派亲信携带亲笔书信到滏口，召张沈乘虚袭邺。宦人却将石鉴的信转给了石闵、李农，二人急还邺城，废杀了石鉴，并杀石虎的孙子三十八人，尽灭石氏。姚弋仲的儿子姚益、姚若率邺宫禁兵数千人斩关

奔滠头。弋仲率众讨伐石闵，屯军于混桥。

石闵、李农杀了石鉴，司徒申钟等劝石闵称帝。闵以帝位让李农，李农坚决不受。闵说："我们都是故晋人，今晋家犹在，可奉迎晋天子还都洛阳，如何？"尚书胡睦说："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大位。晋室衰退，又远在江东，怎能总驭英雄，混一四海呢？"闵说："胡尚书之言，可谓识机知命呀。"于是即皇帝位，改年号永兴，国号大魏。石闵又复改姓冉，所建政权，史又称"冉魏"。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冉智为皇太子。以李农为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

冉闵称帝不到两个月，后赵新兴王石祗也在襄国称帝，改年号永宁。以汝阴王石琨为相国，割据于诸州郡的六夷渠帅也纷纷响应。石祗为了笼络姚弋仲，任命他为右丞相、亲赵王，给予特殊的礼遇。

这样，在邺与襄国之间，形成了两个对立政权，都想把对方吃掉。冉魏永兴元年（350）四月，石祗派石琨率兵十万伐魏。冉魏内部变化，闵命武士杀了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内外交困中的冉闵深感势单力薄，想联合东晋，共取中原，于是派使者到建康，表称："朔胡乱中原，今已诛平，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东晋朝廷内部正忙于荆、扬之争，已无精力顾及中原了。六月，石琨进据邯郸，后赵镇南将军刘国又自繁阳移师会击邺城。冉闵派卫将军王泰大败石琨，死者万余人。刘国退还繁阳。

十一月，冉闵率步骑十万攻围襄国，直到次年二月，不能克。石祗因战事吃紧，于是去皇帝号，改称赵王，派中军将军张春乞师于姚弋仲，弋仲派其子姚襄率骑二万八千救襄国，又遣太尉张举向燕主慕容儁求救，许诺将后赵传国玺送给燕，打算降附慕容氏。慕容儁遣御难将军悦绾率兵三万赴援。

冉闵闻知慕容儁欲救赵，遣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常炜出使

燕国，劝慕容儁不要出兵。儁使封裕诘难他说："冉闵，石氏养息，负恩作逆，何敢辄称大号？"炜说："汤放桀，武王伐纣，以兴商、周之业。曹孟德养于宦宦，莫知所出，竟能立魏国根基。若非天命，怎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问。""人们都说冉闵初立，用铸金像的办法占卜成败，而像不成，是真的吗？""没听说。""从南边来的人都这样说，您为何还要隐瞒呢？""奸伪之人，想假借天命来迷惑人心，于是凭记符瑞、蓍龟自重。魏主握符玺，据中州，受命无疑，为何还要反真为伪，取决于金像呢？""传国玺到底在哪里？""在邺。""张举说在襄国。"炜说："杀胡人的时候，邺中的胡人几乎被斩尽，即使有漏网的，都潜伏在沟渎中不敢出来，他们怎么能知道玺绶藏放的地方！石祗为了求得救兵，故为妄诞不实之辞，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况且是一枚玺绶呢！"

慕容儁仍然相信张举的话，想试探一些常炜的虚实，让士兵搬来干柴，使封裕召常炜至柴堆旁，威胁他说："你要如实供出冉闵的情况，不然的话，将把你变成灰烬，请你三思。"炜厉声道："石氏贪暴！石虎曾亲率大军攻燕国都，虽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所以运资粮、聚器械于东北，并不是资援贵国，实是想吞灭贵国。魏主诛剪石氏，虽不是为了燕，臣子之心，闻知仇敌灭亡，义当如何？而更为彼责我，不亦异乎！吾闻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纵薪火，使仆得上诉于帝，则心满意足了。"左右的人请求杀了常炜，慕容儁说："他不怕杀身以殉其主，忠臣也。且冉闵有罪，与使臣何干？"仍让常炜回到住处。当天夜里，慕容儁又派常炜的同乡赵瞻去劝慰他，说："君何不以实言相告？燕王生气了，要把你流放到辽、碣以外的地方，怎么办呢？"炜说："吾自从长大成人，尚不欺布衣平民，怎么敢欺骗人主呢？曲意苟合，是我本性所不能；直情尽言，虽把我沉没东海，在所不辞。"遂卧身向壁，不再与赵瞻搭

话了。赵瞻俱将常炜言语、态度告诉慕容儁。儁于是囚禁常炜于龙城，直到悦绾救襄国回到蓟，慕容儁才知道张举虚妄，下令杀了张举，释放了常炜。常炜能言巧辩，临危不惧，不辱本国气节，也是十六国时期外交方面一段佳话。

冉魏永兴二年（351）三月，姚襄与石琨各引兵救襄国。冉闵遣车骑将军胡睦拒襄于长芦，将军孙威拒琨于黄丘，皆败还，士卒死亡殆尽。

冉闵久攻襄国不下，打援的军队几将败没，心急火燎，欲亲率大军出击。卫将军王泰谏阻说："今襄国未下，外援云集，若我出战，必背腹受敌，这是很危险的。不若固垒以挫其锐，慢慢寻找机会再出击，况且陛下亲临行阵，如失万全，将败大事呀。"冉闵觉得言之有理，正想停止出击，道士法饶进言道："陛下围襄国经年，无尺寸之功，今贼至而避之不击，还怎么号令将士呀！而且天上的太白星运行至昴星的附近，天意表明：当杀胡王，百战百克，机不可失。"冉闵把袍袖一甩，大声道："我决心出战，有敢阻拦众人者，斩！"于是尽众出战，攻姚襄、石琨。这时，悦绾率领的燕兵也赶到，仅与冉闵军相隔数里，疏布骑卒，曳柴扬尘，冉魏军望见，人人汹惧。姚襄、石琨、悦绾三面围攻冉闵，石祗又自后冲击，魏兵大败，冉闵仅带十余骑逃还邺，官僚将士十多万人陈尸沙场。前线战事残败的消息传到邺中，城中士民大为惊恐，又纷纷扬扬传言冉闵死了，人心更加涣散。冉闵亲至城郊抚阅士民，这才稳定了众心，并当众肢解了法饶父子，奠祭战死疆场的将士。

不久，赵王石祗使其将刘显率众七万攻邺，军于明光宫，去邺二十三里。冉闵害怕了，使人召王泰，谋议退敌之策。王泰嫉恨冉闵先前不用己言，招致襄国残败，托辞疮疾严重，不能行动。冉闵亲临王泰府舍，征询退敌之策，泰佯装病笃，闭目不言。冉闵怒，还宫。对左右的人说："王泰这个巴奴，你家老公

岂能靠你活命！待我先灭了群胡，再和你算帐。”于是悉众出战，大破刘显，追击至平阳，斩首三万余级。刘显十分恐惧，秘密派使请降，要求杀石祗以自救，冉闵这才引军还邺。这时，有人向冉闵告发王泰欲叛入苻秦，闵杀王泰，夷其三族。

四月，刘显杀赵王石祗及其丞相石炳、太宰赵庶等十余人，传首于邺。冉闵焚石祗首于通衢，任命刘显为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

七月，刘显背叛冉魏，复引兵攻邺，被冉闵击败，刘显退还襄国，并在这里称帝。

冉魏永兴三年（352）正月，刘显攻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市郊东故城）。冉闵留大将军蒋干使辅太子冉智守邺，自率八千骑救常山，于常山城外击败刘显。显败退，冉闵追至襄国。刘显大将军曹伏驹开门纳闵。闵杀刘显及其公卿以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民于邺。后赵汝阴王石琨携带妻妾来邺，投奔冉闵，闵收捕石琨，斩于邺都建康市，石氏遂绝。

冉闵攻克襄国后，因粮食缺乏，遂游食常山、中山诸郡。永兴三年四月，燕王慕容儁遣慕容恪等攻击冉闵。冉闵将与燕军开战，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谏阻说：“鲜卑乘胜锋锐，且彼众我寡，请暂时避敌强势，待其骄惰，然后再出兵击败他们。”冉闵听了，很不高兴，说：“我正想率兵平定幽州，斩慕容儁，今遇慕容恪，不战而躲，人们会怎么看我呢?”司徒刘茂、特进郎闿都觉得冉闵这次出战，不可能生还，但又不愿当俘虏受鲜卑人戮辱，相与自杀了。

冉闵把军队稍加整顿，然后移师安喜（今河北定州东南），慕容恪率燕兵尾随而来。闵又奔赴常山，恪也追来，两军在魏昌县境的廉台摆开阵势，大小十战，燕兵皆败。闵向来以勇战著称，部下士卒也很精锐，燕人都害怕他。慕容恪为了鼓励将士，亲到各军营巡视，告诉众将士说：“冉闵勇而无谋，不过是一匹

夫。他的士卒饥饿疲劳，甲兵虽精，其实难能发挥作用，他们不可能战胜我们。”冉闵麾下多是步兵，利于在山林中作战；而燕军多骑兵，长于平原争战。冉闵引兵将入林中，慕容恪的参军高开说：“吾骑兵利平地，复闵得入林中，不可复制，应赶快派轻骑邀击他，佯装战败，把他引入平地，然后围击。”慕容恪点头称是，果然把冉闵诱至平地，慕容恪分兵为三部，对诸将说：“闵性轻锐，所部兵众又少，这次必来向我送死。我加强中军的阵势，待他到来，你们从两侧旁击，必将克他。”于是挑选鲜卑善射弓手五千人，用铁锁连环战马，编成方阵，齐步向前。闵坐下战马名叫“朱龙”，日行千里。他拍马驰来，左手操双刃矛，右手握钩戟，奋击燕兵，斩首三百余级。这时，猛抬头，望见前面的燕军帅旗，知是其中军，于是又来了精神，拍马直冲。燕军两翼从旁夹击，大破魏军，又将冉闵团团围住。闵杀出一条血路，溃围东走二十多里，坐骑朱龙突然倒毙，燕军追兵赶到，一拥而上，将闵绑了。士卒将闵解赴慕容恪处，恪又将闵押解至蓟。燕王慕容儁当众责骂冉闵说：“你一个奴仆下才，何得妄称皇帝?”冉闵厉声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为何不能称帝?”慕容儁大怒，责打冉闵三百鞭子，然后押送龙城（今辽宁朝阳），不久把冉闵处死在这里。

慕容儁俘获冉闵后，出动步骑三万多人，由慕容评、慕容军、慕舆根等率众攻邺，冉魏蒋干及太子冉智闭城拒守。永兴三年五月，邺中大饥，人相食，故赵宫人尽被当作食粮吃掉。蒋干内外交困，不得不派人向东晋将领谢尚求救，谢尚派部将戴施援邺。

六月，戴施率壮士一百多人入邺，助守邺城西北隅的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并威迫蒋干交出冉魏传国玺，送于东晋，这才与蒋干一起率锐卒五千多人出战。慕容评大破魏晋联军，斩首四千级，蒋干、戴施脱身逃入邺城。

七月，冉魏长水校尉马愿等开邺城纳燕兵，戴施、蒋干自城垣悬縋而下，逃奔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燕军俘冉闵妻董氏、太子冉智及其文武官吏。冉闵残胡，建立冉魏政权，至此立国仅二年另七个月。它是十六国时期汉人在中原建立的唯一的短命王朝。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赵魏乱中原》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梁犊起义

后赵延熙二年（334），石虎称居摄天王，立石邃为太子，并使石邃处理尚书奏事，选用牧守、祭祀郊庙。唯征伐、刑断由石虎亲览。石邃执掌朝政，荒淫酒色，骄恣无道，经常游于畋猎。夜间出没于宫臣之家，奸淫别人的妻妾，还把庙观中长得漂亮的尼姑召到宫中，与之交亵。完事之后，再把尼姑合牛羊肉一起炖煮了，赐给左右 的人吃，说是让他们尝尝尼姑的滋味。又选宫中的美淑，妆饰一番，然后把她们的头割下来，洗去血迹，放到盘子上，传给左右的人观赏，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发泄他的兽性，寻找开心与刺激。而且他凶悍王霸的欲望也极强。他的两个弟弟石宣、石韬有宠于石虎，石邃疾之如仇，试图想把这两个弟弟杀了，然后再杀掉他父亲石虎。石虎大怒，杀了石邃一家妻小二十六口，诛其宫人支党二百多人，立石宣为天王太子、大单于，以石韬为太尉，让他们二人轮流到朝中值日，处理尚书奏事。

太子石宣为了加强东宫的权势和宿卫力量，挑选民间良人子弟 18 岁以上的人，充实东宫的武装。这些被选拔来的小伙子，一个个身强力壮，石宣为他们取名为“高力”，任命定阳（今陕西延安东南固县镇）人梁犊为督将，掌领这支军队。石宣又伙同五兵尚书张离奏夺诸公府吏，余兵悉配东宫，东宫的军队达到了十万多人，这引起了后赵诸公的不满。石虎宠爱石韬，想立他为太子，但因石宣年长，没有贸然行事。石宣嫉恨石韬，怕他夺取

自己的太子地位，于是派亲信在一天夜里，登上邺城东南隅的东明观，杀死了石韬。石宣还想乘石虎出来为石韬收尸时杀石虎，但未成功。石虎听说石韬被暗杀，十分悲愤，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厥过去。后来得知是石宣杀了石韬，于是把石宣关入地牢，在邺城北堆起干柴，把石宣活活烧死。又尽诛石宣妻妾、诸子、亲党等，把东宫当猪圈，东宫的十万高力被谪戍凉州（后赵于金城置凉州，在今甘肃兰州西北黄河南岸）。这些平时在邺城骄横惯了的高力，一旦像囚犯一样被贬戍边地，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虐待，因此，人人怨愤。

后赵太宁元年（349）正月，石虎在邺城南郊祭天，即皇帝位。立年仅10岁的小儿子石世为皇太子，大赦境内。但在赦令中明文规定，东宫高力仍谪戍凉州，不在赦例。这些高力有一万多人行至雍城（今陕西西安西北），听说石虎没有赦免他们，一个个愤愤不平。这时，石虎又下了一道手令，不准高力在雍城停留，命雍州刺史张茂率兵把这些高力尽快送往凉州。张茂怕这些高力闹事，没收了他们的马匹，让他们步行推着鹿车，载粮到戍所。高力们本来就没有好气，这下更受不了啦。高力督梁犊因众心怨愤，暗中派胡人颉独鹿微传告下去，准备举事。高力们听了，十分振奋，欢呼雀跃，一起杀了押送他们的官兵，拥戴梁犊为晋征东大将军，从此，轰轰烈烈的起义爆发了。义军一举攻克了下辨城（今甘肃成县西）。后赵安西将军刘宁自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率兵击梁犊，大败而还。

梁犊为了使义军更有号召力，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用轺车拉着他随军作战。秦、雍二州的官吏看见义军打着张茂的旗号，走的走，降的降，义军沿途所过城戍，无不摧陷，尽斩后赵二千石以上的长吏，长驱而东。高力们都是些多力善射的人，打起仗来，一以当十。他们虽无甲兵，所在取来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后赵的许多戍卒又纷纷响应奔赴，等

到了长安时，义军已发展到十万人。石虎的儿子乐平王石苞这时镇守长安，尽锐御敌，一战而败。梁犊起义军浩浩荡荡出了潼关，进至洛川（今陕西洛川东北）。石虎又仓皇派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领卫将军张贺、征西将军张良、征虏将军石闵等率步骑十万奔赴前线，镇压梁犊起义。两军在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展开激战，后赵官军战事不利，退至洛阳。再战，李农等又败，于是退壁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拒守险要，想阻止义军东进。义军越过官兵的边线，东攻荥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诸郡，声势越来越盛。

官兵步步失败，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后赵的京都邺城，把石虎吓坏了。他派人驰召羌族部帅姚弋仲，弋仲率其部众八千多人屯驻在邺城南郊，防御京师。他应召轻骑至邺宫，这时石虎抱病不起，不能出见弋仲，让人把他引人领军省，赐给他喜欢吃的饭食。弋仲怒，不食，扯着嗓子喊叫起来："召我击贼，我难道是来找东西吃的呀！我不知主上是死是活，如能一见，虽死无恨。"左右的人只得为他通报石虎，石虎让人把他引至病榻前。弋仲一见石虎那副病态，就嚷开了，数落石虎道："儿子死了，愁了吧？竟病成了这个样子！儿小时，不能使好人辅相，至今相杀。儿自有过，责其下人也太过分了，所以逼反了他们。汝病久了，所立儿又小，照此下去，天下必乱。当宜忧此，不烦忧贼。梁犊因有思归之心，共为奸盗，所行残贼，已经是势在必擒了！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的观念，张口开口就是"汝之，汝之"，石虎怒而不责，于坐授他为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说："汝看老羌堪破贼不？"于是贯甲跨马于庭中，策马南驰，不辞而出。石虎又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蒲洪等击梁犊于荥阳东，大败梁犊起义军，斩犊首而还，进而又镇压了义军的余部。至此，梁犊起义被彻底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沉重打击

了后赵的残暴统治，石虎忧怖成疾，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就死去了，紧接着就是一场大乱，后赵的统治土崩瓦解了。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石季龙载记》、《姚弋仲载记》

《太平御览》卷 299《兵部、兵众》

王猛治前秦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南）人。他小时候，住在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家境贫寒，靠卖簸箕度日。有一次，他到洛阳做生意，一位主顾愿意出高价买他的簸箕，王猛十分高兴。那位主顾摸了摸口袋，却忘了带钱，让王猛跟他到家里去取，并说住址离这里不远。王猛为图贵利，于是跟随那位主顾到家里去。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发须银白，踞胡床而坐，左右侍立着十来个人。一人前来引王猛进拜床上父老，那位父老说："王公何缘拜谢！"于是用十倍的价钱偿他，并派人送他出山。王猛既出，回头一看，背后却出现了一座高山。王猛自谓遇上了嵩山仙人，编造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常讲给别人听。

王猛生得体姿俊伟，博学，喜好读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不拘小节，性情孤傲，很少与人交往。因此社会上的一些浮华子弟都轻蔑他，还常常以他为笑料逗乐。王猛却悠然自得，不屑一顾。他少年时游居邺都，时人很少有认识他的，只有徐统见而奇之，召他为功曹。王猛逃走了，不去应召，遂隐居在华阴山。他胸怀佐世大志，一直希望能有一天得龙颜明主赏识，在很久一段时间内，敛翼待时，候风云形势而动。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北伐入关，屡破秦军，进驻灞上（今陕西西安东白鹿原北首），王猛披着破旧的棉袄，到军营中去见桓温，一边高谈阔论时事，一边抖落着棉袄捉虱子，旁若无人。桓温观察他半

天，觉得这人非同一般，问他："吾奉天子的命令，率锐师十万，仗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是何原因?"王猛说："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虚实，所以不来。"桓温听了，默然不语。不久，晋军将还江东，桓温赐给王猛车马，拜任他为高官督护，请他一起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王猛回到华阴山中，去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说："卿与桓温岂能并存？在这里自可富贵，何必求远!"王猛这才没有随温南行。

苻坚欲发动宫廷政变，谋篡大位，他去征求梁平老的意见，梁平老把王猛介绍给他。两人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兴废大事，异符同契。苻坚自谓遇上王猛，犹如刘备之遇诸葛亮，十分高兴。苻坚政变成功，做了大秦天王，以猛为中书侍郎。这时，从枋头西归的氐人多聚居在始平县，境内豪门纵横，劫盗充斥，苻坚调王猛任始平县令。猛下车，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豪强，鞭杀一吏，一些不法之徒纠集起来，联合上讼。朝廷有关部门劾奏，槛车征猛下廷尉诏狱。苻坚亲自审讯，对猛说："为政之体，德化为先，到任不久就杀戮无数，竟是那么的残酷!"猛说："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为不才，把难治的县邑交给臣，臣谨为明君剪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的话，甘心受刑，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不敢接受。"苻坚对群臣说："王景略本是夷吾、子产一类的人物。"于是把他释放了。

苻坚又把王猛调到中央，任用为尚书左丞。他帮助苻坚加强中央集权，突出皇权地位，抑制氐族部落贵族，打击豪强。氐族部落贵族包括宗室近戚、勋旧重臣，他们都很嫉恨王猛。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几次在苻坚面前说王猛的坏话，苻坚大怒，黜腾为甘松护军，宝为白衣领长史。氐族大臣樊世，辅佐秦主苻坚立有大功，他尤其看不起王猛，曾对王猛说："吾辈耕之，君食

之邪!”王猛回答道：“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樊世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然，吾不处世!”后来两人在苻坚面前发生廷争。樊世丑言大骂，苻坚大怒，命宿卫斩樊世于西厩。氐族贵族都不服，纷纷攻击王猛。苻坚愈发气恼，谩骂，并命人鞭挞那些带头闹事的贵族大臣。从此，公卿以下没有不怕王猛的。

王猛在对氐族贵族守旧势力的斗争中，非常注意策略。他拉拢了一批主张中央集权的氐族贵族，首先争取苻坚及他们的支持，在此前提下，惩治那些不法豪强。而且支持他的氐族贵族又都是苻坚敬重亲信的人，如尚书右仆射梁平老，曾帮助苻坚发动政变，为他取得大秦天王的宝位立有大功；尚书左仆射李威是苻坚母亲的表弟，与苻坚的父亲苻雄关系亲密，苻雄死后，他又受到苻坚母亲的爱幸，两人合伙赐死了清河王苻法，集朝政大权于苻坚一人。苻坚待威如父亲一般，李威又常劝苻坚将国事委任王猛。此外，还有领军将军强汪，司隶校尉吕婆楼等。王猛和他们一起团结在苻坚的周围，同氐贵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后来，苻坚任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贵集中的地方，不好治理。苻健的妻子强太后有一位弟弟名叫强德，他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成了百姓的一大祸患。王猛到任后，下令逮捕了他，奏未及报，就把他杀了，陈尸于市。王猛与御史中丞邓羌同志，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多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王猛的政策是成功的，他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对苻坚感动至深。苻坚曾感慨地说：“今吾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王猛还调发王侯富室的僮隶三万人，兴修关中水利，“以溉冈卤之地”，垦辟田畴，改造良田，并劝课农桑，提倡植树造林，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国库的钱粮充盈。又立学校，发展教育事业；恤困穷，增加社会福利，稳定社会治安。自公元

357年苻坚即位到370年灭前燕，在这十多年中，前秦国内有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关中的经济与社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晋书·苻坚载记》）。在兵荒马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却出现了一种“小康”的气象。这为前秦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前秦建元六年（370），王猛率大军讨灭前燕慕容暐，军纪严明；师无私犯。王猛未到邺前，邺下盗劫公行，及猛至，远近肃然，深得人心。苻坚留他镇守冀州，关东六州事务听他便宜处置。王猛简召英俊，以补关东守宰，巩固了前秦对关东、河北地区的统治。

不久，王猛又被苻坚召至入朝，拜任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持节、常侍、将军，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王猛一再上表辞让。苻坚说：“卿昔螭蟠布衣，朕龙潜弱冠，属世事纷纭，厉士之际，颠覆厥德。朕奇卿于暂见，拟卿为卧龙，卿也异朕于一言，回《考般》之雅志，岂不精契神交，千载之会！虽傅岩人梦，姜公悟兆，今古一时，亦不殊也。自卿辅政，几将二纪，内鳌百揆，外荡群凶，天下向定，彝伦始叙。朕且欲从容于上，望卿劳心于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遂不许。过了几年，又授任他司徒官职，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都由王猛裁处。

王猛治前秦，很有政绩。《晋书·苻坚载记》曾这样说：“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苻坚曾从容对王猛说：“卿日夜操劳，尤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猛说：“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坚说：“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常喻太子苻宏、子长乐公苻丕等

说："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见重如此。

前秦建元十一年（375），王猛患下重病，苻坚亲祀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祀，靡不周备。王猛的病并不见好，苻坚又大赦境内诛死以下罪犯，想以德化感动神灵，为王猛驱除病魔。王猛在病中上书谢恩，并言时政，多所弘益。苻坚阅罢流涕，悲恸左右。后来，王猛病情恶化，苻坚亲到床前视疾，问以后事。猛说："晋虽僻处吴越，却是正朔相承，亲仁善邻是治国之宝。臣死后，但愿不要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才是我们的仇敌，终为人患，宜渐清除，以便社稷。"言罢，就死了。时年51岁。苻坚哀恸痛哭，对太子苻宏说："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依照汉代大将军霍光的故事，为王猛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丧礼。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苻坚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苻秦据长安》、《苻秦灭燕》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柔然兴衰

柔然是东胡族的后裔，其血亲源缘与拓跋鲜卑相近，姓郁久闾氏。柔然的先世源由，史书曾这样记载：早在北魏神元皇帝的晚年，部下一位掠骑抢来一位奴隶，这奴隶相貌长得奇怪，头发才长得与眉毛一般齐，没名没姓，主人为他起了个“木骨闾”的小名。“木骨闾”是鲜卑语，意思是“秃头”。其实他的头发并不秃，可能是秃顶的缘故，主人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后来因为谐音的关系，人们叫顺了口，变成“郁久闾”了。他的子子孙孙都以此为姓。木骨闾长成了一位强壮的小伙子，主人免除了他的奴隶身份，成了一名骑卒。穆帝时，他耽误了服役的日期，按照律令应当斩首，被迫逃匿在大漠川谷间，聚集起流亡者一百多人，投奔了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后，他的儿子车鹿会慓悍雄健，开始组建了自己的部落，自号“柔然”，并仍役属于拓跋氏。这时，柔然的势力还非常弱小，因此，北魏世祖皇帝给他们起了个“蠕蠕”的名号。车鹿会做部帅时，每年向拓跋氏贡献马畜、貂豽皮。冬则徙渡漠南，夏则还居漠北。

车鹿会曾孙地粟袁死后，柔然分为二部。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代王什翼犍死后，缊纥提归附了匈奴刘卫辰。北魏登国年间，拓跋珪发兵讨伐柔然，柔然移部遁走，魏军追破于大漠南床山下。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逃去。拓跋珪又遣长孙嵩、长孙肥率兵渡过大漠，追击，大破屋击于平望川，斩屋击。匹候跋在涿邪山投降了长孙肥。缊

纥提西遁，将归刘卫辰。拓跋珪追至跋那山，缊纥提复降。

登国九年（394 年），社仑袭杀了他的伯父匹候跋，北渡大漠，并联合后秦姚兴，与北魏拓跋珪作对。社仑又侵入了高车部落聚居的鄂尔浑、土拉河流域，兼并了许多部落，在这里发展起来。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无文记，将帅用羊屎蛋粗计兵数，后来才学会了刻木记事。当时在鄂尔浑的西北，还有许多匈奴残余部落，后来也被社仑征服。社仑自号“豆伐可汗”，意思是“驾驭开张之王”。建汗庭于鹿浑海附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柔然汗国的版图，东起大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自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包括准噶尔盆地，一直和天山以南的焉耆国交界，成为五世纪初亚洲东北部一个强盛的游牧国家。

柔然在战争与竞争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从而变得聪明起来。按柔然的习俗，根据君臣的才能冠加称号，一旦有了称号，至死不变。部族出战抄掠，总是让母牛驾车逃遁，驱犍牛随行，母牛疲累倒地不能行进，也不知道换牛，别的部族人教其用犍牛驾车，柔然人却说：“它的母亲还不能行，更何况儿子呢？”固执不肯，遂被敌兵俘虏。到了社仑时，又学中原国家，立法，置战阵，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并不断骚扰北魏，卒成拓跋魏北边一大忧患。

永兴二年（410），社仑死，部落立其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意思是资质美好。

神瑞元年（415），斛律与冯跋和亲。跋聘斛律女为妻。将为交婚，斛律的侄子步鹿真对斛律说：“堂妹年纪还小，远嫁他国，忧思生疾，可让大臣树黎、勿地延等人的女儿代替。”斛律不从。步鹿真出，又对树黎说：“斛律想把您的女儿远嫁出去。”树黎遂与步鹿真共结谋，在夜里于斛律的穹庐帐外埋设伏兵，候其出，众人一拥而上，将其拿住，把斛律和其女儿一块送到北燕的龙城

去了。于是立步鹿真为汗。

步鹿真行为荒唐，经常与社仑的儿子社拔到高车大人叱洛侯家，与他的小妻子淫奸，小妻子告诉步鹿真，叱洛侯想立大檀（社仑叔父的儿子）为主，送给大檀金马勒做信物。步鹿真听说这事，回到府中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叱落侯焚其珍宝，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击大檀。大檀发兵俘获步鹿真及社拔，绞死了二人，自立为柔然主，号牟汗纥升盖可汗，即制胜王。

大檀在位时，柔然汗国达到了极盛时期，其势力曾发展到准噶尔盆地西北，一直到哈萨克高原，给居住在这一带的乌孙人和悦般人以很大威胁。乌孙原是汉代的大国，到了北魏时，由于常常遭到柔然人的侵扰，西徙葱岭山中，以后就逐渐衰落了。悦般国在乌孙的西北，是匈奴北单于的余部，其游牧地区在龟兹以北至乌孙的西北，相当于今天的伊犁河至巴尔喀什湖一带，他们也数次受到柔然兵的征讨。

柔然又是北魏的强敌，拓跋氏为了抵御柔然的进攻，在京都平城周围设置六镇，屯兵戍边。柔然的骑兵几乎年年入犯北魏的并、幽二州边地。始光元年（424）秋，大檀想趁北魏明元帝病死不久，亲率六万骑兵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太武帝拓跋焘亲征，经过三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云中。大檀布骑张网，围拓跋焘五十多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魏兵见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拓跋焘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士卒的情绪这才稍有稳定。魏军首先打击柔然的先锋部帅，以弓手射杀大檀的侄子于陟斤，柔然人慌了，于是退走。次年（425），拓跋焘大举征讨柔然，东西五路并进，诸路军马至漠南，留辎重，轻骑携带十五天的战粮，渡漠北战，大檀部落惊骇逃走。

神䴥二年（429），拓跋焘于平城南郊练兵，将袭大檀。公卿大臣都不愿行，焘从崔浩计，决定北讨柔然。这时，出使江南的北魏使者回到平城，诉说刘义隆如何蛮横，欲犯河南，并威胁说

若不归还河南地，即以刀枪相见。拓跋焘听罢，哈哈大笑，说："龟鳖小竖，自救不暇，又能何为。即使能来，待我灭了蠕蠕，回过头来再收拾他。"于是东西两路出兵北伐，焘亲率军自东道向黑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同会柔然汗庭。五月，魏军屯于漠南，舍辎重，轻骑奔袭，至栗水（今翁金河），大檀率众西奔。大檀的弟弟匹黎掌领柔然东部部落，他闻知魏军人众，想奔赴大檀。途中与魏将长孙翰遭遇，翰骑掩击，杀柔然大人数百。大檀闻知，十分震恐，率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不知去向。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拓跋焘沿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驻跸菟园水，又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多里，南北三千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多万落，俘获首虏及战马一百多万匹。八月，拓跋焘又征服了居住在巳尼陂（今贝加尔湖）的东部高车，降者数十万。柔然汗国的势力经此沉重打击，骤然衰弱了。大檀因惨败，饮恨身亡。

大檀死，子吴提立，自号"敕连可汗"，即神圣王。北魏俘获了柔然的巡逻兵二十多名，发给衣服，遣返回部，吴提上下感恩，于是向魏朝贡。延和三年（434）二月，北魏太武帝把西海公主聘给吴提为妻，吴提也把自己的妹妹进给太武帝为夫人，后来又进位为左昭仪，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太延二年（436），柔然又与魏绝和，犯魏边塞。四年（438），拓跋焘分兵四路讨伐柔然，西登子阜（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杭爱山脉西北部），刻石记行，不见柔然而还。这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五年（439），北魏西征北凉沮渠牧犍，吴提乘虚袭击平城，前锋至七介山（今山西平鲁西北），平城居民大骇，争相入中城。这时，镇守漠南的魏将拓跋嵇敬、拓跋崇率兵绕到阴山以北，大破吴提的哥哥乞列归部众，斩首万余级。吴提担心魏兵抄其后路，于是退走。太平真君四年（443），拓跋焘又分兵四路，讨伐柔然，进

至鹿浑谷（鄂尔浑河山谷），与吴提相遇。柔然人逃走，魏兵追至頞根河，击破柔然军。又至石水，不及柔然，遂撤军回漠南。

吴提死，他的儿子吐贺真立，号处可汗，即唯王的意思。太平真君十年（449）正月，北魏太武帝趁吐贺真新立，国势未固，亲率大军北伐柔然，吐贺真远遁。九月，太武帝再举北伐，高凉王拓跋那出东道，略阳王拓跋羯儿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吐贺真尽举全国精锐，军资甚盛，围拓跋那数十重。那掘长围坚守，相持数日。吐贺真几次挑战，都未得便宜，又怕北魏大军到来，于是解围夜遁。拓跋那引兵追击，历九天九夜，吐贺真更是害怕，丢弃辎重，越穹隆岭远遁。拓跋那收其辎重，引军还。略阳王拓跋羯儿尽收柔然人户畜产百余万。从此吐贺真遂单弱，远窜。太安四年（458），太武帝又发骑十万，战车十五万，旌旗千里，浩浩荡荡渡过大漠，伐柔然。吐贺真闻风远逃，拓跋焘刻石记功而还。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和平五年（464），吐贺真死，儿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意思是惠王。始仿中原王朝，建立年号曰永康。柔然初时，国政疏简，到了这时，已知文字书契了，还拥有一些学者。柔然汗写信给南朝的齐武帝萧赜，要求派医生和锦工到漠北传授技术，并请教指南车和刻漏的制造方法。在军事方面，予成还想联合南朝来牵制北魏的北伐。北魏太和二年（478），南朝宋派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洪范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远涉三万多里，到达柔然汗庭，克期共攻北魏。次年，柔然发三十万骑南犯魏边，一直进至离平城七百里的地方。这时，南朝未能如约出兵，柔然兵在燕然山下（杭爱山南麓）纵猎而返。

柔然屡屡南下受挫，还经常遭到北魏的攻击。南战失利，于是调转兵锋向西发展，在和平元年（460），攻占了高昌国（都高昌壁，在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哈拉和卓堡西南），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接着西域诸国焉耆（今新疆焉耆）、鄯善（都捍泥城，

今新疆若羌县卡克里克)、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始墨(今新疆阿克苏)等，也依次被征服，成了柔然的役属。柔然汗国的势力，不但到达了东道的托什干河流域，而且柔然汗国还乘北魏击败吐谷浑之际，进兵南道，攻击于阗王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派使者求救于魏，魏因于阗路途遥远，未能成行。

太和九年(485)，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可汗，即恒王，改年号为太平。豆仑性情残暴好杀，臣侯醫埋、石洛侯屡次忠言劝告，还建议他与邻国通和，不要再犯魏国。豆仑大怒，诬陷二人谋反，诛其三族。太和十六年(492)八月，魏孝文帝以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并为都督，率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伐豆仑。柔然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落西走，自立为主。豆仑与叔父那盖分兵两路追击，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盖出自金山。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那盖累有胜捷。柔然人都以为那盖为天所助，欲推那盖为主。那盖不从，众人于是杀死豆仑母子，以尸示那盖，那盖这才袭立为汗。

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即悦乐王，自称太安元年。自高车独立之后，柔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太和十二年(488)，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主羊烝子率众三千人，以城降附了北魏。同时，西域的焉耆、龟兹、姑墨等国也纷纷脱离柔然，改附了哌哒。到了太和十五年(491)，高车的势力还一度进人了高昌。柔然在塔里木盆地的霸主地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垮台了。

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可汗，即绪王，自称始平元年。魏正始三年(506)、永平元年(508)，伏图两次派使者到魏通和，魏帝不许，要求柔然向魏称藩。北魏永平元年，伏图西征高车，被高车王弥俄突杀害。伏图子丑奴即位，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即彰制王的意思，自称建昌元年。丑奴体魄壮健，又善用兵。熙平元年(516)，他西征高车，擒杀高车王弥俄突，将原先叛离柔然的高车部众全部吞并，国势遂又复盛。

丑奴在武功方面虽有建树，但政治非常糟糕。丑奴称汗不久，有一天儿子祖惠忽然失踪了，到处寻找，却无踪影。这时，有一位柔然人名叫屋引副升牟，他的妻子叫是豆浑地万，年纪约有20岁，是一位巫医，经常装神弄鬼，骗人财物。丑奴十分信重她，她告诉丑奴说："这个小儿子现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十分高兴，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侯吕陵氏。次年仲秋，地万在大泽中搭起帐篷，斋洁七日，祈请天神。过了一夜，祖惠忽端坐在帐中，他自称一直在天上。丑奴母子抱着祖惠，悲喜交加。丑奴大会国人，封地万为圣女，纳入后宫，又授任他的丈夫为官，赐牛马羊三千头。地万善弄鬼神，又有姿色，很得丑奴爱重，信用其言，乱其国政。数年之后，祖惠慢慢长大。忽有一天，他的母亲问起当年在天上的事，祖惠说："我一直在地万家，不曾上天，上天的话都是地万教我这样说的。"他母亲把这事告诉了丑奴，丑奴不信。后来地万做贼心虚，在丑奴面前潜毁祖惠，丑奴偷偷地把祖惠杀了。

正光初（约520），丑奴的母亲侯吕陵氏十分恼恨地万，派李具列等人去绞死地万，丑奴不肯丢掉这位让他迷信的情人，大怒，还要诛具列等。这时阿至罗进犯丑奴，丑奴匆忙率兵迎战，军败，回到汗庭。侯吕陵氏伙同大臣杀丑奴，立丑奴的弟弟阿那瓌为汗。阿那瓌为汗才十天，他的族兄示发发动兵变，率众万人攻打汗庭。阿那瓌战败，南逃入北魏。示发杀了阿那瓌的母亲侯吕陵氏及两个弟弟。

阿那瓌逃往北魏后，他的堂兄婆罗门率兵数万入讨示发。示发兵败，逃奔地豆于部落，为其所杀。柔然人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即安静王。正光二年（521）五月，高车人起来把婆罗门赶跑了，婆罗门率十部落到凉州，投降了北魏。北魏孝明帝元诩封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把他安置在怀朔镇北的吐若奚泉，让他在这一带收集亡散，游牧耕垦；又把婆罗门安置

在额尔纳河流域的故西海郡。

正光三年（522），婆罗门与部众谋叛北魏，投奔㕭哒。㕭哒的三位妻子，都是婆罗门的姐妹。事泄，被北魏凉州军击破，俘擒婆罗门，送到洛阳。

正光四年，柔然部众大饥，阿那瓌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兵三十万，入塞抄掠。北魏孝明帝元诩派尚书左丞元孚持节抚谕阿那瓌。元孚去见阿那瓌，却被阿那瓌逮起来，让他随行，打着朝廷的幌子，纵骑抢夺，驱掠良口两千人，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头，北遁，然后向元孚道谢，放他南归。明帝元诩大怒，于是派尚书令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伐阿那瓌，出塞三千多里，至瀚海，因找不到柔然部众，不得不撤军回到洛阳。

这年，北魏六镇起义，朝廷无力镇压，不得不借助柔然的兵力，于是派人招阿那瓌南下。孝昌元年（525），阿那瓌率众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连战连捷。柔然兵十分凶悍、野蛮，所到之处，人烟绝迹，城为墟丘。北魏六镇本是为防御柔然人侵而设置的，最后又不得不把柔然兵请来把它们毁掉了。而且，阿那瓌借镇压六镇起义的机会，占据了北魏长城以北的地盘，又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促使柔然部落内部重新凝聚，士马稍盛起来，阿那瓌也称起了敕连头兵伐可汗，即把揽王。

永熙三年（534），魏分东、西。东、西魏竞相与柔然交婚通好，西魏丞相宇文泰以舍人元翌的女儿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的弟弟塔寒。为了讨好阿那瓌，他又让文帝元宝炬废皇后乙弗氏为尼，另娶阿那瓌的女儿郁久闾氏为正妻。这位郁久闾氏十分骄横，到了长安，仍容不得乙弗氏，把她赶到秦州去了。元宝炬恩好不忘，仍思念乙弗氏。这时柔然举国渡河南侵，人们传言，说柔然兴兵是为了郁久闾氏。元宝炬忍痛把乙弗氏赐死了，并凿麦积山崖壁为洞穴，殡葬了她。

东魏武定三年（545）六月，西魏与柔然阿那瓌谋连兵伐东

魏，丞相高欢忧虑不安，遣行台郎中杜弼出使柔然，为世子高澄求婚。阿那瓌说："高欢自娶则可。"欢犹豫不决，他的结发妻子娄氏说："国家大计，不要再犹豫了。"世子高澄、大臣尉景也劝高欢早做打算。欢于是派镇南将军慕容俨聘阿那瓌女儿郁久闾氏，号曰蠕蠕公主。八月，高欢亲迎公主于下馆。公主至，娄妃避让正室，移居别处。高欢跪在娄氏面前，拜谢她大度。娄氏说："不要这样，免得被柔然人察觉，愿君尽管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阿那瓌让弟弟秃突佳送女儿到晋阳，临行还叮嘱他说："等见到外孙再回来。"而柔然公主秉性严毅，终身不肯讲汉语。高欢尝借口有病，不与公主同居，秃突佳很不高兴，高欢不得不带病乘舆到柔然公主那里歇宿。

北齐天保三年（552）正月，突厥土门在怀荒镇北袭破柔然，阿那瓌兵败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阿那瓌堂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率众投奔了北齐，余众复立登注次子铁伐为主。

北齐天保四年（553）二月，齐文宣帝送登注及子库提北还柔然。铁伐不久被契丹所杀，国人立登注为可汗。登复又被其大人阿富提所杀，国人立库提。三月，柔然别部又立阿那瓌叔叔邓叔子为可汗。突厥乙息记击破邓叔子于沃野镇北木赖山。十一月，突厥复攻柔然，柔然举国投降了北齐。

天保五年三月，柔然可汗庵罗辰叛齐。齐文宣帝高洋亲自率兵讨伐，大破柔然部众，庵罗辰父子向北逃走。

四月，柔然进攻北齐肆州，齐文宣帝自晋阳率兵出击，至恒州，柔然散走。北齐军撤回，高洋以两千兵断后，宿营子黄瓜堆。柔然别部数万骑奄至，高洋安卧，至平明才起，神色自若，指画形势，纵兵奋击，柔然披靡，遂溃围而出。柔然逃走，齐兵追击，伏尸二十多里，获庵罗辰妻子，虏三万余口。高洋派都督高阿那肱率骑数千切断柔然退路，这时柔然兵犹盛，阿那肱因兵少，请求高洋增派军队，高洋不但不增，反而又把他的骑兵裁减

了一半。阿那肱奋击，大破柔然，庵罗辰跨越岩谷，仅以身免。接着，高洋又亲率军击柔然，大破之。

六月，柔然余众东徙，又欲南攻。齐文宣帝高洋率轻骑邀之于金川。柔然闻知，远遁，营州刺史王峻设兵伏击，获其名王、大人数十人。

天保六年六月，齐文宣帝高洋到晋阳，随后自将军队北击柔然。七月，至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留辎重，率轻骑五千追柔然，及之于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高洋亲冒矢石，连续作战，大破柔然，至于沃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乌梁素海之北），俘获其酋长及生口两万余，牛羊数十万。

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击柔然主邓叔子，叔子兵败，收集余烬投奔了西魏。木杆恃其强，请尽诛邓叔子于西魏，使者相继于道。西魏太师宇文泰收捕叔子以下三千多人，把他们交给突厥的使者，突厥人尽将他们斩于长安青门之外。从此，蒙古草原上的柔然汗国被消灭了。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蠕蠕传》
《北史·蠕蠕传》
《通鉴纪事本末·魏伐柔然》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高车由来

高车大概是古赤狄的遗种，与匈奴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他们的语言与匈奴语大同小异，属土耳其语系。高车初号狄历，汉代称之为丁零，到了南北朝时，北方的鲜卑人、柔然人管他们叫敕勒，中原的汉人则称他们为丁零、高车。狄历、敕勒、丁零，都是译音之转，而高车的名称，则是由于这些部族俗多乘高车，车轮高大，辐数较多的缘故，因以得名。今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上还行驶着一种车轮高大的“勒勒车”，就是当年高车族的遗风。

高车最初游牧在西伯利亚南部，从贝加尔湖以北的安加拉河流域到叶尼塞河上游，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西晋末年，一部分丁零人南人中原，他们分别活动在中山（今河北定州）、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市郊东故城）二郡境内及西部太行山一带。秦晋淝水之战以后，丁零族还在荥阳举兵反秦，准备进攻洛阳，后又参加了后燕慕容垂的复国运动。不久，又与后燕决裂，自己在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建立了翟魏政权。慕容垂灭翟魏，丁零部众又回到中山。北魏攻陷中山，将他们迁往北边六镇，很快鲜卑化，最后又被汉化了。

而绝大多数的丁零人留在漠北，北方的部族管他们叫高车。高车初无都统大帅，部落种姓有六氏十二姓。六氏即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他们游牧在鄂尔浑、土拉河流域。十二姓即泣伏利氏、吐卢氏、乙旃氏、大连氏、窟

贺氏、大薄氏、阿䘪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罗氏、乞袁氏、右叔沛氏。他们的牧地在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以东，各种姓都有君长，但没有形成部落联盟。

高车人性情粗猛，部族内部十分抱团，一旦遇有寇难，生死与共。斗无行阵，蜂拥而出，成群而入，只能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其风俗，男女随地大小便，无所避忌。婚姻纳聘以牛马为礼，婚礼多少，一旦说定，不可更改。纳聘礼时，男方营车栏马，让女方家里的人来随意挑取，女方的人光膀赤背乘马出栏，男方站立栏外，举手惊马，如骑者不坠，马即归女方，如坠落，再重新换取，直到选够双方商定的匹数。部落不事农业，不食五谷杂粮，也不会酿酒。迎娶媳妇的那天，男男女女，成群打伙，带着马酪熟肉到女家，主人筵宾，也不论辈分，在庐帐前坐成一大片，饮宴终日，至晚歇宿女家。明日，乘载新妇而归。然后，男方家再到女方家随意选取最好的马做陪送，父母兄弟虽不愿意，但也不说什么。丈夫婚毕，便又回到女家，一直等到妻子生儿育女，然后全家再回到男方部落里，颇忌讳娶寡妇，以示同情忧怜。其畜产自有记识，虽纵在野外，从不妄取。迷信天神，每遇有雷声隆隆，各从毡帐中跑出来，一边嗷嗷嚎叫，一边张弓搭箭朝天空乱射，然后迁移到别处。第二年秋天，重又回到这里，在响雷的地方，埋羖羊，燃火，拔刀高擎，跳神驱魔，女巫口中嘟嘟囔囔，诵念祝辞，然后又群队驰马旋绕一百圈乃止。人人又各执一柳枝回去，插在帐前，用乳酪浇灌。女人用羊皮、羊骨做成冠帽，戴在头上，形状像帝王的轩冕。其死亡葬送，选择向阳的坡地，挖一土坑，让死者尸体成坐势，张臂引弓，佩刀挟矟，犹如生前的动作，土坑也不掩埋。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柔然相同。

公元4—5世纪时，高车族徙于鹿浑海（今鄂尔浑河河谷）西北百余里，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常与柔然发生牧地与财产争

端，也时常扰掠北魏。魏道武帝拓跋珪曾渡弱洛水（今土拉河西支之喀尔喀河）而西，袭击高车，虏获生口，牛、羊二十多万，接着又在狼山讨破高车余种，乘势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道武帝亲勒六军出中道，自驳髯水（今内蒙古集宁西北），徇略其部，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三十余落。卫王拓跋仪别率诸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道武帝自牛川南撤，大校猎，让高车人为长围，周七百里，聚杂兽于其中，一直把这些杂兽驱赶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又用高车部众建鹿苑，鹿苑的范围很大，南至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西至西山。后来，高车部帅敕力犍、幡豆建又先后归附了北魏。拓跋珪还于女水击破高车吐突邻部和解如部。北魏登国五年（390），又破贺突邻部。八年（393），破侯吕邻部于苦水河，还击破了纥奚部、薛干部等。

柔然的部帅社仑被北魏击败后，收捡部落，转移到漠北，侵人高车部落的地盘。高车斛律部帅倍侯利恐柔然为患，说："社仑新集，兵贫马少，易于攻取。"于是举兵掩击，人柔然部落。高车人贪利，不顾后患，分抢柔然庐室，妻其妇女，安息寝卧不起。社仑登高望见，于是招集亡散，聚得千人，于次日早晨，掩杀高车。高车逃脱的人仅有十之二三，倍侯利遂投奔了北魏。倍侯利性情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十分凶猛。北方部族都有些怕他，婴孩啼哭，人们常说："不哭，倍侯利来了！"哄吓孩子。一些姑娘们也常为歌谣说："求良夫，当如倍侯。"倍侯利在北魏，很受拓跋珪的赏识，以后病死在平城。拓跋珪又遣军袭破高车余种袁纥乌部。登国年间（386——395），离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役使，故得别为部落。

北魏神䴥二年（429）八月，太武帝拓跋焘北败柔然，回到漠南，闻知东部高车屯巳尼陂（今贝加尔湖），人畜甚众，距魏军有一千多里，遂遣左仆射安原等率兵往讨。军至，高车诸部闻

风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百余万头，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这些部落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农耕。这一时期，边境相对安定，畜牧、农业相应发展，牛、羊价格便宜，毡皮委积。北魏文成帝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舞狂欢，文成帝也亲临观看，这是高车部族一次最隆重的集会。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召高车部众随行，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袁纥树者为主，相率北走，游践金陵（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墓，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魏都督宇文福追讨，大破高车而还。孝文帝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元继为都督，攻击高车。元继先派人慰劳树者，树者投奔了柔然，不久又后悔了，相率又投降了北魏。

孝文帝南迁以后，留在六镇的高车人生活状况愈益恶化。因此，当北魏六镇起义之际，在高平镇的敕勒酋长胡琛立即响应，与胡汉镇民一起举行暴动，不久，河西地区的敕勒部民也起来响应，与六镇起义互为声势，共同反抗北魏的统治。这些高车人与其他胡汉民族团结一起，共同斗争、生活，以后逐渐融合于汉民族之中了。

在漠北的高车族人，自从柔然汗国兴起以后，东部高车六氏受到柔然的侵袭。他们被迫放弃鄂尔浑、土拉河流域一带的牧地，迁移到土拉河以北和贝加尔湖以南的地区。西部高车十二姓依附了柔然。豆仑为柔然统帅时，由于连续受到北魏的打击，部落离乱，国部分散。这时，副伏罗部酋长阿伏至罗与堂弟穷奇共同统领着高车部众十多万落。北魏太和十一年（487），豆仑进犯北魏边塞，阿伏至罗乘柔然南下的机会，率部西走，到达车师前部的西北（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建立起独立的高车王国。阿伏至罗被部民尊为“侯娄匐勒”，即“大天子”的意思。穷奇号“侯倍”，即“储主”。二人和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豆仑追讨，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不得不引众退走。

高车王国建立后，袭杀了高昌王阚首归，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使高昌成为其藩属。后来，高车人又攻破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卡克里克）。这时，中亚的嚈哒汗国也兴盛起来，先后征服了罽宾（今克什米尔西北）、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句盘（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等国，开地千余里。柔然势力的衰落，已没有能力再控制塔里木盆地，嚈哒乘机向这一带发展，与高车争夺塔里木盆地的霸权，击败了高车的军队，杀高车国“储主”穷奇，虏走穷奇的儿子弥俄突。高车部众离散，有的投奔柔然，有的投奔了北魏。北魏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同时，阿伏至罗的部众也发生了内乱。他的长子暗中与他的小老婆淫奸，想谋害他，事败，阿伏至罗把他的大儿子杀了。这事使阿伏至罗十分羞恼，脾气越来越坏，御下更加残暴，大失众心，众人起来杀了阿伏至罗，立其宗人跋利延为王。过了一年多，嚈哒汗国帮助穷奇的儿子弥俄突进兵高车，高车部人共杀跋利延，迎立弥俄突为主。从此，高车国成了嚈哒汗国的藩属，塔里木盆地的霸主地位归属了嚈哒汗国。

北魏正始五年（508)，高车主弥俄突与柔然汗伏图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西北巴里坤湖）之北，柔然大败，伏图被擒。弥俄突把他剃成光头，押送给北魏将孟威。北魏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伏图的儿子西征高车，为父报仇。高车主弥俄突战败被擒，丑奴把弥俄突的双脚系在驽马的尾巴上，鞭马奔跑，把弥俄突拖死了，并把他的头割下来，剔出颅骨，用漆漆了，当作碗使。这次战争，使高车受到沉重打击，部众全都归附了嚈哒。过了几年，嚈哒汗国立弥俄突的弟弟伊匐为高车国王，令其还国。伊匐复国以后，连败柔然。柔然汗婆罗门只好投奔了北魏的凉州。不久，高车部众内讧，伊匐的弟弟发动政变，杀了伊匐，自立为高车国王。到了公元6世纪40年代，

正是柔然汗阿那瓌和睦诸部，士马稍盛的时期，高车王国又屡被柔然汗国所败。东魏天平年间（534——537）高车王国由于军事的失利，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剧，伊匐的儿子比适起来杀了叔叔越居，自立为王，越居的儿子去宾投奔了柔然。兴和年间(539——542)，比适又被柔然打败。去宾又自柔然逃奔了东魏。东魏封他为高车王、肆州刺史，不久病死。

正当高车、柔然相互征战的时候，突厥汗国兴盛起来。东魏武定四年（546），突厥的土门可汗率领部众，邀击高车，高车部众溃败。土门把高车五万多落置于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高车失去了独立国家的地位，成了突厥人的役属。到了唐贞观初，高车族的一支薛延陀部落一度挣脱突厥的役属，称雄漠北，但不久就又覆灭了。唐玄宗时，高车的另一支回纥部落又终于击溃东突厥，在漠北建立汗国，称雄一时。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高车传》

《北史·高车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前凉兴替

西晋惠帝时，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张轨在京城洛阳做散骑常侍，赵王司马伦专擅朝政，他看到统治集团互相倾轧，政治混乱，想到距离洛阳较远的河西走廊一带，保据一方，所以要求去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永宁元年（301），西晋朝廷任命他为凉州刺史。张轨到任后，首先稳定了地方的政治局势。当时很多鲜卑部族散居在河西，相互攻掠，甚至侵扰地方，治安情况非常糟。张轨起用当地有才干的汉族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宋配、阴充、氾瑗、阴澹等人，延做谋主，将狡黠难制的鲜卑部落贵族一一击破。不久，张轨的名声就威著西土了。

晋惠帝永兴二年（305），鲜卑若罗拔能率众十万多人，从漠北向河西移动，侵入凉州，张轨遣宋配率兵阻击，斩拔能，尽获鲜卑部众，安置在河西走廊。这一战役更使张轨威名大震。

怀帝永嘉二年（308）二月，凉州刺史张轨中风，口不能言，让他的儿子张茂代行州事。陇西内史张越是凉州大族，想把张轨父子赶走，自己取代凉州，与其兄酒泉太守张镇及西平太守曹祛谋议，派人到长安将张轨中风的事告诉了南阳王司马模，请求让秦州刺史贾龛代行凉州事。贾龛不知事情蹊跷，正要去上任，被他哥哥训斥了一顿："张凉州是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有何德，怎么敢取代他！"贾龛这才没有赴任。张镇等人又上疏朝廷，另请刺史，还未等到朝廷发落，便迫不急待地发布檄文，废逐张轨，让军司杜耽摄行州事，接着又逼杜耽上表朝廷，请求让张越

任凉州刺史。

张轨得到了这些河西大族联合炮制的檄文，觉得凉州不好再待下去了，想着回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养老。长史王融、参军孟畅十分生气，把檄文扔到地上，一脚踩作两截，推开守门的卫士，大步蹿到署堂，冲着张轨喊叫起来："晋室多故，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胆敢肆虐凶逆，我们应当鸣鼓进军，杀了他们！"不等张轨表态，遂出外戒严。这时，张轨的大儿子张寔正好从洛阳赶来，于是众人以寔为中督护，率兵讨伐张镇，派张镇的外甥令狐亚先去见镇，陈述利害。张镇听说张寔如何厉害，吓哭了，说："我上了别人诱骗的当！"于是亲到张寔面前谢罪，张寔率步骑三万南击曹祛，俘斩曹祛，张越逃奔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平定了这场内乱。

永嘉年间（307——312），晋怀帝常常遭到汉刘聪、王弥、石勒的攻击，京城洛阳数被围困。地方州郡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晋帝，各地的使者也很少到洛阳请命，而张轨在凉州，独遣使贡献，岁时不绝。

洛阳陷落后，中州人到凉州避难的越来越多，张轨把这些流人与秦、雍二州的流人一起安置在姑臧的西北，置武兴郡，又分西平郡，置晋兴郡。河西走廊一带，魏晋以来比较荒凉，经济落后，市而萧条，民间不曾流行铸币，多用布缣充当货币。"裂匹以为数段，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因此，张轨下令铸造五铢钱，"立制准币用钱，钱遂大行"（《晋书·张轨传》）。商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永嘉六年（312）八月，秦王司马邺在长安以皇太子的身份建行台。张轨发兵东出，翼戴帝室。九月，秦州刺史裴苞不欲借道，据险阻止凉州兵人境，被张寔、宋配击破。

建兴二年（314）二月，晋愍帝以张轨为太尉、凉州牧，封西平郡公。拜其子张寔为副刺史。

五月，张轨病死，临终前，遗令文武将佐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张轨死后，张寔代行父位。十月，张寔任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

四年（316）四月，张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指出他的过错的，赏给布帛羊米，贼曹佐隗瑾说："今明公理政，事无巨细皆自决断。或兴师发令，府朝不知，万一违失，没有人为您承担责任。群下畏威，仅仅是接受成命而已。这样，虽重赏千金，也没有人敢吭声的。我认为应该让您的聪明稍少些，让群下自己处理一些政事，各能所能，择善而行，有益的建议自然涌现，也用不着奖赏。"张寔听了，十分高兴，允从了隗瑾的意见，增瑾官位三等。

晋愍帝即位时，长安城中，户数不到一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全城公私车辆仅有四乘。此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不断火并，社会经济没有能够逐渐恢复，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这年，刘曜再度攻入关中，进围长安。长安城中发生饥荒，人相食，死者过半。张寔遣将军王该率步骑五千人，入援长安，并带去许多粮食、物品。司马邺以寔为都督陕西诸军事，以寔弟张茂为秦州刺史。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正月，西晋南阳王司马保（司马懿弟司马馗曾孙）在上邽（今甘肃天水市）称晋王，由于受到汉刘曜的威胁，想投奔凉州。张寔遣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阆率步骑一万东击刘汉，命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前驱，接应司马保。不久，司马保病死，部众散去。韩璞等中途闻知，不能进而还，行至南安郡（治貆道，在今甘肃陇西东南），诸羌截断归路，双方相持了一百多天，粮竭矢尽，韩璞杀车中牛，让将士饱餐一顿，然后哭着对众人大声说："汝曹念父母乎？"众人齐声回答："念！""念妻子乎？""念！""欲生还乎？""欲！""从我令乎？""诺！"于是鼓噪进战。

恰在这时，张阆率金城兵赶到，前后夹击，大破羌兵，斩首数千级。

先前长安城曾流传这样一句谣言："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及刘汉兵覆捣关中，氐、羌扰掠陇右，雍、秦二州居民死者十之八九，独凉州安全。

大兴元年（318）三月，张寔派牙门蔡忠出使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这时平司马睿已在建康称帝。张寔不用江东年号，犹称建兴。

三年（320）六月，京兆人刘弘流寓凉州天梯山，以妖术惑众，从受道者有一千多人，张寔左右的人都奉事他。帐下阎沙、牙门赵印都是刘弘的同乡，弘对他们说："上天给了我一枚神玺，让我做凉州王。"阎沙、赵印信以为真，暗中与张寔左右十多人谋杀寔，奉刘弘为主。张寔的弟弟张茂发觉了刘弘、阎沙等人的阴谋，急匆匆地去见张寔，请诛刘弘。张寔令牙门将史初去收捕刘弘。史初率武士直奔天梯山。与此同时，阎沙等人也动起手来，怀揣凶器，闯入州府，杀张寔于外寝。当史初来到天梯山，正要缚执刘弘时，刘弘说："张寔已死，杀了我又能如何？"史初大怒，割掉他的舌头，把他囚枷起来，押赴姑臧，游街示众，斩于市井，诛其党徒数百人。左司马阴元等因张寔子张骏尚幼，推张茂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八月，张茂立侄子张骏为世子。

四年（321）二月，张茂筑灵钧台，基高九仞。武陵阎曾夜叩府门，大呼道："武公（张寔）派我来，言'何故劳民筑台！'"官吏以为妖，请求捕杀。张茂说："吾也认为劳民。阎曾称先君之命规劝我，怎么能说是妖呀！"于是罢台役。

永昌元年（322）十二月，张茂使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八月，前赵刘曜自陇上西南击凉州，遣其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今甘肃甘谷西南），呼延晏攻宁

羌护军阴鉴于桑壁（今甘肃临洮西南），曜自将戎卒二十八万军于河上，列营百余里，金鼓之声动地，河水为之沸荡，前凉临河诸戍皆望风奔溃。刘曜扬言要百道横渡黄河，直抵姑臧，凉州大震。参军马岌劝张茂亲出拒战，长史汜祎反对，两人争执起来。祎怒，请求斩马岌。岌说："汜公糟粕书生，刺举小才，不思家国大计。明公父子欲为朝廷诛刘曜，已经多年了，今曜自至，远近之情，共观明公此举，当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力虽不敌，势不可以不出。"张茂说："好！"于是，出屯石头（今甘肃武威东）。张茂问参军陈珍说："刘曜举三秦之众，乘胜席卷而来，我们将如何对付他？"珍说："曜兵虽多，精卒很少，大抵都是氐、羌乌合之众，恩信未洽，且又有山东方面的顾虑，安能舍其腹心之患，旷日持久与我争河西之地呀！若在二旬之内不退，珍请得敝卒数千，为明公擒他。"张茂高兴起来，于是让陈珍率兵救援韩璞。前赵诸将争欲渡河，刘曜说："吾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有三分之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今但按兵勿动，以吾威声震慑，若出中旬张茂求和书表不到的话，那么我就有负众卿了。"果然不出刘曜所料，没过多久，张茂遣使称藩，献牛羊珍宝不可胜数。刘曜封张茂为凉王，班师回长安去了。

张茂筑姑臧大城，修灵钧台。别驾吴绍劝阻说："明公所以修城筑台，原因不过是想惩戒已往战争之患。愚以为如果恩信不能深入人心，虽处层台，也无所益，相反还会疑群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系托之望，示怯弱之形，启邻敌之谋，将何以佐天子、霸诸侯呀！愿亟罢兹役，以息劳费。"张茂说："亡兄（张寔）一旦失身于物，岂无忠臣义士欲尽节者！顾祸生不意，虽有智勇无所施展。王公设险，勇夫重闭，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今国家未靖，不可用太平的理论指责身处乱世的人。"执意兴建城、台工程。

二年（324）五月，张茂病卒。临死前，遗令说："吾官非王

命，苟且行事，岂敢以此为荣！死后，当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盛敛。”张骏袭受西晋官爵，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并又接受前赵刘曜的官号，为凉州牧、凉王。

成帝咸和元年（326），张骏畏前赵逼迫，徙陇西、南安民两千多家于姑臧，又遣使修好于成汉，并劝成主李雄向东晋称藩。自此，前凉与成汉友好，信使往来不断。

二年（327）五月，张骏闻知前赵被后赵打败，于是去前赵官爵称号，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数万，东会韩璞攻掠前赵秦州诸郡。前赵南阳王刘胤率兵屯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御敌前凉军。韩璞越过沃干岭，与刘胤夹洮水相持七十多天。十月，韩璞遣辛岩督运粮草于金城，刘胤率骑三千袭岩于沃干岭。辛岩败，刘胤尽夺其粮草，遂又前逼韩璞营。璞众大溃，胤乘胜追奔，渡过黄河，攻拔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斩首二万级，进据振武城（今甘肃永登北）。河西大骇，张阆、辛岩率其众投降了前赵军，张骏遂失河南之地。

五年（330）五月，张骏因前赵亡，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护军，与后赵分境。

八年（333），张骏假道于成，与东晋通使，打通了由凉州经汉中、巴蜀至江东的通道。自此，前凉与东晋每年使者不绝。

咸康元年（335），自张轨父子经营凉州，年年征战不息。及张骏嗣立，境内渐平。骏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远近都称之为贤君。骏遣将杨宣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诸国焉耆、于阗之属，皆至姑臧致送方物，其中有汗血马、火浣布（石棉布）、犎牛、孔雀、巨象等珍奇物品二百多种。张骏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置高昌郡，又于姑臧城南做五殿，官属皆称臣。骏有兼并秦、雍之志，遣使至建康（今南京市），欲联合东晋伐李期和后赵石虎，未成功。

穆帝永和元年（345）十二月，张骏征服了焉耆。这年，骏划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以世子张重华为刺史；分兴晋等八郡为河州，以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和西域都护等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张宣为刺史。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官号多仿效西晋。

二年（346）五月，张骏病死。官属上世子张重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尊嫡母严氏为大王太后，母马氏为太后。

后赵将王擢袭击前凉武街（今甘肃临洮东），俘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多户于雍州。后赵凉州刺史麻秋、将军孙伏都攻前凉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黄河南岸），太守张冲降，姑臧震动。张重华征发全境兵，使征南将军裴恒率领御赵。裴恒壁于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久而不战。张重华又以主簿谢艾为中坚将军，给步骑五千人，使击麻秋。艾引兵出振武，与后赵军战，大破赵军，斩首五千级。

三年（347）四月，后赵麻秋攻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南）。前凉晋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欲弃外城。武城太守张悛说："弃外城则动众心，大事去了！"宁戎校尉张琚依从张悛的意见，固守大城。麻秋率众八万围堑数重，又做云梯，凿地道，百道俱进，强攻，城中守军顽强抵御，后赵兵死伤数万。赵王石虎又派部将刘浑率步骑二万与麻秋会攻。郎坦恨张琚不用己言，让军士李嘉暗引赵兵一千多人登城。张琚督诸将力战，杀敌二百多人，赵兵退。张琚烧其攻具，麻秋退保大夏（今甘肃广河西北）。

石虎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并、司二州兵二万人为麻秋后继。前凉将宋秦率户二万投降了后赵。张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艾乘轺车，戴白帢，鸣鼓而行。麻秋望见，怒气冲冲地说："谢艾一年少书生，这样的打

扮，是轻视我呀!”命黑矟龙骧三千人驰击，谢艾左右的军队乱了起来。有人劝谢艾乘马指挥，艾不从，下车，踞胡床，指挥镇定。后赵军以为有伏兵，惧不敢进。前凉别将张瑁从间道引兵堵截赵军后路。赵军退，艾乘势进击，大破赵军，斩其将杜勲、汲鱼，获虏首一万三千万级，麻秋单骑逃还大夏。

五月，麻秋与石宁复率众十二万进屯黄河南岸，刘宁、王擢略地晋兴（今青海民和西北湟水南岸）、广武、武街，至于曲柳(今甘肃武威东南)。张重华使将军牛旋御敌，失利，退守枹罕，姑臧震动。重华欲亲自率兵拒战，谢艾固谏。别驾从事索遐说：“君者一国之镇，不可轻动。”于是以谢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索遐为正将军。率步骑二万拒敌赵兵。别将杨康败刘宁于沙阜，宁退屯金城。

七月，后赵石虎复遣征西将军孙伏都、将军刘浑率步骑二万会麻秋军，长驱济河，击前凉遂城、长最。谢艾建牙誓众，这时刮起一阵西北风，军中旌旗猎猎东南指，索遐说：“风为号令，今旌旗指敌，天赞助我也!”艾军于神鸟，王擢与艾前锋战，败走还河南。八月，谢艾进击麻秋，大破赵军，秋逃遁到金城，石虎闻知前线连连败北，哀叹地说：“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呀！不可图取。”谢艾又还讨叛虏斯骨真等万余落，皆破平。

九月，后赵麻秋又袭前凉将张瑁，打败张瑁军，斩首三千余级。枹罕护军李逵率众七千人投降了后赵。自黄河以南，氐、羌诸部众都依附了后赵，后赵与前凉隔河对峙。

五年（349）九月，凉州官属共上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重华屡以钱帛赐左右宠臣，又喜博弈，颇废政事。征事索振劝道：“先王夙夜勤俭，以实府库，正以仇耻未雪，志平海内的缘故。殿下嗣位之初，强寇侵逼 ，多赖重赏，得战士死力，仅保社稷。今积蓄已虚，而寇仇尚在，岂可轻有耗散，以与

无功之人呀！昔汉光武帝躬亲万机，章奏诣阙，当天处理，故能隆中兴业绩。今章奏停滞，动经时月，下情不得上通，沉冤困于囹圄，这决非明主治政的事！”重华听了，很是惭愧。

东晋永和九年（353）十月，前凉张重华病，立10岁的儿子曜灵为世子。重华本家的哥哥张祚，办事干练，又以机巧善事内外，与重华的幸臣赵长、尉缉结成异姓兄弟，进而骗取了重华的信任。他们合伙陷害功臣谢艾，把他排挤出朝，出任酒泉太守。艾上疏说：“权幸用事，公室将危，乞听臣入侍。”又说：“张祚、赵长等将为乱，宜尽驱除。”重华不听。十一月，重华病死。临死前，作手令征谢艾为卫将军，监中外诸军事，辅政。祚、长等匿而不宣，又假造重华遗令，以张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弼新即位的张曜灵。

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前凉时期，其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读史方舆纪要》），是前凉政权兴盛的时期。张曜灵即位，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残杀，前凉政治走向衰落。

十二月，前凉右长史赵长与太后马氏合伙废张曜灵为凉宁侯，立张祚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祚既得志，恣情淫虐，杀重华妃裴氏及谢艾。

十年（354）正月，张祚自称凉王，改建兴二十四年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为王后，子太和为太子，封弟天锡为长宁侯，子庭坚为建康侯，曜灵弟玄靓为凉武侯，置百官，朝仪用天子礼乐。尚书马岌劝谏，被免官，郎中丁琪复谏，说：“我自武公以来，世守臣节，抱忠履谦，五十余年，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虏，年年征战，民不告疲。殿下勋德未高于先公，而急谋革命，臣未见其可。士民所以听命，四远所以归向，因吾能奉晋室的缘故。今而自尊，则中外离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张祚大怒，挥剑斩丁琪于殿下。

十一年（355）七月，凉王张祚淫虐无道，上下怨愤。祚恶河州刺史张瓘兵权太重，遣张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讨叛胡，又遣其将易揣、张玲率步骑三千袭击张瓘。张掖人王鸾知术数，他看到前凉将乱的形势，求见张祚，对祚说："此军出，必不还，凉国将危。"并揭露了张祚一些不道德的事。张祚大怒，以鸾为妖言，将鸾处死。鸾临刑，仍警告张祚说："我死，军败于外，王死于内，必然。"祚将鸾族灭。张瓘闻知，先下手杀了索孚，起兵击祚，传檄州郡，废祚，复立张曜灵。易揣、张玲刚渡过黄河，就被张瓘击败，揣等单骑逃还，张瓘随后追来，姑臧震恐。骁骑将军宋混因哥哥宋修与张祚矛盾，怕招来灾祸。八月，宋混与弟宋澄西走，聚众一万多人响应张瓘，还向姑臧。张祚怕曜灵复辟，遣杨秋胡把曜灵带到东苑，拉其腰杀死，埋于沙坑。

闰九月，宋混军至姑臧，凉王张祚收张瓘弟张琚及子张嵩，想杀掉他们。琚、嵩闻知，募市人数百，扬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经至城东，敢举手者诛三族。"遂开西门迎宋混兵。领军将军赵长等惧罪，入阁呼张重华母马氏出殿，立凉武侯张玄靓为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捕赵长等人，杀死。张祚按剑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战。张祚素失人心，没有人肯为他效命，遂被士兵杀死。宋混等枭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城内齐呼万岁！混、琚上玄靓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复称建兴四十三年。这时，玄靓才刚7岁。

张瓘至姑臧，推玄靓为凉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以宋混为尚书仆射。陇西人李俨、西平人卫綝、酒泉太守马基各据郡，与张瓘作对，张瓘派兵一一击破。

永和十二年（356）正月，前秦征东大将军晋王苻柳遣参军阎负、梁殊使于凉，以书劝说张玄靓向秦称藩。阎负、梁殊至姑

臧，张瓘会见了他们，说："我等是晋室臣属，臣无境外之交，二君何以来辱？"负、殊说："我家晋王与君邻藩，虽山河阻绝，风通道会，故来修好，君为何这样见怪呢？"瓘说："吾尽忠事晋，于今已有六世，若与苻征东通使，是上违先君之志，下失士民之节，这怎么行呀！"贞、殊说："晋室衰微，坠失天命，本已很久了，是以凉之先王，北面向二赵称藩，这才是识时务呀！今大秦威德方盛，凉王若想自称帝于河右，恐非强秦的对手，若想以小事大，何不舍晋事秦、长保福禄呢？"瓘说："中州的人好食言，先前石赵的使车刚还，而戎骑已至，吾不敢再轻信了。"负、殊说："自古帝王居中州，政化各殊，赵为奸诈，秦敦信义，岂能一概面论？张先、杨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讨擒了他们，然后释其罪戾，宠以爵秩，原非石氏所能比。"瓘说："必如君言，秦之威德无敌，何不先取江南，则天下尽为秦有，你家征东将军何故让君到此辱命？"负、殊说："江南有纹身的习俗，道污先叛，化隆后服。主上以为江南必须兵服，河右可以义怀，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达天命，则江南得延数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疆土了。"瓘说："我跨据三州，带甲十万，西包葱岭，东距大河，伐人有余，况于自守，何畏于秦？"负、殊说："贵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饶，孰若秦、雍？杜洪、张琚因赵氏成资，兵强财富，有囊括关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云散，旬月之间，不觉易主。主上若以贵州不服，赫然奋怒，控弦百万，鼓行而西，未知贵州将何以对待？"瓘笑笑说："兹事当决断于凉王，非吾所能了。"负、殊说："凉王虽英睿夙成，然年在冲幼，君居伊、霍之任，国家安危，系君一举。"张瓘内心惧怕前秦兴师动武，于是借玄靓之命，遣使向前秦称藩，前秦封玄靓为凉王。

升平三年（359），张瓘猜忌苛虐，专以爱憎为赏罚，由是人情不附。辅国将军宋混性忠鲠，张瓘视之为眼中钉，想除掉宋

混、宋澄兄弟二人，自己取代张玄靓，于是征兵数万集姑臧。宋混闻知，在这年的六月，与弟澄率壮士杨和第四十多骑奄人南城，宣告诸营说："张瓘谋逆，遵太后令诛逆。"不大一会儿，众至二千人。张瓘率众出战，被宋混击破，瓘麾下张玄胪刺混，不能穿甲，被混生擒，瓘众悉降。瓘、琚兄弟见政变不能成功，畏罪自杀了。宋混又夷其家族。凉王张玄靓以宋混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酒泉郡公，代张瓘辅政。

升平五年（361）四月，前凉骠骑大将军宋混病重，张玄靓与祖母马氏亲到床前视疾，问道："将军万一不幸，寡妇孤儿将何所托？欲以林宗继将军，可以吗？"混说："臣的儿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若蒙不弃，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其儒文，不称机事。殿下可多加策励任用。"又告诫弟及子、臣下为国尽忠。及卒，路人为之挥涕。玄靓以宋澄为领军将军，辅政。

九月，前凉右司马张邕恶宋澄专政，起兵攻杀澄，并灭其家族。张玄靓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同辅政。

张邕骄矜淫纵，树党营私，滥行刑杀，成了国人的祸患。敦煌刘肃对张天锡说："国家事欲未静！"天锡问："何谓也？""今护军出人，犹似长宁（指张祚）。"天锡吃惊地说："我早有怀疑，未敢出口，计将安出？"肃说："正当迅速除掉。"天锡问："谁能当行此任？"肃说："我！"刘肃这时还不到20岁。天锡说："你年少，还须再找一助手。"肃说："赵白驹与我，二人足可行事。"十一月，天锡与邕俱人朝，肃与白驹跟从在天锡身后，至宫门下，遇邕，刘肃猛然挥刀砍过去，邕把身一闪，躲过，白驹又上前一击，仍未命中。张邕一溜烟逃走了，天锡与刘肃、白驹也急忙闪进宫中。不一会儿，张邕率甲士三百多人攻宫门，天锡登屋大呼："张邕凶逆无道，既灭宋氏，又欲倾覆我家。你们将士也为凉臣，何忍以兵相残呢？今所取者唯张邕一人，其他一概不问。"邕兵于是全都散走，邕自刎而死，尽灭其族党。玄靓以天

锡为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

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八月，张玄靓祖母马氏卒，尊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恶天锡专擅，与大臣张钦密谋诛天锡，事情败露，张钦等都被处死。玄靓惧，以位让天锡，天锡不受。右将军刘肃等劝天锡自立。闰八月，天锡使刘肃等夜率兵攻入宫中，杀玄靓，宣称暴死。天锡自称凉州牧、西平公。这时，他才18岁。

张天锡篡位后，与前秦断绝藩属关系。前秦王苻坚让王猛作书谕告天锡，晓以利害，天锡惧，又向前秦称藩。不久，天锡又闻知前秦欲兼并凉州，于是联合东晋，欲共举兵击前秦。前秦苻坚乘前凉内部混乱，张天锡荒于酒色，不恤政事，人人愤怨的时机，于东晋太元元年（376），调集步骑十三万人进攻前凉，天锡也先后征集十万人的军队抵抗，几经合战，前凉大败，张天锡被迫出降，前凉亡。前后凡九主，立国七十六年。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张轨传》、《苻坚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张氏据凉》、《苻秦灭凉》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

大夏覆亡

大夏是匈奴族人赫连勃勃建立起来的政权。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人，与汉刘渊同族。他的曾祖父刘虎，汉刘聪时，以宗室封娄烦公，任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今山西忻县北七十里的云中河）。西晋末年，并州刺史刘琨招引鲜卑拓跋猗卢打败了刘虎。刘虎西渡黄河，退往塞外去了。刘虎死，他的儿子刘务桓代领部众。务桓一名豹子，他招集种落，又成了诸部的霸主。后赵石虎任命他为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务桓的儿子刘卫辰，娶了代王什翼犍的女儿为妻，匈奴与鲜卑拓跋氏曾和好了一段时间，后来什翼犍势力大了，时常想吞掉女婿的部众和财产，屡次出兵攻击卫辰，卫辰归附了前秦苻坚。苻坚统一北方，灭了代国，把黄河以西的地盘，划给卫辰管辖，卫辰驻治代来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西）。淝水之战以后，前秦衰落了，刘卫辰乘机占据了朔方之地，控弦之士发展到三万八千。北魏登国六年（391），拓跋珪自五原金津（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南渡黄河，攻克了代来城，卫辰被部下所杀。拓跋珪又杀了卫辰子弟宗党五千多人，获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

当拓跋珪屠杀代来城匈奴士众时，卫辰的三儿子勃勃死里逃生，投奔到叱干部落中。酋长叱干他斗伏怕得罪拓跋珪，不敢收留他，打算把他送给北魏。他斗伏的侄儿阿利带领劲勇在半道上截获了勃勃，把他送到后秦高平公没奕于那里去了。没奕于非常

赏识勃勃，把女儿许配给他，还把他引荐给后秦主姚兴。勃勃身长八尺五寸（约为二米），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姚兴一见，就觉得他才貌不凡，任用为安远将军，让他帮助没奕于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给他统领。不久，又任他为安北将军，配以三交（今陕西榆林西）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后来，勃勃因后秦向北魏通好，北魏又是勃勃的杀父仇敌，大怒，于是谋叛后秦。这时，河西鲜卑杜仑向后秦姚兴贡献战马八千匹，来到大城。勃勃扣留了这些战马，从此，与后秦姚兴决裂了。他又召集部众三万多人到高平川（今宁夏南部的清水河），佯装围猎，乘机袭杀了岳父没奕于，收编了没奕于的部众，使他的兵众达到了数万人。

夏龙升元年（407）六月，勃勃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署置百官。自称先人是夏后氏的苗裔，因国号为大夏。以长兄右地代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征南将军、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征西将军、尚书左仆射，乙斗为征北将军、尚书右仆射，其余依次授任。用汉族王朝的官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勃勃称大夏天王后，游弋在今陕甘宁边界，诸将劝他定都高平。他说："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也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取。且其诸镇用命，吾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攻吾，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吾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今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以北地区）、河东尽为我所有，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谋之中。"不肯建都高平，欲采取流动游击的战略蚕食后秦的地盘。岭北地区诸城昼夜紧闭城门，人人惶恐。

勃勃雄猛好战，称王不久，向南凉秃发傉檀求婚，傉檀看

不上这个野小子，拒绝了他的要求。勃勃怒，率骑二万越过九峻岭，南侵凉境，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头而还。秃发傉檀率众追夺，勃勃在阳武下陕凿凌埋车，堵塞通道。傉檀指挥弓箭手射勃勃，中其左臂。勃勃勒众还击，大败傉檀，追奔八十多里，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多人。勃勃将南凉将士的尸体堆积，号为"骷髅台"，以为景观，然后凯旋回岭北去了。

以后，勃勃把矛头集中在后秦姚兴身上，在青石原打败了后秦将张佛生，俘斩五千七百人。

龙升二年（408），姚兴派将齐难率众两万击勃勃，勃勃退往河曲（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曲流处）。齐难以为勃勃已经远去，于是纵兵掠野。勃勃潜军返击，俘获秦兵七千多人，收其戎马兵仗。齐难引兵退走，勃勃又追击至木城，拔城，擒获齐难，俘其士卒一万三千人，戎马万匹。龙升三年（409）九月，后秦主姚兴亲率兵击勃勃，至贰城（今甘肃平凉、华亭附近），勃勃趁其诸军未集，率骑邀击。姚兴十分恐慌，遣将出战。勃勃设伏，大败秦兵。这时后秦左将军姚文崇率兵赶到，与勃勃激战，勃勃退走，姚兴也回长安去了。勃勃又攻拔后秦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镇大城。龙升四年三月，勃勃又攻取定阳（今陕西宜川西北），坑斩后秦兵四千多人。龙升五年正月，攻占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降其众四万五千，获戎马两万匹。以后，赫连勃勃加强了对后秦的攻势。夏凤翔三年（415）三月，勃勃攻姚兴将姚逵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经二十天的强攻，拔城，擒获姚逵及其将姚大用、姚安和等，坑杀后秦兵二万人。

从龙升元年到龙升六年（407——412），勃勃连年战争，打出了自己的一块地盘。凤翔元年（413）三月，勃勃谋划建都，以叱干阿利领匠作大匠，征发岭北胡汉民十万人，于朔方水北、

黑水之南（今陕西靖边东北），营建都城。勃勃说："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聪明乖巧，然残忍苛暴，让民工把土蒸熟以夯筑城垣，待筑就后，再严格验工，用锥锥城，若入一寸，就把筑城人杀了，并把其尸体一并筑入墙内。因此，墙体非常坚固，可以砺刃。勃勃以阿利为忠，把营缮工作委任于他。他又造五兵之器，精锐无比。兵器打造成后，呈给勃勃。勃勃让人试用，射甲不穿即杀造弓的人；如射入，便斩铠匠。因此，无论兵器质量多高，总有些工匠要死于非命。又造百炼钢刀，为龙雀大环，取名为"大夏龙雀"，刀背刻有铭文，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成为稀世珍品。还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类的雕刻，全都用黄金装饰，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人，以是器物莫不精丽。这年，勃勃还下书说："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姓，非礼也。……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于是自称赫连，庶系旁属改姓铁伐。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后秦，勃勃与北凉沮渠蒙逊建立联盟，双方约定："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发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这样，使夏免去了西顾之忧，集中兵力，征战于关中和河套地区。

夏凤翔四年（416）正月，后秦王姚兴死，太子姚泓即皇帝位，国势衰微。六月，赫连勃勃趁后秦将姚嵩与氐王杨盛相持的机会，坐收渔翁之利，率骑千万袭取了上邽（今甘肃天水），杀后秦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又进攻阴密（今

甘肃灵台西南)，杀后秦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让他的儿子赫连昌为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镇阴密。

凤翔五年，赫连勃勃闻知东晋太尉刘裕西人关中，征伐后秦，于是进据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后秦九峻岭以北的郡县镇戍都投降了赫连夏。刘裕攻克了长安，灭掉后秦。不久，刘裕退回江东，留次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夏主赫连勃勃闻知刘裕东还，十分高兴，问计于谋士王买德说："朕将进图长安，卿试言取之方略。"买德分析了关中形势，说："刘裕灭秦，所谓以乱平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镇守，非经远规略。狼狈而返者，不过是想早日篡夺东晋朝权罢了，无暇有意于中原。陛下若取长安，可于地处冲重的青泥、上洛布置游击部队，断晋兵来去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陕，绝其水陆之道。陛下声檄长安，申布恩泽，三辅父老都会壶浆以迎王师。义真独居空城，逃窜无所，一旬之间必而缚麾下，这就是兵不血刃，不战而定的方略。"勃勃听了，连连称善，于是派他的儿子赫连璝为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向长安进军，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以买德为抚军长史，南断青泥，勃勃率大军继发。

夏昌武元年（418)，赫连璝到了渭阳，刘义真派龙骧将军沈田子迎战，失利，退屯刘迴堡。田子与义真的司马王镇恶不和，他趁王镇恶出战夏兵的机会，杀了镇恶。义真又杀了田子，于是把城外的兵都召回长安城中，闭门固守。关中郡县都归附了赫连夏。赫连璝夜袭长安，不克。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刘裕闻知赫连勃勃攻长安，大惧，急忙召刘义真东镇洛阳。刘义真东行到了灞上时，赫连勃勃已人了长安城，然后派赫连璝率众三万追击义真，王买德又自青泥邀击。晋兵大败，死者不计其数，刘义真单骑逃遁到洛阳。夏兵把晋兵的人头垛积起来以为景观，炫耀自己的赫赫战功。

十一月，夏王赫连勃勃筑坛于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至此，赫连夏达到了全盛，其四境“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读史方舆纪要》）。

夏真兴元年（419）二月，夏群臣请都长安。勃勃说：“朕岂不知长安为历代帝王之都，沃饶险固。然晋人僻远，终不能为吾患。魏人与我风俗略同，土壤邻接，自统万至魏境才百余里，朕在长安，统万必危；若在统万，魏必不敢济河而西，诸卿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罢了。”于是在长安置南台，以赫连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勃勃回到统万，这时统万宫殿刚刚竣工。勃勃游览宫室，十分高兴，下令大赦天下，又改年号为真兴。还刻石于统万城南，颂其功德。刻辞由秘书监胡义周撰写，言语精美，是十六国时期的一篇上乘散文。《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录有全文。赫连勃勃又十分狂妄，不仅把自己都城命名为“统万”，声称他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还将都城南门取名为朝宋门，东门为招魏门，西门为服凉门，北门为平朔门。

赫连勃勃也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位暴君，凶残好杀，视臣民为草芥，生杀随意。他常居统万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便随手杀死，群臣有斜视他者，则挖其眼球，如有笑话他的，则割其嘴唇，谏者被视为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杀死。胡汉士民都惧怕这个恶魔，人人自危。

夏真兴七年（424），即赫连勃勃病死的前一年，赫连夏发生了诸子争夺太子，相互残杀的恶剧。这年，勃勃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想废掉赫连璝，立小儿子赫连伦为太子。赫连璝知道了这件事后，大怒，率兵七万自长安北上，攻战赫连伦。赫连伦率骑三万拒敌，兄弟二人在高平展开激战，赫连伦败死。伦的哥哥、太原公赫连昌（赫连勃勃第三子）听说伦被杀，很是恼火，又率骑兵一万袭杀了赫连璝，兼并了赫连璝的部众八万五千人，归于统万。赫连勃勃对这场兄弟残杀不但不感到痛心，反而大悦，

于是立赫连昌为太子。第二年，赫连勃勃死了，赫连昌即位。

夏赫连昌承光二年（426），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趁勃勃新死，夏国局势不稳，派大将奚斤率兵五万多人，袭取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进据长安；自己又亲率精骑二万，渡过黄河，袭击统万城，掠得牛马十多万头，徙其民一万多家而还。

承光三年（427），夏赫连昌派弟弟赫连定统众二万攻长安，与奚斤相持。北魏拓跋焘出动了十万大军，乘虚进攻统万。拓跋焘率轻骑三万兼程至统万城下，赫连昌以步骑三万迎战失败，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占领统万城，掠获到马三十多万匹，牛羊数千万头。赫连定反攻长安未能得手，听说统万失守，也退往上邽去了。

夏赫连定胜光元年（428），北魏进兵上邽，生俘赫连昌，赫连定逃奔到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自称夏皇帝。胜光四年（431），赫连定灭西秦，虏西秦民十多万口，想渡河西击北凉，在渡河时，遭到吐谷浑的突然袭击，赫连定被俘。夏亡，立国二十六年。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魏书》：《太武帝纪》、《奚斤传》

《通鉴纪事本末》：《赫连据朔方》、《魏灭夏》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

秦、凉诸国并立

自淝水之战以后，前秦衰败，北方分裂，关、陇地区出现了诸国并立的局面。在今陕西和甘肃东部及内蒙古的伊克昭盟，除匈奴族赫连氏建立的大夏政权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今青海乐都、西宁一带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前后出现了鲜卑秃发氏的南凉、氐族吕氏的后凉、汉人李氏的西凉和卢水胡沮渠氏的北凉。在这些分裂王朝中，以后秦较为强盛。

后秦是姚苌建立的王朝。姚苌字景茂，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羌人。他是姚弋仲的第二十四个儿子，从小就很聪明，又有心计，长大后，大大咧咧，不事产业，他的哥哥们都觉得这位小弟弟不一般。他们的先人，传说是有虞氏的后裔，东汉中期迁居到赤亭。西晋永嘉之乱时，羌族部落酋长姚弋仲又率部徙居榆眉（今陕西千阳东），后来依附了前赵刘曜。后赵太和二年（329）九月，石勒灭前赵，石虎攻取关中，徙关中氐、羌实河北。后赵延熙元年（333），石虎以姚弋仲为西羌大都督，率羌众数万居于清河郡的滠头（今河北枣强东北）。冉魏永兴三年（352），姚弋仲病死，他的第五子姚襄也因赵魏大乱，率部离开了滠头，屯守碻磝津。不久又经荥阳，西人关中，在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被前秦苻坚、邓羌打败。姚襄被杀，襄弟姚苌率众投降了前秦。前秦苻坚以姚苌为扬武将军，历任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

州刺史，复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并为前秦屡建大功。

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前秦苻坚磬举全国之众，讨伐东晋，授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苻坚淝水战败，回到长安，鲜卑慕容泓起兵反叛。苻坚派儿子苻叡镇压，命姚苌为司马，协助苻叡指挥作战。苻叡败死，姚苌无法回去向苻坚交待，于是奔于渭北，又到了马牧。西州豪强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众5万多家，也活动在这一带，他们请姚苌做了盟主，在羌族与西州豪强的支持下，姚苌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改年号为白雀。

这时，慕容冲与苻坚互相攻战。姚苌抓住机会，发展自己，通好慕容冲，进屯北地，厉兵秣马，等待时变。又招怀了北地、新平、安定等地羌胡十多万户。慕容冲攻长安，姚苌与群下议进取之计。群下都说："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姚苌分析了关中的形势，说："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能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关中，兵不血刃，坐定天下。"他要一箭双雕，坐收渔翁之利。

后秦白雀二年（385）五月，苻坚自长安出奔五将山，被姚苌俘获处死。慕容冲入长安后，被部下杀死。鲜卑部众放弃长安东归，姚苌轻取长安。后秦建初元年（386）三月，姚苌在长安称帝，立皇后、皇太子，置百官，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姚苌称帝后，关陇地区氐族残余势力仍很强盛，使后秦政权受到威胁。姚苌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对氐族残余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先后攻取了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上邽、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故邑）等城。前秦苻登在陇东称帝后，率众反攻后秦，苻登立苻坚像于军中，用大车拉着，建青旗黄盖，以虎贲三

百人卫护，凡有出征、作战必先启奏神像而后行，借此激励将士。他引兵五万，东击姚苌，将士都在铧、铠上刻有“死”、“休”字样。每次战斗，以剑、矟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后秦屡败，军心不稳。姚苌掘苻坚尸，鞭挞无数，剥衣裸体，举在枪刺上示众，又就坎土掩埋。他认为苻登屡胜，是因为得到了苻坚的神助，也于军中立苻坚像，并祷告说：“臣兄襄让臣复仇，新平之祸，臣行襄之命，非臣之罪。苻登是陛下的疏属，犹欲复仇，何况臣呢？怎么能不执行自己亲哥哥的命令呀？而且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臣违背了陛下。今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计臣之过错。”苻登升楼遥谓苌说：“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能得好吗？”因大呼道：“弑君贼姚苌，何不自出？吾与汝决一死战！”姚苌不应。后秦战事仍久未得利，军中每夜数惊，于是斩苻坚像头，送给苻登。不久，姚苌趁苻登攻平凉时，率骑三万夜袭苻登后方大营，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还，并俘虏了苻登的妻子毛氏。毛氏美而勇，善骑射。后秦兵入其营，毛氏犹弯弓跨马，率壮士数百人力战，杀敌七百多人，后因众寡不敌，被后秦兵活捉。姚苌想纳她入后宫，毛氏又哭又骂：“姚苌，汝先已杀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能容你吗？”姚苌恼羞成怒，就把她杀了。

后秦建初八年（393）十月，姚苌因连年在外争战，患了重病，不得不撤军回到长安。十一月，姚苌召太尉姚旻，仆射尹纬、姚晃，将军姚大目，尚书狄伯支入禁中，受遗诏辅政。他对太子姚兴说：“有毁此诸公者，慎勿接受。汝抚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我就无后顾之忧了。”不久就死去了。

姚兴自称大将军，代姚苌统众，讨伐苻秦。次年四月，姚兴大败苻登，苻登率残众逃入马毛山中。五月，姚兴即皇帝位于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南佐村），改元皇初。七月，姚兴俘杀了苻

登，尽散其部众，使归农业。接着，后秦又平定了关陇地区其他胡汉杂夷割据势力，控制了关中及陇东地区。西燕灭亡后，后秦又夺取了河东地区。并乘东晋内部混乱的时机，兵出潼关，攻取了洛阳。后秦强盛时，疆域“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

姚兴是十六国时期比较留心政事的君主。他是姚苌的长子，前秦苻坚时为太子舍人，及被立为皇太子时，常留统后事，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东宫国副的事务非常熟悉。而且他本人态度宽明，待人接物，甚有威惠，又常与身边的人讲论经籍，也有些才学。他即位后，依靠叔父姚绪、姚硕德和尹纬等人的支持，朝政颇有些气象。姚绪、姚硕德等人都是些能征善战的将军，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由于他们的支持，使姚兴在军事上能够战胜前秦苻登和其他割据势力，并扼制夏赫连勃勃的南侵。朝政主要得力于尚书仆射尹纬。纬少有大志，不营产业，相貌堂堂，有相辅之才。尹氏又是天水的大族，在西州地区很有影响。前秦苻坚因为尹赤曾迎降过姚襄，嫉恨尹氏家族，凡尹姓都不起用。当姚苌逃奔到马牧时，尹纬和尹详等煽动群豪，推苌为盟主，遂于后秦是佐命元勋。姚苌捕获了苻坚，让尹纬去劝说苻坚，把王位禅让给姚苌。与苻坚一席谈，苻坚这才知道他命世不凡，问他道：“卿在朕朝任何官？”纬答道：“尚书令史。”苻坚叹道：“此人有宰相之才呀！堪与王景略（王猛字）相比，而朕却不曾知遇他，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姚兴即位后，尹纬又帮助后秦灭了苻登，军国朝政，畴谋策划，“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

姚兴在政治方面也多有建树，他曾下令：“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当时，关陇地区胡汉杂夷聚居，豪强急相掠夺生口，多纳奴婢，相当部分的胡汉部民因年景糟糕，自卖为奴。他们失去了人格的生存自由，像牲畜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姚兴的命令，将会使一些奴婢从十分悲惨的境地中有所解

脱，这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十六国时期，一些暴君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而姚兴“立律学于长安”，把各州郡的候补令史召到长安来学习，掌握和领会朝廷的法律精神。然后再回到各州郡，决断刑狱，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州郡可上报中央机关——廷尉审判。姚兴自己还亲自处理刑事诉讼。后秦用法律管理国家，根据法律条文，量刑定罪，多少也避免了官吏滥杀无辜，在一定限度内给百姓士民一些生存权利。姚兴对儒学也比较重视，他做苻宏的太子舍人时，就曾陪苻宏念书，自己做了太子后，常与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勗等讲论经籍，即使有繁忙的战事，也从不废止。还把国内一些硕儒名学召到宫内东堂，讨论道艺，错综名理。这些人主要有姜龛、淳于岐、郭高等，他们都是关中的耆宿，“经明行修，各有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凉州人胡辩也是有名的学者。苻坚末年，关中混乱，他东迁洛阳，并定居到这里，兴学授徒，学生有一千多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特意关照守卫潼关的尉吏说：“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人，勿拘常限”（《晋书·姚兴载记》）。于是学者相互劝学，关中儒风兴盛起来。姚兴信奉佛教，拜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为国师，亲率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解佛经；又命罗什翻译佛教经论四百多卷。罗什持梵本，口自宣译，姚兴持旧经，以相考校。由于姚兴的提倡，关中佛教十分兴盛。儒学与佛教的活跃，发展了关中文化。因此，后秦较诸其他秦、凉、夏等国，精神面貌颇不相同。

后秦弘始十六年（414），姚兴寝疾，他的儿子们各自结党营私，相互残杀，争夺皇位继承权。广平公姚弼欲取代姚泓为太子，事败，被免官。此后，姚弼的死党尹冲又发动了宫廷政变。后秦永和元年（416）二月，姚兴到华阴，使太子姚泓监国，人居西宫。姚兴病重，还长安。黄门侍郎尹冲阴谋乘姚泓出宫迎接姚兴的机会杀泓。姚兴至，姚泓正要出迎，被宫臣谏止，说：

"主上疾笃，奸臣在侧，殿下今出，进不得见主上，退有不测之祸。"泓说："臣子闻君父疾笃，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全身以安社稷，才是最大的孝。"泓不出，尚书姚沙弥对尹冲说："太子不出迎，宜奉持圣驾至广平公（姚弼）宅第，然后挟天子举事。"尹冲因姚兴生死未知，不敢贸然打劫圣驾，想随姚兴入宫，见机行事。兴入宫，命太子姚泓录尚书事，东平公姚绍及右卫将军胡翼度典禁兵，防制内外，又没收了姚弼宅第中的甲仗武器。姚兴病情加重，他的妹妹南安长公主视疾，兴昏睡不醒。小儿子姚耕儿以为父亲死了，出告南阳公姚愔。愔即与尹冲率甲士攻端门，宫中禁兵闭门拒战。姚愔等登门，缘屋而入，及于马道。姚泓在谘议堂侍疾，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宫兵入屯马道南，愔等不得进，遂烧端门。姚兴强打着精神临前殿，赐死姚弼。禁兵见兴还活着，欢呼雀跃，争相赴贼，愔等大败。姚愔逃入了骊山，尹冲等投降了东晋。不久，姚兴病死，姚泓秘不发丧，待捕杀了姚愔这才殡葬了父亲，遂即皇帝位。

八月，东晋太尉刘裕趁姚兴新死，兴兵讨伐后秦。十月，晋军攻克洛阳。十一月，正当晋军节节胜利、步步进逼的关键时刻，后秦统治集团却发生了内讧。姚泓弟、太原公姚济在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举兵称帝，并欲取代姚泓。东平公姚绍兵入蒲坂，俘获了姚济，平息了这场叛乱。

后秦永和二年（417）正月，姚泓朝会百官于前殿，以内外危逼，君臣相泣。这时，齐公姚恢又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庐舍，自北雍州趋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长安大震。姚泓不得不把守潼关的军队调回来，费了好大气力，才把姚恢打败。这种形势对东晋十分有利，晋军在后秦"内外离叛"的局面下，长驱入关，水陆并进。七月，晋军大败秦兵于长安城下，姚泓出降，后秦亡。立国凡三十二年。

西秦的创始人是陇西鲜卑族人乞伏国仁。国仁的先祖原居住在漠北，后来南出大阴山，迁往陇西。关于他们先辈的迁移，鲜卑人世世代代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他们的先人乞伏、如弗斯、出连、叱卢四部落结伴而行，途中，遇上了一头巨大怪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怪兽形状像神龟，大得像一座山丘。先人们于是杀马祭祀，跪下祷告，说："若是善神，请闪开路，让我们过去；若是恶神，就把道路塞绝不通。"一眨眼，神兽消失了，却有一个小孩站在那里。当时乞伏部落中有一位老翁，膝下无子，非常喜欢这位小孩，于是收养了他，为他起了个"纥干"的名字。"纥干"是依靠的意思，是说这位老人有了儿子做依靠。这小孩长到10岁时，骁勇善骑射，能弯五百斤重的弓，本事十分了得。四部的族众都佩服他雄武，推举他做了统主，号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讬铎，是非神非人的意思。讬铎的后人有叫祐邻的人，是乞伏国仁的五世祖。西晋泰始年间（265——274），他率领部众打败了鲜卑鹿结，移居陇西高平川（今宁夏南部的清水河），以后又移居苑川（今甘肃榆中东北），在苑川水一带发展起来。前秦时，被苻坚将王统打败，国仁的父亲司繁率众投降了苻坚。苻坚把司繁留在长安做人质，让司繁的叔叔吐雷统领其部众。不久，鲜卑勃寒侵犯陇右，苻坚派司繁率众征讨，勃寒投降了司繁，司繁遂镇勇士川。

司繁卒，国仁代镇。前秦建元十九年（383），苻坚大举攻晋，征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这时，国仁的叔叔步穨在陇西反叛前秦，苻坚让国仁讨伐步穨，步穨迎国仁于路，一起脱离了苻秦。苻坚淝水战败后，国仁招集诸部众至十多万。

前秦太安元年、西秦建义元年（385），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为建义，筑勇士城（今甘肃榆中东北）而居之。从此与苻秦公开决裂了。

苻坚死后，苻登自称皇帝，招引国仁，于前秦太初二年

（387）封国仁为苑川王。国仁死，他的弟弟乞伏乾归统部，改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苻登又封他为金城王。前秦延初元年、西秦太初七年（394），苻登败死，乞伏乾归尽有陇西之地，自称秦王，史称西秦。西秦太初十七年（404），乾归迁都苑川。不久被后秦姚兴打败，乾归投降了后秦，受任为河州刺史。姚兴又怕他坐大难制，征乾归为朝官，让他的儿子乞伏炽磐统部。乾归在长安居住了三年（406——409），又回到苑川（即勇士川，今甘肃榆中大营川）。这时，夏赫连勃勃在后秦岭北地区崛起，时常虎视长安，姚兴已无暇顾及陇西了，乞伏乾归乘机又称了秦王。

西秦永康元年（412）六月，乾归被部下所杀，儿子乞伏炽磐即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永康三年（414），南凉连年饥馑，秃发傉檀率骑七千远袭乙弗部落。炽磐趁其都城乐都（今青海乐都）空虚，率步骑二万袭破，灭了南凉。以后又屡败吐谷浑，还掠夺了契汗部落的牛羊五十多万头。西秦强盛时，其疆域“西逾浩亹（今青海乐都东），东极陇坻，北距河，南略吐谷浑”（《读史方舆纪要》）。

西秦永弘元年（428），乞伏炽磐死，儿子乞伏暮末即位。暮末御下残忍，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到了永弘三年（430），境内大旱，饥荒严重，为了躲避饥荒，乞伏暮末想东趋上邽，归附北魏，率户一万五千走到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的高田谷，遭到夏赫连定的堵击，暮末退保南安城。次年，夏兵进围南安，暮末饥穷出降，西秦亡。立国四十七年。

后凉是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氐人吕光建立的政权。吕光是前秦苻坚太尉吕婆楼的儿子。苻坚统一北方后，于建元十九年（383）正月，发兵七万，骑五千，命吕光经营西域。吕光以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真为向导，行越流沙三百多里，到达西域的龟兹城（今新疆库车）后，西域三十多个小国，陆续归附。

苻坚任命吕光为使持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

淝水之战以后，前秦衰败，西域与关中的通道被隔绝。吕光以龟兹城繁华热闹，宫室煌丽，市邑也颇类长安，舍不得离开。沙门鸠摩罗什对吕光说："这里是死亡之地，不值得留恋。将军尽管东归，途中自然有福地可居。"吕光的部众也都愿意回关中，于是他们征发了两万多头骆驼，驮载外国珍宝、奇伎异戏、殊禽怪兽等，并驱赶一万多头骏马上路了。

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九月，吕光到了玉门，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五万拒光于酒泉。吕光大破凉州兵，杀梁熙，遂人姑臧城（今甘肃武威）。次年，苻坚被姚苌杀害后，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建元太安。后凉麟嘉元年（389）二月，吕光称三河王。麟嘉八年（396）六月，吕光自立为大凉天王、署置百官，建立凉国，史称后凉。

吕光称霸河西，多得力于谋士杜进的帮助。他非常宠幸杜进，任命他为武威太守，对他言听计从，群僚没有能超过他的。后凉太安三年（388），吕光的外甥石聪从关中来到凉州，吕光问他："中州人认为吾为政如何？"石聪说："但闻杜进而已，不闻有舅舅。"从此，吕光妒忌杜进，借故把他杀了。吕光心胸狭隘，眼里容不得能人，而且，又刚愎自用，严刑苛刻。有一次，吕光与群僚聚宴，谈论到政事，参军段业向吕光进言，说："明公用法太峻。"吕光说："吴起无恩而楚强，商鞅严刑而秦兴。"段业说："吴起丧其身，商鞅亡其家，都是因为自己做事太残酷造成的。明公正要开建大业，景行尧、舜，犹恐不济，而竟羡慕吴起、商鞅的办法，这岂是凉州士女所希望的吗？"吕光的脸色马上沉下来，冷冰冰地说："算你说得对！"

后凉朝中没有能人，这一政权主要靠七万五千人的军队支撑

着，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军队老化，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杀，国力就积弱不振了。后凉承康元年（399），吕光死，太子吕绍即天王位。吕绍软弱无能，吕光的庶长子吕纂发动宫廷政变，杀绍自立。不久，纂又杀弟大司马吕弘。吕纂嗜酒好猎。有一天，他和番禾太守吕超戏言，说："你靠着兄弟桓桓（吕桓），才敢欺吾，应该杀了你，天下才能安稳。"本来想吓唬一下吕超，并无杀意。吕超内心恐惧，趁与吕纂在宫中游玩的机会，一剑刺穿吕纂的胸膛，割下吕纂的头示众，立吕隆为天王。吕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后凉衰败，周边的后秦、南凉、北凉兵相继入侵，内外交困，当北凉兵包围了姑臧时，城内谷价暴涨，五千文才能买到一斗谷，饿死的人有十多万。城门昼闭，城内居民又无法樵采觅食。为了活命，百姓自愿出来充作北凉将吏的奴婢。吕隆把这些偷偷逾城的人全部坑杀，城内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后凉神鼎三年（403），吕隆见大势已去，难以再困守下去了，于是向后秦姚兴请降。姚兴派兵四万入河西，后凉兵见秦兵强盛，退避三舍。吕隆素车白马，迎降于道旁，后凉亡。立国仅十五年。后凉不仅短命，疆域也小，吕光初居姑臧时，基本上占据了前凉旧境，不久纷纷割裂，到后凉亡时，除姑臧外，只剩下仓松（今甘肃古浪西）和番禾（今甘肃永昌西）二郡了。

南凉的建立者是河西鲜卑族人秃发乌孤。他的先人与北魏拓跋氏原出一脉。乌孤的八世祖叫乌发疋孤，是北魏圣武皇帝拓跋诘汾的长子、北魏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的长兄。汉魏之际，他率领一支部族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他们的牧地十分广阔，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东北）、牵屯山（今宁夏固原西），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之东沟、西沟），北接大漠。疋孤死，他的儿子寿阗统部。寿阗还是个胎儿时，他母亲睡在被窝里，突然一阵剧痛，生出了小寿阗。鲜卑人被称为"秃发"，因而为氏。也有人认为秃发是拓跋的异译。到了乌孤的父

辈思复鞬时，河西鲜卑部众稍盛。以后乌孤嗣位，务农桑，修邻好，接受到后凉吕光的官号，为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开始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作为政治中心。

后凉龙飞二年、南凉太初元年（397），秃发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建元太初。从此，与后凉吕光展开了争城夺地的战争。不久，乌孤改称武威王，徙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太初三年（399）八月，乌孤酒醉乘马，马奔，把他从背上闪摔在地，肋骨伤折。他笑笑说："几使吕光父子大喜。"不久，伤势加重，他遗嘱群下说："方难未靖，宜立长君。"说罢就死了。

乌孤死，弟秃发利鹿孤立，迁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南凉建和二年（401），利鹿孤称河西王。次年，利鹿孤病死，弟秃发傉檀嗣位，称凉王，改元弘昌，再从西平迁都乐都，史称南凉。

秃发傉檀即位不久，畏后秦强盛，于是去凉王号，向姚兴称臣。后凉吕隆投降了后秦以后，姚兴封傉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让他镇守姑臧（今甘肃武威）。傉檀得到姑臧后，便与姚兴决裂，自己又做了凉王。这时南凉所控制的地区东自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西至青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自此，秃发傉檀与大夏赫连勃勃、北凉沮渠蒙逊为争夺河西霸主地位，互相争战。南凉弘昌六年（407）七月，傉檀率兵五万多人攻北凉，被沮渠蒙逊击败。

十一月，傉檀又被夏赫连勃勃打败，损失了二三万人，夏军积南凉兵的尸体为景观，取名为"髑髅台"。在这场战争中，傉檀本人险些丧命。经过这次打击，伤了南凉的元气，傉檀怕东、西被敌，于是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了姑臧城，国中上下骇怨，人心不稳。这时，后秦姚兴也想投井下石，趁南凉失败，讨伐傉檀，于是派尚书郎韦宗先到姑臧观察南凉形势。傉檀与韦宗高谈阔论，探讨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韦宗非常佩服，回到长

安，劝姚兴不要轻举妄动。姚兴不听，派兵出击南凉，先胜后败，只得罢兵。傉檀也因连年战争，处处受逼，在河西走廊待不下去了，只得还都乐都。北凉沮渠蒙逊取得姑臧以后，继续对南凉进行攻击和骚扰，并三次包围了乐都城。

南凉不断遭到北凉的进攻，农田荒芜，不种多年，庄稼连年不收，上下饥敝，内外穷困。南凉嘉平七年（414），傉檀打算去远征，掠夺青海乙弗部的畜产，来补救饥荒。他亲率精骑七千前去袭击，掠夺到牛马羊四十多万头。西秦主乞伏炽磐率步骑二万，乘虚来袭乐都。乐都城溃，乞伏积磐徙城中文武百姓万余户于枹罕，南凉城镇也陆续归附了西秦。随同傉檀西征的将士，听说乐都失守，妻小被虏掠，纷纷逃散。傉檀走投无路，只得投降了西秦，南凉亡。立国凡十九年。

西凉是汉人李暠建立的政权。李暠，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出身陇西大族，高祖、曾祖都是西晋的郡守，祖父在前凉时，任武卫将军，封亭侯。后凉吕光末年，段业在张掖自称凉州牧，起用李暠为效谷（今甘肃敦煌西）令，后又升任敦煌太守。又进暠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镇军。

西凉庚子元年（400）十一月，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发动兵变，推举李暠为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领敦煌太守，建元庚子，西凉立。西凉建初元年（405）正月，西凉公李暠自称大将军、大都督，领秦、凉二州牧，改元建初。九月，迁都酒泉。这时，李暠雄心勃勃，想在河西干一番事业。他告诫诸子："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西凉嘉兴元年（417）二月，李暠病死，世子李歆即位。

西凉在诸凉中是一个小国，全盛时，其境域只有今天甘肃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几县地，军队步骑加在一起，仅有三

万人。这么一点家业，不久就被李歆葬送掉了。李歆即位后，不听他父亲的先前劝诫，御下残忍，用刑过严，又好治宫室。臣僚多进谏言，不听。西凉永建元年（420），李歆听说北凉沮渠蒙逊东伐西秦乞伏炽磐，便想乘虚偷袭蒙逊的都城张掖。沮渠蒙逊却来了个声东击西，在西凉进军的通道上设下伏兵。李歆率步骑三万东出，行至都渎涧，蒙逊引兵掩击，战于怀城，西凉兵大败。僚佐劝歆退保酒泉，李歆不肯，执意在蓼泉（今甘肃高台西）与蒙逊决一死战，结果全军覆没，李歆战死，酒泉随之失守，西凉亡。立国凡二十一年。

北凉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国家。蒙逊的先世曾官任匈奴左沮渠，遂以官号为姓。卢水即今黑河。这支胡人很早就居住在河西走廊黑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保存着自己的部落组织。蒙逊的祖父叫沮渠祁复延，曾被西晋朝廷封为狄地王；父亲法弘还担任了前秦的中田护军。法弘死后，蒙逊代父统领部曲。蒙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喜欢读史书，又懂得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受到诸胡的推服。

北凉神玺元年（397），后凉吕光派儿子吕纂率领张掖卢水胡部帅沮渠罗仇伐西秦，在这场战争中，吕光的弟弟吕延战死。吕光以败军之罪，杀了罗仇及弟麹粥。这时，蒙逊自领营人在后凉宫中担任宿卫工作，他得到了伯父罗仇被杀的消息，赶来送葬。当罗仇、麹粥归葬临松那天，赶来送葬的胡人有一万多人，蒙逊哭着对众人说：“吕王昏荒无道，多杀无辜，打从我们的上世起，就曾虎视河西，我今要与诸部起兵，昭雪二位伯父的冤耻，恢复上世的功业，如何？”众人听了，群情汹涌，欢呼万岁，遂结盟起兵，攻下了后凉的临松郡，屯据金山（今甘肃山丹西南）。这时，蒙逊的堂兄沮渠男成也聚众数千反凉，打败了北凉酒泉太守垒澄，垒澄被杀。又攻建康，遣使劝说建康太守段业共同起兵反凉，段业被迫答应了。男成等推段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

州牧、建康公，改年号为神玺。蒙逊也率众归附了段业。不久，段业进据张掖，自称凉王。

沮渠蒙逊暗中想取代段业，但却无法下手，于是玩弄诡计，借刀杀人。北凉永安元年（401）四月，凉王段业怕蒙逊勇略难制，想削弱他的权力，让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马权是河西的大族，瞧不起胡人，蒙逊心里十分嫉恨他，于是到段业那里说他的坏话。说："天下不足虑，唯当忧患马权而已。"段业于是把马权杀了。蒙逊又对堂兄沮渠男成说："段公无鉴断的才能，哪里是拨乱的君主。索嗣、马权向来是我们不放心的人，今天都已被处死。蒙逊打算除掉他，奉戴哥哥为主，如何？"男成说："段业本来就是一个外来户，受吾家兄弟拥立，恃吾俩如鱼得水。人家亲信我们而我们却欲图谋人家，不祥。"蒙逊见男成不应，于是约他同祭兰门山，又暗中派司马许咸密告段业，说："男成想借假日谋乱，如求祭兰门山，臣的话就应验了。"男成果然向段业请假，去祭兰门山。段业于是派人捕了男成。男成据理争辩，说："蒙逊先与臣谋反，臣因兄弟的缘故，隐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众不从，故约臣祭山而反诬臣，其意是想借王之手杀臣。乞求您诈言臣死，暴臣罪恶，蒙逊必反，臣然后奉王命讨伐他，没有不败他的。"段业不听，赐死了男成。蒙逊又假惺惺地哭着对男成的部众说："男成忠于段王，而段王无故杀了他，诸君岂能坐视不问吗？况且当初立段王，不过是想安抚人心罢了。今州土纷乱，非段王所能克济。"男成素得众心，众皆愤泣争奋。蒙逊又率领男成的部众杀了段业，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

这时，南凉与大夏都想称霸关陇，秃发傉檀取得姑臧城后，遭到夏主赫连定的攻击。沮渠蒙逊也屡败傉檀，几次进兵包围了姑臧，傉檀守不住姑臧，只得退回乐都。北凉弘昌十年（411），沮渠蒙逊终于据有姑臧。第二年，迁都于此，改称河西

王，史称北凉。北凉玄始九年（420），蒙逊灭西凉，取酒泉、敦煌，河西走廊完全被沮渠蒙逊占据。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金城、西平、乐都等郡地，并连通西域诸国。

北凉永和元年（433），蒙逊病死，儿子沮渠牧犍即位。永和七年（43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攻伐北凉，包围姑臧，这座拥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城市，很快被攻陷，沮渠牧犍出降，北凉亡。立国凡三十九年。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蒙逊据张掖》、《蒙逊伐西秦》、《魏灭北凉》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前燕兴衰

前燕是鲜卑族的一支慕容氏建立起来的政权。关于“鲜卑”一词的来历，有许多说法，或说秦汉之际，他们的先人被匈奴打败，人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或说其酋长莫护跋喜欢模仿燕代人冠步摇冠，诸部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称慕容；或说其部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为慕容氏。早在东汉末年，檀石槐做了鲜卑的大汗，他将辖控的地盘划分为三部，东部归属宇文氏，中部属鲜卑氏，西部属拓跋氏。鲜卑氏部族人皮肤长得较白，因此被称为“白部鲜卑”。三国曹魏初年，他们居住在辽西一带，魏晋之际，迁到了辽东北。他们的酋长慕容廆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他打败了自己的敌对部族，还不断把战火引至西晋的辽西边境。他一向倾慕华风，学习汉族文化，晋元康四年(294)，率部族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南），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晋永嘉元年（307）十二月，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

晋建兴元年（313）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又奔走他处。鲜卑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附于他的门下。慕容廆选择英俊有识之士，随才授任，以河东裴嶷、北平阳耽、庐江黄泓、代郡鲁昌为谋主，广平游邃、北海逄羡、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开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黄甫岌、岌弟真、兰陵缪恺、昌黎刘斌、勃海封奕、封裕典掌机要，这些汉族士人对慕容廆的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帮

助慕容廆组建了政权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教给了慕容氏如何统治人民的方法。

东晋咸和八年（333）五月，慕容廆卒。六月，世子慕容皝统摄本部。

东晋咸康元年（335）七月，慕容皝立子儁为世子。

咸康三年、前燕元年（337）十月，慕容皝称燕王，署置群司，以封奕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为奉常，阳骛为司隶，王寓为太仆，李洪为大理，杜群为纳言令，宋该、刘瞻、石琮为常伯，皇甫真、阳协为冗骑常侍，宋晃、平熙、张泓为将军，封裕为记室鉴。立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慕容儁为王太子。改年号为燕元年，建立燕国，史称"前燕"。

前燕二年五月，后赵石虎率众二十万攻燕，被慕容皝击败，后赵士卒死者五万多人。十二月，慕容皝又破段辽。

前燕五年（341）正月，燕王慕容皝使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名为"龙城"（今辽宁朝阳）。八年（344）十月，龙城建成，慕容皝迁都于此。国力愈益强盛，东破夫余及高句丽，攻灭鲜卑宇文部，成为辽西地区的霸主，这为以后慕容氏人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前燕十二年（348），慕容皝死，子慕容儁即燕王位。这时，慕容氏已有兵二十多万，由于多年经营，辽西地区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提高，可谓是富国强兵。

前燕十三年四月，石虎死，后赵大乱，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杀。燕平狄将军慕容霸上书于燕王儁说："石虎穷凶极暴，天之所弃，余烬仅存，自相鱼肉。今中国倒悬，企望仁恤，若大军一振，势必投戈。"北平太守孙兴也上表说："石氏大乱，应乘机进取中原。"慕容儁认为后赵刚遭大丧，这时伐赵，不合礼仪。慕容霸得知慕容儁的心思，十分焦急，乘骑快马飞驰到龙城，直奔王宫，对慕容儁说："难得而易失的，是机会。万一石氏衰而

复兴，或有英雄站出来，执掌后赵军政，这不仅是失掉了十分有利的机会，还恐怕进一步成为我们的后患。”慕容儁说：“邺中虽乱，邓恒据乐安城（今河北昌黎西南），兵强粮足。今若伐赵，东道通不过，就要走卢龙道。卢龙山径险狭，若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将我拦腰截断，使我首尾不得相顾，这该怎么办呢？”慕容霸说：“邓恒虽然想为石赵据守边要，而他部下的将士顾恋家眷，人人都有还乡的心思，若我大军逼临，自然瓦解。臣请求充任殿下的前驱，东出徒河（今辽宁锦州），暗趋令支（今河北迁西县西），出其不意，彼闻知势必震骇，大不过闭门自守，小不免弃城逃溃，哪里还顾得上抵抗。这样，殿下可以安步前进，再不会有什么顾虑。”慕容儁仍犹豫不决，召来五材将军封奕、从事中郎黄泓等人商议。封奕说：“用兵之道，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是故以大吞小，就像狼吃小猪一样；以治易乱，犹如烈日融雪。大王自上世以来，积德累仁，兵强士练。石虎极其残暴，死未瞑目，子孙争国，上下乖乱。中原之民坠于涂炭，伸着脖子、踮着脚尖，盼望救援。大王若扬兵南向，先取蓟城，次指邺都，炫耀威德，怀抚遗民，彼孰不扶老携幼以迎大王。凶党将望旗冰碎，怎么还能伤害我们呀！”黄泓也说：“现在太白星特别亮，岁星运行到毕星的北边。这一征兆，意味着天下易主，北方国主接受天命，君临中原。应迅速出师，以承天意。”折冲将军慕舆根说：“中国之民，困于石氏之乱，咸思易主，以救汤火之急，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自宣武王（慕容廆）以来，招贤养民，务农训兵，正待今日。今时机成熟了，却不去征取，还顾虑重重，难道是天意不想使海内平定，还是大王不想取天下呢？”慕容儁笑了，依从了大家的意见。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左长史阳骛为辅义将军，谓之“三辅”。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选精兵二十多万，讲武戒严，准备进取中原。

前燕十四年（350）二月，燕王慕容儁使慕容霸将兵两万自东道出徒河，慕舆根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卢龙塞，三路出兵伐后赵。以慕容恪、鲜于亮为前驱，命慕舆埿槎山通道。留世子慕容晔守龙城，以内史刘斌为大司农，与典书令皇甫真留统后事。

慕容霸率军来到了三陉（今河北滦县北），后赵征东将军邓恒惶怖，焚烧仓库，弃乐安城逃走，与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蓟城。燕使河南部都尉孙泳急入乐安城，扑灭余火，籍其谷帛。慕容霸收乐安、北平兵粮，与慕容儁在临渠（今河北三河东）会师。

三月，燕兵到了无终（今天津蓟县），王午留下数千名士卒，使部将王佗率领守蓟，自与邓恒走保鲁口（今河北饶阳）。慕容儁攻陷蓟城，俘杀了王佗，又打算把俘虏到的后赵蓟城守兵一千多人全部坑杀。慕容霸劝阻，说；“赵为暴虐，王兴师讨伐，将以救民于涂炭而抚有中州。今始得蓟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为王师的先声。”于是把这些降卒全都释放了。燕军占据蓟后，慕容儁把都城从龙城迁来这里，在这里谋畴了入主中原、建立封建帝制的大政方针。

燕军攻取蓟后，又南下到了范阳（今河北涿州），范阳太守李产想为后赵拒敌燕军，但部下将士却不愿出战，李产无可奈何，只得率领所辖八县令长投降了慕容氏。慕容儁仍任用李产为范阳太守。李产的儿子李绩官任幽州别驾，跟从王午在鲁口。邓恒对王午说：“李绩的家乡在北，父已降燕，今虽在此，恐终难相保，徒为人累，不如及早除掉他。”王午说：“你这是什么话！当今丧乱，而李绩能立义捐家，情节之重，虽古之烈士都不能超过。你却以猜疑加害他，让燕赵士人听了，会说我们相聚为贼，并无保家卫国的意识。众情一散，就很难再聚集起来，这等于自己把自己搞垮了。”这才打消了邓恒杀李绩的念头。王午仍忧虑诸将不与自己同心，或致非意，于是打发李绩回家。李绩辞

别王午往见慕容儁，慕容儁大声嚷叫道："卿不识天命，背弃父亲，想邀个好名声，怎么直到今天才来见我！"李绩回答说："臣眷恋旧主，志存微节，身为赵国官吏，怎么能事从燕王呀。殿下正以义取天下，我今日求见您也不算晚。"慕容儁高兴起来，待他很是亲善。

慕容儁以弟慕容宜为代郡城郎（即太守），孙泳为广宁太守，悉置幽州郡县守宰。儁又使中部俟釐慕容句督蓟中留事，自将兵卒击邓恒于鲁口。军至清凉，恒将鹿勃早率数千人夜袭燕营，已有一半的士卒冲入营门，他们直奔先锋都督慕容霸的营帐，突入幕下。慕容霸忽然发现有变，从床上一跃而起，光着膀臂，抄起武器奋击，手杀十多人。鹿勃早受阻，不能进，因此，燕军得以严整。慕容儁对慕舆根说："贼锋甚锐，应暂且躲避一下。"根严肃地说："我众彼寡，力不相敌，所以敌军才乘夜来战，希望侥幸获胜。今正想找贼算帐，而贼自己送上门来了，正当击杀他们，不要再忧虑了。王尽管安卧，臣等自率将士为吾王破敌。"慕容儁心里仍感到不安，内史李洪随慕容儁走出营外，屯守在高冢上。慕舆根率左右精勇数百人，从中牙营帐出发，直奔前营，击战鹿勃早。李洪又徐整骑队前来助战，鹿勃早见战事不利，不得不退走。众军追击四十多里，鹿勃早仅以身免，所从士卒死亡略尽。慕容儁经过这次偷袭，觉得鲁口难能猝下，于是引兵还蓟。

前燕十五年（351）四月，慕容儁遣封奕和昌黎太守高开率兵收服了勃海郡。

八月，慕容儁使慕容恪攻中山（今河北定州），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冉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龛闭城拒守，恪南徇常山，军于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九门村）。冉魏赵郡太守李邽举郡降燕，慕容恪厚加抚慰，与李邽一起还围中山，侯龛这才投降了慕容恪。恪入中山，迁其将帅、土豪数十家到蓟，其余的随宜处置，

军令严明，秋毫无犯。以后，燕以北平太守孙兴为中山太守，兴善于绥抚，稳定了燕在中山的统治。慕容评到了南安，王午遣部将郑生拒战，被评击斩。

前燕元玺元年（352）正月，慕容恪在魏昌廉台一带击败冉魏的军队，俘获了魏皇帝冉闵，乘胜攻占了常山。这时，冉魏元气大伤，已没有力量抵抗燕军了。慕容儁遣慕容评及中尉侯龛率精骑万人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收复了邺城周围的地盘，包围了邺城。五月，慕容儁为了加强邺城的攻围力量，又派广威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率步骑两万助援慕容评。六月，冉魏邺城守将蒋干联合东晋兵，出战，被慕容评击败，于是紧闭城门，不敢出。魏长水校尉马愿见冉魏大势已去，亡在旦夕，于是纠集部下的士卒打开城门，迎接燕兵，蒋干越城逃走。慕容评俘获了魏后董氏、太子冉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攸等及乘舆、服御，并将他们送往蓟城。慕容儁诈称董氏献传国玺有功，赐号奉玺君，赐冉智爵滨海侯，以申钟为大将军右长史，命慕容评镇邺。

王午在鲁口闻知冉魏败亡，这时邓恒已死，便自称安国王。八月，燕王慕容儁遣慕容恪、封奕、阳骛攻鲁口，王午闭城自守，燕掠获禾稼而还。

十月，故赵将拥兵割据州郡者，各遣使降燕。慕容儁以王擢为益州刺史，夔逸为秦州刺史，张平为并州刺史，李历为兖州刺史，高昌为安西将军，刘宁为车骑将军。

慕容恪屯安平，积粮治攻具，将讨王午。这时，中山苏林起兵于无极，自称天子。慕容恪自鲁口还讨苏林。闰十月，慕容儁遣广威将军慕舆根助恪攻林，斩苏林。王午为其将秦兴所杀，吕护又杀秦兴，自称安国王。不久，燕兵攻拔鲁口，吕护降。

这时，燕国的地盘，“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读史方舆纪要》），占有辽东、辽西及中原地区

的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四省广大地区，拥有辽河、滦河、海河流域，还与关中的苻秦平分了黄河流域。

随着地盘的扩大，慕容儁要以当然的皇帝身份，君临中原，于元玺元年（352）十一月，即皇帝位，署置百官，以国相封奕为太尉，左长史阳骛为尚书令，右司马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典书令张悕为右仆射，其余文武各有封授，改元元玺。这时，适有东晋使者来到燕国，慕容儁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天子，中原无主，我秉承天命，受中国推戴，已做了皇帝。"遂又把都城自蓟迁至邺，改司州为中州，建留台于龙城，以玄菟太守乙逸为尚书，专委留务。

元玺二年二月，慕容儁立其妃可足浑氏为皇后，世子慕容晔为太子。

元玺三年四月，慕容儁命冀州刺史吴王慕容霸移治信都（今河北冀县）。霸是慕容皝第五子，皝奇霸之才，故为他取名为"霸"，想立他为世子，因群臣谏阻而止，然宠遇犹过于世子慕容儁。因此，儁常常嫉恨他，以其曾坠马摔掉了门牙，唤他为"缺"。不久，以其应验谶文，又改名"垂"，迁侍中，录留台事，徙镇龙城。垂治理地方有方，大得东北之和。慕容儁愈是妒嫉他。复又把他召回邺都。

元玺五年（356）七月，燕太子慕容晔死，第二年二月，慕容儁立中山王慕容暐为太子。

前燕光寿二年（358），慕容儁向来讨厌弟弟慕容垂，儁的妻子可足浑皇后又嫉恨垂的妻子段氏。段氏是段末柸的女儿，才高性烈，自视出身贵姓，不尊事可足浑后。中常侍涅皓私下秉承慕容儁的旨意，告发段氏及吴国典书令辽东高弼假借巫术谋逆，想连污慕容垂。儁下令逮捕了段氏、高弼，让廷尉审讯。段氏与高弼志气确然，终无屈辞。刑讯拷打，一天比一天严酷。垂爱怜妻子，十分心痛，私下派人对段氏说："人终究一死，何

堪受此苦毒，不如屈招了吧。”段氏叹了一口气，说：“吾难道吝惜死吗？若自诬以恶逆，上辱祖宗，下累于王，决不能做出这等事情。”辩答愈明，故垂得以免祸，而段氏竟死于狱中。儁又出垂为平州刺史，镇辽东。垂又娶段氏妹为继室，可足浑氏十分气恼，黜段氏妹为夫人，把自己的妹妹长安君硬塞给慕容垂做吴王妃。垂不悦，兄弟之间的裂痕更深了。

前燕自都邺后，国力达到了全盛。光寿二年十二月，慕容儁下令州郡检括户口，每户留一丁，其余的全部当兵，想凑足一百五十万的军队，来年聚集于邺，准备大举攻伐江南的东晋和关中的苻秦，统一天下。但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第二年冬天，诸州的兵聚集邺下。十二月，慕容儁病倒了，他恐怕自己不久于人世，强打着精神检阅了州郡兵，然后又打发他们回去了。回到宫中，他把弟弟大司马慕容恪召来，说：“吾病必不济，今二方（东晋、前秦）未平，太子景茂冲幼，国家多难，吾欲效法宋宣公，把社稷托付给您，如何？”恪说：“太子虽幼，也是胜残致治之主，臣实何人，怎么敢干预正统。”儁怒气冲冲地说：“我们自家兄弟，岂能虚饰呀！”恪说：“陛下若认为臣能荷天下之任，难道不认为臣能辅弼少主吗？”儁高兴地说：“你能像周公一样，我还忧虑什么。李绩，清方忠亮，你要善待他。”又下令召吴王慕容垂还邺。

前燕建熙元年（360）正月，慕容儁病重，召大司马慕容恪等受遗诏辅政。不久，儁卒。11岁的儿子慕容暐即帝位，改元建熙。

二月，慕容暐尊可足浑氏为皇太后，以太原王慕容恪为太宰，专录朝政；上庸王慕容评为太傅，阳骛为太保，慕舆根为太师，参辅朝政。慕舆根顽固保守，自恃先朝勋旧，心不服恪，举动居傲。时太后可足浑氏颇预外事，慕舆根欲为乱，于是对恪说：“今主上冲幼，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变，以保万全。

且定天下者，全凭着殿下的功劳。兄亡弟及，古今成法，等先帝山陵竣工，宜废主上为王，殿下自践尊位，以为大燕无穷之福”。恪说：“公醉了吗？怎么出此悖逆言语？吾与公受先帝遗诏，无论如何也不能有此议论。”根愧谢而退。恪以告吴王垂，垂劝恪诛根。恪说：“今新遭大丧，二邻观衅，而宰相又相诛夷，恐失远近之望，不如忍耐一些。”秘书监皇甫真对恪说：“慕舆根本是一庸竖，过蒙先帝厚恩，引参顾命。而小人无识，自国哀以来，骄狂日甚，将成祸乱。明公今日居周公的地位，当为社稷深谋，早作打算。”恪不听。慕舆根又对可足浑氏及慕容暐说：“太宰、太傅将谋不轨，臣请率禁兵诛杀他们。”可足浑氏信以为真，慕容暐说：“二公，国之亲贤，先帝选拔，委以重任，必不肯做出这等事情。安知莫非太师欲为乱。”不从其议。慕舆根见邺城呆不下去了，思恋东土，又上言可足浑氏及慕容暐，说：“今天下萧条，外寇非一，国大忧深，不如还东。”慕容恪闻知，这才与太傅慕容评谋，密奏慕舆根罪状，使右卫将军傅颜就内省诛根，并其妻子党羽。

慕容恪除掉慕舆根后，稳定了前燕统治集团内部。从此前燕政治、社会步入了巩固与发展的阶段。从建熙元年至建熙七年(360——366)，慕容恪辅政凡七年。他虽综大政，每事必和叔父慕容评（慕容廆子、慕容皝弟）商议，未尝专断，虚心待士，咨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逾位。官属朝臣，或有过失，不显其状，随宜提醒注意，不致使他们难堪。官吏对他多是心悦诚服，而不敢犯错。并且，他还富有军事才能，在攻取中原时，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熙六年（365）他亲自指挥军队，重新从东晋手中夺回洛阳城。他将兵不事威严，专用恩信；管理军队，务综大要，不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时营中宽纵，似若可犯；然警备严密，敌至却不能逼，所以也很少失败。由于慕容恪励精图治，前燕内外齐一，使东晋、前秦不敢窥图。

建熙八年（367）五月，慕容恪病重，慕容暐亲到床前探视，问以后事。恪语重心长地说："臣闻报恩莫大于举贤，贤人虽远不相识，犹可引人为相，何况至亲呢？吴王（慕容垂）文武兼资，仅次管仲、萧何，陛下若任以大政，国家可安；不然，秦、晋必有窥窬之计。"言罢而卒。后来，慕容暐与执掌朝政的慕容评不用恪言，把总统六军的大司马官位给了中山王慕容冲。冲是暐的弟弟，才十几岁。

慕容恪死后，前燕逐渐趋于衰落，统治集团内部，执掌朝政的慕容评与吴王慕容垂的矛盾日益加深。关中前秦也因恪死，积极备战，伺机东征。东晋大司马桓温也乘前燕政治腐败的机会，于前燕建熙十年（369）率师五万人北伐，连败燕兵，水陆并进，一直攻到离邺城二百里的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慕容暐、慕容评十分惊慌，准备逃往龙城。慕容垂请兵抵抗，又向前秦许诺割让土地，请求救兵。垂正面迎战，范阳王慕容德，李邽断桓温粮道，秦兵又自西来攻，桓温连连失利，粮储又尽，不得不弃辎重、铠仗奔还。慕容垂追桓温，及于襄邑，大破晋军，死者三万多人。襄邑一战，击退了桓温北伐，也解救了前燕的危难。

慕容垂从襄邑前线凯旋而归，声望益振，太傅慕容评更加嫉恨他。垂向朝廷奏请道："所募将士忘身立效，将军孙盖等椎锋陷阵，应蒙殊赏。"慕容评拒不执行。慕容垂接连数请，与慕容评在朝廷上发生争执，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浑氏向来讨厌慕容垂，毁其战功，又与慕容评密谋诛杀他。太宰慕容楷（慕容恪的儿子）及兰建（慕容垂的舅舅）得知消息，暗中转告慕容垂，劝他先发制人，除掉慕容评及乐安王慕容臧。垂说："骨肉相残而首乱于国，吾有死而已，不忍做出此事。"不久，二人又密告垂说："内意已决，不可不早发。"垂说："必不可弥缝，吾只得外出躲避些时日。"

慕容垂回到家中，与世子慕容令商议，欲逃往龙城。十一

月，垂佯装到大陆泽狩猎，微服出邺，将趋龙城。行至邯郸，他的小儿子慕容麟出卖了父兄，回邺向慕容评告密。垂逃奔龙城的计划破产了，只得返回邺，藏身在后赵的显原陵。这时，数百名前燕骑兵正在这一带围猎，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向慕容垂飞驰围来。垂父子及随从十分紧张，打又打不过，逃又无路，一旦被发现，性命不保。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猎鹰飞扬，众骑散去，垂等这才免遭大难，于是杀白马祭天，与从人盟誓，与段夫人、世子令、子宝、农、隆，兄子楷、舅兰建、郎中令高弼等，由洛阳投奔了前秦苻坚。

苻坚早有图燕之心，只是怕慕容垂，不敢妄动。及闻知垂至，十分高兴，亲到长安郊外迎接，拉着垂的手，又说又笑，以垂为冠军将军，慕容楷为积弩将军。

慕容垂出走，前燕政治更加黑暗、衰败。太后可足浑氏侵扰国政，太傅慕容评贪昧无厌，货赂上流，官非才举，群下怨愤。尚书左丞申绍上疏，说："守宰是政治的根本。今之守宰多非其人，有的是出身行伍的武人，有的是贵戚绮纨子弟，既不由乡曲选举，又不经朝廷任命。加上黜陟无法，贪惰的人没有刑罚的畏惧，清廉的人没有旌赏的鼓励。因此，百姓困弊，寇盗遍地都是，纲纪败坏，不能纠摄。又官吏冗滥，超过前世，公私纷然，不胜烦扰。大燕户口，数量相当于秦、晋之和，弓马强劲，四方没有能比得上的。但近来战则败，都是因为守宰赋调不平，侵渔无已，行留俱窘，没有肯效命的缘故。后宫之女达四千多人，僮侍厮役人数尚在其外，一天的费用，竟值万金，上行下效，士民也争相奢靡。彼秦、晋虽地处偏僻，犹能条治本部，有兼并中原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正是彼之心愿。我认为应精择守宰，并省官职，存恤兵家，使公私两遂，节抑浮靡，爱惜用度，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如此，则桓温、王猛可亡，晋、秦二方可取，岂能仅仅是保境安民而已。"疏折奏上，慕容

暐、慕容评等人连看都不看。

先前，前燕许下诺言，割让虎牢以西的地盘给前秦，求前秦出兵退桓温。东晋兵退走后，前燕反悔，对秦人说："先前是使者失言，有国有家的人，分灾救患，也是理所当然的。"秦王苻坚大怒，于前燕建熙十年（369），遣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率步骑三万伐燕。十二月，攻洛阳。第二年正月，前燕洛阳守将慕容筑惧，以城降秦。秦军又攻荥阳，东安王慕容臧弃城逃走。

六月，王猛又督镇南将军杨安等十将率步骑六万伐燕。秦王苻坚送王猛于灞上，说："今委卿以关东之任，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取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吾当亲督万众继卿星发，舟车粮运，水陆俱进，卿勿以为后虑。"猛说："臣仗灵威，奉成算，荡平残胡，如风扫叶。愿不烦銮舆亲犯尘务，但愿速敕所司部置鲜卑之所。"苻坚大悦。七月，王猛攻壶关，杨安攻晋阳。八月，前燕慕容暐命太傅慕容评将中外精兵三十万拒敌秦兵。王猛克壶关，俘获了前燕上党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过郡县皆望风降附，燕人大震。

秦将杨安攻晋阳，晋阳兵多粮足，久攻不下。王猛留屯骑校尉苟长守壶关，自己引兵援助杨安攻晋阳。凿地道，使虎牙将军张蚝率壮士数百人潜入城中，大呼"城破了！秦兵进城了！"燕兵闻风丧胆，纷纷缴械。王猛、杨安人晋阳，俘燕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慕容评畏惧王猛，不敢进前，屯兵于潞川（今山西浊漳水）。十月，王猛留将军毛当守晋阳，进兵潞川，与慕容评相持。王猛派将军徐成侦察燕军形要，约定中午回营，直到黄昏，徐成才回到中军帐中，报告敌军情况，王猛十分生气，斥责他拖延了时间，要处死徐成。邓羌请求说："今贼众我寡，诘朝将战，徐成是一大将，应原谅他一次。"王猛说："若不杀成，军法不立。"邓羌一再请求，说："成是我邓羌部下的郡将，虽违期应

斩，我愿与他一起效战，以功赎罪。”王猛不听。邓羌怒，回到军营，击鼓勒兵，要进攻王猛的营帐，王猛走出营外，问邓羌说：“为何鼓噪兴兵?”邓羌说：“受诏讨远贼，今有近贼自相杀，欲先除掉他。”王猛感到邓羌义而有勇，派人对他说：“将军住手，吾今赦免徐成。”成既得赦，邓羌到王猛帐中谢罪。王猛拉着他的手说：“吾不过想试试将军罢了。将军对郡将尚能如此，更何况国家呢？吾不再以贼为忧了。”

燕太傅慕容评认为王猛悬军深入，欲以持久战，消耗秦兵。评为人贪鄙，鄣固山泉，鬻樵卖水，积财帛如丘陵，士卒怨愤，没有斗志。王猛闻知，笑着说：“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呢？吾今兹必然破他。”于是遣游击将军郭庆率骑五千人，在一天夜里，抄小道出燕军营后，烧其辎重，火光直冲云天，远在一百多里之外的邺城，也能望见。前燕皇帝慕容暐十分恐惧，遣侍中兰伊斥责慕容评，说：“王是高祖的儿子，当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抚战士而榷卖樵水，专以赚钱为心呀！府库之积，朕与王共有，何忧于贫？若贼兵遂进，家国丧亡，王持钱帛，又将置于何所?”命慕容评尽将其钱帛散给军士，鼓励士卒趣战。慕容评惊恐万状，于是派使向王猛请战。

王猛接受了慕容评的战表，率众在渭源誓师，当众呼喊：“王景略（王猛字）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君之朝，称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踊跃，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猛望燕兵众多，对邓羌说：“今日之事，非将军不能破劲敌，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将军应多勉励将士。”羌说：“若能以司隶的官职给我，公勿以为忧。”猛说：“此非吾所能及，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邓羌听了，不高兴地回到军营中。接着两军交兵，战场一片厮杀混战，王猛召邓羌出，羌寝卧不应，猛驰就帐中，许以司隶校尉的官职，邓羌这才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

等跨马运矛，驰赴燕阵，出入数回，旁若无人，所杀伤数百。待至中午时分，燕兵大败，俘斩五万多人。秦兵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有十万多人。慕容评单骑逃回到邺城。

秦兵长驱而东，围邺。王猛未至邺前，邺地治安十分混乱，剽劫公行。及猛至，远近帖然，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燕民各安其业。人们奔走相告，说："没想到今天又看见了太原王。"太原王慕容恪是前燕贤明的宰辅，邺下士民都很怀念他。他们又遇王猛，于是将猛比作太原王。王猛听了，感叹地说："慕容玄恭（慕容恪字）真是奇士啊！可谓古之遗爱。"于是设太牢礼，祭奠慕容恪。

十一月，秦王苻坚留李威辅太子守长安，自率精锐十万赴邺。行七日至安阳，王猛暗中到安阳谒见苻坚。苻坚吃惊地问："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这是为何?"猛说："亚夫前曾阻拦汉文帝入军营，是为了博取治军严整的名声，臣私下缺少名声的欲望。且臣奉陛下威灵，攻击即将灭亡的敌虏，如釜中取鱼，不足为虑。只是留守长安的太子年纪尚幼，銮驾远临，万一有什么差错，后悔莫及！陛下难道忘了臣在灞上说的话吗?"其实，苻坚心里早另有打算，他虽然相信王猛，但没有放弃对王猛的提防。王猛握重兵在外，辖掌关东，一旦有变，很难掣肘，为保万全，苻坚这才率大军星夜赶赴邺城前线。

苻坚到达邺城后，立即掌握了总指挥的大权，使邓羌攻信都（今河北冀县），自率王猛等攻邺。大军压境，城中士民人心溃散，前燕散骑侍郎徐蔚率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多人，夜开邺北门（广德门）迎秦兵。前燕慕容暐见邺城破，率诸王公仓皇逃往龙城。秦王苻坚人居邺宫。

慕容暐出邺时，随从侍卫有一千多人，出城不久，众皆散去，身边只有十多骑从行。秦王苻坚使游击将军郭庆追捕，及于高阳（今河北高阳东）。暐失马步行，秦将巨武上前缚绑，暐喝

道："汝何小人，敢缚天子！"武说："我受诏追贼，何谓天子！"遂将他绑了，押回邺城。苻坚呵斥慕容暐，说："见了本王，为何不降而走？"回答："狐死首丘，不过是想归死于先祖坟墓罢了。"苻坚顿时生了哀怜之情，于是释放了他，让他回宫，率文武出降。

前燕诸州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秦，凡得郡一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以燕宫人、珍宝分赐将士。苻坚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邓羌为持节、征虏将军、安定太守；郭庆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镇蓟；京兆韦钟为魏郡太守，彭豹为阳平太守，其余州牧守县令，皆因旧而授。以燕常山太守申绍为散骑侍郎，使与散骑侍郎京兆韦儒俱为绣衣使者，循行关东州郡，观省风俗，劝课农桑，振恤穷困，收葬死亡，旌显节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加变除。

十二月，苻坚迁慕容暐及前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多户于长安。前燕亡。自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到370年慕容暐降秦，立国凡三十三年。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载记第八·慕容廆》、《载记第九·慕容皝》、《载记第十·慕容儁》、《载记第十三·苻坚》

《通鉴纪事本末》：《慕容据邺》、《赵魏乱中原》、《苻秦灭燕》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苻坚统一北方

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小名坚头，是苻雄的儿子。略阳临渭氐人。据史书记载，他们的先祖是有扈氏的后裔，世代为西戎酋长。因其家池中长有蒲草，高五丈，五节如竹子一样的形状，人们都管他们叫“蒲家”，因以为蒲姓。后来酋长蒲洪因谶文有“艸付应王”的字眼，又其孙蒲坚背上有“艸付”字迹，遂改姓苻氏。

苻氏的兴起是从苻洪开始的。苻洪出生的那一年，陇右大雨，百姓谣言：“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取了个“洪”的名字。苻洪好善乐施，骁勇多权略。西晋永嘉之乱时，被部族推为盟主。先附前赵刘曜，后赵灭前赵，又投降了石虎。石赵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徙之居枋头（今河南浚县淇门渡），因屡立战功，封西平郡公。后赵末年，赵魏大乱，苻洪割据枋头，部下氐兵已发展到十多万人。

冉魏永兴元年（350），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他对博士胡文说：“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日而灭，克姚襄父子也在我掌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高祖刘邦。”初，石虎使麻秋镇枹罕，冉闵控制了邺城，麻秋归邺，途中被苻洪的三儿子苻健击获，以秋为军师将军。这年三月，秋劝苻洪说：“冉闵、石祗正相持不下，中原之乱还未平息，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能敌之。”洪点点头，正中心意。不久，麻秋在一次宴会中，于酒中投毒，鸩洪，想吞并

其部众。苻健捕杀了麻秋，洪临死时对苻健说："吾所以没有入关，以为中州可取。今不幸被竖子麻秋所困。中原非尔等兄弟所能办。关中为形胜之地，吾死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罢就咽气了。苻健代统其众。

八月，京兆人杜洪占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大将军、雍州刺史，关中胡汉诸部族民都归附了他。苻健暗中有图谋关中的打算，恐被杜洪发觉，于是伪装着接受了石祇的官爵，又在枋头修缮宫室，课所部民耕种麦田，装出一副久居河北，不欲西去的样子。有些部民已猜测到苻健的心意，不耕种麦田，苻健把他们杀了，以免走漏风声。不久，苻健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忽尽将部众西行。行至盟津，架设浮桥横渡黄河。又遣其弟苻雄率步骑五千入潼关，侄子苻菁从轵关入河东。临行前，苻健拉着苻菁的手，说："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到黄泉，恐怕难能再相见了。"渡过河后，又放火烧了浮桥，苻健自统大众继雄而进。大军到了潼关，杜洪才发觉了苻氏西进的行动，急忙派部将张先邀击苻健，被苻健打败。健虽得胜，但仍写信给杜洪，并送名马珍宝，请至长安上尊号。洪说："币重言甘，这是在引诱我呀！"于是聚集关中全部军队拒敌。苻健屯军赤水（今陕西华县西渭河支流赤水），遣苻雄略地渭北。九月，苻菁败张先于阴槃（今陕西临潼东北阴盘城），生擒张先，诸城尽陷。所到之处，胡、汉部众纷纷投降，三辅略定。十月，苻健长驱至长安，杜洪逃奔司竹（今陕西周至东南）。后来，杜洪被部将张琚杀害，苻健又斩张琚，吞灭其众。十一月，苻健入都长安，遣使修好于东晋。

前秦苻健皇始元年（351）正月，苻健在长安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改元皇始。立妻强氏为天王后，子苻苌为太子，其余尽封为公。以苻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车骑大将军、雍州牧、东海公；苻菁为卫大将军、平昌公，宿卫二宫；

雷弱儿为太尉，毛贵为司空。略阳姜伯周为尚书令，梁楞为左仆射，王堕为右仆射，鱼遵为太子太师，强平为太傅，段纯为太保，吕婆楼为散骑常侍，建立了前秦中央政权机构。

皇始二年（352）正月，苻健称皇帝，诸公进爵为王，以大单于授太子苻苌，统掌诸少数部族。

皇始四年（354）六月，丞相苻雄卒，苻健哀恸以致吐血，说："皇天不想让吾平定四海吗？何夺吾元才（苻雄字）之速呀！"苻雄以佐命元勋，位兼将相，权侔人主，而廉恭博爱，遵奉法度，因此受到苻健的敬重，常说："元才，我之周公呀！"苻雄死后，他的儿子苻坚袭其官爵。苻坚性至孝，博学多才，胸怀大志，交结英豪，吕婆楼、强汪及略阳梁平老等人都与他相友善。

前秦苻生寿光元年（355），前秦太子苻苌病死，强后欲立晋王苻柳。苻健因谶文有："三羊五眼"，立苻生为太子。苻生性情粗暴，一只眼瞎，他的爷爷苻洪曾和他开玩笑，说："吾听说瞎儿一泪，是真的吗？"苻生怒，引所佩刀自刺出血，说："这也是一泪！"苻洪大惊，挥鞭抽打苻生。苻生说："性耐刀槊，不堪鞭挞。"洪对他的父亲苻健说："这小子太狂悖，应早些除掉他，免得他以后闯祸。"苻健欲杀他，苻雄劝阻道："儿长，自然会改过，怎么竟可杀戮。"苻生长大后，力举千钧，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

六月，苻健病倒了。苻菁以为健已死去，打算先下手为强，夺取帝位，突然发动政变，勒兵攻东宫，欲杀太子苻生而自立。这时，苻生在西宫侍疾，苻菁攻东掖门。苻健闻变，让人搀扶着，登上端门，陈兵自卫。苻菁的部众望见苻健，惶惧，纷纷弃仗逃走。苻健捕获了苻菁，把他数落了一通，推出宫外砍了，其余的一概释免不问。苻菁政变被挫败后，苻健忧虑重重，猜忌多端，越来越感到身边的大臣不可靠，又觉得太子太年轻，难能支

撑内外门面，终日惶惶惑惑，不几天就病死了。临终前，以大司马武都王苻安都督中外诸军事，引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遗诏辅政。嘱太子苻生说："六夷酋帅及大臣掌权的人，若有人不从汝命，宜渐清除。"这样安排，反面加剧了前秦统治集团的内乱。

苻健死后，苻生即皇帝位，改元寿光。群臣奏道："未逾年而改元，不合礼仪。"苻生怒，穷究奏请的主要朝臣，得右仆射段纯，于是下令杀了他。

七月，苻生尊母强氏为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梁氏是梁安的女儿。

苻生信用身边的嬖臣，排斥辅政大臣，借故杀梁后及毛贵(梁皇后的舅舅)、梁楞、梁安。十一月，以辛牢守尚书令，赵韶为左仆射，董荣为右仆射，赵诲为司隶校尉。

十二月，丞相雷弱儿性刚直，以赵韶、董荣乱政，每次上朝，常当众呵斥，见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赵韶、董荣在苻生面前谗毁雷弱儿，苻生杀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从此，诸羌因苻生昏暴乱杀，各有离心。

苻生虽在为父服丧期间，游宴自若。常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身旁经常备置铁钳锯凿等凶器，稍不如意，便加诛戮。即位不久，后妃公卿以下至于仆隶，凡杀五百多人，截胫、拉肋、锯项、刳胎者，比比皆是。

寿光二年（356)。司空王堕性刚峻，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皆以佞幸受到重用。堕疾之如仇，每次朝令，见了董荣，从不理睬。有人劝他说："董君贵幸无比，公应随和些。"堕说："董荣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他言语?"赶上天气有异变，董荣、强国对苻生说："天有异变，应杀大臣。"于是将王堕处死。临刑，董荣问王堕："今日还敢将我比作鸡狗吗?"堕怒目圆瞪，破口大

骂。苻生又宴群臣于太极殿，以尚书令辛牢为酒监，酒酣，苻生怒，喝道："为何不灌酒，还有端坐未醉的人！"张弓搭箭，射死辛牢。群臣大惧，没有敢不醉的，一个个东倒西歪，醉态百出，苻生望见，哈哈大笑。苻生又征发三辅民众建造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谏阻，认为妨碍农事，苻生怒，下令杀了他。

四月，长安大风，树木摧折，房屋倒塌。皇宫中惊扰，或称贼至，宫门昼闭五日，苻生命众推告贼人，刳出其心。强太后的弟弟、左光禄大夫强平劝谏说："天降灾异，陛下当爱民事神，缓刑崇德，方能弥灾。"苻生怒，凿穿他的头顶，处死了他。卫将军广平王黄眉、前将军新兴王苻飞、建节将军邓羌等人都叩头固谏，并请强太后出来劝说。苻生不听，尽将他们降职处理。强太后愤恨不已，不久就病死了。

六月，苻生下诏说："朕受皇天之命，君临万邦，嗣统以来，而谤讪之音，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之残虐。走路的人摩肩接踵，人口并不算少，今正可峻刑极罚，又能把朕怎么样！"

从去年春天到这年七月，潼关至长安一带，虎狼为暴，昼则断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七百多人丧命。民废耕桑，相聚邑居，而患害仍不能息。群臣奏请禳灾，苻生说："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难道是皇天不爱民吗？正因为犯罪的人多，故帮助朕杀戮而已。"

十月，苻生夜间贪吃了许多大枣，第二天早上害了疾病，召来太医令程延诊治。延说："陛下无它疾，只是食枣多了。"苻生怒，喝道："汝非圣人，怎么知道我食枣？"让卫士缚执至宫外斩了。

前秦苻坚永兴元年（357）正月，苻生梦见大鱼食蒲，这时长安城内又谣传："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苻生十分厌恶，以为梦境与谣言都应在太师、录尚书事鱼遵身上，于是把他杀了，并杀其七子、十孙。

苻生饮酒无度，不分昼夜，或数月不出，奏事不省，军政机要多被延误。或醉中决事，左右因以为奸，赏罚无准。或至黄昏才出视朝，乘醉多所杀戮。自以有一只眼的缺陷，诏令文件及日常言谈，忌讳使用“残、缺、偏、只、少、无、不具”等一类的字眼。官民言谈撰文常不知不觉犯讳，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他喜好生剥牛羊驴马、鸡豚鹅鸭，纵之殿前数十为群，观看这些动物如何在死亡中挣扎。又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临观作乐。尝问左右的说：“自吾临天下，你们在外面听到过什么反映?”或答言：“圣明宰世，赏罚明当，天下唯歌太平。”苻生怒斥道：“你是在谄媚我呀!”让人推出斩首。第二天，又问，或对答道：“陛下刑罚稍有些过头。”又怒道：“你在诽谤我!”又让人推出去杀了。勋旧亲戚被杀几乎殆尽，臣僚得保一日，如度十年。

东海王苻坚素有声望，原与姚襄部下参军薛赞、权翼相友善。赞、翼暗中劝苻坚，说：“主上猜忍残暴，中外离心。当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谁，愿早作打算，勿使他人得先。”苻坚又问计于尚书吕婆楼，婆楼说：“奴仆不过是刀环上的人，不足以办大事。奴仆的家乡，居住着一位名叫王猛的人，很有谋略，但从不抛头露面，殿下应把他召来咨议一番。”苻坚让婆楼去招王猛，苻坚一见如故友，共论天下时事，大悦，感叹道：“我遇王猛，犹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呀!”

六月，太史令康权预感到宫廷将有政变，对苻生说：“从五月上旬至今，天气阴沉沉而无雨，将有下人谋上之祸。”生怒，以为妖言，将他扑杀。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怕夜长梦多，劝苻坚及早动手，说：“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怀异志，关东的慕容燕与江东的司马晋，伺隙待动，恐祸发之日，家国俱亡。这是殿下的事情，应早作定夺。”这话也正中苻坚的心意，只是畏苻生骄勇，未敢妄动。

苻生夜里对身边的侍婢说：“阿法兄弟（苻法、苻坚）也不

可信，明日当除掉他们。”婢女偷偷跑出来告诉了苻坚及兄清河王苻法。法与梁平老及光禄大夫强汪当夜率壮士数百人潜入云龙门，苻坚与婆楼率麾下三百人鼓噪继进，宿卫将士皆舍仗而归苻坚。这时，苻生仍醉寐在床，苻坚的兵蜂拥至前，苻生从床上惊跳起来，问左右的人，说：“此辈何人？”回答：“贼。”生说：“为何不拜我！”坚兵全都大笑起来。苻生又大声喝道：“何不速拜？不拜者斩！”众人一起动手将苻生绑了，押解到另一房间，废为越王，不久又把这个暴君杀了。

苻坚政变成功，自称大秦天王，即位于太极殿，诛苻生幸臣董荣、赵韶等二十多人，改元永兴，尊母苟氏为皇太后，妃苟氏为皇后，世子苻宏为皇太子。以清河王苻法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东海公；堂祖父苻侯为太尉；晋公苻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诸王皆降爵为公。苻坚诸弟及子也都封为公。又以李威为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吕婆楼为司隶校尉，王猛为中书侍郎。重新改组了政权。

李威是苟太后姑姑的儿子，素与苻雄相友善，苻生几次想杀苻坚，多赖李威营救得免。威得幸于苟太后，苻坚事之如父。威知王猛贤良，常劝苻坚以国事相委任。王猛典掌机要，帮助苻坚加强中央集权，制定典章制度，在内外朝政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一月，苟太后与李威谋，赐死了苻法，前秦大权尽集于苻坚。

自苻坚即位，任用王猛，励精图治，十多年间，关中相对稳定发展，前秦国力强盛，在此基础上，苻坚开始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建元六年（370），前秦先后出动十六七万的军队，一举灭了前燕，占据了关东及河北的地盘。

建元七年（371）三月，前秦西县侯苻雅、杨安、王统、徐成及羽林左监朱彤、扬武将军姚苌率步骑七万伐仇池公杨纂。

秦兵到达鹫陕，杨纂率众五万拒敌，东晋梁州刺史弘农杨亮遣督护郭宝、卜靖率千余骑救纂，与秦兵战于陕中。纂兵大败，死者十之三四，郭宝等人战死，纂收集散卒逃还。苻雅进攻仇池，杨纂的叔叔武都太守杨统率众投降了前秦。纂惧，面缚出降，苻雅把杨纂送至长安。前秦以杨统为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仇池。

建元九年（373）八月，东晋梁州刺史杨亮遣其子杨广袭击仇池，与秦梁州刺史杨安战，广兵败，沮水诸戍皆委城奔溃。杨亮惧，退守磬险。九月，杨安进攻汉川。

冬，前秦苻坚使益州刺史王统、秘书监朱彤率兵出汉川，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率卒三万出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攻东晋梁、益二州。梁州刺史杨亮率巴獠部众一万多人御敌，战于青谷（今陕西洋县东北）。亮兵败，逃奔固西城。朱彤遂拔汉中，徐成攻克剑门。杨安进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困守涪城，遣步骑数千送母、妻自汉水趋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中途被朱彤邀获，周虓遂投降了杨安。十一月，杨安克梓潼。东晋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救梁、益，瑶闻广汉太守赵长战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孙勒兵拒朱彤于绵竹，闻毛当将至成都，仲孙率骑五千奔于南中。前秦遂取梁、益二州，西南夷邛莋、夜郎等部也相继归附了前秦。苻坚以杨安为益州牧，镇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汉中；姚苌为宁州刺史，屯垫江（今四川合川）；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

建元十二年（376），前凉张天锡荒于酒色，不亲庶务，人情愤怨。族弟从事中郎张宪用车拉着棺材上殿切谏，不听。

五月，苻坚以张天锡对秦不忠，派出步骑十三万人，陈兵西河，又遣尚书阎负、梁殊奉诏征天锡入朝，并扬言说："若有敢违抗王命的人，即进师扑讨。"

七月，秦使阎负、梁殊到了姑臧（今甘肃武威）。张天锡召

集臣僚商议对策，说："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从，秦兵必至。如何是好？"禁中录事席仂说："以爱子为人质，赂以重宝，先退其师，然后再从长计议，这是屈伸之术。"众人怒道："我们世事晋朝，忠节著称海内。今一旦委身贼庭，辱及祖宗，就要丢大丑了。且河西天险，百年无虞，若集中境内精兵，西招西域，北引匈奴，何愁不能取胜。"天锡把袍袖一甩，大声呼叫道："孤计已决，言降者斩！"使人问秦使阎负、梁殊说："君想活着回去？还是想死了回去？"二人辞气不屈，天锡怒，命武士将二人缚绑至军门射死。遣龙骧将军马建率众二万拒秦兵。

秦人闻知天锡杀阎负、梁殊，八月，秦将梁熙、姚苌、王统、李辩等率兵自清石津渡河，攻凉骁烈将军梁桀于河会城，梁桀降。秦将苟苌又于石城津渡河，与梁熙会师，攻拔缠缩城。马建惧，自杨非退屯清塞。天锡又遣征东将军掌据率众三万屯守洪池（今甘肃武威东南），天锡自率余众五万军于金昌城（疑在今甘肃武威东南，一说在甘肃永昌北）。安西将军宋皓对天锡说："臣昼察人事，夜观天文，秦兵不可敌呀！不如投降。"天锡怒，贬宋皓为宣威将军。苟苌使姚苌率甲士三千为前驱，进攻马建。马建率万人迎降，余兵全都逃散。苟苌又与掌据战于洪池，据兵败，坐骑被乱军所杀。部属董儒将所乘马送给他，据说："吾三督诸军，再秉节钺，八将禁旅，十总外兵，宠任到了极点。今天却受此困迫，这里就是吾之死地，安心了！"于是走入营帐，脱下盔甲，西向拜了九拜，抽剑自刎而死。秦兵杀军司席仂，乘胜入清塞。天锡遣司马赵充哲率众拒敌，秦兵与充哲战于赤岸（疑在甘肃武威东南），大破充哲，俘斩三万八千人，充哲战死。天锡出城自战，城内叛变，天锡进退失据，只得率数千骑奔还姑臧。秦兵进围姑臧，天锡素车白马，载着棺材，绳绑索缚，来到秦营军门前投降。苟苌释缚，焚棺，把天锡送往长安，凉州郡县悉降于前秦。

十月，刘卫辰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苻坚以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冀兵十万击代，使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肜，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皆与苻洛会师，以卫辰为向导。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南御秦兵，皆不胜。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率十万骑御敌，与秦兵战于石子岭，大败。这时，什翼犍病，不能亲自将兵，于是率诸部奔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抄，不得刍牧，什翼犍复渡漠南。后来闻秦兵稍退，于十二月回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代亡。

建元十八年（382），苻坚又命氐族部落贵族吕光率兵进驻西域。从此，苻坚完成了其统一北方的大业，前秦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六十二国，都遣使与苻秦和睦友好，只有东南一隅的东晋与之相对峙。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苻氏载记》、《张天锡传》

《通鉴纪事本末》：《苻氏据长安》、《苻秦灭凉》、《苻秦灭燕》、《拓跋兴魏》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淝水之战

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一心想吞并江东的东晋。他自恃兵强，十分狂妄，认为灭亡东晋，轻而易举，于是不断发动对东晋的战争，并酝酿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淝水之战。

前秦建元九年（373），苻坚发兵五万攻取东晋梁州、益州。

建元十四年（378），苻坚命子长乐公苻丕等率步骑十七万围攻襄阳，历时一年，才把襄阳攻下，生擒东晋襄阳太守朱序。同时，苻坚又派俱难、毛当、彭越等率步骑七万攻下东晋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诸城。然后，苻秦又集中了六万人的兵力围攻三阿（今江苏宝应）。三阿距东晋江防重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只有一百里，三阿被围，建康震动。东晋沿江加强防守，宰相谢安遣其弟征虏将军谢石统帅舟师屯兵涂中（今安徽涂县、全椒一带），遣兄子兖州刺史谢玄自广陵救三阿。三阿解围，谢玄又和三阿守将田洛合兵五万，又败秦军，连克盱眙、淮阴，俱难等自彭城退兵淮北。苻秦以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南兖州刺史，镇湖陆（今山东鱼台西南）；王显为扬州刺史，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淮上的战争，胶着在淮水以北、徐州以南一带。

在荆州方面，东晋与苻秦围绕襄阳的争夺，展开了拉锯战。在襄阳失守前，东晋荆州刺史桓冲畏秦兵强盛，将荆州的治所从江陵移至江南的上明（今湖北松滋西北）。建元十七年（381），苻秦荆州刺史都贵在襄阳，派兵二万进攻东晋的竟陵（今湖北潜

江)，桓冲派兄子桓石虔率水陆军二万大破秦军，斩首七千级，生俘一万人。次年九月，桓冲又派将军朱绰进攻苻秦占领下的襄阳，焚毁沔北田稻，掠走六百多家屯户。建元十九年（383）五月，桓冲亲率大军十万，进攻襄阳，苻坚派其子巨鹿公苻叡率领步骑五万援救襄阳，桓冲退还上明。

建元十八年（382），苻坚已经着手大举进攻东晋的准备工作了。四月，他以子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八月，又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他秘密制造舟船，训练水师。

十月，苻坚把文武大臣召集到太极殿，举行御前会议。他说："自吾承业，已将近三十年，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亲统大众，讨伐江东，如何？"秘书监朱彤很会见风使舵，说："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无战，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苻坚听了，十分高兴，说："兹正是我的心愿。"尚书左仆射权翼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昔殷纣王残暴无道，因有三位仁贤大臣在朝，周武王犹不敢征伐他。今晋室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都是江东伟人，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以臣看来，未可图取。"苻坚的脸色突然沉重起来，良久，才说："诸君，请各言其志。"太子左卫率石越说："从天文上看，今岁、镇二星守护着斗星，福德在吴地，伐晋必招致天灾。而且晋据长江大险，民众乐意被他使用，殆不可伐。"苻坚说："昔武王伐纣，并不信天文、占卜，天道幽远，谁能说得清楚。夫差、孙皓都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彼之有何险可恃呢？"石越回答说："三国时期，东吴的君主淫虐无道，所以被敌国攻取。今晋虽无德，未有大罪，愿陛下暂且按兵积谷，以待其衅。"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苻坚说："此

所谓筑室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罢了。”

群臣皆出，苻坚单独留下阳平公苻融，对他说：“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共同决断此事。”苻融说：“今伐晋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无衅；三是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群臣言晋不可伐的人，都是忠臣，愿陛下能听从他们的意见。”苻坚一脸不高兴，说：“你也这样认为，吾还指望谁！吾强兵百万，资仗如山。吾虽不是什么令主，也非闇劣。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患不克？岂能再留此残寇，使其长期成为国家的忧患！”苻融见父王如此固执，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哭泣着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类都是我们的深仇。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臣恐怕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否则，后悔都来不及。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吗？”苻坚不听。于是朝臣进谏的人很多，坚说：“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都说不可，这实在让我难以理解。”太子苻宏说：“今岁星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虑重重。”苻坚说：“昔吾灭燕，也是犯岁而捷，天道本来难知，秦灭六国，六国之君难道都是暴虐的吗？”

冠军将军、京兆尹慕容垂对苻坚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这是常识。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战将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能复留他们，以遗子孙！《诗经》说得好：‘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就足够了，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帝平吴，所仗者张华、杜预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能建树统一的功劳？”苻坚大悦，说：“与我共定天下的人，只有卿一人而已。”拿出五百匹帛送慕容垂，作为奖赏。

苻坚锐意攻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苻融劝谏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没有不亡的。且国家本是戎狄，正朔曾不归属。江东虽微弱仅存，然而是中华正统，天意必不使其断绝。”苻坚说：“帝王历数，岂有经常？唯德之所在而已。刘禅岂非汉之苗裔？终为曹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缺点就在于这样的不达变通罢了。”

苻坚素信重沙门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说：“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也是很快活的吗？”安说：“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以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远方呢？且东南卑湿，沴气易构，虞舜游而不归，大禹往而不复，何足以上劳大驾呢？”坚说：“天生蒸民而树之君，使君司牧蒸民，朕岂敢惮劳，使江南一方独不被吾之恩泽！必如公言，自古帝王就没有征伐的事了。”道安说：“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称臣，陛下就不必再亲涉江、淮了。”苻坚不听。

苻坚喜爱后宫的张夫人，张夫人也乘幸谏阻苻坚说：“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治天下，皆顺其自然，故功无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马，因顺其性。禹濬九川，障九泽，因顺其势；后稷播植百谷，因顺其时；汤、武率天下而攻桀、纣，因顺民心，皆有因则成，无因则败。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尚书》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犹因民，更何况人呢！妾又闻王者出师，必上观天道，下顺人心。今人心既不然，请验之天道。谚语说：‘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群犬嗥者宫室将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自秋冬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嗥，厩马多惊，武库兵器自动有声，此皆非出师祥兆。”坚说：“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参预。”

苻坚的小儿子中山公苻诜最有宠，也进谏说：“臣闻国之兴

亡，系于贤人之用舍。今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不听。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征伐，臣心里不明白。”苻坚说：“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苻坚一意孤行，在朝野上下反对的处境中，大举伐晋，于建元十九年（383）五月，诏令全国，民每十丁抽出一人当兵，凡富家子弟年龄20岁以下有才勇者，全都封拜为羽林郎。又说这次出师，不久就会降服东晋，凯旋而归。于是预先封东晋武帝司马曜为秦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还让人预先在长安为他们修造宅第，准备灭晋以后，让他们到长安来住。苻坚聚集富家子弟三万多骑，让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掌领。这时朝臣大多数阻止苻坚的行动，只有慕容垂、姚苌及富家子弟劝坚伐晋。阳平公苻融对苻坚说：“鲜卑、羌虏是我之仇敌，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划，千万不可听从！良家少年都是些富饶子弟，不会打仗，只会说些好听的话，迎合陛下的心意而已。今陛下信用他们，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又有后患，悔之不及。”坚不听。

八月，苻坚遣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苻坚对姚苌说：“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易授人，当不可辜负朕意！”左将军窦冲说：“王者无戏言，这是不祥的征兆。”苻坚默然不语。

慕容楷、慕容绍对慕容垂说：“秦主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中。”垂说：“对，没有你们，谁能与我共成大业！”

数日之后，苻坚发长安戎卒六十多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苻坚到了项城（今河南沈丘），凉州的兵才到达咸阳，蜀、汉之兵正顺江而下，幽、冀二州的兵结集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东西万里，水陆齐进，漕运万艘。阳平公苻融等率领的先头部队三十万人，到了颍口（今安徽颍上东南颍河

入淮河之口)。

东晋武帝司马曜积极迎战，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率众八万拒秦兵，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今安徽寿县)。

这时，秦兵势盛，东晋建康震恐。谢玄不知所措，入朝去见宰相谢安，向他讨教策略。谢安不慌不忙地说："这事已另有旨意。"既而闭目不言，神情怡然。玄不敢再多言，于是又让张玄重请。谢安遂命驾出游鉴山墅，群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谢安的棋艺劣于谢玄。这天谢玄常为战事焦虑，与谢安对弈而又不胜。安遂游陟，至夜才回。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人援京师。谢安不同意，说："朝廷处分已定，兵甲不缺，西藩宜留以为防。"桓冲对部下佐吏长叹一声，说："谢安有庙堂之量，不懂将略。今大敌将至，方游谈不暇，尽派些不经事的少年御敌，众又寡弱，天下事已经可知，吾等将左衽披发了。"

十月，秦阳平公苻融攻寿阳，拔城，俘东晋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苻融以其参军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郧城。东晋龙骧将军胡彬得知寿阳沦陷，于是退保硖石，苻融又率兵攻硖石。秦卫将军梁成等率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晋兵。谢石、谢玄等在距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扎下营寨，惮梁成兵，不敢进。胡彬粮尽，暗中派使者带书向谢石告急，说："今敌军势盛，我处粮尽，恐不复见大军。"使者被秦兵俘获，送于阳平公苻融。融得到消息，派人驰报秦王苻坚，说："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应迅速前来。"苻坚于是留大军于项城，自引轻骑八千兼程赶到寿阳，并派东晋降将、尚书朱序去劝说谢石投降。朱序来到谢石的中军帐中，对石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彼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应迅速出击。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便可进一步破溃。"

谢石听说苻坚到了寿阳，心里有些害怕，想与秦兵对峙，以老其师。谢琰劝谢石依从朱序的意见。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率精兵五千趣洛涧，行至距洛涧十里的地处，秦将梁成已阻涧，布好了阵势。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败秦军，斩成及弋阳太守王詠。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一万五千人，俘获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苻坚与阳平公苻融登寿阳城观望，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顾谓苻融说："这也是劲敌，怎么能说是弱呢?"怃然始有惧色。

秦兵逼淝水布阵，晋兵不得渡。谢玄派人至秦军营中去见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这是持久战的打算，并不想速战速决，若移阵稍退，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也是善策吗?"秦诸将都说："我众彼寡，不如遏之渡水，使不得前，可以保万全。"苻坚说："但引兵稍退，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杀他们，没有不取胜的。"苻融也点头赞成，遂麾兵使退。秦兵大多是临时征来的胡汉丁壮，没有打过仗，又不愿打仗，这一退便不可收拾。东晋叛将朱序乘秦兵稍退，在阵后高呼："秦兵败了！秦兵败了！"后面的士卒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阵前的秦兵真的败了，各自争相逃命。谢玄、谢琰、桓尹等引兵渡水击秦兵，苻融驰骑略阵，被乱兵拥挤冲撞，马倒，晋兵赶来，丧身于刀枪之下。帅旗倒折，秦兵无主，更是乱不成军，兵溃山倒。晋将谢玄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今安徽凤台西北），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逃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追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加以饥冻，死者十之七八。朱序、张天锡、徐元喜都投奔了东晋，东晋复取寿阳，俘秦淮南太守郭褒。

苻坚也于乱军逃命，被流矢射中，单骑走至淮北，饥饿难忍，不得不停在路边稍歇。有一农民拎着水壶、猪肘，送饭给他

吃。苻坚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然后送些绵帛给农民。农民告辞说："陛下厌腻安乐，自取危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答的呢？"说罢，头也不回，扬长而去。途中，苻坚回想起这场战争的惨状，对其幸爱的张夫人说："吾今还有何面目治天下呀！"不觉潸然流涕。

苻坚败阵，一路收集亡散，比至洛阳，有众十多万，百官、仪物、军容粗备，十二月，回到长安，痛哭苻融，然后回到宫中。

淝水一战，东晋大获全胜，谢玄、谢石等将战捷驰报朝廷，宰相谢安得驿传书报时正与客人围棋，取过书来暂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是否有了急事，谢安静静地回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了。"既罢，谢安起身回内宅，过门坎时，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步子快了些，不觉木屐的齿被门坎碰折了。

东晋乘胜进击，东起淮、泗，西至荆、襄，数路深入秦地。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正月，到次年四月，先后收复襄阳、梁州、益州。八月，谢安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先头部队还曾一度打过黄河，进入鄴城。后来，由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统治者又缺乏深远的战略眼光，没有攻取关中、河北，河南难固，不久，随着后燕在河北地区的复兴，河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又一一失守。

淝水战后，北方重又陷入分裂，慕容垂占据河北，在中山（今河北定州）做了皇帝。关中形势，对于苻秦王朝十分不利。苻坚败归长安不久，鲜卑贵族慕容泓（前燕慕容暐弟）招集被奴役的马牧鲜卑，众至十余万人，屯兵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苻坚令其子巨鹿公苻叡与羌部贵族姚苌等率兵五万击泓。苻叡兵败身死，姚苌出奔渭北，在羌人与西州豪族的支持下，自称万年秦王，建立后秦，并进屯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苻坚亲率步骑两万进攻姚苌，先胜后败。这时，慕容冲率鲜卑兵

逼长安，苻坚只得引兵回到宫中。

慕容冲是慕容泓的弟弟，鲜卑部众火并，杀泓立冲，冲率众攻长安，秦王苻坚身自督战，飞矢满体，流血淋漓。慕容冲暴掠关中，士民流散，关中饥荒，长安城中人相食。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苻坚穷困窘迫，于是留太子苻宏守长安，遂率骑数百与张夫人及中山公苻诜，二女苻宝、苻锦出奔五将山（今陕西岐山东北）。七月，姚苌派兵包围了五将山，俘获了苻坚、张夫人、苻诜及二女。八月，后秦姚苌向苻坚索求传国玺，苻坚怒目圆瞪，喝斥道："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玺已送晋，不可得了！"痛骂姚苌忘恩负义，求死。苻坚对张夫人说："岂可令羌奴辱吾儿。"于是先杀二女宝、锦。姚苌派人把苻坚缢死于新平郡城（今陕西彬县）内的一座佛寺内。张夫人、苻诜自杀。后秦将士皆为之哀恸。

苻坚出走五将山后，太子苻宏守不住长安，率领数千骑与母、妻逃奔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八十里），后又辗转投奔了东晋。

苻坚的庶长子苻丕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淝水战后，慕容垂起兵反秦，围攻邺城。苻丕固守，相持了一年多，双方损失惨重，慕容垂不得不退往中山，苻丕也率邺中男女六万多口，西迁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并在这里称帝。后来，苻丕被西燕慕容永打败，南逃到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他想偷袭洛阳，遭到东晋将冯该的邀击，被冯该所杀。苻丕死后，关陇的氐族残余势力拥护苻坚的族孙苻登做了皇帝，率众与后秦连年征战。到了后秦皇初元年（349），被姚苌的儿子姚兴打败，兵溃自杀。苻登的儿子苻崇奔湟中（今青海西宁、湟中一带），被西秦乞伏乾归逐杀。前秦亡，自公元349年至394年，立国凡四十四年。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苻坚载记》、《慕容垂载记》、《姚苌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慕容叛秦复燕》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慕容氏复燕

前燕故将慕容垂（慕容皝第五子）因遭慕容评的排挤，委身前秦苻坚。苻秦灭前燕，他时有复燕之心，但一直屈己隐忍，藏锋不露。前秦建元十九年（383），秦晋淝水大战，苻坚惨败，诸军皆溃，唯慕容垂所率三万人独全。苻坚曾逃人他的军中，他的大儿子慕容宝、弟弟慕容德等人劝他杀掉苻坚，复兴燕祚。慕容垂感到时机还不成熟，没敢下手，于是护送苻坚回长安。行至渑池，他对苻坚说："北鄙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镇慰安集，并顺道过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拜谒祖庙。"苻坚拨给-·支三千人的军队，让他去经抚河北。

十二月，慕容垂来到了安阳，前秦邺城镇将苻丕闻垂北来，感到来者不善，表面上待以上宾之礼，暗地里派重兵严守，密切注意垂之动向，把垂安顿在邺西馆，不许他人城。垂秘密联络前燕故将，图谋复兴燕国。这时，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攻洛阳，苻坚以手书召慕容垂南下击翟斌。苻丕拨给慕容垂两千弱兵和一些锈蚀斑剥、不堪使用的铠仗，让他出师，又派氐将苻飞龙率骑一千监视慕容垂。

慕容垂留慕容楷、慕容农、慕容绍等人于邺，率兵南行至安阳的汤池，发觉了苻丕与苻飞龙的阴谋，慕容垂想借机激怒部众，于是愤愤不平地喝道："吾尽忠于苻氏，而彼专欲图吾父子，吾虽不计较，彼却死死不放！"众人也不愿为苻氏卖命，于是借口兵少，停河内（今河南沁阳）募兵，不到十天的功夫，聚众八

一千人。

苻秦催促慕容垂进兵，垂对苻飞龙说："今寇贼不远当昼宿夜行，袭其不意。"飞龙不知是计，以为然。一天夜里，慕容垂派世子慕容宝领兵居前，小儿子慕容隆勒兵随己，令氐兵五人为伍，与慕容宝约定，听到鼓声，前后合击氐兵及苻飞龙，尽数袭杀。从此与苻秦彻底决裂。接着，慕容垂渡黄河，来到洛阳附近，和翟斌联军进攻洛阳。

前秦建元二十年、后燕慕容垂元年（384）正月，慕容垂因洛阳四面受敌，欲取邺而居之，于是引兵而东。到了荥阳，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至此，后燕立。垂以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封范阳王；兄子慕容楷为征西大将军，封太原王；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然后，率众二十多万，从石门（即汴口）渡过黄河，长驱向邺。

当慕容垂渡黄河时，为了牵制苻丕，他派人偷偷到邺，密告慕容农等使起兵响应。这时已临近大年除夕，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等乘苻丕不备，在一个漆黑的夜间，盗取苻丕骏马数百匹，伢装成牧马人混出邺城，遂同奔列人。次年正月初一，苻丕在邺大会宾客，召慕容农不至，发觉有变，派人四出寻找，三天以后，才知道其已在列人起兵。

慕容农等到列人后，纠合乌桓鲁利、张骧，驱居民为士卒，斩桑榆为兵器，裂襜裳为旗帜。又使赵秋游说屠各毕聪，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馀和、敕勒、易阳马桓刘大等，各率部众数千聚会列人。农封赏官号，建立政权，率众攻破馆陶，收其军资器械。又派兰汗等人掠取康台（今河北丘县西南）牧马数千匹。并进一步扩大势力，西招库傉官伟于上党，东引乞特归于东阿，北召平叡、平幼兄弟于燕国。伟等皆响应。

苻丕遣部将石越率兵万余，攻列人，慕容农大破秦兵，斩石越。然后率众到邺与慕容垂会师。

慕容垂在邺，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沿用前燕朝仪典章，立世子宝为太子，封从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输、舅子兰审皆为王，其余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浑谭、平幼等也各率众会垂攻邺。

慕容垂率众攻拔邺城外郭，邺城守将苻丕退守中城。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多万，为飞梯、地道攻邺，不能克，于是改筑长围困守。将军中老弱安置在肥乡，筑新城（今河北肥乡西）存放辎重，又分兵攻取邺城周围郡县堡壁，扩大地盘。

三月，慕容垂以邺城犹固，于是采用右司马封衡的建议，引漳水灌城，不久，引水工程受到丁零翟真的破坏。

八月，邺中刍粮俱尽，削松木以饲马。燕王垂也因军中粮草不济，解邺围，退屯新城。又遣慕容农徇清河、平原，征督租赋。慕容农明立约束，适度征集，军令严整，无所侵暴，因此，谷帛属路，军资丰给。

十月，燕王垂以苻丕据邺犹不去，又引兵围邺，开其西归之路，想把他赶跑。苻丕联合东晋，对付慕容垂。

后燕二年（385）三月，慕容垂久攻邺不下，将北诣冀州，分命诸将经营信都（今河北冀县）、中山（今河北定州）、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市郊东故城）诸城。四月，东晋刘牢之进兵至邺，慕容垂逆战而败，遂撤邺围，退屯新城，又自新城遁。牢之引兵追至五桥泽（今河北临漳北），急抢燕军辎重，慕容垂邀击，大破晋军，斩首数千级。牢之单骑逃入邺，不久因兵败被晋廷召回。八月，苻丕也因邺中饥馑，率男女六万余口西人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把邺一座空城留给了后燕慕容垂。由于燕、秦争战经年，幽、冀二州大饥，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

十二月，慕容垂始都中山，次年正月，在中山即皇帝位，改

元建兴，置公卿尚书百官，缮宗庙、社稷。

慕容垂定都中山以后，首先将冀州境内苻秦残余势力消除干净，然后进一步拓广地盘。

后燕建兴七年（392）二月，垂引兵南击丁零翟钊建立的政权——魏，自鲁口（今河北饶阳）南行至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勃海（今河北南皮东北）、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三月，翟魏将翟都侵馆陶，屯苏康垒。燕兵进逼苏康垒。四月，翟都南走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六月，慕容垂屯兵黎阳，临河欲渡，翟钊在河南陈兵御敌。为了牵制翟钊，分散其兵力，慕容垂移军西去，到了距黎阳四十里的西津，并用牛皮船百余艘，伪列兵仗，溯流而上，装作一副大军西去的样子，翟钊也引兵西去。这时垂暗中派中垒将军慕容镇在夜间，于黎阳津强渡黄河，在河南扎营，至第二天早上，营成。钊闻知，回兵攻营，垂命镇坚壁勿战。钊兵往来疲竭，攻营不能拔。正要撤走，慕容镇突然引兵出战，慕容农又自西津渡过黄河，与慕容镇夹攻翟钊，大破钊兵。钊逃到滑台，带着妻子，收集散众，北行渡过黄河，登白鹿山，凭险自守。燕兵不得进，慕容农说："钊无粮，不能久居山中。"于是留了一些骑兵候守，引大军回营去了。翟钊果然下山，慕容农还兵掩击，尽获其众。翟钊单马逃奔长子，投靠了西燕慕容永。翟魏亡，所统七郡三万户归属于后燕。

慕容垂在灭了翟魏政权以后，于是把矛头指向了西燕。西燕和后燕一样，都是鲜卑慕容氏建立起来的政权。前秦灭前燕后，苻坚把徒何鲜卑四万多户迁到关中，安置在长安城内及近畿各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陷入被奴役的悲惨境地，就是鲜卑贵族，许多人也变得穷困起来。慕容永是慕容廆弟弟慕容连的孙子，徙居长安后，家境贫寒，夫妻靠卖靴糊口。当然，他们不甘心做亡国奴，时刻想着东山再起。淝水战后，苻秦统治衰败。慕容暐的弟弟、秦北地长史慕容泓跑到关东，收集鲜卑部众，聚

得数千人，还屯华阴，击败秦将强永。苻坚派儿子巨鹿公苻叡和大将军姚苌镇压，泓大败秦兵，斩苻叡。姚苌跑到渭北，另立山头。同时，慕容泓的弟弟冲也起兵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金殿）。不久，冲被秦将窦泰击破，遂率鲜卑骑八千奔慕容泓。泓众达十多万人，自称济北王。他派人送信给苻坚说："我家吴王（慕容垂）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慕容暐）。吾当率关中燕人翼卫乘舆，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永为邻好。"坚大怒，召来慕容暐，怒责一顿，命他作书招降慕容泓。暐却作手书给泓，鼓励他复兴燕国。泓进逼长安，改年号为燕兴，这是西燕纪元的开始，西燕建立。

后燕元年（384）六月，慕容泓谋臣高盖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于是杀泓立冲。冲率兵进围长安。九月，慕容冲攻长安，苻坚登城观敌阵，看到城下黑压压的鲜卑兵，叹道："这些虏奴是从哪里出来的呀！"又把目光投向阵前的慕容冲，大声喝斥："奴何苦来送死！"冲也高声叫道："奴厌奴苦，欲来取代你呀！"苻坚平时对冲有些喜欢，于是派人送给他一袭锦袍，让他退兵。冲说："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早送皇帝。"坚大怒，说："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竟敢如此欺吾！"十二月，冲仍围长安，慕容暐在城中谋杀苻坚为内应，事情败露。苻坚杀暐，城内鲜卑人尽被杀绝，慕容柔、慕容盛乘间得出，逃奔了慕容冲。

后燕二年（385）正月，慕容冲在阿房（今陕西西安西）即皇帝位，改元更始。秦、燕先后在仇班渠、雀桑、白渠等地几经恶战，各有胜负。不久，西燕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攻入南城，被秦兵击破，斩首八百级，长安城中粮尽，秦兵分鲜卑兵尸体为食粮。双方又在成式壁、骊山激战。苻坚担心长安危险，于是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守长安。苻坚亲自督战，飞矢满体，流血淋漓。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被掳掠

的三辅民与苻坚通谋，约定在燕军营中纵火，内应外合，击燕兵。但这些愚民逆风纵火，自己反被风火所烧，幸免于难者仅十之二三。苻坚祭哭，士气更加低落。不久，苻坚出奔五将山。六月，太子苻宏守不住长安，逃往下辨去了。慕容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后燕建兴元年（386）二月，慕容冲乐在长安，且畏后燕慕容垂强盛，不敢东归，于是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鲜卑众怨，左将军韩延因众心不悦，攻杀冲，立段随为燕王，改元昌平。三月，西燕慕容恒、慕容永袭杀段随，立慕容𫖮。恒又立慕容冲子瑶为帝，改元建平。众人不服，离开了慕容瑶，投奔慕容永去了。永俘杀瑶，立慕容泓子忠为帝，改元建武。慕容忠以永为太尉、尚书令。永持法宽平，鲜卑众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慕容永携忠，到了闻喜，得知慕容垂已在中山称帝，不敢进，于是筑燕熙城，定居下来。六月，西燕刁云等杀慕容忠，拥立慕容永为主。慕容永率部继续东进，十月，在襄陵（今山西襄汾北）打败了前秦苻丕，夺道而行，进至长子（今山西长子西）。永在长子称皇帝，并定都于此，改元中兴。西燕强盛时，其统治区域南抵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北至新兴郡（治九原，今山西忻州），东依太行，西临黄河。

西燕慕容永与后燕慕容垂虽同属鲜卑一支，但作为慕容廆裔孙的慕容垂决不会让庶属枝叶慕容永另立山头的，于是在后燕建兴八年（393）召集御前会议，当众宣布："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永，终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遂号令全军戒严。十一月，慕容垂发中山步骑七万，命丹杨王慕容瓒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县西井陉山上），攻打西燕武乡公慕容友（慕容永弟）镇守的晋阳。慕容永集中了精兵五万防守潞川（今山西浊漳河）。次年二月，慕容垂增调司、冀、青、兖四州兵，分兵三路，太原王慕容楷出滏口（在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辽西王慕容农出壶关

(今山西长治东南)，慕容垂自率主力出沙亭（在邺城西南)。慕容永分兵拒守，另外派了一万多人防守储粮地台壁（今山西黎城西南)。慕容垂在邺西南屯兵月余不进，西燕慕容永怀疑慕容垂欲从诡道进取，于是除台壁一支守军外，把主力集中布防到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慕容垂忽引军出滏口，入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太行山上)，直趋台壁。慕容永仓促集结五万精兵，回救台壁。慕容垂布阵于台壁南，遣将慕容国伏千骑于涧下。垂与永军战，佯装败退。行数里，慕容国率伏兵冲出，切断慕容永后路，诸军四面俱进，大破慕容永，斩首八千余级，慕容永逃回长子。后燕军乘机攻取了晋阳。慕容垂进围长子，于八月间，陷长子，斩慕容永，得西燕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及前秦乘舆、服御、妓乐、珍宝甚众。西燕亡，从公元384年慕容泓改元到394年慕容永被杀，立国仅十年。

慕容垂灭掉西燕后，又利用东晋的衰弱，渡过黄河，略地青、兖，把疆域拓展到今山东临沂、枣庄一带。后燕全盛时，其四境“南至琅邪，东迄辽海，西界河、汾，北暨燕、代”(《读史方舆纪要》)。

当慕容垂称霸中原的时候，长城以北的拓跋鲜卑发展起来。后燕建兴元年（386)，拓跋珪建立了北魏政权，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拓跋氏与慕容氏世代有姻亲关系，拓跋珪的庶祖母慕容氏（什翼犍妻）是慕容垂的同胞姐妹，论辈分，慕容垂与拓跋珪是重外甥与姥舅的关系。在两国关系上，慕容垂常以长辈自居，向拓跋珪索取贡物。后燕因战马缺乏，屡求于魏，甚至发生了扣留北魏使者拓跋觚（拓跋珪的弟弟）以求名马的事，于是两国绝交。拓跋珪转而采取联合西燕，抗拒后燕的策略。建兴九年（394)，西燕危急时，慕容永向拓跋珪求救。拓跋珪派了五万骑兵，进至今山西忻县附近，遥为西燕声援。建兴十年，北魏常常侵逼后燕边境诸部。这年五月，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赵王

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又遣范阳王慕容德率骑一万八千为后继。拓跋珪听说燕军北上，于是将部落、畜产和二十多万大军转移到黄河以南。燕军到达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收北魏穄田百余万斛，又赶造渡船，准备渡河。九月的一天，突然狂风大作，漂其船数十艘泊南岸，北魏获后燕甲士三百多人，又尽将他们释放了。

慕容宝从中山出发时，慕容垂已患下了疾病。军至五原后，拓跋珪切断了燕军后方通道，截获了中山到五原的信使。慕容宝出师五个月，一直没有得到中山方面的消息，心里十分担忧。拓跋珪让使者隔河向慕容宝喊话，说："你父已死，何不早归！"宝等忧恐，士卒骇动，后燕军内部不稳。再者，寒冬逐渐降临，战事又不利，慕容宝不得不在十月间烧船夜遁。时河冰未结，慕容宝以为魏兵必不能渡，撤退时，不设后方了望哨。

十一月，暴风骤起，河水冻结，拓跋珪引兵济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九日，燕军宿营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东。当天黄昏，拓跋珪的骑兵追踪到参合陂西，珪乘夜部署诸军，准备凌晨掩击燕军，士兵衔枚潜进。十日清晨，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行，忽见山上敌兵，士卒惊忧，乱不成军。拓跋珪纵兵奋击，燕兵赴水逃命，人马自相践踏，压死溺死者成千上万。拓跋遵带领七万骑兵又扑到燕兵前邀击，燕兵四五万人，纷纷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生还的不过几千人。太子慕容宝等单骑仅免。陈留王慕容绍被杀，鲁阳王慕容倭奴、桂林王慕容道成等文武将吏数千人被俘。魏兵缴获兵器、衣甲、粮货无数。拓跋珪将燕臣有才用的人，如士人贾闰、贾彝、晁崇等人留下来，其余的士人发放衣粮遣返，以招怀中州儒士，对于俘虏的甲士武人四五万，尽数坑杀。

慕容宝回到中山后，不甘心失败，请求慕容垂再次出战伐魏。慕容垂的弟弟范阳王慕容德也劝慕容垂健在时亲征，以免留

下后患。慕容垂召龙城兵人中山，准备伐魏。后燕慕容宝永康元年（396）三月，慕容垂留慕容德守中山，引兵密发，越过广昌岭（俗名五迴岭，在今河北易县、满城之间），经天门，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今山西大同东北）。北魏陈留公拓跋虔率部落三万余家守平城。垂至猎岭，以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隆为前锋袭击平城。这时，燕兵新败，皆畏魏兵，只有龙城兵勇锐争先。拓跋虔麻痹大意，也不设备，闰三月，燕兵至平城，这才发觉有敌情，率麾下出战，败死，燕军尽收其部落。魏主拓跋珪在盛乐闻知燕兵卷土重来，震恐欲走。诸部听说拓跋虔战没，人心不稳。

慕容垂在行进途中，经过参合陂，见去年交战处，积骸如山，为死亡将士设祭，军士皆恸哭，声震山谷。垂惭愤呕血，由此发疾，乘马舆而进，驻跸于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慕容宝闻知父亲病情加重，引兵还平城。北魏拓跋珪也退保阴山，暂避燕兵锋芒。

慕容垂在平城积十日，疾转笃，于是筑燕昌城而还。四月，卒于上谷之沮阳，秘不发丧。回到中山，发丧，葬于中山。太子慕容宝即皇帝位，改元永康。

慕容宝即位后，后燕军事力量更加呈现颓势，政治愈益衰败，统治集团内部离心。他又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而且法峻政严。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因失去了大量荫户而心怀不满，荫户也因官府租调、力役苛重嘘叹怨愤，后燕统治者失去了民心，“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慕容宝载记》）。

正当后燕日益衰落的时候，北魏拓跋珪于后燕永康元年（396年）八月间，大举伐后燕，率步骑四十多万南出马邑（今山西朔县），鼓行而进。别遣将军封真东道出军都，袭燕幽州。九月，魏兵取晋阳，燕兵全军覆没。晋阳镇将慕容农被创，独与

三骑逃还中山。十一月，魏兵锋转向河北，相继克常山（郡治真定，在今河北石家庄市郊东故城）、信都（今河北冀县）。慕容宝在中山集结了步骑十五万七千人御敌，大败而还，魏兵进围中山。永康二年（397）三月，慕容宝率万余骑，冲出重围，退往龙城去了。中山便在这年十月被拓跋珪攻下，后燕公卿将吏士卒两万多人投降了北魏。

后燕慕容盛建平元年（398）三月，后燕尚书、顿丘王兰汗在龙城发动政变，四月，杀慕容宝及太子策、王公、卿士百余人，自称大都督、大单于、昌黎王，改元青龙。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是兰汗的女婿，在家装病，不预政事，兰汗放过了他。但他暗中积极活动，图谋兰汗，在七月的一天夜里，趁兰汗酒醉，逾墙入宫，杀了兰汗，自立为主。慕容盛以威严驭下，骄暴少亲，宗亲、勋旧多被诛杀，人人自危。左将军慕容国等谋率禁兵袭击慕容盛，事败，死者五百多人。前将军段玑等因众心动摇，在夜里于禁中鼓噪大呼，慕容盛闻变，率左右出战，众皆披溃。这时有一甲士从暗处突然蹿到慕容盛面前，一刀将他砍伤。盛遂被卫士抬至前殿，他知道自己伤势过重，恐不久于人世，派人速去召叔父慕容熙，嘱以后事，但等熙到来，就咽气了。

慕容熙与嫂嫂丁太后（慕容宝妻）奸通，两人合伙废太子慕容定，丁氏立情夫熙为帝。慕容熙即位后，实行胡汉分治，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在私生活方面，他厌倦了丁太后，宠幸苻贵人。丁氏十分怨恨，熙逼令她自杀了。他又大兴土木，筑龙腾苑，广袤十多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不计其数。还仿照邺城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为苻昭仪起承华殿，高出正殿承光殿一倍。熙亲负土于北门，因工程量太大，城内的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至阙，上

书极谏，慕容熙太怒，斩杜静。苻氏尝于盛夏想吃冻鱼脍，仲冬求生地黄。熙责令部下办理，不得，则处以大辟的极刑。后燕建始元年（407）苻昭仪病死，慕容熙悲号躃踊，若丧考妣，拥抱着苻氏的尸体，抚摸着苻氏的脸，说："体已就冷，命遂绝了！"于是僵仆气绝，良久才醒过来。大殓既讫，复又让人开棺，与苻氏尸体交接拥抱，并为她披麻带孝，食粥。下令百僚于宫内哭临，让沙门也着白服。还使有司案验哭者，有泪以为忠孝，无者就要治罪。于是群臣震惧，全都在嘴里含上辣椒等物，使眼睛流出泪来。慕容隆的妻子张氏是慕容熙的嫂嫂，相貌漂亮，熙逼她为苻氏陪葬，还命令公卿以下至士民，家家都去营造陵墓，陵墓规模宏大，周围数里。苻氏的灵柩下葬时，慕容熙披头散发，光着脚步行为苻氏送葬，灵车高大，拆毁龙城北门而出。

后燕中卫将军冯跋等趁慕容熙为苻氏送葬出城的机会，带领尚方徒五千多人闭门据守，想驱逐慕容熙。慕容熙闻龙城有变，并不认真组织军队迎战，不以为然地说："此鼠盗耳，朕还当诛之。"于是收发贯甲，驰还赴难。夜至龙城，攻北门不克，败走龙腾苑，被人活捉，押送冯跋军中，被处死，后燕亡。自慕容垂称王（384）到慕容熙被杀（407），立国凡二十四年。

附：南燕

后燕慕容宝时，北魏进兵中原，攻取信都、常山、中山，又派兵攻邺。后燕邺城镇将范阳王慕容德（慕容皝小儿子、慕容垂弟弟）为避敌锋，率民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从邺迁往黄河南岸的滑台，称燕王，建立南燕。南燕二年（399），以"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余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资治通鉴·东晋隆安三年》），又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八里）。次年正月，在广固称帝，改元建平。南燕最强盛时，有"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其疆域"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钜野（今山东巨野北古巨野泽），北薄于河"（《读史

方舆纪要》)。

南燕太上元年（405），慕容德病死，无子，兄子慕容超即帝位。超宠信幸臣公孙五楼，专事畋猎，不恤政事。太上六年（410），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南燕，攻取广固，斩鲜卑王公以下三千人，南燕亡。从慕容德广固称帝到广固陷落，立国十一年。从此，鲜卑慕容氏彻底衰落，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载记第23》、《载记第24》

《通鉴纪事本末·慕容氏叛秦复燕》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拓跋珪兴魏

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支，他们自称是黄帝的小儿子昌意的后裔，世世代代居住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魏书·序纪》），因境内有大鲜卑山，故以山名为号。实际上，他们的先人原生活在鲜卑山中的洞穴内，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的大兴安岭北部东麓的嘎仙洞。1980 年 7 月文物工作者曾在这里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的祭祖石刻祝辞。他们以畜牧射猎为业，没有文字，刻木记事，世事远近，都靠口头传授。自以为是黄帝的后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即帝王）为拓，谓后（即帝王之妻）为跋，因以为姓。拓跋氏传人到六十七世，部落中出了个拓跋毛，他以聪明武略，受到远近部落的推崇，统辖三十六国，九十九大姓，威震北方。

到了拓跋诘汾时，这支鲜卑族人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向南大迁移。越过高山深谷，经历了九难八阻，队伍行进在深山老林中，十分艰苦，还常常迷失方向，许多人都受不了这种磨难，几次想中途停止。当他们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时，突然来了一只被他们奉为“神兽”的动物，形状像马，叫声似牛，它导引着拓跋鲜卑人，经过一年多的跋涉，终于走出了深山，来到了原为匈奴人活动的蒙古高原。

关于诘汾的婚姻与拓跋力微的降生还有这样一段浪漫的传说。有一次，诘汾率领数万人在山泽中狩猎，忽见天空中飘下一辆高大的彩车，待彩车降落到他面前时，从车内走出一位美丽动

人的青年妇女，装束打扮高贵堂皇，身边的侍卫仪仗规模盛大。诘汾很奇怪，问她道："你是何家的千金贵人？"美妇人说："我是天女，奉上天的旨命，来到人间与你成婚。"诘汾大喜，当天夜里就与她婚配同寝。第二天天刚亮，美妇人起床请还，说："待至明年此时，我们再到这里相会。"说话间，如风雨一般，转身不见了。到了第二年此时，诘汾就早早来到去年他们婚配的地方等候，果然重又相见。美妇人怀里抱着自己生育的婴儿，她把婴儿送给诘汾，说："这是您的儿子，请您好好地看护他，子孙相承，从他这一辈便可做人间帝王。"语讫而去。这个小孩就是北魏的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当时的鲜卑人还根据这段美丽的传说，编出了一句谚语："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从此传说，可以看出拓跋鲜卑这时已进人父系氏族社会了。

诘汾卒，力微统部，受到西部鲜卑人的攻击，部民被打散，力微投靠了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力微与窦宾联合起来攻击西部鲜卑，军败。窦宾从马上掉下来，步行逃走，力微把自己乘坐的骏马让给窦宾。窦宾十分感恩，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力微，让力微率部北居长川（今内蒙古兴和西北）。经过十多年的生息，诸旧部民又都归附了力微。窦宾死后，力微又吞并了他的部众。这时，他的军队已是控弦之士二十多万了。不久，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在一次祭天的活动中，杀了不前来助祭的白部大人，震慑了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大人。他吸取了匈奴失败的教训，遣使与曹魏和亲，派儿子沙漠汗留居洛阳，学习中原汉族文化。从此，胡汉边民和睦相处。

西晋武帝时，力微年老多病，沙漠汗请求回部省视，武帝允准。力微听说儿子回来了，十分高兴，使诸部大人到阴馆迎接。诸部大人于露天设宴为沙漠汗接风，酒酣，这时一群鸟儿从空中飞过，沙漠汗仰视飞鸟，对诸部大人说："我为你们取只下来。"援弹飞丸，应声而落。当时鲜卑部众不知弹弓是何等玩艺儿，一

个个都惊呆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说："太子风彩被服，如同南夏，兼有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众人也都点头称是。于是想设谋陷害他，先派人驰还盛乐去见力微。力微问："我子既历他国，德性如何?"众人说："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好像是得晋人异法怪术，这是乱国害民的征兆，愿吾主案察。"自沙漠汗去了洛阳后，诸子守在力微身旁，很受爱宠，再说力微年老惑阍，听诸部大人这么一说，也有些疑虑，说："不可容者，除掉算啦。"于是诸部大人驰至塞南，矫害了沙漠汗。不久，力微病倒了，西晋幽州刺史卫瓘设离间计，使鲜卑拓跋氏各部互相猜忌残杀。力微忧愤而死，他的第四子拓跋悉禄官统部，其国遂衰。

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十二月，拓跋禄官统部，分其国人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亲统领；一居代郡参合陂之北，使侄子拓跋猗㐌（沙漠汗子）统领；一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使猗㐌弟猗卢统领。

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禄官卒，拓跋猗卢统摄三部。

永嘉四年（310）四月，晋并州刺史刘琨召拓跋猗卢击破白部鲜卑刘虎。刘琨表猗卢为代公。猗卢率部自云中人雁门，徙居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等县地。

西晋建兴元年（313），代公猗卢筑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以为北都，以故平城为南都，又建新平城（今山西大同）于灅水之北。

建兴三年（315）二月，晋封猗卢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租赋。

建兴四年，猗卢被长子拓跋六脩杀害，六脩的弟弟拓跋普根又举兵攻灭了六脩，即代王位。不久，普根死，拓跋郁律代立，是为北魏平文皇帝。

东晋元帝太兴四年（321），拓跋猗㐌的妻子唯氏忌代王郁律

强盛，恐对自己的儿子不利，于是杀了郁律，立她的儿子贺傉为代王，诸部大人数十人也被杀。这时，郁律的儿子什翼犍幼在襁褓，他的母亲王氏把他藏在袴中，暗暗祈祷："上天若能让你存活，你千万不要啼哭。"他却在袴中睡着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才免遭于难。

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代王拓跋贺傉筑城于东木根山，并徙居这里。次年，贺傉卒，弟纥那立。

东晋咸康三年（337），郁律的儿子拓跋翳槐被部众举立为代王，他联合后赵，赶走了纥那，翳槐筑盛乐城而居之。

咸康四年（338），代王翳槐卒。临终前，遗令立其弟什翼犍为主。这时，什翼犍在后赵邺都作人质。翳槐的弟弟拓跋孤亲至邺迎接。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于繁畤北，改元建国，建立代国。什翼犍雄勇有智略，在邺学到了很多治理国政的经验，称王后，始置百官，分掌众务。以代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制定法律，政事清简，于是东自涉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阴山，北尽沙漠，全都归服了他，有众达数十万人。他又向燕国求婚，燕王慕容皝把妹妹许配他为妻。并定都云中之盛乐宫，还在故城南八里筑新城。

东晋宁康二年（374），代王什翼犍击匈奴刘卫辰，卫辰南逃。

东晋太元元年（376）十月，刘卫辰为代所逼，向前秦求救，苻坚派兵三十万灭了代国。什翼犍逃往阴山以北。后来，听说秦兵稍退，这才又战战兢兢地回到云中。一天夜里，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君突然发动政变，杀了什翼犍并其他诸子。什翼犍诸子妇及部人连夜逃奔前秦军中。秦将李柔、张蚝勒兵趋云中，拓跋氏部众溃逃，国中大乱。拓跋珪的母亲贺氏带着儿子投奔了贺讷。

拓跋珪是什翼犍的嫡长孙，他的父亲是世子拓跋寔。东晋咸

安元年（371）三月，代将长孙斤谋杀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护卫什翼犍，与斤格斗，被长孙斤刺伤胸肋。他负伤猛战，遂擒长孙斤杀之。五月，拓跋寔因伤口疾发，病情恶化，不久就死了。寔的妻子是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这时，正怀有身孕。七月，贺氏生下了这个遗腹子。什翼犍见是男孩，十分高兴，为他大赦境内，给这个小孙子取个“涉圭”的名字。代国亡后，小涉圭在母舅家长大，改单名为“珪”。

东晋太元十一年、北魏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大会部众于牛川，即代王位，建年号为登国。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衮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重建拓跋氏政权。二月，迁都盛乐。

四月，拓跋珪改称魏王，因政权草创，人情未一，拓跋珪处处受逼。先前，秦灭代，苻坚迁什翼犍的小儿子窟咄于长安。前秦衰败，窟咄跟随慕容永东归，永任窟咄为新兴太守。匈奴人刘显派弟弟刘亢泥迎窟咄，又借给他军队，让他进逼魏南境，拓跋氏诸部骚动。拓跋珪左右的人于桓等与部人谋缚珪响应窟咄，代人莫题又暗中与窟咄勾结。于桓的舅舅穆崇向拓跋珪告密，拓跋珪诛杀于桓等五人，原谅了莫题等七姓。拓跋珪恐怕部众内部起乱，于是北越阴山，复依贺兰部，遣外朝大人安同到中山（今河北定州）向后燕求救，后燕主慕容垂派赵王慕容麟救助。

十月，拓跋窟咄逼魏王珪于前，贺染干又侵犯魏北部，响应窟咄。魏众惊扰，北部大人逃亡到匈奴刘卫辰那里去了。慕容麟闻知拓跋珪处境困窘，先派安同回去安抚众心，燕军随后继进。窟咄进屯高柳（今山西阳高西北），珪引兵与麟会师，合击，窟咄大败，逃奔了刘卫辰，卫辰杀窟咄。珪悉收其众，以代人库狄干为北部大人，慕容麟也引兵回中山。

登国二年（387），匈奴刘显地广兵强，雄于北方。这时，其兄弟内争，互相攻杀。魏长史张衮向拓跋珪进言："刘显志在吞并我国，今若不乘其内乱消灭他，必为后患。然吾不能独克，请与燕合兵攻取。"拓跋珪复遣安同乞师于燕。七月，刘卫辰献马于后燕，途中被刘显截获。慕容垂大怒，遣太原王慕容楷将兵助赵王慕容麟击显，大破之，刘显逃入马邑西山。拓跋珪又引兵会慕容麟击刘显于弥泽，又破之，刘显投降了西燕慕容永。

登国三年，拓跋珪破库莫奚于弱落水南。七月，库莫奚复袭魏营，又被拓跋珪击破。

登国四年正月，拓跋珪袭破高车，二月，又在女水击破叱突邻部，尽徙其部落而还。

登国五年四月，拓跋珪会燕赵王慕容麟于意辛山，击破贺兰、纥突邻、纥奚三部，纥突邻、纥奚二部投降了北魏。七月，刘卫辰遣子直力鞮攻贺兰部。贺讷困急，请降于魏。拓跋珪引兵救援，直力鞮退走，珪徙讷部落，处之东境。

登国六年十月，刘卫辰遣子直力鞮率众八九万攻魏南部。十一月，拓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敌，大破直力鞮于铁岐山南。直力鞮单骑逃走，魏兵又乘胜追击，自五原金津南渡黄河，径入卫辰国，卫辰部落骇乱。拓跋珪直抵卫辰的老巢——悦跋城（又称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卫辰父子出走。珪又遣诸将轻骑追击，魏将伊谓擒直力鞮于木根山，卫辰为其部下所杀。十二月，拓跋珪屯军于盐池，诛杀卫辰宗党五千多人，尽投尸于河。黄河以南诸部悉降，魏获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国用由是遂饶。

卫辰的小儿子刘勃勃逃亡到叱干部，拓跋珪派人索求，叱干部帅他斗伏的儿子阿利把勃勃转移到鲜卑没奕于处。以后，勃勃建大夏国，改姓赫连。

登国八年（393）八月，拓跋珪以叱干部拒不交出刘勃勃为

由，派兵袭击其部众，屠其城，他斗伏逃奔了后秦。

北魏皇始元年（396）七月，群臣劝拓跋珪称尊号，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改元皇始。

八月，魏拓跋珪率步骑四十多万，大举伐后燕，又别遣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今北京昌平北），袭后燕幽州，围蓟城（今北京西南）。

九月，拓跋珪次曲阳（今河北曲阳西），据太行山，临观晋阳，克收并州。

十月，拓跋珪率军自井陉趣中山，沿途克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市郊东故城），俘太守苟延。常山以东诸郡县守宰或走或降，相继归魏，唯中山、信都、邺三城为后燕据守。

十一月，拓跋珪遣拓跋仪率五万骑攻邺，将军王建、李粟攻信都，珪自将兵攻中山。后燕中山王慕容隆守中山城南郭，率众力战，杀死数千人，魏兵退。珪知中山城固，于是决定先引兵南取邺、信都，然后再图中山，遂移军鲁口城（今河北饶阳）。拓跋珪屯兵鲁口，燕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阳太守崔宏奔海渚。拓跋珪素闻宏名，遣骑追获，用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同掌机要，创制立法。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为中书令，出纳号命，兼总文诰。拓跋珪十分重视录用中州汉族名士，这为北魏的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后燕邺城守将慕容德遣将慕容青夜袭魏兵于邺城之下，魏军退屯新兴城（今河北肥乡西）。十二月，魏将贺赖卢率骑两万会拓跋仪攻邺。

北魏皇始二年（397）正月，魏以重兵攻邺。邺城守将慕容德利用魏军主将内部矛盾，遣将慕容镇、慕容青大破魏军。魏将王建攻信都，六十多日不下，士卒多死。魏王拓跋珪亲率兵强攻，后燕守将慕容凤逾城夜逃中山，北魏据信都。

后燕慕容宝闻知拓跋珪攻信都，率军出屯深泽（今河北深泽

东南），遣赵王慕容麟攻杨城（今河北宁晋），杀魏守军三百人，并悉出珍宝及宫人，募郡国强民以击魏兵，又使慕舆腾攻博陵（今河北安平），杀魏所置守宰。

二月，拓跋珪还屯杨城。后燕悉发步卒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屯曲阳之柏肆（今河北晋县西），营于滹沱水北岸，北魏军营于水南。后燕募兵万余人，潜师夜渡袭魏营，慕容宝率军为后援，大败。燕军复渡水北，魏军追击，慕容宝、慕容农等弃大军，率骑两万奔中山。拓跋珪俘中州名士后燕秘书监崔逞，用为尚书，掌管三十六曹，任以政事。魏军攻中山，屯于芳林园。中山城内乱，后燕尚书慕容皓谋杀慕容宝，立赵王慕容麟，谋泄。宝使慕容隆收皓，皓与同谋数十人斩关奔北魏。

三月，后燕慕容会发兵龙城，经卢龙、渔阳，到达蓟城，救中山。魏军久困中山，后燕内部不稳，赵王慕容麟欲率禁兵杀慕容宝，事败。贺麟出奔西山丁零，活动于蒲阴（今河北完县）、望都一带，以后，遭慕容详军掩击，贺麟亡人太行山中。慕容宝深恐中山不保，率太子慕容策及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隆、长乐王慕容盛、勃海王慕容朗、博陵王慕容鉴等奔蓟城，赴慕容会军。后燕王沈降魏，慕容惠、韩范、段宏、刘起等率工伎三百人奔邺。拓跋珪遣将长孙肥、李粟率三千骑追宝至范阳（今河北涿州），不及，破后燕新城戍（今河北徐水西南）而还。珪自率兵攻中山。中山城中，慕容详自立为主，闭门据守。魏军连夜强攻，不克。慕容宝至蓟，慕容会率众两万迎于蓟南。宝欲削弱会的势力，减会兵给慕容农、慕容隆，又遣库傉官骥率兵三千助守中山。不久，宝尽徙蓟城府库北趣龙城，魏将石河头追击，被慕容会、慕容农、慕容隆合兵击破。

四月，慕容会以北迁龙城，权不复在己，谋作乱，杀慕容隆，重伤慕容农。慕容宝使慕舆腾斩会，伤其首，不能杀。会逃走，勒兵攻宝。宝率数百骑驰入龙城，慕容会率众攻城。慕容宝

派兵夜袭会军营，会将十余骑逃奔中山，被慕容详擒杀。魏拓跋珪因军粮不济，命拓跋仪罢邺围，徙屯巨鹿，积租杨城。慕容详派兵七千人，伺机击魏诸屯。珪反击，斩首五千级，生擒七百人。

五月，后燕库傉官骥入中山，与慕容详相攻。详杀骥，尽杀库傉官氏，又杀中山尹苻谟，夷其族。中山城无定主，民恐北魏兵来攻，男女结盟，人自为战。魏军以给养不足，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督诸郡义租。慕容详自谓能退魏兵，威德已振，于是即皇帝位，改元建始。

七月，中山城中饥窘，慕容详又不准城民出来采食野谷，死者相枕，举城皆谋迎慕容麟。详遣辅国将军张骧率兵五千多人督租于常山，麟自丁零入骧军，潜袭中山，缚斩慕容详，遂称尊号，听人四出采野谷。人既饱，求与魏战，麟不从，稍复穷馁。拓跋珪屯于鲁口，遣长孙肥率骑七千袭中山，入其郛。慕容麟率众反击，追战魏军于泒水，败还。

八月，拓跋珪移军于常山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九门村），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思归。珪不从，遣大将拓跋遵袭中山，入其郛而还。

九月，中山饥甚，慕容麟率二万人出奔新市（今河北新乐南），拓跋珪发兵攻麟。

十月，慕容麟退阻泒水。拓跋珪与麟战于义台（今河北新乐县境），斩首九千余级。麟与数十骑驰入中山，取妻子入西山，后又奔邺。魏陷中山，后燕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多人。珪入城，尽得后燕玺绶、图书、府库珍宝数万件。魏陷中山后，于此置安州。既而，珪遣拓跋仪率兵三万攻邺。慕容德在邺，奉表至慕容宝，劝其南还，复取中原。宝以德为冀州牧，却不敢南下用兵。

皇始三年（398）正月，后燕邺城守将慕容德接受了慕容麟

的建议，率户四万自邺南徙滑台。魏将拓跋仪入邺，收其府库，追德至河，不及而还。以后，慕容德在广固称帝，建立南燕政权。拓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今河北高邑东南），得前秦王猛孙王宪，用为本州中正。珪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遂置行台，以和跋为行台尚书，与左丞贾彝率吏兵五千镇邺。不久，拓跋珪自邺还中山，将北归，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出倒马关至代五百多里。又恐幽冀有变，也于中山设行台，命拓跋仪镇守，另遣拓跋遵镇勃海之合口（今河北沧州南）。拓跋珪发中山，并徙幽、冀等六州吏民杂夷十多万口实代。博陵（治今河北安平）、勃海（治今河北南皮北）、章武（治今河北大城）等郡民不愿迁徙，群起反抗，先后遭到魏将拓跋遵的残暴镇压。至此，北魏占据了河北地区。

六月，拓跋珪命群臣议国号，群僚都说："周、秦以前，皆自诸侯升为天子，因以其国为天下号。汉氏以来，皆无尺土之资。我国家百世相承，开基代北，遂抚其方夏，今宜以代为号。"黄门侍郎崔宏说："昔商人不常厥居故而称殷、商。代虽旧邦，其命唯新，登国之初，已更曰魏。大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宜称魏如故。"珪从之。

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八月，珪命有司正封畿，东至上谷军都关，南至中山隘门塞，并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又遣使巡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加考察黜陟。

十一月，魏王珪命尚书吏部郎邓渊主官制，协音律，仪曹郎清河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

十二月，拓跋珪即皇帝位，改元天兴。命朝野皆束发戴帽。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率众郤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至是始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然唯孟夏祀天亲

行，其余多由有司摄事。又用崔宏议，自谓黄帝后裔，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两千家于代都。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皆为畿内，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序纪》、《道武帝纪》

《北史·道武帝纪》

《通鉴纪事本末》：《拓跋兴魏》、《魏灭后燕》

北魏统一北方

北魏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建立了拓跋魏政权，史称北魏。这时，拓跋珪的势力还弱，北魏政权刚诞生就受到大漠诸部的威胁。于是，拓跋珪借助后燕的力量，东破库莫奚，西破高车，又灭了匈奴别部刘卫辰，先行统一了大漠诸部，军队发展到四五十万人。后燕慕容垂常欺拓跋珪弱小，向他勒索名马，两国的关系闹崩了。拓跋珪于是想联合西燕，抵制后燕。后燕在灭了西燕后，于登国十年（395年）发兵伐魏，惨败于参合陂。次年，慕容垂亲征，不久因病退回，死于途中。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发兵四十多万攻伐后燕，到次年十月，攻下后燕的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州）。以后又占领了邺城，尽取黄河以北（今河北、山西等地），隔河与东晋相峙。天兴元年（398），拓跋珪迁都平城，即皇帝位，即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死后，儿子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即位。拓跋嗣死，子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立。

拓跋焘即位后，开始了他统一中国北方的大业。

北魏始光二年（426）六月，拓跋焘召集群臣会议，问诸公卿说："今当用兵，赫连夏与柔然二国何先?"长孙嵩、长孙翰、奚斤都说："赫连土著，地处偏远，不足为患，不如先伐柔然。"太常崔浩说："赫连氏的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应先讨伐。"尚书刘洁、武京侯安原则主张先伐北燕。拓跋焘倾向崔浩的意见，于是自云中西巡至五原，因畋猎于阴山，东至和

兜山，借畋猎演练军队，做伐夏准备。八月，回到平城。

九月，拓跋焘听说赫连勃勃已死，诸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互相残杀，想出兵伐夏。长孙嵩等人都反对出兵，担心柔然乘魏兵西进之机进犯魏土。而崔浩执意主张伐夏，两人在太武帝面前争吵起来。拓跋焘大怒，把长孙嵩臭骂了一顿，还命武士当众羞辱他一番。于是派司空奚斤率四万五千人袭击蒲坂，将军周几率万人袭陕城，以河东太守薛谨为向导。

十月，拓跋焘发平城，行至君子津，遇寒流，气温骤然下降，黄河水在一夜之间冻结成冰。十一月，拓跋焘率轻骑两万跨过黄河袭击赫连夏的统万城。夏主赫连昌正与群臣宴饮，全无戒备，忽闻魏兵奄至，君臣上下一个个吓得不知所措。拓跋焘屯军于黑水，离统万城仅有三十多里。赫连昌仓促出战，大败，退走入城。魏兵紧追不舍，城门不及关闭，小校豆代田率人乘胜攻入夏西宫，放火烧了统万城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拓跋焘十分嘉赏代田之勇，任命他为勇武将军。魏夜宿城北，又分兵四掠，杀获数万，得牛马十多万头。拓跋焘对诸将说："统万城一时难能攻克，待至他年再与诸卿共同攻取。"于是徙夏民万家而还。

夏弘农太守曹达闻周几将至，不战而走。魏师乘胜长驱，遂入三辅。蒲坂守将乙斗闻奚斤将至，遣使驰赴统万告急。使者至统万，魏军已围其城，还告乙斗说："统万方而已败了。"乙斗惧，弃城西奔长安，魏兵遂克蒲坂。乙斗逃入长安，与夏主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助兴谋议，认为长安难以固守，于是西奔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十二月，奚斤入长安。

始光四年（427）四月，拓跋焘再次出兵攻伐统万，简兵练卒，部分诸将，命司徒长孙翰等率三万骑为前驱，常山王拓跋素等率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拓跋伏真等率步兵三万运攻具，将军贺多罗将精骑三千为前候。五月，拓跋焘发平城，命龙骧将军

代人陆俟督诸军，镇大碛，以备柔然。

不久，拓跋焘自君子津渡过黄河，进至拔邻山，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倍道先行。君臣都劝阻说："统万城坚固，非朝夕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能克，退无所资，不若与步兵、攻具一时俱往。"太武帝说："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后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进，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能马上陷城，食尽兵疲，外无所掠，进退无地。不如轻骑直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懈，吾佯装羸弱，诱他出战，就能擒获他了。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我军离家两千多里，又有大河阻隔，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而且我军攻城不足，决战则有余。"遂行。

六月，拓跋焘至统万，分军伏于深谷，派一些弱兵到城下讨战。这时，魏兵又有犯罪开小差的，跑到赫连夏那里，说："魏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应迅速出击。"夏主赫连昌信以为真，率步骑三万出城。魏将见夏兵严整，对拓跋焘说："夏兵步阵难陷，应避其锋锐。"焘说："吾远来求贼，唯恐不出，今天他们既然出城，哪有避而不击的道理。"遂收众佯装逃走，牵着夏军兜圈子，想把他们拖疲。

夏兵分作两翼，鼓噪而进，行五六里，忽然风雨大作，从东南滚滚而来，尘沙弥天蔽日。宦人赵倪懂得些方术，对拓跋焘说："今风雨从贼上空来，我逆向而彼顺势，天不助人。且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暂避一些，更待后日再战。"崔浩喝斥道："胡说什么！吾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不变的道理。"拓跋焘说："善！"于是，骑为左右队成犄角之势反击夏军。两军混战，拓跋焘的坐骑闪失前蹄，马蹶人坠，险些被夏兵俘获，多亏拓跋齐以身捍蔽，决死力战，夏兵这才退去。拓跋焘又腾身上马，刺杀夏尚书斛黎文，又杀骑兵十多人，身中流矢，奋击不

辍，夏众大溃。

魏军乘胜逐夏主赫连昌至统万城北，杀赫连昌弟、河南公赫连满及兄子赫连蒙逊，死者有一万多人。赫连昌不及入城，遂奔往上邽（今甘肃天水）。拓跋焘身着士兵的服装，追逐逃亡的夏兵，人统万城。拓跋齐固谏，不听。后来被夏人发觉，关闭了统万所有的城门。拓跋焘与拓跋齐等人人夏宫，得妇人裙，将衣裙连接起来，捆在槊上，然后将槊扔到城墙上，架在两垛口之间，攀缘而上，逾城逃走。待至黄昏时分，夏尚书仆射问至奉载赫连昌的母亲出统万城逃走。魏将长孙翰率八千骑追赫连昌至高平，不及而还。

第二天，魏主拓跋焘人统万城，获夏王、公、卿、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多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颁赐将士有差。

当初，赫连勃勃性好豪侈，筑统万城，高十仞，基厚三十丈步，上宽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壮大，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穷极文采。拓跋焘巡视宫城，回头对左右的人说："撮尔小国，而如此劳民伤财，哪有不亡的道理！"

魏克统万，得夏太史令张渊、徐辩，复用为太史令；得东晋故将毛修之，以毛修之善烹调，用为太官令。魏主拓跋焘见夏著作郎天水人赵逸所撰《夏史》，誉夏主太过，怒道："此竖无道，何敢如是，谁所为邪？当速案究。"崔浩在一旁说："文士褒贬多过其实，盖非得已，不值得加罪。"焘这才罢休。

拓跋焘欲班师，奚斤上疏说："赫连昌亡保上邽，纠合余烬，未有蟠据之资，今因其危，灭之为易。请益铠马，待灭了赫连昌再还。"魏主不许，奚斤固请。这才允许给奚斤调拨一万人的军队，另派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并留将军娥清、丘堆，协助奚斤，共击夏兵。

北魏神䴥元年（428）二月，魏平北将军尉眷攻夏主于上邽，

夏主退保平凉。奚斤进军安定，与丘堆、娥清军合。魏军战马多疫死，士卒乏粮，于是深垒自固。遣丘堆督租于民间，士卒暴掠，不设警备，遭夏主袭击。丘堆兵败，率数百骑还城。夏主乘胜，自来城下抄掠，魏军不得刍牧，诸将深以为患。监军侍御史安颉说："受诏灭贼，今反被贼困，退守穷城。若不为贼杀，当坐法诛，进退都是死，而诸王公晏然曾不做任何打算吗?"奚斤说："今军士无马，以步击骑，必无胜理，当须等待京师救至，再合击夏兵。"颉说："今猛寇游逸于外，吾兵疲食尽，不一决战，死在旦夕。救骑何时能来？等待实际上就是死，反正都是死，何不去战死！"奚斤又以马少为辞。颉说："今敛诸将所乘马，可得二百匹。颉请募敢死士出击，虽不能破敌，也能挫其锐气。且赫连昌有勇无谋，每自出挑战，众人都认识他，若设伏兵掩击，便能擒他。"奚斤仍是不从。安颉于是与尉眷谋议，选骑以待夏兵。不久，夏军来攻城，安颉出战。赫连昌自出阵前搏斗，魏兵识其貌，争相奔赴擒他。这时，大风骤起，飞沙走石，一片昏暗，赫连昌败走。安颉率众追上，赫连昌马蹶而坠，遂被魏兵擒俘，押回城中，后又解往平城，向朝廷献捷。

赫连昌被俘后，夏大将军、平原王赫连定收集余众数万人，奔还平凉，并在这里即皇帝位。

三月，魏将奚斤自以为元帅，而赫连昌却被部下偏裨所擒，深以为耻，于是舍辎重，携带三天的战粮，追夏主赫连定于平凉。奚斤自北道邀击夏军退路，至马髦岭，夏军见魏兵至，想夺路逃走。这时，魏军中有一小将因犯罪逃入夏军，告以魏军食少无水。赫连定于是分兵邀击奚斤，前后夹击，魏兵大溃，奚斤、娥清、刘拔都被夏兵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辎重在安定，闻知斤败，弃辎重奔长安，又与高凉王拓跋礼奔蒲坂，夏人复取长安。拓跋焘大怒，命安颉斩丘堆，代将其众，镇蒲坂，拒夏兵。

神䴥三年九月，夏主赫连定联合南朝宋，约合兵灭魏。魏主拓跋焘闻知，大怒，治兵将伐赫连定，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拓跋焘问计于崔浩，浩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以虚声唱和，共窥大国。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都不敢先入，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勿疑。"拓跋焘遂发兵西伐赫连定，先后克安定、平凉，又围赫连定于鹑觚原，断其水草。赫连定突围，西保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关中侯豆代田救出奚斤、娥清等将，献于魏帝。魏帝拓跋焘把夏主的皇后赐给代田，命奚斤膝行执酒以奉代田，对奚斤说："全汝生者，代田也。"赐代田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

夏长安、临晋、武功守将皆走，关中悉入于魏。

神䴥四年（431）六月，赫连定畏魏人之逼，率秦民十多万口，自治城（今甘肃临夏西北）渡河，欲攻取北凉地盘，遭到吐谷浑的袭击，赫连定被俘，吐谷浑将其送至平城，斩首。赫连夏亡。

北魏灭夏后，又调转锋芒直指北燕。北燕是鲜卑化汉人冯跋建立的政权。冯跋，字文起，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的祖父叫冯和，西晋永嘉之乱时，避地到上党（今山西长子县境）。父亲冯安，曾在西燕做官。西燕慕容永败亡，冯氏家族被迁居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冯跋小时候，恭慎勤于家产，而他的三个弟弟却都仗侠行义，不修行业。后燕慕容宝末年，他出任中卫将军。慕容熙时，他因犯罪逃亡山泽。由于后燕政治荒唐，赋役繁重，人不堪命，冯跋与其兄弟二十二人定计，潜入龙城杀死慕容熙，拥立高云。云封跋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武邑公。及高云被离班、桃仁等所杀，冯跋帐下督张泰、李桑杀班、仁，拥立冯跋为天王，改元太平，仍都龙城，国号依旧为

燕，史称“北燕”。北燕仍沿袭后燕制度，在官制上胡汉分置，由太子冯永领大单于，置四辅。冯跋在位时，禁止贿赂得官，劝课农桑，营建太学，颇有些政绩。

北魏神䴥三年（430），冯跋病死，他的弟弟冯弘发动政变，尽杀冯跋诸子一百多人，自立为燕天王。延和元年（432）五月，魏帝拓跋焘治兵于平城南郊，谋伐北燕。六月，发兵平城。七月，行至濡水，遣安东将军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即密云山，在今河北承德市北武烈河上游诸山）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会兵攻龙城。魏兵长驱至龙城，北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魏发其民凿围堑困守龙城。八月，燕王冯弘派兵数万出战，被魏军击败，死者万余人。燕尚书高绍率众万余家，据保羌胡固，被拓跋焘攻破，斩高绍，又攻拔带方、建德、冀阳等城。九月，拓跋焘攻龙城一时不下，于是引兵西还，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十二月，北燕长乐公、肥如镇将冯崇以辽西郡降魏。燕王冯弘派兵围冯崇于辽西。

延和二年（433）正月，魏帝拓跋焘遣永昌王拓跋健督诸军救辽西，燕兵退走。六月，拓跋健与左仆射安原督诸军击龙城。将军楼勃另率五千骑围凡城，燕守将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余家而还。延和三年六月，魏永昌王拓跋健复率军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还。

北魏太延元年（435）六月，拓跋焘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镇东大将军徒河屈垣等率骑四万伐燕。七月，拓跋丕等到了龙城。燕王冯弘以牛酒犒劳魏兵，献甲三千副，还向魏帝许诺进献季女，并送侍子为人质，屈膝求和。魏军掠男女六千口而还。

太延二年三月，魏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将精骑一万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婴率辽西诸军会战。四月，娥清、古弼攻克

了白狼城。燕王冯弘东依高丽，高丽王派其将葛卢孟光率众数万至龙城迎燕王，高丽兵屯驻临川。燕尚书令郭生因龙城民不愿东迁，于是开城门纳魏兵，魏人怀疑有诈，不敢入城。郭生遂勒兵攻燕王，燕王引高丽兵自城东门入城，与生战于阙下，生中流矢死。葛卢孟光入城，命军士脱掉破烂军装，尽取燕武库精仗服装分给众人，大掠城中。

五月，燕王冯弘率龙城男女东徙，焚宫殿，火旬日不灭。在东徙过程中，令妇女被甲居中，阳伊等勒兵居外，葛卢孟光率骑殿后，方轨而进，前后八十多里。至太延四年（438），高丽王杀燕王冯弘，北燕亡。拓跋焘又尽取大辽水以西地域。

拓跋焘灭了北燕后，剩下的唯一劲敌就是北凉沮渠牧犍了。北魏太延三年（437），拓跋焘把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塞给牧犍做妻子，牧犍不喜欢这位拓跋氏，却喜欢上了嫂嫂李氏。李氏前后曾受到牧犍兄弟三人的爱幸，她嫉恨北魏公主，就伙同牧犍的姐姐想毒死拓跋氏，却没有成功。北魏早就想找茬动武，于是下令征李氏到平城治罪。牧犍不肯，让李氏到酒泉暂且躲避一时。

北魏每次派使者到西域，常使牧犍派向导护送使者出流沙。使者从西域回到武威，牧犍左右的人告诉北魏使者，说："我主得柔然可汗妄言，说：'去年魏天子亲来伐我，士马疫死，大败而还。我擒获了魏帝的弟弟乐平王拓跋丕。'我君大喜，在国内到处宣扬。又听说柔然可汗派使者到西域诸国，宣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再有魏使来，不要接待'。西域诸国都对魏国起了二心。"使者回到平城，把这番话告诉了拓跋焘。焘决心灭掉北凉，又派尚书贺多罗到凉州观察虚实，多罗回，也言牧犍外修臣礼，内实乖悖。

魏帝拓跋焘打算西伐北凉，先问计于崔浩，浩说："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战马三千万匹，途中死伤最多不过八千匹，常年病死也不会超过一

万。而彼以为我衰耗不能复振，今出其不意，大军猝至，彼必惊骇，不知所为，擒他已是必然的事情了。”拓跋焘说："好！吾意也是如此。”于是大集公卿，议于西堂。弘农王奚斤等三十多人都说："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位以来，职贡不缺。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恶未彰，宜应恕宥。国家刚刚征讨柔然，士马疲弊，未可大举。且闻其土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既至，彼必婴城固守，攻之不拔，野无所掠，那就危险了。”

先前，崔浩讨厌尚书李顺。李顺曾十二次出使北凉，拓跋焘一直认为他很能干。牧犍曾几次与李顺一起出游，有时对部下说些对魏主不尊重的话，他怕李顺泄露出实情，贿赂李顺，李顺也常为他隐瞒。崔浩知道这事后，告诉了拓跋焘，拓跋焘还有些不相信。及议伐凉州，李顺也不愿意兴兵，于是与尚书古弼一起站出来说："自温圉水以西至姑臧，遍地都是枯石，水草不生。那里的人说：'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他们闻大军到来，决断渠口，水必乏绝。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奚斤等人的意见是对的。”拓跋焘使崔浩与李顺辩论，众人都不再说什么了，只是担心那里没有水草。崔浩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繁衍？再者汉人终不会在无水草的地方修筑城郭，建置郡县呀！且雪之释，仅能敛尘，何得通渠灌溉呢？这都是些欺诬之辞！”李顺说："耳闻不如目见，吾曾亲眼看见，这还有什么可辩驳的！”浩说："你受人金钱，想为他人游说，以为我目不见，便可欺邪？”拓跋焘在里屋隐听群臣辩论，闻知这事，于是出来见奚斤等，辞色严厉，群臣不敢复言，唯唯诺诺而已。

会议结束，群臣一个个依次退出，振威将军代人伊馥对太武帝拓跋焘说："凉州若果无水草，彼何以为国？众议皆不可用，

宜从浩言。”拓跋焘点点头。

太延五年（439），五月，太武帝拓跋焘在平城西郊誓师。六月，兵发平城，发表讨伐牧犍的檄文，列其十二条罪状，勒令他赶快投降。

拓跋焘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渡过黄河，七月，到了上郡属国城。然后，留下辎重，分部诸军，轻装前进。八月，拓跋焘率军围姑臧（今甘肃武威）。他见姑臧城外水草丰饶，由是恨李顺，对浩说："卿之昔言，今日果然验实。"

九月，牧犍的侄子沮渠万年率所领部众投降了魏军。姑臧城溃，牧犍率其文武官吏五千人面缚请降。魏帝拓跋焘释其缚，以礼相见，收其城内户口二十多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使张掖王秃发保周、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徇诸郡，杂胡降者又有数十万。接着又派兵攻克张掖、乐都、酒泉、晋昌、武威等城，占据了河西地域。北凉亡，拓跋焘迁沮渠牧犍入平城。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拓跋焘赐死了牧犍。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先后灭了赫连夏、北燕、北凉，太平真君四年（443），又攻取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以威制服西域诸国，北败柔然，统一了北方。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二月，拓跋焘率领步骑十万突然南下伐宋，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宋南顿太守、颍川太守相继弃城逃走。悬瓠守将陈宪，奋力抗击四十二天，魏军久攻不下，不得不退走。七月，宋将王玄谟率师北伐，进围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十月，拓跋焘率大军，号称百万，进援滑台，鼙鼓之声，震天动地，宋军仓皇逃走。魏军乘势南下，收复了河南的失地，并在这年的十二月，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临江观兵。至来年（451）正月，魏军因长年征战，兵疲粮缺，并没有能力渡江作战，因而焚烧庐舍，驱赶居民而还。北魏这次南攻，给刘宋以沉重打击。《资治通鉴·宋纪》元嘉二十八年曾这样记载：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戮，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也过半，国人皆忧之。上（宋文帝）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轻易进退，此其所以败也。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而且北魏因连年争战，资财损耗严重，也没有能力兼并江东的南朝，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载记》

《宋书·索虏传》

《魏书》:《太武本纪》、《崔浩传》

《资治通鉴·宋纪》

《通鉴纪事本末》:《魏灭夏》、《魏灭北燕》、《魏灭北凉》

鸠摩罗什译经

鸠摩罗什（344——413），是十六国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的父亲鸠摩琰是天竺（今印度）人，母亲是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人。公元344年，他出生在龟兹，父母为他取名“罗什”，这是梵语的译音，即“童寿”的意思。鸠摩琰本是天竺王室贵族，他聪明有懿节，性情孤僻，不大合群。他厌倦了贵族优裕而无所事事的生活，于是抛弃了相国的继承权，偷偷地出了家，东渡葱岭，来到了龟兹。龟兹国王十分欣赏他的才学，聘请他做了国师，并把妹妹许配他为妻，因生下了小罗什。

罗什7岁那年，随母亲出家，开始诵读小乘教义《毗昙》。9岁时，又跟着母亲到了罽宾（在克什米尔西北），拜槃头达多为师，学习中、长《阿含》小乘佛经。后来又游学到月氏、沙勒。在沙勒，他研读了《六足》，即《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界身足论》等六部佛经论著，还学习了《增一阿含》等经论。又拜佛陀耶舍为师，读《十诵律》。这时的罗什还是一位小乘学者，并旁通婆罗门哲学。此后，罗什又到了莎车，向老师须利耶苏摩请教大乘教义，攻读了《放光般若经》。从此，他的学问兴趣由小乘转人大乘，利用在莎车的两年时间，广泛诵读了大乘经论，精研《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经典，深刻体会其精神奥秘，越来越感到大乘比小乘更能普渡众生。回想起启蒙老师槃头达多的先前教诲，愈发感到有必要把大乘的教义告诉老师。于是动身又回到罽宾，为他

的老师槃头达多讲说大乘妙义。槃头达多起初对此并不感兴趣，还责备罗什说："你说的'一切皆空'的论调是十分可怕的。"罗什十分耐心，反复开导，历时一个多月，终于使老师开窍了。槃头达多越听越着迷，逐渐"感悟心服"了，随即尊罗什为师。他对罗什说："我是您的小乘老师，您却是我的大乘老师呀！"罗什小小年纪，竟把比他大几十岁的老师说服了，使老师由小乘改宗了大乘，说明他读经、讲经是很有感染力的。

随着才学的增长，罗什的佛道震动了西域，龟兹国王又把他迎回了龟兹。他的名声还播扬到关陇及中原地区。前秦苻坚攻破东晋的襄阳，把名僧道安迁到长安，道安向苻坚建议西迎罗什。苻坚也素闻罗什大名，于是在前秦建元十九年（383）派骁骑大将军吕光率军七万西征。临行前，苻坚嘱咐吕光说："听说西域有位名僧叫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当今佛学宗师，我日夜思念能得到他。若克龟兹，立即由驿道快马送他到长安。吕光西渡流沙，征服了焉耆、龟兹等西域东道诸国，索得鸠摩罗什。这时，苻坚在淝水被晋兵打败，长安又受到鲜卑人的困围。吕光欲率军东归，罗什也劝他说："龟兹不是久留之地，可率军东还，沿途自有福地可以择据。"遂行。进至凉州，听说苻坚已被姚苌捕杀，吕光于是在凉州称王，建立了后凉政权。罗什也随吕光滞留在凉州达十六七年之久。这期间，罗什在凉州认真学习，掌握了汉语，为他以后从事佛经翻译事业做了必要的准备。

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出兵攻破凉州，迎取罗什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让罗什住持长安城内草堂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聚集有三千德僧。当时，长安佛教十分盛行，而佛教经典新、旧不一，宗教界常因此引起争论。姚兴想统一教义，重译佛经，于是辟御苑逍遥园为译场，请鸠摩罗什担任译主，并命僧肇、僧叡、道生、道融等八百多人襄助翻译。

后秦皇帝姚兴比较注重学术，对佛经思想也颇有研究。他常

常与罗什讨论佛教经典，晤言相对，从早到晚，对佛经的研究既深刻又细致，二人结成了莫逆之交，探讨经论，穷年忘倦。而且在姚兴执政期间，后秦正是兴盛时期，国力比较强大，长安也相对稳定，这为罗什在此译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罗什自后秦弘始三年（401）入长安，到弘始十五年（413）病死在这里，在长安生活了十二年。他的译经活动从到长安后不久就开始了，一直到弘始十四年（412），前后将近十一个年头。这期间，他才华横溢，硕果累累，每年都有新译经卷问世，甚至一年之内译出数部经书。其前后译经事略，可按年头排列如下：

弘始四年（402）正月十五日，译出《禅经》三卷。又名《菩萨禅法经》。

二月八日，译出《无量寿经》一卷。又名《阿弥陀经》。

三月五日，译出《贤劫经》七卷，又名《贤劫三昧经》、《贤劫定意经》。

十月一日，于逍遥园译出《思益经》四卷。又名《思益义经》、《思益梵天问经》、《思益梵天所问经》。

这年，还译出《弥勒成佛经》一卷。当年就完成了五部经书，共十六卷。

弘始六年（404）四月二十三日，在逍遥园译出《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大品》三十卷。又名《大品般若经》、《新大品经》。这部经典的翻译工作始于弘始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至此，历时整一年才告竣。

这年，还译出《百论》二卷。

弘始七年（405）六月十二日，译出《佛藏经》三卷。又名《选择诸经》、《选择诸法经》。

十月，译出《杂譬喻经》一卷。

十二月二十七日，于逍遥园译出《大智度经》一百卷。又名《大智度经论》、《摩诃般若释论》。这部经典始译自弘始四年夏。

历时三年半，是罗什译经部头最大的一部。

这年，还译出《菩萨藏经》三卷。又名《富楼那问》、《大悲心》、《富楼那会》。

译出《称扬诸佛功德经》三卷。亦名《集华》。

弘始八年（406）夏，于长安大寺译出《法华经》七卷。又名《新法华经》。

同年，在长安大寺还译出《维摩经》三卷。又名《新维摩诘经》、《不可思议解脱》、《维摩诘经》。

于草堂寺译出《梵纲经》二卷。

译出《华首经》十卷。

弘始九年（407），译出《自在王经》二卷。

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至四月二十日，译出《小品槃若》十卷。又名《摩诃般若波罗密》、《新小品经》。

又于大寺译出《十二门论》一卷。

弘始十一年，于大寺译出《中论》四卷。又名《中观论》。

弘始十三年（411）九月八日至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因尚书令姚显之请，译出《成实论》二十卷。

以上罗列，是罗什译经的大概情况，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经典翻译，译本成书年代不清。如《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花经》、《十住毗婆沙论》、《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提婆菩萨传》等。罗什译经数量，史书记载不一。按照《历代三宝记》卷八的说法，是“九十八部，合四百二十五卷”。

罗什译经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其方法基本上是一人翻译，一人对校，大家共同讨论、修改，最后再由译主定稿。如弘始五年四月十三日，罗什在长安城北逍遥园译《大品般若经》，后秦主姚兴也来到这里，并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罗什演讲经卷。罗什通辨汉语，他手拿胡本《大品》，一边念，一边用汉语翻译，若遇到西晋旧译本与原版经文不相符的地方，详加考辨，姚兴手执旧

译本，与罗什的新译互相考校，其旧本与新本不一的地方，全都以义理改正。然后，罗什再与诸宿旧义的沙门释慧恭、僧䂮、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宗等五百人，详其义旨，逐字逐句审定，写成初稿，再进一步校正检括。文既粗定，再以《释论》验之，犹多不尽，于是随检验随修改，直至定稿。

而且，罗什译经与讲经结合在一起，一边讲经一边译经。众多沙门一边听他讲经，一边参与佛经的翻译。译《法华经》时，所受领悟的僧人达八百多人，而且这些僧人都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译《思益经》时，听讲的僧人达二千多人。而且罗什译经、讲经都非常严谨、认真，译《维摩经》时，"手执胡本，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梁僧佑《经录》卷八载僧肇《维摩诘经序》）。罗什兼通梵汉语文，他对佛经的翻译，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天竺国的习俗，十分重视文制格式，讲究韵律入弦，觐见国王的赞铭，朝拜佛祖的歌叹，都有严格的形式。因此，他在译经时，力求文守典丽而不损原意，有时"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出三藏记集》）卷八释僧叡《大品经序》）。他的译文，既不流于生硬的直译，又保存了"天然西域之语趣"，受到了僧侣们的普通欢迎。当时，佛教界把他的译本称作"新本"，称西晋的译本为"旧本"。自"新本"问世，沙门争相诵念，而旧本则问津的不多了。罗什译经，开创了中国佛教译经史上一个新时代，而且也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

罗什在佛学上的主要贡献是译经，著述不多。他的若干著述，后人辑有《鸠摩罗什大师大义》，又名《大乘义章》，共三卷十八章。其章目依次为："答真法身义"、"重答法身义"、"答法身像类义"、"答法身寿量义"、"答三十二相义"、"答受记义"，

以上为卷上；“答法身感应义”、“答法身尽本义”、“答造色法义”、“答罗汉受记义”、“答观佛三昧义”、“答四相义”、“答如、法性、真际义”，以上为卷中；“答实法有义”、“答分破空义”、“答后识追忆前识义”、“答遍学义”、“答住寿义”，以上卷下。罗什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这些著述中。在世界观方面，罗什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主张“一切皆空”，亦即“性空”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者。他说：“从本以来，无所有，毕竟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就是无，一切“有”都是从“空”、“无”中派生出来。在认识论方面，罗什是一个形而上学论者。他说：“所观之法，灭一切戏论，毕竟寂灭相。”“法性常住，如虚空，无有为，无为等戏论”。就是说法性不生不灭永久存在，芸芸众生对法性的体会不能等同而论。具有“钝根”和“中根”的人，不可能体会到法性，只能通过“说法”，达到“断爱”，得到解脱；而具有“利根”的人，才能进入“空”境，达到涅槃。这都表明罗什那特有的形而上学观点。

罗什又是一位佛学教育家。他的门人弟子号称“三千”。比较突出的，有所谓“十哲”，即僧䂮、僧肇、僧叡、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八俊”，即“十哲”的前八名；“四圣”，一般是指僧肇，僧叡、道融、道生。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了名僧，继承发展了罗什的佛学思想，把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牛润珍）

参考资料：

《晋书》：《艺术列传》、《罗什》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杜国庠、邱汉生等：《中国思想通史》

殷浩北伐

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四月，会稽王司马昱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辅佐年幼的穆帝司马聃。转年，庾冰、庾翼与何充等大臣先后故去，朝廷以蔡谟和会稽王共同辅政，因缺乏能臣，卫将军褚裒荐举前光禄大夫顾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三月，顾和任尚书令，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顾和因为母亲去世，居丧守孝，故辞官不受；殷浩也坚决辞让，不肯受命。会稽王司马昱致书殷浩说："国家正值艰难时期，足下沉毅有见识，足以治理国家。若要再推辞逊让，恐怕天下大事去矣。足下的去就，关系时局的兴衰，足下应当深思。"自三月直拖到七月，殷浩才肯接受官职。

殷浩，字深源，其父殷羡字洪乔，曾任豫章太守、光禄勋，著名江南，是东晋放诞豪放的名流。殷浩从弱冠时就有名气，尤其喜好谈玄论道，他与叔父殷融都精通《老子》、《易经》，殷浩议论风生，口似悬河，连殷融也甘拜下风，当时的士人奉之为楷模榜样。殷浩不肯轻易入仕，屡次辞去征辟，曾经被征西将军庾亮任为记室参军，后做到司徒左长史。安西将军庾翼聘他为司马，朝廷封他为侍中、安西军司，他都称病不肯受职。殷浩避居在先人墓地将近十年，人们都认为他是隐居的高士，淡泊名利的贤人，比作管仲、孔明。

是年七月，诏命兖州刺史褚裒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一月，安西将军桓温率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谯王司马

无忌、建武将军袁乔统兵伐蜀。永和三年三月，桓温大军攻克成都，成汉李势兵败，归降晋朝。伐蜀成功，使桓温名声大振，兵威远扬。桓温势力的增强引起朝廷的不安，会稽王司马昱因为殷浩素有名誉，朝野推重服膺，便倚为膀臂，让他参与朝政，想借助殷浩对抗桓温，求得平衡。因此之故，殷浩和桓温相互猜疑，彼此失和，各不相下。

适逢殷浩因父丧丁忧去职，便由蔡谟暂时摄理扬州刺史。殷浩服满后，征拜为尚书仆射，殷浩不肯接受，遂又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预朝廷政务。征北长史荀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素来有才能干练之名，殷浩便提升荀羡为吴国内史，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作为左膀右臂。王羲之以书法精妙名冠天下，而且此人见识不凡，他认为殷浩与桓温失和，内外不协，对国家不利，密劝殷浩与荀羡不宜和桓温结下嫌隙，应释怨修好。殷浩不能采纳。

四年八月，朝廷任桓温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西中郎将谢尚为安西将军。

五年正月，后赵石虎在邺（今河南临漳）称皇帝，到四月，石虎便去世了。其子石世继承帝位，不久石遵废掉石世，自立为帝。桓温闻知后赵发生内乱，便出兵进驻安陆（今湖北钟祥），做收复北方的准备。此时后赵扬州刺史王浃献寿春城归降东晋，晋西中郎将陈逵遂领兵据守寿春。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朝廷，请求伐赵，随后进军泗口（今江苏铜山境内）。朝廷认为褚裒官位高，不宜亲自深入敌境领兵征战，应当先派出一支兵为偏师，以恃慎重。褚裒上奏："前者已经派遣前锋督护王颐之等直指彭城（今江苏徐州），其后又派遣督护麋嶷进兵占据下邳（今江苏邳县），现在应该急速发兵，形成攻势。"

七月，加封褚裒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褚裒领兵三万直奔彭城。褚裒乘后赵内乱举兵北伐，北方士民久经战乱，深受胡族统治压迫，向往晋朝，每天来归附的数以千计，

朝野上下都以为收复中原指日可待，只有光禄大夫蔡谟表示忧虑。有人问起缘故，蔡谟说："大凡在艰难时期顺应天时、救济苍生的，除非圣贤和英雄，他人不能为之。其余平庸之辈则不如度德量力行事。看现在的形势恐怕不是眼下诸公所能胜任的，否则必然落得出师不利，劳民而已。既而才略疏陋，力不从心，财用枯竭，智勇困乏，怎么能不忧及朝廷呢！"

晋兵北伐震动了北方，鲁郡民众五百余家互相联络，起兵归附晋朝，向褚裒求援。褚裒遣部将王龛、李迈率领精锐人马三千前去接应。后赵南讨大都督李农率领两万骑兵拦截晋军，在代陂（今山东滕县）击败晋军，王龛被擒，李迈战死。

八月，褚裒退兵广陵（今江苏扬州），陈逵得知褚裒退兵，焚烧了寿春的物资积蓄，毁掉城垣，也撤兵而回。褚裒因出师不利，上疏朝廷请求自贬官职，朝廷不准，命褚裒收兵，仍旧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解除征讨都督职务。当时后赵已大乱，北方民众二十多万人渡过黄河要来归附晋朝。此刻褚裒已经退兵，无法接应，南下民众陷人绝境，几乎全部死亡。

晋梁州刺史司马勋攻破后赵长城戍（今陕西周至西南），进兵悬钩（今周至西南，长城戍以东），遇到石虎旧部将领麻秋的抵抗，司马勋退回梁州。

十一月，后赵石鉴杀掉石遵夺取了政权。

褚裒回转京口，听到一片哭声，便询问左右侍从，回答他说"这些哭者都是代陂战死将士的家属，"褚裒听后十分惭愧愤恨，从此一病不起，到十二月便去世了。朝廷任命荀羡为使持节、监徐兖二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荀羡时年28岁，是东晋各地镇将中最年轻者。

六年闰正月，北方陷人更大的混乱，冉闵杀死石鉴，自称天王，建立政权，国号为魏。石鉴之弟石祗在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称帝，双方互相攻战。东晋朝廷认为这是出兵收复中原的

大好时机，再度筹划进兵攻伐中原。命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这时氐族首领苻洪派来使者愿归降晋朝，遂封苻洪为氐王、征北大将军、广川郡公，任其子苻健为右将军、襄国公。三月，投降苻洪的石虎部将麻秋借设宴饮酒的机会毒死苻洪，想兼并苻洪部众。苻健杀死麻秋，继其父统领氐族部众。在八月，苻健转向西方发展，率领部下西进入关，乘北方战乱，在关中立足，建立政权。十二月，蔡谟长期称病辞官，穆帝召见他，又不及时入朝，被免为庶人。

永和七年，后赵石祇与魏国冉闵之间的战争更趋激烈，石祇在襄国击败冉闵，遣部将刘显攻打邺城。冉闵战败刘显，刘显回转襄国杀死石祇。此时前燕已准备出兵南下，夺取中原。十一月，石祇部将羌族首领姚弋仲、冉闵部将魏脱，都派遣使人愿归降东晋。晋朝廷便封姚弋仲为车骑将军、大单于、高陵郡公；姚弋仲之子姚襄为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平乡县公；魏脱为安北将军、冀州刺史。

起初，桓温想借后赵石氏内乱之机，上疏给朝廷，请求出兵北伐中原，长久没有回音。桓温知道朝廷对自己存有疑忌，并依恃殷浩抑制自己的力量，心中忿忿不平。桓温素知殷浩的为人和才干，并不惧怕他，便一心发展实力。他统辖的八州之地人力物资，全归自己调用，全不由国家支配。他屡次上表要北伐均被拒绝，便在十二月又上表章，不待朝廷下诏，便率领四五万大军顺流而下，屯兵武昌（今湖北鄂城）。桓温此举使朝廷大为恐慌，殷浩便要辞去职位避让桓温。吏部尚书王彪之向会稽王司马昱进言："这般人都为自身算计，并非要保社稷，为殿下考虑。若殷浩去职，人心离散，大臣分心，天子独坐庙堂。这样一来，负其责任者，不是殿下又是谁呢？"又对殷浩说："对方若要兴师问罪，卿必然是罪魁祸首。事情已成这样，想当个平民百姓，难道就可保全！暂时应该静以待之，使相王写书信给桓温，表示诚心

敬意，陈述成败之理，对方必然回师。对方若不从命，再发下朝廷诏书。再不从命，便可以出于正义予以制裁。为什么无缘无故先匆匆着慌，自己先惊恐呢！”殷浩道：“此事决断不下，我正在作难，终日来烦闷，闻卿筹划，我心中豁然了。”抚军司马高崧当即代司马昱起草书信，向桓温表示坦诚友好，劝其罢兵。桓温接到书信后，遂收兵还镇。

永和八年正月，刘显在襄国自立为帝，冉闵攻破襄国，杀死刘显。这时苻健已经夺取了关中，在长安建立前秦政权，自称皇帝。

殷浩受命之后，便以收复中原为己任，一心准备北伐。尚书左丞孔严向殷浩进言：“近来的形势实在令人担心，不知使君如何决断。愚见以为应当明确受任的职权。当年楚汉战争，韩信、彭越专征伐，萧何、曹参守管钥，内外的任务，各有专司。要深刻反思廉颇、蔺相如委屈求全之义，陈平、周勃交欢共事之谋，使朝廷内外文武协同无间，然后才可以保证成就大功。观察近来降附的诸人，都是人面兽心之辈，贪而无亲，恐怕难以用恩义感化。”一则劝殷浩与桓温修好，二则劝殷浩提防降将的叛乱。殷浩不从其言。

殷浩上疏请求北征许昌、洛阳，朝廷准许之后，殷浩便以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进兵驻扎寿春。谢尚招抚的后赵降将张遇在许昌叛变，令部将上官恩据守洛阳，令一支兵进攻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许昌、洛阳形势有变，叛军据城抵抗，殷浩大军受阻。三月，殷浩命荀羡镇守淮阴（今江苏淮阴东南)，不久，移镇下邳。

姚弋仲死去后，其子姚襄继其父统领部众。姚襄单骑渡过淮河到寿春见谢尚，谢尚素闻姚襄名气，令部下撤去仪仗侍卫，便服接见姚襄，如遇故交。姚襄能说善道，大受江南士人推重，又勇武果敢，被认为是孙策一流人物。

四月，叛将张遇归附前秦，受秦任命，封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此时，魏冉闵被燕慕容儁攻灭，慕容儁在中山（今河北定县）称帝。燕国势力由北向南发展，占据中原，在北方形成前秦与前燕两大政权并峙的局面。

六月，谢尚同姚襄一起出兵攻许昌，进击张遇，前秦苻健立刻遣丞相苻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苻菁领兵到关东开拓疆土，并率步骑二万援救张遇。秦、晋两军在许昌诫桥展开激战，谢尚等大败，阵亡将士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淮南，姚襄丢弃辎重，护送谢尚到芍陂（今安徽寿县南），谢尚便将善后事宜全部交付姚襄处置。殷浩得到谢尚兵败消息，便退兵寿春。秦军得胜，苻雄遂迁徙张遇连同中原地区五万余户民众到关中，留右卫将军杨群为豫州刺史，镇守许昌。谢尚因作战失利，被降为建威将军。

殷浩这次出兵北伐，中军将军王羲之曾经寄书劝阻，殷浩不听。因谢尚失利，殷浩无功而返，便想筹划再举兵北进。王羲之致书殷浩："以区区江左之力争武功，并不适宜。兵败于外，资竭于内，淮河流域也势难保全。不如防守长江，督将各自回归本镇，引咎自责，好好治理内政，省赋役，惠人民，以渡过危机。君以布衣起家，负天下之重任，而兵败丧师，恐怕合朝官员没有人可以替你分担毁谤。若仍然以前事未能成功而遗憾，所以又希求意外侥幸，恐怕天下至大，何地自容?"又给会稽王司马昱致笺说："作为臣子，谁不愿意主上与前世一般兴隆呢? 只是力量不及，怎么可以不权衡轻重而处置。现在虽然有可喜的机遇，但是对内省察自己，所忧要超过所喜。成功尚难预料，百姓却尽遭丧亡，劳役没有休止，征派索取日益加重，以区区吴越之地，想经营规复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却又不度德量力，不困弊決不停手，这是我痛心感叹而又不敢不坦诚吐露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为今后打算，请殿下垂听三思。先做好不能取胜的思想准备，树立这样想法，然后再图后举，谋划也不晚。若不能

实行这一打算，恐怕将来麋鹿游荡，不只是在林薮之地了。愿殿下暂时放弃虚渺久远的计划，解救目前倒悬之急，可称是以亡为存，转祸为福了。”王羲之担心南弱北强，生怕北伐不成引起严重后果，连偏安江南的小朝廷也保不住。

九月，殷浩出兵屯驻泗口（今江苏铜山境内），遣河南太守戴施据守石门（今河南荥阳北），荥阳太守刘遯戍守仓垣。殷浩为北伐军事需要，遣散了太学学生，东晋的学校因此被废止。

十月，谢尚遣冠军将军王侠攻克了许昌，秦豫州刺史杨群退往弘农（今河南陕县）。朝廷下诏召回谢尚，任给事中，戍守石头。

永和十年（354）七月，张遇发动叛乱被杀。自从张遇归降前秦，苻健将张遇的后母韩氏纳为昭仪，常在众人面前对张遇说：“卿是我的儿子呀。”张遇十分羞惭，心里怀恨，便想带领旧部下再归晋朝，于是与黄门刘晃策划夜袭苻健，发动叛乱。这一阴谋被苻健察觉，遂杀了张遇。这一来，张遇旧部孔特在池阳，刘珍、夏侯显在鄠，乔景在雍，胡阳赤在司竹，呼延毒在霸城，都准备起兵背叛前秦，诸将各自拥有兵卒数万，派遣使人见桓温、殷浩，请求救援。

这一时期，姚襄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见北方燕、秦的统治都已经稳固，国力强大，不是北伐的时机，便在淮河流域屯田耕种，训练士卒。殷浩驻于寿春，憎恶姚襄兵力日益强盛，一面囚禁了姚襄诸兄弟，一面多次派遣刺客去刺杀姚襄。刺客不仅没有刺杀他，反而把行刺内情告诉姚襄。殷浩见暗算不成，便想明取。这时安北将军魏统去世了，其弟魏憬代他统领部下，殷浩秘密使魏憬率领五千人袭击姚襄，不料又未成功，姚襄斩了魏憬，兼并了魏憬的部众。殷浩更加嫉恨，令龙骧将军刘启驻守谯（今安徽亳县），迁移姚襄到梁国蠡台（今河南商丘境），上表荐举他任梁国内史。

魏憬的子弟与寿春频繁来往，引起姚襄的疑心和忧惧，便派遣参军权翼去见殷浩。殷浩责备姚襄说："我与姚平北都是晋朝大臣，休戚与共。姚平北寻常做事独断专行，大失做臣子之理，这岂不是有负期望?"权翼答道："姚平北将军英姿盖世，拥兵数万而远来归顺晋室，是认为朝廷有道，宰辅大臣贤明之故。如今将军轻信谗言，与平北将军造成嫌隙，愚见以为猜疑和嫌怨的生成，在此而不在彼。"殷浩又说："平北性情倔强，生杀自主，又纵使小人掠夺我马匹，身为晋朝臣子，难道应该这样?"权翼说："平北归顺圣朝，岂敢妄杀无辜。若依理而论，奸邪小人为王法所不容，杀了又有什么不对!"殷浩道："那么掠夺我的马匹，是何居心?"权翼答道："将军曾经说过：姚平北雄武难于控制，终究要讨伐他。故尔夺取马匹好自卫。"殷浩也无可奈何，只好笑道："何至于竟这样子呢。"不久，姚襄部将有想投效殷浩者，被姚襄杀了。殷浩密谋除掉姚襄。

起初，殷浩曾经秘密派人诱降秦国的大臣梁安、雷弱儿，让他们杀掉秦主苻健，并将关中的统治大权许给他们。雷弱儿等人假意应允，并且请殷浩出兵接应。及张遇叛乱被杀，牵连到秦国一些大臣，苻健之侄辅国将军苻黄眉从洛阳西奔，殷浩以为梁安等人大事成功了，便在十月亲自率领七万大军从寿春北上，准备首先占领洛阳，修复晋帝陵园。吏部尚书王彪之急忙写信给会稽王司马昱，认为："梁安、雷弱儿等人可能有诈，殷浩不可轻率发兵。"司马昱求成心切，不听王彪之的劝阻。

殷浩任用姚襄为前锋。姚襄领兵北进，估计殷浩大军将到，令部下假作夜间逃遁，暗地埋伏人马准备邀击晋军。殷浩闻知姚襄军中发生变故，便率兵追赶姚襄，来到山桑（今安徽蒙城北），姚襄伏兵齐出，向晋军猛击，殷浩中埋伏被杀得大败，抛弃辎重，退往谯城。殷浩部下伤亡士卒上万，军械及物资都被姚襄缴获。姚襄使其兄姚益守山桑，又回军淮南。

殷浩遭袭击，气恨难消，命部将刘启、王彬之攻打山桑。姚襄从淮南领兵出击，与姚益里外夹攻，晋军惨败，刘启、王彬之都战死。姚襄随后占据芍陂。十二月，姚襄渡过淮水，屯兵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招抚流民，掠夺临近地区人口，兵力发展到七万。姚襄在各地分派了地方官，督率百姓务农植桑。又派使人到建康，陈述殷浩的罪状，并表示谢罪。朝廷并不能将姚襄怎样，认为谢尚可以笼络住姚襄，便任命谢尚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历阳。

殷浩连年出兵北伐，军事上屡屡失利，将士伤亡惨重，粮食物资诸备与军械甲仗损耗一空，引起朝野上下一片怨恨。征西将军桓温借机上疏，历数殷浩的过失，请朝廷废黜殷浩。朝廷不得已，便下诏免殷浩为庶人，将他迁徙到东阳的信安（今浙江衢县）安置。从此，桓温在政治、军事上竞争的唯一对手殷浩失去权势，军政大权渐渐落入桓温之手。

殷浩少年时期与桓温齐名，心里常不服气，要和桓温争个高下。桓温得志，殷浩被贬，桓温便对人说："少年时代我与殷浩一起骑竹马游戏，我丢弃的竹杖，他却常常拾取，所以他始终不如我。"又对郗超说道："殷浩有德行，善言谈，前时若让他做令、仆等执政的高官，足以经邦治国，可惜朝廷用非其才。"桓温这话倒是知人之论。

殷浩被废黜流放后，却不说一句怨言。他神态悠闲，不以命运偃蹇为虑，终日谈论吟咏，即便是家中亲人也看不出他有流放的伤感。只是整天用手指在空中指画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殷浩一向喜爱的外甥韩伯，随他一起来到流放地。一年以后，韩伯回建康，殷浩送他到江边，吟诵曹颜远的诗句送别，念道："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为之伤怀泣下。后来桓温执政，想起用殷浩为尚书令，寄书信告诉他。殷浩欣然允诺，兴奋不已，便书写回信，又怕言词有误，反复开封数十次，最后竟然发出一

封空函。桓温因而大不高兴，由此与殷浩断了交往。

永和十二年（356）殷浩去世。

殷浩确是用非其才。他有才学，善辩论，却不谙兵机权谋。朝廷借他压制桓温，殷浩也想在军事上有番建树，最终却落得失败，导致政治上的垮台，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晋书》：《穆帝本纪》、《殷浩传》、《蔡谟传》、《谢尚传》、《苻健载记》、《姚襄载记》

《通鉴纪事本末·江左经略中原》

寇谦之改革道教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成为宗教滋生发展的土壤。在北方，佛教异常兴盛，传播发展很快，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等名僧辈出，佛教徒遍布各地，佛经的翻译研究与佛教寺庙空前兴盛。相比之下，道教的发展势头却远不如佛教。虽然也出现了张巨和、王嚣等一些有名的道士，但是一些道教徒用“李弘”名义发动起义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也有些道人方士为避战乱隐居山林、招聚徒众去修炼学道，处在民间分散的状况。道教旧的道规教义、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在北魏兴起之后，便出现了道教改革活动，创立了新天师道，发起、组织并完成这次道教改革的便是寇谦之。

寇谦之，字辅真，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北）人。生于前秦建元元年（365)。他出身于门阀世家，自称是东汉寇恂的十三世孙，在三国曹魏统治时期，寇氏家族由汉中地区迁人关中。寇谦之的父亲寇修之在前秦时任东莱太守，他的兄长寇讚在北魏初年曾任南雍州刺史。寇氏家族原是五斗米道信徒，受家庭环境影响，寇谦之承袭了道教信仰，喜好修炼仙道，有绝俗之心。他出生后正值前秦苻坚在贤相王猛辅佐下统一北方时期，但不久，经淝水之战前秦失败，前秦政权随即崩溃，北方再度陷人分裂和战乱中。少年的寇谦之学道修炼，接受汉中五斗米道张鲁所传法术，服食饵药，经历数年而无成效。

寇谦之向道的诚心感动了上界天仙，仙人成公兴下凡引导他

入山修炼。寇谦之在姨母家见成公兴佣工耕作，身强体壮，异于常人，便带回家中雇佣耕田，令成公兴开垦舍南田地。寇谦之坐在树下演算，成公兴在田里耕作，不时地来看他演算。寇谦之对他说："你只管用力耕作，看我演算做什么?"如此两三天，成公兴还是常来看他演算。后来，寇谦之算七曜遇到困难，成公兴帮助他很快便解了难题。寇谦之大为惊异，对精通《周髀算经》的成公兴深为佩服，要认成公兴为师。成公兴不肯，只答应做寇谦之的弟子。数日后成公兴说道："先生有意学道，肯和我一起出走隐居吗?"寇谦之欣然应允，遂斋戒三天，二人一同隐入华山。成公兴让寇谦之居住石室，自己出去采药，回来后与寇谦之服食，从此不感饥饿。以后又隐居嵩山，居住在石室中。一年后，成公兴对寇谦之说道："我去后有人拿药前来，只管食用，不要疑虑害怕。"不久，果然有人送来药物，都是些毒虫臭恶东西，寇谦之又惊又怕，逃出石室。成公兴得知后叹息说："先生做不了神仙，只可以做帝王师而已。"两人相处七年，成公兴尸解飞升。传说成公兴是因为失火被谪贬到人间的仙人，被罚做寇谦之的弟子七年。

寇谦之在嵩山专心致志修炼不懈，在神瑞二年（415）十月乙卯（初五日），忽然遇见大神乘云驾龙，百灵引导，仙人玉女左右侍卫着从天而降，称是太上老君，对寇谦之说道："前者在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上表文于天曹，言称自从天师张陵去世以来，人间天师之位虚旷，修善之人失去师承传授。嵩山道士寇谦之诚心修行，我来授你天师之位，赐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此经卷戒律，开天辟地以来人间不传，如今该应运出世。你宣扬吾《新科》，清理整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容有这样的事。要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之法。"又命仙人传授寇谦之服气导引口诀法术。从此寇谦之遂避谷不食，气盛体轻，颜色殊丽，精神健

旺。他的门徒弟子十余人都炼得了这种法术。

泰常八年（423）十月戊戌（初五日），太上老君的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来到嵩山，传授寇谦之《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传道化民，并授他方药炼丹之法。牧土上师又命寇谦之为子，与群仙结成师友。

寇谦之遇仙传经自然是他假托。寇谦之一心修道，随方士入山修炼，因为他不甘寂寞，不能忘情于社会，做不成清修隐居之士。在山中数年，对道教教义、仪式、科条，反复研究反省，随后潜心修改著述，写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和《录图真经》，假托太上老君和李谱文之名，立志要改革道教。他打算把儒家学说和佛教义理融汇到道教中，自己取得道教教主领袖地位，做一番大事业。待准备就绪，寇谦之便出山逐步实现其理想。

寇谦之实行道教改革的有力支持者，是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另一位是司徒崔浩。

北魏统治者拓跋氏属鲜卑族，早在西晋时期道教就传入拓跋部，北魏文帝沙漠汗在晋朝洛阳时，侍从务勿尘信奉道教，传说他在伊阙山成了仙。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也好道。天兴年间，仪曹郎董谧献《服食仙经》数十篇，道武帝下令设置仙人博士官职，设立了仙坊，煮炼百药，封闭西山专供薪蒸，令犯死罪囚犯服用试验，往往被毒死。道武帝和他的儿子明元帝拓跋嗣，都是因为煮炼百药想服食成仙而中毒身亡的。太武帝拓跋焘也热衷于道教，他知道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统治广大汉人，必须利用汉族的思想工具，不仅需要借助儒学，同样需要佛、道二教，有利于统治的宗教自然会被接受。

寇谦之要取得皇帝的认可和支持，还需要借助有力量的人引荐和帮助，寻找到上通帝王的人才能实现其设想。于是他倾心结交太武帝的左光禄大夫、著名儒学家崔浩。崔浩出身于北方显族清河崔氏，门望甚高。崔浩博学善辩，深有谋略，是参预军国大

事的谋划、深得宠信的大臣。有崔浩鼎立周旋，便容易获得朝廷支持。另外，崔浩之母是卢湛的孙女，即东晋天师道起义领袖孙恩的妹婿——卢循的姑母，崔浩与卢循乃是表兄弟，崔浩亦信奉天师道，因此崔浩与寇谦之二人信仰相同。寇谦之要想把儒学融进道教教义，实现"礼度为首"的改革，不能不学习儒学，但是他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并不通儒学，便请崔浩补习指教。另一方面，崔浩与寇谦之的结合也是政治同盟，寇谦之初到魏都平城时，崔浩受北魏鲜卑权贵的排挤诋毁，正赋闲在家。寇谦之要做帝王师，辅佐太平真君，使道教取得国教地位；崔浩也要用儒学改造鲜卑族统治方式，实现儒家政治，二人政教合一来左右北魏政权，各自实现理想抱负。崔浩尽心帮助指点，寇谦之也努力用功，崔浩为他讲述古今治乱兴亡的历史，常常通宵达旦，并应寇谦之请求，撰写历代王朝治国事典并论其大要，上自太初之世，下及秦汉，主旨在于论述恢复五等社会。

始光初年，寇谦之向北魏朝廷献书，起初太武帝并未重视，命他留在仙人博士张曜处。寇谦之游说朝廷的结果，朝野人士半信半疑，只有崔浩大为赞赏，尊他为师，学习法术。崔浩上疏给太武帝，赞助寇谦之弘扬道法，辨明新天师道对经国治世的功用。经崔浩解说，太武帝欣然领悟，于是使谒者备办礼品祭物，祭祀嵩山，迎接在山中的寇谦之弟子们入都，崇奉寇谦之为天师，显扬新天师道法，宣布天下大兴道教。嵩山道士四十余人被迎到都城，在魏都平城东南起天师道场，建重坛五层，一切遵照新道经仪制，供给一百二十名道士衣食职位，按时举行仪式，每月设数千人大会，新道教蓬勃发展起来。

始光三年（426），太武帝想乘夏国主赫连勃勃去世的时机出兵攻打夏国，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畏难不肯发兵。太武帝一时难下决心，便向寇谦之问吉凶成败。寇谦之答道："必能克敌制胜。陛下神武，上应天命，治理邦国，将以武力平定九州，先武

后文，成就太平真君。”太武帝遂决心用武力征服北方。从这一年起，北魏的铁骑连年出击，先后灭掉了大夏、北燕、北凉等国政权，终于在太延年间荡平中原，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宏图，结束了北方的战乱。

在战争中崔浩、寇谦之也随军筹划军务，军事上进展顺利，太武帝更加崇信道教。在北方统一后的太延六年（440），寇谦之到中岳嵩山为太武帝祈福，回来后上奏太武帝："精诚通灵，感动太上老君，授给皇帝太平真君称号，并授冠服符箓。”太武帝甚是得意，下诏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三年（442），寇谦之奏说："现在陛下以真命天子治理天下，建静轮天宫之法，从古以来未有过，陛下应建天宫，登坛接受符书来彰显圣德。”太武帝便听从其建议，亲自到道坛接受符箓。置办的法驾仪仗，旗帜都用青色，遵从道教的颜色崇尚。这个先例一开，以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遵循和履行这套仪式。寇谦之还根据《录图真经》奏请修建静轮天宫，一心要造得高耸入云，听不见人间嘈杂和鸡鸣犬吠之声，以便与神仙相会。工程巨大，花费劳力钱财无数，历年而不成。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便出面反对，向太武帝说："天上人间有别，高下尊卑有定分。如今寇谦之要兴无休止的工程，实现不可能的事，耗费财力，百姓劳苦，是否不当如此？若果然如寇谦之所言，不如在高山之上修建，还比较容易成功。”太武帝虽然以为太子所言有理，只是碍于崔浩赞成，难于违崔浩之意，沉吟了许久才说道："吾也知道此事难成，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又何惜三五百功。”在太平真君年间，崔浩和寇谦之的宠遇极为深厚，道教的发展到了极盛。

凭藉着太武帝与崔浩的支持，寇谦之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道教的设想。

寇谦之猛烈抨击五斗米道旧道法，说五斗米道在三张之后混乱胡行，在革除旧道教种种弊端的同时，援入儒学、佛学的内容

改革道教。首先，他反对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对各地道徒利用道教发动起义，寇谦之认为是大逆不道。他以老君口气斥责作乱者："我极恼怒，借助我的名义的恶人如此之多，愚痴之人竟敢这样!"寇谦之说这般乱民狂诈多端，惑乱万民，是"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的恶人、愚人，与老君不相干，这样的道徒不过是下俗臭肉，奴狗魍魉。寇谦之要改造天师道成为父慈、子孝、臣忠、守本分、遵循纲常礼教的道教。

其次，废除三张时期的租米钱税制度。张鲁统治汉中地区时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不设官吏，用天师道各级首领——祭酒来管理地方，管下的民户也就是道民，要交纳租米钱税。一些道官祭酒敲诈勒索，任意取人财物。寇谦之宣布这是三张伪法，必须按"新科"革除。借老君之口批评说："我当初立天师道传授符箓，岂有取人一钱之法乎?"按新法不准乱征滥收，只收民户每年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锭。若有道官浊心不清除，允许道民提请更换清正者。这便减轻了道民负担，制止道官的贪敛。

再次，革除道教养生术弊端。一些道徒借养生术多行不法之事，像道教房中术变成了淫秽之术，大讲黄赤之道、男女合气之法，以致引导人贪恋纵欲，伤风败俗。寇谦之认为房中术讲求节欲，还精补脑，是健身养生之术。他斥责一些道士妄传张陵所授房中术，损辱道教。寇谦之还批评道教中人滥传服食药物，人人造法，经方成千上万，欺世骗人，甚至害人性命。

寇谦之提出改革道教的道官祭酒世袭制度。旧道规实行父死子继的父子相传，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承，称嗣师；张衡死后其子张鲁继承，称系师。各地的道官祭酒也相沿照办，使一些不肖之徒身任道官，手掌教权，妨害很大。寇谦之说："道尊德贵，惟贤是授，若子胤不肖，岂能继承先业?"提出重视道德，任用贤人，废除世袭旧制，整顿道规。

新天师道又增订了戒律和斋仪。寇谦之写的《老君音诵戒

经》二十卷，主要讲戒律，如：不准犯上作乱，废除租米钱税制，不准欺诈钱财，遵行忠孝等，用来维护统治，维护国家统一。他又增订了斋醮仪范，他说服饵食药，辟谷导引，只可除病去灾，但是要长生就必须诵经礼拜，斋戒修功，感通仙官下降接引，口授诀要，才能飞升成仙。同时还制订了受箓、求愿、犯律解度、为人治病、超度亡灵等各种仪式，制订程序，做了许多新的详细规定。新的科条戒律和仪式，吸引了大批道教信仰者，巩固了道教组织。

旧道教奉"太清玄元无上之天无极大道"为主神，同时也祭祀天地水三官等天官鬼神，具有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特点。寇谦之作《图录真经》称上界三十六天，各有一宫，各有一神主之，是"无极至尊"之神。其次有大至真尊、阴阳真尊、牧土官主李谱文，以及五等天官、赤松、王乔等成仙者，他自己也位列仙班，形成神仙系列。

经过改革后的天师道，原始性减少了，成熟度增加了，儒家纲常伦理思想和佛家礼仪等充实到道教中去，所以又称新天师道，或称北天师道。道教从原始的民间宗教上升为官方正统宗教地位，在北朝发展兴盛起来。

本来北魏统治者对佛、道二教并重，崔浩、寇谦之推行儒、道思想的成功，使北魏王朝的认识产生了变化。太武帝很赏识新道教清静无为，有仙化的教义，表示崇信。司徒崔浩博学多闻，以儒学辅佐太武帝完成文治武功，太武帝对他甚是倚重。崔浩不信佛，屡次诋毁佛教虚诞，费财害民，太武帝渐对佛教产生恶感。太延四年（438），下诏青壮年沙门为民充军。次年魏军攻凉州，因僧侣参加守城抵抗，太武帝要杀尽僧徒三千余人。北方统一后对佛教压迫更厉害，太平真君五年（444）下令，王公庶人不准私养沙门、巫师，过期不出者，巫师沙门身死，主人门诛。真君六年，爆发了盖吴起义。次年二月，在长安僧寺中发现大量

武器，太武帝认为僧人与盖吴通谋，在抄查中又发现了大量酿酒具和私人寄存财物、僧人与贵室妇女私通淫乱的密室。太武帝大怒，下令在全国诛杀僧侣，焚毁经像，发生灭佛事件。

在灭佛事件中，崔浩态度坚决，鼓动太武帝对危害王法礼教的胡神鬼道无情打击。寇谦之懂得佛道一损俱损的道理，不赞成毁佛灭法，与崔浩激烈争辩。真君九年，在灭佛高潮中，寇谦之死去了。死前一日，他说感觉到气息不接，腹中巨痛，次日便死了。

真君十一年，崔浩因为恃宠跋扈，受到鲜卑贵族的嫉恨和仇视，借修撰北魏国史事件被处死，崔氏家族和范阳卢氏、太原郭氏等北方世家大族也受到株连。不久，太武帝也被弑身亡。文成帝拓跋濬即帝位后，下诏复兴佛教，佛教再度兴起。新天师道从鼎盛逐渐衰落，但是，终拓跋魏统治之世，依然保持着官方宗教地位，君主都要受道家符箓。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天师道更加衰落。武定六年（548），手握东魏实权的高澄准备建立北齐，废魏禅代，罢免了天师道的官方宗教地位。北齐天保六年（555）在佛道论争中道教失败，文宣帝高洋下令禁绝道教，命道士剃发为僧。于是，北齐境内道教活动低落到极点。

（吴振清）

参考资料：

《魏书》：《崔浩传》、《释老志》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中国道教史》

徐、傅废少帝

元兴三年（404），刘裕打败桓玄，开始掌握东晋朝政。元熙二年（420）代晋建宋，永初三年（422）病故，前后当政近二十年。这期间，他对外北伐，灭南燕，亡后秦，收复了大片土地，对内平定了桓玄之乱，还采取措施革除东晋弊政。刘裕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整顿吏治，鼓励发展生产。义熙七年（411）会稽大族虞亮因私藏隐户一千余人，被判死刑。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因打击豪强不力而被免职。义熙八年，他下令禁止士族豪强封固山泽，向砍柴捕鱼的农民收税。同年，刘裕大规模推行“土断法”，将北来的流民编入州郡户籍，这样做，既增加了国家控制的人口，又阻止士族豪强非法扩充劳动人手。刘裕还多次下令减免租税。东晋以来百姓欠政府的租债，一部分得到免除。刘裕当政期间，比较清正廉洁，他保存贫穷时所用的物品和农具，用以教育子孙，防止骄奢。他生活节俭，后宫嫔妃不多，无丝竹之乐。地方进贡的琥珀，光色华美，当他得知琥珀可以治疗刀剑创伤时，便将其捣碎分给诸将以备药用。

刘裕在晋末宋初所进行的军事活动和推行的改革措施，对刘宋初年的强盛和“元嘉之治”的出现起了积极作用。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刘裕是汉唐间有作为的帝王，他的功绩不在曹操以下。然而，刘裕死后，朝政开始发生变化。

永初三年（422）三月，刘裕病重。几位朝廷重臣，长沙王刘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

檀道济及太子刘义符等都在刘裕身边伺候。

一天，谢晦私下对刘裕说："陛下年事已高，应该考虑如何使国家大业万世长存，皇位至关重要，不能交给没有才能的人。"刘裕心里明白，谢晦所说的没有才能的人是太子刘义符。刘义符，小字车兵，是刘裕的长子。生于义熙二年（406），其时刘裕已年过不惑，他非常喜欢刘义符。刘裕称帝后，立他为太子，成为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刘义符自幼不喜欢读书，喜欢骑马射箭，颇有勇力。他整天与一帮奸佞小人混在一起，与他们游戏玩乐。许多大臣对刘义符不满，对他将来继位表示担忧。那么，改谁继位好呢？刘裕心里没有主意。于是说："庐陵王怎么样？"谢晦说："臣请求去观察一下。"刘裕点头同意。

庐陵王即刘裕的次子刘义真，他很有才气，但性情轻浮。谢晦前去拜访刘义真，刘义真见谢晦来访，很兴奋，盛情款待，并想与他长谈。而谢晦却对他尚空谈不感兴趣。支吾了几句就告辞了。回宫后，谢晦对刘裕说："义真的德行低于才能，不可为人主。"立刘义真为皇太子的事被搁置起来。

五月，刘裕病危，他把太子刘义符召到床前，告诫他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不像他哥哥檀道韶有一股难以驾驭的气质。徐羡之、傅亮没有其他企图。谢晦多次随我征伐，颇识机变，日后若有变化，一定是他。"说罢，刘裕又写下亲笔诏书："后世若有幼主，朝中政事一概委任给丞相，皇太后不准临朝。"刘裕命令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五月二十一日（癸亥）刘裕去世，终年60岁。17岁的皇太子刘义符即皇帝位，是为宋少帝。

刘义符即位之初，理应为父亲守灵尽哀。但是，他却不在灵堂，整日在后花园与随从练武习阵。只听花园内喊声震天，鼓声隆隆，大臣们都非常不满。老臣范泰上书劝谏道："陛下常在后花园习武练功，鼓声远传至宫外，在深宫深院这样打闹砍杀，实

在不妥。这样做，不但不能威服四夷，还使远近人感到荒唐不堪。陛下只与小人亲近，恐怕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好办法。”刘义符不听范泰的劝告，而且变本加厉，更加放任自己了。

有一天，他突发兴致，命人在华林园开了一排商店，他和随从们装扮成商人和市民模样，买入卖出，讨价还价；又跟左右亲信划船取乐。傍晚，刘义符又与随从去天渊池游玩；晚上也不回宫，就睡在龙舟上。后来，刘义符高兴起来，就搞这种做买卖的游戏。还有一次，刘义符见运河中有埭（小坝），过往船只有困难，用牛牵引行驶。他觉得有意思，便让民工在后花园中模仿破岗埭建造一埭，建成后，刘义符和左右随从拉着船又喊又唱，非常热闹。

对刘义符这些举动，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都非常失望，他们认为刘义符太不称职了。决定废掉刘义符，另立新帝。立谁为帝呢？按照顺序，应立刘裕的次子刘义真。而这几位顾命大臣对刘义真都不感兴趣。刘义真爱好文学，与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之及慧琳道人等情投意合，关系密切。当时，谢灵运任太子左卫率，颜延之任员外常侍。刘义真曾经说：“有朝一日我当上皇帝，就任命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豫州都督。”谢灵运是谢玄之孙，虽才华横溢却性情傲慢偏激，不遵守法令及世俗的约束。朝廷认为谢灵运有文才，但缺乏从政的才干，而谢灵运自认为他有才能，应该参与朝廷机要。常因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颜延之也是孤高自傲，喜爱饮酒，放荡不羁。徐羡之等辅政大臣对刘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交往十分厌恶。刘义真的部下范晏也曾婉言规劝刘义真，刘义真不以为然地说：“谢灵运思想空疏，不切实际，颜延之心胸狭窄，见识浅薄，这正如魏文帝曹丕所说的‘古今文人，多不拘小节呀！’我们几个人性情相投，不能在我得意的时候忘记他们。”依然与他们密切来往。这样一来，徐羡之等人对谢灵运、颜延之更加反感了。他们认为谢、颜

拨弄是非，离间亲王与朝廷的关系，于是贬谢灵运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颜延之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

刘义真对朝廷不满。他当时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任南豫州刺史等职，不断向朝廷索要供应。掌权的朝臣每次都裁减，故意刁难他。刘义真愤懑不平，常发牢骚。他还上书要求回京师建康。徐羡之等人便乘机向刘义符说刘义真的坏话，建议下诏将刘义真贬为庶人。刘义符不知其中的内幕，再加上兄弟二人平时就不和，便同意了。

前吉阳县（今江西吉水东）令张约之不同意将刘义真贬为庶人，上疏说："庐陵王（刘义真）从小就得到先帝优厚的待遇，长大后又与陛下和睦友爱。他也许有违背为臣之道的行为，但他天资聪颖，才华过人，应该对他宽容，发挥他的长处，原谅他的缺点。现在突然剥夺了他的爵位，贬为庶人，不仅伤害了陛下的手足之情，还使大臣惶恐不安。大宋王朝刚刚建立，宗室枝叶未繁，互相之间，应和睦友好，以保证国家稳固。人谁能无过？贵在自新。刘义真是先帝的爱子，陛下的弟弟，怎么可以因为他一时过失，就舍弃放逐！"张约之的话合情合理，但刘义符不但没听，反而将他杀害。

刘义真被废为庶人后，徐羡之等人加紧了废帝的行动。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是刘裕时的大将，握有重兵，在朝廷内外很有威望。景平二年（424）四月，徐羡之将他及江州刺史王弘召入京师建康，把废立皇帝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均表示同意，并留在建康参与谋划。刘义符对徐羡之等人的活动全然不知，每天依旧玩乐游戏，无忧无虑。

五月，徐羡之、谢晦决定动手。谢晦先借口领军府房屋破败，将家人全部迁到别的地方居住。而在府内聚集了军队，又派中书舍人邢安泰和潘盛在宫内为内应，时刻准备动手。起事的前一天晚上，谢晦请檀道济同住一室，谢晦十分紧张，思前想后，

不能合眼；檀道济却倒下便睡。谢晦十分佩服檀道济处事不乱的大将风度。

五月二十五日（乙酉）清晨，檀道济、谢晦领兵在前，徐羡之紧随其后，从云龙门直接入宫。因为邢安泰已提前说服了禁卫军，所以一路上没有人阻拦。檀道济、谢晦等人一直进人天渊池。这天，刘义符玩乐后，没有回宫，在天渊池的龙舟上就寝。檀道济、徐羡之指挥士兵冲上龙舟，这时刘义符还没起床。士兵们先将刘义符身边的两名侍从杀死，刘义符被惊醒，未来得及反抗，手指就被砍伤。几名士兵上前将他推出东阁，收缴了皇帝的玉玺。刘义符被送至故居太子宫。接着，刘义符接到徐羡之等人以皇太后名义下达的命令：他被废为营阳王。另由他的弟弟宜都王刘义隆即皇帝位。刘义符被送至吴郡，软禁在金昌亭。

六月二十四日（癸丑），徐羡之等人派邢安泰前去刺杀刘义符。刘义符平时习武，身强力壮，他奋力反抗，逃出昌门，士兵们从后面赶上，用门闩将他活活打死。为了免除后患，徐羡之又派人将刘义真杀死。

刘义符被杀后，徐羡之等人决定迎立刘义隆为帝。刘义隆，小字车儿，是刘裕第三子。当时任荆州刺史，封宜都王。

景平二年七月，尚书令傅亮率领百官，备齐法驾，前往江陵（今属湖北）迎接刘义隆回京。徐羡之认为荆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担心刘义隆回京时，任命别人为荆州刺史，便以录尚书事的名义，任命谢晦代理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使谢晦成为在外地支持他的力量。

这时，刘义隆已接到傅亮来江陵接他回京继承皇位的报告，也得到了刘义符、刘义真被杀的消息。他非常惊恐。左右诸将也认为，徐羡之等人擅自废立，心不可测，轻率东下，凶多吉少。司马王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威服。虽嗣主违法犯纪，但刘氏仍为人心所向。再说，徐羡之为中

才寒士，傅亮也不过是布衣书生。他们并没有晋宣帝司马懿、王敦那样的野心。他们接受托孤重任，享有崇高地位，一时不会背叛。另外，徐羡之等人功劳地位相同，谁肯服谁？即使他们当中有人图谋不轨，企图背叛，也势必不成。他们不过想牢牢掌握大权，巩固地位，使年轻的君主仰视他们而已！殿下只管长驱六辔，入宫即位称帝，以符天人之心。”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都劝刘义隆动身东行。王昙首又陈述天人符应，说明刘义隆称帝乃是天意。刘义隆经过反复考虑，终于下决心回京师建康。他说：“徐羡之等人受先帝遗命，不至于背义忘恩。而且功臣旧将，布满朝廷内外，现有的兵力足以制服叛乱，我决定东行了！”他命令王华留守荆州，到彦之镇守襄阳。

这时，傅亮等人到达江陵。先在城南立起一座象征性的宫门城门——“大司马门”，然后率百官前往，向刘义隆呈上皇帝的印玺及各种器物。刘义隆发布文告说：“我以微薄的才德，接受大任，实在不安！现在暂且回到京师，哀祭祖先陵墓，并与朝中大臣共议国事，希望诸位大臣体谅我的用心！”

七月十五日（甲戌），刘义隆从江陵出发。临行时他接见了前来奉迎的傅亮。一见傅亮，便失声痛哭，左右众人见状，也一起落泪。过了一会儿，他向傅亮问起刘义符、刘义真被废、被杀的经过，又不禁悲泣呜咽。两侧侍者皆不敢抬头，傅亮被问得汗流浃背，张口结舌。

刘义隆上路后，为防不测，以原府州将士自卫，朝廷所派百官士兵一律不得接近。他的心腹、中军参军朱容子，手持佩刀，日夜守卫在刘义隆所乘船的舱门外，一路上，衣带不解直到建康。

八月，刘义隆到达京师，群臣拜迎于新亭（今江苏南京南）。徐羡之与傅亮见面，问道：“宜都王可与谁相比？”傅亮回答：“是晋文帝、景帝以上之人。”徐羡之听了，说：“既然如此，他

一定能明白我们的一片忠心。”傅亮苦笑着摆摆头说：“不然。”似有难言之隐。

八月初九（丁酉），刘义隆拜谒了父亲刘裕陵墓后，正式登基继承了皇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嘉，是为宋文帝。

徐羡之、傅亮等人废杀少帝刘义符，立宋文帝刘义隆，本有废昏立明之意，但刘义隆能否不计较他们杀兄之仇呢？能否容忍他们掌握朝政大权呢？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即将展开。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宋书》：《武帝纪》、《少帝纪》、《文帝纪》、《傅亮传》、《徐羡之传》、《檀道济传》

文帝图强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人们都在观察这位新皇帝对废杀其兄又立他为帝的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的态度。刘义隆是一位颇有心计的皇帝。他知道，这几位辅政大臣在朝廷内外很有势力，对他们不可贸然触动，只能顺水推舟，见机行事。

他即位不久，便正式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谢晦对此半信半疑，临行前，他向祠部尚书蔡廓辞行。他问蔡廓："你看我能够幸免吗?"蔡廓说："卿受先帝委托辅政，以社稷兴衰为己任，废昏立明，符合道义。但杀了二兄后又北面称臣，则有震主之威。现在你又任荆州刺史，镇守长江上游，以古推今，恐怕难以避免灾祸。"蔡廓的话，使谢晦不禁忧心忡忡，恨不得马上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等船离岸后，他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石头城，暗自高兴，脱口说道："今天终于脱险了!"

接着，刘义隆下令擢升司空徐羡之为司徒，王弘晋升为司空，傅亮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谢晦加授卫将军，檀道济晋号征北将军。

有司奏请刘义隆依照惯例到华林园听取诉讼，处理刑狱。刘义隆下诏说："我对于政务刑法很不熟悉，可以跟以前一样，仍请徐羡之、王弘二公主持。"随后，刘义隆又任命王昙首、王华为侍中，王昙首还兼任右卫将军，王华兼任骁骑将军，朱容子为右军将军。

从刘义隆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看，他对顾命大臣们还是信任

的，同时也把他的亲信提拔了上来。

元嘉二年（425）春正月，徐羡之、傅亮见刘义隆办事有主见，完全能亲理朝政，便上书要求归政。起初刘义隆不答应，经三次上表，才获批准，由刘义隆亲自处理朝廷政务。徐羡之归政后，辞官还家，静心休息。但其侄子徐佩之、侍中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人怕徐羡之一朝无权，便大祸临头，都劝他还是参政为好。徐羡之在众人的劝说下，又动摇了，他向刘义隆表示还要辅政。刘义隆听说后，心里不快，但为了显示自己宽宏大度，还是同意了。于是下诏再次请徐羡之临朝视事。

傅亮、徐羡之把持重权，不肯放手，使侍中王华等人极为不满。王华本来就是刘义隆的亲信，他与步兵校尉孔宁子经常在刘义隆面前捏造罪名，陷害徐、傅二人。刘义隆逐渐对徐羡之、傅亮产生了反感，决定除掉他们。同时他也想将参与废杀少帝的谢晦一并除掉。徐羡之、傅亮在京师，随时可以杀掉他们，而谢晦占据荆州，手握重兵，必须发兵讨伐才行。于是，刘义隆装备战船，锻造武器，宣称将征伐北魏，实际要攻打谢晦。这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徐羡之、傅亮的猜测。这时，宫中也传出刘义隆名为伐北魏实则打谢晦的消息。徐、傅非常紧张，赶忙给谢晦写信，让他早做准备。

元嘉三年春天，谢晦的弟弟黄门侍郎谢皭见刘义隆已做好了讨伐谢晦的准备，即将出兵，便派人飞速通告谢晦。但谢晦仍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谣言，不必相信。并命令谘议参军何承天给朝廷写信，建议朝廷讨伐北魏最好拖延到明年。这时，江夏内史程道惠接到寻阳方面送来的信，信中说："朝廷将有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确切无疑。"程道惠派人将信送给谢晦，谢晦看后，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他问何承天："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办呢？"何承天说："如果皇帝动员全国的力量进攻一个州，力量对比悬殊，您到境外去保全性命，这是上策。其次，派心腹将

领驻守义阳（今河南信阳），您亲率大军与敌人在夏口（今湖北汉水入长江处）决战；如果失败，可以从义阳出境投奔北魏，这是中策。”谢晦沉吟良久才说：“荆州乃兵家必争之地，兵力和粮草容易接济，不妨先与之决战，失败了再走也不迟！”于是命令何承天撰写檄文，正式宣布与朝廷对抗。

刘义隆见谢晦已公开打出反叛的旗号，决定派兵出击。由谁领兵呢？刘义隆打算派檀道济去讨伐谢晦，王华等皆认为不妥。刘义隆说：“废帝时，檀道济只是胁从，不是主谋，而谋杀之事，更与他无关，我安抚而使用他，不必有其他顾虑。”众人同意刘义隆的分析。

出兵以前，刘义隆必须先将徐羡之、傅亮诛杀。正月十六日（丙寅），诏召徐羡之、傅亮。当天，谢晦的弟弟谢皭正在宫中值班，忙派人报告傅亮。这时傅亮已经上路，听说后马上借口嫂嫂生病，要回家探望，并派人转告徐羡之。徐羡之见大事不好，赶忙回到西城，乘车出城，步行至建康城外二十里的新林浦，在一个烧陶器的窑中自杀而死。傅亮也乘车逃出建康城，再乘马奔往其兄傅迪的陵园。刘义隆派屯骑校尉郭泓带兵赶到，将傅亮抓获。在傅亮被杀之前，刘义隆念其前往江陵迎驾之功，派中书舍人转告他说：“念你江陵迎驾心诚，饶恕你的儿子们不死。”傅亮读罢诏书，愤愤地说：“我受先帝之托，辅佐朝政，废昏立明，是为了国家大业，你想把罪名加在我身上，还怕没有借口吗？”于是傅亮被杀。徐羡之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害。

徐、傅被诛后，刘义隆下令讨伐谢晦，他向檀道济询问策略。檀道济说：“我曾经与谢晦一道北伐，当时得以入关的十条计策，有九条是谢晦提出的。谢晦精明老练，善于谋略，但他从没能单独带领部队打过胜仗，在战场上行动，恐不是他的特长。我们彼此了解，可趁他没摆开阵势以前，将其擒获。”

这时，谢晦也得到徐羡之、傅亮被杀的消息。他义愤填膺，

很快召集了三万精兵，并上表称赞徐羡之、傅亮都是忠贞之士，却遭迫害。谢晦还说："我们这些人如果当初想把持朝政，不为国家着想，在废黜少帝时，陛下远在荆州，武皇帝儿子之中尚有幼童，我们完全可以拥戴小皇帝，发号施令，谁敢不同意！怎么会逆流而上三千里，虚位七十多天，去迎接陛下即位！庐陵王刘义真冒犯皇上，死于非命，我们怎敢辜负宋皇室呢！这都是王弘、王昙首、王华一伙阴险狂暴之徒猜忌、挑拨离间造成的灾祸。现在我要发兵清除陛下身边的邪恶之徒。"然后，他亲率大军从江陵东下，直奔建康。刘义隆也指挥军队离开建康。谢晦的军队到达西江口后，正遇大雨连绵，数日不停，参军刘和之建议趁檀道济的大军未到，应速战速决。部将庾登之却畏惧不敢战，让人做了一个大型口袋，装满茅草挂在桅杆之上，声称可以用来焚毁敌人的舰船。可是用火攻须等到天晴，于是军队在此逗留了十五天。再次出兵后，与官军交锋，官军战败，退守隐圻（今湖南岳阳东北）。

正当谢晦为初战告捷而高兴的时候，檀道济率军赶到。谢晦深知檀道济用兵胜自己一筹，不禁大为恐惧。

檀道济率军队到达隐圻后，将战船沿岸停泊。谢晦远远望去，以为战船不多，不以为然，也不马上发动进攻。到了晚上，刮起东风，官军的战船乘风扬帆，发起反击，前后相连，塞满江面。谢晦军队的士气低落，斗志全无。双方交战，谢晦大败，仓皇逃回江陵。谢晦回到江陵后，部将周超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官军，其余部将也都散尽。谢晦又向北逃去，途中被捉住，用囚车送到建康。刘义隆下令将谢晦斩首。

刘义隆诛除了徐、傅、谢之后，重新做了人事安排。任命庐陵王刘义真所亲信的谢灵运为秘书监，慧琳道人因擅长谈论，刘义隆让他参与朝政机要。于是许多人争相求见慧琳，并向他赠送礼物。慧琳脚穿高齿木履，身披貂皮大衣，趾高气扬，人称"黑

衣宰相”。此外，刘义隆对诛除徐、傅有功之臣也分别予以提升。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和江州刺史；到彦之升为南豫州刺史，王华为中护军仍兼侍中。王华认为，司徒王弘是辅弼之臣，王昙首是皇上的亲信，他们的地位与自己相当，他常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能完全施展，故常常叹息地说：“朝中宰相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当时朝中没有固定的宰相，皇帝与谁讨论国家大事，机要大事交给谁办，谁就是宰相。

王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都任侍中，他们精明干练，颇具风采，荣显一时。刘义隆曾设宴款待他们，筵席散后，刘义隆目送他们离去，感叹道：“这四位贤才，是一时之俊杰，像我的喉唇一样重要，恐怕后世很难再出现。”黄门侍郎谢弘微与王华一样也受到刘义隆的重用。他与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等号称五臣。

刘义隆还打算对王昙首、王华等人封爵。一天，他手抚御座对他们说：“此宝座若不是你们兄弟出力，我今天就坐不上。”说罢，他拿出封爵的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坚持推辞，说：“近来发生的事，全赖陛下英明断决，臣等岂可因国家的灾难，而自己获利呢！”刘义隆这才作罢。

刘义隆在诛除徐、傅后，收回了朝政大权，加强了皇室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并让自己的亲信掌管朝政要职，形成了比较得力的统治机构。同时，刘义隆着手进行一些改革。他派使者巡行州郡，考察守宰的政绩，常在延贤堂听讼，以求刑狱公允，还下求贤诏，令各地推举贤能之人。刘义隆很重视农业，采取措施安置流民，鼓励人民耕种土地，养蚕植树，兴修水利。对遭受灾荒的地区则减免赋税。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刘宋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国势强盛。史称“元嘉之治”。

然而，刘义隆并不满足国内局势的稳定，他雄心勃勃，想继承父亲刘裕未竟的事业，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统一中国。

元嘉七年三月，刘义隆下诏选派精兵五万人，由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率领，乘战船进入黄河。出兵前，刘义隆派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对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说："黄河以南本来就是宋国的领土，后来被你们侵占，现在我们将改变旧土，与黄河以北的国家没有关系。"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就已经听说黄河以南是我国的土地。你们休想得到！如果你们一定要出兵攻取，我们现在会撤军相避，等入冬后天寒地冻，黄河上结冰，我们会重新夺过来。"

刘义隆按期出兵。北魏的南方守将连续向朝廷上疏告急，并建议在漳水沿岸建造战船南下，迎击宋军。拓跋焘没有同意，下命令在冀州（今河北冀县）、定州（今河北定县）、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打造战船三千艘，选派幽州以南各地驻军在黄河北岸集结防备。

七月，刘宋军队北上，一路顺利。右将军到彦之率大军从淮河进入泗水，因天旱水浅，每天仅行军十里，从四月出发一直到七月，才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而后进入黄河逆流而上。拓跋焘认为黄河以南四镇兵力太少，命令收缩防线，一律撤到黄河以北。于是在碻磝（今山东聊城东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的魏军相继撤出。刘宋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些地方，夺得了司州、兖州。各路军队都喜形于色，只有安北将军王仲德满面忧愁。他说："各位将军不了解北方的真实情况，一定会中敌人的计谋。现在北魏军队弃城北撤，一定会集结会师。如果黄河结冰，势必再次南下进攻，怎能不让人担忧呢！"

八月，到彦之派副将军姚耸夫渡过黄河，进攻冶坂（今河南洛阳北），北魏派安颉迎战。结果，姚耸夫战败，士卒伤亡很多。接着北魏派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与丹杨王拓跋大毗屯兵黄河北岸，防御到彦之。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十月，天气转凉，北魏加紧了军事部署，刘宋军队也沿黄河南岸布防守军。不久，北魏军队渡过黄河，攻打金墉（今河南洛阳北），金墉城墙破败，城内又无粮食，刘宋守将杜骥及姚耸夫见很难把守，便弃城而走。北魏军队占领金墉城。接着又攻克了洛阳，屠杀守城将士五千余人。杜骥回到京师，把弃城逃跑的责任推在了姚耸夫身上，说："我本打算死守金墉，可姚耸夫一进城转身就走，使城中将士人心涣散，难以挽回。"刘义隆听罢大怒，立即下令将姚耸夫斩首。

这时，北魏军队又攻克了虎牢。刘宋守将、司州刺史尹冲及荥阳太守崔模都投降了北魏。宋军统帅到彦之听到洛阳、虎牢失守，各路军队相继失败的消息，连忙南撤，经济水到达历城（今山东济南），焚毁战船，丢弃铠甲，步行直奔彭城（今江苏徐州）。兖州刺史竺灵秀也放弃须昌，南下逃往湖陆（今山东鱼台南），青州、兖州陷于混乱。

到彦之逃走后，北魏军队赶到，开始进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率几百名士卒奋勇抵抗，北魏军队攻势猛烈，守城军队难以支持，怎么办呢？萧承之想出了一个计谋。他让士兵们都隐蔽起来，大开城门。不少部将不解其意，说："现在敌众我寡，怎么能这样轻敌呢？"萧承之说："我们困守孤城，情况危急，如果向敌人示弱，必定遭到屠杀，只有摆出强大的姿态来等待敌人。"北魏军队见城门大开，怀疑城中有伏兵，不敢贸然进城，于是撤退。与此同时，北魏将领叔孙建带领军队向退据湖陆的竺灵秀发动了进攻。竺灵秀大败，五千多士卒被斩杀。叔孙建获胜后，驻防范城。北魏冠军将军安颉也率军将滑台包围。

刘义隆得到北伐失败的消息极为恼怒，下令将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免职下狱。兖州刺史竺灵秀因弃军逃跑，被斩首。到彦之率军北伐之时，武器及各种军用物资都很充足，等到大败而还，一路上抛弃殆尽，国库因此空虚。

元嘉八年正月，刘义隆派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率兵北上，解滑台之围。抵达寿张后，与北魏军队遭遇。一场大战，宋军获胜。然后，乘战船沿济水，直抵历城。途中，与魏军交战三十多次，大多取胜。檀道济遭魏军堵截，不能进；北魏调集军队，猛攻滑台。滑台守将朱脩之带领士卒顽强抵抗，城中粮食吃光，就用烟熏出老鼠，烤熟吃掉。在外无援兵，内缺粮食的情况下，滑城终于被魏军攻克。

檀道济进军至历城也遇到了断粮的问题，无法继续前进，只好撤军。刘宋军中有个士兵逃走，投降了北魏，将刘宋军队粮尽的困难情况报告了他们。于是，北魏军队全力追击，刘宋军队军心不稳，几乎溃散。檀道济为迷惑敌军，在夜里命士兵把沙子当作粮食，用斗升称量，边称量边大声喊出数字，使北魏军队也能听到。然后用军中仅剩下的米覆在沙子上。第二天早晨，北魏将领见到这种情况，认为檀道济军中的粮食还很充足，一怒之下，杀了降卒。当时，檀道济兵少，北魏军队人多势众，从四方包围了檀道济。檀道济不慌不忙，命令战士都披上铠甲，自己则身穿白衣，十分醒目，带领军队缓缓出城。北魏军队以为有伏兵，不敢接近。这样，檀道济得以安全撤军。

刘宋发动的北伐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檀道济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胆量和智慧赢得了人们的称赞。经过此次战争，宋魏之间二十年间，大体相安无事。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宋书》：《徐羡之传》、《檀道济传》、《谢晦传》、《文帝纪》

文帝诛除彭城王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之后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实行改革，加强集权，出兵北伐，国势强盛。然而，皇室内部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权力之争。其弟刘义康、儿子刘劭都曾觊觎皇权，刘义康被刘义隆诛除，刘劭却将父亲杀死，但没等坐稳龙床，又被其弟刘骏杀死。从此，刘宋皇室骨肉相残，政治日趋腐败。

刘义康是刘裕的四子，永初元年（420）被封为彭城王。历任南豫州、南徐州刺史。元嘉三年（426）任荆州刺史。刘义康聪敏明睿，办事干练，在荆州政绩卓然。刘义隆在诛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之后，为加强皇室对中央政权的统治，便于元嘉六年将刘义康调回京师，任司徒、录尚书事，与王弘共同辅政。刘义康权力欲望很强，他与王弘共同担任尚书，仍感到快快不快，打算代替王弘兼任扬州刺史。王弘见刘义康雄心勃勃，加之自己身体欠佳，便将扬州刺史一职让了出来。刘义隆因身体多病，朝政大事均由刘义康断决。人们知道他手握重权，都纷纷向他争宠献媚。每天早晨，他府第前而常有车数百辆，他对来访者都热情接待，很得人心。连四方所献物品，也将上品献给刘义康，而将差些的给皇帝。有一次，刘义隆吃柑桔，叹息其形状味道太差，当时刘义康正好在座，说：“今年柑桔也有的很好。”于是派人到府中去取，刘义隆拿来一比较竟比自己的大三寸。

一些刘义隆的亲近大臣见刘义康权大势重，也转变了态度，

投靠刘义康。领军将军刘湛原来很受刘义隆信任，后来转而拥护刘义康。刘义隆对此亦有所察觉，心中不快，但表面对刘湛还比较客气。他私下对亲信说："刘湛当初进京时，我与他谈话，常看时间早晚，唯恐他离去。现在我与他谈话，也看时间早晚，是希望他快走。"

刘义康总揽朝政后，感到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对自己构成威胁。檀道济在刘裕时就屡立战功，远近闻名。他左右心腹战将都身经百战，几个儿子均有才气。元嘉初，檀道济击败谢晦，为刘义隆收回朝政大权立下汗马功劳。连刘义隆对檀道济都有几分畏惧心理。领军将军刘湛与檀道济不和，他对刘义康说："皇上身体一直不好，一旦驾崩，檀道济将不可控制，应及早采取措施。"刘义康正想借机除掉檀道济。元嘉十三年，他趁刘义隆病重，召檀道济入京，檀道济的妻子对他说："功勋卓著的大臣，自古以来都易被猜忌。如今没有战事，却召你入京，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檀道济到建康后，刘义隆的病情开始好转。一个月后，刘义隆让檀道济回到江州任所。檀道济的船还没有离岸，刘义隆的病又加重，刘义康见机会到了，便矫诏召回檀道济，将他逮捕。三月，檀道济及其儿子被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檀道济的两员心腹战将薛彤、高进之。他们二人勇猛善战，人们把他们比作关羽、张飞。

檀道济被逮捕时，怒不可遏，目光如炬，把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说："你们是在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北魏人听到檀道济被杀的消息非常高兴，都说："檀道济死了，东吴那帮小子就不值得我们害怕了！"

元嘉十六年，刘义康进位为大将军，权势更为显赫。他独揽朝政，专权横行。尚书仆射殷景仁秘密对宋文帝刘义隆说："相王刘义康的权势太重，对国家不利，应加以抑制！"刘义隆虽然当面未作表示，心中却深以为然。

司徒左长史刘斌与刘湛是同族人，他与从事中郎王履、主簿刘敬文等人都善于阿谀奉承，排挤别人。他们常周旋在刘义康身边，他们见刘义隆多病，都说："皇上一旦驾崩，应该拥立年长的人为君主。"很显然，这位年长者是指刘义康。刘义康听说后，也不制止。有一次，刘义隆病情严重，让刘义康起草顾命诏书。刘义康回到府中，将此事告诉刘湛等人，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刘湛愤愤地说："天下艰难，幼主为政怎能承担！"刘义康听了，沉默不语。

为使刘义康当皇帝，刘湛等人加紧活动。刘义康的亲信孔胤秀特地去尚书仪曹，索取当年晋成帝去世，改立其弟晋康帝的材料，为刘义康继承帝位做准备。后来刘义隆得知此事，非常恼火，又考虑到解决刘义康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暂且忍耐一时，但对刘义康开始有所戒备了。

刘义康想让亲信刘斌担任丹阳尹，便向刘义隆提出刘斌家贫，还没有说完，刘义隆就说："可以让他去吴郡。"后来，会稽太守羊玄保请求调离，刘义康又想让刘斌接替他。就上奏刘义隆说："羊玄保请求调回，不知陛下欲以谁为会稽太守？"当时，刘义隆尚未确定此事，一见刘义康，就随口答道："我已用了王鸿！"又一次使刘义康的打算落空。

十月，刘义隆认为刘义康企图谋反的事实已经明显，势必酿成祸乱，决定铲除刘义康势力。他先将刘义康的亲信刘湛逮捕并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刘湛的党羽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刘义隆起用被刘义康等人排挤的殷景仁和檀道济的亲信沈庆之负责逮捕，处理此事。刘义康见阴谋败露，便上疏请求辞职，刘义隆念其是自己的兄弟，命他仍为江州刺史、侍中、大将军等职，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另外，又任命司马萧斌为刘义康的谘议参军，领豫章太守，大小事皆由他处理；任命龙骧将军萧承之率兵驻防戒备。

在追随刘义康的人中，有二位没有被杀。一位是车骑将军徐湛之。他是刘裕长女会稽公主之子，平时与刘义康关系十分密切，刘义隆对他极为不满。刘义康失败后，徐湛之被捕，罪当处死，其母会稽公主求见刘义隆。会稽公主在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大，而且性情泼辣，刘义隆也听她的。会稽公主手中有一件刘裕贫贱时穿过的破旧衣服，这是刘裕当皇帝后交给会稽公主保存的。刘裕还对会稽公主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把此衣拿出给他看。"会稽公主抱着衣服，见到刘义隆，也不顾君臣之礼，放声大哭，用力把绸缎包裹的旧衣服扔在地上，悲痛地说："你家本来出身贫贱，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做的衣服。今日才有一顿饱饭，你就想杀我的儿子！"刘义隆连忙施礼，请会稽公主息怒，表示赦免徐湛之的死罪。另一位被赦免的是吏部尚书王球的侄子王履。王球淡泊于名利，名声很好，为刘义隆所重。王履却热衷于名利，与刘义康及刘湛关系密切，王球多次劝告，他都不听。诛杀刘湛的那天夜里，王履惊慌失措，光着脚跑到王球家相告，王球让人给王履穿上鞋，端上酒为他压惊。责备他说："我平时对你怎么说的？"王履战战兢兢，说不出话来。由于刘义隆尊敬王球的缘故，王履被免一死，撤职还家。

刘义康被贬江州后，会稽公主非常担心刘义隆对他下毒手。一次，刘义隆到会稽公主家赴宴，席间，会稽公主突然起身跪在地上，向刘义隆叩拜行礼，泪流满面，不胜悲伤。刘义隆不明其意，赶忙上前将姐姐扶起，会稽公主说："车子（刘义康的小名）晚年，陛下一定不能容他，今天特地求你饶他一命。"说罢又放声恸哭。刘义隆也流涕不止，他手指埋葬其父的蒋山发誓说："请大姐不必担心，我若违背今天的誓言，就辜负了长眠地下的高祖皇帝！"说罢，他把正在饮用的酒封起来，送给刘义康，并附了一封信，说："我与会稽姐宴饮，想起了你，特将余酒封送。"会稽公主卒于元嘉二十一年，在此期间，刘义康一直平安

无事。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散骑侍郎孔熙先等人阴谋刺杀刘义隆，拥立刘义康。事情败露后，刘义隆感到刘义康仍然是自己帝位的威胁者，他除将范晔、孔熙先及其党羽斩首外，又将刘义康削爵，贬为庶人，在宗室中除名，徙往安成郡（今江西安福东南）。

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军队南下侵宋，攻到了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形势危急。刘义隆生怕有人再次拥戴刘义康进行叛乱，太子刘劭和武陵王刘骏等也几次劝刘义隆早日处死刘义康以免后患。于是，刘义隆派中书舍人严龙带药赐刘义康死。刘义康拒绝服药，说："佛教不许自杀，愿意随意处死。"严龙就用被子捂住他的头，将其活活闷死了。

刘义隆杀死了弟弟刘义康，自以为皇帝宝座稳固了，没想到两年之后，他又死于亲生儿子之手，刘宋皇室陷人了骨肉残杀的血雨腥风之中。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刘义隆的皇后袁氏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皇子刘劭。袁皇后把孩子搅在怀里，仔细端详，越看越不顺眼。忙派人向刘义隆报告，说："此儿相貌异常，日后必会破国亡家，不能养他！"刘义隆早就希望有个孩子，听说袁氏果然生了儿子，喜出望外。但一听说袁氏要杀掉孩子，不禁大惊失色。他三步作二步，直奔后殿，劝阻袁皇后住手，才保住了刘劭的性命。

元嘉六年，立刘劭为皇太子。刘劭长大后，美须眉，大眼方口，倒是相貌堂堂。但是性情粗暴，遇事独断专行。刘义隆多病，为防止皇权被他人篡夺，他让刘劭参与朝政，以锻炼从政能力。但是，刘劭刚愎自用，与刘义隆关系越来越紧张。

元嘉二十九年，有一位名叫严道育的女巫，自称能不食人间烟火，驱使鬼神做事。由于东阳公主婢女王鹦鹉的推荐，可以出

入公主家宅。刘劭及兄弟刘浚和东阳公主的黄门陈庆国等人也相信这些巫蛊之事，并一起活动。他们用玉石雕刻了一座刘义隆的像，埋在含章殿前。东阳公主去世后，陈庆国怕事情败露，便向朝廷自首，揭发了事情的全过程。刘义隆听后大吃一惊，立即命令逮捕王鹦鹉，并从她家搜查出刘浚、刘劭相互往来的几百封信。上面皆是巫蛊之言。还在含章殿前挖出了玉雕刘义隆像。刘义隆下令严厉追查此事，严道育畏罪潜逃，刘劭、刘浚非常害怕，一再向父亲承认错误，要求处罚。刘义隆对这两个儿子又失望又伤心，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最终没忍心处罚他们。

刘义隆非常痛恨女巫严道育，派人到处搜捕。严道育将自己改扮成尼姑，藏匿在太子宫内，后来又随始兴王刘浚到了京口；有时还藏在京口人张旿家中。一天，刘义隆接到密报，严道育正在张旿家中躲藏。他立即派人前去捉拿，但只捉到了严道育的两个婢女。二人交待说，严道育已跟随刘浚回到了京师建康。刘义隆一直以为刘劭、刘浚知错改过，与严道育断绝了关系，谁知他们关系还如此密切！他惊骇不已，命令将二婢女从京口押往京师，重新审问，待弄清事情真相后，再给刘劭、刘浚治罪。

刘浚的生母潘淑妃深知事情的严重性，非常害怕，抱住刘浚，哭着说："你上次与严道育一起搞巫蛊之事，已经败露。当时我希望你仔细反省自己的过失，万没想到你把严道育窝藏起来。皇上现在大发雷霆，我叩头乞求他开恩都无济于事，事到如今，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快拿药来，我先喝下自尽，我实在不忍心看你遭受杀身之祸！"刘浚听完母亲的哭诉，二目圆睁，跳起来说："自己做事自己当，事情不久就见分晓，请母亲放宽心，我决不会连累你！"

刘义隆对刘劭、刘浚兄弟已完全失望，他打算废黜太子刘劭，并对刘浚赐死。但是，再立谁为太子呢？刘义隆再三考虑，举棋不定。刘劭是长子，刘浚是次子，废掉他们，接下去应立

三子武陵王刘骏。但刘义隆不喜欢刘骏。他宠爱的是四子南平王刘铄和七子建平王刘宏。这两个人哪个为太子呢？他还没考虑成熟。侍中王僧绰见刘义隆优柔寡断，非常着急，对刘义隆说："立太子之事，宜早不宜晚，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拖延下去，事情一旦泄漏，容易招致意外之祸。"刘义隆认为王僧绰的话很有道理，但还是犹豫不定，难下决心。

正在刘义隆反复斟酌立太子之事的时候，刘劭加紧了发动政变、夺取帝位的准备。

起初，刘义隆认为皇室力量强大，唯恐发生内乱，特别加强了太子宫的兵力，使之与羽林军的兵力差不多，实际兵力达到了万人。这些本来是刘义隆的依赖力量，现在成为刘劭反叛朝廷的工具。为了笼络人心，刘劭几乎每天都在太子宫大摆宴席，犒劳将士们。他还亲自前来敬酒。大臣王僧绰将此事秘密报告了刘义隆。

元嘉三十年二月二十日，刘劭伪造刘义隆的诏书，说："鲁秀图谋反叛，命令你清晨守住宫门，率领部队人宫。"于是，他命令心腹张超之组织起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夜里，他将亲信萧斌、袁淑、殷仲素、王正见召人宫中，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主上轻信谗言，将要废掉我。我自思无过，不能受此冤枉。明天早晨，我将采取行动，希望诸位和我共同努力。"说罢，他起身向各位一一跪拜。诸将听后十分惊愕，没人敢说话。过了一会儿，袁淑和萧斌说："自古以来没有此事，希望再认真考虑。"刘劭听罢大怒，脸色非常难看。萧斌一见，感到害怕，连忙说："请殿下息怒，我们当竭尽全力执行命令。"只有袁淑坚持己见，他说："你们以为殿下真要这样吗？殿下小时候曾得过疯病，现在可能是旧病犯了。"刘劭更加生气，斜着眼看着袁淑拉着长声说："你看我的事能不能办成？"袁淑说："成功不会有问题。我是担心你在事成之后，将为天地不容，大祸也会降临，我劝你把念头打

消!”左右人没等袁淑的话说完，便把他拉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建康城内的人们还在熟睡，皇宫大门紧闭。刘劭身穿朱色朝服，内穿戎装，与萧斌一同乘坐画轮车，带着侍卫随从直奔皇宫。行到东宫西门奉化门时，又将袁淑召来，经过几次催促，袁淑才很不情愿地跟在车后。刘劭命令他上车同行，袁淑推辞不肯上去。刘劭大怒，他想起昨天袁淑对自己的顶撞，对袁淑更加憎恨，便喝令左右将其杀死。将尸体扔在路边。这时，宫门打开，刘劭从万春门进去，按照惯例，太子宫卫队是不能入宫的，刘劭拿出伪诏给守卫看说：“我奉皇帝旨令，进宫讨伐叛逆，不得阻挡。”说着，率领队伍直奔刘义隆居住的合殿。刘劭的心腹张超之等人冲在前面。昨天晚上，刘义隆与徐湛之密谋了一夜，早上蜡烛还没有熄灭，合殿的卫兵还在睡觉。刘义隆听到脚步声，睁眼一看，只见张超之拿着刀已经站在他的床前。他慌忙举起床边的小几抵抗，张超之大喝一声，举刀便砍，刘义隆的五个手指全被砍掉；接着又一刀，将刘义隆杀死。

这时，刘劭来到合殿中阁，知道皇父已死，心中大喜，立即坐在中堂，萧斌持刀在身旁。刘劭传中书舍人顾嘏前来见他，顾嘏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迟疑了半天才来到刘劭跟前。刘劭生气地问道：“皇帝想把我们废了，你为什么不早来报告?”顾嘏还没答话，便被刘劭一刀杀死。一些宿卫将领听说皇上被弑，忙率兵抵抗，左细仗主卜天与来不及披上铠甲，就一手拿刀一手持弓，大声呼唤左右人出战，他拉满弓，用力向东堂射出一箭，几乎射中刘劭。经过一场激战，卜天与负伤身亡。刘劭又将刘义隆左右亲信数十人杀死，占领了皇宫。

刘劭见大局已定，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登基即位。但他想到三弟刘骏拥有重兵，若得知他弑父称帝，一定会出兵讨伐，不如先下手为强，便写下诏书让亲信沈庆之带诏前去杀害刘骏。

这时刘骏已得到刘劭称帝的消息，他怒不可遏，立即发兵，

向建康进发，一路发布檄文，希望各地共同讨伐刘劭。

四月，刘骏的先锋部队到达建康附近新亭，沿途许多将领归顺了刘骏。刘劭感到前景不妙，无计可施。不久，刘骏也到达新亭，并在这里称帝，随即向建康发动了进攻。刘劭的军队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四散而逃，刘劭只身一人躲进了武库中的一口井中，被卫队队副高禽抓获。刘劭被杀后，刘骏成了刘宋的第三位皇帝，这就是宋孝武帝。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宋书》、《南史》：《宋文帝本纪》、《刘义康传》、《檀道济传》、《王履传》

孝武诸王之祸

元嘉三十年（453），刘劭杀死了父亲宋文帝刘义隆，夺得了帝位。不久，他又被弟弟刘骏杀死。刘骏即帝位，是为宋孝武帝。刘骏心狠手毒，他在位八年，对宗室诸王大肆屠杀，使朝政十分昏暗。

刘骏是刘义隆的三子，但是，皇父看不上他，而四弟刘铄、七弟刘宏却受到刘义隆的宠爱。以至刘义隆欲废太子刘劭而另立太子时，竟根本不考虑排行老三的刘骏。刘铄也不把三哥看在眼里。刘骏对刘铄十分憎恨，他即位不久，便秘密派人将毒药放人食物中，刘铄食后中毒死亡。

刘骏除掉刘铄后，又将叔叔刘义宣列为打击对象。刘义宣是刘裕的第六子，生而舌短，口齿不清，羞于在人前讲话，也不受父亲的喜爱，初封竟陵王，后改封南谯王。刘裕因荆州地处长江上游，是军事重镇，临终时，遗诏要诸子轮流镇守。刘义隆继位前就曾任荆州刺史。后来，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也先后任此职。元嘉二十一年（444）宋文帝任命刘义宣为荆州刺史。太子刘劭杀害刘义隆自立为帝后，刘骏在江州起兵，刘义宣也起兵响应，在讨伐刘劭的战争中，战功卓著，被列为第一等。

刘骏对六叔刘义宣心存疑忌，不愿意让他久居荆州。即位不久便下诏改封刘义宣为南郡王，立刘义宣次子刘恺为南谯王，内调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在荆州十年，兵强地广，财产丰富，不愿意进京，于是上表谢绝。刘骏无奈，只好任命刘义

宣为荆、湘二州刺史，刘恺为宜阳县王。

刘义宣自以为讨刘劭立有战功，又有皇叔的身份，因此十分骄横，做事独断专行，对朝廷的要求都必须满足。而对朝廷的法令制度，只要不同意，就不执行。刘骏对刘义宣更加憎恨，寻找机会要将他除掉。

江州刺史臧质是刘义宣的表哥，他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足可称为盖世英雄。他见刘义宣庸暗易制，打算表面拥戴刘义宣称帝，再趁机推翻他。然而，刘义宣已拥戴刘骏称帝，臧的计谋未能得逞。在平定刘劭之乱中，臧质也立下功劳，居功自傲，看不起刘骏。州中的各种政事，他们擅作主张，从不奏请刘骏批准，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得知刘骏荒淫无道，奸淫了刘义宣留在建康的几个女儿，刘义宣气愤不已，便派人向刘义宣游说，劝刘义宣起兵推翻刘骏 。刘义宣的心腹将领蔡超、竺超民等人想领先臧质的武力得到荣华富贵，也劝说刘义宣接受臧质的建议。刘义宣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娶了臧质的女儿为妻，与臧质是儿女亲家，臧质肯定不会有其他想法，便采纳了臧质的建议，决定起兵。为了壮大力量，刘义宣于孝建元年（454）正月，秘密派人前往寿阳（今安徽寿县）邀请南豫州刺史鲁爽一同起兵。本来，他们约定在当年秋天共同起兵，使者到达寿阳时，正赶上鲁爽喝醉了酒，他听错了使者转达刘义宣起兵的消息，十分震惊，只好与臧质仓促起兵响应刘义宣。同时刘义宣向朝廷上表，宣称自己受到皇帝身边小人的谗言陷害，所以才起兵诛君侧之恶。这时刘义宣兼有荆、江、兖、豫四州的军事力量，声势浩大，威震远近。刘骏感到朝廷的力量不是对手，想奉所用乘舆法物前去迎接。竟陵王刘诞坚决反对，他说：“你怎么把帝位轻易让给他人！”刘骏只好作罢。急忙调兵遣将，准备迎敌。

刘骏派将领柳元景、王玄谟等人率兵讨伐刘义宣。刘义宣、臧质则亲率十万大军，沿江东下。双方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

南）、梁山（今安徽当涂西南）相遇，展开激战。结果叛军大败。臧质逃至武昌，在南湖被追兵抓住杀死。刘义宣逃到了江夏，听说巴陵有朝廷的军队，又赶忙逃往江陵。跟随他的士兵差不多都散逃了，他仅带着十几个人跑到江陵。这时，江陵仍有甲士上万，左右侍从翟灵宝劝刘义宣出来抚慰将士，以利再战，并教给他说："因臧质违反命令，而导致我们失败，现在我们应重新整治武器，训练将士，重振士气……从前汉高祖刘邦百次失败，终成大业……"谁知刘义宣讲话结结巴巴，还忘了翟灵宝所教之语，说成"项羽千败。"惹得将士掩口窃笑。刘义宣心情沮丧，已无心再战，打算跟随部将鲁秀一起逃命。这时宋军杀到，江陵城内一片混乱。刘义宣只身一人逃到南郡的一座空房躲藏起来，部将竺超民见大势已去，派人将刘义宣抓获，投入监狱。刘义宣懊丧地坐在监狱的地上，不住地叹息道："臧质这个老奴害了我！"

刘义宣被抓的消息传到建康，刘骏非常高兴。但他不想亲自杀掉叔叔，以免落得不好名声，于是让王公以及八座给荆州刺史朱脩之写信，让他处置刘义宣。信还没能送到，朱脩之已入江陵，杀了刘义宣，同时，诛杀了刘义宣的十六个儿子以及同党竺超民、蔡超等。

刘骏除掉了刘义宣，保住了皇位。通过此事，他感到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主要是在皇室内部，因此，他对叔弟们进行更为严厉的监视和控制，一旦发现他们有不轨行动，便毫不留情地予以制裁。

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年轻爱游戏。一次，他与左右侍从写了一份檄文，自称楚王，改年号为永光，设置文武百官，以此进行取乐。长史王翼之把刘浑亲笔写的文告呈报了朝廷。刘骏见后大怒，下令将刘浑废为庶人，流放到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刘骏还觉不解恨，又派人狠狠责备刘浑，逼他自杀。

在诸王中，刘骏最不放心的是六弟竟陵王刘诞。刘诞待人宽厚有礼，在诛杀太子刘劭和讨伐刘义宣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而刘骏十分荒淫，脾气暴躁，大臣们人人自危，许多人都拥护刘诞，暗中归附于他。刘诞又多聚才力之士，广蓄精甲利兵，刘骏对他又嫉恨又害怕，不愿让他在京师任职，便下令他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后又嫌他在京口离建康太近，将他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另派他的心腹大臣刘延孙镇守京口，加强防守。

刘诞知道刘骏猜忌自己，也在暗地做应变的准备。大明三年（459）夏天，北魏南侵，刘诞乘机在广陵修筑城墙，疏通护城河，积蓄粮草。这时，民间纷纷传言刘诞将反，吴郡人刘成见有机可乘，便上书诬告刘诞私修乘舆法物，演习皇帝出行的仪式，有篡位之心。刘骏接报，十分恼怒，立即下令垣阆、戴明宝带兵袭击刘诞。垣阆等到达广陵时，刘诞还没有发现。戴明宝连夜通知刘诞的典签蒋成，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打开城门作为内应，蒋成把这事告诉了府舍人许宗之。许宗之见事态严重，又赶忙报告了刘诞。刘诞闻讯，大吃一惊，立即集合将士，逮捕了蒋成，下令军队做好自卫准备。拂晓时，戴明宝与垣阆率兵攻城，见城门没有打开，感到意外；这时，刘诞站在城墙上，指挥将士守卫，他见攻城军队形不整，立即下令出击，混战中，垣阆被杀，戴明宝从小路逃回。

刘骏见刘诞势力强盛，又派身经百战的大将沈庆之率兵讨伐。沈庆之率军来到广陵城下，刘诞登上城楼，对沈庆之说："沈公已是垂白之年，何苦来到此地呢？"沈庆之回答说："对你这个狂妄愚蠢的叛贼，不需要青壮年出马，你快快投降！"说罢，下令将士攻城。刘诞拼死抵抗，沈庆之身先士卒，冒着飞箭和石头，勇猛攻城。终于攻克广陵，将刘诞斩杀。

刘骏听说广陵已攻克，刘诞被杀，非常高兴，他走出宣阳门，命令左右一起高呼万岁，众人遵命欢呼。只有侍中蔡兴宗面

色严肃，毫无兴奋神色。刘骏不解问道："卿为何不欢呼?"蔡兴宗说："陛下诛杀亲兄弟，应该痛哭流涕，怎么能让大家欢呼呢?"刘骏听后很不高兴。

为发泄对刘诞的余愤，刘骏下令将广陵城内所有居民，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杀掉。沈庆之认为不妥，请求留下五尺以下的男子，其余男子全部处死，女子全部赏给将士们做妾或婢女。这样，被杀者仍有三千多人。刘骏还命令将死人的头颅送到石头南岸，堆成一座高台，侍中沈怀文劝阻，刘骏不听。

刘骏在位期间，诛除了他所嫉恨的诸王，自以为朝政稳定，独断专行，不听劝谏，对大臣无端折磨，视为奴仆。朝中大臣差不多都受过他的侮辱。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是先朝老臣，因是北方人，刘骏便称他为"老伧"；颜师伯牙齿长露在唇外，就称其为"大板牙"；其余大臣均有绰号。黄门侍郎宗灵秀身体肥胖，拜起行动不便，每次上朝，刘骏都故意赏赐物品，让他一次次地跪接谢恩，看他笨拙的动作取乐。每次宴会时，他一定让群臣喝醉，让他们互相嘲谑为嬉。沈怀文平时不爱饮酒，又不爱开玩笑，刘骏对他十分不满，认为他故意与自己作对。一些同僚也劝沈怀文要识时务，顺从刘骏，避免灾祸。沈怀文说："我从小就如此，怎能一下子改过来?不是我想与众不同，而是本性就这样。"刘骏得知后，开始冷落沈怀文，后寻找借口将沈怀文杀死。

刘骏残杀诸王，疏远大臣，却信任出身微贱的寒人。这些人虽然担任典签、中书通事舍人等地位很低的官职，但由于受到宠信，都可以把持朝政大权，监视诸王和大臣。如戴法兴、戴明宝、蔡闲等人是刘骏任江州刺史时的典签，后随刘骏举兵讨伐刘劭，刘骏即帝位后，任用他们三人为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参与朝政的决策。这些人依仗皇帝的势力，把持大权，营私舞弊，多纳贿赂，任用亲信，为所欲为，使朝政更加混乱。

大明八年（464），刘骏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他诛杀诸王

和疏远大臣，落得众叛亲离，身边没有心腹大臣。而太子刘子业年仅 16 岁，是一个很不安分的浪荡青年。刘骏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由刘子业继位。为稳定政局，由江夏王刘义恭与尚书令柳元景辅佐朝政。

五月，刘骏病死。太子刘子业即位，刘宋王朝更加混乱的一幕开始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宋书》、《南史》：《宋孝武帝本纪》、《刘诞传》、《刘义宣传》、《刘浑传》、《沈庆之传》

宋帝狂暴

大明八年（464）五月，宋孝武帝刘骏病死，其子刘子业继位，是为前废帝。转年，刘子业被杀，其叔父刘彧称帝，是为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刘彧病死，其子刘昱继位称帝，是为后废帝。这几个皇帝在位期间，是刘宋王朝政治最黑暗、最肮脏、最混乱的时期。帝王荒淫奢侈，狂暴肆虐，宗室间骨肉残杀，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

刘子业是宋孝武帝刘骏的长子，小字法师，生于元嘉二十六年（449），少时爱读书，尤其爱好历史，对历代兴衰替代颇为熟悉。刘骏称帝后，他被立为太子。刘子业生性急躁，常常受到父亲的指斥。后来，刘子业的生母王皇后失宠，殷淑仪因年轻貌美受到刘骏的喜爱，他生的儿子刘子鸾也非常得宠。这使刘子业更成为刘骏的眼中钉。一次，刘骏西巡，刘子业写信请安，字迹有些潦草，受到刘骏的狠狠责备。刘骏说："你的脾气反复无常，写字又不长进，怎能承担大业?"刘子业虽然表面上承认错误，表示悔改，但内心里并不服气。后来，刘骏曾有废刘子业立刘子鸾为太子的打算，只是由于大臣的极力劝阻，才没有改立。这件事使刘子业对父亲和弟弟子鸾十分怨恨。

刘子业继位后不久，便下令废掉刘骏时所立南北驰道和孝建年间以来所改制度，恢复文帝元嘉时期的制度。吏部尚书蔡兴宗不满意刘子业的做法，气愤地对颜师伯说："先帝虽非盛德之主，不过始终没有离正道，古人云：'三年不改父亲的制度，才是难

能可贵的'。如今先帝去世不久，陛下对所有制度不论是非，一律改变，虽然是改朝换代，也不至于如此。"

后来，刘子业又令在太庙画诸祖考的像。画成后，他前去观看，在刘裕的画像面前，他翘起大拇指赞叹道："好一位大英雄，生擒数天子！"对文帝画像，他说："这位也不错，但晚年还是被儿子砍了头。"在父亲刘骏像前，他很不高兴，用手指着像说："他是个大酒糟鼻子，为什么不画上？"立即命令画工在孝武帝的鼻子上加了许多酒糟红包。

对生母王太后，刘子业毫无感情，他称帝后，太后病重，派人召他前去。刘子业说："病人那里多鬼，哪能到那样的地方去。"太后听人报告后，大怒，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周围的人说："快取刀来，剖开我的肚子，我怎么生下这样的混帐儿子！"不久，太后病故。

刘子业年纪不大，却十分凶恶残暴。即位之初，还勉强接受太后、辅政大臣及戴法兴等人的管束，不敢任意妄为。等到太后一死，他开始放肆起来。几位辅政大臣刘义恭、柳元景、沈庆之、颜师伯等胆小怕事，只是刘骏的佞幸戴法兴出面限制，甚至告诫刘子业："你这么乱来，难道是要当营阳王刘义符么！"刘子业心中忿忿不平。刘子业宠信宦官华愿儿，常赏赐给他大量财物，戴法兴经常加以扣减，华愿儿对此怀恨在心。刘子业派他到宫外察听民情，他回来报告说："外面人们都在议论：'宫中有二个天子，戴法兴是真天子，您是假天子。'您深居宫中，不与外界接触，现在戴法兴与太宰刘义恭及颜师伯、柳元景串通一气，来往宾客随从常有数百人，京城内外官民没有不畏惧、服从他们的。戴法兴是先帝的亲信，久在宫中，长此下去，恐怕皇帝的宝座就不是您所有了。"刘子业听后，感到戴法兴的确对自己有威胁，立即下诏免去戴法兴的官职，遣返乡里，徙往远郡，后又赐死。

起初，孝武帝刘骏对周围的人十分猜忌残忍，王公大臣做事都十分谨慎，互相间不敢随便往来。刘骏死后，太宰刘义恭等松了一口气，互相庆贺说："从今天开始，免于横死了。"安葬刘骏后不久，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等在一起不分昼夜地歌舞宴饮。刘子业得知后，心中十分不满。戴法兴被杀后，这些人都感到恐惧。柳元景、颜师伯打算密谋废黜刘子业，推刘义恭为天子。然而，他们空有此谋，虽日夜商议却迟疑不决。于是柳元景找到了沈庆之，把计划告诉了他。沈庆之听后，沉吟半天，并不表态，柳元景只好闷闷不乐回府。沈庆之送走柳元景，反复寻思，他与刘义恭平时就没有多少交情，而颜师伯又目空一切，独断专行。本来，在刘骏遗诏中，沈庆之也是参与朝政大臣之一，然而，颜师伯却将沈庆之拒之门外，朝政从不和沈庆之商量。颜师伯还对尚书令史讲："沈庆之不过是个爪牙而已，怎能参与政事！"沈庆之对此怀恨在心。这么一想，他断然向刘子业告发了柳元景、颜师伯等人的阴谋。

接到沈庆之的密告，刘子业极为震惊，立即率亲兵将刘义恭抓获。斩首后，又砍断其肢体，掏出肠胃，挖出眼球后用蜜汁浸泡，称之为"鬼目粽"。刘义恭的四个儿子也被杀害。捕杀刘义恭的同时，刘子业又下诏召柳元景进宫，并派士兵跟随，柳元景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便神态安详地向老母告别。随后，穿戴好朝服，坦然地登车入宫。其弟司马柳叔仁却身着戎装，欲率左右将士抗拒，柳元景苦苦劝阻。车刚出巷口，朝廷军士便将车包围，柳元景面色镇定，下车受刑。他的八个儿子，六个弟弟也同时被杀害。颜师伯也在路上被抓，和他的六个儿子一起被处死。

新安王刘子鸾当年曾得到父亲刘骏的宠爱，刘子业还险些被废。刘子业十分憎恨刘子鸾，派人命刘子鸾自杀。刘子鸾年仅七岁，临死时，悲愤地对左右人说"愿我来世不要生于帝王之家。"刘子鸾的同母弟，南海王刘子师和同母妹也同时被杀。为解除心

头之恨，刘子业还命人开掘殷贵妃墓，抛尸荒野；他还打算开掘刘骏的景宁陵，太史认为这样做对他不利，极力劝阻，刘子业才罢休。

刘子业诛杀了顾命大臣和新安王刘子鸾，扫除了他把持朝政的障碍，从此他肆无忌惮地淫乱享乐，对不中意的人残酷迫害，手段极其狠毒。他常常带领亲信出宫游玩，不理朝政，再也无人劝阻。沈庆之因告发柳元景，成了刘子业的宠臣，刘子业出游时，常让沈庆之同车陪驾。刘子业有个姐姐山阴公主，名刘楚玉，嫁给驸马都尉何戢。她特别淫荡放纵，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一次她对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说是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陛下六宫妃嫔数以万计，而我却只有驸马一人，此事太不公平！"刘子业听后，欣然应允，为山阴公主选了三十位貌美风流的男宠，作为面首，送给姐姐。又将公主进爵为会稽郡长公主，地位和郡王一样。吏部郎褚渊仪表堂堂，英俊漂亮，山阴公主十分爱慕，请求刘子业让褚渊做她的侍从。褚渊无奈，侍奉公主十几天，受尽公主逼迫，他苦苦哀求，誓死不从，才得以脱身。

刘子业也淫乱不已。他的后宫中有一位"谢贵嫔"，实际是他的姑姑刘英媚。刘英媚嫁给宁朔将军何迈，后被刘子业偷偷纳于后宫，对外则诈称公主去世，将一宫女的尸体送往何迈府中，以掩人耳目。然而这一拙劣的伎俩却骗不了何迈。何迈秘密联络将士，准备在刘子业出游时将其废杀，另立刘骏第三子、晋安王刘子勋为帝。但不慎事泄，刘子业亲自带兵诛杀了何迈。

刘子业总感到自己的皇位不稳。尤其对几位叔叔既害怕又猜忌，担心他们推翻自己。于是把他们都集中在建康，拘于殿内，对他们百般侮辱虐待，肆意折磨。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都很肥胖，刘子业把他们分别放人竹笼中过秤，刘彧最肥，取名为"猪王"、刘休仁为"杀王"、刘休祐为"贼王"。

东海王刘祎傻乎乎的，被称为“驴王”。因刘彧、刘休仁、刘休祐三人年长，被刘子业视为心头之患，一直囚禁着他们，而且常常叫他们跟着自己，不许离开。桂阳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年纪尚小，行动还比较随便。刘子业常拿他们开心取乐。他曾叫人用木槽盛饭，加以杂粮搅拌，又在地上挖坑，里面灌进泥水，让“猪王”刘彧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在坑内爬行，还让他像猪一样用嘴吃槽子里的食物。刘子业在旁边看得哈哈大笑。他多次想杀掉几位叔叔，幸亏建安王刘休仁机智善谈，每次都用讨好献媚的话取悦刘子业，才保全了这几个人的性命。一次，刘彧不慎得罪了刘子业，刘子业立即下令将刘彧的衣服剥光，将手脚分别捆上，用木棍穿起，几个人像抬猪一样抬到太官处，并对左右说：“今日屠猪！”刘休仁见状，赶忙说：“猪不该杀。”刘子业问：“为什么？”刘休仁知道刘子业将少府卿刘曚之妾藏在宫中，准备等她生下儿子后立为皇子，便笑嘻嘻地说：“待皇子降生再杀猪取其肝肺。”刘子业听了这话，才消了气。说：“暂且把他交付廷尉。”第二天，刘彧被放出。

刘子业自以为天下无敌手，狂妄已极，荒淫无耻。一天，他下令召诸王妃、公主、郡主等入宫。在他面前站成一排，命令左右侍从当众奸淫她们。南平王刘铄的妃子江氏誓死不从，刘子业大怒，下令杀掉江氏的三个儿子，又命人打江氏一百鞭。还有一次，刘子业在华林园内的竹林堂中游玩，他淫兴大发，命令宫人都脱光衣服，赤身裸体互相追逐取笑，有一宫女不从命，被刘子业当场杀死。刘子业玩耍了一天后，晚上就睡在竹林堂。夜里，他梦见一个女子走到他面前，骂道：“我已向上帝控告你了！”刘子业心惊胆战，他让巫师为他占梦，巫师说：“竹林堂有鬼。”于是刘子业再也不敢在竹林堂住宿了。但他不甘心，当天晚上，他又带着一群巫师和宫女在竹林堂射鬼，以发泄心头之恨。

正当刘子业乱杀人射鬼的时候，宫中主衣阮佃夫、寿寂之，

细铠将王敬则，中书舍人戴明宝等人正在密谋除掉这个昏君。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晚上，刘子业射鬼完毕，正要奏乐庆祝，寿寂之等人举着刀冲到刘子业面前。刘子业大吃一惊，赶忙拉开弓箭向寿寂之射去，但没有射中。这时，竹林堂内一片混乱，宫女们惊恐万状，拼命向外面逃奔，刘子业也仓皇出逃，边跑边喊："镇静！镇静！"寿寂之紧追不舍，赶上刘子业，举刀砍去，刘子业惨叫一声，当时毙命。刘子业被杀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他的尸体停在太医阁口，无人理睬。几天后，新上台的刘彧才将尸体收殓下葬。

刘子业称帝仅一年，但是，他的狂暴、荒淫却是历史上罕见的。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宋书》、《南史》：《宋前废帝纪》、《柳元景传》、《刘彧传》、《刘休仁传》

刘氏相残败亡

泰始元年（465）十一月，前废帝刘子业被杀，湘东王刘彧在兄弟和大臣的簇拥下登上皇帝宝座。刘彧，字休炳，小字荣期，是宋文帝刘义隆第八子，刘子业的叔叔。在刘子业称帝期间，最嫉恨的就是刘彧。百般折磨，甚至想杀害他。刘彧心里虽然恨透了这位丧失人性的侄子，但为了活命，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恭顺、服从的样子。

当刘子业在竹林堂射鬼的那天晚上，刘休仁、刘休祐都随其左右，唯有刘彧未被征召，他一个人在秘书省里，心中十分恐惧，担心大祸临头。正在他焦虑万分之时，刘休仁冲进屋来，一见刘彧便跪下来称臣。没等刘彧明白过来，又拉着刘彧来到西堂，因为走得仓促，刘彧的鞋也掉了，光着脚，头上仍然戴着黑帽子。刘休仁让他坐稳后，找了一顶天子应戴的白帽子给刘彧换上，然后下令准备好羽林军仪仗队。这时刘彧才知道刘子业已被杀死，众人推举他代行天子事。十二月初七（丙寅），刘彧正式称帝（即宋明帝），改年号为泰始。

刘彧称帝后，刘氏宗室内部并没有安定，为争夺皇位，他们明争暗斗，大打出手，骨肉相残的闹剧此起彼伏。

泰始二年（466）正月，刘彧的侄子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称帝，改元义嘉，公开与刘彧抗衡。其实，刘子勋年仅10岁，并非有如此野心，而是在府州长史邓琬挑动下，才这样做的。邓琬对刘彧称帝不满。他认为：晋安王刘子勋在兄

弟中排行老三，其父孝武帝刘骏也是排行老三。当年，刘骏也是从寻阳起兵夺取帝位的，刘子勋如果起兵，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刘子勋称帝后，他的七弟、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和六弟、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豫州刺史殷琰等都起兵响应。一时间，建康朝廷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丹阳、淮南等几个郡，而这几个郡中又有不少县起兵响应刘子勋。形势对刘彧极为不利。他焦虑万分，急召众臣商讨对策。蔡兴宗说："现在几乎举国反叛，我们应该镇静，以诚待人。叛者的亲戚遍布朝廷，若对其绳之以法，我们就会立刻土崩瓦解。而应强调父子兄弟之间，犯罪互不株连的大义，民心安定之后，将士才能有斗志，这样，定能战胜叛军。"刘彧认为蔡兴宗的分析有道理，于是分兵三路，一路向西，由刘休祐指挥，攻打寻阳。一路向东，由刘休若指挥沈怀明、张永、萧道成等讨伐会稽叛军。

东路军开始出师不利，后来出现转机，接连获胜。寻阳王刘子房战败被活捉。东方平定以后，刘彧调集军队增援西路军，经过激烈战斗，刘彧军队攻入寻阳，晋安王刘子勋被杀。不久，又攻陷荆州。

刘彧平定这次叛乱之后，将参与叛乱的临海王刘子顼、安陆王刘子绥、邵陵王刘子元赐死。寻阳王刘子房被押送回京师，刘彧恕其罪，将他贬为松滋侯；对刘骏的其他九个儿子，仍如平日一样对待。对此，刘休祐认为不妥，他说："这些兄弟将来很可能要闹事，不如早些除掉他们。"刘彧听后也感到后事不可预料。他仅有太子刘昱一人，而三兄刘骏儿子众多，将来恐势大难制。经过再三思考，刘彧决定先下手为强，除掉他们。于是他下诏，将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淮南王刘子孟等全部赐死。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到这时全部死光了。

然而，刘氏宗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到此停止。没过多久，刘彧又开始了诛杀兄弟的行动。

事情是由柳欣慰等人打算拥立太尉庐江王刘祎引起的。刘祎是刘彧的八哥，因为人品庸劣，众兄弟都瞧不起他。刘彧称帝后，虽然任命刘祎为中书监、太尉，但大事从不与他商量。对此，刘祎心怀不满。泰始五年，柳欣慰等谋反，想拥立刘祎为帝，刘祎便与他相互勾结起来。柳欣慰又拉拢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杜幼文向刘彧告了密。刘彧大怒，立即下诏贬刘祎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并将柳欣慰等全家杀害。不久，刘彧又授意有关部门上奏，告刘祎对皇帝心怀不满，口出怨言，请求追查。刘彧先是故作姿态不准奏；然后又下诏免去刘祎的官爵，并派人逼刘祎自杀。

泰始七年以后，刘彧身患重病，他生怕大权旁落，越来越猜忌，残忍。他相信鬼神，忌讳很多。言语、文书之中，凡有祸败、凶丧及相似的字眼都要回避，规定了成百上千条。不慎违犯忌讳的人常常被开膛斩首。

他对自己的弟弟们很不放心，生怕他们篡夺政权，便计划将他们除掉。刘休祐在刘彧兄弟中排行第十三，镇守江陵时，贪虐无度，百姓怨声载道。刘彧调他另任南徐州刺史，但只让其长史、司马去代行府州政事，而把他留在建康。刘休祐性情暴烈凶狠，多次冒犯刘彧，刘彧积恨在心，寻找机会要干掉他。

泰始七年二月，刘彧与寿寂之策划了杀死刘休祐的计划。这一天，刘休祐随刘彧外出射雉。傍晚将返时，有一雉不肯入场，刘彧命令刘休祐射杀这只雉，并对他说："得不到雉，就不要回来。"刘休祐只好单人骑马而去，他的随从因为分散都没有随他前往。刘彧见刘休祐走远，立即向寿寂之示意，寿寂之领会刘彧的意思，带着几员武士尾随刘休祐。这时，太阳落山，天色转暗，刘休祐在山间东张西望，寻找野雉，忽然看见寿寂之等人赶到，他不由一惊。只听寿寂之大声喝道："刘休祐快下马受死!"刘休祐哪里肯服，他勇壮有气力，挥拳左右出击，众人不得靠

近。正在相持中，有一人窜到刘休祐背后猛然把他拉下马，寿寂之等人上前，将刘休祐活活打死。随后，寿寂之派人飞告刘彧："骠骑落马而死。"刘彧听后，知道事情已经办妥，但表面却装作惊讶的样子："休祐身材高大，落马可不容易呀！"还让御医前去检验。这时，刘休祐的左右随从也赶到，发现他已死去多时了。

刘休祐之死，使刘彧的几个弟弟内心十分恐慌，始安王刘休仁预感到，刘彧下一步要诛杀的就是他了。

刘休仁在刘氏兄弟中排行仅次于刘彧，二人年龄相仿，情趣相投。但是，身患重病的刘彧担心的是自己死后大权旁落，于是对刘休仁也起杀机。五月初一（戊午），刘彧召刘休仁进宫朝见，对刘休仁说："今晚你先在尚书下省安歇，明天一早再来见我。"当天夜里，他派人带着毒药赐刘休仁死。刘休仁一见，破口骂道："你能得天下，是谁的力量！孝武帝谋杀兄弟而子孙断绝；今日你又重蹈覆辙，宋的统治怎能长久！"说罢，将毒药一饮而尽。

刘彧害死了弟弟刘休仁，良心也似乎受到了一些责备。他常对人说："我与刘休仁年纪差不多，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他建功立业，功勋不少，可是，事到临头，我不得不先下手除掉他。想来真令人悲痛。"说罢，泪流满面。

刘彧兄弟中最小的刘休若也没能逃脱被杀的下场。刘休祐死后，建康民间流传谣言，说巴陵王刘休若有至贵之相。当时，刘休若正任荆州刺史，刘彧写信将此言告诉了他，刘休若一见，惊恐不安，担心大祸将临。不久，刘彧任命刘休若接替刘休祐为南徐州刺史。刘休若的心腹将领都认为，刘休若只要回到建康，肯定难逃大祸。刘休若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赴任。到达京口时，他听到刘休仁被毒死的消息，更加恐惧。刘彧认为刘休若性情温和，很得人心，担心将来夺取幼主刘昱的帝位，更坚定了他除掉刘休若的念头。可是刘休若不在京师建康，正任南徐州刺史，手

握重兵，不宜轻易使他就范。经过反复考虑，刘彧想出了一个计谋。他假装调刘休若为江州刺史，并亲自写信给刘休若，热情地召他来建康，参加七月七日的皇家宴会。刘休若按期回到建康。刘彧马上派人到其宅“赐死”。

刘彧除掉刘休若之后，只剩下一个弟弟桂阳王刘休范了。他人品低劣，才能平庸，不会威胁幼主，故得以保全性命。

刘彧为了让儿子平稳接班，将自己的兄弟诛杀殆尽。他在临终前，又设计将重要帮手寿寂之杀掉，为儿子称帝扫清了道路。

泰豫元年（472）四月十七日（己亥）晚上，刘彧去世。转天，他10岁的儿子刘昱即皇帝位。刘彧虽然为儿子继承帝位绞尽了脑汁，但是他没有治国安邦之术，却擅长滥杀骨肉兄弟，其子刘昱也把这套学到了。刘昱在位期间，宋王朝内乱不已，政治更加昏暗。

刘昱称帝后，首先遇到了叔叔刘休范起兵谋反事件。

在刘彧杀戮诸弟之时，刘休范因无能而免遭一死。然而，刘昱称帝后，刘休范这个言讷辞拙的平庸之辈，自以为宗室中他最亲近，应该居宰辅之位。但刘昱并不重用他，于是愤愤不平，招募勇士，密谋起事。元徽二年（474）五月，刘休范自江州反，他率军沿江而下，直取建康，朝廷面临严重威胁。这时右卫将军、卫尉萧道成提出了防守对策，拖住叛军，伺机反攻。大臣均表示赞同。萧道成率军队还击刘休范，大获全胜，刘休范被杀。刘昱的皇帝宝座没有被推翻。

打败了刘休范，刘昱自以为天下太平，其狂暴、放肆的性格开始暴露，太后太妃及辅政大臣都控制不住他了。他当太子的时候，常在宫中胡闹，父亲刘彧多次让他母亲陈太妃打他。刘昱当皇帝后，便没有人敢管束他了。他喜欢出宫游逛，起初出宫，还有整齐的仪仗队；后来他觉得仪仗卫士碍事，就把他们丢在一边，仅带几十名随从，或跑到郊野，或进入市场，到处游玩。他

的生母陈太妃怕出意外，常乘车在后面跟随，监视他。刘昱一见母亲赶来，便纵马疾驰，一跑就是一二十里，把陈太妃远远甩在后面。

刘昱出行，常穿短裤、短衫，他到处都去，夜晚就在旅店投宿，有时白天累了就睡在道路旁边。他随心所欲，无日不出，或夕去晨返，或晨出暮归。出行时，他骑马在前，随从们手持兵器紧随其后，路上的行人，不论男女老幼，还是牛马牲畜，只要被他们碰上，立即诛杀。老百姓一听刘昱将到，无不四散躲藏，家家户户关闭门窗，商业店铺停止营业，路上行人断绝。

刘昱性格十分暴戾，特别爱杀人，一天不杀人就闷闷不乐。他让随从带着钳、锥、凿、锯等刑具，看到谁不顺眼，便顺手抓起凶器，当场将人杀死。每天受刑的常有数十人之多。朝廷大臣无不惧怕他，整日战战兢兢，吃饭睡觉都不安稳。元徽五年四月，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密谋废黜刘昱，不料消息走漏，刘昱将阮佃夫捕杀。不久，又有人上告，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佃夫合谋。刘昱立即带人去这三家，不论大人小孩全部诛杀，将尸体割裂。沈勃当时正在家里守丧，刘昱先赶到，卫队还没有到，他挥刀直冲而入，沈勃自知不能幸免，赤手空拳与之搏斗，他猛击刘昱面颊，唾骂道："你的罪恶超过桀纣，死期不远！"刘昱大怒，亲手将沈勃杀死。

刘昱是个杀人狂，迫害狂，他的倒行逆施，经常受到皇太后的训斥，刘昱不服气。端午节时，太后赏给刘昱一把羽毛扇，刘昱嫌扇子不够豪华，便动了杀机。他让御医配制毒药，毒死太后。左右人都劝阻道："皇上如果要做此事，便应作孝子，否则就不能随便出入宫门玩耍游戏了！"刘昱想了想，说："你们的话有道理。"于是打消了杀太后的主意。但是，他还是寻找机会，以杀人为乐。有一天，他来到领军府，当时正值六月，天气炎热，萧道成正裸身躺在那里睡觉。刘昱看着萧道成的大肚皮，顿

生邪念。他把萧道成叫醒，在他肚子上画上箭靶，然后拉满弓就要发箭。萧道成见状大惊，急忙说："老臣无罪，请手下留情！"刘昱的随从王天恩说："萧领军肚子是射箭的好靶子，要是一箭射死了，以后就射不成了。不如改用圆骨箭头，这样可以多射几次。"刘昱觉得有理，便让人换箭；一箭射去，正中萧道成的肚脐。他得意洋洋，把弓扔到地上，大笑着说："看我这箭法怎么样！"萧道成足智多谋，刘昱十分嫉恨他，他曾在宫中亲自磨刀，并扬言："明天杀掉萧道成！"其母陈太妃骂他说："萧道成为国家立了大功，如果杀他，谁还愿意替你效劳呢！"刘昱才住手。

刘昱的狂暴、残忍，使萧道成等人十分忧虑，生怕被刘昱无端杀害。他与中书令袁粲、中书监褚渊等密谋废黜刘昱，另立新君。有人建议萧道成去广陵，在那里起兵攻打建康，但萧道成认为把握不大。他的部下刘善明、垣荣祖都建议萧道成沉住气，等待时机，干掉刘昱。他的族弟萧顺之、次子萧嶷都认为，刘昱喜爱单独出来游逛，可乘他不备时下手。越骑校尉王敬则主动为萧道成侦察刘昱的行踪，他每晚身穿黑衣趴在路边观察刘昱的举动。萧道成还让王敬则秘密与刘昱身边的卫士们联络，准备伺机行事。

七月六日（丁亥）晚上，刘昱身着便服，仅带了几个随从出来游逛，走到领军府门口，有一个随从对他说："领军府的人都已睡熟，我们翻墙进去玩玩吧！"刘昱说："今天晚上，我要到别的地方玩个痛快，明晚再来。"员外郎桓康在领军府内听得清清楚楚，并告诉了萧道成。萧道成听后，感到杀刘昱的时机到来了！

七月七日（戊子），刘昱乘坐露车前往台冈与左右随从比跳高，然后又到青园尼姑庵玩耍。当天晚上来到新安寺偷了一只狗，在昙度道人那里杀掉，煮狗肉吃。边吃边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到宫中仁寿殿就寝。他身边有一亲信叫杨玉夫，平时很

得他欢心。那天晚上，不知为何，刘昱突然对杨玉夫憎恨起来，一见面就咬牙切齿地说："明天我要杀了你，挖出你的肝肺！"杨玉夫惊慌不已。这天夜里是传说天上的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深夜，刘昱命令杨玉夫到殿外观察星星，说："你看见织女星渡河时，马上叫醒我，看不见，就杀死你。"杨玉夫知道刘昱杀人不眨眼，心中更是害怕。当时，刘昱出入无常，宫内各门夜晚都不关闭，官员们值夜班因怕碰到刘昱，都不敢出屋；宿卫士兵也都躲避起来，殿省内外无人管理，互不相关。这天晚上，王敬则在宫外观察动静。

杨玉夫无端遭到刘昱的憎恨，越想越怕。他想：不如趁刘昱睡熟将他杀掉。于是，他与早已投靠萧道成的杨万年一起来到刘昱的下榻处，先轻轻解下刘昱的防身刀，举刀猛砍，刘昱没哼一声，便身首异处。然后，假传圣旨，说刘昱外出，命两厢房奏乐，并将承明门打开，把刘昱的人头交给王敬则。王敬则接过人头，上马疾驰，来到将军府门前，敲门大喊。萧道成担心是刘昱的诡计，不敢开门。王敬则性急，把刘昱的头从墙上扔了进去。萧道成用水洗去血污仔细辩认，果然不错。他又惊又喜，赶忙披甲上马，带着王敬则等人直奔皇宫。他们诈称刘昱出行归来，未受阻拦就直接进入长寿殿。殿中官员侍卫见到萧道成都非常惊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听说刘昱已被杀，欣喜若狂，高呼万岁。

转天早晨，萧道成召集执政大臣刘秉、袁粲、褚渊等商议国家大事，他们慑于萧道成的势力，把军权拱手相让，并由萧道成处理善后事宜。当天，萧道成以太后名义，发布命令，列举刘昱的罪状，立安成王刘准为帝，追封刘昱为苍梧王。

刘准，即宋顺帝。他当皇帝时年仅 11 岁。萧道成任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总揽了军政大权，刘准不过是个傀儡而已。两年后，萧道成废掉刘准，建立了萧齐王朝，建元三年

(481) 五月，刘准被人杀死。刘宋王朝在不断的内乱中，宗室残遭屠戮，致使子孙断绝，终遭灭顶之灾。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宋书》、《南史》：《前废帝纪》、《明帝纪》、《后废帝纪》、《戴法兴传》、《阮佃夫传》、《寿寂之传》、《文九王传》、《孝武十四王传》

《南齐书》：《齐高帝纪》

萧齐宗室之乱

升明三年（479）四月，宋顺帝刘准禅位于齐王萧道成。萧道成称帝后，改国号为齐，年号为建元。萧道成在位期间，对刘宋以来的弊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广开言路，鼓励群臣议政，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减轻市税，发展经济，贵族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等等，他曾表示"如果我治理天下十年，可使黄金与土同价。"刘宋王室的骨肉相残，导致朝政衰败，政权颠覆，萧道成常以此为戒，让儿子不要重蹈刘宋王朝的覆辙。建元四年（482）萧道成病重，特地把太子萧赜叫到跟前，嘱咐他说："宋氏若不是骨肉相残，外姓人怎么会乘其衰弊而取代之！你应该深以为戒呀！"三月，萧道成病死，太子萧赜继位。司徒褚渊和尚书左仆射王俭接受遗诏，辅佐朝政。

萧赜是萧道成的长子，当皇帝时已四十余岁。他年轻时随父亲征战，有较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继位之初，他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很有抱负。然而，他排斥老臣，用人不明，所亲近的尽是些恩幸小人。如他宠信中书通事舍人茹法亮、吕文显，外监吕文度等人，这些人很会向萧赜讨好，因而受到重用，势倾朝野。这时，共有四位中书舍人，被分别派驻各省，称为四户，由茹法亮、吕文显等担任。他们总揽大权，势力超过朝廷其他大臣。地方官纷纷给他们送礼，一年就达几百万之多。茹法亮曾当众对人说："何必要得到外任官的俸禄，就在这一户中，一年可得百万！"辅政大臣王俭都不满地说："我虽有大位，但权力哪里

比得上茹法亮!"

显然,萧赜重用茹法亮等恩幸是有意抑制权臣的策略。但是,真正困扰萧赜的还是萧齐宗室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

萧赜兄弟十九人,他为老大。老二萧嶷是他的同母弟,他们二人自幼和睦,亲密无间。使萧赜不放心的是四弟长沙王萧晃。萧晃少有武力,喜爱武士的威仪。齐高帝萧道成时,任豫州刺史。当时为防止诸王作乱,朝廷都在他们身边设典签,以制约、监督他们。萧晃讨厌典签,一次,在盛怒之下将典签杀死。萧道成非常恼火,下诏责仗萧晃,也不再喜欢他了。萧道成临终时,叮嘱萧赜,要让萧晃留在宫中或京城附近任官,不要派他去边远地方,以利控制。萧赜即位后,先任萧晃为南徐州刺史,后来又征他到建康。旧制规定,亲王在京师,只可以带四十名武装侍卫。萧晃离开南徐州入京时,私自带着数百人的武器,被负责防卫的官员发现后,投入江中。萧赜闻知大怒,打算对萧晃绳之以法。二弟豫章王萧嶷再三劝阻,说:"看在亲兄弟的情谊上,还是宽恕四弟吧!"萧赜也难过地哭了。他赦免了萧晃,也不再信任、重用萧晃。这件事反映出萧赜对兄弟还算是宽容的。

萧赜对五弟武陵王萧晔也没有好感。萧晔多才多艺,但性情直率。有一次,他入宫参加宴会,醉酒倒地,帽子上的貂尾沾上了肉汤。萧赜笑着说:"肉汤把你的貂尾弄脏了。"萧晔回答说:"陛下喜爱这些羽毛,却疏远亲生骨肉。"萧赜很不高兴。后来,萧赜派萧晔出任江州刺史。萧晔答应了,准备赴任。临行时,萧赜向萧晔提出一个要求,把他在京师的住宅分给诸皇子。萧晔很不高兴,他说:"先帝给我这所住宅是为使我有所归宿,陛下想以州易宅,我不想以宅易州。"萧赜没有达到目的,只好让萧晔赴任。萧晔至镇百余日,便被典签告发有过失,萧赜立即将他召回京师,任左民尚书,从此再未出任州镇之职。

萧赜在位期间,遇到最棘手的一件事是处理荆州刺史、巴东

王萧子响的问题。

萧子响是萧赜第四子。起初，萧嶷无子，萧赜便将萧子响过继给了萧嶷。后来萧嶷有了儿子，上表请求仍留萧子响为嫡长子，萧赜答应了，又特别关照萧子响可以享受见诸王不致敬的待遇。不过，他毕竟已过继了，车辆服饰皆与诸王不同。萧子响性情暴躁，每次入朝，都忿忿不已，用拳猛力敲击车壁。萧赜得知后，特令其车服与诸皇子相同。永明六年，萧子响恢复原来的宗属，封巴东王，转年任荆州刺史。萧子响自幼爱好武艺，勇力绝人，他身边有六十名武士，个个武艺高强，胆量过人。在荆州，萧子响常在内府杀牛置酒，与之聚会。同时，他还在私下制作了锦袍等物，准备与蛮族交换武器。此事被长史刘寅、司马席恭穆暗中报告了萧赜。萧赜虽然不大相信儿子有谋反的野心，但还是派人前去调查。萧子响听说朝廷派人调查，便把刘寅、席恭穆等人叫去盘问。刘寅等人保守秘密，不肯回答。萧子响勃然大怒，竟将刘寅等八人全都杀死。

萧赜闻讯大怒，他认为萧子响做得太过分了。为维护国家法纪，他打算派淮南太守戴僧静率兵讨伐萧子响。戴僧静推辞道："巴东王年轻，而长史刘寅逼得太急，一怒之下做错事是难免的。天子之子因过失杀人，有何大罪！陛下忽然派大军西上，使人们感到恐慌，因此，我不敢接受圣旨。"萧赜听了，虽然嘴上没说什么，而心里却很赞赏戴僧静的话。于是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率军前往荆州，搜捕萧子响身边的小人，又特地嘱咐说："如果萧子响放下武器，到建康请罪，要保全他的性命。"

胡谐之等率军到达江津后，在燕尾州修筑城垒。萧子响闻讯，多次派使者到胡谐之处联络，向他表白："天下哪有儿子反叛父亲的呢？我不是做贼谋反，只是做事粗疏。现在我将乘船回朝廷，接受杀人罪的处罚，你何必筑城垒，派大军抓我呢？"尹

略说："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萧子响见他们不理解，不禁泪流满面。他又杀猪备酒，慰劳朝廷派来的大军，尹略拒绝，将酒菜全都扔进江水之中。萧子响想与茹法亮对话，茹法亮疑惧不肯前去。最后，萧子响又请求会见传诏官，茹法亮仍不答应，反而把萧子响派来的使者关押起来。萧子响一再受到羞辱，愤怒不已，他率领所养勇士和州府兵二千人出城，与朝廷军队交战，萧子响在江堤上用强弓射击，朝廷军队大败，尹略被杀，胡谐之等人逃回建康。

萧赜见萧子响公然动兵，已成反状，非常气愤，又派丹阳尹萧顺之率兵讨伐。太子萧长懋平时忌恨萧子响，萧顺之出发时，私下告诉他，早些把萧子响杀死，不要让他活着回到建康。萧子响动武出于无奈，为了向父亲解释清楚，他仅率三十名侍从，乘船直奔建康。途中与萧顺之相遇。萧子响打算申诉理由，但萧顺之不容分说，便在演习堂里用绳子把萧子响勒死了。

萧子响临死之前，给萧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委屈，说："我犯了大罪，本来我已愿意接受惩罚，可是，胡谐之等人前来，竟然没有宣读圣旨，便修筑城垒讨伐，我几次派人送信求见茹法亮，请求见他一面，他始终不肯见我，以致发生双方激战。我本想放下武器，只身一人投奔朝廷，回到建康，在家中呆一个月，然后自杀。临死前给你写信，哭泣哽塞，不能再说！"萧赜见了儿子的信，心里明白了许多，他知道，萧子响虽然有罪，但如果处理得好，还不至于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又不好流露对萧子响的怜悯之情。不久，有司奏请断绝萧子响与皇族的关系，削除其爵位封地，改姓氏为"蛸"，萧赜也批准了。

过了很久，萧赜对萧子响的怀念之情也没有消失。一次游华林园，他见到一只猴子跌跌撞撞，不停地悲鸣，便问左右何故，随从说："它的孩子日前从悬崖上摔下死去了。"萧赜一下子想起

了萧子响，不禁呜咽流涕。

萧赜晚年，又为寻找接班人所困扰。本来，萧赜即位之初就已立长子萧长懋为太子，萧赜晚年喜宴游，使将尚书曹中的一部分事交给萧长懋处理，使太子威望远近闻名。

然而，萧长懋生性奢侈豪华，他耗巨资，大规模修建自己的殿堂、花园，远远超过了武帝的宫殿。各种服饰、玩物大都奢侈过分。他怕萧赜发现，就沿着殿门，种植了一排排高竹。萧长懋的活动，还是被萧赜发现了，将他狠狠责备了一顿。尽管如此，萧赜还没有打算废掉萧长懋。可是，萧长懋命短，永明十一年（493）正月，他患病去世，时年36岁。萧赜不得不重新挑选接班人。按兄弟排行，萧子良是次子，他任宰相多年，是萧赜的得力助手。萧子良喜好文学，他在鸡笼山开士邸，招集文士，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沈约、谢朓、王融、萧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西邸，号称“西邸八友”。按萧子良的才能声望，做萧赜的继承人当不成问题。然而，萧子良并没有继位称帝。原来，萧长懋死后，有一天，萧赜到太子宫，看到了萧长懋过去的那些豪华的服饰、玩物，极为愤怒，下令全部查处、销毁。萧赜认为萧子良平时和萧长懋关系最好，可他却不向自己报告，因此他责备了萧子良，萧子良也丧失了继承帝位的资格。

经过反复考虑，萧赜决定立萧长懋的长子南郡王萧昭业为皇太孙，太子宫的官属，全都改为太孙的官属。

这年七月，萧赜病重，召萧子良带甲仗入延昌殿侍奉医药。萧子良日夜守卫禁宫，皇太孙萧昭业每隔一天入宫问安侍奉。七月三十日（戊寅），萧赜病情恶化，生命垂危。萧子良及侍从焦急地等待萧赜的临终嘱托。这时，萧赜吃力睁开眼睛，问道：“太孙在哪里？”左右忙请萧昭业入殿，萧赜伸出手拉住太孙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说：“如果想念我，当好自为之。”说罢，便停止了呼吸，终年54岁。萧赜谥号武帝。萧赜死后，萧昭业

即位。如果说萧赜在位期间还能够控制政局，南齐宗室内部尽管矛盾很多，但未酿成大乱，而萧昭业称帝后，南齐的政局便每况愈下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南齐书》、《南史》：《武帝纪》、《武十七王传》、《茹法亮传》

萧鸾政变

永明十一年（493）七月，齐武帝萧赜病死，太孙郁林王萧昭业继位。萧昭业与他爷爷萧赜相比，无论是才能还是人品都相差甚远。南齐自萧昭业之后，皇帝昏聩暴虐，内乱不已，骨肉相残，愈演愈烈，为萧衍乘机而起、取代齐朝提供了契机。

萧昭业继位时，萧赜留下遗嘱，由萧子良和萧鸾共同辅佐朝政。萧昭业对他们二人态度却不一样。原来，在萧赜刚咽气之时，人们乱成一团，萧子良的亲信、中书郎王融想乘乱拥立萧子良为帝。他起草了一份立竟陵王萧子良为帝的诏书，身披戎服，站在中书省门口，阻挡萧昭业入殿，萧昭业焦急万分。这时，殿内传来萧赜召皇太孙入殿的声音，萧昭业才进入殿中。时间不长，萧赜去世，王融连忙派萧子良的士兵守卫各道宫门，准备让萧子良登基。正在这时，萧鸾赶到，他推开守门的卫兵，直奔殿中，拥萧昭业登基。又命左右侍从把萧子良扶到殿外，然后有条不紊地安排部署各种事情。殿内所有官员侍从，没有不听他的命令的。王融见自己的计划落空，只好脱下战服，返回中书省叹息道："萧子良耽误了我！"从此以后，萧昭业对王融深为怨恨，对萧子良也耿耿于怀。虽然任命他为太傅，但对他已不信任了。

萧昭业即位十余月，便下令将王融收捕，交廷尉审判，命令中丞孔稚珪罗织罪名控告王融。王融向萧子良求救，萧子良虽然知道王融是为自己而入狱的，但他自身难保，深居简出，不参与朝政，所以只是唉声叹气，不敢答应。不久，萧昭业命令王融在

狱中自杀。

萧鸾因拥戴萧昭业称帝有功而受到重用，以尚书令的身份参与朝政。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其父萧道生是萧道成的二哥。他在萧氏皇室中辈分高，年龄大，阅历广，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把持朝政后对萧昭业的表现深感失望。萧昭业很虚伪，在为萧赜服丧期间，他跪在灵前放声痛哭，不肯起来。左右人都感动得垂泪，称赞他懂事、孝顺。可是他一回到家里，立刻笑逐颜开，大吃大喝，还令乐队奏乐。在此以前，他就常让女巫杨氏向天祈祷，诅咒祖父和父亲快点死去。后来，父亲去世，萧昭业认为是杨氏祈祷的结果，于是更加敬重杨氏。等到他被封为皇太孙以后，武帝萧赜病重，他又命令杨氏向上天祈祷，此时，他的妻子何婧英还在西州。萧赜病危时，萧昭业给何婧英写信，在信纸中间写了一个大喜字，又围绕着大喜字写了三十六个小喜字。萧赜死后，尸体还没有安葬，萧昭业便把萧赜的歌舞伎都叫来，让他们演奏音乐。

萧昭业称帝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隆昌。他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对军国大事漠不关心。他宠爱中书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阁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宦官徐龙驹等人。朝廷大小事都由綦毋珍之说了算。綦毋珍之把朝廷内外的官职都定出价格，交了钱就可以做官。旬月之间，家累千金。他还擅自索取朝中财物，官员们都说："宁可抗拒皇帝的诏敕，也不能违背中书舍人的命令。"萧昭业任命宦官徐龙驹为后阁舍人，他依仗权势，经常住在含章殿中，头戴黄丝帽，身披貂皮袍，像皇帝那样南面北坐，代替皇帝批阅文书。

萧昭业整天就知道挥霍钱财，玩耍嬉戏。他常和左右侍从换上便衣在城里游荡。喜欢在父亲崇安陵的墓道中投掷泥块，比赛跳跃，做各种粗俗的游戏。他挥金如土，随意赏赐左右随从，动辄百数十万。齐武帝萧赜聚敛钱财，国库积存的钱有五亿万之

多。他尽情挥霍，不到一年，已基本告罄。他还常带着皇后何氏和诸宠姬，到后宫主衣库，让她们拿各种珍玩器物互相投击，打碎，以此为笑乐。他还与父亲萧长懋的宠妾霍氏通奸，为她改姓徐。

面对一味胡来的萧昭业，萧鸾多次劝谏。萧昭业不但不听，反而忌恨萧鸾，想除掉他。怎么才能除掉萧鸾呢？他想让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锵帮助他。

萧锵是萧道成的第七子，为人谦和，甚有威望，在皇室中年龄较大，萧昭业很信任他。一次，他对萧锵说："你听说萧鸾对我怎么样？"萧锵谨慎地回答道："萧鸾在皇室中年龄最大，而且受到了先帝的委托，我们年龄都小，朝廷所依赖的只有萧鸾一人，愿陛下不要以他为虑。"萧昭业听了，默默无言。回到后宫，他对徐龙驹说："我想与萧锵共同设计除掉萧鸾，他不同意，我独自一人又不能办到，只好听任萧鸾专权一阵子吧。"

皇室中，何皇后也是个淫荡的女人。她与萧昭业的侍从杨珉私通，二人同眠共枕，如同夫妻。何皇后对萧昭业也分外亲热，把他弄得神魂颠倒，所以萧昭业也对她听之任之。他还把何皇后的亲戚迎进宫内居住，殿阁的门彻夜大开，宫内外混乱不堪。萧鸾非常恼火，派萧昭业的亲信萧坦之人宫奏请杀掉杨珉。何皇后得知后，大哭大闹，对萧昭业说："杨郎是个英俊、年轻的好人，没有犯罪，怎能枉杀？"萧坦之对萧昭业悄悄说："外面盛传杨珉与皇后有奸情，不可以不杀呀！"萧昭业不得已，只好下诏杀掉杨珉。不久，萧鸾又上书，要求杀掉徐龙驹。萧昭业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不过，他对萧鸾更加忌恨了。

萧昭业身边的亲信萧坦之和萧谌见萧昭业狂暴不已，日甚一日，已不可悔改，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便反过来依附萧鸾，并劝萧鸾废掉萧昭业，另立新帝。他们暗地充当萧鸾的耳目，萧昭业没有发现这件事。

名将周盘龙之子周奉叔，勇猛剽悍，很受萧昭业宠信。周奉叔依仗权势，经常欺辱公卿大臣。他常在身边带着二十把单刀，大摇大摆出入宫门，门卫不敢阻拦。他动辄发火，公开扬言："我周郎的刀可不认人！"萧鸾很讨厌周奉叔，便让萧坦之、萧谌去劝说萧昭业，将周奉叔调离京师。萧昭业答应了，以周奉叔为青州刺史。周奉叔请求封他为千户侯，萧鸾反对，萧昭业又改封周奉叔为曲江县男，食三百户。周奉叔得知后大怒，当众拔刀威胁，又喊又叫，经过萧鸾反复劝说，他才接受。在周奉叔率众出发上任的那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尚书省，他不知何事，只得前去。原来，这是萧鸾与萧谌设的计谋。周奉叔一到，他们便将其杀死。然后，萧鸾又向萧昭业报告，周奉叔轻视朝廷，已被处死。萧昭业虽然不信，却也无可奈何。接着，萧鸾又将萧昭业的心腹綦毋珍之、杜文谦杀掉。

很显然，萧鸾消除萧昭业身边的亲信，是为自己上台扫清障碍的。这时，社会上纷纷传说，萧鸾有政变的企图。萧昭业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与中书令何胤谋划杀掉萧鸾。何胤是何皇后的堂叔，萧昭业非常信任他。但何胤非常害怕，不敢参与此事。萧昭业只好作罢。他又打算将萧鸾调任到西州，朝廷大事都由自己决断。

萧鸾也加紧谋划取代萧昭业。尚书左仆射王晏、丹阳尹徐孝嗣等也支持萧鸾。

萧昭业越发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心神不定。一天，他问萧坦之："人们传言镇军将军萧鸾与王晏、萧谌一起想废掉我，好像不是虚传，你听到些什么？"早已站在萧鸾一边的萧坦之赶忙说："天下哪有这种事，谁愿意没事废掉天子呢？朝廷大臣是不可能制造这种谣言的，一定是那些尼姑们瞎说的，不可相信！如果您无缘无故把他们三人除掉，谁敢自保？"萧昭业无话可说。然而，他的心腹、直阁将军曹道刚始终认为萧鸾有野心，他秘密

做了杀害萧鸾的准备。

当时的形势是，谁先下手，谁就可能占据主动，把持朝政。萧鸾抓住了时机。七月二日，萧鸾开始行动，他先派萧谌入宫，正碰到曹道刚与中书省舍人朱隆之，他们二人未及时反抗，就被萧谌杀死。宿卫将军徐僧亮见此情形，对卫兵大声喊道："我们承受皇恩，今日当以死相报！"话音刚落，也被杀死。这时，萧鸾带兵从尚书府进入云龙门。在这生死的关键时刻，他也很紧张，才进入宫门，鞋子就掉了三次。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等人紧随其后。萧昭业正在寿昌殿，听说外面有变，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下诏令让萧谌前来相救，又让人把内殿的门窗关闭。不一会儿，萧谌已带兵进入寿昌殿。萧昭业一见萧谌神情不对，才发现萧谌不是来解救他，而是要废杀他的。他转身就跑，来到徐姬的房中，自知大势已去，便拔剑自刎，但刺得不深，又用帛缠住脖子，卫士用轿把他抬出。萧谌刚进入寿昌殿时，守卫宫殿的卫士都拿起武器准备抵抗，萧谌对他们喊道："我要捉拿的人与你们无关，你们不要动！"这些卫士向来隶属于萧谌，对萧谌的话，深信不疑，不再抵抗。萧谌抓住萧昭业，将他带到延德殿西边的小巷，用刀杀死。萧鸾原想抓住萧昭业后，借皇太后诏令把他杀掉，这时徐孝嗣马上从衣袖中取出已准备好的诏令，萧鸾看后非常高兴。七月二十一日（癸巳），萧鸾以太后的名义封萧昭业为郁林王，贬何皇后为王妃。

当时，萧鸾称帝已不成问题。然而，他想立一位傀儡皇帝作为过渡，于是，迎立萧昭业的弟弟、15 岁的新安王萧昭文为帝，大权由萧鸾把持。萧鸾不急于称帝，是想以小皇帝为幌子，清除与自己作对的势力，同时进一步拉拢人心，为自己称帝做准备。为此，他培植亲信，广揽同党，任命萧遥光为南郡太守，将中书郎萧遥欣提拔为兖州刺史，他们二人是萧鸾的哥哥萧凤之子。

一些朝臣已发现萧鸾打算称帝的野心，他们反对萧鸾这样

做，便有意与他保持距离，避免卷入政治旋涡。有一次，萧鸾召集大臣入宫议事，国子祭酒江斅行至云龙门时，借口药性发作，在车中呕吐不已，又返回去了。中散大夫孙谦兼任卫尉，配给上兵百人。然而，孙谦不愿意成为萧鸾的心腹，擅自遣散了士兵，萧鸾无可奈何。侍中谢朏也对萧鸾不满，他不愿意在朝廷任职，请求出任吴兴太守。到任之后，他给担任吏部尚书的弟弟谢瀹送去酒，并附信一封，信上说："应该努力喝酒，不要参与人事的纠纷！"

萧鸾为了把持朝政，对政敌和反对派坚决诛除，毫不手软。他的主要对手是高帝、武帝的子孙。

司徒、鄱阳王萧锵是萧昭业的叔爷，起初，他不知道萧鸾要废萧昭业自己称帝，每次去拜访萧鸾时，萧鸾都热情迎接，有时连鞋都没有穿好就跑出去了。说到国家大事，萧鸾常常声泪俱下，显得很忠贞。萧锵也相信萧鸾。然而，朝廷内外都知道萧鸾篡位的野心，希望萧锵发兵入宫，取代萧鸾，辅佐朝政。制局监谢粲对萧锵和随王萧子隆说："你们只需乘油壁车入宫，把皇帝带到朝堂，以其名义发号施令，我和其他人关闭城门，然后带卫士前来支持，谁敢不从？东府的人会乖乖把萧鸾缚送过来。"萧子隆是武帝萧赜第八子，有文才，身体强壮，连萧鸾对他都有几分畏惧。他认为此计可以考虑，萧锵却认为朝中兵力全控制在萧鸾手中，此事不一定能成功，有些犹豫不决。

马队主刘巨是萧赜的老部下。一天，他来见萧锵，恳切要求萧锵快些动手，跪地叩头，久久不起。萧锵被他感动，命令准备马车。刚要出发，他想到此行不知凶吉，于是又返回内室，与母亲陆太妃告别，直到天黑了还没有出发。萧锵的异常表现被身边的典签察觉了，立即报告了萧鸾。萧鸾接到密报，大吃一惊，连忙派遣二千士兵包围了萧锵的住处，将萧锵杀死，接着又杀了萧子隆、谢粲等人。

武帝萧赜第七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听到叔叔萧锵和弟弟萧子隆被杀的消息，准备起兵讨伐，他对防阁将军陆超之说："此事若成功则朝廷获得安宁，如果失败我们也死得其所。"另一位防阁将军董僧慧也说："江州虽然地域狭小，可是当年宋孝武帝就是从这里起兵讨伐刘劭。现在我们如果发兵，讨伐萧鸾杀害郁林王之罪，谁能够抵抗呢?"萧子懋的母亲阮氏尚在京师建康，他怕起兵后母亲遭难，便秘密派人把她接回江州。阮氏读信后，非常紧张，便把情况告诉了同母异父的哥哥于瑶之，同他商量。谁知于瑶之派人告诉了萧鸾。萧鸾立即宣布内外戒严，派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懋，又让裴叔业和于瑶之先袭击江州府驻地浔阳（今江西九江)。裴叔业假称被任为郢州府司马，前去上任，过浔阳后，又连夜回袭湓城。城局参军乐贲开门迎接裴叔业入城，湓城失守。萧子懋得知后，率府州兵力据城自守，士兵们斗志旺盛，决心一拼到底。裴叔业派于瑶之去见萧子懋，劝说道："你现在如果主动弃城，回到建康，可以做一个闲散之官，仍不失荣华富贵，请不必担忧。"萧子懋听了他的话，半晌无语，犹豫不定，迟迟不出兵攻打裴叔业，致使军心动摇，斗志减弱。

于瑶之的哥哥于琳之，在萧子懋府中任中兵参军，他假装关心，劝萧子懋用重金贿赂裴叔业，以免除灾祸。萧子懋答应了，派他前去接洽。而于琳之见到裴叔业，又劝他赶快出兵，捉拿萧子懋。裴叔业派四百士兵随于琳之进入江州城。顿时，江州大乱，官吏士兵纷纷逃命。于琳之亲自带领二百人，来到萧子懋的住处。萧子懋见到于琳之，怒目圆睁，大声骂道："你这个无耻小人，怎么忍心干出这样的事呢?"于琳之也不答话，用衣袖挡住自己的脸，命令将萧子懋杀死。

直阁将军董僧慧被王玄邈抓获，以参与萧子懋谋反罪名，要将其杀害。董僧慧毫无惧色，大声说道："晋安王萧子懋举义兵，讨逆贼，我确实参与了策划，现在为主人而死，死无遗恨!"王

玄邈觉得董僧慧很有义气，就把情况告诉萧鸾，萧鸾下令不将董僧慧处死，发配到东冶。

直阁将军陆超之在萧子懋被害后，仍留在府中，于琳之劝其逃命，陆超之坦然地说："人皆有死，这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如果逃亡，不但已死去的晋安王的家眷无人照料，还可能遭到田横门客的嘲笑。"陆超之也被杀害。

萧子懋死后，萧鸾为绝后患，开始对诸王大肆屠杀。

萧鸾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击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萧子敬毫无防备，被斩杀。萧鸾又派徐玄庆前往江陵，杀害荆州刺史临海王萧昭秀。萧昭秀年仅 12 岁，西中郎长史何昌寓主持州中事务。徐玄庆到达江陵后，想通过何昌寓杀害萧昭秀。何昌寓义正辞严地说："我受朝廷之托，翼辅外藩，殿下并没有什么过失，你只不过一个差使，我决不能随便把殿下交给你！若朝廷一定要殿下去，就应亲自发圣旨给我，我等候圣上的诏令！"何昌寓态度坚决，徐玄庆无可奈何。后来，萧昭秀回到了建康，改封为巴陵王。

裴叔业帮助萧鸾杀了萧子懋，又被派往长沙，杀害了萧道成第十五子、湘州刺史南平王萧锐。萧鸾又任命吴兴太守孔琇之主管郢州事务，想让他杀害萧道成第十八子、郢州刺史晋熙王萧銶。孔琇之宁可辞职也不答应，最后绝食而死。萧鸾只得命令裴叔业前往郢州，杀死了萧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也同时被杀。

萧鸾杀了宗室诸王，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为进一步把持朝政，他给自己加官进爵，任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进爵为王。

就萧鸾的本意而言，他是以称帝为目的。为此，他还要继续扫除通向皇帝宝座的障碍，同时他还制造舆论，以示不凡。他向表弟江祐透露自己肩胛上有一颗赤痣，江祐建议他出示给别人

看。萧鸾也有此意，便让晋寿太守王洪范看了，并故意对他说："有人说这是帝王相，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王洪范知道萧鸾的用意，说道："你身上有帝王的征兆，为什么要隐瞒呢？我要告诉别人！"这话使萧鸾心中暗喜。于是他加紧了对诸王的残杀。

中军将军桂阳王萧铄是萧道成第八子，与鄱阳王萧锵齐名。萧锵喜爱文学，萧铄喜爱名理，人们并称他们"鄱桂"。萧锵被杀后，萧铄很害怕，特地到萧鸾处试探。回府后，萧铄对左右的人说："萧鸾接见我时很亲切诚恳，依依不舍，但他脸上流露出惭愧的神色，可见这一定是想杀我。"果然，当天夜里，萧鸾派兵将萧铄杀害。

在萧道成诸子中，十二子萧锋有才能，勇猛过人，尤其他敢于直言，最使萧鸾畏忌。有一次，萧鸾曾对他说："萧遥光有才力，可以承担大任。"萧锋说："萧遥光与殿下相比，就像殿下和高祖萧道成的关系一样，保卫宗庙，安定社稷是很合适的人选。"萧鸾听后大惊失色。

萧鸾诛杀诸王，萧锋又写信谴责他，所以萧鸾很怕萧锋，不敢贸然去萧锋府第抓捕，便设计，任萧锋为祭祀太庙的主祭官。一天夜里，萧锋在太庙值班，萧鸾派兵前去抓捕。萧锋出门登车准备回府时，士兵们将车包围，上车去抓。萧锋很有力气，用拳头猛击，一连打倒数人，但因寡不敌众，终于被杀。

萧鸾又派典签柯令孙去杀建安王萧子真。萧子真是萧赜的第九子，年仅 19 岁。他慌忙跑到床下躲藏，柯令孙伸手把他拉出。萧子真跪地哭泣，恳求留条活命，甘做奴隶。柯令孙根本不理，把他杀死。

与此同时，萧鸾又派中书舍人茹法亮去杀南兰陵太守巴陵王萧子伦。萧子伦是武帝萧赜第十三子，虽然只有 16 岁，但英勇果敢。镇守琅邪，城中有守兵。萧鸾担心不能轻易将萧子伦置于死地，就问典签华伯茂有什么办法。华伯茂说："您如果动用军

队去捉拿他，恐怕不会很快成功，如果让我去办，一个人就行了。”于是，萧鸾派他和茹法亮一同前往南兰陵。到郡后，向萧子伦宣布赐死的诏书。萧子伦穿戴整齐，坦然地对茹法亮说：“今天的事情，就像当年先朝诛杀刘氏一样。您是我家的故旧，如今执行这个命令，也是身不由己，这酒也并非一般的劝酬之酒，我只能喝下去了！”说罢，一饮而尽，中毒身亡。茹法亮和左右都伤心地掩面流涕。

萧鸾诛除诸亲王，皆命令典签去执行。典签实际上是皇帝的亲信和耳目，皇帝常与他们单独谈话，查问诸王和州郡长官的情况。诸王和地方长官的好与坏都在他们嘴上，他们依仗权势，横行不法，杀害诸王时，没有人敢抵抗。大臣孔珪曾流着眼泪对萧鸾说：“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一心辅佐皇室，可现在连他们都杀了，如果不置典签，是不会到这地步的。”萧鸾也知道典签制度的弊端，因此特地发布诏令：“今后各州如有紧急事情，应当秘密奏报朝廷，不要再派典签进京了。”自此以后，典签的地位渐渐下降。

这时，萧昭文虽然仍为皇帝，但是，他的起居饮食，都要得到萧鸾的允许才能去做。有一次，他想吃蒸鱼，太官令回话说：“没有萧鸾的命令，不能做。”萧昭文无可奈何。

隆昌元年（494）十月，萧鸾见时机已到，便以皇太后名义下令，废掉傀儡萧昭文，萧鸾正式称帝，改年号为建武。为了使自己称帝名正言顺，萧鸾宣布自己是高帝萧道成的第三子，又尊父亲萧道生为景皇帝。

萧鸾称帝后，最不放心的还是那些功勋显赫的有功之臣和诸王，生怕皇帝宝座被他们夺去。因此，他继续采取诛杀的办法，不断削弱他们的力量。

萧谌帮助萧鸾废萧昭业，立下功劳。当初，萧鸾曾许诺萧谌为扬州刺史，但后来让他担任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萧谌心怀

不满，怨恨地说："饭做熟了，却推给别人吃了。"萧谌因为有功劳，他的兄弟们也被封王授官。哥哥萧诞封安复侯，任司州刺史；弟弟萧诔封西昌侯。萧谌自恃功高，骄傲自大。萧鸾对萧谌表面依然如故，但内心却厌恶他。建武二年（495）元月，萧鸾在华林园与萧谌及尚书令王晏等一起宴饮，大家十分高兴。宴会结束之时，萧鸾又留萧谌，二人又说了一阵话，萧谌才离开。当他走到华林阁时，突然出现几名执杖卫士，不容分说，将他抓住押到官署。萧鸾没有出面，让手下人莫智明宣布萧谌的罪行，然后让萧谌自杀。接着萧鸾又将萧谌的兄弟萧诞、萧诔杀害。

建武四年正月，萧鸾杀害了尚书王晏。王晏起先很受萧鸾宠信，让他参与国家大政。但王晏很自负，萧赜在位时，他常以佐命大臣自居，在众人面前指责萧赜。萧鸾称帝后，王晏任尚书令，他办事坚持己见，常与萧鸾因为用人发生争执。萧鸾讨厌王晏，起了杀机。

萧鸾晚年，重病缠身。由于他亲属少，力量单薄，所以对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的子孙特别忌恨。当时，萧道成、萧赜的子孙还有十人为王。他们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入朝拜见萧鸾。萧鸾见过他们回宫之后，常常叹息地说："我家的儿子年龄幼小，萧道成、萧赜的子孙们都长大了！"萧鸾想把他们斩尽杀绝。他曾试探地问太尉陈显达，陈显达爽快地回答说："这些人何必使您忧虑呢？"萧鸾又问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也主张诛杀，并建议逐个杀害。于是，萧遥光经常乘车从望贤门进入华林园，每次进园后萧鸾就和他密谋策划。谈话结束，萧鸾都要焚香祈祷，呜咽流涕，第二天准有亲王被杀。被杀者有：河东王萧铉、临贺王萧子岳、西阳王萧子文、永阳王萧子峻、南康王萧子琳、衡阳王萧子琅、湘东王萧子建、南郡王萧子夏、桂阳王萧昭粲、巴陵王萧昭秀。至此，萧道成、萧赜、萧长懋的儿子们全被杀害。

为了掩人耳目，萧铉等十王被杀后，萧鸾又让公卿上表奏告他们的罪行，并要求诛杀他们。萧鸾假意下诏不允许，公卿再奏，然后批准。

萧鸾大肆屠杀萧道成、萧赜诸子孙的行径引起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是萧道成、萧赜时的旧将，他心中很不安。萧鸾对他虽然表面很客气、尊敬，内心却对他十分猜忌、提防。萧鸾患重病，一方面诛除诸王，另一面对王敬则也加强了防备。他派光禄大夫张瑰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并秘密布置兵力，监视王敬则。这一新的任命引起了朝廷内外的纷纷猜测。人们都传说萧鸾又要在东方进行大的举措了。王敬则听了传言之后，暗自寻思："东方现在还有谁？只不过是要除掉我罢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当天夜里，王敬则就与手下文武官员一起商量对策。在众人的鼓励下，王敬则决定发兵起事。他打出拥戴南康侯萧子恪的旗号，公开反叛萧鸾。当时，萧鸾病情已非常严重，朝廷百官得知王敬则正率军向建康进发，惊慌失措，太子萧宝卷已准备逃跑。王敬则起兵虽然很有声势，但准备仓促，又遇到了朝廷军队的顽强抵抗，在进攻建康途中战败，王敬则被杀。萧鸾总算在临死以前平定了王敬则之叛。

永泰元年（498）七月，萧鸾病死，谥号明帝。他在位期间，对皇室诸王进行了罕见的大屠杀，使萧齐陷入了严重的内乱之中，到了他的儿子萧宝卷继位后，朝政更加混乱衰败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南齐书》、《南史》：《齐明帝纪》、《武帝十七王传》、《萧谌传》、《裴叔业传》、《茹法亮传》、《高祖十二王传》

东昏侯暴虐

永泰元年（498）七月，齐明帝萧鸾病逝，太子萧宝卷即位。永元三年（501）十二月萧宝卷被杀，在位仅三年多。萧宝卷死后被追封为东昏侯。萧宝卷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是，他极其荒淫狂暴，是南朝最昏庸的君主之一。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不满，萧衍乘机起兵，攻下建康，杀死萧宝卷，建立了梁朝。

萧宝卷是萧鸾的次子，因其兄萧宝义自幼残废，他才得以立为太子。萧宝卷做太子时就不好学，只知道毫无节制地玩耍。他父亲萧鸾疯狂地诛杀诸王，给萧宝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小就知道，要保住皇帝宝座，必须毫不留情地屠杀一切可能威胁自己的人。萧鸾也向萧宝卷灌输这种思想，告诉他："做事不可在人后。"萧宝卷说话迟钝，少言寡语，待人冷漠无情。萧鸾死后，灵柩停在太极殿，他很不高兴，想快些安葬了事。由于大臣力争，才停放了一个多月。每当萧宝卷按照丧礼应该哭的时候，他就说喉咙疼痛。太中大夫羊阐入宫哭吊，他没有头发，哭得前俯后仰，不慎将头上的帽子掉到地上，露出了光头。萧宝卷看见了，竟哈哈大笑起来，对左右人说："秃鹫哭起来了！"群臣见状，无不惊讶。

萧宝卷即位时，年仅16岁，所以萧鸾特地安排了一批顾命大臣辅佐朝政。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始安王萧遥光、侍中江祀、领军将军萧坦之和卫尉刘暄，他们轮流在宫内值班，

各自签署诏令，权力很大，当时被称为“六贵”。

萧宝卷每日只知嬉戏玩耍，很少与朝中大臣见面，只亲近身边的宦官和左右心腹，如茹法珍、梅虫儿等人。辅政大臣总限制、约束他，使萧宝卷不能随心所欲，于是，他对辅政大臣开始厌恶，他尤其憎恨江祏、江祀兄弟。

江祏、江祀的姑母是萧鸾的母亲，由于有这种关系，萧鸾一直很信任他们。萧宝卷到处游玩，不理政事，其他辅政大臣不敢过分劝阻，只有江氏兄弟坚决制止，使萧宝卷十分恼火。后来，他们见萧宝卷越来越不听约束，便打算废掉他，立萧宝卷之弟萧宝玄。但是，他们的想法受到“六贵”之一刘暄的反对。原来，刘暄是萧宝卷、萧宝玄的舅舅。萧宝玄任郢州刺史时，刘暄任郢州行事。他对萧宝玄管束很严，有一次，有人向萧宝玄献了一匹马，萧宝玄想看看，刘暄说：“马有什么可看的！”萧宝玄的妃子想吃鸡杂碎，手下人请示刘暄，刘暄说：“早上刚吃过蒸鹅，用不着再吃鸡杂碎了！”对此，萧宝玄愤恨地说：“我的舅舅太无情了！”现在，江氏兄弟想立萧宝玄为帝，刘暄当然不会同意。他主张立萧宝卷的另一个弟弟建安王萧宝寅，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六贵”之一萧遥光。萧遥光是萧宝卷的堂兄，萧鸾在世的时候，他就以至亲的身份参与朝政。他见刘暄要立新帝，心中不快。萧遥光以为自己年龄大，地位高，皇帝应该他来坐，江氏兄弟亦有此意。然而，刘暄又不高兴了。他想，若立萧遥光为帝，自己将失去元舅的身份，他不肯赞成。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意见不能一致，事情久拖不决。萧遥光称帝心切，认为是刘暄从中作梗，于是派人刺杀刘暄。未等动手，刘暄察觉，刘暄为保住自己，索性向萧宝卷告发了江祏等人的密谋。

萧宝卷对“六贵”早已耿耿于怀，正想找借口除掉他们；一得到消息，立即下令将江祏、江祀兄弟抓捕斩杀。萧遥光见江氏兄弟被杀，担心自己性命难保，十分害怕。有时在梦中突然惊

醒，仓皇地跑到屋外，问左右人："抓我的人来了吗?"很久，神色才安定下来，回到屋里坐下，悲伤地说："我不是怀念江家兄弟，是为自己悲痛呀!"萧遥光由于过度恐惧，后来就装起疯来，忽而哭泣不已，忽而沉默不语。永元元年（499）八月十二日（乙卯），他孤注一掷，起兵讨伐萧宝卷。但由于用兵不当，部将萧畅、沈昭略等人临阵投降，起兵仅四天，萧遥光就战败被杀。

萧宝卷不久又杀了刘暄。当初，刘暄告发了江祀兄弟之后，萧宝卷对刘暄产生了好感，但萧宝卷的亲信茹法珍忌恨刘暄，说刘暄反复无常，有图谋朝政的野心。萧宝卷说："刘暄是我舅舅，他哪能干这种事呢?"另一亲信徐世标说："明帝萧鸾与武帝萧赜是堂兄弟，萧鸾受到萧赜恩待，但是他还是杀尽了萧赜的后代，舅舅难道值得信任吗?"萧宝卷听后，觉得有理，便下令将刘暄杀死。

至此，"六贵"中仅剩下徐孝嗣。徐孝嗣出身文士，虽居辅政重位，但办事谨慎，萧宝卷倒也容他。当他看到萧宝卷将辅政大臣诛杀殆尽，自己也将难逃厄运时，也起了废昏立明的念头，但他迟迟不敢下决心。虎贲中郎将许准劝徐孝嗣快些动手，徐孝嗣反复考虑，才想出一个不用武力就可以废掉萧宝卷的办法，等萧宝卷出游时，关闭城门，使他不得入宫，然后拥立新帝。可是他又不果断行动，仍犹豫不定。连萧宝卷的亲信们都开始讨厌徐孝嗣了。

对老臣早已不满的萧宝卷终于抢先一步动手。十月二十三日（乙未），他召集徐孝嗣和尚书仆射沈文季、侍中沈昭略到华林省。沈文季是明帝萧鸾的近臣，很受重用，他见萧宝卷滥杀重臣，便借口年老多病，不参与朝政。他的侄子沈昭略对他说："您已年近60，只甘心做员外仆射，打算免除灾祸，那怎么可能呢?"沈文季苦笑不答。这天，他与徐孝嗣、沈昭略突然接到入华林省的诏令，感到凶多吉少。登车时，回过头说："此行恐怕

是一去不复返呀!”

三人入华林省后，萧宝卷派茹法珍给他们端来了毒酒。他们一见，全明白了。沈昭略大怒，指着徐孝嗣骂道：“废昏立明，是古往今来国家重要的宪章法令，都因你这个无能的宰相，才使我们有今天的下场!”说罢，将酒杯向徐孝嗣掷去。并喊道：“让你做个破面鬼!”徐孝嗣自知大势已去，显得十分坦然，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顾埋头喝酒，喝了一斗多才咽气。徐孝嗣之子徐演、徐况也被杀害。

萧宝卷自己以为除掉了“六贵”，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玩耍胡闹了。他不分日夜地与侍从们在后宫擂鼓喊叫，骑马作乐，常常闹到五更时分才就寝，至午后才起床。每逢初一和节日，大臣朝见他时，都要等到下午才能进宫，天黑时才出宫。萧宝卷厌倦朝政，尚书台的奏章案卷，一个月或数十天才能批回，有时还弄丢了，宦官们竟然用奏章案卷包裹鱼肉拿回家。

自六位辅政大臣被萧宝卷杀害后，朝廷内外人人自危，笼罩着恐怖气氛，人们都各自打着主意。太尉陈显达知道自己是高帝萧道成、武帝萧赜的旧部将，在明帝萧鸾诛杀高、武子孙的时候，内心总感到危惧。他小心谨慎，生怕被株连。常常乘坐破旧的车子，前卫和仪仗队仅用十几个瘦小的卫士，以躲避是非。有一次，他出席宫中宴会，喝醉了酒，便向萧鸾借了一个枕头，陈显达抚摸着枕头说：“我年老体弱，富贵已足，只欠枕着枕头死去了，特意请陛下赏赐。”萧鸾听后，非常惊讶，说：“你喝醉了!”陈显达已70高龄，请求退休，萧鸾不准。萧宝卷称帝后，陈显达心里更不安稳，请求调离建康，萧宝卷任命他为江州刺史。陈显达很高兴，连忙登程赴任，心想：“我总算离开了是非之地。”后来，萧宝卷屡诛大臣的消息不断传出，陈显达又紧张起来。“六贵”被诛杀后，他又听说朝廷将派兵袭击江州。陈显达觉得只有寻求生路了，便于十一月十五日（丙辰）在浔阳（今

江西九江）起兵。他给朝臣发出一封信，历数萧宝卷的罪恶，并表示："我打算拥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只要京师安定，便西迎萧宝寅登基。"

陈显达率军东下，在采石山（今安徽当涂北）击败了禁军将领胡松，迅速逼进建康。萧宝卷十分惊恐，下令严加防守，并派护军将军崔慧景率军迎击陈显达。在激战中，年过七旬的陈显达体力不支，落马被斩，此次起兵以失败告终。

萧宝卷诛杀陈显达以后，以为从此再也无人敢约束与威胁自己了，越发随心所欲，骄横恣意。他喜欢出宫游逛，又不愿让人看见他。因此，每次出行前，都由士兵清街开道，把要经过的路边人家赶走。居民们只要一听到鼓声，就应该立即跑开，连穿衣服鞋子的时间都没有。违反规定，格杀勿论。萧宝卷频繁出行，每个月竟达二十多次。而且出行没有具体去处，东西南北，无所不去。他还常常在凌晨三四更时分出游。出行时，鼓声四起，火光照天，手持旗帜和武器的士兵在道路上戒严，居民们叫嚷着拥挤着到处奔跑，最遭殃的是那些行动不便的妇女老人。因为到处戒严，有人患病无法医疗，病重而死，甚至连掩埋的地方都没有。萧宝卷出行时，还让人在路旁挂上高高的布幔，派人防守，称为"屏除"，也叫"长围"。有一次，萧宝卷发现一位妇女因临产而没有及时躲藏，他顿起邪念，下令剖开产妇的腹部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有一次，一个老和尚因患病不能走动，躲在草丛里，被萧宝卷发现了，他命令左右人用箭射，老和尚身中数箭，悲惨死去。萧宝卷最喜欢的就是毫无节制地玩耍。他臂力过人，能拉开三斛五斗重的大弓。他喜欢扛高幡，七丈五尺高的白虎幡，他能放在牙齿上顶起来。牙齿折断了还没玩够。为玩高幡，他自己制作了挑幡器械和服装，上面都用金玉珠宝装饰。他尤其喜爱骑马。骑马时，他身着轻便的衣裤，头戴金箔制的帽子，手持七宝长矛，一骑上马就忘了一切，顶风冒雪地驰骋不倦。口渴

了，便跳下马，解下腰边的水瓢，取水痛饮，然后上马，继续奔驰。他还挑选了能跑路、身体健壮的五百名无赖小人，称作“逐马左右”，出行时让他们跟随。他还爱打猎，专门开辟了近三百处打野禽场。每天到处奔走往来，玩耍嬉戏，没有一刻暇闲。

萧宝卷的生活也很奢侈荒唐。他宠幸潘贵妃，潘贵妃生的女孩子死了，萧宝卷亲自为她发丧，仪式比他父亲发丧时还隆重。他每次到潘贵妃娘家去，都亲自打水做饭。出游时常让潘贵妃乘轿子，自己则骑马随后。萧宝卷为了取乐，还把阅武堂改为芳乐苑，当时正值暑天，他命令栽种树木。由于天气炎热，早晨栽树傍晚就死了，他又让人把死树拉走，再种新树，这样反复栽种，以致树的来源都成了问题。萧宝卷又命令到民间去找，只要发现好树，宁可拆屋毁墙也要移植。萧宝卷在芳乐苑中按照京城的样子建造店铺，他与宫女、侍从都打扮成商贩模样做生意。他让潘妃任市令，自己任市吏录事，遇到买卖纠纷，就让潘妃裁决。还在苑中开源引水，在岸边设立店铺，他卖肉，潘妃卖酒。萧宝卷在宫中开店做买卖的事，传到民间，人们编了歌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永元二年八月，皇宫中发生火灾，许多人被烧死，三千多间宫室被毁。萧宝卷下令大兴土木，修复宫殿，用麝香涂抹墙壁，雕刻绘画，极其奢侈豪华。服役的工匠不分昼夜地干，还赶不上萧宝卷要求的进度。后宫嫔妃彩女的服装和各种用品，都选用极珍贵新奇的。库房里存的东西用光了，便到民间用高价购买。萧宝卷还别出心裁，用黄金凿成莲花形状粘在地面，让潘贵妃在上面行走，说：“这是步步生莲花！”萧宝卷还强迫百姓交纳野鸡头上的红羽毛、仙鹤的翎毛、白鹭的绒毛为贡赋。他的亲信们乘机渔利，皇帝需要一件，他们却向老百姓索要十件。为抵偿宫中巨大的花销，萧宝卷还派人到各州县直接收税，一律交现款，不让地方转送。在朝廷官府沉重的盘剥下，老百姓被搜刮殆尽，许多

人倾家荡产，只好背井离乡，逃往别处谋生。

萧宝卷对大臣动辄训斥，那些老臣更成为他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所宠信的尽是些奸佞小人。宦官王宝孙，年纪仅十三四岁，蛮横霸道，绰号“伥子”，最受宠爱。他参与朝政大事，许多宠臣都在他以下；王宝孙随意指使大臣，改变皇帝的诏敕，甚至可以骑着马进入宫殿。公卿大臣见到王宝孙，都战战兢兢，不敢喘大气。

萧宝卷的暴虐和奢侈，使朝政混乱不堪，尤其是他随意诛杀宿将老臣的行径，把不少老臣逼上了绝境，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一拼了之。裴叔业就是这样一位老臣。裴叔业原是萧鸾的老臣，曾为萧鸾诛杀诸王立过功劳，后一直担任豫州刺史，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萧宝卷即位后，诛杀了许多老臣，裴叔业担心自己也将成为萧宝卷的刀下鬼。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既能避免杀身之祸，又能保全荣华富贵的办法。这一天，他登上城墙，北望淝水，对部下说：“诸位想富贵吗？我能为你们办到！”他的意思是投降北魏。不久，萧宝卷调裴叔业任南兖州刺史。裴叔业担心是萧宝卷设的圈套，不愿意赴任，经过反复考虑，他在永元二年正月奉表降魏。北魏接受了裴叔业的投降要求。二月二十九（己亥），裴叔业病死。众部下推举裴叔业的侄子裴植监管州务。这时，北魏军队到达寿春，接管了这个北方重镇。

裴叔业投降北魏的消息传到建康，萧宝卷立即派平西将军崔慧景率军讨伐。崔慧景也是萧齐的一员老将，对萧宝卷的狂暴早就不满。他决定利用受命出征的机会反戈一击，推翻昏君萧宝卷。他率领军队在距广陵（今江苏扬州）数十里处停下，召集各路军队将领开会，他说：“我身受高帝、武帝、明帝的厚恩，有责任辅佐幼主。然而，萧宝卷昏聩狂暴，朝政败坏；现在正是为国尽力的时候。我想和诸君共创大业安定国家，你们看如何?”崔慧景的话受到部下的齐声响应。于是，崔慧景率领军队渡过长

江直奔建康。

崔慧景的军队声势浩大，连战皆捷，攻破建康，包围了皇宫所在的台城。起先，崔慧景打算废掉萧宝卷后拥立萧宝玄。萧宝玄是萧宝卷的同母弟，他娶徐孝嗣的女儿为王妃，徐孝嗣被杀后，萧宝卷命令萧宝玄离异，萧宝玄十分怨恨。所以崔慧景认为萧宝玄一定会支持他起兵。萧宝玄见有人拥戴自己称帝，自然高兴，便随崔慧景一起到达建康。谁知，这时又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

齐武帝萧赜的孙子萧昭胄和萧昭颖为躲避萧宝卷的屠杀，二人化装成和尚隐匿于民间。崔慧景包围台城，他们见时机已到，便来投奔，说出了自己的本来身份。崔慧景见到萧昭胄，认为他是武帝之后，又想拥立萧昭胄为帝。他犹豫不决，一时难下决心，另外，崔慧景见台城被围，以为胜利指日可待，骄傲起来。他住在法轮寺，整日与客人空谈义理、佛教，坐失了攻城良机，军心开始涣散。

萧宝卷这时从惊慌中镇静下来，他急召豫州刺史萧懿增援建康。萧懿接令，立即出发。夜里，台城军队看见城外燃起一片火把，知道援军已到，大受鼓舞，纷纷击鼓欢呼。萧懿向崔慧景发起进攻，崔慧景战败，仅带几名心腹逃跑，在长江边被斩杀。后来，萧宝玄也被萧宝卷杀死。

萧宝卷接连打败了陈显达、崔慧景等反抗者，诛杀了许多老臣，自以为政权稳固，依然整日花天酒地，恣意胡为。不久，他又对萧懿下了毒手。

崔慧景被杀后，萧懿以功升任尚书令。这时，把持朝廷大权的是茹法珍、王咺之等恩幸，他们见萧懿受到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夺走，便散布谣言说萧懿企图谋反。萧宝卷对有人谋反的事特别敏感，一听这话便警觉起来。他的人生信条是：做事要在人前。于是决定杀掉萧懿。萧懿的部下徐曜甫得到了这个消

息，秘密在江边准备了一条小船，让萧懿逃往襄阳投奔弟弟萧衍。萧懿不肯，他说："人生自古皆有死，哪有叛逃的尚书令！"不久，萧懿被萧宝卷用酒毒死。接着，萧宝卷又下令搜捕萧懿在建康的弟弟和侄子，其弟萧融被杀，其他人因躲藏及时，幸免于难。

萧宝卷残忍暴虐，荒淫无度，把朝政推向绝路，朝野上下，人心思变。永元二年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讨伐萧宝卷。这个昏君的末日到来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南齐书》、《南史》：《东昏侯本纪》、《郁林王何妃传》、《武十七王传》、《江祏传》、《徐孝嗣传》、《裴叔业传》、《崔慧景传》

萧衍建梁

永元二年（500）十一月，尚书令萧懿被东昏侯萧宝卷用毒酒害死，弟弟萧融也被抓住杀害。其余的弟弟因躲避及时，幸免于难。

在萧懿的弟弟中，最有才干和韬略的是萧衍。齐明帝萧鸾时，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萧鸾死后，萧宝卷即位。他暴虐无道，诛杀大臣无数，朝政腐败混乱。萧衍虽在雍州，却非常关心朝廷发生的事情。他断定局势迟早要发生变化，便秘密召募骁勇兵士，又采伐大量竹木沉于檀溪备用。萧懿被杀后，萧宝卷担心萧衍会起兵反叛朝廷，便派直后将军郑植到襄阳，以探望弟弟郑绍叔为名，企图对萧衍行刺。郑绍叔在萧衍手下任宁蛮长史，知道这件事后，秘密地告诉了萧衍。萧衍却满不在乎，他在郑绍叔家备置了酒席，吃饭时，对郑植开玩笑说："朝廷派你来谋害我，今天在宴会上，正是动手的好机会呀！"说罢，宾主哈哈大笑。饭后，萧衍又让郑植参观城防工事、仓库、士兵、战马、武器、船舰等。郑植看过以后，对郑绍叔说："萧衍实力雄厚，不容易对付呀！"郑绍叔说："哥哥回到朝廷，应把看到的情况告诉皇帝，如果要攻取雍州的话，我要率众决一死战！"

这时，萧懿被杀的消息传到雍州，萧衍悲愤不已，连夜召集部将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人到家里研究对策。十一月九日（乙巳），萧衍把僚属集中起来，

对他们说："萧宝卷昏庸残暴，罪恶超过了商纣王，我和你们共同除掉他！"萧衍正式举起了讨伐萧宝卷义旗。他有士兵一万多人，战马一千多匹，各种船只三千艘。他还把当年储存在檀溪的木材、竹竿拿出来修造战船。

萧宝卷闻知萧衍起兵，急忙派辅国将军刘山阳率三千军队，并在途中会合荆州军队，一起袭击襄阳。萧衍得到情报，马上派参军王天虎从雍州去江陵，沿途向荆州各地方官发信，宣称："刘山阳率大军西上，要袭击荆州和雍州。"萧衍对部下说："荆州一向畏惧襄阳人，况且荆州、雍州地界相联，唇亡齿寒。我们应该和他们联系，同心协力！如果我们将荆州、雍州的部队集中起来，顺江而下，纵然是韩信、白起复生，也不能解救建康了。况且建康城内仅有昏君和一批刀敕之徒呢！"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年仅13岁，州中大小事均由长史萧颖胄决定。萧颖胄刚见到萧衍的信时，迟疑不能决定。这时，刘山阳到达巴陵（今湖南岳阳），萧衍再派王天虎去荆州游说。王天虎出发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上次派王天虎去荆州，沿途对各州郡都发了信。这次让王天虎再去，只带了两封空信给萧颖胄、萧颖达兄弟。信上不谈事，只写'天虎口传。'但当问及王天虎时，王天虎却不知所答。王天虎和萧颖胄关系密切，人们一定会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隐瞒着事情。这样，刘山阳也搞不清楚，会与萧颖胄互相猜疑。而萧颖胄有口难言，必然会中我的计谋。这便是两封空信，平定一州呀！"

这时，刘山阳到达了江安（今湖北公安北），他果然疑心，迟疑了十多天不敢前进。萧颖胄非常害怕，却又想不出好办法。一天，他与参军席阐文、谘议柳忱商议。席阐文说："萧衍在雍州蓄兵养士，已非一日，荆州人平时就害怕襄阳人，荆州的兵力也不如雍州雄厚，与萧衍作战，很难取胜。不如杀掉刘山阳，与雍州共举大事，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天子，则霸业可成。现在刘

山阳迟疑不进，这是还不相信我们。我们如果杀了王天虎，将首级送给刘山阳，他的疑虑就可消除。等他到来之后，再将他杀掉，肯定能够成功。”柳忱接着说道：“萧宝卷昏狂悖乱日甚一日，京城大臣人人胆战心惊，我们幸好远离朝廷，可暂保安全。朝廷命令我们攻打雍州，不过是借此让我们互相残杀罢了。当初尚书令萧懿的几千人马打败了崔慧景的十万大军，到头来还是被那帮邪佞小人陷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记取。再说雍州兵力强盛，萧衍才干超群，刘山阳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打败了刘山阳，我们也会受到朝廷的怪罪，是进是退，应该认真考虑。”萧颖胄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纳这个计谋。转天早晨，他召见王天虎，刚刚坐定，萧颖胄便开口道：“你同刘山阳相识，现在借你的头用用”。王天虎大惊，未来得及反抗就被士兵斩首。刘山阳得到王天虎的人头，非常高兴，认定萧颖胄未反，便带少数随从去见萧颖胄。萧颖胄设下埋伏，刘山阳刚进城门，就被袭杀。

萧颖胄杀掉刘山阳后，派人将其头送至襄阳。萧衍大喜，与萧颖胄约定，同时东下，攻打建康。为扩大声势，萧衍上表南康王萧宝融，劝他称帝，萧宝融不答应。萧颖胄便让从建康逃出的降将夏侯亶假称宣德太后敕令，待清除宫中的昏君和奸佞后，由萧宝融继承皇位。现可封地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

中兴元年（501）春天，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命萧颖胄为左长史，号镇军将军；萧衍为征东将军。萧衍从襄阳出发，二月到达竟陵（今湖北钟祥），命令王茂、曹景宗为前锋指挥，众将领建议萧衍用主力进攻郢城（今湖北武汉），另派军队袭击西阳、武昌。萧衍不同意，他说：“王茂、曹景宗应率军渡过长江，与荆州兵力联合，共同进攻郢城。我则带兵围攻郢城西南的鲁山以打通沔汉水路，保证郢城、竟陵的粮草供应。然后从江陵、湘州增兵，兵多粮足，何愁不能夺取天下！”

三月十一日（乙巳），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被萧衍等人拥立为帝，是为和帝，改元中兴。萧颖胄为尚书令兼荆州刺史，萧衍为左仆射、征东大将军，统领各路军队。萧宝融还下诏，宣布废萧宝卷为庶人，封涪陵王。在建康城中的萧宝卷对这些诏令自然不理会，他派豫州刺史陈伯之率大军向西发兵，进攻荆州和雍州。

四月，萧衍出沔水，命王茂、萧颖达等率军逼近郢城。郢城守将薛元嗣不敢出城迎战，闭城等待建康援军。诸将领要求攻城，萧衍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同意。萧衍包围郢城达两个月之久。

五月，萧宝卷派部将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援救郢城，进驻巴口。萧衍闻讯，立即派梁天惠驻军渔湖城、唐修期把守白阳垒，与吴子阳夹岸相对。吴子阳见势又赶忙占据离郢城三十里的加湖。七月初，萧衍命令王茂乘水涨时，率水军袭击加湖，吴子阳战败，士兵被杀、溺水而死者数以万计，王茂大胜而归。加湖之守失利后，郢城、鲁山的守军士气大减。

在萧衍的围困下，鲁山守军粮食吃光，士兵靠捕捞河边的小鱼充饥。守将房僧寄病死，新推举的将领孙乐祖无计可施，只好举城投降。郢城也因被围二百多天，而临绝境，城内瘟疫流行，死者十之七八，死尸无处埋葬，有的就堆在床下，而活人还在床上睡觉。郢城守将薛元嗣无路可逃，出城投降。

至此，郢城地区全部被萧衍占领，萧衍率军迅速东进，这年十月，抵达建康城下。萧宝卷指挥军队顽强抵抗，双方在朱雀桥南展开激战。王茂英勇果敢，他跳下马，挥舞大刀，冲在前面。士兵们也个个争先，斗志旺盛。朝廷军队顶不住如此凶猛的冲击，顿时土崩瓦解，士兵竞相逃命，践踏而死、掉入秦淮河被淹死的不计其数。尸体堆积都高出水面，后来的都踏着尸体过河。萧衍乘胜进军，包围了皇城。这时宫中还有士兵七万人。

起初，萧宝卷与左右亲信商量，认为陈显达起兵时一战即溃；崔慧景围城十几天便退败，萧衍也会这样。所以，仅准备了够一百天使用的木柴、粮食。但朝廷军队连遭败溃，溃不成军，茹法珍等人怕人民逃跑，便关闭城门不再出战。

萧宝卷平时自己挥霍无度，却对臣下非常吝啬，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他赏赐众将士，以鼓舞士气。萧宝卷却说："贼来只是为了收拾我一个人吗？为什么找我要东西！"宫内有数百块木板，官员们请求做城防工事用。萧宝卷不让动，说要留下用于修造宫殿。在被围的危急时刻，他还催促御府制作了供三百人使用的精致仪仗，准备待建康解围后，他出行时使用。他还让人为他打制金银雕镂的器物，比平时要得还急。对此，人们怨气很大，消极怠工，都盼望萧宝卷早些败亡。

齐朝虽已临近末日，可是佞幸小人茹法珍和梅虫儿还给萧宝卷出坏主意。他们说："围困不能解除，是因为大臣不肯出力，应该全都诛杀！"征虏将军王珍国和张稷害怕大祸临头，就秘密派亲信出宫，向萧衍献上一块明镜，以表示自己的真心。萧衍会意，用一块割断的黄金回报，表示与他志同道合。兖州中兵参军张齐是张稷的心腹，王珍国让他与张稷合谋，共同杀掉萧宝卷。他们同意了，并让后阁舍人钱强作内应。十二月初六（丙寅）夜里，钱强秘密派人打开云龙门，王珍国、张稷带士兵进人内殿。此时，萧宝卷正在含德殿听笙歌。他突然听到有人进殿的声音，感到情况不妙，赶忙从北门跑出，打算回到后宫，但宫门已经关闭。宦官黄泰平赶上，举刀便砍，正中萧宝卷的膝盖，萧宝卷跌倒在地，张齐上前一步，将萧宝卷斩杀。接着，张稷等人召集文武百官，让他们在给萧衍的投降书上签名，又将萧宝卷的头用黄油绢裹好，派张弘策先人宫清理，查封库房及图籍。此时，城内珍宝到处堆积，张弘策严厉约束部属，秋毫无犯，并将潘贵妃和萧宝卷宠幸的佞臣茹法珍、梅虫儿、王咺之等四十一人全部抓

获关押起来。

十二月十九日（已卯），萧衍进驻阅武堂。为整顿朝政，接连下达了三次命令。其一："要仔细检查各种规章，凡是没有用的规章，滥设的赋税，苛刻的刑罚和劳役，一律废除。"其二："对尚书省各部门的文案要通检一遍，萧宝卷时对各种诉讼案件处理不公道的，要予以纠正，对拖延不办的要及时办理。"其三："对阵亡将士，包括朝廷军队中的死亡者要加以掩埋。"潘贵妃国色天姿，萧衍打算收留她，征求侍中、领军将军王茂的意见。王茂说："亡齐者正是这个女人，如果留下她会招来外界的议论。"萧衍接受了王茂的意见，下令将潘贵妃处死，佞臣茹法珍等人也被杀。

天监元年（502）春天，在江陵的和帝萧宝融遣使到建康慰问萧衍，萧衍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三月，萧衍派人迎萧宝融东归建康。这时，萧衍已为自己称帝制造了许多舆论。萧宝融自知与其当傀儡皇帝不如及早退位，以求平安。三月二十八日（丙辰），萧宝融到达姑孰（今安徽当涂），下诏禅位于萧衍。四月，萧衍在建康南郊正式称帝。改年号为天监。是为梁武帝。

萧衍称帝前后，采取了不少措施改变东昏侯萧宝卷时的朝政弊端。如他下令杜绝浪费，说："凡是东昏侯时候的不必要的开支，除了用以学习礼乐法度，或用来加强和修缮军事装备的以外，其余全部禁绝。"萧衍还允许臣民批评朝政，特地下诏说："在公车府谤木、肺石旁边分别设立信箱。如果当政者不肯进言，臣民想批评朝政，把意见写下投入谤木箱即可；如果功劳和才干被埋没，受冤屈没有得到昭雪，都可以把申诉投入肺石信箱。"他还率先勤俭，穿衣都是多次洗过的，平时吃饭只以蔬菜为主。遇有事务繁忙，只喝稀汤充饥。每次选拔地方官员，尽量要求廉洁公正，并且亲自接见他们，勉励他们为政之道。政绩显著的官吏，可以很快得到提升。

萧衍代齐建梁后，能接受齐亡的教训，勤于治国，整顿吏治，使梁朝初年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气象。

（孙立群）

参考资料：

《南史》、《南齐书》：《东昏侯纪》

《梁书》：《武帝纪》、《王茂传》、《曹景宗传》、《张弘策传》

侯景之乱

天监元年（502）四月，萧衍称帝建梁。萧衍深知，宋齐两朝之所以覆亡，是由于皇帝昏庸和宗室内部骨肉相残所致。为避免前朝悲剧重演，必须协调好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为此，萧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他为了赢得士族的支持，广泛吸收士族参政，并给予他们许多特权。天监三年，萧衍命令吏部尚书徐勉整理《百家谱》以甄别士族。规定各郡国均应有士族在朝为官，又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还派人专门搜检、推荐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希望他们参加政权。其实，到了梁朝时，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已经走下坡路，他们凭借门第的高贵，不思进取；他们治国无方，办事无能，整日花天酒地，只会打扮享受，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萧衍尽管对他们予以许多特权，无非是希望自己的政权得到他们的支持。梁朝把持机要大权的往往是寒门出身的低级官吏。如朱异任中书通事舍人，把持朝政达三十年之久。他们或靠军功起家，或受皇帝宠信而发迹。萧衍调合士庶矛盾的作法，使他获得了社会上较多的支持。

萧衍一方面尊重士族，重用寒人；另一方面对皇室子弟则极力优容，甚至对他们肆意聚敛和违法行为也不允追究。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一个既无能又贪财的家伙。天监五年（506），梁朝出兵北伐，萧衍没有起用名将韦睿，却任命萧宏为主帅。当时梁军武器精良，阵容齐整，北魏深感震惊。梁军在洛口（今安徽怀

远西南）驻扎，一天夜里，突降暴雨，雷声隆隆，狂风呼啸，萧宏以为是北魏军队前来偷袭，惊惶失措，丢下军队，只带着几名亲信跑回建康。天亮以后，梁军找不到主帅，乱作一团，各自逃散，一路上，尽是丢弃的武器和铠甲，死伤士兵近五万。萧宏临阵脱逃，本应按军法处治，萧衍却宽宏大量，反而用好言相慰，没过多久，又将萧宏升官。萧宏奢侈无度，贪财无厌。他家有库房近百间，平时紧锁房门。有人怀疑里面存放的是武器铠甲，便秘密报告了朝廷。萧衍虽然对兄弟之情看得很重，但听了这种事也很不高兴。有一天他带着老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去萧宏家中吃饭。半醉之后，萧衍对萧宏说："我想到你的后房看看。"随即招呼轿子，直接到了内堂的后面，萧宏惟恐萧衍发现自己的秘密，脸上带出恐惧的神色，萧衍对他更怀疑了。于是挨屋检查，他看到屋里放的全是钱。每百万钱堆放在一起，上面放一黄色标志；每一千万钱放在一间库房中，挂一紫色标志，共有三十多间房屋。萧衍屈指一算，知道萧宏的钱总共有三亿多。其余库房中则存放了大量的布匹、绢绸、丝绵、漆、蜂蜜、纻麻、蜡等杂货，库房中塞得满满的，难以数计。这些钱和物品都是萧宏受贿所得。萧衍一见不是武器，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他笑着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不错呀！"于是又回到堂前痛饮，一直到深夜才还宫，从此，他们兄弟之间更和睦了。

萧衍对贵族优容，对老百姓的盘剥却丝毫不减，人们贫穷困窘，怨声载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有一年春天，萧衍到南郊祭天，路上一位老者拦住了萧衍的车，对他说道："陛下行法，对百姓苛刻，对权贵却一味宽容，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您能有所改变，这将是天下的幸事。"萧衍听后并没有根本改变。

萧衍晚年，笃信佛教，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同泰寺。他还三次舍身出家，每次都是大臣花巨资把他赎回。萧衍醉心佛教，浪费了大量的钱财，贻误了国家军机要

务，加剧了社会矛盾。到了他的晚年，又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侯景之乱。

侯景是东魏高欢手下的将领，善谋略，深得高欢器重。在东魏历任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领兵十万，控制着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侯景因功自傲，看不起高欢之子高澄，他曾经对人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高王死后我一定不能与高澄这鲜卑小儿共事！"他想打过长江，当天下之主。曾对高欢说："我愿意带领三万人马，横扫天下，渡过长江把萧衍那个老头抓来，让他做太平寺的寺主。"

太清元年（547）正月，高欢病死。其子高澄担心侯景势大难制，想将侯景调回，夺其兵权。侯景想到自己与高澄素有隔阂，心里非常不安，于是在河南叛变，以十三州之地投降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对侯景投降的态度非常谨慎，表面上任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等高官，暗地却很戒备，派大军接收侯景所辖州县，并召侯景入长安，想趁机夺其兵权。侯景见投降西魏无利可图，又改变主意，派人到江南向萧衍上表，请降梁朝。

萧衍接到侯景上表，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说："近年来，我们与魏友好往来，边境地区一直平安无事，现在若收留叛逆之臣，恐怕不太合适。"萧衍不同意谢举的意见，他认为："如果得到侯景，塞北就可以到手，这是难得的机会，应该变通些才是。"萧衍愿意接受侯景投降还有一个原因：当年正月，他曾做一梦，梦见中原地区的牧守们都来献地投降，举朝上下一片欢庆。起床后他把做梦的事告诉了中书舍人朱异。并说："我平时很少做梦，一旦做梦必会应验。"朱异随即附和："这一定是天下要统一的征兆！"不久，果然有侯景欲降的消息。萧衍自然高兴，执意收留侯景。他下诏授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并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兵三万向悬瓠

（今河南汝南）方向靠近，接应侯景。平西咨议参军周弘正知道侯景内心奸诈，反复无常，见萧衍不听劝阻，不禁叹道："乱事就在眼前了！"

为牵制东魏，支援侯景，萧衍又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兵五万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待攻下彭城后再与侯景会师北伐。九月初九，梁军到达距彭城十八里的寒山。按照预定计划，梁军在此修堰，截断泗水淹灌彭城。侍中羊侃征调民夫，只用二十天便修筑完毕。羊侃劝萧渊明趁洪水暴发，水势凶猛，放水灌城。萧渊明没有听从，众将领与萧渊明一起议事，萧渊明也不能作出决定，只会说："到时候根据情况采取措施吧。"原来萧渊明是个毫无作战经验的无能之辈！

这时，东魏的援兵正在赶赴彭城。羊侃建议萧渊明："魏军远道而来，趁其疲惫出击，可以取胜。"萧渊明仍不采纳。第二天，羊侃又劝萧渊明出战，萧渊明还是不听。羊侃知道萧渊明必败，便率领他的部下离开了萧渊明，驻扎到新修好的堰坝上。

十一月十三日，东魏将领慕容绍宗率军直到彭城城下。他亲自带领一万多士兵攻打潼州刺史郭凤的军营。当时，萧渊明喝醉了，不能起床，命令将领们去救郭凤，但没有人敢出战。北兖州刺史胡贵孙对谯州刺史赵伯超说："我们领兵干什么来了？为什么不敢应战呢？"赵伯超不能回答。胡贵孙独自率领部下与魏军作战，斩杀二百名魏军。论实力，魏军不在梁军以下，可是，慕容绍宗突然下令，魏军撤退。原来，这是一个圈套，他们佯装撤退，引诱梁军追击，然后再前后夹攻，歼灭梁军。梁军果然中计，紧追不舍，忽见身后闪出一支魏军，冲杀过来；慕容绍宗亦令军队回头再战，梁军遭前后夹击，被动挨打，士兵四散而逃，主帅萧渊明及胡贵孙、赵伯超被魏军活捉。只有羊侃未遭损失，全军撤退。

梁军战败，萧渊明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廷，萧衍正在午睡。朱

异将他叫醒，萧衍闻讯，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倒，他长叹一口气，说道："难道我也要步晋朝的后尘吗?"

东魏在寒山打败梁军后，接着回师进攻侯景。侯景带领四万人马，退守涡阳（今安徽蒙城）。双方经过数月的反复交战，最后侯景军队粮食用尽，又无外援，被魏军打败。侯景仅带八百步骑，狼狈不堪，逃到梁朝。萧衍将侯景收留，任他为南豫州刺史，驻扎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一些大臣对萧衍收留侯景的作法十分不满。光禄大夫萧介上表劝谏说："我听说您收留了侯景。为了梁朝的大业，我要告诉您，恶人的秉性是不会改变的，天下的恶人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狼子野心，最终也难于驯服。饲养老虎，一定会出现被饥饿的老虎吃掉的祸患。侯景凭借他的凶狠与狡猾，受到高欢的豢养和保护，身居高位。然而，高欢死后坟土未干，他就背叛了高氏，后又逃到关西，宇文泰没收留他，所以才投靠了我们。我认为侯景肯定不会为梁朝效力，他抛弃国家就像脱掉鞋一样轻率，背弃国君、亲人像丢掉草芥一样容易，您怎么会认为他是纯正的臣子呢?"萧衍虽然很赞赏萧介的一片忠心，却没有听进他的忠告。

东魏打败了侯景之后，多次给萧衍写信，请求和好，后来又通过萧渊明写信提出："如果梁与魏恢复友好关系，高澄会允许我回到梁朝。"萧衍思念侄子，看了萧渊明的信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便与大臣们共同商议此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人说："静寇息民，与魏和好实属上策。"只有司农卿傅岐认为："高澄为什么要和我们讲和?这一定是他的离间计，是想使侯景产生猜疑，他一定会发动叛乱。如果您答应与东魏友好往来，就会中了他的奸计。"朱异等人支持与东魏友好，梁武帝同意了朱异的意见。

侯景得知萧衍欲与东魏和好，极力反对。他给萧衍写信说：

“我与高氏之间的嫌隙和仇恨已经很深，我仰仗您的威灵期待着报仇雪恨，现在您又与高澄友好，让我何处安身呢？我请求再次与高澄交战，来显示梁朝的皇威！”萧衍回信拒绝了侯景的要求。侯景再次写信，要求出兵收复北方，萧衍仍未答应，坚持与东魏和好。侯景的要求没有实现，又气又恼，开始憎恨萧衍，他说：“我早就知道吴老公是个薄心肠的家伙！”行台左丞王伟趁机鼓动侯景谋反，说：“现在，坐等是死，举大事也是死，请您早做决定！”这时，侯景又听说萧衍已派徐陵等人出使东魏，反叛的念头更加强烈了。

促使侯景反叛的还有一事。侯景曾上书萧衍，要求娶王家或谢家的女子为妻，萧衍说“王、谢门第高贵，你与他们不相配，可与朱、张以下的家族寻访聘娶。”对此，侯景更加愤恨，他说：“将来我一定把吴地的女儿配给奴隶！”从此，侯景在寿春大量征召男子为士兵，将女人分配为军妻，修整器械，准备起兵。在寿春的太子舍人元贞知道侯景有叛逆之心，多次向萧衍要求回朝廷。萧衍不以为然，对他说：“黄河以北的事虽然没有成功，何必担心失掉江南呢？你要再忍耐一下！”元贞还是害怕，逃回建康，把侯景的事告诉了萧衍，萧衍任命元贞为始兴内史，却没有把侯景的事放在心上。

萧衍的侄子临贺王萧正德贪婪残暴，无法无天，萧衍很厌恶他。萧正德私下豢养敢死之士，积存粮食货物，希望国家动乱，以求一逞。侯景知道了这一情况，便派人前去联络，表示愿意拥护萧正德称帝。萧正德欣然同意作内应，侯景加紧准备，起兵叛梁。

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将侯景欲谋反的情况报告了萧衍。当时萧衍把边防之事交给朱异负责，大小事都找朱异商议。他问朱异：“侯景谋反，有无此事？”朱异说：“侯景军队已经溃散，馀部不足一千，怎么会造反呢？”萧衍让人转告萧范说：“侯景困孤

单危难而投靠我，如同婴儿希望得到哺乳，他怎么能够谋反？”萧范再次上书陈述说：“如不早将侯景除掉，灾难将会降临到百姓身上！”并表示愿亲率军队讨伐侯景。萧衍还是无动于衷，不耐烦地说：“这种事朝廷自有安排，你没必要操心！”朱异也对萧范的使者说：“鄱阳王难道不许朝廷有一个客人么？”从此，萧范再上书，均被朱异扣压不报。

侯景想联合司州刺史羊鸦仁一起反叛朝廷，羊鸦仁大怒，将侯景派来的信使抓捕并押送建康。朱异很不高兴，阴沉着脸说：“侯景只有八百叛虏，能有什么作为？何必大惊小怪？”不久，命令将侯景使者释放。侯景见萧衍对他的举动不仅不加防备，还袒护包庇，便更加大胆，加快了谋反的准备。他甚至公开上书，要求诛杀羊鸦仁，表示自己很冤枉。对侯景这并不高明的谎言，萧衍又相信了。他让朱异告诉侯景说：“一般百姓家中有五个或十个客人，尚能使他们满意；我身为帝王，只有你这么一个客人，还让你有怨言，这真是我的过错呀！”于是他多次向侯景赠送彩帛和钱币，侯景得到赏赐，心里暗喜：“萧衍这个老头子的末日快到了！”

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终于起兵反叛梁朝。他声称要诛杀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骥、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这些人都以奸诈贪婪，远近闻名，为人痛恨。其实，这不过是侯景掩人耳目而已，他的目的是要取代梁朝。萧衍得知侯景起兵，还以为是小事一件，毫不惊慌，拈须笑道：“侯景有何作为？我一扬鞭，就够他受的。”他以为有长江天堑，侯景是不会轻易打到建康的。他对萧正德早已与侯景相互勾结毫无所知，反而派萧正德防守长江，阻挡侯景。没想到正中萧正德下怀。十月，侯景率军抵达长江北岸，萧正德连忙派数十艘大船将侯景军队全部接到江南。侯景不用一兵一卒便顺利地渡过长江，很快逼进建康。萧正德又暗地派人打开城门，引侯景入城，并与侯景联合，

包围了台城。

台城是梁朝的宫城，也是萧衍的最后一道防线。到这时，他才意识到，是自己的一味宽容酿成了侯景谋反的大祸，现在已无退路，只有一拼到底，听天由命了。台城防守牢固，侯景一时不能攻下。此时，萧衍已 86 岁，城中防务由太子萧纲主持，防军在羊侃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羊侃病死后，右卫将军柳津继续率众防守。侯景为攻下台城，想尽了办法，或用火烧，或用水淹，均未能奏效。从十月到转年三月，台城仍未被攻下，然而城中的情况却越来越恶劣了。台城初被围时，城中有男女十万余人，甲士二万余人，米四十万斛。随着时间拖延，城中粮食断绝，战士死伤严重，能够登城作战的士兵已不足四千人了。这些人也都瘦弱不堪。城中道路上到处堆着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三月十二日（丁卯）黎明，侯景军队从城西北楼攻人台城。永安侯萧确奋力抵抗，未能击退敌人，他赶快回宫，告诉萧衍，“城已被攻陷了!”萧衍病饿交加，躺在床上已不能动弹，他有气无力地问道：“还可以再打一仗吗?”萧确说：“不行了。”萧衍见大势已去，遂轻声叹息说：“梁朝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还有什么悔恨呢?”

不多时，侯景派王伟来见萧衍，萧衍让侯景在太极东堂晋见。侯景来到时，随身有五百名军士护卫。侯景见到萧衍，叩头触地，不敢仰视。萧衍神色安详，问道：“你在军中时间很久了，一定很辛苦吧?”侯景汗流满面，不敢回答。萧衍又问：“你是哪一州人？为何到这里来，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惶恐不知所答。其部将任约在旁边代答道：“侯景的妻子儿女全被高氏屠杀，今天仅单身投靠陛下。”萧衍听了，觉得好笑，又问：“你刚渡江时有多少人马?”侯景说：“不足一千人。”萧衍再问：“包围台城时呢?”“十万。”萧衍问：“现在共有多少人?”侯景答：“四海之内没有不属于我的人。”萧衍低下头去，不再说话。侯景

凭借军事力量，以主宰者自居，他派人监视萧衍，平常饮食，不让吃饱，各种要求，多不能得到满足。萧衍忧愤成疾，体力越来越弱。五月初二（丙辰），精力耗尽的萧衍躺在净居殿内，口中觉苦，想喝蜂蜜却无人给送，他虚弱地呼出两声“荷！荷！”便死去了。享年86岁，谥号武帝。

萧衍是代齐建梁的开国之君，他的文治武功曾显赫一时，但他对侯景一味宽容，养虎成患，又葬送了梁朝，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萧衍死后，太子萧纲即位，是为简文帝。侯景自称相国、汉王、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把持朝政。萧正德为侯景渡江、攻下台城出力不少。侯景在太清二年（548）十一月包围台城时，也兑现诺言，拥萧正德为帝。萧正德自以为梁朝天下非他莫属了。但在侯景眼里，萧正德并无大用，不想真正立他为帝。果然，攻下台城后他便矫武帝诏，任自己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将萧正德废黜，任他为侍中、大司马。萧衍一死，萧纲又名正言顺地当了皇帝。萧正德美梦破灭，非常怨恨侯景。太清三年六月，他秘密写信给鄱阳王萧范，要他领兵人建康杀掉侯景，此信恰被侯景士兵截获，侯景遂将萧正德缢杀。

简文帝萧纲在侯景手中也不过是个傀儡，处处都要受到他的限制。两年之后，即太清五年八月，侯景便将萧纲废掉，不久又杀了萧纲，立豫章王萧栋为帝。这时，侯景称帝的时机已日渐成熟，立萧栋为帝，不过是装装样子。他利用这个机会大肆诛杀萧氏子弟，排除他称帝的障碍。十一月，称帝仅三个月的萧栋便被废掉，十一月十九日（己丑），侯景称帝，改年号为大始。然而，正当侯景陶醉在登基大典的礼乐声中的时候，讨伐他的各路军队已纷纷逼进建康。其中梁大将王僧辩、高要太守陈霸先都是攻打侯景的主力军。承圣元年（552），王僧辩自江州出发，攻克芜湖，直指建康。三月，侯景战败，仅带数百骑逃跑。一路上又遭

追击，所剩不过数十人。四月，他从沪渎（今上海）入海，被部下羊鲲所杀，送尸于建康。

侯景这个反复无常、凶恶残忍的野心家，攻占建康三年，称帝一百二十天，就灭亡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梁书》：《武帝纪》、《简文帝纪》、《侯景传》、《王伟传》

《南史》：《梁武帝纪》、《梁简文帝纪》、《侯景传》、《王伟传》

西魏犯江陵

承圣元年（552）四月，侯景兵败被杀，至此，历时五年之久的侯景之乱被平息。侯景之乱后，梁朝的政局并未安定。梁的诸王相继起兵，割据一方，并互相攻打。西魏趁机大举南下，蚕食土地，掳掠人口，梁朝进一步衰落。

这年二月，征东将军王僧辩攻克建康，侯景溃败之后，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称帝于蜀。萧纪是萧衍第八子，大同三年（537）任益州刺史，到他称帝时，已在蜀地经营十多年。这期间，他向南开发了宁州、越嶲，向西打通了资陵、吐谷浑的交通；内修耕织、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财用充裕，兵势强盛。

当建康陷落，武帝萧衍饿死台城之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起兵，讨伐侯景。萧绎是萧纪之兄，因排行第七，故萧纪常称之为七官。萧纪一向看不起萧绎，听说萧绎要讨伐侯景，便不以为然地对左右说："七官萧绎是个文人，怎能匡扶社稷，救济黎民！"后来，萧绎发兵攻打侯景并取得了胜利，实力大增。承圣元年十一月，萧绎见侯景已平，亦在江陵即位称帝。是为梁元帝。转年三月，萧纪率军东下，攻打萧绎。萧绎闻讯大怒，他让方士在木板上画萧纪的像，亲自在图像的四肢上钉钉子，以为这样可以厌杀他。为阻止萧纪进兵，萧绎还派人向萧纪报告说侯景已平，要萧纪退兵。使者在途中被太子萧圆照截获，他极力主张东进，便向萧纪谎报说："侯景还没有平定，而且已攻破荆州，应该赶快发兵征讨。"萧纪信以为真，就火速率兵东下。

萧绎怕不敌萧纪，便写信向西魏求援。请西魏太师宇文泰出兵攻打萧纪。宇文泰见这是坐收渔利之机，便同意发兵。他派大将军尉迟迥率甲士一万二千，骑兵万人，从散关进发，讨伐蜀地。萧纪设置的潼州刺史杨乾运想担任梁州刺史，沙州刺史杨法琛想担任黎州刺史，萧纪均未答应。他们对萧纪不满，当西魏军队到达的时候，便一同投降了尉迟迥。承圣二年五月，尉迟迥在他们的配合下，很快包围了成都。

萧纪进军到巴东时，才知道侯景之乱已经平定，感到后悔，便把太子萧圆照叫来，责备他。萧圆照不服气，回答说："侯景之乱虽平，江陵的湘东王未服！"萧纪也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称帝，就不能再臣服于别人，于是想继续东进。但是，他军中的将士都思念家乡，不愿意出川，萧纪坚持出兵，并宣布："有反对东进者，一律处死！"

六月，萧纪的军队进至西陵，萧绎派护军陆法和在峡口两岸修筑两座城垒把守，并用大石、铁锁拦截江流，阻止萧纪。萧纪攻断铁锁，陆法和向萧绎告急，萧绎无将可派，只得将被俘的侯景手下将军谢答仁从狱中释放，任他为步兵校尉，带领军队增援陆法和。同时派人带信去见萧纪，准许他回蜀称帝，专制一方。萧纪不答应，回信仍以兄弟相称，表示不承认君臣名分。不久，又有军队增援萧绎，萧绎实力增强，又给萧纪写信，说："我的年龄比你大，又有平定侯景的功劳，按理而论，皇位应该归我。我期待你遣使讲和，你若一意孤行，不要怪我不念兄弟情谊。"这时，萧纪见军队屯驻日久，并无进展，后方魏军包围成都，危在旦夕，便有求和之意。他派度支尚书乐奉业去江陵见萧绎，请求按照以前萧绎信中所说，回师蜀地。乐奉业知道萧纪必败，到了江陵，便背叛萧纪，向萧绎报告说："蜀军缺粮，士卒死亡甚多，全军败亡，指日可待。"萧绎得知此情况，又改变主意，不允许萧纪求和了。

萧纪非常贪财，他在蜀期间，搜刮了许多金银财宝。他用一斤黄金做成一饼，一百个黄金饼装为一箱，共有百箱，约万斤。还有银子五百箱，其他锦彩不计其数。这些东西都随军携带，每次打仗前，他都把这些东西挂起来悬示将士，却又不肯真的拿出来作奖赏。宁州刺史陈智祖建议把这些财物分发给军队，以招募勇士，鼓舞士气，但萧纪不听。再有求见议事者，萧纪干脆称病不见，因此军队将士离心离德，日渐离散。

七月，萧绎派军队重创萧纪，萧纪军队溃败。八千余人投水而死。萧绎部将樊猛紧追不舍。萧绎秘密指示樊猛，“如果让萧纪生还，那是不成功的。”樊猛明白萧绎的意思。遂率兵追到萧纪的船上，萧纪在船上绕船而跑，见无法逃脱，就将装金子的口袋扔向樊猛，说：“这个给你，送我去见七官。”樊猛大笑着说：“你怎能随便与天子见面！杀了你，金子还能跑到哪儿去呢?”随即将萧纪及其子萧圆满杀死。不久，西魏大将军尉迟迥攻下了成都，益州遂为西魏占领。

萧绎打败了萧纪，想返回建康。许多大臣不同意。领军将军胡僧佑说：“建康王气已尽，与北虏只隔一江，若有意外，后悔莫及。且自古有言：‘荆州沙洲满百，定会出天子。’现在枝江又生出了新沙洲，荆州的沙洲已满百，陛下正应此兆。”在大臣们的劝阻下，萧绎也认为建康经过战乱，残破凋敝，不宜建都，而江陵正处于全盛之时，便留在了江陵。

当时，岳阳王萧詧占据雍州襄阳，不服从萧绎。萧詧与其兄萧誉都是昭明太子萧统之子，萧统早死，萧衍立三子萧纲为太子，而不立他们兄弟为太孙，他们心中不平。与叔叔萧绎关系也不好。侯景之乱时，萧绎向萧誉征兵征粮，萧誉不从。于是，萧绎派兵攻取湘州，杀死萧誉。萧詧见哥哥被杀，对萧绎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萧绎定都江陵后，派侍中王琛出使西魏。西魏宇文泰占领益

州后，又产生了夺取江陵的念头。萧詧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送给西魏的贡品越发多了。承圣三年三月，西魏派侍中宇文仁恕出使梁朝，恰巧北齐的使者也到了江陵。萧绎对西魏使臣的接待不如对北齐使臣那样热情。萧绎还要求按过去的版图划定疆界，言辞也很傲慢。宇文仁恕回国后把情况报告了宇文泰。宇文泰听罢，愤怒地说："古人有言：'天意将抛弃他，谁能使他兴起呢？'这话指的就是萧绎吧！"于是秘密准备伐梁。降魏的梁朝旧臣马伯符偷偷派人把这一情况报告萧绎，但萧绎不相信他。

当年十月，宇文泰派柱国将军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率兵五万，大举伐梁。萧绎得知后，赶忙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对策。领军胡僧佑、太府卿黄罗汉说："西魏与梁朝一向友好往来，也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想西魏不会进攻我们。"侍中王琛也附和说："去年我曾出使西魏，揣摩宇文泰的神色，判断他不可能发兵攻打我们。"萧绎也认为他们分析得有道理，放松了警惕。没过几日，于谨的队伍抵达樊、邓；萧詧也率领军队与西魏军会合，共同进攻江陵。

十一月初一（癸未），西魏军队渡过汉水，于谨命令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占领了江津，切断萧绎东逃的道路。初二（甲申），宇文护攻克武宁。萧绎赶忙出城布置防守，他让修筑栏栅，长达六十多里。又派领军将军胡僧佑负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任他的副将，左仆射王褒负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任他的副将。萧绎还派太子在城楼上巡视，命令城中居民帮助军队搬运城防用的木石。初四（丙戌）夜里，西魏军队到达距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两天后，梁军将领裴畿、裴机、朱买臣等冲出栅栏迎战，裴机将西魏仪同三司胡文伐斩杀。同时，萧绎改任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让他带兵救援江陵。正当防守的关键时刻，萧绎军营的栅栏内失火，烧毁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萧绎心急如焚，亲临烧毁的城楼察看，又看到魏军正源源不

断地渡江，不禁仰天长叹。

王琳率军赶到长沙，派长史裴政由小道先去江陵报信，裴政走到百里洲，被魏军俘获。萧詧对裴政说："我是武帝萧衍之孙，难道不能当你的君主吗？如果臣服于我，我可以保你富贵，如果不从，定将你身首异处。"裴政假意回答说："我愿意服从你。"萧詧把裴政捆住，推到江陵城下，让他向城里喊话，说："王僧辩听说江陵被困，已自立为帝。王琳势单力弱，不能再来救援了。"但是，裴政却大声向城中喊道："援军已大批来到，你们要坚持到底！我虽被敌人抓住，宁肯粉身碎骨也要报效国家！"在旁边监视的士兵连忙打裴政的嘴，不让他再说下去。萧詧大怒，下令将裴政处死。西中郎参军蔡大业劝阻说："裴政颇有民望，杀了他，荆州恐怕难以攻下。"萧詧觉得此话有理，便放了裴政。

萧绎为保住江陵不失，向四方征兵求援，都未能实现。西魏从各个方向一齐攻城。城中的守军顶着门板作为盾牌，胡僧佑冒着飞箭流石，昼夜指挥作战。鼓励士兵拼死抵抗。魏军死伤很多，无法前进。不久，胡僧佑被流箭射死，军队无人指挥，城内军民惊惶失措。西魏军队进入城内。元帝见大势已去，带着太子及少数大臣退到金城自保，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圆为人质，到于谨军中去求和。魏军又将萧绎等人包围。萧绎躲进东阁竹殿，命令舍人高善宝把自己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烧毁。他也准备跳到火中自杀。左右侍从好不容易劝阻了他。萧绎万分痛苦。他抽出宝剑，向柱子猛砍，宝剑折断。他长叹道："文武之道，今天算完了！"他让御史中丞王孝祀写投降书。于谨接到投降书，提出让太子来当人质，萧绎只好把太子送去。萧绎投降后，萧詧先把他带到自己的军营，关在黑帐幕中，狠狠地羞辱了他一番。有人问萧绎："为什么把书都烧毁了？"萧绎回答说："我读书万卷，还落得今天亡国的结局，所以干脆烧了它！"十二月十九日（辛未），萧绎被杀死。

西魏军队攻陷江陵后，将府库珍宝洗劫一空，又将梁朝王公百官及男女百姓数万人押送长安。撤离前，将萧詧立为梁主，只给了他一座江陵空城和荆州界内缘江的一块狭长土地，宽不超过三百里，其余地方以及他原来拥有的雍州襄阳都被西魏夺走。

在此以前，部将尹德毅曾劝萧詧："现在魏军的精锐都集中在江陵，不如以宴会为名，将于谨等魏将诱杀，把魏军歼灭，然后安抚百姓，招安王僧辩，并回到建康称帝。这是极好的机会，如果错过将后悔莫及！"萧詧却说："此计并非不好，只是魏人待我不错，我不能以怨报德。"等到西魏将江陵百姓掳掠北去，连襄阳也丢了，萧詧悔恨万分，长叹道："只恨我当初不采纳尹德毅的计策！"

第二年正月，萧詧在江陵称帝，年号大宝。是为梁宣帝。史称萧詧所建梁朝为后梁。萧詧虽然称帝，但对魏上疏仍然称臣，不过是西魏的附庸。

西魏攻陷江陵之后，梁朝又丧失了许多土地，朝政进一步衰败，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

（孙立群）

参考资料：

《梁书·元帝纪》

《南史》：《王僧孺传》、《胡僧佑传》、《萧詧传》

陈霸先建陈

梁武帝萧衍后期，由于一味宽容，导致了侯景之乱。侯景之乱被平定后，诸王争斗不休，西魏乘机南下占领了大片土地，梁朝日益衰败。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位将领的力量却不断发展壮大，最后终于取代了梁朝，建立了南朝中最后一个政权——陈朝。这位将领就是陈霸先。

陈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生于天监二年（503)。青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喜读兵书，长于谋略，处事果断，深为当时人所推服。

最初，陈霸先在乡中任里司，后来到建康做油库吏，不久又任新喻侯萧映传教，因忠于职守，深受萧映赏识。后萧映任吴兴太守，指名陈霸先随他赴任，他对左右人说："此人前程远大，不可预料。"萧映改任广州刺史时，又举荐陈霸先为中直兵参军，并让他招兵买马，部众达到千人。太清二年（548)，陈霸先因功升任西江督护、高要郡守，督七郡诸军事，威震南方，远近闻名。

侯景之乱爆发后，陈霸先准备率军北上勤王。这时，有人告诉陈霸先，广州刺史元景仲打算谋害他。陈霸先听后，即与成州刺史王怀明、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对策。太清三年七月，陈霸先在南海起兵，讨伐元景仲。元景仲部下惧怕，四散而逃，元景仲自知不敌，走投无路，自缢身亡。陈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守广州。十一月，陈霸先又与始兴郡豪杰商议，准备起兵讨伐侯

景。当地豪强侯安都、张偲等率千余人前来归附。萧勃听说陈霸先要起兵征讨侯景，忙派人阻止他说："侯景骁勇强悍有力，天下无敌，先前各路援兵十万多，兵强马壮，尚且不能打败他，您以区区之众，能有什么作为呢？我还听说，北方局势不稳定，皇亲之间互相开战。依我看，您不如暂住始兴，遥张声势，保住此地，将来必定有好处。"陈霸先流着眼泪回答说："我本是一介武夫，蒙受国恩才达到高位，如今国都沦陷，主上蒙尘，我怎能只顾自己的性命不去救难呢？我决心已定，不能改变了！"陈霸先随即派人抄小路赶奔江陵，表示接受湘东王萧绎的指挥。而萧勃却派心腹谭世远为曲江县令，与南康（今属江西）的豪强蔡路养联合起来，企图遏制陈霸先。

大宝元年（550）正月，陈霸先率军从始兴出发，抵达大庾岭，蔡路养率二万人驻扎南野进行抵抗。他的妻侄萧摩诃，虽年仅13岁，却非常英勇，单骑出战，无人敢挡。陈霸先的部将杜僧明出阵与萧摩诃交战，萧摩诃猛刺一枪，正中杜僧明战马的眼睛，马受惊仰起，将杜僧明摔到地上。陈霸先赶忙出战，杀败萧摩诃，救起杜僧明，并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他。杜僧明要求再次出战，陈霸先为他赐酒壮行，并率兵紧随其后，终于打败蔡路养。萧摩诃投降，陈霸先占领了南康地区。萧绎闻讯大喜，以皇帝之令授予陈霸先明威将军、交州刺史。

接着，陈霸先又打败了企图袭击他的高州刺史李迁仕。起初，李迁仕担心自己兵力不足，便召高凉太守冯宝前去商量对策。冯宝的妻子冼夫人是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酋长之女，多谋略，善用兵，深受各部拥戴。她见李迁仕召冯宝，知道是想拉冯宝一起发兵，便劝他不去。冯宝对冼夫人的话一向听从，于是托病拒绝前往。过了几天，李迁仕果然起兵，派主帅杜平虏率兵袭击南康。陈霸先派部将周文育迎击。冼夫人得知后对冯宝说："杜平虏是李迁仕手下一员骁将，现在正与官军对抗，一时不能回来。

李迁仕一人在高州，人少势单，你可派人带着礼物去见他，说病未痊愈，不能前往，想派我的妻子与你一同起兵。冯宝一听这话，定会高兴而不作防备。那时我率千余人担着杂物，以送物输粮为名，进入李迁仕的军营后，伺机发动进攻，准能打败他。”冯宝按计行事，李迁仕果然不加戒备，冼夫人率众进入高州后，发出一声暗号，众人一起向李迁仕发起进攻，李迁仕措手不及，仓皇逃跑。这时，周文育也已击败杜平虏。杜平虏退回高州城下，知道城中有变，遂绕城逃走。周文育追杀至城下，冼夫人开门出迎，向周文育说明情由，周文育大喜，并带冼夫人去见陈霸先。陈霸先赠送金银玉帛以示感谢，冼夫人没有接受。回到高州后，冼夫人对冯宝说：“陈都督可不是平庸之人，他很得人心，将来必定能平定贼乱，成就宏伟大业。你应该多支援他军资，与他结好关系。”冯宝随即拨出军粮、武器，支援陈霸先。陈军士气高涨，第二年将李迁仕擒获斩杀。

平定李迁仕后，陈霸先北上到达江州（今江西九江）。萧绎得知陈霸先北上并获胜利，便任命陈霸先为江州刺史。大宝二年七月，大将王僧辩奉命率军征讨侯景，驻兵湓城，因为缺粮，行军困难。陈霸先得知后，立即将自己所贮存的军粮五十万石分出三十万石送给王僧辩。此时，侯景废简文帝萧纲，立萧栋为帝。陈霸先立即派人到江陵劝萧绎称帝。萧绎虽然没有接受，但更看重陈霸先了。特授予他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东扬州刺史。

承圣元年（552）二月，陈霸先与王僧辩率大军东进，讨伐侯景。东征军连克芜湖、姑熟、蔡洲，抵达建康城下。侯景登上石头城观察形势，见陈霸先阵容严整，士气旺盛，心中不禁恐慌，对左右说：“此军上有紫气，恐怕不易抵挡。”决定用舟船筑石，沉塞淮口。又沿淮水修筑城垒，以加强防守。王僧辩派人向陈霸先询问计策，陈霸先说：“若攻下石头城，必须渡河抢占北

岸。诸将如果不敢出击，我愿意先去立营。”王僧辩表示同意。陈霸先遂率兵赶到石头城西选择有利地形修筑军营。侯景怕通往西州的道路被割断，忙带领步兵万余人，铁骑八百，结阵而进，与陈霸先对峙。陈霸先对众将说：“兵书上说，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首尾相应，困而无暇。现在我军人多，敌军人少，应分割其力量，才能以强制弱。”于是命令诸将分别驻军，大造声势，以迷惑敌军。

侯景派骑兵袭击部将王僧志军营，王僧志抵挡不住，向后退却。陈霸先忙派部将徐度率弓弩手二千，从侧面阻击，将侯景骑兵击退。陈霸先抓住时机与王琳、杜龛等将领指挥主力军队冲击敌营，侯景见状不好，急忙退兵拒守。此时，石头城守将卢辉略见侯景必败无疑，便开门出降，王僧辩占领了石头城。陈霸先在城外与侯景几经拼杀，终于将其打败。侯景仅带着两个儿子和数百名心腹向东逃跑。

侯景之乱平定后，萧绎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十一月，萧绎在江陵称帝，派陈霸先镇守京口。

承圣三年十二月，西魏攻陷江陵，洗劫一空后又将梁元帝萧绎杀死。陈霸先与王僧辩等大臣商议，迎立年仅13岁的晋安王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萧方智是萧绎之子。

陈霸先与王僧辩在平定侯景之乱时互相配合，关系密切。后来他们之间在如何对待萧渊明的问题上出现了矛盾。萧渊明是梁武帝萧衍长兄萧懿的儿子，太清元年（547）八月，受命为大都督，率兵北伐东魏。由于指挥错误，兵败被俘。八年后，当萧方智称帝不久，北齐将他送回梁朝。王僧辩又决定立萧渊明为帝，陈霸先不同意，派使者数次到建康苦苦劝阻，王僧辩不听。陈霸先私下叹息，对他的亲信说：“梁武帝的子孙很多，只有梁元帝萧绎能复仇雪耻，平定侯景之乱。他的儿子有什么罪，就突然废

了他！我与王公僧辩同是托孤大臣，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不按次序立天子，他这是想干什么呢?”于是，陈霸先秘密准备军械和赏赐部下的物品，欲与王僧辩争一高低。

同年九月，陈霸先召集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徐度和杜稜商议起兵。诸将表示同意，只有杜稜认为此事很难进行。陈霸先生怕泄漏机密，用毛巾将他勒昏，关在一间屋子里，派人看管起来。然后，他把金帛分赐给将士，让侄子陈昙郎据守京口，当夜起兵，诸将分别率部队连夜奔向建康。

三天后，侯安都的水军已经接近石头城。陈霸先却担心侯安都等将领不能一心死战而有意放慢了进军速度。侯安都非常气愤，他责问陈霸先说："今日举事已成为不可避免，在这生死关头，您在后面犹豫不进，到底是为什么？如果失败，我们都会被杀头，难道留在后头就可以逃脱吗?”陈霸先见侯安都态度如此坚决，心中暗喜，当即下令全军急速前进。侯安都率军到达石头城北，登岸后，攻入城内，直奔王僧辩卧室；陈霸先也从南门攻入城内。当时王僧辩正在处理政务，士兵报告外面发生变故，王僧辩慌忙跑出，正遇到儿子王頠，和他一起冲出门外，跟随他的仅有几十名亲信，与侯安都展开激战。不多时，陈霸先也率军赶到，王僧辩寡不敌众，退到南门楼上，陈霸先命令将士放火烧楼，王僧辩无法脱避，只好下楼投降。当天夜里，陈霸先将王僧辩父子杀死。

萧渊明听说王僧辩被杀，自知帝位难保，便主动搬出宫廷回自己的官邸。十月，陈霸先拥萧方智即皇帝位，改年号为绍泰。陈霸先任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兼扬、徐二州刺史。

杜龛依仗王僧辩的权势，一向对陈霸先不礼貌，陈霸先很厌恶杜龛。王僧辩被杀后，杜龛立即起兵反抗。陈霸先派部将周文育去攻打义兴（今江苏宜兴），义兴所属各县的士卒都是陈霸先的旧部，善于使用弓箭，远近闻名。王僧辩的部将韦载找出了几

十人，用长长的锁链把他们联在一起，派亲信在一旁监视，命令他们射击周文育的军队。并警告说："如果十箭中有两箭射不中，就处死！"弓箭手迫不得已，只好射击，几乎箭不虚发。周文育进攻不利，只好退兵。陈霸先得知周文育受挫，心中焦急，命令侯安都和杜稜防守建康，自己亲率大军前往救援。

陈霸先到达义兴后，很快攻破韦载设置的水栅，将韦载包围。然后派人带信去见韦载，劝他投降。韦载见自己实力不敌陈霸先，只好出城投降。周文育又出兵吴兴，进攻杜龛，宁远将军裴忌赴吴郡讨伐王僧智。这时，建康又出了意外，陈霸先赶忙返回建康。

原来，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的堂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王僧辩被杀后，徐嗣先逃到徐嗣徽处，怂恿徐嗣徽投降北齐。陈霸先东讨韦载时，徐嗣徽见建康空虚，便率五千精兵偷袭建康。攻克了石头城，前锋部队已逼进台城宫阙之下。负责守卫台城的侯安都见敌人势众，下令关闭城门，藏起旗帜，命令士兵："不准登城窥探敌军，违者斩首。"徐嗣徽不知底细，果然不敢攻城。

陈霸先临近建康时，又听到北齐已派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率兵万人和大批粮草援助徐嗣徽。陈霸先向韦载询问计策，韦载说："齐军如果分兵占据通往三吴的道路，并在我们东面发动进攻，我们将会失败。现在齐军没有这样做，我们有取胜的机会，应该迅速到淮南沿着侯景旧垒筑城，保护东方的粮道。然后分兵断绝敌人的运输道路，使他们得不到粮草供应，不用十天，齐将首领的脑袋就会送来了。"陈霸先听从了韦载的建议，派侯安都偷袭北齐船队，将齐军一千多艘战船烧毁。又派仁威将军周铁虎切断了北齐的运输道路，将北徐州刺史和领州抓获。

这年十二月，陈霸先命令侯安都向徐嗣徽发动进攻，取得胜

利。又抄了徐嗣徽的家，派人将其用的琵琶和养的鹰送到徐嗣徽那里。徐嗣徽一见大惊失色。陈霸先则在冶城对面的江上将船只连接，搭了一座浮桥，指挥将士冲到对岸，放火烧毁敌军栅栏，北齐军队大败。争着上船逃跑，互相拥挤，掉入水中溺死者上千，哭喊声震天动地。这时，徐嗣徽带领北齐水陆军队万余人退守石头城。陈霸先抢先一步，派兵赶赴江宁，占据了险要之地；徐嗣徽不敢前进，在江宁浦口驻扎。陈霸先又派侯安都率兵袭击他们，徐嗣徽战败逃走。十二月十三日（乙未），陈霸先从四面攻打石头城。城中仅有柳达摩率孤军抵抗。城中缺水，一升水可换一匹绢。柳达摩支持不住，派使求和。但请求以陈霸先之子为人质。这时，陈霸先军队也因粮草供应困难，实力有所减弱，众将都认为应该允许求和。陈霸先经过反复考虑，只得答应。他说："在座的诸位都主张与齐和议，如果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大家会说我偏爱儿子而不顾国家，现在我决定把儿子陈昙朗送给北齐。不过北齐人一向不守信用，我答应讲和，他们必然认为我们力量软弱；如果北齐再来进犯，诸君一定要为我拼力战斗呀！"说罢，便将陈昙朗和永嘉王萧庄、丹扬府尹王冲之子王珉作人质，与柳达摩在城外会盟。柳达摩随后率兵北归，徐嗣徽等人也投奔了北齐。

陈霸先命令宁远将军裴忌去吴郡讨伐王僧智，裴忌赶到城下正值黑夜，裴忌命令击鼓攻城。王僧智从睡梦中惊醒，以为陈霸先的大军来到，连忙从后门逃出，乘小船投奔在吴兴的杜龛。此时，周文育和陈霸先的侄子陈茜正全力攻打杜龛，杜龛有勇无谋，酷爱喝酒，常常醉得不省人事。陈茜暗地交结杜龛的部将杜泰，作为内应。一次，杜龛同陈茜交战失败，杜泰乘机劝杜龛投降，杜龛答应了。但是他的妻子王氏却说："陈霸先杀了我父亲，怎么可以向他求和！"于是她自己出钱赏赐招募战士，命令他们与周文育决战。战士们得到赏赐，个个奋勇，一下子打败了周文

育军。杜龛特别高兴，开怀畅饮，一醉不醒。周文育整顿人马，再次进攻，杜泰偷偷把城门打开，周文育很快攻入城内，王氏急呼杜龛，杜龛沉醉如泥，依然酣睡。王氏无奈，自剪头发，扮作尼姑，出城逃命去了。周文育的士兵进入府中，杜龛还在睡，便将其背出，到项王寺前将他斩首。王僧智与其弟王僧愔投奔了北齐。

接着，陈霸先又打败了与自己作对的东扬州刺史张彪、江宁令陈嗣和黄门侍朗曹朗等人，建康地区的敌对势力已基本平定。

太平元年（556）三月，北齐派仪同三司萧轨率十万军队南下，直逼建康。陈霸先则派部将黄丛阻击，齐军战败，退保芜湖。陈霸先亲自到前线慰问各路军队。北齐虽败，但不甘心，又提出此次出兵仅是奉齐主之命召见建安公萧渊明。陈霸先答应把萧渊明送交北齐。不料萧渊明背上生疽，不能出行，几天后死去。齐军见萧渊明不出，又发兵再战，陈霸先命令周文育、徐度、杜稜分别统兵迎击齐军。齐军首先从秣陵渡过淮河，进兵方山，周文育败退建康，齐军紧追，抵达建康城下。陈霸先指挥将士严密防守。

五月二十九日（癸卯），北齐军从方山推进倪塘，游骑已到达台城之下，情况十分紧急。陈霸先与周文育当机立断，集中兵力迎击齐军。这时，西风骤起，飞沙走石。陈霸先说：“军队最好不要逆风出击。”周文育说：“军情紧急，何必遵循古法！”说罢抽出一把槊，跃身上马冲向敌营，众将士紧随其后。不多时，风向转变，周文育奋勇拼杀，齐军溃败，死伤数百人。与此同时，侯安都与徐嗣徽在耕坛之南展开激战。侯安都虽然仅有十余骑，但异常英勇，如入无人之境，将徐嗣徽打败。陈霸先又拨三千精兵，渡过长江到瓜州偷袭齐行台赵彦深，缴获船舰百余艘，米一万斛。

六月初一（甲辰），北齐军队再次发动进攻，陈霸先一面组

织军队抗击，一面派兵从江乘出发，截击北齐军队的运粮船队，将军粮缴获。北齐军队在前线吃不到粮食，饥饿难忍，只好杀战马、驴子充饥。这时，又赶上连日暴雨，平地水深丈余，齐军日夜在泥水中，手脚都泡烂了。面陈霸先的军队占据高地，又经常调换，士气旺盛，把握了主动权。只是因道路阻隔，粮食运输困难。正好陈茜运来三千斛米、一千只鸭。陈霸先立即命令将大米和鸭子做熟，让将士饱餐一顿。将士们情绪振奋，陈霸先抓住时机，决定第二天黎明向齐军发起进攻。他对部将萧摩诃说："早就听说你骁勇出名，然千闻不如一见。"萧摩诃胸有成竹地说："今天定让你见一见！"战斗开始后，突前将领侯安都因战马受伤，摔倒在地，齐军正要上前捉拿，只听萧摩诃一声大吼，猛冲上来，把齐兵杀退，救出了侯安都。陈霸先与部将吴明彻、沈泰等率领士兵一起冲锋，齐军抵抗不住，开始退败。侯安都又带领一支军队切断了齐军的后路，北齐军一败涂地，几千人被杀被俘，互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齐军逃走后，陈霸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临沂。徐嗣徽及其弟徐嗣宗被活捉，斩首示众。此时，在江乘、摄山、钟山的梁军也相继获胜，北齐将领萧轨等四十六人被俘。

陈霸先大获全胜，威震京师。被任命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为长城公。不久又进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封义兴郡公，把持了朝政。太平二年（557）八月，陈霸先进位太傅，加赐黄钺，剑履上殿。九月，陈霸先又进位相国，总领朝政，封为陈公，备九锡之礼，陈国设置百官，俨如皇帝。不久，陈霸先再进爵为王。这时，梁敬帝萧方智已形同虚设。这一年的十月初三（乙亥），萧方智被迫禅位于陈霸先。陈霸先贬萧方智为江阴王，梁朝遂灭。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建立了。

（孙立群）

参考资料：

《陈书》：《高祖纪》、《周文育传》、《杜稜传》、《萧摩诃传》

《南史》：《高祖纪》、《周文育传》、《萧摩诃传》、《杜稜传》

谢灵运作山水诗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出生在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一所老宅子里。

谢氏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东晋南渡以来一直是高门华胄的领袖。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前敌指挥之一，曾和叔父谢石、族弟谢琰一起率领八万人马击败了前秦苻坚的百万之众，建立殊勋，因此被封为康乐公。谢氏的这一支中，人丁不怎么兴旺，谢玄只有一个儿子谢瑍，而且“生而不慧”。谢灵运的出生，使谢家喜忧参半，喜则终于后继有人，忧则唯恐难以养活。为了让这个谢氏的继承人能平安长大，这个信奉道教的家庭按照当时的习俗把谢灵运送到了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这样，谢灵运就有了“客儿”、“阿客”的小名，后代人也习称他为谢客。在寄居钱塘的时期，谢灵运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据史书记载，幼年的谢灵运笃志好学，“博览群书”，这就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15 岁的谢灵运结束了寄居生活回到了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是东晋政权的中心，地势上虎踞龙盘，文化上菁华荟萃。谢家和王家两大家族就聚居在建康城里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内。东晋南渡以后，世族门阀统治的根蒂更加深固，显赫大族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垄断地位。凭借这种优势，乌衣巷子弟中也确实产生过一些文化素养很高的人物。这样的文化环境对谢灵运的影响也是巨大

的。

其影响最大者是谢灵运的族叔、晋孝武帝的女婿谢混。谢混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的中心人物，文采风华，被推为江左第一。他能诗，并开始创作一些集中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如《游西池》等。这些诗作中悄然增多的山水成份，领风气之先，开始给以注疏老庄哲学为能事，玄学气氛极浓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空气。齐、梁时的著名文学家沈约认为，是谢混改变了晋太元年间诗坛的风气。谢灵运在青年时代能经常得到谢混的教诲，在诗歌创作上也受到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谢灵运18岁，承袭了康乐公的封爵，食邑二千户。接着又按照惯例授员外散骑侍郎。当时的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属于“清贵”之官，由此迁转，往往坐致公卿，所以都由世家大族的成员担任。但是，对这样一个好机会，谢灵运却拒绝而辞官不就。其原因，估计和桓玄造反、进入建康有关。元兴三年（404），桓玄为刘裕等所讨平。下一年即义熙元年，又授谢灵运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他不嫌屈就而到任了。这是谢灵运出仕之始，时年21岁。转年，他又人抚军将军刘毅的幕府，任记室参军。这样，初入仕途的谢灵运就身不由已地卷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两晋政权，实质上是门阀专政。南渡以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最突出的是拥护皇室的门阀和意在篡权的军阀之间的矛盾。谢灵运出仕之始，正是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桓玄后，迎立晋安帝复位而实际上控制了东晋政权的时候。司马氏政权式微，刘裕权威日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急忙筹划对策。当时，高门华胄的冠冕王、谢二家，王氏的力量业已稍衰，作为谢氏家族中心人物的谢混就势所必至地肩负起团结世族、对抗刘裕的重任。谢混的计划是利用刘毅的实力以打击刘裕。

刘毅也出身于北府兵，参与过推翻桓玄的计划。元兴三年

(404) 春，刘裕在京口 (今江苏镇江) 起兵，刘毅同时在广陵 (今江苏扬州) 起兵。二刘会师，攻克被桓玄占据的建康。其后，刘毅的地位很快上升，渐至于和刘裕势均力敌。从豪门世族来说，需要刘毅军事上的后盾；反之，刘毅也需要豪门世族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义熙二年 (406)，桓玄之乱刚刚平定不久，刘毅以抚军将军、豫州刺史的身份移镇姑孰 (今安徽当涂)，谢灵运就入其军幕为记室参军，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从义熙二年开始，以刘裕为一方和以谢混、刘毅为另一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义熙八年 (412)，刘毅移镇江陵，任荆州刺史。谢灵运也跟着到了江陵。这时刘裕乘刘毅战败于卢循的机会，没有容得他喘息即于这年九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死了谢混和刘毅的弟弟刘璠，紧接着又进兵江陵，刘毅兵败自杀。从此，刘裕代晋之势已经定而不可移，余下的不过是时间和机会问题了。

这一次斗争，以庶族出身的刘裕代表的军阀势力取得了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从根本上动摇长期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门阀力量。刘裕本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刚刚击溃了政敌以后，立即改变了做法。他没有株连谢混的家人妻子，并立即起用谢灵运为太尉参军，以安定世族的情绪。第二年，刘裕从江陵回到建康，改任谢灵运为秘书丞，但时隔不久又把他免职。免职原因，史阙不详，想来也不至有什么重大的罪名。这不过是刘裕对世族又拉又打，交互为用的手段而已。

由于谢灵运和谢混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且追随刘毅达七年之久，这种情况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受到刘裕集团真正的信任。再则，作为乌衣巷子弟，谢灵运的门第优越感特别强烈。《宋书》本传说他“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族叔谢混批评他“博而无检”，就是这种优越感的折光反映。这些高门大族本来就瞧不起武将，更何况刘裕所出身的北府兵又为谢玄所一手创建。要谢灵

运向自家门下的一个“老兵”“摧眉折腰”而又心甘情愿，在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不信任加上瞧不起，就决定了谢灵运的仕途命运和悲剧性的下场，同时也直接影响着谢灵运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基本格调。

义熙十二年（416），谢灵运32岁，罢官已经三年。这时刘裕准备北伐，骠骑将军刘道怜留守建康，又召谢灵运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书咨议，黄门侍郎。

义熙十四年（418）六月，刘裕接受相国宋公的官职和封爵，在代晋而自立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这时刘裕对谢灵运又重加笼络，任命他为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这当是本年或稍后的事情。

刚刚重新当官，倒楣的事情又跟着赶到。谢灵运有一个门人桂兴，和他的小妾通奸。事情被发觉，谢灵运一怒之下杀了桂兴，并把尸体扔到水里。一个世家大族的贵官杀掉一个地位低微而且情不可宥的门人，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他却因此被王弘参了一本，要求把他免官、削爵、治罪。刘裕给予免官了事，以示宽大。

在谢灵运36岁的那一年（420），刘裕通过“禅让”的形式正式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虽说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但既然是改朝换代，总得有一番“正名”的手续。刘裕在安排好了晋恭帝的去处以后，接着就下了一道诏书，凡是晋代的封爵一律作废。例外的只有五家公爵，即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因为他们“德参微管，勋济苍生”，对他们的后人仅降一级，食邑二百户，以资奉祀先人。谢灵运被降为康乐侯，为此，他还写了一封言不由衷的《袭封津乐侯表》。

永初三年（422）五月，刘裕病卒，长子义符继位，是为宋少帝。

少帝即位时，年仅17岁，朝政大权落在徐羡之、傅亮、谢

晦等大臣手中。当时谢灵运与刘裕的次子庐陵王义真交往甚密，徐、傅等人为了芟除义真的羽翼，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理由，将谢灵运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七月，谢灵运离开建康由水路去永嘉赴任。以这次贬官为契机，谢灵运开始大量写作山水诗。

谢灵运出京后，先回到会稽始宁老宅。在和家人亲友道别的时候，他声称三年任满就要回来安享清福。然后，他沿着富春江溯流而上，经相庐、兰溪，转由婺江而到达金华。舍舟陆行，至丽水而又挂帆东下，直抵永嘉。这一路线沿途是有名的风景区，山水佳绝，风光绮丽。谢灵运一路都用诗写景、抒情、记事。《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夜发石关亭》等，就是这次行程中描写山川旅途的作品。

贬官永嘉对谢灵运的打击是巨大的，一路上的山水佳境也排解不开心中的郁闷。因此，抵达永嘉不久，他就患病卧床，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算痊愈。当早春的阳光赶走了萧杀的寒风，他登楼眺望，不禁感慨系之，写下了著名的诗章《登池上楼》。这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代表作。诗中以潜伏的虬龙和高飞的鸿雁起兴，归结到离群索居的感伤。其中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佳句，工巧自然，经常为后人赏析。

人总是要有精神寄托的。谢灵运青云失路，成为徐羡之、傅亮网中的政治俘虏，他无法反击而心又不甘，于是就寄情山水，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和适意。谢灵运病愈之后，开始四出游山玩水，每次出游常常十天半月不归，根本不把郡内的政务放在心上。每到一地都要作诗歌山咏水，以抒情怀。永嘉郡治地处浙江东部沿海，以风景清幽著称，这就更为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现实背景。

谢灵运游踪所及，遍于永嘉全境。他登上秀丽的瞿溪山、绿嶂山、岭门山、石鼓山、白石山，在清澈的瓯江上泛舟，兴之所

至，则一片孤帆，直抵沧海。从病愈到他离开永嘉，登山临水一直是他贬官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写了许多诗篇记胜抒怀。这一时期是他山水诗创作的高潮。

谢灵运的山水诗观察入微，笔法细腻，用语富丽而精巧。如《登江中孤屿》：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象崑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这首诗描绘了永嘉江中孤屿的秀丽景色，诗中的"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四句，把江中孤屿在水流烘托下交相辉映的情景逼真地描绘出来了。谢灵运山水诗鲜丽清新的艺术风格，仅从这里即可窥见"一斑"了。

谢灵运在永嘉登临遨游和山水诗写作，在诗人本身，是出于仕途蹭蹬的无奈，是排遣失意的一种形式。但他把自己游览中所目击的山光水色，朝霞夕霏用诗句描绘出来，却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在客观上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主题，大大改变了东晋以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诗风，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在永嘉整整一年，谢灵运的思想始终纠缠在矛盾之中，进既不能，退又不甘。而在庙堂之上，徐、傅当权的局面丝毫也没有改变的迹象。于是他决心称病去职。他的同族兄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来信劝阻，都没能动摇他的决心。这一年秋天，他离开永嘉，途中有《初去郡》诗，自称现在可以得遂素志，达生而谢绝浮名，成为羲皇上人。通篇议论夹以叙事，只有"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四句写景，清净明朗，和矛盾暂时得到解决以后的欣快心情正相一致。

一年前，谢灵运在老家始宁声称，做官以三年为期。现在，

他提前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回到始宁老宅，时年 39 岁。

会稽始宁是谢氏家族安身立命的据点，谢安曾在这里高卧不起，谢玄东归，开始经营庄园，到谢灵运辞永嘉太守还乡，其间已历四十年。庄园带水傍山，极幽居之美，而且规模巨大，包有南北二山，两山之间有水道往来。谢玄原来住在南山，谢灵运又在北山大建别墅，并对庄园的新建部分以及农田水利、手工作坊等一一亲自规划布置。他有一篇《山居赋》，详尽地记载了这些情况。从文学技巧的角度来说，《山居赋》不是一篇成功的作品，但其中关于始宁别墅的详尽描写，却为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当时的士族庄园留下了一份重要的资料。

谢灵运这一次辞官家居，前后约两年多。除了修治庄园以外，他还是继续登临游览，并继续写山水诗。这一时期可以考见的诗作，有《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等五首。这时，他的山水诗影响越来越大，诗名也越来越高。《宋书》本传记载，他在始宁写的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正当谢灵运在始宁老家剪榛开径，觅石寻崖，并且和隐士名僧谈玄说法的时候，刘宋王朝最高统治层的内部斗争却激化到白刃相加的地步。景平二年（424），做了两年皇帝的少帝义符，以"刑罚苛虐"、"费用万端"的理由被废，主其事者就是徐羡之、傅亮。他们拥护义符的三弟义隆登上皇位，即宋文帝。改元"元嘉"。不久，义符、义真陆续被杀害。

元嘉三年（426）初，宋文帝的地位已经巩固，于是，他下手剪除了专政擅权的徐羡之和傅亮。这件事为谢灵运带来了虚幻的希望。果然，宋文帝下诏征他为秘书监，他还故作姿态不肯出山，到第三次才整装就道，到达建康。一别四年，乌衣巷的旧宅依然安然无恙。他见到了同时被召还京的老友颜延之，高兴地写下了《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颜延之有和诗。可惜这种高兴

并没有维持多久。宋文帝征召谢灵运，其目的和他的父亲刘裕起用谢灵运一样，不过是杀了这个家族的成员又作出一点廉价的安抚，决不意味着对谢灵运本人的真正信任。谢灵运出任秘书监，又迁侍中，始终只是一个文学侍从之臣，任务是整理内府藏书，“补足遗阙”，以及撰写《晋书》。

谢灵运自视甚高，自以为出身高贵而又具有政治才能，理应参与朝廷大政。现在宋文帝把他作为文学侍从之臣，无疑是委屈了自己。于是他经常称疾不朝，去游山玩水。据《宋书》本传记载，他常常出城游玩，有时一天能走出去一百六七十里，有时滞留在外十多天不归，连个招呼都不打。这种对执政者的公然藐视使宋文帝不能忍受，但是形格势禁，又不便使用过于激烈的手段，于是暗示他自己辞官。谢灵运被迫接受了这一保全双方面子的做法，于元嘉五年（428）上表称病，宋文帝批准给假回老家会稽休养。这一年，谢灵运44岁。

谢灵运再度回到始宁后，与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等文坛知名人士在一起，唱和酬应，“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这一时期，谢灵运啸傲风月，徜徉山水，头戴曲柄笠，脚登木屐（这种木屐被后人称为谢公屐），不论多么险峻幽僻，也必定要登临而后快，同时还和从前一样，所到之处都要写诗记景抒怀。这时的谢家，在政治上虽已不像过去那么烜赫，但在经济上却依然富足。谢灵运出游，经常跟随有一批门人和奴僮，多的时候竟达几百人，以至于让临海太守王琇误认为山里出现了强盗。由于谢灵运的不自检点，使政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打击的借口。先是被御史中丞傅隆参奏而免官。元嘉七年（430），会稽太守孟𫖮又以紧急公文上奏宋文帝，加之以蓄意谋反的重大罪名。这时谢灵运不敢怠慢，星夜驰入建康，上表为自己辩护。宋文帝也认为孟𫖮的罗织有欠高明，对这件事暂时置而不问。但却把谢灵运留在建康，前后大约半年多。在这段时间里，谢灵运比较认

真地做了两件事，一是编定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三卷“四部书”的目录，二是和名僧慧严、慧观对《大般涅槃经》作了文字上的润饰。这一年年底，宋文帝又把他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江西抚州）内史。

元嘉八年（431）春天，谢灵运携带家眷从建康出发，乘舟溯江西上赴临川上任，船一进彭蠡湖（今鄱阳湖），如入画中一般，巍巍庐山犹如天然画屏屹立眼前，色彩缤纷的湖光山色，使谢灵运“千念”、“万感”盈集心间，于是写下了《入彭蠡湖口》这首千古流芳的山水诗杰作：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这首诗是谢灵运山水诗清俊秀逸风格的代表作，其中“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更是一人出口万人称绝的佳句，向为人们所称道。

在临川内史任上，谢灵运“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仍写了不少的山水诗。不过，这时的诗作已由失意而失望、绝望，有类于其鸣也哀了。像“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等诗句所表现出的心情颓废和情调的凄厉，都是在永嘉的诗作中所见不到的。

元嘉九年（432），谢灵运又被人弹劾，出于死中求活的希冀，他举兵抗命。后来兵败被擒，流放广州。元嘉十年被政敌罗织罪名杀害于广州，时年49岁。

谢灵运一生著作颇丰，据近人的统计，见于著录的有二十一种，可惜大多散佚。今天所能见到的，除了《大般涅槃经》的译文而外，还有诗九十多首和文四卷。谢灵运的主要成就，则在

于诗歌，特别是山水诗。

谢灵运颠顿于宦海风波，一生不得志，但他寄情山水排遣失意的大量诗作却成就了他“山水派开山祖师”的美名。是他的艺术实践，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从而确立了山水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山水诗”是后人在总结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而赋予的名称。在谢灵运本身，他登临寓目而辄有所书，也不过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而已。他并没有着意去区别山水、玄言或别的什么。谢灵运的巨大突破，在于沟通并且融化了玄言和山水，寓理于情，寓情于景。诚如后人所评论，“于汉魏之外另辟蹊径，抒情缀景，畅达理旨。”

谢灵运的山水诗。绝大部分是在他任永嘉太守以后写的，诗里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他的山水诗大都带着孤清闲适的情调，但有不少诗句生动细致地刻划了自然界的优美景色，情调开朗，给人以清新之感。

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是以多方面的艺术手法准确地捕捉大自然的各种形象，以细致的刻画达到巧似。雕琢多、偶句多、形容多，不免流于繁冗堆砌。谢灵运的诗作虽不乏名句，但绝少佳篇。他的诗往往是前半写景，后半谈玄，总是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写景部分又往往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像是一篇旅行日记，谈玄的部分则时时流露出消极出世的思想，令人生厌。谢灵运山水诗的这种缺陷正反映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发展过程中的某种不成熟。这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思是说，两晋期间曾盛行一时的玄言诗，到南朝刘宋时已逐渐被山水诗所代替。实际上，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专门以描写山水风景本身为目的和重点的诗，即使是在《诗经》中也是没有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具有开创生面，变革诗风的意义。自从谢灵运开创

山水诗之后，摹仿者风起云从，一时所谓“谢灵运体”蔚成风气。其中佼佼者，如齐梁时的诗人沈约、谢眺等，都相继写出了不少歌颂自然风光的诗篇。唐代诗人王维和孟浩然，也深受谢灵运的影响，并把山水诗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范大章）

参考资料：

《晋书·谢混传》
《宋书》：《谢灵运传》、《谢弘微传》
钟嵘：《诗品》
萧统：《文选》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黄节：《谢康乐诗注》附《补遗》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刘义庆著《世说新语》

刘义庆本是刘道怜的次子，东晋末年刘道怜随兄刘裕发动起义，讨灭了桓玄。刘道怜没有什么才干，又贪婪财物，所以很少领兵征战，常常担任留守之任。刘裕代晋建立宋朝，封刘道怜为长沙王。因为其幼弟刘道规无后嗣，便将刘义庆过继给刘道规为子。

刘道规，字道则，是刘裕幼弟，自少年便倜傥不群，胸怀大志，与刘裕一同谋划发动义军，讨伐桓玄。刘道规与刘毅、孟昶斩了桓弘，袭夺了广陵。桓玄从京师败走后，刘道规与刘毅、何无忌率兵追击，取得了盆口大捷，随后再破桓玄军于峥嵘洲。又几经转战，击走桓谦，克复了江陵。以战功封辅国将军，任荆州刺史。卢循、徐道覆乘刘裕北伐南燕，在广州起兵反晋，纵横江南，逼近京师。桓氏残余势力也乘势发动，联络了后秦与蜀地割据势力谯纵，发兵攻荆州，卢循部将荀林也带兵赶来。荀林屯兵江津，桓谦驻军枝江，准备合围荆州。荆州城内桓氏旧党也伺机谋做内应，为桓谦传递密信。刘道规在内忧外患交迫下镇定自若，命夜开城门，有愿出城者不禁，以安定人心。雍州刺史鲁宗之领兵援救荆州，刘道规信之不疑，委以守城重任，亲自率军远出攻桓谦，追斩了桓谦后回军，攻破荀林。又将所获荆州人给桓谦密信全部烧掉，城内民众都很感激。因保卫荆州有功封为征西将军。徐道覆领兵三万再攻荆州，这时鲁宗之已领兵回转襄阳，荆州势单力孤，人心恐惧，江汉民众感念刘道规焚书信的恩惠，

不再有背叛之心。刘道规分兵命刘遵率领游军，内外夹击杀败了徐道覆的兵马。刘道规进封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改任豫州刺史。义熙八年（412），刘道规去世。追赠侍中、司徒，谥号武烈公。因平定桓玄的功劳封南郡公。刘裕代晋称帝后，追封刘道规为临川王。刘道规因无子，起初抚养了刘裕之子刘义隆为后嗣，后刘义隆返本归宗，遂确定其兄刘道怜的次子刘义庆为后。

刘义庆自幼聪明，很受武帝刘裕的喜爱，13岁时承袭了南郡公封爵。义熙十二年，刘义庆跟随伯父刘裕攻伐后秦，进兵到长安。攻灭后秦后回到东晋，刘义庆封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未曾到任，迁为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又加封都督淮北诸军事，仍任豫州刺史。刘裕建宋称帝后，永初元年（420），承袭封爵为临川王，入朝担任侍中之职。刘裕死后，其长子刘义符继承皇位，是为少帝。这一年，刘义庆的生父刘道怜也去世了。因刘义符年少，尚书仆射傅亮与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辅佐政务。景平二年（424），庐陵王刘义真被废为庶人，不久被杀。随后，少帝刘义符也被废黜，并被谋害，死时只19岁。

执政大臣与百官迎立刘义隆继承帝位，是为文帝。刘义隆博涉经史，善写隶书。刘义隆登基改年号为元嘉，刘义庆转任散骑常侍、秘书监，又迁为度支尚书，再迁丹阳尹，主管京师地方事务。元嘉三年，文帝刘义隆诛杀了徐羡之、傅亮，又领兵西征，讨伐荆州，擒杀了谢晦。文帝励精图治，勤于政务，此后出现了元嘉之治的安定繁荣局面。

元嘉六年，刘义庆兼任尚书左仆射，参与朝廷政务。元嘉八年，天文星象发生变化，太白星凌犯象征左执法的星座，刘义庆怕自己有灾祸，于左仆射不利，请求辞去仆射之职。文帝降诏向他解说，不要迷信星象那样难测的事。刘义庆坚持辞职，不愿在朝廷参政，文帝遂准其所请，加封他为中书令，晋升官号前将

军、常侍，仍旧任丹阳尹。元嘉九年，出任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控制长江中游，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管辖的地界广阔，物资储备充足，而且兵精粮足，这一州的财力和兵力几乎占全国之半，是朝廷第一重镇，所以宋武帝刘裕一直任命最亲近的人担任刺史。在权臣谢晦被平定之后，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先后坐镇荆州。刘义庆在宗室中一向名誉很高，临川烈武王刘道规又功勋卓著，故而特别授给他荆州刺史的重任。刘义庆既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过多的奢望，为人谦恭容人，在荆州从到任直至离去，不受人馈赠，故此官声很好。

朝廷有诏，命令京师内外官员举荐人材，刘义庆在荆州上表章，举荐敦守礼教、极尽孝道的庾寔，隐居不仕、潜心读书的龚祈和操守清廉、洁身自好的师觉三人。刘义庆在荆州八年，地方上安定，官民各乐其业。元嘉十六年，刘义庆改任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的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并加封卫将军。太尉袁淑，文才冠天下，刘义庆对他十分倾慕，便请求以袁淑任卫将军谘议参军，朝夕相聚。当时的文人名士，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人，都罗致在他周围，委任做参佐官吏，终日谈诗论文。一年后，在朝辅政的彭城王刘义康被贬出京，到江州代替刘义庆任刺史。两人在江州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相见，相对哭泣。此事传到了京师被文帝知道，责怪刘义庆，要调他回京。刘义庆大为恐惧，后来文帝未再究问，改授刘义庆为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不久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刘义庆晚年信奉佛教，养了许多沙门僧徒，破费了不少钱财物品，受到人们的非议。后来刘义庆在广陵得病，这时发生白虹贯城的自然现象，他的府署内生长有野菌，刘义庆心里甚是厌恶，便上疏给朝廷请求回京，文帝遂准许他解除州任。刘义庆回到京师病势仍不见好转，元嘉二十一年

去世。文帝追赠他为司空，谥号为康王。刘义庆死后其子刘晔嗣封，后来太子刘劭杀死其父文帝刘义隆篡夺帝位，刘晔也被刘劭所杀。刘晔之子刘绰袭封，升明三年（479）因谋反被杀。从此封国被取消。

刘义庆生长在东晋末年，少年时善于骑马，长大以后受风气影响，刘氏宗室子弟多数喜好文学，便不再骑马，并且在当时练习骑马，往往被人看作有政治野心，不便常骑马。刘义庆爱好文史才艺，文学素养很高，来往的人都是诗文才学出众的人，如鲍照等。刘义庆写作的文章虽然不多，却曲雅优美，是宗室子弟中的佼佼者。他在荆州时曾经撰写了《徐州先贤传》十卷，进呈给朝廷，刘氏的本贯彭城原属徐州，此书是追述和赞颂家乡先辈贤士的著作。他仿汉代文史学家班固的《典引》写作了《典叙》，称颂皇朝的盛德伟业。他著有《世说》十卷，《集林》二百卷，在世间流传。因为刘义庆的才学很好，身边又多才华出众的文人名士，文帝刘义隆每逢寄书给他，常常要字斟句酌，怕被他讥笑。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就是《世说》，千百年来盛行不衰。

最初，西汉末期著名学者刘向曾经撰写过一部《世说》，刘义庆承袭了他的书名，为表示与刘向旧本有别，所以又称《世称新书》。到唐朝的时候还使用《世说新书》之名，后来便改称《世说新语》了。

此书广泛采集了前代的遗闻轶事，经过错综排比、分门别类而成，全书原来分为十卷，今本经过后人删并，为三卷，每卷各分上下，辑录分成三十六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棲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其中开端的四门是沿用了《论语·先进》篇里孔门弟子的四科。书中所记述的事迹上起东汉，止于东晋末

年，涉及到的人物达五六百人以上，既有帝王将相，又有士庶僧人，山林隐逸。

《世说新语》问世后，受到人们的喜爱，有一些人便为《世说》作注。最早为此书作注的是南齐时人敬胤，他采录史书补充了一些事实，对刘义庆原作也有所驳正。由于年代久远，又有后出的注胜过敬胤之注，所以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只保留下零星残文。敬胤之后梁朝人刘孝标又为《世说》作注，取得的成就最大，是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并驾齐驱，称美千古的有名注本。

刘孝标，名峻，是梁朝的文学家、学者，曾撰写过《辩命论》以抒怀，又在梁朝曾经典校秘书，天监年间编成《文德殿四部目录》。刘孝标博学多识，精于目录学，人称玄靖先生。他注《世说》，随文施注，所引用的经史杂著各种书籍多达四百多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十分宏富广博，而且其中大部分书籍在后代都已经散失亡佚了，有赖于他的注保存下了可贵资料。刘孝标注《世说》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内容很丰富，引据赅洽，清晰详尽，剪裁得当，价值是很高的。刘注和原本合计，涉及人物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到了北宋时期，文学家晏殊对《世说》又作了删并，对注文进行剪裁，其卷帙分合遂成为今本的样子。

刘义庆著《世说》，开创了后代专以从事搜访遗闻轶事而写作笔记、野史的风气。这种轶事小说，所记内容多是真人真事，凡只言片语、一行一事，有可称道者无不记述。《世说》着重记述的是清谈家的言行事迹。《世说》重点反映的崇玄学、尚清谈的社会风气，肇始于东汉末年，盛行于魏晋，延及于南朝。东汉晚期士林及上流社会很重视品题人物，叫做清议，一言一行常常可以定人名誉、定人沉浮，对一个人的声望和前途影响很大。魏晋以后由于玄学的兴起，士风有所改变，谈吐更加崇尚玄虚，行为更加故为放诞。这时佛教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魏末正始

年间老、庄学说日益流行，士人竞相清谈玄理，评鉴人物是清谈的重要内容。人们都认为清谈误国，可是西晋灭亡后晋室南渡，这种风气仍然不衰，继续崇尚空谈不务实事，徒务虚名而鄙薄礼法，政治上无所作为，生活上荒淫放纵，精神空虚，行为怪诞。同时也有些人风流倜傥，重义轻生，勇于改过自新，廉洁自守，贞操自爱。当时社会上对于士族名流的言谈举止、轶闻琐事深感兴趣，于是，记述各种人物的清谈隽语、轶闻琐事的作品便应运而生，并且深受人们的喜爱。概括地说，《世说》所记述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题材：一类是继承汉末月旦评的传统，品评人物，就是“人伦鉴识”，在三十六门中，识鉴、赏誉、品藻等篇多属此类，在其他篇中也有些是属于这一类的。如“赏誉”篇中记载了对吴国四姓旧目，是对江南大姓顾、陆、朱、张四大家族的品评。另一类是记叙魏晋南朝玄谈清言，其中有言哲理的，有言词雄辩的，有善于应对的，将政治情况、思想意识等诸方面，通过人物语言反映出来。

体现在《世说新语》中的艺术成就是高超的。刘义庆文笔洗练，词语优美，尤其以简朴隽永著称。书中记述的都是简短的故事或对话，虽然简短，却写得极生动，含义深刻，耐人寻味。刘义庆使用尽可能少的笔墨，维妙维肖地描述各种人物的风貌，真实而又传神地勾画出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神态。如《忿狷》篇中描绘性情急躁的王蓝田吃鸡子的情形，活灵活现。所以后人评价说：“临川（刘义庆）善述，更自高简有法。”

《世说》中虽则故事简短，语言简略，但是揭示的道理、阐述的哲理却很深刻、明确；并且隐喻蕴含的主旨深邃，意义往往在文字之外，启发阅者深思联想。如《任诞》篇中的一则：一句问话：“阮籍何如司马相如？”一句答话：“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问者郑重，答者似非正面作答，其实点出了正始年间政坛风云瞬息万变，“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背景，政治的恐怖

和正始名士的心境行为通过这一问一答深刻地表示出来。刘义庆这类描述真是如神之笔，故后人对此大为称赞，说："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

刘义庆的写作，把记言和记行结合起来，通过人物的语言问答和人物所做所为，使各朝代、各阶层人物的面目神韵展现面前。对于记言、记行，古代就已经产生过两种记述形式，或云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或说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但是灵活地把这两种记述形式，运用于描绘和记述轶事的小说中，而且如此成功，《世说新语》是最早的。宋朝学者高似孙在《纬略》一书中评价说："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

《世说新语》虽然是一部古代的小说，但是，它真实地记载了汉末、魏晋时期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了人物的语言行为。所以，它不仅是一部优美成功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史料价值很高的史学著作，一向被研究汉魏六朝时期的历史、语言及文学的人所重视。南宋董弅说过："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认为《世说新语》的宝贵之处及真实性是后世任何作品所代替不了的，也是不可比拟的。对于《世说》这样的小说家言，它的实录性却是如此的突出。

《世说新语》又是笔记小说的先驱，此后历代都陆续出现了一些仿《世说》体例的作品，可见其影响之大。《世说》中的许多故事是作者的提炼，是精华所萃，被后代文人广泛地吸收利用，或者成为写作诗文的典故，或者成为戏剧小说的素材，也有一些成语即出自此书，如"身无长物"即取自王恭的故事。《世说》涉及的这段历史时期很重要，研究中国学术史及魏晋玄学，了解清谈之风、魏晋风度，依据的重要书籍，也非《世说新语》不可。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宋书》：《刘道怜传》、《刘道规传》、《刘义庆传》
《南史·刘义庆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学林漫录》四集

刘勰作《文心雕龙》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祖父刘灵真，可能没有出仕或者地位较低。父刘尚，曾任越骑校尉（一种低级军职)，但死得很早。刘勰自幼家境贫寒，终身未曾婚娶。[①]

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刘勰20岁，丧母（依范文澜之说)。居丧三年后，即入定林寺投靠当时著名的和尚僧祐。僧祐，本姓俞，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14岁时，家人秘密地为他访婚，他知道后避至定林寺，投靠法达法师。后精研戒律学成名。僧祐这段逃婚的经历对刘勰的终身不婚可能有一定影响。

刘勰在定林寺居住长达十四五年之久。当时寺庙藏书是很丰富的。除佛教经籍外，还有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再者，定林寺地处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外，要阅读定林寺内没有的书籍，也容易借到。所以，自幼“笃志好学”的刘勰，在这十多年内，除阅读佛书和协助僧祐整理佛经外，还认真学习了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这为他后来写成《文心雕龙》这部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勰在定林寺期间，曾写过不少有关佛教方面的东西，并且

① 《宋书》记载：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并由此上推为刘邦的后裔。经近人考证，刘灵真与刘秀之并非同宗。

小有文名，以致于“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如齐永明十年（492），名僧超辩终于山寺，僧祐为其修造墓所，墓碑是“东莞刘勰制文”。齐延兴元年（494），高僧僧柔死后的墓碑也是“东莞刘勰制文”。虽然刘勰长期居住在定林寺，并写出了许多关于佛理的文章，但此时他的思想并未皈依佛教，而是另有所属，这从他并未年满具戒出家和夜梦孔子可以看出来。

刘勰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他认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应具备高尚的才德，以待时机的到来，做出一番事业，因此，要充实其内，光彩其外，如高大的楠木、樟木，坚其质而挺其干。从事写作就应有助于军国大业，出仕做官则须负起栋梁之重任。然而，心存鸿鹄之志的刘勰所面对的现实却是十分严峻的。南朝承两晋遗风仍是门阀士族的统治。出身寒门的人，即使真是“负重”的栋梁之材，也是壮志难酬的。当时的法制是“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而立试吏”（《梁书·武帝纪》）。穷得必须投靠寺院才能生存的刘勰，既非“甲族”，也非“后门”，所以，20岁以后可“登”者只有定林寺，“过立”之后也没有“试吏”的机会。面对“齿在逾立”而出仕无门的社会现实，刘勰清楚地意识到：“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涓涓细流是不能和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相比的，自己抱负的实现，必然要经历无数的艰难曲折。正因为有此认识，他才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选择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路，立志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其“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远大抱负。

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刘勰已过了而立之年。就在他忧虑“岁月飘忽”，而仍无所建树时，他忽然夜梦随孔子南行，而后以极大的毅力开始了《文心雕龙》的写作。刘勰在《序志》篇中具体记载了他引以为荣的美梦和立志著书的起因：年过而立之时，曾于夜间梦见自己手捧着涂有丹漆的礼器，跟随着孔夫子向南方

走。天亮醒来后，心里非常喜悦。伟大呀！圣人是难见到的，却能托梦给我这个无名小卒！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没有过像孔夫子这样的圣人。因而我想到，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是注释经书，但是马融、郑玄这些前代学者，在这方面的发挥已经很精当，即使我再有什么深人的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从（圣人）经典发展而来的文章，后世离开圣人太远了，文章体制逐渐败坏。有些作者喜欢新奇，一味追求浮浅怪异的文辞，就像在华丽的羽毛上再加文饰，在绣花巾带上再绣花纹一样，使文章越来越离开根本，走上了错误而漫无节制的道路。《尚书·周书》中讲文辞，说应该抓住要点，不能好奇异。孔子垂训也反对不正确之学说。于是，我就提笔用墨，本着（儒家）圣人的精神来论述一下作文章的根本。

刘勰在定林寺寓居七八年之后，居然做起这样的梦来，并对孔子作了如此崇高的评价，这至少说明，刘勰虽身在佛门，但并非是一心只读佛门书，一意只奉释家圣。他称孔子“垂梦”于他，实际上是他长期沉浸于儒家著作而心向往之的反映。他对这个梦如此重视，并为实现其梦而开始提笔论文，这正是刘勰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的表现。

从《文心雕龙》的书名可以看出刘勰写作此书的目的。文心，是研究写作文章的用心；雕龙，在这里是借代，雕龙借指文采。这出自《史记》上的一个典故：战国时齐国有个学者叫驺奭，齐人称颂他为“雕龙奭”，意思是说他的文采好像雕刻龙的花纹一样。刘勰在书名中用“雕龙”就是说要论述写文章的文采问题。这表明刘勰根据当时的文风和自己的研究积累，审时度势，决定写一部以儒家经典的精神为指导，总结创作经验，匡正时弊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意图，和他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实现其远大抱负的具体行动。

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刘勰37岁，《文心雕龙》成书（依清人刘毓崧之说）。刘勰从“齿在逾立”开始，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步的文学理论巨著。全书共五十篇，包括总论五篇，文体论二十篇，创作论十九篇，批评论五篇，《序志》一篇，约三万八千余字。

然而，“人贱物亦鄙”，《文心雕龙》脱稿之后，却没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刘勰自己也承认：“识在瓶管，何能矩矱”，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不可能确立人人遵循的正确法则。但他相信自己这部书对有关文学艺术的种种问题都已作了全面而周密的论述，因而“自重其文”，有充分的信心。为了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刘勰决定把《文心雕龙》送给沈约鉴定。沈约是当时声望很高的文坛领袖，并且官位也很显赫，深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在《文心雕龙》成书的第二年（502），萧衍代齐自立为帝，封沈约为建昌侯，迁尚书左仆射。刘勰送书给沈约，大约就在这一年。

刘勰地位低微，没有正式拜访沈约的资格，想送书却无由送达。于是，他就背上书稿，装扮成卖货的小贩，待沈约的车驾经过时，上前求见送上书稿。沈约看了《文心雕龙》之后，非常重视，称赞此书“深得文理”，并且把书置于案头，经常阅读。由于沈约的称誉，刘勰及《文心雕龙》才渐为世人所知。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近40的刘勰踏上仕途：起家奉朝请。《宋书·百官志》说：“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当时只是一个没有具体官职的低级官号。天监三年（504），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刘勰任萧宏的纪室（管理文书）。天监四年（505），十月萧宏北伐，刘勰又改任车骑将军夏侯祥的仓曹参军（管理仓库）。从天监六年（507）开始，刘勰做了四五年的太末（今浙江龙游）令，“政有清绩”。约在天监十年（511），刘勰又改任仁威将军萧赜的记室。到天监十二年（514），刘勰50岁时做了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管理章奏）。《梁书·刘勰传》说：

"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这是刘勰一生最幸运的时候，但也只是侍从之臣，并没被委以栋梁重任。天监十八年（519），刘勰虽再迁步兵校尉（管理东宫警卫工作），继续兼任通事舍人，但他已经55岁了，当年栋梁重任的抱负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僧祐死于天监十七年（518）五月，他生前搜集的经卷急待整理。所以在天监十八年，刘勰奉命再度回定林寺整理这些佛经。旧地重游，刘勰忆起当年引以为荣的旧梦，反省二十多年的艰难曲折，这时才若大梦初醒，悟得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真谛"。因此，在完成整理佛经的任务之后，便决心消除尘念，皈依佛祖了。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刘勰先在定林寺燔发自誓，然后请求弃官为僧，改名慧地。刘勰出家后，不到一年就死了，终年57岁。

刘勰的著作除《文心雕龙》外，现在尚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石像碑》和《灭惑论》，两篇都是佛教方面的著作。刘勰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文心雕龙》奠定的。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书，它全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主要经验，把握了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规律。通过此书可以鸟瞰齐梁以前的文学概况及其精华。

刘勰的文学理论，主要是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文心雕龙》既以大量篇幅分别总结了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也吸取了《乐记》、《毛诗序》、《典论·论文》和《文赋》等前人已有初步总结的种种经验。另外，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先秦诸子百家论著，刘勰也从其片言只语中吸收了丰富的养料。

刘勰众采百家，不是在思想上兼收并蓄来拼凑一个大杂烩，而是从写作上根据自己立论的需要，或取各家之长，或利用旧说，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不仅是从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到批评论，井井有条地组成了一个整体，而且以儒家

经典中表述的文学观点为主，以“衔华佩实”（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为纲贯串全书，全面论述了物与情、物与言、言与情三种关系，把文学理论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刘勰的这一成就，在封建社会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文心雕龙》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提出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点。

刘勰认为文学的兴衰，文风的转变是受当时客观的社会现实制约的。他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和世风出发，探索了文学盛衰和变化的根源。如论《诗经》，认为是“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论建安文学，则提出慷慨多气的作品是“世积乱离”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而这种慷慨多气之作，又真实地反映了“风衰俗怨”的现实面貌。刘勰在深入地研究社会政治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后，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的结论。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作品的演变联系着社会的情况，文坛的盛衰联系着时代的动态。这样的见解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茂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刘勰认为写文章就像织布一样，织布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也就是质），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另外，刘勰从文、情关系的角度，肯定了《诗经》以来“为情而造文”的优良传统，批评了后世“为文而造情”的不良倾向，进而提出了以“述志为本”（抒写情志为根本）的文学主张。

刘勰在重视内容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形式，他在《情采篇》中，用虎豹没有花纹则类同犬羊的比喻，肯定了文采的重要性，并用诸多事例阐明了质与文二者不可偏废，相互依存的道理。

刘勰对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除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外，更主要的是为矫正过分追求华艳的文风，提供了理论指导，维护了文学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初步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刘勰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他在《知音篇》中，检讨了秦汉以来文艺批评中的错误倾向，一是“贵古贱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伪迷真”，认为这些流弊造成了文艺批评的紊乱。为此，他提出作为批评者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广博的学识修养，才能准确地进行批评，正好比“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一样，见识广博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一是在态度上要公正无私，不夹杂个人的爱恶，即“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这样才能持论公允，客观准确。对于如何评价作品的好坏，他提出了“六观”的方法，这“六观”是：

一观位体（看作品采用的形式体裁）。

二观置辞（看作品的遣词造句）。

三观通变（看作品继承与创新）。

四观奇正（看作品的表现手法）。

五观事义（看作品的事理与用典）。

六观宫商（看作品的声律韵律）。

“六观”的方法是通过全面考察分析作品，从而探讨作品思想内容的步骤和手段。这一方法为后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本路数。

除上述三个方面的成就外，《文心雕龙》对其他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如构思、想象、风格、继承、革新等问题，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向为人们所重。早在唐代，刘知几就曾指出，它可以纠正创作和批评上的偏

差；到了宋代，黄庭坚曾称赞它能正确指出文学上的弊病。明、清以来，赞赏它的人就更多了，如谢榛认为它关于诗歌的论点是深于此道者才能说出来的，胡应麟说它的议论非常精当，章学诚佩服它的规模宏大，思考周密，叶燮指出“风骨”之说是接触到创作的根本问题，刘熙载则非常赞美它关于“隐秀”的主张。由上可见，在一千多年的古典文学史上，这部书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在国外也有重大影响，仅在日本就出版了三种全译本、一种选译本和《文心雕龙索引》。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的全译本，列入了《世界古典文学全集》。译者在《总说》中说：“早在公元五世纪末就出现具有如此切实可靠的构想及如此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著作的这一事实，可以视为中国文明早熟的成长发展的现象之一，必然引起我们的关心。”这种关心很能说明，《文心雕龙》确是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范大章）

参考资料：

《梁书·刘勰传》

《南史·刘勰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

詹锳：《刘勰和〈文心雕龙〉》

陶弘景隐居句曲山

在南朝齐、梁之际，出现了一位隐居山林、声名显赫的山中宰相、道门学者，这人便是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生在刘宋孝建三年（456年），出身于江东名门丹阳陶氏，他的七世祖陶浚在三国时期做过吴国镇南将军、荆州刺史。陶弘景的祖父陶隆在刘宋时征战有功，封晋安侯，喜好读书写字。其父陶贞曾做过江夏孝昌令，精通文史，擅长书法。仕宦之家爱好才艺的传统对陶弘景的成长有很大影响。陶弘景自幼异于常人，四五岁时便喜好写字，常用荻杆为笔在灰中学字，9岁起读了《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孝经》、《毛诗》、《论语》等大量儒学经典，并学习写文章。10岁时得到葛洪写的《神仙传》，爱不释手，日夜阅读思考，启发了他超世养生的念头。陶弘景生得眉清目秀，神采奕奕，长大以后又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17岁时，他的才学便很知名，与江敩、褚炫、刘俣并称宋朝升明四友。后来陶弘景做了齐宜都王的侍读，他以写文章优美著称，写作的《水仙赋》博得了文豪沈约、任昉的称赞。他29岁时，齐国的清溪宫新落成，举行宴会，有五人献赋称颂，陶弘景作的文章最出色。陶弘景虽在权贵朱门，却不喜依附权势，不愿结交王公贵族，看不起趋炎附势之徒，所以仕途很不得意，直到36岁时还只做到“奉朝请”六品文官。他写信对他的从兄说：“昔年出仕做官，打算在40岁时做到尚书郎，然后出任浙东一处有名的好县令，在青山秀水中度过

一生。不料年纪已经36岁才做到奉朝请，我这头颅将来如何可想而知矣。不如早日离去，不要自寻其辱。”永明十年（492）陶弘景上表辞官，脱去朝服挂在神虎门，离朝隐居而去。他离开京城时，公卿官员在征虏亭为他设酒饯行，规模盛大，车马堵塞，出现了宋、齐以来少见的场面。

陶弘景来到句曲山（今江苏茅山），建立华阳馆，自号华阳隐居，时年37岁，开始了后半生四十年的隐居修道生活。这句曲山号称仙家第八洞宫，又名金坛华阳之天。相传西汉年间有咸阳人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渡江来到此山修道，后来成仙，乘白鹄飞去，当地百姓便立了白鹄庙祭祀。每年的三月十八、腊月初二，传说仙人来游看茅山洞室，四方好道求仙的人从远近赶来，车马成百，人众上千，道俗男女云集此山，热闹得很。因三茅君在此山得道成仙，所以又叫茅山。方圆一百五十里，层峦叠嶂，树木茂密，溪流奔涌，幽谷清风，真是人间仙境。陶弘景率门人弟子修复了中茅山以西的大塘，蓄水灌溉田地，当地农家受益不小。

陶弘景在做官时便跟随孙游岳学道，学习符图经法。孙游岳字玄达，东阳永康（今浙江金华）人，是吴国的后裔。孙游岳之师乃是著名道教改革家、南天师道的创始人陆修静。孙游岳隐居缙云山四十七年，宋明帝泰始年间，孙游岳曾随陆修静到京城参加校刊整理道经。齐武帝永明初年，孙游岳奉召至京城，任兴世馆主，与孔德章、刘孝标等名士都有交往，文人沈约、陆景真、陈宝炽等都在他门下就学，在门徒弟子数百人中，唯陶弘景最受孙游岳赏识，将道法经诀传授给陶弘景。

陶弘景在句曲山悠游闲适，寻访仙药，经常坐卧于山涧幽谷之中，吟咏盘桓，留连忘情。这时沈约任东阳郡守，多次寄书来邀他出山，陶弘景不应。永明十一年，齐武帝萧赜死后，明帝萧鸾篡位夺权，大肆诛杀萧氏宗室，高帝、武帝的子孙几乎被他杀

尽。传说宜都王萧铿遇害之夜，陶弘景梦见萧铿前来告别，陶弘景访问得许多阴间幽冥之事，后来他据此写作了《梦记》。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后，更是凶虐，国内民不聊生。乘齐国内乱，北魏不断南侵。内忧外患使齐国民众陷于灾难之中。陶弘景为避乱世，又修筑了三层楼，陶弘景处其上，众弟子居其中，宾客在其下，与外界隔绝，只留一家僮在身边。陶弘景特爱松风，每当听到松风之音，便欣然为乐。有时闲游于泉石之间，望见者以为是仙人。但是，他退出官场，归隐山林，却并没有忘情政治，他向往着太平盛世，愿为有道明主出谋划策，为救民于水火而效力。

当东昏侯萧宝卷弄得国事日非时，萧衍自江陵起兵杀向京城。陶弘景早年与萧衍曾有过交往，当他得知萧衍的兵马到达新林时，俯察民心，便赞同萧衍发动义师拯民众于涂炭。他派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献表文，表示拥戴。萧衍攻下京城，要代齐称帝，谋士范云、沈约议论许久，国号没有确定。陶弘景引十六国时期著名道士王子年的《归来歌》“水丑木处”，是梁字，又援引图谶也数处都是梁字，认为“梁”字应运当兴，便命弟子进献，萧衍遂定国号为梁。陶弘景又代萧衍选定郊禅的良辰吉日，帮助萧梁政权圆满顺利地完成了禅代。萧衍即帝位就是梁武帝，他不忘陶弘景出的力，对陶弘景恩礼隆厚，问讯的书信不断。天监三年（504），梁武帝派人送来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物，供陶弘景炼丹使用。天监四年，陶弘景迁到积舍东涧，继续修道炼丹，并从事于著述，研讨道经以及算学、地理学、医学。天监十二年，陶弘景离山外出寻找药物，梁武帝命司徒慧明迎接他返回茅山，在归山途中多次颁下诏书，想邀他到都城。对梁武帝屡次礼聘他出山，陶弘景坚辞不应，便画了一幅图画，画有两只牛，一牛散放在水草之间，一牛戴着金笼头，有人用绳牵着，用杖驱赶。呈献给梁武帝，萧衍笑着说：“这人真是无事不做，想学曳尾之龟，逍遥江湖，怎么能劝得动、请得来?”陶弘景十分敬慕

汉朝张良，认为张良是无人企及的古代贤士，表露了他关心世事又不肯随俗的态度。天监十三年，梁武帝命人在茅山为他修建朱阳馆，天监十五年又建造太清玄坛。国家每有吉凶征战等大事，必派人前来向陶弘景咨询，一月之中常有数次书信来往，当时人们都称陶弘景是山中宰相。梁武帝晚年好佛，虽然他异常笃信释教，但是对陶弘景的宠遇始终不衰。

梁朝的后宫后妃、王公显贵也十分礼敬陶弘景，时常使人馈赠物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邵陵王萧纶等都和陶弘景来往密切。萧纲任南徐州刺史时，特邀陶弘景到任署后堂谈论数日。公卿官吏纷纷拜倒在陶弘景门下，徐勉、丘迟、范云、江淹、任昉、萧子云、沈约、谢览、谢举等名流文士都从他受业。据说他的弟子多达三千人，陶弘景成为当时朝野尊崇的著名道士。

梁朝建立后，衰颓的风气并没有改变，王公贵戚士人阶层竞谈玄理，尤其是佛教流行很盛，玄理合流，士人放荡纵欲，只重浮华，不务实际。陶弘景担心这样下去，会像两晋末年一样有亡国的危险，他作诗题写在居室墙壁，写道："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忽作单于宫。"用西晋衰亡的前车之鉴儆戒当权者。后来侯景作乱，梁武帝被挟制而饿死，侯景在昭阳殿谋朝篡位，果然应验了陶弘景的预言。

梁武帝晚年佞佛、政治腐败，武备不修。高门仕宦子弟养尊处优，不知武事。陶弘景根据历史经验和教训，预感到军事松弛将会误国。陶弘景本人虽然好文修道，却不是文弱的人，他能文能武，善骑射，熟知兵书战策，他曾经写作《太公孙吴书略注》，便是兵书。陶弘景还擅长铸造刀剑，大通初年，陶弘景派弟子献给武帝两口宝刀，一把叫作善胜，一把叫作威胜。

陶弘景多才多艺，他写了大量的诗赋、书表、序论和碑铭，他的文笔很好，曾编纂了一部类书《学苑》，多达一百卷，抄录

了古今各种书籍中有用的内容。他的书法得自家传，尤善于写隶书，风格独特，他常和梁武帝讨论书法，评论名家的书帖真迹。陶弘景还长于绘画，精于书画的鉴赏。

陶弘景取得荣耀地位，除去政治因素和才艺成就，还因为他对道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陶弘景是道教改革家、学者陆修静的再传弟子，是道教上清派继承人孙游岳的门徒，所以他是上清派的嫡传。他得到孙游岳的真传，在永明二年到四年的三年中，跟随孙游岳学习道家符图经法真本，虽说是真本，但由于流传抄写也有错误之处。陶弘景四处搜访道经，加以校正。永明六年他初到茅山，得到前辈道家杨羲、许谧的手书真迹，他欣喜万分。永明八年，他东行江浙一带，留心寻访道经，虚心请教道法。在会稽大洪山谒见了著名居士娄慧明。又到余姚太平山，谒见居士杜京产。在始宁嵬山，谒见了法师钟义山。在始丰天台山谒见诸僧标。他遍访各地著名道士和年长饱学居士，并且获得真人遗迹十余卷。这次游历经过二百多天，为他经学研究打下了根底。他隐居茅山为了弘扬上清道法，写作了大量道书，最有价值的是撰写了具有道教教派史性质的《真诰》。他说该书记录的是真人面授的诰语，上清经就是根据真人所授诰语写成的。书中记有某年某月某日，真人下降某处，向杨羲、许谧等授诰传经等神话故事。在许多故事中记述了大量经书的名称、内容、道教人物和事迹，以及方术道法等；同时记述了经书传授流布情况。此书为后世保留了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资料。

陶弘景在茅山传授上清经法，弘扬上清道，随他从学问道的人很多。因为陶弘景名气很大，朝野官民中广有信徒，所以这时期茅山成了上清派道教的中心。陶弘景和后继的茅山历代传人，多是有名气、有学问的道士，从陶弘景开始茅山代表了上清派，人们便将此后的上清派直称作茅山宗，陶弘景就是茅山宗的创始人。历隋、唐、五代和两宋，茅山宗人才辈出，在道教各派中有

重要地位。茅山宗奉的主神是元始天尊，主要经书是《大洞真经》和《上清经》。

陶弘景对养生学也作出了贡献。他继承了道教传统，主张形、神兼修的修炼方法，精神与肉体均长存不灭。他写的《养性延命录》一书，归纳前人言论，总结自己经验，他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延年益寿，与天争寿，不要人为地戕害作践自己。这种进取精神、乐观态度，比起佛教以人生为苦、轮回、涅槃的说教来，具有积极意义。陶弘景的养生说推动了道士努力修炼，鼓舞道家从事修身、食药、炼丹等活动。陶弘景提倡清心寡欲，控制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主张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贪娇妻美妾和声色犬马，强调运动对身体的益处，正确对待行气、导引和房中术。

陶弘景对医药学亦有成就，著作了《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补阙肘后方》等书。他整理研究《神农本草》与《名医别录》，并加注释，写成《本草集注》，对药物学作出贡献。《补阙肘后方》是总结和补充葛洪《肘后方》所写的方剂医书。陶弘景着眼济世利人，突破了道士修仙用药的局限。

炼丹术本是道士的修炼术，用服食药物使人长生不死，服之成仙。陶弘景从事炼丹二十年，共实验了七次，前六次均未炼成，第七次开鼎时，光芒四射，动人心魄，炼丹大功告成。在天监年间将炼成的丹药献给武帝。在长期炼丹实践的基础上他著成多种炼丹书，其中记述了许多古代化学试验，对原料、反应过程等详细记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有名的炼丹家之一。

陶弘景对道教发展的又一个贡献，是他建立了道教神仙谱系。道教自产生以来，善于对已往的文化和信仰兼收并蓄，所以信奉的神灵既杂又多，不仅有古已有之的众多神灵，也有天师道、太平道自创的神灵，新神旧神、天地人鬼、仙家真人，应有尽有。这种多神泛神的特点对道教发展是很大的弊端。陶弘景专

为此作了《真灵位业图》，他把道教崇拜的神仙人鬼群体，分成七个等级，在每个等级七位主神之下，分别左右位，统率若干仙众，这样构成一个等级层次分明的神仙谱系。当然这是陶弘景人为的拼凑，但是却反映了当时社会门阀士族等级制度的时代特点，去掉了奉神杂乱之弊。这个谱系也表现了陶弘景的神学观点，他把三个主要的道教派别的创始人，分别列入三个神阶，上清派创始人纳人第二神阶，灵宝派创始人纳入第三神阶，天师道创始人纳人第四神阶，三派中上清最高。陶弘景第一次给道教众神仙排了座次，分了等级，这个做法直接影响了道教尊奉的三清神的产生，后来道教三派融合，以玉清元始天尊代表上清派，上清灵宝天尊代表灵宝派，太清道德天尊代表天师道及其他派别。关于地狱的说法，也被引入了道教，说北方有罗酆山，山上下有六座鬼神宫殿，主管阴世鬼众，各殿中有许多鬼神都是历代帝王将相，曹操、孙策都在其内。

大同二年（536），陶弘景去世，终年81岁。死时颜色如生，身躯绵软，屈伸如常。朝廷下诏追赠他为中散大夫，谥号为贞白先生，并派遣舍人来监护举办丧事。陶弘景临终前嘱咐弟子们要薄葬，众弟子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葬于雷平山，萧统、萧纶亲自为他撰写了碑铭和墓志。

陶弘景修道却不排佛，主张佛道兼修。萧梁时期佛教甚是兴盛，特别是梁武帝事佛佞佛，几次舍身出家。陶弘景为调和佛道之争，佛道兼修，他说曾经梦见佛授给他菩提记，名叫胜力菩萨，于是他到鄮县（今浙江镇海西）阿育王塔发誓，受五大戒。还在茅山设立佛堂，鼎礼朝拜，造佛像、写佛经，他的弟子中也有僧人。

陶弘景在茅山隐居四十五年，一生著述了八十余种著作，除了道教书籍之外，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兵法、医药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内容，是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在陶弘景努力和影响

下，道教有了发展，在上层社会有更广泛的传播。同时，道教中人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有学识有名望的道士逐渐增多。梁武帝之后的简文帝、梁元帝也信奉道教，陈朝的皇帝也崇奉道教，道教从民间宗教开始成为官方宗教。

东晋和南朝的道教改革，从葛洪到陶弘景方告一段落，这一代山中宰相、道门学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业绩。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梁书·陶弘景传》

《南史·陶弘景传》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

钟嵘著《诗品》

钟嵘《诗品》是南朝齐、梁时期出现的一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它与刘勰《文心雕龙》合称双璧，交相辉映，并称于史册。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四年（468）。他的七世祖钟雅在东晋时官至散骑常侍、尚书右丞、侍中，在苏峻之乱中被害殉难。钟嵘的从祖钟宪在南齐任正员郎，他的父亲钟蹈为齐中军参军。其兄钟岏，字长丘（一说字长岳），南梁时任府参军、建康令，著有《良吏传》十卷。其弟钟屿字季望，任永嘉县丞，梁天监十五年（516）曾经奉诏参加类书《遍略》的编纂。钟岏、钟屿都有文集传世。钟氏是颍川望族，有社会地位，钟氏三兄弟都好学，善于思考。

钟嵘和兄钟岏兄弟二人在齐永明三年（485 年）同进入国子学学习，因为钟嵘通晓《周易》，得到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举荐他为本州的秀才。在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居于鸡笼山西邸，广招文人雅士，当时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经常赋诗唱酬，号称“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才学杰出，诗名很高，是“永明体”诗的创始人，这时期钟嵘正在京师，受其诗风影响和熏陶，对诗歌产生浓厚兴趣。齐建武初年，钟嵘踏入仕途，起家任南康王萧子琳的王国侍郎，建武三年（496）他曾经上书言事，建议齐明帝不要事必躬亲，纠缠在细务中。齐明帝很不高兴，对太中大夫顾

嵩说："钟嵘是什么人，想干涉我的事！卿认识他吗?"顾暠答道："钟嵘虽然官卑职小，而他所言之事或许有可以采纳之处。况且繁杂琐碎的事务，各有主管官员，如今皇上总揽过来亲自处理，是皇上愈辛劳而臣子愈安逸。"经顾暠进言齐明帝才不提此事。建武五年，萧子琳被杀，钟嵘改任抚军行参军，不久出为安国令。永元末年又任司徒行参军。梁朝建立之后，天监初年，梁武帝整饬朝政，改革旧制。钟嵘上书建议，批评从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以来，造成任官制度的混乱和腐败，说"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没有战功而有勋劳，出钱行贿可以做官。又请朝廷要分别流品，鉴别门第，分清世族寒门，任官应有阀阅资历做依据。他的上书被采纳，迁官为临川王行参军。天监三年（504)，衡阳王萧元简出任会稽太守，任命钟嵘做宁朔记室，专门掌管文卷事宜。这时居士何胤在若邪山筑室隐居，与萧元简有交往，山洪暴发冲毁了山石树木，何胤的居室却岿然独存，萧元简遂命钟嵘写作了一篇《瑞室颂》来记颂此事。这篇文章文词典雅优美。天监十三年，萧元简回京任职，钟嵘随同返京。十七年晋安王萧纲任西中郎将，钟嵘被选任西中郎将晋安王的记室。不久，钟嵘便死在任此职时期，终年约 51 岁。

钟嵘在青年时便对诗歌有兴趣，在永明诗人影响下对诗歌深人探索，他曾与诗人、诗论家谢朓、刘绘等人交往，丰富了他对诗歌理论的见解。中年开始，经过研讨深思，精心结撰，著成了论诗专著《诗品》。其书原名《诗评》，也称《诗品》，唐朝以后便定名为《诗品》，它是历史上第一部论诗并评价诗人成就的专著。全书分三卷，每卷的卷首都有一篇序言，序言与该卷的正文并没有特定的关联，后人便将三篇序文合在一起置于书前，称为《总序》或《诗品序》，它是钟嵘诗歌评论的纲领。

钟嵘是最早把诗作为一种专门学问来研究评论的，他刷新了齐、梁以前人们对诗学的观念和认识，在《诗品》问世以前，还

没有人完全脱离开经学而专门论诗，诗学还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诗品》产生以后，才使诗学脱离经学而独立，具有纯文学性。

首先，《诗品》把五言诗作为纯粹文学作品来研究，不像前人研究诗经那样，只当作辅政化民的工具。其次，钟嵘肯定了五言诗形式。从两汉到六朝，五言诗兴起并且逐渐繁荣，渐渐取代了《诗经》以来传统的四言诗地位，成为诗作的主要形式。出于宗经思想观念的保守者往往认为“四言正体，五言流调”，《诗品》打破了以四言诗为正宗、以五言诗为流调的陈腐观念，认为五言诗新形式是进化，是发展，使诗作更完美，含容量更大。

魏、晋以来，士人往往是从文体辩析来认识诗歌的特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这和《毛诗序》讲的“吟咏情性”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常说的“诗言志”，“诗缘情”。钟嵘认为诗人吟咏诗赋，不仅是主观自生的，而且是对客观外物的感受和引起的触发，触景而生情，人类社会的悲欢离合、荣辱喜忧，都是引发诗歌创作的源泉。他提出了“物感说”，他论述道：诗的本原不能仅仅为刑政的得失，风俗的盛衰，负有讽谏之责的瞽、矇、臣、工为政治而自觉发出。凡感荡心灵者都会由于郁结于胸而陈诗展义，抒发情感。那么，既有屈原那样心系家国、身在江湖的贤能之士，也有王嫱一流出塞和番的薄命佳人，亦有负戈戍边、抛骨朔野的军士戍卒，还有忧怨怀思、泪尽春闺的妇女。一切人生遭遇、真情实感，都可以激发诗歌创作，动荡的社会和不幸人生构成的苦难现实，便成为诗作的源泉。他的认识使人对诗本原的认识有了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自然风物景观作为外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受，当然也就成为创作诗歌的本原之一，这一认识在诗歌理论方面是个进步。纯粹吟诵山水、流连风景的诗作，在建安以前绝少见，多是以描述和表达自己的感情志趣为

主，即或写景状物也是寄托感情的陪衬，所以古代诗歌抒发的主要是人的主观方面，对纯属于客观外物的自然风光少有描述。在建安以后，山水风物才作为独立的描写对象在诗中体现，山水诗、田园诗等才屡见不鲜。钟嵘以自然风物作为诗情本原的总结和论述，发展了诗作的内涵和创作领域，对诗歌的繁荣和诗情多样化做出了贡献。

《诗品》在诗歌创作方法上提出了“三义说”。三义就是指的兴、比、赋。在钟嵘以前，论诗向有“六诗说”，有“六义说”，还没有只标明三义的。六诗或六义之说，也是诗学从属于经学观念的反映。在《周礼·春官》中记载：“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是六种不同的韵文样式，其中风、雅、颂可歌，赋、比、兴不可歌，实际上指风雅颂是诗歌的形式，赋比兴只可以说是韵文记事的形式。在古代，口耳相传是流传和继承的途径，可歌的传下来了，文繁事杂又形式不整而且不能歌唱的作品，便慢慢地散亡不传了。到了春秋时代风、雅、颂依然存在，而赋、比、兴变成了用诗、作诗的方法。及至战国以后，礼崩乐坏，乐亡诗存，歌唱诗的条件又不存在了，诗的本身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内容。于是人们以意逆志，以史证诗，就文面求义，进入了说诗的时代。发展到汉代，经学盛行，又将说诗理论向前推进，提出了六义说。《毛诗序》可以说是六义说的代表，它对风、雅、颂三体从“义”出发作了解释；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家又详释了赋、比、兴三义，于是乎使六义都具有了颂扬赞美或讥刺讽喻的政教性质，含有劝善惩恶的政治伦理意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衰微，玄学和佛、老思想渗透进来，玄言诗大量出现，人们崇尚通脱放达，情性开放，文学思潮冲击下转而忽视政治、伦理的重要，追求缘情绮靡，抒情达性的境界，精神上的解放、思辩能力的提高，使人的文学艺术认识产生新的跃进。风、雅、颂作为陈旧体式已经不为人所注意，

而赋、比、兴却依然受到重视，被视为诗文创作的最基本方法，且有了新的理论说明。可是赋、比、兴三义与上古时期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它不再是杂文韵语样式而是向纯文学样式转化，同时也使诗歌创作理论摆脱了儒家经学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开拓了诗学的新时期。

钟嵘对兴、比、赋作出新的解释，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他从文、意关系抽象出兴来。"因物喻志，比也"，所谓比，通义就是譬喻，别义就是比体诗，在后世比体诗约可分为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咏史之作是以古比今，游仙之作是以仙比俗，艳情之作是以男女比主臣，咏物之作是以物比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赋的新定义兼寓比、兴在内，言内有实事，言外有意旨，叙物言情、寓言写物。钟嵘把兴、比、赋看作诗歌创作三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各有特点也各有局限。《诗品》的三义说对于后世诗学的影响，还在于又引出了兴托、寄托、托喻等新概念，对诗作的形式、情感等提出见解。

钟嵘《诗品》还提出"滋味说"，这是出于诗歌为纯文学性质而引出的鉴赏论。滋味指诗本身的审美价值。滋味的有无或多少，决定审美价值的存否与高低。它特别指出五言诗取代四言就是因为五言诗的特殊滋味。他对四百年间出现的五言诗作了评论鉴定，从而总结归纳了滋味的具体标准：一曰尚气力，二曰贵深远，三曰重典雅，四曰喜华靡，五曰爱巧似，六曰崇自然。

钟嵘论"味"，首先是重风力、气力，一方面要求作品有充实而深刻的内容，另一方面应具备清拔而刚健的风格，从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人们所提倡的建安风骨就是典范，曹植的骨气奇高，刘桢的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等等，都是气力雄浑之作的代表。钟嵘对刘琨评价甚高，认为他的作品具"清刚之气"，在五言诗发展过程中扭转永嘉颓风，开启元嘉新境，起了重大作用。

所谓的"深远"，不仅诗作思想内涵深刻，而且表现手法委婉，意在言外，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要求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典雅是说典则、雅正，作品文字要质朴，思想要醇正，不能流于俚俗妖冶。但是钟嵘强调的典并非指事典、典故，他所崇尚的雅也并不排除幽怨情感。推重华靡、巧似，钟嵘认为这是五言诗形式美的主要因素，关于具备这种风格者，曹植"词采华茂"，应璩"善为古语"，典型代表是张协，词采动人又音韵铿锵，使人体味之娓娓不倦，是上乘佳作。可是，钟嵘对自然美的意境开掘不够，对意象自然的杰出典范陶渊明的诗作，疏于注意，并没有发现陶诗真正价值。

钟嵘《诗品》的又一贡献是对诗学探源溯流、分门别派。历史对流派的研究基本上是两类，一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广校群书，撰写了《七略》、《别录》，对整个学术和著作进行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工作，文学只是其中一个门类。其二是晋代挚虞作《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从文体的性质、源流入手进行论述。钟嵘《诗品》别开生面，在魏晋的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启发下，运用于诗歌评论，并且专门就四百年来发展的五言诗来研究流别。具体做法是置品级、辩流别、溯渊源。

置品级是《诗品》的主要内容，是钟嵘对五言诗成就所作的评论，寓褒贬轻重的见解，同时也是对五言诗作家的评价。他的原则是"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无涉于文流者虽贵不录"，专门对可以入流的一百二十二位作家，依据其成就高低，分别列入上中下三品。像这样定品第、显优劣的评论方式，既反映了魏、晋、南朝的门阀等级观念在文学艺术上折射的体现，又在客观上丰富了诗学理论和文学艺术的评论形式。钟嵘主张以一位作者的一生成就和全部作品为依据，强调坚持一定的原则，不随心所欲、随波逐流，不以贵贱，不论亲疏。在一百余人之中，贵为帝王者只有魏文帝曹丕名列中品，魏武帝、魏明帝、宋孝武帝、

齐高帝等都列在下品。其从祖钟宪颇有诗名，却也被列入下品。与钟嵘交谊很厚的诗人谢朓名声很高，沈约曾说三百年来无此诗也，梁武帝讲三日不读谢诗即觉口臭。钟嵘认为他工于发端，而末篇多踬，故被列入了中品。可见他不徇私、不阿贵。有些人认为他在定品级时持有个人恩怨，说钟嵘当年曾经求誉于沈约，遭到拒绝，所以才把沈约列在中品。但是从沈约的诗作成就而论，列在中品并没有明显的失当。对钟嵘有恩者莫过于王俭，在太学时王俭便赏识他，荐举他，而且王俭出身名门，位列三公，《诗品》中尊称王俭为"王师文宪"，可是王俭仍然列在下品。《诗品》品级的确定只是钟嵘个人的总结和看法，反映诗人们在当代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完全用后人的眼光看待。

关于溯渊源，钟嵘提出《诗》、《骚》分流论。他认为五言诗的写作方法和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源出于《国风》、《小雅》，即源出于《诗》；另一派则源出于《楚辞》，也就是源出于《骚》。其中源出《小雅》的仅阮籍一人，实际上便只有《国风》、《楚辞》两个源头，可以看出钟嵘重视民歌和屈原的作品。他把诗人分别标出其渊源关系，只是仅作了三分之一而没有全部标明。

钟嵘论五言诗体，网罗六代名家，辨析考论，据摭利病，开创了中国古代的诗学，虽然《诗品》内容存在不足或不当之处，却是瑕不掩瑜，功绩是巨大的。《诗品》一书在宋朝以前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明朝以后开始大显于世，它的价值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所公认的。

《诗品》对后世的影响甚大，唐人司空图写作了《诗品》，清人袁枚也作过《续诗品》，此外，论词者也写作《词品》，使文学理论益加丰富多彩。《诗品》的又一个重要影响，体现在诗歌评论的主要形式——诗话上。历代各种诗话著作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论诗、评诗的其他形式作品，仅宋代就有上百种，历来有

《诗品》为历代诗话之祖的说法，认为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二者在体例上虽然不一致，一般地说《诗品》较有系统性，诗话多为零散支离之论；《诗品》内容集中，诗话较庞杂；《诗品》严正，诗话随意发论很多。但二者仍有密切的关系，它直接启迪和影响了层出不穷的诗话创作。

《诗品》凝聚了钟嵘一生的心血，是文学史上一部不朽著作。

（吴振清）

参考资料：

《梁书·钟嵘传》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传》第1卷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

宋文帝元嘉六年（429）三月初一，祖冲之诞生在一个世代司掌历法的士族家庭。祖氏家族祖籍在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西晋末为避战乱，迁居江南。祖冲之的曾祖父祖台之在东晋时任侍中，祖父祖昌在南朝宋任大匠卿，父亲祖朔之曾任奉朝请。

祖冲之自幼受家学影响颇深。其中任大匠卿的祖父祖昌对他的影响最大。大匠卿是朝廷中负责营造的官员，祖昌为了职务的需要，经常研读一些算学、历法、工程建筑方面的著作，对天文、数学、历法、机械制造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祖冲之自幼受其熏陶，培养了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对天文、数学的浓厚兴趣。

元嘉十九年（442），祖冲之入国子学读书。著作郎兼领国子学士何承天负责教授。据《宋书》记载，何承天是一位“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的人。他撰国史，删定《礼论》凡三百卷，并且制订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宋文帝年号定名为《元嘉历》。祖冲之师从何承天，自然受益匪浅。

祖冲之勤奋好学，善于思考，20多岁时就有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刘骏夺得帝位后，笼络有才之士，祖冲之奉诏到华林学省供职。华林学省是当时政府最高的研究机关，设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鸡鸣山南古台城内。此址本为东吴的旧宫苑，晋南渡后重修，仿洛阳园名为华林园。朝廷专门招揽有才能的人来此从事学术研究。进华林学省的人称为华林学士，虽没有

什么实际官职，但却有较高的待遇，他们所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坐的车子都是皇帝所赐。祖冲之在华林学省期间广泛收集、认真阅读了大量前人关于天文、数学等方面的著述，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祖冲之离开了华林学省，应南徐州刺史刘子鸾之邀，担任了州从事史。政务之余，他潜心于天文观测和历法的研究。

当时南朝宋使用的历法是《元嘉历》，这部历法是宋文帝元嘉年间制订并于元嘉二十三年（446）颁行的。祖冲之在观测研究中发现《元嘉历》虽然比古代的历法好，但仍有不够精密的地方，如：日月的方位、行星的出没、冬至和夏至的时间，与实际尚有出入。于是他就开始着手拟制一部新历法。经过长期的观测计算，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新历法编成，以孝武帝的年号定名为《大明历》。

《大明历》中有不少创见，反映了祖冲之长期天文观测计算的成果。首先，《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岁差现象最早是由东晋天文学家虞喜提出的。祖冲之通过亲身长期观测，证实了岁差的存在，并将其考虑到历法的计算中去。这是历法编制的一个重大进步。《大明历》的另一个重要改革是修改闰法。祖冲之在对北凉赵歐《元始历》提出的六百年置二百二十一个闰月的计算进行了反复推算后，提出了新的闰法，即每三百九十一年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月。按照祖冲之的推算，一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8148日（与现今准确数据仅差46秒），精确度前所未有。

《大明历》编成后，祖冲之上表给宋孝武帝，请求准予颁行，但却遭到权臣戴法兴为首的朝臣们的反对。戴法兴等人对《大明历》引进“岁差”和行新闰法横加指责，认为“古法虽疏，永当循用”。祖冲之据理力争，写了一篇一万二千多字的《辩戴法兴

难新历》的奏折。在奏折中他引用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测算结果，说明《大明历》的改革是有科学根据的，对那些因循守旧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大明八年（464），孝武帝决定转年颁行《大明历》。但这一年孝武帝突然病死，16岁的太子刘子业继位，戴法兴把持了朝政。颁行《大明历》一事遂搁置一边。

新历实行受阻，祖冲之转而潜心于数学研究。经过不懈努力，他在圆周率的计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7位数字的人。

圆周率（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是数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的取值经历了一个由疏到密的过程。从先秦到两汉，人们一般沿用自古以来“径一周三”的说法，圆周率取值为3。这个数值过于粗略，难以满足精确计算的需要。王莽新朝（8—23）时，刘歆受命制造标准量器——“律嘉量”，采用的圆周率值是3.1547。东汉的天文学家张衡在历法研究中曾用了3.1466的圆周率值。这些数值较之“径一周三”的近似程度有了提高，但都是从经验而来，没有理论依据。

大约在曹魏景元四年（263）前后，数学家刘徽开始为《九章算术》一书作注。《九章算术》是一部以问题集解形式编订而成的数学著作，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成书约在先秦至东汉初年间，系经多人增补面成。《九章算术》在计算圆面积的时候，所沿用的仍是“径一周三”的旧说，取圆周率值为3。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过程中，创立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建立了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算法。

刘徽的“割圆术”，先是把一个圆的圆周作六等分，然后作出了一个圆内接正六边形，再用勾股法算出六边形周界的长度。接着再把圆继续等分，作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九十六边形……刘徽认为当圆内接正多边形边数无限增加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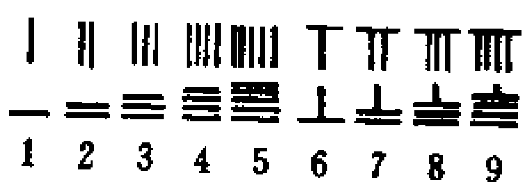
周长也就越逼近圆周长，“割之弥细，所失弥小。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这种割圆术，是通过使折线逐步接近曲线，使多边形的周界逐步接近圆周，以求得圆周长的更精确数值。当圆内接正多边形边数无限多时，其周长的极限即为圆周长，面积的极限即为圆面积。刘徽的这种方法和理论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把极限的概念用之于解决算学问题；二是直接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方法可以求出相当精确的数值。

刘徽使用这个方法，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相继算出了正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直到正一百九十二边形时，得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是$\frac{157}{50}$（3．14）。后来他又求得圆内接正三千零七十二边形，得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是$\frac{3927}{1250}$（3．1416）。

祖冲之在研究《九章算术》的时候，从刘徽的注文中看到了割圆术这种方法，认识到这是推算圆周率的正确路子。对于刘徽所推算出的结果，他认为还有进一步精确的可能，于是他就开始了复杂而艰巨的计算工作。

祖冲之是用“筹算法”来进行数字运算的。这是一种用“算筹”作为计算工具的计算方法。“筹算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算筹”的形状，是直径一分（合今0．23厘米），长六寸（合今13．86厘米）的圆形竹棍。以二百七十一根为一“握”，装在六角形的筒内以便于取用。算筹表示数字分为横式数码和纵式数码两种。

纵式：
横式：
数字：



筹算法计数是按照“纵横相间”摆出数字。纵数码用于个位、百位、万位，横数码用于十位、千位。“零”用空位表示。

筹算法运算是先将数码在筹算盘上列好，然后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等运算。这种计算方法很麻烦，要将无数的小竹棍摆来摆去，才能算出结果。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要从圆的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将边数一倍一倍地增加，一直要翻十二翻。每一翻至少要经过十一次运算。除了加减外，还有两次乘方和两次开方。这需要对有九位有效数字的大数进行各种运算一百多次，其中有近五十次的乘方和开方，有效数字高达十七八位之多。祖冲之用落后的“筹算法”来进行如此浩繁的运算，其复杂和艰巨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祖冲之把上述运算一直算到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八边形和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六边形，得出了他的圆周率结果。对于这个结果，他是这样表述的：把一丈长的圆直径分成一亿微，求出圆周长的盈数（过剩近似值）是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不足近似值）是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祖冲之计算的结果用阿拉伯数码表示就是，圆周率的准确值在“盈数”3.1415927和“朒数”3.1415926之间。这样，祖冲之的运算就把圆周率推算到了小数点后第七位。如果取二限的平均值3.14159265作为圆周率的近似值，也就是推算到了小数点后的第八位。这是当时世界的最好结果。另外，祖冲之用“盈朒二限”来精确说明圆周率的大小范围，这也是个创造。

为了运算方便，祖冲之还求出了用分数表示的圆周率。密律：“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即$\frac{355}{113}$。约律：“圆径七，圆周二十二”，即$\frac{22}{7}$。密律化成小数约等于3. 1415929，也能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数。

祖冲之的数学研究成果，都记录在他撰写的《缀术》一书中。书中除记载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外，还记载了许多其他的数

学研究成果，内容非常深奥。《隋书》称《缀术》为“算氏之最”。唐朝时《缀术》一书被规定为“十部算经”之一，是算学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后来，《缀术》还传到了朝鲜、日本。可惜的是，这部著作在宋朝中叶以后就失传了。

祖冲之在《缀术》中研究了“开差幂”和“开差立”的问题。“开差幂”是已知长方形的面积和长、宽的差，用开平方的方法求出它的长和宽。“开差立”是已知长方柱体的体积和长、宽、高的差，用开立方的方法求出它的边长。这已经是二次、三次代数方程求解正根的问题，说明祖冲之的数学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还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在他们之前，《九章算术》中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圆面积和圆柱体体积的计算问题，但关于球体积的计算公式却是错误的。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的时候，指出了这个错误，并且提出了正确的分析论断，但是未能求出球体积的计算公式。祖冲之父子继续刘徽的工作，在我国数学史上第一次导出了正确的球体积公式。

祖冲之不仅在天文、数学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而且在机械制造方面也颇有成就。宋顺帝升明年间（477——479），祖冲之在朝中担任谒者仆射（谒者仆射：掌管引见臣下，传达使命）之职。他应齐王萧道成之请，曾造过一辆指南车（指南车：车中装有机械，连动车上的木人指示方向，无论车子怎样行走，都始终指南。相传是黄帝发明制造。史书记载，东汉张衡、三国马钧都制造过指南车）。机械零件都是铜制的，转动灵活，指向准确，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的制造水平。

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4），南朝境内没发生大的战争，出现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局面，生产也因此有所恢复和发展。祖冲之在这一时期以很大的精力来研制与生产有关的交通工具和农业机械。他制造了号称“千里船”的桨轮船，研制成功了用水流作

动力，以机械代替人力的水碓磨，以及其他一些机械、器物。

齐明帝建武（494——498）年间，年近70的祖冲之兼任了军职——长水校尉。这时他向齐明帝建议开辟屯田，扩大了农业种植，搞一些有利民生的建设。但因连年战争，他的主张没能实现。

齐永元二年（500），祖冲之与世长辞，终年72岁。

祖冲之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梁武帝天监九年（510），祖冲之去世后的第十年，他生前编订的《大明历》，经他儿子祖暅多次上书推荐，终于在南朝正式颁行。这对古代农业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

祖冲之除天文学上的贡献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在数学上。他运算求出的圆周率数值，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次。直到他逝世一千年后，即15世纪时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了祖冲之运算的精确度。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的密律$\frac{355}{113}$，在世界上也是首创。它与现代科学求得的数值比较大不过千分之四。祖冲之逝世一千一百年之后，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先后算出了密律的数值。欧洲人当时不知道祖冲之早已提出过“密律”，他们在编写数学史时，便把它定名为“安托尼兹律”。为此，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提出建议，要将此律改称为“祖律”以纪念祖冲之的伟大贡献。这无疑是十分公允而又正确的。这也足见祖冲之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

（范大章）

参考资料：

《南史·祖冲之传》

《宋书·律历志下》

《南齐书·祖冲之传》
《隋书·律历志上》
阮元：《畴人传·祖冲之》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范缜著《神灭论》

范缜，字子真，原籍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其先祖流寓江南，遂定居不返。据他的活动推算，约生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约卒于梁天监十四年（515）。范缜出身寒门庶族，为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祖父范璩之，官至中书侍郎。父亲范璩早亡，因而家境清贫。

宋泰始四年（468），范缜年未弱冠，拜当时名儒刘瓛为师。他勤奋好学，卓越不群。当时在刘瓛门下的学生，大都是门阀世家子弟，他们车马来去，挥霍游荡。范缜常年穿着草鞋布衣，步行来去，却毫无愧色。他“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深得刘瓛所爱。他朴实耿直，平时喜欢发表危言高论，因而“不为士友所安”。范缜在求学期间，就具有不同于流俗的性格，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

宋元徽三年（475），范缜曾向王仆射上书，谋求仕进，但泥牛人海，杳无消息。此后几年中，仍然怀才不遇。大概是愤世嫉俗而悲怨过甚的缘故，而立之年时竟是白发皤然了。他曾作《伤暮诗》和《白发咏》等诗，借以抒发自己潦倒困顿的情怀。

齐永明三年（485），范缜35岁时，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开始出仕为齐宁蛮主簿，官位十分卑微。后累经升迁为尚书殿中郎。永明七年（489），齐魏两国和亲，范缜以“才学之士”被选拔作为使者奉命出使魏国。出使期间，范缜的博学多才在魏国也颇有名气。

齐永明年间，齐竟陵王萧子良盛招宾客，范缜也成为萧子良的宾客。萧子良身为南齐宰相，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对佛教“敬信尤笃”。为了宣扬佛教，也为自己积阴功，造冥福，他“招致名僧，讲论佛法”，把他的宰相府变成了一座佛教大本营。他为僧众设斋，亲自给他们端水送饭，虔诚之态，无以复加，“世颇以为失宰相体”。范缜虽然只是一个宾客，却敢于在崇信佛教的当朝宰相面前“盛称无佛”，“不信因果”。萧子良大怒，盛气责问：你不信轮回因果，那么世间为什么有富贵贫贱呢？范缜神色泰然答道：人们降生下来，就如同一棵树上开发的花，风吹花儿纷纷坠落。有的落到了华丽的坐席上，就像殿下你；有人则落到了茅厕旁，就像下官我。贵贱虽然不同，但轮回因果究竟在哪里呢？萧子良被驳得无言答对，心里却对范缜大为不满。

范缜同萧子良的这次辩论，是他反佛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斗争。范缜认为贫富贵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这虽然有力地驳斥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但过分强调偶然性的作用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经过这次辩论，范缜意识到，仅仅批判佛教的轮回报应说，还不能击中其要害。佛教与中国传统道教所谓“长生不死”、“肉体成仙”不同，它并不否认肉体死亡。既然肉体不能成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承担者，那么，承担轮回报应的主体只可能是一种永远不灭的精神主体，即所谓“神”。因此，“神不灭”是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说的理论基石。为了驳倒佛教的神学理论，范缜写下了著名的《神灭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

在《神灭论》中，范缜开宗明义地提出：精神和形体结合，形体和精神结合，二者不相分离。所以形体存在，精神也存在；形体衰谢，精神也就消灭了。他还指出：形体是精神的实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形体是从实体方面来讲的，精神是从作用方面来讲的。形体和精神是统一的，是互为依存而不能割裂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形神之间的统一关系，范缜运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去加以论证。他说：精神对其形体来说，好像刀刃的锋利和刀刃的关系一样；形体对其精神作用来说，好像刀刃和它的锋利的关系一样。有刀刃才有锋利，有锋利才称得上刀刃。虽然刀刃不就是锋利，锋利也不就是刀刃，但是离开锋利就称不上刀刃，离开了刀刃就不会有锋利。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不存在了还会有锋利的，那怎么会有形体已经死亡而精神却能单独存在的道理呢？

《神灭论》写成后，"朝野喧哗"，更震撼了所有的佛教徒。萧子良当然不甘罢休，于是发动众多的"高僧"、"名士"同范缜进行辩论，但终究不能驳倒范缜。太原一个名叫王琰的佛教信徒著文讥讽范缜说：范先生竟然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弦外之音是说范缜宣传神灭论就是最大的不孝。王琰试图以此来堵住范缜之口，但范缜并未被吓倒，他著文反驳道：王先生既然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那你为什么不自杀去跟从他们呢？这样才能真正显示王先生的孝心呀！范缜的无畏精神与机智辩才，使萧子良等人理屈词穷。萧子良无可奈何，企图收买范缜，他派王融前去游说范缜：如果你能放弃神灭论，不怕做不到中书郎。范缜听后大笑说：要是我范缜"卖论取官"的话，何止是一个中书郎，恐怕早已当上尚书令或仆射了！

齐建武三年（496），范缜出任宜都（今湖北宜都）太守。当地敬神的烟火很盛，范缜"性不信神鬼"，下令禁止人们祭祀那里的伍相庙、唐汉三神庙和胡里神庙。数年后，范缜因母亲去世而去职，归居于南州（今安徽当涂）。

齐永元二年（500），凶狂暴虐的东昏侯萧宝卷杀了尚书令萧懿，萧懿之弟、雍州刺史萧衍因而在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萧衍率兵途经南州时，在家居丧的范缜身着黑色丧服前往迎接。萧衍与范缜昔日曾同为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文士，此次相见，

萧衍十分高兴。次年，萧衍领兵攻入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自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齐中兴二年（502），萧衍称皇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不久，梁武帝任命范缜为晋安（今福建福州）太守。范缜在任内为政清廉，任职四年后，返京城任尚书左丞。

天监四年（505），范缜因替旧友王亮辩护而触犯梁武帝，并遭御史中丞任昉谗言，被谪徙到广州。两年后又被召回朝廷。

梁武帝建立梁朝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创儒、佛、道“三教同源”说，他一面力求调和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又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的修行方法，对民众更具有吸引力，因而极力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天监三年（504），梁武帝颁布《舍事道法诏》，宣布：道有九十六种，只有佛教一道，方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为邪道。必须舍弃其他邪道以专心敬奉佛祖才是。从而把佛教奉为国教，令文武百官一律信奉佛教。由于梁武帝的大力倡导，南朝佛教日益兴盛，到处佛寺林立。上自皇帝、王公和诸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和善男信女，都以敬奉佛法为事。

天监六年（507），梁武帝亲自出马，对始终坚持反佛立场的范缜发起论难。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说：对于神灭论，我颇不以为然。灵魂不灭是有经典记载的。比如《祭义》讲，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先人享受他的祭品。《礼运》说，如果人们在祭祀前三天便十分虔诚，就一定能看见祖先或鬼神。那些说祖先鬼神不能飨受祭祀和见不到祖先鬼神的观点，是离经背亲的，是不该说的。这番话是对坚持神灭论的范缜的严厉指责。他要求范缜“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向范缜提出了挑战。接着，庄严寺大僧正法云又动员了王公朝贵六十二人，各以书面表示，一致拥护诏旨。一时间，朝廷内外，神不灭论甚嚣尘上。

面对皇帝和权贵的威压，范缜没有退却，他采用自问自答的

文体重新写成《神灭论》。论中设有问答三十余条，范缜在坚持“形神相即”、“形质神用”这一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精神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现象。

佛教徒驳难范缜说，人质和木质都是一样的“质”（实体），为什么只有人有知而木无知？这不是说明精神和形体没有必然联系吗？范缜指出，这是混淆了两种不同“质”的诡辩。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物质形体都具有精神作用，精神现象只是人的形体所特有的属性。同时人的形体也有“生形”和“死形”的不同，只有“生形”才有精神活动，这就好像只有活着的树木才能开花结果一样。树木都是先荣后枯，枯树不能再荣。人也一样，活人都会死，但死后绝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所以，佛教徒宣扬的人死变鬼，鬼又能转生为人的灵魂不死的理论，是荒诞无稽的。

范缜还提出了人的生理器官是精神活动的基础的思想。佛教徒为了证明精神不是“生形”的作用，又提出了“虑体无本”的观点。即是说，知觉固然如范缜说的，不能离开活人的形体器官，但思维不同，它可以神游无极，能够不依赖于形体而独立存在。对此，范缜指出，知觉和思维同是人的统一的精神活动的两个方面，二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浅者为知，深者为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分别依据于人体的不同生理器官。手足等器官有痛痒等感觉，但没有判断是非的作用，判断是非的思维活动是由思维器官——心发出的，心是思维活动之本。如果按“虑体无本”的说法，思维活动可以脱离一定的形体而寄托在任何地方，那么，张三的情感就可随意地寄托在王二的身上，李四的性格又可随意地寄托在赵五的身上。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把“知”和“虑”分割开来，所谓“虑体无本”也是十分荒谬的。

范缜在《神灭论》中还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严重危害性。他指出：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天堂

的快乐引诱人，使很多人竞相出家，争当和尚。这样，对人民来说，败坏了风俗，造成了骨肉分离，子嗣断绝；对国家来说，伤害了政事，使行伍间没有可用的兵，政府里没有可管事的官，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尽，财物因豪华的寺院建筑而耗尽，以至坏人充斥，却到处可闻“阿弥陀佛”的念佛声。对于佛教的狂风迷雾，如果不加扫荡，祸害是没有止境的。范缜认为，现在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神不灭的缘故。“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决心要把人们从佛教弊害的深渊里挽救出来。只有认识万物本身的自然规律，“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劳动者安心田亩生产，为政者减少奢侈浪费。耕田吃饭，养蚕穿衣。一个丰衣足食、天下太平的盛世就会到来。

在范缜《神灭论》发表后，梁武帝又发动和组织了王公朝贵六十余人，先后写出七十多篇有关神不灭的文章，企图以强大的攻势压服范缜。在这些文章中，有尚书令沈约《形神论》、《神不灭论》，尚书论功郎、东宫舍人曹思文《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光禄大夫萧琛《难神灭论》等。其中如沈约等人，多是“攀龙附凤”的人物，他们虽说是佛教信徒，并以文学、史学知名，但对佛学的研究却十分肤浅，实在拿不出什么具有深奥佛理的文章。还有如辅国将军韦睿等人，原来并不信佛，但因迫于梁武帝“敕旨”的压力，也不得不跟着摇旗呐喊。这样，他们只会按皇帝旨令作鹦鹉学舌式的随声附和，谀言称颂，或是用“异端”、“外道”、“妨政”等一套名词去企图压服范缜。范缜对这些谴责和辱骂不屑一顾，只是对论敌曹思文的《难神灭论》这篇代表作进行诘难。范缜在《答曹舍人》一文中，针对曹文利用人的做梦现象去宣扬“形静神驰”的形神二元论进行驳斥。他说：既然“梦为牛”、“梦为马”，那么，第二天早晨应有死牛死马，而没有其物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他进一步认为，人做梦是由于“神昏于内”，因而“妄见异物”。这种虚妄的、不真实的东西，是不

能用来证明形神分离的。范缜虽然孤军奋战，但他真理在手，故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做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当时以善辩著称的曹思文，在给梁武帝的启奏中不得不承认：自己才智愚浅，无法挫败范缜的锋锐。梁武帝迫于无奈，最后只好以范缜“灭圣”、“乖理”的钦定方式结束了这场辩论。

范缜贬官广州被召回朝廷后，迁任中书郎、国子博士。天监十四年（515），卒于官。

范缜一生坚持反佛斗争，他的“神灭论”为玄学、佛学中长期论争的形神因果问题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丰富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范缜一生的著作，据载有《文集》十卷（或十五卷），但在唐时多已散佚。现保存下来的重要著作，仅有《神灭论》与《答曹舍人》。此外还有《拟招隐诗》、《与王仆射书》及《以国子博士让裴子野表》等三篇。

（张晓峰）

参考资料：

《梁书》：《范缜传》、《王亮传》

《南史》：《范云范缜传》、《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传》

梁·僧祐：《弘明集》

唐·道宣：《广弘明集》

梁武帝崇佛

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萧氏是汉初相国萧何的后裔，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枣庄峄城镇东），东晋初南迁到晋陵武进县（今江苏常州）界内的侨置兰陵郡，故称为南兰陵人。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曾参预佐命，封临湘侯。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死后赠镇北将军。萧衍代齐自立后，追尊萧顺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萧衍生于秣陵县（今江苏南京）同夏里三桥宅。少时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

齐武帝永明元年（483），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招集文学之士，赋诗作文，纵谈阔论。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以才学之士的身份并游西邸，号称“竟陵八友”。萧子良对于佛教“敬信尤笃”，经常“招致名僧，讲论佛法”。萧衍在萧子良门下深受熏染，由家传的信奉道教转而接受了佛教理论。

齐隆昌元年（494），萧鸾辅政，起用萧衍为宁朔将军，镇守寿春。当年，萧鸾自立，是为齐明帝，改元建武。

齐建武二年（495），北魏派遣刘昶、王肃率兵南侵。萧衍被任命为冠军将军、军主，领兵击退了北魏军的进犯。战后，擢升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

建武四年（497），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南征雍州。齐明帝命

萧衍赴援。建武五年（498）三月，萧衍率军英勇抵抗，阻止了魏军的进犯。后被任命为辅国将军、雍州刺史，都督六州军事。七月，明帝崩，其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萧宝卷上台后，大肆残杀王室方镇，并派兵袭取镇守襄阳的萧衍。萧衍亦举兵声讨。

永元三年（501），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即帝位，改元中兴，遥废东昏侯萧宝卷为涪陵王。任命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中兴元年十二月，东昏侯兵败被杀。萧衍任中书监、大司马、骠骑大将军等职，封建安公，食邑万户。

中兴二年（502）二月，齐和帝萧宝融封萧衍为相国梁公。四月，齐和帝萧宝融禅位，萧衍代齐自立，改国号为梁，改元天监，是为梁武帝。

天监元年，梁武帝即位后，追尊其母张氏为“献后”，并为其造智度寺，以资冥祐。同时还将秣陵老家同夏里三桥的故宅，舍宅为寺，名为光宅寺。天监初年，梁武帝曾与宝志公同登幕府山，见林峦殊胜，遂命建寺，名曰：“同行寺”。

天监三年（504）四月八日，梁武帝郑重宣布，从今往后，不再事奉道教，要归信佛教，并且亲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手书《舍道事佛文》，以示信奉佛教。四月十一日，梁武帝又宣布，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正道，其余九十五种都是邪道。他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都来“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信奉佛教。

天监五年，梁武帝征扶南（今柬埔寨），僧人僧伽婆罗在寿光殿等处翻译佛经，对其礼节甚厚，引为家僧。又有扶南僧曼陀罗，亦被敕共同译经。另外，还曾遣僧诣外国寻禅经。著名的天竺（今印度）佛经翻译家真谛闻梁武帝崇佛之名，亦东来参加译经。他译出的经论很多，主要是有关大乘瑜伽宗的，其中《摄大乘论》的译本，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梁武帝在宣扬佛教的兴头上，又想起了永明年间与神灭论者

范缜的那场未了结的辩论。现在他要以皇帝的身份发起论难。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范缜的《神灭论》是“违经背亲”，要求范缜“标其宗旨”，以“辩其短长”。范缜没妥协，采用自问自答的“自设宾主”的文体重新写了《神灭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天监六年（507），梁武帝发动和组织王公朝贵六十四人，先后写出七十五篇宣扬神不灭的文章，与范缜辩难。在这些文章中，有尚书令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尚书论功郎、东宫舍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光禄大夫萧琛（范缜的妹夫）的《难神灭论》等。范缜写了《答曹舍人》一文，对其观点进行了驳斥。事后不久，曹思文在给梁武帝的启奏中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在辩论中，范缜孤军作战，“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最后，梁武帝只好以指责范缜“灭圣”、“乖理”的钦定方式，来结束这场辩论。

同年，梁武帝派僧祐在光宅寺造无量寿佛。两年后，又造丈八弥陀铜佛像置于光宅寺。

天监八年（509），梁武帝在新建的蒋陵皇宅寺作佛会，参加者有僧及士人一百零八人。当时的文坛名士沈约，受命作《舍身愿疏》。

天监十年（511），梁武帝为德皇后（萧衍原配郗氏）建解脱寺。

天监十二年至十五年（513——516），梁武帝敕僧祐督造剡溪大石像，立像高十丈，坐像高五丈，龛前驾三层堂，又造门阁殿堂，十分壮观。

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梁武帝56岁，在无碍殿受佛戒，取法名冠达。梁武帝受佛戒后，皇储以下，王侯子弟以其为榜样，受佛戒者达四万八千多人。为统管全国僧尼守戒，梁武帝敕命法超为都邑僧正，以法云为大僧正，由法超制订《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梁武帝自受佛戒以后，每次

礼拜敬佛，都脱下皇帝的衣服，穿上乾陀袈裟，十分虔诚地顶礼膜拜，口称弟子萧衍。大臣奏表、上书时，也称梁武帝为“皇帝菩萨”。为了持戒守规，梁武帝于天监中便断绝肉食只食菜蔬，而且祭祀宗庙也不设牢牲，只用蔬果。

佛教本来并不主张绝对素食，所以梁代以前，佛教僧人，一般还是吃荤的。佛教《十诵律》中说可以吃三种净肉，即不见，不闻，不疑。意思是没有看见，没有所闻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肉，僧人是可以吃的。梁武帝为了要改变这一习惯，宣扬并贯彻他的素食主张，他根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乘经文，自作四篇《断酒肉文》，以大菩萨的慈悲心肠劝导和帝王之威的严令，命僧徒遵守。

梁武帝的《断酒肉文》撰出后，即召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于华林殿前，梁武帝亲自坐镇，静听耆阇寺道澄宣讲《断酒肉文》。从而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净肉的习惯，形成了出家僧尼一律吃素的传统。

梁普通元年（520），梁武帝在钟山竹涧，为其父太祖文皇帝造大爱敬寺。为此，他强迫世家大族王骞出卖其曾祖王导在钟山西边的赐田八十顷。王骞不愿卖，他竟大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王骞由于忤旨，出为吴兴太守。经过三年时间，爱敬寺建成。这座寺院，规模宏丽，宛若天宫，中院距大门延袤七里；旁置三十六院。寺内有僧人一千多人，四时讲诵。

梁武帝为给自己“修福”，在宫城北掖门外原东吴的后苑内建造了同泰寺。寺中有浮图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规模十分宏大，蔚为壮观。同泰寺是梁武帝崇佛的舞台，他在寺中进行的讲经、设会、舍身、奉赎之事，不可胜记。

大通元年（527）三月，梁武帝驾幸同泰寺，留连忘返，立愿舍身寺中。这时他已 64 岁，即位二十五年。佛教中的所谓舍

身有两重意思，一是舍资财，即个人的所有身资服用统统舍给寺庙；一是舍自身，即自愿入寺为僧众执役。梁武帝舍身为寺奴，一是为表示自身虔诚信佛，并不留恋皇帝宝座，他说："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二是通过舍身带头兴起崇佛的热潮。这次舍身历时四天，后在百官的恳请下才回宫执政。回宫后，大赦天下，改元"大通"。另外，梁武帝还命在皇宫后面开一门，正对着同泰寺的南门，名为"大通门"，取反语以谐"同泰"之名。

中大通元年（529），秋九月，梁武帝又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所谓"四部"即指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即无所限制，平等相待，凡是来者都可与会。另外佛教中的"平等法会"、"无碍大会"等亦都与此意义相同。在会上，梁武帝脱去皇帝的衣服，披上法衣为众僧讲经。会后，他又舍身寺院。十一天后，群臣用钱一亿万去赎皇帝，僧众默许。两天后，百官到寺东门奉表，请皇帝回朝执政，请了三次，梁武帝才答应还朝。

同年十月，梁武帝又在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僧俗参会者五万余人。会后，梁武帝还在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

中大通二年（530）四月，梁武帝驾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

中大通三年（531）十月，梁武帝行幸同泰寺，高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文，这次讲经从己酉说到乙卯，共讲了七天。

同年十一月，梁武帝又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从十一月乙未到十二月辛丑，也讲了七天。

中大通五年（533），梁武帝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升法座，讲《金字摩诃波若经》。这次讲经的规模非常之大，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另有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其余还有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等，共计三十一万九千余人。

大同元年（535）三月，梁武帝驾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同年四月，又行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并设无碍会。

大同二年（536）三月，梁武帝行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同年九月，又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法会。十月，再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

大同三年，（537）五月，梁武帝行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同年八月，又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大赦天下。

大同七年（541）三月十二日，梁武帝在华林园中的重云殿，开讲《金字般若波罗蜜经》和《三慧经》。听经者有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还有尚书令何敬容、百官卿士、虏使主崔长谦、使副阳休之，以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同时还请了义学僧一千人，夜间在同泰寺复述梁武帝白天所讲的经义。这样一直讲了二十三天，自开讲一直到解座（结束），每日遍设供品，普施京师。

中大同元年（546）三月，梁武帝参加同泰寺大会，留在寺中讲《金字三慧经》。再次舍身三十七天后，皇太子以下奉赎，方重新返朝。

太清元年（547）梁武帝84岁。二月，魏司徒侯景带十三州要求内属。梁武帝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三月，同泰寺设无遮大会，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中，他除去皇帝衣服，披上法衣，行清净大舍，睡素床，用瓦器，把皇帝所用的车舆、衣服一概屏除。三十一天后，群臣用一亿万钱来奉赎皇帝，同泰寺众僧默许。八天后，百官到凤庄门奉表请梁武帝返朝，三请、三答后，方舆驾还宫，大赦天下，改元“太清”。

同年八月，梁武帝以为侯景的归附增强了梁朝的力量，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就派自己的侄子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率军五万北伐东魏，援助侯景。十一月，梁军战败。

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举兵反梁。

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率军攻陷建康（今江苏南京），纵兵大掠，自封为大丞相，矫诏行事。年已老耄的梁武帝被困宫中，仍斋戒不废。五月卒于净居殿。年86岁。

梁武帝崇佛除频繁进行佛事活动外，还非常重视宣扬佛学理论。他敕名僧为佛典撰写注疏，如命宝亮撰《涅槃经疏》，命建元、僧朗（法朗）撰《涅槃经注》，又命僧旻等编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命智藏纂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命宝唱抄撮《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东传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续法门论》七十余卷。他还三次刺编有关佛经目录，其中第三次由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极有学术价值。

梁武帝本人也长于佛典，著述颇多。具体的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另外还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净业赋》、《注解大品经序》、《宝亮法师制涅义疏序》、《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若干篇佛学文章。梁武帝的著述大部分已经佚失，现存的主要保留在《弘明集》、《广弘明集》中。

梁武帝在著述中阐发的佛教思想，具有独创性的是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论。

所谓三教同源，是指儒教和道教都同源于佛教。梁武帝说，老子、周公、孔子都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儒、道两教来源于佛教。他把最高的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次等的儒教道教比作众星，彼此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他认为儒、道之所以低于佛，是因为儒、道只能求世间的善；佛之所以高于儒、道，是因为佛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儒、道和佛的区别是凡圣的区别。要以佛为主把三教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

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既用儒、道的道理教人在世间行善，又用佛教教义劝人出世成佛。这样就解决了东汉以来儒、道、佛三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梁武帝提出的真神佛性论，认为人的精神、灵魂是成佛的原因，是对成佛具有决定意义的实体。这种真神是轮回、因果报应的主体，是永恒不灭的。一般地说，印度佛教是不讲灵魂的，更不明确地讲灵魂不灭。梁武帝用中国传统的神不灭观念解释佛性，促进了佛教理论的中国化。

梁武帝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梁朝盛极一时，其时京师的寺刹就达五百余所，皆穷极宏丽，寺中僧尼达十万余人，并广有资财。这种情况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流弊，加速了梁王朝的崩溃。

（范大章）

参考资料：

《梁书·武帝纪》
《魏书·萧衍传》
《南史·梁纪·武帝纪》
《南史·王昙首附骞传》
《弘明集》
《广弘明集》

魏梁淮上之争

北魏景明三年、南梁天监元年（502）萧衍篡齐，建立梁国。萧宝夤逃往北魏，于次年三月，到了洛阳，伏跪在魏阙之下，请兵伐梁。这时，梁将陈伯之又投降了北魏，也请兵南下。宣武帝于是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计策。四月，北魏任命宝夤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丹阳公、齐王，赐给他十分丰厚的礼物，调拨军队一万人，让他屯守东城；任用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守阳石，待至秋冬时节，大举南伐。宝夤受任那天夜里，大哭一场，内心复仇火焰烈燃。北魏又让他召募四方壮勇，得兵数千人，以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为将军、军主。宝夤誓死复仇，绝食酒肉，每日蔬食粗衣，从不嬉笑。六月，扬州刺史元澄上表，说："萧衍几次塞断东关，欲使巢湖水泛涨，淹没淮南地区的城戍，吴、楚一带地势低，易被萧衍灌淹、攻掠，淮南地盘也将丢失。寿阳距长江五百多里，黎民惧怕水害，人心惶惶。可顺民愿，攻敌之虚，召集各路兵马，于秋初集结淮南，见机行事，虽然不能统一江南，可确保江西无事。"于是，北魏发冀、定、瀛、相、并、济等六州兵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于八月间全部到达淮南，合寿阳原有守兵三万，归元澄统一指挥，萧宝夤、陈伯之也由元澄节度。

八月，北魏以征南将军元英为都督，指挥进攻义阳的战斗。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得知魏军来攻，派骁骑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三千多家保贤首山，建起三道栅栏。十月，魏军包围了贤首栅，守

栅的民兵任马驹率人杀杨由，投降了魏军。

元澄命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攻东关（今安徽巢县东南）、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淮陵（今安徽嘉山东北）、九山（今江苏盱眙东北古淮河北），高祖珍率骑三千为游军，往来照应，澄麾大军继后。相继克关要、颍川（今河南许昌）、大岘三城，白塔（今安徽来安东北）、牵城、清溪（今安徽含山西南清溪镇）的梁兵不战自溃。梁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刺史潘伯驎据淮陵，宁朔将军王燮保焦城（今安徽嘉山东北焦城湖附近）。魏将党法宗等进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擒明素，斩伯驎。

南梁太守冯道根奉命戍守阜陵（今安徽全椒东），刚到任就发动民众修筑城池、烟墩，好像大敌就要临至，气氛十分紧张，众人都觉得可笑。道根解释说："这就叫做怯防勇战"。城还未竣工，党法宗等众两万人黑压压已至城下，梁将一个个惊骇失色。道根命大开城门，穿着睡衣在城墙上慢慢悠悠地散步，又选出精锐二百人出城迎战魏兵，个个凶猛，先打掉了魏军先头部队的士气。魏人见道根神态如此闲暇，战又不利，认为他设下什么圈套，不敢盲动，于是退走了。道根又带百名骑兵袭击高祖珍，得胜而归，魏军也因粮草不济，撤退而去。冯道根一出空城计，保住了阜陵城。

在西线，梁将吴子阳与魏将元英战于白沙（今湖北红安东北豫、鄂二省交界处），失利。

北魏正始元年（504）正月，萧宝夤进军汝阴（今安徽阜阳），东城已被梁军占领，宝夤屯驻寿阳栖贤寺。二月，梁将蒋庆真因元澄率兵东进，乘虚袭击寿阳，占领了外郭，留守寿阳的魏军长史韦缵仓皇失措，元澄的妻子、太妃孟氏亲登高地，指挥战斗，分兵把守要害，激励文武，安慰新旧，赏罚严明，将士人人奋勇。孟太妃冒着矢石，登上城墙，巡视城防。萧宝夤闻寿阳

告急，率兵连夜赶来救援，与州军内外合击，战斗从凌晨开始至早饭时刻，庆真抵敌不住，仓皇逃走。韦缵临阵懦弱被元澄免官。

元澄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梁萧衍派冠军将军张惠绍等率兵五千送粮往钟离，元澄派平远将军刘思祖中途邀击。两军战于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上），梁兵大败，全军覆没，惠绍等十将被俘。刘思祖因功应受封千户侯，但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曾向思祖索要二位婢女，没有得到，心里忌恨他，遂将表文扣压下来，未能奏闻魏帝。

梁武帝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王僧炳等率步骑三万救义阳（今河南信阳）。僧炳率二万人据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景宗率万人继后。魏将元英命冠军将军元逞等据樊城（今湖北襄樊）拒敌，三月，大破僧炳，俘斩梁兵四千多人。

魏宣武帝元恪诏元澄，说："四月淮水可能泛涨，便于行舟，于梁军有利，不可冒进。"这时，大雨如注，淮水暴涨，元澄不得不退还寿阳。魏兵闻退，失了阵序，军纪不整，狼狈不堪，沿途开小差的有四千多人。中书侍郎贾思伯担任元澄的军司，为魏军断后，元澄认为他是一名儒生，思想着这次必定死了。当思伯活着出现在元澄面前时，元澄大喜，说："'仁者必有勇'，我从您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朝廷因元澄出师无功，撤了他的开府官衔，降职三级。萧衍派人到北魏，提出将俘获到魏军将士交换梁将张惠绍，经过协议，双方成交。

五月，魏军围义阳，城中守兵不满五千人，粮食仅仅能支撑半年时间。魏兵昼夜强攻，梁刺史蔡道恭奋力抵抗，相持百余日，打退了魏军多次进攻。魏兵因久攻不下，又晓得道恭厉害，有些厌战情绪。这时，道恭病倒了，让他的堂弟灵恩接替他率军守城，临终嘱咐大家说："我受国家厚恩，不能攘除寇贼，今病转笃，恐不久于人世。你们应当以死尽节，我死也无遗恨了。"

说罢就咽气了。

七月，魏军得知道恭病死，加急攻城，双方天天短兵相接。梁将曹景宗屯凿岘不进，只是耀兵游猎。萧衍派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仙琕一路转战，直指义阳，士气精锐。魏将元英在士雅山设垒，分命诸将埋伏在四座山包后，让一些弱兵出来与仙琕挑战。仙琕挥师掩击魏军大营，元英佯袭败退，将仙琕引至山间平地，忽挥令旗，伏兵四起，凶猛扑向山下梁军。魏统军傅永披甲握槊，单骑先入，军主蔡三虎随后跟来，两人一前一后，于梁军阵中横冲直闯。梁兵张弓，射穿傅永的左大腿，永拔出箭来，又杀入梁军阵中。仙琕大败，一子战死，不得不率军退走。元英对傅永说："您负伤了，快回军营。"傅永说："昔汉高祖中箭捂脚，不让士兵知道。下官虽然职微，也是国家的一将，怎么能让敌人有伤我将领的名声。"于是仍与诸军追击梁军，直到夜里才回到营中，傅永这时已70多岁，军中人人钦佩他勇壮。仙琕又率兵一万多人进击元英，元英再破仙琕，杀梁将陈秀之。仙琕因义阳危在旦夕，索性与魏军赌注决战，一日之内，连续三次激战，都被打得大败。梁义阳守将蔡灵恩走投无路，投降了魏军。梁的三关戍将听说义阳失守，纷纷弃城逃走。北魏取得义阳及三关城戍，元英因立有战功，复被封立为中山王。

南梁丢了义阳城，于是于南义阳置司州，移镇关南，以卫尉郑绍叔为刺史。

北魏于义阳置郢州，以司马悦为刺史。梁将马仙琕在三关南筑竹敦、麻阳二城，司马悦派兵攻克竹敦。

正始二年（505）二月，梁武帝萧衍谋伐北魏，派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堵塞洛口。八月，魏中山王元英攻梁雍州。杨公则至洛口，与魏豫州长史石荣接战，斩石荣。梁将蒋庆真与魏军战于羊石，失利，公则退屯马头。九月，杨公则又被北魏扬州刺史元嵩打败。

十月，南梁大举伐魏，以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督帅，王公以下官吏都必须献出赋税田粮以助军饷。萧宏屯兵洛口，逼临魏境。

正始三年四月，魏以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众十万拒敌梁军。元英召集各路将领会议，指授众将灵活作战。梁江州刺史王茂率兵数万攻魏荆州，又遣兵袭取魏河南城。魏平南将军杨大眼都督诸军击茂，茂战败，亡失二千多人。魏军收复了河南城，王茂逃还。大眼追到汉水，又连克五城。北魏征虏将军宇文福攻梁司州，俘获一千多人而回。

五月，梁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攻魏徐州，占据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旧黄河东北岸古城），活捉城主马成龙。北徐州刺史昌义之率军克梁城（今安徽淮南市田家庵附近）。豫州刺史韦睿遣长史王超等攻小岘（今安徽含山北），未能奏效，于是改置围栅，困城。北魏兵数百人列阵于南门之外，欲与梁军接战。韦睿将发兵进击，众将说："我等轻装深入，准备不足，待回营披挂完毕，再战不迟。"睿说："不！城内魏军有二千多人，足以固守，今无故出城挑战，必然是一些骁勇的士卒，如果能挫败他们，其城必克。"众将迟疑不决，韦睿怒气冲冲，用手指着节仗高声道："朝廷把这枚节授给我，不是为了装饰好看。韦睿的法令不得违犯！"下令进击，士卒人人殊死奋战，魏兵败走，乘胜急攻，至中午时分，拿下了小岘城，梁军连续作战，一直打到合肥城下。

先前，梁右军司马胡略等攻合肥，久攻不下。韦睿到达后，考察山川地形，乘夜率众在淝水上筑堰，很快堰成水通，漕运畅通。魏于合肥东、西侧筑小城，夹击合肥，又互为犄势。韦睿先攻二城，魏将杨灵胤率众五万前来救援。梁将多恐怕难能敌御，请求朝廷增兵。睿笑着说："魏军已至城下，请兵增援能来得及吗？况且我们增兵，敌人也会增兵。出奇制胜，岂在于人众。"遂率众击破灵胤军。韦睿让军主王怀静在淝水岸边筑城，护守堤

堰，魏军破城，城内守兵一千多人全部战死。魏兵蜂至堤下，气势强盛，众梁将有的想退回巢湖，有的想撤至三叉（今安徽合肥东南）。睿大怒，冲着众人喝道："大敌当前，岂能临阵脱逃！"命人取来帅旗，插到堤下，以示军队岿然不动。魏军前来凿堤，韦睿身先士卒，率众拼争，护守大堤，魏军退却，并在堤上修筑堡垒固守阵地。韦睿制造斗舰，高与合肥城相等，四面攻城，城中的人吓得直哭。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箭身亡。不久，城溃，俘斩魏兵一万多人，获牛马数万匹。

韦睿身体瘦弱，本来不骑马，每次战斗，都让士兵用木板抬着他督励将士，勇气无敌。他白天处理军务，半夜起床，演算军事，还常常彻夜不眠。又爱兵如子，丁壮都争相投募在他的部下。攻下合肥后，梁军又进至东陵，梁武帝萧衍下诏班师。因军营接近魏城，众将恐魏兵追击，韦睿部署辎重先行，自己坐着木板殿后。魏军服睿威名，眼巴巴看着他离去，面不敢相逼。梁徙豫州治于合肥。

魏遣尚书元遥南拒梁兵。梁庐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城（今安徽霍丘东南），又克霍丘城。六月，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

梁张惠绍与代徐州刺史宋黑水陆俱进，趋彭城，围高冢戍。魏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兵救援，打败惠绍，临阵斩宋黑。

七月，桓和击魏兖州，拔固城（今山东滕县东北）。梁徐州刺史王伯敖与魏中山王元英战于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伯敖大败，损失将士五千多人。

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增兵伐梁。梁将角念屯蒙山，萧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将邢峦遣统军樊鲁攻桓和，大破桓和于孤山；别将元恒攻萧及，克固城；统军毕祖朽攻角念，角念弃城逃走。

魏诏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督后发诸军赴淮南。

梁将蓝怀恭与魏邢峦战于睢口，怀恭失败，邢峦进围宿预。怀恭又在清水（即泗水）南筑城，邢峦与杨大眼率兵合击，于九月破城，斩怀恭，俘杀梁兵万人，张惠绍、萧炳慑于魏兵的威势，相继弃宿预、淮阳逃走了。

梁临川王萧宏以御弟的身份统军，器械精良，军容强盛，魏兵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唬人的军队。梁军屯洛口（今安徽淮南市东北青洛河于高塘湖北入淮河之口），前锋攻破梁城，众将主张乘胜深入，萧宏性情懦怯，不敢前进。魏邢峦引兵渡过淮水，与中山王元英合攻梁城。萧宏闻知色变，召集众将商议退兵，吕僧珍说："知难而退，不亦善乎！"萧宏说："我也认为这样。"柳惔说："我大军所向披靡，何谓难啊？"裴邃说："这次出师，还未遇上硬仗，避什么难？"马仙琕对萧宏说："您怎么听信亡国言论！圣上把统一重任委于您，宁可前进一尺死，不可后退一寸生。"昌义之怒目圆瞪，胡须都奓起来了，喊道："吕僧珍该斩！岂有百万之师出未逢敌，望风骤退，我等有何面目去见圣上？"朱僧勇、胡辛生拔剑而起，说："想退的人自己退走，下官愿前向取死。"众人议罢走出帐外，僧珍忙向众将赔礼，说："殿下昨来伤风，没有心思打仗，我深恐士气沮丧，所以想保全军队，安安稳稳回去。"萧宏不敢强违众议，按兵不动。魏将知其不懂军事，派人送给他一件女人用的围巾，嘲笑他的懦弱，而且还为他编了一首歌谣，说："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虎就是韦睿。吕僧珍长叹道："我若能辅佐始兴、吴平为帅，怎么能受敌人这样的侮辱！"建议裴邃分兵攻取寿阳，大军暂停在洛口，萧宏根本不听他的，传令军中说："人马有前行者斩！"于是将士人怀愤怒。魏将奚康生派杨大眼飞报中山王元英，说："梁军自占据梁城以后，停止不前，必是害怕我们。王帅若进据洛水，敌军将不战自败。"元英说："萧宏虽蠢，他手下还有良将韦睿、裴邃等，不可轻举妄动。应观其形势，见机行事。"

梁将张惠绍号令严明，出师顺利，一直把军队推进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东）。一天夜里，洛口暴风大雨，梁军士众惊恐，临川王萧宏仓皇与数名骑兵夺路逃走，将士失了主帅，也都纷纷散归，丢盔卸甲，辎重狼藉，水陆交通被堵塞，军中老少病弱遗弃路旁，哀鸿呻吟，死者近五万人。萧宏乘小船渡江，至夜时分到了白石垒，叩城门求入。临汝侯渊猷登城对他说："百万之师，一朝鸟散，国家是存是亡都还不知道。恐奸人生出变乱来，夜里不能开门。"萧宏无话可说，只得在城下守到天明。这时，守梁城的昌义之与驻下邳的张惠绍，听说洛口兵败，也都引兵退回去了。

北魏宣武帝元恪下诏给元英，命他乘胜平荡东南。魏兵攻破马头城（今安徽寿县西北），将城内粮储全部运回后方基地。梁朝的一些官吏误认为魏缴获的粮草裹携而去，不可能有南下的意思。萧衍说："不然，这必然是声东击西，诈兵之计。"于是命令士卒修筑钟离城（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命令昌义之作好战斗准备。

十月，元英进围钟离，魏帝又把邢峦调到钟离前线，与元英一同作战，邢峦向朝廷上表，说："梁军曾不善野战，却善于守城。今调动全部精锐攻钟离，就是攻下城来也没有多大的利处，当然不攻下来，亏损就更大了。而且钟离远在淮水以南，即使梁兵束手归顺，我们恐怕无粮难守，更何况不惜牺牲那么多士兵来攻城呢？再说，征南的士兵，长期连续作战，疲惫死伤，不问也能知道。虽然有乘胜进军的机会，恐怕没有足够的力量。依臣之愚见，应修复旧戍，抚慰诸州，以后再作打算。江东的空子，不患他们没有。"魏宣武帝复下诏说："按原计划渡淮作战，不得迟疑盘桓！从速进军。"邢峦又上表说："今中山王元英进军钟离，有些冒险。若从得失方面考虑，不顾万全，直接奔袭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上），出敌不备，或许能取胜。若用支撑八十天

的粮食去攻取钟离城，臣从来还没听说过。钟离城坚池深，敌军固守不战，我军空费时粮，到来年春天，士卒也将自毙。若调臣赴钟离作战，军粮从何处来？我军在夏天被调来前线，不曾带有冬衣，一旦遇上冰雪天气，又到何处取得给养？臣宁愿承担懦怯不进的责任，不愿接受败损徒劳的罪过。钟离天险，南梁朝贵多居住在这里，若有内应，或许能胜；如无内应，必难攻取。若相信臣的话，请皇上允准臣停止进军。如认为臣畏缩不前，求革去臣的兵权，将军队尽付中山王指挥。臣仅以一名骑兵的身份，随部调遣。臣屡任边将，比较熟悉边地的情况，既然认为困难，何必还要强行调遣？”魏帝于是召回邢峦，改命镇东将军萧宝夤与元英共同率兵围钟离。侍中卢昶向来讨厌邢峦，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合伙陷害他，使御史中尉崔亮弹劾邢峦在汉中掠人为奴婢的罪行。邢峦把从汉中获得的美女送给元晖，元晖上言给魏帝说：“邢峦近来立有大功，先前的小事已宽赦了，不应再揪小辫子了。”魏帝点点头，不加追究。

这时，围义阳的梁兵自相骚扰，于夜间纷纷逃遁，魏郢州刺史娄悦乘机出击，大破梁兵。

十一月，梁武帝萧衍命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二十万攻钟离。萧衍让景宗屯道人洲，等众军齐集后再出师，景宗求功心切，违诏而进，遇上暴雨，损伤了一些士卒，不得不退回道人洲。萧衍听说景宗没有妄动，得意地说：“景宗不进，真乃天意呀！若孤军独往，又无城可据，士众必然狼狈不堪。今军队整齐，必破魏兵。”

正始四年正月，魏中山王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率众十万攻钟离。钟离城北临淮水，魏军在邵阳洲架设浮桥，于桥西端树立围栅，守护浮桥。元英在淮水南岸攻城，大眼在北岸建城，督运粮草。城中的梁兵才三千人，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机处置，顽强抗御。魏兵推车运土填堑，又使众人背土紧随其后，还有骑兵

沿途督促监工，许多人劳累过度，倒下就起不来了，则连人带土一块推入堑中。城堑很快被填平，魏兵又用冲车猛撞城墙，城土呼呼啦啦地坠落，梁兵复用蒸土补修。墙体土质柔韧，冲车虽能撞人墙内，但不能毁坏。魏军昼夜轮番强攻，前仆后继，人人奋勇，一日数十次进攻，死伤一万多人，士兵的尸体堆积起来高与城墙相平。

二月，魏帝命令元英撤兵，元英上表说："臣一定荡灭梁寇。而月初以来，霖雨不止，若三月天气转晴，必能破城，请皇上再宽限些日子。"魏帝又诏告他说："梁兵用蒸土构筑钟离城，耐得水淹。虽然势在必取，这是将军的谋计，然而兵久力殆，也是朝廷的忧虑。"元英仍上表，坚持攻城。魏帝派步兵校尉范绍到元英那里，帮助他谋议攻取形势。范绍见钟离城坚固，劝元英引军还，元英不从。

梁帝萧衍派豫州刺史韦睿率兵救钟离，受曹景宗指挥。韦睿由合肥抄近路，披荆斩棘，翻山越涧，直奔钟离。左右的人惧怕魏军强盛，劝他慢行。韦睿说："钟离危急，城内人凿穴藏身，隔窗取水，车驰卒奔，犹恐落后，岂能容人缓慢？打败魏军的谋划，已在我腹中，你们不要忧虑。"仅十天的功夫，就赶到了邵阳。萧衍预先告诫曹景宗，说："韦睿是您有威望的同乡，应以礼善待。"景宗见到韦睿，礼敬谨慎。萧衍闻知，高兴地说："二将和气，军队必胜呀！"

景宗与韦睿把军队推进到邵阳洲，命士兵在北距军营二十里的地方开挖沟堑，沿沟树立鹿角，又截洲筑城，与魏军城相距仅一百多步。南梁太守冯道根善骑马丈量土地，马到营立，临近破晓时，梁军已布置停当。魏将元英早上起来，走出营外，望见梁军营墙整齐，大惊，用杖"咚咚"地直杵地，说："这是那路神仙的功夫呀！"梁军器甲精新，军容强盛，魏军望见一个个倒吸冷气。曹景宗担心钟离城中的士民危惧，召募识水性、熟悉地形

的言文达等人，潜行水底，带着皇帝的诏书入城，城内的人这才知道外有救兵，士气大振。

魏将杨大眼勇冠军中，率一万多骑兵直闯梁军大营，所向披靡。韦睿连接战车，布列圆阵，大眼聚集骑兵包围梁兵。韦睿一声号令，二千名强弓手，众箭齐发，洞甲穿中，杀伤许多魏兵。大眼右臂中箭，不得不退走。第二天，元英又亲督大军进攻梁军，韦睿坐在白色的小木车上，拿着白角如意指挥军队作战，一天的时间，就打退了魏军的几次进攻。夜间，魏师又来攻城，飞矢如雨，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先到城下躲避一下，睿不准。士兵有的惊惶失措，韦睿在城上厉声呵斥，稳定了众心。梁将曹景宗募集勇敢战士一千多人，在杨大眼驻守的城邑以南数里处筑垒，大眼攻垒，被景宗击退。从此，梁魏钟离大战的主战场移到了淮水两岸。

为了击退魏军，保守钟离，萧衍命景宗制造高舰，舰高与魏兵所建淮水桥相等，准备火攻。景宗与韦睿各攻一桥，睿在南，景宗在北。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睿使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乘斗舰竞发，击溃了驻屯在淮水邵阳洲上的魏军，然后，再用小船装满柴草，浇上膏油，引燃柴草，小船顺流直下，风怒火盛，烟尘滚滚，天空一片昏暗。又使敢死士卒，拔栅砍桥，水流湍急，顷刻之间，桥栅尽毁。冯道根等人身先士卒，亲自搏战，士卒人人奋勇，呼声惊天动地，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大败。元英见桥被烧，脱身弃城逃走，大眼也纵火焚烧了军营，跑掉了。魏军诸垒一个个土崩瓦解，士卒纷纷投水逃命，被烧死、淹死、杀死者有十多万人。韦睿派人将战况告诉了钟离守将昌义之，义之悲喜至极，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大叫："又活了！又活了！"梁军一路向北追击，直到涉水岸边，元英单骑入梁城。钟离一场大战，北魏惨败，沿淮水一百多里，尸藉相枕，生擒五万人，收集资粮、器械堆积如山，牛马驴骡不计其

数。

八月，北魏朝廷因中山王元英在钟离一战中经算失图，齐王萧宝寅守桥不固，都被免官为民，杨大眼被徙往营州为兵。以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

北魏永平元年（508）九月，北魏郢州司马彭珍等发动兵变，暗中引梁兵攻义阳，三关（即武阳关、平靖关、黄岘关，合称义阳三关）戍主侯登等畏惧梁兵强盛，投降了南梁。郢州刺史娄悦率兵固守。魏重新起用中山王元英都督南征诸军事，率步骑三万出汝南救援娄悦。

十月，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豫州刺史司马悦，自号平北将军，投降了南梁。北魏以邢峦为豫州刺史，率兵击白早生。临行，魏帝问邢峦说：“您认为白早生是走？还是守？何时能平?”邢峦回答道：“早生没有深谋大智，由于司马悦暴虐，犯了众怒，使他乘机变乱。士民迫于他的凶威，不得不顺从他。纵使他引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粮运不继，也能生擒他。早生已得南梁救助，必然守而不走。若王师临城，士民必翻然归顺，不出今年，当传首京师。”魏帝听了，十分高兴，命邢峦先发，使中山王元英继后。邢峦率骑八百，倍道兼程，五天就到了鲍口（即今湖北蒲圻）。白早生遣大将胡孝智率兵七千，出城二百里迎战。邢峦纵骑奋击，大破孝智，乘胜长驱至悬瓠。早生出城接战，失利。邢峦挥师乘机渡过汝水，围城。魏帝又诏加邢峦都督南讨诸军事。

魏镇东将军参军成景儁杀宿豫戍主严仲贤，以城投降了南梁。这时，北魏郢、豫二州自悬瓠以南到安陆，诸城尽归南梁，唯义阳一城属北魏。蛮帅田益宗率群蛮归附了北魏，魏帝任命田益宗为东豫州刺史。十一月，魏遣安东将军杨椿率兵四万攻宿豫。宣武帝元恪得知邢峦连战连捷，命中山王元英趋义阳。元英因兵少，几次上表请兵，未能得到准许，于是，赶赴悬瓠（今河

南汝县南)，与邢峦合兵作战。十二月，悬瓠叛将白早生部下将士齐苟儿等开门出降，斩白早生及其党羽数十人，元英这才引兵奔义阳（今河南信阳），沿途攻克楚王城（今河南信阳北长台关之西），斩梁宁朔将军张道凝。又破长薄（今河南信阳南）、武阳（今河南罗山南）、广岘（今河南信阳南）等城。

魏义阳太守辛祥与娄悦共守义阳，梁将胡武城、陶平虏来攻。辛祥在一天夜里，率兵出城突袭梁军营，擒平虏，斩武城，从而保住了州境。

永平二年（509）正月，魏中山王元英至义阳，正要攻取三关，先与部下将士面授计策，说："三关互为犄势，如左右手一样，若攻取其中一关，其他二关不攻自破。攻难不如攻易，应先攻取东关（即武阳关）。"于是，他让长史李华率一支军队攻西关（即广岘关，又名黄岘关），牵制关内守兵，元英亲督主力攻东关。梁将马仙琕畏惧魏兵势强，弃关逃走。

梁魏历年战争，双方损失都惨重。梁武帝萧衍首先主张弥兵，想通过俘获到的北魏中书舍人董绍，与魏通好。萧衍让主力霍灵超去见董绍，说："今放还您北归，使您能沟通两家和好，彼此弥兵息民，难道这样不好吗？"萧衍又亲自召见了董绍，赏赐给他衣服，说："战争多年，民物涂炭。因此，我不以主动提出讲和为耻辱，与魏通好，本早就有这样的念头，只是没有人能沟通，今托您将我的意思向魏主说明。另派传诏霍灵秀送您回国，我期待您的好消息。"接着又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不杀您吗？能获得您，这也是天意。身为君主，应当多为民办事，君臣牧民，怎么能不考虑这些事呢？贵国若想通好，我今将宿豫归贵国，贵国应把汉中归还我朝。"董绍回到洛阳，向宣武帝元恪奏明萧衍的意见，北魏虽不同意将汉中归还南梁，但也主张停战通好，南北出现了一种相对安定的局面。

魏梁虽无大战，但边地常有摩擦，规模较大的是北魏延昌三

年至熙平元年（514——516）发生的梁魏淮堰之争。延昌二年（513）五月，寿阳久雨，大水入城，庐舍尽被淹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但见城内城外一片汪洋，城内居民全都困守在城墙上，水势仍在上涨，眼看就要漫过城墙，将佐劝李崇弃寿阳保北山，李崇不从，于是结筏将城中居民转移到高处，自己督励将士坚守城池。

扬州治中裴绚率城南民数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他听说李崇北还的传言，信以为真，因自称豫州刺史，与别驾郑祖起一起向南梁请降。

李崇闻知裴绚叛变，一时又弄不清真实情况，于是遣国侍郎韩方兴单舟召他。裴绚听说李崇仍在，怅然惊悔，又觉着既已归附了梁朝，不好再反悔归魏，拒绝了李崇的征召。李崇派弟弟宁朔将军李神率水兵讨伐裴绚，绚败，逃走，被村民缚执。他自觉惭悔，无颜再去见李崇，于是投水自尽了。郑祖起等皆伏诛。

李崇深沉宽厚，又有方略，深得民心。他在寿春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来无不摧破，邻敌谓之“卧虎”。南梁屡施反间计，陷害他，魏宣武帝元恪知李崇忠笃，委信不疑。

延昌三年十月，北魏王足投降了南梁，向梁武帝萧衍献计，堰淮水灌寿阳。萧衍十分赞同，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勘察地形，都说：“淮水河床沙软，底基不实，功不可就。”萧衍不听，征发徐、扬二州民筑淮堰，每二十民户出丁壮五人，假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在钟离修筑护堰工程。役人及战士总计二十万，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筑土，合脊中流。

延昌四年三月，魏左仆射郭祚表称：“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宜命将出师，长驱扑讨。”魏帝诏平南将军杨大眼督诸军镇荆山。四月，南梁浮山淮堰成而复溃。有人说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萧衍下令运东西冶铁器数千斤沉入淮水，仍不能合垅。于是又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

上。沿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担者磨破了肩膀，又遇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九月，梁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并据西硖石逼寿阳；又筑外城，徙沿淮之民以实城内。梁将军田道龙等散攻北魏诸戍，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敌。同时，魏又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硖石，并遣镇东将军萧宝夤决淮堰。

十二月，魏将崔亮至硖石，赵祖悦逆战而败，闭城自守，崔亮进围硖石。

魏熙平元年（516）正月，崔亮攻硖石未下，与李崇约水陆并进，崇屡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一，改派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节度诸军。临行，胡太后嘱他从严治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夤遣轻东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又击败梁将垣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硖石，督李崇、崔亮等克日水陆进攻，众将不敢怠慢，战屡有功。

梁帝萧衍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还未到达浮山，魏兵已被康绚击退，昌义之又与直阁王神念泝淮救硖石。崔亮遣将军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甕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辋，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絙，贯连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辘轳，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退路，又令战舰不通，梁将昌义之、王神念屯梁城不得进。魏李平部署军队水陆俱进，攻克硖石外城，祖悦出降，被斩，梁兵尽被俘获。

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涤人。李平分命诸将，水陆俱进，攻浮山堰。崔亮违背李平节度，借口患病请还，未经许可就退兵。李平奏明朝廷，要求处死崔亮，胡太后责令崔亮将功补过。魏军因将帅不和，遂退师。

四月，梁筑淮堰成，长九里，下宽一百四十丈，上宽四十五

丈，高二十丈，沿堤栽植杞柳，军垒列居其上。由于淮堰阻塞，淮水上游多处决水，淮水两岸方圆数百里尽为泽国。魏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垄。其水清澈，府视庐舍冢墓，了然水底。

九月，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多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元澄为上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淮堰不攻自破，胡太后大喜，重重赏赐李平，元澄遂不行。

梁魏淮堰之争以后，南北双方各因国力衰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无暇顾及对外扩张，南北战火逐渐熄灭。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

《梁书》

《资治通鉴》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南北兵争

北魏泰常七至八年（422——423），明元帝拓跋嗣乘刘裕政权新立，利用其关中撤兵、无暇北顾的机会，陆续占据了滑台、虎牢、洛阳等城邑，拓地至河南。这时，漠北柔然兵时常出没于北魏北部边地，虏掠骚扰；西部又有赫连夏的威胁。境内各族人民又不断起义，反抗北魏统治的风潮此伏彼起。内外困迫，拓跋氏还不敢放手南向用兵。以后太武帝拓跋焘消灭了赫连夏，又打跑了柔然人，统一了关中和黄河流域。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拓跋焘调动六十万大军南下，进攻南朝宋。他亲率步骑十万，进攻宋的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宋守将苦战却敌。之后。刘宋出动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其主力在王玄谟统率下，进攻滑台，被魏军主力击败。刘宋虽在主战场失利，但在其他战场上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建威将军柳元景率领一支偏师，用很少的兵力，突击卢氏（今河南卢氏），卢氏豪强赵难驱率部曲私兵为元景向导，在当地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形成相当大的力量和声势。他们直出熊耳山（今河南卢氏东南），连克弘农、陕县，进军潼关，势如破竹，斩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魏军死亡万余人。关中士民和四山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纷纷响应宋军。由于王玄谟率领的主军溃败，宋文帝召回前线军队，柳元景也不得不撤军回到淮南。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攻下悬瓠、项城（今河南沈丘），进逼彭城（今江苏徐州），分路南下，渡淮直趋瓜步（今江苏六

合东南)。拓跋焘登临瓜步高阜，遥望江南，恨不得飞过长江，消灭刘宋，统一天下。他号令诸军，拆毁民房，砍伐蒹苇，大造箪筏，准备渡江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宋文帝向沿江各郡发出战争总动员令，丹阳郡所辖民户，所有丁壮全部充军，南兖州五位丁壮抽出三人从军，缘江五郡兵众结集广陵，缘淮三郡结集盱眙，江南自采石（今安徽当涂）至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陈舰列营，建立了坚固的防线。拓跋焘见不能取胜，又无能力渡江，鲜卑兵不习水战，于是不得不退军。在退军时，魏军采取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将江北一带的丁壮全部斩戮，把婴儿挑在槊尖上，盘旋取乐，狂叫狞笑。史书曾这样记载说："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其见，其中幸者，不过驱还北国作奴婢耳。""所过郡县，赤地无余。"《宋书·索虏传》说："喋喋黔首，……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江北经此空前浩劫，荒败了数十年。

自此，南朝宋逐渐收缩防线，步步南撤，由洛阳、滑台撤至淮北。到了宋明帝刘彧时，南朝统治集团忙于内争，北魏乘机夺取了淮水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南朝宋的防线复由淮北撤至淮南。

北魏占据淮北以后，仍时时进逼南朝，南北兵争西在宛、邓，中在义阳，东在淮上。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十月，太上皇帝拓跋弘亲将南征，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军伍，然其后南巡，至怀州（治野王，今河南沁县）而还。太和三年(479)，北魏命元嘉出淮阴、元琛出广陵、薛虎子出寿春进攻南朝齐。次年二月，元嘉等将率步骑二十万攻寿春，被齐将崇祖击

破。魏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又为南朝齐徐州刺史崔文仲所败。魏兵攻司州，分兵出兖、青二州界，围朐山，南齐守将玄元度固守，青、冀二州刺史卢绍之派儿子卢奂往援。潮水至，魏兵多被淹死，元度出兵奋击，大败魏军。孝文帝派冯熙迎接元嘉北撤。七月，齐角城（今江苏淮阴南）守将投降了魏军，魏派徐州刺史元嘉迎降。十月，又命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大阳（今湖北蕲春西北）蛮酋桓延出义阳，骚扰南朝淮、泗诸城戍。

太和五年（481）正月，南齐军破魏兵于淮阳，冯熙准备退往司州，蛮人桓天生劝冯熙联合诸蛮部落，南进淮上，而蛮族各部不应，冯熙大怒，于淮北岸边游猎而去。这时齐高帝萧道成因谋位不久，未遑外略，想借魏军新败的机会与魏廷通和，于是遣后军参军僧朗北使。先前，南朝宋的使者殷灵诞、苟昭先在北魏平城京，他们听说萧道成篡夺了宋的帝位，建立南齐，对北魏的典客说："宋、魏通好，患难与共，宋今灭亡，魏不相救，和亲还有何用？"待齐使僧朗至，殷灵诞串通北魏官吏，杀了僧朗。

太和七年（483），北魏遣李彪出使南齐，齐使刘缵报聘。从此南北通好，历时三四年，南北无战事。

太和十一年（487），桓天生与雍、司二州诸蛮相互连接，据南阳故城，攻南齐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北魏遣骑兵一万多人助战，进至比阳（今河南泌阳西），被齐将戴僧静等打败。桓天生也被舞阴戍将殷公愍击破。第二年，桓天生复又引魏兵出据隔城（今河南桐柏西北），南齐遣曹虎率军攻拔隔城。

此后，南北不断摩擦，北魏、南齐境内的变乱分子相互招引对方结援。太和十七年（493）二月，南齐雍州刺史王奂杀宁蛮长史刘兴祖。齐武帝萧赜大怒，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阁将军曹道刚领斋仗五百人收奂，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王奂第三子王彪闭门拒守。司马黄瑶起与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

攻王奂，斩之。王彪及弟弟王爽、王弼，女婿殷睿皆伏诛。长子王融及弟弟王琛，被斩于市曹。王琛的弟弟王肃、王秉投奔了北魏。

七月，魏孝文帝借南伐为名，定迁都之计。北地人支酉聚众数千人，于长安城北西山起义。支酉派人联络南齐梁州刺史阴智伯，取得南齐的支持。秦州人王广也起义响应支酉，缚北魏秦州刺史刘藻。秦、雍间七州民众尽被震动，纷纷参加义军，众至十万，各自保壁望救。孝文帝遣弟河南王元干、尚书卢阳乌击秦、雍义军，大败。支酉进至咸阳北浊谷，围长洛王穆亮，大破之，穆亮走还长安。南齐阴智伯遣数千人接响支酉，支酉又率军进攻长安。魏孝文帝闻关中形势危急，遣杨大眼等将率数万人镇压支酉起义，支酉、王广都被魏军杀害，起义失败。

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锐志攻取南齐。太和十八年(494)，元宏遣薛真度出襄阳，刘昶出义阳，元衍出钟离，刘藻出南郑攻齐。孝文帝也亲率军南伐，进至悬瓠。次年，齐明帝萧鸾使王广之、萧坦之、沈文季分别督司、徐、豫三州兵抵御魏军；又使青、冀二州刺史张冲出兵，分其军势。魏孝文帝自渡淮水攻钟离，被南齐徐州刺史萧惠休击破。孝文帝为掩饰兵败的事实，借司徒冯诞逝世回洛阳治丧的名誉，派使者临江数落齐明帝萧鸾杀主自立的罪恶，然后草草收兵。而魏军其他将领仍与南齐相持，刘昶与南齐降将王肃围义阳，齐司州刺史萧诞固守。齐将王广之遣萧衍等间道先进，内外合击，解义阳围。魏将元英围南郑，齐南郑守将萧懿苦守，自春至夏六十多天。萧懿派氐人杨元秀还仇池，劝说氐人起兵切断魏军的粮道，元英不得不退人斜谷。

太和二十一年(497)，魏孝文帝再次大举南伐，过赭阳(今河南叶县西南)、南阳，分兵攻围，而自南至新野。十月，魏军四面攻新野，不克，于是改筑长围困守。齐将曹虎与南阳太守房

伯玉不和，屯兵樊城不进。齐遣萧衍、张稷救南阳。十二月，齐又遣崔慧景总督众军，抵御魏兵的进攻。

太和二十二年正月，魏军久困新野，城中粮尽，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煮土为粥，苦等救兵不至。城陷，思忌被俘，被押至孝文帝面前，孝文帝问他说："今欲降未?"思忌回答："宁为南鬼，不为北臣。"魏兵杀了他。新野陷，湖阳、赭阳、舞阴、顺阳诸戍将领并弃城逃走。二月，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投降了北魏。齐遣陈显达救南阳，还未等援军到来，南阳已被魏军占据。崔慧景到了襄阳，南阳、新野、南乡、北襄城等五郡已落入北魏，于是分兵助守樊城。三月，慧景与萧衍等五千多人向邓城（今湖北襄阳北）进发，魏兵中途阻击，慧景败绩。孝文帝亲率军追至樊城，齐将曹虎固守，北魏耀兵襄阳而还。齐豫州刺史裴叔业率军围攻魏涡阳城（南兖州治，今安徽蒙城），又分兵攻龙亢戍（北魏马头郡治，今安徽怀远西北）。北魏广陵王率步骑二万五千救龙亢，被裴叔业击败。这时，王肃正在攻义阳，魏孝文帝闻知涡阳告急，命王肃解义阳围，援救涡阳。裴叔业见魏兵势盛，弃军逃走，齐军奔溃，魏军一路追杀，齐兵死伤不可胜数。裴叔业还保涡口。七月，齐明帝死，魏孝文帝称礼不伐丧，自悬瓠还师。

太和二十三年二月，南齐陈显达督崔慧景等将率军四万围魏马圈城（今河南邓县东北），历时四十天，城陷，又遣兵进取南乡。三月魏孝文帝复南伐，至马圈，显达退保均口，齐军沿途奔溃，损折了万人。不久，魏孝文帝逝世，宣武帝元恪即位，魏、齐暂且罢兵。

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投降了北魏。魏使奚康生、杨大眼入据豫州，又以彭城王元勰领扬州刺史，与王肃率步骑十万奔赴前线。齐以萧懿为豫州刺史，屯兵小岘。萧懿又使胡松、李居士屯于宛，为魏将王肃击破。齐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也为魏兵所擒。同时，齐将陈伯之所率领的水

军在肥口又被魏军打败，寿春城归属了北魏，魏置兵四万戍守寿春。

景明三年，南齐发生内乱，统治集团政争。十一月，北魏镇南将军元英向宣武帝元恪上表，要求南伐。他说："萧宝卷一天比一天骄纵，逼害无辜的人。齐雍州刺史萧衍又举兵东伐秣陵(在今南京市中华门外故报恩寺附近)，后方孤城空虚。天赐良机，正可趁此兴兵南伐。臣乞求亲率步骑三万人，直指沔水以南地区，占据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切断黑水水路，让昏庸的南齐君臣，自相鱼肉去吧，而我们占据长江的上游，远近威震。长驱南下，进拔江陵，则'三楚'地区便垂手可得，溯江而上，岷、蜀的航道自然被我们断绝。再让杨、徐二州的兵配合作战，建业城中的萧齐政权就成了瓮中之鳖，可以使天下文轨齐而混一。愿陛下圣心独断，不要听信那些怀疑论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书表到了朝廷后，被那些负责文书处理的官吏扔到了一边，没能呈阅给宣武帝。

车骑大将军源怀也上书说："萧衍兴兵内战，想篡夺帝位，萧宝卷孤立危急。广陵、淮阴等戍镇都居中观望成败。这真是天赐良机，吞并萧齐，应东、西并举，形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阴谋得逞，齐国上下同心，不但不能吞并它，就连杨州恐怕也要受到威逼。为什么这样说呢？寿春离建康仅七百里，山川水路，他们都很熟悉。他们君臣若齐心协力，凭借水路，突然攻击我们，并不那么容易抵挡得住，现在宝卷的都城建康有土崩瓦解的忧患，边地城邑没有继援的希望，廓清江南的地盘，正在今日。"魏宣武帝这才以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使他经略南下用兵的事宜。但实际并没有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也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又上表说："萧氏朝廷已乱了常伦，君臣相互交争，江东与江外的州镇形成对峙，时间已近一年了。平民

百姓因支差转输而穷困不堪，军队士卒因攻城争战而十分疲惫，眼前的事，萧氏都应付不过来，更无力维系外藩的州镇，藩镇一个个孤立独存。如果我们不乘此机会扫荡江南，拓展疆域，恐怕以后就没有这样容易的机会了。我们虽然取得了寿春，但寿春城三面受敌，仍须加强防守。义阳城（今河南信阳）接近于淮水的源头，为交通要道，我军南下，必须经由此地。若江南一旦平定了，向淮水以西一带用兵，可以乘夏水泛涨的时机，由水路进兵。进师寿春，须经义阳城北，更是居我咽喉要地，不得不深为忧虑。平定义阳，实在今日呀。估计守城敌军精锐不超过一万二千人，然而行军的要领，贵在虚张声势，建议使两荆的兵众打出随、雍、扬三州军队的旗号，屯于建安（今河南宜阳西），守卫三关以为声援；再调二豫的军队进据南关，对抗延头，派一名都督总制各方面的军事，于冬季进师，至来年春末，不过百日，必能攻克义阳城。"

元英再次向朝廷上奏，说："今萧宝卷骨肉相残，藩镇自立。义阳孤城，接近我之边地，城内守兵少，城外又无粮食接济。这是一只欲焚的小鸟，恋卧在柴草堆上不肯离去。敌寇自动把头伸过来，难道还容许我们手中的砍斧迟缓吗？如果这时不夺取它，以后就难能相图了，恐怕还会留下深深的后患。现在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整装待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建议派军司统一指挥。"魏帝这才让身边的宦官羊灵引为军司，把他派往前线。田益宗率兵攻齐，齐建宁太守黄天赐迎敌，两军在赤亭相遇，混战一场，天赐败阵。

景明三年二月，南齐梁王萧衍杀了邵陵王萧宝攸、晋熙王萧宝嵩、桂阳王萧宝贞。萧忙于内部残杀，各藩镇对北魏的防守十分懈怠。鄱阳王萧宝寅家的阉人颜文智与宝寅左右的人密谋，从家宅的后墙上凿出一个洞，乘着夜色，护拥着宝寅逃走，数人摸摸索索来到江边，跳上已停泊在那里的一只小舟，解开缆绳，慢

慢向江中划去。天色渐亮，守兵发现宝夤逃走，追至江边，又顺流查询。宝夤装扮成渔民的模样，身着黑布袄，腰系千枚钱，脚穿旧草鞋，悠悠然然，垂钓江中，随流漂泊了十多里，瞒过了追兵，来到了西岸，投奔到居民华文荣家里。文荣联络了本家几位青壮，把宝夤藏到一条山涧内，找来一头毛驴给他骑，一路上夜行昼宿，来到了寿阳的东城。魏军守将杜元轮派人驰告扬州刺史元澄，澄备车马侍卫迎接宝夤到州。宝夤这时才 16 岁，远途劳顿，面容憔悴，一路徒步跋涉，双脚满是血泡，看见他的人都以为是被掠卖的生口。元澄以客礼相待，宝夤说："我主上被杀，请求能为主上穿丧服。"元澄派人做了一套丧服给他，并帅官僚亲到宝夤住处吊唁。宝夤在寿阳有许多故旧，在他的感召下，纷纷背齐向魏，元澄也因宝夤深明大义，很是器重他。

三月，齐和帝萧宝融下诏禅位于梁王萧衍。萧衍改国号为梁，史称"南梁"。从此，北魏与南朝宋、齐的交争转变为魏梁南北交争。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太武帝本纪》、《孝文帝纪》、《宣武帝纪》、《元澄传》

《南齐书》：《高帝纪》、《武帝纪》、《明帝纪》

《宋书·索虏传》

《通鉴纪事本末·南北交兵》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六镇暴动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地边镇军人地位下降。孝明帝元诩正光四年（523）四月，魏遣尚书令李崇击柔然阿那环，长史魏兰根劝李崇说："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调遣国人部族，委以守边重任。自迁洛以来，官府称他们为'府户'，如同厮养的奴役一般，按年龄由官方指令婚配，以致失去清流的地位。而他们原来的部族，各居荣显，相比之下，自然生出愤怨。应改镇为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全都免为平民，入仕选举，一律遵照原来章程，文武兼用，恩威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几乎再没有北顾的忧虑了。"李崇将这些意见转奏朝廷，但并未能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

再者，元叉幽禁胡太后，又驾空魏帝，独立朝政，刚执政时，矫情自饰，谦勤待物，时事得失，还多少关心些，一旦官瘾过足了，又刚愎自用，嗜酒好色，贪吝宝贿，予夺任情，纪纲坏乱。元叉的父亲京兆王元继更加贪纵，与其妻子各受赂遗，培植亲信私党，连郡县小吏的选用，都须经他批准，他任命的牧守、令长都是些贪官污吏。因此，百姓困穷，人人思乱。武卫将军于景本也是贪暴之徒，不满元叉独擅，谋废叉，事败，元叉黜他为怀荒镇将。

而且，柔然屡为患，入境抄掠，镇民深受其害。四月，柔然兵寇怀荒（今河北张北），镇民请粮抵抗，镇将于景不肯给，镇民不胜忿，遂反，绳绑于景，当众杀死。不久，沃野镇（今内蒙

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乌梁素海之北）民，破六韩拔陵也聚众造反，杀死镇将，改年号真王，诸镇胡汉士民纷纷响应。拔陵引兵南下，遣别率卫可孤围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又攻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怀朔镇将杨钧起用尖山豪强贺拔度及其三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让他们父子率兵镇压北镇起义。

正光五年（524）三月，北魏以临淮王元彧都督北讨诸军事，率兵北上，镇压破六韩拔陵。

这时，义军别率卫可孤攻怀朔镇已有一年的时间，镇将杨钧使贺拔胜向临淮王元彧求救。贺拔胜挑选敢死少年十多人，乘夜色漆黑，伺隙突围出去，义军骑兵急追，待至赶上。贺拔胜一边扬鞭策马狂奔，一边大声高呼："我乃是贺拔破胡！"义军闻知贺拔胜勇猛善战，不敢相逼，眼睁睁地看着他逃走。贺拔胜直奔云中，见到元彧，诉说道："怀朔被围，危在旦夕。大王今屯兵不进，怀朔若陷，则武川也危，反民锐气百倍，虽有良、平二城，大王也恐怕难保。"元彧答应出师救援，贺拔胜复突围入怀朔镇城。镇将杨钧复使贺拔胜出城打探武川镇情况，这时，武川镇已被义军攻陷，贺拔胜调转马头，驰回怀朔，怀朔也被义军击溃，贺拔胜逃奔北魏广阳王元深军中。

五月，临淮王元彧与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兵败，北魏朝廷因元彧兵败，将他革职。同时，北魏安北将军李叔仁又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白道川南谷）被义军打败。义军连战连捷，声势日盛。

魏帝召集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问道："今北镇反民兵连恒、朔二州，逼近金陵，诸位有什么计策？"吏部尚书元修义请求派重臣督军镇守恒、朔二州，抵御六镇军。魏帝说："去年阿那环叛乱，遣李崇北征，崇上表请求改镇为州，朕认为旧章难改，不从其请。寻思李崇这纸表文，开启了镇民非望之心，才酿成今日祸患。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这里再

重提一下。然而李崇身居贵戚重望，器识英敏，吾欲再派他北上，你们意下如何?”仆射萧宝夤等齐声道：“如此，实合众望。”李崇说：“臣因六镇偏远，地近北地寇戎，欲以安慰众心，岂敢导引他们作乱？臣罪当就死，望陛下恩赦。今再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之秋。但臣已年70岁，加之疲病，不能胜任军旅,愿改择贤才。”魏帝不许，加李崇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安王元深与李崇协同作战，并受李崇节度。

七月，魏军的主力已与破六韩拔陵接战，崔暹不听李崇的指挥，自与拔陵战于白道，大败，单骑逃回。拔陵集中兵力，进攻李崇。李崇力战不能抵御，引军还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与拔陵的义军相持。广阳王元深上书朝廷，说：“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选派亲贤，委任边镇，配以高门弟子，以死防守，不但不废仕宦，还优免各种赋役，当时人们羡慕边镇将士，并争先充任。太和年间，仆射李冲同事，凉州土人尽免厮役。帝乡旧门，仍守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镇兵受本镇驱使，只能混到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同族留在京师的人，得上品通官，在镇的人与清途相隔绝，或多逃逸。于是更加严格边兵律令，镇人不听，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之流涕。自迁都伊、洛，边任益轻，唯下等庸才，才出任镇将，前后镇将轻相模习，专事聚敛，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又将劣迹恶习带至边镇，政以贿立，边人无不切齿痛恨。及柔然阿那环纵兵抢掠，官军追敌，不能深人，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更加轻视中国。尚书令李崇请求改镇为州，本为远见，朝廷不许。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杀死他，遂相率为乱，攻城掠地，所过夷灭，王师屡次北战，拔陵兵众日盛。此次举兵，本指望削平暴乱，而崔暹全军覆没，李崇与臣彼此照响，相与还屯云中，将

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恐诸镇不久也将如此，天下之事，多么不可估量！”元深上书分析了六镇暴动的直接原因，指出了北魏朝廷所面临的灾难。而北魏皇帝昏庸无知，书文送至朝廷，他连看都不看。而崔暹的失败，也使他恼羞成怒，下令逮捕崔暹。崔暹用女妓、田园贿赂当朝权贵元叉，始终逍遥法外。皇帝的诏旨只是一张废纸。

八月，东、西敕勒尽叛北魏，起兵响应破六韩拔陵。敕勒酋长斛律金事怀朔镇将杨钧为军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能知马步多少，嗅地使知军队远近。北镇镇民暴动，斛律金率众归附了破六韩拔陵，拔陵封斛律金为王。在六镇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魏帝才醒悟到李崇与元深的先见之明，于是下诏说："诸州镇军凡非一贯犯罪而配隶充军的人，尽免为民。"改镇为州。又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这时，六镇已尽被镇民义军控制，郦道元未能成行。先前，迁居洛阳的代人，多受到掌管选举的官吏的压制，许多人不得仕进。及六镇暴动，元叉这才起用代来寒人为传诏，借此慰悦他们。

十月，北魏广阳王元深见边地诸镇大势已去，于是又上书朝廷说："今六镇尽叛，高车二部也倒向起事的镇民，以此疲惫不堪的军队去攻击他们，必然无取胜的道理。不如选练精兵，分守恒州各处要塞，以后再作其他打算。"遂与李崇引兵撤至平城。李崇对诸将说："云中是白道的要冲，敌人的咽喉，若此地不保，则并、肆二州危在旦夕，当留一人镇守，谁可担当此任？"众将一致推荐费穆。李崇于是请求朝廷，让费穆出任为云州刺史。

北魏孝昌元年（525）六月，破六韩拔陵围广阳王元深于五原（今山西沁县境），军主贺拔胜召募二百人，开东门出战，斩首百余级，义兵稍退。元深拔军退往朔州，贺拔胜殿后。

云州刺史费穆招抚离散，四面拒敌。这时，北境诸镇尽被镇民义军控制，唯云中一城独存。时间长了，道路阻绝，援军不

至，粮秣俱尽，费穆无可奈何，弃城南奔秀容，投奔了尔朱荣。

长沙参军于谨见义兵人多势盛，官兵节节失利，于是向元深献计，说："今寇盗蜂起，不宜专用武力取胜。谨请求奉大王的威命，谕以祸福，不久将使其各部分离。"元深点头赞同。于谨兼通诸国语言，于是单骑人诸族部落营，求见他们的酋长，凭着三寸伶俐之舌，昭示朝廷恩信，在其煽动下，西部敕勒酋长乜列河等率三万余户南奔，向元深投降。元深欲引军到折敷迎接，于谨说："破六韩拔陵兵势十分强盛，闻知乜列河来降，必然出兵邀击，若先据险要，不一定能抵挡得住，不如以乜列河为诱饵，设伏兵等他们到来，必能袭破他们。"元深依从了于谨的建议。破六韩拔陵果然引兵邀击乜列河，尽俘其众，这时官军伏兵突然攻袭，大败拔陵的义军，重又夺回乜列河及其兵众，敕勒酋长斛律金见破六韩兵势衰落，也奔云州，投降了北魏官军。

北魏又勾结柔然头兵可汗阿那环，召引柔然兵镇压六镇暴动。阿那环率军大破破六韩拔陵，于阵斩拔陵麾下大将孔雀等。拔陵想避开柔然兵，向南渡过黄河。魏将李叔仁因拔陵稍逼，求援了广阳王元深。元深率众赴援，义军腹背受敌，接连失利，士气低落，拔陵兵二十万人相继投降了北魏官军，破六韩拔陵本人下落不明。元深与行台元纂上书朝廷，请求于恒州以北另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济，息其乱心。朝廷不听，诏使黄门侍郎杨置到北镇，将六镇降户至别处置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元深对元纂说："这些人又成为乞活了。"二十万北镇流民被徙往河北，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仍受到北魏统治者残酷压迫，北镇镇民与统治者的尖锐矛盾没有得到缓和，只是在地理上位移了一些，以后，北镇流民又在河北重举义旗，最终暴发了轰轰烈烈的北魏末年河北流民起义。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

《通鉴纪事本末·六镇之叛》

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

河北流民起义

六镇暴动被镇压后，北魏朝廷将北镇降户二十万人安置到冀、定、瀛三州就食。其实，冀、定、瀛三州因战乱频仍，田园荒芜，且又历年多灾，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地居民自顾不暇，哪还有余食供北镇降户就食。这么多的降户流入冀、定、瀛三州，又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粮食奇缺、田园财产的分配与争夺等，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镇镇民的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北魏孝昌元年（525）八月，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上谷（今北京延庆），起兵击魏，改年号真王，攻打郡县官府，揭开了北魏河北流民起义的序幕

杜洛周起义初期，手下将领不乏人才，如高欢、蔡儁、尉景、段荣及安定人彭乐等。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义军战事比较顺利。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是燕州。围燕州刺史博陵崔秉，又在黄瓜堆打败了投降北魏的敕勒酋长斛律金，斛律金投奔了尔朱荣。九月，北魏朝廷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元潭讨伐洛周。自卢龙塞至军都关，尽置士卒据守险要，元潭还亲自率兵出屯居庸关，想把杜洛周起义军阻止在燕山以北，不使他们南下。

孝昌二年（526）正月，北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今河北滦平南）三戍兵二万人反，响应杜洛周，洛周率兵自松岍往赴接应。行台常景使别将崔仲哲屯守军都关，邀击洛周军，义军打败官兵，杀崔仲哲。元潭的军队闻知军都关失守，十分恐慌，在

一天夜里，自惊溃散，北魏朝廷又以别将李琚取代元谭为都督。

杜洛周举义，鼓舞了北镇流民反魏的信心。在其影响下，五原降户鲜于修礼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改年号为鲁兴。鲜于修礼起义时，曾遭到官军严厉镇压，义军与官军曾在拒马河一带多次大战，双方死伤惨重，拒马河西岸布满了尸体。直到东魏、北齐时，有人到这一带游历，还曾看到白骨累累①，可以想见当年战争的惨状。鲜于修礼定州左人城起义，壮大了河北流民军的声势，并与活动于幽、燕二州的杜洛周南北呼应，在河北地区形成两支颇具规模的起义军。

四月，杜洛周南出，到蓟城一带活动，被北魏统军梁仲礼击败。都督李琚又与洛周战于蓟城之北，败没。常景亲统大军迎战义军，洛周引兵退还上谷。

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纥真等率军攻蓟城以南县邑。七月，魏行台常景遣都督于荣等在栗园击破义军，斩杀曹纥真及将士三千多人。洛周率众南趋范阳（今河北涿州），又被常景、于荣合军击破。

八月，鲜于修礼麾下部帅元洪业突然发动变乱，杀死了修礼，向北魏官军请降。流民军将领葛荣又召集部众杀死元洪业，自立为帅，率领流民军与官兵继续作战。

九月，葛荣北趋瀛州（治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北魏广阳王元深自交津（即交漳口，在今河北磁县西）引兵追。葛荣至白牛逻（今河北博野县境），轻骑掩击魏军，杀章武王元融，遂自称天子，建国号齐，年号称为广安。元深闻知元融败死，引军还定州，驻在州城南一座佛寺内，定州刺史杨津怀疑元深图谋不轨，派都督毛谥讨伐元深。元深出走，与左右间行至博陵郡界，遇葛荣游骑，被擒，解往葛荣帐前，葛荣杀元深。当葛荣在白牛

---

① 《刘敦桢文集·定兴县北齐石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

逻大败北魏军的时候，而杜洛周却被北魏行台常景击破，部下武川王贺拔兴战没，士兵四百人被俘。

十一月，杜洛周围范阳，范阳城民响应洛周，捕获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并将他们送给杜洛周，开门迎流民军入城。

孝昌三年（527）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以北道行台博陵人崔楷为刺史。崔楷上任后，因州城新立，粮仗俱无，上表朝廷，乞请兵粮。表文送到朝廷，在部省官署转了一圈，且分文不给。有人劝崔楷把家眷留在洛阳，自己一人乘马到广阿上任。崔楷说："吾听说食朝廷奉禄的人，当以朝廷之忧为已忧，如果吾一人独往，那么将士谁还肯卖命呢！"遂举家迁往殷州。葛荣率流民军直逼州城，有人劝崔楷，先把城中老弱转移出去，崔楷让自己的小儿子和一个女儿当夜随众出城，不久又后悔起来，说："这样作，人们会说吾守城不坚决，亏忠而全爱。"于是命人将小儿子和女儿追还。流民军聚临城下，强弱十分悬殊，守城官军又无防御器械。崔楷勉励将士固守，士卒人人争奋，都说："崔公尚不惜全家百口的性命，我们怎么能自爱一身呢？"连战不息，死者相枕。城陷，守御官军全部覆没。崔楷被擒获，坚强不屈，葛荣命甲士杀死了他，遂又率军进围冀州。

河北流民军声势迅猛，官军连战失利，北魏右民郎和平人路思令上书朝廷，认为"戎之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为战地。……比年以来，将帅多是宠贵子孙，……衔环躍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便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怖惧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令不败，岂有得哉！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又怖敌，迁延而不进。国家

便谓官号未满，重爵屡加，复疑赏赉之轻，金帛日赐。帑藏空虚，民财殚尽。致使贼徒更增，胆气益盛，生民损耗，荼毒无聊。……德可感义夫，恩可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搜徒简卒，练兵习武，甲密弩强，弓调矢劲。谋夫既设，辩士先陈，晓以安危，示其祸福。如其不悛，以我义顺之师讨兹悖逆之竖，岂异厉萧斧而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虽愚者知其不旋踵矣”。这一表疏，揭示了北魏政治、军事的腐败，提出了一些切中时弊的对策，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三月，葛荣久围信都（今河北冀县），北魏以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救援信都。但子邕在洛阳迟迟没有动身。七月，北魏又命相州刺史乐安王元鉴与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元鉴因北魏朝廷风雨飘摇，暗自高兴，阴怀异志，遂据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叛变，投降了葛荣。八月，魏帝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进攻邺城。子邕行至汤阴（今河南汤阴西南），相州刺史元鉴使自己的弟弟元斌夜袭子邕营，不克。子邕乘胜挥师进击，围邺城，经过一番激战猛攻，邺陷，斩元鉴，传首洛阳。魏帝因又遣子邕、裴衍讨伐葛荣，但由于将帅相互矛盾，全部按兵不动。

十一月，葛荣围信都自春至冬。冀州刺史元孚激励将士，昼夜拒守，粮储已尽，外无救援，抵敌不住，城陷。葛荣擒获元孚，将城中居民尽行驱出城，时值寒冬，冻死的人有十之六七。元孚的哥哥元祐任城防都督，葛荣召集将士，商议俘虏将士生死处置。元孚兄弟各自引咎，争相赴死，都督潘绍等数百人，全都向葛荣下跪，请求处死自己，保全元帅元孚兄弟。葛荣感慨地说：“这些人都是魏朝的忠臣义士。”于是将元孚兄弟及被关禁的五百名将士免除死罪。冀州陷落，北魏朝廷十分震惊，慌忙派源子邕为冀州刺史，率兵抵敌葛荣。裴衍上表朝廷，请求同行。魏帝诏命许可。子邕又上言说：“裴衍行，臣请求留驻；臣行，请

求留驻裴衍。若遣臣与衍同行，败在旦夕。”魏帝不许。十二月，源子邕与裴衍同行至阳平城（今河北馆陶）东北漳水曲，葛荣率十万大军邀击，两军混战一场，官军大败，子邕、裴衍全都战死。漳水曲一战，流民军基本上消灭了官军在河北地区的主力。这一胜仗使流民军士气更加高涨，同时，也滋长了葛荣的骄傲情绪。此后，葛荣又率军直指相州。相州吏民闻知冀州失陷，源子邕、裴衍又在漳水曲败死，十分惊恐，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李神轨志气自若，抚励将士，士卒人人尽力。葛荣动用全部精锐强攻，卒不能克。

北魏永安元年（528）正月，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居鲜于修礼与杜洛周之间，流民军迭相攻围州城。杨津积蓄薪粮，整治器械，随时拒击，使流民军一时不能克。杨津又暗中派人携带铁券劝说流民军将领不要攻城，流民军中也有私通杨津的人，他们写信给杨津说：“北镇流民可以围城，正是为了迎取城中的北镇流民。应将城中的北镇流民全部斩除，不然的话，必致后患。”杨津尽将北镇民安置在州城子城内，抚慰不杀，众人无不感激其仁德。葛荣代修礼统领士众时，派人劝说杨津投降，许诺他为司徒。杨津怒斩其使，固守州城三年。葛荣先后攻克殷州、冀州，将杨津与北魏洛阳朝廷南北隔绝，致使定州外援无望，杜洛周乘机攻围定州。杨津派儿子杨遁突围出去，向柔然头兵可汗求救，杨遁日夜哭求，头兵才不得不派其堂祖父吐豆发率精骑一万南出。前锋至广昌（今河北涞源北），流民军堵塞隘口，柔然兵无法前进，只好撤回。杨津在定州久等援军不至，人人惶恐不安，僚属长史李裔暗中通流民军，引流民军入城捕获杨津，占据定州城。定州城被流民军攻破后，北魏瀛州刺史元宁据守孤城，恐不自保，也以城投降了杜洛周。

二月，葛荣北上，火并了杜洛周，收编了洛周的流民军。三月，葛荣攻陷沧州（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俘获了州刺史

薛庆之，居民死者十之八九。

六月，葛荣军缺粮，遣其仆射任褒率兵南掠至沁水。北魏以元天穆为大都督，统辖东北道诸军，率宗正珍孙等将镇压流民军。接着，魏帝又下诏说："朕当亲御六戎，扫净燕、代。"以大将军尔朱荣为左军，上党王元天穆为前军，司徒杨椿为右军，司空穆绍为后军。葛荣退屯相州以北。

八月，葛荣又引兵围邺，众号百万，游兵南行已过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尔朱荣向魏帝请求允许他率兵进击。九月，尔朱荣召见从子肆州刺史尔朱天光留镇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身体料及不到的地方，非你不能称我心。"自率精骑七千，每位骑兵配备两匹马，轮流乘骑，倍道兼程，东出滏口（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以侯景为前驱。葛荣起事日久，横行河北，尔朱荣众寡不敌，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尔朱荣不可能取胜。葛荣听到这些议论，更加得意忘形，眉开眼笑地对部下将士说："这一仗好打，你们多置办些长绳，等敌人到来，尽管缚取就是了。"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部队就像撒网捕鱼一样，十分零散。尔朱荣将军队潜伏在山谷中，设奇兵，分督将以上的将领三人为一处，每处有数百名骑兵，命令他们就地扬尘鼓噪，使流民军弄不清其兵力多少。又调遣人马，布置交手近战，因交手战，刀不如棒，令军士各带一枚袖棒，挂置于坐骑侧旁，待至短兵相接时，马不能腾驰，不得斩敌首级，尽情挥棒打击，即使不能打死，也能使其因伤失去战斗力。然后分命壮勇所向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尔朱荣亲率士卒冲锋陷阵，绕到流民军背后，内外合击，大破流民军，于阵擒葛荣，余众尽降。尔朱荣因流民降众太多，如将他们分割在各处，恐怕他们内心疑惧，再相聚起事。于是下令解散降众，来去自由，亲属相随，任从其便。于是群情大喜，登下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降人走出百里之外，尔朱荣又派人分道押欲，随便安置，

各得其宜。又从降人中选任渠帅，量才授任，掌握降民事宜，降民全都得到安置，当事人也都佩服尔朱荣干事机敏迅速。尔朱荣又以槛车送葛荣赴洛阳，流民军占据的冀、定、瀛、沧、殷等五州重又沦人北魏朝廷，河北流民起义被镇压。这时，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屯军朝歌以南，穆绍、杨椿还未发兵，尔朱荣兵贵神速，抢了头功。

十月，葛荣被押至洛阳，魏帝率群臣登阊阖门，引见葛荣，然后将葛荣押至街市斩首。

十二月，葛荣的将帅韩楼复聚众，占据幽州，反抗北魏，攻克郡县。尔朱荣以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守中山，韩楼畏惧贺拔胜威名，不敢南出。

永安二年（529）九月，尔朱荣派大都督侯渊到蓟镇压韩楼，配给他很少的兵力，骑兵仅七百人。部属有人怀疑这么少的军队不可能取胜，尔朱荣说："侯渊随机应变，是他的长处；若总欲大众，未必能用得上，今让他带领这些兵众去击韩楼，必能取胜。"侯渊遂广张军势，多设运输车具，又亲率数百人出其不意地深入韩楼境地，在距蓟百余里的地方，与韩楼部帅陈周率领的马步万余人遭遇，侯渊潜伏下来，等陈周率游军过去，从背后突然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大破流民军，俘虏其士卒五千多人。随即又将马仗归还给他们，让他们回蓟。左右的人都有些不解地问道："既然俘获了他们，为何又放还他们呢?"侯渊说："我兵既少，不可力战，须设奇计离间他们，如此才能攻克。"侯渊估计降兵已入蓟城，遂率骑兵乘夜进发，次日拂晓，叩击城门。韩楼闻知侯渊来攻，又怀疑降卒为渊内应，优虑蓟城不保，于是弃城逃走，被侯渊的骑兵追擒，蓟陷。

当北镇流民在河北起义时，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大族邢杲，率河北流民十万多户徙往青州，流民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土著民骂流民为"舐榆贼"，当地官府也出动军队围击流民。

北魏武泰元年（528）六月，邢杲率河北流民在青州北海起义，自称汉王，改年号天统。起义震动青、齐二州，北魏朝廷慌忙派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叔仁率兵进讨。北魏永安二年（529）三月，北魏又诏命上党王元天穆镇压邢杲起义。四月，魏军破邢杲义军于济南。邢杲投降了北魏，被送至洛阳处死。至此，河北流民青州起义失败。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帝纪》、《尔朱荣传》

《通鉴纪事本末·六镇之叛》

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

北魏惩治贪污

鲜卑拓跋氏以异族君临中原，在入主中原前后，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仍保留了漠北粗犷的形式，利禄酬劳的来源主要是战争的俘获物，如人口男女、金银财物、牛马牲畜、粮食等，分配的方法是帝王按功论赏。封赏是不定期的，数量也没有一定，这要看战争的长久与俘获物的多少。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称代王，班爵叙勋，按等级论赏，在官僚阶层中，改变了过去平均分配的做法。

登国二年正月，拓跋珪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赏赐数量不等。

登国三年五月，拓跋珪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多万头，渡弱落水，班赏将士不等。

登国六年（391）十月，拓跋珪北征柔然，于大漠南床山下大破柔然部落，将俘获物班赐从臣不等。十一月，又大破匈奴刘卫辰的儿子直力鞮于铁歧山南，获其器械辎重，牛羊二十多万头。又乘胜奋击，于十二月，消灭了刘卫辰部落，将其珍宝造册登记，得名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

登国七年五月，拓跋珪班赐诸官马牛羊各有差。

皇始二年（397）十月，拓跋珪平中山（今河北定州），获后燕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班赐功臣将士各有差。

天兴二年（399）七月，拓跋珪诏赐天下镇戍将士布帛各有

差。

拓跋珪通过赏赐，用物质刺激将士臣僚为他卖命。有时战争打得非常残酷，将士臣僚不但得不到赏赐，甚至还得饿肚子，这时就没了积极性，如攻打中山时，数月不下，粮草不济，许多将士都不愿再打下去了，要求撤回平城，拓跋珪费了许多气力，才笼络住军队，最终平了中山。

拓跋珪占据中原地区以后，又调过头来对付北方诸族部落，年年战争，每次也都有赏赐，班赏的对象主要是将士。中原汉族居住区，仍沿袭后燕，设置州郡牧守。地方官吏有职无禄，家财资产都是靠贪污、贿赂、巧取豪夺得来。官吏贪赃枉法成风，久而久之，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积成恶习。到拓跋嗣即位以后，才注意了这个问题并开始整饬。

永兴三年（411），拓跋嗣诏北新侯安同等人持节巡行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问其疾苦，察举守宰不法。

神瑞元年（414）十一月，拓跋嗣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有，悉簿为赃。诏守宰如不守法，民可直接到朝廷告状。

神瑞二年三月，拓跋嗣下诏说："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后怠惰。数加督罚，犹不悛改。今年赀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征发于民"（《魏书·太宗纪》）。

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427），魏帝行幸中山，贪官污吏十数人被免职。

神䴥元年（428）正月，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州郡官吏贪污风气稍有收敛。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间不长，这种痼疾复发。

太延三年（437）五月，魏帝下诏说："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带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

守令不如法者。”但这纸惩治贪污枉法的诏令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凡庶凶悖刁民借此诏命，专求牧宰之失，诬告邀赏，清廉的官吏怕被诬告受冤，迁就这些刁民，而真正的贪官污吏又惧怕这些刁民告发，施以恩惠笼络，与他们相互勾结，不告不纠，贪暴官吏犹自贪暴，清廉的官吏惧怕诬告，反倒慌恐不安。

贪污的问题没有解决，州郡官吏照样侵吞民产，鱼肉百姓。太平真君四年（443）六月，魏帝拓跋焘又下诏说：“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扬恩德，勤恤民隐，至乃侵夺其产，加以残虐，非所以为治也。今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之徒，各励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有司弹纠，勿有所纵。”这一诏令，只是在某一方面对州郡牧守的不法行为作了些限制，不久，这种限制又被日烈的贪风冲破了。

和平二年（461）正月，文成帝拓跋濬下诏说：“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地方官吏与大商富贾勾结起来，盘剥百姓，按利分红。而且，官僚自己也经商，把收受的贿赂物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河内太守赵柔居官纳贿，别人给他送了几百枚铁犁铧，赵柔与儿子赵善明就把这些犁铧拿到市场上卖掉了，换得了二十匹绢；郑羲任西兖州刺史，政以贿成，性又吝啬，州中吏民常给他送上大礼，他却连一杯酒一小块肉都舍不得酬谢，有时在兖州城西门收受了羊、酒礼物，随即拿到城东门去卖。官场腐败已到了极点，农民已不堪忍受。因此，北魏前期，许多州郡的城民纷纷起来杀死刺史、郡守，社会不稳，直接原因是官吏贪污。拓跋濬对此感到很是头痛，也想下决心整饬一顿，于是颁布禁令，规定官吏贪赃十匹帛，就要处

以死刑。同时，拓跋濬又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外部州镇。甚至张设耳目，让一些候官乔装改扮成士兵和平民，杂乱于官府寺署内，暗访官吏赂私，一旦发现，穷加追讯。也有不少人趁机诬谄，发泄私愤，造成很多冤假错案。一些贪官污吏混水摸鱼，倒打一耙，转嫁赃证，最终使拓跋濬惩治贪污的行动不了了之。拓跋濬不肯罢休，更立严制，又规定“诸司官赃二丈皆斩”。(《魏书·刑罚志》)

拓跋濬的严刑峻法，没能解决问题，州郡牧守在对待朝廷反贪污的政令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软泡硬抗，寻隙蒙混，躲过浪头，行事依旧。到了献文帝拓跋弘时，继续惩治贪污。他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以后传位给孝文帝，自己作了太上皇，仍穷览万机，政刑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在他执政期间，北魏虽然出现了几位清正廉洁的官吏，但贪污腐败的官风远没有煞住。

延兴二年（472）十二月，孝文帝元宏想从考核选举升迁方面，制止贪官的不法行为，于是下诏，说：“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魏书·孝文帝纪》)

延兴三年正月，孝文帝又制定州郡县地方官吏三载考绩升迁之法：“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魏书·高祖纪》)以此鼓励地方官吏创建政绩，制止官场贪污之风。

太和二年（478）十一月，孝文帝又采用重奖重罚的办法，解决州郡官吏贪污枉法问题，下诏说：“悬爵于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赏；悬刑于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

之实要。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朝廷虽有科禁，官吏照样贪污，孝文帝很想了解这些贪官污吏的实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魏书·高祖纪》）贪官污吏已结成一个关系圈，其罪恶勾当秘而不露，孝文帝自然难得实情。

太和八年（484）六月，北魏朝廷始参照汉晋制度，颁行官吏俸禄，内外官吏可根据自己的品第领到相应的食禄，又禁止官吏经商，集中精力，治理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豫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魏书·高祖纪》）。官吏的食禄每年从十月份开始，一季度发放一次。班行奉禄的目的在于养廉，制止贪污。这年秋，孝文帝派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这次颁行俸禄收到较好的效果，自北魏建国以来，官吏贪污的顽症得到了诊治。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元宏病死，宣武帝元恪即位。他意在宽政，官吏贪污之风重又复兴。而且，在元恪即位之前，北魏曾有一条规定：“皇族有谴，皆不持讯”（《魏书·刑罚志》）。宗族弟子虽也矫恃，但碍于法令严峻，多少还能收敛些。元恪实行宽政，官僚及皇室纨绔子弟肆无忌惮，骄横残暴，聚敛无度，“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河间王元琛最为豪奢，他和高阳王元雍争富，家里喂养着名马，用银作马槽，金为锁环，至于各种珍宝器皿冰罗雾縠等，不计其数。他曾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洛阳伽蓝记》卷四）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

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他一餐要化去数万钱。“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洛阳伽蓝记》卷四）。

这时，北魏对贪官的惩治，并不像前期那样严厉，只是到了不成样子的时候，才轻描淡写地走走形式，没有认真地去整饬。如章武王元融，性尤贪残，恣情聚敛，引起极大民愤，被中尉纠弹，朝廷这才不得不夺了他的官爵，但不久又重新起用了他。河间王元琛拜任定州刺史，多所受纳，贪吝至极，后来朝廷征用他为朝官，元琛将大批赃物运回洛阳。当时掌握朝政的灵太后胡氏十分生气，下诏说：“琛在定州，唯不将中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于是免了他的官。元琛罢官回家，不甘心，想方设法买通皇帝权贵，小皇帝元诩始就学，元琛乘机献上金字《孝经》，又与宫中权宦刘腾相勾结，赂腾金宝以巨万计。刘腾屡屡到灵太后面前美言元琛，于是又起用他为秦州刺史，到任后，恶习不改，仍是聚敛无度，百姓吁叹，激起东益、南秦二州氐族部民起义。灵太后任命元琛为行台都督，仍兼州刺史，镇压氐族部民起义。琛性情贪暴，兼总军政大权，愈加强取豪夺，百姓患害，有甚虎狼。朝廷派这么一条恶棍去镇压氐族起义，接战不久，就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扔下数千名士兵的尸体，仓皇逃回了秦州城。虽然吃了败仗，他内恃权宦刘腾，无所畏惮。又被朝廷监察官纠弹，除名为民，不久又恢复王爵。这时，北魏前期惩治贪污的法令已不起任何作用了。

而且，北魏后期，官僚经商十分严重。皇室贵族经商的有咸阳王元禧，拥有许多吏僮，经营盐铁生意；北海王元详公私营贩，侵剥人民。大官僚经商的有邢峦，他在汉中时，将良人籍没为自家奴婢，又兼营商贩，聚敛钱财。李崇生性嗜好财货，贩肆聚敛，家资累巨万仍营求不息。他的儿子李世哲作相州刺史时，不清不白，在邺城、洛阳开设市廛，垄断市面，收擅其利。官中

的宦官也经商，大长秋刘腾，“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魏书·刘腾传》）。贵族官僚贪污、经商，政治搞得一团糟，因此朝廷不得不屡令禁止。这时官商内外上下已结成各种关系网，动一毫而牵全身，虽有政令，而仅是一纸空文而已。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太祖纪》、《太宗纪》、《世祖纪》、《高宗纪》、《显祖纪》、《高祖纪》、《世宗纪》、《章武王元融传》、《河间王元琛传》、《刑罚志》

《洛阳伽蓝记》

关陇起义

关陇泛指故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或今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和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的陇右地区。北魏正光五年（524）初，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乌梁素海之北）起义，这里也暴发了胡汉各族人民大规模的反魏起义。关陇起义的核心是高平镇民和秦州城民。正光五年四月，高平镇（今宁夏固原）赫连恩聚众举义，推举胡人酋长胡琛为首领。胡琛自称高平王，率众攻打高平镇城，与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遥相呼应。北魏派别将卢祖迁统领官兵迎战义军，义军失利，胡琛向北逃走。

六月，自破六韩拔陵起义以来，二夏、豳、凉诸州民变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政刑残虐，触犯众怒，州民薛珍等聚众突入城门，活捉李彦，并将他杀死。薛珍等推举莫折大提为帅，大提自称秦王，占据秦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北魏遣雍州刺史元志率兵攻秦州。

先前，南秦州豪族杨松柏兄弟数次起兵反抗官府，刺史博陵人崔游诱骗松柏投降了朝廷，任用他为州主簿，又伪施好言，让他劝手下群氐兵归顺，然后摆设酒宴，声称共享和好，而暗设伏兵，待松柏等聚集，一声令下，尽将他们捕杀。从此，崔游麾下各部互相猜惧，都怕遭暗算。崔游闻知李彦被杀，自知不安，正准备逃走，未及脱身，城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攻杀崔游，以城响应莫折大提。大提又遣卜胡袭破高平城，杀镇将赫连略、

行台高元荣。不久，大提卒，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自称天子，设置百官，改年号为天建。又立子阿胡为太子，封兄阿倪为河西王，弟天生为高阳王，伯珍为东郡王，安保为平阳王。关陇起义发展很快，魏廷又派吏部尚书元修义兼尚书右仆射、西道行台 、行秦州事，为西讨诸军节度，率大军赶赴关陇，企图一举扑灭起义烈火。

八月，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向朝廷上书说："凡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兵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并无积蓄，虽据有两城，本无德威。其势在于急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沮，坐待崩溃。飙至风起，逆行的人伐幸祈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才能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晓兵，奔利不相待，逃难不相顾，将无法令，士非教习，不思长久之计，各有轻敌之心。如使陇东不守，汧军败散，则两秦遂强，三辅危弱，国之右臂，将如此断废。宜令大将坚壁勿战，另遣偏裨率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今甘肃天水东南)，以袭其后，则汧、岐之下，群妖自散。"魏以李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俱出梁、益，隶属益州刺史魏子建指挥。义军首领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率兵东进陇下，与魏都督元志战于陇口（即陇关，今陕西陇县西境陇山东坡）。元志兵败，弃众东保岐州（治雍县，今陕西凤翔东南义乌堡）。

莫折念生又遣都督窦双攻盘头郡，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窦念祖击破义军都督窦双。

九月，西道行台元修义患了中风急症，不能治军。魏以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众军讨伐莫折念生。

十月，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率兵攻豳、夏、北华三州。魏遣都督、北海王元颢率诸将进兵讨伐。

莫折天生进攻岐州，十一月，陷州城，俘获都督元志及州刺史裴芬之，将他们解赴至莫折念生处斩首。念生又派卜胡等人攻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在平凉东打败了魏光

禄大夫薛峦。

高平人攻杀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北魏以京兆王元继为太师、大将军、都督西道诸军，讨伐莫折念生。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民赵天安聚众绑缚州刺史，响应念生。凉州又被义军占领。

北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招谕南秦诸部氐人，氐人陆续投降了朝廷，遂收复了六郡十二戍，还斩了义军将帅韩祖香。魏帝因子建镇压南秦州民起义有功，任命他以刺史兼任尚书，为行台，节度梁、巴、二益、二秦诸州。

北魏孝昌元年（525），莫折天生屯军于黑水，兵势十分强盛。北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率兵五万进讨。延伯与行台萧宝夤屯驻马嵬（今陕西兴平西）。延伯向来以骁勇著称，宝夤催他出战，延伯说："明晨为公先试探一下贼众的胆量。"于是挑选精兵数千，西渡黑水（今陕西兴平西），列阵向天生军营行进，阵法严整，直抵天生营下。萧宝夤率军在黑水东岸接应。延伯耀武扬威一番，然后引兵回撤，天生见延伯人少，开营门争先追逐，兵众多于延伯十倍，紧逼延伯于黑水西岸，宝夤在东岸望见，大惊失色。延伯横枪断后，也不与天生战，军阵始终严整划一，纹丝不乱，天生不敢击。待军阵渡过黑水，回到东岸，延伯才慢慢渡水而东，天生兵众也转身回营。宝夤这才放了心，高兴地对延伯说："崔君之勇，关羽、张飞都不如呀。"延伯说："这些贼众哪是老奴的对手，明公尽管放心，看我老奴破他。"第二天，延伯勒兵出战，宝夤举军继后。天生尽众迎敌，延伯身先士卒，陷敌前锋，将士披坚执锐，竞相前进，大破天生军，斩俘十多万人，追击至小陇。义军占据的岐、雍二州及陇东地区复失。官兵因粮草不济，稽留在陇东地区采掠，义军遂塞陇道，阻止官兵西进。

秦州义军在东面失利，曾想向西发展。正光五年十二月，莫

折念生西击凉州，姑臧城民赵天安执刺史宋颖响应。次年十月，吐谷浑主伏连筹发兵救宋颖，赵天安再次反叛，凉州又落入魏军手中。念生又两次派义军南下，攻打仇池郡，以图攻取南秦州，都被魏子建的守军打败。

魏军击败秦州义军的攻势后，又把矛盾指向高平镇的义军。孝昌元年四月，高平义军首领胡琛遣其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攻泾州。魏将卢祖迁、伊瓮生讨伐，不能克。萧宝夤、崔延伯引兵与祖迁会师于安定，甲卒计有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势十分强盛。丑奴在安定城西北七十里的当原城安营扎寨，不断以轻骑向官兵挑战，大兵还未交战，又呼啦一下回走，数番骚扰官军。延伯自恃其勇，遂自告奋勇，充当前驱，出击义军。他让人打制了一枚大盾，使壮士擎负行进，号称“排城”，置辎重于内，战士在外，自安定城北，沿着坡岭北上。战斗即将开始，有数百名义军骑兵奔驰而来，手里举着一张文书，诈称是降簿，呼喊着朝官军飞奔而来。他们把“降簿”交给萧宝夤、崔延伯，还未等宝夤、延伯看清“降簿”的内容，宿勤明达率兵自东北突袭官军，官军仓促迎战，诈降的义兵又从西边猛击官军，官军背腹受敌。延伯上马奋击，径直奔义军营。义军尽是轻骑，作战灵活；官军步骑相杂，反应迟钝，且又久战疲乏。义军乘机得入排城，尽获官军辎重，延伯遂大败，死伤近二万人。萧宝夤收拾惨众，退保安定。延伯因战败自感羞惭，于是修缮甲兵，募集骁勇，复又自安定西进，在距义军七里的地方结营驻扎。又事先并不通告宝夤，独自出袭义军营，大破义军，顷刻之间，平毁义军数座营栅，官军因胜懈怠，四出采掠，士卒散乱，义军乘机还击，魏兵大败，延伯中流矢身亡，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战役，使义军声势大震。北魏朝野因失骁将崔延伯，更加忧恐。而且朝廷昏庸，实情不能上达，每当胡太后问及关陇战事，群臣竞相谎言，以求悦媚。因此，前线将帅请求增兵，却常常遭到拒绝。

孝昌二年（526）九月，秦州义军内部分裂，莫折念生部下将领吕伯度据显亲城（今甘肃秦安西北）叛变。念生派军攻克显亲，吕伯度投奔了高平义军胡琛。胡琛封伯度为大都督、秦王，拨给他一支军马，让他去攻击莫折念生。伯度屡屡击破念生军，复据显亲城。不久，伯度又背叛了胡琛，东投魏军。莫折念生处境更加严峻，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投降了魏行台萧宝寅，宝寅使行台左丞崔士和据秦州。北魏以吕伯度为泾州刺史，封平秦郡公。魏大都督元修义停军陇口（即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境陇山东坡），迟迟不敢西进。莫折念生在秦州重举义旗，囚执崔士和，北送高平，后于途中杀死。从此以后，“胡琛与莫折念生交通”，高平、秦州两支义军，由前期相互抵牾、牵制、甚至残杀，终于结成了联盟，秦陇地区形成了以高平义军为主体的义军联合体，关陇起义进入联合发展的新阶段。

高平义军万俟丑奴部众较为强盛，丑奴杀了义军叛将吕伯度，收编了他的部众。胡琛联合莫折念生，想对抗沃野镇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拔陵派人诱杀胡琛，万俟丑奴又乘机兼并了胡琛的部众。

孝昌三年，魏行台萧宝寅因连年征战，将士疲惫。关陇义军乘魏军疲惫，发起猛攻，在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大败萧宝寅。宝寅收集亡散，得万余人，龟缩在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见义军势众，以汧城投降了义军。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人缚执州刺魏兰根，响应念生。魏豳州刺史毕祖晖在与义军的战斗中丧生，行台羊深弃城逃走，北海王元颢的军队也被义军打败。义军首领胡引祖据北华州（治杏城，在今陕西黄陵西南故邑），叱干麒麟据豳州（治安定，今甘肃宁县），响应莫折念生，关中大震。魏雍州刺史杨椿募兵七千多人，率以拒守。魏帝诏加他为侍中兼尚书右仆射、行台，让他节度关西诸军。魏北地（今陕西富平东北古义亭城）功曹毛鸿宾投降了义军，并引义军

进人渭北地区，雍州录事参军杨侃率兵三千掩击义军，鸿宾惧，复又叛变了义军，缚擒义军将领宿勤乌过仁送于官军。莫折念生乘机攻雍州，萧宝夤部将杨侃躲在沟堑中，暗放冷箭，天生应弦而毙，部众溃散。

二月，关陇义军占据潼关。三月，魏帝诏命将士镇压义军，中外戒严。关陇义军迫于官军威势，弃潼关西走 。

萧宝夤兵败泾州，被免为庶人。这时，雍州刺史杨椿患病，请求卸职。朝廷又以萧宝夤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其节度。杨椿回到乡里，他的儿子杨昱正要到洛阳去，他对儿子说："我恐宝夤有异心，你到京师，把我的意见奏明皇上和太后，并告诉宰辅，改派长史、司马、城防都督，监佐宝夤，要想安定关中，正需要这三人。如不派遣，必致深患。"杨昱当面奏上，魏帝及胡太后都不听。

九月，秦州民杜粲突然叛变，将莫折念生全家老少尽行斩除，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也乘机自行州事，派人捎信给萧宝夤，请求投降，关中形势复又变得对朝廷有利。

萧宝夤泾州兵败后，有人劝他将责任推委给洛阳朝廷，还有人劝他留在关中，戴罪立功。行台都令使冯景说："拥兵不还，罪就更大了。"宝夤不听，自己认为出师累年，消耗了不计其数的钱粮，一旦覆败，内心不安；朝廷也怀疑宝夤有二心。

中尉郦道元向来以严猛著称，他不避权贵，依法处死了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的宠宦丘念，元悦十分恼恨他。这时，萧宝夤反状已败露，元悦想借宝夤之手杀死郦道元，奏请朝廷以道元为关右大使，让他去招抚宝夤。宝夤闻知，认为他来者不善，十分害怕。长安城中的一些轻薄子弟，又都劝他起兵。宝夤问计于河东柳楷，楷说："大王是齐明帝的儿子，天下人众望所归。今日之举，实合人意，而且谣言也说：'鸾生十子九子殨，一子不殨关

中乱’。乱就是治，大王当治关中，还疑虑什么呢？”郦道元到了阴盘驿，宝夤遣其将郭子恢攻杀道元，又派人收殡道元尸体，上表朝廷，谎称道元被白贼杀害。还上书自我表白，并无反意，所谓反状都是杨椿父子的诬谄谮毁。

萧宝夤向来看重行台郎中武功人苏湛，打算起兵，让湛的表弟姜俭捎信给苏湛，说：“元略接受萧衍的旨意，要剿除吾，道元这次来，事不可测。吾不能坐受灭亡，今须为自己打算，不再对魏称臣了。生死荣辱，与您相共。”苏湛看罢宝夤的信，举声大哭。姜俭劝止说：“为何这样大哭？”苏湛说：“我全家百口人今天要遭屠灭的横祸呀，怎么能不哭呢？”哭了数十声，又慢条斯理地对姜俭说：“替我转告齐王，王本以穷鸟投人檐下，多亏朝廷使王羽毛丰满，荣宠到如此地步。今国家多难，不能竭忠报德，却想乘人之危，听从过路人无识言语，欲以弱败之兵守关问鼎。今魏德虽衰，但天命还未改。而且王的恩义还未感化民众，只能看见失败，不能看见成功，苏湛不能拿全家百口人的性命被王诛灭。”宝夤又使人对他说：“我迫于无奈起兵，若不预先告知您，恐怕您阻止。”苏湛说：“凡谋大事，当得天下奇才与之共事，今当与长安有博识的人谋议，看此事成否？湛恐怕荆棘必生于自家斋阁，愿您允准，让我这把老骨头归还故里，一旦病死，好去见先人。”宝夤知道苏湛不为己用，听任他还武功老家。

十月，萧宝夤自称皇帝，改年号隆绪。都督长史毛遐与毛鸿宾率氐、羌兵反对宝夤，宝夤派大将卢祖迁出击，被毛遐杀死。这时，宝夤正在祭祀南郊，行即位礼，忽闻卢祖迁被杀，吓得脸色都变了，顾不得整顿队伍，狼狈逃归雍州城中。行台郎封伟伯与关中豪杰谋议，欲举兵诛宝夤，事泄，兵变未遂。

北魏朝廷闻知萧宝夤举兵关中，急忙派行台长孙稚率兵讨伐。正平民薛凤贤与宗人薛修义聚众河东郡（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与萧宝夤遥相

呼应。北魏又派都督宗正珍孙率兵镇压。

永安元年（528）正月，萧宝夤围冯翊，未能攻下。长孙稚率兵到恒农，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昔魏武帝曹操西征，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以韩遂、马超的才气，那里是曹操的对手，然而胜负持久未决，原因在于韩遂、马超能扼守险要。今敌军守御已固，就是曹操再生，也难以施展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深入敌军腹地，我军因处死地而不得不英勇奋战，华州之围将不战自解，潼关的敌军必内顾而奔走，支节既解，长安便可坐取。若愚计可施，吾愿为明公充当前驱。"长孙稚说："您的计策很是高明，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今山西夏县禹王城）。宗正珍孙守虞坂（今山西平陆东北），不能进兵，我军如何可往？"杨侃说："宗正珍孙不过是一行伍勇夫，凭关系充任将领，但可为人使，怎能使人？河东郡治在蒲坂，西近河岸，辖境大部地区在郡城以东。薛修义驱率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全都留在旧村，一旦闻知官兵到来，必有内顾之忧，将望风自溃。"长孙稚点头称是，于是让儿子长孙彦与杨侃率骑兵自恒农北渡，占据石锥壁。扬言说："今官军停驻此地，等待步兵，并且观察民情向背。凡是将降人名单送给官军的村民，须各还本村，待台军燃起三堆烽火，当也燃火响应，不燃火响应者，便是贼党，屠戮全家，没收全部家产赏军。"村民纷纷扬扬，相互转告，那些未降义军的家属，也诈举烽火，一夜之间，火光遍及数百里。围城的义军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各自散归。薛修义也逃走了，后又与薛凤贤一起投降了官军。不久，长孙稚克潼关，遂又入河东。

萧宝夤遣其将候终德击毛遐。这时，郭子恢等人屡屡被魏军打败，终德因兵势受挫，还军袭击萧宝夤，到了白门，宝夤才发觉，仓皇迎战终德。宝夤败，于是携带妻子南阳公主及小儿子，率部下百余骑从后门逃出，投奔了万俟丑奴，丑奴任命宝夤为太

缚。

七月，万俟丑奴自称天子。这时，波斯国送狮子给北魏朝廷，被丑奴中途拦截，因改年号为神兽。

永安二年九月，万俟丑奴发兵攻克东秦州，杀刺史高子朗。

永安三年正月，万俟丑奴转战关中，攻克郡县。魏尔朱荣派武卫将军贺拔岳镇压，岳私下对其兄贺拔胜说："万俟丑奴是一劲敌，今攻之不胜固然有罪，胜了，又将遭到别人的谗毁妒嫉。"胜说："这如何是好？"岳说："请朝廷派尔朱氏一人为帅，吾等辅佐。"贺拔胜替岳转告尔朱荣，尔朱荣很是高兴，于是以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人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一并为尔朱天光副佐，共同督师镇压关陇起义。

尔朱天光出发，尔朱荣只给了他一千人的步卒，让他沿途征发民马。在西进途中，天光遭到赤水蜀民起义军的袭击，待至潼关，不敢进。贺拔岳说："蜀民鼠窃，帅公这样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说："今日之事，全都委托您了。"贺拔岳遂移军渭水北岸，进击蜀民义军。胜，获马二千匹，又挑选壮健义军士卒编入官军。加上税取洛阳以西州郡民马，尔朱天光共有战马一万多匹。天光仍因兵力不足，淹留不进。尔朱荣十分生气，派骑兵参军刘贵乘驿传快马驰至军中，严责天光，杖打一百，又调配给他三千名兵士。

过了两天，丑奴自率义军围岐州，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体自武功南渡渭水，攻围官军营寨，尔朱天光使贺拔岳率兵千骑救援。这时菩萨已拔寨而还，贺拔岳纵兵杀掠义军士民，向尉迟菩萨挑战。菩萨率步骑一万至渭水北岸，贺拔岳以轻骑数十自渭水南岸向菩萨喊话，称扬国威。菩萨让手下省事传话，贺拔岳怒气冲冲，喝道："我与菩萨对话，你是何人？"边说边张弓搭箭，将其射杀。第二天，贺拔岳又引百余骑隔水与菩萨对话，

然后稍引兵向东，到水浅可涉的地方，贺拔岳立即驰马向东奔走，义军以为贺拔岳撤退，丢下步兵，轻骑南渡渭水，追击。贺拔岳依横岗设伏兵以待。义兵半渡岗东，贺拔岳还兵奋击，义军败走。岳下令说："凡下马者勿杀!"义军士兵一个个落马，官军顷刻俘获三千人，马也无遗，遂擒菩萨，又乘胜渡过渭水，降俘义军步卒一万多人，并收其辎重。万俟丑奴闻知义军兵败渭水，恐不自安，弃岐州奔走安定，在平亭扎下营寨。这时，尔朱天光才从雍州到了岐州，与贺拔岳会师。

四月，尔朱天光在汧、渭两水之间，停军牧马，派人四处宣扬："天时将热，不便行师，待至秋凉，再图进止。"丑奴探知，信以为真，分散部众，耕于细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进率兵五千人，据险立寨，其余的小股部队也都主寨自保。尔朱天光得知丑奴兵力分散，至黄昏时，密严诸军，相继进发。次日黎明，包围了侯伏侯元进的大寨，顷刻克拔，所得俘囚，全都遣散。其他诸寨闻知，也都投降了官军。天光昼夜奋击，直抵安定城下，丑奴泾州刺史侯几长贵以城降。丑奴弃平亭逃走，欲奔高平，天光遣贺拔岳轻骑追击，及于平凉。义军队伍不整，直阁代郡人侯莫陈崇单骑入丑奴军中，于马上生擒丑奴，高声大呼："吾已生擒丑奴，尔等还不快降!"众皆披靡，没有敢抵当的。不久，大部骑兵赶到，义军崩溃，官军遂大获全胜。尔朱天光又进逼高平，城中守军缚执萧宝夤送天光，以城降。尔朱天光将万俟丑奴、萧宝夤押赴洛阳，以囚笼囚禁，放置在阊阖门外都市之中，让京城士女围观三天，然后将宝夤赐死在驼牛署，斩丑奴于都市。

万俟丑奴起义失败后，自泾、豳以西到灵州，义军各部迫于官兵威势，大多投降了北魏。只有丑奴所署行台万俟道洛率众六千逃入山中，坚持斗争。这时，高平大旱，尔朱天光因战马缺乏草料，退屯城东五十里，遣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镇守高平城。道洛暗中联络城民为内应，掩袭长孙邪利，尽杀其部

众。尔朱天光率诸军奔赴高平，道洛出战失利，率其众西入牵屯山，据险自守。尔朱荣因天光损折长孙邪利，又没有擒道洛，复派人杖打一百，借诏书的名义，黜他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降爵为侯。

尔朱天光追击万俟道洛，进军牵屯山，道洛败走，入陇关，投奔了略阳义军首领王庆云。道洛骁勇善战，庆云得道洛，十分高兴，自谓大事可济，遂称帝于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为大将军。

七月，尔朱天光率诸军入陇，至水洛城，庆云、道洛出战，天光拍马来到阵前，张弓搭箭，射中道洛胳臂，麾兵攻拔义军东城，义军尽奔西城。城中无水，士兵干渴难忍，一些人投降了官军，庆云、道洛也因缺水准备突围计划，降卒把他们的突围计划泄漏给尔朱天光。天光恐怕道洛逃掉，派人召谕庆云，让他早日投降，说："如若不能自决，可听从手下诸人意见，今夜可共同商议，限明晨早些报告。"庆云等希望乘夜突围，因让来使回去禀报天光"请等明日"。天光知道义军缺水，于是将军队稍退，让出一段涧水，让义军士卒取饮。义军十分高兴，喝足了水，却动摇了突围的决心。天光密使军士多制木枪，各长七尺，黄昏时刻，绕城布列，主要通道加厚，又设伏于枪林中，准备冲突。又密令绑扎长梯于城北，作强攻准备。夜里，庆云、道洛果然驰马突围，遇枪刺，两人的坐骑受伤倒地，伏兵突起，即刻被擒拿下。军士攀梯入城，义军转身奔城南，遇枪刺而止，走投无路，纷纷投降。至天亮，尔朱天光尽收义军兵杖，将手无寸铁的降卒分别集中在几处，转歼坑杀，死者有一万七千人，还将义军将士妻女家口全都充作奴婢，分赐诸将。关陇起义在尔朱氏的残酷血醒镇压下失败了。但关陇胡汉民众并没有屈服于尔朱契胡的淫威。此后不久，秦州城民复相聚，谋杀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也起来谋杀刺史辛显。由于起义组织得不够严密，事先被骆超、辛

显发觉，二人相继逃到尔朱天光军中，尔朱天光发兵镇压了这两次小规模的城民暴动。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肃宗纪》、《尔朱天光传》、《萧宝夤等传》

《北史》：《肃宗纪》、《尔朱天光传》

《通鉴纪事本史·六镇之叛》

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

肇、忠擅权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六月，宣武帝元恪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并将她的神牌供奉在高祖孝文帝的庙堂内，为她增修坟茔，号为终宁陵。追赠高氏的父亲高扬为勃海公，谥号为敬。让他的嫡孙高猛袭封了勃海公的爵位，封文昭皇后的哥哥高肇为平原公，肇的弟弟高显为澄城公。高家三人在同一天受封，魏帝元恪从来没见过诸位舅舅的面，赐给他们衣服头帻，让人引人宫内。三人见了魏帝，一个个张皇失措。仅几天的时间，高氏兄弟叔侄全都赫然富贵。

北魏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元恪这时才16岁，不能亲自决断朝廷事务，把朝政委任身边的人。于是幸臣茹皓和赵郡的王仲兴、赵修、上谷的寇猛、南阳的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开始处理朝中的事务，国家大权落人了幸臣和外戚的手中。

景明三年十二月，北魏的陈留公主守寡在家，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张彝都想娶公主为妻。公主应允了张彝，没有答应高肇。肇恼羞成怒，在魏帝面前谗毁张彝，彝遭到贬斥，沉废了许多年。

景明四年十一月，魏帝把高肇哥哥高偃的女儿纳进皇宫，封为贵嫔。

正始元年（504），魏冠军将军茹皓，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受到宣武帝的宠信，常在魏帝左右，掌管门下奏事，弄权纳贿，朝野都很怕他。北海王元详依附于茹皓，皓娶尚书令高肇的堂妹为

妻，皓妻的姐姐又是元详从父安定王元燮的妃子。元详与自己的庶母有奸情，由于高氏姐妹的姻亲裙带和私情关系，元详与茹皓益力相昵狎。直阁将军刘胄原本是元详引荐的人，殿中将军常季贤因善于喂养马匹，陈扫静是专门给皇帝梳头的，因都得幸于皇帝，他们在朝中与茹皓互为表里，卖弄权势。

高肇本是高丽人，当时的社会名流都瞧不起他。魏帝罢黜了六辅的官职，又杀了咸阳王元禧，尽将朝政委任给高肇。肇因在朝中亲族太少，于是邀结朋党。依附他的人，旬月之间连连破格提拔，不顺从的人则以大罪受到陷害。肇特别忌恨北魏诸王，由于元详的职位比他高，欲除掉他，在魏帝面前诬告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相互勾结，谋为逆乱。四月的一天夜里，魏帝把中尉崔光秘密召进皇宫，嘱他具状弹奏元详贪淫奢纵，与茹皓等四人怙权贪横等罪行。随即派兵逮捕了茹皓等人，并把他们囚禁在洛京的南台，又派虎贲卫士百名包围了元详的住宅。魏帝又怕元详惊惧逃走，派了左右宠信郭翼打开金墉门，飞驰至元详家中，宣谕皇帝谕旨，并出示中尉崔光的状纸。元详说："看了中尉的弹纠，我还有什么忧虑呢？现在正恐怕有更大的罪祸降临我身上。别人给我的礼物，实际上我也接受了。"经过当朝对质，有关部门奏请处罪茹皓等，魏帝下诏赐死了他们。

魏帝又召高阳王元雍等五位王公议定元详的罪行。元详被单车乘载，监护至华林园，母亲、妻子随行，身边仅有小奴弱婢数人服侍。周围士卫严守，内外不通。五月，魏帝元恪下诏赦免元详死罪，贬为庶人。不久，又将元详迁至太府寺，围禁更加严密，母亲被遣还南第，只允许他们每隔五日会一次面。后来，元详暴卒，皇帝下诏书让有关部门按照王公的礼仪殡葬。

茹皓等人用事专权，曾得汉族士人的反对，他们借禽畜畸形怪胎不断出现，劝皇帝勿用小人。先前，典事史元显向朝廷献上了一只长有四翼四足的鸡雏。皇帝诏问崔光这是怎么回事，崔光

上表说："汉元帝初元年间，丞相府史家的母鸡孵育小鸡，后来这只母鸡渐渐变成了公鸡，长出鸡冠，又打鸣报晓。永光年间，又有人向朝廷献上了一只长角的公鸡。刘向认为：'鸡是一种小家禽，能为人们报晓，告诉人们何时起居。这是小人主事理政的征兆。'竟宁元年，石显伏诛，这就是一个例子。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内一只母鸡身子变成了公鸡的模样，而头冠没有变，皇帝诏问议郎蔡邕。邕回答说：'头为元首，是人君的象征。现在鸡的身子变了，还变到头上，而且长在头上的眼睛能够发现身子的变化，这是将要发生变乱但不能成功的征兆。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政无所改，头冠也发生变化，那样祸患就愈酿愈大了。'从此以后，黄巾军骤起四方，天下沸荡。现在这只怪鸡虽然与汉代不同，而感应变化颇相类似，着实可怕。臣从刘向、蔡邕的言论推断，翼足众多，也是群下相互扇动的征兆，幼雏未大，足羽还小，也是其势力尚犹微弱，容易制服。臣听说灾异的出现都能显示吉凶，若遇开明的君主，及时补救，则能逢凶化吉，碰上昏庸的君主，视而不见，则凶祸临头。也许现在朝中可能有卑贱的人居位权贵，干预政事，是不是像前世的石显那样呢？愿陛下您提拔显能的人，罢黜奸佞小人。这样，妖邪之气就会弭灭，福庆则将来集了。"几天之后，茹皓等人伏诛，魏帝元恪认为崔光有远见，更加器重他。

茹皓、元详等人被除掉，高肇在朝中更加得势。为了严加控制北魏王公，使他们就范，高肇劝皇帝使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监护诸位王公的府第，但遭到彭城王元勰的竭力反对，未能如愿。

正始三年（506），魏帝元恪把朝政委任给了高肇，他与宗室的关系越来越疏薄了。又喜好上了桑门之法，不再亲理政事。

正始四年，高贵嫔受到魏帝元恪的宠爱，而高氏性情妒嫉，高肇又势倾内外，父女二人相互勾结，专横于朝野上下。这年，皇后突然病死，内外议论纷纷，传扬皇后的死是高氏的陷害。由

于宫禁内的事蹊跷神秘，究竟如何，谁也说不清楚。

北魏永平元年（508）三月，魏皇子元昌病了，侍御师王显在为元昌治疗时，出了事故，把药用错了，元昌病死。社会上纷纷传说是王显秉承高肇的主意，把元昌害死了。

七月，魏立高贵嫔为皇后，尚书令高肇更加贵重用事。肇多次更变先朝旧制，减削官吏的封秩，压制贬废有功勋的人，因此惹得众人怨声载道。群臣宗室全都巴结高肇，只有度支尚书元匡与高肇抗衡。元匡预先抬了一口棺材，放置在厅堂上，打算用车拉着棺材到皇殿上揭露高肇的罪恶，并准备自杀以死谏。高肇听说这事，十分恼恨他。有一次殿前议政，元匡与太常刘芳议权论事，高肇赞同刘芳的意见，元匡遂与高肇争吵起来，上表斥责高肇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弹奏元匡诬毁宰相，有关部门判处元匡死刑，皇帝诏免死罪，降职为光禄大夫。

初，魏帝元恪为京兆王元愉纳于皇后的妹妹为王妃，元愉不喜欢于妃，而爱恋小妾李氏，生子名叫宝月。于皇后把李氏捶了一顿。元愉性情骄奢贪纵，多有不法行为。魏帝把他召到宫中，立案处罚，杖打五十，让他外任冀州刺史。元愉认为自己年长而官位还不及二弟，怀恨在心。而且又与爱妾李氏常常遭到捶杖羞辱，高肇几次在皇帝面前说元愉兄弟的坏话，元愉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杀了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诈称得清河王元怿的密书，说："高肇纂逆，杀了皇帝。"于是筑天坛于信都城（今河北冀县）南，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平，封立爱妾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反对元愉称帝，元愉派人把他杀了。冀州以北的州镇都怀疑北魏朝廷发生了政变，定州刺史、安乐王元诠把冀州变乱的实情公诸于众，这才安定了人心。这时，北魏朝廷以尚书李平任都督北讨诸军，行冀州事，率兵讨伐元愉。平是李崇从父的弟弟。

魏高贵嫔被封立为皇后时，彭城王元勰坚决反对，一再谏

阻，元恪不听。高肇因此恨上了元勰，几次在魏帝元恪面前谮毁元勰。当京兆王元愉在冀州称帝时，协迫元勰的舅舅、长东太守潘僧固一同起来反对洛阳朝廷。高肇借机诬谄元勰北与元愉通谋，又南招蛮人变乱。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望得到高肇的提拔，加油添醋，捏造事实。肇让侍中元晖奏告魏帝元恪，遭到拒绝。又令左卫元珍上奏。魏帝召见元晖，案验事实，元晖说："彭城王不会这样做事。"魏帝又问高肇，肇把魏偃、高祖珍召来作证人，这才相信了高肇的鬼话。一天，魏帝召元勰和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还有高肇等一起入宫饮宴。元勰因妃李氏正在分娩，固辞不去赴宴。宫内的差使接连不断来召，不得已与李氏诀别，登车进宫，穿过东掖门，过小桥时，驾车的牛不肯走，无论怎么驱赶，总是使劲地往后缩，耽搁了多时，这时又有使者催召，还责备元勰蹒跚来迟，命令把牛卸了，让人挽车。宫中的宴饮直至夜分，一个个酩酊大醉，各自到别处休息去了。不一会儿，元珍带着数名武士，端着毒酒来到元勰面前要赐死他。元勰说："我没有罪！为何赐死我？我要见皇上问个明白，就是死了也无悔恨。"元珍说："皇上还能再见你吗？"勰说："皇上圣明，不应该无辜杀我，求求您，让我与原告当面对对曲直。"武士用刀环揍元勰的项背，勰大声喊叫起来："冤呀！皇天呀！我为朝廷尽忠却被杀害。"武士又揍他，元勰遭逼不过，刚要低头去饮毒酒，武士趁势握住酒壶，将毒酒猛灌下去，害死了元勰。等到第二天早上，皇宫派人用被褥将元勰的尸体裹起来，装到车上拉回他的家。说："彭城王因饮酒过量死了。"李妃嚎啕大哭，喊叫道："高肇枉理杀人，上天有灵，你怎得好死！"魏帝在东堂为元勰举哀，赠封官爵，葬礼也非常优厚。满朝上下，没有不哀声叹气的，连行路的仕女见此惨状，也都流下了眼泪，说："高令公枉杀了贤王。"从此，朝廷内外更加厌恶高肇。

京兆王元愉不能固守信都，放火烧了城门，带着妻子及四个孩子弃城逃走。李平入信都，斩元愉所置冀州牧韦超等，派统军叔孙头追缚元愉回信都，并奏报朝廷，听候发落。群臣请求诛元愉，魏帝不许，命将他锁送洛阳，用家法罚治他的罪过，囚车行至野王时，高肇暗中派人把元愉杀了。元愉的孩子们到了洛阳，魏帝全都赦免了他们。

魏帝想杀掉元愉的妻子李氏，中书令崔光谏阻说："李氏怀有身孕，刳胎的酷刑是桀、纣的行为，请求待她分娩后，再施刑法。"元恪应允了。

李平逮捕了元愉余党一千多人，准备将这些人全部杀掉。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人都是协从，先前已经许诺赦免了他们，应该说到做到。"平应从了，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朝廷因李平讨伐元愉有功，又给加官为散骑常侍。但高肇和中尉王显向来讨厌他，王显弹劾李平在冀州私自截留官口，高肇奏请朝廷免了李平的官职。

北魏延昌元年（512），元恪任命高肇为司徒，清河王元怿为司空，广平王元怀进号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肇虽位居三司的要职，仍不满足，脸色神态怏怏不乐，还常常发泄牢骚，朝臣见了，一个个嗤之以鼻。尚书右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向来以方直自励。高肇作了司徒后，绰出入高家，送迎来往，而封轨竟不迈高家门坎。高绰见封轨不趋炎附势，颇觉惭愧，于是离高家而去，叹道："我平生自谓不失规矩，今日举措，远不如封生呀！"高绰是高允的孙子，封轨是封懿本家的孙子，二人是世家大族的后裔。

清河王元怿有些才学，名气很大。他从彭城王元勰的杀身之祸中，察觉到高肇的不轨。一次，他陪元恪饮宴，席间，对高肇说："天子兄弟能有几人，而被你翦除殆尽。过莽不过是位秃头，仗着皇后女儿，以国丈的身份，篡夺汉室。今君也只是位罗锅，

恐终将以外戚构权，酿成祸乱。”赶上大旱天灾，高肇私自释放囚徒，想借此收揽众心。元怿对魏帝说：“过去季氏旅于泰山，遭到孔子的痛斥，诚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渐，不可乱来。减膳、释囚，都是陛下您的事，现在司徒做了，这难道是人臣的本份吗？开明的君主失之于上，奸臣就会窃之于下，祸乱的根茎，就在这里呀。”宣武帝元恪笑笑，但不听他的。

延昌四年（515），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死了，太子元诩即位。当初，高肇擅权，特别忌讳宗室中有威望的人，太子太保任城王元澄几次遭到高肇的谮毁，恐自身难保，于是终日酣饮，佯装痴狂，朝廷机要从不干预。等到世宗死后，高肇拥兵于外，朝野上下惶恐不安。领军将军于忠与门下商议，认为“肃宗年幼，还不能亲理政事，应使太保高阳王元雍移居宫中西柏堂办公，处理朝廷事务，让任城王元澄提任尚书令，代朝廷掌管国家所有军政大事。”当下奏明皇后，当即请求下旨施行。王显向来受到世宗的宠信，靠着皇帝的恩宠作威作福，受到世人的痛恨。他盘算着元雍、元澄执政，恐怕容不得他，于是与中常侍孙伏连密谋把门下的书奏搁置起来，并假造皇后的手谕，使高肇录尚书事，自己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听说这事，借口王显在宫中侍护皇帝治病没有疗效，逮捕了他，并让皇帝下诏罢免了他的官爵。武士动手绑缚王显时，显一边反抗一边大喊：“冤呀！”直阁卫士用刀环撞击他的胳臂窝，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右卫府，当夜就死去了。后来，皇帝下诏，让元雍、元澄掌管朝政。

二月，魏帝元诩把世宗元恪的死事告诉了高肇，让他回洛京奔丧。高肇听到世宗去世、宫中政变的消息，十分忧惧，朝夕哭泣，面容憔悴。匆匆忙忙备车回洛阳，途至洛阳附近的瀍涧，家人迎接，他不肯见，直奔殿阙，披麻带孝，嚎啕大哭，又一步一趋上了太极殿，在世宗的灵堂前痛哭了一场。高阳王元雍与于忠密谋，在舍下省周围设下伏兵，等高肇哭罢，被人搀扶至西

原，清河王等王公看着高肇入舍下省，窃窃私语，互使眼色，众伏兵一跃而起，把高肇活活勒死了。为了稳定众心，魏帝元诩当即下诏，昭示高肇罪恶，称高肇畏罪自杀了。并下令罪止高肇一人，其亲党皆赦免不问，并削除高肇的官爵，按士大夫的礼仪举行葬事。等到天黑，从宫中的侧门把高肇的尸体送回家。

此后，于忠官居宫庭门下的职位，总掌宿卫禁军，遂专制朝政，权倾一时。

魏尚书裴植，自谓入门在王肃之前，而朝廷却不重用他，常常郁闷不乐，上表皇帝，请求解官隐居嵩山，魏帝元诩不同意，还把他责怪了一顿。等他作了尚书的官职，盛气凌人，见人就说："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逢朝议，喜好当面讥毁群官，又写信给征南将军田益宗说："华夷不同类，夷类的职位不应在百世衣冠世族之上。"于忠、元昭听了这话，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自已认为是东宫太子的老师，巴望着封候、仪同。魏帝让郭祚任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郭祚与裴植都讨厌于忠专横，暗中劝高阳王元雍把于忠排挤出朝廷，让他到外地州镇任官。于忠知道了这事，大怒，使有关部门捏造罪名，陷害他们二人。尚书奏道："羊祉告裴植表弟皇甫仲达，说'受植利用，诈称被诏，率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仲达拒不交待，然众证明明白白，按律当死。众证虽不曾提及裴植，都说'仲达为植所使'。裴植本应与仲达同处死刑，但他能亲率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量罪减刑，请求朝廷裁处。"于忠假造诏书说："凶逆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不得上议，应立即处死。"八月，裴植、郭祚与都水使者杜陵、韦儁都被赐死。韦儁是郭祚的儿女亲家。于忠又欲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固执不从，于是罢免了元雍的官职，仅保留了 -个王

爵，让他回家去了。于忠的霸道，引起朝野愤慨，人人恨之入骨。

不久，魏帝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加仪同三司。他官位升迁，更加威风专断。

自从郭祚等人死后，于忠挟制皇帝下诏，让他执掌朝廷生杀大权，连宗室王公都惧怕他。直到太后亲理朝政，这才解除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宫卫尉的头衔，仅保留仪同三司、尚书令官职。过了十多天，太后召来门下侍官到崇训宫，问道："于忠掌管门下事务，声望如何?"众人回答说："他很不称职。"于是令于忠出任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

初，于忠专制朝政，扬言世宗在世时，曾许诺破格提拔他。太傅元雍等都不敢违抗他，加忠为车骑大将军。忠自称世宗崩卒、肃宗新立之际，有定社稷之功，向朝廷大索封赏；元雍等商议封忠为常山郡公。忠不好意思独吞封赏，又逼朝廷向所有门下官吏赠加封邑。元雍等人不得已，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屡屡上书反对。太后召集公卿举行御前会议，太傅元怿说："先帝仙逝，奉迎新立，侍卫宫省，是臣子的日常职责，不应以此为功。臣等先前的意见，授于忠封邑，正是因为惧怕他的威权，避免他的暴戾行径。如果将功抵过，都不应该封赏，请求朝廷将先前封赏追回。"崔光也将封赏的印绶土地退回，连续上表十多次，太后这才应允了。

高阳王元雍上表弹劾了自己先前的过错，说："臣初入柏堂，见圣上诏旨全都由门下拟定发出，臣下代行君主的权力，深知不可但不能禁止。于忠专权，生杀任意，连我都不能违背。忠还劝皇上下诏杀我，多亏当事人的反对，这才保我不死。我曾想调于忠到外镇任职，不但没有把他剔掉，反而让他罢了我的官。我身为朝廷命官，食受封禄，却辜负了皇上对我的私恩，请求免官回家，听候朝廷发落。"太后没有发落元雍，又因于忠对她曾有保

护之功，没有问他的罪。

北魏熙平元年（516）二月，魏中尉元匡又向太后上表弹劾于忠。说于忠“趁国家遭受大难，专擅朝命，裴植、郭祚等人冤死，宰辅大臣受黜废侮辱。又假造圣旨自封为仪同三司、尚书令，任崇训宫卫尉，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受皇朝厚恩而图谋不轨，应将于忠当众斩戮。请派一名御史，到冀州把他处决了。自去年世宗归天之后，皇太后未亲临朝政之前，诸事不由朝廷决断，而或由门下发出诏书、中书发布的敕令定夺。于忠擅自任命官吏，先前已经得到了恩释，他们的罪行可免，而他们的官爵应全部追夺回来。”太后下令说：“于忠已受到特别的原谅，没有理由再加罪责了，其他的人可按奏书中的意见办。”

四月，北魏胡太后追思于忠的功劳，说：“怎么能以一时的错误，抛弃他先前的功勋。”又封于忠为灵寿县公。

北魏神龟元年（518）三月，魏灵寿武敬公于忠病死。朝政权柄归胡太后，北魏政治并无起色，而且愈益积弱败落。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后妃传》、《外戚传》、《幸臣传》

《北史·后妃传》

《通鉴纪事本末·肇忠用事》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元叉幽后

北魏永平三年（510）三月，魏皇子元诩诞生了，宣武帝元恪下诏，大赦天下。元诩的母亲叫胡充华，是临泾（今甘肃镇原东）人氏，她的父亲胡国珍沿袭祖上作了武始伯。充华刚被选人宫时，因为北魏皇宫有生了皇太子，母亲即被杀死的制度，同伴们都为她祈祷，说："但愿充华生诸王、公主，不要生太子。"充华说："我的想法和别人不同，怎么能顾恋自己的生命而使国家社稷无后继之人呢？"后来，她有了身孕，同伴劝她把胎儿坠掉，她不肯，并暗暗立下誓言，说："若生男孩，排行又是长子，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果然生了元诩。先前，北魏的皇子多未成年就夭亡了，元诩的降生，自然会受到皇室上下小心翼翼的护养，并严格地为他挑选了乳母，娇养在专门的宫室，连皇后、充华都不能接近。

北魏延昌元年（512）十月，宣武帝元恪立皇子元诩为太子，从此废掉了立太子杀其母的旧习。

延昌二年八月，魏帝元恪亲临太子的居处东宫，让中书监崔光作了太子少傅，教元诩读书写字。

延昌四年正月，元恪卧病不起。过了几天，死在了洛阳皇宫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人侯刚迎太子元诩于东宫，即皇帝位。高皇后打算杀了元诩的母亲胡贵嫔，中给事谯郡刘腾把这事偷偷地告诉了侯刚，刚又转告给于忠。忠找崔光商量计策，他们迅速将胡贵

嫔转移到别处，并派亲信武士严加守卫，使她免遭于难。因此，胡贵嫔深深感怀于忠、崔光等四人救命之恩。

二月，元诩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又废高太后为尼，把她赶到了金墉城内的瑶光寺，除非大的节庆事典，平时不得随便入宫。

八月，魏帝元诩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宫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任命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魏江阳王元继的儿子元叉娶胡太后的妹妹为妻，让叉作了通直散骑侍郎，叉的妻子胡氏封新平郡君，仍担任女侍中的官职。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九月，灵太后胡氏始垂帘听政。太后聪颖灵悟，又喜好读书著文，常以一种特制的短箭玩射，能穿中针鼻小孔，朝廷政事也都亲笔批示决断。并提升胡国珍为侍中，封安定公。

北魏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屡屡出入于宗室勋贵的宅第。侍中崔光上表劝阻说："《周礼》有这样的记载：'诸侯非问疾吊丧而随便到臣下的家中走动，这是不严肃庄重的行为。'虽没有提到王后夫人，更说明不得随便出入臣下家门。身为夫人，父母在则可回家省亲，双亲没则可让下属去问候。汉代的上官皇后要废掉昌邑，霍光是皇子的外祖父，又是朝廷宰辅，上官皇后还要隔着武帐朝见群臣，显示男女有别。现在皇室家族子孙繁衍，勋贵的身份越来越多，往来迎请都有了一定的规矩，愿陛下您尽可能少走动，使百姓吏民有所信赖，苍生有所仰悦。"

神龟元年（518）七月，宦官刘腾不学无术，却有一肚子鬼主意，整天琢磨人。胡太后因他有保护的功劳，让他作了侍中、右光禄大夫。刘腾一旦大权在握，便处处干预朝政，收受贿赂，代人求官，许多人靠送礼爬上了高位。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作了定州刺史，因贪纵出了名，被免官，将强取豪夺的财物

珍宝大批大批地运到洛阳家中。太后的诏书说："元琛在定州，除了没有把中山宫搬来，其他的财物无所不致，像这样的人还怎么再任用？"元琛认刘腾作干爹，贿赂给他的金宝有好几万。刘腾在太后那里常为他说话，又任用元琛，使他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等到刘腾病重时，太后想在他活着的时候，满足他的富贵奢望，让腾作了卫将军，加仪同三司。

正光元年（520），太傅侍中、清河王元怿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胡太后看上了这位元氏宗室中的美男子，诱逼元怿与她通奸。元怿又很有才能，辅弼朝廷颇有政绩，喜好文学，礼敬士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名望。侍中领军将军元叉在门下，又统掌禁兵，仗着太后的宠信恣意骄横，贪得无厌。元怿曾依法制裁他，两人从此结下怨仇。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倾内外，吏部巴结他，要提拔他的弟弟为郡守，惹得众人议论纷纷，元怿将吏部的意见压下来，不去转奏朝廷，刘腾也恨上了元怿。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怿举荐他当了通直郎，而他轻浮没有德行，元叉把他召来，让他捏造事实，诬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阴谋叛乱，立元怿为皇帝。元怿因受牵连被逮起来，经过立案侦察，没有叛乱造反的事，又释放了他，宋维因诬陷罪受到刑罚。元叉对太后说："现在杀了宋维，以后一旦真的发生了叛乱，谁还敢再报告呢？"于是宋维被降职为昌平郡守。

元叉觉得元怿终究是自己的祸害，与刘腾合伙密谋除掉他，让管理皇帝膳食的中黄门胡定告知魏帝元诩，说："元怿买通胡定，让定在膳食中投毒，想毒死皇帝。事情成功之后，元怿得皇帝位，许给定富贵。"元诩这时才 11 岁，相信了胡定的鬼话。七月，太后在后宫嘉福殿，未御前殿。元叉带着皇帝到显阳殿，刘腾关闭了后宫的永巷门，使太后不能出宫。元怿入宫来，在含章殿后与元叉相遇，元叉厉声高叫，阻止元怿入宫，元怿呵斥道："你想造反呀！"叉回答道："叉不反，等在这里正要缚造反的

人。”喝令宗士及当班的武士上前扭住元怿衣袂，推推搡搡把他押到含章殿东侧庑室内，派人严加看管。刘腾称旨召集公卿百官会议，论述元怿大逆之罪。众人本来就惧怕元叉骄横跋扈，那还敢有什么异意。只有仆射新泰公游肇陈辞抗言，反对杀怿，结果议而未决。

元叉、刘腾又持公卿议人奏小皇帝，又很快出来宣告得皇帝诏可，当夜就杀了元怿。又假造太后诏书，自称身患疾病，还朝政给皇帝。把胡太后幽禁在北宫宣光殿，宫门昼夜紧闭，断绝内外一切联系，刘腾亲自贴身佩带宫门钥匙，连皇帝都不能省见胡氏一面，太后的衣服膳食全被裁撤，饥寒交迫，她长叹道："养虎为患，这是我的报应呀！”元叉使中常侍贾粲陪皇帝念书，让他暗中监视元诩的行动。叉遂与太师高阳王元雍等同辅朝政，帝管叉叫姨父，叉与腾互为表里，专擅朝纲，元叉为外御，刘腾为内防，同掌禁省，共裁刑赏，大小政事都由他们二人决断，威振内外，百僚敢怒不敢言，朝野吏民听说元怿死了，人人丧气，数百胡人装鬼作祟，与元叉等人捣乱。大臣游肇忧愤而卒。

相州刺吏、中山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与弟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纂，平时都受到清河王元怿的厚待，听到元怿被处死的消息，十分愤慨，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起兵，向朝廷上表，诛伐元叉、刘腾。元纂也从洛阳逃到邺，参加兵变。十多天后，长史柳元章等率守城的士兵倒戈，大喊大叫蜂拥人城，活捉了元熙、元纂及其诸子，尽将他们囚禁于府中高楼内。八月，元叉派尚书左丞卢同到邺，斩熙、纂及其诸子于邺街。

元熙喜好文学，相貌长得也漂亮，许多名士和他都有来往。临死前，写信给自己的故友旧知，说："我和弟弟都受到皇太后的知遇，我居大州刺史之任，弟弟在皇宫侍从太后，言行都很殷勤，太后像慈母一样待我们兄弟。现在皇太后被废禁于北宫，太

傅清河王元怿又遭到横祸，皇上年纪幼小，独自居临前殿。君亲有了这样的难处，我心里着实不安，所以率兵民起事，想建树大义于天下。但我的智识短浅，不久即被囚俘，上惭朝廷，下愧朋友。原本想维护我魏朝名义，不得不举事，即使流肠碎首，都没有任何怨言！希望诸位君子，人人都要敬守礼仪，为了国家与个人，保持完美的名节。”人们读了他的信，无不为之怜惜。元熙的头被送到京城洛阳，亲故朋友都不敢看，只有前骁骑将军刁整使人为元熙收尸并掩藏起来。

正光二年（521），元叉、刘腾幽禁胡太后，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了他们的谋划，叉任命康生为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让他掌管宫中的宿卫。康生的儿子难当娶侍中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为妻，侯刚的儿子又是元叉的妹夫，元叉、奚康生、侯刚三人通过联姻抱成一团，完全控制了皇宫的侍卫。康生性情粗鲁，说话嗓门火爆，元叉稍有些怕他，可元叉也不断给康生些颜色看看，使康生畏惧不安。

二月，魏帝朝见太后于西林园，文武官吏两旁侍坐，酒意正酣，又有歌舞助兴。康生表演《力士舞》，转身旋舞之际，每次面冲太后顾视，举手跺脚，两眼圆瞪，头前后摇动，动作似被执杀之状，太后明知他的意思而不敢吭声。朝宴直至傍晚，太后想带着皇帝元诩宿息在宣光殿，侯刚说：“皇上已朝见了太后，应回南宫宿息，何必还要留在这里呢？”康生说：“皇上是太后陛下的儿子，陛下可随意处置，难道还要让谁允准不成！”群臣一个个面带惧色，不敢开口。太后独自起身，拉着皇帝的胳臂下堂走去。康生大呼“万岁！”皇帝走进阁内，左右的侍卫相互拥挤，阁门不能关闭。康生夺过儿子难当佩带的千牛刀，砍死了直后武卫元思辅，这才稳住了秩序。皇帝登临宣光殿，左右侍臣都站立在两侧的台阶下。康生乘着酒势要站出来发落那些捣乱的侍从武士，元叉率众上前缚执了康生，并把他锁在门下省。光禄勋贾粲

想把太后支开，对太后说："侍官惊慌不安，陛下您应该亲自出去安慰一些。"太后信从了他的话，刚下殿来，贾粲就拉着皇帝从殿堂的东门出走了，前行至显阳殿坐下。粲又回身将宣光殿的大门锁闭，使太后不得出。当夜，元叉在宫中，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多人审讯康生，判处康生斩刑，难当绞刑。元叉与侯刚起草了处决诏书。康生斩首，饶恕难当死罪，流放外地。难当哭着向父亲辞行，康生慷慨且无悲色，说："我没有反叛而死，你哭什么呀！"这时，天色漆黑，武士押着康生到洛京街市，斩首。尚食典御奚混因与康生一起持刀入宫，也被绞死。由于难当是侯刚的女婿，得以在京城留住了一百多天，从轻发落，流放到安州（今河北隆化北土城子）。后来，元叉派行台卢同到安州杀了他。

北魏以刘腾为司空，朝中大臣常在早晨到刘腾家，接受其旨意，然后才能到省禁办公。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要取决于礼物的轻重，侵吞国家关税、盐税、商税，霸占丰饶的山泽，克扣六镇的饷粮，欺行霸市，每年得利以亿万计算。还逼夺邻舍，扩展自己的宅居，远近的吏民都遭受了他的苦难。

正光四年（523）三月，刘腾死了。宫内宦官四十多人都是他的干儿子，为他披麻戴孝，身着孝服送葬的有数百人，朝贵送葬的更多，以致塞路蔽野。

孝昌元年（525），早在刘腾死后，对胡太后及魏帝元诩的监守有所放松。元叉也不像以前那么谨慎了，有时外出游历，几天不回，身边的亲信曾多次规劝他节游，他不予理睬。太后发现了元叉的变化，为了麻痹他，当着群臣的面对皇帝说："现在我们母子被分隔在两处，不准来往，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我该出家为尼了，到嵩山闲居寺去修道。"还要让人为她剃发。皇帝和群臣听了，忙都跪下叩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她不要走，太后于是更加声色俱厉，吵闹着要去。从此，皇帝被允许和太后住在一

起，过了几天，遂与太后密谋废黜元叉，但元诩很有心计，不露声色，连太后都有些着急。元诩假惺惺地哭丧着脸对元叉说："太后闹着要出家，我心里十分忧虑，终日坐立不安。"元叉一点也不怀疑，还劝皇帝顺从太后的心意，于是太后数次御临显阳殿，后宫与帝宫的来往不再有什么障碍了。元叉举荐元法僧作徐州刺史，法僧在徐州造反，太后曾几次对元叉说，不应使法僧牧守徐州，元叉十分后愧。

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位居元叉之上，却十分害怕元叉。有一次，太后与皇帝乘舟到洛水上游玩，元雍邀请二人到他家中，设宴款待，宴毕，帝与太后来到元雍的内室，屏退一切侍从，三人相与制定了除掉元叉的计划。太后回到宫中，召见元叉，对他说："元郎如若真的忠于朝廷，没有反心，为什么不辞掉领军的职衔，担任其他的官职辅政呢？"元叉听了，十分恐惧，摘掉头冠跪下，请求解除领军。太后让元叉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明升暗降，解除了他的兵权。

元叉虽丢失了兵权，仍掌管着朝廷内外的政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废黜的道理。胡太后颇满足于元叉的让步，一时还下不了决心除掉他。侍中穆绍劝太后说："时机已成熟，这时不废他，还要等到何时？"宦官张景嵩平时仇恨元叉，乘机到皇帝那里告状，说："元叉要害死潘嫔。"潘氏是魏帝心爱的嫔妃，又哭着向魏帝诉说了元叉欲加害于她的情状，说："叉不但要杀妾身，还想杀死陛下您呀。"元诩信以为真，趁元叉外出的机会，解除了他的侍中职务。第二天早上，元叉回来，要入宫，被守门的卫士拦住，元叉这才知道自己被罢了官。四月，胡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下诏追削刘腾的官爵，将元叉贬官为民。

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朝廷，为元怿诉冤，乞求诛杀元叉等人，说："过去赵高专擅秦朝，激起关东民变兵乱，社会鼎沸。今天元叉独揽魏国，使四方动荡，如乌云翻滚。逆行的肇始，起

于宋维的诬告，祸乱的最后形成，根源在于刘腾。应将刘腾枭首示众，捣毁他的阴宫，斩戮他的党族，昭示他的罪恶。”太后命人掘开刘腾的墓，扔掉他的骨骸，籍没他的家财，尽杀其养子。

元叉被解除领军时，太后因为元叉党羽的势力还很强盛，恐一时难能制服，于是让侯刚代叉为领军，稳定局势。不久调侯刚外任冀州刺史，加仪同三司。还没有上任，便降职为征虏将军，随即死于洛阳家中。太后想杀掉贾粲，因元叉党羽众多，恐惊动内外，于是将粲调开，让他出任齐州刺史，随即把他杀掉了。只有元叉，因为有妹夫这一层姻亲关系，一直没有忍心下手。

先前，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性情刚直，违背了元叉的心意，被排挤出朝廷，外任齐州刺史。元叉权势倒台后，太后把他征还，提任侍中。有一次，他陪太后坐，元叉的妻子在太后身旁，元顺用手指着元叉的妻子对太后说："陛下怎么能因一妹妹的缘故，不正元叉的罪恶，让天下的吏民不能伸雪自己的冤愤。”太后只是嘿嘿一笑了之。过了一些日子，太后从容地对侍臣们说："刘腾、元叉过去曾要挟我给他们铁券，希望得到免死证，多亏我没有给他们。”中书舍人韩子熙说："生杀大事，怎么能单单凭着一枚铁券？况且陛下过去虽曾不予，怎么解释今天的不杀？”太后默然。几天之后，又有人告发元叉和弟弟元爪阴谋诱惑六镇降户反于定州，又招鲁阳诸蛮族部落侵扰伊阙，欲为内应。并把截获的元叉手书交给太后看，太后仍不忍心杀叉。群臣一再要求将叉正法，魏帝也主张治罪。太后这才顺从了大家的意见，派人到元叉、元爪家中对他们兄弟赐死了。还追认元叉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江阳王元继被废黜在家中，直至病死。元叉的党羽、前幽州刺史卢同被免官除名。

太后平时喜欢穿着打扮，几次外出游历，元顺当面劝阻说："仪礼规定，妇人的夫丈死了，自称是未亡人，头不戴珠玉，衣服不能有花纹，陛下以母后的身份君临天下，已经这把年纪了，

还这样过份装饰，怎么能以礼仪刑罚播扬后世呢?”太后满面羞惭，回到宫中，召见元顺，指责他说：“我千里迢迢把你召还至宫，难道是让你当众羞辱我的吗?”元顺回答说：“陛下不怕天下的人笑话，还怕臣下的一句话呀!”

元顺与穆绍同在宫中供职，顺喝醉了酒，来到绍的寝室，绍拥抱着被子坐起来，厉声嚷叫道：“与你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你一旦得势，怎么能这样排挤我呢?”元顺遂卸职回家，朝廷几次诏谕他出来作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元顺这才重返政坛。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皇后传》、《元叉传》、《元顺传》、《恩幸传》

《北史》:《后妃传》、《元叉传》、《恩幸传》

《通鉴纪事本末·元叉幽后》

河阴之变

北魏神龟二年（519）正月，征西将军、平陆侯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向朝廷上书，要求修改品级门第的标准，贬低武人，不许他们进人清流品级，引起武人愤怒。洛阳街头，一群群将士武人喧嚣闹事，还在主要道口张帖布告，约定日期，聚集起来，除掉张氏全家，张彝父子却不以为然。二月，羽林、虎贲近三千人，相率来到尚书省门前，破口大骂，要求逮捕仲瑀哥哥张始均，没有达到目的。众人怒不可遏，拣起砖瓦石块猛砸尚书省的大门，又放火焚烧街道两旁的荒草，以杖石为兵器，吵吵嚷嚷，直奔张氏的家宅，把张彝揪下殿堂的台阶，一顿拳打脚踢，连呼带喊，烧了张家的府舍。事情越闹越大，连朝廷都不敢禁止。始均跳墙逃走，复又回来向武人跪下，求饶他父亲活命。众人一拥而上，朝始均乱打一通，然后抬起来，把他扔到火中活活烧死，仲瑀受了重伤，逃脱了。张彝被打得奄奄一息，第二天就死了。这一件事震动了洛阳城，事后，胡太后下令捕杀了八名首犯，因怕触犯大多数的武人，宽赦了其他所有从犯，并向武人让步，规定武人也可按资格入选清品，从此，北魏朝廷越来越软弱无能了。

同时，地方豪强的势力越来越大。如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气度深沉，心怀大志，家境贫寒，曾在平城服役，被富家的女儿娄氏看中，召为门婿。他这才有了自己的马，得以成为北镇的函使。有一次，高欢送信到洛阳，亲眼看见张彝被打死。略有所悟，回到家，变卖家产，结纳豪强。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

"皇宫的宿卫武士相率烧了大臣的宅第，朝廷害怕骚乱而不敢过问，为政如此，事理也十分明白，财物难道能常守吗?"高欢与云中司马子如、秀容刘贵、中山贾显智、咸阳孙腾、怀朔侯景、善无尉景、广宁蔡隽等人特别相友好，并以任侠仗义，称雄于乡里。

正光五年（524），契胡羽健的玄孙、秀容酋长尔朱荣阴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显智的哥哥）、段荣、窦泰等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孝昌元年（525），先前，郑俨任司徒胡国珍的行参军，暗中与胡太后有奸情来往，没有引起人们的知觉。萧宝寅西征，任命郑俨为开府一类的官职。胡太后再度听政，把郑俨召回，留在宫中，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掌管太后的衣食起居，昼夜在禁宫服侍太后。太后洗浴，常常让他跟随。郑俨回家见到自己的妻子，尽谈论些家务琐事，而无夫妻生活。中书舍人徐纥粗通文学，曾先后媚事赵修、清河王元怿、权臣元叉，因卷人朝廷权争，几起几落，很会见风使舵，他看到郑俨得势，又千方百计巴结郑俨，俨也因徐纥有些小聪明，视他为谋主。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把持朝廷内外，号称"徐、郑"。郑俨连升为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累至给事黄门侍郎，仍领舍人，总摄中书、门下的事务，军国诏令都是由他手中发出。徐纥十分机智，能言善辩，精力充沛，整天忙于事务，很少休息，并不感到疲劳。有时朝廷发出紧急诏命，他让数人执笔，自己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同时口授数事，众笔吏一齐挥毫俱成，诏令文告条理有序。他虽有些才气，但不懂治国的大道理，专好耍些小手腕，装作一副老实的样子，笼络人心，许多人都投靠在他的门下。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曾任中书舍人，受到胡太后的信任。当时，人们传扬神轨也和太后有奸情，皇宫里的事，笼罩着一层神秘，究竟有无这种丑事，谁也说不清楚。

永安元年（528）二月，北魏灵太后胡氏再度亲政以后，阉宦用事，朝政废弛，威恩不立，四方变乱环生。魏肃宗逐渐长大，胡太后恐怕自己的淫乱丑事被皇帝知道，把皇帝左右亲信的人一一清除掉，不让皇帝知道外面的事。通直散骑常侍谷士恢曾受皇帝宠信，魏帝让他掌管左右侍从。太后屡次劝皇帝调士恢外任州刺史，士恢自恃受皇帝宠爱，不愿出外，胡太后借故杀了他。还有一位密多道人，会说鲜卑语，皇帝常让他在身边做事，太后派人在洛阳城南暗杀了他。从此，母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

这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连朝廷都怕他三分。高欢、段荣、尉景、蔡儁曾投奔杜洛周，后来又合谋企图杀死洛周，事败逃走，投奔了葛荣。葛荣起义失败，又归附了尔朱荣。高欢的好友刘贵先附尔朱荣，屡次向尔朱荣举荐高欢。尔朱荣见高欢面目憔悴，并不觉得他有什么惊人之处，没有重用他。一天，高欢随尔朱荣到马厩去，厩里有一匹烈马，尔朱荣命高欢制服。高欢不使羁绊，顺势跨上马背，两腿死死夹牢，烈马服服贴贴，也不踢蹄嘶咬。他于马上对尔朱荣说：“降服恶人也是这样的。”尔朱荣觉得他言语不凡，让高欢坐在床上，屏退左右，征求他对时事的看法。高欢说：“听说您的马有十二山谷那么多，按毛色分成群，牧养这么多马有何用呀！”尔朱荣说：“尽管说说您的意见。”高欢说：“今朝皇上愚昧懦弱，太后淫乱，阉宦小人专擅诏命，朝政不行。您以雄武著称，当乘时奋发，讨伐郑俨、徐纥罪恶，以清帝侧，霸业便可举鞭而成，这就是贺六浑（高欢的小名）的主张。”尔朱荣十分高兴，两人自中午一直谈论到半夜。从此，尔朱荣每有军事行动，都请高欢参谋。

并州刺史元天穆与尔朱荣关系亲善。尔朱荣尊天穆为兄，常与天穆及帐下督贺拔岳密谋，欲举兵入洛阳，诛杀权宦，二人也

劝尔朱荣及早行动。

尔朱荣向朝廷上书，借口出兵镇压河北流民起义，率兵奔相州（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他说："山东（指太行山以东）群盗气势正盛，冀州、定州覆没，官军屡屡战败，请遣精骑三千东援相州。"胡太后怀疑尔朱荣图谋不轨，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说："北海王元颢率众两万出镇相州，不须出兵。"尔朱荣又上书说："贼势虽衰，官军屡败，人情危惧，北海王的军队实难抵得葛荣。若不另谋方略，恐无以保万全。依臣之愚见，蠕蠕主阿那环受国家厚恩，不应报答，应使他发兵东趋下口（今北京昌平西北居庸关口），击葛荣军之后背，北海王之军加强警备，阻挡葛荣军之前面。臣的军队虽少，只有竭尽全力，自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以北，滏口（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以西，分兵据守险要，攻葛荣的肘腋。葛荣虽火并了杜洛周，但威信还未树立，人各有异志，可以分化瓦解。"于是勒兵，召集义勇，北捍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塞井陉。徐纥劝太后以铁券为信物，离间尔朱荣内部将领。尔朱荣听说后，更加恼恨徐纥。

魏肃宗也厌恶郑俨、徐纥等人，由于太后的威逼，又不敢除掉他们，于是密诏尔朱荣率兵向洛阳，欲借他的兵势威胁太后。尔朱荣以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古驿），魏帝又诏尔朱荣停止进兵。郑俨、徐纥恐祸及自身，暗中与太后谋议鸩杀皇帝。过了几天，皇帝突然暴病身亡。胡太后立皇女为帝，后来又改立元钊为帝，元钊这时才3岁。胡太后想长期执掌朝政，所以才选择了这么一个幼儿。

尔朱荣闻知，大怒，对元天穆说："主上晏驾，年19岁，天下的人仍还称他为幼君，何况现在又抱出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儿来君临天下，天下能得到安治吗？吾要率铁骑到肃宗的陵墓前举哀，翦诛奸佞，改立年长的人为君，您意下如何？"天穆奉承地说："汉代伊、霍二臣辅弼社稷的事，今天又重见了。"于是上表

抗旨，说："大行皇帝背弃国家社稷而去，天下的人都说是因鸩毒致祸。岂有天子不豫，初不召医，贵戚大臣都不在床边侍护，这怎么能不使远近的人感到惊愕呢？又以皇女为继承人，虚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既而又从孩子中间选择君主，实使奸竖专擅朝政，堕乱纲纪，这与掩目捕雀、塞耳盗铃有何区别？今群盗沸腾，邻敌偷视，而想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镇安天下，这也太难了！愿您能允许我入朝，参与大政谋议，向侍臣讨问皇帝死亡的原因，查访禁卫不知事变的情状，逮捕徐纥、郑俨之徒，把他们投入监牢，昭雪天下人的耻辱，平舒远近的怨气。然后改择宗亲继承皇帝宝座。"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这时在朝中任直阁的官职，胡太后派他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慰问尔朱荣，请求他不要动武。尔朱荣想留住世隆。世隆说："朝廷已怀疑兄兴兵，所以派我来为说客。今若留我，必使朝廷有所准备。"尔朱荣这才放他回朝。

三月，尔朱荣与元天穆商议，打算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他派从子尔朱天光及亲信奚毅、仓头王相到洛阳，与尔朱世隆密议。天光又去见子攸，把尔朱荣的心思详细告诉他，子攸答应了尔朱氏的安排。天光等人回晋阳，尔朱荣对皇帝的继承人选犹豫不决，于是采用占卜的方法，用铜为显祖皇帝诸子孙铸像，只有长乐王像成，尔朱荣这才起兵由晋阳出发，世隆逃出洛阳，在上党迎会尔 朱荣。灵太后胡氏闻知，十分恐惧，把王公全都召来商议对策，宗室大臣都忌恨太后的所作所为，一个个闭口默然，徐纥独自上前道："尔朱荣不过是一位小胡，胆敢称兵犯阙，文武宿卫足以制服他。只要据守险要，以逸待劳，而尔朱小胡悬军千里，士马疲惫，破他自有把握。"太后听罢，宽舒了一口气，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众拒敌。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守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县东北黄河上），武卫将军费穆屯守小平津。

尔朱荣到了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后，又派王相悄悄至洛阳，迎取长乐王元子攸。四月，子攸与兄彭城王元劭、弟霸城公元子正在高渚（今河南孟津东）偷渡黄河，到河阳与尔朱荣相会，将士欢呼万岁。不久，尔朱荣挥师渡过黄河，公开拥立子攸为皇帝，以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子攸任命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掌管皇帝左右侍卫，封太原王。

郑先护向来与元子攸关系亲善，听说他当了皇帝，与郑季明开城迎接。费穆弃众投降了尔朱荣。李神轨在河桥，闻知诸将叛变，随即率众逃走了。徐纥假作诏书，在夜里打开殿门，牵取骅骝厩御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也逃往老家去了。胡太后走投无路，召集后宫妃嫔，让她们全都出家，自己也落发为尼。尔朱荣率兵直奔洛阳，召集百官迎接新皇帝，百官捧着皇帝的玺绶，备具御车，迎子攸于河桥。接着，尔朱荣派兵逮捕了胡太后和小皇帝元钊，把他们押送到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尔朱荣数落太后罪行，宣判处她以死刑。太后面对尔朱荣，陈辞申辩，请求他免除死罪。尔朱荣把袍袖一甩，头一扬，起身走去。他手下的壮士一拥而上，将胡太后和小皇帝拿下，捆绑在石头上，沉入黄河淹死了。这就是北魏历史上的“河阴之变”，从此，契胡尔朱氏控制了北魏朝政，契胡集团的残暴统治使北魏政治更加黑暗，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正一步步走向灭亡。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

《北史》

《通鉴纪事本末·元魏之乱》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尔朱荣作孽遭诛

“河阴之变”以后，尔朱荣更加丧心病狂，滥杀无辜。费穆私下对他说：“您士马不过万人，今长驱人洛，前无横阵阻挡，既然没有战胜者的威望，群情自然难能压服。京师人口众多，官吏成堆，都知道您的老底，有轻侮的心思。若不大行诛罚，另树自己的亲党，恐怕您北归时，过不了太行山，而朝内变乱就要发生了。”尔朱荣会意地点点头，又对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城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若不加铲除，终究难能制服他们。我想趁百官出迎的机会，把他们全都斩尽杀绝，您看如何?”绍宗说：“太后荒淫失道，嬖侍小人弄权，四海混乱，所以明公您才兴义兵清理朝廷，今无故滥杀朝士，不分忠奸，恐大失天下之望，这不是长久之计。”尔朱荣不听，于是携傀儡皇帝元子攸沿黄河西至淘渚，把百官引至行宫西北，扬言要祭天。待百官列队聚集坛下之后，尔朱荣一声令下，契胡骑兵迅速将群臣团团围住。尔朱荣厉声大骂，呵斥百官，将天下丧乱、肃宗死亡的责任，全都归咎于朝臣的贪虐、不能匡弼的结果，因纵兵乱砍乱戮，自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以下死者二千多人，前黄门郎元遵业兄弟因父亲刚刚去世，正在服丧，他的母亲是皇帝元子攸的继母。遵业兄弟闻知子攸到来，相率出迎，尽被契胡兵杀死。遵业又是彗龙的孙子，爽直好学，当时的人都怜惜他的才学而抱怨他的暴躁脾气。尔朱荣尽将百官杀死后，又有朝士一百多人赶来参加祭天仪式，尔朱荣又命契胡骑兵

将朝士围住，下令说“有能写禅让文告的人，可免他不死。”侍御史赵元则出来应募，于是给其纸笔，让他撰写。尔朱荣又令他的士兵齐声高喊：“元氏已灭，尔朱氏兴！”向尔朱荣欢呼万岁。随后，尔朱荣派了十名胡兵手提大刀，扑向行宫，皇帝元子攸与无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俱出帐外。荣先让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人叱烈杀鬼站在子攸身旁，谎称防卫，将子攸抱住推入营帐，其他胡兵上前挥刀杀了元劭、元子正。又派数十名胡兵把子攸迁移至河桥，软禁在中军帐中。

子攸忧愤不堪，却又无计可施，使人捎信给尔朱荣，说：“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敌，这是天意，非人力所致。我原本想投靠在您的门下，保全性命，岂敢妄想称帝？是将军把我逼到这个地步。若天命归于您，您可应时称帝。如果您推辞不就，保留魏朝社稷，也当另择亲贤即帝位，由您辅弼朝政。”这时，都督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左右的人也多赞同高欢的意见，尔朱荣犹豫不决。贺拔岳向他进言，说：“将军首举义兵，志在铲除奸逆，大勋未立，却有如此的打算，正可速召祸灾，不会有什么福运。”尔朱荣只好自铸金人，卜问祸福，前后连铸四次，都不成。功曹参军燕郡人刘灵助会卜筮之术，他对尔朱荣说：“天时、人事未可顺应将军。”荣说“若我不能得到吉卦，应当迎立天穆为帝。”灵助说：“天穆也不吉，只有长乐王占有天命。”尔朱荣精神恍惚，站立不住，良久方醒，深感悔愧，说：“我的过错竟至如此，只有以死谢罪朝廷。”贺拔岳请杀高欢以谢天下，左右的人都说：“高欢虽然一再愚蠢疏忽，说话不负责任。今四方多事，须招揽武将，请饶他一回，观其后效。”尔朱荣这才罢休，至深夜四更，复迎帝元子攸还营。尔朱荣望见子攸的马首，叩头请死。子攸自顾不暇，哪还敢降罪于他。

尔朱荣手下的骑兵因杀朝士太多，不敢入洛阳城，建议把都

城北迁至晋阳。尔朱荣狐疑良久，武卫将军泛礼一再谏阻，迁都的事暂且被搁置起来。尔朱荣奉戴皇帝元子攸入洛阳城，居临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年号建义。这时，百官几乎被杀尽，幸存者全都鼠匿不出，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赴阙朝拜。洛阳城中，大街小巷，全是胡兵，居民人心惶惶，各怀异虑，或传言尔朱荣要纵兵大掠；或声称要迁都晋阳；富者弃宅，贫者携子，纷纷逃窜，城内居民十不存一二。直阁侍卫空虚，官职守令旷废。尔朱荣上书说："大兵混战之际，政令不能整齐划一，诸王朝贵多被戮杀，臣今粉身碎骨都不足以弥补以往的罪过。乞求追赠死亡的人，公开申明过错。无上王请追尊为无上皇帝，其他死于河阴者，诸王赠三司，三品官职的人赠令、仆，五品赠刺史，七品以及无官位的人赠郡、镇，死者无子孙后人，允许近亲过继，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劳问。"子攸下诏允从，于是朝士稍出，人心初安。

尔朱荣仍坚持迁都的意见，皇帝元子攸不敢违抗。都官尚书元谌竭力争辩，认为不可。尔朱荣大怒，喝道："关你屁事！固执阻谏，河阴之事，想必你应知道吧！"元谌大声道："天下事当与天下人议论，怎么以河阴惨杀恐吓元谌！谌是国家的宗室，身居朝官，活着无用，死了又有何损！即使今日碎首流肠，也无所惧。"尔朱荣更是怒不可扼，欲治罪元谌，尔朱世隆固谏，这才饶了元谌。在场的人一个个吓得直哆嗦，而元谌却面不改色，镇静自若。过了几天，皇帝子攸与尔朱荣登高游玩消遣，望见洛阳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于是长叹一声，说："臣昨日愚昧，有北迁之意，今见皇居盛况，熟思元尚书的言论，真不该难为他。"从此罢迁都之议。

五月，魏帝元子攸加尔朱荣北道大行台。尔朱荣入宫，在明光宫朝魏帝，忏悔河桥之事，发誓不再有二心。子攸起身说："不要说了，朕从此对您再不会有疑心了。"尔朱荣十分高兴，向

子攸要酒喝，饮得酩酊大醉。子攸想杀掉他，左右的人苦苦劝阻，这才罢休，即以床輦把他拉到中常侍省。尔朱荣半夜醒来，发现自己一人躺卧宫中，非常惊恐，瞪大双眼，达旦不眠，从此再也不敢在宫禁中留宿。

尔朱荣的女儿先前曾被选人宫中，作了肃宗的嫔。肃宗死，她归属了元子攸。尔朱荣想让子攸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子攸犹豫不决。给事黄门侍郎祖莹说："过去文公在秦，怀嬴入侍，这种事情虽违背经伦，却合乎情义，陛下还有何疑虑？"于是子攸不得不遵从尔朱荣的意见，封立尔朱氏为皇后。

尔朱荣举止十分轻浮，喜欢跑马射箭，每次人朝，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道作上马、下马的游戏。于西林园宴射，执意请皇后出来观看，并召来王公、妃主聚集一堂。每见皇帝射中，辄自起舞，大喊大叫，将相卿士跟着他盘旋，连妃嫔也不得不甩甩袖子助兴。及至酒酣耳热，席地盘坐，演唱契胡歌曲，直到日暮才与左右的人手拉手，跺着脚，唱着《回波乐》回家。尔朱荣性情严酷暴戾，喜怒无常，刁槊弓矢，不离于手，若不高兴，即开杀戒，左右的人总是十分小心谨慎。有一次，他看见两个和尚同骑一匹马，即令两和尚相斗，两人斗至力尽，爬在地上，不能动弹。他让手下的人抓着两个和尚的头相互撞击，直至把两人活活折腾死了才罢休。

不久，尔朱荣回到晋阳，魏帝元子攸在邙阴为他饯行。荣令元天穆人洛阳，加天穆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以行台郎中桑乾人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要官全由其心腹充任。

魏员外散骑常侍高乾，与弟高敖曹、高季式都喜欢任侠使义，与元子攸有旧情。尔朱荣举兵向洛，他们逃奔齐州，闻知河阴之变，遂聚集流民，起兵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屡破州军，子攸让元欣招降他们，以高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

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尔朱荣因高乾兄弟先前曾参与流民起义，指使子攸把他们解官归乡。敖曹等复聚义兵，尔朱荣将其诱捕，拘禁在晋阳。

七月，魏帝子攸加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不久，又以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其子尔朱殊、尔朱义畅都被封王。

永安三年（530）八月，尔朱荣虽居外镇，却遥控朝政，树置亲党，布列魏帝子攸左右，伺察他的动静。元子攸虽受制于尔朱荣，然而能勤政事，朝夕不倦，常常亲览诉讼，办理冤案。尔朱荣闻知，不大高兴。元子攸又与吏部尚书李神儁商议整顿选举，尔朱荣曾向吏部推荐曲阳县令人选，神儁认为荣推荐的人不胜任，另派人任曲阳县令。尔朱荣大怒，随即派他推选的人夺回曲阳县令的官印。神儁十分恐惧，被迫辞职，尔朱荣让尔朱世隆代替神儁掌管吏部选举。尔朱荣又启奏朝廷，派北方胡人充任河南诸州的官吏，魏帝子攸没有允准。太宰入朝面见子攸理论一番，子攸仍不准。天穆威胁说："天柱（指尔朱荣）既有大功，为当朝宰相，如果提出更换天下所有的官吏，恐陛下也不敢违抗。为何启用数人为州官却不行呢？"元子攸脸色一沉，说："天柱若不想作人臣，朕另改用他人。如果他还想保留臣的节操，就没有全部改换天下官吏的道理。"尔朱荣闻知，十分悔恨，说："天子由谁得立？今日竟不听我言。"

尔朱皇后性情妒忌，屡屡与子攸胡搅蛮缠，帝元子攸让尔朱世隆劝说她。她说："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又敢把我怎样。我父本可自作皇帝，现在就是把他元子攸废了，又有何不可。"世隆说："只是自己不为，若自为皇帝，我今日也要封王了。"

魏帝元子攸外逼于尔朱荣，内迫于尔朱皇后，终日怏怏不乐。多亏流民起事，他想借流民的力量牵制尔朱氏。忽有信使向

子攸报告，说关、陇一带流民被平定，他听了，心里并不高兴，于是对尚书令临淮王元彧说："即今天下，本来就没有贼。"元彧见子攸面色不悦，说："臣恐贼平之后，还须圣上多思虑。"子攸怕被别人听出，岔开话头说："对，宁静四方，成就来之不易。"尔朱荣见世道安宁，奏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臣恶其言，将他呵斥一番，解除了他的官职。"实际上是想提醒皇帝子攸再加封他，子攸原本不想加封他，顺势把他夸奖了一番了事。

尔朱荣喜欢狩猎，不论寒冬酷暑，常常带领士卒围捕禽兽，每次狩猎，令士卒整齐划一，遇上险阻，不得退避，如有一只鹿漏逃，就要处死几人。有一士卒见虎而逃，荣对他说："你怕死呀！"即令砍了。因此，士卒围猎就像上战场一样紧张。尔朱荣曾在一条山谷的尽头，看见一只猛虎，即令十几名士兵上前空手捕捉，又不准伤害老虎，数人被虎咬死，终于擒得猛虎。人与虎的搏斗，惊心动魄，尔朱荣一边观看，一边哈哈大笑，感到十分刺激好玩。太宰元天穆客气地对尔朱荣说："大王勋业已盛，四方宁静，唯应修政养民，顺时狩猎，何必在盛夏之季追逐禽兽，伤了天地和气。"尔朱荣把袖子一甩，说："灵太后不能自正，我守人臣常节，推奉天子，葛荣等本都是些奴才，被我擒获。近来受国大恩，不能混一海内，如何谈得上勋业？现在朝士有些宽纵，今秋我要与兄一同勒马，到嵩山校猎，令贪污朝贵，人围搏虎。然后出兵鲁阳（又名鲁关，在今河南南召东北、鲁山西南，为豫、荆间交通要道），历三荆，尽破蛮人诸部，再北征六镇，回军之际，扫平胡汾。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封他为万户侯；如其不降，命数千骑兵渡过长江直接缚取过来。然后与兄奉天子巡视四方，这才可称为勋。今不频猎，兵士懈怠，那还有什么用！"

城阳王元徽的妃子是皇帝元子攸的表妹；侍中李彧是子攸的姐夫。元徽、李彧欲得权宠，恐怕尔朱荣加害自己，劝皇帝除掉

他。帝子攸因河阴之变的教训，也怕尔朱荣终难保全自己，暗中有图谋尔朱荣的心思，于是与元徽、李彧及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密谋杀尔朱荣。

尔朱荣请求入朝，想探视女儿尔朱皇后怀孕情况，元徽等劝帝子攸乘他入朝的机会，刺杀他。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元晖业说："尔朱荣若来，必当有备，恐不可图。"众人又想先杀其党羽，然后发兵拒绝他入朝，元子攸犹豫不决。洛阳朝士听说尔朱荣要来，一个个东躲西藏。武卫将军奚毅曾往来于尔朱荣和元子攸之间传递命令，子攸一直认为他是尔朱荣的亲信，不敢与他谈论真情。他对子攸说："若朝廷有变，臣宁愿为陛下捐躯，不能为契胡干事。"子攸说："朕保天柱（指尔朱荣）无异心，但也不忘您忠心耿耿。"

尔朱世隆怀疑元子攸政变，写了一张匿名小字报贴在门上，说："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人设计，欲杀天柱大将军。"派人揭下送给尔朱荣。尔朱荣自恃兵强，不以为意，把小字报撕成碎片，扔到地上，嚷叫道："呸！世隆胆小鬼，何人敢杀我？"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长公主也劝荣不要入朝，尔朱荣不听。

尔朱荣率四五千骑兵发并州，这时，社会上流行各种传言，有的说尔朱荣反了，有的说皇帝要杀尔朱荣。九月，尔朱荣入洛阳，元子攸想杀他，因元天穆留在并州，故忍耐了一些，派人召天穆入朝，欲一网打尽。有人告诉尔朱荣，说帝子攸想谋害他，荣即将传言上奏子攸。子攸说："外边还传言您要害我，岂能相信？"从此尔朱荣打消了疑虑，每次入朝，仅带数十人随从，又都不带兵仗。子攸愈发犹豫起来，元徽说："纵使他现在不反，也难保以后不会有什么变卦！"同时，尔朱荣的亲信都鼓动他谋篡帝位，行台郎中李显和对荣说："您到洛京，没有九锡的权威，哪有自己去索取的，都怪元子攸不识时务。"都督郭罗察说："正可作皇帝，何止九锡。"参军褚光说："人们说并州城上有紫气，

何虑不应在天柱大将军身上。”尔朱荣的下人一个个盛气凌人，欺辱皇帝左右的人，肆无忌惮，子攸闻知，十分愤恨。

奚毅暗中求见皇帝元子攸，子攸下明光殿与他交谈，他将尔朱荣想趁打猎的机会，裹胁天子迁都的事告诉了子攸。子攸知道他忠诚，于是召来元徽、杨侃、李彧等商量对策。尔朱荣的小女儿是帝子攸的侄子陈留王元宽的妃子，荣曾指着元宽说：“我终当得力于这位门婿。”元徽将这话传给了子攸，说：“尔朱荣恐怕陛下害他，想立未出生的太子为帝，如果皇后生不出太子，则立陈留王元宽。”子攸当夜作了一场恶梦，梦见自己用刀砍掉了自己的十个手指头，第二天醒来，将梦中的事情告诉了元徽、杨侃。元徽说：“蝮蛇咬手，壮士砍断手腕，这与梦中的割指在道理上是一样的，为吉祥征兆。”

元天穆被召至洛阳，帝子攸出宫迎接。尔朱荣与天穆一起随子攸人西林园宴射。尔朱荣奏道：“近来侍官皆不习武，陛下应率五百名骑兵，出去打猎，不要再为诉讼官司费神了。”子攸听罢，想起奚毅先前说的话，心里更加戒备尔朱荣。

帝子攸把中书舍人温子升召来，将捕杀尔朱荣的想法告诉了他，并向他讨教东汉王允是如何杀董卓的，子升将事情本末详细叙述了一遍，当听到王允最后也被杀，说：“王允杀了董卓应马上大赦凉州，否则不至于亡身。”沉默了良久，又对子升说：“朕之情理，您已全知，就是死了也得这样作，况且不一定败死，吾宁愿像魏高贵乡公那样死，不愿像常道乡公那样生。”指出这次政变，只杀尔朱荣、元天穆二人，其余的人不问。应诏王道习说：“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都受到尔朱荣的特别委任，具知天下虚实，不应留其性命。”元徽、杨侃说：“若杀了尔朱世隆，尔朱仲远、尔朱天光就难稳住。”帝子攸点头称是。元徽说：“尔朱荣腰间常佩戴刀子，应防备他狗急跳墙，临事时，愿陛下躲避些。”于是，子攸让杨侃等十多人埋伏在明光殿东。这天，

尔朱荣与元天穆一起入朝，坐下来用餐，席间起身走出，杨侃等人从东阶上殿，这时，尔朱荣与元天穆已走到中庭，杨侃见无下手的机会，只好作罢。

过了两天，尔朱荣入朝，稍待片刻，即退出，到陈留王家饮酒，极醉，病发，数日不入朝。这时帝子攸的计谋有些泄露，尔朱世隆告诉了尔朱荣，劝他快回晋阳，免遭不测。尔朱荣一向轻视子攸，认为他懦弱无能，满不在乎地说："何必这样匆匆?"

元徽、杨侃等人十分恐惧，子攸也忧心重重。元徽说："我们可以托辞太子降生，尔朱荣必然入朝，乘机杀他。"子攸说："皇后怀孕才九个月，行吗?"元徽说："妇女早产的人多了，他必定不会怀疑。"子攸同意了。第二天，子攸于明光殿东厢下设伏兵，声称皇子降生，派元徽骑马飞报尔朱荣。尔朱荣在自家院内与元天穆摔跤。元徽上前摘掉尔朱荣的帽子，手舞足蹈，这时殿内文武齐声欢呼："皇子降生了！皇子降生了!"尔朱荣信以为真，与天穆一起入朝。帝子攸闻知尔朱荣入宫来，胆战心惊，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升凑上前说："陛下脸色变。"子攸连忙取酒急饮，又让子升作敕文。文成，子升手握敕文走出殿庭，迎面遇上尔朱荣。荣问："是何文书?"子升颜色不变，坦然地说："敕!"尔朱荣看也不看，直奔明光殿。魏帝元子攸在殿东序下西向而坐，尔朱荣、元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元徽上殿来，始一拜，以此为暗号召伏兵。尔朱荣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从东门入，起身奔御座躲避，帝子攸先横刀于膝下，随手抄刀猛刺尔朱荣，众人又一起上前乱砍，尔朱荣与元天穆同时俱死刀下。尔朱荣的儿子菩提及车骑将军尔朱阳覩等三十人跟从荣入宫，也全被伏兵杀死。帝子攸得荣手板，板上写有数条奏事，都是有关宫中人事变更的事，尽将其心腹亲信安插在子攸左右。子攸看罢，说："若再过数日，这小子就难制服了。"尔朱荣被杀，朝廷内外欢呼雀跃，震动洛阳城，百僚入朝称贺。帝子攸

登阊阖门，下诏大赦，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率兵镇北中。当天夜里，尔朱世隆奉带北乡长公主率领尔朱荣的部曲焚烧洛阳西阳门，出屯河阴。

卫将军贺拔胜与尔朱氏亲党田怡闻知尔朱荣死，急急忙忙来到荣家，商议对策。田怡主张率众打入宫中，为荣报仇雪恨。贺拔胜制止说："天子既然干出这样的大事，必然有所防备，吾等兵少，不可轻举妄动，不如先出城去，再作其他打算。"田怡只得罢休。元子攸发动政变，事先并没有周密部署，朝廷宫殿诸门不加严防，贺拔胜的劝阻，也使子攸免遭灾难。尔朱世隆出走后，贺拔胜思忖着朝廷还有一定势力，没有依从世隆。以后，他又在子攸的拉拢下，与尔朱荣亲信朱瑞倒向了朝廷一边。契胡酋长尔朱荣专横跋扈，恶贯满盈，终遭杀身之祸。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

《北史》

《通鉴纪事本末·元魏之乱》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高欢起兵灭契胡

北魏永安三年（530），孝庄帝元子攸发动政变，杀死契胡酋长尔朱荣，不但没有消除尔朱氏集团的专横，反而更加激化了契胡集团与元魏统治集团的矛盾，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乱。

尔朱荣死后，他的亲信、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自宫中突出，赶到荣家，弃家随荣的妻子逃出洛阳城。尔朱世隆打算北还晋阳，司马子如说："兵不厌诈，今天下汹汹，唯强是视，当此之际，不可以弱示人，如若北走，恐变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桥，再派出一支兵马攻洛阳，出其不意，也许还能成功。假使不能得手，也能显示一下威势，使天下畏我之强，不敢叛散。"世隆采纳了子如的建议，发兵攻河桥，擒斩奚毅等，据北中城。洛阳朝廷十分恐惶，不但不组织军队御敌，反而派前华阳太守段育去慰问世隆，世隆将段育枭首示众。

孝庄帝元子攸以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以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经略河、汾。又起用高乾、高敖曹兄弟，以高乾为河北大使，敖曹为直阁将军，让他们回冀州召集乡里部曲，接援朝廷，并亲自送他们到黄河边。子攸指着河水说："卿兄弟是冀部豪杰，能令士卒致死效力朝廷，京城如有不测，可为朕在河上扬把尘土以示悼念。"高乾垂涕受诏，高敖曹拔剑起舞，誓死效忠朝廷。

十月，尔朱世隆遣尔朱拂律归率胡骑一千，尽穿白服，来到

洛阳城郭下，索求尔朱荣尸体。孝庄帝元子攸登临大夏门，遣主书牛法尚对拂律归说："尔朱荣阴图大逆，已正刑法。罪在荣一人，余皆不问，你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归说："臣等从太原王（尔朱荣）入朝，太原王奕遭杀害，今不忍心空手而归，愿得太原王尸，生死无恨。"因涕泣，哀不自胜，群胡皆恸哭，声振城邑，子攸也不禁怆然。子攸想笼络尔朱世隆，遣侍中朱瑞赐世隆铁券，世隆对朱瑞说："太原王功盖天地，赤心奉国，长乐王（元子攸）不顾信誓，枉加屠害。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吾为太原王报仇，终无降理。"朱瑞还以告元子攸，子攸出国库中物，放置在城西门外，召募敢死之士，讨伐世隆，一日即得万人，与拂律归等战于郭外。拂律归等都是行伍出身，勇猛善战，而洛阳人不习战斗，屡战不克。子攸又任命李叔仁为大都督，率众讨世隆。又以中书令魏兰根兼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都由兰根节度，用以牵制尔朱世隆。

尔朱氏兵临城下，元子攸召集群臣商议退敌之策，众臣畏惧，不知所措。通直散骑常侍李苗奋衣起身说："今小贼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测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日，臣虽不武，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径断河桥。"元徽、高道穆等都以为善，子攸允从。李苗募众，于夜间由马渚上游顺流而下，距桥数里，纵火船焚河桥。尔朱氏兵在河南岸，望见河桥被烧，争相夺路北渡，顷刻桥断，淹死者不计其数。李苗等约一百人停泊在河中小渚，等待接援，官军不至，尔朱世隆就势掩击，李苗等全部战死。世隆因战事不利，收兵北遁。孝庄帝元子攸诏行台源子恭率步骑一万出西道，杨昱率募士八千人出东道，击世隆。世隆走至建州（治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攻破州城，将城中士民全部斩尽杀绝，唯州刺史陆希质一人逃脱。

汾州刺史尔朱兆闻知尔朱荣被杀，自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率骑据晋阳。世隆至长子（今山西长治东南），尔朱兆率

众迎接。二人回到晋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元晔为皇帝，改年号为建明。以尔朱兆为大将军，封王；世隆为尚书令，封乐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为太尉，赐爵常山王；世隆兄尔朱彦伯为侍中；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徐州大行台。仲远也起兵趋洛阳。

当孝庄帝发动政变时，尔朱荣的从子尔朱天光正在关陇地区镇压宿勤明达领导的胡汉部民起义，攻克了平凉郡（治鹑阴，今甘肃华亭西），宿勤明达逃往东夏州（今陕西延安东延河东岸）。天光得到尔朱荣被杀的消息，悲愤不已，与贺拔岳、侯莫陈悦谋议，决定发兵向洛阳。魏孝庄帝元子攸想劝天光息兵，派朱瑞慰谕天光等。天光、贺拔岳等人想把元子攸赶跑，另立宗室为帝，于是接连上书，说："我等实无异心，只是想到皇上面前，申诉宗门之罪。"又让手下的人上书朝廷说："天光另有阴谋，愿皇上小心提防。"威胁子攸，使他摸不着天光的实情。

范阳太守卢文伟诱平州刺史侯渊出城打猎，闭门拒绝他回城来。侯渊屯驻城南，为尔朱荣举哀，率兵南奔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侯渊，被渊打败。不久，孝庄帝元子攸因兰根战事不利，罢免了他的行台官职，以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

魏帝元子攸以元徽兼大司马、领尚书事，总统内外。元徽原以为尔朱荣已死，树倒猢狲散，没想到尔朱世隆等人率兵四起，党众日盛。他终日忧怖不知所措，又性多嫉妒，眼里容不得人，每次与帝子攸谋议，群臣有献策的人，全被他拒绝。且大言不惭地说："小贼何虑不平。"又吝惜财物，赏赐薄少。若稍多些，还被他从中克扣；有时赏赐不久，又被他追夺；有时又滥加赏赐，财物靡费了许多，而人们并不感恩。

十一月，孝庄帝元子攸以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行台杨昱共讨尔朱仲远。尔朱仲远攻西兖州，破州城，擒刺史王衍。

元子攸以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又以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贺拔胜共讨仲远。先护怀疑贺拔胜有异心，让他屯驻大营之外。贺拔胜在滑台东布阵，迎战尔朱仲远，兵败，投降了仲远。

早在尔朱荣镇压葛荣流民起义时，曾参加流民起义的北镇豪强高欢投靠了尔朱荣。有一次，尔朱荣曾从容地问左右的人，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众人说："尔朱兆。"荣说"兆虽勇于战斗，然所能带兵不过三千骑，多了就会生出变化来。能接替我的，只有贺六浑（高欢小字）一人。"因告诫尔朱兆说："你不能与他相比，终究会让他牵着鼻子走。"于是以高欢为晋州刺史。及尔朱兆引兵向洛阳，遣使召高欢前来助战。高欢派长史孙腾到尔朱兆军营，借口蜀地不稳，拒绝出兵。尔朱兆有点不高兴，对孙腾说："你回去告诉高晋州（高欢），吾夜得吉梦，梦见与先人登上高丘，见遍地稼禾成熟，先人让吾收获，随手而尽。由此看来，吾将无往而不胜。"孙腾还告高欢，欢说"尔朱兆狂愚到这等地步，而胆敢行悖逆之事，吾势必不能与他长久共事。"

十二月，尔朱兆攻丹谷，魏都督崔伯凤战死，史仵龙投降，源子恭逃走。尔朱兆轻骑倍道兼行，从河桥西渡过黄河。孝庄帝元子攸以为大河深广，尔朱兆难能济涉，麻痹大意，沿河不设任何防御。而兆渡河那天，河水竟不没马腹，使胡兵轻易渡过黄河。忽一日，暴风骤起，黄沙蔽日，兆率轻骑叩宫门。胡兵到了鼻子尖下，这才被北魏朝廷宿卫发现。官兵弯弓欲射，由于风力太大，箭竟射不出去，一时纷纷走散。宫内侍官王鸷曾依附尔朱荣，是契胡兵的奸细，当尔朱兆南下洛阳时，孝庄帝欲亲率诸军拒敌，王鸷劝孝庄帝说："黄河万仞，尔朱兆如何得渡？"孝庄帝子攸遂自安。及兆率胡兵打进宫来，王鸷又让卫兵放下武器，不得抵抗。胡兵一路顺利，杀进宫来。城阳王元徽见势不妙，急忙乘马逃走。孝庄帝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

漫步出云龙门外看看，迎面遇上元徽策马面去，他不知何故，连连呼唤："卿到何处去！"元徽头也不回，一溜烟跑掉了。胡兵包围了皇宫，将孝庄帝活擒，锁在宫城中永宁寺的楼上。孝庄帝感到孤寂寒冷，忍受不了，向尔朱兆索求头巾，兆不予。尔朱兆以尚书省为军营，出入用天子金鼓，设刻漏于庭，俨然像北魏皇帝，又扑杀皇子，奸淫后宫嫔妃，纵兵大掠，杀司空临淮王元彧、尚书左仆射范阳王元诲、青州刺史李延寔等。

城阳王元徽逃至山南，投奔到前洛阳令寇祖仁家中。祖仁一门出了三位州刺史，都是元徽引荐的，因有旧恩，所以才投靠了他。元徽送给祖仁金百斤，马五十匹。祖仁贪图财利，对元徽装作一副十分热情关心的样子，而私下对他的子弟说："我听说尔朱兆购募元徽的头，得之者可封千户侯，今日可得富贵了。"于是恐吓元徽说："官军来追捕您了。"让他逃往别处，又派人于途中将元徽斩杀，把他的头割下来送给尔朱兆，而兆竟不加勋赏。尔朱兆梦见元徽对他说："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存放在祖仁家，您可自己取来。"醒来后，意所梦为实，即掩捕祖仁，让他交出金、马。祖仁以为有人告密，从实招供，说："实得金百斤，马五十匹。"尔朱兆怀疑他有诈，一定要他交足梦境中的金、马数量。祖仁被逼不过，又将自家的金三十斤、马三十匹，尽数拿出来给兆，兆仍不相信，怒将起来，揪着祖仁的头发，悬首高树，大石坠足，再重加捶杖，将他活活打死。

尔朱世隆也率师至洛阳，尔朱兆以功高自傲，呵斥世隆道："叔父在朝日久，耳目应该灵些，如何使天柱（尔朱荣）受祸！"手按剑柄，怒目圆瞪，声色俱厉。世隆连忙拜谢，好言相劝，这才罢休。从此，世隆内心十分忌恨尔朱兆。尔朱仲远也从滑台赶来洛阳。

尔朱荣死后，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曾诏河西（泛指今山西吕梁山以西黄河两岸地区）胡帅纥豆步蕃袭秀容（今山西忻县西北）。

及尔朱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势强盛。尔朱兆不敢久留，让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镇守洛阳，自率兵急还晋阳。至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清点从京师掠获来的财物，裹胁着孝庄帝元子攸北走。高欢闻知子攸被挟至晋阳，欲于途中打劫，未能得手，于是写信给尔朱兆，陈述利害，劝他不要杀害天子，背负恶名。尔朱兆大怒，根本不听，到晋阳后，将元子攸缢死在三级佛寺内，并杀陈留王元宽。

尔朱世隆在洛阳，杀了害死尔朱荣的主谋之一高道穆。又与兄弟们密谋，恐元晔的母亲卫氏干预朝政，伺其出行，遣数十名骑兵装扮成强盗的模样，把她杀死在京巷。随后又悬榜告示，出一千万钱募拿凶犯。从此，北魏朝廷已名存实亡，洛阳、晋阳尽归尔朱氏契胡集团掌握。

纥豆陵步蕃攻秀容，大破尔朱兆，又南逼晋阳。尔朱兆十分恐惧，使人召高欢救助。欢部下僚属怕遭尔朱兆暗算，劝高欢不要应召，欢说：“尔朱兆正处于危急之中，保无他虑。”遂行。高欢的亲信贺拔焉过儿建议军队慢行，待至尔朱兆疲惫时再出击。高欢走走停停，借口河无桥，不得渡。步蕃兵众日盛，尔朱兆屡屡战败，一再向高欢告急。高欢磨蹭够了，这才挥师急进。契胡兵向南节节败退，步蕃追至平乐郡。高欢与尔朱兆合兵掩击，大破之，斩步蕃于石鼓山，步蕃部众退走。尔朱兆对高欢感恩戴德，相与誓为兄弟，率数十骑至高欢营中，通夜宴欢。

先前，葛荣部众二十多万人流徙到并（今山西太原西南）、肆（今山西忻县）二州，受尽契胡的凌辱，无法生存，相继发动了二十六次起义，有一半人被杀戮，但仍镇压不了。尔朱兆十分忧患，问计于高欢。欢说：“六镇反叛的流人，不可尽杀，应选派大王的心腹统领他们，若再有反者，治罪其帅，这样，受刑的人就少了。”兆说：“好，可谁能统制他们呢？”贺拔允这时在座，请求让高欢统领。高欢佯装瞋怒，挥拳打掉了贺拔允的大门牙，

喝道："过去天柱（尔朱荣）在世时，我等奴辈像鹰犬一样服侍他。今日天下事情的定夺在于大王，而你竟敢胡言乱语，真该杀。"尔朱兆认为高欢忠诚，于是将流民帅的职衔委任于他。高欢知道尔朱兆这时已酒醉八成，怕他醒后食言，遂出帐宣布："我受大王委任，统领州镇兵，可到汾水东岸集合待命。"军士向来恨尔朱兆，十分乐意受高欢调度，争相奔赴。

高欢在阳曲川屯驻不久，使刘贵向尔朱兆请命，说"并、肆二州，连年霜旱，降户掘田鼠作食粮，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请令到太行山以东就食，待温饱后再听调遣。"尔朱兆依从了高欢。长史慕容绍宗劝阻尔朱兆说："不可，今四方人心不稳，高欢雄才盖世，复使他握大兵于外，等于将云雨借与蛟龙，恐将不可制服。"尔朱兆说："我与高欢有香火重誓，还忧虑什么？"绍宗说："亲兄弟尚不可信，何况香火。"兆左右的人都得到了高欢的贿赂，言称绍宗与高欢有旧仇。兆怒，将绍宗囚禁起来，命高欢东行。高欢自晋阳奔滏口（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中途遇上北乡长公主（尔朱荣妻）从洛阳来，并带有三百匹马。高欢尽将她的马匹夺取，而把军中一些不中用的劣马留给她使用。尔朱兆闻知，醒悟到不该放走高欢，于是释放了慕容绍宗，绍宗说："高欢仍是掌握中物，可速将他追回。"尔朱兆率随从追至襄垣（今山西襄垣北郊），漳水暴涨，河桥被冲毁，高欢隔水拱手作揖，大声说："我借用公主马，没有别的意思，是防备山东的盗贼。您听信了公主的谎言，自来赐追，欲降罪我等。今天我等拼命渡过漳水，是怕军士再生变乱。"尔朱兆自称无此意思，于是轻马渡水，与高欢一起坐在幕下，表示歉意，把所佩刀送给高欢，并伸长脖子让高欢砍斫。欢大哭，说："自天柱（尔朱荣）死后，贺六浑还仰仗谁呀！但愿大王您千万岁，当誓死效命。今被旁人挑拨离间，大王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复斩白马与高欢盟誓，因留宿夜饮。尉景伏设壮士欲捕杀尔朱兆，高欢咬住尉景

的胳臂制止他，悄悄地说："今日杀他，其党羽必奔归聚集。我兵疲马瘦，不可为敌，若英雄乘间而起，对我们更加不利，不如暂且饶他一命。兆虽骁勇，凶悍无谋，不值得图害他。"次日早晨，尔朱兆回到营中，复召高欢。欢欲上马应召，孙腾牵住高欢的衣角，欢这才未去。尔朱兆隔着漳水，破口大骂，驰还晋阳。尔朱兆的心腹念贤率领降户家属另编为一营，高欢假装与他十分友善，言称观赏他的佩刀，就势挥刀杀了他。士众感悦，更加附从高欢。

北魏节闵帝元恭普泰元年（531）正月，自元子攸被囚禁以后，宫室空荡近百日。尔朱世隆镇洛阳，商旅流通，盗贼不作。世隆兄弟密议，以长广王元晔亲系疏远，又无人望，欲更立宗室近亲。仪同三司、广陵王元恭是元羽的儿子，好学有志度，正光年间领给事黄门侍郎，因元叉擅权，装聋作哑，居住在龙华佛寺，从不与人来往。永安末，有人启奏元子攸说："广陵王外表佯装聋哑，内心有异志。"元恭惧，逃入上洛山，被洛州刺史捕获，又解送至朝廷，经长期审验，并无反状，这才释免了他。关西大行台薛孝通劝尔朱天光说："广陵王颇似高祖孝文帝，素有声望，沉晦不言，已有多年，若奉他为主，必能得到天下人的赞成。"天光与世隆等谋议，怀疑元恭实哑，使尔朱彦伯暗中访究，并胁逼他。元恭这才开口道："天啊！有何言语要说呀！"世隆闻知，大喜。

二月，长广王元晔到邙山南，世隆等为他作禅文，使泰山太守窦瑗赶赴邙山南见元晔，启奏道："天人之望都在广陵王，愿您依照尧、舜的作法行事。"元晔遂在禅文上署签名字。元恭上表三次推让，然后即位，大赦天下，改年号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起草赦文，叙述元子攸枉杀太原王尔朱荣事，元恭说："永安帝（孝庄帝元子攸）手翦强臣，非为失德，正是天不厌乱，故永安帝遭杀。"因顾左右取笔，自作赦文，直接了当地说："门下：

朕因德寡，幸运受众拥戴，思与天下人同兹大庆，典章制度一依常式。”元恭闭口八年，至此开口发言，朝野欣然以为明主，望致太平。

庚午日，元恭颁下诏书，以“三皇称‘皇’，五帝称‘帝’，盖递为冲挹。自秦以来，竞称‘皇帝’，吾今但称‘帝’，也就足够了。”加尔朱世隆仪同三司，追赠尔朱荣为相国、晋王，加九锡。世隆使百官议尔朱荣神灵牌位配飨，司直刘季明说：“若配享世宗庙堂，于时无功；若配孝明皇帝，杀害其母（胡太后）；若配庄帝，为臣不终。以此论之，无所可配。”世隆大怒，喝道：“你真该死！”季明说：“下官既然为议首，依礼而言，不合圣心，翦戮唯命。”世隆默然，也不治罪于他。最终决定把尔朱荣的牌位置放在高祖孝文帝的庙堂内。并在首阳山为荣修庙，因袭周公旧庙遗址，以为荣功可与周公相比。庙成，不久又被焚毁。尔朱兆因世隆废立皇帝，事先不曾与他谋议，大怒，欲发兵攻世隆。世隆使尔朱彦伯前往晋阳劝解，这才作罢。

契胡尔朱氏祸乱天下，人人怨愤。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假借方术，聚合四方之众，又推算尔朱氏将衰，于是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声言为敬宗元子攸报仇，并妄述图谶，到处煽动，说：“刘氏当王。”因此，幽、瀛、沧、冀四州民众多依往赴。响应者于夜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戮，许多人被裹胁。灵助引兵南至博陵郡安国城（今河北安国东南安国城），并作南攻准备。魏使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人叱列延庆率军镇压刘灵助，至固城（约在今河北定州附近），渊等畏惧灵助人多势众，欲引兵西人，拒关守险以待其变。延庆说：“灵助不过是一庸人，假借妖术惑众，若声东击西，必能擒他。”侯渊出屯城西，声称撤军，于夜间选精骑一千，袭破灵助营垒，斩灵助，灵助起义失败。

尔朱兆遣监军孙白鹞到冀州，托言调取民马，欲乘高乾兄弟

向他们献送马匹之时，收捕高氏兄弟。高乾等闻知，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合谋，暗中部署将士，袭据信都（今河北冀县），杀死白鹞，活捉冀州刺史元嶷。众人拥戴封隆之行冀州刺史，并为元子攸举哀，将士尽着白衣孝服，高乾、封隆之等升坛誓死，共讨尔朱氏。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兵五千袭信都，高敖曹来不及披挂，率十多骑猛击羽生军，高乾从城墙上放下绳索，五百名军士沿绳而下，接援敖曹，众人刚下得城来，敖曹已交兵，羽生败走。敖曹走马挥矟，武艺盖世，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左右的人无不以一当百，当时的人都把敖曹比作项籍。

高欢屯壶关大王山六十天，然后引兵东出，声言讨信都。信都人十分恐惧，高乾说："我闻高晋州雄略盖世，其志不居人下。况且尔朱氏无道，杀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今日之来，必有深谋，吾当轻马迎接，暗中共商大计，诸君勿惧。"于是率十余骑与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密会高欢于滏口（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劝欢说"尔朱酷逆，人神痛恨，凡是有知觉的人，无不思念先帝子攸，明公您威德向来著称，天下倾心于您，若为正义而战，再倔强的不法之徒也不是您的对手。鄙州虽小，户口不足十万，粮草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思计策。"高乾语气慷慨，高欢听了，大悦。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直至深夜，遂同帐就寝。

先前，河南郡太守赵郡人李显甫喜好豪侠，集诸李姓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占据方圆五六十里的地方。显甫死，他的儿子李元忠继父为主。李家向来十分豪富，多出贷取息，元忠将债契全部烧掉，接济穷人，受到乡人的敬重。北魏末年，社会混乱，盗贼遍地，打家劫舍。清河郡有五百名丁壮服兵役，役满归乡，路过赵郡，遭到流盗的拦截，众人投奔了李元忠。元忠派人护送众人回家，临行，嘱他们说："若遇拦阻，可说是受李元忠派遣出行的。"果然，盗贼听说李元忠的名字，全都避让放行。葛荣率流

民在河北地区起义，李元忠结垒自保，数次击退流民军的进攻。葛荣大怒，说："我自中山到此，连为赵郡李所破，怎么能成大事。"于是调集大军攻围，擒元忠，并把他囚禁在军中。葛荣起义被镇压后，元忠被朝廷任命为南赵郡太守，他在郡纵酒不视政事。

尔朱兆杀了孝庄帝元子攸以后，元忠弃官回家，谋举兵讨伐。这时，高欢东出，元忠乘坐着无篷的露车，载着素筝浊酒前来奉迎。高欢听说他是一位酒客，没有马上见他。元忠下车独自坐在高欢的营门前，一边喝酒，一边撕着肉吃，对守卫营门的人说："听说高公招揽俊杰，今日得知国士到门，不快快出来迎接，我可知道他是什么人了。还有牒刺，不要再通报了。"守门的人将此话告诉了高欢。高欢这才出来见他，把他引入营中，重又摆开酒席，元忠到车上取来筝，边弹边唱，长歌慷慨。唱罢，问高欢说："天下形势可见，高公还给尔朱氏干事吗?"高欢说："富贵都是他们给的，怎么能不尽职尽守。"元忠说："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来过吗?"这时，高乾已见过了高欢，高欢故装糊涂，说："吾家从叔粗鲁，怎么肯来?"元忠说："虽粗，却明白事理。"高欢说："赵郡（指李元忠）醉了。"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孙腾进言说："此君由上天派来，不可违背他。"高欢这才又留下与他畅谈。元忠慷慨流涕，高欢也悲不自胜。元忠因进计策，说："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视高公为主人，殷州便委托于您，冀、殷既合，沧、瀛、幽、定自然弥服。唯刘诞黠胡，或许不听驯从，但他不是高公对手。"元忠之策正合高欢心意，他急忙握住元忠的手，连连称谢。

高欢师出山东（太行山东），严明军纪，秋毫无犯，每过麦地，高欢牵马步行。远近闻知，都称赞高欢将兵整肃，更加倾心归服于他。来到相州地界，高欢向相州刺史刘诞请粮，刘诞不给。高欢的军队恰巧遇上刘诞运送租米的车队，就势掠取过来。

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开门迎高欢入城。这时，高敖曹在外地作战，闻知高欢入信都，很生气，认为高乾懦弱，送给他一件布裙嘲讽他。高欢派世子高澄以子孙的礼节去见敖曹，敖曹这才回信都见高欢。

魏帝元恭封尔朱世隆为太保，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为勃海王，征使入朝，高欢辞不就征。尔朱兆辞天柱号，说："这是叔父所终之官，我怎么敢受?"因固辞不拜。不久，魏帝又升任他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尔朱仲远徙镇大梁（今河南开封)，复加兖州刺史。

尔朱世隆任仆射时，害怕尔朱荣的威严，于公务不敢怠慢，办事认真，开明敏思，有些名气。尔朱荣死后，无所顾忌，为尚书令，在家办公，独掌台省，事无大小，都须先请示他。每次办理政务，他让尚书郎宋游道、邢昕东西各坐一旁，处理辞讼，最后由他裁定。他们相互勾结弄权，贪淫公行，生杀自恣。为了笼络军士，滥施封赏，士卒皆为将军，又没有名额限制。从此勋贵之官，泛滥成灾。这时，天光专制关右（今潼关以西地区)，兆拥有并、汾，仲远擅命徐、兖，世隆居中用事。尔朱氏集团把持中央与地方，竞相贪暴，而仲远尤甚。徐、兖二州的富室大族多被仲远诬陷，以谋反为罪，将没收的妇女财物尽占为私有，投其男子于河，像这样的例子多不可数，自荥阳以东，租税全入其军，不送洛阳。洛阳东南一带的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远如豺狼。因此，四方的人都非常仇恨尔朱氏，但惧其权势，又不敢违抗。

四月，魏以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高欢欲起兵讨伐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库狄干与欢妻弟娄昭、妻之妹夫段荣全都赞成举事。高欢作书，在军中广泛散布，诈称：尔朱兆欲将六镇流人分配给契胡为部曲，众人都十分

恐惧。又假造并州兵符，称尔朱兆要征兵讨步落稽，发一万人，立即进军。孙腾与都督尉景一再申请，要求拖延五日，未能允许。高欢亲送众人到郊外，涕泣执别，众皆嚎啕大哭，声震郊野。高欢于是登高呼喊道："吾与你们都是流浪人，情义犹如一家，没想到上锋征发催逼！今日西征已当死，耽误军期也当死，配国人为部曲又当死，怎么办？"众人齐呼："反了吧！"高欢说："造反乃当务之急，然应推举一人为主，谁可为主？"众人共推高欢。高欢说："你们北镇人难制，没看见葛荣吗？虽有百万之众，曾无法度，终自败死。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凌汉人，不得违犯军令，生死由吾，只有这样才行。不然，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众人都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唯命是从。"高欢宰牛飨士，遂起兵于信都。这时，高欢还未敢公开背叛尔朱氏。

不久，李元忠举兵逼殷州。高欢令高乾率众救援，乾轻骑人殷州见刺史尔朱羽生，谋划军计。羽生与高乾一起出战，乾作内应，临阵斩羽生，把羽生的头送到高欢面前。高欢拍着胸脯说："今日反定了！"于是任命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又上表朝廷，数列尔朱氏的罪状，尔朱世隆将表文藏置起来．不通报皇帝。

北魏杨播、杨椿、杨津兄弟都是世家大族，华阴杨氏是十分有名望的人。椿、津都官至三公，一门出了七位郡太守、三十二位州刺史。孝庄帝元子攸诛尔朱荣时，杨播的儿子杨侃参与了这事，阳城王元徽、李彧都与杨家有姻亲关系。尔朱兆人洛，杨侃逃回了华阴，尔朱天光使杨侃的岳父韦义远招侃，声称与他结为兄弟，不问前罪。杨侃出来见尔朱天光，被天光杀害。这时，杨椿居官，与其子杨昱在华阴，椿弟冀州刺史杨顺、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刺史杨辨、正平太守杨仲宣都在洛阳。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氏谋反，请收捕治罪，魏帝元恭不许。世隆苦苦请求，元恭不得已，命有司查验奏来。尔朱世隆于是在一天夜里派

兵包围了杨津的家，天光也派兵在华阴逮捕了杨椿父子，杨氏东西两族，无少长尽被杀戮，籍没家财。世隆奏称："杨氏实反，抗拒官军收捕，已全被格杀。"魏帝元恭惋惜良久，缄口不言。朝野闻知，无不痛恨尔朱氏残暴。杨津的儿子杨逸为光州刺史，尔朱仲远派人到州杀死，唯有另一个儿子杨愔，事发时出门在外，逃匿获免，投奔信都去见高欢，哭诉家祸，并向高欢进献讨伐尔朱氏的计策，高欢十分重视，即委任他为行台郎中。

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闻知高欢起兵，自恃兵强，不以为虑，独尔朱世隆心里有些担忧。尔朱兆率步骑二万出井陉，趋殷州，李元忠弃殷州奔信都。八月，尔朱仲远、尔朱度律将兵讨高欢。九月，魏以尔朱仲远为太宰，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孙腾劝高欢说："今朝廷隔绝，号令无法禀告，不暂立一帝主，则众将溃散。"高欢迟疑不决，孙腾再三固请，于是立勃海太守元朗为帝。十月，元朗即位于信都城西，改年号中兴，以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屯军于阳平（今河北馆陶），尔朱兆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军于广阿，众号十万。高欢纵反间计，让人在尔朱兆军中散布"世隆兄弟谋杀兆"，又在尔朱仲远军中扬言"兆与欢同谋杀仲远等"。因此，尔朱氏内部互相猜疑，徘徊不进。仲远屡使斛斯椿、贺拔胜向尔朱兆解释，兆率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斛斯椿、贺拔胜追上尔朱兆，当面劝解，兆把椿、胜裹胁回营。仲远、度律十分惧怕，引兵南遁。尔朱兆数列贺拔胜罪过，要斩他，说："你杀卫可孤，罪一也；天柱（尔朱荣）卒，你不与世隆等具来河桥，面东征仲

远，罪二也。我早想杀你，今有何话要说？”贺拔胜说：“可孤是国家巨患，胜父子诛他，其功不小，反倒有罪吗？天柱被戮，以君诛臣，胜宁负王，不负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贼近在旦夕，骨肉构隙，自古至今，像这样没有不灭亡的。胜不怕死，恐王失策。”尔朱兆这才没有杀他。

高欢将与尔朱兆交战，而畏其众强，问计于亲信都督段韶。韶说：“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尔朱氏上杀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顺讨逆，如汤沃雪，那里有什么众强？”高欢说：“虽然如此，吾以小敌大，恐无天命不能成大事。”段韶说：“韶听说‘小能敌大，小道大淫’。‘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心，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人心已去，天意怎能有不从的呀！”高欢点头称是，于是部署军队，猛击尔朱兆，大破兆军于广阿，俘虏甲卒五千多人。

十一月，高欢引兵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兴元年（532）正月，高欢指挥军队强攻邺城，掘地道，施木柱于地道中，地道成，然后焚烧木柱，城陷入地。拔邺，擒刘诞。高欢任命杨愔为行台右丞，时军国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开府咨议参军崔㥄。

二月，元朗封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以高澄为骠骑大将军。是月，元朗率百官由信都徙居邺城。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互相猜忌，世隆卑辞厚礼奉谕尔朱兆，欲使兆入洛，唯其所欲。又请求魏节闵帝纳兆女为皇后。尔朱兆这才高兴起来，并与天光、度律再立誓约，复相亲睦。

斛斯椿暗中对贺拔胜说：“天下皆怨毒尔朱氏，而吾等为他们利用，亡必有日，不如图谋除掉他们。”胜说：“天光与兆各据一方，欲尽斩除十分困难，斩除不尽，必为后患，怎么办？”椿

说："这事容易。"于是劝尔朱世隆召集天光等人洛，共商讨伐高欢计策。世隆屡征天光，天光不至，使椿亲往邀请。椿对天光说："高欢作乱，非王不能定，岂可坐视宗族被夷灭吗？"天光不得已，将东出，问策于雍州刺史贺拔岳。岳说："王家跨据三方，士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但愿能同心协力，无往不胜。若骨肉相疑，连存亡都暇顾不及，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不如暂且镇守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自全。"天光不从。闰三月，天光自长安，尔朱兆自晋阳，尔朱度律自洛阳，尔朱仲远自东郡皆会于邺，众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魏节闵帝元恭以长孙雅为大行台，总督各路军队。

高欢令吏部尚书封隆之守邺，自出屯紫陌（在邺城西北五里），大都督高敖曹率乡里部曲王桃汤等三千人随从高欢。欢说："高都督所将尽是汉兵，恐不足济事，吾欲调配鲜卑兵一千人给您，如何？"敖曹说："敖曹所将，练习已久，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今若使汉兵与鲜卑兵杂用，情不相洽，胜则争功，退则推罪，请不必增配。"

一天夜里，尔朱兆率轻骑三千偷袭邺城，叩击西门，不克而退。第二天，高欢将战，马不满二千匹，步兵不满三万，众寡不敌，于是在韩陵山（在邺城西南）布置圆阵，连系牛驴以塞归道，将士皆有死志。尔朱兆远远望见高欢，大声斥责高欢背叛了先前的誓言，欢说："先前与你共约，原本是为了共辅帝室，今天子何在？"兆说："永安帝（元子攸）枉杀天柱（尔朱荣），我报仇杀了他。"欢说："我过去亲闻天柱计，你在门前站立，怎么能得言不反呢？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我们的情义已断绝了。"双方遂交战起来。高欢率中军，高敖曹率左军，欢的堂弟率右军。欢战不利，尔朱兆等乘势猛攻，高岳以五百骑冲锋在前，别将斛斯敦收集散卒跟在后面，高敖曹以千骑自栗园突出横

击兆军，兆等大败，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于阵投降了高欢。尔朱兆面冲着慕容绍宗，用手拍着脑门子，说："不用公言，以至于此！"欲轻骑西走，绍宗反旗鸣角，收集散卒而去。尔朱兆逃还晋阳，尔朱仲远奔东郡。尔朱彦伯闻尔朱度律等兵败，欲自将兵守河桥，世隆不从。

度律、天光打算回洛阳。大都督斛斯椿对都督贾显度、贾显智说："今不先擒尔朱氏，吾等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三人在深夜盟誓于桑下，相约倍道先回洛阳。尔朱世隆使其外兵参军阳叔渊单骑驰赴北中（今河南孟县南），收编败还散卒，安置于城内。斛斯椿来至城下，不得入城，于是诡劝叔渊说："天光部下都是西人，听说欲大掠洛邑，迁都长安，快放我入城，早做防备。"叔渊信以为真，开门把他引进城内。四月，椿等人据河桥，尽杀尔朱氏党羽。度律、天光欲攻他，赶上大雨昼夜不止，士马疲惫，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波津，被人擒捉，送交斛斯椿。椿使行台长孙雅到洛阳奏知魏帝，另派贾显智、张欢率骑掩袭世隆，擒世隆。彦伯这时正在皇宫值守，长孙雅于神武门启奏节闵帝："高欢义功既振，请诛尔朱氏。"节闵帝派舍人郭崇报信给尔朱彦伯，彦伯狼狈出走，被人抓获，与世隆俱被斩于阊阖门外，送其首级并尔朱度律、尔朱天光于高欢军中。节闵帝又派中书舍人卢辩到邺慰问高欢。

尔朱天光自长安东下时，留其弟尔朱显寿镇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欲与他一起东下。贺拔岳知天光必败，欲留侯莫陈悦共图显寿，响应高欢，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留住侯莫陈悦。宇文泰对贺拔岳说："今天光还未走远，侯莫陈悦未必敢有二心，若以此告知他怕惹他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劝说其部众，必然人人都想留下。悦进失尔朱氏军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机会劝说他，事情就能成功。"贺拔岳大喜，即令宇文泰混入侯莫陈悦的军中活动，侯莫陈悦遂与贺拔岳一起袭击长

安。宇文泰率轻骑为前驱，尔朱显寿弃城逃走，追至华阴，被抓获。高欢任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以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托于他。

元朗随高欢军来到邙山，高欢因他与宗室血缘关系疏远，想废掉他，但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让仆射魏兰根到洛阳观察节闵帝的为人，打算复奉他为帝。兰根以节闵帝神采高明，恐日后难制，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㥄共劝高欢废掉他。高欢召集百官讨论废立事宜，众人莫有应者，太仆綦毋儁盛称节闵帝贤明，宜主社稷，高欢欣然称是。崔㥄厉声道："若言贤明，自可等我高王到来，再登大位。广陵（节闵帝元恭）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为天子，若从綦毋儁之言，王师何名义举？"高欢遂幽禁节闵帝于崇训佛寺内。

高欢人洛阳，斛斯椿对贺拔胜说："今天下事，在吾与您二人，若不先制人，恐被人所制。高欢初至，图之不难。"胜说："他有功于时，害他不祥。近来数夜与他同宿，共叙往日情怀，也深感兄恩，何故忌惮他不成。"椿这才罢休。

高欢因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的儿子，召来欲立为帝，听说他狂暴无常，遂止。这时，诸王多逃匿，尚书左仆射平阳王元修为元怀之子，匿于田舍，欢欲立为帝，使斛斯椿访求。椿见到元修的亲信员外散骑侍郎王思政，打听元修的下落，思政说："为何寻找元修？"椿说："欲立他为天子。"思政这才告知。椿跟随思政来见元修。元修吓得脸色都变了，问思政说："你可别出卖了我？"思政说："不会。"又问："能担保无事吗？"答："事态变化百端，谁敢担保呀！"椿驰报高欢，欢派四百名骑兵迎接元修人毡帐，陈述忠诚，泣下沾衿。元修以寡德谦让再三，欢再拜。欢出备车辇，进汤沐，达夜严警。次日凌晨，文武执鞭人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帷门，因磬的延首被折断，不敢上前。元修令思政取表阅视，说："不得不称朕了。"于是为元朗作诏策，禅

帝位，是为北魏孝武帝。

戊子日，元修于洛阳东郭之外举行登基大典，采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在七个人的身上，高欢为其中之一。元修于毡上西向拜天毕，然后入御太极殿，接受群臣朝贺，又升阊阖门大赦天下，改年号太昌，以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加高澄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初，高欢起兵信都，尔朱世隆知道司马子如是高欢的故旧好友，让他自侍中、骠骑大将军的官任上出任南岐州刺史。高欢入洛，召司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朝夕不离左右，参加军国大事。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追尔朱世隆，世隆逃入南梁。

丞相高欢任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冀州是高欢起兵的地方，贺拔岳畏惧高欢，不愿离开自己经营的地盘关中，逊辞上表朝廷，而不就征。

待洛阳新朝廷诸事安排已就，高欢回到邺中，送尔朱度律、尔朱天光于洛阳，斩首。

五月，北魏孝武帝元修鸩杀节闵帝元恭于门下外省，诏百官会丧，葬礼十分隆重。又封任朝廷要臣，任命丞相高欢为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以天柱大将军自取身亡，高欢忌讳这一官号，固辞不受。

为扫除尔朱氏残余势力，高欢引兵入滏口（今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大都督库狄干入井陉（今河北井陉县微水镇西），击尔朱兆。随后，魏帝元修又使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率步骑十万，会高欢于太原，欢任隆之为丞相军司。高欢屯兵于武乡（今山西榆社西北社城），尔朱兆大掠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北走秀容（今山西忻县）。并州平，高欢因晋阳山河四塞，形势险要，于是在这里建大丞相府。

十二月，北魏孝武帝元修纳丞相高欢女为皇后，命太常卿李

元忠到晋阳去迎娶。高欢设宴招待元忠，席间，论及往事。元忠说："昔日建义，轰轰烈烈，十分快活，近来寂寞无事可做。"高欢抚掌笑道："此人逼我起兵。"元忠开玩笑说："若不与您共举大义，当改求他人了。"欢说："起义早晚会进行的，只怕是您这样的老翁不可遇呀。"元忠说："正是因为我老翁难遇，所以才不肯放我去。"说罢，伸手捋捋高欢的胡须，大笑起来。高欢领会到他的雅意，内心很是敬重他。

尔朱兆到了秀容后，分兵把守关隘，出入寇掠。高欢扬言讨伐他，虚张声势，师出又止，前后四次。尔朱兆被拖得十分疲惫，士气懈怠。高欢估计他大年初一置办宴会，欲趁此时击他，派都督窦泰率精骑驰进，一天一夜行走三百里，欢率大军随后赶到。

永熙二年（533）正月初一，窦泰突袭尔朱兆大庭。尔朱氏的军士正在饮宴过年，毫无准备，忽见泰军到来，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窦泰率军追破赤谼岭，尔朱兆的军队全都降散。兆本人逃入山中，走投无路。命随从张亮、陈山提斩下自己的头颅出降，众人都不忍心。兆于是挥刀杀死自己乘坐的白马，自缢于树上。高欢亲临其丧，置办上等棺木和许多随葬品，为他厚葬。慕容绍宗携带尔朱荣的妻子及尔朱兆的余众投降了高欢。高欢因他重义气，又是自己的故旧，十分厚待他。至此，尔朱氏尽被翦灭。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

《北史》

《通鉴纪事本末·元魏之乱》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崔浩遭诛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出身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盛门大族。先祖崔林仕三国魏为司空，曾祖崔悦官至后赵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祖父崔潜任后燕黄门侍郎，父亲崔玄伯为北魏白马公，又是一位大书法家，写得一手好字，尤善长模仿西晋卫瓘字体。崔氏世代高官，又都是饱学文才。浩是崔玄伯的长子，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以及百家之言等典籍，精研义理，又好书法，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北魏天兴年间，他出任给事秘书，后又转调著作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因他能写得一手好字，常常让他跟随大驾，不离左右。拓跋珪晚年性情愈发变得暴烈，左右的人稍不小心，就要受到一顿毒打，人们不免都躲他远远的，只有崔浩恭勤不怠，忙于公务，还经常终日连家都不能回。拓跋珪知道这事后，命厨人将御粥端给他吃。

北魏永兴元年（409），拓跋珪被他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杀死，太子拓跋嗣率兵杀绍，即皇帝位，是为太宗明元帝。明元帝任命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让他在宫中教授自己经书，朝廷每有郊祀活动，皇帝都让他和其父亲玄伯一起乘坐轩轺参加，出尽了风头，当时，人们对他们父子二人羡慕得不得了。明元帝喜欢阴阳术数，听说崔浩善长天文，对天文、人事很有研究，料事多能应验，常常就军国大事召来崔浩商量，君臣私情十分密切。这时，后宫发现有野兔奔跑，宫宦去问守门的人为何放纵野兔入宫，门卫说："终日严守，不曾有兔出入。"明元帝感到

很奇怪，命崔浩推占这是什么征兆。浩回答说："当有邻国贡献美女，是善应啊！"第二年，后秦姚兴果然给拓跋嗣献来美女。从此，拓跋嗣更加宠信崔浩，对于崔浩的意见多言听计从。

神瑞二年（415），秋稼歉收，太史令王亮、苏坦和华阴公主等主张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崔浩与特进周澹向明元帝进言，说："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东州之人，向来认为国家北居广漠，民、畜无数，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平城，分家南徙，恐难以布满诸州。若散居各郡县，处榛林之间，不服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众人心离情散，四方闻知，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举兵南侵，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代、恒之险，虽欲援救，鞭长莫及，如此则声实具损。今居北方，假令太行山东诸州有变，轻骑南出，耀威于桑梓之中，谁知我军数量多少？百姓望尘震服，这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呀！待明年春天，草生畜肥，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情就好办了。"拓跋嗣阅罢，十分赞同他们二人的意见，说："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又派身边宦人去问崔浩、周澹："今已无粮糊口，怎么能挨至来秋，若来秋再无收成，又该怎么办呢?"浩等回答说："可简穷下之户，到诸州就食，若来秋庄稼不收，再作别的打算，但不可迁都。"明元帝听从了他们二人的建议，于是分民到太行山以东冀、定、相三州就食，让各州地方官吏开仓赈济。来年遂获丰收，使北魏渡过了饥荒，拓跋嗣十分高兴，赐崔浩、周澹妾各一名，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等。

在对外军事方面，崔浩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柔然，对于关中地区，静观待变，伺机夺权，对于南朝，不可轻举妄动。泰常元年（416），东晋向北魏借道北伐关中姚秦。朝廷内外公卿多主张乘刘裕用兵关中时，抄他的后路，从背后攻击他。明元帝因与姚秦有婚姻关系，常怀姚兴贡献美女的好感，也主张出兵。而

崔浩主张借道给刘裕，让他入关攻击后秦，使北魏“坐观成败，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还说：“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拓跋嗣不听，派兵出击刘裕，结果大败。拓跋嗣闻知，后悔莫及，恨不同崔浩计。

泰常二年，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了北魏，上书给明元帝，建议断刘裕后路。书奏，明元帝正在听崔浩讲授书传，于是问崔浩，说：“刘裕西伐，前军已至潼关，其事如何?以卿观之，事得济不?”浩胸有成竹地说：“昔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拓跋嗣又问：“刘裕与慕容垂相比，谁的才气大?”答：“刘裕。”“说说我听听。”“慕容垂凭借父祖世君的资格，生便尊贵，慕容族类像夜蛾扑火一样归附他，稍加倚仗，便可立功。刘裕出身微寒，没有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晋朝衰落，政归刘裕。裕若平姚而还，必篡其主，其势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裕也不能守。……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也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拓跋嗣又问：“刘裕入关，不能进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刘裕凭什么自立?”浩回答：“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兵众虽胜，而将无韩白。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退之能，非刘裕敌也。”拓跋嗣笑着说：“卿也考虑到这些了。”浩说：“臣曾私下评论近世人物，不敢不启禀皇上。像王猛那样治国，真可谓是符坚的‘管仲’；慕容玄恭（慕容恪）辅弼少主（慕容時），也是慕容時的‘霍光’；刘裕平定叛乱，也是司马德宗的‘曹操’。”拓跋嗣问：“卿认为本朝先帝如何?”浩答道：“小人一孔之见，怎么能看到广大的苍穹。虽然如此，太祖道武帝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原，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伏羲、神农齐列，臣岂能仰名。”拓跋嗣听罢崔浩这一席奉承话，自有几分得意，又问：“屈丐如何?”浩

答："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殖。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乃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撅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所灭耳。"拓跋嗣大悦，与崔浩谈论到半夜，赐给崔浩御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说："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

崔玄伯死后，崔浩袭父爵为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等文件的起草，都有崔浩参与。他懂得很多，但写文章不多。尤其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曾撰写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颇具义理。性不好《老子》、《庄子》等书，每次阅览不过数十行，然后扔到一边，说："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能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韦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明元帝拓跋嗣常患疾病，又十分迷信鬼怪神异，宫中屡屡闹鬼。于是派人暗访崔浩问计。崔浩劝他封立太子，选拔公卿忠贤、左右信臣辅弼太子理政，使他从政务中脱身，优游无为，颐神养寿。拓跋嗣接受了这一建议，使崔浩奉策告祈宗庙，立拓跋焘为太子，国之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阴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拓跋嗣避居西宫，把政事交给了太子拓跋焘。

泰常七年（422)，南朝宋帝刘裕死，拓跋嗣乘其大丧，举兵南下，欲攻取洛阳、虎牢、滑台，师出无功。拓跋嗣怒，亲提大军南征，任崔浩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

泰常八年四月，崔浩随拓跋嗣北还，途经西河（今山西离石)、太原，登上高陵憩息，俯临河流，傍览川域，十分感慨，于是与同僚讨论五等郡县的是非，考察秦始皇、汉武帝的功过得失。崔浩好古识治。人们都叹服他的观点。天师寇谦之每次与崔浩谈话，静静地听他论述古代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神意安

然，无有倦意。寇谦之十分佩服崔浩学问渊博，称他是当世的皋繇。对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拓跋焘），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崔浩于是著书二十多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历述列代兴衰变化。其主要思想在于主张恢复传统的五等爵制度。五等爵制源于西周，至秦朝被废除，两汉儒家都主张恢复。魏晋时曾一度复行，晋末至十六国，又废。崔浩竭力维护汉族传统，想通过恢复五等爵制，促使鲜卑拓跋氏汉化，这与拓跋氏中反汉化的保守势力的政治主张是针锋相对的。

十一月，明元帝拓跋嗣病死，太子拓跋焘即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即位后，宫内一些反汉化的人物，围绕着拓跋焘，说了许多有关崔浩的坏话。拓跋焘下令免了崔浩的官职。浩罢官回家，拜寇谦之为师，研习其《神中录图新经》，修服食养性之术。他生得纤妍白皙，美如妇人，又习养性之术，愈发容颜焕发。

始光年间（424——427），拓跋焘又起用崔浩为太常卿，进爵东郡公。参与朝议，协助拓跋焘击败西夏赫连昌。

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曾诏尚书邓渊著《国记》十卷，记载北魏入主中原以前的事，按年代先后编次事件，体例未成。到了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时，废而不述。太武帝拓跋焘神䴥二年（429），又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崔浩及弟崔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国书》告竣后，崔浩又为拓跋焘出谋划策，北破柔然。拓跋焘更加亲近崔浩，引他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又从容对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

太延五年（439），崔浩向拓跋焘献计，出兵攻破凉州，北凉

主沮渠牧犍投降。北凉亡。

太平真君初（440），拓跋焘又诏崔浩主持撰修国史，说："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协顺天人，以征不服，应期拨乱，奄有区夏。太宗承统，光隆前绪，厘正刑典，大业惟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宾服。此祖宗之遗志，而贻功于后也。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䴥，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以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大小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崔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都由崔浩负责。这次修史，是在邓渊《国史》基础上进行的，书中《太祖纪》原为邓渊所撰，崔浩原封不动照搬过来。《先帝纪》与《今记》由崔浩与高允合作撰成，崔浩负责综合、总裁，最后定稿；高允多注疏。尤其是《先帝纪》，直书拓跋氏先祖父子乱伦事，无所隐讳。书成之后，藏于宫中秘府。

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皇太子亲政，诏崔浩与宜都王穆寿辅弼，裁决政务。崔浩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恢复汉族儒家传统，"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他找卢玄商量，卢玄劝他说："创制立事应识时务，乐于此事的人，能有几位？应三思而行。"崔浩默然不言，竟不采纳。他想通过齐整人伦、明辨姓族来实现恢复五等爵的政治目的，因而与鲜卑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发生了矛盾，这主要反映在用人问题上。崔浩用人注重家世高卑、人伦优劣，他举荐的冀、定、相、幽、并五州士人数十名，直接

被任命为郡守。太子拓跋晃反对这种做法，想让以前由州郡选举出来的士人外任郡县。因为这些人多年担任郎吏官职，熟悉官府事务，而崔浩举荐的豪望，门第虽高，但对官府的事务并不太熟悉。崔浩固执己见，认为州郡选举出来的人，门第才学不强，不重用这些人。还有一次，朝廷要选举一名中书助教博士，太武帝拓跋焘与太子拓跋晃想让范阳李訢充任。崔浩认为范阳李訢不是高门大姓，不同意。由于拓跋焘父子执意选用李訢，崔浩这才没了办法。这说明，拓跋氏与崔浩在用人标准上存在着矛盾分歧。

而且，崔浩崇拜高门，看不起没有学术文化的鲜卑贵族。崔浩有一位弟弟叫崔恬，他听说王慧龙是太原王氏的后裔，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王氏世世代代长了一个大鼻子，东晋人称太原王氏为"齇王"。崔浩觉得攀上这门亲事很体面，把王慧龙召来，看见他那只大鼻子，说："我相信他是王家的儿子。"又说："真是贵种啊！"他数次向北魏王公称赞这位贵婿长得如何美。鲜卑贵族长孙嵩听了，十分不高兴，转告给太武帝拓跋焘，认为崔浩叹服汉族大姓，就是对鲜卑国人的大不敬。拓跋焘大怒，把崔浩找来，痛加斥责。崔浩急忙跪倒，摘掉冠冕，连连叩谢，拓跋焘这才饶了他。

太平真君六年十二月，崔浩随拓跋焘西征，先后镇压了东雍州蜀人薛永宗起义和关中盖吴起义。拓跋焘至长安，从官在长安城内一座寺院的便室里，发现了大量弓箭兵器，将这事报告了拓跋焘，焘怀疑寺内的和尚与盖吴相通，大怒。这时，崔浩在拓跋焘身旁，他向来讨厌沙门，因上言，建议灭佛。太武帝拓跋焘遂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下令自王公以下，禁止私养沙门。而太子拓跋晃"素敬佛道"，自然对崔浩鼓动太武帝灭佛一事，疾恶如仇。崔浩进言废佛，既得罪了为数众多的和尚和佛教信徒，又得罪了监国的太

子。寇谦之告诫崔浩说："卿进言，使那么多和尚被戮，会遭灭门的报应。"崔浩不以为然。

崔浩与冀州刺史崔赜、荥阳太守崔模年岁相当，而浩为长，依次为崔模、崔赜。三人虽同为崔姓，而不同祖，就血亲关系讲，崔模、崔赜亲近些。崔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瞧不起模、赜。崔浩不信佛道，而崔模归向沙门，敬事佛祖，虽处粪土之中，也常常顶礼膜拜。崔浩见了，大笑，说："持此头颅，于不干不净处跪事胡神。"言语讥刺刻薄。

太平真君九年（448），崔浩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初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妇人，更无余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崔浩的父亲玄伯善书法，模写卫瓘体。浩既工书，解《急就章》，人多托写。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世宝其迹，对北朝书法有很大影响。

崔浩才学博洽，又建树大功，权柄炙手可热，许多官吏都想巴结他。著作令史太原闵湛很会见风使舵，谄媚崔浩，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于是上书给太武帝，言称马融、郑玄等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注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颁行崔浩的注释，命天下习业，并请求皇帝下令让崔浩注《礼》、《传》，使后生得观正义。崔浩也上表给朝廷，推荐闵湛，说湛有著述之才，互相吹捧。不久，闵湛、郄标又劝崔浩刊刻所撰《国书》于石，永垂不朽，欲以彰崔浩直笔之迹。崔浩欣然赞成，太子拓跋晃也点头称善。于是在平城郊外天坛东三里处，划出一块地方，范围为一百三十平方步，布列石铭，用功三百亿，这才告竣。

由于《国书》石铭刊布在冲路，往来行人都停下来观阅，看

到拓跋氏先祖的隐私生活，都觉得好奇有趣，于是传扬开来，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事情传到太武帝拓跋焘的耳朵里，大怒。拓跋焘本来对崔浩定姓族的作法，早就忌恨在心，怎能忍受他以汉族高门自居，藐视鲜卑拓跋氏。于是正可借此机会打击汉族大姓。他派人把崔浩召来，使人责问他说："《国书》所载先帝事有何根据?"崔浩恍惚不能对。而高允在一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拓跋焘怒气冲冲，当下将崔浩投人监狱，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高允犹豫不决拓跋焘一再催逼，于是求见拓跋焘说："崔浩坐法，若更有其他罪过，非臣敢知。若仅以《国书》事，罪不至死。"拓跋焘听罢大怒，命武士逮捕高允。太子拓跋晃因从高允受书，十分敬重这位老师，一直在保护高允，力主将高允与这场国史案分开。他见父亲生气，高允被执，急忙上前跪下，乞求赦免高允，拓跋焘这才放了高允，说："没有此人惹我发怒，当有数千口死掉!"这时的拓跋焘对那些轻视胡人的汉族高门已恨得咬牙切齿。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太武帝拓跋焘下诏诛杀崔浩。行刑前，将崔浩重枷链锁，放置在槛车内，拉出平城南门外，监斩官让卫士数十人，站在囚车上冲着崔浩的头、脸撒尿，崔浩尿汤满面，嗷嗷嚎叫，哀声闻于行路，受尽百般羞辱。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是崔浩的姻亲，并受其牵连，尽被灭族。参与国史修撰的秘书郎吏以下尽被处死。从此罢置史官，直到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460）六月，才恢复了史官制度。

崔浩被诛是北魏前期汉化与反汉化的重要政治事件，民族、宗教、社会、阶级等矛盾交织一起，最后由撰修国史引发出来。因此，史书又称此事件为"国史案"。"国史案"的发生，使崔浩想要建立的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梦幻破灭了。北方高门大族崔、卢、郭等遭受沉重打击，鲜卑反汉化势

力占了上风，以后到孝文帝迁都汉化，这种势力才被打垮。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世祖纪》、《崔浩传》、《卢玄传》、《高允传》

《北史》：《崔宏传附浩传》、《高允传》

《资治通鉴》卷 126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盖吴起义

盖吴是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族的一支，因居住在卢水，所以被人称为卢水胡。后来，这支胡人又迁居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自西晋以来，卢水胡与匈奴其他支系及氐、羌等部族杂居在关中地区，过着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十六国时期，诸族豪强混战，匈奴族前赵刘曜、氐族苻秦、羌族后秦、匈奴族大夏赫连氏等先后统治关中，由于各胡贵政权的残暴统治，卢水胡部民遭受了不少灾难。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䴥元年（428），出兵关中，攻克了长安、统万等城，俘虏了西夏王赫连昌，兼并了关中地区。拓跋氏对新征服的关中地区的汉族及各少数部族，采取高压政策，坑杀迁徙，使人人危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关中胡汉民不断起来反抗。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三月，酒泉公郝温起兵杏城，杀守将王幡。北魏官府调集大批军队，镇压了这次兵变。

太平真君六年九月，29岁的盖吴纠集部众，起义于杏城的天台。起义前，盖吴派人四处传播起义口号："灭魏者吴"。部民十分痛恨拓跋氏的残酷统治，都恨不得与拓跋氏一起死掉，听到这样的口号，一个个精神振奋，起义的时机成熟了。盖吴登高一呼，许多少数部族民众纷纷响应，转瞬间，起义军已聚集了十多万人。十月，北魏朝廷派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兵进攻起义军，起义军迎战，大败官军，杀死了元纥。起义后的第一次胜仗，大大鼓舞了义军的士气，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元纥兵败身亡的消息传

到了京师平城，太武帝拓跋焘又气又恼，急忙调遣高平镇的敕勒骑兵，火速奔赴长安，一方面加强长安城防，另一方面阻击起义军西进。同时，拓跋焘又诏命将军叔孙拔带着朝廷颁发的兵符，即刻出京，驰乘官道沿途各驿站快马，星夜赶往前线，统领并、秦、雍三州的官兵，屯守于渭水北岸，企图以合兵围剿的态势，将起义军一网打尽。

十一月，盖吴派其部落帅白广平率领一支军队向西进攻。义军队伍声势浩荡，士气高昂，新平（郡治漆县，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等地胡族部落酋帅，纷纷聚众响应。各部族义军联合起来，进攻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城陷，义军杀死了守城镇将。于是，盖吴将起义军的指挥中心移至李闰堡（今陕西大荔北），分遣义军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以东各县城。义军节节胜利，官军往往败阵。盖吴又派兵西攻长安。

这时，盖吴得知朝廷派大批官军向起义军扑来，自知力薄，难能抵敌，于是派使者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上表给宋文帝刘义隆，说明起义的原因和战斗的形势，并请兵援助，共同打败北魏拓跋氏。表文说：

臣以庸鄙，仗义因机，乘寇虏灭亡之期，借二州思奋之愤，故创迹天台，爰暨咸雍。义风一鼓，率土响同，威声既张，士卒效勇。师不崇朝，群狡震裂。殄逆鳞于函关，扫凶迹于秦土。……今平城遗虐，连兵大坛，东西狼顾，威形莫接，长安孤危，河洛不戍。……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归京。

宋文帝刘义隆封盖吴为使持节、都督关陇诸州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北地郡公，送给他官印一百二十一纽，由他随宜假授将吏；又命雍、梁二州发兵屯于边界，以相接援。在南朝宋的支持下，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这时，起义军东、西两路作战，兵力势必有些分散，官军乘机反扑，各个击破。魏将章直率军在临晋以东一带与义军交战，义军败溃，纷纷夺路逃生，有三万多人被淹死在河水中。叔孙拔又在渭水北岸大败起义军，斩首三万余级。接连两次大败，义军损折了约有一半的兵力。为了保存力量，避敌强势，盖吴改变策略，将义军主力分散入北地山谷隐蔽起来。

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太武帝拓跋焘亲督大军进入关中，沿渭水南岸西向长安。这时，义军已分散隐蔽，拓跋焘扑了个空，更是恼羞成怒，滥杀关中各部族居民，他从长安西行，沿途大规模屠杀。二月，拓跋焘到周至（今陕西周至东），因耿青、孙温二垒的部众曾与义军通谋，下令尽将他们斩戮。又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渭水东岸），把杀死散关镇将的氐族等部众聚集起来，全部捕杀，制造一桩又一桩的大惨案，尸陈遍地，惨不忍睹。经过一番发泄报复之后，拓跋焘这才回到长安。同时，北魏尚书乙拔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在杏城打败了盖吴率领的一支义军，盖吴逃走，起义转入低潮。

当拓跋焘率领官军进入关中时，盖吴再次上表给宋文帝刘义隆，请求援兵，说：

"昔中都失统，九域分崩，……使长安为豺狼之墟，邺、洛为蜂蛇之薮。纵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叹愤，倾首东望，仰希拯接。……

"臣仰恩天时，以义伐暴，辄东西连接，南北树党，五州同盟，失相要契，仰凭威灵，千里云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师。……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遍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

刘义隆虑盖吴难成大事，又惧怕北魏强势，屯兵边界，却不敢出战。义军面对官兵的强大攻势，士气受挫，又乞求不到援

兵，于是纷纷败阵。

三月，太武帝拓跋焘班师，取道洛邑回平城，沿途分遣军队镇压了活动于李闰堡一带的羌族部民起义。由于大部官军撤出关中，关中诸胡部民起义战火重又燃起。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黄河南岸）人边冏与天水人梁会聚胡各族部民，占据上邽东城（今甘肃天水）。北魏秦州刺史封敕文慌忙调兵遣将，攻击义军。义军战败，边冏丧身，义军复举梁会为帅主。五月，魏将闾根率领一支骑兵赶到上邽，与封敕文会师，合兵进击义军，义军抵敌不住，溃败，梁会逃往汉中。

正当官军被调往上邽，镇压梁会起义时，盖吴复聚众杏城，重又举起反抗北魏统治的大旗，自称秦地王，署置官吏，众旅复振。太武帝拓跋焘急忙派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督师北道诸军前来镇压。接着，又在六月中，调发定、相、冀等三州兵二万人，屯于长安南山各山谷隘口，以阻防义军向南方突出，隔断义军与南朝宋的联系。南北夹击，合兵围剿，北魏仍旧采用了拉网的战术。待各路军队到位，预防部署就绪，于当年八月，官军向义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义军失败，别部帅白广平、屠各路那罗等义军首领相继牺牲。由于官军的强大攻势，盖吴领导的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屠各部族叛变，盖吴率部平叛，被突然飞来的流矢射中，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盖吴的弟弟吾生率余众转入木面山，躲避官军围剿，欲保存力量，伺机再起。这时，义军残众屡屡受挫，士气低落，不久，被入山的官军击溃，关中盖吴起义被镇压。自北魏建国到统一北方，这期间最大的一次胡汉部民起义失败了。

盖吴起义，聚集了关中各种反抗北魏统治的政治力量，包括匈奴卢水胡、屠各种和氐、羌等胡族部民，还有汉族人民，给了北魏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而且，这次起义还与河东地区的薛永宗领导的起义联合起来，相互配合，互为声势。薛永宗是迁居河东

的蜀人，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与宗人薛安都聚众起义，夺得官马数千匹，率领三千多人转战于汾水之曲，薛安都又率兵袭取了弘农城。次年，盖吴在关中起义，薛永宗派人与盖吴取得联系，盖吴任命永宗为秦州刺史。两支义军连衡抗击官军。在盖吴义军节节胜利的同时，薛永宗也率军打败了魏将周鹿观。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督大军赶至东雍州（今山西新绛），进围薛永宗营垒，永宗战败，部众全部壮烈牺牲于汾水河畔。薛安都见官军来势凶猛，料及众寡不敌，于是率部投奔了南朝宋。拓跋焘在扑灭了薛永宗起义烈火之后，这才挥师入关，镇压盖吴起义。

盖吴起义虽然失败，但关中、河东一带胡汉各族人民反抗北魏统治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太平真君七年底，安定卢水胡刘超又聚众一万多人，举兵反魏。魏将陆俟率军镇压，起义失败。次年（447）正月，吐京胡和山胡曹仆浑又接连起兵攻打北魏郡县，不久又相继被官军镇压下去了。

关中卢水胡屡屡起义反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怀疑这事与前北凉降王沮渠牧犍有牵连，因为沮渠牧犍也是卢水胡种。再说，北凉与拓跋氏原有姻亲，太武帝拓跋焘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牧犍为妻，又娶牧犍的女儿为妃嫔。牧犍并不爱北魏的公主，以后北魏灭北凉，沮渠牧犍作为亡国之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私生活上，都与拓跋氏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据《魏书·沮渠牧犍传》记载：牧犍十分喜爱他的嫂嫂李氏，经常与李氏淫通，李氏因姿貌端丽受到沮渠牧犍兄弟三人的爱幸，李氏与牧犍的姐姐合伙想毒死北魏公主，未果。北凉亡国前夕，沮渠牧犍又让人撬开府库门锁，盗取大量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事后，也不封闭库门，让百姓随意取拿，府库被抢劫一空。北魏灭北凉后，派人调查此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太平真君八年（447），拓跋焘以此为罪责，想惩治沮渠牧犍。这时，又有人告发沮渠牧犍家里窝藏大量

毒药，经常偷偷将人毒死，沮渠氏姐妹都会左道，常常集体裸露淫奸。当初，罽宾有位和尚名叫昙无谶，东行到鄯善，自称能使鬼治病，令妇女多生儿子，与鄯善王的妹妹私通，事发，逃奔到凉州，受到沮渠蒙逊的宠信，称他为“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女，沮渠氏诸女及儿媳都曾受法。拓跋焘听说这事，十分羞怒，立刻将昭仪沮渠氏（沮渠蒙逊的女儿）赐死，又诛灭了她的家族。正当拓跋焘盛怒之际，又有人告发沮渠牧犍与故旧臣僚通谋叛变，于是又将沮渠牧犍赐死了。由于北魏的屠杀镇压，卢水胡人的势力从此衰落了。

（牛润珍）

参考资料：

《宋书》：《索虏传》、《薛安都传》

《魏书》：《太武帝纪》、《沮渠牧犍传》

《资治通鉴》卷 124、125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魏太武帝灭佛

魏太武帝拓跋焘是明元帝拓跋嗣的长子，母亲为杜贵嫔。天赐年间（404——409），生于平城东宫。长大后，体貌环异，膀宽腰圆，面带几分凶煞气。他的爷爷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看见这位孙子，又奇又喜，说："成吾业者，必此子也。"泰常七年（422）四月，封泰平王，五月，被立为太子，监国，亲理政事。八年（423）十一月，即皇帝位。

拓跋焘即帝位后，北破柔然，西败夏王赫连昌，攻取了长安、统万等城，并于神麢元年（428）俘虏了赫连昌。太延二年（436），攻占龙城，灭北燕冯氏。五年（439），攻取凉州，灭北凉，俘沮渠牧犍。西凉李嵩的孙子李宝曾奔据伊吾，复东取敦煌，后又投降了北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中国北方，并进攻南朝宋，临长江，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瓜埠山）而退。从此形成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

拓跋焘继祖父之业，锐志武功。在宗教方面，起初也是像其祖父一样，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兼容佛教。道武帝拓跋珪笃信道教，喜好《老子》一书，反复诵读，不知疲倦。天兴年间，仪遭郎董谧向他献上《服食仙经》数十篇。他又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乞求长生不老。同时，拓跋珪又不触犯佛教，道、佛并蓄。皇始年间，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看见沙门、道士，都很尊敬，禁止军旅无有所犯。拓跋珪好黄老，又颇览佛经，还时时注意招揽名僧。有位

和尚叫僧朗，与他的徒弟隐居在泰山的琨瑞谷，拓跋珪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和缯、素、旃罽、银钵等礼品，去召他。后来人们称僧朗隐居的山谷叫“朗公谷”。天兴元年（398），拓跋珪下诏，说：“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就在这一年，他在京师平城建造了第一座五级佛塔，还有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另外构筑讲堂、禅堂及沙门座等。以后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即位，遵从太祖拓跋珪之遗绪，也好黄老，又崇佛法，京城及四方州郡，都建有佛寺，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一些名僧还接受了北魏皇帝的封号，甚至被任用为官吏。早在皇始年间，赵郡有一位和尚叫法果，演讲佛经，修行到了一定程度。拓跋珪闻其名，诏以礼征召他赴京师。后来，封他作了官，让他专门管理佛教事务。到了拓跋嗣时，他倍受崇敬。永兴年间，前后授他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号，都被他谢绝了。拓跋嗣还亲临其宅，见他的宅门狭窄，舆辇不能通过，于是下令拆掉扩建为大门。法果活了80多岁，至泰常年间病死。拓跋嗣三次亲临其丧吊唁，追赠他为老寿将军、赵胡灵公。法果生前常常称赞太祖拓跋珪明睿好道，是当今的如来，号召佛教僧众宜应尽礼，经常礼拜。他逢人便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40岁时，才受戒当了和尚，这时他已是有子的父亲了。他死后，由他的儿子猛袭受其爵号。拓跋嗣还曾巡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有一沙门名叫昙证，年将百岁。他在路旁邀请这位老和尚过来相见，送给他一些果物，敬其年老智力不衰，也加他老寿将军的封号。

拓跋焘即帝位后，仍然礼敬佛教，时常把一些有名望的和尚召来，谈论经法。每年四月八日是浴佛节，和尚们抬着佛祖塑像，行于广路，拓跋焘登临皇城门楼，兴致勃勃地观看，还亲将

一束束鲜花撒下。

北凉沮渠蒙逊在凉州（治姑臧，在今甘肃武威县），喜好佛法。有位来自罽宾（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和尚名叫昙摩谶，习诸经伦，在姑臧与沙门智嵩等人，合译《涅槃》等经卷十多部。他又通晓术数，历言他国安危，多能应验，蒙逊每以事咨访他。神䴥年间，拓跋焘命蒙逊送昙摩谶到平城，蒙逊不愿给，又怕得罪北魏，于是派人杀了昙摩谶。太延年间，北魏平凉州，曾迁徙大量僧众到平城。平城的沙门弥增，太武帝因和尚的数量太多，下令50岁以上的和尚还俗为民。

太武帝拓跋焘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惠始本姓张，祖籍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人氏。他听说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新经，亲赴长安观习经典，坐禅于白渠北，白天入城听罗什讲经，晚上回到居处静坐。他有一副修炼真功，长安一带的僧众多拜他为宗师。刘裕灭了后秦姚泓，让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义真及僚佐都非常敬重惠始。后来，匈奴赫连屈丐占据长安，坑杀沙门，惠始身遭白刃，而体不伤，众人十分惊异，言于屈丐。屈丐大怒，把惠始召到面前，手握宝剑猛刺惠始，惠始紊然不动。屈丐认为遇上了真神，胆战心惊，扔掉手中的宝剑，连忙谢罪。北魏灭西夏，统万（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平，惠始迁居平城，受到拓跋焘的礼敬。惠始自从修炼禅法以来，一直到死，五十多年，不曾寝卧。有时光着脚走路，即使泥泞的道路，也不能污其脚，甚至更加白净，世号称他为白脚师。太延年间，他坐化于平城内八角寺。临终前，洗浴整洁，然后端坐于莲座，溘然而去，停尸十余日，坐既不改，面色如一。遂埋葬在寺内。太平真君六年（445），朝廷规定京城内不准殡葬亡者，于是沙门把惠始改葬于南郊之外。这时，惠始已死去十年了，尸体仍为端坐状。惠始的修炼真功，征服了成千上万的人，迁葬那天，六千多人自愿为他送葬，中书监高允为创作传，颂扬他的功德。佛门弟子还在他

的冢墓上建造石精舍，图绘他的形像。到太武帝灭佛时，仍完好无损。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礼敬佛教，目的是为维护其统治，利用佛教导治民俗，服从拓跋氏的政治主张。其实他本人并不迷信佛教，对于佛教经典，更是不屑一顾。

到了始光初年（424)，天师道新教的创始人寇谦之到平城求见拓跋焘，献上《录图真经》六十多卷，他假托受老君之命，传播道家真经，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真经是用古文字写成的，字形像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婉而有章。共内容大致与儒家倡导的礼相吻合，选择贤良，推崇德望，人生于世，“信”为第一重要，其次是“勤”。又将整个宇宙分为上仪、下仪，在二仪之间，存在有三十六层天，中有三十六宫，每宫都有一主，主宰一层天。并把太武帝拓跋焘说成是主宰一层天地的太平真君，让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还要修身炼药，学长生不老之术，这样才能成为真君的种民。寇谦之的演说，太武帝越听越人耳，把他留住在平城，好生款待。朝野上下闻听，也都被寇谦之虚虚实实、天花乱坠的说教，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有的点头，有的摇头。只有崔浩觉得谦之谈吐不凡，于是拜他为师，受其法术。浩又上书给太武帝，赞明其事，说：“臣闻圣王接受天命，会有大征兆。而《河图》、《洛书》，都是借助虫兽之文表述微言大义。不曾像今天这样人与神接对感应，手书字迹明明白白，辞义深妙，自古无比。过去汉高祖虽再英圣，天下人还有的看不上他，并不为他的权威所屈服。今天拥有清德的隐仙，不召自至。这真是陛下步轩辕皇帝后尘，顺应上天的兆头，怎么能凭着世俗常谈，而忽视上灵的命令。臣心里于此颇感忧惧。”拓跋焘阅罢，不觉喜上眉梢，派人带着玉帛、牲牢，祭祀嵩岳，将寇谦之留居山中的弟子全都迎到平城。从此，太武帝因清静无为，一心想得道成仙，崇奉天师道教，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待嵩

山道士四十多人来到平城，拓跋焘在京城东南建天师道场，按照道教新经的规定，筑起重叠五层的道坛。这时，平城的道士有一百二十人，衣食都由官府供给，道士的斋肃祈祷，六时礼拜，每月开一次厨会，每次都有数千人参加。

太武帝拓跋焘崇信道教，对佛教越来越疏远了。再者，司徒崔浩是拓跋焘军国大事得力谋士，他本不信佛，自寇谦之来到平城后，拜谦之为师，更加讨厌佛教，常在拓跋焘面前非毁沙门，说这些佛教徒天天诵念些虚诞的佛经，不事生产，白白浪费了许多粮食。崔浩能言善辩，拓跋焘为之折服。

拓跋焘欲出兵西夏，讨伐赫连昌，太尉长孙嵩认为此举无取胜的把握，不同意出兵，拓跋焘问计于寇谦之，谦之说："必克。陛下神武正应期天命，若得天下长治久安，应当以兵充九州，先武后文，以成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三年（442），寇谦之奏言拓跋焘说："现在陛下以真君的身份御临天下，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不曾有。应登临道坛，接受上天的符书，并以此显示圣德。"拓跋焘听从了寇谦之的意见，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治备法驾仪仗，旗帜尽用黑布制成，服从道家的颜色。太子拓跋晃信从佛教，他听说寇谦之要造静轮天宫，想难为他一番，命令他必须将天宫建得很高，人站在上面听不到鸡鸣狗叫，这样，皇帝才能与天神交接。但工程耗消功役万计，经年不成。这时，拓跋晃对父皇拓跋焘说："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要修造无以休止的工程，干些不能干的事，费损财力，百姓疲劳，能否停下来？如果一定要建造天宫，不如因东山万仞顶峰为基，建造起来也较容易。"拓跋焘听了，点点头。但因崔浩赞成寇谦之的计划，拓跋焘难违其意，沉吟良久，说："朕也知这项工程不能成就，事情既然如此，还在乎那三五百个功役呀。"

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聚众起义，关中震动。第二年正月，拓跋焘亲率大军镇压。及至长安，城内

有一大寺院，院内种有大片麦田，时值隆冬，草木干枯，只有这麦田里麦苗青青。拓跋焘的马卒牵着皇帝乘坐的御马来到麦田牧马，拓跋焘带领随从入寺观马。和尚们搬出酒来招待随从官吏，一些官吏在寺中闲逛，来到和尚们的便室，忽然发现这里堆放着许多弓箭矛盾，出来报告了拓跋焘。焘听罢，大怒，说：这不是沙门使用的东西，他们必然与盖吴通谋，谋害官兵！命有关部门案验，将寺内和尚全部诛杀，并没收了寺内一切财产。在清点财产时，获得了大批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在寺内的财物，约有万件。还发现寺内的地下室，和尚在这里与贵室妇女私行淫乱。拓跋焘对沙门干的非法勾当忿恨不已。这时，崔浩随太武帝出征，谋划军政，乘机向太武帝进言灭佛。拓跋焘听从了他的意见，颁布诏令，诛杀长安城内的和尚，焚毁佛像、佛经。还派人到各州郡，令一依长安行事，将境内沙门斩尽杀绝。后又下诏，说：

“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魏书·释老志》）。

这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留守京城处理朝政事务。他向来礼敬佛教，得到父皇诛杀沙门的消息，派人到长安，频频上表给拓跋焘，陈述各地滥杀沙门的情状，申诉佛像无罪。劝拓跋焘不要诛杀和尚，建议罢废其道，杜绝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三次上表，都遭到拓跋焘的拒绝。于是又下诏说：

“昔后汉荒唐，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

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神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释老志》）。

这时正是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太子拓跋晃有意袒护沙门，嘴里喊着不用佛道，却迟迟不公布太武帝的诏书，并放出风来。太武帝灭佛的消息不胫而走，使远近的和尚预先闻知，早做准备。四方州郡的和尚，走的走，散的散，多免遭于难。京师平城的和尚，也蒙全济。金、银佛像及诸经论多被秘密转移，坚壁起来。而土木宫塔及大型教具，因无法掩蔽，全都被毁。

太武帝拓跋焘西征时，寇谦之与崔浩同行随驾。崔浩建议灭佛，谦之私下见崔浩，苦苦谏诤，劝他做事不得过分，崔浩不听，两人僵持不下，于是告诫他说："您这样行事，催促皇上诛杀沙门，也等于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死路，是要灭门户的呀。"后来，国史案发了，崔浩被诛。这时，太武帝拓跋焘对灭佛的事有些后悔了，但事情已做出来，也难以收复了。太子拓跋晃暗中想复兴佛教，但不敢明言。北魏正平二年（452），拓跋焘病死，佛禁逐渐宽弛，笃信佛教的人又开始活动起来，他们偷偷地穿着法服，诵念佛经，起初只是秘密活动，后来逐渐公开了。

拓跋焘下令灭佛，佛教沦废前后约有七八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佛教信仰并没有被彻底扼制，一些沙门仍秘密从事佛教活动。名僧昙曜很有操尚，曾受到太子拓跋晃的礼敬。太武帝灭佛，许多沙门还俗，自找生路去了。昙曜欲誓死守道，拓跋晃亲加劝说，反复再三，动员他还俗，免遭屠诛，不得已，昙曜这才

脱下袈裟，蓄起了长发。但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曾离身。佛禁稍解，昙曜又公开事佛了。

北魏高宗拓跋濬即位，遂解佛禁，下诏说：

“今制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魏书·释老志》）。

此后，往时所毁图寺，重又修复起来，佛像经论，尽得复显，佛教又兴盛起来。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释老志》、《世祖纪》、《崔浩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冯后临朝

北魏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她的父亲冯朗，曾任秦、雍二州刺史，西域郡公，母亲为乐浪（治棘城，今辽宁义县北）王氏。冯氏生于长安，当她出生时，人们谣传说她诞生的那间屋宅曾有神光闪烁。她的父亲因犯罪被诛杀，冯氏被没入宫。北魏太武帝的左昭仪是冯氏的姑姑，温柔贤慧，抚养冯氏成人。她 14 岁那年，拓跋濬即位，即文成皇帝，选冯氏为贵人，后来又立她为皇后。北魏和平六年（465），拓跋濬病死，按北魏传统，国家有大丧，三天之后，皇帝的日用衣服车辇器物需全部烧掉，百官及后宫齐集现场哭泣，当汹汹大火燃起，场内一片哀恸，皇后冯氏悲叫着投身火中，欲自焚来表示对丈夫文成帝的忠贞，左右的人急忙把她从火中拉出，经过及时抢救，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苏醒过来。

文成帝拓跋濬死后，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显祖献文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这时，拓跋弘才 11 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朝政被车骑大将军乙浑把持。乙浑欲独专政事，假造皇帝诏书，惩办了那些不顺从自己的大臣，先后在禁宫中杀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侍中司徒陆丽从汤泉（在平城）入朝，乙浑又命甲士将他捕杀。乙浑斩戮异己，使朝廷上下震慑。傀儡小皇帝封他为太尉、录尚书事。和平六年七月，乙浑又升任丞相，位居诸王之上，朝廷事无大小，都由乙浑决断。乙浑为了巩固自己的独擅地位，把小皇帝与百官隔绝，自己居中

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朝臣敢怒不敢言，且又无计可施。殿中尚书、顺阳公拓跋郁受不了乙浑的气，于是召集起殿中卫士数百人，亲自率领，由顺德门直奔朝中，欲诛杀乙浑。乙浑惧，硬着头皮走出来，问拓跋郁说："君入宫，想干什么?"郁回答："不见天子，群臣忧惧，今求见主上。"乙浑脸都吓白了，颤抖地对拓跋郁说："今先帝在殡，天子刚刚登基，所以还未来得及接受百官的朝贺，诸君有何疑虑?"于是奉拥显祖拓跋弘临朝。百官见了新皇帝，对乙浑的怨气多少缓和些。后来，乙浑图谋不轨，想废掉拓跋弘，另立皇帝，受到群臣的反对。顺阳公拓跋郁与宜都王目辰商议，谋诛乙浑。乙浑事先有所察觉，先下手为强，派武士捕杀了拓跋郁，目辰逃匿得免。

北魏天安元年（466）正月，丞相乙浑谋逆的事件已经败露，朝廷上下十分气愤，侍中元丕把这些事奏闻冯太后。太后密定大策，诏命元丕率元贺、牛益得等人逮捕了乙浑，并处于死刑。冯太后诛乙浑后，遂临朝听政。这时，冯氏才 24 岁。

北魏献文皇帝皇兴元年（467），献文帝的李夫人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冯太后非常喜爱这棵幼苗，躬亲抚养，从此罢令，不听政事，临朝一年，又将朝政还给了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元宏被立为太子，按照北魏的制度，儿子被立为太子，生母即被赐死。李夫人死后，元宏完全由冯太后养育成人。冯氏虽退位，但朝政大事仍时时过问，献文帝常常抱怨她的限制，皇帝与太后的矛盾出现了。在个人生活方面，冯太后年轻守寡，忍受不了深宫中的寂寞，而且鲜卑拓跋氏男女习俗又比较自由，于是悄悄地爱上了身边的侍从官吏李奕。李奕常在宫中陪伴冯氏，时间久了，事情被张扬出去，献文帝非常难堪，借故把李奕杀了。冯氏失去了李奕，很不得意，十分恼恨献文帝。从此，两人的矛盾加剧了。冯太后千方百计掣肘献文帝，献文帝针锋相对，凡冯氏喜欢的人，他都厌恶疏远；冯氏不喜欢的人，他

却常常加以重用。如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镇将薛虎子，先前曾被冯氏贬黜为守门卫士，献文帝起用他作了镇将。但献文帝的阅历毕竟还浅，自然斗不过冯氏，于政事拱手不得有为，并且几次差一点被废黜。因此，心灰意冷，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进而又染上了“黄、老、浮屠之学”的嗜好。在他即位的第六年，即延兴元年（471），不得不禅位于他的刚满4周岁的皇太子元宏，自己作了个18岁的太上皇。但冯氏并没有因此放过他，在他退位不久，冯氏于宫中埋伏壮士，待他入宫时，突然捕杀了他。

孝文帝元宏即位，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这时孝文帝还不满5岁。冯氏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便不再还政了，直到太和十四年（490）身死，她临朝二十年之久。在太和十四年以前，孝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国家大事都是由文明太后作出决定。正像《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所说的那样：“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冯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办事很果断，生杀赏罚决之于俄顷。因此，威福兼作，内外震肃。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人原都是出身微贱的阉宦，不到一年，都被冯氏提拔到王公的官位上。王睿经常出入太后卧内，几年的功夫，官至宰辅，还得到了数以亿万计的财帛赏赐及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于帷幄，密加赏赐，不可胜数。但冯氏御下非常严明，即使是自己宠爱的官吏，也是十分严格，不使他们任纵，左右的人稍有不是，即动加杖责，多至百余，少则数十。然她又不抱成见，允许臣下改过，又待之如初，甚至更加宠信。因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对外，冯氏礼重民望元丕、游明根等人，颁赐金帛、舆马。她每次褒美王睿等，都引元丕等人参加，以示无私，她不但对臣属严厉，甚至连孝文帝也是如此。有一次，一位宦人在冯太后面前说

了孝文帝的一些坏话，冯氏大怒，杖打孝文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冯太后御下有方，赏罚严明，用人也很有政治眼光，她尊重的游明根，是北魏的一代宗师；李冲是著名的政治家，孝文帝一代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参与谋划。

由于冯太后善用人，制定了一条比较适宜的组织路线，从而保证了在其执政期间几次重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是均田制和三长制。均田制是太和九年（485）实行的，这时候冯太后临朝，均田制度的制定与颁布都和冯氏有关。和均田制相辅而行的三长制，就是由她主持，经过讨论，经她裁决而施行的。《魏书·李冲传》说："高祖初，（冲）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谬。'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唯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这说明北魏"三长制"，是李冲提出建议，文明太后召集御前会议，进行讨论，最后在她的决断下实行的。同样，均田制也

是这样决定的，到了孝文帝执政时，严格执行了文明太后的既定方针，进一步推广这一土地制度。

其次，推行汉化政策。文明太后是汉人，她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是北燕王国的国王。北魏灭北燕，他的父亲冯朗投降了拓跋氏，被派往长安作州刺史。文明太后生在长安，从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冯朗被诛后，她入宫受到姑母的教育，又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汉族文化在她的头脑中有很深的烙印。因此，在她临朝期间，积极倡导汉化，推行民族改革。太和七年（483年），在她的主持下，即曾下诏禁止拓跋氏同姓为婚。《北史·帝纪·高祖孝文帝纪》记载说："（太和七年十二月）诏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政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自今悉禁绝之。有犯者，以不道论'。"

拓跋氏入主中原以前，男女婚姻关系比较紊乱，父子、兄弟共妻，兄弟姐妹为婚。婚姻关系又比较开放、自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因此，王室宗氏多有不少荒唐事。入主中原以后，鲜卑遗风也没有多大改观。为了改造拓跋氏鲜卑旧习，移风易俗，文明太后首先从禁止同姓婚姻着手，推行汉化政策。当然，同姓为婚在鲜卑拓跋部族中已根深蒂固，文明太后虽有一纸诏书，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孝文帝执政后，实行比较彻底的民族改革，禁同姓婚，禁止使用鲜卑语言、服装等，提倡与汉族大姓联姻，讲汉语，着汉服等，汉化改革成效卓著。

冯太后的个人生活比较朴素，衣着不好华饰，膳食粗淡。她对待身边的佣人也比较宽厚，颇受"下人"的爱戴。《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后）性俭素，不好华饰，躬御缦缯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径尺。羞膳滋味，减于故事十之八。太后尝以体不安，服庵闾子。宰人昏而进粥，有蝘蜓在焉。后举匕得之。帝时侍侧，大怒，将加极罚，太后笑而释之。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于平城皇宫太和殿，时年49岁，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大同东北）。她生前曾预作遗命，后事一切从俭。这可从《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所载孝文帝的诏书中反映出来："尊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仰损俭训之德，进退思唯，倍用崩感。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奄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步。今以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孤负遗旨，益以痛绝！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具奉遗事。而有从有违，未达者或以致怪。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已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其余外事，有所不从，以尽痛慕之情。其宜示远近，著告群司，上明俭诲之美，下彰违命之失。"

冯太后生前节俭，又反对死后厚葬，遗嘱墓内不置随葬品，墓室二丈，坟陵不得超过三十步。按照北魏的惯例，这仅仅是一位普通官吏的规格。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一片孝敬之心，违背了冯太后的遗命，将坟地扩展为六十步。这对于一位临朝称制太皇太后来说，也是够薄俭了。

冯太后死后，孝文帝非常悲哀，连续五天不吃不喝，又绝酒食，三年不与后宫后妃同居。他还在文明太后永固陵东北一里多的地方预先营建自己的寿宫，准备死后葬在这里陪伴冯太后，及迁都洛阳后，又在瀍涧西建造山园，为方山冯太后虚宫，号称"万年堂"。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继续文明太后的未竟之业，实行大规模的汉化民族改革，推广均田制、三长制，迁都洛邑，制定一系列汉化措施，使北魏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何兹全：《北魏文明太后》

北魏均田

北魏早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由游牧业开始向农业转化。登国元年（386），拓跋珪称代王后，主张“息众课农”，下令解散原来的氏族组织，使氏族成员分土定居下来，而且不准他们随便迁徙，使他们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编户齐民。接着，又使东平公元仪率领部落成员和掠来的汉人，垦辟黄河以北的沃田，自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到固阳塞（今内蒙古固阳）外，实行屯田。这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地里的庄稼没有多少收成，粮食缺乏一直是北魏的一大难题。皇始二年（397），拓跋珪进攻中山时，由于士卒饥饿，不得不停止战斗，只得接受崔逞的建议，收取桑椹以充军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拓跋珪攻克后燕都城中山后，将太行山以东的吏民及鲜卑慕容、高丽、杂夷以及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多万人口迁徙到平城一带，分配给他们耕牛，按户口多少授予田地。天兴初（398），拓跋珪又划定京畿范围，以都城平城为中心，东到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西至善无（今山西右玉东南），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西南），南极阴馆（今山西朔县东南夏关城），为畿内田地。京畿之外，又分四方八维，设置八部帅监督，劝课农桑，每年年终，评比各部农业生产情况，经营好的受到奖赏。以后，北魏的许多皇帝都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动了不少心思。永兴元年（411），太宗拓跋嗣发布诏书，说：“若不夫耕妇织，内外相成，怎么能做到家给人足。”于是放出许多宫女和手工女工，婚配给民间娶不上妻室的

男子，加强农村劳动力。拓跋嗣还将破获的越勒倍泥部落二万多家，迁徙到大宁川（今河北张家口市沿大清河一带），给他们农器，按人口分配土地。恭宗拓跋晃作太子时，还制定了一项人力牛力换工互助的制度，解决农民耕牛缺乏的问题。这项制度规定：官府有关部门掌管人、牛换工事宜，没有耕牛的农家与有耕牛的农家可以换工，从事垦植锄耨等农活。有牛的农家给无牛的农家种田二十二亩，无牛的农家可为有牛的农家锄七亩田作为报偿，双方换工，以此为标准进行折算。至于有牛的农家给老少病残缺乏壮劳力的无牛农家种田七亩，可锄二亩地作报偿。各户农家一律按五口下贫家为标准。同时，还将各家家别、人口数、所劝种顷亩数，明立簿目。各户在自家地头插上牌子，写上自己的姓名，以此辨别各家的种植之功。还明文禁止饮酒杂戏、弃农经商的人，于是垦田数量大大增加。高宗拓跋濬也曾一再鼓励农耕。高祖孝文帝元宏希望做到“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布外，桑妇内勤”，勿使人有余力，地有遗利，还分割畿内田亩给百姓耕种。经过几代皇帝的经营，平城京畿一带分割田地，计口授田，人牛换工互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一次，高祖元宏和文明太后冯氏召集王公以下的大臣议事。高祖问众人说：“近年来，方割畿内及平城三部的田亩给百姓耕种，效益如何？”大臣公孙邃说：“先前民人离散，主司官吏泛滥，至于督察工作，实难整齐划一。自方割以来，各种租赋容易办理，实在大有益处。”太后接过话茬说：“别人多说无啥益处，您说的话是符合实际的。”

尽管北魏许多皇帝十分注意农业生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粮食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而且社会上还出现了许多怪现象：一方面大量土地荒芜，民缺衣粮；另一方面大批丁壮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且土地的占有，十分悬殊，多者方圆数十里，少者无一丝一厘。官府的土地制度又很不完善。到了孝文帝当政

时，这些矛盾更加严重，成了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在土地兼并方面，早在太祖拓跋珪时，鲜卑贵族就广占良田。和毗在灅水以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世祖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也营立私田，畜养鸡犬。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广封良田，划置禁苑，不准百姓耕种。因此，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境）民联名上书北魏皇帝，指出贵族苑囿过度，百姓无田业，乞求朝廷裁减大半苑地，赐给贫民耕种。北魏统治者还大量圈占土地为牧场，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浮游流散。汉族地主也广占田川。如赵郡大族李灵的孙子李显甫，以豪侠著称，聚集本族李姓数千家于殷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西山，开李鱼川，方圆五六十里，并占据这里，显甫还被推崇为宗主。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兼并土地，被兼并土地上的原有农民或逃亡在外，成为浮游人户；或成为贵族豪门的依附、荫庇户口。从而使北魏政府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和纳税户，形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再者，水旱灾荒。北魏京畿地处北地，所辖主要地区在海河流域和内蒙古高原。这些地区，灾害频繁，水旱饥荒时常发生。太宗拓跋嗣因平城大饥，还曾打算把都城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去，从孝文帝元宏即位到施行均田的十五年中，就有十年许多州郡遭遇贱年，大小灾饥，几乎年年有。具体到各州镇，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北魏脆弱的封建自然经济根本经不起水旱灾害的打击，每遇饥荒，大批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以致卖儿鬻女，形成浩浩荡荡流民潮。此外，还有一部分流浪人口是拓跋部的氏族成员，他们没落破产，无田无业。

粮食严重短缺，农业生产萎缩不前，流浮入口和贵族荫附入口越来越多。早在世祖拓跋焘时，京师平城就出现了大批游食者，到了孝文帝元宏颁布均田令时，“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麒麟传》）。京师如此，地方州镇

的流浪人户应当更多。这么多的流浮人口不事田业，但他们仍需衣食，为了生计，卑躬乞讨，乞讨不得，只有铤而走险，聚众起义，劫富济贫。北魏朝廷对流民问题很是头痛，一再下令说："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流迸之民，皆令还本，违者配徙边镇"(《魏书·世祖纪》)。尽管三令五申，但收效不大。而且，还有一大批流浪人户转投豪强大族，成为荫附私口。北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家三十家为一户，谓之"荫附"(《通典·乡党》)。后来，这种荫附户口越来越多。孝文帝元宏曾遣使者十人，巡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而青、冀、定、相、东青等五州，民户殷多，但编籍不实，一次就检括出隐漏户口十多万户。加上其他州郡检括出的户口，还有未检括出的户口，可见其数目不是小数，这么多的荫附人户为豪强耕作，贡赋尽入私门。这样，国家的编户齐民成了私人的庇荫，赋税又被截留，政府的财政自然入不敷出。

为了抑制豪强兼并，解决人口流浮问题，扩大政府的编户齐民，在国有土地上重新编置劳动人手，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北魏大臣李安世向孝文帝上疏，建议实行均田。《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记载了这件事，说："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居，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

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经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

"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李安世在自己的疏文中，列举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牵扯到封建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很识时机地提出了均田的建议，受到了孝文帝元宏的高度重视。于是在太和九年（485）十月，颁布了均田令。《魏书·高祖纪》说：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

均田制的内容和具体实施办法，《魏书·食货志》曾有这样的记载：

关于受田的对象、受田的种类和数量，规定如下：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若土地宽余，授田数可增加一或二倍，供作休耕。诸民够年岁就授给田地，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及死亡，政府收回田地另行分配。而桑田不在还受之限。

初受田的人，男夫一人给二十亩桑田，"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植完毕，否则，政府将土地收回。按照北魏政府的规定，桑田可算做倍田数。

适宜种麻的田地，够年龄的男夫一人另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至于老弱病残无壮劳力的农户，年11以上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70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然免除课赋，也受妇田。

诸民有新立或新迁户，三口给地一亩，作为宅基地。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15岁以上，适当给二分菜地。

关于田地的还授时间，规定为：每年正月，还授民田，诸民有刚受田不久就死亡的，以及买卖奴婢、牛者，须等到明年正月，才能得以还受。

田地买卖也有规定：桑田为世业田，子孙可以继承。桑田多余的农户不受不还，不足的人家政府不再补加，“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关于宽乡、狭乡、迁徙和借荒的规定为：土广人稀的地方，民户除按规定受田外，还可根据自己的力能所及，向官府借种荒地。后来迁居的民户，依法受田。人稠地狭的地方，不愿迁往宽乡的农户，正田还受不足，可以桑田、倍田相抵；又不足，可减少受田数。愿意迁徙的人家，允许他们逐垦空荒，不限异州他郡。若田地绰余的地方，居民不得无故迁徙。

政府对于各类田地统一划分，规定正田和倍田不能相混杂，新丁受田，就近封授，如果同时有许多新丁受田，先贫后富。再倍之田，也仿效此法。

所均之田，主要是公田，除国有的空荒田地外，“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

关于官吏受田，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从均田制有关规定看，授田种类主要有五种：露田、桑田、麻田、住宅地和二分菜地。露田、麻田有还有受，农民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必须按所受露田、麻田数向政府交纳租税。桑田

和宅基地可世袭私有，每户按一夫一妇计算，所受露田、倍田、桑田合在一起共一百二十亩。实际上，北魏均田多达不到这样高的水平，受田不足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北魏政府对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作了严格限制，防止大族强买豪夺，抑制土地兼并。然虽有明令禁止，但土地兼并的情况并未终止。再者，对于受田的奴婢数目，没有明文限制，贵族官僚，豪强地主仍可以通过大量的奴婢，来占有广大的田地。均田制并没有触动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均田制的实施首先是从旧京平城开始的，以后推广到四方州郡。在均田制颁布之前，北魏就曾“方割畿内”田地给百姓耕种。均田令颁布后，孝文帝元宏又下令罢去平城的山北苑，以其地赐给农民耕种。迁都洛阳后，北魏又将均田制推行到新京。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说：“京民始业，农桑为本，田稼多少，课督以不，具以状言”（《魏书·高祖纪》），催促京畿官吏向朝廷汇报洛阳地区的均田情况。元恪在洛阳，还一再将皇家的苑牧公田，分赐给从代都迁来的民户。当然，均田制的实行有先有后，而且程度也不一样。实施得比较好的主要有恒、燕、幽、定、冀、相、司等州。尤其是定州，州刺史元澄在均田制推行过程中，还因地制宜，修订实施办法，“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甚有纲贯，大便于时”。（《魏书·任城王云传附之澄传》）

北魏均田制的实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兼并。如太仆卿杨椿，招引佃户，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被朝廷查处；大臣崔暹因侵夺田产被免官；华州刺史杨播在州，借民田，被御史王基揭发检举，朝廷撤销了杨播的官爵。杨椿还因与华州民史底争田吃官司，经有关部门判决，杨椿将田退给了史底。

第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北魏通过均田，使大批浮游人户重新回到田地里，垦辟、耕作，扩大了耕地面积，增

加了农业投入，提高了粮食产量，人民的衣食问题在许多州郡基本得到了解决。元宏、元恪之际，"国富民康"，"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这些都是北魏前期所不曾看到的现象。

第三，北魏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均田制实行后，更多的劳动人手被束缚在官田荒地上，农业得到开发，政府的赋税增加。冀州刺史元晖在州检括丁户，让民户自报丁口，不得隐瞒，以前曾隐瞒丁口不向官府缴纳捐税者，必须补缴，一次就得到五万匹绢。仅冀州一州就如此，至于全国，为数就更多了。租调增多，官府库藏暴满。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了肃宗、灵太后胡氏执政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灵太后胡氏让百官在库藏背绢，根据体力，任意自取，所背绢全归自己。于是百官一个个施出浑身的力气背，章武王元融与陈留侯李崇因背得太多，摔倒在地，把脚歪了。太后见他二人太贪婪，于是没收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回。元融、李崇因此受到众人的耻笑。而侍中崔光，仅取两匹。太后问："侍中为何取这么少?"回答说："臣只有两只手，两匹足够多了。"朝贵都佩服他清廉。库藏这么富足，这当然和均田制的实施、农业生产发展有关。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高祖孝文帝》、《食货志》、《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

《洛阳伽蓝记》卷 4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北朝土地制度史》

魏迁洛阳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因平城气候严寒，甚至六月天气，雨雪交加，冬春之月，风沙弥漫，盘算着迁都洛阳。但他又怕群臣反对，于是召集文武会议，借口大举伐齐，诱胁众僚支持他的行动计划。当众在宫中的明堂设斋，使太常卿王谌占卜问卦，碰上了“革”卦。孝文帝说：“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真是大吉大利。”群臣都不敢言语，尚书、任城王元澄说：“陛下是英明中兴之主，拥有中原，今出师征伐还未臣服于我的南朝齐国，又遇汤、武革命的征兆，不见得都是吉利吧？”孝文帝厉声喝道：“繇曾说过‘大人虎变’，怎么说是不吉利？”澄说：“陛下龙兴登基已久，为何今日才得虎变？”孝文帝满面怒容，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你想阻挠大家呀！”澄说：“社稷虽是陛下的，臣是社稷之臣，岂能知危而不言！”孝文帝默然了良久，遂自解说：“各言其志，何必伤了和气！”

孝文帝回到了后宫，单独召见了元澄，把澄迎入室内，说：“刚才的‘革’卦，现在再与你讨论一下，明堂上的忿怒言论，是恐怕人人争相发言，坏了我的大计，所以声色俱厉，不过是想吓唬一些文武众僚罢了。想必你已意识到我的心意。”于是屏退左右，对澄说：“今日之举，诚非易事。但国家兴起于北方，徙居平城，这是一块用武之地，不是文治的国都。现在要移风易俗，如何进行，这实在太难了。因此，我想迁都中原，您认为如何？”澄说：“陛下想借占卜，说服众人，宅都中土，经略四海，

这也是周、汉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孝文帝说：“北方人常常习惯恋守故土，迁都的事一旦张扬出去，必将惹得他们自相惊扰，这如何是好？”澄说：“非常之事，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到。陛下圣心决断，别的人又敢怎么样？”孝文帝高兴地说“任城，真是我的张良呀！”

六月，孝文帝命人在黄河上建造浮桥，准备渡师击齐。秘书监卢渊上表，想劝阻孝文帝亲征，说：“前世太平之主，不曾亲自统帅六军、决胜于行阵之间，这莫非是说胜利不足以说明主上的武勇，不胜反而损失皇帝的威信？昔魏武仅以弱兵一万，击破了兵众强盛的袁绍；谢玄率步兵三千，摧垮了号称百万众的苻秦。胜负的变化，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不在于兵力的多少。”孝文帝手撰诏书，回答道：“太平之主所以不亲率军打仗，或因天下统一已无敌手，或因懦劣偷安。今日天下还未统一，懦劣偷安则可耻。如果帝王不必亲率兵作战，那么先王有关战车武装的制度还有什么用呢？魏武帝曹操的胜利，主要是仗着天时、地利；苻坚的失败，原因在于其政治失误。难道寡就一定能胜众，弱就一定能制强吗？”丁未日，孝文帝阅兵讲武，让尚书李冲掌管武士的选拔。

九月戊辰，孝文帝率军渡过了黄河。庚午日，到达洛阳。

孝文帝自平城出发，行至洛阳，途中遇上阴雨连绵的天气。到了洛阳后，淅淅沥沥的小雨仍下个不停，孝文帝仍诏命诸军向南进发。他身贯铠甲，执鞭乘马出奔营外，亲督众军拔营。群臣见天气恶劣，难以行军作战，颇有畏难情绪，于是一个个跪倒在孝文帝的马前，请求暂停进军。孝文帝说：“庙算已定，大军就要开拔，诸公还有什么话要说？”尚书李冲等人说：“今天的行动，是天下人所不愿的，只有陛下您要这样。臣不知陛下如此一意孤行，究竟有何打算？我们都悟识到您的意图，却没有得到您的明教，斗胆敢以冒死请示。”孝文大怒，说：“我正要经营天

下，希望天下统一，而你们这些儒生，屡屡怀疑我的大计，斧钺有常，你不要再说了。”说罢，扬鞭策马正要南走。这时安定王元休等人连连叩头，哭着劝阻。孝文帝这才谕示群臣说：“这次兴兵，规模不小。如此大的行动没有成功，怎么向后人交待？朕世世代代居住在幽朔，想南迁中土。如果不南伐，当迁都这里，诸位王公意下如何？赞成迁都的人站到左边，不赞成的到右边去。”安定王元休等相率走到右边，南安王元桢站出来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能停止南伐的计划，迁都洛阳，这也是我们的愿望、苍生的幸运。”群臣全都高呼“万岁！”那些守旧的人虽然不愿迁都，而又害怕南伐，也都不敢言语，孝文帝遂定迁都之计。

李冲对孝文帝说：“陛下准备定都洛阳，宗庙、宫室不可能马上迁来。愿陛下暂时回代都（平城），等群臣将洛阳宫殿建成后，请皇上再携带宫室文物稳稳当当地移临这里。”孝文说：“朕打算巡视州郡，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留住些日子，明年开春再回去，没有必要立即北归。”于是派任城王元澄回平城，把迁都的事告诉留守平城的百官，说：“今天的事才真正是所谓的‘革’，王公应尽心尽力。”

孝文帝因群臣意见不一，于是征求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的意见说：“您意下如何？”于烈回答说：“陛下圣略渊远，非愚浅之人所能揣测，若凭心而论，喜欢迁都的人与恋守故土的人各占一半。”孝文帝说：“您不反对，就是赞成，感谢您不为异意者帮腔。”让他回镇平城，临别，嘱咐他说：“留守平城政务，全都委托给您了。”

十月戊寅日，孝文帝来到了洛阳城西北隅的金墉城，召见了穆亮，让他与尚书李冲、匠作大将董尔主持营建洛都。然后巡视河南郡城，又到豫州，住在石济。乙未日，孝文帝设祭坛于滑台城东，于坛上布置列祖列宗牌位，将迁都的意图祷告祖宗神灵。

又大赦天下，营建滑台宫。任城王元澄曾受命到平城，众人才知道皇帝要迁都，一个个惊恐万状。元澄援引古今历史，详细阐述了迁都的道理，众人这才逐渐明白了。元澄到滑台将平城的变化向孝文帝作了汇报，孝文帝高兴地说："若不是任城，我的事业将不会成功。"

乙巳日，孝文帝派安定王元休带领随从到平城迎取家室。

孝文帝又在邺城西修筑宫室。十一月，移居到邺西宫。

太和十八年（494）正月，孝文帝到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述了四件事：第一，"我私下听说皇上今年夏天不宜巡视三齐地区，应当到中山（今河北定州）去。去年冬天皇上留住在邺，正值农闲时期，犹比屋供奉，不胜劳费。况且蚕麦方急，将何以堪命。且六军涉暑，恐生疠疫，臣愿早还北京（平城），以省诸州供张之苦，成洛阳营缮之役。"第二，"洛阳宫殿故基全都是曹魏明帝时建造的，前世已有人讽刺曹魏建筑工程的奢丽。这次营缮，应缩小规模。再者，近来富室的宅第争相攀比，应趁迁都的机会，作些限制。还要拓宽理顺街道，疏通沟渠。"第三，"陛下回洛阳，仅带数名随从。帝王在宫禁之内还要严密布置宿卫，况且到洛阳还要翻岭越河，沿途那么多危险，怎么不加三思呢？"第四，"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典籍，口答百问，心虑万机，日午而食，夜半才寝，又极为孝顺，涵养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深邃，文章之业每天都有进展。然一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愿陛下放手大胆地任用臣僚，则天下就可以大治了。"孝文帝对显宗的意见颇有同感，多予以采纳。

显宗又上书说："州郡推荐的人，空有秀、孝的名声，却没有秀、孝的实际行动，朝廷仅考察他们的门第高下，却不看他们的品行才能。如果这样，就让有门望的人出来任职吧，何必还要假冒秀、孝之名呢？有门望的人不过是沾了他们父祖的光，这对朝廷有什么用呢？真正有用的人是贤才。如果有才能，即使是屠

夫、无业者、奴隶、俘虏，圣王都不耻于任用为臣；若没有才能，即使是三代帝王之后也只能堕落为皁隶。有人还这样议论：'今世没有奇才，如取有门望的人致仕。'这就错了，怎么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公，就要废掉宰相的官职呢？寸有所长，铢有所重，应通过比较选用人才，这样，贤才就不会漏掉不用。

"再者，刑罚的要领，在于严明适当，不在于苛重。有罪就要受到惩处，就是从轻发落，人也不敢犯法。若让那些犯罪的人侥幸漏网，法律再严，也不足惩禁。今日朝廷内外的官吏，都想邀得一时的名声，争相以严酷刑法为无私，一个赛一个地厉害，形成了官场上的风气。陛下居皇帝的高位，视人如赤子，而有关部门分理各方面的政务，看见下面的人就像仇敌一样。这样就形成上头尧、舜仅一人，而官府桀、纣成千百的局面，皇帝的和气不能通达于民。应当指示百官，多给黎民百姓一些实惠。

"又，过去周迁居洛邑，仍保留了宗周的地位；汉迁东都，又置京兆尹。按照《春秋》大义，建有宗庙的城为都，无者叫邑。况且代京是皇上宗庙、先辈陵墓的依托，王霸之业的根本，尽管还远不是神乡福地，但若把它降到郡国一样的地位，臣实感到不安，应将平城一带划为畿辅地区，置尹牧守。像周、汉一样，崇尚根本，注重旧土，世世代代不忘祖典。

"又，古时候士农工商，按照职业相互居住在一起，目的是让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行业。太祖道武帝开创基业时，日无暇接，还能注意分别士人与庶民，不让他们杂居，工、伎、屠、沽，各有住地。但由于不设科禁，时间长了就混杂起来。现在听说洛邑的居民制度，专门依照官位分别居处，不分族类。官位无常，朝荣夕悴，会使衣冠士人与皁隶卑贱不日同处一地。假如在一里范围之内，有的家庭调习歌舞，有的家庭讲肄诗书，纵使他们的子女各随其好，必然是不弃歌舞而又从诗书。如果让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仿效工伎容态，一朝而

就。所以孔子称赞里仁的美德，孟子的母亲有三徙居处的教训。这是风俗形成的根源，不可不注意。朝廷每次选拔人士，凭借考核其家庭婚姻、官位决定升降，为何那么严密？至于乡邻环境，清浊分明，为何如此忽略？现在正可趁迁徙开始，全是公家地盘，分别工伎，也仅是多一句话，有什么可怀疑的，而能使阙里居民结构合理。

“又，南朝人过去占据淮北地区，自称中华正统，侨置郡县。这一地区自归附我朝后，侨郡县地名多沿袭未改，交错混乱，往来文书很难辨别。应依据原地理旧名，尽行改革，政区小者合并，大者分置。至于中原郡县，过去曾因户口减少被并省，现在民口已经多起来了，也可恢复旧政区建制。

“又，帝王以天下为家，不得有自己的私心。仓库的储备，是供应军国使用的，没有功德的人，不应受到赏赐。朝廷中的权贵人物，受到了丰厚奉禄，近来的颁赏，动不动就是数千。如果分赐给那些鳏寡孤独的人，得到恩济的人该有多少啊！现在只知道赏赐亲近的臣将，岂不是让那些已经够富了的人更加富有吗？”

孝文帝阅罢显宗的奏书，连连点头称善。

二月，孝文帝到北地巡视，渡过黄河，于三月间回到平城，让群臣再次讨论迁都的利害，众人议论纷纷，各有看法。燕州刺史穆羆说：“今四方还未廓定，不应该迁都。况且打仗没有马，靠什么战胜敌人呢？”孝文帝说：“我以代地为厩牧，还愁没有马？今平城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尚书于果说：“臣并不认为代地比伊、洛还美，但自先帝以来，久居这里，百姓安心。一旦南迁，恐众人的心情不悦。”平阳公元丕说：“迁都是件大事，应当问讯卦卜如何。”孝文帝说：“过去周公、召公这些圣贤的人，才能问卜宫宅的事。今无其人，占卜又有何用？而且以占卜决断疑虑，不可怀疑的事还用着占卜吗？黄帝占卜把龟甲都烤焦了，掌管天象的天老说‘吉’，黄帝这才应从了。人们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才去借助于占卜。帝王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这是常有的事。朕的远祖，世世代代居住在荒远的北地，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营建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为都，道武帝又迁于平城。朕有幸承继社稷大运，为何就不能迁都呢？”群臣知道孝文帝主意已定，就不敢再言语了。几天之后，孝文帝召集群臣御前会议，布置迁都事宜。

十月，孝文帝亲至太庙，祈告前世帝王迁都大事，派高阳王元雍、于烈奉持历代帝王牌位到洛阳。

十一月，孝文帝由平城至洛阳，打算清理整顿一下胡汉士族品第等级，命尚书崔亮兼任吏部郎，负责这一工作的日常事务。

十二月，孝文帝要变易鲜卑旧风，下诏禁止士民穿着胡人服装，鲜卑人多不乐意。通直散骑常侍刘芳与给事黄门侍郎郭祚都因其文学才能受到皇帝的礼遇，多次被召见讲论汉家礼仪，并秘密议论政事。鲜卑等胡族大臣、贵戚都觉着皇上疏远了他们，一个个愤愤不平。孝文帝让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下告诉他们说：“皇上想多了解些古事，询访前世的礼仪法式，终了也不会亲近汉族的。”这才稍稍缓和他们的情绪。为了鼓励代人南迁，孝文帝又下诏，规定：凡迁来洛阳的北地代民，免征三年的租赋。

太和十九年（495）五月，孝文帝想改变鲜卑旧俗，召见群臣，问道：“你们想让朕远比商、周，为何不想让朕及于汉、晋呢？”咸阳王元禧回答说：“群臣愿陛下能超过汉、晋的帝王。”孝文帝又问：“那么是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应因循守旧呢？”回答说：“愿圣上的政治日日更新。”又问：“更新政治，是仅限于我一人，还是子孙世代相传呢？”回答说：“愿传至百世。”孝文帝说：“既然如此，就必须进行改革，你们可不许违背我的旨意。”回答：“上令下从，谁敢违背！”孝文帝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现在要断除北地语言，一律使用中原汉族正音。

30岁以上的人，已养成了习惯，容许他们不马上改变。30岁以下的人和现任朝中官职的人，不准再使用旧的语音。如果有人明知故犯，应处以降免官职的惩罚，人人都要深以为戒。王、公、卿、士同意否？"众人齐声答道："遵旨。"孝文帝说："朕曾与李冲讨论过这个问题，冲说'四方的语音，究竟谁是，皇上的语音即为正'。李冲这种论点，其罪当死。"于是，转过脸来，看了看李冲，说："你辜负了社稷国家，应该让御史把你拿下。"李冲急忙跪下，摘掉冠冕置于地上，连连叩头，说："恕罪，恕罪，谢皇上恩教！"孝文帝又斥责洛阳留守官，说："昨天望见街上有妇女还穿着夹领小袖的服装，你们为何不遵从以前的诏令问罪呢？"众位官吏也都跪下谢罪。又说："朕说的如果不对，你们应该在庭堂上当面理争，为何朝堂上顺从朕的旨意，下堂就不遵从了呢？"六月，孝文帝又下诏，规定"不得使用北地俗语于朝廷，违者免除所任官职"。

戊午日，北魏改用长尺、大斗，尺子的长度和斗的容积依据《汉书·礼乐志》的记载制成。

八月，孝文帝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

九月，北魏六宫、文武朝官全都迁至洛阳。

十二月，甲子日，孝文帝驾临光极殿，召见群臣，颁赐了新制成的官吏冠服。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诏说："北地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的先世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王在下，所以叫拓跋氏。土，颜色属黄，为万物之元，应改姓元氏。祖上出自北方代地的功臣旧族，姓多重复，都可改姓元。"七月，太子元恂不好好学习华汉风俗，体态生得又胖又大，忍耐不了河南地区的炎热天气，常常思念回归代北。孝文帝赐给他的汉族服装，他弃置一旁，常常偷着胡装。八月，元恂密谋找来牧马轻骑，想偷奔平城，尚书陆琇将元恂的行动计划奏知孝文帝。孝文帝召见元恂，

把他数落一顿，又让人杖打了一百多棍，囚禁在城西，废为平民。

孝文帝刚迁都洛阳时，所亲信重用的人大多是中州的儒士，宗室及鲜卑贵族对此很不高兴，穆泰与陆睿阴谋造反。孝文帝在凝闲堂召见了元澄，对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动诱惑宗室反对朝廷。现在迁都工作刚开始，北地人怀恋旧土，南北纷扰，朕就无法立足洛阳了。这是国家大事，非您不能办成。您虽然病了，也得勉强替我北行平城一趟，见机行事。趁他们的势力还不成气候，直接擒拿下他们。若他们的势力强盛起来，可奉旨发动并州、肆州的兵讨伐。"元澄说："穆泰等人愚蠢糊涂，因为守恋旧土，才干出这等非法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瘦弱胆小，足能制服他，愿陛下勿忧。虽然我的腿脚有些毛病，怎么敢推辞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王肯行，朕还忧虑什么呀？"于是授给元澄一副象征皇权的节，还有铜虎、竹使符、左右御仗，仍行恒州事。

元澄行至雁门，天色已晚。雁门太守来告说："穆泰已率兵西走阳平了。"元澄命令部下即刻进发。右丞孟斌说："穆泰的兵力还不清楚，应按皇上的指示，先把并、肆二州的兵力召集起来，然后再慢慢前进。"元澄说："穆泰已经叛乱，应当先占据坚固的城邑，而他却朝着阳平的方向走了。由此推测，他的兵力似乎弱小。穆泰既不抵抗，无故发兵西走，真是愚蠢的举动。我们尽管迅速进兵镇压他们，民心自然就安定了。"于是连夜倍道兼程。先派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平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的党羽，示以祸福。这些人纷纷背离了穆泰。穆泰无计可施，指挥随从数百人攻击李焕，不能取胜，又不敢恋战，出城向西奔走，李焕率人将穆泰追捕。不久，元澄已到了平城，清理了穆泰的党羽，逮捕了陆睿等一百多人，尽将他们投入监狱，稳定了社会秩序。元澄上表给孝文帝，数列穆泰罪责和战况经过。这篇表文，

文字犀利、优美，铿锵穿石，是北魏散文名篇。孝文帝阅罢，十分高兴，召集公卿，拿出元澄的书表给众人看，说："任城（指元澄）真可谓社稷功臣，观其狱辞，就是皋陶再生也难超过啊！"回过头来，冲着咸阳王元禧等人说："你们遇到这事，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太和二十一年（497）二月，孝文帝来到平城，召见穆泰、陆睿的党羽，追问他们先前曾犯过的错误，人人供认不讳，当时的人都佩服元澄干事明断。穆泰及其党羽全都伏诛，陆睿被赐死在狱中，免其妻子不死，流徙到辽西郡为民。

当初，孝文帝迁都，变易旧俗时，并州刺史新兴公元丕全都看不惯。孝文帝因他是宗室长辈，也不强逼他服从，仅诱示大理，使他不生异同罢了。等到朝臣全都更换了衣冠，满座尽着红衣，而元丕独自穿着胡服夹在众人中间，很不协调，到了晚年才偶尔戴戴新式冠冕，而容仪仍不加修整，孝文帝也不勉强他。

太子元恂自平城准备南迁洛阳，元隆与穆泰等人密谋留住他，于是发兵把守通往中原的关隘，控制了陉北一带的交通据点。元丕据守并州，元隆等人将自己的谋划告诉了他。元丕考虑他们的事情难以成功，嘴里虽不答应，心里却很是赞同。事情败发以后，元丕随从孝文帝到了平城，孝文帝每次审问穆泰等人，常常让元丕在一旁陪观。有关部门奏言：元业、元隆、元超罪当诛灭九族，元丕也应该受到惩罚。孝文帝因元丕曾受过诏书，许他不死，免了他的死罪，贬官为民，留下后妻和两个小儿子与他一起居住在太原，杀了他的两个大儿子元隆、元超和弟弟乙升，其他的儿子被流放到敦煌。

当初，元丕、陆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都受过不死的诏书。陆睿死后，孝文帝赐给李冲、于烈的诏书说："陆睿执意叛逆，自去找死。违背誓言的是他，与朕无关。反逆既然受到罚处，朕虽然想宽恕那些从犯，可又如何宽恕呢？但还是不能忘记

先前的誓言，允许他们到别处自尽吧，免得像牲口一样遭到弩戮。元丕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首先起来谋逆，受到牵连，犯下死罪，特别宽恕贬官为民。朕本愿一直是这样的，而他们一意孤行，自绝于朝廷，违心乖念，多么可悲！可以将朕之心意告诉你们，想必不会见怪，谋反之罪，皎如日月呀。”李冲、于烈都上表称谢。经过对守旧派的打击，孝文帝迁都、汉化、民族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使北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牛润珍）

参考资料：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韩显宗传》、《乐平王丕传》
《北史·高祖孝文帝纪》
《通鉴纪事本末·魏迁洛阳》
肖黎：《北魏孝文帝传》

魏分东西

高欢带兵击灭了尔朱氏，废掉了北魏节闵帝，立平阳王元修为皇帝，这就是北魏孝武帝。高欢仍旧镇守晋阳，声势益盛。

尔朱氏失败后，尔朱仲远逃奔南朝梁武帝。尔朱仲远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投降高欢。高欢责骂道："你等跟随尔朱仲远，享尽荣华，受尽富贵，立下山盟海誓，要同生共死。尔朱仲远在徐州作乱，你们是罪魁祸首。如今尔朱仲远南逃，你们又背叛了他。事天子则不忠，事仲远则无信。犬马尚且认得主人，你们连犬马都不如！"遂杀了二人。

孝武帝永熙二年（533）正月，魏侍中斛斯椿得知乔宁、张子期被杀消息，惶惧不安，怕高欢一旦与自己翻脸，追究往日之事。于是与南阳王元宝炬、武卫将军元毗、员外散骑侍郎王思政密谋，劝孝武帝除掉高欢。舍人元士弼又奏说高欢对朝廷诏令不敬重，孝武帝由此亦对高欢不满。斛斯椿遂着手布置，增添警卫部队，拣选各地勇士扩充卫士。孝武帝多次出巡，斛斯椿亲自率领卫士，演练行兵布阵。从此，朝廷政务、军事策划，孝武帝只和斛斯椿商议决断。孝武帝为加强外镇辅佐的形势，以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拥有重兵，遂秘密联络；又派出侍中贺拔胜出任都督三荆等七州（荆、东荆、北荆、襄、南襄、郢、南郢）诸军事、荆州刺史。想依靠贺拔胜、贺拔岳兄弟的力量与高欢相抗衡。高欢对此事大为不悦。

孝武帝又想笼络侍中、司空高乾，收为己用，于是在宫中华

林园饮宴之后，单独留下高乾，对他言道：“司空几代忠良，如今又建立大功，我们相待虽说是君臣，却义同兄弟，应当一同立下盟约，加深感情和友谊。”遂好言相劝，苦苦相求。高乾答称：“臣以身许国，怎敢有二心。”因事出仓猝，高乾也未预料孝武帝别有企图，遂不再推辞，立下盟约，也未把此事告知高欢。待以后见孝武帝增设武备，联络贺拔岳、贺拔胜出镇荆州，内树党羽，外结方镇，祸难将作，那时势必牵涉自己。于是高乾暗地告知高欢。高欢得信，召高乾到并州商讨时事，高乾借机劝高欢夺取政权，代魏称帝。高欢急忙用袍袖掩其口，道：“不可胡说！现在我让司空复任为侍中，门下省的事情全都拜托您了。”其后，高欢多次奏请孝武帝任高乾为侍中，孝武帝坚持不允。原来孝武帝怀疑高乾是替高欢监视挟制自己的。高乾预感事变将要发生，为自安之计，暗中请求高欢，想出任徐州刺史。二月，委任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就在高乾将要赴徐州之前，孝武帝获得了高乾泄露机密的证据。于是，下诏给高欢：“高乾与朕私下立有盟约，如今竟然反复无常，首鼠两端。”高欢闻知高乾与孝武帝曾立盟约，不禁恼恨，就将高乾前后议论政事的书信，派使者呈交朝廷。孝武帝召见高乾，当着高欢使者的面责问高乾，遂即赐死。孝武帝又密令东徐州刺史潘绍业杀死高乾之弟高昂。高昂字敖曹，生得豹头环眼，胆略过人。高昂先已得到高乾凶讯，遂在中途埋伏，捉住潘绍业，在袍领内搜出孝武帝密令。于是高昂奔赴晋阳，不久高昂之兄高慎也投奔晋阳，誓要报仇雪恨。高欢遂积极谋划，准备兵进洛阳废黜孝武帝，但顾虑贺拔岳兵势强盛，欲先结好贺拔岳，以保南下万全之策。

魏帝与高欢嫌隙已深，双方均有相图之意，其势已成水火。贺拔岳想探访高欢动静，遂派行台郎冯景到晋阳，高欢见贺拔岳使者到来，心中大喜，在晋阳厚待冯景，并歃血为盟，与贺拔岳约为兄弟。冯景回关中复命，向贺拔岳说：“高欢奸诈有余，不

可轻信。”府司马宇文泰自请出使晋阳，以观察高欢的为人。高欢见宇文泰相貌不凡，想留他在帐下，宇文泰坚决要求返回复命，高欢遂遣送他回去，既而高欢又反悔，派人急追至蒲阪关，已然不及。宇文泰回转长安，对贺拔岳献策说：“高欢所以至今没有篡魏，就是因为忌惮公兄弟之故，侯莫陈悦之徒，并非他最忌之人。公只要暗作准备，图高欢并不难。如今，费也头控弦铁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有劲旅三千，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首领纥豆陵伊利等拥兵而无所归属。公若领兵靠近陇地，扼守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就可收其兵马以扩充我军。西向平定氐羌，北部抚绥塞外，然后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成就齐桓、晋文之功业。”贺拔岳连连称是，遣宇文泰至洛阳，向孝武帝秘密陈奏。孝武帝大喜，加封宇文泰武卫将军，使其回关中复命。是年八月，魏帝任贺拔岳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命使者带去赐给贺拔岳。贺拔岳领兵驻扎平凉，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费也头等归附贺拔岳，只有曹泥归附高欢。贺拔岳又遣宇文泰镇守夏州。

至此时，高欢对贺拔岳越加顾忌。高欢认为贺拔岳、侯莫陈悦的强大，成为自己的威胁，乃谋划对策。右丞翟嵩言道：“我能以离间之计，使其自相攻杀。”十二月，高欢遣翟嵩去行反间。并命长史侯景去招抚纥豆陵伊利。伊利不肯从命，永熙三年(534)正月，高欢派兵进击伊利，擒获了伊利，将其部落迁移到河东（五原河以东)。孝武帝闻讯，派使臣责备高欢：“伊利不侵不叛，是国家纯正之臣，丞相突然擅自攻伐他，难道事前不能遣一介使人先来朝廷请示吗?”

贺拔岳对此事也大为恼怒，是年二月，准备出兵攻打曹泥，还以颜色，先使都督赵贵到夏州与宇文泰商议，宇文泰说：“曹泥孤城，势单力薄，不足为忧。侯莫陈悦贪而无信，应当首先对付他。”贺拔岳不听，遂招侯莫陈悦在高平（今甘肃固原）相会，

一同出兵攻曹泥。这时，侯莫陈悦已经听从了翟嵩的话，密谋杀害贺拔岳。二人会见后，多次宴饮议事，贺拔岳并命侯莫陈悦率军为先锋。这日，兵到河曲（今宁夏灵武西南），侯莫陈悦诱请贺拔岳过营议事，谈话间佯称腹痛站起身来，其婿元洪景飞身上前，挥刀将贺拔岳杀于座席，左右侍卫一齐动手，贺拔岳的亲信纷纷逃散。侯莫陈悦传令："受魏主旨意，只斩贺拔岳一人，诸君不必惊怕。"贺拔岳部下兵将遂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侯莫陈悦对贺拔岳部众却心怀疑惧，对如何安置犹豫不决，最后他放弃了安抚招纳的打算，领本部兵马回陇屯于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东南）。贺拔岳部众一时群龙无首，各部兵马先后退回平凉，诸将推举年长的都督寇洛总领各军。寇洛一向没有威望，缺乏才略，不能号令全军，赵贵建议说："宇文夏州英才伟略，盖世无双，远近归心，赏罚严明，士卒用命。如若迎他到来，奉他为主，何愁大事不成。"诸将议论纷纭，有人想南去招请贺拔胜，有的想东行上告魏朝廷，争执不下。都督杜朔周赞同赵贵之议，见诸将久议不决，遂大声言道："远水难救近火。眼下之事，非宇文夏州，无人敢当此任，赵将军的建议为是。请飞马告哀，并迎请宇文夏州。"于是使杜朔周驰往夏州。

宇文泰得信，召集部下将佐共议去留之计，前太中大夫韩褒道："这是天赐良机，有什么可犹豫的？侯莫陈悦乃是井中之蛙，君若前往，必擒他无疑。"众人以为"侯莫陈悦屯兵水洛城，离平凉不远，如果已经招抚统领了贺拔岳的部众，那么图谋他实在很难，望宇文公暂且停留，以观事态变化。"宇文泰道："侯莫陈悦既然已害死了元帅，按理应当乘势直取平凉，而他却退守水洛，是以我知道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难得而易失者，时机也。如果不及早赶赴平凉，众心就要离散了。"遂束装准备起程。

此刻，宇文泰又得到密报，夏州首望都督弥姐元进密谋响应侯莫陈悦。宇文泰急召帐下都督高平、蔡祐商议，蔡祐道："弥

姐元进这时候反叛，不如杀了他。”于是召元进等入府议事。宇文泰当众说道：“陇贼谋逆作乱，杀害元帅，我等应当同心协力讨伐逆贼。诸位中间好像有不同意的，为什么呢？”蔡祐披甲执刀，直入堂前，圆睁双眼对诸将道：“朝谋夕异，反复无常，何以为人！今日必杀奸人之头！”在座诸将无不吃惊，纷纷请求指出其人。蔡祐叱骂元进，举刀斩了他，并诛其党羽。诸将当堂明誓，齐心讨伐侯莫陈悦。夏州事既平定，宇文泰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并令杜朔周领兵占据弹筝峡（今平凉西百里）。

此时，高欢也派遣侯景前来招抚贺拔岳部众，宇文泰行至安定（今固原县）遇到侯景，宇文泰对侯景道：“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在。卿来此何干？”侯景面目失色，答道：“奉命行事，并非得已。”遂返回去了。宇文泰赶到平凉，设祭哭奠贺拔岳，异常悲痛。将士们见此情景又悲又喜，都愿归其节制。于是，宇文泰统领了贺拔岳部众。孝武帝授他为大都督。

高欢得知这个消息，便遣侯景与散骑常侍张华原、义宁太守王基慰劳宇文泰。宇文泰不受，并想威逼扣留来使，张华原道：“明公若以死亡胁迫使者，这可不是张华原所惧怕的。”宇文泰无奈，只得放行。王基回去后向高欢建议：“宇文泰当今英雄，不如乘其立足未稳赶紧击灭他。”高欢笑道：“君不见贺拔、侯莫陈乎？吾当以计取之，拱手可成。”

侯莫陈悦诛杀了贺拔岳之后，全军上下共相庆贺，只有行台郎中薛憕私下里说：“侯莫陈悦向来没有雄才大略，就这样轻易害死了著名良将，我们眼看要做人家俘虏了，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宇文泰统领贺拔岳部队后，致书侯莫陈悦，责其“党附国贼，擅杀大臣”。悦见宇文泰即将兴师问罪，便遣部将王伯和、成次安领兵二千助原州刺史史归防守原州（今固原），宇文泰令都督侯莫陈崇帅轻骑一千进袭原州。侯莫陈崇乘夜色领十骑直抵原州城下，余骑埋伏附近。史归见敌军人少，放松戒备，高平令

李贤在城内为崇内应，遂里应外合袭取了原州，史归被擒。三月，宇文泰率军至原州，集中各路兵马。高欢得知宇文泰进击侯莫陈悦，派都督韩轨领兵一万据蒲坂以援救悦，而迟迟不敢进兵。四月，南秦州刺史李弼劝说侯莫陈悦道："贺拔公无罪而遭你杀害，又不招抚收纳其部众，如今其将士拥戴宇文夏州，声言为主报仇，势不可当。你应当解除武装向他们谢罪，不然，必有大祸。"悦不从。

宇文泰亲自领军入陇，一路上军令整肃，秋毫无犯，大得民心。宇文泰军兵出木峡关（今固原西南，陇山山口），雪深二尺，宇文泰军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兵临水洛城，侯莫陈悦留万人守水洛，自己退保略阳（甘肃秦安东南）。水洛守军投降，宇文泰遣数百骑兵直趋略阳。悦又退保上邽（秦州治所，今天水西南），同时召李弼领兵助战。李弼献城投降宇文泰，悦军不战自溃。侯莫陈悦见势不妙，众叛亲离，遂率领二弟、儿子及谋杀贺拔岳的亲信七八人弃军而逃，自己乘驴，左右徒步跟从，欲投奔曹泥。宇文泰命原州都督贺拔颍率骑兵紧追不舍，悦见追骑紧逼，脱逃无望，在牵屯山中自缢而死。

宇文泰进入上邽，将秦州库内多如山积的财物全部分赏士卒，以稳定和笼络军心。又命都督刘亮率兵袭取豳州，悦党孙定儿被杀。宇文泰令赵贵镇守秦州，李弼镇守原州，以酬谢其功劳；命拔也恶蚝镇南秦州，可朱浑道元镇渭州。征调豳（今陕西邠县）、泾（今甘肃泾川）、东秦（今陕西黄陵）、岐（今岐山县）四州粮草供给军需。氐王杨绍先惧怕兵威，遂送妻子为人质，称藩求和。宇文泰经营谋划，藉以全面控制关陇之地。夏州长史于谨向宇文泰进言道："明公据有关中险固之地，土地肥沃，将士骁勇。当今天子在洛阳，日在群凶逼迫之中。君若向魏主示以诚恳忠心，晓以利害，迁都关右。到那时明公挟天子以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成就齐桓、晋文的霸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宇文泰称善，遂一步步实现这一计划。

高欢得知宇文泰业已平定秦陇，便派使者好言厚礼以结好，宇文泰拒而不受，封缄高欢的书信命人献给魏主。在洛阳朝廷斛斯椿问宇文泰使者道："高欢的逆谋，路人皆知。人心所依赖的只有西方，不知宇文比贺拔如何？"使者道："宇文公文足以经国，武足可定乱。"斛斯椿说："果然如君所说那样，才真正可以依恃。"

孝武帝与斛斯椿谋议，命宇文泰遣骑兵二千镇守东雍州（今陕西华县）以防高欢，随后命宇文泰大军东还镇守关中，与洛阳形成犄角之势。宇文泰任大都督、梁御为雍州刺史（治长安），率步骑五千先行，自率大军后继。这时原雍州刺史贾显度听从梁御劝说，背弃高欢迎接梁御进人长安。随即宇文泰人长安，接受孝武帝封号，任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统辖了关陇地区。

孝武帝既有占据关陇的宇文泰为党援，乃放手排除河南、洛阳的高欢势力。侍中封隆之、仆射孙腾、领军将军娄昭均被排斥，先后回归晋阳。四月，魏主以斛斯椿兼任领军将军，同时，改任领兵的督将，任免河南、关西的各州刺史。当时魏帝命王鸷为徐州刺史，高欢使大都督邸珍夺去锁钥，争徐州之权。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儁，都是高欢之党，魏帝省去建州的行政设置免掉韩贤；又使御史举发蔡儁罪状，命汝阳王元叔昭代替他。高欢争辩上奏："蔡儁有大功，不可解职夺官。汝阳王德高望重，自然应有重要藩地。臣之弟永宝任定州刺史，宜让位避贤路。"魏帝不听。五月，魏主增设勋府庶子，增加骑官，扩充武装。

孝武帝部署大致就绪，遂下诏实行戒严，说要亲征梁朝，发动河南诸州军马在洛阳阅兵，祭告邙山，魏帝身着戎装，与斛斯椿亲临检阅。

六月，魏帝下密诏给高欢，假称“宇文黑獭（泰）、贺拔胜早有野心，故尔假称南伐，暗作军事准备，丞相也应一同行动，作出支援的势态。读后焚之。”高欢心中早已明白其用心，将计就计，上表说：“荆州、雍州方面若有作乱之谋，臣如今秘密统率三万兵马东渡黄河，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率兵四万自来违津（今山西保德境）渡河，领军将军娄昭等领兵五万讨伐荆州，冀州刺史卫景等领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讨伐江南。均已整军待命。”魏帝知高欢已发觉他的计划，于是把高欢的表文，命群臣会议，想制止高欢的军事部署。高欢也召集并州帐下将官共议，仍旧上表文奏称：“臣被朝廷嬖佞侫臣所离间，陛下一时对臣生疑，臣若敢有负于陛下，使臣身受天灾，子孙灭绝。陛下若相信臣一片赤心，免动干戈，愿陛下斟酌思量，将佞臣赶出朝廷。”

十六日（丁卯），孝武帝遣大都督源子恭防守阳胡（今山西垣曲），汝阳王元暹防守石济（今河南延津），又任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率领豫州刺史斛斯元寿（斛斯椿之弟）向东直趋济州。蔡儁不接受去职之命，孝武帝愈怒，一面大举征召州郡兵马，一面作敕书给高欢，辩论是非，指责高欢有废立野心。

中军将军王思政向魏帝进言：“高欢之心，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宇文泰忠于王室，如今前去依就宇文氏，将来光复旧京，不怕不能成功。”魏帝深表赞同，遣散骑常侍柳庆前往高平见宇文泰。宇文泰欣然愿意奉迎车驾，柳庆还京复命，孝武帝私下里对柳庆道：“朕想去荆州，你看如何？”柳庆道：“关中形胜之地，宇文泰雄才大略，足可依恃。荆州非要害之地，南面又迫于梁朝的威胁，依臣愚见，向荆州并无益处。”孝武帝又问阁内都督宇文显和，显和也劝魏帝西行。这时东郡太守裴侠率本部兵马至洛阳，王思政问他道：“如今权臣专擅朝命，王室日益卑弱，怎么办呢？”裴侠道：“宇文泰受三军拥戴，居于形胜险固之地。所谓‘已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即便投奔关中依恃宇文

泰，恐怕无异于避汤而又入火。”王思政道：“那么如何是好？”裴侠答道：“谋取高欢有立时便至之忧，西去有将来必生之虑。暂且去往关右，以后再慢慢想万全之策吧。”

这时，高欢再次谋划迁都于邺，派遣三千骑军镇守建兴（今山西晋城西北），增兵河东及济州，将所有各州和籴收入的粮食，全部运往邺城。此举使孝武帝大为震怒，再次下敕书给高欢，要高欢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使蔡儁接受代替之命，邸珍让出徐州。高欢又上表文，大肆宣扬宇文泰、斛斯椿罪恶。孝武帝一面下制书，条列高欢罪状，一面征召贺拔胜赶赴行宫。贺拔胜接诏，问计于卢柔，卢柔说：“公提兵入都，与高欢一决胜负，上策也。守卫四方，养精蓄锐，待机而动为中策。以三荆之地投靠梁朝，功业名声俱失，是下策。”贺拔胜笑而不应。

魏帝又任宇文泰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并将冯翊长公主许他为妻。传命宇文泰迎圣驾至长安。宇文泰遂发布檄文，声讨高欢，同时令骆超领轻骑一千奔赴洛阳，都督杨荐、长史宇文测出关等候车驾，自率大军从高平出发，前军屯弘农（今河南陕县）。贺拔胜也出兵屯于襄城界，为声援。

高欢命其弟高琛守晋阳，以诛奸佞、杀斛斯椿为名，领兵南下，以高昂为先锋，又命相州刺史窦泰向滑台（今河南滑县），建州刺史韩贤向石济（今河南延津）。

七月初九日（己丑），孝武帝亲率大军十余万屯于河桥，以斛斯椿为前锋，在邙山以北摆开阵势。斛斯椿准备率精骑二千乘夜渡河，掩击高欢远来疲惫之师，孝武帝起初同意，黄门侍郎杨宽劝说魏帝：“把军队交付别人，恐怕要生变故。斛斯椿渡河交战，万一建功，是灭一高欢，又生一高欢。”孝武帝闻言急忙命斛斯椿停止进兵。斛斯椿长叹道：“主上听信左右的离间构陷，不用吾计，岂不是天意！”随后孝武帝令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

大都督颍川王元斌之去守虎牢，行台长孙子颜镇陕，贾显智、斛斯元寿镇滑台。

宇文泰闻知高欢率军急驰南下，对左右说："高欢数日之间行军八九百里，这是兵家所忌；而主上为一国之尊，不能渡河决战，只知道把守渡口，长河万里，防御极难，如果一处得以渡河，大事去矣。"随即任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坂（今陕西大庆关）渡河直趋并州，命大都督李贤率精骑一千赶赴洛阳。

是月中旬，窦泰与贾显智两军在长寿津（今河南滑县）相遇。贾显智暗地约降于高欢，领兵退却。军司元玄觉察此情，飞马驰还，请求魏帝增兵，孝武帝遣大都督侯几绍领兵前往，与窦泰战于滑台东，贾显智率军倒戈，侯几绍战死。高欢秘密率军到达野王（今河南沁阳），北中郎将田怙为高欢内应，被魏帝发觉，田怙被杀。高欢领兵进军至河以北十余里，再遣使者口述诚心至意。魏帝不答。二十六日（丙午），高欢率军渡河。

大河之险已失，形势危急，孝武帝向群臣问计，有人说奔梁，有人要南走依贺拔胜，有人想西就关中，也有人愿守洛口（洛水入河之口）死战，各执一词，不能决断。此刻，元斌之又与斛斯椿争权，弃军奔回，欺骗孝武帝说："高欢大军已到了"。二十七日（丁未），孝武帝派人召回斛斯椿，遂带领南阳王宝炬、清河王亶、广阳王湛，率五千骑军宿营于瀍西（今洛阳瀍水以西）。部下兵将知魏帝将要西行，当夜逃亡过半，元亶、元湛也逃了回去。惟有武卫将军独孤信单骑赶来追随魏帝，孝武帝感叹道："将军辞别父母、抛弃妻儿而来，'世乱识忠臣'，并非虚言呀！"二十八日（戊申）孝武帝西奔，在崤中遇到李贤之军，一同急急西行。二十九日（己酉）高欢进入洛阳。遣领军将军娄昭等追赶魏帝。行台长孙子彦也弃城西逃，高昂领骑军追魏帝至陕西，不及而还。

孝武帝一路上策马急走，缺水乏粮，两三天之间，随从的文

武官员只靠饮山涧溪水活命，一行人行至湖城，王思村的村民以麦饭浆水献食，孝武帝大喜，下令免除一村十年租税。来到稠桑（今灵宝），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接魏帝入关，献上酒食，随从官员才解除饥渴。此时赵贵、梁御也相继领兵来迎，遂拥护魏帝沿河西行入关。

八月初四日（甲寅），高欢召集洛阳百官，责骂道："为臣子的要尊奉主上，要能匡救危乱，你们在朝廷上不直言劝谏，在朝外主上出走不陪从，太平无事时邀宠争荣，危急时刻弃主逃窜，做臣子的气节何在！"遂将左仆射辛雄、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等一干大臣斩首。又推举司徒、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承制决事，暂时总管政务。处置已毕，高欢亲率大军西进，欲乘势击灭宇文泰，吞并关中。

孝武帝入关后，宇文泰急忙备办仪卫，迎接魏帝于东阳驿（今陕西临潼），遂入长安。魏帝任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国大事取决于宇文泰。又设置了两尚书省，分掌机要，以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担任，经二人精心筹办，积粮治器，简选士马，使长安魏朝廷初具规模。宇文泰遂与冯翊长公主完婚。

八月末，高欢进军到弘农。九月十三日（乙巳），高欢使行台仆射元子思带领侍卫官迎回魏帝，被回绝。二十九日（己酉）高欢军攻克潼关，毛鸿宾被擒，高欢军驻扎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献城投降。此时，高欢虽然已经兵进潼关，但见宇文泰实力未损，而且已有准备，攻之一时难克，又顾虑洛阳不稳，且惟恐贺拔胜袭其后路，遂决计退兵。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山西永济），薛绍宗为华州刺史并筑城于蒲津西岸（今陕西朝邑东北），高昂行豫州事镇守虎牢；并遣侯景领兵向荆州，采取南攻西守之策。侯景后来攻占了荆州、东荆

州之地，贺拔胜兵败投奔梁朝。

十月，高欢回到洛阳，又遣著名僧人道荣奉表文呈送魏帝，申明："陛下若肯还洛阳，当率文武百官迎接。若返回无日，国不可无主，高欢宁负陛下不负社稷。"孝武帝不作答复，高欢集百官商议立皇帝之事，当时清河王亶已经准备登基，高欢以"昭穆失序，业丧祚短"为理由，决定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十七日（丙寅）元善见在洛阳即帝位，称孝静帝，时年11岁。这一年改年号为天平。

高欢退兵东还后，宇文泰进军攻潼关，斩薛瑜，俘虏士卒七千人。宇文泰回转长安后，加封为大丞相，挟持孝武帝控制政权，是为西魏。

因为洛阳西近西魏，南临梁朝，受到两方面的威胁，高欢决定迁都邺。迁都的诏书颁布三天便催促起程，四十万户官民随同魏朝廷仓促上路，孝静帝遂自洛阳到达邺，是为东魏。高欢处置洛阳迁都事务完毕，回归晋阳，以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洛阳。以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留居邺，共同管理朝政。于是，东、西魏分立，两相对峙，与南朝梁形成三分鼎足之势。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北齐书》：《神武帝纪》；《高乾传》

《周书·文帝纪》

《魏书·出帝平阳王元修纪》

《资治通鉴》卷156

高洋建北齐

北齐基业，虽然由神武帝高欢开创，而厉行整顿治理，奠定政权的组织基础，规划建制，完成建立国家的一切计划和准备，则是文襄帝高澄。

高澄，字子惠，是神武帝高欢的长子，武明皇后娄氏所生。魏中兴元年（531）立为世子。幼年曾随杜询学习文化，生来机敏颖悟过人。因为他是长子，又生长于多事之秋，政治纷乱，兵戈连年，故而成熟很早，自少年时期就参与军国大事的筹划。

天平元年（534），高澄被封为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时年只14岁。天平三年（536）便入辅朝政，加封领左右、京畿大都督。此际，高欢忙于军务，而将东魏朝廷政务委任高澄。他处理政务的才干、办事果断严明，已经为人瞩目。元象元年（538），高澄摄理吏部尚书，掌握任免考核百官的大权，他改革了自北魏中期以来选拔官吏以年限劳绩和资格为准绳的制度，开始采取任用官员标准惟在得人，重在才干能力。同时，又甄别淘汰尚书郎，从优择人充任。当时一些才学出名人物，都被推荐任用，即便没有担任要职，也被高澄招致在门下，作为宾客，让他们各尽所长。这便在武人、勋贵之外，使用和提拔了一些人才，使这些人得到仕进机会，发挥作用。兴和二年（540），高澄加大将军衔，仍摄理吏部尚书。

北方少数民族进人中原，多数是以武力支持政权，依靠军事征服建立统治，往往因为不知理政，疏于建立制度和治理国家而

导致失败。更有的少数民族权势人物，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最终难脱覆灭败亡的命运，近者如尔朱荣即是。高欢虽然具有才略，朝廷政事却不能不藉助高澄，高澄在这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干。

自从魏正光年间以来二十多年，天下无官不贪，徇私枉法，贪财受贿，巧取豪夺，不法的权贵、官员比比皆是。高澄荐举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负责纠察举劾权势豪门及官员，力图扭转腐败习俗，澄清吏治。又在通衢大道张挂榜文，公布治理国家的政策，广开言路，征求意见，有上书议论政事直言不讳、切中要害的，予以宽大优容，劝勉奖励。

御史中尉崔暹，字季伦。此人清廉刚正，勇于任事，先后选用了毕义云、卢潜、宋钦道等数人为御史。高澄为培植崔暹的威势，在朝官满座时，使崔暹昂首慢步，与他并肩登堂人室，两人分庭对揖，崔暹毫不谦让据席便坐，不待席终崔暹便起身告辞，高澄亲自下阶恭送。高澄与权贵众官在去东山的路上遇到崔暹，高澄的前导侍卫被御史出行的开路赤棒打散，高澄也掉转马头以示回避，处处显示对御史职权的尊崇。崔暹不避权贵，先后弹劾尚书令司马子如、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以及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公布其罪状，并且都被免了官。其余不法官员遭到处死或黜免的更多。高欢为表示对崔暹的信任与尊重，特地寄书给邺都诸权贵："早先我不知崔暹之能，直到他位居宪台，才知他执法严明。咸阳王、司马子如，都是与我平起平坐的布衣旧友，论尊贵亲近，无人能比。如今获罪，我也不能救他们。诸君可要谨慎啊！"高欢自晋阳到京城，百官前往紫陌迎接，高欢握着崔暹的手，表示慰劳，说："从前朝廷不是没有执法之官，天下官员贪婪却不能纠察弹劾。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使得举朝上下法制肃清，群官奉法。冲锋陷阵者大有人在，我见得多了；当官正直不阿，我如今才见识到。你的荣华富

贵，全是你自己兢兢业业挣得的，并不是高欢父子报答你的。”说毕赠给崔暹良马一匹，二人边走边谈。崔暹下拜答谢，马惊跑了，高欢亲自把马牵回来将辔缰递给崔暹。魏帝在华林园设宴款待高欢，对高欢言道：“近年以来朝廷权贵、各地方长官、官府属吏，许多人贪暴不法，欺压百姓。若朝廷中有忠心秉正、直言弹劾、不避权贵的，王可代我敬酒。”高欢离位下跪说：“惟有御史中尉崔暹。我奉旨意向他敬酒，并请将赐臣的物品千疋，转赐给他。”由此，崔暹的威名日益显赫，内外官员都惧他三分。

高澄又任用宋游道为尚书左丞，高澄对崔暹、宋游道说：“卿一人处南台（御史台），一人处北省（尚书省），必当使天下肃然。”宋游道不惧权势，先后弹劾太师咸阳王元坦、录尚书元弼、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令司马子如等地位显赫的高官权贵。当时孙腾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称四贵，受高欢委任把持东魏政务，倚为心腹。这四贵志气骄淫，专横跋扈，此际不得不有所收敛。宋游道又上奏批驳尚书省违纪与失误数百条，尚书省横行不法的豪吏王儒等官员都受了鞭打处罚。高隆之等一些权贵怨恨难消，便诬陷宋游道有欺君不臣的言论。论罪应当处死，给事黄门侍郎杨愔为他辩解，说道：“养犬就是让它吠，如今要是因为它总是吠而杀了它，恐怕将来再也不会有吠犬。”宋游道遂免死，被除名罢官。不久又被高澄任为大行台吏部。高澄任用这些人发挥作为，使东魏整肃法纪产生了一些成效。

高澄任中书监之后，将门下省的机要政务移到中书省统管起来，以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使他监察魏帝举动。东魏的朝廷政务几乎完全控制于高澄之手。东魏由于长期战乱，户口不实，徭役赋税不均，国家收入减少。高澄任用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巡查各州郡，查出没有户籍的民户六十多万，整理了民籍，增加了财赋收人，使贫困民户境况有所改善。

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在晋阳去世。不久，侯景在河南举兵造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起兵响应，诱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人。高澄在晋阳秘不发丧，遣司空韩轨等率兵讨伐侯景。四月，高澄返回邺都。六月，为高欢发丧，告谕文武百官，公布高欢的遗嘱。七月，魏帝下诏，以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以高洋为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

侯景反叛之后，先降西魏，不久又归降梁。八月，梁朝命萧渊明为统帅，大举攻东魏，策应侯景。这时，有人告诉高澄，说侯景有北归之心。正好侯景部将蔡道遵回到东魏，也称侯景有悔改之意。并且侯景的母亲、妻子都在邺，高澄遂争取和平解决，想尽快平息侯景反叛事件。高澄寄书侯景，表示要妥善保护其家眷，若肯回归东魏，终身任豫州刺史，部将属吏也不予追究。侯景复书道："我如今引来两国兵马合力讨伐，夺取中原，何劳你来恩赐！自古成大事者不顾家，家眷生杀由你，不关我的事。"一口回绝了高澄。高澄于是决心武力解决，先后遣高岳、潘乐及慕容绍宗领兵抵御梁军，攻打侯景。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正值青年，生得仪表堂堂，力大无穷，能挟起石狮子踰墙，精通骑射，又举止文雅沉静，每逢宴会常命群臣赋诗，喜欢接触文士，大有当年魏孝文帝的风范。高欢在世时，逼走孝武帝入关，耻于蒙受逐君的名声，所以奉事孝静帝谨慎小心，不敢非礼，故尔他的下属也不敢不恭敬。高澄继承父业掌握大权以后，对静帝深为顾忌，使中书黄门侍郎崔季舒监视孝静帝，事无大小都必须崔季舒知道。高澄常向崔季舒了解孝静帝消息，寄书问："痴人（指孝静帝）比先前如何？他的势力又小了吗？你要用心检查。"孝静帝十分反感，曾将崔季舒比作不离婴儿左右的乳娘。孝静帝在邺东打猎，纵马奔驰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在后面大呼："天子不要走马，大将军嗔怪！"有一

次高澄陪侍孝静帝饮酒，手捧大杯强递给孝静帝劝酒："臣高澄敬陛下酒。"孝静帝对其逼迫不胜气愤，忍无可忍，便说道："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又何必非要活着！"高澄大怒，骂道："朕！朕！狗脚朕！"命崔季舒打孝静帝三拳，拂袖而去。

孝静帝不堪忍受凌辱，终日在忧伤恐惧中生活，常吟咏谢灵运的诗句"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身江海人，忠义动君子"，抒发内心愤怨之情。常侍、侍讲荀济明白孝静帝心意，于是联络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人，密谋杀掉高澄。孝静帝假作敕书给荀济："准备在何时开讲？"用隐语传递消息。于是，假称在宫园内修造土山，秘密开挖地道通向北城。挖掘到宫城千秋门时，守门卫士觉察地下响动，便报告高澄。高澄闻讯十分恼怒，即刻带兵入宫。见了孝静帝也不朝拜，气呼呼坐下质问孝静帝："陛下为什么造反？臣父子为社稷建功立业，有什么地方亏负陛下呢！这一定是妃嫔们干的好事！"便要杀害孝静帝宠妃胡夫人和李嫔。孝静帝正言厉色答道："自古以来只听说臣反君，没听说过君反臣。王自己要造反，何必责问我！我杀王则社稷可安，不杀你则不知哪天国家就要灭亡。我的性命尚且不及顾惜，何况妃嫔！你一定想叛逆弑君，那么早晚随你处置好了！"高澄并不想在此时动手，遂打破僵持局面，下了坐床叩头大哭，表示谢罪。遂命人设酒宴为孝静帝压惊，表示与孝静帝谢过和解，至夜深了才出宫。三日后，将孝静帝软禁在邺宫内殿的含章堂。随即将荀济等人烹杀于市井街头。高澄怀疑著名文士谘议温子升知情，当时温子升正受命撰写《献武王碑文》，等碑文写成，便将温子升投入晋阳监狱，饿死在狱中。

高澄与孝静帝矛盾日益激化，势同水火，取代魏帝建立政权只是早晚之间的事，只是由于梁军入侵，侯景叛乱未曾平定。这一年九月，高澄还晋阳。

十一月，慕容绍宗等大破梁军，俘获梁军主帅贞阳侯萧渊明及胡贵孙、赵伯起诸将，梁军损失士卒数万。随后慕容绍宗领兵击侯景，双方争战相持数月，侯景粮尽，司马世云投降魏军，侯景益形孤立。武定六年（548）正月，慕容绍宗、高岳等在涡阳大破侯景，俘虏斩杀五万余人，溺死在涡水中的不计其数，河水为之不流。侯景难以立足，遂领残兵逃向淮南，投奔梁朝。

四月，高澄又命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大行台，与太尉高岳、司徒韩轨、大都督刘丰生领兵十万征讨西魏王思政，筑土山攻打颍川城，督率将士日夜轮番攻城。

武定七年（549）三月，侯景攻克梁京城建业，挟持梁武帝萧衍，侯景夺取了政权。高澄也加紧筹划，为早日篡夺东魏做准备。四月，高澄进封为相国、齐王，向夺取帝位迈进一步。高澄召集将佐谋议，都劝他顺应朝命，代魏称帝，独有散骑常侍陈元康认为不可，高澄因此嫌恶陈元康。因颍川久攻不下，高澄又急于求其成功，遂增兵援助，一年之中前接后续，援军粮草源源不断开往颍川前线。

因颍川久攻不下，大都督刘丰生献计，用洧河水灌城。在波涛汪洋之中，王思政仍率兵死守。因遇暴风，慕容绍宗与刘丰生船翻身死。东魏军主将身亡，士气沮丧，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猛烈攻城。陈元康向高澄建议："王自从辅政以来，未有显赫功绩，虽平定侯景，算不得外寇，今颍川围攻一年，眼看要被攻破，主将遇难，将要功败垂成。请王自己建此功劳，亲自攻破颍川。"高澄深以为然，亲领十万兵马奔赴前线，集中兵力强攻颍川。高澄急于成功，亲临洧水筑堤堰，堤堰三次决口，高澄十分恼怒，将负土筑堰的兵士民夫连同土袋一齐推入决口，塞住汹涌洪流。六月，攻克颍川，生擒西魏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东道大行台、太原郡开国公王思政，颍川刺史皇甫僧显等将帅及军士一万余人，获男女民户数万口。

七月，高澄回到邺，加紧筹备取代东魏的一切事宜。他辞去了爵位及特殊礼遇，又请孝静帝立太子，公开作出谦让姿态，暗中却紧锣密鼓布置将来建立王朝的准备。一天，高澄问济阴王元晖业："这一向读些什么书？"元晖业答道："一向阅读伊尹、霍光传记，不读曹氏、司马氏之书。"用以讥讽高澄。

八月初八日（辛卯），静帝立皇子长仁为太子。高澄在京城邺北城东柏堂的府中召集亲信大臣议事，因事关机密，高澄屏去左右随从，与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侍中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秘密商议禅代细节，拟定新王朝百官的署任计划。正在商议时，伺候饭食的膳奴兰京进来送食物，高澄一心议事，拒绝进食，望着兰京退出房门，对陈元康等人道："昨夜梦见此奴持刀砍我，定要赶紧杀了他。"不料兰京有心事在怀，去后并未走开，掩在户下窃听。

原来这兰京乃是梁朝徐州刺史兰钦之子，被俘获做了膳奴。兰钦请求赎回儿子，高澄不允，兰京屡次自己诉求，高澄越怒，命人杖责兰京，训斥说："若再诉求，定要杀了你！"兰京怀恨在心，遂联络了六个人结成党羽，寻找机会报复。而高澄府中守卫却很松弛。高澄十分宠爱的琅玡公主，本是魏高阳王元斌的庶妹，名玉仪，在其家身份卑贱，被家人鄙视，先曾作孙腾的歌妓，被孙腾遗弃，一次高澄在路上遇见玉仪，遂钟情于她，封为琅玡公主。高澄居住柏堂，为了琅玡公主往来方便，遂命侍卫都在外面守护。兰京见自己命在旦夕，遂铤而走险，立刻知会同党一起发作。兰京将刀置在盘下，假冒进食再次闯进议事堂。高澄一见怒道："我未索要食物，为何又擅自闯进来！"兰京从盘下抽出利刃，挥刀扑来，叫道："来杀你！"高澄一惊，慌忙跳下床来，不想扭伤了脚踝；杨愔见势不妙，拔脚便跳，连靴子掉了也顾不得了；崔季舒一头躲进厕中藏起来；陈元康见情形危险，挺身上前遮护高澄，与刺客夺刀，争夺中被刺破腹部，顿时肚肠

拖出倒在血泊中。高澄行走不动，钻入床下，兰京等人掀翻床，杀死了高澄。高澄贴身侍卫库直王纮拼死格斗，纥奚舍乐在争斗中被杀。变乱发生得突然，合府内外一片惊慌混乱。太原公高洋在城东双堂，听到凶信后即刻指挥部署卫士，冲入府中乱刀杀死了兰京等人。

待平定变乱之后，高洋封锁消息，出府宣布："奴仆造反，大将军受伤，并无大碍。"陈元康伤势很重，仍亲笔修书与母亲诀别，又使功曹参军执笔记录，口述了对政事的意见，当夜便死去了。高洋将其殡殓府中，诈称陈元康奉命出使，并虚封了他中书令官衔。又升王纮为领左右都督。对高澄秘不发丧，隐瞒凶信。

太原公高洋是高欢次子，平时谦退容忍，不露锋芒。待诸事安排就绪，左右亲信大臣劝他早回晋阳，因重兵都驻扎在并州。高洋遂召大将军督护唐邕进府，命他分派将士镇守京城四方，防止暴乱。

初十日（癸巳），高洋奏请静帝，为立太子大赦天下罪囚，稳定人心。此时，高澄死信渐渐露出风声，魏孝静帝听到传闻，心中暗喜，私下对心腹人说："如今大将军一死，似是天意，威权又要归帝室了！"

高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杨愔守邺，其余勋贵都随他返回晋阳。十一日（甲午），高洋谒见孝静帝辞行，随从甲士八千，遍布皇宫内外，昭阳殿殿阶上排列二百余名，个个顶盔贯甲，如临大敌。高洋令朝官传奏："臣有家事，须要到晋阳。"遂拜辞出宫。孝静帝见这般情景，面目更色，目送高洋远去的身影说道："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哪天！"

晋阳旧臣宿将，平日看不起高洋。及高洋回到晋阳，大会文武，神采飞扬，言辞敏捷。高澄所订不合时宜的政令，全部重新

修改。文武官员无不惊服。随后，高洋启用亲信大臣参与朝政，十月，任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十二月，任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又命金门公潘乐等率兵五万袭攻南朝司州。当时南朝湘东王萧绎与陈霸先等讨伐侯景，正是内乱纷争之时，司州刺史夏侯强遂投降了东魏。于是淮南地区全部归属东魏。

武定八年（550）正月，正式公布高澄死讯，魏帝亲自为他举哀致祭。高洋进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三月，又进封齐王。

高洋已经有取代魏帝之意，但又顾虑人心不一，时机未到。这时一班自称精于图谶符命的人游说劝进，金紫光禄大夫徐之才、北平太守宋景业说："太岁星在午，当有革命。"又请高洋心腹旧属官高德政劝高洋接受魏帝禅位，夺取政权。高洋心存狐疑，便铸像问卜，又铸像成功。于是使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去问肆州刺史斛律金，斛律金来见高洋，认为不可。高洋见有人反对，便令高德政到邺探察公卿百官的意向。高德政尚未回转晋阳，高洋已经率兵东行，高洋到达平都城，召集勋臣权贵议事。议论国家兴亡大事，诸人都不敢贸然作声。长史杜弼说道："关西西魏，是我国劲敌，若代魏受禅，恐怕他们要挟持天子，自称是义兵而来兴师问罪，那时王何以对待？"徐之才说："与王争天下的人，他也想干王所干的事，纵然他逞强，不过随我之后也称帝罢了。"高德政在邺向公卿百官示意，也没有响应的。这时司马子如迎高洋到辽阳，坚持认为不可。于是，高洋准备回转晋阳，仓丞李集道："王为了何事东来？未达目的怎么要回去呢？"高洋佯装发怒，命人杀了李集，吩咐赐给其家属绢十疋，便下令还晋阳。

从此高洋总是闷闷不乐，徐之才、宋景业每日占卜，鼓吹高洋应该早日受天命，高德政也在身边敦劝不已。高洋心神不定，便召术士李密占卜，遇到"大横"卦象，说是"汉文帝的卦"，该当受命为帝。高洋又使宋景业筮卦，遇到"乾之鼎"，宋景业

说是“乾是君主，鼎是五月卦，应在仲夏之月受禅称帝”。有人认为“五月不可入宫上任，犯了，就会死在官任上”。宋景业说：“王做了天子，再不能改了，这不就是终于其位吗?”高洋听了十分高兴，决定五月初自晋阳进发赴邺。

高德政草拟了在邺应当准备的事项，一项项交高洋过目，大略是令杨愔预作禅代准备，防察魏元氏宗室诸王。高洋命亲信陈山提带着事项条文及密信飞马送与杨愔。杨愔接信后，即刻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书崔悛、度支尚书陆操、詹事王昕、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商议礼节仪式，令秘书监魏收草拟九锡文、禅让文等文件诏诰。

五月初六日（甲寅），杨愔邀集太傅咸阳王元坦等宗室诸王，引入北宫，拘留在东斋内，受禅的事情完毕才可释放。

这天高洋行至前亭（晋阳东），乘骑忽然跌倒，高洋心中甚是厌恶。到达平都城后不想再行进，高德政、徐之才苦苦劝说：“陈山提已经先行一步，恐怕消息泄漏。”劝高洋莫再中途折回。高洋遂命司马子如、杜弼先后驰往邺，观察情况。初七日，子如至邺。公卿百官见事已如此，大势早已确定，无人敢有异言。高洋至邺，命人征召民夫携带工具聚集到城南，高隆之问道：“用这些人做什么?”高洋厉声道：“我自有事。君何必多问！想灭族吗?”高隆之吓得谢罪而退。随后在城南筑成圜丘，备办下法物祭器等物。

初八日（丙辰），杨愔书写旨意，令魏襄城王元旭及司空潘相乐、侍中张亮、黄门赵彦深入宫奏事，孝静帝在昭阳殿召见，元旭道：“五行递相运转，有始有终。齐王圣德英明，万民归心，愿陛下效法尧禅位给舜。”魏帝严肃地说道：“此事酝酿已久，理当逊位。”又说：“若这样，须要写制书。”中书郎崔劼、裴让之奏道：“制书已经作好了。”随即交付杨愔呈给孝静帝。孝静帝问：“朕安置在什么地方?”杨愔答道：“北城另有馆舍。”孝静

帝下了御座，漫步东廊，吟咏范晔《后汉书赞》，吟道："献帝生来不逢时，国家受难身飘零。汉家天下四百年，永像丹朱作虞宾。"（虞舜接受尧禅位后，以尧子丹朱为宾）孝静帝又说："古人都要怀念遗簪坠屦，朕想与六宫妃嫔告别，可以吗?"高隆之道："今日天下还是陛下的天下，何况六宫!"孝静帝遂入宫与妃嫔夫人诀别，举宫痛哭。李嫔诵陈思王曹植诗句相送："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直长赵道德备车一辆，载着东魏末代皇帝直趋北城，安置在司马子如南宅。

初十日（戊午），高洋在南郊即皇帝位，国号为齐，改年号天保。十一日（己未）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十七日降魏宗室诸王爵位为公。六月，齐文宣帝高洋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库狄干等七人为王，同时其弟十三人也都被封王。立长子高殷为太子，封群臣，赦天下。

灭亡一个朝代，兴起一个新朝，竟然如此容易！魏国的皇帝、宗室、臣僚竟毫无反抗交出政权！高洋十分得意取得的成功。事先他顾虑重重，做起来却如此顺利。高洋日益骄傲专横起来，想方设法讥讽元氏的衰弱卑微，羞辱败在他手下的政治敌人。故彭城王元韶，娶了高欢之女、原魏孝武帝的皇后为妃，成了高氏的女婿，他性格懦弱，又没有政治才干和野心。高洋命人剃去元韶胡须，涂脂抹粉，穿戴起妇女服装，让他随身侍奉。

高洋虽然鄙视元魏宗室，但总觉得是后患，对他们放心不下，出行时常命废帝中山王及宗室诸人跟随左右同行，时时提防。天保二年冬季，高洋到晋阳，又命元氏宗室跟随同行，在晋阳宫外，美阳县公元晖业恼恨元韶的屈辱懦弱，在宫门外大骂元韶："你还不及一个老太婆，背负着传国玺送给人家，为什么不打碎了它？我敢说就不怕死，看你又能活到几时?"这事被高洋得知，便把元晖业及临淮县公元孝友一起杀了。高阳县公元斌随高洋征讨契丹，也被寻个错处赐死。新丰县公元坦因为儿子酒后

胡言乱语，被加上诽谤罪名，发配北营州，元坦死在了那里。这年十二月，废帝中山王元善见也被毒死。

天保十年（559）五月，高洋坐朝听政，太史上奏："今年当要除旧布新。"高洋闻听此言，不由疑心到改朝换代，继而联想到元魏宗室身上。高洋问元韶："汉光武中兴是为了什么缘故？"元韶答道："因为王莽诛杀刘氏未尽。"于是高洋下令诛杀元氏。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老小被斩，元韶等十九家都被看管监押起来。元韶被关押在京畿地牢中，断绝食物，元韶饥饿难挨，连衣袖都吃掉了，活活饿死牢中。至七月，再次大诛元氏，自魏昭成帝以下宗室亲故，被斩尽杀绝。有的父辈、祖辈曾经封王，有的曾经身份高贵地位显赫，也有的因为家族兴盛、兄弟们强壮，都被斩首东市，婴儿抛向空中，用矛承接刺穿。先后杀了七百二十一人，尸体全投入漳水。人们捕鱼剖开鱼腹，常常发现有人的手足指甲，邺都居民为此很长时间不吃鱼。高洋又逼令元黄头及其余元氏囚犯，从高耸的金凤台上乘骑纸鸥飞翔降落，无不摔得粉身碎骨，只有元黄头借助气流飞到紫陌才坠落。但他仍未能逃过厄运，被御史中丞毕义云拘禁饿死。在屠杀中，仅元蛮、元文遥等几家幸免于难，元蛮是常山王高演的岳父，故尔未遭厄运。定襄令元景安想请求改姓高氏，其从兄元景皓说："哪有弃祖宗而从别人姓的道理？大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元景安告发了元景皓，景皓被杀，元景安赐姓高氏。

高洋篡魏建立北齐，死后传位给儿子高殷，其弟高演夺了帝位，死后由其弟高湛继承帝位，高湛禅位给儿子高纬，在北周兵伐北齐时，高纬传位给幼子高恒，直到公元557年为北周攻灭。历国二十八年。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北齐书》：《帝纪·文襄》、《帝纪·文宣》、《元坦传》、《元韶传》、《元晕业等》、《崔暹传》、《高德政传》、《酷吏传》

《北史》：《齐本纪》、《魏本纪》

《资治通鉴》卷158、163、167

沙苑大战

高欢用离间之计，以谋略使贺拔岳与侯莫陈悦相互攻杀，坐收渔人之利，又想以同样手段对付宇文泰，岂料宇文泰并非等闲之辈。宇文泰迎孝武帝入长安，已有挟天子令诸侯之势，高欢遂立孝静帝，并迁都于邺。东、西魏与南朝梁，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这样形势之下，高欢谋求武力统一北方，兼并西魏，进行通盘筹划，做攻伐西魏的战争准备。

当孝武帝与高欢矛盾激化，兵戎相见时，齐州（今山东茌平西南）刺史侯渊、兖州（在今山东省）刺史樊子鹄、青州（今山东益都）刺史东莱王元贵平，相互联络，以观时变。同时侯渊又遣使联络高欢。孝武帝出走后，清河王元亶承制摄政，任汝阳王元暹为齐州刺史，侯渊拒而不纳，不肯让位，齐州城民刘桃符暗地引元暹进城，侯渊被迫率部骑出走，妻子部曲都被元暹所掳。侯渊走到广里（今山东长青），接到让他行青州事的任命，并收到高欢来书："卿不要认为人单势孤，不敢东进。齐地民众民风浅薄，寡于信义，唯利是从。齐州人能迎纳汝阳王，青州人就不能开门迎你进城吗?"侯渊便领部骑赴青州。元贵平也拒不交权，侯渊袭破州城，斩了元贵平。东魏迁都邺后，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据瑕丘以武力抗拒高欢，南青州刺史大野拔附合。转年（535）二月，高欢命仪同三司娄昭领兵攻兖州，攻克东平，包围瑕丘，娄昭以水灌城，大野拔杀死樊子鹄，献城投降。三月，高

欢又任封延之为青州刺史，代替侯渊，侯渊遂举兵造反，济州刺史蔡儁讨平侯渊。于是，东魏东方得到稳定。

稽胡刘蠡升，自孝昌年间以来，居云阳谷（今山西左云）自称天子，魏北方边境常被侵略。东魏天平二年（535）正月，高欢决心解除北方边患，率军袭破刘蠡升。三月，高欢假称与刘蠡升约和，将女儿许嫁刘之子，刘蠡升遂不戒备，高欢派兵袭击，北部王杀刘蠡升降东魏。余众又拥立其子南海王，高欢军击败并擒住南海王，俘获其皇后、诸王、公卿四百多人，各族民户五万余人，从而解决了边患。

侯景得到荆州后，贺拔胜奔梁。宇文泰为争夺荆州，乃以独孤信都督三荆诸军事，并为荆州刺史。蛮族首领樊五能攻破了淅阳，响应西魏军，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派兵攻淅阳失败，淅阳城民遂召请独孤信，独孤信进兵武关（今商县东南）。东魏遣弘农太守田八能率领蛮族武装抵御独孤信，又遣都督张齐民率三千步骑出击独孤信之后，形成夹击之势。独孤信召集部将说道："我军不足千人，又腹背受敌，若回军迎击张齐民，淅阳蛮军必以为我军退却，前来邀击。不如我军进击田八能，蛮军不攻自破。"于是独孤信攻破田八能，乘胜攻取了穰城（今河南邓县东南）。辛纂领兵出战又大败而回，城门不及关闭，便被独孤信部将杨忠袭取了城池，辛纂被杀。独孤军便分兵平定三荆。当年夏，高欢派高昂、侯景各统兵三万争夺荆州，独孤信兵少不敌，与杨忠奔梁。东魏再次夺取了荆州地区。

东魏天平二年正月，高欢派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攻潼关，西魏宇文泰屯兵灞上（今长安西）抵御。司马子如回军，自蒲津夜渡，袭攻华州（今陕西华县）。华州修筑城墙尚未竣工，长梯倚放城外，东魏兵攀梯入城，杀进华州。华州刺史王罴在睡梦中惊醒，光身赤足，手持棍棒大呼而出，召集部下奋力拼斗，将东魏军驱逐出城。司马子如出兵未能

得手，便领兵东还。

天平三年，高欢策划瓦解西魏北方，是年正月，高欢亲率骑兵一万奔袭夏州，随身携带干粮，急行四日兵临夏州，接扎矟矛为梯，乘夜色朦胧攻入州城，生擒刺史斛拔俄弥突。留都督张琼领兵镇守，迁移夏州部落民众五千户归东魏。于是，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又归降东魏。宇文泰闻讯，遣军讨伐曹泥，围困灵州，引水灌城，仅差四尺就要淹灌城内，情势急迫时，高欢使阿至罗率骑兵三万直趋灵州救援，绕至西魏军背后。西魏军遂退兵而去，高欢迎曹泥、刘丰，并迁民户五千归东魏，夺取了夏、灵二州。

天平二年，柔然头兵可汗向东魏求婚，高欢以常山王之妹为兰陵公主，嫁予他为妻，并唆使柔然侵扰西魏。东魏与梁经过几年相互攻战，各有胜负。天平三年，梁朝撤回北伐之师，十二月，高欢主动派使臣向梁求和。于是，高欢南和梁、北和柔然的策略乃告成功。待高欢布置既定之后，等待时机准备对西魏用兵。

与此同时，宇文泰也在巩固权力，筹划战备。孝武帝西入长安，已经钻进宇文泰掌握之中。但孝武帝元修，并不是个任人摆布、甘做傀儡的人，高欢的所作所为，孝武帝难以容忍，又如何甘心受宇文泰的控制呢？宇文泰遂起了废黜孝武帝的心。孝武帝行为本来不检点，淫乱享乐，任性放纵。从妹中平原公主明月、安德公主、蒺藜三人都没有出嫁，被他留居宫中。此时平原公主明月随他入关，二人依然如旧，同欢共乐，吟咏着鲍照的乐府诗“朱门九重门九闺，愿逐明月入君怀”，不知隐伏的祸端。宇文泰唆使元氏诸王杀死了明月，孝武帝为此大为不悦，极为怨恨，与宇文泰嫌隙日益加深。北魏永熙三年（534）十二月，宇文泰毒死了孝武帝，另立元宝炬继位，便是文帝，是谓西魏。宇文泰总揽西魏大权，免去内顾之忧，处心积虑与高欢一争雄长。

在军事上，宇文泰与高欢争夺潼关、杨氏壁，并击退了司马子如对潼关、华州的进攻，据山河之险，固守潼关一线。为进一步肃清境内敌对势力，翦除心腹之患，于是出兵攻打渭州（今甘肃陇西）刺史可朱浑道元。可朱浑道元起初附于侯莫陈悦，又与高欢友善，宇文泰击走可朱浑道元，平定了渭州。

宇文泰新得关中，由于征战不息，兵民劳困，极需要安定，复苏经济。宇文泰命各部官员参照古今政令，因时制宜，颁布了二十四条新制。仆射周惠达荐举行台郎中苏绰有王佐之才，宇文泰连续提升苏绰为著作郎、大行台左丞，虚心采纳苏绰建议，经苏绰策划，订立了户籍法，稳定社会，充实财赋，增强了西魏实力。

宇文泰遣独孤信争夺荆州受挫，于是固守上洛（今陕西商县）、武关。对南方则固守仇池（今甘肃成县）、武兴（今陕西略阳）以拒梁。当柔然与东魏和亲之后，屡次侵扰西魏，宇文泰使中书舍人库狄峙出使柔然，和亲结好，由是柔然不再人寇。

东、西魏各自经过几年经营治理，进行战争准备，厉兵秣马，战争爆发已日益临近。

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东魏天平二年（535），西魏文帝下诏，历数高欢二十条罪状，宣称："朕将亲统六军，与宇文丞相扫除凶丑。"高欢也传檄西魏，指斥宇文黑獭、斛斯椿为逆徒，威胁说："现在准备分命诸将，领兵百万，刻期西征。"双方都发出战争叫嚣。

大统二年（天平三年）二月，高欢先发制人，令阿至罗逼攻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自领大军为后继。五月，万俟普与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奔东魏。宇文泰得讯，急率轻骑追赶，直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高欢此举意在大举进攻前扰其后方。

是年十二月十一日，高欢亲自领兵攻西魏。高欢兵分三路，

司徒高昂领兵向武关，趋上洛，攻宇文泰之南；大都督窦泰领兵趋潼关，居中进攻；高欢自率大军于蒲坂（今山西永济）渡河趋渭北，自此南下，攻宇文泰北方。三路兵马约十余万，会攻关中，合击长安。

大统三年、天平四年（537）正月，高欢驻扎蒲坂，造三座浮桥，示以准备渡河之势。这时宇文泰兵扎广阳（今临潼北），得悉高欢三路进兵，召集众将计议，说："敌军攻我三面，高欢造浮桥显示必将渡河姿态，这不过是想牵制我军，使窦泰得以长驱西进罢了。高欢自起兵以来，窦泰常被任为前锋，他统辖的乃是精锐之师，因屡次取胜而骄，我袭击窦泰军必能成功。击破了窦泰军，则高欢不战自退了。"诸将都纷纷言道："高欢军相距不远，我军舍近而求远，去奔袭窦泰，倘有闪失，后悔不及。不如分兵抵御。"宇文泰道："当高欢再次攻潼关时，我军驻防灞上，没有出击。这次高欢大举而来，认为我军也必然固守，有轻视我不敢出战之心。乘此袭击，不怕不能成功。敌军造浮桥，但是并未长驱渡河。不出五日，我军必定攻破窦泰。"众将仍不赞同宇文泰的作战计划。只有行台左丞苏绰、参军达溪武赞成。十四日，宇文泰回到长安，向族侄宇文深问计，宇文深说："窦泰乃高欢部下骁将，如果我军攻蒲坂，则高欢拒守而窦泰援救，我军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这是危道。不如潜派精锐轻骑出兵小关（今临潼东）袭攻窦泰，窦泰骄横急躁，必然率军决战，高欢持重，不敢及时援救窦泰，我军急攻窦泰，必能擒他。击败窦泰则高欢兵势沮丧，我军回击，可以取胜。"宇文泰见此议与自己的打算不谋而合，心中大喜。于是宇文泰扬言要退兵保守陇右。十五日，宇文泰谒见文帝，稳定文帝之心，尔后秘密率军东进，疾驰奔向小关。十七日晨，宇文泰兵到小关。窦泰猝然听说宇文泰大军来到，便领兵自风陵津北渡，迎击宇文泰，两军在马牧泽展开激战，窦泰军大败，全军覆没，窦泰自杀。当窦泰被攻击

时，高欢想率军急赴援救，因河冰薄不能渡河，援军受阻。及窦泰全军被歼，高欢只好撤去浮桥，下令退兵。命仪同薛孤延领兵殿后，掩护大军退走。

窦泰败没，高欢退军，高昂尚未接到信息，率军自商山（今陕西商县东）辗转征战，挥兵挺进，攻打上洛。上洛郡人泉岳、其弟猛略，顺阳人杜窋谋作东魏军内应，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得知后捕杀了泉岳兄弟，杜窋逃奔东魏军，为向导，高昂督率将士攻城，高昂身中三箭，昏厥过去，苏醒后又扳鞍上马，不戴头盔，继续巡视攻城战斗。泉企固守十余日，率两个儿子泉元礼、泉仲遵拼死抵抗，仲遵伤目不能支撑再战，城被攻破，泉企等被俘。高昂任杜窋为洛州刺史。高昂身带重伤，依然计划进兵蓝田关，此刻，接到高欢急报："窦泰军战没，军心动摇，宜速还，路险贼盛，急速脱身可也。"高昂见孤军势危，又不忍弃军脱险，于是率军苦战，全军退回东魏。还军途中泉元礼逃回洛州，泉氏兄弟杀死杜窋，夺回了洛州。

八月，宇文泰发起反攻。十四日，率李弼等十二员大将兵伐东魏，在潼关誓师出征，命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攻克盘豆（今阌乡西）。二十五日大军至恒农（今河南陕县），二十七日攻克恒农，生擒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虏东魏兵士八千人。随后派兵攻略河北邵郡（今山西垣曲）、正平（今山西绛县西南），准备进攻河南，攻取洛阳。九月，柔然响应西魏，出兵侵扰东魏三堆（今山西崞县），高欢带兵击退了柔然。

高欢的失利，暴露了东魏政权的内部问题，纲纪不整，法治废弛，文武贪污，军纪涣散，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军事掠夺习性。东魏行台郎中杜弼见文官武将多数都贪婪不法，便向高欢禀明此事，请他加以整治。高欢也深知存在这种弊病，却又不能操之过急，便对杜弼说道："杜弼，我对你说吧，天下文官武将贪污不法，习俗相传已久。如今督将们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对他

们百般招诱，人心去留未定。江东又有个吴翁萧衍，专讲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见了以为是正统所在。我如果急切地整肃纲纪，不讲情面，毫不缓和，恐怕督将们要尽归黑獭，士子要悉奔萧衍。人物离散出走，还成什么国家！你要暂时忍耐、等待，我不会忘记你的忠告。”高欢此时不得不施以权宜之计，维系人心，不计小过而成大功。

高欢经过休整，准备反击宇文泰的进攻，杜弼再次请他先除内贼。高欢问道：“内贼是谁？”杜弼说：“就是掠夺百姓的勋贵诸将。”高欢未作回答，令帐下武士弓上弦，刀出鞘，排列两厢，命杜弼在刀枪阵中通过。杜弼汗流浃背，颤抖不止，战兢兢大着胆子走过去。高欢于是对他慢慢说道：“箭上弦不射，刀虽举不砍，枪虽按不刺，你尚且丢魂落魄。诸勋贵督将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百死一生。虽然有人贪婪鄙琐，其功劳却不小，怎么可以视同一般人对待呢？”

九月，高昂自上洛返回，高欢任他为军司大都督，统领七十六都督。又命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高昂、行台任祥、御史中丞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莫侯洛，一同在虎牢整训士卒，练兵习战。这一年关中地区受灾缺粮，发生饥荒，高欢想乘机再次举兵西征。

闰九月，高欢率军二十万自壶口（今山西吉县西）趋蒲津，命高昂领兵三万出河南，攻恒农、潼关。这次进兵关中，以高昂一部兵力入崤谷之道，攻陕城作为牵制，高欢集中绝对优势主力渡蒲津，自渭北攻长安。

这时，因关中地区缺粮，宇文泰所领将士不满万人，在恒农就食五十余日，闻知高欢将要领兵渡河，急忙率军入关。高昂遂兵围恒农。

右长史薛琡向高欢献计道：“西贼连年饥荒，故冒死攻入陕州，想夺取仓储粮食。如今高昂已经围困陕州，粮食不能运出，

只要我军在各个要道上分兵把守，不与西魏军野战，等到明年夏季麦秋，西魏人自然要饿死。何愁元宝炬、宇文黑獭不降！大军不必渡河。”侯景又说：“这次举兵西征，声势浩大，万一发生不利，后果很难收拾。不如全军分成二军，前后相继进发，前军若取胜，后军保存了实力，前军若败了，后军继续可战。”高欢皆不听，命令大军自蒲津渡河西进。

宇文泰探知高欢已经渡河西进，急使人告戒华州刺史王罴固守冯翊（今大荔），邀击高欢军之后；同时，急忙征调诸州郡兵马，集中军队。王罴接到使者传令，对使者道：“老罴当道卧，貉子哪得过？”表示不负重任。不久高欢兵临冯翊城下，派人对城上大呼：“王罴何不早降？”王罴大叫：“此城就是王罴坟墓，誓与此城共存亡。找死的来吧！”高欢见冯翊急切间难以攻下，便舍城而过，指挥大军涉过洛水，进军至许原西（今富平东故市附近）。

宇文泰兵扎渭南，征集各州兵力尚未齐集，便想进击高欢大军，众将都认为众寡悬殊，请等待高欢军再向西进，观其形势，伺机而动。大兵压境，形势危急，宇文泰对诸将言道：“高欢若是到了长安，则人心大乱，大势去矣。如今只有在东魏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之际，才可击破敌军。”随即在渭水造浮桥，令将士携带三日口粮，轻骑渡过渭水，军中辎重自渭水南岸沿河西进。

十月初一日（壬辰），宇文泰兵至沙苑（今高陵县附近），距东魏军六十里。部下诸将因为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无不心怀恐惧。只有宇文深上前称贺，宇文泰问其原故，宇文深道：“高欢镇抚河北，甚得民心，若保境自守，不是可以轻易吞灭的。如今高欢率军渡河远来，并非人心所愿。高欢只是为了窦泰报仇雪耻，不听劝阻大举进兵，是所谓‘忿兵’，兵忿者败，可一战而擒也。事理如此清楚，为什么不称贺呢？给我一道军令，调王罴

之兵断其退路，管叫他无一人生还。”

宇文泰为刺探东魏军动静，命达溪武前去侦查高欢军情。达溪武奉命带随从三骑，更换了东魏军服装潜往敌营。日暮时离高欢军营数百步，下马潜伏窃听，听得东魏军中军号口令，然后乘马来到高欢军营之中，伪装成巡营查夜将官，遍历各营，东魏军偷懒怠惰的军哨，往往还被他鞭打一顿，高欢军中竟然毫无察觉，东魏营中情况被他探查了个仔细，问了个清楚，达溪武这才返回本营。

高欢得知宇文泰亲自率军来到，于初二日（癸巳）率领大军逼近，准备决战。侦骑探知后急报宇文泰，宇文泰召集诸将商议应敌之策，开府仪同三司李弼道：“敌众我寡，不可在平川之地布阵。东去十里有渭曲，可以领兵争先占据有利地势，以待敌军。”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地形复杂，这里港湾河汊密布，芦苇茂密。宇文泰听从此计，领兵在渭曲背水东西列阵。李弼为右翼，赵贵为左翼，亲率精锐居中，列成方阵。又命将士偃旗掩戈，埋伏在芦苇中，以鼓声为号，闻鼓声一齐杀出。日晡时分，高欢大军推进到渭曲，都督斛律羌举献计道：“宇文黑獭倾其全力而来，想一决生死。譬如狂犬，往往伤人。况且渭曲地形复杂，苇深草密，土地泥泞，兵力施展不开。不如暂缓与敌交锋，暗地分一支精锐之师直袭长安，敌人巢穴既倾覆，则黑獭不战可擒了。”高欢自恃兵力强盛，想一战成功，遂不考虑分兵之策，言道：“纵火焚烧苇地如何？”侯景道：“应当生擒宇文黑獭以示百姓，若在乱军中烧死，谁又相信他已经死了呢？”彭乐摩拳擦掌，大呼请战，言道：“我众贼寡，百人擒他一人，还怕什么不能成功！”高欢点头称是，于是指挥全军出击。

东魏将士望见敌军兵少，都想争功，遂争相奋进，蜂拥向前，阵形行列顿时一片混乱。在两军将要接触交锋之际，宇文泰命人鸣鼓发令，隐伏在芦苇中的将士一跃而起，冲向敌阵。于谨

等六军与东魏军合战，双方交锋，杀声震天动地。李弼率领西魏铁骑自侧翼横击，将高欢军从中冲开，截为两段，首尾不能相顾。高欢军大乱。李弼之弟李檦，身材矮小却勇猛非常，跃马挺枪直冲进东魏军中，隐身在鞍甲之中，横冲直撞，锐不可挡。征虏将军耿令贵手执大刀，左右挥舞，杀伤东魏兵将无数，衣甲尽赤。东魏勇将彭乐杀得性起，举杯狂饮，乘醉杀人宇文泰军，腹部被刺伤，肚肠流出腹外，他用手把肚肠纳人腹中，依然苦战不休。

东魏军阵形已乱，挡不住宇文泰各军猛攻，遂溃不成军，大败亏输。高欢想收兵再战，令属官张华原点兵派将，竟无人应声，张华原回禀高欢："兵将逃散不知去向，各营都空了。"高欢仍要决一死战，不肯退却，阜城侯斛律金劝道："军心离散，不可复用。只有急返河东，再作打算吧。"带领残余将士簇拥高欢向东方驰去。当夜，东魏残兵败将来到黄河岸边，因船只离河岸很远，高欢等人跨上骆驼才能上船，于是渡过大河，引兵东还。

蒲坂当地土豪敬珍、敬祥，纠合了乡里人士，招聚兵马，组织了万余人的乡兵武装。这时乘高欢军自沙苑败归之机，中途邀击，斩杀俘虏了很多东魏士兵。

这次沙苑大战，高欢所领东魏军损失甲士八万人，丢弃铠杖十八万，精锐军队损失过半，元气大伤。宇文泰领兵追击至河，俘获东魏军卒数万，选留了甲士二万余人，其余全部释放回去。都督李穆进言："高欢胆已吓破，急速追击，必擒高欢。"宇文泰深知这次战役侥幸获胜，消灭高欢谈何容易，便下令还军渭南。这时，宇文泰征调的各州郡兵马才相继赶到，宇文泰下令全军，在沙苑战场每人种植柳树一株，纪念沙苑大战的功绩。

宇文泰大获全胜，凯旋回长安。西魏文帝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于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溪武十二将，分别加官进

爵，增加封地。

高昂闻知高欢大军失利，便解除恒农之围，领兵退保洛阳。

高欢既已败退河东，令部下将士休整，这时侯景向高欢进言："黑獭新胜而骄，必然不设戒备，请给我精锐骑兵二万，我要直取黑獭。"高欢未置可否。在府内高欢对娄妃说起侯景请战一事，娄妃言道："即便真的像侯景所言，侥幸成功，侯景岂有还回来之理？得到宇文黑獭而失去侯景，又有什么利益呢？"于是此事作罢，高欢没有采纳侯景的话。

沙苑之战，是军事上以少胜多，以寡敌众的著名战役，西魏军的获胜，扭转了西魏政权的危机，使西魏转危为安。同时，沉重打击了强大而嚣张的东魏军。而东魏军主要失之于恃众而寡虑。沙苑大战失败严重削弱了东魏军事实力，从此，遂不复能渡河入关，构成对西魏生存的威胁。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周书·帝纪·文帝》

《北史·齐本纪》

《资治通鉴》卷 157

《中国历代战争史》

邙山大战

高欢在沙苑大战失败之后，带领残兵败将东归。当月十八日(己酉)，西魏行台宫景寿乘得胜之势领兵夺取洛阳，被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击退。当西魏军来犯时，又起内乱，洛州人韩木兰聚众作乱，又被韩贤镇压下去。平定了叛乱之后，韩贤带领部下收敛兵器铠杖，不料潜伏在死尸堆中的一个叛贼突然跃起，挥刀硬砍，韩贤猝不及防，登时便被砍断双腿，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当此之际，西魏兵分三路，反攻东魏。行台冯翊王季海与独孤信率领步骑二万直取洛阳，洛州刺史李显带兵攻打三荆地区，贺拔胜、李弼领军围攻蒲坂。

东魏秦州刺史薛崇礼守蒲坂，其族弟别驾薛善劝他归降西魏，说："高欢犯下驱逐君主之罪，我兄弟世受国恩，现在魏主的大军兵临城下，我等却为高氏守城，一旦城池失守，死后还要被人称为逆贼，死有余愧。不如及早归降。"薛崇礼不从。薛善遂献城投降。宇文泰进兵蒲坂，并攻取了汾、绛各州郡。

东魏晋州（今山西临汾）守将封祖业，惧怕敌军强盛，弃城逃走，仪同三司薛修义直追赶到洪洞，苦劝他回城防守。封祖业执意不听，薛修义回转晋州，整顿兵马守卫晋州。西魏仪同三司长孙子颜率领大军来攻晋州，薛修义命人大开城门，埋伏甲士，等待敌军决一死战。长孙子彦见晋州城门洞开，难测城内虚实，不敢贸然攻城，遂传令退兵。高欢便授任薛修义为晋州刺史。

独孤信领西魏大军到达新安（河南渑池东），东魏高昂带兵

渡河北去，独孤信进逼洛阳。东魏洛州刺史广阳王高湛见敌军声势很大，弃城奔回邺都，独孤信进兵金墉城（洛阳东阿斗城）占据洛阳。于是东魏颍州（今河南长葛）长史贺若统拘捕刺史田迄，举城降西魏，贺拔胜遣都督梁迥入据颍州。前通直散骑侍郎郑伟在陈留起兵，攻打东魏梁州（今河南开封），捉获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打东魏荥阳（今河南荥阳），捉获太守苏淑，与广州（今河南襄城）长史刘志都归降了西魏。旬日之间，东魏数处州郡接连失守。

十一月，高欢为了稳定战局，开始在河南反击西魏军。派遣行台任祥率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攻颍川，宇文泰闻报，乃遣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怡峰领步骑二千援救。这时，尧雄领兵已经逼近颍川，离城只有三十里，任祥率大军为后继。西魏援军诸将都认为敌众我寡，不可冒险交锋作战，宇文贵说道："尧雄轻视我军兵少，不来与我交战。若是他与任祥合兵攻颍川，颍川城就危险了。如果我等坐视贺若统陷没，我们来这里做什么？"遂引兵疾趋颍川，背城列阵以待敌军。尧雄杀到城下，双方展开大战，西魏军死中求生，奋力拼斗，东魏军大败，尧雄退走，士卒被俘上万人，赵育也降顺了西魏。任祥闻知尧雄已败，不敢贸然进兵，宇文贵与怡峰乘胜领军进逼，任祥退守宛陵（今河南新郑），宇文贵军追击，任祥又被杀得大败。东魏督将是云宝杀死了阳州（今河南宜阳）刺史那椿，叛降西魏。这时，西魏都督韦孝宽攻陷豫州（今河南商水西北），俘捉东魏行台冯邕。河南大部分地区都已陷落。

十二月，东魏阳州刺史段粲出兵袭攻潼关，欲截断西魏军后路，西魏行台杨白驹率兵迎战，段粲在蓼坞（潼关北十余里）大败杨白驹，杨白驹退守潼关。

这一时期，东魏东荆州刺史慕容俨守城拒敌，与西魏荆州刺史郭鸾交战二百多天，反击得手，郭鸾军大败，保住了河南东荆

地区。

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天象元年（538）春，高欢再度大举反攻，拉开邙山会战的序幕。

二月，东魏大都督贺拔仁攻打西魏汾州（今山西吉县），刺史韦子粲归降。宇文泰大为震怒，为杀一儆百，诛杀了韦氏全族。当月，高欢命侯景治兵虎牢，将收复河南各州郡。不久，侯景率军出虎牢向东南发起攻势，西魏将领梁迥、韦孝宽、赵继宗相继放弃颍川、汝南等地西撤。侯景攻广州（今襄城），西魏宫景寿遣仪同三司程华、王征蛮领兵援救。侯景部将行洛州事卢勇率领百骑侦探西魏援军军情，行至大隗山（今禹州市西北）与西魏援军遭遇，当时已日落黄昏，暮色苍茫，卢勇在树上遍插旗帜，乘夜幕降临，分百骑为十队，鸣角进击，势如猛虎，直扑西魏军营。西魏军在昏暗中不辨敌军多少，顿时大乱溃败，程华、王征蛮被活捉，卢勇得胜回营。援军被歼，求救无望，广州守将骆超遂献城投降。于是，南汾、颍、豫、广州被东魏收复。

三月，宇文泰因为河南战事不利，自河东回到长安，准备调集兵马，亲自东征，与高欢决战。

七月，侯景自广州北进，高昂自河内渡河南下，合兵攻洛阳，包围独孤信于金墉，高欢自率大军作为后继。独孤信向宇文泰告急，宇文泰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太子元钦留守长安，与西魏文帝倾关中之兵东救洛阳，命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东骑大将军达溪武率千骑为前锋。

八月初三日（庚寅），宇文泰军到达谷城（今洛阳西北），侯景整顿兵马，准备列阵待敌，仪同三司莫多娄贷文请战，愿领本部兵马击敌前锋，侯景不准其出战，贷文自恃勇武，不遵将令，擅自与可朱浑道元领千骑应敌。当夜，与西魏军前锋李弼、达溪武在孝水（洛阳西四十里）相遇。李弼令军士播鼓呐喊，曳柴扬尘，虚张声势，乘机进击，贷文军大败。李弼追杀了莫多娄贷

文，可朱浑道元只身匹马逃回，全军覆没，被俘将士都被押送到恒农。

宇文泰大军进到瀍东（洛阳东），出侯景军之背后，侯景于夜间解围而退。

初四日（辛卯），宇文泰不领大军，自率轻骑追击侯景，侯景摆开阵式，北据河桥，南据邙山，严阵以待。宇文泰挥军进击，两军展开厮杀，宇文泰的战马忽然被流矢射中，狂奔乱跑，一时不见了去向，西魏骑兵失去了主将，立刻溃乱。宇文泰落荒奔跑，被惊马掀翻在地，眼看侯景追兵赶到，宇文泰左右亲兵四散奔逃，危急万分，都督李穆急忙跳下马，用马鞭敲击宇文泰后背，口中骂道："无用军士，你主子在那里，独自留在这儿做什么?"东魏追兵遂不怀疑落马者就是敌军统帅，舍弃了他继续追击。李穆忙将战马让与宇文泰，救他脱险。

宇文泰返回军中，恰逢西魏文帝统领后续大军赶到，兵势重又振作，向东魏军卷杀过去，东魏兵将抵挡不住，纷纷向北败退。忠武公高昂见情势危急，急忙命部下建旗张盖，担负起主将之任，率军苦战。西魏认为是敌方主将所在，集中精锐全力向高昂进攻。

双方大军决战，摆列的军阵极大，自河桥至邙山，漫山遍野，绵延不断，首尾相隔很远。两军自早晨杀到午后，往复冲杀几十个回合，战场上杀声震天动地，刀光剑影令人胆战心寒，尘土飞扬弥漫，对面看不清人。高昂一军吸引了西魏主力，潮水般涌杀过来，经长久鏖战，高昂全军覆没，高昂杀开一条血路，闯出重围，单枪匹马奔往河阳南城。西魏军在后紧追不舍。河阳南城守将高永乐，是高欢族兄，往日与高昂有旧怨，见高昂只身逃来便闭门不纳，高昂大呼请求放下绳索，系他进城，城上也无人敢应，紧急中高昂拔出佩刀想砍穿城门入城，还来不及穿透追兵已赶到，高昂见无法脱身，挺身大叫道："来吧，送你一个开国

公当吧!”西魏追兵遂斩下高昂头颅请功去了。原来西魏曾悬下重赏，誓要杀死这勇冠三军的敌将。杀高昂的人受到宇文泰布绢万疋的赏赐，年年支付，直到宇文氏篡魏建立的北周灭亡时，也没有付清。

东魏中军失利，溃败将士争相奔往河桥，渡河北撤，幸赖万俟洛领兵守住河桥，挡住西魏追兵。在两军鏖战中，宇文泰军斩杀了东魏西兖州刺史朱显等多名将官，俘虏甲士一万五千人，被杀及赶入河中淹死的数以万计。

当宇文泰与西魏文帝率中军获胜时，独孤信、李远所率右军，赵贵、怡峰所率左军交战失利，战场宽阔，烟尘蔽天，又不知宇文泰与魏帝消息，遂溃败下去。开府仪同三司李虎、念贤统领后军接应，被败兵冲动，“兵败如山倒”，遂一同败走。

宇文泰虽然中军得胜，因左、右、后三军已经败退，独力难支，而高欢又已率领七千铁骑自晋阳赶来，便下令烧掉营寨，退兵班师。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防守金墉，命王思政、蔡祐率兵殿后，便匆匆撤兵西走。

东魏军追击而来，在崤（今河南省洛宁县北）与西魏殿后部队展开激战。平东将军蔡祐见追兵来势很猛，便下马步战，左右部将劝他乘马以备危急时脱身，蔡祐怒道：“丞相爱我如子，今天怎能顾惜性命!”率部下拼死抵抗。东魏军见他并无接应，遂将他团团包围，叫道：“看你是个勇士，只要放下武器投降，保你富贵!”蔡祐骂道：“死卒，吾今取你人头，自然富贵，何必要你赏赐!”弩弓四射，东魏军不敢逼近。派一身披重甲，手持长刀的勇士，直扑蔡祐，眼看只距三十步，左右劝蔡祐快射，蔡祐说：“我等的性命，在此一箭，岂可虚发?”仅差十步时蔡祐一箭射去，正中勇士面上，登时应弦而倒。趁东魏军稍有退却之机，蔡祐带部下得以脱身。王思政抵挡追兵，舞动长矛左右横击，杀入东魏军阵中，所部兵马全部战死，王思政受重伤昏死过去。因

为每逢作战王思政总是穿破衣弊甲，敌人不知他就是主将，这次便得以幸免于难。日色黄昏，残阳夕照，东魏军收兵扎营，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时王思政苏醒过来，适逢帐下都督雷王安到战场哭喊寻找他，遂扶他上马，救回军中。

次日，高欢下令攻打金墉城，长孙子彦自知难以防守，焚毁城中房室，弃城西逃了。高欢遂毁掉城池，领兵回转晋阳。

宇文泰与文帝退到恒农（今河南省陕县），守将已经弃城逃走，所俘虏的东魏降卒发动暴乱，闭城拒守。宇文泰指挥将士攻下恒农。当夜，蔡祐等率断后部队赶到恒农，宇文泰见到蔡祐，心里才感到安定，经过邙山一场恶战，宇文泰惊恐难眠，头枕在蔡祐股上，才能安神入睡。大军继续西撤，王思政留守恒农。

西魏倾尽关中兵力东征，留守兵力薄弱，前后俘虏的东魏兵士分散在民间各处，此时，得知西魏军大败，遂蓄谋暴动。李虎等将领先退回长安，无力稳定局面，便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文武官员奉太子元钦出离长安，屯扎在渭北。关中地区形势一片混乱，兵匪混杂，相互劫掠。沙苑大战时俘来的东魏都督赵青雀、雍州民人于伏德等聚众起事，赵青雀占据了长安子城，于伏德联络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占据咸阳，招聚兵马，抗拒西魏退回关中之军。长安大城军民联合自保，与赵青雀每日攻战不休，大都督侯莫陈顺率大城兵民几次击退了赵青雀进攻。

东征军不能回转长安，西魏文帝与宇文泰驻在阌乡（今河南阌乡西），宇文泰因士马疲惫，难以急速进兵长安，再去交战。通直散骑常侍陆通劝谏说："反贼预谋已久，决不肯善罢甘休，又诈言东魏大兵就要到了。目前，大军虽然疲惫，精锐部队尚不少，以明公的威望，率领大军讨伐，不会不成功。"宇文泰听他言之有理，于是带兵西进。这时华州刺史宇文导领军攻入咸阳，斩慕容思庆，擒于伏德，与宇文泰大军会合，一同攻灭了赵青雀。西魏遂再度转危为安。

九月，魏文帝回到长安，宇文泰屯兵华州，再图后举。十二月，西魏是云宝袭取洛阳，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城而走。都督赵刚袭取了广州（今河南省鲁山），于是，自襄城以西的城镇，复归西魏。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形势险要，控制汾水入黄河的漕运，将来可以截断高欢军西进运粮之道，请求筑城，将守军自恒农移镇玉壁。宇文泰准其所请，加封王思政为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

此后，双方边界虽有攻伐，并无大的战事发生，高欢、宇文泰各自致力于内政修整，积蓄实力。

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兴和四年（542）八月，高欢自晋阳率领大军南下汾、绛，连营四十里，欲从河东进兵关中。宇文泰令王思政扼守玉壁，断其后路，又使太子元钦率军镇守蒲坂。十月，高欢兵围玉壁，围攻九日，这时天降大雪，气候骤然严寒，士卒饥寒难当，高欢遂解围退兵。宇文泰出兵援救玉壁，走到皂荚，得知东魏已经退兵，于是渡过汾水追击，因不及而还。

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543）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御史中丞、虎牢守将高慎，以虎牢叛降西魏，宇文泰大喜，封高慎为侍中、司徒，亲自率领大军东出接应。虎牢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晋悼公与楚国争霸中原，据虎牢而使郑国臣服，进而逼使楚国势力不能北进，不得不伏处南方。楚汉战争中，刘邦以虎牢为伐楚据点，项羽虽勇竟不能举兵西向。东、西魏交战以来，侯景凭据虎牢为重镇，屯兵驻军，进可攻，退可守，宇文泰也因为始终不能取得虎牢而保有河南之地。双方对虎牢地势之重要都十分清楚。至此，邙山二次会战再起。

宇文泰部署东进军事，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驱，向洛阳。遣仪同三司于谨攻柏谷（今河南宜阳南）。攻克柏谷后，三月初十日（庚子），宇文泰大军围攻河桥南城（今河南孟县南）。

此时，高欢亲自统兵十万到达河北。宇文泰一而退军瀍上

(瀍水以西)，一面在河上游纵火船以烧断河桥。高欢部将斛律金命行台郎中张亮驾百余艘小艇载运铁锁链，等火船将要临近时，把铁链钉在火船上，引向河岸，保住河桥，高欢遂得以全军渡河，据邙山摆开阵势，按兵不动。宇文泰将辎重留在瀍西，十七日夜，准备乘夜色昏暗登邙山偷袭高欢。侦察骑兵报知高欢："贼军距此四十里，坐食干粮后出兵而来。"高欢点头道："活该他渴死！"遂号令全军严阵以待。十八日（戊申）黎明，宇文泰军与高欢相遇。两军各逞英雄，冲杀相拼，展开大战。东魏军阵右翼骁将彭乐，率领数千铁骑直冲宇文泰军北翼，勇不可挡，所向披靡，一直向魏军大营奔杀，宇文泰败走，俘虏西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柬、蜀郡王荣宗、江夏王升、钜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赵普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东魏众将乘胜猛攻，将西魏军杀得大败，阵斩敌军三万有余。

高欢命彭乐追击宇文泰，彭乐得令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赶上，宇文泰上天无路，人地无门，窘急生智，便对彭乐说道："你不是彭乐么？痴汉，今天没有了我，明天岂能有你？还不赶紧回营收取你的金宝去？"彭乐思忖其言有理，想起古语所说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于是转身回到宇文泰营中，获取金带一袋回到本营。回复高欢道："黑獭从刀下逃生了，吓破胆了。"高欢既喜他获胜立功，又怒他放走宇文泰，喝令彭乐伏在地上，用手揪住彭乐的头，连连磕地，咬牙切齿地数落他沙苑失败的罪责，拔出佩刀几次要砍他，咬紧牙关，两眼逼视彭乐。彭乐请求说："给我五千骑军，再为大王捉他回来！"高欢道："你放了他是何用意？还说什么再去捉他！"命人取来三千匹绢压在彭乐身上，全部赏赐了他。

次日，宇文泰整顿兵马，两军再次交战。宇文泰自为中军，中山公赵贵为左军，领军若干惠等为右军。双方交锋，右军若干惠等攻破东魏军左翼，与宇文泰合击东魏中军，高欢所率中军大

败，步卒尽数被俘，高欢的战马倒毙，部下赫连阳顺将坐骑让给高欢。高欢上马急走，仅有步骑七人跟随在后，西魏追兵紧紧追赶，高欢亲信都督尉兴庆忙说："王快走！兴庆身有百箭，足可杀敌军百人。"高欢道："若能脱险，封你做怀州刺史，若战死了，便任用你的儿子。"尉兴庆拼力抵抗，箭射光了遂战死。

东魏叛卒逃奔西魏，告知宇文泰此刻高欢所在位置，宇文泰即刻召三千勇士，手执短刀，跟随大都督贺拔胜直取高欢。贺拔胜昔年与高欢同在军伍，故而相识，遂手擎长槊率十三骑紧追高欢，飞驰数里，贺拔胜手中槊在高欢背后晃动，大呼："贺六浑，贺拔破奴定要杀你！"高欢喘息不停，策马狂奔，正在危急之际，河州刺史刘洪徽一马赶到，从侧面向贺拔胜等连射二箭，二名追骑应声落马，武卫将军段韶相继赶到，一箭射中贺拔胜坐骑，等贺拔胜所骑副马赶来，高欢已经逃远了。贺拔胜顿足叹道："今日未带弓箭，岂不是天意！"

此刻，两军仍在激战。西魏郢州刺史耿令贵，怒吼连声，冲人敌阵，在刀山剑树中冲突，在部将以为他有死无还时见耿令贵又挥刀杀出阵来，就这样杀了四进四出。

高欢在双方激烈大战中，显示了临机应变之才，高欢下令集中兵马，攻击西魏左军。西魏左军赵贵等五员大将作战失利，整个战场上东魏军士气又重新振作。宇文泰见形势不好，急率中军增援左翼，仍然抵挡不住敌军猛烈攻势，渐渐支持不住。当日暮时分，西魏军溃败退走，一路上丢盔弃甲，狂奔逃生，被追兵掩杀得难以招架之际，独孤信、于谨收拾残兵，从东魏追兵背后杀来，东魏军受到冲击一时混乱，西魏兵马才得以逃生。右军主将若干惠乘夜掩护大军西撤。若干惠令将士建旗鸣鼓，整队后撤，东魏追兵惮于若干惠勇武，又怀疑设有伏兵，不敢紧逼。宇文泰退兵至陕，命达溪武镇守，自领败军退往关中。

高欢领兵进至陕，遂止兵不进，下令停止追击。行台郎中封

子绘向高欢进言："统一东西，正在今日。昔年魏太祖平定汉中，不乘胜夺取巴蜀，失策在于迟疑不决，日后后悔不及。请大王不要疑虑。"高欢仍然决定不下，于是召集诸将会议。众将认为"春季青黄不接，野无青草，人疲马瘦，不可穷追"。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说："两雄相争，岁月已久，如今幸而取得大捷，天授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当乘胜进兵。"高欢问道："若遇敌军伏兵，我用什么策略对付呢?"陈元康接着说："大王前者在沙苑大战失利，对方取胜尚且没有伏兵，如今溃败的这般狼狈，怎么还顾得上深谋远虑？假若今日舍而不追，日后必成后患。"高欢未纳陈元康之言，决意班师。命刘丰生率领数千骑兵追击宇文泰，自率大军东归。

宇文泰出兵东征之前，派人到玉壁召王思政，命他前去镇守虎牢，王思政未到而宇文泰已遭失败。于是，命王思政守恒农。王思政进入恒农，令人大开城门，任人通行。士卒解衣而卧，安心休息，又亲自慰劳将士，表示敌军不足畏惧。数天后，东魏刘丰生兵到恒农城下，东魏军对王思政心存惧怕，又担心有伏兵，不敢轻易攻城，遂引军而退。王思政待敌军退走，便调集民夫大修城郭，修建楼橹，加强城防；又在恒农营农田，积粮草，从此恒农具备了坚固的守御能力。

四月，宇文泰不肯轻易舍弃虎牢这一要地，秘密派遣谍报潜入虎牢，令守将魏光固守。不料侯景截获了谍报人，模仿笔迹改了书信内容，改"固守"为"宜速去"，然后放谍报进入虎牢。魏光得信，信以为真，遂弃城西去。侯景兵不血刃得了虎牢，捉获了叛将高慎的妻子送往邺都。北豫、洛二州遂复归东魏。五月初三日（壬辰），东魏因克复虎牢，大赦天下死罪囚犯，惟独不赦高慎一家。初六日（乙未），以收复虎牢之功，加封侯景为司空。

两次邙山会战，西魏倾全军谋取东方不为不力，兵锋也很锐

猛，然而终于两次受挫，而且关中几乎酿成大乱。即便西魏已经全力以赴，仍然失之于力小任重，不足以征服东魏。西魏就实力而言，只足自保，不足进取。而东魏虽然几经挫衄，终归实力雄厚，避过敌方锋芒之后，仍可组织有效反击。但反击得手之后，其势已成强弩之末，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入关渡河，实现吞并的计划。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北齐书·帝纪·神武》
《周书·帝纪·文帝》
《资治通鉴》卷158
《中国历代战争史》

北齐帝昏虐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元年（543），高澄总揽了东魏朝廷大权，荒淫好色的品行就表露出来。御史中尉高慎的后妻李氏艳丽贤慧，高澄一见便神魂颠倒，李氏不肯依从。又因为高慎与前妻之兄崔暹有矛盾，高慎遂据虎牢叛降西魏，于是暴发了二次邙山会战。战后，侯景用计赚得虎牢，虏获了高慎妻子送到邺（今河南临漳），朝廷有令，天下实行大赦惟不赦高慎一家，李氏论罪当死。这时高澄盛服接见李氏，说道："今天你又该当怎样？"遂纳为妃嫔。正在高澄加紧部署，准备取代东魏，篡夺政权时，武定七年八月，高澄死于突然遇刺事件。

高澄的突然去世，造成了高洋成为政坛风云人物的机会。高洋继承了父、兄开创的事业，东魏军政大权落在他的手中。因为禅让夺权已经是水到渠成之势，所以他很容易地迫使孝静帝元善见退位。高洋建立齐国，登上帝位，是为文宣帝。改元为天保。高洋追尊其父高欢为献武皇帝，兄高澄为文襄皇帝，封逊帝元善见为中山王。立其子高殷为太子。

高洋执政初，也有过一些作为，西拒西魏，南伐梁，北征契丹、突厥，其后又遣萧渊明过江，以武力支持他登上帝位。

天保二年（551），高洋派人毒死了中山王元善见，大肆诛杀元氏宗室，前后杀戮了几百人。

天保五年正月，齐文宣帝击破山胡，男子12岁以上都被杀死，妇女和儿童分赏给军士。在战斗中，有一都督作战受伤，部

下什长路晖礼没有救他，文宣帝大怒，命人剖其五脏，令九人分食，肉和五脏都被吃尽。从此，高洋逞威肆虐，丧失理性。

这一年，老臣高隆之因平素轻视高洋，受禅时高隆之又是反对大臣之一，并且与元氏宗室有交往，文宣帝衔恨，命壮士痛殴高隆之百余拳，放出后高隆之口渴难当，饮水后，死在从驾的半路上。文宣帝末年，又追怀旧恨，杀了高隆之之子司徒中兵高慧登等二十人。

文襄皇后元氏是魏孝静帝之姐，孝武帝时嫁给高澄。天保六年文宣帝移居高阳宅第，夺取了文襄皇后府库财物，对元氏说："吾兄以前奸污了我的媳妇，我今天定要报复。"遂强逼元氏淫乱。高氏家族妇女不论亲疏远近，文宣帝命左右亲信胡乱逞淫。自天保六七年以后，文宣帝通宵达旦寻欢作乐，他赤身裸体，涂脂抹粉，散发胡服。不管炎夏寒冬，或到街市游玩，或至勋贵家临幸。杀害人命如草芥，支解、火焚、投河，手段残酷，经常酗酒颠狂，嗜杀成性。

天保九年夏，天下大旱，因为祈雨不灵验，文宣帝拆毁了西门豹祠，挖掘了西门豹坟冢。又征发民夫工匠三十多万人在邺下营造三台，在旧址基础上增高扩建，改铜爵台为金凤台，金兽台为圣应台，冰井台为崇光台。又修建了游豫园，多次大兴土木修造宫室。这一年，文宣帝又杀了永安王高浚、上党王高涣，兄弟之间骨肉相残。永安王高浚为王氏所生，上党王高涣是韩氏所生，都是高洋同父异母兄弟。青州刺史高浚豪爽有气力，善骑射，诸兄弟中高澄最喜爱高浚，故此被高洋忌恨。文宣帝晚年嗜酒，荒怠政务，高浚对亲信人说："二兄原来资质平平，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自从当了皇帝，见识顿时长进了。近来往往因酒败德，朝廷大臣没有敢劝谏的。当前大敌未灭，吾深感忧虑，想入京当面劝谏，不知肯听从我否？"有人密报给文宣帝，高洋更加怀恨。天保八年高浚来邺朝见，随文宣帝到东山游幸，高洋又命

艺伎裸体歌舞，男女混杂，表演狐掉尾游戏。高浚进言说：“这不是万民之主应当看的。”高洋很不高兴。高浚又在休憩之处召请杨愔，责怪他不劝谏。文宣帝极忌讳大臣和诸王交往，杨愔怕受牵连，便将此事奏明文宣帝。高洋十分恼怒，骂道：“小人，越来越让人不能容忍！”于是罢酒还宫，大扫其兴。高浚回青州后又上书苦苦劝谏。高洋恼恨之下，顿起杀心，便下诏征召高浚。高浚担心大祸临头，称病不来，高洋更加恼怒，命人逮捕高浚押送来邺，将高浚与上党王高涣关在铁笼之内，安置在北城地牢中，吃喝拉尿都在笼内，污秽不堪。这上党王高涣，几次领兵出征，很有威名，自然招忌，这次却死在术士的胡言乱语上。当初术士曾经预言：亡高者黑衣。自高欢起便在出行时忌讳沙门，厌恶沙门穿黑衣。文宣帝曾问左右：“何物最黑？”回答说：“最黑莫过漆。”因为高涣排行第“七”，便被捕来邺。二人一直关到转年，某天高洋带左右亲到地牢观看，并讴歌一曲，令高浚唱和，高浚不知所措，既害怕又悲伤，声音颤抖，使高洋也感到伤感，不觉落泪。高洋准备赦免了二位兄弟，其同母弟高湛原先便与高浚不睦，于是进言：“擒虎易，放虎难。”文宣帝闻言默默无语，高浚切齿大呼高湛：“步落稽，你我阴间相见！”高浚、高涣勇武有力，高洋亲手刺高涣，又命壮士刘桃枝向笼中乱刺，高浚、高涣双手拉住刺来的槊，呼天抢地哭号不止。高洋命人燃柴投火，烧死了二个兄弟，并把高浚妃陆氏赏给杀害二人出力的刘郁捷，把高涣妃李氏赏给冯文洛。

大臣杜弼性情耿直，敢于言事，文宣帝曾问他：“治国当用何人？”杜弼答道：“鲜卑车马客，治国当用中国汉人。”这话正与北齐政权的鲜卑化主张相悖，天保十年杜弼被斩。

其生母娄太后见文宣帝狂饮，很气愤，举杖击之，说：“如此父生如此儿！”文宣帝道：“就应当把这老母嫁给胡人。”太后大怒，遂不言不笑，文宣帝想使太后笑，时太后在北宫坐在小榻

上，文宣醉醺醺用手一掀，把太后掀翻在地受了伤。文宣酒醒后又惭又悔，要自焚而死，太后又惊又怕，亲手牵挽他，勉强装笑，说："方才你是醉了。"文宣又令高归彦执杖责打他，并命令："杖不出血当即杀你！"并发誓戒酒。不出十天又故态复萌，狂饮如旧。高洋临幸李后家，用鸣镝射中李后母崔氏面颊，并大骂道："我醉了时尚且不认识太后，这老婢算什么！"用马鞭乱打百余下。

文宣帝出游街市，问道旁一妇女："当今天子怎么样？"妇女答："癫癫痴痴，成什么天子！"文宣立刻杀了她。文宣或乘鹿车，或骑着白象、骆驼、牛、驴，奔走驰逐，有时抛撒钱物，让人争抢取乐。在宫中以凌辱、摧残妇女寻欢，每当酒醉时，或持剑，或弯弓，越发狂虐。

修建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们都腰系绳索以防失脚，高洋登上去疾走如飞，或旋转起舞，毫无惧色。又召来死囚犯，用席子做翅膀，从高高的三台上飞下，不顾死活拼命跳下的，往往逃了活命；犹豫害怕胆怯畏缩的，常跌得骨折身残。又令人挑拣出判处大辟杀头的死囚，随时伺候，号称"供御囚"，文宣帝何时想杀人取乐了，由他亲自动手砍头。并制作了大镬、长锯、锉、碓等杀人工具，陈列殿廷。都督韩哲无故被杀，用矟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丧命，锯死了都督穆嵩，弄得百官战栗，朝不谋夕。

宰辅杨愔人称杨大肚，被文宣帝用马鞭抽后背，血染袍褂；又把他放进棺材，几次要把他钉在棺内。文宣帝对崔暹妻李氏说："想念崔暹吗？"李氏道："结发夫妻恩义深厚，实在怀念。"高洋说："既如此，自己去看望吧！"亲手斩了李氏，将人头抛出墙外。魏乐安王元昂是李后姐姐之婿，其妻有姿色，文宣帝想纳为昭仪，便用箭射死元昂，文宣帝又亲去吊唁，在灵堂便威逼拥抱其妻，命令从官脱下衣物作为赠送死人的衣物，一日之间献

衣、钱财、綵缎上万。文宣帝宠爱薛嫔，忽然一天回忆起她曾与高岳私通，便斩下头揣在怀中。在东山宴会饮酒时掏出人头投在席上，并支解尸体，用髀骨制成琵琶，在座者无不胆飞魄散，文宣帝手持琵琶忽又垂泪道："佳人难再得，真是可惜了。"

开府参军裴让之极言劝谏，文宣帝对杨愔说："这个愚汉，竟敢如此！"杨愔道："他想让陛下杀了他，成全他后世名声罢了。"文宣帝道："小人！我且不杀他，看他如何得名。"文宣帝与左右饮酒，高兴地说："乐哉！"都督王纮说："有大乐，也有大苦。"文宣帝问："这怎么讲？"王纮答道："彻夜痛饮，国亡身丧不顾，是谓大苦。"文宣帝恼怒之下命人捆绑王纮要斩，想起他有救高澄的功绩，便释放了他。一天文宣帝对群臣说："宇文黑獭不肯归降，如何是好？"都督刘桃枝说："臣领三千铁骑，到长安把他擒来。"文宣帝赞赏其豪壮，赐帛千疋。赵道德言道："东西两国势均力敌，他人可擒之而来，我们自然可被擒之而去，刘桃枝大胆妄言应诛，陛下为何滥赏？"文宣帝道："赵道德之言为是。"将帛转赐赵道德。一次文宣帝想纵马从峭岸上驰下渡漳水，赵道德挽住马缰不放，文宣帝发怒要杀他，赵道德说："臣死不恨，我必在地下启奏先帝，说这个儿子酗酒癫狂，不可教训。"文宣帝默然而止。一天对赵道德说："我饮酒过度时，你要痛打杖责我才好。"一次痛饮，赵道德执杖便打，文宣帝急忙逃走，赵道德追逐大叫："你是什么人，竟这样行为！"典御丞李集当面劝谏，把文宣帝比做桀、纣，文宣帝命人把他捆起来放在激流中，李集决不改口，文宣帝大笑："天下竟有这样痴人，我才知道龙逄、比干算不得人杰！"文宣帝时喜时怒，或杀或放，人人担惊。天保七年八月文宣帝将西巡，百官送行，文宣帝命铁骑包围众官员，下令："我举鞭，便杀掉他们！"时日落黄昏，文宣帝大醉不起，黄门郎是连子畅向醉皇帝说："陛下这样做，群臣不胜恐怖。"文宣帝说："很怕吗？要这样就不杀了罢。"百官方

免杀身之祸。

到天保十年，高洋神智昏惑，常常白日见鬼，不能进食，每天只频频饮酒，终因酒色过度，十月十日去世，终年31岁。当初高洋登基改年号天保，有人便说“天保二字，是一大人只十”，说其统治不过十年。又有位太山道士说他可做三十年天子，文宣帝对李后说：“十年十月十日，不就是三十吗？我很担心，人生之死，倒不足惜，只是可怜儿子正道还年幼，人家要抢夺他的位子呀！”这话却被他不幸言中。

齐文宣帝仍顽固保持着少数民族边镇军将的习气，既具有野蛮落后的风俗习性，又时刻突出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特权。在北齐取代东魏之后，打击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元魏，这种边远军事贵族的野蛮落后又占上风。

文宣帝高洋之子高殷，字正道。立为太子后文宣帝常说：“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想废掉太子。一次高殷随高洋登金凤台，召太子亲手处死囚犯，太子心有不忍，面露难色，再三不肯下手，文宣帝大怒，亲手夺过马鞭狠狠撞击太子三下。从此太子常常气喘口吃，有时精神恍惚昏乱。天保十年，文宣帝暴死，太子在晋阳即位，次年改元乾明（560）。

高洋死后第一个被报复、遭厄运的是高阳王高湜，高湜滑稽，奉迎拍马，经常在文宣帝左右，执杖责打诸王，太皇太后恨之入骨，这时加以罪名杖死了高湜。此时，常山王高演掌握了大权，与长广王高湛合谋，矫诏诛杀了尚书令杨愔、尚书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侍中宋钦道、散骑常侍郑子默。是年八月，高演废高殷为济南王，夺了帝位。

高演是高欢的第六子，高洋的同母弟。虽然是同胞，高演也深受残暴虐待。文宣帝沉溺酒色，高演忧愤之情被文宣帝察觉，对他说：“只要有你在，我何乐而不为呢？”高演拜伏在地，不敢发一言。高演妃元氏，本是魏宗室之女，文宣帝为他广求美女，

逼他与元妃离异。高演性情急躁，尚书省官吏常被他责打，文宣帝召这些官吏与高演当面对质，用刀架在脖子上逼他们揭发高演的短处和隐私。高洋晚年昏聩，曾将宫女赐给高演，酒醒后忘了这回事，说高演擅自强取，命人用刀环乱击，把高演打得昏死过去。皇太后见状日夜涕哭，高演一个多月伤势才平复。高演登上帝位后，当年便改元皇建，十一月便立其子百年为皇太子。

高演担心废帝济南王高殷重新崛起，而且他年岁渐长，自己夺位名义不正，于是不顾当年许下的不加害的誓约，秘密遣人携带鸩毒谋害高殷，高殷不肯服毒，被扼杀丧命，年方 17 岁。害死济南王后，高演内心有愧，后悔不该急于下此毒手，一个月后，精神恍惚，频频服用药剂。这时有位姓赵的尚书令史，说在邺城郊外遇见了文宣帝高洋带着杨愔、燕子献等人往西方去，并声称要复仇。这使本来身感不适的高演更是病上加病，时而发生幻视幻听症状，病势日渐沉重。派人施法术，驱邪祟，全不见效。高演又想用阅兵练武来厌胜[①]，高演勉强乘马检阅三军，由于马受惊，高演坠地，折断了肋骨，卧床不起。太后探视其伤，三次问到济南王何在，高演默不作声，太后发怒说：“杀掉了吗？不听我的话，你死了活该！”高演临终之际，遗命长广王高湛继承帝位，并亲手写下书信，称：“要将我妻、子安置在一好处所，勿学前人。”极担心高湛学他的样子。

高湛即位，是为武成皇帝。他是高欢第九子，高演的同母兄弟。当年改元太宁（561)。转年改元河清（562)。立妃胡氏为皇后，其子高纬为太子。

高湛耽于玩乐，喜爱北方胡族“握槊”的赌博游戏，常令宠臣和士开与胡后对坐游戏。高澄长子河南王高孝瑜认为有失体统，曾劝阻，和士开遂进谗言陷害高孝瑜，引起高湛忌恨，又高

① “厌胜”——“厌”通“压”yā，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

孝瑜行为不检点，与后宫御女有私情，武成帝大怒，罚孝瑜连饮酒三十七杯，孝瑜生得肥胖，大腹便便，酒中又已下毒，孝瑜毒发躁热烦闷，投水而死。河间王孝琬是高澄嫡子，一向骄矜自负，孝瑜之死无人敢哼声，唯孝琬大哭，他怨恨执政小人与和士开、祖珽，便扎成草人用箭射以泄愤。当时流传民谣“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和、祖进谗言，解释说：“河南、河北就是河间、金鸡鸣是新皇帝登基要大赦天下。”暗示河间王孝琬要夺位。这时孝琬得到佛牙舍利，夜放神光，又不肯献给武成帝，高湛命人去搜，从镇库中搜出武器、旗帜数百件，武成帝认为他果真要反，怒不可遏，命卫士倒持马鞭毒打，孝琬大呼“阿叔”，武成帝怒道：“谁是你阿叔，你竟敢唤我作叔？”孝琬答道：“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亲外甥，为什么不能唤陛下阿叔？”武成帝更怒，命武士折断两腿胫骨残害了孝琬。高澄第五子安德王延宗闻二位兄长被杀，痛哭不止，又难雪冤仇，又扎草人为武成帝像，边鞭打边斥责，被奴仆告发，痛责了二百鞭。

文宣帝皇后李祖娥，是汉人，生得姿容美丽。高湛逼李皇后淫乱，威胁说：“若不答应，我要杀你的儿子。”李皇后被迫无奈，只好应允。后来怀了身孕，文宣帝次子太原王绍德到宫中求见母后，李后不见，高绍德愤恨道：“儿岂不知，妈妈肚腹大了，所以不见儿。”李后深感惭愧，由这缘故，李后生下女婴也没有成活。武成帝高湛大为恼怒，横刀诟骂李后，扬言：“你杀我女儿，我就不能杀你儿子！”当着李后的面痛打绍德。高湛又记起前仇，骂道：“当年你父打我时，为什么竟不来救？”用刀环捣死了高绍德，亲自动手埋在游预园。李后眼见亲子被杀，痛不欲生，悲泣不止，高湛愈怒，扒去李后衣服打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盛在绢囊中扔到渠水里，很久才苏醒过来。后被送往妙胜尼寺出家为尼。

高演有七个儿子，元皇后所生高百年是嫡子，高演当皇帝之后立高百年为太子，高演临死将帝位传给高湛，留下手书请高湛手下留情。河清三年，高百年大难临头，因天象变化，高湛想借机除去心腹之患，适逢贾德胄教授百年书法，百年曾写了数个“敕”字，只有皇帝之命才可以称“敕”，贾德胄便去告发，武成帝即刻召来百年，高百年料定凶多吉少，便割下佩带的玉玦留给妃子斛律氏。在玄都苑凉风堂朝见高湛，高湛命他书写“敕”字相验，与贾德胄所献者相似，遂命侍卫乱棒齐下，又令牵曳百年围绕凉风堂边走边打，鲜血遍地，眼看气息奄奄，垂垂待毙，高百年哀告：“饶我一命，愿给阿叔作奴。”结果还是被砍了头。斛律妃手握玉玦哀号痛哭，水米不进，不久也死了，玉玦仍紧握手里。

高湛大约是怕自己死后，帝位被夺，儿子们性命难保，于是在河清四年传位给太子高纬，改元天统元年，自己当太上皇，仍控制朝政。

高纬年方10岁，自幼受宠爱，高湛将侄子杀了好几个，满心指望儿子安稳坐皇帝，谁料这后主皇帝昏虐之性颇有家风，直闹到破家亡国而后已。

高湛又封儿子高俨为大将军，高绰为司空，来辅佐高纬，不想高湛并未活多久，天统四年十二月高湛便一命呜呼了。后主高纬亲政理事，天统五年封高俨琅邪王，高绰南阳王，其他兄弟也封了王位。

南阳王高绰是李夫人所生，与胡皇后所生高纬同在天保七年五月五日出生，但比高纬早两个时辰，因此是长子，只因李夫人不是正嫡，故没有继承皇位资格，封了王位。高绰10余岁时留守晋阳，任性放纵，残忍恨戾。他喜爱波斯狗，尉破胡劝他不要玩物丧志，荒怠了政事，高绰一怒之下，立时砍杀了数条爱犬，殿廷上血肉狼藉，尉破胡吓得赶快溜走，从此再不敢多口。后高

绰任司徒，冀州刺史，为一方土皇帝，更加胆大妄为。他喜欢剥光别人衣服，踞伏在地作兽状，纵猛犬狂咬吞食。转任定州，好在楼上用弹弓射人。时常便服游逛，为非作歹，祸害百姓，自称是学伯父文宣帝高洋的样子。一次出游，有一怀抱婴儿的妇女躲避在路边草丛，高绰夺下婴儿喂了波斯狗，妇女号哭不止，高绰大怒，又纵狗扑咬，见狗不咬人，高绰命人将婴儿血涂在妇女身上，被活活咬死。后主知道了此事，命人将高绰锁拿到行宫。高绰一来便被释放，问他在地方上什么事最有乐趣，高绰说："多取蝎子和猴子放在一起最乐。"后主即刻传令当夜便索要蝎子一斗，到天明得蝎子三升，放在浴盆内，将人剥光衣服放人浴盆，后主与高纬一起观看人在盆中痛哭号叫。后主喜笑颜开埋怨高绰："这样的乐事，何不早飞马奏闻!"从此高绰很受后主宠信，封为大将军，早晚相聚游乐。后来韩长鸾指使高绰亲信诬告高绰谋反，后主命胡人何猥萨与高绰相扑，高绰被扼杀。

后主高纬昏虐残忍，是个虐待狂，兽性血食的野蛮性令人发指。然而他受过教养，学习过汉族文化，他还设置了文林馆，招纳了不少文学之士。而且他语言讷呐，不善言词，不喜见朝士，不是亲近熟悉的人不愿交谈。性格懦弱腼腆，别人注视他也不能容忍。又自诩风雅，常常自弹胡琵琶，唱着无愁曲，民间称他"无愁天子"。但他却是如此冷血，杀人不眨眼，看着活剥人的面皮而毫不动心。他只信任身边亲昵的人，任用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掌握大权，引用亲党，官由财升，狱以贿成，政务混乱。宫中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受他宠惯，享荣华受富贵的上万，宫廷婢女都封为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多人，一裙值万疋，一镜台值千金，式样翻新，追逐时髦。后主又大修宫苑，建造了偃武修文台，为妃嫔营造镜殿、宝殿、玳瑁殿，极富丽堂皇。在晋阳又修十二院，壮丽超过邺都。一些建筑毁了又造，造了再毁，土木工程接连不

断，天寒时用沸汤和泥，夜晚用火照明，无休止地劳民伤财。开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灯油万盆。又给胡昭仪起造大慈寺，未完工又改建穆皇后大宝林寺，花费钱财无数，人、牛死的数不胜数。御马披着华丽毛毡，饮料极其讲究，他豢养的马、鹰、犬都有仪同、郡君封号，如"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连斗鸡也号称"开府"。又在华林园设立贫穷村舍，后主身穿破衣扮成乞儿。或命人穿黑衣假扮羌兵，后主亲自带人攻击，往往假戏真作，用弓箭射死人。经他这样挥霍胡闹，国库空竭，国内人力困乏，北齐境内赋敛日益加重，徭役繁苛，民不聊生。

韩长鸾、穆提婆与高阿那肱共掌机要，号称"三贵"，败坏朝政。穆提婆之母陆令萱曾在宫中抚养过后主，称之为"干阿妳"，陆令萱奸巧诡诈，在宫中作威作福，号称"太姬"，其母子权倾内外，生杀予夺无人敢惹。和士开官居高位，又和太后淫乱，丑闻传遍宫内外。

和士开忌恨琅邪王高俨，便离间后主与高俨，谋划夺去高俨兵权。高俨遂决心除掉和士开，武平二年（571）四月，先令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上表弹劾和士开，随后假称奉诏，杀了和士开。后主哀悼不已，用刀环乱打高俨泄恨，参与谋杀和士开的文武大臣，被后主亲自用箭射，而后斩首，又支解尸体，暴露街头。自从此事件后，高俨被太后藏在宫中，食物都要亲口尝，以防遭毒手。陆令萱劝后主尽快除掉高俨，九月下旬，陆令萱与后主定计，以一同狩猎为名，诓出高俨杀害，年仅14岁。将高俨尸体用席包裹埋在大明宫室内，料理完毕才启告太后，太后悲伤不已，来到大明宫只哭了十几声，便被强行送回后宫。

后主高纬又听信谗言，杀了名将斛律光。国内卖官现象严重，郡县长官乃至乡官、主簿，都被富商大贾有钱人所得，贪污腐化成风。自邺都到各地，百姓困苦不堪。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的趋势已经形成，北齐的败亡便指日可待了。

高欢在世时，东魏强盛，人力、物力均超过西魏，高洋在世时，北齐国力仍不弱，后北齐诸帝昏虐残暴，政务日益败坏，最终被北周灭亡。后主高纬当了俘虏，以后加以谋反罪，连同宗族数十人不分老幼都被赐死，高欢的子孙存活下来的仅一二人而已。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北齐书》：《帝纪·文宣》、《帝纪·废帝》、《帝纪·孝昭》、《帝纪·武成》、《帝纪·后主》、诸皇后传、诸王传等

《北史·齐本纪》

《通鉴纪事本末·齐显祖狂暴》

苏绰定新制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宇文泰利用孝武帝与高欢日益加深的矛盾、最终导致兵戎相见的机会，使孝武帝西入关中，投入怀抱，自此，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地位。高欢在洛阳拥立孝静帝继位，迁都于邺。东、西魏对峙，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较量，彼此伺机吞并对方，高欢与宇文泰各自把持并且主导着东、西魏的军国大政，加强武备，兴举文治，任用和选拔人才，改革政治制度，励精图治。

宇文泰知道孝武帝并不是个可以任人摆布、甘当傀儡的皇帝，当初既不能容忍高欢的跋扈，长久下去自然难忍自己的专权，于是决心实行废立之策，在当年闰十二月，用药酒毒死了孝武帝，另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其后，拥兵坐镇荆州地区的贺拔胜，被东魏侯景所攻，兵败逃奔南朝梁，最后丧师失地，失去他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他本来足以和高欢、宇文泰抗衡的力量。贺拔胜与贺拔岳兄弟，本来同被孝武帝所倚重，拥有数州之地，握有重兵，及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所害，宇文泰捷足先登，继统了贺拔岳部众。至孝武帝构隙交兵，有人劝贺拔胜出兵勤王建立功业，贺拔胜又迟疑不决，按兵未动。他缺乏深谋远略，不图进取，最终难以自保。

转年，西魏文帝改元大统（535），进封宇文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封安定郡公。此时，高欢平定了东方各州郡，南和梁朝，北和诸胡，专力对付西魏，并遣大行台尚书司

马子如率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领兵攻潼关，袭华州。西魏虽然击退了东魏军人侵，但东魏攻势咄咄逼人，大战必不可免。而关中地区，连年征战，军役不息，各级官府和百姓苦于军役，疲劳衰敝；朝廷新立不久，也是财乏赋困，收入不丰，兵力和劳役不足，人、财、物均缺。宇文泰当此草创之际，遂命各部官员斟酌古今政令制度，参考变更，又根据当时社会情况，适合于当时施行的，制订了二十四条新制，奏明西魏文帝颁行各地。

宇文泰实行政治改革的主要谋划者及政令的制订者，便是苏绰。

苏绰字令绪，武功（今陕西武功）人。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其父苏协，做过武功郡守。苏绰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尤其擅长算术。其从兄苏亮博学有才，文章写得很好，苏绰文章不如苏亮；经划谋略，苏亮又不及苏绰，世人称之为“二苏”。他的从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时，宇文泰在都城东门外为他饯行，临别之时宇文泰对苏让说：“卿守子弟们中间，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吗?”苏让便推荐了苏绰。宇文泰召苏绰任为行台郎中，在此职位上任职一年多，宇文泰并没有了解他的才能。然而诸部曹有了疑难之事，常向他请教，咨询苏绰的意见后才决定。朝廷往来的公文，都依照苏绰制订的条款格式。行台官员无不称赞他的才干。后来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论事，周惠达不能回答，便请求出府召人商议后再答复。周惠达便召来苏绰，告诉他所论之事，苏绰当即为他酌量裁定，对事情作了论述。周惠达将论事状呈给宇文泰，宇文泰连连称好，问周惠达：“谁为你作出如此议论的?”周惠达回答说是苏绰，并称赞苏绰才能出众，学识渊博高深，有治国安邦之能，具王佐之才。宇文泰点头道：“我也很早就听说过此人之才。”不久，任苏绰为著作佐郎。一次，宇文泰与公卿百官游乐，往昆明池观赏捕鱼，路途中行经长安城西汉代的仓池故址，宇文泰询问左右臣僚，没人知道该地历史，有人说：“苏

绰博学多识，无所不知，请问他吧。”宇文泰便召苏绰，苏绰将仓池沿革始末作了回答。宇文泰大为高兴，接着又向他询问天地造化的许多道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史实事迹，苏绰知天文，晓地理，通人事，滔滔不绝，对答如流。宇文泰极其喜悦，于是与苏绰并马徐行，一路上边走边谈，直到昆明池。昆明池上波澜浩渺，鱼跃水面，宇文泰却无心捕鱼，与苏绰谈古论今，兴犹未尽，竟然没有使网设罟便回转长安。遂留苏绰在府中直到夜晚，向他询问治国平天下之策。宇文泰侧卧床上倾心细听，苏绰便陈述帝王之术，同时申述春秋战国申不害、韩非学说的主旨。宇文泰自幼惯于北方少数民族习俗，戎马征战多年，胸怀大志，早就存有建功立业的雄心，苏绰这番议论，他以前闻所未闻，苏绰说的帝王权术谋略，申、韩学说的治国驭下、政令纲纪等内容，正中其下怀，对其心思。宇文泰不知不觉坐起身来，对苏绰及他的阐述议论，肃然起敬，整衣端坐，不知不觉膝行而前，靠近苏绰细听，直至东方欲晓，天光放亮，宇文泰犹听得津津有味，余兴不减。早朝时，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乃奇士也！我要任用他掌管政令。"随即任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事务。自此之后，宇文泰对苏绰信任礼遇日益加深，苏绰也尽力发挥才能，施展抱负。苏绰见西魏朝廷迁长安不久，诸事草创，典章制度缺而不备。朝中勋贵大臣以武将居多，不知朝章典制；而且关中地区屡经战乱之后，民生困苦，经济凋敝，于是开始制定文案程式，统一文告、文书朱出墨人的规矩。又制订了施行各地州郡的计帐法、户籍法等政策。计帐法是对来年课役的估算，预算出第二年财赋收入及役力征派的情况，上报度支，由国家掌握。户籍法是清理登记户口，由国家掌握户口、人口情况。经过苏绰策划制定法规，逐渐使西魏统治有了条理规章，经济开始复苏，民力得以恢复，国库收人日渐丰富。

大统三年（537），东魏高欢兵分三路入侵，高欢亲率大军于

蒲坂修造三座浮桥，自渭北进兵。大都督窦泰领精兵攻潼关，司徒高敖曹趋上洛自南路进兵。宇文泰召诸将商讨御敌之策，诸将都认为应分兵抵御，独有苏绰赞同宇文泰的主张，集中精锐全力对付窦泰，歼其一路，高欢、高敖曹可不击自退。宇文泰领兵奔潼关，杀窦泰，尽歼东魏军，高欢、高敖曹闻知窦泰失利，遂撤兵而去。

大统四年，苏绰晋职为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食邑三百户。不久又加封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伯，增加食邑二百户。

西魏倾其全国兵力东征，第一次邙山会战爆发。河桥之役失利后，魏文帝与宇文泰领兵败回，这时关中大乱，战争中俘虏的东魏将士联络关中人相与起事暴动，俘虏的东魏都督赵青雀攻占了长安子城，雍州民于伏德联络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占据咸阳，抗拒归来的西魏军。先期退兵回到长安的李虎等将领无策平乱，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奉太子元钦出离长安，驻屯在渭北，及宇文泰率军回来，与华州刺史宇文导平定了咸阳、长安的叛乱。

大统五年十月，宇文泰在长安阳武门外，设置了纸、笔，征求国人对治国为政的议论，鼓励人们直言利弊得失，评定是非。魏朝廷自西迁以来，礼乐制度散逸不存，丞相宇文泰命左仆射周惠达、吏部郎中北海人唐瑾，根据旧有的礼乐制度程式，修改增减，重新制定。在封建社会，国家的礼乐制度起着很重要的政治作用，周朝末年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孔子就曾哀叹“礼崩乐坏”。北魏自从孝文帝改革，使少数民族国家向汉族封建专制国家形态演化，礼乐制度是其实现封建社会文明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宇文泰掌握着西魏朝廷的军政大权，对礼乐制度的恢复与发挥其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遂命令大臣重新修改制订。这时，大体上更定完成，基本使礼乐制度得以完备。

大统七年十一月，宇文泰又奏准西魏朝廷，颁行十二条制

度。惟恐百官不能够勤勉任职，尽心办事，又下令详细申明，命百官遵照执行。

以上诸项改革措施及各项制度的制订与建立，都有苏绰的建议和策划，宇文泰对苏绰益加尊重，更加信任。大统十年，授苏绰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宇文泰一心要实现富国强兵，要改革时政。西魏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都不如东魏雄厚，几次大战役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邙山会战的失利，更使西魏军事力量受创至巨。对东魏采取军事行动，不仅不足以进取，而且难于自保。另外，几年的天灾造成关中地区农业歉收，粮食短缺，给经济和民生、兵饷军粮，都带来很大的困难。宇文泰任用苏绰为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让他担负起这一重任，尽其才智。苏绰遂整顿吏治，减免冗散官员，又下令设置屯田，以资军国之需。因为国用不足，为维持庞大的开支，苏绰制定了征税法，虽然税额比较重，但却使国家收入得到了保障。经过开源节流，发展经济，促进生产，使西魏国内情况大有起色。

为了使改革的各项制度条理化，并且作为永久实行的复兴模式，宇文泰命苏绰斟酌修订，写成六条诏书，总为五卷，颁示天下。这六条诏书是：

其一清心。各级官员治民先应当治心，心不清静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身不能自治，又怎么能够治民！所以治民的关键在清心。清心并不单纯指不贪财货，而是要做到心气清和，秉心公正，只有出于至公，去除邪僻，才可以治民化民。其次在于治身，人君是百姓表率，君身不能自治就不可能企望治百姓。所以为人君者必须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行仁义，行孝悌，行忠信，行礼让，行廉平，行俭约，然后继之以勤勉不倦，加之以明察。能实行这八条，才可以治民。

其二敦教化。人的性情是发展变化的，随教化而变迁，教化

敦厚朴实则人性质直；教化浇薄伪诈则人性浮薄。浮薄是衰弊风气，质直才是淳和风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所以治与乱，兴与亡，无不由于教化所致。世道凋丧已数百年，大乱也有二十年，人民见不到重德崇善，唯有兵戈战争是闻，统治者不行教化，惟用刑罚。中兴以来，连年征战，频受灾荒，国家草创之期许多政策都是权宜之计。近年来粮食略有丰足，徭役赋税稍有减轻，衣食已经不再困难，教化可以施行了。各地方牧守令长，应当改变观念，禀承朝廷的旨意，宣行教化。要提倡道德，讲究淳朴，移风易俗。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治天下达到太平，这乃是重要措施。

其三尽地利。人以衣食为命，饥寒交迫而想使民礼让是不可能的。先足其衣食，然后随之行教化，足衣食在于尽地利。其关键在于各地牧守令长，每年春季要劝课劳力开垦春种，不失农时。麦收及养蚕，要动员劳力及时操作，不废其业。游手怠惰者罚，不勤事业者罚。春耕夏种秋收三时，孤贫之户，无牛之家，富家大户要资助，互通有无。农闲间隙要种桑植树，种菜修圃，养殖鸡畜。地方官要注意掌握宽严适中，为政过于碎细则民烦，劝课过于疏简则民怠，要因时制宜，繁简宽严得当。

其四擢贤良。上至帝王，下至郡国地方，得贤则治，失贤则乱。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决其门望资历，往往不能选拔贤良；末曹小吏，只是凭藉其刀笔之能，并不过问其品质操行。论门望资历，人有贤愚；论刀笔之能，人有善恶。从今选拔荐举人才，不限资历门荫家世，唯在得人。凡征求有才能的人，首先考核品质操行。凡不能发现人才、荐贤举贤者，都是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才。要发现人才，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使其积小功而成大功，由微末而显著。不要等人才使用，要在任用中识别和发现人才。认识这个道理，则贤

可求，士可择，天下可治。任用官吏要懂得省官，官省则好人容易充任，官烦则杂人恶人；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静；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乱。冗滥没有实际职事的官员应一律罢黜。

其五恤狱讼。要分善恶，明赏罚，治狱之官应当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刑罚轻重要适当。即便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也必须出于公心，去徇私枉法之意，只论是非曲直，尽量公平允当。听案审察时要详审细问，用刑要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及时剖断审理，不准停滞牵延狱案。还要注意德教，宁舍有罪，不害善人。如今有些掌握刑罚的人，为吏宁可酷烈，以免自受罪责，这不是出以公心，这样执法是奸人所为。人死不能复生，断狱必须慎重。若有罪大恶极的奸人豪滑，伤风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者，杀一儆百。以上两种情况要并行兼施。

其六均赋役。国家无财，地位不能保证，自古以来就有征税之法。如今逆寇未平，军用物资财帛用量很大，虽然还不能减免以恤民困，然而使其平均，使百姓不致乏匮。不舍弃豪强而征贫弱民户，不放纵奸巧者而压迫愚拙者，这便是平均。钱财货物的产生不易，生产要有周期过程，必须首先劝课使其经营生产，先时而备才能至时而输，不能临时督责，应付眼前差事。租税虽有程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全要决定于地方，若斟酌处理得当，则政和民悦；若料理处置无方，则吏奸民怨。又有差事征发徭役，往往不留心注意，以致使贫弱者有的负担很重徭役而远戍边地，富强者有的得到轻闲差事而防守近地。守令有这样的心思，不存恤民之意，便是王政的罪人。

宇文泰对苏绰制订的六条诏书极为重视，时常放置在座右，时时观览，事事依照它施行。又下令百官都必须学习记诵，现任的各地牧守令长，不通晓六条诏书及计帐法的，不得居官。宇文泰又广泛征召选拔人材，依照新制的规定审查考核，加以任用，

派到各地去担任牧守令长。数年之后，对于新制的施行，百姓一致称道，很得民心，受到拥护。

某次，各地牧守长官，一起谒见宇文泰，宇文泰命河北太守裴侠单独向前站立，并对各位地方官说道："裴侠为官清慎奉公，是天下最突出的，各位如果有像裴侠一样的，可以和他立在一起去！"众官员默然无声，竟无一人敢应声而出。于是宇文泰厚赏裴侠，以他为地方官的榜样。裴侠的政绩受到朝野一致好评，号称"独立君"。

自从晋朝以来，士大夫崇尚清谈，谈玄论道，奢靡成风。及后魏与南朝宋、齐、梁并立，文风崇尚浮华，写文章争奇斗艳，追求辞藻华美，行文典丽。宇文泰想革除习俗，改变文风，遂在大统十一年（545）六月，西魏文帝祭庙，群臣都来参加祭典的时候，命苏绰撰写一篇大诰，不用骈丽，摒弃浮华，仿《周书》专用古体文章体式，以期返朴归真，恢复古文淳厚朴实的文风。这篇大诰写成后，宇文泰大加提倡，命国中文士写文章，著述文字，文笔都要依据这种文体。苏绰写作大诰，对西魏变革文风，改革文体，起了一定作用。苏绰还著有《佛性论》、《七经论》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汉、魏以来，朝廷的官号、职称繁杂；自晋朝之后，南北分立，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又带来不同称谓的官号。因为繁杂混乱，宇文泰命苏绰和卢辩依据《周礼》的记载，更定官制，实行官制改革。恭帝二年（555），初建六官，设置三公、三孤爵位，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保、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也都仿周礼而设置。

苏绰忠心任事，俭以律己，常以拯救天下丧乱为己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苏绰任政以来，襄助丞相宇文泰治理国家，使西魏的纲纪政务渐有条理。苏绰访求贤才，荐举能者，与贤才之

士共同弘扬治道，为国出力。经他推荐和选拔的人，很多人后来都做了高官，担当了重任。宇文泰对苏绰也是倾心委任，极其信赖。有时宇文泰离开朝廷外出巡视，经常将事先署名用印的空白公文交给苏绰，有需要及时处理的事务，苏绰可以随时处置、发号施令，实行理事之权。待宇文泰回到朝中，苏绰只要禀告一声就可以了。苏绰经常对人说："治理国家之道，应当爱人如同慈父，训人如同严师。"每逢与朝中公卿大臣议论政事，常常从白天到黑夜。夜以继日，事无巨细，苏绰对政务无不了如指掌。因为他耗尽心血，不知疲倦地尽心尽力，终于积劳成疾，过早地去世了。死时年仅49岁。

苏绰一生俭约朴素，不营治家业，家无余财。长期以来，权贵豪门巧取豪夺，武人集团掠夺强占，在当时社会情况下，苏绰的清贫淡泊极为难能可贵。宇文泰得知苏绰死讯，深感悲痛，十分惋惜，在苏绰将要下葬时，宇文泰对公卿大臣们说道："苏尚书平生谦恭礼让，敦厚纯朴，崇尚节俭。我想成全他的意志，但是，又担心庸夫俗子不体恤此意，认为我刻薄寡恩，没有情义；如果要厚礼封赠，又违背了平日彼此相知的本心。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我不知如何办才好。"尚书令史麻瑶越过班次进言道："古人晏子是齐国的贤大夫，一件狐裘服用了三十年。待到他去世时，齐侯赠他车一乘，不肯违背晏子平昔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谦恭自居，我的愚见以为应该节俭从简，以此表彰苏绰的美德。"宇文泰称是。为此向朝廷荐举麻瑶。到苏绰灵柩归葬武功故里时，只用布幔灵车一乘载运。宇文泰与公卿百官，一齐步行送出直到郭门以外。宇文泰亲自在灵车之后酹酒祭送，并说道："尚书平生以来做事，妻子兄弟亲如骨肉所不知道的，我全都知道。只有你知我心，我知你意。正要一同平定天下，不幸你竟然舍我而去，奈何！"言罢放声痛哭，酒杯失手落地也全未在意。到下葬之期，又遣使者以太牢之礼致祭，宇文泰亲手书写了

祭文。

苏绰改制，定章立宪，奠定了西魏政权的统治基础，结束了魏西迁以来草创阶段的缺略简陋，对西魏国家的治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屯田兴农生产发展、选才任官、改革文风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建设性的规划。对宇文泰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起到巨大作用。后来北周的改革政策加速了民族融和过程，防止了北齐政权那样的鲜卑化和倒退。苏绰改制成功，从而也奠定了日后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坚实基础。因此，隋代周灭陈统一天下，仍念念不忘苏绰在西魏初期所作的开创性工作，纪念苏绰制订的影响深远的政策及各项措施。隋朝开皇初年，隋文帝杨坚下诏书，褒扬苏绰的功绩，追封他为邳国公，食邑二千户。

宇文泰很了解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又很能够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虽然他在少数民族习俗和烽火征战中长大，建功立业，但是他仰慕崇尚汉族的高度文明，提倡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起初，宇文泰在文士影响和建议下，想实行上古《周官》的制度，命苏绰专门掌管这件事，但不久苏绰去世，宇文泰便命卢辩继掌其事，接续苏绰未竟之业。于是，卢辩依据《周礼》的建置，设立六官，设置公、卿、大夫、士各个等级，并且编排规定了朝仪、车、服、器用的规格模式，大多数依据古礼之制，改革了汉、魏的一些法度。北周设六官，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而它的提出及制订起始于苏绰。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周书》：《帝纪·文帝》、《苏绰传》、《卢辩传》

《资治通鉴》卷 157～159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西魏建府兵

宇文泰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人。自少年时就随父宇文肱在鲜于修礼军中，葛荣率众起义，杀死鲜于修礼，宇文泰便在葛荣部下为将，不久，尔朱荣领兵攻打葛荣，葛荣失败被擒，宇文泰随尔朱荣到晋阳，成为尔朱荣部将。其后尔朱荣遣贺拔岳率军讨伐北海王元颢，宇文泰任贺拔岳部别将，跟随出征。孝庄帝反正复辟后，宇文泰因战功被封为宁都子，食邑三百户，又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万俟丑奴在关右地区起兵，孝庄帝派遣尔朱天光及贺拔岳前往讨伐，宇文泰便随贺拔岳入关，为先锋，攻破万俟丑奴部属行台尉迟菩萨等。在平定万俟丑奴过程中，宇文泰屡建战功，加封征西将军。普泰二年（532）尔朱天光领兵东拒高欢，留其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宇文泰游说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一同袭破长安，追擒尔朱显寿于华山。太昌元年（532），魏孝武帝任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宇文泰任其左丞、府司马。贺拔岳驻军平凉，宇文泰出任夏州刺史。

永熙三年（534）春，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所害，而侯莫陈悦胸无大志，缺乏远略，并没有兼并贺拔岳部众，贺拔岳部兵将一时军中无主，在群龙无首之际，大都督赵贵建议迎接宇文泰主持军务。宇文泰率部下轻骑驰赴平凉，途中斥退了前来招引贺拔岳部队的高欢部下长史侯景，当仁不让，不失时机地继统了贺拔岳部队，随后讨平了侯莫陈悦，为贺拔岳复仇，侯莫陈悦兵败自杀，宇文泰连克原州、水洛、上邽数处州郡，收秦州府库厚赏

兵将，军心大悦。以贺拔岳部队为基本力量，宇文泰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及孝武帝与高欢矛盾日益加深，终成水火之势，孝武帝外结方镇作为外援对抗高欢，遂倚重宇文泰，进封宇文泰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宇文泰成为占据关中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支军事力量。孝武帝讨伐高欢，遣人四处征兵，宇文泰命骆超率轻骑一千赴洛阳，并做军事部署作为声援，孝武帝失势后西奔长安，投入宇文泰怀抱，宇文泰从此遂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大统三年（537），东魏高欢分兵三路大举进攻，高欢率大军屯兵蒲坂（今山西永济北），造三道浮桥渡河，自渭北攻长安；窦泰率军居中攻潼关，高昂围攻洛州，自南路进兵。三道攻其三面，大有一举攻破关中之势。西魏面临危亡，情况十分严峻。宇文泰兵力单薄，分兵御敌更显得力不从心，宇文泰力排众议，毅然集中精锐攻击窦泰，取得小关大捷，窦泰战殁，东魏军万余人被俘，迫使高欢、高昂撤兵东归。

同年八月，宇文泰乘得胜之势反攻，率领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悳、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等十二将东征。于谨率前军攻盘豆（今河南阌乡西），东魏守将高叔礼投降，俘获戍卒一千。西魏军攻弘农（今河南陕县），冒雨攻城，斩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虏兵将八千，于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邵郡（今山西垣曲）归附西魏。当时河南地区豪杰纷纷招聚兵马，响应西魏，及宇文泰接连获胜，各自率领所部人马来降。几次掳获的东魏军战俘以及河南地区的豪杰乡兵武装，壮大了宇文泰的军事实力，补充了兵员。然而毕竟还不如高欢兵力雄厚，更兼关中地区经济财富和生产发展的限制，关中地区的灾荒歉收，严重缺粮，也都限制了宇文泰大规模扩充军队，没有足够的财力养兵。

不久，高欢凭藉东魏雄厚实力，避开宇文泰军势锋芒之后，转入反攻。高欢统兵十万出壶口（今山西吉县西），趋蒲坂，大将高昂领兵三万出河南。这一年因关中饥荒缺粮，宇文泰攻克弘农后带兵在此就食，部下将士不满万人。闻知高欢将要渡河入侵，急领兵入关迎击高欢。此时双方兵力悬殊，诸将都认为敌众我寡，难以取胜，宇文泰意识到若待敌西进，到了咸阳、长安，国内人心骚动，军心不稳，则大事去矣。在他尚未来得及调集各地兵马的情况下，决计率现有军队渡过渭水与敌交锋，于是展开了沙苑大战。这次战役宇文泰大获全胜，高欢军受重创，遭到惨败。宇文泰在战争中俘掳东魏兵士七万，选留下甲士二万人，其余全部放归东魏。在沙苑大战前后，西魏乡兵也投入战斗，蒲坂土著豪强敬珍、敬祥兄弟纠合乡里，招聚兵马，组织了万余人的武装，在高欢领残兵自沙苑败归之时，敬珍、敬祥领乡兵在中途邀击，斩杀俘捉东魏军甚多。

大统四年，宇文泰兵伐东魏，在邙山会战中失利，退兵到恒农，守将已经逃走，以前俘掳来的东魏降卒乘机作乱，关闭城门抵抗西魏军，宇文泰攻破城池，将叛军首领数百人杀死。这次战役西魏倾其全力出动，关中留守兵力薄弱，前后几次战争中俘掳的东魏降卒散处在民间，得知宇文泰出师不利，大败而回，便乘机叛乱。沙苑大战中掳获的原东魏都督赵青雀成为首领，率众占领了长安子城，雍州人于伏德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占据咸阳。开府李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奉西魏太子元钦出离长安，屯驻于渭北。西魏内部的兵变使宇文泰西归将士退无所据，情势严重，华州刺史宇文导与宇文泰合兵平乱，才使西魏政权转危为安。

这次事件暴露了西魏政权的许多问题，兵力不足，人心不稳，各级政权也不稳固，长久这样下去，不惟不足以进取，而且难于自保。在四邻不靖，特别是在东魏的军事威胁下，建立一支

强大而稳固的军队，成为宇文泰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能够尽快施行的办法，就是收乡兵为己用，招揽并任用拥有武装的土著豪强，封官职，赠爵位，委任其军政事务，让他们担当一方之任，特别是靠近东魏的沿边地带的防务，作为前沿的军事屏障。如伊川豪强李长寿当初任防蛮都督，后来积功做到北华州刺史，西魏建立之后李长寿率部抵御东魏，被任为广州刺史。东魏侯景攻破其坞壁，杀死李长寿。其子李延孙又收集其父旧部人马继续与东魏对敌，西魏贵戚大臣广陵王元欣、录尚书长孙稚等都携带家眷前往依附他，李延孙资助并护送他们到达关中，李延孙所部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势力，高欢深以为忧，几次派兵攻打李延孙，都未成功。西魏封李延孙为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因其兵少，又任命李延孙之婿韦法保为东洛州刺史，配置了数百名军士帮助他，连兵在伏流城建立栅寨。西魏独孤信率军入洛阳，想修缮宫室，命外兵郎中权景宣率领役徒军三千采运木石。此时正好东魏军来进攻，河南各地纷纷叛归东魏，权景宣只得由小路西退，与李延孙合兵一处，攻打孔城，攻下孔城后，洛阳以南各地又相继归附西魏。宇文泰遂命权景宣驻守张白坞，节制指挥东南沿边地区响应西魏的各路乡兵地方武装。大统四年末，李延孙部发生内乱，李延孙被其长史杨伯兰所杀，韦法保便领兵据守了李延孙的栅寨。可见豪强武装的作用不可轻视。

大统八年三月，宇文泰接受苏绰的建议，初置六军，仿照上古时期《周官》、《周礼》的记载，建立起六军的军事编制。四月，宇文泰大会诸军于马牧，检阅各军的军容武备。有了这支武装，宇文泰藉以展开军事进攻。

大统九年，东魏将领高慎（字仲密）据虎牢投降西魏，宇文泰乘势东征，三月，双方展开第二次邙山会战，西魏军战败，伤亡惨重。高欢虽然获胜，但损失也很大。封子绘、陈元康建议高

欢乘胜攻打西魏，夺取关中，统一北方，高欢因其兵势已成为强弩之末，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必胜的把握灭亡西魏，便没有采纳继续进兵一举攻入关中的建议，追击到陕州便收兵而回。宇文泰这次东征又失利，使军队受创甚巨，在带领残兵败将回撤途中，又被东魏追兵追杀，经殊死作战方才逃脱。返回关中后，宇文泰请求自贬官爵，魏主不许，西魏军出师无功而受损，损失督将四百余人，军士被俘及阵亡的有六万人，原来建立起来的六军，已经所剩不多，兵员亟待补充。为了扩军，宇文泰下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将大量关陇地区豪强武装和勇健之士招募为军士，整编为军队。这一年的招募豪右从军，包括了豪右本身及其统带的武装兵众，这些豪右督将的兵员，是靠着宗族、乡党、部曲的关系，招聚编制在一起的，以地方豪右作为首领，其宗族人、乡里人、宾客和义从作为基本力量。在西魏府兵制建立的初期，招募豪右乡兵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乡兵部曲的豪右被加封委任，给予职务，如韦瑱，以当地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又迁升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行京兆郡事。苏椿因在乡里有声望，领乡兵，因从战有功封散骑常侍、大都督。乡兵首领被任命为大都督、帅都督等官号，本身为乡里望族大姓，而且乡兵不必驻守在本乡本土，可以随时受命出征，外出参战。故此乡兵武装逐步正规化、中央化，直接受命于中央指挥调动。

东魏的兵制却与西魏不同。北魏时期的六镇之兵多为高欢所得，高欢时实行兵农分离之制，兵士由鲜卑人充当，汉人主要从事耕织，以供军旅之需。高洋建齐后，励精图治，也同样致力军队的整训，简选六坊青壮年充当六军宿卫之士，都是以一当百的壮士。冲锋陷阵敢死之士称作“百保鲜卑”，又挑选汉人勇力绝伦之士称作“勇士”，驻防在军事重镇及边塞要地。但是，北齐对兵制的创革，并未改变兵与民、胡与汉之分。

西魏宇文泰也在改革兵制，创立府兵之制。设立柱国大将

军，并且将乡兵武装也纳入柱国统领的军队系统。最初，战国时期楚国设置了柱国的名号，作为统率军队的将官，也称上柱国，地位略次于令尹。后魏初年曾经设置过柱国这个官职，世祖加封太尉长孙嵩为柱国将军，但并未普及使用。到后魏末年，又出现了柱国的官号，北魏敬宗孝庄帝曾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地位在丞相之上，尔朱荣败事以后，这一官号随之废止。大统三年，西魏文帝又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此后，佐命功臣、位望功勋并重的大臣，也都封为柱国大将军之号，共有八人：即安定公、丞相宇文泰，广陵王元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称为八柱国。贺拔胜因死去比较早，未曾加封柱国名号。

宇文泰召募民众有才力者应征从军，称为府兵，本身负担的租庸调一切蠲免。将户籍纳入府兵军籍，分别于民籍，农闲之时训练演习军事，征战所需的马畜口粮，由六家供给。

府兵的编制：府兵合计为百府，每一府设置一员郎将统带，分属于二十四军。宇文泰任总百揆，作为最高统帅，都督指挥中外诸军，元欣以帝王宗室贵胄，指挥宫禁卫军，并不参预征战。其余六柱国大将军各自统辖二大将军，计十二大将军，即广平王元赞、淮王元育、齐王元廓、章武郡公宇文导、平原郡公侯莫陈顺、高阳郡公达奚武、阳平公李远、范阳公豆卢宁、化政公宇文贵、博陵公贺兰祥、陈留公杨忠、武威公王雄。每一个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每个开府各领一军，计二十四军，也称二十四团。每一团设仪同二人，统兵带队。

西魏的府兵制，主要沿袭、借鉴了鲜卑军制。后魏六镇的军士，主要归属了高欢，成为东魏军的主干。宇文泰部下军人多是关西之人，从军队的组成来看，其主要者，一是原贺拔岳部众；一是关陇地区州郡兵；一是乡兵即豪右武装；另一来源是战俘，即历次与东魏交战中俘获的军士，特别是沙苑大战中掳获的东魏

甲士。从历次战争及双方实力看，西魏宇文泰弱于东魏高欢，如果不建立一支新型稳固的军队，难以与高欢争衡，在军事上占得上风。宇文泰生长在北部边镇，长期在军中，自然熟悉鲜卑兵制，在鲜卑兵制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兵制。魏孝武帝入关以前，宇文泰建有十二军；大统八年始建六军，即是六柱国大将军所领的军队，创建伊始，转年就遭到邙山之败，损失惨重。于是在大统九年下令广募关陇豪杰以增军旅，充实六军兵力，整顿建制，将乡兵武装纳入六军系统。六军之名虽然仿据《周官》的记载和名称，其基础实质上仍是鲜卑兵制，并在当年阅兵于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大统十一年又在白水（今陕西白水南）大规模阅兵，狩（练兵习武）于岐阳（今陕西扶风西北)。十二年大会诸军于咸阳。十三年再次狩于岐阳。十四年又大狩于原州以北长城。宇文泰勤于讲武教战，府兵渐渐成为劲旅。

大统十六年，开始执行籍民为兵的政策，下令："籍六等民之有才力者为府兵。"这种变募兵为籍兵的办法是按籍征兵，有强烈的强迫性质，就是在中下户等以上的六等户中拣选魁健才力之士应征，由民户变为军户，实现军、民分籍，同时入军户之后，可以免除赋役负担。府兵军士的供给，马匹衣粮等由六等军户供给，而辎重铠杖重要武器才由官家供给。这样一来在形式上虽然依据鲜卑军事建制，实际上扩大了汉人应征的成分，当时六等户中被籍为府兵的不是少数，以致有"半为兵"的说法。

不仅府兵军士是以关陇汉人为主，府兵统帅也有是汉人，柱国大将军中的辽东襄平人李弼、天水南安人赵贵，大将军中的弘农华阴人杨忠、出自太原王氏的王雄，也都是汉人。府兵制一创立，形成的便不是一个完全鲜卑化的武装集团，而是民族混和的军事集团，从而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在军队中实现。

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宇文泰去世，宇文觉继任太师、

大冢宰，其后接受西魏的禅让，即皇帝位，建立了北周政权，由晋公宇文护执政。不久，宇文护逼迫宇文觉逊位，立宇文毓继位。武成元年（559），晋公宇文护上表归政，表示不参预政务，宇文毓开始亲政理事，而军旅征战等军事事务，仍然由宇文护总揽掌握。左右十二军都受其节制指挥，凡是征发调遣，都由宇文护下令施行。这一年，下令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任命亲信的人出任，如大将军宇文宪为益州总管，宇文直为襄州总管。宇文毓去世后，武帝宇文邕继帝位，兵权仍掌握在宇文护之手。

这时北方形势已变，北突厥强盛，北周军事力量增强，北齐很是惧怕。保定四年（564），北周与突厥联兵伐齐，晋公宇文护征发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秦、陇、巴、蜀之兵，并羌、胡内附的少数民族之军，合二十万人出征。二十四军即左、右十二军，为六柱国和十二大将军所统率的关中诸府兵。杨檦因为轻敌被齐军击败，降齐。周军攻洛阳，大败于太和谷（洛阳东北），王雄战死，军士死伤甚众，军资器械损失不计其数。

天和元年（566），周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用来安置军士，成为府兵屯兵之所，周武帝亲自巡视新城，历时二十五天。

天和四年，又筑崇德等五城。周、齐展开宜阳争夺战。周将韦孝宽认为：“宜阳一城之地，得之不足为益，失之不足为损，两次争夺宜阳，劳师动众。若经营汾水以北，放弃崤山以东，必能争得主动，应急速在华谷、长秋筑城。”并画出地形图，上奏朝廷。晋公宇文护不以为然，说：“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防守？”事情遂作罢。后来，齐将斛律光在华谷、龙门筑城，转年又筑十三城。在河南、汾北的周、齐接壤边境所筑的新城，多是防卫戍守性质，作为军事防御之用。另在长安附近及内地也筑有新城，主要用于安置六府军士，军人城居有家属随军，成为有军事性质的城防，有别于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

的城镇，也不同于军事防御的堡垒，乃是内地边防化、军人职业化的一项措施。

天和七年（572），周武帝设计诛杀了宇文护，改元建德。武帝宇文邕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立志实现统一，攻灭齐国。当时北齐政治黑暗，嬖幸奸佞当权，国势日益衰败。武帝出于用兵的需要，下令扩大募兵范围，府兵兵额迅速增加。当年十一月，武帝亲率六军在长安城南习武练兵，巡视羌桥，召集京城以东诸军都督以上将领，颁给赏赐。十二月，武帝巡察斜谷，召集京城以西诸军都督以上将领，颁给赏赐。

建德二年六月，武帝下令选拔诸军将帅，并在露寝集合军将，勉励他们习武练兵，勤于戎事。并且下诏，诸军旌旗上面图画上猛兽猛禽的图像。十一月，武帝亲率六军在长安城东习武阅兵，又召集了诸军都督以上将帅五十人在道会苑校射，武帝亲临射宫观看，并检阅军容。

建德三年正月，设宴款待二十四军督将以下众将，测试军事征战的兵法战策，命众将痛饮尽欢。六月，又召集诸军将，教导作战列阵等兵法。十二月，大会宿卫官及禁卫军人，赏赐钱帛等物。并且下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有能劝勉征召来从军者，分别授给官职，贫下户给复三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当，除去县籍，立为军籍。此令下达后，征兵范围不限于中下户等以上的六等户，扩大到征召贫下户加人军籍，汉人多数人应征从军，达到了“夏人半为兵”的程度。当年又集合诸军在临皋泽讲武阅兵。

建德四年春，开始设置营军器监，兵器甲杖等军械始有专门政府机构主管营造。二月，改置宿卫官员。七月，武帝召见大将军以上高级将领到大德殿，武帝亲自训示：“太祖（宇文泰）神武，创立帝王基业，兵威所到无不征服。惟有伪齐，犹怀跋扈之心，屡次征讨伪齐未成大功。朕继位以来，往年政权操在权臣手

中，自朕亲政掌权就谋划东征，经数年努力，战争准备大致完成。伪齐主昏虐无道，除暴勘乱这时正是时机，如今准备几路出兵，一举灭齐。”遂下诏出兵伐齐。于是发生了河南战役。九月，武帝在军中患病，周军遂班师，结束了第一次伐齐之战。十月，设置上柱国、上大将军官衔，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设置上开府、上仪同等官。

建德五年九月，设醮于正武殿，祈祷东征胜利。十月，大举出兵伐齐，兵力达到二十万人。终于灭亡了齐国，取得重大军事胜利。

宣政元年，武帝亲自率军出征突厥。这次行动，征发了关中人力、畜力全部从军。征发豪侠少年及驴马从军，属临时调发，以增加兵力和运输供给能力。

实行府兵制的结果，使正规军的编制确定下来，平时练兵，战时出征，便于将领统率指挥。同时使兵源充足，特别是汉人大量从军，使兵额剧增。府兵制使兵、民分离，各立户籍，保证了军队的正规化。这样，转变了西魏与东魏的兵力对比，扭转了处于劣势的局面，奠定了周灭齐的军事基础。府兵制一直延续实行到隋、唐两朝，在战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周书》：《学纪·文帝》、《帝纪·武帝》

《资治通鉴》卷 157～173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周武帝禁佛道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已难稽考，古来佛教徒中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据史书记载，佛教传闻于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发生了。据说汉武帝元狩年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至皋兰，过居延，远征万里，兵威远扬，当时西域昆邪王杀休屠王，带领部众五万降汉，获得一尊西域人供奉的金人，武帝认为是大神，安放在甘泉宫。这尊金人身长丈余，供奉不用祭祀，只烧香礼拜而已，佛教的流传初始于这时。在西汉开通西域的过程中，张骞出使大夏回汉，传言大夏之旁有身毒国，又名天竺，开始听说源于印度的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博士弟子秦景先接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佛经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廷。明帝访问群臣，傅毅回答说金人乃是佛。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出使天竺，学习并抄写佛法经卷，其后蔡愔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东还至洛阳，中国开始有沙门及跪拜朝佛的礼法。蔡愔此行又获得佛经四十二章，释迦佛的主像，明帝令画工绘制佛像，安放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卷收藏于兰台石室。蔡愔还朝回国时，因为用白马驮负经卷，遂在洛阳雍门之西建立了白马寺，天竺两位高僧便居于此寺，后来二人都在此寺去世。

南北朝时期，社会出现畸形发展状况，佛教数度兴盛。在北朝，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览佛经，礼佛好道，敬信沙门，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在都

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塔寺，法果死后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的封号。在此前后，名僧迭出，后秦姚兴礼敬鸠摩罗什，撰译经文，著论传经。又有沙门法显，自长安游天竺，周历三十余国，译著经律，并传记诸国。至太武帝拓跋焘，锐志武功，好武习战，有平定祸乱之志，因采纳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之言，崇道而不信佛，于太延四年（438）下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发生盖吴之乱，太武帝西征来到长安，在一寺内沙门所种麦地里放喂马匹，太武帝进寺看马，沙门邀从官饮酒，见寺内收藏弓矢矛盾等武器，太武帝大怒，认为僧徒与盖吴通谋作乱，命官府杀僧众，查封寺院财产，又搜得大量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藏的大批财物，寺内又营造暗道秘室，沙门与贵室妇女私通淫乱。太武帝对僧徒的非法大为震怒，听从崔浩的进言，下令大肆诛杀长安及各地僧众，焚毁佛像，下诏："沙门僧众假藉西方外族的虚诞之说，妄生妖孽，妨害政令教化。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府，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送者，沙门正法，收容款留者诛杀一门。"由于太子晃一向敬奉佛教，再三劝阻，又故意拖延宣布诏书，四方远近各自闻风设法逃祸，各地沙门全都逃匿四散，佛像经卷也多被秘藏，只境内寺塔被破毁无遗。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禁佛的开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因事被杀，禁律渐渐松弛。文成帝拓跋濬嗣位，下诏重兴佛教，准许诸州、郡、县在民户聚集之地各建寺院一所，财用不加限制，准许平民出家。此令一出，寺塔迅速修复，文成帝亲自为罽宾（今克什米尔）沙门师贤落发，封为道人统。兴光元年（454）命在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成释迦立像五尊，高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师贤死后，又以凉州沙门昙曜继任，道人统更名为沙门统。文成帝奉之为师，听从昙曜建议，大兴工程，在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镌建佛像，修造了著名的云冈石窟。昙

曜又奏："捐输谷粟六十斛给僧曹的民户，即为'僧祇户'，粟称'僧祇粟'，犯了重罪的民人及官奴，为'佛图户'，在诸寺洒扫供役使，兼种田输粟，为寺院服役。"文成帝一并应允，其后僧祇户、僧祇粟及寺户，遍布境内各州郡，寺院经济迅猛发展。献文帝拓跋弘，笃信佛教，大修寺塔，起建的永宁寺，修造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号称天下第一塔。又在天宫寺造佛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孝文帝拓跋宏嗣位之初，下诏限制佛教寺院的泛滥，民间不得容留长年游荡的僧徒，清查并遣送无籍的僧徒，传教的僧徒要持有印牒文移，违者治罪。随后又下诏禁止建造塔寺，不准竞相夸耀豪富，费竭财产。至承明元年（476）孝文帝剃度僧尼百余人，起造建明寺、思远寺，又多次设会讲法，广作佛事。一时间修造寺塔的风气很盛，太和年间（477），都城平城的新旧寺院约有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各地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太和十年(486）官府上奏："愚民希图侥幸，假称入道出家，逃避输课赋役，检查出无籍僧尼及行为不端、勒令还俗的僧尼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太和十六年朝廷下诏，明令规定："四月初八日，七月十五日，准许大州剃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

到了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寺院就有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僧庙约计三万有余。北魏时期佛教的发展盛极一时，而产生的流弊也很严重，寺院经济畸形发展，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据为寺院所有。不法之徒、逃避赋税徭役的民人，纷纷出家，僧尼徒众的来源猥滥之极。特别是正光年间以后，国家政治混乱，战争频兴，佛徒数量剧增，各地僧尼约略在二百万以上，成为不容忽视、流弊甚多的重大社会问题。

后魏分裂为东、西魏，孝武帝西入长安，依宇文泰，是为西魏。高欢另立孝静帝，迁都于邺（今河南临漳)，是为东魏。

当此时，东魏洛阳的佛寺庙宇，在战乱中毁弃不少，迁都时

洛阳诸寺僧众也一同迁邺，建立新寺，广招僧徒，名僧昙鸾被孝静帝敬奉若神，称为“神鸾”。多年来边镇流民起义，权臣武将争斗，烽烟遍地，赋役繁重，百姓不堪承受，纷纷去当僧尼或荫附于寺庙。元象元年（538）邙山大战，东魏击退了宇文泰的大举进攻，战后人力物力均感困乏，财赋短缺，是年秋东魏颁布诏令，不准多建寺庙，停建新寺。命令各地郡守、县令，有擅立寺者，不问财力来源均以枉法论。高欢、高澄并不看重佛道。北齐代东魏后，文宣帝高洋崇信释教，曾经请高僧法常到内廷讲法，封为国师。建昭玄寺，设立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那三人，管理佛教事务。因为佛、道二教不同，高洋想去除一教，奉行一教，在天保六年（555）召集佛教、道教二家到邺，双方论难，辩论的结果道教失败。文宣帝下令道士全部剃度为沙门。道士不服，高洋杀掉道士四人，其余道士不敢再反抗。从此灭道而兴佛，北齐境内再也没有道士。文宣帝晚年在辽阳甘露寺禅居深观，不亲理政务，唯军国大事才使人奏闻。

武成帝高湛即位，大造佛寺，下诏以邺城南双堂闰位之苑改建大总持寺，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后主高纬也好佛，将金凤等三台未入寺的土地建筑全都施舍大兴圣寺，把并州原尚书省建成大基圣寺，晋祠建成大崇皇寺。北齐后宫妃嫔也好佛，僧尼经常出入宫禁，讲法诵经，不法者淫乱后宫。武成皇后胡氏与沙门昙献有私情，宠爱倍加，任昙献为昭玄统，又将少年男子冒充女尼，混入内廷，后来败露，昙献与二少年都被杀。邺都的大寺约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北齐全境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

西魏都城长安，曾因为魏太武帝灭法，佛教一时衰落。孝武帝西奔长安后，因孝武帝和宇文泰均好佛，佛教逐渐兴起。宇文泰选有学问的高僧百人到府邸讲说佛法。一次到檀台山狩猎，宇文泰遥指山上问随从文武：“你们看见什么没有？”都说未见，唯

独卢光答："看见一个沙门。"宇文泰称是，遂中止狩猎，令卢光在沙门站立的地方修建寺庙，挖掘地基时在地下深一丈处掘出瓦钵、锡杖各一件。西魏文帝时建造大中兴寺，任命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立科条，宣扬佛法。

北周取代西魏建国，也崇奉佛教，明帝宇文毓建造大陟岵寺、陟屺二寺，年年剃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号称玄门二杰，南方游学游方僧人也纷至沓来。但不久，周武帝宇文邕灭佛道事件便发生了。

宇文邕初即位时宇文护专权，诛杀了宇文护后，周武帝励精图治，志在灭齐统一北方。他深深感到佛道的为害，蛊惑人心，寺庙经济膨胀，成千上万逃避赋役者不是出家就是托庇于寺庙，成为富国强兵的极大障碍。宇文邕又没有民族偏见，重儒术而不以胡族自居，也不提倡胡教。北周的崇儒风气在明帝宇文毓在位时便开始形成，宇文毓自幼好学，喜读儒家经典，善于写文章，文词文雅优美。他性情宽厚明达，深受儒家仁厚教育的影响。宇文毓即位后，集中文士八十余人在麟趾殿整理典籍，校刊经史。又搜集采录各种书籍，上自伏羲、神农，下迄魏末，撰写成《世谱》五百卷。宇文毓自著文章十卷。到武帝时重儒崇学之风更盛，保定末年，征召儒学大师沈重到都城，命他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这时，有个还俗僧人卫元嵩，看破佛教，反戈一击，现身说法尤其不信释佛。他上疏给武帝，激烈地攻击佛教，请废除佛法。又有道士张宾也建议省寺减僧，请武帝废佛。从此揭开了周武帝废除佛道的序幕。

天和二年（567），卫元嵩上疏说："国家大治不在寺庙，尧舜时没有佛教而国泰民安，南朝齐、梁信佛教而社稷覆灭。大周的兴盛要依从唐尧、虞舜的教化，去除齐、梁的弊政。"他请求建造平延大寺，主张"容纳四海万姓，不偏立伽蓝释佛。以城隍为寺庙，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推令德

作三纲，尊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做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他上疏陈述十五条，阐述效法上古圣王，重教化，宏治道。这深合武帝之心。

当时中国北方流行谶语，说沙门依次序、承运会，当为天子。故统治集团都忌讳黑衣（沙门衣黑色）。北齐术士传言“亡高者黑衣”，齐神武高欢出行不愿见到沙门；文宣帝继位问左右何物最黑，从人回答说最黑莫过漆，漆、七谐音，遂将行七的兄弟高涣处死。忌黑衣、忌沙门之说也流行北周，卫元嵩及张宾请废毁佛教也援引了黑衣当兴的谶语。这便引起武帝的警惕。但佛道地位崇高，徒众甚广，势力很大，武帝尚难以决断，自天和年间至建德年间，七次辩论三教先后。

天和三年八月，在大德殿，武帝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亲自升座讲《礼记》，崇重儒家的意向已经很明显。四年二月戊辰（初八日），武帝又在大德殿，召集百官和沙门、道士，讨论释、老之义，开始辩论佛、道的教义，二教的大小。三月十五日，下令召集僧、道、名儒及百官二千余人，武帝在正殿升御座，亲自参加三教优劣的讨论，儒学大师沈重在辩论中言词明确，辩析清楚。因众议纷纭，没有结果。同月二十日，又依前次召集僧俗，继续讨论三教优劣，三派各自争锋斗胜，互相攻讦。四月初，武帝又下令广召三教，命陈述教义。武帝本想定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于是数次召集大会，因众家议论难分轩轾，没有确定三教次序。天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僧人甄鸾著成《笑道论》三卷，进呈朝廷，五月十日，武帝召集群臣，详细论定甄鸾的上书，认为他伤蠹道法，被当廷焚毁。这时道安法师又奏上《二教论》，激烈地攻击道教。但此时，武帝并未显露出有抑扬偏重的意思，作于天和五年五月丙寅（十四日）的《二教钟铭》一文中，有“二教并兴，双銮同振”之句。

天和七年正月，武帝贺临玄都观，亲自登法座讲说，公卿百

官并道、释各家互相辩论。至三月，专权的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其子柱国谭国公宇文会、大将军莒国公宇文至、崇业公宇文静等被杀，天下大赦，改年号建德。

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初二日），再会集群臣及沙门、道士，武帝升高座，命僧道俗辩论考核三教先后。经过这次辩论，确定了三教次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明确提出尊儒主张，贬低削弱了释教地位。武帝先后七次讨论三教优劣，先道后释的确定，受张宾和卫元嵩的影响。佛教不甘失败，遂反击道教，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一卷，又作《释老子化胡传》一卷，攻击道教。又有猛法师，与武帝争论，语言激烈，静蔼、道积也诣阙陈述，攻击道教。

建德三年五月，武帝下诏设立太子谏议员四人，文学十人，皇弟、皇子友员各二人，学士六人。规定以儒教为正统，作为治国施教的大法，并以皇储皇子等帝王家族的学习与教育立为天下表率，以期上行下效，在全国尊崇儒学，教化百姓。

因释教不服道教，武帝再次大集臣僚及僧道各众，命道士张宾与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虽然偏袒道教，亦不能驳倒智炫，令智炫屈服。武帝斥佛之不净，佛法虚诞，胡人本无此教，乃汉人无赖所伪造。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甚至直言抵触武帝之短，武帝不悦而退。于是武帝便将佛教、道教一同废斥。斗争的结果，释、道二教两败俱伤。

五月十五日，武帝下令开始禁断佛、道二教。所有经像全部毁弃，大量裁汰沙门、道士，令僧、道徒众还俗为民。佛、道二教占有的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贵族。当时被勒令还俗的僧、道多达二百余万，有些僧徒避难逃入北齐和南朝。同时，禁止淫乱的祭祀，礼法典章所不记载的，全部废除。

六月戊午（二十九日）下诏："圣贤至道宏大深远，包含千古万物，其后分歧日出，异说沸腾，不能融汇归一，纷争不息。

现在设立通道观，圣贤哲人的微言大义、典章训戒，要奉为金科玉律，宏扬阐发，一以贯之。”于是设立了通道观，选取名僧高道一百二十人，称作通道观学士，汇通和阐扬三教的经义。这项措施，旨在统一三教，归三为一，兼容并蓄而用之。

四年，武帝发兵东征，失利而回。五年九月，准备再次东征；丁丑（初二日）设大醮于正武殿，祈祷保祐东征大功告成。十月，大举伐齐。设醮祈福，依然用道教的法事。

建德六年正月，周军攻人邺城，灭亡北齐。邺城有位通经博学的大儒熊安生，是北方著名学者。自从当年宇文泰任用苏绰改制，依周礼行政令，朝廷公卿百官学习周礼周官，有数十条疑难长期得不到解释，无人可以详细论述。天和三年周齐和好，兵部尹公正奉命出使北齐，与齐人论及周礼，齐人也不能通晓，于是齐国便命熊安生到宾馆见尹公正，对尹公正所问疑难，熊安生一一解释辨析，究本探源，讲得透彻明白，尹公正极为佩服。返周后便详细回禀了武帝，因此武帝对熊安生久有敬仰之心。武帝进入邺都后，熊安生令家人洒扫门庭，家人感到很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定要来见我。”果然不久，武帝亲临其家，与熊安生执手并坐，谈古论今，并赏赐了物品，命他随驾人朝。由此可见武帝重儒之真切。

在邺都，武帝召集北齐境内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宣讲斥佛省寺之意，说明儒家六经弘扬治术，教人忠孝礼义，于世有益；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应该罢去。沙门静影、慧远不服，与武帝反复辩论，武帝虽然不能驳倒慧远，但对于坠人阿鼻地狱的恫吓毫不畏惧，下令毁弃齐境佛教，所有各地寺庙一概废止，四万余所寺庙全部改作宅第，还俗僧众约有三百万人。十一月四日，武帝驾临邺宫新殿，僧人任道林上表，劝谏毁法之举，与武帝争辩，武帝不为所动。灭法令下达后，一些僧人只得避往江南，如北齐法主沙门靖嵩，此时与僧众结伴到南方，辗转到桂

州。武帝凯旋还朝，献俘太庙，此后，又命熊安生等儒生到大乘佛寺参议五礼。

灭齐后第二年六月，周武帝因病去世。宣、静二帝继位后，复兴佛法，原邺城僧人王广明上书驳斥卫元嵩毁法。当时手握大权的丞相杨坚信奉释教，故佛教再次复兴。

建德年间的法难，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政令极为严厉，禁毁令得到严格执行，范围波及到北周、北齐两国全境，整个北方的寺庙经像，扫地净尽，僧徒道众颠沛流离，困苦不可名状。僧徒的遭遇比道徒更甚，有的僧人以身殉法，如僧人静蔼，脔割肢体、现骨剖心而自杀。有不少僧徒被迫令还俗，隐迹在民间，内心仍坚守佛教教义，如北周的费长房、昙崇、法纯、静端、道宗、法祥、僧渊、智藏，北齐的法上、灵裕、昙荣。也有些遁迹山林，藏匿不出，如北周的昙相、静渊、普安、法应、法藏、道判，北齐的慧藏、慧瑱、僧邕。又有志念逃到海隅，匿身滨海边远之地。有的有身份的僧人进入通道观，如彦琮、任道林、普旷等人，都做了通道观学士。也有的像靖嵩一样逃到江南。来到南朝的著名学僧昙迁、靖嵩、智者大师，先后奠定并开创了法相宗、天台宗两派的先河。自魏孝文帝之后，僧人北来，及周武帝灭佛北方僧人又驱之南方，于是南北交流，相互沟通。

周武帝的灭佛道政策，旨在富国强兵，这一点僧徒也很清楚，建德二年确定了三教次序，释昙积就说："顽劣僧人服兵役，不足以强兵；寺庙田产给了民众，怎么能富国？"事实上灭佛道的结果，确实加强了王权，加强了中央的财富和兵力。周武帝决心很坚定，毫不动摇，周灭齐后，推行灭佛道政策，僧人慧远以地狱相威胁，他说："陛下现在仗恃着王权灭三宝，是邪说蛊惑，阿鼻地狱可不论贵贱，陛下难道就不害怕？"周武帝仍毅然下令禁断佛教。灭佛道的目的，在于强迫三百万僧侣还归编户，成为国家控制的户口；没收寺院财产为了归富于官，而不是想彻底消

灭佛道思想。所以这次灭佛道并没有发生杀戮僧尼之事，与北魏太武帝坑杀沙门不同。在通道观学士中，儒、佛、道三家都有名人参加，但是，僧道不是以出家人资格，而是以官吏身份，要留发留须，着衣冠，一些名僧高道都封了世俗官职。从统治集团长远利益着想，废毁佛道远不如利用佛道有利，所以武帝死后，从政治、军事需要出发，为巩固政权，缓和政教之间、僧俗之间的矛盾，又逐步恢复了佛道。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周书·帝纪·武帝》

《北史·周本纪》

《高僧传》

《广弘明集》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北周灭北齐

北齐武成帝高湛昏虐狂诞，荒淫暴戾，国事日益衰败。又鉴于宗室杀戮过甚，几代皇子都不得令终，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的儿子，多数都没有落得好结果。高湛即帝位四年，便将皇位传给太子高纬，自己做太上皇。后主高纬年纪只10岁。四年后高湛去世。

尚书右仆射和士开受顾命之托，后主对他极信任，和士开与司空娄定远、录尚书事赵彦深、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掌权，号称“八贵”。和士开字彦通，先辈本是西域经商的胡人，和士开擅长握槊游戏和弹琵琶，又机巧奸诈，受高湛宠信成为心腹。后主即位后，和士开与胡太后有情，从此更加亲密，作威作福，权势更大。朝中宗室诸王策划要将他排挤出朝廷。和士开施展诡计，太尉赵郡王高睿被杀，和士开反而封为淮阳王，权势愈盛。

后主高纬年少，放纵昏虐，身边多嬖幸宠臣，武卫将军高阿那肱素以谄佞得宠，升任并省尚书令、封为淮阴王。武成帝曾选派二十名都督为东宫侍卫将领，其中昌黎人韩长鸾备受高纬厚爱，升为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宫婢陆令萱，起先因丈夫骆超谋反被杀，被罚人后宫，儿子提婆也做了奴隶。高纬幼时陆令萱是他的保姆，抚养他长大，陆令萱奸巧善媚，骗得胡太后信任，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都拜在她名下做养子。后主高纬任陆令萱为女侍中，其子提婆也人宫侍奉后主，陪伴后主狎戏

寻欢，封做武卫大将军。宫女穆舍利原是斛律后的侍婢，极受高纬宠爱，陆令萱想攀附势力，便做她养母，荐举她封了弘德夫人，于是叫提婆冒姓了穆氏。这一班人联手固宠，成为很有势力的集团。

后主思念祖珽，便在流放地封他为海州刺史，和士开也与祖珽释去旧怨，与陆令萱向后主进言："文襄、文宣、孝昭三位皇帝的儿子都没有当成皇帝，惟独皇上您保全了帝位，祖珽出了大力。"后主召人祖珽任秘书监。

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劝说琅邪王高俨，联络侍中冯子琮、领军库狄伏连，发动京畿军士矫诏斩了和士开，诱杀陆令萱未成功，太后与后主借助斛律光平息了事变，高俨与同谋诸人先后被杀。胡太后因行为不检也被幽禁北宫。

天统五年（569），侍中祖珽进封左仆射，祖珽想以陆令萱为太后，便向陆陈说北魏保太后的故事，以保姆的身份封为太后，并掌握朝廷大权。陆令萱也称祖珽为国师、国宝，一唱一和，把持朝廷内外。

左丞相斛律光既厌恶这班人无耻又恼恨其误国害人，每每望见祖珽，便骂："多事乞索小人，还想什么坏主意？"常对诸将领说："边境军情，兵马调遣，以前赵令常与我们商议，这个瞎子掌管机密以来，凡事不和我辈招呼，真担心误了国家大事。"穆提婆求娶斛律光之女，斛律光鄙薄其人，不许婚事；后来后主将晋阳田地赐给了穆提婆，斛律光在朝廷公开反对："自神武帝以来晋阳田地常种禾麦，饲养战马数千匹，以备战抗敌，如今赐给穆提婆，这不是损害军务吗？"由此，祖、穆皆怨恨斛律光。

斛律光乃开国功臣斛律金之子，将门之后，其弟斛律羡任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书令，也善于用兵征战，在边境守备严密，士马强盛，突厥人都惧怕他，称他"南可汗"。其长子斛律

武都任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其女为皇后，因不喜曲媚而无宠。斛律光统兵与士卒同甘苦，临阵时身先士卒，赏罚公平，军纪严明，深得军心，自少年从军攻必取战必胜。又生活俭朴，不好声色，不结交招纳宾客，不受人馈赠，不贪图权势。在朝廷正直、深沉、有主见，齐周两国交战，北周军屡次败在他手下。北周勋州刺史韦孝宽见齐国小人专权，斛律光受到忌恨，除此劲敌正是时机，便行使反间计借刀杀人。韦孝宽命人编造谣言，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派人在北齐邺都散布。祖珽听说后自己又续上两句“盲老公背受大斧，绕舌老母不得语”。并指使他的妻兄郑道盖去奏知后主。后主遂问祖珽；祖珽与陆令萱都说确有其事，祖珽解释说：“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说臣，饶舌老母似是说女侍中陆氏。斛律家历代为大将，斛律光字明月，威震关西；斛律羡威震突厥，女为皇后，男娶公主，真是了不得，谣言所说甚是可怕。”继而有人告发斛律光家藏弓弩铠甲，奴仆成千，要图谋不轨。后主听信谗言，骗斛律光进宫将他杀害了。

邢祖信奉命查抄斛律光家产，祖珽问抄得物品，邢祖信答道：“只得弓十五张，宴射箭百支，刀七口，赏赐给他的矛二支。”祖珽厉声喝问：“还得到何物？”“枣杖二十束，是为奴仆与人争斗时使用的。”祖珽深感惭愧负疚。周武帝听说斛律光已死，大喜，为此下令大赦以示庆祝。

北齐武平元年（570），高阿那肱录尚书事，总管外地兵马和内省机密，与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共掌朝政，号称“三贵”。卖官、鬻狱、祸国殃民，借赏赐之名变国库为私财。尤其嫉恨士人，鄙视汉官，常常大骂“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北齐的鲜卑化在加速，民族对立尖锐，境内民众怨声载道。

北齐国势日益衰败，祖珽有意整顿，选拔才能之士，裁汰庸

禄之官，一时颇受好评。但祖珽的主张与陆令萱、穆提婆往往不合，受陆、穆与韩长鸾谗言蛊惑，祖珽被排挤出朝廷，强迫他出任北徐州刺史。

后主高纬要去晋阳，侍中崔季舒和国子祭酒张雕怕惊扰民众，便与从驾的文官联名上书劝阻，韩长鸾向后主进言："这般汉官联合署名，声称劝驾，其实未必不是要造反。"后主听从他的话，将署名官员召到含章殿，崔季舒、张雕、尚书左丞封孝琰及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裴泽、郭遵等被斩首，家属迁移北地，妇女配给奚官，幼男下蚕室被阉割，家产抄没。汉族士人官员再次受到打击。

北齐国内赋重役繁，民不聊生，后主亲近小人，挥霍浪费，胡儿、宦者、歌舞人、见鬼人封官受赏，狗马鹰犬都得了封号，大兴土木，国库空虚。与百弊丛生、政治败坏的北齐并立北方的，却是励精图治，虎视眈眈的北周。

周武帝宇文邕时刻都在积蓄力量，准备攻灭北齐。起初，周在边镇增兵派将，储备物资，齐国闻讯也增兵储粮加强戒备。柱国于翼建议："边疆争战互有胜负，白白损耗兵员储备，无益于灭齐大计。不如边境解严，双方和好，使敌国松懈无备，然后出其不意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周武帝采纳了此议。

久镇边防的宿将韦孝宽上疏，陈述灭齐三策：其一，齐国内离外叛，机不可失。令大军出轵关，与南朝陈联为犄角之势，并令广州义军出三鵶，募南山骁锐之士沿河而下，再遣北山稽胡截断晋阳之路，招募关河以外勇士为前驱，一鼓作气直捣齐都。其二，若不能即刻灭齐，为长远谋算，宜与陈分其兵势。在三鵶以北屯田养兵，敌东南有敌情，我出奇兵攻击，敌若增援，我则坚壁清野，敌去我复出师，经常用边境之兵引其内地之军，彼劳我逸，一二年敌国自乱。而且齐君昏虐，政治混乱，忌害忠良，举国怨恨。乘机征战如摧枯拉朽。其三，勾践亡吴要十年，

武王伐纣非一战。现在要修邻好，申盟约，通商惠工，养精蓄锐，待机而动。周武帝反复考虑此三策，遂召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问计，伊娄谦说："齐主荒淫昏虐，名将斛律光已死，上下离心，道路以目，容易进取。"武帝心喜，遂命伊娄谦与小司寇元卫出使齐国观察情形。

周建德四年（575年）、北齐武平六年七月，周武帝宣告伐齐。以柱国陈王纯、荥阳公司马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率军二万趋黎阳（今河南滑县北），隋公杨坚、广宁公薛回领舟师三万自渭河人黄河，梁公侯莫陈芮领军二万守太行道，申公李穆领兵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率兵二万出陈、汝。周武帝将要出兵河阳（今河南孟县），内史上士宇文弼道："齐建国已历数世，虽说无道，边镇守将尚有其人。今日出兵必须选择地理。河阳是冲要之地，精兵聚集，怕难以取胜。依臣之见，出兵汾曲，易于攻取。"民部中大夫赵煚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然得了也不可守。请从河以北进兵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以一举成功。"遂伯下大夫鲍宏说："我强齐弱，我治齐乱，何忧不胜！但是先帝屡次出兵洛阳，对方有防备，往往不能取胜。如臣之计，进兵汾水、潞水，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出其不意似为上策。"周武帝一概不加采纳，率领大军六万直指河阴（今河南孟津东），意在攻取洛阳。

八月，周军进人齐境，攻克河阴大城，齐王宪攻克武济（今河南孟津），继而围攻洛口（洛水人黄河处，今河南巩县东北），攻下东西二城，纵火烧断浮桥，以阻断齐军增援。齐永桥（今河南武陟西）大都督傅伏保卫中潬城（今河南孟县西）。周兵又攻克南城，包围中潬。围攻了二旬未能攻下。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固守金墉（今河南洛阳西北），周武帝亲自指挥攻城，也未攻克。独孤永业连夜赶造马槽上千个，周兵探得消息，以为齐大军

将到，军心动摇。

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率兵南援洛阳，兵到河阳。这时，周武帝身患疾病，下令放弃攻克的诸城，连夜班师。

齐王宪、于翼、李穆所领兵马势不可挡，连攻下齐国三十余城，此时也弃城而走，留仪同三司韩正驻守要地王药城（今河南济源）。水军烧掉舟船也退兵而回。不久，韩正献城降齐。

周武帝在河阴得病乃麻痹中风之症，口不能言，眼睑下垂，一足短缩，当时江南名医姚僧垣在军中，急忙为武帝治疗，退兵路上边走边调治，来到华州已大致平复，武帝遂还长安。

北齐虽击退周军，政治仍不见起色，国库空虚，于是下令，征收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各种税金，同时开放酒禁，来弥补资财的亏空，百姓负担更加沉重。

周建德五年、齐武平七年（576）九月，周武帝准备再次出兵伐齐，召集群臣宣布说："朕去年患病，遂未能扫平敌寇。齐朝廷混乱，小人当政，百姓水深火热，朝不保夕。前次出兵河南，未能扼其咽喉。晋州是高欢兴起之地，震慑全境的要冲，我攻晋阳，彼必来援，我严阵以待，击之必胜。然后乘胜一鼓作气，足以倾其巢穴，实现统一。"诸将多数人不愿东征，武帝下令："时机不可失，有阻滞我出兵者，军法从事。"

十月己酉（初四日），周武帝亲征伐齐，以越王盛、杞公亮、隋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窦恭、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大举出兵。

当时后主高纬在晋阳，丙辰（十一日）在祁连池狩猎，闻知周军出兵，次日回到晋阳。

是月中旬，周武帝在汾曲（今山西临汾南）扎营。命齐王宪领精锐骑兵二万守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陈王纯率步骑二万守千里径（今山西霍县东），郑公达奚震领步骑一万守统军川（今山西石楼西），柱国宇文盛领步骑一万守汾水关（今山西灵石

西南)，以上四将阻击晋阳齐军援兵。又命大将军韩明领步骑五千守齐子关（今山西垣曲东），焉氏公尹升领步骑五千守鼓钟镇(今山西垣曲北)，以上二将阻击齐河内援兵。凉城公辛韶领步骑五千守蒲津关，保全后方。命赵王招领步骑一万自华谷（今山西稷山西北）攻打齐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诸城。分派已定，内史王谊监诸军攻平阳城（今山西临汾)。齐守将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领兵防守。甲子（十九日），齐后主高纬集兵，庚午(二十五日）后主高纬从晋阳南下增援晋州。周武帝亲自赶往平阳督战，攻势猛烈，平阳十分危急，行台左丞侯子钦投降周军。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平阳北城，壬申（二十七日）夜，派人到周军请求投降，周将王轨领兵接应，天尚未明，周将段文振手持铁槊与数十勇士率先登城，进人平阳，会合崔景嵩一齐直奔尉相贵府邸，以武力劫持了齐军主帅。周军鼓噪呐喊，攻人城内，齐军溃败，平阳陷落，俘虏尉相贵及齐兵甲士八千人。平阳失陷这天，齐后主正和冯淑妃在天池射猎，晋州告急使者从早晨到中午，三次飞马求救，右丞相高阿那肱喝道："皇上正在作乐，边境小小交战，乃是常事，何必急着奏闻?"天已黄昏，使者又到，报说平阳已经陷落。这才奏知后主，后主闻报准备回营，冯淑妃请再猎一围，后主依她继续围猎。

后主猎罢回营，癸酉（二十八日）领十万大军南下。此时周军齐王宪已攻下洪洞（今山西洪洞)、永安（今山西霍县）二城，准备乘胜进攻，齐军焚毁桥梁，守住险要，周军受阻，便屯兵永安，使永昌公宇文椿领兵进占鸡栖原（今山西霍县东北)。后主分兵一万向千里径，又分一支兵出汾水关，亲自率大军上鸡栖原。汾水关周将宇文盛抵挡不住齐军，派人告急，齐王宪领兵赴援，齐军退去。不久，鸡栖原周将宇文椿告急，齐王宪又率骑兵赶来，与齐军对阵到黑夜，并未交战。齐王宪此时接到武帝召他回军之命，趁夜退兵。齐军在天明后方知周营已空无一人。后主

命高阿那肱率前军先行，自己在后指挥全军向平阳进发。甲戌（二十九日）周武帝令开府仪同大将军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守平阳，大军准备回撤。十一月己卯（初四日）齐后主大军到平阳。周武帝见齐军强盛，想退兵避其锋芒，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忻劝谏说："陛下圣武，敌人荒纵，还怕不胜？倘若齐国有了明主，君臣同心协力，就不易取胜了。"军正王韶也说："如今一战攻取平阳，扼其咽喉，平齐正在今日。要退兵而去，臣真是不解。"武帝虽赞赏其言，最终还是下令撤兵回国了。

周大军已退，齐兵包围平阳，日夜攻城，平阳很是危急，城楼堞墙都毁尽了，双方有时短兵相接肉搏，有时马军冲突拼杀。因没有援兵，周军将士无不恐惧，梁士彦慷慨陈词："死在今天，我也要死在你们前面！"鼓舞守军誓死坚守。齐军稍有退却，梁士彦急召妻妾、军民、妇女日夜修城，三天修复了城墙。武帝得知平阳告急，令齐王宪领兵六万屯涑川（今山西闻喜），遥为平阳声援。齐军攻城不止，挖地道攻城，城墙崩坍了十余步，齐军将士乘势想攻进城中，而在此关头齐后主传令，暂停攻城，要召冯淑妃一同观战，一睹攻克平阳的盛况，冯淑妃梳妆打扮，姗姗来迟，这时周军已用巨木塞住缺口，齐军遂未能攻下平阳城。传说晋州城西石上留有圣人遗迹，如此名胜不可不看，冯淑妃要去观赏，后主担心城上周军的弩箭射到桥上，便抽调攻城木料在远处修桥，待桥匆匆架好，齐主与冯淑妃度桥而过，哪知桥是仓促搭成，经不住人马众多，桥便坏了，后主与冯淑妃直到夜里才回到大营。

十二月戊申（初四日），周武帝亲自领兵来救平阳，庚戌（初六日）集合诸军八万人，东西向列阵长达二十里。齐军恐怕周兵猝然来攻，在城南开挖长堑，这时周武帝率军攻击，遇到长堑阻住，只得停止进攻。两军自早晨直到申时，相对峙不下。后主问高阿那肱："战是邪？不战是邪？"高阿那肱说："我军虽人

多，能打仗的不过十万，伤病和樵采做饭的又占三分之一。昔日攻玉壁，敌人援兵来了我们就退兵，今天我们的将军岂胜过神武帝那时吗？不如不战，退守高梁桥（今山西临汾东北）。”安吐根道：“一撮贼军，马上就可以解决，把敌人掷到汾水中去！”诸内臣也说：“他是天子，我们也是天子，他能远来，我们何必守堑显示懦弱？”后主认为有理，于是命将士填平堑壕领兵南进。周武帝见齐军填堑来战，心中大喜，忙传令各军攻击。

两军才开始合战交锋，齐军阵地东侧稍稍退却，观战的冯淑妃大惊失色，恐怖地叫：“军败了！”穆提婆接着说：“皇上快走！皇上快走！”后主即与冯淑妃奔往高梁桥。开府仪同三司奚长劝谏说：“半进半退是作战常情，如今兵将阵形整齐，没有受损，陛下丢下这里到哪儿去？陛下马足一动，军心惊乱，不可复振。请急速回去稳定军心。”武卫张常山也从后面赶来，说道“方才收军完毕，全军完整，围城的兵也不动摇，皇上应当回去。”后主听从将要回马，穆提婆扯住后主臂肘说：“此话难信。”后主遂不顾大军，同冯淑妃向北奔去。齐军士气顿挫，一场大战，齐军惨败，战死万余人，军资器械丢弃得漫山遍野。

齐后主来到洪洞（今山西洪洞），冯淑妃在粉镜前自玩自乐，听得外面纷纷叫嚷“贼军来了”，于是又北走。前时后主认为冯淑妃有功勋立为左皇后，遂派内臣到晋阳取皇后服饰，这时相遇在途中，后主为冯淑妃拢马，让冯淑妃穿戴了，奔往晋阳。平阳会战就此以齐军大败告终。

当月辛亥（初七日），周武帝进入平阳，梁士彦持武帝须哭道：“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因将士疲劳，武帝想退兵，梁士彦扣马谏阻，劝武帝乘胜灭齐。武帝执着他的手说：“晋州是灭齐的基地，若不能固守，则大事难成。你好好为我守住它。”遂率军追击齐军。

癸丑（初九日）齐后主到晋阳，召集大臣问计，都认为：

"应该减免赋役，安定民心，整顿军队，背城死战，保卫晋阳。"高纬打算奔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若晋阳守不住，再奔突厥。遂不听众臣劝阻，留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守晋阳。这时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等近臣三十余人投降周军，受到封赏。高阿那肱部下还有兵士一万，驻守高壁（今山西灵石东南），其余齐军守洛女砦。周军攻高壁，高阿那肱闻风而逃，周军又攻下洛女砦。有军士逃回晋阳，告高阿那肱叛国，齐主不信，高阿那肱部下心腹又告发他谋反，以妄言罪杀了告发人。乙卯（十一日）齐主召见高延宗，告诉他准备出走，并派人将皇太后、皇太子秘密送往北朔州。丙辰（十二日），周武帝与齐王宪在介休会合，齐守将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献城投降。这天齐主到晋阳城南劳军，当夜便想逃走，诸将不肯放行。丁巳（十三日）齐主下诏大赦，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加封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命他守土抗敌。当夜斩开五龙门逃出晋阳，欲奔突厥，随从官员四散逃走，只剩下高阿那肱等十余骑，领军梅胜郎苦劝，齐主才向东奔往邺都。这时素受宠爱的穆提婆也叛逃去投降周军，陆令萱自杀。周武帝封穆提婆柱国、宜州刺史，并下诏：彼朝或我方逃到彼朝的，不问贵贱，不记前嫌，来者都有封赏。此后，齐国文臣武将投降者接连不断。

齐主逃出晋阳后，诸将敦请安德王高延宗称帝，声称："王不做天子，诸人实不能为王出死力。"高延宗不得已，戊午（十四日）即皇帝位，改元德昌。一面派人在突厥求救，一面将库存财物、宫中美女赏赐三军，又查抄了内臣十余家。齐主听到消息，恼恨不已，对近臣说："我宁使周军得并州，也不让安德王得之！"高延宗慰劳将士，深得军民拥护，妇女儿童也愿意出力杀敌。己未（十五日）周武帝大军到达晋阳，晋阳保卫战开始了。

周军围攻晋阳，如黑云四合，压向晋阳城。高延宗命莫多娄

敬显、韩骨胡守城南，和阿干子、段畅守城东，亲自在城北抵抗周将齐王宪。高延宗身体肥胖，大腹便便，前看如仰，后观如伏，此刻挥舞长矛往来督战，矫捷若飞。周军多次被击退。周武帝亲自攻东门，守将和阿干子与段畅叛变投降，黄昏时周军攻入东门，火烧佛寺。这时高延宗与莫多娄敬显率兵也从东门杀入，与城内守军前后夹击，周军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争门夺路逃生，挤压践踏死伤无数，把道路堵塞得水泄不通，齐军从后面砍杀击刺，杀死周兵二千余人，周武帝亲兵侍卫死伤殆尽，困在城内难以脱身，幸赖承御上士张寿牵马头，贺拔伏恩在后鞭马，辗转而逃，几乎被齐兵刺中，城东道路蜿蜒曲折，地形复杂，赖降卒皮子信引导才幸免于难。这时天已四更，高延宗以为武帝已被乱军杀死，令人在积尸中寻找长须者未能寻到。齐军获胜后纷纷到坊肆中饮酒庆贺，醉得东倒西歪。

周武帝逃回营中，又饥又累，便想即刻撤兵，众将领也劝说退兵，宇文忻勃然说道：“昨日轻敌稍有失利，何足挂怀。大丈夫应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如今破竹之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齐王宪、柱国王谊也认为不可撤退，降将段畅又反复陈说城内空虚。武帝遂传令整顿人马，士气又振。辛酉（十七日）天光破晓，周军猛扑东门，破城而入，齐军将士尚在醉梦中，高延宗力战不敌，奔向城北，被周军擒获。高氏起家的基地、北齐军事重镇晋阳便陷落了。

齐主在邺都，因兵微将寡，命人立重赏招兵，却不肯拿出财物。广宁王孝珩献计：“使任城王高湝领幽州兵马入土门（今河北井陉）扬言攻并州；独孤永业领洛州兵马入潼关，扬言攻长安；臣愿领京畿兵马出釜口（今河北武安南）迎战。敌人闻知南北有军情，必定撤走。”又请齐主拿出珍宝、宫女赏赐将士，齐主大不高兴。斛律孝卿劝齐主亲自慰劳将士，并且为他撰写了词文，叮嘱他要慷慨流涕，感动激发军心斗志。齐主出宫劳军，将

要致词时，早忘记了要说的话，遂大笑，左右随从也笑，三军将士怒火满腔，斗志瓦解冰消。齐主不给人实惠，却滥封了许多太宰、三师、大司马等虚官。

朔州行台仆射高励领兵护送太后、太子回到邺都。这时宦官苟子溢还恃宠肆虐，把百姓养的鸡猪当作他放纵鹰犬的猎物，扰害百姓。高励传令要杀他，赖太后解救才得了活命。有人劝高励："苟子溢之徒一言可定人祸福，你就不怕后患吗？"高励奋然说："西寇占据并州，达官显贵全都无耻背叛了，正是此辈搅乱了朝廷！今天杀了此辈，明天我死了，也不悔恨！"齐国朝野上下对这班小人恨之入骨。甲子（二十日），齐主召文武一品以上官员到朱华门，赐酒食，给纸笔，问御敌之策，群臣献的计五花八门，齐主不知所从。邺都人心惶惶，朝中出城投降的日夜不断。高励劝后主说："现在反叛者多是贵人，至于兵卒还未与朝廷离心，请拘禁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胁迫这些官员作战，若不能取胜，则处罚家属。此辈顾惜妻子必能出力。而且贼军轻视我，现在背城一战，必能破敌。"齐主不听，倒听信了望气者的话，把帝位禅让给8岁的太子高恒。转年正月初一高恒即位，改年号承光，尊高纬为太上皇。

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商议在千秋门伏兵，杀高阿那肱，立广宁王孝珩为帝。恰好高阿那肱从别路上朝，未能成功。孝珩请出兵退敌，对高阿那肱等说道："朝廷不肯出兵，莫不是怕我造反？我若破了宇文邕，便到长安去造反，又何关国家事？在这紧急关头犹如此猜忌吗？"这班小人怕生出变故，派孝珩出任沧州刺史。

齐主命长乐王尉世辨侦探周军动静，刚出滏口登高西望，见群鸦飞起，认定是周军旗帜，飞马跑回邺都。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等劝太上皇往河外募兵，再图后举，若不济便南投陈国。高纬别无良策只好听从。丁丑（初三日）太皇太后

等东向济州出发，癸未（初九日）幼主高恒也启程东去。己丑（十五日）周军到达紫陌桥（今河南临漳西南）。壬辰（十八日）周军到邺都，随后围城。癸巳（十九日）周军击败齐兵，太上皇率百骑东逃。周军进入邺都，齐王公大臣纷纷投降。武帝命将军尉迟勤追捕齐主。

甲午（二十日），武帝入邺，造访名儒熊安生，慰问中书侍郎李德林，使内史宇文昂访问齐国风俗、政教、人物善恶，留心理政治国。

乙未（二十一日），太上皇高纬到济州，当天，幼主禅位给大丞相任城王高湝，又代高湝写诏尊高纬称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随后命斛律孝卿赴瀛州送禅文和玺绂给高湝。斛律孝卿立刻奔往邺都，献给周军请功去了。

高纬留胡太后在济州，命高阿那肱守济州关，自己与穆后、冯淑妃、幼主带韩长鸾等数十骑奔往青州，想南逃入陈。高阿那肱早生背叛之心，密招周兵约定要生擒高纬，接连派人报告高纬说："周兵还远，已命人烧桥断路。"高纬不慌不忙，行动迟缓。周兵一到济州关，高阿那肱立刻投降，周兵急奔青州。高纬将金银珠宝驮在马后，与后妃、幼主南逃，己亥（二十五日）在南邓村（今山东临朐西南）被追兵擒获，与胡太后一起被送往邺都。

庚子（二十六日），周武帝下诏为斛律光、崔季舒赠谥改葬，优待其子孙。下令废除齐苛政，赏赐从征功臣。

齐广宁王孝珩与任城王湝共图恢复，后被周齐王宪领军击败，高湝被擒后说："我是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只有我活到今天，国家灭亡了，我死而无恨。"高孝珩道："自神武皇帝而外，我的诸父辈及兄弟，无一人活到40岁。嗣君不明，任用小人，只恨我不能握兵权施展抱负耳。"

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在并州失陷后，孤掌难鸣，遂降周。周武帝分兵平定齐境，周将宇文神举攻北朔州，齐范阳王高绍义逃

奔突厥。齐国唯有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宝宁不肯降服，其余者全部归属于周，计五十州、一百六十二郡、三百八十县，三百零三万二千五百户。

周武帝屡次招降傅伏，皆不肯降，周武帝自邺西还，又派高阿那肱到汾水招降，傅伏得知齐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后降周，周武帝封他上仪同大将军，并表示敬重。问傅伏道："前者援救河阴得了什么封赏？"傅伏答："官升一级，授特进，永昌郡公。"周主对高纬说道："朕为平齐，三年教战，决心夺取河阴，只因傅伏善防守，城池坚不可摧，只好撤兵。公当时赏功，何其薄也！"

四月，周武帝回长安，举行献俘大典，安排高纬在前，齐国王公显贵在后，缴获的车舆、旗帜、器物依次摆列。六军戎装列阵，高奏凯歌，在太庙献俘。观看者人山人海，高呼万岁。

十月，有人告发高纬与穆提婆等谋反，高氏宗族全部赐死。

（吴振清）

参考资料：

《北齐书·帝纪·后主》

《周书·帝纪·武帝》

《通鉴纪事本末·周灭齐》

《中国历代战争史》

《兰陵王入阵曲》

《兰陵王入阵曲》是北齐歌颂兰陵王高肃的名曲。高肃，一名孝瓘，字长恭，为北齐世宗文襄皇帝高澄的四儿子。勃海蓨（今河北景县）人。约生于东魏武定三年（545），卒于北齐武平四年（573），一生活了28岁左右。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先后因战功被封为乐城、乐平、长乐、巨鹿、高阳等郡公，徐州兰陵王，左、右大将军，大司马，尚书令，录尚书事，都督并、定、青、瀛州诸军事，并州、定州刺史，司州牧，太保，太尉等官职。他生得貌如美妇人，看上去还给人几分端庄贤淑的感觉。但他气质非凡，蕴具将帅风范，且居上不骄，能以恩信御下，平时好接纳一些“文艺轻识之士”，又轻财货女色。《北齐书》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麾下将士多是些彪悍而善歌舞的鲜卑斗士，能与他“共其存亡”，“同生共死”。据唐朝人崔令钦撰写的《教坊记》，说他性胆勇，但因貌美如玉，每临战争，敌人并不害怕他。于是，他用木头雕刻了一副面孔狰狞可憎的假面目，一有战事，便著于脸上，冲锋陷阵，使敌人望而生畏。从此，“乃百战百胜”。尤其是邙山大战，使他名声大震。北齐河清三年（564），北周十万大军攻伐北齐，围困洛阳城，消息传到北齐的都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朝廷大为震恐，急忙组织军队御敌。武成帝高湛诏兰陵王高肃率中军，大将段韶为左军，斛律光为右军，驰赴洛阳救援。三军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奋力与周军激战，短

兵相接，血肉横飞，经过一场殊死拼搏，周军大溃。尤其是兰陵王率领的中军，所向披靡，周军“一时瓦解，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北齐书·段荣传》）。兰陵王终将剩勇追穷寇，复又率精骑五百人，冲入败退的敌军，杀开一条血路，神速地穿插到敌军深处，来到被团团围困的洛阳城西北的小城金墉城下，呼唤守城的齐兵，守兵竟不敢相信是援军已杀到城下。兰陵王摘下假面目和盔胄，城上的将士这才看清楚是他，十分惊喜，军心大振，于是内外夹攻，大败周兵，解除了周军对洛阳的围困。周军奔遁，丢盔卸甲，尽弃营幕，从邙山到谷水三十里间，“军资器物弥漫川津”。邙山大捷，兰陵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于是“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这一曲子首先在北齐军队中广泛传播开来，还编排成舞蹈，为独人舞。舞者仿效兰陵王头戴假面具、指麾击剑的姿态，直冲敌阵，敌人闻风丧胆。后来，兰陵王高肃又与段韶讨伐柏谷，攻克定阳，为北齐又立一大功。

邙山之战时，北齐太子高纬监军，临阵提醒兰陵王高肃说：“入阵太深，一旦失利，后悔都来不及。”兰陵王说：“家事亲切，不觉遂然。”高纬嫌其不称皇上，而称家事，心里十分忌恨他。邙山大捷后，随着《兰陵王入阵曲》的流传，高肃“威名日显”，高纬更加妒嫉他。高肃预感到自己处境困窘，想以贪残自秽求得解脱。及在定阳时，他的僚属尉相愿问他说：“王既受朝廷厚禄，为何还这样贪残?”兰陵王默不作声，自感有苦难言。相愿说：“莫不是由邙山大捷，恐以武威受人忌恨，所以故作贪残以自秽呀?”兰陵王点点头，说：“对。”相愿说：“朝廷若忌王，王若如此犯罪，便当受罚，求福不成，反速招祸。”兰陵王潸然泪下，从席上跪着前行凑到相愿的跟前，讨教安身之术。相愿说：“王前已有勋，今又奏捷，威声太重，应称疾在家，勿干预政事。”兰陵王然其言，但不能急流勇退。后来江淮一带又起战事，兰陵王恐复为将，长叹道：“我去年面肿，今年为何不复发呢?”后来

果然又犯病，有病不治，闲居在家。但北齐后主高纬并没有因此放过他，于武平四年（574）五月，使宦人徐之范带着毒酒到兰陵王家，把他赐死在家中。次年五月十二日葬于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台村）西北十五里，即今河北磁县刘庄村东，其陵墓及墓碑至今保存完好。兰陵王墓碑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碑刻，碑阳圭额字迹清晰，上书四行共十六字，曰："齐故假黄钺太师太尉公兰陵忠武王碑。"

兰陵王高肃死后，《兰陵王入阵曲》曾在民间广泛流传。隋朝时，文帝杨坚派使者到关东诸州，采集民间歌曲，这一古曲即登皇宫大雅。至唐初，《兰陵王入阵曲》还十分盛行，唐朝人段安节撰著的《乐府杂录》一书，对这支舞曲演奏的乐器，舞者的服饰、道具作了这样的记述，说："乐有笛、拍板、答鼓即腰鼓也，两杖鼓。戏有代面（即假面具），始自北齐。……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兰陵王入阵曲》"初唐已盛行，尤为宫中常演，武后时，卫王（即玄宗之弟岐王）以五龄童曾登场弄兰陵王"。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以其非正声"，下诏禁止此曲在皇宫的演奏。而民间仍有流传，大约在唐后期，这支著名古曲在中国渐渐失传了。宋词中仅有《兰陵王》词牌曲名，而其谱律及演奏方法不见经传。

当《兰陵王入阵曲》于唐以后在中国悄悄消失时，这一古曲却在日本流行起来。唐朝中日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大批遣唐使者到中国来，学习华夏文化。据说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兰陵王入阵曲》由中国林邑僧人佛哲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事类苑》等史籍记，《兰陵王入阵曲》在日本称陵王、罗陵王、高陵王、中华调、沙陀调等。其乐谱舞图初保存在唐昭提寺。奈良王朝时，女帝高野姬天皇酷爱这支舞曲，曾让当时日本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尾张滨在御前为她表演。这支舞曲初传入日本时，是在日本佛教寺院如唐昭提寺、东大寺等供养佛事时演奏的，后来由

于天皇的爱好，这支舞曲由寺院传入宫廷，以后又渐渐传入民间。在日本古代的竞马节会（五月五日）、相扑会（七月七日）、宴射大赛等节日都要演奏此舞曲。舞者戴木雕形似金龙的面具，手执金色短鞭棒，身着紫袍金带，翩翩起舞，作旋转跳跃、指挥、击剑等动作，和着浑雄、深沉、悲壮且又十分优美的乐律，再现了北齐名将高肃英勇威武的风采。1986年秋，中国《黄河文明展》在日本举办，我国文物工作者利用此机会，在日本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将《兰陵王入阵曲》及有关研究资料进行录制和复制，使这支失传了一千二百多年的著名古曲得以重新回归祖国。

（牛润珍）

参考资料：

《北齐书》
《北史》
《全唐文》

魏收作《魏书》

淝水之战以后，鲜卑族拓跋部重新崛起，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后魏，或北魏。渐次攻灭了后燕、夏、北燕、北凉等政权，统一了北方，与南朝形成对峙。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到新疆，东达辽西，南境扩展到淮河流域，成为北方的强大王朝。后逐渐衰落，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0年高洋废掉东魏孝静帝，建立北齐，改元天保。天保二年，魏收受诏撰著《魏书》，肩负起为北魏王朝纂修历史的重任。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战国魏公子无忌之后。无忌之孙无知，汉朝初年封高良侯。子孙四传至魏歆，在汉成帝时，位终钜鹿太守，始定居于下曲阳。魏歆十四世孙魏悦，字处德，仕于北魏，官任济阴太守，其子子建，字敬忠，历官太尉从事中郎、东益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卒后封赠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文静。子建有二子，魏收、魏祚。

魏收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自幼聪明机智，行事不拘小节，15岁时就已经很会写文章了。16岁时随父赴东益州刺史任，在武兴镇好习骑射，想以武艺立功扬名，后弃武习文，潜心读书，好学不倦，数年后才学出众，名声渐著。孝昌二年（526），魏子建征拜常侍、卫尉卿，魏收随父还洛阳，为太学博士。武泰元年（528），尔朱荣在河阴屠杀朝士二千余人，魏收幸

免于难。吏部尚书李神儁器重魏收才学，奏报朝廷，任魏收为司徒记室参军，后任北主客郎中。节闵帝继位后诏魏收试作《封禅书》，洋洋千言下笔便就，大受赞赏，遂迁官散骑侍郎，命他撰述起居注，并修撰国史。自此，魏收终生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

次年，高欢废节闵帝，孝武帝立，魏收以中书侍郎职务负责起草撰写文诰。孝武帝曾不顾天寒，恣意游猎，朝野怨声载道，魏收作《南狩赋》讽劝，孝武帝大加赏识。这时，高欢与孝武帝矛盾日深，魏收畏祸，遂请求解职。不久，又任命他为孝武帝之侄广平王开府从事中郎，魏收不敢推辞，作《庭竹赋》来表达隐衷。孝武帝建造平等寺五层宝塔一座，魏收撰写了平等寺碑文。当时，朝廷的诏诰文词多出自魏收手笔，而且他又擅长诗赋，与温子升、邢子才齐名，号称三才。魏收深怕在政治漩涡中祸事临头，再次辞去中书舍人官职。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征调兵马，欲讨伐高欢，高欢发觉后领兵南下，孝武帝出奔长安，高欢遂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称东魏。

天平四年（537），魏与梁通和，选拔聘使人才，魏收与邢邵、魏季景、邢昕同被征赴邺都。魏收兼通直散骑常侍，作王昕的副使，出使到梁朝，魏收以文才杰出，词藻富逸，深得梁武帝萧衍的敬重。出使途中作《聘游赋》益显才华。

然而魏收有才无行，出使时颇喜声色，又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高欢的亲信崔㥄声势熏灼，魏收不诣其门，又嗤笑崔㥄的文章，崔㥄深为忌恨。出使梁朝时，崔㥄做刺史，摆列仪卫迎接聘使，又受到魏收讥讽。在梁朝买吴婢，放荡不检，亦受到物议。魏收的从叔魏季景，做官和以文才出名，均早于魏收，也受魏收鄙视，有人恭维说："我朝人才有二魏。"魏收脱口便道："从叔和我相比，便是痴汉与你相比一般。"自负不逊之态毫不掩饰。

高欢相府主簿孙搴，文才绝妙，在相府专掌文笔，甚受高欢信任。因为和司马子如、高季式饮酒致醉而死，高欢深感痛惜。高欢亲临吊祭，对司马子如等言道："折我右臂。好好寻觅个替代人才还我！"司马子如便荐举魏收，高季式荐举陈元康。魏收被召赴晋阳，授为中外府主簿。因不被高欢赏识，常被责罚，加以箠楚，很不得志。司马子如趁饮宴之机向高欢说："魏收乃天子的中书郎，一国大才，愿大王借以颜色，另眼相待。"然而魏收依旧不被礼遇。

魏收想以文才脱颖而出的愿望既不能实现，遂希望专心编修国史。崔暹向高欢之子高澄进言："修纂国史的事体重大，公一家父子霸王功业，都应该记载史册，修史之任非魏收不可。"经高澄启奏朝廷，魏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以后又授为正常侍、兼领中书侍郎，仍修国史。至此，他的才学得到发挥，并逐渐受到高氏父子的器重。

史官秉笔修史，使一代军国大事及风云人物的事迹载人史册，历史上的有作为者，无不希望自己名垂青史。高氏父子何尝不想让自己的丰功伟业流芳千古呢？在高氏父子积极谋划取代魏朝，建立新王朝的关头，自然更加留意名声影响，史官的褒贬评鉴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对此，高欢有清楚的认识，高欢曾经指着魏收对高澄说："此人是崔光再世。"把魏收比做北魏著名史学家崔光。武定四年（546）高欢在西门豹祠宴集百官，在席间高欢对司马子如言道："魏收为史官，记载我等事迹。听说北伐时许多权贵常向史官馈赠食物，司马仆射也经常馈送吧?"说完一同大笑起来。于是高欢对魏收说道："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事后加封魏收兼任著作郎。

武定五年高欢在晋阳去世，司徒侯景举兵叛乱，降西魏，不久又归顺梁。高澄命魏收作讨伐檄文，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作檄梁文并令梁朝转送侯景，初夜执笔，七纸长文，三更便告写

成。高澄大为叹赏。秋季大射时群臣赋诗，魏收作诗末句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语气豪壮，大有鲸吞南朝，臣服西魏的雄浑气概。高澄自豪而得意地说：“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家的光荣。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文词气势，人所不及。我有时意有所怀，忘而不语，语而不尽，意有未及，魏收呈上文稿，都为我思虑得周密详备，真是难得。”

武定七年高澄在邺遇害，高洋继掌朝政。武定八年，高洋代魏建立政权，为北齐文宣帝，改元天保。禅代的诏册文告，出自魏收一人之手。

魏收自魏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受命撰述起居注，参与修撰国史，时年 25 岁。至北齐天保二年（551）魏收官居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已是 45 岁年纪了。二十年中他披阅官私所藏史籍，留心朝章典故，潜心研究史学，为完成有魏一代历史的著述努力做着准备。新的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历代相沿，此时北齐代魏建国，为魏正式修撰国史的时机成熟了。魏收便向文宣帝表明自己的志向与愿望：“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在魏收请求和权臣的建议推动下，天保二年文宣帝高洋颁下诏令，命魏收撰修《魏史》。

当初，北魏时期曾经多次编修过魏史。魏初期道武帝时，邓渊撰有《代记》十余卷，记载了北魏改国号之前代国的史事。惟编次年月起居，记述大事而已，未有体例。明元帝时，废而不述，一度中止了修史活动。太武帝神䴥二年（429），崔浩总领修史之任，集中了崔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宗钦、黄辅等史学人才共同著述，撰成《国书》三十卷，因该书系编年纪事，故亦称《国纪》。太延五年（439 年）平定北凉以后，又诏崔浩续修国史，命高允、张伟助修，援引段承根、阴仲达参与著作。崔浩、高允都精于史学，直笔不讳，认真详实地记载魏史。前后一同修史者也都是一时俊秀，故而颇有成效。书修成后立石刊

载。其后崔浩之狱发生，崔浩及史官、部属一百二十八人都遭灭族，成为历史上株连杀戮最酷烈的一桩史案。崔浩被杀虽然还有别的缘故，“尽述国事，备而不典。立石公布于众，任人观看谈说”，却是他与诸史官被杀的直接原因。崔浩被杀后高允继续修史，襄助者有游雅、程骏、程灵虬、江绍兴、刘模。

孝文帝时，高祐、李彪等认为编年体史书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奏请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例，编写纪传体史书。太和十一年（487）下诏，命李彪、崔光改编国史。太和十四年又下诏颁定《起居注制》，把起居注的记述制度化。以后参与修史者付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房景先、李谐、袁翻、李琰之、孙搴等人，都是才学出众，长于著述之士。他们在崔浩、高允所著史书基础上区分改析，但最终并未成书。

宣武帝时，命邢峦、崔鸿追撰孝文帝起居注。孝明帝时，又命崔鸿、王遵业、房景先续修《孝文·宣武起居注》。此后，谷纂、韩子熙、辛贲、裴景融、周道方、许绚、温子升、卢元明、阳休之、宇文忠之、邢昕、裴伯茂、李同轨等人先后撰述起居注、修国史，直至东魏灭亡。然而并未见重大成就，写成《后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大约只是记录时事而已。

此外，元晖业撰有《辨宗室录》四十卷，述魏诸藩王宗室家世。崔鸿撰有《十六国春秋》，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历史。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均记东晋历史。宋云《行记》专记西域诸国事迹。又有诸家晋书，北魏诸家文集，沈约《宋书》，并北魏朝廷的档案簿册文籍，如《武定文簿》、《永熙绾簿》、《后魏仪注》、《后魏律》等。以及谱牒家传之类，如《尔朱家传》。上述诸书，均成为魏收据以撰史的基本资料。

但是，北魏末年的战乱，使国家典籍史册遭受很大损失，尔朱兆带兵进人洛阳时，国史典书高法显秘密将史书埋藏起来，才使国史保存下来，没有遭劫失落。又由于魏末著作郎山伟主张用

鲜卑人修撰国史，排斥汉人任史官，自崔鸿死后山伟掌管国史二十多年，时事记述万不记一，使魏后期历史记载极其缺少简略。因上述原因，资料很不完备，如北魏疆域的档册，只有武定年间及以后的记录，以前的资料荡然无存，以至北魏全盛时期的疆域、行政区划无从考查了。

魏收家中藏书丰富，本人又博览群籍，文史兼通，为他胜任修史打下了基础。

天保四年，魏收授任魏尹，不必管理郡内政务，又因京职俸薄清贫，特命给予他优厚俸禄，从财力、人手上支持他在史阁专心修史。同时下诏以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修史，以示重视，总监只是名誉，并不干预修史具体事务。为了让魏收放手行事，文宣帝特命魏收："尽管秉笔直书，我绝不作魏太武帝诛杀史官。"

魏收受命后，便荐举史官一同修史。为了贯彻自己修史主张，避免争议，消除阻力，惟选取学术主张相同、附合自己史学见解的人。在朝中居官长久，熟谙朝章典制的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尚书左丞眭仲让，以文才著称的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以及尚书郎高孝干、前西河太守綦毋怀文，一同参与修史。虽然有的人并非长于史学，但也各有所长。故《魏书》发凡起例，制订编纂体例结构，以至写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同时又搜集采访亡遗史料，征集诸家谱状，补写和续作魏后期史事，使一代历史首尾详备。

天保五年三月，《魏书》修撰告成，全书记载自道武帝至孝静帝十二本纪、九十二列传，合计一百一十卷。奏上朝廷，魏收加封为梁州刺史。因为史书中"志"部分尚未完成，魏收请求继续完成未竟之业。获准后，魏收同史官采旧增新，撰述志书。当年十一月，完成十篇志，计二十卷，续于纪、传之后，合为一百三十卷，并序例目录一卷，总计一百三十一卷，分装成十二帙。其中三十五篇史例，二十五篇序，九十四篇史论，前后附录的两

篇表文和一篇启，全由魏收一手写成。

《魏书》中，修史诸人的宗族姻亲都被录入史册，得到美言称赞。魏收、刁柔等人又性情偏颇急躁，不能坦诚公允待人，素常有积怨者，善行美德往往埋没失记。一朝春秋笔在手，任意褒贬随心书。魏收每每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当初，魏收在高欢属下甚不得志，得到阳休之帮助才任为太常少卿，参与修撰国史，魏收对此念念不忘，感恩图报，对阳休之说："无以酬谢恩德，必当为您作一篇佳传。"阳休之的父亲阳固，北魏时任北平太守，因为贪虐被中尉李平弹劾而获罪，此事记载于《魏起居注》，魏收在《魏书》中却写道："阳固为北平太守，有卓越的政绩，受公事牵累而免官。"又说："李平对阳固很是敬重。"尔朱荣在魏朝末年是奸贼逆臣，魏收因为高欢父子出身尔朱荣部下，又乘尔朱之乱以成就大业，而且收受了尔朱荣之子的馈赠，所以在《魏书·尔朱荣传》中减轻其罪恶，增书其善行，在评论中认为他"若要修立德义之风，则豕韦、大彭、伊尹、霍光何足称道。"用来夸大粉饰朱尔荣的事迹。

《魏书》既出，随即引起轩然大波，谤议沸腾，人们纷纷议论，认为魏收著史不公允。文宣帝遂命魏收在尚书省与立传人物的诸家子孙一同商讨辩论。此诏颁布之后，先后到尚书省投诉者百余人。有的说遗漏了他家的家世职位，有的说其家不见史书记载，有的说对其先人毫无根据地非议毁谤。魏收根据诉状逐一答复。范阳卢斐投诉其父卢同附于族祖卢玄传之下，没有单独立传；顿丘李庶称其家本是梁国蒙人，传记有误；卢斐、李庶指责《魏书》秉笔不公，记载不实。在众口责难之下魏收性急起来，不胜愤慨，遂启奏文宣帝说卢、李等人欲借此陷害。文宣帝大怒，召集有关人员亲自诘问。卢斐言道："臣之父仕于魏朝，官位做到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魏收没有亲戚关系，遂不

为他立传。博陵崔绰，官位只是本郡一个功曹，又没有显赫事迹，因为是魏收外亲，于是立为传首。”魏收答道：“崔绰虽无高官显位，其道义可嘉，所以合当立传。”文宣帝问：“卿何以知道他是好人?”魏收说：“魏史官高允曾经为崔绰写有赞语，称他道德高尚。”文宣帝说：“司空高允是文才之士，为人作赞语，当然要称扬赞美。即如你为人作文章，说他好处时，岂能都是事实?”文宣帝的责问，魏收不敢当面辩驳，伏首无言，战栗而已。

文宣帝自初便看重魏收才学，不想加罪于他，遂将毁谤魏史者治罪，王松年、卢斐、李庶均以谤史受到凭头鞭打，配给甲坊，卢思道也为此抵罪，后来卢斐、李庶都死在狱中。

孰料文宣帝责罚并未能平息众怒，依然群口喧沸，相从发难，攻击《魏书》。文宣帝只好下令魏史且勿施行，命群臣集议，听任史书中述及家事者到官署听证，记载不实者呈递牒文。此令一出，更引动了发难者群起而攻，于是众口喧然，称《魏书》为“秽史”。呈文投诉的人前接后续，魏收难以招架。当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权势倾动朝野，与魏收又有亲戚关系，司马子如也和魏收有很深交谊，认为这事很难辨明是非曲直。尚书陆操曾对杨愔说：“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赞扬《魏书》，并表彰魏收著史的功劳。杨愔也认同此说，一次杨愔召魏收议事，对魏收说：“《魏书》一代大典，万世不刊之书，自然会流传千古。但是，遗憾的是传记中论述诸家的家世，枝叶姻亲，未免过于繁芜琐碎，与历代旧史体例不同，岂不自招非议?”魏收答道：“往年由于中原沦丧，士人的谱牒家乘遗失殆尽，所以才详细书写其家族支派。还希望明公观过知仁，体谅苦心，以免罪责。”当时社会上门阀制度盛行，每个人政治地位与特权，都和家族门望相关，谱牒家史非常重要，大臣权贵往往依靠血统取得地位，按照家系写史，便是如实记述社会情况，实在是时势使然。当朝一些权贵大臣既听取了肯定《魏

书》的意见，又体谅魏收著史的苦心，不想弄成史书失实的结论，遂抑塞诉辞，压制反对意见，努力平息这场风波。终文宣帝之世，不再争论《魏书》是非。

皇建元年（560），高演登基，是为孝昭帝。因为魏史未能施行颁布，便下诏命魏收再用心研讨审核，改正修订。魏收受诏后又对史书内容作了许多更正。孝昭帝下诏颁行《魏书》，魏收提出建议，认为史书放置在秘阁，深藏禁中，外面的人们无从得见。于是命人抄录了副本，一本送到并省官署，一本送到邺都，任人抄写过录。

皇建二年孝昭帝死后，武成帝高湛立。河清四年（565），武成帝禅位给太子高纬，是为齐后主，改年号为天统。

天统二年，因为一些大臣经常进言称魏史不实，太上皇武成帝又命魏收再次修改。魏收时年已60岁了。魏收将传记部分又一次调整回换，为卢同立了传，崔绰反而作为附传记述。杨愔在高演与废帝高殷争夺政权中被杀，这次遂改写了杨愔家传中“有魏以来，一门而已”八个字，原先记为“弘农华阴人”，改为“自云弘农人”，用来匹配王慧龙传文“自云太原人”。这样改写传文，魏收是想释憾于因谤史获罪的卢思道及王松年。这次修改，又有人认为传文改写失当，依然是秉笔的过失。自天保五年修成魏史，至天统二年修订，魏收三易其稿，十二年中受尽讥刺毁谤，《魏书》始终未能洗掉“秽史”之名声。

武平三年（572），魏收去世，终年66岁。封赠为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有文集七十卷传世。

魏收死后，不满《魏书》的人向后主进言，要求改修魏史。武平四年五月，后主下诏命史官改修。这次改修由中书监阳休之担任，一方面因为魏收叙述他家事迹有许多褒美，另一方面阳休之寡于才学，迁延岁月，很长时间竟没有着手刊削改正，其后也只是在字句上稍有变动而已。四年后北齐灭亡，这次改修魏史没

取得重大成果。

齐幼主承光元年（577）正月，周军入邺，后主高纬、幼主高恒都被周军俘虏，北齐王朝覆没。时距魏收去世已五年，魏收由于修史与人结下怨恨，在北齐亡国的兵荒马乱之际，魏收的坟冢被人发掘，骨殖抛弃荒郊。在他有生之年人们宿怨未报，在他死后，这些人发泄私愤，祸及枯骨。

《魏书》自撰成之日便受到非议，“秽史”之名沸沸扬扬，故后世曾经多次重修。隋文帝使魏澹、颜之推等另写了一部后魏史，以西魏为正统，这是因为隋朝承袭北周，北周又取代西魏的缘故，为了表示隋朝是正统，所以要尊西魏而黜东魏。这部后魏书自道武帝至西魏恭帝为十二本纪，将魏收书中隐晦的道武帝、太武帝、献文帝之死的真相，据事直书。又撰有七十八列传，史论与史例各一卷，合为九十二卷。这次重修并未能取代《魏书》，成就较《魏书》逊色。唐朝人曾评论，说魏澹改魏收是“以非易非”。隋炀帝也认为魏澹所著《后魏书》不尽如人意，又曾命潘徽、欧阳询等人协助杨素重修魏史，书未成而杨素身死，事遂中止。唐朝初年，敦煌人张太素撰有《后魏书》一百卷，另外裴安时撰《元魏书》三十卷，卢彦卿撰《后魏纪》三十三卷，元行冲撰《后魏国典》三十卷，更难以与魏收《魏书》相提并论。以上诸书，除了张太素之书有《天文志》二卷，后人取来补魏收书的《天象志》，魏澹之书的《太宗纪》用来补魏收书的缺佚之外，其余都已经很早就失传了。唐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尽管对魏收之书有诸多贬訾，依然认为“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

《魏书》在数百年流传过程中，渐有散佚，至北宋初年已有不少内容残缺，史学家刘攽、刘恕等校刊《魏书》时，曾记述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后人多据李延寿《北史》及《高氏小史》补其缺佚，据《册府元龟》、《通典》补《魏书》中《礼志》、《刑罚志》的残缺。今天所见到的《魏书》，已经有相当

多的内容不是魏收的原文了。

在二十四部正史中，《魏书》是唯一被称作“秽史”的史书，它自问世便经历了聚讼纷纭的过程，作者魏收也长久以来身被恶名。究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些是历史客观条件所致。

《魏书》的修成，距东魏灭亡仅仅五年，时世既近，恩怨未泯，魏齐禅代之际的恩恩怨怨依然在人们心中耿耿于怀，列入史书传记中的人物不仅有子孙在世，而且多数在朝居官，有一定的势力。做子孙的哪个不想乃祖乃父荣耀显赫？既不能一一遂其心愿，于是便群起而攻。如卢斐父卢同，当初承希元叉之意杀戮多人，后因为元叉之故而罢官，不能说是功业显著；崔绰虽秩位卑下却为高允看重，称赞其道德，当然在为行为高洁者立传时不当遗落。卢斐的诉词，单单凭据其父官位来较量尊卑，争专传、附传的荣辱，是难以服人的。

另外，文宣帝高洋处置也有失当。他下诏命魏收在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讨论，有这一命令遂使人纷至沓来，竞相投诉，希图侥幸。家世未被载入《魏书》的，想要求载入史书；已经在书中载录的，又想增饰褒美。出于家门私心，又恃有讨论之命，这是失误之一。其后，投诉诸人不仅言不得申，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以谤史罪名受到处罚，甚至有人死于非命，便激化了矛盾，而且怨家皆归罪于魏收，深怨遂不可解，此失之二。随着矛盾激化，群口沸腾，文宣帝又令魏史且勿施行，等于承认了史书存在问题，同时又令群官博议，听任有家事牵涉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莫说魏收招架不了，即便是古代著名直笔史官、有杀身成仁之志的南史氏与董狐在世，也难惬诸人心意，此其失之三。“众口喧然，号为秽史”的结果于是因势形成。

《魏书》成书迅速，是因为修史过程中，大量依据旧史资料，许多内容是因袭旧文，撰述时间短，成书仓促。而且一同修史史官多数人并非史才，有的人不能出于公心平允执笔，如刁柔，志

存偏党，与其通亲者在《魏书》中虚美过实。故书中瑕疵不能完全归罪于魏收。

至于魏收可议之处也是事实，他恃才傲物，轻薄无行，早就有“惊蛱蝶”之称，德望本来就不足以服众。在担当了修撰一朝历史的重任之后更加得意忘形，公开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借修史以寄个人恩怨，是以招致众多的反对者。

平心而论，史学家生活于社会中，思想有时代的局限、地位的局限，也有七情六欲，好恶爱憎，尽管如何标榜直书实录，有时也会流露于史学著作之中。综观历代诸史，《魏书》并没有违背和远离是非标准，“秽史”之说，实在是过甚之词。

（吴振清）

参考资料：

《魏书》

《北齐书·魏收传》

《北史·魏收传》

缪钺：《魏收年谱》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郦道元著《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zhǎng），北魏地理学家兼散文家。祖籍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郦道元的曾祖父郦绍，在鲜卑族慕容部所建立的后燕任濮阳太守。当北魏拓跋珪南征时，他以郡迎降。被北魏授予兖州监军的官职。郦道元的祖父郦嵩，曾任北魏天水太守。郦道元的父亲郦范，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朝中任给事东宫的官职。太武帝嫡孙拓跋濬即位后，赐他为男爵，接着又晋赐为子爵，颇受重用。

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出征山东，郦范随军任左司马。皇兴三年（469），郦范因襄助军事有功任青州刺史。郦道元大约就在这一年生于青州。后来，郦范又晋升为侯爵，并人朝为尚书右丞。

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郦范以平东将军的头衔再度出任青州刺史，并晋为公爵。郦道元随父到任所，在青州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当时，青州所辖地域颇广，领有七郡三十二县，有优美壮丽的山川景色。郦道元从少年时代就爱好游览，曾与友人游遍山东，对山川地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太和十六年（492）以前，郦道元就已入仕，曾任尚书祠部郎中、尚书主客郎中等职。郦道元初入仕途，正赶上魏孝文帝积极推行改革，准备进军江南统一中国的时候。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和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顺应了当时历史潮流的发展，受到了士民的拥护，使北魏成为南北朝时土地最广和国势最强的一个朝

代，出现了举朝振奋，励精图治的蓬勃气象。这对郦道元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太和十八年（494）八月，魏孝文帝拓跋宏为防御匈奴的分支柔然族的侵犯，亲自巡视北疆六镇，郦道元以尚书郎随行。这次巡行历时两个月，遍历长城内外，最远直到阴山一带。巡行中，郦道元访问耆老，纵览历史遗迹，广开了眼界。

同年十月，魏孝文帝迁都改服。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迁至洛阳，诏禁士民胡服。迁都期间，郦道元跋涉于平城与洛阳之间，对中原的河道情况有了更实际的了解。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魏孝文帝改姓氏“拓跋”为汉姓“元”，从此称为元魏。

太和二十三年（499），魏孝文帝亲率大军南征，四月病死于谷塘源。北魏自此内变迭起，国力日趋衰落。

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年间（500——503），郦道元任冀州（今河北冀县）镇东府长史，并代行刺史之职。其执法严峻，下属官吏敬畏，为奸作盗者逃往他境。

魏宣武帝永平年间（508——512），郦道元出任鲁阳（今河南鲁山）太守。朝廷要求图状山川形势，郦道元积极主张进行实地考察，以确保绘制地图的准确。鲁阳是“蛮族”聚居地区，郦道元向朝廷上表，要求立校劝学，得到魏宣武帝特许。他任太守期间，崇勤学教，社会秩序井然。

魏宣武帝延昌年间（512——515），郦道元升任东荆州（今河南唐河县）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后因当地豪绅向朝廷告状而免官。

郦道元游踪宦迹甚广，所到之处，他都注意访渎搜渠，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河道源头，了解河道流经地域的物产和地理沿革，以及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并且随时记下所闻所见。同时，他在余暇时间还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书籍。这样，他逐渐积累

了丰富的山川地理方面的知识和资料。

延昌四年（515）正月，魏宣武帝驾崩。其子元诩继位，是为魏孝明帝。九月，孝明帝母胡太后临朝称制。这时，皇室骄奢淫逸，朝政腐败已不可收拾，而北疆六镇又频频告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南征统一已经断乎不可能。郦道元眼看锦绣河山支离破碎统一无日，自己又免官闲居难以有所作为。于是，他开始运用他长期以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积累的丰富知识给《水经》作注。他正是通过潜心著述，来表达他热爱祖国河山和渴望祖国统一的情感。

从延昌四年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15——524），郦道元闲居十年，这大约就是他写作《水经注》的时间。

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动机，在他为此书所写的原序中有所述及。他在阅读地理古籍的过程中，常感到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如，《山海经》虽记述详细，但是不完备；《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又过于简略，使人不容易看懂；一些描写山川景物的赋体文章，因受体裁的限制而不能尽情描述；《水经》虽然论述了全国主要河流水道，但是缺少发展脉络，不够系统；而且各种书的记述互不相同，十分混乱。郦道元还认识到地理现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远古时候的情况已经很渺茫，以后又经过历代的更迭、城邑的兴衰、河道的变迁和山川名称的更易，出现了许多名实不符的情况。因此应该在对现有地理情况考察的基础上，印证古籍，然后把业已变化的地理面貌尽量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郦道元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水经》作注的。

《水经》是三国曹魏人桑钦写的一部专门研究河流水道的书，共记述全国主要河流一百三十七条。原文一万多字，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和有关的自然、人文地理的情况说清楚，只能算是略具纲领。郦道元以此为底本进行注疏，其工作量

是十分浩大的。他在撰写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广泛地收集资料。凡是撰写所涉及之地，他无不尽可能地搜集有关的地理、历史、文学、碑碣等资料。这是他撰写《水经注》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在中国北方，他的游踪宦迹所达甚广，但即使是他亲自目击之地，他在搜集文字资料方面也绝不疏忽，以便与他的目击情况相印证。在全部《水经注》中，引文所涉及的书目就达四百七十七种之多（依陈桥驿之说）。其中包括了经学、诸子、历史、地理、地图、方志、人物传、诗赋、书信、辞书等十类。此外，郦道元还引用了大量的各地碑碣、民歌、谚语等。广泛地搜集资料还仅仅是初步工作。对于搜集到的资料的取舍引用，郦道元还下了大量的功夫进行资料分析，最后写进书中的只是一部分。所以除了在《水经注》中列名的四百多种资料以外，必然还有为数更多的资料经过分析面未被引用。由此可以想见，郦道元为撰写《水经注》而搜集的资料，其总数一定很大。在雕板印刷尚未开始，一切资料的获得都要依靠传抄的情况下，郦道元为收集资料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郦道元对于前人的记录和研究成果，是批判地“撷其精华，以注水经”的。对其中遗漏或错误的地方，都据实予以补充和纠正。在撰写过程中，他还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反对那种“默室求深，闭舟问远”的脱离实际的作法。他亲自考察了许多河流，并将考察所得的大量成果写入了著述之中。如郦道元在考察“決水”时，发现当地的地名与古籍里的地名完全不一样，经过实地踏勘了解才知道，原来是“決水”曾经决口改道。在实地考察中，他还重视民众之见。所谓不废舆徒之说，也有许多实证。经过这样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写出了规模空前的地理学巨著《水经注》。至于最后脱稿时间，迄无定论。但在他遇害之前，此书已经完成，则是可以肯定的。

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郦道元复出，始为河南尹。后迁

黄门侍郎，奉命与李崇一起去北边筹处“六镇”改州事宜。次年，又升任侍中兼摄行台尚书，率兵讨叛将元法僧于彭城（今江苏徐州）。

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郦道元任御史中尉，掌监察、执法之权。司州牧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拓跋宏的儿子，十分腐化，酷爱男色，嬖幸小人丘念，常与之同卧同起。选拔州官时，丘念仗势操纵舞弊。郦道元查明实据后，将丘念收捕入狱。汝南王元悦向灵太后说情，灵太后徇情，下令赦免。郦道元不听，执意将丘念处死，并且又据此弹劾汝南王元悦。郦道元为官正直耿介，执法清刻，素有严猛之称，因此颇遭权贵、豪门的忌恨。

孝昌三年（527），雍州刺史萧宝夤在关中反谋渐露。城阳王元徽设借刀杀人之计，怂恿朝廷派遣郦道元为关右大使。萧宝夤趁郦道元尚在赴任途中，将其围困在阴盘（今陕西潼东）驿亭。驿亭在冈上，没有水吃，凿井十几丈，仍不得水，最后水尽力屈，贼兵逾墙而入。郦道元叱贼而死。他的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一同被害。郦道元死后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封男爵。

郦道元一生勤勉力学，著述很多。除《水经注》，还撰有《本志》十三篇，《七聘》等著作，但流传下来的只有《水经注》一种，其他皆亡佚。

《水经注》共四十卷（原书宋朝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三十多万字，是一部规模浩大的地理学巨著。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是《水经》原书的近十倍，文字增加了二十多倍。《水经注》的内容也比《水经》原著丰富得多，它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了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

《水经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地域上讲，郦道元虽然是生活在南北朝对峙时期，但他并没有把眼光仅限于北魏所统治

的一隅，而是以历史上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写作范围，对全国一千二百多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以及古来河道变迁等情况都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从内容上讲，书中不仅详述了每条河流的水文情况，而且还详尽地记载了地形物产、水利设施，生动地描述了风土民俗、历史传说，翔实地考订了城镇沿革、河道变迁、地名更易等情况，留下了丰富的有关地质、地貌、土壤、气候、物产、民俗、城邑兴衰、历史古迹以及神话传说等方面的资料。如，《漯水注》中有平城西南火山活动的记载。《湽水（今沙河）注》中有温泉可以治疗疾病的介绍。《涢水注》中对石灰岩地貌情况有生动的描写。另外，《水经注》中还记有高奴县（今陕西延安东北）的石油，邺城（今河北临漳北）的煤炭，衡阳地区的鱼类化石等有关记载。

《水经注》中还保留了大量水利建设工程的资料。郦道元在逐一记述了各条干支河流的同时，还把各地的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以及运河渠道的开凿情况作了仔细描述。如历史上西门豹引漳灌邺工程以及漳河十二渠的开凿，郑国渠、都江堰、灵渠三大著名水利工程的兴建原委等，《水经注》比前人的记载都详细、丰富得多。书中还介绍了我国最早的水库——芍陂。描述了这座公元前597年前后楚国劳动人民在淮河流域建造的大型水库的规模，以及设有五个水闸的情况。另外，《水经注》所记载的“黄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日大水”的伊阙石刻铭文，则留下了世界较早的水尺记录。

除上述以外，《水经注》中引用了大量古籍和古代碑刻，后来这些古籍和碑刻都已亡佚，是《水经注》使之得以保存。同时书中还收集保存一些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这都成为后世弥足珍贵的资料。

《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散文集。郦道元以简洁的文笔，浓郁

的情感，精美的语言，开了游记随笔的先例，作了山水小品的示范。如：《江水注》中对于长江“三峡”清幽风貌的描绘，《河水注》中对黄河“砥柱”险峻态势的刻画，《湘水注》中关于南岳衡山“上有飞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练在山”的临摹，《资水注》中关于益阳古城附近，“渔者咸轻舟委浪，谣咏相和”的述说等，都是古代山水散文中的精品，历来为人们所欣赏和称道。

其中“三峡”一段最为脍炙人口，正所谓千古绝唱。“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以不见曦月写连山之高，是郦道元的独创。接着写“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以表现水流之速。接着写春冬之时的景色和高猿长啸的凄婉，最后以渔者之歌作结。这段描写，文字洗炼，形象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水经注》中，模山范水的精采描写比比皆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水经注》内容翔实丰富，文字生动，因而受到后世的注意与推崇。隋时虞世南著《北堂书钞》，唐初徐坚著《初学记》，杜佑著《通典》，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以及北宋时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等，都曾援引郦道元《水经注》的大量资料。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下江陵》诗，北宋文学家苏轼的《石钟山记》，也都曾化用和转引《水经注》。苏轼还有诗赞道：“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北宋以后，金朝礼部郎中蔡珪撰写了《补正水经》三卷，这是学者研究《水经》的嚆矢。从明代起，人们对郦道元及《水经注》的研究开始蔚成风气，大量《水经注》刻本刊行于世。万历四十二年（1614），朱谋玮著《水经注笺》，开创了一门专门研究《水经注》的“郦学”。清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四中，把《水经注》赞誉为“宇宙未有之奇

书"。其他如"郦学"家族全氏，从全元立到全祖望祖孙三代都潜心于"郦学"的研究。另外，还有戴震、孙星衍、赵一清、顾炎武、阎若璩等人，也都对《水经注》一书多有引注。晚清到民国期间，有杨守敬、熊会贞完成了"郦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水经注疏》、《水经注图》等。胡适等人对《水经注》也进行过研究。

郦道元和《水经注》不仅在国内有历久不衰的影响，而且还越出了国界，成为一部世界性的著作。国外也有许多学者研究"郦学"，著名的有：伯希和（Paul Pelliot）、费瑯（G·Ferrend）、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组织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由著名郦学家森鹿三教授主持。日本关西大学开设了有关《水经注》的专门课程。另外，日本几位出色的郦学家日比野丈夫、日原利国、藤善真澄等还共同翻译出版了《水经注（抄）》的日文译本。由上亦可见郦道元和《水经注》的重大世界影响。

（范大章）

参考资料：

《魏书》：《郦范传》、《郦道元传》、《慕容白曜传》

《北史》：《郦范传》、《郦道元传》

《资治通鉴》卷 139、140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

明·朱谋玮：《水经注笺》

清·全祖望：《全校水经注》

清·赵一清：《水经注释》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

杨坚代周

杨坚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华阴），生于贵族之家，自称先世可以追溯到汉朝太尉杨震。杨震八世孙杨铉在燕朝做北平太守，杨铉子杨元寿，在北魏初年为武川镇司马，此后，子孙遂定居朔州神武郡殊颓县（今山西寿阳县北）。杨元寿的玄孙杨忠，就是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北周的开国功臣，官至柱国、大司空，西魏时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受封随国公。

西魏大统七年（541 年）六月十三日（癸丑）深夜，杨坚诞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寺内，传说杨坚降生之时，紫气充盈室内，是大吉大祥，大富大贵的征兆。稍长后，性情深沉，目光外射，望去凛然不可侵犯。西魏恭帝元年（554 年），杨坚被京兆尹薛善聘为功曹，这一年他才十四岁。第二年，因杨忠的功勋，杨坚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又过了一年，升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有一次，周太祖宇文泰看见他，感慨地说："这个年轻人相貌不凡，必大有作为！"北周明帝即位以后，授予杨坚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周明帝对杨坚亦格外注目，派善于相面的赵昭暗中观察杨坚，过后赵昭向明帝报告说："从杨坚的相貌看，最高不过做一个柱国而已。"私下里赵昭却告诫杨坚好自为之。北周武帝初期，杨坚先升任左小宫伯，后又出任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此时宗室宇文护把持朝政，见杨坚深沉干练，想引杨坚为心腹，为自己效力。杨坚将此事告知杨忠，杨忠料定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不会甘心受制于人，宇

文护迟早必败，劝杨坚切勿追随他。宇文护见杨坚不愿为自己所用，十分忌恨，多次暗中设计，欲置杨坚于死地，多亏大将军侯伏、侯寿等人救护，才幸免于难。杨忠死后，杨坚袭爵随国公。

北周建德二年（573年）九月，杨坚与北周皇室联姻，太子宇文赟纳杨坚长女杨丽华为妃。这在杨坚的政治生涯中是至为关键的一件事，是日后杨坚能入宫辅政进而取代北周的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本。

联姻皇室使杨坚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同时受到的猜忌也更重了。齐王宇文宪是周武帝之弟，德高望重，深得周武帝信任。他见杨坚地位日隆，对周武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我每次见到他，都不自觉地举止失措，恐怕他不是一个久居人下的人，请您早些把他除掉。"北周武帝对杨坚也是将信将疑，派会相面的畿伯下大夫来和给杨坚相面。来和对杨坚说："您的双眼象启明之星，光照四方，必当君临天下，不过须经大肆诛杀后方可。"回过头来和却欺骗周武帝说："随国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可派他镇守一方。若为将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太子宇文赟亲近小人，荒于酒色。有一次内史王轨对周武帝说："皇太子恐怕担负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而普六茹坚貌有反相，请陛下废掉太子，杀掉杨坚，以根绝后患。"其实周武帝对宇文赟也非常不满，但有他的苦衷，次子汉王宇文赞没有才能，其他的儿子都还年幼，所以，没有办法实行废立。因此，听了王轨的话，烦恼地说："一切都听天由命吧，你能把上天怎么样呢！"朝廷内外关于杨坚的这些议论，杨坚略有所闻，非常害怕，平时深居简出，凡事退让，尽量不露锋芒。

建德五年（576年），杨坚率领北周三万水军在河桥（在今陕西大荔县与山西永济县之间黄河上）大破齐军。第二年，跟随周武帝出征灭齐，与宇文宪在冀州（今河北冀县）打败北齐任城王高湝的军队，以功进位柱国，被任命为定州总管。后又调任亳州

总管。

宣政元年（578 年）六月，周武帝病死，宇文赟即位，他就是北周宣帝。闰六月，周宣帝立妃杨氏为皇后。七月，周宣帝征拜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元年（579 年）正月，杨坚又升任大后丞。同年七月，又迁大前疑。由于是皇后的父亲，杨坚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三次升官，已经接近了权力的中心。而且，周宣帝每次外出巡视，都让杨坚留守京城，委任甚重。但周宣帝是个喜怒无常的人，除皇后杨氏外，他还另立了四个皇后，她们之间为争宠互相诋毁。有一次，因一点小事，周宣帝赐皇后杨氏死。杨坚得知后，急忙派妻子独孤氏入宫向周宣帝谢罪，叩头求情，把头都叩破了，杨后才免除一死。周宣帝对杨坚也是疑虑重重，曾对杨后说："我早晚把你们一家全部杀掉！"有一次他单独召见杨坚，事先对左右的卫士们说："如果杨坚的神色有什么不正常，你们就立即把他杀掉。"杨坚进殿后，神色坦然自若，左右的卫士才没有动手。

杨坚虽然渡过了一次次危机，但深怕终有一天会遭不幸，非常不安，以为万全之策就是暂时离开权力中心，躲开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内史上大夫郑译，是周宣帝做太子时的东宫旧臣，深得周宣帝信任。他与杨坚是少年时代的同学，二人私交很深。有一次两人在宫中长巷相遇，杨坚悄悄地对郑译说："我想出镇外藩，原因你是知道的，请你稍加留意，必要时帮我说句话。"郑译回答说："您在朝廷当中德高望重，天下早已归心，将来我还要仰仗您的恩泽，怎敢忘记您对我的嘱托！"不久，周宣帝派郑译南征陈朝，郑译请求再派一名善于领兵的元帅同行，周宣帝说："你看派谁去好呢？"郑译乘机回答说："若想平定江东，非派一名懿戚重臣不可，可将此任交给随国公。"于是，周宣帝下令以杨坚为扬州总管，发扬州兵，郑译发京师兵，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会合，以讨伐陈朝。杨坚将赴扬州，突然患脚病，未能成行。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周宣帝突患重病，将平时最亲信的两个人，小御正刘昉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召入寝殿，嘱托后事。但等刘昉和颜之仪赶到，周宣帝已不能说话了，刘昉见太子宇文衍年幼，不能亲理政事，杨坚为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与郑译及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謩、御正下士皇甫绩商议，引杨坚入宫辅政。杨坚固辞不从，刘昉说："您如果想干，就赶快出马，不要推辞，如果您确无此意，我可就自己干了，您可不要后悔。"杨坚一看事已至此，机不可失，就答应了刘昉等人的请求，假称受周宣帝之诏，入宫侍候疾病。

周宣帝死后，秘不发丧，刘昉和郑译伪造周宣帝诏书，命令杨坚都督内外诸军事，让颜之仪签署发布。颜之仪知道这并不符合周宣帝的遗愿，拒不签字，严厉地说道："皇上去世，嗣子年幼，辅政的重任应该交给宗室中有才能的人，赵王宇文招年纪最长，不论是从与皇帝的亲疏关系出发，还是从德望角度考虑，都应该让他辅政。你们几个人都备受先皇信任，应该考虑怎样尽忠报国，怎么能将国政交给外姓人掌管呢？我颜之仪不过一死而已，决不做对不起先皇的事情。"刘昉等人见不能使颜之仪屈服，就代替他在诏书上签了字。杨坚原来担任过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军官（左右宫伯），与禁卫军有较深的关系，现在诏书一发，诸卫都归杨坚指挥，首先牢牢控制了军权。

杨坚担心出藩在外的宗室诸王发生变乱，就以千金公主将出嫁突厥为理由，征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五王入朝。征藩王入朝需用玺书，而皇帝玉玺归颜之仪手下的人掌管，杨坚索要玉玺，颜之仪正颜厉色地说："玉玺是天子之物，有专门的人掌握，你凭什么索要！"杨坚勃然大怒，想杀掉他，但颜之仪威望很高，又怕人心不服，于是将颜之仪贬为西部边郡的郡守。

陈王宇文纯镇守齐州，杨坚派门正上士崔彭带领两人前往。在

距离齐州三十里的地方，崔彭停了下来，派人去对宇文纯说："天子派崔彭送诏书来了，驻在驿站里，崔彭因患病，不能前来，请大王屈身至驿站受诏。"宇文纯心存疑虑，为防不测，带领很多随从前往。崔彭担心宇文纯抗命，对宇文纯说："请大王屏退众人，崔彭有密事相告。"宇文纯让随从退下，崔彭遂命令自己的两名骑士将宇文纯捆绑起来，然后对宇文纯的随从大声说道："陈王有罪，征召入朝，你们谁也不许轻举妄动。"宇文纯的随从愕然相顾，无可奈何转身散去。至六月，五王全部返回长安。

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杨坚才宣布周宣帝死讯，太子宇文衍即位，是为周静帝。发布诏令，以汉王宇文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以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宇文赞实际只被尊以虚名，文武百官全部听命于左丞相。尽管如此，宇文赞还是搬入宫中居住，整天与周静帝在一起，对杨坚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于是刘昉就选了几个美女进献给他。宇文赞非常高兴。刘昉乘机哄骗他："皇帝年幼无知，怎能承担大任，大王您是先帝的弟弟，众望所归，理应继承皇位。只是先帝去世不久，大家的情绪不稳，不如您暂且回归王府，待形势稳定下来以后，再入为天子。"宇文赞当时尚未成年，又天生愚笨，听信了刘昉的话，从宫中搬回王府。

此时，朝廷内部的形势，正如刘昉对宇文赞所说，极为不稳，对杨坚以左大丞相辅政，不少人很不服气。杨坚将禁军将领，司武上士卢贲安排在自己身边，以防不测。周静帝为太子时居住的东宫叫正阳宫，杨坚决定以正阳宫为丞相府。走马上任之日，害怕百官有不从命的，先叫卢贲集合禁卫军待命，然后将公卿大臣召到一起，对他们说："想求荣华富贵的跟随我去正阳宫。"大臣们窃窃私语，有的想去，有的不想去，正在这时，卢贲率领禁军赶到，大臣们一看，谁也不敢动了，乖乖地跟着杨坚出崇阳门，前往东宫。东宫的卫士不让众人入宫，卢贲怒声将门卫喝退，杨坚遂率领百官进入正阳宫，命令卢贲负责丞相府的宿卫。以郑译为

丞相府长史，刘昉为丞相府司马，御正下大夫李德林为丞相府属，内史下大夫高颎为丞相府司录。李德林文才甚高，杨坚受顾命之初，派邗国公杨惠对李德林说："随国公想与您共图大业，希望千万不要推辞。"李德林说："若得随国公提携，必以死相报。"杨坚大喜，即以李德林为谋主。开始，按照郑译、刘昉的打算，以杨坚为大冢宰，郑译为大司马，刘昉为小冢宰，三人共同执政。杨坚问李德林应该怎么办，李德林说："您应该做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这样树立不起权威，压不服众人之心。"至此，杨坚完全按李德林的策划进行人事安排，郑译、刘昉二人很不高兴。

虽然杨坚大权在握，但前途如何难以预料。他想了解一下天象，看看上天对自己是个什么态度。一天深夜，将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召人府内，问道："我以庸虚之才，受先帝顾命辅政。你给我说说天时人意，我又该怎么办？"季才说："天象是非常微妙的，要想确切知道上天的意思非常困难。我若用占卜的方法为您推测一下，恐怕也没什么用，大局已定，我即便说辅政对您不利，您难道真的能效法许由吗？"杨坚沉思良久，说道："事情正象你所说的这样。"独孤夫人也对杨坚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已成骑虎之势，没有退路，努力为之吧！"

周宣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皇帝，他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实施严刑酷法，征发徭役无度，搞得群心崩骇，怨声载道。杨坚为收拾人心，上台伊始就停止了劳民伤财的修建洛阳宫工程，接着又修改法律，删去了周宣帝时严酷的律条，制成《刑书要制》，颁行天下，他还以身作则，提倡节俭。这样一来，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护，形势也渐趋稳定下来。

但是，对杨坚来说，还有一个巨大的威胁没有消除，这就是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尉迟迥是周太祖宇文泰的外甥、北周的元老重臣，在朝廷中威望极高，除北周宗室诸王之外，杨坚最

不放心的就是他。于是派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带着周静帝的诏书，征召尉迟迥回京师，参加周宣帝的葬礼，同时命令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取代尉迟迥。果然不出杨坚所料，就在杨坚计划着征召尉迟迥入朝之时，尉迟迥也是忧心忡忡，他深知杨坚的为人，早晚要取代北周，于是就谋划着起兵讨伐杨坚，匡复周室。

韦孝宽受命出发，赴相州（今河北临漳）。当行至朝歌（今河南滑县西南）的时候，碰到了尉迟迥派来迎接韦孝宽的大都督贺兰贵。经过交谈，韦孝宽发现贺兰贵神色不定，担心会发生什么变化，就假称生病，放慢了前进的速度，又派人去相州问医求药，以刺探相州城内的动向。韦孝宽的侄子韦艺在尉迟迥手下做魏郡太守，尉迟迥派韦艺迎接韦孝宽。韦孝宽问他尉迟迥有什么阴谋，韦艺谎称没有，韦孝宽大怒，假装要将韦艺斩首，韦艺害怕了，将尉迟迥的打算全都告诉了韦孝宽。韦孝宽一听，急忙带着韦艺返身西走，每走到一个驿站，就将驿马全部驱散，对驿站人员说："蜀国公一会儿就到，赶快备办酒食。"尉迟迥得知韦孝宽已返转回京，派仪同大将军梁子康率数百名骑兵追赶，梁子康等人每至一个驿站，都被美酒美食招待，而且又没有驿马换乘，减慢了追赶速度。这样，韦孝宽和韦艺才逃回长安。

杨坚又派侯正破六韩裒到相州劝阻尉迟迥不要起兵，同时让破六韩裒给相州总管府长史晋昶捎去一封密信，授意晋昶暗中除掉尉迟迥。没想到此事被尉迟迥得知，大怒，将晋昶与破六韩裒斩首。然后集合相州文武官员和城内百姓，登上城北楼，慷慨激昂地说："杨坚就依靠着是皇后的父亲，挟幼主以作威福，篡位之心，路人皆知。我与皇室是甥舅关系，又被委以将相之任，先帝让我镇守相州，就是让我拱卫着帝室的安全。所以我想与大家一起，兴正义之师，匡复国家。大家意下如何？"众人一致响应。于是尉迟迥自称大总管，建置官属，正式起兵讨伐杨坚。并向四面

州县移送文书，号召同时起兵。青州总管尉迟勤是尉迟迥的侄子，开始将尉迟迥的文书呈送长安，表示效忠中央，不久又与尉迟迥联兵。由于尉迟迥是以忠于帝室相号召，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尉迟迥和尉迟勤管内的相州、卫州（今河南淇县）、黎州（今河南浚县）、洺州（今河北永年）、贝州（今河北清河）、赵州（今河北隆尧）、冀州、瀛州（今河北河间）、沧州（今河北盐山）、青州（今山东益都）、齐州（今山东济南）、胶州（今山东诸城）、光州（今山东掖县）、莒州（今山东沂水），都树起了讨伐杨坚的旗帜，短短十几天之内，从者数十万。荥州（今河南荥阳）刺史宇文胄、申州（今河南信阳）刺史李惠、东楚州（今江苏宿迁）刺史费也利进，潼州（今安徽灵壁）刺史曹孝远都各据本州响应尉迟迥。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和前东平郡守毕义绪也分别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和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起兵响应。怀县永桥镇（在今河南武陟）将纥豆陵惠则以城投降了尉迟迥。以上是尉迟迥控制的河北、山东地区。此后不久，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也分别率领郧、随（今湖北随县）、温（今湖北京山）、应（今湖北应山）、土（今湖北随县东北）、顺（今湖北随县北）、沔（今湖北汉川）、儇（今湖北应山北）、岳（今湖北孝感）九州和巴蜀之兵与尉迟迥相呼应，反抗杨坚。尉迟迥和司马消难还分别向陈朝求援，陈朝也就乘机派兵遣将攻取北周的地盘。一时间三方俱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本来对杨坚入宫辅政最义愤填膺的是宇文宗室诸王。赵王宇文招等五王被杨坚骗回京城，夺了兵权，此时见三方兵起，想与之里应外合，毕王宇文贤遂也与五王合谋，杀害杨坚。结果事情泄露，杨坚将宇文贤及其三个儿子杀死。由于当时山东的形势吃紧，杨坚害怕事态激化，故意不问五王之罪，并特别下诏准许五王可带剑上殿，入朝时也不必按规定快步而行，用以安定五王心。可是五王心中却不自安，知道宇文氏政权与杨坚最终将势不两立。

一天，赵王宇文招请杨坚过府赴宴，他将杨坚引入寝室，杨坚的随从皆不得入内，只有杨坚的从弟、开府大将军杨弘和大将军元胄被安排在寝室门外就坐，而宇文招的两个儿子宇文员和宇文贯，都守在室内佩刀而立。宇文招还事先在寝室后面埋伏下卫士。当酒饮到高兴的时候，宇文招的两个儿子进上西瓜，宇文招用佩刀的刀尖扎在切好的西瓜上，将西瓜捅到杨坚面前，欲顺势行刺。元胄一看形势危急，快步走入室内，对杨坚说："相府有事，丞相不可在此久留。"宇文招抽回佩刀，大声叱责道："我与丞相正在商谈国事，你是干什么的？还不给我退下！"元胄不但不退，反而又上前几步，站到杨坚身后，手按佩刀，对宇文招怒目而视。于是宇文招问了元胄的姓名，赞叹道："真是壮士！"赐了元胄一杯酒，说："我哪有恶意呀！你的猜忌心太重了！"过一会儿，宇文招假装呕吐，多次起身要到屋后去，元胄怕发生意外，都把他拦住了。宇文招又假称口渴，让元胄到厨房取水，元胄也不动身。正在这时，滕王宇文逌来到，杨坚起身出屋去迎接，元胄乘机对杨坚耳语说："我看事情有些不妙，您赶快离开这里。"杨坚却没有意识到危险，说："他们手里没有兵马，能把我怎样？"元胄着急地说："兵马都是属于他们家的，一旦让他们先下手，就一切都完了。我元胄并不怕死，只怕死得没有价值。"杨坚不听，又入室就坐。过了一会儿，元胄突然听到屋后有铠甲相撞的声音，急忙说道："相府事务那么繁忙，您怎么在这里留连不返呢？"说完强行搀扶起杨坚，快步而去。宇文招想追出去，元胄用身体把他挡在屋内，等杨坚走出赵王府大门，元胄才从后面赶上来。宇文招自恨错过了机会，没能杀死杨坚，手指都弹出了鲜血。不久，宇文招与越王宇文盛被杨坚诬以谋反的罪名，连同诸子都被杀害。

为平定三方之乱，杨坚调发关中精锐的府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梁士彦、元谐、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杨素、李询等为行军总管，讨伐尉迟迥。又以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率四行

军总管兵讨伐司马消难。以柱国梁睿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于义、张威、达奚长儒、梁昇、石孝义将步骑二十万讨伐王谦。三方之中，以与尉迟迥的战斗进行得最为激烈。

开始，尉迟迥处于攻势。他派出自己任命的大将军石逊进攻建州（今山西绛县），建州刺史宇文弁被迫投降；西道行台韩长业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俘虏了刺史赵威，以郭子胜为潞州刺史；纥豆陵惠攻降钜鹿（今河北平乡）后，又进围恒州（今河北正定）；上大将军宇文威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莒州刺史乌丸尼等率青、齐二州之众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大将军檀让攻下了曹州（今山东曹县）与亳州（今安徽亳县）后，屯兵梁郡（今河南商丘）；席毗罗率领八万之众攻陷了昌虑（今山东滕县东南）和下邑（今河南下邑）；李惠则攻占了永州（今河南信阳北）。

尉迟迥又派出使者，劝并州总管李穆起兵，李穆扣押了使者，将尉迟迥的书信呈送杨坚。李穆的儿子李士荣，以并州（今山西太原）士马强健，劝李穆与尉迟迥联兵反杨，李穆拒不采纳。杨坚对手握重兵的李穆不太放心，派内史大夫柳裘往并州陈述利害，又遣李穆的儿子左侍上士李浑往并州深致重托之意。李穆遂命李浑迅即返京，转送杨坚一个熨斗和一句话："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后又派人给杨坚送去一副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十三环金带。杨坚大喜，马上派李浑去见韦孝宽，向韦孝宽转述李穆之意，以坚定韦孝宽忠于自己的决心。李穆的侄子李崇为怀州刺史，最初准备响应尉迟迥，后知李穆归附杨坚，叹息道："全家受国恩为官富贵者有数十人，现在国家有难，竟不能扶助，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不得已也归附了杨坚。尉迟迥子尉迟谊在李穆管下为朔州刺史，李穆将其扭送长安。又派兵讨伐潞州，活捉了郭子胜。

徐州总管源雄的家属都在相州，尉迟迥派人策动源雄归附自己，源雄不从。杨坚得知后很高兴，给源雄写了封信，说："知道

您的妻子儿女都在相州的邺城（今河北临漳邺镇），但从即日起，不过数旬，贼徒必然翦灭，到时你们就可团聚了，不必过分挂念。徐州（今江苏徐州）是一个大镇，又与陈朝相近，您的才能出众，才被委以如此重任，望能建功立名，以不负朝廷。”源雄派徐州刺史刘仁恩击毕义绪于兰陵，遣仪同刘弘、李琰讨席毗罗于昌虑、下邑，均获胜利。

尉迟迥派遣檀让攻取黄河以南诸州郡，东郡太守于仲文以兵拒之，杀敌五百多人。尉迟迥大怒，命令宇文胄和宇文威分别从石济（今河南滑县西南）和白马（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两路夹攻于仲文。于仲文力不能支，抛妻弃子，率领六十多骑，从城西门溃围逃回长安，其三子一女被尉迟迥所杀。杨坚在寝室内接见了于仲文，谈及其子女被杀，杨坚为之泪下。于是命于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乘驿传之马驰至洛阳发兵，讨伐檀让，又命杨素讨伐宇文胄。

这时，韦孝宽率领的主力大军已进至永桥城，韦孝宽说：“永桥 城小但很坚固，一旦攻而不克，则有损我兵威。若破其大军，这个小城就可不战而降了。”于是率军屯于武陟（今河南武陟南）。尉迟迥派其子尉迟惇率兵十万人据武德（今河南武陟东南），扎营于沁水以东。正赶上沁水上涨，韦孝宽与尉迟惇隔水相持不进。

于仲文因事至武陟拜见韦孝宽。行军总管宇文忻对杨坚疑虑很重，对于仲文说：“你刚从京师来，看丞相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尉迟迥并不足为虑，只怕事平之后，丞相有鸟尽藏弓之意。”仲文害怕宇文忻倒戈相向，就对他说：“丞相宽仁大度，只要能竭诚尽力，必无二心。仲文在京三日，见其三善，以此来看，不是一个寻常之人。”宇文忻问：“都是哪三善？”仲文说：“有一个人叫陈难敌，他的哥哥刚从贼军中跑过来，仍命难敌召募乡曲，从军讨贼，表现了丞相的大度，此其一；上士宋谦，奉使办案，别求案外之罪，丞相责备他说：‘只追究案内之罪就行了，何必别求他罪

呢？真是不识大体。'这是不求人私，此其二；说到我妻子的遭遇，丞相泫然泪下，这是有仁者之心，此其三。”听于仲文这么一说，宇文忻心里踏实多了。

其实宇文忻的想法代表了当时不少将领的心理，元帅长史李询对此颇有察觉，于是给杨坚写了一封密信，说：“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都接受了尉迟迥馈赠的金了，现在军中已出现混乱迹象，人心不稳。”杨坚接信后非常担忧，与郑译商议另选将领取代这三个人。李德林知此事后对杨坚说：“您与诸将原来同是国家的贵臣，地位不相上下，现在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前面派出的将领您不信任，再派去的人就能保证是您的心腹吗？接受馈金一事，虚实难明，一旦换将，梁士彦等必然害怕被治罪，有逃跑的可能。如果将他们禁锢起来，则自郧国公以下诸将都会心存疑惧。而且临阵换将为兵家大忌，古时燕惠王信谗言用骑劫取代乐毅，赵惠王被离间，以赵括取代廉颇，这就是燕、赵所以失败的原因。依我之愚见，您不如派一个既有智略，素来被诸将所信服，又是您的心腹之人，火速至前线，观察事情的真伪，梁士彦等人纵然心存异图，也必不敢妄动，即便敢动也能迅速制止。“杨坚一听恍然大悟，说：“多亏了你提醒我，险些坏了大事。”杨坚希望刘昉、郑译其中一人往前线监督诸军，于是对二人说：“须得心腹之人以统帅大军，你们二位谁去呢？”可是刘昉以未曾为将，不懂军事为理由，郑译以母亲年迈为理由，均辞而不去，杨坚很不高兴。这时，高颎主动提出愿担此重任，杨坚大喜。高颎出了丞相府立即乘驿传快马驰往前线，连家都没回，只是派人通知母亲一声而已。从此以后，军机之事杨坚只与李德林商议。当时战事繁忙，每天要起草的军事文件上百封，李德林往往同时口授几个文件，数人执笔，而不需涂改，深为杨坚所信赖。高颎自主动请缨以来，也渐渐被杨坚所宠信。而刘昉、郑译，最初因杨坚得政全靠此二人，故将他们作为最得力的心腹，分别被封以黄国公

和沛国公，红极一时，朝野瞩目，称为“黄、沛”，当时人有“刘昉牵前，郑译推后”之说。但这两人都恃功放纵，骄恣不法，贪污受贿，杨坚对他们早有不满之意，及辞行监军，杨坚非常失望。此后，对二人渐渐疏远，恩宠也越来越淡薄了。当时战事紧急，杨坚整日废寝忘食，忧虑万分，刘昉却游乐纵酒，不把相府的事务放在心上，耽误了很多事，所以后来高颎自前线返回后，杨坚就以高颎取代刘昉为丞相府司马。因与郑译有同学之谊，杨坚不忍心废弃，但私下告诫丞相府官员，凡事无须向郑译请示。郑译不知内里，仍然去长史厅办公，却无人答理。郑译恐惧，向杨坚叩头请求解除职务，杨坚对他做了一番劝导，仍保留他的原职。

高颎赶到前线，命令在沁水上架桥。尉迟惇在上流放下木伐，木伐上堆满燃烧的木柴，想烧毁木桥，高颎则事先让士兵在水中造了几个象狗的形状一样的土堆，挡住了燃烧的木伐。尉迟惇见烧桥不成，就命令稍稍后退布阵，想乘韦孝宽军半渡之机而发起进攻。韦孝宽见尉迟惇后退，遂下令全军鸣鼓齐进。渡过沁水以后，高颎下令焚毁桥梁，迫使士兵义无反顾。两军大战，尉迟惇军惨败，韦孝宽乘胜追至邺城。

尉迟迥与尉迟惇及另一个儿子尉迟祐，率领邺城的全部十三万人马，在城南严阵以待韦孝宽，尉迟勤率领青州的五万人马也赶来邺城会战。尉迟迥常年以军旅为生，虽已年老，仍然披挂上阵，他亲自统帅一万人，头戴绿巾，身着锦袄，号称“黄龙兵”，都是关中人，因尉迟迥威望极高，他们都不顾父母妻子的安危，英勇作战，韦孝宽军连连败退。当时邺城士女在旁边观战的有数万人，为尉迟迥军助威。宇文忻对高颎说：“事情紧急，看我以诡计破敌。”于是发箭射观战者，观者返身大叫而逃，互相推搡、碰撞，一片混乱。宇文忻大声呼叫：“贼已败了！”于是韦孝宽军重新振作，奋力反击，尉迟迥军大败，逃入邺城。韦孝宽将邺城团团围住，实施强攻。李询与贺娄子干首先登上城墙，邺城被攻破，尉

迟迥走投无路，向楼上逃去，崔弘度在后面紧追不舍。崔弘度的妹妹嫁与尉迟迥子为妻，尉迟迥弯弓正要射向崔弘度，弘度摘下头盔说道："难道不认识我了？今天我们是各为其主，没有办法。念及亲戚之情，我将乱兵阻止在下面，不许他们对你有所侵辱。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早做一个了断，你还等什么呢？"尉迟迥将弓箭扔在地上，破口大骂杨坚，然后抽出佩刀自杀而死。跟随尉迟迥在城中的士兵，全部被韦孝宽坑杀。尉迟勤与尉迟惇、尉迟祐三人逃奔青州，中途被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抓获。韦孝宽传尉迟迥首于阙下。尉迟迥自起兵至失败共六十八天，失败的这一天是大象二年八月十七日（庚午）。

讨伐檀让的于仲文进军至汴州，遇上了尉迟迥手下的将领刘子昂、刘浴德，将其击败后进至蓼堤（在今河南东部），距梁郡只有七里。檀让手下有好几万人，兵力对比于仲文处于劣势。于是仲文先以弱师挑战，檀让率全部人马迎战，于仲文假装失败而退，檀让以为于仲文不堪一击，遂不加防备。于仲文派遣精兵突然袭击，大败檀让，俘获五千余人，斩首七百余级。又乘胜进攻梁郡，檀让守将刘子宽弃城而逃，于仲文追击，又斩获数千人。接着，仲文又攻下了曹州，俘获了尉迟迥任命的刺史李仲康。檀让自蓼堤败后，率领残兵退保成武（今山东成武东南），于仲文故意向各州县移送文书，说："大军将至，多多准备粮草。"檀让以为于仲文既让州县准备粮草，就不会马上出兵，放松了警惕，没想到，于仲文率精锐骑兵一天就赶到了，夺取了成武。

席毗罗在沛县（今江苏沛县）屯兵十万，准备进攻徐州。席毗罗的部下多是金乡（今山东金乡）人，于仲文派人冒充席毗罗的使者对金乡城主徐善净说："檀让明天午时到金乡，将宣布蜀国公的命令，赏赐将士。"金乡人信以为真，都非常高兴。第二天，于仲文率精兵，打着尉迟迥的旗帜，急速奔往金乡。徐善净见于仲文军至，以为是檀让，出城迎接被俘，不战而取金乡。席毗罗

一看老窝被端，部下的妻子儿女全部都成了人质，遂发兵来夺金乡，于仲文背城布阵，摆出决战的架势，而在数里之外的麻田中设下伏兵，两军才一交锋，伏兵突发，都拽着柴禾在麻田中喧嚣、鼓噪，尘土冲天，似千军万马。席毗罗军惊慌失措，大败而逃。于仲文乘胜追击，敌军纷纷跳入洙水淹死，河水为之不流。

韦孝宽攻下邺城后，又分兵讨伐各地尉迟迥的余部，不久，关东被彻底平定。杨坚命令韦孝宽将邺城焚毁，把相州连同邺城的居民一同迁往安阳（今河南安阳南），又分割相州一部份土地设置毛州和魏州，用以削弱相州的反抗能力。

王谊率领四总管兵到达郧州，未经战斗，司马消难就仓惶逃往陈朝。

王谦则依靠巴、蜀险要的地形顽强抵抗梁睿。派大将赵俨、秦会领兵众十万据守险关龙门（在今四川广元北）。梁睿命令将士从小路偷袭，四面合击，大破敌营。龙门一破，蜀人大惊。梁睿则扬旗击鼓而进，剑阁（在今四川剑阁东北）守将敬豪不战而降。王谦先前曾派达奚惎等帅兵十万攻利州（今四川广元），利州兵力只有二千，在总管豆卢勣率领下昼夜拒守，已坚持四十天之久，至此，达奚惎闻知剑阁已失，梁睿将至，遂解利州之围，逃归王谦。梁睿自剑阁人川，进逼成都。王谦命令达奚惎守城，自己亲率精兵五万，出城迎战梁睿。结果王谦战败，准备人城，达奚惎已经投降，不接纳王谦，王谦只得率三十多名骑兵逃往新都（今四川新都西），被新都县令王宝俘获，献给梁睿，梁睿将王谦斩首。杨坚以巴、蜀地形险要，剑南人好据险为乱，乃另外开辟一条平道，毁掉了剑阁之路。至此，三方之乱全被平定。杨坚渡过了险关，地位更加牢固了。

大象二年九月，诏令以杨坚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管辖原来的北齐地区，加强了杨坚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又以杨坚为大丞相，废除左、右丞相之官。杨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

又迈出了一步。

十月，杨坚杀陈王宇文纯及诸子。

十二月，杨坚又杀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及其诸子。对杨坚威胁最大的宗室五王，至此全部被诛杀，杨坚彻底扫清了他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

十二月十二日（癸亥），杨坚以周静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命令废除西魏以来汉人所得赐姓，一律恢复汉姓，以激发汉人的民族感，为杨坚取代鲜卑族政权、建立汉人政权做准备。

十三日（甲子），周静帝下诏，以杨坚为相国、总百揆、进爵为随王，以安陆（今湖北安陆）等二十郡为随王封国，可佩剑上殿，入朝可缓步而行，拜见皇帝不必自称姓名，享受九锡的礼仪待遇。杨坚假意推让，只接受了王爵和十个郡。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四日（甲寅），杨坚在文武百官敦劝之下，以无可奈何的姿态接受了相国、总百揆和九锡。六日（丙辰），周静帝又下诏，杨坚可建天子的旌旗，乘天子的车马，王妃独孤氏进为王后，世子杨勇进为太子。杨坚又假意推让了三次才接受。到这时候，杨坚距离登上皇帝宝座仅有一步之遥了，而这一步对他来说已无任何阻力与风险，只是顺理成章而已。

庾季才劝杨坚应该在二月甲子日接受天命即位为帝，李穆、卢贲等人又反复劝进，周静帝也被迫发出了周朝最后一封诏书，表示顺应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随王杨坚。

二月十四日（甲子），杨坚离开相府入宫，接受皇帝册书及诸玺，脱下官服，换上黄袍，然后进入临光殿，正式即位，接受百官朝贺，又遣使至南郊，告天受命之意。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杨勇为皇太子。封周静帝为介国公，周氏诸王全部降爵为公。政权的转换最终完成了。

周宣帝皇后杨氏最初看到静帝年幼，担心大权会落到别人手里，一听说杨坚入宫辅政，非常高兴。后来渐渐发现自己的父亲

有夺权野心，很生气，常常形于言色。及静帝被迫禅位，更加愤恨，杨坚在女儿面前也甚觉惭愧，将她改封乐平公主。后来杨坚又强迫女儿改嫁，乐平公主誓死不从。

内史监虞庆则劝杨坚将宇文宗室斩尽杀绝，以绝人望。高颎、杨惠二人虽以为有点过份，但不敢说，违心表示同意。只有李德林公开表示不能这样做，杨坚生气地说："你是个读书人，这种事你不懂。"于是周太祖孙谯国公宇文乾恽、冀国公宇文绚、周闵帝子纪国公宇文湜、周明帝子酆国公宇文贞、宋国公宇文实、周武帝子汉国公宇文赞、秦国公宇文贽、曹国公宇文允、道国公宇文充、蔡国公宇文兑、荆国公宇文元，周宣帝子莱国公宇文衎、郢国公宇文术全部被杀。不久，周静帝亦被杨坚所害。

杨坚即位以后，将年号改为开皇，因杨坚的父亲杨忠被始封随国公，就将国号定为随，又因随有"走"字，不吉利，遂去走字为隋。从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这个既强盛又短命的大隋王朝的建立者杨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70—175

《隋书》：《高祖纪》、《刘昉传》、《郑译传》、《卢贲传》、《梁睿传》、《源雄传》、《宇文忻传》、《元胄传》、《李德林传》、《崔彭传》、《于仲文传》、《庾季才传》

《周书》：《静帝纪》、《宣帝杨皇后传》、《文帝诸子传》、《尉迟迥传》、《王谦传》、《司马消难传》、《韦孝宽传》

开皇新政

北魏永熙三年（534 年），大将高欢立元善见为帝，以邺城（今河北临漳邺镇）为首都，建立东魏。第二年（535 年），以宇文泰为首的六镇军人集团，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拥立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北魏遂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权，继而是北齐与北周的对抗，中国北方再次陷人割据状态。双方战争连年不断，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北周建德六年（577 年），周武帝灭掉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但周武帝未及收拾残局，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继位的周宣帝荒淫残暴，实施严刑酷法，强征劳役大兴土木，滥杀宗室与大臣，使社会各种矛盾严重激化。所以，隋文帝杨坚成功地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以后，而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百废待兴的局面。他即位以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是改革官制。北周的官制有复古的倾向，模仿《周礼》设置六官。开皇元年（581 年），二月，少内史崔仲方向隋文帝建议废除周六官，恢复汉、魏旧制，被隋文帝采纳。中央设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三师无具体职责，不置官府，没有属官，只授予德高望重的大臣，有时与皇帝论学聊天而已。三公设置官府，配备僚属，地位很高，也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但因规定“无其人则阙”，所以实际上也是形同虚设。秘书省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事务机关，内侍省由宦官组成。因此，中央最高政权机关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各有分工，互相

牵制。内史省是决策机关，长官是内史监和内史令，各一人；门下省是审议机关，长官是纳言二人；尚书省是执行机关，事无不总，长官是尚书令及及左、右仆射各一人。三省长官共为宰相。由于宰相人数众多，加之各有分工，互相牵制，它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方面决策过程趋向科学化，而且达到了集思广益目的；另一方面，相权一分为三，便于皇帝控制，避免了宰相的专权，防止了宰相篡权之事在隋朝重演，使皇权得到了加强。尚书省下分设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开皇三年（583年），又改都官为刑部，度支为民部。各部设尚书一人，总管部务。六部尚书与尚书令及左、右仆射共称为八座。吏部负责官吏的选拔，考核、迁转等；礼部负责朝仪、祭祀、礼宾；兵部负责军政；刑部负责司法；民部负责户籍财政；工部掌管营建工程。

五省之外，又有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掌管天下水利、渡口、船桥的都水台，长官是都水使者；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十一寺，分管各项事务，国子寺的长官是国子祭酒，将作寺的长官是将作大匠，其它九寺的长官为卿。又置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十二府，各设大将军一人，分领内外军宿卫。

以上各部门及其职称并非隋代首创，例如三省六部，在隋朝以前就已出现，但职权界限和名称都不大稳定，隋文帝是把三省六部作为一种体制加以确立，并且奠定了唐、宋官制的基础，而六部制，则一直沿袭到清末。

其次是简化地方行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两级制，但从东汉开始，地方行政形成了州、郡、县三级政权，到南北朝后期，州郡数目特别多，例如北周末年，有二百一十一个州，五百零八个郡，县的数目就更多了。机构重叠、官员数量庞大的结果是办事效率差，人民的负担也重。开皇三年，河南道兵部尚书杨

尚希针对这一情况，向隋文帝上表说："如今郡县的数目比古时候多出好几倍，有的地方方圆不到百里，数县并置，还有的两个郡管辖的民户加在一起尚不足一千。民少官多，就象十只羊有九个牧人一样。官僚人众使支出日益增多，吏卒倍增使租调年年减少。清干良才本来就很稀少，郡县所需数万官员到哪里去寻觅？所以应该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既可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又可优化地方官员。"太子少保苏威也建议废郡。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隋文帝正式下令废除郡一级行政，五百多个郡被撤销，同时还裁撤了一批小州小县。这样，变六百余年的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减少了很多官吏，提高了办事效率，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三是改革官吏的选拔、任用制度。自魏晋以后，隋朝之前，选举官吏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到北朝后期北周的时候，选拔官吏已不大重视门第，出现了"选无清浊"的现象。而隋文帝虽然在州、郡仍然设置中正的职务，但地位已大大降低。如以前的州郡中正属于朝廷显官，由当地第一流的大姓担任；隋文帝将州都（即州中正）定为视正八品官，郡正（即郡中正）定为视从八品官，已经不是正式官员，这样的地位显然已经不能担当评定人物的工作了。因此，隋文帝尽管没有明确废除九品中正制，但这一制度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开皇七年（587年）正月，下令诸州每年举荐三名贡士。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下诏令五品以上京官以及各州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文帝选拔官吏方法的改革，为科举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踵魏晋以来之遗风，据门第高低选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一旦发现，隋文帝即予以惩治。如代理吏部尚书卢恺在选用官吏时，讲求门第而不按照才能，竟被隋文帝撤职查办。

在地方中下级官员的任用方面，隋文帝还废除了州郡辟举制。自汉朝以来，州、郡、县的长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另外，地方

长官的几个主要副手也由中央政府委派，其它的僚佐则全由地方官在本地任意选用，所以，地方政权多被当地的大姓豪强所把持。隋文帝将地方官自辟僚佐的权力收归中央，较高的官员由吏部尚书负责选用，下级官员由吏部侍郎负责选用，凡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中央实行任免。开皇五年（585 年）二月，隋文帝做出规定，各州刺史及长史、司马每年岁末朝集京师，由吏部对其政绩进行考核，予以黜陟。以后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不得连任，而且仕人不得在本地做官，以防枉法徇私。

第四是减轻刑罚，制定《开皇律》。北朝后期，刑法非常残酷。北周宣帝在位期间，曾制定《刑经圣制》，律条更加严峻，官民动辄即触犯法律。隋文帝入宫为宰相以后，为收买人心，宽大刑法，将《刑经圣制》中严酷的律条删去，制成《刑书要制》，颁行天下，此举深得当时百姓的拥护。但这仅是权宜之计。开皇元年，隋文帝夺取政权以后，命令尚书左仆射高颎、上柱国郑译、杨素，大理少卿常明，刑部侍郎韩浚，比部侍郎李谔，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率更令裴政等人全面系统地修定法律。裴政熟习历朝典故，当时参加修定法律的十余人中，凡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高下取舍也多由他裁决。所以，裴政在修律的十余人中地位虽不算高，其实是核心人物。十月十二日（戊子），新律修成，颁布实行。新律的基本精神是“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废除了前代枭首、轘裂、孥戮、鞭刑、宫刑等酷法，和谋叛罪以下的收族之罪。量刑共为五类：死刑分两种，绞刑和斩首；流刑为三种，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二千里；徒刑分五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和三年；杖刑也分五等，自六十至一百；笞刑同样分五等，自十至五十。法律又定十恶之罪，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凡犯十恶之罪及故意杀人者，虽遇大赦，亦在不赦之例，即所谓十恶不赦。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有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

贵、议勤、议宾，凡属八议范围之内者及七品以上官员，犯罪皆减一等治罪。另外，九品以上官员犯罪，还可以交铜赎罪。最轻笞刑十交铜一斤，以上递增，至最重死刑交铜一百二十斤，即可免罪。官员还可以官抵罪。如犯私罪，五品以上官，一官可抵二年徒刑，五品以下官，一官可抵一年徒刑。若犯公罪，则分别可抵三年和二年徒刑，免官即可免罪。隋文帝在颁布新律的同时还规定，百姓如有冤屈者，可以逐级上诉，若上诉至尚书省仍不予受理，可诣阙敲响登闻鼓，直接向皇帝申诉。对死刑尤为慎重，后来作出规定，诸州所判死罪，不得立即执行，须移送大理寺复核，然后上报刑部批准。执行死刑时，需上奏三次，方可行刑，以防止冤案发生。

开皇三年年末，隋文帝阅览刑部上奏，发现当年定罪的案件数目达一万，认为这是法律过于严密所致。于是命令苏威和秘书监牛弘等人对刑律加以改定，除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罪、杖罪等千余条，删繁就简，定留五百条，编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二篇，这就是隋《开皇律》的定本。《开皇律》被史家誉为“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对后世影响很大，著名的《唐律》就是在《开皇律》的基础上修定的。所以《开皇律》尽管早已失传，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第五是改革府兵制。隋朝继承西魏、北周，继续实行府兵制。前期府兵的成份是由鲜卑人和汉族地主构成的。北周武帝时曾对府兵制进行了一项改革，即招募汉人百姓充当府兵。当府兵后“除其县籍”，另立军籍。府兵单独立籍有一个弊病，由于府兵连同家属都入军籍，可以不交纳租税，于是有些人为逃避赋税就冒充府兵家属挤人军籍。针对这种情况，开皇十年（590年）五月，隋文帝发布诏书说：“魏朝末年，因天下大乱，战争不断，军人南征北战，无固定居处，没有土地房产，象流民一样，实在是值得

同情。从今以后，军人户籍一律属所在州县，享受与当地百姓一样分配土地的待遇。”隋文帝对府兵制的这一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扩大了兵源，府兵不再局限于原来只有军籍的人。另外，将府兵制与均田制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了兵农合一，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又扩大了政府的赋税来源。一般认为，府兵制的发展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特殊贵族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比较平民制。而前后期的分界线则是隋文帝对府兵制的改革。

第六是调整赋役。隋朝建立之初，确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四岁至十岁为小，十一岁至十七岁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要承担赋役，六十岁以上为老，免除赋役。一夫一妇称为一床，交租三石，产桑之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产麻之地调布一端、麻三斤。单丁及奴婢、部曲减半。劳役依照周制，每丁每年服役三十天。未授予土地者可不交纳租调，有品爵之人及被封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的，课役俱可免除。从这个赋税剥削量和劳役征发强度来看，隋朝与前代并无明显变化。

兼民部尚书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为度支尚书，迫于当时军费支出浩繁，财政紧张，制定的税法较重，叹息道：“今天我所制定的税法，就好象张开的弓一样，已拉到极限，并非太平之法，有待后世君子减轻了！”苏威将父亲的这句话记在心里，常以此为己任。现在隋朝已露升平景象，自己又身兼民部尚书之职，于是苏威向隋文帝建议减轻赋役，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被隋文帝所接受。开皇三年，下令将成丁年令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丁每年服役天数由三十天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匹减为二丈。北周实行盐酒专卖，盐池、盐井禁止民间开采，酒也是由官方经营，隋这时也罢去盐、酒专卖，深得民众拥护。开皇十年六月，隋文帝又令五十岁以上丁可用交纳绢布等实物的方法代替服役。

隋文帝对赋役的上述调整，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从整体

上缩短了农民服役的时间，可以使农民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上去，对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特别是“免役收庸”制的出现，虽然还只是局限于五十岁以上的人，但可以模糊地看出由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为唐初“输庸代役”制的出现开了先河。

第七是整理户籍。南北朝以来，户籍十分混乱，为逃避繁重的赋役，有的整家整户的逃亡脱籍。例如原北齐地区，被称为“避役惰游者”竟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六七；有的谎报年龄，诈老诈小；有的一个宗族或乡党聚集在一起，只报一个户口，即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上述遗风至隋初尚存，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改变这一现象，隋文帝在减轻赋役的同时，大力整顿户籍。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地方基层组织，京畿地区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京畿以外地区亦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党长，里正等乡官的职责就是检查、登记户口。在此基础上，隋文帝采取了四项整理户籍的具体措施。其一是大索，大索就是括户，它针对的是整家整户逃亡脱籍者，主要在原北齐地区实行。开皇初年，只在个别地区有括户之举。如开皇元年，乞伏慧被任命为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刺史，曹州居民历来脱籍成风，实际人口与户籍上登记的数字相差甚远。乞伏慧到任后，首先检查户籍，搜括出脱籍人口数万户。沧州（今河北盐山西南）居民脱籍也十分严重，开皇二年（582 年），任命令狐熙为沧州刺史，令狐熙在任期间，劝课农桑，宣扬风化，使一万户脱籍农民主动回归户籍。由于令狐熙政绩卓著，开皇四年（584 年），隋文帝行幸洛阳，特召令狐熙来朝，予以奖励。接着，隋文帝就命令治书侍御史皇甫诞为河南道大使，主持在原北齐旧境实施大规模括户，称为大索。规定如发现户籍不实，有隐漏的人口，将里正、党长流配远方。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此举使北齐旧境的流亡隐漏之户基本被

括入了户籍。其二是貌阅，它针对的是民间诈老诈小之风。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命令全国各州县官吏按照户籍上人口登记的年龄，逐一与本人的体貌形状进行核对，同时将户内出生后不进行注册的中、小、黄人口登入户籍。结果使四十四万三千诈老诈小者转入丁籍，又新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中、小、黄人口。其三是析籍。隋文帝下令堂兄弟以下必须析籍分居，各为户头，以防隐瞒人口。其四是输籍法。当时在赋税征收中，州县长吏存在严重的贪污现象，他们在文帐中上下其手，或者将人口统计数字减少，或者将课户改为不课户。针对这种现象，隋文帝在尚书左仆射高颎的建议下实行输籍法。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负责组织，以三党或五党为一个单位，按照规定的标准确定应交纳赋税的户、口数字，里正、党长就按照这个数字来征发租调力役，同时政府也就掌握了每年的定簿，按照定簿验收各地课输。由于每年检查一次，政府对各地人口、课户、课口变化的情况都能及时掌握，长吏就没有了肆情贪污的余地，同时也使户籍上的人口数字较为真实、可靠。以上整理户籍的措施使隋朝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字大大增加。开皇初年，全国人口不满四百万户，到隋文帝末年，全国人口达到八百多万户，翻了一番多，这样赋税收入也就增加了，增强了国力。

第八是设置义仓。开皇五年五月，民部尚书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遭水旱之灾，百姓饥馑，于是上书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时候，耕作三年可余下一年的积蓄，九年就可储备三年的粮食。虽遇水旱之灾，而民无菜色，这就是由于劝导有方，事先有充足的储备的原因。去年关内大旱，庄稼欠收，陛下运来关东地区的粮食，并开发仓廪，赈济百姓，才使饥民度过难关，这充分显示了陛下的仁政。但治理国家，不能临渴而掘井，需未雨而绸缪。请下令诸州刺史、县令，劝课农桑，做好粮食储藏工作。"隋文帝采纳了长孙平的建议，命令诸州百姓在每年秋天根据贫富

状况上交数量不等的粟麦，储于村社，名为义仓，又称社仓。若遇灾年，当社有因饥馑不能存活者，即以义仓之谷赈给。自此以后，各州都积蓄了大量粮食。开皇五年以后，关中地区连年大旱，而关东地区遭遇大水，到处都是饥民，隋文帝派苏威等人分道开仓赈灾，使贫下之民深受其惠。

第九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北朝后期，币制十分混乱，官方发行的钱币就有四种之多，民间私铸之钱，品类更加繁杂。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铸造五铢重的铜钱，名曰五铢钱，一千枚五铢钱重四斤二两。在四面诸关各置样钱百枚，从关外来的商旅行人所带钱币都需经过勘验，与样钱不同者，一律没收，融化为铜。新钱铸成后，虽然明令旧钱一律禁止使用，但北周的五行大布钱、永通万国钱和北齐的常平钱等由于百姓习用已久，在民间贸易中仍然流行，私铸钱币事件亦时有发生。开皇四年，隋文帝下诏，若旧钱再不能禁止，或再发生私铸事件，罚当县县令半年俸禄。开皇五年正月，隋文帝又下诏严禁。从此以后，货币始归统一。隋文帝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通行全国。货币及度量衡的统一，方便了民间贸易往来，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十是提倡朴实文风。东晋，南朝以来，文风趋向奢华，流行骈体文，讲究对仗和平仄，辞藻华丽、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思想空洞，缺乏实际内容。这种文风，也浸染北方文坛。隋文帝十分厌恶这种浮华的文风曾下诏令，天下公私文件信函不许使用骈体，而用写实的散文。治书侍御史李谔是隋朝朴实文风的积极倡导者，向隋文帝上奏说："曹操父子三人崇尚词藻，作文不注重内容，好雕虫之小技，上行下效，遂成风俗。齐、梁两朝其弊最甚，朝野文士为一韵而争奇，为一字而争巧，连篇累牍，竟无一句实词，积案盈箱，唯写风云之状，世俗以此为高，朝廷据此选士。既可名利双收，士子趋之若鹜，文风愈加浮华。将宿儒视

为古拙，推文词之士为君子。因此，公文日益繁琐，行政愈加混乱。今朝廷虽有诏书，文禁浮华，但外州远县弊风仍盛，轻薄为文之人选充吏职，仁孝敦厚之士不加收用，这都是因为刺史、县令不遵风教之故，请治刺史、县令之罪。”李谔的奏文被隋文帝颁示天下。开皇四年（584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被御史台治罪。由于隋文帝的大力提倡和强制推行，六朝靡丽的文风略有扭转。

隋文帝在开皇年间所进行的改革大致就是上述十项，这些措施在政治上使已走向衰落的门阀士族遭到沉重打击，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对府兵制的改革使隋朝在军事上更加强大；而对赋役的调整，对户籍的整理，都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增加，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开皇年间的社会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另外，隋文帝在历史上还以俭朴著称，自为表率，所用器物尽管破旧，修补后照样使用，六宫宫女穿的都是经过多次洗濯的衣服，平时吃饭不过一盘带肉的菜而已。在隋文帝的躬身倡导之下，当时男子都穿绢布之衣，不服绫绮，装束不过用铜铁骨角制品，很少有金玉之饰，开皇年间的民风得以返朴归真。旧时史家在评价隋文帝时曾说：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百姓各安其业，没有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之事，人口众多，百物丰富，朝野欢娱。二十年的时间里，天下安定，一片升平气象。所以历史上将隋文帝的统治称为“开皇之治”。史家所言虽不免夸张，但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间，人口由不足四百万户增至八百多万户，各大粮仓储积的粮食多者一千多万石，少者数百万石，各地义仓的粮食也都堆得满满的，京师长安及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库里的布帛各有数千万匹、段，到隋文帝末年时，全国的粮食、布帛储备可供五、六十年之用。国库如此充裕，是魏、晋以来几百年没有过的，几乎达到了盛唐的水平。但是，唐朝“开

元盛世”的出现，是在建国一百多年以后，而隋朝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隋朝经济发展、社会强盛的原因虽有多种因素，但隋文帝励精图治、锐意攻革之功不可没。

隋文帝的统治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均田不力。隋朝的土地制度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每名男了受露田八十亩，受永业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四十亩。上至亲王，下至都督，授给永业田一百顷至四十亩不等，京官还给职分田，一品给田五顷，以下递减，至九品官给田一顷，外官也按官品授给职分田。隋朝的均田制没有什么新东西，是“皆遵北齐之制”。而北齐的均田制实行的是比较差的，豪强兼并土地的情况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到隋朝没有什么改变。因此，自开皇初年就存在着农民受田不足的现象。开皇三年，民部尚书苏威提出土地问题，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民田不赡”，建议削减功臣的土地分给老百姓。大官僚王谊站出来反对，他说功臣的土地多是前朝所赐，不宜削减，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使朝中大臣为国尽忠尽力，至于民田不足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结果，隋文帝没有采纳苏威的建议。到开皇十二年(592 年)，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于是，隋文帝派出使者“均天下之田”，说是均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均田的举动，只是派人下去调查调查，摸摸情况，结果，在地少人多的狭乡，每丁才有二十亩土地，远远低于法定数额。隋文帝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农民受田不足问题，对官僚地主大量占有土地采取淡然处之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隋文帝在法制方面存在着立法与执法不一致的矛盾现象，他自己就经常在朝廷上不遵律条，责罚官吏，甚至在殿廷杀人。至其晚年，更背离了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实施严刑峻法，规定盗一钱以上就处以弃市，三人共窃一瓜也被处以死刑，使触犯刑律者甚众。后有数人劫持朝中当权者，对他说：“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天下冤枉之人。你对皇帝说，自古以来，各朝

从未有过盗一钱即死的法律。如果你不将这句话转告皇帝，我们还要来，再来就对你不客气了！”隋文帝听说这件事以后，才取消了盗取一钱弃市之法。复次，隋文帝本人素无学术，对文化教育事业不予重视。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以各级学校的学生徒有其名，空度岁月，论德行不能做世人的典范，论才能担负不起国家重任为理由，下令国子学只留学生七十人，将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全部废掉。此举可以说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破坏。另外，隋文帝虽然比较注意人民的疾苦，征发劳役较轻，但在开皇十三年（593年），命令右仆射杨素主持修建仁寿宫，杨素督役严急，劳动强度太大，民工因疲劳而死者将近万人。当时天气炎热，杨素命令将死尸全部焚烧。仁寿宫修成以后，隋文帝派左仆射高颎前往视察，高颎向隋文帝报告说，工程过于绮丽，而且损失人丁太多，隋文帝听后很不高兴。但当他亲自到仁寿宫游览一番之后，怒气全消，反而夸奖杨素为忠，并赐给杨素钱一百万、锦绢三千段作为奖励。这件事说明，隋文帝的躬履俭约也是有限度的。所以，对隋文帝时期的统治应一分为二，开皇之治虽彪炳史册，其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75—180

《隋书》：《高祖纪》、《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杨尚希传》、《苏威传》、《乞伏慧传》、《令狐熙传》、《长孙平传》、《王谊传》

唐·杜佑：《通典·食货典》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灭后梁

后梁建国于梁承圣四年（555年），第一代君主是梁武帝的孙子岳阳王萧詧。梁武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梁武帝被软禁，因饥饿而死。梁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湘东王萧绎在江陵（今属湖北）称帝，是为梁元帝。萧詧和他的哥哥镇守湘州（今湖南长沙）的河东王萧誉是昭明太于萧统的儿子，因萧统早死，梁武帝另立太子，他们兄弟的地位自然有所下降，心中颇为不平。萧绎与他们兄弟二人素来失和，曾寻找借口派兵攻取湘州，杀死萧誉，因此结仇。当时萧詧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担心被萧绎吞并，就向西魏遣使称藩。西魏求之不得，遂向襄阳派兵，为萧詧提供保护。襄阳与江陵都是南北对峙这盘大棋上的战略要地，西魏想把这两地都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使之在与南朝的对抗中处于有利地位，于是在西魏恭帝元年（554年）九月，派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率步骑兵五万人，会同萧詧，向江陵发起进攻，萧绎战败被杀。西魏将江陵数万居民分赏三军作奴婢，驱入关中，小弱者全被杀掉。次年，萧詧在江陵即皇帝位，年号为大定；这就是后梁。

西魏将襄阳划归自己所有，后梁只管江陵一州三百里之地，而且萧詧居于江陵东城，西魏派江陵总管率兵驻江陵西城，名曰助防，实则兼对后梁进行监视，所以后梁不是一个独立政权，它向西魏及后来的北周称臣，只是西魏北周的附庸。它对西魏北周的作用，一方而是以这个傀儡政权来表示南朝政权的正统所在，象

征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梁及后来的陈政权的非法性，这是政治性的。另一方面，让后梁与梁、陈直接对抗，可作为一个缓冲地带，这是军事性的。萧詧死于北周保定二年（562年），太子萧岿即位为后梁皇帝，年号天保。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周宣帝死，由于即位的周静帝年幼，杨坚以皇后父亲的身份入宫为丞相，总理朝政，宇文氏政权岌岌可危。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总管见杨坚将不利于周室，共同起兵抗拒杨坚。正在这时，萧岿派出的使者、中书舍人柳庄到达长安，杨坚害怕后梁也趁火打劫，对柳庄极力拢络，拉着柳庄的手说："过去我曾经以开府的身份驻防江陵，深蒙梁主照顾。现在周朝主幼时艰，我担当顾命之任，时刻害怕辜负了先帝的重托。梁主累世忠诚于朝廷，今后还须双方共同努力，维持友好关系。你回国以后，请代我向梁主致意。"此时，后梁小朝廷内部正在为对北周应采取什么策略而议论纷纷，几乎所有将帅都主张应举兵北上，与尉迟迥等形成连衡之势，若能成功，也算为周室尽节，即便不能推翻杨坚，也可乘机席卷江汉，扩大占领区域，如此良机不可坐失。但萧岿认为出兵没有把握，犹豫不决。这时柳庄回到江陵，向萧岿转达了杨坚拜托之意，并为萧岿分析说："历史上的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之流，都可称得上是一时之豪杰，据要害之地，拥强悍之兵，但谁也没有成就功业，败不旋踵。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魏、晋挟天子以令诸侯，仗大义以为正名。今天尉迟迥虽是大将，但已是垂暮之年，不会有什么作为；司马消难、王谦，能力在常人之下，没有匡合之才；周朝诸将相都是明哲保身，一个个为杨坚效忠尽节。据我所料，尉迟迥等终当覆灭，杨坚必将代周。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不如保境安民以观其变。"柳庄之言深为萧岿赞同，所以没有出兵。不久，尉迟迥等相次失败，萧岿对柳庄说："若听从众人之言，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隋朝建立以后，萧岿立即派遣其弟太宰萧岩入隋，向隋文帝表示祝贺，同时确定对隋朝的臣属关系。隋文帝对后梁在三方构难之时按兵不动保持沉默亦心中有数，派人出使江陵，赐给萧岿黄金五百两、白银一千两、布帛一万匹、良马五百匹，以示感谢。

在杨坚代周过程中以及隋朝建立之初，陈朝乘机不断向北入侵。隋文帝考虑到政权尚不稳固，而且还要对付北面的突厥与西面的吐谷浑，不便对南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陈朝结好的同时，极力加强与后梁的关系，建立信任感，防止后梁倒向陈朝，措施之一就是与后梁结亲。隋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决定在后梁为晋王杨广选妃。萧岿有一女儿生于二月，江南风俗，二月生子不可自己抚养，于是出生后就交与叔父萧岌收养。不久萧岌夫妻二人相继死亡，又转养于舅舅张轲家。杨广选妃时，经占卜，萧岿身边诸女皆不吉利，就将此女接回，占卜吉利，遂纳为晋王妃，这就是后来隋炀帝的萧皇后。隋文帝还准备把女儿兰陵公主嫁给萧岿之子萧玚。从此，隋朝与后梁的关系更加亲近。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说："我们和梁主已是亲家，如同心腹一般，何必再加以防范呢？"于是隋文帝罢除了自西魏以来设置的江陵总管，萧岿才开始得以专制其国。

开皇三年（583年），萧岿派太子萧琮入隋朝拜，祝贺迁都大兴城。开皇四年（584年），萧岿又亲自入长安朝见，以天子服装，通天冠、绛纱袍，面向北接受郊劳。接着入大兴殿拜见隋文帝，隋文帝穿戴通天冠、绛纱袍，萧岿则换上大臣服装，远游冠、朝服，隋文帝与萧岿互拜。表示后梁既臣属于隋朝，梁主又具有皇帝的地位。隋文帝赐与萧岿一万匹缣，以及大量珍玩，下诏萧岿朝会时的位置在王公之上。一个月后，萧岿返回江陵，隋文帝在灞上（今陕西西安东）为萧岿饯行，隋文帝拉着萧岿的手说："梁主长期滞留在荆楚，未能收复旧都，怀念故乡的心情我深深理解，我要振旅长江，送你返回建康。"萧岿拜谢而去。

开皇五年（585年），萧岿病亡，太子萧琮继位，年号广运。隋文帝在赐给萧琮的玺书中说："我国虽然与陈国表面上维持友好关系，但边界之上摩擦不断，所以不能放松警惕。我与梁国累世亲善，又有婚姻关系，情义深厚。江陵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与陈人仅有咫尺之隔，水涨之时，尤其要加强戒备。"萧琮也是尽职尽责，即位后不久就主动出击，派大将军戚昕率水军袭击陈朝的公安（今湖北公安），但没有成功。

开皇五年以后，隋文帝开始了灭陈的具体准备工作，对后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为加强对后梁的控制，隋文帝征萧琮的叔父太尉吴王萧岑入朝，拜为大将军，留长安供职，其实是留为人质，同时恢复设置江陵总管，对后梁进行监视。隋文帝的这一做法虽加强了对后梁的控制，但同时在后梁内部也引起对隋的离心力，大将军许世武秘密与陈荆州刺史陈慧纪联系，准备献城投降，因谋泄被萧琮所杀。这件事反过来又加剧了隋文帝的担心，害怕江陵落人陈朝之手，增加灭陈的难度，于是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征萧琮人朝。八月，萧琮率群臣二百余人离开江陵，江陵父老都流着眼泪说："我君一去不返矣！"待萧琮到达长安，隋文帝马上命令大将崔弘度率大军进驻江陵。当崔弘度军行至鄀州（今湖北荆门北），萧琮的叔父安平王萧岩与弟弟义兴王萧瓛见隋军来者不善，恐遭不测，就派都官尚书沈君公去向陈慧纪请降。九月，陈慧纪引陈兵至江陵城下，萧岩等率文武百官及百姓十余万人降陈朝而去，崔弘度军进驻江陵。隋文帝得知萧岩降陈，即废掉梁国，同时派左仆射高颎前往江陵安集后梁遗民，很快稳定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

隋文帝对萧琮仍很客气，拜他为柱国，赐爵莒国公。隋炀帝即位以后，因为萧皇后的关系，更见亲重，拜萧琮为内史令，改封梁国公，萧琮的宗族人员也都根据才能授以官职。萧琮性格淡雅，又有自知之明，在朝不以职务为意，退朝则纵酒为乐。内史

令杨约与萧琮同官，隋炀帝令杨约向萧琮宣旨，诫励他要振作。杨约私下也劝说萧琮不要消沉，萧琮回答道："你我是不同的，如果我事事负责留意，你我还有什么区别呢?"杨约含笑而退。萧琮虽为亡国之君，客居他乡，但与隋朝权贵交往，昂然无所屈下。与大将贺若弼交情最深，后贺若弼因事被杀，民间又流行童谣说："萧萧亦复起。"隋炀帝遂生猜忌之心，将萧琮罢官，废居于家，不久病亡。

后梁自建国至亡国历经三帝三十三年，这一政权是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对峙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全国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隋文帝即将一举灭陈之时，后梁自然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74—176

《隋书》：《萧岿传》、《萧琮传》

《周书》：《萧詧传》、《萧岿传》、《萧琮传》

灭陈统一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杨坚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就是灭亡陈朝，统一全国。因为长期的南北对峙发展到这时候，已经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统一的使命，历史地落到隋文帝的肩上。

其实，隋文帝与陈朝的较量，早在隋朝建立之前就开始了。北周武帝平齐之后，又经过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大捷，周陈两朝基本上是以淮水为界。周大象元年（579 年），周宣帝遣韦孝宽等进攻陈淮南之地，屡战屡胜，江北之地全被北周占领。所以，在杨坚出任北周丞相之前，陈朝已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实际统治区域已退至长江以南，局蹙于荆、扬两大地区，周陈两朝以长江为界。大象二年（580 年）五月，杨坚入总北周朝政，宇文氏政权岌岌可危。六月，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三总管共赴周难，以相抗拒。而陈宣帝则试图乘敌国内乱之机，开拓疆域，重温占齐淮南地旧梦，再振陈威，于是调兵遣将进攻江北。七月，陈将陈纪、萧摩诃等进犯广陵（今江苏扬州）；八月，陈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遣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率兵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进军南兖州（今江苏扬州）；智武将军鲁广达攻陷郭默城（今安徽寿县西）。连战连捷。司马消难又以鲁山（今湖北汉阳附近）、甑山（今湖北汉川东南）二镇降陈。杨坚此时正穷于应付内部构难三方，无力南顾，只得派内史中大夫柳雄亮出使陈朝，以结邻国之好。陈的攻势稍缓，双方进入暂时休战时期。

隋开皇元年（581 年）四月，陈朝派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出使北周，至长安方知周已被隋所代。于是借机又开战端。九月二十四日（庚午），陈将周罗睺攻陷胡墅（今江苏南京江北），萧摩诃进犯江北。在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二十六日（壬申），隋文帝命令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和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讨伐陈朝，以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由于此时隋朝刚刚建立，并不想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隋文帝在九月发出命令后，非但没有马上派出军队，反而不断做出友好的表示，每次在边境地区捕获陈朝间谍，都给以衣服马匹，很礼貌地送还江南，并且在十一月派遣兼散骑侍郎郑㧑出使陈朝。由于隋文帝的外交努力，自九月以后，陈兵停止了向北推进的军事行动，双方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是到开皇二年（582 年），形势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正月十日（甲寅），陈宣帝病死，由于始兴王陈叔陵阴谋篡位，致使京城大乱。十三日（丁巳），太子陈叔宝带伤即皇帝位。三天以后，十六日（庚申），陈朝国丧的消息就传到长安。隋文帝一听大为振奋，认为机不可失，随即命令长孙览统八总管兵从寿阳（今安徽寿县）出发，元景山率领行军总管韩延、吕哲从汉口（今湖北汉口）出发，高颎火速赶往前线，指挥诸军，将去年九月发出的命令付诸实践，大举伐陈。二十三日（丁卯），元景山派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率兵四千进攻甑山，陈朝的镇将军陆纶率水军救援，被邓孝儒打败。在隋军的攻势下，陈朝在涢口（今湖北汉阳西北）、甑山、沌阳（今湖北汉阳东）的守军纷纷弃城南逃。二十四日（戊辰），陈朝被迫遣使请和，将胡墅归还隋朝。至此，自周末以来陈朝所抢占的江北之地已全部被隋朝收复。这时，隋文帝同意了陈提出的请和要求，打出“礼不伐丧”的旗帜，班师还朝。

陈占领江北部分重镇虽未构成对隋朝的重大威胁，但对陈的攻势如不予以遏制，他们就会利用这些江北据点进一步骚扰、蚕

食隋领土，使隋朝经常处于被动和紧张状态，也无法为以后灭陈部署兵力。因此，乘陈有国丧之机收复江北失地，虽然带有被迫自卫反击的性质，实际可视为隋文帝灭陈战略的第一步。

隋文帝欲吞并江南蓄谋已久，但是却不急于采取行动，将陈逼至长江以南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为最后一举灭陈做充分周密的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外交上主动与陈朝维持正常关系。为此，隋文帝几乎达到了委屈求全的地步。开皇二年六月，隋文帝派使者前往陈朝吊唁陈宣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陈没有相应的举动，迟至开皇三年（583年）二月，才派兼散骑常侍贺彻、兼通直散骑常侍萧褒回访，这是陈朝首次派出遣隋使。仅两个月之后，四月，隋文帝再次派兼散骑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劭出使陈朝，而陈则又间隔半年多之久，至十一月才派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访隋。过了两个月，闰十二月，隋文帝又派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出使陈。隋文帝每次都好像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陈使的到来，送走陈使后马上就遣使于陈，在此后双方的交往中都是这样。而且，隋朝从未对陈主动采取过一次军事行动。开皇三年四月，陈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向隋朝请降，开皇四年八月，陈将军夏侯苗又向隋朝请降，隋文帝为表示诚意，均以和好未予接纳。相比之下，陈后主叔宝的态度则大为不同，他以华夏正宗自居，除故意拖延派遣答隋使以示尊大之外，傲慢之意形于言表。如陈宣帝死后，隋文帝遣使吊唁，在写给陈叔宝的书信中称“杨坚顿首”云云，非常礼貌、客气，而陈叔宝给隋文帝的回书却简慢无礼，在书末说道：“看来你的统治区域内还算可以，这样天下就太平了。”一副以上凌下的样子。对此，隋朝大臣均忿忿不平，杨坚虽然也不高兴，却能冷静对待。他在回答梁睿提出的出兵平陈之请时说：“我初临天下，国家还没有做到政通人和，先大规模出兵伐陈并不可取。想汉朝之时，公孙述、隗嚣割据一方，光武帝与其通和，称对方为皇帝；尉

陀最初也不向汉高祖称臣；孙皓给晋文帝的答书平等相称。可最后或者灭亡，或者臣服。所以王天下者应虚怀若谷，雍容大度。陈国傲慢无礼，确应讨伐，但要暂缓出兵，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意。”开皇四年十一月，隋文帝派兼散骑常侍薛道衡出使陈朝。临行前，薛道衡上奏说：“陛下自登基以来，国家日益强大，岂能容忍区区陈国与我分庭抗礼？臣这次奉使，请允许我责其称臣。”隋文帝却说：“对陈朝的无礼，我尚且能够容忍，不予计较，所以你这次出使千万不要以言辞冒犯对方，一定要记住我的话。”隋文帝在外交上采取这种策略有两个用意，其一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除了隋文帝自己所说的刚建国不久，不便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个因素之外，统观隋初形势，大敌并非南陈，而是北方强邻。隋朝初年，突厥与吐谷浑经常入侵，仅开皇元年至三年间，对突厥和吐谷浑大的军事行动就有十三次，这种形势对刚刚代周的杨隋政权来说是严峻的，因此，不可能在南北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相比之下，北敌近，对京城长安威胁大，是当务之急；南敌远，对京城威胁小，可缓其诛，为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必须对南陈采取友好睦邻政策。隋文帝的第二个用意就是以此来迷惑陈人，让陈人觉得隋朝并不想打仗，很安全，到时候突然发兵，一举灭陈。

隋文帝所做的第二项准备就是广泛在朝臣中征求平陈计策，制定周密的战略计划。隋文帝曾询问高颎平隋的方略，高颎说：“江南地区天气炎热，水田成熟较早，估计快到收获之际，可象征性地调集一些人马，扬言要袭击陈朝，他们必然要屯兵防御，足可废其农时。他们一旦聚兵，我们随即将军队解散。连续这样搞两三次，他们习以为常，以后我们再调集人马，他们就不再理会，我们就可乘机渡江。另外，江南地区水位高，粮食不能藏在地窖里，都在地表，可秘密派人过江焚烧他们的粮仓，这样，不出数年，陈朝财力俱尽。”这是破坏陈朝粮食储积和迷惑陈人的策略。高颎之策付诸实施后，陈朝的国力开始削弱。虢州刺史崔仲方还

上书提出了伐陈的军事部署和具体步骤，他说："可在武昌（今湖北鄂城）以下蕲（今湖北蕲春）、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方（今江苏六合）、吴（今江苏扬州）、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州部署精兵，准备秘密渡江。在益（今四川成都）、信（今四川奉节）、襄（今湖北襄阳）、荆（今湖北江陵）、基（今湖北钟祥南）、郢（今湖北武昌）等州大张旗鼓地造船，为水战做准备。蜀、汉二江是陈朝的上流，水路要冲，为必争之所。陈虽于流头（今湖北宜昌西长江中）、荆门（今湖北荆门）、延州（今湖北宜都长江中）、公安（今湖北公安）、巴陵（今湖南岳阳）、隐矶（今湖南临湘西北）、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蕲口（今湖北蕲春西南）、盆城等地都驻有水军，然水军的大决战必在汉口、峡口（即长江西陵峡口）两地。假若陈见我在上游集结军队，派精兵赴援，那么下游诸将即乘机渡江。如下游陈军不上调，拥众自卫，我上游水军则可鼓行而下。定可灭陈。"崔仲方的策略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平陈战役基本上就是按照他提出的战略步骤进行的。此外，贺若弼、李德林、杨素、王长述、梁睿、杜整、高劢、王颁等人也都曾上平陈之计，众人之策总汇于隋文帝，于是制定出最佳战略方案。

第三就是为伐陈做具体的准备工作。开皇初年，隋文帝任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将最有才干的两员武将安置在对陈前线，委以平陈重任。开皇五年（585 年），任命吐万绪为徐州总管，命令他在徐州（今江苏徐州）修造战具，为伐陈做准备。开皇七年，隋文帝发动民众开挖山阳渎，沟通淮河与长江，以便向前线运兵运粮草器械。隋文帝又任命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杨素到任后，在永安（今四川奉节）造五牙大舰，可容战士八百人，舰楼分五层，高百余尺，在船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设置六个高五十尺、可拍击敌船的拍竿。还造了很多可容纳百名士兵的黄龙船及平乘、舴艋

等。另外，李衍在汉江上游重镇襄州也加紧营造战船。以上各项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至开皇七年，灭陈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恰巧在这一年，后梁安平王萧岩率文武百官及兵民十万人投降陈朝。这件事使隋文帝十分愤怒，对高颎说："我作为天下百姓的父母，怎能限于一衣带水而不拯救江南之民！"于是进一步实施崔仲方的策略，下令在长江上游各地公开大造战舰，摆出将顺流而下进攻陈朝的姿态，目的是将陈的注意力吸引到上游来。隋文帝唯恐陈不相信他在大造战具，下令各造船处将碎木及木屑投入江内，使之顺流而下以示陈人。此举果然奏效，陈顿感紧张。陈叔宝一方面派散骑常侍袁雅出使隋朝，试图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派大将周罗睺率兵屯驻峡口，加强上游守备，以防隋师。开皇八年（588 年）三月，隋文帝发出讨伐陈朝的诏书，诏书命令益州等部楼船全部向东进发，同时下令将诏书抄写三十万份散发到江南各地。这是隋文帝以诏书的形式诱使陈继续调兵西上。与长江上游的行动截然相反，下游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贺若弼用军中淘汰下来的老马大量购买陈的船只藏匿起来，只将五六十艘破船摆在沟渠之内，故意给陈人看，让陈觉得隋朝在下游无船。贺若弼还下令守卫长江沿线的士兵在换防的时候，都集中于广陵，大张旗帜，营幕遍野。陈以为隋朝要发动进攻了，急忙发兵备战，等搞清了原来是隋兵换防，陈兵又各归原处。贺若弼还经常组织士兵沿江打猎，故意让手下人马喧闹鼓噪，最初也着实使陈紧张了一阵。后来陈人习以为常，隋军再换防或打猎时就不予理会了。久而久之，就放松了对下游贺若弼等人的警惕。

与隋朝君臣同仇敌忾积极备战伐陈相反，陈朝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陈至德二年（584 年），陈叔宝大兴土木，在宫内修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每阁都有数十间的规模，其门、窗、栏、槛等都是用沈香和檀木制作，并用金、玉、珍珠、翡

翠装饰，奢侈华丽程度古今所未闻，微风一吹香飘数里。阁下筑有假山、水池，种植奇花异草。三阁建成后，陈叔宝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贵嫔和孔贵嫔居望仙阁，三阁之间有架空的复道相通。当时得宠的还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陈叔宝与众嫔妃日夜游宴三阁之上。仆射江总虽身为宰相，却不理政务，和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十余名文士也参杂其间，既无上下尊卑之序，又无内外男女之别，当时称江总等人为“狎客”。陈叔宝还任命宫女中有文才者为女学士，每逢饮酒，就使诸嫔妃及女学士与众狎客赋诗，互相赠答，然后取其中文辞艳丽的谱成歌曲，选宫女千余人歌唱。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内容都是赞美诸嫔妃容貌的。君臣长歌酣饮，通宵达旦。

张贵妃名丽华，生于士兵之家，最初为龚贵嫔侍儿，后被陈叔宝所宠爱，升至贵妃。张丽华聪明敏慧，举止优雅，神采照人，尤其善解人意。她还经常引荐诸宫女，所以在后宫中声望很高。陈叔宝不亲政务，朝中大臣上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呈进内廷，陈叔宝斜倚隐囊，张丽华坐叔宝膝上，二人共决政事。张丽华和孔贵嫔还与宦官勾结在一起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生死赏罚全由内廷决定。于是张、孔二人权倾内外，执政大臣对张、孔二人则竭尽谄媚、依附之能事。

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陈叔宝最讨厌臣下上报不好的消息，孔范投其所好，每有这类消息，必定加以文饰，或报喜不报忧，因此深得宠信，陈叔宝对他言听计从。中书舍人施文庆是陈叔宝太子时的官臣，也被陈叔宝所宠信。施文庆又推荐沈客卿，于是沈客卿也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掌管金帛局。根据陈朝制度，军人和官吏可以不交纳关市之税，由于陈叔宝修建三阁，造成府库空虚，于是沈客卿不问士庶，一律征收关市之税，而且加重征税数额，使财政收入超过平常数十倍。陈叔宝大为高兴，夸奖施文庆

知人善任。由此，施、沈二人更加为陈叔宝所信任，成为左膀右臂。而沈客卿聚敛无厌，则搞得陈朝士民怨声载道。

有一次陈叔宝大宴群臣，命江总以下各奏乐赋诗，轮到吏部尚书毛喜的时候，毛喜想上前劝谏，但陈叔宝已喝得酩酊大醉了，于是毛喜佯装突患心疾，倒在台阶之下，宴会不欢而散。陈叔宝酒醒后对江总说："毛喜根本没病，他是故意装病阻止我欢宴，指责我的所作所为。"于是将毛喜贬为永嘉内史。

秘书监傅绛才高气盛，被施文庆、沈客卿二人诬告接受高丽使者贿金，被捕下狱。傅绛不满陈叔宝所为，在狱中上书说："作为君主，应该上敬天地，下爱子民，节制各种欲望，远离奸佞之徒，勤于政事，做到未明而起，日落忘食，这样才能使万民拥戴，天下世世相传。可是陛下最近以来酒色过度，亲近小人，将忠鲠正直之臣视为仇敌，将天下百姓视如草芥。后宫穿绮戴绣，马厩粟麦成堆，而百姓却流离失所，僵尸蔽野。朝廷内部宦官小人当权，贿赂公行，已经到了神怒民怨，众叛亲离的地步。臣下担心这样下去东南王气维持不了多久了。"陈叔宝览书大怒，将傅绛赐死狱中。

太市令章华也上书谏道："想当初，高祖南平百越，北诛侯景；世祖东定杜龛、张彪之乱，西破王琳进犯之师；高宗收复淮南千里之地。三祖之功均是勤奋所致。陛下即位五年以来，不思先帝创业之艰难，不知天命责罚之可畏，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祀天地祖庙，唯拜龚、孔、张三妃，老臣宿将被弃之于草莽，谄佞奸邪之徒升之于朝廷。现在国土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更张，亡国之祸就是眼前了。"陈叔宝一看更加愤怒，立即下令将章华斩首。

孔范自以为文武才能居天下第一，曾洋洋自得地对陈叔宝说："在外领兵诸将皆起自行伍，只有匹夫之勇，毫无深谋远虑。"陈叔宝问施文庆是不是这样，施文庆害怕孔范，点头称是。中书通

事舍人司马申亦附合孔范。所以，自此以后，将帅只要稍微有一点过失，即被夺去兵权，改由文吏领兵。还把大将任忠手下的私兵部曲夺去，分配给孔范。因而造成文武解体。

隋军大举伐陈前，薛道衡与高颎在谈及灭陈战役是否有成功的把握时，曾有过一段议论。薛道衡说："预测大事成败，须以至理推断。晋朝时的郭璞曾说过，江东分王三百年，才能重新与中原合一。至今三百年将满，此其一。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历来如此。主上躬履俭仆，励精图治；叔宝荒于酒色，不恤政事，上下离心，怨声载道，此其二。国家的兴亡安危在于用人，陈朝以江总为相，只知饮酒赋诗，无经略之才，主管政事的施文庆是奸佞小人，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亦无将帅之才，此其三。陈朝可调动的兵众不过十万，可防线漫长，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兵则势孤而力弱，聚兵则顾此而失彼，此其四。据以上四点，陈朝必克无疑。"薛道衡对成败的分析，应该说是很中肯的。

开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己未），隋文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置淮南行台，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正式建立伐陈前线总指挥部。二十五日（辛酉），陈朝使者散骑常侍王琬、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到达长安，被隋文帝拘留于客馆。二十八日（甲子），隋文帝亲祀太庙，告知列祖列宗将伐陈之意。然后发布命令，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今江苏六合）、杨俊出襄阳（今湖北襄樊）、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今湖北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合计九十行军总管，军队五十一万八千人，皆受晋王杨广节度，以左仆射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三军事务全由高颎决断。十一月二日（丁卯），隋文帝亲自为出征将士饯行，同时悬赏获陈叔宝者拜上柱国、封万户公。十日（乙亥），隋文帝在定城（今陕西华阴东）主持召开誓师大会，送将士

出征，开始了伐陈战役。

按照崔仲方提出的战略计划，进攻首先从长江上游开始。十二月，秦王杨俊率所部诸军从襄阳进至汉口，拉开了平陈战役的序幕。隋军在汉口首先发难，目的是试图吸引聚集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十余万精兵赴援，使杨广军可轻取建康。但是，陈叔宝却诏以屯兵峡口的周罗睺下至郢州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杨俊，这样，就使峡口兵力相对薄弱，杨素乘机率所部顺三峡而下。杨素率军进至流头滩，陈将戚欣以青龙船百余艘、兵数千人把守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长江中），拦截隋军。此处地势险峻，隋军诸将均有怯意。杨素对诸将说："胜负在此一举。假若白日进攻，敌人可发现我军虚实，对我不利，不如乘夜色掩袭。"当晚，杨素亲率黄龙船数千艘，趁夜色衔枚而下，同时派开府王长袭率步兵沿长江南岸袭击戚欣的营寨，命令大将军刘仁恩率铁甲骑兵沿长江北岸前进。黎明时分进至狼尾滩，向戚欣发起进攻，戚欣败走，陈军全部被俘。杨素将陈军遣散，秋毫不犯，深得陈人之心。打败戚欣后，杨素率军大举东下，大小船只布满江面，旌旗铠甲辉天曜日。杨素端坐在平乘大船上，容貌雄伟，威风凛凛，沿途陈人望见皆有惧色，说："清河公简直如江神一般！"

隋军在上游大举进攻的消息相继传到建康，但全被施文庆、沈客卿扣压，不让陈叔宝得知。当初，后梁萧岩、萧瓛等梁宗室来降，陈叔宝对他们颇怀猜忌之心。这时候，陈叔宝召镇守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南平王陈嶷和镇守南徐州（今江苏镇江）的永嘉王陈彦参加明年元旦的大朝会，命令缘江各地的船舰都随二王还都，向萧岩等人显示威力。这样，就造成了江州以下江面无一可战斗之船，江州以上诸州兵、船则皆被杨素、杨俊军所牵制。

晋熙王陈叔文镇守湘州（今湖南长沙），据有长江上流，被陈叔宝所猜忌，于是任命施文庆为湘州刺史，并配以二千名精兵西上，征陈叔文还朝。施文庆非常高兴。但害怕出外后被人所中伤，

就推荐沈客卿代替自己掌朝中机密事务。这时，陈护军将军樊毅担心隋军在下游发起进攻，对仆射袁宪说："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北）是要害之地，应该各派精兵五千，金翅船二百艘，沿江防备。"樊毅的建议得到袁宪和骠骑将军萧摩诃的赞同。又与文武群臣共议，获得一致通过。但施文庆担心若向京口、采石派兵，恐怕再难以派兵随自己赴湘州，而沈客卿则希望施文庆早日赴任，自己得以专权，于是二人对群臣说："既然这样，也不必面陈皇帝，写一个上奏就可以了。"二人将奏文交给陈叔宝，又曲为解释。陈叔宝说："隋军在江北调集人马是常有的事，何必大惊小怪，边城的将帅足可以应付，不必派出兵船，以免造成人心惶惶。"不久，陈朝的间谍回报说，隋军在江北越聚越多。袁宪等再三请求赶快向京口、采石发兵。施文庆对陈叔宝说："元旦朝会将至，然后还要行郊祀天地的大礼，这都需要士兵参加。今若出兵，礼便废阙。"陈叔宝说："不然先出兵，到时候让水军参加郊祀大礼也不是不可以。"施文庆说："以水军从郊，若传至邻国，会被人瞧不起的。"施文庆又向江总大行贿赂，请江总向陈叔宝游说。陈叔宝不好驳江总的面子，但又迫于群官的再三请求，只得下令朝廷再详细讨论，讨论时江总又持反对意见，因此久议不决。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陈叔宝依然轻松自如。一天，他从容地对周围的侍臣说："王气在我们这里。想当初，齐国三次入侵，周朝两次来犯，都被江南摧败，这次隋朝能有何作为！"孔范附合道："长江自古以来是阻隔南北的天堑，今日隋军难道能飞渡不成！纯粹是边将立功心切，谎报军情，把事态说得很紧急。我总觉得我这官做得太小，北军若真能渡江，我定能立大功，因此也可得个太尉公做做！"当时有传言隋军战马多因病而死，孔范说道："这些马都该属于我的，为什么就死了呢？可惜！"说得陈叔宝大笑。君臣照样整日奏乐、纵酒、赋诗。

开皇九年正月一日（乙丑），陈叔宝朝会群臣。这一天大雾迷

漫，朝会结束后，陈叔宝倒头便睡，直到黄昏时分才醒。就在这一天，坐镇六合桃叶山（今江苏六合南）的隋晋王杨广，下令隋军乘大雾实施偷渡。于是，贺若弼率兵自广陵渡过长江，陈人竟然没有发觉；韩擒虎率五百人自横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江，陈采石守军都喝得酩酊大醉，韩擒虎轻易地就攻占了采石。二日（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赶至建康报信。三日（丁卯），陈朝文武大臣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四日（戊辰），陈叔宝发布诏书，表示要亲率六师讨伐隋军，任命萧摩诃、樊毅和中领军鲁广达为都督；施文庆与司空司马消难为大监军；派南豫州刺史樊猛率水军出白下（今江苏南京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率兵镇南豫州（今安徽宣城）；僧、尼、道士尽令从军。

七日（辛未），贺若弼攻克京口，活捉陈南徐州刺史黄恪。贺若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士兵违反军令于民间买酒，贺若弼立即斩首。所俘获的六千余人，贺若弼全部释放。当天，韩擒虎进攻南豫州，经半日激战，大败皋文奏，占领姑熟（今安徽当涂），活捉樊猛之子樊巡及其家属。江东父老素闻韩擒虎威名，纷纷至军门拜见。鲁广达之子世真、世雄二人也以所部兵降于韩擒虎，并派人劝其父降。鲁广达屯兵建康，接信后上书自劾请罪，陈叔宝对他进行了安慰，并赐以黄金，仍使其领兵。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统率青龙船八十艘游弋于白下江面，防御杨广的六合大军。陈叔宝因樊猛的妻儿均在隋营，怕他心怀异志，想以镇东大将军任忠取而代之，派萧摩诃将此意婉转告知樊猛。樊猛一听很不高兴，陈叔宝怕伤害樊猛，也就作罢了。贺若弼和韩擒虎攻克京口、姑熟后，分别从北、南两个方向向建康推进，沿江守军皆望风而逃。贺若弼还分兵守卫曲阿（今江苏丹阳），以阻止东部陈军入救建康。陈叔宝急忙命令豫章王陈叔英屯兵朝堂，萧摩诃屯兵乐游苑，樊毅屯兵耆阇寺，鲁广达屯兵白土冈，孔范屯兵宝田寺，任忠屯兵朱雀门，保卫建康城。九日（癸酉），贺若弼进据钟

山（今江苏南京紫金山），屯兵白土冈之东；杨广遣行军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共步、骑兵二万人，屯于新林（今江苏南京西南）；王世积率水军出九江（今江西九江），在蕲口大破陈将纪瑱。至此，隋军对建康已形成合围之势，灭陈在即。

此时，建康尚有兵力十余万人，本足可与隋军一决高低，但陈叔宝性格怯懦，只知整日啼哭，所有事务全部交予施文庆。施文庆心知诸将痛恨自己，唯恐诸将立功，对陈叔宝说："这些武将平时都郁郁不乐，对陛下素来轻视，在此关键时刻，哪能相信他们！"因此，诸将凡有建议，都不能实行。贺若弼进攻京口时，萧摩诃请求率兵支援，陈叔宝不许。及贺若弼进据钟山之初，萧摩诃又请求乘贺若弼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之机予以打击，又被陈叔宝拒绝。任忠也向陈叔宝建议说："兵法云：'客贵速战，主贵持重。'现在国家兵食俱足，应该固守都城，北军虽已过江，但不要与之交战，分兵切断长江通道，使之与江北失去联系和粮草供应。然后给臣精兵一万，金翅船三百艘，过江袭击六合。隋六合大军必然以为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士气自然低落。淮南地区百姓与我熟悉，听说我率兵而至，会群起响应。我再扬言进军徐州，断其归路，则隋朝大军自可退去。待到春天长江水涨，上游周罗睺等众军必来赴援。这是应敌上策。"此策中关于以兵袭击六合能否成功，周罗睺能否赴援均不可逆料，但对付已经过江的贺若弼和韩擒虎，确是上策。但是，陈叔宝也没有接受。过了一天，陈叔宝忽然说道："总是这样真让人心烦，让萧郎出兵将隋军赶走。"任忠叩头请求勿战，叔宝不听。十二日（丙子），陈叔宝下令出击贺若弼。贺若弼的兵力只有八千人，在兵力对比上，陈军具有绝对的优势，但陈叔宝不懂战法，命令鲁广达布阵于白土冈，居最南边，任忠、樊毅、孔范依次向北排开，萧摩诃军居最北边，诸军南北横亘二十里，无主帅指挥，各自为战，互不相知。贺若弼因未得杨广军令，本不想与陈军交战，但当他骑马登山一望，看出了陈

军的败征，立即飞驰而下，匆忙布阵，进行决战。鲁广达最先向贺若弼发起进攻，隋军连连败退，死亡二百七十多人。贺若弼纵火，利用烟幕阻止鲁广达的攻势。贺若弼见鲁广达军勇不可当，转而向北进攻孔范，双方刚一交兵，孔范掉头就走，主将一走，部下跟着后退。陈军本无战心，孔范一败，引起其它诸军混乱，纷纷败退，势不可止，死亡五千多人。

任忠单骑逃入建康城内，对陈叔宝说："我是无能为力了。"陈叔宝给他两大袋黄金，让他再募人出战。任忠说："已经不行了，现在陛下只有乘船去投奔上游诸军了，臣愿以死护卫。"陈叔宝信以为真，命任忠出去准备船只，然后下令宫人整装准备出发，过了很久不见任忠回还，陈叔宝十分奇怪。原来任忠出宫后，率手下几名骑兵奔往石子冈，投降了自新林进军至此的韩擒虎，然后引韩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兵正欲交战，任忠挥手说道："老夫都投降了，你们还干什么！"于是城内陈军皆四散逃走，文武百官也都各自逃命而去，只有袁宪留在大殿当中。陈叔宝对袁宪说："以前我没有很好地对待你，今天看来是我看错了人。国家到今天这个地步，不仅仅是我的德行不够，与江东士人道义沦丧也有很大关系。"说完，陈叔宝准备躲藏起来，袁宪严正地说："北兵入宫以后肯定不敢冒犯陛下，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陛下躲藏起来就安全了吗？希望陛下端坐正殿，效法梁武帝见侯景。"陈叔宝不听，飞跑出殿，边跑边说："乱兵之下什么事都能发生，我可没这个胆量，我自有办法。"他领着十几名宫人来到景阳殿后，想跳到枯井里去。袁宪紧追而至，苦苦劝谏，陈叔宝不听；后阁舍人夏侯公韵用身体挡住井口，不让陈叔宝入井，两人争执了很长时间，陈叔宝最终进入井内。不久，韩擒虎率军进入皇宫，几名士兵来到井边，发现井栏上有胭脂的痕迹，就向井内探望，发现有人，问井下是谁，陈叔宝不敢应声，士兵说再不答应就下石了，陈叔宝连忙喊叫起来。士兵将绳子系入井底，拉陈叔宝上来，份量之重

使隋朝士兵深感惊奇。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拉上来，一看，原来陈叔宝与张贵妃、孔贵嫔三人捆绑在一起了。太子陈深虽然才十五岁，却比陈叔宝体面得多，在东宫阁内闭门而坐，太子舍人孔伯鱼站立一旁。隋军敲门入阁，陈深安坐不动，从容地说："诸位远征至此，真是辛苦了！"隋朝军士都向陈深致敬。当时陈朝宗室王侯在建康的有一百多人，都投降了隋军。

贺若弼乘胜进至乐游苑，鲁广达仍率余部与贺若弼苦战，杀伤隋军数百人。天黑以后，鲁广达已无力再战，遂解去铠甲，面对建康城下拜恸哭，对众人说："我不能救国于亡，真是罪孽深重！"士卒皆痛哭流涕。于是贺若弼从北掖门入城。听说韩擒虎已俘获陈叔宝，叫陈叔宝前来相见。陈叔宝诚惶诚恐，向贺若弼下拜。贺若弼说："小国之君相当于大国之卿，下拜是应该的。你不用害怕，入朝不失作归命侯。"贺若弼自恨没能俘获陈叔宝，功劳在韩擒虎之下，气愤之余，向韩擒虎寻衅，两人对骂，以至拔刀相向。

第二天，高颎进入建康。高颎之子高德弘为晋王杨广记事参军，杨广遣高德弘飞驰至建康，令高颎留张丽华。高颎说："武王伐纣，姜太公蒙面斩妲己，今日怎能留张丽华！"当即下令斩首。高德弘回报杨广，杨广非常愤怒，说道："古人云：无德不报。将来我一定会报答高公！"因此而深恨高颎。接着，杨广进入建康，将施文庆、沈客卿二人斩首，以答谢三吴士民。又命令高颎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接收陈朝图书、户籍，封闭府库，珠宝钱财一无所取，于是天下之人都称杨广为贤。杨广又因贺若弼违反军令先期决战，将贺若弼关押起来，准备治罪。深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隋文帝得知后，立即召贺若弼驰驿入京。见面以后，隋文帝对贺若弼说："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又下诏书嘉奖贺若弼与韩擒虎二人，每人赐绢帛一万段。

杨俊统帅三十行军总管、水陆十余万人马屯兵汉口，牵制陈水军都督周罗睺，不与交战，双方相持一个多月。陈荆州刺史陈慧

纪派遣南康内史吕忠肃屯兵岐亭（今湖北宜昌西北），跨江设置三条铁锁，阻止杨素东下。杨素与吕忠肃前后交战四十余次，互有胜负，隋兵死亡五千多人。陈人割下隋死亡士兵的鼻子以邀功求赏，而杨素对俘获的陈军士兵三擒三纵，因而陈军士兵皆无战心，吕忠肃弃阵而逃，退守延州。杨素命令士兵除去铁锁，继续东进。至延州，杨素派一千名巴蛮，分乘四艘五牙大船，与吕忠肃再战，用拍竿拍碎陈船十余艘，吕忠肃遂大败，陈军被俘二千余人。守卫安蜀城（今湖北宜昌西北）的陈信州刺史顾觉和屯兵公安的陈慧纪闻吕忠肃败，皆弃城而走。陈慧纪率将士三万人、战船千余艘，想沿江而下救援建康，至汉口，被杨俊所阻挡，不能前进。这时，建康已被下游隋军攻克，杨广派樊毅和陈慧纪之子陈正业携带陈叔宝的亲笔信至江夏，命周罗睺与陈慧纪投降。周罗睺见陈叔宝的命令后，与诸将为国举丧三日，然后遣散士兵，与陈慧纪都投降了杨俊。此时，杨素到达汉口，与杨俊会合。在蕲口的王世积知陈国已亡，派人遍谕江南诸郡，于是诸郡纷纷向王世积投降。这样，长江中上游沿江诸州郡皆为隋朝所有。

陈国灭亡后，吴州（今江苏苏州）人推吴州刺史萧瓛为陈国主。陈永新侯陈君范也从晋陵（今江苏常州）投奔萧瓛，共同抗拒隋兵。隋右卫大将军宇文述率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前去讨伐，这时，燕荣自东海率水军自海道登陆，与宇文述合兵。萧瓛在晋陵城东树立木栅，留部分士兵抵抗宇文述，又派王褒据守吴州，自己率兵自义兴（今江苏宜兴）进入太湖，想从背后袭击宇文述。宇文述先破晋陵木栅，又派人袭击吴州，王褒换上道士服装弃城而逃，然后回兵大破萧瓛。萧瓛率领残兵退保包山（在太湖中），又被燕荣击败，与左右数人藏人民宅，被人扭送宇文述处。宇文述乘胜进兵至奉公埭，陈东扬州刺史萧岩被迫以会稽（今浙江绍兴）投降。萧岩、萧瓛二人均被送至长安斩首。

杨素击败吕忠肃后，派部将庞晖率兵向陈朝腹地挺进，南至

湘州。湘州城中将士全无斗志。新任刺史是岳阳王陈叔慎，十八岁，年轻有为。他摆酒宴请文武僚吏，酒饮到高兴的时候，陈叔慎长叹一声，说道："陈国的天下算是彻底完了！"助防湘州的遂兴侯陈正理挺身而起，高声说道："君主受辱，臣当死节。在座诸位哪个不是陈国之臣，今国家有难，正是效忠致命之时，即便不能救国于亡，也可尽臣下之节。今日之事不能犹豫，谁有异议，当立即斩首！"众人都随声响应。于是陈叔慎与众人杀牲结盟，决心抗隋。派人向庞晖奉书诈降，庞晖不知有诈，应邀入城，陈叔慎暗设伏兵，庞晖与手下将士全部被杀。陈叔慎招募兵众，几天之内就得兵五千余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也举兵响应陈叔慎，联兵抗隋。这时，隋朝新任命的湘州刺史薛胄率兵赶到，与行军总管刘仁恩一起进攻湘州。陈叔慎派陈正理与樊通应战，结果兵败。薛胄乘胜入城，活捉了陈叔慎。刘仁恩亦败邬居业。于是陈叔慎等人都被送往汉口，被杨俊斩首。

岭南地区数郡则共推高凉郡太夫人冼氏为主，号称圣母，保境抗隋。隋文帝派遣柱国韦洸率兵安抚岭南，陈豫章郡太守徐璒自豫章（今江西南昌）退保南康（今江西南康），挡住了韦洸的去路。杨广派人给冼夫人送去陈叔宝的亲笔书信，告诉她陈国已亡，劝她归附隋朝。冼夫人接信后，聚集大小首领数千人，为陈恸哭一整天，然后派孙子冯魂率兵迎接韦洸。韦洸率兵攻南康，斩杀徐璒，南下至广州（今广东广州），于是岭南诸州皆降隋。隋文帝下诏封冼氏为宋康郡夫人。

至此，陈国全境皆被平定，共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四百个县，民户五十万，人口二百万。隋文帝下诏将建康城夷为平地，另在石头城（今江苏南京西）设置蒋州。

二月，晋王杨广率大军班师，命元帅司马王韶镇守石头城。三月六日（己巳），陈叔宝及陈宗室诸王公、文武百官从建康出发，前往长安。隋文帝下令腾出一部分官居民宅以安顿陈人，内外修

整一新，又派人迎接、慰劳，陈人皆有宾至如归之感。四月七日（己亥），隋文帝亲至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迎接伐陈大军。十三日（乙巳），大军凯旋入京，向太庙献上陈俘，告知祖宗伐陈成功之意，陈叔宝等陈王侯将相随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而入，站立在殿廷之上。十四日（丙午），隋文帝端坐广阳门城楼之上，将陈叔宝及陈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和司空司马消难以下、尚书郎以上官员二百余人引至城楼之下，先让纳言宣读诏书，对他们长途跋涉而至表示慰问，接着又让内史令宣读诏书，责备陈国君臣不能相辅相成，导致灭亡。陈叔宝等人都诚惶诚恐地俯身下拜，无言以对。最后隋文帝将陈叔宝等人全部赦免。十八日（庚戌），隋文帝在广阳门大宴将士，对杨广以下直至士兵依次进行赏赐，布帛等赏赐之物自广阳门外夹道排列直至外郭城南部，总计三百余万段。拜杨广为太尉、并州总管，镇守太原（今山西太原），以杨俊为扬州总管、督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守广陵；高颎加位上柱国，进爵齐国公；杨素进封越国公；贺若弼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韩擒虎进位上柱国，各以奖励平陈之功。杨素因勋位已至上柱国，故只进爵位；韩擒虎因攻人建康后放纵士兵淫乱陈宫，被司法部门弹劾，故只进勋位，不加爵邑。十九日（辛亥），隋文帝下诏大赦天下，陈朝旧境免征十年租赋，其它各州免除当年租赋。

隋文帝给陈叔宝的物质待遇十分丰厚，并经常接见，朝会时让他站在三品官行列中，举行宴会的时候，为怕陈叔宝伤心，特地下令不奏江南音乐。可是陈叔宝却通过监守人向隋文帝上言说："我经常参加百官朝集，没有官位非常不便，希望能得到一个官号。"隋文帝听罢说道："陈叔宝简直一点心肝都没有！"监守人又对隋文帝说："陈叔宝经常喝得烂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隋文帝问："他每天能饮多少酒？"监守者回答："与其子弟日饮一石。"隋文帝非常惊讶，下令对陈叔宝供酒要稍加节制。过了一会隋文帝又说："干脆任其所为吧，不这样，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后陈

叔宝陪同隋文帝登临邙山（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上表请求封禅。过了几天，隋文帝举行宴会，陈叔宝坐陪，宴会结束，陈叔宝离去，隋文帝望着陈叔宝的背影说："陈叔宝之败全是因为酒。诗作得倒是满不错的，把作诗的功夫用在治理国家上，何至于如此下场！当初贺若弼渡江，陈人飞书告急，叔宝当时正在饮酒，连看都不看。等高颎进入建康，发现告急文书被扔在床下，还没有开封。这事真是可笑之极。所以我灭亡陈朝是符合天意的。过去前秦的苻坚对被他灭亡的君主，都给以高官厚禄，这是只知求名，不知违反天意，我是不能违反天意，再让陈叔宝做官以废政害民。"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二十日（壬子），陈叔宝死于长安。

中国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至隋朝时复归一统，绝非偶然。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诸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汉族官僚集团退居江南，双方势均力敌，形成南北不同民族政权的长期对峙。至北朝末期，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已接近完成，各少数民族已渐渐融入汉族，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已很淡薄，尤其是隋文帝杨坚取得政权后，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占了统治地位，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已然消失。加之至南北朝后期，北方日趋强大，均势被打破了，使统一有了可能。由北方统一南方，更有其必然性。在经济方面，南方的基础本来较差，虽经东晋、南朝几百年的开发，南方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但只局限于荆、扬地区，整体实力仍在北方之下；北方虽经十六国时连年战乱的破坏，使经济有所衰落，但基础较强，加之北朝实行均田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隋文帝实行的经济改革措施，更加强了隋朝的国力。在军事方面，南朝实行世兵制，士兵的地位、待遇都很低，战斗力不强；而西魏、北周、隋朝都实行府兵制，组织系统严密，士兵地位高，战斗力强。在政治方面，南朝实行门阀士族政治，腐败严重，至陈叔宝更是整日对酒当歌，不问政事，横征暴敛，民

怨沸腾，社会处于危机阶段；而北方自隋朝建立后，实行政治改革，扫除门阀政治，隋文帝励精图治，提倡节俭，轻徭薄赋，严惩贪官污吏，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处于上升阶段，上述三方面的优势，再加上隋文帝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实施正确战略战术，终于灭亡陈朝，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全国大统一。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74—180

《隋书》：《高祖纪》、《梁睿传》、《薛道衡传》、《崔仲方传》等

《陈书》：《后主纪》、《任忠传》、《萧摩诃传》、《鲁广达传》等

平叛江南

隋朝灭陈以后，为稳定江南地区的政治形势，使原陈朝国民心悦诚服，采取了几项怀柔措施。陈朝末年，陈后主叔宝以中书舍人施文庆掌握机要政事，施文庆谄佞奸邪，在隋军大举进攻之时，隐瞒军情，阻止向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今安徽当涂北）两地派兵，致使隋军轻易渡江，导致灭亡。中书舍人沈客卿兼掌金帛局，加征关市之税。太市令阳惠朗、尚书都令史暨慧景亦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施文庆等人与刑法监徐析被陈人视为祸害，共称为“五佞”。隋晋王杨广进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后，立即将“五佞”斩首，以答谢陈朝国民。并派元帅长史高颍封闭府库，禁止士兵抢劫，树立隋军的良好形象。陈叔宝及宗室诸王公、文武百官至长安后，受到很好的接待。隋文帝还发布诏书，下令对原陈朝旧境之民免征十年的租赋。上述措施对使陈朝首都之外其它地区很快归附，对稳定平陈之初的江南政局，无疑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江南地区自晋朝以来，盛行门阀政治，刑法废弛，士族凌驾于寒族之上，地方政治被士族豪强所把持，对统一的隋朝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隋文帝在平陈之后也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统一的局面。下令将陈朝首都建康城的所有宫殿、房屋、城墙全部拆毁，夷为平地，以根绝陈朝的遗老遗少复辟的念头。又发布诏书说：“现在全国已复归统一，天下从此太平，百姓各安其业。军队为国家所有，用以禁卫首都，镇守边疆，除

此用途之外，各地所有军队全部解散，习武之人可改学经书，民间各种武器一律收缴销毁。”隋文帝这一诏书虽然是面向全国，但很显然，主要是针对原陈朝地区，这必然会引起江南地区拥有大量家兵、部曲的士族豪强的不满。隋朝派到各州的刺史遵照隋文帝的指示也有意压抑当地的世族。隋文帝还制作旨在弘扬孝道的《五教》，令江南老少百姓背诵，以改变江南浮华的民风。但出使江南主持此项工作的纳言苏威，在《五教》中增加了许多烦琐并带有侮辱性的言词，引起江南民众的反感。苏威回京后，又建议将隋朝在北方实行的整理户籍的措施推行到南方，以加强对江南人民的管理。而负责这项工作的户部尚书张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过激行动。加之民间又有谣言说隋文帝准备把江南之民全部迁入关中，以便控制，于是引起江南人心惶惶。士族豪强则乘机煽动民众作乱。这样，在陈朝灭亡一年多之后，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江南各地均发生了反抗隋朝的叛乱。婺州（今浙江金华）的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的高智慧、苏州（今江苏苏州）的沈玄恰皆自称天子，建置百官；乐安（今浙江仙居）的蔡道人、蒋山（今江苏南京紫金山）的李稜、饶州（今江西鄱阳）的吴世华、温州（今浙江温州）的沈孝彻、泉州（今福建福州）的王国庆、杭州（今浙江杭州）的杨宝英、交州（今越南仙游）的李春皆自称大都督。叛乱几乎遍及原陈朝故境。多者数万人，少者数千人。他们攻陷州县，捉住隋朝官员，或抽其肠而杀之，或割其肉而食之，并质问隋官：“还让不让我们背诵《五教》！”

隋文帝急忙派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前往讨伐。杨素率兵抵达长江后，先派麦铁杖头戴草束乘夜色只身游过长江侦察敌情，不幸被擒。李稜派三十名士兵押送麦铁杖去见高智慧，行至庱亭（今江苏丹阳东南）的时候，士兵停下来休息、吃饭，看麦铁杖饿得挺可怜，就将捆绑的绳索解开，让他也跟着一起吃。麦铁杖乘

机夺过士兵手中之刀，左右挥舞，把三十名士兵全部杀死，然后将这些死亡士兵的鼻子割下，揣在怀里，返回江北，向杨素报告侦察到的敌情。于是，杨素率军自扬子津（今江苏扬州南）渡过长江。当时，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率兵屯据京口，顾世兴自称太守，盘踞晋陵（今江苏常州），叶略占据无锡（今江苏无锡）。杨素过江后，马不停蹄，前后三战，连平三城。沈玄侩、沈杰率兵围攻苏州，刺史皇甫绩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屡战屡败。正在危急时刻，杨素率大军赶到。沈玄侩自知力单，不敌杨素，走投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陆孟孙。杨素率兵进至松江，大破叛军，活捉陆孟孙、沈玄侩。然后，乘胜挺进黝县（今安徽黟县）、歙县（今安徽歙县），大败沈雪、沈能。

高智慧沿浙江（今富春江）东岸设置营垒，长百余里，有船舰一千多艘，在各路叛军中势力最大。杨素率军进至浙江，子总管来护儿对杨素说："南人的优势是水战，难以与之争锋，您只需严阵以待，不要与他交战，我率领奇兵数千人偷偷渡江，袭击叛军营垒，使他进不得战，退无归路，这正是韩信破赵之策。"于是杨素命令来护儿率数百艘轻舟夜渡浙江，直登江岸，纵火焚烧敌军营垒。杨素见来护儿得手，便从正面猛攻，从天亮一直苦战至下午。高智慧军水战不利，退无所归，因而溃散；高智慧顺江而下，逃入大海，且战且退，最后逃入闽、越。杨素又平汪文进于婺州，败蔡道人于乐安，破沈孝彻于温州，转陆路进入天台山，直指临海郡（今浙江临海东南）。

杨素又遣行军总管史万岁率兵二千自婺州别道而进，讨平叛乱。史万岁前后七百余战，转战一千余里，将近一百天的时间里杳无音讯，被认为已全军覆没。史万岁因崇山险阻，无法互通信使，就将上杨素的书信置于竹筒中，然后投入水中，被山外汲水百姓发现，交与杨素。杨素大喜，将此事上报隋文帝。隋文帝赞叹很久，赐与史万岁家钱十万。

隋文帝因杨素长期领兵在外，辛苦万分，而且叛乱已基本平定，就下令其乘驿传之车马入朝，为其子杨玄感加官为上开府，赐彩色丝绸三千段，作为奖励。杨素至长安后，对隋文帝说，如不把高智慧等彻底消灭，将来必为后患，还需二次出兵，不如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请求让他继续领兵平叛。隋文帝下诏书说："江南叛党虽已溃败，但贼首逃亡山洞，恐怕其重新集结，扰乱苍生。内史令杨素深谋远略，威名卓著，宜以为行军元帅，统帅大军，振武扬威，剪除叛党，并安抚江南百姓。"于是，杨素再次乘驿传之车马来到会稽（今浙江绍兴）。

泉州的王国庆是当地的豪族，他杀死刺史刘弘，起兵作乱，周围各路叛乱兵马都归附于他。他自以为有大海阻隔，北方人不习惯于海上行船，所以不设防备。没想到杨素率兵从海上突然赶到泉州，王国庆措手不及，弃州而逃，余党或逃入山洞，或散入海岛。杨素派诸将分路追捕，又派人对王国庆说："根据你的罪行，肯定要被斩首，但如果你能立功赎罪，擒获高智慧，可以免除一死。"于是王国庆将高智慧抓获，送往泉州，被杨素斩首。高智慧一死，余党纷纷投降。

杨素班师还朝，隋文帝派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迎接，以平定叛乱之功，拜杨素子杨玄奖为仪同三司，赐黄金四十斤，细绢三千段，马二百匹，羊二千口，土地一百顷，住宅一所，又加赐一个银瓶，里面装满了金钱。不久，杨素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与左仆射高颎共掌朝政。

这时，岭南地区的叛乱尚未平定。广州（今广东广州）土著首领王仲宣率兵包围广州，在交战中，广州总管韦洸中流箭而死。隋文帝下令以韦洸副将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又下令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裴矩立即出发，行至南康（今江西南康）募人为兵，得数千人。这时，王仲宣派出部将周师举围攻东衡州（今广东韶关南），并屯兵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广东南雄之间），立

九层栅栏，以阻止隋朝援军。裴矩与大将军鹿愿率兵大破敌军，斩周师举，解东衡州之围，乘胜进兵，救援广州。在岭南地区颇有声望、被隋朝封为宋康郡夫人的冼氏，这时也派其孙冯暄率兵救广州。冯暄与王仲宣的部将陈佛智关系很好，因此逗留不进，冼夫人知道后大怒，将冯暄逮捕下狱，另派孙冯盎出战陈佛智。陈佛智战败，冯盎进兵至南海与裴矩、鹿愿会师，然后与慕容三藏一起，内外夹击王仲宣。王仲宣溃败，其众四散而逃。广州解围之后，冼夫人乘战马，披铠甲，陪同裴矩巡抚二十余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首领陈坦等都亲自前来拜见裴矩，裴矩根据隋文帝的指示，任命归附的酋长为刺史、县令，仍然让他们统帅各自的部落。裴矩回京后，向隋文帝报告巡抚岭南的经过。隋文帝高兴地对高颎和杨素说："平陈之初，韦洸率兵二万进军岭南，进展十分缓慢，我经常担心给他的兵力太少了。可裴矩却仅以三千士兵直抵南海，臣下如都能象裴矩一样，我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于是提升裴矩为民部侍郎。又拜冯盎为高州刺史，册封冼氏为谯国夫人，特赦冯暄逗留之罪，拜罗州刺史。独孤皇后赐给冼氏首饰和宴会时穿着的服装各一套。隋文帝还利用冯家的势力和威望，特颁给冼氏谯国夫人印章，赋予在紧急情况下，发所属部落六州兵马，见机行事的权力，以稳定岭南地区。

至此，江南地区大规模叛乱被最后平定，这不仅彻底击溃了陈朝的残余势力，而且沉重打击了江南地区的门阀士族，使晋朝以来的士族势力更加衰落，维护了全国统一的局面。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77

《隋书》：《杨素传》、《史万岁传》、《麦铁杖传》、《裴矩传》

《北史·苏威传》

突厥朝隋

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这个分裂动荡的时期以后，在中国内地，通过民族融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隋朝，这同时，在北方也形成了一个自匈奴以后最强大的民族，这就是突厥。关于突厥族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匈奴族的分支，有人认为是上古涂兰族之苗裔，还有人认为突厥族是由羌族发展演变而来。突厥族的图腾是狼，自称是狼种，姓阿史那氏。其发祥地是金山（今阿尔泰山），金山远看状如兜鍪（头盔），当时将兜鍪俗称为“突厥”，于是将突厥定为国名。

突厥兴起于北魏末年，西魏大统八年（542 年），突厥从连谷（今陕西神木北）入寇，这是突厥为害中原的开始。大统十一年（545 年），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酒泉胡人安诺槃陀出使突厥，第二年，突厥酋长土门派人出使西魏，两国正式建立官方联系。突厥原依附于柔然，后渐渐强大，大统十七年（551 年），土门向柔然求婚，遭柔然拒绝和辱骂，故转而求婚于西魏，宇文泰将长乐公主嫁与土门。西魏废帝元年（552 年），土门率兵灭亡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

伊利可汗死后，其子乙息记可汗继位。乙息记可汗临死前，舍其子摄图不立，传位于其弟木杆可汗。木杆可汗在位二十年，北周建德元年（572 年），他在临终前，效法其兄，又舍其子大逻便不立而传位于其弟佗钵可汗。这时，突厥已先后征服了塞外诸民族，其领域东起辽海（辽河、渤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南

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纵横五六千里，兵力数十万，势力达到极盛，经常派兵对北周与北齐进行掠夺，成为中国北方的大患。而北周与北齐都惧怕对方和突厥联兵，所以争相讨好突厥。周武帝娶突厥可汗女为皇后，每年送给突厥各种丝织品十万段，突厥人平时停留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者常在千人以上，都给以极好的招待；北齐也倾其国库所有经常给突厥送去布匹、粮食之类的东西。这使突厥的气焰更加嚣张，以至佗钵可汗得意地对部下说："有我在南边的两个儿子如此孝顺，就不用担心贫穷了。"大象元年（579年），突厥向北周请婚，周宣帝以赵王宇文招之女为千金公主嫁与佗钵，第二年，北周派汝南公宇文神庆、司卫上士长孙晟将千金公主送至佗钵可汗牙帐。

不久，佗钵可汗病危，临终之际，对其子菴逻说："亲莫过于父子，可是我兄不立其子，传位于我，所以，我死后你要让位于大逻便。"佗钵死后，国人将立大逻便，但大逻便的母亲出身微贱，难以服众，菴逻的母亲出身高贵，素来被人所看重，摄图对国人说："若立菴逻，我就帅众兄弟俯首听命，若立大逻便，我自有利刃长矛来对待他。"摄图年长，而且威武雄壮，当时为小可汗，统东面部落，国人都害怕他，谁也不敢说什么，于是就立菴逻为新可汗。大逻便因未当上可汗，心里非常不服气，经常派人辱骂菴逻，菴逻对大逻便毫无办法，就想把可汗位让于摄图。国人商议说："四可汗（伊利可汗的四个儿子，即乙息记、木杆、佗钵、褥但）诸子当中，以摄图最贤。"于是摄图被立为可汗，即沙钵略可汗，居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菴逻降居独洛水（今蒙古土拉河），称第二可汗。大逻便对沙钵略说："我与你都是可汗之子，今天你位至极尊，我却无位，这是为什么？"沙钵略害怕大逻便惹起事端，就任命他为阿波可汗，领所部居都斤山之北。另外，沙钵略的从父玷厥居突厥西部，号称达头可汗。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在突厥中也有一定威信，深为沙钵略所忌惮。因此，自佗钵可汗

死后，突厥就开始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一改过去北齐、北周时讨好突厥的政策，对突厥的待遇不象以前那么优厚，引起突厥的不满；北周嫁到突厥去的千金公主，痛恨自己的国家被隋文帝取代，极力要求沙钵略为她的娘家报仇。沙钵略对他的部下说："周家是我的岳父，今隋公自立而我不能制止，还有什么面目见可贺敦（突厥对可汗妻的称呼）！"于是，和过去北齐的营州刺史高宝宁一起，进犯隋朝边境，攻陷临渝镇（今河北抚宁东）。隋文帝急忙下令沿边诸州修竣长城，又命上柱国阴寿镇守幽州（今北京），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今山西太原），屯兵数万以防备突厥。

奉车都尉长孙晟武艺超群，尤其精于骑射，他在北周时送千金公主去突厥，深为突厥可汗所敬重。有一次，随同可汗打猎，遇有二雕争肉，可汗给长孙晟两支箭命他射取，长孙晟发一箭竟中两雕。可汗大为高兴，极力挽留长孙晟，让诸子弟与之交游，希望能学得箭法。处罗侯深知自己为沙钵略所忌惮，就私下里与长孙晟结盟，希望能以中原王朝为靠山。长孙晟在突厥呆了将近一年，对突厥的山川形势、各部落之间的关系及其强弱了如指掌，知道对突厥难以力征，但可离间。这时，他上书隋文帝说："今国内刚刚稳定，外敌尚强，不是出兵讨伐的时候，若将其置之度外，他又不断地侵扰。所以需要想出一个良策对付他。臣下在周末曾出使突厥，对其内部情况知之甚多，玷厥兵虽强盛，但位在摄图之下，名义上虽归摄图统辖，但内心不服；处罗侯是摄图之弟，奸诈多计但势力很弱，竭力收买人心，被国人所拥护，因此为摄图所忌惮，内心不安，常怀恐惧；阿波则在各势力之间首鼠不定。我们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通使于玷厥、阿波，摄图必然回兵防备其西部，再派人与处罗侯及奚、霫等族通和，则摄图又需分兵防备其东部。利用他们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十几年后再出兵讨之，可一举灭亡其国。"隋文帝一听大为高兴，即

按照长孙晟的策略，派太仆卿元晖出使达头可汗，赐给达头以狼头纛，正式承认达头大可汗的地位。达头使者入隋，故意让其位居沙钵略使者之上；又派长孙晟带着大量礼物出使奚、霫、契丹，使其归附；又到处罗侯所居之处，重申前盟，使其依附隋朝。隋朝的反间计果然奏效，突厥内部的矛盾更加严重了。

开皇二年（592年），沙钵略统帅五可汗之兵共四十万，大举攻入长城，隋文帝闻报大惊，命太子杨勇率兵屯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做一旦出现最坏情况的准备。又下令柱国冯昱兵屯乙弗泊（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北），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临洮（今甘肃岷县），上柱国李崇屯幽州，上大将军达奚长儒据周槃（约在今宁夏庆阳附近），但冯昱等人并为突厥所败。达奚长儒在周槃以二千人马抵抗沙钵略十万之众，军士见众寡悬殊，皆有惧色，达奚长儒则神色镇定，慷慨激昂地鼓励将士。刚一接战，隋军即被突厥冲散，但很快又聚集到一起，且战且行，转斗三日，昼夜十四战，武器损失殆尽，士兵就以空拳与敌人殴打，手上的骨头都暴露出来，总计杀伤突厥一万多人，达奚长儒的部下则死亡十分之八九。于是突厥乘胜自木硖（今宁夏固原西南）和石门（今宁夏固原西北）分两道入寇，武威（今属甘肃武威）、天水（今属甘肃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今属陕西延安）等地的六畜被劫掠一空。沙钵略想继续南进，达头反对，擅自引兵而去。长孙晟又游说沙钵略之子染干，让染干诈告沙钵略，说铁勒等起兵造反，想袭击突厥牙帐，沙钵略害怕老窝被端，于是也退兵出塞而去。

开皇三年（583年）二月至四月间，突厥又多次出兵入侵隋朝边境，大肆抢掠，隋文帝忍无可忍，发布诏书说："过去周齐分立之时，突厥与两国均有往来，周人东虑，唯恐齐人与之结和好之盟，齐人西顾，只怕周人与之交往深厚，以为国之安危全取决于

突厥的倒向，这是因为周齐互以对方为大敌，结好突厥可减旁顾之忧，于是都竭尽府库之财送与突厥，实为中国一大祸害。我认为厚敛百姓以惠顾豺狼，上违天地之意，下非帝王之道，所以轻徭薄赋，绝其供给，将以往入贼之物转赐守边将士，百姓也可免去向突厥运送财物的劳役，专心于耕织。但突厥不识时务，以今天天下大定之日，比过去周齐分立之时，乘昔世之骄纵，频犯北边，我已分命诸将，予以反击，并可深入其境，灭其巢穴。诸将此行，突厥有降者纳之，若违者死之，使其从此再不敢犯我边境。”于是任命卫王杨爽、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等并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迎击突厥。

杨爽率行军总管李充等四将从朔州（今山西朔县）出塞，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与沙钵略相遇。李充对杨爽说：“突厥屡战屡胜，必有轻我之意，不加防备，若以精兵袭击，必能破敌。”诸将都以为不可，只有长史李彻赞成此计，于是二人率精骑五千进行偷袭，大败突厥，沙钵略为防止被隋军认出，丢弃了所穿的金甲，藏在草中而逃过一死。这时突厥军中乏食，以粉碎的畜骨为粮，又加上疾疫流行，大量士兵死亡。

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兵十万从卢龙（今河北卢龙）出塞，进攻高宝宁。高宝宁向突厥求救，突厥正自顾不暇，不能相救。高宝宁放弃盘踞的和龙（今辽宁朝阳），向北逃窜，阴寿以重金悬赏捉拿高宝宁。结果，高宝宁在逃往契丹途中被其部下所杀。

窦荣定率九行军总管、步骑兵三万人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出塞，在高越原（今甘肃民勤西北）与突厥阿波可汗相遇。两军交战，阿波接连败阵。前上大将军史万岁因事除名，被发配至敦煌（今甘肃敦煌）为戍卒，这时候，史万岁自投军门请求从军效力。窦荣定素闻史万岁威名，非常高兴，派人去对突厥说：“士卒有何罪过，让他们互相残杀，我们双方各遣一名壮士以决胜负吧。”突厥同意，派一人骑马出阵挑战。窦荣定遣史万岁应战，万岁驰至

阵前，只几个回合，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不敢再战。长孙晟这时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派人对阿波说："摄图每次来侵，战之必胜，而你此行，屡战屡败，这是突厥的耻辱，你难道不觉得惭愧吗？摄图与你本势均力敌，摄图战之能胜，为民众所推崇，你每战必败，为国家增添耻辱，摄图本来就不信任你，必借此灭你的牙帐。你想想能保全吗？"阿波听后，派人来见长孙晟，长孙晟又对他的使者说："今达头与隋朝连和，摄图对他毫无办法。可汗为什么不依附于天子，并连结达头，为万全之计呢？可汗今负丧兵之罪，归就摄图，必然被其所杀。"于是阿波留兵塞上，派使者随长孙晟入朝。

沙钵略素来忌惮阿波骁勇难制，自白道战败后，听说阿波依附于隋，便率兵袭击阿波牙帐，并杀死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向西投奔达头可汗。达头一听沙钵略自相残杀，非常愤怒，就给了阿波骑兵十万，命他向沙钵略报仇。这样，突厥正式发生分裂，达头可汗与阿波可汗占据西域地区，称西突厥汗国，沙钵略可汗统治的地区称东突厥汗国，双方争斗不息，使隋朝与突厥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开皇四年(584 年)二月，达头可汗想进一步得到隋朝的援助，向隋朝请降。至九月，沙钵略可汗因多次被隋朝所打败，又不断遭受西突厥的进攻，不得已，也遣使向隋朝朝贡。千金公主上书，请求改姓杨氏，做隋文帝的女儿。于是，隋文帝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出使东突厥，改封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随即，沙钵略写信给隋文帝说："天生大突厥沙钵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皇帝既是我妻子的父亲，也就我的岳父，我既是你女儿的丈夫，也就相当于是你的儿子。虽为两国，但亲如一家，从今以后，子子孙孙，至于万世，友好相处，上天为证，绝不背叛！我国所有的羊马，都是皇帝的畜生，你国所有的丝绸，也就等于是我国之物。"隋文帝复信说："大隋天子赠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我既是沙钵略

的岳父，就将沙钵略当儿子看待，今特遣大臣去看望我的女儿，也看望沙钵略。”于是派遣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车骑将军长孙晟为正副使者出使东突厥。沙钵略以士兵排列两旁，并陈列国中所有珍宝，坐着接见虞庆则，说自己身体不适站不起来。又说：“自从我父亲以来，突厥可汗从来不向别人下拜。”虞庆则向前责备沙钵略，千金公主悄悄对虞庆则说：“可汗性如豺狼，过分与他相争，他会咬人的。”这时候，长孙晟上前说：“突厥与隋都是大国天子，可汗不拜也说得过去，但可贺敦是大隋皇帝的女儿，你就是大隋的女婿，你怎么能不拜岳父呢？”沙钵略笑着对属下众官说：“应该拜岳父。”于是起立下拜，跪受玺书，双手举过头顶。可是过后沙钵略觉得非常惭愧和屈辱，与群官聚在一起痛哭了一场。虞庆则又让沙钵略向隋朝称臣，沙钵略问左右从官：“什么叫做臣？”左右回答说：“隋国所谓臣，就如同我国称奴一样。”沙钵略无可奈何地说：“我能够成为大隋天子之奴，多亏了你虞仆射之力呀。”

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因西面不断遭受达头及阿波的攻击，东面又被契丹所威胁，遣使向隋朝告急，请求允许率所部南渡沙漠，寄靠近长城的白道川，隋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派晋王杨广率兵援助，还赐给沙钵略许多衣服、粮食及车辆、仪仗、鼓吹等物。沙钵略借助隋兵之势西攻阿波，阿波战败。可是阿拔国部落乘虚袭击东突厥，隋朝又派兵打败了阿拔国，将所获得的人口及财物全都送给沙钵略。沙钵略大喜，与隋朝订立条约，双方划定以大漠为界，上表隋文帝说：“大突厥沙钵略可汗臣摄图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才是真皇帝，我岂敢偷窃名号。今感慕华夏之风，愿归心大隋，永为藩臣。”并派遣其第七子库合真入朝。八月，库合真至长安，隋文帝下诏书说：“突厥称雄漠北历数十年，往年虽与沙钵略通和，犹为两国，今既作君臣，两国便成一体。有关部门可将此事上告天地，下告祖先，并普告天下，使万民皆知。”从此以后，凡隋赐沙钵略诏书，不称其名，对其赏赐

丰厚，沙钵略非常高兴，岁时派人前来朝见贡物。

开皇六年（586年）正月，隋朝向突厥颁发历书，突厥正式接受隋朝正朔。

开皇七年（587年）正月，沙钵略遣其子入朝，并请求允许进入长城以南打猎，隋文帝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人赐给酒食。沙钵略善于骑射，一日之内获鹿十八头，将舌、尾割下献给隋文帝。不久，沙钵略病死，隋文帝特为此废朝三天，并派太常寺官员前往吊祭。

沙钵略因其子雍虞闾懦弱，遗令立其弟处罗侯为可汗。沙钵略死后，雍虞闾奉父遗命遣使迎立处罗侯，处罗侯说："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可汗位置的继承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违反先祖之法。你尽可继位，我支持你。"雍虞闾又遣使对处罗侯说："叔叔与我的父亲共根连体，我不过是枝叶，哪有我做可汗，让根本服从枝叶，使叔父屈从于卑幼的道理！况且先父之命不可违抗。我完全是出于真心，请叔叔相信我。"两人如此遣使推让了五六次，最后，处罗侯继位，称莫何可汗（一说叶护可汗）。遣使上表隋文帝。隋文帝派长孙晟至突厥持节拜之，表示承认，并赐以鼓吹和幡旗。莫何有勇有谋，当即打着隋朝赐予的旗帜，敲着隋朝给的战鼓，西征阿波，阿波手下的兵众以为莫何得到了隋军的援助，不敢抵抗，纷纷投降。于是活捉阿波，上书隋朝，请示如何处置阿波。隋文帝将此事交与朝廷讨论，乐安公元谐认为可派使者至突厥将阿波斩首；武阳公李充提出应派人将阿波押送回朝，斩首示众。隋文帝问长孙晟以为如何，长孙晟回答说："如果突厥是因犯我边界而被擒，可将其处以极刑。今天是他们兄弟之间互相残杀，阿波的罪恶并不是辜负国家，在其穷困之际将其斩首，不是大国招怀远方夷狄归附之道，不如让莫何与阿波共存。"左仆射高颎也说："鼓励骨肉相残有损于教化，应该保留阿波的性命以示国家的宽大。"隋文帝接受了长孙晟与高颎的意见，高颎举起酒杯祝贺说：

"自从轩辕氏以来，夷狄多为边患。今天远至北海皆向国家称臣，如此盛事，亘古未闻。"

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莫何又率兵西征，中流箭而亡，国人立雍虞闾，号称都兰可汗。都兰派使者至长安，上告国中发生的变化，隋文帝赐与绢帛三千段。这时正值灭陈不久，隋文帝问突厥使者："你听说过江南有陈国天子吗？"使者回答听说过，隋文帝命令引突厥使者去见韩擒虎，说："这就是抓获陈国天子者。"韩擒虎怒目相视，使者吓得不敢抬头。隋文帝又派长孙晟至突厥吊祭莫何。此后，都兰可汗每年遣使朝贡。

陈朝灭亡以后，隋文帝曾以陈叔宝的屏风赐给大义公主。公主心中对宗国覆亡一直不能忘怀，见陈叔宝屏风，勾起亡国之恨，在屏风上作诗以抒发心中不平，诗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隋文帝得知此事，心中非常不高兴，对大义公主及突厥的态度变得冷淡了。彭国公刘昶在北周时娶周朝公主为妻，开皇十三年（593年），被流放的犯人杨钦逃入突厥，诈言刘昶与妻宇文氏准备起兵反隋，派遣他密告大义公主，让突厥发兵，里应外合。都兰可汗信以为真，乃停止向隋朝朝贡，不断发兵扰边。隋文帝派长孙晟出使突厥，搞清事情原委。大义公主见长孙晟，出言不逊，又派与其私通的胡人安遂迦与杨钦游说都兰，与隋朝绝交。长孙晟回到长安后，向隋文帝做了汇报。隋文帝又派长孙晟至突厥索要杨钦，都兰不给，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长孙晟贿赂都兰手下官员，得知杨钦住处，夜晚将其抓获，又揭发大义公主与安遂迦私通之事，国人深以为耻，于是都兰将杨钦与安遂迦交给长孙晟，长孙晟押着杨钦与安遂迦返回京师。隋文帝大喜，再次派他入突厥，废除大义公主，害怕都兰不服从诏命，又派太常卿牛

弘送给都兰四名美妓。莫何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突厥北部，这时派人向隋朝求婚，隋文帝命内史侍郎裴矩对染干使者说："杀掉大义公主，才可许婚。"于是染干又在都兰面前说大义公主的坏话，都兰在盛怒之下将公主杀死，接着上表隋朝请婚。朝廷多数官员同意许婚，长孙晟上奏说："我看雍虞闾反覆无信，只因与玷厥有矛盾，才依附于国家，即使与他为婚，早晚还得反叛。如果将公主嫁给他，他名正言顺，玷厥、染干都得听从他指挥，一旦反叛就不好对付了。染干是处罗侯之子，父子两代都忠诚于国家，不如许婚染干，他兵少力弱，易于控制，同时命他向南迁徙，还可利用他防御雍虞闾的侵扰。"隋文帝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派他出使染干，让染干准备迎娶公主。

开皇十七年(597年)七月，染干遣使及五百名骑兵至长安迎接公主，隋文帝让他们住在太常寺，学习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将宗室女安义公主嫁给了染干。隋文帝为离间染干与都兰的关系，有意优待染干，相继派出朝廷高官，如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出使。长孙晟又劝说染干向南迁徙到都斤山附近。都兰果然大怒，说："我是大可汗，为什么反不如染干。"于是断绝了朝贡，经常派兵侵扰隋朝边境，但每次出兵，染干都事先向隋朝报告，边军有所准备，都兰总不能得逞。

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染干向隋朝报告都兰大规模制造攻城用具，准备进攻大同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以北)。于是，隋文帝派汉王杨谅统帅左仆射高颎、右仆射杨素、上柱国燕荣等各路大军出塞讨伐都兰。都兰知染干告密，遂与西突厥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攻染干，大战于长城之下，染干大败，兄弟子侄全被都兰所杀。部落散失。此时长孙晟正在染干处，二人连夜南行，只有五名骑兵跟随，至黎明时分，走出一百余里，收合散兵数百骑。染干与其部下商量说："今日兵败入朝，不过是一投降之人，大隋

天子还能以礼相待吗？玷厥与我素无冤仇，不如去投奔他。”长孙晟知其谋，秘密派人去附近边城，令镇兵速燃烽火。一时四烽俱起，染干问长孙晟，城上为什么燃烽，长孙晟欺骗他说：“城上位置高，可以看到远处的敌兵。我国的燃烽之法是，如果敌兵少燃二烽，敌兵多燃三烽，敌兵大举逼近燃四烽。一定是城上的士兵看到后面大兵将至了。”染干非常害怕，对部下说：“追兵已经逼近了，只有入城了。”入城后，长孙晟让染干的从官执室暂领其众，自己带着染干乘驿传之马入朝。四月，染干至长安，隋文帝大喜，热情接待。不久，都兰之弟都速六抛妻弃子投奔隋朝，隋文帝命染干与都速六摴蒲赌博，故意输给都速六珍宝，以安慰他。

高颎率将军王詧、上柱国赵仲卿从朔州出长城。赵仲卿率三千名士兵为前锋，与突厥相遇，交战七日，突厥败走，赵仲卿追至乞伏泊，再败突厥，俘虏一千多人，杂畜一万多口。这时突厥援军赶到，赵仲卿排成方阵，四面迎敌，苦战五日，高颎率大军赶到，又大败突厥，高颎率兵追出白道，超越秦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七百里外才回兵。杨素率柱国李彻、韩僧寿从灵州（今宁夏灵武）出长城，与达头相遇。以前，诸将与突厥交战，害怕被突厥骑兵冲散，都是以战车、步兵、骑兵相结合，布成方阵，骑兵在中间。杨素说：“这是自守之法，不足以取胜。”于是改变战法，令诸军布成骑兵阵。达头闻之大喜，说：“这是天助我也！”下马仰天而拜，率骑兵十余万直奔杨素。上仪同三司周罗睺说：“可趁其队列不整时出击。”于是周罗睺率二十名精锐骑兵，出其不意直冲敌阵，使敌阵大乱，接着，杨素率大军发起攻击，短兵相接，战了两个多小时，突厥大败，杀伤不可胜计，达头也被重创，其众号哭而去。

十月，隋文帝封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汉语即智与健的意思。隋文帝赐射于武安殿，选朝廷中精于射术者十二人，分为两队进行比赛，其中包括启民和长孙晟，启民说：“臣因长孙大使

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与长孙大使一队。”结果启民之队获胜。这时有一队鸮鹰从天上飞过，隋文帝对启民说：“听说您善于弓弹，请为我把它们取下来。”启民发射十颗弹丸，颗颗命中，鸮鹰纷纷应丸而落。

这时，突厥归附启民者已达一万多人，于是隋文帝命长孙晟率五万人在朔州建筑大利城（在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安置启民。因安义公主已死，隋文帝又以宗女为义成公主嫁与启民，命长孙晟送至大利城。但由于大利城北靠都兰，经常遭其抢掠，长孙晟上奏说：“染干部虽在长城之内，但仍常被雍虞闾抄掠，不得安居，请将其部徙至黄河以南的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在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与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之间，东西至黄河掘一条横堑，让他们在这个范围之内居住，南面与夏州、胜州相连，东、西、北三面有黄河阻隔，可免于雍虞闾抄掠，任情放牧。”隋文帝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又命令上柱国赵仲卿在五原一带屯兵二万，代州总管韩洪率步骑兵一万镇守恒安（今山西大同东北），为启民防备达头、都兰。

十二月，都兰被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它诸部不服，突厥国内大乱。长孙晟上奏说：“都兰被杀，诸部离心，乘此时机进行招抚，可使其投降，请派染干率部下分道招慰。”此举果然十分有效，突厥诸部纷纷归附启民，达头大为恐惧。开皇二十年（600年）四月，达头率十万骑兵南侵，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与杨素和汉王杨谅与史万岁分别从灵州和朔州两道出塞迎战。长孙晟为行军总管率领突厥降人随杨广出征。突厥人畜都饮泉水，杨广接受长孙晟的建议，将毒药投人泉水上流，造成突厥人畜大量死亡，突厥大惊，说：“天降毒水，这不是要灭亡我们吗？”因而退兵。长孙晟率兵追击，杀死一千多人，俘虏一百多人，六畜数千头。史万岁率兵行至大斤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与突厥相遇，达头遣使探问：“隋将是谁？”隋军士兵答道：“是史万岁。”突厥又

问："是那个敦煌戍卒吗？"隋兵说："正是。"达头一听，不战而退，史万岁率兵追击，杀死突厥数千人，又继续向北，深入沙漠数百里，将突厥远远赶走才回兵。于是隋文帝又派长孙晟至大利城，安置新附的突厥降人。

不久，达头又派其侄俟利伐从大漠以东进攻启民，隋文帝发兵为启民把守险要通道，俟利伐被迫退兵。启民上表答谢说："大隋圣人可汗爱惜百姓，如上天无所不覆，如大地无所不载。突厥诸部蒙感盛恩，诚心归服，或南入长城，或住居白道，人口羊马遍于山谷之间。我染干就好比枯木逢春，愿千世万世为大隋放牧羊马。"于是隋文帝又遣赵仲卿率人为启民在黄河以北修筑起金河（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二城。时隔不久，又有突厥九万多人前来投降，归于启民。

仁寿元年（601年）十一月，长孙晟上表称："臣夜登城楼，看到大漠以北上空有赤色之气，长一百余里，如下雨之状直达于地，据兵书所言，这种现象叫做洒血，预示其下之国将要灭亡，如想一举消灭突厥，当在今日。"于是以杨素为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率启民可汗之众，从灵州出塞，北伐达头。仁寿二年（602年）三月，突厥思力俟斤则乘虚南渡黄河，掠夺启民之众六千余人，杂畜二十余万头而去。杨素率上大将军梁默跟踪追击，转战六十余里，至夜晚，与其后军相接，杨素恐怕突厥乘夜色逃逸，令大军稍后慢行，自己亲率两名骑兵和两名突厥降人与突厥人马并行，突厥也不知觉。突厥见隋军停止追击，就准备宿营。杨素知其宿营之地，率大军突然发动袭击，大败思力俟斤，将其掠夺的人口、牲畜全部夺回，归还启民。杨素又遣柱国张定和、领军大将军刘升率军深入突厥境内，将突厥赶至大漠以北。长孙晟又让启民分遣使者招降北方铁勒诸部。仁寿三年（603年），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个部落都背叛了达头，转降于启民，达头内部随即发生变化，达头逃往吐谷浑，达

头之众也多降于启民。于是，隋文帝派长孙晟将启民可汗送至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安置，统领突厥各部。

这样，自开皇元年以来一直困扰隋朝的突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启民可汗每年派使者朝贡，北部边境再无突厥南侵事件发生，隋文帝还在边境地区设置市场，两国进行贸易，双方一直保持友好相处的关系。这种关系直至隋朝末年才被破坏。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59—179

《隋书》：《高祖纪》、《长孙晟传》、《突厥传》

文帝易太子

杨勇是杨坚的长子，小名睍地伐。自幼勤奋好学，对诗词歌赋尤为善长，性情仁慈宽厚。北周时期，靠祖父杨忠的军功被封为博平侯。北周末年，杨坚入宫辅政，立杨勇为世子，官拜大将军、左司卫、封长宁郡公。后进位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全部禁卫军皆归杨勇指挥，为杨坚能够成功代周奠定了武力基础。杨坚当了皇帝的第三天，便册立杨勇为皇太子，这一年，杨勇才十五岁。几年以后，杨勇步入成年，隋文帝渐渐开始让他熟悉政务，一些军国大事及死罪以下的一些重大案件也让他参与决断，以培养他的政治能力。杨勇也经常能提出一些利国利民的建设性意见，往往被杨坚所采纳。有一次，杨坚因山东地区流民太多，计划将流民迁到北部边疆地区去，这样既可解决流民问题，又可加强边疆的防卫。杨勇上书谏止道："怀乡恋土是人之常情，流亡他乡是迫不得已的。北齐时期政治昏暗，北周末年又实施残暴统治，老百姓不堪忍受，才有流亡的事情发生。加之尉迟迥起兵造反，使这个地区饱受战争之苦。若有几年休养生息的时间，天下安定，轻徭薄赋，逃亡之人自然会回归本土。北方的突厥虽然经常侵犯边塞，各城镇只要加强防卫，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还是不要把老百姓迁到荒凉的边疆地区吧。"隋文帝看了杨勇的奏章，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并对杨勇予以嘉奖。由于杨勇在政务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在朝野都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以至在开皇六年（586 年）的时候，有人甚至上书，请隋文帝退居太上

皇，把国政全部交给杨勇。隋文帝对杨勇自然也非常满意，他曾经从容地对大臣们说："前代帝王多有内宠，所以才发生废立太子的事件。我除了皇后外，别无宠姬，五个儿子都是同母所生，是真正的亲兄弟，他们绝不会象前代那样彼此纷争，造成亡国之祸的。"

可是杨勇也有使隋文帝不满的地方。隋文帝生性节俭，后宫宫女平时穿着的都是经过多次洗濯的旧衣服，宫中物品有损坏的，修复后照样使用，除非举行宴会，平时吃饭不过一盘带肉的菜而已，是历史上有名的节俭皇帝。可是他的几个儿子都奢侈好色，杨勇也不例外。而且杨勇有一个特点，率意任情，从不掩饰自已的行为。他曾经得到一副蜀地（今四川）生产的铠甲，非常喜欢，当时蜀人以工巧著称，蜀铠本已精致绝伦，杨勇又在上面增添了一些花纹、图案，使之更加美丽。当隋文帝看到这副铠甲以后，很不高兴，认为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奢侈腐化都是一点点开始的，为防微杜渐，他告诫杨勇说："上天对谁都不会特殊照顾，谁有德行，就让谁坐天下。自古以来的历代帝王，没听说过有喜好奢华而能长治久安的。你现在是太子，应当注意节俭，为天下之人做一个表率。如若不能上称天心，下合民意，怎么能继承帝业，治理万民呢？我把我过去穿的旧衣服给你留下几件，希望你能经常观看，以警诫自已。我真担心你当了皇太子而忘记往昔之事，再送给你一盒淹菜，这是你过去在周朝做上士时经常食用的。千万可不要忘本，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呀！"

如果说蜀铠事件并不足以威胁到杨勇的太子地位的话，此后不久发生的杨勇接受百官冬至朝贺事件，使杨勇的太子地位开始动摇了。有一年冬至，文武百官齐聚东宫参见杨勇，杨勇则奏乐接受朝贺。隋文帝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问朝中大臣："听说冬至节的时候，内外百官一起到东宫朝见太子，这是什么礼节呢？"太常少卿辛亶回答道："百官前往东宫是贺见太子，不能说是朝见。"隋

文帝说："节气更改，百官往东宫祝贺是对的，但应该三三两两而去，为什么有关部门将百官集合到一起，一同前往东宫，而太子又身穿法服奏乐接受百官祝贺。这样做符合礼制吗？"为此事隋文帝还专门颁布了一道诏书，说："礼有等级，君臣有别。近代以来，礼教渐渐被破坏，随心所欲，因循成俗。皇太子虽然是国家的皇储，但若论名份，仍属臣子之列，不能接受百官朝贺，特别是地方官以本土所产作为贡品，朝见东宫，更是违背礼制。这样的事情，今后绝不许再次发生。"杨勇接受百官朝贺这件事虽说有越礼之嫌，却算不上什么特别严重的大事。但这件事在隋文帝看来却非同小可，因为他就是靠宫廷政变的方法取得的政权，所以上台以后猜忌心很重，唯恐别人也用同样的方法将他搞下台。杨勇在朝野上下声望日高，这对隋文帝来说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高兴的同时，又害怕百官心属东宫，迫使他让位。所以，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隋文帝对杨勇渐生疑忌之心。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就是将守卫东宫的部份士兵调入上台宿卫，在加强自己防卫力量的同时，削弱东宫的武力，以防止杨勇发动政变。这样一来，隋文帝对杨勇的宠爱自然也就变得淡薄了。

杨勇的母亲独孤皇后本来对杨勇也是很宠爱的。但独孤皇后在历史上以"嫉妒"而著称，反对男人多宠，而杨勇又偏偏好色，这一点大大刺激了独孤皇后，于是杨勇在失爱于父皇的同时又失爱于母后。杨勇的嫡妃元氏，为北魏贵族之后，其父元孝矩，在北周为贵族，杨坚重其门第，娶其女为杨勇妻。杨勇被立为皇太子不久，元氏即被立为皇太子妃。可是杨勇并不喜欢元氏，而宠爱别的侍姬。杨勇共有十个儿子，其中杨俨、杨裕、杨筠为云昭训所生，杨嶷、杨恪为高良娣所生，杨该、杨韶为王良娣所生，杨煚为成姬所生，杨孝实、杨孝范为后宫所生，无一人出自元氏，由此可见杨勇对元氏之冷淡。独孤皇后对杨勇冷落元氏本来就不平，开皇十一年（591 年）正月，元氏突患心脏病，第二天就死去了。

独孤皇后认为元氏死因不明，更增加了对杨勇的不满。特别是对杨勇专宠云昭训，将东宫内政全部交于云昭训掌管尤为生气，经常派人到东宫暗中了解情况，搜求杨勇的过失。

隋文帝的第二子叫杨广，小名阿麽。自幼好学，聪慧机敏。开皇元年（581年），被立为晋王，开皇八年（588年）被任命为行军元帅，统帅大军伐陈，还曾率军抗击过突厥，在诸王当中功绩最高，因此，在文武百官中有一定影响。与杨勇相比，杨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虚伪，善于矫饰自己的言行。当他感觉到杨勇太子地位已经动摇后，更加剧了矫揉造作的表演，挖空心思以博取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好感，阴谋取杨勇而代之。为讨独孤皇后欢心，当独孤皇后到晋王府来的时候，杨广就将漂亮的姬妾藏人密室，只留一些年老和貌丑的侍候左右，让独孤皇后感觉到他只和萧妃居住在一起。后庭其它姬妾一旦有子，杨广一概不使其生育，或不让幼儿成活，以博取不贪恋女色的名声。为使隋文帝高兴，杨广把乘坐的马车装扮得特别俭朴，居室内的屏帐也极为俭素，摆设的乐器有意不让侍从拂去上面的灰尘，还故意搞断乐器之弦。隋文帝到晋王府看到这一切，以为杨广不好声色，非常满意。只要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派到晋王府来的人，无论贵贱，杨广必定与萧妃出府门远接高迎，然后设美食款待，还给以丰厚的赏赐，所以这些人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交口称赞晋王仁孝。在和朝廷大臣的接触中，杨广也极力做出礼貌、谦恭的样子。杨广的作法很有成效，在朝臣中名声越来越高，冠于诸王。尤其是获得了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钟爱，在父皇和母后心目中的地位，已超过了杨勇。

上仪同三司韦鼎博通古今，涉猎经史，尤其精于相术，隋文帝曾向韦鼎问道：“你看我这几个儿子当中谁能继承皇位？”杨勇的皇储地位本是法定的，隋文帝这样发问，已明显地表现出有废立太子的意向，于是韦鼎顺情说道：“皇上与皇后最喜欢谁，就应

该让谁继承皇位，这不是我所能预测出的。”隋文帝笑道：“你是不愿意把话说明呀！”

到这时候，杨勇的皇太子地位已经很危险了。但杨广的表演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知道，要夺取皇太子的地位，仅取得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对自己的好感是不够的，还必须向杨勇发动进攻，才能将杨勇打倒。平定陈朝后不久，杨广就被任命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每年回长安朝见。有一次，朝见完毕，入宫向独孤皇后辞行，装做难分难舍的样子，说：“儿臣在外镇守，不能朝夕与父母相处，但我无时无刻不挂念你们，我这一辞宫阙，不知何时再能相见。”说完痛哭流涕。独孤皇后被他感动得也泫然泪下，说道：“我年纪大了，真希望你能守在我的身边。”杨广进一步说道：“儿臣性识愚下，一心和众兄弟友好相处，可是我不知怎么得罪了东宫太子，他总是对我怒气冲冲的，欲置我于死地，我怕早晚要死于太子之手。”独孤皇后听后勃然大怒，说：“睍地伐简直越来越不象话了，我为他娶了元氏，实指望他们相亲相爱，生儿育女，以兴旺我们杨家的基业，可是他对元氏竟然不以夫妻之礼相待，专宠阿云和其他女人，生下这么多猪狗一样的孽子来。后来元氏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肯定是被他和阿云毒死的，这件事我还没有治他的罪，现在他又要欺负你。现在我活着尚且如此，将来我死了，你还不得象鱼肉一样被他宰割吗？一想到东宫没有嫡子，皇上千秋万岁之后，你们兄弟几人要在阿云的孽子面前卑躬屈膝，这是何等痛苦的事呀。”

独孤皇后的这番话，使杨广摸清了母后已有废除杨勇之意，于是开始具体策划夺宗之计。杨广与管下的寿州刺史宇文述关系极好，于是问计于宇文述。宇文述说：“皇太子失爱已经很久了，大王您才能盖世，多次领兵作战，有功于国家，又以仁孝著称，最为皇上与皇后所钟爱，皇太子一旦被废，取而代之者，非您莫属。然而皇太子的废立是国家大事，尤其又是你们父子、兄弟骨肉之

间的家事，别人最难插手。能够在这件事上说得上话的，唯有杨素一人，而杨素有事只与他的弟弟杨约商量，我与杨约私交很好，请您派我朝见京师，和杨约相见，共图废立之事。”杨广听后大喜，送给宇文述大量金银财宝，资助他人关。

杨素时为尚书右仆射，权倾朝野。其异母弟杨约，时为大理少卿，杨素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先与杨约筹划，然后实行。宇文述到京师后，多次宴请杨约，与杨约赌博取乐，将带去的金银财宝全都故意输给杨约，杨约过意不去，向宇文述表示感谢。宇文述说：“不必谢我，这全是晋王所赐，让我与你一起高兴高兴。”杨约一听，大惊失色，问道：“这是为什么？”宇文述说：“尊兄杨素功名盖世，掌握朝中大权已有多年，被你们家伤害的朝臣不可胜数。另外，皇太子有时因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也十分憎恨掌权者。尊兄虽得到皇上的信任，但欲报复他的人为数不少，你们想过没有，皇上一旦升天，你们依靠谁呢？现在皇太子失爱于皇后，皇上早就有废黜之心，这是你所知道的，如果请求立晋王为太子，在尊兄一句话而已。如能在这件事上建立大功，晋王必刻骨铭心，这样不就消除了累卵之危，变成了泰山之安吗？”宇文述一番话使杨约豁然醒悟，遂将此意告知杨素。杨素一听大喜，说：“这一点我真没想到，幸亏你启发了我。”杨约一看其计可行，又进一步说到：“皇上对皇后的话言听计从，应该寻找机会，尽早促成此事，才能长保富贵，不至于使子孙衰落。兄长若迟疑不决，一旦皇上归天，太子登基，我们就大祸临头了。”

几天以后，杨素入宫参加宴会，对独孤皇后说：“晋王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又非常节俭，很象皇上。”以试探皇后的心意。皇后果然伤心的说：“您说的一点不错，就数我这个儿子最孝顺，每次听到他父皇和我派遣的使者到来，总是远接高迎，问起我们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流泪的。晋王的萧妃也真让人喜欢，我每次派婢女去，都和她同吃共睡。哪象睍地伐和他的阿云，总是他们

两个相对而坐，终日饮酒，亲近小人，疏远骨肉。所以我特别怜爱阿麽，经常担心他被觊地伐所暗害。"听独孤皇后一说，杨素心里有底了，说了很多太子不才，难以担当大任之类的话。皇后遂送给杨素大量金银，委托他支持皇上废掉杨勇，另立杨广。

事态的发展使杨勇非常害怕，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他求助于善于占候的新丰人王辅贤。王辅贤说："最近以来，白虹横贯东宫门的上空，太白星侵袭月亮，这是皇太子废退的迹象。"于是王辅贤为杨勇用铜和铁铸造了五名士兵，作为镇压奸邪之物。又在后花园内建立了一个庶人村，杨勇身着布衣，以草为褥，在陋室中寝息，希望以此能摆脱厄运。

隋文帝知道杨勇整日坐立不安，害怕出现意外，就派杨素前往东宫，看看杨勇到底在干什么。杨素来到东宫，通报以后，故意迟迟不人，以激怒杨勇。杨勇冠带整齐地等待了很长时间，才见杨素蹒蹒而人见，心中不快，不免形于言色。于是杨素马上返回仁寿宫向隋文帝报告说："我发现杨勇怨气极大，恐怕会发生什么不测事件，希望陛下有所防备。"隋文帝听到杨素对杨勇的诽谤，将信将疑。与此同时，独孤皇后经常派人到东宫，搜集杨勇的过错，然后向隋文帝报告。杨广又命令手下的段达，用重金收买杨勇的宠妾姬威，要她把太子的一举一动密告杨素。段达还威胁姬威说："东宫的过失，皇上早就都知道了，皇帝已下了密诏，要废掉皇太子，你如果能揭发皇太子，一定能大富大贵。"在威胁利诱面前，姬威答应上书揭发杨勇的罪状。于是每天都有关于杨勇的坏话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这样，隋文帝感到对杨勇不得不防了，便在玄武门到至德门的路上，布置警卫，严密监视东宫的举动，随时报告。又下令将东宫卫士的名籍隶属于中央诸卫府，将其中的勇猛健壮者全部裁撤，只留老弱不堪战斗者。又将深得杨勇信任、有领兵才能的太子左卫率苏孝慈调任为浙州刺史。这一切使杨勇甚为不满。这时候，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令袁充向隋文帝报告说：

“根据臣下观测天文所显示的迹象，应当把皇太子废掉。”隋文帝听罢并不感到惊讶，说道：“玄象早就显示出来了，只是群臣不敢向我报告罢了。”至此，隋文帝已下定决心实施废立。

开皇二十年（600年）九月二十六日（壬子），隋文帝自仁寿宫返回京师。第二天，在大兴殿召见群臣，对大臣们说：“我刚回到京师，应该非常高兴，可不知为什么，心情特别烦闷。”吏部尚书牛弘站出来回答说：“这都是因为我们做臣下的不称职，使陛下操劳过度所致。”原来隋文帝经常听到关于杨勇的坏话，以为朝臣们也都知道关于杨勇的情况，故意这样发问，希望能听到关于皇太子的过失。牛弘的回答使隋文帝大为不满，生气地对东宫官属说道：“仁寿宫离这里很近（在今陕西麟游县西），可是每次我回京师的时候，都要戒备森严，好象进入敌国一样。我因患痢疾，昨天夜里要去厕所，厕所本在后房，我害怕到后房遇到不测，而改在前殿就厕。都是你们这些人坏我国家大事，搞得我如此紧张。”于是将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逮捕，交付有关部门审讯。命令杨素将太子杨勇的罪状向朝臣通报，杨素站出来，高声说道：“我奉诏到京师，命令皇太子追究因图谋不轨而被斩首的刘居士的余党。太子接诏以后竟勃然大怒，对我说：‘刘居士余党早已全部伏法，叫我到哪里去追查，你身为右仆射，担负国家重任，自己追查去，不要来麻烦我！’又说：‘想当初夺取政权时，一旦失败，诸子当中我第一个被杀，现在做了天子，待我竟然不如诸弟，任何一点小事都不得自由，真是太不自在了！’”隋文帝接着说道：“我很早以前就看出来这小子不堪承受帝业，皇后多次劝我把他废掉，我看在他是我身份低微时所生，又是长子的份上，希望他能慢慢改正，所以才忍耐到今天，他曾经对卫王（隋文帝弟杨爽）说：‘阿孃不给我娶一个好妇女，真是可恨。’又指着皇后的侍儿们说：‘这些侍儿都是属于我的’，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平陈之后，陈朝宫中貌美的宫女都分配给了东宫，可是他还不知满足，经常到

外面求访美女。皇太子妃元氏死的不明不白，我深深怀疑是遇毒而亡，我曾为此而责备他，他却恨恨地说：'元孝矩这个该杀的东西！'这不是明显的指桑骂槐吗？当初，长宁王俨刚出生的时候，我与皇后高兴，抱过来要亲自喂养，他却把我们当外人，接连派人前来索要。云定兴的这个女儿阿云是在外私合而生的，因此说起来，还不一定是云定兴的后代呢！历史上晋国的太子娶屠户家的女儿，生出的儿子即爱好屠宰割杀。倘若阿云并非出自官宦之家，国家社稷不是要受到影响吗？我的德行距离尧舜虽然相距甚远，但也绝不会把国家和天下百姓交付给这样的不肖子孙！我纯粹是害怕他加害于我，才总象是如临大敌一样。看来要使天下长治久安，只好把他废掉了。"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站出来向隋文帝进谏，说："皇太子的废立是件大事，天子无戏言，诏书一旦发布，后悔就来不及了。千万不要听信谗言，所以这件事还望陛下三思而行。"可是隋文帝主意已定，并不理睬元旻，却命姬威上殿，对她说："你把太子的所作所为对大臣们说说。"姬威道："皇太子平时对我说的话都是些骄奢不法之言。他曾经计划将樊川（在今陕西西安附近）到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都划归为禁苑。并且说：'当初汉武帝要兴建上林苑，东方朔上书谏止，结果赐给东方朔黄金百斤，真是太可笑了。我没有黄金赐这种人，如有谏者，就把他杀掉，杀他一百多人，自然就没有说废话的了。'他还在东宫苑内筑造一座小城，一年到头劳作不息。苏孝慈被解除左卫率的时候，太子曾扬言：'这件事我决不会忘记，早晚有一天，要他看看我的厉害。'东宫内所需物品，尚书经常按照规定不予满足，这时候太子总要愤怒地说：'自仆射以下，我一定要杀一两个人，让他们知道怠慢我的下场。'他还常说：'父皇总是嫌我的儿子多出于侧庶，高纬、陈叔宝难道是孽子吗？不是照样亡国。'他还曾让巫女占卜凶吉，对我说：'开皇十八年（598年）皇上必死，这一天不远了！'"姬威

说到这里，隋文帝泫然泪下，说道："谁不是父母所生，他怎么能有这样狠毒的心肠。我最近看《齐书》，读到高欢放纵他的儿子，不胜愤怒，我可不会效法他。"于是下令禁锢杨勇及其诸子，将部分东宫的党羽收监，由杨素负责审理此案。

几天以后，有关部门秉承杨素的旨意，向隋文帝上奏，诬陷元旻身居宿卫之职却附托杨勇。并说在仁寿宫时，杨勇曾派他的亲信裴弘送信给元旻，在信封上写着"勿令人见"四字。隋文帝说："我在仁寿宫，有一点小事东宫也能知道，速度比驿马还要快，我常感到奇怪，可能就是这两个人在通风报信吧。"于是派武士将元旻与裴弘抓入监狱。

从前有一次，杨勇到仁寿宫参见隋文帝，在回京师的路上看到一棵古槐，盘根错节，树身得五六个人才能围过来。杨勇问随从古槐做什么最好，有人答道："古槐尤堪取火。"当时的卫士佩带火燧，于是杨勇命令工匠用古槐造数千枚火燧，准备赐给东宫卫士。现在被从东宫仓库中搜出，却成为杨勇想造反的证据。又从东宫药藏局搜出艾数斛，隋文帝感到非常奇怪，问姬威是做什么用的，姬威说："太子用以饲养一千匹马。皇上在仁寿宫时，他曾经说，'千匹战马直奔仁寿宫，守住城门，自然使其饿死。'"杨素以姬威所言盘问杨勇，养这么多马做什么用，杨勇回答说："听说您家里养马数万匹，我身为太子，养千匹马，就是造反吗？"杨素还把东宫当中稍加雕饰的衣服、器物，全都陈列在庭院中，让文武群臣观看，作为太子的罪证。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多次派遣使者责问杨勇，杨勇拒不认罪。

十月九日（乙丑），隋文帝派人召见杨勇，杨勇一见使者，大惊失色，说："是不是要杀我？"杨勇被召到武德殿，隋文帝身着戎装，士兵分列左右，文武百官立于大殿东面，皇室诸亲立于大殿西面，将杨勇及其诸子引至殿庭中央，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读废除杨勇的诏书，诏书中说："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

不可虚立。皇太子勇，居长子之地，为我所钟爱，建国之初即被立为储君，本希望他能德行学业俱进，以担当大任，无奈性识愚下，仁孝无闻，亲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所犯罪过无数。百姓是上天之百姓，我受命于天，安抚万民，虽然我念及父子之情，但却畏惧上天的惩罚，怎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勇及其子女为王、公主者，并废为庶人。”又令薛道衡对杨勇说：“你的罪恶人神所共弃，事已至此，想求不废也办不到了。”杨勇向上拜谢后说道：“本来应该将我杀头示众，以警戒将来，蒙父皇哀怜，才得以保全性命。”说完泪如雨下。接着，对隋文帝行舞蹈之礼。然后退出武德殿。左右的人们无不对杨勇抱以怜悯之情，但谁也不敢为杨勇说一句话。

十三日（己巳），又下诏书，将元旻、唐令则及太子家令邹文腾、太子左卫率司马夏侯福等人处斩。将杨勇从东宫移入内史省，给以五品料食待遇。赐杨素绢帛三千段，以奖赏审理杨勇之功。

十一月三日（戊子），晋王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恰巧在这一天发生了强烈地震，京师地区风雪交加，这在当时被视为不吉祥的征兆。

杨勇为太子时曾大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手弹琵琶，口歌《武媚娘》，太子洗马李纲站起来对杨勇说：“令则身为宫卿，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比倡优，口歌淫声，这件事如果让皇上知道，令则罪名不轻，对殿下也大为不利。请太子治令则之罪。”杨勇却说：“我愿意听。你不要多事。”及杨勇被废，隋文帝将东宫官员召集到一起，狠狠责备众人没有尽到教导太子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话，唯独李纲站出来说：“废立对国家是一件大事，文武百官都认为这件事不可行，可是谁都不敢说，臣下不怕死，为陛下谈谈我的看法。太子之性本非上品，是中等之人，可培养成好人，也可变成坏人，如果陛下选择贤明之士对他进行辅导，足以继承国家基业。可是您让唐令则为左庶子，以邹文腾为家令，这两个

人只知道以弦歌鹰犬引导太子娱乐，这才有现在这个结果。所以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隋文帝听罢，面带惨容，过了好久才说：“李纲对我的责备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选择你做宫臣，可是杨勇并不听你的话，再选择明贤之士又有什么用呢”李纲回答说：“臣下所以不被太子亲近信任，是因为有奸邪之人在，陛下如早将令则、文腾处斩，更选贤才以辅导太子，我就不会被太子所疏远了。自古以来，废除嫡长子，很少有不发生变乱的。所以这件事还望陛下深思熟虑，以免后悔。”李纲这样一说，隋文帝很不高兴，不欢而散。

不久，文林郎杨孝政又上书隋文帝，说：“皇太子是被小人所误，应当严加教诲，不应当废黜。”隋文帝览书大怒，对杨孝政可不象对李纲那么客气了，命令鞭挞杨孝政之胸。

又过了些时候，贝州长史裴肃遣使上书，称：“庶人杨勇废黜已久，想已悔过，请封给他一个小国，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隋文帝知道废弃杨勇不符合天下士人之心，乃征裴肃人朝，在含章殿接见了他，对他说：“杨勇等兄弟五人都是我的儿子，都是一母所生，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好恶轻率地实施废立，而是从国家的前途考虑的。”向他解释杨勇既废不可复用之意。

立杨广为皇太子以后，隋文帝下令将杨勇囚禁在东宫，受杨广管束。杨勇自以为废非其罪，多次要求面见隋文帝申冤，可是杨勇的要求都被杨广所遏制。无奈之下，杨勇爬上一棵大树大声呼叫，希望因此能得到隋文帝的接见。可是杨素却对隋文帝说：“杨勇现在神志昏乱，已不可再用了。”隋文帝听信了杨素的话，到底没有召见杨勇。杨广的太子地位终于牢不可破了。

仁寿四年（604 年），隋文帝临终前发现杨广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想重立杨勇为太子，但为时已晚。杨广弑父登基后，伪造隋文帝遗诏，赐杨勇死，追封为房陵王。杨勇诸子亦相继为杨广所害。

史学家魏征在论及隋文帝废立太子之事时说："房陵王曾参与谋划夺取政权，之后以皇储身份抚军监国二十年，虽谈不上出色，但举动符合君臣之义，对父母也能遵循孝道。既而失爱于上，谗言随之而起，一朝废立，父慈母爱之人理天性荡然无存。这是隋朝将要灭亡的征兆。"这在当时成为天下人的共识。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74—180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杨勇传》、《杨约传》、《裴肃传》、《宇文述传》

《旧唐书·李纲传》

文帝弃高颎

高颎别名敏，字昭玄，自称是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父亲高宾，原在北齐做官，后投奔北周，在大司马独孤信手下做幕僚，被赐姓独孤氏。高颎自幼聪明好学，遍读史书，通晓兵事，尤其善于辞令。十七岁的时候，被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周武帝时，被任命为内史上士，不久又升为内史下大夫。周宣帝死后，杨坚入宫辅政，知高颎才能过人，想把他引入丞相府为己所用，派族子杨惠前去游说。高颎一听非常高兴，说："愿受随公驱使，即令大事不成，高颎死而无怨。"于是被任命为丞相府司录。尉迟迥起兵匡复周室，杨坚派韦孝宽率大军讨伐，当时诸将对杨坚心存疑虑，在怀州（今河南沁阳）境内隔沁水与尉迟迥军相持不进，杨坚优虑万分，决定派心腹刘昉或郑译往前线监军，二人均推托不去。正在杨坚为难之时，高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出行，杨坚大喜。高颎受命后，派人告知母亲说，忠孝不可两全。即刻驰往前线，协助韦孝宽指挥诸将平定了尉迟迥之乱。大军班师回朝，杨坚在卧室内设宴款待高颎并将周帝赐予的帷帐转赐高颎。提升高颎为丞相府司马以取代刘昉。

隋朝建立以后，高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封渤海郡公，位居首席宰相，与广平王杨雄、内史监虞庆则、纳言苏威并称"四贵"。开皇元年（581年），高颎领衔修改法律，遵循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原则，蠲除前代酷法，简化律条，于当年十月修成，颁布实行，奠定了隋朝法律的基础，并为后世历代所遵用

开皇二年（582 年），隋文帝嫌长安城规模狭小，而且宫内经常发生妖异之事，有一天夜里，与高颎及苏威商议迁都。由于政权刚刚建立不久，物质基础尚不雄厚，此项工程又比较浩大，故尔举棋不定。恰巧第二天早晨，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上奏说："臣仰观天象得知，最近应有迁都之事发生。而且此城是汉代所筑，至今已八百年，地下水都变得又咸又混，不适宜人居住。请陛下上应天象，下合民意，做迁都的打算。"隋文帝愕然对高颎、苏威二人说："这件事真是神了！"于是任命高颎为领新都大监，在长安东南龙首原创建新都大兴城。新都的规模、制度都是由高颎策划。开皇五年（585 年），高颎以各州的课输虽有固定的数额，但由于存在长吏涂改籍帐，肆情贪污的现象，所以上交的租调数额有逐年减少的趋势，政府对籍帐又不组织推校，是一个很大的漏洞，于是建议隋文帝实施输籍定样法：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负责组织，以三党或五党为一个单位，按照标准确定每党的课户、课口数字，正长就按照这个数字来征发租调力役，同时政府也就掌握了每年的定簿，按照定簿验收各地课输。高颎的建议为隋文帝所采纳。实行输籍法以后，政府对各地户口、课户、课口变化的情况都能及时掌握，长吏就没有了肆情贪污的余地，从而保证了每年定分课输的完成，在财政上具有重大意义。开皇七年（587 年），后梁安平王萧岩率十万民众投归陈朝，隋文帝派高颎安集后梁地区遗民，甚得人和，很快稳定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开皇十年（590 年），隋文帝巡幸并州（今山西太原），命令高颎留守京师，及隋文帝还京，赐给高颎缣五千匹、行宫一所作为庄舍。

除总管朝中行政事务之外，高颎还多次领兵出征。开皇二年，隋文帝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伐陈，命令高颎节度诸军。开皇三年（583 年），又以高颎为行军元帅，率兵抗击突厥侵扰。开皇九年（589 年），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三行军元帅，大举伐陈。杨广为众军节度，而高颎被委任为杨

广帐下元帅长史，三军进退全由高颎决断。平陈后，亦由高颎负责陈朝善后事宜。开皇十八年（598 年），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率水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丽，隋文帝以杨谅年少，特任命高颎为元帅长史，负实际指挥之责。开皇十九年（599 年），又命高颎为行军元帅，出朔州（今山西朔县）抗击突厥，大败突厥而还。

高颎虽然权倾朝野，难能可贵的是不以权势为怀，常让贤推美于人。开皇初年，高颎就曾上表，逊位于苏威。隋文帝想成全高颎让贤之美名，就解除了高颎左仆射的职务。几天以后，隋文帝对大臣们说："苏威在前朝高蹈不仕，是高颎屡次举荐。我听说进贤者应受上赏，哪有使之去官的道理！"又命令高颎复位。高颎与苏威同心协力，朝中政事无论大小，隋文帝都先与二人商议，然后实行，因此，隋朝建立几年之内，面貌大有起色。平陈以后，高颎以功授上柱国，进爵齐国公，得赐物九千段。盛名之下，高颎再次上表逊位。隋文帝特下诏书说："您才识过人，谋略出众，出兵远征，平定淮海江南，入掌禁旅（高颎兼左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委以心腹之任，自朕受命以来，您掌管朝政机要之事，可谓竭诚尽力。这是天降良相来辅佐我的，再也不要提让位之事。"还有一次，隋文帝从容地命高颎与大将贺若弼论平陈之事，高颎说："贺若弼先献平陈十策，后又于蒋山（即钟山，在今江苏南京东）苦战破敌，我不过是一名文吏，怎敢与大将军论功！"隋文帝听罢大笑。时论赞美高颎能让功于人。

高颎对隋文帝竭诚尽力，隋文帝对高颎的宠信也是异乎寻常的。平时呼高颎为独孤公而不称名，以示亲近。高颎经常坐在朝堂北面一棵槐树下处理政务，这棵槐树突出于行列之外，有关部门为整齐、美观，计划将其伐掉，隋文帝特别下令保留此树，以示后人。太子左庶子卢贲，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有翼戴之功。建隋后，见高颎、苏威执政，颇为不平，与柱国刘昉、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策划废黜颎、威二人，五人共同辅政。后阴

谋泄露，刘昉等推罪于卢贲，卢贲被除名为民。开皇九年平陈归来后，隋文帝对高颎说："您伐陈后，有人说您要造反，此人已被我斩首。您我君臣二人志同道合，不是小人所能离间的。"左卫将军庞晃与高颎不合，在隋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隋文帝闻言大怒，出庞晃为怀州刺史，对高颎说："独孤公就象是一面镜子，虽被磨损却更加明亮。"后因水旱不调，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奏说是由于高颎执政不力所致，请求废黜高颎，结果姜晔、李君才二人均因此而得罪，隋文帝对高颎却愈加信任。高颎夫人贺拔氏身患重病，隋文帝频频派出使者探望，络绎不绝。隋文帝还亲自光临高颎府第，赐高颎钱百万，绢万匹，千里马一匹。不久，又将太子杨勇之女嫁与高颎之子高表仁，从此，隋文帝与高颎关系更加密切，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国子祭酒元善曾对隋文帝评论说："朝中将相，杨素过于粗疏，苏威过于怯懦，元胄、元旻二人象鸭子一样随波逐流，可以托付社稷者，只有高颎一人。"隋文帝深以为然。

但是至开皇末年，高颎渐渐为隋文帝所疏远，最后竟被罢免。君臣二人由亲而疏的根源，是因为高颎在两件事上得罪了独孤皇后，而隋文帝对独孤皇后是言听计从，这样就导致了高颎在仕途上的极盛而衰。

高颎与独孤皇后的关系本来是很好的。独孤信被杀以后，独孤皇后以高宾是父亲故吏的原因，经常往来高家，因此，对高颎也就格外亲近，高颎被隋文帝所重用，与此有很大关系。独孤皇后在历史上以"嫉妒"著称，后宫的嫔妃无人敢接近隋文帝。尉迟迥有一个孙女，长得十分美丽，尉迟迥兵败以后被没入后宫，隋文帝在仁寿宫偶然相见，十分喜欢，因此而得幸。独孤皇后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一天，她乘隋文帝上朝听政的机会，将尉迟氏秘密杀害。隋文帝恼羞成怒，独自一人策马奔出禁苑，不沿道路而行，深入山谷二十余里。高颎和杨素得知隋文帝出走后，立即

乘快马追赶，追上后二人苦苦劝谏，隋文帝长叹一声，说："我贵为天子，连这点自由都没有！"高颎劝道："陛下怎能因一个妇人而将国家大事轻易抛弃呢？"高颎这么一说，隋文帝的怒气稍稍缓和了一些，在山谷中呆了很久，直到深夜才回宫。自隋文帝出走后，独孤皇后一直待在阁内等候隋文帝回还，见隋文帝归来，流着眼泪向他请罪，高颎和杨素在旁边说了许多和解的话，隋文帝设酒宴款待高颎、杨素二人，这件事才算平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和好如初。但事过后，高颎在山谷中劝隋文帝的话传到了独孤皇后耳中，独孤皇后见高颎称自己为一个"妇人"，因此而产生了对高颎的深深不满。

另一件事是关于太子废立问题。开皇后期，太子杨勇失爱于独孤皇后与隋文帝，于是隋文帝就萌动了废立太子的想法。但是他知道，要实施废立，必须得到首席宰相高颎的认可，不然难以实行。有一天，隋文帝故作从容地对高颎说："前不久有神灵告知晋王妃，说晋王必有天下，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高颎一听马上跪下说道："长幼有序，废长立幼万万不可！"隋文帝沉默了很久，没再说话。回宫后，隋文帝将此事与独孤皇后一说，独孤皇后知道要想使高颎赞成废立是不可能了，就暗暗产生了除去高颎的念头。

当初，高颎夫人贺拔氏死后，独孤皇后曾对隋文帝说："高仆射上年纪了，陛下为什么不为他再娶一位夫人呢？"隋文帝将皇后之言告知高颎，高颎非常感动，流着眼泪说："臣已年老，退朝之后只是在书斋读佛经而已，并无纳室之心，感谢陛下和皇后对我的关心。"高颎这么一说，隋文帝也没再坚持，这件事就放下了。可是这时候，高颎的爱妾生一男孩。隋文帝听说非常高兴，可独孤皇后却甚为不悦。隋文帝问为什么不高兴，独孤皇后乘机说道："高颎这个人以后还值得相信吗？当初陛下要为他娶妻，他心里恋着爱妾，当面欺骗陛下，说不愿纳室，每天只读佛经。现在爱妾

生子，其诈已现，难道还能相信他吗！”自从这件事以后，隋文帝开始疏远高颎。

开皇十八年，隋文帝计划出兵讨伐高丽，高颎极力谏阻，隋文帝不听，以高颎为元帅长史，随杨谅出征。由于连降大雨，士兵多患疾病，结果无功而返。独孤皇后又乘机对隋文帝说：“当初高颎反对出兵，陛下硬派他去，我就知道此行必不能成功。”出征时，隋文帝因杨谅年少，将军中之事全部委托给高颎。高颎因责任重大，怀至公之心，无自疑之意，杨谅之言多不采纳。因此，杨谅甚为不满，回到长安后，哭着对独孤皇后说：“儿此行只差没被高颎所杀。”独孤皇后将此言转告隋文帝，隋文帝对高颎更加不满意了。

隋文帝为防范太子杨勇，命令选东宫卫士中勇猛健壮的守卫皇宫，高颎上奏说：“如果陛下把强壮的警卫人员都选走，恐怕东宫的防卫力量太弱了。”隋文帝严厉地对高颎说：“我经常外出，宿卫的士兵必须选拔勇毅果敢的。太子深居东宫，根本用不着强壮的士兵。东宫有独立的宿卫系统，这是前代极大的弊政，本应改革，你不要因循守旧。”隋文帝一心要废掉杨勇，将高颎视为障碍，加之高表仁是杨勇的女婿，隋文帝怀疑高颎维护杨勇是别有私心，对高颎也就愈加不信任了。

开皇十九年，凉州总管王世积因罪被捕入狱，在审理过程中，涉及宫禁中的秘事，王世积交待说是从高颎那里听说的。司法部门上奏说：“左仆射高颎与王世积案有牵连，因为高颎曾接受王世积赠送的名马。”隋文帝正想除掉高颎，就借此治高颎之罪。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弼、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纷纷上书证明高颎无罪，隋文帝却将贺若弼等人一齐交有关部门审查。这样，朝臣再无人敢为高颎说话了。八月十日（癸卯），高颎被免去上柱国、左仆射及其它官职，只保留齐国公的封爵。

几天以后，隋文帝在秦王杨俊家里设宴，特召高颎前往。席间，高颎痛哭流涕，不能自胜，独孤皇后心里也不是滋味，流下了眼泪。隋文帝对高颎说："我没有对不起你，这一切都怪你自己。"又转而对左右侍臣说："我以前待高颎胜过儿子，即使有时不见，但也象在眼前。可是自从他去职以来，我却把他忘了，就好像本来没有高颎这个人一样。所以作为人臣万万不可以蔑视君上，自以为天下第一。"

不久，高颎的国令向隋文帝告密，说高表仁对高颎说："司马仲达称病不朝，最后得天下，您今天逢此遭遇，说不定还是好事呢！"隋文帝闻此大怒，将高颎囚禁在内史省，立案审理。这时司法部门又上奏，说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家将有大丧。"尼令晖也曾对高颎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将遭厄运，十九年是大限，不可逾越。"隋文帝闻奏更加愤怒，对群臣说："帝王难道是能够强求而得的吗？孔子以大圣之才，作垂世之法，难道他不想做帝王吗？上天不许，所以不能得天下。高颎与子之言，自比晋帝，这是何等用心？"有关部门请求将高颎斩首，隋文帝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年又斩王世积，如再诛高颎，天下之人该如何说我！"于是将高颎除名为民。

开皇初年，高颎被任命为左仆射时，他的母亲曾告诫他说："你如今富贵已极，只差没被杀头了，千万要谨慎从事！"高颎牢记母训，常恐大祸临头。至此，被除名为民，高颎怡然处之，无丝毫怨恨，以为从此远离祸患了。

仁寿年间（601--604年），贝州长史裴肃上书说："高颎是佐命元勋，才能出众，为众人所嫉妒，才遭致废弃。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重新任用。"裴肃的意见未被隋文帝所接受。

隋炀帝即位以后，启用高颎为太常卿。隋炀帝迷恋声色，下诏征天下散乐及周、齐两朝的乐人，此事属高颎的职责范围，上奏劝谏，使隋炀帝很不高兴。高颎退朝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宣

帝因好乐而亡，这个教训并不遥远，哪能再效法他呢！”当时隋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甚厚，高颎对太府卿何稠说：“突厥对中国内部的虚实、山川险易了如指掌，这样对待他而不加防备，恐怕会留下后患。”高颎又针对隋炀帝骄奢淫逸，征发徭役修筑长城，对观王杨雄说：“最近以来，朝廷一点纲纪都没有了。”高颎的这些言论都被上奏到隋炀帝那里，隋炀帝以诽谤朝政为名，于大业三年（607年）七月二十九日（丙子），下诏将高颎杀害，高颎诸子全被徙往边郡。

高颎有文武大略，才识过人，自被隋文帝所任用，竭诚尽忠，以直道事君，身居宰相之职，以天下为己任。尤其善于发现、引进贤良之才，象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都是高颎所推荐，各尽其用，成为隋代名臣。平定尉迟迥、灭亡陈朝两大关键性战役，都是高颎实际指挥的，可谓参谋帷幄，决胜千里。其它立功、立言、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近二十年，开皇之治升平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高颎辅佐的结果。当时论者视高颎为真宰相。然而，因谏止隋文帝废立太子而遭遗弃，为忧患隋炀帝骄奢亡国终被诛杀。旧时史家曾评论说：“假使高颎不被隋文帝废弃，君臣二人戮力同心，虽难以与商契、周稷同列，造就出象商、周一样的强大王朝，也足可与萧何、曹参并驾，象汉朝一样，为长治久安奠定一个基础。”史家所论虽无从证明，但我们从隋文帝对高颎的任用与废弃，的确可以发现隋朝治乱的一条隐约界限。所以，一代名相高颎被杀，天下之人无不伤心惋惜，进入唐代以后，朝野士庶谈及高颎，仍称冤不已。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75—180

《隋书》：《高祖纪》、《独孤皇后传》、《高颎传》、《食货志》

杨广弑父

隋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氏感情极好，他曾向独孤氏发过誓言，决不与别的女人生儿育女，所以独孤皇后在世期间，后宫的偏妃、宫女只是按照规定不得不设置而已，隋文帝很少光顾。仁寿二年（602年）八月，独孤皇后去世以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同时得宠。陈氏是陈宣帝之女，聪敏智慧，美貌无双。陈朝灭亡之初，被籍没入宫为婢女，后选为嫔妃，暗中早得隋文帝宠爱。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时，作为夺宗计划之一，曾进献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陈氏；作为回报，陈氏则经常在隋文帝面前讲杨广的好话。故杨广最终被立为太子，陈氏起了一定作用。独孤皇后死后，陈氏进位为贵人，最得隋文帝宠幸，后宫内政全由她一人专断。蔡氏是丹阳（今江苏南京）人。陈朝灭亡以后，被选入宫为世妇。独孤皇后去世以后，进为贵人，被隋文帝所宠爱，参断后宫事务，地位仅次于陈氏。隋文帝由于失去了独孤皇后的约束，不免有些放纵，惑于女色，身体也就渐渐垮了下来。

杨广自从成功地取代了杨勇、夺得皇太子的地位以后，踌躇满志，渐渐撕下伪装，对登基做皇帝也显得有些迫不急待了。独孤皇后死的时候，他在隋文帝面前表现得悲痛欲绝，回到东宫则谈笑自若，吃饭饮酒与平时一样。隋文帝命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独孤皇后选择埋葬之地，杨广派太子左卫率宇文述对萧吉说："过去你给我相面，说我能立为太子，果然应验，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现在你选择山陵，一定要有利于我早做皇帝，我登基之后，

会好好报答你的。”到仁寿四年（604年）正月，隋文帝的身体和精力已经难以处理政务了，决定到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县西）去休养，将上至财政支出，下至给众人的赏赐等全部朝政都交给太子杨广全权处理。术士章仇太翼不知是出于隋文帝身体欠佳不宜出行的考虑，还是预见到杨广有篡权的图谋，认为不宜将朝政交予杨广，极力谏止隋文帝此行，甚至说：“我是怕陛下此行有去无返！”隋文帝勃然大怒，将章仇太翼关进长安的监狱，并说：“我返回长安之日就是你的死期。”可是隋文帝到底没有生还长安。

隋文帝正月二十七日（甲子）离开京师前往仁寿宫，到四月十四日（己卯）就病倒了，自此一病不起。六月六日（庚午），隋文帝下诏大赦天下，希望能以此善举使病情好转，然而事与愿违，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至七月十日（甲辰），隋文帝的病情急剧恶化，急忙召太子杨广前来仁寿宫准备交待后事。

杨广来到仁寿宫后，被特准入居隋文帝居住的大宝殿，与宣华、容华二夫人日夜同在一殿。在仁寿宫侍候隋文帝的还有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

柳述出身名门，年轻有为，三十余岁即为朝中高官，娶隋文帝第五女兰陵公主，深得隋文帝信任。但柳述依仗身份显贵，非常傲慢，杨素当时权倾天下，朝臣无不惧怕，唯独柳述不把杨素看在眼里，多次在隋文帝面前指责杨素的过失。处理政事的批文也多不合杨素之意，杨素派人命令柳述修改，柳述对杨素使者说：“回去告诉仆射，就说尚书不愿意改。”因此深被杨素忌恨。元岩也不是杨素的亲信。

杨广探望过隋文帝的病情以后，知道已不可救，想到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梦想即将成真，十分高兴。但是，一想到杨勇虽然被废多年，但威望未减，文武百官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拥戴杨勇呢？蜀王杨秀虽然已被废为庶人，但汉王杨谅尚领兵在外，他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造反呢？想到这些，他坐不住了，马

上给杨素写了一封亲笔信，问他皇上一旦归天，怎样应付突然变化的政治形势，派宫人立即送给杨素。杨素看罢，立即给杨广写了一封回信，分析了隋文帝死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和应该采取的各项措施，然后派人送入大宝殿。没想到宫人误将这封信送给了隋文帝，文帝看后非常寒心。

杨广早就垂涎于宣华夫人陈氏的美色，只是无缘接近，一想到隋文帝死后，就可将陈氏收归己有，不愁她不乖乖地伺候自己，就禁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自入居大宝殿以来，朝夕可与宣华夫人相见，使想占有陈氏的欲望更加急不可耐了。十三日（丁未）凌晨，侍候隋文帝一整夜的宣华夫人离开隋文帝的寝室，外出更衣。此时天色尚早，宫女们尚未起身，大宝殿内空无一人。杨广一看机不可失，尾随跟至宣华夫人的寝室，欲强行无礼。宣华夫人拼命抵抗，也没更衣，就逃回隋文帝的寝室。隋文帝发现陈氏神色异常，而且头发凌乱，面带微伤，便问是怎么回事，宣华夫人泫然泪下，说："皇太子无礼。"隋文帝听罢勃然大怒，强撑病体想从床上坐起，口中骂道："这个不是人的畜生！都怪我误听了独孤氏的话，白白冤枉了我的儿子（指杨勇），相信了这死狗，怎么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呢？"于是急忙派人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入大宝殿，隋文帝对他们俩说："赶快把我的儿子召来！"柳述和元岩不知就里，正要召杨广入室，隋文帝赶忙又说了一句："不是杨广那个畜生，是我儿杨勇。"柳述和元岩大惊，于是隋文帝向二人详细叙说了要废掉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的心意，命令二人起草敕书，火速召杨勇来仁寿宫。柳述和元岩急忙离开大宝殿，起草敕书。敕书写好后，送左仆射杨素签字、执行。杨素一看大吃一惊，急忙将此事告知杨广。杨广和杨素知道，杨勇一旦复位，不但二人的地位保不住，身家性命也得丢掉。二人经过商议，认为事情紧急，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扭转事态的发展。首先，杨广假传隋文帝的诏旨，说柳述和元岩图谋不轨，将二人抓

了起来，关进大理寺监狱，使隋文帝想重立杨勇为太子的计划流产。接着杨素又伪造隋文帝诏书，命令太子左卫率宇文述、太子左宗卫率郭衍率领东宫士兵负责仁寿宫宿卫，未经杨广允许，任何人也不准出入仁寿宫。这样，仁寿宫就与外界全部隔绝，隋文帝完全处于杨广的掌握之中了。随后，杨广又挑选身材骁健的宦奴三十人，让他们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内暗藏兵器，立于大宝殿周围。所有这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杨广将伺候隋文帝的宣华、容华二夫人及其它宫女都赶到其他房间，派太子右庶子张衡进入隋文帝的寝室，将隋文帝刺杀，鲜血都溅到周围的屏风上。宣华夫人及其它宫女听到隋文帝的惨叫声，都吓得浑身颤抖。

黄昏以后，杨广派使者赐宣华夫人陈氏一个金盒子，盒盖处贴着封条，封条上有杨广的亲笔题字。陈氏一见诚惶诚恐，心想一定是早晨拒绝了太子，太子怀恨在心，赐我毒品让我自尽，不敢打开。使者再三催促，陈氏才慢慢打开盒子，原来盒子中装着几枚同心结。诸宫人一看都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道："这下可免除一死了。"可陈氏却气愤地坐在一旁，不肯向使者致谢。诸宫人害怕再出意外，逼着陈氏拜谢了使者。就在这天夜里，杨广霸占了宣华夫人。第二天容华夫人蔡氏要求面见杨广，说有要事相告，杨广将蔡氏引入内室，将蔡氏也占为己有了。

杨广将隋文帝杀死以后，秘不发丧。八天以后，七月二十一日（乙卯），才向全国发布隋文帝死亡的消息。正巧在这一天，杨素的弟弟伊州刺史杨约入朝仁寿宫，杨广即派杨约回京师宣布隋文帝死讯。杨约进入长安以后，先撤换了留守京师的官员，接着进入东宫，谎称隋文帝有遗诏，赐杨勇死，杨约没等杨勇作出反应，就用带子将杨勇勒死了。然后集合长安的文武百官，两旁排列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才宣布了隋文帝的死讯。杨广听说杨勇已被除掉，非常高兴，夸奖杨约说："你真不愧是杨素的弟弟，果然能办大事。"后来杨广用毒酒将杨勇的长子杨俨杀死，将杨勇其

它诸子全部发配岭南，又下令全部杀死在赴岭南的路途中。

柳述和元岩二人因与杨广作对，被除名为民，元岩被远徙到南海郡（今广东广州）。后遇到朝廷发布大赦，返回长安，有人诬告元岩擅自逃回，被逮捕杀害。柳述被远徙到龙川郡（今广东惠阳），强令与兰陵公主离婚。兰陵公主上表请求免去公主名号，愿与柳述同徙龙川。杨广不许，兰陵公主忧愁愤恨而死。柳述又被迁徙到宁越（今广西钦州），后患疟疾而死。

直接残害隋文帝的杀手张衡，在杨广即位之初，很受重用，但后来因事被除名为民，最后竟然被杨广赐死。临死之前，张衡大声喊道："我为人做了那种灭绝天理的事情，还指望能活多长时间吗！"

杨广在为隋文帝发丧的同一天，在仁寿宫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第二年，他把年号改为大业。从此以后，隋朝的历史进入了动荡的年代。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79、180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宣华夫人陈氏传》、《容华夫人蔡氏传》、《柳述传》、《杨素传》、《杨约传》、《张衡传》、《郭衍传》、《萧吉传》、《兰陵公主传》、《华阳王楷妃传》

杨谅起兵

杨谅是隋文帝第五子，由于在兄弟几人中年纪最小，因此最受隋文帝的宠爱。开皇元年（581 年），被立为汉王。开皇十二年（592 年），官拜雍州牧、上柱国、右卫大将军。开皇十七年（597 年），出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管辖黄河以北五十二个州的大片土地。隋文帝在朝廷百官中选择最有声望的名士担任并州长史、司马，以辅助杨谅。并特别赋予杨谅有特殊情况下不执行国家律令，见机行事的权力。杨谅上任之日，隋文帝亲自为他送行至长安郊外，和杨谅秘密约定："如用玺书召你入京，我在'敕'字旁加一个点，不然就是假的，可不应召。"

自从太子杨勇因为谗言被废以后，杨谅总是闷闷不乐。后来蜀王杨秀又被废为庶人，杨谅内心更加不安，预感到厄运不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心想自己手握天下精兵，管辖五十二州百姓，决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就滋生了起兵造反夺天下的野心。火星在古代叫做荧惑，被认为是主罚之星。一天，杨谅发现荧惑出现在代表长安所在秦地的东井区域，杨谅就问通晓天文的仪曹傅奕，这种天象意味着要发生什么事情？傅奕察觉到杨谅有作乱之心，故意说道："天上的东井，是黄道必经之路，荧惑入东井是很正常的，假如荧惑进入地上的井那才是奇怪的事呢。"杨谅一听很不高兴。

杨谅手下有两个亲信，一个是梁朝大将王僧辩之子王頍，任汉王府谘议参军，再一个是陈朝旧将萧摩诃。这两个人都不被隋文帝重用，郁郁不得志。他们看到杨谅日夜害怕被废，就极力怂

恿杨谅起兵，王頍还劝杨谅修缮、制造武器，为起兵做准备。于是杨谅上书隋文帝说："北方的突厥还很强大，太原是个重镇，为对付突厥的骚扰，应该加强太原的防卫力量。"隋文帝不知杨谅别有用心，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杨谅在管内征召工匠，打造了大量武器，存放在并州的仓库中。又招募亡命之徒，在正式编制之外，建立起一支几万人的私人部队。

有一次，突厥侵犯隋朝边境，隋文帝命令杨谅出兵抵抗，结果被突厥打败，隋文帝将八十多名领兵将帅除名，派去戍守岭南。杨谅以这些人都是跟随自己多年的旧将为理由，上书请求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隋文帝生气地说："你身为藩王，应当服从中央的命令，怎么能私论宿旧，违背国家的宪法呢？你这个小子呀，有我在什么事都没有，我死了以后，你若敢轻举妄动，他（指杨广）取你还不跟取笼内的小鸡一样，你留这么多心腹之人也没有用！"

仁寿四年（604 年）七月，杨广杀死隋文帝后，秘不发丧，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持伪造的隋文帝玺书，征召杨谅入京。杨谅打开玺书一看，"敕"字旁无点，知道事情不妙，于是盘问屈突通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屈突通说一切正常。杨谅一看也问不出什么，就把屈突通放回长安。接着就传来了隋文帝已死，杨广即位做了皇帝的消息，杨谅遂正式起兵。

皇甫诞原为尚书左丞，为官清正，杨谅出藩之际，隋文帝特别任命他为并州总管府司马以辅佐杨谅，杨谅对皇甫诞也很尊敬，总管府的政事全交他处理。这时，皇甫诞见杨谅起兵造反，痛哭流涕地劝阻道："以大王的兵力恐怕敌不过京师中央的军队，而且太子已即位做了皇帝，您现在起兵，就是犯上作乱，尽管您兵强马壮，也难以取胜。希望大王遵守为臣之道，奉诏入朝，可保荣华富贵。起兵一旦失败，便落个叛逆之名，到那时候，您就是想做布衣百姓都不可能了。望您三思！"杨谅一听大怒，将皇甫诞关

进了监狱。

杨谅向管内诸州征兵，岚州刺史乔锺葵接到命令后，准备率兵奔赴太原，岚州司马陶模拒不服从，说："汉王征兵显然是要图谋不轨，您蒙受先皇厚恩，身为刺史，应该竭诚报效国家，怎么能起兵从乱呢？"乔锺葵说："你这不是要造反吗？"并以死相威胁，陶模坚决不屈服，于是将陶模投入监狱，率兵赴太原。总计跟随杨谅造反的共十九个州。

杨谅起兵是以杨素造反，起兵诛之作为号召的，可是起兵后到底采取什么战略，却举棋不定。王颎对杨谅说："大王手下的将领和官员家属基本都在关中，所以您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率兵长驱直入京师。如果您想割据齐朝旧地，就应该重用关东人。"总管府兵曹参军裴文安进一步对杨谅分析说："大王如果依靠现有兵力割据黄河以北，他（指隋炀帝）率领天下之兵，从四面向我进攻，事情恐怕难以成功，所以割据河北是下计。如果您率领一万名精锐骑兵，日夜兼程往京师奔丧，名正言顺，没人敢阻拦，快至京城时，突然转道袭击仁寿宫，事情或许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中计。现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以西在大王直接掌握之内，太行山以东的兵力也归您指挥，如果将所有兵力都发动起来，派兵守卫各要害之地，并根据情况，扩大占领区域，派精锐兵力直入蒲津关（在今陕西大荔），我愿为前锋，您亲自率领大军随后，以风驰电掣之势屯兵霸上（在今陕西西安东），京师必然惊慌失措。现大行皇帝的梓宫尚在仁寿宫，他要征召各地援兵起码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军占领长安以后，号令天下，谁敢不从。不出十天，大事可成。这才是上计。"杨谅一听大喜，即按裴文安所策划的上计，派遣他自己任命的大将军余公理从太谷（今山西太谷）出击，进攻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大将军綦良从滏口（在今河北磁县西北）出击，进攻黎阳（今河南浚县），大将军刘建从井陉出击，攻取燕、赵之地，柱国乔锺葵出击雁门（今山西代县）方向。又

任命裴文安为柱国，命令他与柱国纥单贵、王聃、大将军茹茹天保等率精锐之师直奔长安。

隋炀帝得知杨谅起兵的消息后，派右武卫将军丘和为蒲州（今山西永济）刺史，镇守蒲津关，阻遏杨谅入京。杨谅选数百名精锐骑兵，身着妇人服装，戴着羃䍦遮住面孔，诈称是杨谅的宫人回长安路过蒲州，骗过了守门的士兵，进入蒲州城，城中有不少人响应杨谅，丘和一看大事不好，只身逃回长安，杨谅顺利占领蒲州。可是就在这时候，杨谅突然改变主意，命令纥单贵烧毁黄河桥，据守蒲州，召回裴文安。裴文安返回太原后对杨谅说："兵贵神速，我们原来的计划就是要出其不意，现在您中途变卦，事情可就很难成功了。"杨谅并不答话，下令以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一心要割据为王了。

隋炀帝派遣左仆射杨素率轻骑五千人袭击蒲州，夜间抵达黄河岸边。由于黄河桥已被烧毁，杨素征集数百艘商船，在船内铺上青草，践踏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士兵口中衔枚，乘黎明前的黑暗渡过黄河，向守河的纥单贵发起突然袭击。纥单贵大败而走，王聃被迫以蒲州投降。杨素在出发前曾向隋炀帝保证若干天内拿下蒲州，果然如期破贼，隋炀帝大为高兴，于是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领步、骑兵四万讨伐杨谅。

隋炀帝计划同时命令幽州（今北京）出兵，对杨谅实施南北夹击，但幽州属杨谅管辖区域，隋炀帝担心幽州总管窦抗拒不从命，问杨素谁可取代窦抗，杨素推荐前江州刺史李子雄。李子雄接受命令后，只身匹马奔至幽州，住在驿站内，召募了一千多人，在驿站内设下伏兵，然后派人去请窦抗。窦抗率领二千名铁骑兵来与子雄相见，窦抗一进驿站便被擒拿，子雄当众宣读诏旨，然后率领幽州的三万名步骑兵讨伐杨谅。

并州总管府主簿豆卢毓在杨谅起兵之初，曾苦苦劝阻，杨谅

不听，豆卢毓私下对他的弟弟豆卢懿说："我如果逃归京师，自然可以免祸，但这是从我个人的安危考虑，为了国家利益，我不如暂且屈从，以后见机行事。"豆卢毓的哥哥豆卢贤为显州刺史，他对隋炀帝说："臣下之弟豆卢毓，素怀忠烈节义之心，决不会参加乱党，一定是被逼无奈。臣下请求参加讨伐大军，与豆卢毓里应外合，杨谅必然失败。"隋炀帝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豆卢贤秘密派遣仆人携带隋炀帝的敕书前往太原，命令豆卢毓暗中相助。正巧杨谅离开太原前往介州（今山西汾阳），命令豆卢毓与并州总管属朱涛留守。豆卢毓对朱涛说："汉王起兵造反，失败在所难免。我们难道就等着遭受灭顶之祸，而又辜负国家吗?"朱涛惊讶地说："汉王以重任托付给我们，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说完拂袖而去。豆卢毓一看朱涛不能同谋，连忙追出将其斩首，然后将皇甫诞从监狱放出，二人会同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宇文永昌、仪同三司成端、长孙恺、车骑将军元世雅、原武县令皇甫文颖等人，下令关闭太原城门，抗拒杨谅。他们还没有将各城门兵力布置好，杨谅就得到了消息，返兵袭击太原城。豆卢毓发现杨谅又回来了，欺骗守城士兵说："这是盗贼。"杨谅进攻城南门，豆卢毓派散居介州和石州（今山西离石）一带的少数民族稽胡守卫南城门，稽胡不认识杨谅，不放杨谅入城，城上箭如雨下。不得已杨谅又转攻西门，西门守兵全是并州人，认识杨谅，即开门放杨谅入城。于是豆卢毓、皇甫诞等人全部遇害。

杨谅派出四面进攻的几路兵马，进展都不顺利。綦良先进攻慈州（今河北滏阳），没有攻下，又进攻相州（今河南安阳），还是没有成功，最后总算攻占了黎州（今河南浚县），控制了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余公理自太行山下至河内（今河南沁阳），隋炀帝命令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率兵抵达河阴（今河南宜阳东），被余公理所阻，不能渡河。史祥对军吏说："余公理为人骄躁而无谋略，他所依仗的只是人多势众，没有战斗力，要打败

他简直易如反掌。”于是史祥在河阴聚集了大量船只，做出要在河阴强行渡河的样子。余公理派出间谍，侦察到这一情况，就把主要兵力都集中于河阳（在河阴对岸），以防备史祥。没想到史祥亲自率领精锐转移到下游，实施偷渡，余公理急忙赶至下游阻挡，但为时已晚，史祥已渡过黄河。双方在须水（即今河南济源、孟县境内黄河支流漭河）相遇，史祥乘余公理尚未将军队布置成列之机发起突然进攻，余公理大败。史祥又乘胜进至黎阳，綦良严阵以待，可是双方还未交兵，綦良先弃军而逃，于是其众不战自溃，史祥从后面追击，杀死一万多人。

出击雁门方向的乔锺葵率兵三万进攻代州（今山西代县），代州的兵力不过几千人，城池也不坚固，在乔锺葵的进攻之下，城墙不断坍塌，可是代州士兵在总管李景率领下殊死战斗，城墙毁掉了又筑起，乔锺葵尽管人多势众，但在李景的坚守下，屡屡受挫，一个多月也没有攻下。隋炀帝知代州危急，命令朔州总管杨义臣救援。杨义臣受命后率马步军二万，夜出西陉关（在今山西代县西北），黎明时分抵达代州。乔锺葵以全部兵力转而对付杨义臣。锺葵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叫王拔，异常骁勇，善使用稍，冲锋陷阵，无人敢当，是杨义臣军的大患。于是义臣在军中招募能抵挡王拔者，车骑将军杨思恩请出阵擒拿王拔，杨义臣看到思恩气貌不凡，勇气十足，赞叹道：“真是壮士！”赐给他一杯酒，杨思恩抬眼一望，王拔正立于敌军阵后，将酒一饮而尽后把酒杯往地下一扔，策马飞奔冲向敌阵。可是接连两次都是无功而返。杨义臣又精选了十几名骑兵作为杨思恩的随从，第三次向敌阵冲去。这一次杀开一条血路，来到王拔面前，杨思恩与王拔刚一交手，跟随杨思恩的骑兵纷纷向后败退，杨思恩失去保护，结果被王拔所杀。王拔乘势发起进攻，杨义臣向后败退了十几里。稳住阵脚后，用重金赎回杨思恩的尸体，杨义臣抚尸痛哭，三军将士也莫不下泪，伤心之余，杨义臣将跟随杨思恩的骑士全部腰斩。杨

义臣自知兵少，难敌乔锺葵，于是将军中的全部数千头牛和驴集中到一起，藏在山谷之间，又命数百名士兵每人带一面鼓，也隐藏起来。黄昏以后，义臣向锺葵挑战，刚一交兵，杨义臣下令鼓声齐鸣，牛、驴也被赶出山谷，飞奔而来，搞得尘土满天，乔锺葵以为中了伏兵之计，掉头后退，被杨义臣打败。被杨谅派去进攻井陉的刘建，也被李子雄的幽州兵战败，逃往太原。

这时，隋军对杨谅已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杨素率领的讨伐大军从蒲州出发，先拿下了晋州（今山西汾西）、绛州（今山西闻喜）、吕州（今山西霍县），步步向太原推进。杨谅派遣手下大将赵子开率领十余万人屯据高壁（在今山西灵石南），布阵五十里，以阻止杨素。杨素命令诸将在正面布阵与赵子开相对，自率一支骑兵潜入霍山（在今山西霍县东南），沿着山崖前进，奔向赵子开的指挥大营。快接近赵子开军营时，杨素下令安营扎寨，自己坐在军营门外，命令军吏挑选三百人守营，其余继续前进。军士害怕并州士马强劲，都不想出战，愿意留下守营，很长时间才定下守营人员名单。杨素问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军吏将情况一说，杨素立即将留下的三百人召出军营，全部斩首。下令再留三百人守营，这下谁也不愿留下了，纷纷要求随军出战。杨素率军急速前进，绕到赵子开军北面，突然发起进攻，赵子开军不知所措，自相践踏，杀伤数万人。杨谅任命的介州刺史梁修罗屯兵介休（今山西介休），闻杨素大军将至，弃城而逃。

杨谅闻知赵子开兵败，急忙亲率十万兵马开至蒿泽（在今山西祁、介休、平遥、汾阳四县之间），迎战杨素。由于天空突降暴雨，杨谅想班师北还，王頍进谏说："杨素悬军深入，人疲马乏，大王若亲率精锐出击，必然取胜。今见敌而退，是灭我军之威风，长敌军之志气。恳请大王千万不要北还！"杨谅不听劝告，退守清源（今山西清徐）。杨素跟踪而至。这里距离太原只有三十里了，杨谅率大将王世宗、赵子开、萧摩诃，领十万之众与杨素大战而

败，死亡一万八千人，萧摩诃被俘，杨谅退保太原。杨素进兵将并州城团团包围，杨谅一看大势已去，举兵投降，并州之乱终被平定。

王頍知若被官军所获必不免一死，带其子挺身逃往突厥。至山中，路径断绝，对其子说："我的智谋并不在杨素之下，只因我的话不被汉王所接受，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我不能在这儿等着束手就擒，让别人借此立功成名。我死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说完自杀而死，被其子掩埋在石窟里。几天以后，其子因忍受不住饥饿，到王頍的一个朋友家求食，竟被擒送官府。其子被杨素所逼说出王頍尸体埋藏之处，王頍终被枭首于太原。

百官联合向隋炀帝上表，说按国家法律，杨谅应判死罪，隋炀帝说："我的兄弟已经不多了，怎么忍心再杀他呢？就违法免他一死吧。"于是杨谅被除名为民，不仅失去了地位和封号，还从属籍上被清除出皇室家族。不久，被幽禁而死。并州管内的官民受杨谅牵连被处死和流放的达二十万余家。杨素则因平定杨谅之功，得赏赐布帛五万段，绮罗一千匹，以及杨谅的伎妾二十人，并拜其子杨万石、杨仁行、其侄杨玄挺为仪同三司，还发布诏书对杨素进行嘉奖。

隋朝初年，隋文帝曾向大臣夸耀，他的五个儿子都是一母所生，是真正的亲兄弟，不会彼此纷争，互相残害。可是至此，五子中已废四子、亡三子，到隋朝末年，隋炀帝和杨秀又死于江都（今江苏杨州），五子皆不得寿终。

战国时的慎到在《慎子》一书中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只兔子在街上跑，大家共同追逐，而堆积在市场上的兔子过路人看都不看，并非不想得到，是因为归属已经确定了。杨勇的太子地位确定已久，相安无事，隋文帝一朝易之，从此开启逆乱之源，助长觊觎之望。加之隋文帝使诸子出藩大镇，权力不加节制，可与中央相抗衡，于是杨秀生割据岷、蜀之心，杨谅更起太原之兵，

这一切都是事出有因的。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0

《隋书》：《杨谅传》、《杨素传》、《王頍传》、《皇甫诞传》、《豆卢毓传》、《史祥传》、《杨义臣传》、《李景传》、《李子雄传》

《旧唐书》：《傅奕传》、《屈突通传》、《丘和传》

唐·杜宝：《大业杂记》

开凿运河

中国古代对河道开凿的历史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大禹。大禹的父亲鲧，费时九年，治水不息，终未成功，被舜放逐而死。禹继承父业，吸取了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变构筑堤坝堵截为开凿河渠疏导，终于治除了水患。所以，大禹开凿河道的目的是为了疏导洪水，尽管他开创了人类开挖人工河之先声，但是，经他开凿的河道并不具有“运”的意义，因此，还不能作为运河的历史。古往今来，人类开挖运河无非两个目的：运人与运物，具体的讲，就是运兵与运粮，军事与经济两大作用。一般认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进军中原，称霸天下，而开挖邗沟，是运河历史的先声。此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历代虽然都有开挖运河的举动，但给终没有出现一条带有全国性规模的运河。这是因为，战国及南北朝时期，全国呈分裂割据状态，不具备大规模开挖运河的条件；秦汉时期虽然统一，但当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是重合的，江南尚未充分开发，在经济上无足轻重，没有开挖运河南粮北调的必要。北周建德六年（577 年），周武帝灭亡北齐，统一了北方；隋开皇九年（589 年），隋文帝又灭亡陈朝，实现了全国统一。这时候，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几百年的开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比秦汉时有很大增长，成为中国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域，每年都需要把江南大量的租税运往北方的政治中心。可是靠陆路运输，一则运费太高，二则当时陆路运输工具落后，运量有限；靠海路运输，一则海运又不发达，二则

隋朝的两个政治中心长安（今陕西西安）和洛阳（今河南洛阳）都远在内陆，海运亦不可取。因此，只有依靠内河水运江南租调北上。可是，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在太平洋西部，故所有大的河流都是东西走向，没有贯通南北的自然河流，要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就必须开挖一条南北运河。另一方面，隋朝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这也为大规模开挖运河提供了历史可能性。这样，中国运河历史发展到隋朝，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恢宏的阶段。

隋朝运河共有五条，为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它们是分阶段开凿的，历经两代君主，二十七年。虽然上面我们简单分析了隋朝开凿运河的大背景，实际上，隋朝各段运河的开凿目的各有不同。

隋朝以长安为首都，仅靠关中地区的租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的需要。开皇三年（583 年），京师仓廪空空如也，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朝廷百官经过商议，决定在渭水、黄河、汴水沿岸十三个州招募运米丁，在卫州（今河南浚县）设置黎阳仓，洛州（今河南洛阳）设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设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设置广通仓，运米丁将关东地区的粮食通过各粮仓递相转输，漕运至京。陕州境内一段黄河中流有砥柱山，此处水流湍急，很难通行，隋文帝派仓部侍郎韦瓒到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陕州以东，招募能将四十石米从洛阳经砥柱之险运抵常平仓者，可免除出征戍边。但是，这条漕运路线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还不在砥柱之险，因为砥柱虽险，技术高超的船工仍可驾轻就熟，或者漕船快至砥柱时，将漕粮卸下，改由陆运，过砥柱山后，再将漕粮装入黄河漕船，因路途较短，不会耗费太多的人力。问题是渭水流沙太多，造成河道深浅不定，漕船常常搁浅，非常不便。针对这种情况，开皇四年（584 年）六月，隋文帝发布诏书说："京城长安是全国的中心，虽然地势险要，易

守难攻，但同时也造成水陆交通十分艰难。黄河之水波澜壮阔，襟带百川，直通大海，是重要的交通线路，虽然三门之下有砥柱之险，但漕运之粮可自小平（在今河南孟津东北）登岸，躲过砥柱，陆运至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再入黄河，因此，黄河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渭水水量无常，流浅沙深，给漕运带来很大的困难，漕船进入渭水以后，至长安的路程不过数百里而已，往返却需要几个节气的时间，成为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役，其辛苦实在值得同情。我作为天下万民的君主，理应兴利除害，只有发动民力，自潼关（在今陕西潼关东北）至长安开凿一条漕渠，才可能解决漕运不便问题。我已下令水工勘查地理，选择开渠位置。漕渠一旦修成，公私船只即可日夜航行，如履平川，花费旬日之功，可节省上亿两的运费，并可造福千秋万代，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此时天气正当炎热，开渠十分辛苦，然若不付出暂时的辛劳，怎能换得长久的轻松。故特发此诏书，望万民能理解我的心意。”于是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此项工程，又以郭衍为开漕渠大监，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河之水，自大兴城开始，途经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渭南（今陕西渭南）、郑县（今陕西华县）、华阴（今陕西华阴）等地，东至潼关达于黄河，全长三百余里，因此渠经过置于渭水入黄河口的广通仓，故称为“广通渠”。广通渠修成后，关东地区的粮食经此渠源源不断运至长安，关中地区百姓深受其惠，故在当时又被称为“富民渠”。

开皇七年（587 年）四月，隋文帝为准备伐陈，向前线运兵、运粮草器械，又开挖了第二条运河山阳渎。这条运河工程量不大，基本上是将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疏浚、拓宽，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经安宜（今江苏宝应南）、高邮（今江苏高邮），南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入长江，将淮河与长江联接起来。这条运河的重开，对灭陈战役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隋文帝所修运河基本上还是属于地段性的，真正使运河超越

地区，具有全国性的规模，并形成运河体系的是隋炀帝。隋炀帝好大喜功，他利用隋文帝“开皇之治”所造就成的稳定的政治形势，借助隋文帝留给他的经济遗产，即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条件，上台伊始即着手兴修隋代规模最大的几项工程，其中之一就是通济渠。

大业元年（605 年）三月，隋炀帝为把江淮地区的租税运往洛阳和长安，同时也为了便于到江南游玩，下令征发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诸州一百多万民众开挖通济渠，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主持其事。通济渠始自洛阳西苑，引谷水和洛水入洛阳城，从东北方向出城后，顺着东汉时的阳渠故道至偃师（今河南偃师），再入洛水，循洛水进入黄河，沿黄河向东至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经荥泽（今河南荥阳东北）进入汴水，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引汴水转向东南，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宋城（今河南商丘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入淮河。隋炀帝又征发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十余万民众，将开皇七年隋文帝时开挖的山阳渎再次整修、扩大，使其规格与广通渠相一致。整个工程至当年秋天完成，修成后的通济渠和重新整修的山阳渎，水面宽四十步，两岸筑有御道，种以柳树，自洛阳至江都，将近二千里，树荫蔽日，每间隔两个驿站即设置一所行宫，作隋炀帝巡游时停顿休息之处，从长安至江都共设置行宫四十余所。通济渠是隋朝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高，气派，豪华，因当时主要为隋炀帝巡游所用，故又称为御河。由于它的建成，就把黄河、淮河、长江三条重要的大河联接起来，隋炀帝可以从洛阳坐船直达江都。

大业四年（608 年）正月，隋炀帝为便利黄河以北地区的军事运输，巩固东北部边防，并为向高丽用兵作准备，下令征发河北地区诸郡一百余万民众开挖永济渠，命殿内丞阎毗为工程总监。永

济渠南起沁水下游接近入黄河口处，引沁水北上，途中与清水、淇水相接，以获得补充水源，经新乡（今河南新乡）、汲县（今河南汲县）、黎阳（今河南浚县）、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南）、魏县（今河北大名西）、馆陶（今河北馆陶）、临清（今河北临西）、清河（今河北清河）、长河西（今山东德州）、东光（今河北东光）、长芦（今河北沧州）等地直达涿郡（今北京）。全长二千余里，河道较宽，可通龙舟。隋炀帝即位之初，推行新政，曾免除了妇女的课役，到这时，由于永济渠工程浩大，所需劳力众多，河北地区丁男供应不足，又重新征发妇女服役。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欲东巡会稽（今浙江绍兴），下令对六朝时的江南运河进行疏浚、拓宽。完工后的江南河起自京口（今江苏镇江），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晋陵（今江苏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吴县（今江苏苏州），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水面宽十余丈，可通龙舟，并在沿岸设置驿宫、草顿，作为隋炀帝东巡时上岸休息之用。江南河是隋朝开凿的最后一条运河。

隋朝对运河的兴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隋炀帝主持的四条运河的开挖意义尤其重大。它们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全长四五千里，显示了统一的大隋帝国的气魄和面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奠定了唐朝以后历代运河的基础，所以，直至今日，世界上仍把我国的大运河称为“隋朝运河”。

隋朝运河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促进统一和巩固统一。隋文帝对山阳渎的开挖，保证了灭陈战役的胜利，而大运河的完成，改变了过去一旦发生北部外族入侵或南部地方叛乱面而临的“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局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其次是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大运河成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南北货物通过运河互相交流，促进了各地经济的繁荣；运

河开通后，象余杭、京口、江都、大梁、洛阳这些沿运河的都市都是文人荟萃的地方，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隋朝开运河的第三个作用是对后世的影响。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大量需要南粮北调，所以运河就成了唐宋两代的生命线，元明两代在隋代基础上对运河进行改造，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经济作用。

隋朝运河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隋炀帝身上。隋炀帝修运河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北侵高丽，一个是到南方巡游，在这种目的支配之下，急功暴役地强迫数百万劳动力开挖运河，造成大量民工死亡，确实是值得遣责的。后人曾经评论隋炀帝开河是"可谓不仁而有功"，是非常准确的。另外，中外学者中都有人将隋炀帝开运河比之秦始皇修长城，这两件事在残酷地役使百姓与深深地造福于后世上确有共同之处，但是秦始皇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而隋炀帝开运河是为了向外侵略，而且为了游玩的用意很重，所以，隋炀帝修运河与秦始皇修长城还不能相提并论。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76、180、181
《隋书》：《高祖纪》、《食货志》、《郭衍传》、《阎毗传》
唐·杜宝：《大业杂记》

炀帝西巡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祖先居于徒河之青山（在今辽宁义县）。西晋时期，鲜卑慕容氏的首领涉归有两个儿子，长子曰吐谷浑，少子曰若洛廆。吐谷浑虽为长子，但出于侧庶，所以涉归死后，由若洛廆统领慕容各部落。吐谷浑因与若洛廆不和，遂率所部西迁，附阴山（今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山脉）而居。西晋末年，吐谷浑又率部自阴山向西南迁徙，定居于群羌之故域（今青海北部和新疆东南部），以后就以吐谷浑为其国号。魏、周之际，其首领夸吕始称可汗，定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铁卜卡古城），在青海（今青海湖）以西十五里。

隋朝初年，吐谷浑经常对隋朝边境进行侵扰，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进犯弘州（今甘肃临潭）和凉州（今甘肃武威），隋文帝因弘州地旷人稀，即将弘州废撤，派乐安郡公元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领步骑兵数万人至凉州抗敌。吐谷浑听说隋军出击，倾国出动拒战，隋军与吐谷浑定城王钟利房率领的两万名骑兵在丰利山（在青海湖东）相遇，展开激战，隋军得胜后，继续向西推进，在青海又打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率领的五万劲骑，俘斩一万多人。吐谷浑举国震惊，其王侯三十人各率所部投降，可汗夸吕率亲兵逃遁。于是隋军班师，以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统领吐谷浑降众。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守凉州。

开皇三年（583年），夸吕卷土重来，以兵进犯临洮（今甘肃

岷县)，旭州刺史皮子信战死。接着，吐谷浑又侵犯廓州(今青海贵德)。于是，隋文帝以汶州总管梁远为行军总管，率兵大败吐谷浑。

开皇四年(584年)，吐谷浑再度寇边，隋文帝命贺娄子干发凉州、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敦煌)、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五州兵马讨伐吐谷浑，深入其境，杀死吐谷浑一万多人。

鉴于河西地区常遭吐谷浑寇掠，隋文帝下令贺娄子干改变当地散居的习俗，聚民为堡而居，并开发土地，实行屯田，以加强防御。贺娄子干上书说："陇右、河西地区土旷民稀，不可能大规模耕种土地，而且以往的屯田，虽投入大量的人力，但收获甚少，还常遭吐谷浑践踏破坏，所以请将离城镇较远的屯田全部废省。另外，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业，不适宜聚居。对吐谷浑只要加强各镇戍的防守就可以了。"贺娄子干的建议被隋文帝所接受。不久，吐谷浑又来犯边，被贺娄子干击退。

开皇四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吐谷浑由于发生内乱，无力寇边，隋文帝也针对性地改行招抚政策，双方的交往由军事战场转移到外交方面。原来，吐谷浑可汗夸吕喜怒无常，多次无故废杀太子，后来太子可博汗害怕被废，就阴谋执夸吕降隋，请隋朝出兵为援。隋文帝觉得此事虚实难辨，没有出兵。可博汗的阴谋泄露被杀，夸吕又立少子嵬王诃为太子。开皇六年(586年)，嵬王诃又害怕被其父所杀，计划率所部一万五千户降隋，请隋朝出兵迎接，隋文帝又没有出兵。到开皇八年(588年)，又发生了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以所部 千多户降隋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大军又一举灭陈，大大地震慑了吐谷浑，夸吕再不敢东侵了。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死，子世伏立为可汗。从此，双方关系进一步得到缓和，经常互派使者往来。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为笼络吐谷浑，将宗女光化公主嫁与世

伏，使双方关系转入亲善阶段。开皇十七年（597年），吐谷浑国内大乱，世伏为国人所杀，其弟伏允被立为可汗。但这一事件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关系。伏允遣使向隋朝谢专杀之罪，报告事情经过。隋文帝则尊重其习俗，批准伏允仍以光化公主为妻。从此以后，吐谷浑每年都派遣使者向隋朝朝贡。终隋文帝之世，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隋炀帝即位以后，吐谷浑也没有中断对隋朝的朝贡，伏允还派其子顺前来朝见。

大业初年，有不少西域诸国商人到张掖（今甘肃张掖）与隋朝进行贸易，隋炀帝命吏部侍郎裴矩管理其事，意在怀柔西域诸国，使西域诸国前来朝贡。裴矩知隋炀帝好大喜功，在张掖对西域商人就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情况作了一番详细调查，撰成《西域图记》三卷，入朝上奏隋炀帝。裴矩在序言中说："西域地区共四十四国，以我国家之强盛，将士之骁勇，将其征服易如反掌，只因突厥与吐谷浑处在中西交通的要道上，西域诸国被其阻挡，所以不能前来朝贡。今各国都通过商人向我表示愿意向大隋称臣，所以应该向各国派出使者进行安抚，西域诸国既归顺于我，突厥、吐谷浑自然可灭。"隋炀帝看罢非常高兴，赐给裴矩绢帛五百段，每天让裴矩入宫，亲自询问西域之事。裴矩则乘机反复向隋炀帝说"西域的珍宝如何之多，可以将吐谷浑轻而易举地吞并"云云，鼓动炀帝西征。隋炀帝本来就有远略之心，经裴矩一煽动，便慷慨激昂起来，羡慕秦皇、汉武之武功，立意经营西域，提升裴矩为黄门侍郎，再次派他到张掖，劝诱西域各国入朝，结果，前来朝见隋炀帝的西域使者达十余国。

在此之前，正如裴矩所说，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多被西突厥与吐谷浑所把持，由于裴矩的经营，越来越多的西域商人直接与隋朝贸易，使吐谷浑失去了很多利益，这对吐谷浑来说是很难容忍的。当时，张掖已经成为西域与隋朝进行贸易的中心，为破坏西域与隋朝的直接贸易，吐谷浑联合党项羌多次对张掖进行骚扰、抢

劫，都被张掖太守阴世师所击退。后来吐谷浑还组织过一次对张掖的大规模入侵，被长孙炽率五千精锐骑兵打败，一直追击到青海。在这种情况之下，隋炀帝认识到，若想经营西域，彻底打通丝绸之路，必须先消灭吐谷浑。

大业四年（608年），铁勒向隋朝请降，隋炀帝派裴矩对铁勒进行安抚，并游说铁勒，让其出兵进攻吐谷浑，铁勒答应了隋朝的要求，出兵击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不知铁勒是受隋朝唆使，向东退入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境内，并遣使向隋朝求救。隋炀帝派观王杨雄率兵出浇河（今青海贵德），许国公宇文述率军出西平，名为救援，实欲袭击。伏允见隋兵来势很凶，知其不怀善意，掉头又向西逃遁，宇文述率兵追击，攻占曼头（今青海共和西）、赤水（今青海兴海东）二城，吐谷浑死亡三千余人，王公以下官员被俘二百人，伏允向南逃往雪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

但是，隋军班师后，伏允又返回故地。这样，为彻底解决吐谷浑问题，并慑服西域诸国，隋炀帝决定亲自西巡。

为保证对吐谷浑战争的胜利，隋炀帝计划与西突厥一起行动，先派司朝谒者崔君肃出使西突厥，对处罗可汗说："吐谷浑不向隋朝朝贡，可汗若出兵击之，天子一定非常高兴，隋兵与可汗兵内外夹击，一定能打败吐谷浑。"临西巡前，隋炀帝又派侍御史韦节去与处罗可汗相约，双方兵马在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南）会师共攻吐谷浑。虽然处罗可汗最后因国人反对未能如约出兵，此举对孤立吐谷浑还是起了作用。

大业五年（609年）三月二日（己巳），隋炀帝离开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开始西巡。四月三日（己亥），在陇西（今甘肃陇西南）举行大规模围猎。六日（壬寅），高昌、伊吾等国听说炀帝西巡，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见。由于隋炀帝在行前并未发布针对吐谷浑的西巡诏书，所以吐谷浑也派出了朝见使者。二十七日（癸亥），从临津关（今青海循化东）渡过黄河，到达西平，在这里陈

兵讲武，做进攻吐谷浑的军事部署。五月九日（乙亥），在拔延山（今青海化隆西北）又一次举行大规模围猎，围长达二百里，以使将士熟悉作战环境。十四日（庚辰），大军进入长宁谷（今青海西宁北川）。十六日（壬午），翻越星岭（在青海西宁北）。二十日（丙戌），抵达浩门川（今青海大通河），因桥未及时修成，隋炀帝将都水使者黄亘及九名督役者斩首。几天以后，桥才修成，继续前行。

这时，吐谷浑可汗伏允帅众聚守覆袁川（今青海俄博河），隋炀帝命令内史元寿南屯金山（今青海西宁西），东西连营三百余里；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今祁连山东端冷龙岭），连营三百余里；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今青海门源西），连营八十里；将军张寿西屯泥岭（今青海大通山），对吐谷浑实施四面合围。伏允率数十轻骑逃出合围，遣其名王诈称伏允据守车我真山（在今青海俄博河南）。五月二十六日（壬辰），隋炀帝派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率兵进攻车我真山。张定和轻敌，不穿铠甲，挺身登山挑战，被吐谷浑伏兵射杀，副将柳武建率军猛攻，杀敌数百人。二十八日（甲午），吐谷浑仙头王被追率男女十余万人投降。

六月二日（丁酉），隋炀帝遣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卫将军李琼等追击伏允，被伏允所败，二人皆力战而死。这时，左武卫将军周法尚率军从松州（今四川松潘）道北上，一路追捕吐谷浑亡散士兵，一直到达青海；卫尉卿刘权出伊吾（今新疆哈密）道出击吐谷浑也到达青海，俘虏一千余人，又乘胜追击，直至伏俟城。伏允无立足之地，率数千骑兵向南投奔党项去了。对吐谷浑的战争以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六月十一日（丙午），隋炀帝到达张掖。十七日（壬子），隋炀帝至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南），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都来朝见。隋炀帝命焚香奏乐，歌舞欢腾，以示隆重。又命武威（今甘肃武威）、张掖的士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在四

周观看，车辆、马匹将道路都阻塞了，周围数十里都是人山人海，以此向西域诸国表现中国的强盛。伊吾吐屯设等向隋朝献上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大为高兴。十八日（癸丑），隋炀帝下令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四个郡，发配天下罪犯为戍卒以守卫四郡，又命令刘权率兵驻守在河源郡的积石镇（在今青海兴海一带），广开屯田，防备伏允再卷土重来，捍卫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二十一日（丙辰），隋炀帝又在观风行殿设宴款待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诸国使者，命乐工伎人演奏九部乐，表演鱼龙戏，极欢而罢。

七、八月间，隋炀帝踏上归途，经过大斗拔谷的时候，天气骤然变化，遭大风雪侵袭，一时天昏地暗。此谷纵深几十公里，山路险峻，只能鱼贯而行，当晚未能走出谷口，文武百官、后宫嫔妃、公主等都相互走失，与士兵混杂在一起，宿营在谷中，士兵有一半以上被冻死，马、驴则损失十分之八九。九月十九日（癸未），隋炀帝返回长安，结束了西巡。

隋炀帝西巡虽然明显地带有好大喜功的色彩，表现了他的民族征服及领土扩张的欲望，但此举的结果使青海大部分地区首次置于中原王朝管理之下，并扫清了中国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障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大业末年，天下大乱，隋朝失去了对西海等四郡的控制，伏允悉复故地。隋亡以后，吐谷浑的侵扰又成为唐初的主要边患。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75--181

《隋书》：《炀帝纪》、《吐谷浑传》、《西突厥传》、《贺娄子干传》、《元寿传》、《段文振传》、《裴矩传》

炀帝北巡

隋炀帝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巡游无度著称的皇帝。隋炀帝时实行东西两京制度，他在位共十四年，其中居住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时间不足一年，居住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的时间也不过四年多一点，其余的时间全部用于在四处巡行游玩。其中北巡共有三次，主要是针对北方的突厥。皇帝出巡自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巡行边疆地区，对加强国防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隋炀帝如此频繁、大规模地出巡，已经远远超出了必要性所允许的限度，对内造成的是劳民伤财，对外也没有完全起到震慑外族的作用，最后竟被突厥包围在边塞，险些丧命。

在隋朝有力的军事打击与外交攻势之下，至隋文帝末年，突厥侵扰边境问题已基本获得解决，与隋朝为敌的突厥诸部先后灭亡，隋朝扶植起来的启民可汗统领各部突厥降人居住在长城内外，启民每年遣使朝贡，双方友好相处。

大业三年（607 年）四月二日（庚辰），隋炀帝发布诏书说："自从突厥降附以来，一直没能亲自安抚，今欲前往巡省，有关部门做好出巡准备。"十八日（丙申），万事俱备，从长安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北巡。二十一日（己亥），銮驾驻于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南）。五月九日（丁巳），启民可汗得知隋炀帝北巡，派其子拓特勒至行在所朝见，并陪同炀帝北行。十日（戊午），隋炀帝下令征发黄河以北十余郡的丁男开凿太行山，修筑通往并州（今山西太原）的驰道。十八日（丙寅），启民又遣其兄之子毗黎伽特勒朝

见隋炀帝。二十三日（辛未），启民又派遣使者，请求允许亲自入长城奉迎銮驾，隋炀帝没有允许。

隋炀帝在经过雁门（今山西代县）的时候，雁门太守丘和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但当到达马邑（今山西朔县）时，马邑太守杨廓只供给一般的饭菜，隋炀帝很不高兴。因此，将丘和调至内地的博陵郡（今河北定县）任太守，以示奖赏，让杨廓到博陵去学习丘和是怎样做官的。于是，隋炀帝每到一地，当地官员为求赏免罚，都尽其所能，供献最丰厚的食物。

六月十一日（戊子），隋炀帝到达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南）。隋炀帝为震慑北部各族，计划让随行各军武装列队，耀武扬威而行，横贯突厥各部落，东至涿郡（今北京）。但担心吓着启民可汗，就派武卫将军长孙晟先至启民处告知此意，启民马上将突厥各部及奚、霫、室韦等各部酋长数十人召集到一起。长孙晟见牙帐中乱草丛生，想让启民亲自清除，以借此折服各部酋长，就指着帐前的草说："这个草特别香。"启民拔起一根闻了闻，说："并不香吗？"长孙晟说："天子所到之处，诸侯都亲自洒扫，清除道路，以表示至敬之心。今牙帐之内这么多乱草，我以为是故意保留的香草呢。"启民这才醒悟过来，说："这都是奴的罪过。奴的身躯是天子所赐，哪敢不为天子效力，只是我们边鄙之人不知国法，今幸得将军教诲。"遂拔出佩刀，亲自割除牙帐内外野草。启民如此，各部酋长争相效法。于是突厥举国动员，从榆林北境开始，中经启民牙帐，东至涿郡，开出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

二十日（丁酉），启民与义成公主至榆林行宫朝见隋炀帝。二十七日（甲辰），隋炀帝在榆林大宴百官。太府卿元寿对隋炀帝说："当年汉武帝出关，旌旗千里而行。今天应分为二十四军，一天发遣一军，每军相距三十里，旗帜相望，鼓角相闻，首尾相接，千里不绝，这也可以称得上出师之盛。"定襄太守周法尚说："不然，

兵亘千里，中间必被山川所阻隔，一旦出现突然情况，首尾不能相救，这是取败之道。”隋炀帝一心要向突厥炫耀武力，听周法尚一说，有点不高兴，问道：“你意下如何呢？”周法尚说：“可结成方阵而行，四面以车为壁垒，排列诸军，六宫、百官及其家属在方阵之中，这和据城一样，既可出兵交战，又可屯营自守。臣以为这是万全之策。”隋炀帝觉得也有道理，就接受了。隋炀帝又命令将作大匠宇文恺造大帐蓬，帐内可容数千人，在帐内宴请启民及各部酋长三千五百人，表演各种杂技，诸胡人见大帐无不惊骇，纷纷贡献马、牛、羊、骆驼，总数达数千万头。隋炀帝一高兴，赐给启民绢帛二十万段，各部大小酋长也得到数量不等的赏赐。又赐给启民车辆、乘马、鼓吹、幡旗等物，并特许启民上表进拜时可不称姓名，朝见时位置在诸侯王之上。于是，启民可汗上表说：“先帝圣人可汗在世之日，可怜臣下，赐婚安义公主，又赐给各种各样的物品，致使臣兄弟嫉妒，欲杀害臣下。臣当时走投无路，向上看只见天，向下看只见地，被先帝所收留，先帝不仅给臣下再生之命，还以臣为大可汗，统领突厥之民。陛下即位以来，如先帝一样怜养我突厥之民。所以，臣已不是昔日边地的突厥可汗，而是陛下的臣民，愿意率各部落改穿戴华夏的衣服装束。”隋炀帝将启民的上表交由朝廷百官讨论，多数官员同意突厥变服，但隋炀帝说：“夷夏风俗自古不同，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胡服便于骑射，所以变服未必合适。”于是赐启民玺书说：“大漠以北尚未完全平静，今后还须征战，只要你好心孝顺就行了，何必改变衣服呢？”

七月，隋炀帝征发丁男一百万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浑河），尚书左仆射苏威谏止，隋炀帝不听，工程督促严急，二十天完成，民工死亡达一半以上。

八月六日（壬午），隋炀帝从榆林出发，沿金河（今内蒙古大黑河）向东北方向的启民牙帐进发。随行将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一路浩浩荡荡。隋炀帝还命宇文恺造

成观风行殿，由很多部分组合而成，下面安装木轮，推移前进，上面可容纳侍卫者数百人。又用木板和布制作行城，周长二千步，外面画着各种图案，行城中央还建有楼橹（古时军中用以侦察、防御或攻城的高台）。胡人在十里之外望见御营，就都屈膝稽首，不敢乘马。九日（乙酉），隋炀帝到达启民牙帐，启民举杯上寿，下跪拜伏，极为恭敬，王侯以下，都按照其民族风俗袒衣割肉，以表示崇敬，一个个不敢仰视。隋炀帝大为高兴，当即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迴。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鞲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赐给启民及义成公主每人一个金瓮，以及衣服、被褥、彩色丝绸等，特勒（突厥高官）以下也都分别得到了赏赐。

隋朝与高丽关系欠佳，此时，正值高丽使者出使突厥，启民不敢隐瞒与高丽之交，引高丽使者见隋炀帝，隋炀帝对高丽使者说："我因为启民诚心奉国，所以亲自来到他的大帐。你回去对高丽王说，让他早来朝见，如不来朝，我就率启民及其兵马到高丽巡行。"

第二天，隋炀帝启程南还，启民将隋炀帝送至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十三日（己丑），隋炀帝命启民归藩。十七日（癸巳），隋炀帝进入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北），二十六日（壬寅），至太原（今山西太原），九月二十三日（己巳），回到东都，结束了第一次北巡。

半年以后，大业四年（608年），三月二十二日（乙丑），隋炀帝从五原（今陕西定边）出塞，巡视长城，又开始了第二次北巡。此次车驾形制又有翻新，行宫设六合板城，一百二十步见方，四丈二尺高，设南北两个门。城中载有枪车，宿营时车辕向外，布设铁蒺藜；又设置弩床，弩床皆向外插以钢锥；弩床上设旋转机弩，城外布置绳索，绳索与弩机相连，一旦有人触绳，则弩旋转，向有人方向发箭。城外还设有铃柱等作为报警之用。

四月十三日（乙卯），隋炀帝下诏书说："突厥启民可汗思慕华夏，多次上表请求改其戎俗。可在万寿戍（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为其建城造屋，帷帐床褥等各种应用物品优厚供给。"

七月十日（辛巳），隋炀帝征发丁男二十余万，自榆谷向东修筑长城。八月二十一日（辛酉），隋炀帝亲自祭祀北岳恒山。然后返回东都。

大业五年（609年），突厥启民可汗病死，隋炀帝为此废朝三日。其子咄吉继位，称始毕可汗。始毕上表请以义成公主为妻，隋炀帝尊重其风俗，答应了他的要求。

隋炀帝过于宠待突厥，引起朝廷中不少官员的担忧，大业三年，太常卿高颎曾说："突厥对中国的内部虚实、山川险易都了如指掌，恐怕将来还会成为中国的大患。"大业八年（612年），兵部尚书段文振又上表说："臣下以为陛下宠待突厥太厚。戎狄之性，不重情义，弱则归附，强则反叛，历史上刘曜灭晋，侯景乱梁，人所共知，以臣看来，突厥将来必为国患。应该将突厥全部迁至塞外，加强缘边防守，才是万全之策。"但隋炀帝除了两次发动民工修筑长城之外，对突厥并未采取其它防范措施。

自大业十年（614年）以后，由于隋炀帝的暴政，民众的反隋起义已成风起云涌之势，隋朝政权趋于动摇，加之三征高丽的失败，使已很强盛的突厥始毕可汗渐生轻隋之心。鉴于此，黄门侍郎裴矩建议隋炀帝将宗女嫁与始毕之弟叱吉设，拜叱吉设为南面可汗，以分始毕之势。但叱吉设害怕始毕报复，不敢接受。此计未成，更使始毕生出怨隋之心。于是裴矩又向隋炀帝献计说："突厥人的性格最为淳朴，本来很容易离间，只因突厥身边有很多狡猾的西域胡人，所以不容易对付。听说始毕信任的史蜀胡悉最为奸诈，可设计将其杀死。"得隋炀帝同意后，裴矩派人对史蜀胡悉说："天子拿出很多的珍宝，准备在马邑（今山西朔县）与各部落互市，如能早来，一定会得到很多好东西。"史蜀胡悉贪心而轻信，

背着始毕，率领其部落，赶着六畜，前往马邑，被裴矩设下的伏兵所杀。然后遣使告始毕说："不知什么原因，史蜀胡悉忽然率领其部落至马邑，说已背叛可汗，请求我容纳。可汗既是我的臣下，岂能容忍他背叛可汗。今已将其斩首。"但始毕深知这是隋朝设下的一个阴谋，因此而生恨隋之心，从此不再遣使朝贡。

这时，隋朝与突厥的关系已十分紧张，双方随时有兵戎相见的可能，但是，隋炀帝对突厥并没有足够的心理戒备，以为经大业三年那次北巡，突厥已完全慑服，虽小有不顺，但绝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大业十一年（615年）五月，隋炀帝竟然冒险到距长城不足百里的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南）避暑。八月五日（乙丑），隋炀帝离开汾阳宫，向北巡视，这就是隋炀帝第三次北巡。八日（戊辰），始毕得到隋炀帝出汾阳宫北巡的报告，率数十万骑兵南下，袭击隋炀帝车驾。多亏义成公主提前派人将这一消息向隋炀帝做了报告，十二日（壬申），隋炀帝驰入雁门避难，齐王杨暕率后军进驻崞县（今山西原平北），与雁门成犄角之势。十三日（癸酉），突厥大军赶到，将雁门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雁门城中共有兵民十五万人，粮食仅可支持二十天，而城外突厥骑兵铺天盖地，上下一片恐怖。雁门附近共有城池四十一座，经激烈战斗，突厥连克三十九城，唯雁门、崞县二城不下。突厥知隋炀帝身在雁门，对雁门实施猛攻，雁门兵民拆除民房，用砖木以加强防守，情况十分紧急。突厥射向城内的箭一直达到隋炀帝住处跟前，隋炀帝吓得与赵王杨杲相抱而哭，眼睛都哭肿了。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隋炀帝不要坐以待毙，挑选数千名精锐骑兵护卫着突围而出。纳言苏威不同意，说："依靠城墙固守还是比较稳妥的，而以骑兵交战为突厥所善长。陛下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切不可轻动。"民部尚书樊子盖也说："陛下突围而出，是毫无把握、孤注一掷的侥幸之举，一旦出现差错，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固守城池，征天下之兵入援；陛下还要亲自抚慰士卒，告诉

他们不再征讨高丽了，再悬以重赏，士卒一定奋勇作战。”内史侍郎萧瑀又建议说：“突厥的制度，可贺敦（突厥可汗之妻）参预决策，义成公主以皇帝之女外嫁，其心必向着我大隋，可暗派使者向公主求援。另外，将士士气不高是因为担心解除突厥之围后还要东征高丽。如果发布诏书，告谕天下，赦免高丽，专讨突厥，将士必定会人自为战。”

隋炀帝接受了萧瑀等人的建议，亲自抚慰将士，对他们说：“努力作战！这次如能击退突厥，凡参战人员都可得到奖赏。”又正式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的直接任命六品官，赐绢帛一百段；有官的加官加赏。”隋炀帝派去慰劳将士的使者更是往来不断。于是士兵都将生死置之度外，昼夜拒战。

二十四日（甲申），诏令天下诸郡募兵，于是各地郡守、县令纷纷率兵前来勤王。卫尉少卿、唐国公李渊之子李世民，年十八岁，应募救援，隶于屯卫将军云定兴。李世民建议实行疑兵之计，多树旗帜，击鼓而行，他说：“始毕可汗敢于倾全国的兵力包围天子，必定以为我国的援兵不可能很快赶到。我们要昼夜兼行，白天要多张旗帜，使数十里不绝，夜里则击鼓行军。突厥必然以为天下救兵云集，望风而逃。”云定兴接受了李世民的建议。

义成公主接到隋炀帝的求救要求后，立即派使者诈告始毕说北面部族要袭击突厥牙帐，让始毕回兵。这时东都及诸郡的援兵也都赶到了距雁门一百多里外的忻口（今山西忻县北），云定兴部更大张旗鼓进至崞县。九月十五日（甲辰），始毕解雁门、崞县之围而去，隋炀帝方才脱险。十八日（丁未），隋炀帝还至太原，十月三日（壬戌），回到东都，完成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巡。

雁门之围以后，隋朝与突厥的关系公开决裂，突厥又开始了对隋朝的不断侵扰。接着隋朝天下大乱，中原地区避乱百姓多投奔突厥，北部地区的民众起义及割据势力，为得突厥援助，都向突厥称臣，使突厥空前强盛。隋朝灭亡以后，突厥则成为唐朝初

年最主要的边患。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0—182

《隋书》：《炀帝纪》、《长孙晟传》、《裴矩传》、《突厥传》

隋讨高丽

高丽自号高句丽，建国于西汉时期，公元五世纪建都平壤（今朝鲜平壤），开始向大陆方向扩张，是朝鲜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北周武帝时封其国王高汤为辽东王。隋朝建立后，高汤派使者入朝，隋文帝改封高汤为高丽王，自此以后，经常派出使者入隋朝贡。

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陈，震惊高丽，高汤练兵积粮，做抵御隋朝进攻的准备。于是两国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入隋朝贡的使者也就变得稀疏了。

开皇末年，隋朝社会进入全盛时期，隋文帝开始把目光转向外部，对高丽采取的敌视隋朝的态度变得不能容忍，朝野上下也出现了一片讨伐辽东的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赐给高汤一封玺书，对他未尽藩臣之节予以责备，并威胁他说："高丽虽然地狭人少，但普天之下都是我的臣民。我要将你的王位废黜，再派出使者安抚百姓，并另立贤明之人。如果你能洗心革面，改弦更张，仍然是我的良臣，保有王位。帝王立法行事，以仁、信二字为先，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你若无罪，我自然不会出兵讨伐的。过去陈叔宝盘踞江南，经常对我的边境进行抄掠，我用了十年的时间对他进行劝诫，可他自以为有长江之险，就是不听，不得已我命将出师，来往不过旬月之间，兵骑不过数千之众，就将他灭亡。你可以想一想，辽水比长江，是宽还是窄？高丽比陈国，人口是多还是少？如果我想灭亡高丽，费不

了多大劲，只派一个将军就行了。但我还是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你要好自为之。”高汤接书后非常害怕，正准备上表谢罪，恰巧因病而死。其子高元继位，隋文帝派使者命高元袭爵辽东郡公，高元上表谢恩，并请求封王，于是隋文帝又册封高元为高丽王。

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元率兵与靺鞨之众一万余人侵犯辽水以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接到报告大怒，下令以汉王杨谅与上柱国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辅助杨谅，以幽州刺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六月，杨谅率兵出临渝关（今河北抚宁东）。由于粮草运输跟不上，导致六军乏食，再加上天气连降大雨，军中疾病流行，及至辽水时，隋军已非常狼狈。高元见隋军已至辽水，非常恐慌，赶紧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于是隋文帝借此罢兵，隋军未战而回。此后，高元每年遣使朝贡。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适逢高丽使者出使突厥，突厥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引高丽使者见隋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对隋炀帝说：“高丽之地，本是周代箕子的封地，汉朝分为三个郡，晋朝在那里也设置郡县，后来才脱离中原，别为外国。因此，先帝早就想将其征服，无奈杨谅无能，师出无功。陛下登基以来，天下大同，难道还能容忍这块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仍为蛮夷之乡吗？今日其使者朝于突厥，亲眼看见启民举国降附，必然惧怕，可因其恐惧，迫使他入朝。”于是隋炀帝命吏部尚书牛弘向高丽使者宣旨说：“我因为启民诚心奉国，所以亲自来到他的大帐。你回去对高元说，让他亲自来朝见我，如不来朝，我就率启民及其兵马到辽水以东巡历。”可是高元不予理睬，炀帝遂生讨伐之意，开始为征辽做准备。

隋炀帝接受杨谅征辽因粮草运输跟不上导致失败的教训，先征发河北地区一百多万民众开挖南起黄河、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又在黄河以北地区增置军府，将所有男丁都纳入军府，作

为征辽的预备兵源；下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造戎车五万辆，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建造战船三百艘；由于不断地北巡、西征，战马损耗很多，隋炀帝又令天下富人根据财产多少出钱买战马，补足原数，使战马总数达到十万；还下令所有兵器必须崭新、精良，隋炀帝亲自检阅，如发现谁的兵器破旧，不堪使用，立即斩首。在上述准备工作完成之后，隋炀帝便连续三次发动了对高丽的大规模进攻。

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今江苏杨州）出发前往涿郡，并发布讨伐高丽的诏书。四月，隋炀帝到达建在涿郡的临朔宫，并征召天下兵马，无论远近全部至涿郡会集，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五月，隋炀帝下令河南、淮南、江南地区将所造五万辆戎车送往高阳（今河北高阳东），征发黄河南北民夫往前线运送军需物资。七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将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等诸仓之米运往涿郡。于是在所有通往涿郡的道路与河流上都挤满了开赴前线的士兵与运送粮草器械的民工，昼夜不绝。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各路大军皆会集涿郡，在命将出师之前，隋炀帝问通晓天文占卜的合水令庾质："我继承先帝遗愿，出兵伐辽，高丽的土地和人口才相当于我们一个郡，你认为此行能否成功？"庾质回答说："以臣下之管见，此行可以成功，但臣下有一个建议，希望陛下不要亲临前线。"隋炀帝一听，生气地说："我已统帅大军到达涿郡，哪有未见敌人的踪影就后退的道理？"庾质又说："陛下亲行，若一旦进攻受阻，则有损军威。您不如坐阵涿郡，命猛将勇士，授以方略，日夜兼行，出其不意，必能战而胜之，事不宜迟，缓则无功。"隋炀帝非常不高兴地说："你既然害怕出行，就自己留在这里吧。"右尚方署监事耿询更上书直谏说："辽东不可讨，出师必无功。"隋炀帝大怒，下令斩首，少府监何

稠苦苦求情，耿询才免除一死。

二日（壬午），二十四军总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在隋炀帝亲自指挥下从涿郡分道出发。江淮七万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由东莱出发。各路人马约定，会师于平壤。陆军二十四军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下辖骑兵四团，每团十队，每队百人，又有步兵四团，每团二十队，每团的铠甲与旗帜颜色各不相同。每军还设受降使一人，直接听命于隋炀帝，不受大将指挥。三日（癸未），第一军从涿郡出发，以下各军相次进发，每军相距四十里，用了四十天时间，二十四军才全部发毕。各军连营渐进，鼓角相闻，旌旗绵延九百六十里。隋炀帝的御营押后，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也是相次出发，绵延八十里。此外，另有随军民夫二百多万。自古以来，属此次出师规模最为盛大。

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率左六军出南苏道，不幸患病。危重之际，向隋炀帝上表说："夷狄狡诈，诡计多端，必须深加防备，若高丽表示投降，切不可轻易接受。另外，雨季即将来临，大军不可在外久留，望陛下严令水陆诸军，日夜兼程，出其不意，直攻平壤，平壤一破，余城不战自克。如果不能早日取胜，拖至雨季，行动维艰，兵粮也将断绝，到那时，强敌在前，靺鞨再从后方向我发动袭击，势态就严重了。"几天以后，段文振病死军中。隋炀帝读过段文振上表，深为叹惜。

三月十四日（癸巳），隋炀帝到达辽水，这时，众军都已会于辽水西岸，被高丽兵所阻，隋军不得前进。隋炀帝命令工部尚书宇文恺在岸上预造浮桥，桥成后推向东岸，隋兵沿桥前进。可是浮桥长度不够，距岸边还有一丈多远，高丽兵在东岸严阵以待，隋兵奋勇跳入水中交战，高丽兵居高临下，隋兵死伤甚众。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身先士卒，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隋军被迫后退，亦将浮桥撤回西岸。又命令少府监何稠接桥，桥成

后，隋军顺利渡辽，在辽水东岸与高丽兵大战，高丽军战败，死亡一万多人。隋军乘胜前进，包围辽东各城。隋炀帝也渡过了辽水，命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慰辽东之民，宣布免征辽东十年租税，并设置郡县。

从涿郡出师之前，隋炀帝曾告诫诸将说："这次出师，只为吊民伐罪，不为功名，你们切不可轻举冒进，孤军深入以求勋赏，所有军事行动都要奏闻上报，不许专擅。"这时，高丽军与隋军交战不利，都退入城中固守。隋炀帝下令强攻，又告诫诸将，高丽如果投降，就停止进攻，对其进行抚慰。在隋军强攻之下，高丽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守军坚守不住，声言愿降，诸将马上停止进攻，急忙派人向隋炀帝报告，等报到隋炀帝那里，高丽军已完善了守备，继续抵抗。高丽再三以此伎俩对付隋军，隋炀帝仍不知醒悟。六月十一日（己未），隋炀帝亲自来到辽东城下督战，把诸将召集到一起责备说："在东都的时候，你们谁都不愿意让我来，是不是害怕我亲眼见到你们的失败？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看看你们的所作所为，象你们一个个这样不肯尽力，贪生怕死，以为我不能杀你们吗！"诸将皆恐惧失色。然高丽诸城仍久攻不下。

来护儿率水军越海进入浿水（今朝鲜大同江），在距平壤六十里处大败高丽兵。来护儿想乘胜进攻平壤，副将周法尚建议等陆军到达后同时发起进攻，来护儿不听，挑选精兵四万，直逼平壤城下。高丽在城内寺院中暗设伏兵，然后派兵出城与来护儿交战，佯装失败，将隋军引入城内。隋军入城后，大肆抢掠，乱成一片，伏兵乘机而发，来护儿大败。高丽乘胜追至隋军停船之所，多亏周法尚严阵以待，才将高丽击退。进攻平壤的四万精兵只有数千人生还。于是来护儿退至海边，等待陆军消息。

隋炀帝见攻辽东诸城受挫，就派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九路大军进趋平壤，会集于鸭绿水西。宇文述等军自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中附近）二镇出发

时，每名士兵配给百日粮，加上武器、衣被、宿营野炊用具等，每人所负重量在三石以上，士兵均不胜负荷。宇文述等下令军中："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而士兵虽不敢将米粟公开丢弃，却都在晚间把粮食偷偷埋在宿营的帐蓬之下，军将毫无察觉。及至鸭绿水时，诸军米粟都已食弃殆尽。诸将议欲班师，但无隋炀帝的命令，不敢擅还。正在犹豫之际，高丽王派大臣乙支文德渡过鸭绿水向隋军诈降，实际是借机观隋军虚实。出师前，于仲文与宇文述二人曾得隋炀帝密旨：一定要擒获高元及乙支文德，所以于仲文准备扣押文德。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他认为若扣押文德，高丽将拒降，因此极力阻止仲文，于是放文德还平壤。既而仲文后悔，派人对文德说，请他暂回，还有其它事情商议。文德置之不理，渡鸭绿水而去。于仲文选轻骑渡水追文德，文德边战边退，并派人送给于仲文一首诗："神策究天文，妙算究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追兵因人少，不敢深人，退回鸭绿水西。

于仲文和宇文述因放走了乙支文德，怕隋炀帝怪罪，心中非常不安，于仲文主张派遣精锐兵马追获文德，可以建功；宇文述认为粮草已尽，应该退兵，二人僵持不下。于仲文愤怒地说："将军率十万之众，未建丝毫战功，回去有什么面目见天子！我就知道此行必然无功。"宇文述严厉地问："你何以知道此行无功？"于仲文说："古时良将之所以能功成名就，因为军中事务由一人决定，今天一人一条心，怎么能战胜敌人！"原来，隋炀帝曾下令，渡过辽水诸军皆听仲文指挥，所以于仲文才发此言。于是，宇文述等人不得已，听从于仲文，大军渡过鸭绿水追击乙支文德。宇文述军先与文德交战，文德见隋军士兵多露饥饿之色，故意采取疲劳战术，稍一接战，掉头便走，宇文述一天之中七战七捷，渡过萨水（今朝鲜清川江），进至距平壤三十里处，依山扎下营寨。这时，乙支文德再次遣使诈降，对宇文述说："如果你们退兵，高元将去朝见天子。"宇文述明知其有诈，但见士卒疲惫，又无粮草，已不

堪再战，而且平壤城坚固难攻，就以高丽已降为理由，退兵北还。为防止高丽袭击，宇文述等结成方阵而行。至萨水，高丽乘宇文述军半渡之机，从后面发动攻击，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力战而死，众军溃败，不可禁止，将士纷纷逃命，一日一夜狂奔四百五十里，逃至鸭绿水，将军王仁恭率部下死战，才将高丽击退。来护儿听说宇文述等败绩，亦引兵西还。

进攻平壤的九路大军渡过辽水时是三十万五千人，自萨水战败，一路溃退，还至辽东城时只乘下二千七百人了，各种器械丢失殆尽。隋炀帝大怒，将宇文述等人关押起来。七月二十五日(癸卯)，隋炀帝被迫班师。此行的战果，仅攻占了高丽在辽水以西的前哨阵地武厉逻，设置辽东郡，及通定镇（今辽宁新民西北）而已。一征高丽以大败结束。

八月，隋炀帝下令将黎阳仓、洛阳仓、洛口仓、太原仓（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南）的粮食运往望海顿（今辽宁锦县东南），为下一次进攻高丽做准备，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自己回到东都。十一月，将放走乙支文德的刘士龙斩首，九军诸将皆将败阵的责任推给于仲文，于是把诸将释放，免官为民，独关押于仲文。仲文因惭愧忧虑，发病而死。

大业九年（613年）正月二日（丁丑），隋炀帝再次征召天下兵会集涿郡，又招募骁果作为卫士，拟二征高丽。二月，隋炀帝下诏书说："宇文述因断绝兵粮而导致失败，是军吏的责任，非宇文述之罪，可恢复其官爵。"起用宇文述，为征辽作准备。又让朝臣详细讨论征辽事宜。左光禄大夫郭荣谏止说："夷狄失礼，派臣下去讨伐就可以了。小小鼷鼠何必用千钧之弩，这次陛下不要亲临前线了。"隋炀帝不听。隋炀帝又问庾质："你看这次出兵结果如何？"庾质说："臣下的见解还和上次一样，而且，陛下亲征耗费的民力、物力太多。"隋炀帝闻听大怒，说道："我亲自出征犹不能取胜，只派将去哪能成功！"

三月四日（戊寅），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前往辽东。四月二十七日（庚午），隋炀帝率大军渡过辽水。此次征辽，兵分四路：来护儿仍然统帅水军从东莱出发；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率所部渡辽后直趋平壤，很快进至鸭绿水；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兵从扶余出发，进至新城（今辽宁抚顺），高丽兵数万出城迎战，被仁恭以劲骑一千击败，高丽退入城内拒守，王仁恭从四面围攻；隋炀帝则亲自指挥进攻辽东城。这次隋炀帝接受上次失败的教训，允许诸将见机行事。

辽东城攻守战非常艰苦，隋军施展各种手段，运用飞楼、橦（古代的冲锋车）、云梯、冲梯竿、地道等，从四面发动进攻，昼夜不停；而高丽则随机应变，奋勇拒守，激战二十余日，双方损失惨重。冲梯竿长十五丈，骁果沈光登至顶端，与城墙上的高丽军士短兵相接，连杀十余人，后被高丽兵击中坠落；未及落地，被竿上拴着的绳索挂住，沈光返身又上。隋炀帝从远处望见，为之感动，当即提升沈光为朝散大夫。隋炀帝见久攻不下，又下令造布袋百余万口，里面装土，堆积为鱼梁大道，宽三十步，高及城墙，使士兵沿大道攻城，又制造八轮楼车，高于城墙，置于鱼梁道两侧，以便向城内放箭。高丽无计可施，辽东城指日可下。

正在这时，从后方传来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造反、进逼东都洛阳的消息。杨玄感是大臣杨素之子，此次征辽，被命之于黎阳督运粮草，他见天下百姓苦于兵役、徭役，人心思乱，遂借机起兵，欲取隋朝而代之。隋炀帝闻报大惊，将纳言苏威引入中军大帐，说道："杨玄感这小子十分聪明，这下可如何是好？"他又听说许多达官贵人子弟都随杨玄感造反，更加忧虑。兵部侍郎斛斯政与杨玄感关系甚好，是杨玄感造反的同谋，此时正跟随隋炀帝在前线掌握军机要事。杨玄感的两个弟弟，武贲郎将杨玄纵和鹰扬郎将杨万石也都随军讨伐高丽，身在辽东。杨玄感在黎阳起兵，斛斯政事先就得到了消息，秘密让杨玄纵和杨

万石逃回中原，等杨玄感起兵的消息报到辽东时，杨玄纵等早已逃之夭夭了。隋炀帝下令追查此事，斛斯政心中不安，害怕事情败露，逃奔高丽。六月二十八日（庚午）夜二更时分，隋炀帝秘密召集诸将，布置撤兵，回去镇压杨玄感。军资器械、攻城用具堆积如山，营垒帐篷原封不动，全部丢弃，悄悄撤退。由于事出突然，造成人心惶惶，各军全无秩序，分散而行。高丽虽然发现隋军撤退，但不敢出城。至第二天中午，才派出间谍侦察虚实，仍然怀疑隋军有诈。两天以后，才派出数千人马从后面追赶，但害怕隋军人多，不敢紧逼，经常保持八九十里的距离。快到辽水的时候，高丽知道隋炀帝的御营及隋军主力已渡至辽西，才敢逼近后军。这时后军未渡河者还有数万人，高丽从三面进行袭击，最后有羸弱者数千人被截在辽东，或者被杀，或者被俘。二征高丽再告失败。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三日（辛未），隋炀帝下令朝廷百官商议第三次讨伐高丽。这时候，杨玄感起兵刚刚平定，农民反隋起义已遍及全国，隋朝政权开始动摇，显然已不适宜再向高丽出兵，但慑于隋炀帝的淫威，一连几天，百官中竟无一人敢站出来说话。于是，二十三日（辛卯），隋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马开赴辽东。三月十四日（壬子），隋炀帝向涿郡进发，士兵不愿再向辽东送死，纷纷逃亡。二十五日（癸亥），隋炀帝在临渝宫祭祀黄帝，斩逃兵以衅战鼓，但士兵逃亡之势仍不可遏止。七月十七日（癸丑），隋炀帝到达怀远镇，各路大军或因士兵在路途逃亡殆尽，或被反隋义军所阻，多未能如期而至，所以，隋炀帝未敢渡辽水。只有来护儿率水军自海道进至卑奢城（今辽宁金县东），与高丽兵大战，取胜后，准备继续向平壤进军。高丽因连年作战，颇感力不可支，又看到隋炀帝如此锲而不舍，早晚有一天平壤将被攻破，于是，二十八日（甲子），高元上表请降。为使隋炀帝相信，派人将斛斯政押至辽东城下，交与隋方。隋炀帝觉得三年努力，终有所

获，非常高兴，派人告知来护儿，高丽已降，让他停止进攻。来护儿召集诸将说："大军三度出兵，竟未能平贼，这次回去，肯定不可能再来了，劳而无功，作为军人我真感到耻辱。今高丽已困弊不堪，继续进攻定能获胜。我想进兵平壤，抓获高元，得胜而归。"于是上表隋炀帝请求进兵，不肯奉诏而退。长史崔君肃坚决阻止。来护儿说："高丽已经支持不住了，只靠我们一路兵马就可将其击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抓获了高元，还会被皇帝怪罪吗？放弃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做不到。"崔君肃见不能说服来护儿，转而对诸将说："你们若抗拒诏书，跟随元帅进兵，我一定上奏天子，你们都得因此而获罪。"诸将一听，都劝来护儿接受诏书，来护儿这才退兵。八月四日（己巳），隋炀帝自怀远镇班师回国。三征高丽，不了了之。

隋炀帝三征高丽均告失败，有两大原因。第一是轻敌。隋炀帝自以为高丽弹丸小国，大军一到，必望风投降，故率领二十四军耀武扬威，缓缓而行，使高丽有了充分的准备；接连被高丽诈降所误，其根源也是轻敌，所以导致第一次征辽失败。第二是穷兵黩武，不得人心。隋炀帝倾全国的物力、人力，发动侵略战争，农民被驱赶着往前线运送粮草器械，由于督促严急，造成大量死亡，无数士兵又战死辽东，故从第二次征辽时开始，国内就出现了厌战、反战情绪，后方严重不稳，然隋炀帝却不知醒悟，一意孤行。杨玄感借助民心起兵反隋，导致第二次征辽中途夭折。士兵逃亡，征辽大军失期不至，国内民众起义风起云涌，又使隋炀帝不得不与高丽议和，第三次征辽也草草收兵。

隋炀帝回到东都以后，征高元入朝，高元还是不来。隋炀帝又下令诸将帅集兵整装，准备再伐高丽。但这时已天下大乱，四征高丽终未成行。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78、181、182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食货志》、《高丽传》、《于仲文传》、《宇文述传》、《来护儿传》、《庾质传》

炀帝三游江都

江都（今江苏扬州）旧称广陵，在西晋灭亡以后至隋朝以前几百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东晋、南朝统治之下。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制度至东晋时达到极盛，由于士族世代掌权，至南朝时已走向腐化，士族官僚平时身穿用香料熏过的衣服，足蹬高跟带齿木履，面部则擦粉点红，纵情声色，整个社会风气比较奢侈。江都虽地处江北，但在南朝的长期统治之下，也深受江南奢侈风气的熏染，与北方较为俭仆的民风绝然不同。隋炀帝在做皇帝以前当过十几年的扬州大总管，他的皇后萧氏是江南人，故深受南方奢侈之风的影响，他自己又善讲吴语，对江都这个地方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他登基以后的第一次出巡就是去江都，并且一而再，再而三。隋炀帝在历史上以巡游无度著称，如果说隋炀帝的北巡和西巡还具有巩固国防的意义的话，那他的三次出巡江都则纯粹是为了游玩。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发表诏书，布告天下，他要巡历淮海，观省风俗。为准备这次南巡，隋炀帝征发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诸州一百多万民工开挖通济渠，又征发淮河以南诸州十余万民工拓宽邗沟，建成一条自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直达江都的人工运河，全长二千余里，水面宽四十步，沿河两岸筑有御道，道旁种以柳树，并在沿途设置几十所行宫，供隋炀帝巡游时停顿休息之用。又命令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於士澄到江南采集木材，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八月，王弘将造好的各色船只送往洛阳，十五日（壬寅），隋炀

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开始了第一次南游。文武百官及十余万禁卫军随行，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统领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统领后军。隋炀帝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下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供召见大臣和议事之用；中间两层共有房一百二十间，都用黄金、美玉装饰，供隋炀帝休息之用；下层供侍从人员之用。皇后萧氏乘翔螭舟，规模制度小于龙舟，但与龙舟一样豪华。另有浮景九艘，跟随龙舟前后，上下三层，为水中宫殿。文武官五品以上每人给楼船一艘，六品以下给黄篾一艘。此外，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道场、玄坛、板舱等各色船只数千艘，分别由后宫、诸王、公主、僧、尼、道士、各国使者、客商等乘坐及装载内外百司所需物品。共用挽船民夫八万余人。其中有九千余人是专门招募的水工，身穿锦衣，称为殿脚，为龙舟、翔螭舟、浮景、漾彩等拉纤，将五色丝缆系在船上宫殿的殿柱上，殿脚牵引而行。还有平乘、青龙、艨艟、艚䑼、八櫂、艇舸等各类船只数千艘，供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左右监门、左右领军十二卫士兵乘坐，不给纤夫，由士兵自己牵引。这支上万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首尾相接，绵延二百余里，每到夜晚，灯火通明，丝竹鼓乐之声闻于数里之外。骑兵则沿两岸的御道护送而行，旌旗蔽野，规模之盛大，场面之豪华，可称得上是前不见来人，后不见来者。船队所到之处，周围五百里以内的州县都要供献食物，最多的一州要献食一百多车。所供食物极尽水陆珍奇，吃不完，在出发前就埋掉。隋炀帝对供献精美食物的州县官加官进爵予以奖赏；献食不足或不精者则予以贬官，甚至有因此而获死罪者。

隋炀帝在江都住了半年，要回洛阳，这次他不愿乘船回去了，想走陆路。但是，他到江都是乘船而去，江都并没有供皇帝在陆路使用的乘舆、仪仗等，隋炀帝当然是不会将就而行的。其实水路去陆路回是隋炀帝的既定计划，他对此早就做了周密的安排。临去江都之前，隋炀帝对开府仪同三司何稠说："现在天下安定，但礼仪制

度却不完备。你可以按照以往各朝的图书古籍,制造舆服羽仪,制成后送到江都去。"即日任命何稠为太府少卿。于是何稠博览图籍,参考古今,费尽了心思,制成三万六千人的黄麾仪仗,以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等等。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骨角、齿牙、皮革、羽毛等物,都向州县征调。由于工期紧迫,往往是早晨将征调令下到州县,晚上就要将物品上交。于是,百姓四处搜捕,水陆禽兽捕获殆尽,仍然不能满足下达的数量。百姓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向豪绅富商之家购买,使价格暴涨,一根长尾野鸡的羽毛值十匹双丝细绢,白鹭的羽毛也卖到五匹一根。乌程县(今浙江吴兴)有一棵大树,上面有一个鹤巢,百姓想抓鹤取毛,但此树逾百尺,高不可攀,于是想把大树伐倒,鹤唯恐幼鹤被杀,自己将羽毛拔下来投到地下,当时有人将此事称为祥瑞,说:"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此项工程共用工十万余人,耗费金银钱物以亿计。后隋炀帝派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审核工程帐目,竟花费了几年的时间。

大业二年(606年)三月,舆服仪仗全部制成送至江都。十六日(庚午),隋炀帝离开江都,踏上归程,羽仪填满街道,长达二十余里,四月二十六日(庚戌),隋炀帝大列仪仗,与十二卫兵马浩浩荡荡从伊阙(今河南伊川西)进入洛阳,结束了第一次南游。

在一游江都的来去路程上,其排场是极尽了奢侈、豪华,但隋炀帝对江都的居住条件还感到不满意。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准备二次南游,派榆林太守张衡负责营建江都宫,后因江都丞王世充上奏隋炀帝说张衡不按制度施工,擅自缩减工程规模及项目,隋炀帝将张衡除名为民,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于是王世充顺承隋炀帝的旨意,提高施工标准,雕饰水池台榭,使隋炀帝非常满意。

大业六年(610年),江都宫完工,三月二日(癸亥),隋炀帝从洛阳出发,第二次前往江都。六月,隋炀帝下令把江都太守的品级、待遇提高至与京兆尹相同,使江都具有了与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同等的地位。不久,隋炀帝又下令开凿江南河,从京口(今江

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宽十余丈，使其可通龙舟，并在沿岸设置驿宫、草顿，准备向东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巡游。大业七年（611年）二月三日（己未），隋炀帝临扬子津（今江苏扬州南），升钓台垂钓，并大宴百官。十九日（乙亥），隋炀帝结束二次南游，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涿郡，准备讨伐高丽。此时，正值一年一度的官员调选期，隋炀帝命令尚书省吏部、门下省、内史省、御史台四部门官员在船前进行选补，接受选补者达三千余人，都沿运河随船而行，有人竟然徒步随船走了三千余里，最后落选，未得一官，因寒冷、饥饿、疲劳而致死者有十分之一二。

大业十一年（615年），在隋炀帝暴政压迫之下忍无可忍的民众起义已呈燎原之势，遍及全国。隋朝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形势之下，隋炀帝仍不能忘怀江都的美景，还想第三次南游。但是，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时候，已将龙舟、水殿全部焚毁，于是，隋炀帝下令在江都重新建造，这次又造了数千艘，船只规模比以前的还要大。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江都新造龙舟完成，送至东都。一贯善于阿谀奉承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深知隋炀帝的心意，就上表劝隋炀帝去江都，给他一个南游的借口。炀帝大为高兴。但这时的形势显然已不适于皇帝离开统治中心，出外巡游。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谏止道："现在天下百姓已疲惫不堪，府库也已经空竭，民众造反蜂起云涌，州县已不能禁止。希望陛下西还京师长安，安抚万民。不要去江都。"隋炀帝闻听大怒，将赵才关押起来。十天以后怒气稍解，才把赵才放出来。这时，绝大多数朝臣都认为不应该去江都，但隋炀帝的去意坚定不移。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谏阻，当即被杖杀于朝堂之上，因此，百官再无人敢于出面谏止。十日（甲子），隋炀帝出发赴江都，命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

卢楚等人留守洛阳。临行前，隋炀帝作诗与留在洛阳的宫人赠别，其中有两句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充分表露了这位不以天下为意的皇帝的嘴脸。奉信郎崔民象冒死于建国门拦截隋炀帝困驾，上表说，现在天下盗贼充斥，四海土崩瓦解，皇帝不宜巡幸。隋炀帝大怒，下令先摘掉他的下巴，然后斩首。行至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求隋炀帝还西京，又被斩首。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南），郡民聚集在一起，在路上拦住车驾上书说："陛下若一定要去江都，天下从此就再不是陛下的天下了！"隋炀帝又将为首者斩首而去。

隋炀帝到达江都以后，江淮地区各郡的官员都来朝见，隋炀帝不问政绩如何，专看上贡的礼物是厚还是薄，贡品丰厚者越级提升，礼物轻薄者即时解职。江都郡丞王世充因营建江都宫本已深得隋炀帝好感，这次又献上精美的铜镜和屏风，被提拔为江都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上珍禽异味，隋炀帝吃得高兴，提拔他为江都郡丞。于是郡县官吏竞相刻剥百姓，以充贡献，百姓苦不堪言，使更多的人投入民众起义的队伍当中去。到后来，东都被瓦岗义军所包围，江都被江淮各义军所包围，北上的道路也被义军所阻，隋炀帝就是再想回洛阳或长安也不可能了。最后他终于被杀于他所迷恋的江都，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0—182

《隋书》：《炀帝纪》、《食货志》、《何稠传》、《赵才传》

杨玄感叛隋

杨玄感是隋代两朝重臣杨素之子，大器晚成，少年时代被人视为痴呆儿，唯有杨素深知其子，经常对人称“此儿不痴”。成年以后，玄感爱好读书，精于骑射，身材魁伟，以美男子著称。弱冠之年，依靠父亲的军功授勋柱国，位居二品，朝会则父子同列，荣极一时。起家授官郢州刺史，到任以后，先将心腹安插在各个部门，暗中察访官吏的能力和作为。于是官吏的善政和劣迹均被他掌握，奖惩分明，处事如神，官吏无不佩服。以后历任宋州刺史、鸿胪卿，杨素死后，玄感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

杨玄感出身显赫，身居高位，性格傲慢，但却酷爱文学，喜欢招贤纳士，司农卿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均与玄感结为至交。四海名士也多投靠玄感门下，其中一人就是李密。李密也是贵族出身，隋上柱国、蒲山公杨宽之子，胸怀大志，不求仕进，潜心读书。一天，李密乘黄牛外出，将《汉书》挂于牛角之上，手持一卷边行边读。由于李密专心读书，路遇杨素而未发现，杨素颇为好奇，从后面追上李密。问道：“你是哪里的书生，学习如此勤奋？”李密见是越国公杨素，连忙下牛拜见，自报姓名。杨素又问所读何书，李密答曰：“《项羽传》”。杨素更加好奇，将李密引至家中，经过交谈，十分高兴，暗暗称赞李密的才学和见识，对玄感说，依我看李密的学识非你所及，可与之交往。于是玄感倾心交结李密，二人遂成刎颈之交。玄感曾私下问李密：“当今皇上猜忌心重，隋朝的天下也不会长久，中原一旦有变，你我二人谁

能成就大事?”李密答道:“若论领兵作战,战之必胜,我不如你,至于驾驭天下英雄,使远近归属,你不如我。”

随着朝政的败坏,隋炀帝对大臣的猜忌也越来越重。隋炀帝篡夺帝位曾得杨素的帮助,但杨素居功自傲,引起炀帝的不满,杨素病死以后,隋炀帝曾对近臣说:“假使杨素不死,终当夷族。”加之杨家累世尊贵,颇负盛名,所以杨玄感深知自己是隋炀帝猜忌的主要对象,内心颇为不安,遂与诸弟暗中策划废除杨广,另立隋文帝之孙秦王杨浩为帝。隋大业五年(609年),玄感随隋炀帝西征吐谷浑,班师时路经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南),当时天气恶劣,风雪交加,士卒冻死一半以上,加之此处路径狭隘险峻,只能鱼贯而行,文武百官都相互走失,隋炀帝也与军士混杂在一起,夜宿于山谷之间,玄感想乘机袭击行宫,发动政变。玄感之叔杨慎知其谋,劝阻道:“目前天下士人之心尚未涣散。国家亦无明显的内患,时机尚不成熟,绝不可贸然行事。”于是玄感才放弃冒险的念头。

隋炀帝好大喜功,经常东征西伐,干戈不息,杨玄感想宣扬威名于天下,且欲执掌军队,作为起兵反隋的资本,遂向兵部尚书段文振求为将领,说:“玄感世代承受国恩,却不能报效国家,深感不安,一旦边疆有紧急情况,愿从天子征讨,以尽微薄之力。”段文振将玄感之言告诉隋炀帝,炀帝颇为高兴,对群臣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固不虚也。”于是赏玄感绢帛一千段,由此取得了隋炀帝的信任。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第二次出兵讨伐高丽,命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粮草。此时天下百姓苦于兵役、徭役,人心思乱,民众起义已成蔓延之势,玄感认为民心大可利用,起兵时机已然成熟,尤其是自己身兼督运粮草之职,掌握着前线大军的命运,如此天赐良机决不可失。于是他一方面与跟随隋炀帝至前线掌军机大权的斛斯政通谋,作为内应,又与镇守临渝关

（今河北抚宁东）的赵元淑通谋，以断隋炀帝归路；另一方面与在黎阳的副手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议定计策，故意延误发运粮草，以造成前线大军因缺粮而发生变故。由于前线缺粮，隋炀帝遣使者至黎阳催运，玄感以水路盗贼太多为借口，依然拖延发运粮草。另外，玄感之弟虎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石并从军讨伐高丽身在辽东，玄感为使二人免遭杀身之祸，在斛斯政的建议和帮助下，使玄纵、万石二人逃离辽东。同时，玄感深知若想成就大事，非以李密为谋主不可，就在举兵之前秘密派家僮至京师长安迎接李密，令李密与玄感之弟玄挺等同赴黎阳。

按东征计划，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自东莱（今山东掖县）从海路进攻平壤（今朝鲜平壤），当时尚未出发。杨玄感万事俱备，苦于兴师无名，乃派遣家奴冒充隋炀帝的使者，谎称来护儿因误了军期，不得已而造反，命令杨玄感急速出兵讨伐。六月三日（乙巳），玄感进入黎阳城，关闭城门，强征所有男夫为兵，以帆布为铠甲，并且向四方各郡发出文书，以讨伐来护儿为名，令各郡发兵会于黎阳，正式起兵反隋。

杨玄感建置官属一律恢复开皇时期制度，以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祎为怀州刺史。治书侍御史游元与杨玄感同在黎阳负责督运，杨玄感对他说："杨广这个独夫肆意虐待百姓，现在他身陷辽东，这是上天要灭亡他，我今天率领正义之师讨伐无道之昏君，你意下如何？"游元正言厉色答道："你的父亲所受到国家的宠幸，自古今无人可比，你们兄弟几人也都在朝廷为官，你本应当竭尽忠诚以报答皇帝的鸿恩，怎么能在你父亲刚死不久就干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呢？至于我，不过一死而已，决不与你一起造反。"玄感大怒，将游元囚禁起来，后又多次以死相威胁，游元仍不屈服，最后被玄感杀害。不久，唐祎又自黎阳逃归河内（今河南沁阳）。

杨玄感选运粮民夫五千余人，又选江南船夫三千余人，对他

们说，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天下骚扰，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辽东，现在我们一起起兵以拯救百姓，你们说如何？众人欢呼雀跃，高呼万岁。

正在这时，李密从长安赶到黎阳，杨玄感见李密如期而至，大喜过望，遂以李密为谋主，对李密说，你常以普救天下为己任，现在正是施展才干的时候，你说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李密说："我有三计，供你选择。现天子远征高丽，距离幽州（今北京）尚有千里之遥，南有大海，北有强胡，只有榆林一条道路与中原相通，若出其不意，率兵入蓟，扼临渝关之险，阻断其归路，高丽闻知后必然向其发动进攻，至多不过一个月的时间，粮草用尽，其众不战自溃，然后天下可定，此为上计。"玄感听后不语，然后说道："愿闻其次。"李密说："关中乃天府之国。四面有险，进可攻，退可守，现虽有卫文升留守，不足为虑，若鼓行而西，经过城镇不要进攻，直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安抚士民，然后据函、崤二关守之，等天子回来已失去根本，我们可据关中和他对抗，照样有夺取天下之可能。此为中计。"玄感听罢又说："更言其次。"李密接着说："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有越王杨侗率兵留守，如果就近进攻东都，一旦久攻不下，隋兵再四面来救，胜负就很难说了。此为下计。"玄感听罢却说："不然，现如今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如能够攻取，必然会使百官发生动摇，而且经过城镇不攻取，怎能显示我的威力，你的下计正是上策。"玄感遂决计袭击洛阳。派遣杨玄挺率兵一千为前锋先进攻河内，遭到唐祎的顽强抵抗，同时唐祎急速派人向越王杨侗报告玄感欲袭取洛阳的意图，使洛阳隋军有了准备。

杨玄感率兵自汲郡（今河南滑县西）南渡黄河向洛阳进发，沿途民众纷纷自动从军。玄感使弟杨积善率兵三千沿洛水西进，又使弟杨玄挺率所部翻越邙山（在今河南洛阳东北）南进，玄感自率三千人押后，杨玄感军没有弓箭甲胄，只用单刀柳木盾。杨侗

派遣河南令达奚善意率精兵五千人拒杨积善，将作监、河南赞治裴弘策将八千人拒杨玄挺。达奚善意与杨积善一交锋，隋军不战自溃，铠甲兵器全部丢弃在地上，被杨积善军所取。裴弘策与杨玄挺一交兵也是一战就退，铠甲兵器丢了一大半，杨玄挺也不追击，裴弘策后退三四里地以后，收集散兵，布好战阵等待杨玄挺，杨玄挺军不慌不忙来到裴弘策军对面，下令士兵坐下休息，过了很长时间，乘隋军不备突然发起攻击，裴弘策又败，如此五战五败。六月十四日（丙辰），杨玄挺直抵洛阳城门之下，裴弘策仅以十余骑逃入城，余部全部投降了杨玄感。

杨玄感屯兵洛阳城上春门外，向兵民发表演说："我做官做到上柱国，财产积到万金，富贵已无所求，现在冒着灭族的风险，只是为了解救百姓的苦难。"玄感一番话深得民心，洛阳城外百姓竞相向杨玄感军敬献牛酒，每天有上千人到军门投效，杨玄感军扩大到五万余人。同时，杨玄感起兵也得到其它地方的响应，如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刘元进得知玄感起兵的消息后，在余杭起兵与杨玄感遥相呼应，周围地区逃避兵役和苦于徭役的民众纷纷投于刘元进旗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聚集了好几万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朱燮、晋陵（今江苏常州）人管崇也于江南起兵应杨玄感，自称将军，聚众十余万人；梁郡（今河南商丘）人韩相国也起兵相应，亦聚众十余万人，并被玄感任命为河南道元帅。另外，由于杨玄感在官僚集团内部有一定的影响力，故不少达官贵人的子弟如名将韩擒虎之子韩世萼、观王杨雄之子杨恭道、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子虞柔、大将军来护儿之子来渊、御史大夫裴蕴之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之子郑俨、大将军周罗睺之子周仲等四十余人也都相继降于玄感，以上诸人均被玄感委以重任，更壮大了杨玄感军的声势。

内史舍人韦福嗣战败被俘，杨玄感以厚礼相待，命他掌握军中机密之事，又命韦福嗣代他给协助杨侗留守洛阳的民部尚书樊

子盖写信，说："当今皇帝自即位以来，荒于酒色，大兴土木，民力已为之耗尽，征发兵役徭役无度，士卒多无辜死于荒野，黄河以北人烟已非常稀少，长江淮河之间土地也多被荒废，长满了野草，盗贼越来越多，高祖皇帝所创立的天下已危在旦夕。我杨玄感世代受国之厚恩，身居上将之位，先公（杨素）曾奉高祖遗诏：太子若有道则为我尽力辅佐，若无道就为我将他废掉。所以现在我上奉高祖皇帝遗命，下顺民众之心，废掉无道之昏君，更立贤明之帝王，得到天下响应，万众拥护，天意如何，人心向背，已昭然可知，现在你独守孤城，到底能支持多久呢？自古以来，忠义并没有固定模式，君子应当见机行事，想当初，商朝的宰相伊尹将商王太甲放逐到桐宫（今河南虞城南），汉朝的大司马霍光废汉帝刘贺归于昌邑（今山东金乡西），这是你所熟知的。希望你以百姓死活为怀，以国家前途为重，切勿拘于小礼，为昏君尽忠而不自珍重。"樊子盖收到杨玄感书信后不予理睬，玄感遂遣精锐兵力猛攻洛阳城，樊子盖则尽全力固守，双方呈相持状态。玄感又分五千兵据守慈涧（在今河南洛阳西）五千兵据守伊阙（今河南伊川），又遣韩世萼率三千人围攻荥阳（今河南郑州），派顾觉率五千人攻取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阻止隋朝各处的援军。

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知洛阳危急，派刑部尚书卫文升率兵四万出关援救。卫文升路过华阴（今陕西华阴），命部下挖掘杨素的坟墓，放火焚烧了杨素的骸骨，向士兵显示要与杨玄感死战到底的决心。至洛阳后，卫文升先以步兵和骑兵二万人渡过瀍水（在河南洛阳北）向杨玄感挑战，玄感事先设下伏兵，双方稍一交锋，玄感即佯为败退，卫文升不知是计，率兵追赶，结果伏兵突发，隋军大败。几天以后，卫文升稍加休整又向杨玄感发起进攻，交战不久，玄感使人于阵中高声喊道："官军已将杨玄感活捉。"于是隋军稍微有些松懈，杨玄感乘机率几千名精锐骑兵发动突然攻击，隋军再次溃败。卫文升连败两阵仍不死心，倾全部剩余兵力进屯

邙山以南与杨玄感决战，一天之内双方交战十余次，卫文升的兵力死伤殆尽，正巧杨玄挺在战斗中中箭而亡，杨玄感才退出战斗。

杨玄感力大无比、骁勇异常，每次临战都身先士卒，手持丈八蛇矛，无人可与之匹敌，当时人以为唯有古人项羽可比。而且玄感善于安抚部下，士卒都愿意为他出生入死。因此每战必胜，势力愈发壮大，兵力发展到十余万人。

这时，隋炀帝正在统帅大军猛攻高丽，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指日可下，突然接到杨玄感造反，洛阳告急的文书，隋炀帝大惊，将纳言苏威引入中军大帐，惊惧之情形于颜色，对苏威说："杨玄感这小子十分聪明，这下可如何是好？"苏威回答道："能明辨是与非，预知成与败者，才称得上聪明，杨玄感性格粗疏，没有远见，谈不上聪明，不足为虑，值得担心的是，因这一事件而演变成天下大乱就难以收拾了。"苏威之意是看到劳役兵役连年不断，人心思乱，想借此婉转告诫隋炀帝明辨是非、改弦更张、安定民心，才能保证天下无事。隋炀帝接着又得到消息说达官贵人子弟多追随杨玄感造反，更加忧虑。这时他才发现杨玄纵兄弟早已逃之夭夭，于是下令追查是谁帮助杨玄纵等逃走的，斛斯政做贼心虚，急忙逃往高丽。六月二十八日（庚午）夜二更时分，隋炀帝秘密召集诸将布置撤兵，回去镇压杨玄感，于是所有军用物资全部丢弃，连夜退兵。高丽虽然发觉隋军动向，但害怕中计，不敢贸然出兵，两天以后才派数千人追击，隋军得以顺利渡过辽水。

隋军班师后，隋炀帝命令虎贲郎将陈棱进攻元务本占据的黎阳，又命令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乘驿传之车马速发兵讨伐杨玄感。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此时尚在东莱，闻知杨玄感围攻东都的消息后，召集诸将商议回师讨伐杨玄感，诸将都认为没有隋炀帝的命令绝不能擅自回兵，来护儿厉声说道："高丽不服从我大隋之命是皮肤之疾，而杨玄感围攻洛阳是心腹之患，怎样对国家有利就应该怎样去做，不能知而不为。今天的事情，如

皇帝以擅自专权怪罪，责任我一人承担，与大家无关。如有不服从命令者军法从事！”于是率部回师救援洛阳，同时命他的两个儿子来弘、来整乘驿马急速去辽东向隋炀帝上奏。这时隋炀帝已回到涿郡（今北京），要来护儿救援东都的命令已经下达，见到来弘、来整，得知来护儿已先期发兵大为高兴，赐给来护儿一封玺书道：“公回师洛阳之时，正是朕下达要你回师的命令之日，你我君臣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正如同契符那样一致。”

杨玄感自从俘获韦福嗣后，将韦福嗣视为心腹，对李密反有所疏远。韦福嗣本不是起兵的同谋，因战败被俘不得已才归附杨玄感，每次筹划军机之事韦福嗣总是首鼠两端，态度不明朗，杨玄感要他作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他也推托。韦福嗣身虽在玄感军中，心实向着隋朝，这一点李密看得很清楚，他对杨玄感说：“韦福嗣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同盟，现在他又采取观望的态度，你现在所做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身边就有这样的坏人，若对他听之任之，大事必然坏在他身上，不如趁早杀掉他以示众。”玄感说道：“哪至于这么严重。”李密知道杨玄感听不进自己的话，退出后对自己所亲信的人说：“楚公轻易起兵而不图谋如何取胜，这可怎么办？我们早晚都要做隋朝的俘虏啊！”

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曾因违法而被除名为民，隋炀帝第二次讨伐高丽，命令李子雄以士卒从征，戴罪立功，隶属来护儿部下。隋炀帝得到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后对李子雄放心不下，下令将李子雄武装押解到隋炀帝处，在路途之中，李子雄杀掉押送自己的使者投奔杨玄感。为取悦杨玄感，李子雄力劝玄感称帝，取隋朝而代之。杨玄感就此事征求李密的意见，李密说道：“秦末起义的时候，陈胜起事不久就要称楚王，张耳谏止而被陈胜疏远；汉末曹操当权想向汉献帝要求得到九锡的礼仪待遇，荀彧谏止，最后竟被曹操逼迫自杀。现在我如果如实说出我的想法，恐怕张耳、荀彧二人的遭遇就是我的下场，而阿谀奉承，只说使你高兴的话，我

李密又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起兵以来，虽然屡战屡胜，但四方郡县却没有一个响应的。东都的防守力量还比较强大，各地援助洛阳的救兵也已纷纷赶到，在这种形势下，你应该身先士卒。带领部下英勇奋战，而且应该放弃东都西进，早日占领关中。现在你急于称王称帝，这不是在告知天下，你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并不是要解救天下的百姓吗？”杨玄感听罢会意地笑了。遂放弃了称帝的念头。

这时，屈突通已率领隋朝大军挺进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宇文述也渐渐向洛阳逼近．杨玄感与李子雄商议对策．李子雄说："屈突通精于兵法，如果让他渡过黄河，胜负就难以预料了．现在应该分出一部分兵力阻止屈突通，屈突通不能渡河，樊子盖、卫文升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援。”玄感准备照李子雄的计策行事，没想到这一计划被樊子盖识破，樊子盖多次出兵袭击杨玄感，杨玄感军被牵制在洛阳周围．不能分兵以阻挡屈突通，屈突通遂顺利渡过黄河．屯兵于破陵（在今河南洛阳东北）。杨玄感于是兵分两路，西路军抵抗卫文升，东路军阻挡屈突通。樊子盖见屈突通已渡过黄河，遂倾城出动与杨玄感大战，杨玄感军三面受敌，处于劣势，屡战屡败。此时宇文述、来护儿也率领大军扑了上来，形势对杨玄感已相当不利。杨玄感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李子雄说："解救东都的援军越来越多，我军接连失利，如继续留在此地无异于自取灭亡，不如改变进攻方向，挺进关中，先拿下永丰仓（在今陕西潼关北），开仓济贫，必然会得到百姓的支持，有了百姓的支持，占领关中地区就容易了，然后以关中为根本，依靠地理优势和京师府库的物资与隋朝争夺天下，依然可以成就霸王之业。”其实李子雄所说正是李密一贯主张的中计，于是李密补充说道："弘化郡留守元弘嗣手握强兵居于陇右（今甘肃一带），我们可以宣称元弘嗣在陇右起兵反隋。派来使者迎接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抗隋，以这个理由可以蒙骗众人和我们入关。”正巧，这时候杨玄感在华

阴的宗党派人来请玄感西行，并表示愿意做杨氏大军的向导，于是玄感决意西取关中。而深得玄感信任的韦福嗣果然不出李密所料，在这时候叛变了玄感，逃往东都。

七月二十日（壬辰），杨玄感解除对洛阳的包围，率领大军向西进攻潼关（今陕西潼关西），对沿途百姓则声称已经攻克了东都，要继续向西拿下长安，宇文述等诸军则在后面紧追不舍，弘农（今河南灵宝）地处西进关中的必由之路，弘农太守是蔡王杨智积，颇有智谋，他对属官说："杨玄感看到大军集于洛阳才转而西取关中，如果他这个计策成功则难以平定了。我们要使用计谋将他阻止在此，不让他西进，不出十天准可将他活捉。"而当玄感军行至陕县（今河南三门峡）的时候，当地父老向杨玄感献计说："弘农城内守备空虚，而且有大量粮食储备，可以轻易攻占，占领弘农以后再继续西进，可使跟进的隋军无法利用弘农的粮食。"陕县父老所献之计正中杨智积下怀，实为下策。待杨玄感军行至弘农城下时，杨智积唯恐玄感绕城而走，登上城墙大骂杨玄感，玄感果然被激怒，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包围弘农城。李密急忙向玄感进谏说："你是以欺骗的手段蒙蔽众人随你入关，所以事不宜迟，况且后面的追兵很快就到，哪能在此逗留，若隋朝大军一到，前我们尚未占据潼关，退又无城可守，一旦部下逃散，就难以自保了。"玄感不听劝告，下令攻城。玄感命令士卒放火焚烧城门，而杨智积将计就计也在城门内纵火，杨玄感军不得入城。三天以后，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率领隋军追击而至，玄感不得已才放弃对弘农的包围继续西进。行至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双方军队开始接触，玄感将军队拉上盘豆（今河南灵宝西北），布下横亘五十里的一字长蛇阵，与官军边战边行，一天之内连吃三次败仗。八月一日（壬寅），玄感在董杜原（在今陕西潼关东），摆开阵式与隋军决战，宇文述与来护儿将军队排列在杨玄感军正面，派屈突通出奇兵绕到杨玄感背后，诸军合力将杨玄感打得大败，玄

感仪与十余人骑马逃出，将奔往上洛（今陕西商县），追赶的骑兵紧紧跟随其后，杨玄感返身大喝一声，追兵吓得纷纷后退而走，至葭芦戍（在今河南卢氏西），玄感下马与弟杨积善徒步而行，自知败局已定，不免一死，对杨积善说："我不想遭受被别人屠杀的耻辱，你就把我杀了吧。"杨积善果断抽刀将玄感斫杀，然后反刀自刺，未遂，被追兵所抓获，与玄感的首级一起送往隋炀帝处，杨玄感的遗体在东都被分尸，三天以后又将尸体切碎焚烧。杨玄感的弟弟杨玄奖为义阳太守，玄感起兵后，玄奖准备投奔，被义阳郡丞周旋玉所杀；杨万石自辽东逃回，至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住在驿站里，被监事许华俘获，送往涿郡被杀；杨民行为朝请大夫，被斩于长安；杨玄挺死于战阵之中；杨积善后亦被杀。杨素诸子均死于非命，可谓灭门之祸。隋炀帝又根据公卿大臣的奏请，将玄感之姓改为枭氏。

响应杨玄感起兵的韩相国虽然兵力发展至十余万人，然而听到杨玄感失败的消息后，众人即做鸟兽散，韩相国在襄城（今河南临汝）被俘而死。刘元进曾计划向北出兵支援杨玄感，未及渡长江而玄感已经失败，刘元进遂与朱燮、管崇二人合兵一处，以吴郡为根据地，刘元进称天子，朱、管二人称仆射，建置百官，继续与官军对抗，后败于王世充。

隋炀帝下令由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东都留守樊子盖负责推究杨玄感的党羽。李子雄与赵元淑先后被杀。李密在董杜原战败以后与杨玄感从叔杨询学逃出战阵，但不久又被捕获，与王仲伯等人一起被押往东都。韦福嗣叛逃至东都后，最初未被追究，后来樊子盖在检查杨玄感的文件时，发现杨玄感写给自己的策反书信是韦福嗣起草的，樊子盖即将韦福嗣起草的书信草稿寄送隋炀帝，隋炀帝命令将韦福嗣等押送行在之所，当时隋炀帝已还至高阳（即博陵、今河北定县），于是樊子盖派人武装押送韦福嗣、李密、王仲伯等十余人赴高阳。途中，李密对

众人说："我们的性命已朝不保夕了。现在路途之中尚有逃脱的机会，一旦到达高阳必死无疑，难道我们就乖乖就死，不想法逃命吗?"其中一人身上带有不少黄金，李密让他全部拿出来给负责押送他们的使者看，对使者说："到我们临死的那一天，这些金子全部都留给你，希望你能将我们的尸体掩埋，其余的全部送给你作为酬谢。"使者见有如此好处，就答应下来，对李密等人的防范也渐渐松弛。每天晚上李密都请人买来酒和食物，通宵达旦的饮酒喧闹，使者对他们的防备更加松懈。当行至魏郡(今河南安阳)石梁驿时，他们将看守者全部灌醉，李密、王仲伯等七人将墙壁凿穿逃脱。李密招呼韦福嗣一起逃，韦福嗣却说："我没有罪，天子对我至多不过当面责备一下而已。"执意不走，结果到高阳以后，隋炀帝将韦福嗣写的书信草稿拿给他看，韦福嗣无话可说，被收进大理寺监狱，与杨积善等人被车裂而死。

隋炀帝又对裴蕴说："杨玄感登高一呼就有十万人响应，可见天下人不能太多，人多了就相聚为盗，不将杨玄感的党羽斩尽杀绝，怎能惩戒别人。"樊子盖本来就生性残酷，裴蕴又得到隋炀帝的这一指示，于是大施严刑峻法，一共杀了三万余人，这三万多人多数都是冤枉的，他们的家属全都被没人官籍成为奴婢。被流放的有六千多人，象和杨玄感关系很好的著名文人虞绰、王胄等人。本与杨玄感起兵毫无牵连，也被流放到边疆地区。杨玄感在洛阳曾经开仓赈济百姓，凡是取米的都被活活坑杀。

十二月，卫文升与樊子盖到高阳拜见隋炀帝，隋炀帝赏给二人大量物品，以奖励他们抵抗、讨伐杨玄感之功。然后二人各自返回长安与洛阳，继续担当留守之任。

玄感借助民众的厌隋情绪，自大业九年六月三日起兵反隋，至八月一日败亡，前后历时五十八天。苏威曾借杨玄感起兵婉转劝戒隋炀帝减少兵役、劳役、安定民心，才可保天下不乱，然隋炀帝不加理会，却从杨玄感起兵得出天下人不能太多，多了就相聚

为盗的结论，对民众大加杀戮。以至大业十一年（615年）他回到洛阳后，在街道上看见行人往来很热闹，竟然对从官说："犹大有人在。"意思是说当年平定杨玄感后杀人太少了。隋炀帝如此仇视民众，所以尽管他暂时将杨玄感之乱平定下去了。但最终还是被民众起义所推翻。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2

《隋书》：《炀帝纪》、《苏威传》、《宇文述传》、《杨玄感传》、《李子雄传》、《赵元淑传》、《斛斯政传》、《李密传》、《刘元进传》

《北史》：《杨玄感传》、《赵元淑传》、《刘元进传》、《李雄传》

两唐书：《李密传》

王薄首举义旗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暴君，以荒淫残暴著称，由于他的暴政激化了隋朝社会的各种矛盾，引发了民众起义，最后导致隋朝的灭亡。

隋炀帝的暴政最突出地表现在徭役和兵役的过度征发上。上台伊始就大兴土木，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命尚书令杨素等营建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又命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在洛阳南面的寿安（今河南宜阳东南）营建显仁宫。五月，又修筑洛阳西苑。所需木石材料都采自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由所经州县民工接力运送，一根大木柱就需要三千人共拽。整个东都营建工程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每月征发壮丁二百万人。由于隋炀帝规定的工期短促，督促严急，累死的民工有十分之四五。在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的道路上，载运死亡民工的车辆每天往来不绝。大业三年（607年）七月，又征发一百多万男丁修筑长城，用了二十天完成，民工夜以继日地劳作，累死十分之五六。次年七月，再次征发二十余万男丁筑长城。大业元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又征发三百多万民工先后开挖和疏浚了几条运河，这项大工程又造成大量民工死亡。在开挖永济渠的时候，由于河北地区丁男供应不足，甚至征发妇女服役。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为准备征讨高丽，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监造战船，在元弘嗣等官吏的严厉监督之下，诸州役丁昼夜立在水中工作，不敢休息，自腰以下都生蛆了，死亡者达

十分之三四。又发动大量民工往高丽前线运送作战物资及粮草，在通往辽东的道路上，往来的民工常常有数十万人，昼夜不息，劳累致死者枕藉于路。除了这些大的劳役之外，其它劳役工程常年不断。例如，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东都洛阳及江都（今江苏扬州）三处尽管已是宫殿苑囿林立，但时间一长，隋炀帝便觉厌倦了，经常是左右顾盼，找不到合意的居处，不知所适。于是命有关部门送上全国山川地图，自己亲自在上面寻找名胜之地，用笔圈下，然后下令在那里建造宫苑，仅长安至江都运河沿线就建造了四十余座离宫。因此，隋炀帝在位的十几年间，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修建宫殿。

不但有徭役，还有兵役。隋炀帝好大喜功，经常发动带有扩张掠夺性质的对外战争。大业五年（609 年），隋炀帝率兵数十万亲征吐谷浑，此战虽大获全胜，但在班师路过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南）的时候，遭大风雪袭击，有一半以上的士兵被冻死。讨伐辽东所征兵员及造成士兵死亡数量就更大了。例如第一次讨伐高丽，出动兵力一百一十三万，结果大败而回，仅进攻平壤（今朝鲜平壤）的九路大军，渡过辽水时是三十万五千人，及回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东北），只剩下两千多人了。

据统计，从隋炀帝即位至大业八年（612 年），隋炀帝对劳役、兵役的大规模征发就有二十多次，合计共用人力三千多万人，其它无法估算人力的工程则还有很多。隋炀帝不仅征发劳役频繁，而且劳动强度大，军队出征的死亡率也很高，所以当时有“天下死于役”的记载。

隋炀帝的巡游无度也是著称于史的。他在位期间，居住京师长安的时间不足一年，居住东都洛阳的时间也不过四年多一点。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四处巡行游玩。其中一次西巡、三次北巡、三次南游。每次出巡，卫队及随行人员就有一二十万，还要征发民夫供役。例如，大业元年隋炀帝第一次南游江都时，仅挽船夫就用

了八万人。巡游时，沿途五百里内的州县都要献食，供献食物精美者加官进爵，献食不足或不精者获罪贬官。

隋炀帝的生活极其奢侈，肆意挥霍浪费。在洛阳修建的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有海，海中建蓬莱、方丈、瀛州三座山。每座都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参差座落着亭台殿阁。北面有一条蜿蜒的龙鳞渠，沿渠建造十六个院落，供宫女居住，院内殿堂楼台极其华丽。到了冬天，苑中树木凋零，就用彩色丝绸剪成树叶和花朵形状，缀于枝条之上，旧了再换新的，使苑内看上去总和春天一样，海内则命人将结冰去除，用彩色丝绸制成荷叶、荷花，安放在水面上，隋炀帝乘船在上面游玩。为游江都，制造了龙舟及各种杂船数万艘。为制造从陆路返回洛阳的乘舆、仪仗等物，耗费的金银钱物巨亿计。为向诸蕃国酋长夸耀富强，从大业六年（610 年）开始，每年正月在洛阳端门大街上设戏场，演出百戏，执丝竹者一万八千人，加上演员歌伎达三万人，百官夹路起棚纵观。隋炀帝还命令洛阳城内所有店肆必须装饰一新，整齐划一，路边的树都用丝绸缠绕，外国商人如进酒食店，可尽情享用，分文不取，并欺骗说："中国富饶，在饭店吃饭从来不交钱。"而外国商人却说："你们为什么不把缠树的丝绸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中国穷人做衣服呢？"

隋炀帝大兴土木，经常发动战争，肆意挥霍浪费，必然造成国库空虚，于是就加重对人民的赋敛。隋炀帝加重剥削的方法在历史上也是比较奇特的，他提前预征以后若干年的赋税。农民常年被征去服劳役、兵役，已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土地因农民没有时间耕种而荒废，农民的生计出现了问题，隋炀帝再加重剥削，更使农民没有活路。农民为了生存，为了逃避连年不断的劳役，为了不去高丽送死，只有起来反抗这一条路了。

在全国各地区中，今天山东、河北地区农民所承担徭役和兵役最重。隋朝征发徭役的原则一般是就近征发，为了征高丽而开

发永济渠，为征高丽而建造船只，向高丽前线运输粮草物资，这些大的劳役工程都落在山东、河北地区人民头上。隋炀帝为准备征辽，在山东、河北“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可见，这个地区的农民又是百万征辽大军的主要承担者，大业七年秋天，这个地区又遭受特大水灾，三十多个郡被淹，很多农民没法生存，被迫卖儿卖女，甚至自卖为奴婢。沉重的徭役、兵役，再加上水灾，使个这个地区的民众苦上加苦。

大业七年底，正当隋炀帝积极准备第一次侵略高丽的战争时，邹平（今山东邹平北）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第一个举起了反抗隋炀帝暴政的义旗，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王薄自称知世郎，意思是预知天下大局的发展趋势，并创作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农民参加他的起义队伍，歌词是这样的：“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档，长矟侵半天，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结果，周围逃避征役的农民都去投奔王薄，很快就达到数万人。

王薄义旗一举。首先在山东、河北地区获得响应，主要有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境内）的刘霸道起义，部众达十万人，号称阿舅贼；高鸡泊（今山东恩县境）的孙安祖起义，孙安祖自称将军；清河（今河北清河）的高士达起义，高士达自称东海公；还有活动于俞县（今山东夏津）一带的张金称起义。漳南（今河北故城东）人窦建德，为征辽大军的二百人长，曾帮助孙安祖入高鸡泊起义，后郡县官吏怀疑窦建德与义军有联系，将其家属全部杀害，窦建德被迫率领手下二百人投奔高士达。

接着，起义向其它地区蔓延，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境）爆发了由翟让为首领的起义。从此，各地义军蜂起，不可胜数，人数多在万人以上，至大业九年（613年），就形成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在黄河下游地区爆发的民众起义主要

有：杜彦冰、王润在平原（今山东平原）的起义，他们攻陷了平原郡城（今山东陵县）；李德逸及郝孝德各自在平原郡的起义，聚众都达数万人；韩进洛在济北（今山东聊城）的起义，聚众数万人；甄宝车在济北的起义，聚众一万多人；孟海公和吴海流各自在济阴（今山东定陶西）的起义，各聚众至数万人；郭方预在北海（今山东益都）的起义，自号卢公，众至三万人，攻克了郡城；孟让在齐郡（今山东济南）的起义；格谦在河间（今河北河间）的起义，自号燕王；孙宣雅在渤海（今山东阳信）的起义，自号齐王；孟让、格谦、孙宣雅聚众都达十余万人；吕明星在东郡（今河南滑县东）的起义，聚众数千人，围攻郡城；彭孝才在东海（今江苏连云港）的起义等等。在关中及陇右地区爆发的起义主要有：白榆妄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的起义，号称奴贼，声势很大；向海明在扶风（今陕西凤翔）的起义，自称弥勒佛出世，称皇帝，建年号白乌，聚众达数万人，在江淮及岭南地区爆发的起义主要有：陈瑱率众三万起义，攻陷了信安郡（今广东肇庆）；梁慧尚率众四万起义，攻陷了苍梧郡（今广东封川）；李三儿、向但子在东阳（今浙江金华）起义，聚众一万多人；苗海潮在永嘉（今浙江温州）起义；另外，杜伏威、辅公祏在山东地区起义后，渡过淮河，向江淮一带发展。

大业九年以后，各地的起义继续高涨，义军数量越来越多，据统计，达到一百多支，但由于多是孤军作战，力量比较分散，虽然有时也能攻城夺地，取得一些胜利，可是很多义军在举事不久即被隋军所镇压，还未能对隋王朝构成大的威胁。例如首举义旗的王薄在起义的最初两年，多次打败官军的进攻。官军多次失利后，派齐郡丞张须陀率领郡兵向王薄发动大规模进攻，王薄避其兵锋，向南转入鲁郡（治今山东兖州），张须陀跟踪追至泰山之下，王薄因多次取胜，产生轻敌思想，未加防备，张须陀率精锐骑兵出其不意发动袭击，大败王薄，义军死亡数千人。王薄收集散兵

一万多人掉头向北，准备渡过黄河，张须陀紧追不舍，至临邑（今山东临邑南）又大败王薄，义军又死亡五千多人。王薄率余众北渡黄河，与孙宣雅、郝孝德等联兵十余万，又南渡黄河向张须陀报仇，围攻章丘城。张须陀先派水军占领黄河渡口，切断了义军北还的道路，然后亲率步骑兵二万人向义军发动袭击。王薄等人又败，当退至河边，发现渡口已失，后面又有张须陀追兵，在前后夹击之下，义军遭受重大伤亡。

各地义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之后，逐渐认识到分散作战力单势孤容易被官军各个击破，如能联合起来才能抵抗强隋。另外，各支义军之间也不断地有互相火并，以大吞小的事件发生。这样，众多的义军经过主动的联合和互相兼并，到大业十二年（616年），在全国逐渐凝聚成三大支主力义军，这就是以翟让、李密为首的瓦岗军，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和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江淮起义军。从此，隋末农民大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0—182

《隋书》：《炀帝纪》、《食货志》、《张须陀传》

瓦岗军起义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的一天，唐高祖李渊在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举行大朝会，朝会结束后，唐高祖设盛大宴会招待文武百官。席间，君臣频频举杯，祝天下早获一统，愿大唐国运长久，场面十分热烈。可是，有一个人在这时候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就是不久前刚被任命为光禄卿的李密。想到自己尽管是兵败王世充后归唐，但仍然带人关中二万兵马，而且此举带动占据关东各地的部将也纷纷降唐，如此功劳仅得到一个光禄卿的职位。更难以忍受的是，在这个盛大宴会上，光禄卿要负责向皇帝及百官供应酒食，这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当初，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做魏公，统帅百万大军，是何等的风光！

确实如此，瓦岗军是隋末起义军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李密是后期领袖，前期首领是翟让，约创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王薄首举义旗后不久。翟让原为东郡法曹，因犯法人狱当斩。狱吏黄君汉素来佩服翟让仗义骁勇，一天夜里悄悄对翟让说："翟法司，天下大势如何发展，你我都看得很清楚，你难道就这么坐在狱中等死吗？"翟让闻听此言惊喜过望，说道："我现在就好比圈牢中的一只猪，生死全听凭您作主了。"黄君汉当即将翟让放出，翟让下拜说道："我蒙再生之恩固然可喜，您可怎么交待呢？"说着流下了眼泪。黄君汉生气地说："我本以为你是大丈夫，可以救生民于涂炭，故置生死于度外放你出狱，你怎么象妇孺一样又哭又谢的！你好自为之就行了，不要担心我。"于是，翟让逃到瓦岗

聚众起义，单雄信、徐世勣（茂功）都前往投奔。徐世勣对翟让说："我们都是东郡（今河南滑县）人，不宜在当地抢掠。宋（今河南商丘南）、郑（今河南郑州）两郡是御河流经之地，商旅来往不绝，劫获其财物，就足够我们享用了。"翟让接受徐世勣建议，率众进入二郡，劫掠运河中公私船只，取得大批粮食物资。来往于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和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的官马也多为翟让所掠夺。越来越多的人来投奔，兵势大振，达到一万多人。但这时的瓦岗军还仅局限于打家劫舍，并无争夺天下的远大志向。所以自起事以来四五年间，始终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大业十二年（616年）李密的加入，是瓦岗军迅速壮大的起点。

李密出身贵族世家，曾祖李弼是西魏的司徒，著名的八柱国之一；祖李曜是北周的太保、魏国公；父李宽是隋朝上柱国、蒲山郡公，累世显贵。李密初以门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袭爵蒲山郡公。一次，隋炀帝在仪仗队中发现李密特别引人注目，退朝后问许国公宇文述："刚才左仗下穿黑衣的小伙子是谁？"宇文述回答："故蒲山公李宽之子李密。"隋炀帝说："这小子的眼光左顾右盼，不要让他宿卫。"几天以后，宇文述对李密说："你出身显贵，又很聪明，应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不是养贤之所。"宇文述所言正中李密下怀，高兴地称病引退，潜心读书。后偶遇尚书令杨素，经过交谈，杨素知李密非等闲之辈，将来必成大器，命子杨玄感交结李密，二人成刎颈之交。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叛隋，以李密为谋主。兵败以后，李密逃入潼关（今陕西潼关东），藏在杨玄感从叔杨询家中。不久，为邻居告发被捕，押赴隋炀帝所在的高阳（今河北定县）。行至魏郡（今河南安阳）石梁驿时，李密等人将押解者灌醉，凿穿墙壁逃脱，前往平原（今山东陵县）投奔义军郝孝德。郝孝德不以礼相待，李密投齐郡（今山东济南）的义军王薄，王薄亦不愿收留。李密备遭饥馑，甚至剥树皮为食，走投无路，藏在淮阳（今江苏清江西）的村舍之

中，冒名刘智远，以教书为业。因郁郁不得志，做五言诗一首以抒怀："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涂士，空轸郁陶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不禁泪流满面。村中有人发现觉得奇怪，报告下邳太守赵他，赵他派兵捕获，李密又逃到雍丘（今河南杞县），投奔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君明以朝廷命官不敢收留通缉的要犯，就将李密安置在游侠王秀才家。后丘君明侄子丘怀义告发其事，隋炀帝亲自下令，命梁郡太守杨汪收捕李密。杨汪派兵包围王秀才家，正值李密外出，再次获免，丘君明、王秀才都因此被杀。

这时，在瓦岗附近活动的义军还有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的王当仁、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的王伯当、韦城（今河南东明西）的周文举、雍丘的李公逸等。李密自雍丘逃亡后，往来于各义军之间，游说他的取天下之策。开始无人相信，时间一长就渐渐被他说动了，互相议论说："此人是公卿子弟，志向不凡。今天下传言杨氏将灭李氏将兴。据说王者不死，此人再三逢凶化吉，遇难不死，取代隋朝的大概就是他吧！"对李密也都变得尊敬起来了。

李密遍历各义军后，知瓦岗军最强，就由王伯当引荐，拜见翟让。翟让想看看李密有什么本事，就派他去招降各小股义军。李密所到之处，都归附了瓦岗军。翟让大喜，召李密人大帐议事。李密对翟让说："刘邦、项羽二人都是起自布衣而至帝王。当今君昏于上，民怨于下，士兵死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昏君又放弃京都，巡游江都，这正是刘、项奋起之时，以您的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完全可以席卷二京，诛杀暴虐，灭亡隋朝。"翟让听罢说道："我落草为寇只为求生，您之所言我怕是做不到。"没有响应。正巧此时有一个叫李玄英的，自东都逃出寻访李密，来到瓦岗寨，说李密当取隋朝而代之。人问何以见得，李玄英说："最近民间流传

歌谣《桃李章》，歌词是：'桃李子，皇后绕杨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是说逃亡者乃李氏之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是说皇上与皇后留滞扬州不还，最终将转于沟壑；莫浪语，谁道许就是密字。"又有宋城尉房玄藻，怀才不遇，曾参加杨玄感叛乱，事败后隐姓埋名四处逃亡，这时来追随李密。李密带着房玄藻到各地游历，游说各义军首领。再回瓦岗时，跟随他的各大小义军首领有数百人。翟让见李密受到天下豪杰的拥戴，就想接受李密的建议，准备大干，但犹豫不决。翟让的军师叫贾雄，通晓阴阳占候，翟让对他言听计从。李密就结交贾雄，想通过贾雄从术数的角度劝说翟让，翟让犹豫不决之际就问贾雄，李密所言是否可行，贾雄占卜一番后说："吉不可言。"接着又进一步说："您自立恐怕事情不一定能成功，若立此人，事无不成。"翟让说："如你所言，蒲山公应该自立，何必来投奔我？"贾雄回答："这是有原因的。将军姓翟，翟就是泽，蒲离开泽不能生存，所以必须借助将军。"翟让一听还挺高兴，与李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于是李密献上第一条计策，他说："现在您手下士兵很多，却无固定的粮食来源，只靠掠夺度日，非长久之计，一旦强敌压境，必涣然离散。应该先拿下荥阳（今河南郑州），养精蓄锐，待士马强壮了再与人争夺天下。"翟让接受这一建议，先派兵攻下荥阳郡内各县城，并攻陷了金隄关（今河南荥阳北），士气大振。

大业十二年十月，隋炀帝命荥阳太守杨庆与荥阳通守张须陀讨伐瓦岗军。张须陀是隋末著名战将，镇压了多支义军。翟让也多次败在他的手下，现在一听张须陀率兵前来，非常害怕，想带兵远遁。李密说："张须陀有勇无谋，而且他没吃过败仗，一定非常骄傲。您只需列阵以待，我保证为您一战破敌，将其活捉。"翟让不得已，只得出战，李密在荥阳大海寺以北的树林中设下伏兵。张须陀素来轻视翟让，列成方阵进攻，翟让不利而退，张须陀向北追击，突遭李密伏兵袭击，隋兵一乱，翟让也停止了退却，前

后夹击，大败隋兵，张须陀力战而死。隋河南诸郡县得知张须陀被杀，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瓦岗军声威大振。于是，翟让令李密自建牙帐，统帅部分兵马，号称蒲山公营。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李密又向翟让献计说："现东都洛阳兵力不足，越王杨侗年幼，留守诸官政令不一，士民离心，据我所料，东都非我瓦岗所敌，将军如进图东都，天下可指麾而定。"于是派出间谍侦察东都虚实。但东都留守官员察觉了瓦岗军的意图，在加强守备的同时，派人赴江都告急，请求援兵。李密对翟让说："形势所迫，已不可不发。兵法曰：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今天下百姓苦于饥饿，兴洛仓屯有大量米粟，距东都一百多里，将军若亲率大军袭击兴洛仓，东都救援不及，可一举攻占。发放粮食赈济穷苦百姓，远近必然都来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然后传檄四方，号召天下豪杰齐力灭隋，大事定可成功！"翟让听罢说道："如此雄图大略不是我能担当起的。这样吧，你率兵先发，我来殿后，攻下兴洛仓我们再别做商议。"于是李密与翟让率七千精兵，乘敌不备，一举占领兴洛仓，打开仓门，任百姓自由取粮。

越王杨侗见丢了兴洛仓，急忙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等率步、骑兵二万五千人讨伐李密。当时东都人以为李密手下是些由饥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纷纷应募，象国子、太学、四门三馆的学生及一些纨绔子弟都来从军，衣服旗帜十分鲜艳华丽。又命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率所部兵迂迴至兴洛仓东面，与刘长恭合兵进攻李密。结果裴仁基误了军期，刘长恭如期而至。他为争头功，不等裴仁基，连早饭也不吃，就驱赶士兵渡过洛水，列阵向瓦岗军挑战。李密与翟让挑选精锐士兵分为十队，令四队设伏仓城东面以待裴仁基，以六队迎战刘长恭。刘长恭见瓦岗军兵少，有所轻视，结果双方一交战，由于隋兵饥饿疲惫，惨遭失败，士卒死亡一大半，刘长恭只身逃回东都。

经大海寺与兴洛仓两战，翟让主动让位，推李密为首领，号

为魏公。二月十九日（庚子），李密设坛场，即魏公位，改大业十三年为永平元年，设行军元帅府，以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府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事。远近各义军无不响应，齐郡的孟让，平原的郝孝德，林虑（今河南林县）的王德仁，济阴（今山东定陶西）的房献伯，上谷（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长平（今山西晋城东北）的李士才，淮阳（今属河南）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今安徽亳县）的张迁、黑社、白社，魏郡的李文相，济北（今山东东阿西北）的张青特，上洛（今陕西商县）的周比洮、胡驴贼等十几支义军都归附了李密。李密均授以官爵，使各领其众，共设置百营，兵力达数十万。建成周长四十里的洛口城作为大本营。李密又派房彦藻率兵向南发展，攻占了安陆（今属湖北）、汝南（今属河南）、淮安（今河南泌阳）等地。

三月，李密派孟让率步、骑兵二千人突入东都外廓城，烧掠丰都市而去。于是洛阳居民都迁入宫城，政府各部门都住满了人。李密率军进攻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县长柴孝和以城投降，被李密拜为护军。裴仁基因兴洛仓城之战误了军期，听说刘长恭败又不进兵救援，自知有罪，不敢回东都，屯兵百花谷（今河南巩县东南）固垒自守。李密知他进退两难，派人劝降，于是裴仁基率所部以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降，李密以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郡公。秦叔宝为裴仁基部下，李密得秦叔宝非常高兴。选军中骁勇者八千人自收，分录四骠骑，号为内军，秦叔宝与程咬金都被任命为骠骑，李密常对人说："这八千人足当百万。"

李密进一步部署向东都挺进。派裴仁基率二万余人袭击回洛仓（今河南孟县南），占领回洛仓后又率兵南下，烧毁东都宫城外天津桥，纵兵对东都外围进攻。东都出兵反击，裴仁基大败，回洛仓也丢了。李密率兵进攻偃师（今河南偃师）、金墉（今河南洛

阳东北）亦受挫。这时东都尚有兵力二十余万，布帛堆积如山，但缺乏粮食。杨侗派人运回洛仓米入城，以五千人屯丰都市，五千人屯上春门，五千人屯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连兵九营以防备李密。李密受挫后返回洛口，稍加休整，又亲自率兵三万进逼东都，杨侗派将军段达等出兵七万迎战，经激烈战斗，隋军败走，李密乘胜再次占领回洛仓，大修营堑，围逼东都。同时发起政治攻势。命祖君彦起草讨伐隋炀帝的檄文，移送各郡县，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又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斗争目标公然指向隋炀帝。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穿越各义军占领区，到江都拜见隋炀帝，报告说："李密有兵众百万，占据洛口仓，围逼东都。陛下如果赶快西还，乌合之众必一哄而散，不然，东都就要被攻陷了。"说完痛哭流涕。但隋炀帝无意离开江都，只派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兵救援东都。

柴孝和向李密献计说："关中阻山带河，地势险要，项羽弃之而亡，刘邦据之而兴。应令翟让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您自率精锐西袭长安。占领长安就有了可靠的基业，然后出兵向东，传檄可定天下。现在隋失天下，群雄争夺，恐怕有先我而占长安者，到那时后悔就晚了。"柴孝和所言，其实正是当初李密向杨玄感所献之计，杨玄感没有接受。这时，李密说道："你之所言，我也思考很久了。确实是上策，但我的部下都是山东（太行山以东）人，攻不下洛阳，他们谁愿意跟我西入关中？而且我手下诸将都出于群盗，我走之后，他们会互相争斗，那样一来，大业就要失败了。"李密也没有接受柴孝和的建议。

此时李密兵锋正锐，经常进入洛阳西苑与隋兵大战，屡屡获胜。后李密被流箭射中，卧于营内。杨侗知李密受伤，乘机派段达、庞玉等出兵。李密派裴仁基出战，瓦岗军大败，放弃回洛仓，返回洛口。庞玉屯兵偃师防备李密。

六月，李密再次率兵进逼东都，与隋军大战于平乐园（今河南洛阳东），李密在左侧排列骑兵，右侧排列步兵，中列强弩，敲响千只战鼓向隋军猛冲，东都兵大败，李密重新夺取回洛仓。杨侗再次向江都告急。七月，隋炀帝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率五万名江、淮劲卒，河北招讨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招讨大使虎牙郎将王辩各率所部兵马同赴东都，共讨李密。

这时，自太原起兵的李渊已占领了长安，他为了解除东顾之忧，主动派出使者与李密联络。李密自恃兵强，想做盟主，命祖君彦复信李渊说："我出于辽东，兄出于陇西，但同姓李氏。我德望浅薄，被四海英雄共推为盟主，所望诸英雄给予提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诛商辛于牧野。"李渊接信后笑着对左右说："李密真是妄自尊大。现在关中尚不稳定，如果拒绝他，则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他为我牵制东都之兵，我得以专心西征。待关中平定了，我们据险自守，观鹬蚌之争，可收渔人之利。"于是命温大雅复信李密说愿拥戴他作盟主。李密接信大喜，对左右说："既被唐国公推戴，天下不难平定了。"

九月，河南、山东一带发生水灾，饿殍满野，隋炀帝下诏开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赈济，但地方官吏不及时开仓，又层层克扣，致使每天饿死数万人。徐世勣对李密说："天下大乱的根本就是因为百姓饥馑，如果我们再拿下黎阳仓，大事定可成功。"于是李密派徐世勣率部下五千人北渡黄河，会同郝孝德、李文相以及洹水（今河北魏县西南）义军张升、清河（今河北清河）义军赵君德和前不久投降的武阳郡丞元宝藏联兵攻下黎阳仓，开仓任凭饥民取粮。十天之内，又有二十多万农民加入瓦岗军。齐郡、武安（今河北永年东），永安（今湖北新州）、义阳（今河南信阳）、弋阳（今河南光山）等郡县都相继投降李密，势力仅次于瓦岗军的河北义军领袖窦建德也向李密表示归附。

隋将王世充、韦霁、王辩等人先后率所部兵会集东都。九月

十一日（己未）越王杨侗命刘长恭率东都兵，庞玉率偃师兵，与王世充等共十余万兵众，出兵洛口讨伐李密，奉隋炀帝之命，由王世充节度诸军。十月二十五日（壬寅）夜，王世充渡过洛水，在黑石（今河南巩县南）扎营。第二天，留部分士兵守营，自率精锐向瓦岗军发起进攻。瓦岗军大败，柴孝和溺水而死。王世充进兵包围了与洛口城呈犄角之势的月城，李密则率麾下精兵直取黑石。黑石守军大惊，连举六烽向王世充告急，王世充见大本营遭袭击，当即解月城之围，回兵黑石，李密在半路邀击，大败隋军，杀敌三千余人。王世充不敢再战，坚壁不出。杨侗派遣使者慰劳，王世充诚惶诚恐，只得再次出战。十一月九日（丙辰），两军交锋，瓦岗军先由翟让出战，不利而退，王世充乘胜追击，王伯当、裴仁基突然从左右出现，将隋军横断为二，李密则率中军猛击，王世充大败，向西逃去。

这时，瓦岗军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翟让手下的一些部将对他让位于李密颇为不满，司徒府司马王儒信劝翟让做大冢宰，总领众务。以夺李密之权，翟让不听，翟让的哥哥翟弘也对翟让说："天子该自己做，怎能让给别人呢？你如果不愿意做，我就来做！"翟让听后付之一笑，并不以为意。但翟弘的话传到李密耳朵里，李密很不高兴，萌生了铲除翟让的念头。翟让为人贪得无厌，隋朝官员崔世枢投降瓦岗军，被翟让囚禁起来，让他交出珍宝，并欲动刑。元帅府记事邢义期与翟让赌博获胜，竟被翟让杖打八十下。翟让还对左长史房彦藻说："上次你率兵打汝南，得大量珍宝，全都给了魏公，为什么一点都不给我？魏公是我立起来的，将来还不知怎么样呢！"房彦藻一听害怕了，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密。并与左司马郑颋一起劝李密说："翟让贪愎不仁，有轻魏公之心，应早做打算。"李密说："天下未定就起内哄，对事业不利呀！"郑颋说："手若被毒蛇咬了，壮士可挥刀将手砍掉，为的是保全性命。如果他先动手，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于是李密下了杀掉翟让的决心。

十一月十一日（戊午），李密宴请翟让、翟弘、翟弘子翟摩侯也在邀请之列。翟让部将徐世勣、单雄信等在旁侍立，房彦藻，郑颋往来侍候。李密说："今日高官相聚，人不需多，左右只留下几人就行了。"李密亲兵闻言大都退下，但翟让的卫兵仍站立不动。房彦藻对李密说："天气寒冷，请赐给司徒左右酒食。"李密说："听司徒吩咐。"翟让说："很好。"房彦藻就把翟让的卫兵引到其它房间，酒食招待，这时只有李密的亲兵蔡建德在旁持刀侍立。酒过三巡，李密取出一张良弓，与翟让习射。翟让使尽全力张弓搭箭，未发之际，蔡建德从后面一刀砍去，翟让大叫一声，如牛吼一般，当即毙命。翟弘、翟摩侯、王儒信亦被杀死。徐世勣见状夺门而逃，被乱刀所伤，幸得王伯当救护而免死。单雄信等人一看只得叩头求饶。李密大声说道："我与诸位同起义兵，本为铲除暴乱。司徒凌辱群僚，专行暴虐，所以今日所杀只限翟让一家，与诸位无关。"亲自扶徐世勣坐下，为他治伤，又使单雄信等人至翟让大营安抚众人。为表示对翟让部下的信任，李密又单骑进入翟让营中亲加抚慰，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领其众。翟让旧部很快稳定下来。没有酿成大乱。最初，王世充以为一山不容二虎，指望翟让与李密发生内哄，他得以乘机破敌，当得知翟让被杀，大失所望，叹道："李密聪明果敢，成龙成蛇，深不可测！"

不久，有隋军士兵向瓦岗军投降，李密问："王世充现在在做些什么？"士兵回答说："这几天王世充大量募兵，并宴请将士，不知要干什么。"这时正是十二月的月末，李密对裴仁基说："我差一点被王世充算计了。因为我们这么长时间不出兵，王世充的粮食都快用尽了。所以他募兵飨士，想乘月黑之夜袭击仓城，应赶快做好准备。"命令郝孝德、王伯当、孟让分别率兵屯于仓城旁边，以待隋军。当天夜里，隋军果然前来袭击，由于瓦岗军有备，王世充大败，士卒死亡一千多人。王世充因屡战屡败，向越王杨侗上书，强调兵力太少，于是杨侗又派出七万东都兵援助王世充。

大业十四年（618年）正月，王世充既得东都援兵，向李密发起进攻，初战告捷，进屯巩县以北，命令诸军各造浮桥，渡过洛水进击李密。各军造桥速度不一，桥先成的先进，王辩最先渡过洛水，攻破洛口城外围营栅。瓦岗军一片惊惧，就在行将溃败之际，王世充不知王辩军已得势，见天色已晚，下令鸣金收兵。李密乘机率敢死队猛攻过河隋军，隋军反败，争先恐后逃往洛北，落水而死的一万多人。王辩、霍世举、刘长恭等诸将皆战死，洛北未渡河诸军也都溃散。王世充不敢回东都，率兵向北败退，仅与数千人到达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上书请罪，杨侗遣使赦免其罪，并赐与珍宝、美女加以安慰，召他回东都。于是王世充收集亡散，得一万多人，回屯含嘉城（今河南洛阳北），再不敢出战了。

李密则乘胜进据金墉城，东都城内日夜都能听见瓦岗军的钲鼓之声。几天之后，李密率三十万兵马布阵于北邙山，进逼洛阳上春门，越王杨侗派段达与韦津出兵迎战。段达出城后，望见李密兵势甚盛，不战而还。李密乘机进兵，隋军大溃，韦津战死，于是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及偃师守官各率所部降于李密，将作大匠宇文恺子儒童、职方郎柳续等人也向李密投降。李密又派房彦藻、郑颋等人向东分道招慰各郡县。此前，河南大郡荥阳的太守杨庆已投降了瓦岗军。这时，李密又向另一大郡梁郡（今河南商丘南）派出专使，劝梁郡太守杨汪投降。李密在给杨汪的信中说："当初在雍丘你派兵追捕我的事情，我早就把它忘记了。"并任命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于是杨汪也向李密派出使者，表示归附。这样，西至洛阳，东至大海，北至黄河，南至江淮，几乎所有郡县都归属于李密。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各义军首领都遣使到瓦岗军，劝李密取隋朝而代之，瓦岗军内部裴仁基等人也上表请李密建尊号、正帝位。李密均加以回绝，说："在平定东都之前，不可议论此事。"

这时，东都已成为一座孤城，越王杨侗的号令不出四门，人

心惶惶，皆无固志。朝议郎段世弘派人与李密联络，约定某日夜晚献城投降，不料事机泄露。杨侗命王世充将段世弘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当夜，李密如约前往，当得知段弘已被平定，又率兵返回金墉城。

四月，在江都发动政变后，率十余万精兵试图返回长安的宇文化及来到东都外围，被瓦岗军所阻，不得已引兵转向东郡（今河南滑县东），东郡通守王轨以城投降。宇文化及将辎重全部留在东郡，命王轨守卫，自己率兵向北进攻黎阳，试图抢占黎阳仓解决军粮问题。徐世勣见宇文化及来势凶猛，就放弃黎阳，退保仓城。宇文化及渡过黄河后占领了黎阳。分兵包围徐世勣。李密亲率步、骑兵二万救黎阳之危，驻兵清淇（今河南淇县东南），与徐世勣以烽火相应。李密知宇文化及缺粮，急于开战，故意不与之交锋，每当宇文化及向黎阳仓城发动进攻，李密就从后面袭击他。宇文化及大规模制作攻城用具，实施强攻，徐世勣在城外掘深沟固守，宇文化及难至城下。李密率轻骑五百赶援，仓城又出兵相应，宇文化及大败，攻城用具全被李密焚毁。

由于李密与东都长期相持为敌，现在又要与宇文化及作战，非常但心在对付宇文化及时遭东都袭击，而东都见宇文化及西来也十分恐惧，想利用瓦岗军阻挡宇文化及，使之两败俱伤。因此，在得知隋炀帝死讯后做了皇帝的越王杨侗派通直散骑常侍盖琮出使瓦岗军，用高官厚禄诱使李密。李密一见盖琮大喜，当即上表请降，请求讨灭宇文化及以赎罪，并派元帅府记室李俭等人东都面见杨侗，以表诚意。于是杨侗任命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命令他先平定宇文化及，然后人朝辅政。七月，杨侗又派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出使瓦岗军，在给李密的诏书中说："今日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从今以后便为一体，朝中大政等待您来掌管，征伐之事也有赖您来指挥。"李密跪受诏书，非常高兴。这样，李密就解除了西顾之忧，倾巢出动来

战宇文化及。

李密知宇文化及的军粮已快用尽，就假意与他议和，宇文化及大喜，以为将得李密的援助了，便放任士兵食粮。后得一瓦岗军降卒，被告知事情原委，方知是计，但此时粮食已经用尽。宇文化及大怒，率兵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决战于童山（今河南滑县北）之下，从清晨激战至傍晚，双方伤亡都很大，于是各自退兵。由于宇文化及屡战不胜，加之草尽粮绝，军心动摇，部将陈智略、樊文超、张童仁及王轨各率所部降于李密，宇文化及的兵力只剩二万人，害怕被瓦岗军歼灭，遂放弃西还计划，向北转移。李密知宇文化及元气大丧，已难成气候，就引兵西还，准备入东都朝见杨侗。正在这时，东都发生变乱，反对与李密议和的王世充杀死力主招降李密的内史令元文都等人，控制了政权。李密西行至温县（今河南温县东），听说元文都等人已死，就又回到了金墉城。

李密自杀翟让以后，渐渐骄傲起来，对士卒也不知爱惜了，又因为没有占据大都市，缺少绢帛钱币，战士立功者也得不到赏赐，而为了招降纳叛，对归附的降人待遇却很优厚，这些都引起瓦岗士卒的不满；杀害翟让事件虽然没有酿成大乱，但使李密的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手下将佐对李密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徐世勣曾在一次宴会上指责李密的过错，李密很不高兴，派他出镇黎阳，名为委以重任，实则有疏远之意，所以手下将领也出现了一种离心的倾向；李密开洛口仓散发米粟，缺乏管理，听凭众人任意搬取，有人取粮太多，搬不动了，就丢在路上，自仓城至城郭大门，路上米厚数寸，被车马践踏，没有容器就用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到处都是淘洗时遗漏的米，看上去象白沙一样，李密高兴地对元帅府司兵参军贾闰甫说："真可谓足食啊！"贾闰甫回答："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百姓之所以归附如流，正因为食这个天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对粮食不知爱惜，一旦米尽民散，您的大业就难以成功了！"另外，经童山大战，劲卒良马伤亡很大，

损失严重。这些都是对瓦岗军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李密身为主帅，对此却估计不足，以为东都经多次失败以后，兵力已十分虚弱，将相之间又互相残杀，可轻易将其平定。

王世充自控制东都政权以后，为收买人心，厚赏将士，又加紧修造器械，做与李密决战的准备。但王世充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缺少粮食，于是他提出用布帛与瓦岗军进行交换。李密知道瓦岗军对布帛的需求虽然也很迫切，但对军队来说，粮食更加重要，所以拒绝了王世充的建议。但右长史邴元真等人觉得在这种交易中有私利可图，反复劝说李密，于是李密答应进行交换。这是李密的一个失误。原来，因东都缺粮，每天有数百名隋军投降李密，自得瓦岗军粮食接济，前来投降的隋军越来越少，李密非常后悔，终止了这笔交易。

王世充想乘瓦岗军童山大战后元气尚未恢复之机出击李密，但又担心士气不高，就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夜梦周公，说周公将助隋军出战，而且要急速出兵，必能获胜，如若不然，士兵都将得瘟疫而死。王世充部下士兵多是楚人，笃信鬼神，纷纷请战。于是王世充挑选精锐二万余人，良马二千余匹，于九月十日（壬子）出兵进攻李密，旗幡上都写着“永通”二字，军容十分齐整。十一日（癸丑），隋军到达偃师，在通济渠以南扎下营寨。李密则留王伯当守金墉城，自率精兵赶到偃师，沿北邙山列阵迎战。

李密召集诸将开会，商讨拒敌之策。裴仁基说：“王世充倾巢出动，洛阳必然空虚。可以分兵把守要路，不让他向东进兵，挑选精兵三万进逼东都，世充还救东都，我就收兵，世充再出兵，我又进逼东都。这样，使他疲于奔命，然后可以破之。”李密说：“你说的对极了。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第一，士卒、武器精锐；第二，有备而来，决计深入；第三，食尽求战。我只要固守城池，养精蓄锐，他求战不得，不过十日，自然失败。”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等人则说：“王世充兵力并不多，而且屡战屡败，都已经丧

胆。兵法曰：'倍则战'，我们的兵力何止数倍于他，战之必胜！"诸将纷纷附合，主战者占十分之七八，李密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决定迎战，裴仁基苦争不听，用手击地叹道："您一定会后悔的！"元帅府文学参军魏徵私下对长史郑颋说："魏公虽然屡战屡胜，但骁将锐卒死伤甚多；又军无府库，战士立功得不到赏赐，所以都不奋勇立功。有这两个因素难以应敌。而且王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以与之争锋。你要劝劝魏公，不如深沟高垒拒战，不过十天半个月，王世充粮尽，自然退兵。我再纵兵追击，战无不胜。"郑颋说："你是老生常谈。"魏徵生气地说："这是奇策，怎么是常谈！"说完拂袖而去。

程咬金率马军与李密同在北邙山扎营，单雄信率外马军扎营于偃师城北。王世充派数百名骑兵渡过通济渠进攻单雄信，李密派裴仁基之子、上柱国裴行俨与程咬金援助单雄信。裴行俨骁勇善战，单骑赴敌，被流箭射中，坠马落地。程咬金上前抢救，连杀数人，将裴行俨抱上自己的战马奔还己阵。隋军紧追不舍，长矛从后面刺透程咬金的身体，程咬金返身折断长矛，斩杀追者，与裴行俨俱得生还。这时天色已晚，各自鸣金收兵。瓦岗军损失惨重，除裴行俨与程咬金外，孙长乐等十几员骁将皆遭重创。

当天夜里，王世充派二百骑兵潜入北邙山，埋伏在山谷之中。十二日（甲寅）清晨，王世充集合士兵说："今日之战不仅仅是争个胜负，是生是死在此一举，如能获胜，大家都可富贵，如若战败，我们谁也活不了。所以我们既是为国而战，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各自努力吧！"说完，率兵直奔李密营垒。李密出兵迎战，尚未布成战阵，王世充突然发起进攻，王世充事先将军中一相貌类似李密的人捆绑起来，双方正在激战时，将此人牵至阵前，令士兵大声呼喊："李密已被活捉！"隋军士兵皆高呼万岁。这时，埋伏在北邙山中的伏兵冲下山来，纵火焚烧李密营垒。于是瓦岗军大败，陈智略、张童仁举兵投降，李密率一万多人逃亡洛口。王

世充进围偃师，偃师守军叛变，劫持守将郑颋，开城门投降，偃师城中的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数十名瓦岗军将佐全被俘虏。

王世充又率兵进军洛口。守卫洛口的是右长史邴元真。邴元真原为县吏，因贪赃犯罪，逃往瓦岗寨，为翟让所用，及李密建元帅府，翟让推荐邴元真为长史，李密不得已而用之，但并不让他参予重大决策。邴元真为人贪鄙，宇文温曾对李密说："不杀邴元真，将来必为大患。"此话传到邴元真耳中，就阴谋叛变。杨庆得知邴元真心迹，告知李密，李密将信将疑，未采取果断行动。这时，李密率败兵准备进入洛口城，而邴元真已经派人去迎接王世充了。李密知邴元真已经叛变，佯装不知，想等王世充率兵来到，乘其半渡洛水之时予以打击。可是，王世充军至洛水时，哨兵没有发觉，等发觉后准备出战时，王世充军已全部渡过了洛水。在此关键时刻，单雄信又不听指挥，据兵自守。李密自知不能取胜，率兵向东，奔往虎牢(今河南荥阳西)，邴元真以洛口城降于王世充。

单雄信异常骁勇，精于马上使枪，名冠诸军，军中号称"飞将"。但单雄信为人轻于去就，房彦藻曾劝李密将其除掉，但李密爱其才，不忍心下手。这时，单雄信见李密大势已去，遂率所部投降了王世充。

李密将前往黎阳，有人对李密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差一点死于乱刃之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信任他吗?"李密也自觉对徐世勣的为人没有把握，就打消了去黎阳的主意。这时，王伯当放弃金墉城，据守河阳，于是李密自虎牢赶往河阳，与诸将商议下一步将如何行动。李密提出南依黄河之险，北据太行山，东连黎阳，再图进取，诸将皆以为不可行，说："现在刚刚失利，众心涣散，士无斗志，难以成功。"李密说："我所依仗的就是诸位，大家既然觉得不可行，我就无路可走了。诸位跟着我辛苦了，今我以一死来感谢大家!"说完就要自刎。王伯当抱住李密大声痛哭，诸将也都流下了眼泪。李密见状说道："诸位既然信得过我，那就

跟随我去关中吧，我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保证可使诸位富贵。”元帅府掾柳燮说：“您与唐国公同族，又曾有书信之盟约，虽然没有参与唐公起义，但牵制东都隋军，使唐公不战而取长安，这也是您的功劳呀！”这一提议得到一致赞同。李密又对王伯当说：“将军家富人多，难道也与我们一起走吗？”王伯当回答道：“当初楚汉之争，萧何率子弟追随汉王，伯当所恨不能使兄弟子侄全都相随魏公，哪能见您今日失利而轻于去就呢！此行纵然葬身原野也无怨言。”左右众人无不感动。于是跟随李密入关者达二万人。瓦岗军原控制区域的郡县大都投降了东都。

在长安建立唐朝的高祖李渊听说李密来降十分高兴，接连派出使者迎接。李密见状大喜，对诸将说：“我有兵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数百座城池都曾归我统辖。得知我已归唐，遣使招之，必然都来归附，比之窦融以河西之地归汉光武帝，功亦不小，怎么也能让我做一名宰相吧！”十月八日（已卯），李密 到达长安。李密 在山东的部将李育德、刘德威、贾闰甫、高季辅等人听李密已至长安，也各以城邑或率部众投降唐朝。占据北海（今山东益都）的义军綦公顺曾归附李密，见李密归唐，也随之投降了唐朝。占据黎阳的徐世勣这时归属未定，正在观望。跟随李密至长安的魏徵向李渊上书请求前去招降，经魏徵劝说，徐世勣决定降唐。对其长史郭孝恪说：“这里的土地与民众都是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献之，是乘魏公之败，窃为己功以求富贵。应该把这里郡县的户口数和兵马数告诉魏公，让他自己献给唐朝。”于是派郭孝恪前往长安。李渊听说徐世勣的使者到了，没有上表，只有给李密的一封信，非常奇怪，召见郭孝恪，才知徐世勣之意，慨然叹息道：“徐世勣不背叛旧主，不贪功，真是一名纯臣！”于是赐徐世勣姓李氏。但同时，这件事也增加了李渊对李密的猜疑、防范之心。

李密自以为对唐朝有功，可官至宰相，但是，到长安以后，有关部门并没有予以热情接待，部下的士兵竟然一连几天吃不上饭，

引起众人不满。李渊表面上对李密很亲热，经常以弟相称，并将外甥女嫁与李密为妻，但仅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使李密大失所望。朝臣对李密 也不够尊重，执政的宰相甚至向李密索要贿赂，李密心中愤愤不平，整日闷闷不乐。开头所说的朝会献食之事发生以后，李密更觉得受到奇耻大辱。退朝以后，向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的王伯当倾诉。王伯当说："天下之事应在您的算计之内。现在徐世勣在黎阳，张善相在罗口（今河南巩县南）都是您的部下，河南的形势将被他们左右，所以您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李密一听大喜，向李渊献计说："臣蒙受国家的宠幸，闲居京师不能报效，心中不安。山东之众都是我过去的部下，请求派我前去收抚。凭借大唐国威，取王世充如俯身拾物一般！"这时，李密过去的将士多数都归附王世充，李渊决定派李密去收抚。唐多数朝臣都不同意，他们认为李密非常狡猾，如派他去，无异于投鱼于水，放虎归山，肯定不会再回来了。李渊说："为天子者自有天命，无天命者不能得之，即便李密叛去，不过如将蒿做的箭射人蒿草之中，必无所作为！今天派他前去，与王世充相斗，我可以坐收渔利。"李密请求与贾闰甫同行，李渊答应了。命李密与贾闰甫登上御榻。赐以酒食，并传饮一杯酒，说："我们三人共饮这一杯酒以表明同心协力。大丈夫一言既出，千金不易。有人坚决不同意让弟出行，但我与弟推心置腹，不是别人所能离间得了的。"李渊又派王伯当为李密的副手同行。

十二月一日（辛未），李密率旧部从长安出发，前往山东。李渊尽管力排众议，派李密出行，但对李密也是放心不下，所以当李密行至华州（今陕西华阴）的时候，李渊下达一项命令，命李密将旧部的一半留驻华州，只率另一半兵马出关，长史张宝德害怕李密一去不回，自己受到牵连，在华州上密表，说李密必叛。李渊这时也后悔了，想将李密调回，又怕激起李密反叛，就下一道敕书，命李密让所部减速前进，自己单骑入朝，有要事相商，李

密行至稠桑（今河南灵宝北），接到李渊敕书，对贾闰甫说："派我出行，现在无故又将我召还，临行时，天子说有人坚决不同意让我出行，现在谗言起作用了。我若回还，必死无疑。不如索性攻破桃林县（今河南三门峡西），劫其军粮，向北渡过黄河，等消息传到熊州（今河南宜阳西），我已远走高飞。一旦到达黎阳，就大功告成了。你意下如何？"贾闰甫说："天子待您不薄，您怎能生反叛之心呢？况且任环和史万宝镇守熊州，这里早晨举事，熊州兵晚上就能赶到。为您考虑，不如暂且听从朝命以表明本无异心，谗言自然不攻自破。如果不愿在长安，想到山东发展，将来等机会再说。"李密生气地说："唐朝让我与周勃、灌婴之流同列，怎么能忍受得了！谶文说姓李的可得天下，说不定指的是谁呢。他没有杀我，听凭我东行，足可说明王者不死。纵然唐稳定了关中，山东最终还是为我所有。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怎能不要，却回去等着束手就擒！你是我的心腹，怎么不与我同心呢？我主意已定，违命者斩！"贾闰甫哭着又说："您虽然与谶文相应，但近察天象人事，已相去甚远。观天下分裂，人人都想称王，谁还愿意听您指挥呢？而且自从翟让被杀，人人都说您弃恩忘本，过去的旧部谁还肯将手中之兵交给您？他害怕被您夺去兵权，必然抗拒，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如果不是您的心腹，谁肯对您说这番话。望您三思而后行！"李密一听大怒，想杀贾闰甫，被王伯当等人劝阻，于是贾闰甫逃往熊州。王伯当亦劝李密不要起兵，李密不听。王伯当说："义士之志，不以生死存亡改变，伯当我受您的厚恩与赏识，定以性命相报。您既然不听我的劝告，我只有与您同行，死而无怨，只怕是不能成功呀！"

于是，李密将李渊使者斩首，十二月三十日（庚子）清晨，挑选骁勇之士数十人，身着妇人衣，头戴幂䍦，（妇女遮面头巾），藏刀于裙下，诈称李密妻妾进入桃林县舍。瞬间，脱去妇人服装，挺刃而出，占领了县城。接着率兵东进，并派飞骑驰告故将张善相

出兵接应。镇守熊州的唐右翊卫将军史万宝对副将盛彦师说："李密诡计多端，又有王伯当相辅，恐怕势不可当。"盛彦师笑着说："请给我几千兵马，定能将其斩首。"史万宝问："你以何策破敌？"盛彦师说："兵法尚诈，现在不能说。"于是盛彦师率众进入熊耳山（在熊州以南），埋伏于山谷之间，下令等李密军半渡山涧之时出击。有人问："听说李密要往洛阳，您为什么要率兵向南入山呢？"盛彦师说："李密声言向洛，其实是要出其不意，往襄城（今河南临汝）依靠张善相，我在这里设伏，定可将其擒获。"李密自桃林东行不久，果然向南进入熊耳山，结果遭盛彦师袭击，李密与王伯当俱力战而死。

李渊担心徐世勣听说李密被杀，不明真相，起兵作乱，派人将李密首级送到黎阳，通报李密图谋造反的前后经过。徐世勣见李密首级，面向北下拜痛哭。上表请求收葬，李渊又将李密尸体送到黎阳。徐世勣身着丧服，命三军缟素，按君臣之礼葬李密于黎阳山南。李密素来得瓦岗将士拥护，故将士无不痛哭，有的都哭得吐血了。邴元真投降王世充后被任命为行台仆射，镇守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李密故将杜才干恨邴元真背叛李密，葬送了瓦岗军的事业，向邴元真诈降，后伺机刺杀邴元真，用其首级祭奠李密的坟墓。

轰轰烈烈的瓦岗军起义以李密被杀为标志终告结束，它是隋末所有义军中声势最大、作战最为英勇的一支，是推翻隋王朝的主力军。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3—186

《隋书》：《炀帝纪》、《李密传》、《王世充传》、《裴仁基传》

两唐书：《李密传》、《李勣传》

窦建德起义

窦建德是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人，世代务农，自称是汉景帝太后的父亲安成侯窦充的后代，胆量勇力过人，重义尚侠。有一天夜晚，家遭强盗抢劫，窦建德站立门后，连续击死三人，其余强盗再不敢人，请求归还同伴尸体，建德命其用绳拽出，强盗将绳投人，建德系在自己身上，被强盗拽出后，跃起挥刀，又杀数人。还有一次，乡人丧亲，无力举办丧事，当时建德正在耕田，听说后，当即解下耕牛送与丧主，供办丧事之用。因此，建德闻名乡里，为乡党所归附。他父亲死后，乡人送葬的达一千多人。但所有赠送之物，一概不受。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为大举讨伐高丽，在黄河以北地区“扫地为兵”，窦建德也在其中，并以勇敢被选为二百人长。当时山东发大水，人户流散，同县人孙安祖家被水漂没，妻儿冻饿而死，但他也在被征之列。孙安祖面见县令，请求免征。县令不但不答应，反而大怒，处孙安祖以笞刑。孙安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杀了县令。事发后，孙安祖投奔到窦建德家隐藏起来。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帝之时，天下强盛，发百万之众讨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洪水泛滥成灾。百姓穷困，皇帝不加抚慰，反而发兵去讨高丽，而且往年西征的士兵活着回来的不到十分之一，今又发兵，人情危惧，天下必将大乱。大丈夫只要不死，就要建立大功，怎能象这样东躲西藏呢！”于是窦建德招集附近一带的逃兵和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孙安祖率领，到附近的高鸡泊落草起

义，孙安祖自称将军。

这时，在王薄起义的带动下，山东、河北地区已是义军蜂起，在漳南附近的义军就有清河（今河北清河）自称东海公的高士达起义，俞县（今山东夏津）的张金称起义等。这些义军经常往来漳南、干些劫掠财富、焚烧宅舍的营生。因窦建德为人轻利重义，为义军所敬仰，所以每次都是窦建德所居的闾巷免于浩劫。因此，郡县怀疑窦建德私通盗贼，将建德一家老小全部收捕杀害。此时，窦建德随征辽大军行至河间（今河北河间），听此噩耗，当即率麾下二百人南下，加入到高士达的队伍当中，高士达任命窦建德为司兵。不久，孙安祖与张金称发生火并，孙安祖被杀，于是孙安祖部下数千人转投窦建德。窦建德为人仗义，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人争归附，很快达到一万多人，士兵也愿为他尽死力，成为河北诸义军中很强盛的一支，仍以高鸡泊为根据地。

大业十二年（616年），涿郡通守郭绚奉命率兵一万余人讨伐高士达。高士达自起事以来未经大战，见郭绚来势汹汹，不免有些胆怯，自知才略在窦建德之下，遂提升建德为军司马，委以全权指挥的重任。窦建德初掌大权，欲立奇功以在全军树立威望，请高士达守卫营垒、辎重，自率精兵七千人迎郭绚而进，诈称与高士达不和而分道扬镳；高士达则宣称窦建德背叛，从俘虏中取一妇人，佯称是建德妻子，于军中斩首，以迷惑郭绚。这样，窦建德遣使向郭绚请降，并求为郭绚前锋，破高士达以报仇，郭绚信以为真，率兵跟随窦建德至长河（今山东德州东）。窦建德乘其不备，发动袭击，大破隋军，杀死数千人，获马一千多匹。郭绚率数十骑向南逃遁，至平原（今山东平原）被追兵所获，斩其首献于高士达。此战大大提高了窦德的威望。

在郭绚讨伐高士达的同时，太仆卿杨义臣也奉命率兵一万余人进攻张金称，结果张金称兵败被杀，亡散之众都转投窦建德。杨义臣欲乘胜进兵高鸡泊，荡除高、窦义军。窦建德对高士达说：

"历观隋朝诸将，唯杨义臣最善用兵，今又新破张金称，其势锐不可当，应避其兵锋，使其求战不得，待其将士疲倦，粮草殆尽之时，出兵袭击，定可破敌。若与其争锋，恐怕我们不是他的对手。"高士达一则见窦建德轻易击败郭绚，以为杨义臣也不过如此，因而产生轻敌思想；再则见窦建德以军司马立功，声望鹊起，于己不利，故急于建功，以巩固自己的首领地位，不听窦建德的劝告，留窦建德守卫营垒，自率精兵迎击杨义臣。高士达初战小胜，便大摆宴席，纵酒庆祝，以为杨义臣指日可破，不在话下。窦建德闻听后说："东海公尚未破敌就妄自矜大，怕祸不旋踵了。隋兵获胜以后，必长驱而来。营垒怕是不能保全了。"遂留众人守垒，自率精锐百余人出营占据险要，以防士达之败。五天以后，杨义臣果然大破高士达，高士达被斩于阵前，杨义臣乘胜进至高鸡泊大营，营中守军顿时溃散，窦建德率百余人向北逃窜，行至饶阳（今属河北），乘守军无备，一举攻克，收抚饶阳士众，又得三千多人，杨义臣以为高士达已死，高鸡泊也被荡平，窦建德再难成气候，故未追击，引得胜之师而去。

窦建德见杨义臣退兵，又率众南下，至平原，收葬高士达军死亡士兵，为高士达发丧，招集溃散军卒，得数千人，军势复振，窦建德开始自称将军。此前，诸义军凡捕获隋朝官员及士族子弟，一概杀死，只有窦建德以礼相待，故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少隋朝的郡县长吏向窦建德投降，使其势力日益壮大，兵至十余万人，成为河北地区最强大的一支义军。至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五日（丙辰），窦建德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立为长乐王，建年号丁丑，设置百官，分治郡县，正式建立政权。

七月，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受隋炀帝之命，率精兵三万南下讨伐围困东都的瓦岗军。同时兼有翦灭沿途义军的任务。行至河间，首先遇到了窦建德。薛世雄在城南七里井扎下大营，准备向乐寿发起进攻。义军士众一片惶惧，窦建德也感到没

有取胜的把握，他向一女巫占卜凶吉，问女巫："我率众躲避薛世雄怎么样？"女巫答道："不免。"窦建德又问："若率众投降呢？"女巫回答："亦不吉。"窦建德再问："若乘其不备袭击呢，结果如何？"女巫答："若今夜天明之前到，大吉。"于是窦建德下令义军撤出所占据的各城镇，向南退却，声言逃往豆子䴚（今山东惠民境内）。薛世雄以为窦建德害怕自己，防备也就松弛了。至夜晚，窦建德率敢死之士一千人掉头向北急行，偷袭薛世雄大营。敢死队出发地点距七里井一百四十里，窦建德与部下相约：至七里井时，若天色尚暗，则突袭敌营；若天色已明则投降。当急行至距七里井还有一里多地的时候，天色将要放明，窦建德顿时害怕起来，命令停止前进，准备向薛世雄投降。正在犹豫之际，突然，大雾从天而降，人隔咫尺而不见，窦建德大喜曰："天助我也！"遂率敢死队突入隋营。隋兵惊恐万状，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死亡一万多人，薛世雄见溃败之势已不可遏制，就率领数百名骑兵逃归涿郡（今北京），余众尽被窦建德所俘获。至涿郡后，薛世雄因惭愧忧愤发病而死。

于是，窦建德乘胜围攻河间。河间郡丞王琮率众坚守，窦建德久攻不下。大业十四年（618 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发动政变，隋炀帝被杀。消息传来，王琮率河间郡官员及士众为炀帝发丧。窦建德得此消息，也向河间派出使者，吊唁隋炀帝。这时，河间城由于久被围困，粮食将绝，已很难坚守，而且，隋炀帝已死，亦失去了为隋坚守城池的意义，于是，王琮通过窦建德派去的使者向义军请降。窦建德当即退兵三十里，并备办酒食等待王琮。王琮将自己捆绑起来，率领属官来到义军大营。窦建德亲自为他松绑，言及隋朝灭亡之事，王琮痛哭流涕，窦建德为之下泪。诸将中有人说道："王琮久拒我军，我众多将士死于河间城下，现在他无力坚守，被迫出降，今请将其烹了，以告慰全军。"窦建德说："王琮是忠臣义士，我正要奖赏他以劝励人们

忠于君上，怎么能杀呢！过去我们在高鸡泊中那是做草寇小盗，自可随意杀人，今天我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决不可杀害忠良！”于是下令三军：“凡先前与王琮有怨仇而敢轻举妄动者，夷灭三族！”并授王琮为瀛州刺史。在此之前，窦建德攻陷景城（今河北沧州西）的时候，抓获景城户曹张玄素，要将其杀害，有县民一千多人请求代死，说：“张户曹为官清正，大王如果将他杀了，怎么能劝善呢！”窦建德将张玄素释放，并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张玄素固辞不就。这时，窦建德又任命他为黄门侍郎，因此时隋朝已亡，张玄素也就欣然接受了。又有隋饶阳县令宋正本，为窦建德攻克饶阳时所获，此人极有学识，向窦建德献上平定河北之策，窦建德将宋正本尊为谋主，参决军机大事。由于窦建德对隋朝官吏采取拢络政策，特别是他对王琮的处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河北郡县争相归附。窦建德将乐寿定为都城。号称金城宫，百官行政一依隋开皇制度。

这一年冬至，窦建德在金城宫大会百僚，有五只大鸟降落在乐寿，跟随而至的群鸟达数万只，停留一天才飞去。窦建德将此视为祥瑞，因改年号为五凤。又有一宗城人向窦建德献上玄圭一枚。原隋景城县丞孔德绍说：“这是当年上天赐予大禹之物，今王得之，请改国号曰夏。”于是义军正式称夏国，窦建德称夏王，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窦建德在稳固控制河间郡的基础上，图谋进一步向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周边各郡发展。上谷（今河北易县）的王须拔自号“漫天王”，聚众数万人，是河北地区另一支势力较大的义军，后王须拔在进攻幽州（今北京）时中流箭而死，其副将魏刀儿代领其众，号称“历山飞”。以深泽（今河北深泽）为根据地，活动于冀（今河北冀县）、定（今河北定州）二州之间，有士众十万人。窦建德遣使往深泽，假称连和，使魏刀儿放松了对窦建德的戒备。不久，窦建德突然发兵，一举攻占深泽，斩魏刀儿，将其领地吞

并。接着，西部易（今河北易县）、定两州的原隋朝守官也先后投降了窦建德，只有南面的原隋冀州刺史麹稜，依附于唐，坚守不下，窦建德猛攻不舍。麹稜的女婿崔履行自称可以奇术破敌，使攻者自败。麹稜愚腐，信以为真，令其施展。崔履行设立坛场。命守城的都坐下勿动，说："就是贼兵登上城墙，你们也不要害怕，我可以让他们把自己捆绑起来。"至夜晚，崔履行身着丧服，手持竹杖，登上北城楼恸哭，又命妇女站在屋顶上向不同方向摆动裙子。窦建德急攻，麹稜登城将战，崔履行竭力阻止。不久，城池被攻陷了，崔履行恸哭的仪式尚未结束。窦建德对麹稜以礼相待，用为内史令。

窦建德攻陷冀州以后，兵势更加强盛，遣使者招降原隋涿郡留守罗艺。罗艺不从，越过窦建德向唐递上降表，唐任命罗艺为幽州总管。窦建德大怒，帅十万之众进攻幽州。罗艺将战，薛世雄之子薛万均说："敌众我寡，出战必败，不如命羸弱之兵背城阻水列阵，敌兵必会渡水向我进攻，让我率精骑百人埋伏于城旁，待其半渡之时出击，无往不胜。"罗艺即按薛万均之计布阵，窦建德果然率兵渡河，遭到袭击，使锐气受挫，接着，力攻不能克，围城百余日后，引兵返回乐寿。

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后，率隋军精锐骁果西还长安，当行至洛阳附近时，为瓦岗军所阻，双方在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大战，宇文化及败走魏县（今河北大名东），鸩杀隋炀帝子秦王杨浩，自称皇帝，又遭唐淮安王李神通攻击，宇文化及力不可支，东走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

窦建德听到宇文化及称帝的消息后，对宋正本和孔德绍说："我为隋民数十年，隋为我君已两代，今宇文化及弑之，大逆无道，他就是我的仇人，我想兴兵讨伐，诸位以为如何？"孔德绍说："隋朝失鹿，天下英雄共起逐之，大王以布衣崛起漳南，隋郡县官吏争相归附，这是因为大王是顺时而动，以义安天下。宇文化及

与国家联姻，父子兄弟都蒙受隋朝厚恩，身居不疑之地，却行弑逆之事，进而篡隋自立，是天下之公敌，如不对他进行讨伐，难成诸路英雄之盟主。”窦建德听罢连声称善，即日率大军南下聊城讨伐宇文化及。窦建德使用撞车机石，四面急攻，终于攻陷城池，生擒宇文化及。窦建德入城后，先谒见萧皇后，口称臣下，身着素服，痛哭隋炀帝，接收隋朝的传国玺及卤簿仪仗，并安抚百官。然后将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等江都政变的首恶分子处斩，枭首辕门之外，将宇文化及及其二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用囚车押至襄国（今河北邢台）斩首。对原隋朝官员则一一加以任用，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负责官员的选举，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对不愿留在河北，欲投奔关中及东都者，听其自便，给足盘缠，派兵护送出境。隋朝的骁果卫士被俘虏的尚有一万人，窦建德也将其遣散，任其各奔东西。

不久，窦建德又攻陷了洺州（今河北永年），并将都城从乐寿迁到这里，号称万春宫。这时候，窦建德领导的义军势力达到极盛，雄居河北。他在境内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而且窦建德本人生活俭仆，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不喜欢肉食，常食即粟饭蔬菜。妻子曹氏从不穿纨绮之服，役使的婢妾不过十几个人而已。破宇文化及后，得隋朝宫人上千，全部释放。每战获胜，所得资财全部分赏将士，自己一无所取。因此，窦建德颇得民众拥护，管内很有一番升平气象。唐人殷侔所写的《窦建德碑》有这样的记载：“夏氏为国，……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与夫（王）世充、（萧）铣、（李）密等，甚不同矣。”

窦建德在消灭了宇文化及以后，遣使上表在东都称帝的隋越王杨侗，杨侗封窦建德为夏王。后来，王世充废掉杨侗自立，窦建德遂与东都断绝关系，以皇帝自居。最后败于唐秦王李世民。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1—187

两唐书：《窦建德传》、《全唐文·窦建德碑》

杜伏威起义

在隋末起义当中，除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之外，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就算是本伏威与辅公祏领导的江淮义军了。

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北)人,出身贫苦,无以为生。素与同里人辅公祏友善,二人为刎颈之交。辅公祏的姑姑家以牧羊为业。辅公祏经常将姑姑家的羊偷出宰杀,与杜伏威共享,姑姑被偷急了,就向官方报告二人为盗,郡县派人缉捕甚急,二人被迫逃亡,聚众起义,这时杜伏威才十六岁。杜伏威为人聪慧狡黠,每有行动,总能提出奇策,而且非常勇敢,冲锋在前,退则殿后,深为众人所佩服,被共推为帅。

隋大业九年(613年)。杜伏威感到势单力孤,难成气候,遂率众进人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投奔另一支规模较大的义军首领左君行,但不被礼遇,杜伏威又率部转入淮南,自称将军。当时在下邳(今江苏宿迁东南)聚集着一支义军,杜伏威派辅公祏去对其首领苗海潮说:“我们都是被隋朝暴政所逼,才铤而走险,揭竿起义的,但各自分立,势孤力弱,常害怕被官军所镇压,如果我们能联合起来,不就可以和隋军相抗衡了吗?你能为帅,我们恭恭敬敬服从你的指挥。你若自觉不堪此重任,可前来听命,再不然,我们可一战以决雌雄。”苗海潮自起事以来,未曾遇过强敌,被辅公祏一番话给震慑住了,率众降于杜伏威,使杜伏威的势力稍稍得以壮大。

但此时的杜威与诸义军相比,还是显得微不足道,海陵(今江

苏泰州)义军首领赵破阵就没有把杜伏威看在眼里,派人前来招降。杜伏威的事业刚见起色,自然不愿听命于人,但若拒降,又自知不是赵破阵的对手,思考良久,决定将计就计,率兵奔赴海陵。至赵破阵营寨,杜伏威命辅公祏统兵在外待变,自己带领十个人抬着牛肉美酒,入帐拜见。赵破阵大为高兴,将其大小首领全部召入帐中,纵酒高歌以示庆祝,当酒正喝到高兴的时候,杜伏威出其不意,抽刀斩杀赵破阵,由于事发突然,赵破阵手下众人皆目瞪口呆,杜伏威的诸随从趁其反应不及,又连杀数十人,辅公祏闻乱亦率兵赶到,将众人制服,遂将赵破阵部吞并。这样,杜伏威在淮南站稳了脚跟,兵力达到数万人,开始强盛起来。

隋江都留守眼见杜伏威在自己管辖区内壮大,怕不好向驻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交待,就派校尉宋颢率兵讨伐。杜伏威与之交战,佯装败北,将宋颢一步步引至芦苇荡中,然后从上风纵火,宋颢之众全被烧死。与隋兵首次正式交战即告捷。

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李子通,最初依附于在长白山聚众起义的左才相,因作战勇敢为左才相所器重,统领一部人众。左才相手下诸部首领均残忍好杀,唯独李子通宽大仁恕,为士众所爱戴,因此,远近争相归附,不到半年时间,兵至一万人,大有盖主之势,由此遭左才相猜忌。李子通恐遭不测,率部众渡过淮河与杜伏威合兵。不久,李子通图谋杀掉杜伏威,吞并其部。杜伏威曾选军中壮士三十人养为假子,为首的是军中号称"大将军"和"小将军"的阚稜与王雄诞,这次就是他的假子们救了他。一天,李子通突然发难,杜伏威匆匆上马逃窜,不幸被重创坠马,王雄诞背起杜伏威,在众假子护卫下且战且退,逃入芦苇荡中,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部众却被李子通打散。好不容易将亡散之卒收集到一起,隋朝又派虎牙郎将来整前来讨伐,杜伏威因刚遭李子通袭击,伤了元气,战斗力大减,因此被来整打得大败,身体又遭重创。杜伏威手下有一大将叫西门君仪,其妻王氏力大无比,这次王氏背着杜伏威,阚稜和王雄

诞率众假子护卫左右，辅公祏率余众殿后，退往盐城(今属江苏)，这时还剩八千人。隋朝并不放过杜伏威这支残军，又命虎牙郎将公孙上哲率兵奔往盐城，试图将杜伏威消灭在海边。但这一次，面临被赶下大海的义军，死地求生，奋勇作战，竟将公孙上哲所部隋军全歼，杜伏威兵势复振。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隋炀帝派遣右御卫将军陈稜以精兵八千向杜伏威发起又一次进攻，杜伏威率部迎战。陈稜虽握八千精兵，却不敢战，双方呈相持状态。杜伏威为激怒陈稜，派人给他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并称他为"陈姥"，引诱其出战，陈稜果然大怒，倾巢而出。杜伏威亲自策马至阵前挑战，没想到陈稜阵前一员部将突发冷箭，射中其额。杜伏威大怒，指着射者说："我今日要不杀了你，绝不拔掉此箭！"遂带箭跃马前冲，这位部将连忙退入阵中，杜伏威大声呼叫着冲入敌阵，所向披靡，终获射者，命其将额上之箭拔下，然后斩之，提着此将的首级，左右奋击，又杀数十人。义军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来，隋兵溃不成军，向后败退，陈稜只身逃脱。杜伏威乘胜向西南进军，一举攻克高邮(今江苏高邮北)，接着继续南下，占领了历阳(今安徽和县)，以历阳作为大本营，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分遣诸将，进攻周围各县，无往不克。江淮地区的各小股义军都纷纷前来归附，势力空前壮大，成为隋末三大主力义军之一，对居住在江都的隋炀帝及随行的隋中央小朝廷构成最直接的威胁。

杜伏威治军严整，他曾精选敢死之士五千人，号称"上募"，在军中享有最丰厚的待遇，每当攻城略地之时，都以上募冲锋陷阵，战斗结束，杜伏威定亲自对上募进行抚慰，并逐一查看伤兵伤势，凡有伤在后背者，当即斩首，因为这肯定是临阵后退的。杜伏威还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所获战利品全部赏军，自己一无所取，士卒战死者则以其妻妾殉葬，故义军众将士皆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大业十四年(618年)，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起兵的李渊早已

占领了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也被李密的瓦岗军团团包围,置社稷安危而不顾,留恋江都的隋炀帝,再想北归西还也已经不可能了。而江都周围的高邮、六合(今江苏六合)都被杜伏威的江淮义军占据,使隋炀帝寝食难安,欲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凭长江天险偏安江南。但为准备迁都修治的丹阳宫尚未建成,宇文化及就发动了政变,杀死隋炀帝,率领文武百官及禁军骁果西还长安。宇文化及知道杜伏威是江淮地区的实力人物,就在离开江都之际,任命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但杜伏威深知宇文化及负弑君之名,已成天下公敌,故不受其命。

东都留守官员得知江都政变,炀帝已死的消息后,即立越王杨侗为帝。杜伏威则以为暴君已死,新帝已立,就派出使者向越王杨侗上表,表示归顺,于是杨侗任命杜伏威为东南道大总管,封为楚王。杜伏威接受杨侗的官位、封号后,以朝廷命官自居,开始任用原隋朝政府官员,向民户征收轻微的赋税,废除殉葬法,确立新法:凡犯奸盗,及官吏贪污受贿者,不论轻重,皆杀无赦。在他的治理之下,这个地区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后来杜伏威又打败了李子通,占领了江都和丹阳,并将治所从历阳移至丹阳。至唐武德四年(621 年),唐秦王李世民东进讨伐王世充,并遣使招抚杜伏威,杜伏威遂向唐朝请降,被唐高祖李渊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并赐姓李氏。后入朝,官拜太子太保,并留居京师,享受很高的待遇。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2—186

两唐书:《杜伏威传》

江都政变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四月一日（丁巳）深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宫内突然一片大乱，大业殿西院火光冲天，隋炀帝在睡梦中被嘈杂声惊醒，睁眼一看，红光满室，寝殿外传来喊叫声和脚步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义军已攻入宫内，急忙跑出寝殿，逃入西苑，藏在草丛当中。侍从人员跟随而至，告诉他是宫内失火，并无危险，隋炀帝还不相信，一直等大火熄灭一切都恢复平静以后，才敢回宫。这时天还没亮，他躺在榻上却再也睡不着了。回想着自大业八年（612年）以来，造反的义军是越来越多，几乎已将洛阳包围起来，搞得他寝食不安，每天晚上需要几个妇人摇抚着才能睡着，睡到半夜时常惊醒，高喊有贼，而今天这声虚惊更是非同小可，他越想越觉得不能再在洛阳呆下去了，再呆下去，不定哪一天义军真的攻人洛阳，非得死在宫内不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想起了江都（今江苏扬州）。于是他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定地踏上了赴江都之路。

隋炀帝到江都后生活更加荒淫，他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在江淮地区挑选美女送到宫中，共有一百多房，每天以一房美女作主人，隋炀帝与皇后萧氏及诸嫔妃至其房中宴饮。隋炀帝整日酒杯不离口，从姬一千多人也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隋炀帝虽然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但他的心里对动荡的政局及将要面临的命运看得十分清楚，每天退朝以后，就手持拐杖在宫中散步，面对楼台亭阁，水池假山，驻足伤神，流连忘返，不到天黑不止。隋炀帝通

晓天文占卜，有一天夜里，他仰观天象，对萧后说："外面有不少人想算计我，但即使把天下让给别人，我仍不失为长城公（陈亡后，陈后主叔宝被封为长城公），你不失为沈后（陈叔宝皇后），我们还是高高兴兴地喝酒吧。"又有一天，隋炀帝照着镜子对萧后说："这么漂亮的一颗脑袋，会被谁砍下来呢？"萧后听罢大惊，说道："皇上为何要说这种话？"隋炀帝却笑着说："贵贱苦乐，互相更迭为之，即便有那一天也是命该如此，无所谓的。"

自隋炀帝离开洛阳后，天下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的起义及豪强起兵愈演愈烈，贵族李渊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起兵后，长驱直入关中，占领了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李密的瓦岗军则将洛阳团团包围，杜伏威及李子通领导的义军活跃在江淮地区，直接威胁着江都的安全。隋炀帝见大势已去，更加无心北归，想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凭借长江天险保据江南半壁河山，下令朝廷大臣商议迁都之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等人顺从隋炀帝旨意，说迁都丹阳为上策。但当初曾反对隋炀帝到江都来的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这时站出来，极力主张应西还长安，隋炀帝则沉默不语。赵才与虞世基激烈争论，一气之下拂袖而去。门下录事李桐客又站出来说："江南气候潮湿，土地险狭，根本不能供给宫中所需，更不能养活朝廷百官及三军将士，百姓不堪赋敛，最终还要造反。"李桐客说罢，御史马上弹劾他涉嫌诽谤朝政。这样一来，公卿大臣都违心地说："江南之民早就盼望陛下过江，此举是堪与大禹南巡会稽（今浙江绍兴）相比的盛事。"于是，隋炀帝下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

跟随隋炀帝到江都的骁果卫士基本都是关中人，因久居他乡，人人思归，逃亡事件不断发生。后隋炀帝采纳黄门侍郎裴矩的建议，搜括江都境内的民女及寡妇配嫁与将士，骁果才稍稍安定下来。但这时候听说隋炀帝准备迁都丹阳，彻底断绝了他们回家的希望，就都想在迁都江南以前逃回关中，遂发生了郎将窦贤率所

部集体逃归的事情。窦贤等人被抓回后全部斩首，但仍然不能阻止骁果逃亡的势头。

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果，屯于东城，发现部下均骚动不安，对亲信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说："陛下修筑丹阳宫，这一过江，肯定再不会北还了。现在骁果人人都想逃亡，我想报告，但陛下性情暴烈，听了一定不高兴，说不定会把我杀了；如果不报告，一旦发生大量骁果逃亡，我将遭灭族之祸，我进退都是个死，这可怎么办呢？"裴虔通说："皇上这个人就是这样，我真为你担忧。"司马德戡又说："我听说关中失陷，华阴令李孝常以华阴（今属陕西）投降李渊，陛下将其在江都二弟收监，准备斩首。我们的家属都在关中，不是也有这样的顾虑吗？"裴虔通说："是啊，我的子弟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说不定在家里也干出什么事，我也是整天担惊受怕，这可怎么办呢？"司马德戡说："我们该商量个计策，骁果若逃，我们不如和他们一起走。"裴、元二人都说："你说得对，若想活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于是三人又联络了内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阵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十余人，结为刎颈之交，日夜聚在一起商讨叛亡之事，言无回避。有宫人对萧后说："宫外人心不稳，好像要造反。"萧后说："那你就向陛下报告吧。"宫人对隋炀帝一说，隋炀帝大怒，说这种事不是你该管的，将宫人杀了。过了几天，又有宫人向萧后报告骁果的动向，萧后说："天下形势已经如此，不可挽救了，说了也没用，只能增加皇上的烦恼。"这样，再没人向隋炀帝报告宫外的情况了。

赵行枢本是乐人之子，家产巨万，与大臣宇文述之子将作少监宇文智及交往甚深，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二人遂将所谋之事告知智及。宇文智及素来狂妄不法，一听大喜，去参加司马德戡召开的聚会。司马德戡等最后决定，大业十四年（618年）三

月十五日（庚申）举行兵变，劫持十二卫兵马，掠夺居民财物，西归长安，宇文智及说："这并非上策。陛下虽无道，但威令尚行，你们如果逃走，正和窦贤自取灭亡一样。现在看来，上天是要灭亡隋了，英雄并起，同心叛隋的骁果有数万人，依靠这支力量举行大事，可以成就帝王的基业。"宇文智及的意见被司马德戡等人所接受，但需要推举一个能服众的人作首领，赵行枢及薛世良提议请智及之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主持此事。

宇文化及为宇文述长子，性格凶险，不循法度，喜欢乘骑肥马、手持弹弓，在大街上驰骋，在长安被称为轻薄公子。隋文帝时官至太子仆，因接受贿赂，再三被免官，又因得太子杨广宠幸，免官后又得复职。后其弟宇文士及娶南阳公主为妻，宇文化及因此更加骄横。大业初年，随隋炀帝北巡，化及与智及二人违禁与突厥进行交易，隋炀帝大怒，将二人关押数月，准备斩首，后因南阳公主的关系才免除二人死罪，将二人回赐宇文述为奴。宇文述死后，隋炀帝追念君臣之情，提拔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宇文化及虽然轻薄不法，却性格怯懦，能力低下，司马德戡等人请宇文化及出山，他竟然吓得脸色都变了，汗流不止，过了很久才稳定下来，答应了司马德戡等人的请求。

司马德戡担心举事之时人心不齐，派许弘仁与张恺到备身府对所认识的骁果说："陛下听说骁果想叛变，已准备下很多毒酒，打算在举行宴会时将骁果全部鸩杀，只与南方人留在这里。"接着，这个消息就在骁果中传播开了，人人都很害怕，司马德戡一看时机已然成熟，就在三月十日（乙卯）遍召骁果军吏，向他们通报准备举行兵变，众军吏一起说："唯将军是命！"这一天晚上，元礼与裴虔通在宫内值班，唐奉义负责关闭宫城城门，与裴虔通相约，诸门皆不上锁。至三更，司马德戡在东城内集合骁果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隋炀帝被喧嚣声惊醒，望见火光，问怎么回事？裴虔通回答说："草坊被烧，外面的人正在扑救。"炀帝信以为真。

宇文智及与孟秉在宫城外聚兵一千多人，见城内火起，劫持候卫虎贲冯普乐，分兵把守街巷。隋炀帝的孙子、燕王杨倓发现事情有变，从芳林门旁边的水道钻入宫城，向隋炀帝报警，至玄武门被拦住。杨倓说："臣突然中风，恐怕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请求与皇帝见上一面。"裴虔通知道其言有诈，并不上奏，派人将杨倓关押起来。至五更，司马德戡将部分骁果交给裴虔通，以取代诸门卫士。裴虔通领着数百名骑兵来到成象殿，守卫成象殿的右屯卫将军独孤盛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裴虔通说："大势所趋。这件事与将军无关，将军不必管。"独孤盛大骂道："你这个老贼，说的这是什么话！"来不及披上铠甲就与手下十余人挺刃拒战，被乱兵所杀。千牛独孤开远率殿内卫兵数百人至玄览门，对隋炀帝说："现在我们尚有一定的兵力，陛下若出殿临战，人心自然安定下来，不然大祸就要降临了。"隋炀帝无奈出殿召集士兵，竟然没有响应的，独孤开远手下的几百人也渐渐散去。司马德戡率兵自玄武门进入宫内，隋炀帝脱下黄袍，换上一般官服逃入西阁，裴虔通与元礼率兵推门进左阁，又驰入长巷，问道："陛下在哪里？"有一美人答："在西阁。"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奔西阁，隋炀帝隔着窗户对行达说："你难道是想杀我吗？"令狐行达回答说："臣不敢，只是想护送陛下西还京师。"说完，搀扶着隋炀帝走出西阁。裴虔通本是隋炀帝做晋王时的亲信，隋炀帝问裴虔通："你是我的亲信故人，为什么也这样恨我，跟着造反呢？"裴虔通回答道："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请陛下与我们一起回长安。"隋炀帝说："好吧，我和你们回去。"于是裴虔通率兵将隋炀帝看守起来。

这时已是三月十一日（丙辰）清晨，孟秉率骑兵迎宇文化及入宫。宇文化及不知已大功告成，见骑兵前来，不知何事，吓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骑马入宫途中，凡有人拜见，只是低头据鞍，口称"罪过"。司马德戡将宇文化及迎进城门，引入朝堂，号为丞相。裴虔通对隋炀帝说："百官现在全部集合在朝堂，

陛下应该亲自出去慰劳一下。”强迫隋炀帝骑在自己的马上，裴虔通持刀牵马走出宫门。众骁果一见捉住炀帝，欢呼声四起，震天动地。宇文化及受此感染，精神也振奋起来了。大声说道：“把这个东西带出来干什么？赶快把他杀了吧。”隋炀帝问：“虞世基现在哪里？”马文举回答：“已被斩首！”于是又将隋炀帝带回寝殿，裴虔通与司马德戡持刀侍立两旁。隋炀帝叹了口气，执迷不悟地说：“我有什么罪，你们要这样干？”马文举说：“陛下遗弃宗庙，巡游不息，对外征讨不断，在内又奢淫无度，使丁壮死于战场，妇女老弱死于沟壑，万民尽失本业，盗贼蜂起，又专门任用奸佞之人，饰非拒谏，这能说是无罪吗？”隋炀帝说：“我确实是有负于天下的百姓，至于你们这些人，我给你们荣华富贵，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今天这件事谁是首领？”司马德戡回答说：“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宇文化及又命内史舍人封德彝上前宣布隋炀帝罪状。隋炀帝说：“你是士人，怎么也参与这种事？”封德彝惭愧而退。隋炀帝的爱子赵王杨杲，年仅十二岁，在隋炀帝旁边恸哭不已，裴虔通挥刀杀死，鲜血直溅到隋炀帝身上。宇文化及下令杀隋炀帝，隋炀帝泰然自若，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哪能施加刀剑！取鸩酒来！”马文举不许，命令狐行达将隋炀帝强推坐下。隋炀帝自己解下身上的练巾交与令狐行达，行达将隋炀帝缢杀。

当初，隋炀帝自知必不免于难，为避免被人活捉遭受羞辱，将毒药装在小罐里随身携带，对所宠幸的诸嫔妃说：“如果叛贼入宫，你们先饮，然后我饮。”及事发，左右侍众皆四处逃散，隋炀帝索取毒药不得，终被骁果所杀。萧后与诸宫人拆漆床板制成棺材，将隋炀帝与赵王杨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

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后，想立蜀王杨秀，众人以为不可，遂杀杨秀及其七子。又杀齐王杨暕及其二子并燕王杨倓等，隋朝宗室、外戚全部遇难，只有秦王杨浩素来与宇文智及关系很好，被宇文智及保全下来。齐王杨暕是隋炀帝第二子，小名阿孩，失爱

于隋炀帝，父子二人互相猜忌。事变之初，隋炀帝听到外面一片混乱，对萧后说："是不是阿孩作乱呀？"宇文化及命人去抓杨暕，杨暕尚未起床，兵人室后，杨暕吃了一惊，忙问是谁，士兵并不答话，杨暕以为隋炀帝派人抓他，说道："诏使且慢动手，儿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士兵将杨暕拽到大街上一刀杀死，杨暕竟然不知道是被谁杀死的。父子二人至死仍怀猜忌。

宇文化及又杀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皛等人。事变即将发生时，江阳长张惠绍飞马向裴蕴报告，二人商议假传隋炀帝诏书发城外兵马收捕宇文化及等，人宫援救隋炀帝。裴蕴将商议结果报告虞世基，虞世基怀疑张惠绍所告不实，不许发兵，接着政变就发生了。裴蕴后悔莫及，叹曰："谋及播郎（虞世基小名），竟误大事！"及虞世基将死，其弟虞世南抱世基痛哭，请求代兄而死，宇文化及不许。裴矩为人圆滑，他知道迟早必将发生宫廷政变，为保其身，与人交往皆厚待之，哪怕是杂役人员，也尽量讨其欢心，又提议为骁果娶妻，士兵均感其恩。发生政变的当天清晨，裴矩将去早朝，至坊门，遇数名士兵，带着他去见孟秉，众士兵齐声说道："裴黄门无罪。"一会儿，裴矩又去拜见宇文化及，故得免死。原宰相苏威也主动去参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以苏威名位素重，又久不参政，亦免其死。局势大定以后，宇文化及坐在朝堂接受百官祝贺，唯独给事郎许善心不至，其侄许弘仁飞马至许善心府第劝他说："天子已崩，现宇文将军摄政，满朝文武全都到齐了，天道人事的变化是无可奈何的，叔叔何必这么固执呢？"许善心大怒，不肯随许弘仁上朝。许弘仁没有办法，返身上马，哭着说："宇文将军对叔叔全无恶意，你自己求死，这又何苦呢！"宇文化及见许善心不来，派人将他押到朝堂。开始，还想收买他，命令将许善心释放，不料善心不行舞蹈之礼返身就走出朝堂。宇文化及目送他出去，说道："此人太不象话了。"又

命将许善心捉来，大骂道："我好心放你一马，你竟敢如此无礼！"许善心遂被杀害。其母范氏年九十二岁，临丧不哭，抚摸着灵柩说："能死国难，是我的好儿子！"

于是，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萧皇后名义发布命令，立秦王杨浩为帝。实际只是傀儡而已，并派兵严加看守。宇文化及以宇文智及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又以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总领留后事宜。三月二十七日(壬申)，下令西还长安。皇后及六宫仍按制度为御营，御营前立一别帐，宇文化及在帐中视事，警卫仪仗与皇帝的规模一样。抢夺江都人的船只，从水路西归，以折冲郎将沈光统领禁内宿卫。行至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对沈光说："我们都蒙受先帝厚恩，今天却为先帝的仇人效力，受其驱使，有什么面目活在人间！我一定要杀了宇文化及，死无所恨！"沈光亦流下了眼泪，说："这件事就指望将军了。"于是麦孟才纠合数人，商定在早晨将出发时率所部数千人袭击宇文化及。不料事机泄露，宇文化及当夜躲到营外，派人命司马德戡率兵讨伐。沈光听到营内喧闹。知道事情有变，当即袭击宇文化大营，但空无所获，只抓住内史侍郎元敏，将其斩首。司马德戡引兵赶到，杀死沈光，沈光麾下数百人皆苦斗而死，无一人投降，麦孟才也被杀害。

宇文化及手下共有十余万兵马，他将六宫嫔妃据为己有，起居奉养与隋炀帝一模一样。每天视事时，于帐中面南而坐，有人上奏，皆默然不对，下衙以后才收取奏状与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人参决。将幼主杨浩交付尚书省，命十余名卫士守护，不许百官朝见。行至彭城（今江苏徐州），水路不通，又抢夺百姓牛车二千辆，载宫人和珍宝，戈甲戎器全部令军士肩挑背扛。军士疲惫不堪，开始口出怨言。眼见这种情况，司马德戡非常失望，私下里对赵行枢说："当初你推荐宇文化及真是一大失误，当今拨乱反正，要依靠英贤，化及庸暗，才质低下，又有小人在侧，

将来必败无疑，这可怎么办呢?”赵行枢说:“事情还不是在我们吗，把他废了有什么难的!”

政变成功之初，司马德戡以首功，被宇文化及封为温国公，食邑三千户，加光禄大夫，仍然专领骁果，但宇文化及心里对司马德戡非常忌怕。几天以后，宇文化及将骁果分配给诸将分领，以司马德戡为礼部尚书，表面上是高升美职，实际是夺其兵权。司马德戡内心虽十分愤恨，但为了重获兵权就将所获得的赏赐全部送给宇文智及。宇文智及经常在宇文化及面前为司马德戡美言，当行至彭城，舍舟登陆，宇文化及又命司马德戡统帅一万多人为后军。于是，司马德戡和赵行枢与李本、尹正卿等诸将合谋，以后军袭杀宇文化及，更立司马德戡为主，并派人联络占据济阳（今山东定陶西）的义军首领孟海公，结为外援。因等待孟海公回报，所以迟迟没有动手。这期间，许弘仁、张恺二人得知司马德戡的计划，告诉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就派宇文士及佯装游猎，来到后军。司马德戡不知事情已经泄露，出营迎接，结果被捕。宇文化及责备司马德戡:“我与你戮力同心，出生入死，共定天下。今天事情已经成功，本应共享富贵，你为什么又要造反呢?”司马德戡说:“本来废杀昏君是因为不堪其淫虐之苦，可是把你拥立起来，淫虐又超过了昏君。我是顺从大家的意愿，不得不这样做。”宇文化及无言可对，将其缢杀，赵行枢等十余人亦死。孟海公畏惧宇文化及，率众以牛酒相迎。李密的瓦岗军占据巩县（今河南巩县），挡住了宇文化及西去的道路，宇文化及又引兵向东郡（今河南滑县东），东郡通守王轨以城投降。

当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东都，留守官员随即立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这时听说宇文化及引兵西来，东都上下一片恐惧。内史令元文都说:“本应报弑君之仇，但苦于兵力不足。如果赦免李密之罪，让他去打宇文化及，化及既破，李密亦伤，然后我们再出兵，两贼并可擒拿。”元文都的计策得到其它官员的赞同，于是派

遣使者任命李密为太尉、尚书令、魏国公，命令他先平定宇文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李密一听非常高兴。宇文化及因军中乏食，渡过黄河，想抢占黎阳仓，李密派大将徐世勣据守仓城。宇文化及渡河后占领了黎阳县（今河南浚县），分兵包围徐世勣。李密亲率步骑兵二万屯于清淇（今河南淇县东南），与徐世勣以烽火相应。李密知道宇文化及缺粮，急于开战，就深沟高垒，故意不与交锋。宇文化及每向黎阳仓城发动进攻，李密就引兵从后面袭击他，故宇文化及久攻不下。一天，李密与宇文化及隔淇水相遇，李密谴责他说："你本来是匈奴的奴隶破野头，父子兄弟都蒙受隋朝的厚恩，甚至娶公主为妻，累世富贵，举朝无比。君上失德，不能以死进谏，反行弑逆，不效诸葛瞻之忠诚，却为霍禹之恶逆，为天地所不容。如果你能归顺于我，还可保全你的性命。"宇文化及听后默然不对，低头思考很长时间，突然瞪起眼睛大声说道："与你谈论相杀之事，何必引用书中之语！"李密一听，哑然失笑，对身边的人说："宇文化及如此庸俗愚蠢，竟然要图谋帝王之业，他纯属赵高之流，我要象打狗一样把他赶走！"

李密知道宇文化及的军粮就要用尽了，便心生一计，假意与他议和。宇文化及不知是计，大喜，以为能得到李密的粮食支援，就听凭士兵任意食用。李密军中有一人因获罪投奔化及，告知李密议和是假，但这时粮食已经吃光了。宇文化及大怒，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决战于童山（今河南滑县北）之下。从清晨一直激战至傍晚。李密被流箭射中，从马上坠地晕倒，左右卫兵以为李密已死，一哄而散，追兵渐渐逼近，秦叔宝将李密救起后，收集散兵力战，将宇文化及击退。宇文化及进入汲郡（今河南滑县西）求军粮，又遣使至东郡拷打吏民强征米粟，王轨等不堪忍受，遂以东郡投降了李密。化及闻王轨叛变，大惊失色，急忙自汲郡引兵北上，这时，宇文化及的部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一万多人、张童儿率江东骁果数千人也投降了李密。宇文化及所部只剩二万人，北

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李密知其元气大丧，已无所作为，就西还巩县，留徐世勣在黎阳，防备其南侵，派记事参军李俭押解俘获弑隋炀帝的令狐行达赴东都，朝见杨侗。

宇文化及至魏县以后，张恺等人见大势已去，准备逃走未遂，被宇文化及所杀。从此，腹心离散，兵力日少，宇文化及兄弟几人无计可施，整日相聚宴饮。化及醉后埋怨智及："当初你们干的事我一点不知道，都是你的主意，硬把我立起来，今天一无所成，兵马日散，负弑君之名，为天下所不容。就要遭受灭门之祸，这都是你惹出来的。"说完抱着他的两个儿子大哭。智及闻听大怒，说："事成之日不给我赏赐，现在就要败了，你又归罪与我，你为什么不把我杀了去投降窦建德？"兄弟之间醉后经常对骂，言无长幼，醒来接着又饮，以此度日。宇文化及自知必败，叹曰："人生早晚是一死，为什么不坐坐皇帝呢？"于是在当年九月，宇文化及鸩杀杨浩，在魏县即皇帝位，定国号为许，改年号为天寿，并任命百官。

第二年正月，宇文化及进攻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四旬不克，反为降于李渊的魏州总管元宝藏所败，损失一千多人。李渊又派淮安王李神通进攻，宇文化及力不可支，东走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李神通又进围聊城。宇文化及知势单力孤，难以自立，就以珍宝诱降周围的义军。齐州（今山东济南）的义军首领王薄听说宇文化及宝物甚多，前来诈降，为化及所信，二人共守聊城，又派宇文士及往济北（今山东东阿东北）求粮。

号称夏国，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的义军首领窦建德对手下群官说："我为隋民数十年，隋为我君已两代，今宇文化及弑之，大逆无道，他就是我的仇人，我不能不讨伐！"于是引大军南攻聊城。

李神通猛攻聊城，宇文化及粮尽请降，李神通不许。不久，宇文士及自济北运粮入聊城，宇文化及兵势复振，李神通强攻十余

日不能克。这时窦建德率大军来到聊城，李神通害怕被窦建德吞并，遂退出战斗。

宇文化及与窦建德交战，连战连败，窦建德从四面强攻，王薄开门引窦建德入城，生擒宇文化及。窦建德入城后，将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秉等人斩首，把宇文化及与其二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用囚车押至襄国（今河北邢台）处斩。宇文化及临死之前别无他言，只说了一句“不负夏王！”

不久，窦建德追谥隋炀帝为闵帝，封齐王杨暕遗腹子杨政道为郧公。此时，窦建德依附于突厥，隋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遣使奉迎萧皇后，窦建德就派一千多名骑兵将萧后及杨政道、南阳公主等人送至突厥，又将宇文化及的首级献给义成公主。突厥处罗可汗立杨政道为隋王，居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统领因避乱逃入突厥或被突厥掠夺去的汉族人。直到十一年以后，李靖大破突厥，萧后及杨政道才回归长安。

江都政变标志着强盛一时的大隋王朝的灭亡。隋朝灭亡以后，各势力集团就开始了争夺全国政权的角逐，占领长安的李渊在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于大业十四年五月二十日（甲子）正式做了皇帝，建立起鼎盛的大唐帝国。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3—187

《隋书》：《炀帝纪》、《宇文化及传》、《司马德戡传》、《杨暕传》、《许善心传》、《裴矩传》、《李密传》

李渊兴唐

李渊，庙号高祖，是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孙子。李虎追随宇文泰开创关中政权，因佐周代魏有功，位极荣贵，周受禅时他虽已死，仍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父名昞，北周时袭爵唐国公，历任刺史、总管、柱国大将军。至于李氏皇室自撰谱牒称自己七代祖是凉武昭王李嵩，全属攀附伪托，以提高自家的出身门第。李渊的先祖如不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就是赵郡李氏“假冒牌”。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李渊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爵。长大后，性格倜傥豁达、宽仁容众，善于和各类人物结交。娶妻窦氏，即纥豆陵氏，是隋朝神武公窦毅的女儿，其先辈源于西北少数民族。窦氏的母亲是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由于窦氏才貌双全，周武帝很是喜爱，养在宫中。窦毅也认为不能随便许配，要为求贤夫，于是在门屏上画了两支孔雀，让上门求婚的人持二箭射它，约定射中孔雀目的娶女为妻。前后数十人谁也射不中，唯独李渊最后连发两箭，各中一目，因此成婚。窦氏共生四子一女。四子是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嫁给柴绍，即建唐后册封的平阳公主。在众兄弟中，玄霸只享年十六岁，在大业十年（614年）就夭折了。

李渊还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因此特受亲爱，在文帝朝历任谯、陇、岐三州刺史。炀帝大业初，转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后调往殿内少监，大业九年迁卫尉少卿。炀帝征辽东，他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东）督运粮草。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令李

渊迅速赴弘化郡（今甘肃庆阳）任留守，并辖关右十三郡兵。李渊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平时注意树立自己的威望。实权增大后，更用心结纳豪杰，充实羽翼。这时义军蜂起，炀帝的宝座动摇了，杨玄感起兵使炀帝更加猜忌杀戮贵族宿将，象李渊这样“相表奇异，名应图谶”的人自然也成了怀疑对象。所谓名应图谶，是说当时社会流传“李氏当为天子”。一次炀帝诏李渊朝见，恰巧他有病未能按时成行。炀帝问李渊外甥女后宫王氏：“你舅为什么迟迟不到？”王氏说病了。炀帝竟以诅咒的语气说：“能病死吗？”李渊闻听此事，不由想到右骁卫大将军、郕公李浑宗族三十二口被杀的原因：一是炀帝忌他门族强盛，一个就是姓李。而且方士安伽佗还劝炀帝杀尽天下李姓。于是，李渊一面纵酒以韬晦存身，一面采纳妻子的建议，频频贡献鹰犬善马，来博取炀帝的欢心。

大业十一年四月，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可以承制升降选补郡县文武官，并征发河东兵讨捕“群盗”。他闻令而动，行至龙门（今山西河津）击败了毋端儿。十二月，因民部尚书樊子盖率关中兵镇压绛郡（今山西新绛）义军敬磐陀时极其残暴，自汾水以北，村庄全烧毁，降者都活埋，激起百姓愤恨，反抗烈火燃烧更旺，于是调李渊替代。他采用了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策略，有投降的，还安置在左右。这样，前后招安了数万人，不仅瓦解了义军，而且增强了私人实力 。

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离京去江都（今江苏扬州）。十二月，以李渊为太原留守，率兵讨义军甄翟儿。李渊心中暗喜，他知道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而且本爵唐国公，太原正是古代唐旧地，这也是天授兴邦定国之意。于是把建成、元吉留在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保护家眷，并命建成在当地潜结英杰；把世民带到太原（今山西太原南），在这里密招豪友。兄弟俩分别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即使是商贩、赌徒、看门的奴仆，只要有一技可取，都热情结交。因此，得到各阶层的欢心，投奔的人络

绎不绝。当然，炀帝对李渊并不放心，同时任命亲信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暗中监视。

李渊镇压了甄翟儿不久，因突厥频频寇掠北边，炀帝令他率太原道兵马到马邑（今山西朔县），和太守王仁恭合力讨伐。当时突厥强盛，而李渊两军合计不满五千。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王仁恭无计可施，李渊则首先分析敌方所长："惟持骑射，风驰电闪，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无警夜巡昼之劳，无筑垒运输之费。"认为我方如以寻常战法和他争战，难以成功。于是提出对付突厥的方略：选拔两千善骑射的将士，让他们饮食起居完全模仿突厥，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如和突厥相遇，可乘对方不辨真假时突袭。就这样获得了数次胜利，突厥感到很难对付这支精骑。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李渊的军事才能。北朝到隋，天下纷争，戎马不断，贵族官僚中流传着尚武风俗，李渊出身于关陇军贵家族，他和三子无一不善骑射。

边境有所缓和，李渊返回太原。突厥得知，又率兵寇马邑。李渊派高君雅带兵和王仁恭共同抗拒，但被突厥战败。李渊忧虑炀帝将借此治罪。果然，大业十三年四月，炀帝以他和仁恭不能御寇为由，遣使者执送江都治罪。在这关键时刻，世民、裴寂力劝李渊起兵，说："今炀帝昏暗，国家大乱，尽忠无益。这次本偏将战败，却祸及您身。如此燃眉之急，应该早下决心。太原士马精强，积蓄巨万，凭此举大事，何愁不成！而且守长安的杨侑是个孩童，关中豪杰并起，就缺一个政治核心。您若鼓行西进，抚而有之，得天下如探囊取物。为什么要束手待擒，受灭门之祸！"李渊知建成、元吉还在河东，会有风险，但不得不决心行动了。于是秘密部署军队，要起兵太原。

李渊取代隋室之心，实早已有之。早在隋文帝让他任刺史时，有一人名史世良，善相面，说他"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李渊听

后，感到自己天命不凡，产生了经纶天下之心。因此，接待人物，不限贵贱，苦心经营政治势力。大业九年他目睹天下动荡的局面，叛隋之心不断滋长，从怀远镇督运粮草路过涿郡（今北京）时，曾和好友宇文士及夜中密谈取天下大事。但李渊老谋深算，不贸然行动。杨玄感反隋时他不但没莽撞而起，相反告密有功，被炀帝任命为弘化郡太守。这时，他的妻兄窦抗曾跑来劝说："杨玄感起兵是个好兆头。李氏名在图谶，当有天下，应乘机而动，不要错过大赐良机。"可李渊认为时机不成熟，为祸始不祥。不出他所料，杨玄感起兵仅两个月就失败了，他却获得委任河东、发展势力的契机。

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他推荐的副帅夏侯端颇知玄象，又劝起兵反隋，说"天下大乱，能安定者，非您莫属。"并晓以利害："炀帝性多猜疑而又残忍，特忌李姓，强者先诛，李浑已被杀死，你恐怕就是第二位。如早定大计，则上顺天命，不然，一定会被杀掉。"李渊深深点头。任太原留守后，晋阳令刘文静看出李渊有四方之志。崔善为以隋政倾颓，秘密劝反。许世绪提出"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唐宪、唐俭也劝李渊举兵。武士彟暗劝他反隋，甚至进"兵书"、"符瑞"。对此，李渊心领神会，只叮嘱要严守机密，并许愿将来大事成功，同享富贵。李渊成了河东地区反隋势力的希望和领袖，晋阳长姜谟拜见他后对亲近人说："隋祚将亡，必有救世奇才，以应图谶。唐公有霸王风度，一定会成为拨乱反正的帝王。"并投靠了李渊。

在太原酝酿起兵的过程中，李世民、刘文静、裴寂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世民聪明勇敢，遇事果断，而且见识胆量过人。他随父镇守太原，也看出隋朝土崩瓦解的趋势，决心取而代之，因此倾身下士，散财结客，积极帮助父亲集结力量。世民妻是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女，长孙顺德是晟的族弟。顺德和刘弘基、窦琮都逃避征辽东兵役，亡命在太原依托李渊庇护，世民和他们友

善。晋阳令刘文静有才干，倜傥多谋略，与晋阳宫监裴寂相结为友。一次夜间同宿，望着城上烽火，联想时局动荡，裴寂仰天叹道："贫贱若此，又逢乱离，今后如何生存!"文静笑道："世道如此，时局可知。只要我们同心合作，愁什么卑贱。"后来，文静因与瓦岗军李密是姻亲，被炀帝下令囚禁狱中。世民知道这个人可图谋大事，前去探望。文静大喜，试探着说："天下大乱，若无商汤、周武、汉高祖、光武帝那样有盖世奇才的人，是不能安邦定国的。"世民答道："你怎知没有，只怕平庸之辈不能识别。今入狱中看你，非因儿女俗情，是谋议大事的。你有何高见?"见此情景，文静直抒胸臆："今炀帝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计。当此之时，有真主驱驾用之，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百姓都避盗入城，我任县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父所率将士有十万之众，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必成"!世民完全同意。

李世民、刘文静对李渊按兵不动有些焦急。刘文静知李渊和裴寂有旧交，提出可利用裴寂说项，因此介绍裴寂和世民交往。世民为了拉拢裴寂，出私钱数百万让高斌廉和裴寂赌赙而故意输钱。裴寂大喜，与世民关系日渐亲密。裴寂自然将世民立即起兵的意图转告了李渊。河东重要人物纷纷表态正中心怀，但李渊仍窥伺最好时机。前述炀帝借口他不能抗御突厥要执送江都治罪，逼得他不得不下提前起兵的决心。然而，正当李渊秘密部署将要发动之际，炀帝又派使者到达太原，赦免李渊、王仁恭罪，并官复原职。[①] 见此，李渊虽又推迟了起兵时间，却加速了反隋的准备。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李渊所以不早起兵，除了因为建成、元吉和家属还在河东没集中到太原外，更重要的是隋朝还有相当的

---

① 据《资治通鉴》卷183载，王仁恭败于突厥后，于大业十三年二月被部将刘武周所杀。炀帝在这年四月还治、赦仁恭罪，当是远在江都，信息传递不便的缘故。

力量，能够抽调大军镇压反叛者。他知道自己名高位重，地处形胜，若提前行动，会把隋军吸引来，胜负难卜。而大业十三年春夏间隋政权已接近土崩瓦解，选择这时起兵危险性小多了。李渊让刘文静伪造炀帝的敕书，征发太原、西河（今山西汾阳）、雁门（今山西代县）、马邑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当兵，并要在年底前集中于涿郡，再次东征高丽。这一谣言搞得人们慌恐万分，想反隋的更多了。

隋在楼烦郡（今山西静乐）筑有汾阳宫，被起兵反隋的刘武周攻占了。世民借机说："父亲身为留守，而盗贼窃据了离宫，再不早定大计，就会大祸临头。"李渊正想趁此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于是恫吓王威、高君雅说："武周占汾阳宫，我们不能阻止，罪当灭族，如何是好。"两人惧而请计。李渊接着说："我们一举一动都要受朝廷的节制，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要，又有其他盗贼中途拦阻，用这种死守城池而毫无行动自由的兵，来对付狡猾凶猛的敌人，必败无疑。真是进退维谷呀！"王威等都说："您是皇亲，一定会和国家休戚与共。若等上奏批复，哪里来得及！只要为了消灭敌寇，您就专断吧！"李渊看鱼已上钩，佯装不得已而顺从，下令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召募新兵，十日间增兵近万人，由顺德、弘基分别统领。同时，秘密派人到河东召建成、元吉，到长安召柴绍速速赶赴太原。

王威、高君雅本是炀帝监视李渊的耳目，李渊的行动，引起两人的猜疑，曾对武士彟说："德顺、弘基都是逃避随征高丽的罪犯，怎能让这样的人率兵！我要逮捕审问他们。"士彟劝道："这两人都是唐公的客人，如这样做，一定会惹出大麻烦。"听此言，王威等暂时疑而不发。留守司兵田德平也想劝王威追查募兵内幕。士彟劝德平说："兵权都在唐公手中，威、君雅只是陪衬，他俩能做什么？"德平点头称是。

太原乡长刘世龙，是当地富豪，和高君雅友善，又与裴寂相

识。裴寂引他结识李渊，渊想通过他拉拢当地豪强，因此热情招待，世龙也死心投靠。当他探知王威、高君雅密谋后立即向李渊告密："两人要乘晋祠祈雨机会动手加害。"李渊和世民、文静商议后，决定先发制人。五月十四日（癸亥）夜，李渊令长孙顺德、赵文恪率领集中在兴国寺的五百兵，由李世民总指挥，埋伏在晋阳宫城东门左边，以备非常。同时策划了诬陷王威、高君雅的计谋。十五日（甲子）清晨，李渊和王、高共坐办公，忽然，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到留守厅，声称有密状告人谋反。李渊假惺惺示意王威先看，刘政会不给，说所告的就是副留守，只有唐公能看。李渊佯装吃惊说："难道会有这种事！"取状看后怒道："王威、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入寇。"君雅挽袖大骂："这是谋反的人要杀我。"此时李世民已布置军队严密封锁了道路，文静、弘基、顺德等一跃向前将王、高二人绑起关进监狱。十七日（丙寅），恰逢突厥数万骑掠逼太原，轻骑入外郭城北门，出东门。李渊命裴寂、刘文静等勒兵备战，而将各城门大开。突厥莫明其妙，不敢贸然入城。民众都以为王、高确实勾引突厥入寇，李渊就这样名正言顺地把两人杀掉。部将王康达率兵千余出战，全军覆没，城中慌恐。李渊夜间派军悄悄出城，清晨则张旗鸣鼓从其他道路返回，象援军连续不断。突厥见状始终迷惑不解，留驻城外二日，抄掠一番而去。

建成、元吉接到父亲密令后，丢弃了十四岁的异母弟智云立即奔赴太原，河东官吏把智云囚送长安杀害了。建成、元吉在途中碰见自长安抄小路而来的柴绍，当三人进入雀鼠谷（位今山西介休至霍县一带），得知李渊起兵的消息，高兴万分。六月初，他们赶到太原。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通好，获取兵马援助，以增强兵势。李渊同意这一见解，此外，他还希望这样可以消除南下时突厥从北面威胁的可能性。于是亲自写信，卑辞厚礼，讨好始毕可汗。声

称："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时。若能一起南下，愿不侵暴百姓；若因路远不能出兵相助，只是和亲通好、坐受宝货，也听凭可汗决断"。始毕得信说："炀帝为人，我是清楚的，如迎来，必害李渊而击我。如李渊接受我的封号，自为天子，当不避盛暑，以兵相助。"遂以此意回书答复。使者仅七天就顺利返回，将佐皆喜，请答应突厥条件。李渊考虑公然叛隋附突厥不够策略，因此不同意。裴寂、刘文静等都说："今义兵已集，最缺的是战马；蕃兵倒不是急需，胡马待之若渴。如再迟疑，会追悔莫及"。李渊让他们再考虑一个万全之策。裴寂等提出以尊炀帝为太上皇的办法实加废弃，立代王为皇帝。传檄郡县，改隋赤旗为赤、白两色旗。因为突厥是白旗，用半白旗表示臣伏突厥，用半赤旗表示尚尊隋室。李渊听后无可奈何地说："这可谓掩耳盗铃。"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就派使者将此议速报突厥。

李渊如起兵南下必经西河郡（今山西汾阳），该郡守官不肯听命，且离太原近在咫尺。六月五日（甲申），李渊派建成、世民前往进攻，令温大有同行参谋军事。当时军队召集起来不久，未经操练。建成、世民与战士同甘苦，遇敌则身先士卒。路旁菜果，非买不食；军中有人偷吃，就赔偿失主，也不追责盗窃的人。士兵和百姓都很受感动。兄弟二人很快就攻下了该城，只将靠向炀帝献媚得官的郡丞高德儒斩首，自外不杀一人。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并抚慰百姓，使之复业，从而深得人心。这一战役，从发兵到军回太原仅用九天，李渊大喜道："用此兵，虽横行天下可也！"十三日（壬辰）这一天，终于确定了公开举兵太原，直捣关中的大计。

李渊为壮大势力，曾不断开仓赈济贫民，召募新兵，应募从军的人越来越多。他建三军，分左右，通称"义士"，自号"大将军"。十四日（癸巳）建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

唐俭、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姜謩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王长谐、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其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统军；各置官属。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刘瞻任西河通守。

十七日（丙申），突厥派康鞘利带一千匹马和李渊互市，并答应发兵助他入关，要多少兵力都可以。次日，李渊接见康鞘利等，极其恭敬地拜读了可汗来书，厚赠了使者；对马则只择好的买了一半。将士因缺马着急，纷纷请求自己出钱把剩余的也买了。这时李渊狡黠地说："突厥马多而且贪利，今后会源源不绝地来卖马，怕你们买不了。这次我所以少买，是假装没钱，也好象不急需。这样，他们以为马卖不完，就会赊给我们，哪里需要你们破费。"

康鞘利北归，李渊令刘文静随同出使突厥请兵，暗中叮咛："胡骑入中国，是百姓一大祸患。我所以拉拢突厥，是怕马邑的刘武周勾结他们攻我后路；又胡马边行边牧，不费草料。只暂时利用一下壮我声势，勿需超过几百人。"

灵寿（今属河北）的义军郗士陵率众来降，李渊委任为镇东将军，燕郡公，并设镇东府，补充僚属，以此来招抚河北郡县。

七月四日（壬子），李渊任命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基地的一切事务可全权处理。五日（癸丑），李渊率军三万立军门宣誓。誓词中痛斥炀帝"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黩武"；"苛税重敛，吸光百姓血汗，沉重徭役，殚竭民众人力"。以致造成"十分天下九分'盗贼'"的恶果。表示自己当仁不让，要"举勤王之师，废昏立明，拥立代王，安定隋室"，号召军队、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并下令把誓辞作为檄文遍传所属郡县。然后，李渊父子率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这时，居楼烦的西突厥史大奈也率部赶来随同南下。

傍晚，大军进驻清源（今山西清徐）。六日（甲寅）军行时，派张纶分兵西向，经略离石（今属山西）、龙泉（今山西隰县）、文城（今山西吉县）等郡，并征服居住在汾西到离石一带的稽胡部落。八日（丙辰），李渊到西河，慰劳吏民，赈济穷乏。百姓七十岁以上都授与“散官”荣誉衔，其余豪杰，则据才委任 。

大军入雀鼠谷进驻灵石县。十四日（壬戌）遇雨，移营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此地距霍邑（今山西霍县）仅五十里。隋代王杨侑得此消息，忙派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守霍邑，屈突通屯河东，以截断李渊南下的道路。这时阴雨连绵，李渊军不能前进。于是命沈叔安、崔善为等带羸弱士兵回太原再运一个月军粮。十七日（乙丑），传来张纶攻克离石杀太守杨子崇的捷报。

刘文静至突厥拜见始毕可汗，请出兵，并相约：如进长安，民众土地归李渊，金玉绢帛归突厥。始毕大喜，十八日（丙寅），派大臣级失特勒先到李渊军，告诉兵已经上路，不久便到。

二十一日（己巳），李密遣使者送信，约李渊联合灭隋，而且自恃兵强，要做盟主，并建议李渊带步骑数千到河内（今河南沁阳）面结盟约。李渊阅信后计上心头，笑道：“李密狂妄自大。我现在目标是攻占关中，与其拒绝而增加一个新的政敌，不如谀辞赞美以骄其志。他麻痹大意不西向争夺，实际替我堵塞成皋（今河南汜水镇）险道，使江都信息不通；牵制东都的隋军，使其不能策应长安。这样，我能够专心西征。等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可安然地看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于是令温大雅复信说：“我虽庸劣，幸蒙朝廷重用，处隋室将倾 之际而不扶，会遭贤士责备。所以大会义军、和亲突厥，志在救天下，尊隋室。天生众民，必有首领；当今首领，非您而谁？我年过半百，无此大志，心甘情愿拥戴您，无非是攀龙附凤。只望阁下能早日登基，安定百姓。盼能以同姓之情，再封于唐，这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杀杨广于江都，执杨侑于长安，实在不敢遵命。汾、晋一带尚需安抚，河西

会盟，难定日期。”李密得信后大喜，举着对将领们说：“连唐公也拥戴我，夺天下易如反掌了。”于是全力以赴攻取东都，无心外顾，而双方信使自此也往来不绝。

连绵秋雨十余日不止，道路泥泞，李渊军中缺粮。刘文静迟迟不回，又流传突厥与刘武周联兵乘虚袭击太原。李渊举棋不定，召集官员计议。裴寂等说：“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不易迅速攻克。李密虽说联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图，而且刘武周已投靠突厥。太原是一方的都会，又是义军家属所在地，不如回救根本，再图后举。”建成、世民则认为：“目前禾菽被野，何愁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只顾保守同洛粮仓，目光短浅，无暇经略远处。武周、突厥外表相依附，内实相猜忌。武周虽想远攻太原取利，但担心突厥会乘虚夺取马邑。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抢先进入长安，号令天下。今遇小敌，就止足班师，恐从义的人一朝解体，返回太原据守城池为盗贼，我们如何是好！”议后，李渊采纳了前者的意见，下令班师。世民想再次进谏，恰巧夜深，父亲已睡，他不能进见，急得在帐外号啕大哭，声闻帐中。李渊召进询问原因，答道：“今兵以义动，进战则胜，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即到，怎能不悲？”李渊翻然醒悟说：“军已出发，怎么办？”世民道“右军整装未发；左军虽去，估计不远，请让我立即追回”。李渊点头，于是世民和建成夜追左军返回。二十八日（丙子），太原军粮也运到了。

八月一日（己卯），天放晴。二日，李渊令全军晒干行装，整好武器。于次日清晨向东南进发。为避免敌人发觉，沿着霍山脚小路急行军直指霍邑。李渊担心宋老生怯懦不战，闭门守城。建成、世民分析宋老生勇而无谋，用轻骑挑逗，定会出战。万一固守，就诬他私通我方，使城中互相猜忌，老生惧怕左右奏报，怎敢不出城迎战。李渊认为这一看法有道理，并说：“在我军屯贾胡堡时宋老生不乘机进攻，我就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宋老生据城固守，李渊率数百骑兵先到霍邑城东五、六里处等待步兵，并命建成、世民率数十骑兵到城下，一边佯装指挥军队围城的样子，一边叫士兵百般辱骂宋老生。老生果然忍耐不住，点兵三万，分两路从东门、南门杀出。李渊命殷开山速召后军参战。后军一到，李渊和建成列阵城东，世民列阵城南。隋军先冲击城东阵，李渊、建成迎战，渐渐不支。世民见状，与军头段志玄引精骑从城南高地奔驰而下，向隋阵冲杀。世民手挥双刀，接连砍倒数十人，杀得两刀刀刃缺口，敌人鲜血湿透了衣袖。李渊军复振，大声传呼"已活抓了宋老生"。隋军大乱，丢盔弃甲逃向城中。但李渊军已抢先到达城下，城中隋军不得不闭门而将宋老生关在城外。老生自知无望，翻身下马要投城濠自杀，刘弘基等赶到将他斩首。李渊军士气更加高昂，傍晚，在没有攻城器械的情况下肉搏而上，拿下了霍邑城。

霍邑大捷后，李渊封赏有功将士。对原刑徒、奴隶出身应募从军有功的是否和"良人"同样对待，有关官员请示李渊。答道："激战之时，不分贵贱；封赏之际，就有差别。若这样做，怎能鼓励奋战！"并规定"部曲、刑徒、奴隶出身征战有功的，和良人同样授勋"。① 四日（壬午），李渊接见霍邑吏民，象在河西那样慰劳赏赐一番，并选择其中青壮男子从军。同时，原隋驻守霍邑的关中军士想回故乡的一律放归，还授五品散官衔。这样既顺其归志，又通过他们动摇收买关中军民的心。此后，凡没归附的，不论乡村城堡，都写信招抚；凡来投顺的，都授朝散大夫以上官。有人提出赏官太高，李渊说："炀帝吝惜勋赏，在雁门被突厥围困时许授高位，免祸后只给小官，因此士无斗志，将有堕心，我们怎能效仿他，况且加官抚慰以收众心，不胜过用兵杀戮吗？"

八日（丙戌），入临汾郡（今山西临汾），安抚任用郡内官民，

① 隋唐时"良人"指普通百姓，"部曲"指身份低于普通百姓而高于奴隶的人。

如同霍邑。十二日（庚寅），宿营绛郡（今山西新绛）西北的鼓山。绛郡通守陈叔达固守。十三日（辛卯），李渊军攻克该城，俘虏陈叔达等，叔达是陈高宗的儿子，有才学，李渊免罪不问，予以任用。

十五日（癸巳），军行至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刘文静、康鞘利带突厥兵五百、马二千匹到来。李渊大喜，一因可以借助突厥威势震摄关中；二因兵少来迟突厥难以居功自傲；三因突厥马多，可增精骑的战斗力。于是夸奖文静道："这都是你出使的功劳啊！"

这时，汾阴人薛大鼎献计说："请不要攻河东，而从龙门直渡黄河，占据永丰仓（今陕西潼关北），传檄远近，关中唾手可得。"李渊欣赏此策，任命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椽，监察违法乱纪之事。但众将多主张先攻河东。曾在河东照料过建成的任瓌也来谒见。李渊问："你是将门之子，足智多谋，看我起兵之举能成功吗？"答道："关中豪杰都翘首等待义军。我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多年，熟悉那些人，请让我前去宣谕，定会群起响应。义师从梁山横渡，指韩城（今属陕西）、逼郃阳（今陕西合阳）。萧造是个无武略的文吏，必当望风请降。孙华之辈，无所适从，一定远接奉迎。然后鼓行西进，直据永丰。那时虽未得长安，关中大局已定。"李渊也很赞同这一看法，以任瓌为银青光禄大夫。

当时关中反隋力量孙华部最强，十八日（丙申）李渊到汾阴（今山西河津西南）写信召他来见。二十一日（己亥），李渊军进驻壶口，黄河边的百姓献船的日以百数，于是组建了水军。二十四日（壬寅），孙华率轻骑数十从郃阳渡河拜见，李渊和他握手同坐，抚慰夸奖一番，任命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随从将士让孙华据功授官。李渊都给了丰厚的赏赐。

随后，李渊令孙华先过黄河，继派王长谐、刘弘基、史大奈、陈演寿率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占领黄河西岸，等待大军到来。临

行时嘱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距我仅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说明人心不为他所用。但他又怕担怯敌罪名，不敢不战。若渡河时袭击你们，我就进攻河东，乘虚破城；他若全军守城，你们就拆毁蒲津桥，前扼其喉，后击其背，他不逃跑定被我擒。"与此同时，还以任瓌为招慰大使，说降了韩城。

九月七日（乙卯），张纶连克龙泉、文城等郡，并送来俘虏的文城太守郑元璹，李渊把他释放了。

不出李渊所料，屈突通得知孙华引导王长谐等渡河，就派桑显和率精骑数千夜袭长谐军营。正当长谐难以抵挡时，孙华、史大奈率游骑从隋军背后突然袭击，显和大败，狼狈逃回城中，并拆毁了黄河上的蒲津桥。八日（丙辰），冯翊太守萧造归降了李渊。

十日（戊午），李渊指挥各军进围河东，屈突通据城死守，不敢出战，李渊军一时也难以攻克，双方处于相持状态。这时，京畿一带的"豪杰"前来归附的日以千数。见此情景，李渊想放弃河东引兵西向速击长安，但犹疑不决。裴寂说："屈突通拥重兵，凭坚城，我们舍之而去，如攻长安不克。前有京城之守，后有河东之援，易陷入背腹受敌的险境。不如先克河东，然后西进。长安仰仗屈突通的支援，通败，京城援绝，可不攻自破。"李世民反驳这种意见，认为"兵贵神速，我积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城人必闻风丧胆，取之若摧枯拉朽。如淹留在河东坚城下，会给敌人以从容谋划、精心准备的时间，而我方则失去战机，众心离散。况且关中蜂起的群雄没有主帅，不可不早日招抚为我所用。屈突通只是龟缩城中的一个匹夫，不值得担心。"李渊对双方的意见采取两从的态度：留偏师围河东，自己率主力军西进。这时，朝邑法曹靳孝谟以蒲津、中潬二城降（两城全在今陕西大荔东），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京兆府所辖的许多县也纷纷派使者向李渊请降。

十二日（庚申），李渊率大军渡河，十六日（甲子）至朝邑

（今陕西大荔东），宿于长春宫。听到李渊渡河的消息，关中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就象赶集一样。李渊一一劳问，区别授官。

李渊坐镇长春宫指挥军事行动。十八日（丙寅），派建成、文静率王长谐等众军数万人屯驻永丰仓，以扼守潼关（今属陕西）咽喉，防止东方政敌入关，慰抚使窦轨等也受指挥；派世民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率军数万人，沿渭水北岸西进，取泾阳（今属陕西）、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盩厔（今陕西周至）、鄠（今陕西户县）等县，慰抚使殷开山等也受指挥。

于志宁、颜知古和世民妻兄长孙无忌到长春宫拜见李渊。三人都以文学闻名于世，无忌且有才略。李渊一一任用：志宁为记室、师古为朝散大夫、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

屈突通闻听李渊西进，连忙令尧君素代领河东通守，固守城池，亲自率兵数万援长安，但被刘文静阻截，无法通过。隋将刘纲守潼关，兵驻南城，屈突通想前往合军一处，但李渊将领王长谐抢先斩了刘纲，据城抵抗，屈突通只得退保北城。李渊知屈突通分兵去援长安，令吕绍宗乘虚攻河东城，仍未成功。

柴绍受李渊密召赴太原时，对妻子李氏说："尊父起兵，我去参加，同行不方便，可留你在此有杀身之祸，怎么办？"李氏道："你只管快走，我一个妇人容易躲藏，自有办法。"柴绍走后，李氏秘密回到鄠县庄园，散家财、聚徒众。李渊堂弟李神通当时也从长安逃入鄠县山中，与史万宝等起兵响应李渊，聚众万余，以令狐德棻为记室。西域胡商何潘仁在盩厔聚众数万，以隋原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柴绍妻李氏派仆人马三宝说服潘仁，联合神通，合力攻下鄠县城。又派马三宝说服数支反隋力量：有李密的叔父李仲文，以及向善志、丘师利等。隋西京留守屡次派兵镇压都被他们打败，李氏连克盩厔、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南），有兵达七万人。李渊另一女婿段纶也在兰田（今属陕西）聚众万余反隋。

这些力量控制了长安西部和东南部分地区，是李渊在关中的重要基础之一。李渊过河后，神通、李氏、段纶各派使者前去迎接。李渊以神通为光禄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并令柴绍带数百骑沿南山迎接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其他反隋力量纷纷归降，李渊一一写信慰劳、授官，令各住守原地，听世民调遣。

二十一日（己巳），李渊至蒲津。次日，自朝邑渡渭水到永丰仓劳军，并开仓赈济饥民。二十四日（辛未）回长春宫。二十五日（壬申）进屯冯翊。

李世民率军沿渭水北岸西进，所到之处，隋官民及反隋力量归之如流。世民选择豪俊充实部下，进驻泾阳（今属陕西）时，已统劲旅九万。李氏带精兵万余与柴绍同行，和世民会师于渭北。李氏和丈夫分置大营，军中号称“娘子军”。隋官僚子弟丘行恭和兄师利也率军到渭北拜见世民。这支部队本是原州（今宁夏固原）一个奴隶出身的领袖统率的反隋起义军，有数万人。曾围攻扶风太守窦琎，数月未克，军中乏粮。丘师利派弟行恭带五百人背米麦、持牛酒到义军假意慰劳，义军“奴帅”不知是计，在揖拜时被行恭杀害了。他们就这样吞并了这支起义军。世民以行恭为光禄大夫。隋隰城尉房玄龄赶到军营拜谒，世民和他一见如故，委任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感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知无不为。

李渊令刘弘基、殷开山从在泾阳的李世民军中分兵六万西克扶风（今属陕西），南渡渭水，屯驻长安故城（今西安西北）。长安守军出战，被弘基战败。世民则从泾阳引军西向司竹园（在今陕西周至境），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带军随从。当渡渭水进驻阿城（原秦阿房宫城，在今西安西）时，兵力又达到十三万。军令严肃，秋毫不犯。随后西至盩厔，完成从西、北、南扫清包抄长安外围任务。二十八日（乙亥），世民由盩厔派人向李渊禀告，请约定合围长安日期。李渊知道屈突通已陷入东行不可，西归无

路的绝境，不足为虑。遂命建成选驻屯永丰仓的精兵经新丰（今陕西临潼西北）速达长乐宫；世民率军经鄠县进屯长安故城，和刘弘基合军一处，形成东西夹击长安的态势，等待总攻命令。这时，延安（今陕西延安北）、上郡（今陕西富县）、雕阴（今陕西绥德）都归降了李渊。

二十九日（丙子），李渊从冯翊率军西进，废弃沿途经过的隋离宫园苑，将宫女送还亲属。十月四日（辛巳），李渊至长安，在春明门（长安城东门）西北处扎营，诸路大军共集二十余万。李渊令各守壁垒，不得入村侵暴。隋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仅十三岁，辅佐他的卫文昇已年老，听说兵临城下，忧惧成疾，不能理事。只剩下阴世师、骨仪操持守城。李渊多次传谕卫文昇，宣称自己拥护代王、尊崇隋室，但不被理睬，十四日（辛卯），命诸军进围长安。十七日（甲午），李渊迁驻安兴坊。

二十七日（甲辰），一切准备就绪，李渊下令攻城，并宣布纪律：入城后不得侵犯隋宗庙及代王宗室，违者灭三族。由于城固堑深，攻坚战打了十三天，至十一月九日（丙辰），军头雷永吉攀云梯首先登城而入，大军继进，才攻占了长安。激战中孙华中流矢阵亡。

代王在东宫，左右四散逃亡，只有侍读姚思廉陪伴，见军士要冲上殿来，厉声呵斥："唐公举义兵，为的是匡辅帝室，你们休要无礼！"军士愕然而止，布立庭下。李渊随后赶到，将代王移居大兴殿后，叫思廉扶代王到顺阳阁，他行臣子礼后才泣拜而别，回宿于长乐宫。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即宣布约法十二条，尽除隋苛法，仅杀人、劫盗、背军、叛逆的处死。十一日（戊午），因卫文昇已死，以贪婪苛酷、抗拒义师的罪名杀阴世师、骨仪等十余人。马邑郡丞李靖，这时正在长安，此人文武全才，但和李渊有隔阂。李渊进城后也要杀他，李靖大呼道："唐公起义兵，想平定暴乱，难道

竟以私怨杀壮士吗?"李渊为这豪言所动，世民在旁又竭力求情，于是获得了宽恕。随后，李靖被世民召入自己幕府中。其他被俘的隋守城官员也一律释放了。

十五日（壬戌），李渊拥立代王即位于大兴殿，是为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617年），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十七日（甲子），李渊从长乐宫进入长安，恭帝封他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十九日（丙寅）又下诏，将军国政务、文武官任命、刑律赏罚全权归丞相府决定，不用上奏。又置丞相府官属。自隋代周，本不设丞相府及官属，因李渊辅政地位特殊才又设置。

十二月，割据陇右的薛举也进军长安，途中听说李渊已先破城，就围扶风。李渊令世民将薛举击败，又派姜谟、窦轨安抚陇右；李孝恭招慰山南（今秦岭以南）；张道源招慰山东（今潼关以东）。李孝恭击败在山南残暴杀掠的盗贼朱粲，但宽大俘虏，影响不小。金川（今陕西安康）到巴蜀一带有三十余州降附。榆林（今内蒙托克托）、灵武（今宁夏灵武南）、平凉（今属甘肃）、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河池（今陕西凤县东）、扶风、汉阳（今甘肃礼县南）等郡纷纷表示归顺李渊。

屈突通和刘文静相持月余，他密令桑显和夜中偷袭，文静和段志玄全力苦战，击败显和，俘虏全军，屈突通力量更加削弱。有人劝说投降，但他坚决不从。当屈突通听到长安失守、家属全部被俘的消息，便留显和守潼关，自己引兵东出，投奔洛阳。可他刚离开，显和就降了文静。文静派窦琮率轻骑带着显和追赶，在稠桑（今河南灵宝北）相遇，屈突通结阵顽抗。窦琮召来通子屈突寿到阵前劝降，屈突通不听，并叫左右放箭。桑显和对隋军将士喊道:"今京城已经陷落，你们都是关中人，离乡背井想去哪里?"隋军纷纷放下武器。屈突通知不能幸免，下马向东南江都方向叩头，号哭道："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可知。"文静军把他

执送长安，李渊赞他品德忠贞，委任兵部尚书兼世民元帅府长史，然后派他到河东城招降尧君素。君素斥责他不忠隋室反当说客，拒绝投降。

刘文静引兵东向，取弘农郡（今河南灵宝），控制了新安（今属河南）以西地区。二十八日（甲辰），李渊派出的詹俊、李仲衮攻下了巴（今四川重庆）、蜀（今四川成都）。义宁二年二月四日（己卯），李渊派郑元璹带兵出商洛，攻南阳（今河南邓县），马元规攻安陆（今属湖北）、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樊）。

四月，江都兵变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在大兴后殿举哀，尽臣子之礼。五月十四日（戊午），恭帝退位，逊居代王府。二十日（甲子），李渊改大兴殿为太极殿，在此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武德，国号唐，仍定都长安，以土运为德，崇尚黄色。六月一日（甲戌），以世民为尚书令，以侄李瑗为刑部侍郎；原相府官员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殷开山为吏部侍郎，赵景慈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裴晞为尚书右丞；以原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琎为户部尚书，屈突通为兵部尚书。李渊在群臣中最宠信裴寂，上朝时必招与同坐，退朝则引入卧室，言无不从。把日常政务委于萧瑀，瑀也孜孜尽力，刑罪罚过。六日（己卯）又追尊先祖，立太庙。次日，立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宗室李神通等数人也被封王。十二日（乙酉），封杨侑为酅国公，表示对先朝君主的优待。

九月，韦义节攻隋河东尧君素，连连受挫，李渊以独孤怀恩代之。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丑），双方战于蒲坂，李渊婿赵慈景被君素擒获，枭首城外。十二月，李渊令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轮番攻城，都未成功。因攻城严急，君素造木鹅，写信系于颈，详述河东形势，放到黄河中。后顺流到河阳（今河南偃师北），守城人得后送到东都，隋皇泰帝杨侗视信连连叹息，但自顾不暇，无

力增援。隋将庞玉、皇甫无逸从东都来降，李渊派至河东劝降，尧君素不听。又叫君素妻到城下奉劝，被他射死。君素自知没有希望，但决心与城同存亡。后来仓粟尽，人相食。六日（丙子），部将薛宗等杀君素降唐。

李渊以韬晦存身之计，在炀帝疑忌猜测、大杀李姓时保存了自己。任太原留守时暗中聚积力量，坐观群雄争斗。窥伺起兵良机，可谓老谋深算。大业十三年春夏间隋已接近土崩瓦解，他看准时机，杀王威、高君雅，举兵太原。南下途中，废隋苛政、开仓济贫，军纪严明，注意收拢人心，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拥戴。论功行赏，不问出身贵贱，激励了士卒的斗志；偏师围河东，主力军则抢先入关中，最后合击长安，军事战略正确。至于以拥戴杨侑为旗号，可以拉拢隋官僚势力；暂时忍辱称臣突厥，减少后顾之忧，手段也算高明。总之，他是整个历史事件的总指挥。王夫之评论说："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当然，李世民年轻有为，胆略过人，善于结交豪杰，特别是果断纠正李渊指挥中的有时失误，战功显赫，在建唐中起了仅次于其父的作用。李建成在起兵后所显露的军事才能和战绩也不可忽视。

李渊定鼎关中，以此为根基，开始了扫平群雄、统一全国的大业。

（马俊民）

参考资料：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资治通鉴》卷 182—187

《通鉴纪事本末·高祖兴唐》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纪》、《太宗纪》、《高祖皇后窦氏

传》、《平阳公主传》、《裴寂传》、《刘文静传》、《武士彟传》、《崔善为传》、《夏侯端传》、《宇文士及传》、《窦抗传》、《唐俭传》、《李靖传》、《姜谟传》、《许世绪传》、《任瓌传》、《刑法志》、《丘行恭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

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唐高祖》

唐平陇右

李渊定鼎关中，占踞形胜之地，但天下仍群雄逐鹿，争战激烈，新建的唐朝首要任务是通过兼并来统一全国。当时在它的周围存在着数支劲敌：关东，以王世充为首的郑和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正在中原鏖战；晋北，刘武周以马邑（今山西朔县）为根基，勾结突厥，威胁太原地位；梁师都所建的梁，占有朔方（今内蒙白城子）、雕阴（今陕西绥德）、弘化（今陕西庆阳）、延安（今属陕西）等郡，北连突厥，是唐北面的一个威胁；李轨称帝于河西，割据以武威（今属甘肃）为中心的地区；而当时对唐威胁最大的是控制陇右（又称陇西，泛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的薛举、薛仁杲势力。

薛举原籍河东汾阴（今山西河津西南），到他父亲时才迁居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身形魁伟、凶悍善射，骁武绝伦，而且家产巨万，交结豪杰，称雄于边地。曾任隋金城府校尉。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名仁杲（一说仁果），次子名仁越。隋炀帝大业末年群雄四起，陇右也如此。金城县令郝瑗募兵数千人，令薛举统领镇压。大业十三年（617 年）四月三日（癸未），郝瑗给这些兵士发放铠甲武器后设宴款待，不料，薛举早有反心，与儿子仁杲及党羽十三人在宴席上突然动手，劫持郝瑗，获取了兵权，并谎称搜捕谋反的人，囚禁起郡县官吏。随后开仓赈济贫乏，收买人心，自称“西秦霸王”，改年号为“秦兴”。封仁杲为齐公，仁越为晋公。

薛举树起叛隋大旗后，竭力招集群盗，抢掠隋牧场中的马匹，

以充实骑兵部队。陇右盗首宗罗睺，在薛举起事以前就已聚众不少，这时率军归服，被薛举封为义兴公。隋将军皇甫绾带兵一万屯驻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薛举选精兵两千人袭击，攻克该城。这时珉山羌酋长锺利俗又率众二万归降，薛举兵力大振。更以仁杲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宗罗睺为兴王，作仁杲副手。随后，分兵攻略土地，取西平（今青海乐都）、浇河（今青海贵德）二郡，很短时间，就尽占了陇右地区，拥兵十三万。

七月，薛举在金城自称秦帝，立妻鞠氏为皇后，仁杲为皇太子。又令仁杲率兵攻克天水（今属甘肃），随后，薛举把都城从金城迁到此地。薛举还令薛仁越率兵攻剑门关口（今属四川），但行至河池郡（今陕西凤县东北），遇隋太守萧瑀阻击而被迫撤回。

义宁元年（617 年）十二月，薛举派仁杲攻隋扶风郡城（今陕西凤翔），但途中遇唐弼在汧源（今陕西陇县）拒守。唐弼是在扶风地区的一支反隋豪强势力，早在大业十年就拥立李弘芝为傀儡天子，自称唐王，有众十万。西秦军受阻不能通过，薛举就派使者前往招降，唐弼杀李弘芝请降。仁杲乘唐弼防备松懈，引军突然袭击，打败唐弼并兼并了全军。唐弼仅带着数百残余骑兵到扶风郡向隋请降，被太守窦琎杀死。

这时薛举兵势更强，号称三十万，虎视眈眈要图谋长安，但李渊已捷足先登，薛举闻讯，于是围攻扶风。薛氏大兵压境，李渊令李世民率兵进击，又令姜谟、窦轨同出散关（位今陕西宝鸡西南），安抚陇右。十七日（癸巳），李世民在扶风大破薛仁杲军，斩首数千，追奔至陇坻（今陕西六盘山一带）而还。受此巨创，薛举又怕李世民逾陇追击，便问群臣道："自古有投降的天子吗？"褚亮说："越帝赵佗归汉，蜀刘禅降晋，近代后梁萧琮降隋，子弟至今仍享受荣华富贵。转祸为福，自古就有"。郝瑗反驳说："陛下问这种问题是欠妥当的，褚亮的话又是何等荒谬呀！过去汉高祖

屡经战败，蜀先主刘备败后曾失丢妻子，才终于成就大业；陛下怎能因一战不利，就立即想到亡国的问题呢！”闻听此言，薛举也后悔了，自我掩饰道：“只不过为了试试你们罢了。”于是重赏郝瑗，引为谋主。

姜谟、窦轨行至长道（今甘肃礼县），被薛举所败，退回长安。李渊派通议大夫刘世让安抚唐弼余党，但途中与薛举相遇，战败被俘。

义宁二年四月，郝瑗建策薛举联合梁师都，厚赂突厥，合纵并力，攻取长安，薛举点头同意。但由于李渊闻讯后派宇文歆去突厥活动，突厥翻悔，又拒绝了原已答应的助薛举、梁师都攻长安的请求，郝瑗的谋略没能实现。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六月十日（癸未），薛举发兵进攻泾州（今陕西泾川北）。这时，李渊已断定薛举是大唐的心腹之患，只有首先把他铲除，京城才能安全。因为潼关以东李密和王世充在洛阳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无暇西顾；刘武周虽一再进攻河东太原，对关中还没有形成直接威胁；梁师都虽离长安最近，但他兵力不够强劲，不是唐的主要敌人；李轨起兵的目的是割据河西一方，没有更大的政治抱负；唯独薛举野心大，兵力强，而且处心积虑要夺取长安。李渊于是以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率八总管进兵讨伐。

七月，唐丰州总管张长逊击宗罗睺，薛举率大军来援，军屯高墌城外（今陕西长武北），纵兵虏掠，游兵直达豳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境内。李世民得知后率军来到高墌城中。他估计薛举军粮不足，急于速决战，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下令军队深沟高垒，拒而不战。不料战机未到，李世民得了疟疾，只得把军事委托给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但告诫说：“贼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锋。应该坚壁不战，待其粮尽兵疲，才可出击。他们如来挑战，千万不要理睬，等我病愈，再来打败他。”

殷开山心中有些不服，私下对文静说："秦王担心您办不了此事，所以才说这样的话。而贼兵知道秦王有病，一定会轻视我们，应该对他们显示兵威才是"。于是刘、殷两人率军在高墌西南列阵，并自恃兵多而不设防。世民得知，立即写信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薛举率军悄悄潜到唐军背后，以精骑突然袭击。九日（壬子），双方激战在浅水原（今甘肃长武北）唐八总管皆败，士卒死亡一半以上，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都阵前被俘。李世民只得引残兵退还长安，薛举于是攻克了高墌城。李渊追究战败的责任，罢免了刘文静、殷开山的官爵。其实，李世民虽然患病，但仍在军中。刘、殷指挥上的轻率导致失败，他作为军事统帅也有间接责任。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几乎连战连捷，从未经受过如此惨败，所以这次因骄而败的教训是极深刻的，使他在以后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头脑都能保持高度冷静。

八月，薛举派仁杲进围宁州（今甘肃宁县），被唐刺史胡演击退。郝瑗又向薛举献计说："今唐军新败，关中惊恐骚动，应乘胜直取长安"。薛举赞同，不料临发兵前，忽然生病，只得暂时中断军事行动。召来巫师看病，说是死去的唐兵鬼魂作祟。薛举为人残忍，每战胜，所获俘虏全部杀掉，而杀时多用断舌、割鼻，或用碓捣杀。这时听了巫师的话，精神恍惚，病情加重，于九日（辛巳）病亡。太子仁杲继位，居于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

薛仁杲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称"万人敌"。但性贪而好杀。曾俘名士庾信的儿子庾立，因为不肯降服而大怒，他竟将庾立肢体砍成数块放在火上烤，然后分割给军卒们吃。前攻克天水时，把富人全召来倒悬起，用醋灌鼻，逼迫他们交出金宝。总之，残暴程度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连薛举也觉得仁杲太过份，常告诫道："你的才略足以办事，但苛虐寡恩，这样最终会败我国家的"。但仁杲依然故我。由于他对将领们也"苛虐寡恩"，和众将平常就矛盾重重，嗣位后，大家更猜惧不安，离心离德。而郝瑗哭薛举

过于悲痛，一病不起。从此，西秦兵势渐衰。

唐则利用这一机会，十七日（己丑），李渊以李世民为统帅，再次西征薛仁杲。事前，为了防止李轨和薛仁杲联合，还暗中派遣使者拉拢了李轨。

九月十二日（甲寅），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杲，战不利。仁杲则又进军包围了唐骠骑将军刘感镇守的泾州。泾州城中粮尽，刘感杀所乘马，把肉分给将士，而自己一点不吃，只煮马骨汁混合木屑充饥，仍顽强固守。激战中城几次险遭攻陷，这时唐长平王李叔良率兵赶来增援。仁杲见此情景，扬言粮尽，引兵南去；十三日（乙卯），仁杲又派高墌城人伪以城降。李叔良令刘感率军前往高墌城。十七日（己未），刘感到城外叩门，城中人却答道："贼已离去，可爬城进来。"刘感命烧城门，城上浇水灭火，这时刘感完全明白敌方在施诈降计，必有埋伏，连忙令步兵先还，自率骑兵殿后。突然城上举起烽火，仁杲见此信号，率兵自南原凶猛冲下，双方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刘感遭擒。仁杲乘胜再围泾州，并强逼刘感对城中喊话，要说"唐援军已败，不如早早投降"。刘感假意应允，到城下后却大呼："逆贼饥馁，亡在旦夕，秦王率军数十万，四面包剿而来，城中人不要担忧，奋力守城吧！"仁杲大怒，把感在城旁埋到膝，然后驰骑射杀，但刘感至死，面色凛然，骂声不绝。李叔良在城上望见大惧，忙出金厚赏将士，死守城池，但仅能保住泾州，无力去救刘感。

十八日（庚申），唐陇州刺史常达在宜禄川（今陕西长武境）击败薛仁杲，斩首千余级。薛仁杲屡攻常达不能取胜，就派部将仵士政带数百人去诈降，常达不知是计，厚加抚慰。二十三日（乙丑），仵士政找到机会，带其徒劫持了常达，胁迫城中二千人投降。常达见到仁杲，词色不屈。仁杲这次却称他是条硬汉子而予以释放。敌将张贵对常达说："你认识我吗？"答道："你只不过是一个逃死的贼罢了。"张贵大怒，要杀他，有人从旁相救才得幸

免。

十一月，李世民率大军再次到高墌，仁杲命宗罗睺带兵抵御。罗睺频频挑战，世民仍按上次战术，坚壁不出，以消耗敌军锐气。众将领纷纷请战，他冷静地说："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军恃胜而骄，有轻我之心，应闭垒不战以耗敌军。等敌军骄傲松懈而我军愤怒激昂时，可一战而胜。"并严令全军："敢言战者斩！"

两军相持六十余日，西秦军粮尽，内史令翟长孙、将领梁胡郎等带部下来降，仁杲妹夫左仆射锺俱仇也以河州（今甘肃和政西北）降唐。这时，李世民深知薛仁杲将士离心，消耗殆尽，反攻战机已到，就令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原扎营诱敌。秦将军宗罗睺自恃骁悍，多日求战不得，气愤已久，果然上当，率全部精锐猛攻，想一口吞掉这支较小的唐军。可梁实守险不战，挫其兵锋。营中无水，人马数日不饮，仍顽强抵抗。世民料敌军已疲惫，决战时机成熟，于是对众将说："现在到了全面出击的时候了"。次日早晨，世民令右武候大将军庞玉列阵于浅水原南，从敌阵右方相诱，宗罗睺又全力进击，两军酣战，庞玉渐渐不敌。突然，世民率主力军自浅水原北出其不意直捣敌军后背，宗罗睺只得回师相拒。只见李世民一马当先，亲率骁骑数十冲陷敌阵，唐军士气激昂；庞玉军重振旗鼓，配合主力夹击，一片杀声惊天动地。宗罗睺腹背受敌，虽经苦战终于大败，士卒死亡数千，余军狼狈逃窜。世民率二千精骑要乘胜追击，窦轨拦马谏阻道："现在薛仁杲仍占守着折墌坚城，罗睺虽败，不可轻进。暂请按兵不动以观形势。"世民答道："对此我已深思熟虑了，必须乘现在破竹之势，不可坐失良机！舅舅请不要再多言。"说罢迅速挺进，直抵折墌城。仁杲在城前列阵企图顽抗，世民扼守泾水南岸。

唐兵临城下，西秦危若垒卵，这促使仁杲与众将平日不和的矛盾激化了，秦骁将浑干等数人临阵降唐。仁杲恐惧，引兵入城固守。这天傍晚，唐军大队人马纷纷赶到，将折墌城团团围住。半

夜里，守城将士争先恐后缒城而下，投降唐军。仁杲黔驴计穷，只得于次日（八日、己酉）早晨率文武百官开城门出降。世民受降，获西秦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战役结束后众将向李世民祝贺，并借机问道："大王野战获胜，可仁杲尚保坚城，你舍弃步兵，又无攻城器械，只率轻骑直逼城下，我们都认为难以成功，但结果却大获全胜。此中道理何在？"世民答道："宗罗睺率领的都是陇右人，将骁兵悍，我是乘他骄傲轻敌，出其不意才将他打败，但斩获不多，若不迅速进击，溃兵会全部退入折墌城中，仁杲抚而用之，要攻克该城就困难了。而乘胜追击，使溃兵无喘息之机，则散逃回归陇外。折墌城空虚，我已兵临城下；敌军主力丧失，薛仁杲吓破胆而无暇谋划，因此不战而投降。这就是我获胜的原因。"众将听此精辟分析无不悦服。

世民把归降的士卒全部让仁杲兄弟及宗罗睺、翟长孙等率领，和他们一起狩猎，并不疑忌，薛仁杲等降将畏威感恩，都愿效犬马之劳。世民早闻褚亮大名，而且知他曾劝薛举归唐，于是求访得见，厚加礼遇，引为秦王府学士。

高祖李渊要派使者到世民处传令，说"薛举父子，杀我战士甚多，一定诛尽其党羽以慰死者冤魂。"当时已降唐的李密谏阻道："薛举残暴地滥杀无辜，这正是他灭亡的原因。对归降的人，不可不安抚！"李渊觉得有理，于是下令只杀首谋者，其余全部赦免不问。

二十二日（癸亥），秦王世民返回长安，在市上斩了薛仁杲。李渊赐临死不惧，忠于大唐的常达三百段帛；追赠为唐尽忠而死的刘感为平原郡公，谥忠壮；在殿廷击杀西秦降将仵士政；因张贵尤其淫暴，处以腰斩。然后，李渊设宴犒劳将士，并对群臣说："今后要靠在座诸公忠心拥戴以成就帝王大业，若天下太平，大家可共保富贵。王世充如果得志，你们定遭灭门之祸。薛仁杲君臣的下场，岂不是前车之鉴吗！"二十八日（己巳），以刘文静为户

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殷开山恢复了原来的官爵，因为两人都随李世民参加这次战役而立了功。

薛举父子建西秦至被唐消灭，前后不到二年。唐平定了陇右，铲除了争夺关中的心腹大患，为以后的东进免去了主要的后顾之忧。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3—186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陇右》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纪》、《太宗纪》、《薛举传》、《刘文静传》、《殷峤传》、《李叔良传》、《刘感传》

《通典·兵典》

《汪篯隋唐史论稿·唐太宗）

唐平河西

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好读书，有谋略，家富于财而乐善好施、赈济贫乏，因此受到家乡人的称赞。大业末年，任隋鹰扬府司马。

大业十四年（617 年）四月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举兵后，七月李轨和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商议道："薛举为人残暴，而我地近临金城，他定会前来侵掠。隋本郡官员平庸怯懦，势必不能抗拒，我们岂能束手被擒落个妻离子散的下场呢！与其如此，大家不如戮力同心，保据河西（指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湟水流域），以待天下之变。"众人异口同声地赞同李轨的看法，但在推举一名举事首领时，大家又互相推让，没有主动承担的人。曹珍说："我很早就听说图谶已预示了李姓当为天下之主，今日李轨参预这一谋划，正是天命啊！"一句话说得大家如梦初醒，纷纷拜贺李轨，尊奉为主，然后商定了起事的周密计划。

七月十三日（丙辰），李轨令安修仁在夜间率领居住在当地的"诸胡"即各种少数民族人悄悄潜入内苑城，树起大旗，高声呐喊；李轨则在城外聚集了当地豪强群起呼应。就这样里应外合，逮捕了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控制了武威郡（今甘肃武威）。起事成功后，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并仿照隋开皇时的官制设置了官僚机构。

关谨等人想把逮捕的隋官员杀尽，然后瓜分他们的财产。李

轨不赞成，说："诸位既然尊我为主，就应听从我的号令。我们举义兵的目的在拯救黎民百姓，若干杀人取货的强盗勾当，怎能成就大业！"因此释放了逮捕的隋官员，并任命谢统师为太仆卿、韦士政为太府卿。这时会宁川（今甘肃永登一带）的西突厥阙度设也自称可汗，拥有两千骑兵，降服于李轨。阙度设是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的弟弟，大业八年随兄率众降隋，炀帝令他带病弱万余口留居在会宁川。

果然如李轨所料，不久，薛举派将领常仲兴渡黄河进攻河曲。李轨遣将李赟迎击，双方在昌松（今甘肃古浪西北）展开激战，结果常仲兴全军覆没。李轨要将俘虏宽大放回，李赟反对道："我们竭力苦战，才俘虏了这些敌人，你若将他们放回，岂不是放虎归山又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吗？不如全部坑杀，以除后患。"李轨说："天若保佑我，终当擒获薛举，这些人仍归我所有；如果大业不成，留他们又有什么用！"于是将俘虏释放了。随后不久，又连克张掖（今属甘肃）、敦煌（今属甘肃）、西平（今青海乐都）、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四郡，全部占有了河西五郡之地。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薛举在浅水原（今甘肃长武北）大破唐军，并要乘胜进取长安，只因薛举病重未能实现。薛举死，太子仁杲继位后仍野心勃勃，虎视长安。为了打败这支劲敌，李渊想拉拢李轨，因为李轨和薛氏西部接壤，可以从背后牵制他的兵

自己的谋主。梁硕见诸胡势力强大，暗中奉劝李轨要小心提防。

户部尚书安修仁本出自西域安国，他的先祖安难陁在北魏时迁居凉州，至修仁时已经四代，约百年左右，历代都担任凉州主祠火祆教的萨宝，也就是本州信仰火祆教的西域诸胡的领袖。梁硕的建议损害了以他为代表的诸胡集团的利益，因此怀恨在心。李轨儿子仲琰曾拜访梁硕，梁硕安坐不起，仲琰认为是轻视自己，也大为不满，于是勾结安修仁共同诋毁梁硕，诬告他谋反。李轨信以为真，也不核察，竟派人带毒酒到梁硕府中鸩杀了他。梁硕是举事元勋之一，这样无辜被杀，引起故旧元勋们的疑惧。从此，李轨心腹们离心离德了。

有一胡巫对李轨说："上帝要派玉女自天而降"。李轨竟然相信，兴师动众，征发百姓修筑玉女台迎接玉女降临。由于劳费甚广，引起民众不满。又逢天灾，河西大饥，乃至人相食。李轨虽倾尽家产施舍饥民，但象杯水车薪，不能周遍，于是召集群臣商议能否打开国家仓库赈济百姓。曹珍说："国以民为本，本若不固，国将倾危，我们怎能爱惜仓粟而坐视百姓饿死呢！"李轨的元勋故旧一致认为开仓赈饥为上策。谢统师为首的原隋旧官员则不然，他们被李轨逮捕后虽放免并任以官职，但是内心不服，秘密与诸胡相勾结，结成朋党，排挤李轨的元勋故旧。这时，他们又想借天灾的机会离间李轨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于是攻击曹珍道："百姓中挨饿的都是病弱无用之人，勇壮之士是不会的。国家仓库储粮是为了防备不测的大事，怎能随便散给这些无用之人。曹珍的建议只是讨好世俗人情，并没有考虑国家大计，他不是忠臣。"李轨认为这话有道理，决定不开仓赈济。百姓怨声载道。

武德二年二月，唐使者张俟德来到凉州。李轨召集群臣廷议道："唐天子是我的从兄，现在长安即皇帝位。一姓不能互争天下，我想去掉帝号接受唐赐封的官爵，你们看如何？"曹珍答道："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称王称帝的，何止一人！唐在关中称帝，您

在河西称帝，各主一方，互不妨碍，况且已经作了天子，为什么又自我贬黜呢！一定要以小事大，不妨效法萧詧事西魏的故事，虽是附属国，但保有领土帝号。”李轨点头称是。二月二十八日（戊戌），派尚书左丞邓晓去长安，带去的书信中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接受李渊赐封的官爵。李渊见信大怒，拘留了邓晓，开始谋议兴师讨伐李轨。

其实，唐于武德元年底击灭了薛仁杲，解除了京城西侧的心腹大患，进而想进取河西之地，以完成关陇地区的统一。因此，李轨不仅已失去牵制薛氏东进力量的价值，而且成了继消灭薛氏集团后又一个要铲除的对象。这是李渊所以绝李轨通好并拘禁其使者的主要原因。至于李轨用曹珍的建策，依萧詧自称帝而向西魏称臣的故事，只不过是李渊的借口而已。

由于李轨连接吐谷浑和突厥为外援，李渊为了分化他们之间的联盟，孤立李轨，就派使者前往和李轨南面接壤的吐谷浑。吐谷浑可汗名伏允，其子顺曾作隋朝的人质，这时留在长安。李渊提出伏允如和唐联合并出兵进攻李轨，唐就把顺放还。伏允欣然同意，起兵击李轨，双方战于库门。

李轨臣安修仁兄安兴贵在长安居住，上书李渊，请求前往凉州说降李轨。李渊有些怀疑地说：“李轨占据河西，连好吐谷浑，结援于突厥，我兴兵讨伐，恐怕还难以取胜，你独身前往只凭三寸之舌就能成功吗？”兴贵答道：“李轨凶强，诚如您所言。但臣家在凉州，历代都是豪门望族，有很高威望，当地胡汉士民没有不信服的；弟修仁又被李轨所信任，子弟们身任机密要职的也有数十人。臣今前往，晓以祸福，他要听臣良言相劝自然很好；如若不听，我在他身边伺机图谋，也易如反掌。”李渊点头赞许，令他前往凉州。

安兴贵到凉州后，李轨授左右卫大将军职，并询问自安之策。安兴贵乘机说：“凉州地处僻远，土薄民贫；胜兵虽十万余，但地

广不过千里；既无险固，又接蕃戎；蕃戎豺狼，非我族类。凭此条件想享国长久，我实在怀疑。今唐起兵太原，略定中原，战必胜，攻必克，这是天命，并非人力所能。今日如举河西之地归顺大唐，你的功劳要超过归降东汉的窦融，定能登卿相高位，获封侯之爵。”听此言后，李轨沉默良久，不满地说：“昔刘濞凭借江左的兵力还自称‘东帝’，我今以河西之众，为何不能称‘西帝’？我据山河之固，唐虽强大，能奈我何？你从唐来，是替唐作说客的吧！”安兴贵恐惧，假装谢罪道：“臣闻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绣夜行。臣满门受陛下荣禄，怎能附唐！只想竭尽忠心，报效陛下，因此提出愚蠢见解，采纳与否全凭圣断，臣对大凉决无贰心！”

安兴贵经此事后知道李轨无法劝降，就和安修仁等暗中集结诸胡力量准备举行政变。这时，大凉国的内部已危机四伏：薛举起兵时，凉州大受威胁，当地的汉、胡各族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所以能团结一致对抗外敌。到薛仁杲败亡后，河西诸胡渴望恢复中亚、长安的贸易，但李轨则旨在割据河西，这样就与河西安氏代表的胡商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现在他们也要举兵除掉李轨。此外，李轨初起时，其支柱一是曹珍等故旧，另一是河西胡人领袖安修仁。但事成后，诸胡与故旧分为两党，互相倾轧，而隋旧官僚谢统师等又与诸胡相勾结，排斥李轨元勋故旧，并离间君臣关系，李轨政权内部分崩离析。

安氏兄弟准备好后，率领诸胡兵包围了凉州城，李轨率步骑千余出城迎战。先前，原薛举部将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逃归李轨，李轨开始答应任以刺史之职，但后又翻悔未授，而且礼遇又薄，奚道宜怀恨在心。这时他率部下羌兵和安修仁共同攻击李轨。李轨战败只好退回城中固守，等待外面援兵。安兴贵在城外大声宣告：“大唐派我来杀李轨，谁胆敢帮助他顽抗，要诛及三族！”城中人听后纷纷出降。李轨见状无可奈何地叹道：“人心已去，这是天亡我呀！”于是携妻子登上玉女台，置酒为别。五月十三日（庚辰），

安兴贵将李轨逮捕并上奏唐廷。原凉派往长安的使者邓晓听到这一消息，却舞蹈称庆。李渊斥责道："你作为凉的使臣，闻听国家灭亡，不悲而喜，以向我献媚取宠。象你这种不忠于李轨的人，今后岂能会尽节于我！"遂废弃终身，永不任用为官。

李轨被囚送长安，和子弟们一起斩首。李渊因安氏兄弟有功，委任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爵凉国公，赐帛万段；安修仁为左武候大将军，爵申国公。

李轨自建凉到灭亡共三年。河西被平定，唐完成了关陇地区的统一。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4—187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河西》
《旧唐书》、《新唐书》：《李轨传》、《吐谷浑传》
《隋书·西突厥传》
唐·林宝《元和姓纂》
《汪篯隋唐史论稿·西凉李轨之兴亡》

唐平河东

武德元年（618 年）十一月，唐刚平定陇右、河西，稳定了关中局势，盘踞马邑（今山西朔县）的刘武周、宋金刚在突厥的支持下率大军冲杀而来，要与唐室争夺天下。

刘武周原籍河间景城（今河北沧州西），父亲刘匡迁居马邑。刘武周为人骁勇善骑射，喜欢交结豪强。兄名刘山伯，曾训斥他道：“你交往的净是狐朋狗友，将来会灭门九族的。”刘武周因此恼羞，离家去洛阳，投隋太仆杨义臣帐下。曾随军征辽东，因军功授建节校尉。回马邑后作鹰扬府校尉。太守王仁恭因为他是当地豪强的首领，颇是厚爱，令率领亲兵随侍左右。刘武周和王仁恭的小妾私通后，恐怕事情败露，又见天下已乱，于是暗怀诡计，阴谋作乱。

马邑太守王仁恭，为人贪鄙，多受贿赂，但从不赈济贫乏。刘武周乘机煽动：“现在百姓饥饿，僵尸满道，王太守紧闭粮仓，毫不赈灾恤民，身为百姓父母官能这样做吗？”民众听后无不愤怒。随后，他假装生病在家不出。众豪强纷纷前来问候，他杀牛纵酒款待，宴席间又鼓动道：“大丈夫岂能坐着等死！现在官仓中粮食新旧相积，以至腐烂，谁能和我共取之？”众豪强同声许诺。

大业十三年（617 年）二月八日（己丑），王仁恭坐衙办事，刘武周入内拜见，跟随身后的党羽张万岁等径直向前杀了仁恭，并将首级拿出示众，郡中无人敢动。于是开仓放粮，赈济饥民，收买人心。又派人骑快马将檄文遍送境内各地，所属城堡全部归顺，

搜集兵力得一万余人。这时，刘武周自称郡太守，并归附突厥作为靠山。

隋雁门丞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讨刘武周，包围了桑乾镇（今山西朔县境）。二十一日（壬寅），武周与突厥合兵击杀智辩，孝意奔逃回雁门（今山西代县）。三月十七日（丁卯），武周袭破楼烦郡（今山西静乐），进取炀帝行宫汾阳宫，并用俘虏的隋宫女贿赂突厥始毕可汗，始毕 用战马回报。武周得突厥良马，充实骑兵，军力更强，又攻陷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这时，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赠给狼头大旗。倚靠突厥的支持，他自称皇帝，立妻沮氏为皇后，改元“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左仆射，妹婿苑君璋为内史令。随后，刘武周率兵攻克隋陈孝意驻守的雁门郡。

李渊在太原起兵南下以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向突厥称臣。等到唐在关中的统治地位日渐巩固以后，唐和突厥的关系便日渐疏远。虽然唐对突厥还时常奉献金帛，却不能满足突厥贵族的欲壑。这样，想扩大自己地盘的刘武周便勾结突厥一道南侵。

上谷郡（今河北易县）人宋金刚，原在故籍聚众万余反隋，和定州（今河北定县）豪杰魏刀儿互为唇齿关系。窦建德灭魏刀儿，宋金刚前去相救，但被战败，于是率军四千西投刘武周。武周早就听说宋金刚善于用兵，得之如获至宝，不仅封为宋王，委以军权，还将家产的一半相赠。金刚感恩戴德，为了表示忠心，将妻子休掉，娶武周妹为新妻，并建议刘武周先攻下太原，再南向争天下。武周深表赞同，以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率兵三万攻唐。

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辛卯），刘武周进攻并州（州治所太原，又称晋 阳，在今太原南）。四月，又引来突厥骑兵，屯驻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境），兵锋甚盛。当时唐镇守并州的总管是齐王李元吉。敌人大军压境，元吉竟派车骑将军张达只带百名步兵尝试敌军兵力强弱。张达因兵力太单薄，不愿听命；但元吉强迫出兵，

结果全军覆没。张达愤怒之下投降了刘武周。二日（庚子），张达引导刘武周偷袭榆次（今属山西），攻克该城。十八日（丙辰）又进围并州。太原告急，二十日（戊午）唐高祖李渊诏太常卿李仲文率兵救并州。五月十九日（丙戌），刘武周攻陷平遥城（今属山西）。六月十日（丁未），武周进逼介州（今山西介休），僧人道澄作内应，用佛幡将武周的人缒入城中，遂攻陷该城。

李渊令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反攻介州。这时，刘武周部将黄子英率军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内来回奔驰，并多次以轻兵挑战。但唐军刚一接战，黄子英就佯装战败逃入谷中。五次三番，逗得宝谊、仲文心头火起，于是率全军追入谷里。忽然，伏兵四起，唐全军覆没，宝谊、仲文都被俘虏。后来，这两人又侥幸逃出，李渊仍令他们率兵讨击刘武周。

刘武周攻势猖獗，唐军连连失利，李渊很是忧愁。右仆射裴寂自告奋勇，愿领兵前往相救。二十六日（癸亥），李渊以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统率大军讨伐刘武周，并给了临机决断、不用上奏的权力。

七月二十五日（辛卯），宋金刚进攻唐浩州（今山西汾阳）达十日之久，不克而退。九月，裴寂率大军到介休，宋金刚紧闭城门，坚守不战。裴寂见一时无法攻破，就命令全军在城东南的度索原安营扎寨，以待战机。但宋金刚切断了唐军营饮用的涧水，士兵渴乏，裴寂只得移营就水。宋金刚乘势纵兵进袭，唐军溃散，逃亡略尽，裴寂一日一夜马不停蹄，逃入晋州（今山西临汾）。裴寂败后刘武周又数次派兵进攻浩州，都被刺史刘赡击退。李仲文引唐军来援，两人据城固守，竭尽全力保持这一战略要地。裴寂战败上表请罪，李渊来书安慰一番，仍叫他镇抚河东。

刘武周打败裴寂后，迅速进逼并州。李元吉惊慌失措，无心守城，于是骗司马刘德威说："你率老弱守城，我率强兵出战。"刘德威信以为真，谁知九月十六日（辛巳）夜间，元吉携带妻妾，在

太原精兵的保护下弃城逃往长安。元吉刚走，刘武周兵临城下，唐军已无抵抗能力，城中土豪薛深开城投降，武周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太原城。并州失守消息传来，李渊大怒，对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稚，不熟悉军政大事，才派窦诞、宇文歆辅弼。太原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又是兴唐的基地，可轻易就抛弃了，据说是宇文歆首先提出这种建议，应当将他斩首。"李纲谏道："齐王年少骄逸，可窦诞从不劝戒，还掩饰他的过失，百姓从而愤怒。今日失败，是窦诞的罪过。宇文歆屡次进谏，齐王拒而不听，今年二月，他还上奏章反映了这一情况。象这种忠臣怎能杀掉！"其实，窦诞是李渊女襄阳公主的丈夫，他有意袒护，想拿宇文歆当替罪羊，以开脱李元吉的罪责。好在李渊听了劝阻，于次日召见李纲，称赞道："我有你这样的辅臣，今后不会出现滥刑了。元吉自己胡作非为，不是两人能禁止了的。"于是把窦诞、宇文歆一同赦免，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唐卫尉少卿刘政会在太原被刘武周俘虏，但他忠于唐室，秘密派人送信论述刘武周形势。

刘武周占据太原，立即派宋金刚进取晋州（今山西临汾），攻克该城并俘虏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但不久，弘基又侥幸逃归。这时，金刚迅速南下，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攻陷龙门（今山西河津）。十月，又克浍州（今山西翼城、绛县）。军势凶猛，锐不可当。唐河东统帅裴寂性本怯懦，又无将帅之才，面对劲敌，无计可施，只是不断地派遣使者到虞、泰二州（今山西夏县、运城、永济、河津一带），强令乡村百姓进城堡防守，并将积蓄焚毁。民众因此慌恐不安，怨声载道，都想叛唐。夏县民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裴寂带兵进讨，又吃败仗。随后被李渊召回朝廷，交司法部门追究败军之罪，但旋即赦免，恩宠弥厚。

李渊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率兵征讨吕崇茂。当时，原隋朝残将王行本仍占据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他本是尧君素部下，武德元年十二月薛宗

等杀尧君素降唐时，他带精兵七百驻扎在外，听到消息后回军杀进河东城，逮捕了参与杀害尧君素的数百人，全部杀头，再次登城拒守。独孤怀恩引兵围城久攻不克，而王行本也举众响应刘武周。到这时，唐在黄河东岸就只剩下晋东南的一隅之地了。关中大为震骇，李渊慌忙中竟下手令道："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应放弃黄河以东，谨守蒲津关（今陕西大荔东黄河西岸）以西地区。"在这关键时刻，李世民上表说："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地区富实，是京师的财源之一，如果拱手让人，臣实不甘心。请给我三万精兵，定能消灭刘武周，克复汾、晋！"李渊于是尽发关中兵力充实世民所统率的军队，命他前去讨伐。十月二十日（乙卯）这一天，李渊亲自到长春宫（位今陕西华阴县境）设宴壮行。

十一月十四日（己卯），刘武周又进攻浩州。秦王李世民引兵自龙门（今山西河津）踏坚冰渡过黄河，驻扎在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和屯驻浍州的宋金刚主力相对峙。当时黄河以东州县被刘武周、宋金刚军队虏掠一空，民间无仓廪积谷。人心慌乱，聚入城堡。唐军征粮无所得，军中缺粮。针对这种情况，世民发布政令，抚慰百姓，号召复业。百姓听说秦王为帅而来，无不归附，自近及远，回来的人逐日增多，唐军因而能够征取谷物，使军粮充实。在军事上，他一面命令大军休兵秣马，坚壁不战；一面派偏将率小股兵力乘机抄掠敌军粮草。

原来，宋金刚孤军深入晋南，不得民心，想在当地征粮困难，大部分军粮是从太原远运而来。沿途山险重重，不论是运输还是保护粮道，都十分艰难。当时，从太原到晋南主要有两条交通线：一条从太原沿汾水西侧经清源（今山西清徐）、浩州渡汾水达灵石（今属山西）。这就是李渊太原起兵南下的路线。另一条是从太原沿汾水东侧经榆次、平遥、介休以达灵石。这是刘武周南下时所采用的路线。浩州正当西线要冲，刘武周虽反复争夺这一战略要

地，但始终掌握在唐手中。这样不仅可以切断刘武周运输西线，还直接威胁运输东线。李世民正是针对刘武周、宋金刚这个致命弱点而制定了军事方针。有一次，李世民和李道宗登玉壁城观察敌情，他问道宗："敌凭兵卒众多，邀我交战，你说怎么办好？"道宗说："敌军乘战胜余威，锐不可当，易以智取，难以力敌。今深沟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众，不能持久，粮运枯竭，自然离散，可不战而擒。"世民点头道，你的见解和我完全相同。李世民坚壁不战而抄掠敌军运输粮草的方略，使宋金刚军因粮草不足而日渐衰落。

十二月，于筠劝李孝基急攻夏县吕崇茂，独孤怀恩却提出先制成攻城器械，再进军，孝基采纳了怀恩的意见。这样就给了吕崇茂准备的时间，于是他派人向宋金刚求救，金刚派手下将领尉迟敬德、寻相率兵迅速赶到夏县。李孝基背腹受敌，唐军大败，孝基、怀恩、于筠、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等都被俘阵前。尉迟敬德得胜回浍州，李世民侦得消息，派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早已伏埋在他们归途中必经的美良川（今山西夏县北）。敬德军一到，唐军突然袭击，斩首两千余级。不久，敬德、寻相又偷偷率精骑援助河东的王行本。世民消息灵通，亲自率步骑三千抄近路夜至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埋伏下来，又袭敌方措手不及，敬德、寻相全军覆没，仅两人单身逃归。李世民并不追赶，带着投降的骑兵返回柏壁。

李世民用奇兵连连获胜，唐军将士斗志昂扬，纷纷请求要与宋金刚决一死战。李世民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分析形势道："金刚孤军深入，精兵猛将，都聚在此。武周占据太原，全靠金刚为藩篱。但他军无粮草积蓄，而用虏掠的手段获取军资，难以持久，利在速战。我大军闭营养锐以挫其锋，而组织小股精锐部队插入汾、隰二州（今山西汾阳、隰县），捣其心腹之地。等敌方粮尽计穷，自然逃回。要耐心等待这一战机，不应速战。"

武德三年正月，唐将秦武通攻河东，王行本出战败北，开门投降，后被斩首。宋金刚率军围绛州。二月，刘武周派兵攻潞州（今山西长治）、陷长子、壶关（今皆属山西）。唐潞州刺史郭子武难以抵挡，李渊令将军王行敏相助。但行敏与子武不和，就借传说子武要叛乱的机会将他斩首。这时，刘武周又派兵攻潞州，但被王行敏战败。

三月二日（乙丑），刘武周派部将张万岁攻浩州，被唐守将李仲文战败，斩俘数千人。二十一日（甲申），唐行军总管张纶再次击败进攻浩州的刘武周，俘斩千余人。刘武周为打通南下的粮道连续进攻浩州，都被李仲文击败。宋金刚粮草告急，刘武周只好派将领黄子英保护汾水东岸的粮道强行运输。但唐浩州行军总管张德政突袭，杀死黄子英，俘虏了运粮敌军，并占领了汾水东岸的张难堡（今山西介休北），切断了刘武周的运输东线。

粮道全被切断，宋金刚军中食尽，无法立足，于四月十四日（丁未）向北撤退。李世民抓住战机，立即率军衔尾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追上寻相，大破其军，又乘胜向北挺进，一昼夜急行军二百里，交战数十回合。当追到高壁岭（今山西灵石南）时，总管刘弘基手执马辔劝阻说："大王破贼追击至此地，功劳显赫，无人能比。请您爱惜贵体，暂停深入追击。况且士兵们又饥又疲，应该在这里屯驻休息，等后面兵、粮到齐，再北进也不迟。"世民答道："宋金刚计穷而逃，众心离散；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须乘此有利形势彻底打败他。如果中途停顿，使他获得喘息机会，就会功败垂成。我尽忠报国，岂能顾惜自身！"说罢策马扬鞭而进。将士们见主帅如此，也不敢再说饥饿，终于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刚。两军一日八次交战，唐军大胜，俘斩敌军数万人。夜间，唐军宿营在雀鼠谷西原。这时，世民已经两日未进食，三日没解甲了，军中只有一只羊，他与将士们分而共食，大家异常感动。

二十三日（丙辰），被俘的原陕州总管于筠从宋金刚处逃回唐营，报告了敌方的军情。李世民随即率军急行到介休。宋金刚仍有兵二万，出西城门背靠城布阵，南北长七里，要与唐军在这里决一死战。世民令总管徐世勣、程咬金、秦叔宝攻阵北端；翟长孙、秦武通攻阵南端。两翼军和金刚军激战，力渐不支，向后退却。金刚乘势进攻，世民则率精骑向敌军阵后勇猛冲击。金刚背腹受敌，难以招架，大败而逃。世民紧追数十里，直到张难堡。唐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据堡固守。世民卸下甲胄后，这些历尽艰难的将士们才看清楚，迎接进堡。大家一边欢呼雀跃，一边泪流满面，直到李世民随从将士告诉秦王还没进食时，才想起献上浊酒、粗饭。

宋金刚逃后，尉迟敬德收集残兵败将拒守介休。李世民知他是一员猛将，爱才心切，就派任城王李道宗和宇文士及前去劝降。敬德、寻相、张万岁于是献介休、永安（今山西灵石西）两县降唐。世民得到敬德，高兴万分，委任为右一府统军，仍率旧部八千人马，和唐各军一起屯营驻扎。屈突通见世民全不提防，担心敬德等不是真心投诚，急忙提醒，世民却不以为然。

刘武周听宋金刚军兵败，大为惊恐，连忙丢弃太原逃往突厥。宋金刚收集了刘武周的残军，想再和唐军决一雌雄，但军已丧失斗志，不肯听命。金刚无可奈何，也只好和百余骑北奔突厥。李世民到太原，刘武周的仆射杨伏念出城投降；被俘的原唐将领唐俭则在城内封了府库，等待大军入城接管。至此，刘武周占领的河东州县又全部回归唐政权手中。

宋金刚带少量残兵败将逃到突厥后，不被突厥重视。不久，他离开突厥，想回原起兵基地上谷郡发展势力。但中途被突厥发现，追获杀死。

刘武周南下时，他的内史令苑君璋曾劝阻道："李渊率一州之兵，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太原以南，道

路险隘，孤军深入，难以增援。如果进攻不利，怎能顺利归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割据一方，称孤道寡，这是上策”。武周当时不听，留苑君璋守朔州（今山西朔县）。失败后面对君璋不禁落泪，追悔莫及。刘武周寄突厥篱下生活了一段时间，日子也不好过，于是和部属谋划逃回马邑旧地。不料消息泄露，也被突厥杀掉。

平定河东（这里泛指黄河东，即今山西）的捷报传到长安，李渊大喜，二十九日（壬戌），大宴群臣。赏赐缯帛时，让将士到皇家府库中尽力搬取。

李世民留李仲文镇守并州，五月二十九日（辛丑）班师回到长安。

刘武周从起兵到被突厥杀掉，前后共六年。但盘踞河东时，是悬在长安头上的一把利剑。如今这一患已除，唐出关东争夺天下的时机成熟了。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4—188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河东》

《旧唐书》、《新唐书》：《刘武周传》、《裴寂传》、《独孤怀恩传》、《太宗纪》

《通典·兵典》《汪篯隋唐史论稿·唐初之骑兵》

唐平东都

李渊攻占西都长安后，就想图谋东都洛阳。一次，李渊要大发兵讨伐王世充，司农卿韦云起曾谏道：国家承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加上连年灾荒，关中贫饥。现京师初平，人情未安，长安周围，群盗实多。舍此不图而出兵潼关，一旦内盗乘虚，祸将不小。他还认为王世充远隔千里，对关中目前没有威胁。当务之急在安人劝农，巩固关中。三年之后，待实力雄厚，兵强马壮，一举可平定关东。李渊暂时听从了这一劝阻。但义宁二年（618 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李密大破驻守洛阳的隋将王世充，二十二日（戊辰），李渊即以救东都为名，命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直指东都。四月，军至洛阳，屯营在芳华苑；东都闭门不出，无法入城。李密派军来攻，双方发生一次小规模战斗，不分胜负。这时，李世民认为唐新定关中，根本未固，孤军远来，虽得东都也不能固守。于是在九日（戊寅）引军返回长安。

武德元年（618 年）六月以后，李渊集中起主要兵力为了击败严重威胁关中安全的薛举父子和刘武周、宋金刚，已不能抽调大军东顾了。即使如此，李渊仍念念不忘经营关东地区。他在武德元年十月派淮南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去招抚关东郡县。武德三年当唐消灭了严重威胁关中安全的两支劲敌后，唐主力军立即再次东出潼关，翦除关东群雄。

在这段时间里，关东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武德元年五月，隋

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了东都，留守洛阳的隋官尊奉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元皇泰。九月，王世充击败了李密瓦岗军，被杨侗授以太尉、尚书令，总督内外诸军事，执掌一切军政大权。王世充在武德二年四月又篡夺了杨侗的帝位，建国号郑，改元开明。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势力。但王世充为人刻薄猜忌、虚伪奸诈，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激烈，瓦岗军降郑的将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等猛将都脱离了他归降了唐朝。武德三年，郑将领、州县降唐的连续不断，王世充为此制定了严刑峻法：一人亡叛，全家不论老少全部斩首；父子、兄弟、夫妻相互告发的可以免罪。又让五家为保，有一家逃跑而四家不知也全部杀头。但杀人越多逃亡越厉害。还以宫城为大狱。凡是被王世充怀疑的人，连家属都囚禁起来；众将出征，也将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关在里面。平日禁闭的人不下万口，饿死的日有数十。弄得公私愁窘，人不聊生。

武德三年六月，唐高祖李渊召集群臣谋议进击东都。王世充闻讯不敢怠慢，连忙命令所属各州镇选拔精兵良将集中到洛阳。他设置了四镇将军分守洛阳四城。七月初一（壬戌），李渊下诏令秦王李世民挂帅，统领众军出潼关讨伐王世充。二十一日（壬午），唐军进至新安（今属河南）。这时，王世充已布署兄弟子侄及宗族同姓固守洛阳及周围战略要地：魏王王弘烈镇襄阳（今湖北襄樊）、荆王王行本镇虎牢（今河南汜水镇）、宋王王泰镇怀州（今河南沁阳）、齐王王世恽守洛阳南城、楚王王世伟守皇城、太子王玄应守洛阳东城、汉王王玄恕守含嘉仓城、鲁王王道徇守曜仪城。王世充亲率众将：左辅大将军杨公卿领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领内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领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总计三万人作为主力，严阵以备唐军。

唐将罗士信率前军包围了慈涧（今河南洛阳西）。慈涧东距洛阳仅约三十里，王世充立即率兵三万来攻。二十八日（己丑）李世民带轻骑前往侦察，不料和王世充数兵在慈涧附近猝然相遇。郑

军见李世民人少，将他团团包围。唐军毫无惧色，奋勇冲杀；世民一马当先，左右驰射，敌应弦而倒，生擒了郑左建威将军燕琪。最后终于杀退了郑军，脱险而回。鏖战中李世民杀得尘埃满脸，面目皆非，以至守卫军门将士都不能相识，拒而不让进营，直到世民脱掉头盔才被认出，请进营中。次日，世民率步骑五万进军慈涧；王世充闻讯怯战，放弃了该城撤回洛阳。

李世民夺取了洛阳西线的主要据点慈涧后，紧接着作了重要的军事部署：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下占据龙门（今洛阳西南）；将军刘德威越太行山东下包围河内（今河南沁阳）；王君廓自洛口（今河南巩县东北）切断东都粮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今河南郑州西北）攻迴洛城（今河南孟县南）；自己率主力军进屯北邙山（今洛阳北），连营结阵，步步进逼。在唐军声势的威慑下，王世充的长史张公谨和刺史崔枢以洧州（今河南扶沟）降唐。邓州（今河南邓县）土豪也囚送王世充所任命的刺史降唐。

八月十四日（甲辰），黄君汉按李世民的命令派校尉张夜叉用水师袭取了迴洛城，俘虏了郑的将领达奚善定，拆断了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南桥，降服了郑的二十余城堡。王世充派太子玄应率杨公卿等反攻迴洛城，未能成功，只得在城西筑月牙形城，留兵戍守。

王世充在洛阳西北面的青城宫布阵，李世民也列阵相抗。世充隔水对世民说："隋室倾覆，唐称帝在关中，郑称帝在河南；我未曾西侵，你却率兵东来，原因何在？"世民叫宇文士及答道："四海之内都望风降唐，唯独你不知时务，特为此而来。"世充又说："如两家息兵讲和，岂不善哉！"士及答道："奉诏攻取东都，没令讲和。"双方相持到傍晚，才各引兵回营。

九月十三日（癸酉），王世充的显州总管田瓒以所辖的二十五州降唐，从此，王世充与襄阳间的联系被隔断了。史万宝根据李

世民的命令进军至甘棠宫（在河南宜阳境）。十七日（丁丑），世民令右武卫将军王君廓攻拔了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王世充派将魏隐等反击君廓，君廓伪装撤退，郑军追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唐军乘胜东进，直达管城（今河南郑州）。

王君廓本是并州石艾（今山西平定）人，少孤贫。大业末年聚众反隋，曾降李密，不被重用而又降唐。先前，王世充曾派将领郭士衡、许罗汉侵掠唐境，他以奇策击退敌军。李渊下诏称赞说："将军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胜多，也没有这样的奇迹"。

王世充的尉州刺史时德叡率所辖杞（今河南杞县）、夏（今河南太康）、陈（今河南淮阳）、随（胡三省认为是淆州之讹）、许（今河南许昌）、颍（今安徽阜阳）、尉（今河南尉氏）七州来降。李世民仍叫这些归唐的郑官吏在各地留任原职，不加变易，以分化瓦解王世充集团。于是河南郑所属州县相继降唐。

二十一日（辛巳），李世民带五百护卫骑兵登上魏宣武陵（在北邙山上）观察阵地，被王世充发现，他亲率步骑万余突然将唐军包围。单雄信手持长槊跃马直刺世民，尉迟敬德见状，大吼一声，飞骑而来，一槊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军惊惧，稍稍退却，敬德掩护世民杀出重围。随后，两人率骑兵回战，在郑军阵中杀进杀出，如入无人之地。屈突通率大队人马赶到。郑军大败，世充只单身逃脱。唐军生擒了郑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千余级，俘虏六千余人。

战后，李世民对敬德说："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报答我了。"原来李世民在讨伐王世充的过程中，刘武周降唐的一些将领如寻相等又叛逃而去。世民部将怀疑尉迟敬德，私自把他囚禁在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建议世民说："敬德骁勇绝伦，今天已然把他关押起来，心必怨恨，留下恐生后患，不如杀掉。"世民道："不然，敬德如有贰心，早就反叛了，岂能在寻相之后！"立

即下令释放敬德，并引入卧室，赐给黄金，安慰道："大丈夫要胸怀宽阔，不要因一点小事记仇。我决不会听信谗言而害忠良，你要相信我。如你一定要走，就以此金相赠，聊表前段共事之情。"敬德深受感动，愿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之恩。因此在这次危险之中，他拚命救助世民。世民为奖赏敬德战功，赐金银一箧，而且自此以后更加信任。

二十二日（壬午），原李密濮州刺史杜才干用诈降计杀郑滑州刺史邴元真，以濮州（今河南鄄城北）降唐。十月五日（甲午），郑大将军张镇周又来降。十五日，唐行军总管罗士信攻陷郑硖石堡（今河南新安西）后，又围攻千金堡（今洛阳西北）。千金堡拒不投降，守堡军中还有人泼口大骂。士信大怒，夜派百余人抱数十婴儿到城下，让婴儿啼哭，并诈道："我们都从东都来投罗总管的。"一会儿又互相吃惊地说："这是千金堡，我们走错路了，赶快离开。"堡中守军以为罗士信已经率兵撤退，堡外全是从洛阳逃亡的人，遂出兵追击。士信暗中埋伏在堡旁，见城门一开，立即杀入堡中，并残酷屠城，老少不留。

唐军进逼洛阳，王世充的管州总管杨庆降唐，世民封他为上柱国、郇国公，并派徐世勣率兵进驻管州城。当时郑太子王玄应镇守虎牢，驻军在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汴州（今河南开封）之间，闻听此讯，便率兵攻管城，但被徐世勣击退。李世民又派郭孝恪带书信劝降了郑荥州刺史魏陆。王玄应不知，还派大将张志等四人往荥州（今河南荥阳）征兵，在二十七日（丙辰）全被魏陆逮捕了。邓阳城县令王雄也以诸城堡（在今河南登封到禹县一带）降唐，世民令徐世勣带兵接应，并任命王雄为嵩州刺史。嵩山以南的道路从此畅通无阻了。这时魏陆叫张志模仿王玄应的笔迹写假信，令郑的东道援兵停止前进，并令将领张慈宝暂回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汉杀掉慈宝。张慈宝不知是诈，到汴州后被杀；王要汉斩慈宝后也归降了唐军。李世民任命王要汉为汴州总管。郑

的州县官吏见唐强郑弱，一时间纷纷叛郑归唐。王玄应大惊失色，只好撤回洛阳。

十一月一日（庚申），唐安抚大使李大亮攻拔了王世充侄王弘烈管辖下的樊城镇（今湖北襄樊市北）等城栅十四座。二十九日（戊子），又攻陷了沮州（今湖北南漳）、华州（今湖北宜城）。驻守襄阳的王弘烈原已经和洛阳隔绝不通，这时更成了孤岛。

李世民率大军压城，完全陷于孤立的王世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只好派使者向占据河朔（即今河北一带）的窦建德求援。建德权衡了利弊，决定出兵相助。

十二月三日（辛卯），王世充的许（今河南许昌）、亳（今安徽亳县）等十一州降唐。十三日（辛丑），郑总管徐毅也以随州（今湖北随县）降唐。形势紧迫，王世充见到窦建德回访的使者后，立即派兄子王琬及长孙安世带去厚礼，恳求建德马上出兵。

武德四年正月，李世民选拔千余精锐骑兵都穿上黑衣黑甲，分为左右队，命猛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别统领。每次战斗，世民也身穿黑色铠甲亲率这支精骑为前锋，乘机突袭，所向披靡，敌军颇是恐惧。一次，屈突通和窦轨率军按行营屯，不料与王世充军猝然相遇，唐军交战不利。正当这危急之际，李世民闻讯率这支精骑驰来相救，猛冲郑军。世充大败，仓皇逃归，唐军生擒郑骑将葛彦璋，并俘斩六千余人。

二月，王世充太子王玄应自洛阳带兵数千去虎牢运粮，归途中受李世民派遣的将领李君羡的截击，全军覆没，玄应单身狼狈逃回。世民见王世充粮源不足，所属外围城镇纷纷降唐，令宇文士及奏请进围东都。李渊对士及说："回去告诉秦王，今攻取洛阳，目的在安定天下，破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等非私家应有的东西，你们要封存好，其余子女、玉帛全部分赐立功将士。"

军事行动被批准后，十三日（辛丑），李世民移军到青城宫。但壁垒尚未建好，王世充率军两万已出方诸门临谷水列阵，要发

动进攻。唐将领惊惧不安，李世民却镇定自若，指挥精骑在北邙山摆好阵势，并登魏宣武陵观察敌情。然后对左右说："贼穷途末路，才倾巢而出，侥幸来战。今日破之，以后他就不敢再出洛阳城。"于是派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谷水出击，临行时嘱告："兵一交锋立即点火放烟。"世民见烟升起，率精骑从北邙山冲下，与屈突通合军力战。世民想知道世充军阵的厚薄，他一马当先，与数十精骑冲进郑军，勇不可当，直透敌阵。但激战中和护卫骑兵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紧随身后。世民正要拨马杀回，郑军数十名骑兵已追到。突然，世民的坐骑中流矢倒毙，情况危险万分。这时，丘行恭回马射追来的敌骑，箭不虚发，郑军不敢向前。丘行恭抓住这一瞬间，把战马让给了世民，自己挥舞长刀在马前护卫，跳跃大呼，连斩数人，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再次突破世充军阵返回唐营。王世充也率军殊死拚战，几次被唐军冲散而复合。这一场恶战，从早晨辰时直杀到午时，郑军力量不支才开始撤退。李世民乘机挥军追击，直抵城下，斩俘七千人，并包围了洛阳城。唐骠骑将军段志玄与郑军力战时深入敌阵，不幸马倒被擒。郑军两骑兵把他夹在中间，并用手揪住发髻，要渡洛水回城报功。但正要渡河，志玄突然大吼一声，纵身跃起，把两人拉下马来，夺马驰归唐营。郑军追骑数百，竟然不敢逼近。

十四日（壬寅），王世充不甘心战败，又出洛阳城南面的右掖门，指挥军队临洛水列阵，想和唐军再决一雌雄。不料，身边将领王怀文突然举槊便刺，由于世充内穿铠甲，槊仅透外衣而折断。左右将士因这意外事件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王怀文见行刺不成，拨马逃奔唐营，被追杀于途中。原来，王怀文是唐骠骑将军，从前在侦察敌情时被俘，王世充想收买他，引置身边。但怀文忠于唐室，这次就是想杀敌首立功。世充回军营后，解去上衣内的铠甲，裸示群臣道："怀文小儿用槊行刺都不能伤我一根毫毛，这岂不证明天命在我身吗！"

郑的御史大夫郑颋原是李密部下，见王世充为人猜忌狡诈，常称疾不参预政事。至此，见郑势孤力弱，便请求削发为僧躲避祸患。王世充恐怕国家大臣在这时出家会动摇民心而不应允，郑颋则擅自出家为僧。世充闻知大怒道："郑颋这匹夫以为我一定失败，想出家为僧来侥幸逃脱，不杀他如何威慑众人！"遂将郑颋斩于市。但郑分崩离析的趋势已不可避免了。二十二日（庚戌），郑将王泰弃河阳（今河南孟县）逃走，部下赵夐以城降唐。

不久，唐总管王君廓按李世民断敌最后饷路的部署率军到洛口城下，与郑将领单雄信、裴孝达相持不下。李世民率步骑五千从洛阳来援，刚到轘辕，已成惊弓之鸟的单雄信等闻讯即逃去。王君廓又乘势追杀，并占据洛口城。二十七日（乙卯）郑刺史陆善宗以怀州（今河南信阳）降唐。

洛阳的外围战略要地大多被唐军控制了，于是李世民对洛阳宫城展开猛烈的围攻。但城高堑深，防御极严。郑守城的重武器，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大如车辐，箭镞象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命令四面攻城，昼夜不停，但十余日未能成功。城内想内应唐军的达十三次，也都因行动迟疑而被杀。唐军久攻坚城不下，伤亡较大，将士们有些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世民断然否定道："我军大举东进，是为了一劳永逸。中原各州已望风降服，只剩洛阳一座孤城，其势必不能持久，功已在垂成之际，为什么舍弃！"并严令全军："洛阳不破，决不回军。敢言班师者斩！"将士们因此不敢再说撤兵。李渊听到这一情况，也密令世民回师。世民上书论述东都必能攻克，又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面论形势。德彝对李渊说："世充占地虽多，但郑属各州都是表面服从，真正执行他号令的，只洛阳一城而已。况且世充现在已经智尽力穷，攻克洛阳只待旦夕了。今日如若回师，贼势复振，相互联结，以后一定很难铲除了。"李渊听罢连连点头。

三十日（戊午），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暗派使者到管城向唐将

徐世勣请降，世勣令驻守洛口的唐将军王君廓夜引兵偷袭虎牢，沈悦在城中开门接应，遂攻陷该城，俘虏了郑荆王王行本以及长史戴胄。唐占据军事要地虎牢，对赢得这场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世民给王世充写信，分析祸福，劝他投降，世充置之不理。三月，李世民知郑粮道已全部被切断，于是改变强攻坚城的战术，采取兵围洛阳不攻，而掘堑筑垒封锁，要把王世充困死在孤城中。果然，城中不久就缺乏食品：绢一匹仅值粟三升，布十匹只值盐一斤，服饰珍宝贱如粪土。后来，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只得澄取浮泥，放点米糠作饼充饥；吃后全身浮肿，腿脚无力，死者的尸体在街巷中相互枕倚。先前隋皇泰帝迁入宫城的居民原有三万户，此时不足十分之一。即使贵为郑的公卿高官，糠皮也不果腹；尚书郎以下中低级官员往往饿死。眼看东都洛阳就要陷落，正在这关键时刻，河朔的窦建德亲率大军西救洛阳。夏军一到滑州（今河南滑县东），郑的行台仆射韩洪就迎接入城。二十一日（己卯），窦建德进驻酸枣（今河南延津西）。

为了截断郑、夏两军会合，李世民当机立断，把围困洛阳的唐军分成两支：一支令屈突通辅佐李元吉继续围困东都；他亲自率精锐步骑三千五百迅速开进虎牢，扼制了窦建德西进路线。

四月十五日（壬寅），王世充听夏军来援，精神为之一振，派骑将杨公卿、单雄信领兵出击。李元吉迎战不利，唐行军总管卢君谔战死。但郑军终是将卒饥疲，无力再战。不久，王世充的刺史周仲隐又以平州（今河南荥阳东北）降唐。

五月一日（戊午），李世民率军在虎牢大破夏军，临阵生擒窦建德。消息传开，郑的剩余州县又接连降唐。七日（甲子）偃师（今河南偃师东）、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来降；王世充将领王德仁也放弃洛阳旧城而逃，副将赵季卿以城降。

八日（乙丑），李世民将囚禁的窦建德以及王世充先前派往夏请救兵的使者王琬、长孙安世等，带到洛阳城下示众。世充在城

上望到，与建德对语而泣。李世民又放长孙安世进城叙述窦建德兵败被擒的经过。王世充听后，更加惊恐万分，他召集众将商议弃城突围南奔侄儿王弘烈还驻守的襄阳，可将领们已丧失斗志，都说："我们靠的是夏王，如今夏王被擒，即使侥幸逃脱，也没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世充见大势已去，无力挽回，只好投降。

九日（丙寅），王世充身穿素衣，带着太子、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出城，步行到唐军营门前，俯伏请罪。世民讥笑道："你过去常把我当作无知的孩童，如今见了孩童，怎么这么恭敬？"世充连连叩首，吓得汗流浃背，恳求宽恕，世民答应不杀他。

随后，李世民命令唐军先入洛阳城，分守市肆，维持秩序，严禁抢掠。军令如山，无人敢犯。十日（丁卯），世民进入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到郑中书、门下省，搜集隋原来的图籍、制诏；但已被王世充毁掉了，没有所获。又命萧瑀、窦轨等封存府库，取出部分金帛，赏赐将士。逮捕了王世充部下中罪大恶极的段达、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张童儿、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几员将领，押至洛水边斩首。囚禁韦节、杨续、长孙安世等十余人送往长安。然后，打开牢门，把被王世充关押的无辜士民全部释放，还祭祀了遭冤被杀害的人。经此一番安置，洛阳的人心安定下来了。

唐败夏灭郑，攻取了东都，天下大为震动，王世充残余州县纷纷降唐：二十一日（戊寅），王世辩以徐州（今属江苏）、宋州（今河南商丘南）等三十八州到唐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瓌处请降；七月五日（庚申），王弘烈、王泰、豆卢行褒、苏世长以襄州降唐。至此，王世充原占领的地域（相当今河南和湖北省北部）全部被唐平定了。

十九日（甲子），李世民押送王世充到长安。李渊历数王世充罪状，他答道："臣虽罪恶深重，死有余辜，但秦王曾许臣不死。"于是二十一日（丙寅），下诏免王世充死罪，与兄弟子侄们一起流

放到蜀地。不久，当王世充停留在廨舍中准备起程时，唐定州刺史独孤修德带兄弟到此，假称有敕书唤他听旨。世充和兄世恽连忙跑出，因毫无防备，被修德等杀死。原来独孤修德父名机，在隋皇泰帝手下为官。王世充篡权称帝时，独孤机密谋归唐被世充所杀。这次修德是特来报杀父之仇的。李渊对此也不深究，只免除了修德的官职。随后，王世充的儿子玄应、兄世伟等兄弟子侄们在流放途中谋反，也统统被处死。

王世充从篡权称帝到被唐消灭，前后共计三年。唐平定郑、夏两个劲敌后，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5—189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东都》

《旧唐书》、《新唐书》：《王世充传》、《韦云起传》、《唐太宗纪》、《王君廓传》、《尉迟敬德传》、《李大亮传》、《段志玄传》、《李勣传》

唐平河朔

武德二年(619 年)四月，已上表向隋皇泰帝称臣的窦建德闻听王世充篡位的消息，也建立天子的旌旗。他以夏皇帝的身份，追谥隋炀帝为闵帝，封隋齐王杨暕子杨政道为郧公，并与王世充绝交。为了壮大自己的兵势，他依然结好突厥。当隋和亲突厥的义成公主派使者迎接萧皇后和南阳公主时，窦建德不仅以千余骑兵护送，还把宇文化及首级献给了义成公主。窦建德这时的政治目标，就是以河朔(又称“河北”，泛指今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为根基，要公开与群雄争夺天下。

六月三日(庚子)，窦建德攻克了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八月，他利用刘武周南下连败唐军的机会扩大地盘，带兵十万攻洺州(今河北永年东)。李渊先时派出的山东道安抚大使李神通正在洺州，因怯敌而率军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十一日(丁未)洺州被夏军攻陷，唐总管袁子干投降。十九日(乙卯)，窦建德又联合突厥攻相州，李神通又连忙撤到唐将徐世勣驻守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九月四日(己巳)，相州陷落，唐刺史吕珉被杀。而李神通所派由慰抚使张道源镇守的赵州(今河北赵县)也在二十五日(庚寅)被攻陷，张道源和总管张志昂全作了夏的俘虏。窦建德因这两人和在以前被俘的唐邢州刺史陈君宾都守城抗拒、杀伤夏军，要把他们斩首。国子祭酒凌敬道：“人臣各为己主，他们坚守不降，正是忠臣所为。今若斩首，大王如何激励自己部下！”建德大怒道：“我都攻到城下还不投降，他们是力屈被擒的，怎能宽容！”凌敬

面色安然地说："假如唐幽州总管罗艺攻我，您派大将高士兴到易水抗拒；罗艺军一到，他就投降，您难道喜爱这种懦夫吗？"建德翻然醒悟，下令释放。

十月四日（己亥），唐高祖李渊特赐占据幽州（今北京）的罗艺姓李氏，封燕郡王，目的在鼓励他替唐经略河北。六日（辛丑），罗艺在衡水（今河北衡水西）击败夏军。窦建德和罗艺几次交战都失利，于是率兵南向发展，攻卫州（今河南汲县）。他每次行军，常将部队分成三路并进：辎重、体弱的将士居中央，步兵、骑兵分列左右，相隔各三里余。这次进军，建德率一千骑兵打先锋，在过黎阳三十余里时，和徐世勣派出侦察的三百骑兵相遇。唐将丘孝刚，骁勇而善使马槊，他兵力虽少，但猛击夏军，建德猝不及防而败退。这时夏右路军赶来相救，击斩了丘孝刚。建德南下途中遭此意外截击，不禁勃然大怒，集中兵力攻陷了黎阳，俘虏了李神通、徐世勣父亲徐盖、魏征和李渊妹同安公主。只有徐世勣带数百骑兵杀出重围，渡过黄河脱险。但数日后闻父亲被俘，又回黎阳投降了窦建德。建德任命徐世勣为左骁卫将军，仍驻守黎阳，但把他父亲带在身边作人质。以魏征为起居舍人，魏征是随李密降唐后自愿请命安抚山东的，他到黎阳说降了原李密将领徐世勣，因而正在黎阳。唐卫州和共州（今河南辉县）官员闻听黎阳陷落，也都归降了窦建德。

不久，滑州刺史王轨的奴仆杀轨并带首级来降。窦建德却说："奴杀主人大逆不道，我怎能容纳这样的人！"立即下令杀死该奴，并将王轨的首级送还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州的官吏富人感激非浅，当即请降。接着，东面的济州（今山东东阿西北）、齐州（今山东济南）以及兖州（今属山东）的徐圆朗也表示归服。徐圆朗就是兖州人，隋末举兵反隋，占据了琅邪（今山东临沂）到东平（今山东郓城东）一带，拥兵二万余人。曾归附李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现又降夏。

二十四日（己未），窦建德回洺州，筑万春宫，把都城从乐寿（今河北献县）迁到这里。而安置李神通于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以客礼相待。

十一月，徐世勣想归唐，但又怕连累父亲，与部将郭孝恪商议。孝恪道："我们刚降窦氏，动则被疑，应先立功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图谋此事。"世勣称是。于是袭破王世充的获嘉城（今属河南），俘获甚多，全献给了窦建德，从此受到信任。十二月，徐世勣又派人献计道："曹（今河南定陶西）、戴（今河南成武）二州户口充实，孟海公窃据其地，和王世充面合心离。如用大军攻击，指日可取。得该地后，再兵临王世充的徐（今江苏徐州）、兖二州，河南之地可不战而定。"建德听罢深以为然，想亲攻河南，先派将领曹旦等率兵五万渡黄河，命徐世勣引兵三千会合。

武德三年正月，徐世勣计划等窦建德到河南后，乘其不备，用兵突袭大营把他杀掉。这样不仅可以解救父亲，而且举夏领土归唐，创立奇功。不料窦建德妻子临产，迟迟不到。曹旦是建德的妻兄，到河南后仗势经常侵扰地方，引起归属夏的一些州县的怨恨。魏郡李文相，绰号李商胡，聚众五千余人，占据孟津中潬（今河南孟县南）。母亲霍氏，也善骑射，自称霍总管。徐世勣和李文相结为兄弟后入拜霍氏，她见世勣后流泪说："窦氏如此无道，你为什么向他俯首称臣！"世勣答道："您不要悲伤，不出一个月，我必杀掉这贼，然后和兄弟一起归唐"。徐世勣辞别后，霍母对儿子说："世勣已答应我共图此贼，但恐事久生变，要当机立断"。这天夜里，李文相召集曹旦偏将二十三人饮宴，用酒灌醉后全部杀死。曹旦别将高雅贤、阮君明尚在黄河北岸未渡，文相用四艘大船运北岸兵三百人渡河，到中流时也全部杀掉。仅有一个兽医跳水逃脱，到南岸报告了曹旦，他吃惊非小，连忙戒备。李文相动手后才派人悄悄告诉徐世勣。世勣军和曹旦连营扎寨，郭孝恪主张立即偷袭，但世勣迟疑不决，派人打探，回报说曹旦已戒备森严。万般

无奈，徐世勣只好和郭孝恪率数十骑兵连忙驰奔关中。徐世勣归唐后，夏群臣纷纷请杀徐盖。窦建德不同意说："世勣原是唐臣，被我俘虏后仍不忘本朝，是个难得的忠臣呀。他的父亲又有何罪？"

李文相又率精兵二千袭败夏将阮君明，高雅贤连忙收军撤退，文相追击不及而回。此时，曹旦攻取了济州，降服了守将张青特，随后，返回了洺州。二月，窦建德攻杀了李文相。

窦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休养生息；境内无盗，商旅野宿。一时期本地出现太平景象。

五月，窦建德回师北指，派大将高士兴再次进击罗艺，谋取唐的幽州，但仍未成功，撤军至笼火城（今北京南）。罗艺反击，大破夏军，斩首五千级。窦建德有一员大将名王伏宝，勇猛而多谋略，功勋为众将之冠。有些将领嫉妒，进谗言诬他谋反而被冤杀。临刑时大呼："我无罪，大王为何听信谗言而自斩左右手！"自伏宝死后，窦建德用兵多不利。八月九日（己亥），夏共州县令唐纲杀刺史后以州降唐。

这时，李世民在洛阳集中主力正准备与王世充决战。为了防止郑、夏间联盟，李渊派使者拉拢窦建德。而建德则全力在河北、山东扩大地盘，为了表示与唐友好，让唐同安公主随使者一起返回长安。

十月，窦建德亲率大军二十万攻幽州，一心想拔掉身背后的这根眼中钉。夏军人多士众，蜂拥而上，有些已经攀上城堞，眼看就要破城，可是，罗艺部将薛万钧、万彻兄弟率敢死队百人由地道从夏军背后突然袭击，打个措手不及，夏军溃乱而逃，死亡千余人。罗艺乘胜进攻夏军大营，窦建德则在营中排好阵势，奋勇杀出，反败为胜，直追到幽州城下。随后仍不能攻克该城，只好返回洺州。

夏的纳言宋正本，原是隋饶阳县令，博学有才能。他在武德元年七月归降了窦建德，曾献平定河朔之策，被引为谋主。后建

夏时封为纳言。此人好谏诤，这时窦建德又听信谗言把他杀了。群臣都以宋正本的下场为诫，无人再敢直言，夏政治也由此日益衰败。

十一月，窦建德亲自渡黄河击孟海公。海公是曹州（今河南定陶西）人，早在大业九年（613年）起兵反隋，拥精兵三万，以周桥城（今河南定陶）为根基，在河南地区扩张势力。这时和也向该地区发展的窦建德产生了矛盾。与此同时，李世民正兵逼洛阳城下，就要发动总攻。王世充黔驴技穷只得向夏求援。起初，窦建德对唐、郑交战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因为自王世充篡夺隋杨侗的帝位后他就表示了绝交。而去年冬，王世充进攻建德的黎阳，建德令徐世勣袭破世充的获嘉以报复，双方交恶，互不来往。但现今洛阳危机，世充派人前来求援，如何处理当前政局？夏中书侍郎刘彬献策道：“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失败。郑亡，则夏不能独立存在。不如解仇除恨，发兵相救。夏击其外，郑攻其内，两面夹击，定能破唐。唐军退后，徐观变化，若郑可取则顺势吞并。然后合两国兵力，乘唐军战败疲惫，夺取关中，可以一统天下。”建德听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妙策呀！”于是派使者回告世充，答应援救；又派礼部侍郎李大师等带书信到唐，请罢围困洛阳的兵马。李世民软禁了夏的使者，不予答复。

为了牵制夏军西向援郑，十二月四日（壬辰），唐将罗艺又在笼火城击败夏军。而去年九月被建德俘虏的唐官员张道源，这时正随建德在河南，他心不忘唐，秘密派人到长安，请乘虚出兵攻夏都城洺州，以震慑山东。十八日（丙午），李渊令并州总管刘世让率兵出土门（今河北获鹿西南）进攻洺州。不久，夏行台尚书令胡大恩降唐，被任命为代州总管。

武德四年二月，窦建德攻克周桥，俘虏了孟海公。三月，唐将刘世让攻拔夏的黄州，洺州闻讯严加戒备，世让无法前进。恰巧

突厥攻并州（今山西太原南），李渊令世让撤军回防。但随后，夏的普乐令程名振来降，李渊又命他率兵经略河北。

东都被唐军围困得无粮可食，危如累卵。建德恐怕一旦郑亡就会威胁到自身，而且现在河北根据地基本稳定，于是决定即刻发兵救郑。这时他灭孟海公后正在曹州，便留下将领范愿守该城，亲自率领部下将士并征发孟海公、徐圆朗的全军西救洛阳。至滑州（今河南滑县东），郑行台仆射韩洪开城迎入。二十一日（己卯）进驻酸枣（今河南延津西）。然后攻陷唐管州（今河南郑州），杀刺史郭士安。又连克唐荥阳（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城。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浩浩荡荡，沿黄河西上。王世充弟徐州行台王世辩也派将郭士衡带兵数千会合。建德拥兵达十余万，号称三十万，迅速抵达成皋东原，还在板渚（今河南汜水镇东）修筑了行宫，并派使者通告了王世充。

先前，窦建德给李世民书信中，叫唐解洛阳之围，撤回潼关，归还占领郑的土地城镇，夏、唐才能和好，那时李世民不屑一顾。可现在郑、夏联盟已成，建德援军气焰高涨，咄咄逼人。面对新的形势，世民召集部下谋议，但出现了两种不同方略。郭孝恪说："王世充已穷途末路，即将被擒。窦建德不识时务，远道来助，这是上天让我们一战而灭二敌。应立即扼守虎牢之险，阻断夏军，然后伺机而动，定能破敌。"薛收也说："世充死守东都，府库充实；部下兵卒，都是江、淮精锐。目前致命弱点，只是缺乏粮食，饥饿难耐，因此被我所困，出战无力，固守难久。建德亲率大军远道来援，也必精锐。若不加阻截，使两支劲敌合军一起，再转送河北粮饷支持洛阳，那时战争将长期拖延下去，统一天下也会遥遥无期。今日应分兵两支：一支继续围困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您北率一支精锐，抢先驻守虎牢，厉兵秣马，以逸待劳，等夏军疲惫可一战而胜。建德既败，洛阳不攻自破，不出二旬，两敌帅就擒无疑。"世民连连称善。

萧瑀、屈突通、封德彝却说："现今我军久战疲惫，而王世充凭坚城死守，难以迅速攻克。窦建德又乘胜而来，兵锋锐利、士气高昂。我军已处于背腹受敌的不利境地。不如退保新安（今属河南），以后再图进取。"世民反驳道："世充军连连受挫已上气低落，加上食尽饥饿，上下离心，我军不用力攻，可以坐待其亡。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兵惰。我据虎牢，扼其咽喉。窦建德若敢冒险争锋，我破他易如反掌；他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王世充已自溃而亡。一旦洛阳城破，我军气势更强，一战消灭两敌，在此一举。我军若不迅速东进，如让敌人占据了虎牢，那么众多刚归附唐的城镇定不能守；两敌联军以后，势焰高涨，还有什么战机可寻？"并斩钉截铁地说："战略就这样定了。"屈突通等又请解东都之围，据险以观形势变化，也被世民断然拒绝。

李世民采纳了主动东进而否定了消极退守的意见后，立即分兵两支，使屈突通辅助李元吉继续围困东都，自己则率精锐步骑三千五百迅速东向战略要地虎牢。出发时正值白昼，越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经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奔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见，莫明其妙，也不敢出城。

二十五日（癸未）世民率军进入虎牢。虎牢这一战略要地是不久前，即武德四年二月三十日（戊午），驻洛口（今河南汜水镇西）的唐将王君廓夜引兵偷袭，通过郑降唐官吏沈悦作内应而夺取的。李世民不失时机率兵扼守虎牢，实际已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二十六日（甲申），李世民率骁骑五百前往虎牢东二十余里侦察敌营，沿途逐次留下随从骑兵，使徐世勣、程咬金、秦叔宝分别统领，埋伏在道旁，自己与尉迟敬德仅带四骑继续前进。边行边对敬德说："我持弓箭，你执槊相随，敌虽百万能奈我何！"到离敌营仅三里的地方，遇到夏游动骑兵。世民大呼："我是秦王。"随即张弓射死一将。窦建德军大吃一惊，派出五六千骑兵追来，世民随从都恐惧变色，他却安然地说："你们只管前回，我和敬德殿

后。”并缓缓慢行。敌骑一追近，则引弓射杀一人；敌骑惧而不前，他就徘徊引诱。李世民就这样屡行屡射，杀敌数人；敬德也杀十余人。最后终于把夏追骑诱入伏中。徐世勣等起而奋击，大破夏军，斩首三百余级，擒获骁将殷秋、石瓒，凯旋而归。

初战告捷，接着，李世民派人送给窦建德一封亲笔信，谈道：“赵、魏之地，本为我所有，而被阁下夺去。但念阁下俘淮安王李神通后以礼相待，又送同安公主归唐，因此我方释怨结好。王世充为人反复无常，今日亡在旦夕，才谀辞相诱。阁下举国动员，耗费巨资，而为他人卖命，实非上策。前两军初战，贵军即败；想救洛阳，又受阻不能。大势若此，愿阁下听我良言相劝，自动撤回，否则将追悔莫及。”窦建德对此置之不理，双方在虎牢相持。

四月三十日（丁巳），李世民派王君廓率轻骑千余成功地抄了夏军粮运，并俘获大将张青特。而窦建德被唐军阻于虎牢累月不能前进一步，又屡战不利，士气开始低落，将领思归。这时，国子祭酒凌敬向建德献计：“大王乘唐军主力集中在洛阳周围，应率大军北渡黄河，攻取唐兵力空虚的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然后大张旗鼓，越太行山，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取汾（今山西汾阳）、晋（今山西临汾），直指蒲津（今山西永济西）。如此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地，取胜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势力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窦建德认为有理，准备按计而行。

哪知王世充的告急求救使者连续不断到来，在夏军营中的郑使者代王王琬及长孙安世也朝夕哭泣着哀求速救洛阳，还暗中用金玉贿赂夏的众将官去阻挠实行凌敬计谋。夏将领受贿都对建德说：“凌敬是个书生，懂什么战事，怎能听他的话！”建德因此改变了主意，对凌敬说：“现今将士求战心切，斗志昂扬，这是天助我呀！凭此决战，必将大捷。我不能采纳你那个迂缓的建议了。”凌敬一再谏诤，惹怒了建德被赶了出去。建德妻曹氏知道后劝道：

"凌敬的话不可不听。今大王自滏口(今河北武安南)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指今山西),再借突厥的力量西击关中,唐必回师自救,何愁郑围不解!若顿兵于此,疲师费财,欲求成功,等到何日?"建德仍不肯听从,说:"你妇人家懂得什么!我来救郑,郑今亡在旦夕,我若舍之而去,是畏敌而背信,绝对不可?"

经过一个多月的相持,李世民通过侦察、试探和小规模交战,摸清了敌方的底细,决定诱使窦建德的主力出战。他根据谍者情报,得知建德要等唐军草料尽、牧马于河北的机会来突袭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五月一日(戊午),他北渡黄河,再南登广武山(今郑州西北)观察敌军形势,顺便留下千余匹战马在黄河中的绿洲上牧放,以诱惑敌人,晚间才回虎牢。建德果然被此假象所迷惑,第二天早晨,他全力出击,自板渚出牛口(在板渚西南)列阵,北距黄河,西临汜水,南到鹊山,横亘二十里,擂鼓而进。王世充部将郭士衡也在夏军南面布阵,绵长数里,鼓噪助威。唐在汜水西岸严阵相峙,但众将见夏军兵力如此浩大,不免都有些惊惧。李世民沉着冷静,先带数骑登上高丘仔细察看敌军,然后对众将分析道:"窦建德起自山东,未尝遇见过大敌。今日度险而喧闹,说明军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战,敌勇气自衰,列阵久而兵饥,必将自退,那时乘势追击,无往不克。现在我对诸公预言,一过中午,定破敌军。"

窦建德果然仗着将多兵众而骄傲轻敌。他派三百骑兵涉汜水直到距唐营仅一里处,并向李世民挑战道:"敢选数百勇士决一死活吗?"世民令王君廓率长槊兵二百应战。双方激战,乍进乍退,不分胜负,各收兵回营。这时,在夏的郑代王王琬铠甲鲜明、骑着原隋炀帝的骢马突出阵前显弄。世民见景脱口而出:"骑的真是匹好马!"尉迟敬德闻听,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飞驰夏军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王琬,手牵骢马而回。

决战时刻终于到了,李世民悄悄派人去把牧放在河北的战马

调回，准备马一到便发动总攻击。而建德列阵，从早晨到中午，士兵又饥又疲，纷纷坐在地上；又争夺饮水，阵容混乱；无复斗志，逡巡思退。李世民抓住这一战机，命宇文士及率三百骑兵经建德阵西，驰而向南，以试探敌人。并叮嘱道："敌军若不动，你就返回；若动则引兵东去。"士及至敌阵前，夏军果然动乱。世民大声道："攻击的时候到了！"正好牧放的马也调到，遂命全军杀出。世民率轻骑先进，大军随后，东涉汜水，直冲敌阵。这时，夏的群臣全然不知，正去朝拜，唐骑突然杀到，他们慌忙逃向建德；建德急召身后骑兵阻挡唐军，但中间被朝臣所阻不能通过；建德挥手大喝朝臣赶紧闪开；就在这进退瞬间，唐骑已到面前；窦建德惊慌失措，狼狈退倚东山坂。唐将窦抗引步兵攻击，没能取胜。李世民率骑兵猛冲，所向披靡。李道玄挺身陷阵，直透夏军背后，又突阵杀回；再入再出，身中飞箭如猬刺，而勇气不衰，射敌应弦而倒。世民见状大悦，将自己的备用副马相赠，让跟随在自己身边。

两军鏖战，尘埃满天。世民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旗冲出夏阵，杀出阵后时突然展开旗帜。夏将士们看见唐旗飘扬在自己阵后，以为前后被围，顿时大乱，纷纷溃逃。唐军乘胜追击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窦建德身中槊伤，单人匹马逃窜到牛口渚。唐将白士让、杨武威策马追来，建德惊慌中落马。士让举槊要刺，建德连忙叫道："不要杀我，我是夏王，能使你富贵。"杨武威下马擒获建德，献给了李世民。世民指着建德斥责道："我讨王世充，不关你事，为何越境，犯我兵锋？"建德竟答道："我今如若不来，恐劳大驾远取。"

夏军残余将士都溃散而去，而建德妻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带数百骑兵逃回了洺州，李世民则把俘获的五万夏军放归故里。虎牢大捷后封德彝前来祝贺，李世民笑道："不用公言，才有今日。这也是智者千虑不免一失呀！"德彝颇感惭愧。

建德余部回洺州后，有的要立建德养子为主，征集各地夏军拒唐，也有的主张剽掠居民再回海边为盗。只有齐善行认为不可，说："因为隋末丧乱，我们才相聚草野，苟求生存。夏王何等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但一朝被擒，易如反掌。岂非天命有归，非人力所能争呀！今丧败如此，守也无成，逃也不免，一个要灭亡的国家，怎能再祸害百姓，不如诚心归大唐。谁想获取缯帛，可以从府库中搬取，千万不要杀掠居民！"随后，从库中运出数十万段帛，放在万春宫东街，分散给将士，经三昼夜才完毕。与此同时，布置兵士防守街巷，凡领得财物的立即出城，不得再入居民之家侵扰。十五日（壬申），士卒散尽后，齐善行和夏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率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破宇文化及时得到的传国八玺等珍宝降唐，同时还献洺、相、魏三州之地。李渊厚赐齐善行，并任命为李世民的左二护军。随后，夏博州刺史冯士羡复推唐淮安王李神通为抚慰山东使，招降三十余州；窦建德原占河朔地区全部归唐。

七月九日（甲子），李世民凯旋至长安。他身披黄金甲，齐王元吉、徐世勣等二十五员大将随从身后，紧接的是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的浩浩大军，嘹亮的军乐伴奏着，好不威风。当日，把刚俘虏的王世充、窦建德献于太庙，祭告祖先。十一日（丙寅），在长安市上将窦建德斩首，时年仅三十九岁。他自起义反隋到被唐消灭共计六年。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7- 189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河朔》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纪》、《太宗纪》、《窦建德传》、《李神通传》、《李勣传》、《陈君宾传》、《张道源传》、《罗艺传》、

《魏征传》、《徐圆朗传》、《郭孝恪传》、《薛收传》、《李道玄传》

《册府元龟·帝王部·褒功》

《全唐诗·凌敬》

唐平江陵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割据的情况下，隋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张绣等人也谋划据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反叛隋朝。开始，大家推举董景珍为首领，但他推辞说："我出身寒贱，很难服众。罗川县令萧铣本是梁室的后裔，为人宽仁大度，请尊奉他为领袖以顺众望民心。"众人赞同，于是派遣使者将此意报告给萧铣。铣闻听大喜，立即回信道："我先君过去事奉隋朝，贡献从来不缺。可它贪我土地，灭我国家。因此我痛心疾首，总想报仇雪恨。现在是上天启发诸公，要恢复梁朝，我岂能不厉兵秣马应声而动呢！"随后，萧铣也以讨捕群盗为名，募兵数千人。

原来，萧铣是后梁宣帝萧詧的曾孙。祖名岩，隋开皇初叛隋降陈。陈亡，百姓推其为主，抗御隋军，被隋将宇文述战败，杨坚将他斩首于长安。萧铣少年时家境贫寒，靠受雇替人抄书为生，因为孝顺母亲而闻名乡里。隋炀帝念他是萧皇后的堂侄，才提拔为罗川县令。

这时，恰巧颍川（今河南许昌）的反隋豪强沈柳生率军进攻罗川（今湖南汨罗），萧铣与战失利，于是对部下们讲道："现今天下皆叛，隋政令不行。我一个人即使拚命固守，也无济于事。目前巴陵郡的豪杰们起兵，要奉我为主，而我先辈正在此地建国。如果顺从他们的请求，号令江南地区，就可以中兴梁祚。用梁室的

名义召安沈柳生，他也会降服于我。”众人听罢大悦，全愿唯命是从。萧铣于是自称梁公，改隋服色旗帜都如梁朝旧时。沈柳生果然率众归降，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萧铣自起兵后仅五日，远近归附的就达数万人。随后率领部众前往巴陵。

董景珍闻听萧铣驾到，派徐德基、郭华带郡中豪杰数百人出城迎接，而首先拜见了沈柳生。柳生见此情景，暗和党羽们商议道：“是我们最先尊奉梁公，功勋第一。现在巴陵众将，位高兵多。我们若入城，反居其下。不如杀掉德基把郡中这些首领当作人质，然后独自挟持梁公攻进郡城，那么就无人高居我们之上了。”遂与部下杀死了徐德基，然后才入内禀告。萧铣闻听大惊道：“现今要拨乱反正，可你突然干出这种自相残杀的事，我不能再作你的君主了。”于是步出军营大门，要离他而去。柳生惊恐万分，连忙伏地请罪。萧铣见此情景，把他训斥一番也就宽恕了，仍官居旧职。随后，列队进入巴陵城。

萧铣入城不久，董景珍就挑拨道：“徐德基是举义建业的功臣，而无辜被沈柳生杀害了，象这样的人如不斩首，怎能治理国家！况且他为盗日久，现虽顺从义军，但凶悖本性没有改变。今日共处一城之中，势必要叛上作乱。若不预先图谋，会追悔莫及。”萧铣点头同意。董景珍于是逮捕了沈柳生，斩于城内。柳生部下溃散而去。

十月十九日（丙申），萧铣在城南筑坛，祭祀告天，自称梁王，改元鸣凤。义宁二年（618年）四月即皇帝位，按梁朝旧制设置百官。谥其叔父萧琮为孝靖皇帝，祖岩为河间忠烈王，父璿为文宪王。封功臣董景珍为晋王、雷世猛为秦王、郑文秀为楚王、许玄彻为燕王、万瓒为鲁王、张绣为齐王、杨道生为宋王。

萧铣命杨道生率兵攻克了南郡。南郡的郡城是江陵（今属湖北），萧詧曾在这里建立后梁，因此萧铣把都城从巴陵迁到这里，并修建了宗庙社稷。当时，原萧詧的吏部尚书岑善方的孙子岑文

本也在江陵，萧铣知他博学多才，引为中书侍郎，使主管文翰，执掌机密。

萧铣又命张绣进攻岭南（泛指今五岭之南），隋将张镇州、王仁寿等进行阻击，但不久听到炀帝被杀的消息，就归降了萧铣。隋钦州刺史甯长真也以郁林（今广西贵县东南）、始安（今广西桂林）两郡之地降梁。随后，萧铣派使者前去招降隋交趾太守丘和。丘和不从，萧铣命甯长真率岭南兵自海道进攻。大兵压境，丘和欲降，司法书佐高士廉劝阻说："甯长真兵数虽多，但孤军远来，不能持久。我城中劲兵足以抵挡，为何不战投降而受制于人！"丘和点头赞同，随即以高士廉为军司马，率水陆诸军迎击，大破梁军，甯长真仅单身逃脱。但事过不久，有炀帝的禁卫军"骁果"从江都（今江苏扬州）而来，丘和等得知炀帝被杀的凶信，也以郡归降了萧铣。

始安郡丞李袭志，是北周大将军李迁哲之孙。他在隋末散家财募兵得三千人，固守始安郡孤城。萧铣等数次来攻，都未攻克。后李袭志听到炀帝死信，亲率吏民追悼三日。有人劝说："尊公本是中原贵族，而久任边疆郡职，政绩卓著，华、夷悦服。今隋室无主，海内沸腾，凭您的威望，号令江南，象秦末尉陀一样割据岭南称王可不费吹灰之力。"李袭志大怒道："我家世代忠臣，坚贞不贰。今江都虽然倾覆，但国家社稷犹存。尉陀狂妄僭上，有什么值得羡慕！谁若再胡言乱语，定斩不饶。"众人不敢再言。李袭志坚守孤城二年，终因外无援兵而被萧铣攻陷。萧铣俘虏李袭志后不但不杀，而且任命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于是东自九江（今属江西），西抵三峡（今四川奉节一带），南尽交趾（今越南河内），北达汉川（今汉水以南），都为萧铣所有，拥劲兵四十余万。

武德二年（619年）八月，萧铣派将杨道生攻唐的峡州（今湖北宜昌），被刺史许绍战败。又派将陈普环率水军乘大舰越三峡攻

取巴（今四川重庆）、蜀（今四川成都）。许绍派子许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等追至西陵峡（今湖北宜昌西），大破梁军，生擒了陈普环。萧铣听此败讯，连忙派兵扼守安蜀城（今湖北宜昌西北）及荆门城（今湖北荆门），以防唐军顺江而下。

先此，唐高祖李渊曾派李靖到夔州（今四川奉节）助总管李孝恭经略萧铣。但李靖到峡州后，被梁军所阻，许久不能前进。李渊大怒，说李靖故意逗留不前，暗下敕书叫峡州都督许绍将他斩首，实际上仍想借机报原来的旧仇。但许绍爱惜李靖的才能，上书论奏，从而获免，后李靖才得以到达夔州。

武德三年三月，占据开州（今四川开县）、通州（今四川达县）的蛮族酋长冉肇则进攻夔州，这是一支归降萧铣的势力。李孝恭迎战不利，李靖率兵八百突袭，临阵斩冉肇则，俘获五千余人。随后，李孝恭又乘势攻克了开、道二州，击杀了梁东平王萧阇提。

萧铣为人心胸狭窄，多疑猜忌。而当时众将又恃功骄横，专擅诛杀。他担心这些将领们权重难制，就宣称罢兵营农，实际想借此夺众将军权。大司马董景珍弟为将军，心怀不满，图谋作乱，因机密泄露而被斩首。董景珍当时镇守长沙（今属湖南），萧铣下诏赦其应受株连之罪，召还江陵。景珍认为这是圈套，恐惧万分，于是在十一月五日（甲子）举长沙城降唐。李渊令峡州刺史许绍出兵相助，十二月十五日（癸卯），许绍攻克梁的荆门镇。

萧铣闻董景珍叛变，就派张绣进攻长沙。景珍引汉高祖杀功臣的故事警告张绣道："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你没看到吗？我们俩何必相互残杀。"张绣也不答言，指挥军队围城。景珍见难以固守，欲突围逃跑，被部下所杀。萧铣嘉奖张绣功勋，升任为尚书令；但他恃功骄横，专断弄权，也被萧铣杀掉了。大臣接连遭诛戮，萧铣势力日益削弱。

武德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唐黔州刺史田世康攻陷梁的

五州、四镇。这时，李靖向夔州总管李孝恭献取萧铣十策，孝恭将其上奏朝廷，李渊颇是赞赏。二月三日（辛卯），李渊命李孝恭大造战舰，练习水战。又因李孝恭不熟悉军事，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委以军机。李靖请孝恭将巴、蜀地区蛮夷酋长子弟全部召来，量才授官，安置在身边，外示提拔重用，实际作为人质。

六月，唐黄州总管周法明攻克萧铣安州（今湖北安陆），俘虏其总管马贵迁。七月二十六日（辛巳），唐襄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克了萧铣的鄀州（今湖北宜城东南）。九月，李渊下诏征发巴、蜀兵，以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任行军长史，统率十二总管，自夔州顺长江东下；以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对萧铣发动大规模进攻。李孝恭得令，随即准备发兵，但三峡江水暴涨，水流湍急，众将领请等水落后再进军。李靖反驳道："兵贵神速。今我军始集，萧铣还不知晓。若乘江水上涨，可瞬间抵达江陵。攻其不备，他必被我生擒。此兵家上策，机不可失。"孝恭听后，命令大军速进。

十月七日（辛卯）梁鄂州刺史雷长颖以鲁山来降。而李孝恭率战舰二千余艘顺江东下时，萧铣不出李靖所料，果然以为江水方涨，无须设防。这样，唐军顺利地攻克荆门、宜都（今属湖北）二镇，进至夷陵（今湖北夷昌）。萧铣将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守清江（长江支流，今位于湖北），想阻截唐军。九日（癸巳），孝恭挥军进击，大获全胜，得战舰三百余艘，文士弘军被杀、溺而死的以万计。唐军乘胜一直追击到百里洲（今湖北枝江东）。文士弘收集残兵再战，又败，退入北江（长江支流沮漳河）。这时，梁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地降唐。

萧铣以罢兵营农为名削夺了大将们的兵权后，江陵只留宿卫兵数千人。听到唐大军将至，而文士弘大败的消息，他大惊失色，

仓猝征兵，但军队全在江、岭之南，道路险阻而又遥远，无法迅速赶来增援。萧铣万般无奈，只得用现有的全部兵力出城迎战。李孝恭见梁军人少，想挥师进击。李靖劝阻道："萧铣这些是救败之师，势必不能持久；我军不如暂屯长江南岸，缓攻一日。萧铣一定要分散兵力，或留兵拒我，或归守城池。等敌军兵分势弱，我乘懈进击，必胜无疑。今若急攻，敌军一定要拼命死战，楚地兵卒剽悍精锐，难以抵挡。"孝恭不听，留李靖守长江南岸军营，自率精锐部队出击北岸梁军，果然战败，逃回南岸。

萧铣士卒见唐军逃跑时丢弃了大量军资，纷纷弃战船收掠，每人都获取不少。李靖这时见敌军队列已乱，突然纵兵奋击，大获全胜，一直追至江陵外廓城。紧接着又攻陷萧铣水城，获取大量战舰。李靖请李孝恭将这些战舰全部散入江中。众将不明用意，都说："这些破敌缴获的战舰，应当为我军所用，为何白白丢弃而资助敌军？"李靖解释道："萧铣占地甚广，南达岭外，东到洞庭湖。我方孤军深入，若攻江陵不下，敌援军四集，就会表里受敌，进退两难，虽有舟楫又有何用？今弃舰船，使塞江而下，援兵见到，必认为江陵已被我攻破，不敢冒险轻进，往来侦察，也需旬月。我军抓紧这一空隙，定能攻克江陵城。"果然，萧铣援兵见顺江而下的散乱战船，疑惑不前。梁的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等去江陵朝见，听说萧铣大败，全都投降了李孝恭。

李孝恭指挥唐军把江陵团团围住，萧铣困守孤城，外无援兵，问策于中书侍郎岑文本，文本劝他识时务降唐。萧铣无可奈何地对群臣说："天不保护梁朝，不能再坚持了；如果一定等到城被攻破，那么百姓要蒙受灾难。我不愿因我一人而使黎民惨遭涂炭。"十月二十二日（乙巳），萧铣用太牢祭告完梁的太庙，然后下令开城投降，守城将士无不流泪。萧铣和百官身穿罪衣到唐军营门前，说："该当死罪的只有我一人而已，城中百姓无辜，愿不要杀掠。"

李孝恭率军入据江陵后，众将要纵兵抢掠。岑文本对孝恭道：

"江南百姓，自隋末以来，困于虐政，又遇群雄虎争，今日存活的人，都是刀剑之下的万幸，无不仰首企望真主。萧氏君臣、江陵父老所以决定降唐，是盼望能安居乐业。今日如若纵兵大肆虏掠，恐怕此地以南，没人再肯归顺了。"李孝恭称善，严令禁止。有些将领还不死心，又说："梁将帅中凡因抗拒我军而战死的，都罪大恶极，请没收这些人的家产，赏我军将士。"李靖反驳道："王者之师，应以义为先。梁军将帅能为他的君主战死，这是忠臣，岂能等同叛逆罪人抄没家产！"于是唐军秋毫无犯，城中安然。南方州县听此情况，都纷纷归顺。萧铣降唐数日后，梁各路援军到达的有十余万，闻听江陵失守，都释甲投降了李孝恭。

李孝恭把萧铣押送长安，李渊历数他所犯罪状。萧铣答道："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我无天命，为陛下所擒。若以此为罪，甘愿一死。"李渊恨他言辞不屈，下诏斩于都市，时年三十九岁。萧铣自初起，五年而亡。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4—189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江陵》

《旧唐书》、《新唐书》：《萧铣传》、《岑文本传》、《许绍传》、《李靖传》、《李孝恭传》

《周书》：《萧詧传》、《李迁哲传》

《隋书·后妃传》

唐平江淮

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建唐时，江淮地区林立着数支割据一方的武装力量，其中主要的有：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的杜伏威；占据海陵（今江苏泰州）的李子通；占据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陈稜；占据毗陵（今江苏常州）的沈法兴。

杜伏威本是隋末一支重要的农民起义军。但宇文化及发动江都政变后，他上表称臣于隋皇泰帝杨侗，被任命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李子通也是隋末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原在山东齐郡（今山东济南），后南下占据海陵。

陈稜是隋朝将领，宇文化及杀炀帝后引军北上，召他守卫江都。沈法兴是湖州武康（今属浙江）人，世代为本地名门望族。沈法兴在隋大业末年任职吴兴郡太守，奉炀帝命令，镇压东阳（今浙江金华）楼世干等反隋义军。当他听到宇文化及政变的消息，遂用举兵讨逆之名，召兵买马，攻占余杭（今浙江杭州）、毗陵、丹阳（今江苏南京）等十余郡，拥精兵六万余。他上表皇泰帝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后又自称梁王，以毗陵为都城，改元延康，依陈朝制度，建置百官。

这些武装力量相互撕杀火并，都有窥伺、独占江淮地区的野心。

武德二年九月，李子通围攻江都，陈稜力屈，求救于沈法兴和杜伏威。沈法兴派子沈纶举兵数万与杜伏威合力救助，伏威驻军清流（今安徽滁县），沈纶屯在杨子（今扬州市西南）相距数十

里。李子通采纳了部下毛文深的计策，暗中召募江南人假冒沈纶部士兵，在夜间偷袭杜伏威大营。伏威不明真象，大怒，也派兵袭击沈纶。就这样，两支援军中了李子通的离间之计，互相猜疑，谁也不敢冒然进军。李子通抓住战机，倾精锐之师猛攻，拿下江都。陈稜侥幸逃脱，投奔杜伏威，不久被杀。李子通进占江都后，随即纵兵击败沈纶，杜伏威也只好引兵撤回。

李子通占据江都后，即以该城为首都，建立吴国，自称皇帝，年号明政。这时，丹阳（今南京）地区由乐伯通率领的一支万余人的武装力量归降了他。

面对争雄的劲敌，杜伏威想借助唐的声威，于是派使者向唐请降；而李渊为了利用杜伏威牵制江淮各支武装力量，以防干扰唐在北方主战场上正在进行的统一战争，便对他采取了拉拢政策。九月十三日（丁丑）李渊封杜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武德三年六月初一（壬辰）又升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杨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安抚使、封吴王，赐姓李氏。并任命杜伏威的副手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李子通渡长江攻沈法兴，夺得京口（今江苏镇江），沈法兴派部将薛元超迎战，元超败死。沈法兴慌忙弃毗陵逃奔吴郡（今江苏苏州南）。于是丹阳、毗陵等郡都投降了李子通。

杜伏威派辅公祏率兵数千攻李子通，以将军阚稜、王雄诞为副将。辅公祏渡江后攻克丹阳，进屯溧水（今属江苏）。李子通率兵数万阻击。公祏选精锐甲士千人，手持长刀为先锋；又令千人紧随其后，专斩先锋中怯战后退的人；自己亲率其余将士为第三梯队。李子通列成方阵向前进，辅公祏前锋战士拼死奋战，挡住攻势，公祏又组织左右两翼军从侧后面包抄，子通军受到夹击，形势不利而撤退。辅公祏乘势追击，不料遭到了李子通的伏击而受挫，他连忙收兵回营，坚闭不出。这时王雄诞献计说："敌军初胜而骄，不设壁垒，若乘其不备而攻击，定能破敌。"辅公祏怯战不

听。王雄诞深知战机不可错过，遂带私属（不在大军名籍内的亲兵）数百人夜出偷袭，顺风纵火；吴军营中烈焰腾腾，一片混乱，大败而逃，被俘达数千人，李子通损失惨重，而且军粮又尽，只得弃江都保京口。杜伏威的势力于是扩展到了江西地区（指今安徽和县至合肥一带），他也迁居于丹阳。

李子通不甘心失败，他东到太湖，收集散逃部下得二万人，突袭吴郡，大败沈法兴。沈法兴只剩残余数百人，欲投奔割据在吴郡的另一支武装力量闻人遂安，闻人遂安则派部下叶孝辩迎接，但沈法兴中途反悔，想杀叶孝辩后南逃会稽（今浙江绍兴），被孝辩察觉，法兴恐惧，跳江而死。沈法兴自义宁元年（618年）三月起兵割据，于武德二年攻克毗陵称梁王后，认为江、淮以南举手可定，遂狂妄自大，专尚威刑，将士小有过失，立即斩杀，由此将士解体，终至败亡。

李子通吞并沈法兴后，军势复振，率领群臣迁都余杭，尽占沈法兴故地；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达宣城（今属安徽）。

武德四年十一月，杜伏威遣将王雄诞伐吴，李子通则以精兵扼守独松岭（在今安徽广德东南）。王雄诞令部将陈当世率兵千余人，登高据险渐逼敌军，白日多树旗帜，夜间则在树上绑上火炬，漫山遍野火光冲天。李子通不知虚实，惊恐万分，烧营退保杭州；王雄诞衔尾追击，又败吴军于杭州城下。初七（庚癸），李子通计穷请降。杜伏威将他囚送长安，李渊并没治罪，予以释放。但武德五年七月，他又想逃回江东收集旧部，东山再起，当途经兰田关（今陕西兰田东南）时被唐官吏擒获杀死。

王雄诞击灭李子通后，又回军降服了割据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两地称王十余年的汪华。随后，杜伏威又派王雄诞进击据守昆山（今属江苏）的闻人遂安。雄诞因昆山险隘，难以为胜，遂单骑到该城下，陈述大唐威势，晓以祸福，说降了闻

人遂安。这时，杜伏威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五岭，东到海边，统一了江淮地区。

武德五年七月，李世民击败刘黑闼后，南攻徐圆朗，势如破竹，连克十余城，声震江淮。杜伏威见唐连灭北方远比自己强大的群雄，自己若再保持原有表面臣服而实际独立的状态，唐定要移兵征讨。为了避免兵败被擒的下场，他请求入朝为官。李渊欣然同意。初八（丁亥），杜伏威带养子阚稜来到长安，李渊恩宠异常，手引伏威同坐御塌，官加太子太保并兼原职，留在朝中，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后又升任太保。阚稜也受职为左领军将军。江淮地区就这样归属大唐。

不料唐于武德六年二月平定山东半年后，江淮局势又出现了反复。即八月初九（壬子），留守江淮的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起兵反唐。

从杜伏威举义旗反隋以来，辅公祏一直作为副帅。公祏比伏威年长，军中称之伯父，敬畏与伏威等同。辅公祏权势日盛，逐渐引起杜伏威的疑忌，于是任命自己的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暗中削夺公祏兵权。公祏察觉伏威用意，心中愤愤不平，但不露声色，佯与故人左游仙学道，修炼长生不死之术，以韬晦待机。

杜伏威入朝时，留辅公祏守丹阳，又令心腹王雄诞掌兵权为其副，并暗中叮嘱雄诞道："我至长安，只要不失职，千万要防止公祏叛乱。"杜伏威行后，左游仙立即劝辅公祏叛唐，但王雄诞手握重兵，是一大障碍，于是两人首先密谋夺取兵权。他们诈称收到杜伏威来书，怀疑王雄诞专擅兵权，心怀贰心，并四处散布这一谣言。雄诞听后心中不悦，为避嫌疑，称疾在家。辅公祏乘机统领军队，随后派党羽西门君仪劝说王雄诞跟随自己叛乱。王雄诞此时才恍然大悟，拒绝道："今天下刚刚太平，吴王又在京城，大唐兵威，所向无敌，为何无故自求灭族之祸？诸公若强逼雄诞

为此逆行，只有一死而矣，断难从命。”辅公祏知雄诞难以屈服，就将他缢死。

辅公祏又制造谣言，宣称杜伏威被唐囚禁，不能回江南，寄书叫他起兵相救。于是大造兵器铠甲，运储粮草。不久，他在丹阳称帝，国号宋，任命百官。并与原唐洪州总管张善安联合。张善安本兖州（今属山东）人，隋末起兵，初转战淮南，后渡江占据洪州（今南昌）等地。武德五年二月，他举洪、虔（今江西赣州）、吉（今江西吉水东北）等五州降唐，被任命为洪州总管。但武德六年三月，他又谋反，辅公祏起兵后，他立即派人联合，被公祏任命为西南道大行台。这样，江、淮地区重又崛起与唐为敌的一大割据势力。

李渊接报后，马上部署围剿：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顺流直指江州（今江西九江）；岭南道大使李靖督领交、广、泉、桂四州兵北上宣州（今安徽宣城）；怀州总管黄君汉从谯、亳率军南下；齐州总管徐世勣从淮泗南进，四路大军全受李孝恭节度，分进合击辅公祏。李孝恭发兵时与众将士宴饮，口渴令取水，忽变为血，在屋众将都大惊失色，以为出师不利。但孝恭举止安详，款款解释道：“辅公祏恶贯满盈，这杯中之血，正是他不日授首的征兆。”说罢一饮而尽，众将疑云也顿时消散。

九月，辅公祏派部将徐绍宗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陈政道攻寿阳（今安徽寿县）。

十一月，唐黄州总管周法明率兵进击辅公祏，张善安则据夏口（今汉水人长江处）阻截，周法明被阻，屯军荆州镇（今湖南岳阳附近）。初十这天（壬午）法明登舰饮酒，张善安暗派刺客数人假扮渔夫划船而至，乘守卫不备将他刺杀。十二日（甲申），唐舒州总管张镇周在猷州黄沙（今安徽泾县西）大破辅公祏部将陈当世。

十二月初二（癸卯），安抚使李大亮计擒张善安。李大亮本奉

李渊诏命开拓广州以东地区，行至九江时遇到辅公祏叛唐。于是率军进击洪州，与张善安隔水列阵。大亮采取攻心战，以福祸利害进行劝说，张善安动摇了，说："我本无反心，是将士们逼反的；但事已至此，即使归降也难免死罪。"大亮高声道："张总管有降心，就是与我是一家人了。"说罢单骑渡河驰入张善安阵中，与善安执手亲切共语，表示出一片诚意。张善安大喜，遂答应降唐。随后，张善安带了数十骑回访李大亮。在唐营门外，随骑被婉言阻止，只让张善安一人进见。善安不知是计，被引进军营。李大亮热情接待，交谈许久。当张善安起身告辞时，大亮忽然变脸，一声号令，左右埋伏的武士一拥而上，把他捆绑起来。

在营外的骑从闻变，急忙回到张善安军营报告。全军闻听大怒，倾营来攻唐军。李大亮早已料到，于是派人宣告："我并没有扣留张总管，是他赤心归国，对我说恐回营后受将士的挟制，不能如愿，自己请求留在唐营。"张善安的将士们信以为真，果然大骂张善安卖友求荣，愤起离散。李大亮乘机追杀，斩获很多。接着李大亮把张善安执送长安，后被李渊斩首。辅公祏的侧翼就这样被唐铲除了。

武德七年春，唐集中军力围剿辅公祏。李孝恭在枞阳（今属安徽）击败辅公祏一支偏师后，东进攻克了鹊头镇（今安徽铜陵东北）。随后在芜湖（今属安徽）大破辅公祏，拔梁山（今安徽芜湖北）等三镇。矛头直指丹阳。唐安抚使李大亮率另一支军队和辅公祏接战，也获得胜利，辅公祏派军攻猷州（今安徽泾县西）想从侧面牵制唐军进攻，但唐刺史左难当婴城固守，难以攻破。这时，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率兵来援，不仅解该城之围，而且攻克辅公祏的枚洄等四镇。

面对唐军的步步逼近，辅公祏派部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师三万屯驻博望山（今安徽芜湖北）；令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屯驻青林山（今安徽芜湖东北）；并在与博望山隔江相对的梁山拉

起拦江铁索封锁江面，还沿江修筑连绵十余里的月牙形城墙，又在长江西岸设置相结的壁垒，有如连环。冯慧亮、陈正通所率的两支部队互成犄角之势，从而形成横断长江护卫丹阳的防线。

这时，李孝恭和李靖率水军到达舒州（今安徽潜山），徐世勣率步兵一万渡过淮河，攻拔寿阳（今安徽寿县），进驻硖石（今安徽寿县北），从西、北两面对丹阳形成钳形攻势。大敌当前，冯慧亮等将领坚壁不战，李孝恭也不正面强攻，而暗派一支奇兵切断了宋军的粮道。不久，宋军发生粮荒，冯慧亮等无法再长期固守，只得改变战术，于是，在夜间遣兵偷袭唐营。但李孝恭临变不乱，唐营无懈可击，宋军徒劳而回。

为了打破双方僵持不下的格局，李孝恭召集众将商议作战方案。多数将领认为，冯慧亮等人不仅拥有重兵，而且占据水陆险要之地，难以迅速攻克，不如直接攻打丹阳。丹阳是辅公祏的老巢，该城一破，冯慧亮等残敌可不战而降。李孝恭觉得有理。但李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冯慧亮等所率领的水陆两军虽是精兵，但辅公祏亲率的精兵也为数不少。今日我们连冯慧亮等驻守的博望山等据点都攻不下，怎能攻克辅公祏亲自坐镇的丹阳城。如果进攻丹阳旬月不下，冯慧亮就会乘机抄我军后路，到那时前有坚城，后有敌军，腹背受敌，就太危险了。冯慧亮、陈正通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心中并非不想大战一场，以决雌雄，只是奉辅公祏之命不得不采取以逸待劳的战术罢了。如果我们攻城挑逗，诱敌出战，定能一战而胜。"

李孝恭通过斟酌，最终采纳了李靖的作战方针。于是组织老弱残兵做为前锋部队佯攻宋军大营，而把精兵安排在后面，结阵以待。前锋军和宋军刚一接战就败下阵来，宋军不知是计，加以粮尽又急于决战，遂衔尾追击。但追赶数里后，就中了唐军精锐部队的埋伏。一场激战，宋军损失惨重。杜伏威的养子阚稜也随唐军南征，这时突然出现在阵前。他脱下头盔对宋军将士喊道：

"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怎敢和我交战！"宋军中将士多是阚稜的旧部下，一见阚稜，都无心再战，有的还投身下拜。李孝恭、李靖抓住宋军混乱溃散的战机，率大军乘胜追击猛攻，转战百余里，连克宋军博望山、青林山两个战略要地。冯慧亮、陈正道等狼狈逃跑，将士伤亡达万余人，整个防线完全崩溃。

李靖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丹阳。辅公祏猝不及防，胆战心惊，率兵数万，弃城东逃，想至会稽与先前派驻在该城的左游仙合兵一处，不料徐世勣追杀而来，公祏落荒而逃，部将纷纷溃散，到句容（今属江苏）时，随从部众只剩下五百人。直逃到常州（今属江苏），辅公祏才暂时摆脱唐军，于是夜宿该城，想恢复一下疲劳的倦体。但他的部将吴骚等又发动了兵变，事出突然，辅公祏慌乱中连妻子都无暇顾及，只带数十心腹斩关出城继续南逃，最后在武康（今属浙江）遭到地方武装力量的攻击，力尽被俘。

三月二十六日（戊戌），李孝恭占领了丹阳。随后，辅公祏也由武康囚送到这里，被枭首示众。李孝恭又分兵遣将一一捕杀拒不投降的辅公祏余党。

杜伏威早在本年二月已暴卒于长安，原因是他修炼神仙长生之术，服食云母粉中毒。但由于辅公祏反唐时曾假借杜伏威的名声动员部众，李孝恭平定江淮后得知这一情况，不明其中之诈，随即上奏朝廷。李渊大怒，下诏削除杜伏威的官爵，并将妻子、家产全部没收充公。直到李世民即帝位，才昭雪了这一冤案。

跟随李孝恭平定江淮的原杜伏威部将阚稜在破辅公祏战役中，立功居多，颇有些洋洋自得之色，引起李孝恭的不满。加上李孝恭没收辅公祏及其部将田宅时，连本不应该没收的阚稜及杜伏威、王雄诞在江淮的田宅也包括在内，阚稜不服，找李孝恭当面辩理。孝恭勃然大怒就利用辅公祏临死时曾诬陷阚稜和自己暗中勾结，以谋反罪杀掉了阚稜。

唐消灭了辅公祏，再次平定江淮，不仅稳定了对江南的统治，而且标志着唐统一全国战役的胜利完成。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5—191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江淮》

《隋书·陈稜传》

两唐书：《李子通传》、《沈法兴传》、《杜伏威传》、《辅公祏传》、《张善安传》、《李孝恭传》、《李大亮传》、《李勣传》、《李靖传》

唐平山东

武德四年（621年）五月，夏主力军被唐击溃，窦建德临阵被俘，斩首于长安，但他的许多部下在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分取府库财物后散匿在民间。唐为了加强对河北地区的统治，设法清除这部分势力，于是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唐地方官以“暴横乡里”为由逮捕了窦建德的一些部将，严刑拷打，追索库物，判处罪名，这使建德旧部都惊恐不安。

窦建德部将高雅贤、王小胡家住洺州，听此情况，想携带财物亡命他乡。他们躲过了前来搜捕的唐官吏，才好不容易逃到了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恰巧这时李渊亲下诏旨征调夏的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高雅贤等人进京，他们认为凶多吉少，就聚在一起商议对策，说：“王世充以洛阳降唐，可他帐下的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还是统统被杀。我们如到长安，也必死无疑。大家跟随夏王，身经百战，九死一生，那么，今日为举大事何惜余生！况且夏王俘虏李神通，待以客礼；可是唐擒夏王就加以杀害。夏王对我们恩重如山，如不起兵报仇，有何面目见天下英雄！”遂决定举旗反唐。

为找出具有天命的领袖，范愿等人进行占卜，结果刘氏主吉祥。他们想到同僚刘雅，随即来到了漳南（今河北故城南），把大家的谋划报告给他。不料刘雅却说：“天下已经太平，我愿在乡间做一个农夫，不想再参与什么起兵了。”一句话激怒了这些人，又怕他泄露机密，便杀死了刘雅。这时，范愿忽然想起一个人，对

大家道："汉东公刘黑闼果断骁勇、谋略超群，而且宽仁容众，在夏军中有很高威望。今日举大事，要想重聚夏王旧部，非他不可。"

刘黑闼是贝州漳南人，少年时就和同乡窦建德友善。他家贫不能自给，建德时常相助。隋末天下纷争，黑闼最初参加了郝孝德义军，后归瓦岗军，做李密的裨将。李密失败，黑闼被王世充俘虏，世充素常听说他骁勇善战，于是任做骑将。但刘黑闼瞧不起王世充，常常私下嘲笑他的举动。后来，黑闼逃归窦建德，建德大喜，立即任命将军，赐爵汉东公。此后，窦建德有军事行动，常派黑闼率奇兵东西掩袭，或潜入敌境，侦察虚实；他往往乘机奋击，获取胜利，军中号为神勇。建德失败后，他隐藏在漳南务农为生。

范愿的话提醒了众人，于是前往刘黑闼家。黑闼欣然赞同举兵反唐，而且杀掉耕牛，设宴共饮，商定了行动计划，并召兵得百余人。

七月十九日（甲戌），刘黑闼率众突然袭取了漳南县城。唐廷接到黑闼起兵河北的奏报，在洺州设置了山东道行台，在魏（今河北大名北）、冀（今河北冀县）、定（今河北定县）、沧（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四州设置了总管府。二十二日（丁丑），任淮南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以加强防御和镇压。

八月十二日（丁酉），刘黑闼从漳南县南下攻克鄃县（今山东夏津）。唐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合军争夺，都战败而亡。黑闼把千余俘虏和缴获的军械用来充实自己，壮大了声势。又有一些窦建德旧部闻讯赶来投奔，队伍很快扩展到二千人。刘黑闼在漳南设坛，祭祀窦建德，正式宣告起兵反唐，报仇雪恨。自称大将军。

唐讨伐受挫，使李渊吃了一惊，下诏征发关中步骑三千，派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率兵进击，同时命令幽州总管罗艺引兵配合，各路唐军合力征讨刘黑闼。

刘黑闼兵锋甚盛，二十二日（丁未）又攻陷历亭（今山东东武城东），杀唐守将王行敏。而二十六日（辛亥），唐兖州总管徐圆朗逮捕了唐廷派来安抚的官员盛彦师，公开举兵响应刘黑闼。

徐圆朗是兖州（今属山东）人，隋末起兵占据本郡，后纵兵略地，尽有琅邪（今山东临沂）以西，北至东平（今山东郓城东）地区，拥兵二万余人。曾归附瓦岗军李密，李密失败后转归王世充，洛阳被平定后降唐，委任为兖州总管，爵鲁郡公。刘黑闼谋划举兵反唐时，就和徐圆朗暗中沟通。黑闼反后，唐在加强军事镇压的同时，还派盛彦师安抚河南，以防连锁反应。谁知盛彦师行至任城（今山东济宁），被心存疑惧的徐圆朗逮捕。唐的这一行动弄巧成拙。

刘黑闼以徐圆朗为大行台元帅。这时，兖、郓（今山东郓城东）、陈（今河南淮阳）、杞、伊、洛、曹（今山东定陶西）、戴等八州豪强也纷纷杀唐地方官吏响应徐圆朗。九月七日（辛酉），圆朗自称鲁王。至此，山东（古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与“关东”意同，指今河北、河南、山东省地区）形势顿时为之一变。

李神通率唐军至冀州，与罗艺合兵一处，又征调邢、洺、相、魏、恒、赵五州兵共五万余人，和刘黑闼在饶阳城（今属河北）南展开激战。唐军人多势众，布阵十余里；黑闼人少，依河堤单行列阵相抗。当时风雪交加，李神通乘顺风之势发动进攻，不料风向突然逆反，刘黑闼趁势反击，神通所率的唐主力军大败，士卒、战马、军资丧失了三分之二。罗艺率偏师从唐阵西端出击高雅贤，胜后正追杀时，闻听大军失利，连忙退保藁城（今属河北）。黑闼则乘胜进攻，罗艺也战败，部下猛将薛万钧、万彻兄弟都临阵被俘，截去头发，但他俩混在俘虏群中，乘机逃归。罗艺见势已如此，率军返回幽州。获得这场大捷，黑闼军威更振。

十月六日（庚寅），刘黑闼攻陷瀛州（今河北河间），杀唐刺史卢士叡。随后，观州（今河北东光）人捆绑唐刺史雷德备，举

城降黑闼。毛州（今河北馆陶）人董明灯等也杀唐刺史赵元恺响应。

十一月十九日（壬寅），刘黑闼攻陷定州，生擒总管李玄通。黑闼爱其才，想劝降后任命为大将，遭到拒绝。黑闼恼羞成怒，把李玄通囚禁起来。有故吏不忘旧恩带酒肉探监，玄通道："诸君可怜我今遭囚禁，以酒肉来相宽慰，当为诸君一醉方休"。酒酣，对看守说："我能舞剑，请借刀暂用，以助酒兴。"持刀舞罢长叹道："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一方，不能保全所守城池，有何面目活在世间。"随即引刀刺腹而亡。李玄通原是隋鹰扬郎将，李渊起兵入关时率所部归降。他以自杀殉唐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不禁泪下。

十二月三日（乙卯），刘黑闼攻陷冀州，杀唐刺史麹稜，传檄河北各地，原窦建德旧部纷纷杀唐官吏响应。八日（庚申），唐派右屯卫大将军李孝常征讨。刘黑闼则率兵数万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唐黎州总管徐世勣屯驻宗城，见敌军强大，弃城走保洺州。黑闼衔尾急追，于十二日（甲子）大破唐军，杀步兵五千余人，徐世勣仅只身幸免。十四日（丙寅）洺州土豪举城奉献。洺州原是夏都城，刘黑闼先在城东南筑坛，庄重告天并祭祀窦建德后，才率军进城。随后十余日，又引兵攻拔相州（今河南安阳），俘虏唐刺史房晃，右武卫将军张士贵突围逃脱。黑闼再南取黎（今河南浚县）、卫（今河南汲县），仅用半年就完全恢复了窦建德时的旧辖区。还派使者北连突厥，颉利可汗派宋邪那率胡骑相助。

刘黑闼势炎气盛，唐派往河北的官员左武卫将军秦武通、洺州刺史陈君宾、永宁令程名振都逃回长安。黑闼军以锐不可挡之势，三天之内连克邢州（今河北邢台）、赵州（今河北赵县）、魏州、莘州（今山东莘县），并杀唐魏州总管潘道毅。

武德五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原文武官统统恢复旧职，一切法律行政也都按照夏的原制度，一个与唐分庭抗礼的河北政权重新

蜂起。

面对新出现的严峻形势，李世民又自告奋勇率兵征讨，李渊令他和李元吉一同前往平定山东。世民军至获嘉（今属河南），黑闼弃相州退保洺州。正月十四日（丙申），世民取相州，随即北进肥乡（今属河北），再推进到洺水南岸，隔河列阵威逼洺州城。与此同时，幽州总管罗艺率所部兵数万配合李世民南北夹击刘黑闼。刘黑闼想先击败罗艺，再和李世民主力军决战。于是留兵万人，令范愿固守洺州，亲自率军北上，夜宿于沙河县（今河北沙河北）。就在这天晚上，唐将程名振奉李世民密计，把六十面大鼓运到洺州城西二里堤上。夜深人静，突然鼓声齐鸣，震得城中大地都颤动起来。范愿以为唐军要大举进攻，惊慌失措，急忙派人驰告黑闼。

刘黑闼闻报大惊，匆忙返回洺州城，另派弟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分兵一万北进鼓城（今河北晋县）阻截罗艺。三十日（壬子），罗艺与刘十善在徐河（今漕河）一带会战。十善军大败，伤亡八千，残军狼狈逃回洺州。

洺水县人李去惑见唐军强大，以城归降，李世民大喜，派王君廓率一千五百骑兵入城共守。二月，刘黑闼率兵东攻洺水县（今河北曲周南），但十一日（癸亥）行至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时，遭到唐将秦叔宝的邀击。

十七日（己巳），李世民夺回邢州。十九日（辛未），冯伯让以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降唐。二十四日（丙子），罗艺夺取了刘黑闼的定、栾（今河北隆尧东）、廉（今河北藁城）、赵四州，俘虏其尚书刘希道，并率军和李世民会师于洺州。

刘黑闼行军途中虽遇秦叔宝截击而小受挫折，但并未回师，直抵洺水城。该城四面环水，宽五十余步。刘黑闼难以涉水攻城，就在城东北筑两条甬道作为攻城道路。李世民见洺水城吃紧，曾三次率兵相救，都因敌军阻截而不能通过。他担心王君廓不能守城，

就召集众将谋议。徐世勣认为，刘黑闼的甬道如修到城下，洺水城必难保。这时，行军总管罗士信自告奋勇，愿代君廓死守该城。李世民于是登上城南高冢，用旗召王君廓。君廓率部下力战，突围杀出；士信则乘机率左右二百人冲人城中。

刘黑闼决心拿下该城，昼夜不停，连续猛攻。恰逢大雪，唐军无法增援，罗士信苦战八日，在二十五日（丁丑）这天城破被擒。黑闼爱士信年轻骁勇，尽力劝降；可他词色不屈，被杀时年仅二十岁。李世民不甘心战败，于二十九日（辛巳）又夺回洺水城。

三月，李世民与罗艺连营扎于洺水河南，分部分兵屯驻河北岸，等待战机到来。刘黑闼恃勇接连挑战，但唐军坚壁不出，李世民暗派奇兵去断绝刘黑闼的粮道。

十一日（壬辰），刘黑闼提升高雅贤为左仆射，并在军中设宴欢庆。徐世勣乘机引兵偷袭，高雅贤带醉上马，单骑冲出，被徐世勣部将潘毛一枪刺落马下，幸亏左右赶来相救，但还没回到军营就伤重而亡。十三日（甲午），唐军又去偷袭，不料人家早有防备，潘毛被黑闼将领王小胡生擒活捉。

刘黑闼从冀、贝、沧、瀛诸州筹集大量粮草，水陆并进，送往洺州，途中遭到唐将程名振所率千余精兵的突然袭击：粮船被凿沉、粮车被烧毁、粮道被切断。这时，李世民与刘黑闼已相持六十余日。黑闼因粮草将尽，想速战速决，亲自率兵偷袭徐世勣军营。世民得报，引军来援，从敌军背后掩杀。黑闼见状，指挥部众迅速回师，反将世民团团围住。幸亏尉迟敬德率一队勇士及时赶到，杀入重围；世民和略阳公李道宗及敬德合力杀开一条血路，才脱险而出。

李世民回到大营，从动向推测刘黑闼军粮已尽，要来决战，便暗中派人在洺水上游筑堰堵住河水，密令唐守堰士兵在双方交战时决堰放水。不出世民所料，二十六日（丁未），刘黑闼见河水已

浅，就率步骑二万南涉洺水，逼近唐营，列阵决战。李世民一马当先，亲率精骑击败黑闼骑兵，乘胜以铁骑蹂敌步兵。黑闼率军死战，两军自中午直杀到黄昏。黑闼军力渐渐不支，王小胡见情况不妙，劝道："现我军已智穷力尽，应早离去，再图后举。黑闼点头，与王小胡悄悄遁去。余众不知，仍在苦斗，这时洺水守堰唐兵接令决堰，顷刻间河水暴涨，汹涌而至，深达丈余。刘黑闼军大惊失色，唐军则乘势猛击。黑闼军终于溃败，被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刘黑闼与范愿等带残军二百余骑落荒而逃，投奔突厥。

徐圆朗闻听刘黑闼兵败，惊恐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刘复礼献计说："有一人名刘世彻，是个盖世奇才，而且有帝王之相。您若自立为帝，恐难成功；如尊世彻为主，天下屈指可定。"圆朗应允，派他到浚仪（今河南开封）迎接刘世彻。这时有人劝圆朗道："将军派人去迎接刘世彻，真是受骗非浅；世彻如果得志，将军怎能有立身之地！您没看见李密杀翟让吗？"圆朗连连点头称是。不久，刘世彻带众数千来到兖州城下，等待徐圆朗出城相迎。圆朗不出，派人召见。世彻知道事情有变，想逃走，又恐难以脱身，只得硬着头皮进城拜见。徐圆朗夺其部众，给个司马衔，并令前往攻取谯（今安徽亳县）、杞二州。山东人素闻其名，所到处无不归降。圆朗更加嫉妒，于是把他杀掉。

李世民战胜刘黑闼后，在四月初从河北引军征讨徐圆朗。但途中，李渊召他回朝，世民暂将军事移交给李元吉。四月九日（庚申），李世民至长安，李渊亲自在长乐（今陕西西安东）接风洗尘。世民陈述了徐圆朗力屈途穷的形势，李渊再次派他出关到黎阳，汇集众军，直指济阴（今山东定陶西）。二十五日（丙子），唐将史万宝攻陷徐圆朗的陈州。到七月初，李世民指挥唐军以破竹之势，连克徐圆朗十余城，基本扫平了淮河到济水一带地区。这时，他令淮安王李神通、行军总管任瓌、徐世勣继续消灭残敌徐圆

朗，自己在七月初六（乙酉）和齐王元吉等班师回朝。

就在李世民从河北移兵南击徐圆朗时，刘黑闼引来突厥颉利可汗数万骑兵包围了新城（今山西朔县南），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壬申）杀唐将李大恩。六月一日（辛亥），又引突厥大举进攻山东。七月初，当刘黑闼长驱南下到定州时，亡命在此地的曹湛、董康买等故将重新聚兵响应。李渊一面诏令幽州罗艺出兵迎击，并在七月十五日（甲午）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征讨刘黑闼。九月，黑闼攻陷瀛州（今河北河间），杀唐刺史马匡武。为增强讨伐刘黑闼的力量，十月初，李渊又命齐王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总管，出兵山东。

河北重又燃起熊熊战火。十月五日（癸丑），唐贝州刺史许善护和黑闼弟十善战于鄃县，善护全军覆没。六日（甲寅），唐将桑显和在晏城（今河北深县西）击败刘黑闼军，但唐观州刺史刘会以城降了刘黑闼。

十七日（乙丑），唐河北道行军总管李道玄与刘黑闼在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展开一场激战。当时道玄率兵三万，他亲带轻骑先冲敌阵，令副将史万宝督领大军随后继进。不料万宝轻视道玄，竟对亲信说："我奉密诏，道玄小儿仅名为主将，而军队进止都由老夫我决断，今他轻率冒险，我们若紧跟在后，定会同归于尽。不如把他当作诱饵，他败后敌必争进，我则坚阵相待，以逸待劳，定能大获全胜。"就这样李道玄寡不敌众，战败而亡。刘黑闼乘胜指挥大军冲杀过来，史万宝还想迎战，但军无斗志，纷纷溃散，他只落得单身逃回。

李道玄是李渊堂兄的儿子，年十五岁就随从世民征讨宋金刚，后又参加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战役。每战冲锋陷阵，勇猛无畏，深得世民赞赏。此时遇难年仅十九岁。

李道玄全军覆没，使山东地区的其他唐军惊恐异常。洺州总管李瑗弃城西逃，一些州县又纷纷叛唐。旬日间，刘黑闼再次收

复故地，于二十七日（乙亥）仍建都洺州城。

十一月初三（庚辰），唐沧州刺史程大买为刘黑闼逼迫，弃城而逃。李元吉面对咄咄逼人的劲敌，怯战而不敢进军。山东形势严峻，这时东宫官员王珪、魏征见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就劝建成抓住这一机会，主动请缨出征，建成依计而行。于是，李渊在七日（甲申）这天诏太子建成率军东征，令陕东道大行台、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全受建成指挥，并授与临机决断、不用上奏之权。

唐增强了对山东的攻势。二十二日（己亥）李元吉派兵击败在魏州的刘十善。刘黑闼闻听弟弟战败，率军南下增援。这时，自相州以北的州县已经归降了黑闼，只有唐总管田留安死守魏州孤城。黑闼强攻不下，引兵南拔元城（今山东莘县西南）后，回军再攻，仍不克。十二月十一日（戊午），黑闼北上攻陷恒州（今河北正定），杀唐刺史王公政。十六日（癸亥），唐幽州大总管罗艺收复廉、定二州。十七日（甲子），刘黑闼又攻魏州，田留安奋击，破黑闼军，擒获其莘州刺史孟柱，俘虏将士千人。

当时，山东豪杰多杀唐官吏响应刘黑闼，形成上下猜疑，人心离怨的局面。田留安对吏民则以诚相待，凡有事禀告的不论亲疏，都可以直入卧室。他常对官吏百姓讲："我与诸位一起为国御贼，本应同心协力；谁要弃顺投逆，就杀我头请赏去吧。"有一人名苑竹林，原是刘黑闼党羽，潜存异心。田留安明知，故意不说，还把他安置在身边，叫掌管钥匙。苑竹林深受感动，愿以死相报。大家见田留安这样忠厚，都互相约定，决不辜负田公。由于众志成城，魏州城才坚不可破。

十八日（乙丑），唐并州刺史成仁重击败刘黑闼部将范愿。刘黑闼则全力攻魏州，想拔掉这钉子。这时，李建成、李元吉率大军来援，推进到昌乐（今河南南乐）。黑闼引兵南下阻击，双方多次列阵相抗，但都没贸然交锋。

魏征向建成献计道："从前战败黑闼后，对他的逃亡将领总是列名缉拿处死，连妻子都被囚禁。所以齐王李元吉来时，虽有诏书宣称赦免，可无人肯信。今天我们如将过去的俘虏、囚徒统统释放，给以生路，则可坐观敌人分崩离析。"建成按计而行，果然生效，等到黑闼粮尽，部下不断逃亡，有的士兵还捆绑了他们的长官投奔唐营。

刘黑闼见人心离散，又怕魏州城出兵和唐大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遂在夜间拔营北逃。至馆陶（今属河北），在永济渠上架桥渡河，但还没架成，建成、元吉率大军衔尾追到。黑闼令王小胡背水列阵抵挡唐军，自己督促加速建桥。桥刚建好，黑闼就迫不急待地策马驰过桥西。见主帅先逃，黑闼军丧失斗志，随即纷纷溃散。唐军乘势过桥追击，不料才过千余骑，大桥忽然崩塌，贻误了战机，刘黑闼带残骑数百侥幸逃去。

李建成派将领刘弘基率精骑尾追不舍。刘黑闼被唐军所逼，不敢驻马休息，日夜兼程，逃至饶阳，随从仅剩弟十善等百余骑。这时人困马乏，饥饿难熬。黑闼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出城迎接，黑闼心存疑虑，不肯入城；德威涕泣恳请，才跟随到城旁市场中下马休息。德威随即送来美食佳肴，正当他们狼吞虎咽时，德威突然率兵团团包围，刘黑闼等就地被擒。武德六年正月初三（己卯），诸葛德威举城投降了唐军，并将刘黑闼和刘十善等囚送给李建成。李建成在洺州将黑闼和十善斩首。

割据兖州的徐圆朗被唐将李神通、任瓌、徐世勣围攻，虽数次出战，但频频败北。刘黑闼彻底失败后，他更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到武德六年二月间，唐军加紧攻城，城中军民争先恐后弃城降唐。徐圆朗山穷水尽，于二十日（丙寅）带数名亲骑弃城夜逃，在途中被人杀死。至此，山东再次被唐平定。

刘黑闼起兵距窦建德失败仅仅两个月，而山东各地群起响应，很快就恢复了夏的故地。溯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唐平夏灭郑后

对山东地区的控制力还很薄弱；二是窦建德的朴素作风和良好政治在当地影响较深；更重要的是，唐廷采取错误的镇压政策、严厉绳治夏的故将，这不仅引起窦建德旧部的愤慨，而且使山东人民不满。李世民再次出关镇压，虽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直到李建成领兵前往，他接受了宫臣魏征的建议，主要采用宽大政策，顺应了山东人民愿意恢复生产、愿意生活安宁的民心，刘黑闼军心随即瓦解，唐才恢复了对这一地区较为稳固的统治。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8--190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山东》、《旧唐书》、《新唐书》：《刘黑闼传》、《徐圆朗传》、《李玄通传》、《罗艺传》、《罗士信传》、《李道玄传》、《李建成传》

玄武门之变

李渊建唐时，按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立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随后展开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由于建成是储君，需要协助坐镇长安的父亲处理政务，所以统一战争中的关键性大战，都是李世民任元帅，统领大军、浴血奋战、克敌制胜，从而立下了赫赫战功。如果说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一段时间内，建成功绩虽不如世民，但还相差无几。那么，随着统一战争的进展，他的勋绩和世民相比，就越来越逊色了。李世民战功显赫，一方面使他逐渐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建成的疑忌；而建成的疑忌，又增强世民"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恐惧，也越发要夺取最高权力。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血腥的宫廷斗争成为不可避免了。

早在武德元年（618 年）十一月李世民讨平薛氏父子时，李渊令李密到豳州（今陕西彬县）迎接李世民。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李渊时还常常面带傲色，但见到世民的威严气势，不觉惊服，私下对殷开山说："真是英主啊！若非这样的人，怎能平定祸乱。"统一战争的首次胜利就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

武德二年，李建成就开始嫉妒世民战绩卓著，颇为猜疑，加上他又渐渐亲昵小人，因此，礼部尚书领太子詹事李纲多次进谏，但建成不听。九月，李纲向李渊提出辞官。李渊予以挽留并提高李纲官衔，李纲再次上书谏太子，劝他不要"饮酒无节，听信谗言，疏远骨肉兄弟"。建成依然拒而不听，所为如故。这是兄弟间

争夺帝位继承权的先声。

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武德四年又消灭了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势力，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他谋取帝位继承权的欲望随着战功增高而滋长。还在讨伐王世充时，李世民曾和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叫王远知的著名道士。远知迎接两人时惊道："此中有圣人，莫非是秦王吗？"世民据实相告。道士说："你将来要作太平天子，望多珍重。"他听后一直牢记心中。

李世民在率兵征战中，非常注意招揽人才，象骁勇善战的徐世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张公谨、侯君集等都网罗在自己的帐下。武德四年七月李世民灭掉郑、夏凯旋回长安时，身披黄金甲，后随徐世勣等二十五员大将，铁骑万匹，真是威风凛凛。十月，李渊因为前代官称都不足表彰李世民的盖世殊功，特创"天策上将"徽号，位在王公之上，以世民就任。并设"天策府"，置官员。天策府实际是李世民的军事顾问决策机构。此外，李世民还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管辖潼关以东地区。

李世民又以天下即将太平为名，设立"文学馆"，延请各方文学名士。一时，人才俊秀济济一堂。有秦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他们都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叫阎立本为这些人画像，褚亮写赞词，号称十八学士。当时士大夫们都以能选入文学馆为崇高荣誉，竟把文学馆看作是东海三仙山的瀛州，称人选为"登瀛洲"。世民把这些名士分为三组，每日轮流值班，供给美食佳肴，恩礼优厚。他每日上朝后就到馆中，和众学士讨论文籍，纵论古今。文学馆实际是李世民政治上的顾问决策机构。这些僚佐们还煞费苦心地为他招揽人才。洛阳平定时，王世充部下杜淹降唐，他原想依附太子建成谋取高升。房

玄龄知杜淹多权术，恐他投靠太子对秦王不利，于是禀告世民，抢先引入天策府为官。李世民还在朝廷大臣中争取了萧瑀、陈叔达的支持。

对世民早有疑忌之心的建成当然不会漠然视之。他首先利用太子的地位和在朝辅政的条件培植自己的势力。武德四年窦建德被擒后，魏征和裴矩入关降唐。建成久闻魏征大名，魏征一到，他就恭敬拜访，引任太子洗马，收为自己部下。裴矩也重用为太子左庶子，不久又升任太子詹事。太子中允王珪颇受建成礼遇，一直忠心耿耿助他巩固太子地位。在朝廷大臣中，李建成争取了宰相裴寂、封德彝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东宫太子集团。

齐王李元吉成为李建成的有力支持者之一，他是经过一番权衡才和长兄结成联盟的。元吉为人，勇猛有力，在随李世民平定东都和讨伐刘黑闼起兵时都立有战功。然而，他骄逸放纵，性好畋猎，自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他狩猎时，随意践踏田野庄稼，放纵部下杀掠百姓牲畜。甚至对街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加上他还有刘武周攻太原时弃城逃跑的不光彩历史，因此名声不佳。在东宫和秦王府箭拔弩张的斗争中，李元吉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和前途。长兄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猎，和自己性格基本相投；建成早已立为太子，而嫡长子继帝位又是名正言顺；秦府手下虽然有很多骁将精卒，但东宫和齐王府联合起来兵力也占优势；世民胆略超群，战功显赫，而且执法很严，如果继承帝位，自己很难为所欲为，在建成下面当齐王则要悠游自在得多；特别是他也有承继帝位的野心，认为只要除掉秦王，取东宫则易如反掌。

东宫、秦府集团争取支持者的活动也深入后宫。李渊晚年多内宠，嫔妃成群，生小王十七人。这些年青的嫔妃们考虑到李渊驾崩后自己和年幼儿子的地位，竞先结交已法定的帝位继承人李建成，作将来的政治靠山。建成为通过她们吹枕边风巩固太子的

地位，增强东宫势力，也与元吉千方百计讨好嫔妃，阿谀奉承，贿赂珍宝，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流传李建成和李渊最宠幸的张婕妤、尹德妃还有暧昧关系。因此，大多数嫔妃经常在李渊面前说太子、齐王的好话，说秦王不好，挑拨李渊和世民父子间的关系。

武德五年十一月的事件又加深了李渊嫔妃和李世民的矛盾。那是在世民平定洛阳后，李渊派贵妃等数人到洛阳挑选隋时的宫人及验收府库珍宝。贵妃们私下向世民要宝物并为亲属求官。世民说："珍宝已登记入册上奏朝廷，官职应授贤才或赏有功的人。"这些遭拒绝的嫔妃们更加不满。此外，李世民因淮安王李神通在平洛阳时有战功赐良田数十顷。张婕妤的父亲借裙带关系也要这块地，李渊不知地已被世民给了神通，于是亲笔写敕赐与。李神通说这地秦王先已赐给了自己，拒绝让给张婕妤父亲。婕妤向李渊诬告说："陛下手敕赐给我父的土地，硬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闻听大怒，训斥世民道："难道我的手敕还不如你的教（即太子、诸王的命令）管用吗！"随后私下对左仆射裴寂说："世民这孩子长期在外领兵，被一群文人教坏了，再也不是我过去那个听话的儿子了。"

不久又出了一件事。尹德妃父亲阿鼠骄横不法，秦王府属杜如晦骑马从他门前过，被恶奴数人拉下马痛打一顿，还折断一个手指。骂道："你是什么人，竟胆敢过我家门前不下马！"阿鼠恐怕李世民把此事上奏李渊，就恶人先告状，指使德妃诬告说："秦王左右欺侮妾父。"因张婕妤父亲的事李渊余怒未息，一闻此言有如火上浇油，指着世民骂道："我嫔妃家还受你左右欺凌，更何况一般百姓！"李世民反复说明情况，无奈李渊就是不相信。

李世民在宫内侍宴时，面对欢歌笑语的众嫔妃，不由想起生母窦氏早终，没能看到大唐一统天下并享受皇后的荣华，有时不免歔欷泪下。正在欢乐中的李渊见此大煞风景，很不高兴。不少嫔妃乘机一起背后诋毁，说："现今天下太平，陛下年岁已高，只

有和我们心情舒畅地娱乐才能益寿延年，而秦王每每独自流泪，正是因为憎恨妾等。陛下健在尚且如此，若千秋万岁后，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说罢相互悲啼。又边哭边诉：“皇太子仁孝慈爱，陛下要把我们母子托付给他，才能平安无事。”宠妃们的娇啼悲诉，使李渊黯然神伤。此后，待世民渐渐疏远，而和建成、元吉的关系日益亲近。当然，李世民也知道父亲的嫔妃是一股重要的势力，希望从中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他不仅也用“金宝”贿赂，而且叫妻子长孙氏亲自出面活动，孝顺高祖，恭敬妃嫔，尽力弥补，争取李渊和某些妃嫔的同情和谅解。

为使李建成在和世民的角斗中增加政治资本和充实党羽，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劝他主动请求征讨再起河北的刘黑闼。他们说：“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您只凭年长位居东宫，无赫赫战功镇服海内。现刘黑闼率败亡之余不满万人，而且资粮匮乏。您要出征，大军一到，势必摧枯拉朽。这样不仅可以建功立威，还可乘机结纳山东豪杰，太子地位才能安稳。”建成接受这一建议，遂向父亲请命。于是，李渊命建成、元吉率军出关，很快就平定了山东。这是李建成在统一全国战争中所建的唯一大功。他还借机外结了镇守幽州（今北京）的燕王罗艺。后又收买了调任幽州大都督的庐江王李瑗。在河北地区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武德六年，双方斗争已趋激化。李世民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武德七年三月，辅公祏反唐失败，江南平定。随着统一战争的完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倾轧已公开化。李元吉曾劝建成除掉世民，并扬言“要为兄亲手刃之”。六月，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第，李元吉竟将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内，要行刺世民。这时李建成还不忍心下此毒手，由于他的制止，暗杀才没进行。但元吉恼怒地对建成说：“我全是为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随后，他又多次说以利害，终于使建成点头。

李建成私招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别屯守东

宫的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秘密派遣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罗艺处调发幽州精锐骑兵三百，藏在东宫，准备用来突袭秦王府。不料事机不密，被人告发。李渊得知后，对建成训斥一番，将可达志发配到巂州（今四川西昌）。

建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庆州都督杨文干曾经宿卫过东宫，和太子关系亲密。建成又暗中指使他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私自募兵悄悄送进长安。这时，李渊将要到宜君县（今属陕西）新落成的仁智宫休养，让世民、元吉同往，而留建成居守长安。建成认为良机已到，对元吉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他叫元吉寻机暗杀世民，又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到庆州送给杨文干铠甲，令他速速举兵和自己内外相应，发动政变。尔朱焕、桥公山走到豳州，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因恐怕获罪而驰往仁智宫告密。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也到行宫揭发此事。李渊平素知道东宫、秦府有隔阂，但万没想到形势发展如此迅速而险恶，不由得大怒，假托他事，亲笔写诏令建成速来仁智宫。

建成心中有鬼，见诏书后恐惧而不敢行。太子舍人徐师谟劝他索性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他轻车减从前去请罪。建成几经斟酌，决定只带十余骑随从亲赴仁智宫认罪。他面见父皇后叩头请死，奋身自掷，摔得几乎昏死过去。李渊怒气不消，这天夜里，把他囚在幕帐中，只给点麦饭吃，还叫殿中监陈福带兵防守。与此同时，另派司农卿宇文颖驰往庆州召杨文干来见。没料想宇文颖是李元吉死党，行前元吉令他将真情告诉杨文干，所以宇文颖一到庆州，杨文干立即举兵叛乱。李渊连忙派左武卫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讨伐。

由于事态严重，二十六日（甲子），李渊召世民商量对策。世民说：“杨文干这小子竟敢造反，州府官员们就可以剿灭他；如若不然，只需派一员将领就能将他擒获。”李渊说：“不然，文干的事牵连建成，恐怕会有不少人响应。你还是亲去一趟，事成之后，

立你为太子。但我不能象隋文帝一样自杀己子，要封建成为蜀王。蜀地兵脆弱，他日建成如果顺从，你要保全他的性命；否则，你除掉他也很容易。”这是李渊第一次正式许诺立世民为太子。

李世民奉命后欣然前往，元吉和倾向太子的嫔妃们则络绎不绝地向李渊为建成求情。宰相封德彝在这次阻止李渊废立太子事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封德彝本是降唐的隋朝旧臣，为人智略过人而又阴险狡猾。武德三年任中书令，执掌机要大权。曾多次随世民征讨，很受重视。在太子和秦王的倾轧中，他有时向世民献策，世民以为忠于自己，前后赏赐以万计。太子集团也用重金收买他。他表面脚踏两只船，骨子里实际倾向李建成。这时，封德彝在外朝暗中配合元吉和嫔妃们活动。当李渊征求废立太子的意见时，他坚决反对。在内外两股势力的夹攻下，李渊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赦免了建成，仍派他回长安居守。只轻描淡写地责备建成、世民兄弟不能和睦相处，而归罪于东宫官员中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和秦王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说是他们撺掇得兄弟们不和，一起流放到巂州。上述封德彝暗中支持建成一事，直到贞观年间他死后数年李世民才知晓。

七月，杨文干攻陷宁州（今陕西宁县）。但李世民大军一到，其党羽四散而逃。五日（癸酉），文干被部下所杀，宇文颖也被擒斩首。可是，立世民为太子一事，李渊已绝口不再提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日（戊寅），突厥大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十二日（庚辰）攻陇州（今陕西陇县），十五日（癸未）攻阴盘（今甘肃平凉东），二十一日（乙丑）攻并州（今山西太原），频频威胁关中安全。二十六日（甲午）李渊忙回长安商议对策。有人劝李渊说：“突厥所以接连攻掠关中，是因为子女金帛都在长安。若烧毁长安迁都远处，突厥之患自然就烟消云散。”李渊同意这一看法，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今陕西终南山）至

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地寻找可供迁都的地点。建成、元吉、裴寂顺旨赞同，萧瑀等虽知不可而不敢谏阻。

这时，李世民大胆进谏。他说："戎狄为患中原，自古就有。陛下兴建大唐，精兵百万，所向无敌，怎能因区区戎狄据边，就迁都躲避，贻四海之羞，为百姓所笑呢！霍去病仅汉朝一员将领，还志灭匈奴，况我身为皇子！请容我数年，必活擒颉利可汗献于阙下。如不能奏效，再迁都也不迟。"李渊听后说好。建成却讥讽道："汉代樊哙曾吹牛说要以十万兵横行匈奴，秦王的话何其相似。"世民笑道："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子，何足挂齿。不出十年，我必平定漠北。"李渊经斟酌，还是听从世民的谏阻，停止了迁都。谁料建成和嫔妃们又暗生诡计，借此事共同诽谤世民，说："突厥虽屡为边患，但得点贿赂就立即返回。秦王居心叵测，实际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揽兵权，阴谋篡夺帝位。"

建成和元吉加紧谋害世民的活动。一次，李渊到城南打猎，建成、世民、元吉随从。李渊令三子驰射角胜。建成有匹胡马，体肥壮、性暴烈而喜蹶，他把这匹马牵给世民说："此马雄骏，能腾跃几丈宽的沟涧。你技艺高超，骑骑看。"世民明知太子不怀好意，但身经百战，何惧悍马。闻听此言，一跃上马追逐野鹿。果然在奔驰中马突然扑地而卧；但未等马卧倒，世民已腾身离鞍，跃立于数步之外；马刚站起，他又翻身而上。如此三扑三跃，没伤他一根毫毛。李世民对宇文士及说："他想用这种手段害死我，可死生有命，岂能暗算的了。"建成知后，心中暗恨，唆使嫔妃们向李渊诋毁道："秦王自称有天命，正要当天下之主，哪能轻易被人害死。"李渊听罢大怒，先召建成、元吉询问，然后召来世民呵斥道："天子自有天命，不是靠智力强求的，你谋取帝位的心也太急了吧！"世民大吃一惊，免冠叩头，连称冤枉，请求将这事交司法衙门审问清楚。李渊怒气不消，恰巧有关部门上奏突厥人寇，才改容安慰世民，叫他冠带整齐，共商对付突厥之策。闰七月二十五

日（己未），诏令世民、元吉率兵出豳州抵御突厥。此后，每有寇盗，就令世民征讨；事平之后，猜忌更甚。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深知和东宫集团的斗争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因洛阳是形胜之地，必须牢固占有作为自己根基，以防政变时的不测事件。于是令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坐镇洛阳，又令心腹秦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部下王保等千余人也去，并叮嘱要不惜金帛，秘密网罗山东豪杰，待机策应京师政变。这事被元吉发现了蛛丝马迹，告张亮要图谋不轨。李渊命官员审讯，张亮始终没有泄露机密。因查无实证，只好将他放回洛阳。

建成召世民夜宴，暗中在酒里下了毒。世民不知，饮酒中毒，胃痛如绞，吐血数升。幸亏淮安王李神通陪席，将他扶回西宫。李渊得知前来探望，试图采取平衡的办法使三子不至骨肉相残。于是写敕给建成道："秦王平素不能饮酒，自今以后不许再夜饮。"又对世民说："削平海内，统一天下，你立有大功；建成年长，为太子日久，我不能废弃。观你们兄弟，似水火不容，同在京城，必有纷争。应该让你回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东）以东都归你管辖。"

李世民刚要走，建成、元吉商议道："秦王如到洛阳，有了土地军队，我们难以控制。留他在长安，则只是一匹夫，除掉很容易。"就密令数人上奏，说："秦王左右都是山东人，听说能去洛阳，无不喜悦，如鱼得水，看他们志向，恐怕不会再回来了。"又托近幸大臣从中劝阻。结果李渊又改变了主意，此事中途而废。

争夺皇位继承权使兄弟三人走到不共戴天的地步，谁也不能调解了。建成、元吉和尹德妃、张婕妤等日夜向李渊耳中灌输世民的坏话，使他不由不信，要贬黜世民。宰相陈叔达谏阻道："秦王对建立大唐天下有赫赫战功，不可贬黜。而且他性情刚烈，若加压抑，恐不胜忧愤，一旦得了不治之疾，陛下悔之晚矣！"李渊觉得有理，打消原来的念头。元吉还秘密请杀秦王，李渊问："他

有平定天下战功，又没明显的罪状，以什么理由杀他？”元吉道：“他初平东都时，观望不回。散钱帛网罗私人势力，树立自己威望，这不是谋反吗！只要速杀，何患无辞。”李渊难以勾销父子之情，没有答应。

李渊倾向东宫，形势对李世民愈来愈不利。秦王府的官员们都忧虑焦急、紧张不安。房玄龄对世民妻兄长孙无忌说：“如今秦王和太子的裂痕之深，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一旦祸发，非但秦府不保，还要危及大唐社稷；只有劝秦王行周公诛管、蔡的故事，才能使国家安定。生死存亡，刻不容缓，正在今日。”无忌道：“你我所见相同。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说出。”两人商谈罢，无忌立即到秦王府转告了房玄龄的意见，世民也马上召来玄龄谋议。世民说：“险兆已见，怎么办？”答道：“大王功盖天地，本应承继帝位；今日身处忧危境地，正是天赐成大业之时，愿您当机立断！”秦王府官员杜如晦也协助房玄龄力劝世民先发制人，铲除建成、元吉。但世民一时还下不了决心。

东宫集团也在紧张策划。建成、元吉知秦府多骁勇善战的将领，想收买过来为己所用，第一个目标是秦府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建成派人给他秘密送去金银器一车，并亲笔写信表示愿结成布衣之交。但敬德将金银器原封不动地送回，拒绝说：“我出身微贱，在隋末动乱之际，又投身刘武周，本罪不容诛。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唯有杀身以报。我对殿下无尺寸功，不敢谬收重赐。若私交殿下，则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您要这样的人又有何用！”建成大怒，遂与敬德绝交。事后，敬德把此事禀告了世民。世民说：“我知你心如磐石，即使送堆积如山的金子，也绝不会动摇。贿赂你就要，没什么关系，还可以了解他们的阴谋，岂不更好。不然，他们要谋害你了。”果然事过不久，元吉就派刺客夜间行刺。敬德察觉，故意洞开房门，安卧不动。刺客慑于他的威名，徘徊庭前，终于不敢入室。见谋刺不成，元吉又诬告敬德谋反。李渊令逮捕

审讯，竟定成死罪，多亏世民力争，才侥幸获免。接着，建成、元吉又用金帛收买引诱秦王府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也拒而不收，暗将此事禀告了世民。东宫集团以李世民手下的重要将领为收买对象，而这些都是秦王重用的心腹，结果很难成功。

建成为了翦除世民的羽翼，瓦解秦王集团，诋毁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将他远调康州（今甘肃成县）任刺史。咬金拒不赴任，劝世民说："大王的股肱羽翼折尽了，自身怎能久全，所以我宁死不去，但愿您早决大计！"

建成、元吉分析秦王府谋士中最厉害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于是又加以诽谤。李渊下诏将两人革去官职，逐出秦王府；责令回归自己宅第，不许再私见秦王。

秦王府党羽接连被调被逐，形势逼人。世民妻兄长孙无忌、世民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及尉迟敬德日夜劝世民抢先下手杀建成、元吉。他犹疑不决，问灵州大都督李靖，靖拒绝参与；又问行军总管徐世勣，世勣也拒绝。两人都看到秦王集团处于劣势，难料事变结局。

在这关键时刻，突厥又来侵掠，数万骑兵入塞后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境内）。建成立即推荐元吉代替世民督帅诸军北征。李渊同意，命元吉率右武卫大将军罗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这正是削弱秦府势力的良机，元吉请求将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骁将和秦府帐下所有精兵全部调归自己统辖。李建成还授与元吉一条密计：当他和世民一起到昆明池饯行时，要安排伏兵，刺杀秦王，谎奏暴病而死；然后再坑杀尉迟敬德等秦府猛将。还答应自己即帝位后，封元吉为皇太弟。不料王晊得知此阴谋后秘密报告了李世民。

王晊当时任东宫率更丞，是东宫的低级官员，暗中已被世民收买。另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常何，此人在武德五年曾随李建成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被建成视为旧部下。武德七年调入京城守

卫宫城北门即玄武门。玄武门是进人禁内的捷径，是政变的必争之地。李世民暗中将常何收买了。此外，屯守玄武门的将领敬君弘、吕世衡也被收买，成为秦府死党。谋划深远的李世民着重收买李建成手下次要人物，因为这些人既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一方面容易达到收买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发挥内线作用。特别是他精心收买了驻守玄武门的禁卫军将领，曾在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世民的势力和地位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最后竟胜李建成，这一策略起了关键作用。

听了王晊的密告，世民忙召集剩下的心腹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议。无忌劝世民速下决心，先发制人。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确知祸在朝夕，但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以义讨伐，不更名正言顺吗？"敬德坦率地说："人情谁也不愿意死，但今日众人为您举大事甘愿去死，真是上天恩赐的事。祸患就要爆发，您却安然不动，即使大王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也要考虑国家的前途啊！这次您再不采纳我的话，敬德就要窜身草泽，不能留在这里束手受戮。"无忌也说："再不听敬德的劝告，必败无疑。他们一定要走，我也跟随而去。"世民说："我讲的也不是全没道理，请你们再考虑考虑。"敬德说："大王今日理事优柔寡断，非智；临难犹豫不决，非勇。况且您平日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面的现已进入府中，披坚执锐，事势已成，箭在弦上，怎能不发！"

事关生死存亡，李世民又访问秦府其他幕僚的意见。大家都说："齐王凶恨残忍，也决不会顺从他的长兄。听说薛实曾对他讲，'大王之名，合起来恰成唐字，最终要得帝位。'齐王听后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取东宫易如反掌。'他和太子谋乱未成，就有取代之心。象这种狼子野心的人，什么事干不出来。若两人阴谋得逞，大唐要失去天下。凭您的贤德才能，杀二人如拾草芥，为何要拘泥匹夫之节，而不顾江山社稷呢！"世民仍感到胜负没有把握，就命人取来龟甲，以卜凶吉。幕僚张公谨正好进来，见此情

景，抓起龟甲扔到地上，说："卜以决疑，今日事已不疑，还卜什么！难道卜而不吉就罢手不成！"这时，李世民才终于下了立即政变的决心。

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可两人为了激发他干到底的决心，故意推辞说："敕旨不让我们再侍奉秦王，今日如私自拜见，一定是死罪，不敢遵命。"无忌将此话回报后，世民勃然大怒，对敬德说："难道玄龄、如晦要背叛我吗！"当即解下佩刀交给敬德，吩咐道："你前去观看，如无来意，立即杀掉，提头见我。"敬德和无忌同去，讲明秦王这次真已下了决心，才派他俩请二人速去秦府共谋大计。为了遮人耳目，房玄龄、杜如晦乔装打扮成道士与无忌进入秦王府，敬德则绕道返回。房、杜面见世民后，随即制定了周密的政变计划。

六月三日（己未），李世民突然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我没做丝毫对不起兄弟的事，可他们非要杀我不可，似要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我今日含冤而死，永离君亲，魂归地下，实在耻见诸贼。"李渊看罢奏章，不禁愕然，半晌才说："明日朝会当面审问，你要早些上朝对质。"

四日（庚申），李世民事先部署妥当，亲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秘密伏兵于玄武门内。不料，张婕妤探听到李世民向李渊密奏的内容，连忙派人驰告建成。建成马上召元吉商议对策。元吉说："应令东宫、齐王府卫士整装侍命，然后托疾不入朝，以观形势。"建成认为自己对京城的军事力量私下已作了准备，而且旧属常何在玄武门，不会出现问题。于是说："我们的兵已严备，应当同去参见父皇，当面问个明白。"所以，两人没进一步采取应急措施就进了玄武门。当时，李渊召来了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准备会审，查清真假。

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察情况异常，立即拨马掉头，东归宫、府。世民突然出现，纵马追赶，在背后大声呼唤。元吉回头张弓就射，由于惊慌弓不能拉满，连射三箭不中；世民突发一箭先射死建成。这时，敬德率七十骑兵赶到，乱箭齐发，元吉被射落马下，逃人园林。世民跃马向前，尾追不舍，不料马被树枝所挂，人重重摔在地上，一时不能站起。元吉见状，返身奔到，夺过世民手中弓要扼杀他。敬德下马[illegible]救，厉声呵斥；元吉慌忙弃了世民，向武德殿逃去。敬德纵马追杀，背后一箭射死。建成死时三十八岁，元吉仅二十四岁。东宫将军冯立、薛万彻和齐府亲将谢叔方闻听建成死，誓为主人报仇，率东宫、齐府精兵二千急驰玄武门。张公谨力大无比，独闭城门挡住来兵。东宫、齐府拚死猛攻。驻守玄武门的宿卫将领敬君弘挺身出战，有的亲信制止道：“事变结局尚不明朗，不如徐观变化。等大军聚集，结阵而战，为时不晚。”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力战而死。寡难抵众，形势险恶。世民在玄武门，急召秦府中将士入宫支援。行前，世民妻长孙氏亲自慰勉，将士无不感激。高士廉甚至将狱中囚犯放出，授给兵甲，组成军队，迅速赶到芳林门，准备与秦王府兵合势。秦府兵、玄武门宿卫军和东宫、齐府兵苦战良久，不分胜负。薛万彻鼓噪要引兵攻秦王府。秦府空虚，临战的秦府将士大为惊恐。在这关键时刻，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级示众。宫、府兵全体将士都知主人已死，无心再战，纷纷溃散。薛万彻带数十骑逃人终南山。因为斩了敬君弘等，冯立这时对随从将士说：“总算报了太子知遇之恩。”于是解散兵众，逃亡荒野。谢叔方也下马号哭而逃。

玄武门刀兵相见、激烈鏖战之时，李渊和应诏来会审的大臣们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内泛舟。战斗接近尾声，李世民命尉迟敬德人宫宿卫。敬德身着铠甲，手持长槊径直闯人李渊泛舟处。李渊见状惊问：“今日是谁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敬德答道：“太

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举兵杀了他们。恐陛下受惊，特派臣前来守卫。”李渊长叹一声向裴寂等说：“万没想到今天让我亲眼见到这种事，你们说如何处理为好？”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没参加太原谋划起兵，又无功于天下，而嫉恨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秦王功盖宇宙，九州归心。既然已杀了建成，陛下如册立他为太子，委以军国重任，就平安无事了。”事情已到这样的地步，李渊只得说：“好啊，这本是我素来的心愿。”

这时，玄武门宿卫军、秦府兵与东宫、齐府残余军队仍混战不止。敬德请李渊速降手敕，令众军都受秦王管辖。李渊也只好答应，命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读敕书，各军才停止交战。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喻，东宫众将士也都溃散。

李渊召见世民，安抚道：“近日以来，由于建成频频诋毁，我几乎象曾母投杼，以假当真，实在委屈你了。”世民跪地痛哭，悲恸许久。

接着，建成子除长子太原王承宗早死外，其余的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都因是谋反者家属而坐诛，并除去皇室宗籍。当时李世民并不是皇帝，他和建成、元吉相杀只是兄弟间的谋害，不属谋反罪，但身为皇帝的李渊，坐视众孙以反律株连而不能相救，说明秦王威势之大，李渊自身也危。

秦府有些将领还要将建成、元吉党羽百余人斩尽杀绝，并以随从谋反罪籍没全家。尉迟敬德反驳道：“有罪的是建成、元吉两个元凶，他们已被诛杀，若再广泛牵连，恐不是安定政局的良策。”世民同意敬德的看法，残杀才得到制止。当日，李渊下诏大赦天下，明确犯谋逆罪的只是建成、元吉，所有余党，概不问罪。同时把国家一般行政事务的处理权交给了李世民。

五日（辛酉），冯立到秦王府自首请罪。世民责问他道：“你

在东宫挑拨离间，使我们兄弟不和，此罪一；昨日又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此罪二。大罪若此，怎能饶你一死！”答道：“我侍奉主人，就应忠心耿耿。任职之日，无所顾惧。”世民听此言转怒为喜，并抚慰勉励一番，冯立深为感动，决心效忠世民。谢叔方也到秦府请罪，薛万彻经秦王数次派人晓喻，才敢出来。世民说这些人都忠于职守，是义士，不予追究。

七日（癸亥），李渊册立世民为皇太子，下诏说：“自今军国政务，不论大小，全由太子决断，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开始执掌了国家大权。十二日（戊辰），原秦王府重要文武僚佐加官晋级，组成新的东宫班子：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咬金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并将齐王府金帛器物全部赐给尉迟敬德。

李世民是个胸怀宽阔、眼光长远的政治家，他作了太子后，对原东宫集团的文武人才，尽力争取，为己所用。从前魏征常劝建成早除秦王。建成败后，世民召魏征厉声责问：“你为什么离间我们亲兄弟？”旁边的人听了，替他暗捏一把汗。但魏征举止从容，面不改色地答道：“先太子要早听我的劝告，必无今日之祸。”世民平日就爱重魏征的才能，今听此刚正豪爽言谈，油然起敬，引为太子詹事主簿。还将去年李渊流放到嶲州的建成宫僚王珪、韦挺召回京师，任谏议大夫职。

十六日（壬申），李渊赐裴寂手诏：“朕当加尊号太上皇。”显示了要退位的意向。

李建成死后，诏令幽州大都督李瑗归京城。李瑗本建成党羽，又知建成被杀，心中疑惧。部将王君廓想出卖李瑗取功，于是怂恿他起兵。李瑗十七日（癸酉）反叛，二十五日（辛巳），王君廓又杀掉李瑗获得幽州都督职位。

七月三日（己丑），任命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咬金为右卫

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六日（壬辰），任命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七日（癸巳），又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杜淹为御史大夫，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左骁卫将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这是以李世民的前东宫班子为基础组成的新朝廷。

建成、元吉余党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仍不自安。侥幸小人争相告密捕捉以邀功请赏。谏议大夫王珪将此情况禀告世民。世民下令："六月四日以前事连建成、元吉，十七日以前事连李瑗的人，一律不许告发，违者治罪。"十一日（丁酉），又派谏议大夫魏征抚慰山东，可以便宜行事。魏征至磁州（今河北邯郸南）。遇州县枷锁押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去长安。魏征道："我受命抚慰山东之日，赦令说前东宫、齐府部下都免罪不问，今若再押送思行等治罪，谁还会相信赦令！"于是果断地将两人释放了。李世民听此消息，颇是高兴。

八月八日（癸亥），李渊下诏传位给太子。九日（甲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七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曰剌，并以礼改葬。改葬日，他在千秋殿西宜秋门痛哭，还把自己第十三子李福作为建成的后嗣。同时答应原太子宫僚魏征、王珪送葬到墓地的请求，并让所有宫、府旧僚都送葬到墓地。李世民赐建成、元吉带有贬意的谥号，目的在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其他作法，则为表白自己仁爱博大的胸襟，力图弥补以杀兄逼父获得帝位而在封建道德上留下的伤痕。

李渊退位后当了九年太上皇，病死时年七十岁。

对于玄武门之变，古代颇有议论。司马光认为，立嫡以长是

符合礼法的，但李渊所以有天下，皆世民之功，而建成以庸劣居其上，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他还认为，如果兄弟们互相礼让，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祸乱；即使不能，李世民也应等建成先动手，再后发制人。但世民被属下逼迫，在玄武门杀兄斩弟，从而被千古讥笑，实是憾事。范祖禹也认为李渊立建成为太子是符合礼法的，而世民杀建成是无父无君。王夫之则认为，根据太原起兵建唐的具体情况，按"立嫡以长"的礼法立建成为太子是不行的，因这一原则只适应太子诸王都生长在深宫，而无功于天下。如李渊放弃建成而立世民为太子也是不行的，因这两人都有创业之功。故李渊处理此事太难了；岂只是难，实在没有处理的良方；如果说有能处理好的，那只有"圣人"。

在皇位继承权上，李渊按封建礼法立建成为太子；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中，他采取了倾向太子但以平衡手法尽量缓和双方关系的办法，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为争夺帝位骨肉间互相残杀的事件，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层出不穷，这是制度本身的弊病。王夫之说李渊没有处理玄武门事件的良方，倒是很有见地。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5—196

《通鉴纪事本末·太宗平内难》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纪》、《太宗纪》、《王知远传》、《魏征传》、《裴矩传》、《王珪传》、《李建成传》、《李元吉传》、《后妃传》、《封伦传》、《张亮传》、《陈叔达传》、《尉迟敬德传》、《段志玄传》、《长孙无忌传》、《敬君弘传》、《薛万彻传》、《长孙皇后传》、《高士廉传》、《冯立传》、《谢叔方传》、《曹王明传》、《赵王福传》、《贞观政要·忠义》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唐高祖》

宋 · 范祖禹《唐鉴 · 高祖》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汪篯隋唐史论稿 · 李世民》

唐初定制

李渊为首的集团在太原起兵及入关建唐，由于戎马倥偬，无暇他顾，典章制度都仿照隋朝。武德七年（624年），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完成，这时虽然仍面临许多问题，但重建隋末以来被打乱的封建秩序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已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为此唐统治集团在政治、军事、科举、法律、均田制和税法上都在隋代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和补充，而比隋制更加完备、周密。这些制度大体是在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时奠定的。成为唐朝前期的基本制度。

在中央行政方面，设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为三师，做皇帝的名义老师；设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员为三公，与皇帝坐而论治国之道。这都是正一品的尊贵官称，但既无实权，也无属官，并且常虚悬而不授人。

唐中枢机要之司是中书省和门下省。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二人，正三品。副长官为中书侍郎，二人，正四品。由于中书令身为相职，主要在“政事堂”议政办公，因而中书省实际负责的往往是中书侍郎。此外，还有中书舍人、散骑常侍、补阙、拾遗等。唐中书省的中心工作是起草诏书，以及负责整理、陈奏来自各方面的表章，并提出处理的初步意见。共有七种形式：一是“册书”，凡立皇后、太子及封王等场合使用。二是“诏书”（又称“制书”），一般用于重要的赏罚刑政，重大官爵的授与，改革旧制等。三是“慰劳制书”，用于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四是“发敕”

(又称"手诏"),是使用最多的一种形式。如增减官员,免除官爵,六品以下官任命;州县行政区划的废置改易;判流放以上罪刑;征发兵马以及国库钱物支用。五是"敕旨",是根据皇帝旨意而制作的施行程式。六是"论事敕书",用于慰谕官员,戒约臣下。七是"敕牒",是在不违背原有典章制度的前提下,按旨意发出的公文。

中书省草拟的册诏或批复奏章的敕旨,要一式两份。一份称"底",即在中书省留档备查;一份称"宣",即送到门下省审核的那份。这种经过中书,门下,有底本留在中书省可以检查的诏敕才是正常合法的。

在中书省负责诏敕起草工作的主要是中书舍人,官正五品,定额六人。一般以年资较高的一人判本省杂事,称为"阁老"。负责草拟诏敕的也只有一人,称为"知制诰"。中书舍人起草诏书要求不能泄漏,不得延缓,不能遗失,不得忘误,否则要受处罚。

由于唐代六部章表由尚书省汇总奏上,而中书省要对这些表章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所以唐六位中书舍人参议奏章要按尚书省六部分工,称六舍人分押六曹。虽然如此,但一位舍人对他分管的关于军国政事的奏章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时,其余舍人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称"五花判事"。这样既有分工负责,又可集中众人的智慧。

唐门下省长官名侍中,二人,正三品。门下侍郎二人,正四品,为副长官。此外,还有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唐侍中也是当然的宰相。门下省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凡是有不便施行的,封驳奏还。

具体的说,中书省以皇帝的名义草拟的诏敕,要签上时间、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姓名按行政程序送到门下省审查。如果此诏敕内容是军国大事而门下省又审查同意,则先写上侍中、门下侍郎、给事中姓名后,再写上一段对诏敕内容加以褒美的文字,

署上时间，复奏皇帝批准，付外施行。若草拟是一般诏敕，则门下省不须加褒美的一段文字，只写“判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等字，复奏皇帝御批实行。当门下省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后，认为不便施行，有权进行封驳。“封”就是将草拟的诏敕密封后退回中书省。而“驳”则还要附上批驳意见，说明不同意的原因。有时甚至直接在上面涂改，密封送回，时称“涂归”，中书省这时需要考虑重新草拟或修改“诏敕”。

唐代臣下给皇帝的上书分为六种形式：一是“奏抄”，是较常用的公文形式，如有关部门关于祭祀，国用支出的报告，吏兵二部授六品以下官名单，司法部门处断流放以下罪的意见、以及官员犯法后免职等。二是“奏弹”，专指御史台弹劾百官不法之事使用的公文。三是“露布”，是军队破敌后申报尚书省兵部而奏闻天子的公文。四是“议”，是大臣讨论朝廷疑难事，将不同意见奏请皇帝裁决的公文。五是“表”，一般臣下给皇帝的上书都可称表。如贺表（贺祥瑞、生日等）、谢表（谢赐官爵、赐物等）、让表（让官爵）、请表（请上尊号，请坐朝等）。六是“状”，如举人自代状，论事状等。它和“表”不同在于，“表”只能上奏天子使用，而“状”也可以用在其它上下级关系。

这六种臣下给皇帝的上书，也都要经过门下省的审查。如果同意，复奏皇帝“画可”批准。然后，原件返回门下省留档，更抄一份，侍中注“制可”，并加盖骑缝御印（皇帝玺在门下省保存），送交尚书省颁下施行。门下省审查这些章奏时，如认为其中有违失的地方，也有权封驳退回。唐制规定，只有奏抄、露布由侍中亲审，其他的主要由给事中具体进行，这样，给事中职位十分重要。

中书、门下两省官员都有进谏的职责，并设专门以进谏为职务的谏官，即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

散骑常侍在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始作为专职谏官隶于门

下省，定额二员。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中书省也设置了二员。它的地位仅次于侍中、中书令，职务是进谏规劝皇帝，并做皇帝的顾问随时解答疑难问题。

唐前期谏议大夫定额四员，正五品。设于门下省。补阙、拾遗是武则天垂拱元年（685 年）创置的谏职，中书省、门下省各设二人。补阙官七品，拾遗官八品。这些谏官品位不高，顾虑少，是唐朝起主要作用的谏职。

谏官言事，一是廷争，即当面指出皇帝某些行为的不当，以及就时政向皇帝陈述宰相的得失。二是上封事，就是以书面形式议论上述的内容。唐代设置专职的谏官，并属于比较重要的清职。象补阙、拾遗虽然品位不高，也不由吏部任命而直接由君相授任。这样，可以对制约皇帝以及宰相的乱政起较大的作用。

此外，中书、门下两省还有记皇帝每日言行以及统领史官修史等职能。

唐代的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它掌管政令的颁行和节制。作为事务性机关的九寺五监以及地方州县都要遵守这些政令面各负其责。

尚书省根据制敕的内容，有时直接将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转发到中央各部及地方州县执行。有时需要按制敕所确定的大政方针制定出具体施行的政令，称“施行制敕”。施行制敕有三种形式。一是“起请条”，就是根据制敕精神拟出的具体执行方案。二是“商量状”，凡有军政大事中书、门下难以作出判断时，便下敕付尚书省有关部门研究，并将具体意见写成“商量状”附于原敕后进呈中书、门下决策时参阅。三是“详定制敕”，凡是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府县奏请并获敕批准的事情，还要送到尚书省“详定”，即根据已有的法令和实际情况，审查该事项实施的可能性。

中央各行政、事务部门和地方州县的一般行政事务，尚书省有权根据现有的法令处理。

唐的尚书省的首脑部门是都省。它是行政的总汇，中央的政令通过它向诸司、诸州府传达，诸州府的上奏文书通过它向上传达。京师各部与地方诸州府的联系，也必须通过都省。

尚书都省的长官为尚书令，额定一员，正二品，副长官是左、右仆射各一人，从二品，左、右丞各一员，正四品，左右司郎中各一员，从五品。尚书令一职，李世民在高祖朝曾居任，以后一般不再授人。左、右仆射成了实际长官，而且是宰相（唐玄宗开元以后，才被摒弃宰相之外）。这样，都省的具体政务一般由左、右丞负责。左、右丞领导省内诸司的工作，监督官员们履行职责，检查各部门间往来文书，严格按有关制度签发。

都省下设六部二十四司，吏部冠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一员，正三品，副长官为吏部侍郎，二员，正四品。下设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都设郎中、员外郎主其事。吏部的重要职责是铨送官员，其次是官员的考核，再次为封爵、勋赏。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科举考试也由吏部主管。吏部尚书、侍郎除统领本部职官、监督所属各司的工作外，还要亲自分掌铨选。因五品以上官由中书、门下选，所以吏部尚书掌六、七品，侍郎掌八、九品官员的选任。吏部四司的官员则担任吏部所属大量的具体政务。

户部是掌管天下户口、田赋、仓储等财政方面的政令。在六部中，本部政务最为繁多。长官为户部尚书，一员，正三品，副长官为户部侍郎，二员，正四品。户部下设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各以郎中、员外郎主管。

户部在尚书、侍郎的领导下，户部司官员主要政务有三：其一，全国各地土特产的进贡、清点；其二，全国州县户籍的管理，丁口的核准和户等划分；其三，均田的授收管理，赋税的征收和减免。度支司是最高财会主管机构，它最重要的职责是作出国家每年的预算开支，并对已花费的钱物进行核算。金部司掌管国家

库中钱物出纳的政令。具体出纳事务则由太府寺按政令执行。仓部司掌管国家仓储粮食出纳的政令，具体事务则由司农寺按政令执行。

礼部的长官是礼部尚书，一员，正三品，副长官礼部侍郎，一员，正四品。礼部下设礼部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各有郎中、员外郎主管。礼部主要掌管文教、祭祀、外交礼仪等政令。玄宗开元年间主持科举考试由吏部移属礼部后，则成为该部最重要的政务。

兵部是全国军政领导机关。长官为兵部尚书，一员，正三品，副长官为兵部侍郎，二员，正四品。掌管的军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军籍的管理，二是根据敕书调动兵马武器，三是军官的选拔。兵部下属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以郎中、员外郎为首，管理有关军政的具体政务。

刑部长官为刑部尚书，一员，正三品，副长官为刑部侍郎，一员、正四品，掌管司法行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刑法的颁布，二是刑事案件审视定罪，三是管理官奴婢的簿籍及放免。四是国家各种经费开支的审计。五是全国门禁出人与关津越渡。以上各方面的政务分属刑部下设的司刑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具体办理。而四司的主管官员为郎中及员外郎。

工部长官为工部尚书，一员，正三品，副长官为工部侍郎，一员，正四品。主要掌管有关全国的百工、屯田、山泽的政令，指导将作监、少府监等部门和地方州县营建宫殿、修造桥梁、筑城、挖河等工程建造方面的工作，指导司农寺、都水监和天下军州的屯田、水利方面的工作。具体政务由本部下设的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部司分工负责。

唐三省分掌拟旨、审查、执行之权，互相制约，便于皇帝的控制，也有利于防止制敕中的谬误。但中书省出诏令，门下省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又直接影响了皇帝诏敕的迅速制定

和贯彻执行。开始，为协调中书、门下两省意见，在门下省设置政事堂，草拟诏令前两省长官先在政事堂商定。唐太宗时，形成了政事堂制度。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选由宰相组成：包括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还包括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而成为宰相的，这些人都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予朝政”等名。后来，逐渐固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头衔。政事堂会议成了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关。

政事堂先设于门下省，弘道元年（683年）迁到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年）改名为“中书门下”。印名也改为“中书门下之印”。这时机构也相应扩充，分为正堂和后院两部分。正堂是宰相的办公和会议厅，后院是秘书处，分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而且，以前宰相除在政事堂议政外，还要回本官衙主持处理政务，这时，宰相成了专职，只在“中书门下”主政了。在诸位宰相中有一位秉笔宰相，具有首席宰相的身份。

政事堂职能的产生和完善化，建立起“皇权专制——三省分权——政事堂集议”三者结合的行政体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同时也相对削弱了中书省、门下省的原有权力。

唐代宰相的职权是十分广泛的，但就其最重要的而言，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即决策权与人事权。决策权是指宰相可以议决天下大政方针，政事堂会议就是重要的决策形式。人事权是宰相可任免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高中级官员与六部郎官、御史台六品以下的重要官员。当然宰相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宰相的决策只有经过皇帝的批准，以皇帝制敕的名义颁行才有效力。

沟通皇帝和宰相的联系除章奏外，还有面议政事制度。唐前期主要是常朝议政。即皇帝每日上朝（后改单日御朝，双日休息），文武百官奏事完毕，皇帝要留下宰相议政。唐代宗以后，皇帝召宰相到延英殿议政和宰相奏请皇帝开延英殿议政，成了皇帝

和宰相共议政事的重要形式。

中央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一员，正三品，副长官为御史中丞，二员，正四品。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持，各有分工，承担具体的监察职务。御史台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法律制度监察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如果有，不管是自己采访得知，还是接受别人告状而来，都可进行弹劾。在弹劾时，大事由御史大夫或中丞亲自写表章进行，小事由侍御史等弹劾，但事先要报告御史大夫，经过署名同意。若在朝堂弹劾，被劾的官员要到殿下首待罪恭听。

御史台还有审理狱讼的职责。为方便审讯，太宗时又单独设置了监狱，称为"台狱"。御史台一般只审皇帝交办的案件，即所谓的"制狱"。重大案件，它与刑部、大理寺联合组成"三司"进行会审。

御史台由于有监察刑狱的权力，大理寺、刑部所判的案件，要报御史台复查；而御史台审讯落实后的案子，一般要移交大理寺法官量刑判罪。

唐代还设有庞大的事务性机关。这就是九寺、五监；秘书、殿中、内侍三省；十六卫以及东宫官属。它们和政务机关尚书省六部虽非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政务机关发号施令，节制督责，而这些事务机关要仰承政令，分工负责某项具体事务。

上述官署按其所掌管的事务性质划分，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管皇家事务，有殿中省、内侍省、宗正寺。二是管礼乐祭祀、民族与外交事务，有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三是管文化教育事务，有秘书省、国子监。四是管司法事务，有大理寺。五是管财物出纳、贸易以及屯田、水利事务，有司农寺、太府寺，少府监、将作监、都水监。六是管武器与军工事务，有太仆寺，卫尉寺、军器监。七是管京城宿卫事务，有十六卫。东宫官属是为太子服务

的。职官很多，大多闲简无事。

唐为了管辖幅员辽阔的国土，在地方上也设置了一整套的政权机构。在内地是州、县两级。在边疆或军事要地设都督府、都护府。

州的长官为刺史，统管一州的民政、司法、教化、生产、赋税的征收以及地方贡举等。刺史下设众多的官员。主要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上佐”即别驾、长史、司马，他们作为副手协助刺史。“判司”指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参军事。他们相对中央尚书省六部而设，分管州内的政、刑、财、工等具体事务。录事参军的职责是监察“判司六曹”官员是否依法办事。

都督府在行政区划上和州同级，长官名都督，一般兼任所治州刺史，出于军事需要而兼管军政。设都护府是为了管理归附唐的边疆少数民族，长官名都护。都护府下设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这些府州可以不向中央政府交纳贡赋，一般内部事务也可自治，但必须接受都护政治领导。

县的长官为令。县令的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征督赋税、编造户籍，此外还要审理狱讼、分派差役。下属有丞、主簿等一些官吏协助办理具体事务。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乡、里。里管百户，五里为乡，把农民编入乡、里之中。地方的各项政务要遵照尚书省发下的政令办理，并按时汇报，重大的直至皇帝批准才能执行。这一套行政体制好象一座金字塔，皇帝坐在塔尖上，把统治权力一直贯彻到基层。

唐高祖李渊恢复的府兵制，与隋统一以前的制度有些类似。唐太宗贞观十年以后，府兵经过重新整理，进入了全盛时期。在武则天当政以前，府兵在宿卫与征战中都居于重要的地位。

府兵的组织系统是中央设十六卫，直接隶属于皇帝。十六卫中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

金吾卫都掌管府兵。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不领府兵，前者负责京城诸门警卫，后者负责皇帝的左右护卫。各卫的长官都称大将军。

掌管府兵的十二卫分辖设在各州县的折冲府。每个卫辖四十至六十个不等。折冲府长官名折冲都尉。每府统领府兵千人左右。折冲府虽设在州县，但分布极不平衡。全国设府约六百三十四，但在关中就有二百六十一个。接近关中的河东和河南，也有很多折冲府。折冲府下设团、旅、队、伙四级组织。

府兵（时称“卫士”）的来源，一般从下级官员子弟、普通地主和有一定资产的农民中挑选。挑选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府兵从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才免役。他们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冬季农闲时由折冲都尉进行军事训练。军事任务主要是轮流到京师宿卫，其次是戍边，第三是征战。担任府兵的本人不服徭役，不纳租调，但执行军事任务时要自备弓、箭等一般武器和粮食、衣装等。若作战立功，可提拔为武官，或授以勋级。勋级十二等，根据不同的勋级可得到相当数量的勋田。

府兵的调遣、征发权全在皇帝。一般由君相议定，降制敕于兵部，兵部据敕发符契到有关折冲府。州刺史和折冲都尉共同审查符契真伪后，才发兵。若出征作战，率兵大将由皇帝临时委派。军事任务结束后，兵散回府，将归于朝。

府兵制度，从组织系统和征调制度上保证军权直接控制在皇帝手里。折冲府设置的不平衡，形成内重外轻的局面，使中央能迅速调集重兵，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府兵日常管理由十二卫承担，征调的军令发自兵部，而将帅却又不能长期握兵在手，从而防止了大将专兵跋扈。府兵制“兵农合一”，能减少国家养兵费用。但这种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它也必然遭到破坏。

唐保卫京师的中央禁军除了南衙十二卫轮流宿卫的府兵外，还有一部分是北衙禁军（又称“北军”）。南衙禁军屯在宫城南，宰相可以奉敕调遣武将和军队；北衙禁军，屯在宫城北面的苑内，归皇帝直辖，宰相不得过问。

北衙禁军源于随李渊起兵入关的河东“义兵”，其中愿留宿卫的有三万人，李渊加以“元从禁军”荣号，为左右屯营驻守于宫城北门。父老子代，“称父子军”，归左右屯卫所辖。贞观十二年，太宗始置左右屯营“飞骑”，以充实加强北军。这些“飞骑”都是才力骁健、善骑射的战士。高宗龙朔二年，守卫宫北门的左右屯营脱离左右屯卫而独立，不久改称左右羽林军，而左右屯营“飞骑”也改称左右羽林军“飞骑”。此后为进一步充实左右羽林军，一方面从府兵中选拔，另一方面实行召募，都要身强力壮，精于骑射的。

在左右羽林军组建的过程中，左右龙武军也发展起来。它的前身是太宗从左右屯营“飞骑”中挑选护卫自己游猎的将士，号“百骑”。此后，这支北军不断扩充，武则天朝为“千骑”，中宗朝为“万骑”，直到玄宗时“左右万骑营”从左右羽林军独立出来，正式建立左右龙武军号，与左右羽林军平行并举，合称天子“北门四军”。唐中央禁卫军所以分成南、北衙军两部分，目的是互相制约，而北衙军因其地理位置和战斗力强，对保护皇帝的安全更为重要。此外，遇有大规模战争，唐政府不仅征调府兵，而且临时召募征人，令其出征，以补充府兵兵力不足。这种召募是强制性的。召募的标准与府兵相同。

为了培养和选拔封建官吏，唐继承了隋朝所创立的科举制，并使之完善化。学校和科举有密切联系，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中央设有六种学校：国子学，收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子孙；太学，收五品以上中级官员子孙；四门学，收七品以上低级官员和一般弟子；律学、书学、算学，收八品以下和一般地主的子弟。这六种

学校都隶属国子监。州县还设有州学和县学。各级学校主要学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则另外学律令或一些专门技能。上述国家学校的学生称"生徒"。

唐代选拔士人的方法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一般每年一次，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固定科目。有资格应考的一是由学校保送的"生徒"；二是由州县考试合格后保送的"乡贡"。常举考试科目虽多，其中进士、明经两科尤为重要。两科考试内容，开始主要是时务策。高宗时，进士科加考诗赋，明经科加帖经。由于明经着重考帖经，即考儒家经典的记诵，比较简易；进士科着重考作诗写赋，较难，而且进士科仕途优于明经。因此高宗以后进士科最为时人所重。当时士人竞趋进士科，大抵能考中的占百分之一、二，而明经占十分之一、二。因此考中进士的称"登龙门"。也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举考试合格称"及第"，这只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考身、言、书、判。所谓身、言，只是通过察看，取"体貌丰伟"、"言辞辨证"的。考书、判则是关键。考"书"要看书法是否遒劲、秀美；考"判"要看判词是否文理优长。这些考试全部合格，才能成为朝廷命官。

主持科举考试的最初是吏部员外郎，唐玄宗时改为礼部侍郎。考试日期唐初也有变动，后确定在起于十一月，结束于次年三月。

制举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并亲自主考。时间不定，名目很多，达数十种。如"文词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普通人和现任官都可应考。考中后原有官职的升官，没有官职的由吏部直接授官。

科举制作为一种制度，从隋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它比较广泛地给地主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以政治出路，从而扩大了唐政权的基础。相传唐太宗看着考进士的举子们鱼贯入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射中了。"唐人也有诗说："太宗皇帝真长

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此后历代王朝无不把它作为巩固统治的有效办法之一。

唐朝的法，有律、令、格、式四类。律是刑法典。李渊起兵太原，为了争取人心，就颁布了宽大法令。进入长安后，废除隋炀帝的繁法酷刑，约法十二条，其中只有杀人、劫盗、背军、叛逆的处死。称帝后，又几次修定法律，主要由刘文静、裴寂主持，以隋《开皇律》为基础，以宽简易知作为删改律令的指导思想，至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致治与立法原则，在宽严两种不同的主张中采纳了慎刑宽法作为立法精神。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主持，和一些学士法官进一步修定刑律。经过十年努力，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简称“唐律”，它是《武德律》的进一步完善。唐高宗永徽初年，由长孙无忌领衔，对《贞观律》加以疏释，编成《唐律疏义》，它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刑法的规范。

《唐律》分为十二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律条五百零二。刑名有五级：笞、杖、徒、流、死。在量刑定罪上，唐律比隋律又有减轻，如取消隋律中大辟罪九十二条，将流罪律文降为徒罪的七十一条，其余变重为轻的还很多。

唐律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专制主义封建统治，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因此，把“十恶”罪列在篇首。所谓“十恶罪”，即：谋反（谋害皇帝）；谋大逆（谋毁宗庙、陵寝、宫阙）；谋叛（叛国投敌）；恶逆（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等至近亲属）；不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厌魅诅咒等）；大不敬（盗劫国家大祭祀用的器物和皇帝的乘舆御物，伪造皇帝印玺，诽谤皇帝等）；不孝（诅咒、辱骂祖父母、父母、不赡养祖父母、父母；以及在父母丧期间自身嫁娶作乐等）；不睦（谋杀及卖五服之内的亲属、殴打丈夫及三服以内的尊长等）；不义（兵杀害本部长官，学

生杀授业师，以及妻知夫死匿不举哀，居丧作乐、改嫁等），内乱（强奸四服之内亲属及父祖妾）犯十恶罪的视为罪大恶极，不能宽赦，以保证封建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

唐律中专有“户婚律”，对户口、田宅、纳税、婚姻作了详细规定。对劳动人民触犯户籍法私自外流、抗拒交纳租税、不服兵役的人，定出轻重不同的刑罚，这就把广大农民死死束缚在土地上，承受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唐律还规定了各阶级和各等级的不平等的地位。贵族、官僚犯罪有所谓“八议”：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大德行的人），议能（有大才学的人），议功（有大功勋的人），议贵（高级官员），议勤（官员中受过大劳苦的人），议宾（先朝皇帝后代为国宾的人）。“八议”内人物犯罪除“十恶”外都可以从轻论处。官员犯罪还可减、赎、官当（用官职抵罪）。此外，地主、平民、部曲（地位低于平民高于奴婢的人）、奴婢在法律上也不平等：平民侵犯贵族官僚要加等处罪，主人有随意殴打部曲的权力。法律规定奴婢是主人的“畜产”，主人只要报请官府，就可以杀死他们；但部曲、奴婢谋杀主人，即使谋而未行，也要斩首。

唐律中也有些防止官吏过分压迫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的条文。如官员占田超过法令限额，或以权侵占他人私田要受处罚。州县等地方官吏必须按均田令进行土地还授，若应授田而不授，应还田而不收要治罪。征收赋税、摊派徭役要依法进行，违法而不均平受杖刑，擅自加重赋敛以贪赃或枉法论罪。

律以外的“令”，如《户令》、《田令》，这是对各项制度所作出的具体规定。“式”如《水部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唐朝不断以制敕的形式，对律、令、式加以某些补充和修改。这些制敕经过整理、删定、编制成书，就叫“格”。以律为主，律令格式互为补充，结成严密的法网。

经过隋末战乱，唐初经济凋弊。全国在籍的户口不满三百万，

约当隋盛时的三分之一。黄河下游地区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为了使流亡的农民再回到荒芜的土地上进行生产，为了能从占有土地的人征收赋税以解决财政来源，使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唐采用并改进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和租调制。

武德七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 授田根据户籍。规定三岁以下的小孩为黄、四岁至十五岁为小、十六岁至二十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每三年县里主持造一次户籍。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残废人、守寡的妻妾受田三十亩，如当户主的均增加二十亩；这些人的田均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田。(2) 贵族官僚授田另有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第九级的男爵到最高的亲王可分永业田五顷到一百顷。武官获勋从最低十二级武骑尉到最高上柱国可分永业田六十亩到三十顷。有职有权的职事官从九品到一品可分永业田二顷到六十顷。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最低九品小官二顷、最高一品官十二顷，地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地租作办公费用。中央的官署最高占二十六顷。(3) 地多人少受田足的叫宽乡，地少人稠受田不足的叫狭乡。狭乡口分田只受半数，但可以在宽乡遥授土地。狭乡占田禁止过限，宽乡有剩田处，只要申报立案，经当地官府批准可以超额占田。官人永业田和勋田要在宽乡授给。(4) 永业田都可传子孙，不再收还；口分田死后还官；职分田离任时移交下任官员。(5) 土地买卖受严格控制。一般卖口分田要受到刑罚，地还本主，财产没收。但平民有身死家贫无法埋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的，并准许出卖口分田。官人永业田和赐田可以出卖。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唐的均田制是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隋朝时期土地占有关系情况下实行的。土地名义上尽管都属于国家，但实际上土地占有状

况、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的来源呈现了复杂的情况。对于没有受触动的地主土地，不管超过法定数额与否，通常是不加触动的，实际上只不过有个均田名义。对唐的贵族官僚，则用这个名义允许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一部分农民在隋末战争中从地主手中夺得的土地，唐通过均田令使之“国有化”；也有一部分无地或少地农民因实行均田令而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均田”决不是平均分配土地，也不保证每个农民都占有法令上规定的土地数目。

与均田制相适应的租庸调制规定：丁男每年向政府交纳粟二石或稻三石，叫“租”。交纳绢或其它丝织品二丈，绵三两，或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调”。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天，若不去服役，每天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庸”，也称“输庸代役”。中男受田的要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

唐还规定，政府如需要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三十天。租庸调法还规定了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的具体办法：水旱虫霜灾，十分损四成，免租；损六成，免租调；损七成，课役全免。唐官僚贵族享有免除租庸调的特权。

除租庸调外，还有两种附加税：一种是地税，王公以下按田数亩税二升。贞观二年（628年）初设时名义是作义仓储粮以备灾荒之用，但久之变成了正式税收。另一种是户税，按户等征收。初分三等，唐太宗时改为九等，主要是收钱。

唐代的赋役令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庸代役的办法也逐渐成为通常的制度，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生产。但租庸调的固定额是以均田令授田足数为标准计算的，很多农民特别是狭乡得不到足数土地，仍要交纳满额的租庸调，实际上农民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

唐的统治者李渊、李世民以及唐初的许多大臣都亲眼见到隋

朝的覆灭，并经历了激烈的阶级大搏斗。这些人不平常的阅历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唐太宗时君臣经常以隋亡为鉴戒，探求如何巩固封建政权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前提下，制定了上述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使重新统一的中国得到巩固，形成了比隋朝更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参考资料：

《大唐六典》
《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职》
《文献通考·门下省》
《唐会要·御史台》
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唐代尚书省职权与地位》
唐长孺《新唐书兵志笺证》

贞观君臣论治道

一个既富且强的隋朝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这给亲身经历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李世民等人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李世民即位后，又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玄武门之变后政局不稳；战乱之后，户口凋零，田园荒芜；霜旱为灾，米价昂贵，百姓饥馑；加上东突厥频频侵扰，边境州县骚动不安。因此，在这种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如何治理国家，进而使李唐王朝长治久安？这使太宗君臣结合施政实践从各方面孜孜不倦地探求治国之道。

武德九年（626 年）八月太宗即帝位后，就遇到帝王如何行使赏罚大权的问题。九月，太宗确定了功臣的爵位，命陈叔达当面宣读，征求功臣的意见。这时，众将纷纷争功。淮南王李神通首当其冲说："高祖举义旗于太原，臣在关中聚众首先响应；而房玄龄、杜如晦等只会舞文弄墨，今日爵位却居我之上，臣心中实在不平。"太宗道："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先响应，但也为自己避祸。后来与窦建德战于山东，全军覆没。刘黑闼再起，您又望风而逃。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应在您先。叔父是皇家至亲，朕怎能不尊，但不能因私情而滥赏啊！"一席话说得神通等人心悦诚服。房玄龄又反映太宗原秦王府旧人中没升官的也有怨言，说我们侍奉陛下多年，今日封官反不如原李承乾、李元吉的手下人。太宗解释道："帝王只有大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心。朕与诸公的衣食，都取之于百姓。因此命官设职，应为百姓着想，择贤才而任用，怎能以新旧为先后呢？"

不久，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消除盗窃现象。有的主张用严刑重法禁止，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民所以为盗，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苛刻，饥寒交迫，才不顾廉耻呀！朕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自然不去为盗，哪里需要什么严刑重法！"他还对群臣说："君靠国家，国家靠百姓。刻剥百姓供奉君主就象自己割自己的肉吃，结果腹饱而身亡，君富而国亡。因此人君的祸患不是外来的，而都由自身引起：贪图享乐则靡费财物；靡费财物则加重赋税；赋税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机；国家危机则君主灭亡。朕常思考这一道理，因此不敢纵欲。"十二月，益州大都督奏獠人反叛，请发兵镇压，太宗道："獠人依据山林，有时抢掠，是其习俗。地方官如能以恩信抚慰，獠人自然降服，怎可轻动干戈妄加杀戮。"

太宗励精求治，他闻听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贤德之名，便召见访问为政之道。玄素认为："隋朝皇帝包揽政务，不信任群臣；群臣恐惧，只知遵命照办而已。以一人的智慧来处理天下如此繁杂的政务，即使得失各半，也已经谬误百出了。况且这导致下面奉迎讨好，上面闭目塞听，岂有不亡之理！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大胆使用，考其成败予以刑赏，何愁不治！此外，臣观隋末大乱，其实想争天下的不过十余人而已，大多数都为了保宗族、全妻子，等待有道明君的出现。可知百姓中好乱的占极少数，问题是人主不能使之安居乐业。"太宗听罢很是赞赏，立即提升为侍御史。

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太宗宴请群臣，奏《秦王破阵乐》。席间太宗道："朕从前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雅乐，但功业也确是由此而成。因此奏此乐以示不敢忘本。"封德彝附合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岂能相比。"太宗却又说："勘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你说文不及武，此言差矣！"

不久，御史大夫杜淹面奏："诸司衙门的文案，恐有差失，请让御史们检查。"太宗询问封德彝的看法。答道："设官分职，各

有权限。如果有违法乱纪的现象，御史自应弹劾。若遍历诸司，查找疵漏，恐太繁琐。”杜淹听后沉默不语。太宗问杜淹为何不再论奏？答道：“天下之事，都有其理，善则从之。德彝所言，合乎为政之理，令臣心服，不敢强辩饰非。”太宗听罢大悦，说：“公等都能如此，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闰三月，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道：“朕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十余张良弓，自认为天下没有比这再好的了。最近拿给弓匠看，他却说全不是好弓。朕问为何？回答道：‘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但发出的箭不直。’朕这时才明白从前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好弓箭。朕以弓箭定四方，对其好坏还不能正确地把握，何况天下事怎能无一不晓呢？”遂命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班，并多次召见访问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五月，有人上书请清除佞臣。太宗问谁是佞臣？这人答道：“臣身居草野，不得确切知道是谁，但望陛下与群臣商议政事时佯装大怒，凡是执理不屈的，就是直臣；而畏威顺旨的，就是佞臣。”太宗道：“君是源，臣是流，浊源而求流清，是不可能的。君若自身施行欺诈，怎能要求臣下正直呢！朕正以诚治天下，不能采纳你的权术。”

十二月，有人告尚书右丞魏征违法庇护亲属，太宗让御史大夫温彦博审查，没有事实。但彦博奏道：“魏征平日不谨小慎微，才引起这样的嫌疑；心虽无私，这点也应责备。”太宗遂叫温彦博告诫魏征今后要谨小慎微。不久，魏征进见，严肃地对太宗说：“臣听说君臣同体，应以诚相待。若上下都不思虑国家大事，只谨小慎微地躲避嫌疑，则国家兴亡就难以预料了。陛下的告诫臣实不敢苟同。”太宗恍然大悟，说：“我已知错了。”魏征又道：“臣有幸侍奉陛下，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困惑不解地问：“忠臣、良臣间还有区别吗？”答道：“稷、契、皋陶（传说中辅佐尧、舜、禹的大臣）是良臣，龙逄（夏桀的大臣）、比干（商纣的

大臣）是忠臣。良臣与君同心协力，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面折廷诤，身受诛戮，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差甚远。”太宗连连点头，并赐绢五百匹。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道：“国家置中书、门下两省，意在相互制约。中书省草拟的诏敕如有差失，门下省本应加以驳正。人的见解，互有不同，彼此辩论，求取正确；己错从人，有何关系。近来有的因护短饰非，相互怨恨；有的为避免私怨，知错而不纠正。只顾一个人的情面，不惜给万民造成大祸患，这是亡国之政。隋炀帝时，内外官员一味阿谀奉迎，当时都自以为聪明，祸不及身，待至天下大乱，家国两亡。即使有少数侥幸得免，也被时论谴责，遗臭万年。望你们徇公忘私，不要学炀帝朝的官员。”

太宗还对侍臣说：“朕听说西域胡商得到上等珍珠，就不惜剖身掩藏。真有这样的事吗？”侍臣回答有。太宗又说：“人们都知道嘲笑胡商爱珍珠而不爱惜自身。但官吏贪赃获罪，与帝王纵欲亡国，岂不是与这些胡商一样可笑吗？”魏征道：“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人有好忘事的，迁居后就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了。’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桀、纣连自身都忘记了。’也说明这一道理。”太宗紧接着说：“正是这样，朕与诸公要戮力同心，以免也被别人耻笑。”

一次，太宗谈话时论及关中人、山东人，意中流露出褒前者而贬后者（因太宗是关中人）。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要以四海为家，不应有狭隘的地域观念。”太宗连连称对，并厚加赏赐。自此每有大政，常让他参预商讨。

这年，太宗还对侍臣们讲道：“朕见古来帝以仁义治天下的，国祚久长，以法治天下的，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也快。前代成败，足可借鉴。朕今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国之道，以改变近代浇薄之风。”黄门侍郎王珪说：“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俗，这

是万代宏福。但治理国家，必得贤才。”太宗道：“朕思贤之情，真是梦寐以求！”给事中杜正伦紧接着说：“世必有才，只看陛下能否选用，哪里需要梦中去寻求呢！”太宗深表赞同。次年，太宗以“仁义”治国出现成效，他对侍臣们说：“朕原以为乱离之后，风俗难移，近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才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因此，治国之道，必须抚以仁义，示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这样，百姓自然安宁。望诸公与朕共行此事。”

贞观二年正月，太宗问魏征：“人主怎样做就能英明，怎样做就会昏暗？”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古代尧询问身份低贱的人，因此得知有苗的罪恶；舜广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也不能蒙蔽。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已土崩瓦解，还不知晓。梁武帝偏信朱异导致侯景兵围都城，活活饿死。炀帝偏信虞世基，最后落个江都政变而被勒死。由此可知，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能壅蔽，而下情得以上达。”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回答。

二月，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至尊，无所畏惧。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不副众望。”魏征道：“这正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关键，但愿陛下慎终如始！”太宗又对房玄龄说：“为政没有比公正更重要的了。过去诸葛亮贬廖立、李严于荒远的南夷地区，但亮死后两人都垂泣，李严甚至悲痛而死，除非至公怎能如此！还有，高颎任隋相，为人公平而又识治国之道；他的存没，关乎隋的兴亡。朕羡慕前代的明君，卿等不可不效法前世的贤相。”

六月，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演奏新作成的《唐雅乐》。太宗听罢道：“礼乐，是圣人因物设教的一种方法，对国家兴亡没多大作用。”御史大夫杜淹不同意，说：“齐将亡，作《伴侣曲》，陈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凄凉，行路人听后都悲泣，怎能说治乱和乐没有关系？”太宗说：“不然。乐能感人，因此，心中高兴的闻听则喜，心中忧愁的闻听则悲。悲喜本在人心，非由乐呀。亡国之

政，民必愁苦 因此闻乐而悲。今两曲俱在，朕为你演奏，你会悲伤吗？”魏征同意太宗的看法，并补充道：“乐的根本在人和，不在声音。”

太宗看《隋炀帝集》后对侍臣道：“炀帝的文章内容渊博，而且也知道赞颂尧、舜，贬斥桀、纣，但为何行事恰恰相反？”魏征答道：“人君虽圣明，也应虚怀若谷。这样智者才会献其谋，勇者才能竭其力。炀帝自恃有才，狂妄自大，因此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以至国灭身亡。”太宗点头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呀！”不久，太宗又说：“朕每次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说错了有害于百姓，因此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管起居注的杜正伦接着说：“臣职是记言，陛下有过失，臣必记录。这样，陛下若有过失不仅对今日有害，也要被千古讥笑。”太宗闻听大悦，赐帛二百段。太宗还说：“梁武帝君臣只知讲佛教苦空，等侯景之乱，百官想逃连马都不会骑。梁元帝崇尚玄谈，被北周军围困后还大讲《老子》，百官戎服而听，结果兵败身亡。这些实在应引以为戒。朕喜爱的只是尧、舜、周、孔治天下之仁道，就象鸟有翼、鱼有水，失之则死，片刻不能离开。”

九月，太宗见群臣屡次上表贺祥瑞（即吉祥征兆，以少见的自然现象、动植物表示，分大瑞、上瑞、中端、下瑞四等），便不以为然地说：“家给人足而无瑞，不会影响皇帝成为尧、舜类明君；百姓愁怨而多瑞，皇帝也不免是桀、纣类昏君。”并下诏：“自今以后，大瑞可以奏闻，其他的申报礼部即可。”后来，有白鹊在寝殿的槐树上筑巢，形状象腰鼓，左右大臣都赞颂这是天下太平的征兆。太宗却说：“我常嘲笑隋炀帝喜好祥瑞，其实瑞在得到贤才辅政，象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庆贺！”命人将巢毁坏，使鹊群飞散野外。后来，太宗还谈道“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不应妄求”，并以秦始皇求仙被方士所骗；汉武帝为求神将女儿嫁给道士，也毫不灵验的事例加以证明。

太宗曾询问王珪："近世帝王治国越来越不如古代，其因何在？"答道："汉代崇尚儒学，多用儒学之士为宰相，因此风俗淳厚；近代重文辞轻儒术，参以法律治国，这是治国化俗所以益衰的缘故。"太宗同意这一见解。此后百官中有精通儒学、兼识治道的，就连加提拔。太宗还对房玄龄谈君主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他说："为人必须有学问。朕从前因天下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无暇读书。其实，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全在书中。读后深思，才知少小时做了不少错事。"

十二月，太宗对侍臣道："替朕抚养百姓的，主要是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因此朕总是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常看；得知他们任职中的善恶政迹，便都注在本人名下，以备升降赏罚。而县令，因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也不可不谨慎选择。"随后，命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举适合担任县令的，列名奏闻。

太宗和大臣们还研究杜绝谗佞在治国施政中的重要性。他说："朕观前代谗佞之徒，都是害国的蟊贼。他们巧言令色，朋比为奸；暗主庸君，无不被其所迷惑，从而使忠臣孝子泣血衔冤。"魏征补充道："臣也看到自古有国有家的，若听谗谮之言，妄害忠良，必然国破家亡。愿陛下千万谨慎。"

贞观三年三月，太宗批评尚书省长官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杜如晦道："公等身为仆射，应当助朕广求贤人，随才授任，这才是宰相的主要职责。近来闻听公等整日忙于听受辞讼，处理一般政务，如此怎能助朕求贤呢！"随后令尚书省一般政务由左右丞处理，唯有大事应上奏皇帝的才向仆射汇报。四月，太宗对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也提出批评说："中书、门下，本是参预决策的机要部门，诏敕内容中有不妥的地方，应该驳正。但近来只见顺从，不闻异议。若仅是办理文书，那谁不能做，何必选拔贤才任此职！"房玄龄等皆连称有罪。唐制原规定：凡草拟军国大事的诏敕，中书省的六名中书舍人要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并签署自己的姓名，

称“五花判事”。然后上交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通过后，再转送门下省，由该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复审驳正。由于太宗强调必须遵照执行这一行政制度，因此政事上很少出现大错。

十二月，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包含什么意思？”颖达具体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后，并议论道：“不仅一般百姓要这样做，帝王更应如此。帝王应内蕴圣明，处要谦逊。若位居极尊，炫耀聪明，盛气凌人，饰非拒谏，那么下情难以上达，这是亡国之道。”太宗非常赞赏这一见解。

年底，宰相房玄龄、王珪主持考核内外官员政绩优劣。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两宰相考核不公平，太宗想让侯君集审查。魏征谏道：“玄龄、王珪都是朝中老臣，历来都因忠直被陛下委以重任。现考核官员人数众多，其中难免有一两人评判不准，但决非徇私枉法。今若将个别不准的审查出来，其他的也好象都不可信，两宰相此后就无法再担当重任。况且权万纪也参加考核，从前没有驳正过；等自己考绩不佳，才进行论奏，这是出于私心激怒陛下，非竭诚为国。因此，即使审查出有这样的事，对朝廷大局无补；若是子虚无有，就严重损害了陛下用人不疑的原则。臣考虑的是治国之道，并非要包庇两人。”太宗觉得有理，遂不再追问。

这一年，太宗还对侍臣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君纳忠谏，臣进直言，君臣间这种配合默契的关系，是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若君自以为贤能，臣也不加谏诤。君臣如此而行，想不危亡，实不可能。而君失其国，臣也不能独全自身。譬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遂至灭亡，谗佞之臣虞世基不久也被杀死。前车之鉴，朕与卿等怎能不以此为师！”

贞观四年七月，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属于哪一类帝王？答道：“文帝勤于政事，每次归朝，常至午后，五品以上，引

坐论事；性情虽非仁厚，也是励精图治之主。”太宗摇头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政务独裁，而不信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然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深知其性情，只是奉命执行，虽有错失，也无人敢谏。这就是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充任百官，使思考天下之事；而由宰相集思广益，推敲妥当，然后奏闻。朕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尽职。这样，何愁天下不治！”说罢，诏令百司，“自今日起，诏令颁行后，发现有不妥处，都要论奏，不得阿谀顺从。”

太宗初即位和群臣讨论如何施政时说：“今承大乱之后，恐百姓难以教化。”魏征说：“不然，久安之民骄逸，骄逸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就象饥者易供食，渴者易给饮一样。”封德彝却说：“夏、商、周以后，人渐奸诈，因此秦专崇法律，汉也仁政、霸道兼用，都是想教化而不能，哪里是能而不想教化！魏征是个书生，不懂时务，若信他的空论，必败国家。”魏征反驳道：“古代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伐纣，都在大乱之后施行教化而出现太平盛世。如果说古人淳朴而后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了今日，都应变成鬼魅，帝王岂不是无法治理了？”经过激烈辩论，太宗终于采纳了魏征的主张。而随后的贞观元年，关中遭饥荒，斗米值绢一匹；二年，全国闹蝗灾；三年，又闹大水。太宗就在这战乱后又连年天灾的情况下实施了仁政教化的方针，勤加抚慰，百姓虽东西奔波就食，但没有怨言。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百姓都返回了家园，斗米不过三、四钱，岁终判死刑只有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达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之人不用带粮，可在途中就食。看到这种景象，太宗感慨地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上书的人都说：‘帝王要独掌威权，不可重用臣下。’又说：‘应震耀武威，征讨四夷。’只有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此言，今颉利可汗被擒，酋长

们都成了我的宿卫将领，这全是魏征的功劳啊！遗憾的是封德彝已去世，不能亲眼目睹。”魏征在旁闻听，连忙拜谢道：“突厥灭亡，海内康宁，全是陛下威德所致，臣有何功劳。”太宗说：“朕能重用公，公也称所任，朕怎能独占此功劳。”这时，房玄龄奏道：“臣阅库中铠甲兵器，已远胜隋朝。”太宗却说：“武备确实不可短缺，但炀帝兵器并非不足，可终丧天下。依我之见，若诸公尽力，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朕最好的武备。”

这年，太宗还说：“隋炀帝性好猜疑，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以至改胡林名交林，改胡瓜名黄瓜，结果还是被宇文化及派令狐行达杀死。他又听信道士说：‘李氏当为天子’，遂杀尽大将李金才一族，但也毫无用处。人君只须正身修德，其他虚事，大可不必在意。”

贞观五年十二月，太宗对侍臣们讲：“治国如治病，病初愈，还应小心调理；如若自我放纵，病复发，就无法医治了。今国内安居乐业，外部四夷降附，也是古来少有的幸事，但朕日慎一日，惟恐不能善始善终，因此希望经常听到诸公的谏诤。”魏征道：“内外安定，臣不以为喜，惟喜陛下能居安思危呀！”太宗又和群臣讨论治狱方面的事。这时，魏征提到隋朝炀帝时的一件事：“有一次出现了盗窃事件，炀帝令於士澄搜捕，稍涉嫌疑就严刑拷打，牵连二千余人，炀帝全令斩首。主管复审的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犯人如此之多，在复核供状时发现其中只有五人是盗贼，其余都是无辜百姓，但竟然不敢上奏，最后还是全部杀掉了。”太宗道：“此事不仅是炀帝无道，大臣也不能尽忠。君臣之间关系如此，国家怎会不亡。公等也应警惕。”

贞观六年七月，太宗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大臣。席间太宗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中外安然，都是诸公的功劳啊。但隋炀帝威加华、夷；东突厥颉利可汗跨有北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雄踞西域，至今全覆灭了。这是朕和诸公亲眼所见，千万不要自恃强盛

而狂妄自大，胡作非为呀！”闰八月，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太宗阅后赐亲笔诏书道：“卿对朕的评价太高了，朕怎敢比古代明君，何况卿只看到朕的善始，还不知能否善终。若朕能慎终如始，此篇大作还可流传；如若不然，恐后人要讥笑卿作的是谀辞了。”

这年，有一次太宗对侍臣语重心长地说：“看古代帝王，有兴有衰，就象有朝有暮。追其缘由，都因忠正者不言，谗佞者日进，君主耳目闭塞，不知政事得失，以至灭亡。朕深居九重，不能全知天下事，因此靠诸卿作朕耳目。千万不要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留心政务。可爱的不一定是君主，可畏的不一定是百姓。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民弃而不用。这一道理实在令人畏惧。”魏征说：“自古丧国之君，都是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太平，能留心治道，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自然国运长久。臣又闻古语：‘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陛下知道畏惧，是懂治道真谛。”

贞观九年三月，太宗问魏征：“齐后主、周宣帝都苛敛百姓，奢靡享乐，自取灭亡。就象馋人自吃己肉，肉尽而毙，何其愚哉！但两人相比，谁更劣些？”魏征答道：“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宣帝骄暴，独断专行；虽同是亡国，齐后主更劣些。”

贞观十一年正月，太宗在洛阳造飞山宫，魏征上书认为：“炀帝恃富强不思后患，穷奢极欲，以使百姓穷困，以至身死国亡。陛下拨乱返正，应思隋之所失，我之所得；拆除炀帝建造的那些豪华宫殿，而安居简陋的屋宇。如在隋代宫殿的旧基上重建并加以修饰，这是以乱易乱，祸患必至。天下难得易失，请陛下深思！”

三月，太宗在洛阳宫西苑宴请群臣后，在积翠池内泛舟。太宗触景生情，对大臣们说：“炀帝因建造这些宫苑，引起百姓的怨恨，结果今日转为朕所有；宇文述、虞士基、裴蕴奸佞之徒内为

谄谀，外蔽聪明，这也是隋亡的原因。我们都要以此为鉴”！

四月，魏征上书言为君之道。他说：“人主善始者多，善终者少。难道是取天下易而守天下难吗？其因在初得天下时百废待兴，君主日夜忧虑而体察民情；等天下太平后，则安逸享乐，狂妄专横。体察民情可使四夷同心，狂妄专横六亲也会离德。这时，虽以威怒压制，结果也是貌从而心不服。君主若能见想要的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停止；居高位则思谦逊；临满盈则思亏损；遇逸乐则思节制；处太平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有人伪冒；施刑罚则思因怒而产生冤案。帝王兼备此十思，而又能选贤任能，就可以无为而治，何必劳神苦体代替百司来处理一般政务呢！”

七月，魏征又上书言君道，认为：“贞观以来，十有余年，而以德教化百姓还不能尽如人意，其因在陛下待大臣还未能尽诚至信。今日定制度治理天下确实委任君子，但执政时偶而出现差失就去询问小人。其结果是待君子敬而疏，对小人轻而亲；亲则无话不谈，疏则心不相通。中智之人，也有小慧，但才不能治国，谋不及深远，即使竭力尽诚，也难以成功，何况心怀奸恶的小人！君子也不能无小过，只要不害于正道，就不要斤斤计较。既然说是君子而心中又怀疑，岂不成了立直木而怀疑影子歪曲吗！陛下只要慎选君子，待之以礼，用而不疑，何愁天下不治！不然，后果就难以预测了。”太宗阅后亲笔写诏加以赞扬，并表示改过。六年后，太宗和侍臣又谈及诚信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太宗说：“孔子言：‘民无信不立’。从前项羽进人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能行仁义而不屠戮咸阳，使百姓大失所望，谁能夺去他的天下！”房玄龄补充道：“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于施政必大有补益。”

贞观十二年九月，太宗问侍臣创业难还是守成难。房玄龄道：“隋末，大唐初创天下，与群雄并起，经沙场鏖战、抛头洒血才重

定九州。创业难啊！”魏征说：“可自古以来帝王莫不得天下于艰难，而失天下于安逸，还是守成难。”这时太宗道：“玄龄与朕共取天下，百死一生，故知创业难。魏征与朕共安天下，常恐富贵生骄奢，安逸生祸乱，故知守成难。然而，创业之难已是往事，守成之难现在朕正应与诸公谨慎为之。”玄龄等群臣闻听，同声道：“陛下能认识到这一点，真是万民的福份！”三年后，太宗对群臣又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征说：“守天下甚难。”太宗询问：“君主只要任贤能、纳谏诤，就可守住天下，为何说难呢？”魏征答道：“纵观自古帝王，在忧危之际，则任贤纳谏，及至太平，必安逸享乐，喜顺耳之言，群臣钳口。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说居安思危，其因正在于此。安而能惧，岂不甚难！”

贞观十三年，太宗对侍臣说：“林深则鸟栖，水深则鱼游，仁义积则万物自归。人们都知躲避灾害，但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仁义之道，当牢记心中，不要离开须臾。就象人要活着不能离开饮食一样。”王珪听后赞道：“陛下能如此，真是天下大幸。”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魏征再次上书论君道中的用臣问题。他说：“在朝群臣，都身负国家军政重任。然而，陛下委任虽重，信任不足致使大臣中有的自疑，心怀苟且。而且，陛下忽略大事，苛求小罪，突发雷霆之怒，以爱憎斥责大臣。治国之道，应委大臣以大局，责小臣以小事。今责任政事，重大臣轻小臣；而一旦出现差错，则信小臣而疑大臣。如此施政怎能实现天下大治！若任以大官，苛求小过，刀笔之吏，就会顺风承旨，舞文弄法，曲成罪状。这时，此大臣若自陈述实情，恐陛下认为有罪不服；不说，陛下又会以为所列皆实。真是进退维谷，不能自明。如此而行，将使大臣们苟求免祸，虚伪成风。”太宗表示赞同。不久，有些官员请太宗亲自阅览奏表，以防壅蔽。太宗询问魏征的看法。答道：“这些人根本不懂治国的道理！若只有陛下一一亲自处理才能防止壅蔽，那不仅朝中的政事，连地方州县事也要这样做了，这岂不

可笑！”

这年年底，太宗因平定高昌在两仪殿宴请群臣。席间太宗对房玄龄感慨道：“高昌若不狂妄自大，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有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言以自正。黜奸佞，用贤臣，不因小人之言疑君子。如此谨慎守业，或许能够平安。”魏征随即进言：“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时必自戒慎，采纳百姓之议，听从忠谏之言。但天下安定后，则恣情纵欲，喜听谄谀，恶闻正谏。今陛下即位十有五年，总是居安思危，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

贞观十五年七月，有一次太宗指着宫殿对侍臣们说：“治天下如建此屋，营建已成，就不能多次改动，即使易一椽、换一瓦，也要践踏摇动，整个房屋必有损坏。如果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便多。”

贞观十六年十二月，太宗问侍臣：“古代有君乱天下而臣治天下的，也有君治天下而臣乱天下的，两者哪一种好些？”魏征答道：“明君治天下，善恶赏罚得当，臣怎能乱天下！若是昏君，纵暴拒谏，虽有良臣，也无济于事。”太宗反问魏征：“齐文宣帝是个昏君，但因有贤臣杨遵彦，时人都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这难道不是君乱而臣治吗？”魏征又答道：“那仅是侥幸没有亡国，哪里谈得上治世！”

这一年，太宗还问魏征：“朕克己为政，仰慕前代明君。积德、累仁、丰功、厚利，这是人们认为最重要的四件事，朕都努力为之。但人难有自知之明，不知朕以往行为如何？”魏征说：“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定百姓，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依臣所见，陛下以往所为，功、利居多，至于德与仁，陛下还需自强不息，才能达到。”太宗又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卿位史职，近来记我施政如何？”答道：“史官之职，君行必书；既不谀善，也不隐恶。”太宗接着说：“朕从今日起勤行三事：一观前代

成败事，以为借鉴；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我能坚持，一贯始终，使史官不会记下我有什么恶事。"

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宗慨然谈及做明君之难。他说："人君只有一心，而攻击的人甚多。有的用勇力，有的用辩口，有的用谄谀，有的用奸诈，有的用嗜欲，环攻包围，用尽心机，都想得逞，以猎取宠幸富贵。人君稍微疏忽，即使受其一，则危亡随之而至。这就是难以成为明君的原因啊！"

这一年，太宗还问侍臣道："自古草创之君，至子孙多乱，为何？"房玄龄道："此因幼主，生长深宫，少享富贵，不识人间情伪，治国之道，所以为政多乱。"太宗道："公推过于君，朕则归罪于臣。功臣子弟多无才能，凭父祖的地位遂居大官，德、义不修，专好奢纵。这样，君既幼弱，臣又不才，岂能不乱！朕说此言，想让诸公告诫子弟。"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侍臣道："朕观古来帝王，因骄而败的，不可胜数，如晋武帝平吴、隋文帝灭陈后，都骄奢自大，臣下不敢直言，政道因此衰乱。朕平突厥，破高丽，兼并铁勒，夷狄远服。朕恐骄矜，常自我警惕，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每次臣下有正言直谏可施于政教的，就以师友相待。如此而行，只望能出现太平盛世。"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太宗在翠微殿问侍臣："自古帝王虽能平定中夏，却不能降服戎狄。朕才不如古人，而功绩过之，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缘故。请诸公各抒己见，实言相告。"这时，群臣都赞美道："陛下功德如天地，这是自然的结果。"太宗却说："不然，朕认为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功业，只因能做到五件事：自古帝王嫉恨胜过自己的人，但朕见别人的善处，就象自己具备一样。此其一。人的才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此其二。君主往往在奖进贤臣时，爱得想抱在怀里；在贬黜不良者时，恨得要推到沟中。朕见贤者则敬，见不良者也可怜，使两者各得其所。

此其三。君主多厌恶正直的人，阴诛显戮，历代都有，但朕即位以来，正直之臣，比肩在朝，未尝黜责一人。此其四。自古帝王都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此，夷狄种族也爱朕如父母。”说到这里，太宗又问褚遂良：“公曾任过史职，朕说的是否真实?”遂良答道：“陛下盛德之事数不胜数，今说自己只做了这五件事，是证明陛下谦逊的美德。”

太宗一朝的二十余年中，君臣在政治实践中就这样不断探求治道，并把这种理论再付诸政治实践。他们讨论治道的重点是君道，其次是臣道，而核心是推行儒家的仁政。在仁政思想的指导下，勤政爱民，宽缓刑罚，从而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贞观之治”。宋人范祖禹评论唐太宗的治道为“以武拨乱，以仁胜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说：“太宗为君，魏征为相，聊修仁义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辫归诚，不待尧、舜、汤、武也。”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92—199

《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贞观政要》：《君道》、《政体》、《诚信》、《公平》、《择官》、《君臣鉴戒》、《仁义》、《慎所好》、《杜谗邪》、《悔过》

《唐鉴·太宗》

《读通鉴论·太宗》

太宗纳谏臣直言

"贞观之治"被人最赞叹的是它的开明性，这种开明性集中表现在太宗一朝君纳谏臣直言。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二十余年间谏臣盈庭、进谏成风。不仅有朝廷众多大臣，还有皇后、嫔妃、太子，乃至平民百姓；而太宗从谏如流，形成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

唐太宗即位后不久，就在贞观元年（627 年）向群臣求谏。他说："人欲自照，须有明镜；君欲知过，必靠忠臣。君王若自以为英明无比，臣子也不加以谏诤，要想国家不败亡，那是白日做梦。而君失其国，臣也不能独全自身。隋炀帝残暴，臣下钳口；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罪恶，以至亡国；专会奉迎的佞臣虞世基等随后也被杀死。覆车之鉴，后事之师，望诸公每看朕行事不利于百姓处，千万极言规谏。"太宗还察觉由于自己面容威严，使百官朝见时举止失措，有碍进谏，于是主动改正。每见人奏事，必和颜悦色，使对方畅所欲言，自己则从谏诤中知政治得失。

这一年太宗还一再向侍臣求谏说："明君用佞臣，不能治理好国家；良臣事奉昏君，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只有君明臣贤，如鱼得水，四海才能安宁。朕虽不明，但有幸得到诸公的辅佐，恳望能直言极谏，致使天下太平。"这时谏议大夫王珪道："臣闻木从绳则直，君从谏则圣，因此古代圣主必有诤人七人，言若不听，则以死谏诤。陛下胸襟如海，向臣下主动求谏，臣等处不讳之朝，怎敢不竭心尽智。"太宗连连称好，并下令宰相入宫商讨国家大事时，

一定要叫谏官随入，参与政事的决策。谏官如有谏谕得失，太宗总是虚心听取。

本年九月还有这样一件事。当时太宗让大臣推荐人才，宰相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杜淹此人有何优长？答道："炀帝已决定去江都，故意召百官问留居洛阳和到江都哪个为好？大臣都不敢讲，当时只有身任吏部主事小官的邸怀道敢说不可去江都。这是臣亲眼目睹的事。"太宗问："卿认为怀道所为正确，自己为何不正谏？"答道："臣那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也不听，白白送死"。太宗又问道："卿知炀帝不可谏，为何在其朝为官？既在其朝为官，又为何不谏？卿仕隋，还可说位卑，后出仕王世充，官高位尊，为何也不谏诤？"杜淹说："臣对王世充并非不谏，但不听从啊！"太宗道："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怎会免祸？"杜淹无言可对。太宗这时才转入正题道："卿今日身为宰相，官高位尊，可以谏诤了吧！"杜淹立即答道："愿尽死力进谏。"太宗哈哈大笑。

贞观二年，太宗问侍臣："明君思短而益善，昏君护短而益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也实在难以进谏。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不应深责。古时商纣暴虐，箕子装疯保身，孔子仍称其仁。但炀帝被杀，世基是否也应受死？"杜如晦答道："天子有谏臣，虽无道不失天下。春秋时代，卫国史鱼因自己不能进贤退佞臣，死后还以尸谏，孔子赞其是直臣。世基怎能因炀帝无道，不纳谏诤，就闭口不言，与箕子装疯离去事理不同。晋朝时惠帝和贾后要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谀保身。及赵王伦举兵废贾后，遣使逮捕张华。张华辩解道：'将废太子日，不是不谏，只是没被采纳。'使者反驳说：'你居王公高位，太子无罪被废，谏既不从，为何不辞官引退。'张华无言回答。遂被斩首。古人道：'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虞世基位居宰辅，处应言之位，竟无一言谏诤，诚也该死。"太宗听罢说道："公说得很对，人君须有忠

良辅弼，才能身安国宁。炀帝正是因为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而至死亡。若君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谏正，而一味服从，事事赞颂，那么君是昏君，臣为谀臣，君昏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公心，相互切磋，以成治道。诸公都应尽力谏诤，匡正朕恶，朕决不因直言忤旨，予以斥责。”

太宗虚心求谏，自然引至大臣敢逆龙鳞。一次，由于太宗痛恨官吏多受贿赂，曾秘密派身边亲信去行贿试探。有个衙门小吏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就要将这人杀掉。民部尚书裴矩谏道：“为吏受贿，罪诚当死，但要是陛下派人故意贿赂才接收的，这是陷人于法呀，恐不符合‘以德礼教化’的原则。”太宗大悦，召集了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说道：“裴矩能当面谏诤，不作阿谀顺从，倘若每件事都这样，何愁天下不治。”

这年十二月的一天，太宗和宰相王珪闲谈。当时太宗身边有一美女侍奉。这美女是卢江王李瑗的美姬，李瑗谋反被诛后，被籍没入宫中的。太宗手指美女对王珪说：“这女子原有丈夫，李瑗荒淫无道，杀其夫而将其占为己有，暴虐若此，怎么不灭亡呢！”王珪听后问道：“陛下认为李瑗的行为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觉得奇怪，反问：“象杀夫夺妻这样的事，卿怎么还问朕对不对呢？”王珪紧接着说：“臣见《管子》书中写道，齐桓公到被齐灭亡的郭国问当地父老：‘郭国何故而亡？’父老回答道：‘郭君喜欢善事而痛恨恶事。’桓公说：‘如能这样正是贤君，怎会亡国？’父老解释道：‘郭君喜欢善事而不去做，痛恨恶事而又不能放弃，所以亡国呀！’今日陛下留此美人在身边，陛下一定认为这是对，如果陛下认为不对，就是知恶而不放弃。”太宗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称赞王珪谏的好，随后，便下令将美人归还给她的亲属。

长孙皇后为使太宗心情欢畅，想替他寻找美女为妃嫔。后访问到郑仁基有女十六、七，容色娇好，遂向太宗提出，太宗应允。正当诏书写好而送诏使者尚未出发之际，魏征听说此女已许嫁陆

爽，连忙进谏道："陛下为民父母，应抚爱百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明君，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居宫室，则使百姓有房舍；食美味，则使百姓无饥寒之患；视嫔妃，则使百姓有妻子之欢。今郑氏女，久已许人，陛下娶之，这合乎为民父母之道吗？臣虽听传闻，恐亏损圣德，不敢不谏。"太宗闻听大惊，亲写诏书，自我检讨，并令将女仍嫁原夫。房玄龄、王珪、韦挺等都认为郑氏女许配陆氏没有明显证据，陛下不必多虑。此时陆爽也上书道："我父陆康在世与郑家来往，虽常相互赠财物，并无婚姻之约。外人不知，妄有此说。"这时太宗颇是疑惑，问魏征："群臣也许是顺从朕意，陆氏为何也这样说？"魏答道："以臣揣度，陆爽认为陛下与太上皇一样。太上皇初克长安时，宠幸辛处俭的妻子，处俭当时官任东宫太子舍人，太上皇竟然下令把他从东宫外调万年县。因此辛处俭整日胆战心惊，恐首级难保。陆爽以为陛下今天只是表面宽容，以后会暗中报复，所以上书自陈，这也毫不奇怪。"太宗道："朕言必有信"。于是下诏道："今闻郑氏女先已受聘，以前朕要聘娶，源于情况不明。这是朕的错误，也是有关部门的过失。选郑氏女为嫔妃一事立即停止。"此诏一出，哄动全国，时人无不赞叹。

这年底，太宗令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因不称旨意，受到太宗训斥。温彦博、王珪谏道："孝孙是文雅士人，今却令教宫人音乐，这本不妥，又严加斥责，臣认为更不应该了。"太宗悖然大怒道："朕将卿等当作心腹重臣，怎能附下罔上，为孝孙诡辨！"彦博惧，连称有罪。但王珪高声道："陛下要求臣子忠直，今臣等直言，岂是徇私，可陛下毫不考虑，是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太宗听后默然不语，起身入内。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日怒斥温彦博、王珪，至今很是后悔，公等千万不要因此事而不敢直言哪！"

贞观三年，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

朕总是贴在屋内墙壁上，便于观看思考。所以如此孜孜不倦，是想深入了解臣民们的详情。每一思政理，常三更才寝。也望诸公竭心尽力，不辜负朕的期望！”

这一年，因连年天灾，太宗于八月九日下诏关中地区免除二年租调，关东地区免除一年。但不久又下诏道：“已交的不再退还，免租调从明年算起。”给事中魏征上书谏道：“臣见百姓得知八月九日诏书后，老幼相欢，边歌边舞。又见百姓闻听后面的话，大失所望。臣以为，君主行仁政上天才会保佑，君主言而有信万民才会相助。现陛下刚登宝位，百姓无不观察陛下的道德，但开始发诏书，就反复无常，失信于天下。那些给陛下谋划此策的，只知获蝇头小利，不知这样会大损德义，臣实在痛心，请陛下斟酌。”

此事过后不久，右仆射封德彝主持征兵，他想将中男（当时规定十六至二十岁）十八岁以上也征服兵役，太宗同意。但敕旨拟后三、四次，都受到魏征阻止，因唐制二十一岁至六十岁才是兵役期。德彝只好再次上奏，并说明：“这次征发服兵役的中男，都是其中身长体大的，但魏征就是横加阻拦。”太宗大怒，口授敕旨说：“中男以上，虽未满十八岁，只要身形壮大，也可以征服兵役。”敕文拟好，魏征仍不肯署敕，使敕旨不能合法发出。太宗更加恼怒，将魏征召来训责道：“中男若真个小体弱，当然不会征服兵役；若身长体大，征发入伍，与你何干？你这么固执，简直让人难以理解。”魏征面不改色，高声奏道：“臣闻竭泽而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猎，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如中男以上，都征发入伍，租赋杂徭，从何取给？而且这些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是人少，只因缺乏礼遇，遂使人无斗志。此状不改，即使征人再多，也是无用。不如精选健壮，厚加礼遇，一人可当百人。陛下常说，‘我为君主，要以诚信待人，致使官员百姓都无矫伪之心。’但陛下自即位以来，已做了三数件失信的大事，将来如何取信于民？”太宗愕然道：“朕做了哪些失信天下的事？”魏征侃侃而

谈："陛下初即位，诏书中说：'逃租宿债，欠负官物，一律免除。'有的官府以为原欠秦王府的并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从秦王升为太子，秦府物不是官物是何物？又曾下诏道：'关中免二年租调，关东免一年。'可接着又下诏加以改变。还有，和陛下共治天下的刺史、县令，平时征租税，全由他们负责，但征人服兵役时，又怀疑这些人诈伪。这些是以诚信治国吗？如此而期望臣民诚信，实在难啊！"太宗听到此处，怒气全消，笑道："朕见卿固执不已，还怀疑卿不明此事，今论及国家失信，百姓离心，真是至理明言。朕以往莽撞行事，过失太多，如不痛改，怎能实现天下大治！"说罢，下令停止征发中男，并赐魏征金罋一个，以示奖励。

贞观四年六月，太宗下诏征发士兵修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道："臣思秦始皇吞并六国但二世而亡，诚出逞嗜纵欲、逆天害人的缘故。所以天下不可以力胜，唯有崇俭约、薄赋敛、慎始终，才可长治久安。今日在战乱之后，承凋弊之余，一定要以礼节制嗜欲，而陛下要先为典范。可现今巡幸洛阳，日期未定，却预先大修宫室，会使万民失望。当初陛下初平洛阳，层楼广殿都令拆毁，以示节俭，天下无不敬仰。岂有初恶其侈靡而今又袭其雕丽的呢？从前汉高祖想建都洛阳，后采纳娄敬的意见从洛阳迁都长安。他们并非不知洛阳地处九州之中、便于输运贡赋，只因形胜不如关中啊！加以陛下灭东突厥后，将其安置于国中，怎可轻易离开长安？臣曾亲见隋炀帝兴造乾元殿，近山无大木，都从豫章（今江西南昌）运来。二千人曳一柱，若用木轮，则压磨火出，于是铸铁为毂，但行一、二里，铁毂即破；又专令数百人带铁毂随时更换，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仅运一柱就需数十万人力，其它就不言而喻了。臣听说阿房宫建成，秦人离散；乾元殿完工，隋人解体。再请陛下深思，今日财力是否能和隋朝相比！陛下若役使疲困之人，袭亡隋之弊政，其害民程度将超过隋炀帝！"

太宗阅罢，立即召见张玄素，问道："卿认为我不如炀帝，比桀、纣如何?"玄素凛然答道："若此役不息，也同归于乱。"太宗叹道："朕未深思，以至于此。"又对房玄龄道："朕以洛阳居国之中，便于运送贡赋，遂命兴建。今思玄素所言，诚是有理，应该停止修造。以后或因事到洛阳，虽露居又有何妨！古往今来，以卑犯尊，实是不易，玄素若非忠直，岂能如此！"遂赐绢二百匹以资鼓励。魏征也赞叹道："张公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威力无穷。"

太宗有一匹骏马，特别喜爱，在宫中饲养，忽然无病而死。太宗大怒，要杀养马人。长孙皇后说："从前，齐景公也要因马死杀人，这时晏子请景公让自己列举养马人该杀的罪状，景公很高兴。晏子于是数道：'你养马而死，一罪；使景公因马死杀人，而百姓得知，必怨我君，二罪；诸侯闻听，必轻视我国，三罪。'景公这时翻然醒悟，将养马人释放。陛下读书时曾见此事，莫非忘记啦。"太宗听此言后怒气顿消。后来太宗对房玄龄说："皇后平时常对朕进行启导，大有益处啊！"

贞观五年，太宗语重心长地对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而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日无时无刻不以此为鉴，想使诸公始终能尽情极谏。公等也应接受别人谏语。千万不要因为不同意自己的见解，便护短报复。若不能受谏，怎能谏人?"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都因为告讦谗毁官员受到唐太宗宠信，两人有恃无恐，恣意弹劾，激怒太宗，导致群臣慌恐不安。魏征于八月间严肃地面奏道："万纪等小人，不懂治国大道，以告讦为正直，以谗毁为忠心，陛下并非不知他们并无德才，只是想取其无所避忌，欲以此来警策群臣。而万纪等则挟恩依势，驰逞奸谋，凡所弹劾，皆非有罪，其结果只能使臣下离心离德。陛下即使不能举贤能以崇德化俗，也不能亲昵佞人而自损己身哪！"

太宗听罢欣然采纳，并赐绢百匹。后来权万纪、李仁发奸状暴露，都受到处罚。

九月，太宗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又要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谏道："隋末天下大乱刚刚结束不久，百姓凋弊，府库空虚。若营建不已，公私劳费，将难以忍受。"太宗称赞道："戴胄和朕非亲非故，但忠贞为国，知无不言，应当得到任用。"此事过了很久，太宗又让窦琎修建洛阳宫。窦琎以为太宗要享乐，遂凿池筑山、雕饰华丽。太宗原只想对洛阳宫作一般修缮，见到修的如此侈华，于是大怒，立即下令将宫殿拆毁，并将窦琎撤职。

贞观六年正月，文武官请到泰山行封禅大典。开始太宗不同意，说："卿辈皆认为封禅是帝王盛事，朕却不然，若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又有何妨！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难道后代谁会认为文帝的贤德不如始皇呢！敬天可扫地而祭，关键在于心诚，何必非要登泰山之巅。"然而群臣仍恳请不已，太宗正要应允，独有魏征以为不可。于是太宗说，朕欲得卿直言，不要隐讳。并连续质问魏征："公不想让朕封禅，是因为朕的功绩不高吗？"魏答："高"。是因为朕德不厚吗？"厚"。"是因为中国未安吗？"安"。"是因为四夷不服吗？"服"。"是因为年谷未丰吗？"丰"。"是因符瑞未至吗？"至"。太宗最后奇怪的问："既然如此，为何不可封禅？"魏征侃侃而谈："陛下虽有上述六种功勋，可是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库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沿途难以供给。而且陛下封禅，则万国毕集，远夷君长，皆当随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茫茫千里，草木丛生，烟火尚稀，这是引戎狄入腹地，示以虚弱。况且赏赐不厚，无法满足远来随从人们的欲望；而即使连年免除赋税征收，也不偿百姓的劳费。象这种封禅是崇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做它何用！"太宗称善。又逢河南、北数州遭水灾，遂停止了封禅。

三月，长乐公主出嫁。太宗因她是长孙皇后所生，非常宠爱，

特命嫁妆要倍于永嘉公主（太宗姊）。魏征得知后谏道："昔汉明帝封皇子时说：'我子岂能和先帝子相比！'并使先帝子的封地大于己子。可今陛下送公主的嫁妆却倍于长公主。这和汉明帝行事岂不相反吗？"太宗觉得谏的有理，遂入后宫告诉长孙皇后。皇后叹道："妾多次听到陛下称重魏征，不明其故；今观他引礼义抑制君主私情，才知真是社稷之臣呀！妾与陛下乃结发夫妻，相亲相爱，但每说一言，总要先看陛下脸色，不敢轻犯威严；何况人臣疏远，而能如此直言，真是难能可贵，陛下不可不听。"长孙皇后还请太宗同意自己派人携钱四百贯、绢四百匹赏赐魏征，并转告道："闻公正直，今才亲见，因此相赏。望公常秉此心，不要转移！"

此事过后不久，太宗罢朝回内宫，怒气冲冲地说："等有机会非杀这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是谁？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在朝堂上当着百官面羞辱我。"皇后闻听此言，退入卧室，换上朝服才又出来相见。因朝服只有册封皇后、助祭祖先和参加朝会大事才穿，极为庄重，所以太宗觉得奇怪，惊问缘故？皇后娓娓而言："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如此忠直，是因为陛下英明所至。妾怎敢不隆重庆贺？"太宗听罢，怒气顿消，开怀大笑。

闰七月，太宗宴请群臣。席间长孙无忌感慨地说："王珪、魏征原都是李建成的宫臣，助他图谋帝位，与我们这些原秦王府的旧臣本是仇敌，不想今日能在一起饮宴！"太宗说："魏征、王珪有忠心事主的高尚品德，因此我予以重用，但魏征每次进谏我若不听时，我再与他说话就不理了，这是为何？"魏征答道："臣因为您有些事处理不当，可以进谏。若陛下不听而臣随口应声，那么错事就施行了，因此不敢答应。"太宗说："为何不暂且答应然后再谏，这又有什么关系？"答道："古时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后乱言。'臣心明知陛下所为不对而当面顺从，这合乎稷、契辅佐舜治国之道吗。"太宗哈哈大笑，然后道："人们都说魏征举止疏慢，而我觉得非常妩媚，正因为他为人忠直啊！"魏

征闻听此言，连忙站起，躬身施礼，然后说："陛下广开言路叫臣进直言，所以臣才能进愚忠；若陛下刚愎拒谏，臣怎敢频频触犯龙颜。"

十二月，太宗与侍臣讨论安危的根源。温彦博道："愿陛下常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就永远安然了。"太宗问道："朕近来懒于处理政务了？"魏征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近来修建土木工程稍多了些，而进谏的人多受斥责。这是陛下今日和贞观初不同之处。"太宗听罢击掌大笑道："你说的真对呀！"

不久，太宗对大臣们说："朕近来决事有时不能完全按着律令，诸公认为都是些小事，不再谏诤，但事无不由小致大，这是危亡的端倪呀！往昔夏桀的贤臣龙逢因忠谏被杀，朕读书每到此时未尝不停读叹息。炀帝骄暴而亡，诸公亲眼所见，望诸公常为朕思炀帝之亡，朕为诸公念龙逢之死，何患君臣不能相保。"

这一年，因为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直谏，太宗亲自召见，设宴款待，赐绢奖赏，同时虚心求谏。他说："朕历观自古人臣进忠之事，若遇明君，便能尽诚规谏；但忠臣龙逢、比干遇到的是桀、纣暴君，就难免被杀身亡。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听说龙很温顺，可喉下有逆鳞，若触犯逆鳞便有杀身危险。但是，卿等都不怕触犯逆鳞而直言极谏，若始终如此，朕哪里还用担忧国家的败亡！望卿等再接再励！"

有一次韦挺上书论时政得失，太宗阅后立即回书加以褒美，说："所上意见，极是直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朕近来不闻己过，多亏卿竭忠尽诚，数进嘉言，激励朕图治之心，真是难能可贵。"

贞观七年，太宗子蜀王李愔的岳父杨誉犯法，被刑部拘禁，尚未审讯处理。这时杨誉子是宫中千牛侍卫，遂在朝堂鸣冤说："五品以上非谋反大逆罪不应拘禁，只因我家是皇亲国戚，故多生枝节，不肯结案，拖延岁月。"太宗闻听大怒道："知道是我的亲戚

还故意刁难，应给他点颜色看。”下令要将薛仁方杖打一百后罢官。魏征得知，挺身进谏：“城狐、社鼠都是弱小动物，可它的穴在城、社下。就因为有城、社的庇护，要想除去很是不易。况且皇亲国戚古来难治，汉、晋以来不能禁御。高祖朝外戚骄纵，陛下登基后加以抑制，气焰才收敛。薛仁方身为刑部官员，能为国家守法，应予肯定，岂可枉加刑罚，而助长外戚跋扈！此源一开，万端争起，那时将后悔莫及。自古以来能禁外戚违法，只陛下一人。防患于未然，是治国常道，千万不可因为水未横流，便想自毁堤防！”太宗道：“公言之有理，刚才朕没能深思。但仁方经常拘禁不奏，颇是专权，虽不该处以重罚，也应稍加惩处。”于是改杖二十，仍官任原职。

这年十二月，太宗问魏征：“群臣上书，内容多可采纳；为何召见面问时却错谬百出？”魏征答道：“臣观百官奏事，常思考数日，但到陛下面前紧张得三分不能道其一。况且谏诤的人都犯讳触忌，除非陛下和颜悦色，虚心纳谏，否则谁敢尽情吐露！”太宗连连点头。从此接见群臣，辞色更加温和。太宗还常常说：“炀帝性猜忌，临朝时群臣多沉默不语。朕则不然，要和群臣亲密如一人。”

贞观八年十二月，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谏诤，其中批评道：“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厚敛；民俗好高髻，是受宫中影响。”太宗看后大怒，对房玄龄等说：“难道国家不役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女都剃光头发，皇甫德参才满意吗？”于是要以谤讪罪加以处罚。魏征谏阻道：“昔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论形势，书中就写‘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打动君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就是此意。望陛下三思明断。”太宗恍然大悟，称赞魏征：“多亏你阐明这一道理，否则朕若惩处此人，以后谁还敢谏！随后，赐皇甫德参绢廿匹，以资奖励。次日，魏征又奏道：“陛下近日不好直言，

虽勉强接受，远非从前那样豁达。”太宗听后，对德参奖励更优厚，并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病危，太宗前去探望。当时房玄龄因忤旨被免官，皇后弥留之际对太宗进言：“玄龄事陛下很久，小心慎密，奇谋密计，从未泄露，苟无大罪，愿勿遗弃。”还劝太宗“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奸、省作役，止游猎。”长孙皇后病逝，太宗悲痛地说：“朕今后入宫不能再听到规谏之言，从而失一良佐，让我怎能忘怀呢?”随后，召房玄龄官复原职。

八月，太宗对群臣道：“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家。但近来上封事（给皇帝的秘密奏书）多是揭露别人的琐碎小事，而且也不近事实。自今以后再有人这样做，朕要以谗人罪予以惩处。”魏征奏道：“古代舜置谤木，欲闻己过，今日上封事，就近以谤木。陛下想知得失，可让他们恣意陈述，若说得对，则有益于陛下，若不对，也无损于国家。”太宗称魏征“言之有理”，并抚慰上封事人。

魏王泰是长孙皇后所出，聪敏绝伦，太宗特别宠爱。有人向太宗挑拨说，三品以上官员多轻蔑魏王。其意在激太宗发怒，以达到陷害魏征等大臣的目的。太宗果然上当，在齐政殿召集三品以上大臣，声色俱厉地训斥道：“以前的天子是天子，今日的天子就不是 天子了？以前的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的天子儿就不是天子儿了？隋文帝时，一品以下大官都被诸王所屈辱。朕不许诸子纵 横，你们就轻视我儿；朕若放纵他们，岂不折辱诸公!”房玄龄吓得汗流浃背，连称有罪。独有魏征凛然不惧，朗声谏道：“臣以为当今群臣，必无敢轻视魏王的。因为礼曰，臣、子相同。《春秋》中说，王虽衰微，但在诸侯之上。另一方面，三品以上皆公、卿大臣，为陛下所尊重。若纲纪大坏，另当别论。但今日圣君在上，魏王必无所辱群臣之理。隋不知礼义，骄纵诸子，使多行无礼，终皆灭绝。难道这值得效法吗?”太宗听罢 ，转怒为喜，高兴

地说："理一说透，不得不服。朕所言，自身私爱；魏征所说，国家大法。朕先前恼怒，还自认为有理，听魏征一说，才知以私爱忘公义，实在理屈。人君发言真不容易呀！"随后责备房玄龄为何不谏，而赐魏征绢一千匹。此事发生在这年十二月。

太宗巡幸到河南寿安县显仁宫，因官吏供奉不够丰盛，受到太宗的训斥。魏征得知后谏道："陛下因供奉厚薄谴责官吏，若此风相扇，以后就民不聊生了，这并非陛下巡幸的本意呀！当初炀帝出巡，令各郡县献美味佳肴，视其丰俭而为赏罚，故海内叛离。此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还要效仿呢！"太宗听后吃惊非小，称赞魏征道："只有你才能让我听到这一深刻的道理。"又对长孙无忌等道："从前朕也曾经过此地，那时买饭而食，租舍而宿；今能得到这样的供奉，怎能还嫌不足呢！"

五月，魏征感觉太宗励精图治心有所衰退，遂上书进谏，尖锐指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昔时，闻过必改也不如往日，谴罚增多，颜威语怒。由此才知古人所说，'贵不与骄相约而骄自至，富不与侈相约而侈自至'，真非虚言！想隋时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我朝今日简直无法比拟。然而，隋因富强胡作非为而国灭身亡，我虽寡弱休养生息而天下太平。安危之理，昭然若揭。再者，隋未乱时，自认为必不会乱；未亡时，也自认为必不会亡，所以赋役无穷，征伐不息，直至祸将及身还不醒悟。臣恳望陛下取隋亡国之鉴，去奢从俭，亲忠远奸，在当今天下安宁之时，仍施行往昔恭俭恤民之政，则尽善尽美了。况且取天下实难，坐天下甚易；陛下既然能在万难中夺取天下，岂不能做到比较容易的守住社稷。"

七月，太宗因水灾，诏令朝中文武百官上书极谏。而且令各州把官民中有明识治道、方正直言的人举荐入朝，太宗要亲自召见，面问自己的过失。八月，侍御史马周长篇上书进谏，他说"三代及汉，享国长远，多的八百年，少的也不减四百，其因在于

能以恩结人，使人不能忘怀。而以后朝代，多的六十年，少的才二十余年，都因无恩于人，本根不固的缘故。陛下要兴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能不深思远虑！然而今日户口不及隋十分之一，但服役的人却兄还弟去，相继不止。陛下虽下恩诏，减轻劳役，但营缮不休，百姓怎能安生？这种诏书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书中又说：“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公主服饰，都不节俭。陛下少年多居民间，知民疾苦，尚且如此。而现今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懂民情，今日若不节俭，他日即位，恐必奢靡。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国家没有不亡的。那时君主想改悔，为时已晚。因此应修德于可修之时，不可追悔在国亡之后。周厉王、周幽王嘲笑夏桀、商纣昏暴，隋炀帝也嘲笑北周、北齐的君主，陛下千万不能让后代笑今日如今日笑炀帝呀！贞观初，天下饥馑，斗米值匹绢，而百姓不怨，因知陛下忧念万民。今连年丰登，匹绢值粟十余石，而百姓口出怨言，因知陛下不思百姓疾苦，多兴土木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蓄积多少，而在百姓苦乐。隋贮洛口仓而为李密所用，东都积布帛而为王世充所用，西京府库也为大唐所用，至今未尽。当然，蓄积本不可无，但要在民有余力，然后征收。如若横征暴敛，最终必然资助寇敌。节俭以养民，陛下在贞观初身体力行，今日继续坚持，本也不难。陛下欲使天下长治久安，不必远求上古，但求如贞观初，则天下幸甚。”

上书还说：“陛下宠魏王泰过分。想当年魏武帝爱曹植，及文帝即位，曹植遭到囚禁，武帝的宠爱恰成了使他受苦的根源。陛下不可不深思。”最后说：“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刺史、县令，如果选用得当，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可如今朝廷重用内官，而轻外官。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才改任地方官，边远之地，更加忽视，这也是百姓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太宗阅罢此措辞犀

利的谏书，称善良久。然后对侍臣说："自以后刺史由朕亲自选用，县令则让京官五品以上各推荐一人。"

贞观十二年三月，太宗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太宗道："贞观以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功劳为首；贞观以来，绳过纠谬，魏征功绩最大。今全赐佩刀以示嘉奖。"随后又问魏征："朕近来政事比往年何如？"答道："若说威德所加，远夷朝贡，那远超贞观之初；若说德义教化，民心悦服，比贞观初期又相差甚远。"太宗不解地问："远夷来服，不正说明德义有所增加吗？"魏征说："不然。陛下往昔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渐增骄奢之心，因此功业虽盛，不如贞观之初。"太宗又问："朕现今行为和往年相比有何不同？"魏征答道："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三年以后见人谏，悦而听从。近一、二年来，不喜人谏，虽勉强听从，犹有难色。大有区别啊！"太宗惊讶地说："请举些具体事例。"魏征一一列举道："贞观初，陛下要杀元律师，司法官孙伏伽犯颜力谏，认为据法不应处死。后陛下不仅听从，而且将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林赏给了他。当时有的人说赏赐太厚，陛下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谏者，因此重赏。'这是导人使谏。徐州司户柳雄妄诉在隋朝时曾任的官阶，企图提升官位。当时陛下令处以死刑，但司法官戴胄据法直谏，认为只应处以徒刑。陛下也采纳了戴胄之谏而改正了。这是悦而从谏。近期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大怒，要处以讪谤朝廷大罪，虽因臣谏而罢，但愤愤不平。这是勉强从谏事例。"太宗感慨地说："公所言全合事实，也只有公才能谋虑及此。人难有自知之明，公未说时，朕还以为前后所为没有不同。及听公言，着实吃惊。望公永远直谏，朕也决不违公语。"

贞观十三年，太宗及群臣因是否实施分封制展开辩论。早在贞观元年，太宗问享国长久之策，萧瑀说："三代封建而久长。"太宗表示同意。贞观五年，太宗令群臣议封建之事，魏征反对。他

认为："若封建诸侯，则众多卿大夫都需供给俸禄，必导致重敛百姓。而且，若畿外尽封诸国，中央经费必缺。"颜师古同意分封，但提出："封王的土地不要过大，杂以州县，互相维持，以扶皇室。"太宗采纳了颜师古意见，并令制定分封的等级和条例。但贞观十三年二月太宗下诏宗室功臣袭封刺史时，于志宁上书谏阻，认为古今不同。马周也上书反对说："陛下行封建，目的是为了厚爱宗室、功臣，想让其子孙世守封地，与国无疆。但孩童嗣封，万一骄愚，则万民被其殃，国家被其害。这岂不是所谓爱之反而害之。"功臣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受封，上书固辞。太宗终于下诏停止世封刺史。

五月天旱，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上书谏诤。魏征随即上书，尖锐指出太宗的志业，比贞观初，有十条未能善始善终。他说："陛下在贞观初，清静寡欲，德化远及夷狄，而今遣使万里，市索骏马，并访求珍宝，此其一。陛下在贞观初，忧民劳苦，爱之如子，不轻易兴建土木；近年奢糜，思用民力，竟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国家因百姓逸乐而倾败，劳而安定的？此其二。陛下在贞观初，苦己以利物，而今纵欲以劳民。虽忧民之言不绝于口，而享乐事实记在心。兴建时常说：'不如此，不便我身。'此其三。贞观初，亲君子，斥小人，近来重君子恭而远之，轻小人却狎而近之。昵小人，远君子，而欲至治，实不可能。此其四。贞观初，不贵异物，不做无益之事；而今难得奇货杂然并进，玩好之作无时而息。上奢糜而望下朴素，力役繁而望农业兴，不可得呀！此其五。贞观初，求士若渴，贤者所举，即信而委任，取其所长，常恐不及；近来随心好恶，因众贤举而用，但一人毁而弃，虽多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弃。遂使谗佞得逞，忠臣寒心。此其六。贞观初，清静无为，无田猎之好，数年之后，不能守志，鹰犬之贡，远及四夷，晨出夕归，驰骋为乐。此其七。贞观初，待下有礼，群情上达。今外官奏事，脸色不悦，有时还追问小错，使

虽有忠言，也难以申明。此其八。贞观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近年恃功业之大，负圣智之明，长骄纵欲，无事兴兵，问罪远夷。此其九。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百姓，寻食关外，扶老携幼，来往数年，但无一户逃亡，只因陛下勤政爱民，民宁死也无二心。近年百姓疲于徭役，关中劳弊尤甚。或有一年遭灾不收，百姓之心恐不会如前时安定了。此其十。”魏征最后以警告的语气说：“福祸无门，惟人所召。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郁长叹呀！”

太宗阅后，深加赞叹，对魏征道：“朕今知错了，愿意改正，以终善道。并将公的上书写于屏风，朝夕瞻仰。还要抄录给史官，让万代知君臣之义。”随后赐魏征黄金十斤，御马两匹。

太子右庶子张玄素曾任刑部令史，这是低微的吏职。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在一次上朝时，太宗当着群臣忽然追问玄素的入仕经历。玄素因曾任小吏感到羞耻，面如死灰。褚遂良谏道：“君能对臣有礼，臣才会竭心尽力。玄素虽出身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高官，并委以辅佐太子的重任，怎可当着群臣追问出身而使他难堪！”太宗说：“朕现在也很后悔。”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论事，其因何在？”魏征答道：“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忠心为国的少，爱自身的多。朝臣畏谏而获罪，因此不言。”太宗说：“是呀。朕也常思此事，人臣欲谏，常惧死亡之祸，与赴汤蹈火有何不同！因此忠贞之士，非不想竭诚，只是极难。朕今开怀纳谏，卿等勿须恐惧，径可直言。”

不久，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窦德素，问“宫城北门近来营建什么？”德素将此事上奏太宗。太宗闻听大怒，训斥玄龄等：“你们的职权是管南衙的政事，宫北门搞点小修缮关你们何事？”玄龄等连称臣罪该万死。魏征起身而出道：“臣不明陛下为何斥责玄龄等人，而玄龄等人也为何自称有罪。玄龄等既是陛下的股肱耳目，对中外事岂有不该知道的呢！假如北门营建是对的，应助陛

下修成；若不对，当请陛下制止。因此，玄龄询问有司，理所当然。而陛下斥责，玄龄请罪，臣实在不明其中原故。”太宗听罢，愧容满面。

太宗一次临朝对侍臣们说：“朕身为君主，但常兼任将相之事。”言谈中面带洋洋得意之色。张行成退朝后上书道：“舜对禹说，你不自傲自夸，所以天下无人与你相争。陛下拨乱反正，功高北斗，群臣确实望尘莫及，但不应临朝自夸。以万乘之尊，而与群臣比功争能，臣认为实不足取。”太宗觉得言之有理。

贞观十六年七月，魏征染疾，太宗亲笔写诏慰问，并说：“不见数日，朕错多矣。今欲亲往，恐增烦劳，若有闻见，请上书谏奏。”魏征遂上书道：“近来陛下临朝，言辞总是大公无私，但退朝所为，不免有些私弊。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有何益处！”魏征府第简陋，太宗特意停建小殿，将材料为他建厅堂。并根据魏征为人清正的品德，赐素屏风、素褥等。魏征上书谢恩。太宗亲笔答道：“朕如此而行，全为百姓与国家，岂为卿一人。”不久，太宗对房玄龄等说：“自知者明，但实难做到。人君须有匡谏直臣，指摘过失。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然勤劳，怎能尽善！朕常思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错，如明镜照形，善恶立见。”并勉励房玄龄力行谏诤。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重，太宗派使者问讯，赐以御药，络绎不断；又叫李安俨留宿魏府，随时将病情奏闻；后太宗又亲去探望。魏征逝世，太宗登禁苑西楼，远望灵车痛哭，并亲自撰写碑文。此后，经常思念不已，对侍臣们痛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魏征病逝后，太宗仍坚持求谏。他对侍臣们说：“朕观古代帝王，无不因受正谏而兴，拒忠谏而亡。有劝朕安国的，必授以高位；若引朕为非的，要加以显戮。朕向诸公乞言，望无所隐。”二

月，太宗问褚遂良："舜造漆器有十余人进谏，这样的小事值得苦谏吗?"遂良答道："奢侈是危亡的根源；漆器不止，将用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微杜渐，若祸乱已成，再谏就无用了。"太宗赞赏地说："对呀，朕有过，卿也应在端倪时进谏。朕见前代帝王拒谏时常说：'已经做了'，或说：'已经答应了'。以此为借口，终不改过。如此，想不灭亡，哪里可得!"

这年四月，太宗向侍臣求谏："朕即位后，诚念苍生。有人进直言能益时补政，朕总是洗耳倾听，即使是身份卑贱的人也不废其良言。"不久，高季辅上书陈述时政得失。太宗特赐锺乳药一剂，说："卿进药石之言有益于国，朕以药石相报以健卿身。"

贞观十八年四月，太宗问侍臣道："人臣顺旨的多，犯颜的少。今朕欲闻己过，请诸公直言无隐。"长孙无忌、唐俭等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道："近来上书凡是不合圣心的，陛下都当面穷诘，无不惭惧而退。这恐怕不是广开言路之道。"马周也谏道："陛下近来赏罚，有点以个人喜怒决定轻重。"太宗表示采纳。

有一次太宗大怒，要在朝堂将苑西监穆裕斩首。由于太子李治犯颜进谏，太宗才停止这一错误行动。长孙无忌感叹地说："自古太子进谏，只是见机从容而言。今陛下发雷霆之怒，太子能犯颜直谏，真是古今无有。"太宗说："人久相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纳谏，遂有魏征朝夕进谏。魏征辞世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续直谏。太子自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喜谏者，感染成性，所以有今日之谏。"

贞观二十年十二月，太宗亲写诏书求谏。他说："朕即位以来，抚育黎民，既怕大德有亏，也惧小过积累。因此，望忠臣直言极谏。但今日谏鼓空悬，不闻逆耳之言。想魏征在时，每谏朕过；自其去世，虽有不多。岂是朕往日有错而今日全对，恐是群臣苟顺旨意，不逆龙鳞。望自今以后，众卿各尽忠心，直言无隐!"不久，房玄龄因小错受责回府反省。褚遂良上书道："玄龄自义旗初举，

就有翼赞大功；武德之际，冒死决策，助陛下转危为安；贞观之初，选贤定制。人臣之勤，玄龄为最。非犯有不赦之罪，不可遗弃。陛下若因他衰老，应该致仕，退之以礼。怎能因小错而弃数十年的勋旧！”太宗阅罢，连忙请玄龄进朝理政。

贞观二十一年八月，齐州平民段志冲上书，竟然请太宗传位太子。长孙无忌请杀此人。太宗不仅不同意，还亲笔书诏道：“志冲欲以匹夫解天子位，朕若有罪，是他正直；朕若无罪，是他狂愚。譬如尺雾障天，不损天大；寸云遮日，何损日明！”

太宗晚年因征辽东，军旅屡动，加上兴建宫室，百姓有些疲于劳役。嫔妃徐惠于贞观二十二年三月谏道：“自贞观以来，二十二载，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但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终，愿陛下警惕。妾见近年来，力役多兴，东征辽东，西讨龟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运输。虽除凶伐暴，国有常规，但黩武玩兵，先哲所戒。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怜疲恤乏，减徭役之繁。”又说：“妾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土木之功，不可兼兴。但翠微、玉华宫相继营建，颇费工力。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民以时，则民力不竭而心悦！”还说：“珍玩巧物，是丧国的斧斤；珠玉锦绣，是迷人的毒酒。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望陛下鉴百代安危之迹，得兴衰祸乱之机，抑欲节奢，慎终如此！”太宗不仅重视这一谏言，还礼重徐妃为人。

这年七月，房玄龄病危。临终前对儿子们说：“我受主厚恩。今天下无事，惟征辽东未停，群臣不敢谏，我知而不言，死有余辜。”遂上表谏诤，请罢辽东之役。太宗亲临探视，握手诀别，悲不自胜。次年五月，太宗也离开人世。

关于太宗纳谏臣直言一事，司马光就裴矩进谏作这样的评论：“古人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本性改变。君恶闻己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可知君是表，臣

是影，表动则影随呀!”正因为太宗求谏、纳谏，才导致各方面人物直言极谏。而正是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制约了太宗奢侈腐化的倾向，提高了行政效率，并避免了不少错误。它对“贞观之治”的产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千古佳话。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贞观政要》：《求谏》、《纳谏》

《资治通鉴》卷191—199

两唐书：《魏征传》、《太宗妃徐氏传》

《册府元龟·帝王部·招谏》

太宗知人善任

贞观十八年（644 年）八月的一天，唐太宗和重要大臣商讨国政，其间他想求谏，于是对长孙无忌等说："朕闻君贤则臣直，人很难有自知之明，请诸位当面直言，专讲朕的过失。"但长孙无忌却说："陛下文治武功，空前绝后；发号施令，无不妥当，臣等实看不出陛下有何过失。"太宗很不以为然地说："请公言朕的错误，公却歌功颂德，那朕就当面讲各位的得失，以为戒鉴。"随后，太宗对身边大臣的优缺点一一进行了评论。他说："长孙无忌身为国戚，善避嫌疑，处理政务，迅速果断，合乎情理；但率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学问渊博，心胸光明正大，临难不改大节，当官不结私党；不足的是缺乏直言极谏。唐俭言辞敏捷，并善于与同僚和好相处；但事朕三十年，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情谨慎，能独善自身；但实在怯懦，不敢负责，紧急情况下难以依赖。岑文本为人敦厚，文章华美，而且深谋远虑，能担当重任。刘洎性最坚贞，敢于真言极谏；然而太重朋友间的私人感情。马周观察事物敏锐，性情坚贞，品评人物准确，处理政务公正，朕所托付大事，多能胜任。褚遂良有学问，性也坚正，尽忠效力，亲附于朕，就象飞鸟随身，让人喜爱。"唐太宗对当时的重要大臣的优缺点能如数家珍一样，这是他知人善任的一个缩影。

太宗能知人善任，首先由于他认识到有了正确的施政方针，还必须有一批贤能的官员，这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亡的大事。贞观元年他就对房玄龄说："致治的根本，在于'慎选贤能'，'量才授

职'，设官要少而精。"还打比方说："任官不得贤才，好比画地作饼，不能食用。"他对太子李治说："治国的关键，在于进贤退奸，赏善罚恶，至公无私。"他对大臣褚遂良说："我要始终坚持做三件事：一要以前代成败作为借鉴；二要进用善人，共同治理天下；三则斥弃奸邪小人，不听谗言。"他晚年为教育李治总结一生治国之道写成《帝范》一书，专设《求贤》篇，其中写道："国家的辅弼大臣，必须选用忠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又说："黄金再多，不如人才济济。"

唐太宗一生把选贤任能作为治国之本，并要求宰相等大臣也要这样做。太宗即位不久，就叫宰相封德彝举荐贤才，但过了较长时间德彝没有举荐一人。太宗询问原因，德彝说："臣并非不尽心此事，只因现今没有奇才值得向陛下推荐。"太宗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君主用人就象使用器具，各取所长。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而实现太平盛世，难道都借用别的朝代的人才辅佐的吗？问题恐怕是自己不知人，怎可诬称今世没有人才呢！"后来，太宗也为此事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他说："公等身为宰相，应替朕分忧，广开耳目，求访贤才。但听说你们每日忙于处理诉讼等一般事务，这怎能助朕选拔贤才呢！"

为了消除大臣在协助皇帝举贤任能方面的顾虑，太宗在贞观初就对大臣们讲："朕现在孜孜不倦地访寻贤才，专心探求治国的道理。一旦发现你们推荐的贤能之士，立即提拔重用。但也有些人议论说：'选拔重用的那些人都是宰相的亲朋故旧。'诸公只要出于公心，就不要顾忌这些流言蜚语，缩手缩脚。古人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是为了能举荐出真正的贤才呀！望诸公大胆举贤任能，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和自己有仇怨，也毫不迟疑。"

太宗还把能否举荐贤才作为赏罚大臣的重要依据。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就因为任职很久，从不向太宗进一贤者，退一小人，而被削职为民。

唐太宗不仅对用人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提出在选拔人才时要把品德放在首位。贞观三年他对杜如晦指出选人中存在的问题："朕最近见吏部选人，只注重言辞华美，而不了解品德行为。品德不好，任官数年后，恶迹暴露，那时虽以刑法严惩，但百姓已身受其害。这样的选人怎能获得贤才！"后来，太宗和魏征又讨论这一问题。他说："君主选人任官，必须小心谨慎。朕今一言一行，都被天下人观察仿效。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魏征补充说："知人，自古以来就以为很难，因此进行考绩，察明善恶，以定升降。今日欲求贤才，必须深入访察品行，只有访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才能任用。这样的人即使办事不利，也只是才能不强，对国家不会造成大害。若误用了奸佞小人，越是强干，为害越大。在乱世时用人可以专取才能，不顾品行；但太平时必须德才兼备，才可任用。"

后来，魏征在给太宗的上书中提出君主要能识别"六正"、"六邪"。他解释道："所谓六正，即一为圣臣。这类大臣有天才般的预见能力，在事物还处于萌芽时就已经洞察其利弊得失，防患于未然，从而使君主超然立于显荣之位。二为良臣。这类大臣竭心尽力，孜孜不倦地劝导君主施行礼义仁政。君主做的对时能加以鼓励，做错时能够补救。三为忠臣。这类大臣夙兴夜寝，进贤不懈。并经常谈古论今，激励君主专心求治。四为智臣。这类大臣在事情刚一出现就能明察成败，对祸患能早做预防，杜绝祸根，转祸为福，使君主高枕无忧。五为贞臣。这类大臣严守法令，做官不受贿赂，而且能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为直臣。这类大臣在国家混乱时，不同流合污，敢冒犯君主的威颜，面指君主的过失。所谓六邪：一为具臣。这类大臣安居官位，贪图俸禄，不理公事，左右观望，随波逐流。二为谀臣。这类大臣对君主说的一切都说对，做的一切都赞好，千方百计迎合君主的嗜欲，以讨取欢心，而不顾后患无穷。三为奸臣。这类大臣内心奸险，外表谦

恭，能言善辩，妒善嫉贤。他想进用的人，就只讲优点，隐其罪恶；想黜退的人，则只讲过失，藏其美德。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四为谗臣。这类大臣的智慧足以掩过饰非，灵牙俐齿也足以打动君主。内可离间君主骨肉，外可制造朝廷祸乱。五为贼臣，这类大臣专权擅势，破坏法令，结党营私，损国富家，而且擅于假借君主旗号，自我吹嘘，吓唬别人。六为亡国之臣。这类大臣一方面以邪恶的手段引诱君主，荒淫无道，一方面结成朋党，蒙蔽君主的视听，使君主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直至恶名无人不晓。"这里魏征实际上提出了两大类十二条识别官员的具体标准。这十二条标准中"六正"类大臣中，只有"智臣"就其才能而言，"圣臣"是德才兼备，其他的都是从德的角度提出的。而六种邪臣没有一种是由于无才，全部是由于无德。魏征认为，君主用这些标准去考察官员的实际行动，就不难知人。太宗对此很是赞同。

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忠臣，奸佞，貌同心异。唐太宗知道，自己认为贤良的，未必尽善；众人加以诋毁的，未必全恶。他对魏征说："朕近来读书，每见善事，立即就办。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因此知人极为不易。"特别是唐太宗清醒地知道自己地位特殊，更容易被臣下所欺骗。他曾感叹地对大臣们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无所不用其极，以求宠禄。"这就更增加了知人的难度。

唐太宗懂得知人难的道理，从而形成了自己辨别忠奸贤佞的原则和经验。有一次他来到一棵树下，随口说道："这树长的真好啊！"跟在身边的宇文士及顺口答音，滔滔不绝地赞美起这棵树来。唐太宗这时表情严肃，尖锐地说："魏征曾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心中怀疑是你但不敢确定。今天见你所为，佞人果然是你。"唐太宗把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佞人，而把魏征为代表的敢于为国事面折廷争的人视为忠贤。他在《帝范》中也指出：谗

佞之徒的重要特点，就是用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取悦君主。象唐太宗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确实难能可贵。

唐太宗还从臣下是否能实事求是地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来识别忠奸。他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朕所以广开言路，是想知天才冤屈之事和能听到谏诤直言。但无知小人却乘机告讦谗毁，挑拨君臣关系。而君臣相疑，则下情不能上达，这非常有害于国。"因此，他要对这些告讦小人治以谗人罪。

魏征在一次上书中指出："作为君主，要近君子而远小人；而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但君子小过，象白玉微瑕，小人小善，就象铅做成的刀一样，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欣赏小人的小善而憎恶君子的小过，结果就会玉石不分，香臭不辨了。"唐太宗认为魏征此论颇有道理，因为要识别贤佞必须注意抓住一个人的本质和主流，为此赐绢三百匹以示奖励。

唐太宗为了知人，有时还让群臣互相品评优缺点。有一次在宰相的宴会上，他对王珪说："听说你很善于识别人，今日请你从房玄龄以下一一加以品评，而且将自己和众人加以比较。你意下如何？"王珪遂说道："孜孜不倦操劳国事，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文武兼才，出将人相，臣不如李靖。陈奏详明，谈吐公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政务，一一恰到好处，臣不如戴胄。愿君成为尧、舜，以直言极谏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嫉恶好善这一点，臣和众人相比，还不逊色。"太宗连连点头，被评众人也口服心服。

唐太宗作为明君，不仅有辨别忠奸贤佞的理论和标准，而且对所用的每个大臣的优缺点都了如指掌。前述贞观十八年八月的宴会中所作的评论，就是一个例证，他对臣下了解的这样准确，可称得起是真正的"知人"了。

知人难，用人更难，难在善任，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唐太宗在善任方面也做得相当成功。

唐太宗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因此用人要舍短取长。他在《帝范》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议论：“明君之任人，就象巧匠使用木材：直的用作车辕，曲的用作车轮；长的用作栋梁，短的用作房椽。这样，无论曲直长短，都有恰当的用处。明君用人也是这个道理：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这样，无论智愚勇怯，都能兼而用之。所以能工巧匠没有废弃的木料，明君也没有不能使用的人才。”唐太宗批评宰相萧瑀时也曾指出：“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长。”房玄龄、杜如晦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置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遵循“舍短取长”原则，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宰相之才。结果，两人都成了辅助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名相。戴胄的短处是不通经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曾任用他为大理少卿。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滞留。并敢于犯颜执法，纠正唐太宗量刑过重的过失，使太宗发出“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这既是对戴胄的好评，也说明了唐太宗舍短取长，用人得当。

唐太宗用人尽量冲破门第、地域、民族、亲疏等关系的局限，把地主阶级中各阶层乃至贫贱出身的人才选拔出来，为己所用。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明君广求英才，博访贤能，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虽重用关陇集团中的人物，如提拔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杨师道、杜淹、侯君集等为宰相，也兼用出身山东和江南士族中的人才为宰相，如房玄龄、高季辅、王珪、褚遂良、岑文本等。朝中文臣武将有出身原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等。有的是他的政敌部下：如刘洎原是萧铣部下，戴胄原是王世充部下，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大将，魏征最初是李密部下，后又投归太子李建成；还有李建成亲信部将冯立和李元吉部将谢叔方等。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为太宗所重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铁勒人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甚

至还有奴仆出身的人，如钱九陇、樊兴、马三宝等。

唐太宗知人善任传为千古佳话的是用仇人魏征，和从布衣平民中擢用马周。魏征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被太子李建成收用。在唐初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建议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了阶下囚。唐太宗知他才华出众，不报私仇，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数年间从仇家而提升为宰相，任期达十四年之久。唐太宗对魏征信任不亚于自己原来的亲信房玄龄、杜如晦，经常召人寝宫，请教治国方略。魏征也不负厚望，面折廷诤，频加忠谏，劝行仁政，不许为非，充分发挥了个人的政治才能。唐太宗赞扬魏征"随时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在封建帝王中"弃怨用才"能达到如此落落大度的地步极为罕见。马周家贫好学，精通《诗》、《传》，后辗转到长安，住在武将常何家。贞观三年唐太宗令百官上书言政事得失。常何不懂经学，就请马周代写章奏，马周写了二十余件事。常何上奏后，竟然条条皆中太宗心意。太宗觉得奇怪，因常何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如何能有这般远见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如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奇才，随即宣旨召见。由于求贤若渴，急不可耐，短短时间内竟四次派使者催促速来。接见交谈后，大为满意，马上授门下省官职，后直提升为宰相。马周精通治国之道，而且办事精密，甚得时人赞誉。太宗也曾亲笔题十六个大字相赐："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这是对马周辅政的高度评价。唐太宗就这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形成了贞观一朝贤臣良将盈廷的盛况。

为了使谋臣勇将，文人学士都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唐太宗在君臣关系中确定了以诚待下、用人不疑的原则。他对大臣们说："君臣一体，应协心同力。若君臣相疑，不能肝胆相照，是国家一大祸害。"他在《帝范》中也写道："立国治人，要靠大臣和君主同心同德。"这方面生动的例子很多，唐太宗以诚信感动冯立

是其中之一。

冯立在唐高祖朝任东宫率，是太子李建成的宿卫军将领，很受建成信任和重用。因此，当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后，东宫官吏见大势已去，纷纷逃散，他却慨然长叹："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率东宫兵进攻玄武门，经殊死苦战，杀了拥戴李世民的将领敬君弘后，对部下说："总算报答一点太子的恩惠了。"才解散兵众离去。后来他向李世民自首，世民开始斥责他杀死秦王府战士太多，难逃死罪。当听到冯立说自己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忠于职守，认为是位"义士"，随即转怒为喜，厚加抚慰，并授左屯卫中郎将，仍统兵掌管京城宿卫。冯立深受感动，对亲人说："我受到如此厚恩，一定以死相报！"不久，李世民即帝位，东突厥默啜乘唐室内乱率大军兵临城下，冯立率百余骑兵与突厥激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披靡。太宗闻听，感叹许久。

唐太宗以诚信感动尉迟敬德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尉迟敬德是在唐平定刘武周时和寻相等一起投降的。后来李世民率大军征讨王世充时寻相等又叛唐逃走。唐将屈突通、殷开山等怀疑尉迟敬德，于是私下把他囚禁军中，并建议李世民杀掉以绝后患。世民知道敬德如果想叛逃，不会等到寻相之后，立即下令释放，并引入卧室，赐给黄金，请敬德不要因这件事情记仇，表示自己决不会听谗言杀害忠良。还说，如敬德不愿做自己部下，一定想走，就以这些黄金为路费，以表前段共事之情。李世民的诚信，深深打动了尉迟敬德的心。就在同一天，李世民只率五百骑兵观察阵地，被王世充部将单雄信率军万余突然包围，异常危急。敬德奋勇拚杀，刺单雄信坠马，掩护李世民杀出重围。在玄武门之变的殊死争斗中，李世民追杀李元吉被树枝所挂，重摔在地上不能站起；元吉反过手来正要扼死李世民时，敬德跃马赶到，才化险为夷。而冯立、谢叔方率东宫、齐王府兵猛攻玄武门，并要乘秦王府空虚予以袭击时，李世民一派形势很不利，又是尉迟敬德手持

李建成、李元吉首级及时赶到，东宫、齐王府将士由此而丧失斗志，这对政变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尉迟敬德对李世民如此忠心耿耿，为唐朝打天下，为李世民夺帝位立下汗马功劳，正是唐太宗以诚信待臣下的结果。

更可贵的是，唐太宗对少数民族将领也同样信任。阿史那社尔官居左骑卫大将军，统领守卫皇宫的北门禁军。契苾何力也曾执掌北门禁军，官升至左骁卫大将军。贞观十六年，契苾何力回本部族探望母亲，不料契苾部落归附了薛延陀，他遭到绑架。薛延陀可汗命契苾何力投降。他抽出佩刀，大呼："岂有大唐壮士屈膝投降之理!"并割下左耳表明宁死不降。契苾何力到薛延陀后，唐廷不明真象的人纷纷议论，说契苾何力本是胡人，现如鱼得水，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唐太宗却说："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叛我!"不久，真实消息传来，太宗落泪对群臣说："你们看契苾何力如何!"于是，太宗立即派使者到薛延陀，以许嫁公主为条件才将何力换回。唐太宗病逝后，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特别伤心，竟然请求杀身殉葬，遗诏不许。但可见这些少数民族将领对唐太宗的赤胆忠心。

要做到以诚待下，用人不疑，必须防止谗言挑拨离间。贞观元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攻击宰相杜如晦等权势过大。唐太宗对戴胄说："朕以公治天下，今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非因他们是我原来的亲信，而是由于这两人有才能。陈师合无中生有，妄加毁谤，想离间我君臣关系。往昔蜀后主刘禅昏弱，但国家得治，只因信任诸葛亮而不猜疑。朕今任用杜如晦等，也要如此。"为了警告谗言离间，将陈师合流放岭外。有人诬告魏征谋反，太宗大怒道："魏征过去虽是我的仇人，但他忠心耿耿，我所以提拔重用。怎能这样诽谤，陷害!"遂将诬告斩首。后来，宰相萧瑀由于与同僚不合，攻击房玄龄暗结朋党，图谋不轨。太宗批评他太言过其实，并说："人君选贤才作为左膀右臂，应当推诚信任。"

屈尊礼贤也是唐太宗善于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和李靖谈话，常以兄相称，与魏征谈话，也不用皇帝专称，常自称名字。这种平易近人作风，在历代帝王中颇为少见。阿史那思摩在征辽东战役中被弩箭射中，唐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去毒，将士无不为之感动。徐世勣得了急症，医生开的药方中说用"须灰"方可治疗，太宗得知，剪下自己的胡须为徐世勣合药。世勣感激万分，病愈后入宫拜谢，双目垂泪，叩头出血。太宗说："我是为了国家，无须深谢。"马周有病，迟迟不好，唐太宗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为马周建造疗养宅院，还亲自为马周调药，叫太子前去问候。魏征病时更是如此，太宗派人住在魏征府中，随时将病况奏闻，送去的饮食，药品不计其数，还两次亲去探望。魏征逝世，太宗登禁苑西楼遥望灵车痛哭，后常思念不已，留下了"魏征没，朕亡一镜"的千古佳话。

为了调动臣下的积极性，防止渎职尸位，唐太宗在用人上非常重视利用赏罚这个有力的武器。但他的赏罚原则不是以臣下"顺己"或"逆己"为根据，而看对国家有功还是有罪。他在《帝范》中这样写道："要用惩罚来威慑，要用奖赏来教化。有威慑恶人才惧怕，有教化好人才奋进。然而，对一味顺从自己而妨害治国之道的人，不能加官进爵；对违逆自己而有利于国的人，不能施以刑罚。因此，君主奖赏的人，不是因为能讨好自己，而是功劳所致；君主惩罚的人，也不是出于个人私怨，是其罪当如此。"唐太宗的高明处在于努力排除个人感情上的好恶进行赏罚，这样能够真正赏善罚恶，公平得当。

贞观初年唐太宗奖赏功臣，恐有不当，叫臣下提意见。皇叔李神通不服房玄龄、杜如晦所受封赏高于自己，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杜等刀笔吏反功居第一，臣心不服。"唐太宗于是历数李神通战场上的败绩，摆出了房、杜运筹帷幄，安定国家的功劳，然后指出叔父虽是至亲，但不能因私情滥加奖赏。唐

太宗一生在赏罚大臣中也出现过个别的失误，但就总的方面来看，他自己晚年曾说："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我未尝黜责一人。"基本符合事实。

唐太宗根据德才两个方面制定了考核官员的具体制度，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指二十七类官员办事的标准。如"选司之最"是"铨衡人物，擢尽才良"。根据为官的"善"、"最"程度，把官员考第分为九等，凡属"四善"与"一最"的为第一等，以下依次递降，那些"居官谄诈，贪浊有状"的为最末一等。有了这一套具体制度，就能更好地委任责成，公平赏罚。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有效地调动了群臣办事的主观能动性。群臣们无不竭尽其智，尽其能，毕其力。房玄龄官居尚书省之首时，不分昼夜，尽心竭力，恐怕有一件事处理不当。甚至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征辽东。唐太宗感动地说："此人病危若此，还忧虑国家之事。"真是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岑文本被唐太宗任为宰相后，日夜勤劳，笔不离手，直到精力耗竭，染病身死。唐太宗破格提拔的马周，欣逢明君，竭尽才能。魏征更是喜遇知己之主，成为千古直言极谏方面的名臣之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旧唐书》作者对唐太宗用人及其效果作了这样的评论："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他指出了"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唐太宗知人善任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贞观政要》：《择官》、《任贤》、《杜谗》、《公平》、《政体》、

《忠义》

《资治通鉴》卷192--199

两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契苾何力传》、《钱九陇传》、《樊兴传》、《马三宝传》、《马周传》、《徐世勣传》、《执失思力传》、《魏征传》、《房玄龄传》、《职官志》

《唐会要·委任》

《帝范·求贤》

《全唐文·金镜》

唐·刘肃《大唐新语·谀佞》

胡如雷《李世民传·明于知人善于任使》

太宗执法慎刑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帝大权独揽，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独裁统治下，皇帝的诏敕具有与封建国家法律同等、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皇帝还具有最高的立法与司法权力。这就造成皇权凌驾于法权之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以私敕随意践踏国法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在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却基本做到能执法慎刑，成为他“贞观之治”业绩中一个耀眼的闪光点。

唐太宗即位后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就确立了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仁政”，来代替隋末严刑酷法、恣意杀戮的暴政，而体现在立法原则上就是宽法慎刑。因此，在制定《贞观律》的过程中，本着“变重为轻”的精神，把九十余条死罪律文降为流刑，把七十余条流刑降为徒刑，而且改五十条绞刑为断右趾，使死刑律文比古代几乎减少一半。

不久，唐太宗又要革除肉刑。他对大臣们说：“前代很久不施用肉刑，今增断人右趾的律文，恐不妥当。”谏议大夫王珪认为：“古代以肉刑为轻罪，今陛下怜悯叛死罪的犯人太多，才将本当死刑改为断趾。这些人死中获生，虽失一足也感陛下恩德。况且，让别人看见，也能引以为戒。”太宗还是觉得不妥，又和萧瑀、陈叔达讨论此事。这两人看法和王珪相同。贞观元年（627 年）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奏，指出律令不便治国的四十余事。太宗令与房玄龄进一步删改律令。他们上奏认为，古代五刑，刖刑是其中

之一。后废肉刑，改五刑为死、流、徒、杖、笞。今再设刖足，便成了六刑。当初减绞刑律文，意在宽弘，而增此刑又加繁峻，不符合立法宽减的精神。太宗又让与八座（尚书令、仆射、六部尚书的合称）共同商定奏闻，终于决定废除断趾，改为流三千里，加劳役二年。

贞观四年，唐太宗读《明堂孔穴图》，见五脏都附于背，叹道："笞刑是五刑之中最轻的，可一些人却因受此刑致死。古代帝王不明白其中道理，岂不悲哉！"于是下诏不许鞭犯人后背。此外，为了防止在刑具上作手脚以轻重徇情，还明文规定了枷、杻、钳、锁的长短粗细尺寸。

慎刑宽法是唐太宗强调的立法总原则，在此基础上他还注重立法的简明划一性和相对稳定性。贞观十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不可一种罪定出几种律文。格式太多，官员不能尽记，奸人就会乘机作祟：想徇私轻判就援引轻条，想报复重判就援引重条。因此，每定一条律文，一定谨慎，不要出现这种弊病。"次年，他又对大臣们说："法令若不稳定，则人心多惑，无所适从，奸诈就会从中产生。"太宗还肯定汉代萧何辅佐汉高祖制定法律，能整齐划一。这些立法原则的贯彻有利于量刑的准确性，防止贪官污吏舞弊破坏法制。

唐太宗不仅确立了具有一定进步性的立法原则，而且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使贞观律令能够严格执行。太宗深知，如果立法者本身破坏法制，违律行事，法律定得再好，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曾说："君主不约束自己而禁止别人为非作歹，就好象恶火燃烧，添薪望其止焰，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之法。"因此，唐太宗很注意以身作则，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权力，一般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唐太宗在严格执法守法方面，有很多生动的事例。

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连续发生两件棘手的司法案件。第一件事，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见驾，没有解下身佩的钢刀就从东上阁门进入宫中；出阁门后，监守阁门的校尉才发觉。当时，太宗叫大臣们讨论给两人如何定罪。宰相封德彝考虑到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的妻兄，而且君臣关系极为密切，遂提出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有人带刀进入宫内，论罪当斩；长孙无忌是出于疏忽，误带刀入宫，应判徒刑二年，可用铜二十斤赎罪。太宗刚答应，掌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就提出反驳："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长孙无忌带刀入内，都是疏忽失误。臣子对皇帝，不得称误。按刑律规定：'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如果念无忌功勋卓著，想特恩宽恕，那是您的特殊权力；如果依法而断，罚铜一说，是不恰当的。"太宗听后说道："法不是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法律。朕怎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破坏法律呢！"于是叫大臣再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又要同意，戴胄再次反驳道："监门校尉是因长孙无忌才导致犯罪，按法当轻；若说失误，则情况相同，而定罪如此悬殊，臣实不敢苟同。"唐太宗觉得有理，于是免除了校尉的死罪。

这事过后不久，朝廷大开仕途，选拔官吏，但不少人假造资历，混水摸鱼。唐太宗发现这一问题，敕令有这种行为的人必须自首，否则被查出来要处以死刑。果然有人暴露了这样的罪行，但大理少卿戴胄根据法律定成了流放罪，这一判决和太宗的敕令发生了矛盾。太宗召戴胄怒斥道："朕已经下过了不自首就处死的敕令，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断成流刑？这不是向天下人显示我言而无信吗？"戴胄反驳说："陛下尽管操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但案件既然交付法司审理，臣就要忠于法律，不能枉法屈断。"太宗虽然感到戴胄说得有理，可一想到这会有损万乘之君的威望，仍固执地质问："你守法，难道就叫朕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振振有词地说：法是国家向天下宣示的最大信用，而君言是一时感情冲

动所发出的。陛下因恨选人中的欺诈行为，发出要处以死刑的敕令，又知道这不正确，所以叫法司据法断案，陛下此举正是忍小愤而存大信呀！”当戴胄指出国法比君言重，也就是大信比小信更重要后，太宗恍然大悟，赞叹说：“朕执法有过错，你都能犯颜纠正，朕不再担忧国法不能执行了。”再如，有一次侍御史张玄素弹劾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大怒，下令斩首。中书舍人张文瓘根据律文提出不应该判死罪。太宗坚持道：“国家仓粮，事关重大，如不杀他，恐以后犯此罪的人会更多了。”魏征进谏说：“陛下立法，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今若随意改变，人们必然认为可律外定罪，致使法律失效。况且盗官粮处死，若有比此罪再重的，如何再加重处置？”一席话说得太宗心服口服，收回成命，依法惩办了犯人。

国君要严格执法，关键在是否能做到公正，不徇私情。唐太宗在这方面也较出色。他不仅从原则上强调“朕以至公治天下，法之所行，不私亲昵。”而且也身体力行。贞观三年发生了一件事：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受到撤职追赃的处分。他上书太宗，陈述自己原是秦王府的旧官属，希望得到宽恕。唐太宗心念旧情，想改变原决定，仍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得知后立即谏阻，指出：“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恃私恩违法，这足使好人惧怕。”唐太宗觉得有理，欣然采纳。随后把庞相寿召来说道：“我为秦王时，只是一府之主，今居帝位，而是四海之主，不能徇私枉法，袒护故旧。大臣们提的意见很有道理，朕实在不敢违背！”于是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叫他另去谋生。这个贪官只得默默流涕而去。

贞观九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因在军事行动中贻误军期，受到主将李靖的责罚。他怀恨在心，诬告李靖谋反，被判处“减死徒边”。这时有人因为高甄生是秦王府旧功臣，请求宽免其罪。唐太宗或许接受上次教训，断然道：“高甄生在秦王府时的功劳，诚不可忘。但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他不听李靖节度，又进行诬陷，此

若宽免，法将如何执行！国家自太原起兵以来，功臣甚众，若高甄生获免，则有功之人都可犯法了。这是我不敢赦免他的原因。"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处理党仁弘案，更能生动说明这一代英主如何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党仁弘原是隋朝武将，李渊太原起兵入关时，他率部下二千余人归顺，随从攻克长安。因功授陕州总管。李世民统领大军平定关东地区，党仁弘转运粮饷，及时供给，在统一战争中又立了功勋。后又历任南宁、戎州、广州都督。此人有才能，所任官处也不乏政绩，太宗对他很器重，但致命弱点是贪财。离任广州都督后，有人揭发他贪脏百余万，依法当判死罪。太宗见到大理寺请求批准杀党仁弘的奏书后，既念他旧功显著，又可怜他白发暮年还要受一刀之苦，想赦免党仁弘的死罪，可这样又破坏了法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尽量减轻坏的影响，他将五品以上官员召集到太极殿，态度极为恳切地说："法，本是君主受于天，不可因私情而违背。今日朕哀怜党仁弘，想赦免他的死罪，这是自己乱法，上负于天。人臣有过，向君主请罪；君主有过，应向天请罪。朕要在南郊祭天，处席藁而卧，每日只吃一次蔬食，向天谢罪三日。"房玄龄等都说："生杀大权，本是君主专断独行的事，何必自我贬责到这般地步！"太宗坚持要这样做，群臣反复劝阻，清晨直劝到中午，太宗才答应不去南郊向天谢罪，但仍亲笔书诏自责，称："朕有三罪：其一，知人不明；其二，以私乱法；其三，善善未赏，恶恶未诛。"随后，将党仁弘免职为民。远徙钦州（今广西钦州东北）。在封建社会中，手操生杀之柄的封建皇帝能这样引咎罪己，来尊重法律，实属罕见，这不仅对维护法制有一定作用，也给臣下做出了不能违法的典范。

对宗室皇亲，唐太宗也不允许居于法律之上。为了预防子弟们破坏法度，他选择正直的官员做师傅，训导诸王，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奏闻，以便制止。其中严重的，也严惩不贷。凉

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纠集一群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太宗派中书令宇文士及前去追查，这些无赖还想杀宇文士及，拥戴李幼良割据河西。太宗查清此事，将李幼良赐死。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贪脏，太宗下令将他逮捕入狱。并对大臣们说："李道宗俸禄很高，所得赏赐也不少，而如此贪婪，真是可耻！"随后削去官职。还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唐太宗有一姐姐名长广公主，初嫁赵景慈，生子赵节。赵景慈唐初战死后，长广公主改嫁杨师道。太宗朝赵节任洋州刺史，和太子李承乾关系密切，参与了李承乾谋反。事情暴露后，太宗令宰相杨师道和长孙无忌共同审讯，赵节罪当斩首。杨师道在审案中暗替赵节开脱，从相位贬为吏部尚书。事后，唐太宗到姐姐处，长广公主不禁痛哭，他也边落泪边解释道："赏不避仇，罚不阿亲，这是天下至公之道，我实不敢违背，所以对不起姐姐了。"唐太宗就这样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扰。

唐太宗对死刑的处理特别慎重。贞观元年他就对大臣们郑重地说："人死不能复生。自今以后，死罪都经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及尚书、九卿合议断定，如此，可免除冤滥。"据记载，贞观四年，全国仅有二十九人判处死刑。

从《北魏律》到《隋律》，都有处决死囚需"三复奏"（连续三次上奏皇帝批准）的条文。贞观五年十二月，唐太宗进一步完善死刑审批手续。他对大臣们说："死刑事关重大，为了深思熟虑，避免杀错人，所以规定了三复奏。但以往三复奏仅在一日之间，使人无暇思考，徒有虚名。"于是规定，自今以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要"五复奏"，即在处决前一日复奏两次，处决当天复奏三次；天下诸州三复奏。还规定，门下省在审核囚犯，有据法当死而情可宽恕的，要录下奏闻。此外，为了突出审批案件的严肃性，唐太宗又规定行刑日皇帝不食酒肉，宫中不奏乐曲。

唐太宗上述行为事出有因。原来，他初即位时，有一小官名张蕴古上《太宝箴》，文义甚美，可为规诫，博得太宗赞赏，提拔

为司法官员大理丞。可是，贞观五年八月竟死在唐太宗的盛怒之下。当时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李好德患有精神病，口吐妖言，太宗令大理寺审讯。张蕴古奏道："此人患精神病是实，胡言乱语，自是难免，据法不该治罪。"唐太宗同意宽免，张蕴古就暗中将此消息通知了李好德，并和他对棋。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道："张蕴古原籍相州（今河南安阳），而李好德兄李厚德正任该州刺史，张蕴古是蓄意包庇。"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张蕴古斩首。气消后，太宗后悔自己办了一件错事，因为张蕴古这样的问题据律并不能构成死罪。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承认了错误，并批评宰相房玄龄为何不敢谏诤，有关司法机构为何不复奏。当即下诏："自今有死罪，虽敕令斩首，也要三复奏才能行刑。"随后，又进一步改革为"五复奏"。

唐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从刑部转来的各地疑案、死刑及中央百官的犯法案件。由于这一机构职责关乎人命，唐太宗从慎刑的原则出发确立了大理寺官员必须精选的严格标准。戴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性情刚正，有才能，又精通律令。贞观元年，太宗就选任他为大理少卿。戴胄任此官后，犯龙颜，执法令，所断刑狱，皆无冤滥，而工作效率极高，审讯时引用律文，言如泉涌。大理寺卿唐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任万泉县丞时在执法方面就有很高威信。有一年，县中监狱关押十余名轻罪犯人，到春末时，虽及时降雨，但家中田地仍未耕种，唐临请县令暂放他们出去。县令怕担责任，最初没答应。后因唐临挺身担保，县令才应允。他于是和犯人约定，春耕完毕立即回到监狱继续服刑，深受感动的这些人果然按时返回。唐临被提升大理寺卿后依然秉公执法，断案精当。唐太宗为了尽量避免冤狱，有时还亲到大理寺查问被判死罪的囚犯有无冤屈。唐临刚任大理卿，太宗就去查访了，发现前任官所判的十余名死囚口称冤枉，而唐临判处的一名死囚却默默不语。太宗觉得奇怪，因为见了皇帝畏死

喊枉是一般现象，默默不语实属反常，于是问其缘故。这一死囚犯答道："唐大人断我死罪，一定不会冤枉，所以甘愿受死。"太宗赞叹良久，自言自语地说："断狱应达到这样的程度才好。"随后，将唐临提拔为御史大夫，还亲自给写政绩评语为："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唐太宗慎选中央大理寺的司法官员，并加以鼓励，无疑对公正执法起很大作用。

唐太宗还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造成冤案的教训，健全了刑讯制度。《贞观律·断狱律》中规定，审案时必须首先详察辞理屈直，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要受到杖六十的刑事处分。并进一步对拷讯也作了限制：拷打囚犯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讯数满不承认罪状的，取保释放。此外，还规定法官滥用酷刑，拷打致死者，要依法处以过失杀人罪。唐太宗慎刑思想所体现的这些法律条文，有利于防止屈打成招，含冤而死，是刑讯制度进步的表现。

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喜怒任刑、践踏法律是无法避免的。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也偶有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公开悔过，总结教训。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唐太宗的执法慎刑。

贞观二年，交州都督李寿贪脏获罪后，太宗因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招入朝，让他出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满口答应，拜谢而出。随后考虑交州（今越南河内）荒远艰苦，又以有病为借口不去赴任。太宗派宰相杜如晦宣旨劝喻道："匹夫犹重然诺，卿不应许朕而又反悔！"祖尚不听。太宗再次面见，晓以道理，可卢祖尚仍然固执不从。太宗不由大怒道："我派人不行，如何执政！"令斩于朝堂。不久，他后悔量刑太重，对魏征说："前时卢祖尚违背了臣子之道，但朕杀他也暴躁了，这是朕的过失。"于是追复了卢祖尚的官职，并根据制度荫他的后代为官。

贞观二十年，陕州人常德玄揭发刑部尚书张亮养义子五百人；

与术士公孙常说自己“名应图谶”，又问术士程公颖：“我臂起龙鳞，欲举大事，能成功吗？”太宗命宰相马周审问。程公颖和公孙常都证明确有此事。但张亮不服，说这两人畏死诬陷。又陈述自己是秦王府旧将，在玄武门之变时有佐命之功，请求宽赦。太宗对大臣们说：“张亮有义子五百是实，畜养此辈目的何在？不正是想谋反吗？”遂命百官议定其罪。大多数官员都主张张亮谋反当诛，独有将作少匠李道裕认为张亮“反形未具”（没有谋反的具体事实），罪不当死。当时太宗盛怒，没能认真考虑，派长孙无忌、房玄龄代表自己到狱中与张亮诀别道：“法是治天下的标准，谁都得遵守。公不自爱，与凶人交往，陷于法网，今将奈何！公好去。”就这样，张亮与程公颖一起被斩首。事过一年以后，刑部侍郎出缺，太宗命宰相精择人选，接连推举数人，都不合乎太宗的心意。一天，太宗忽然对大臣说自己得到了合适的人选，此人就是说张亮“反形未具”的李道裕。并说：“他当时说的很恰当啊，可惜朕没有听从，至今后悔。”

唐太宗还能要求大臣经常提醒自己守法。贞观十一年，他发现法官断狱失之苛严，询问大理卿刘德威是何原因。德威答道：“此关键在君主，不在群臣。君主好宽则宽，好严则苛。律文规定断案时量刑若不准，失之宽要比失之严处罚是轻，但现在实际上恰巧相反，司法官吏怎不竞相深文严判！陛下倘严格按着原定律条考核司法官，则此风气马上就会改变。”太宗高兴得连连点头，从此断狱趋向平允。同年，魏征也直言进谏，指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所以为天下制定统一遵守的法律，是消除因贵贱亲疏而执法不公。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于喜怒。遇喜则循情于法中，逢怒则求罪于事外。”他还批评太宗近来责罚稍多，有时因物不称心，有时因人不从命，都是一些无关宏旨的事情，希望他戒骄奢，注意慎刑。太宗也欣然采纳。

唐太宗能执法慎刑，也带动一些司法官员勇于执法。有的为守法不怕犯龙颜。如贞观初，鄃县令裴仁轨违法私役门夫，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县令斩首。殿中侍御史李乾佑谏道："法令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今仁轨犯轻罪而处以极刑，这是刑罚不当；若此，则天下人无所措手足。臣身为司法官，不敢奉旨。"太宗醒悟，免裴仁轨死罪，并提升李乾佑的官职。

更值得一书的是崔仁师不考虑个人得失，审理冤狱。有一次，青州（今山东益都）发生了一起"谋逆"案件，当地州、县滥肆逮捕，个个带上枷锁。严刑之下，谁能不招，致使死囚填满了监狱。太宗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去复查。他到青州后，一反原地方官吏的作法，将被捕人所带的枷锁除去，给以饮食，还让沐洗干净。他从实际材料出发，作具体分析，最后只将十余名魁首定罪，其余全部释放回家。崔仁师复审毕，回京师奏闻。随后敕使奉命前往处决犯人。这时大理少卿孙伏伽担心地对崔仁师道："您平反的人如此之多，但人情谁不贪生，恐那些死囚见同伴获免，不肯甘心，反咬一口，您恐怕就有口难辩了。"仁师安然地答道："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能容身保位，知其冤滥而不申理。万一因本人才能不高，误有宽纵，但能以我一人性命换十名囚犯之死，也心甘情愿。"孙伏伽听到这大义凛然的话，深感惭愧。而敕使到州再次审讯死囚时，都异口同声说："崔公执法平恕，事无冤滥，情愿速死。"

由于唐太宗执法慎刑，使他有很高的法律威望。贞观六年十二月，他亲自核查罪犯名单，其中被判死罪的有三百九十人，一时动了怜悯之心，敕令全国将这些死囚全部放出，以便和家人能团聚一段时间，定于次年秋季都到京都受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九月，这些暂时放出的死囚都如期来到朝堂，无一人逃亡和藏匿。太宗感叹他们诚信，赦免了死罪。这件事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它只能是执法公允的结果。

正因为贞观年间君臣上下既严格执法，而又宽仁慎刑，所以造成了一代守法之风。《贞观政要·政体》对这方面有这样的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污，有枉法受财的，必惩不贷。因此当时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不敢侵欺小民百姓。社会没有盗贼，监狱常空，外户不闭。"这里自然有溢美之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安定的事实。而若追寻唐太宗执法慎刑更深层次的背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汲取了亡隋的教训：隋炀帝朝君主"益肆淫刑"，司法官"生杀任情"；而隋文帝立法精神虽也"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但执行中却不按法律办事，"每尚惨急"。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实践造就了唐太宗"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并主导了他一生的立法、执法的行动。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贞观政要·赦令》、《贞观政要·刑法》

《资治通鉴》卷192--199

两唐书：《刑法志》、《李道宗传》、《李幼良传》、《戴胄传》、《唐临传》、《卢祖尚传》、《张亮传》、《李昭德传》

《唐会要·议刑轻重》、《唐会要·君上慎恤》

《隋书·刑法志》

《魏郑公谏录》卷1

唐·刘肃《大唐新语·持法》

太宗重农恤民

贞观二年（628年），关中地区继去年雨涝又遭春旱，百姓饥饿，多卖儿鬻女接济衣食。唐太宗得知，对大臣说：“水旱失调，都因人君失德，朕修德不够，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遂派御史大夫杜淹巡视，出御库中的金帛，将卖出的孩子赎回，还其父母。并下诏称：“如果年谷丰登，百姓安然，愿老天将灾难移给自身”。而六月，关中地区春旱之后又闹蝗灾。唐太宗心急如焚，走出玄武门来到宫城北的禁苑，见到了蝗虫，立即捉了几个，向苍天默默祷告后，口对蝗虫说：“民以谷为命，你将谷苗食掉，百姓还怎么活！与其如此，不如让你吃我的肺肠。”说罢就要生吞蝗虫。身边的随从连忙谏阻：“陛下千万不可，吃这种恶物或许会生重病。”太宗断然答道：“朕要替百姓受灾，还怕什么！”遂将蝗虫吞下。据记载，这一年关中蝗灾果然不严重。当然，蝗虫没成大灾和唐太宗生吞几个蝗虫没有必然联系。从表面上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做这种事未免有点滑稽，他的真实意图或许是出于收买民心而做的政治表演，但无论如何，皇帝能做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重农恤民了。

树有根，水有源，唐太宗重农恤民思想形成的渊源是当时的社会实践。隋末十余年的大混战，使唐初时的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唐高祖在位的九年间，大部分时间仍进行统一战争，社会经济没能得到恢复。唐太宗即位时面临的仍是城乡残破的凋敝景象。又逢连年灾荒，粮价飞涨。如何安定饱受战争之苦、挣扎在饥饿死

亡线上的广大民众，是关系到唐政权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唐太宗从历代兴衰特别是隋亡的教训中寻求治国之道。他亲眼看到，一个既富且强的隋朝，由于隋炀帝统治过分残暴而激起全国农民大起义，很快被推翻了。这一事实使他认识到亿万群众的巨大威力，懂得了古人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赢得民心，从而形成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政治思想。早在武德九年（626年）十月，他就对大臣们说："君靠国家，国家靠百姓。苛剥百姓来满足君主的欲望，就象自己割自己的肉吃。结果是腹饱而身亡，君富而国亡。"贞观九年他又对大臣们说："从前，攻克长安时，见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可炀帝意犹不足，征敛无已，又东征西讨，穷兵黩武，至使民不聊生，遂致灭亡，这都是朕亲眼目睹。因此，日夜深思，只有君主清净无为，徭役不兴，年谷丰登，百姓安乐，才能长治久安。治国就象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这些生动比喻，形象地表明他治国必须安民的远见卓识。

在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成分是农业，绝大多数百姓是农民。因此，恢复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是"存百姓"的关键。唐太宗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反复强调民为国本的同时，也不断强调农为民本。他对大臣们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足，则百姓非国家所有。"他在《帝范》一书的《务农》篇中写道："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国无九年的储蓄，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的衣服，不足御寒暑。劝耕务农，就能消除饥寒之患。"唐太宗把谷粟看得重于珍珠玉璧。他叮嘱地方官员们："育物养人，需有粮食；家给人足，全靠务农。纵使珍珠玉璧琳琅满目，也不能解除饥寒。"唐太宗本人也表示自己每吃饭就想到耕田的艰难，每穿衣就思念纺织的辛苦。

唐太宗不仅能从治国兴邦的高度上认识到重农恤民的重要

性，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认真落实均田制，奖励垦荒是其中之一。隋末战乱后，一些地区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唐高祖武德七年虽颁布了均田令，力图使农民归田垦荒。但此后一段时间皇室内争权激烈，加以时间短促，均田令贯彻效果不是很好，唐太宗即位后才切实地推行。在皇帝的影响下，地方官认真落实均田令，并打击违令占田的官僚权势。贞观初，长孙顺德出任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发现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非法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他上奏弹劾二人罪状，并按均田令将这些土地全部分给贫户。

在荒地少人口多的"狭乡"地区，农民得不到法定的土地数。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到灵口（今陕西临潼县内），发现村落密布，询问受田情况，每丁才得三十亩，不足应受田额的三分之一。他忧虑这些民户不能自给，至深夜仍难以入睡。遂令雍州地区（今西安周围一带）登记受田太少的民户，免除赋税，组织他们移居空荒地较多的"宽乡"。贞观年间制定的《唐律》，也反映了唐太宗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志。其中不仅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而且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此外，为了解决类似问题，他还一再减缩皇家园苑，以增加农民耕地。隋朝在洛阳置有上林苑，唐高祖时改名芳华苑。该苑周一百二十六里，唐太宗即位后，将它分赐给了当地农民。贞观十一年七月，洛州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暴雨成灾，谷水、洛水泛滥，官衙、民居全被冲毁，连洛阳宫殿也损坏一部分。唐太宗到洛阳后，下令赈灾，而只将洛阳宫稍加修理，把剩余木材全赐给城中房屋毁坏的人家。又废明德宫和飞山宫的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灾户。由于唐太宗认真施行均田令，贞观年间是这一法令实行得最有效时期，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

唐初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还遇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隋代

极盛时全国户数近九百万，贞观初骤降至不满三百万。为了尽快增加农业劳动力，唐太宗千方百计增加人口。首先，他招来、赎还隋末战乱时流落到边沿各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区域的汉人。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颉利汗送给刚即位的唐太宗马三千匹、羊万头，可他表示不受羊、马，希望归还所掠去的汉族户口。贞观三年据户部统计，汉人从塞外回归以及突厥前后内附等达一百二十万余口。贞观四年东突厥颉利汗降唐，次年，唐太宗用金帛从突厥赎回汉人男女八万口，尽还其家属。直到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还派使者用财物去赎被铁勒掠去的边地汉人。这对于解决中原地区劳动力的缺乏，起了一定作用。

唐太宗还大力奖励男女及时嫁娶，提倡鳏寡婚配，以达到生育人口的目的。贞观元年所颁布的《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中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为法定的婚龄，应及时嫁娶；鳏夫、寡妇守丧期已过的，也要婚配。为了保证男女及时嫁娶，诏令还责成乡里富有之家对贫困不能嫁娶的要资送钱财相助。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地方官考核的依据。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减少，准户口增多，提高考绩等级；如劝导乖方，不能及时配偶，准户口减少，降低考绩等级。这自然提高了地方官执行诏书中各项政策的积极性。唐太宗还特别以物质鼓励生育男口。如贞观三年下诏中说："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赐粟一石。"

唐太宗还大规模地释放宫女。武德九年八月放宫女三千余人。贞观二年九月，又派戴胄、杜正伦释放了一部分。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怜。隋朝末年，不停采选。连根本不去的离宫，也多聚宫人，这种竭人财力的事情，朕绝不做。况且宫女除洒扫之外，又有何用？今放他们出宫，任从婚嫁，不仅能节省国家财力，而且还能生男育女。"这番话道出了他如此而行的目的。

轻徭薄赋是唐太宗重农恤民的重要表现。他一反隋炀帝横征暴敛政策，经常强调说明，只有轻徭薄赋，使农民专心致力于生产，才能民殷物丰，家给人足。为防止滥征民力，唐太宗率先做出节制私欲的榜样。贞观元年，他原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想到秦朝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次年夏秋之交，因太极宫地势低，潮湿而又闷热，大臣们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凉爽的台阁，但是太宗坚决不允。他对大臣们说："朕患气疾，呼吸困难，确实不适宜居住在这卑湿的地方。但若同意众卿的建议，又要糜费不少的人工物力。往昔汉文帝将造露台，需要花费相当于中等户十家的资产。他因崇尚节俭，爱惜财物，终于罢建。朕德不如汉文帝，而所费过之，这岂是为天下父母之道！"贞观四年，他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殿，游赏池台，这是帝王愿意百姓不愿意的事，因为帝王追求享乐，百姓就会劳弊。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实在不能强加于百姓。朕虽尊为帝王，富有四海，但能自我节制，若百姓不欲，必能顺从民情。"魏征在旁立即举隋炀帝好奢侈为例，并说："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唐太宗颇是赞赏。

为了贯彻轻徭薄赋政策，唐太宗还从法律上限制官吏聚敛邀功或滥用人力。《唐律》中规定：非法擅自赋敛以及赋敛擅自增加数额的，要予以刑事处分。修城郭、筑堤防，征发民工要按《营缮令》，计人工多少申报尚书省批准。如不上报或上报未批就擅自行动，也要予以刑事处分。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在这些使者出发前亲自面见，谈了一番生动的劝农道理。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天，若禾谷不丰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接着说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从这想到农民实在非常辛苦。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去州县时到田垄间劝勉，不得令有送迎。若迎来送往，影响农耕，如此劝农，不

如不去。

由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所以他非常强调不违农时。《唐律》中惩办“非法兴造”的条文中既包括“法令无文”，也包括“虽则有文，非时兴造”。因为非时兴造，农忙动工，耽误农时。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能以身作则。贞观五年，发生了皇家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官上奏，二月是皇太子行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的礼仪）的黄道吉日，请征调府兵作仪仗队。太宗道：“现在春耕正忙，恐妨碍农事，可改在十月农闲举行。”太子少保肖瑀援引阴阳家的理论为根据，劝说还是在二月举行为好。太宗认为，吉凶在人，不在阴阳拘忌。只要行为合乎正道，自然就会大吉。并断然地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皇太子冠礼在当时来说是皇家的一件大事，唐太宗宁愿屈己而不误农时，足见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唐太宗的重农恤民，还表现在他藏富于民而不执行过头的储粮于官的政策。贞观二年，他对黄门侍郎王珪批评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愚蠢行为。说：“开皇十四年（594年）大旱，人多饥乏，当时仓库堆满粮食，但文帝竟然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到山东去流浪就食。到文帝晚年，天下库存可供五六十年需用，炀帝恃此富饶，奢侈无道，遂至灭亡。由此可见，治理国家，要藏富于民。古人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的积蓄可备凶年，多余又有何用！后代若贤明，自然能保住天下；如果是不肖，多积仓库，只会增加奢侈，反成了危亡的根源。”从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到隋炀帝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转变为唐太宗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可见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洗礼，唐初赋敛政策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此外，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也是唐太宗重农恤民采取的具体措施。贞观二年春，尚书左丞戴胄联系唐初的经济现状说：“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租米，不入仓廪，随即

出给，才供当年，若遇凶灾，将如何赈恤？”并根据前朝的经验，提出每年秋熟时，计算田亩，抽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储藏在当地，备荒年赈济。唐太宗认为这是利民之事，就交由户部制定了具体条例。同年四月，诏令全国州县执行，设置义仓：粟、麦、粳稻，随地所产，亩税二升，商人无田，据资财将户划分为九等，出粟自五斗至五石；若遇灾荒，以义仓粮赈民，或贷为种子，至秋偿还。唐太宗还声明，义仓虽由官府掌管，但是为百姓渡荒年而作的储备，并非横生赋敛。唐太宗非常重视救济工作，在位二十三年中，除贞观五年、六年、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外，其他十八年每年都有赈恤灾民，而开义仓赈给又占其中的八个年头。

唐太宗既然以农为本，就必然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贞观十一年九月，黄河泛滥，陕州河北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被淹，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视察。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中央的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员外郎，负责全国的水利事业的兴建。还设有都水监，专职掌管京师地区河渠的疏浚和灌溉。此外，还制定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法规《水部式》，以保护河流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因当地民俗喜背商，不事农业。于是引雷陂水，又修筑勾城塘，灌溉农田八百余顷，百姓大获其利。沧州刺史薛大鼎到任，见州内无棣河在隋末淤废，上奏请求开河。经批准后组织民众终于疏通至海。百姓作歌赞颂道：“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因沧州地势低洼，薛大鼎还掘通长卢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季积水，从此，境内无复水灾。贾敦颐任瀛州刺史，州内滹沱河、滱水，每年泛滥，漂流居人，他奏请修筑堤堰后，也消除了水患。如此等等，太宗一朝，约兴修了二十余处水利工程。

唐太宗从各方面推行的重农恤民政策，扭转了隋末社会凋弊的现象，使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

"自贞观初，太宗励精图治，至贞观八年、九年，连年丰收，一斗米价仅四、五钱，马牛遍布原野，社会秩序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到贞观十五年，米每斗又低至两钱。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面对全国大丰收的景象，对大臣们不仅又一次强调了"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如果五谷不丰登，百姓是不会拥护国家"的道理。并说："即使天下富足若此，我身为亿兆人的父母，也只能节俭，不能奢侈。我常想让百姓富贵，现今我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使农民能安居乐业，勤奋耕稼，就能够富。教以礼义，使少敬长，妇敬夫，此就是贵。只要全国都能这样，我虽不听管弦，也乐在其中了。"联系到前述唐太宗初即位时的言行，说明他经常能念念不忘重农恤民。

当然，在生产发展、国力日强的情况下，唐太宗的奢侈心也有时暴露，有一次竟然说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谬论，遭到魏征的尖锐批评和及时遏制。唐太宗临终前一年为教育太子李治有一席深谈。他说："我自即位以来，行为不善处也很多。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楼阁屡有兴作，犬马鹰鹘远方求至，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这都是我的大过。但我弘济苍生，好处多；安定天下，功劳大。好处多损民少，所以百姓不怨恨；功劳大过失小，所以业绩不堕毁；然而，用尽善尽美的标准来衡量，深感惭愧。"他叮嘱李治要以古代的圣君为师，不要效法自己，竭力为善，力戒骄惰奢纵，否则国家性命不保。这是难得的自知之明和高标准地要求自己。纵观唐太宗一生，俭朴自持，轻徭薄赋，重农恤民是主要方面，并构成历史罕见的"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贞观政要》：《政体》、《务农》、《仁恻》、《俭约》

两唐书：《长孙顺德传》、《薛大鼎传》

《资治通鉴》卷192—198
唐太宗《帝范·务农》
《唐会要》:《嫁娶》、《疏凿利人》
《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册府元龟·帝王部·惠民》
《唐律疏议》卷13、16
赵克尧等《唐太宗传·抚民以静》

修《氏族志》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愤愤不平地大发一段议论。他说："近来山东（指函谷关以东，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崔、卢、李、郑四姓，虽然累代都无高官显爵，仍然依恃远祖的名望，以士大夫自居，狂妄自大。每嫁女时，必广索聘礼，以多为贵。讨价还价，就象集市上的商人。真是伤风败俗，紊乱礼教。事情既然如此荒谬，理应改革。"于是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尚书令狐德棻负责刊正姓氏，撰《氏族志》，要普遍搜集全国的谱牒，参阅史传，考清真伪，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他在采取一项重大的政治措施，并为之提出了指导思想。

李唐皇室源出于关陇集团，而且在此集团里又是八柱国大将军之一，居最高的地位。所以唐初皇帝对自己的家世颇有自豪感。李渊曾对妻子的从父兄窦威说："从前周朝有八柱国之贵，我和你家都登此职。"又说："近来关东人与姓崔、卢的通婚，还自矜骄，而你家数代都是皇亲国戚，不更荣耀！"李渊对裴寂也说："我李氏从前居于陇西（李渊伪托是陇西李暠后代），既富且贵。至祖父辈，又成了皇亲。太原义旗一举，四海云集，才经数月，升为天子。而前代帝王多起微贱，你也是世胄名家，历职显要，象萧何、曹参这些出身刀笔吏的人岂能相比！"洋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就政治地位来说，关陇集团从北周时就已经显贵了。杨坚、李

渊二家又都成了统一朝代的君主，其它各家也多分据将相要职，因此在"贵"这一方面，自然占着上风。但是，就社会地位来说，那就大大不同了，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姻做标准的，那时更看重的是"清"，即血统的纯粹和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汉人，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受到高水平的儒学礼教的熏陶，因此不被士族（也称"世族""氏族"等）所重视。在这一方面，唐初皇帝便不免又有自卑心理。在"自以为贵"的自骄和"并不算清"的自卑两种矛盾心理冲突之下，唐太宗对山东世族着实没有好感，他的前述举动，就是要压抑山东世族。

历史的发展也给唐太宗提供了这一契机。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各地士族称雄乡里，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西晋末年从北方到江南的"侨姓"士族，以王、谢、袁、肖为首；东南称"吴姓"世族，以朱、张、顾、陆为首；山东的"郡姓"士族，以王、崔、卢、李、郑为首；关中也称"郡姓"士族，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北魏孝文帝改革，在鲜卑族皇族的贵族间建立门阀制度，形成"虏姓"士族，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首。这些纷繁复杂的士族，随着历史的变迁，由于本身在特权中逐渐腐朽，又历经多次农民起义的打击，以及统治集团的内部火并，到唐统一时期，从总体上大大衰落了。其中江南的"侨姓"、"吴姓"士族在陈朝灭亡时就一蹶不振。"虏姓"士族也今不如昔。山东士族声誉虽然显赫，但政治特权丧失，经济基础空虚，就象一支银样蜡头枪。

而以李唐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却勃勃正兴。因为唐在统一战争的创业阶段以及在治理天下的守成阶段，又培养了一批官僚新贵。他们或因驰骋战场，或因参谋帷幄，立下汗马功劳。唐太宗按照论功行赏，量才录用的方针，或以军功进爵，或以奇谋授官，

成了唐朝的开国元勋。这样，唐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官僚新贵。他们中不少成员出身门第不高，在谱牒上不入士流，有的虽出身士族，但也屈居老牌士族之下。这就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即唐初统治集团的核心势力，虽然政治地位很高，经济实力很厚，而且手握军权，但社会地位并没有相应的显赫起来。唐太宗要用政权的力量改变这种名、实不符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要煞一煞唐时社会地位仍很高的山东士族的气焰，以提高关陇集团为核心的这些新贵们的社会地位。

高士廉等人奉诏后，经过几年努力，编成《氏族志》草稿，进呈御览，唐太宗对此十分重视，仔细审阅。当他发现把山东士族之冠，但官仅居正四品黄门侍郎的崔民干家族放在第一等，大为不满。其因在高士廉修《氏族志》时并没有完全领悟唐太宗提出的指导思想。

高士廉是山东地区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的家庭；韦挺是关中士族首姓；岑文本为江南士族；令狐德棻属虏姓世族范围。这批出身门阀而又熟悉门阀制度的人难以跳出原来的旧巢，他们在修《氏族志》时，除遵照唐太宗提出普遍搜集天下谱牒，参阅史传，考清真伪，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外，又增加了“退新门，进旧望，崇膏粱，压寒门”的准则，这与太宗的原意大相径庭。所以才把山东旧士族但在唐朝官位仅居中级的崔民干列入一等姓氏。

鉴于这种情况，唐太宗进一步明确指出修《氏族志》的准则。他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四姓，先前并没有什么仇怨。只因他们世代衰微，全无冠冕英贤，还自称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要财礼。才能低下，而妄自以门第尊大。这实际是靠卖祖宗以取富贵，寡廉鲜耻之极。过去北齐只占河北，梁、陈偏安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因都在偏僻小国，不足可贵，所以至今仍以山东崔、卢、江南王、谢等旧姓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归一，凡在朝官

员，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是何等荣耀，而那些衰世旧门有什么值得羡慕！可有的三品以上高官，竟然低三下四请求和这些旧士族通婚，即使多给钱帛作聘，仍被轻视，不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今日我所以要重定族姓，就是要纠正谬误，舍虚取实，以崇重大唐的官爵，怎能将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古时汉高祖只是山东一匹夫，因他平定天下，君尊臣贵。你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英贤，心怀敬重。既然如此，为何不重视我的官爵？你们要重新修定《氏族志》，不管几代以前祖宗的情况，专以今朝官爵高低定等级。而且，确定以后，作为永则。"

高士廉受到一番训斥，也明白了唐太宗"以唐的官爵高低"为标准的修谱原则。既然皇帝是百官的总后台，外戚是与皇帝沾亲带故的贵族，自然高人一等。于是修改后的《氏族志》，以皇帝为上之上——第一等，外戚为上之中——第二等，降崔民干为上之下——第三等。全书一百卷，共收录二百九十三个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成九个等级。

这次《氏族志》修成后，唐太宗很高兴，赏赐高士廉绢帛达千匹，其它人也不少，并在贞观十二年正月下诏颁布于天下。唐太宗认为自己通过这一政治举动树立了一些新的族阀。这些族阀以皇室、外戚即以前关陇贵族的主要家族主其轴心，而以唐朝重要官员的各种来源复杂的家族环绕外围，让它渐渐地结成坚强而巩固的团体，使李唐皇朝能稳定地统治下去。

但社会风气有相当顽固的惯性，它的改变往往比政治变革更缓慢、更艰巨。几百年来世族炫耀的礼法门风在唐初还严重存在，唐太宗本人也没有摆脱门阀观念，而只是以新谱牒代替旧谱牒，以新门阀代替旧门阀。因此，重修的《氏族志》既有抑制旧士族的一面，也有和旧士族妥协的一面。官位只有四品的山东旧士族崔民干竟能列为仅次于外戚的第三级，正是这种妥协的产物。加上贞观朝的重臣魏征、房玄龄、徐世勣等人都以和山东旧世族攀亲为

荣，这就使他们的声望在颁行《氏族志》后依旧不减。

贞观十六年六月，唐太宗又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书："氏族之盛，实系于官宦；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北魏丧国，北齐灭亡，朝代更替，风俗变迁。燕、赵大姓，历代多无官位；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贫贱。口夸高门之后，行为不尊礼仪。问名惟在窃财，结亲必找富室。而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羡慕这些人的祖宗，争相与之结亲，多纳财礼，有如买卖。而联姻之后，家门仍被轻辱，公婆受到非礼。积习成俗，迄今未改；既乱人伦，又损礼教。朕日夜忧劳政道。前朝蠹害，都已革除，惟此弊风，未能尽变。现明加告示，使知嫁娶，各合典礼；自今年六月起严禁卖婚。"

这道诏书，实际是修《氏族志》的继续。南北朝以来，士族看重有二个方面，一曰婚，二曰宦。太宗修《氏族志》，从"宦"的方面对山东士族加以抑制，而这道禁卖婚的诏书，则侧重在"婚"的方面，通过限制唐朝新贵、富室与山东士族联姻，削弱他们的社会声望、地位。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通婚上还做出了典范。唐皇室的王妃和公主夫婿都选择当世勋贵名臣之家，不和山东旧士族联姻。

由于李唐皇室家世"贵"而不"清"，唐高祖、唐太宗对社会地位仍很高的山东士族抱有歧视态度；由于传统世族观念不能摆脱，唐太宗于是有树立新门阀，提高以自己为首的唐统治集团社会地位的意图。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修《氏族志》以及辅助的禁止卖婚。这些顺历史潮流而动的政策有明显的进步性，确实难能可贵。然而数百年沉积而成的门阀观念陋习远非短时间所能扫除干净。因此不论是修《氏族志》，还是禁卖婚，在削弱山东士族的社会声望、地位方面虽有一定作用，但成效并不太高。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95—200

两唐书：《高士廉传》、《窦威传》、《裴寂传》、《柳冲传》

《贞观政要·礼乐》

《唐会要·氏族》、《唐会要·嫁娶》

《汪钱隋唐史论稿·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

官修正史

武德四年（621 年），在门下省任职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向高祖李渊提出了编修前朝史的建议。他说，自“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北齐还算是有些典籍，到了周、隋二代，由于隋末动乱，文献典籍大都散失了。现在那些亲身经历了历史活动的人们还在，他们口耳相传的那段历史，尚可做为编修史书的根据，否则，再过十几年，人事俱亡，修史就失去了依据，史迹就将湮没无闻。”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唐皇朝先祖的功业奠基于北周，如果文史不存，就不能获得历史的经验教训。

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的史学家，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河西（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地区）显赫的士族之家。父亲令狐熙博览群书，因通晓经书而被隋朝任命为官。这样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士族家庭，对令狐德棻的早期教育以及他后来学术思想上的建树和政治上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高祖武德元年，令狐德棻被任命为起居舍人，掌管记录皇帝的言行、命令。很受高祖李渊的重视。高祖武德五年，被任命为秘书丞。

令狐德棻向高祖李渊提出的修撰前朝诸史的建议，正符合刚刚建立起新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武德五年十二月，李渊颁布了命萧瑀等人修六代史（魏、周、隋、梁、齐、陈史）诏。诏书强调编撰的目的就在于惩恶劝善，从前古历史中获得为当今和将来治理天下服务的经验教训。诏书中还具体任命了修撰前朝

各史的人选。令狐德棻和太史令庾俭被任命主修北周史。

但是，武德年间，正值唐立国之初，战乱尚未平息，天下尚未安定，唐皇室内部权力争夺不止。同时，受诏修史的官员，也有的相继去世。这样，修撰了几年以后，未及完成而中途辍止。然而，令狐德棻的建议和李渊的修前朝史诏书毕竟拉开了唐代官修"正史"的序幕。

正史一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它来自南朝阮孝绪的《正史削繁》。

魏晋以来，人们常将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视为正史，凡仿效《史记》、《汉书》的纪传体史著也被视为正史之作。令狐德棻建议中所提到的"正史"的含义正是魏晋以来人们约定俗成的看法。

官修史书的制度萌芽於东汉年间。汉明帝曾诏兰台令史班固等人修世祖（刘秀）本纪以及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章帝、和帝以后，图书典籍由兰台移至南宫的东观。东观便成为修史官员查取史料、著述国史的地方。先后由刘珍等人奉诏修东汉国史，编纂成《东观汉记》，这便是后世官修史书的滥觞。

东汉以后，修史机构逐渐形成了，北魏节闵帝时设立修史局，史官名"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北齐时修史局改称史馆，由宰相统领，监修国史。史官设置与北魏相同。北周、隋朝也大致相同。但那时的史馆虽有监修、众人合修之名，却无其实。

官修正史——设史馆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贞观君臣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为镜"，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借鉴隋亡的教训。鉴于武德年间萧瑀等人尚未修成前朝诸史，唐太宗深感改组旧史馆、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由宰相房玄龄总领监修。具体任命是，由秘书

丞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同时负责五代史全书的体制、义例。

唐初的修史制度因袭隋制，史馆也称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省，由著作郎掌修国史。唐太宗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修五代史，由宰相监修、多人合作，这是对旧史馆制度的重大改革。

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这样，经过改革后的史馆，就具有了两类不同的职责：一是修前代史，即所谓的纪传体、正史；二是修当朝的国史（纪传体国史及编年体实录），二者都是官修。

唐初修前朝史的史官常由非官职的其他官员兼任，史书修成后，便不再具史职。修本朝国史的，自天宝以后他官兼任史职的称修撰，未登朝官任史职的称直馆。另外，史馆还设有修史辅助人员。组织完备，分工细致，是唐代史馆区别於以往各朝史馆的优点之一。

其次，唐代史馆还订立了一整套搜集史料的制度，详细规定了中央及地方官署按月向史馆送交诸如起居注、时政记、日历、诸王来朝、刺史县令善政、州县废置乃至天灾地震等一系列史料的制度，这就为修撰本朝国史（包括实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较为真实的根据。同时也就成了后一代王朝修前朝史的重要史料。

史馆的这些制度保证了前朝史和本朝国史的修撰，同时位居禁中、史馆待遇优厚的政治地位，更刺激了学有所长的修史者们参加官修史书的欲望，这就进一步保障了史馆修史制度的相沿不废。

贞观十年，五代史纪传部分修成，计《梁书》、《陈书》、《北

齐书》、《周书》、《隋书》共二百四十七卷，进呈给唐太宗，受到了太宗的高度赞赏。他对五代史的作者们说："你们用了数年时间编撰成了前五代史，非常符合我的愿望，这是极可嘉尚的。"随后，太宗对每位编撰人员都给予了重奖。魏征被加官左光禄大夫、进封郡国公，并赏赐绢二千段；李百药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四百段；姚思廉加通直散骑常侍，赐五百段；令狐德棻赐四百匹；岑文本封江陵县子。

五代史是唐初史馆制度确立后第一代产品，也是中国历史上官修正史的第一代产品。由于它的初创性，因而还带有从私修向官修过渡性的时代特点。梁、陈、齐、周四史，上有宰相房玄龄监修，秘书监魏征总加撰定，下有众多的史馆人员辅助，区别於以往的私修。但就其中间环节——具体修撰的情况来看，仍带有私修的特征。五代史中最能体现出官修正史性质的当属《隋书》。

由于各史作者的身世、经历各不相同，他们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也彼此有别，因而又分别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梁书》、《陈书》的作者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姚察是梁、陈、隋三朝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家，并且擅长文学。隋文帝灭陈后曾对朝臣说："姚察品学当今无比，我平陈所得人才，唯姚察一人。"隋开皇九年（589年），姚察奉诏修梁、陈二史，但未及撰成就去世了。临终时嘱其子姚思廉依其所撰体例续修完整，姚思廉自幼受父亲影响，勤学好文史。贞观初奉诏修梁、陈二史。其中《梁书》因袭其父所作居多，而《陈书》因袭较少。由于姚察历经梁、陈两朝，姚思廉也曾在陈为官，所述历史多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而且所依据的史料，也多为当时修撰的国史、起居注以及当时人编修的关于梁、陈两代的史书，因此材料来源比较真实。这是梁、陈二书编撰上的特点之一。但也正因为姚氏父子曾先后在梁、陈为官，加之所据史料也有曲笔的地方，所以梁、陈二史为梁、陈统治者讳的地方也不时出现，这成了梁、陈二书编

撰上的另一特点。梁、陈二史编撰上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叙史时都用散文体，简严完善，曲折明畅。六朝时文学争尚骈骊，以骈体文叙史者大有人在。但梁、陈二史以清新的古文力扫骈文入史的陋习。

《北齐书》是李百药继承其父李德林的事业，奉诏修撰而成。其身世特点与姚氏父子特点相近。李德林学富才优，在北齐时曾参予史馆修国史，隋开皇时又奉诏续修，但未及成书而去世。李百药在其父所撰纪传体齐史的基础上，杂采其它史料，修成五十卷的《北齐书》。李德林父子都生长于北齐，所以《北齐书》材料来源比较真实，但也有为齐统治者讳饰的地方。在文字上比较真实生动，常实录当时的一些口语。由于北齐历史较短，其间也没有多少奇功伟绩可供史笔的发挥，所以总体说来，比较平淡。

《周书》是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等人奉诏修撰的，较之梁、陈、齐三史的修撰，从形式上看，更多了众人合修的色彩。但岑文本只撰史论，崔仁师仅为助手，从始至终修撰的实际上是令狐德棻一人。令狐德棻颇有才识，但由于编撰《周书》时所可参阅的史料极少，周史官柳虬的北周起居注，隋秘书监牛弘的《周史》，成了取材的主要来源。所以，北周崇尚古文字的文风，以及对周代史事有所讳饰的特点，对《周书》都产生了影响。但令狐德棻毕竟是一代史才，他竭力搜寻史料，详加考证，慎重处理，保存了北周均田制、府兵制等许多重要史料以及《哀江南赋》等许多重要文献。

《隋书》的总编是魏征，他亲自撰写了序十四篇，论三十三篇。参加修撰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李延寿、敬播、赵宏智等，以魏征为首的作史者们多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家。因此，《隋书》是唐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隋书》经传部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料，而且文字简净、叙事简练、

作为官修正史第一代产品的五代史，在思想内容上一个共有

特点就是处处显示出唐初政权控制者的政治意图，显示出浓重的以史为鉴的特色。

中国古代史学自商周以来总是体现着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进入唐代以后，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程度空前加强了。这主要是由于隋唐之际的历史变动给予了新的统治者以强烈的震憾。他们急需要从近现代史获取亡国之鉴和治国之道 。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前五代史的修撰，正是这种政治需要在史学上的反映。

五代史的鉴戒特色，主要表现在详载“水可覆舟”的史实和多做“亡国之鉴”的史论两方面。其中尤以《隋书》为典型。主修《隋书》的魏征，本身就有“以隋为鉴”的思想，并常以此劝谏唐太宗。所以他主修的《隋书》对隋炀帝暴政虐民的举措多有描述，对君暴则乱、民困则反的史实的记载系统而详实，从而暗示了“水可覆舟”的道理。其史论更为突出，无论纪传，篇篇有论，少则近百字，多则数百字，最长者竟多达一千一百余字，宏篇巨论，为前史所罕见。魏征还精心撰写了梁、陈、齐各史总论。史论以鲜明的政治色彩概括了亡国之鉴，指出亡国之君就亡在失民、失臣上。君民关系这个关系到封建统治的治、乱、安、危的政治理论问题在五代史史论中得到新的发挥。

但五代史所体现的鉴戒作用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种鉴戒性的前提是肯定封建制度永恒不变，是维护新的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它不可能深入探究治乱兴衰的终极原因。他们把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力量视为君主的意志：“一人失德，四海土崩”。他们虽然也看到民，看到“水可覆舟”的力量，但民是被动的，是被奴役的对象。国君善于驾驭民，那么“水”就不会覆舟。因此，他们不能详载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及其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他们更愿意记叙、探究君主的行为变化及其治民政策的变化，同时也就不可能根本否定与君位的确定关系密切的神秘的“天命”的存在。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因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编成时都没有志这一部分，於是又诏修五代史志。命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同修。十七年，又诏谏议大夫褚遂良监修，李延寿同修。太宗在位时，书未修成。

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命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令狐德棻为监修，继续修撰。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五代史志修成，由监修太尉长孙无忌奏上。

五代史志前后历时十五年，撰成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百官志、地理志、食货志、刑法志、经籍志，十志共三十卷。修成时，因五代史流行已久，所以十志单行于世，俗称为《五代史志》。后来，五代史各自单行，但十志难于分割，由于《隋书》居五代史之末，於是将十志附於《隋书》中，所以又称《隋志》。这样，官修的《五代史志》就成为官修正史《隋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隋书》十志在编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史馆修史的优越性一面。唐政府将熟悉各类典章制度文化的人才聚於史馆，使其各抒己长，故使十志内容丰富、详实。十志中对后世学术文化发展最有影响的是经籍志。它是自《汉书·艺文志》以后，对古代图书典籍的又一次全面性总结。它依图书性质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

五代史志未修成以前，唐官修正史的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件大事。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唐太宗下达了修《晋书》诏。这是继高祖李渊命萧瑀等修亡代史诏之后，唐代皇帝第二次颁布修史诏书。诏书指出：自古代至唐初，各代史家著述的史籍彰善惩恶、详载令典，历史典籍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但以往有关晋朝的史书虽有十八家，由于修史者并非良史，影响了史书的实录性，故令史馆依官修五代史的办法，从各方面调集人力改撰《晋书》。随后，

司空房玄龄、中书舍人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受诏负责《晋书》的修撰。先后参加修撰的还有李延寿、令狐德棻、李淳风、上官仪等共二十人。他们之中以令狐德棻的才学和组织能力最为突出，因此被推举为修撰中的实际负责人，房玄龄不过是监修而已。

贞观二十二年，《晋书》修成，记载了自晋武帝太始元年（265年），至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并追述了晋的先世司马懿的事迹，还记载了北方各少数族建立的“十六国”时期（实记十四国）的史实。唐太宗亲自为宣帝（司马懿）纪、武帝（司马炎）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论赞，因此，《晋书》旧题为“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帝为史书写论赞，此前并不多见。东汉明帝诏班固等人撰《世祖本纪》，开了皇帝下诏修史的先例，但皇帝本人并不参予撰写。南朝梁武帝也曾下诏编撰《通史》，并亲自写赞、序，但《通史》一书未传下来。唐太宗亲自为《晋书》写四篇论赞，正是唐太宗一贯以史为鉴思想的发展。

《晋书》问世后，历代以来，毁誉参半。一般说来，《晋书》在编纂方面有三长：一是体例严谨，列传分类得当，并设载记三十卷叙述十六国（前凉、西凉人列传，除外）割据政权的兴亡。二是取材广泛，史料丰富。编撰《晋书》中，除参阅十八家晋史外，还将晋代国史、起居注以及关于晋代旧事的杂著、十六国史事杂著等几十种作为凭借资料。因此《晋书》内容比较丰富，保存一代史料。三是编写者分工合理，充分发挥了各人专长，使《晋书》具有较高的质量和自己的特色。但《晋书》在编纂方面也有其短，即由于众人合修，且资料复杂，而成书时间又很短（不到三年），因此缺乏统贯，前后重复，甚而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在内容上也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宣扬天命，借述鬼神怪异之事，以烘托天命；二是宣扬忠孝，专门立《孝友列传》、《忠义列传》。宣扬天命、忠孝很明显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统治。

《晋书》的编撰成功，在史学史上意义重大。贞观初年所修五代史，还明显地带有私修向官修过渡的性质，只有《隋书》是真正的官修。而《晋书》则是第二部官修史书，并最终实现了修史制度的一大变革，确立了官修前代史的制度，为以后历代沿袭。

唐代官修六部正史，体现了设馆修史制度的优越性。它能集众多的史臣于一馆，给史家以切磋研讨、分工合作的机会，集众家之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长篇巨制；它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搜集、保存大量典籍和档案材料，为史书编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但唐代官修六部正史过程中也暴露出设馆修史的许多弊端。这主要表现在完全服从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束缚了历史家的思想，难以完全客观地记述历史；而一书出于众手，各人看法、写法不易统一，重复、抵牾处在所难免。史馆修史的弊端甚至也没有逃脱封建社会中进步史家的批评。《晋书》修成七多年以后，卓越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便在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史馆修史的五大弊端。

（李海涛）

参考资料：

《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

《旧唐书》：《房玄龄传》、《魏征传》、《令狐德棻传》、《姚思廉传》、《李百药传》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

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分册》

玄奘西行求法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人，生于隋开皇十六年（596 年）。父亲陈慧，是个饱经学的儒者。生四男，玄奘排行第末。他眉清目秀，自幼聪明绝顶。

玄奘二哥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为僧，常带他参加寺中道场，教他诵读佛经。大业三年（607 年），有敕在洛阳度僧二十七名，当时参预的已有数百人。玄奘年仅十二，因年幼，不在备取之列，但心中恋恋不舍，时常徘徊在寺门之侧。负责此次度僧的官员是大理卿郑善果，见玄奘后大为惊异，问是谁家子弟，在此为何？玄奘回答了姓名后，并说明了想要剃度出家的想法。善果更加惊异，又问："你小小年纪出家为何？"玄奘从容不迫答道："我想远续如来的慧命，近弘遗传的大法"。善果赞叹玄奘幼小年纪就有如此宏大的志向，又见他气宇英俊，一表非凡，就破格允许出家。

玄奘出家后，和兄陈素同在净土寺。那时寺中有位景法师讲《涅槃经》，他随众听讲，反复钻研，废寝忘食。又向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他听了一遍，大义尽通，再加研习，更无所遗。众僧大为惊异，共同推举玄奘开座复讲。他当仁不让，朗朗而言，穷尽奥妙，大名也就从此传开了。当时玄奘仅仅才十三岁。

隋末天下大乱，洛阳无法安身，遂同兄陈素辗转到了成都。各方高僧也因蜀中安定络绎不绝集中到此。于是大开法筵，宣讲经论，使玄奘有机会从道基、宝暹二法师听讲《摄论》、《阿毗昙》，从震法师听讲《迦延经》。二三年间，诸部经书全部通晓，名声也

传遍了关、蜀、荆、楚各地。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年满二十七岁，在成都受“具足戒”（佛教最高的受戒形式）。由于他把蜀中所有的经论一一钻研遍，便想远游求师，解析疑义。当时住在成都空慧寺的二哥留他不放，只好私下和商人结伴，放舟三峡，沿江东下。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天皇寺后，给慕名而来的人们讲《摄大乘论》、《阿毗昙》。镇守荆州的汉阳王李元庆率领僚属们也来瞻仰参问。

讲罢后，玄奘继续北游，访问众高僧。到相州（今河南汤阴）向休法师质疑；又到赵州（今河北大名）向深法师学小乘经要典《成实论》。武德八年入长安大觉寺，从岳法师学小乘经“一切有部”要典《俱舍论》，都能一遍而尽其旨意。当时长安有法常、僧辨两大高僧，号称佛学权威，尤其擅长《摄大乘论》。玄奘多次前往，询问学习，终于掌握了两大高僧的佛学精髓，使这两位大师深深赞赏，视为佛门的千里驹。玄奘后来还被选为庄严寺十大高僧之一，誉满长安。

玄奘已参遍了国内的高僧，通达了各宗学说。但他精进不息，对“瑜伽”学说深感兴趣。当时这一系统的经论传译到中国的还不完备，而且译文晦涩，要义分歧，无人能通。武德九年，印度僧明友法师到长安，他是印度那烂陀寺戒贤三藏的弟子，传“瑜伽学”，长安众高僧都出其门下。玄奘得此良机，向他请教，钦佩明友法师佛学的高深，自此更加倾心于瑜伽学，并决心西行到印度的那烂陀寺，向戒贤三藏求学：一方面破析心中所惑，一方面取回《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以释众疑。

玄奘自立志去印度取经后，便开始寻求侣伴，并上表朝廷请示批准。但当时太宗刚即位，东突厥频频扰边，有旨禁国人出蕃。玄奘的请求没获准许，只得先就近地诸蕃人学习印度语。这时同伴们都已灰心绝念，只有他不变初志，静待西行机会。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二十二岁。这年八月，有一位秦州

（今甘肃天水）僧孝达在长安学习《涅槃经》课满还乡，玄奘不顾一切和他同行至秦州。然后自己又随人经兰州（今属甘肃），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是河西一大都会，葱岭以西的各国商人，往来不绝。玄奘在凉州停留月余，应请讲经。西域诸国商人施奉珍宝无数，他只留一半作燃灯费，其余尽给诸寺庙。西域胡商回本国后，到处宣扬玄奘的美德和要西行求法的弘愿。因此，西域各大城市，无不筹备欢迎这位高僧的光临。

凉州都督李大亮奉敕防禁百姓出蕃特严。忽有人报告说，有僧人从长安来，欲去西国，不知何意。大亮闻听，将玄奘找来追问缘由，玄奘明确回答“要向西国求法”。大亮不准，逼令回京。河西佛教领袖慧威法师非常钦佩玄奘的志向，就派了慧琳、道整两名弟子，帮助他偷渡出境，昼伏夜行，来到了瓜州城（今甘肃安西东南）。

瓜州刺史独孤达听说玄奘莅境，欢喜非常，殷勤供奉。玄奘顺便打听西行路途的情况，有人告诉道，从瓜州北行五十余里有条瓠𬍤河，水流湍急，深不可渡。上面设置玉门关，是西行的必经之地。关外西北又有五座烽火台，住有守候的士兵。每烽相距百里，途中绝无水草。五烽以外是莫贺碛（今从安西到哈密广八百里大沙漠），为伊吾国境内。玄奘听后，一时不知如何通过这层层险阻，恰巧所骑马又死，只好在瓜州闷住了一个多月。正在将行未行之际，凉州缉拿的文书又到，由州吏李昌办理。李昌崇信佛教，更景仰玄奘西行求法的弘愿，遂当面将文书撕毁，叮嘱他早早离境。

这时，道整先已去了敦煌，慧琳也返回了，只剩玄奘孤身一人留住当地寺院中，他买了一匹马，但苦于无人引路。恰巧有一名叫石槃陀的胡人来寺中拜佛，并请玄奘为他受戒，于是给受了具五戒。石槃陀非常高兴，答应亲送玄奘过五座烽火台。随后，槃陀又引荐一胡翁。胡翁告诉玄奘，西路险恶，许多人同行尚且迷

途丧命，单身孤影怎能去得，并力劝作罢。玄奘断然答道："贫僧为求大法，发誓前往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途中，也不后悔"。胡翁被他的诚心所感动，送给他一匹赤色的识途老马。

装束行李后，玄奘和石槃陀星夜出发，三更时分偷渡过瓠河，稍事休息。天刚发白，玄奘催促继续西行，但槃陀已经动摇。他说："弟子眼看前途险远，又无水草，惟五烽下有水，必须夜间偷水而过；只要一处被发觉，便会送命，不如返回为妙"。玄奘决心不为所动，又见槃陀不愿再行，就放他回家去了。此后，玄奘西出玉门关，飘然一身，独闯大漠。黄沙浩浩，杳无人烟，惟望一堆堆白骨和驼马的粪便，寻迹而前。就这样行进了八十余里，才见到第一烽。玄奘恐守烽士兵发现，遂隐伏在沙沟间，夜间走到烽西，看见一泓清水，下马就饮，刚要取皮囊盛水，突然一箭射来，险中膝盖，随后又是一箭。玄奘知道已被发现，索性大声喊："我是和尚，从京师来，请莫射我！"随即牵马向烽走去，守烽士兵带见校尉王祥。王祥早从别人口中得知玄奘大名，但仍说西路艰险，法师无法到达，劝他到敦煌寺院暂住。玄奘慨然道："贫僧在国中已名声不小，然生平所恨，我国中经论不全，义有所缺，所以不顾性命，誓往西方求法。施主不相勉励，反劝退还，恐非助人为善。必欲拘留，甘受刑罚，决不东移一步以违初志！"王祥听后极受感动，不仅热情款待，并于次日派人盛水备饼，亲送十多里路。还指路道："师从此路可直到第四烽，其校尉王伯陇与弟子要好，到后就说是弟子让师来的"。说罢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玄奘顺路前行，入夜到了第四烽，恐被留难，心想悄然取水而过。谁知未到水边，冷不防已飞来一箭，玄奘只好按王祥所嘱去办，王伯陇果然欢喜异常，留宿一夜，又取大皮囊及马麦相赠。临别时关照不要去第五烽，那烽官粗暴，恐生异图。此去百多里有野马泉，可取水。

玄奘离开第四烽，便进入长八百里的莫贺延碛。在这茫茫的大沙漠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更无水草，夜间磷火闪烁，阴气森然，白天热风卷沙，散落如雨。玄奘独身一骑，口诵观音和《般若心经》，步步向前。他走了百余里，就迷了路，找不到野马泉，又失手将一皮袋水全洒在沙漠里。他抱着“宁可西行死，也不东归生”的决心，勒马继续前进。连续四夜五天滴水未进，眼枯唇焦，喉痛腹乾，势难活命，遂卧沙漠中默念观音。直到第五夜半，忽觉凉风触身，清爽如沐甘泉，眼前一亮，马也站起来了。因此打起精神，行了十里左右，马好象有了预感，忽然跑起岔路来，玄奘控制不住，任马径行数里，忽见前面出现青苗数亩，绿油油一片，于是叫马饱吃一顿。距草十余步，又发现一池清水，甘甜无比，人马痛饮一番，生命才重获平安。因就草地休息一日，次日盛水取草进发。又经两日，终于走出茫茫沙漠，到达了伊吾国（今新疆哈密）。

玄奘投宿在伊吾的一个寺庙后，胡僧和国王都来参谒；国王又把他请到宫中供养。当时高昌王麴文泰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派使者到伊吾，要伊吾王护送玄奘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并命贵臣们途中迎接。玄奘原想取道可汗浮图，因高昌王盛情难却，在伊吾停留十余日，便来到高昌。到王城时正值半夜，守门官启奏国王，破例洞开城门。国王与侍人前后秉烛，亲出宫门迎入后宫，让坐在一座重阁宝帐中，殷勤拜问。次日清晨，玄奘尚未起床，国王已率领王妃等前来礼问。国王说：“弟子思量沙漠茫茫，道路艰阻，法师能独身至此，真是奇迹！”流泪感叹不能自已。

高昌王想留玄奘在高昌传法，不要再去西方，但几次挽留都被辞谢。国王有点恼羞成怒，大声说：“法师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送回国，一条留此地。还请三思！”玄奘坚定地答道：“贫僧远游，只为求取大法。今日既然被阻，只可让骸骨被留，神识终不会羁留此地！”说罢泣不成声。国王见硬的不行，更加殷勤款待，

每日亲自捧盘送食。玄奘仍不为所动，并决定绝食，希望能感化他。于是端坐不言，三日水浆不入口。到了第四日，国王察觉法师气息微弱，赶快叩头谢罪，连连说："任师西行，请早进食！"随后，两人结拜为弟兄，并约定取经回日，必须在高昌留住三年。

经过这番周折，高昌王对玄奘更加敬仰，临行时厚送大量的黄金、银钱、绢，够往返二十年费用，另派官员欢信护送到西突厥叶护可汗衙所。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照会沿途二十四国，妥为照顾。玄奘也深受感动，亲笔书写一篇文章，以示感谢之情。出发那天，国王、大臣、百姓等，倾城出送。国王抱玄奘恸哭，僧俗无不泪下。

贞观二年二月间，玄奘离高昌向西进发，经无半城，笃进城，至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国王与诸臣来迎，留住供养。次日起程西行数百里入屈支国（今新疆库车）。国王、群臣和僧侣数千奏乐迎接。当地高僧名木叉毱多，曾游学印度二十余载，最善《声明》之学。玄奘起初很是礼敬，后听毱多以小乘自足，毁谤大乘《瑜伽论》为邪见，大不以为然，因此和他辩论。玄奘所提质疑，毱多不能解答，只得以年老忘记自我解嘲。由于凌山雪路未开，不能进发，玄奘留驻六十余日，除游览山水外，常和毱多说法。毱多深感玄奘佛学渊博，私对人说，印度僧中少壮学者也未必有此学问。临行日，国王和僧侣百姓倾城送别。

西行数日，渡小沙漠至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又行三百里，才到葱岭北端的凌山（今穆素尔岭）。此山高耸险峭，万年积雪，结为冰层，上接云天。而冰棱崩落横在路侧，或高百尺，或广数丈，因此山路崎岖，登涉更加艰阻。加上风雪杂飞，寒冷彻骨。玄奘悬釜而炊，卧雪而眠，整整跋涉七日，方才出山，伴侣中冻饿而死的十之三四，牛马死得更多。

出山后便到热海（今中亚伊塞克湖），玄奘等人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到达素叶城（今中亚托克马克）。恰逢叶护可汗来此狩猎，

当将高昌王亲笔信和礼物呈进后，可汗大喜，请玄奘先至可汗衙所安住，自己两三日猎毕即归。三日可汗归衙所，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帐中接见玄奘。玄奘缓步而行，当离帐三十多步，可汗已出帐欢迎。还特为他设一把铁交椅，铺垫请坐。随后设宴奏乐，西突厥达官贵人以及引进唐使者、高昌使者入座相陪，气氛极其庄严隆重。宴后，可汗请玄奘对众宣讲佛法，因此停留数日。可汗说："印特伽国（今印度）气候炎热，国人体露肤黑，多无威仪，不值得去"。玄奘仍申诉西行求法的大志。可汗知他意坚，于是相助。很快物色到了一位通汉语和西域诸国语的青年，令他草拟致诸蕃国书，并护送法师到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喀布尔北）。

玄奘别可汗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位今中亚吉尔吉斯山一带），水清树茂，是可汗避暑之地。又西行，经呾逻斯城（今中亚江布尔）、至白水城（今中亚吉姆肯特东）。由此西南行经笯赤建国（今中亚赛喇穆城）、赭时国（今中亚塔什干）、窣堵利瑟那国（今中亚乌腊提尤别）。又西北进入沙漠，无水草，惟望遗骨而进，至飒秣建国（今中亚撒马尔罕）。此国的国王及百姓不信佛，以事火为道，客僧投宿，每被烧逐，不许停留。玄奘初至，国王接待简慢。住宿后为演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使国王皈依佛教，百姓中也纷纷信佛。

玄奘再西南行到羯霜那国（今中亚沙赫里夏勃兹），然后入山，行三百余里始至铁门。出铁门后至覩货罗国（今阿富汗境内）。从此前进渡缚刍河，至活国，停留月余，赴小王舍城礼拜佛教许多圣迹，并和当地僧人慧性研读小乘"一切有部"的经典。由于锐末陀、胡实健国的国王盛情邀请，玄奘不得已而行。两国王大喜，供奉金宝，玄奘不受而返。

离小王舍城后，南行入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余里，出覩货罗境，入梵衍那国。此国东西二千余里，在雪山中，道路艰阻，倍于冰川沙漠之地，凝云层层，飞雪千里，从不天晴。玄奘

饱尝艰辛，才到都城（今阿富汗巴米扬）。受到了国王殷勤款待，接进宫中供养。从此东南行过大雪山至小川，经十五日始出该国国境。接着遇到两天大雪，迷失道路。后经猎人指示，越黑山，才到迦毕试国境。玄奘一到，王与众僧一起出城相迎。遂在此停住一段时间。

玄奘离迦毕试国后东进，越黑岑，入北印度境。先至滥波国，停留三日。南行至那揭罗喝国。又东南行到佛顶骨城。闻听灯火城西南有瞿波罗龙王所住的石窟，如来佛昔日除伏此龙，留影在窟中，但道路荒阻，又多盗贼，参谒者甚少。玄奘以为如来真身之影，千载难逢，毅然前往礼拜。返回后又东南行至健陀逻国，都城名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此国圣迹有多处，玄奘一一观礼，并将高昌王所施的金银绫绢衣服等，分留各大塔、大寺院。

从此又到乌铎迦汉荼城，出城北涉山川，入乌仗那国。再南渡信度河至呾叉始罗国。又东南越山谷至僧诃补罗国。又行山路至乌剌尸国。更东南渡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位今克什米尔）。时在贞观二年的冬季。

迦湿弥罗国是佛教正统派说“一切有部”的发源地。有寺院百所，僧五千余人。玄奘初入国境国王就遣弟弟带车马来迎。随后，国王率群臣及都城僧侣千余人迎候，仪式极为隆重。玄奘乘大象进都城后，住在阇耶因陀罗寺中。次日，又被请入宫中供养。国王请以僧称为首的高僧数十人讲法，令玄奘问难。听双方雄辩，心中甚喜。又见玄奘远来求学，但少经书，遂给抄书手二十人，令帮助写经论；另给五人供驱使。一切花费，全由公给，这是玄奘踏入印度国境后第一次受到特殊的礼遇。

僧称法师年近七十，佛法精深，性爱贤士；玄奘既为上宾，又虚心求教，僧称于是不顾气力已衰，竭力讲授诸论：午前讲《俱舍论》，午后讲《顺正理论》；初夜讲《因明》、《声明论》。玄奘随

其所说，领悟无遗，尽得精髓。僧称法师非常欢喜，向众僧夸道："玄奘智力超群，你们无一人能出其右，实足以承继世亲菩萨兄弟的慧业啊！"玄奘留此学习，首尾共两年，诸经典已经娴熟，圣迹也一一参拜过，于是在贞观四年底辞别该国。这时他三十四岁了。

玄奘西南行，逾山涉险至半笯嗟国。从此东行至曷罗阇补罗国，再东南下山渡水至磔迦国。自滥波国至磔迦国，都属北印度境，风俗猛烈，礼义轻薄，人性骁勇，不免有边鄙之风。玄奘从曷罗阇补罗国到磔迦国巡礼时，还遇到一番不小的波折。

当玄奘出曷罗阇补罗国后，经二日渡河至阇耶补罗城，中经奢羯罗城，到那罗僧诃城。再东行穿波罗奢大森林时，突然遇到强盗五十余人，不仅玄奘的衣服全被抢劫，几乎还遭杀害。幸而他由池边水穴逃离险境，并遇到一位耕地的婆罗门，召集八十余百姓驱走了群贼，还救出了其余同伴。在村舍投宿时，众人都因丢失财物而哭泣，独玄奘欢笑无忧。大家怪问缘故，他坦然答道："人生莫贵于性命，性命既存，区区衣食又何足惜！"说得大家转悲为喜。

玄奘在磔迦国还访问一位传说七百岁的婆罗门，看上去不过三十余，体形魁梧，学问渊博，住在大菴罗林中。两人相谈后十分投机。他闻知玄奘遭劫，号召大家敬施。玄奘也为他们讲经，说因果报应，大受欢迎。玄奘在此停留一月，从婆罗门学习《经百论》、《广百论》。这位高寿的婆罗门是龙猛的弟子，亲得师传，讲得十分明彻。

玄奘又东行到至那仆底国，投宿突舍萨那寺。寺中有位高僧名调伏光，风度美，善三藏，著有《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玄奘因此留居十四个月，随从学习《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接着，东北行至阇烂达罗国，住在那迦罗驮那寺，用时四个月，向寺中高僧旃达罗伐摩学习《众事分毘婆沙》。

从此东北攀登险径至屈露多国。又南行越山渡河，至设多图

庐国。又西南行至波里夜咀罗国，即进入中印度境。又东行至秣菟罗国。又东北行至萨他泥湿伐罗国。又东行至窣禄勤那国，该国东临恒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中境而流。沿河东行八百余里至恒河源，水味甘美，细沙随流。印度俗书称为“福水”：入中沐浴，罪恶可以涤除；饮水嗽口，殃灾可以殄灭；淹死的，可升天受福。因此男女百姓，常集聚在河边。国中有高僧名阇耶鞠多，精通佛法，玄奘遂住一冬半春，直至听讲《经部毗婆沙》完毕。

暮春东渡河至秣底补罗国。该国有高僧名蜜多斯那，年九十，佛法高深。玄奘因此停留半春一夏，就学《辨真论》、《随发智论》等。然后北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又东南行至垩醯掣咀逻国。又南渡恒河，再西南至毗罗删拏国。又东行至劫比他国。从此西北行至羯若鞠阇国，又名曲女城（今印度恒河与卡里河合流处，称卡瑙季）。有寺院一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乘、小乘俱学。国王号戒日，雄姿英发，称霸印度。境内不杀生，到处兴建佛寺。每年三、七日中遍供众僧，五年一开无遮大会，弘扬佛法。玄奘到该国后，在跋达罗毘诃罗寺住三个月，随从毗离耶犀那三藏读《毘婆沙》、《日胄毘婆沙》完毕。

然后，玄奘东南渡恒河，再南行至阿瑜陀国。瞻礼完此国圣迹，即顺恒河与八十余人同船东下。途中忽遇贼船截拦，将众人衣服脱光，搜求珍宝。这群强盗供奉突伽天神，每秋寻一仪容端美的人杀取肉血祭祀，借以求福。今见玄奘正合标准，相视而笑道：“我们祭神节将到，正愁没好材料，这和尚生得这般好，杀了祭祀必会大吉大利”。随后便在岸边林中设立祭坛，令两人拔刀牵玄奘上坛，预备动手。在这生死关头，玄奘自知难免大难，闭目打坐，异常镇静，众贼大为惊异。同伴无法搭救，同声号哭。突然，黑风四起，折木飞沙，河水涌浪。贼徒大惊失色，忙问玄奘同伴：“这是何人”？齐声回答是中国求法高僧。并说：“你们要杀他必遭神责，赶快忏悔吧！”众贼大惧，叩头求饶。玄奘遂讲因果

报应，劝他们弃邪归正。这些人纷纷将武器投入河中，将衣物归还原主，并受五戒，欢喜而别。

此后，玄奘又开始周游印度，巡礼圣迹。先东行渡恒河，再北行至阿耶穆佉国。从此东南行又渡恒河、阎牟那河，北至钵罗耶伽国。从此西南入森林，多逢恶兽、野象，又至侨赏弥国。又东行至鞞索迦国。又东北行至室罗伐悉底国。从此东南行至劫比罗伐窣堵国。再东行荒林至蓝摩国。走出荒林至拘尸那揭罗国。再入大森林行至婆罗痆斯国。从此顺恒河东行至战主国。又东北渡恒河至吠舍厘国。又南渡恒河至摩揭陀国（今印度巴特那和加雅一带）。该国有寺院五十余所，僧万余人，是大乘佛学的中心，圣迹很多。玄奘先在无忧王故城遗址礼拜圣迹，七日才遍。又西南行六七日至底罗磔加寺，受到寺中僧人的欢迎。离寺南行到菩提树，如来佛就坐在此树下成无上等觉。树茎黄白，枝叶青润，秋冬不凋。唯至如来涅槃日，树叶顿落，经夜还生如故。每到此日，诸国王和臣僚们共集树下以乳灌洗，收叶而归。

玄奘巡礼圣迹到此处，瞻仰菩提树及慈氏菩萨所作成道时像，不觉五体投地，悲泪满目，自伤自叹。在此停留八九日，然后向那烂陀寺（位今印度巴特那县境内）进发。时在贞观七年九月。

那烂陀寺众僧闻讯，马上推举四名高僧远迎。随后又有二百余僧人和千余施主，捧着幢盖华香来迎。在众人的赞叹簇拥中，玄奘进入了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

玄奘一到那烂陀寺，众僧齐集，一一见礼。另在上座安置一床给玄奘坐。然后维那击响木宣布玄奘留住寺中，并享有寺中僧人的一切待遇。接着选二十位中年僧人拥着玄奘去参谒该寺住持戒贤法师。戒贤当时已百余岁，是大乘佛学的权威，众僧尊敬，不敢称名，号为“正法藏”。玄奘依此间仪式，极其恭敬地膝行肘步，鸣足顶礼参拜。戒贤当即命坐，问从何而来？答道：“从中国来，想随师学《瑜伽论》”。戒贤听罢感动得流泪，唤弟子觉贤来前。觉

贤是戒贤侄，年也七十多岁了，博通经论，善谈吐。戒贤遂叫觉贤向僧众讲三年前的“病恼因缘”。觉贤立即泪流满面，说戒贤昔日在病中如何忍受百般折磨，只为等待传授中国僧人佛法的故事，恰应了玄奘今日求法的因缘。众僧听罢，无不称奇。玄奘更是悲喜交集，说：“弟子当尽力听习，不负慈悲教诲”！从此师徒之间分外投契，而对玄奘的生活供应，也极为优待。那烂陀寺主客僧万人，能享受这种待遇的，仅仅十人。

印度当时寺院以万计，但论规模宏伟，地位崇高，那烂陀寺数第一。该寺僧人讲习大乘，兼习小乘十八部以及俗典《吠陀》等，其他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也都研习。寺内讲座每天开百余所，学习空气非常认真严肃。寺院建立后没有一人犯罪，国王为了表示礼敬，特拨百余座城邑的收益供养僧人，使寺内僧人得以专心学业。

玄奘在寺中住下后，先到南部王舍城一带短期巡礼圣迹。礼毕后返回，请戒贤法师讲《瑜伽论》。戒贤已多年不说法了，特为玄奘开讲，同听者数千人，前后十五个月才讲完。玄奘在寺，计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两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他如《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昙》等曾在迦湿弥罗诸国听过，在此仅提出若干疑义，寻求解释。

玄奘留学那烂陀寺一年余，深通大小乘学，兼学婆罗门书，声誉鹊起。但他学而不厌，要游南印度诸国，进一步求法。于是在贞观九年初前往伊烂拏钵伐多国。国中有两位高僧：一名如来密；一名师子忍。都精通《萨婆多》部。玄奘遂停留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从此顺恒河南岸东行至瞻波国。又东行至羯朱嗢祇罗国。又东渡恒河，至奔那伐弹那国。又东行至迦摩缕波国。一路寻礼圣迹。

随后又东南行至羯罗拏苏伐剌那国，始进入东印度境。又东

南至滨近大海的三摩怛吒国。再西行至耽摩粟底国。从此西南行至乌荼国。又西南行至恭御陀国。又西南人大荒林行至羯馂迦国，到了南印度境。从此西北行至侨萨罗国，复人中印度境。该国有位婆罗门善解因明（即逻辑学），玄奘停留月余，读《集量论》。

离后南行，人大森林向东南行又至南印度境的案达罗国。又南行至驮那羯磔迦国。玄奘在该国遇两僧：一名苏部底，一名苏利耶，深通大众部三藏。遂留居数月，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他们也跟玄奘学大乘诸论。

从此西行至珠利耶国。又南经大森林至达罗毗荼国。折而西北归，至恭建那补罗国。又西北经大林猛兽荒野，至摩诃刺陀国。又西北渡河行至跋禄羯呫婆国。又西北行至阿吒厘国。从此西北行至契吒国。再北行至伐腊毗国。又西北行至阿难陀补罗国，进人西印度境。又西北行至苏刺侘国。又东北行至瞿折罗国。又东南行至邬阇衍那国，复人南印度境 从此东行至掷枳陀国 又折而北行至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复人中印度境。从此又西返苏刺侘国，再西至阿点婆翅罗国，又西北行至狼揭罗国。该国临近大海，为西印度西部边境。

随后东北行至臂多势罗国。又东北行至阿夆荼国。又东行至信度国。又东行渡河至茂罗三部卢国。又东北行至钵伐多国，进人北印度境。此国有几位高僧，玄奘遂留住两年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玄奘游学遍及印度东南西凡数十国。每到一地，即礼拜圣迹，参谒名师，虚心请教。在贞观十二年冬又回到那烂陀寺，时年四十四岁。他参见戒贤法师后，闻寺西不远有底罗择迦寺，有离僧名般若跋陀罗，精通“一切有部”和《声明》、《因明》等，遂前往谘决所疑，留居两月。随后又往杖林山居士胜军论师处，从学《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以及询问《瑜伽》、《因明》等疑文。首尾

用时两年。课程学毕，于贞观十五年春再度回到那烂陀寺。

玄奘这时对佛学各派融会贯通，达到当时最高境界。戒贤亲命他为众人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此前寺内高僧师子光已为众人讲《中》、《百》论，对发挥“非空不空”的《瑜伽论》颇加指摘。玄奘认为圣人立教，论说角度不同，而不相矛盾；后人不能会通，致有争执，这是传授之失，并非佛法有缺。为了阐明此理，他数次前往诘难。师子光不能解答，于是原听师子光讲法的都归附到玄奘这边来了。玄奘为和会二宗所言，使不相违背，遂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僧众观看，无不称善，并共同宣行。师子光惭愧已极，另找东印度一位同学名叫旃陀罗僧诃来相辩难，希望能洗刷羞辱。哪知这位老同学到后，慑于玄奘大名，竟默然不敢发问。玄奘声誉益发大振，他的地位也就被公认为当时佛学界的权威了。

戒日王是中印度的英主，他征服了印度的五部（即东、西、南、北、中），又是那烂陀寺的护法。有一次他亲征恭御陀国，经过信仰小乘教的乌荼国。该国僧人见戒日王后攻击那烂陀寺的大乘教是空华外道，并呈上《破大乘论》七百颂。这部经是南印度王灌顶师老婆罗门般若毱多所著。僧人还说：“我宗如是，大乘人岂能难破一字！”戒日王信仰大乘，斥责他们是井中之蛙，固守愚宗。小乘僧徒不服，请戒日王召集两派辩论谁是真正的佛法。戒日王遂给戒贤法师写信，请选人到乌荼国辩论。戒贤挑选了海慧、智光、师子光和玄奘前往。海慧三人有些胆怯，玄奘道：“小乘部三藏，我在本国及入迦湿弥罗以来，都已学遍，他们不可能攻破大乘，愿诸位勿须烦忧”。海慧等听罢，才转忧为喜。正要出发，戒日王又来书，请稍待再说。

恰在这时，有婆罗门来求论难，写了四十条论义，挂在寺门口挑战，宣称：“若有人驳倒其中一条，我愿割下头来认输”。挂了几天，无人敢应。玄奘挺身而出，在戒贤面前，并请众高僧为

证，和这个婆罗门展开辩论。玄奘一针见血指出婆罗门教立论的宗本，不外乎四种外道。而且修道方法极其浊劣愚蠢：如以灰涂体；裸体标奇；以骷髅为环挂颈；穿粪衣，饮便秽。接着批判外道的"偏执成性"等等。滔滔雄辩，口若悬河。如此往复数番，说得婆罗门哑口无言，只好认输，并请照约办理。玄奘说："我佛门不杀人，你就服侍我吧"。这个婆罗门欢喜从命，闻者无不称庆。

此后，玄奘为赴乌荼国辩论，就钻研《破大乘义》，发现几处疑问，于是问所伏的婆罗门是否听过此经。答道听过五遍。玄奘欲令他讲解，但婆罗门说："我今为奴，怎敢给尊师讲解"。玄奘道："这是外宗，我未曾见，你但说无妨"。婆罗门恐被外人听见有污师名，便请夜深人静时独自来讲解。玄奘应允。于是夜间屏去诸人，令讲一遍，备悟精髓。遂寻书中谬处，申大乘义批驳，著《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呈戒贤法师及向众僧宣读，无不称赞说："如此精详，何敌不摧！"玄奘随后对婆罗门说："你论败为奴，耻辱已够。现在我放你回去，随意到何方"。婆罗门欢喜告辞，往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向鸠摩罗王称颂玄奘的道德学问。

紧接着鸠摩罗王派使者奉书戒贤，请玄奘来国讲法。戒贤考虑到戒日王原令去乌荼国辩论，于是婉言相辞。就这样，三次来使相请均遭辞绝，鸠摩罗王大怒，以武力相威胁。戒贤法师恐兴动干戈，就让玄奘随使者前往。玄奘到后，备受欢迎，延请入宫奉养。玄奘在此国宣讲佛法，广破邪论，并为回答国王"佛功德"问，著《三身论》三百颂。

月余后，戒日王远征回归，一听玄奘已在鸠摩罗王处，遂派使者让护送玄奘前来。鸠摩罗王当即准备象车二万乘，船三万艘，浩浩荡荡，亲送玄奘溯恒河直赴戒日王处。途中经过了羯朱嗢祇罗国。不久，鸠摩罗王将玄奘安置在事先已在恒河北岸建好的行宫，然后与众臣渡河到南岸拜见戒日王。戒日王见玄奘心切，当天晚上初更天就渡河前往。见面后戒日王首先向玄奘行了足下顶

礼，然后散着香华，并致颂辞。礼毕，戒日王问道："弟子闻贵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曲，不知秦王是何人，有何功德致此赞颂？"玄奘于是陈述唐太宗圣明英武，除暴平乱，重使天下太平。戒日王也深表赞许，并请次日来自己宫中讲法。

第二天一早，戒日王遣使来迎，玄奘和鸠摩罗王同往，戒日王等亲自相迎。礼毕，戒日王索观《制恶见论》后，赞叹不已。接着，玄奘畅论大乘、小乘教的得失。戒日王妹妹也听得入神。这时，戒日王提出在曲女城召开一大会，叫五印度僧人、婆罗门、外道等齐集，宣讲大乘教微妙。玄奘同意后，即日，戒日王向远近各国，发出文书。

贞观十五年末，戒日王陪同玄奘沿恒河至曲女城会场。各方到会人士，计五印度中有十八位国王，熟知大小乘僧人三千余，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千余僧。这班贤德，都是文义博通、善长辩才的知名人士，为向中国僧人请教，才不远万里而来，一时间象舆幢旛，若云兴雾蔚，充塞数十里。次年春，大会开始。会场中先期已造好两座草殿，每个可坐千余人。戒日王行宫在会场西五里，他命人在宫中铸一尊金佛，载于大象，上施宝帐；戒日王扮作帝释，手执白拂侍右；鸠摩罗王扮作梵王，执宝盖侍左，分外庄严；载金佛大象后紧随两支大象，驮着宝华，随行随散；玄奘和戒日王的门师各乘大象依次列于王后；又调三百大象给诸国王、大臣、高僧等乘坐，分列道旁，称赞而行。至院门后全部下乘，捧金佛入殿，置于宝座。然后，戒日王和玄奘首先进殿入座；接着是十八国王；再者是诸国僧中声誉最高的千余人；婆罗门有名望的五百余人和各国大臣也入殿就座；此外僧俗于院门外安置。

戒日王设食招待来人后，便恭请玄奘升上庄严的七宝论坛高座，宣布为论主，颂扬大乘教义。并由那烂陀寺明贤将《会宗论》读示大众。另写一本悬于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

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如是至晚，无一人发言。这样的盛会连续开到第五天，小乘、外道眼见自宗被毁，竟想谋害玄奘。戒日王察觉，严厉警告，给压服下去。又经十八天，仍无人敢与辩论。在闭幕那天，由玄奘作总结，再次称颂大乘教义，赞佛功德，号召其他教派同修大乘。十八日功德圆满，戒日王对玄奘越发尊敬，大量施送金银钱等，十八国王也施珍宝，可他一丝不受。这时，戒日王命侍臣隆重装饰一支大象，请玄奘上坐，令贵臣陪卫，巡行向大众宣扬：“中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十八日无人敢辩论，大家都要知道！”于是万众欢腾，为玄奘竞立美名：大乘学者高呼为“大乘天”；小乘派学者高呼“解脱天”。这都是最崇高的称号。从此玄奘名震印度五部，无人不知。

接着，戒日王邀请玄奘光临五年一度为期七十五日的无遮大施，这是一种规模极大的施舍。他们一行来到设在钵罗耶迦国（今印度阿拉哈巴德）的大施场。总计到达的僧俗人多至五十余万。十八国的国王也随同戒日王从曲女城，来到这里。经过八轮施舍，戒日王将五年来府库积蓄施舍得干干净净，连自己身上的衣服、璎珞、耳珰、臂钏等也不留，然后向妹妹讨来粗布衣穿上，礼拜十方诸佛，并发表“藏富于民”的讲演。最后，再由诸国王用钱宝，赎回戒日王所施舍的御服及身上的装饰物，转献给他，以示敬意。

玄奘参加完无遮大会，已到贞观十六年五月中了，于是想告辞回国。戒日王和鸠摩罗王殷勤劝留。玄奘反复讲述路途遥远，求法极难，终于说服了两王。启程时两王送大量金钱和宝物，玄奘一概不收，只留戒日王施给的大象和鸠摩罗王所施的一件曷剌厘帔，预备途中防雨。珍重告别后，两王及众人又送行数十里，才挥泪而去。

玄奘先将经像等托附北印度王乌地军，驮载渐进。后戒日王又托乌地王带上大象一头、金钱二千，银钱一万，供玄奘作路费。才离别三日，戒日王和鸠摩罗王、跋吒王等各带轻骑数百，又来

送别，恋恋不舍。临走时派达官四人带着写在素氎上用红泥封印的文书，送给途经诸国，令这些国家一路发骑护送，直到中国边境。

玄奘回国路线是：离钵罗耶那国后，途经㤭赏弥国、毗罗删拏都城等到达阇兰达国，这是北印度王都。乌地王到本国后，另派人引送玄奘到僧诃补罗国。和玄奘同行的还有北方的百余僧人，携带着经像。又行至呾叉尸罗国。当北渡信度河时，忽然风波乱起，船身几濒覆没，失去五十夹经本。正在乌铎迦汉荼城的迦毕试王听到这个消息，亲到河边迎问，并帮助补全遗失经本。

此后西北行至兰波国，南行至伐剌拏国，西北行至阿薄健国、漕矩吒国。又北行至佛栗氏萨傥那国，东行至迦毕试国。又西北行过雪山，种种险境，不减来时。后到达安怛罗缚婆国。又西北山行至活国。又东行至瞢健国、呬摩怛罗国、钵铎创那国。从此入葱岭、东南山行至淫薄健国、屈浪阇国。又东北山行至达摩悉铁帝国。商弥国，再东行便到波谜罗川（今帕米尔）。从此从东行，登山履雪至朅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又东行出葱岭至乌铩国。从此北行至佉沙国（今新疆喀什）。又东南行至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又东行至瞿萨旦那国，即于阗（今新疆和田南）。于阗王闻玄奘法师莅临，亲自迎谒，延请入城，殷勤挽留。这时，玄奘万里回归，经两年跋涉，已到贞观十八年三月了。他在于阗萨婆多寺住下后，修书一封，派高昌人马玄智随商人人长安，代向太宗呈递，陈述自己前往印度求佛法，周游十六载，今已归还，在于阗待命。至于玄奘归程不经高昌，因这时高昌已被唐灭掉，改为西州。

太宗得知玄奘取经载誉而归，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并令地方官沿途迎接。玄奘得敕立即进发，东经媲摩城，入沙漠至尼壤城。又东至沮沫（今新疆且末）。又东北至旧楼兰地，辗转进入大唐国境。至沙州城（今新疆敦煌西），玄奘又上表太宗。

当时太宗因欲征高丽在洛阳，就命守留长安的宰相房玄龄派人迎接。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平安回到长安，暂停都亭驿。玄奘西行求法，历经一百二十余国，先后共一十七年。出国时刚过而立之年，这时已是半百的老人了。他从西域带回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尊。拟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尊。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刻檀佛像一尊。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尊。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尊。拟摩揭陀国鹫峰山说《法华》等经像金佛像一尊。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尊。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刻檀像等。还带回《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论》一十三部。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用二十匹马驮回。

就在玄奘到长安这一天，唐廷颁告诸寺院准备好宝帐、幢、旛等，悬灯结彩，准备迎接新到的经、像于弘福寺安置。二十五日这一天，在朱雀街两侧排满幡帐、幢盖、宝案、宝舆，富丽堂皇，光华灿烂。驮经、像马匹前梵乐齐鸣，后拥薰炉，香烟缭绕，众僧尼整服随行。从朱雀街起一直到弘福寺门前，数十里间，文武官员、长安百姓列两旁瞻仰，真是人山人海。

二月，玄奘赴洛阳拜见了唐太宗。太宗赞他舍身求法，惠利苍生，并询问沿途所见的山川气象、物产风俗、佛教圣迹，以及张骞未见、《汉书》未记的种种问题。玄奘对答如流，太宗于是请主持撰写《大唐西域记》。随后，玄奘要求太宗帮助翻译从西域请得的梵本佛经。太宗满口答应，安置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并

征选各方高僧相助，组成一个人才济济的译经班子，而物资供给也十分丰厚。

贞观十九年五月译经正式开始。玄奘手持贝叶经，开讲经文，带头创译《大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此后又组织翻译了《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瑜加师地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大乘五蕴论》、《能断金刚般若经》、《摄大乘论》、《缘起圣道经》、《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论》。

贞观二十二年大慈恩寺建成后，玄奘主持寺务，移此寺翻经院译经。又翻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大乘成业论》、《阿毗达磨俱舍论》、《顺正理论》、《难提密多罗所说法经住记》、《显无边佛土功德经》、《陀罗尼》、《因明正理门论》、《瑜伽师地论释》。玄奘专心翻译，每日自立课程，若白天有事，必夜间赶出。常过夜半才停笔，接着礼佛。三更暂眠，五更又起读诵梵本，用朱笔点定，并安排次日翻译。每日黄昏，还要抽出二时讲新经论，答各方僧人疑难。过度劳累，使他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一度病倒。

病愈后，在高宗的关照下，曾在宫中供养，居洛阳积翠宫。后为减少俗事应酬又移居长安西明寺。无论居住何处，玄奘都译经不辍。又译了《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发智论》、《集异门足论》、《品类足论》、《大般若经》等等。前后十九年间，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娑论》二百卷和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是玄奘翻译佛经事业中最卓越的成果。太宗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撰《述圣记》，都对玄奘求法事业高度褒美。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这一学究天人、行迈古人、朝野共仰、中外同钦的一代伟大学者圆寂于玉华寺，享年六十九岁。外间得知后，高宗流涕，百官痛哭，僧侣奔走哀号。四月十四日，

在终南山下白鹿原安葬时，长安周围五百里内百余万人前来送葬，三万余人挂孝宿于墓旁。至总章二年（669年）四月八日，诏旨徙葬于樊川北原，营建塔宇。迁殡之际，众人哀恸，一如初丧。可称生荣死哀，前所未有。至于玄奘为学忘身的精神和伟大的成就，一直激励着后人。

（马俊民）

参考资料：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

苏渊雷：《玄奘》

唐平东突厥（上）

唐太宗李世民接到李靖等平定东突厥(又称北突厥或突厥)的捷报，竟对侍臣道:“往昔国家草创之际，太上皇因为百姓的缘故，屈膝称臣于突厥，我对此真是痛心疾首。此后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发誓要消灭突厥，今日终于实现了我的宿愿，洗刷了奇耻大辱。”李渊太原起兵及以后一段时间称臣于东突厥一事，本是唐庭后来讳莫如深的不光彩的历史。李世民泄露这一机密，既说明他高兴得忘乎所以，更说明平定东突厥对大唐坐稳天下的重大意义。

原来，东突厥被隋文帝杨坚战败后，启民可汗曾纳贡称臣。但隋末政乱，东突厥在启民子始毕可汗统领下乘机复振。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北巡，耀武扬威，想乘机震摄东突厥，反被始毕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隋臣樊子期、萧瑀等用尽心机，杨广才侥幸脱险。此后，东突厥更加强盛，雄踞漠北、东控契丹、西臣吐谷浑、高昌，控弦百万，成为势倾华夏的强大军事力量。隋末起兵的薛举、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虽称王道帝，但都对东突厥屈膝称臣，接受可汗之类的封号，引以为援。连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也以宗女下嫁，勾通联系。

李渊毫不例外，太原起兵时就向东突厥始毕称臣，占据关中称帝建唐后，前后朝贡送礼，多不可数。但始毕越来越骄横，每派使者到长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唐高祖李渊考虑稳定关中和平定中原是大唐当时主要任务，只好忍气吞声，百般讨好，恣其所为。

武德元年（618年）正月，始毕可汗派骨吐禄特勤（一曰“特勤”，即可汗子弟）来，李渊在太极殿大摆宴席为他接风，奏九部乐助兴，并厚赠锦綵布绢。九月，李渊派李琛、郑元璹给始毕可汗送去歌妓美女。十月，始毕叫骨吐禄特勤来唐，李渊不仅设宴款待，还亲引其升御塌同坐，示以殊荣。

但东突厥的贵族们欲壑难填，特别是他们竭力要保持中原分裂的状态，以从中渔利，因此同时支持中原各支政治势力，使其互相撕杀、割据。武德二年闰二月，始毕率军渡黄河至夏州，割据夏州（今内蒙白城子）一带的梁师都发兵相会，企图南下虏掠唐地。同时，颉利还分五百骑兵支援割据马邑的刘武周自句注（今山西代县西北）进攻唐的太原（今山西太原南）重地。不料始毕猝然身亡，此举未能成功。

始毕可汗死后，子什钵苾年幼，立其弟俟利佛设为处罗可汉，仍以隋义成公主为妻。处罗以什钵苾为泥步设（“设”是别部领兵的官称），后升为小可汗，名突利可汗，领一支部众居于幽州（今北京的正北面）。统领东突厥东部区域，管辖本地契丹、奚、霫、靺鞨等数十部族。

李渊闻听始毕可汗南下入寇的军情，立即派高静奉厚礼出使东突厥，以谋取转机。但高静到达丰州（今内蒙五原南），李渊得知始毕可汗死讯，便令他将携带的宝物收藏在本州府库，以侥幸观变，不想再进奉纳贡。处罗见唐竟敢如此不恭，悖然大怒，立即点兵大举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见情况不好，连忙叫高静带原来厚礼出塞纳贡，处罗怒气才消，收兵而归。然而，处罗可汗仍延续始毕维持中原分裂、阻挠任何一姓统一的方针。四月，处罗派军支持刘武周进军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北）威逼太原。而六月，他又派使者来唐正式通知始毕去世。李渊不敢怠慢，举行隆重的仪式：亲自在长乐门哀悼，废朝三日，并诏令百官就使馆吊丧，随后，又派郑德挺前往突厥吊祭，并带去三万段绢帛作为赙礼。李

渊的这种纳贡孝敬的表现，暂时博取了处罗的欢心，李世民讨伐刘武周，他派弟步利设率二千骑兵相助。

与此同时，处罗可汗还支持另一割据势力梁师都。梁师都是夏州人，世代为本郡豪族，曾任隋鹰扬郎将，大业十三年二月，据郡反隋，随即投靠了东突厥。后攻占雕阴（今陕西绥德）、弘化（今陕西庆阳）、延安（今陕西延安北）等郡。自称皇帝，国号为梁，年号永隆，始毕可汗赐与大度毗伽可汗的封号。他经常勾引东突厥南下虏掠。李渊建唐后，梁师都也曾连结割据陇右的薛举与唐为敌。武德二年八月，梁师都与东突厥合数千骑兵进寇延州（今陕西延安北），唐将段德操兵少不敌，闭垒不战，以耗敌军。直相持到九月，梁师都军师老懈怠，段德操乘机，将其击溃。但梁师都不甘心失败，于武德三年七月，又引来东突厥兵报仇，但仍被段德操战败。九月，东突厥莫贺德设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唐将杨仁恭战败，居民男女数千人被东突厥虏掠西去。

十一月，梁师都眼看割据一方的群雄薛举、刘武周等都被唐消灭，连自己手下将领张举、刘旻也慑于声威降唐，深感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派陆素览前往东突厥，劝说处罗道："往昔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纷纷归附东突厥，纳贡称臣。如今连定扬可汗刘武周也被唐灭掉了，天下即将为唐统一。那时臣我家破人亡倒不足惜，恐也会危及大王。不如乘唐羽翼未丰，您南取中原，君临天下，臣愿为向导，效犬马之劳。"处罗觉得言之有理，于是谋划兵分四路，大举进攻中原。

处罗虽制定好入主中原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但尚未出师也猝然身亡。义成公主因处罗子奥射设丑弱，改立处罗弟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颉利是启民可汗第三子，名咄苾，初号莫贺咄设，建牙帐于五原（今内蒙五原南）之北。

颉利继可汗位后，仍纳隋义成公主为妻，随后派使者入唐报丧，李渊隆重吊祭，礼仪完全象始毕丧时。然而颉利承父兄之资，

兵马强盛，野心更大，一心要主宰中原。因此，尽管李渊象以前那样仍忍辱纳贡，但颉利欲壑难填，索取无厌，言辞骄横，比兄始毕、处罗尚有过之，还不断举兵侵扰虏掠。

武德四年四月，唐稳定了关中的统治，平定东都，河朔的战役也接近尾声，遂开始改变屈辱纳贡的政策，双方战争随而频频不断。十二日（已亥）颉利可汗率万余骑兵进攻雁门，被唐将李大亮击退。二十二日（戊申），突厥又攻并州。五月，突厥寇边，李渊令李叔良率军反击，激战中叔良中流矢阵亡。八月，突厥进攻代州（今山西代县），唐将李大恩派部下王孝基抵御，但全军覆灭。突厥乘胜进围崞县（今山西原平北），李大恩据城固守，突厥围困月余才撤离。九月，突厥分兵一路攻并州，李渊令窦琮等进击；突厥另一路军攻原州，唐将尉迟敬德率兵抗拒。

十一月，割据渔阳（今河北蓟县）一带的高开道与突厥连兵，频繁南下虏掠，恒（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幽（今北京）、易（今河北易县）等州皆受祸害。

高开道本是沧州阳信人，少以煮盐自给，勇力过人，跑似奔马。大业末年参加反隋，后攻战渔阳（今河北蓟县）为都城，自称燕王，国号燕，署置百官，割据一方，北连突厥，作为靠山。

武德五年，唐与再次崛起山东的刘黑闼鏖战。李渊为了牵制黑闼和东突厥的关系，三月，他不仅派使者带厚礼重赂颉利，还以和亲进行拉拢。颉利表面也作出交好的姿态，将原先扣留的唐使李瓌、郑元琦、长孙顺德放送，还派使者回访唐廷。李渊也将先前扣留的突厥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等送还。然而，颉利并没有改变他的既定方针，几乎与此同时，他和高开道、苑君璋合军进攻雁门。唐并州总管刘世让死守城池，颉利可汗攻城达月余，才不克而退。

苑君璋原是刘武周部将，武周兵败降东突厥后被杀，突厥让他统领刘武周余部，在突厥卵翼下以恒安（今山西大同）为据点，

进行割据。

四月，唐代州总管李大恩被东突厥杀死。原来，李大恩曾奏称东突厥饥荒，乘机可攻取马邑（今山西朔县，当时由苑君璋控制）。李渊随即令独孤晟率兵与李大恩合军进击，并在二月会师于马邑。但独孤晟失期未到，李大恩孤军不能独进，只好屯兵新城（今山西朔县南）。颉利得到军报，派数万精骑和刚被李世民战败投奔自己的刘黑闼合围李大恩。李渊急令将领李高迁相救，但援军未到，李大恩军粮已尽，被迫夜间突围。东突厥精骑于途中邀击，大恩阵亡，唐军战死数千人。

五月，东突厥进攻唐忻州（今山西忻县），被李高迁击退。六月，东突厥出兵支持刘黑闼进攻河北，深入定州（今河北定县）。八月初六（乙卯），颉利可汗寇边，李渊令将军段德操、郭子和率兵抵御。初七（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兵入雁门，初十（己未）攻并州，另派西路军进攻原州。大敌压境，李渊令太子李建成出豳州（今陕西彬县）援原州，令刚从山东击徐圆朗班师回朝的李世民出秦州（今山西河津）援并州。同时令郭子和直插云中（今山西大同），待颉利回师时进行掩击；段德操进军夏州，待机截击西路的东突厥归敌。

颉利引军南下受阻后，便派使者来唐谈和亲交好。十二日（辛酉）李渊召集群臣商讨战和哪个有利。郑元璹等多数人认为战则怨深，不如先和。但封德彝认为："东突厥恃兵强马壮，轻视大唐，今岁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虏掠。如果集结大军，全力出击，胜后而和，则恩威并著"。李渊点头。二十日（己巳），并州大总管李神符破东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顗也破东突厥，斩首五千余级。

颉利并没因局部受挫撤退，而是聚集数十万精骑，驻满了自介休（今属山西）至晋州（今山西临汾）数百里间的田野山谷。二十七日（丙子），他率兵攻廉州（位今山西北部）；二十九日（戊

寅)，东突厥西路军攻陷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威胁京师。颉利的强大军力和凌厉攻势，迫使李渊不得不采取重赂求和的缓兵之计，于是派郑元璹面见颉利。元璹道："唐与东突厥，风俗不同，东突厥虽然得到唐地，不能久居。今日战争所获又全人部下私囊，于您何利之有？如果您班师而回，与唐和亲，那时不劳您远途跋涉，就能得到唐奉送的大量金币，而且又全人您的府库，岂不更好！"颉利为利所动，欣然同意，引兵而归。

武德六年五月，一些割据豪强又在东突厥支持下反攻大唐，梁师都部将辛獠儿引东突厥攻林州（今陕西华池东西），苑君璋部将高满政攻代州，高开道引东突厥攻幽州。但六月十四日（戊午），唐却获取了军事重镇马邑。

原来，并州总管刘世让调任广州总管，临行时李渊召见并询问加强边防的方略。世让道："东突厥近来能多次深人我境内虏掠，正因为通过苑君璋控制了马邑军事重镇。马邑有城有粮，成为东突厥长途行军的中间休息供养基地。如果派勇将驻扎崞城，多贮金帛，重赏降者，同时连派骑兵到马邑城外虏掠，践踏庄稼，这样不出一年，城中粮尽，必降无疑。"李渊听罢，连称妙策，随即命刘世让镇守崞城。他依计而行，马邑果然困弊。当时，马邑人也不愿附庸东突厥，李渊又乘机派使者召降，高满政劝说苑君子尽杀东突厥戍兵投降。君璋不从，满政顺从民心，在夜间突袭君璋。君璋察觉，狼狈逃奔东突厥。满政遂杀君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后举城归唐。苑君璋并不甘心，二十三日（丁卯）和东突厥吐屯设反攻马邑，但被高满政击败，李渊嘉奖满政，任命他为朔州总管。

七月开始，东突厥对唐北部边境发动连续攻击，初二（丙子），苑君璋引东突厥万余骑又攻马邑，李渊令将李高迁助高满政反击获胜。初九（癸未），东突厥攻原州，十一日（己酉），攻朔州（今山西朔县），李高迁被东突厥战败，唐将尉迟敬德忙率兵相

救。由于北部边境吃紧，十三日（己亥），李渊派李建成率军屯驻北边，以备攻原州一路之敌。李世民守卫并州，以抵御攻朔州一路的东突厥。八月初一（甲辰），东突厥攻真州（今陕西榆林东），又攻马邑。二十八日（辛未），攻陷原州的善和镇。九月又两次进攻幽州。

配合军事进攻，东突厥还施行反间计。前述七月时苑君璋在东突厥支持下想夺回马邑，但未能得逞。颉利大怒，大发精兵攻马邑。唐将李高迁恐惧万分，夜间率所部二千人开城逃跑，途中遭东突厥骑兵邀击，伤亡过半。颉利亲率兵攻马邑，高满政出兵御敌，艰苦奋战，李渊令驻守崞城的刘世让前去相救，世让率军至松子岭，见东突厥军力强大，不敢再进，回保崞城。颉利一面进攻，一面派使者到唐请求和亲。李渊提出要和亲必须首先解除对马邑的包围，颉利不听，加紧攻城。高满政虽拼死守城，但外无救兵，内粮也尽，万般无奈，想突围到朔州。而部下杜士运认为难以成功，遂刺杀满政投降东突厥。苑君璋入城杀满政亲信三十余人后又退保恒安。随后，东突厥又提出和亲，并把马邑归唐，来使曹般陁还密告唐将刘世让前时暗与东突厥勾通，才回兵不救马邑，而且，不久还要叛乱。李渊中敌反间之计，信以为真，竟派人杀了刘世让。被东突厥视为一大劲敌的大唐名将就这样冤屈而死，时在十月初四日（丙午）。

东突厥精骑频频进攻，来如飚风，去如骤雨。唐调动大军抵御，粮草供给是大问题，为节省运输费用，并州守将窦静上表获准在太原置屯田，边耕边战。

武德七年初，东突厥看到唐不仅消灭了刘黑闼、徐圆朗，稳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且就要平定再起江淮的辅公祏。为了阻挠唐的统一战争，更加紧了军事进攻。三月攻原州，五月攻朔州，六月攻武周城（今山西左云），七月再攻朔州、原州，又攻陇州（今陕西陇县）、阴磐（今甘肃平凉东）、并州。在东突厥强大

攻势面前，李渊竟要焚毁长安，迁都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躲避，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和宰相裴寂都赞同，多亏秦王世民谏阻，提出自己在数年内要生擒颉利，否则再迁都也不迟。闰七月，李渊令世民、元吉率兵出豳州（今陕西彬县）抵御东突厥。八月，东突厥对原州、忻州、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发动进攻，矛头指向长安，唐京师紧急戒严。

李世民率军北进，和东突厥相遇于豳州。这时，颉利、突利两可汗倾全国军力攻唐，而唐虽基本完成了统一战争，但国力尚不足与东突厥抗衡。加上关中秋雨连绵，粮道不通，战士疲于征役，军械也破旧不堪。唐廷和军中对迎战东突厥都缺乏信心。八月十二日（己卯），东突厥万余骑兵居高列阵，唐军震恐。世民对元吉说："现敌军气焰嚣张，我们不可怯战，你能和我一同出击以耀军威吗？"元吉惧道："形势如此，为何冒险出战，万一失利，后悔莫及。"世民说："你既不敢，我当独往。"于是留下元吉压阵观战，亲率精骑驰向敌阵。他首先大义凛然地对颉利可汗讲道："唐一向奉行和亲修好，可汗为何背约，深入我地！事已至此可汗若有胆量，我们可单战独斗，一决雌雄，可汗若无胆量，只凭人多势众，我也敢以身边一百骑兵拼个你死我活。"颉利素知世民英武多谋，恐是诱敌之计，因难测唐军虚实，只是笑而不答。世民抓住颉利狐疑，不敢贸然进攻之机，又率骑驰向突利道："你往昔和我焚香盟誓，说急难相救，可今日引兵相攻，哪有兄弟之情！世民此举本在离间颉利和突利，而突利正因害怕颉利产生猜疑，也不敢答话。世民乘机又打马向前，将渡河沟，接近突利。原来颉利、突利叔侄间已有嫌隙，颉利见世民简从轻出，又听结为兄弟之言，怀疑突利和李世民真有盟约，对自己不利，便派人向李世民声称此来本无他意，只是想和唐再次申固盟约。随后引兵稍退。

李世民用计虽暂缓危机，但强弱之势并未转变，双方仍在对峙。此后秋雨更甚，世民又生一计，对众将说："东突厥依仗的锐

利武器是弓箭，如今秋雨连绵，筋胶潮解，弓不能用，敌方就象飞鸟折断两翼。而我军屋居火食，刀槊犀利，又以逸待劳，此机不乘，更待何时！”遂潜师夜出，冒雨而进，东突厥大惊。与此同时，世民又派人以利害说动突利。此后，颉利要战，突利反对。颉利只好派突利和自己的部下阿史那思摩会见世民，双方约定和亲罢战。世民乘机又进一步拉拢突利，两人盟誓结拜为兄弟。李世民在军事上不利的情况下，就这样以智退敌，并离间了颉利、突利两可汗的关系。

后来，颉利派使者阿史那思摩到长安，李渊手引思摩升御榻共坐，百般慰劳拉拢。随后李渊又派裴寂回访了东突厥。

然而颉利并没有改变对唐的既定战略，九月，派兵攻绥州，十月又攻甘州，军事虏掠连续不绝。因此武德八年四月，唐廷计议大举反击东突厥，并且恢复了十二军的建制，以窦诞等为将军，精选训练骑兵。此十二军是武德二年七月初置，分辖关内众军府。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任职，督以耕战，由此士马精强，所向无敌。武德六年二月，唐平定刘黑闼、徐圆朗后，李渊认为天下已定，被废除，现又恢复。

六月，李渊令罗艺屯华亭县（今属陕西）和弹筝峡（今陕西平凉西）、姜行本断石岭道（今山西忻县西）防备东突厥。但颉利则攻灵州，李渊忙派张瑾为主将，温彦博为副将前往抵御。七月，唐代州都督蔺謩与东突厥战于新城（今山西朔县南），唐军不利，李渊急调张瑾屯石岭、李高迁屯太谷（今属山西）御敌，又令李世民守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防备东突厥威胁长安。

八月，突厥一路军逾石岭攻并州城；另一路攻灵州。后又连攻潞（今山西长治）、沁（今山西沁源）、韩（今山西襄垣）三州。李渊令李靖出潞州道，任瓌屯太行山一线，防御东突厥，屏卫中原。但颉利可汗亲率军十余万大肆虏掠朔州。唐将张瑾与东突厥战于太谷，全军覆没，仅单身逃奔李靖，温彦博临阵遭擒，因不

屈而被流放到阴山。东突厥获胜后西攻灵州，被灵州都督李道宗击败。不久，颉利派使入唐约和，撤兵北归。

武德九年二月，突厥攻原州，唐派将军杨毛出击。三月，东突厥攻灵州。当时唐臣欧阳胤奉命出使正在东突厥，谋划率五十名部下突袭颉利牙帐，但因机密泄露而被囚禁。四月，东突厥连续进攻朔州、原州、泾州。唐将李靖与颉利在灵州硖石（今宁夏青铜峡市西南）激战一整日，东突厥才退，但又进攻西会州（今甘肃靖远）。五月，东突厥攻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兰州（今属甘肃）。六月攻陇州、渭州（今甘肃陇西东南）。李渊令将军柴绍率军出击。七月，柴绍在秦州打败东突厥，斩首千余级。随后东突厥又派使者入唐约和。

八月初九（甲子），李世民即皇帝位，但国内政局因玄武门之变尚存动荡。这时，梁师都力劝东突厥抓此战机攻唐。于是颉利、突利两可汗合十余万骑冲杀而来，掠泾州（今陕西泾州北），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唐京城戒严备战。二十四日（己卯），东突厥推进到长安东北七十里的高陵。二十六日（辛巳），唐猛将尉迟敬德与东突厥在泾阳（今属陕西）激战获胜，斩首千余级，但并没能扼止东突厥的攻势。二十八日（癸未），颉利率大军进至距长安仅约五十里的渭水便桥，他一面在渭水北岸列阵威逼长安；一面派心腹执失思力为使者入唐观察虚实，并进行军事恫吓。李世民毫无惧色，厉声斥责道："我曾与你可汗面结和亲，赠送金帛，前后无数。今你家可汗背弃盟约，引兵入寇，不讲信义，可你还敢自吹强盛，现我先斩你，再去破敌。"思力惧而恳求饶命，萧瑀、封德彝也请以礼遣回。李世民道："今若放他，东突厥还以为我胆怯，必更加骄横，暂且将他囚禁于门下省，等候发落。

随后，李世民亲出玄武门，仅带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至渭水南岸，与东突厥隔河相对，高声责备颉利不应弃盟背约，化玉帛为干戈。东突厥见世民亲临简从，无不惊讶，这时，唐诸军

相继而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李世民挺身先出，军容严整，士气旺盛，而探测虚实的执失思力又被扣不回，摸不透李世民的疑兵之计，因此心存顾忌，不敢贸然挥军进攻。李世民洞察敌方心理，指挥众军后撤一步，列好阵势，自己要单骑独与颉利对话。萧瑀认为这太冒险，拉马力谏。世民说："此事我已深思熟虑。东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京畿，以为我们有玄武门之变的内难，而我又新即帝位，不可能出兵御敌。今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东突厥定会纵兵大掠，那时将为害不浅。而我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耀军威，使知必战；出其不意，打乱敌谋。况且东突厥孤军深入内地，也有顾虑。因此我与战则可胜，与和则可成。制服东突厥，在此一举。"果然不出所料，当日颉利派使谈和，李世民同意，随即回宫。三十日（己酉），李世民亲至城西，在渭水便桥上，与颉利斩白马盟和。东突厥得到唐赠送的大量金帛后引兵撤回。

萧瑀请教世民道："与东突厥未和之时，众将争相请战，陛下不许，可不久敌方自退，原因何在？"世民解释道："我观察东突厥兵虽多而阵不严整。他们君臣唯贿是求，当双方约和时，只可汗独在渭水西岸，其他显官都过河东拜我，我若在宴中将他们灌醉后统统擒获，再乘势进攻，可摧枯拉朽。而且，东突厥攻泾阳时，我就令长孙无忌、李靖率兵埋伏在东突厥北归必经的豳州。那时，东突厥如逃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败之易如反掌。但我所以不战，因我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不富，应当生息休养。一与东突厥交战，难免重大消耗；东突厥怨恨既深，必然惧而备战，那就影响我远期目标的实现。今我不战讲和，贿以金帛，彼方已满足欲望，理当自退，而且会志意骄惰，不复设防；我则养威伺隙，可一举根除敌患。老子曰：'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正是此意！"由于唐与东突厥不战而和，埋伏在豳州的李靖等也未邀击。李世民就这样以智退敌，化险为夷。

九月，东突厥赠唐马三千匹，羊万口，李世民不收，但请归

还所虏掠的中国户口，以及前兵败被俘的温彦博。

李世民清楚知道，边患并未真正解除，为彻底消灭东突厥，他抓紧战备训练。二十二日（丁未），李世民引诸卫骑兵统将等，在显德殿庭习射，并教导说："戎狄侵掠，自古就有，不足为奇，患在边境稍安，人主即逸游忘战，敌来则措手不及。今日朕不让你们挖池筑苑，而专习骑射；政事之暇，则教你们练武，突厥入寇，则让你们做统帅。这样，中原百姓才可以安居乐业。"此后，持之以恒，每日训练数百人，并亲自考核。士兵中箭法优秀的赏以弓、刀、帛，对其将帅也加奖励，群臣多劝阻，说让这些身份低微的武夫于显德殿庭张弓挟矢，而皇帝又亲临其间，实在危险。他一概不听，说："帝王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难道还猜忌自己的宿卫之士！"将士听后深受感动，无不尽心竭力，苦练骑射本领，数年之间，练成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劲旅。

贞观元年（627年），东突厥内部形势变化。初，突厥族性淳厚，政令简略。后来颉利可汗重用汉人赵德言。德言专权，多变更东突厥旧俗，而且政令烦苛，东突厥人开始不满。颉利又信任西域胡商而疏远本族人，但胡商贪婪阴险，反复无常，颉利因多次兴兵讨伐背叛的胡商，导致兵革岁动，无有宁日。加上连年冬季大雪，深达数尺，牲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足，重敛各部，因此内外离怨，部众多叛，兵势渐弱。再者，东突厥强盛时，居于碛北的铁勒十五部都降附颉利。此时，铁勒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见颉利政乱，相继背叛，他也无力制服。

五月，依附颉利的苑君璋也率众降唐。原来，武德六年，苑君璋引东突厥攻陷马邑，杀高满政后退保恒安，但他的部下都是汉人，纷纷归唐，君璋心存恐惧。此时，他也看到颉利政乱，难以倚靠，遂降唐。李世民任命他为隰州都督。

到十二月严冬季节，不仅颉利内政更衰，族人离散，而且又逢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众大饥。颉利恐怕唐乘其困弊

出兵进击，于是以攻为守，引兵入朔州境内，扬言围猎，实际设防。唐郑元璹出使东突厥返回，知其虚实，对李世民报告："戎狄兴衰，常以羊马为征兆。今东突厥民饥畜瘦，这是将亡的迹象，不会超过三年了。"世民点头，群臣也多劝世民乘机出击东突厥。他却答道："新与人盟而背叛，这是不信；利人之灾，这是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这是不武。即使颉利所辖部族分崩离析，六畜死亡无余，朕也不出兵攻击，定要待他有罪于我，然后再名正言顺出师讨伐。"其实，这是一种托词。李世民初平内难，国力不足，尚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贞观二年，东突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突利可汗上表唐朝，表示愿意归附。原来，随着东突厥势衰，加以突利征税无度，辖区内的部族多叛降归唐，颉利斥责突利无能，丧失部众。再者，薛延陀、回纥背叛后，颉利曾派突利征讨，但大败而回，颉利怒他辱丧军威，不仅囚禁十余日，还加以鞭挞，突利心中怨恨，暗欲叛离。不久，颉利又征调突利部下兵力，突利不给，恐颉利率兵攻击，才上表降唐，以备万一。

颉利果然发兵攻突利，四月十一日（丁亥），突利派使者来唐乞援，并奏称自己与颉利已成仇敌，请唐来合击颉利。李世民一面令秦武通以并州兵马相机接应，一面和群臣谋议。他说："朕与突利三年前就结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但和颉利在渭桥又定立了盟约，如何是好？"杜如晦道："戎狄无信，终必负约，今不因其衰乱而讨伐，将后悔莫及。而取乱侮亡，本是古训。"李世民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仍没有大举出师。

二十日（丙申），契丹酋长率部落降唐，颉利遣使者来，要以梁师都和唐交换契丹。李世民严辞拒绝道："契丹和突厥种族本不相同，今来附我，你凭何索要？梁师都是华夏族人，侵盗我土地，暴我百姓，我兴兵讨伐，你们还庇护支持。现他已成釜中之鱼，何愁不被我擒；即使不能如此，我也决不会以降附之民换梁师都逆

贼！”其实，李世民早已深知东突厥衰乱，不能再庇护梁师都，曾出书招降，师都不从，遂命驻夏州的将领刘旻、刘兰成图谋。刘旻等频频派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师都朔方城中渐渐空虚，降唐的络绎不绝，连亲信将领李正宝、辛獠儿等都降了唐朝。刘旻等见战机已成，上表请兵，世民随即令柴绍、薛万均率军讨伐，又令刘旻等据朔方东城进逼。颉利发兵救梁师都，柴绍率军中途迎击，大败东突厥，进围朔方城。颉利不敢再救。城中食尽，二十六日（壬寅），梁师都堂弟梁洛仁杀师都降唐。梁师都从隋大业末起兵割据，至此被唐所灭，共十二年。

九月，东突厥乘天高气爽，又侵扰边境，唐朝臣中有人建议修秦蒙恬所筑的古长城，征发百姓登堡障来防御东突厥，李世民大不以为然说：“东突厥灾异频现，可颉利不惧而修德，却更加暴虐，乃至骨肉相残，亡在旦夕。朕正要为诸公扫清沙漠，何用劳民远修障塞！”这透露了李世民要以进攻的战略方针来根除东突厥造成的边患。

当时，东突厥北方叛离颉利的铁勒部族纷纷归附薛延陀，共推夷男为可汗，但夷男尚惧颉利，不敢当。李世民正力图孤立东突厥，于十二月间，派乔师望抄隐蔽小路至薛延陀，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以表示支持。夷男大喜，遣使入唐朝贡。唐与称雄漠北的薛延陀结盟，使东突厥处于南北两面受敌的不利地位。贞观三年八月，薛延陀毗伽可汗派弟统特勒入唐朝贡，颉利可汗得知惊恐异常，开始向唐称臣，并请娶公主，修子婿礼，实际施行缓兵之计。这时，唐代州都督张公瑾上表言应抓住战机、消灭东突厥六大理由，称：“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此其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此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都讨叛丧师获罪，无立足之地，此其三；塞北霜旱，粮草乏绝，此其四；颉利疏远本族，亲委诸胡，胡人性反复，大军一临，必生内变，此其五；华人避隋乱北入突厥，数量甚多，近闻啸聚反抗，保据山险，

我军出塞，自然响应，此其六。”

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彻底铲除东突厥的时机完全成熟。张公谨提及的是外部条件，而内部条件是唐政局完全稳定。而且贞观三年，关中丰收，经济充裕，特别是几年来李世民精心训练了强大的骑兵劲旅，完全可以和东突厥在辽阔战场上驰骋角逐。于是他以颉利可汗先前既请和亲，又援梁师都为理由，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十一月十五日（庚申），命徐世勣出通汉道（一曰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柴绍出金河道，李道宗出大同道，卫孝节出恒安道，薛万彻出畅武道，六路大军共十余万，都受徐世勣（一曰李勣）节度，分道合击东突厥。不久，李道宗就在灵州首战告捷。这就震动了东突厥和北方各部族。拔野古、同罗、仆骨、奚、鞣鞨纷纷降唐，颉利统辖的有些东突厥部众也如此。十二月十四日（戊辰），突利可汗亲自入唐朝拜。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今内蒙和林格尔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夜袭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北），攻克该城。颉利狼狈逃出，他的亲信康苏密则带隋萧皇后和炀帝孙杨政道投降了李靖。唐军的神速完全出乎颉利的意料之外，他错误地揣测。”唐军若不倾国而来，李靖怎敢孤军至此！”部众也一日数惊，慌忙北撤。

李靖旗开得胜，徐世勣出云中（今山西大同）后也马到成功。颉利北撤，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这是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隘，徐世勣军早已埋伏在此，颉利全然不晓，突遭截击，被杀得大败。

颉利连遭两次惨败，于二月逃窜至铁山（位于今内蒙阴山北），余众虽尚有数万，但已无力和唐抗争，他派执史思力至唐，表示愿意举国内附，亲自入朝请罪。其实，颉利外装卑躬屈膝，内心想等草青马肥，逃入漠北。李世民识破他的缓兵计谋，将计就计，一面派唐俭等前往抚慰，使颉利放松戒备，一面以迎接颉利

入朝为名令李靖率兵继续推进。

李靖很快就和徐世勣会师于白道，两人深深领会了李世民的意图，并在作战方案上获得共识，即颉利虽败，部众仍盛，若渡过碛北，重新控制拔野古、薛延陀等，就会东山再起，而因道路险阻遥远，我方又难以深入追击。今唐使在东突厥，颉利必弛懈，若选精骑一万，带二十日粮奇袭，可大获全胜。李靖将此策略告诉自己的副将张公瑾，公瑾吃惊道："诏书已许颉利归降，使者又在彼处，怎能出击！"李靖道："这正是刘邦遣郦食其去说降，而韩信乘其不备袭破齐国的战术。为了大局，唐俭辈何足惜！"

作战方针一定，李靖便在夜间率精骑进发，徐世勣率另一支紧跟。两军驰至阴山，偶遇东突厥侦察骑步千余，速战速决，全部擒获，为不走露消息，随军压行。随后兵分两路，李靖直指颉利牙帐，徐世勣则前往碛口（今内蒙苏尼特右旗西）。这时，果然不出所料，颉利见到唐俭后大喜，以为缓兵之计奏效，因此不再戒备。李靖则令苏定方率二百精骑为前锋，乘雾疾驰，离颉利牙帐仅七里，才被发觉，但苏定方已飞速掩杀过来，颉利措手不及，无法组织抵抗，仓皇中，乘千里马先逃，李靖率大军跟到，发动总攻，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牲畜数十万，并杀颉利妻隋义成公主，擒其子叠罗施。唐俭则乘乱安全归唐。颉利率残兵万余人想渡碛口逃遁，那知徐世勣早列阵碛口，切断了漠北退路。颉利部下的大酋长们到碛口后见无路可逃，纷纷率众降唐。颉利见势不妙，只得拨马西走，徐世勣俘东突厥五万余口凯旋而还。

先前，始毕可汗以启民可汗母弟阿史那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统领部落五万家，居于灵州西北。突利可汗降唐后，颉利因苏尼失忠于自己，立为小可汗，颉利西逃想先到此暂歇，再奔吐谷浑。但他惊魂未定，出大同道的李道宗又追杀过来，逼苏尼失交出颉利。颉利闻听仅带数骑夜间逃窜，藏在荒谷。苏尼失迫于唐军压力，派

骑驰追，将颉利擒获。李道宗的副职张宝相得知消息，率军突然来到苏尼失大营，苏尼失只得献出颉利，而他也归降大唐。时在三月十五日（庚辰）。

这场反击前后不足四个月，就征服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颉利，李世民也把大漠南面的土地收归大唐的版图。而且，西北各部族君长纷纷来唐请李世民为“天可汗”。此后，凡以玺书赐西北君长，都署此称。

颉利被押至长安，四月初三（戊戌），李世民召见，斥责道：“你凭借父兄之业，纵淫虐以取亡，此罪一；数与我盟而背约，此罪二；恃强好战，白骨遍野，此罪三；蹂我庄稼，掠我民众，此罪四；我恕你罪，存你社稷，而迁延不来，此罪五；但自便桥会盟以后，不再大肆入寇，因此饶你不死。”颉利哭谢而退，随后太宗将他安置在太仆寺，供养丰厚。

李渊闻听生擒颉利，高兴得召世民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公主置酒于凌烟阁，庆功畅饮。酒酣，李渊自弹琵琶，李世民起舞，余众连呼万岁，至夜才罢。

然而，如何安置败亡的东突厥却是一大难事。因为东突厥既亡，所属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降唐的也达十余万口。李世民召群臣商议。大臣中多主张：“东突厥为患中原很久，今日幸而破亡，应把这些降者全部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泛指今河南、山东一带），离散种族，散居州县，教以耕织，这样可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颜师古认为：“突厥、铁勒皆古代所不能制服的强敌，今陛下将其臣服，应置于河北（指今内蒙托克至临河一段黄河以北，时称此段黄河为“北河”），分立酋长，统领部落，就永无边患了。”李百药也认为：“突厥虽说一国，但种类纷杂，各有酋帅。今应乘其离散，给各部任命君长，互不臣服。因分则弱而易制，势均则难相并吞，各自为政，必不能抗衡大唐，再于定襄置都护府，加以总辖，此是安边之长策。”温彦博则认为：

"迁徙到兖、豫间，则乖违物性，非存养之道。请仿照汉建武帝做法，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地域，使为华夏藩篱，此是上策。"魏征不同意这一看法，说："东突厥世为寇盗，是百姓的仇敌，今日破亡，真是万幸。陛下念其降附，不忍尽杀，但应令回故土，不可留在中原。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今降众近十万，数年后蕃息倍多，必为心腹之患。晋初诸胡与汉人杂居中原，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中原之地，遂被诸胡占据，此前车之明鉴。"温彦博反驳道："王者对于万物，象天覆地载，无有遗漏。今东突厥途穷来降，为何遗弃！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仪，数年后，皆成我民。选其酋长，使人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

经过激烈论争，因李世民想施怀柔政策，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于是，将东突厥降众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广阔区域，分突利所辖故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分颉利故地为六州，并划成左右二部，左置定襄都督府（位今陕西靖边东北），右置云中都督府（位今内蒙白城子）。由这些机构统辖归降的东突厥部众。五月，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率部落还蕃。并封和颉利一同被擒的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不久，又任命思摩为北平州都督，使统领颉利旧部，其余东突厥酋长至长安的都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就有百余人，几乎占朝臣中大臣一半，随他们人居长安的东突厥人近万家。

贞观六年，居长安的颉利郁郁寡欢，常与家人相对悲泣，容貌倦怠。李世民见而怜悯，因虢州（今河南灵宝）地多麋鹿，可以游猎，便任命颉利为虢州刺史，但他辞不愿往。贞观七年十二月，李世民随父李渊置酒于汉未央宫。李渊命颉利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大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贞观八年正月十日（癸未），颉利死，李世民令东突厥人按其风俗焚尸于

灞水东，并追封归义王。突利前已死于贞观五年，是入朝途中病亡在并州的。李世民得知亲自哀掉，并令岑文本撰写碑文，以突利子贺逻鹘嗣位。

贞观十三年发生一件意外事件。先前，结社率随兄突利朝唐，被任为中郎将，但居家无赖，受突利训斥竟诬告兄长叛唐。李世民查清真相，鄙视其为人，久不提升。结社率心中怀仇。这年四月，李世民居九成宫，结社率随从宿卫，他暗中勾结旧部四十余人，阴谋乘晋王李治四更出宫开门时驰入宫中，刺杀李世民，夺取帝位。十一日（甲申），结社率带贺逻鹘夜伏宫外，不料因大风李治未出。结社率恐天明被察觉，遂孤注一掷，进攻御营，突破四重幕帐，乱箭齐发，射杀数十名皇帝卫士。宿卫将领孙开武率军奋战，结社率等不敌才撤退，驰入御厩，抢二十余匹马北逃，想渡渭水回旧地，被追获斩首。只特免贺逻鹘死罪，流于岭外。

乱事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朝臣中纷纷进言，说留东突厥在河南（指“北河”之南）是祸患。李世民也有些后悔，道："华夏是根干，四夷是枝叶，割根干以奉枝叶，树怎能茂盛！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遂于七月，诏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并令在各州安置的东突厥及诸胡降户全部渡黄河返回旧地，作唐藩篱，守卫边塞。但当时薛延陀雄踞漠北，突厥恐惧，不敢出塞。李世民派郭嗣本赐薛延陀玺书，告知突厥是奉唐命回居漠南，两方要各守本土，不得相互抄掠。薛延陀表示遵命，李世民于是遣思摩率部在河北建牙帐，并在齐政殿亲自饯行。思摩泪下，举杯谢恩道："奴等败亡之余，蒙陛下再生之恩，复立可汗，誓子子孙孙永侍陛下。"

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三日（乙亥），阿史那思摩才率东突厥部落渡黄河，在故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牙帐，有户三万，兵四万，马九万匹。但思摩不能抚御，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突厥部众弃思摩南渡黄河，请求居于胜、夏之间（今内蒙托克托至白城

子一带)。当时，李世民正要远征高丽，群臣认为，胜、夏距京师不远，若允许东突厥居住，岂不增后顾之忧。世民则认为："夷狄也是人，性情皿与华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族。若恩泽深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骨肉不免为仇敌。东突厥贫弱，朕收而养之，度其感恩深入骨髓，岂肯为患！"于是力排众议，下诏应允。思摩既失部众，也轻骑入朝，李世民任为右武卫将军。

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东突厥余部乙注车鼻可汗遣使入唐朝贡。车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代为小可汗。颉利败亡，他率一部分东突厥人归降薛延陀，但不久遭疑忌又逃离。薛延陀派数千骑追击，反被斛勃战败。于是，斛勃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北建起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数年间，胜兵三万。及薛延陀被唐战败，斛勃势益强大，但怕唐讨伐，就派了沙钵罗特勤入唐，又请示亲自朝见。当李世民派郭广敬真令他入朝时，则只讲好话，没有来意。贞观二十三年正月，李世民派高侃征发回纥、仆骨等部族攻击斛勃。兵一入其境，斛勃所属拔悉密部吐屯（突厥官名）肥多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六月，唐高宗李治即位。十月，李治对已经归顺的东突厥各部重新设置管辖机构：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阿史那部置阿史那州，绰部置绰州，贺鲁部置贺鲁州，葛逻禄、悒怛二部置葛逻州，并隶属云中都督府（辖区相当今内蒙阻山西北一带）；以苏农部置苏农州，阿史德部置阿史德州，执失部置执失州，卑失部置卑失州，郁射部置郁射州，多地艺失部置艺失州，并隶属定襄都督府（辖区相当今内蒙二连浩特市东北一带）。

李治令高侃继续征服斛勃。永徽元年（650年）六月，高侃追击至阿息山，斛勃召所属诸部兵，皆不至，只好带数百骑逃窜。高侃率精骑紧追不舍，至金山，终于将斛勃擒获。九月初四（庚子），高侃押解斛勃到长安。李治免罪释放，并任命为左武卫将军，

管。随后，唐在东突厥居住的广大区域分置单于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前者辖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二十四州；后者辖瀚海、金微（一为“金徽”）新黎等七都督府，仙萼等八州。仍以东突厥原各部酋长为刺史、都督。唐通过这些机构进行统治。至此，东突厥全部被唐征服。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2—199

《通鉴纪事本末·太宗平突厥》

两唐书：《突厥传》、《梁师都传》、《李叔良传》、《高开道传》、《苑君璋传》、《封伦传》、《李靖传》、《高祖纪》、《太宗纪》、《张公谨传》、《李勣传》、《苏定方传》、《高宗纪》

《贞观政要·安边》

《唐会要·安北都护府》

唐平东突厥（下）

自永徽元年(650年)东突厥(又称北突厥或突厥)各部均被唐征服后，唐北部边境安定无事近三十年。但调露元年(679年)十月，迁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的阿史德温博、奉职二部叛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随后，漠南降唐的东突厥各部酋长群起响应，拥众达数十万。这象惊雷，震动了唐朝廷。

唐高宗李治忙派萧嗣业、花大智、李景嘉率兵征讨。萧嗣业等初战屡捷，遂骄傲轻敌，不设防备。东突厥乘机先劫粮运，使唐军饥馁，又趁大雪天，夜袭唐营，嗣业措手不及，狼狈逃窜，唐军大乱，被杀不计其数。

东突厥乘胜攻定州(今河北定县)，刺史李元轨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东突厥疑有伏兵，惧而撤退。定州人李嘉运与东突厥暗通，被察觉，高宗令穷治党羽。元轨认为："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大肆追捕，是为渊驱鱼。"于是只杀李嘉运，余无所问，然后上表自劾违旨之罪。高宗览表醒悟，赞叹不已。

为防备东突厥深入河北内地和威胁关中，高宗令曹怀舜屯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关隘，令崔献屯龙门(今山西河津)。东突厥则扇诱奚、契丹侵掠营州(今辽宁省宁朝阳)。

十一月，高宗任命文武兼才的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主力军十八万，又以程务挺为东军统帅，李文暕为西军统帅，全受裴行俭节制。三军合计三十万，浩浩荡荡北伐东突厥。

裴行俭行至朔州(今山西朔县)，知东突厥曾劫掠嗣业粮运，使

唐兵多冻馁，遂诈为运粮草车三百辆，每车内隐藏壮士五人，各持长刀劲弩，只用老弱兵数百护卫，而将精兵埋伏于险要之地待机出动。东突厥果然故伎重演，派兵劫粮，唐运粮的老弱士兵按计弃车四散奔逃。东突厥军洋洋得意，驱车到草丰水美处，解鞍牧马。但正要取粮，壮士突然一起从车中大吼跃出，挥刀砍杀。东突厥军惊恐万状，有的人头落地、有的狼狈逃窜。唐埋伏的精兵也及时赶到围歼，将东突厥劫粮军杀获殆尽，此后唐运粮草车，东突厥再不敢抢劫。裴行俭对部下说："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这就是诈道。"

唐军行至单于都护府北，天气已晚，安营扎寨，但连护营沟堑都挖好了，裴行俭却命令把军营速移到高岗；众将领都说士卒刚安置就绪，不应劳扰；行俭断然拒绝，严令执行。这夜，风雨暴至，前扎营地，水深丈余。众将惊惧之余，无不佩服。当询问原因时，行俭只笑道："今后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就是了。不必追问根由。"其实裴行俭精通阴阳，他看出了天气的变化。

唐军连战连捷不断向北推进，东突厥退至黑山(今内蒙包头西北)。永隆元年(680 年)三月，双方在此会战。裴行俭大破东突厥，临阵生擒奉职，泥塾匐也被部下所杀，东突厥残部逃向西北狼山(今内蒙杭锦后旗西北)。随后，高宗令崔知悌前往定襄处理东突厥余部，裴行俭率大军凯旋而归。

开耀元年(681 年)正月，裴行俭率大军归朝，东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连兵攻唐，李治令裴行俭再次出任定襄道大总管，以曹怀舜，李文暕为副，出师讨伐。

三月，曹怀舜与部将窦义昭率前军进击东突厥途中，有人相告，说，"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在黑沙城，左右不足二十骑，若速往可擒获。"怀舜等相信不疑，留老弱兵于瓠芦泊，亲率精锐轻骑加速前进。至黑沙城，一无所见，但已人困马乏。曹怀舜垂头丧气引兵南回，至长城北，遇温傅，双方仅接触小战，便各自引兵离去。

而到横水，便遭到伏念轻骑的阻击。曹怀舜无心恋战，将军队组成方阵，边战边退，整整一日，忽然狂风大作，伏念顺风猛攻，怀舜弃军逃走，唐军溃败，死伤不可胜数。后来，怀舜收集残兵，敛金帛贿赂伏念，恳请杀牛盟和。伏念应允北去，怀舜才狼狈逃还。

裴行俭屯军于代州陉口（今山西代县境内），先不出击，而使反间计使伏念与温傅相互猜忌。等伏念留妻子、辎重于金牙山自己率轻骑袭击曹怀舜时，行俭则派部将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务挺自石地道偷袭。伏念与怀舜约和后回金牙山，妻子、辎重早被唐军俘取一空。伏念目瞪口呆，士卒因奔驰劳累又多疾疫，只好引兵北走保细沙。裴行俭答应不失战机，令部将刘敬同、程务挺等率单于都护府兵衔尾追击。伏念认为自己位居遥远，唐兵必不能至，不再戒备。刘敬同等率军杀到，伏念慌恐无法迎战，遂执温傅绕道投降了裴行俭。行俭尽平东突厥余党，押伏念、温傅回京师。时在闰七月。

伏念降时裴行俭免除死罪，但回朝后，裴炎妒嫉行俭功高，奏称伏念是被程务挺等逼迫到穷途末路才投降的，不应赦免。于是，十月，高宗下令将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斩首于长安东市。裴行俭叹道："恐杀归降人后，不会有人再投降了。"

不幸被裴行俭言中，永淳元年（682 年），阿史那骨吐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东突厥溃散部众，据黑沙城第三次起兵反唐，随后，进攻并州及单于都护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唐代州都督薛仁贵率兵到云州（今山西大同）击元珍。元珍问，"唐来将何人？"答道："薛仁贵。"元珍说："我听说薛仁贵因罪流放象州，早已死了，为何骗我！"仁贵脱掉头盔，东突厥将士一见是真，慑于声威连忙撤退，仁贵挥军掩杀，俘虏两万余人。但不久，仁贵病死。

弘道元年（683 年）二月，东突厥攻定州、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三月，围单于都护府，杀唐将张行师。五月攻蔚州（今山西灵丘）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知辩率兵到朝那山北邀击，兵败被东突厥生擒。唐朝议竟要废丰州（今内蒙五原南），将百姓迁居灵

(今宁夏灵武西南)、夏(今内蒙白城子)。丰州守将唐休璟上表反对说:"丰州阻河为固,居东突厥南下的要道,而且土地适宜耕、牧,自秦、汉以来即为郡县。隋末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两州,致使东突厥深入,灵、夏成了边境;贞观末年,募人充实,西北始安。今若废弃,则河滨之地复为敌有,灵、夏等州不能安业,非国家之利!"高宗觉得言之有理,此举才罢。六月,东突厥攻岚州(今山西岚县北)。十一月,令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前往招讨。

弘道元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死后,皇后武则天执掌了唐的一切大权。骨咄禄乘唐廷权力更换之机,连攻朔州、代州(今山西代县)。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令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大总管北讨,至忻州(今山西忻县)与东突厥相遇,鏖战不利,唐兵死亡五千余人。

垂拱二年九月,东突厥攻唐边地,武则天令黑齿常之率兵抵御,至两井,遇东突厥三千余人,常之亲率二百精骑猛冲,初战获胜。夜间,东突厥大队人马冲杀而来,唐军人少,将士震惊,但常之镇定如常,施行疑兵之计。他令营中燃火,又派人到东南较远处同样燃火。东突厥见此,怀疑是援兵接应的信号,遂撤退离去,唐军化险为夷。

垂拱三年,东突厥攻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又攻朔州。七月,武则天仍令黑齿常之为燕然道大总管反击。在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大破东突厥,追杀四十余里,东突厥溃散逃入碛北。

爨宝璧见黑齿常之屡立战功,心生羡慕,也想侥幸立功,于是奏请穷追东突厥余部,彻底根除边患。武则天令他和常之计议,相互援助。宝璧以为东突厥是败亡残敌,可轻而易举消灭,为独占军功,不等常之,率一万三千精兵先行,当出塞二千余里时,间谍报告宝璧说阿史那元珍等部尚未发现唐军,也没戒备时,他率大军冲杀而至;但至近前,又认为偷袭不光彩,应堂皇决战取胜,遂派人告诉东突厥,令列阵出战,结果唐全军覆没。宝璧单身逃回后,被武则天

斩首。此事发生在这年十月。

永昌元年(689年)五月,九月,武则天用宠僧薛怀义为大总管,两次北讨东突厥,后一次率兵达二十万,但都无功而还。

延载元年(694年)正月,东突厥可汗骨咄禄死,子幼,弟默啜夺权自立为可汗。东突厥在他统率期间,对唐的威胁比以前大大加强了。

默啜为可汗后,随即攻灵州。武则天又派薛怀义为大总管,领十八员大将征讨,但唐军未行,默啜率军已退。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武则天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出击东突厥。默啜感到自己力量尚弱,不足抗据唐军,于是采用缓兵之计,派使者入唐请降。武则天苦于东突厥扰边多年,无法平息,闻讯大喜,不仅撤回征讨的唐军,还册封默啜为大将军、归国公,赐帛五千匹。但出乎武则天意料,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东突厥骑兵数万攻凉州(今甘肃武威),并生擒了唐将许钦明。武则天正想征讨,可默啜又派使者来唐,言辞恭顺,恳请为武则天儿子,并给女儿求婚。不仅如此,当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叛唐,攻陷了营州,默啜还提出率部下为唐讨伐契丹,以效犬马之劳。武则天不知是计,转怒为喜,点头应允,封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

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默啜乘机突袭契丹,大获全胜,虏掠了许多契丹人口,包括尽忠、万荣妻子。武则天予以嘉奖,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默啜自破契丹后,军威远扬,兵众渐盛,开始轻唐,神功元年(697年)正月,他率兵攻灵州,叫前时俘虏的唐将许钦明喊话招降。钦明至城下,大呼要"美酱"、"粱米"和"墨",暗示城中选良将、行精兵,夜袭东突厥军营,可惜城中无人能解此意。不久,默啜又引兵攻胜州(今内蒙托克托西南)。

武则天对默啜采取怀柔政策,三月,派阎知微、田归道出使东突厥。阎知微见默啜后献媚讨好,竟然舞蹈,跪吻靴鼻。田归道则

长揖不拜，默啜大怒，以死威胁，但田归道面不改色，严辞斥责默啜贪得无厌，并晓以祸福。这时，阿史那元珍在旁说："归道乃大国使者，杀掉于我们不利。"默啜怒稍解，但仍拘禁起来。

随后，默啜派使者到长安提出三项强硬要求：一是归还六州降户，即咸亨年间安置在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的降唐东突厥人。二是割让单于都护府之地。三是索要谷种、缯帛、农器、铁。当默啜得知武则天不应允时，泼口大骂，扬言要杀到长安。这在唐廷中引起了震惊。姚畴、杨再思以契丹尚未平定为理，竭力主张答应默啜要求。李峤反驳道："东突厥贪而无信，若这样做正是所谓的'借寇兵资盗粮'，不如练兵备战"。可是武则天竟听从姚畴等的主张，将六州降户数千全部逐出，交给了默啜；并给谷种四万石、杂彩五万匹、农器三千件、铁数万斤，还答应和亲。默啜由此更加强大。

默啜讹诈成功，心中洋洋得意，而将田归道、阎知微放回，作为回报。武则天接见两人，问东突厥情况。田归道认为默啜必负约，不可恃和亲，要加强军备，阎知微则认为和亲必能保默啜归顺。武则天也幻想和亲能起到这种作用，遂在圣历元年(698年)六月，命侄孙武延秀入东突厥，娶默啜女为妃，另派阎知微等带金帛巨亿作为聘礼。行前朝臣张柬之谏阻道："自古未有华夏亲王娶夷狄女为妃的。"则天大怒，以忤旨罪外贬地方任职。

武则天万没想到自己一片诚意换来的是难堪的侮辱。八月，武延秀到黑沙南庭，默啜轻蔑地对阎知微道："我要将女嫁给李氏，武氏小子到此做甚，他是大唐皇帝的儿子吗？我东突厥世受李氏恩，听说李氏都被武则天杀害，只剩下两个儿子，今日我要发兵辅佐他俩夺回帝位。"说罢，将武延秀囚禁起来，封阎知微为南面可汗，做将来管唐地百姓的傀儡，遂发兵攻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率兵五千投降，东突厥士气大振，进而围妫、檀(今河北密云)等州。同时送书至唐廷宣战，并历数武则天之罪："给我的是蒸熟谷种，种而不生，此一；金银器都是伪滥品，非真物，此二；缯帛皆

疏恶，不能穿用，此三；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对，假冒骗婚，此四"，等等。并称："我为此起兵，定取河北。"这时，唐北方闻听东突厥大举进攻，不顾秋收正忙，纷纷征发百姓修城，只有卫州刺史敬晖例外，他对僚属说："我听说虽固若金汤但无粮不守，为何舍收获而修城郭！"

武则天恼羞成怒，以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率兵三十五万讨伐东突厥。又以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率兵十五万为后援。但默啜破飞狐（今山西灵丘），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焚房屋，乡里被虏掠一空。

九月，默啜派阎知微去赵州（今河北赵县）招降，知微到城下，竟厚颜无耻地和随身而来的东突厥将士连手蹋歌《万岁乐》。唐将陈令英在城上喊道："阎知微，你在唐朝官居尚书高位，而为敌寇蹋歌，难道不羞愧吗？"知微闻听此言顺口答道："不得已《万岁乐》。"招降不成，默啜挥军围城，守将唐般若开城降敌，刺史高叡与妻秦氏饮药诈死，被东突厥士兵抬到默啜面前。默啜指着金狮子带、紫袍说："降则拜官，不降则死！"高叡回顾看妻子，秦氏说："酬报国恩，正在今日！"高叡遂闭目不言。默啜知不可屈服，将他杀害。

东突厥连战连捷，武则天任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并广泛募兵、扩充军队。但李显不亲行，武则天又任命狄仁杰为副元帅领兵征讨。默啜得报，尽杀虏掠的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从五回道撤回，沿途大肆抢掠。唐将沙吒忠义引兵跟踪，不敢逼近；狄仁杰率军十万追赶不及。默啜回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强族皆听命，颇有轻大唐之心。

默啜撤离河北时，便抛弃了阎知微。知微心存侥幸返回唐廷，武则天咬牙切齿，把他处以磔刑，然后令百官共射，又剐肉碎骨，而且诛连三族。

东突厥年年南掠唐边境，戍兵疲于应付。为防备东突厥，圣历

二年腊月，武则天令在河南、北置武骑团，每一百五十户，共出兵十五人，马一匹。二月，令魏元忠为天兵军大总管，屯驻并州；久视元年(700年)十月，又调任萧关道大总管等，也为防备突厥。但防不胜防，就在这年十二月，默啜从唐设在陇右的监牧(养马场)中掠走马万余匹。长安元年(701年)八月，为防御东突厥进攻，任命相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兵未出而默啜已退。长安二年正月，东突厥又攻盐(今陕西定边)、夏二州，掠羊、马十万。破石岭，围并州。武则天连忙以薛季昶为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军都受节度。四月，又令张仁愿专门负责幽、平、妫、檀州防御，并和季昶犄角相应，抗拒东突厥，而默啜于八月攻代州，九月掠忻州。

长安三年六月，默啜忽然派使臣莫贺干来，说要将女嫁给唐太子李显的儿子。武则天以为有转机，满口应允。十一月，默啜再派使者来谢许婚时，武则天高兴异常，亲自盛宴款待，并令太子李显出席坐陪。长安四年八月，默啜为表示诚意，还将武延秀放回。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戴唐中宗李显复位。为防默啜乘新帝登基进扰，令裴思政为灵武军大总管。神龙二年十二月，默啜抓住唐韦皇后、武三思勾结专权，朝政混乱时机，率军攻鸣沙(今宁夏青铜峡南)，灵武道大总管沙吒忠义迎战，军败，死亡六千余人。突厥乘胜进攻原(今宁夏高平)、会(今甘肃靖远)等州，掠陇右监牧马万余匹而去。

中宗大怒，于是景龙元年(707年)正月，下令断绝和亲；悬出王以国、宫卫大将军的重赏招募能斩获默啜的人；还命内外官各进平东突厥之策。言官右补阙卢俌提出备边方略，他说："大军主帅应选智谋之士，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义，本是一介勇夫，不足以当大任，因此战败。又，鸣沙之战，主将沙吒忠义先逃，而仅免官，应正法斩首；赏罚既明，将士尽节，战无不胜。又，边州刺史应选择精当，才能练兵积谷，独当一面，敌来则御，敌去则备。"他还说："陛下当兼理内外，抚近以来远，待仓廪实，士卒精，然后再大举讨伐。"李

显称善。五月，命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东突厥。十月，东突厥南下，仁愿出击获胜。

当时，唐朔方军与东突厥以黄河为界。河北有拂云祠，东突厥每次南下攻掠前夕，必先到祠中祈祷，牧马点兵，而后渡河。景龙二年初，因唐长期对东突厥西邻突骑施采取拉拢政策，使之成了牵制默啜的一支力量，阿史那元珍率兵征讨阵亡，所以默啜亲自率全军西击突骑施。张仁愿抓住这一机遇，上表请求乘虚夺取漠南地区，并在黄河北修筑中、东、西三座受降城（中城在今内蒙包头西南、东城在今内蒙托克托南，西城在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首尾相应，以绝东突厥南下之路。朝臣中唐休璟反对，提出"两汉以来，都北守黄河，今在河北东突厥境内筑城，恐劳民伤财，终为敌有。"仁愿接连上表恳请，中宗终于批准。

张仁愿又上表获准留下了戍边满期应回的镇兵，帮助筑城。咸阳兵二百余人不满，私自逃归，仁愿捉回，皆斩于城下。军中无不胆战心惊，卖力筑城，仅用六十日就筑成三城。以拂云祠为中城，距东、西两城各四百余里，都占据渡河要冲，并向北拓地三百余里。又在牛头朝那山北（今内蒙固阳东）置一千八百所烽候，派部将论弓仁驻守诺真水（今内蒙艾尔盖河），以巡逻护卫。这一边防休系的完成，时在景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丙辰）。自此，东突厥不敢过山放牧，黄河以南安居乐业，张仁愿于是裁减镇兵数万人。

张仁愿所筑的三座受降城，都不建壅门（一说悬门，一说甕城）等只供防守的设施，有人询问原因，仁愿道："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此当拼死出城，回头望城的犹应斩首，岂能要这些设施，而增怯敌后退之心！"备受时人赞叹。

三受降城的防御体系有力地遏制了默啜南下侵扰。默啜转而又要与唐和亲。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711 年）正月，他派使者入唐。而唐廷内屡次政变，尚无暇组织大规模反击，遂于三月应允以宋王李成器女为金山公主嫁给默啜。十月，派和逢尧出使东突厥回

报。默啜还听从和逢尧说和亲大唐能威震桀傲难驯的部族，于是穿上唐衣紫衫，戴上唐帽朴头，南向拜伏称臣。并派子杨我支等随和逢尧入唐。但不久睿宗传位给子玄宗李隆基，和亲未成。

开元元年(713年)八月，默啜派子杨我支又来唐求婚，李隆基应允以蜀王女南和公主下嫁。但开元二年二月，默啜却派子同俄和妹夫石阿失毕率精骑围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奇台西)。同俄恃勇单骑远出进逼城下叫阵，被唐守城将郭虔瓘埋伏在道旁的伏兵突起斩首。石阿失毕请用全军的资粮赎回同俄，后知已死，恸哭而去，但恐默啜治罪不敢回归，于是携带妻子降唐。

默啜于武则天执政年间臣服了东部的奚和契丹，景云中又灭了西部的突骑施，自颉利可汗后最为强盛，但他自恃兵威，残暴虐众，衰老后昏暴更甚，部落犯叛逃散。开元二年九月，葛逻禄等部至凉州降唐。十月，东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至北庭降唐。开元三年二月，东突厥十姓婿高文简和跌跌思泰等相继降唐，前后共计万余户，玄宗令全部安置在河南(指"北河"以南)，并于四月任命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居凉州；郭虔瓘为朔州镇大总管，居并州，整兵以备默啜。

默啜面对分崩离析的形势，一面向唐屡求和亲，以缓和与唐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加紧镇压反叛部落。而唐以答应和亲麻痹敌方，又积极支持叛离默啜的部落，即不仅对降唐的酋长们一一封官爵，而且以兵相助。就在四月，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玄宗令北庭守将汤嘉惠等发兵相助。

开元四年，默啜出兵漠北讨击回纥拔曳固部，在独乐水(今蒙古土拉河)大战获胜。但他恃胜骄傲轻敌，行军不设戒备，忽遇拔曳固败逃的战士颉质略从柳林中冲出，将默啜斩首。东突厥全军惊呆，颉质略乘机迅速驰走。恰逢唐郝灵荃奉命出使东突厥，颉质略将默啜首级奉献，一同回唐。玄宗令悬首于大街示众。时在这年六月二十九日(癸酉)。与此同时，漠北拔曳固、回纥、同罗、雹、仆骨五

部和东北的奚、契丹都归顺了唐朝。

默啜死，骨咄禄子阙特勒杀默啜子及亲信，立兄默棘连，称毗伽可汗。自己为左贤王，专掌兵马。以暾欲谷为谋主。当时暾欲谷已七十余岁，足智多谋，很受东突厥人信服。八月，被唐安置在河南的东突厥降户知毗伽可汗性仁友，又多叛唐逃归。并州守将王晙上奏道："东突厥前因国家丧乱，故来降唐，若彼处安宁，必复叛走。今置河南，实难制御，不仅经常兴兵剽掠，还充河北东突厥间谍。日月越久，奸诈愈深，虏骑南攻，必为内应，将成大患。愿在秋冬之交，大集兵众。晓以利害，给其资粮，迁居内地，二十年后，渐变旧俗，皆成我劲兵，虽一时暂劳，然永久安逸。或道，前贞观年间曾置东突厥降户于河南，平安无事，今为何生疑？此事同时异。那时颉利败亡，降户无复异心，故能平安无变。今毗伽尚存，降户或畏其威，或怀其惠，或其亲属，岂愿长期降我。以臣愚见，徙居内地，上策；多屯士马，严加防备，华夷相参，人劳费广，次策；象今日不加变更，下策。愿陛下审引三策，择利而行，若迁延到黄河冰封，恐必生变。"此表章还没批复，东突厥降户跌跌思泰、阿悉烂已叛。

原来，这些东突厥户先前降唐时，单于副都护张知远把他们的武器全部没收，才令南渡黄河，这引起降户怨恨。后御使中丞姜晦到河南巡边，降户纷纷诉说无弓矢，不能射猎，姜晦又令归还。降户得到武器后不久就叛归。十月，张知远仓促无备，与东突厥叛归降户战于青刚岭（今甘肃环县西北），兵败被擒。叛归降户想把张知远献给毗伽，于是押着他行进，但至绥州境（今陕西绥德），遭唐将郭知途截击而大败，遂丢弃张知远散逃到黑山呼延谷（今内蒙包头西北）。

毗伽可汗得到思泰等后，想南下侵掠。暾欲谷劝阻道："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无隙可乘，不可躁动。我众新集，力尚疲羸，应当息养数年，才可观变而举。"毗伽又要筑城，并立寺观。暾欲谷又劝阻道："东突厥人众稀少，不及唐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之为敌，正因随逐水

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习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另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尚。"毗伽因而停止。

开元六年正月,毗伽采纳暾欲谷的策略,遣使来唐请和,得到应允,北境暂时无事。但开元八年六月,唐朔方守将王晙开了杀戒。当时,还有一部分未叛唐的东突厥跌跌部落降户和仆固都督勺磨散居受降城侧。王晙说这些人暗中勾引东突厥,谋陷军城,秘密奏请诛杀。遂诱跌跌等八百余人宴于受降城,伏兵突起,全部杀害。这在北方诸部族中引起极大震动。原降唐的拔曳固、同罗诸部居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北)、横野军(今河北蔚县)左右,听后惊恐不安。驻守并州的张说连忙前去抚慰,他只带二十随从,夜间就住在那里。部下李宪恐出意外,派人飞骑送信劝回。张说回书答道:"我肉非黄羊肉,不畏人食;我血非野马血,不畏人饮。士应舍身报国,正在今日。"拔曳固、同罗见张说这样赤诚不疑,众心才安。

不久,王晙又奏请西发拔悉密,东调奚、契丹,约定秋季至稽落水掩击毗伽牙帐。毗伽得此信息,大惊失色。暾欲谷说:"此不足畏。拔悉密西居北庭,与东面的奚、契丹相离甚远,无法相互支援。王晙统领的朔方兵预计也不能来此地;若能来,待其将至,迁牙帐北行三日,唐兵粮尽自退。拔悉密贪利轻动,得王晙之约,必喜而先至。况且王晙与宰相张嘉贞不和,王晙奏请多不批准,定不敢贸然出兵。王晙兵不到而拔悉密兵独到,击败他易如反掌。"

不出所料,拔悉密果然发兵逼近东突厥牙帐,而朔方及奚、契丹兵未至,拔悉密孤军势单,恐惧撤退。毗伽要挥军进攻,暾欲谷说:"这些人离家千里,此时若击,必将死战,以求复生。不如率兵尾随其后,见机行事。"当离北庭二百里时,暾欲谷分兵一支抄小路乘虚先攻陷北庭,随即纵兵进击拔悉密归师,拔悉密大败,溃兵逃窜北庭,但老巢已失,都被东突厥俘虏。

十一月，暾欲谷引兵从北庭得胜回，出赤亭（今新疆鄯善东北）东向，掠凉州羊、马。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派部将卢公利、元澄中途邀击，暾欲谷笑道："我乘胜而来，势不可挡，杨敬述若守城自固，即与讲和，但他敢出兵，破之无疑。"卢公利等率兵西至删丹（今甘肃山丹），与东突厥军相遇。元澄令兵士挽袖满弓西向，时值隆冬，又恰逢风雪裂骨之寒，兵士手皆冻僵，弓矢纷纷落地。暾欲谷挥军进击，唐军大败，只卢公利、元澄侥幸只身逃回，东突厥然后进攻甘州、凉州，掠羊、马数万而去。毗伽由此军威大振，尽有默啜余众。

由于开元年间唐国势强盛，毗伽难以抗衡唐朝，因此对唐基本采取了请亲求和政策。开元九年二月，毗伽派使来唐求和，玄宗赐书道："想往昔国家与东突厥和亲交好之时，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东突厥羊马，东突厥获国家缯帛，彼此有利。自数十年来，不象旧时，正因默啜无信，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掠边境，人怨神怒，身死丧头。何祸何福，都可汗亲见。今你复蹈前迹，袭我甘、凉，又派使者前来求和。国家如天之覆、海之容，但看今后，不追往咎，可汗如有诚意，则可保证无穷之福；否则，不要派使者徒劳往复。若胆敢扰边，我自有良策。你要三思而行。"

开元十二年七月，毗伽派臣哥解颉利发来唐求亲，玄宗借口使者职轻等不许婚，而厚赐遣回。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巡泰山封禅，恐东突厥乘机人寇。裴光庭建言："四夷之中，东突厥最大，前屡求和亲，而朝廷未应允。今派一使者，征其大臣随从封禅泰山，他必欣然奉命。东突厥来，戎狄酋长无不来，这样可偃旗息鼓，高枕无忧了。"玄宗于是派袁振到东突厥宣喻旨意。毗伽、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帐中，设宴招待，但问道："吐蕃能娶唐公主，奚、契丹本是东突厥奴，也能娶唐公主，但我们前后求婚独不许，原因何在？而且我们也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但屡请不准，实羞见诸蕃。"其实，玄宗不允，正在于四夷之中，突厥最强，深恐他娶唐公主后再借大唐声威，降服四夷，势力更盛，对唐构成强大威胁。袁振不便明

言,只一再应允要替他们奏请皇上,毗伽遂派部下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并随从东巡护驾。颉利发辞归时,玄宗仍只赐与丰厚,不许婚。

开元十四年,唐在定、恒、莫、易、沧五州置军,以备东突厥。毗伽和好唐的政策是真诚的,开元十五年,吐蕃要偷袭瓜州(今甘肃玉门镇西南),并送信给毗伽,约他共谋。但毗伽随即派大臣梅录啜入贡,献名马三十匹,还将吐蕃的书信献上。玄宗大为赞赏,设宴款待,厚加赏赐,并令在西受降城设立定点市场,每年以数十万匹绢帛购买东突厥马匹。东突厥获唐绢帛后向西方转卖,从中获利丰厚。而唐得东突厥良马,不仅可充实骑兵,增强军力,更重要的是作监牧种马,通过改良马种而使国马益壮。

唐与东突厥此后一直交好。开元十九年三月东突厥左贤王阙特勒死,玄宗令张去逸、吕向奉玺书前往吊祭,并为立碑,上刻玄宗亲自撰写的碑文。还为立祠庙,派技艺高超的六名艺师,刻石为像,四壁绘画阙特勒战阵图状。其精美逼真为东突厥所未见,至使毗伽每见必悲泣。

毗伽连连请尚公主,终于获得应允,开元二十二年四月派使者哥解栗必来谢恩,并定婚期。但十二月,毗伽为大臣梅录啜所毒,药发暂未死,忍痛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既而身亡,子伊然可汗继位。玄宗闻讯,为之举哀,并派李俭前往吊祭,建立碑、庙,由唐史官李融撰写碑文,同时册封伊然。但不久伊然病死,又立伊然弟,被册封为登利可汗。开元二十四年正月,登利派使者伊难如入朝,献贡物,并祝贺说:“拜天可汗如拜天,今新岁正月,愿以万寿献天子。”

登利年幼,母婆匐暾欲谷女,和小臣斯达干通奸,干预国政,诸部不服。此外,登利两位堂叔父分掌兵马,号左右杀(突厥可汗亲属分掌东西兵的称东、西杀,也称左、右杀),登利不满两杀专权,与母密谋,诱斩右杀,夺回兵权。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左杀制阙特勒率兵攻杀登利,立毗伽可汗子;可被骨咄叶护所杀,改立其弟;不久又杀掉,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天宝元年(742年)八月,东突厥拔悉密、

回纥、葛逻禄三总共同攻杀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叶护、突厥大臣名）。东突厥其余部众共立制阙特勒儿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乌苏儿子为西杀。玄宗命乌苏内附，乌苏不从。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盛兵屯于碛口相威胁。乌苏迫于兵势，表面归降而拖延不朝。忠嗣知其诈，派使者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发兵进攻，乌苏败逃。王忠嗣乘势出击，取东突厥右厢（即右杀所辖部）而归。十五日（丁亥），东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及西杀葛腊哆、默啜孙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三女率部众千余帐，相继降唐。东突厥从此衰弱。九月初三（辛亥），玄宗在兴庆宫花萼楼设宴款待降服的东突厥，赏赐甚厚。

天宝三载八月，拔悉密攻斩东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东实厥一部分立乌苏弟为白眉可汗，另一部分推拔悉密为可汗，东突厥内部大乱。玄宗令王忠嗣乘乱用兵出击，至萨河内山，破东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独右厢尚未攻下。而回纥、葛逻禄又共同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派使入唐，被册封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东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统药逻葛等九姓，后又吞拔悉密、葛逻禄等十一部。

天宝四载正月，怀仁可汗击杀东突厥白眉可汗，将首级送到长安。随后，东突厥毗伽妻子也率众降唐，被封为宾国夫人，岁给粉值钱二十万。东突厥至此灭亡。唐北境于是晏然，烽燧无警。而后，回纥崛起于东突厥故地。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01 -215

《通鉴纪事本末·突厥叛唐》

两唐书：《裴行俭传》、《裴炎传》、《突厥传》、《高宗纪》、《则天皇后纪》、《薛仁贵传》、《黑齿常之传》、《武延秀传》、《张仁愿传》、《王

晙传》、《中宗纪》、《睿宗纪》、《玄宗纪》、
《册府元龟·外臣·和亲》
《唐会要·诸使杂录》
沙畹《西突厥史料》

唐平铁勒

铁勒，又称敕勒，种族源于匈奴。自突厥强盛，铁勒众渐寡弱，分为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散居碛北，随水草迁徙，并无统一君长。人性骁勇，善于骑射，风俗和突厥基本相同。突厥建国后，常借其力东征西讨，控制漠北地区。

薛延陀是薛部击灭延陀部合并而形成的，姓一利咥。唐初，在铁勒部族中，它最为强大。

隋大业时西突厥曷萨那可汗（又称"泥撅处罗可汗"或"处罗可汗"）正强，铁勒各部都向他伏首称臣，但曷萨那征税无度，引起铁勒诸部的怨恨。曷萨那得知，杀了铁勒酋帅百余人。于是，铁勒诸部群起反叛，共同推举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燕末山北。

后射匮在隋炀帝的支持下取代曷萨那成为可汗后，西突厥再次强大，薛延陀、契　二部并去可汗称号而臣属射匮。

东突厥始毕可汗在隋末强大起来，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　六部居于偏东的郁都军山（今蒙古杭爱山），遂东向臣属了东突厥（又称"北突厥""突厥"）始毕可汗，而薛延陀乙失钵部族居偏西的金山（今阿尔泰山），仍附庸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统叶护是射匮弟，射匮死后嗣位。统叶护势衰后，乙失钵孙夷男率部落七万余家也臣服了当时嗣东突厥可汗位的颉利。颉利政乱后，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又群起叛离，颉利派兄子欲谷设率十万骑兵镇压。回纥酋长菩萨只拥兵五千，但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在马鬣山会

战，以少胜多，大破欲谷设，直追至天山，俘虏无数，声震北方，回纥由此强盛。薛延陀也击败了东突厥四设（突厥典兵将领称"设"），威势大震，颉利从此无法控制。

贞观二年（628 年），漠北铁勒各部见颉利政乱势衰，纷纷叛离东突厥，共同推举薛延陀酋长为可汗。但夷男对颉利尚存疑虑，恐招致更凶猛的镇压，于是推托不敢任此大位。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正图谋消灭颉利，而唐在北方的主要敌手是东突厥而不是薛延陀，所以太宗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薛延陀以孤立东突厥，力图从南北两面形成夹击的态势，遂派乔师望抄僻静小路到达薛延陀，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也称"真珠可汗"），并赐以鼓纛，以示支持。夷男大喜，随即派使者入唐进贡，双方结成了联盟关系。有了大唐作为后盾，夷男公开在郁都军山下建立牙帐。而疆域东至靺鞨；西到金山，和西突厥接境；南接沙碛，和东突厥连壤；北达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部落全部归服，俨然成为崛起于东突厥北面的一个大国。

贞观三年八月，薛延陀毗伽可汗派弟统特勒至唐进贡，太宗赐宝刀和宝鞭，并说："卿所部有大罪的可用此刀斩首，犯小罪的可用此鞭鞭笞。"夷男受宠若惊，高兴万分。而东突厥颉利闻听后感到极大压力，也连忙派使者入唐称臣，求娶唐公主，修女婿之礼。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薛延陀乘北部边塞空虚的机会，发展势力，扩充疆域，拥兵二十万，以二子拔灼、颉利苾分别率领，号南、北部。将牙帐东迁至都尉犍山北、独逻水（今蒙古土拉河）南，距长安约三千余里，从而取代了东突厥变成唐北境的劲敌。随后，唐太宗对两族的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过去的拉拢薛延陀、打击东突厥改为利用东突厥降户以抵御薛延陀。

尽管薛延陀在东突厥灭亡后曾八次入唐朝拜，但太宗仍担心它将成为唐边境大患，在贞观十二年九月派使者册封夷男二子拔

灼、颉利苾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想分其势力，并制造潜在的权力争端。

贞观十三年，阿史那结社勾结少数突厥降户叛乱，兵犯九成宫。此后不久，唐太宗于七月封阿史那思摩（因唐赐姓李，也称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以鼓纛，东突厥及诸胡降唐户安置在各州的，也命令全部渡过黄河，回归原居住地。目的是利用东突厥和薛延陀的矛盾，牵制后者，减少它对唐北疆的威胁。但东突厥降户仅三斤，兵力才四万，怕雄踞漠北的薛延陀，不肯出塞。唐太宗派郭嗣本赐薛延陀玺书，书中说道："颉利败亡，东突厥部落都来归顺，我不记前恶，奖其后善，待酋长如我百官，待部众象我百姓。大唐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东突厥只缘颉利一人害我百姓，并非贪其土地人畜。我早想为他们选立新可汗，所以将来降的部落安置在河（此指内蒙磴口至山西河曲一段黄河，时称"北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繁盛，我心甚喜。既答应选立新可汗，就不能失信。因此，今秋将让东突厥降户渡河，以复兴故国。薛延陀受封在前，东突厥受封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在碛北，他在碛南，望各守本土，镇抚部落。谁若越份侵掠，我则兴师问罪。"薛延陀心虽不满，但畏于唐的强盛，不得不表示奉诏，太宗于是命令阿史那思摩到黄河北建立牙帐。

思摩直拖延到贞观十五年正月，才率部落北渡黄河，建牙帐于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北）。薛延陀夷男心恨思摩，对唐此举也非常不悦，但暂时忍耐。思摩也预感到薛延陀的压力，上奏唐廷道："臣蒙非份鸿恩，有幸为部落之长，子子孙孙誓做国家一犬，守卫北门。但若薛延陀侵逼，请允许东突厥家属撤入长城以南躲避。"太宗下诏同意。

果然就在这一年，薛延陀闻听李世民将要东封泰山，便蠢蠢欲动。夷男对部将们说："天子东封泰山，兵马随从，边境必虚，我乘机取思摩，如摧枯拉朽。"遂命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

骑兵共二十万，渡漠南，屯白道川（今呼和浩特西北），占据善阳岭（今山西朔县北），要进击东突厥。思摩知自己势单力薄无法抵御，慌忙率部落南入长城，退保朔州（今山西朔县），遣使告急。

十一月十六日（癸酉），太宗令营州都督张俭率本部骑兵及奚、霫、契丹压薛延陀东境；以兵部尚书徐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六万、骑兵一千二百屯朔州；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山西大同）；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逼薛延陀西境。诸将临行，太宗面授军机道："薛延陀自恃强盛，逾大漠而南，行程达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急进，不利速退，而薛延陀既不能乘思摩不备突然闪击，思摩退入长城后又不能迅速撤回。我已令思摩烧光秋草，这样一来，薛延陀必军粮日尽，野无所获。前不久侦骑来报，说其马将林木的皮都啃吃略尽。你等当与思摩共为犄角之势，不须速战，等敌将退，同时奋击，定获大捷。"

薛延陀大度设率三万骑兵，直追思摩至长城，知思摩不敢交战，而自己又不敢深入唐境，为解心头之气，遂派人登长城大骂。这时徐世勣行军赶到，大度设见烟尘冲天，知唐军杀来，连忙率兵自赤柯泺北走。徐世勣则选部下和东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猛追，逾白道川经青山（今内蒙大青山），直至诺真水（今内蒙艾不盖河）。大度设虽奔逃累日，但唐军尾随不舍，无法摆脱，于是整军还战，列阵长达十里。

先前，薛延陀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都以步战取胜。他谋攻东突厥阿史那思摩也想用这一战法，曾在出兵前精心训练步战，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前战，战胜后则乘马追击。而现在与徐世勣交战就用此法。

战役开始，东突厥骑兵先发动攻击，但受挫而败退；大度设乘胜反攻，徐世勣率主力骑兵迎战。两军相遇后，薛延陀万箭齐发，唐

骑兵战马死伤很多，形势危急。世勣见状，速变战法，急令士卒下马步战，手执长矛，数百为队，列阵向前协力冲杀。薛延陀抵挡不住训练有素的唐军，阵乱兵溃，想乘马逃奔，但徐世勣的副职薛万彻早率数千精骑将薛延陀的执马人连马匹席卷而去。薛延陀这些战败的将士见所乘马匹踪迹皆无，都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唐军乘势纵击，斩首三千余，俘虏五千余，获马一万五千匹，其他军资则不可胜数。大度设侥幸逃脱，率残军狼狈回归，到漠北又逢大雪，人畜冻死十之八九。这一战役发生在本年十二月十七日(甲辰)。

这是唐与薛延陀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而对薛延陀的打击相当沉重。随后，夷男立即派使者入唐请罪，并表示愿与东突厥和亲通好。太宗告诫道："我早就约定薛延陀和东突厥以大漠为界，谁要侵掠，我则兴兵讨伐。你们自恃兵强，竟敢跨越大漠远攻东突厥。但徐世勣才率数千骑兵，你们就已如此狼狈，回去告诉夷男，何去何从，要仔细斟酌！"贞观十六年，薛延陀夷男又派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唐请婚，献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件，玛瑙镜一个。

对现在的薛延陀应采取何种政策，太宗在十月和侍臣做了一番探讨。太宗说："今薛延陀崛强漠北，须早做准备。朕深思唯有两策：选精兵十万，击而诛灭，可百年无事，此一策；若允其请求，结婚姻以安抚，可获三十年安静，此也一策。众卿认为何策为上？"房玄龄对道："天下新定，疮痍未复，战虽胜，犹危道。臣以为和亲之策，实苍生大幸。"太宗点头道："朕为百姓父母，只要对百姓有利，岂惜一女！"不久，太宗就派崔敦礼前往薛延陀宣喻，答应将亲生女儿新兴公主许配夷男。夷男高兴万分，于贞观十七年闰六月，派突利设来唐献聘礼：马五万匹，牛、骆驼万头，羊十万只。太宗在相思殿盛宴款待突利设，唐百官坐陪，而鸣奏十部乐，以助酒兴。突利设在席宴间连连叩首，高呼万岁，万万岁。太宗也丰厚地赏赐了使者。

不料，薛延陀使者走后，契苾何力上奏说："不可与其和亲"。太宗道："我已经应允了，身为天子，岂能食言？"何力陈述道："臣并非

要陛下马上绝亲，只愿能拖延此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召夷男亲迎，虽不至京城，也应到灵州；他必不敢来，绝亲就有借口了。夷男性刚烈，既不能成婚，部下再叛离，不出一二年定病死。那时两子争可汗位内部大乱，我们可坐收渔翁之利。”太宗赞道：“此不失为一条妙计。”遂诏夷男亲自迎亲，并说自己也要到灵州和他相会。夷男接诏后大喜，遵命要到灵州，但部下阻道：“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都是一国之主，那有亲自朝拜之理。如被拘扣，后悔莫及。”夷男说：“我闻大唐天子有圣德，能身往会见，死而无怨，况且漠北必当有主，舍我别求，对唐恐也无利。我志已决，勿复多言！”

太宗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发三道使者，催夷男按期奉羊、马等聘礼。薛延陀本无库厩，只能紧急向各部调敛，经返万里，道经沙漠、无水草，耗死近半，导致纳贡误期，唐臣中有的提出聘礼不齐而与成婚，将使戎狄轻视大唐。这恰中太宗心怀，于是下诏绝婚，停至灵州，并召回三道使者。

诸遂良上书，以为：“薛延陀夷男本是一俟斤（突厥大臣名），陛下灭东突厥后，念万里萧条，余寇奔波，须有酋长，才赐玺书鼓纛，立为可汗。近日又降鸿恩，应允和亲；而且西告吐蕃，北谕思摩，连唐童幼，无人不知；又款待来使，宴乐终日。众人都说陛下欲安百姓，宁舍亲女，凡是生灵，谁不怀德。今一朝生变化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此声誉，况如此而行，彼国蓄被欺之怒，我民怀负约之愧，恐非合服远人、训万民之道。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信义安抚夷狄，无不欣然，何不善始善终呢？北荒之地，部落无数，出兵诛杀，终不能尽。当以德怀柔，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我，则陛下逾尧、舜远矣！”太宗不听。

当时，群臣多赞同诸遂良的意见，纷纷上言“不可失信戎狄，再生边患”。太宗反驳道：“诸卿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而华夏弱，因此饰子女，奉金帛。今大唐强，戎狄弱，以我步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唯命是从，不敢傲慢，是因新为君长，欲借大

唐威势摄服非本族的杂姓。杂姓中如同罗、仆骨、回纥等十余部，兵各数万，若合力攻之，立即破灭；正因为它是大唐所立，才不敢贸然行动。今如以女婚配，夷男会自恃大国女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稍不如意，就立相残杀。今日绝婚，杂姓知我抛弃薛延陀，不久就要把它瓜分了。你们可拭目以待！"

太宗绝婚后，东突厥思摩果然数次派兵攻掠薛延陀。夷男派突利失回击思摩，直追到定襄，太宗速派徐世勣率兵前往支援，但突利失抄掠后已提前撤回。此后，思摩与夷男兵戎相见，连连不止。太宗表面采取不偏不倚，遣使告诫双方不要相互攻击，实际深知东突厥势弱，暗中偏袒支持，以制衡薛延陀。夷男心中也很清楚，他采取两手对策：一方面应敷太宗，上书道："陛下有命，怎敢不遵，但突厥反复无常。陛下记得当他盛时，岁掠中原，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陛下诛灭后，会把突厥降户变为奴婢，赏给大唐百姓，谁知反抚养如子，真是恩德无量啊！可是，结社率竟然反叛，危及圣上，如此兽心，怎能以人理相待。臣蒙圣恩深厚，愿为陛下将这些兽心人铲除。"另一方面：置太宗警告于不顾，用军事行动一心想拔去东突厥这颗眼中钉。

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东征高丽，夷男得知，表面遣使人贡，实际刺探虚实。太宗一眼看穿，厉声对使者道："归语你家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你们要想入寇，请速来！"夷男闻听，大为惊恐连忙再派使者请罪，并请求率兵前往助讨高丽，被太宗回绝。后来高丽在驻骅山被唐战败，高丽盖苏文派人为使者游说夷男，并用厚礼引诱，让他乘虚虏掠唐北部边境，这样也可减轻唐军对高丽的压力，但夷男被唐的威势所慑服，不敢行动。

九月初七(壬申)，夷男死，太宗亲自哀悼。夷男死前，曾请唐册封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杂姓部族；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太宗都准许，以礼册封。而曳莽性暴躁，好用兵，与拔灼不和。夷男死后，同来会葬。葬毕，曳莽恐拔灼

图谋自己，先回本部。果然拔灼飞骑急追，袭杀了曳莽，然后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这次内乱，为薛延陀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拔灼自称可汗后，改变了父亲夷男对唐和好的政策，乘太宗征高丽未回之机，行兵十万进掠河南（指“北河”以南）。其实，太宗东征高丽前，对薛延陀早已严加防备，即派右将军执失思力统领东突厥屯于夏州之北。太宗闻奏后，又派将领田仁会与思力合兵进击。执思失力采取诱敌之计，和拔灼接战后，便佯装不敌，引军撤退；拔灼洋洋得意，率军追击，直到夏州（今内蒙白城子）境内。突然，唐军列阵整齐，转退为攻，拔灼措手不及，大败而逃。唐军乘胜追杀六百余里，耀威漠北凯旋而归。拔灼不甘心失败，又发兵攻夏州。这时太宗已从高丽班师回朝，遂在十二月廿七日（己未）令李道宗征发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屯朔州；薛万彻、阿史那社尔征发胜、夏、银、绥、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屯胜州（今内蒙托克托西南）；宋君明、薛孤吴征发灵、源、宁、盐、庆五州兵屯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征发居住在灵、胜二州的东突厥兵与李道宗相互接应。拔灼到塞下后知唐已严阵相待，连忙撤回。

唐太宗见拔灼竟敢接连扰边，决心加以铲除。于是，贞观二十年正月，唐将领乔师望和执失思力出击，大破薛延陀，俘虏数万人，拔灼侥幸轻骑逃脱。这对薛延陀是沉重的一击。本来，拔灼自立为可汗时，由于他性格刚愎急躁、猜忌刻薄，又废弃父时的重臣，专用自己亲昵的人，部众就开始离心。而对唐做战的惨败，顿时引发内部的混乱。六月，回纥酋长吐迷度乘机与仆骨、同罗共击拔灼，拔灼大败。太宗抓住战机，令李道宗、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派执失思力率东突厥兵，契苾何力率凉州兵及当地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领本部兵，分道并进，合击薛延陀。这有如惊雷，震撼了漠北。

与此同时，太宗还派宇文法出使靺鞨，在靺鞨东部遇见薛延陀阿波设的兵马，宇文法遂率兵出击。阿波设不知虚实，小战不利就

狼狈逃回薛延陀，大叫道："唐兵到了！漠北诸部乱作一团，拔灼更是惊弓之鸟，带部下数千骑慌忙投奔东突厥阿史德时健部落。不久，回纥攻杀了薛延陀的拔灼，并占据他的地域。

拔灼死后，群龙无首，薛延陀一些俟斤互相攻杀，纷纷遣使入唐请降；另一部分约七万余口西行，立夷男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回到从前居住的郁都军山北面的故地。不久，又自去了可汗称号，遣使奉表入唐，请允许居于此地。太宗随即令崔敦礼前往安抚。

铁勒各部素服薛延陀，咄摩支虽衰，但铁勒其他部族仍然畏惧。太宗恐薛延陀东山再起，成为唐漠北祸患，所以一面派崔敦礼安抚，一面又派徐世勣与铁勒九姓共图薛延陀。临行太宗告诫："降则安抚，叛则征讨。"徐世勣行后，太宗又亲笔写诏嘱道："薛延陀破灭后，其他铁勒各部，有的来降顺，有的未归服，呈分崩离析之态，今不乘机，后悔无穷。朕还要亲到灵州招抚。"

徐世勣率精骑到郁都军山。咄摩支见唐军来之突然，有如天降，惊恐不知所措，苍皇南逃荒谷。徐世勣立即派萧嗣业前去招降，咄摩支于是投降了嗣业。但薛延陀部落仍首鼠两端，外表好言乞降，暗中还想拒战。世勣洞察，挥军纵击斩首五千余级，俘男女三万余口。七月，咄摩支来到长安，被太宗封为右武卫大将军。

八月初十(己巳)，太宗亲往灵州坐镇指挥，他要彻底扫清薛延陀残余势力，同时招抚其他铁勒诸部，以牢牢控制整个漠北地区。唐将李道宗率兵渡过大漠后，遇薛延陀阿波达率众数万拒战，道宗激战获胜，斩首千余级，追击二百里。李道宗乘战胜之威，与到漠北的另一路唐军统帅薛万彻各派使者招喻铁勒诸部。各部酋长大喜，争相请求入唐朝拜。

十一日(庚午)，太宗行至泾阳(今属陕西)时，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派使者纳贡朝拜，齐称："薛延陀不降服大唐，暴虐无道，不能做奴等之

主；今又自取灭亡，部落鸟散，不知所往。奴等各有份地，不想随薛延陀流浪，一心要归顺天子。愿圣心哀怜，设置官府，养育奴等。”太宗闻听大喜，于十二日（辛未），亲自和回纥等使者宴乐，并厚赏封官；又赐各酋长玺书；还派安永寿回访铁勒。十三日（壬申），太宗西进歇息在汉故居甘泉宫（位今陕西泾阳西北），他踌躇志满地下诏道：“戎狄与天地同生，虏掠中原，自古难制。但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才施谋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散处漠北，远派使者，委身归服，请同编户，分列州郡；开天以来，前所未闻，应备礼告庙，颁示普天。”九月，太宗到灵州，铁勒各部酋长相继派使者到灵州的达数千人之多，都说：“愿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永为天至尊奴，才死而无憾。”十五日（甲辰），太宗喜气洋洋地赋诗抒怀道：“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还听从了群臣的请求，刻石记功于灵州。

十二月二十日（戊寅），回纥吐迷度、仆骨歌滥拔延、多滥葛末、拔野古屈利失、同罗时健啜、思结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酋长都来朝拜。二十二日（庚辰），太宗在芳兰殿盛宴款待，赏赐丰厚，而且每五日一会，隆重之极。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初九（丙申），太宗下诏：以回纥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各以本部酋长为督都、刺史，并分赠金银缯帛及锦袍。铁勒各部大喜，欢呼拜舞，宛转尘中。这些酋长归时，太宗在天成殿又大摆宴席，奏十部乐以助酒兴。酋长们异口同声道：“臣等既成唐民，往来天可汗处，如见父母，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道，可称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供给来往使者，而臣等岁贡貂皮充租赋。另请派学士文人，给臣撰写奏章。”太宗一一应允，于是漠北安定。然而回纥吐迷度却私下自称可汗，官号也按突厥旧制。

四月初十（丙寅），唐设置燕然都护府（位今内蒙五原西北），统

辖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州，任命李素立为都护。素立以恩信抚慰，铁勒各部深受感动，争先奉献马、牛表示敬意。而素立只受水酒一杯，其他一概谢绝。

贞观二十二年八月，薛延陀余部又叛，被唐将执失思力讨平。后到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专设溪弹州进行管辖。

十月，回纥酋长吐迷度被侄乌纥杀死。乌纥是西突厥车鼻可汗的女婿，他谋杀叔父吐迷度想投靠车鼻。此事被燕然副都护元礼臣得知，迅速用计稳住乌纥，即假称上奏朝廷，以他为瀚海都督。乌纥喜出望外，轻骑简从到元礼臣官衙致谢，礼臣喝令左右拿下斩首，然后修书上奏。这时，太宗担心回纥部落离散，立即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并庄重地祭祀了吐迷度。随后，任命吐迷度子婆闰接替父位为瀚海都督。回纥部落重新安居乐业。婆闰感恩戴德，对唐忠心耿耿，助唐东征西杀达十余年。

贞观末年，铁勒诸姓入唐朝拜，太宗总是亲自接见，并经常说："你们归我，能获安存，犹如鼠得窟，鱼得水。不知我的窟和水能容下否？如不能容，我必为你们大作窟、深挖池。"又说："我今为天下主，不论华夏和四夷，皆养活。不安者安之，不乐者乐之。"

高宗龙朔元年(661 年)十月回纥酋长婆闰死后，唐北境一时出现波折。当时，婆闰侄比粟毒带领回纥部众，与同罗、仆骨南下侵扰边境。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府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两路大军分进合击，北上征讨。龙朔二年三月，铁勒九姓闻听唐军将到，聚众十余万抗拒，并先选拔数十名骁健精骑前来挑战。薛仁贵一马当先，连发三箭，射死三人。铁勒骁骑目瞪口呆，摄于神威，都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全部坑杀。随后唐大军迅速渡大漠推进到天山(即郁都军山)。薛仁贵率军一支连战连捷，擒叶护(官名)兄弟三人凯旋而归。军中歌颂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薛仁贵勇猛善射，弓大箭

长。这次出军前夕设宴壮行，席间高宗令取御库铠甲，叫仁贵试射，并说："古善射人中有能射穿七层铠甲的，卿姑且射五层。"仁贵满弓，一箭洞穿。高宗惊叹不已，忙令奖赏更坚固的铠甲。

铁勒中思结、多滥葛等部先保天山，及郑仁泰军到，惧而请降；可仁泰不纳，纵军攻击，抢掠财物，思结等部遂率众远遁。不久，侦察的骑兵回报仁泰，说："敌军的辎重牲畜就在附近，赶快前往掠取。"郑仁泰于是亲率轻骑一万四千，倍速驰进，直至仙萼河（今蒙古色楞格河），但一无所见，粮尽而还。归途又逢大雪，士卒饥寒交迫，万般无奈，只好抛弃铠甲兵器，杀马而食。马尽，人自相食。及入塞，残兵仅剩八百。

唐军班师后，杨德裔劾奏："郑仁泰等诛杀已降，使敌虏逃散；不抚士卒，不计资粮，遂使白骨蔽野，弃甲资寇。自大唐开创以来，从未有今日之败丧。薛仁贵也取俘虏为妾，又多受贿赂。并请交付法司问罪"，高宗下诏，说功罪相抵，免于追究。

高宗以军事力量征服了铁勒的反叛后，随即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为副，去安抚铁勒余众。契苾何力只选精骑五百，便驰入铁勒九姓中：铁勒九姓大惊，但何力安详地对铁勒部众说："国家深知你们都是被迫胁从，出于无奈。罪在酋长，只要交出这些祸首就无事了。"铁勒九姓民众大喜，立即将本部的叶护、设、特勒（皆官名）二百余人擒住，交给了何力；何力历数这些人的罪状，然后斩首示众。至此，铁勒再次被唐全部平定。

龙朔三年二月，唐为加强对北疆的控制，将贞观二十一年所置的燕然都护府迁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府（位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徙永徽元年所置的瀚海都护府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府（位今内蒙和林格尔）；以碛为界，碛北州府都隶属瀚海，碛南隶属云中。总章二年（669年）八月二十八日（甲戌），又改瀚海都护府名安北都护府。此后，铁勒各部和唐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好关系。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92　201

《通鉴纪事本末 · 唐平铁勒》

两唐书：《北狄传》、《回鹘传》、《突厥传》、《契苾何力传》、《执失思力传》、《薛仁贵传》

《册府元龟 · 帝王部 · 来远》

《隋书 · 北狄传》

唐平高昌

高昌国在麴文泰统治时期，国内流传这样的歌谣："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文泰千方百计追查编造此歌谣的人，但踪迹皆无。果然，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高昌国被唐灭亡了。这一历史过程是这样的。

高昌国的前身是西汉时的车师前王庭国。晋朝时，因此地高敞、人群昌盛，遂以此地为高昌郡(另一说"高昌"名源于当地有汉时的高昌垒)，以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为郡治所，设太守统辖。后魏文成帝末年，茹茹(一为"蠕蠕")占据这一地区，立阚伯周为王，这是高昌称王之始。伯周死后，子义成嗣位，被堂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后，又被铁勒(一称高车)阿伏至罗所杀，铁勒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不久，高昌人杀孟明，改立马儒为王。马儒派使者到后魏请求内属，但高昌人依恋故土不愿东迁，遂杀马儒，立金城榆中人麴嘉为王，又臣属了茹茹族。铁勒击败茹茹后麴嘉随而臣服于铁勒。嘉死后，子坚嗣位。

交河城是高昌的都城，周长一千八百四十步。坐室中画鲁哀公向孔子问政画像。主要官员有令尹、交河公、田北公，这都由王子担任，其他官大致与中原王朝相同。大事由王决断，小事由太子和交河公、田北公评断。

高昌地多沙漠，气候温暖，可耕地土质肥沃，谷麦一年可以两熟。还适宜种棉花，俗称"白叠一条"。高昌人采花织布为衣，也上市交换。又盛产葡萄，能酿出醇美的葡萄美酒。民俗信奉天神，也

兼信佛法。男子穿胡服,女人则穿汉人的裙襦。面貌和高丽人相似。男子辫发垂于背,女子发辫垂于地。文字以汉文为主,兼用胡文。赋税计田收银,无银收麻布。刑法及婚姻丧葬风俗和中原汉族也基本相同。

长安到高昌约四千三百里,有两条通道:一条称伊吾路;另一条是捷径,从武威西北出发,要渡沙漠千余里,茫茫大漠中,没有明显的道路,需寻人畜遗骨及骆驼粪行进。途中有时会听到歌哭之声,但若寻找则踪迹不见,于是传说有魑魅魍魉作祟。因此商客东西往来多取伊吾路。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突厥攻破高昌四座城池,有二千高昌人东到隋地。麹坚死,子伯雅继位,并在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派使者进贡,炀帝厚赏了使者。次年,麹伯雅亲自入隋朝觐,后还随炀帝东征高丽。为此,炀帝封亲戚宇文氏女为华容公主嫁给伯雅。大业八年,伯雅回高昌,下令国中仿照大隋,改变胡俗,解辫削发。炀帝得知大喜,下诏表彰,并赐衣冠样品和制造格式。然而,伯雅先已臣服铁勒,铁勒派大臣常驻高昌,专征胡商往来的过境税。所以,伯雅虽下此令取悦炀帝,终因畏惧铁勒而不敢实施,可是每年都派人入隋朝贡,在隋和铁勒两大势力间采取脚踏两只船的策略。

唐初,高昌疆域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有二十一城,拥兵万人。武德二年(619年)麹伯雅死,子文泰嗣位,仍以华容公主为妻,并派使者到唐告哀。高祖李渊派朱惠表前往吊祭。武德七年,文泰进奉拂林狗雌雄各一。此种狗高六寸,长尺余,能曳马衔烛。中原自此始有拂林狗。太宗李世民即位,文泰派使者献玄狐裘,太宗回赐华容公主花钿一对,华容公主又贡献玉盘。而且,麹文泰经常向唐通报西域各国的动态。贞观四年,麹文泰亲自入唐朝见,太宗重礼相待,归时赏赐丰厚。华容公主还请求进唐宗籍,太宗下诏赐姓李氏,改封为常乐公主。次年正月麹文泰又入唐朝见,太宗也盛宴

款待。

但从贞观六年起，唐与高昌的关系开始恶化。原来，这年七月，焉耆国王龙突骑支派使者入唐进贡，并请求重新开通由焉耆到唐的大碛路，以便于往来，这一请求得到唐太宗的支持。这条大碛路自隋末以来就阻塞不通，焉耆等高昌西面的国家入唐必须经过高昌，这样它就垄断了丝绸之路上过境贸易的好处。大碛路一旦开通，西域各国使者和胡商入唐就不一定必经高昌，自然就影响了它的经济利益。因此，高昌对焉耆怀恨在心，竟然派兵袭击焉耆，大掠而去。此后，麴文泰经常阻遏西域入唐朝贡使者和胡商通过，双方关系也不断恶化。为了抗衡唐的压力，高昌又与和唐对立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盟，从而更加有恃无恐，与唐明争暗抗。唐太宗下诏令麴文泰归还逃奔到高昌的中原汉人，这些人是避隋末战乱逃到东突厥，而颉利可汗被唐战败后，其中一部分人又逃到高昌，但麴文泰隐匿不还。

高昌东邻是伊吾国，此国先时曾臣服于西突厥，后内附唐朝，唐以此地为伊州。麴文泰和西突厥竟联合进攻该州。太宗得知，下诏书斥责，并征召高昌大臣阿史那矩入唐议事。麴文泰拒而不派，仅让官位较低的长史麴雍入朝请罪。但在贞观十二年十二月又和西突厥合兵攻破焉耆三城（一说五城），焉耆王上表陈述。太宗派李道裕前往质问。贞观十三年初麴文泰又派使者来请罪。太宗深知麴文泰派使者请罪只是表面敷衍，于是厉声斥责高昌使者道："高昌数年来不朝贡，全无藩臣之礼；所置官员皆准天朝，僭越制度；又筑城掘池，准备攻战。我使者到你国，麴文泰竟然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窜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活'。此话暗含叛意。而且西域各国使者入贡，你主百般阻遏。还派使者到薛延陀挑拨，说什么'既是可汗，当与唐天子等同，何用拜唐使者'！如此作恶多端，不诛何以劝善，明年我要发兵灭你国家。"

三月，薛延陀可汗闻听唐要征讨高昌，派使者入唐请求为唐军

向导，太宗于是派民部尚书唐俭和执失思力带缯帛赏赐薛延陀，谋划合力攻取高昌。但太宗仍希望麴文泰自动悔过，归顺大唐，随后又下玺书晓喻祸福，并召麴文泰入唐，麴文泰则称疾不到。太宗震怒，在十二月初四，以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薛万均为副，率唐军及东突厥、契苾等步骑共数万人出师征讨。

军令颁发后，唐朝臣纷纷上谏，认为万里用兵，途经大漠，恐难取胜；况且高昌地处遥远，即使攻克，也不能固守。但太宗决心已下，一概不听。麴文泰听到唐军出动的消息后，轻蔑地对近臣说："唐距我国有七千里，沙漠占其中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大军岂能渡过！而且我从前入唐朝觐，见秦、陇以北，城镇萧条，已无法和隋时相比。唐今日发兵攻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在三万以下，我力足能置之于死地。况且道路艰险，唐军必然疲惫，以逸待劳，就可坐收其弊。即使真能到我城下，不出二十日，食尽必走，我军乘机进攻，何愁不胜！"

完全出乎文泰所料，贞观十四年八月，唐军顺利渡过大漠，直抵碛口。文泰得报后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不久就忧惧成疾，一命呜呼。子麴智盛继位。这时，唐军已推进到柳谷(今新疆哈密东)。唐侦察骑兵报告说麴文泰就要安葬，高昌人都集中送葬，可抓住此机会突然袭击。侯君集说："不可，皇帝因高昌无礼，才令我等讨伐，今袭击人于墓地之间，非吊民伐罪之师。"于是鸣鼓进军，直抵田地城(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军婴城固守，侯君集招降不成，于次日凌晨指挥攻城。唐对进攻高昌的战役作了充分的准备，大军出发时，征召山东很多擅长制造攻城器械的人随军而行。这时，唐军砍木填平城壕后，用撞车将城墙撞塌数丈；抛车石飞击城中，中石的无不糜碎，守城兵士被石打得不敢站立，中午时就拿下该城，俘虏男女七千余口。随后，侯君集令部将辛獠儿为前锋，夜间急行军袭击高昌首都交河城。唐先锋军击败了高昌军的阻击，而唐大军也迅速跟进，将交河城团团围住。

麴智盛见兵临城下，给侯君集去信说："对大唐天子有罪的是先王，今上天惩罚，已染病身亡。我刚刚嗣位，恳请阁下哀怜。"君集回书道："如能悔过，应自缚到我军门谢罪。"麴智盛不出城。君集见麴智盛非真心投降，遂命填平城堑，以抛车攻城，瞬时间抛车石如雨下。又造巢车，高十丈，可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击中的地方，巢车上人都大声报告，以使抛石车提高命中率，城中人只得到屋中躲避。

前述麴智盛给侯君集写信告饶，这其实是缓兵之计。因为以前麴文泰和西突厥可汗结盟时约定，一旦高昌有紧急情况，西突厥出兵相救，可汗还派叶护（突厥官名，为大臣之首）率兵驻在可汗浮屠城（今新疆奇台西），为高昌声援。麴智盛拖延时间的目的在等待西突厥援兵到来，但他哪里知晓，当侯君集大军一到高昌，西突厥可汗惧而向西迁徙千余里，逃之夭夭。援兵不到，麴智盛力屈计穷，于八月初八（癸酉）开城出降。侯君集攻克交河城后，立即分兵扩大战果，连下二十二城，得户八千四十六、人口一万七千七百，占据了高昌国全部地区。这时，留驻可汗浮屠城的西突厥叶护也举城降唐。

捷报传到长安，太宗大喜，盛宴庆贺，并且决定要把高昌故地划为州县，但遇到一些大臣反对。魏征说："陛下初继位时，麴文泰夫妇就来朝拜。但后来，他阻遏商胡贡献，又骄傲无藩臣礼，陛下才兴师诛讨。可有罪的仅麴文泰一人，应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大唐威德被于荒远，四夷无不悦服。今若贪其土地，划为州县，常须有兵千人镇守。这样数年一换，每次轮番，疲病而死将十有三四。加以供办衣粮、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而陛下终不能得高昌撮谷、尺布利我华夏，这正是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认为不可。"太宗不听。九月，以高昌故地为西州，把州治所设在高昌县。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又以可汗浮屠城为庭州。

侯君集攻高昌时，曾派使者约焉耆出兵与唐合力，焉耆遵命。及高昌灭亡，焉耆王到唐军门谒见君集，请求归还被高昌夺去的三

城。君集奏请后连被高昌掠去的焉耆百姓一起归还了焉耆王。

随后，侯君集带俘获的麴智盛和高昌群臣、豪杰等凯旋回长安。太宗免麴智盛罪，封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又将带来的高昌乐工交付太常寺，原九部乐增高昌乐后形成唐国家法定的十部乐。至此，唐的疆域已东达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全成唐加州县，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高昌氏自麴嘉有国，至麴智盛被唐灭亡，共传九代，一百三十四年。而唐得高昌后设安西都护府并留兵镇守，使之成为进一步向西域开拓的桥头堡。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7－195

《通鉴纪事本末·太宗平高昌》

《通典·边防·车师》

《隋书·高昌传》

《两唐书·侯君集传》

唐平焉耆、龟兹

焉耆国，源于汉代通焉王理员渠城，在长安西七千三百里。土地肥沃，种植稻、粟、菽、麦，盛产葡萄。畜有驼、马、牛、羊，又因临近大湖（今新疆博斯腾湖），兼有鱼盐之利。风俗信仰佛教。婚姻之礼和中原相同。死后火葬。男子剪发，女子穿襦和大袴。又好饮葡萄酒和喜爱音乐。一年中民间的娱乐活动是：二月初三野祀，四月十五游林，七月七日祭生祖，十月十五日国王始出游，到岁末止。

隋时，焉耆疆域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东距高昌九百里，西距龟兹也九百里，都是沙漠。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户四千，兵约二千。国王姓龙，字突骑支（一为“突骑”）。隋炀帝大业中，龙突骑支又派使者到隋贡献方物。

唐贞观六年（632 年）正月，龙突骑支派使者人唐进贡，沟通联系。同时请求开通隋末以来被阻塞的大碛路，便于东西交通往来，这一请求得到唐太宗的支持，但因损害了高昌垄断征敛过境贸易税的利益，导致两国结怨，进而成为唐和高昌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贞观十四年太宗派侯君集征讨高昌，约焉耆出兵相助，东西夹攻，焉耆欣然遵命。及高昌被唐灭亡后，唐将高昌占领焉耆的城池和虏掠的人口全部归回，焉耆王为此遣使到唐谢恩，贡献方物，唐与焉耆的关系这时相当融洽。但后来却出现了变化。

原来，西突厥内乱后，乙毗咄陆可汗打败了亲唐的咥利失可汗，势力渐渐膨胀，自恃强大，与唐为敌，并在贞观十六年公然拘留唐的使者侵暴西域，并进攻唐的伊州，还千方百计破坏唐与焉耆的

友好关系。乙毗咄陆可汗让部下重臣屈利啜为弟弟娶焉耆王龙突骑支的女儿为妻，从此结成唇齿相依的关系。焉耆投靠西突厥后，就断绝了对唐的朝贡，太宗则令安西都护郭孝恪伺机征讨。

不久，乙毗咄陆同部将泥熟啜因瓜分虏掠财物发生内哄，泥熟啜和乙毗咄陆另一个部将尼啜以及弩失毕诸部派使者入唐，请求废弃乙毗咄陆可汗。唐太宗利用这一机会，于九月册立乙毗射匮可汗，又在西突厥内部建立亲唐势力。乙毗咄陆也因部众不附，逃奔吐火罗。接着，太宗开始对焉耆用兵。贞观十八年八月，诏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由西州出银山道进攻焉耆。这时，恰逢焉耆王弟颉鼻、栗婆准等兄弟三人到达西州，于是郭孝恪以栗婆准为向导，大军直指焉耆城（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南）。

焉耆城四面环水，龙突骑支恃险不戒备。郭孝恪采取闪电突袭战术，偃旗息鼓，连续急行军七百一十里，夜间抵达城下。焉耆人还在梦中，但唐军将士已浮水而渡，凌晨登城，突然鼓角齐鸣，城中顿时乱作一团。郭孝恪纵兵攻杀，生擒了龙突骑支，斩、俘千余级（一说七千级）。因栗婆准引导唐军有功，留在焉耆摄理国事，郭孝恪则率军而回。

但郭孝恪刚离去三日，西突厥原乙毗咄陆可汗的大臣屈利啜率兵到焉耆，擒栗婆准，并以五千精骑追击郭孝恪至银山。孝恪回师反击，大破追敌，屈利啜军溃散逃去。九月二十一日（辛卯），太宗胸有成竹地对侍臣说："孝恪近奏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在二十二日破城，朕计算路程，使者今日到了。"言犹未毕，报捷使者乘驿骑赶到。十月，太宗驾临东都，郭孝恪因送龙突骑支及其妻子到洛阳，太宗下诏免罪释放。

然而，西突厥处般啜（一为"处那啜"）乘唐军撤后之机派吐屯（突厥官名）控制了焉耆，并遣使者入唐，叫唐承认既成事实。太宗呵斥道："我发兵击获焉耆，你是何人，胆敢攫为己有"！吐屯闻报大惊失色，连忙撤离焉耆。焉耆人遂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

王，但仍附属于西突厥处般啜。唐这次战役没有实现对焉耆真正有效的控制，直到发动平定龟兹的战役时才一起解决。

龟兹（一曰"邱兹"，一曰"屈茨"等）国是唐太宗开拓西域时遇到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此国源于汉代通焉耆理延城，在长安西七千五百里。土地适宜种麻、麦、秔稻、葡萄，也产良马、封牛。多葡萄酒，富家达数百石。有城郭房屋，居民耕田畜牧为业。风俗善歌舞，信佛教。男女都剪发垂与项齐。唯有国王不剪发，头系彩带，垂于后，身着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座。国中习惯法是杀人偿命，劫贼断一臂、砍一足。每年正月初一，斗羊、马、骆驼七日，观胜负来预卜岁丰歉。葱岭以东风俗喜淫，龟兹、于阗设置妓院敛钱。

隋朝时国王姓白，字苏尼咥。都城名伊逻卢城，方六里，北倚白山（也称阿羯田山）。疆域东西千里，南北六百里，拥兵数千。龟兹东距焉耆九百里，西距疏勒一千五百里，南距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北到西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距瓜州四千六百里。

龟兹在炀帝大业中就派使者到隋贡献方物。唐高祖李渊即位，龟兹王苏伐勃驶遣使者来唐。勃驶死后，子苏伐叠嗣位，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又遣使者献马，太宗赐玺书，厚加抚慰，从此岁贡不绝。

然而，后来龟兹转投西突厥，贞观十六年郭孝恪奉命率兵征讨亲附西突厥的焉耆时，龟兹王不仅派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向唐朝贡。不久苏伐叠死，弟诃利（或"黎"）布失毕代立，和唐关系进一步恶化，无藩臣之礼，还侵掠邻国。太宗大怒，于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令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唐大军，并征发铁勒、东突厥、吐蕃、吐谷浑兵合计十余万骑进讨龟兹。

唐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威震西域。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原与唐为敌的西突厥屈利啜在唐军压力下也请求率本部随讨龟兹。九月，阿史那社尔打败西突厥别部处月、处密后，于十月，率大军自焉

耆西直指龟兹北境。军事运动之快，出敌不意，西突厥支持的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慌忙弃城逃奔龟兹，社尔迅速派出轻骑追擒斩首。随后，改立薛婆阿那支的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在焉耆重新建立了亲唐政权。

龟兹国也惊恐万分，守将纷纷弃城逃跑。社尔率唐军进屯碛门，距龟兹都城仅三百里，于是派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随后，向西推进。至多褐城，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和首相那利、羯猎颠率军五万拒战。兵锋刚接，韩威引兵便退。龟兹不知是计，见唐军兵少，就挥动全军追击。行三十里后，韩威和曹继叔合军一处，列阵严整，旌旗蔽天，鼓声动地，龟兹大吃一惊，慌忙后撤，唐军乘势攻击，龟兹大败，北逃八十里。

龟兹王布失毕战败后退保首都伊逻卢城，阿史那社尔率军紧逼。布失毕知难以守住，遂轻骑西逃，唐军顺利攻陷该城，时在本年十二月。随后，阿史那社尔令安西都护郭孝恪守城，又令沙州刺史苏海政以及部将薛万备率精骑衔尾追击布失毕，奔驰达六百里。布失毕见无法逃脱，只好进守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阿史那社尔立即指挥大军将该城团团包围，连攻四十日，终于在闰十二月初一(丁丑)拿下拨换城，生擒布失毕和羯猎颠，但那利侥幸逃脱。

那利脱身走后，引来西突厥和龟兹兵共万余人偷袭郭孝恪驻守的龟兹都城。当时，郭孝恪认为龟兹余部未平，扎营城外，便于行动。有的龟兹人告诉孝恪道："那利任相，素得人心，今逃亡在外，必思变乱；城中人也颇有异志，愿您加以提防。"但郭孝恪不以为然。这样，那利率军突然杀来，孝恪措手不及，慌忙中想带本部兵千人进城固守，但那利早和城中龟兹人暗中联系，内外相应，他的士兵也捷足先登，抢先入城，并占据了城墙等制高点。等郭孝恪进城时，龟兹兵箭矢如雨，而且城中的龟兹人也帮助那利进攻唐军。郭孝恪虽率军死战，终不能敌，想撤出城外，至西城门中流矢身亡。但郭孝恪部将崔义超率兵二百人守卫唐军资财物，与龟兹军在城内继续

苦战。这时，唐将曹继叔、韩威率军赶到，自城西北角进攻。那利见唐援军已到，料难抵挡，撤军出城而去。城中依然一片混乱，唐军斩首三千余人，才稳定了对该城的控制。后十余日，那利又率龟兹万余人袭击伊逻卢城，曹继叔迎击获胜，斩首八千级，那利单骑逃脱，后被龟兹人擒住，献给了唐军。

阿史那社尔前后攻陷龟兹五座大城，俘虏男女数万口。同时派部下权祗甫到龟兹其他城池晓喻祸福，各城主纷纷投降，共七百余城。社尔召集龟兹父老，宣扬大唐威势，晓喻吊民伐罪之意，并立布失毕弟叶护为新的龟兹王，龟兹国人无不悦服。这一仗也震骇了整个西域，西突厥、于阗、安国争献驼、马、军粮。阿史那社尔勒石记功后凯旋而还。

贞观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尔俘虏龟兹王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羯猎颠等至长安，太宗训斥后免罪宽释，并任命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那利以下也授与不同等级的官职。

后来，唐所立的龟兹王没能控制龟兹全局，各个酋长争立，相互攻击。于是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八月，高宗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让他回国安抚民众，那利、羯猎颠也随同而归。显庆元年(656年)八月，布失毕入唐朝觐。但不久，龟兹国内朝政混乱。因为布失毕的妻子阿史那氏和那利私通，布失毕不能禁止，君臣猜忌，各树党羽，并都向唐朝廷告状。为解决这一问题，高宗将布失毕和那利都召入朝，然后囚禁了那利，派唐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不料到龟兹东境泥师城，遇到龟兹大将羯猎颠的阻截。与此同时，羯猎颠遣使投靠了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保，不敢前进，郁郁而死。

高宗令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伐，生擒羯猎颠及其党羽，全部斩首。显庆三年正月，以龟兹地为龟兹都督府，并立布失毕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五月初二(癸未)将安西都护府从交河城迁至龟兹(今新疆库车)在交河城复设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

唐征服了焉耆、龟兹，并挫败了西突厥，从而在西域站稳了脚跟，为以后进一步开拓西域奠定了基础。

（马俊民）

参考资料：

《隋书》:《焉耆传》、《高昌传》

《资治通鉴》卷 194—200

《通鉴纪事本末·太宗讨龟兹》

《通典·边防·焉耆》、《通典·边防·龟兹》

两唐书:《郭孝恪传》、《阿史那社尔传》、《焉耆传》、《龟兹传》

唐平西突厥

西突厥汗国的始祖是土门的弟弟室点密。土门于西魏时创建了突厥汗国，室点密镇守西部地区。隋初，室点密的儿子达头可汗玷厥建立了独立的政权，突厥汗国正式分裂。于是，以沙钵略可汗摄图为首的政权称东突厥（又称北突厥或简称突厥），而以达头可汗玷厥为首的政权称西突厥。当时，西突厥区域，东自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到雷翥海（今咸海）；北自瀚海（约今巴尔喀什湖一带），南到疏勒（今新疆喀什）。阿史那部落与都陆、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部落共同居住。

隋朝末年，西突厥在达头可汗孙子射匮可汗的统治下势力强大，建玉庭（突厥可汗居住地）于龟兹北的三弥山（今新疆库车北）。他死后，弟弟统叶护可汗嗣位。此人勇而有谋，善于攻战，国势因此更加强盛，拥兵数十万，疆域向西扩展到波斯（今伊朗）、罽宾（今阿富汗卡菲里斯坦一带），独霸了西域。这时，西域诸国都向其称臣纳税；统叶护可汗向每个臣属的王国派吐屯（官名）一名加以监统。他还将王庭西迁至千泉（今吉尔吉斯山一带），以加强对西部臣域的控制。

唐建立后，在高祖武德二年（620年）七月，统叶护可汗派使者到唐进贡，沟通了双方的联系。次年三月又贡献条支国的巨卵、狮子皮等。高祖为了对付当时对唐威胁最大的东突厥颉利可汗，于是利用东、西突厥间的矛盾，极力拉拢西突厥，终于使统叶护可汗同意于武德五年冬出兵助唐征讨东突厥。颉利可汗得知唐与西突厥

结盟的消息后非常恐惧，马上派使者到西突厥通好，使唐的这次谋划没能成功。

武德八年四月，统叶护可汗派使者到唐请求和亲。高祖问裴矩："西突厥离唐甚远，我方若出现紧急情况他也难以相助。现提出请婚，如何处理为上策？"裴矩答道："今日北境的东突厥正强，是大唐的主要外敌，所以应采用远交近攻之计，答应西突厥和亲请求，借以威胁颉利。等数年之后，我国实力雄厚，足以抵御东突厥时，然后再考虑如何平定西突厥。"高祖同意这一见解，遂答应和亲，并派高平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大喜。

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李道立一起来唐，献万钉宝钿金带和马五千匹，并迎娶唐公主。东突厥颉利可汗不愿意唐与西突厥通过和亲结成同盟关系，于是极力破坏。他一面频频派兵进攻唐的边境，切断唐通往西方的道路，一面派人威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说："你迎娶唐公主，必经我控制区域，我要将公主扣留。"唐与西突厥均无良策解决这一难题，和亲没有实现。

贞观二年西突厥发生内乱。这年十二月，统叶护可汗被伯父莫贺咄杀死，莫贺咄自称莫贺咄可汗。但西突厥国人不服，弩失毕部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敢承当。这时，统叶护可汗的儿子咥力特勒避祸逃亡于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泥孰遂把他迎来立为可汗，即肆叶护可汗。从此，西突厥的莫贺咄可汗与肆叶护可汗互相攻战，连年不息，并且都派使者到唐请婚、求援。太宗一概拒绝，劝两可汗各守份地，勿再相攻。因为西突厥内乱，原臣附的西域诸国以及被西突厥征服的铁勒部族纷纷独立，西突厥国势衰弱。

肆叶护可汗因为是统叶护可汗之子，为西突厥众心所归，后来连莫贺咄可汗部下的酋长们也多归顺。这样，肆叶护于贞观四年终于战胜了莫贺咄。莫贺咄败后逃到金山，被泥孰设杀死。西突厥诸部共同拥戴肆叶护为大可汗，西突厥暂时安定了。

肆叶护可汗为人猜忌而残忍，又无统治才能。他部下有一酋长

名乙利,功劳最多,因此被授为小可汗。但肆叶护听信谗言,竟将乙利灭族。这一事件在西突厥诸部中引起很大的震动,无不感到自身难保。肆叶护又最疑忌泥孰,暗欲加害。泥孰被迫逃到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避难。肆叶护可汗的昏暴行为,终于导致了部众的反叛。贞观六年七月,设卑达官与弩失毕两部合兵进攻,肆叶护可汗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又逃奔康居,不久忧惧而死。西突厥国人将泥孰从焉耆迎回立为可汗,名咄陆可汗。咄陆可汗被立后,随即派使者入唐,请求内附,并愿去可汗称号。

原来,咄陆可汗的父亲是莫贺设,是统叶护可汗的部下,唐高祖时曾到长安,并和当时的秦王李世民结拜为兄弟。

太宗见到咄陆可汗使者大喜,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回访西突厥,册封咄陆名号为奚利邲咄陆可汗,并赐给战鼓、大旗以及丰富财物,表示支持。

贞观八年咄陆可汗逝世,弟同娥设嗣位,名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并于第二年派使者到唐,献马五百匹,请求和亲。太宗只厚加抚慰,没有同意婚事。

不久,咥利失可汗将西突厥分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统领,号为十设;每设赐箭一支,因此又号称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辖五箭。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啜,突厥官名),即处木昆律啜、胡禄屋阙啜、摄舍提敦啜、突骑施贺逻施啜、鼠尼施处半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俟斤,突厥官名)即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暾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阿舒虚半俟斤,一俟斤也管一箭。五咄陆居碎叶(今中亚托克马克)以东,五弩失毕居碎叶以西。自此以后,左右两厢合称十姓部落。

咥利失可汗在西突厥并没有很高威望,贞观十二年,东部竟然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公然与咥利可汗分庭抗礼。随后,双方展开大战,死伤惨重,但不分胜负。于是,以伊列水(今伊犁河)为界,中分西突厥之地:以西属咄陆可汗,以东属咥利失可汗。西突厥

因此分裂。

贞观十三年,咥利失可汗的大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勾结作乱,咥利失狼狈逃到䥽汗(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后死在那里。弩失毕部酋长拥立䥽利失可汗侄薄布特勒为可汗,名乙毗沙钵罗可汗,建王庭于虽合水(或为睢合水)北,称南庭。当时,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都臣属乙毗沙钵罗可汗。乙毗咄陆可汗建王庭于镞曷山西,称北庭,并臣服了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焏、触木昆等国。两个分裂的西突厥政权仍以伊列水为界:东属乙毗沙钵罗可汗,西属乙毗咄陆可汗。

在西突厥两个分裂政权相互攻战中,乙毗咄陆可汗逐渐强大,西域诸国大多数都臣服了他。乙毗沙钵罗可汗为求取唐的声援,多次派使者到唐朝贡。贞观十五年七月,太宗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出使,以册封的形式承认他的可汗称号,并赐给鼓、旗以示支持。然已无济于事。不久,乙毗咄陆可汗令石国出兵偷袭乙毗沙钵罗可汗,大获全胜,生擒了乙毗沙钵罗,献给了乙毗咄陆,后被杀死。

乙毗咄陆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后,不满唐对乙毗沙钵罗的支持,又自恃强大,公开与唐为敌,拘留唐的使者,并在贞观十六年派兵进攻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唐安西都护郭孝恪闻讯,率轻骑两千自乌骨邀击,打败了西突厥军。乙毗咄陆可汗又派所属的处月、处密两部包围天山军(位今吐鲁番东南),也被郭孝恪击败。孝恪乘胜之威攻克处月俟斤居住的城郭,直追至遏索山,降服了处密才凯旋而还。

乙毗咄陆可汗对扣留的唐使者元孝友傲慢地说:“听说唐天子文武双全,我今日讨伐康居,叫你们看我比他如何!”遂携带元孝友等出征。途经米国(今中亚朱马巴札尔),将其攻破,虏获甚多,但丝毫不分给部下。将领泥孰啜不满,擅自夺取。乙毗咄陆大怒,为杀一儆百,将泥孰啜斩首,部众无不为之愤怨。泥孰啜部下胡禄屋乘机举兵袭击,乙毗咄陆措手不及,慌忙逃到白水胡城(今中亚奇姆

肯特东南)固守。于是,弩失毕诸部及乙毗咄陆部的屋利啜等派使者到唐廷,请废弃乙毗咄陆,更立新可汗。太宗立即派通事舍人温无隐为使者带玺书册封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

乙毗射匮是在唐的支持下取得可汗地位,从而表现了亲唐倾向,将乙毗咄陆可汗扣留的唐使者全部以礼送回。随后,他率领诸部进攻白水胡城,不料反被乙毗咄陆战败。乙毗咄陆战败乙毗射匮后,派人召集旧部落。但旧部都说:“即使我们千人出战,仅一人生存,也决不降你!”乙毗咄陆自知不得民心,于是西奔吐火罗(今阿富汗一带)。

贞观二十年六月,乙毗射匮可汗派使者到唐进贡,并请求和亲。太宗应允,但提出西突厥要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作为聘礼,于是和亲未成。而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年),阿史那贺鲁吞并了乙毗射匮可汗部众。

阿史那贺鲁是室点密五世孙。乙毗咄陆可汗统治西突厥时以他为叶护(突厥官名),居多逻斯水(今额尔齐思河),统辖处月、处密、始苏、歇逻禄、失毕五姓部众。乙毗咄陆可汗逃奔吐火罗后,乙毗射匮可汗想铲除阿史那贺鲁,遂派兵攻击。贺鲁无力抵抗,在贞观二十二年四月率部众数千帐降唐,被安置在庭州莫贺城(今新疆阜康东),官封左骁卫将军。这时,唐正进攻龟兹(今新疆库车)贺鲁听说这一消息,遂带数十骑人朝请作向导。太宗心中欢喜,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并在嘉寿殿设宴厚赏,然后让他返回。闰十二月,又加泥伏沙钵罗叶护衔,赐给战鼓、大旗,命他招讨西突厥还未降唐的部落。次年二月,唐特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都督,隶属于安西都护府。贺鲁利用这一机会招集西突厥离散部众,势力逐渐强大。太宗逝世后,他率众西走,吞并了乙毗射匮可汗,自称沙钵罗可汗,建王庭于双河(今新疆温泉一带)和千泉,咄陆五啜、弩失毕五俟斤也都归附。这时,贺鲁拥兵数十万,又与逃到吐火罗的乙毗咄陆可汗连兵,不仅统一了西突厥十姓部落,而且控制了处月、处密

和西域大多数国家，并公然与唐为敌。

永徽二年七月，贺鲁进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攻陷了金岭城及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杀掠数千人。高宗大怒，令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征发秦、成、岐、雍四州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兵讨伐。次年正月，梁建方等在牢山击败归附贺鲁的处月，生擒其酋长朱邪孤注，斩首九千级，然后回师。

永徽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死，其子颉苾达度设和贺鲁有矛盾，遂联合五弩失毕部共同攻击贺鲁，还数次派使者到唐请求出兵相助。西突厥的内乱，给唐提供了有利战机。永徽六年五月，高宗以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贺鲁。十一月，又派丰州都督元礼臣为使者前去册封颉苾达度设为可汗，以在西突厥内部扶植亲唐势力。但元礼臣至碎叶，遭到贺鲁的阻截。不久，颉苾达度设部众多被贺鲁兼并，余众寡弱，元礼臣感到难以扶植，遂没册封而回。

显庆元年(656年)八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与西突厥歌罗禄、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唐军获胜，杀敌千余。副总管周智度也攻克了突骑施、处木昆等部居住的咽城，斩首三万级。十二月，程知节率唐军推进到鹰娑川(今新疆开都河)，遇西突厥二万余骑兵拒战。总管苏海政出战，不分胜负。忽然，西突厥鼠尼施等部二万余骑兵又接踵而至，唐军形势紧急。正在这时，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精骑赶到，出其不意，从西突厥军背后发动猛烈攻击。西突厥军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苏定方乘胜追击二十余里，杀敌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西突厥军所丢弃的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苏定方的显赫战功，引起副大总管王文度的妒忌。他暗地对程知节说："此仗虽然获胜，但唐军也有伤亡，实属冒险之举。自今以后结成方阵，将辎重放于阵中，稳步推进，遇敌则战，这才是万全之策。"又假称曾密受旨意，因程知节恃勇轻敌，委任自己加以节制。

于是将各军聚集在一起，不许迅速深入。这样，唐军将士终日跨马，披甲结阵，不胜疲弊，马也多瘦死。苏定方目睹此状向程知节建言："出师本为讨伐西突厥，可今日止步不前，自我消耗，马饿兵疲，遇敌必败；怯懦如此，岂能成功！况且圣上以公为大将，怎会再派副将专断军权，事必有诈。请公囚禁王文度，飞表上奏朝廷，弄清虚实。"但程知节不听。

唐军到恒笃城，有不少胡人投降。王文度说："这群人等我军回师，还会反叛；不如杀掉，取其资财。"苏定方反驳道："如此而行，我们岂不成了贼，何谈伐叛！"文度独断专行，竟杀人分财，只有定方一无所取。唐军返回后真相大白，王文度因假称圣旨罪当死，后宽大除名；程知节坐逗留追敌不及罪，减死免官。

显庆二年正月，高宗以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征讨贺鲁。以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抚。因为弥射和步真都是太宗时降唐的原西突厥酋长。

十二月，苏定方率军行进至金山北，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木昆部，其俟斤嫩独禄率部落万余帐降唐。定方厚加安抚，然后征发此部一千骑兵同行。

这时，右领军郎将薛仁贵在朝中进言："西突厥泥孰部一直不服贺鲁，被贺鲁战败，妻子也被俘虏。恰巧现今我军破贺鲁部众时获得泥孰妻子，应让他们夫妻团圆，并厚加赏赐。这样，使泥孰明知贺鲁是贼而大唐爱之如父母，则泥孰部必助唐攻战，不遗余力。"高宗同意施行。泥孰感恩戴德，请求随唐军共同征讨贺鲁。

苏定方率军推进到曳咥河（即多逻斯水）西，贺鲁率胡禄屋阙啜、慑舍提暾啜、鼠尼施处半啜、处木昆屈律啜和五弩失毕部兵马近十万来拒战，而苏定方所率汉兵和回纥兵才万余人，众寡悬殊。但苏定方毫无惧色，令步兵抢先占据南面高地，将长矛的矛头外

向;自己亲率骑兵列阵于北面高地。贺鲁轻视苏定方兵少,挥师将唐军包围;又认为唐步兵是薄弱点,就先用骑兵攻唐步兵阵地,但连续三次冲锋都没成功。苏定方抓住西突厥军受挫、士气衰落的战机,率骑兵从高地迅猛冲下,贺鲁军难以抵挡,大败而逃。唐军乘胜追击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次日,率兵继续深入追击,不给败敌以喘息机会。于是,胡禄屋等和五弩失毕部归降,贺鲁只与处木昆屈律啜带数百骑狼狈西逃,其余的五咄陆部闻听贺鲁惨败,都奔南道投降了阿史那步真。

苏定方要彻底消灭贺鲁残余势力,遂命萧嗣业、回纥婆闰率胡兵为先锋军,兵锋直指邪罗斯川,穷追贺鲁;自己和任雅相率新降的西突厥军随后跟进。这时恰逢大雪,平地深达二尺,唐军将士都请求等天晴再进军。苏定方断然道:"因为雪深,贺鲁认为我军不能前进,必休息兵马。我军抓此战机迅速行动,才能追擒;若延缓不前,贺鲁西逃太远,就难以追及。省日建功,正在此时!"说罢,身先士卒,踏雪昼夜兼行,途中还不断收集贺鲁溃散的部众,直至双河,与南路军弥射、步真会师。

双河距贺鲁所居金牙山牙帐约二百里,苏定方布阵长驱直入。不出定方所料,贺鲁万没想到唐军如此神速,毫无准备,正要和部众狩猎。定方乘其不备,纵兵进击,斩获万余人。贺鲁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侥幸逃脱,驰往石国(今中亚塔什干)。

直到这时,苏定方才令唐军将士休整,同时叫降唐的西突厥各部回原居地。为牢固控制这一区域,他组织当地部族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划定疆界,恢复生产。于是,西突厥十姓安居乐业。随后,苏定方命令萧嗣业率军一支继续穷追贺鲁,自己则率大军凯旋。

贺鲁逃到石国西北的苏咄城,人马饥乏,派人带着珍宝入城买马。城主伊沮达官诈奉酒食出迎,盛加款待,并请贺鲁进城好好休息。贺鲁不知是计,进城后随即遭擒,囚送给石国。萧嗣业到石国

后，石国将贺鲁献给了嗣业。贺鲁押至唐京师后，高宗因他有悔改之意，赦免死罪。不久贺鲁逝世，葬在颉利墓旁。

唐灭亡西突厥后，遂于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乙丑），将西突厥旧地分置两个都护府：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以东设昆陵都护府，以西设濛池都护府。高宗派光禄卿卢承庆前往，册封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管辖五咄陆部；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管辖五弩失毕部。并命弥射、步真和承庆根据降唐的西突厥各部落大小，位望高低，授给刺史以下官号。西突厥原辖西域各国全置州。至此，西突厥原来占据的领土全部归唐所有，而总辖于安西都护府。唐的西部边境直至波斯。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武则天在庭州置北庭都护府，统领昆陵、濛池两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唐玄宗时在北庭都护府住地设北庭节度使，在安西都护府住地设安西节度使，以进一步加强对天山南北广大区域的控制。唐平定西突厥，客观上密切了内地和边疆以及中亚一带的经济、文化联系。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7—207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西突厥》

两唐书：《突厥传》、《苏定方传》、《地理志》

冯承钧《西突厥史料》

唐平吐谷浑

隋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率大军征讨吐谷浑,占领了该国的全境,并设郡县镇戍,把它置于隋政权的管辖之下。然而隋末天下大乱,逃到党项的原吐谷浑伏允可汗乘机恢复了故地,重建了吐谷浑国。唐朝建立后,为消灭割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派使者到吐谷浑连和伏允可汗。条件是:如果伏允配合唐铲除李轨,唐将慕容顺遣送回国。慕容顺是伏允的嫡子,一直在隋朝作为人质。炀帝南下时把他带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炀帝被杀后又逃回了长安,落到高祖之手。伏允高兴地答应了唐的条件,遂即出兵攻击一次李轨。然后,就多次派使者入唐朝贡,请唐实现诺言。终于将慕容顺迎接回吐谷浑。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最初对吐谷浑仍采取通好的政策。但伏允年老昏聩,对唐的政策摇摆不定。就在太宗刚即位时,伏元遣其洛阳公为使者来唐进贡,然而使者还没返回,他又派兵大掠唐的鄯州(今青海乐都)。太宗派使者责问,并召伏允来唐面约和好;伏允推拖有病不能前来,而为儿子尊王求娶公主;太宗同意和亲,让尊王亲自迎接,但尊王又不至。太宗下诏停婚,伏允遂即派兵进掠唐的兰州(今属甘肃)、廓州(今青海贵德东)。后来,伏允又信任对唐主战的大臣天柱王,更加兴兵频频攻掠唐的边地。不仅如此,伏允还扣押了唐出使吐谷浑的使者赵德楷。太宗多次派人交涉,并且亲自召见吐谷浑使者喻以祸福,但是毫无结果。

太宗不由得大怒,于贞观八年(634年)六月,命令左骁卫大将

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率领唐边兵及契苾、党项部族兵进攻吐谷浑。十月,段志玄首战获胜后,衔尾追击八百余里,一直到离青海(今青海湖)仅三十里的地方。吐谷浑则驱赶牧马远遁。唐副将李君羡率精骑抄近路追赶,在青海南面的悬水镇打败了吐谷浑,掠获牛羊两万余而回。

但这次战役并没能给伏允以致命打击,段志玄率军刚刚回撤,吐谷浑便在十一月十九日(丁亥)进攻凉州。二十一日(己丑),太宗下诏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征讨吐谷浑的战役。这时,他很想让李靖担任统帅,但又考虑到李靖已老,难以说出口。当李靖从侍从大臣中得知这一情况,立即面见宰相房玄龄,主动请求道:"靖虽年老,足当此任。"太宗闻奏大悦,十二月初三(辛丑),以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辖五总管,率领唐军及突厥、契苾部族兵征讨吐谷浑。

贞观九年闰四月初八(癸酉),李道宗在库山击败吐谷浑。可汗伏允受创后遂烧光野草,率轻骑西逃沙漠以避唐军。李道宗认为:"伏允西逃,不知确处。此后行军,全仗马力。今马因无草已经疲瘦,难以深入追击。不如先到鄯州休整,待马肥之后,再图进取。"侯君集反驳道:"不然。前者段志玄出师告捷,凯旋而归,但才到鄯州,伏允军也已跟至城下。其因在于敌军主力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部众也为伏允所用。今则不同,伏允在库山之战惨败后如鼠逃鸟散,君臣分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反掌。若不抓此战机,将追悔莫及。"李靖点头同意,随即分兵两路:李靖亲率薛万均、薛万彻、李大亮、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由北道,侯君集和李道宗等由南道,分头迅速追击。

李靖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首先战败吐谷浑,斩其名王,大获杂畜,以充军粮。不久,李靖等破吐谷浑于牛心堆(今青海海晏西北),

又破敌于赤水源。

侯君集和李道宗率南路军艰苦行进,经无人区达二千余里,而且气候极其恶劣,盛夏降霜。过破逻真谷时,其地无水,只好人啃冰、马嚼雪以解渴。直到五月间,侯君集等在乌海(今青海苦海)终于追上伏允。双方一场激战,唐军获胜,生擒吐谷浑名王梁屈葱,伏允落荒而逃。

北路军将领薛万均、薛万彻率百余轻骑深入到赤海,突然被吐谷浑天柱王数千骑兵包围。激战中薛氏两兄弟皆中枪落马,徒步而斗,士兵阵亡十之六七。在这危急时刻,契苾何力率领数百骑兵飞驰赶到,突破重围,纵横奋击,所向披靡。终于杀败敌军,万均、万彻也才转危为安。不久,李大亮率精骑行至赤海西的蜀浑山时,和吐谷浑军相遇,经过激战,唐军大捷,俘虏吐谷浑名王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率另一支骑兵在居如川也战败了吐谷浑。李靖督率北路大军进一步深入追击,经积石山,黄河河源,一直到且末(今新疆且末南),穷尽了吐谷浑的西部边境。

这时,传闻伏允西走,要穿过突伦川(又称图伦碛。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境内),逃奔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唐军下一步如何行动?契苾何力主张继续西进,穷追到底。薛万均鉴于自己前次险遭失败的教训,断言不可。契苾何力据理力争道:"敌军没有城郭,随水草迁徙为生,若不乘其聚居时突然袭取,一朝若鸟惊鱼散,如何倾覆其巢穴!"说罢,自选骁骑千余,直奔突伦川。万均也只好引兵相随。茫茫大漠中缺水,干渴难熬,将士们刺马血而饮,顽强挺进。终于攻敌不备,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头。伏允狼狈逃窜,妻子也做了唐军俘虏。

侯君集等所率的南路军经星宿川,抵达柏海(今鄂陵湖、扎陵湖)。然后,才回师与李靖所率北路军会合。

慕容顺于唐初回吐谷浑后,并没被伏允立为太子,只当了大宁王。因为他虽是嫡子,但留居隋朝,久不得归,伏允已经立其他的儿

子为太子了。慕容顺心中一直怏怏不乐，伺机夺取太子地位。李靖率唐军的节节胜利，使吐谷浑受到沉重的打击，人们怨恨天柱王不该唆使伏允挑起与唐的战端。慕容顺感到这是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利用民心所向，斩了天柱王。而其父伏允率千余骑逃到大漠中，流浪十余日，部众逐渐离散，最后被左右随从杀死（一说自缢死）。吐谷浑遂立慕容顺为可汗。

五月十八日（壬子），李靖上奏说吐谷浑已被平定。二十一日（乙卯），太宗下诏恢复吐谷浑国，册封亲唐的慕容顺为西平顺王、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太宗还担心他不能控制局势，于是令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果如太宗所料，慕容顺因长期留居隋作为人质，在吐谷浑族内威望不高，不久就被臣下杀死。其子诺曷钵嗣可汗位。但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太宗为扶植这个亲唐政权，先派使者前往吐谷浑劝解，随即又令兵部尚书侯君集等率兵作为后盾。并授意侯君集说，如有不听从大唐诏令而服从诺曷钵可汗的，就以武力铲除。在强大的唐王朝的支持下，稳定了吐谷浑国内局势。

贞观十年三月初七（丁酉），诺曷钵派使者到唐，请求在吐谷浑颁用唐的历法，行用唐的年号，并允许子弟入侍唐廷。太宗欣然同意。十七日（丁未），派淮阳王李道明出使吐谷浑，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并赐以鼓纛，这样吐谷浑可以用唐的旗号征战。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诺曷钵亲自入唐朝拜、请婚，并献马、牛、羊一万。太宗满口答应，遂以宗室女弘化公主相嫁，陪嫁财礼也颇为丰厚，并命李道明和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护送公主到吐谷浑。但不久，吐谷浑内部又发生动乱。丞相宣王专权，阴谋作乱。其谋略是，诈言祭祀山神，调集军队，然后袭击弘化公主，劫持诺曷钵可汗投降吐蕃。

原来，太宗时期吐蕃兴起，吐谷浑处于唐和吐蕃两大势力中间，并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因此，吐谷浑内部就出现了亲唐以及

亲吐蕃的不同政治派别。可汗慕容顺、诺曷钵为首的亲近唐廷，而丞相宣王则是亲吐蕃势力的代表。

诺曷钵得知宣王谋叛的机密后，极为恐惧，率轻骑慌忙逃奔鄯善城(今新疆若羌)，他的大臣威信王得知后率兵相迎。不久，唐果毅都尉席君买率精骑一百二十和威信王合力共讨宣王，获胜，将宣王兄弟三人全都斩首，随后上奏唐廷。时在贞观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丁巳)。由于吐谷浑国内仍然惊恐不安，太宗于是又派民部尚书唐俭、中书舍人马周前去抚慰，诺曷钵为首的吐谷浑政权因此重新稳定下来。太宗逝世后，还按诺曷钵的样子雕成石像，列于昭陵之下，象征臣服大唐。

唐高宗李治即皇帝位后，因诺曷钵娶唐公主为妻，遂封为附马都尉。永徽三年(652 年)十一月，诺曷钵和弘化公主来唐朝拜，高宗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嫁给诺曷钵长子苏度摸末为妻，并封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后来，苏度模末逝世，弘化公主带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闼卢摸末来唐请婚，高宗又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嫁与闼卢摸末。双方保持和亲友好关系。

显庆五年(660 年)后，强大的吐蕃加紧了对吐谷浑的争夺，公然出兵进攻亲唐的吐谷浑政权。但高宗并没给诺曷钵以有力的支持，只是采取调和吐蕃与吐谷浑关系的政策。龙朔三年(663 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因罪逃到吐蕃，使吐蕃对吐谷浑国内情况了如指掌。然后出兵避实捣虚，大破吐谷浑，诺曷钵与弘化公主仅带数千帐仓皇逃往唐的凉州避难，吐蕃遂占有吐谷浑领地，吐谷浑也名存实亡。

咸亨元年(670 年)，唐高宗以薛仁贵为统帅讨伐吐蕃，力图护送诺曷钵回吐谷浑故地，复兴吐谷浑国，重建唐与吐蕃的中间缓冲区。但由于唐军在大非川(位今青海共和西南的切吉旷原)惨遭失败，这一目的没有实现。高宗这时只好将诺曷钵及其亲近数千帐迁到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并在灵州境内特设安乐州(今宁夏同心

东北），以诺曷钵为刺史，意在叫他安居而欢乐。至此，吐谷浑彻底灭亡。

诺曷钵一直活到垂拱四年（688 年）逝世。此后，他的子孙和部属一直生活在唐朝内地。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87—201

《通鉴纪事本末·太宗平吐谷浑》

两唐书：《吐谷浑传》、《李靖传》、《契苾何力传》、《薛万彻传》、《李大亮传》

唐、吐蕃和亲

吐蕃人是现今藏族的祖先，源于古老的羌族。羌族最初散居在今青海一带，以游牧为业，随水草迁徙。其中发羌、唐旄、牦牛等部先后进入今西藏地区。南北朝末期，西藏高原的中部和北部有羌人建立的苏毗国，以逻些（今西藏拉萨）为中心。在苏毗之南，有牦牛部建立的吐蕃国，吐蕃王称赞普，意思是雄强的丈夫。王族皆称论，宦族都称尚。隋末唐初，吐蕃赞普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他的儿子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又消灭了羊同（今西藏阿里一带）、孙波（今青海玉树一带），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

这时，吐蕃人已经营农业，有小麦、青稞麦、荞麦等。但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生产，家畜有牦牛、马、羊、猪等。取牛羊乳酪为食，用毛织衣，住毡帐中。矿产有金、银、铜、锡。吐蕃人爱用赭色涂面以避风寒，妇人辫发而盘于头上。民俗重鬼巫，也信佛教。国家政事必以僧门参决。贵壮贱弱，母拜子，子傲父，出入前少而后老。重战死，几代都有战死的人家被视为高门大族；怯战脱逃的在他头上垂一狐尾加以羞辱。行礼时手据地学犬叫，再揖而止。居父母丧，要断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但既葬而吉。赞普死，不仅将所用的衣服、珍宝及马匹弓剑都埋掉，还以人殉葬。

弃宗弄赞统一西藏高原后制定了固定的官制、兵制、法律、文字。赞普下设大论（大相）、小论（副相）等官职，由贵族担任，父死子代。吐蕃刑法残酷，犯小罪就要剜眼、断腿、削鼻，用皮鞭抽打无定数，全凭施刑人喜怒。罪人关在几丈深的地牢中，两三年才放出。

弃宗弄赞制定的成文法名《十善法律》。吐蕃拥兵数十万，军法很严，战时前队皆死，后队方进。武器铠甲也很精良。发兵时，以七寸金箭为符契。百里一驿，传递紧急军情的人胸前佩银制鹰徽；军情越急，佩带的鹰徽越多。弃宗弄赞为改变刻木和结绳记事法，派人到天竺学习，参考梵文和古于阗文创造了吐蕃文字。

唐太宗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声威远扬。贞观八年(634年)十一月十六日(甲申)，从未和中原王朝有官方往来的吐蕃也派使者来唐朝见，太宗派冯德遐为使者前去抚慰。弃宗弄赞见德遐后颇是高兴，又闻听突厥、吐谷浑都娶了唐公主为妻，遂于贞观十二年再派使者随德遐到唐朝。吐蕃使者奉献许多珍宝后，提出了娶唐公主的要求，但太宗没有应允。使者回吐蕃后觉得难以实言，就编造说："臣刚到唐时，天子待臣很好，亲口答应许配公主。这时恰巧吐谷浑王也入唐朝拜，因为他的挑拨，唐天子待臣礼遇渐薄，连许婚事都翻悔了。"弄赞闻听大怒，发兵攻吐谷浑。吐谷浑难以抵挡，逃到青海(今青海湖)北，又攻破党项、白兰等羌族部落，以二十万大军屯驻松州(今四川松潘)西。然后派使者入唐贡金帛，扬言来迎娶公主，唐若不以公主和亲，将率兵深入。随后又挥兵进攻松州。唐松州都督韩威轻敌，出城交战败北。一时间，引起唐边地的震动。

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断然以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以执失思力为白兰道、牛进达为阔水道、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共率步骑五万反击。九月，牛进达所率先锋军自松州夜袭敌营，斩首千余级。弃宗弄赞觉察唐军如此精锐，有些畏惧，引兵撤退，并派使者谢罪，再次恳请娶唐公主。太宗这才应允。

贞观十四年闰十月二十三日(丙辰)，弃宗弄赞派大相禄东赞来唐，献黄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为聘礼，太宗答应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次年正月十二日(甲戌)太宗因为很赞赏禄东赞的才能，想以厚恩怀柔，遂封为右卫大将军，并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相嫁。十五日(丁丑)，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至吐蕃，并在河源

地(位今青海兴海东黄河边)筑馆居留等候。弃宗弄赞对娶唐公主为妻一事极其重视,亲自率兵进驻柏海(今鄂陵湖、扎陵湖)边,然后到河源馆舍中迎接。他见李道宗后非常恭敬地行了子婿礼,当看到大唐服饰华美,礼仪隆重,颇有些羞愧之色。当时太宗给文成公主带去了丰富的嫁妆:如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还有多种烹饪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以及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还有芜青种子。用车载释迦佛像,用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用具。弃宗弄赞接公主回吐蕃后,高兴地对亲近的人说:"我父祖从没有和中原大国通婚,我今天能娶唐公主实在荣幸,要为她单筑一城,夸示后代。"文成公主居住在新建的城郭宫室内,弃宗弄赞见公主时也穿上丝绸衣服。公主不喜欢吐蕃人赭面习俗,他就下令禁止。由于他非常羡慕唐的文化礼仪,就派贵族子弟到唐国学中学习《诗》、《书》,又请唐文人为吐蕃掌管表疏。从此,唐和吐蕃结成友好关系,并且吐蕃自弃宗弄赞娶文成公主后,赞普就一直称唐皇帝为舅,而自称外甥。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东回长安,弃宗弄赞特派禄东赞上书赞颂:"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无不臣服。高丽恃远,不守臣礼。陛下自领百万,渡辽进讨,毁城陷阵,指日凯旋;雁飞于天,无此之速,鹅似雁,臣冶黄金为鹅奉献。"此金鹅高七尺,中可盛酒三斛。贞观二十二年,唐派王玄策出使五天竺,东、南、西、北四天竺国都派使者入唐朝贡,但被中天竺截掠。王玄策战败后到吐蕃请求援助,弃宗弄赞立即发精兵一千二百归玄策指挥,一举击败了中天竺。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逝世,弃宗弄赞极为哀伤,遣使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放在太宗灵座之前。并致书长孙无忌表示效忠刚嗣位的高宗李治,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的,我要率兵赴国讨除。"高宗为此嘉奖,以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为賨王,赐杂彩三千段,还刻

他的石像列于昭陵玄阙之下。这时，吐蕃请求蚕种以及造酒、碾、纸、墨的工匠，高宗满口应允。永徽元年(650年)五月二十四日(壬戌)弃宗弄赞病逝，高宗亲自为他举哀，并派鲜于臣济持玺书前往逻些吊祭。以后历任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还要得到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

弃宗弄赞逝世后，因为他的嫡子早死，年幼的孙子嗣位为赞普，大权落到国相禄东赞手中。禄东赞为人足智多谋，刚毅果断，又善于练兵指挥，吐蕃在他统治下更加强大。显庆三年(659年)十月，吐蕃派使者献金盎、金颇罗等，又请婚。

但显庆五年八月，因吐谷浑内附唐朝，禄东赞首开战端，进攻吐谷浑。此后，两国相互攻击，而且都上表唐廷，各论曲直，请求援兵。唐则表示中立，不论是非。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详细报告了国内虚实。吐蕃遂于五月发兵突袭，大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昌钵与弘化公主率残余数千帐弃国北逃凉州(今甘肃武盛)，向唐廷告急并请徙居内地。吐谷浑处唐与吐蕃的中间地带，吐蕃占领吐谷浑后，不仅势力大增，而且与唐边境接壤，构成对唐的直接压力。因此唐廷迅速做出反应，派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州、鄯州(今青海乐都)，以备吐蕃。六月，又增派苏定方为安抚大使，节度各军，援助吐谷浑，禄东赞则屯兵青海，派使者论仲琮入唐，陈述吐谷浑罪过，并请和亲，遭到高宗拒绝。高宗还派刘文祥出使，以玺书斥责吐蕃不应灭吐谷浑国。麟德二年(665年)，正月，吐蕃使者来唐，表示愿和吐谷浑释恨和亲，但同时提出要唐承认吐蕃占据原吐谷浑赤水(黄河河源)流域畜牧，又遭高宗拒绝。唐、吐蕃关系逐渐恶化。不久，禄东赞死，子论钦陵继续居中执政，钦陵弟赞婆、悉多干、勃论则分别率兵在外。这兄弟四人都有才略，想进一步拓宽统治区域。因此连年进攻唐西部边疆地区。

总章年间，高宗和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忠何力等谋议征

讨吐蕃，兴复吐谷浑，但意见分岐，议而不决。吐蕃则于咸亨元年（670年）四月攻陷唐西域十八个羁縻州，又与于阗袭破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此时无力控制西域，只得废弃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镇。这迫使唐不能不大动干戈，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率兵十余万征讨吐蕃，并护送吐谷浑返回故地。

郭待封和薛仁贵在朝中官阶相同，但征吐蕃则位居仁贵之下，心中不服，因此言行故意和仁贵相违。八月间，唐军至大非川（位今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旷原）将深入乌海（今青海苦海），这时仁贵道："乌海险远，车行甚难，若带辎重，将失战机。应留二万人，在大非岭上扎两栅，将辎重置于栅内。我们率轻锐部队倍道急行，攻其不备，必获大捷。"随后仁贵率本部先行，在积石河口大破吐蕃军，斩获颇多，又推进至乌海，等郭待封到后合军一处。然而待封不听从薛仁贵的命令，带辎重缓缓而行，还未至乌海，就遇到吐蕃二十余万大军截击。郭待封战败，落荒而逃，丢弃了全部军粮辎重。仁贵得知，连忙撤军屯驻大非川。钦陵又增兵达四十万和唐军会战，结果唐军惨败。仁贵无奈只好和钦陵约和而还。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被囚送到京师后，都受到免死罢官的处分。唐于大非川失败后，吐谷浑全境都被吐蕃占领。

咸亨三年四月，吐蕃派大臣仲琮进贡，此人青年时曾在唐太学中学习，颇有才学。高宗召问吐蕃风俗，答道："吐蕃地薄气寒，风俗纯朴，然而法令森严，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上，因人所利而行之，故此能持久强威"。高宗责问为何要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寇逼凉州等事。又答道："臣只受命贡献，军机大事不是我应知道的。"高宗觉得合乎情理，于是厚赐仲琮，并派黄仁素回访吐蕃。上元二年（675年）正月，吐蕃派大臣论吐浑弥来唐请和，并说愿与吐谷浑重修旧好，高宗不听。

仪凤元年(676年),吐蕃攻唐鄯、廓(今青海贵德东)、河(今甘肃河西北)、芳(今甘肃迭部东南)、叠(今甘肃迭部)等州杀掠吏民及马牛万计。高宗虽前后派将刘审礼、契苾何力、萧嗣业、刘仁轨征讨、防御,都无成效。次年,吐蕃军又攻扶州(今四川南坪东),破临河镇。吐蕃频频进攻,对唐西南边防造成很大压力,高宗大为恼火。

仪凤三年正月,高宗以宰相李敬玄去代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安抚大使兼鄯州都督,又命李孝逸调发剑南、山南兵前往充实,还令曹怀舜等到河南、河北召募猛士以增加军力。高宗就这样集中十八万大军,以李敬玄为统帅,要和吐蕃决一死战。

李敬玄出任统帅是刘仁轨荐举的。原来,刘仁轨镇守洮河,每有奏请,多被宰相李敬玄批驳,心怀怨恨。仁轨深知敬玄非将帅才,想陷害他,上奏道:"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也知自己不懂军事,一再谢绝。高宗竟说:"只要仁轨需要,朕也要亲往,卿怎能推辞!"敬玄万般无奈,只好就任。

七月,在龙支县(今青海民和东南)和吐蕃小战获胜,遂于九月率大军推进到青海北,吐蕃论钦陵率军迎战。李敬玄令部将刘审礼领前军深入,驻扎在濠河,遭到吐蕃军的包围。敬玄畏敌,按兵不救;后听审礼战败,就狼狈回逃,直到承风岭(今青海乐都西南),才凭借一条泥沟为险阻而固守。吐蕃则屯军高岗威逼,唐军形势危急。这时多亏将领黑齿常之夜率五百名勇士偷袭敌营,吐蕃军一时大乱,将领跋地设引兵遁去,李敬玄才得以收集余众撤回鄯州。高宗令李敬玄留守鄯州。嘉奖黑齿常之,提升为左武卫将军、河源军副使。同时令随军出征的监察御娄师德收集溃散的士兵,唐军元气才有所恢复。不久,高宗又命娄师德出使吐蕃,吐蕃将领论赞婆迎于赤岭(今青海日月山),师德传达高宗旨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几年没进掠唐的边地。

这时,吐蕃东与凉、松、茂(今四川茂汶)、嶲(今四川西昌)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里

余,颇为强盛,成为唐西南的一大劲敌。高宗性格懦弱而无远略,见众将数败,深以吐蕃为忧,遂召侍臣谋议。有的说应和亲以使百姓生养休息;有的说应严设守备,等公私富实再讨伐;有的说纵敌生患,应立即发兵进击。群论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不了了之。

调露元年(679年)二月十一日(壬戌)吐蕃赞普逝世,八岁的儿子器弩悉弄嗣位,大权仍操在论钦陵兄弟手中。高宗想乘机图谋,裴行俭谏阻道:"钦陵当政,吐蕃政局稳定,不能轻举妄动。"高宗采纳而打消了这一念头。十月,文成公主遣吐蕃大臣论塞调旁来告丧,并请和亲,高宗派宋令文前往吐蕃吊祭。

永隆元年(680年)七月,赞婆率兵三万攻河源,屯于良非川。黑齿常之率精骑三千夜袭敌营,杀获二千人,获羊马数万,赞婆单骑逃遁。高宗提升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以河源(今青海西宁)位居战略要地,想增兵戍守,但交通险阻,运输困难。于是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年收五百余万石。因此战守全有了充足的基础。

该年十月初五(丙午),文成公主在吐蕃逝世。丧仪传来,高宗派使者到吐蕃吊祭,吐蕃归还唐使者陈行焉遗体。十年前行焉出使吐蕃,论钦陵要他跪拜自己,遭到拒绝,将刀架在脖子上威逼,仍不屈,遂被羁留死在吐蕃。

开跃元年(681年)五月,赞婆驻军青海旁,黑齿常之率精骑一万突袭,烧敌粮储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守固战胜,吐蕃深深畏惧,因此不敢进犯他所留守的唐边。

永淳元年(682年)七月,论钦陵进攻唐柘(今四川黑水南)、松、翼(今四川黑水东)等州,高宗令将领李孝逸、卫蒲山调秦、渭等州兵分道防御。十月,吐蕃攻唐河源军,军使娄师德率兵迎击于白水涧(今青海大通西),奋勇拚杀,八战八捷。

武则天执掌大权后,于垂拱元年(685年)和三年两次命宰相韦待价征讨吐蕃,为了让出征将领有独立的指挥权,还废除了御史

监军制度。永昌元年(689年)五月,又命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以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率三十六总管出击吐蕃。七月,待价率军至寅识迦河,被吐蕃军战败,又逢大雪,粮运不继,待价本无将领之才,这时狼狈不堪,束手无策,士卒冻馁,死亡颇多。遂率军退守高昌(今新疆吐鲁蕃东南)。败讯传来,则天大怒,杀副帅阎温古,韦待价发配绣州。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整顿残军,安抚当地,武则天以他为西州都督。

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一次巨大的胜利。原来,仪凤三年王孝杰随同刘审礼进击吐蕃,兵败后一起被俘。不料赞普见孝杰后,涕泣交流说:“此人面貌很象我父。”因此非常优待,后来竟然能返回唐朝。孝杰在吐蕃很久,对其虚实了如指掌。当唐西州都督唐休璟请求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今托克马克)四镇时,武则天就令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和阿史那忠节率兵击吐蕃。十月十六日(丙戌),唐军大破吐蕃,收复四镇,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留兵戍守。捷报传来,武则天高兴地对侍臣道:“贞观年间得此城池,控遏西域。后来西陲失守,都被吐蕃夺去。今日又全部收复,边境自然无事了。王孝杰真是功勋卓著。”

武则天高兴得有些太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七月,吐蕃又进攻临洮(今甘肃临潭)。武则天忙令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征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一月,又以娄师德任行军副总管相助。三月,两将率唐军和吐蕃论钦陵、赞婆在素罗汗山会战,唐军大败。然而九月,吐蕃却派使者请求和亲,这时,武则天命郭元振前往吐蕃观察实际情况,论钦陵于是提出讲和的条件:唐撤回戍守安西四镇的军队,并和吐蕃分割西突厥十姓(五咄陆、五弩失毕)所居地域。郭元振反驳道:“四镇、十姓与吐蕃种族根本不同,而且很早就成唐的编户齐民了。今日你要唐撤出四镇戍兵,莫非想兼并此地?”钦陵答道:“吐蕃若贪土地,想为唐边患,为何不攻取近处的甘(今甘肃张掖)、凉,而要去争夺万里之外的西突厥居住地呢!现在四夷

都被唐臣服，吐蕃所以还能独立存在，只因我们兄弟小心谨慎罢了。十姓的五咄陆离安西近，距吐蕃远，但五弩失毕距离吐蕃仅隔一条沙漠，骑兵奔驰，十日即至，因此忧虑。乌海、黄河，道路险阻，多瘴气，唐军不能深入；而此地的庸将弱兵常常侵扰吐蕃，所以我占领这一地区。唐甘、凉二州距积石山二千里，其宽处不过数百里，狭处才百里。我若出兵张掖、玉门，经常骚扰，使此地春不能耕，秋不能收，不出五六年，可断唐右臂。今弃而不为，也因对我们构不成威胁。"随后，吐蕃派使者和郭元振入唐，一再提出上述要求。

唐朝臣对吐蕃要求议论不一，武则天也犹疑不决。这时郭元振上书认为："钦陵请求罢四镇戍兵，分割十姓突厥之地，此事关系重大，切不可轻举妄动。今日若直接拒绝，恐边患再起，必甚于前。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利近，不可不深谋远虑。现应以计拖延，不断绝吐蕃讲和的希望，这就是上策。吐蕃急切想得到四镇、十姓，而它占领的青海、吐谷浑则是唐的战略要地。现在要这样答复，'四镇、十姓地区，本对大唐无用，所以派兵戍守，只想镇抚西域，分散吐蕃兵势，使不能全力东侵。吐蕃今后若没有东侵的想法，就应归还强占的吐谷浑及青海地区，那么，唐也将西突厥五弩失毕部众割给吐蕃。'如此而行，足可以堵住钦陵之口，而又没有直接拒绝他提出的请和条件。钦陵在这种情况下要举兵行动，则先理屈。况且四镇、西突厥十姓很久就归附了我方，今若不察该地人情向背，不明事情利害关系，就贸然割弃，恐伤各族人心，非抚御之良策。"武则天看罢点头同意。元振又上书献策道："吐蕃连兵不断，百姓疲于徭役，早愿与唐和亲罢战；但钦陵兄弟为统兵专权，独不想和。今陛下若年年派和亲使者前往，而钦陵兄弟频频拒绝，则吐蕃百姓怨恨钦陵日深，感陛下恩惠日甚。那么，钦陵兄弟们想发动战争，恐也困难。这一离间计，可导致吐蕃上下猜疑，祸患内兴。"武则天很是赞赏，依计而行。

自此以后数年间，吐蕃君臣果然猜忌。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嗣位

时年幼，论钦陵兄弟专权。钦陵居中秉政，诸弟统兵分据四方，其中赞婆居东边，为唐边患三十余年。但器弩悉弄年长后想夺回权力，遂暗中与大臣论岩谋划诛杀钦陵兄弟。一次，钦陵外出，赞普乘机诈称打猎，集合军队先围歼了钦陵党羽二千余人，随后派人召钦陵兄弟全回都城。钦陵等闻听有变，拒不受命，举兵反叛。赞普率军讨伐，钦陵兵溃自杀。圣历二年（699年）四月，赞婆率部下千余人降唐，武则天特命郭元振和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相迎。封赞婆为归德王。随后，钦陵子弓仁率所统领的吐谷浑七千帐也降唐，被封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十月，赞婆到东都洛阳，武则天厚加赏赐，以右卫大将军军衔，使率部众镇守洪源谷（位今甘肃武威东南），但不久病故。

吐蕃经此内乱，国势开始转衰。但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吐蕃将麹莽布支率骑兵数万进攻凉州，要经洪源谷，包围昌松县（今甘肃古浪西北）。唐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率军数千截击，两军会战于洪源谷。唐休璟临阵登高，望敌军衣甲鲜华，遂对部下说："自论钦陵死、赞婆降，麹莽布支新任将领，想以战功炫耀威武。随从的都是吐蕃的贵臣豪酋子弟，人马装备虽优良，但不熟悉军事；表面看象精锐部队，实不堪一击。"说罢一马当先，猛冲敌军，部下紧随身后，呐喊砍杀，六战六捷，斩首二千五百级，吐蕃军大败而逃。

吐蕃遭此惨败，于长安二年（702年）九月派大臣论弥萨来求和。武则天在麟德殿设宴款待，这时唐休璟恰好回朝也参加了宴会。宴席间，论弥萨频频用眼偷看休璟。武则天很奇怪，询问其中缘故，弥萨答道："洪源谷之战，此将军勇猛无敌，我想认清此人。"则天赞叹不已。唐休璟是京兆人（今西安），少年时明经科及第，后长期在边疆任职，非常熟悉边事，东自辽西碣石，西至西域四镇，绵亘万里，其中山川要害都了如指掌。

器弩悉弄赞普一面派论弥萨入唐求和，自己则率万余骑兵又偷袭茂州（今四川茂汶。另一说攻"悉州"），都督陈大慈迎击，四战

四捷，斩首千余级。赞普军事上再次受挫，于第二年四月派使者献马千匹、黄金千两来唐求婚请和。可是，为时已晚，由于吐蕃势衰，南部属国泥婆罗门(今尼泊尔)等皆叛，赞普亲往征讨，死于军中。随后，器弩悉弄的诸子争赞普位，引起吐蕃内政的混乱，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确立器弩悉弄的七岁幼子弃隶缩赞为赞普。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吐蕃使者来唐告丧。中宗亲为举哀，停朝一日。景龙元年(707年)三月，赞普祖母派大臣悉薰热来唐贡献，并替孙子请婚。四月，中宗应允以亲自抚养的雍王李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嫁给弃隶缩赞。吐番赞普高兴万分，连年都来唐贡献。景龙三年十一月，赞普派大臣赞咄等千人迎接公主。中宗在苑内毬场设宴款待，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者打马毬助兴。次年正月又特下诏书道："吐蕃虽地处荒远，但自唐初就遣使朝贡。太宗怜悯百姓，思息甲兵，遂与吐蕃和亲通好。此后数十年间，边境安然。自文成公主仙逝，中生变故，我方边陲，屡次兴师，吐蕃内部，也多凋弊。近来赞普及祖母可敦等，多次恳请，思续旧亲，再崇新好。金城公主本朕的少女，远嫁他乡，岂不思念！但为边地安宁，百姓休息，忍痛割爱。"

正月二十五日(丁丑)，中宗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又念公主年幼，赐锦缯数万匹，龟兹乐队一组，以及杂使和各种工匠。二十七日(已卯)，中宗亲自将公主送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东南)，在百顷泊旁设大帐，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者宴饮。酒酣时，中宗召吐蕃使者到面前叮嘱，当谈及公主年幼，今割爱远嫁时，不禁泪流满面。随后，命随从大臣赋诗饯行，赦免始平县死罪以下囚犯，百姓免赋一年，并改始平县为金城县，改分别地名为凤池乡怆别里。最后依依不舍而别。金城公主到逻些，赞普也特地另筑一城让她安居。杨矩回唐被任命为鄯州都督。

睿宗登基后，监察御史李知古进言，说姚州(今甘肃临潭)诸蛮，附属吐蕃，今乘吐蕃势衰，应发兵征服。睿宗听从，遂命他往剑

南征兵经略。蛮族酋长傍名引吐蕃兵攻杀了李知古，并断尸祭天。与此同时，张玄表任安西都护，与吐蕃相邻，也挑动战端。吐蕃内心怨恨，但表面仍佯装和好，并想出一条妙计，即厚赂鄯州都督杨矩，以为金城公主请汤沐地（唐公主封地）为名，请唐割让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湖东南一带），杨矩受贿后奏请赐与。河西九曲土质肥沃，水甘草美，非常适宜屯兵畜牧，又和唐边境相接，从此以后，吐蕃势力日益强盛，并重新开始和唐争夺西部边地。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五月，吐蕃相坌达延给唐宰相来书，请到河源订正两国疆界线，然后结盟。玄宗令解琬前往，又命宰相回书，予以安抚。解琬进言："吐蕃必阴怀诡计，请在秦、渭等州屯兵十万加强战备。"六月，吐蕃又派宰相尚钦藏来献盟书，以麻痹唐廷，而八月，正如解琬所料，吐蕃坌达延、乞力徐率兵十余万大举进攻临洮军（位今甘肃乐都），又攻兰州（今属甘肃），直至渭源（今甘肃渭源南），抢掠唐监牧（国家牧场）马、羊而去。这时，杨矩悔惧交加，服毒而死。玄宗立即命薛讷为陇右防御使，郭知运为副使，率兵反击；并令陇右群牧使王晙率兵配合；还广泛召募勇士到河西、陇右充实薛讷军队。

十月，吐蕃再攻渭源。玄宗大怒，初二（丙辰），下诏征兵十余万、马四万匹，要御驾亲征。而初十（甲子），薛讷等将领与吐蕃在武街（今甘肃临洮东）鏖战，大获全胜。当时，坌达延率吐蕃兵十余万屯于大来谷（今甘肃临洮东南），而薛讷住军武街（位大来谷西北），王晙率本部二千人从临洮军住地东进与薛讷合击吐蕃。王晙悄悄接近吐蕃军后，选武士七百人为敢死队，以丰安军使王海宾为首，身穿吐蕃服，夜间偷袭；自己则率后军间隔五里，多带鼓角，紧紧相随。王海宾率敢死队冲人吐蕃军中，怒吼厮杀；王晙率领后军鼓角齐鸣，震天动地。吐蕃军出乎意料，认为唐大军来到，遂惊慌失措，乱成一团，黑夜中不分敌我自相砍杀，死亡万计。这时，薛讷军还在武街，距大来谷二十里，吐蕃军充塞其间，王晙再次夜间奇袭，乘吐

蕃军混乱时冲杀过去，终于和薛讷合军一处。吐蕃连败两次，军心不稳，又见唐军强盛，遂率军撤退。唐军乘势追击，直到洮水，双方再战于长城堡，唐又获胜，前后杀获达数万人，但唐将王海宾战死。玄宗得到捷报后停止亲征。

十四日(戊辰)，姚崇、卢怀慎等上奏："从前唐与吐蕃本以黄河为界，神龙年间和亲吐蕃，才跨河筑城，设独山、九曲两军，距积石山三百里，又在黄河上造桥，便于往来。今吐蕃既叛，应拔城毁桥，复退守黄河。"玄宗听从。为怀柔吐蕃，以宣慰金城公主为名，又命尉迟瓌出使。不久，吐蕃派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与唐约和，但不称臣，要用与唐平等的敌对国仪式。玄宗闻奏后勃然大怒，一口拒绝。从此，吐蕃连年侵扰唐河西、陇右地区，但遇到唐的有力抵御。开元四年，吐蕃围松州，被都督孙仁献击败。次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在河西九曲又大破吐蕃军。随后，金城公主上书玄宗，请唐与吐蕃重修旧好，并说赞普君臣都想与唐天子共署誓文。开元七年六月，吐蕃派使者来唐，献宝瓶、金杯，并请玄宗签署誓文。玄宗认为，往昔和亲已有誓文，只要认真遵守就可以了，无须再立新的，从而没有答应，但以礼相待使者，厚赐了赞普。此后，几年间吐蕃朝贡不断。

吐蕃无力和唐争夺河西、陇右地区，转而将矛头指向西域。开元十年九月，吐蕃包围了已经归附唐的小勃律(位今克什米尔西部)。小勃律王没谨忙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求救。张嵩清楚知道，小勃律是唐的西大门，若失去它，整个西域都会被吐蕃控制。于是立即命令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步、骑四千增援。唐军昼夜兼程及时赶到，与没谨忙夹击吐蕃军，大获全胜，斩首数万人。吐蕃遭此惨败，累年不敢再犯唐边境。

因为开元二年吐蕃自恃强大，以平等的敌国身份致书唐玄宗，而且言辞悖慢，玄宗记恨在心，总想大举进攻吐蕃，以出胸中恶气。这时见吐蕃军接连受挫，认为时机已到。宰相张说劝阻道："吐蕃无礼于陛下，确应诛灭，但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等州已疲弊不

堪。我军虽屡次取胜，可得不偿失。吐蕃今已悔过求和，望陛下海涵恩准，也使我边民休养生息。”玄宗推托道：“等朕和王君臭计议后再定。”张说私下对源乾曜说：“君臭有勇无谋，常想侥幸晋升，若唐与吐蕃和好，就无法以边功邀宠。我的建议一定不被采用了。”凉州都督王君臭奉诏入朝后，果然奏请深入进讨吐蕃。

开元十四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即“悉诺逻恭禄”）攻大斗谷（位今甘肃民乐东南），进而焚掠甘州而去。王君臭度吐蕃军已疲弊，率兵暗中尾随。恰逢大雪，吐蕃士兵冻死甚众，自积石军（今青海贵德）西归。君臭派人抄小路潜入吐蕃控制区内，烧尽道旁野草。悉诺逻到大非川，想休息士兵、马匹，但因野草全被烧光，马饿死过半。王君臭和秦州都督张景顺乘机追击，直抵青海西，又踏冰渡湖。这时，悉诺逻已率大军渡过大非川，辎重和疲兵尚在青海边。王君臭挥兵进攻，将这些弱兵残将全部俘虏，并获辎重羊马万计，时在开元十五年正月。君臭因此功晋升为左羽林大将军，而玄宗也进一步增强了开拓疆域的雄心。

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和莽布支（即“烛龙莽布支”）率军报复，攻陷瓜州（位今甘肃安西东南），擒刺史田元献及居住此城的王君臭的老父。又攻玉门军（位今甘肃玉门西北）。随后，放俘虏的僧人去凉州带口信给君臭说：“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出城一决雌雄！”君臭畏敌兵锋甚盛，只是登城向西号哭，终不敢出兵。

这时，莽布支另率一军攻常乐县（位今甘肃安西南），县令贾师顺率众固守。瓜州被攻陷后，悉诺逻也合兵一处猛攻该城。但连攻十余日，吐蕃军精疲力尽，仍未攻克，于是派人劝降，贾师顺严词拒绝。吐蕃不甘心地说：“明公既不投降，也应搜集城中财物相赠，我等便退兵。”师顺答道：“如果这样，那只好叫我的士兵脱衣相赠了。”悉诺逻知城中没财物，引兵佯装去毁坏瓜州城。师顺抓住这一空隙，速开城门收器械，修城墙，增守备；吐蕃军果然派精骑回袭，见城中严防以待，只好离去。

闰九月，吐蕃赞普率军围攻安西城(今新疆库车)，被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败。这时，吐蕃想连络东突厥毗伽可汗共同与唐为敌，于是派使者抄小路前往。王君㚟获此信息，亲率精骑至肃州(今甘肃酒泉)阻截，但回至张掖县(今属甘肃)西南巩笔驿时，回纥护输伏兵突起，杀死君㚟，然后投奔吐蕃。

原来，凉州界住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种部落，世袭酋长，王君㚟官微时往来凉州，被这些酋长轻视；等他官任河西节度使后，酋长们又耻居其下。君㚟怀恨在心，竟然诬陷回纥等暗中谋反。玄宗也未审理清楚就胡乱处罚了四个部落的酋长。回纥酋长承宗的党羽护输决心杀君㚟为主人报仇雪恨，遂出现了上述事件。

王君㚟突然被杀，河西、陇右震骇。玄宗立即任命信安王李祎为朔方等节度副大使，以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

萧嵩奏请以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重新修筑故城。但城墙刚筑成，吐蕃军猝然而至，城中人大惊失色。守珪胸有成竹地说："敌众我寡，不可力敌，当以奇计取胜。"于是在城上置酒作乐，谈笑风生，实施疑兵之计。吐蕃军果然怀疑城中有备，恐中埋伏，连忙撤退。守珪乘势进击，敌军落荒逃走。随后，守珪修复好城市，又招集流散百姓，回归旧业，使瓜州重新复兴。玄宗嘉奖，以瓜州为都督府，任守珪为都督。与此同时，因悉诺逻威名甚盛，成唐一大劲敌，萧嵩便施反间计，派间谍潜入吐蕃散布谣言，说悉诺逻暗通唐朝。果然引起赞普的疑惧，将他召回杀掉。吐蕃失去这员大将，势力又稍稍衰落。

开元十六年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进攻瓜州，被都督张守珪挫败。河西节度使萧嵩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也在渴波谷大破吐蕃军。忠亮乘胜追击，攻拔大莫门城(位今青海共和东)，擒获甚众，又焚毁吐蕃骆驼桥才回。八月，吐蕃出兵报复，萧嵩派副将杜宾客率强弩军四千迎击于祁连城(位今甘肃民乐东南)下。双方鏖战，杀声震

天，箭如飞蝗，自晨至暮，散而复合。吐蕃军终于不敌，散逃山谷，哭声一片。

唐在鄯州西部有一个战略要地名石堡城(位今青海湟中西南)，后被吐蕃夺去，留兵固守，成为侵扰河西地区的桥头堡。玄宗命李祎和驻守河西、陇右的众将谋议协力攻取。众将都认为："石堡城地据险要，吐蕃极为重视，而且道路遥远。今率兵深入，敌必拼命死守，若攻之不克，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如按兵不动，以寻良机。"李祎力排众议，督率众将神速进军，攻敌措手不及，拿下石堡城，斩首四百多，生擒二百余，并缴获大量粮储器械。随即分兵据守要害，阻断吐蕃出师的必经之路。此后，河西、陇右诸军又分头出击，拓地千余里。玄宗闻报大喜，改石堡城为振武军。

开元十八年八、九月间，吐蕃接连派使者求和。皇甫惟明面奏玄宗时也陈述和亲之利。玄宗却怒气冲冲地说："赞普从前给朕来书，言辞骄横无理，这是奇耻大辱，朕必灭其国才消心头之恨。"惟明劝道："开元初，赞普年岁幼小，怎能写出此书？必是吐蕃边将所为，以激怒陛下。边境有事，则将吏可以借机盗匿官物，妄述功劳骗取勋、爵，这是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此疲弊。陛下若命一使者借探望金城公主之机，与赞普面结盟约，使其伏首称臣，永息边患，这岂不是驾驭夷狄的良策！"玄宗转怒为喜，随即命惟明等出使吐蕃。

皇甫惟明到吐蕃后，面见赞普和公主，宣喻旨意。赞普大喜，将珍藏的自贞观以来所得敕旨全部拿出请惟明观看，以表示对唐的友好情谊。这年十月，赞普派大臣论名悉猎随皇甫惟明到唐朝贡，献金胡瓶、金盘、金碗、玛瑙盃、零羊衫段各一；金城公主也单独献金鹅盘盏杂器等物。赞普在上玄宗的表中说："外甥世娶公主，义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因张玄表、李知古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掠吐蕃，遂使双方交恶。外甥以先辈娶文成公主，今又娶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只因年纪幼小，被边将谗言所惑，

使舅怪罪。后虽屡派使者朝见，又都被边将阻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外甥不胜欢喜之至。若能修复旧好，死无所恨。"从此，吐蕃重新臣服于唐朝。

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辛未)，玄宗派崔琳出使吐蕃。吐蕃使者回访，并称金城公主请赐《毛诗》、《左传》、《礼记》、《文选》各一部。于休烈上奏认为，"吐蕃是唐仇敌，今若赠送此书，使知用兵权略，会更加狡诈，恐非大唐之利。"裴光庭等反驳道："吐蕃愚昧凶顽，久叛新服，借其求和，赐以诗书，可使吐蕃渐受儒学教化。休烈只知书内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在书中。"玄宗点头称善，遂命秘书省抄写相赠。九月，吐蕃派相论尚它硉入唐，请在赤岭设立互市场所。玄宗应允，双方再次沟通大规模贸易关系。

为防止边将因疆界不明而发生冲突，开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丁酉)，金城公主请在赤岭立碑以明确划分唐和吐蕃的边界，玄宗欣然同意，于次年六月初六(乙未)特派金吾卫将军李佺到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然后，诏令唐边将张守珪、李行祎和吐蕃使者莽布支分头晓喻剑南、河西州县："自今两国和好，勿相侵暴！"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94—214

《通鉴纪事本末·吐蕃请和》

两唐书：《吐蕃传》、《西戎传》、《薛仁贵传》、《李敬玄传》、《黑齿常之传》、《韦待价传》、《王孝杰传》、《郭元振传》、《唐休璟传》、《王晙传》、《王君㚟传》、《萧嵩传》、《李祎传》、《玄宗纪》

《册府元龟·外臣部·吐蕃》

《通典·吐蕃》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唐平契丹、奚

契丹，本是东胡种，至北魏时，始自称此名。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之北，位长安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接，南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北到室韦，地方圆两千里。君长姓大贺氏，拥兵四万三千，分为八部。平时各部落单独活动，逐猎往来，居处无常；若调发征战，则由各部落酋长共同商决，单一部落不得擅自行动。风俗与突厥大抵相同。人死后不筑坟墓，用车马载尸入山，放在树上，经三年后，再收骨骸焚烧，并祷告说："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兽时，使我多得猪鹿。"也无丧服。若子孙死，父母朝夕哭；父母死，子孙不哭，谁要悲哭则被讥讽为无壮士气概。

奚也是东胡种（一说匈奴别种）。北魏时自号库莫奚（一说库真奚），至隋时始去"库莫"，只称奚。在长安东北四千余里，居松漠之间（今滦河上游），东接契丹，西至东突厥，南临白狼河，北至霫。拥兵三万余人，分为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为长。与突厥同风俗。主要逐水草畜牧，也种穄等耐寒作物。居毡帐，环车为营垒。君长牙帐中常有五百人持兵刃护卫。此外，部落都散居山谷，无赋税。奚人死后也以芦苇薄薄裹尸，悬在树上。

契丹和奚在突厥兴起后，都长期受突厥控制。隋时突厥一度衰落，两大部族都遣使人贡朝隋。唐高祖武德初年，契丹、奚虽几次乘中原混战抄掠河北边境，但武德后期随着唐政局稳定，奚即遣使朝贡，而契丹君长咄罗在武德六年（623 年）也派使者贡献名马、肥貂。贞观二年（628 年）四月，契丹酋长摩会率部落降唐。

贞观四年，东突厥颉利可汗被唐消灭。借此声威，营州都督薛万淑派契丹酋长贪没折说服东北地区的奚、霫、室韦等十余部族归顺唐朝。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首领窟哥率整个部族内附，唐在契丹居住区域设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克什克腾旗东)，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氏；又将契丹八部分别置州，各以原酋长为刺史，都受松漠府统辖。与此同时，奚首领可度者也率整个部族内附。唐在奚居住地置饶乐都督府(今河北承德东北)，以可度者为都督，赐姓李氏；将其他五部也置州，以原酋长为刺史，统辖于饶乐府。唐太宗就这样实现了对契丹和奚的羁縻统治。

高宗显庆年间窟哥和可度者死后，契丹与奚一度联合叛唐。高宗令阿史德枢宾率兵伐奚，奚惧乞降，唐将奚王匹帝斩首。又令枢宾等继讨契丹，生擒叛首阿卜固送东都洛阳，唐重新控制了这一地区。

但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十二日(壬子)，窟哥孙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妹夫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叛唐，并攻陷了营州，杀掉都督赵文翙。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营州为根基，以万荣为先锋，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旬日内，兵至数万。契丹叛唐事出有因，原来，营州都督赵文翙为人骄横刚愎，不仅在契丹民众饥馑时不加赈给，而且平日视李尽忠，孙万荣等酋长们如同奴仆，所以两人怨恨，振臂一呼，契丹部众群起响应。

这一非同小可的事件震惊了女皇武则天，二十五日(乙丑)，令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二十八员将领征讨。七月，又令梁王武三思为瑜关道安抚大使，以姚畴为副，防备契丹，还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面对唐军进攻，契丹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先时，孙万荣破营州，获唐俘虏数百，囚在地牢。万荣闻听唐军将至，令狱卒骗这些人道："现今连我们自己家属都饥寒不能自保，只等唐军一到就投降。"不久，万荣又放了这些俘虏，给碗糠粥喝，并以歉意的口气说："我养你们但无粮食，杀掉你们心又不忍，

今日放你们去吧!"被释放的俘虏们到幽州(今北京)后,绘声绘色地叙述契丹资粮困乏的情况。唐诸军闻听后,以为契丹不堪一击,争先出兵,以抢头功。当军进至黄麞谷(今河北卢龙东南),万荣又特意安排一些老弱迎接唐军,还将老牛瘦马散放道旁。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都以为饥饿困倦的契丹军就在前面不远,三军都抛弃步兵,只率少量轻骑加速前进。他们哪里知道契丹精兵早在峡石谷埋伏好,等唐军一到突然袭击。契丹将领李楷固先飞抛套索将唐主将张玄遇、麻仁师生擒活捉,随后凶猛围歼,唐军将士死亡惨重,尸遍山谷,几乎无一人逃脱。契丹得到唐军印后,诈为军牒,逼张玄遇署名,催促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道:"现官军已破契丹,你军速速前进,若至营州仍未赶到,军将皆斩首,士兵不记功勋。"燕匪石等得牒后不敢怠慢,昼夜兼程,废寝忘食,正跑得人困马乏时,遭契丹伏兵在途中的截击,全军覆没。唐军这次出师惨败是在本年八月。

九月,武则天为了扩充讨伐契丹的军事力量,竟然下诏书征发全国狱中囚徒以及官宦人家奴仆中的骁勇人士。还令山东近边各州置武骑团兵,每一百五十户,共出兵十五人,马一匹。同时又任用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再次征讨契丹。

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与契丹军战于崇州,兵败被擒。契丹军进而包围了安东都护府并威逼许钦寂去劝降。这时,安东都护裴玄珪固守都护府所在地新城(今沈阳市东),钦寂对城墙上的玄珪高喊:"狂贼必遭天罚,亡在旦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契丹酋长没想到钦寂会说这样的话,遂把他杀掉。

契丹的反叛正使武则天感到很棘手时,刚刚复兴的东突厥默啜想乘机扩大影响和势力,他假惺惺请求要做武则天的义子,并要把女儿嫁给唐室,同时提出武则天只要把以前降唐被安置在河西的突厥降户归还给东突厥,自己愿意率部队征讨契丹。武则天大上其当,册封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统部队,默啜乘机袭破松摸都督府,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此一战使默啜

声威大振。

但契丹并没损伤元气，孙万荣很快聚合余众，军力复强，并派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洲（今河北河间），河北震动。魏州刺史独孤思恐怕契丹军猝然而至，于是不顾生产，将百姓全部驱入城中，大修守备城池。不久，狄仁杰继任，他一到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就叫百姓全部回家归农，并宽慰道："契丹还在远处，何须如此惊慌！万一贼来，我自有办法。"百姓无不欢悦。

神功元年（697年），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率兵十七万（一说十八万），再次大举讨伐契丹。三月十二日（戊申），双方大战于东硖石谷，唐兵惨败，王孝杰也死。当时，王孝杰率军至东硖石谷和契丹军遭遇，山谷狭窄，敌军甚众，孝杰率精兵为前锋，且战且前；契丹军象力不能敌，引军撤退，孝杰乘势追击。当孝杰率军行到一个背后为万丈悬崖的险要地段时，契丹大军突然回师反击，形势万分危急，可后军统将苏宏晖畏敌弃甲先逃。孝杰孤军深入，人单势弱，被契丹军击溃。孝杰在混战中坠崖摔死，所率前锋军也死亡殆尽。这时，身为讨契丹主帅的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武攸宜军至幽州后，闻听王孝杰战死，胆战心惊，竟滞留不敢前进。至使契丹军乘胜东向进掠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武攸宜仅派偏将敷衍出战，毫无效果。

四月，武则天以侄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五月，又选用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二十万又一次大规模征讨契丹。武懿宗军至赵州（今河北赵县），仅听说契丹将领骆务整率数千骑要攻冀州，就惊恐得不知所措，要向南逃跑。部下有人劝道："契丹军中无辎重，以抄掠为军资；若按兵守城，坚壁清野，敌一旦缺粮，势必离散，我军乘机进攻，可获大胜。"武懿宗已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会听从，丢弃了大量的武器军资，慌忙撤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契丹军轻易进入赵州，大肆杀掠而去。

然而正当唐军节节败退，契丹军气焰高涨时，出现了意外转机，孙万荣在六月二十日（甲申）也被自己奴仆杀死。

原来，孙万荣破王孝杰后，在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北四百里依险筑一新城，将老弱妇女和缴获唐军的武器资财留在城中，令妹夫乙冤羽守护，自己则率精兵攻幽州。万荣又担心突厥默啜乘虚袭击背后，于是派五名使者到突厥王庭黑沙。其中三人先到，对默啜说："我军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吓破了胆，请可汗和我们一起乘胜共取幽州。"默啜开始不知是计，大喜，赐这三人绯袍。可不久另外二名使者也到了，默啜怒这二人行动稽缓，命左右推出杀掉。二人连忙同声哀求道："请可汗听我们一句真话，再杀也不算迟！"默啜奇怪，追问缘故，二人就把契丹实情相告。默啜转而杀了先到的三人而赏赐了后到的二人，并命这二人做向导，发兵袭破了契丹所筑的新城，将人财掠虏一空而回，只放乙冤羽驰告孙万荣。

这时，万荣在幽州正与唐军相持不下，契丹军中一听突厥抄了自己的老巢，顿时大乱，无心再战。奚兵见契丹军形势不妙，遂叛万荣降唐。战局由此迅速转化。唐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契丹军前，奚兵攻契丹军后，两面夹击，契丹军因首尾不能相顾而大败，猛将何阿小临阵被擒，孙万荣带轻骑数千落荒东逃。途中又遭到唐前军总管张九节的截杀，最后万荣只剩单枪匹马和一奴仆，逃至潞水东，这时已人困马乏。万荣休息树下，仰天长叹道："今欲降唐难免一死，降突厥也死，降高丽也死，将到何处安身！"身旁奴仆见万荣已走投无路，遂乘其不备，斩首降唐。契丹这次叛唐虽失败，但契丹其余部众及奚、霫都投靠了东突厥颉利可汗。

二十七日（辛卯），武则天命河内王武懿宗及娄师德、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地区。哪知这个闻敌丧胆的武懿宗对河北百姓极为残酷，凡被契丹军俘虏后又回乡的，一律处以谋反罪，先剜人胆，然后斩头，血流满地，他却谈笑风声。先前契丹将领何阿小也杀人成性，因此河北流传这样一句话："唯此两何（武懿宗爵河内王，为一

“何”；另一“何”指何阿小），杀人最多。”不仅如此，七月，武懿宗还奏请要把河北百姓顺从过契丹的全都灭门九族。谏官左拾遗王求礼挺身而出，厉声反驳道：“河北百姓手无寸铁，无力抗击契丹军，才苟且求生，岂有叛国之心！然而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逃跑，才使契丹气焰嚣张。今懿宗又欲委罪于遭难百姓，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安河北民心！”大臣杜景俭对王求礼奏言也表示赞同，武则天才赦免一切胁从百姓。这时另一个怯敌不敢与契丹交战的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武攸宜也假装得胜从幽州而还。

契丹有两员猛将，一名是李楷固，善飞抛套索及骑射、舞槊，每陷阵，如鹰入鸟群。另一名是骆务整，也屡胜唐军。孙万荣死后，二人降唐，经狄仁杰保奏，被武则天任命为将军，令率兵征讨契丹余党，取得一些战果，但终未能收复营州。

武则天晚年直到唐玄宗先天元年（712 年），薛仁贵子薛讷镇守幽州达二十余年，未曾举兵出塞，契丹、奚等部族也不敢进扰，边地吏民得以安居乐业。但薛讷和同驻幽州的燕州刺史李琎不和，李琎遂向宰相刘幽求诋毁。三月，幽求荐将军孙佺任幽州大都督，而将薛讷调任并州长史。

孙佺到幽州不久，就想立边功以提高威望，于是和部将李楷洛、周以悌率步兵二万、骑兵八千分兵三路要袭击奚和契丹。时值六月，部将乌可利谏阻，认为“道险而天热，悬军远袭，往必败。”孙佺不以为然地说：“薛讷在边多年，竟不能为国家收复营州，真是个无用的懦夫，今日我乘敌不备，往必成功。”随即令李楷洛率骑兵四千为先锋，自己率大军随后。行至冷陉，楷洛遇奚酋长李大酺所率骑兵八千，接战不利，而孙佺怯懦，不敢援救，引兵欲还，奚军乘势进攻，唐先锋军大败。孙佺连忙依山结成方阵自保。李大酺派人质问：“朝廷既与我和亲，今大举为何而来？”孙佺佯称道：“我是奉诏前来抚慰，楷洛不听节度，擅自交战，我要把他斩首。”大酺又问：“如果这样，国家信物何在？”孙佺连忙把军中的锦帛全部收敛起

来，共万余段，连同紫袍、金带、鱼袋等唐官员服饰一起奉送给奚。大酺为麻痹孙佺，和颜悦色地说："请将军南归，以后不要相互惊扰。"唐军将士早已丧胆，闻听让走，争先回撤，一片混乱。奚军飞骑追杀过来，唐全军覆没，孙佺、周以悌也被奚军生擒，献给了突厥，被默啜杀掉；仅李楷洛、乌可利侥幸逃回。同年十一月，奚、契丹联兵二万骑攻掠渔阳（今河北蓟县），新任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

唐初，营州都督府治所设在柳城，用以镇抚契丹和奚。武则天时都督赵文翙败政，导致契丹、奚的反叛，攻陷了柳城，此后营州都督府名存实亡，寄治在幽州东的渔阳城。由于契丹、奚和东突厥联兵屡为边患，开元二年（714年）正月，有人建言说："靺鞨、奚、霫很想降唐，只是唐不恢复原营州，无所依靠，被默啜攻扰，暂且顺服；若唐复建营州，则会相继降唐。"并州长史薛讷赞同这种看法，于是奏请出击契丹，夺回柳城，复置营州；玄宗也因冷陉之战大败而有损国威，想讨伐契丹和奚，遂不顾姚崇等众臣反对，以薛讷为统帅出兵征讨。

七月，薛讷与部将杜宾客、崔宣道等率兵六万出檀州（今北京密云）击契丹。杜宾客认为："士卒盛夏负戈甲、带资粮，深入敌境，难以成功。"薛讷却说："盛夏草肥，是羔犊生息之际，借粮于敌，正当天时，一举可灭契丹，不能失此战机。"薛讷率主力轻率进至滦水山峡中，被契丹伏兵前后截断，进退不得。这时，两面山上敌箭齐发，唐军无处躲藏，死亡十之八九。薛讷与数十骑兵杀出一条血路，才得以幸免。崔宣道率后军，闻薛讷军败，慌忙撤走。薛讷为推卸责任，上奏朝廷，将败军之罪归于宣道等八员将领。玄宗大怒，下诏将八人全部斩于幽州；薛讷免死，削除官爵；只赦杜宾客罪。

玄宗讨契丹虽一时失败，但开元年间唐国力强盛，契丹、奚无法相比。到开元四年八月，契丹首领李尽忠堂弟李失活和奚首领李大酺见默啜政衰力弱，遂脱离东突厥率部落降唐。玄宗大喜，以李失活为松漠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契丹八部酋长都任命

为刺史,派唐将薛泰督军镇抚。以李大酺为饶乐郡王,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开元五年二月,李大酺亲自入朝,玄宗封外甥女辛氏为固安公主嫁给大酺。

这时,因契丹、奚都已降唐,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恢复营州。三月,玄宗命在柳城故地复设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也全如旧时,以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和宋庆礼共同组织筑城,三旬而毕。庆礼清勤严肃,开屯田八十余处,招慰流亡的百姓归业,数年间,仓廪充实,市邑繁荣。

十一月,契丹王李失活入朝,次月,玄宗封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下嫁。开元六年五月,李失活死,其弟李娑固代统部众。唐遣使册封,袭其兄官爵,次年十一月,娑固与公主入唐朝拜,玄宗赏赐丰厚。

契丹有一军将名可突干(一为"可突于"),骁勇善战,又得众心。李娑固因惧怕,想除掉他。开元八年,可突干举兵战败娑固,娑固逃到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派安东都护薛泰率骁勇州兵五百和奚王李大酺一起奉娑固讨伐,但战败,娑固、大酺都被可突干杀死,并生擒了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澹撤军入渝关(今河北抚宁西)。然而可突干立娑固堂弟郁干(一名"郁于")为主,并遣使入朝请罪。玄宗见好就收,不予追究,赦可突干无罪,以郁干为松模都督,以李大酺弟鲁苏为饶乐都督,仍以固安公主为妻。但后来公主与鲁苏嫡母不和,玄宗诏令离婚,又封成安公主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妻鲁苏。开元十年,契丹王郁干入朝请婚,玄宗封皇堂妹夫慕容嘉宾之女为燕郡公主下嫁。

开元十二年,郁干死,弟吐干袭位(一名"吐于"),又与可突干相猜忌,恐被杀掉,遂于开元十三年携公主逃到长安,不敢再还,被玄宗封为辽阳王,留在京城宿卫。可突干改立李尽忠弟邵固为契丹王。当年冬玄宗东封泰山,李邵固随从,表示降服。开元十四年,玄宗封李邵固为广化王,奚王李鲁苏为奉诚王。又以皇从外甥女陈氏

为东华公主妻邵固。

但三年后，唐与契丹、奚的和亲通好关系再遭破坏。事情起因是契丹王李邵固派可突干朝贡，宰相李元纮不以礼相待，至使可突干怏怏离去。大臣张说预感不妙，对别人道："奚、契丹不久必叛。可突干狡而狠，又久专国政，契丹人心归附，今他恼怒而归，必不再来。"果不出张说所料，在开元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己酉)，可突干杀李邵固立屈烈为王，并率契丹部族胁迫奚人一起叛唐归降东突厥。但奚王李鲁苏不从，逃往渝关，鲁苏妻东光公主韦氏和李邵固妻东华公主陈氏都逃归营州。

玄宗大怒，令朝臣裴宽、薛侃等在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分道招募勇士，于开元二十年春，以信安王李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统率将领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奚、契丹。赵含章率军先行，与奚、契丹军相遇，尚未交战，敌军便慌忙逃去。含章以为两敌都惧怕自己，颇有些洋洋得意。平卢先锋使乌承玼提醒道："契丹和奚都是骁勇狡诈之敌，他们遁走，并非怕我，是诱我深入之计，应按兵不动以观变化。"含章哪里听得进这样的劝告，催军速追，果然在白山中了埋伏。但正当奚、契丹军胜后懈怠之际，乌承玼则自率一军从另一条路秘密速进，突然出现在敌军右方，闪电般迅猛攻击，打败了奚和契丹联军。随后，李祎率大军继至，又大破奚和契丹，俘斩甚众，可突干率亲近随从落荒远逃，余党在山谷中回窜逃命；奚酋长李诗琐高则率五千帐降唐。玄宗赐李诗琐高爵归义王，将他和部落迁到幽州境内安置。李祎率唐军凯旋回朝。

开元二十一年，可突干又来扰边。闰三月，幽州长史薛楚玉派副将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率精骑一万及降唐奚人出击契丹。军行至渝关外都山下(今河北青龙西北)，可突干引东突厥兵来会战。在这关键时刻，奚军持两端，四散据险自保，唐军不利，英杰、克勤战死，知义、守忠率三千部众逃归。但唐其余六千骑兵拼命厮杀，力战不停。可突干以英杰首级相示，也拒不投降，直到全部战

死。

玄宗罢免薛楚玉，以张守珪出任幽州长史。守珪体形魁伟，善骑射，长期任职西北边州，身经百战，足智多谋。他到幽州后，频频出击，每战必捷。到开元二十二年，可突干连遭失败，极为窘迫，想施用诡计，于是派人到唐营诈降。守珪心知其伪，但将计就计，令部下王悔前往，名为安抚，实见机图谋。王悔来到契丹王屈烈的牙帐，暗中察明可突干移营西北，并密派人引东突厥兵，阴谋杀掉自己后再攻唐。王悔还得知契丹军中李过折和可突干分掌兵马，而且争权不和。于是以利害说降了李过折。就在这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巳)，过折夜间率兵突然行动，斩屈烈和可突干，并杀尽余党，率契丹余众降唐，张守珪立即出师紫蒙川展示军威，宴赏将士，以镇抚契丹。随后，将屈烈、可突干首级传送东都洛阳，挂于天津桥南示众。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契丹王李过折入唐朝见，玄宗封他为北平王松漠州都督，但就在这一年被部下涅礼(又称"泥里")所杀。涅礼上书唐廷，声称李过折为人残暴，杀他为稳定契丹民心。玄宗心知这是夺权擅杀，而含混了之，遂以涅礼为松漠都督。此后，奚王李诗琐高死，子延宠嗣位，一度与契丹又叛，但仍被镇守幽州的将领张守珪征服。天宝四载(745年)，李怀秀(又名李怀节)为契丹王。三月，玄宗封外孙女独孤氏为静乐公主下嫁怀秀；与此同时也封外甥女杨氏为宜芳公主和亲延宠。上述九年间，唐对契丹、奚实施羁縻统治，东北地区基本稳定。

然而，自安禄山天宝三年三月身兼平卢、范阳两道节度使，执掌东北地区军政大权后，他想以边功市宠，曾多次出兵侵掠奚和契丹，导致两部族于天宝四年九月各杀静乐、宜芳公主举兵再叛。安禄山将这次叛唐行动镇压后，于次年四月，唐改封契丹酋长楷洛为恭仁王、松漠都督；同时封奚酋长娑固为昭信王、饶乐都督。

契丹、奚安定下来后，安禄山继续采用邀功固宠晋升的手段，激化唐和契丹、奚之间的矛盾。他多次诱骗两大部族的一些人参加

宴会，而用有毒的莨菪酒灌醉后全部活埋，每次达到数千人之多，然后将割下的酋长首级呈送京城，玄宗龙颜大悦，记功厚赏。

天宝十载，安禄山又诬契丹酋长欲叛，于八月率幽州、平卢、河东三道兵六万人征讨，令奚骑兵二千为向导。当唐军至土护真水（今老哈河），遇雨，禄山倚仗兵多势众，对部将们说："我若急行军，乘其不备，必胜无疑。"遂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直扑契丹牙帐。契丹军大吃一惊，但做好了准备。这时雨下得更大，唐军弓弩筋胶皆驰，已无法使用，但禄山仍督促进击。大将何思德进言说："我兵虽多，但远来疲弊，不宜速战；应按甲息兵，列阵威逼，再派使者说以利害，不到三日，敌寇必降。"禄山勃然大怒，要将思德斩首，以杀一儆百；思德为赎罪，请作先锋，拼死立功，遂冲入敌营。何思德貌似安禄山，契丹军乱箭齐发，将他射死，以为杀了禄山，勇气倍增。被胁迫而来的奚兵也叛，与契丹相互配合，夹击唐军，杀伤殆尽。禄山身中流矢，魂飞魄散，丢盔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狼狈逃回。然后，安禄山和契丹、奚相互攻战，直至天宝十四载他发动叛乱为止。

安史乱后，河北地区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这些藩镇专心巩固割据地区，不生边事，契丹、奚也很少扰边，常常选酋长人长安朝会，唐皇帝也予以赏赐。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193—217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奚、契丹》

《隋书·契丹传》、《隋书·奚传》

两唐书：《契丹传》、《奚传》、《王孝杰传》、《武懿宗传》、《薛讷传》、《地理志》、《张守珪传》、《安禄山传》

《唐会要·和蕃公主》、《唐会要·诸使杂录》

唐征辽东（上）

隋唐之交，辽东地区（指今辽河以东）有三个国家：北部的是高丽，南部偏东为新罗，偏西为百济。高丽当时的社会概况在隋"三征高丽"中已作了介绍，因此这里只简述其他两国。

百济源于东汉末夫余王尉仇台之后，最初因为百家济海开创基业，遂取名"百济"。自仇台建国后历十余代，都臣服于中原政权。隋开皇初，其王余昌就遣使贡献地方特产，被封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当时，百济疆域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以居拔城为首都。官有十六品，以左平官为首。地方设郡。有法律，即叛逆的处死，抄没家产；杀人的，以奴婢三人赎罪；官员受贿贪污，三倍追赃，并终身禁锢。赋税和物产，基本和高丽相同。

百济国中杂居着新罗、高丽、倭国人，也有汉人。其风俗男子喜骑射、读书。妇女不施粉黛，姑娘辫发垂后，已婚则分为两条，盘于头上。行礼时以两手伏地为敬。所穿衣服与高丽略同。国王穿大袖紫袍，官员穿红色官服；但禁止百姓用这两种颜色做衣服。婚娶礼仪略同汉族，丧仪则如高丽。书籍有五经、子、史，历法及表疏并仿汉族。

唐建国后，百济王扶余璋于武德四年（621 年）派使者人唐献果下马，沟通了双方的联系。

新罗国是弁韩的后裔。隋文帝时新罗王金真平派使者贡献，被封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当时，其疆域东西千里，南北二千里，以金城（今韩国庆州）为首都。国中杂居有汉、高丽、百济人。文

武官有十七等，以伊罚干为首。有大事，国王召集众官详议而定。地方设郡、县。文字、铠甲兵器和中国同，而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服色尚白。新罗人中多金、朴两姓，异姓不通婚。妇人辫发绕头，以杂綵和珠作装饰；男子剪发，头戴黑巾。婚嫁之礼，唯有酒食而已。死有棺敛，葬起坟陵。土地很肥沃，五谷、果菜、鸟兽等物产，略与中国同。

隋朝大业以来，连年都派使者朝拜贡。唐建立后，武德四年，国王金真平派使者到唐朝拜。高祖派庾文素回访，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

隋炀帝三征高丽，在高丽王高元的顽强抵抗下，以惨败告终。隋末高元逝世，异母弟高建武嗣位。唐建立后，高建武于武德二年就派使者来唐，沟通了两国联系。武德四年七月又派使者入唐朝贡。唐高祖也采取通和友好态度。他感叹隋炀帝征高丽失败后有很多华人沦落在高丽没能回国，便于武德五年给高丽王去书，约定高丽人在唐的由唐护送回高丽，华人在高丽的由高丽遣送回唐。于是高建武送还华人前后以万数。

武德七年二月，高建武派使者来唐请赐《历法》。高祖遂派使者去高丽，册封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到百济，册封扶余璋为带方郡王；又到新罗，册封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但三国只表面称臣，国王并不亲自到唐朝拜，各自保持独立的状态。高祖曾对裴矩、温彦博说："名实须相符。高丽虽向隋称臣，而终以兵抗拒炀帝。朕专心安定百姓，何必勉强他们称臣。"两人答道："辽东原本是商朝箕子封国，魏晋时也是中国的封域，不可不受其称臣。但中国和夷狄，又象太阳和列星，也不能不让他们保持独立。"终高祖朝，唐与辽东三国就保持这种关系。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原来，新罗最初力量弱小，附庸百济；百济进攻高丽，国人不堪军役，多逃到新罗；而新罗因此逐渐强盛。一次百济又攻高丽，因战局不利向新罗求援，新罗却乘机袭

击百济。从此反目为仇，相互攻击。新罗后又擒杀了百济王。这样，三国间长期纵横捭阖，你攻我战，形成复杂的关系。而唐建立后，新罗有明显的亲唐倾向，逐渐形成高丽与百济联合同新罗对抗的局面。

唐太宗即帝位后，高丽、百济连兵进攻新罗，新罗派使者到唐廷告急，太宗派朱子奢前往说和，三国表面上也都派使者来唐表示遵命。然而仍攻战不止。直到贞观十五年(641年)以前，太宗主要精力是稳定国内政局、发展社会经济、消灭强大的东突厥、开拓西部疆域以确保政治中心关中地区的安全，所以对辽东地区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没有进行军事干预。

然而，太宗并不是没有征服辽东之心。贞观十五年，唐使者陈大德出使高丽。大德要了解高丽的山川风俗，每到一城镇，就贿赂当地官吏，使之引导游历，无所不至。大德游历时常常遇到华人，他们都自我介绍说家乡原居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娶高丽女为妻，遂留居此地，人数之多几乎占该国半数了。同时询问亲戚情况。大德假称"全都安然无恙"。这些人听后，泪流满面，奔走转告。因此大德走到哪里，都有很多隋时沦落在高丽的人望着他因思乡而痛哭，声彻郊野。大德归唐后将这一情况禀告太宗，并说："高丽闻听高昌灭亡后，非常恐惧，因此对我殷勤款待，百般讨好。"这时太宗流露出征辽东的心意，说道："高丽本是汉武帝所设置的四郡之地。我若发兵攻辽东，它必倾国来救；这时，另派舟师从东莱(今山东掖县)自海道击平壤(今属朝鲜)；水陆合势，灭高丽不难。但山东地区因战乱经济还未恢复元气，我不愿疲弊百姓罢了。"

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了政变。原来，统辖该国东部的官员泉盖苏文凶暴不法，高丽王高建武和大臣们密谋把他杀掉，不料机密泄露。盖苏文得知消息，立即将本部人集中起来，伪装检阅，并在城南大摆酒宴，请百余大臣亲临观看，乘机全部杀死。随后闯进宫中，亲手刺死建武，将尸体砍为数段，弃于沟中，拥立建武弟弟的儿子

高藏为傀儡国王。自任莫离支(职权相当唐吏部兼兵部尚书),掌握了高丽的一切大权。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放,身佩五刀,其威严令左右不敢仰视。这年十一月,营州都督张俭将高丽政变的消息上奏唐廷,亳州刺史裴思庄奏请乘机征讨高丽。太宗虽有此意,但仍考虑山东地区经济凋敝,用兵不到时机。

贞观十七年六月,太宗开始跃跃欲试了。他对长孙无忌说:"盖苏文弑君专权,罪大恶极。以唐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愿疲劳百姓而已。我想令契丹、靺鞨出兵骚扰,你看如何?"无忌答道:"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唐征讨,必严加守备。请陛下稍加忍耐,等他骄惰松懈,然后讨伐,为时不晚。"太宗点头称善,遣使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表面承认了盖苏文政变的既成事实。这时,太宗虽没大动干戈,但火高丽的雄心已溢于言表。

九月,新罗使者忽然来到唐朝,诉说百济攻占了自己四十余城;又和高丽连兵,断绝朝贡道路,乞求出兵救援。这时,新罗王金真平于贞观五年已经逝世,因无子,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太宗为支持亲唐倾向较强的新罗,随即令相里玄奖前往高丽,携带的玺书中道:"新罗臣服大唐,朝贡不缺,你与百济应立即停止进攻;如若不听,明年朕要发兵讨伐。"贞观十八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时,盖苏文已率兵攻破新罗两城。高丽王将他召回后,玄奖传达了太宗的旨意。盖苏文道:"从前隋进攻高丽时,新罗乘机侵占我地五百里,除非全部归还,否则不能罢兵。"玄奖反驳说:"往事岂能追论。辽东诸城,汉、魏时本都是中国的郡县,我们尚不追究,你们何必定要夺回故地。"盖苏文拒而不听。

二月,相里玄奖返唐汇报了情况。太宗说:"盖苏文弑君残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是可忍,孰不可忍!"褚遂良谏阻道:"陛下指挥大军清中原而服四夷,威望极高。今渡海远征小国高丽,若马到成功尚可;万一受挫,伤威损望;再兴愤兵,则安危难测了。"徐世勣反驳说:"贞观十五年薛延陀真珠可汗不遵陛下诏令,擅自发

兵进攻大唐拥立的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当时陛下要发兵深入讨伐，斩草除根，但被魏征谏阻，至今留下祸患。若用陛下谋略，北境早安定了。”太宗随即说：“魏征在这事上确实有过失。其实事过不久朕即后悔不该听他谏阻，所以不说，是恐塞直谏之道罢了。”言谈中表明太宗已做出征辽东的决断。

不仅如此，太宗还要亲自挂帅。这又首先引至褚遂良的进谏。他认为：“天下譬如一身，两京是心腹，州县是四肢，而四夷是身外之物。高丽罪大，诚应讨伐，但只须命二三猛将，率四五万兵马，仰仗陛下威灵，取之易如反掌。况且刚刚废弃太子李承乾，新立的李治年纪幼稚，储君地位还不稳固。陛下身为一国之主，在这种情况下轻率远征，实属冒险之举。”群臣中对征高丽也多持反对态度。太宗却不以为然地说：“盖苏文凌上虐下，高丽百姓延颈待救，这正是灭亡高丽的良机。你们议论纷纷，就是看不到这一要害。”唐太宗在这时所以作出亲征高丽的最后决断，除对高丽的政局有如上估计外，还由于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稳定，财政充裕，而且，唐这时也牢牢控制了西部边疆地区，东面远征没有后顾之忧。

太宗为发动大规模远征，加紧进行准备。七月，令阎立德等到洪、饶、江三州督造战船四百艘，供运输军粮之用；又令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攻辽东，以观察形势；令韦挺为馈运使，以崔仁师为副，黄河以北各州都受韦挺节度；又令萧锐运黄河以南各州粮食由海路供给。九月，高丽派使者进贡白金，太宗拒绝接受，并以助盖苏文为虐的罪名将使者押送大理寺治罪。

十一月初二（壬申），太宗离长安到达洛阳。这时，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年老已离职，因他曾随从炀帝进攻过高丽，太宗特召来亲自询问过去的经验教训。元璹道：“辽东路远，粮运艰难。高丽善于守城，攻之难以速克。”太宗却信心十足地说：“今日非隋时可比，你就静候大捷的消息吧！”但前时命令作试探性进攻的张俭部队，因辽

水(即今辽河)暴涨,久不能渡,毫无进展。太宗以为畏敌不前,大怒,召张俭到洛阳欲加治罪。不料张俭到洛阳后,详细地陈述了辽东的山川险易,水草美恶,太宗转怒为喜。

二十四日(甲午),太宗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常何、左难当为副,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为总管,率江、淮、岭、峡兵四万,并在长安、洛阳募兵三千,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徐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麴智盛、吴黑闼、张君义为总管,率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赴辽东。水陆两军分进合击高丽,大规模的战争从此正式开始。

三十日(庚子),唐诸军会聚幽州(今河北蓟县)。太宗令姜行本、丘行淹先督促工匠在安萝山造云梯等攻城器械。这时,远近勇士前来应募从军以及奉献各种攻城武器的不可胜数。太宗亲笔书诏喻全国:"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罪大恶极,实难容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东,所过之处,切勿劳费。"又说:"往昔隋炀帝残暴百姓,而高丽王仁政爱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所以不能成功。今则不同,出师必胜:一因以大击小;二因以顺讨逆;三因以治乘乱;四因以逸待劳;五因我悦彼怨,何愁不克!布告黎民,勿为疑惧。"显然这一诏书想消除隋炀帝三征高丽惨败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增强战胜的信心。十二月,又诏契丹、奚、新罗、百济配合唐军分道进攻高丽。

贞观十九年正月,运米船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今北京西南)搁浅,太宗追究馈运使韦挺不先行视察漕渠罪,枷送洛阳除名,副使崔仁师也免职,以李道裕接任馈运使。

二月,徐世勣率本部兵到达幽州。这月十二日(庚戌),太宗也亲率大军从洛阳出发,令萧瑀为洛阳留守,并让太子李治随军到定州(今河北定县)监国。尉迟敬德担心太宗远征辽东,太子又到定州,长安、洛阳心腹之地空虚,恐发生杨玄感之类的叛乱,于是再次

谏阻御驾亲征。太宗仍是不从，并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随自己而行。

三月九日（丁丑）太宗至定州。他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土地，隋朝曾前后四次出师都未能收复，朕今东征，一为中国那些父兄死在高丽的子弟们报仇，二为高丽雪君主被弑而臣子不能讨逆之耻。而且，现今周边安定，仅辽东未平，趁朕不老，用士大夫们的余力铲除此隐患。"

唐太宗很注意拢络人心。他每见到患病的士卒，就抚慰一番，并吩咐当地的州县给医治，因此，战士无不感悦。即使不是应服征辽东兵役的人，也纷纷自愿报名，并以私产购买装备从军，动以千计，名为"义征"。这些人都说："不求勋赏，惟愿效死！"太宗一一谢绝。二十四日（壬辰），太宗留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在定州辅佐太子，同掌机务，自己则身佩弓箭，手结雨衣于鞍，率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离定州北进。

这时，徐世勣军发柳城（今辽宁朝阳），表面象出击怀远镇（位今沈阳西南），而暗中率兵驰奔甬道（即隋炀帝攻高丽时为渡辽水而架的浮桥）。四月初一（戊戌），世勣出高丽意料之外，自通定镇东渡辽水迅速攻拔玄菟城。高丽震惊，各城镇连忙闭门固守。初五（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李道宗率兵数千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部将曹三良只带十余骑直逼城门。城中恐惧，不敢出战。营州都督张俭率胡兵为前锋，渡辽水后，兵锋指向建安城（位今辽宁营口东南），破高丽军，斩首数千。但唐军也未能攻克这两城。

初十（丁未），太宗从幽州出发。十五日（壬子）徐世勣、李道宗合军攻盖牟城（今辽宁盖县）。二十日（丁巳）太宗到北平（今河北卢龙）。二十六日（癸亥）世勣等攻克盖牟城（后太宗改名为盖州），获人二万余口、粮十万余石。随后，便挥师直指辽东城（今辽宁辽阳）。

张亮率另一路大军乘战舰自东莱渡海袭击卑沙城（位今辽宁金县东）。此城四面悬绝，唯西门一路可上。总管程名振夜间引兵

悄悄接近后，副总管王文度奋勇先登，于五月初二(己巳)攻陷该城，俘男女八千口。随后，张亮令总管丘孝忠分兵一支耀威于鸭绿水(即今鸭绿江)。

初三(庚午)，太宗至辽泽，前面是人马难以行进的二百余里泥淖地带。但阎立德铺土作桥，使唐军于初五(壬申)便迅速通过，到达辽泽以东。

初八(乙亥)，高丽步骑四万营救已被徐世勣等包围的辽东城。李道宗要率四千精骑迎击，军中都认为，"众寡悬殊，不如深沟高垒，等候太宗统率大军到后再行动。"道宗却自有见解，他说："敌恃人多，有轻我心，而且远来疲惫，定能击败。我们身为先锋军，当扫清道路以待陛下，怎能将敌寇留给君父！"徐世勣点头赞许。这时，部将马文举高声道："不遇劲敌，怎显壮士！"说罢策马冲向敌阵，所向披靡。但当李道宗率张君义正式和高丽军会战时，君义畏敌势众临阵逃脱，唐军形势危急。李道宗毫无惧色，收集散兵，重整旗鼓，并登高瞭望，发现高丽军阵混乱处，遂与骁骑数十猛冲，左右驰突，如入无人之地；徐世勣率军相助，高丽军败北，死亡千余。

初十(丁丑)，太宗渡过辽水，为坚定士卒信心，将桥拆毁。随后，屯军于马首山，嘉奖李道宗，破格提升马文举，将张君义斩首示众。太宗又亲自率数百骑兵到辽东城观战。见士卒正负土填城壕，遂以身作则，对负土特重的则分过一部分以所骑马驮送，随从官员也纷纷负土填壕。徐世勣指挥本部兵力昼夜不停地攻城，达十二天之久，仍不克。太宗引精兵支援，将辽东城层层包围数百重，鼓声震天动地。十七日(甲申)，南风劲吹，太宗心生一计，派勇士登冲竿顶端，烧辽东城西南楼。火借风势，很快蔓延到城中，引起一片混乱。太宗抓此战机，指挥将士登城。高丽军力战不敌，城被攻陷。此一战，唐军杀敌万余人，俘劲卒万余人，获男女四万口。随后，将此城改为辽州。

随后唐进围白岩城(位今辽宁辽阳东北)。阿史那思摩中敌弩

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去毒;将士闻听,无不感动,士气倍增。乌骨城(位今辽阳东南)派兵万余为白岩城声援,唐将契苾何力率劲骑八百迎击。何力挺身陷阵,腰间中槊,薛万备单骑驰往营救,拔何力于万敌之中而回。何力气益激愤,束伤而战,从骑奋击,遂破乌骨城援军,追击数十里,斩首千余级,至天黑才罢休。六月初一(丁酉),徐世勣攻白岩城西南,太宗攻城西北。城主孙代音暗派心腹面见太宗,表示愿意归降。其信号是:当唐军逼近城时,从城上投下刀钺。但来使又说:"我们愿降,城中也有不愿投降的,如何是好?"太宗将唐旗帜赠给他说:"你们若真心归降,就把这旗帜插在城上。"使者将太宗话转告孙代音后,代音随即遵照办理。城中人见城墙上高树唐旗,都以为唐兵已登城,遂全部投降。

太宗正要举行受降仪式,徐世勣率甲士数十人向前谏阻道:"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畏战死,是贪图虏获男女及财物。今城垂拔之际,为何接受投降?这恐怕会挫伤战士之心。"原来,太宗在攻辽东城时,白岩城就曾遣使请降,后又翻悔。太宗怒其反复无常,攻白岩城时下令道:"一旦攻克此城,要将城中男女和财物全部赏给战士。"太宗听徐世勣这番话后,连忙下马道歉说:"将军说得不差,但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子,朕实不忍心。将军麾下有功将士,朕用库物奖赏。愿将军能宽恕这一城百姓。"世勣退下后,太宗才举行了受降仪式,并赐给降唐的男女万余口人食物,八十岁以上还赐绢帛。改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

拿下白岩城后如何行动,太宗对徐世勣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朕听说安市城险要而兵精,城主又才勇双全。盖苏文篡逆时,此城主不服;盖苏文攻不能下,只得让他仍据该城。但建安城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拿下该城后,安市城则在朕手心之中,插翅难逃。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城有不攻'的道理。"世勣答道:"建安在南,安市在北,而我军粮草全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敌若断我粮道,将如何是好?不如先攻安

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太宗说:"既然以公为将,岂能不用公策。但愿不误朕事。"

决策一定,十一日(丁未)太宗率军离开辽东,于二十日(丙辰)至安市城(位今辽阳西南),随即指挥唐军攻城。

高丽北部耨萨(官名)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太宗得报后对侍臣道:"延寿此来可有三策: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粮,纵靺鞨掠我牛、马。这样,我攻城不能速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如此可坐困我军。此上策。撤城中之众,一起悄悄逃跑。此中策。自不量力,来与我战。此下策。诸卿观之,延寿必取下策。被我生擒,指日可待。"

高丽有一年老的对卢(官名),深谋远虑,对高延寿道:"唐太宗内平群雄,外服夷狄,是个盖世奇才。今率举国之众而来,不可与他正面交锋。应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粮道。等唐军粮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才可取胜。"但延寿不听,引军直进,离安市城四十里处暂停。太宗恐敌畏惧不前,遂命大将阿史那社尔率一千突厥骑兵引诱,刚一交锋就伪败逃走。高丽军不知是诈,相互道:"唐军徒有虚名,不过如此。"于是衔尾追击,直至安市城东南八里,才依山布阵。

太宗召集众将问计,长孙无忌答道:"臣闻临敌将战,应先察看士卒情况。方才巡视各营,见战士闻高丽的兵至,都摩拳擦掌,喜形于色。此乃必胜之兵。陛下未冠就身临军阵,凡出奇制胜,无不出自陛下妙算。今日事,还是请陛下指教!"太宗笑道:"诸公如此谦逊,朕就不客气了。"说罢,带无忌等数百骑登高瞭望敌阵,观察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处。高延寿所率的高丽、靺鞨合兵为阵,长达四十里。唐将李道宗看后献计说:"高丽倾国出动以拒我军,都城平壤守备必弱。请陛下借臣精兵五千,捣毁其老巢,则此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没有同意,而派使者骗延寿道:"我只因你国权臣弑主,才前来问罪;至于交战,非我本心。入你境后,虽夺数

城，也是为了补充粮草不足；一旦你国守臣子之礼，则将所占之地完璧送回。”延寿竟然相信了，不再严加戒备。

太宗趁敌松懈之机，夜间召集众将进行布署：命徐世勣率步骑五千列阵于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一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峡谷击敌背后；太宗自率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令各军一听鼓角声就一齐杀出，合力奋击。同时命人架起受降大幕准备接受敌军投降。

二十二日（戊午），高延寿只见徐世勣带少数人马布阵，勒兵欲战。这时，太宗望见长孙无忌军尘滚滚而起，知已绕到敌军背后，便命擂鼓鸣角，高举进攻令旗。诸军闻见总攻号令，一起杀出，鼓声震天。高延寿军四面受敌，想分兵拒战，但阵势已乱。这时，只见唐军中一白袍小将手握长戟，腰佩两张硬弓，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兵纷纷溃逃。唐大军乘势猛攻，斩首二万余人。

这名白袍小将名薛仁贵，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少贫贱，以种田为生。太宗征辽东求猛将，仁贵妻柳氏劝他从军求取功名富贵，仁贵遂到张士贵军中应募。攻安地城时，唐将刘君印身陷敌军包围，仁贵跃马驰救，手斩敌将，系首马鞍，由此知名。此次进攻安市城，他自恃骁勇，欲立奇功，遂身穿白袍（唐士兵穿黑军服），以引人注目。太宗观战时望见这员骁勇小将，非常赞赏，特派人召来，立即任官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后薛仁贵屡立战功，成为唐一员名将。

高延寿败后，率残军依山固守，太宗挥师将他团团包围，还令长孙无忌将桥梁全部拆毁，断敌归路。延寿、惠真陷于绝境，只好率部众三万六千八百人来降。入唐军门后，膝行而前，伏地请罪。太宗得意洋洋地说：“高丽小儿，只能跳梁海边；至于摧坚决胜，怎能及朕等老人。你今后还敢与朕交战吗？”延寿等不敢答话，连连叩首。随后，太宗选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迁入唐内地；其余全部释放，让回平壤，这些人感动得都双举手以头顿地，欢呼声闻数十

里外;但将高丽军中三千三百靺鞨兵全部坑杀。这一仗唐还缴获马五千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器械。高丽遭此大败,举国震骇。不久,黄城、银城都自拔逃走,数百里无复人烟。太宗派人飞骑向太子告捷,在给留辅太子的高士廉信中说:“朕为大将若此,你看如何?”字里行间流露出矜功自夸之意。又改所居六山名驻跸山。

八月初十(丙午),太宗移营安市城南,继续指挥攻城。安市城守军为激怒太宗,一见他的旗帜伞盖,就击鼓喊叫,骂声不停。太宗果然大怒,徐世勣见状,请克城之日,不分男女一律活埋。安市人闻听,守志益坚,唐军久攻不下。

这时降唐的高延寿、高惠贞献策道:“臣等既降大唐,不敢不献诚心,使陛下早成大功,臣等也好能与妻子团圆。安市人爱惜身家,人自为战,难以速拔。但臣前率高丽精兵十余万,一败涂地,高丽国人已吓破了胆。乌骨城(位今辽宁丹东西北)耨萨年迈昏聩,不能坚守;若移兵攻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逃窜。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能守。”群臣也进言:“张亮一路兵马已进至卑沙城,召之,立即可至。然后乘高丽惊恐之际与大军合力攻拔乌骨城,再东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平定高丽,在此一举。”太宗正要采纳此项建议,长孙无忌却极力反对。他认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冒险,侥幸取胜。今建安、新市之敌,众犹十万。若向乌骨进军,两城敌军会攻我背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是万全之策。”太宗点头,停止出奇制胜的冒险方略。

太宗指挥唐军加紧进攻安市城,忽听城中有鸡鸣猪叫声,便对徐世勣说:“围城颇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彘甚喧,此必犒劳将士,欲夜出偷袭我军营,要严加戒备。”不出所料,这夜高丽兵数百人垂城而下。太宗立即察觉,亲到城下,指挥唐军围歼,斩首数十人,其余狼狈逃跑。

攻坚战到了关键时刻。太宗令李道宗在城东南角督促唐军筑土山渐渐逼近城头,城中人也增高城墙予以抗拒。徐世勣攻城西

面，冲车、砲石刚将城的楼堞破坏，城中人马上立木为栅塞住缺口。唐军将士轮番攻城，日战六、七回合。激战中李道宗扭伤了脚，太宗亲为针灸。唐军筑土山昼夜不停达六十日之久，用工五十万。土山筑成后，山顶高出城墙数丈，下临城中，李道宗令部将傅伏爱带兵屯驻山顶以防备敌人。不料土山倒塌压城，城墙也被砸毁。这时高丽兵数百人从城墙缺口处冲出，恰巧傅伏爱擅离职守，土山遂被高丽军占有，并挖堑固守，使唐前功尽弃。太宗大怒，将伏爱斩首，命众将夺回土山，但连攻三日不克。此时已到九月中旬了。

太宗深知辽东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军粮将尽，只好在十八日（癸未）下令班师。先将辽、盖两州户口撤到辽水以西，再耀兵于安市城下，城中慑于军威也未敢出击。太宗率军先行，命徐世勣、李道宗率步骑四万殿后。二十日（乙酉）至辽东城，次日渡辽水。辽泽泥泞，车马难通。太宗令长孙无忌带万人割草垫道，水深处以车为桥，他还亲自在马鞍头系柴草以助役，鼓舞士气。十月初一（丙申），太宗至蒲沟，督促垫道诸军速渡渤错水（蒲沟、渤错水都在辽泽中），这时遇到暴风雪，士卒沾湿，冻死甚多。

这次征高丽，先后攻拔了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人唐的七万人；新市城、建安城、驻跸山三大战役斩敌四万余；唐军死亡二千人，战马死十之七八。太宗因为此项战役未能成功，颇有些懊悔，长叹道："魏征若在，不会让朕有这一举动啊！"并派人驰驿祭祀魏征。

十一日（丙午）太宗至营州，命把辽东阵亡士兵骸骨集中埋在柳城东南，丧仪隆重，太宗亲作祭文临哭。二十一日（丙辰），太宗听说太子前来奉迎，便带禁军飞骑三千人驰人临渝关（今山海关），道逢太子。半年前，当太宗从定州出发时，指着自己所穿褐袍对太子道："等见到你已后，朕再脱下此袍。"在辽东时，虽盛暑汗流浃背，也不更换；到秋季袍已穿坏，左右劝更换，太宗回答："战士衣多破烂，朕岂能独穿新袍！"至此，才换上太子进奉的新衣。

十一月初七(辛未),太宗至幽州,后经易州、定州于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并州城(位今太原南),在此停住一段时间,直到贞观二十年三月初七(已巳)才回到长安。

一次,太宗问李靖道:"朕以天下之众反受挫于高丽小国,其因何在?"李靖答道:"此陛下一问李道宗便知。"太宗回头询问,道宗陈述了在驻跸山时提出的乘虚取平壤的方略。太宗怅然良久,说:"当时戎马倥偬,朕没深入思考啊!"

闰三月,废辽州都督府及岩州,因唐无力固守,五月,高丽王高藏及盖苏文派使者入唐请罪,并献两名美女,太宗不受送回。太宗自辽东返回后,盖苏文更加狂妄。表面虽派使者奉表入唐,但言辞傲慢;对唐回访使者也不以礼相待;还常常窥伺唐东部边隙;太宗多次命他不要进攻新罗也丝毫不听。九月,太宗下诏断绝与高丽的关系。

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太宗谋议再征高丽。朝臣们认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难以速拔。前御驾亲征,使高丽人不能耕种,又将所克城中的粮食全部收为军用,继以旱灾,高丽百姓大半乏食。今若分兵数支,轮番攻扰高丽边境,使其疲于奔命,不能生产。这样不出数年,高丽就会千里萧条,人心离散,鸭绿江北可不战而取。"太宗赞同,遂于三月以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李海岸为副,发兵万余人,乘船自莱州渡海攻击;以徐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孙贰郎等为副,率兵三千,会合营州都督府兵力自新城道进击。两军选拔的都是骁勇善战而又熟悉水性的将士。

五月,徐世勣率军渡过辽水,经南苏等数城,高丽军多背城拒战,世勣破其兵后焚毁城郭而还。七月,牛进达、李海岸率军从海路入高丽境,凡百余战,无不捷。攻拔石城(位今辽宁庄河西)。当进至积利城(位今辽宁复县西)时,高丽兵万余人出战,被李海岸击败。九月,太宗令宋州刺史王波利发江南十二州匠人造大船数百艘,备征高丽使用。十二月,高丽王派儿子任武入唐请求恕罪。太

宗口头表示答应,实际继续进行军事准备。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命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裴行方为副,率兵万余人乘战舰,自莱州泛海进击高丽。四月,乌胡镇将古神感也率兵渡海击高丽,在易山战败前来迎战的五千敌军后,又设伏战败夜间偷袭船支的敌人,才凯旋而还。

太宗就这样实施了近一年半的轮番袭击破坏高丽生产的策略,遂于六月间对朝臣提出:"高丽现已困弊,明年要发兵三十万,一举将其消灭。"这时有人建议:"大军东征,必须备足经岁军粮,此非畜运所能解决,应靠水运,大造船舰。隋末剑南道(今四川一带)独无战乱,而且前征辽东此地也没受征役,百姓富庶,正好承担造船任务。"太宗同意,遂于七月,令官员强伟到剑南道征集百姓伐木造船。其中大的长达百尺,宽五十尺。

再征辽东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身患重病的元老重臣房玄龄感到这是一大弊政,而群臣又不敢进谏,于是上书道:"《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德威名前无古人,应该满足了,拓地开疆也可停止了。陛下每断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吃素膳,止音乐,如此谨慎用刑,是重人命。但今驱无罪士卒,委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而独对此却不怜悯吗?假使高丽违失臣节,应该诛之;侵扰百姓,应该灭之;他日能成大唐祸患,应该除之。今无此三条而兴师动众,疲扰百姓,而内仅为雪隋代之耻,外为新罗报仇,这岂非本末倒置,得小失大。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战舰,散军队,自然华、夷欢悦,远肃近安。臣旦夕入地,如能听此哀鸣,死也瞑目。"太宗览罢虽赞叹房玄龄病危仍不忘国事,但征高丽决心并没有动摇。

八月,太宗令越州都督府(今绍兴)及婺、洪等州(今浙江金华、江西南昌)造海船及双舫一千一百艘。九月,强伟等在剑南加紧督促民工赶造战船,引起雅、邛、眉三州(今四川雅安、邛崃、眉山)獠人反抗。太宗派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征调陇右、峡中

兵二万人才镇压下去。蜀地人苦于造船重役,有的请求输绢雇潭州(今湖南长沙)人造船;太宗允许。由于州县督迫交纳雇值严急,百姓甚至卖田宅、鬻子女也不能交齐,这导致剑门关以南民众的动乱。太宗忙派司农少卿长孙知人前去视察。知人奏道:"蜀人脆弱,难耐重役,而造大船一艘,需花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况且山谷中已伐的大木挽曳未毕,以征造船庸绢,二事合一,百姓实难承担。望陛下恤民疾苦。"太宗遂令雇潭州人造船的庸绢全由官府支给。

此外,太宗还命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士;命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食、器械储于乌胡岛(今渤海隍城岛),都是为大举伐高丽而作的准备。

但太宗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已到终点,时间不允许他再发动一次这样的战争了。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逝世,遗诏太子李治继位,罢征辽东战役。

唐太宗戎马得天下,几乎战无不胜,晚年最后一战竟以失败而结束,这或许令他死不瞑目。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88—199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辽东》

《隋书》:《百济传》、《新罗传》

两唐书:《朱子奢传》、《李道宗传》、《薛仁贵传》、《高丽传》、《百济传》、《新罗传》

《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

《通典》:《百济》、《新罗》、《高句丽》

《北史·新罗》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胜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唐征辽东(下)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征讨辽东之心并未泯灭,只是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战机。这时,新罗亲唐倾向更加明显,高丽、百济也维持着对唐的朝贡关系。

然而永徽六年(655 年)正月,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高丽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北境,占领三十三城。新罗王派使者紧急到唐求援,引发了唐再次征辽东的战火。

这时新罗王名金春秋,是新罗女王金善德的弟弟。善德于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死后,妹真德嗣位,太宗派使者册命,并封为乐浪郡王。随后,真德派春秋到唐朝拜,并请改新罗章服(即表示官位高低的官服)随从大唐制度,太宗立即令取御库章服相赐。春秋还到国学观释奠(祭孔子的礼仪)、讲论,太宗又赐自己亲自参与撰写的《晋书》。永徽五年金真德死,高宗下诏立金春秋为新罗王。因此,当桀傲不驯的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唐高宗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更何况平辽东也是他要实现亡父的宿愿。

永徽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乙丑),高宗令营州都督程名振与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五月十三日(壬午)程名振等渡过辽水(今辽河)向东推进;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的高丽军见唐兵人少,出城渡贵端水迎击,双方展开会战。程名振以少击众,毫无惧色,战胜了敌军,杀获千余人,进而焚新城的外郭城及村庄而还。显庆三年(658 年)六月,高宗又派程名振和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兵攻拔高丽赤峰镇,斩首四百余级,俘虏百余人。高丽派大将豆方娄率

军三万反攻,程名振用契丹兵迎击,又大破高丽军,斩首二千五百级。次年,薛仁贵等与高丽将领温沙门战于横山,也取得胜利。

然而,唐这些小胜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灭掉劲敌高丽,从显庆五年起,唐采用的战略出现新的变化,即将用兵的主要矛头指向百济。因为唐军不善于海战,只有连结亲唐的新罗,制服百济,作为陆地根基,以实现对高丽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才能灭亡高丽。

就在显庆五年,百济仗高丽的支援,连续进攻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高宗遂于三月初十(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带水陆十万大军讨伐百济;以新罗王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将士与唐军合击。八月,苏定方引兵自成山(今山东成山角)渡海,百济闻讯据守熊津江口。定方率先锋军首先登陆,依山列阵,与百济军激战;唐大军扬帆盖海相继而至。百济兵力不敌,死亡数千人,其余溃逃。定方乘势沿熊津江水陆并进,直指百济首都俱拔城(一称"真都城")。离城约二十里,百济倾国之兵来战。经殊死拼斗,唐军大胜,杀虏万余人。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慌忙远逃到北部边境,苏定方指挥唐军将俱拔城围个水泄不通。

这时,留在城中的义慈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太子隆的儿子扶余文思对心腹们说道:"王与太子都健在,叔叔却专兵自立为王,他如果能击退唐军,我父子必死无疑。"遂率左右垂城降唐,百姓也纷纷随从,扶余泰无法禁止。苏定方抓住战机,命战士登城树立唐的大旗。扶余泰感到末路途穷,只得开城出降。不久,义慈、隆及诸城主皆降。百济原设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唐高宗下诏在此地设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十一月苏定方俘虏义慈、隆、泰以及百济将领五十八人献于洛阳。高宗亲临则天门楼举行受降仪式,随后,将这些战俘全部赦免。数日后义慈病死,高宗赠官埋葬。

拿下百济后,高宗于十二月十六日(壬午),以左骁卫大将军契

苾何力为坝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率兵分道讨伐高丽。龙朔元年(661年)正月十九日(乙卯)，高宗下令在黄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兵四万四千余人充实平壤、镂方两路大军。二十二日(戊午)，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族兵前往平壤。至此，唐调动五路大军对高丽展开全面进攻。

但正在这时，百济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先前，苏定方灭百济后便率大军以及俘获的百济王义慈等返回唐朝，只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不久，高宗虽又增派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任熊津都督去安抚百济，但文度渡海时病死。百济僧人道琛、旧将福信趁唐驻军势单力薄之机，将义慈的儿子扶余丰从倭国接回立为百济王，并引兵包围了刘仁愿驻守的府城。为扭转百济出现的对唐不利的局势，高宗起用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统领原王文度所率的将士，并征调新罗兵马，合力增援刘仁愿。

刘仁轨是汴州尉氏(今属河南)人，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因此博涉文史。唐初任陈仓尉(九品)，当地有一折冲都尉(四品)鲁宁，恃官位较高，横行不法，无人敢惹。仁轨予以警告，但他非但不听，反而更甚。仁轨遂逮捕杖杀。州府奏闻，太宗大怒道："是何县尉，竟敢杀朕折冲！"召令入朝。言谈中太宗察觉仁轨为人刚正，擢升为栎阳丞，后不断升迁。高宗显庆四年出任青州刺史，次年征辽东令仁轨监统水军运粮，因船翻海中被罢官。

刘仁轨被委以重任后，知道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已到，高兴地说："天将富贵我了！"并带着唐朝的历法而行。人们不明其意，他解释道："我要扫平辽东，颁大唐历法于海外。"

刘仁轨军令森严，部伍整肃，转战而前，所向披靡。道琛在熊津江口立两栅以拒唐军，仁轨率军与新罗兵四面夹击；百济军不敌，想退入栅中；但阻水桥窄，一时难以通过，被杀和落水淹死的达万

余人。道琛遭此惨败,只得解除对刘仁愿的包围,退保百济西部的任存城。但这时新罗军粮尽,引兵撤回。道琛、福信抓住这一间隙,招集部众,势力复强。仁轨兵少,与仁愿合军一处,在熊津城休息士卒。

高宗诏令新罗迅速出兵,配合唐军消灭百济残余势力。新罗王春秋奉诏,派将金钦率兵援助仁轨等,但行至古泗,遭福信邀击,损失惨重,从葛岭道逃回本国,不敢复出。福信得胜后杀掉道琛,执掌了全部兵权。仁轨、仁愿无新罗军配合行动,暂时固守熊津城,养精蓄锐,以待战机。

龙朔元年四月,高宗见于数月前五路大军出击高丽并没取得战果,遂又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共三十万,水陆分道并进,合击高丽。高宗也要御驾亲征,因武后谏阻而止。

七月,苏定方所率一路军渡海直指高丽,在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击败高丽军后,势如破竹,进围高丽都城平壤(今属朝鲜)。为阻止唐大军从东路进攻,盖苏文预先派子男生率精兵数万防守鸭绿水(今鸭绿江)。九月,唐大军到鸭绿水受阻,无法东渡。不久,大将契苾何力赶到前线,恰逢朔风凛冽,河水冰封。契苾何力抓此天赐良机,率军踏冰而渡,擂鼓进击;高丽军失去凭借的天险,难以敌挡如潮水般的唐军,大败而逃,唐军乘胜追击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全部投降,仅男生只身幸免。这时契苾何力接到班师的诏令,遂奉命率军回朝。

龙朔二年二月,浿江道大总管任雅相病死军中。不久,沃沮道总管庞孝泰率岭南兵进屯蛇水,遭到高丽军的攻击,全军覆没,孝泰和十三个儿子也全战死。而苏定方围平壤坚城,久攻不下,又逢大雪纷飞,也撤军返回。唐这次大规模进攻高丽又无显赫战果。

由于唐征高丽的大军全部撤回,高宗给坚守在百济熊津城的刘仁愿、刘仁轨去敕书道:"平壤军回,一城难以固守,应率军到新

罗;新罗若留卿等镇守,则暂居其地;如若不留,速渡海回唐。"将士们闻听都愿西归,仁轨却不同意。他说:"身为臣子,要为大唐的利益视死如归。陛下欲灭高丽,故先平百济,留兵镇守;百济余寇虽然猖獗,只要我等砺兵秣马,攻其不备,定能取胜。胜利之后,军心稳定。然后分兵据险,拓宽地域,飞表奏闻,请求增兵。朝廷知能成功,必然命将出师;一旦与我军合力,必歼百济残敌。这样,不仅前功不弃,而且永清海外。今平壤唐军既还,熊津我军又撤,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凶敌,何时可灭!况且现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如若动足,即被擒虏;即使侥幸进入新罗,也是客居,如有意外,追悔莫及。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忌,不久将自相残杀;此时正应坚守观变,乘机进取,决不可轻率撤离!"一席话说得大家心口皆服。

百济王扶余丰与福信认为刘仁愿等孤城无援,难以固守,竟然派使者以讥讽的口气说:"贵军何时西还,我们要列队欢送。"仁愿、仁轨知其轻敌无备,突然出击,攻拔百济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镇守。福信大吃一惊,连忙增兵加强对战略要地真岘城的守卫。

真岘城临江高险,易守难攻。但刘仁轨伺敌稍懈,引新罗兵夜间悄悄兵临城下,四面攀草面上,百济守军全然不知,至黎明已占据该城。这样,就打通了前往新罗的运粮道路。时在龙朔二年七月。

紧接着,刘仁愿奏请增兵,高宗以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率由淄、青、莱、海四州调集的七千士卒渡海奔赴熊津。刘仁轨就这样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善于捕捉战机的智慧,终于在百济站稳了脚跟,并打开了局面,为唐再次征服百济奠定了基础。

不久,正如刘仁轨所料,百济出现了内哄。因为百济王扶余丰和专权的福信互相猜忌,日益加深,福信想先下手为强,佯装病卧在家,想等扶余丰探问时刺杀。扶余丰得知此阴谋,遂率亲信袭杀福信,并派使者到高丽、倭国乞师以拒唐军。

龙朔三年九月，奉命增援的孙仁师率军渡海至百济与刘仁愿、刘仁轨会师，唐军士气大振。百济王扶余丰南引倭国兵抗拒唐军。开始，唐众将多认为加林城地处水陆冲要，应先攻克。仁轨却说："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士卒，缓攻则旷日持久。而周留城是敌寇巢穴，除恶务本，宜先攻之。若克该城，诸城不攻自破"。这时，大家都赞此策高明。于是制定了作战布署"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率步骑从陆路推进(金法敏是在龙朔元年九月其父金春秋死后嗣位的)；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沿熊津江入白江；两路军于白江会师后再进攻周留城。但刘仁轨军行至白江口，遇到扶余丰率领的百济兵和倭国兵联合阻击，双方展开激战。仁轨军四战四捷，焚毁敌舰四百艘，烟炎冲天，海水皆赤。百济王扶余丰支身逃奔高丽，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众及倭国残军降唐，这一战扭转了整个百济战局。随后，除百济将领迟受信所守的任存城外，其他城也再次全部降唐。

这时刘仁轨大胆使用百济降将黑齿常之、沙咤相如率兵攻取任存城。黑齿常之是百济西部人，身高七尺骁勇有谋略。最初在百济任郡将。显庆五年苏定方灭百济国时，常之率部下降唐。但苏定方因禁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纵兵劫掠，丁壮多被杀戮。常之不满，逐与左右十余亲信遁归本部，招集流散，以任存山为根基，结栅固守。百济民众纷纷归附，旬日间聚众三万余人，苏定方派兵进攻，常之率敢死队战败唐军，并乘胜收复本国二百余城。定方无能为力，不久奉命撤军返唐。后来福信聚众再起，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各据险要之地响应。百济这次又被唐击败，两人也率部众投降。

刘仁轨的建议一提出，孙仁师立即反对说："这些人都是人而兽心，岂能信任！"仁轨解释道："我观察这二人都是忠勇有谋、守信重义的壮士。因以前投错了人，所以背叛；今遇明主，正是感恩立功之时，勿须疑虑。"遂供给粮草、器械，并调遣部分唐军支援，终于攻陷了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妻子，狼狈逃往高丽。百济至此再次被唐

全部平定。

高宗见用兵百济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下诏留刘仁轨率兵镇守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回朝。百济战火之余，僵尸遍野，一片残垣断壁。仁轨领导掩埋骸骨，登记户籍，整顿村邑。任命官员、疏通道路、架设桥梁、筑堤补堰、修复水库、劝课农桑、赈济贫乏、存养孤老、立唐社稷、颁唐历法，使百济百姓安居乐业。然后屯田储粮，训练士卒，准备进一步图谋高丽。

麟德元年(664 年)十月，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反应留守百济唐的士兵中疲弱多，勇健少，衣服破烂，唯思回归。其因在自显庆五年以后，国家对士卒待遇降低。此前士卒阵亡，朝廷要派专使吊祭，追赠 官爵，或将死者的官爵授与子弟。而且凡渡海征辽东的，都赐勋一级。但是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勋，战死的也无人问津，因此无人愿意从军。这样，州县每次征发百姓为兵，强壮而富有的，用财物贿赂官吏即可避免，贫困的虽老弱也被征行。而且这次东征百济，离家时只叫准备一年资装；今已经二年，还未有归期。仁轨最后剀切指出："陛下留兵海外，镇守百济，目的在灭亡高丽。百济和高丽原来有联系关系；倭国人距离虽远，也是支持百济的潜在力量。大唐若无强兵镇守，百济极易东山再起。今日既然留兵镇守，又置屯田，要想扎住脚跟，全靠将士同心同德。愿陛下改弦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激励将士之心。否则，恐众疲师老，大事难成。"

高宗观刘仁轨上书后，深深点头，随即派右威卫将军刘仁愿率兵渡海替换留守百济的旧镇兵，并召仁轨一同回唐。仁轨对仁愿说："国家悬军海外，欲经略高丽，此非易事。现收获未毕，原镇守的将士若一起回归，恐刚刚降服的百济会生变故。不如暂留旧兵，令其收获，准备资粮，分批遣还；而将领仍须留下镇守，方才稳妥。"仁愿连忙道："我上次返唐，大遭谗谤，竟然诬我多留兵众，阴谋割据百济，险遭大祸。今日我只能照章办事，岂敢擅自更改。"仁轨凛然

道:“若有利于国,应知无不为,怎能顾及个人安危!”遂上书陈述利害关系,自请留镇百济。高宗应允,同时以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令他返回百济安抚民众。

麟德二年八月,高宗命扶余隆和新罗王金法敏在熊津城释怨会盟,并造金书铁契,藏于新罗庙中,随后,刘仁轨带新罗、百济、倭国使者渡海回唐,参加高宗祭祠泰山。高丽也派太子福男参加了这一大典。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发生了内乱。这年五月,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接任莫离支。由于初掌国政,要外巡诸城,令弟泉男建、泉男产留守京城平壤。这时,有人对男建、男产说:“男生疑忌你俩,伺机铲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两人开始不信。又有人对男生说:“你俩位弟弟害怕你回京城后将权力收回,阴谋要阻止你回去”。男生听后疑心顿起,暗派亲信往平壤窥探,不料被男健、男生捕获。这时,两人对前述的话已确信不疑,遂假借王命召男生速回平壤。男生知凶多吉少,不敢回归。男建自任莫离支,发兵讨伐。男生一面固守国内城自保,一面派儿子献诚到唐廷求救。

唐廷立即抓住高丽内乱的战机,于六月,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兵援助男生;任命献诚为右武卫将军,担任向导;又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协同作战,讨伐高丽。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男生率本部与同善合军一处。高宗下诏封男生为辽东道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玄菟郡公。

十二月,唐又增兵遣将,以徐世勣为统帅,以安陆、郝处俊为副。并且,把黄河以北各州租赋全部运送辽东供给军用。徐世勣率大军渡过辽水后,兵锋直指新城。他认为该城是高丽西境战略要地,如不先攻克,其他城池难以进取。乾封二年九月,正当世勣指挥唐军猛烈攻城时,城中人师傅仇等捆绑了城主开门投降。世勣令契苾何力留守,随即率军乘胜进击,连克十六城。这时,男建派高丽兵

到新城偷袭，想夺回这一战略要地，但被唐将薛仁贵击败。唐将高侃率军进至金山(今吉林四平西南)，与高丽军交战受挫，撤军北逃，高丽军乘胜反击；在这关键时刻，薛仁贵率军赶到拦腰横击，大破高丽军，进而连克南苏(今吉林四平东南)、木底(今吉林通化西)、苍岩(今吉林集安)三城，与泉男生等会师。

郭待封率水军从另外一条道路进军平壤，徐世勣令冯师本供应军粮器械，但途中船破误期。待封军中饥窘，想写信禀告徐世勣，又怕被高丽军截获从而暴露军中虚实。万般无奈，只好作离合诗派人传递。世勣见诗大怒道："军情紧急，还有闲心作诗，我定要把他斩首！"多亏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释明其意，世勣才恍然大悟，派人送去军粮器械，待封军转危为安。

郝处俊率军一支先推进到平壤城下，但还没摆好阵势，高丽军突然杀来，唐军震惊。郝处俊却镇定异常，坐在胡床上一边吃干粮，一边指挥精锐部队出击，战败了敌军。将士们无不佩服他胆略过人。

薛仁贵在金山大破高丽军，连克三城后，要乘胜率军三千人进攻扶余城(今吉林四平)。众将都认为兵力太少，仁贵却说："兵不在多，只看主将是否善于指挥"。遂一马当先，率军挺进，连战连捷，于总章元年(668年)二月攻克了扶余城。扶余川一带四十余城也望风投降。

男建派兵五万想夺回扶余城，途中与徐世勣所率唐军主力在薛贺水相遇，两军展开激战，结果高丽军大败，死亡三万余人。世勣乘胜又攻克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南)。

就在此月，侍御史贾言忠奉命从辽东回京，高宗询问军情，言忠回答："高丽这次定被扫平。"并陈述理由道："隋炀帝三次东征失败，其因在于人心离怨；先帝东征也未成功，只因高丽没有衅隙。今则不同：高丽王高藏权势微弱，权臣擅权；盖苏文死后，男建兄弟内相攻夺；男生归降大唐，为我向导，敌方虚实，无不知晓；加以高丽

连年饥馑，人心不稳；而我方陛下圣明，国家富强，将士尽力，又乘高丽内乱良机，大捷自然无疑。”

不出贾言忠所料，总章元年九月十二日(癸巳)，徐世勣指挥唐军，终于攻陷了平壤城。此战役过程是这样的。徐世勣攻克大行城后，汇集了各路唐军，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阻截，唐军奋击获胜，追击二百余里，又攻拔了辱夷城。在唐大军的压力下，高丽诸城主或逃或降，连续不断。契苾何力率军首先推进到平壤，徐世勣率军继至，将该城团团包围。随后，唐军连续猛攻达月余之久。高丽王高藏感到难以再守，遂派泉男产率官员九十八人持白旗到唐营投降，徐世勣以礼相待。泉男建却紧闭城门死守，并频频派兵出战；由于连连败北，他把军事委托给僧人信诚指挥。信诚密派亲信面见徐世勣，表示愿做内应，并约定好日期。世勣按期攻城。信诚打开城门后，唐军蜂拥而进，登城呐喊，鼓声震天，并烧毁城墙四角。男建知大势已去，拔刀自刺，未死，被唐军擒获。高丽王高藏和从前逃亡寄居在此的原百济王扶余丰也作了俘虏。至此，高丽被唐平定。

十月，徐世勣奉命留薛仁贵率兵二万镇守平壤，自己率大军班师回朝。十二月初七(丁巳)，高宗在含元殿处理战俘：因高藏虽居王位，但有职无权，免罪，赐官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泉男产、僧人信诚识时务降唐，前者赐官司宰少卿，后者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功高，升官为右卫大将军；泉男建因顽抗到底，被流放到黔中；扶余丰则流放到岭南。同时下诏将原高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分划成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个县，选择在战役中有功于唐的原高丽酋长任都督、刺史、县令，并派唐人参与治理；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作为统辖高丽全境唐的地方最高政府；提升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兼安东都护。

但相当多的高丽人并没甘心降服。总章二年，因平壤的高丽百姓纷纷叛离，这年四月，高宗下令将三万八千二百高丽户迁徙到唐的江淮以南及山南、京西空旷之地，面只留下贫弱的。咸亨元年

(670年)四月,高丽酋长剑牟岑反唐,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王。高宗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率兵镇压,安舜杀剑牟岑,逃往新罗。但高丽人的反唐并没停止。

咸亨三年,辽东地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动态。一直和高丽、百济为敌而依附唐朝的新罗,这时转而支持高丽人反唐。当高侃于该年十二月和高丽叛军在白水山交战时,新罗派兵援助高丽。次年闰五月,唐燕山道总管李谨行在瓠芦河西大破高丽叛军,残余的也全逃奔新罗。

新罗王金法敏不仅支持保护高丽叛唐势力,而且占据了原百济地区,派兵戍守。高宗勃然大怒,于上元元年(674年)正月,以宰相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以李弼、李谨行为副,发兵讨伐新罗。与此同时,削去金法敏的官爵,将居住在唐京城的法敏弟弟金仁问立为新罗王,护送回国。次年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军;又令靺鞨渡海攻新罗南境,也斩俘甚众。刘仁轨奉诏凯旋后,高宗令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驻新罗的肖买城继续扩大战果,连战连捷。金法敏遂派使者入唐朝贡,请求恕罪。高宗应允,恢复了金法敏的爵位,并将途中的金仁问召回。

仪凤元年(676年),唐从辽东开始采取收缩的战略。这年二月初六(甲戌),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此前有华人任安东都护府官职的,一律罢废。同时,将设在熊津城的熊津都督府迁至建安故城(今辽宁营口东南)。

为了抗衡日益强大的新罗,仪凤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巳),高宗封高藏为朝鲜王、辽东都督,派回辽东,以安抚高丽余众;先前被迁移到唐各州的高丽人户,也一起返回。同时,封扶余隆为带方王、熊津都督,派回百济安抚百济余众。这时百济荒芜残破,高宗同意他暂时寓居高丽境内。扶余隆是在刘仁轨于麟德二年返唐后不久,由于畏惧新罗的侵逼,不敢留居熊津城而又回到唐朝。高宗还把安东都护府再移至新城,总辖辽东地区。

高藏回辽东后，阴谋叛唐，并暗中勾结靺鞨，求取支援。不料事机不密，被高宗察觉召还，流放到邛州而死。后来将遗骨葬在长安灞水突厥颉利可汗墓左侧。将高藏部众分散安置在河南、陇右各州，其中贫困的留在安东都护府城旁。此后，高丽旧城逐渐被新罗占据，高丽余众则散入靺鞨及突厥。扶余隆见新罗势力强大，也不敢回百济故地。唐想重新扶植高丽、百济抗衡新罗的战略完全失败了。

新罗占有高丽、百济地区，疆域增大，西至于海。然而，直到唐末，始终保持和唐的友好朝贡关系。

为什么唐太宗倾唐全国之力进攻高丽，最终败退？为什么唐高宗能灭高丽但旋而撤出？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论述。他说："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之高丽甚远。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馈粮之运输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又说："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临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善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然既得其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00—202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辽东》

两唐书：《程务挺传》、《苏定方传》、《刘仁轨传》、《契苾何力

传》、《黑齿常之传》、《泉男生传》、《李勣传》、《薛仁贵传》、《高丽传》、《百济传》、《新罗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太宗废立储君

唐太宗李世民共有子十四人，其中长孙皇后所生的有三子：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承乾武德二年(619 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取为名。武德三年封恒山王，武德七年改封中山王，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十月初八(癸亥)，根据皇位世袭嫡长子制立承乾为太子，时年八岁。

李承乾是个跛脚，行动有些不便，但幼时聪明伶俐，深得太宗的喜爱。为培养他处理政务的能力，贞观四年(630 年)五月诏令：刑事诉讼经尚书省判不服的，可由太子裁决，仍不服，再上奏皇帝。同年七月，太宗选择德高望重的李纲为职掌教谕的太子少师，教以儒家臣君父子之道。太宗行幸离长安时，还常令承乾留守监国，处理一般政务。

然而，李承乾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长大后养成了嗜好声色畋猎、奢靡无度、荒废学业、不循法度的恶习。他恐怕父亲知晓，千方百计制造假象愚弄朝臣。每当代理政务时，大谈忠孝之道，回宫之后，则与宫女、宦官厮混，恣意作乐。当揣测东宫辅臣要进谏，便正襟危坐，引咎自责，搪塞过后，依然故我。开始时因他智足饰非，人们还以为贤明，但纸包不住火，太宗逐渐察觉了他一些劣迹。

为了加强对承乾的教育，贞观五年六月李纲病逝后，太宗选名臣于志宁、李百药任辅弼太子的左、右庶子官职。李百药针对承乾嬉戏过度，特写一篇《赞道赋》，陈述古来储君成败之事进行讽谏，

但他并不醒悟。贞观七年，太宗以杜正伦接替李百药任太子右庶子，此人在贞观初以不畏逆龙鳞而闻名朝野，太宗想借助他的直谏协助于志宁共同匡正太子过失。还特意指出："朕年十八还在民间，百姓疾苦、人情真伪无不知晓，但居帝位处理政务时还有差失。况且太子生长深宫，小民艰难从未耳闻目睹，怎能不骄逸。望卿等直言极谏。"

两人不负太宗重托，针对承乾嬉戏无度，不守礼法多次直谏，但他恶习难改，杜正伦遂向太宗奏明。太宗叮嘱正伦要细心观察，随后，杜正伦又屡次劝导，仍不见效，万般无奈，正伦想利用太宗的私嘱进行威慑，希望能促使承乾改过自新，不料他反咬一口，写表上奏。太宗怒杜正伦私泄旨意，贬出京师。又选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孔颖达坚守职责，当承乾不循法度时，就犯颜直谏，不留情面。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说他这样对太子有些过份，颖达凛然答道："深受国恩，死无所恨"，谏诤愈烈，承乾仍无动于衷。

太宗还任命著名诤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三年，玄素因承乾贪恋游猎荒废学业劝诫道："福祸来临，都是由小到大，如不谨言慎行，就会失去储位。"贞观十四年，有一次承乾在东宫击鼓作乐，声闻宫外，玄素叩阁切谏，承乾心中不快，竟然当着玄素面把鼓砸坏，接着月余不见宫僚。玄素苦谏，说"朝廷选俊贤辅佐殿下，但殿下动经月余不见宫臣，如何纳谏补缺。"承乾一概不听。太宗闻听张玄素频频正言规劝太子，于是升官进级，以资鼓励。

与此同时，于志宁也不负君望：李承乾在农忙季节征用民工，营建宫室，他劝谏；承乾宠昵宦官，疏远宫臣，他劝谏；承乾违背制度，超期役使在东宫服役的民工达半年之久，不让轮换，他也上书切谏；为了使李承乾绝淫逸，远小人、近君子，于志宁还撰写了《谏苑》二十卷。太宗为此重赏，提升志宁任太子詹事，激励他尽心辅弼。可李承乾不但拒谏，而且勃然大怒，于贞观十五年五月，竟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前去行刺。两名刺客潜入府中，见于志宁身穿

麻衣，头枕土块，睡在草垫上，原来他正在为母亲去世而守丧。刺客徘徊许久，终不忍下手而离去。

太子李承乾声誉日坏而又拒谏不改，逐渐失去太宗的喜爱。和此同步，对李泰的恩宠则与日俱增。

李泰少年就有才气，擅写文章。武德三年封为宜都王，次年进封卫王。贞观二年改封越王，授扬州大都督。贞观八年再迁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贞观十年正月封魏王。这年二月，太宗任命一些皇子为都督：三子李恪为潭州都督，四子李泰为相州都督，五子李祐为齐州都督，六子李愔为益州都督，七子李恽为安州都督，八子李贞为扬州都督。可其他人都走马到任，唯独李泰留在长安，让张亮代理都督事。太宗还特降恩旨，以李泰爱才喜文学为名，令在魏王府第开设文学馆，随自己意愿召揽文人学士。亲王开文学馆是循李世民当秦王时的旧例，他就是用此方式集结了一批人才，为取代太子李建成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和权力。太宗还因李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特准乘小舆上朝。这些特殊的安排和宠爱透露出太宗因承乾日益失德而产生废立储君的念头，也刺激李泰萌发了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

李泰手下的谋士对太宗的暗示心领神会，贞观十二年由苏勖出面，以自古贤王多引宾客著书为名，提议李泰撰写《括地志》。李泰随即奏请获准，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若市。如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都是当时人选。也是在这一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公卿途遇亲王时下马拜见，不符合礼法规定，请求取消这一仪式。太宗当即反驳道："人生寿夭难料，万一太子不幸，诸王他日就成了各位之主，怎能轻视藩王！"这实际暗示大臣们要以李泰作新的皇储。这时魏征挺身力谏，强调只有坚持立嫡以长的宗法原则，才能堵塞祸乱根源。太宗听后虽采纳了王珪的奏请，但对李泰的恩宠仍有增无减。贞观十四年太宗亲临李泰位于延康坊的府第，并因李泰王府

在长安县辖区，就宽赦了本县囚徒死刑以下的罪犯，还免除了延康里一年租赋，并赏赐魏王府的僚属。贞观十六年《括地志》修成，太宗诏令付秘阁收藏，重重赏赐了李泰和参修人员。

就连俸禄李泰也超过了太子承乾。谏议大夫褚遂良认为这太不合乎礼制了，上书谏道："圣人制礼，尊嫡卑庶；庶子虽爱，不能逾嫡，以此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若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巧佞的奸人，会乘机钻营。"太宗对此虽表面听从，并没有实际纠正，还叫李泰迁居到武德殿。此殿在东宫西面，过去是齐王李元吉的住所，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很不适宜。魏征上书谏阻，说："陛下爱魏王，常想使他安全，就应抑制他的骄奢，不应让他住在这种嫌疑的地方。"太宗这才让李泰搬回原府第。

太子李承乾虽然不肖，但还没有坏到足以废弃的地步；唐太宗偏爱李泰，但被重臣魏征、褚遂良等坚主立嫡以长所抵消。因此，太宗对废立储君陷入迟疑不决的状态。直到贞观十六年六月，太宗在朝廷重臣维护封建礼法，以息皇储争夺舆论的压力下，才一度想放弃废立的打算。

见于褚遂良谏李泰的俸禄不该超过承乾，遂于六月二十日（甲辰）下诏书："自今皇太子取用库物，有关衙门不要限制。"八月十四日（丁酉），太宗询问群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针对当时太子失德，魏王爱宠，群臣思想混乱，尖锐提出："今四方安定，谁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份，陛下也应为子孙树立传嗣的万代法典，此事最急！"太宗心中非常清楚，于是答道："此言极是。朕年近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为储君，但弟和庶数近五十，心常忧虑。"并决定选用主张立嫡以长最坚决而威望又高的魏征任东宫最高辅臣太子太师，表明自己不变储君的决心，同时，消除大臣们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的疑虑。当时魏征年事已高，又重病稍愈，因此上表辞谢。太宗特下手诏晓谕道："周幽王、晋献帝，都因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也几乎废太子，多亏四皓护卫，汉室才转危为安。我今

托公重任，就是此意。知公有疾，可卧而辅弼。”魏征遂不顾老病，接受了这一重任。

贞观十七年正月，太宗又针对李泰党羽散布的流言蜚语进行批驳。他严肃地对朝臣道：“朕闻外间流传太子有足疾，而魏王聪明，常随从朕巡察四方，遂生异议，侥幸之徒已有附会。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况且礼法规定，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孩已五岁，朕决不会以庶代嫡，启藩王夺嗣乱国之源。”此刻，太宗对众明确宣布确定承乾的太子地位，力图杜绝李泰党人非份之想。同月，魏征病危，太宗和太子亲临魏征府第探视。这个举动也反映太宗明确承乾的皇储地位。

唐太宗从贞观十年萌生废立皇储之意，因此于二月特恩令李泰开文学馆招揽人才，此后在太宗的偏袒宠爱下，李泰地位日隆。直到贞观十六年六月，在元老重臣坚持嫡长子嗣皇位的压力下，也为防止亲子争夺储位、大臣结成朋党，使亲身经历的玄武门血腥政变重演，才暂时结束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在是否更换储君问题上的犹豫，重新强调嫡长子继承制，想巩固李承乾的太子地位。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太宗的意愿发展，李承乾继续胡作非为。贞观十六年六月太宗刚下诏不限制李承乾取用府库财物，他就恣意浪费，奢靡无度，不到六十日，用物就超过七万。东宫辅臣张玄素上书直谏，尖锐指出他骄奢已极、亲昵群邪，恶声已闻于外，劝他要居安思危。承乾见书后恨从心中起，竟令户奴伺玄素早朝时，黑暗中用大马箠猛击，玄素险些丧命。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逝后，李承乾的胡作非为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年他制造了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召募一些无赖盗窃民间马牛，在宫内亲自烹煮，和亲昵的奸幸们一起大吃大喝。

李承乾喜好学说突厥语和穿戴突厥服饰，还在宫中扮演作突厥可汗的游戏。他挑选侍从中面象突厥的人，让五人为一个小部落，头编发辫，身穿羊皮裘牧羊；并制造了突厥用的五狼头纛和幡

旗，设置了毡帐；他扮成可汗，身居帐中，命左右宰羊烹煮，抽佩刀割肉一起大嚼。又对侍从道："我试作可汗死，你们模仿突厥丧礼仪式。"说完就僵卧在地。侍从们边大声号哭，边跨马环走，然后跪伏身旁，用刀割面流血，表示哀痛。丧仪嬉闹了许久，承乾突然坐起道："我有朝一日即帝位，要率领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以西游猎，然后披发左衽，投身突厥阿史那思摩帐下，若当一设（突厥领兵官名），决不会比别人逊色。"当时，东突厥的阿史那思摩早已被太宗降服，李承乾却说当皇帝后去充当蕃将的部下，荒谬得不成体统。

汉王李元昌是太宗庶弟，因经常违法乱纪，受到太宗训斥，心怀怨恨。知太子承乾妒忌魏王李泰受宠，遂勾结承乾，图谋不轨。两人气味相投，亲密无间，朝夕寻欢作乐。承乾将左右侍卫分成两队，与李元昌各领一队，被毡甲，执竹矛，互相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取乐。侍从中有畏缩不拼命的，就捆绑树上，狠狠鞭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却笑着对李元昌说："假如我今日作天子，明日就在御苑中置万人军营，和你分别统率，观他们互相厮杀，岂不快哉！"真是狂愚之极。

李承乾的东宫辅弼重臣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都对他的胡作非为连续苦谏，他恨这些人如此唠叨，又派人暗杀于志宁和张玄素，但仍未成功。承乾恨恨地说："我当天子后，要纵情享乐，谁胆敢谏阻就斩首，杀他几百人，自然就无人敢多嘴多舌了。"

与李承乾所作所为相反，李泰自从萌生了夺取储位的野心后，就折节下士，博取声誉，集结党羽。而太宗在贞观十六年六月虽重新强调嫡长子继承制，但太子承乾不堪造就，完全辜负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况且，太宗对李泰的恩宠始终未衰，李泰党羽揣测储君还会有变化，从未停止活动，因此，东宫和魏王府的保储、夺储的斗争在暗中一直在继续发展。而且，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死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贞观十七年时，李泰不仅以重金笼络了开国元勋柴绍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宰相房玄龄子房遗爱等二十余人为心腹，而且拉拢了重要朝臣韦挺、杜楚客。韦、杜两人又为李泰邀结朝臣，贿赂权贵，散布舆论，赞美魏王聪明，应作储君。李承乾担心自己的太子地位被李泰夺去，暗中指使人假冒魏王府属吏秘密上书，满纸都是揭发李泰罪恶。太宗心知这是冒名诬告，下令缉拿，但未捕获。储位争夺引起当时政局很大震荡，一时间文武群臣，各有附托，皇帝贵戚，分为朋党。

在争夺储位新的关键时刻，李承乾又一次的荒淫行为重新唤醒了太宗废立储君的念头。原来，太常寺有一个乐童年十余岁，美貌而善歌舞。承乾不顾礼法，把这个乐童私自召入东宫，同卧同起，赐名“称心”。又宠幸专弄左道旁门的道士秦英、韦灵符。太宗得知后大怒，将“称心”和两名道士都杀了，还狠狠训斥承乾一番。承乾怀疑是李泰密告的，恨得咬牙切齿。又思念“称心”不已，在宫中特建一室，中间塑立其像，像前供着偶人车马，令宫人朝夕奠祭，自己也多次到室中，徘徊流涕。又在宫中为“称心”起坟厚葬，并赠官树碑，表示悼念。这种明显的抗旨行为使太宗极其不悦。承乾心里明白父亲对自己不满意，索性推托有病，几个月不去朝拜，暗中却豢养刺客纥干承基、张师政和宿卫武士左卫副率封师进等百余人，谋杀李泰。可因魏王府戒备森严，一直未能得手。

以暗杀手段除去夺储君对手的计划不能实现，李承乾作出了冒险的抉择，妄图发动宫廷政变夺取帝位，于是进一步搜罗党羽。当时，侯君集因为平高昌国时私贪了许多珍宝，被弹劾下狱，后太宗虽免罪释放，并恢复吏部尚书的原职，但他自认为有功不赏，反受侮辱，一直怏怏不乐。李承乾知侯君集怨恨太宗，而恰巧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任东宫卫士，便多次令楚石邀请君集到宫中密谈，问如何才能巩固太子的地位。君集知承乾劣弱，想利用他作为傀儡，自己然后再夺取帝位，遂劝承乾谋反，并举起双手道：“这好手，要

为殿下夺宝位。”还煽惑说:“皇上宠爱魏王,恐殿下有隋朝太子杨勇被废之祸,要早做准备。”承乾连连称是,并重重贿赂侯君集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让他们刺探太宗意图,观察太宗行动,伺机政变。李安俨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宫臣,玄武门政变时建成被杀后,他为建成报仇而力战,太宗以为此人品德忠贞,当作亲信使掌宿卫军,哪知他这时完全投靠了李承乾。

汉王李元昌也劝承乾谋反,还说:“我前些天看见皇上身边有一个美人,琵琶弹得真妙,望举大事成功后能赐于我。”太子私党中还有洋州刺史赵节,他的母亲长广公主是太宗的妹妹。宰相杜如晦子驸马都尉杜荷也和承乾亲昵,参预谋反。凡是密谋政变的人,都割臂出血,用白帛揩吸,然后将血帛烧成灰,和在酒中一起饮下,誓同生死,伺机率兵攻入太宗居住的西宫(也称“大内”)。杜荷还出诡计道:“天文有变,我们应当迅速发动以应天命。殿下可诈称身染暴病,皇上一定亲临探视,那时动手夺取帝位,可不费吹灰之力。”

太子集团阴谋发动宫廷政变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出任齐州都督的齐王李祐却在贞观十七年二月抢先举兵谋反。李祐是太宗第五子,为阴妃所生,性情轻浮暴躁,昵亲群小,尤喜游猎。贞观十年外出任齐州都督后,他的母舅阴弘智常说:“你的弟兄众多,皇上百年后难测吉凶祸福,应及早蓄养壮士自卫,才能保全自身。”李祐言听计从。阴弘智又推荐了妻兄燕弘信、燕弘亮,一起暗地用重金召募敢死壮士。齐王府长史薛大鼎屡次规劝无效,太宗改用权万纪为长史辅佐。

权万纪虽正直,但偏急躁。他以法辖治李祐,把李祐亲昵的勇士昝君謩、梁猛彪逐出王府,可李祐又私自召回,宠幸更甚,太宗知李祐行为不端,多次下敕书训斥,权万纪怕受牵连获罪,于是说:“王如能改过自新,引咎自责,我入朝保奏,皇上必转怒为喜。”李祐惧而听从,遂上书自陈过失,请求恕罪。随后,权万纪到京城面君,说李祐必能改悔。太宗大喜,称赞了权万纪,并下敕书历数李祐的

过失，责令警戒，不可再犯。"李祐得知后大怒道："权万纪胆敢出卖我！他劝我自首而骗取匡辅之功，不杀此贼怎解心头之恨。"

权万纪在太宗面前夸下海口，回齐州（今山东济南）后对李祐管束更严，不许他出城，把齐王府中的鹰犬全都放掉，又怀疑昝君謩、梁猛彪等谋杀自己，逮捕入狱，并上奏揭露和李祐共同为非作歹的达数十人。太宗派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去审讯，一切属实，遂诏李祐和权万纪一起入朝。李祐对万纪积恨已深，再也忍耐不住，就和燕弘亮等谋杀他。万纪奉诏先行，李祐派弘亮等二十余人飞骑追赶射杀，并将尸体肢解，齐府僚属见状股栗，纷纷伏地叩首。接着，李祐私命官职，开府行赏，驱民入城，修缮甲兵城池，并将男子十五岁以上全征为兵。但城中吏民不附，夜间弃妻舍子纷纷垂城出逃，李祐无法禁止，他传檄所属诸县，也无一听从。

三月，太宗命兵部尚书徐世勣发兵讨伐。李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同宿卧室，余党分统士兵巡城。他每夜都和弘亮等对妃宴饮，恣意享乐。嬉笑之际，偶而谈到即将来临的大军。弘亮等吹嘘道："大王不必忧愁，我等右手持酒杯，左手一挥刀就能将来敌斩尽杀绝。"李祐竟信以为真。

徐世勣大军没到，而青、淄等数州兵已临齐州城下。这时，齐王属员杜行敏暗中组织擒拿李祐。齐王左右及吏民凡没参与谋反的无不响应。初十（庚申）夜间，杜行敏聚众千余四面鼓噪，声闻数十里，并先将李祐居住府外的党羽杀尽。李祐听到鼓响和厮杀声，忙问何事，左右骗说世勣率精兵已登城了。正当李祐不明真情无法行动时，杜行敏分兵凿穿府墙杀入齐王府中。李祐与弘亮等慌忙披甲执刃退入室内顽抗，行敏威胁若不出降要积薪焚房，这些人才交械出屋。杜行敏随即将李祐绑在官府前示众，其余乘折双腿后杀死。李祐谋反就这样被平定。十五日（乙丑）太宗令徐世勣等罢兵。李祐押至长安，赐死于内侍省。

李承乾开始听到李祐在齐州谋反的消息，心中暗喜，以为可助

自己浑水摸鱼。但这一谋反活动旋即失败，承乾也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自己政变的条件远比李祐优越。他对纥干承基等心腹说："东宫西墙，离皇上住的大内不过二十步，与卿等举大事，李祐怎能相比！"不料，纥干承基与齐王李祐也有勾结，审问李祐谋反案时牵连出承基，被逮下狱，罪当问斩。承基想立功求生，于四月初一(庚辰)揭发了承乾谋反的内幕。

太宗闻奏吃惊非小，立即令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徐世勣、孙伏伽、岑文本、马周、褚遂良共同会审。事实确凿，太宗问左右侍臣如何处治承乾，情况这样严重，无人敢贸然发言。沉默良久，通书舍人来济才进言道："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能得善终，就是良策。"太宗点头。初六日(乙酉)下诏废太子承乾为庶民，幽禁于右领军府；赐汉王李元昌在家自尽；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都斩首；辅佐太子的官僚张玄素、赵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谏诤为理由免职为民，只称赞于志宁敢于直谏，劳勉一番；纥干承基因反戈一击有功，任命为折冲都尉，爵平棘县公；赦免了其他当连坐的人。

李承乾获罪被废，储君位空缺，魏王李泰认为时机已到，高兴万分，他早晚入宫侍奉父亲，格外殷勤。太宗称赞他孝顺，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宰相岑文本、刘洎也劝太宗立李泰为储君。但元老重臣又身为国舅的长孙无忌则坚决主张立晋王李治，专司规谏皇帝的谏论大夫褚遂良也附合无忌。李泰早知道父亲也很爱弟弟李治，就故意撒娇，投入太宗怀里说："臣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爱子，有如再生之日。臣只有一子，臣死之日，为不辜负陛下爱晋王之心，要杀子传位给晋王。"太宗很受感动，把李泰话原原本本告诉侍从大臣，并表示李泰如此大仁大义，自己不忍另立别人为储君。褚遂良当即提出疑问说："陛下此言大错，请深思不要受蔽。试想，陛下万岁后，魏王一旦继任皇位，怎肯杀爱子传位给晋王？陛下先时既立承乾为太子，又恩宠魏王，以致酿成兄弟争位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

陛下一定要立魏王为储君，愿先把晋王安置好，才能获得安全。”太宗听罢，潸然泪下道：“我不能这样做呀！”随后痛苦地起身入内。

李泰听到风声，恐怕太宗会立李治，就恫吓他说：“你和李元昌关系密切，如今他犯了谋反大罪，你难道没事吗！”当时李治不满十五周岁，被吓得整日愁眉苦脸。太宗看了感到奇怪，多次询问，李治才把实情相告，太宗听了，才发现李泰阴险，后悔不该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并由此想到被废黜的承乾，召来斥责他为何谋反，承乾道：“臣贵为太子，还有何求？但因李泰千方百计图谋储位，逼得我不得不与朝臣谋划自安之策，奸佞小人乘机教臣行为不轨，以至酿成大罪。今陛下若立李泰为太子，正中了他的圈套。”

不久，太宗在两仪殿坐朝听事罢，群臣俱出，只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徐世勣、褚遂良和李治留下。他把李泰恐吓李治的事告诉了四大臣，然后悲痛地说：“我三子一弟（指承乾、泰、祐和元昌）行为如此，我心都碎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突然倒在床上，抽出佩刀就要自刺。长孙无忌等急忙上前抱住太宗，褚遂良把刀夺下交给李治，四大臣一起询问究竟想立谁为太子，太宗才说：“我要立晋王。”长孙无忌马上说：“谨奉诏。谁有异议，臣请斩谁！”太宗对李治说：“你舅舅许诺保你当太子了，还不拜谢！”李治连忙下拜。太宗还有些不放心，询问无忌等：“诸公已经同意，不知外界舆论如何？”四人齐声回答：“晋王仁孝，天下归心已久，请陛下召百官试问，若有反对的，臣等愿受欺君之罪。”

于是，太宗转驾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官员，宣布道：“承乾悖逆，李泰凶险，都不可立为太子。朕欲在诸子中选储君，谁最合适，望卿等明言！”群臣齐声欢呼道：“晋王仁孝，当为太子。”太宗心中大悦。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李泰带百余骑到了太极殿南的永安门。太宗下令将全部随骑拦在门外，只放李泰一人入内，随即幽禁在太极宫北的北苑中。

初七（丙戌），太宗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并亲临太极殿正门

承天门城楼，大赦天下，对大臣们说："我如果立李泰，那么太子地位就变成钻营可得。自今以后，凡是太子失德，藩王窥伺储位，一起废黜。要传及子孙，作为永制。"又说："若立李泰，承乾和李治性命都难保全；而立李治，则承乾和李泰都可安然无恙。"

紧接着在初十(己丑)，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徐世勣为詹事，李大亮领右卫率，于志宁、马周为左庶子，苏勖、高季辅为右庶子，张行成为少詹事，褚遂良为宾客。让这些朝廷元老重臣都兼任东宫僚属，组成强大的阵营辅佐李治。而在十四日(癸巳)又解除李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后虽又升爵为顺阳王，但在贞观十七年九月太宗把他远迁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居住。一次，太宗手执李泰的来书对近臣说："泰文辞华美，是个有才之子，我心中非常思念，但为社稷大计，断割私情，责居外地，也是为了两全啊！"透露了太宗这一安排是为了巩固新太子地位，消除李治疑忌，从而稳定中央政局的意图。李泰就这样在郧乡县呆到永徽三年(652年)死去。李承乾也在贞观十七年九月迁徙到黔州(今四川彭水)，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就死在该地。

李治虽被立为新太子，但太宗深知他的弱点，就在立李治为太子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又产生动摇。太宗秘密地对长孙无忌道："公劝我立李治，可他懦弱，恐不能守住江山社稷。而吴王李恪英明果断颇似我，改立他如何？"无忌极力反对。太宗冷笑道："难道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无忌力争道："太子仁孝，是守成的良主。做一般的事举棋不定都会失败，况且储君至重，岂可一再变易！愿陛下慎重考虑。"太宗至此终于打消了再更换储君的念头。

吴王恪是太宗第三子，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他文武兼才，名望很高，虽是庶出，但很受太宗喜爱。现太宗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不成，恐他不服李治而生贰心，遂严肃告诫道："过去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被辅臣霍光杀掉。你要小心谨慎，免遭杀身

之祸。"但长孙无忌辅立李治后，深忌李恪。李治嗣位后不久，无忌就借谋反罪名把李恪杀掉了。

太宗坚定了立李治为太子的信念后，煞费苦心地加强培养教育，想提高他的学识和决断政务的能力。直到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这一代英主病逝，李治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辅佐下顺利地继承了帝位。

司马光对唐太宗废李承乾、弃李泰而立李治评论说："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能远谋矣。"这虽说不无道理，但若更全面地说：玄武门政变中兄弟间血腥惨杀对李世民的印象未免太深了，他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自己的儿子间重演，并造成政局动乱，加上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又极力主张立李治，因此太宗虽深知李治性情懦弱，不很满意，但无其他良策，也只好如此为之了。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91--199

《通鉴纪事本末·太宗易太子》

两唐书：《李承乾传》、《李泰传》、《太宗纪》、《李纲传》、《孔颖达传》、《李百药传》、《杜正伦传》、《韦挺传》、《于志宁传》、《李元昌传》、《侯君集传》、《李勣传》、《李恪传》

二

武则天争后

据说武则天(又称武曌)还在襁褓中,精通相术的袁天纲到武士彟府中替一家人看相。当时,她穿着男孩子的衣服,正抱在乳母的怀里。袁天纲走近看后,说此郎君神色不凡。又叫她下地试行几步,抬头举目。天纲大惊道:"这郎君龙睛凤目,贵为人极。"又在侧面仔细端祥,更是吃惊地说:"这郎君若是女子,后当为天下之主。"不论这记载是否是无稽之谈,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后来确实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当然,在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武则天是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登上宝座的,而夺得皇后的地位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事还需从头说起。

武则天父亲武士彟先世以务农为生,后他经营木材生意才发家致富。李渊起兵太原时他攀龙附凤,随军进入长安。唐建立后,武士彟以开国元勋的身份,在高祖朝做到三品工部尚书,成了唐朝的新贵。武则天母亲杨氏家世显赫,她的外祖父杨士达是隋朝的宰相。但杨士达去世后,又继隋朝灭亡,家族也衰落了。杨氏以年逾四十的老姑娘嫁给武士彟为继室,生下三个女儿。武则天排行第二,于武德七年(624 年)生在长安。

贞观九年(627 年)武士彟死在荆州都督任上,他的前妻相里氏生的两上儿子元庆、元爽对继母杨氏刻薄无礼。因此,寡母孤女在长安过了一段很不如意的生活。

贞观十年六月,贤惠的长孙皇后去世,太宗哀思不已。次年,太宗听说武则天妩媚艳丽,要召进宫中,封为才人,这是掌管皇帝食

宿等事的侍妾。当时，太宗年四十，武则天仅十四岁。临别时，母亲痛哭不舍，武则天虽小小年纪却自有主意，她安然地劝母亲道："女儿能见天子，谁知不是大福，何必这样伤心！"杨氏听女儿有这样的胆识，遂破啼为笑。

武则天入宫后，太宗赐号"武媚"。但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年华在宫中虚渡了，并没有得到太宗的宠幸，十多年既没有生男育女，地位也没有晋升。而且在贞观二十二年，还险遭灭顶之灾。原来，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君羡防守玄武门，而太白星多次在白昼显现。太史对这一星相占卜的结果是"女主昌"。民间流传的一本《秘记》的书中也说："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唐有天下。"对此，太宗心中很是忌讳。一次，太宗与众武将在宫中宴饮，行酒令，让各言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报小名"五娘"。太宗心中一惊，但马上哈哈大笑掩饰说："你是什么样的女子，竟这样的勇健！"李君羡是一员勇将，早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杀，战功卓著，所以身居重任。事后，太宗因君羡的官称、封爵都有武字，特别小名又叫"五娘"，就成了第一位怀疑对象。不久，免去掌管北门禁军的职务，出任华州刺史。后来，君羡与一位自称通晓佛法的员道信秘密来往，被御史弹劾与妖人交通，图谋不轨。太宗遂于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下诏斩首。

但太宗仍不放心，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载是否可靠？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起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此征兆已经形成。"太宗问："把类似《秘记》所说的全部杀掉如何？"淳风道："这是天意，人不能违，不要滥杀无辜。况且自今以后三十年，此人已老，可能会生慈悲心，为祸或浅。今日即使找到此人，将她斩首，天还会生年青力壮的加倍肆虐怨仇。那么，陛下子孙将被灭绝了。"太宗这才止息对后宫大屠杀的念头。武则天遂安然渡过了这场大劫难。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己

已），太宗逝世，她和后宫没有生育过的侍妾们一起剃度落发，被送到感业寺为尼，而与青灯古佛相伴。

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忌日那天，高宗到感业寺烧香，寺中众尼姑接驾。高宗李治举目望去，其中姿容超群、丽色照人的正是武则天。只见她桃花如旧，只不过少了一头乌发。两人一见面，悲喜交集，情不自禁，相对落泪。原来两人在贞观二十二年就有了暧昧关系。当时太宗卧病在床，李治以太子身份入宫侍奉，一眼就看中了不时往来父亲身边妩媚多情的武才人；而她见太宗不久人世，也产生了托身太子的想法，自然对李治含情脉脉，暗中往来。武则天进尼姑庵后，把希望寄托在情人身上，而高宗这位新皇帝对她也一直思念不已。

这事被高宗的王皇后知道了。但那时她正为皇帝宠爱萧淑妃而吃醋，想到武则天若进宫，正好可给自己添个好帮手，所以非但不怪，还暗中叫武则天蓄发，并怂恿高宗把武则天接入宫来。当然，这也恰中帝怀。遂于永徽二年，武则天再次进入宫中，这时她已经二十八岁了。漫长的宫廷生活和复杂的勾心斗角使她已经成熟，不仅性格刚强，而又擅于谋略权术。

武则天入宫后，马上对王皇后和萧淑妃间的矛盾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审时度势，先卑躬屈膝巴结王皇后，把她哄得欢喜不尽；王皇后也就常在高宗面前夸奖武则天。不久，她就受到十分的宠爱，被封为地位仅低于后妃的"昭仪"，王皇后和萧淑妃反而一起失宠。王皇后弄巧成拙，追悔莫及，于是和萧淑妃联手诋毁武则天，但高宗根本不理，只信武则天的话。武则天知道自己在宫中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争夺皇后地位的阴谋。为此，她在后宫千方百计笼络女官、宫女，每次得到赏赐就分给他们。这些人因为王皇后平时架子大，对她们也冷淡寡恩，如今见武则天这般亲近，自然很是感激，都乐意为她所用。武则天就利用这些受笼络的宫人暗中监视王皇后和萧淑妃，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只要抓住短处，就添油加醋地

说给高宗听。永徽四年正月，武则天生了男孩李弘，高宗更加宠爱这个比自己大三岁的昭仪，疏远王皇后。但终因是十多年结发夫妻，还没有废弃皇后的想法。武则天只好另觅毒计。

永徽五年初，武则天生了个女儿，王皇后没生过孩子对这个刚诞生的小生命很是喜爱，常到昭仪宫中逗弄。一次，王皇后刚离开，武则天知道高宗要来，就狠心掐死了亲生女儿。然后盖上被子。不一会高宗来了，武则天象没事人一样，承欢谈笑了一会儿。随后掀开被，装作突然发现女儿已死的样子，大声啼哭起来，并问有谁来过。左右宫女都说王皇后刚刚来过。高宗听罢勃然大怒，断言："一定是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则天边哭边诉王皇后的种种不贤行为。王皇后闻听就象晴天霹雳，有口难辩，无法自明。这一事件使高宗和王皇后的感情完全崩裂，并决心要废立皇后。

皇后母仪天下，废立皇后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外廷大臣的赞同。十月，高宗和武则天感到首先要争取执政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如果他一同意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于是两人屈尊登门拜访。君臣在长孙无忌府中大厅开怀畅饮，当酒兴正浓时，高宗忽然封无忌宠姬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给金宝、锦缎十车。然后说王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暗示想废立皇后。长孙无忌明白了高宗和武则天来府的目的，但装痴作傻，旁顾左右而言他。高宗和武则天讨个没趣，怏怏而回。武则天还不死心，让母亲杨氏到无忌府中多次低三下四地请求，也毫无结果。礼部尚书许敬宗自不量力，也替武则天说项，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训斥。

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废王皇后是有深刻根源的。太宗死后，他以帝舅之亲、顾托之重，手握大权，并以他为核心组成了外朝执政的宰相班子，其中柳奭就是王皇后亲舅舅。为了稳住这一政治格局，他们还针对王皇后无子这一薄弱点，征得王皇后同意，将后宫刘氏所生的燕王李忠在永徽三年立为太子。由于李忠以微贱的庶子得到他们的拥戴而登储位，对王皇后自然亲近，对长孙无忌等重臣也

会感恩戴德，这样，他们的权势至少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代。因此，长孙无忌等决不愿意中宫地位有任何动摇而导致自己势力集团的瓦解。

至此，武则天也完全清楚了，她要取代王皇后，不可能得到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执政元老重臣的支持，而必须在外朝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把长孙无忌为首的政敌搞掉。

王皇后的家族首先遭到打击。永徽六年六月，武则天诬陷王皇后和母亲魏国夫人柳氏请妖人作诅咒谋害自己，高宗不听王皇后分辩，敕禁柳氏不得再入宫中，王皇后舅舅柳奭原任中书令，去年因王皇后宠衰心中不安，请解除宰相之任，遂被降任为吏部尚书，而现今又远贬为荣州刺史。这样，支持王皇后的家族势力被铲除了。

与此同时，高宗为抬高武则天的地位，封她为"宸妃"，立即遭到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的反对。他们说后宫已设贵、淑、德、贤四妃，名位已满，不能违制别立妃号，结果成了泡影。武则天怀恨在心，但不露声色，加紧集结自己的亲信力量。她找到被长孙无忌排斥的一批政治上的失意分子。首先是李义府，他官居中书舍人。此人以善写文章著名，但为人阴险奸猾，逢人先笑，但谁只要稍不屈从他，必暗中陷害，当时人们都说他笑中有刀。又因他阴柔而能害人，起绰号称为"李猫"。

长孙无忌厌恶李义府，要把他贬为壁州司马。敕令过门下省这道最后手续就要下达，李义府得知了这件机密，急忙向同僚王德俭问计。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许敬宗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当过秦王府学士，在太宗朝也一度高居相位。高宗嗣位，任礼部尚书，但因嫁女受贿，被弹劾降职。这时，官居无多大实权的卫尉卿，政治上很不得意。许敬宗、王德俭甥舅两人平时就对执掌大权的长孙无忌心怀不满，于是王德俭给李义府出主意道："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想立他为皇后，但犹疑未决，恐怕朝臣们反对。你能带头上书请立昭

仪为皇后,定能转祸为福。”义府连称妙计,当天就代替王德俭在朝堂值班,乘机上表,假借为民请命,要求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这恰合高宗心意,当即召见,赞扬一番,赐珍珠一斗,并仍留住旧职。武则天也暗中派人勉励。紧接着李义府就被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这样一来,许敬宗、王德俭以及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承袁公瑜争先恐后秘密投靠了武则天,在朝廷中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政治派别。武则天有了这股力量的支持。又有高宗做为后台,她不再怕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了。

这年八月,长安令裴行俭风闻要立武则天为皇后,认为国家祸乱将从此开始,十分焦急,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商议对策。此事被袁公瑜侦知,通过武则天母亲杨氏转告宫中。裴行俭随即被远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而不久,高宗就将许敬宗提升为礼部尚书。

从离间高宗和王皇后感情做起,又经过内外廷的一番精心准备,武则天自信摊牌的时机到了。于是,一场废立皇后的斗争终于公开爆发了。

九月的一天退朝后,高宗令太尉长孙无忌、司空徐世勣和宰相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议事。褚遂良看出了高宗的意向,于是慷慨激昂地说:“今日召我们,多半是决定废立皇后的事。皇上决心已定,逆之必死。太尉是皇上的亲舅舅,司空是功臣,不能让皇上背上杀亲舅和功臣的恶名。我起自平民,无汗马功劳而今居高位,又受先帝顾托,不以死谏诤,有何面目去见先帝。”表示要杀身成仁。

原来,太宗临终前为稳固即将成为新皇帝的李治的地位,曾精心做了一些布署。他先嘱咐李治道:“徐世勣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无恩,将来恐难以臣服。现在我将他远贬叠州都督,如果旨下他立即就走,等我死后你再授他仆射,他必感恩图报;他若徘徊观望,就杀了他。”徐世勣一受诏就知这是太宗的权术,连家也不回,就离京师而去。太宗弥留之际,把长孙无忌、褚遂良召到面前,对两人说:“朕今把后事全托付给二公。你们都知太子仁孝,要好好辅弼他!”又对

李治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必忧虑坐不稳天下!”再嘱咐褚遂良:“无忌忠于我,我得天下,他出力甚多。我死后,不要让奸人谗害他!”太宗逝世后,李治遵嘱调徐世勣回京任左仆射,又提升自己东宫僚佐于志宁为侍中。所以高宗即位,形成以长孙无忌为首,褚遂良、于志宁、徐世勣为辅的执政班子。然而,长孙无忌对徐世勣有疑忌之心,不久,将他升为司空,名位虽高而不握实权,引起徐世勣的不满。

高宗虽令四人入宫议事,但徐世勣推说有病没去,因此只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三人进入内殿。不出所料,高宗这次直接了当地对长孙无忌说:“罪大莫过绝嗣。王皇后多年无子,武昭仪有子,朕要立昭仪为皇后,你们意下如何?”褚遂良以先帝顾命大臣的老资格挺身反对道:“王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时拉着臣的手说:‘朕的佳儿佳妇,今托付卿。’这话陛下也听到了。如今言犹在耳。皇后没有过错,怎能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违背先帝遗命。”君臣不欢而散。

武则天并不死心,次日高宗再议此事时,他亲自坐在帘后监视,气氛更加紧张。高宗话刚一出口,褚遂良就谏诤道:“陛下一定要另立皇后,也应慎重地从名门望族中挑选,何必立武氏!武氏侍奉过先帝,此事无人不知;全天下人的耳目,陛下岂能遮蔽?恐万代之后,也要指责陛下无德。请陛下三思!臣知违忤陛下旨意,罪该万死。”说罢,将朝笏放在殿阶上,脱帽叩头,血流满面。口中还道:“还陛下朝笏,请放臣回归故里吧!”这番话无疑是揭了高宗和武则天的短处,两人顿时恼羞成怒。高宗喝令左右将褚遂良轰出去,武则天在帘中大骂:“还不赶快打死这老畜牲!”长孙无忌闻听,急忙保奏:“遂良是顾命大臣,即使有罪,也不能用刑!”褚遂良才暂免于难。君臣这时已完全撕破了脸,于志宁吓得不敢发言。

随后,侍中韩瑗也为此事一再泣涕极谏,论说皇后母仪天下,关乎国家治乱兴亡,并列举妲己倾覆殷商,褒姒灭亡周室,以及吴

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忠言而国破身亡的历史悲剧，侧面预示皇帝若一意孤行的危险性。中书令来济也上表力谏，说："王者立后，必择选名家，才能上补天神之意，下称四海民心。"又警告说："汉孝成帝纵欲，立婢为后，结果使皇统亡绝。"

朝中元老重臣绝大多数都竭力反对废立皇后，这使高宗不免有些犹豫。但高宗也发现有一人例外，这就是徐世勣。当初诏四大臣面议此事时，他以有病为借口没有参加。后众宰相拼死谏阻，他却默不表态。于是，高宗就单独征求徐世勣的意见，问："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但褚遂良坚决反对，他又是顾命大臣，难道此事就这样罢休了吗？"徐世勣说："这是陛下家里的私事，何必还要去问外人。"这话说得很圆滑，表面上没有直接表态，骨子里支持高宗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不要理会长孙无忌等一班人，从而也就离间了高宗与执政的元老重臣的关系。徐世勣是开国元勋，威望很高，由于他的支持，高宗最后下了废立皇后的决心。

与此同时，投靠武则天的许敬宗也在朝中大肆宣扬："乡巴佬多收十石麦子，还想换个老婆。何况贵为天子，想另立皇后，这关别人什么事，而妄加干涉。真是多此一举！"武则天听后很是满意，令身边亲信将这些话转告给高宗，促使皇帝废立皇后的决心更加坚定。

于是，高宗断然行动了。首先将褚遂良远贬为潭州都督，以警戒反对废立皇后的朝臣。然后在十月十三日（己酉），以王皇后、萧淑妃阴谋毒死皇帝的莫须有罪名，废为庶人。并将两人的亲属流放到岭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十九日（乙卯），百官上书请立新皇后，遂即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诏书中盛赞她出身开国元勋之门，德贤才淑。为了掩饰两人早期的暧昧关系，说高宗还身为太子时，太宗就已将武则天赐给了他。并用汉宣帝选后宫家人王政君为太子妃一事为立武则天为皇后辩护。

十一月初一（丁卯）举行册封皇后仪式，在高宗的主持下，由司

空徐世勣出面，把皇后的玺绶奉献给了武则天。当天，还破天荒地命百官和四夷酋长在肃义门朝拜新皇后，而内外贵族、高官的夫人要到宫中拜见。整个过程异常隆重，三十二岁的武则天终于夺得了皇后地位。而正是从夺得皇后位置起，她也就开始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199—200

两唐书：《袁天纲传》、《武则天本纪》、《武则天传》、《王皇后传》、《长孙无忌传》、《李义府传》、《许敬宗传》、《韩瑗传》、《褚遂良传》、《燕王忠传》

唐·刘肃《大唐新语·记异》

《汪篯隋唐史论稿》：《武则天》、《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

武则天参政

武则天四岁丧父，幼时和寡母一起饱受同父异母兄武元庆、武元爽和叔伯兄弟武惟良、武怀远的冷眼和欺凌，从而形成刚强和冷酷的性格。武则天入宫作太宗才人时的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太宗有一匹名马叫狮子骢，性情暴烈，连善骑烈马的太宗也不能驾驭。武则天正在旁边侍奉，忽然对太宗道："妾能制服它。"太宗不相信地问："你有什么办法？"她答道：我只须有三件东西。"太宗问："哪三件？"她说"一条铁鞭，一把铁锤，一支匕首。马不驯服，妾开始用铁鞭抽；若不服，就用铁锤锤；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这畜牲的喉咙！"语气有如斩钉截铁。

太宗朝，武则天在宫中生活十二年，但始终是位居低级侍妾才人，未受宠幸。太宗逝世，她又被迫到感业寺为尼。多亏她早托身于高宗，又巧遇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良机，才再次入宫，得以重见天日。随后便展开了争夺皇后的激烈斗争。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武则天少女时就初步形成的刚强而冷酷的性格受到进一步的磨炼。而当武则天取得皇后地位并开始参政，她就用上述对付烈马的铁腕残酷打击所有妨碍她进一步夺取权力的一切政敌。而首先是彻底消除废后王氏和废妃萧氏这两个隐患。

王皇后、萧淑妃被废后，囚禁在冷宫别院。高宗和两人终是多年夫妻，难免藕断丝连。十一月初一（丁卯）武则天立为新皇后不久，高宗忽然想起王皇后、萧淑妃二人，于是找一个机会，瞒着武则天前去探望。只见囚室严密封闭，宫墙上只留一个孔通递饮食。高

宗不觉恻然伤心，呼喊："皇后、淑妃在哪里？"听见高宗的声音，王皇后一边哭泣，一边悲声答道："妾等获罪，贬为宫婢，哪里还敢当此尊称。"又哀求道："陛如念旧日情份，使妾等重见天日，请将此院改名为回心院！"高宗应允道："朕马上就去办理此事。"

不料此消息被武则天得知，她勃然大怒，并先下手为强。命心腹将王氏和萧氏各杖一百，断去手足，塞进酒瓮。还咬牙切齿地说："要让这两个老婆子的骨头都喝醉了。"就这样泡了数日才死，她又派人把两人的头割下。

当初高宗下诏废立皇后时，王皇后接旨跪拜道："愿皇上万岁。武昭仪承恩受宠，妾本应死。"萧淑妃接到被囚禁冷宫的诏旨时，大骂武则天："阿武狐媚惑主，竟到了这种地步！我愿下世投生为猫，使阿武为鼠，狠狠地咬断她的喉！"武则天闻听，下令宫中不许养猫。王氏和萧氏死后，她经常梦见王、萧两人披发沥血找他复仇，吓得她一再迁居，最后不敢再住长安，而多居洛阳。

武则天除掉王皇后、萧淑妃后，清醒地知道，要巩固自己的皇后地位，并进一步参与国家大政，还必须搞垮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强大的敌对势力。因为褚遂良虽被远贬潭州，但外廷仍掌握在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手中，他们有随时倾覆自己的实力。在搞垮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这一问题上，高宗是全力支持的。因为他虽然性格懦弱，但当皇帝以后也并不甘心受制于这批老臣。一心要摆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包围控制，使高宗和武则天有了共同点，他们同心协地打击政敌。

武则天第二个打击目标是长孙无忌等拥立的太子李忠。十一月初三（己巳），许敬宗秉承武则天的旨意，面奏高宗道："太子是国家根本，关系到治乱兴亡。今新皇后已正位，又有嫡子李弘；而太子李忠生母低微，不应再窃居东宫之位。高宗自然准奏。显庆元年（656 年）正月初六（辛未），降皇太子李忠为梁王、梁州刺史，改立四岁李弘为皇太子。这样，武则天在宫中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武则天在铲除政敌的同时，特别注意培植自己的党羽。为了让这些人替自己卖命，甚至通过高宗包庇他们违法乱纪。八月，李义府倚仗首喝拥立武后之功，胡作非为。他见大理寺狱中的犯妇淳于氏长得妖艳动人，竟让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放出，要纳为己妾。大理卿段宝玄发觉上奏，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复察。李义府恐真象大白，逼毕正义在狱中上吊自杀。高宗虽察明实情，但对李义府罪释而不问。御史王义方冒死在朝堂弹劾，高宗竟然大怒，反说义方缀辱大臣，降职远贬。不久，又将李义府提升为中书令。

当然，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也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十二月，侍中韩瑗上书为褚遂良讼冤。他称赞遂良为国亡家，忠心耿耿，是社稷的旧臣，皇帝的贤佐，请高宗加以宽恕，以顺人心。还说："陛下无故弃逐顾命大臣，恐会招来祸患。"但高宗恨褚遂良悖戾犯上，拒不听谏言。韩瑗见谏诤无效，要求解职归田。高宗不许。

韩瑗的举动，使武则天大为恼火。当初高宗为提高武则天的地位要把她封为"宸妃"时，就是韩瑗、来济两人的阻拦而未能实现。但武则天被册封皇后时，或许出于拉拢这两人的目的，特别对高宗关照，说韩瑗、来济对立宸妃一事敢于面折廷争，正是忠心为国的表现，并请皇上加以褒赏。当时，韩瑗、来济也摸不清这一着的真实意图，很是忧惧。但两人并没有改变立场，屈膝武后。这时韩瑗竟还敢替褚遂良说话，让他东山再起，重返朝廷，武则天岂能容忍！于是在显庆二年七月，许敬宗、李义府遵照武则天的旨意，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其借口是在该年三月褚遂良由潭州（今湖南长沙）调任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他们硬说这是韩瑗和来济有意安排的，企图在谋反时搞里应外合，因为桂州向来是用武之地。高宗准奏。八月，将韩瑗贬为振州刺史，来济贬为台州刺史，而且终身不许回京朝觐，面见皇上。受韩瑗、来济案件的牵连，褚遂良又远贬为爱州刺史，柳奭也以荣州刺史远贬为象州刺史。

褚遂良到荒远的爱州（今越南清化）后，上表陈述自己的种种功劳道："当年李泰和李承乾争夺太子地位，臣不顾身家性命，归心陛下。李承乾获罪被废后，岑文本、刘洎主张立李泰，臣又极力抗争，终于和长孙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使您获得皇储地位。先帝驾崩前夕，只有臣和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丧期内不胜悲恸，臣劝节哀，以江山社稷为重。陛下感动得手抱臣颈。此后，臣与无忌精心辅政，内外安定。望陛下能哀悯老臣，留得残生！"但高宗不予理睬。褚遂良自武德初从薛举手下归唐，以文章书法自负。跟随太宗，晋升宰相高位，并成为顾命大臣，年已六十却遭到一贬再贬。哀告无效，心情极度颓丧，遂一病不起。次年，死于爱州。不久，韩瑗也忧愤而死。而与此截然相反，显庆三年十一月，许敬宗荣升为中书令。

武则天心中十分明白，长孙无忌是妨碍自己获取更大权力的主要政敌。但此人是高宗的亲舅，而且既是开国功臣，又是佐命元勋，威望很高，根深蒂固，所以不敢轻易下手，但她决不能将这人放过。武则天隐忍数年，一方面逐一剪除长孙无忌的羽翼，一方面密令许敬宗伺机构造陷害长孙无忌的陷井。当把韩瑗、来济赶出朝廷以后，她感到时机成熟，就对长孙无忌下手了。

显庆四年四月，许敬宗终于精心设计了一个陷害长孙无忌的冤案。他首先指使洛阳人李奉节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勾结长孙无忌，图谋不轨。高宗立即令宰相许敬宗和辛茂将秘密进行审讯。许敬宗严刑逼供，要韦季方诬陷长孙无忌。韦季方于心不忍，又受刑不过，遂自杀，但没有死成。许敬宗抓住这一机会，诬奏道："韦季方和长孙无忌谋反是实。他们通过陷害忠良近戚，使长孙无忌夺取朝廷大权，今日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高宗故作吃惊地说："还能有这样的事！舅舅被奸人挑拨离间，心中对朕稍有不满，何至于谋反？"许敬宗深知高宗已不愿再受这位亲舅舅的挟制了，所以这样说，只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于是进一步诬奏道："臣审得详细，反状已很清楚，陛下要再怀疑，恐非社稷之福。"这

时,高宗佯装悲泣,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我的姐妹高阳公主与附马房遗爱谋反,如今亲舅舅又如此,使朕羞见天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许敬宗又添油加醋地说:“房遗爱只不过是房玄龄的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与一个女人谋反,能成什么气候!可长孙无忌不同。他与先帝夺取天下,众人无不服其智谋;任宰相达三十年之久,百姓全都畏其威严 可称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担心他一旦知道密谋泄露,便会破釜沉舟。振臂一呼群凶云集,谁能抵挡得了!恳请陛下当机立断,迅速下令逮捕抄家。”他还列举宇文化及父子两代深受隋室信任重用,化及弟士及还娶炀帝女南阳公主。但身为皇亲国戚的宇文化及最后还是在江都发动叛乱,杀掉炀帝,倾覆了隋朝。并说这是前车之鉴。

高宗觉得罪状还不够充分,难以服天下人心,叫许敬宗再加以审讯。次日,许敬宗编造好了韦季方的供词,然后上奏道:“昨夜季方已承认与无忌同反。臣又特别追问:‘无忌是皇家的至亲,累朝受恩宠,有何仇恨而图谋以叛?’季方供称:‘韩瑗曾对无忌说,您和褚遂良、柳奭一起拥立李忠为太子,如今李忠被废,皇上已经疑忌您,所以去年将您的表弟高履行由太常卿远放为益州长史。长孙无忌听韩瑗话后,忧虑恐惧,开始谋划保身之计。后又见自己的叔伯兄子长孙祥由工部尚书外放为荆州长史,韩瑗也获罪被贬,因此日夜和我等策划谋反。’臣审核韦季方上述供状与实情完全相符,请陛下赶忙收捕。”高宗假意于心不忍道:“舅舅果真如此,朕也决不杀他。杀了亲舅舅,天下人一定要骂朕,后世也一定要骂朕。”许敬宗再鼓如簧之舌,消除高宗最后疑虑。说:“薄昭是汉文帝的亲舅,也有拥戴之功,但只不过犯了杀人罪,文帝令百官孝服往哭,逼他自杀,至今天下都认为文帝是明主!而今无忌忘两朝大恩,图谋篡逆,其罪之大与薄昭不可同日而语。幸而皇天保佑,阴谋早露,党羽也已招供,陛下应当早下决断。无忌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再迟疑,一旦变乱爆发,将后悔莫及!”高宗至此顾虑全消,也不

召见长孙无忌核实一下，只听许敬宗一面之辞，便下诏削去无忌的官爵，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

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又进一步广泛诛连，上奏道："长孙无忌谋逆，是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扇惑而成。柳奭暗通宫内，谋行鸩毒。于志宁也是无忌的死党。"于是，高宗随即下诏，追削褚遂良死后的官爵；将韩瑗、柳奭除名；于志宁免官；无忌子附马都尉长孙冲和近亲等都除名，流放岭外；褚遂良子彦甫、彦冲流放爱州，又在途中杀掉。连韩瑗的姨侄赵持满都没放过。他当时任凉州刺史，性情豪爽，力大而善骑射。许敬宗怕他知道消息后在西凉起兵，便诬奏与无忌同反，召至京城下狱，用尽酷刑，终无异辞，但还是以谋反罪在城西斩首。

武则天还不罢手，她要根绝后患。该年七月，徐世勣、许敬宗、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奉命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乘此之便，令同党袁公瑜等往黔州，逼长孙无忌自缢身亡；杀柳奭于象州；韩瑗这时已死，开棺验尸；还没收三家财产，将近亲都流放到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是无忌的宗族子，因与无忌有书信来往，竟处以绞刑。总之，自高宗即位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执政的元老重臣及其亲属，或杀或流，至此已被彻底清除。雄心勃勃的武则天开始公开出台参政了。

历史也给武则天参政提供一个好时机。显庆五年十月，高宗患了次轻度中风，头痛、目不能视。百官奏事，他有时就让武后代理决断。武则天聪明敏锐，涉猎文史，处理的事都能符合高宗心意。高宗大喜，遂进一步委托政事。就这样，权力渐渐转移到她的手中，威势和皇帝等同。武则天大权在握，就一改过去对高宗百依百顺的作风，从而导致了宫中的一场风波。

当初高宗将武则天从感业寺接入宫中纳为昭仪时，她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忍辱柔顺，百般迎合皇上心意。高宗认为武则天能体贴自己，才力排众议立她为后，并和她一起搞掉了以长孙无

总为首的元老执政集团。但随着武则天权势的增长，她一反过去的谦恭姿态，愈来愈骄横，揽权行威，连高宗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挟制，其程度比过去遗老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高宗难以忍受。麟德元年(664年)，宦官王伏胜揭发武则天私自引道士郭行真人禁中蛊祝妖术，祈求非份之福。高宗顿时大怒，想乘势将武则天废掉，于是密招宰相上官仪商议。上官仪极力附合道："皇后专权跋扈，令天下失望，应该废弃她以顺应民心。"高宗立即令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

他们哪里知道武则天早在宫中布满了心腹。当她安插在皇帝身边的眼线得知此事后，飞奔相告。武则天连忙赶来。这时，废皇后的诏书还捏在高宗手中。她一见就边哭边诉，模样楚楚动人。高宗又爱又惧，很是后悔，马上回心转意，待之如初。还怕武后怨怒，竟然说："我本无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的。"就这样将上官仪出卖了。武后恨得咬牙切齿，必除之而后快。

上官仪诗、文兼美，与王伏胜共同侍奉过前太子李忠。武则天将高宗哄得回心转意后，翻过手来，立即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串通废太子李忠谋反。高宗一切听任武后，上官仪和儿子上官庭芝下狱而死，家口籍没。这事一出，武则天觉得废太子李忠也必须除掉。李忠自显庆元年十四岁时被废，出任梁州都督，后转房州刺史。成年后因惊吓精神恍惚，有时穿妇人衣服防备刺客，有时因恶梦而自己占卜。后被人告发，废为平民，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囚禁。上官仪死后，李忠也被赐死，年仅二十二岁。此外，王伏胜被杀头。郑钦泰等一批朝臣因与上官仪交往被流贬。宰相刘祥道也因与上官仪友善，受到降职处分。

通过这次反复，武则天的政治权力更加膨胀了。从此高宗临朝，她都垂帘于后听政。政事不论大小，官员都要奏闻。而高宗自显庆五年以后身体每况愈下，上元二年(674年)因头痛目眩严重，竟想下诏由武则天全权处理朝政，由于宰相郝处俊等的谏阻才没实行。但百官奏书，国政大事，高宗越来越依赖武后处理。武后在

高宗朝辅政数十年，威势与皇帝无异。当时中外都称朝中有两个皇帝。

武则天在高宗朝参政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首先是修定《姓氏录》，以取代太宗朝的《氏族志》。魏晋以来形成的重视门第阀阅的观念，到唐代还有很大的影响，而太宗时修成的《氏族志》并没有将武则天、李义府家族列为门阀世族。显庆四年六月，也就是长孙无忌被逐出京城两个月，许敬宗就以《氏族志》不列武后家族为理由奏请修改。李义府极力赞同。

李义府本是瀛州饶阳（今河北河间）的李氏，门阀不高。永徽六年，因拥立武后有功升为宰相，想凭借权势提高自己的门弟，自言原出身赵郡（今河北赵县）世族李氏，并和赵世族李崇德续族谱。李崇德官居给事中，不敢得罪当朝宰相，只好默认。但显庆三年，李义府因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等罪一度被贬为普州刺史，李崇德马上把他剔出赵郡李氏族谱。第二年李义府重新任相，虽将李崇德诬陷下狱而死，但他一直以自己非世族出身为耻，羡慕高门的荣耀。许敬宗提出修改《氏族志》的主张，恰中他的胸怀。

这一建议也极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武则天父亲武士彟虽是开国元勋，当朝新贵，但先祖只不过是普通农夫，直到武士彟经营木材生意才发财致富，因此门弟不高，太宗朝修《氏族志》并没有把武则天父亲列入世族之列。后来褚遂良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也把她并非出身世族名家作为一条理由。而修改《氏族志》，提高自己家族的门阀，也就消除了这块心病。

在武则天、许敬宗、李义府的推动下，高宗自然下诏恩准。遂命礼部郎中孔志约以及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修成《姓氏录》。高宗亲自为此书作序。在这本姓族等级书中，共收录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将武后家族也列入第一等，其余完全按照仕唐官品高低为准，分为九等。凡在唐官居五品以上的，全部列入世族，连士卒中以军功得五品官的也如此。这就彻底打破了以前划定姓族等级

的框框，扩大了士族的范围，冲击了旧世族的营垒，赢得了以军功或其他途径获得高品的普通地主的欢迎。

旧的门阀世族把《姓氏录》视为赏军功的"勋格"，他们不愿与这些人同伍而加以抵制。李义府又上奏收天下《氏族志》，加以焚毁。十一月，李义府因向旧世族求婚遭到拒绝，更上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博陵崔懿，赵郡李楷高门世族不能相互通婚，也不得以"赔门财"为名，向门阀低的索取大量财礼。高宗也下诏批准执行。其目的同样是用政权力量瓦解传统的门阀世族。但重视旧门第的传统观念难以短期清除，被禁婚的七姓十余家有的偷偷地将女儿送到同等门阀的夫家，有的宁将女儿老死在家也不外嫁非世族之家。而七姓十家中那些衰宗落谱，往往自称禁婚家，从而索得更多的赔门财。这种门阀观念的彻底变革，直到五代才实现。从那以后，选拔官员不问出身家世，通婚也不问祖先门阀了。

武则天为实现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参政后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对官僚群的影响，不断培植拥戴自己的势力，奠定她一生成功的基础。历史给她提供了这一契机。南北朝以来，随着世族门阀地主的衰落，普通地主势力的崛起，保护门阀世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在隋初被废除了，而代之以考试作为选拔官吏主要手段的科举制。大批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纷纷涌上官场，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地位，在社会上要有所作为。武则天就顺应这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放手招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显庆二年，主持官员选拔的刘祥道上书反映："当今吏部铨选太多太滥。每年任命的品官超过一千四百，而每年合适的任官人数有五百人即可。而且，各种非科举出身的胥吏不经吏部考核精选也都成了国家的正式品官。"第二年，中书令杜正伦也上奏论及每年选任的品官太多，是政治上的弊端。高宗让刘祥道和杜正伦详议改革，但大臣们知道这一现象的背后有武则天作为后台，难以执行，遂不了了之。

在扩大科举取士方面，武则天参政后首先增加了进士等常举科目录取的人数。太宗贞观年间，平均每年取进士、明经等科不过十名，而武则天和高宗共同执政期间，平均每年只进士一科就过二十多人。此外还大开制科，以显庆三年到仪凤二年(677 年)，制科名目达二十一种之多，给士人当官大开方便之门。武则天参政后为想做官的读书人广开仕途，特别适应了没有显赫门第的普通地主出身的读书人的要求。武则天开的仕途越广，这些人就越拥戴她。武则天不仅在官僚阶层中由此培植了一批亲信，而且也有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麟德二年，高宗要到泰山行封禅。十月，武则天奏称："封禅大典而不让皇后等参加，是不合乎礼仪的。"并提出自己要率嫔妃、公主、国夫人等随同祭奠。高宗应允。十一月，高宗从洛阳出发，护卫的文武仪仗队浩浩荡荡，数百里不绝。东自高丽，西至波斯等诸国朝见的使者也率众随从，盛况空前。乾封元年正月，高宗先登泰山祭昊天上帝后，次日，在社首山祭皇帝祇，高宗初献毕，武后升坛亚献。随后晋升全部随行官员：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武则天自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在封禅大典中取得了亚献的特殊荣誉，从而扩大了对国内外的影响。

上元元年(674 年)八月，武则天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建议高宗称天皇，自己称天后。十二月，她又上书，提出十二条治国方案："一、劝农桑，薄赋徭；二、免除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徭役；三、停止征战，以道德教化天下；四、禁止国家手工工场制造侈奢品；五、节省功费力役；六、广开言路；七、杜谗言；八、王公以下大臣都学《老子》；九、父在为母穿孝由一年延长为三年；十、上元年以前给当官委任状的不再追夺；十一、京官八品以上增加俸禄；十二、百官任职久而才高位低的，应予以晋升。"这些建议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咸亨元年(670 年)，天下四十余州遭旱及霜、虫灾，百姓饥乏，关中地区尤其严重使高宗不得不下诏，令受灾百姓到其他各州求生，并转运

江南租米赈给灾民。而连年的战争:东征高丽,西战吐蕃,兵役大兴,徭役加重。其中前五条意在通过这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第五、六条是为了改善行政作风。第九条是有意提高以她为首的女子的地位。第十至十二条是着意笼络官僚队伍。而第八条,则为了讨好高宗为首的皇室宗族,因为唐以老子为始祖。

高宗对武则天这些涉及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治国方略大为赞赏,下诏褒美,皆令执行。不管这些建议实行的效果如何,但是,足可以看出武则天很有政治头脑,并已经全面地注意和处理国事了。

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参与政事,却无正当的名份控制以宰相为首的外廷。于是她在上元二年以修撰为名,在宫中召集一批文人学士,利用这些人帮助她批改诏令和百官奏书,组成以她为核心的内朝权力中心,以逐渐夺取外朝宰相的权力。这些人有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韩楚宾等。由于他们被特许从宫城北门出入禁中,当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他们在帮助武则天参决政事,分割宰相权力之余,也撰成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书,达千余卷。北门学士这个智囊班子的组成,对武则天控制当时政局,并为她以后登上女皇的宝座起了重要作用。

武则天自永徽六年以皇后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杀王皇后、萧淑妃,稳固自己的皇后地位;杀太子李忠,根绝身后的隐患;搞掉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执政集团,使她得以放手参政;杀逐上官仪等人后,她的权力进一步膨胀;修定《姓氏录》,提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扩大科举、放手招官,在官僚群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建言十二事,显露自己的治国才能;组织"北门学士",形成以自己的为核心的决策班子。武则天在攀登最高权力顶峰的过程中精心设计,稳步向前,充分体现一个政治家的老谋深算。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00—202

两唐书：《王皇后传》、《武则天纪》、《武则天传》、《高宗纪》、《李忠传》、《上官仪传》、《长孙无忌传》、《韩瑗传》、《于志宁传》、《武士彟传》、《刘祥道传》、《刘祎之传》

宋·王溥《唐会要·氏族》

《通志·氏族志》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清·徐松《登科记考》

《汪篯隋唐史论稿·武则天》

《汪篯隋唐史论稿·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武则天杀废亲子

武则天以权雄之性，一朝得志，她的目的不止于正位中宫，参予朝政，而是要登上皇帝的宝座。为此，她要及时扫除一切妨碍她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争夺最高权力，导致武则天和亲子间出现了你死我活的矛盾，而长子李弘首先遭到鸩杀。

武则天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生于永徽四年(653年)正月；次子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午)；三子李显(又名哲)生于显庆元年(656年)十一月初五(乙丑)；四子李旦，生于龙朔二年(662年)六月初一(乙未)。武则天搞掉王皇后、废弃太子李忠后，于显庆元年正月初六(辛未)，将自己亲生的年仅四岁的儿子李弘扶上太子的位置。龙朔三年(663年)十月，高宗就培养十一岁的李弘参予政事，下诏令太于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百官奏事，其中小事，全叫他决断。随着李弘年龄的增长，他任太子期间做的一些事，表现他性情和母亲迥异，他仁孝谦恭，礼敬朝臣，深受高宗喜爱，而且很得内外人心。

高宗承继太宗遗愿，于乾封元年(666年)再次发动大规模征辽东的战役。连年征战，加重了百姓的兵役与徭役负担，征辽东的兵士也出现逃亡现象。高宗下诏令这些逃亡的军人在一定期限内自首，如在期限内不投案自首或再有逃亡的，要斩首示众，家口没官。太子李弘上书谏诤：指出这一诏在执行中造成一些冤案。因为有些士兵因病不能按期应征；有的因采集柴草被敌军俘掳，有些士兵因渡海淹死或深人敌境作战身受重伤阵亡而未能归伍，如此等

等，执法者不明真情，一律按逃亡处理，将不该逮捕的囚禁狱中，将不该没官的家属大量没官。他请求高宗："与其冤杀无辜，不如修改诏令。愿陛下收回逃亡士兵家属籍没入官的成命。"高宗下诏批准。

咸亨二年(671 年)，高宗到东都洛阳，让李弘留长安监国。这年大旱，关中缺粮。李弘察看廊下守卫士兵所吃的干粮，发现有的竟然吃榆树皮和蓬实，于是悄悄命令东宫太子家令寺供给这些卫士米。

这时，他发现义阳、宣城两公主年过三十还未出嫁。因为他们是萧淑妃的亲生女儿，受母亲的株连一直被囚禁在掖庭宫。李弘又吃惊、又可怜，立即上奏父皇，请选婿出嫁，高宗也应允。李弘还奏请将同州沙苑(今陕西大荔南)的国家土地分借给无地贫民。

李弘还有纳谏的作风。咸亨三年因他接见东宫属僚少些，掌管太子饮食的典膳丞邢文伟就减少供给的饮食并上书劝谏。李弘回书加以赞扬，解释说："因身体多病以及侍奉皇上而时间紧张。"不久李弘设宴款待东宫官员，席间，令宫臣作"掷倒"的游戏，依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时，他拒绝，并说："掷倒是伶官的事，臣的职责是保卫殿下。"李弘听罢，连忙道歉。

咸亨四年八月，高宗因患疟疾，令李弘代替自己在延福殿受理百官奏事，实习朝政。高宗还选择右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作太子妃。送聘礼时，有关官员奏称"用白雁最为吉利"，恰巧在宫苑内捕获到罕见的白雁。高宗欢喜异常。十月完婚后，裴氏很是贤惠。高宗曾对侍臣说："东宫的内政，我完全放心了。"也常说："太子仁孝，礼敬大臣，古今未有。"

在高宗对李弘不断培养，充满期望之际，也正是武则天精心谋划、扩大自己权力的时候。李弘的思想作为，特别是其羽翼渐渐丰满，极不利于她今后夺取皇帝的宝座。其实，武则天对李弘的举动早存戒心。她发现亲生的长子李弘不是等闲之辈，竟敢多次违背自己的旨意向皇帝上奏。特别是连自己仇敌萧淑妃的女儿也奏请出

嫁。她恼怒之余，也给李弘点颜色瞧。将义阳、宣城两公主嫁给权毅、王遂古，而这两人只是守卫宫城的普通士兵。

上元二年(675年)三月，高宗因头痛、目眩加重，想逊位，让武则天全权代理国政，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极力反对。他谏道："天子理外，皇后理内，这是天道。昔魏文帝曹丕制定法令，即使皇帝幼小，也不许皇后临朝，以杜绝祸乱的萌芽。陛下为何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交给武后呢！"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赞同道："处俊之言极忠，陛下应听从。"高宗遂消除了这一念头，而想禅位于皇太子李弘。这就使权势欲极强的武则天必须除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四月，李弘随高宗、武后到合璧宫，武则天在这月二十五日(己亥)，用毒酒将年仅廿四岁的李弘害死。高宗得知凶讯，悲痛万分。万般无奈，只好在五月下诏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帝子谥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李弘死后，高宗将希望寄托在次子李贤身上，六月初五下诏立二十三岁的李贤为皇太子。李贤天份很高，自幼举止端重，小小年纪就读了《尚书》、《礼记》、《论语》，过目不忘。高宗非常钟爱。为使李贤尽快熟悉政事，高宗在他位居储君不久，就让他监国。李贤处理政务精明果断，颇受朝廷百官称赞。这使高宗高兴万分，仪凤元年(676年)亲下手诏褒美道："皇太子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要，安抚百姓，刑罚谨慎。理政余暇，攻读典籍，汲取精华，喜贤好善，堪当国家重任，深合朕的心意。"并赐绢五百段。

李贤又招集一批学者，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纳言，以及格希元、许叔牙、成玄一、文藏诸、周宝宁等，和他一起注范晔《后汉书》。为首的张大安是张公瑾之子，而张公瑾是玄武门政变中帮助李世民的重要人物之一，正是他力劝李世民抢先发难，不必占卜，后又死守玄武门，成为太宗朝凌烟阁功臣。李贤以注书为名招集这批学士，实际上为自己增添政治上的羽翼，在后党"北门学士"之外另立太子系的一派势力。而《后汉书》中有关于后汉政权落

到皇太后、外戚手中的记载，注《后汉书》似也包含有影射武后专权的微言大义。书注成后，高宗赐绢三万段，并将书交秘阁保存。

仪凤四年五月，高宗又让李贤监国理政。这时武则天不仅看到次子李贤的政治能量超过长子李弘，而且高宗也一心培植这个儿子尽早继承大业。这使她面临高宗一旦去世后大权会落到李贤手中的危险。于是武则天千方百计加紧对李贤的控制。

当时，正谏大夫明崇俨以符咒幻术被武则天所信任，他看穿武则天疑忌李贤的心里，遂密奏道："李贤不适宜承继帝位，李显貌似太宗，是更合适的储君人选。"不久，宫中又出现流言，说李贤是武后姐韩国夫人的私生子。韩国夫人嫁贺兰越石，早年守寡。永徽中武则天进宫为昭仪后，她以大姨身份出入禁中。李贤得知这些消息后，心中又疑又惧。与此同时，武则天让北门学士撰写《少阳正范》、《孝子传》，令李贤熟读，并连续亲笔修书加以训斥。李贤敏锐地感到母后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于是作《黄台瓜辞》，命乐工歌唱。歌词是："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之。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暗示武则天只有四个儿子，如果一个个都杀掉，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希望母亲听后能够省悟，产生恻隐之心。李贤此时作的乐曲《宝庆乐》曲调也很哀伤。但武则天要当皇帝，必然要把李贤再搞掉。因为他已年长，又有政治才能，一旦李贤当了皇帝，不仅自己当女皇帝的梦想会破灭，而且手中已有的权力恐怕也会被剥夺。

永隆元年(680 年)八月，武则天决心搞掉李贤，并设下圈套。她先指使人向高宗告发太子喜好声色，并与户奴赵道生关系暧昧。高宗令宰相薛元超、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审理此案。这些人忽然兴师动众搜查东宫，在马坊内查获数百件黑色甲胄，便断定是谋反的证据。随后，被逮的赵道生又揭发太子指使自己杀了明崇俨。

原来，深受武则天信任的明崇俨在去年五月一天的夜间遇刺身亡，司法部门不能破案，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派刺客所为，目的是

剪除自己羽翼，赵道生的揭发是严刑诱逼下的伪供，因为李贤被废后，捉到了真正的凶手。

李贤被诬陷后，一时无法洗清，太子地位就岌岌可危了。但高宗素爱李贤，想宽大处理。武则天假意要依法从事，振振有词地说："做儿子的心怀逆谋，天地不容；应大义灭亲，不可宽赦！"高宗无奈，只好下诏将太子李贤废为庶人，并令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把李贤从洛阳押送到长安囚禁起来。并将甲胄在洛阳的天津桥南当众焚毁。这一案件牵连了不少人，除李贤一批党羽被杀外，宰相兼左庶子张大安贬为普州刺史，太子洗马刘纳言等十余人被流放。武则天仍不罢手，次年十一月又把李贤流放到巴州(今四川巴中)。

李贤被废后的第二天，立二十四岁的李显为太子。李显才能平庸，这样，唐高宗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的愿望破灭了，心情悲伤，身体也越来越坏。开耀元年(681年)七月，高宗因服药，令李显监国，还是想培养儿子的执政本领。特别是在永淳元年(682年)二月，高宗破例立李显刚诞生的儿子重润为皇太孙，并为其开府置师、傅等官员。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戴，或可保持李氏的江山。

四月，高宗因关中饥荒，到东都洛阳，留李显在长安监国，并让宰相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政。但李显放肆游猎，不问政事。薛元超上书规谏。高宗得知，召赴洛阳。永淳二年，高宗病势已非常严重，连预定在十月封嵩山的祭典也不能举行。十一月初三(丙辰)，他感到头痛难忍，且双目失明，急召御医秦鸣鹤医治。鸣鹤请用针刺头放血，可以治愈。武则天迫不急待想当女皇，恨不得高宗早死，根本不想让大夫治愈。于是大怒道："天子头岂能刺血，此人当斩！"鸣鹤吓得连连叩头请求饶命。高宗道："你只管刺，朕不怪罪。"遂针刺了百会、脑户两个穴位。"高宗高兴地说："我的双目好象明亮些了。武后闻听，一反前态，举手加额道："这是天赐陛下的宏福。"并亲自负綵百匹赏赐鸣鹤。由此可以看到武则天手段的阴险狡诈。

然而高宗终究病入膏肓。十一月十五日(戊戌),诏李显在洛阳监国,令宰相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和太子处理国事,以防不测。十二月初四(丁巳)改年号为弘道。高宗想到则天门楼宣赦,然而因呼吸困难不能乘马。当夜召裴炎入贞观殿受遗诏辅政,随即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遗诏内容是:“太子李显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的,取武后处分。”初七(庚申),裴炎上奏,因太子尚未即位,不能宣敕。有要事需马上处理的,请武后宣令于中书、门下施行。十一日(甲子),二十七岁的李显正式登基,即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政事都由她裁决。武则天从而实质上获得了掌管国家的最高权力。

武则天的欲壑难填,她要公开当女皇。所以在弘道二年二月,找了一个借口,把继位不足两个月的中宗废黜。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中宗于弘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甲子)正式即帝位,于次年正月初一(甲申)改年号为嗣圣元年(684年),随即册立原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同时将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从低级官员普州参军越级提升为高级官员豫州刺史。紧接着又想让岳父为侍中,进入宰相班了。还要授奶母的儿子五品官。宰相裴炎觉得这样任官是违制滥任,遂再三谏阻。年轻气胜的中宗勃然大怒,信口顶道:“我就是把天下让给韦玄贞有何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个侍中吗?”裴炎惊呆了,遂把这些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正苦于找不到废弃中宗的合适借口,中宗本人倒给她提供了一个良机。于是武则天利用中宗和外廷朝臣的冲突,和裴炎秘密策划废立大计。

二月初六(戊午),武则天在乾元殿召集百官。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按预先布署,带兵入宫。裴炎当廷宣布太后命令,废中宗为庐陵王,随即将中宗拉下皇帝宝座。这时中宗惊恐万状,问:“我有何罪?”武太后斥道:“你想把天下送给韦玄贞,还说没罪!”中宗万没有想到一时气话竟成为母后搞掉自己的理由。当时也无言可答,被押出殿堂,囚禁起来。

废弃中宗的第二天，武则天立自己第四子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时年不满二十二岁。但她把睿宗安置在别殿，所有国家大事，全由自己决定，睿宗不得参予，完全是个傀儡。此后，武则天常在洛阳宫的紫宸殿中，垂下浅紫色的丝帐，临朝听政，独揽一切大权。

这时，她对被流放在外地的李贤惴惴不安了。因为李贤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影响，她恐怕有人以李贤为旗号反对自己。为了防患于未然，于是以检查李贤住宅安全的名义派亲信左金吾卫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暗中叮嘱要除掉李贤。三月，丘神勣到巴州后，将李贤单独囚禁起来，威逼自杀而死，年仅三十二岁。为掩人耳目，武则天将李贤死的罪责推给丘神勣，外贬为叠州刺史，还在显福门假惺惺举哀哭泣，并追封李贤为雍王，然而不久，又把丘神勣调回，官复原职。

武则天在搞掉李贤的时候，厄运也降临到他的孩子们头上。他的三个儿子光顺、守礼、守义都被幽禁宫中，十余年不许出庭院。光顺后来被杀，守义病死，守礼在长期监禁中经常惨遭毒打。玄宗朝时，玄宗弟李范向皇兄报告说："守礼能预知晴雨。"玄宗奇怪地召问。守礼答："由于脊背被打的瘢痕很厚，欲雨，臣脊背沉闷，欲晴，就轻松，因此能预知晴雨。"说着涕泪沾襟，玄宗也潸然泪下。

对废弃的中宗，武则天恐他留在都城于己不利，遂在五月，迁徙到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囚禁在原来李泰所居故宅。不久，又转移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囚禁。多亏李显才能平庸又无政治影响，使他得以保留一条性命。

当亲生儿子成为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障碍时，武则天残酷地毒死长子李弘，逼死次子李贤，剥夺了三子李显的帝位，并囚禁外地，立小子李旦为皇帝，实际也是软禁宫中，暂作傀儡。至此，她向权力的顶峰又跨进了一大步。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00—203

两唐书：《高宗纪》、《李贤传》、《李弘传》、《中宗纪》、《睿宗纪》、《武则天纪》、《武则天传》、《明崇俨传》、《李嗣其传》、《李𫍯传》

《汪篯隋唐史论稿 · 武则天》

徐敬业叛乱

武则天于嗣圣元年(684 年)二月废唐中宗后，虽立四子李旦为睿宗，但不许参与政事，自己大权独揽，并加速改朝换代的准备。为防患于未然，派亲信丘神勣于三月到巴州逼死废太子李贤，五月将废弃的中宗囚禁到均州。闰五月，将侄子武承嗣提升为宰相。武则天为了证明自己临朝称制上合天意，鼓励各地献符瑞。八月，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她命令放在朝堂展示给百官。九月初六(甲寅)，武则天改年号为光宅，旗帜一律改成金色，八品以下官服由青色改为碧色，东都改名神都，又改尚书省等各政府机构和官员名称。为加强对百官的监察，增设右肃政御史台，专门监察诸州地方官员，而左肃政御史台掌管监察京师官员。随后，武承嗣上奏，请武则天追封先祖，立武氏七庙，武太后当即批准。于二十一日(己巳)追尊五代祖武克己为鲁靖公；高祖武居常为太尉、北平肃恭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父武士彟为太师、魏定王。又在故籍文水(今山西文水东)造武氏五代祠堂。

武则天这些紧锣密鼓的行动，使她取代唐室的野心暴露无疑，引起一批忠于唐室大臣们的反对。刘仁轨对武则天的企图很早就有所警惕，并提出告诫。那是在武则天废中宗又废中宗皇太孙李重照后，留守长安的刘仁轨就上书陈述汉吕氏专权最后落个家族灭亡的下场。武则天为安抚老臣刘仁轨，特派武承嗣带玺书解释道：自己可以亲政，是因为睿宗还在守丧期间，不能临朝。并说仁轨以吕后的史实提醒自己大有教益，还表扬他品德忠实。其实这只不过

是武则天在改朝换代时机尚不成熟时的韬晦手段而已。

宰相裴炎在武则天要追封先祖立武氏七庙时也坚决反对。当时裴炎和武则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裴炎尖锐指出:"太后母仪天下,当示至公,不可对后族怀有私心。难道您没看到汉代吕氏的败亡吗?"武则天辩解道:"吕后把权力委任给活着的吕禄、吕产,因此祸国灭家;我今日追尊死去的祖先,于国有何妨碍!"裴炎坚持认为不可,要防微杜渐。她拒而不听。

武则天一步一步接近女皇宝座,她侄儿武承嗣等娘家亲属也执掌大权。李唐宗室则人人自危,众心愤慨。光宅元年(684 年)九月二十九日(丁丑),徐敬业在扬州率先起兵,以讨伐武则天、匡复中宗帝位为名,发动叛乱。

徐敬业是徐世勣的孙子,青少年时随同征战,以勇猛闻名。徐世勣去世后他袭祖父英国公爵位,任眉州刺史,后因贪赃罪贬为柳州司马。他的弟弟徐敬猷原任周至令,也因事免官。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因事被贬的中小官员:给事中唐之奇贬括苍县令,长安主簿骆宾王贬临海县丞,詹事司直杜求仁贬黟县令,魏思温则从御史贬为周至县尉,又被远贬。这些人会聚在扬州,同病相怜,都因为遭到贬黜而非常怨恨,遂谋划叛乱。

魏思温设计,让他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请求出使江都(扬州治所,今江苏扬州)。仲璋到后,思温事先安排好的雍州人韦超就向仲璋告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随即以谋反罪逮捕了敬之。几天后,徐敬业乘官方驿马而至,冒充是新上任的扬州司马,并称:"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自己奉密旨发兵前去讨伐。"于是打开府库,并命士曹参军李宗臣到铸钱的官府作坊,将作工的囚徒和工匠数百人带来装备为兵。然后杀了陈敬之。扬州录事参军孙行处不服,也被立即斩首,于是扬州府的官吏再没人敢动。这时徐敬业征集扬州兵,设置三府:一为匡复府,二为英公府,三为扬州大都督府。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

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不过十天就聚兵十余万。

徐敬业等人知道，武则天图谋篡夺唐的天下，引起李氏宗室和一些大臣的不满。为了争取拥唐派的支持，而自己也可以标榜为正义之师，他们打出了匡复中宗帝位的旗号。大文学家骆宾王还撰写了一篇《讨武曌檄》，向各州县散发这篇千古名檄，文辞极为精彩。文中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旧恩。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连。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裂山河。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武则天阅读这篇极尽谩骂攻击自己的檄文，不但不生气，反为其精彩生动、神韵盎然所倾倒，边读边微笑。当读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时，不由惊叹，问侍臣道："这是谁写的？"有人回答是骆宾王。她惋惜地说："让这样的人才沦落在外面不得重用，是宰相的过失呀！"徐敬业知道原太子李贤有一定政治声望，因此特意找了一个相貌与李贤相似的人为傀儡，欺骗部下道："李贤太

子没死，前些时逃到扬州城，是他命令我们带兵拯救唐室的。”而且发布号令都假借李贤的名义。

扬州处在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唐每年要从江浙运送大量粮食到长安、洛阳，扬州是必经之地，而且它又是控遏东南的军事重镇。因此徐敬业占据扬州重地，对刚刚临朝称制的武则天无疑是迎头一棒。不仅如此，光宅元年十月，楚州（今江苏淮安）司马李崇福又率属下山阳（江苏淮安）、盐城（今属江苏）、安宜（今江苏淮安东南）三县响应徐敬业。武则天认为如果不迅速将这支反叛力量扑灭，恐怕会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她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率兵三十万征讨徐敬业。武则天还发现楚州司马李崇福率三县响应徐敬业，独有刘行举据盱眙县（今属江苏）不从，徐敬业派将尉迟昭进攻也没攻克。于是封刘行举为游击将军，封其弟刘行实为楚州刺史，加以拉拢。

但武则天没有想到徐敬业在扬州举兵叛乱会在朝廷中引发了巨大的政治波澜，而宰相裴炎首先被送上了断头台。

裴炎在高宗朝调露二年（680 年）就已经任相。弘道元年（683 年）十二月高宗临死前受遗诏辅政。中宗即位后，官职由侍中迁任中书令，宰相班子议事处政事堂也由门下省迁到中书省，可见他在执政中枢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他因反对中宗徇私情将自己岳父韦玄贞提为侍中，将乳母子封五品官，君臣发生严重冲突。武则天正是利用这一冲突，废弃了中宗。但裴炎是忠于李唐皇室的，他原以为武则天废中宗后会将大权交给新立的睿宗，没想到她却临朝称制，独揽大权，并有取代李氏天下的野心。因此，当武则天要追封自己先祖，立武氏七庙，他就坚决反对，还以吕后专权祸乱汉室的历史进行讽谏。武则天从此对裴炎不满。后来，武承嗣、武三思因为高祖子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辈尊位重，屡劝武则天借机诛杀。当武则天和宰相商议时，刘祎之、韦思谦沉默不言，独有裴炎力

争不可。武则天更加记恨在心。

徐敬业谋反，裴炎的外甥薛仲璋是重要的参加者之一，朝廷众臣都知道这一情况，但裴炎因自己与此事毫不相干，并不心虚。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这一形势要挟武则天下台，谋取一个返政睿宗的功臣地位。所以徐敬业举兵后他神态自若，也不积极采取行动。武则天临朝议政，向裴炎问计，他不慌不忙地回答："睿宗已经成年，但不能亲主国政，因此这群小子才有了借口。如果太后还政给皇帝，叛乱可不讨自平。"监察御史崔詧闻听此言，奏道："裴炎受先帝顾托，大权在握，若无异图，为何要太后归政？"武则天早就想除掉这个位高权重而又忠于唐室的顾命大臣，于是乘此机会将裴炎下狱，命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侍御史鱼承晔严加审讯。裴炎性格刚烈，在狱中凛然不屈。有人劝他委曲求全，他不愿折节偷生，也深知武则天不会放过自己，于是说："宰相下狱，哪有不死的呢！"

裴炎案件使朝臣分成两派。凤阁舍人李景谌附合崔詧证明裴炎必反。但凤阁侍郎胡元范奏道："裴炎是社稷忠臣，有功于国，一心奉上，天下共知，臣证明他不反。"宰相刘景先、左卫率蒋俨也都为裴炎辩护。武则天说："裴炎早有反心，但你们不知道而已。"胡元范、刘景先说："如说裴炎谋反那我等也是反臣了。"武则天说："朕知裴炎反，也知卿等不反。"一时间文武官员中大多数都证明裴炎没有反罪，连在外防御突厥的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也秘密上书为裴炎鸣冤。武则天一概不听，光宅元年十月十八日（丙申）将裴炎在都亭驿斩首。临刑前他伤感地同受株连的亲属诀别道："兄弟们的官位都凭自己的才能获得，没受我丝毫照顾，但今日受牵连流窜到荒远的地区，我心里实在难过。"裴炎为官两袖清风，籍没抄家时，竟无一点私蓄。

武则天利用裴炎案大力清洗朝中不恭顺自己的官员。刘景先一贬再贬为吉州员外长史，后又被陷害入狱自缢而亡。胡元范流放琼州而死。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武则天还密派将军裴绍

业到军中将程务挺斩首。程务挺勇猛善战，又得军心，镇守边防威望很高，突厥因怕他而不敢犯边。当突厥闻听务挺被杀，高兴得饮宴相庆。夏州都督王方翼因与程务挺友善，又是已废王皇后的近属，也被下狱，后流放崖州而死。

裴炎的侄儿太仆寺丞裴伷先年仅十七，受株连判流岭南。他上书请求而见武则天陈述得失。武则天怒气冲冲召见，劈头就说："你伯父谋反，依法当斩，还有什么冤枉可言！"伷先却面无惧色，侃侃而言："臣怎敢辩冤，只是为陛下考虑。陛下是唐家妇，先帝弃天下，遂独揽朝政大权，变易帝位，排斥李氏宗室，封崇武姓外戚。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陷谋反，戮及子孙，海内愤怒。陛下如此而行，臣实痛心。愿陛下早日归政皇帝，罢诸武权力，然后高枕深居，则武氏宗族尚可保全；不然，天下一变，悔之晚矣！"武则天没想到这小小孩子竟敢斗胆口出狂言，喝令左右拉出在朝堂杖一百，长流瀼州。

武则天为清除政敌，以谋反罪将裴炎处死。但证据非常不足，为掩饰自己，她通过手下爪牙给裴炎编造种种谋反罪状。说什么裴炎想乘武太后出游龙门时，发兵逮捕，还政天子，但恰逢久雨，太后没去，此阴谋没能实现。更离奇的是，还说徐敬业准备起兵时，叫骆宾王谋划联络裴炎。骆宾王于是作一歌谣："一片火，二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裴炎庄园小孩和洛阳儿童诵唱，借以见裴炎，说服他做内应。裴炎给徐敬业回书只写"青鹅"二字，被人告发后朝臣无人能解，独武则天一见便知说："此青字表示十二月，鹅字含我自与意。就是说，裴炎和徐敬业约定十二月里应外合。"等等，真是煞费苦心。此外，武则天还追削了徐敬业祖、父官爵，并掘坟砍棺。

在清洗裴炎为首的忠于唐室派的同时，武则天将负责审理裴炎案的骞味道和证裴炎必反的李景谌，首告裴炎谋反的崔詧都晋升为宰相。这一段中央政局的动荡不稳给徐敬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利时机。然而，他选择了错误的战略方向。

起先，军师魏思温向徐敬业建策道："明公以匡复唐室为名，应该率大军鼓行而进，直捣洛阳。这样天下义士都知道明公志在勤王，自然四面响应。"薛仲璋反对，主张南取金陵(今南京)。他说："金陵有王气，又有长江天险，不如先取常州(今属江苏)、润州(今江苏镇江)，再占金陵，做为霸业的基地，然后再北向图取中原。如此而行，进无不利，退有所归，这才是良策。"魏思温坚持说："山东豪杰都因为武氏专制、愤愤不平。一听明公举事，都自蒸麦饭为粮，举锄为兵，渴望我军北至。不乘有利形势建立功业，反而畏缩不前，自谋巢穴，远近闻知必寒心而解体！"徐敬业不听，采纳了薛仲璋的建议。令唐之奇守江都，亲率主力南渡长江进攻润州。发兵时魏思温对杜求仁叹道："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北渡淮河，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失败就在眼前了。"

光宅元年十月十四(壬辰)，徐敬业攻破润州，活捉该州刺史徐思文，以部将李宗臣主州事。徐思文是敬业叔父，先前得知敬业谋反，已派人到洛阳告发。敬业攻城他又竭力拒守，城破遭擒。魏思温请将徐思文斩首示众，徐敬业不许，只讽刺道："叔叔是武则天的死党，应改姓武氏。"然后关在狱中。润州司马刘延嗣也拒不投降，徐敬业想杀掉，因魏思温说情得免，也囚在狱中。这时，曲阿县令尹元贞带兵救润州，兵败，被徐敬业斩首。

徐敬业的战略错误使武则天赢得了时间，这时她以铁腕铲除了裴炎等，重新稳固了中央政局，而集中精力调动唐军镇压徐敬业叛乱。

李孝逸率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顺运河东南而下，开赴到江淮前线。徐敬业闻听唐军将至，急忙从润州回师，亲自率军屯驻高邮(今属江苏)旁下阿溪水的南岸；令弟徐世猷进守淮阳(今江苏淮安)，派将韦超、尉迟昭屯盱眙(江苏)南的都梁山，形成鼎足防御态势。李孝逸进至临淮(在淮河北，当时与盱眙隔河相对)，与叛军隔水对峙。

战幕首先在都梁山拉开。李孝逸先令偏将进攻，但初战受挫。孝逸恐惧，按兵不进。监军魏元忠警告道："公是皇室近亲，故委以重任，天下安危，在此一举。如今大军逗留不进，万一朝廷另派大将来替代将军，将军难逃临敌怯战、贻误军机之罪！"李孝逸这才重整旗鼓，再行攻击。部将马敬臣临阵斩尉迟昭。但韦超仍率叛军占据都梁山天险。

十一月，因唐军一时难以攻克凭险自固的叛军，众将在下一步打法上产生了分歧。多数将领主张："韦超凭险固守，步兵无法施其勇，骑兵无法展其足；而且穷寇死战，强攻必然造成大量伤亡。不如放弃攻山，分少量兵力加以防守，大军则直取江都，捣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杨则认为："韦超虽然凭借天险，但兵力不多，今多留兵则我军会力量分散，少留兵则恐生后患；如果集中兵力攻击，其势不难攻克；而攻下都梁山，淮阴、高邮叛军必望风瓦解。"这时魏元忠提出了先攻击驻守淮阴的徐敬猷。一些将领反对道："与其攻敬猷，不如直接进攻屯守高邮下阿溪的敬业主力；敬业败，敬猷不战可擒。若击敬猷，敬业率兵相救，我军则腹背受敌。"元忠力排众议道："不然。敌人的精兵，尽在下阿溪。都梁山的守敌都是乌合之众，应首先在这里一战，获胜后进攻敬猷。敬猷赌赙之徒，不懂军事，而且兵力寡弱，大军迅速前进，一攻就克。敬业虽想救援，但艰于路程，为时已晚。我军消灭敬猷军后，再乘胜推进，那时就是韩信再生，也难以抵挡。"李孝逸采纳了魏元忠的谋略，率兵猛攻都梁山。韦超星夜逃窜，部众溃散；唐军乘胜急行军进攻徐敬猷，敬猷望风而逃。唐军遂南进到下阿溪北岸。徐敬业在南岸阻溪拒守，列阵相对，双方决战开始了。

十一月十三日（庚申），唐后军总管苏孝祥夜率兵五千乘小船渡溪首先发动进攻，但失败，孝祥战死，士兵逃奔，投溪溺死过半，果毅成三朗也被徐敬业生擒斩首。后来李孝逸率军连攻失利，他又胆怯了，想引兵撤退。魏元忠坚决不同意，并和行军管记刘知柔建

议赶快利用顺风苇干的天时，以火攻取胜。李孝逸听从，于是双方又摆开阵势。开始，双方谁也不敢贸然出击，相峙颇久。当李孝逸发现敌军许多士兵显露出疲倦不振的现象时，便挥军进击，并乘风纵火。烈焰熊熊，徐敬业军无法抵御而大败，被杀七千人，跳水淹死的不计其数。

徐敬业、敬猷、杜求仁、骆宾王等轻骑逃入江都，携妻子奔润州，然后弃马登舟顺流出海，准备到高丽避难；李孝逸进屯江都，分遣众将追捕。十八日（乙丑），徐敬业船行海陵（今江苏泰州），因风阻不能启航。部将王那相突然叛变，杀了敬业、敬猷、骆宾王以及其妻子等二十五人，携首级投降了李孝逸。余党唐之奇、魏思温不久也全被捕获，斩首后传送洛阳。杨、润、楚三州就这样被平定了。徐敬业叛乱前后共经四十四天，至此烟消云散。

武则天能迅速镇压徐敬业叛乱，其主要原因除徐敬业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外，还因她在当时只临朝称制，形式上保存了李唐皇室，以顺讨逆的名义第一批就调动三十万精锐府兵，军力对比三比一。后还以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配合扬州大总管李孝逸的军队。而徐敬业所率仅十万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

武则天杀裴炎，灭徐敬业后，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两大事件怒训群臣："朕辅佐先帝二十余年，为操劳天下事真是耗尽心血！你们的富贵荣华，是朕赐给的；天下的安居乐业是朕养育的。先帝驾崩将天下托付于朕，朕不爱自身爱百姓。可今日谋反的，全出自将相，你们对朕为何如此忘恩负义！现今你们中的顾命大臣，倔强难制的有超过裴炎的吗？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的，有超过徐敬业的吗？握兵宿将，攻战必胜的有超过程务挺的吗？此三人乃人中的枭雄，但只要不利于朕，朕就能把他们杀戮。你们的本领有能超过这三人的，不妨再反对朕；不然要革心事朕，不要做那些被天下人耻笑的蠢事！"显然她的目的是力图进一步控制外廷，而加强独裁专制。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03

两唐书：《武则天传》、《武则天本纪》、《李勣传》、《骆宾王传》、《裴炎传》、《程务挺传》、《李孝逸传》、《武承嗣传》

宗室起兵

武则天废中宗、软禁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使徐敬业乘机以讨武复唐名义在扬州举兵叛乱。这一政治波澜虽在她心中留下深深的痕迹，但丝毫没有减弱她要登上女皇宝座的雄心。她果断地镇压了这场叛乱，继续膨胀手中的权力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为此，她用尽了浑身的招数。

垂拱四年(688年)正月，武则天令在东都洛阳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季祭祀，如西京长安的礼仪。与此同时，借机兴建崇先庙，以祭祀武则天的父、祖。她命官员讨论崇先庙的规模。司礼博士周悰看出武则天的心思在崇武族贬唐室，遂迎合道："崇先庙应设七室，唐太庙减为五室。"春官(礼部)侍郎贾大隐反驳道："据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自古不变的典制。周悰献媚取宠，竟敢违背国家礼仪！太后受先帝顾托，崇先庙应依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变移。"武则天此计没能实现。

按天子之制建武氏崇先庙受阻后，使武则天汲取了教训。二月，她要独树一帜，建造明堂，以供朝会大典、宣明政教等用。此事早在太宗、高宗朝就想兴建，都因诸儒对其制度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而未成。武则天干脆甩开诸儒，只和"北门学士"商定，拆毁乾元殿，在其基址上建造，令僧怀义为督作使监修。这一工程征用了数万民工。

僧怀义本名冯小宝，原籍鄠县(今陕西户县)。他体形魁伟有力，在洛阳卖药为生。因和高祖女千金公主的侍儿有私，公主得知，

将他推荐给寡居的武则天。从此，深受宠幸。武则天为方便他出入宫中，遂剃度为僧，取名怀义，时常委以重任。

四月，武则天又导演一幕天意授命自己做女皇的戏剧。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为了给姑姑制造理当君临天下的舆论，暗中指使人在一块白石头上凿了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还用紫色石粉掺杂药物涂成紫色，格外醒目。又指使雍州人唐同泰上表贡献，诡称是在洛水中得到的，是一个天大的祥瑞。武则天兴高彩烈，把这块白石命名为"宝图"。将唐同泰提升为游击将军。五月十一日（戊辰）下诏：自己要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到南郊，举行告天仪式；礼毕，登明堂接受百官朝贺。还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十二月拜洛水前十天集中到洛阳。十八日（乙亥），武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六月十六日（壬寅），铸造了执掌国柄的象征"神皇三玺"。七月初一（丁巳），大赦天下，又改"宝图"名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立庙祭祀，并禁止在洛水中捕鱼垂钓。与此同时，还改嵩山名神岳，封嵩山神为"天中王"，禁止在山中樵采放牧。因为此前在汜水也得到过瑞石，于是将汜水改名为广武。武则天借这些东西大作文章，真是兴致勃勃，她的身上好象显现了"真命天子"的光环。

唐宗室诸王敏锐地感到"圣母神皇"比太后临朝称制又前进了一步，它相比"皇帝"之称仅多"圣母"两字。武则天要改朝换代的野心至此已暴露无遗。

唐高祖第十一子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第十四子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第十九子邢州刺史鲁王李灵夔；太宗第八子豫州刺史越王李贞；以及李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国公李譔，李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李绪，高祖第十五子李凤的儿子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李灵夔子范阳王李蔼，李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人，在宗室中都以品德才行享有美名。武则天平时特别疑忌，因此这些人都惶恐不安，怀有除掉武则天，夺回李唐旁落大权的心愿。

首谋起兵的是韩王李元嘉，其母宇文昭仪是隋左武卫大将军宇文述女。李渊建唐称帝时因结发妻窦氏已死，要立宇文昭仪为皇后，但她固辞。元嘉少年时因母亲受宠，也特别被高祖所爱。而本人酷爱学习，聚书至万卷。又洁身自好，有类寒士大夫，威望很高。到睿宗为帝时，他作为太皇叔，辈份极尊崇。高宗逝世，武则天临朝摄政，恐怕李元嘉别生变故，为抚慰其心，晋升太尉，官居极品，但仍外任刺史，不让在朝中掌有实权。四年前徐敬业在扬州发动叛乱时，武承嗣因李元嘉和同母弟李灵夔辈尊位重，多次建议武则天找借口杀掉两人，以防不测。武则天心有同感，但由于宰相裴炎竭力阻拦而没能动手。朝不保夕的政治险境使宗室诸王渡日如年。而今，武则天诛杀李唐宗室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在大祸就将临头之际，他们只好破釜沉舟抢先发难了。

韩王李元嘉与他的儿子李譔谋划，举兵后以"迎还中宗"为名，号召天下群起响应。并于垂拱四年七月开始秘密联络宗室诸王公。李譔用暗语致书李贞道："妻妾病情逐渐加重，应当赶快医治；若延迟到今年冬天，恐会变成痼疾。必须及早动手，并请速速回音！"

正在这时，武则天因明堂将要建成，举行宴享大典，追召皇室众王公汇集洛阳。李元嘉派使者通知诸王道："宴享大典之际，武则天一定让人告密，诬陷宗室诸王谋反。然后便大肆杀戮，那时皇家子孙将被一网打尽。"李譔又伪造皇帝玺书与李冲道："朕遭囚禁，诸王赶快发兵救我！"李冲也伪造皇帝玺书道："武则天要倾覆李唐社稷，把天下送给武氏。"李冲命博州长史肖德琮等召募士兵，并分头通告韩王、霍王、鲁王、越王，以及贝州刺史纪王李慎等，一起举兵，相互策应，同心协力杀往洛阳。

参加谋划起兵宗室王公当时都任州刺史，分布在洛阳周围：韩王李元嘉在洛阳西北的绛州（今山西新绛）；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琅邪王李冲分别在洛阳东北方的青州（今山东益都），邢州（今河北邢台）、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越王李贞、虢王李凤之子东莞

公李融分别在洛阳东南方的豫州（今河南汝南）和申州（今河南信阳）；黄国公李譔、霍王李元轨子江都王李绪分别在洛阳西南方的通州（今四川达县）和金州（今陕西安康）。

参加宗室起兵的还有唐高祖女常乐公主和她的丈夫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赵瓌。越王李贞举兵前夕，派使者送信联络赵瓌。信中道："我要统领义军，借道贵境。"赵瓌答应率兵响应。这时，常乐公主以李贞姑姑的身份对来使说："替我回报越王，我们只有和他一起奋进而决不退缩。我常听老一辈说，隋文帝要篡夺周室，尉迟迥是周室的外甥，犹能在相州起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但威震海内，足称忠烈。何况你们都是宗室诸王，先帝之子，岂能不以社稷为重！今李氏危若朝露，诸王不舍生取义，还犹豫不发，更待何时？大祸即将临头，大丈夫当为忠义鬼，不可虚生浪死，叫后代耻笑。"情绪极为激奋。

此外，越王李贞的女婿汝南县丞裴守德，唐高宗女儿太平公主丈夫附马都尉薛绍和他的两个哥哥，济州（今山东东阿西北）刺史薛顗，以及薛绪也都参预了宗室起兵活动。

如前所述，皇亲国戚中为反对武则天篡唐而内外相联合的人甚广，其中相当多的人分布在洛阳周围，有包围洛阳的态势。然而，这些力量是分散的。韩王李元嘉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他见到琅邪王李冲派来催促起兵的使者后，立即派人回报李冲和越王李贞，叮嘱"只有同时举兵，四面共进，才能成功。"

就在这关键时刻，鲁王李灵夔子范阳王李蔼认为越王李贞在运筹未周时急于行动，必然失败。为了自保，遂将起兵计划向武则天告了密。李冲得知密谋泄露，便于八月十七日（壬寅）在博州匆匆发难。武则天立即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前往镇压。

李冲是越王李贞的长子，好文学，善骑射，历任密、济、博三州刺史，都有些政绩。他率先起兵后，想率领新招募的兵士五千余人

渡黄河夺取济州，而先攻武水县（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水县令郭务悌奔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求救。魏州莘县令马玄素率兵一千七百人想于途中邀击李冲，又恐兵力不敌，遂先人武水县城，闭门死守。李冲令士兵推草车塞城南门，欲顺风纵火，焚毁城门，并乘势突入城中。不料火未起时南风甚急；及火已燃，忽然转成北风。这样，李冲军阻于火而城门却安然无恙。因此，士气非常沮丧。随从李冲攻武水县的部下董玄寂又散布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这是谋反！"李冲得知，虽将他斩首示众，但军心涣散越发不可收拾。士兵纷纷窜逃草泽，无法禁止。最后，李冲身边仅剩数十个家僮。他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博州。二十三日（戊申），当李冲回至博州城门时，被守门人突然袭杀。这次起兵仅七日就失败了。

随后，丘神勣率军到博州。当时事件已经平定，博州官吏身穿素服戴罪出迎。丘神勣不问青红皂白，挥刀便砍，全部杀尽，共计千余家。然后，将李冲首级传送洛阳，枭首于阙下示众。

李冲仓促举兵，而诸王尚未准备就绪，不敢贸然行动，结果只有李冲父亲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响应。他派兵攻占了上蔡县（今属河南）。九月初一（丙辰），武则天令左豹韬大将军麹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率兵十万镇压，又命宰相张光辅为诸军节度。

大军即将临境，又传来李冲失败的消息，李贞恐惧动摇，想自锁到洛阳面见武太后请罪，苟求幸免。但恰巧李贞新任命的新蔡令傅延庆募到勇士二千余人，便又想对抗一下，希望能有转机。于是他欺骗部众道："琅邪王李冲已攻破魏、相等数州，拥兵二十万，很快就要和我军会师了。"以此鼓舞士气。并征调豫州所属县地方兵共得五千人，连新募兵总七千人马，分为五营。李贞自统中营；令女婿裴守德为大将军、内营总管；赵成美为左中郎将、押左营；闾弘道为右中郎将、押右营；安摩诃为郎将、后军总管；王孝志为右将军、前军总管。又以蔡州长史韦庆礼为银青光禄大夫、越王府司马。为

收买人心，李贞任命九品以上官达五百余人。然而这些官员都是被胁迫的，没有斗志。只有裴守德忠心耿耿，加上他又骁勇、善骑射，李贞在起兵前将女儿良乡公主相嫁，委以心腹重任。为求得神佛的冥冥相助，李贞还聚集道士、僧人大诵经论，左右将领以及战士都带上刀枪不能伤害的“辟兵符”。

麹崇裕等率大军进至豫州城东四十里处，李贞派少子李规及裴守德前往阻击，但战败，兵溃逃归。李贞大惊，闭城死守，不敢出战。麹崇裕遂兵临城下。李贞见大势已去，不愿身受戮辱，服毒而死。李规缢死母亲后自杀身亡，裴守德和妻子也双双自缢。部下家僮这时如鸟兽散，纷纷弃刃就擒。麹崇裕斩李贞父子及裴守德等首级传送洛阳，枭首阙下。李贞起兵前后二十天也失败了。

武则天在李贞举兵失败后要穷治其在豫州的党羽，株连之广达六七百家，籍没人官五千余口。当时狄仁杰新任豫州刺史。他哀怜这些人无辜受难，在司刑寺（大理寺）催逼迅速执行时，狄仁杰不顾个人利害秘密上书道：“此等出于胁迫，本无反心。臣知而明奏，似替逆人申理；不言，恐违背陛下仁爱之心。”武则天遂特恩免死，将这些人全部流放到丰州（今内蒙五原南）边地。

琅邪王李冲和越王李贞的军事行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武则天要不失时机地铲除李姓宗室这些绊脚石。她为了杀韩、鲁诸王，先命监察御史苏珦进行审讯，以获取宗室诸王秘密谋反的罪状。但苏珦查无明证，于是有人诬告他暗通韩王等，有意袒护。武则天召苏珦当面质问，苏珦慷慨陈言，不肯滥刑。武则天只好说：“卿是文雅之士，朕另有重用。”遂将苏珦外调为河西监军，改用酷吏周兴审讯宗室诸王。周兴秉承武则天的旨意，立即将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国公李譔、常乐公主逮捕，全都逼迫自杀于洛阳狱中。

随后被杀的还有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当武则天召宗室众王公到明堂朝会时，他秘密派人前往洛阳，向在成均（国子监）任助教官的亲信高子贡询问可以入朝否？子贡回答道：“来必死！”李融于

是装病不赴。黄国公李譔和越王李贞谋划宗室起兵，颇依仗李融为外援，因为他少年时便以勇猛闻名。但李融得到李贞起兵的书信后，仓猝不能响应。又被僚属逼迫，不得已将李贞派来送信的使者绑起，并向武则天告密，得到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衔。但不久，李融就被参预宗室起兵的其他人揭露，十月，斩首于洛阳市中，家口籍没。高子贡也被诛戮。

十一月，武则天杀薛顗、薛绪。薛绍因是武则天亲生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特免身首异处，杖一百，活活饿死狱中。十二月，霍王李元轨以与越王李贞串通谋反罪流放黔州，坐槛车行至陈仓(今宝鸡市)时死于途中。江都王李绪和殿中监郕公裴承先也都在洛阳市中斩首。

至此，李唐宗室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而武则天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已酉)则按计划举行了拜洛水受唐同泰所献“宝图”的仪式。皇帝李旦、皇太子李成器随从，内外文武官员、蛮夷酋长各依方位站立，祭坛上摆满了珍禽、奇兽、珠宝。场面之隆重，是建唐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是武则天和李唐宗室一次较量大胜后的庆典。

本月二十七日(辛亥)，明堂顺利落成。其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三层：下层效法四季，各按四方颜色。即东而青色，南面红色，西而白色，北面黑色。中层效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相捧。上层效法二十四节气，也为圆盖。上设铁凤，高一丈，外饰以黄金，光华烂灿。明堂中央有一棵十围粗的巨木，上下通贯，作为整个建筑的柢柱。明堂四周以铁铸渠通水，如玉璧环绕。武则天给这气势宏伟的建筑命名为“万象神宫”。第二年元旦(乙卯)，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举行了祭祀大典。她身穿帝王的衮服，头戴帝王的冠冕，腰带上插着天子的大圭，手中拿着天子所用的镇圭，堂而皇之地为初献。皇帝李旦悄悄跟随后面为亚献，太子李成器为终献。先祭昊天上帝；其次唐高祖、太宗、高宗；再次魏国先王武士彟；最后是五方帝座。

祭祀大典毕，武则天又驾御则天门城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昌元年(689年)。正月初三(丁巳)，她在明堂接受群臣朝贺。初四(戊午)，在明堂布政，特别颁示了训戒百官的九条律令。初五(己未)，则在明堂大宴群臣。这一番表演可称目标明确、恩威并用。武则天离正式登上女皇宝座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03—204

两唐书：《武则天本纪》、《武则天传》、《虢王凤传附东莞公传》、《韩王元嘉传》、《鲁王灵夔传附范阳王蔼传》、《越王贞传附琅邪王冲传》、《僧怀义传》

胡戟《武则天本传》：《圣母神皇》、《宗室起兵》

女皇建周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九日（壬午）是重阳佳节。这一天，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历经了才人、昭仪、皇后、天后、太后、圣母神皇，费时三十六载，终于正式登基，成为圣神皇帝"，建立了周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而她攀登权力顶峰的每一步，都通过苦心经营和激烈争斗。

在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里，武则天要破天荒地做女皇，这和传统的封建政治原则及道德观点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她虽然以军事手段镇压了徐敬业的叛乱和宗室起兵，但也清楚地知道，朝廷内外仍存在着阻碍自己即帝位的相当强大的势力。性格雄悍的武则天已经攀登到了"临朝称制"的高度，历史的惯性促使她不能罢手，改朝换代成了武则天一定要达到的目标。为此，她在直接动用军队消灭武装反抗的同时，还祭起了奖励告密、大开制狱、滥刑杀戮的法宝，消灭一切政敌。

早在中宗被废、武则天独揽朝政的同时，这些残酷的政策就大规模地实施了。嗣圣元年（684年）二月，中宗被废后数日，有十余飞骑（禁卫军的一种）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发牢骚说："要早知废中宗后一点勋赏也没有，还不如拥戴原来的皇帝呢。"这时，另外一个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站起走出，原来他到玄武门去告密。武则天得知，立即派人前来，这些飞骑还在痛饮，就全被捕入羽林军狱中。发牢骚的人斩首，其余以知谋反不报的罪名处以绞刑，只有那个告密的因功授给五品官。告密之风在武则天

的提倡下从此开始。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以讨武为名在扬州发动叛乱，给武则天很大的震动，她深信有相当多的人反对自己独专国政，特别是宗室、大臣心怀不满。武则天为了巩固临朝称制的权力并进而称帝，便大开告密之风。垂拱元年（685年）二月，她撤除西朝堂“登闻鼓”和东朝堂“肺石”的看守人，以方便击鼓、立石的告密者。而且，命御史一旦接到状纸立即上奏。

武则天觉得仅利用上述原有设施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告密需要，于是在垂拱二年三月采纳了鱼保家的建议以及设计方案，用铜铸成四个独立方形铜匦，接受天下表疏。四个铜匦分别涂上不同颜色：青匦名“延恩”，放在朝堂东面，供献赋颂，求仕进的人投入；红匦名“招谏”，放在朝堂南面，供言朝政得失的人投入；白匦名“伸冤”，放在朝堂西面，供有冤屈的人投入；黑匦名“通玄”，放在朝堂北面，供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的人投入。武则天还创造了匦使院制度，即由正谏、补阙、拾遗等官兼任知匦使掌管铜匦。每日辰时放在朝堂，未时以后取回设于门下省的匦使院。知匦使必须及时将每日投匦官民的奏书交送武太后处理。后为了方便的移出送入，将四匦合而为一，匦中间用十字隔分为四，各有孔穴通外。外部四面仍涂原来的四种颜色以示区别。

武则天有了这一制度，给告密者提供一条合法而又方便的途径，大量告密表疏纷至沓来，因此人间善恶事无不知晓。更重要的是她能及能掌握政敌动态，以加强钳制和打击。可笑的是，铸造铜匦的最初建议者鱼保家，曾参预徐敬业谋反，教他制造刀车和弩。敬业失败后，鱼保家本侥幸逃脱，可有了铜匦告密制度，不久，他就被冤家投匦告密，落个伏诛的下场。

武则天为打击政敌而鼓励告密，简直用尽心机。她还下令规定，凡是地方上来京告密的，官员不能询问，并全都给驿站马匹骑乘，按五品官员待遇供给食宿，使这些人迅速而安全到达。告

密的人即使是农人樵夫，武则天也一律召见，并安置在国家的客馆里居住。召见时只要言谈符合武则天的心意，就破格授官；即使说的不实也不问罪。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造成了人人惊慌不安的恐怖局面。

武则天通过奖励告密的政策，很快就搜罗到一批专靠告密诬陷升官发财的酷吏无赖。有一个胡人名索元礼，因为他对武则天以威制天下的意图心领神会，遂通过告密获得召见，提拔为游击将军，专掌武则天下诏办理的“制狱”。索元礼性情残忍，审讯时必用严刑相逼，让一人广泛牵连达数十百人。武则天多次召见赏赐，以张大其权势。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纷纷仿效。周兴破格升至秋官（刑部）侍郎，来俊臣提升御史中丞。他们又各自私下豢养数百名无赖，专门从事告密。想陷害某一人，就指使几处同时告发，而且全是一样的内容。来俊臣与司刑（大理寺）评事万国俊以及党羽朱南山共同编造了《告密罗织经》一卷，有数千言，教 爪牙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极其周密，使被诬陷的人浑身是口也分辩不清。

武则天将告密者所揭发的人，交给来俊臣、索元礼等审讯。他们竞相制造残酷的刑具和施用骇人听闻的酷刑。索元礼做的大枷就有十种：“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在审讯中，他们有时用椽关住犯人手足而转动，称“凤凰展翅”；有时用物绊住犯人的腰，引枷向前，称“驴驹拔撅”；有时让犯人跪地捧枷，在枷上层层垒砖，称“仙人献果”；有时让犯人站在木桩上，引枷向后，称“玉女登梯”；有时用绳索将大石吊在犯人头上；有时用铁圈箍住犯人头，中间打进木楔，以至脑裂髓出。此外，还有“泥耳笼头”、“悬发熏耳”、“方梁压髁”、“碎瓦支膝”、“猕猴钻火”等等。来俊臣审讯囚犯，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囚禁地牢中。或装进瓮中，以火环烤。或不给饮食，还在寝处泼上粪尿。

他使犯人备受苦刑，直到身死。当时审讯，往往将刑具一摆，囚犯就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偶然遇到大赦，来俊臣就先令狱卒将重囚先杀掉，再宣布赦令。武则天认为来俊臣对自己忠忠耿耿，倍加宠信。由于她经常重赏这些酷吏，导致官吏争相仿效。

武则天推行的恐怖政策也受到有些官员的谏诤。麟台正字陈子昂上书，以为"执政者恨徐敬业首谋祸乱，要根除恶源，穷尽其党，遂使陛下重设严刑。臣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故扬州叛乱，但天下安然，无人响应。情况若此，陛下不应纵威刑以失天下人心。臣见各方告密，囚捕千百人，及经审讯，百无一实。陛下仁恕，曲法宽容告密不实者，遂使奸恶之党，恣意极复私仇。一人被讼，株连百人，至使天下不安。"他还例举隋朝杨玄感叛乱后炀帝滥行杀戮，至使雄杰并起而亡隋等历史教训，奉劝武则天谨慎刑罚，改变政策。武则天当然听不进这样的话。

从嗣圣元年二月武则天提倡告密之风杀掉十余名飞骑后，到天授元年建立周朝止，她以血腥的手段铲除了大量的政敌。

首先是文明元年（684年）她临朝称制后，为防有人利用废太子李贤反对自己，派丘神勣到巴州（今四川巴中）逼死李贤。同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以讨武匡唐名义起兵后，她在朝廷中制造裴炎谋反案，清除一批以裴炎为首的拥唐派文武官员。又利用徐敬业叛乱案，广泛诛连，使恐怖气氛弥漫朝廷内外。

垂拱三年五月，武则天杀掉了宰相刘祎之。刘祎之原籍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少年时就以文学出名，又以孝友为当时士族称颂。他曾是武则天"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一直受到武则天的重用。但他心存唐室，一次他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能废昏君立明主，哪里还用临朝称制，不如归政睿宗，以安天下人心。"贾大隐随即将这话密奏武则天。武得知后勃然大怒，对左右侍从道："刘祎之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从北门学士直到宰相高位，如今竟敢背叛我！"立即有人按照她的心意诬刘祎之接受

了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又和许敬宗的妾有暧昧关系。武则天命令逮捕下狱，让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当王本立到狱中口称宣敕时，刘祎之顶撞道："你宣读的东西没经过宰相副署的正常行政程序，哪里算什么敕旨！"王本立回奏后，武则天简直怒不可遏，以拒捍制使冒犯天威的罪名，赐死。

刘祎之刚被捕入狱时，睿宗因他拥戴自己而获罪，便上书申理。祎之亲友都认为武则天必会宽赦，于是纷纷向他庆贺。刘祎之长叹道："这样一来我定死无疑了。太后临朝独断，生杀随意，皇帝上表，正触犯她的忌讳，只会加速我的死期而已。"临刑前，他洗沐清洁，神色自若，自写谢表，援笔立成，词理恳切，见者无不哀痛。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叹其文采，武则天闻听不满，都被远贬外州。

同年九月，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假造圣旨在都市募人，要将被废中宗李显从房州接入京师。事件察觉后被斩首。

连镇压徐敬业叛乱的主将李孝逸也难逃厄运。因为他出师扬州大捷，凯旋而归，声望甚高，又是李唐宗室，武承嗣等感到他将是武氏篡权的一个劲敌，于是屡次向武则天暗进谗言，于垂拱二年二月，将孝逸贬为施州刺史。武承嗣等还不罢手，在垂拱三年九月，又使人诬奏，说李孝逸曾自解己名"逸"字说："名中有兔，兔，月中之物，月近天，当命为天子。"这就构成了谋反大罪。武则天表面念他有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功，于十一月下诏李孝逸减死除名，流放儋州（今海南岛），不久就死在那里。他的亲信崔知贤、董元昉、裴安期等被斩首。

大约也是在垂拱三年，武则天还除掉了一直反对她篡夺李唐权力的冯元常。元常是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高宗朝为官颇有政绩。高宗晚年多病，冯元常官居尚书左丞，深受重用。高宗常对朝臣说："朕体中不佳，有事可与元常商议后再奏闻。"元常察觉武后野心，曾密奏道："中宫威权太重，应稍加削夺。"高宗

虽不能采纳，但深知此言正确。武则天知道后便怀恨在心。到她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时，各地官员为取宠争献表示吉祥的符瑞。崇阳令樊文献瑞石，武则天命摆放在朝堂，让群臣观看，证明自己主政符合天意。但冯元常却奏道："樊文献瑞石实属谄伪，不可以此欺骗天下。"这使武太后大为扫兴，一怒之下贬为陇州刺史，后又改任眉州刺史、广州都督，虽在各地屡有政绩，武则天既不奖赏，也不许入朝。至此，酷吏周兴秉承她的意愿，终于将冯元常诬谄逮捕，害死在洛阳狱中。

垂拱四年，武则天又残忍地制造了郝象贤冤案。象贤是郝处俊孙。上元二年（675 年）三月，高宗因头痛目眩严重，和宰相们商议想逊位，让武后摄理国政。当时主要因郝处俊谏阻，使武则天提前独掌大权的一个良机化为泡影。她记恨心中，伺机报复。但郝处俊于高宗朝开耀元年（681 年）病逝，武则天将仇恨转移到郝象贤身上。垂拱四年四月，有个家奴诬告当时任太子通事舍人的郝象贤谋反，武则天抓住这一机会，命周兴审讯，并授意要陷郝象贤于灭族之罪。象贤家中人到朝堂，向监察御史任玄殖诉冤。玄殖奏称郝象贤没有谋反的罪证。随即遭到免官的处分。郝象贤心知武则天是报私仇，临刑时破口大骂，揭露武则天在宫中的丑事，并夺市人的木柴击行刑的刽子手，被管巡街的金吾兵乱刃砍死。武则天恨犹未已，命人支解象贤尸体，掘了父、祖坟墓，毁棺焚尸。自此以后，法官每次将死囚押赴刑场斩首时，必先用木丸塞住囚犯的口，使不能骂出声来。此制一直执行到武则天死为止。

杀郝象贤后仅三月余。面对武则天高高举起的屠刀，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起兵发难。武则天用军事力量镇压下去后，不失时机的清除一批参与起兵的李唐宗室王公。

垂拱四年十二月，宰相骞味道和儿子辞玉也被斩首。骞味道因按照武则天旨意办理裴炎案有功，从御史大夫晋升为宰相。但不久，有个官员被贬职，心中不服，找宰相申诉，骞味道说“这

是太后处分的。"武则天闻知，认为他"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于垂拱元年四月将他贬为青州刺史，直到垂拱四年九月才恢复了宰相职务。不料又遭到告密者诬陷，被捕入狱。武则天令侍御史周矩审讯。骞味道任宰相时看不起周矩，常说他什么事也做不好。周矩这时大权在手，乘机报复，对骞味道说："你常训斥我做不好事，今日我要替你把这件事做好。"于是以谋反罪将骞味道父子全都处死。

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继续铲除妨碍自己改朝称帝的李唐宗室王公。四月，以鄱阳公李諲案件大开杀戒。李諲是唐高祖孙，道王李元庆的儿子，当时任连州别驾，他谋划迎回中宗复位。案发后，武则天不仅杀了李諲，还乘机株连杀戮了太宗子蒋王李恽的长子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等宗室王公共计十二人，还将这些人的家属流放到巂州（今四川西昌）。随后，天官（吏部）侍郎邓玄挺也被诛杀。邓玄挺是李諲岳父，又和李炜交好。李諲谋迎中宗复位时，征询他的意见，他拒不回答。李炜也曾问计，他依然这样。虽然如此，但仍犯了知反不告的死罪。

同年，纪王李慎也命赴黄泉。李慎是太宗第十子，少好学习，擅长文史。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晋升太子太师，任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宗室谋划起兵，越王李贞和他联络，可他认为时机不成熟，拒绝参与。后李贞起兵失败，李慎也株连入狱，临刑前因查明这一情况而免死，关押在贝州狱中。这年七月，判发配巴州，但因禁在栏车中行至蒲州（今山西永济西）而亡。徐州刺史东平王李续、沂州刺史义阳王李琮、楚国公李叡、遂州别驾襄郡公李秀、广化郡公李献、建平郡公李钦等李慎的五个儿子也相继被杀，家属流放岭南。

八月，徐敬真一案使武则天又杀贬一批大臣。徐敬真是徐敬业的弟弟。敬业在扬州叛乱失败后，他被流放到绣州（今广西桂平西南）。后逃归，想北投突厥，途经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

阳令张嗣明给衣粮遣送。但到定州（今河北定县），被官吏抓获。弓嗣业被捕入狱后，自缢而死。张嗣明、徐敬真在被审时胡乱招供，广泛牵连海内相识的人，想借此免己一死，这样朝野人士中很多人以谋反罪被杀。张嗣明诬陷宰相张光辅，说他当年征讨越王李贞任诸军节度使时，私下议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以观双方胜败。张光辅遂因此被杀，家口籍没。敬真、嗣明未能幸免，一同斩首。还杀了陕州参军弓嗣古、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尚方监王令基。彭州长史刘从易也被徐敬真诬引。他为官清廉，临刑时，彭州百姓可怜他无辜遭难，纷纷奔赴刑场，争相脱衣投地，说"为长史祈求冥福"。这些衣物价值竟达十余万。被徐敬真诬引与敬业相通谋反的，还有秋官（刑部）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义，原"北门学士"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临刑时，武则天派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口喊赦令停刑。张楚金等闻听死里逃生，欢呼跳跃。唯有魏元忠安坐不动。有人告诉他无事了，站起来罢。元忠道："还不知敕令是真是假。"王隐客到后又叫他起来，元忠道："等宣赦后再说。"直到宣敕完毕，才徐徐站起，竟然毫无忧喜之色。他们被免死后都流放到岭南。

闰九月，宰相魏玄同被武则天赐死于家。魏玄同是高宗朝老臣，上官仪草敕废武后未成时，魏玄同因与上官仪有文章交往而发配岭外。似乎此时就得罪了武则天，后遇大赦回京又任官。高宗朝后期累升至宰相高位。他与裴炎交友，生死不渝，时人称为"耐久朋。"酷吏周兴恨魏玄同。原来，高宗朝，周兴任河阳令，一次，高宗要召见他加以擢用，因有人反对而作罢。周兴不知，多次到朝堂等候。其他宰相都不明言，只有魏玄同好意相告道："周县令可以回去了。"周兴认为自己不得升官是魏玄同从中作梗，从此怀恨在心。武则天重用酷吏清除政敌，周兴遂利用裴炎案件以及魏玄同与裴炎的莫逆之交这一点，诬陷玄同曾说过："太后老了，不如奉储君执政。这样我们可以久居宰相高位。"武则天顿时大怒，

立即下令赐死。监刑御史房济对玄同说："您可以声称有机密相告，获得召见。当太后面陈述实情。"玄同不肯沾污人格，长叹道："人杀鬼杀，有何不同？怎能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勾当！"遂慨然受刑。此外，还秘密杀了夏官（兵部）侍郎崔詧，又有一批内外大臣受牵连被杀或遭流贬。

不久，周兴又诬陷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武则天下令逮捕入狱。这位原籍百济的大将，骁勇而有谋，多次率军驰骋边疆沙场，屡立战功，使吐蕃、突厥军畏惧。而且他一贯爱惜将士。有一次，他的坐骑被士兵弄伤，他不许鞭打，说："岂有因损伤私马而惩罚官兵的道理！"因功所得赏赐都分给部下将士，深得军心。然而这时有冤无法申诉，于十月初九（戊午），自缢狱中而死。当时人无不可惜这员名将。初十（己未）武则天杀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长子鄂州刺史嗣郑王李璥等六人。当时，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的儿子嗣滕王李脩琦兄弟六个也身陷诏狱，侥幸免死，于十一日（庚申）流放岭南。

右卫胄参军陈子昂上书，以为："太平盛世，不应每日有乱臣贼子，接连诛杀。近来大狱增多，逆党滋广，实有无罪之人误遭逮捕。其因是陛下务在宽刑，狱官专在苛严，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臣请陛下亲自讯问狱中系囚：真有罪的，显以明刑；违法滥刑，严惩狱吏。这样才能服天下人心。"这次与垂拱二年上书一样，不可能有任何效果。本月三十日，武则天下诏，令高祖的太穆神皇后，太宗的文德圣皇后应配皇地祇享受祭祀。同时将已死的生母尊为忠孝太后，一起享受祭祀。十一月初一（庚辰），武则天驾御万象神宫，大赦天下，开始改用以十一月为岁首的周代历法，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以夏正月为一月。并改唐朝的"宾恪"制度（古代建国要封前代帝王的后代为宾恪，加以礼敬，目的在笼络前朝遗老遗少）。唐本以宇文氏的后周和隋的后代为宾恪，武则天改封周、汉的后代为二

王，以舜、禹、成汤的后代为三恪。这时，武则天堂姐的儿子凤阁侍郎宗秦客别出心裁地改造十二个字进献；"照"为"曌"等等，武则天颁令推行。她还自取名为"曌"。随后，周兴又乘机提出除去唐亲属的宗室属籍。显然，这都是为改朝换代所做的提前准备。

武则天这时特别重用自己的武姓亲族，侄子武承嗣、武攸宁官居宰相，武三思为夏官（兵部）尚书。这些人全无德才，只因他们都极力支持武则天取代李唐而已。由于武承嗣、武三思专权跋扈，绝大多数宰相都对他们低三下四，但韦方质例外。载初元年一月，韦方质因病告假在家，武承嗣、武三思到府中探视。韦方质卧床不起，左右劝道："您见权贵这样不恭，恐招危祸。"方质道："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奴颜卑膝讨好外戚！"不久，韦方质就被酷吏周兴、来子珣诬陷，流放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家口籍没入官。

四月，宰相范履冰下狱死。范履冰早期以"北门学士"进用，在禁中为武则天效劳二十余年，最受信任，参与政事，助武则天分割宰相权力。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提拔为宰相。这时只因以前举荐的人犯谋逆罪而株连身死。

七月，舒王李元名和子豫章王李亶被武则天杀死。李元名是高祖第十八子，生性高洁，不贪钱物。曾告诫李亶道："我等藩王所缺的不是钱财官职，而是力行善事，以忠孝为本。"父子两历任外州刺史，俱有善政。元名在石州（今山西离石）二十余年，赏玩林泉，竟有脱离凡尘之意，但也没逃脱厄运。诬陷的人名侯思止，本是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北）的一个狡诈无赖，先以卖饼为业，后到游击将军高元礼家当仆从。恒州刺史裴贞杖罚部下一个参军，这人怀恨在心，遂指使侯思止告密，说裴贞勾结结舒王李元名谋反。这恰中武则天铲除宗室心怀，李元名父子就这样做了屈死鬼，裴贞也被灭族。当时凡告密有功的可得五品官位，武则天提升侯思止为游击将军，但他要求当御史。武则天问，"卿不识

字，岂能任御史?”侯思止道：“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原来獬豸是传说中的野兽，生一支角，性忠直。见人打架，则触那个理亏的人；听人争吵，则咬那个胡搅的人。武则天听了侯思止的诡辩，很是高兴，立即授与侍御史要职。不久，武则天又赐给他先前没收的一所私宅。侯思止不要，说：“臣最憎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武则天更加赞赏。其实这都是高元礼教的。

几乎与上述冤案同时，又制造了邑斋冤案。告密人王弘义是衡水县（今河北衡水西）的无赖，此人曾向邻居讨瓜吃，邻居不给，他怀恨报复。跑到县官处报告，说邻居的瓜田里有白兔，是一祥瑞。因武则天临朝后一直提倡各地献祥瑞，这个县官立即派人搜捉，瓜田因此被践踏而毁。武则天奖励告密，王弘义就到处寻求机会，当游到赵州（今河北赵县）、贝州（今河北清和西）时，看到乡间老人主持作邑斋，这本是民间平常的祭祀活动，他竟诬告聚众谋反，无辜百姓就这样被杀二百余人。而王弘义则被擢升为殿中侍御史。不久有人密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武则天令王弘义前往审讯，安仁不服，他竟在枷上将王安仁斩首。又杀安仁子，把两人首级装入匣中带回。途经汾州（今山西汾阳），州司马毛公设宴相请，不料饮宴未完，王弘义就喝令将毛公拉下阶斩首，还枪挑首级入洛阳，见到此景的人无不毛骨悚然。

仍在这年七月，武承嗣让周兴诬告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李上金是高宗第三子，杨氏所生，早就为武则天所恶。李素节是高宗第四子，萧淑妃所生，更被厌恶。两人受诬陷后奉召回洛阳。素节从舒州（今安徽潜山）起程时，闻听哭丧声，长叹道：“能够病死真是幸事，何须悲哭啊!”已预感到将遭不测。果然行到洛阳城南龙门驿，被缢死。儿子李瑛、李琬、李玑、李玚等九人被武则天杀掉。只李琳、李瓘、李璆、李钦古因年纪太幼小，令免死而长期囚禁在雷州（今广东海康）。李上金囚禁在御史台，闻听李素节一家情况，恐惧得也自缢而死。儿

子李义珍、李义玫、李义璋、李义环、李义瑾、李义璲等七人流放到显州（今吉林敦化）而死。只有李珣逃到岭外，匿身于佣保之间，侥幸获免。两王党羽也遭到牵连杀戮。

同年八月十一日（甲寅），武则天杀宰相裴居道，他是原太子李弘的岳父。二十日（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二十八日（辛未），杀高祖第二十一子李元晓的长子南安王李颖、鄅国公李昭以及李直、李敞、李然、李勋、李策、李越、李黯、李玄、李英、李志业、李知言、李玄贞等宗室十二人。至此李唐宗室已被杀戮殆尽，其中幼弱的也流放到边远荒地，还杀这些王公亲党数百家。

武则天一批一批杀戮李唐王公，特别是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中德高望重的皇子。因为这些人是她夺取皇位的最大障碍。这三代皇子除了武则天亲生的李显、李旦外，在世的全部被杀尽。李唐宗室后裔中只有俯首贴耳、平庸无才或宗枝较远的才得幸免。如唐高祖女千金公主以谄媚得全。她以前给武则天推荐了僧怀义，后虽身为武则天的姑姑辈，却请求做武则天的女儿，改姓武氏，讨得武则天的欢心，并赐号“延安大长公主”。再如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长子李仁，性格急躁而又无才，但会迎合武则天心理，他多次进献祥瑞，庆贺武则天临朝，从而保全了性命。

武则天对唐廷大臣的打击也十分沉重，因大臣中的拥唐派是她改朝换代的另一大障碍。大臣们只要稍露匡救李唐社稷或只凭有人诬告有这样的企图，武则天非杀即贬，决不手软。当时武则天在丽景门内特设制狱，由酷吏来俊臣等负责。凡入此狱的无一生还，因此丽景门被称为“例竟门”。朝中官员人人自危，相见不敢答言，道路以目。有些官上朝后，突然被捕下狱，从此下落不明。这样，官员每次上朝，常与家中人诀别道：“不知还能再见面否？”。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废中宗囚禁外地，软禁睿宗于宫内；用军事手段镇压了徐敬业叛乱和宗室中李贞父子起

兵；用严刑酷法不仅将李唐宗室主要政敌杀戮干净，而且使相臣中再也形不成拥唐反己的强大势力集团。此外她还需要在理论上做准备。

武则天要以女主君临天下，要想证明她这一行为的合理性，决不可能在儒家经典中找到根据，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武则天母亲杨氏笃信佛教，她幼年时就深受佛教影响。东魏国寺僧法明和僧怀义体察了武则天的心意，将四卷《大云经》附以新疏，巧为附会，于载初元年七月献上。其中说："武太后乃弥勒佛降生，当代唐为人世之主。"《大云经》原本出自天竺，其中有菩萨转化为女身当国王的经文，这就为武则天提供了对抗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武器，也论证了她当女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武则天异常欢喜，随即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随后又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收藏《大云经》，还度僧千人，让僧升高坛讲解。一时间，大云寺遍布全国，女皇当君临天下也广为宣传。佛教经典为武则天披上了神秘的灵光。

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时机完全成熟了。载初元年九月（690年），她及时地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劝进"闹剧。这月初三（丙子），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余人到宫门前上表称武氏符瑞，请改国号为周，赐睿宗李旦姓武。武太后佯装不允，但将傅游艺晋升为给事中。这一褒奖的暗示发出后，紧接着文武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僧人道士达六万余人纷纷上表，仿效傅游艺的恳求，声势浩大。睿宗迫于压力也只好上表自请赐姓武氏。初五（戊寅），群臣又编造祥瑞上奏，说有凤凰自明堂飞入上阳宫，又落在肃政（御史）台的梧桐树上，很久才向东南飞去。还说："有赤雀数万只飞集在朝堂等等，以显示改朝换代符合天意。初七（庚辰），武太后这时才恩准皇帝及群臣的请愿，并于初九（壬午）重阳节这天驾御则天门城楼，大赦天下，宣布周朝正式建立，改年号为"天授"，普天同庆七日。十三日（乙酉），群臣上

尊号称“圣神皇帝”。降睿宗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降皇太子李成器为皇孙。

十三日（丙戌），在洛阳立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妣姒氏为文定皇后；平王少子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妣姜氏为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武克己为严祖成皇帝，妣为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武居常为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武俭为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武华为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武士彟为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称皇后。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封武士彟兄孙武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都为郡王；封兄孙延基等六人也为郡王；诸姑姐都为长公主。武则天援引遥远姬姓周文王为自己始祖，并伪称武氏出自姬姓，实在荒唐不经，只因苦于自己先世没有门第封爵，只得胡乱攀附，为新成立的武周皇帝制造高贵的社会出身背景。

与此同时，女皇将对她有功的一批官员大大提升：宗秦客曾暗中劝武则天改朝换代，因此从凤阁侍郎升为内史（中书令）。傅游艺则从给事中破格提为鸾台（门下）侍郎、平章事，两人都登上相位。傅游艺和酷吏丘神勣、来子珣等还赐姓武。天下姓武的也为此沾了点光，女皇在十月命各地免除武氏课役。

天授二年正月初一（癸酉），女皇武则天在万象神宫隆重地接受了群臣所上的尊号，并改旗帜为赤色。初二（甲戌）下诏，将周的社稷建于洛阳。初九（辛巳），武氏神主在太庙中安置妥当，同时将唐室长安的太庙降为享德庙，而且只祭礼高祖、太宗、高宗三位亡灵。将武氏在长安的崇先庙升为崇尊庙。十三日（乙酉）女皇在明堂举行庄严的祭礼：昊天上帝在上，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享，唐高祖、太宗、高宗放在最后，至此，这位女皇登基大典的各种礼仪进行完毕，而且完全按照一个新王朝建立的规格。

女皇建国这段历史，《新唐书 · 则天武后传》这样概况说：武

则天要改朝换代，然畏人心不肯归附，乃阴险残忍，肆斩杀怖天下。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牙，对不恭顺或素常疑惮的人，必罗织陷害。于是，宗室王公以及骨鲠将相连遭斩首，血流牢狱，家家惶恐不能自保。这样武太后稳坐深宫而国命已移。”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03—204

两唐书：《武则天本纪》、《武则天传》、《索元礼传》、《来俊臣传》、《周兴传》、《刘祎之传》、《李孝逸传》、《冯元常传》、《郝象贤传》、《纪王慎传》、《张光辅传》、《魏玄同传》、《黑齿常之传》、《滕王元婴传》、《武承嗣传》、《武三思传》、《武攸暨传》、《韦云起附方质传》、《元万顷传》、《范履冰传》、《舒王元名传》、《王弘义传》、《侯思止传》、《泽王上金传》、《许王素节传》、《章怀太子贤传》、《徐有功传》、《傅游艺传》

《唐会要·酷吏》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武曌与佛教》

马俊民《唐代匦使院制考论》载《天津师大学报》1990年1期

女皇治术

当武则天坐上女皇宝座，已经没有人敢公然反对了，但为预防可能的颠覆以及一切不利于自己政权的行为，她继续推行临朝称制时严厉镇压的恐怖政策。就在天授元年（690 年）十月，女皇毫不留情地处理了宗秦客案。秦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在她当太后时就潜劝革唐建周，武则天称帝后将他擢升为宰相。时仅月余，因犯贪脏罪贬为遵化尉。他的弟弟宗楚客、宗晋卿也因奸脏罪流放岭外。宰相邢文伟平时附合宗秦客，被贬为珍州刺史。不久，奉诏出使的使者至州，文伟以为杀己而来，惧而自缢死。同月，年初遭酷吏周兴陷害贬儋州的前宰相韦方质也被杀掉。

还是这一年，道州刺史李行褒及弟榆次令李长沙为酷吏唐奉一诬告，以谋复李氏帝位罪被杀。秋官郎中徐有功辨冤不成，被周兴反咬一口，说："有功包庇谋反囚犯，罪当斩首。"武则天不允，只将徐有功免官。

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跋扈，上书道："今告密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大奸阴谋离间君臣。古时断狱，公卿参听，然后上奏于王，王命三次复核落实，才能行刑。但近来狱官奉命出使审讯，案情一定，法官依断，不令复审；有时还临时专断，不再奏闻。如此，则权在臣下，非审慎之法，倘有冤滥，岂能知晓！况且以九品小官专命审讯，操生杀之柄，窃人主之威，审案权既不在刑部，复核权也不在门下。国家刑罚大权，就这样轻易交付他人，恐成社稷之祸。"李嗣真在这里奉劝女皇不要破坏正

常的执法制度，然而这正是她以厉行的残酷镇压来巩固统治的手段，李嗣真上书当然不会被采纳了。

同月，尚衣奉御刘行感和他的兄弟雅州刺史刘行实、渠州刺史刘行瑜、兄子鹰扬郎将军虔通等被酷吏来子珣诬谋反被杀，并将其父左监门大将军刘伯英的棺柩捣毁。刘行实等是当年独在盱眙县抵抗徐敬业而擢官的刘行举的兄弟和侄子。宰相史务滋与来俊臣同审此案，来俊臣奏："史务滋与刘行感有私交，总是掩盖反状。"女皇大怒，命来俊臣追究，务滋惧而自杀。他是女皇登基后首批擢升的宰相，任期仅四个月。

天授二年一月，丘神勣被人告发谋反。丘神勣是著名酷吏之一，武则天指派他到巴州害死废太子李贤后，很受重用。后又率军镇压琅邪王李冲起兵，亲手挥刃杀尽博州官吏达千余家，官升至左金吾卫大将军。这时以谋反罪下狱伏诛。

又有人告发秋官侍郎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女皇密令来俊臣审讯。来俊臣面对这个不亚于自己的酷吏，想出一条毒计。一次，这两个大酷吏对面相坐，饮酒进餐。来俊臣装作很谦恭的样子向周兴请教一个问题："大多数囚犯不肯承认谋反罪，周卿有何妙策？"由于周兴还不知自己也被人告了密，洋洋得意的说："这还不容易！取一个大瓮，以炭火周围炙烤，令犯人进人其中，无论何事，还愁他不招认！"来俊臣立即叫人取来大瓮，周围以火烘烤，完全按照周兴的办法。来俊臣站起，突然说道："我奉旨审讯老兄谋反，就请进入此瓮中吧！"周兴闻听魂飞魄散，连连叩头认罪。按法律，周兴罪当斩首，武则天念他 助自己即帝位有功，免死流放岭南。但途中被仇家杀掉。

酷吏索元礼，徐敬业扬州举兵失败后于洛州审讯该案。他生性残忍，每审一人，就严刑逼供，株连数十百人。他和周兴竞相残害无辜，前后杀戮各数千人，官吏百姓畏之如虎狼，武则天这时也将索元礼杀掉，以平民愤。

同年八月，来俊臣奉命审讯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和大将军内侍范云仙。张虔勖即武则天命令率军进宫废唐中宗的原羽林将军之一。这时受来俊臣严刑逼供，不堪苦痛，向徐有功申诉。来俊臣大怒，命卫士乱刀砍死，枭首示众。范云仙自言历事先朝，也称冤枉，来俊臣命人将舌割下。

随后，有人告发武思文曾参与徐敬业谋反。武思文本名徐思文，是徐敬业叔父。任润州刺史时，城破被敬业俘虏，拒不投降，受到武则天嘉奖，赐姓武氏，晋升至地官尚书。这时，女皇令流放岭南，复姓徐氏。

同年九月，来俊臣审讯岐州刺史云弘嗣，一句没问，先砍头再造假案上奏。杀张虔勖后也是伪造的假案。但武则天一一批准，海内钳口，无人敢言。

这月，宰相傅游艺下狱后一命呜呼。此人即带头率众上表恳请则天登基建周者。他于载初元年（689年）任合宫主簿（九品），因百般投武则天登女皇宝座之所好，一年之内历左补阙（七品），给事中（五品），直到三品相位。官服也由青、绿、而朱、紫，时人号称“四季仕宦”，以形容他升官之快。女皇还赐姓武氏，一时大受宠幸。傅游艺小人得志，飘飘然忘乎所以，梦登湛露殿。他情不自禁地把这皇帝梦告诉了亲信，不想被告发，以谋逆罪下狱自杀。女皇命以五品礼埋葬。

宰相岑长倩、格辅元因反对武承嗣图谋代替李旦为皇太子，遭到诸武陷害，被捕入狱。来俊臣乘机逼迫岑长倩子岑灵原诬引宰相欧阳通等数十人谋反。欧阳通被来俊臣拷问时，尽管毒刑用尽，终无异词。来俊臣编造假案上奏。这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一同被杀。而二十五日（壬戌）宰相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又被杀。李安静是隋唐间名医李纲孙，其兄李安仁永徽年间任太子李忠的东宫僚佐。李忠被废时，僚属奔散，独安仁泣拜而别。当武则天改唐为周之际，王公百官纷纷上表劝

进，又独有李安静严辞拒绝。下狱后，来俊臣审问他谋反详情，安静凛然回答："因我是唐家老臣，要杀便杀！若问谋反，无言可告！"乐思晦是高宗朝宰相乐彦玮子，他死因不明，似和李安静一样，都因被女皇疑忌忠于李唐皇室，通过酷吏予以铲除。

天授三年一月，来俊臣诬陷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以及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此，来俊臣曾奏请降旨，凡谋反罪下狱后一问便承认的可以减死。任知古等人被捕入狱，来俊臣以此诱供。狄仁杰叹道："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受诛戮。反是实。"来俊臣的属下王德寿也想浑水摸鱼，对狄仁杰道："看来你一定能减死了，现在我想升官，请你帮我诬引宰相杨执柔！"狄仁杰闻听痛不欲生，大呼："皇天在上，狄仁杰怎能干这等事！"以头触柱，血流满面，吓得王德寿连忙离开。

侯思止审讯魏元忠。这个无赖出身的酷吏大喝道："急认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是洛阳一个山坂的称号，"孟青"即杀琅邪王李冲的孟青棒。侯思止目不识丁，审讯时常以此语吓唬犯人，意思是不招供便用棒打。魏元忠宁死不屈，侯思止怒，命人倒曳。元忠从地上慢慢爬起，讥讽道："我薄命，如乘驴坠，脚挂于镫，被拖曳了。"侯思止更怒又曳，还扬言要以拒捍制使罪奏斩。魏元忠急中生智，唬这个恶棍道："侯思止，你今为国家御史，应懂得礼法。如想要我的头，就用锯截去，为何逼我承认谋反！你身穿朱紫官服，亲奉圣旨，不行正直之事，而胡说'白司马'、'孟青'，这是什么话！除非我魏元忠，没有人告诉你其中利害！"一番教训，使侯思止摸不着头脑，以为自己的信口胡说惹了大祸，惊惧而起，口中道："思止死罪，蒙中丞指教。"并请元忠落坐。魏元忠将这个酷吏捉弄了一顿。从此，侯思止审讯魏元忠也放松了。此事后来流传开来，时人以为谈笑的资料。一次，侍御史霍献可当面嘲笑，侯思止恼羞上奏，女皇怒问霍献可：

"我已用他任官，你为何如此？"献可将详情如实禀告，女皇也不由得哈哈大笑。

狄仁杰已承认谋反罪，只等行刑日期，来俊臣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乘机拆下被头书写冤状，藏入绵衣，交给王德寿，说天气热了，让家人去掉丝绵，德寿没有察觉而照办。狄仁杰子光远得状后上告，被女皇召见。女皇阅后问来俊臣。他诡称狄仁杰等下狱，从未用刑，寝食安然，如无事实，怎肯承认谋反。女皇派通事舍人周綝前往察看。来俊臣将狄仁杰等穿戴整齐，站立西侧，叫周綝察验；周綝连看都不敢，面冲东，口中只称是是而已。来俊臣还让王德寿伪造狄仁杰作谢死表，交周綝呈上。

狄仁杰等性命危在旦夕，这时出了一个救星，竟是三个月前被杀宰相乐思晦的不满十岁儿子。父死后他被籍没入司农寺为官奴婢，这时上书称有密事相告，获得召见。他勇敢地对女皇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可惜陛下法律被来俊臣等肆意破坏。陛下不信臣言，请择朝臣内忠正清廉、陛下素所信任的，假做反状交来俊臣等审讯，无不承认谋反。"女皇闻听，意稍醒悟，召见狄仁杰等，问他为何承认谋反？仁杰答道："如不承认，早已死在鞭笞之下了。"女皇又问为何作谢死表？仁杰答无有此事。拿出表后弄清其中有诈，这七家才逃离死罪。但活罪不免：任知古贬江夏令，狄仁杰贬彭泽令，卢献贬西乡令；裴行本、李嗣真流放岭南。

来俊臣、武承嗣还不放手，屡次奏请诛杀狄仁杰等人，武则天不允，声称："朕好生恶杀，志在宽刑。诏令已出，不可更改。"来俊臣又说裴行本潜行悖逆，罪情尤重，罪当处斩。秋官郎中徐有功驳奏道："明主有赐再生之恩，俊臣不能顺其美，是亏损陛下恩信。"来俊臣不敢再言。殿中侍御史霍献可是崔宣礼的外甥，竟然面奏道："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死在殿前。"说罢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以示不私己亲。武则天也不听。霍献可常用绿帛裹伤，在幞头下微微露出，希望女皇看到能欣赏自己的忠心。

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勒索金宝，献诚不给，被诬陷谋反入狱。泉献诚本高丽人，其父泉男生降唐。天授元年，武则天出内库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中选善射的五人一赌输赢。献诚第一，但他谦让给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吐摩复让献诚。献诚这时奏道：“陛下令选善射的人，但今日多非汉官，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武则天点头称善。然而，这样一员大将遭酷吏诬陷后勒死于狱中。时间是一月初九（乙亥）。

这年四月改年号为“如意”。六月，万年县主簿徐坚上书，认为：“律令明文规定，死刑须经三次复奏批准，才能执行。可如今敕令审讯谋反的，让使者只要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冤枉，岂不痛哉！此不能肃奸逆而明刑典，恰可助长某些人作威作福。臣望绝此弊端，依法办事。”又说：“法官任重，宜加精选。有用法宽平，受百姓称赞的，愿亲而任之。有处事苛酷，不合人心的，愿疏而退之。”

这一上书和天授二年正月李嗣真上书内容相似，也力图改变女皇利用酷吏推行的恐怖政治。但时过境迁，结果却不尽相同，它似乎起了一点作用。因为武则天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而刺史、郎将以下官员，不可胜数。这时，告密的仍然很多，女皇也厌烦了。于八月令公正敢言的监察御史严思善复查酷吏审讯的案件，其中被屈打成招的达八百五十余人，酷吏及其党羽的嚣张气焰从而受挫。

反对酷吏恣横的朝臣还有宰相李昭德，右补阙朱敬则，侍御史周矩。当时，百官对酷吏畏如虎狼，李昭德却能廷奏其奸。朱敬则深知武则天滥刑杀戮目的在禁止对她当女皇的异议，今革唐建周大功告成，应宽省刑罚。遂上书道：“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统一天下；但不知易以宽知，终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劝行礼义，享国长久，此知变之善。陛下自临朝称制以来，韩、霍诸王流言蜚语，徐敬业等举

兵叛乱，不严刑峻法，不能摧奸息暴；故置铜匦，开告密，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九州易主。然而前时妙策，今当变通。愿陛下阅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挫奸险之锋，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百姓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女皇欣赏这一看法，赐帛三百段。

周矩也上书道：“酷吏审讯竟相残忍，施以严刑。人非木石，且救目前，何罪不认。臣在下常听议论，都说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只不过难忍毒刑自诬罢了，愿陛下明察。今满朝惴惴不安，都认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性命难保。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女皇颇纳此言，制狱稍衰。

但是，女皇并没有彻底改变严刑诛杀政策，政治气候乍暖乍寒。严思善奉女皇命，乘机遏制了酷吏的滥刑，这些人怀恨在心，共同陷害思善，不久严思善就被流放到荒远的驩州（今越南荣市）。女皇虽知其冤枉，但五年后才召回任官。

如意元年（692 年）九月初九（庚子），女皇又改年号为“长寿”。这月的二十二日（癸丑），宰相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以及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都被酷吏王弘义诬陷，流放岭南。其中王璿是王德俭子，崔神基是崔义玄子。他们的父亲都是助武则天争皇后时的亲信。

不久，酷吏来子珣获罪发配爱州（今越南清化），死在那里。此人是永昌元年（689 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时当的监察御史，毫无学术，厚颜无耻，只会揣测武则天的旨意诬告、审讯，也曾深受信赖，赐姓武氏。来子珣这时被女皇流死是武则天推行酷吏诛杀政策有所变动的又一迹象。

女皇仍然决不容许有任何可能危及帝位的行为，皇嗣李旦妃刘氏和德妃窦氏因此含冤而死。刘妃是李旦原配，李旦即帝位时，她被封为皇后。女皇登基降为皇嗣妃。窦妃即唐玄宗的生母。原来武则天有一婢女韦团儿，谄佞多端，大受女皇宠信。她勾引李

旦，遭到拒绝，恼羞成恨，于是作桐人偷埋在两妃院内，密诬她们诅咒女皇。长寿二年正月癸巳（962 年 11 月 2 日）刘妃、德妃到嘉豫殿朝拜女皇，一同被杀，秘密埋在宫中。后来睿宗即位，不知尸骨所在，追谥为皇后，只好招魂于洛阳城南。

二妃冤死后，李旦心中非常痛苦，但恐怕违旨获罪，口不敢言，还要在母亲面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韦团儿还想进一步陷害李旦，有人将实情上奏，女皇才将她杀掉。

德妃母亲庞氏也被奴仆告发获罪。当时，告密的人都引诱奴婢告发主人，以求功赏。德妃父窦孝谌任润州刺史，家中有一奴仆妄为妖异恐吓庞氏。庞氏惧，问如何消灾，此奴说夜间祠祷可以除解。庞氏依法照办，随即被这个奴仆告了密。诏令监察御史薛季昶审讯。季昶诬庞氏与女德妃共同祝祷诅咒。上奏时先装出悲不自胜的模样，煞有介事地说："庞氏所为，臣子实不忍言。"女皇立即升薛季昶为给事中，令将庞氏处斩。

庞氏子窦希瑊到侍御史徐有功处讼冤。徐有功上奏，证明庞氏无罪。薛季昶诬徐有功包庇恶逆罪犯，奏请交付司法，判处绞刑。徐有功僚属将此情相告，他视死如归，闻讯泰然，寝食无异平日。有人怀疑徐有功外强中干，必在家中忧惧，遂夜间悄悄窥探，不料他安然熟睡。

女皇召见徐有功，劈头便问："卿近来断狱，为何判那么多人无罪？难道你不知误出犯人，是失出罪！"他安然答道："失出，是人臣的小过；好生，是圣人的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则天下幸甚！"女皇沉思不语，庞氏因此免死，与三个儿子流放到岭南，窦孝谌贬罗州司马，徐有功也受到罢官处分。

刘妃、德妃遇害后三个月余，大祸又降临李旦头上。长寿二年一月甲寅（693 年 1 月 14 日），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私谒太子被腰斩于市。范云仙一年多前被来俊臣审讯时割去了舌头。这两人都忠于唐室，惹恼了女皇。自此以后，公卿以下都

不得拜见太子。这时，又有人投石下井，密告太子潜有异谋。女皇立即令来俊臣审讯李旦左右。酷刑之下，众人不胜痛苦，皆欲屈打成招，只有太常工人安金藏对来俊臣大呼道："你不信金藏的话，我剖心证明太子不反。"说着用佩刀剖腹，五脏并出，血流满地，昏死过去。女皇闻听大惊，命人用轝抬入宫中，派御医复原五脏，以桑皮线缝合，敷好药，经夜才苏醒。女皇从此事相信李旦没有夺权之举，也受到了感动，亲临看望安金藏，叹息道："我有子不能自明，使你至此。"遂命来俊臣停止追查此案，李旦从而幸免于难。

同年二月，补阙李秦授上书，说："陛下自登基，诛斥李氏宗室及大臣，将其家属流放，约有数万人。论语有'代武者刘'、'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一旦同心谋反，恐社稷必危。"武则天随即派万国俊赴岭南按问。这个酷吏到广州后，将流人都召集起来矫称有旨，皆赐自尽。流人号呼不服，万国俊将他们驱至水边，全部杀掉，达三百余人。然后伪造反状回奏，并诬称诸道流人都有怨恨谋反的，不可不早加诛除。女皇很赞赏这一看法，提升万国俊为朝散大夫、侍御史，又派酷吏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大贞、屈贞筠分赴剑南、黔中、安南诸道审讯流人。刘光业等因万国俊多杀获赏，争相效仿。他杀七百人，王德寿杀五百人，其余少的不下百人。其中有些是远年流人，和武则天革唐建周并没关系，也一同被杀。事后女皇知道冤滥，赦免了幸存的流人及家属，允许他们回归原籍。万国俊等六名杀人恶魔不久相继死去，或获罪流窜而亡，无一善终。此外，酷吏侯思止因违反不许人间私藏锦缎的禁令，也在这月被宰相李昭德杖杀于朝堂。

来俊臣诬告冬官尚书苏干，说他在垂拱年间任魏州刺史时与琅邪王李冲勾通谋反。苏干母是唐太宗女南康公主。他任魏州刺史时督察奸吏，劝导农桑，很有政绩，后升至冬官尚书，引起来俊臣的忌恨。这时抓住他和唐皇室的姻亲关系进行陷害，于四月

被杀。

长寿二年（694年）八月，宰相崔元综因罪流放振州。此人表面谨慎忠厚，而内心刻薄。每受诏审狱，吹毛求疵，必断以重刑。被流放后，朝野无不庆贺。大酷吏来俊臣经常贪赃受贿，曾被御史纪履忠弹劾，下狱当死。女皇念其告密之功，免死为民。长寿二年提升为殿中丞，这年九月又犯赃罪贬为同州参军。与此同时，那个捕杀赵、贝二州作邑斋百姓二百余的恶棍王弘义，也因罪流放琼州（今海南琼山）。他贼心不死，诈称有敕召还，途中遇侍御史胡元礼，元礼看他形迹可疑，加以审问，查清奸谋，将这个酷吏杖毙。

同月，宰相李昭德遭女皇疑忌而获罪。李昭德很有才干。如意元年（692年）他任夏官侍郎，曾向女皇密奏“魏王武承嗣权太重。”女皇说：“他是我侄，心腹之人，所以委以重任。”昭德说：“侄和姑的关系有父子间亲近吗？子还有篡父位的，何况侄呢！今承嗣既是陛下侄，封亲王，又任宰相，权近人主，臣恐陛下不能久安皇位了。”女皇闻听大为震惊，说：“朕没有思虑到这一点。”随即将侄武承嗣、武攸宁以及娘家侄杨执柔全部免去相位，李昭德由此升任宰相。武承嗣得知也诋毁他，但女皇说：“自我任昭德为相，始得安眠。他代我劳苦，你不要多言。”李昭德不畏酷吏，杖杀侯思止，摧折来俊臣等嚣张气焰，而且有时还敢违背女皇之所好。女皇好祥瑞，长寿元年有人献一块白石，上面写有赤文。宰相们询问这有何奇异？答道：“表示赤心。”李昭德大怒道：“此石赤心，难道其它石头都谋反！”襄州人胡庆用丹漆写“天子万万年”于龟腹上，到洛阳献祥瑞。李昭德用刀刮尽，奏请依法问罪。被女皇阻止。

李昭德仰仗女皇信任，专权使气，引起不少官员的憎恨，遭到攻击。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书说：“陛下天授以前，万机独断；自长寿以来，委任昭德，参掌机密。臣下商议政事，昭德不

参与；只等上奏御批执行时，才别生驳异，以此显露专擅。臣观他胆大包天，陛下应防微杜渐，大权一出，收回极难。”长上杲毅邓注著《石论》数千言，论述李昭德专权，凤阁舍人逄弘敏代为上奏。这就深深触动了女皇大权独专的忌讳，随即将李昭德贬为南宾尉，不久又免死流窜。新人相的周允元与酷吏皇甫文备乘机上奏，告宰相豆卢钦望、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附合李昭德。女皇全部贬为外州刺史。

证圣元年（695年）二月，内宠僧怀义不知趣，被女皇杀掉。这个原在洛阳卖药为生的冯小宝，被千金公主推荐人宫后，大受宠幸。垂拱元年（685年）特修旧白马寺，令他为寺主。而出人宫中乘御马，随从宦官十余人。士民遇见赶紧回避，否则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武则天委任他督造明堂、天堂，挥金如粪土。还屡任大总管，统率大军出征。官至右卫大将军，封鄂国公。连武承嗣、武三思这些权贵都千方百计巴结，象奴仆一样为他牵马垂镫。可后来他厌恶人宫侍奉女皇，多居白马寺中，选有膂力的度为僧，达千人。证圣元年正月，他因御医沈南璆成了女皇新的男宠，一怒之下秘密放火烧了明堂、天堂。女皇念旧情、替他遮掩，还让他督造新的明堂、天堂。僧怀义更加骄恣，竟敢对女皇也言多不顺，终于引起了女皇的憎恶。先是选健壮有力的宫女百余人加以提防，后在二月初四（壬子），令武攸宁率壮士将他打死在瑶光殿前。那些僧徒也都被流窜到边远恶地。

徐有功于长寿二年平反冤狱被罢官后，到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女皇思徐有功执法公平，又起用为殿中侍御史。远近听说这一消息，无不庆贺。这是女皇要进一步改变恐怖政治的一个信号。不料，随后出现了一件真的谋反案。

箕州刺史刘思礼让术士张憬藏看相，憬藏说他当历箕州，位至太师。刘思礼想入非非，认为太师是人臣极品，必须有佐命之功，遂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他吹捧綦连耀“体内有龙气。”

綦连耀则说他"公姓金刀，合为我辅。"暗定君臣关系。又借相术，许人富贵，引人上钩。此事被明堂尉吉顼察觉，告诉了被贬为合宫尉的来俊臣，让他告密。女皇得知，立即命堂侄河内王武懿宗审讯。武懿宗答应免刘思礼死罪，但让他广引朝臣。于是刘思礼诬陷了宰相李元素、孙元亨，天官侍郎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潘，以及泾州刺史王勔和弟监察御史王助、凤阁舍人王勮共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武懿宗严刑拷问，构成反罪，全部族诛，亲党连坐流窜达千余人。开始，武懿宗假装宽恕刘思礼，让他居在狱外，专事诬引。刘思礼自以为得计，凡平时稍不满意的，必加牵连。等众人被诛后，武懿宗马上杀了他。綦连耀自然也被斩首。

此谋反案使女皇觉得自己地位仍不十分稳固，故又重用酷吏；大酷吏来俊臣因这次告密有功提升了官职。这样，滥刑诛杀政策又猖獗了半年。

来俊臣复用得志后，随即罗告司刑府史樊惎谋反，被杀。樊惎子到朝堂诉冤，竟没人敢替他申理，气愤之下，用刀剖腹自杀。秋官侍郎刘如璿见后偷偷叹泣，被来俊臣诬是同党，下狱后判绞刑，女皇改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西南）。

曾被女皇流放的李昭德不久又被起用为监察御史，他平时就憎恶来俊臣等酷吏。见升任司仆少卿的来俊臣依然倚势贪淫残忍，不由得气愤填膺，又曾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万岁通天二年六月，这两个酷吏共同诬陷李昭德谋反，被捕下狱，判成死刑。

诬告李昭德得手后的来俊臣利令智昏，他知群臣已惧怕自己，就想罗告武氏诸王、太平公主，还想诬陷皇嗣李旦、庐陵王李显与南衙百官、北司禁军将领同反，图谋以此窃取国家大权。阴谋被卫遂忠告发。武氏诸王、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露来俊臣罪状，下狱后被判处极刑。女皇想赦免他，奏状三日不批。宰相王及善奏道："来俊臣凶狡贪暴，是国家的元凶，若不除去，必动摇朝廷。"

女皇在苑中漫游，吉顼牵马。女皇问起外面最近谈论什么大事？答道："大家都奇怪为何来俊臣案久不批下。"女皇说："俊臣有功于国，朕正思虑未决。"吉顼奏道："他聚结歹徒，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是国之奸贼，杀掉有何可惜！"女皇这才批准处决。

六月初三（乙卯），李昭德、来俊臣一同斩首，当时人无不同情昭德冤枉而庆贺俊臣该死。仇家争咬来俊臣的肉，倾刻即尽，又挖眼剥面皮，剖腹剜心，将尸骨践踏如泥。女皇知天下对这个酷吏魁首痛恨已极，遂下诏历数其罪，并说："应加灭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官吏百姓高兴的奔走相告，都说："自今以后可以睡安稳觉了。"来俊臣问斩后，他的党羽也随即被流放岭南。

三个月后，女皇对侍臣发表一番演说："从前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称其谋反；国有常法，朕怎敢违背！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到狱里询问，所得手状，皆自承认，朕因此相信。自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复闻有谋反的，如此看来，以前处死的莫非有冤案？"夏官侍郎姚崇道："自垂拱以来坐谋反罪死的，大多数都是周兴等罗织而成。陛下使近臣视问，近臣自身难保，怎敢异议！被审讯的人若有翻覆，必遭毒刑，不如速死。多亏天启圣人，周兴等伏诛；臣敢以家中百口为陛下担保，自今内外群臣没有谋反的。若有事实，臣甘受知而不告罪。"女皇大悦道："以前宰相只会顺成其事，陷朕成滥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其实女皇借酷吏之手滥杀以树威固位，目的达到后再杀酷吏以平众怒。这时又假装受骗上当，并委过于原来宰相不能直言。而姚崇的话只不过为女皇提供了搞滥刑诛杀政策的下台阶。这一恐怖手段若从文明元年（684年）二月算起，至此时运用了十三年余。

武则天在采取上述统治术的同时，还广开仕途放手招官，借以收揽人心，培植个人势力。垂拱元年（685年）她临朝称制时，

就下诏让内外九品以下官员及百姓，都可以自举，以求坐官升官。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她在洛阳殿主持考试全国的贡士，表示亲自取选人才，使这些人感恩戴德。从此贡士有了“殿试”。她还废弃了为防止考试作弊而采取的“糊名”办法，名义上是信任考官，实际是要从宽取士。

武则天即位女皇后，立即派史务滋等十人为存抚使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天授二年一月，她亲自接见举荐来的人，不问贤愚，让这些人一律试作某官，称为“试官”，高的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者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制度从此开始，而这一次就委任了一百三十人。当时有人讽刺任官之滥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有一举人沈全交续道：“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被御史纪先知擒拿，弹劾他诽谤朝政，请在朝堂杖打后，交司法定罪。女皇笑道：“只要卿辈不滥，何惧人言！可免其罪。”

延载元年十一月，获嘉主簿刘知几上书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说道：“陛下频频以赦令的办法提高官员的勋阶，以至明野宴集，公私聚合，绯服（四、五品官服）多于青衣（八、九品官服），象板（五品以上官用象笏）多于木笏（九品以上官用木笏）。而这些人很少是因德才升迁，不知何为美恶。”又说：“陛下临朝，取士太广，因此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砂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而地方官调动太快，忽来忽往，好比蓬转萍流，谁也不作长远打算。望今后刺史非三年以上不能迁官，以明察功过，确定赏罚。”

女皇并没有改变放手招官的治术。神功元年（697年）闰十月，凤阁舍人李峤掌选官，又设“员外官”数千人，全用权势之家的亲戚，给俸禄，也有实权，以至有些和正员官争事相殴。还设“检校”、“敕摄”、“判知”等名目官。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初设“武举”，给练武的人开辟新的做官途径。

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以卖私恩，收买人心。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管宫中门户的官婢就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当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因此众人竟相趋进而多陷刑戮，但想作官的人还是很多。

女皇的用人政策以个人专权为核心。决不容许任何人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她在临朝称制时即这样。曾为"北门学士"的刘祎之参与他夺权的密谋，提升宰相，很受信任。只因一次与人私语，说她废中宗后应将权力移交睿宗，她勃然大怒，赐死于家。武则天即帝位后更是如此。她任用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武攸宁和娘家侄杨执柔为宰相，当李昭德提醒说武承嗣权太重，有可能危及帝位。这三个侄子立即被免去相位，李昭德因此而受信任。但后由于恃宠专权，又引起武则天的怀疑，终以"谋逆"罪处死。女皇亲自提拔的宰相岑长倩，最初迎合她称帝心理，大陈符瑞，又上书请改皇嗣李旦姓武氏，得到封赏。但当反对在全国建大云寺和立武承嗣为太子时，被以谋反罪杀了头。

在滥刑诛杀造成恐怖气氛的背景下，政府机构中充斥了很多庸臣奸佞。武则天亲自提拔的宰相共计六十七名，而这两类人占绝大多数。其中任相时间最长的杨再思，执政十余年，没有任何政绩。为人巧佞邪媚，能领悟女皇微旨。凡是女皇厌恶的，必攻击毁灭；凡是女皇喜欢的，也一定夸奖赞颂。当时人送外号为"两脚野狐"。另一个任相时间仅次于杨再思的是苏味道，任相六年余，只会察颜观色，顺风承旨。曾对人说："处理事情不要明确表态，若有错误，必受牵连。最好模棱两可。"当时人也送外号为"苏模棱"。

但女皇明察善断，她在官员大量选拔又大量淘汰中，筛选人才，委以重任。而且，梗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谋反，还能从酷吏亲佞的陷害中保全下来。因此，官员中也有一批文武英贤为她

所用。

武则天利用大批酷吏推行恐怖政策，但同时也任用徐有功、魏元忠、杜景俭、李日知、严思善等正直执法官员。早在她临朝称制时，法官办案竟为深酷，而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执法公平。徐有功初任蒲州司法参军时就为政宽仁，政绩优异。升任司刑丞后，酷吏来俊臣、周兴等构陷无辜，他总是核实冤情，前后救活数十百家。常在殿廷奏狱中案件曲直，武则天厉声质问，左右大臣无不战栗，但徐有功神色不挠，争辨更切。武则天虽然残忍好杀，但知徐有功忠心、正直，颇是敬惮。李日知曾和司刑少卿胡元礼为一囚犯发生争执。元礼要杀这囚犯，日知认为罪不当死，两人争论多次。元礼怒道："我只要不离司刑，此囚终无生理。"日知也道："我只要不离司刑，此囚终不会死！"两人各写状上奏，最后日知获胜。杜景俭执法公正也类此。当时遭告密被逮捕的囚犯中流传这样一句话："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

武则天即帝位后，徐有功依然执法不阿。天授元年他因解救道州刺史李行褒的冤狱，被周兴诬陷免官。不久，女皇起用他为侍御史。有功跪在地上涕泣固辞道："臣闻鹿虽在山林奔跑而命悬于庖厨，这是人们要吃它的肉啊！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法；但酷吏恨臣切齿，臣再任此官必死无疑了。"女皇特加褒赞，定授执法官职。长寿二年他为争庞氏案又受到罢官处分，但后又被女皇起用，官至司刑少卿。他曾对人说："身为大理寺官，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只求个人苟免。"他前后历任司法官，因谏诤遭诛杀的案件，三次被判死刑，但志向不渝。这些公正执法官员虽不能改变武则天为登上并巩固女皇帝位而推行的恐怖政策，但武则天任用他们对酷吏进行制约，有意在黑暗恐怖中留下几分光明，给人一线生机。

武则天亲自提拔的宰相中，良臣不到三分之一，如狄仁杰、李

昭德、魏元忠、苏良嗣、杜景俭、韦安石、姚崇、陆元方、张柬之等。都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才。

狄仁杰不仅有政治才能，而且品德高尚。高宗朝时任大理丞，一年中断狱案一万七千人，无一诉冤的。武则天临朝称制时他任豫州刺史时，能冒险上奏，将大量受越王李贞举兵株连的人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率军镇压这次起兵的宰相张光辅要纵兵杀掠，他也能挺身制止。天授二年升任宰相，由于为人正直，被来俊臣忌恨，诬陷下狱，九死一生。女皇知他冤枉后放了他，后又任相位。他对国家的内政、边防大事，经常提出真知卓见。女皇崇佛，要造大佛像，需用工数百万，由于他的谏阻而罢此徭役。他还以举贤为己任，前后引荐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达数十人。狄仁杰忠于国事，受到女皇信任尊重，常称“国老”而不呼名。进见时，不叫跪拜，说：“每见公拜，朕也身痛。”仁杰好面谏廷诤，女皇帝屈己听从。仁杰屡次以年老辞职，她不允许，还叮嘱大臣们说：“非军国大事，不要麻烦国老。”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逝，女皇哭着说：“朝堂空了。”以后有难处理的大事，她就叹息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早夺去我的国老啊！”再如姚崇，当契丹侵扰河北时，军机繁杂，他能妥善处理，获得女皇的赞赏，不断提升，直到宰相。

武则天虽袒护亲近人，满足自己私生活并作为政治上的耳目爪牙，但她也能控制这些人。女皇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机密，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查，不敢犯法。女皇封武家人武承嗣等为王，但也不让他们掌握太大的权力，恐发生篡夺帝位的危险。内宠僧怀义恃势骄横，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他，怀义趾高气扬，良嗣大怒，令左右人打数十嘴巴。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衙是宰相们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杀了僧怀义后，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女皇虽然庇护二张，但

也下敕书说他俩作威作福，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由于武则天对亲近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有了一定的限制，基本上不大能损坏当时政治，整个国家机器大体也能正常运转。坚执刑赏大权，政由己出，明察善断，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为自己效力，这就是武则天的主要治术。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03--207

两唐书：《则天皇后纪》、《武则天传》、《徐有功传》、《来子珣传》、《史务滋传》、《索元礼传》、《周兴传》、《来俊臣传》、《傅游艺传》、《李纲附李安静传》、《狄仁杰传》、《高丽传》、《严思善传》、《宰相世系表》、《安金藏传》、《万国俊传》、《苏瓌附于传》、《崔元综传》、《李昭德传》、《杨执柔传》、《武承嗣传》、《武攸暨传》、《薛怀义传》、《选举志》、《刘思礼传》、《岑长倩传》、《杨再思传》、《苏味道传》、《姚崇传》、《太平公主传》

武李争嗣

圣历元年（698 年）九月十五日（壬申），女皇将亲自废掉的中宗李显复位为皇太子，这在当时的政治上发生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女皇已经最后决定了自己的皇位继承人。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称帝，改唐建周是成功了，但在帝位的继承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如果要传位给儿子，那势必复辟李唐王朝，使武周政权一世而亡；如果要保持武周王朝，只得传位给武姓侄子，可侄子总不如儿子亲，而且将来享受宗庙血食也不会有她这位姑奶奶的份。她杀掉了两个有才干的儿子，两个小儿子还是留下了。由于武则天在这件事上长时间举棋不定，李武两姓储位之争很早就明里暗中的激烈进行着。

武则天的武姓侄子以武承嗣、三思为首，最初他们不但没受重用，而且还和自己的父亲一起遭到她的报复。武士彟死后，同父异母兄武元庆、武之爽和叔伯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武则天母女刻薄无礼，而承嗣恰是元爽子，三思是元庆子。武则天立为皇后，元庆任宗正少卿、元爽任少府少监，惟良任卫尉少卿。武则天母亲杨氏不忘旧恨，叫她上书高宗，以外戚退让为名，将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元庆至州病死，后来元爽从濠州又流放振州（今海南崖县西北）。

乾封年间，高宗祭泰山，武惟良与弟淄州刺史武怀运按制度随祭。当时，武则天姐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在宫中很受高宗恩宠，武则天想除掉她，就劝高宗带贺兰氏到自己母亲府中游赏，乘

武惟良献食，密令人将毒药放在贺兰氏饭中，贺兰氏暴死。武则天归罪惟良、怀运，两人因此被杀，元爽也株连而死，家属流放岭外。

武则天报了旧恨后，以韩国夫人儿子贺兰敏之为父亲的后嗣，改姓武氏。不料敏之年少色美，竟和母亲私通，又要逼淫自己的幼女太平公主。武则天大怒，将他发配雷州，途中自缢身亡。贺兰敏之死后，武则天才上奏高宗，将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承袭武士彟爵位。时已到咸亨五年（674年）。

武则天临朝称制并要进一步当女皇，需要利用武家子侄们的力量，武氏集团的地位从而不断上升。文明元年（683年）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为傀儡皇帝，自己临朝称制，武承嗣立即奏请追封武氏先祖为王，立武氏七庙。武则天不顾宰相裴炎的谏阻，断然应允。在武则天支持下，诸武权势骤增，唐宗室人人自危。

徐敬业借匡唐为名举兵扬州后，武承嗣、武三思因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辈尊位重，多次劝武则天借机诛杀。在武则天以及武氏子侄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终于导致了宗室起兵。武则天以军事手段镇压下去后，利用武承嗣等和酷吏将李唐宗室杀戮殆尽。而且，大臣中谁要让她归政睿宗就受到严酷处置。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武承嗣等武氏子侄一律封王，权势更增。如武承嗣不仅爵魏王，而且官居文昌尚书省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武攸宁爵建昌王，官居侍中，为鸾台（门下省）之首。武三思梁王，官居天官（吏部）尚书。此外，武则天坐镇洛阳，以建安王武攸宜留守长安。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废弃的中宗李显囚禁在房州（今湖北房县），从帝位又降为太子的睿宗李旦和儿子，以及被杀的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义丰王李光顺、嗣雍王李守礼、永安王李守义都幽闭在宫中，形同囚犯，不许出宫门十余年。在这种形势下，武承嗣对皇嗣李旦的地位提出公开的挑战。

天授二年九月，武承嗣密嘱亲信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宰相岑长倩拥戴李旦为皇嗣，奏请严厉警告上书的人。女皇问宰相格辅元的意见，辅元也极力反对变更太子。这两位宰相因违忤了武氏集团的意愿，随即被陷害而死。

十月，王庆之面见女皇，女皇问："皇嗣是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废弃？"他答道："今天是武氏的天下，怎能以李氏为皇嗣！"女皇没有明确表态，叫他先回去。王庆之假装一片忠心，跪地不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说宁愿一死也要请求改立武承嗣。这时女皇给他一张盖有御玺的证明说："你以后想见我，将此出示宫门守卫即可。"王庆之受宠若惊，从此以后频繁求见，引起女皇的厌烦。一次，王庆之又来了，女皇动怒，命凤阁侍郎李昭德予以杖责。李昭德也是拥戴李氏为皇嗣的重要人物，他抓住这一时机，将王庆之拉到光政殿门外，对那里的朝臣们大声说："就是这个贼子想废掉我们的皇嗣，改立武承嗣。"先命左右痛殴，直打得耳目出血，然后杖杀。王庆之的党羽也一哄而散。

李昭德见女皇有立武承嗣为皇嗣的心意，劝说道："先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亲子。您有天下，要为万代考虑，应当传子孙，怎能以侄为皇嗣呢！自古以来，从未听说侄当天子而为姑立庙的。况且，陛下受先皇顾托，若将天下传与武承嗣，先皇也得不到祭祀了。"女皇听罢，觉得有道理。次年，李昭德又密奏武承嗣权太重，恐危及帝位，女皇随即免了承嗣的宰相职位。

但武则天在皇嗣问题上并没有因此作出决断，武承嗣对争夺皇嗣也没有死心。于是，李、武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初一（壬辰），女皇在万象神宫举行祭典，她竟让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皇嗣李旦尴尬地靠边站着，公然摆出一派武氏天下的架势，从而刺激了李、武二姓夺嗣斗争再度激化。就在这月，皇嗣李旦的刘妃、德妃遭

韦团儿诬陷被杀。德妃父窦孝谌和母庞氏受株连，由于徐有功的舍命相救才减死贬流。韦团儿还想陷害皇嗣李旦，有人将实情报告女皇，才暂时幸免。可事过不久，又有人告密，说李旦潜有异谋。女皇竟让大酷吏来俊臣审讯此案，若非安金藏剖腹露心证明皇嗣不反，感动了女皇，李旦的性命恐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李旦的长子封为皇孙的李成器被降为寿春王，取消了第二储君的身份，其它儿子恒王李成义被降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被降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被降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被降为彭城王。这一系列事变的背后，都隐含着动摇皇嗣李旦地位的阴谋。

在此期间，武承嗣在长寿二年九月，率五千人上表请女皇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随后女皇驾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还制造了金轮等七宝，每次朝会，都陈列在殿庭。延载元年（694年）五月，武承嗣又率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女皇驾御则天门城楼，欣然接受这一称号。次年更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而武三思则别出心裁，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枢，立于端门外，铭记女皇功德，黜唐颂周。女皇令姚畴为督作使，众胡人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够，强敛民间农器凑足。天枢造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二尺，八面，各长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顶端造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四个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撰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女皇亲题名"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承嗣领头搞的这些把戏，迎合武则天神化巩固皇权的需要，目的是讨好女皇，使她认为武姓是女皇最忠诚的拥戴者，促使女皇选择自己作新的皇嗣。

延载元年九月，反对废立皇嗣的宰相李昭德专权使气，遭女皇怀疑被流放，对皇嗣李旦也不利，而武承嗣派这时很受重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契丹族举兵反，七月，女皇以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防御契丹。九月，又以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

威大将军，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万岁通天元年正月发生刘思礼谋反案，女皇派河内王武懿宗推审。四月，又任命他为右金吾卫大将军，神兵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击契丹。这年六月，女皇将武承嗣、武三思提为宰相。

武承嗣等为谋求皇嗣的地位，用尽心机。为了讨取女皇的欢心，当僧怀义是内宠时，武承嗣、武三思厚颜无耻，象奴仆一样为怀义牵马垂镫。僧怀义被女皇杀掉后，张易之、张昌宗成为女皇新内宠，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都守候在两家门前，争为牵马，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郎"是当时奴仆对主人的称呼。

武承嗣派主要人物的品质都很恶劣。右司郎中乔知之家中有一美妾名碧玉，十分宠爱，因此不娶妻室。武承嗣得知，巧取豪夺，以教自己姬妾梳妆为名，强借留府不许归还。乔知之思念碧玉不已，以晋石崇爱妾绿珠故事作《绿珠怨》暗中寄送。诗中道："石家金谷重作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读诗饮泪不食，三日后投井，自尽殉情。武承嗣捞出尸体，在裙带上得到这首诗，大怒，叫酷吏罗织罪名，将乔知之斩首，破家籍没。

武三思缺德无才，只会阿谀奉承武则天。女皇晚年不愿居住宫中，他就大兴土木，在嵩山修建三阳宫，在万寿山建造兴泰宫，请女皇临幸。借此随从驰骋，耀武扬威，而不管用工役万万，百姓愁叹。

武懿宗性情阴险残酷，审讯案件，广泛株连，制造冤案。只推按刘思礼谋反案，就借机陷害诛杀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亲党连坐流放千余人。时人认为他不亚于大酷吏来俊臣、周兴。他率兵二十万和契丹孙万荣军作战，闻风丧胆，不战而逃。孙万荣死后，他奉命安抚河北，却残暴地屠杀被契丹军挟迫去又逃回的当地百

姓。

武承嗣、武三思力求做周皇帝的继承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周的女皇实质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更何况他们毫无德望。神功元年（697年）女皇结束诛杀政策后，狄仁杰、杜景俭等重新起用为相并得到信任，这对巩固李氏的皇嗣地位极其有利。

圣历元年（698年）二月，李、武嗣位之争到了最后的时刻。武承嗣、武三思营求为太子，数次指使人游说武则天，他们的唯一理由是“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后嗣的。”女皇始终犹豫不决。狄仁杰也经常委婉地劝说：“太宗栉风沐雨，亲冒刀箭，平定天下，传位子孙。高宗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今日若将皇位移交他姓，恐不符合天意。而且姑侄与母子关系谁更亲？陛下立子，千秋万岁后，享受太庙的祭祀，可以承继无穷；立侄，则从来未听说侄当天子而将姑姑安置在太庙内的。”女皇道：“这是朕的家事，你不要参与。”仁杰说：“帝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哪件不是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是股肱，义同一体，况且臣身充宰相，怎能不进言呢！”狄仁杰还劝武则天召还庐陵王李显，宰相王方庆，王及善也相劝。女皇见重要大臣都支持李姓为皇嗣，心意也向这面有所倾斜。又有一天，女皇对狄仁杰说：“朕梦大鹦鹉两翼都折断了，其中蕴藏何意？”仁杰巧妙解释道：“武，是陛下姓氏；两翼是暗指陛下两子。陛下起用两位亲子，则两翼振兴了。”女皇点头赞同，从此打消了立武承嗣、武三思为皇嗣的念头。

在这件事情上，宰相吉顼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和女皇内宠张易之兄弟平时关系很好。一次易之、昌宗向吉顼密问自安之策。吉顼说：“明公兄弟承恩宠如此之深，非有大功于天下，很难保全。今全国官员百姓都思念李家，但庐陵王李显因禁在房州，皇嗣李旦又幽闭于宫中。主上年岁已高，大业须有托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明公若能乘机劝陛下下决心立李显或李旦为皇嗣，以符

天下人心。这样不但可以转祸为福，而且还能长保富贵。”张易之兄弟欣赏这一谋划，多次劝女皇一定要立子为储君。女皇推测是吉项背后给出的主意，便召来询问。吉项再次向女皇陈述其中利害关系，促使女皇做出了最后决断。

三月，女皇托言庐陵王李显有病，派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到房州接李显及他的妃、子回到洛阳。武承嗣见当太子无望，又恨又气，怏怏成病。于八月一命呜呼。九月，太子李旦见于长幼之序请求将皇嗣位让与兄长李显。女皇准许，就这样，废弃后在房州囚禁了十五年的李显又当了皇太子。由于东突厥默啜率军压境，女皇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出征，而以太子李显挂河北道元帅衔。军队出发前，左威卫将军薛纳说：“太子虽立，但外面还不清楚，议论纷纭，如果陛下不再变更皇嗣，突厥不愁平定！”女皇深表赞同。宰相王及善请让太子能到外庭和百官一起朝谒，以慰人心。女皇也应允。随后，李旦复封相王，李姓诸王也恢复了自由。

武则天恐怕自己身死李显即位后，难容武氏子侄，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命太子、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武姓子侄在明堂盟誓和好，禀告天地，并铭刻在铁券上，藏入史馆。

武则天面对天下官吏百姓不忘唐德的现实，考虑到自己死后到太庙受祭礼的利益，晚年在皇嗣问题上作出了合乎士庶民心的最后决断，从而终止了多年来的李、武嗣位之争。她与儿子李显、李旦以及一切拥唐派官员因此也多少缓和了以前的紧张关系，自然也赢得了死后荣耀。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03—206

两唐书：《则天皇后纪》、《武则天传》、《武承嗣传》、《李昭德

传》、《武三思传》、《吉项传》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2

黜周复唐

武则天杀掉大酷吏来俊臣，结束了滥刑政策，将废弃的中宗从房州接回洛阳确定了储位，周朝廷内部政治气氛一时和缓了。但女皇万没想到在她老病垂危、中宗即将复位之际，拥唐派大臣却迫不及待地用政变方式把她赶下了台。问题就出在她的两个新男宠身上。

内宠僧怀义被处死后，御医沈南璆也患了不治之症。通天二年（697 年），太平公主为不甘寂寞的母亲推荐了男宠张昌宗入宫侍奉，张昌宗又引见了兄长张易之。当时女皇七十四岁，张氏兄弟二十余。

张易之是定州义丰人（今河北安国），族祖张行成曾在太宗、高宗两朝任相。父张希臧，曾任雍州司户。入宫时，兄弟二人都是翩翩青年，姿容秀美，而且精通音律。女皇大喜，兴致勃勃地同他们游宴享乐；张氏兄弟为讨取女皇欢心，经常擦香粉涂胭脂，身穿锦衣绣服。

张易之、张昌宗深受女皇宠幸，入宫不久，易之就官升四品司卫少卿，张昌宗升三品散骑常侍。又赐府第、绢帛、奴婢等等。一时间成了令人瞩目的显贵。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以及一些擅长阿谀奉承的大臣宗楚客、宗晋卿都等候门前巴结。女皇还封二张的两位寡母臧氏、韦氏为太夫人，并命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私夫。

圣历二年正月（698 年 11 月），女皇为张氏兄弟特置控鹤府，

设监、丞、主簿等官。让张易之任控鹤监，张昌宗以及御史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员半千都任控鹤府内供奉。控鹤府中聚集的大多是专向女皇献媚取宠的人物，也参用一些文学优长，富有才能的人士。文学家员半千认为古无此官，而且其中又多轻薄文人，上表奏请罢废，由于违忤旨意而被贬。宰相王及善为人清正，见张易之兄弟参加宫内酒宴，与女皇调笑亲昵，完全没有君臣之礼，屡次上奏，以为不可，使女皇扫兴。这年八月，女皇对王及善说："卿年迈不宜再侍奉游宴，只在中书省内处理政务好了。"王及善遂称病请假，月余后女皇连问都不问。王及善叹道："中书令天子每日必见，我这算什么中书令呢！于是上表辞职，女皇也不准许，就这样把这个不识趣的宰相挂了起来。

控鹤府在久视元年（700年）六月改名奉宸府，仍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等为奉宸供奉。女皇每次在内殿歌舞宴饮，总让武姓子侄、张易之、张昌宗参加。席间一起赌博嬉戏，或嘲戏公卿大臣取笑。武三思吹捧张昌宗是神仙王子晋化身，女皇就叫昌宗在宫中穿羽衣、吹笙、乘木鹤，一群文士赋诗赞美，其中崔融诗道："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女皇还不满足，令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道："嗜欲之情，愚智皆同，但贤者能节制不使过度。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应该满足了。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己子柳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瑞自称阳道壮伟，超过薛怀义，公开宣扬要求当奉宸内供奉。象这样丑陋无耻的话，传遍朝廷。臣职任谏诤，不敢不奏。"女皇表面抚慰道："非卿直言，朕不知此。"为掩盖自己的荒淫生活，女皇让张易之、张昌宗主持，在宫中修《三教珠英》，召集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六名文学士人参加。

在女皇宠爱下，张易之兄弟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奉宸府官员内有他们的一批党羽，修《三教珠英》的文人中有的成了亲信。如李迥秀、李峤、阎朝隐、沈佺期、宋之问等。而且，官员里还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投靠，想依附这两个内宠保官提职。如崔融、苏味道、王绍宗、郑愔、杨再思、韦承庆、崔神庆等。宰相杨再思是其中的典型。司礼少卿张同体是张易之的兄长，有一次他召来一些官员宴饮，酒酣时，戏弄杨再思道："杨宰相面似高丽人。"这个专会谄媚奉迎的佞人不但不恼，反而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随即剪纸贴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丑态百出，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当时有人夸张昌宗美貌，说："长得面似莲花。"杨再思说不对，当张昌宗询问时，他满脸堆笑地回答，"应当说莲花长的象您呀！"这样就形成了二张集团。因为他们得势，连蜀人宋霸子等大商贾也加以倚托。

张易之、张昌宗依权仗势，竞相豪侈，横行霸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久视元年闰七月，尚食奉御杨元嬉得罪了张易之，张易之以他的先辈和隋杨素同族为由上奏女皇："杨素父子，是隋朝的逆臣，子孙不能在朝廷任官。"女皇竟下诏："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杨元嬉因此外放贝州刺史，其兄司府少卿杨元亨贬睦州刺史。不仅如此，连张易之的兄弟们也狐假虎威。张昌仪任洛阳令，恣意贪赃枉法。有一个姓薛的人参加铨选，在张昌仪上早朝时迎候途中，奉上五十两黄金，并留下一张自我介绍的履历书。张昌仪受贿后到朝堂，随手将这张履历书交给主持铨选的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后，张锡不慎丢失，前去问张昌仪。昌仪骂道："你真是个废物！我也记不得名字了，只知姓薛。凡是姓薛的就授官好了。"张锡胆战心惊，回到吏部，查这次参加铨选人中姓薛的共六十余人，全部委任了官职。

久视元年九月，女皇执政后期最信任的宰相狄仁杰死后，她因年岁已高，便将政事多交付张易之兄弟处理。二张势力发展到

代理女皇决策的地步，这在王公贵戚中引起不满。太子李显的长子邵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公主、附马魏王武延基私下议论此事，被张易之得知，向女皇告状，女皇一怒之下逼令三人自杀。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看到母亲如此宠爱张易之、张昌宗，为讨好二张，保全自身，共同上表请封二张为王。女皇虽没封王，但封张昌宗为鄴国公，张易之为恒国公。

张昌宗兄弟贵盛，势倾朝野，一大批正直朝臣愤愤不平，他们要群起反击二张集团，而二张便经常打击不顺从自己的大臣，终于导致了长安三年九月的魏元忠大案。

魏元忠性情刚直，对二张集团深恶痛绝。张易之弟弟张昌仪任洛阳令，本是洛州长史的下级。但他依仗兄长的权势，每到州衙办事，不按制度恭候庭下，根本不把上司看在眼里，直上长史大堂。对张昌仪这种跋扈行为，历来的洛州长史都忍气吞声。后魏元忠出任这一职位，张昌仪依然如此，被魏元忠训斥一顿，轰了下去。张易之的家奴也狗仗人势，经常在洛阳市中横暴乱抢。一次，魏元忠派人将捣乱市场的恶奴拘捕，乱杖打死。

魏元忠晋升宰相后，女皇想调张易之弟岐州刺史张昌期补雍州长史的官缺。上朝时，女皇提出意见询问宰相，多数人都附合说："陛下得人了。"但魏元忠坚决反对，女皇问为什么？元忠答道："昌期年少，不懂吏事，过去做岐州刺史，搞得全州户口都快逃光了。雍州是京城，事繁任重，他怎能胜任！"女皇默然，停止了任命。一次魏元忠还面奏道："臣自先帝朝，就承蒙重用。今日又身居相位，而不能尽忠死节，让小人仍留在陛下身旁，这是臣的大罪。"女皇听出他是暗指二张，心中很不高兴。张氏兄弟更是恨之入骨。

不久，武则天身体不适。张昌宗恐怕女皇一旦死去，弟兄们会被魏元忠杀掉，遂进谗言道："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商议说'陛下老了，不如拥立太子登基，作为长久之计'。"女皇闻听此言，

顿时大怒，下令将魏元忠、高戬逮捕入狱。因为高戬是太平公主的情人，张昌宗这一状不仅要打击朝臣中的反对派，还要牵连太子等王公贵戚。

由于事情严重，次日，女皇召太子、相王、众宰相，让魏元忠与张昌宗当面对质。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女皇无法断决真假。这时张昌宗突然道："张说也听魏元忠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了，请陛下召来相问。"原来，张昌宗作贼心虚，怕假话露了马脚，在事先偷偷找凤阁舍人张说作证，许诺事成后授任高官美职。他以为张说是他主持修《三教珠英》写作班子里的人，关系亲近，定会相帮，张说当时一口答应了。

女皇见张昌宗提出证人，令张说进宫。张说闻召正要进去，一群等在途中的朝臣将他拦住。凤阁舍人宋璟说："人生名义最重，鬼神难欺，不能党附奸邪陷害忠良，以求苟且偷生！如果获罪流放，是莫大荣耀。若事有不测，我一定登殿力争，与先生同死。望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殿中侍郎张廷珪鼓励说："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也提醒："不要沾污了青史，给子孙留下骂名！"张说一入宫，女皇便问，张说却故意默不作声。魏元忠担心，便对张说道："你难道想和张昌宗一起陷害我吗！"张说这时佯装怒斥道："你魏元忠身为宰相，怎能说出这种里巷小人的话！"张昌宗见二人争吵，自以为得计，在一旁连连催促张说快说。不料张说对女皇道："陛下请看，当着陛下的面，他还这样逼臣，何况在外边。臣今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不说实话，臣实在没听见魏元忠说过这种话，是张昌宗硬逼臣作伪证。"

张易之、张昌宗听了，急得大叫："张说和魏元忠一同谋反！"女皇问为什么！二张说："张说曾说过魏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流放商王太甲、周公摄代王位。把他比作伊、周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张说马上反驳道："张易之兄弟都是无德寡才的小人，只闻伊、周之语，哪知伊、周之道！元忠初任相时，臣也前去祝贺。

他对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臣确实说过：‘依明公的德才，堪居伊、周之位’，而伊尹、周公都是最大的忠臣，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让学何人？臣岂不知今日附合昌宗就能立取相位，替元忠说话即遭灭族。但臣怕元忠冤魂，不敢陷害他。”女皇心向二张，听这番话后竟以张说是反复小人为由，把他也一起逮捕下狱。过几天，女皇又亲自询问，希望他能改口，但张说对答如前。女皇勃然大怒，命宰相和河内王武懿宗共同审讯，张说依然坚持不变。

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朝廷，大臣们接连上书，为魏、张两人辩诬。宰相朱敬则说：“元忠素称忠正，张说定罪无名，如若惩处，恐失天下人心。”普通文人苏安恒心中不平，也上书道：“陛下革唐建周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议论纷纷，都以为陛下信任奸佞，斥逐贤良。忠臣烈士，抚膺于私室而钳口于朝堂，都怕违忤张易之等心意而遭杀身之祸。今日赋役繁重，百姓凋弊，加上奸佞专权，刑赏不公，臣恐人心不安，别生变乱。望陛下三思！”女皇根本不听，反而把奏章给张易之看，易之大怒，请女皇杀掉苏安恒。多亏朱敬则及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保救，才幸免于难。

最后，女皇还是把魏元忠贬为高要尉，将高戬、张说流放到岭南。魏元忠临行日，向女皇辞别，说：“臣老了，今去岭南，九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女皇不解而问，魏元忠手指女皇身旁的张易之、张昌宗说：“这两个小子，终为乱阶。”二张连忙跪下，捶胸叩头喊冤。女皇安慰两人道：“魏元忠已经远贬了。”

殿中侍御史王晙还要上奏，替魏元忠鸣冤。宋璟劝道：“魏公幸已保全了性命，今您再冒犯威怒，恐要招至大祸。”王晙凛然说：“魏公因忠获罪，我为义所激，死而无恨！宋璟叹道：“我不能申明魏公之冤，深负朝廷。”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同情魏元忠，在郊外设宴为他饯行。张

易之恨得咬牙切齿，假称告密人柴明写状诬陷崔贞慎勾结魏元忠谋反。女皇心中明白是二张搞的鬼，但为了满足两个内宠的心愿，所以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时说："这事全部属实，你略微问问，就立即奏闻。"马怀素审讯还不到片刻，宫中派出的使者就催促数次，说："反状昭然，为何还这样延迟不判？"怀素奏请让柴明当堂对质，女皇竟说："我不知柴明在何处，你只须按状纸审断就行了。"怀素据实情上奏，指出这是诬陷案。女皇厉声喝道："难道你敢放纵谋反的罪犯？"怀素面不改色，朗朗答道："臣不敢放纵真正谋反的，但魏元忠由宰相外贬，崔贞慎因亲故相送，若诬以为反，臣实在不敢。陛下操生杀大权，欲加之罪，自可圣断；若命臣审问，臣不敢不据实奏闻。"女皇又追问道："你想一点也不加罪吗？"答道："臣智识愚浅，实不知他们犯了何罪。"女皇无言可对，心意回转，崔贞慎等人万幸获免。魏元忠一案至此才算完结。

不满二张派的朝臣们群起反击了。张易之、张昌宗、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兄弟五人不仅生活糜烂，飞扬跋扈，而且个个是贪污受贿的能手。长安四年七月，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贪脏事暴露，被捕下狱。由御史台审问。随后，有人告发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女皇只得也让受审，司刑正贾敬言心知女皇只是摆个样子，于是轻描淡写的奏道："张昌宗强买民田，应罚铜二十斤。"女皇立即同意。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则上奏："张同休兄弟贪赃共四千余贯，按法张昌宗应免官。"张昌宗忙奏："臣对国家有功劳，不应免官。"女皇问宰相张昌宗有什么功劳？杨再思紧接着说："昌宗合神药，陛下服后灵验。"这是莫大的功劳。"女皇闻听正合心意，借此赦免昌宗罪，官复原职，只将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宰相韦安石又举奏张易之等罪状。女皇无奈，让韦安石和另一宰相唐休璟再行追察。可是审讯刚开始，女皇就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加以阻

止；将韦安石出任扬州刺史，唐休璟出任幽、营都督，草草结束了这桩公案。唐休璟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说："二张恃宠，必将为乱，殿下应小心提防。"

十二月，反二张的官员再次群起进攻。当时女皇生病，居住在长生殿，宰相月余不得朝见，惟有张易之、张昌宗在身边侍奉。等女皇病情稍好，宰相崔玄晖奏道："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承担侍奉汤药。宫禁内事关重大，愿陛下不要让异姓人出入。"女皇只是说："卿的厚意朕心领了。"但仍依旧而行。二张见女皇病情严重，恐一旦驾崩，自己失去后台，有杀头之祸，于是引用朋党，扩大势力，暗中进行准备。因此，常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写传单撒在里巷里，甚至贴在大街上，说："易之兄弟谋反。"女皇虽知，但一概不问。

后来，许州人杨元嗣揭发："张昌宗曾召术士李弘泰占卜相面，弘泰说昌宗有天子相，并劝在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面对这一谋反大案，女皇命宰相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审讯。韦承庆、崔神庆想为张昌宗开脱，道："昌宗说弘泰的话，先前已经奏闻。据法，自首者免罪；弘泰妖言惑众，请逮捕行刑。"宋璟与大理丞封全祯驳奏道："昌宗深受荣宠，还召术士占相，可见野心勃勃。弘泰为他占卜，说是天子之卦，昌宗若以弘泰所言为妖妄，为何不执送司法治罪！虽说奏闻，终是包藏祸心。依法当处斩破家。请陛下批准逮辅入狱，彻底查清其罪。"女皇沉默许久，也不回答。宋璟又奏："若不立即逮捕，恐他会抢先下手，摇动众心。"可女皇却说："你暂停追究，等仔细检查文状后再说。"宋璟只得退下。左拾遗李邕紧接奏道："刚才听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自身，愿陛下恩准。"女皇也不听。她还想用上次对付韦安石、唐休璟的办法包庇张昌宗：先命宋璟到扬州审案，又命宋璟去幽州审问都督屈突仲翔贪污案，还命宋璟副李峤去安抚陇、蜀地区。可宋璟一律抗旨不去。他奏道："制度规定，州县官有罪，

品高的侍御史、低的监察御史出京审讯，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应当出使。而今陇、蜀也无大变乱，不知陛下为何遣臣外出？臣不敢违背国家制度。"女皇自知理亏，不再强迫。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书道："张昌宗无功受宠，而包藏祸心，今被揭露这是皇天降怒；陛下若不忍诛，则违天不祥。昌宗既然说已经奏闻，就不应和弘泰继续往来，让他求福禳灾，此是证明并无悔改之心；而所以奏闻，拟事情暴露则称先已陈奏，若不暴露就待机谋反。这是奸臣诡计。况且，大恶已被揭发，陛下释而不问，使昌宗洋洋自得，全国也以为天命使他不死。如此，则陛下会养成祸乱。逆臣不诛，社稷危亡，恳请交付鸾台、凤阁和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联合审讯，查清其罪。"女皇阅后，不予批复。

宰相崔玄暐也屡次进言，请求审问张昌宗。女皇鉴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令司法机构议张昌宗的罪名。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昪判处斩首，女皇当然不允。宋璟又面奏逮捕昌宗入狱。女皇强调说："昌宗自己提前奏闻了。"宋璟道："那是被民间的传单逼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况且谋反、大逆，不能自首免罪。如果昌宗不受大刑，要国法有何用！"女皇用好话解劝，希望他不要再坚持。但宋璟声色愈厉，道："昌宗深受宠幸，臣知言出祸从，但义激于心，虽死不恨！"杨再思在旁恐怕宋璟逆旨获罪，口中宣敕，叫宋璟出去。宋璟却说："圣主在上，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女皇为缓和局面，批准了宋璟的请求，让张昌宗到御史台听审。

宋璟性情刚正不阿，平时即为女皇深知，连张易之兄弟都畏惧三分。有一次女皇宴请大臣、贵戚，按官品张易之兄弟应坐在宋璟上位。但易之为讨好宋璟，虚位揖让，并假意称赞："明公堪称当今天下第一人，不应坐我之下。"宋璟正色道："才劣、位卑，张卿却说第一，这是何意？"天官侍郎郑杲问宋璟："中丞为何称五郎为卿？"宋璟轻蔑回答："按官而言，正当称卿。你并不是张

卿的家奴，为何象奴才呼主人一样称郎?”此言出口，举坐众官无不震惊。因为当时自武三思以下，不少权贵都小心侍奉张易之兄弟，宋璟却敢这样当面折辱。二张怀恨，常想中伤宋璟；但女皇知其内情，不予听从。这次宋璟奉命审讯张昌宗，怒不可遏，竟站立在大堂上问案；但刚审半截，女皇就派宦官宣旨特赦昌宗，召他回宫。宋璟后悔万分，叹道：“没及时先把这小子脑袋砸裂，真是遗恨终身。”女皇为调解双方矛盾，让张昌宗到御史台谢罪，宋璟拒而不见。

女皇宠幸二张，为他们杀了孙子、孙女、孙女婿，贬走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等多年来重用的大臣，将部分政务交给这两个秽声载道的家伙，在朝臣群起攻之的形势下，死死包庇二张，这位年过八十的女皇除了满足私生活的需要外，或许在政治上需要以这两个内宠为首，形成一派牵制外朝大臣的亲信，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然而，这在统治集团内部酿成新的矛盾冲突，二张问题成了武则天末年政治斗争的焦点，反二张的文臣武将终于结合在一起，诉诸武力，发动政变。

政变集团的形成，当溯源于狄仁杰。他在死前曾举荐了姚崇、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暐、袁恕己等，这些人都是后来政变的核心人物。虽然不能说狄仁杰当时已有政变意图，但他的行动实际上起了最初的组织作用。

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张柬之。久视元年前接替杨元琰为荆州长史时，两人一同泛舟江中。谈及女皇革唐建周事，元琰慨然长叹，有匡复唐室之志，柬之心领神会，后女皇叫狄仁杰举将相，仁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此人虽老，但是宰相之才。”女皇将张柬之提为洛州司马。数日后，又让仁杰举荐贤才，答道：“前些时举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重用呢!”女皇说，已提拔了。仁杰道：“臣推荐的是宰相，不是司马。”遂又提为秋官侍郎。长安四年九月，宰相姚崇为灵武道安抚大使，临行时女皇令举堪任宰相的人

选，姚崇又力荐张柬之。说："此人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他已年老，望陛下赶快任用。"十月，张柬之升任宰相，时年八十岁。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病重，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在宫中专权。这使众大臣心神不安。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划铲除二张集团。张柬之首先抓禁卫军，他先争取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李多祚是靺鞨人，骁勇善骑射，以军功进升直至此位。前后统领禁军宿卫宫城北门二十余年。张柬之用话引问李多祚："将军今日享有富贵，是谁所赐？"多祚泣道："是先帝啊！"柬之又问："今张氏两贼危害先帝的亲子，将军不想报先帝大恩吗？"多祚激愤地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惟宰相之命是从，身死家亡也在所不惜！"并对天盟誓，以表诚心。于是他俩商议了政变计划。随后，张柬之举任杨元琰为右羽林将军。并对他说："君还记得在江中泛舟时说的话吗？今日非轻授此职啊！"又将桓彦范、敬晖以及右散骑常侍李湛都安插为左、右羽林将军，掌管禁卫军。张柬之为首的政变集团乘女皇病重，基本上掌握了中央禁卫军权，这样政变就有了成功的条件。张柬之的行动也引起张易之等人疑惧，他们把自己的党羽武攸宜安插为右羽林大将军，这才放心。

不久，灵武道安抚使姚崇回洛阳，张柬之、桓彦范得知，高兴的说："大事定能成功了。"遂前去相见，将除逆的谋划也告诉了他，姚崇满口赞成。当时太子李显从北门进宫拜问女皇起居安好，于是，统禁军守卫北门的桓彦范和敬晖秘密把商定的计划通报了太子，李显也同意了。至此一切准备就绪。

正月二十二日（癸卯），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至玄武门（即宫北门），派李多祚、李湛以及内直郎、附马都尉王同皎到东宫迎接太子李显。李显开始时怀疑，不肯出来。王同皎劝说："先帝以宝位交付殿下，但横遭幽废。因此人神同愤，已二十三年了。今是天意，使北门

禁军众将和南衙宰相同心协力，诛除逆贼，恢复李氏社稷，愿殿下速至玄武门，以孚众望。”李显仍迟疑不決，说：“凶逆诚当诛灭，但圣上身体不安，恐遭惊吓。诸公请暂且停止，以后再待机图谋。”李湛心中焦急，说：“众将相为了社稷，不顾身家性命，殿下为何要把这些忠臣良将陷于死地呢！请殿下自己前去阻止吧！”李显这才答应同去。

王同皎立即将李显扶抱上马，飞驰至玄武门，斩关而入。然后，簇拥李显迅速来到女皇所居的迎仙宫。在此，张柬之等将来不及反抗的张易之、张昌宗斩于廊下。又进至女皇寝处长生殿，以护卫为名用兵团团围住。女皇惊起，忙问：“哪个作乱？”张柬之答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杀掉二贼，因恐机密泄露，没敢事先奏闻。”女皇召见，先看了太子一眼，说：“原来是你啊，二张既然杀了，你回东宫去吧！”桓彦范立即阻拦道：“太子怎能再回去！当初先帝以爱子托付陛下，今年岁已长，不应再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就是因为不忘太宗、高宗的恩德，才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意民心！”

女皇又看了李义府的儿子李湛一眼，说：“你也是杀张易之的将军？我对你们父子不薄，不想有今日！”李湛满面羞愧，不能对答。女皇又对崔玄玮道：“别人都是因人举荐，只有你是朕一手提拔的，想不到你也参加了。”玄玮答道：“这正是为了报答陛下的恩德。”与此同时，袁恕己随从相王李旦统领南衙兵策应。

随后，又杀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把二张的党羽宰相韦承庆、房融以及司礼卿崔神庆逮捕入狱。后来，他们和亲附二张的李峤、阎朝隐、宋之问、杜审言等数十人都贬流外地。

当初二张派得宠时，张昌仪新造一座府第，华奢无比，超出了王公、公主。有人夜间在他的大门上写道：“一日丝能作几日络（乐）？”擦去，又写上，如此六、七次。张昌仪取笔在下面作注说：“一日也足。”果然，他们飞扬跋扈、寻欢作乐没有多长时间就被

诛灭了。

张柬之等发动政变的次日，女皇无可奈何，只得命太子监国。二十四日（乙巳）传位太子。二十五日（丙午）中宗李显复帝位。大赦天下，原被周兴等酷吏所冤枉的，都令昭雪，子女籍没入官的也都释放；只有张易之党羽不在其内。加相王李旦号“安国相王”。官拜太尉兼宰相，加太平公主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前发配籍没的，子孙全恢复宗室属籍，并封爵授官。对以张柬之为首政变有功人员加官封爵。

二十六日（丁未），女皇被迁徙到洛阳宫城西南的上阳宫，中宗派李湛守卫，实际软禁。次日，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给被废黜的女皇加了“则天大圣皇帝”的尊号，以保持名义上的荣崇，二月初一（辛亥），中宗又率百官到上阳宫问安，以后每十天一往。这月初四（甲寅），中宗恢复“唐”国号，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也都恢复了永淳年以前的旧制 。五月，又将周庙的七祖迁出太庙，安放到长安的崇尊庙，改名尊恩庙。而在东都洛阳新设唐的太庙、社稷。

对于武则天这样一个为追逐最高权力而费尽心机的政治人物，失掉皇位而被软禁，这是不堪忍受的痛苦。本已风烛残年，又加以沉重打击，精神的崩溃促使身体很快就垮了。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寅），八十二岁的武则天郁郁地死在上阳宫的仙居殿。留下的遗制 是：“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子孙亲属一律赦免。”

去帝号复称皇后，表示武则天又要到李家来当先妣，下台前夕，她听从李峤、崔玄暐、桓彦范的奏请，于神龙元年正月初一（壬午）大赦时，除直接用武力反对她的徐敬业、宗室李贞、李冲父子以及反逆魁首，那些被酷吏所陷害的人们已经全部赦免。而中宗登基后，随即为李氏宗室平反，这样武则天杀死的冤魂最后只剩下这次所赦免了的人了。她所以如此，或许为了安慰自己的

良心吧！

神龙二年五月十八日（庚申），武则天的灵柩运到乾陵，和唐高宗合葬，并在陵前树起了一座高高的无字碑。

这位中国历史上执掌国柄、建立国号的唯一女皇帝生命终结后，历来人们对她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正如那座无字碑之谜一样，成了一个永远具有魅力的历史研究课题。

（马俊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06—208

两唐书：《则天皇后纪》、《武则天传》、《张行成附张易之传》、《员半千传》、《崔融传》、《苏安恒传》、《杨再思传》、《魏元忠传》、《宋璟传》、《狄仁杰传》、《张柬之传》、《杨元琰传》、《李多祚传》

胡戟《武则天本传》

初唐四杰

六朝以来，特别是齐梁时期，文风华而不实，文人所作诗文，只注意对词句的雕琢及形式的工整，追求辞藻与格律，缺乏思想内容，脱离一般社会，被称为宫体文学、贵族文学。这种文风仍然影响着隋及初唐时期的文坛，所以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主旋律还是风花雪月、骚人愁绪，文章则仍然是骈文的天下。但在初唐时期，有一批青年诗人，在齐梁余风之中，力求创造与解放，使初唐文坛为之一振。这批青年诗人的代表，就是在文学史上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六岁即善文辞，九岁时读颜师古《汉书注》，作《汉书注指瑕》以攻其失。不到二十岁，应幽素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沛王府修撰，深受李贤爱重。当时，上层社会斗鸡盛行，王勃为李贤戏作《檄英王鸡文》，唐高宗览文大怒，以为挑拨诸王关系，即日斥出王府。过了很久，又被任命为虢州参军。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忌恨。后有一官奴曹达犯罪，藏匿于王勃处，既而王勃怕事泄累及自己，遂擅杀曹达，因此被判死刑。巧遇大赦，免死除名。其父王福畤受其连累，被贬为交趾令。上元三年（676年），王勃往交趾（今越南河内）看望父亲，渡南海时溺水而死，年二十八岁。

王勃有大量诗文传世，五言小诗尤为出色。如《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表现出一种悲凉浑壮的气势。《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

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句变悲戚为豪放，表现出胸怀的博大，创造了赠别诗的全新境界。此外象《滕王阁》、《别人》、《江亭夜月送别》等都是唐诗中的名篇。

王勃的文章虽均为骈文，然气势宏大，流畅自然，象《采莲赋》、《乾元殿颂》等都很出色，最为著名的当推《滕王阁序》。王勃往交趾省父途经豫章（今江西南昌），正值洪州都督新修滕王阁落成，于九月九日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都督为夸耀其婿才华，令其提前一天将序作成，至时向众人展示。但都督不免要客气一番，拿出纸和笔逐一请客人为滕王阁作序。众人皆知都督之意，均推托不敢当。让至王勃，王勃欣然接受，毫不推辞。都督见状大怒，拂衣而起，推说更衣转入内室。王勃提笔作序，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都督虽转入内室，但仍关注王勃作序情况，令人将王勃所作序文逐句报告。第一次报告云“豫章故郡，洪督新府”。都督曰：“不过老生常谈而已。”接着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都督听罢，沉吟不语。接下去一句句报来，当报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矍然而起，曰：“真是天才，此文当永垂不朽矣。”遂复出室入席，与众宾客极欢而罢。

王勃每作长文，先研墨数升，然后畅饮，饮后以被覆面而卧，醒后提笔成篇，不改一字，当时人称王勃为腹稿。

杨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自幼聪明博学，善为文章，十岁举神童，后又应制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迁太子詹事司直。不久，因堂弟神让随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杨炯受牵连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任期届满，迁盈川县令。杨炯为官严酷，下属稍不如意，则拷打致死，为时人所指责。卒于盈川令任上，故后人称其为杨盈川。

杨炯的作品主要是文章。如意元年（692 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武则天登上洛阳洛南门与百僚观赏。杨炯献

上《盂兰盆赋》，文辞雅丽之极，为其代表作，称颂当时。

就诗歌而言，四杰中杨炯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最低。他擅长五律，《从军行》是他的名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洋溢着慷慨报国的热忱，是唐代优秀边塞诗之一。

卢照邻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十余岁从曹宪、王义方学习文字训诂学与经史，博学善文。最初为邓王府典签，甚为邓王所爱重，邓王曾对人说："典签是我的司马相如。"后调任新都县尉，因患风疾辞官，居太白山中。服用药石金丹，使病情加重，致手足残废。于是转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下，买田园数十亩，引颍水环绕之，并预制坟墓，偃卧其中。后不堪疾病之苦，与亲属一一诀别，自投颍水而死。年仅四十岁。

卢照邻的诗作以七言歌行最为著名，如《行路难》："娼家宝袜蛟龙帔，公子银鞍千万骑。""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谁家难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汉家陵树满秦川，行来行去尽哀怜。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拟荣华一万年。不见朱唇将玉貌，唯闻青棘与黄泉。"表现了王侯公子们的荒淫生活和他们衰落的命运。《长安古意》："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描写了长安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最后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卢照邻文章的代表作是《释疾文》和《五悲文》，这两篇都是他病后之作，"岁将晏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表现了卢照邻晚年的精神状态，文辞颇有骚人之风，甚为当时文人所推重。

骆宾王，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七岁能赋诗，被称为神童。最初任道王府属，历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数次向武则

天上书言事，以求重用，未果。因犯赃罪，被贬临海县丞，怏怏不得志，弃官而去。光宅元年（684年），参预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被任命为徐敬业匡复府记事，敬业军中书檄，皆出自骆宾王之手。徐敬业兵败之后，骆宾王下落不明，一说被杀，一说出家为僧。

四杰中骆宾王的诗作最多，内容也较为广泛。如《在军登城楼》："城上风威险，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表现了怀古伤时的感慨，气魄悲壮。《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是唐诗中的名作。

骆宾王的文章，则以为徐敬业所写著名的《讨武曌檄文》为其代表作，音情顿挫，酣畅淋漓。当檄文送至武则天手中，武则天边读边笑，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当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矍然而起，问檄文出自谁手，答曰骆宾王，则天慨叹道："这真是宰相的罪过，如此人才，怎么能让他流落呢!"骆宾王因兵败苍皇，文章多失散，武则天曾遣使四出，以求其文。

四杰虽然在文学上都创造了很高的成就，但在仕途上都无甚作为，正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当四杰在文坛名声鹊起之时，曾受到吏部侍郎李敬玄器重，以为四人将来在仕途上必无限量，并将四人引荐给吏部另一侍郎裴行俭。裴行俭对四人却不以为然，对李敬玄说，士人若想显赫仕途，重要的是器识，其次是才艺。王勃等人虽有文华，但浮躁浅露，怎能成就大器。杨炯稍微沉静一些，大概可以做到令长，其余三人能有善终就不错了。"果然时隔不久，王勃渡海堕水而死，杨炯终于盈川令，卢照邻自沉颍水，骆宾王下落不明，全不出裴行俭所料。究其原因，四杰文人气质太重，全不解官场中之奥妙，年轻

气盛，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加之不拘小节，自然“命途多舛”了。

关于初唐四杰之称起于何时，史料并无明文，目前学术界有唐太宗贞观中期以后至武则天当政期间说；唐高宗至武后初年说；唐高宗龙朔和麟德年间说；唐高宗咸亨年间说。总之，初唐四杰之称及王、杨、卢、骆的排名次序，四杰在世时就已确定了。但杨炯对这个排名很不服气，他曾经对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一些文人以为杨炯之言不虚。后来，崔融和张说对四杰有过议论，崔融说：“王勃的文章宏放、飘逸，非常人所及，只有杨炯与卢照邻可以企之。”张说反驳说：“不然，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照邻，又不在王勃之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因此，关于四杰的排名次序，成为文学史上一桩不大不小的公案。不过王、杨、卢、骆这个排名次序，是唐人一般的看法，即便今日看来，王勃诗文的生命力似乎也较强，尤其是《滕王阁序》一文，简直是名句渊薮：“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句句千古绝唱。故王勃居四杰之首，当之无愧。

由于四杰的文章全为六朝以来的骈文，诗歌亦未彻底脱尽齐梁习气，思想性及气魄都较陈子昂以后的作品为弱，故盛唐时人有轻视四杰的倾向。但初唐诗坛，是唐诗的准备时代，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毕竟是从四杰开始形成的，他们的作品突破了宫体诗、宫体文的狭小内容，抛弃了淫靡与庸俗，扩大了诗文的题材，提高了诗文的风格，对中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的出现有不可磨灭

的贡献。所以杜甫作诗为四杰正名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李燕捷）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03

两唐书：《王勃传》、《杨炯传》、《卢照邻传》、《骆宾王传》、《裴行俭传》

《王子安集》

《杨盈川集》

《幽忧子集》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唐代书风

唐代以前，书法最盛的时代是晋代，书法艺术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到了唐代，由于长期的安定统一局面，加之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较为开明的统治，出现了文治武功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文化，书法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是一个可比拟晋代的全盛时期。

唐朝自唐太宗李世民以下，唐高宗、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宣宗及诸王都酷好书法，特别是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欣赏备至，不惜重金购求王羲之的墨迹，每得王帖，就叫诸王子临摹，每帖要写五百遍，并命书法名家摹写《兰亭序》，分赐朝臣。另外，统治者对书法的重视还表现在国家制度方面。周代以书为教，汉朝以书取士，晋朝置书学博士，唐朝不仅将上述措施全部继承下来，而且创设书学，作为国学之一，专门培养书法人材。唐朝挑选官员有四个标准，即身、言、书、判，其中书即书法，书法达不到一定标准是没有资格做官的。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对书法的爱好与重视，唐代崇尚书法蔚然成风。

唐代书法名家辈出，各种流派都有堪为后世之师的代表人物，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唐代朝野通行的书体是楷书与行书，这两种书体的领衔人物，世称前有"欧、虞、褚、薛"，后有"颜、柳"。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曾官太子率

吏令，封渤海县男，世称“欧阳率更”，亦称“欧阳渤海”。欧阳询最初学王羲之书法，后风格渐渐发生变化，得王羲之之力而失王羲之之温秀，笔力之险劲，有超越王羲之之势，字体结构独特，自成一派，人称“欧体”。其墨迹盛传于世，人取为楷模。高丽曾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取欧阳询的作品。他的书法以楷书最为出色，为唐代之冠，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他所写《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法第一。其行书代表作有《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等，体势纵长，笔力劲险刻厉，似戈戟般森然而列。除楷、行二体之外，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他的隶书作品。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完全继承了欧阳询的书法风格，父子二人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后人亦称其为“虞秘监”或“虞永兴”。唐太宗曾说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虞世南从师于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学习书法，得二王之真传。虞世南学习书法十分刻苦，传说他经常卧于被中画腹习书。他与欧阳询二人并称为“欧、虞”。虞世南的书法外柔内刚，外表气秀色润，笔调柔和，然内涵筋骨，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无丝毫雕饰。传世书迹有《孔子庙堂碑》、《昭仁寺碑》、《积年帖》、《汝南公主墓志》等。《孔子庙堂碑》书法俊朗圆腴，端雅静穆，深得智永笔法。据说碑文写成进呈墨本，唐高祖一览大悦，赐虞世南王羲之所佩右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近人党晴梵作诗曰：“永兴师法永禅师，一代宗风俨在兹。墨本换将银印佩，令人神往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结构齐整，生意盎然，完全是王羲之行草的嫡传，被认为与《兰亭序》并美。由于虞世南得王羲之真传，唐太宗曾向虞世南学习书法，并同他探讨书法理论。虞世南死后，唐太宗

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褚遂良的书法，初学欧阳询，继而以虞世南为师，最终追二王遗风，又融会汉隶，字体丰美富艳，流畅劲练，变化多姿，自成一家。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哀叹无人可以论书，魏徵向唐太宗推荐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唐太宗立即召褚遂良为侍书。唐太宗曾用重金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人闻之纷纷将古旧书帖献上求赏，当时无人能辨其真伪，褚遂良为唐太宗一一分辨，并详论来历，无一误断。褚遂良的传世书迹有《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房玄龄碑》、《孟法师碑》等。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永济北）人，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故世称"薛少保"。他在外祖魏徵家见到收藏的虞世南、褚遂良的墨迹，遂仔细临摹，终有所获，以书法扬名天下。他的书法继承褚遂良的风格居多，但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是宋徽宗瘦金体之所由出，当时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说，可见其成就不让其师。后人将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为唐初四大书家。薛稷的传世书迹有"慧普寺"三字及《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信行禅师碑》等。另外，其弟薛曜的书法与薛稷齐名，世称"二薛"。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官平原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平原"，亦称"颜鲁公"。颜真卿最初学习褚遂良的书法，后又以张旭为师。他参用篆书笔意写楷书，浑厚刚健，正而不拘，庄而不险，既继承了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又不为古法所限，一改初唐以来崇王之风，开创了"二王"以外的新风格，自成一派，世称其字为颜体。颜真卿传世书迹很多，著名的有《多宝塔感应碑》、《东方画赞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颜氏

家庙碑》等。颜体有特点，有个性，有唐代盛世的气象，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宪宗元和初年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唐穆宗即位，召见柳公权，说："我在佛寺见到你的笔迹，想念你已经很久了。"当即提升为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唐穆宗曾问他怎样用好笔，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为之改容，明白他是在笔谏。柳公权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柳公权初学王羲之，后遍阅近代笔法，学习颜体，但能自创新意，独树一帜，体势劲媚，结体严紧，自成一家。他的楷书被称为妙品之最。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柳公权手笔，被认为是不孝。外国使者入唐，均带有专门款项，用以购买柳书。唐文宗夏日与诸翰林学士作诗，命柳公权书写于大殿墙壁之上，每个字方圆五寸，唐文宗赞叹道："钟、王复生，也不过如此啊。"柳公权书碑很多，代表作有《李晟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等。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并称"颜柳"，世称"颜筋柳骨"。

唐代篆书的代表人物是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官至将作少监，人称李监。初学李斯《峄山碑》，后见孔子《吴季札墓志》，精探小学，得其渊源，书体开始变化，独创一格，字体豪骏，以瘦劲取胜，当时人呼之为"笔虎"。曾自称"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独爱《碧落碑》，曾寝卧碑下，数日不去。代表作品有《李氏三坟记》、《栖先茔记》、《般若台铭》、《清凉寺碑》等。所书《缙云城隍庙碑》最为著名，被称为概代冠冕。

唐代隶书的佼佼者是韩择木，昌黎（今河北通州东）人，官至工部尚书、右散骑常侍，故人称"韩常侍"。其隶书与李阳冰篆并称，字体风流娴媚，世谓蔡邕中兴。韩择木的传世书迹有《告华岳府君文》、《叶慧明神道碑》、《曹子建表》等。

唐代草书成就很高，最著名的草书家当首推张旭和怀素。张旭，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骜放不自修，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等人号为“酒中八仙”。张旭自己曾说，最初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而得其神。唐文宗时，下诏以李白歌诗、裴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曾评论说：“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相传张旭每嗜酒大醉，呼叫狂走，继而落笔，或者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故世呼“张颠”。杜甫《饮中八仙歌》叙张旭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的主要作品有《自言帖》、《千字文断简》、《肚痛帖》、《郎官石记》等，字体博大清新，纵逸豪放，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僧人，字藏真，俗姓钱，祖籍长沙零陵（今湖南零陵），是继张旭之后唐代又一大草书家。因贫无钱买纸，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故名所居曰“绿天庵”。他用漆盘练字，把盘子都磨穿了，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无不书之。他和颜真卿皆以张旭为师，颜真卿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怀素对张旭的草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字体超妙自得，笔老而意新，千变万化，以“狂草”得名，世有“颠张狂素”之称。怀素的传世作品很多，著名的有《苦笋帖》、《千字文》、《自叙帖》等，都是狂怪怒张、笔墨飞舞的狂草书，活泼飞动，笔下生风，姿态万千。

此外，陆柬之、李邕、孙过庭、钟绍京、徐浩、柳宗元等都是唐代享有盛名的书法大家。

与书法名家辈出的同时，唐代书法理论也有很大发展，唐太宗李世民、欧阳询、颜真卿、徐浩等人对书法都有精深的论述，张怀瓘的《书断》、孙过庭的《书谱》等更是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李嗣真的《书后品》是著名的书法评论著作，对后世书法实践都

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唐代确是我国书法史上书学鼎盛的一代，特别是楷书、行书、草书，在唐代获得高度发展，时代特点突出，是盛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芳后世。

（李燕捷）

参考资料：

两唐书《虞世南传》、《褚遂良传》、《颜真卿传》、《柳公权传》、《欧阳询传》、《薛稷传》

包备五《中国书法简史》

钟明善《中国书法简史》

刘知几著《史通》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春,修文馆学士刘知几撰成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史通》的问世,是唐朝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古代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司马迁著《史记》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纪传体新体裁;班固加以变通著《汉书》而创立了纪传体断代史体裁;荀悦融断代史与编年史两种著史方法于一体,而创立了编年体断代史体裁。这样,中国古代的封建史学便逐渐建立起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编年二体并行发展,其它体裁的史书也大量涌现,反映了史学的繁荣。但这些史书,内容庞杂,质量高低不一。史学若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对以往的史学加以评论和总结。唐前,史学评论随着史学的发展,也曾发生过,如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东晋干宝的《史议》、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等,对史学实践都曾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这些评论还不是全面的、系统的。

到了唐代。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唐初统治者又极为重视史书的编著,设立史馆编修国史和前朝史,先后著成八部纪传体前代史,这些史书的体例、内容、编撰方法、写作技巧等,也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的必要,同时,设馆修史,亦有其弊,已经影响了史书编著的质量,很需要加以评论总结。

时代在呼唤对以往的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评论,时代也

为这种总结、评论提供了前提条件,《史通》便应运而生了。

《史通》的问世又与作者刘知几家学的影响、本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史学志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出生于一个世代文学仕宦之家。他的叔祖父刘胤之曾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楚州刺史,颇有才学,高宗永徽初年,曾与令狐德棻等共撰国史及实录。父亲刘藏器对文史很有造诣,尤精词章,且为人正直,其兄刘知柔也以词学知名。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刘知几自幼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打下良好的文史基础,而尤其爱好史学。十一岁时,在父亲的督责下便已开始读《尚书》,由于文辞艰涩难读,而产生了厌学情绪,但在这时,他对偶而听到的父亲给兄长们讲述的《春秋左氏传》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逢父亲讲《左传》,他便将《尚书》弃置一旁,而专心听讲,待父亲讲完,他竟能马上给兄长们复述一遍。读《尚书》与听《左传》的极大反差,是刘知几萌生史学志向的重要起因。父亲了解了刘知几的这种意向,便改而向他讲授《左传》。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全部讲诵完毕。这一年他才十二岁。在以后的五、六年里,他又先后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同时也广泛浏览了自东汉以来的各种杂史及唐代实录。

良好的家学文史熏陶、大量读史所获得的丰富历史知识、独立思考特性的形成及各种能力的增长,为刘知几后来撰述《史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刘知几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时年二十岁,但求取功名,对于有志于史学的刘知几并不是最终目的。在获嘉县任职期间,他一有余闲,就广泛阅览史籍及各种杂记小书,手不释卷,潜心钻研,这就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史学思想。钟爱史学而又刚直不阿的刘知几,不善于、也没有余暇在官场周旋逢迎,一连十九年没有升迁。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被调至京城,参与编修一部大型类书《三教珠英》。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长安二年(702年),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又升迁为左史,撰写起居注,成为正式史官。这一年他四十二岁。转年,刘知几又奉诏与徐坚、吴兢等人参与修《唐史》。从此以后直至他逝世的十几年中,尽管职务有过不少变化,但多是任史职或兼任史职,参与编修了《则天实录》、《睿宗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并自撰了《睿宗实录》。

对于刘知几说来,任职史官,在史馆中编修史书,本应是人尽其才,学尽其用了,但刘知几在史馆修史的实践中却深深感到"吾道不行"、"美志不遂"。那些监修大臣和一些史官往往凭个人好恶,恣意曲笔,而使实录不实。和这样的修史者们一道工作,是刘知几极不情愿的。

刘知几心目中的史家是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的史学人才。

长安三年(703年),礼部尚书郑维忠曾问刘知几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学人才多而史学人才少。"刘知几回答说:"史学人才必须具备三长,而世人很难达到这一点,所以史学人才少。"刘知几认为作为历史家就必须具有选择、鉴别史料、编纂史书的能力,这就是"才";历史家还应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博学多识,这就是"学";历史家最应具备的是正确的观点、独到的见解以及敢于秉笔直书的品德,这就是"识"。这样的史学人才,在刘知几看来寥若晨星,他感到只有徐坚、吴兢等五、六位史家可为知音。

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刘知几上书监修大臣中书侍郎萧至忠,力陈史馆修史的五大弊端,要求辞去史职。萧至忠曾几次责备刘知几修史无功,但对刘知几的批评却又无法应对。他也知道刘知几确有史才,因此不准他辞职。另一个监修大臣兵部侍郎宗楚客嫉恨刘知几的正直敢言,挑拨性地对修史官们说:"此人写这样的辞职信,到底要把我们置於何地?"

刘知几深感在史馆里实在无法伸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又恐怕去世之后，再无人知晓自己的史学理论，于是退而私撰《史通》。多年来，他利用修史余暇，认真研读史籍，随时笔录心得，写成了一篇篇闪烁着他史学思想光辉的札记。如今，他在进一步深入研讨的同时，对以往记述加以整理、按类区分。景龙四年春，凝聚了刘知几多年心血和史学智慧的史评专著终于编次成书。刘知几参考历史上汉章帝曾召集儒生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并编撰成《白虎通》，也将自己的这部成于史馆的著作定名为《史通》。另外，王莽时，司马迁的后代被封为"史通子"，也是刘知几定书名为《史通》的一个根据。这一年，刘知几整五十岁。

开元九年(721年)，刘知几的长子刘贶，因罪被判流放边城。刘知几为子上书辩理，触怒了玄宗，于是被贬为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都督府别驾，不久便病死在任上。这一年他六十一岁。

开元十年，刘知几的次子刘餗将《史通》抄录一部，呈奏唐玄宗。玄宗读后称赞是一部好书，追赠刘知几为工部尚书。

《史通》共20卷，分内篇、外篇两大部分。书前有刘知几自作的序，介绍他著述《史通》的简要经过及定名为《史通》的原因。内篇共10卷，36篇(原为39篇，有3篇已亡佚)，主要对历代史籍从体裁、体例、编撰方法等方面作了系统全面的评论总结。外篇共10卷13篇，主要是作者读史札记，也有对历代史官建置及史书编纂的系统评述。全书内容大体可分六类：

第一类，从总体上论述史学源流、评论史籍分类、史官建置等史学发展情况。有《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等篇。

第二类，就史书编纂的具体问题如史书体例(主要是对纪传体体例)、史书应写内容、写作技巧、叙述方法等进行评论，有《载言》、《本纪》、《列传》、《表历》、《书志》、《浮词》、《叙事》等近20篇。

第三类，就史料的搜集、鉴别、取舍进行评论。有《采撰》、《载文》、《补注》等篇。

第四类，就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进行评论。有《核才》、《鉴识》、《辨职》、《直书》等近10篇。

第五类，就一些历史著作进行评论。有《疑古》、《惑经》、《申左》、《五行志错误》等篇。

第六类，叙述自己一生的成长，学史的经过、史学志向、在史馆修史的情况及著述《史通》的目的。有《自叙》、《忤时》两篇。

《史通》问世后，当代人及后世人对它的评价一直是毁誉兼有、褒贬不一。刘知几的好友，著名史官徐坚十分赞许《史通》，说凡担任史官职责的，都应当将它置于座右。唐朝末年柳璨著《史通析微》，批评《史通》"妄诬圣哲"，议驳失当。宋朝孙何著《驳史通》，也对《史通》进行了批评。明朝以前人们对《史通》的评价贬多于褒，《史通》流传不广。明朝中叶以后，人们对《史通》的史学价值，对这种史评体专著，逐渐有所认识，一些有识之士对《史通》重加补正、训释，如明朝李维桢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朝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等，使《史通》得以广泛流传。

《史通》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肯定了据事直书、详近略远、文史结合等史学优良传统，批判了盲目崇古、迷信圣人的错误观点，全面考察了古代历史编纂学；另一方面对以后的撰史方向提出了鲜明的主张，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

《史通》在对以往史学的评论中，形成了求实性、战斗性、辩证性三大特点，这也是刘知几史学理论的特点。

从求实性出发，《史通》将史学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所有违背这一原则的史家、史著，其批判如清代黄叔琳所形容的是"舌长而笔辣"，无情而又无畏。

从求实性出发，《史通》的评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诸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形成了颇具辩证因素的风格。主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史通》中，也反映了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反映在社会历史观上，表现为既反对命定又不否定天命，虽肯定人事的作用，又极力夸大帝王将相个人的“智能”、“神武”的作用；反映在历史编纂学上，表现为既主张直书、实录，又认为有涉及君亲的，就该有所隐讳以符合封建名教；反映在方法论上，表现为虽有朴素的辩证因素，又时而流露出形而上学的色彩。

尽管如此，后世的许多进步历史学家都从《史通》中、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受到不少启发，从而将中国的史学研究逐步向前推进。

（李海涛）

参考资料：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

《旧唐书·刘子玄传》、《旧唐书·刘胤之传》

《新唐书·刘子玄传》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

《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分册》

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韦后乱政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等大臣与羽林兵联手发动政变,斩杀武则天嬖臣张昌宗、张易之兄弟,逼武退位,拥中宗李显复位,改国号周为唐。张柬之、崔玄暐、袁恕己、敬晖、桓彦范拜为相,并赐爵郡公。

中宗即位后,立妃韦氏为皇后,并追赠韦氏父亲玄贞为上洛王,母亲崔氏为妃。左拾遗贾虚己上疏反对道:"异姓不封王,是古今通制。今日中兴之始,百姓翘首以望陛下之政,陛下却先封皇族为王,这不是向天下光显美德。若制命已下,宜让皇后固辞,以显示其谦逊美德。"疏上,中宗不纳。

韦氏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中宗作太子时,纳她为妃。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立中宗为帝,封韦氏为皇后。是年中宗被废,韦氏随他同迁房州(今湖北房县)。中宗生性懦弱,胆小怕事,畏惧母亲武则天,常常在惊恐不安中度日。每看到武则天的使臣一到,他害怕地就要自杀。韦后倒显得镇静自若,安慰他说:"祸福无常,大不了是一死,何苦要这么惊恐地折磨自己呢。"中宗在危难之际靠着韦后的相伴与慰抚才得以度过难关,因此对她十分感激,二人情义甚笃。中宗对韦后许下诺言说:"有朝一日得以见天日,我一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让你随心所欲。"即位后中宗果然如约,纵容韦后,而韦后也恃宠干政,效法婆母武则天所为。这一切引起朝臣的担忧。继贾虚己之后,桓彦范又上疏说:"《尚书》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预闻朝政,臣

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亡身破国的。乞望陛下以古今为戒，以社稷苍生为念，让皇后专居中宫，勿出外朝干国政。”中宗对大臣上谏充耳不闻，对韦后却有求必应。胡僧慧范当初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依附于张易之兄弟，也得韦后器重。二张被诛后，韦后反称慧范参预了诛二张政变，中宗便以功加其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准其出入宫掖，还多次亲至其舍拜谒。桓彦范再次上疏告慧范以左道旁门乱政，请诛之。中宗不听。

当初张柬之等人诛杀了二张，却忽视了武三思等人的势力。洛州长史薛季昶提醒他们说：“二凶虽然被除，吕产、吕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会复萌。”张柬之和敬晖却说：“大事已定，他们不过是机上之肉，成不了大气候了。”季昶叹道，我恐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朝邑尉刘幽求也劝他们说：“武三思尚在，若不早加图谋，后悔就来不及了。”可惜这一切均未引起张柬之等人的重视。

事态的发展不出薛季昶等人所料。中宗复位不久，武三思就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形成了韦武集团，再次危及皇室。

武三思略涉文史，善巧媚取容，当初深得武则天的恩宠，位至宰辅。中宗复位后，他根基未摇。而且又为其子武崇训娶了韦后爱女安乐公主为妻，与皇帝攀上亲，成为外戚，根基更固。他又与上官婉儿私通。上官婉儿是前朝大臣中书侍郎上官仪的孙女，天性聪颖，颇有才气，擅长文词，娴熟吏事，处理宫中事务游刃有余。曾忤旨当诛，武则天爱其才，只黥面而已，仍加重用，让其参决百司表奏。中宗时专掌制命。先拜婕好，后改为昭容，得到中宗和韦后的赏识，于是向韦后推荐武三思。武三思为插手朝政，有意攀援韦后，不久二人有染，颇有丑声相传，而中宗还让韦后与三思在宫中玩双陆游戏，自己则在一边观看。不久即拜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后等人见有中宗的纵容，更加有恃无恐地擅权干政。

韦武集团势力日炽，引起朝臣的担扰。张柬之等人多次进言

说:"当初武后夺权之际,李氏宗室几乎被斩尽杀绝。今日上天保佑,陛下返正复位,而武氏一如既往,专权跋扈,致使远近失望!愿陛下抑损其禄位,以告慰天下。"见中宗不悟,张柬之等朝臣或抚床叹息,或弹指出血,悲愤地说:"当初所以不诛杀诸武,是想让陛下亲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呵。不料今日陛下却如此。一旦大势已去,就无可奈何了。"监察御史崔皎得知中宗多次微服幸三思宅,秘密上疏谏道:"陛下初复位,则天皇帝尚在西宫,仍有人心依附。况且周朝旧臣,如今列居朝廷,陛下不可随意外游。"中宗不仅不听,反而向武三思泄露密疏,引起武三思对大臣的切齿痛恨。

五月初四日(壬午),中宗宣布武三思与张柬之等十六人同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除逆反罪外,各恕十死。第二天,敬晖等率百官上表,以为"武氏上台之际,将宗室诛贬殆尽。现天命惟新,诸武却封官加爵如故,并居京师,自古以来,未有此理。愿陛下为社稷考虑,顺乎众心,降其王爵,以安定内外。"中宗不纳。敬晖等怕遭武三思谗言,让考功员外郎崔湜侦伺武三思动静。不料崔是势利小人,见中宗亲信三思而疏远朝臣,于是将敬晖等人的意图向武三思和盘托出,投靠了韦武,被引为中书舍人。

韦后、武三思周围聚集了一些奸佞之徒。郑愔在武则天朝任殿中侍御史,谄事二张。二张事败后他被贬官,后坐赃逃人洛阳。他私下里拜谒武三思,见面时始则哭泣甚哀,继而大笑,弄得武三思莫名其妙,于是问他缘故。郑愔解释说:"初见大王(指武三思)时哭,是哀大王将身死族灭,后又大笑,是喜大王得郑愔呵。大王虽得天子之意,但张柬之等五人皆据将相之位,而且胆识过人,废太后时易如反掌,大王可估算一下与太后势位谁重?这五人日夜恨不能吞噬大王之肉,不诛大王之族是不会甘心的。大王不除此五人,则危如朝露。而大王竟俨然以为有泰山之安,我为大王感到寒心呵。"武三思听后大悦,与郑愔登楼密谈,询问自安之策。郑愔遂被提拔为中书舍人,与崔湜同为韦、武的谋主。

韦、武将张柬之等掌握朝政大权的功臣视为篡权夺位的障碍，不断在中宗面前恶语中伤。说他们"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武三思还出主意，让中宗封这些人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其权。中宗完全被韦、武迷惑，下诏以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给金帛、鞍马，只让朔望日参加朝见。敬晖等五人被罢去实权后，三思立即命令百官重行则天朝之政，将不依附武氏者排挤出朝，为敬晖等所贬逐者一一复职。朝政大权尽归韦、武。他们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敬晖等上表请削武氏王爵时，中书舍人岑羲、偃师毕仗义执言，结果二人均被贬官。神龙二年四月。处士韦月将上书弹劾武三思潜通宫掖，图谋逆乱。中宗却勃然大怒。下令斩杀韦月将，黄门侍郎宋璟等人力谏不可，才改为杖刑，流放岭南，但不久又派人杀了他。

在此前不久，还发生了王同皎事件。王同皎是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娶安定公主。他参与了诛二张政变，以功升右千牛将军，拜驸马都尉，升任光禄卿。他看到武三思专权任势，图谋逆乱，于是招集壮士，拟在武则天下葬之时，劫杀武三思，不料同谋人冉祖雍向武三思告了密。武三思随即使人告发王同皎密谋杀武三思后，将拥兵诣阙，废黜皇后。王同皎因此反被斩于都亭驿前，同谋人也一一被杀。韦、武并不善甘罢休，抓住此事大作文章，诬陷此前已被贬到地方的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与王同皎通谋。中宗不察真假，一道令下，五人分别远贬为崖州、泷州、新州、窦州、白州司马，并被削去勋封。

武三思欲置五人死地而后快，于是又采用卑劣的手段，暗中指使手下人书写韦后秽行，请求将其废黜的揭帖，贴在洛阳天津桥。中宗龙颜大怒，决定严加惩办，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追查此事。李承嘉早已禀承武三思旨意，奏称："这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

己、崔玄暐指使人干的，而且名为废黜皇后，实则图谋大逆，请依法灭族。"武三思为使中宗确信不疑，又唆使儿媳安乐公主诬潜于内，侍御史郑愔呼应于外。因此事非同小可，中宗命司法部门推问。最后因中宗曾赐敬晖等人铁券，许以不死，而长流远地。不久武三思派爪牙大理正周利用赶至岭外，残酷地将桓彦范、敬晖、袁恕己杀死。张柬之和崔玄暐则在周利用未来之前已忧抑去世。

韦、武铲除了异己，气焰更加嚣张。武三思就曾鲜廉寡耻地扬言："我不知人世间什么叫善人、恶人；只要顺从我的就是善人，反对我的就是恶人。"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等佞臣也助纣为虐，成为武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成为武三思的耳目，被当时人称作"五狗"。

韦后的政治野心决不满足于一般地干预朝政，而是想临朝称制，位居女皇。对此上官婉儿十分清楚，因此常常劝韦后仿效武则天。中宗复位不久，她就劝韦后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指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二十三岁为丁，五十九岁免役。按当时规定，只为父服丧三年，一般不为出母服丧；男二十一岁成丁，即要服役，六十为老。上官婉儿深谙为政之道，她让韦后通过改易制度沽名钓誉，增加威望。而韦后对此也心领神会，不失时机地为当女皇捞取资本。

安乐公主颇随其母。她是中宗与韦后的小女，生于父母被贬房州途中，当时中宗脱下衣服把她包起来，故小名"裹儿"。她容貌俏丽，又伶牙俐齿，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在父母溺爱中长大起来的安乐公主养成了霸道专横的作风。中宗复位后，仍一味地骄纵她，恣其所欲，只要是安乐公主奏请的事无不允许。安乐公主也恃宠骄横、无法无天。有时自草制敕，还故意用手掩住内容，让父皇署名，中宗居然也微笑地从命，对内容看也不看。安乐公主胃口越来越大，向中宗提出废掉皇太子李重俊，而改立她为皇太女的要求。宰

相魏元忠认为，皇太子是国之储君，又无大过失。不能轻易动摇；安乐公主得知后，不屑一顾地讥讽魏元忠为田舍汉，不配议论国家大事，并张狂地说武则天能自为天子，她身为公主，承继皇位有何不可。中宗这次没听她的，却也不加责备。

韦、武阴谋篡权，一致将皇太子李重俊视为仇敌。韦后因为太子非己所生，深怕日后成为自己当皇帝的障碍，所以十分厌恶太子；武三思也疑忌太子。上官婉儿因武三思的缘故，在下制敕时，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室。安乐公主与夫武崇训常常无端凌侮太子，甚至呼太子为奴。在韦、武集团围攻下，太子地位已岌岌可危。

景龙元年（707年）七月初六日（辛丑），太子李重俊经过布署，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和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矫诏动用羽林骑兵三百余人，袭击武三思住宅，杀死武三思和其子武崇训及其同党十几人。然后又派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及其子天水王李禧分兵把守宫城诸门，太子则与李多祚带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直奔宫殿索取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大喊道："太子是要先杀婉儿，再杀皇后，然后谋害皇上呵。"接着与中宗、韦后、安乐公主急忙登上玄武门楼躲避，中宗命令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飞骑百余人守卫在楼下。这时宰相杨再思、苏瓌、李峤及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屯守在太极殿前，闭门自守。李多祚先至玄武门楼下，上楼时被卫兵挡住。太子与多祚很是犹豫，于是按兵不动，想等中宗出来对话。这时，宦官宫闱令杨思勖突然挺刃杀死多祚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羽林兵士气受挫。中宗乘机对羽林将士发话："你们都是朕的宿卫之士，为何随从多祚谋反？若能反戈一击，不愁不富贵。"于是士兵倒戈杀了多祚、承况、祎之、忠义，不战自溃。成王千里和天水王禧攻打延明门，欲杀宗楚客、纪处讷等人，也不克而死。太子仓皇带着百骑逃往终南山，途中被手下士兵所杀。

这次兵变尽管杀死了武三思父子，但却没能扭转韦、武集团控

制朝政的局面。韦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婉儿照样我行我素，依势用事。她们公开地卖官鬻爵，贪脏受贿。当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交钱三十万，她们都让中宗降墨敕授官，斜封付中书，时称"斜封官"。当时，正职之外的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达数千人。上官婉儿以及后宫妃嫔多在宫外设宅，随意出入宫中，朝臣为求显达，争先交结攀附，使这些人家门庭若市。安乐公主尤其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她与长宁公主竞起宅第，其富丽堂皇如宫殿一般。安乐公主还要把百姓捕鱼的昆明池霸为己有，目的没达到，便夺民田作定昆池，延绵数里，垒山灌水，比昆明池还气派。她有一条用百鸟羽毛织成的裙子，价高竟达一亿钱。可以想象其奢侈程度。昏庸的中宗不仅纵容皇后及女儿干政，他自己也不理政事，滥封王爵和食邑，广置员外官。又大崇佛教，倾国财造寺庙，大的耗钱百数十万，小的也要三、五万，共计在千万以上，致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左拾遗辛替否上疏对中宗这种胡作非为提出委婉的劝谏，但中宗毫不理会，朝政弊端日见严重。

景龙二年二月，宫中启禀中宗，说韦后衣箱中裙子上升起了五色云，很久才消散。韦后党羽中书令韦巨源附会说是难得的佳瑞，请中宗诏告天下。中宗命画工绘其形状，宣示百官，并为此大赦天下。不久，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又上表说："从前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应天皇帝（中宗）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韦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女时韦也》，这是天意让顺天皇后作国母，主蚕桑之事。现谨上《桑韦歌》十二篇，请编入乐府，待皇后祀先蚕之时，以享宗庙。"中宗悦而应允，还特地赐给迦叶志忠庄田一座，杂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又加以引申，编成舞咏，亦受厚赏。宗楚客又嘱补阙赵延禧上表陈述符命，将《桑条》释为十八代之符，请颁示天下，书入史册。中宗又很高兴，将赵延禧提升为谏议大夫。

韦后阴谋篡位已昭然若揭。景龙三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下令将其杖杀。五月，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又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谋危社稷。"中宗召他当面诘问，燕钦融神色不变，慷慨陈词，使中宗心有所悟。宗楚客却矫制让飞骑士兵将燕钦融摔死在殿庭石上，并大呼称快。中宗见宗楚客如此目无君主，心中很是不悦，加之中宗对韦后及安乐公主迫害自己胞弟相王李旦不满。这引起了韦后及其党羽的不安。景龙四年六月初二日（壬午），韦后、安乐公主与经常出入宫掖的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少卿杨均密谋，在御膳中下了剧毒，中宗中毒死于神龙殿。六月二十日（庚子）就在韦后一伙紧锣密鼓匆匆准备粉墨登场之时，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斩杀了韦后、安乐公主，一举铲除了韦、武集团。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08

《旧唐书》：《韦庶人传》、《韦巨源传》、《宗楚客传》、《纪处讷传》、《武三思传》、《武承嗣附子延秀传》、《新唐书·安乐公主传》

李隆基定内乱

李隆基(唐玄宗,又称唐明皇)是睿宗李旦之子。封为临淄王,神龙元年(705年)时任卫尉少卿,后二年,又出兼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他从小即怀大志,在宫中曾以曹操的小名阿瞒自称。他生活在李唐王室的多事之秋,先是武后改唐称帝,继而韦后临朝称制,雄心勃勃的李隆基立志要亲手兴复李唐社稷。

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初二日(壬午),懦弱昏庸的唐中宗被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于神龙殿。韦后秘不发丧,自总政务。第二天,她把宰相召到禁中,谋求自安之策。并征诸府兵五万人屯驻京师,以防事变,由亲信党羽附马都尉韦捷、韦濯、卫尉卿韦璿、左千牛中郎将韦锜、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别统领。又派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带兵五百赶到均州(今湖北均县西),防范中宗之子谯王重福。提升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东都留守。匆匆布置完毕,才由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草拟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亲韦后的宰相宗楚客知道李旦参政对韦后专权不利,于是表示反对,理由是李旦与韦后是叔嫂关系,一起听朝议事,有违礼制。他将此意秘密告诉韦后之兄韦温,并得到支持,便率宰相表请韦后临朝,罢李旦政事。大臣苏瓌说:"遗诏怎可随便改动"?韦温大怒,苏瓌只好缄口屈从。李旦改任太子太师。

一切准备就绪后,初四日(甲申),韦氏集团才在太极殿向百官发丧,韦后临朝摄政,大赦天下,改元唐隆。初七日(丁亥),十六岁

的重茂即位，是为少帝。

韦后子弟与党羽把持着南北卫军、台阁要司，且遍布各地，蠢蠢欲动，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聚集在韦后周围，劝她效法武则天。宗楚客还秘密上书引图谶，谓韦氏应当革唐之命。当时京师人心不安，韦后集团图谋篡权，欲谋害少帝，把相王李旦和权力欲极强的太平公主视为夺权路上的障碍，日夜谋划要将其翦除。

兵部侍郎崔日用平时依附韦皇，与宗楚客关系密切。他得知秘谋后，反复权衡双方的力量，感到韦氏未必能成功，为了不让灾祸延身，他派遣僧人普润向李隆基告密，并建议隆基先发制人。李隆基因早有匡复李氏皇室的打算，身边聚集了不少才勇之士。当初，唐太宗挑选一批骁勇善战的人，着虎文衣，跨豹文鞍，随从皇帝游猎，负责在马前射捕禽兽，称为"百骑"；武则天增加为千骑，隶属于禁军的左右羽林；中宗时又称"万骑"，置使统领。李隆基身为禁军将领卫尉少卿，平时少不了和万骑打交道，他有意结纳其中的豪杰之士。日子久了，李隆基在宫中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李隆基感到铲除韦氏集团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与痛恨韦后专权的姑母太平公主，以及公主之子卫尉卿薛崇暕，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人密谋起兵之事。韦党的韦播、高崇分押左右营万骑，平时这二人为了树立权威，动辄棒捶万骑战士，万骑对他俩恨之入骨。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还常向李隆基诉苦。所以李隆基也把诛韦的消息告诉了福顺、玄礼和万骑果毅李仙凫等，都坚决表示以死相报。有人劝隆基禀告父亲相王李旦，李隆基不同意，说："我们为社稷起兵，事成则福归于王，不济则以身殉国，不应当牵连相王。若告诉了相王，相王赞成，实际上就参与了这种危险事情；若不赞成，我们也无法按计行事了。"

二十日（庚子），一切行动按预订计划悄悄地进行着。午后时

分，化装后的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潜入宫苑，到事先约好的钟绍京廨舍聚集。不料钟绍京临事又有些动摇，想闭门不出。其妻许氏劝他道："忘身殉国，天必助之。何况君已参预了大计，即使反悔也来不及了。"钟绍京这才趋出拜谒，将李隆基等人迎入屋内，李隆基拉着他的手坐下。宫苑位于皇城北面，靠近城北的玄武门。守卫此门的是由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安排的亲信羽林将士。夜幕降临，葛、李二人进入宫苑，请求李隆基发号令而举事。至二鼓时分，满天银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天意在昭示着我们，时不可失！"葛福顺遂拔剑直奔羽林军营，手起刀落，斩杀了韦璿、韦播、高嵩，然后向万骑士兵大声宣告："韦后鸩杀了先帝，谋危社稷，今天晚上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诸韦男女长过马鞭高度的人)全部斩杀；立相王以安天下，若有心持两端帮助逆党的，罪及三族。"万骑们早已恨透了残暴的诸韦，当时均表示听命。葛福顺割下韦璿等人的首级，送到李隆基处。经一一辨认无误后，李隆基便与刘幽求等人走出宫苑南门，钟绍京率领二百余名丁匠，手执斧锯扈从而行。李隆基发令，由葛福顺带领左万骑攻玄德门，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白兽门，这两门均是通宫内的要口。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合。

号令一下，葛福顺等人杀死守门将吏，斩关而入。约三鼓时分，带兵守在玄武门外的李隆基闻听噪声大起，便率总监及羽林兵迅猛冲入宫内。守卫太极殿中宗灵柩的诸卫兵得知诛韦氏，皆披甲响应。韦后闻听外面噪声不断，知大事不妙，惊恐万状地奔入飞骑营避难。她没有想到飞骑士兵已反戈，立时成士兵的刀下鬼，首级被送到李隆基处。其女安乐公主一向专横跋扈，这时正在房内照镜画眉，还没等她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闯入屋内的士兵杀死。她的丈夫武延秀则在肃章门外被杀。

上官婉儿见李隆基带兵入宫，赶忙率宫女相迎，并拿出自己起草的中宗遗诏，上面有立温王为太子，以相王辅政的内容，后来被宗楚客等人删除了。她想以此证明自己是拥护帝室的，以求免除一

死。刘幽求也为她求情。但李隆基不准,遂斩于旗下。

少帝当时在太极殿,刘幽求要除去他,以立相王。被李隆基制止了。接着,李隆基下令关闭宫门和京城大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韦温被斩于东市之北。宗楚客骑驴逃至通化门,被守门士兵认出而杀了他。大臣赵履温平日倾国库巴结安乐公主,建宅造屋,筑台修池,无休止地役使老百姓。公主死后,他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来到安福楼下高呼万岁,不料喊声未绝,万骑就将他斩首。一会儿功夫,人们就把他的肉割尽,以泄心中的愤怒。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韦党分子均被斩首,韦、武集团被一网打尽。这时,李隆基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启奏之罪。相王拥抱着他,哭泣地说:"靠你的力量,社稷宗庙才不毁灭。"于是隆基迎相王入辅少帝。隆基以功封为平王,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十四日(甲辰),在李隆基、刘幽求和太平公主安排下,睿宗复位,少帝被迫让位。当时无知年幼的少帝仍稳坐御座上不动。太平公主说:"天下之心归相王,此非儿座。"把他抱了下去。三天后,临淄王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睿宗当政时期(710—712 年),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姚、宋二相协心革除中宗弊政,进用忠良、罢退不肖、赏罚公允、严禁请托,使朝政为之一振,有贞观、永徽之风。但是宫廷斗争还远没有完结。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之女,她的个性、气质都类似武则天,因而深受武后宠爱,常常与她密议天下大事,按制度,公主坐食租税不超过三百五十户,而太平公主却食邑三千户。太平公主与母亲一样,权力欲极强,且有心计谋略,武则天当政时,太平公主畏惧武后威严,因此虽然得宠,却不敢轻易的招纳权势,采取一种深藏不露的态度。后来她参与了张柬之等人诛杀武后宠臣张易之兄弟、拥中宗复位的斗争,锋芒初露。中宗之世,韦后和安乐公主对她都十分畏怕。接着太平公主又与李隆基联手诛韦后,屡立大功,其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胀。睿宗性情软弱,对这个有胆量韬略的妹妹十分尊重,视为辅弼,经常与她商讨军国要政。每逢宰相奏事,睿宗都要

问:“与太平商量过吗?”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商量了吗?”可见太平公主的地位超过了太子。而且,睿宗对太平公主言听计从,满足她的一切要求,自宰相以下,进退全靠她一句话。她推荐的人做大官登显位的,不可胜数,因而趋附其门者如市。她的儿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郊。其用具器玩之类,都要兴师动众远到四川、广东等地去购买。其居处也富于宫掖。家产堆积如山。

太平公主野心勃勃,欲效武后所为,自掌朝政。她没把性情懦弱且无意于政治的睿宗放在眼里。对太子隆基,最初她认为年轻,容易控制,但随即感到隆基英武有才,日后难以驾御。她断不肯屈居隆基之下,于是欲废掉隆基,重立一个暗弱易制的为太子,以便久掌大权。她抓住李隆基不是嫡长子的事实,广为散布“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又在太子周围安插心腹耳目,监视着太子的一举一动,不断向睿宗打太子的小报告,使李隆基深感不安。

太平公主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势,搬倒太子,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人结成朋党,拉拢朝廷大臣。太子少保韦安石心向太子,不理会公主之党的笼络。一次,睿宗密召他问道:“听说朝臣都倾心于东宫,卿仔细观察一下。”韦安石直言不讳说:“陛下为何口出亡国之言!这是太平一伙的阴谋。太子对社稷有功,且仁智尽孝,天下人所共知,愿陛下明鉴,不为谗言所惑。”一席话说得睿宗有所感悟,对安石说:“朕知道了。”并嘱咐其不要再说。不曾想躲在帘后的太平公主窃听了这番话,对韦安石恨得要死,于是无端诬陷,要把韦安石下狱审讯。幸亏宰相郭元振营救,韦安石才免于劫难。

太平公主进而明目张胆反对太子,她把宰相召集到光范门内,公开地说要换易东宫,宰相们大惊失色。不禁愕然。宋璟直言反驳道:“东宫对天下有大功,是宗庙、社稷之主,公主为何说这样的话!”由于大臣一致反对,太平才悻悻作罢。

为了维护太子地位,反击太平的进攻,姚崇和宋璟秘密向睿宗

进言:"宋王(成器)是陛下长子,豳王(守礼)是高宗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使太子深感不安。请外出宋王及豳王为刺史;罢岐、薛二王(隆范、隆业)左、右羽林之职,而为左、右率以事奉太子;太平公主和其夫武攸暨请在东都洛阳安置。"姚、宋建议把太平公主和宋王、豳王调离京城,并罢去岐王、薛王的禁军之职,意在防止他们串通一气动摇太子,这是很必要的措施。但是睿宗却说自己没有兄弟,只有太平这个妹妹,不忍让她远离京城。于是只象征性地下一个制书:不许诸王、驸马掌禁兵,现任者皆改为他官。此事便不了了之。

时隔不久,睿宗突然对大臣说:"有术士说五天内将有军队入宫,请你们为朕作好应变准备。"大臣们感到莫名其妙。宰相张说识破这是那些欲动摇太子的人要的花招,就说:"这是奸人欲离间陛下与太子关系散布的流言,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不攻自破。"姚崇等人也在旁附合。睿宗有所醒悟,景云二年(711 年)二月初一日(丙子),下制以宋王为同州刺史,豳王为豳州刺史,岐王为左卫率,薛王为右卫率,太平公主安置在蒲州(今山西永济)。第二天,又命太子隆基监国,六品以下官员任免和徒罪以下案件判决,均由太子全权处理。

太平公主获悉自己被调出京师是姚崇、宋璟出的主意,立刻勃然大怒,仗着姑母的长辈身份斥责李隆基。隆基无可奈何,只得奏劾姚、宋离间姑兄之罪。初九日(甲申),睿宗遂把姚、宋二人分别贬为申州、楚州刺史。由韦安石与李日知代姚、宋为政,从此纲纪紊乱,中宗朝弊政又死灰复燃。

懦弱无能的睿宗控制不了局面,他召集三品以上的官员,商议道:"朕素喜淡泊,不以帝王为贵,从前做太子和皇太弟时,朕皆推辞不受。今天朕想把帝位传给太子,你们看怎么样?"由于事关重大,群臣多不作声,不敢随便表态。殿中侍御史和逢尧依附太平公主,对睿宗说:陛下年纪不高,天下正依赖陛下,不宜轻易传位!"睿

宗这才决定暂时不让位。但是下制让太子放手处理政事: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官员升降之事,臣僚要先与太子商议,然后奏闻。

太子李隆基开始主持朝政,而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斗争仍在激烈进行着。隆基不动声色地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请求让位于宋王成器,睿宗不准。他又主动请把太平公主召回京师,显示了自己的高姿态,这使睿宗深感宽慰,增加了对太子的好感与信任。

太平公主重回京师后,更加张狂地反对太子。七月,天空出现慧星,古人历来把它视为灾异的预兆。太平公主居心险恶地用此作文章,让术士散布说,慧星的出现,是由于皇太子要夺位作天子。欲以此挑拨睿宗与隆基的父子关系,激怒睿宗废太子。不料,睿宗不愿陷入宫廷倾轧的漩涡,表示愿意传德避灾,让位太子。公主党羽力谏不可,却不被采纳。太平公主弄巧成拙,只好退而求其次,劝说睿宗传位后,犹应自总大政。睿宗答应了,对隆基说:"你以天下为重,愿与朕兼理朝政吗?从前舜禅位给禹,犹亲到各地视察,朕虽传位,仍难忘家国,愿与儿兼省军国大事。"李隆基上表推辞不准后,于景云三年八月初三日(庚子)即皇帝位,是为玄宗,改元先天。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隆基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每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官员升降及大刑政由上皇决断,其余由隆基处理。

太平公主与即位后的李隆基明争暗斗逐渐升级,矛盾达到白炽化程度。太平公主利用睿宗对她的偏袒迁就,擅权用事,结党营私。当时宰相七人,其中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均因她而得进,日夜为其出谋划策。文武大臣也多投靠依附于她,象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待贾膺福、鸿胪卿唐晙等人,均位居军政要职,握有实权,他们聚集在太平公主周围,图谋废立,李隆基完全处在太平势力包围之中。宰相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暐密谋发动禁军战士诛杀太平公主集团,二人商议好后,由张

晧密告隆基说："太平一伙日夜策划危害陛下，若不早作准备，一旦祸起，太上皇无以得安，请立即诛之，臣已与幽求安排好了，只等陛下的命令。"隆基深以为然。不料张晧将此事透露给侍御史邓光宾。隆基大惊，因为时值即位之初，尚未来得及充分准备，一旦打草惊蛇，后果不堪设想。隆基只好忍痛将幽求及张晧流放。

有个河内人王琚，不满太平公主干权。在隆基作太子时，他回长安，选补为诸暨主簿。王琚去谢太子，在宫廷中故意摆出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子。宦官提醒他："殿下在廉内呢。"王琚却高声说："什么殿下，当今只有太平公主！"隆基感到此人不同一般，立即召见他，王琚直言道："韦后害先帝，人心不服，诛她易如反掌。太平公主是武后之女，凶险狡猾，大臣多卖身投靠，臣甚感担忧。"隆基与他同榻坐下，泣道："太上皇只有太平一妹，说出来恐怕伤了太上皇之心，不说又为患日深，到底该怎么办？"王琚趁机开导说："天子之孝，不应同于老百姓，当以安宗庙、社稷为重。治理天下者岂应顾及小节！"隆基很欣赏王琚有谋有识，便奏为詹事府司直，即位后提升王琚为中书侍郎，引为知己。

王琚见太平公主加紧活动，隆基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于是上言："事情已经很紧迫了，应当赶快行动。"左丞张说也从东都洛阳托人给隆基带去佩刀，意欲他决然断割。荆州长史崔日用奏事时说："太平谋逆由来已久，陛下在东宫时，犹为臣子，若诛之，须用谋力。现在已登基即位，只要下张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太平的阴谋得逞，后悔就来不及了。"隆基说："诚如卿所说，但是怕惊动上皇。"日用说："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化为废墟，孝则成为一句空话。臣请先安定北军，然后将逆党一网打尽，则不会惊动上皇的。"隆基赞同他的主意，任命其为吏部侍郎。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宰相魏知古得知太平公主等人欲在是月四日作乱，届时由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率禁兵突入武德殿，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岑羲举兵接应。他将情报禀告隆基。事不迟

疑，李隆基遂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等定计诛之。具体日期定在太平发难前一天。

初三日（甲子），隆基从王毛仲处调来闲厩马及士兵三百余人，由武德殿入虔化门，将应召而来的常元楷、李慈杀死。接着又从内客省逮获贾膺福、李猷，从朝堂抓住萧至忠、岑羲，把他们全部斩首。窦怀贞躲到沟里，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

太上皇闻变，赶紧登上承天门楼。郭元振早一步奉隆基命前来，告诉是奉皇帝命诛窦怀贞等人，并无他事，让太上皇不用担惊。李旦遂下诰宣布怀贞等人罪状，同时大赦天下，只有逆人亲党不赦。薛稷被赐死于万年县狱。

第二天，太上皇又下诰："自今军国政刑，皆由皇帝处分，朕欲无为养志，以遂平生之意。"然后徙居百福殿。至此，李隆基掌握了朝政全权。

太平公主闻乱逃入山寺，三天后才出，被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羽处死者数十人。薛崇简曾因屡谏其母被挞，这次特免一死，赐姓李，官爵如故。公主之家被抄，只见财货山积，珍玩器物超过皇家，其厩牧羊马，田园息钱，竟收数年不尽。

唐玄宗一举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结束了自中宗神龙以来政变频繁的动荡局面，开创了李唐王朝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杨西云）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 208—210

《旧唐书·太平公主传》

《旧唐书·韦庶人传》

开元之治

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初三日(庚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玄宗在即位初期,励精图治,他以政治家的气魄与胆识,锐意进行改革整顿,大刀阔斧地革除自武则天以来的积弊,取得良好成效,使朝政为之一新。

晋陵尉杨相如在玄宗即位伊始曾上疏议论朝政。他说,隋炀帝自恃强大,不忧时政,嘴上说的与尧、舜无异,行为却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而弃之,炀帝纵欲导致国破身亡,唐太宗抑欲而社稷昌盛,愿陛下慎重选择!人主没有不喜爱忠正而厌恶佞邪的,然而忠正之士常遭人主疏远,佞邪之徒反得亲信,君主为此常常倾国危身而终不能醒悟。原因何在?忠正者多犯颜直谏。佞邪者顺旨取容,君主积忤生憎,积顺生爱,自然有亲疏之分了。圣明君主则不然,爱其忤以纳忠贤,恶其顺而去奸佞,如是,则太平之世就不远了。疏文又说,法律,贵在宽简而能禁约,惩罚,贵在轻缓而必行;陛下正大布新政,崇尚至德,请除去琐碎,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法律能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就是至善之法了。疏文呈上,玄宗览后十分欣赏称赞,感到符合自己的心意。

玄宗认识到用人当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因此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他知人善用,把一批才能之士吸收到政权中来,放手让他们处理军国重事,象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都是开元时期的名相,他们不负众望,各有所长,鼎力辅佐,尽职克守。象姚崇,在被玄宗启用之前,曾上“十

事疏”，大意是让玄宗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绝贡献、不贪边功等，让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这十事疏基本上为玄宗采纳，成为开元时期施政方针的基础。继其为相的宋璟则守法持正，扭转时弊，使开元初期的政治逐渐走向正轨。玄宗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韩休秉信刚正，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玄宗在宫中宴乐或在后苑游猎，稍放松求治，就赶紧问周围人：“韩休知道吗？”每每这时，韩休的谏疏就已呈上。一次，玄宗闷闷不乐，拿着镜子端详自己，左右人劝道：“韩休作宰相以来，陛下比以前瘦多了，为何不罢免他呢？”玄宗感叹道：“朕虽然瘦了，天下却肥了。萧嵩奏事常顺从朕意，事后朕却常常担忧而睡不好觉。韩休直言力争，朕反而睡得安稳。朕用韩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江山社稷啊！”玄宗有这样的识见，大臣才敢尽心竭诚，补偏救弊，使政治较少出现失误。

玄宗十分重视调和统治集团上层的矛盾，维护皇权的稳定性。自中宗以来，宫廷政变迭起，外戚专权，王公贵族违法乱纪造成纪纲紊乱，政出多门。对此玄宗采取了安抚皇室诸王，抑制亲贵等措施。

玄宗兄弟很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就有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义、邠王李守礼、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等，俗称“五王”。玄宗对他们十分友爱，这在帝王中是少有的。玄宗在兴庆宫里设五王帐，放上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卧共寝。每天早上，诸王与玄宗在朝堂侧堂例行朝见仪式后，就不复讲君臣之礼，而按家中尊卑长幼之序行事。玄宗与诸王或一同饮食起居，或一同斗鸡、击球、郊游行猎，或讲论诗赋饮酒博弈，或自执乐器，与兄弟一起弹丝品竹，其乐融融。兄弟中谁生了病，玄宗立刻寝食不安，周围人劝他宽心进食，他却说，兄弟如同我的手足，手足不适，我哪有心思品食安寝呢！一次薛王李业患病，正在上朝的玄宗得知后，一时抽不开身，只好不断派使者前去探望。退朝后又亲自煮药，火苗烧着了胡须，左右惊叫着去拉他，玄宗却说：“只要薛王饮这副药治好了病，损失点胡须有什

么可惜的。"于此可见他的手足之情。

玄宗对兄弟们的友爱照顾。不仅出自亲伦之情，还有政治动因。诸王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且他们企望皇位也不算是非份之想，因为玄宗本人就不是以嫡继位的，所以玄宗要积极处理好与诸兄弟的关系。他给诸王特殊的礼遇照顾，却不让他们插手政事，并采纳姚崇的建议，将诸王任外州刺史：宋王兼岐州刺史、邠王兼虢州刺史，申王为邠州刺史，岐王为华州刺史，薛王为同州刺史。诸王刺史之职也属虚设，州务责成地方长史、司马负责。还规定自宋王以下诸王，每季只能有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以避免诸王与京官过多接触交往。当玄宗帝位逐渐稳固后，又把外任的诸王召回京师，但仍禁约他们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游玩宴饮，还私藏谶纬之书，事情发现后，裴虚己被流放到岭南，还让霍国公主与其离婚。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多次与岐王在一起饮酒赋诗，引起玄宗猜忌，于是把刘庭琦贬为雅州司户、张谔为山茌县丞，但对岐王却恩遇如故。在玄宗看来，兄弟之间本无隔阂，不过是些趋利之徒强自依托，所以并不责备自家兄弟。一次，玄宗身体欠安，薛王妃之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背后私加议论，玄宗知道后下令将韦宾杖死，贬皇甫恂为锦州刺史。薛王与妃子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薛王惶恐地站在殿阶下待罪。玄宗拉着薛王的手安慰道："我若有心猜忌兄弟，天地不容。"说罢叫人摆上酒宴，为薛王压惊，还派人慰谕薛妃，玄宗以这种温和的方式，妥当处理与诸王的关系，消除了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对贵戚权要的不法行为，玄宗从不袒护，而是坚持以法办事，严肃处置。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凌百姓，被御史弹劾。薛王为他说情，玄宗命中书、门下二省复审。姚崇、卢怀慎认为王仙童罪状昭著，御史弹劾无枉，不可纵舍他而坏王法，玄宗遂下令依法处罚王仙童。此事对贵戚权要们震动很大，有些人开始收敛气焰。开元

四年(716)正月，王皇后妹夫长孙昕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和，遂约其妹夫杨仙玉在巷子里将李杰打了。玄宗闻昕大怒，决定处以极刑在朝堂上当众杖杀，向臣僚谢罪。事后玄宗还颁下敕书，向李杰赔礼道歉，表示长孙昕等是皇亲国戚，不听训导，凌犯朝臣，虽处以极刑，也不足谢罪，让李杰保持刚肠疾恶，不要介意凶人。玄宗还颁发了《诫励宗室诏》，告诫宗室子弟今后若有违法乱纪，触犯刑律的，一律准法惩处，决不宽赦放纵，让他们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

对居功自傲的公卿大臣，玄宗也注意抑制其权势的膨胀。在诛灭韦、武集团和太平公主党羽的过程中，有的大臣立下功劳，虽被封官加爵，但他们自感劳苦功高，骄傲自满，心怀怨恨。象刘幽求、王琚、魏知古、钟绍京等人，玄宗一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贬官外迁，使这些人难以形成危及皇权的气候。玄宗这些做法，消除了引起政局动荡的隐患，保证了最高权力机关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与此同时，玄宗支持与鼓励正直的官员，与违法乱纪势力作斗争。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李朝隐为政清严，使当地豪强不敢胡作非为。玄宗幸东都途经同州时，特地召见他，并赐衣一件，绢一百匹，不久又提拔他为河南尹。太子舅赵常奴自恃是皇亲国戚，常常无端欺凌百姓，人们对他敢怒而不敢言。李朝隐气愤道："对这种人不绳之以法，何以为政。"于是把他捉拿起来，施以杖刑。玄宗知道后非但没怪罪朝隐，反而降下敕书加以慰勉。由于有玄宗的撑腰鼓励，臣僚官吏同不良现象作斗争蔚然成风。

玄宗对中宗以来吏治的积弊进行整饬。中宗时期，吏治腐败，朝廷公开卖官爵鬻，大量以非正式途径持帝别降"墨敕除官"的斜封官充斥朝中。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等各种名目的闲散官吏超过了正职，官僚机构臃肿，增加了国家开支。玄宗即位伊始，即着手整顿吏治，裁减冗员。开元二年二月，申王李成义请求把王府录事阎楚珪提拔为王府参军。宰相姚崇和卢怀慎上疏表示反

对，认为量才授官，本由专门机构掌管，若因是亲故之恩，就惠以官爵，势必紊乱纪纲。玄宗采纳二人奏议，拒绝了申王的请托，由是请谒不行。五月，又下令罢去员外、试官、检授官，规定若不是有战功及诏敕特别录用的，分掌文武铨选的吏部与兵部不得随便授官。以后又停废闲散的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免冗官三百余员。所谓"大革奸滥，十去其九"。机构精简后，办事效率大为提高，也节省了开支。

为了改善地方吏治，玄宗力图扭转重京官、轻外任的风气。象中宗朝，担任地方第一把手的刺史常以犯错误的京官和声望不高的人充任，县令也多是衰老无能者。玄宗下制，选京官有才识的授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的授京官，使出入常均。这样既可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又防止人们轻外任的偏见。

玄宗十分重视地方官吏的素质。开元四年五月，有人反映，说今年选官太滥，一些县令多非其才。玄宗利用新官入谢的机会，把所有新当任的县令召集到宣政殿庭，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答题及格，当即提拔他为礼泉令；其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依旧退居原职；另有最差的四十五人，被退回重新学习，主考官也因此降职。

当时有些高官子弟以门荫（靠祖先的功勋而得官称门荫）入仕，在地方上做官，倚仗权势，纵欲违法，成为州县大害。针对此，玄宗下诏，朝官子弟年少不谙时事者不可授县官等地方职。玄宗还建立了对刺史、县令的考核制，颁行了《整饬吏治诏》，每年由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工作进行考察，按政绩的优劣分为五等，作为地方官升降的依据。玄宗即位两个月后，就引见京畿县令，勉励他们惠养黎民百姓，对有政绩的地方官则破格提拔。开元十三年，玄宗从泰山封禅回京，沿途留心察看地方官施政表现。有些地方官的嘉言懿行给玄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感慨地对丞相张说道："从前屡派使臣分巡诸道，考察官吏善恶，这次封禅经过诸州，亲眼

所见，才知使臣多有疏漏。怀州刺史王丘，除了献上几头牲畜外，别无所献。魏州刺史崔沔迎候供奉不用锦绣之物，示我以俭。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皆是谏诤之语，朕将把奏书带在身边，用来自戒戒人。这三人不借民力国财邀买恩宠，真是良吏呵。"于是提升王丘为尚书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定州刺史。

武则天统治晚期直至中宗、睿宗以来，统治阶级贪图享乐，奢侈成性，社会风气极为不正。玄宗下大决心要转变这股奢靡风气。为此特地颁下几道敕令，禁抑奢靡，提倡节俭。

开元二年四月，玄宗首先下令销毁武则天在洛阳建的"天枢"，以示与铺张奢靡的风俗一刀两断。天枢用铜铁制成，高达一百零五尺，当时建造由于铜铁不足，连民间的农器也强敛熔毁，所费之钱更是以百万计，很是劳民伤财。这次工匠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将其熔毁，并将铜铁铸钱。同时，又拆毁了韦后在长安城朱雀街建的高数丈的"石台"。三个月后，玄宗又下诏让有关部门销毁宫中多余的乘舆服御，将金银器玩提供军国之用；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而自后妃以下，不得再穿戴；还规定百官服饰制度，即三品以上官，可以用玉器装饰，四品官用金，五品官用银，其余官皆禁用。妇女的服饰随从丈夫或孩子的品级而定。过去织成的锦绣服装染成黑色，禁止天下再采珠玉、织锦绣等，对违令者罚杖刑一百，同时罢废了专供宫廷用的两京织锦坊。玄宗不仅大张旗鼓地禁奢倡俭。还以身作则。这年八月。社会上风传皇帝要在民间挑选美女，充实后宫。玄宗听说后，下了一道《出宫人诏》，向天下表示要改变以往纳女入宫的做法，还要简择妃嫔以下的宫女，放还回家。诏后即将部分宫女集中到大明宫崇明门，用牛车将她们送回家去。玄宗用行动消除了谣言。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诏书中说："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因其无益于死者，而有损于生业。但是近代以来，奢靡成风，多行厚葬，竞相仿效，有人因此倾家荡产，如此失礼违令，实不应当。自今之后，丧葬之家，应有所依准，有关部门据品位高低，做出明文

规定:冥器等物,定出色数及长短大小;坟墓茔域,务遵简俭;送终的器物,不得用金银装饰,如有违犯者,先杖打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的,并贬为远官。”此外玄宗还亲自对棺椁及殉葬品等物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而且率先停废了皇陵供奉鹰犬。

玄宗对皇亲的食封制进行改革,限制诸王、公主的封户数。他对要求增加封户的公主说:“百姓上交国家的租赋非我私有。将士们在疆场上出生入死,不过赏赐一些绢帛,你们有何功劳,而坐享众多的封户呢?你们要懂得俭朴才是。”由于玄宗身体力行提倡节俭,宫廷内奢侈风习大为改观。

为了端正社会风气,玄宗提拔了许多清廉之士,这些人身居高位,却一尘不染,成为天下的表率。宰相李元纮、杜暹皆以恭身节俭闻名。与姚崇同时任相的卢怀慎,才能不及姚崇,遇事不敢决断,当时人戏称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他为官清廉,不营资产,一生清谨俭素,所穿所用,从不用金银锦绣。他当了宰相后,妻子子女们仍过清贫的日子,所居甚至不蔽风雨。玄宗正是用他的清廉来坐镇雅俗。净化风气。对暴殄天物的行为,玄宗深恶痛绝。一次,玄宗在宫中复道中看见卫士将吃剩的饭菜随手倒掉,顿时大怒,下令要杖杀这个卫士。周围人见玄宗为此小事动大刑,均感不妥,但没人敢劝阻。这时,宁王李宪从容劝道:“陛下从复道中窥人过失而欲杀之,今后恐怕人人不自安了,陛下志在节俭,厌恶浪费,但也不可为一点剩饭就杀人呀。”玄宗听后从震怒中回过味来,遂释放了卫士,对兄长说:“不是兄的提醒,我几至滥刑了。”这件小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玄宗尚俭的精神。

玄宗向天下倡俭戒奢,作为帝王,他也有各种欲望,有时难免放纵一下。可是一经臣下提醒便马上加以约束,择善而从。

开元元年二月十五日(庚子)玄宗为了庆贺自已登基即位,下令开皇城门,点上无数灯火,赐天下聚会饮酒,并奏乐歌舞,热闹非凡。玄宗与上皇(睿宗)通宵达旦登城门楼观看,乐此不疲,庆贺活

动竟持续了一个多月。谏官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说："与天下同庆应适可而止，如今损万民之力，营百戏之资，有悖于光显圣德，淳美风化。"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下敕向百官宣示严挺之忠直，又赐予厚赏。

玄宗曾派宦官到江南捕捉鸡鹕、鸿鹅等名贵水鸟，养在宫苑玩赏。这些宦官烦扰沿途州县。路过卞州（今河南开封）时，刺史倪若水向玄宗进言："现在农桑正忙，陛下却令捕罗禽鸟以供园池之玩；而且远至江、岭，水陆传送，喂以粱肉，沿途百姓看到这些，会认为陛下贱人而贵鸟。"玄宗闻奏下手敕谢倪若水，赐帛四十段，并将所捕鸟放掉。

开元四年五月，有胡人告诉玄宗，说海南诸国多产珠翠奇宝，可派人去求取；又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出产灵药，还有善于医术的老妇，可以置于宫中。玄宗一时被胡人夸耀所迷惑。马上就派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道前往寻求。杨范臣劝说："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向天下宣示不用奢侈之物，但是今天陛下所求取的东西与前年焚毁的不是一样吗？"臣是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若有军国大事，臣甘冒酷热瘴疠，万死不辞。今日这事却是胡人眩惑陛下而求媚取容，丝毫无益于圣德，臣认为也不是陛下本意，望陛下三思而行。"玄宗引咎自责，慰谕杨范臣，罢免此事。玄宗克制自己的私欲，身体力行地奉行节俭，对禁抑奢靡，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起了巨大的作用。

玄宗对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也极为重视，把农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玄宗组织人修建大明宫，进入农忙季节后，工程仍未完毕，于是玄宗下诏暂停营造，待农忙过后再建。开元三、四年间，山东连续遭受特大蝗灾，姚崇建议捕杀。玄宗初很犹豫，后认为姚崇建议可行，于是积极支持捕蝗，并派遣监侍御史分赴各道，捕蝗救灾，又派使者到各州县了解官吏捕蝗勤惰情况，一一上报中央，以督促他们尽力救灾。由于组织及时，措施得力，虽然连年闹

灾,百姓并无饥馑与流亡之苦。玄宗多次下诏蠲免租税,减轻人民负担。开元年间在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到五十六项。著名的有蔡州新息县的玉梁渠、蓟州三河县的孤山陂、晋州文水县的甘泉渠、买长渠等,唐代共修水利工程二百六十四项,玄宗执政期间修建的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扩大税源,玄宗即位之初就注意抑制豪强大族,和他们展开争夺土地和劳动人口的斗争。开元九年至十二年,由宇文融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田括户运动,共搜括客户八十余万和大量隐瞒土地。又在姚崇建议下,打击佛教势力。开元初年,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各地还俗僧尼一万二千余人。又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止官员与僧徒交往。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节约了资财,增加了劳动人手。

此外,玄宗还整顿边防,扩充屯田、调整布局,发展学术文化。总之,玄宗于开元期间对朝政弊端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改革。正如《旧唐书·玄宗本纪》所评述:"开元之有天下,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玄宗罢黜前朝奸佞之臣,以杜绝其奸;焚毁珠玉锦绣,以戒其奢靡;禁女乐而放宫女,以明其教化;阅兵而责帅,以明军法;考核官吏,选贤任能,使朝堂之上,人才济济。其志在升平,而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开元年间的各项改革,结出了丰硕成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天下太平,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物价低廉,文化昌盛,国势强大,被史家誉为"开元之治"。唐人著作中多有描绘盛世景象的文章诗句。诗人元结说:"开元天宝之中,人民辛勤耕耘,将榛莽丛生的高山绝壑开垦成为良田,家家户户都储存了数年的粮食,太仓存粮,更是堆积如山,多得简直无法称量。"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的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两位诗人对盛世的赞赏不免有溢美的成分，但文中反映的内容，基本是与实际相符的。

据理财家杜佑记载，天宝八载的库存量，天下诸色米共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其中诸色存粮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正仓存粮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义仓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常仓四百六十万零二千二百二十石。数量十分惊人。储存天下财物的左、右藏库，堆满了绢帛等物，不可胜数。漕河沿途，则布满粮仓。1971年，被考古学者探明的洛阳含嘉仓，东西长六百米，南北七百米，共二百五十九个仓窖。每窖储粮多者一万余石，少者数千石。该仓在天宝八载的储粮量就达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由于粮食产量增加，物价稳定低廉，开元十三年，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青、齐间谷斗才五文。海内富安，人口兴旺，贞观年间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至天宝十三载，增至九百余万户。

农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商业、交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丝织业、陶瓷业、造船等传统手工业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飞性的进展。象唐三彩，已成为盛唐景象的典型代表。全国大中小城市星罗棋布，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十分繁华，各地经济往来频繁，交通畅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四通八达的几条重要交通干线，要道上设立驿站，共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陆驿备马，水驿备船。这是专供官方所用，招待商旅则另有私人开设的店肆。杜佑记述当时情况说："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沿路设店肆待客，酒食丰盛。每店均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达太原、范阳（今北京），西抵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今甘肃武威），皆备店肆，以

供商旅，远出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道路畅通，社会安定。

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期，盛唐诗歌流派众多，光彩夺目。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也有显著成就，带有盛唐气势。

开元期间国力也十分强盛。先后击退契丹、突骑施、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扰，收复了东北营州等十二州土地，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巩固了边防，也保证了唐朝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使唐朝声威远扬。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10—214

《旧唐书·玄宗纪》

《全唐文》卷 27、28、95

《通典·食货典》

《元次山集·问进士》

《文苑英华》卷 350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3)

姚、宋辅政

姚崇，本名元崇，陕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历官濮州司仓、夏官郎中。因才华出众，精明干练，被武则天提升为宰相。神龙元年（705年），武后病重，姚崇参与了张柬之等人发动的杀太后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拥中宗复位的政变，以功封梁县侯。太后被迁往上阳宫，王公百官都额手相庆，惟独姚崇呜咽流涕。张柬之等劝道："今日岂是公哭泣的时候，恐怕祸由此起了。"姚崇答道："臣一直事奉则天皇帝，所以今日辞别，悲痛地不能控制，前日臣从公诛奸逆，是人臣之义；今天辞别旧君，也是人臣之义，即使为此而遭祸，臣也心甘情愿。"遂出为亳州刺史。睿宗即位后召拜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因得罪太平公主贬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

宋璟，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博学有才，工于文翰，进士及第，累迁中书舍人。为人刚直持正，得到武则天的器重，居官左御史台中丞。张易之兄弟恃宠张狂，恨宋璟不依附自己，屡屡中伤他。幸亏武则天明察，宋璟才未被贬黜。神龙元年，升吏部侍郎，中宗嘉其正真，令兼谏议大夫、内供奉、黄门侍郎。武三思干政专权，曾请托于宋璟，被他严辞拒绝。武三思将他排挤出朝，任杭、相二州刺史。睿宗即位后召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为楚州刺史，不久，又任魏、兖、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国子祭酒。一年后，任京兆尹，坐事贬为睦州刺史，又转广州都督、五府经略使。广州旧俗以竹茅造屋，常遭火

灾，宋璟教民烧瓦建房，改造店肆，从此免去火灾之虞。老百姓感激他，立碑记其政绩。

姚崇、宋璟都是有才能正直且作过宰相的官员，在睿宗当政时，就施行过"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等方针，而且收到一定成效，被时人誉为有贞观、永徽之风。

唐玄宗即位伊始，励精图治，下决心刷新吏治，扭转自武后以来的朝廷积弊，纳谏求贤，广揽人才。开元元年(713年)，玄宗欲召同州刺史姚崇为相，中书令张说从中作梗，让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奏，玄宗不理会。张说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对玄宗说："陛下常欲选河东总管而一直没发现合适的人才，现在臣找到一个人。"玄宗问是谁，姜皎说："姚崇文武兼备，堪任此职。"玄宗知他受张说指使，正色道："这是张说的主意，他欺骗了朕，罪该当死。"吓得姜皎不断叩头认错。玄宗正在渭川(渭水沿岸一带)行猎，即命宦官把姚崇召到行宫，拜官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作相前，曾向玄宗上了十事疏，要玄宗应允，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不然他不敢奉诏。玄宗说："卿先说出来，朕当量力而行。"姚崇便说："自垂拱年间以来，朝廷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臣请求为政先仁义，可以吗？"玄宗答道："朕在这一点上对卿寄予厚望。"姚崇又说："朝廷自仪凤三年(678年)在青海与吐蕃战中丧师以来，没有追悔之意，臣请陛下在三、四十年内不贪边功，可以吗？"玄宗点头应允；姚崇接着说："自太后临朝以来，常让宦官传达诏命，臣请不让宦官干预朝政，可以吗？"玄宗说："朕早就想这样做了。"姚崇又说："自武氏外戚占据重要官职以来，继之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干权用事，朝政混乱，臣请求皇亲国戚不任台、省官，凡是斜封、待阙、员外等闲职冗官，一概罢去，可以吗？"玄宗回答：这也是朕的志愿。"姚崇又说："近来佞幸之徒触犯法律后，常常因受宠而免罪，臣请求对此绳之以法，可以吗？"玄宗说："朕对此也是咬牙切齿痛恨。"姚崇又说："常有豪门贵戚向上进献取媚，一些

公卿大臣和地方方镇也乐于效法，臣请求自今以后除租、庸等赋税以外，杜绝进献之路，可以吗？”玄宗说愿意实行。姚崇又说：“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费上百万钱，劳民伤财。臣请求今后停止营建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答：“本来就应如此，朕每次见到这些寺观，内心即感不安，怎么还能再造呢！”姚崇又说：“先朝亵狎大臣，颇失君臣之敬，臣请求陛下待大臣以礼可以吗？”玄宗说：“本来就应如此，有什么不可以的。”姚崇又说：“自中宗朝韦月将、燕钦融直言上谏罪死以后，谏官寒心，臣请求凡是作臣子的，都可以触龙鳞，向陛下进直言，可以吗？”玄宗说：“朕不仅能够容忍，还可以采纳。”姚崇又说：“吕产、吕禄差点倾覆西汉，窦宪、阎显、梁冀又乱东汉，外戚干政使万古寒心，本朝更甚，臣请求陛下把它写入史册，形成万代的法则，永远作为借鉴，可以吗？”玄宗默然许久，才说：“朕对此可谓刻骨铭心啊！”姚崇见玄宗一一答应，十分高兴，再拜说：“这就是陛下行仁政之始。”十事疏成为姚崇施政的纲领。

姚崇为政特点是“尚通”，他处理军国大政极为明敏，善于分析和掌握时机，“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很得玄宗器重与信任。玄宗向他征询军国要政。在便殿单独接见他时，每次都站起迎接，会晤毕走到平台上相送。一次，玄宗召姚崇入宫议事，正遇天下大雨，道路泥泞，便命宦官抬轿子把他接来。玄宗对姚崇放手使用。一次，姚崇奏闻任命低级官员之事，询问多次，玄宗仍然没听见似的，不作回答。姚崇紧张地退下。事后，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上谏说：“陛下正总理万机，宰臣奏事，应当面批示回答，陛下为何一语不发呢？”玄宗说：“朕任姚崇治理政务，是要与他共同商讨大事的，这些小事还要一一烦朕吗？”高力士把话转告给姚崇，姚崇很高兴，放手裁决政务，尽心辅佐。

姚崇刚拜相时，左拾遗张九龄看到他有重望，又被皇上所信，就劝他疏远奸佞小人，近用纯厚忠实君子，还说：“选才用人，是为

政的大体、治理国家的正途。从前用人，并不是不知人，所失在于殉私情用人。自从君居相位，持用人之权以来，一些浅薄之辈已经在下活动，阿谄求誉，献媚取容，这些人中也有有才之人，但是却少德无耻。君用人一定要慎之又慎。”姚崇很欣赏张九龄的劝告，采纳了他的建议。

唐中宗以来，大崇佛教，贵戚王公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僧侣享有免役特权，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开元二年，姚崇上疏请淘汰僧尼，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君主信佛却不能使国家长久的事实，说：“但使天下苍生安乐，即是君主国家的福身，何用妄度奸人，坏了正法。”玄宗采纳他的建议，命令有关部门淘汰天下僧尼，共有一万二千多还俗。又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和营造佛寺。这场由姚崇发起的抑佛运动，增加了劳动力人手，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玄宗之弟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侵扰百姓，遭御史弹劾，李业为他说情开脱，玄宗让中书、门下省复审，姚崇和另一宰相卢怀慎上奏：“王仙童罪状昭著，御史言之有据，并没有冤枉他，不可赦免。”玄宗依法治王仙童之罪，从此贵戚多收敛威风，不敢倚亲坏法了。

玄宗之兄申王李成义请求玄宗把其亲王府录事阎楚珪提升为参军。录事从九品上，是流外官，参军为正七品上，为流内官。玄宗一口答应。姚崇、卢怀慎却上言：“先前圣旨规定，王公、附马有奏请时，没有陛下御批无效，臣等以为应量才授官，由主管部门定夺。若是因为亲戚故旧之恩，就随便惠赏官爵，无异于蹈袭前朝滥官之弊，紊乱纪纲。”玄宗再次接受意见，没有提拔阎楚珪，从此贵戚们也很少再张口请托了。

姚崇儿子去世，他告假十天处理丧事。造成政事堆积，宰相卢怀慎不能裁决，非常慌恐，向玄宗谢罪。玄宗说：“朕把天下大事委托给姚崇，以卿来坐镇雅俗。”卢怀慎清廉节俭，虽贵为宰相，却不

营资产，常常把俸赐送给亲旧，他的妻子也不免饥寒，所居住的院宅也十分简陋，甚至不蔽风雨。姚崇回来后，三下五除二地裁决完政务，颇为得意。便问中书舍人齐澣："我作相，可与谁来相比？"齐澣还未答话，姚崇又问："可以和管仲、晏婴相比吗？"齐澣答："管、晏虽不能施法于后世，犹能惠用当时，您所施政，则随时可变，从这一点比，您不如他们。""那我究竟如何呢？""公可称是救时之相。"姚崇很高兴，挥笔写下"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开元三年，山东（今太行山以东地区）闹蝗灾，老百姓非常迷信不仅不敢捕杀，反而在田边焚香设祭膜拜。姚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分道组织老百姓捕蝗。有人担心蝗虫太多，难以除尽，玄宗也很犹豫。姚崇说："现在蝗虫遍布山东，河南、河北老百姓被迫流亡，岂可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呢？即使一时除不尽，也比看着它泛滥成灾强。"卢怀慎怕杀蝗太多，伤了天地之间的和气，要遭灾祸。姚崇反驳道："为何要不忍杀蝗虫而忍百姓饥死呢？若杀蝗降了大祸，就由我姚崇来担当吧。"最后玄宗支持捕蝗御史下到各地，组织人民按姚崇所说的办法，夜间在田边点火，旁边挖上大坑，将蝗虫吸引过来，边捕杀边挖土掩埋。由于及时捕蝗，使得这年田地仍有收获，帮助老百姓渡过了难关。

次年，山东再次闹蝗灾，姚崇又命人捕杀。卞州刺史倪若水阻拦，说蝗虫是天灾，非人力所能捕灭，应当修德禳灾。姚崇据理驳斥，组织人捕蝗。玄宗也下敕派使臣到州县调查捕蝗勤惰的情况。这两年蝗灾均因为姚崇及时组织人捕杀而没有造成大饥荒。

开元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己卯），宰相卢怀慎病笃，卢怀慎自知才不及姚崇，遇事则谦让退后，被称作："伴食宰相"。但他儒雅清廉，为净化奢靡风气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临终前他向玄宗推荐了广州都督宋璟等人。二十四日（丙申）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代卢怀慎为相。

此时姚崇也染上虐疾，告病寓居于大宁坊罔极寺。玄宗不断派

人去探问病情。每当源乾曜奏事称旨时，玄宗就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而有不称旨时，玄宗就让源乾曜找姚崇商量询问。源乾曜建议让姚崇在中书省四方馆宰臣议事的地方养病，并使家人入内侍奉，玄宗准许。姚崇以四方馆有簿书，不应让病人居住而推辞。玄宗说："设置四方馆，是为了官员议事，今天让卿居住，是为了社稷，朕恨不能让卿搬到禁中来住呢，不要再推辞了。"从此每有大事，玄宗依然询问姚崇的意见。

姚崇为政干练，但对他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却管教不够。二子广结宾客，接受四方馈赠，招致非议。姚崇又亲信主书赵诲。赵诲品行不端，受胡人贿赂事发，玄宗亲自鞫问，判下狱当死。姚崇为其说情营救，玄宗对此很不满；姚崇意识到问题严重，屡屡辞让相位，并推荐宋璟代己。十二月，姚崇罢相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宋璟和中书侍郎苏颋为相。玄宗让姚崇五日一朝，遇有重大事务仍向他咨询，恩遇不衰。开元九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宋璟为人凝重，他为政风格与姚崇有所不同，姚崇"尚通"，宋璟则"尚法"。宋璟不仅善于用人以长，使百官各称其职，而且刑赏无私，秉公持正，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很敬畏，有时上谏虽然不合自己心意，仍能曲意听从，还把宋璟进谏之言写下来，带在身边，以便警示终身。

宋璟为相前，玄宗从广州召他至长安(今陕西西安)，特派内侍、将军杨思勖去迎接。杨思勖虽是宦官，却颇得玄宗宠信，地位仅次于高力士。宋璟对这个受宠的宦官毫不巴结攀援，路上竟不与他说一句话。杨思勖回来后委屈地向玄宗诉苦，玄宗听后很感慨，更加敬重宋璟为人。

开元五年正月初十日(辛亥)，玄宗到东都洛阳巡幸。经崤谷(今河南三门峡东南)，由于道隘难行，归咎于河南尹和负责皇帝行幸知顿使官，欲罢免这两个官员。宋璟上谏说："陛下刚刚巡幸，就

因为道狭要惩罚官员，臣恐怕以后老百姓也要遭罪。”玄宗听后立即下令释放二官，宋璟又说：“陛下治二臣罪，又因臣言免罪，臣代陛下受德，此不妥。请让他俩仍待罪朝堂，而后由陛下赦免。”玄宗一一采纳。

开元六年，广州官民要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上言阻拦：“臣在广州并无特殊的政绩，今天当了宰相，引得人们谄谀巴结；不可助长这种风气，就请从臣这儿开始，请陛下宣敕禁止。”由于宋璟以身作则，其他州也都不敢树碑立传了。

有人向宋璟推荐隐士范知璿有文采，并献上范的文章《良宰论》。宋璟见通篇都是赞美当朝宰相的，于是批示道：“隐士当直进忠言，岂可谄谀取媚，文章若确有功底，自应参加选官考试，不可特殊任命。”

开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壬午），王皇后之父、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死，其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用玄宗外祖窦孝谌之例，筑坟高五丈二尺；得到玄宗允许。宋璟、苏颋坚决反对，上疏说：“按照制度，一品官坟高一丈九尺，陪陵坟高三丈而已。窦太尉坟因其高大过制，已遭议论所讥，可惜当时无人上言谏失，今天怎可重蹈前日之失呢！当初唐太宗嫁女长乐公主，嫁妆资财超过长公主（皇帝之姑为长公主），魏征上言直谏，太宗接受意见，长孙皇后还特别赏赐魏征。岂象韦后那般愚蠢，把其父坟修得高大堂皇，号曰酆陵，招致灾祸速降！作为皇后父亲之尊，想要建造高坟，那有何难，臣等所以要再三劝阻，是想让中宫皇后保留美名，今天的事，要世代传下去为后人效法，不能不慎重啊。”一席话说得玄宗很高兴，说：“朕常常想正身为表率，并不敢殉私情袒护妻子儿女。而你们这番忠言别人是不敢说出的。卿能固守礼法，成全朕以美名，垂法后世，这正是朕所希望的。”于是赐帛四百匹奖励宋璟、苏颋。

岐王令王仁琛是玄宗作藩王时的部下。玄宗要提升他为五品官。宋璟奏说：“照顾亲戚故旧，任命官吏，均有定制，仁琛因是亲

故，已蒙优待，若是陛下再加超奖提拔，就太过分了。仁琛又与皇后同族，应当防止人们说闲话。请交吏部考核，若无大错，可按常格稍加照顾。”玄宗同意。

开元七年吏部铨选，选人宋元超自称是宋璟的叔父，希望得到照顾。宋璟听说后给吏部回信说：“元超是我远房叔父，经常住在洛阳，来往不多。他是长辈我不敢不举荐他，但是又不愿以私害公。如果他没请托，自当按规定授官。既然说了，只好矫枉过正，取消他注官资格。”

同时，宁王李宪请求给选人薛嗣先一个小官，事下中书、门下省讨论，宋璟上奏：嗣先曾两任斋郎，虽不是明显应留任的，但考虑到是皇亲，本应授一微官。在景龙年间，中宗经常随意以官爵授人，叫做“斜封”。陛下即位以来，这种事情就杜绝了。行一次赏，任一次官，必须根据功绩与才能，通过中书、门下。至公之道，只有圣朝才能实行。嗣先是皇亲，不应违反常规。请容许臣等商量一下，再下到吏部，陛下不要下敕命。”玄宗采纳了宋璟意见。

当时，候选人来京师铨选时，经常带着礼物，馈赠有关官员，以期得到提拔照顾，往往很奏效，这些人回本地后，多半升了官。为了扭转行贿的不良风气，宋璟奏请受贿官员一律退还礼物。

宋璟尽心竭诚，爱民恤物，赢得朝野内外一片赞扬声，当时人称他是“有脚阳春”，意为宋璟所到的地方，都带去了和煦的阳光。为表彰宋璟忠正刚直，玄宗在一次御宴上赐给他一双自己用过的金筷子。宋璟不明其意，未敢接受。玄宗说：“朕无意赐给卿金银。今天所赐金箸。是表彰卿正直！”宋璟赶紧下殿拜谢。开元八年，宋璟因严禁恶钱流通，招致人怨，遂罢相，授开府仪同三司。后又任京兆留守、吏部尚书。开元二十一年，以年老致仕退居洛阳，二十五年卒，享年七十五岁。

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姚崇善应变成务，宋璟善守法持正。二人为政风格迥异却都竭诚辅佐玄宗。使开元年间赋役宽平，刑罚清

省。百姓安居乐业。协助唐玄宗开创了唐朝极盛期“开元之治”局面。姚崇和宋璟并称贤相，号“姚、宋”。

（杨西云）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210—212
《旧唐书》：《姚崇传》、《宋璟传》
《新唐书》：《姚崇传》、《宋璟传》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僧一行测天

一行和尚(683—727 年),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张公谨的曾孙。他自幼聪敏,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精天文历象、阴阳、五行之学。道士尹崇博学先达,家中藏书颇丰。一行向他借览杨雄的《太玄经》,几天后看完归还。尹崇说:“此书要义深奥,我研究多年仍未全部通晓其意,你若准备研求,不用这么急归还。”一行回答:“我已明其意了。”说着拿出自己所撰《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向尹崇展示。尹崇惊赞不已,遂与一行共同探讨书中要旨。一行从此名声大起,时人比之为孔子高徒颜回。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名请与他结交,他避而不见,隐居嵩山,削发为僧,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名一行。睿宗即位后又派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邀请,也被一行以病为由推辞。一行访师求学,先后到剡州天台山、荆州当阳山学习佛教经律和天文。

开元五年(717 年),玄宗久闻其名,派他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持敕书召他入宫,将其安置在光太殿。玄宗听说他记忆力惊人,一次为了当面考他,递给他一本宫女名册,一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当即一一背出宫女名字,令玄宗大为叹服。玄宗常常向他征询治国安民之道,一行也知无不言。开元八年,天竺僧金刚智至长安(今陕西西安)传授密宗,一行从金刚智灌顶受法,此后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历律的修订。玄宗时期用的是高宗李淳风的《麟德历》,误差较大,与天体的实际运行已不相符。开元九年,

太史屡次上奏旧历预报日蚀不准确，引起玄宗重视，遂命一行考订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一行认为，创历立元，须知黄道（地球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即星象图中的赤道）进退情况，当是却没有黄道游仪（古代浑仪，用于测量天体的坐标位置）。当他得知率府兵曹梁令瓒在丽正书院设计出黄道游仪，已制成木模，且十分精密，于是向玄宗建议将木模游仪改用铜铁铸造。得到获准后，一行与梁令瓒合作，于开元十一年完成。这架仪器的黄道不是固定的，可以在赤道上移位，以符合岁差现象，与天体运行相符。玄宗十分高兴，亲自提笔写了铭文，把仪器安放在灵台（古代的天文台）以考星度。

一行用此仪器测量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并与汉代的观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发现了恒星也在不断移动的天文现象。这一重大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清人齐召南曾高度评价说："自古皆谓恒星随天不移，西法始谓恒星亦自移动，其法甚确。一行以铜仪测验，即知古今不符，已开西法之先。"一行通过黄道游仪，还发现了太阳运行速度不均匀的规律，这对以后制历来说意义重大。

不久，一行与梁令瓒又奉诏制造出一台水运浑象（属于表演性的仪器，在一个大球上镶嵌上星宿、赤道、黄道、恒隐圈、恒显圈等，类似现代天球仪），称为水运浑天或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古代最初的浑象可能是西汉人耿寿昌发明的。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利用铜壶漏水的力量，制成漏水转浑天仪。张衡以后，天文学家又多次制造过与水力机械联系在一起的浑象。一行等人的浑象就是在前人基础上研制出来的。仪器用铜铸成，用流水作动力推动轮子，令其自转，每昼夜自转一周。又把太阳和月球缀于二轮上，可绕浑象运行，每天西转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二十九转多一点即日月相会，即为一月；三百六十五天转而日周天，即为一年。又用木柜作地平，把仪器一半埋在地下；能准确反映晦明朔望的变

化。仪器上还设置了两个执棰木人，使他们站在地平线上，前面装有钟鼓。每隔一刻（一刻合十四分二十四秒，一昼夜为一百刻）则有一个木人击鼓，每隔一时辰（两小时），一木人出来敲钟，这种自动报时装置，开创了中国独特的天文钟传统。

开元十三年，一行倡议组织人马，在全国进行日影长度（太阳在同一时间内在各地投影长度的差别，即影差）和北极高度的测量，玄宗欣然同意。实际担任此事的还有太史监南宫说和太史官人相元太等。按照《周礼·大司徒》职"以土圭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的郑玄注和《周髀算经》之说，都认为太阳在地上圭表的影子是每千里差一寸，即"王畿千里影差一寸"。但此说经不住实践的检验。如在南朝元嘉十九年（442 年）刘宋曾派人到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测影，夏至那天日影是三寸二分。而同时阳城（今河南登封）的日影是一尺五寸，两影差一尺八寸二分，两地实际距离约万里，即六百里差一寸。隋炀帝时天文学家刘焯也上书炀帝，根据交州与爱州（交州南部）的日影不在表北的事实，驳斥千里差一寸没有根据，并建议作实测工作，后由于刘焯去世，此事搁置了。

这次唐政府派人到十一个地方测日影，最南到林邑（今越南中部），最北到蔚州（今河北蔚县），全长近四千公里。在这条经线的各个点上，皆立有八尺晷表，在夏至日的正午，测量日影的长度。还设计了一种复矩图的仪器，在夜间同时测量北极星的高度。其中在河南所作的一组观测最有成就。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滑州（今滑县），卞州（今开封）、扶沟、上蔡四个地方设置了水准绳墨和圭表，测定了四处的距离和夏至的影长，得出了大约"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的结论，证明旧说没有根据。他们还进一步测定了四地冬至春秋分的影长和北极高度，根据四处的距离，推算出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相距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唐代尺度，约合129.22 公里）。

一地的北极高度即等于该地的纬度，因此一行等人实际上是

求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虽然一行等人实测的子午线并不十分精确，与现代测知的长度相比还有较大的误差，但他们是在世界上第一次用较科学的方法实测子午线，比西方回教王阿尔曼孟于公元 814 年测量子午线早九十年。

这次测量队还在南海看到了在大陆上从没看到过的老人星（又称“南极老人”，“寿星”）下的璀灿群星及南极二十度以上的星群，这些星群都是自古以来没有被命名的。

开元十三年，一行开始编订新历。他研究了历代旧历，考证古今得失，依据《易经》象大衍之说“推大衍数立术以应之，较旧经史所书气朔、日名、宿度可考皆合”。经过两年时间，写成草稿，定名《大衍历》。一行在这年不幸去世，年仅四十五岁。玄宗即命已经致仕（退休）而仍兼集贤殿学士的特进张说和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整理成书。

《大衍历》结构严谨，演算步骤合乎逻辑，比以前所有的历法都精密。共有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它对太阳周年视运动中速度变化的规律描述得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实际。它在日食计算中，把唐人李淳风关于蚀差的计算向前推进一步，首次考虑了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提出全国不同地点相对于标准点阳城计算蚀差的办法，称为“九服蚀差”。在天文计算方面，一行也卓有建树。他在刘焯的基础上更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计算公式；吸收印度传人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又在计算月亮距黄道度数时提出了用等间距三次差内插法的近似公式，将古代天文学的计算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从开元十七年起，根据《大衍历》编算成每年的历书颁行全国，成为当时一部最先进准确的历法。开元二十一年传人日本。中国至明朝末年吸收了西洋历法后，才有所变易。

一行去世后，玄宗下令给他立墓碑，还亲自书写碑文，又拿出国库的五十万钱为其建塔，以纪念他在天文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

（杨西云）

参考资料：

《旧唐书》:《僧一行传》、《天文志》
《新唐书·天文志》
《测绘资料汇编》第一集第一册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页367

鉴真东渡

鉴真，唐朝律宗大师。俗姓淳于，垂拱四年（688年）生于江苏扬州江阳县。武则天时期，大崇佛教，扬州自六朝以来，就是寺院林立、远近僧侣凑集的全国佛教中心之一。鉴真的父亲是虔诚的佛教徒，曾师从扬州大云寺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鉴真从小生活在宗教气氛浓厚的时代与家庭里，耳濡目染，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虽然当时年少不明佛学义理及真谛，但朦胧地萌发了出家的愿望。在他十四岁那年，一天，随父亲去大云寺拜佛，走进佛殿，面前的佛像微目端坐，正用慈眉善目俯视着众生。这目光能让人感受到佛的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胸怀。眼望着佛像及佛殿上香烟缭绕，周围善男信女虔诚顶礼膜拜的情景，鉴真深深地感动了，面前这一切，突然使他隐约形成的出家愿望变得清晰可见，他激动地将献身佛门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得到父亲的支持与鼓励，于是就留在寺内当沙弥，跟随父亲的受戒师智满学佛事，跨入脱俗入佛的门槛。

神龙元年（705年），鉴真从高僧道岸律师受了菩萨戒。菩萨戒是大乘菩萨所应持的戒律，戒律极繁备，按这一派所奉的经典《梵网经》规定，包括十项重禁及四十八条轻戒。鉴真受戒后开始了更严格的修行，加之亲受道岸律师的教诲，对佛学义理有了更深的理解。景龙元年（707年），年满二十岁的鉴真有幸到洛阳、长安（今陕西西安）观光参拜。第二年，在长安的实际寺，鉴真登坛从荆州南泉寺的高僧弘景禅师受具足戒。这是僧侣所持的最高戒律，戒律繁多而严厉，男僧持二百五十条戒律，尼姑持三百八十四条戒律。受戒

仪式也十分郑重。戒坛上有三位戒师，即戒和尚（授戒的主师）、羯磨师（主持受戒仪式）、教授师（对受戒者教授威仪作法），另有七僧在旁作证，即所谓“三师七证”，均选择各地有名望的高僧主持，鉴真跟随道岸和弘景两位为已授戒的高僧，潜心钻研律宗（中国佛教宗派，创立者道宣，奉《四分律》为经典，以研究佛教戒律为旨），又先后听久负盛名的济融、义威、智全、大亮等律师讲授律法。多年的修炼钻研，使其成为一位佛学造诣极深，且掌握各种实际知识的学问僧。

开元元年（713 年），鉴真南返故乡扬州，从事弘法传道的宗教活动及有益的社会活动。近三十年中，鉴真前后讲大律并疏四十遍，讲《律抄》七十遍，讲《轻重仪》十遍，讲《羯磨疏》十遍。又不辞辛劳地登坛授戒，度人四万有余，培养出不少为世师范的弟子。像扬州崇福寺的祥彦、润州（今江苏镇江）天响寺的道金、西京（今陕西西安）安国寺的璿光、扬州白塔寺的法进、洛州（今河南洛阳）福先寺的灵祐等诸僧侣，他们师从于鉴真，而后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群生。鉴真还亲自主持许多具体工作，例如造立寺舍，供养十万众僧，雕塑了不计其数的佛像，缝制袈裟一千领，抄写佛经一万一千卷，开悲田救济贫病之民诸事宜。虔诚的献身精神以及精深的佛学造诣，使鉴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自德望很高的义威律师迁化之后，鉴真便成为江淮一带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众人仰慕的的受戒大师。就在鉴真誉满江淮，取得极高声望时，邻邦日本国向他发出了邀请。

公元六世纪左右，佛教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到日本，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日本政府缺乏对佛教管理的网络，产生了一些弊端：因为僧尼有免赋役特权，有的人并无修炼佛法之心，仅是为逃避赋役才遁入空门。加之僧伽制度极不健全，戒法不严，没有正规的授戒仪式，个人可以随意自度为僧，只要在佛像前进行一番仪式上的自戒自誓，便取得僧籍，享有特权。因此难免冒滥，有的僧侣不修持佛

法，以慈悲为怀，反而伪诵邪说，品行堕落，败坏了社会风纪。再者，僧尼人数激增，免税者越来越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行政命令难以解决宗教事务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从僧团内部整顿，具体来说即建立僧伽制度，确立正规授戒仪式。日本了解到中国僧侣要经过严格的受戒手续才被承认，便想效法。但受戒仪式需要有一批精通佛学的高僧主持，当时日本国内缺乏德高望重的大师，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到中国聘请高僧，设坛授戒。在鉴真前，已陆续有中国僧渡日传法，而继续敦请名僧去日的使命落在了日本大安寺的普照和兴福寺的荣睿二僧身上。

开元二十一年四月，普照、荣睿和另外两名学问僧玄朗、玄法四人，搭乘遣唐使船只渡海向中国驶来。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飘泊，在这年八月到达苏州。转年春天，荣睿一行来到唐朝东都洛阳，被安排在大福先寺师从名僧定宾律师学习律宗，并由定宾律师为他们授具足戒。开元二十五年十月，荣睿、普照等人又来到长安，在大安国寺、崇福寺、荷恩寺继续深造，不觉光阴荏苒，他们在唐土已滞居十载，搭乘的遣唐使船早已返国，他们让先已聘请的东都大福先寺通晓律宗的道璿律师随船先去日本，之后又邀请了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朝鲜）僧如海拟一同赴日。当得知道航是鉴真高足时，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久仰鉴真大名，只是无缘相见，更不敢造次邀聘，有了这层关系，便决定从扬州回国时拜望大师，若能邀大师赴日，也就不虚此行。

天宝元年（742 年），荣睿一行打点行装，启程南下来到扬州，在大明寺拜见鉴真及其弟子。

荣睿虔诚地向鉴真施礼并陈请道："佛法东流传至我国后，我国虽有佛法而无传法人，这如同黑夜有求于幽室，而无烛火照亮前行，大师若能舍此地事业，屈尊渡海赴日传法，实在是我们日本国翘首以盼的。"

荣睿诚恳的邀请，使鉴真很感动。他略一沉思，就下了东渡的

决心。说道:“我听说从前我国陈朝南岳惠思禅师圆寂后,托生为贵国王子(日本的圣德太子),又听说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袈裟千件赠与我国众僧,袈裟上绣着四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看来日本确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我已决定东渡传法,不知同法众中,你们谁愿应此远聘,同去传法?”

在场弟子听鉴真说完,都默默不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们景仰爱戴鉴真大师,但是远渡浩淼的大海,实在太危险了,万一触礁翻船,则必死无疑。因此弟子们犹豫不快,进退两难。良久,心直口快的徒弟祥彦忍不住代表大家说:“日本国离我们太遥远了,要渡过渺茫无际的沧海,真是性命难保,百无一至。大千世界中,生命难得,何况我等修身未齐,造诣不精,恐怕难胜此任。”

鉴真理解弟子的心情,但是他没有因弟子的犹豫而动摇决心,他环视了一下众僧,坚定地说:“为了弘扬佛法,怎可爱惜自己的生命,你们不去,我还是要去!”

弟子们肃然起敬,也不免惭愧万分,当下祥彦率先表示:“大和尚如去,我也跟着去!”其余人也纷纷表示要随师东渡,共有道兴、神顶、崇忍、灵粲、明烈、道默、法藏、法载、幽岩、思托等共二十一名自愿前往。从这时起,鉴真一行开始了六次东度的壮举。

大明寺众僧四下里做东渡准备工作。鉴真高足道航是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供养僧。扬州司仓参军李凑(李林甫的同族)根据李林宗的旨意,为他们造船及备办物品,提供方便。众僧将备好的粮食储存在既济寺中,为防遇到阻拦,对外但说粮食将送往天台山国清寺中供养众僧。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启程时,僧团内部却发生了矛盾。

众僧远道日本是为了弘扬佛法,传播文化,要求僧侣本身应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及较高的佛学造诣,但随行人中,有的学识较浅、艺业不精。例如如海就属此类人。道航直率指出,我们远向他国,是为了传戒弘法,应选择业精德高的人,如海学识较浅,似不宜

同去。如海闻听大怒，心想不让我去，我让你们谁也去不成。他用布包住自己的光头，悄悄溜进官府采访厅向淮南采访使班景倩诬告说："大人知否，有僧人道航等，私下里与海盗相连，要造船入海，他们已在既济、开元、大明寺准备下了干粮，到时将有五百海盗洗劫此城。"班景倩闻讯后大惊，因为当时东南沿海温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一带极不安宁，常有海盗和被生活逼于无奈的人们聚集在海面上抢劫商船，骚扰沿海居民。弄得人心惶惶，谈盗色变。班景倩立即令人将如海下狱中推问，又派人到各寺搜走干粮，从大明寺捉走普照，开元寺捉走玄朗、玄法，荣睿藏在池水中，捕吏见池水波动，将荣睿一起捉拿，躲在民户的道航也被逮捕。官府审问众僧与海盗联合劫城之事，道航解释说："我僧从没与海盗勾结，卑僧是宰相林甫之兄林宗家僧，此行是拟往天台国清寺送功德的，由于陆行翻山越岭太辛苦，准备取海道而行。现有林宗书信一封，请往仓曹李凑处查询。"班景倩看信找李凑核实后，搞清系如海诬告，将他反坐还俗，决杖六十送归本道。所扣留的粮食等物还给众僧，船却没收归官，并借口海面不太平而不放行。扬州又上奏京师，请示安置日本僧问题，玄宗敕许日本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如要回国，可随时放还。荣睿等人经四个月拘禁予以释放。玄朗、玄法无心再滞唐土，便回国去了，第一次东渡失败。

荣睿、普照二人商议道，我们此行目的是要邀请高僧赴日传法，但扬州奉敕只让我们四人回国，而不能请高僧同去。那么现在回国岂不毫无意义？不若暂且不走，依旧请高僧与我们同往。二僧避开扬州官府的注意，又回到鉴真住所大明寺，向鉴真表明心愿。鉴真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发愁，适当机会我还要东渡，了遂你们心愿。"

为第二次东渡能顺利成行，鉴真亲自过问准备事宜，出八十贯官铸铜钱，买下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一艘军船，雇来十八名船工。这次所备除航海必需物品外，有大量佛像、佛具、佛经、香料及

药品。随行僧人有思托、祥彦、道兴等十七人，加了画匠、绣师、雕镂等各种技艺人员共八十五人，同乘一船，于天宝二年十二月从扬州举帆起程。

时值冬季，海面风大浪急，气候恶劣，船由扬州大运河入江，行至一个叫狼沟浦的地方，被卷来的狂浪击破，众僧被迫上岸。尚未喘息，潮水又迎面扑来，没至齐腰深。第二次东渡受挫。

过了一个多月，他们在江滩上修理好船只，准备先到大板山（今江苏海面马鞍岛西北的大盘山。一说为嵊泗列岛的大戢山），但风大浪急，船行不得，只好顺风来到下屿山抛锚暂停，等风缓再行。住了一月有余，开始向桑石山航行，不料行至途中气候又骤然变脸，船在狂风巨浪冲击下完全失去控制，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海面上飘来荡去。大家奋力将船向岸边划去，在快挨近一个小岛时，船撞礁破损。众人挣扎着爬上小岛，累得精疲力尽，瘫软在地。

由于船已破损，淡水与干粮损失殆尽。他们饥渴交加，整整三日，被困在这个无名荒岛上，滴水粒米未进，第四天风渐渐平息下来，他们被路过此地的渔民发现，留下水、米。又过几天，地方政府得知此事，特向明州太守禀报。太守派人将鉴真等人接上岸来，安置在浙江鄮县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又中途夭折。

这时，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今浙江吴兴）、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僧民和居士闻知鉴真海上遇难滞留阿育王寺，纷纷前来邀请其讲律受戒。鉴真不顾年事已高，且经过海上风浪颠簸，体质大为消耗的状况，每有邀请便欣然前往，授戒、讲律、传法……不辞辛苦。他以渊博的学识，慈悲的心怀与献身忘我精神赢得教徒们的景仰。越州僧众得知鉴真仍要远涉大海去异域传教，出于对大师的爱戴和挽留之意，联合到官府报告说，日本僧荣睿诱使大师去日本国，请求官府出面制止。于是由衙尉逮捕了荣睿，将其带枷押送京城。行至杭州，荣睿一病不起，经多方交涉才予以释放。

荣睿及普照二师，为了弘扬本国佛教事业，不远千里来到中国

敦请高僧，经历了无数挫折与考验，或人为的阻止干扰，或大自然的暴虐袭击。但二僧遭挫而不退缩，历难而志弥坚。这使鉴真深感钦佩，觉得与他们志同道合，为了弘法愿抛弃一切，决心尽一切力量继续准备。于是一面为中国僧众讲律授戒，一面暗中积极筹划再次东渡。僧徒法进等人按照鉴真的嘱托到福州买下船只，备好干粮。天宝三载岁末，鉴真率领弟子思托、祥彦和日本僧荣睿、普照共三十余人，悄悄辞别阿育王寺开始第四次东渡。

鉴真一行出鄮县，向台州宁海县白泉寺投宿，次日一早又开始出发，翻山越岭，跨溪过河。时值隆冬，漫天飞雪迎面扑来，脚下道路崎岖蜿蜒，涧水没过膝盖，受尽煎熬。僧徒想起恩师年近花甲，仍不辍此行，不禁深受鼓舞，咬牙前行。翻过岭后，路途变得平坦起来，他们很快进入始丰县，日暮时分到达国清寺。第二天，众僧随鉴真巡礼圣迹，礼拜参佛，在寺中稍事休整后，取道临海县，入黄岩县，准备一早向温州进发，就在他们即将上路时，忽有采访使持牒来追，禁止他们前行。鉴真等人大吃一惊。原来是扬州的鉴真弟子灵佑及诸寺三纲（寺院中统辖僧众的三个僧职，即上座、寺主、维那，或上座、维那、典座等，说法不一）众僧在从中从梗。

鉴真弟子并不十分理解鉴真东渡弘法的献身精神，他们不愿大师冒着生命危险去异域他乡，因此想方设法加以阻拦挽留。众僧商议道，我大师发愿向日本弘法，要登山涉海，历经艰辛，何况大海苍茫无际，生死难测。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有责任请求官方出面阻拦。众弟子便联合上牒州县，于是江南东道采访使下牒诸州，推问追究留宿鉴真的寺院三纲，一直寻踪禅林寺找到鉴真，将他护送回采访使所。官府又向诸寺众僧下令，不许放鉴真东行。这正合诸僧心意。寺院及官府加强对鉴真等人的防护，使之无法动身。

这段时间，不管鉴真走到哪里，都受到僧俗的热烈欢迎和虔诚的顶礼膜拜。他们竟相办四事（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供养大师。鉴真却高兴不起来。想到东渡一次次失败，不禁忧从心生，整日里

闷闷不乐。尤其埋怨带头阻拦的弟子灵佑，从不给他笑脸。灵佑意识到办错了事，自己和众僧的一片苦心没能免除师傅东行之苦，反而惹得师傅郁闷不乐，因而十分内疚。为祈求师傅宽恕，灵佑每夜不眠，从一更站到五更谢罪，持续六十天，诸寺三纲也纷纷前来求情，鉴真才谅解了灵佑等人。

旅途的艰难和人为阻挠，都未使鉴真中断东渡的志向，官府从禅林寺寻着鉴真后，便把他与日僧分开。荣睿、普照被安置在同安郡(今福建同安)，他俩亦未放弃初衷，积极想法与鉴真联系。天宝七载，二人来到扬州崇福寺与鉴真会面，共计东渡事宜。由于几年相安无事，官府和寺院放松了对鉴真的看护，使他行动自由多了。鉴真暗中指挥弟子们做准备工作，造船、买香料、备办物品。一切准备就绪后，六月二十七日，鉴真、荣睿、普照和弟子思托、祥彦、神仓、顿悟、德清等十四人，还有水手，及其他随行人员共三十五人，从崇福寺出发，开始第五次东渡。

鉴真一行在扬州瓜洲运河启航后行至常州狼山(今江苏南通狼山港)，抵达越州三塔山。由于风向不对，在此滞留一月，向署风山驶去，停留一月，风向好转，发向岸顶山。远远望去，那山隐约在东南前方。但行至中午，山却忽然从人们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众人恍然大悟。知道是光线折射在海面上所产生的海市蜃楼。船继续向前划去，岸渐渐消失了，四周是一片白茫茫的水域。老天又沉了脸，风由小变大，由弱转强，随风卷起冲天的浪涛，忽而将小船抛向高高的天空，忽而又要把它拖入深深的海底。船随时有被打翻之险。船上人头昏呕吐，皆以为在劫难逃，有人开始祷告了。但狂风巨浪终未能把一叶扁舟掀翻，僧众经大难而不死，安全渡过险关。船上的淡水早已饮完，只能在雨天接点水喝。遇到晴天，只好以生米充饥，嚼得口干舌燥，无水伴和，米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又吐不出，实在噎的太难受，便喝两口咸水冲下，旋即腹胀肚疼，异常难受。他们在海上漂泊磨难了十几天，靠上岸来，才知并未到达目

的地日本国，而是到了振州（今海南岛崖县）。

振州别驾冯崇债闻讯派兵将鉴真一行护送至城中。冯崇债亲自在宅门处迎接，并说："弟子早有预感大师要来，昨夜梦见有僧姓丰田的，当是弟子之舅，不知尊僧中是否有此姓？"众僧回答没有，冯崇债接着说："虽没有姓丰田的，今大师就是弟子之舅，说罢将鉴真等人迎入宅内，设斋供养，热情款待。又在太守厅内设坛，请鉴真登坛授戒。将他们安置在大云寺内。鉴真在此地逗留了一年，除讲律授戒外，又主持修缮了大云寺的佛殿。因惦着东渡，便告辞北返，决定先回扬州再作计议。冯崇债亲自率领八百人护送鉴真，行路四十余日。抵万安州（今海南岛万宁），受到当地富豪冯若方的款待供养。三天后，他们又动身前往崖州（今海南岛文昌），崖州游奕大使张云见到鉴真感到三生有幸，亲自出迎拜谒，将鉴真安置在开元寺，设斋参拜。又倾当地土特产槟榔子、荔枝、龙眼、甘蔗供奉，施物整整塞满了一屋。当地曾失火将寺院烧毁，张云请求鉴真主持造寺，鉴真欣然允诺。这时护送他们前来的冯崇债尚未离去，听说建寺，命令手下的士兵每人砍伐一根木头建寺。在四面八方支援下，新寺很快落成，佛殿、讲堂、砖塔、佛像也逐一造好，鉴真即刻登坛授戒，讲律度人。传法活动告一段落后，鉴真一行辞别大使，匆匆北返。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抵达雷州（今雷州半岛）经罗州（今广东廉江）、辨州（今广东化县）、象州（今广西象州）、白州（今广西博白）、梧州（今广西苍梧）等地而入桂州（今广西桂林）。鉴真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僧俗、官民的迎送礼拜，供养奉侍。

桂州都督冯古璞为表示虔诚，步出城外对鉴真五体投地，顶其足而礼，将鉴真迎入开元寺。城中僧徒争先恐后来到寺中聆听鉴真传法，老百姓则挤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都督请鉴真为自己授菩萨戒，州县官民和云集此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也随都督受戒。鉴真在此留住一年。又接到南海郡（今广州）都督卢焕的邀请，便离别此地，发向广州。临别之际，冯古璞依依不舍与鉴真洒泪而

别。

鉴真等人下桂江、经梧州抵端州(今广东高要)龙兴寺。荣睿由于长期路途颠簸,久病不愈,在龙兴寺溘然圆寂。鉴真眼见着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伙伴赍志而殁,悲不自胜。为完成其遗愿,将荣睿安葬完毕后,立即起程,为早日东渡而努力。鉴真一行到达广州,卢都督率众出迎城外,将其引至大云寺供养。鉴真每日登坛讲律授戒,一如前往,住了几月,又辞别此地北至韶州(今广东韶关)。

这时是天宝九载。普照就此与鉴真分手去明州阿育王寺。这大概因为荣睿迁化,使他感到形单影只,加上东渡希望渺茫,所以无心北上。鉴真看到与自己多年朝夕相处的两位日本僧人一个圆寂,一个分别,非常伤感。临别时拉着普照的手悲泣道:"我发愿过海,几经挫折,终不能至日本。未遂本愿,我们就分手了,实在让人抱憾感伤啊。"两人依依惜别,难舍难分。

普照告辞不久,又一个打击落在鉴真身上。这年他已六十三岁高龄,几次东渡未遂,使老人心急如焚,加上多年颠沛奔波,特别是中国南方气候异常,热浪袭人,使鉴真身体消耗极大,他的视力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开始尚未在意,以后越来越重,虽经治疗,不见好转,终至失明。弟子们心里非常难过。鉴真想到目瞽将会给日后传法带来诸多不便,也很难过,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倾其一腔热忱于佛法事业。在他失明后,仍率弟子巡游灵鹫寺、广果寺,越过大庾岭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开元寺,一路传播佛学,授戒度人。

一日,鉴真等人来到吉州(今江西庐陵),一直追随鉴真的弟子祥彦端坐在船上,忽然有薪尽火熄的预感,便问另一弟子思托:"师傅在睡觉吗?"思托答是。祥彦说:"今天恐怕是我与师傅辞别的日子了。"思托大惊,赶紧唤起鉴真,大师烧香持几赶来,让祥彦凭几向西方念"阿弥陀佛"。祥彦一声念毕,来不及向师傅告别,便双目微合而圆寂。鉴真连连呼唤着高足的法名,却再也听不见他应声了……

鉴真没有退却。多年的风风雨雨，将他慈悲普渡的胸襟炼得更加开阔宽广了。

鉴真一行继续沿江北上至庐山东林寺，歇息三天，又至浔阳(彭泽)龙泉寺。从此地便改为陆行，抵达江州(今江西九江)城。城中太守召集全城僧尼及百姓夹道欢迎，请他们停留三日以便供养。鉴真等乘船经七天抵达润州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弟子灵佑此时正在镇江栖霞寺，闻听师傅在此，异常欣喜，急忙从栖霞寺赶来五体投地向师傅行礼，畅叙别后思念之情。灵佑喜极而泣道："弟子以为一别恩师，终身将无缘相见，今日能亲礼恩师，诚如盲龟开目见日，戒灯重明，昏衢再朗。"鉴真也感慨万分，随弟子到栖霞寺住了三天，才过江至扬州既济寺。

鉴真为东渡传法，辗转奔波近十年，历尽沧桑，足迹遍及东南各地。如今又回到出发地点。景仰大师为人的僧侣们欣喜若狂，从四面八方向扬州奔来，对大师参拜顶礼，致使陆路道途堵塞，水路舳舻相接。鉴真深为人们的虔诚而感动，废寝忘食地奔走于龙兴、崇福、大明、延光等寺讲律授戒，利乐行善，同时仍寻找赴日的机会。

天宝十一载，日本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第十次遣唐使踏入唐土，在长安与洛阳访问学习，此间曾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并被授位赏赐。他们打算来年回国，当得知鉴真几次东渡未成，便决定回国前取道扬州，邀请鉴真同船赴日。他们先上奏玄宗取得官方的同意，玄宗审奏后虽未反对，但因玄宗崇道，希望让道士也随同前往。日本君主不信仰道教，为慎重起见，日本使者便将二者都婉言推辞了，内心却仍希望鉴真能去。

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五日，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弥胡麿，和多年在唐朝任职的吉备真备、朝衡(阿倍仲麻吕)一行来到扬州延光寺拜见鉴真。将上述情况禀告后表示："愿大和尚自作裁定，我们有四艘船舶，行装物品也很充足，您若有意同去是很方便的。"鉴

真一口答应下来。可是扬州僧众见他为东渡心力交瘁，眼又失明，不愿他冒生命危险远行，便日夜守卫在周围，鉴真无法动身。

这时候，一个叫仁干的禅师从婺州（今浙江金华）来到扬州，他钦佩鉴真东渡壮举，决定协助他成行。他秘密派人备好船只，与鉴真约好在江岸碰头。这次东渡的有思托、法进、义静、法载、法成等僧侣及在建筑、雕像方面有专长的共二十四人。所带传法用的佛像有阿弥陀如来像、雕白旃檀千手像、救世观音像等八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玉环水精手幡、菩提子等七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佛名经、四分律等三十二种，和王羲之字帖一种。一切准备就绪，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九日，鉴真一行悄悄从龙兴寺出发，来到接头地点。正欲出发，突然从江边走来二十四位沙弥，神情庄严悲切，向鉴真请求道："大和尚今向东远去，此地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请师为我等授戒结缘吧。"鉴真亦怅然，依次为他们授完戒，才发船启程。

他们与日本大使约好在苏州黄泗浦会合，从那儿搭乘遣唐使船赴日。但大使临行前又改变主意，考虑到鉴真赴日未经官方批准，若被官方发现不免引起麻烦。因而让众僧下船，在岸上耽搁了十几天。十一月初十，由副使说情才让鉴真等人上了自己乘坐的这条船。十三日，普照也从阿育王寺赶来同去日本。十五日，四船刚要启航，突然一只鸡落在第一条船的船仓上，他们认为不吉祥，又停留一日。十六日正式出发，经过七天航行漂泊，鉴真所乘船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冲绳岛，十二月六日，待南风起，又发自尾久岛，二十日抵达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川边郡西南方村大字秋日浦。终于踏上了日本国土，鉴真走出船仓，不禁感慨万分。

鉴真一行到达日本后，立刻受到在日的中国僧侣及日本朝野、僧俗的热烈欢迎。东道国将他们安置在首都奈良的东大寺，连日来向鉴真礼拜问讯的络绎不绝，日本政府对鉴真这样名气很大的高僧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唐土高僧改变日本佛教界混乱状况，严格戒

律，建立完整正规的僧伽制度。日本天皇委托吉备真备向鉴真下圣旨说：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

天皇又让日僧良辩将临坛诸僧名单呈上，几天后，敕授鉴真、法进、思托、普照、延庆、昙静、法载、义静等为“传灯大法师”位，放手让他们主持佛法事务。

鉴真来日的第二年四月，在东大寺卢舍那殿前设立戒坛。为已退位为太上皇的圣武天皇授菩萨戒，场面十分庄严隆重。皇后、皇太子和四百余人亦受戒。当场又有灵祐、贤景、志忠、善顶、道缘、严德等八十余僧舍弃旧戒，接受鉴真所授之戒。不久，又在东大寺佛殿西边，用为天皇受戒的坛土，按照佛教正式规格建筑了戒坛院，包括戒坛堂、讲堂、回廊，僧房、藏经室等建筑群。在戒坛院北隔一口池塘的地方，建造了鉴真居住的唐禅院。由鉴真主持传法度人。日本天皇下诏天下僧尼师从鉴真学习戒法，各地来学律受戒者，不绝于路。

各地来学律的僧侣，因无供养，十分不便。日本天皇拨水田一百町作为僧人供养田。鉴真欲在此建佛寺，此时正好又赐给鉴真一品新田部亲王的旧宅一区。普照、思托建议用此建寺，正合鉴真心意。在鉴真主持下，寺院于759年落成，即今日矗立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从此鉴真从东大寺搬到招提寺主持佛法事务，培养出一批批通晓律宗的僧侣人员，像忍基、善俊、史慧、惠新、常巍、真法等僧各在所住持的寺中传律。师徒代代相传，使日本律仪渐渐严整，终于有了严格意义的戒律。鉴真确立律宗在日本佛教中的地位，被日本佛教界奉为当之无愧的律宗始祖。

鉴真和以他为首的僧团在传播佛学的同时，也传播了唐代文化。因为佛学本身就杂糅多种学问。佛教徒要救世渡众做社会慈

善事业，也要求传教者本身掌握一定的实际知识及能力。鉴真在江淮从事慈善事业时，接触了中草药知识。当时日本医药学尚不发达，中草药方有很多错误，鉴真虽已失明，但是他凭着丰富的经验，采用鼻嗅、口尝、手触等办法，鉴别药物真伪，所出差错极少。又亲自为人看病，据说还为光明皇太后医好病。曾著《鉴上人秘方》一书。可惜现已失传。跟鉴真学律的僧人，都学到一些药物常识，促进了中国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药物学奠定了基础。十四世纪前的日本医药界一直奉鉴真为始祖。

鉴真师从的道岸律师是著名建筑家，曾主持修建了长安荐福寺和小雁塔。鉴真从师学到很多建筑知识。在国内多次主持造寺建佛。到日本后与弟子合作，按照唐代寺院建筑风格建了唐招提寺，具有高超的建筑水平。寺内的金堂、讲堂及雕像文物也精美别致，灿烂辉煌，代表了盛唐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这些文物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给日本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此外，鉴真等还传播了汉语、书法，绘画。实际上他们以僧团的形式，向日本全面输入唐代文化。

鉴真辛勤忘我地在异域弘法授戒，不觉近十载，他已近古稀之年，长期辛劳损坏了健康。他向弟子思托留下遗愿："我大限若极，愿坐死，你可为我在戒坛院别立影堂，旧住房让与僧住。"弟子们在他临终之前，模仿他真容，按照他坐禅姿式塑造了干漆脱胎纻坐像。广德元年(763 年)，这位毕生传播佛法的高僧生命之火熄灭了。享年七十有六。据说他圆寂后三日，头部仍有微热，因而久久不能入殓。

日本朝廷派使者向扬州诸寺发讣告，众僧得知大师已迁化异域，今生再无缘相见都不胜悲恸。他们穿着丧服，向东(日本方向)举哀三日，又在鉴真居住过的龙兴寺举行盛大法会，寄托哀思。

(杨西云)

参考资料：

（日）真人开元《唐大和上东征传》

宇文融括户

宇文融，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明辨有吏干，居官富平主簿。富平县隶属京兆府，相继任京兆尹的源乾曜、孟温很欣赏他的才干。由于有达官提携，不久即升为监察御史。

开元九年（721 年），宇文融奏请玄宗，在全国范围内检田括户。检田括户主要是针对人口隐瞒逃亡、籍外占田和色役（即各种名目的职役和徭役）伪滥而提出来的，目的是抑制土地兼并和逃户的扩大，以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

唐前期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政府的赋役提供了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土地越来越少，农民受田严重不足。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刺激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追逐，造成均田制的破坏。早在贞观时期，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土地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以后情况日益严重，一面是官僚、豪强广占良田，荫庇客户；一面是农民土地日益减少，无力负担赋税徭役，被迫逃亡他乡，特别是武则天晚年，赋役繁重，迫使农民大量逃亡，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形势。交纳租庸调的丁男日益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为了和豪强地主争夺土地和劳动人口，唐太宗就曾下达过“括天下浮游无籍者”的诏令，武则天时期也派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为此凤阁舍人李峤还提出了检括的具体办法。

唐玄宗即位后，土地兼并、农民逃亡的情况继续发展着。当时户籍混乱，失去土地的农民离开本籍，有的逃入山林、有的逃入城市当佣工，更多的则成为大地主的佃客，导致了财政经济的严重危

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宇文融提出搜括逃户。这项工作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切身得益，为慎重起见，玄宗将宇文融的奏请移文有关部门，集体商议招集流移，查清巧伪的方法。开元九年(721年)二月初十日(丁亥)，玄宗将集体讨论的意见，以制书形式颁行全国：规定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内自首，在法令允许的情况下可于所在地附籍安置，其他的要回归故乡，过期不自首者，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包庇者抵罪。然后以宇文融充使，检括逃移户口和籍外占田。不久，即查获出许多伪滥户口及各种非法免役的情况，宇文融因之升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他乘势又奏置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并亲自推荐了慕容琦、韦洽、裴宽等二十九人为劝农使。这些人都是当时知名之士，组成了一个精练的班子，下到各地，检查户口，搜括隐漏不报和逃亡的人口。为了吸引流亡农民，宇文融还制定了优惠的政策：新附的客户，可以免除六年赋调，而只一次性地交纳轻税，即每丁交纳一千五百文，按时价估算，相当于两年租庸调的总量，比正税相对轻一些。括户旨在把浮逃的农户重新招集起来，控制在政府手中，因此如何安置成为关健，否则括出的人口仍会散失，使前功尽弃。为此，宇文融等人除了减免客户租调外，还尽可能地分给其土地。例如，他们把检括出来的籍外占田全部收归国有，按均田制的规定，分给客户耕种。又把清理出来的寺院非法占有的土地和部分内外官职田，分给客户。当然这些土地远远不够安置农民的，于是就根据宽乡、狭乡、内地、边疆的不同情况而区别对待，灵活安排。例如，在地多人少的宽乡，逃户既可以投亲靠友，也可以单独立户，每十户以上作为一坊，每户给五亩宅地，单丁则可以得到五十亩以上的私田，随其耕种；在地少人多的狭乡，一面鼓励逃户移窄就宽，一面把附近宽乡州县的“剩田”按三分之一的比例拨给狭乡；若往边区迁徙的客户，拨给良田安置，而且永久免除赋税。宇文融括户时不仅给逃户提供土地，还给予耕具种籽，帮助他们恢复农业生产。政府也一再放宽对逃户安置的条件，开元九

年规定逃亡农民只有合乎法令规定的，才能“所在附籍”，其余则要“牒还故乡”，因此受到农民抵制。开元十一年八月，玄宗下诏：“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忧，天下大同，宜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对前项诏令进行修改，允许逃户选择落户地区，不再强迫返归原籍。而按唐令规定，百姓户口是不得随便迁徙的。次年六月，玄宗再次针对逃户颁下制书：允许逃户自首后，垦辟所在闲田，而且官府不得差科征役，租庸也皆蠲免。并仍以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吏民议定赋役。这时距开元九年已三年，仍允许逃户自首，不增任何附加条件，这表明最初“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的规定并没推行，而再次放宽限制，争取逃户的归籍。

检田括户中遇到许多障碍阻挠，为了确保括户的顺利进行。玄宗又加重宇文融的权力，提升他为御史中丞。在玄宗的大力支持下，宇文融手握重权，乘驿周巡各地，诸州大小之事，皆先牒上宇文融等劝农使，然后才向中书省汇报，省司也要通过宇文融指令，然后处理。可见其权力之大。由于政府大开绿灯，以及括田令和安置逃户的措施较为优惠合理，括户进行得较为顺利，从开元九年到十二年的三年时间内，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和大量的隐瞒土地，为国库增加了数百万缗钱，宇文融从此更加得宠。括户工作一直持续到开元十五年。是年二月，玄宗下诏说：“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后复有逃来者，到后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把先前逃户免租赋，只轻税人官的优惠取消了，而且有征役者还先差。”这说明括户活动已告一段落，再出现逃户，政府将示以惩罚了。

括户是政府与豪强大地主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的一种斗争形势。宇文融主持的这次全国范围的括户，对国家财政的好转起了重要的作用。括户的着眼点主要是增加赋税收人，但宇文融等人在实行过程中，注意改变以往对逃户惩罚为主的作法，把减免赋调，帮助他们恢复农业生产放在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利社会生产，得到老百姓的欢迎。史载宇文融每到一地，必招集人民宣

示皇帝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括户主要是检括籍外占田和荫庇的客户，只有官僚、大地主才能占有籍外土地荫庇客户，因此括户难免不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括户自始至终都是在不小的反对声中进行的。括户刚开始时，朝廷内只有侍中源乾曜及中书舍人陆坚赞成。阳翟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相继上书，指出括户以勾剥为计，扰人不便，这代表了许多朝臣的看法。玄宗当时正重用宇文融，因此反对者的意见一概不听，还把皇甫憬贬了官。开元十二年，括户已取得很大成效，还有不少人言其烦扰，不利百姓。玄宗遂召集百官在尚书省讨论，当时公卿以下，畏惧宇文融的权势，不敢表态，只有户部侍郎杨玚认为，括户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玄宗再次对反对者采取压制的态度，将杨玚出为华州刺史。但是宇文融最终还是被排挤出朝，于开元十七年病死于贬官路上。旧史对宇文融括户持贬斥之词，说他以治财赋得幸于上，以括户取媚，是开元时的佞臣。并说他开一代搜括聚敛的风气，而从此皇帝广置诸使，竟为聚敛，百官失其本职而君主之心益侈，造成百姓的苦难。把宇文融说成了后世以聚财取贵的始作俑者。诚然，宇文融括户是为封建剥削服务的，旨在增加国库财富收入。玄宗也正是在“大攘四夷，急于用度”时，看重宇文融理财本事的。这就决定了括户的重要目的是聚财。而且在括户过程中，有些州县为了讨好宇文融，务在获多，有的弄虚作假，把一些居户也当作客户搜括，也就是说把逃户的租赋摊派到未逃户身上，以此充数，这必然给老百姓带来困扰，也给反对派以口实。应当说这是括户中存在的弊端。就宇文融括户主流来说，应予肯定。它与天宝时期，王铁、杨国忠等利用检田括户为聚敛之法有本质区别。

（杨西云）

参考资料：

《旧唐书 · 宇文融传》

《资治通鉴》卷212、213

《唐会要·逃户》

《新唐书》:《宇文融传》、《李峤传》

《全唐文·定户口疏》

马先彦:《宇文融检田括户述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玄宗崇道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肇源于古代巫术，正式形成于东汉末年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尊奉老子李耳为教祖。唐朝建立后，李氏统治者为了提高皇室的门第，将老子附会为李氏皇室的远祖。尊封为玄元皇帝，从而确定了有唐一代尊奉道教的政策。

唐玄宗君临天下前，对道教就颇有兴趣。这与他个人爱好、处境及社会风尚有关。他与不少僧道人物交结，在铲除太平公主势力的斗争中也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与帮助。

玄宗即位后，决心“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为了实现天下大治的需要，儒家学说是其治国的基本思想。与此同时，老子无为而治、清静为本等思想与玄宗崇尚节俭、与民休息的政策相契合。因此玄宗把道教作为治国兴政的一种手段与补充。他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释，总结其大旨是理身理国。也就是用老子的无为去求治，无欲求朴，清静求正身。玄宗这时崇道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以道术邀宠的人或灾祥符瑞之事并不欣赏赞同。例如开元六年(718 年)四月，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献崇道诗，玄宗批道：“观其文理，是崇道法之术，此不切时用。”将他们罢了官。开元十三年，玄宗曾任别驾的潞州(今山西长治)献祥瑞，玄宗对臣下说：“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职。”并下敕天下诸州，不得奏献祥瑞。还把宫内的“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理由是仙者是凭虚之论，朕所不取。

玄宗孜孜求理，迎来了“开元之治”。长期的歌舞升平，使他志

得意满，开始厌倦政事，追求享乐。然而人生短促，光阴如梭，他希望长生不老，永享极乐。于是开始迷信于神仙之术，崇尚玄虚。

玄宗对神仙方术发生兴趣是从与张果接触开始的。

张果，自称有神仙长生之术，在尧时居官侍中，著有《阴符经玄解》，至唐朝时已数千岁，隐居于中条山，来往于汾、晋之间。武则天曾派人召他入朝，他佯死不赴。玄宗时期有人在恒山见到他。开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韦济向朝廷奏闻，玄宗派通事舍人裴晤接他入宫，被他推辞，玄宗又派中书舍人徐峤持玺书邀请，这才随徐峤来到东都洛阳，坐肩舆入宫，受到玄宗的厚待。

起初，玄宗对神仙方药之事将信将疑。为了证实张果的身世，召来善算命知夭寿善恶的邢和璞，让其估算张果的岁数，谁知邢和璞见到张果后却懵然不知其年龄。玄宗又召来善鬼神的师夜光，他与张果对面而坐，却称不知其所在。玄宗对高力士说，听说只有奇才才能喝堇汁。于是命人为其斟上。堇汁是一种有毒性的饮料，张果连饮三碗，醺然如醉，喃喃道："这可不是好酒，"取镜子照时，牙齿已变焦黑，他一点不惊慌，让人取来铁如意将黑牙敲下，藏于袋中，又从怀里取出一包东西，自称是仙药涂在断齿上，然后昏然睡去。一觉醒来，满嘴已长出一口洁白的新牙。张果荒诞妖妄的"道法"使玄宗大为折服。一度曾想招这位方士为驸马。后张果请归恒山，玄宗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号"道玄先生"。从此玄宗对神仙道术深信不疑。

玄宗醉心于炼丹合药，神仙道术。他在宫中设道坛，又在嵩山等地立灶炼丹，令道士、宦官祭祀天下名山，同时又向术士学习隐形仙术，甚至在宫中亲自教道士们步虚声韵，俨然一副道士皇帝的派头。

开元二十九年，玄宗下制在两京（长安和洛阳）、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后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西京的称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州县为紫极宫。朝廷祭祀，必先至太清宫行"事生之礼"，一

切礼仪如宫阙之制。玄宗亲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作为祭祀之乐。这年建庙同时，又置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百人，令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道举从此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玄宗曾经亲自策试。后将崇玄学改称崇玄馆，博士改称学士，助教改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名，由宰相兼任。并领两京玄元宫和道院。

玄宗曾梦见玄元皇帝对他说："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遂派人到周至县的楼观山找到画像，将其奉迎至兴庆宫。又命画工复制许多，分置各地的道观祭祀。

天宝元年(742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奏说："在丹凤门上空，我望见了玄元皇帝，告诉我他在尹喜故宅藏有灵符"。玄宗异常兴奋，立即派人去找，果然在函谷关尹喜台发现了"灵符"。玄宗遂下令在大宁坊造玄元庙。群臣也纷纷上表称："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二字。玄宗高兴地接纳了。二月，玄宗亲享新落成的玄元皇帝庙，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四人所著书改为真经。尹喜台所在的桃林县，因得到"灵符"而改名为灵宝县。田同秀也因之提升为朝散大夫。

田同秀显然伪造灵符，投合取宠，当时就有人怀疑他的诡行，但由于抓不着把柄，也就不了了之，。一年后，清河人崔以清如法炮制，再次上表称，在洛阳天津桥北看见玄元皇帝，告知在武城紫微山藏灵符。玄宗命人去取，果然找到。东都留守王倕断定其中必有诈，于是对崔以清进行审问，崔以清只好据实交待。玄宗得知后并不深加追究，只将他定个流放罪。

由于玄宗沉溺于寻仙求道，佞臣纷纷投其所好，诡称遇见神人，发现符瑞。天宝七载，有人说在华清宫的朝元阁看见玄元皇帝。于是玄宗颁下敕文，改朝元阁为降圣阁。其所在地会昌县为昭应

县,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立祠庙。

天宝八载,太白山人李浑等上言见到神人,说金星洞里有玉板石记载着圣主福寿之符。玄宗派御史中丞王铁人仙游谷的金星洞寻找。当然也找到了。第二年,太白山人王玄翼又诡称见到玄元皇帝,说宝仙洞有妙宝真符。玄宗命刑部尚书张均等人前取。一时间老子处处显灵。所在争言符瑞,群臣不断上表庆贺、吹捧,李林甫等人还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弄得玄宗昏昏然,以为真能羽化登仙,长享人间富贵。

玄宗好神仙,往往进用所谓奇异之士。太常博士王玙曾攻读礼学,后来他看见玄宗醉心神仙道术,于是专习祭祀之礼以迎合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他上疏请立青帝坛以迎春,玄宗很高兴,任命他为侍御史、领祠祭使,王玙又恢复了汉代以来丧葬烧纸钱的作法。他身为朝廷要臣,行为却与巫师无异。

宰相陈希烈精通玄学,常在禁中为玄宗讲解《老子》、《周易》、深受器重,累升为中书舍人。田同秀诈称看见老子、赐下灵符,陈希烈借机献媚说:"臣侍讲《南华真经》第七篇时,陛下曾说:'此言养生,朕已悟其术,而《德充符》难道没有感应吗?'臣当时稽首回答:'陛下德充于内,符应于外,必有绝瑞出来应验。'现在果然降下灵符,正合陛下的心意,请宣示史官,记下祥瑞,光照无穷。"玄宗对这类佞媚之言听得十分顺耳,不久即命陈希烈兼崇玄馆大学士,封临颍侯。

天宝十三载,太清宫有人上奏,说道士李琪看见玄元皇帝乘着一片紫云,飘然往来。还告诉他"国祚延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年安史之乱就在一片崇道求仙声中爆发了。

玄宗仓惶逃奔成都,再次看到玄元皇帝显灵。为"示收禄山之兆"。玄宗至此仍深信不疑,马上令人赶修兴唐观、福唐观,亲自拜谒祈祷。战乱平息后他回到长安,仍炼丹服药,旧习不改。

综观玄宗崇道的一生,前期他成功地将道家思想作为以儒学

治国的补充，后期则沉迷于道术，企望于长生，醉心于极乐，以至更加荒怠政事，从而使他崇道走向了反面。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14、215、216

《旧唐书》：《玄宗本纪》、《礼仪志》、《张果传》

《新唐书·陈希烈传》

《历代崇道记》

高力士弄权

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当权的宦官。本姓冯，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少年时阉身，圣历元年（698年）由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到长安人宫。这时正是武则天当政时期，武则天见他仪表端正，聪明伶俐，便留在身边当差使唤。后因过失，一度被逐。宦官高延福将他收作养子，故改姓高。高延福与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交往勾结，力士遂经常往来三思府第。为高、武传递消息，这为他再次人宫创造了条件。

果然，一年以后，武则天将他召人禁中，隶属司宫台。他接受上次被逐的教训，处处小心谨慎，细致周到，又机灵好学，担任起传达皇帝诏敕的任务，授为宫闱丞。中宗景龙中，唐玄宗李隆基为临淄王，力士倾心附结，得到信任。其时政局迭宕，韦后与安乐公主联手杀了唐中宗，临朝摄政，谋效武后所为。玄宗与姑母太平公主合谋，起兵杀韦后和安乐公主，玄宗立为太子，遂命高力士隶属内坊，日侍左右。玄宗处理政务受到太平公主的掣肘时，朝中“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大臣，大半附之。”先天二年（713年），高力士参预玄宗削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的斗争，以功升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开元中，又加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掌管太监事务的长官。

内侍省是唐代宦官官署，下设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分管宫内日常生活诸方面。唐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未发生过宦官干权的事。武则天当政

时，宦官人数有所增加。至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猛增至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但高品阶者仍很少。唐玄宗时开始重用宦官，当时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有品阶的宦官达到三千人，居高品者就有千余人。稍稍称旨的宦官，玄宗即授三品将军。其时宦官或持节征讨，或奉命宣传，或出使郡县，势力逐渐形成。对外带兵征讨的杨思勖和居中侍卫的高力士成为最受宠信的人物。特别是高力士，由于他机灵乖巧，效忠皇帝，深得玄宗赏识。主管宦官的出使、监军、修佛寺诸事，成为最有实权的宦官。

但是在开元时期，高力士却受到王毛仲辈的非礼与歧视。王毛仲本是玄宗的家奴，性识明悟，常伏侍左右，被玄宗视为心腹。后居开府仪同三司之高品，任内外闲厩监牧都使之职。他恃宠骄恣，不把宦官放在眼里，对小宦官动辄辱骂殴打，视为奴仆，品阶高者也睥睨轻视。高力士等人对他敢怒不敢言。开元十八年(730年)，王毛仲求为兵部尚书，引起玄宗不满而未答允其要求。高力士抓住时机报复。适值王毛仲妻子生下一个男婴，力士奉旨前往庆贺，赐给大量酒食、金帛，并授毛仲子五品阶。力士回宫，玄宗问他："毛仲高兴吗?"力士回答："毛仲抱着襁褓中的婴孩向大臣展示说：'这样的儿子难道不配做三品官吗?'玄宗大怒道："当初诛韦氏的时候，此贼就首鼠两端。朕不计较，原谅了他，谁想到他竟借口儿子怨朕。"力士趁机劝道："北门奴(禁军)势力太盛，相与一心，若不及早除掉，必生大患。"促使玄宗下决心清除了王毛仲势力。从此高力士地位更加稳固。

唐玄宗做太平天子时间长了，渐渐怠于政事，便把宫内的事务委交给力士。力士在宫中地位十分特殊，太子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附马辈呼为"爷"。力士负责接收各地进呈的文表奏章，由他转给皇帝，小的事情他可全权处理，不必请示。玄宗对他十分放心，常说："力士值班，我睡得就安稳。"所以力士经常在宫中

主事，很少外出。因此有人以一睹他容貌作为吹嘘的资本。

由于深得恩宠，善投机钻营的外廷官僚们争先巴结攀缘力士。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等与他结为兄弟，力士母亲麦氏病死，程伯献在灵前披发凭吊，捶胸顿足地痛哭，如丧考妣。力士见瀛州吕玄晤女有姿色，便纳为妻室。后吕氏死时，朝廷大臣竟相致祭。从力士府第到墓地，车马络绎不绝，填满道路。既使很有实权的文武大臣，也多与他交结往来，靠他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藉以巩固地位。象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铁、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都是通过力士的关系而得将相高位的。

高力士资产殷厚，玄宗特在殿侧建院让他居住。该院雕梁画栋、精巧华丽，还附有拜佛念经的场所。力士在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建华封道士观，花费庞大；又在京城西北拦截沣水作碾，每日能碾麦三百斛。当宝寿寺钟铸成时，力士举行庆贺活动，举朝大小官员都到场庆贺。规定击钟一次需纳礼钱十万缗，谄媚他的人有连续击二十杵的，少的也击十杵。

天宝初，加高力士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载(748年)，加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大权在握，高爵厚禄，对玄宗却是忠心耿耿，处处维护皇权。

开元二十五年，深得玄宗宠爱的武惠妃为了达到让自己儿子寿王瑁作太子的目的，指使人诬陷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至死。奸相李林甫平时依附武妃，这年，武妃突得暴病而死，李林甫仍执意拥立寿王瑁，企图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加强在朝廷中的势力，因此屡屡劝说玄宗。寿王瑁在玄宗诸子中排行十八，又无特殊的才华，而忠王玙年长，且勤学好问，仁孝恭谨。玄宗犹豫不决，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三个儿子又同日诛死，后继未定，不免心生烦恼，寝食不安。高力士明知故问，玄宗责备说：“你是我家老奴，难道还揣测不到我的心病。”力士说：“是为立太子事犯愁吧？”玄宗答：“正是。”力士劝道：“陛下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只按制推长而立，谁敢再

争。”一席话玄宗顿时释怀，决定立玙为太子。

关中地狭，储粮有限，玄宗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东都洛阳住上
一段时间以减轻运粮困难。李林甫察觉玄宗厌恶奔波，就多调各地
粮食财物充实长安，使玄宗不必东巡洛阳做“逐粮天子”，省却了劳
顿之苦。玄宗很高兴。天宝三载，玄宗从容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
安快十年了，天下太平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把政事交给林甫，你看
怎样？”高力士直率地劝道：“天子到各地巡狩视察，是历代的定制。
天下大权不可以授人，一旦养成威势，就无可挽回了。”玄宗早已厌
恶了政事，听完高力士的话面露不悦之色。力士赶紧顿首谢罪，自
责狂妄罪该当死。玄宗这才换上笑颜，为其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君
臣和好如初。从此高力士再不敢深言天下大事。

天宝十五载，由于朝政腐败，边防废弛，身兼河东、范阳、平卢
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叛乱，攻下长安、洛阳，高力士扈从玄宗
逃往成都，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愤怒的军士杀死擅权宰相杨
国忠，迫玄宗交出杨贵妃，割恩正法。玄宗不情愿说：“贵妃居住在
深宫，怎知国忠谋反。”高力士说：“贵妃的确无罪，然而将士已杀杨
国忠，贵妃还在陛下左右，他们哪敢自安呢？愿陛下仔细思量，将士
安陛下才能平安。”高力士自然明白贵妃是无辜的，但是他宁愿牺
牲贵妃来保护玄宗的安全。至成都，力士被封齐国公。至德二载
（757 年），随玄宗返回长安，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坐食五百户租税。

上元元年（760 年），肃宗患病，当权宦官李辅国矫旨迎已禅位
的玄宗游西内，行至睿武门时，李辅国带五百甲士拔刀遮道，奏曰：
“皇帝以兴庆宫（玄宗所居）狭小，迎上皇迁居大内。”玄宗被这一拦
大吃一惊，几乎从马上跌落下来。高力士大声断喝：“李辅国不可无
礼！叱令其下马。又代表上皇命诸将士好自为之。将士们将刀收
好，拜呼万岁。高力士叱令李辅国与己共执上皇的马缰，护送上皇
去西内。

高力士保护玄宗受到李辅国排挤，七月，被流放巫州（今湖南

黔阳西南)。该地多荠菜,当地人不知能食,力士感伤赋诗:"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常采之为羹。或登山临水自娱。宝应元年(762年)三月,赦还,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得知玄宗已死的消息,悲不自胜,望北号哭,泣血而死,年七十九。代宗时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高力士一生富过王侯,势倾内外。但他平素谨慎,不妄骄横,又善于观察时势,尽职效忠,所以久受玄宗宠任,于朝廷内外也无大恶名。与他之后跋扈擅权的宦官有所不同。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对天宝时朝政腐败有一定的责任。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10—221

《旧唐书·高力士传》

《新唐书·高力士传》

唐·郭湜《高力士外传》

杨贵妃专宠

杨贵妃，名玉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父亲杨玄琰，任蜀州司户。玉环出生于四川，幼年即丧父，寄养在叔父扬玄珪家里，杨玄珪任河南府士曹，所以杨玉环在河南洛阳度过了她童年及少女时代。

玉环出于世代官宦之家，其祖先是隋朝宗室的后裔，这给杨家留下了高贵的身份，使他们不同于一般平寒之家，没有衣食柴米之虞，玉环可以无忧无虑地抚琴吟唱，尽情歌舞，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由于她天生丽质，长着一副远近闻名的花容月貌，所以在她十七岁时，即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十二月，就被立为当朝皇帝唐玄宗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这种王妃的生活过了五年。

寿王瑁的生母是武惠妃，她聪明貌美，深得唐玄宗宠爱。为了能立她为后，玄宗在开元十二年时废王皇后为庶民。只是遭到大臣的反对，武惠妃才没当上皇后，但是她实际上享受着皇后的待遇，而且玄宗从此再没立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武惠妃得暴病而死。赠谥贞顺皇后，玄宗对她怀念不已，为此常郁郁寡欢。玄宗每年十月都要到骊山华清池避寒，届时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妃嫔宫女前拥后呼陪同前往，玄宗赐她们在温泉洗浴。秋风微起，池波荡漾，佳丽们千姿百态，妩媚动人，但在玄宗看来，却粉色如土。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和后宫才人、乐府伎女数千，却没一人中己意者，能取代武惠妃在自己心中的地

位。玄宗整日闷闷不乐，感到十分寂寞无聊。于是便命心腹宦官高力士到外面寻觅佳人。

高力士在寿王邸见到绝代姿色的杨玉环，遂向玄宗推荐。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照例行幸华清宫时，派人召来了杨妃，只见她“鬓发腻理，纤浓中度”，举手投足之间，宛若古时美人汉武帝李夫人再生。玄宗先自有了十二分的欢喜，赐她洗浴温泉。出浴的杨妃更为楚楚动人，撩人心弦，凝脂般雪白的肤肌，顾盼生辉的双眸，加上那娇羞不胜罗绮的妩媚，令玄宗难以自持。当晚即将杨妃留下，赐她金钗钿盒，还亲自在梳妆台前为她戴上金步摇（耳环）。并欣喜若狂地说：“朕得杨妃，如得至宝也。”为此还专门作了一首《得宝子》之曲。

然而杨妃毕竟是玄宗的儿媳。直接地明媒正娶难免脸面上不光彩，于伦理纲常也说不过去。为了避人耳目，玄宗让杨妃自己提出出家人道的要求。这样摇身一变，王妃就成了女道士，号“太真”，住在“太真殿”里。在不到一年的时光里。玄宗对她的宠爱如同惠妃，对她的礼遇也同皇后无异，由于得到皇帝的宠幸，宫中直呼这位女道士为“娘子”。

天宝四载（745 年）七月，太真“出家”已近五年，玄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于这月先为寿王瑁正式娶韦昭训的女儿为王妃，以示安慰，接着在八月就正式册玉环为贵妃，这是宫中仅次于皇后的封号，玉环堂而皇之地成为贵妃娘娘。在册封贵妃的同时，玄宗赠杨贵妃之父玄琰为洛阳太守，母亲李氏陇西郡夫人。不久，又赠玄琰兵部尚书、李氏凉国夫人，叔父玄珪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以后陆续地将与杨贵妃沾亲带故的杨氏家族全部赐封加官。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玉环一封为妃，立时宠倾后宫。玄宗与她整日厮守，如胶似漆。二人“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须臾不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的《长恨歌》淋漓尽致地描述了玄宗对贵妃的迷恋。贵妃每次乘马外出，玄宗都让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亲自执辔授鞭；宫中专为贵妃织锦刺绣的工人就达七百人，负责雕刻镕造的也有数百人；每逢贵妃生日或节庆之日，各地争先进贡珍奇宝货，有的地方官因之获得提拔；玄宗每年去骊山华清宫避寒，贵妃必同辇前往，特为其在华清宫造梳洗之所端正楼和沐浴之室莲花汤；贵妃喜吃荔枝，此物只生在四川、岭南等地，且不易保鲜，玄宗不惜劳民伤财，命岭南驿站快马传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到贵妃手中的荔枝依然色味不变，当时人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玄宗宠幸贵妃，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来因为贵妃有绝代姿色，使玄宗为之倾倒，二来也因为贵妃有上乘的音乐造诣，使玄宗将她视为知音。贵妃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她跳起舞来婆娑多姿，常常使玄宗禁不住在旁击节叹赏，贵妃跳的《霓裳羽衣曲》舞，创造了一种飘逸如仙的意境，更使玄宗如痴如醉，似乎永远也看不够。贵妃弹琵琶也十分在行，当时诸王及贵妃姊妹，皆拜她为师。自称“琵琶弟子”。贵妃又擅长击磬，其演技甚至超过皇家梨园弟子。玄宗生性风流倜傥，对音乐歌舞样样精通。自然十分欣赏贵妃的艺才，二人爱好相近，情趣相投，使别人难以取代贵妃在玄宗心中的地位。而且，贵妃聪颖灵慧，善解人意，其倩盼承迎，无不投合玄宗的心意。当了三十余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治国施政上早已别无所求，杨贵妃的出现，给他无所事事的晚年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与慰藉。所以使玄宗感到再难以离开贵妃，他俩难舍难分的缠绵之情在历史上帝王妃嫔之间是罕见的。据说一年七月七日乞巧节深夜，两人在长生殿凭栏相依，久久遥望着耿耿银河，最后双双跪下，发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

不过，二人长久在一起耳鬓厮磨，难免也闹别扭，产生龃龉。

这样的事情曾有两次。

第一次时在天宝五载（746年）七月，杨贵妃因妒悍不逊，被送归兄杨铦之宅。事情的起因大概与梅妃有关。在杨贵妃入宫之前，玄宗曾还宠幸过梅妃。梅妃本姓江，名采苹，福建莆田人。祖上世代行医。采苹自幼聪颖好学，颇有文化素养，长大后出落得亭亭玉立，她淡妆雅服，仪态秀雅端庄，又长于作诗。在开元时被高力士召到宫中，大得玄宗欢心。采苹性喜梅花，在自己居室外亲种数枝梅花，玄宗亲题"梅亭"二字，并昵称她为"梅妃"。杨贵妃入宫后，与她争风吃醋，最终贵妃占了上风，梅妃渐受冷落。一次玄宗又想起了她，把她召到翠华西阁，念及旧情，二人难舍难分，均感怅然。这事不知怎么被贵妃知道了，她怒气冲冲赶来，对玄宗出言不逊，惹恼了龙颜，被赶出宫外。

玄宗赶走了贵妃，却立刻感到后悔和懊恼。他茶饭不思，坐卧不安，烦躁渐渐转为暴怒，一向温和的他这日也无缘无故地捶挞下人，吓得周围的人都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高力士体察玄宗的苦恼。他小心翼翼建议将贵妃平日用的器物分出些给贵妃送去，玄宗果然表示同意。还让把御膳也捎去，共拉了百余车之多。到了夜间，高力士又乖巧地提出迎贵妃回宫，玄宗正巴望不得，遂下令开禁门接回贵妃。贵妃一入门即伏地谢罪，玄宗心中的不悦涣然冰释，赶紧软语相慰。从此对贵妃更加宠爱。

第二次贵妃被遣是在天宝九载二月，据说是因为吹了玄宗兄长宁王李宪的紫玉笛。玄宗友爱兄弟，曾在兴庆宫里设五王帐。故上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共处。一次贵妃来到这里，无意间看见紫玉笛，信手拿起吹了起来。诗人张祐"梨花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之句即指此事。这本无可厚非，玄宗却认为伤了他帝王的尊严，再次把贵妃遣送回家。这次玄宗也很快就懊悔了，但不便表示出来。户部郎中吉温这时正巴结依附贵妃族兄杨国忠，便通过宦官向玄宗使激将法。说贵妃是一妇人，识虑短浅，违忤圣

旨，罪为一死，只是应死于宫中，陛下何惜宫中一席之地，而忍心让她在外受辱呢？玄宗听了这话心里更加难受。立即派宦官给贵妃送去御膳。贵妃哭得很伤心，让宦官转告玄宗："妾罪当死，蒙陛下不杀，今日应当永离宫庭，金玉珍玩都是陛下所赐，不足以奉献，唯有发肤是父母所生，敢以捧献。"遂剪下一缕长发，要宦官代献给皇帝。玄宗见到头发，一刻没停留就让人把贵妃接回来了。经过这两次磨擦，玄宗更加感到贵妃在自己心中地位的重要，因而对其宠遇也有增无减。

贵妃得宠，杨氏门第也骤然生辉。玄宗毫不吝惜地对杨家亲戚大加封赏。杨贵妃有三个姐姐，姿色出众，被封为"国夫人"之号。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封为虢国夫人，八姐封为秦国夫人。玄宗每月都赐给她们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作脂粉费。三姐妹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特别是虢国夫人，生性轻佻，常与玄宗虐浪调情，依恃貌美，素面入朝，杜甫有描写她的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贵妃的族兄杨铦擢为殿中监，杨锜为侍御史，并娶武惠妃女太华公主为妻。玄宗在京城赐给杨氏姐妹昆仲五家宅居，还常常把稀世珍宝分给他们。五家也极尽铺张奢侈。平日锦衣玉食，车马仆从如云，又喜大兴木土，建宅造院。每建一堂，动辄以千万计。见到谁家宅院比自己的宏伟，立即拆去重建，挥金如土，毫不吝惜。给五家送四方进献物品的中使，络绎不绝。玄宗每年去华清宫避寒，五家必陪同扈从，每家为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在一起，五色相映成辉，光耀夺目，而人马过后，常有珠翠手饰委弃于地。杨家这种豪奢斗富之情，自开元以来，无人能与比及。当时长安城有这样的歌谣："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贵妃得宠似乎改变了人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这反映了人们的羡慕心理，也流露了人们对杨氏新权贵的不满。

杨家不仅争奇斗富，大开奢靡之风，而且为所欲为，带着暴发户的霸道之气。天宝十载正月十五上元节。杨家五宅夜游，行至西市门时，与广平公主相遇，为争先出门，杨氏家奴斥赶公主等人，挥鞭触到公主身上，公主从马上惊坠落地。驸马程昌裔赶紧去扶，也挨了数鞭。事后公主向父皇泣诉，玄宗虽下令杀了打人的家奴，却也把程昌裔停官。公主平白无故受到杨家欺侮，其丈夫却遭处罚，杨家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虢国夫人一天带着数十侍婢来到前宰相韦嗣立宅前，笑问韦嗣立儿子："听说这宅院要卖，多少价钱？"韦嗣立闻听赶紧走下台阶恭敬答道："这是先人旧宅，不忍出卖。"但未等韦嗣立说完，后边跟来的工匠早已围住韦宅，七手八脚开始拆屋撤瓦，韦嗣立和儿子及家僮眼睁睁见他们拆房，不敢制止，最后只好把琴书之类器物搬到屋外。虢国夫人仅给了韦家十亩空地而已。中堂建成后，只给工匠二百万钱，工匠提出要赏钱，虢国夫人答应给五百段绛罗，但又故意刁难耍弄工匠，要他们提来一些蝼蚁、蜥蜴放在屋中，记下数量，走失一个，则赏钱分文不给。其刁蛮霸道多如此类。

在封建社会，君主宠爱一个妃子本无可厚非，但玄宗对贵妃的宠爱已超出了限度。他对杨氏家族大加封赏，扶植出一个新权贵集团，使其大开奢靡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对贵妃远房兄弟杨国忠的宠信重用，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对贵妃的特殊宠遇，也使玄宗本人沉醉于女色声乐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导致了荒淫误国的结局。因此，尽管杨贵妃本人并没有干政乱权的行为，但她依然对玄宗晚年失政有一定的影响。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14—216

《旧唐书》：《杨贵妃传》

《新唐书》：《杨贵妃传》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

五代·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

计臣聚敛

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局面。当时天下太平，文化昌盛，社会繁荣，四海富庶，是社会少有的治世时代。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增长，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贪欲也越来越大。这时的玄宗一改往日禁抑奢靡、倡导节俭的作法，开始纵欲享乐，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均田农民破产，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玄宗又贪求边功，军费开支浩大，官僚机构也日见臃肿，为维护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运转和满足皇室奢侈生活的需要，便加紧对人民的搜刮苛剥。玄宗开始重用计臣，一批聚敛能手应时而出。如旧史家所说："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

宇文融是第一个以聚财有功而得到玄宗赏识的人物。针对当时豪强地主籍外占田和农民破产流亡的情况，他建议在全国检田括户，并收到了成效。开元十二年(724年)，征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增加了数百万缗钱的收入，将其悉数人官，从面得到玄宗的宠信。玄宗侈心大开，从此广置诸使，派到各地聚敛财物。宇文融获罪后，因国用不足，玄宗训斥宰相裴光庭说："卿等皆说宇文融奸恶，朕听从了你们的意见，放黜了他，如今却国用不足，该怎么办?"光庭等人惶惧面不敢答言。玄宗又问宰相："杨崇礼的儿子哪个能继承父业?"杨崇礼在太府寺任职，在管理财物上颇有一套办法。当时承平日久，太府中的财货堆积如山，经他手而人

库的财物无不精好。他极负责认真，尺寸之物也躬亲省阅，不曾出现一点差错。而且每年勾剥节余出数百万贯钱。他任职二十余年，号称“公清如一”，太府同职人员没人能超过他的。由于管财有方，玄宗将他提升为太府卿，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弘农郡公。这时他已九十高龄，衰老多病，已不能继续任职，只好以户部尚书退休，玄宗准备提拔其子理财。宰相们认为，杨崇礼的三个儿子慎余、慎矜、慎名皆勤勉有才，继承了父亲的遗风，而慎矜最为突出。玄宗于是将杨慎矜由汝阳令提升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杨慎余为太子舍人，监京仓；杨慎名任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东都含嘉仓出纳使。兄弟三人皆称职，并蒙玄宗恩顾。杨慎矜继承了父亲的作法，十分严格地检验诸州输纳的物资。布帛稍有水渍或是质量成色稍差些，他立即责令本州折价赔钱，然后转买当地轻货。这样虽然增加了太府的收人，州县却疲于征调，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杨慎矜由于能聚财，讨得玄宗欢心，晋升为侍御史、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充诸道铸钱使，始终执掌太府出纳。

聚敛之臣得到玄宗的重用，不少人纷纷抱着投机的心理钻营此道，挖空心思地剥下媚上，以求显达。韦坚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其妻是极有权势的楚国公姜皎之女，其妹是皇太子妃。韦族门第显耀，使韦坚早早地进人仕途，开元二十五年就居官长安令。他精明干练，目睹宇文融和杨慎矜父子均以聚财敛物而得到皇帝恩顾，也积极效法。玄宗派他督江淮漕运，他利用这个机会，大显神通，置吏督察，岁增巨万。玄宗认为他有才能，提升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

韦坚以诡计求进，奏请在长安城东九里之处望春楼下引浐水开潭，与漕渠相通，以聚江淮运船。他役使工匠修渠引水，沉重的劳役导致自江淮至京师的民间萧然愁怨。工程历时二年，天宝二年（743年）三月二十六日（丙寅），玄宗登望春楼观新潭，韦坚早已下令把数百艘江淮运船聚集在新潭里，每船标明所来之地，

满载各地的珍贵物产。如广陵郡船堆积着广陵所产的锦、镜、铜器、海味；会稽郡船装载着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携有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上则是名瓷、酒器、茶具等；宣城郡船有纸笔、黄连；始安郡船有翡翠等。数十地的数百船云集新潭，场面颇为壮观。陕县尉崔成甫为庆贺韦坚凿成新潭，改旧歌词道："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杨州铜器多。三郎（玄宗小名）当殿坐，看唱得宝歌。"他又作歌词十首，站在第一条船上引亢高歌，一百名身着鲜艳服装的妇女合声伴唱，又有鼓笛之乐相和，百舸徐徐开动，延绵数里，观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韦坚跪献各地轻货和美味珍馔，玄宗兴奋异常，令在楼上置宴，又颁下诏敕，盛赞韦坚勤勉有功，开此潭是万代之利，赐名为广运潭。不久韦坚即加官左散骑常侍，其僚属吏卒也都受褒赏。京兆尹韩朝宗也如法炮制，在长安西街引渭水置潭，以贮木材。韦坚为了讨好玄宗，竟把江淮农民义仓中荒年自赈的粮食，拿来转 市轻货，供统治者挥霍享用，实在是不择手段。而玄宗也心安理得地享用，鼓励臣下的聚敛行为。

又有王𫟹，志在聚敛，专以剥下媚上为事，得到玄宗赏识，升迁迅速。由鄠县尉、京兆尹稻田判官而连升为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侍御史、御史中丞。天宝四载，在他担任户口色役使期间，玄宗曾下诏蠲免老百姓赋税，王𫟹表面执行，不让人民交纳，却又奏请征收脚钱（运输费），而且广张其数，又市轻货，结果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比正式交赋税还重。王𫟹想方设法巧取豪夺，按唐制，戍守边疆的戍丁，可以免除租庸，六年返归。由于玄宗好大喜功，士卒多死而不返。边将打了败仗，也多隐瞒败绩，不把阵亡的士卒申牒上报，结果人亡而贯籍仍未注销。王𫟹明知实情，为了让死人交税，硬说这些人尚在，是隐漏逃税。于是按照旧籍，刨除六年外，向其家征三十年租庸。老百姓有苦难言，无门上告。王𫟹处处迎合玄宗，玄宗因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对妃嫔后宫滥加赏

赐，毫无节制，但是又不愿频频从左右藏库（储存天下财货之地）取用。王鉷深知玄宗的心思，遂每年额外地搜刮百亿万钱帛，贮存于内库（琼林、大盈二库，专用以储藏州县贡献财物）专门供应玄宗赏赐宴请。并向玄宗献媚说："这些财物皆是常年剩余额外的，不是所征税物。"意思让玄宗随心所欲地支配，不必顾虑。显然这些所谓的"额外"之物均是从人民手中苛敛而得。玄宗却认为王鉷有富国之术，有功王室，对他更加器重。王鉷也不负玄宗厚望，巧立名目，千方榨取。州县所输纳的帛物，稍有污点，即折价下本郡再征纳。又让本郡资财较为殷实的人户出资运输租庸，这些人家往往为此而破产，被榨掠一空。王鉷恣意苛剥，招致民间的怨恨，而他却威权日重，身兼二十余使，近宅造使院，文案堆积，胥吏求押一字，常常累日不得见面。中使赐遗，不绝于门，连大权在握的奸相李林甫也让他三分。

杨国忠是继王鉷之后的又一聚财能手。他是杨贵妃的远房族兄，靠着杨贵妃姊妹的关系得以侍宴禁中，专掌樗蒲（古代一种游戏，象后代的掷色子）文簿。玄宗见他精于筹算，开玩笑说："好度支郎。"诸杨抓住这句戏言不放，向玄宗推荐，恰在这时杨国忠已攀援上王鉷，王鉷因奏充判官，从此他平步青云。如果说杨国忠进身是靠着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那么他得到玄宗的宠信与重用则是靠他搜刮财物，迎合了玄宗的需要。这时期玄宗宠爱杨贵妃，沉溺于声色之中，更加无心于政事，朝政日趋腐败；最高统治集团骄侈淫逸，疯狂地追求与挥霍社会财富，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杨国忠位居宰相，身兼四十余使，掌握着军政财大权，肆无忌惮地聚敛财物。当时州县的仓库粟帛堆积如山，杨国忠奏请就地卖出，换成珍宝锦绣等轻货，又将所征的丁租地税折成布帛，一起输运京师。他屡屡上奏玄宗，说府库充盈，古今罕有。天宝八载二月，玄宗率百官参观左藏，满目的财物，使玄宗误以为国家富足无比，所以视金帛为粪土，无节制地赏赐贵宠之家。而当

时社会的贫富悬殊有如天壤之别。正如时人杜佑所说："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富，闾阎困矣。"

玄宗重用聚敛之臣，不仅加深了统治集团的荒淫腐败，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是玄宗晚年失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12--217

《旧唐书》：《宇文融传》、《韦坚传》、《杨慎矜传》、《王铁传》、《杨国忠传》、《杨炎传》

《新唐书·食货志》

《通典·食货典·赋税下》

天宝法令弛坏

唐玄宗即位初期，力矫时弊，孜孜求治。因而在八世纪初，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都呈现了一种历史上稀有的繁荣景象，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但是随着封建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发展，在盛世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使在前期行之有效的法令设施制度逐渐遭到破 坏或废弃。

唐朝初年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一方面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通过颁授土地控制了劳动人口，保证了国家赋税、徭役与兵役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均田制实行的先决条件，是政府手中必须掌握着大量无主的土地，随时授给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均田中的二十亩永业田一般来说能授足额，且授后不还，所以每授一次土地，国家的官田就随之减少一次。而且唐代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均允许出卖，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刺激了贵戚官僚，豪强地主追逐土地的欲望，形成了兼并之风，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早在贞观时期，土地兼并就已露端倪，至玄宗时，土地问题日益严重，高官贵戚占地成风。李憕、李彭年享有“地癖”之称，卢从愿占田数百顷，被称为“多田翁”。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占有大片京师的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奸相李林甫的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巨商与豪强地主也汇入到兼并土地的行列中去。正如时人杜佑所说：“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

有逾于汉成帝、哀帝之间。”玄宗在天宝十一载（752年）下的诏令中也提到：“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遍置庄田，破坏均田法令，恣意吞并土地。他们有的借口开荒，侵夺农民的熟田；有的借口设置牧场，任意封占山泽；有的违法强买、或用窜改户籍、典帖等方式侵占农民的口分田与永业田。致使百姓无处安置，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均田农民在兼并之风下所占的土地越来越少，但仍要负担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这逼着他们卖光房屋土地，最终破产逃亡。均田制的破坏，使租庸调无法实行，政府的赋税来源得不到保障，统治集团深感担忧，于是玄宗一方面采纳监察御史宇文融的建议，开展检田括户，重新安置流亡农户，一方面力图扭转兼并之风，下诏禁止在两京（长安与洛阳）五百里内置牧地，不得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和借公私荒废田。括户虽能暂时收到成效，却无济于长远，一纸法令也难以阻挡土地集中和土地兼并这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均田制瓦解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发生了动摇。府兵的特点是兵农合一，亦兵亦农。兵士从农民中征调，要自备资粮武器，当农民手中有一定数量土地时，有能力承担自身的装备。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少，以至无力负担资粮武器，于是纷纷逃避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度瓦解的根本原因。其次，府兵地位的低落也是它无法维持的重要原因。唐初，府兵为政府所重视，参加征役者可得勋级，征役死亡可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自唐高宗以来，先前用以吸引富家子弟从军的官品、勋级、赏赐、勋田不能兑现，而且战死也无人问津。随着边疆战事不断，戍边征伐频繁，原来规定戍边的府兵三年一轮换，后来延至五、六年，甚至长期不让归还。诗人杜甫《兵车行》就描绘了天宝年间府兵所遭受的征役之苦：“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些人家中的田园都荒芜了，而官府还向家属催租逼债。戍边的府兵还象僮仆一样

被边将任意驱使，受到虐待和迫害。宿卫京师的府兵是皇帝的侍官，也任意被官吏役使，以至"侍官"成为辱骂人的语言。府兵身份跌落至此，富家子弟不再愿意充军，他们或逃避检点，或雇人替代，兵役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府兵为人所贱，达到"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的地步。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旧兵制的崩溃，使封建政府陷入了兵源枯竭的局面。玄宗统治初期，府兵逃散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改革兵制已迫在眉睫。开元十年（722 年），玄宗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免赋役征行，共募得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彍骑，代替番上宿卫的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由官给资粮，从此宿卫兵士皆由召募而来。开元二十五年，又开始召募征戍的士兵，即在诸军镇置兵防健儿，从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情愿充健儿长驻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听任家属自随，官给田地屋宅。因长驻边疆，也称长征健儿。

地方上则设置团结兵，召募富户强丁者充任，免除征赋，服役期间发给本人身粮酱菜。团结兵由地方政府征发入军，主要任务是协助防守边疆，或配合作战，战事结束后，随即遣返回乡。

天宝八载，鉴于军府已无兵可交，唐玄宗遂宣布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府兵制终告废止。从此召募制的雇佣兵、职业兵代替了征兵制的义务兵。

府兵制的废弃，使唐王朝内重外轻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逆转，给唐后期政治、军事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实行府兵制时，唐政府严格地本着居重驭轻的方针布署兵力。军府近半数集中于京师所在的关内道；遇有重大战事，另行调发府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拥兵自重；中央保持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绝对军事优势，地方难以和中央抗衡。为防军权旁落，边帅的人选，多用忠厚名臣充任，而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绩显著的边将，往往升为宰相，或

以宰相兼任边镇军事长官。对一些有方略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任其为将，但另派重臣加以牵制，不让其专大将之任。这样，中央牢牢控制住军权，防患于未然。高宗武后时期，西北的突厥和吐蕃、东北的契丹逐渐强盛起来，与内地屡有磨擦，边疆战事频繁。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克服临时征调的困难，不得不考虑在边境屯驻重兵。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开始设节度使，节制一方军权。玄宗根据边疆形势的需要，于天宝年间在边陲设置了十个军区长官，即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平卢（治营州，今辽宁朝阳）、河东（治太原）、朔方（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陇右（治鄯州，今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治广州，今属广东）经略使。节度使的权力也由初时仅统一方军权而逐渐扩大。有的兼支度使（管军资粮仗）；有的因边区供养不足，开置屯田，故又兼营田使；有的兼一道甚至数道的采访使或是兼摄数镇。节度使还有权自行召募军队和直接任命自己属下的官吏。至天宝年间，节度使几乎囊括了边州所有军、政、财、监大权。其辖下士兵，多来源于无产业户的雇佣兵，不事生产，往往父死子补，兄终弟代，世代为兵，形成一股特殊的势力，成为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基础。这时节度使人选也发生了变化。李林甫为相，为了杜绝武将人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建议用骠悍善战的胡人，才能为朝廷尽死力。玄宗采纳其策，于是安禄山、安思顺等人先后出任节度使，终成尾大不掉之势。

边疆长期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却越来越空虚。天宝元年边境所设十节度使拥有士兵四十九万。当时全国士兵总数才五十七万，内地兵员仅占边疆的六分之一。而且军备废弛。因为当时天下承平日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禁止民间保持武器；召募而来的

彍骑又多"市人"，富者贩缯采做生意，壮者拔河、翘木为游戏，不堪作战。这样形成了猛将精兵，全部聚集于西北，内地无武备的状况，唐初以来军事上内重外轻的格局完全颠倒过来。由此而酿成了安史之祸。

天宝时期除土地及军制发生变化外，上层建筑的职官制度也发生混乱与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使职差遣官越来越多，官与职脱节。差遣官由最初的临时性质成为固定职官，而且本末倒置，本官变成了空衔，使职才是掌实权的职务。象节度使、团练使、户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采访使等大量出现，权限日重，造成职官制混乱，官员膨胀，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各项法令制度废弛的时候，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没能及时地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情况，保持社会的良性循环。相反他沉醉在表面的歌舞升平之中，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荡然无存。他不理政事，沉湎于声色，疏远忠良，重用奸臣，不惜民力，毫无节制地挥霍浪费。促使各种矛盾激化，引发了潜在的社会危机，使一场标志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祸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杨西云）

参考资料：

《新唐书》：《兵志》、《李峤传》、《卢从愿传》
《唐六典·尚书兵部》
《唐会要·节度使条》
《资治通鉴》卷 210、211
《册府元龟·田制》
《旧唐书》：《李憕传》、《高力士传》、《李林甫传》

张九龄罢相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北）人。少聪慧能文，十三岁的时候，曾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对他大为赞赏，预见他必能作一番事业。后弱冠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唐玄宗作太子时，曾召集天下文学之士，亲加策问，张九龄对策高第，升为左拾遗。曾与右拾遗赵冬曦负责吏部选试，人称允平。开元十年（722年）升为司勋员外郎。当时宰相张说十分器重他，称他是“后出词人之冠”。十一年，拜中书舍人，他曾上书玄宗，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多被采纳。及张说罢相，他受牵连改官太常少卿，后出为冀州刺史。张九龄以老母在乡，河北道太远，不便赡养，请求换江南一州，不久改为洪州都督，后转桂州都督，岭南道按察使。开元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二十一年，以中书侍郎为相，次年又升中书令。

张九龄当上宰相后，仍然保持着坦诚正直的作风，一如既往地尽心辅佐玄宗，从不唯唯诺诺，苟合取容。遇事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坚持原则。

开元二十三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立下战功，玄宗为了嘉奖他的功劳，欲授宰相之称。张九龄上谏说：“宰相是代天治理万物的，不是赏功之官，岂可随便授人。”玄宗还想坚持己见，又问：“朕只是给他宰相之名，并不让他行使其职，这样可以吗？”张九龄回答：“不可。国君应牢牢握有‘名’与‘器’，不可

以轻易授人。而且张守珪只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想以宰相之名酬劳，若尽灭奚、突厥后，将以何官赏他呢？”玄宗认为有道理，于是只拜张守珪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二子官，厚加赏赐而已。

在对安禄山的认识上，张九龄也洞若观火。安禄山当时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开元二十四年，他奉张守珪之命征讨奚、契丹，由于轻敌冒进，招致大败。按军法当斩。张守珪惜其骁勇，带到京师听候发落。张九龄批示道：“从前齐景公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若按军令行事，安禄山不宜免死。”玄宗对安禄山有好感，不愿其死，下敕只免其官，随军立功赎罪。张九龄力争道：“安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而且臣感到他有不轨之心，不杀必留下后患。”玄宗听不进去，反说张九龄不要枉害忠良。张九龄无奈，只得重草敕令，释放了安禄山。十九年后安禄山果然起兵反唐，玄宗仓皇奔蜀避难。思及此事，为之流涕，这时九龄已卒，遂遣使至其原籍曲江祭吊。

唐玄宗即位之初，为扭转唐中宗以来朝政弊端，曾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朝政日益走上正轨，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局面。但是长久的歌舞升平冲淡了玄宗的进取之心，从开元后期以来，他开始贪图享受，对政事大不如前用心了。因此张九龄十分担忧，寻找机会进行规谏。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壬子）千秋节，是玄宗生日，群臣纷纷向玄宗进献宝镜。张九龄没有随大流，他认为以镜自照可以见形容，而以人自照可以知吉凶。因此，他总结前代兴废之因与当朝政治之得失，成书五卷，书名为《千秋金镜录》，向玄宗进献。张九龄在书中对玄宗近期的失政以及府兵制破坏后，边将握军权，形成外重内轻之局面等隐患，或提出委婉的规劝，或恳请玄宗早有所备，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玄宗的忠心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尽管玄宗当时也下诏褒美九龄此书，但是从以后玄宗对张九龄的厌恶和其疏懒政事的态度来看，此举不过是

虚以委蛇而已。

玄宗孜孜求治的时候，为了有效地推行政令，提拔任用了一批良相贤臣，并能各用其所长。象姚崇善于灵活变通，宋璟以尚法见长，张嘉贞吏才为人推重，张说以文学进用，李元纮、杜暹则以节俭为天下表率，张九龄和韩休均以刚正直言闻名。这些忠正之臣以自己的才能辅佐朝政，玄宗也从谏如流，君臣齐心合力，减少朝政的失误，成就了文治武功。但是随着玄宗骄侈厌政，他渐渐感到正直之士的忠言谠论变得刺耳难听了，而谀美逢迎之声却句句入耳，于是他用人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疏远冷落忠直之臣，亲近奸佞之辈，所以当李林甫跻身高位，出现在玄宗周围的同时，张九龄被贬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了。

李林甫是宗室子弟，以门荫入仕，不学无术，才能平庸，却善搞权术，诡计多端，溜须拍马，也颇在行。靠着这些资本，平步青云。他见玄宗在位日久，厌烦政事，渐肆奢欲，于是投其所好，阿谀顺旨，事事处处讨玄宗欢喜，使其遂心满意。例如，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玄宗幸东都洛阳，原打算在来年二月二日返回长安，后来因洛阳宫中有“怪”，弄得玄宗惶恐不安，决定马上回去，于是召集宰相，商议西还事宜。张九龄等人考虑到这时正是农忙季节，圣驾启动，必然给沿途州县带来负担，耽误农事，因此建议延至冬季再行。李林甫早已揣测到玄宗的心意，但是他当时并不表态，等张九龄、裴跃卿退下后，他才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东西两宫，陛下往来行幸，还需要选择时间吗！假使妨碍了农收，只要把沿途州县的租税蠲免也就行了。臣请通知有关部门，即日西行。”玄宗很感宽慰高兴，采纳了李林甫的意见。由于李林甫事事顺旨，深得玄宗青睐。

李林甫是在开元二十二年跻身相位的。此前玄宗欲拜他为相时，曾征求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坚决不同意说：“宰相身系国家安危，臣担心李林甫作相后，会成为社稷之患。”从此李林甫对张

九龄怀恨在心。由于张九龄有文学之才，朝廷诏敕文件，多出自他的手笔，因之得到重用。李林甫一时难以搬倒他，所以表面上仍曲意奉事，背后则在玄宗面前恶语中伤，同时百般讨好玄宗，以巩固自己地位。而耿直的张九龄察觉到玄宗变化，遇事无大小皆据理力争，使玄宗十分不快。

玄宗宠幸武惠妃，武惠妃为了让自己儿子寿王瑁作太子，在玄宗面前诋毁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玄宗欲废掉他们，向宰相征求意见。张九龄谏道："陛下即位近三十年间，太子诸王不曾离开深宫，且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贺陛下享国久长，子孙兴旺。今三子皆已成人，未闻有大过失，陛下为何听从无稽之谈，于喜怒之际把他们全废掉呢！太子为天下根本，不可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被骊姬所谗，导致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之诬而罪及太子，使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废黜太子杨勇，立炀帝，最后终失天下。由此可见立太子不可不慎，陛下如果一定要废太子，臣不敢奉诏。"玄宗听了很不高兴。李林甫见武惠妃得宠，早就主动依附攀援，并向惠妃表示愿意帮助立寿王瑁。他老奸巨滑，玄宗征询宰相意见时他不表态，事后让宦官向玄宗传话说："这是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作了实际上的支持。玄宗仍犹豫不决。惠妃想收买张九龄，私下派手下人对他说："有废必有兴，您若肯支持，宰相职位可长保。"张九龄毫不动摇，他将来人叱走，并将此事告诉玄宗，玄宗有所感悟。所以在张九龄罢相前，太子地位没有动摇。但是张九龄的直谏却使玄宗不悦。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先在河西任判官时政绩较为突出，玄宗欲授为尚书。张九龄反对说："唐兴以来，只有前宰相和德高望重的人才授此职。牛仙客本是河湟小吏，若骤升清要官位，这不符朝廷典制。"玄宗说那就给他增加实封户吧。张九龄说："不可。封爵是用来奖励有功的。牛仙客任边将能修缮器械，充实仓库，这

是其职责，够不上功劳。陛下若想奖励其勤勉，赐给他金帛也就行了，实封而让其坐食租赋，恐不应当。”玄宗听后无语。李林甫挑唆说：“牛仙客是宰相之才，怎不可授尚书职衔？九龄一介书生，不识大体。”此话正中玄宗心意，第二天就加牛仙客实封。张九龄仍固执己见，玄宗气得脸色发青，训斥道：“难道事事都由你来决定吗？”张九龄顿首谢罪。口气却不变说：“陛下不嫌臣愚，使臣为相，事有不妥的，臣不敢不尽言啊！”玄宗讥讽道：“你嫌仙客出身寒微，难道你门弟高贵吗？”张九龄回答：“臣本是岭海孤贱之人，不比仙客生于中原；然而臣出入台阁，典掌诰命有年头了。仙客为边隅小吏，目不知书，任以清要，恐不孚众望。”李林甫退后对玄宗说：“若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玄宗见李林甫支持他，遂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玄宗见张九龄事事不遂己心意，不禁心生反感。加上李林甫不断地飞短流长，对九龄由反感转为厌恶。他再也不能容忍这位耿直忠诚的宰相在自己身边多嘴多舌了。于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年底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了玄宗，又贬荆州长史。二十八年九龄病卒。

张九龄被罢去相位后，围绕在玄宗周围的多为奸诈邪佞之徒，朝臣们皆容身保位，没人再敢直言进谏，从此朝政日坏。

（杨西云）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 214

《旧唐书·张九龄传》

《新唐书·张九龄传》

李、杨乱政

李林甫小字哥奴，是宗室子弟，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林甫以门荫入仕，为千牛直长，很得其舅楚国公姜蛟的疼爱。姜蛟往往为他在朝廷延誉。姜蛟的妹妹嫁给侍中源乾曜的侄孙源光乘。一天，源乾曜的儿子源洁对父亲说："李林甫求作司门郎中。"源乾曜回答："郎官应才望高的才能担任。哥奴怎么能作郎官？"虽然如此，李林甫还是凭借姻亲的血缘关系，升为太子谕德和国子司业。

开元十四年（726年），御史中丞宇文融推荐李林甫为御史中丞，二人同列。李林甫又任刑、吏部二侍郎。他为人狡黠，善于投机钻营，熟谙宫内之事和为官之道，用尽心思在自己周围编织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加强在朝中的势力。为了解皇帝的好恶与意图，以便迎合取媚，他广泛结交宫内得宠的宦官和嫔妃，对玄宗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所以奏事时往往称旨，很得玄宗喜欢。当时武惠妃宠倾后宫，李林甫千方百计巴结攀援。武惠妃想立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作太子，与太子李瑛之间产生了矛盾。李林甫认为投靠武惠妃的机会来了，使通过关系要好的宦官把愿意帮助寿王作太子的意思传达给武惠妃。武惠妃正需要外廷士大夫的支持，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便常常在玄宗面前夸奖李林甫，使其得到玄宗的进一步信任。

李林甫与侍中裴光庭之妻武三思之女有私情，裴光庭死后，武氏请求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在皇帝面前为李林甫说情，代替其夫的

职位。高力士养父高延福与武三思交结，力士与三思家族很熟，但由于关系到任相的大事，力士未敢贸然答允。中书令萧嵩举荐右丞韩休为相，得到玄宗同意。正在起草诏书时，高力士将消息透露给武氏，建议李林甫转告韩休。韩休做相后很感激林甫，向上推荐他有任相之才。武惠妃也暗里使劲帮忙。使原就对林甫印象颇好的玄宗动了心，拜李林甫为仅次于宰相的黄门侍郎。

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以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为侍中，中书侍郎平章事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也同时登上相位，拜官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散阶。李林甫位居宰相，大权在握，便开始残害忠良、打击异己、蒙蔽圣听、干政擅权。加深了政治黑暗。

李林甫做相后仍在废立太子问题上坚持己见，以捞取政治资本。唐玄宗作临淄王时，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并得宠遇。丽妃生太子李瑛，德仪生鄂王李瑶，才人生光王李琚。玄宗即位后，独宠年轻貌美的武惠妃，赵丽妃等人爱弛失宠。武惠妃儿子寿王李瑁也沾母光得到父皇垂青。太子李瑛、瑶、琚均因生母失宠而遭冷落，私下里不免有牢骚语。宫廷历来为是非倾轧之地，驸马都尉杨洄欲投靠武惠妃，抓住太子李瑛等人的把柄，不断在武惠妃面前打他们的小报告。武惠妃要立李瑁作太子，太子李瑛是最大的障碍，如今抓住了过失，就向玄宗挑拨泣诉："太子暗地结交党羽要加害妾母子俩，对陛下也有怨言。"玄宗闻听大怒，要废掉太子，于是召集宰相商讨。张九龄出于公心，坚决反对，并表示若废太子，他不奉诏，引得玄宗很不高兴。李林甫老谋深算，当时没有表态，事后私下对宦官说："废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何必要问外人。"但是唐玄宗终因张九龄的反对，未下废太子的决心。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因屡屡直谏被罢相，杨洄再次诬谮太子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阴谋勾结，有谋反的迹象。玄宗又召集宰相讨论。李林甫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臣等应该参议的。"对

玄宗废太子作了实际上的支持。于是，宦官奉命到宫中宣制，废太子瑛、瑶、琚为庶人，薛锈流放瀼州（今四川上思南）。不久，瑛、瑶、琚被赐死于城东驿，薛锈赐死于蓝田，太子舅家赵氏、妃家薛氏，瑶舅家皇甫氏受牵连被流贬的有数十人。瑶、琚皆好学有才干，平白被诬至死，人们都觉得很惋惜。

开元二十六年，太子瑛死后，玄宗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寿王瑁在玄宗诸子中排行十八，又无特殊才华，特别是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死后，玄宗对他不再偏袒。忠王玙年长，且又仁孝恭谨，按理应立为太子。李林甫却屡劝立寿王瑁，他想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巩固权势。最后玄宗在高力士劝说下，改立玙为太子，致使李林甫打算落空。由于太子不是自己所立，为此李林甫围绕太子玙（后改名李亨）兴起了一场涉及范围极广的冤狱。

开元二十七年四月，李林甫拜官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总管文武官铨选之事。李林甫才学浅陋，仅会写字而已，由于他不学无术，闹出了许多笑话，才学之士很看不起他。一次，选人严迥判语中用了"杕杜"二字，杕音第，杕杜出自《诗经》的篇名，林甫既不知其读音，又不明其意，于是问他的副手吏部侍郎韦陟："这个"杖杜"是什么意思？"韦陟被弄得哭笑不得，由于畏惧其权势，只好低头不语。李林甫舅舅姜度妻子生了一个男孩，李林甫亲书题词祝贺："闻有弄麞之庆。"古人谓生男婴为弄璋之喜，璋是玉器，李林甫把璋误作麞，麞即獐，是一种动物，一字之差，意思大迥，贺喜的客人见了不禁掩面暗笑。李林甫援引的官员也多属无学之辈。如户部侍郎萧炅，素不喜学，曾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对中书令张九龄说："省中岂有伏猎侍郎。"萧炅由此被贬官岐州刺史。

玄宗当初要用林甫为相时，曾征求中书令张九龄的意见，遭到张九龄坚决反对，林甫因此十分忌恨张九龄。九龄才华文学出众，朝廷制敕诏书多出自他手，因而受玄宗倚重，使林甫无机会

陷害，表面上还曲意阿从。后来玄宗渐渐厌恶政事，一味追求奢侈享乐，听不进忠直说言了，张九龄仍一如既往直言上谏，触怨了玄宗。于是李林甫一面百般讨好玄宗，一面恶语中伤张九龄，终于促使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将张九龄罢相。张九龄忠心辅佐却被贬官，使朝廷正直之士深感寒心。李林甫为了彻底蒙蔽皇帝视听，自专大权，把谏官召来训斥道："现在有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呢，哪里用得着多嘴多舌。你们不见仪仗队的马吗，平日吃得是上好的饲料，但是一旦叫唤嘶鸣，立即就被废弃，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谏官们听了这话均感不寒而栗。补阙杜琎曾上书言事，李林甫为了杀一儆百，第二天就把他贬为下邽令。从此朝臣禁若寒蝉，人人容身保位而已，不敢再进直言，使朝廷风气为之一变。

李林甫阴险诡诈，很难看透他的真实内心。常常表面对人甜言蜜语，阿谀奉承，暗地里则栽赃诬谄，欲置人死地而后快。因此当时人说他口有蜜而腹有剑。他要加罪的人，即使是老谋深算的也难逃出他的手掌。他迫害忠良，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功名为皇帝所重视的臣僚，他始则交结亲近，一旦感到对方权力有超过自己的危险，继而千方百计陷害。由于他本人才疏学浅，因此特别忌恨文学之士，常常不择手段地倾轧排挤。

一次，宫廷乐工在勤政楼下奏乐，玄宗垂帘欣赏。兵部侍郎卢绚清雅潇洒，他不知玄宗在帘后，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玄宗十分欣赏卢绚的风采。李林甫早用重金收买了玄宗左右，得知玄宗赞叹卢绚，妒心立生。一天他把卢绚儿子叫来说："令尊素负清望，现在交（今越南河内）、广（今广州）一带正缺官员，皇上想派令尊到那儿任官，不知令尊意下如何？若嫌远不赴任，令尊必会贬官。不过有一个办法，可请求去东都洛阳任太子宾客、詹事之职。"交、广地处偏僻，人们视为畏途；宾客、詹事是清闲无实的闲职，李林甫意在把卢绚排挤出朝。卢绚果然很紧张，主动要

求到东都赴任。李林甫又害怕众人议论，勉强授卢绚华州刺史，卢绚赴任不久，林甫又诬奏其有病，不理州事，降为詹事、员外同正。

玄宗曾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哪里，这个人还是可用的。"严挺之曾任中书侍郎。与张九龄关系密切，张九龄罢相时受牵连贬为洛州刺史，后改绛州刺史。林甫害怕严挺之再被进用，私下里叫来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说："皇上很看重尊兄，何不上奏有疾，请求回京师就医，也好见圣上一面。"严挺之不知事情经过，便按照李林甫旨意上奏，李林甫拿着严的奏文启禀玄宗："挺之衰老得风疾，为使其安心养病，只宜授给散秩。"玄宗很感惋惜，只好授严挺之为詹事。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澣也因是朝廷宿望，被林甫排挤为少詹事，员外同正。当时公卿进用，若不是走李林甫关系上来的，他都想法加罪除去，弄得人人自危。右赞善大夫杨慎矜被升为知御史中丞事，但是他畏惧李林甫而推辞不受，玄宗只好改授谏议大夫。

户部尚书裴宽很得玄宗信任倚重。李林甫害怕他人相，不断寻机排挤。天宝三载（744年）十二月，刑部尚书裴敦复击退台州（今浙江临海）明州（今浙江宁波南）的海贼。立功凯旋，他沾沾自喜，广受请托，大序军功。裴宽密劾敦复，李林甫将消息透露给裴敦复。裴敦复不服气，说裴宽也为自己的故旧亲属向他请托过。李林甫挑唆说："先下手为强，君赶紧抢在前头上奏，不要落在后面被动。"裴敦复便以五百金贿赂杨贵妃之姊，托她向玄宗进奏。初五日（甲午），裴宽坐贬睢阳太守。裴敦复以击寇有功，充岭南五府经略使。但李林甫转而又忌恨裴敦复立功受宠，诬奏其逗留不赴任之罪，贬为淄川太守。

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之妻是李林甫之舅姜皎的女儿，基于这层关系，李林甫提拔韦坚任居要职，以示恩信。两人关系密切。韦坚通漕有功，得到玄宗宠信，他本人也颇自负，有

入相之志。为此而遭到李林甫嫉妒，开始疏远韦坚。九月二十三日（癸未），玄宗根据李林甫的提议，罢去韦坚转运使，官刑部尚书，名为升官，实则夺去了实权。

宗室子弟李适之与林甫同居相位，二人争利结下嫌隙。李林甫利用李适之疏阔马虎的弱点而加以陷害。他告诉李适之："华山有金矿，开采出来足以富国，皇上还不知这事。"李适之觉得这是好事，未加思索就在一次上奏时告诉给玄宗。玄宗询问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却说："臣早知这件事了，但是华山是陛下王气所在，不宜开凿，所以一直不敢向陛下汇报。"玄宗曾立华岳碑，称华山为本命。所以李林甫才在这上作文章。玄宗很高兴，认为李林甫很忠诚，处处维护自己。相比之下，李适之则欠周详细致，从此开始疏远他，并让适之事事要先与李林甫商量好后再禀奏。

为了铲除异己，李林甫搜罗狱吏。萧炅向他推荐了吉温。吉温为人残忍好杀，曾说："若遇到了知己，即使是南山白额虎也不足缚。"宰相李适之领兵部尚书，驸马张垍为侍郎，李林甫欲排挤二人，令手下人揭发兵部铨曹主簿事令史六十余人伪滥之事，交御史审问，因毫无结果，后由吉温接案。吉温将兵部吏员引至厅外，找来两名重囚在厅内严刑拷问，囚徒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吏员素知吉温残酷，又亲闻囚徒号呼，不禁吓得魂飞天外，于是均按照吉温之意自诬服罪。李林甫对此很欣赏。又有杭州人罗希奭，以治狱严苛而闻名，李林甫将他从御史台主簿提升为殿中侍御史。两人感激李林甫知遇之恩，死心塌地投靠他，制造了许多冤狱，无人能逃脱其手，时人称他二人为"罗钳吉网"。

当初，李林甫反对立李亨为太子，为此他常提心太子日后即位会对己不利，因此屡屡寻机动摇太子地位。想法陷害与太子关系亲近的官员。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原为李亨忠王府的属僚，二人关系要好。天宝五载，皇甫惟明击败吐蕃，入朝报捷。他看不惯李林甫专权跋扈的作风，于是在玄宗接

见时婉言建议除去林甫。李林甫得知后，派御史中丞杨慎矜秘密监视皇甫惟明的行动。正月十五日（丁卯），太子出游，与韦坚相见，韦坚又在景龙观道士之屋与皇甫惟明会面。这一切被杨慎矜侦缉并报告给李林甫。李林甫由此诬告韦坚与皇甫惟明合谋欲拥立太子登位，两人被捕下狱。李林甫令党羽杨慎矜、王鉷、吉温共同审讯。玄宗对韦坚和皇甫惟明也有所怀疑，但由于牵涉到太子，不愿彰显其罪，最后，以韦坚干政、皇甫惟明挑拨君臣关系的罪名，将两人分贬为缙云太守、播川太守。玄宗又下制警诫百官。

李适之素与韦坚交好，见韦坚等人被贬，颇不自安，预感自己早晚也要被林甫倾倒，于是干脆提出辞职，后改任太子少保。其子卫尉少卿李霅摆下丰盛的酒宴请客，但是由于大家都畏惧李林甫权势，竟无人敢去赴宴。

李适之罢相后，李林甫推荐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为相。玄宗崇道，陈希烈以讲老、庄得以进用，专用神仙符瑞取媚玄宗，加上他柔顺易制，李林甫才举荐他。陈希烈不过是个摆设，军国要事仍由李林甫一人决断，陈希烈只署名而已。

韦坚被贬后半年多，他的两个弟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韦芝为他鸣冤叫屈，还引太子言为证，实际上等于承认与太子有关。玄宗大怒，吓得太子赶紧上表请求与韦妃离婚，以示不以亲废法。结果韦坚再贬江夏别驾，韦兰、韦芝贬逐岭南。李林甫又投井下石，诬奏韦坚与李适之为朋党。几天后，韦坚长流临封，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此外，太常少卿韦斌贬巴陵太守，嗣薛王李琄贬夷陵别驾，睢阳太守裴宽贬安陆别驾，河南尹李齐物贬竟陵太守。以韦坚余党罪名受牵连贬官的达数十人之多。

但是，李林甫围绕太子兴起的案狱还远没有完结。太子良娣（太子内官）杜氏父亲、赞善大夫杜有邻、姐夫左骁卫兵曹柳勣皆奉事太子。柳勣性情狂疏，喜好功名，广交四方豪杰，与淄川太守

裴敦复、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结为莫逆之交。柳勣与妻族不和，便诬告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皇上。李林甫立即派打手吉温与御史审讯，结果连柳勣也难逃此劫。十二月二十七日（甲戌），杜有邻、柳勣、王曾等人被杖死，陈尸于大理寺。妻辈流放远方，李邕之子嗣虢王巨贬义阳司马，邺郡太守王琚因自称与李邕为耆旧也被李林甫所忌，贬为江华司马。太子被迫将良娣废为庶人。李林甫欲借此机会把政敌置于死地，于是启奏玄宗于次年正月派御史到贬所赐死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又派御史罗希奭先到青州（今山东潍坊）杖死李邕，到淄川（今山东淄博南）杖死裴敦复，又马不停蹄直奔岭南（今广东），所过郡县无不震骇。排马牒（御史所过，沿途郡县要提供驿马，故人未至先有排马牒）到宜春时，李适之惊恐不已，服毒自杀。罗希奭至江华，王琚服药自尽未遂，听说罗希奭已到，又自缢身亡。李适之之子李霅到洛阳奔丧，又遭李林甫诬陷，被杖死在河南府。给事中房琯由于与李适之关系密切，也贬宜春太守。

韦坚已死，李林甫犹不解恨，指使人到漕河沿途罗织韦坚罪名，致使许多无辜船夫遭殃，被关押在牢狱里，打死于大堂上，这场冤狱直到李林甫死后才算了结。

天宝六载，玄宗为广召天下人才，下诏求贤，命通一艺的人都可到京师考试。李林甫自知作恶多端，担心草野之士在对策中揭露他的奸恶，便对玄宗说："举人多为卑贱愚昧之徒，臣担心粗语俚言污浊陛下圣听。"于是他命令郡县长官对举人严加选择考试，合格者送省，由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场。由于层层把关挑剔，竟无一人能及第中选。李林甫厚颜无耻地上表祝贺，称圣上英明，使野无遗贤。

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御边有方，功名日盛，李林甫惟恐他以功名拜相，不断找碴排挤。玄宗命王忠嗣攻打吐蕃石堡城，王忠嗣认为石堡城不易硬攻。将军董延光自告奋勇带兵攻打，却逾

期不克，便诬王忠嗣阻挠军计。玄宗大怒，李林甫趁火打劫，指使济阳别驾魏林诬告王忠嗣曾说过：“我自幼养在宫中，与太子要好，欲拥兵尊奉太子”之语。玄宗将信将疑，命司法部门鞫问。但考虑到太子长年居住深宫难与外人通谋，最后以阻挠军功之名将王忠嗣贬官。

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当初看到李林甫专权霸道，公卿进用，有不出其门者，必以罪名除去，因此他不敢任御史中丞之职。李林甫见他屈从自己淫威，便有意结纳，使其投靠了自己。但由于杨慎矜得到玄宗信任，李林甫又转而嫉恨，推荐王铁为御史中丞，视为心腹。王铁是慎矜表侄，少年时代两人很要好。及王铁升中丞后，慎矜仍如小时那样直呼其名，且谈吐随便，又曾把王母亲微贱之事告诉别人。王铁自恃受李林甫青睐，对杨慎矜日益不满，李林甫见二人产生了隔阂，就唆指王铁诬陷杨慎矜，于是王铁派人上告说，“杨慎矜是隋室子孙（隋炀帝玄孙），与凶徒往来，家里藏有谶书，欲图谋恢复祖业。”唐玄宗闻听大怒，将慎矜下狱，责成刑部、大理与侍御史杨钊（杨国忠）、殿中侍御史卢铉共同审讯。太府少卿张瑄是杨慎矜推荐的官员，卢铉诬告他与慎矜论谶，对他百般拷打用刑，张瑄咬紧牙关终不自诬。李林甫又派吉温到汝州（今河南临汝）逮捕了与慎矜交善的术士敬忠。敬忠与吉温之父有交情，早年常爱抚地把吉温抱在怀里，吉温此次奉命逮他，未置一言，蒙上敬忠头部押回。路上吉温派人劝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服罪，现在只须一份证词，若求生则赶紧招供，不然必死无疑。”敬忠早知逮捕自己的就是吉温，于是说：“七郎，请给一纸。”便按照吉温之意写了供词。天宝六载十一月二十五日（丁酉）杨慎矜与两个哥哥，即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名被赐自尽。敬忠杖一百，张瑄杖六十，流放临封，嗣虢王巨坐与敬忠相识而解官。此案牵连了数十人之多。

李林甫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对玄宗却绞尽脑汁地献媚取宠。

每次奏事，他都贿赂玄宗周围的人，探听皇上旨意，因而上奏无不中玄宗之意。玄宗由于在位时间久了，渐渐怠于政事，开始放纵私欲，对大臣的直谏已听不入耳了，李林甫处处顺从，纵容玄宗姿意行乐，因而深得宠遇。早在天宝三载，玄宗就征询高力士意见说："近来天下太平，朕欲高居无为，把政事委托给林甫，如何？"高力士虽经反对，但并没被玄宗采纳。李林甫不断加官封爵，天宝六载，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坐食三百户租赋，兼领陇右、河西节度。十二月，玄宗命百官在尚书省挑选天下贡物，用车拉到林甫家去。平时也常让宦官给林甫送去各地进贡的珍味佳肴。薛王在城东有一座别墅，林亭幽邃，甲于京师。玄宗特将此赐给林甫。玄宗赐其的珍玩前后不可胜数。

李林甫屡兴冤狱，四方树敌，其子将作监李岫很是为他担心。一天，父子俩漫游后园，李岫指着园中的役夫说："您久握大权，招致怨恨满天下，一旦大祸临头，要作个役夫都不可得了。"李林甫听了闷闷不乐说："势已如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他处处小心提防。其住处机关重重，夹层复壁，如临大敌。还常常换地方睡觉，有时连家人也摸不清他的行踪。每当外出时，为防刺客，都要严密布署一番。由步骑百余名护身保卫，前有金吾卫静街，吏民回避。而他之前的宰相多以德才自处，不滥施淫威，因此内心坦然，外出不过跟数位随从而已，老百姓也不用回避。

李林甫为了专宠固位，杜绝边将入相之途。唐兴以来，朝廷多用一些忠厚名臣作御边将帅。他们任期一般不长，且只领一地。不兼统遥领，功绩显著者往往提升作宰相，象唐初的李靖、李勣（即徐世勣）、刘仁轨和玄宗时的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嵩、李适之等人皆是自边帅入相。有些少数民族将领虽然很有才略，唐廷往往派大臣作元帅进行牵制，不使其独专大将之任。开元期间，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喜好边功，自此边将开始久任遥领。李林甫为了堵死将帅入相的道路，想到少数族将帅文化不高，便于控

制，于是向玄宗进言："文臣作将，胆小怯战，不如用寒族胡人。胡人勇敢善战，寒族则不会拉帮结派，陛下若推诚对待他们，这些人必然为朝廷尽死。"玄宗认为很有道理，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诸道节度使多用少数族将领。安禄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受到玄宗重用，握有精兵的。最后造成强兵武将皆聚集在西北、东北边境上，内地却武备空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为安禄山起兵创造了条件。这一切都是和李林甫专权固位分不开的。

天宝八载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冒杀头之罪揭发李林甫二十余条罪行。不料状未上达，就被李林甫知悉，李林甫命御史将其逮捕，以妖言罪杖杀了他。

李林甫作恶多端，一生以迫害忠良、排斥异己为能事，但是到了晚年，他却遇上了对手杨国忠。

杨国忠，本名钊，山西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南）人，是武则天幸臣张易之的外甥，杨贵妃从祖兄。他从小就不走正道，嗜饮酒赌博，品行不端，杨氏家族对他十分鄙视，在家乡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发愤从军，到蜀郡当屯田兵，以屯优当升，益州长史张宽恶其为人，借故打了他一顿，才授新都尉。

杨国忠早年一直被人歧视，过着潦倒困顿的生活。后来在蜀地结识了富豪鲜于仲通，常得到他的接济和资助。鲜于仲通喜读书，有才智，很受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器重，被提拔为采访支使。有一次，章仇兼琼对鲜于仲通说："我得到皇帝信任，但是在朝内若无内援，必会遭李林甫排挤，近闻杨贵妃新得宠幸。你若能为我到长安与其相结，就无内患了。鲜于仲通考虑到自己是蜀人，未尝游历长安，怕耽误了大事，于是推荐了杨国忠。章仇兼琼见他仪表伟岸，又能言善说，大为高兴，便有意结纳，将杨国忠辟为推官。不久，就让杨国忠到京师进献丝织品。临行前还送给杨国忠一份价值万缗的上等蜀货。杨国忠大喜过望，昼夜兼程赶到长安，一一拜见杨氏诸妹，将部分蜀货赠给她们，并说："这

是章仇公所赠的。”贪财的杨氏姊妹自然很高兴。杨国忠早就与虢国夫人有私情，正值虢国夫人丧夫，杨国忠就住在她家里，又分给她一半蜀货。于是杨氏姊妹不断在玄宗面前称赞章仇兼琼，又推荐杨国忠擅长樗蒱（古代一种游戏，象后代的掷色子），将其引见给玄宗，从此他可随供奉官出人禁中，任职金吾兵曹参军。

杨国忠虽是杨贵妃的疏属，但是凭着这层关系，他能经常在禁中侍宴，专掌樗蒲文簿，计算起来又快又准。玄宗夸奖他精明强干，开玩笑说：“好度支郎。”度支郎中是户部专掌天下赋税收支的官员。杨氏姐妹抓住这句戏言不放，屡屡请求玄宗授杨国忠此职。这时杨国忠又巴结上宠臣王铁，王铁以户部郎中为户口色役使，遂奏请杨国忠为自己属下的判官。杨国忠对唐玄宗则百般讨好献媚。他通过杨氏姐妹探知玄宗好恶，然后竭力逢迎顺从，博得玄宗的欢心。由于他巧妙地利用了杨贵妃及其姐妹得宠的便利条件，加上不失时机的巴结钻营，使他由一个小小的新都尉骤登显位，到天宝七载，杨国忠已任侍御史、度支郎中，并兼领十五余使，成为统治集团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唐玄宗对他也更加宠信器重。

李林甫当初为了搬倒太子，屡起大狱，在长安设置推事院。他看到杨国忠以外戚的身份出入禁中，又受玄宗宠遇，而且此人无大才能，不足为忧，就有意交结，引为党羽。凡是涉及太子的案件，都指使杨国忠奏劾，然后交罗希奭、吉温审讯。杨国忠也愿藉此逞其私志，滥施威权，于是乐此不疲，陷害诛杀了数百家，成为李林甫的帮凶。

杨国忠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为了独专大权，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倾轧与他分宠的官僚，擅作威福的李林甫自然首当其冲。但是杨国忠深知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不便直接下手，于是先对其爪牙开刀。

天宝八载，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坐赃贬官为汝阴太守。次

年，御史大夫宋浑又坐脏巨万，被流放潮阳。这两人素来为李林甫所亲厚，杨国忠暗派人调查其贪污事件，堂而皇之将其贬逐，李林甫干着急而无良策解救。当初依附李林甫的吉温见杨国忠得势，又背叛旧主转而投靠了他。还卑劣地为杨国忠取代李林甫之位献计献策。宰相陈希烈原来对李林甫唯唯喏喏，曲意顺从，这时也开始与林甫为敌。一场倒李的活动在杨国忠指挥下不动声色地进行着。

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铁是李林甫提携的官员，他权宠日盛，兼领二十余使，连李林甫也让他三分。杨国忠视他为自己夺权的障碍，特别是当初他与王铁共为御史中丞，李林甫只将王铁提升为御史大夫，致使杨国忠愤愤不平，更加忌恨李、王二人，遂伺机整治。王铁之弟、户部郎中王銲，凶险不法，暗里与邢縡等人密谋作乱，被人告发。杨国忠趁机禀奏玄宗，说王铁必定也参与了作乱。玄宗认为王铁久受恩宠，不会谋反，李林甫也为其辨解。玄宗决定宽宥王铁之罪，但必须要王铁先奏请罪，然后再行赦免。遂命杨国忠将此意转告王铁。杨国忠心怀鬼胎，只是劝王铁忍痛割爱，上疏请治其弟之罪，并没将玄宗的意图透露给他。王铁不忍治弟之罪，致使玄宗大怒。陈希烈在一旁又极言王铁大逆当诛，玄宗遂下敕让陈希烈与杨国忠亲自审讯。最后王铁被赐自尽，其子王准、王偁流放岭南，旋即被杀，王銲则在朝堂杖死。杨国忠在这场案件中大得实惠，原任王铁的职权一古脑加到他的身上。但杨国忠意犹未尽，他借着负责审问的便利条件，逼着案犯招出李林甫与王铁兄弟交纳勾结的罪状，从而把李林甫牵连了进去。

杨国忠又开始在李献忠叛唐事件上作文章。李献忠原是突厥部落首领，名叫阿布思，受唐廷任命为朔方节度副使。安禄山忌其有才略，强征其兵，迫使他叛归漠北。玄宗大为恼火，李林甫其时正兼领朔方节度使，只得引咎辞职。杨国忠借此弹劾他，还指使陈希烈和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其作证。李林甫挨了杨国忠这

一闷棍，顿时进退两难。玄宗虽没责罚他，但是从此开始疏远冷淡他了。

李林甫对杨国忠又气又恨，天宝十一载十月，由于南诏不断骚扰边境，蜀人不堪其苦，奏请兼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坐镇指挥。李林甫认为这是将杨国忠排挤出朝的时机，趁机奏遣。杨国忠有口难言，临出发前，他一脸委曲地向玄宗泣诉自己遭到李林甫迫害，杨贵妃也在旁边为他求情。玄宗安慰道："卿暂且到蜀区处理军事，朕屈指等卿，回来后即拜卿为相。"杨国忠破涕为笑，放心去四川赴任去了。此时李林甫已染重病，得此消息后忧愤交加，病情加重，请来的巫医说只要见皇帝一面，即可小愈。玄宗本想探视，满足李林甫的要求，可是周围人极力反对。于是玄宗命林甫家人将其抬到庭中，玄宗登上降圣阁遥望，用红巾招之。病入膏肓的李林甫只好请家人代为拜谢。不久，杨国忠即被中使召还，他到李林甫宅第探望，拜在床下，李林甫痛哭流涕对他说："我快要死了，公做相无疑，我把后事拜托给公了。"李林甫命在顷刻，但是杨国忠想起他平时的威权，仍吓得大汗淋漓，连称不敢当。十一月二十四日（丁卯），恶贯满盈的李林甫终于一命呜呼。

杨国忠接任为相，兼吏部尚书，随即对李林甫及其势力进行清洗。天宝十二载正月，杨国忠指使安禄山诬告李林甫私下里与阿布思约为父子，合谋作乱。玄宗半信半疑，派人去查问，李林甫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害怕受牵累，遂出面作证。当时李林甫尚未下葬。二月十一日（癸未）玄宗下制削夺李林甫所有官爵，子孙有官者全部除名，流放岭南与黔中，只准许携带随身所需衣粮，其它财产一律没收。李林甫近亲党羽坐贬者五十余人。他的大棺材被劈开，抉嘴取出含珠，剥掉身上的金紫衣服。改用小棺材，按庶人待遇草草掩埋下葬。李林甫一生以害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可谓罪有应得。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评论玄宗和李林甫时说："玄宗晚年自恃天

下太平，以为无复可忧，遂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李林甫献媚左右，迎合玄宗，来巩固自己受宠地位；杜绝言路、蒙蔽视听，来实行奸恶；妒贤嫉能，排挤异己，来保全自己的地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自皇太子以下，都畏惧其势。他居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玄宗始终不悟。"

杨国忠上台后，承袭了李林甫为相时的许多弊政，使朝政更加黑暗。他志大才疏，强辩浮躁，缺少威仪，却骄横张狂，独断专行。为相时兼任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及租庸、铸钱等使，共达四十余使。即使签署一字，一人之力也难以胜任。于是诸事责成胥吏，胥吏趁机恣意行奸，致使政事弊端百出。杨国忠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处理机务，草率了事。对公卿则颐指气使，台省官有才名而不顺从他的都被排斥，表现出一个暴发户专横霸道习气。很多正直之士不肯与他为伍。例如，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去拜谒杨国忠，说这样立可得到荣华富贵。张彖却说："你们以为倚靠杨国忠如倚泰山，我认为是靠冰山，太阳一出，冰山立刻融化，到时你们还依恃什么。"遂隐居嵩山不仕。

十一载十二月，杨国忠为了收买人心，在铨选上另搞一套，建议吏部选官，不论贤与不肖，年资深的皆可补缺空位和升迁。按这种办法，一些庸人和因各种原因长久滞淹的得以升级，于是大赞杨国忠。

选贤用能，是立国之根本。按唐制，铨选官员十分慎重与严格。兵部、吏部兼宰相之职的负责决策大事，将铨选具体事宜交由属下侍郎处理。经三注三唱，再送门下省复审定夺。铨序过程一

般从春天开始，至夏天结束。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精明干练。把胥吏叫到家里，事先拟好升迁官员名单，然后召集左相陈希烈、给事中、诸司长官到尚书都堂（尚书都省之堂）唱注选人，一天而毕。杨国忠说："今左相、给事中都在座，已过门下省了（左相即侍中，给事中皆门下省官员）。这样门下省与侍郎全被架空，杨国忠自掌铨选大权。如此草率选官，必然造成谬误百出，百官畏其淫威，无一人敢站出来反驳。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拟时，杨国忠又在私宅大集选人，杨氏诸姐妹在旁垂帘观看，不断传来她们的笑语之声。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倚皆衣紫的高品官员，这一天却与本部下属郎官混在一起，被随意支使。杨国忠得意地问诸妹："这两员紫袍'主事'如何?"杨氏诸妹相对大笑。严肃的选官大事被视为儿戏，荒谬至极。他的亲信党羽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竟授意候选人，为杨国忠在省门立一块颂碑，表彰其"铨综之能"。玄宗让鲜于仲通撰写颂词，又亲自改定数字。

杨国忠无时不以权谋私。他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因学业荒疏，没有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权势，先派儿子达奚抚去探杨国忠口气。达奚抚趁杨国忠人朝上马之时，趋至马下。杨国忠料想儿子一定中选，洋洋有喜色。达奚抚说："家父让我转告相公，郎君试卷，不中程式，但也未敢让他落榜。"杨国忠立刻沉下脸来，阴沉地说："我的儿子还愁不能富贵吗？而让鼠辈相卖。"说完策马驰去。达奚抚无奈，给父亲写信说："人家倚权仗势，令人寒心，不可再和这种人论是非曲直。"达奚珣只好作了昧心事，让杨暄及第。后杨暄仕途畅达，官为户部侍郎，主考官达奚珣才从礼部侍郎升为吏部侍郎。杨暄还很不高兴，认为自己不如达奚珣升迁得快。

杨国忠政治上专横霸道，对不依附于他的官员无情打击，毫不留情。政治家李泌志气不凡，颇有独到的政治见解。被太子李

亨视为师友，玄宗让他待诏翰林，留在东宫供奉。杨国忠忌其有才辩，将其贬逐到蕲春郡安置。书法家颜真卿刚正不阿，不巴结逢迎杨国忠，被出为平原太守。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担心他入相，指使人告发他有贪污行为，韦陟被贬官桂岭尉。

天宝十二载，关中地区频年水旱相继，造成饥荒。杨国忠厌恶京兆尹李岘不依附自己，将灾害归咎于他，贬为长沙太守。有时玄宗担心下雨过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找些没受灾的禾苗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然多，并没伤庄稼。"玄宗信以为真。恰好扶风太守房琯上疏报告所管地区灾情，杨国忠立即派御史整治，吓得地方官再也不敢报告灾情。老天久雨不停，玄宗对高力士说："淫雨不止，卿可据实尽言。"高力士坦言："自从陛下把大权交给杨宰相以来，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开口。"玄宗听了也只能默然而已。

在杨国忠鼓动下，唐廷曾两次发动对南诏的大规模战争。第一次在天宝十载初，由于云南地方官欺凌南诏，迫使南诏王阁罗凤发兵反唐，攻陷云南，杀死太守张虔陀。杨国忠推荐亲信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派其率兵打南诏，欲藉此树立军功，和培植自己的军事实力。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分两路进击，阁罗凤见大军压境，即派使者谈和谢罪，表示愿意送交俘虏，修复云南城，并说若不准和，即归顺吐蕃，脱离唐廷。本来阁罗凤反唐出于无奈，谈和确有诚意。可是鲜于仲通既不懂军事，又不识大体，扣留使者拒绝和谈，进军西洱河，与南诏军队大战一场，结果一败涂地，丧兵六万，南诏也归顺吐蕃，与唐交恶。杨国忠百般隐瞒败情，还为鲜于仲通请功。接着又鼓动玄宗下制，在两京和黄河南北大规模募兵征讨南诏，人们听说云南为瘴疠之地，往往未战就染病而死，因此没有愿意应募的。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强征，不从者连枷送到军所。旧制，打仗立功授勋的百姓可免除征役，但由于征

兵太多，杨国忠奏先取高勋，结果造成民怨沸腾。父母妻子相送征人，哭声振野。诗人杜甫《兵车行》诗句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是控诉杨国忠强征民为兵的罪行的。

天宝十三载，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带兵七万攻南诏，阁罗凤诱敌深入，坚壁不战。唐兵断绝了粮饷，士兵患病和饿死者大半。不得已只好撤兵，又遭南诏兵追击，李宓被擒，唐兵几乎全军覆没。杨国忠再次掩盖败状，反以捷书上奏。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发兵，前后丧师二十万，天下百姓大受其害，却无人敢申诉。但是杨国忠毕竟不能一手遮天，唐兵惨败的消息不径而走。高力士就曾劝玄宗说："臣听说云南屡屡丧师，边将也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控制？臣担心一旦祸起，将不可收拾。望陛下仔细思量。"玄宗心有所动，可惜他由于长久荒怠政事，纵容奸臣，已无力控制风雨飘摇的政局了。

杨国忠祸国殃民，在生活上也极尽荒淫奢侈。他深知自己出身寒微，又无真才实学，完全靠着杨贵妃的关系才得以平步青云。所以即使爬得再高也不会留下什么好名声，不如及时行乐。他利用职权大肆聚敛受贿，财货山积，光缣（一种细绢）就达三千万匹。他在虢国夫人宅第旁建房，豪华无比。与虢国夫人昼夜宴饮，有时二人坐车并辔入朝，一路上戏谑调情，旁若无人。每到秋季十月，玄宗驾幸华清宫时，杨国忠都和贵妃姐妹陪同前往，其车马仆从如云、锦绣珠玉鲜艳夺目。

杨国忠权势显赫，得宠一时。他看到安禄山重兵在握，又深得唐玄宗宠遇，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于是屡屡向玄宗告发安禄山必反。二人争宠不和，矛盾日益尖锐，终于促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提前发动了叛乱。杨国忠由于作恶多端，招致天下怨恨，以致在天宝十五载发生的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西）事变中被愤

怒的禁军将士杀死。

总之李林甫、杨国忠执政二十余年，加深了政治的黑暗，激化了社会矛盾，是造成唐朝腐败政局的重要因素。

（杨西云）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214—217
《新唐书》：《李林甫传》、《杨国忠传》
《旧唐书》：《李林甫传》《杨国忠传》

李白笑傲权贵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流放西域，李白即出生于中亚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因李白初生之时，其母梦见长庚星，故命其字太白，因遁还四川后居彰明县清廉乡，故后自号青莲居士。十岁时即精通诗书，十五岁时隐居岷山学道，又游峨眉、青城诸名山，学习剑术。为人任侠，轻财重施，传说他曾经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朝廷下诏令各州以有道举人，李白不应。当时苏颋为益州长史，见过李白后赞叹不已，说："这个少年天才奇特，若再稍微增长些学识，可比司马相如。"

李白才气超人，志气宏放，既有飘然超世之心，又有"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远大政治抱负。开元十四年（726 年），李白二十六岁，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走出四川，开始漫游各地，希望通过交游，登上卿相高位，实现其"安黎元"、"济苍生"的大志。但是李白为人生性天真，自命不凡，全不解官场之奥妙与仕途之险恶，终于在历经坎坷后，结束了他的政治梦。但李白蔑视帝王权贵的傲骨高风，与他的诗名同样流芳万世。

李白出蜀后，几乎游历了半个中国。这期间，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结识了郭子仪；客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徂徕山竹溪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为友，酣歌纵酒，时号为竹溪六逸；客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时，认识了道士吴筠，结

为好友。后来吴筠被崇奉道教的唐玄宗李隆基召入京师，吴筠向唐玄宗推荐李白，于是在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征李白赴长安（今陕西西安）。李白高兴异常，以为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终于到来，做诗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至长安后，先带着诗文去拜见当时诗名很大的贺知章，贺知章一览叹为天上谪仙人，也向唐玄宗推荐李白，使李白在长安声名大振。几天后，唐玄宗在金銮殿召见李白。李白在唐玄宗面前纵论天下时事，并奏上颂一篇。唐玄宗则向李白赐食，亲为调羹，并任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并未因走上仕途且供奉翰林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降低自己的人格去逢合官场上的尊卑之序，向权贵献媚，依然我行我素，每日与酒友在酒肆纵饮。一天，唐玄宗坐在沉香亭内，意有所感，谱成一曲，欲造一首乐府新词与之配合，下令立召李白入宫。这时李白已醉卧酒肆，被人架至宫内，唐玄宗命人用冷水泼面将其激醒。李白醒后，援笔作文，传说由杨贵妃为之捧砚，顷刻之间完成十余章，文词婉丽精切，唐玄宗大为高兴。

由于李白才气非凡，深得唐玄宗喜爱，经常参加宫中宴会。有一次李白醉卧殿上，命大宦官高力士为自己脱靴。高力士素得宠幸，权倾内外，贵不可言，以为遭受莫大耻辱，遂将李白所做蔑视权贵的诗送给杨贵妃看，以激怒杨贵妃。于是高、杨二人经常在唐玄宗面前诋毁李白，唐玄宗想给李白一个正式官职，也被杨贵妃阻止了。

李白自知不为权贵所容，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与现实政治的黑暗，政治理想开始破灭。于是更加狂放，与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人纵酒为乐，时称"酒中八仙"。李白的许多诗句记述了这一时期的生活与思想，如"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不屈己，不干

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上书唐玄宗恳求还山。唐玄宗虽然爱惜他的文才，但对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也有些不满和惧怕，加之权贵的谗毁，唐玄宗同意了李白的请求，赐金放还。

李白的傲骨还表现在他对封建秩序及传统偶象的蔑视，如他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诗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嘲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向孔孟礼教提出挑战。而“尧幽囚，舜野死”的诗句，则是对尧舜禅让的儒家说法的否定。

天宝三载（744 年），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足迹遍于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一时期，李白的生活非常窘困，他做诗形容说：“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

天宝十四载（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北方全部沦为战场。李白隐居于庐山。第二年，永王李璘起兵，欲乘乱争夺政权，对外则以抗敌平乱为号召。李璘率兵东下路过庐山时，派人请李白参加幕府。这再一次唤起李白的政治热情，遂下山至宣州（今安徽宣城）谒见李璘，被李璘辟为从事。不久李璘兵败，李白也被捕下狱，本当处以死刑，此时旧友郭子仪已成为朝廷统领三军的大将，上书请求解除自身官职，以赎李白之罪，加之唐肃宗对杀死李白这样的大名士也顾虑重重，于是下诏免除李白死罪，改判长流夜郎。当西行至巫山，遇朝廷大赦，获得自由东还，往来于宣城（今安徽宣城）、历阳（今安徽和县）之间。上元二年（761年），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此时李白已六十一岁，不顾年老多病，由当涂（今安徽当涂）北上，准备从军杀敌，但中途因病折回，投靠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唐代宗即位以后，征召李白入京

为左拾遗，然诏书送达当涂，李白已在不久前病逝。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将浪漫主义文学推至登峰造极的境地，其最大特色，在于创造了艺术的鲜明形象。如《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搏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行路难》："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筋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蜀道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通人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诗句气势非凡，想象丰富。

李白作品的另一特色是很少雕饰，李白的两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是他的诗境。象"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诗句极其自然。另外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目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句情深意切，自然流畅。

李白的诗天才横溢，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气魄豪迈，瑰丽清新，有神韵，有意境，色彩鲜美，音律和谐，诗情浓郁，使他登上了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盛唐时期另一伟大诗人杜甫评价李白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形容得十分贴切。总之，李白的诗开拓了唐诗的新境界，是盛唐社会面貌的反映。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分别被后人称为“诗仙”和“诗圣”，两人关系极好，具有深厚友谊。但由于二人分别是浪漫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风格不同，因此引起历史上对二人诗歌的不同评价。对李杜诗歌的评价始于元稹，抬高杜甫，压低李白。进入宋朝以后，赞成杜甫的多些，所以在历史上杜甫的影响较大于李白。一般来讲，注重现实的人赞成杜甫，注重灵感的、从艺术角度出发的赞成李白，因为李白的诗有些脱离现实。对李杜二人，总的来讲，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人是齐名的。若一定要分个高下，应该说李白高于杜甫。杜甫的高比较正常，李白的高则有些奇特，这就是诗圣与诗仙的不同之处。杜甫是诗圣，是圣人，李白是诗仙，是神仙，神仙自然要高于圣人。但是圣人对社会现实有用，而神仙则游离于现实，对社会作用不大。这应该说是李白与杜甫二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区别。

（李燕捷）

参考资料：

《两唐书》：《李白传》

《李太白集》

杜甫忧国忧民

杜甫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世多称少陵，祖籍襄阳。先天元年（712 年）生于洛州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曾注解过《左传》。祖父杜审言在武则天时期居官膳部员外郎，是著名诗人。杜甫颇引以为荣，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父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杜甫的家庭享有免赋役的特权，因此他从小过着较为优裕的生活，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受家庭熏陶，他自幼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少年时即被人们以汉朝文学家杨雄和班固相比。他曾与玄宗之弟岐王李范等贵族官僚结交来往，看过名伎公孙大娘的舞蹈，听过当时著名乐工李龟年的歌唱。二十岁时，又开始十余年无忧无虑的壮游，南下吴越（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上齐赵（今山东、河北南部、山西等地），并结交了一批诗人名士，特别是高适、李白、苏源明、李邕等人，和李白结下深厚的友谊。无拘束地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杜甫感到十分快意，他了解到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熟悉了人民生活和社会情况，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胸襟，这对他诗歌创作有很大帮助。他早期诗歌充满豪迈的气概与浪漫主义色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政治上，他也少年气盛，以为凭着自己横溢的才华，功名垂手可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杜甫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那时他已经自许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怀抱着“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希望将其所学施展于治国。不幸落选，但杜甫仍不坠希望。天宝五载（746年），他来到长安，次年，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的士人到京就选。杜甫再次应试，却再次落选。原因是宰相李林甫害怕士人在对策中揭露其奸恶，便以“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为借口，下令郡县先从严挑选，再由尚书省长官复试，将定夺大权归于自己，层层设卡。结果应试者无一及第，李林甫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次落第对杜甫打击很大，很长时间里他心情沉重。痛定思痛，他在诗中写道：“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对自己成为龌龊政治牺牲品感到十分愤慨。考试的失败，迫使他另寻途径，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得到汲引。天宝十载（751年），杜甫作《三大礼赋》，献给玄宗，得到赞许，命待制集贤院。后又进《封西岳赋》和《周泉赋》，直到天宝十四载，才被任为河西县尉，杜甫没有赴任，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个掌管兵甲器仗及门禁锁钥的小官职。这时他已年届四十四岁。

杜甫滞居长安的十年里，多数时间都是在客舍里度过的，最后他把妻子接来，寓居于少陵以西（今西安城南）的地方，以“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为生，他不仅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而且生活陷入屈辱与困窘的境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以至经常忍饥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顿。使 他对底层劳苦大众的苦难有了较多的体察，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期，开元盛世也接近尾声，繁盛外表掩盖下的各种危机已经在政治上显露出来。首先是最高统治集团已失去了往日励精图治的精神。玄宗日益骄奢淫逸，荒怠政事，骨鲠之臣被排挤出朝，奸邪之徒得到宠任，朝政日益黑暗腐败；玄宗又好大喜功，对边疆滥施武力，大量征调人民戍边，使生产遭到

严重破坏，人民饱受离别之苦，具有政治责任感与敏锐观察力的杜甫对此忧心忡忡，他痛恨统治阶级的罪恶，对人民大众的深重苦难则充满了同情，生活的磨难使杜甫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个人的怀才不遇注人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用诗鞭挞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为人民的疾苦大声呼吁。在此十年，他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他的诗被公认为是“诗史。”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黄河南北的人民深受战乱之苦。杜甫和人民一道，饱尝了国亡家破的痛苦，逃难、陷贼、历尽艰辛。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了肃宗政权，“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这时被任为左拾遗，皇帝身边从八品的谏诤之官。他尽心竭诚，知无不言。不料头一个月，因为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几乎问罪，从此他仕途坎坷，被放还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旋即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他来往于战事激烈的两京地区，耳闻目睹了战争把城市乡村毁为废墟，使千百万人生灵涂炭的惨景。他痛斥叛军的罪行，坚决站在平叛的立场上，鼓励人们奋勇杀敌，早日平定战乱。在战争中杜甫自身也饱受忧患，这使他的心与人民连得更紧了。由于深人生活，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凝聚着高度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

乾元二年（759年）关中大饥，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于是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晚年漂泊西南的生活。中间虽曾一度人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幕府，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仅半年时间就辞退了。从此开始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由于有严武、高适等友人的资助，生活不至困顿，还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有水槛、药栏、竹林的草堂，得以安度晚年，但杜甫的心境却一天没有平静过。他哀叹个人坎坷潦倒的一生，又时时挂念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感

时伤世，缅怀往事，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象《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岁宴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杜甫在湖北、湖南漂 泊两三年后，于大历五年（770年）病卒于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

杜甫一生空抱“致君尧舜”的理想，可惜未能如愿以偿。他的后半生充满了不幸。但是不管他个人多么困顿潦倒，饱经忧患，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与人民的疾苦，身在江海，心存宫阙。他的忧伤和欢乐，无--不和时代息息相通。杜甫一生创作了大量诗篇，仅流传下来的就多达一千四百多首，不论是叙事还是抒情诗，都是伤时忧国，缘事而发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生活的艰辛坎坷，缩短了他与劳动人民的距离，使其思想感情与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杜甫时刻把民众的冷暖挂在心上，他用诗赞扬人民的质朴可爱，反映人民的疾苦，对繁重赋役和战乱给人民造成苦难境遇则寄于深切的同情。“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赴奉先咏怀》）是人民的血汗养活了达官贵族，而统治者却毫不体恤民生，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逼得人民要卖儿卖女，以交赋税：“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达了杜甫对那个不合理社会的愤慨之情。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则通过新婚的丈夫、年龄早已过了兵役限“子孙阵尽亡”的老翁、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和根本不该服役的老妇等人被强征服役打仗的几个悲惨事例，集中反映了战乱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生弄到无家可别，当老百姓的还能活下去吗？忿懑的诘问，有力控诉了统治集团急于征兵敛税造成民情愤怒的罪行。杜甫优民之深，达到忘我的境界，当他自己还住

在不避寒雨的茅屋中时，他首先想到的仍是人民的冷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宁愿自己冻死，来换取天下穷苦人民的温暖，这是多么高尚忘我的情怀。

杜甫的诗中还倾注了他炽热的爱国情操。"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个人坎坷多难的经历，并没磨灭他兼善天下的胸襟，他始终执着地关注国家的安危。当安史之乱爆发，国家处于存亡绝续之时，他心痛如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一旦初平战乱，他又高兴地涕泗交流："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悲一喜，杜甫赤诚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暴虐，杜甫则发出愤怒的谴责与无情的讥讽："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兵车行》）《丽人行》则以白描手法揭露了新权贵杨国忠兄妹奢靡专横的嘴脸。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出发点旨在维护国家社稷的利益。总之，杜甫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这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杨西云）

参考资料：

《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安史乱起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少数族人。本无姓氏，小名轧荦山，轧荦山是突厥崇拜的战神象征。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巫师，以占卜为业。据说是母亲在轧荦山祭神时生下他的。后来母亲带着他改嫁突厥人安延偃。开元初，突厥部落破散，安延偃带着他与兄长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出来，故改姓名安禄山。

安禄山长大后，奸诈残忍，诡计多端，特别擅长揣测别人心理。东北一带本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安禄山懂得六种少数民族语言，做互市牙郎，即贸易买卖的中介人。安禄山有个同邻好友叫史思明的，二人前后一天生，即安禄山除夕之日生，史思明正月初一生。他俩一起长大，非常要好，同作互市牙郎，都擅长打仗，以骁勇闻名。

开元二十年（732 年），唐将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发现安禄山偷盗羊群，欲乱棒打死。安禄山临刑前大呼道："大夫不是要灭奚、契丹两蕃吗？为何要杀壮士。"张守珪听他出语豪壮，动了恻隐之心，便释放了他，留在军中效力驱使，遂与史思明同为捉生将。安禄山熟悉山川地势，对契丹内部情况也了如指掌，打起仗来异常勇猛，常常带着三五骑兵生擒契丹数十人。几乎每战皆捷，得到张守珪的器重，提升他为偏将。守珪素有军威，常嫌禄山体胖臃肿，禄山为此而不敢饱食，从而更得张守珪欣赏，将他纳为养子。因屡屡作战有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史思明也是奸诈无赖之徒。他原名史窣干。曾因欠下官债而

逃到奚族部落中。为奚人巡逻兵所获，正要杀他。他诈称："我是唐朝的和亲使，你们要杀我不难，但是得罪了大唐，灾祸要降临到你们头上。"奚族士兵果然信了他的话。带他去见奚王。他神情倨傲，见奚王长揖不拜，奚王虽然恼怒，但畏于唐室而不敢发作，待如上宾。欲派百余人随他入朝觐见皇帝，史思明却说："大王所派的人很多，但观察他们的才能，皆不足以见天子，听说大王有一个叫琐高的良将，何不让此人入朝？"奚王遂命琐高带三百壮士随同前往。史思明早已派人通报平卢军使裴休子，说奚将琐高带着精锐前来，声言入朝，实则要偷袭我军，宜赶紧作好准备，先下手为强。琐高等人被诱至平卢（今辽宁朝阳），裴休子领兵将他们全部坑杀，押琐高至幽州（今北京）邀功。守珪不辨真伪，认为史思明有功，为其奏请果毅，累迁将军。后来他上朝奏事，因能言善说，使玄宗很高兴，赐名思明。

开元二十一年，张守珪派安禄山入朝奏事，中书令张九龄见他心术不正，对侍中裴光庭说："以后乱幽州的，必定是这胡人。"

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安禄山奉张守珪之命讨击奚、契丹。他恃勇轻进，结果吃了败仗。张守珪将其押送京师请求批示。张九龄批道："从前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若按军法行事，禄山不宜免死。"玄宗却怜惜他有将才，不忍杀他，竟下了赦免令。张九龄据理力争说："安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而且臣观察他的相貌有谋逆的迹象。今日不杀了他，必会留下后患。"玄宗听不进去，反而指责九龄枉害忠良。九龄无奈，只得重拟《赐守珪敕》云："禄山勇而不谋，贸然轻进，遂至兵败，挫我军威，按军令当加重罪。然念及尚能与敌勇斗，如今敌寇未灭，军令有所通变，所以不因一败杀之，而观其后效。"安禄山被免于一死，准许以白衣自效，立功赎罪。

安禄山由于兵败被罢去官职，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他以后的升迁腾达。开元二十八年，白衣自效的安禄山即被任为平卢

军兵马使、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并兼两蕃（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朝廷将平卢军镇升级，设节度使，安禄山被任命为第一任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之所以官运亨通，一来朝廷用他的勇猛扼守东北边疆，二来也因为他私下的钻营取巧。凡是朝廷派到平卢的使者，都被他一一贿赂收买过来。这些人回到朝廷，不断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为他延誉，使玄宗对他印象很好。御史中丞张利贞作河北采访使，到平卢巡视，安禄山百般奉承，卑膝献媚，讨得张利贞的欢心，左右随员也都被他贿赂。利贞回京，大赞安禄山之美，随员们也竞相吹捧，安禄山成为人人说好的一员蕃将。玄宗听了自然十分高兴，因此不断以官爵加以笼络。

安禄山重贿朝廷重臣，他入朝时更是竭力取悦玄宗。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奏事，谎称："去年七月，营州有紫方虫吃禾苗，臣焚香祷告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甘愿让虫食臣心，若不欺正道，竭诚事主，但愿虫赶紧散去。当即就有一群鸟从北面飞来，将食苗虫一扫而空，请陛下宣付史官记下。"玄宗听从了。为嘉奖他的忠诚，特加骠骑大将军，不分时间召见他，宠待甚厚。转年加安禄山范阳长史、充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原任平卢节度使如故。三月，禄山入朝奏事离京，玄宗让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到鸿胪寺为他饯行，这种对武臣的礼遇是历来少有的。

安禄山为邀功取宠，常常无故搔扰奚、契丹，致使奚与契丹杀了静乐公主、宜芳公主，与唐廷交恶。安禄山再出兵征讨。天宝四载，又上奏："臣昨天讨伐契丹，驻军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勣、李靖向臣求食，于是立庙祭享。祭奠的时候，突见庙室梁上长出灵芝草来，一本十茎，形状如同珊瑚盘叠。有名将神祇的护佑，定能消灭东夷。请付史馆记下，以彰显幽赞之功。"这本是荒诞不经的鬼话，玄宗却又一次欣然领受。

天宝六载，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又兼御史大夫，两妻康氏、段氏并封国夫人。安禄山外若痴直憨厚，实则狡黠奸诈。他把部将刘骆谷安插在京师探听朝廷动静，稍有风吹草动，安禄山就早已作好了安排，有时由刘骆谷代他上奏章文表。禄山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大量的俘虏、杂畜、珍玩等物，沿途郡县为此而疲于奔命。唐玄宗年事已高，见禄山对自己如此效忠，心中甚感欣慰。禄山揣摸到玄宗的心理活动，常常不失时机在玄宗面前表现一番，以博得皇帝欢心。曾上奏说："臣不过是一介蕃戎贱臣，受了皇上太多的荣宠，臣没有特殊的才华为陛下所用，但愿此身为陛下而死。"玄宗听后不语，内心却大为感动，十分爱怜他这份忠诚，遂让他见太子李亨。安禄山早已熟知宫廷礼仪，却假作无知，对太子拱立不拜，左右使臣问他原因，他说："臣是胡人，不懂得朝廷礼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指点他："这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就由他来代朕做你们的君王。"禄山这才说："臣很愚蠢，以前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储君，臣当死。"然后下拜。安禄山这番做作的"纯诚"，却使玄宗大为满意。又让安禄山拜见杨贵妃。安禄山请求做这位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贵妃娘娘的养儿。每次被召见，都先拜贵妃，玄宗问他为何，他说，胡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大悦。

安禄山与玄宗应对机灵敏捷，还不时加以诙谐幽默，这既讨了皇帝的欢心，又表现了自己愚忠可爱。他身材肥胖，肚子异常突出。据说腹垂过膝，自秤有三百五十斤。抬腿起步的时候，要由侍从扶着他的身子，才能移步。所乘的坐骑，均是优等的良骥，要先试驮五石重的土袋，能驮起奔跑的，才能被选中，平时喂以精饲料。即使这样，安禄山每次赴京师朝拜，途中仍要换马，不然再壮的马也要被累死。因肚子太大，马鞍前要特置一小鞍，专门用来放肚子。一次，玄宗召见他，指着他腹部开玩笑问："你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大？"他回答："除了一颗赤心外，

别无他物。”玄宗大喜，认为难得有安禄山这番忠心。安禄山虽然肥胖，但动作灵敏，毫无笨拙之态，为取悦皇帝，曾为玄宗跳“胡旋舞”，体态灵活，旋转如飞。

朝廷中不少重臣都在玄宗面前美言安禄山，礼部尚书席建侯做河北黜陟使时，称赞禄山公直。户部尚书裴宽和宰相李林甫也经常顺玄宗心意夸奖他，这三人都深得玄宗信任，由此安禄山宠遇更加稳固。

起初，安禄山恃宠傲慢，不把臣僚放在眼里，初见李林甫时，也不自觉流露怠慢之意。李林甫表面不动声色。一次，他在召见安禄山同时，又叫来御史大夫王铁，王铁极有权势且受皇帝宠信。他对林甫卑躬趋拜，毕恭毕敬，态度极为谦卑谨慎。安禄山立刻明白了自己对李林甫的失礼，不觉惶恐起来，特别是李林甫与他谈话时，总是一语道破自己内心的秘密，这使安禄山更为吃惊，把李林甫奉若神明，感到此人比自己更谲诈三分。从此再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每次见李林甫时礼数极为周到，即使是隆冬季节，也常常紧张的大汗淋漓，湿透内衣。刘骆谷每次从京师回来奏事，他总是先问：“十郎（李林甫）说什么了?”有好言则很高兴，若传林甫语：“安大夫要检点检点了。”安禄山就会紧张的反手拉床呼道：“哎哟，我要死了。”当时乐工李龟年将安禄山此态模仿得惟妙惟肖，引得唐玄宗开怀大笑。李林甫为了杜绝汉将入相之路，建议用胡人为将。对安禄山也是恩威并施，牢牢控制住他。一次两人在政事堂谈话，李林甫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安禄山披上，使其受宠若惊，对李林甫又畏又敬。

安禄山荣宠一时。天宝七载六月，赐给他铁券，坐食三百户租税，封柳城郡开国公。九载五月，赐爵东平郡王，这是唐廷第一次为将领封王。八月，又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唐玄宗在兴庆宫勤政楼宴请公卿大臣，文武百官都坐在楼下，却特意在御座东间为安禄山设置一个坐榻席，前面放一面金鸡屏障。还命卷起垂

帘以示荣宠。太子李亨进谏说："自古正殿就没有让臣子进坐之礼，陛下对他恩宠太过分了，必定会助长他的骄纵。玄宗却托词说："朕看此胡人形象怪异，欲用他来威慑臣下。"玄宗又让贵妃的哥哥杨铦、杨锜和姐姐秦、韩、虢国夫人与他拜为兄妹，准许其随便出入禁中。

安禄山常常诱骗奚、契丹人赴宴，席间让他们喝用莨菪子浸泡过的毒酒，待人醉倒后就把他们全部活埋。然后把首领的头割下来，装进盒子里带到京师邀功请赏，手段极为残忍卑劣。天宝九载十月，安禄山奏请入朝，玄宗令有关部门先在王公贵戚私宅聚居地昭应为他建宅。安禄山行至戏水，杨国忠兄弟姐妹皆去迎接，玄宗则到望春宫等他。十六日（辛未），安禄山献俘虏八千人，玄宗命吏部铨选部门将安禄山政绩定为"上考"，这是对官员政绩考核的最高一级。

安禄山在长安道政坊有所旧宅，玄宗认为简陋，下令出国库钱为他在亲仁坊选宽敞之地重建新宅。并且告诫督造部门尽量穷极华丽，不要计较财物。所以新府第富丽堂皇，宛如天造。玄宗又赐给他大量金银器物，甚至连厨房用的器具都是用金银制作的。其豪侈程度超过了皇宫。玄宗不断派宦官为督使替安禄山建宅造屋，赏赐财物，并常常嘱咐道："胡人眼光高，不要让他笑话朕。"

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乔迁新居，举行酒宴，奏请玄宗降墨敕，邀宰相赴宴庆贺。这日，玄宗已安排了击球，遂为之停止，令宰相赴宴。安禄山生日时，玄宗与杨贵妃赐其大量衣服、珍玩宝器，连盛放山珍海味的器具都是用金银制作的，也一起送给他。前后所赐的物品不可胜数。三天后，安禄山被召进宫中，杨贵妃用锦绣为襁褓，裹住安禄山，让宫女用彩舆抬着嬉闹。欢呼声传到宫外。玄宗派人去问，回答说贵妃为禄山三日洗儿，所以欢笑。玄宗也凑趣看热闹，又赐洗儿金银钱物，极欢才散。从此宫中皆称禄山为禄儿，禄山可随便出入禁中，还常与贵妃对饮，甚至通宵

不出，颇有丑声传到宫外，玄宗并不忌讳。

玄宗每吃到一种珍味，或是皇家后苑捕获了珍禽，即令赐给安禄山一份。为安禄山送物的宦官相望于道。安禄山与杨贵妃兄弟们游玩赌博，玄宗命梨园子弟奏乐助兴。玄宗每秋去骊山华清宫避寒，都把安禄山带在身边，以示荣宠。并赐给大量衣服、马匹、珍宝。禄山偶有小病，即让他在宫中调养，命御医精心侍奉。又把安禄山儿子安庆绪及女婿李献诚、养儿王守忠、安忠臣等召到京师，并赐衣服、玉腰带、锦彩，在宫内供食。禄山母亲、祖母皆赐国夫人，其子庆宗、庆绪、庆恩、庆和、庆余等人均由玄宗赐名，庆宗官卫尉少卿，又加秘书少监，娶荣义郡主之后，改太仆卿，庆绪为鸿胪少卿兼广阳郡太守，庆长为秘书监。

安禄山在唐玄宗宠信下，权势日增，羽翼渐丰。他看到玄宗年龄已高，不愿再理政事，朝政纪纲日益败坏；而且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度也难以维持，大量精兵猛将聚集于西北、东北边疆一带，致使内地中原武备废弛，形成外重内轻之势。于是滋生觊觎之心，欲寻机叛乱篡权。安禄山长期在暗中招兵买马，为起兵叛乱作准备。早在天宝六载，安禄山就借口御寇，在范阳修筑雄武城，大贮兵器。二载，又奏请兼河东节度使，玄宗爽快应允。此时的安禄山已身兼三道节度使，重兵在握。户部郎中吉温先前依附宰相李林甫，这时见安禄山恩宠莫比，遂又投靠了他，两人拜为兄弟。吉温劝安禄山说："李林甫丞相虽然待兄不薄，但是他必不肯用您为相。我虽蒙他驱使，终不能得到高升。兄若向皇上推荐我，我也上奏兄堪当大任，咱们共同排挤李林甫，做宰相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此话正中安禄山心意，两人一拍即合，勾结在一起。安禄山屡屡向玄宗推荐吉温有才能，又奏请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另一亲信大理司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安禄山垄断了三镇的刑赏、财赋、军政大权，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地方军阀。

安禄山私下豢养同罗、奚、契丹降卒八千余人，称"曳落河"，即当地少数民族语"壮士"的意思。把他们收为养子。又挑选了百名家僮，训练他们骑马射箭。平时厚给赏物，笼络人心。这些人对安禄山感恩戴德，因此都竭诚事奉，无不骁勇善战，以一当十。安禄山又畜养了数万匹战马，五万余只牛羊。还派胡商到各地去贩鬻，每次接见他们的时候，安禄山都穿着胡服坐在床上，四周焚香，摆满珍宝。百名胡人在两边侍立，众人罗拜于下，案上盛陈祭享用的牛羊，巫师击鼓歌舞，安禄山俨然以土皇帝自居。还秘密派人缝制了大量绯紫袍、鱼袋等官员穿戴之物，留着做皇帝封官时候用。

安禄山周围聚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做为谋逆的骨干。高尚、严庄、张通儒、孙孝哲被安禄山视为心腹。还有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熊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一批领兵打仗的将领。这些人中不乏谋士将才。象高尚，本名不危，颇有才学，却贫困潦倒，很不得志。曾对人感慨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食草根求活？"安禄山与他推心置腹，引为幕僚，令其专掌笺奏文件。他与孔目官严庄为安禄山解释图谶，劝其起兵造反。象田承嗣世代为卢龙小军校，安禄山提拔他为前锋兵马使。一次下大雪，安禄山巡视军营，行至田承嗣处，整个军营寂静无声，似无一人，人阅士兵时却一卒不少，因此得到安禄山器重。

天宝十载秋，安禄山大举进击契丹，并命令两千奚族骑兵助战。行到土护真河，安禄山誓众说："兵贵神速，现在大雨不停，我们离契丹尚远，必须加速进军，契丹不虞我至，才可破之。"军队奉命昼夜兼程三百余里。安禄山还令士兵持捆绑契丹兵用的绳子，意欲全部生擒。不料大雨把弓弩浇透无法使用。大将何思德指出，士兵远道冒雨赶路已必极为疲惫，仓促上阵必然力量不支，建议部队稍作休息再交战。安禄山大怒，要杀他警戒三军，后准

其带罪打先锋。

何思德长相酷似安禄山，契丹兵齐把目标对准了他，不一会儿即中枪矢而死。众兵误以为击毙了安禄山，欢呼雀跃起来。奚族兵也纷纷倒戈，与契丹合攻安禄山。安禄山兵大败，他本人鞍坐也中了流矢，带着二十骑兵狼狈逃往平卢城，幸亏得平卢骑将史定方营救才免于一死。

十一载三月，安禄山又率领步骑二十万进攻契丹，以报去秋兵败之仇。他上奏玄宗，请求朔方节度使阿布思协同作战。阿布思素有才略，遭安禄山忌恨，两人一向不和，安禄山想借此机会吞并他的力量。阿布思不肯出兵，率部逃往漠北，后来被回纥兵击败，安禄山乘机召募他的将士，扩充实力。他的军队称雄于天下。

十一月，安禄山派子范阳节度副使、鸿胪卿安庆绪献奚、契丹及同罗俘虏三千名，并献金银锦绣之物。玄宗大悦，授庆绪散阶特进、卫尉卿。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宰相李林甫死，宠臣杨国忠担任右相。安禄山素来畏惧李林甫，对其毕恭毕敬。杨国忠不过仗着贵妃的关系才得以重用，其狡诈作威的手段远不如李林甫高明，虽然杨国忠在作相前一直对安禄山很恭敬，常常扶着他上下殿阶，但安禄山还是很轻视他。杨国忠作相后也一反对安禄山恭顺的态度，两人为争宠互不服气，相互攻讦，结下嫌隙。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不和，杨国忠便厚交哥舒翰，奏请他兼河西节度使，又赐爵西平郡王。用哥舒翰牵制排挤安禄山。

天宝十三载正月初三日（己亥），安禄山请求入朝。杨国忠一口断定安禄山要造反，对玄宗说："陛下正好可以借此试试他，召他入宫，他必不肯来。"玄宗派使召见他，狡猾的安禄山闻命即刻赶到，将玄宗的疑虑打消。第二天，安禄山在华清宫见到玄宗，哭诉说："臣本是胡人，蒙陛下厚爱提拔才有今日，不料却被国忠所

忌，臣必死无疑了。”玄宗被安禄山可怜兮兮的表情迷惑，赏赐巨万为他压惊。太子李亨也看出安禄山要谋反，不断劝说父皇，但是玄宗听不进去，还要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制书都已草拟出来，杨国忠上谏说：“禄山虽有军功，但是目不识书，怎么可以作宰相，一旦颁下制书，恐怕会引起四夷对我大唐的轻视。”玄宗认为有道理，遂作罢，但是又加安禄山左仆射，赐一子三品官，一子四品官。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深信不疑，更加有恃无恐，得寸进尺。奏请兼领闲厩、群牧使，这是主管战马之职。二十四日（庚甲）玄宗就任命安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二十六日（壬戌），又兼知总监事。禄山还奏以御史中丞吉温充闲厩副使。他掌握国家马政大权后，就密遣亲信挑选出数千匹良马充实自己部队。

二月，安禄山上奏：“臣所属部将讨伐奚、契丹，立功者很多，乞不拘常格，对他们超资加赏。”玄宗对安禄山有求必应，于是禄山军中有五百余人升为将军，二千多人升为中郎将，安禄山意在用官爵收买人心，为叛乱作准备。

三月初一日（丁酉），在长安住了三个月之久的安禄山准备回归范阳，玄宗命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在长乐坡为他饯行。临行前，玄宗脱下身上的御衣赐给他，安禄山又惊又喜。他心怀鬼胎，害怕被杨国忠奏请留下，疾驰奔出潼关，乘船沿黄河而下，昼夜兼程驶出数百里，沿途所过郡县也不下船休息，一口气奔回到老巢范阳。

安禄山不轨之心已昭然若揭，人人都知他要造反。有人向朝廷上告，唐玄宗却把这些人绑起来送交安禄山处理。从此人们道路以目，再也不敢说安禄山谋反了。唐玄宗本人未必糊涂到一点看不出安禄山的不安份，只是心存幻想，认为安禄山会念及自己对他的这番特殊宠遇而不谋反。

天宝十四载二月二十二日（辛亥），安禄山派遣副将何千年入奏，请用三十二名蕃将代替汉将，玄宗命中书省起草诏敕。宰相韦见素与杨国忠商量说："禄山久蓄不轨之心，现在又提出这个要求，反状已很明显了。明天上朝我要极谏皇上，皇上不应，您再接着上谏。"国忠许诺。第二天上朝，玄宗先问他俩人道："你们在怀疑安禄山吧。"韦见素乘机劝玄宗不要答应安禄山的请求。玄宗很不高兴，杨国忠见状，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过了两天，杨国忠向玄宗进言："臣想了一个办法可打消安禄山叛乱的阴谋。陛下可授安禄山平章事，召他入京，改派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这样就把安禄山势力分散了，使其无力叛乱。"玄宗认为可以用这个办法考验安禄山，但是仍犹豫不决，迟迟不发已草定好的制书，而派中使辅璆琳到范阳探听动静。辅璆琳受了安禄山重贿，回来后大赞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玄宗很高兴，对杨国忠等人说："朕推心对待禄山，他必无异心，东北边境还要靠他镇守，朕亲自为他担保，你们不要再担忧了。"杨国忠的建议也不了了之。

自从安禄山从长安奔回到范阳后，就换了一副面孔。他称病不见朝廷派来的使臣，即使见也要盛陈武备，而且不行人臣之礼。使臣裴士淹到范阳二十多天后才被安禄山召见。朝廷这边杨国忠则日夜寻找安禄山反状，想激其速反，以证实自己的先见之明。他派京兆尹李岘搜查安禄山在京师的宅府，逮捕了安禄山门客李超、安岱、李方来，将他们在御史台缢杀，安禄山党羽吉温也被贬为沣阳长史。住在京师的安禄山儿子安庆宗把这一切密告给父亲，安禄山又惊又怒，让严庄上表申辨，且陈诉杨国忠二十余条罪状。玄宗怕激起安禄山造反，将此事归咎于李岘，暂且平息了安禄山怨气。

十四载七月，安禄山请献战马三千匹，每匹跟牵马夫二人，由二十二名蕃将带队护送到京师。河南尹达奚珣感到其中有诈，上

奏道："禄山进献大匹战马，又自带士兵将领，望朝廷下敕禄山，使献马之事等到冬季，而且不烦本军远劳，由官出马夫。"玄宗也渐渐醒悟，恰在这时辅璆琳受贿事发，玄宗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按达奚珣之意起草了诏书，又加"朕新为卿建一浴池，十月在华清宫待卿。"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诏去范阳，宣旨时禄山不拜，仅在床上微微欠起身子，问了一句"圣人安稳。"又说："马不献亦可，十月份当至京师。"说完即让左右带冯神威下去，不再见他。过了几天，才放他回去，也无表章回奏。冯神威见到玄宗哭泣说："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

安禄山专制三道，兵精马壮，久藏祸心。他念及玄宗的宠遇，本想等玄宗死后再作乱。由于与杨国忠矛盾日益激化，促使他下决心立即叛乱。冯神威离范阳后，他召来严庄、高尚和阿史那承庆密谋叛乱之事。其它将领皆不知内情，只是奇怪自八月份以来，安禄山屡屡犒飨士兵，秣马厉兵，笼罩着临战的紧张气氛。正值此时，有奏事官从京师回来，安禄山诈作敕书，召集将领说："朝廷下密旨，令禄山率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立即出发。"众将愕然，但是谁也不敢多问一句。十一月初九日（甲子），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少数族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命令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严守大同，其余将领一律引兵于当夜出发。

第二天早上，军队出了城南，安禄山大阅誓众，以诛杨国忠为名，在军中立榜道："有异议煽动军心的，斩及三族。"军中肃然。安禄山乘着铁甲战车，后面是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浩浩荡荡向南开去，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乱爆发了。

（杨西云）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214—217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旧唐书》:《安禄山传》、《杨国忠传》、《史思明传》

二卿讨叛

颜杲卿，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五代祖颜之推、曾伯祖颜师古，皆一代名儒。杲卿以门荫入仕，性格刚正，而且有行政才能。开元中，为魏州录事参军，政绩突出，天宝十四载（775年），任常山太守。

颜真卿是杲卿从弟，少年时代刻苦勤学，文采飞扬，其书法人称“颜体”。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开元中进士及第，任官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有冤狱，长久以来没有平反昭雪，真卿秉公裁决。当地天大旱，断狱后下起了雨，真卿因此被人称为“御史雨”。又充河东朔方试覆屯交兵使，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郎等职。宰相杨国忠擅权，恨他不依附自己，出为平原太守。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当时天下长期太平，很少有战事，老百姓世代不识兵革，州县储备的武器弓箭等因为长久不用都已锈迹斑斑，腐朽不堪。猝闻叛军起兵，人们十分惊恐。安禄山兼任河东、河北道采访使，河北一带是他统辖的地区，叛兵沿途进攻的郡县，皆望风瓦解，有的守令弃城落荒而逃，有的干脆开城门出迎投降，有的尚未来得及抵抗就束手就擒。无人能阻挡住安禄山兵长驱南下。

安禄山派将军何千年、高邈率奚族骑兵二十人，声称献射生手，飞驰至太原，生擒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十九日（甲戌），叛军大部队抵达博陵（今河北定县）南，斩杀了杨光翙。安禄山命将安

忠志带领精兵驻扎土门。以张守珪之子张献诚为博陵太守。

安禄山到达藁城（今河北正定东），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遂伪降安禄山，行缓兵之计，与长史袁履谦开城门出迎。安禄山升其官职，而将其子弟留下当人质，令他仍守常山。在回常山途中，他指着安禄山所赐官服对袁履谦说："为何要穿着它呢？"履谦心领神会。二人遂秘密酝酿起兵。前真定令贾深、藁城尉崔安石、内丘丞张通幽也参预其谋，他们与太原尹王承业取得联系，遥为呼应。

颜真卿所辖之地平原位于河北道东南方，不在叛军南下进军的路线上。安禄山起兵后，只是移牒给颜真卿，让他以平原、博平（今河北高唐南）七千兵防守黄河渡口。颜真卿对禄山反状早有察觉，因此在安禄山起兵前，就借口霖雨为害，加紧修城竣壕，充实仓廪，召募丁壮。为作掩护，表面上则公开宴请文士，泛舟湖上，饮酒赋诗。安禄山得到密探报告，以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不足为虞，这就使颜真卿得以从容固城备战。在接到安禄山命令时，他巧妙利用这个机会到诸郡组织联络反安禄山的力量。许多郡县立即响应号召，旬日间就募得勇士万余人，命录事参军李择交统领训练。颜真卿对着这些应募的士兵，慷慨陈词，晓谕人们举兵抗击安禄山，士兵们感愤，同心响应；同时颜真卿又派司兵李平火速奔朝廷报告河北情况。安禄山起兵之初，河北郡县皆望风披靡。玄宗叹惜道："河北二十四郡，就无一人是义士吗！"待接到李平奏报，玄宗大喜道："朕不料颜真卿，竟如此有作为！"

十二月，安禄山攻下荥阳，打败驻军武牢的封常清军，攻克洛阳。河南尹达奚珣投降。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荷国重任，虽知力量不敌，当宜为国而死。"卢奕表示赞同，当下二人收整数百残兵，欲作抵制之势，但士兵怕死逃走。安禄山逮获了他俩和采访判官蒋清。卢奕厉声斥责安禄山："作人当知道逆顺，我死不失节，没有什么遗憾的。"安禄山将三人残忍地杀死，然后

派将段子光带着三人的头颅到河北郡示众。十七日（壬寅）段子光来到平原，正在组织反抗的颜真卿害怕人们被叛兵气焰吓倒，引起人心动摇，于是对将士说，"我认识这三人，首级不是他们的。"遂腰斩段子光。将三义士首级带上冠饰，用蒲草接成身体四肢，用棺材装殓，颜真卿伏棺痛哭，人心无不感动，更加拥护颜真卿，讨叛之心也更加坚定。

这时候，清池尉贾载和盐山尉穆宁，合伙斩杀安禄山所任的景城太守刘道玄，缴获甲仗五十余船，带着首级见长史李玮。李玮收斩了安禄山谋士严庄的宗族，将道玄首级送至平原。颜真卿召集贾载、穆宁和清河尉张澹一起到平原议事。此时其他诸郡也纷纷行动，以各种方式进行抵抗活动。饶阳太守卢全诚固城自守，不受伪封，河间司法李奂杀死安禄山所任命长史王怀忠，济南太守李随派遣游弈将訾嗣贤渡过黄河，杀死博平太守马冀，这些人有众上万或数千，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在安禄山河北腹心之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抵抗力量。

颜真卿又派杲卿外甥卢逖自平原潜入常山，与杲卿相议连兵成犄角之势，切断叛军归路，以缓解叛兵西侵之势。颜杲卿遂与长史袁履谦等人合议，欲开土门阻断叛兵。土门（井陉口）在常山郡西侧，是河北西部通往河东的要冲之地。当时由安禄山将李钦凑、高邈率兵五千把守。李钦凑军隶属常山郡。这时高邈正奉安禄山之命到范阳（今北京）征兵支援河南战场，尚未回还。颜杲卿趁机以安禄山之命召李钦凑部众到平原郡受犒赏。李钦凑不知是诈，带兵匆匆赶到，在酒宴上喝得酩酊大醉，与所带兵将全被缴械斩首。土门之兵也被遣散。不久，高邈从范阳回来，行至藁城被擒获。又有消息说叛将何千年将从洛阳来，韦安石与翟万德奉杲卿命在醴泉驿将其扣押，与高邈一同押往常山。何千年为免于一死，向颜杲卿献计道："太守欲尽力王室，当善始慎终。常山郡兵皆乌合之众，难以临敌。上策应深沟高垒，暂避安禄山锋

芒，等朔方兵赶到，可并力齐进，传檄赵、魏，断燕、蓟要膂。现在应放出风声，说李光弼率步骑一万出井陉，再派人劝围攻饶阳的张献诚，说他手下之将多是地方团练之兵，无坚甲利兵，难以抵挡山西李光弼劲旅。张献诚必定解围而去。”颜杲卿觉得有道理，遂用何千年之策。张献诚果然撤兵，其团练兵皆溃，杲卿派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又让韦安石等人到诸郡宣传“唐大军已下井陉，早晚即至，先平河北诸郡，先降者赏，后至者诛。”这一宣扬果然奏效，河北十七郡都表示归顺朝廷，合兵有二十余万。安禄山所控制的地盘，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

颜杲卿趁此形势，又派人到范阳招降守将贾循，布衣马燧劝他说：“安禄山负恩造反，虽然已得到洛阳，嚣张一时，但终归夷灭，公若能诛不从命者，以范阳归国，倾覆安禄山根基，是为天下立了大功。”贾循决定反正，但仍有所犹豫，安禄山别将牛润容侦知此情，立即向安禄山告密。安禄山将贾循召来缢杀了他，并灭其宗族，改以别将牛廷玠知范阳军事。

颜杲卿虽未收复河北，但却达到了拖延安禄山西侵的初衷，安禄山已作好了攻取潼关的准备，行至新安，闻河北有变而还。遂命令史思明、李立节带领蕃汉步骑万人袭击博陵、常山，又别派蔡希德带兵万人自怀州（今河南焦作）击常山。

颜杲卿起兵才八日，就遇到史思明、蔡希德的进攻，只好向太原的王承业告急求援。王承业却拥兵不救。原来在此之前，颜杲卿派子泉明与贾深、翟万德一道献李钦凑首级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师，临行前张通幽泣请与泉明同去，以救兄张通儒与宗族。杲卿答应了他，谁知行至太原，张通幽欲自托于太原尹王承业，让其阻留泉明等人，更换奏表，诋毁杲卿，将功劳窃为已有，另遣使献之。王承业既已窃功，自然不愿出兵了。杲卿孤军奋战，昼夜拒敌，直战到粮尽矢竭。于至德元载（756年）正月初八日（壬

戌)，常山终于陷落，叛军纵兵杀了万余人，最后将杲卿及袁履谦等人押送洛阳。

安禄山见到杲卿，责备他说:“我把你从一个小小的范阳功曹，举荐为判官，不几年就升为太守，为何你还叛我?”杲卿怒骂道:“你本是营州牧羊羯奴，皇帝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恩宠无比，为何你还反叛朝廷?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所赐，虽为你所举荐，岂能就从你而叛!而今我为国讨贼，恨不能杀你，臊羯狗，何不快快杀了我!”安禄山恼羞成怒，立即命人将杲卿与袁履谦等人缚在柱子上，一刀刀地零割，杲卿仍骂不绝口，至死为止。颜家死于刀锯者竟有三十多人。

叛兵攻克常山后，又陆续攻伐不从的郡县，于是邺、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再落敌手。这时唐廷任命李光弼为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河北节度使，带领朔方万余名兵，出井陉，定河北，且初战告捷，常山郡所属九县中，有七县归顺唐廷，叛军只控制着九门、藁城。

在河北的南部，颜真卿依然坚持抵抗斗争。位于平原郡西邻的清河郡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名叫李萼，一天来平原向颜真卿借兵。他说:“您首倡大义，河北诸郡把您看作是抗敌的长城。清河与平原相邻，国家在此聚集着江淮、河南的钱帛，以供应北境军需，号称“天下北库”，现有三百余万匹布，八十余万匹帛，三十余万缗钱以及三十万斛粮食。清河现有七万户，十余万人，估计财富超出平原三倍，兵力也是强过平原。您若能允以借兵，以二郡为腹心，则其它郡如四肢，无不随意所使了。”颜真卿起初想到平原兵新近集结，尚未加训练，自保尚感力量不足，并无力外援，但看李萼虽没明确说出用意，却是出于诚意，决定拨出一部分兵力来，但周围人都认为李萼不过是一介轻狂少年，徒分兵力，必无所成。颜真卿只好回绝了他。

李萼回到馆舍，给颜真卿写了一封信说:“清河去逆效顺，奉

粟帛器械资军，却被您怀疑。我回去以后，清河不能独存，一定要有所依附，到时将成为平原之强敌，您难道不后悔吗？”颜真卿接信后大吃一惊，当即赶到馆舍，借给其六千兵，送至境时，问他借兵用意。李萼这才说：“听说朝廷派程千里统兵十万从太行山东下，将出崞口讨贼，但为安禄山所署魏郡（今河北大名北）太守袁知泰带兵所阻，不能进兵。现在应立即引兵击破魏郡，分兵开崞口之路，迎程千里之兵讨伐邺、汲等郡。平原、清河率领同盟军，合兵十万，南监孟津，据守要冲之地，阻断叛兵北退之路，与唐军呼应。您上表请朝廷令唐军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军一定内溃互相残杀！”颜真卿见他分析有道理，遂命录事参军李择交及平原令范冬馥领兵，与清河兵四千人，博平兵一千人会合一起，开赴堂邑（今山东聊城西北）西南。袁知泰遣兵二万迎战，结果被三郡兵打得大败，袁知泰弃城逃至汲郡，遂克魏郡。

颜真卿又驰书北海（今山东益都）太守贺兰进明，相约合力讨贼。贺兰进明遂率步骑五千渡过黄河，驻军于平原城南，休养士马。颜真卿常和他商讨军政要事，进明逐渐握有军权，真卿并不介意，还把堂邑之功让给他。贺兰进明并不推让，在给朝廷上表时任意取舍，许多有功之将并没得到奖赏。后贺兰进明攻打信都郡（今河北冀县）久攻不下，录事参军第五琦劝他重赏召募勇士，才攻克信都。

四月，安禄山将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诱杀了安东副大都护马灵詧。平卢游弈使刘客奴、先锋使董秦与安东将王玄志合谋诛杀吕知诲，并派人与颜真卿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攻取范阳。颜真卿派遣贾载带着衣粮相助，还把自己年龄才十岁的独生子颜颇送到刘客奴处当人质，激励其杀敌。朝廷闻知后遂以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董秦为平卢兵马使，但在袭范阳途中、被思明击败。

叛兵攻下潼关后，史思明又乘机进攻河北诸郡，饶阳、河间、

景城、乐安相继陷落。只有颜真卿领导的平原与博平、清河三郡仍在坚守。后来大势已去，颜真卿才被迫弃郡西入关中。被朝廷授为刑部尚书、御史大夫。

颜杲卿、颜真卿在河北安禄山腹心之地发起的抵抗斗争，缓解了叛军西侵之势，有力支援了唐军在中原战场上对叛军的斗争。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17、218

《旧唐书》：《颜杲卿传》、《颜真卿传》

《新唐书》：《颜杲卿传》《颜真卿传》

潼关失守

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初九日（甲子）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河北一带本是他的辖区，州县均望风瓦解，叛军长驱直入，向中原逼进。十五日（庚午）正在骊山华清宫避寒的唐玄宗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召集宰相商讨对策。杨国忠与安禄山积怨很深，屡屡上奏安禄山迟早要反，却不为玄宗所信。因此他总是寻机激怒安禄山速反，以取信唐玄宗。这时他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夸口说："现在谋反的只是安禄山自已，将士们都是被逼迫的。不过十天半月，必斩安禄山的首级传到行宫。"玄宗信以为然，大臣听杨国忠出此狂言不禁相顾失色。玄宗派特进毕思琛、金吾将军程千里分别到东京洛阳、河东一带召募数万士兵御敌。第二天，适逢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向他寻问讨叛对策，封常清也轻敌地说："天下老百姓过太平的日子很长了，所以才惧怕叛贼。但是事情有逆顺，形势有奇变，臣请求驰马到东京打开府库，召募勇士，然后率兵渡过黄河，不日即可取逆胡之首献给陛下。"封常清颇有军事才干，是镇守西北边境的一员大将。唐玄宗正忧心忡忡，听了他的话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奉命骑快马到东京洛阳召募了六万士卒，又截断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加强洛阳防御。

二十一日（丙子）玄宗从华清池回到长安，命人杀了安禄山儿子太仆卿安庆宗，赐其妻荣义郡主自尽。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安思顺与安禄山同族，但他事先曾揭发过安禄山谋

反，所以玄宗没杀他，只是让他交出军权调任中央。接着将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提升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在与安史叛军辖区相连接的河南道设节度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帅，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在叛军可能进攻的关东诸郡，设置防御使，抵御防备叛军。

二十二日（丁丑），唐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统率诸军东征。唐廷感兵力单薄，又出内府钱帛，在京城召募士兵，十天之内征集了十一万人。应募者多是市井商贩子弟，号曰“天武军”。十二月初二日（丙戌），高仙芝从天武军和禁军飞骑、彍骑中挑选一些士兵，加上从边境调来的镇兵，共计五万人，从长安潼关向东开去，屯军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玄宗派宦官监门将军边令诚作监军使随同前往。

唐廷刚布置好东击叛军，保卫洛阳的安排，安史叛军就长驱直入，经博陵（今河北正定）、藁城（正定东）来到黄河北岸，初三（丁亥）即从灵昌郡（今属河南）渡过黄河，攻陷灵昌，又向陈留（今河南开封南）郡逼进。河南节度使张介然才到陈留赴任，尚未布署，唐兵抵挡不住叛军进攻，陈留失陷。安禄山进城后得知安庆宗被杀，大声痛哭，当时陈留投降的将士有上万人，安禄山将他们全部杀害以泄私愤。张介然也被斩于军门。然后留下部将李庭望守陈留。他率领大军进攻荥阳。

荥阳太守崔无诐发兵抵御。但官兵久不经战阵，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爬上城墙的士兵两腿发抖，听到隆隆震天的战鼓声吓得纷纷坠落下来。初九日（癸巳），安禄山军即攻下荥阳，杀死崔无诐，以其将武令珣镇守荥阳。

荥阳位于洛阳东面二百六十里，是洛阳东面的门户。安禄山气焰十分嚣张，派部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攻打洛阳。封常清带领新募的士兵驻扎在洛阳东面的武牢御敌。他的士兵人员不少，但多是市井无赖之徒，从没上过战场，也没受过训练，毫

无战斗力，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叛兵对手。因而当安禄山骑兵如潮水般冲来时，唐兵大败。封常清收拾余部，又战于葵园，官兵又败，三战于上东门内，又败。封常清屡败屡战，十三日（丁酉），洛阳城终于失陷。叛军擂鼓入城，纵兵杀掠。封常清仍在拼死抵抗，先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被迫从宫苑西墙坍塌处败退而走。

封常清与残兵从洛阳战场败退至陕郡，与驻守此地的高仙芝军会合，陕郡太守窦廷芝早已逃到河东，吏民也都四处逃散。封常清先前轻敌大意，在连吃败战之后，才知叛军不可轻视。他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才知贼锋锐不可挡。现在潼关无兵把守，一旦遭到叛军出其不意地进攻，长安就危在旦夕了。陕郡是守不住了，不如引兵占据潼关，凭险而守，才是万全之策。"高仙芝认为封常清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帅兵西趋潼关。不料途中就遇上了安禄山的追兵，唐兵队伍不整，狼狈不堪，混乱中人马互相践踏，死者甚众。最后总算摆脱叛兵追击，抢先一步占据潼关。高仙芝立即命令士兵抢修工事。叛兵攻关不成才撤兵而回。

这时临汝、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济阴（今山东定陶西）、濮阳（今山东鄄城北）、云中（今山西大同）诸郡也都归降了安禄山，朝廷征调入援的诸道兵还未赶到，关中一时空虚无备，人心惶惶。幸亏安禄山急于登基称帝，停在洛阳逗留不进，暂且放松了对潼关的进攻，才使朝廷获得喘息机会，做好守御准备。诸道兵也陆续赶来入援。

封常清从洛阳战场上败阵后，多次派使臣奉表向朝廷报告安禄山真实兵力情况，希望引起朝廷注意，不要再轻敌大意。不料唐玄宗根本不接见使臣，封常清只好亲自赴长安汇报。行至渭南，受到朝廷派来的使者阻拦，向他宣敕削去官爵、回高仙芝军以白衣自效的朝命。他只好奉命回潼关，知道命在旦夕，他写下一份遗表，一方面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忠心，一方面提醒朝廷不要轻敌

大意。表文说："自洛阳城陷以来，臣前后多次遣使奉表，详述赤心，竟不被陛下接见。臣此次赴京，不是乞求苟活的，而是要陈述社稷大计，献破贼之谋。盼望能在宫阙朝堂向陛下倾诉。论叛胡的兵势，向陛下献计献策，以报陛下对臣的一生之宠。岂料长安遥遥，无由谒见，函谷关悠悠，下情难达！臣率兵迎战叛贼，从这月七日交锋，到十三日战火仍未停息。臣所率兵都是乌合之徒，从没受过训练。但以长安市井之兵，抵挡渔阳骁勇之师，还是奋力杀敌，血流满野。臣不惧死。愿意冲锋陷阵，死节军前。但臣没这样做，是怕长叛胡威风，灭我军志气。臣已作好了准备，当飞骑赴京之日，就是臣命归天之时。但请陛下听臣倾诉者有三：一请陛下在都市上将臣斩首，以警诫诸将；二请陛下向臣询问逆贼之势，以警诫诸军；三请陛下知臣非贪生怕死之徒，许臣披肝沥胆，直抒胸臆。臣今日以死上谏，陛下也许认为臣在兵败之后，妄为诳语；也许认为竭忠坦露，肝胆相照。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视叛贼，不要忘了臣言。臣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社稷平安，叛贼倾覆，臣仰天饮鸩，向陛下上表，生作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倘若臣死而有灵，必结草军前，引王师之旗鼓，荡平寇贼。"

原来唐玄宗听了监军边令诚的挑唆才对封、高二将不满的。按唐朝制度，将帅在外带兵打仗，要另派宦官监视主将。宦官是刑余之人，长年生活在深宫里，根本不懂军事，但是他们仗着皇帝的威风，常常对主将横加指责，干预战场，引起将士不满。高仙芝本是由边令诚一手提拔上来的一员大将。这次他出征御敌，边令诚作监军，常常指手划脚，所出主意又多不妥，因此不被高仙芝采纳。这使边令诚恼羞成怒。他借入朝奏事的时机夸大战场败状，以此诋毁高仙芝和封常清。又诬告说："封常清夸大叛兵力量，动摇了军心，而高仙芝则放弃陕地数百里，而且还贪污军士的粮食和赏赐。"玄宗正为洛阳失守而恼火，边令诚这一番煽惑，有如火上浇油，玄宗更为大怒，在不辨明事情真伪的情况下，轻信边

令诚的一面之辞。于是唐玄宗不但拒绝听取封常清上奏军情，而且还下了在阵前斩二将的命令。

边令诚到潼关，先将封常清引到军前，宣读敕令。封常清镇定自若接过奉旨说："常清之所以还没有死，是不肯玷辱国家旌麾，受戮贼手，如今讨贼无功，我死而甘心。"他请边令诚把遗表带给皇帝，随即饮毒而死。遗体被放在芦苇席上示众。高仙芝神情黯然转身回厅。边令诚让百余名陌刀手跟着自已，叫住仙芝："大夫也有恩命。"高仙芝急忙退至封常清饮鸩之处，边令诚大声宣旨，高仙芝喊冤道："我遇敌而退，罪该当死，但是说我贪污军粮和赏赐，是诬陷臣。"接着又对边令诚说："今天上戴天，下履地，将士们都在，您真不知道吗？"这时士兵都列队站在门下，高仙芝又对士兵说："我从京师把你们召来，虽然得到少许财物，但是连起码的装束都不足。本想与你们戮力同心，奋力破贼，然后共取高官重赏。不料贼势太盛，只好撤兵潼关，据险而守。现在却诬我盗军粮赏赐，我若真有这事，你们就喊有；我若没此事，你们就喊冤。"高仙芝平时深得士兵爱戴，这时受人诬陷，士兵哪里肯干，于是齐喊"冤枉！"声音之大使大地都震动起来。边令诚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一言不发。高仙芝低头看了一眼陈尸芦苇席上的封常清，怅然说："封二（封常清排行老二），你从微至显，我提升你做我的副官，又代我作节度使，今天我与你同死于此，岂不是命中注定的吗？"话毕即被斩杀。

唐玄宗听信谗言，斩杀了镇守潼关的两员大将。朝中一时无将可使。潼关要地，又非需名将把守不可。玄宗只好把正在家中养病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召来。

哥舒翰是突厥一支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的后代。世代居住在安西（今新疆库车），家道殷富。他轻财重义，很讲信用。好读《左传》、《汉书》。四十岁时父亲去世，他到长安居住了三年，由于不被长安尉所礼，发愤从军河西。先后在节度使王倕、王忠嗣

手下做军吏。作战勇猛，多次击败吐蕃。哥舒翰有个家奴叫左车，年龄十五、六岁，力气过人。打仗时主奴二人配合默契，哥舒翰善使长枪，常常骑快马追敌，把枪搭在敌人肩上，然后大喝一声，乘敌人大惊回头之际，长枪就正刺咽喉。敌人往往被挑起几尺之高然后坠地。跟在后面的左车下马斩首。因御边有功，哥舒翰累升官为右武卫员外将军、陇右节度副使。天宝六载（747 年）冬，王忠嗣被弹劾，哥舒翰竭力为忠嗣说情。玄宗遂贬忠嗣为汉阳太守，以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

哥舒翰素与安禄山不和，唐玄宗曾经从中调解，使之结为兄弟。天宝十一载冬，宦官高力士在京城东崔惠池宴享他俩。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父亲是突厥人，母亲也是胡人，我俩种族相同，为何要不相亲呢？"哥舒翰回答："古人说'狐向窟嗥不祥'因为它忘本的缘故。翰怎敢不尽心呢。"安禄山认为是讥讽自己，于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哥舒翰。哥舒翰正要还嘴，被高力士用眼色止住了，强咽下这口气，一场宴席不欢而散。从此二人结怨更深。

哥舒翰喜欢喝酒，又纵情声色。结果在天宝十三载患了中风病，昏倒在浴池中，半天才苏醒过来。从此因病回京，在家中休养。

唐玄宗这次召他出山，一来考虑到他与安禄山有仇，二来想借用他的威名震敌。哥舒翰虽然勇猛，可是此时有病在身，早已今不如昔，所以坚决推辞，却不被获准，只好走马上任，拜官兵马副元帅。玄宗又命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拨给八万士兵，加上河陇、朔方兵和蕃兵以及高仙芝旧部共二十万兵马，由哥舒翰统领扼守潼关。长安安危全仰仗这支人马了。临出发前，玄宗亲往勤政楼慰劳，大臣则到郊外饯行。

哥舒翰到达潼关后，由于病重不能治军，便把军政要务全部委托给田良丘。田良丘不敢自作主张，命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这二人争长互不服气，使士兵无所适从。哥舒翰虽有威名，但是他用法严厉而不体恤士兵。唐兵士气不高，没有斗志。好在唐兵据险而守，足以抵御叛军西侵。天宝十五载正月，哥舒翰军击退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进攻。玄宗加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勉励他守好潼关。哥舒翰多次向朝廷进言，安禄山虽然窃取了河朔，但是却不得人心，唐兵宜以逸待劳，固守潼关。待叛军内部离心崩溃之时，唐军再抓住时机进击，可达到不伤兵而摧寇的目的。

这时王思礼秘密劝说哥舒翰上表请诛杨国忠以平民愤。杨国忠倚仗杨贵妃的关系，骄纵不法，作恶多端，招致天下的怨恨。安禄山起兵就是打着诛杨的旗号。哥舒翰不答应。思礼又劝他派三十名骑兵把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死，哥舒翰更不敢答应，说："若这样干，就是我哥舒翰造反了，而不是安禄山了。"杨国忠这边也有亲信劝说："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如今握有朝廷重兵，一旦他挥旗西攻，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杨国忠大惊，他深知自己招万人痛恨，又与安禄山起兵有关，因此对平叛将领十分提防。哥舒翰重兵在握，对自己构成了潜在的危险，为了防备哥舒翰，他上奏玄宗："兵法云'安不忘危'，如今潼关兵马虽强，却没有后援队伍，万一潼关失守，京师就难保了。臣请挑选三千监牧小儿在苑中训练。"玄宗对杨国忠历来有求必应。杨国忠让剑南军将李福德等人率领这三千兵，他又召募万名士兵屯驻在长安东面的灞上，派亲信杜乾运率领。名为御贼，实则防备哥舒翰。哥舒翰久经战阵，一下子就识破了杨国忠的花招，他也深怕遭杨国忠暗算，于是上表请灞上之军隶属潼关军。玄宗此时正依靠哥舒翰守关，就准许其请。六月初一日（癸未），哥舒翰召杜乾运入关，找了一个借口把他杀掉。这使杨国忠更加紧张害怕。

潼关西距长安三百里，北濒黄河、南倚悬崖，扼守着黄河要津渡口，是关中长安的东大门，由于地形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对于保障关中安全起有很大作用。所以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老谋深算的安禄山见潼关易守难攻，靠强攻难以取胜，便使计诱使哥舒翰出关。他命崔乾祐带着不满四千的羸兵弱卒驻扎在陕郡，作出一种毫无所备的假象，暗里却蓄养精锐。有人向朝廷奏报这一情况。玄宗求胜心切，赶紧派使催促哥舒翰出击收复陕郡、洛阳。哥舒翰分析军情，认为其中必有奸诈，他上奏说：“安禄山擅长用兵，如今起兵叛乱，不会无所准备。他一定是用弱兵诱我出关，我军前往，正中他的圈套。而且叛兵远道而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要之地，利在坚守。何况叛贼暴虐失人心，兵势已日渐窘蹙，一旦内部有变，我军可乘隙而人，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旨在荡平叛逆，何必求速呢。再有诸道征兵尚未到齐，暂缓出兵为宜。”在河北战场上的大将郭子仪、李光弼也上奏朝廷，建议引兵北攻范阳（今北京），端安禄山的老巢，然后扣押叛兵妻女为人质，动摇其军心。潼关大军却只宜固守，不可轻易出关。从以后事态发展看，这些将领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可是杨国忠见哥舒翰不肯出兵，怀疑他在图谋自己，于是屡屡劝玄宗说：“叛贼正好无备，哥舒翰逗留不进，将失去战机。”请玄宗赶紧派使督促哥舒翰出兵。玄宗长期做着太平皇帝，疏于军事，又被杨国忠眩惑，连续派遣宦官督促哥舒翰出关。哥舒翰不敢违背君命，但他预感到此番出兵将凶多吉少，所以临行前捶胸痛哭，六月初四日（丙戌），带着队伍出了潼关。

初七日（己丑），哥舒翰军和崔乾祐军在灵宝（今属河南）西原相遇。地势对唐军极为不利，崔乾祐按照预定部署抢占了有利地形，据险以待，南面靠山，北有大河为阻，中间还有长达七十里的狭长地带。次日，两军接战，哥舒翰命王思礼带精兵五万打

先锋，庞忠率十万兵为后援，他本人带领三万士兵登上黄河北岸的山岗督战指挥。唐兵见叛兵不过万人，而且稀稀散散不成战阵，不禁放松了警惕。唐兵主动出击，叛兵似乎不堪一击，偃旗息鼓就要溃逃。唐兵更加大意麻痹。突然间，崔乾祐埋伏在高要地带的伏兵出现了。无数飞石乱木，纷纷砸在唐兵头上，不少士卒立时毙命。唐兵拥挤着奔跑在狭窄的山道里，转不动身，刀枪也都施展不开。哥舒翰见情势不妙，急忙以毡车驾马要把叛兵冲散。可惜为时已晚，崔乾祐抢先一步用数十辆草车堵住了道路，继而一束火种点燃了草车，隘道上空升腾起一股股浓烟，熏得唐军睁不开眼。他们揣测叛兵会掩杀过来，于是张弓搭箭猛射一阵，直到日暮矢尽，才发现根本没有叛兵，却伤了不少自己人，唐兵懊丧不已。正在这时，崔乾祐派遣同罗精锐从南山杀来，在唐兵背后猛击一拳，唐兵首尾不顾，倾刻间大败。士兵或弃甲逃窜山谷，或相挤而掉入河中溺死，绝望的哀叫声震天动地。后军见前军已败，纷纷四散而走，溃不成军。哥舒翰在河北的三万兵马也自溃，叛兵乘胜追击，哥舒翰与数百骑兵狼狈而逃。其余残兵也陆续向关内奔命。关外有三道宽两丈、深丈余的壕沟，许多败兵慌不择路，连人带马坠入沟中，时间不长就把沟填满。二十万兵马经一日激战几乎全军覆灭，逃回潼关的仅八千余人。初九日（辛卯），崔乾祐带兵攻打潼关，败兵抵挡不住叛兵的凌厉攻势，潼关终于失守。

哥舒翰退至关西驿张榜收集散卒，要夺回潼关。蕃将火拔归仁劝他："公以二十万之众一战弃关，还有什么脸去见皇帝。您没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还是请公归降吧。"哥舒翰不从，被火拔归仁绑在马上，其余士兵也都被缚。与此同时叛将田乾真赶到，遂将哥舒翰等人押送洛阳。哥舒翰归降了安禄山。潼关一失，关东的华阴、冯翊、河东、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而逃。关东防线彻底瓦解。

潼关失守，唐局势立即发生逆转。而正在洛阳进退两难的安

禄山获得了向关中发展的时机，派军逼近长安。玄宗万般无奈，仓惶奔蜀。正在河北战场围攻博陵的李光弼闻知潼关失守，撤围而去，与郭子仪退至井陉。总之，随着潼关的失守，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这就使平定战乱的时间大大延长，唐廷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17、218
《旧唐书》：《高仙芝传》《封常清传》《哥舒翰传 》
《新唐书·哥舒翰传》

马嵬驿兵变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唐玄宗听信奸相杨国忠的挑唆,强令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关进攻安禄山,结果官兵中计大败。六月初九日(辛卯),潼关失守。哥舒翰急派部下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告急,唐玄宗赶紧召见,情急之下,只能派李福德带领监牧兵奔潼关增援。当时三十里左右设一个烽火台,每日初夜,就点燃烽火,以报平安。这天晚上,迟迟不见报平安的烽火,玄宗意识到潼关局势不妙,开始紧张起来。第二天,玄宗召集宰相商讨对策。杨国忠身兼剑南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乱之初,他就授命留守蜀中的剑南节度副使崔圆在四川聚集货物,打算在危急情况下退回老巢。所以他抢先发言,提出到四川避难的建议,玄宗见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点头答应了。

十一日(癸巳),杨国忠召集百官商讨对策。事已至此,大臣谁也拿不出主意来,都沉默不语。杨国忠心里很紧张,因为众人皆知他与安禄山不和,他害怕人们归咎于己。因此痛哭流涕自辩:"人们向皇上报告安禄山谋反已经有十年了,可是皇上就是不信,今天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是宰相的过失。"把责任全部推在玄宗身上。杨国忠又派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再次劝皇帝幸蜀。百官罢朝后走在街上,只见市民们人心惶惶,无目的的四处奔走,一片恐慌混乱景象。

十二日(甲午),上朝的大臣稀稀拉拉,朝堂异常冷清。唐玄宗已打定主意出逃四川,但是他不愿让臣僚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

因为逃跑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容易涣散军心民心。为遮人耳目，玄宗耍了一个花招，他登上勤政楼，声称要御驾亲征。臣僚们没有一个相信的。接着，唐玄宗进行了一番安排部署：任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长安留守，宫闱钥匙由宦官边令城掌管。又借口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要回本镇，命他在本道做好准备。一切安排妥当后，玄宗又从南内的兴庆宫移到北内大明宫。这天晚上，玄宗又把禁军首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叫来，让他集合六军，对将士们厚加赏赐，最后从皇宫马厩中选出九百余匹良马。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之中进行的。除少数心腹外，其余臣僚都不知内情。

十三日（乙未），黎明时分，玄宗带着贵妃姊妹、皇子、妃嫔、公主、皇孙和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信宦官、宫人一行悄悄从长安禁苑西面的延秋门出宫，向西南方向行去。由于临行仓促，来不及带走住在宫外的妃嫔、公主和皇孙了。当经过左藏库时，杨国忠要放火烧掉，不让其落人叛军之手。玄宗不忍："叛贼进城后抢不着东西，必定要加重对百姓抢掠，不如留给他们，不要再增加百姓困难了。"天渐渐大亮，早上，有的大臣像往常一样去上早朝，走到宫门前，仍听到计时的滴漏声，宫门的仪仗队也井然有序。当宫门被打开时，却见宫女慌慌张张从里面跑出来，大臣们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才发现皇帝已不知去向，宫内外顿时乱作一团。王公百官和百姓纷纷逃窜山谷，有的无赖涌人宫内和贵戚府第乘火打劫，还有人甚至骑驴上殿，又不知谁一把火点燃了左藏大盈库。奉命留守长安的崔光远、边令诚赶紧命人救火，杀了十几个抢劫者，把宫吏派到各处维持治安，才稍稍止住混乱。叛军开进长安后，崔光远与边令诚都投降了叛军。

玄宗一行人马西出长安，往北渡过渭水上的便桥，杨国忠怕被叛军追上，下令点火焚桥，玄宗说："大家都要避贼求生，不要

断了他们的生路。”于是让宦官高力士留下一些人，等灭了火再追赶队伍。又让宦官王洛卿打前站，通知沿途郡县做好膳食安排。将近中午，玄宗等人来到距长安西四十里的咸阳望贤宫，不料王洛卿与县令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好再派宦官四下征召，可是没有官吏和百姓响应。已经过了晌午，却没有搞到一点吃的，大家饥肠辘辘。玄宗让手下人杀了御马，折行宫的木头烧马肉聊解肚饥，人们不忍心下手。玄宗奔波了多半日，又饿又累，便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想起自己大半生在皇宫里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晚年却沦落到这般田地，不禁悲从心生，萌发了轻生的念头。欲就此了却一生。幸亏高力士及时察觉到玄宗的变化，他抱着玄宗的双脚，哽咽地劝说，才使玄宗放弃此念。这时杨国忠从街上买到几个胡饼，装在衣袖中送给玄宗。天将傍晚，村里老百姓陆续赶来，玄宗问百姓家里是否有吃的，请他们把饭菜拿来。不一会儿，百姓提蓝抬筐，送来了干粮，都是些寻常农户所吃的粗粮，还杂以麦豆之类。但人们早已饿不择食，玄宗让把干粮先给禁军将士吃，然后六宫及皇孙辈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得精光，肚子似乎还没全饱。

玄宗厚给送食物百姓酬直，并慰劳百姓。人们见皇帝一行如此狼狈，不禁感慨哭泣起来，玄宗也掩泣呜咽。有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早已不是一天的事了；也有人到宫阙揭发安禄山阴谋的，可是陛下往往把他们杀了。才导致安禄阴谋得逞，使陛下流寓出奔。由此看来，先王务在察访忠良之士以增加自己的聪明，确实是有道理的。臣还记得宋璟作宰相的时候，屡屡直言进谏，天下靠他才得以太平。但是后来的朝廷大臣以直言为讳，人人只知阿谀保位，因此陛下对宫外的事情一无所知。草野之民早知会有今日之事，但九重宫阙，深如大海，百姓区区之心，无缘上达。如果事情不是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这些作臣民的怎能见到陛下而向您倾诉呢？”唐玄宗听了

又羞又悔，连连说："这都是朕的不明智，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于是又好言慰抚百姓。

一会儿，主管膳食的官员端着饭菜送上，玄宗让随从人员先吃，然后他也吃了一些。又叫士兵四下分散到村子里找吃的。食毕，队伍集合继续前行。半夜时分，到达距长安八十五里之地的金城（今陕西新平）。县令早已不知去向，老百姓也都四散而逃。幸好村子里还有现成的粮食和炊具，士兵们自己动手做饭。随从人员开小差的不少，连玄宗身边的亲信宦官头目内侍监袁思艺也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驿馆中没有灯烛，人们摸黑找了一块地方，相拥挤着睡下，也顾不上长幼贵贱之分了。王思礼从潼关赶来，玄宗刚知道大将哥舒翰已被叛军擒获。遂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立即赴镇，收集散卒，作好东讨的准备。

十四日（丙申），唐玄宗一行来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随从扈驾的禁军将士们走得又累又饥，不禁埋怨起来，想到眼下的一切都是由那个平时骄横跋扈的宰相杨国忠招惹的，将士们情绪愤怒到了极点。

禁军首领陈玄礼多年来负责宿卫宫禁，尽职克守，很得玄宗信任。一次，唐玄宗在华清宫欲乘马出宫幸虢国夫人之宅，玄礼劝说："陛下未通知臣下，不可轻易外出。"玄宗听后果然不去了。又一次，玄宗在华清宫心血来潮要半夜出游，玄礼奏说："宫外是旷野之地，陛下若想夜游，也当有所准备才是。"玄宗为此而作罢。陈玄礼对皇帝忠心耿耿，他痛恨杨国忠祸国殃民的罪行。早在安禄山叛乱之初，陈玄礼就通过太子李亨的亲信宦官李辅国密告太子请诛杀杨国忠。原来准备在长安城诛杨，后因故未果。这时，太子和陈玄礼认为除杨的时机已经成熟，就由陈玄礼出而对将士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天子播迁流离，难道不是由杨国忠苛剥百姓，引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才招致了这场大乱吗？若是不诛杨国忠，向天下谢罪，何以平息天下的愤怨呢？"将士们齐声称是，纷纷响

应陈玄礼反杨的号召。

事有凑巧，这时正有二十几个吐蕃使者因为饥不得食，围住杨国忠的马诉苦。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话，禁军将士突然大呼道："杨国忠与胡虏谋反。"话音未落，有的将士就放箭射中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早知自己遭万人忌恨，眼见将士们愤怨已极，吓得滚下马来，逃进马嵬驿西门内。将士们紧追不舍，须臾间将杨国忠乱刀杀死，尸体被割成数块。将士用枪挑着杨国忠的首级来到了驿门外，又杀死了杨国忠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想要劝阻，喊道："你们怎敢害宰相！"话未说完，也被士兵所杀。宰相韦见素闻乱跑出门来，被乱兵打伤，血流了一地，幸亏有人喊："不要伤了韦相公。"他才免于一死。

将士们团团围住玄宗住处。玄宗听到外面喧哗声，忙派人打听，左右告诉国忠谋反，已被杀死。玄宗大吃一惊，但他马上镇静下来，柱杖步出驿门，一点没责备将士，反而好语慰劳，让他们收兵归队。不料将士不应，仍站住不动。玄宗让高力士问明情况，陈玄礼回答："杨国忠谋反，贵妃不宜再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闻听如五雷轰顶，他强忍悲痛说："朕自己来处理吧。"说完转身人门。他不忍回宫见贵妃，就拐进驿门内旁边的一条小巷里，头无力地靠在拐杖上，呆呆地站在那里，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使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宰相韦见素的儿子京兆司录参军韦谔见玄宗犹豫不决，就走上前劝道："现在众怒难犯，陛下的安危就在瞬间，愿陛下赶快下决心吧。"说着叩头直至流出血来。玄宗低头望一眼韦谔，接着长叹一声："贵妃常居深宫，怎么能知道国忠谋反？"高力士忙说："贵妃的确无罪，但是将士们已杀国忠，而贵妃还在陛下身边，他们怎敢自安呢？愿陛下仔细想想，将士安则陛下才能安呀。"玄宗知道自己虽身为帝王之尊，此时此刻是断然无力挽回爱妃生命了，他缓缓走进行宫，与贵妃相拥出了厅门，作最后的诀别。贵妃悲

不自胜，呜咽道："愿陛下多加保重，妾辜负了国恩，死无所恨，只是请求陛下让妾拜完佛再去。"玄宗肝肠寸断，只说了一句"愿妃子善地受生。"便让高力士引贵妃出去。顷刻间，杨贵妃香消玉殒，缢死在佛堂前梨树下，享年仅三十八岁。贵妃刚断气，从南方进献荔枝的快骑就赶到了。玄宗不禁长号数声，命高力士赶紧拿着贵妃平日喜吃的荔枝祭献。

一会儿，高力士命人用舆轿将贵妃遗体抬到驿庭，召陈玄礼等人来验看。陈玄礼见贵妃确已死亡，这才解胄释甲，向玄宗跪下请罪说："杨国忠败坏纪纲，种下祸根。使黎民涂炭，皇上流寓，如果不杀他，灾难就不会结束。臣等是为国家社稷着想的，请陛下恕臣假借圣旨之罪。"事已至此，玄宗只能引咎自责，顺水推舟："朕用人不当，近来也察觉国忠奸佞，有所觉悟，本来是想到蜀地后再清算他的罪行，今天将士们除了他，正合朕的心意，朕当重赏将士们。"玄宗让玄礼晓喻将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哗变的士兵这才安定下来，整理队伍继续西行。

杨国忠妻子裴柔和儿子杨晞，虢国夫人和儿子裴徽闻乱逃到陈仓（今陕西宝鸡），被追来的县令薛景仙士兵所杀。

唐玄宗事后叫高力士将杨贵妃遗体裹上锦衣，胸前放上香囊锦袋，埋葬在驿馆西面的一个小山坡下，即"马嵬坡。"

马嵬坡兵变后，玄宗一人携带少量扈从流寓至巴山蜀水，太子李亨则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长安收复后，玄宗回到京师，抑郁成疾，于宝应元年（762 年）四月初五日（甲寅）崩于神龙殿。享年七十八岁。（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18

《旧唐书》：《杨国忠传》、《杨贵妃传》、《王毛仲附陈玄礼传》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

张巡力守睢阳

张巡，邓州南阳（一说蒲州河东）人。聪悟有才干。博闻强记，读书不过三遍，即终身不忘。又熟悉兵法，擅长用兵。进士及第，天宝年间任清河令。为人重气节讲义气，常常倾财救济危困，名重一时。宰相杨国忠权势显赫，有人劝他趋奉国忠以求显达，被他断然拒绝。任真源令时，当地土豪华南金骄横不法，张巡依法将其镇压，被赦免的华南金余党莫不弃恶从善。而且张巡为政宽简深得民心。

安史之乱爆发后，谯郡太守杨万石投降安禄山，逼迫张巡西迎叛军。张巡至真源，选精兵千人，起兵讨叛，西行至雍丘（今河南杞县）与单父尉贾贲召募豪杰，同兴义举。

天宝十五载（756 年）二月，雍丘令令狐潮投降叛军，引兵攻打雍丘，贾贲迎战牺牲，张巡率兵苦战，击退叛兵从此统率贾贲余部，自称是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吴王李祇的先锋使，坚持守雍丘城。

三月初二日（乙卯），令狐潮与安史叛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率领四万兵向雍丘扑来，雍丘军民见敌人数倍于己，非常紧张害怕，没有信心御敌。张巡鼓励士兵说："贼兵仗着兵精马壮，有轻我之心，我们若出其不意袭击，叛兵必定惊溃，待其势力受挫，雍丘城自然可以保住了。"张巡命千余人守城，他亲自率领千余士兵，分成数队，打开城门直向叛兵冲去。敌营被冲溃，只好退兵。次日，叛军又来攻城，摆上百余门大炮轰城。城堞被毁平，

张巡在城上立木栅拒敌。敌人密密麻麻地开始登城，张巡命士兵点着浸过油的藁草向叛兵头上扔去，迫敌撤退。张巡抓住战机进击，与敌人周旋达六十余日，大小三百余战，雍丘守城士兵食不解甲，裹伤再战，彻底击退了叛兵进犯，并俘获二千人，声势大振。

五月，令狐潮又带兵围城，他早与张巡相识，就在城下展开攻心战，劝张巡投降，说："现在大势已去，足下在这儿坚守一座危城，到底为了什么？"张巡反驳道："您平生以忠义自许，如今的行为，忠义何在？"令狐潮惭愧满面。在张巡拒敌守城期间，安禄山兵已攻下潼关，唐玄宗仓惶逃往西川，令狐潮再次劝降。张巡手下有六员大将，官阶开府、特进。他们以兵力不敌，朝令不通，也劝张巡归降。张巡表面答应下来。转天一早，张巡在堂前挂上皇帝画像，率将士朝拜，将士们感悟地哭泣。这时，六员劝降大将被带到堂前，张巡以大义斥责其怯敌欲降，然后将他们斩首。从此将士们守城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雍丘城由于长期被围，城中粮绝矢尽。张巡侦察到叛军有几百艘运粮盐船往雍丘城开来。马上在城南埋伏下人马，趁令狐潮倾军攻城之际，张巡悄悄派勇士渡过河抢回一千石盐米，缓解了缺粮危机。接着张巡又向敌人"借箭"。命令士兵扎了一千多个藁草人，给它们披上黑衣，远远望去，就像真人一般。一天夜里，这一千多个草人用绳子缒到城下，叛兵不辨真假，对草人一阵猛射，箭矢如雨。当搞清中计后，唐兵已得到数十万矢。过了些时候，张巡又夜缒士兵，叛兵以为仍是草人，不再防备。只见下城的五百勇士们以破竹之势攻到贼营，叛兵顿时大乱，慌忙逃窜，被唐兵追赶十余里。令狐潮气急败坏，又羞又恼，增派士兵围城。张巡屡屡出奇制胜，以千余名士兵制服数万叛兵，迫敌退兵陈留（今河南开封南）不敢轻易围城。

十二月，令狐潮见久围雍丘城不下，于是在雍丘北筑城扎寨，

作长久围困之势，企图断绝雍丘的粮援。这时雍丘东北的鲁郡（今山东兖州）、东平郡（今山东东平北）、济阴相继失陷，叛将杨朝宗帅步骑两万袭击宁陵（今属河南），切断张巡的后路。张巡分析局势，感到雍丘是小城，储备又不足，一旦敌人大举围攻，必难坚守，决定放弃雍丘移兵东守宁陵，张巡诈降列队撤至宁陵。宁陵东与睢阳（今河南商丘）毗邻，两地相距仅四十五里。张巡带领三千名士兵，三百匹战马与睢阳太守许远、城父令姚訚会合。

张巡、许远与杨朝宗兵在宁陵城西北展开激战，昼夜交锋数十回，大破叛兵，杀敌一万多人。杨朝宗狼狈不堪连夜败逃。

肃宗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为鼓励士兵杀敌，张巡派使臣与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联系，请授空名告身（委任状）与赐物，酬劳立功将士。但是李巨仅给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一点不给赐物。张巡写信责问，李巨竟不理会。

安史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谋士严庄和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自立为帝。派遣叛将尹子奇任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与唐兵争夺睢阳。睢阳位于汴河沿岸，是联结关中与江淮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叛兵为占据江淮财赋之地，派重兵围攻睢阳。至德二载（757 年）正月二十五日（甲戌），尹子奇率领妫、檀及同罗、奚兵共十三万向睢阳发起猛攻。张巡接到许远的告急自宁陵引三千兵人援。与许远兵合计共六千八百人，迎战叛兵。张巡身先士卒，在前线督战，不分昼夜。有时一天竟交战二十个回合，唐兵经十六天艰苦鏖战，共擒获叛将六十多人，杀敌二万余。士气倍增。许远佩服张巡指挥有方，诚恳地对他说："许远为一儒生，不习兵法，您智勇双全，就请您来主持军务吧。"张巡爽快应允。从此，许远负责调发粮饷、修理武器、加固城防诸事，张巡则带兵打仗，统筹战斗方略，二人配合默契，使叛军不能得逞。

三月，尹子奇又带兵大举攻城。张巡在阵前对将士们感慨道："我受国恩，已准备为国而死，所痛心的只是诸君为国捐躯杀敌，

却得不到应有酬勋。”将士听了此话无不感动激奋，纷纷请战，群情激昂。张巡命杀牛宰羊，犒劳士兵，然后举城内之兵迎战。

叛军正自嘲笑唐军兵寡时，睢阳城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向敌人冲来。只见张巡一马当先，扛着旌旗跑在最前面，各位将领也不甘落后，率兵冲杀，唐兵一鼓作气，斩杀叛将三十多人和三千士卒，直把叛兵逼退至数十里外，叛军大溃。第二天，尹子奇重整队伍又来攻城，张巡再次亲自挂帅，与敌昼夜拼杀三十余回合，屡次摧败敌人。但是叛军仗着兵多人众，仍旧攻城不辍。

五月，尹子奇加紧对睢阳城围攻。张巡避免与强敌正面交锋，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以智取胜。他让士兵在夜里鸣鼓整队，做出一付要出击的样子，叛兵通宵戒备。黎明时分，城中的鼓声渐渐微弱，唐兵也都忽然不见了，战备一夜的叛兵早已疲惫不堪，看到城里已偃旗息鼓，于是也解甲休息。就在这时，只见城门大开，张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名大将各带五十名骑兵冲到叛军营前，敌营大乱，五十多名将领顷刻刀下毙命，五千多士卒丧生。张巡要临阵斩尹子奇，只是没有人认识他。张巡心生一计，削藁为镞，射进叛军营内，中箭的士兵误以为唐兵矢尽，连忙向尹子奇报告，尹子奇大喜过望，亲自出马督战。张巡命南霁云一箭射去，正中尹子奇左眼，他疼痛难忍，慌忙鸣金收兵，败退而逃。

七月初六日（壬子），尹子奇再次征兵数万围攻睢阳。当初，张巡储蓄了六万石粮食，可够城中军民一年的支付使用。虢王李巨命把一半粮食拨给濮阳、济阴二郡，张巡据理力争，却没有结果。济阴得粮后投降了叛军，睢阳城却由于长期被围而开始断粮。将士每日只供应一合米，只好杂以茶纸、树皮充饥。由于缺粮，将士阵亡也不能补充，士兵减员，仅剩一千六百人。长期的苦战，士兵饥不得食，病不得医，战斗力大为削弱。叛军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给养充足，又可随时征兵补员，得以不断攻城。这次叛兵见守

城力量减弱，开始架云梯登城，张巡一面加固城防工事，一面令士兵在城墙上凿了三个洞，待云梯接近城时，第一个洞中伸出一根顶端带铁钩的大木，钩住了云梯，使之不能后撤；第二洞的木棍则顶住云梯使其不能靠城。与此同时第三个洞伸出的木棍顶端挂着一个燃烧着大火的铁笼，将云梯从中烧断，梯上士兵也全被烧死；叛军又用钩车钩塌了城上棚阁，张巡用大木安上连锁和大铁环，毁坏钩车；叛军造木驴攻城，张巡命士兵往木驴上浇熔化的铁汁；叛军又在城西北用土囊和木头搭台阶攻城，张巡白天不理会，每天晚上让士兵从上面扔下松明，干草等易燃物。这样干了十几天，竟未被发觉。随后，张巡派兵出击，顺手点燃了台阶，熊熊大火把台阶完全焚毁了。叛军苦心经营的攻城计划一个个被张巡破解，最后，尹子奇也不得不佩服张巡用兵神奇，暂时停止攻城，在城外挖了三道深濠，并设立木栅，准备长期围城。

城中唐兵只剩下六百人，张巡和许远分兵而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二将与士兵共患难，同食茶纸。张巡对叛将展开攻心战术。一次，叛将李怀忠在城下，张巡问他在叛军中呆了多长时间，父祖是否做官。李怀忠一一回答，张巡对他晓以大义说："您家世代做官，食天子俸禄，为何要跟随叛贼，和唐兵作对呢？"怀忠心有所动，但说："您所说不差，我从前做朝廷将领，曾多次奋力死战，最后竟被俘虏，看来这是天意啊。"张巡说："自古以来谋反叛逆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一旦事平，您的父母妻儿难免被杀，难道您就忍心让他们受戮吗？"李怀忠掩泣面去，不久就带着数十人投降了唐兵，被张巡劝说投诚的前后有二百多人，他们都为张巡效力杀敌。

当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都拥兵不救睢阳，城里日益困难。张巡不得已派大将南霁云率三十骑兵突围向临淮的贺兰进明求援。南霁云等人奋力冲破敌军阻拦，有两名骑兵阵亡，南霁云飞马狂奔到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贺

兰进明不欲出援，说："睢阳城失陷已是意料中的事了，现在去救兵还有什么用。"南霁云慷慨陈词道："睢阳城若是失陷，霁云愿意以死向您谢罪。退一步说，睢阳不保，也要殃及临淮，两地如皮毛相依，怎能见死不救。"原来宰相房琯与贺兰进明不和，让贺作河南节度使，又派许叔冀做贺兰进明的都知兵马使，两人都兼御史大夫。许叔冀自恃士兵精锐，官职与又与贺兰进明相同，不甘受其节制。贺兰进明对许叔冀十分提防，怕分兵救援时遭到他的袭击，再加上对张巡、许远心存嫉妒，因此不愿救援。但他十分欣赏南霁云的勇敢，想把他留在身边。于是备下丰盛的酒宴款待，引南霁云入座。南霁云痛不欲生说："霁云昨天离开睢阳的时候，守城将士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到粮食了，我虽然饥肠辘辘，但一想到忍饿守城的将士们，难以咽下这美酒佳肴。您坐拥强兵，眼看着睢阳陷没，而无半点分灾救患的意思，这岂是忠义之士的所为？"南霁云越说越激动，伸手拔出身上利剑，"咔嚓"一声切下自己一个手指。"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所交的使命，就留下一节手指作为凭证，也好回报主将。"在座的人都被南霁云行为震惊，有的将领感动地哭了起来。

南霁云见贺兰进明终无出师之意，便立即告辞，临行时他张弓搭箭射中佛寺的砖墙，恨恨地说："如果我能破贼回来，一定要消灭贺兰进明，这箭就表示我的决心。"霁云飞奔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带步骑三千回救睢阳，一路边打边行。至城下时，被敌人发觉，一场激战后只剩下千余人。是夜大雾，张巡从城外激战中听到南霁云的声音，于是开城门将其接入。城中守兵知救援无望，皆失声恸哭。叛兵见城援断绝，更加紧攻城。

进入十月，睢阳城弹尽粮绝，岌岌可危。有人建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在一起商议，认为睢阳是江淮的屏障，一旦失守，叛军长驱南下，江淮必不能保。而且士兵饥疲交加，撤退也十分困难，再者睢阳城周围还是唐军，不如竭力保城等待援兵。当下张

巡动员仅存的四百士兵，人人做好了与城同存亡的准备。城里茶纸也吃完了，开始吃马，马尽之后，又罗雀掘鼠，最后连鼠雀都吃尽，于是张巡杀爱妾、许远杀家奴让士兵食肉果腹。

初九日（癸丑），叛军再次攻城，将士饥病难支，已无缚鸡之力。张巡见大势已去，拱手向西而拜说："臣力已经枯竭，不能保全此城，生既不能报答陛下，死后也要做厉鬼杀贼，"睢阳城终于失陷，他和许远等人被俘。尹子奇问他："听说公每次作战，都把眼眶裂开，牙齿咬碎，为什么呢？"张巡回答："我志在吞掉你们这些叛贼，只恨力不从心！"尹子奇用刀撬开他的嘴，果然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张巡大骂道："我为君父而死，强似你们这些依附叛贼，猪狗不如的人！"尹子奇虽然被骂的很恼怒，但也佩服他的气节，不想杀他。周围人劝道："张巡是个守节的人，终究不会为我们所用，况且他很得士心，留下终是后患。"尹子奇又劝降南霁云，张巡大呼："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矣，不可不义而苟活！"霁云微笑点头。张巡、南霁云、姚訚、雷万春等三十六将同日被杀。许远押到偃师（今属河南）也不屈而死。张巡死前镇定自若，容貌不改，享年四十九岁。

张巡用兵不拘泥古法，常常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以少胜多。每临战，他身先士卒，遇有士兵气馁后退时，他总是说："我不离开战场，你也赶紧杀敌。"所以将士没有不奋力争先的；他以诚待人，体恤士兵，城中数万兵民被他问过姓名的，都一一记在心里；又赏罚公允，号令严明，与将士同甘共苦，所以将士都乐于为他拼死守城。

张巡、许远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以不足万名的士卒，抗击十余倍敌人，前后大小战四百多次，杀敌十二万人，抵抗了叛军的反复围攻，坚守睢阳城达十个月之久。保卫了江淮财赋。虽然睢阳城最终失陷，然而十月后叛军在西线已全线崩溃，无力南下。睢阳保卫战维护了江南安全。正如时人李翰所说，叛贼

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得以保全，全仗张巡之力。没有张巡，就没有睢阳，无睢阳，也就无江淮了。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17--220

《新唐书》：《张巡传》、《许远传》

《旧唐书·张巡传》

《全唐文》卷43《进张巡中丞传表》（李翰）

肃宗收复两京

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叛兵迅速攻下洛阳、长安（今陕西西安）二京，唐玄宗仓惶奔蜀避难，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西），愤怒的将士杀死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逼使玄宗缢死杨贵妃。六月十五日（丁酉），即马嵬事变第二天，玄宗一行起程西行。父老乡亲遮道挽留，恳切地对玄宗说："宫殿，是陛下居处，陵寝，是陛下坟墓。今天陛下舍此欲向何处？"玄宗驻马良久，羞愧难言，最后决定把太子李亨留下安抚百姓。大家又七嘴八舌地对太子说："至尊既然不肯留下，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随殿下东行破贼，收复长安；若殿下与至尊都去了四川，那么谁来做中原百姓之主呢？"不一会儿，太子身边就聚集了数千人。李亨推辞道："至尊远涉险阻，我怎能忍心离开他呢，况且还没向他辞别，现在我要立刻追上父皇，听取他的意见。"说完作出上马要走的样子。李亨之子建宁王李倓、广平王李俶和宦官李辅国劝阻道："叛胡举兵向阙，四海分崩，若不顺乎民意，谈何复兴社稷！现在殿下执意要随至尊至蜀，叛兵一旦烧毁栈道，中原之地就要拱手交给叛贼了。民心涣散，难以复合，到时再想收复就不可能了。如今上策是征集西北守边之兵，与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转危而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再迎至尊，岂不是天下最大的孝。何必要为区区儿女之情而贻误大事呢？"李亨的推辞本就不坚决，听他们这样劝说，也就不再坚持。而派李俶飞驰禀告玄宗。玄宗在前方

久等太子不至，派人去打听。得讯后，玄宗长叹一声道，“这是天意。”于是拨出后军二千人及上乘的飞龙厩马给太子，又嘱咐将出发的将士说：“太子仁孝，可奉事宗庙，你们要好好辅佐。”又勉励太子，不要牵挂自己，还要宣旨传位给李亨，被李亨推辞。

太子留下后，举棋不定，不知到何地去建立讨叛基地为好。广平王俶问大家：“天色已晚，此地不可久留，你们说说到哪儿去？”众人相视无言。李倓建议说：“殿下曾做过朔方（治今陕西靖边县）节度大使，我多少记住些每年来拜见殿下的将吏姓名。如今河西，陇右之兵全被叛兵击败，家属多陷贼中，军心必受影响，有可能滋生异图。朔方军则不然，一来朔方道近，且兵强马壮，二来河西行军司马裴冕是衣冠名族，对朝廷不会有贰心。叛军刚入长安，正忙于掳掠，想来还无暇四出略地，我们应立即赶到朔方，把它作为反攻的基地。”大家认为很有道理，决定北上。

太子一行从奉天（今陕西乾县）北行，一夜急行军三百里，抵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士卒、器械损失大半，随从人员不过数百。新平太守薛羽弃郡逃命，被抓住斩杀。十七日（乙亥），又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太守徐瑴正准备逃跑时被杀。次日，行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彭原太守李遵出迎，并献上衣粮等物。太子又召募数百名士兵。继续前行，转天到达平凉（今宁夏固原），这里有数万匹监牧马，又募得五百士兵，军势逐渐振作恢复。于是暂且在此住下。

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等人，得到太子到达平凉的消息，便聚在一起商量，他们认为平凉地处偏僻荒凉，不是屯兵之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兵众粮足，若迎太子到此，北可召集守边诸兵，西可发河西、陇右劲骑，南向则可安定中原，是养精蓄锐，组织反攻的理想基地。当即由李涵奉笺前去平凉拜见太子，并带去朔方士卒、兵马、谷帛等军需的清册让太子过目，太子大喜。这

时河西司马裴冕也正赶到平凉，劝太子驻军朔方。太子采纳他们的建议，决定立即移驻朔方。

杜鸿渐留下陈少游修治宫殿、做迎驾的准备，他与崔漪亲自到平凉迎接太子。劝太子说："朔方，是天下劲兵聚集之地，如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各地郡县大多坚守拒贼等待唐廷兴复。殿下在灵武理兵，聚集力量，一旦移檄四方，南下反攻，收揽忠义，则定能讨平叛贼，收复失地。"太子听了很振奋，七月初九日（辛酉）太子一行到达灵武。陈少游大兴土木，修治宫室，一切仿效禁中。太子命人撤去不必要的铺张，表明以兴复社稷为重。

裴冕、杜鸿渐不断上笺，劝太子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照例推辞不允。裴冕等人说："将士都是关中之人，日夜盼望回乡，他们不顾崎岖艰辛而跟随殿下远涉塞北，就是希望能立尺寸之功，以便光荣还乡。若一朝离散，不可再集。愿殿下勉励众心，为社稷考虑！"太子这才在灵武城南楼即位，在战乱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朝廷。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徙治安化（今甘肃庆阳），以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时值草创时期，文武官员不足三十人，有的武将不遵守朝章约束，非常傲慢，大将管崇嗣在朝堂上背阙而坐，谈笑自若，没有人臣之礼。监察御史李勉上奏弹劾，肃宗鉴于正处非常时期，宽宥了他。虽然如此，总算有了一个号召天下反攻的政权班子，归附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与此同时，安史叛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忙于抢掠，在战略上再无进展。

叛军攻下潼关后的十天，安禄山才派将孙孝哲带兵进入长安。并进行一番布署：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安思顺奉命屯驻苑中，以镇守关中。叛兵气焰正炽，西面威胁到汧（今陕西陇县南）、陇；南面侵扰到长江、汉水一带；北面占据了河东

（今山西省）大半。只因叛将多是粗猛无远略之辈，以为攻下长安，便可以高枕无忧，因此，整日纵酒声色，无西出进击之意，才使玄宗得以安全入蜀，肃宗北上从容即位。

安禄山宠任孙孝哲，让他监视关中诸将。孙孝哲残忍嗜杀，安禄山命他搜捕百官、宫女等，每抓到数百人，就押送到洛阳。孙孝哲大杀皇室及杨国忠、高力士亲信。霍国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在崇仁坊被刳心，祭祠安庆宗。扈从玄宗西奔的文臣武将的家属，凡是留在长安的，几乎无一幸免，一时血流满街。安禄山在占据长安后，下令大索三日，老百姓家产被抢掠一空。又下令府县推问搜捕，严刑拷打，长安经历了一场浩劫。人民不堪忍受叛军骚扰，人心思唐。自肃宗从马嵬北上以后，民间就相传太子北上征兵要来收复长安，长安老百姓日夜盼望唐兵反攻。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常常不知从哪传来“太子率大军来了！”的喊声，弄得叛军胆颤心惊，成了惊弓之鸟。只要一望见北方卷起烟尘，叛兵就吓得准备遁逃。京畿豪杰趁机杀贼官吏，与官军遥相呼应。叛军所控制的范围日见缩小，其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南不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北不过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唐廷仍控制着江淮漕运线，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四川与灵武。双方力量不断发生着变化。

八月十四日（丁卯），到达蜀地的唐玄宗不知太子已经即位，向天下发布一道任命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等内容的制令。当初潼关失守后，人们不知皇帝去向，因而人心惶惶，如今见到制书，坚定了讨叛的信心。

肃宗在灵武召来了隐居颍阳（今河南登封）的李泌。李泌素以才思敏捷而闻名。肃宗做太子时，与他交往甚密，玄宗见此，欲拜为官，被李泌推辞，表示更愿意与太子做布衣之交。太子称他为先生，后因被杨国忠排挤而隐归。肃宗见到他十分高兴，与他出则联辔、寝则对榻，事无巨细都要与之商量，并要拜他为相。李

泌推辞说："陛下以宾友待我，这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要屈我的志呢？"肃宗不好再勉强。

一次，肃宗与他同车出行，士兵们窃窃私语道："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那位是山人。"肃宗将这些议论告诉李泌，劝道："现在正值艰难之际，朕不敢用官爵委屈先生，但请穿上紫袍（唐朝高品官衣朱紫）以绝众人疑惑。"李泌只好换上官服人谢，肃宗趁机又说："既然穿了官服，岂可没有名称。"说着从怀中取出敕命，当即授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仍要推辞，肃宗说："朕不敢以卿为相，一旦讨平叛贼，任卿自行高志。"李泌这才接受了官职。当时元帅府设在禁中，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与其日夜呆在府中处理军国大事。李泌想到诸将直接向皇帝奏陈军事，有可能因为畏惧有所保留，万一有小差，则会铸成大害，因此向肃宗建议，由他与李俶拆阅四方奏报，听取将领的汇报，要事再奏闻，以免贻误大事。肃宗同意了。当时军旅事繁，各地情报昼夜不停送到府中。李泌和李俶掌管着禁中钥匙，先行拆阅奏报，有十万火急的，则立即隔门奏呈肃宗，保证朝廷能高效率地处置军政大事。

李泌尽心尽意地辅佐肃宗，他富于韬略，政治上有远见卓识，为朝廷出谋献策，协调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关系，增加了朝廷的凝聚力。

例如，当初肃宗想任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倓英武有才略，随从父亲从马嵬驿北上，他亲自率领骁勇之士保护肃宗，十分得力；对父亲的日常起居也挂在心上，有时肃宗过时未吃饭，他常难受地掉泪，这使肃宗感到十分欣慰，加上他也受将士们的爱戴，于是想让他当元帅，统率诸军东征。李泌不同意，因为李倓是肃宗第三子，长子和未来的太子应是广平王李俶。李泌劝肃宗说："广平王尚未正式继太子位，现正值艰难时刻，元帅是众心所归之位，若建宁王建立军功，陛下即使不想让他作储君，那些

随同立功者岂肯答应！当初太宗与上皇（玄宗）之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肃宗这才改任广平王为元帅。事后，李倓得知此事，很感激李泌顾全大局。

肃宗作太子时，曾受到奸相李林甫的迫害，对其恨之入骨，一次谈话时，肃宗告诉李泌，准备给将领下一诏敕，将来收复长安时，要挖开李的坟墓，焚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李泌却说：“陛下正在安定天下，为何与死者过不去呢。李林甫枯骨能知道什么，却白白显示陛下不弘扬圣德。而且依附叛贼的，都是陛下的仇人，若知陛下此举，恐怕阻断其自新之心。”肃宗不悦说，“当初此贼不择手段陷害朕，使朕朝不保夕。朕得以保全，全仗老天保佑。李林甫这贼也恨卿，只是没将卿害死而已，为何卿还要替他说情？”李泌说：“臣当然记得这些，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朝失意，流寓巴蜀，南方潮热，上皇年事已高，若闻陛下此意，定会内惭不已，万一感愤成疾，人们会认为天下之大，而陛下却不能安置自己的父亲……”李泌一席话未说完，肃宗早已是泪流满面，仰天拜道：“朕思虑不及此，是天让先生启发了我。”然后抱着李泌欷歔不止。肃宗政权在李泌尽心辅佐下，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大多数人，扩大了平叛的阵营。

肃宗命令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带兵五千来援。嗣业与节度使梁宰商议，企图缓兵以观势变，保存实力。绥德府折冲段秀实责备嗣业道：“岂有君父告急而作臣子拖延不至的道理，您常自诩为男子汉大丈夫，以今天行为来看，却象一个眼光短浅的小女子。”李嗣业惭愧万分，随即请梁宰如数发兵，让段秀实做副将，带队前往灵武。行军司马李栖筠也奉诏调安西七千精兵赴援。

这时，河北诸郡仍为唐守，平原太守颜真卿将奏表封在蜡丸里，送到灵武，肃宗任其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并致赦书，也封于蜡丸中传送。颜真卿将朝廷消息传到河北诸郡及河南、江淮等地，从此诸道得知灵武建立了新政权，报国之心更加坚定了。

七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五万士兵从河北赶到灵武，肃宗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河北节度使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同任相职。光弼又调河北景城、河间兵五千人马赴太原镇守。灵武军威渐盛，人人心怀兴复之望。肃宗又派人到达蜀地与上皇联系，玄宗这才知道太子已登基，于是下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军国大事皆由皇帝裁决，再奏朕知。"并派宰相韦见素、房琯带着传国宝和玉册到灵武传位。

肃宗一方面用朔方兵，一方面又向少数民族借兵，任命豳王李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部将仆固怀恩同出使回纥搬兵。又发拔汗那兵，许以厚赏，使其随安西兵入援。李泌建议离开灵武，称兵彭原，等西北少数族兵到后，再南下扶风。那时，江淮调运的物资也可到达，保证军需供给。肃宗同意了。九月十七日（戊辰）肃宗带领人马离开灵武南下，二十五日（丙子）抵达顺化（今甘肃庆阳）。这时，韦见素等人从成都赶来，奉上宝册。肃宗因韦见素曾依附过杨国忠，所以对他很冷淡，房琯是名士，谈起军国大事来常常慷慨激昂，肃宗十分信任他，要事均与他商议，房琯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其他宰相则拱手相让。

十月初三日（癸未）肃宗一行从顺化来到彭原。江淮租庸使第五琦到此晋见肃宗，建议用江淮租庸买金帛类轻货，沿长江、汉水入汉口，然后由汉中王李瑀陆运到扶风赡军。肃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他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第五琦擅长理财，实行榷盐法，增加了政府收入，从经济上增强了灵武政权平定叛乱的力量。

宰相房琯上疏，请求亲自带兵收复两京，肃宗求胜心切，在出兵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批准了房琯请求，任命他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房琯又请自选助手。于是，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李揖、刘秩二人均是书生，不熟军旅之事，房琯却把军务全部托给二人，并夸口说："贼曳落河（少数民族语壮士之

意）虽多，怎能敌我刘秩！”

房琯把全部人马分为三军：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攻，刘贵哲率队中军，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进击，北军由李光进率领，从奉天东进。

十月二十日（庚子），队伍由中军、北军打前锋来到长安西北面的便桥，第二天，二军便在咸阳县东的陈涛斜与叛将安守忠相遇。房琯平日里喜欢夸夸其谈，却缺乏实战将略之才。他照搬古兵书上的车战法，摆开了二千乘牛车居中、两边夹以步兵和骑兵的阵势。叛军顺风鼓噪，牛群闻声震骇。叛兵趁唐兵阵法已乱之际，纵火焚烧，唐兵顿时大溃，人畜践踏死伤四万多人，侥幸存活的只剩几千人。二十三日（癸卯），房琯又亲率南军投入战场，结果又败。杨希文、刘贵哲投降了敌军。

唐军组织的第一次收复两京的军事活动以失败而告结束，肃宗大为恼怒，要治房琯之罪。李泌极力劝说，肃宗才息怒。这时，史思明又带兵攻陷河间、景城、乐安、平原、清河、博平等河北诸郡县，使本不占优势的唐军处境更加被动。面对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肃宗担忧地问李泌：“如今敌强如此，何时才可平定？”李泌全面分析了天下形势，回答道：“臣观察到叛兵把从各地抢获的子女金帛，全部都运到范阳（今北京），这岂有雄据四海之志？如今死心塌地跟随安禄山造反的，只有高尚等数人，其余不过是被胁迫。臣推算，不过两年，天下则可平定。”肃宗请详细分析。李泌接着说：“安禄山手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我军若令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把住西人河北的军事要口，那么驻守河北的史思明、张忠志就不敢离范阳、常山一步；郭子仪率兵从冯翊（今陕西大荔）人河东，威胁潼关，使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此即以两军牵制其四将。这样一来，安禄山身边的军事力量，只有阿史那承庆一支了。子仪可坐镇河东，勿取华阴、潼关，使来

往两京之间的道途通畅；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相配合出击。叛兵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他们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首尾不得相救。我军则以逸待劳，敌至则避其锋芒，敌去则击其不意，不攻城、不阻遏道路。第二年来春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光弼军成南北犄角之势，共取范阳，倾覆叛军巢穴，势必造成他们退无所归，留则不安的局面，届时我军四面合击，万马齐发，必能一举灭敌。”李泌的战略计划是基于对客观现实正确认识而作出的，因而是切实可行的，肃宗对此深表赞同，但由于他急切想收复两京，因此作战部署并没按李泌建议而行，致使安史在退回河北后再叛，朝廷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至德二载（756年）正月，正当肃宗政权准备重新聚集力量进攻长安时，安史内部发生了内讧。

安禄山患有眼疾，自叛乱以来，逐渐加重，这时已几近失明，而且又染“疽病”，性情日益暴躁。左右服侍他的人，稍不如意，轻则箠挞，重则残杀，弄得人人自危。他称帝后深居宫中，大将难见其面，有事只能向他的亲信严庄禀报。严庄掌握着军政大权，但这时也不免受安禄山箠挞，对其产生怨恨，于是找来安禄山儿子安庆绪密谋商议。原来安禄山宠妾段氏所生子名庆恩，安禄山欲以他代庆绪为继承人，安庆绪怕被父亲害死，经常不知所措。严庄利用安氏父子之间的矛盾，挑唆说：“事情已经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了，机不可失。”庆绪说：“兄想干什么事，我敢不敬从。”严庄见庆绪已点头答应，又叫来安禄山贴身宦官李猪儿，劝他说：“你被打了多少次，还数得清吗？不举大事，早晚难免一死。”李猪儿是契丹人，十几岁时就服侍安禄山，据说安禄山亲手阉割了他。因为他聪明伶俐，很得安禄山宠任。安禄山腹大出奇，自己无法穿衣系带，每次都由李猪儿顶着他的大肚，才能穿好衣服。然而，正因为他与安禄山形影不离，挨打的时候也最多。所以，严庄一说

出来，他立刻答应。

初五日夜，严庄、安庆绪各执兵器来到安禄山卧房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下，照着正仰面入睡的安禄山大腹便砍，左右侍奉见到这一幕，都吓呆了，无人敢动，安禄山从剧痛中惊醒，伸手便摸床边佩刀，发现刀早已被人拿走，气得他摇着帐竿大叫："一定是家贼。"不一会儿，肠子流出数斗的安禄山就已气绝身亡。严庄等人拥到屋内，在床下挖了个深数尺的大坑，将裹着毡布的安禄山尸体草草掩埋，并警诫宫中不得泄密。

第二天一早，严庄便对外宣布，安禄山病危，传旨安庆绪为太子，随即即皇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给安禄山发丧。安庆绪性情昏懦，说话语无伦次，严庄怕他不能服众，不让他接见朝臣。自己独揽大权，安庆绪也乐于纵酒为娱。这场政变，削弱了叛军的力量。

与洛阳城内讧的同时，河北的叛将史思明、蔡希德、高秀严、牛廷介分别从博陵、太行、大同、范阳率兵十万，围攻太原。镇守太原的是李光弼部队，当时精兵皆留在朔方，守城的多是缺乏训练的士兵，人数不到一万。史思明已作好了轻取太原、然后长驱直入进攻朔方、河西、陇西的打算。太原情形危急，诸将请求修城防守。李光弼却说："太原城周有四十里，敌人将至而兴役，是未见敌而先自困！"他带领士兵和城内百姓在城外挖壕沟，又赶造了几十万块土坯，叛军攻城时，李光弼命令将士在城墙上垒土坯，哪里被攻坏了就立即堵上。史思明只好派人去取攻城器械，以三千蕃兵护送，但途中为李光弼兵全歼。

史思明人多兵众，围太原却月余不下，于是他挑选一些骁骑做游兵，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无奈光弼的军令严整，防备森严，令叛军无从下手。光弼还常常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以攻为守。例如，在敌人脚下挖地道，把敌人从地道中拖到城中斩杀，使叛兵胆颤心惊，走路紧盯着地面；又自作飞石大炮，一发即能击毙二

十余人，迫敌退营到数十步外；光弼还施计诈降，事先在敌营地下挖通了地道，然后用木头支撑起来。到双方约定时间，部将带着数千人出城伪降，叛兵正喜滋滋等着纳降，不料突然营中地陷，死伤千余人，叛兵乱作一团，唐军鼓噪出击，擒杀万人，大挫叛兵。两军正处胶着状态，安禄山死讯传来，安庆绪命令史思明归守范阳，蔡希德留下继续围城。二月，李光弼率领敢死队主动出击，大破蔡希德兵，斩首七万余级，蔡希德狼狈带兵溃逃，解除了太原之围。

在李光弼坚守太原同时，郭子仪也积极筹划攻取战略要地河东，这对收复两京有重要意义。郭子仪派人潜入河东，与陷入叛军的朝臣取得联系，作迎接唐军的内应。接着，郭子仪自洛交（今陕西富县）引兵至河东，并分兵攻取冯翊。

二月十一日（己丑）夜，河东司户韩旻等人翻越河东城迎接唐军，杀敌近千人。守城的叛将崔乾祐率兵抵抗，被唐军击溃，唐军斩敌四千，并俘虏五千，攻下了河东。

在此之前，肃宗得知安西、北庭及西域拔汗那、大食诸国兵已来到凉州（今甘肃武威）、鄯州（今甘肃乐都），便于正月十五日（甲子）启程南下，二月初十日（戊子）抵达凤翔，十天内，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云集凤翔，江淮租庸调物资也运至洋川、汉中。长安老百姓闻得肃宗在凤翔的消息，纷纷前来投奔效力，日夜不绝。准备工作大致就绪后，李泌建议肃宗按原订战略计划行事，派安西及西域兵沿边塞进军东北，从檀州（今河北密云）南取范阳。肃宗问道："如今大军会集，物资充足，理应兵锋直捣长安，为何要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这样不是太迂缓了吗？"李泌分析说："我军若直取两京，定能一举成功。然而叛兵还会卷土重来，使我方陷入困境，这不是久安之策。"讨叛的主力，是西北边防兵和少数族兵，他们耐寒冷而畏暑热，若乘他们刚到的锐气，去打叛兵已老之师，定能取胜。然而，两京已入晚

春，气候转热，叛兵收拾残众，遁归老巢，官兵不耐潮热，盼归西北，即使强留也是留不住的，那时叛兵已休养生息，一旦唐兵撤走，他们定会乘隙而人，再占两京，这样一来，结束战争就是很困难的事了。不如先用兵于寒乡，端其巢穴，切断叛兵归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肃宗太急于收复两京，寄希望于速战速决，没有采纳李泌的正确战略，以后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李泌所料 。

肃宗命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军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和王难得分别扎营于武功的东原、西原二地。二月十九日（丁酉），叛将安守忠攻武功，郭英乂交战失利，王思礼诸军被迫退守扶风。叛军游兵已到达离冯翔五十里的大和关，凤翔唐军立时戒严警备。

二十二日（庚子）郭子仪派其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南渡黄河袭取潼关，一举破敌。潼关为长安东面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安庆绪派兵回救，唐军死伤万余人，李韶光、王祚力战而死，大将仆固怀恩抱着马头浮渡渭水，退保河东。三月，安守忠率领二万骑兵进犯河东，被郭子仪击退，稳定了河东局势。

四月，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令其带兵奔赴凤翔，作好进攻长安的准备。郭子仪带队行至三原北（今陕西三原东北）时，遇到叛将李归仁的五千铁骑的阻击。郭子仪军迅速将其击溃，来到西渭桥与王思礼军会合。进至潏水西岸，迫近长安。安守忠、李归仁军屯于京城西面的清渠。两军对峙七天，互不交手。五月初六日（癸丑），安守忠诈退，郭子仪命全军追击。叛兵九千骁骑摆出了长蛇阵，首尾分成两翼，包抄夹击而来，唐军大败，军资武器几乎弃尽，被迫退守武功，郭子仪只身至凤翔请罪，降为左仆射。

清渠之败，对唐军打击很大，推迟了对长安的进攻。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至九月，决定再次对长安发起攻势。这时，回纥

怀仁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率领四千精兵前来凤翔助战，朝廷隆重地设宴酬劳，肃宗并许下诺言："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随后，元帅广平王李俶率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浩浩荡荡从凤翔出发，第二天抵达扶风。郭子仪要留宴三日，叶护说："国家有急，我们远来相助，不必客气。"宴毕即向前开去。

二十七日（壬寅）唐军大队人马到达长安西，屯兵于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南）北的沣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十万叛军则列阵于北应战。这是一场双方都投入了很大兵力的激战。李归仁率先出兵挑战，唐军迎战，逼进敌阵。叛军齐进猛攻，致使唐兵惊乱，阵势出现空隙，辎重被敌人抢掠。大将李嗣业喊道："现在还不拼命，全军就要完了!?遂脱下戎装，手执长刀，跳到阵前，大呼奋击，杀敌数十人，稳住了阵势。接着，前军将士各执长刀跟随嗣业，组成一排铁墙奋勇前行。都知兵马使王难得在救其裨将时，被敌箭射中眉骨，垂下的皮遮住了眼睛，他拔下箭头，扯下皮肉，不顾满脸鲜血，仍拼杀不止，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叛军在阵东埋伏下精骑，打算在唐军背后搞突袭，被唐军察觉，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回纥精兵一阵冲杀，几乎全歼伏敌，叛军锐气大减。李嗣业乘胜与回纥兵出奇不意来到叛军阵后，与唐兵夹击，敌营顿时溃散。激战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唐兵杀敌六万，大获全胜，安守忠等人狼狈逃逃。

仆固怀恩向广平王李俶建议，派出二百骑兵追取逃敌，逮住安守忠等人，消除隐患。李俶却说："将军也战累了，请回去休息，明天早上再说吧。"怀恩回答："安守忠，李归仁是贼中骁将，屡打胜仗。今天战败，是老天赐我军良机，万不可放虎归山，一旦留下后患，后悔就来不及了。兵贵神速，不可拖到明天。"仆固怀恩多次请求，均没被批准。第二天有消息来报，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等骁将果然早已远逃。

二十八日（癸卯）广平王李俶率大军开进长安。长安老百姓夹道欢迎官兵，许多人激动地流下眼泪。这时叶护欲如约掠城，李俶在他马前拜道："今日刚得长安，若马上掠城，东京人民必为贼守城，我们将打不下来。还望得洛阳后再如约。"叶护听罢急下马答拜，跪捧李俶足说："当为殿下径取东京。"遂与仆固怀恩带领回纥、西域之兵从城南过，来到城外的浐水之东扎营。李俶在长安镇抚三日后，又率大军东进洛阳。

二十九日（甲辰）捷报传到凤翔，百官人贺，肃宗高兴地涕泪交流，当即派宦官啖庭瑶人蜀奏禀上皇，又命左仆射裴冕至长安宣慰百姓。

攻克长安后，郭子仪又带兵追击叛军于潼关，杀敌五千人，占领弘农（今河南灵宝）、华阴二郡。王难得统领着兴平军破敌于武关，拿下上洛郡（今陕西商县）。

在洛阳称帝的安庆绪得知长安不保，立即调发洛阳叛军，由御史大夫严庄统领，开向长安。行至陕郡（今河南三门峡），与从长安战场败退下来的张通儒残兵汇合，尚有步骑十五万，共拒唐军。

十月十五日（己未），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唐兵进至弘农县东的曲沃城。回纥兵在南山北设下伏兵，叛军也依山列阵，双方在新店接战。初战唐兵不利，叛兵呐喊着冲下山来。这时，回纥兵如猛虎下山，突然从敌阵背后掩杀过来。叛兵素知回纥骑兵的厉害，士卒大喊："回纥兵来了！"顿时乱成一团。在唐兵与回纥兵夹击下，叛兵溃不成军，严庄、张通儒丢下满山的尸体，弃陕郡东逃，李俶与郭子仪人陕，派大将仆固怀恩等人分道追击。

严庄逃人洛阳城，急告安庆绪。洛阳城已无兵守城，安庆绪连夜带着余部从洛阳苑门出逃，向河北老巢奔命。临行时，将被俘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余人杀害。十月十八日（壬戌），李俶带唐军进人洛阳。二十一日（乙丑）郭子仪乘胜派左兵马使张

用济、右武锋使浑释之带兵攻取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河内（今河南沁县）。严庄见败势已不可挽回，遂投降唐廷。陈留（今河南开封）郡民众杀死叛将尹子奇，举众归唐。又围攻颍川（今河南许昌）叛将田承嗣，承嗣也派人前来归降。但未等唐廷收降，田承嗣又与武令珣一起逃往河北。

肃宗得到洛阳收复的捷报，于十月二十三日（丁卯）进入长安。长安百姓欢迎队伍长达二十里。人们欢呼雀跃，兴奋地说："没想到还能再见吾君！"肃宗也激动万分。十一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从洛阳归来，肃宗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呵。"

肃宗政权在两京沦陷后，用了一年多时间，重整旗鼓，收复二京，把叛军逼回老巢，虽未彻底平定叛乱，但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避免了李唐王室倾覆。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18—220

《旧唐书》：《肃宗纪》、《安禄山传》、《郭子仪传》

《新唐书·肃宗纪》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肃、代宗平史氏再叛

至德二载（757 年）十月，肃宗朝廷收复了沦陷两年之久的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二京，把安庆绪和史思明残部赶回河北老巢一带，基本解除了叛军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平叛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安庆绪当时从洛阳仓皇遁逃至邺郡（今河南安阳），改邺郡为安成府，随从的骑兵不过三百，步卒不满千人。叛将阿史那承庆等分别散投在常山、赵郡、范阳等地。不久，蔡希德才从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从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从南阳（今属河南）各带所部兵聚拢过来，安庆绪又在河北诸郡招兵买马，扩展了一支有六万士兵的队伍，军势稍振。

但是叛军内部此时正酝酿着分裂的苗头。由于安庆绪昏庸无能，不理政事，引起另一主将史思明的不服。史思明被安庆绪封为妫川王、范阳节度使，占有叛军从两京及各地抢掠运来的大量物资宝货，开始不听安庆绪的调遣。与安庆绪北逃同时，其将李归仁带领精兵曳落河同罗数万人溃归范阳（今北京），史思明乘机将他们招纳收编，势力逐渐壮大。安庆绪忌恨史思明，欲吞并他的力量，于是派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到史思明处征兵，借机消灭他。史思明的判官耿仁智、裨将乌承玼劝他说，安庆绪不过是叶上露水，长久不了，如今唐室中兴，天子仁圣，只有归顺朝廷，方为万全之策。史思明深以为然。

阿史那承庆与安守忠带兵来到范阳时，史思明拉出全部人马

前去迎接。双方相距一里多地，史思明使诈派人前往通告，说本部将士见你们远道而来，十分高兴，但是边兵怯懦，见有如此多的兵马，不敢前迎，请你们弛弓而来。阿史那承庆等人听从了。于是被史思明引入内厅宴饮。史思明乘机派将缴了安庆绪兵马的械，将愿留者编人自己的诸营。第二天，史思明将阿史那承庆等将关押扣留，然后派大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兵八万投降。其将河东节度使高秀严也同时归顺。十二月二十二日（乙丑），窦子昂至京城，肃宗大喜过望，当即任命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其子七人皆授显官。又派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到范阳宣慰，让史思明带所部兵讨安庆绪。乌承恩到河北后一路宣布诏旨，除鄴郡外，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归顺了朝廷。安庆绪以杀戮阻止人们归唐，结果更加不得民心。

对史思明的归降，朝臣多持怀疑态度。河南节度使张镐就曾直言上疏，说史思明为人猾诈凶险，乘乱窃位，心如野兽般凶狠，对这种人万不可给予威权。肃宗正宠纳史氏，听不进去。大将李光弼也认为史思明终当再叛，应对他早设提防，建议肃宗任命与史氏有私交的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赐阿史那承庆免罪的铁券，让二人暗中图谋史思明。

乌承恩之父乌知义原是平卢军使，对史思明有恩，所以史氏与其子关系也颇为融洽，当初乌承恩也极劝史氏归顺。此次乌承恩领了朝命前去范阳，暗中开始了活动，多次用私财召募部众，又男扮女装潜人诸营诱说。有人将此密告史思明，他将信将疑。这时正好乌承恩与李思敬到河北宣慰，史思明决定查个水落石出。他把乌承恩留在府中，事先在床下埋伏了两个士兵，然后让在范阳的乌承恩之子去探望其父。深夜，乌承恩将自己领受朝命，剪除史思明的计划告诉给儿子。床下的士兵大呼而起，将乌承恩父子抓住。史思明勃然大怒，厉声责骂，乌承恩供出主谋为李光弼。史思明斩杀了乌承恩父子，连坐者有二百余人，又扣押了李思敬，上

表喊冤。肃宗只好派中使去慰抚，将责任推给乌承恩。

恰在此时，投降叛军的朝臣被唐廷斩杀的消息传到范阳，史思明趁机煽动将士说："陈希烈等人身为宰相，皆朝廷大臣，上皇（唐玄宗）置他们于不顾，跑到蜀地避难，今天这些被弃之臣尚且不能免死，何况我们这些一直跟从安禄山造反的人呢？"诸将听了人心惶惶，纷纷请求史氏上表诛李光弼，史思明军遂降而复叛。

唐廷这时正组织人马讨安庆绪。尽管安庆绪当初从洛阳溃逃时损兵折将，狼狈不堪，但他仍占据着河北南部及东部的汲、邺、赵、魏、平原、清河、博平等七郡六十余城，物资粮饷也较丰备。只是安庆绪不理政事，专事修缮，日夜酣饮取乐。部下高尚与张通儒等争权不和，内部陷于混乱。大将蔡希德才略兼备，手下部兵也精锐骁勇，他性格刚烈，直言不讳，得罪了张通儒，被其陷害而死。部下数千人见主将被杀，纷纷逃散。安庆绪让残忍嗜杀的崔乾祐为天下兵马使，企图以他坐镇局势，但将士对他均感不服，队伍成一盘散沙状。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肃宗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李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率二十万步骑讨安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率领所部兵助战。诸镇协调作战，十分需要坚强有力的指挥元帅。但是肃宗却以郭子仪、李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为由，不置元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各路节度使。让一个不懂军事的宦官握有全权指挥大权，埋下了这场大战失败的种子。

十月，郭子仪的朔方兵从杏园渡过黄河，东至获嘉，击败叛将安太清，杀敌四千余人。安太清退保卫州（今河南汲县），子仪带兵围攻，淮西兵、郑蔡兵、关内、泽潞兵、镇西、北庭兵分别由其节帅带领从阳武（今河南原阳）、酸枣（今河南原阳西南）等地渡过黄河与朔方兵合围卫州。安庆绪得知卫州形势吃紧，忙倾

邺郡七万之兵，分上、中、下三军赶至卫州救援！郭子仪将三千射手埋伏在垒垣之内，他则率兵上阵与敌交手，佯装不胜而退，叛军追至垒下，突然万箭齐发，子仪兵也反戈追击，安庆绪兵大败，其弟阵亡。唐军攻拔卫州后，对叛军紧追不舍。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相继带兵赶来。安庆绪收拾残部退至邺城西的愁思冈负隅顽抗，又败，损兵三万多人，安庆绪被迫入邺城固守。在唐军合围下，安庆绪一筹莫展，只得派将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以让位给他作为出兵的条件。史思明见有利可图，且考虑到虽和安庆绪不和，但毕竟是唇亡齿寒，利益相关。于是立即调发十三万范阳兵救邺。在唐军合围下他不敢贸然出兵，先遣李归仁带一万步骑驻扎在邺城之北六十里外的滏阳（今河北滋县）观望，遥为救邺的声势。接着，史思明将救兵分为三部，一出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邯郸西北），一出冀（今河北冀阳）、贝（今河北清河西），一从洹水（今河北临漳东南）接近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从邺城的北部和东部对唐军形成包围攻势。并趁唐军在魏州立足未稳之际，攻陷该州，杀唐兵三万。乾元二年（759 年）正月，史思明就在魏州城北筑坛，自称大圣燕王，作出了要在魏州久驻之势。

李光弼分析史思明观望不进的原因，是欲坐等唐兵怠懈，然后攻其不备。他建议让河东与朔方兵合攻魏州，逼史交战，而史鉴于当年嘉山之败，必不敢轻易出兵。时间拖得久了，邺城必定难保，一俟安庆绪倾覆，史思明则孤掌难鸣。可惜李光弼的正确建议被鱼朝恩一口回绝。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自冬历夏，唐兵层层筑垒，重重穿堑，又决开漳水灌城。邺城也危在旦夕，城里粮饷早断，甚至一鼠值钱四千。然而由于唐军无统帅，进退不一，致使久围不下，镇西节度使李嗣业中流矢而死，唐军财竭粮尽，人心思动，上下解体。

史思明见时机成熟，遂从魏州引兵接近邺城。命令诸将离城各五十里扎营，每营各选五百精骑，到城下搔扰抄掠。唐兵出击，则散归各营，使唐军通宵达旦地警戒，搞得人困马乏，唐兵粮饷物资要从江、淮和太行山以西的并、汾地区运来，史思明兵乔装唐兵，抢劫粮道，致使唐兵阵前断炊，士兵无心围城，军心涣散。史思明这才把大军开抵城下，与唐兵一决雌雄。

三月初六日（壬申），唐军步骑数十万列阵于滏水之北，史思明亲自挂帅领五万精兵与之对峙。唐兵初以为是敌人游兵，并未介意。史思明却不顾众多的唐兵，带兵猛冲。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部队与敌人交上了锋。双方势均力敌，杀伤相半。稍后的郭子仪正欲布阵助战，突然一股狂风骤起，飞沙拔木，天地顿时昏晦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军皆大吃一惊，再也无心恋战。唐军溃南，叛军奔北，辎重武器散落一地。郭子仪朔方兵原有战马万匹，在溃退后仅存三千，器械也大多遗弃。朔方兵阻断河阳桥以确保东京洛阳，可是溃军自相惊扰，众人又渡过黄河奔至洛阳城之缺门，这时诸军相继赶来，众至数万。有人建议舍弃洛阳，退保蒲（今山西永济）、陕（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郭子仪采纳了都虞侯张用济的建议，力守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唐军刚布署完毕，敌将周挚就引兵而至，见唐军已有所准备，只好退去。

史思明确知官兵已溃，遂在沙河（今河北邢台南）收整部队，还军邺城南。安庆绪在唐军解围败溃时，乘机出城到唐军营中拿到六、七万石军粮，稍缓城中缺粮之虞，于是对史思明态度又逐渐强硬起来。命令诸将关闭城门拒抗史思明。张通儒、高尚诸人劝他不要与史作对，应开城门迎谢。安庆绪无奈，只好让安太清上表向史思明称臣，任其解甲入城。史思明却大度地表示，不敢受北面之礼，愿结为兄弟之国。互为藩篱之援，鼎足而立。安庆绪大喜过望，全然不晓其中有诈，因请歃血为盟，思明也爽快应

允。安庆绪遂带三百骑兵来到史思明营，拱手称谢。史思明却忽然变脸道："你丢弃了两都，还有什么好说的。而且身为人子，杀父夺位，此乃天地难容。我当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佞媚之语。"说完即令左右将安庆绪架走，连同其弟与将高尚、孙孝哲、崔乾祐一起斩首。史思明带兵入邺，收编了安庆绪兵马，打开府库犒赏将士，占据了安庆绪的地盘。又进行了一番部署，派遣安太清带兵五千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欲向西拓展，又虑根本未固，于是让子史朝义留守相州，他则带兵回到范阳。不久，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妻辛氏为皇后，朝义为怀王、周挚为相，李归仁为将，改范阳为燕京。

观军容使鱼朝恩忌恨郭子仪，于是把滏水之战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子仪。七月，肃宗召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郭子仪宽厚得众，李光弼则治军严整，朔方将士皆怀念郭的宽厚而忌惮李之威严。他们依依不舍，拦中使请留子仪。屯驻河阳的左厢兵马使张用济与诸将商议，欲以精锐突入东京，驱逐光弼而迎子仪，被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和右武锋使康元宝劝止。李光弼带数千骑东出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张用济单骑来迎，被李光弼以晚至为由杀死，由李的部将辛京杲代领其众。仆固怀恩因有五百骑兵陪同前往而免遭算计。朔方兵纷纷离散，仅剩二万人。不久，李光弼又任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使，使之收复河北之地。

九月，史思明让史朝清留守范阳，其余诸郡太守各带兵三千跟随他向河南攻城略地。他把各路人马分为四部，令狐彰一部，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渡黄河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他与史朝义、周挚分别从濮阳、白皋、胡良渡河，相约于汴州（今河南开封）会师。

李光弼闻讯入汴州，命令汴滑节度使许叔冀坚守汴州十五天，而后有援兵来救。布置完毕，李光弼回到洛阳。许叔冀抵挡不住

史思明的进攻，便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投降。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洛阳形势骤然吃紧。本来洛阳东面汜水有成皋之险，东南有崿岭、龙门伊阙可凭险而守，但防线太长，朔方兵力不足，李光弼决定放弃洛阳，坚守河阳（今河南孟县）。河阳北连泽、潞，与王思礼部相临，既可进取，又可退守，足以抵挡叛军西侵。当即李光弼驰书河南尹，让其组织官民疏散到城外避难，接着指挥士兵将军需物资运抵河阳守备。夜晚，李光弼才到达河阳，人马共二万，粮饷仅够十天之用。二十七日（庚寅），史思明兵进入洛阳，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叛军怕有埋伏，不敢入宫，将队伍驻扎在洛阳东北的白马寺南，在河阳城南筑起一道月城防备唐军。这时郑、滑等州也相继陷没。

十月，肃宗得知东都复失，急于下制亲征，被群臣劝阻。史思明则开始率军进攻河阳，李光弼凭险拒守，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得十分艰难。他治军严明，下令后退怯战者一律斩杀。为激励将士杀敌，他把匕首插在靴中说：“打仗，是极危险的事情，我身为国家重臣，不可死于贼手。万一不胜，诸君死于阵前，为国捐躯；我当自刎谢罪，决不让诸君独死而我苟活。”主将如此，将士岂敢不拼力奋争。郝廷玉从战场往后奔去，李光弼立即命令左右取其首级，廷玉急答是马中箭奔回换马，旋即又冲回战场。唐兵众志成城，经过数天浴血苦战，杀敌二千多人，多次击退来敌进攻。史思明难以找到西侵的突破口，转而让李归仁率五千铁骑西攻陕州，也被神策兵马使卫伯玉击退。

上元元年（760年）二月，李光弼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在沁水击退了来援的史思明兵，杀敌二千多人，怀州城下又大破安太清兵。四月，唐兵在河阳西渚再次击败史思明，杀敌一千五百。十一月，李光弼在围攻怀州一百天后，拿下该州，生擒安太清。史思明则在是年五月进入洛阳地区与唐军对峙。

上元二年正月，史思明见唐军坚守河阳一年多了，仍迟迟不

撤，决定用调虎离山之计诱唐出兵。于是暗地里派人到唐营中散布说，洛阳史思明兵皆是河北人，久戍思归，人心厌战，军心不稳。有人听了便向鱼朝恩建议唐军应主动出击。不懂军事的鱼朝恩信以为然，屡屡向肃宗进言，肃宗听取一面之辞，命令唐军进取东京。李光弼分析形势，认为敌人兵锋尚锐，不可贸然出兵，他向肃宗奏报，反对从河阳出兵。仆固怀恩因与李光弼有个人嫌隙，这次也附合鱼朝恩，言洛阳可取，于是肃宗拒绝了李光弼意见，不断派中使督其出战。君命不能违，李光弼不得已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他与仆固怀恩带兵，合鱼朝恩和神策节度使卫伯玉之兵攻洛阳。

二月二十三日（戊寅），唐军抵达洛阳城北邙山。李光弼命令队伍依险布阵，仆固怀恩却把战阵布在平原之地，李光弼劝他说，依险而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于平原布阵，万一失利，就无退路了，史思明辈不可轻视。仆固怀恩极不情愿移阵。就在唐军未定之时，史思明突然发动进攻，唐兵大败，死伤数千人，武器军资也损失殆尽。李光弼、仆固怀恩渡过黄河，退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奔回陕郡，留守河阳的李抱玉也弃城而逃。河阳、怀州再入敌手。史思明乘胜欲西攻潼关，让朝义带兵为先锋，逼进陕城。朝廷万分震惊，为确保潼关、长安的安全，急忙增兵陕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幸亏叛军再起内讧，放慢了进攻的步伐。

原来史思明为人残忍好杀，常常无端猜忌部下。动辄以灭族惩罚不中己意的人，弄得人人自危。长子史朝义较为敦厚，很得人心，却不讨父亲的喜欢。因为史思明偏爱少子朝清，让他镇守范阳，还常常流露出要杀朝义，立朝清为太子的意思。这使朝义深感不安。这次他奉父命从北道袭击陕郡，却多次被陕郡的唐兵击败，史思明为此大为恼怒，大骂朝义胆怯，坏了他的大事，还声称要以军法处斩。后又让朝义修筑三隅城储备军粮，期限一天完工，朝义如期完活，却来不及抹泥，又被父亲大骂一通。临走

时史思明恶狠狠地说："等攻下陕郡，定杀此贼。"这话无疑把史朝义逼上了绝路。朝义部将骆悦、蔡文景劝其赶紧行动，不要坐以待死。在朝义默许下，骆悦等人将史思明心腹宿卫曹将军召来密谋。曹将军见史思明甚招将士怨恨，便领命而去。入夜，骆悦随带三百士兵来到永宁鹿桥驿（今河南洛宁西南）史思明的帐外，宿卫士兵心生疑窦，但畏惧曹将军，无人敢发问。骆悦领兵直闯思明卧室，不巧史思明上厕所未回，士兵急忙奔厕所而去。史思明情知不妙，翻墙越至马厩，上马即欲逃走，被士兵射中手臂跌下马来。当他问清士兵是奉朝义之命捉拿自己时，忙求饶道："今早上我言语有失，应受其祸，但是现在杀我太早，何不等我攻克长安再说。"骆悦将其押送至鹿桥驿东三十里的柳泉驿，缢杀了他，用毡毯裹着尸体，运回洛阳。

随即史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派人到范阳，杀死史朝清及异己者数十人，引发了一场逆党自相残杀的丑剧。经数月火并，死伤数千人，内乱才稍加平定。史朝义以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但是洛阳四周叛军节度使多为安禄山旧将，并不服从史氏指挥，史朝义毫无办法。经过这场内讧，叛军实力大不如前。

然而，邙山之败也使唐军受到重创，一时难以对叛军发动有效的进攻。李光弼上表请求自贬，肃宗制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不久，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八月，赴河南行营。在此期间，唐军与敌数有交锋，取得一些局部上的胜利，但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宝应元年（762年），肃宗崩，代宗即位，重新起用郭子仪为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子仪从河东入朝，遂留京师。又派中使出使回纥搬兵，登里可汗见唐新遭大丧，内地州县又凋弊萧条，颇有轻唐之意，态度大不恭敬。由于仆固怀恩之女嫁给了登里，经怀恩

出面劝说，才勉强出兵。

十月，代宗以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十六日（辛酉），从长安出发，与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兵会合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代宗原想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由于遭到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的阻挠，只好改用仆固怀恩领诸军节度行营，成为实际的统帅。

二十三日（戊辰），会合于陕州的各路人马开始出发。雍王留镇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 殿后，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入；从东、南、西三面合围洛阳的史朝义。

史朝义闻知官军前来，召集诸将商讨对策。大将阿史那承庆认为，若唐兵独立作战，则宜悉众迎战，若有回纥兵参战，其锋锐不可当，则应退守河阳，避其锋芒。史朝义并不赞同。二十七日（壬申），唐军前锋已抵洛阳北郊，旋即分兵取怀州，第二天即攻下该州。三十日（乙亥），唐军在横水列阵，数万叛军立栅自固。仆固怀恩列阵于西原，又派骁将及回纥兵，沿着南山绕至栅寨东北，两面夹攻，大破敌营。史朝义慌了手脚，急举其精兵十万救援。布阵在昭觉寺。唐兵不待其喘息，猛扑过去，杀敌甚多，但敌阵未乱。镇西节度使马璘大呼一声，只身单骑策马狂奔，直杀人敌营，唐大军乘势而入，叛军大败，退至石榴园、老君庙，又败，六万士兵丧生，二万多人被俘，史朝义只带数百轻骑突围东逃。仆固怀恩率军进克洛阳及河阳城，留回纥可汗驻守河阳。派其子右厢兵马使仆固玚和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人乘胜追逐史朝义，在郑州又败叛军，史朝义退至汴州。敌将陈留节度使张献诚决定投降，遂闭城门拒纳史朝义，史朝义被迫奔至濮州（今山东鄄城北）。

十一月，史朝义率残部自濮州渡过黄河，唐朝追兵又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败之。敌将田承嗣等带四万余人与史朝义残部会合，

共拒唐军。仆固玚再次将其击破，长驱直入魏州昌乐（今河北南乐）东。史朝义带魏州兵顽抗，又败。叛将鄴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见大势已去，遂以所领的相、卫、洺、邢四州和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

史朝义逃至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仍在作最后的挣扎。他与叛将薛忠义等部凑在一起，负隅反抗。仆固玚追至临清，史朝义自衡水引兵三万回攻。被仆固玚设伏击退。这时，回纥兵又来助战，官军大振。与叛军大战于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东南，大败史朝义。史朝义如丧家犬又惶惶逃至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怀恩部将薛兼训、郝庭玉、田神功、辛云京于下博会师，又进围莫州，不久，青淄节度使侯希逸也带兵赶至。

这时已是广德元年（763 年），史朝义因为屡战屡败，田承嗣劝他亲往幽州范阳发兵，还救莫州，并表示由他来留守莫州。史朝义不知是诈、遂选五千精骑突围而出，他前脚刚走，田承嗣即以城降唐，把朝义家属子女送交官军。于是仆固玚、侯希逸、薛兼训率兵三万继续追击史朝义。

史朝义正往范阳的路上狂奔，他不知道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通过中使骆奉仙向唐廷请降，并派兵马使李抱忠镇守范阳县（今河北涿县）。史朝义来到范阳，前面闭门不纳，后面追兵将至，急得他赶紧派人通知李抱忠，大军留在莫州，自己轻骑前来发兵求援，并以君臣之义责怪他不该降唐。李抱忠实话实说："天不保祐大燕，唐室复兴，范阳已经归唐，岂可反复无常！大丈夫作事不以诡计相图，还望你们早选择去向以保全自身吧。而且田承嗣已归唐，不然官军何以这么快赶来。"史朝义闻听大惧，乞求道："我早上就没吃东西了，请以一餐相助。"李抱忠便令人在城东设食。史朝义部下的范阳兵皆纷纷离去，只剩数百少数族骑兵随着史朝义吃了点东西，然后又奔广阳（今北京西南），广阳也闭城不纳。史朝义打算北人奚、契丹处落脚 。行至平州石城（今河北唐

山西北）东北的温泉栅，被李怀仙兵追上，史朝义走投无路，在树林中自缢而死。正月三十日（甲辰），史朝义首级送至京师，唐军也凯旋。至此，唐廷终于平定了连绵七年零三个月之久的安史之乱。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20—222

《旧唐书》：《史思明传》、《李光弼传》

肃、代朝宦官用事

唐朝是继东汉以后第二次酿成宦官之祸的朝代。北宋司马光说，唐朝宦官专权，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肃、代时期（756—779 年），宦官开始掌握军权并逐渐形成左右朝政的势力。跋扈擅权的宦官有李辅国、程元振和鱼朝恩。

李辅国，本名静忠，曾赐名护国，后改辅国。少时即阉身，粗识文字，曾在宦官高力士手下打杂。四十余岁时掌闲厩御马的簿籍。天宝中，闲厩使王鉷嘉奖他畜牧之能，推荐人东宫事奉太子李亨。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扈从太子随玄宗及百官至蜀地避难，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时，禁军将士哗变，杀死杨国忠和杨贵妃。李亨被百姓遮道挽留。李辅国向李亨献计，请分玄宗之兵北上朔方，以图兴复。李亨采纳了他和建宁王李倓的建议到达灵武（今宁夏宁武西南），李辅国又劝即帝位以收揽人心，李亨遂于至德元载（756 年）即位，是为肃宗。李辅国因有定策之功，升为太于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专掌军事。肃宗对其特加宠信，让他侍直帷幄，宣传诏命，掌管处理四方文奏、宝印符契，将他视为心腹。

李辅国貌似恭敬谨慎，少言寡语，加上他吃斋念佛，常为僧行，蒙蔽了不少人的眼睛，认为他积德行善。其实他内心阴险，狡猾专横。他看到张良娣得到肃宗宠幸，便有意依附攀援，以加强自己在宫内的势力。这两人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排挤谋士李泌与建宁王李倓。李倓就是被二人诬陷致死的。

两京收复后，肃宗回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李辅国被拜为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等十余使，封郕国公。权势显赫。皇帝制敕必经其签署后施行，宰臣及百官除日常上朝外，奏事必须经过他才能见皇帝。常在大明宫银台门裁决天下大事，颐指气使。又置"察事厅子"数十人，专门侦查官员行动，百官纤介过失，无不伺知，即加传讯。地方州县、京兆府和中央司法部门审理案件，也由他一人裁决，出口即称制敕，无人敢表异议。每出外则随带数百名甲士卫从。宰相李揆是山东七族高门，见他仍要执子弟之礼，可见其气焰嚣张。

李辅国从微贱暴发成为显贵，遭到一些人的轻视，玄宗左右的人就很看不起他，为此李辅国耿耿于怀，伺机报复。玄宗从蜀返京，被尊为太上皇，仍居南内兴庆宫，亲信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等故人仍留身边事奉。兴庆宫南门有长庆楼，坐落在市内大道边上。玄宗闲来无事，常常在长庆楼上眺望休息。来往的百姓见到他，常欢呼万岁，玄宗也经常在楼下置酒相赐，还曾召将军郭英乂等上楼赐宴。这给玄宗孤寂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精神慰藉，却引起肃宗的不悦，害怕父亲与人交往，会于己不利。李辅国看出肃宗父子间微妙的变化，于是对肃宗说："上皇居住在兴庆宫，多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这些人也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都是灵武勋臣，他们常感不安，臣多次晓谕也不见奏效。"他建议把上皇迁往深严的西内太极宫。不久，李辅国就开始了行动。首先，他把兴庆宫的三百匹马减至十匹。玄宗怅然地对高力士说："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这年七月，肃宗患病，李辅国矫称领肃宗命，迎上皇游西内。在睿武门处，李辅国带五百甲士遮道相拦，险些把玄宗惊下马来，幸被高力士喝斥，李辅国才不敢过分无礼，但玄宗就这样移居到太极宫。李辅国只给玄宗留下数十名老弱之兵，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玄宗左右。几天后，高力士等人流放的流放，致仕（退休）的致仕。肃

宗另派百余名宫女，负责西内的洒扫之事。从此玄宗抑郁难排，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忧郁而死。

李辅国骄恣日甚。肃宗逐渐对他起了反感，但畏其握兵而无可奈何。上元二年（761 年）八月，又拜其为兵部尚书。李辅国赴任时，御厨具馔，太常设乐，宰相朝臣皆相送。他提出要作宰相，肃宗推辞说："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作，只是大臣们不允呵。"李辅国不悦，让仆射裴冕等人向上推荐自己。肃宗密对宰相萧华说："李辅国求作宰相，若公卿大臣上表赞同，就不得不授他了。"萧华问裴冕，裴答说："我头可断，也不会推荐他为相！"肃宗闻听大喜，李辅国却忌恨萧华等人。不久，就上奏诬萧华专权，请罢其相。肃宗初不允，但架不住他施加压力，于是罢萧华为礼部尚书，以元载代其为相。

李辅国最初依附张皇后，专权用事，晚年两人关系恶化。肃宗病笃，张皇后与越王係等人密谋杀太子李豫和李辅国。内射生使程元振预知其谋，密告李辅国。于是李辅国与程元振在陵霄门埋下伏兵。宝应元年（762 年）九月十三日（乙丑）深夜，收捕越王係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以太子之命迁张皇后于别殿。十五日（丁卯）肃宗死，李辅国杀死张皇后和越王係、兗王僩。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臣相见。十七日（己巳）太子即位，是为代宗。李辅国自恃有拥立之功，更为骄横，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作太子时，就忌恨其专横，心甚不平。但惧其掌兵，也让他三分。表面仍尊礼之，号为"尚父"而不名，事无大小皆向其咨询。不久，李辅国又任司空兼中书令。

程元振卑微时交结李辅国，因拥代宗有功，升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这时他开始图谋夺李辅国之权。秘密向代宗进言，请对其稍加裁制。代宗遂解除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以程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李辅国始惧，上表让位。代宗又罢其

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李辅国入见时愤愤道："老奴事奉不了郎君，请归地下事先帝。"代宗念及他有拥戴之功，不欲明里诛杀，遂于十月十七日（壬戌）夜，派人入宅刺死。

继李辅国之后的程元振，又加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封邠国公，专掌禁兵，其威权又超过李辅国。他妒贤嫉能，专权自恣。曾请托于襄阳节度使来瑱，遭到拒绝，他握有大权后，利用权势将其诬陷至死。宰臣裴冕因一件事得罪了他，被贬为施州刺史。象这样的名将元勋连遭诬陷，致使天下文武臣僚均感寒心。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党项人犯京师，由于程元振没有及时奏报，使代宗狼狈出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避难。代宗下诏征天下诸道兵勤王，大将李光弼等人因程元振居中擅权，没人敢应诏。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程元振以谢天下。代宗不得已，于十一月初二日（辛丑），削其官爵，放归乡里。十二月，程元振得知代宗回京，换上女装，潜入长安，希冀再次起用。被京兆府捉获。次年春，放到江陵安置。

鱼朝恩是在天宝末年入内侍省的，肃宗常令他监各路军，握有部分兵权。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会师邺郡（今河南安阳）讨安庆绪时，肃宗借口郭子仪和李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不立元帅，而以他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掌握着实际统帅权。"观军容使"一名，即始于鱼朝恩。他不懂军事，却指手画脚，拒绝将士正确的建议，致使人心不服，号令不一，而贻误了战机，遭致战场的失败。他嫉妒郭子仪功高，常常在肃宗面前诋毁郭子仪。肃宗不以为非，反提升他为左监门卫大将军。而代宗避吐蕃奔陕州时，禁军不集，天下镇兵不至，独鱼朝恩率兵迎驾护卫，从此又深得代宗宠信，拜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领禁军。当时天下多事，藩镇林立，代宗提防臣僚，对鱼朝恩却十分信任，前后赏赐无度。

鱼朝恩为人平庸，却自恃受宠，自骄自吹，常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持笔释义，自诩于朝士之中，有文武之

才。代宗又授判国子监事、光禄、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等使，令宰臣百官送其赴国子监视事。代宗常与他议论军国重事，鱼朝恩恣谈时政，凌侮宰相，势倾朝野。

神策都虞侯刘希暹、都知兵马使王驾鹤得宠于鱼朝恩，建议在北军（禁军）置狱，指使市井无赖诬告富户，下地牢拷掠，没收其家资入军，弄得人情慌恐不安。鱼朝恩奏事无不获允，稍不如意，则怒道："天下事难道还有不听我的！"代宗闻听十分不悦。其养子令徽年幼，为内给使，与人争斗，向鱼朝恩告状。第二天鱼朝恩见代宗说："臣子官卑，为人所欺，乞赐之紫衣。"紫衣为唐高品官服，代宗还没答应，旁边早有人递上紫衣。穿上紫衣的令徽拜谢，代宗勉强笑道："此儿正应衣紫。"心里却更加不平。

宰相元载与鱼朝恩有隙，揣测到代宗心理，乘机弹劾其专恣不轨，请除去。代宗知鱼朝恩招天下怨怒，遂令元载计议。鱼朝恩每入殿，随身跟着射生将周皓百人护卫，外还有其党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为援。元载将其同党一一用重金收买过来，对其行动了如指掌。鱼朝恩毫无所察，骄横如常。元载密与皇甫温及周皓商议了铲除鱼朝恩的办法。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初十日（癸酉）为寒食节，代宗在禁中宴请近臣。鱼朝恩宴罢正欲离去，被代宗叫住，责其有异谋。鱼朝恩正欲自辩，被周皓及左右缢杀。代宗随即下诏，罢其观军容等使。对外但说："朝恩受诏自缢。"后将尸体运回家，赐钱安葬。

代宗任用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掌兵柄，又先后将其或诛或贬，此后不再用宦官掌兵。

（杨西云）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18—224

《旧唐书》：《李辅国传》、《程元振传》、《鱼朝恩传》

《新唐书》：《李辅国传》、《程元振传》、《鱼朝恩传》

元载专权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国泰民安。到了后期，却日益鸩于酒色，政治每况愈下。肃宗、代宗、德宗之后，朝中宦官逐渐窃取权柄，宦官专政局面出现。但宦官毕竟是阉人，不便直接出任宰相，于是他们便于国中物色代言人，作为操纵朝政的工具。而此时自有一批利禄之徒，出于个人私利，依附宦官，乞盼提携，于是被宦官引荐至相位。如宦官李辅国推荐元载、吐突承璀推荐李鄘、皇甫镈、崔潭峻推荐元稹等，这些人上台后，与宦官互为表里，专权弄事，于是又出现了宦官专权时期奸相专权的怪现象。然而当时南衙北司之争势如水火，这些人仗宦官之势爬上相位，自然将自己置于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因此一朝势败，便身死族灭，难有善终，代宗时权相元载下场便是如此。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人。

天宝初年，玄宗崇奉道教，下诏开科取明庄子、老子、文中子、列子四子学的学者，元载应试由此进入仕途。初授邠州新平尉，累迁户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转运等使。

肃宗时，宦官李辅国权倾朝野。肃宗对他言听计从。辅国妻元氏是元载的同宗女儿，因此元载被荐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辅国死，元载厚结内侍董秀，金帛相往来。董秀让主书卓英倩与元载私下联络，将代宗的想法通知元载。所以元载的政见总与代宗的看法相吻合，深得信任。元载的儿子元伯和招权受贿，被人揭发。代宗对元载深信不疑，反而将揭发人华原令顾繇流放

到锦州。

大历元年（766年），元载怕有人继续揭发他的私弊，奏请："百官奏事要先向所属长官报告，长官向宰相报告，然后再由宰相向皇帝报告。"他对百官说："近来奏议特别多，皇上的意思是先由长官初审一下，看看是否必须奏报。"

刑部尚书颜真卿上书认为："郎官和御史都是皇帝的耳目。如今上奏论事必须先报告宰相，宰相同意才能上达皇帝，这是堵塞皇帝耳目的作法。如果是担心群臣奏报不实，就应该进行调查，虚报则罚，实报加赏，广开言路。作不到这一步就会堵塞进谏纳言的门路，给人们留下遗憾。唐太宗所著的《司门式》规定：'没有出入宫门许可证的人，如有紧急情况必须报告，管理宫门的人和执掌仪仗的人都应引来奏报，不得作任何阻拦。'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言路被封锁。天宝年以后，李林甫为宰相，不许人们讲话，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群臣缄口，玄宗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以至于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衰落到如今的地步，与人们不敢讲话不能说没有关系。即使朝廷鼓励人们进谏，人们也不一定能够作到言无不尽，何况再让宰相大臣先行裁决，制造压力！那样陛下还能听到什么呢？"

元载听到颜真卿上书很恼火，奏称颜真卿有意诽谤。不久，就找了个借口将颜真卿贬为峡州别驾。

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掌管禁军，深得信任。代宗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鱼朝恩负恃权宠，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夸夸其谈，炫耀自己，凌辱宰相。元载虽有口才，能言善辩，但在鱼朝恩面前也不敢应对，总是拱手沉默，暗暗忍耐。

机会终于来了，代宗对鱼朝恩逐渐产生了反感。因为鱼朝恩实在太骄横了。

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让坊市的无赖少年诬告富户人家犯

了罪，把人逮进地牢，刑讯逼供，直到籍没这家人的资财归北军所有。事后拿出一部分赏给曾经出力的告密者和抓捕者。

对于群臣的奏事，鱼朝恩都能作主，有人不向鱼朝恩打招呼，鱼朝恩就大发淫威，说："天下的事，还有不通过我的道理！"代宗知道了，当然很不高兴。

鱼朝恩的儿子鱼令徽岁数很小，是个没有官品的内给使，穿着六、七品官员应穿的绿衣服，引起其它内给使的不满。鱼令徽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鱼朝恩。第二天，鱼朝恩来见代宗说："我儿子官小，被人欺侮，请赐给他一件紫色的官衣穿。"按照制度，只有三品以上官才能穿紫色官衣。代宗还没应声，有人已经把紫衣拿来给鱼令徽穿好。代宗强作笑颜说："小孩子穿紫衣服也挺好看。"心中却在另想主意。

元载看透了代宗的心思，乘机奏告鱼朝恩专横不轨，请代宗把他除掉。代宗知道大家都对鱼朝恩不满意，就让元载设计一个周密的方案。元载以重赂暗结鱼朝恩的亲信，常使射生将周皓和陕州节度使皇甫温，将鱼朝恩私下的举动了解得一清二楚。

大历五年正月十二日（辛卯），元载实施了第二步骤，将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改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将皇甫温任命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这一变动加强了鱼朝恩对地方的控制权，其实元载是在利用改任的手法将皇甫温调到京师，以便利用他的力量实施计划。为了麻痹鱼朝恩，元载要求朝廷将鄠县、虢县、宝鸡、户县、周至划归李抱玉管辖，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划归神策军管辖。鱼朝恩见自己的亲信得到地盘自然很满意，却不知一张捕杀他的网已经形成。

曾给鱼朝恩出主意设立北军监狱的神策都虞侯刘希暹发现情况不对，提醒鱼朝恩多加小心。但鱼朝恩见代宗对他丝毫没有反常的表示，礼遇如旧，也就没把刘希暹的话当作一回事。皇甫温从陕州来到京师，被元载留下来，元载又把周皓找来，三人共同

讨论诛杀鱼朝恩的方案，最后把讨论结果报告给代宗。代宗同意了他们的办法，嘱咐他们："一定要策划周密，性命交关的事情要万无一失。"

三月十日（癸酉）是寒食节。代宗在禁中设酒宴款待贵近大臣，元载留守中书省。宴后代宗把鱼朝恩单独留下来，说是还有事情。待别人都离去后，代宗指责他有异图，并非忠心耿耿。鱼朝恩在辩解的过程中与代宗顶撞起来。身为鱼朝恩护卫的周皓及其手下的人把鱼朝恩抓起来勒死。事情作得很严密，外间得不到一点消息。随后代宗下诏罢免鱼朝恩观军容使等职务，让他仍作内侍监。对外诈称鱼朝恩受诏后上吊自杀，把尸体交给家属领回，赏下六百万钱的安葬费。

过了几天朝廷下诏提升曾受鱼朝恩信任的刘希暹、王驾鹤为御史中丞，以此安抚北军的情绪。二十三日（丙戌），大赦京城的囚犯，又把已经抓起来的鱼朝恩的党羽全部释放。

从此之后，元载备受宠任。元载步鱼朝恩后尘，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吏部侍郎杨绾主持简选官吏的工作，耿介正直，不买元载的帐。岭南节度使徐浩贪佞迎逢，把大量南方珍宝送给元载。因此元载让杨绾改任国子祭酒，而让徐浩作了吏部侍郎。

元载有一个长辈从宣州来找他要官作。元载看这个人不是作官的材料，就给河北藩镇写了一封信，要他送去。长辈拿着这封信来到幽州私下打开一看，信上一个字也没有，只有元载的署名。这个人试着用这封没有内容只有签名的信投谒使院，结果是戏剧性的。判官见有元载的来函，马上报告节度使。节度使让级别很高的军校抬着箱子接受来信，并给来人以贵宾规格的接待，行前还送给他一千匹绢。元载的权势于此可见一斑。

这些事情代宗都知道，考虑到元载执政的时间很长，想给他一个全始全终、保持晚节的形象，所以代宗单独召见元载时，常常告诫他。但元载我行我素，惹得代宗对他愈来愈厌恶。

元载看代宗信任李泌，便设法排挤他，说："李泌常去北军和亲朋故友饮宴，与鱼朝恩的关系也不错，恐怕参与了鱼朝恩的一些事情。"代宗说："北军的将领多是李泌的旧部，是我让他常去联系这些人。李泌也参与了翦除鱼朝恩的谋划，你对他就不用怀疑了。"元载和他的同党仍然纠缠不休。代宗见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向朝廷要一个参佐，就对李泌说："元载容不得你，我先把你安置在魏少游那里待一段时间，等我下决心除掉元载的时候，一定会有信告诉你，那时你马上可以回来。"于是任命李泌为江西判官，又嘱咐魏少游，一定要善待李泌。

大历六年，代宗对元的所作所为愈来愈不能容忍，想重用一些不肯投靠元载的人作自已的心腹，逐渐缩小元载的权力。八月，代宗绕过元载，让宦官直接发出诏制，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给元载一个警告。

吏部侍郎徐浩的妾弟侯莫陈忿是美原县尉。大历八年，徐浩指使京兆尹杜济为侯莫陈忿虚报政绩，说他主管的邮驿工作特别突出，别的县比不上；又让吏部侍郎薛邕推荐他作长安县尉。徐浩、薛邕都是元载同党。

御史大夫李栖筠将这件事访察清楚，作了奏报。朝廷下诏要礼部侍郎于邵等详细调查。于邵奏报说，这件事千真万确，只是发生在去年五月大赦以前，一经大赦，也就不必治罪了。代宗怒气不休，一定要严办。五月十一日（乙酉），贬徐浩为明州别驾，薛邕为歙州刺史；十二日，贬杜济为杭州刺史，连于邵也因处理不力而被贬为桂州长史。这件事在朝官中引起不小的震动。

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与元载相表里，都是贪官。元载的妻子王氏和儿子元伯和、元仲武，王缙的弟弟、妹妹及出入王门的尼姑都利用权势，争索贿赂。元载又把政务委托给手下的官吏来办，求取功名的士人不巴结元载、王缙的子弟和主书卓英倩等，就无法进入仕途。

大历十二年，代宗下决心除掉元载。他怕消息泄露出来，单独与国舅左金吾大将军吴湊私下策划。这时有人告元载、王缙夜设道场，利用作法事的机会图谋不轨。三月二十八日（庚辰），代宗在延英殿命吴湊到政事堂缉拿元载、王缙，又将元仲武、卓英倩等投入监狱。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负责审讯，所问的内容都是宫中事先规定的。代宗还派中使直接审问和落实元载的罪名。元载、王缙表示服罪。当天杖杀左卫将军、知内省事董秀，接着赐元载在万年县自尽。元载表示："愿得快死。"来人很客气，说："您得稍微受点委屈，不要怪罪我。"说完，脱下脏袜子塞进元载口中，将他杀死。

同时被赐死的还有元载的妻子王氏，儿子伯和、仲武、季能等。女儿早已出家作了资敬寺的尼姑，此时也被没人后宫。抄家的时候，仅胡椒就搜出了八百石，其它资货不可胜计。

随后穷治余党，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韩会等十余人因受元载牵连而被贬黜。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24—卷225

《通鉴纪事本末》：《元载专权》

《旧唐书》：《元载传》

《新唐书》：《元载传》

仆固怀恩之叛

仆固怀恩是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的孙子，语讹称作仆固。唐太宗贞观年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降唐。唐于夏州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安置铁勒九姓，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怀恩，世袭金微都督。

仆固怀恩善格斗，又谙熟蕃情，故得历任节度使的重视，将他委为心腹。安禄山反叛时怀恩随郭子仪征战，多有战功。肃宗于灵武即位后，同罗部落在长安叛唐，北寇朔方。怀恩与郭子仪出兵共击同罗。怀恩子仆固玢领兵邀战，兵败被俘。不久，又逃回本部。仆固怀恩为了严明军纪，叱而斩子。这一行动振作了士气。大家以一当百，在黄河之滨将同罗击溃，尽收其驼马。肃宗为了充分利用蕃兵，派怀恩与敦煌王出使回纥，请兵结好。回纥可汗将女儿许给敦煌王，同时向唐室求婚。肃宗将宁国公主嫁给毘伽阙可汗，并同意将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毘伽阙可汗的小儿子。代宗朝毘伽阙的小儿子即位，称登里可汗。仆固怀恩成了登里可汗的岳父。这时代宗命宦官刘清潭向登里可汗请兵讨史朝义，可汗请与怀恩相见。因怕受到猜疑，怀恩不敢行。代宗赐其铁券，并以手诏令他前去，与可汗相见于太原。回纥可汗见到怀恩许以出兵助讨史朝义。

驻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见可汗与怀恩带军同来，恐其翁婿合谋同袭军府，闭门自守，不敌他们进城，也不按常规出城

犒师。宝应元年（762 年），唐军与回纥军总反攻，取得重大胜利，仆固怀恩收复东都，并令其子右厢兵马使仆固玚等乘胜穷追，平定河朔。史朝义委署的相州节度以相、卫、邢、洺、赵几州降于唐将李抱玉等，恒阳节度李宝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于辛云京。朝义兵败自缢。郭子仪认为怀恩平定河朔有大功，让元帅之位于怀恩，遂授怀恩河北副元帅、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等好几个头衔，另加食封四百户，加上以前的食封户已有一千户。

获得高位与极大荣誉的仆固怀恩送回纥可汗还蕃，师出太原之北，又吃闭门羹。怀恩无法忍受汉将的冷漠与猜忌，状告朝中，却未得到回音。这时有人忌妒仆固怀恩之功，上表诬陷怀恩包藏野心，迟早要造反。代宗把事情说成是一种误会，并不深究。

安史之乱以来，仆固怀恩一门有四十六人死于征战，他有嫁女绝域、说服回纥、收复两京、平定河朔四大功劳，对朝廷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然而在平定朝义叛乱后却被人排陷，受人冷漠，心里很不平衡，于是上书历数自己的六大功绩，并将这些功绩说成是六大罪过。

代宗担心充满怨愤的仆固怀恩一旦与回纥联系，果真兴兵反唐很有危险，便派黄门侍郎裴遵庆出使汾州，要求他到长安，以便控制。怀恩应允下来。副将范志诚却不同意，说："立有大功的来瑱被杀已经是前车之鉴，您不要自投罗网。"第二天，心直口快的仆固怀恩对裴遵庆讲出了顾虑，表示反悔。裴遵庆说："不然让你的儿子入朝也行。"志诚又坚决反对，裴遵庆无功而还。

宝应二年正月，代宗再命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前去说服怀恩入朝。真卿认为仆固怀恩不会来朝，当然他也并不真想造反。讲仆固怀恩要反叛的只有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大家都明白，这话没有根据。真卿对代宗说："陛下如不信任他，可命资深望重的郭子仪取代他。怀恩将士都是郭子仪旧部，他一到

位，大家都会诚服。”

然而，仆固怀恩已与河东都将李竭诚拉上关系，准备共同起兵，反叛朝廷，并俟机谋取太原。事泄，辛云京杀李竭诚加强了太原城防。仆固玚前来攻城，大败而归，转而围攻榆次，太原告急。叛军为了迅速打下榆次，仆固玚遣使急发祁县兵助战。祁县兵匆忙出发，未及造饭，大家饿着肚子赶路，行军速度缓慢，结果贻误了军机，仆固玚下令追究迟到的责任。胡人说：“我们骑马，是汉兵走得慢。”于是，许多汉兵受到处罚。汉兵将领认为仆固玚偏袒胡人，人人心中愤愤不平。当晚汉将焦晕、白玉率众攻杀仆固玚。仆固怀恩获悉兵将哗变的消息，慌忙率部下三百骑渡河北走。其余的人，相率投归新任命的朔方节度大使郭子仪。

六月，仆固怀恩到了灵武收合亡散部队，声势再振。

代宗为招抚仆固怀恩，下令优抚怀恩家人，又下诏称怀恩一门勋劳卓著，天下尽知。此次被他人猜疑以致与朝廷反目，非怀恩本意。朝廷体察怀恩的苦衷，只要重新归顺朝廷，保证君臣之间情谊如初，一切不予追究。保证怀恩一家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但仆固怀恩不从诏令，坚持反叛立场。

郭子仪接受诏命入朝，正值泾原奏报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十万之众入寇，举朝惊恐。代宗令郭子仪率军镇守奉天。子仪受命，代宗向子仪问退敌之策。子仪道：怀恩作不成大事。代宗忙问理由，子仪道：怀恩本是我的副将，其兵将都是我的老部下，此次入寇，是将士们思归故土。这些人与我作战，一定不忍锋刃相加，因此怀恩不会获胜。”代宗深以为然。

八月，仆固怀恩为先导，引回纥、吐蕃兵十万之众入犯泾州、邠州，进扰奉天、醴泉。京师戒严，由郭子仪率军迎敌。郭子仪认为蕃军深入唐土，利在速战，决定坚壁严阵以老敌师。蕃军见唐军有备，不战而退。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为减轻长安方面的压力，采用围魏救赵的

柏文达率河西精锐攻打灵武，令仆固怀恩有后顾之

讯急从永寿回军，与蕃、汉二千骑兵夜袭文达；文达

从伤亡大半，余众退归凉州。未几，吐蕃攻凉州，凉州

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九月，河中行军司马赵复报告说：

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数十万众分道入寇。其中吐蕃、回纥自北道趋奉天，党项从东道趋同州，吐谷浑、奴剌自西道趋周至，仆固怀恩率朔方兵殿后，他们全是骑兵，驰来如飞，声势甚猛。”朝廷闻讯大骇，急诏大将郭子仪、李光进、马璘、董秦、骆奉先、李抱玉等各出兵扼守要地，阻击回纥、吐蕃。代宗下诏亲征，检括士民私马，令城中男子皆服皂衣，按照一定的建制，结成武装部队。连城门也是塞二开一。在紧张的气氛中，居民纷纷出逃。

就在长安城处于一片混乱之时，忽然传来喜讯，说仆固怀恩在行军途中患病，溘死于回归路上的鸣沙县。

代宗得到仆固怀恩的死讯，轻轻地说：“仆固怀恩哪里想造反，都是手下的人搞出的乱子。”其实在代宗所下的诏书中，从来也没提过仆固怀恩反叛。可见，他并不认为朝廷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前前后后都是正确的。

仆固怀恩死后，吐蕃继续入寇，以十万兵众进犯奉天，京城震恐。这时，宦官鱼朝恩意欲劫持代宗至河中避难。一天百官上朝，鱼朝恩忽率十几名禁兵手持利刃冲进来，威逼群臣同意代宗出逃。公卿大臣们惊得目瞪口呆，只有一个姓刘的给事，挺身而出厉声道：“如今大敌压境，你不劝勉天子抗击敌寇，反而要胁迫天子丢弃宗庙社稷，这不是谋反么！”刘给事的话震慑住了鱼朝恩。他惊沮而退，从此再不敢提到河中避难之事。

十月，吐蕃、回纥合兵围泾阳。因仆固怀恩已死，吐蕃、回纥二部争权，内部出现了裂痕。郭子仪便利用这个机会，释甲亲

人回纥营帐，说服回纥大帅药葛罗重新与唐修好。于是药葛罗与子仪执酒为誓，定约而还。吐蕃听说唐与回纥结盟，连夜率兵退去。药葛罗在郭子仪的配合下，率部众追击，大败吐蕃军。仆固怀恩的部将纷纷归降，代宗下诏凡归降者宽赦其罪。至此，仆固怀恩之叛才算告一段落。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19—卷 224

《通鉴纪事本末》：《仆固怀恩之叛》

《旧唐书》：《仆固怀恩传》

刘晏理财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经过长达八年的战争，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流亡。叛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劫，使不少地方成为废墟，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死于刀剑之下。乱前，唐朝拥有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乱后仅剩一千六百九十余万。由于军费剧增，战争破坏，人口减少，税收混乱，唐朝政府时常发生财政危机，不得不着力整顿财政。就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理财家。他，就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刘晏。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西北）人。八岁时，唐玄宗到泰山封禅，他献颂行在，文章写得十分优美。玄宗看到颂文后本以为是一个老年儒生所作，见面一看，竟是个小孩，十分惊讶，命宰相张说面试。张说面试时，见刘晏对答如流，也很惊奇，即授太子正字。朝中公卿大臣，竟相延见，号为神童，名震一时。天宝年间，刘晏先后担任夏县县令、温县县令、侍御史，在任期间深受百姓爱戴。安史叛乱后，刘晏被唐朝政府任命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得以施展理财的才能。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以善于理财被任命为京兆尹，随即加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并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理财工作。但不久被人诬陷，贬为通州刺史。

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任命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成为当时宰相中的一员。其后刘晏虽一度因宦官程元振事被罢为太子宾客，但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开始了连续十几年的理财生涯。

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十分缺乏，京城长安米价竟至每斗一千钱，以至皇帝御膳也不能保证正常供应。禁军吃不上饭，长安附近州县官员只好命令农民把未成熟的麦穗搓下来上交。刘晏上任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扭转这种危难的局势。那么，刘晏到底是怎样做的呢？

首先，大力整顿漕运。长期以来，唐朝政府经济便仰仗江淮。安史乱后，由于黄河流域及关中成为战场，人民大量流亡，江淮更成为军国费用的主要来源。江淮地区的粮食及其他物资都是从水路运来的，安史乱后，漕运制度遭到破坏，汴渠长年失修，由淮、泗入汴水再进黄河的线路不通，运输船只只得由长江进入汉水再到关中，不但运输量小，耗费巨大，还十分危险。刘晏经过实地调查，认为打通汴水漕运关乎国计民生，非办好不可。在给宰相元载的一封信中，他总结出恢复汴水漕运的四个好处：第一，若兴漕运，每年运到京师的米有二三十万石，就可以减轻京师三辅地区的徭赋，使百姓负担不至于太重；第二，由于战争破坏，东都（今河南洛阳）一带残败不堪，人烟稀少，有了南米北运，那么饥馑之人必然依附，村邑增多，就会繁盛起来；第三，从三江、五湖贡输大米到北方，云帆高挂，浩浩荡荡，边境各族知道后，必然认为唐朝粮草充足，不再有入侵之心；第四，漕运恢复后，水陆畅通，南北贸易自然繁荣，可逐渐再出唐初贞观、永徽盛世之风。同时，刘晏也指出了其中不利的地方。一是漕运沿途所经河南之地人烟稀少，难以找到吃住之处；其二在于河道长年失修，船只难行；其三，沿途中有一段因为长期没有戍卒，强盗时常出没

其间，肆无忌惮；最后，从淮阴到蒲坂均有军队驻扎，上自将领下及小卒都有权有势，他们声称自己缺钱少粮，很可能会任意扣留漕船。但终归利大于弊，而且一些不利因素还是很容易克服的。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三月，刘晏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开挖汴水，打通了由淮、泗入汴水再进黄河的水路交通。他又按照江、淮、河、渭各段水力特点的不同，建造坚固合适的船只，分段转运，并将十艘船编为一纲，派将校率领。又用盐利收人雇用船夫，不再要州县征发丁役。这样既减少了运费的损耗，又确保了运船的安全，提高了运输效率。刘晏在任期间，漕运粮船很少沉没，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达到数十万石，多时超过一百万石，彻底改变了过去漕运艰难的状况。史称唐朝漕运治理最好者，首推刘晏。

其次，改革盐法。实行食盐等物品的专卖制度，是唐王朝为解决财政危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唐肃宗时，江淮租庸使第五琦任山南五道度支使，作榷盐法，规定：凡产盐之地，都设置盐院，亭户（即制盐户）生产出来的盐都由官府垄断经营，严禁私盐的经营买卖。还规定许、汝、郑、邓之西的地方都吃河东产的池盐，而汴、滑、唐、蔡之东都吃海盐。刘晏出任盐铁使以后，专门管理江淮的海盐，改革了榷盐法。他针对食盐专卖制度存在的弊端，实行了一种比较严密的官营商销的办法，即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亭户制成的盐加价后转卖给商人，允许他们自由贩卖，不再征税，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这样一来，由于海盐比池盐产量大，价格又低，所以销路颇广，获得极大利益。当初江淮盐税每年只征收四十万缗，改行盐法后激增至六百万缗，占当时国库收入的一半。在那些距离产盐地比较远的地方，就把官盐运到那里，并贮存起来。一旦商盐脱销，盐价上涨，就平价卖出去。这样政府既获得巨利，老百姓却又没有什么意见。

刘晏理财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

为国家兴利时不是不顾民众死活，而是兼顾他们的利益。他认为国库充实的前提是增加赋税，而只有户口增多才能扩大税源，所以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在诸道设置巡院，由廉洁勤奋的士人做知院官加以管理。每旬每月这些知院官都必须将其辖区各州县的降水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详细地报告到刘晏处。如果知院官说当地丰收了，刘晏就在那里用较高的价钱购买谷物，并把它们在歉收地区出售，或者用以换进杂货供官府使用，多余的再运到丰收区卖出。如此调剂的结果，使得物价基本稳定。如果知院官看到当地要闹饥荒，便预先申报，在某月需要蠲免赋税，某月需要救助。到了那个时期，刘晏不等那些州县再次申请，就放粮赈济，使百姓不致于困顿贫穷，流离失所。刘晏的理财措施行之得当，致使社会比较安定，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

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很善于提拔重用才能之士，从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理财好手。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即便刘晏再有才干，也难以把天下的经济管理统于一人之手。正如他说的那样，“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是这么说的，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刘晏不惜重金，招纳贤才，使他们身居要职，先后选拔了几百名有经济才干的人充当各道租庸使及其僚属。在刘晏死后二十多年中，一些掌管财政富有成绩的官员便出自其中，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等人。

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刘晏一向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惟恐得罪权贵以至断送自己为国理财的大业，可由于他久掌财政大权，功高官大，还是遭到一些大臣的嫉恨。不过，由于唐代宗信赖刘晏，加上他理财能力很强，无人能比，谗言到底不能得逞。大历年间，刘晏由吏部尚书升至尚书左仆射，一直受到唐代宗的信任，这也是他理财成功的重要因素。

大历十年（779年）五月，唐代宗去世，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即位后，自然要培植自己的一班亲信大臣。八月，唐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炎本来是被贬出京城的，与刘晏关系一向不好，一旦拜相，便要寻机报复。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杨炎在唐德宗面前诬陷刘晏曾参与谋反之事，企图置刘晏于死地，没有得逞。杨炎又向德宗建议，令天下钱谷都归金部、仓部管理；罢免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务。既而又找个借口，把刘晏贬为忠州刺史。忠州即今四川忠县，远离京师。把大臣远贬到那里，在当时是很重的处罚。

杨炎仍不罢休，把刘晏赶出京城后，又指使荆南节度使庾准诬陷刘晏给朱泚写信请求营救，信中言辞多怨愤；还说刘晏招集州兵，企图造反。庾准的奏书送到唐德宗手中后，杨炎又从旁作证，说刘晏谋反属实。同年七月，唐德宗便暗中派中使到忠州，缢杀刘晏，然后再下诏赐死。刘晏的家属则被流放到岭南。消息传出后，天下之人都为刘晏冤死而悲愤。

一代杰出的理财家，就这样走完了他六十六年的生命旅程。但他的业迹与理财措施，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侯仰军）

参考书目：

《新唐书》：《刘晏传》

《旧唐书》：《刘晏传》

《资治通鉴》卷221—卷226

杨炎创行两税法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制，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唐中期以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亦随之遭到破坏。据载，天宝年间，全国总人口为五千二百万人，而因为是皇亲国戚、官户、僧尼、孝子贤孙而免除租调的就有四千四百多万人，很明显，封建国家的赋税负担全落在少数民众身上，虽然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封建国家的收人却反而剧减。为了增加收人，其它杂税，如户税、地税、青苗钱就日益加重。各地又有不同名目的搜刮办法，各藩镇根据当地情况时有加派，随意征收，人民负担不胜沉重。有的逃人豪强地主庄园，这使租庸户更少。如此恶性循环，使唐政府的财政收人成为一大难题。

为了改变财政上的困境，唐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承认均田制、租庸调制破坏的现实，改变现行赋税制度，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的改革，它的倡导者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

杨炎，字公南，陕西凤翔人，生于官宦之家。杨炎其人风骨峻峙，文藻雄丽，号小杨山人，又有孝行，在士人中颇有声望。初被征召为中书舍人．后历任司勋员外郎、礼部郎中、知制诰，累迁为中书舍人。他与常衮二人草拟制诰各有擅长，常衮擅拟封诰，杨炎擅恩奖诏书。时人羡其所制诏书华美，称二人为常、杨。

杨炎曾为李楷洛撰写碑文，为时人争颂；又任吏部侍郎，受命修撰国史。

代宗大历年间，元载任宰相专权，赏识杨炎，将其提拔重用。元载被诛，杨炎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

德宗继位以后，命群臣议举宰相，有人举荐杨炎。德宗对杨炎早有所闻，知其才行出众，便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任命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因杨炎素有文才，又有德声，故天下士人对其人相寄以热望。

杨炎拜相之时，唐政府面临的燃眉之急即国家收人逐年减少，人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

由于均田制废止，租庸调制的实行越发困难。加之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有意舞弊，其弊端越来越大。例如玄宗时讨伐边患，征调男丁戍边，而戍边之人多死于戍守之地。边将为了吃空额，并不向丁男所在州县报告死讯。这种人已故去，而户籍尚存的现象十分普遍。王铁上台任户口使后，发现这一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强令这些民户补交三十年的租赋，农民苦不堪言。另外租庸调制的主要征收根据是人丁，而不是土地和财产，富人家不但不多交税，还可以利用各种名目逃避赋税，而下层民众虽无家产，但只要有人就要交一份，因此造成富人负担轻，穷人负担过重的不合理现象。天下财富集于少数权贵、军阀手中，朝廷得不到，严重动摇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宰相杨炎于建中元年（780年）向德宗建议，废止租庸调制，推行两税法。

杨炎在奏书中，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阐述了租庸调制的弊病及无法再实行的理由，建议废止租庸调制，代之而推行两税法。

同时还提出了实行两税法的几个原则：改变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的征收办法，而一律以财产多少作为征收依据。首先，由有司作出财政预算，量出以制人，再根据支出情况将赋税分摊至各地。实行两税法，不再进行土断，不再区分土著户与外来户，民

户一律在居地交纳赋税，这叫户无主客，以居地为簿。另外将民户按照财产多少，分为不同等次，根据户等交税，这叫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民户应交地税和户税，地税即地租，按亩征收，户税为财产税，按户等征收。赋税分为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在六月内征收完毕，秋税在十一月内征收完毕。如果天下户数增加，每户的负担酌情减轻。其它杂税，一律并入两税，此外再加征敛者，以枉法论。

德宗对杨炎的建议极为赞赏，信之不疑，便不顾部分反对派的阻挠，下诏天下，正式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行给唐中央政权带来明显的收益，人民负担减轻，国家收人大增，贪官污吏亦无奸可取。刘晏理财时，政府收入增加，史载当时政府年收入为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税占一半以上，而行两税法后，政府收入为一千六百多万缗，还不算盐税，若加上盐税，就达三千万缗，可见这一制度的推行是很见成效的。

杨炎在其它方面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上书德宗建议恢复旧制，将国家府库收归左藏库，由朝官管理，以便根据库藏情况度用。这一措施改变了二十年来由宦官把持国库，操纵国本的腐败现象，夺了宦官的财权。

另外杨炎主张打击藩镇，积极防止吐蕃入侵，作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的工作，赢得了政声。但由于其权力渐大，开始独断专行。而且他为人恩怨分明，掌权之后，利用职权，报恩除恨，在处理政务上，掺杂了较重的个人爱憎。对有恩于己的人，极力提拔，对有怨于己的人，则不遗余力打击报复，渐渐失掉人心。如代宗时，元载案由吏部尚书刘晏讯问，最终定为死罪。杨炎为元载所提拔，又受元载牵连而被贬黜，因此与刘晏结下私仇。入相以后，他先罗织罪名，将刘晏贬官，而后又授意他人诬告刘晏谋反，致使刘晏无辜被杀。朝野为之不平。杨炎为开脱罪责，四处散布流言，将

杀刘晏的罪责推到德宗身上，德宗闻知大为不满，从此开始疏远杨炎。

这时德宗又提拔卢杞为相，与杨炎同列。卢杞是唐代著名的奸相，貌丑而无文才。杨炎自视高雅，不肯与之同桌吃饭，而最终被卢杞所害。

杨炎在曲江南建有家庙。卢杞散布流言说，杨炎建庙之地乃玄宗临幸之所，是有王者之气的风水宝地，在此处建庙，必有篡权之心。德宗闻听大怒，令治杨炎谋反之罪。建中二年十月，德宗下诏历数杨炎之罪，贬杨炎至厓州，不久又将其赐死，其年杨炎五十五岁。

两税法是中国封建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地税和户税，起于唐初。地税从义仓转化而来，开始每亩交粮二升，以备荒年之需。玄宗时将交粮改为折物，变地方留用为转运京师。户税初时将户分为三等征收，后改为九等。起初地税户税在总的赋税中比重很小，后来随着租庸调制的破坏，这二种税作为赋税差额的补偿在总税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就是将本来是附加税的地税和户税作为正税征收，同时废除租庸调制和其它一切杂税。

两税法的实行大大扩展了纳税面，皇亲国戚、官僚地主们不但失去了在租庸调制下的免税特权，而且因为他们的土地、财产多而多交纳一大笔税额。另外还查出了一百三十多万户隐匿于庄园的客户，因此纳税对象增加了好几倍。

两税法以财富、土地为对象征税，改变了以人身为本的旧传统，比较合理，另外规定商人也要在所在地纳税，主客户同样交税，负担也比较平均。

另外两税法免除了徭役，以税代赋，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助于生产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总之，两税法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加强了中央政府控制财政的权力。整顿了财政制度，基本上消除了财政上的混乱局面。

两税法虽然具有不少优点，但其本质仍然是加强对农民阶级的控制和剥削，因此时过不久，在腐败的政治统治下，两税法又生出了许多流弊。不仅各种杂税、摊派又开始出现，十几年后，已由二税取代的徭役又加在人民头上。

（于宝华）

参考资料：

《旧唐书》：《杨炎传》

《新唐书》：《杨炎传》

《通鉴纪事本末》：《两税之弊》

河北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是唐中后期政治的一大特点。

所谓藩镇割据就是地方节度使利用手中的军队，割据一方，建立独立王国，成为对抗中央的分裂势力。

藩镇割据的出现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直接相关。唐玄宗时府兵制破坏，兵源枯竭。为了边防需要，玄宗时采用募兵制征兵，于是当兵成了一种职业，为了管理军队，地方上又设置了节度使掌管当地军事，统领军队。但因兵士不再更换，久而久之便与节度使形成了主从关系，节度使亦靠手中的军队不断扩大权力，控制了所在地的政治、军事大权，成为一方霸主。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即是地方节度使对抗中央发动的叛乱，而在平定叛乱后，唐政府对叛军采取姑息态度，只要投降，一切不问，并未对形成叛乱的根源加以铲除，许多叛军将领摇身一变成为唐廷的节度使，为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局面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安史之乱后割据的主要方镇有魏博镇、成德镇、卢龙镇、淄青镇、宣武镇、相卫镇、淮西镇等。这些方镇的节度使或父子相继，或拥兵自立，唐政府无力干涉，只是承认既成事实。诸镇之间往往互相攻伐，或暂时联合共同对抗朝命，对朝廷稍有不满就率兵作难，成为唐后期战乱的直接祸根之一。

唐玄宗乾元元年（758 年）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下杀王玄志之子，共同拥立侯希逸任节度使，朝廷被迫承认侯希逸任节度副使，开创了将士废立节度使之先例。

代宗永泰元年（765 年）正月，平卢节度使侯希逸镇守淄青。一次兵马使李怀玉乘侯希逸出城之时，将其拒之城外，不让进城，朝廷无力过问。

这时魏博的田承嗣将管区内的青壮年全部著籍为兵，只留老弱耕种庄稼，使魏博兵一下子扩充为十万人。其中有一万亲兵是精锐部队，战斗力极强。与此同时，成德的李宝臣、相卫的薛嵩、卢龙李怀仙亦乘机招降纳叛，扩大势力。他们修建城池，自行任命官员，不再向朝廷纳贡，又利用婚姻关系互相拉拢，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朝廷对此除采用怀柔态度，以求息事宁人外，别无善策。

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六月，幽州兵马使与经略副使朱泚杀节度使李怀仙，自任留后。朝廷无奈，正式下诏令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朱希彩为人残暴，激怒部将，被手下人杀死。朱泚便利用机会夺得了权力，大历七年十月，朝廷又下诏书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大历八年，朱泚派弟弟朱滔奉朝命至泾州防秋，这是自安史之乱后幽州兵第一次受朝廷调遣，因此代宗十分高兴，特在长安为朱泚修建了府第，另给了许多赏赐。于是朱泚留住长安，由朱滔赴镇任幽州留后。

魏博镇田承嗣自恃强大，一向不把周边其它藩镇放在眼里。大历十年，田承嗣出师攻袭相州，在昭义兵马使裴志清的配合下，占据了相、卫四州之地，势力更强。崛起的魏博镇渐渐引起其它藩镇的不满。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田承嗣的女婿。李宝正在魏州闲居，常与田承嗣的儿子田维一同玩耍。一次，二人击毬游玩时，李宝正所乘马匹受惊，误将田维撞死。田承嗣失子心痛不已，遂将李宝正关押起来，并通知了李宝臣。李宝臣派人赔罪道歉，另送一柄罚杖给田承嗣，任其处罚责打宝正。谁知田承嗣竟

用罚杖将李宝正活活打死，从此两镇由姻亲转为仇敌。

这次田承嗣擅取相、卫四州之地，给李宝臣复仇带来借口。他会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共同上书，要求征讨田承嗣。二人的上书正中代宗下怀，他早就希望以藩镇打藩镇的方式，惩治搞独立的藩镇，自然立即批准。大历十年四月，唐廷下诏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为防止田氏抗命造反，诏令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等各道兵马进逼魏博，随时准备开战。

五月，李正己克德州。六月，李宝臣克冀州。九月，李正己、李宝臣在枣强会师，共围贝州（山东临清西北）。

为了庆贺会师，准备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二军同时犒赏部下。事后士兵们发现成德军颁赏丰厚、平卢军颁赏菲薄；经过对比平卢军士大为不满，军营里闹翻了天。李正己怕发生军变撤兵回镇，李宝臣也退兵而去。李忠臣正在攻打卫州，获悉成德、平卢二镇人马已自行退去，孤军不支，撤出战场，南渡黄河，退屯阳武（河南原阳）。李宝臣从贝州撤下后，与朱滔合攻沧州，战局僵持不下。但在十月份，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在清水大破进犯磁州的卢子期，河南诸将又在陈留大破田悦，取得有利的战场态势。

田承嗣采取分化的手段，笼络李正己，重点对付李宝臣。他礼遇李正己的使者，又绘制李正己的图象，焚香祈拜，表示自己已有八十六岁，诸子不肖，嗣子孱弱，死后愿将地盘让与李正己。

代宗为了表彰李宝臣，派中使马承倩前去慰劳。将回朝廷的时候，李宝臣到馆舍送给马承倩一百匹缣，被承倩大骂一通，礼缣也被扔在路上，搞得李宝臣下不来台，很难堪。兵马使王武俊说："你在军中新立大功，尚被中使如此渺视，平了田承嗣后，你到了长安，境遇恐怕还不如现在，不如放田承嗣一条生路，我们也可养敌自重。"这样李宝臣也不再认真进战，只对朝廷敷衍。

田承嗣了解到李宝臣的家乡是朱滔的属地，顿时心生一计。他让人刻了一块谶石，上面写着："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人幽

燕。"偷偷埋在李宝臣的管境内。又让看风水的阴阳先生对李宝臣说，当地有王者之气。李宝臣挖出谶石半信半疑。田承嗣派人表示：李宝臣与朱滔即使出了死力，打下沧州也归朝廷；如李宝臣愿与田承嗣停止对抗，承嗣愿将沧州白白送给李宝臣。此外，田承嗣还愿协助李宝臣攻打范阳，为李宝臣扩大地盘。李宝臣见一系列变化都与谶语暗合，便同意与田承嗣联手，谋取范阳。

事先，李宝臣对朱滔使者说："久闻朱公的仪貌如神，能不能把画象带来，让我瞻仰一下！"朱滔答应这个要求，派人将画像送来。宝臣令将画像悬挂在练习射箭的厅堂之上，让诸将都来观看。他假意说："朱滔神采奕奕，真象神人一样。你们要仔细欣赏，看清楚，牢牢记在心里。"

不久他选派精骑三千，连夜兼程，跑了三百里，奔袭瓦桥。朱滔没料到友军倒戈，仓促出战，结果大败。诸将根据画像，到处搜索朱滔。朱滔为了逃命，丢下体面，变换服装，四处躲藏，极为狼狈。

田承嗣见幽州和恒州二镇交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马上引军南还。他让人告诉李宝臣："河内地区吃紧，我先走一步，很抱歉。刻石上的谶文是我和你开个玩笑！"李宝臣上了当，惭怒退兵。为了防止朱滔反击，他任勇将张孝忠为易州刺史，留下七千精锐骑兵加强守备。

十一月，田承嗣部将吴希光献瀛州（河北河间），归顺唐廷。从十二月到转年二月，田承嗣一再上表，表示愿意人朝自新。而讨伐田承嗣的军事行动早已中止，加上李正己一再为他讲好话，于是朝廷表示同意他和家属人朝，同时赦免田承嗣，恢复他的官职。承嗣部下一切抗拒朝命的作法都不再追究。

大历十一年十二月四日（丁亥），加封李宝臣、李正己为同平章事。

田承嗣根本不想离开军镇入朝。汴宋留后田神玉死后，都虞

侯李灵曜北结田承嗣，杀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朝廷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而以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不受诏，为了息事宁人，改任李灵曜为汴宋留后。田承嗣派兵攻打滑州，李勉不敌，惨遭败绩。

李灵曜作了留后之后，效法河北藩镇，把八州的刺史和县令都安插成他的亲信。于是朝廷再令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伐李灵曜；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进兵助战。

汴宋兵马使摄节度副使李僧惠本是灵曜的谋主。他见寡不敌众，便转变立场，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派人向朝廷献忠。九月，朝廷委任李僧惠为宋州刺史、高凭为曹州刺史、石隐金为郓州刺史。

李忠臣、马燧来到郑州（今属河南），被李灵曜奇兵击败。但李正己攻克了郓、濮二州，李僧惠在雍丘传捷；十月，李忠臣、马燧反击也有建树。其后李灵曜在汴州城西再遭败绩，被李忠臣等围困在汴州城内。

田承嗣派田悦前来救援，田悦在匡城打败永平、淄青联军，乘胜进军汴州；但在汴州被忠臣裨将李重倩夜袭，田悦不战而溃，狼狈逃回。李灵曜见援军败去，难再固守，趁夜开城逃遁。永平军将杜如江将其擒获，送至京师斩首。

田承嗣不入朝，又支持李灵曜对抗官军，朝廷自然还要下诏讨伐，但也没有力量继续再战。所以当田承嗣作出姿态，主动上表谢罪之后，仍旧恢复田承嗣的官爵，同时作出让步，答应他不必入朝。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攻灭李灵曜后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他把治所从青州迁到郓州，由儿子李纳为青州刺史，驻守青州。李正己用法苛严，当地人们不敢相对私语，但他法令统一，赋税均而

不重，也能为当地人接受。正己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近的藩镇都对淄青望而生畏。

此时，田承嗣割据魏、博、相、卫、洺、贝、檀七州，李宝臣割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兵五万。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割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二万人马。这几个人互相支持、互相串通，虽然表面上拥戴朝廷，但不理会朝廷的政令，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委任官吏、组织军队，收取租赋、刑杀赏罚全由自己作主。代宗对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听之任之。这些藩镇其实已是国中之国。

后来，成德镇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为求节度使世袭，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等人兴兵抗唐，酿成“四镇之乱”。藩镇割据成为唐后期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24--卷241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连兵》

《旧唐书》：《李正己传》、《田承嗣传》、《李宝臣传》、《朱滔传》

《新唐书》：《藩镇魏博传》、《藩镇镇冀传》、《藩镇卢龙传》、《藩镇淄青横海传》

四镇连兵

安禄山、史思明死后，安史部下纷纷降唐。由于唐政府无力彻底平乱，就让一些有实力的归降者就地作官，致使许多安史旧部改头换面成了朝廷正式任命的节度使。河北地区是安史发动叛乱的老巢，节度使多为安史旧部。他们是动乱的受惠者，深知维持军事实力是维护既有地位的支柱。因此，一开始就把所辖军镇搞成私人势力的据点，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这些藩镇不仅有自己的军队，而且自行任命地方官吏，自立法规，自收赋税，朝廷对他们奈何不得。

在宗法制下，藩镇节度使是世袭的。而一旦地方长官由世袭形成，唐中央的统治在这些地方就失去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意义。这些藩镇其实已是国中之国。

代宗一朝对藩镇采取掩耳盗铃般的姑息态度。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病死。他的子辈十一人，以侄子田悦最有能力，田承嗣留下遗言，要田悦主持军府。二月十三日（甲申），朝廷根据田承嗣的生前要求，任命田悦为魏博留后。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逼淫将吏妻女。他把军政交给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自己耽于声色。张惠光挟势暴横，惠光的儿子为牙将，也甚得宠，暴横甚于乃父。张氏父子搞得淮西镇怨声载道。李忠臣族子李希烈为左厢都虞候。他见人心怨怒，有机可乘，便与大将丁暠等联合起来，赶走李忠臣，杀惠光父子。从此李希烈成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五月十九日，李希烈作了淮

西节度使。后来淮西镇改名为淮宁镇。

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无能，难孚众望。李宝臣为了让李惟岳接班，事先将资深而难于控制的深州刺史张献诚等人治成死罪。有时，一天要杀十几个将领。李宝臣还想把易州刺史张孝忠杀死，但张孝忠早有提防，无论如何不肯离开老巢易州。李宝臣无计可施。兵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李宝臣将女儿嫁给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士真很会为人，厚结李宝臣左右，关系处理得很好，所以张孝忠、王武俊没有被杀。

李宝臣死后，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怂恿李惟岳匿丧不报，抓紧伪造李宝臣的上表，以李宝臣的口气要李惟岳继袭军府。德宗不许，派给事中班宏来探视病情。李惟岳见隐瞒不住，才承认李宝臣已经死了。

长期以来，李宝臣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山南东道节度使沆瀣一气，在世袭军府问题上达成默契。所以田承嗣死后，虽河东节度使马燧一再断言田悦必反，李宝臣还是力请朝廷将节度使旌节授予田悦。田悦当然要投桃报李，反过来也请朝廷让李惟岳继袭父职。

德宗力图革除前弊，无论外界怎样施加影响，总不肯妥协。有人说：“李惟岳继位已成事实，不正式承认，只有逼他造反。”德宗说：“以前总是迁就各方藩镇，照样出乱子。看来一味妥协让步终究不是办法。如果他要造反，怎么哄也不行。”

田悦和李正己见德宗认真起来，各自遣使与李惟岳串联，密谋兴兵拒唐。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反对田悦的计划。因为打着拥戴唐室的旗号，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享富贵，连兵拒命大有风险。所以再三出来劝阻，这个意见未被田悦采纳。

成德判官邵真从忠君和策略的角度劝谏李惟岳。他认为将李

正己的使者缚送京师向朝廷献忠，求得朝廷的信任，同样能作节度使，还不会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李惟岳本无成见，听了邵真的分析，便让邵真草奏，准备变卦。长史毕华不同意变卦，他对李惟岳说："先公李宝臣与淄青、魏博二镇结好二十余年，这个关系应该珍惜。现在把李正己的使者送交朝廷。是否能象期望的那样得到信任，一时很难作出判断。但李正己翻了脸，立刻派大军袭来；成德镇孤军无援，难以对付，倒是现实。邵真的话只是书生发议论，不能认真。"李惟岳又被说动，回到原来的立场。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是李惟岳的舅舅。他在成德很有威信，受到王武俊等人的敬重，这使李惟岳对谷从政很不放心。于是从政杜门称病。李惟岳只与胡震、王他奴等人商议军府事务，有时还散发一些金帛，以取悦将士，收买人心。从政往见惟岳说："当今天下太平。天子励精图治，极想在这个环境下取消藩镇世袭的旧例。你如带头违诏，肯定会受到讨伐。在被金帛收买的时候，大家当然会拍你的马屁，表示要为你尽死，但真有大难临头一天，树倒猢狲散，谁不和你离心离德！当初你父亲杀死的高班大将加起来也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多少人的子弟在打复仇的主意，你想过吗？另外，我们和朱滔矛盾很深，他们恨不得借机与我们兵戈相见。我们的敌人里里外外加起来，力量很强大。田承嗣曾与安、史一同造反，身经百战，凶悍闻于天下；如果当初不是你父亲按兵不进，又一再为他说情，早就被官军消灭，身首异处了。你年纪太轻，生长在富贵之中，不知事情的利害。我看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李惟诚摄领军府，然后亲自入朝，把事情讲清楚，皇上一定很高兴。那样你纵无大位，却不会失去荣禄，永远不用担惊受怕。不然大祸将至，悔之不及。我知道你一向提防我，不把我当自己人，只是顾念甥舅之情，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能不把真心话讲给你听！"李惟岳等人见他言语激切，不留余地，加深了反感。李惟诚是李惟岳的庶兄，他的姨是李正己的儿媳。惟岳把惟诚送

到淄青，从此惟诚不再回来。谷从政回家后饮药而死，死前他说："死并不可怕，一族从此衰灭让我死不瞑目！"

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虽与李正己等人相结，但自身实力不足，对朝廷的态度比较温和。朝廷为了争取梁崇义，加封他为同平章事，并赐给铁券，同时还任命梁崇义的裨将蔺杲为邓州刺史。蔺杲得诏书后不敢拆开，骑马驰见梁崇义请命。梁崇义对朝廷屡害功臣的一贯作法早有猜忌，不肯受诏。送诏书的御史张著只好回去复命。

六月六日（癸巳），德宗进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要他督理诸道兵讨伐梁崇义。宰相杨炎不同意，他说："李希烈本是李忠臣的养子，又被李忠臣重用，他却在羽翼丰满的时候将李忠臣赶走，夺去李忠臣的职位。这种人肯定不能重用。因为他要是有了功的话，谁也控制不了。应该选任别的合适人选。"德宗不听。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向李希烈提出了一套攻打梁崇义的办法。李希烈见他有点子，便让他作前锋。

当时，内自关中，西至蜀、汉，南达江、淮、闽、越，各处都派了兵。而李正己守住徐州的甬桥和涡口，梁崇义守住襄阳，已成对峙局面，通往长安的运路都切断了，到处人心惶惶。

李希烈因为连日下雨，一直未能进兵。德宗很着急。卢杞暗暗对德宗说："李希烈只是对杨炎不满才不愿进兵。陛下如要早建大功，只有暂时委屈一下杨炎，先免了他的相位，让李希烈满意。待讨平梁崇义后重新启用杨炎也没有多大关系。"于是，德宗听信卢杞之言，下令让杨炎改任左仆射，不再主管政事。

梁崇义见官军四至，便派兵到江陵主动出击，来到四望山，大败而归。于是退兵襄、邓，重作军事部署。李希烈引军循汉水而上，与早已到来的各道官军会师。梁崇义派部将翟晖、杜少诚迎战于蛮水，被李希烈打败，追至疏口（襄阳南），全军溃灭，翟、

杜二将投降。接着李希烈来到襄阳城下。崇义闭门拒守，但守城的士兵把城门打开向外逃，局面不可收拾。梁崇义见大势已去，与妻子一同投井而死。

田悦不听田庭玠的劝告，终于和李正己、李惟岳结成联盟，连兵拒命。田悦除了派兵马使孟祐率五千人马北助成德以外，还分兵攻打临洺，意在乘机拓地。临洺守将张伾拼死抵抗，等来了朝廷派来的援军。这支援军由河东节度使马燧率领，约二万人，加上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的部队，合起来约八万人。他们与田悦大战百余合，斩首一万余级，解了临洺之围。

此间李正己也死了。正己的儿子李纳象李惟岳一样先不发丧，而自领军务，一切安排就绪，请德宗承认事实。德宗照旧不许。

田悦临洺兵败，求救于李纳和李惟岳。李纳派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李惟岳派兵三千前去支援。田悦收拾余众，得二万人，屯于洹水，卫俊驻在田悦东面，李惟岳的三千人驻在田悦西边，二部首尾相应。

十月，淄青将王温与魏博将信都崇庆合攻徐州。徐州刺史李洧要善于跑路的王智兴到长安告急，仅五天时间长安就得到了消息。唐廷派朔方大将唐朝臣与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同去救援。信都崇庆与王温在二十天里攻城不下，请李纳增兵。李纳派石隐金率部前来，与宣武军相拒于七里沟。黄昏，宣武军退兵回营，崇庆等率师追击，却被埋伏在这里的朔方大将唐朝臣击溃，辎重全被缴获。在此之前，朔方军装备很差，旗帜敝坏，衣服破旧，军容很不严整。宣武军称他们"叫花子"。一仗下来，"叫花子"神气起来，装备更换一新。官军乘胜追到徐州城下，打通了江淮漕运。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朝廷决定下诏削夺李惟岳官爵，又加封马燧为魏博招讨使。

建中三年正月，马燧、李抱真在洹水大破田悦，田悦退往魏州。马燧与李抱真关系不好，李抱真追至三桥退军，马燧停驻在

平邑，不肯配合进兵，因此放走田悦。田悦来到魏州南部已是半夜，守将李长春不放田悦进城，希望官军追来，将田悦彻底消灭。这个希望落空了。天明以后，长春不得已，开门请田悦进城。田悦立即将李长春斩首，组织城中的少数士兵准备据城抵抗。大家都没有心情抵抗，常有阵亡将士的亲人在街上痛哭，魏州城内气氛压抑。田悦为了争取魏州军民的支持，把全城的人召集在军府门外的空地上，当众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我是因为李宝臣、李正己二人的保荐才得以嗣守伯父田承嗣的基业，据有魏州。今天，李宝臣、李正己二位老人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儿子得不到世袭。为了这件事，我不自量力，抗拒朝命，落得目前这个样子，让好多士民无辜肝脑涂地。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上有老母，不能自杀，你们不必为我赴难。"说着，抽出佩刀，"你们可以用这把刀砍下我的脑壳出城投降，朝廷自会奖赏你们。大家不要和我一起玉石俱焚。"在场的将领拦住他说："胜败兵家常事，不必介意。您这次举兵确实不是为了自己。我们累世受恩，愿意跟着您再打一仗，打不赢我们再死。"田悦说："承大家这么瞧得起我，即使我死了，也不会忘记大家的厚意。"于是与诸将分别断发，约为兄弟，誓同生死。又把府库的钱以及征敛富民的赀财共百余万，拿出来赏给士兵，稳定民心、军心。魏州城又出现了凝聚力。田悦把贝州刺史邢曹俊找来，要他整饬部队，修缮工事，军队的士气开始恢复。

李纳在濮州受到河南军的威胁，请田悦发兵支援，援军出魏州，担任护送的三百名骑兵在遣军使符璘、副使李瑶的策动下，投降官军。接着，李瑶的父亲李再春献博州，田悦的堂兄田昂献洺州降，田悦部将王光进献长桥降。十几天后，马燧兵临魏州，攻之不克。

田悦的盟军成德镇发生了新变化。正月十三日（丙寅），李惟岳派兵和部将孟祐守卫束鹿，终未能守住。朱滔、张孝忠进围深

州（河北深县）。掌书记邵真见形势不妙，给李惟岳出主意，要他暗与朝廷接洽。这消息被孟祐获知，转告给田悦。田悦大怒，派衙官扈岌来见惟岳，留下话说："我们田尚书为了让你作节度使才举兵拒朝，你要是听信邵真的话，把反逆的罪名全归到田尚书头上，咱们就绝交。不然，必须把邵真斩了。"判官毕华主张仍与魏博、淄青联合。李惟岳本无主见，找来扈岌当着他的面将邵真斩了，随后发兵一万与孟祐合攻束鹿。束鹿之战的先锋王武俊早为李惟岳疑忌。王武俊自忖："我若破朱滔，李惟岳军势大振，回去后我成为无用之人，一定被他杀掉。"所以作战不甚用力，以致失败。

朱滔想乘束鹿之捷进取恒州。张孝忠却早早把部队带到西北方向的义丰县。因为他看到恒州宿将很多，不是可以轻取的，只要外部压力缓和下来，内部矛盾会激化，李惟岳的统治绝不可能长久。而朱滔言大识浅，可与共始，终难共终，所以不与朱滔合作。于是朱滔也屯军束鹿，不敢轻率进兵。

李惟岳见这么多人叛变，对王武俊更加不放心。王武俊对自己的处境也没有信心。人们劝李惟岳说："王武俊智勇双全，与你又有骨肉之亲，在危难之际，不用他又用谁？"李惟岳一想，这话有道理，就让步军使卫常宁和王武俊共击赵州，还让王士真将兵保卫军府。

王武俊离开恒州后，对卫常宁说："终于逃出了虎口，不能再回去了，我准备投靠张孝忠。"常宁道："李惟岳不是成大事的材料，早晚要被朱滔灭掉。天子已有诏书，谁杀了李惟岳，谁就作成德节度使。您在恒州很有基础，取代李惟岳易如反掌。如事不成，再投奔张孝忠也不迟。"王武俊觉得主意不错，便拉拢恒州来的谢遵入盟，共同策划夺取军镇的办法。谢遵回到恒州，先与王士真通了话。闰一月二十一日，王武俊、卫常宁带兵回袭李惟岳。谢遵与王士真矫称奉了李惟岳的命令，开城迎纳。武俊率数百骑

兵冲进府门。里边有王士真接应，一切都很顺利。很快抓到李惟岳，把劝他抗拒朝命的谋主郑诜、毕华、王他奴等就地杀死。王武俊本想把李惟岳送到长安，交给朝廷处理。常宁道："他在长安要是把谋反的责任归咎于您，就说不清楚了。"于是将他勒死，只将首级送往长安。

二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投降。河北大体平定，只有魏州尚未攻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李纳形势愈来愈困难。朝廷以为天下不日可平。十一日（甲子），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又将德、棣二州划归朱滔，让他还镇。朱滔还想要深州，朝廷不许。朱滔当然不满，留屯深州不撤。王武俊本看不起张孝忠，自己亲手杀了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之上，但孝忠作了节度使，自己与康日知都是职位较低的观察使，又把赵、定二州交了出去，心里也不痛快。德宗又诏王武俊筹粮三千石拨给朱滔，马五百匹拨给马燧。王武俊认为朝廷不想让成德旧将担任节度使，攻下魏州后，一定收回恒、冀，所以才让他出粮出马，削弱他的实力。由于存在这种疑虑，王武俊不肯按诏令行事。

田悦知道了这个消息，派判官王侑和许士则从小路赶往深州，游说朱滔。他们说："您奉诏伐李惟岳，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攻克束鹿、打下深州。王武俊乘李惟岳势窘而成事，功劳当然是您的。德宗的诏书明明说，您得取的城邑都归您，却把深州割给康日知，这是自弃信义的行为。朝廷想扫清河朔，不让藩镇割据、权力世袭的行为得逞，准备完全用文臣代替武将，充任节度使。魏博如亡，成德、卢龙以后也站不住脚。如您有意在魏博危难之际帮帮忙，不但对魏博有存亡继绝之恩，对您的子孙万世也有好处。"他们还答应将贝州送给朱滔。朱滔的一切行为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拥有并拓展割据的地盘。所以听了他们的话，特别高兴，立刻要王侑回去告诉田悦，要田悦无论如何顽强守住，他会暗中支援。

田悦又派判官王郅和许士则一同到恒州游说王武俊。他们对王武俊说："您担着身家性命的危险，除掉逆首李惟岳，却与不出赵州城的康日知褒赏略同，大家都为您不平。后来又听说有诏让您向邻道提供粮、马，朝廷的意思无非是削弱军府，待平定魏博后，再让马燧、朱滔合兵消灭成德。朱滔也不能自保无虞。他并不想把深州交给康日知，而愿交给您。只有保全魏博，大家才安全。成德、魏博、卢龙三镇连兵，如耳目手足之相救，可立于不败之地。"王武俊可得深州自然高兴，立刻答应结盟，并派判官出使朱滔，接收深州。朱滔派人与张孝忠联络，张孝忠不愿结盟。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打李纳据守的濮州，克其外城。李纳在城上屈服，愿遣使入朝。李纳的弟弟李经及儿子李成务、判官房说入朝被扣。因为有人主张，李纳形势穷蹙，不日可破，不能轻饶了他。这样，李纳放弃濮州，回到郓州，又与田悦等结合在一起。

李纳最初谋反的时候，他委署的德州刺史李西华防守很严，是忠于他的干将。但李纳听信谣言，让传播谣言的都虞侯李士真代为德州刺史。李士真又编造了一个理由，请棣州刺史李长卿到德州，然后劫持他一同归朝。四月，朝廷正式任命李士真、李长卿为二州刺史。李士真为防李纳反击，求援于朱滔。朱滔声言召李士真到深州议事，把他留在深州，而派大将李济时掌领州事。

德宗派各道兵到魏州讨伐田悦。王武俊不受诏，还把德宗派来的使者送交朱滔。朱滔对军众说："我向朝廷奏请给有功的将士授官，朝廷一个也不同意。我想今天与大家整装前去魏州，击破马燧，过上几天温饱的好日子，好不好？"大家都不作声。问了好几遍，大家才说："我们只愿保住目前的处境，不敢再图侥幸。"朱滔默然而罢。

康日知得到情报，报告给马燧，马燧奏报给德宗。但在魏州未下，王武俊又叛的情况下朝廷的力量不足，只能拉拢朱滔。四月十日（壬戌），赐朱滔爵通义郡王，指望以这个措施稳住朱滔。

未想到朱滔得寸进尺，反叛的意图更加明朗。他分出兵马在赵州设营，准备进逼康日知，又把深州授给王巨源。

王武俊命其子王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率兵围攻赵州。

朱滔率二万五千人马从深州出发，来到束鹿。早晨起来吹号集合，准备行军。士卒忽然大乱，大家乱嘈嘈地说："天子让我们回幽州，为什么要去救田悦？"吓得朱滔躲到驿站的后堂不敢出来。牙将蔡雄、兵马使宗项等出来维持局面。他们连喊："大家不要嚷了，听朱司徒传命！"人们慢慢静下来。蔡雄说："司徒朱滔从范阳起兵的时候，朝廷讲好谁夺了李惟岳的州县，地盘就属谁。我们竭力血战夺下深州，朝廷无信，却将深州交给康日知。另外因你们作战有功，朝廷赏给你们每人十匹绢。这些绢在魏州西境却被马燧抢去了。朱司徒只要待在范阳，就可坐享富贵，这次南征，完全是为了你们！"有人说："敕使为什么不给我们看好赏物？大家找他去！"说着，人们涌进敕使院，将敕使乱拳打死。有人还在喊："即使为了我们，我们也不愿打仗，还是回范阳去吧！"朱滔见形势不妙，带兵回深州，密令访察带头闹事的人，先后杀了二百多人，把事态镇压下去。于是重新率兵南进，没人敢再闹事。他们进取宁晋，停驻在这里等待王武俊。武俊将步骑兵一万五千人夺取元氏县，向东行，赶往宁晋。田悦自恃援兵将至，派部将康愔率万余人出城西，与马燧等战于御河之上，大败而还。

旷日持久的战争每月要消耗百余万缗钱，府库难以长期支持战争。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向富商借钱，以供军用。四月十二日，德宗下诏向商人借钱，令度支负责这件事。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商贾的财产，超过一万缗以外的钱财，全部借为军用，如认为有人申报不实，就抓起来严加榜捶，逼得有人上吊自杀。长安城人声鼎沸，如同遭到强盗的洗劫。就这样搜刮才收到八十余万缗。接着又征当铺的利钱，存有钱帛粟麦的人，都要征借四分之一的积蓄。百姓为了抗议这种作法，停止商业活动，成群结队

地拦阻骑马的宰相，作出申诉。宰相卢杞开始还想作些解释，后来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秩序大乱，卢杞只好溜之大吉。这样，加在一起所借不过二百万缗，人们已经承受不了了。

二十二日，任命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

李抱真作泽潞节度使时，马燧管辖河阳三城。李抱真要杀怀州刺史杨钵，却被马燧收留。马燧还向朝廷诉辩杨钵无罪，与李抱真发生分歧。讨伐田悦时，两人又不合作，矛盾加深，以至互相观望，难有战果。为了这事，朝廷常常派人调解。王武俊进逼赵州后，李抱真分兵二千退守邢州。马燧见尚未迎敌，友军已退守其地，也想罢兵。李晟说："邢、赵二州连壤，分兵把守也很必要，如果自行撤退，对舆论不好交待。"于是马燧决定拒战。他亲自到李抱真的军营，释怨结欢，调整关系。

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排挤判官郑云逵，依靠朱泚的力量贬他为莫州参军。这个郑云逵是朱滔的女婿，贬官后到了老丈人那儿作了掌书记。蔡、郑两人十分对立，不断挑动事端。蔡廷玉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对朱泚说："朱滔在幽州军镇办事独断专行，不是个厚道人，不可以把军权交给他。"这些话传到朱滔的耳朵里，朱滔大怒。他写了好几封信，要朱泚把蔡廷玉、朱体微杀掉。朱泚不理。兄弟俩由此失和。及朱滔拒命，德宗为了拉拢朱滔，将蔡廷玉贬为柳州司户，朱体微贬为万州南浦尉。

朱滔派人给朱泚送去蜡书，要他一同反叛。这封信被马燧截获，使者及书信被送到长安。朱泚并不知情。德宗用驿传把朱泚接到凤翔，让他看了蜡书。朱泚惶恐地谢罪，连连叩头。德宗说："你和朱滔相距数千里，不会是同谋，这件事和你没关系。"继续让他住在长安私第。为了安抚他，还赐给他名园、腴田、锦綵、金银等，十分丰厚，他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太尉、中书令等职衔依然保留。

朱滔、王武俊自宁晋南救魏州。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受命率朔方及神策军一万五千人东讨田悦，同时抵御朱滔。朱滔行军到达宗城的时候，郑云逵及参谋田景仙脱离朱滔投降。

二十九日（辛亥），在定州设置义武军，易、定、沧三州归义武军管辖。

朱滔、王武俊率军来到魏州，田悦令人牵牛担酒出迎，振奋士气。朱滔在惬山扎营，刚刚安顿下来，李怀光的朔方军也赶到了。马燧整军迎接李怀光。朱滔以为官军要来突袭，急忙出军布阵。怀光见其营垒未完，倾军击杀，滔军崩沮。怀光骑在马上巡视战场，面有喜色。怀光军士杀人朱滔军营只顾抢夺宝货，不想王武俊率二千骑兵横冲军营，将抢夺宝货的军士冲开。朱滔率军又杀回来，官军转胜为败，除了战死者，大批军士被挤人永济渠淹死。到了晚上，朱滔等筑起堤坝，将永济渠水导人王莽故河，断绝了官军的粮道和退路。第二天，水深已有三尺多。马燧见形势不妙，派人好言向朱滔讲和，说愿与各节度使退回本道，然后由他们出面奏请德宗把河北的事务交给朱滔来管。朱滔见对自己有利，同意达成谅解。王武俊比较清醒，看出放掉官军必有后患，所以坚决反对，却拗不过朱滔。

七月，马燧与诸军涉水西撤，退到魏县，在这里修建工事，与朱滔相抗。以前的私下协议统统不算数。朱滔上了当，向王武俊赔不是，但消除不了王武俊的怨愤。几天后，朱滔等率兵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官军隔水相抗。

李纳向朱滔求援，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率兵赶来助战。李纳得到支持后，立即攻打宋州，但毫无建树，就派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驻守濮阳、南华二县，以拒官军。

朝廷加紧了讨伐藩镇的部署，七月二十三日，任命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要他进攻李纳。又任命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加封朔方、邠

宁节度使李怀光为同平章事。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与张孝忠专门对付王武俊，两人在赵州合兵后，北略恒州。

八月，泾原留后姚令言升任节度使。

十一月，田悦为了报答朱滔的解救之恩，与王武俊商定，奉朱滔为主，两人对他称臣。朱滔不同意，说："惬山大捷，你们二位出了大力，我怎么敢独居尊位！"这时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出了个新主意，说："三位不必为谁居尊位而谦让不休。你们和郓州李纳四人一齐称王，岂不更好。称王并不一定造反，可以尊奉天子，不改年号，就象周代的诸侯那样，各有自己的王国。如不称王，大家都是叛臣，就是对部下也不好交待。一方面用兵打仗，师出无名；另一方面大家有了功劳，限于名分，也不能进行封赏，还怎么能有凝聚力！"这个建议朱滔等几个人都赞成。于是，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当天，朱滔在军营里修筑了一个盟誓的祭坛，告天受命。朱滔为盟主，称孤，王武俊，田悦、李纳称寡人，以示有所区别。他们各把所治州改为府，设置留守兼元帅一职，主持军政。又置东西曹，职能类似于门下省和中书省。其左、右内史则相当于侍中和中书令。别的官职也和长安相仿佛，不过都改了名字。四人称王的结局表明，德宗讨伐藩镇的计划没有成功。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面对难局的唐德宗下诏罪己，表示自己应对四镇连兵的局面承担责任，同时希望河北四镇放弃对抗。德宗还分别采取措施分化王武俊等人。河北四镇之间终因利益不一致而发生分裂。王武俊、田悦、李纳等相继取消王号，只有朱滔不肯示弱，继续称王。王武俊奉诏击朱滔，朱滔败死，四镇连兵的局面暂告止息。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25—卷227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连兵》

《旧唐书》：《田承嗣传》、《李宝臣传》、《王武俊传》、《朱滔传》、《李希烈传》

《新唐书》：《藩镇镇冀传》、《藩镇魏博传》、《藩镇卢龙传》、《藩镇淄青横海传》

泾源兵变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河北藩镇为争取节度使世袭而发动叛乱，诸镇连兵抗朝。德宗下诏令各地出兵讨叛。不想讨叛军中实力强大的范阳节度使朱滔倒向叛军，竟成为河北各镇的盟主。其中朱滔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一时成了气候，官军反而处于下风。

奉命讨藩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很有实力，他和朱滔一样，起兵的目的在混水摸鱼，并非真心效忠。自朱滔、田悦等四人称王后，李希烈在许州停止了进讨行动。他派出亲信去与叛军李纳联系，要李纳配合他袭取汴州，以便进一步夺取东都洛阳。李希烈又给戍守汴州的李勉写信，欺骗他说自己已受命兼领节度使，要假道汴州去赴任。李勉对李希烈已有警觉。他一边答应接待李希烈，一边作防变的部署。李希烈见袭取汴州的计划难于实施，就留在原地，不再到汴州去。

建中三年十二月，包藏野心的李希烈终于卸下伪装。当月二十九日（丁丑），李希烈在许州宣布独立，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随即向周围官军发动攻势。

李希烈的立场转变，令官军措手不及。转年正月，李希烈部攻陷汝州（河南临汝）、尉氏（今属河南），进围郑州，洛阳形势危急。

德宗对蓄谋已久的叛军李希烈并不了解，还寄希望于他回心

转意，所以特派老臣颜真卿到许州宣慰。真卿在许州被李希烈扣留。

朱滔、王武俊、李纳、田悦得到李希烈称天下都元帅的消息异常兴奋，各派使者劝李希烈称帝。他们说："朝廷诛灭功臣，失信天下，您英武自天，功烈盖世，已经被朝廷猜忌。颜真卿来宣慰只是缓兵之计，早晚朝廷要杀您，还是赶快称帝为好。我们愿听阁下的号令。"李希烈一时下不了称帝的决心。

正月二十一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受命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一万余人讨伐李希烈。其它各道也都接到同样的命令。哥舒曜出师行至郏城（河南郏县）破希烈前锋陈利贞。接着，哥舒曜攻克汝州。

三月，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在黄梅县杀败李希烈部将韩霜露，进取黄州（湖北新洲）。这时李希烈的另一支部队设在黄梅县的蔡山，蔡山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李皋声称西取蕲州，从黄梅溯江而上，诱希烈部循江随战；当他们离开蔡山三百余里的时候，李皋放舟而下，回攻蔡山，李希烈部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坐失天险。李皋乘胜进拔蕲州（湖北蕲春）。

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憺、韦清等不愿追随李希烈。当李希烈派周曾等到襄城（今属河南）攻打哥舒曜时，周曾要王玢、姚憺、韦清作内应，准备反戈一击，奉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提前得到消息，派部袭杀周曾，回头又除掉了王玢、姚憺、只有韦清未暴露，侥幸存活。为了逃跑，韦清主动要求到朱滔那里搬兵求援，到了襄邑，韦清投靠了宣武节度使刘洽 。由于周曾叛逃，李希烈把部队撤回军营，防止部队再叛。进攻尉氏（今属河南）、郑州的部队也收缩回营。李希烈撤回蔡州后，把叛唐的责任推给周曾，向朝廷表示悔过。其实这是缓兵之计。他在等待朱滔出兵，扭转战场力量的对比，然后再来采取军事行动。

三月，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军战于安州，李希烈大胜。

此时，京城召募使白志贞在京城募兵。曾经作过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的家庭都在应募之列。这些家庭的子弟被要求以五品官的身份，自备资粮，率其奴马从军。家道中落的旧宦人家难以承受，深以为苦。

四月，讨伐李希烈的行动有了新部署。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副使，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李皋为副使。哥舒曜受命进兵，行至襄城县的颍桥遇到大雨，道路泥泞，难以行进，于是退守襄城。他在襄城击退了李希烈的攻势。

但是攻打朱滔的李晟、张孝忠部却受到挫折。李晟为了切断朱滔与田悦的联系通道，与张孝忠之子张升云围攻清苑（今属河北），累月不下。朱滔亲将大军赶来会战，将李晟军打垮。李晟退保易州（河北易县）。朱滔还军瀛州。

王武俊见朱滔打了胜仗，留在瀛州仍不撤军，就要给事中宋端去催他回镇。宋端与朱滔交涉言颇不逊。朱滔也很强硬，说："近来我生了热病，暂时不能南撤，你们爱有什么想法都行。我是为了田悦才叛君弃兄，加入联盟。走上这一步并不后悔。如果王武俊对我不放心，我也没办法。"

宋端回来后把情形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武俊。武俊派人来见朱滔，把责任归咎于宋端的无礼，一再解释这是一场误会。朱滔舒服了，只当没有发生这件事。王武俊则耿耿于怀，加深了与朱滔的分歧。

六月，李抱真派参谋贾林偷偷到武俊营中劝降。贾林说："天子知道你是忠义之人，也知道自己错了。他对我说'朕以前有些失误，后悔已来不及了。作为四海之主表示了歉意。大家总该谅解吧！'"王武俊说："是不应该以杀人为事。现今山东连兵，弃骨如莽，就是有一方打赢了，又由谁来守土？我并非不愿意归顺朝廷，只是与诸镇已有盟约，不能单独行动，违约屈人。天子如能

下诏赦诸镇之罪，我会首倡从化。诸镇如有不从诏命者，我也可奉诏辞讨伐。这样，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同列，用不了几十天，河朔就可平定。”贾林回去告知李抱真，双方有了私约。

八月二日，李希烈率兵三万到襄城攻打哥舒曜。李勉及神策军将刘德信发来援兵。

九月，刘德信及宣武将军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于沪涧。官军被杀伤大半，唐汉臣逃奔大梁，刘德信逃奔汝州。李希烈的军队一直剽掠到伊阙。李勉派出四千军队助守东都，希烈切断了这支军队的后路，汴军由此不振，襄城的处境更加困难。

由于征讨李希烈的部队号令不统一，九月二十六日，德宗任命舒王李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更名李谊。又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其余将佐都是很有威信的人选。德宗本想在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攻势，不想这时发生了泾原之变，讨藩的计划搁浅。

为解救襄城，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受德宗之命率兵五千来到长安。军士们冒着寒雨，携家带口而来，希望此行能多得到一些赏赐。可是到了长安一无所得。十月三日，征发他们到浐水，并要京兆尹王翃犒师。王翃提供的饮食极为恶劣，惹恼了众人。大家踢翻了食案，闹了起来。有人喊道：“我们是去卖命，还不让舒舒服服吃一顿！这个仗不能打了！琼林、大盈二库有的是宝货，大家回去抢呀！”说着，军队乱了起来，大家整队跑回长安。姚令言正在宫里和德宗谈话，闻变，匆匆赶回，在浐水西边的长乐阪遇乱兵。令言冒着射来的乱箭，突入军中，喊话劝道：“大家千万不要乱来！东征立功，自有富贵，现在造反可是灭族的事呀！”可是没有人听他讲话，拥着他向回赶。德宗闻变，匆忙令人送来一批帛，每个士兵发二匹。大家更火了，根本不理。德宗再命中使宣慰，乱兵已到京城北面的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被乱兵杀死。德宗命追加二十车金帛；可这时乱兵已经入城，喧声大

作，谁也控制不了了。百姓纷纷避逃。乱兵大呼："大家别害怕！不抢你们的钱财，不征你们的间架陌钱！"所谓间架陌钱指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税即房税。每屋二架为一间，上屋征钱二千，中屋一千，下屋五百，是建中四年新征的税项。陌钱亦称除陌钱，与间架税同时颁行。其内容规定：居民贸易及各项收人每缗官留五十钱。这些苛税很不得人心。德宗再令普王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面慰谕。乱兵已在丹凤门外列阵，成千上万的人都到这里围观。

德宗召禁兵护驾。竟无人听命。原来，白志贞召募禁兵时吃了很多空额，禁兵人数不足。应募的市井富儿都是通过纳贿的手段，在军籍上挂名，吃干饷，并不按时报到。这时他们还在市中作买卖。德宗见禁军没有指望，慌忙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等几个人从宫苑北门逃出，德宗的其它子女，大都没来得及逃跑。只有一百来个宦官跟着他。

姜公辅拦住他说："慢走，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京城里还住着卢龙，幽州节度使朱泚。今有乱事，赶紧把他杀掉。留着他必有后患。"德宗仓猝之际，一切都顾不上，只是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便由普王谊开路，太子殿后，慌忙赶路。当晚来到咸阳，只吃了几匙饭又向前走。在长安的群臣谁也不知道德宗到那里去了。只有少数几个大臣找到咸阳，见到德宗。

泾原兵进人宫区后，第一件事就是抢掠府库。能够进去的人，一定要抢到精疲力尽，实在搬不走更多的东西才肯罢手。一些居民见军队开了头，又没人管，也跟着进去拾洋落。整整抢了一夜。挤不进宫区的无赖，则等在路上剽劫那些从宫殿、府库抢出东西的人。情形异常混乱。

姚令言和发动兵变的人商议下一步该如何办，想到了朱泚。于是派出一队骑兵到晋昌里的私宅去请他。这处住宅还是德宗为他营建的 。朱泚来了之后，立刻成为乱兵之主。他按辔列炬，传呼人宫，在含元殿里自称权知六军。

第二天早晨，朱泚发出榜文要百官前来报到。榜文这样写道："泾原将士长期生活在边塞，不熟悉朝廷的礼节。他们很随便地进入宫殿，令德宗受惊出巡。现在我已主管起长安的警备。我命令文武百官及神策军将士，一句话，凡是食国家俸禄的人都要到德宗那里报到。不能去的，到我这里报到。三天以后，如两面都未登记，不管是谁，一律斩首！"见了榜文，文武大臣不得不来。有人劝朱泚迎回天子，有人劝朱泚乘机称帝。朱泚虽想称帝，但知反对的人很多，不敢草率从事。为了向反对的人显示力量，他常常夜间带着军队从苑门出来，张弓露刃，络绎不绝地巡视。

劝进最力的人叫源休。建中三年，源休出使回纥，回国后，被任命为光禄卿。他对这职位很不满意。源休劝朱泚加强城门的检查，禁止朝士出城，还亲自劝诱别人，要他们效忠朱泚。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在朝都不得志，因而被朱泚启用。

泾原军一部数千人，由张廷芝、段诚谏率领开往襄城战场。这支军队未出潼关，听到京城兵变，杀陇右兵马使戴兰，返回长安，投奔朱泚。朱泚有了更多的军队，称帝的意念强烈起来。他命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处理军政事务这时已和皇帝没有二样。

朱泚还拉拢前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秀实本不欲和朱泚接触，但找他来的骑兵跳墙而入，一定要他出山。秀实自度不免，行前对子弟说："国家有难，我不能躲避。你们要好好生活下去！"朱泚见到段秀实，延坐问计。秀实表明立场说："兵变的原因是犒赏不丰。犒赏不丰是下面的责任，与德宗没关系。应该将这个道理讲给泾原将士听，然后把德宗接回长安才好。"朱泚对这些话虽不觉顺耳，但对他仍十分信任。段秀实作泾原节度使时，培植了几个亲信，其中有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秀等。他与这几个人暗暗作着杀朱泚、迎德宗的计划。这时泾

原兵马使韩旻将精兵三千准备突袭德宗的临时驻地奉天。奉天守备薄弱，段秀实见事情急迫，令岐灵岳假传姚令言的命令要韩旻回军，说是当与大队人马一同进发，不必孤军冒险。灵岳窃令言印符耽搁的时间长了一点。段秀实等不及，就用自己司农卿的印符盖在召韩旻的公文上，派人急速送去。韩旻在骆驿得到还军的命令，立刻掉头回师。秀实知事情很快就会败露，决定与刘海宾，何明礼内外策应，干掉朱泚，但没有成功。

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朱泚把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段秀实几个人找去谈筹备称帝的事情。段秀实突然夺过源休的象笏猛击朱泚。他边打边骂，令在座的几个人大吃一惊。朱泚举手拦挡，只打中了头额。两人缠在一起，周围的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刘海宾在庭外本来讲好要在这个时候带兵进去动手，临时却害怕了，在混乱中逃走。李忠臣前助朱泚，秀实已处于下风。他知事已不成，大喊："我不想造反，你们把我杀了吧！"赶来的军士一齐动手，将段秀实当场击杀。朱泚倒是一条好汉，他一边用手擦着额头上涌出的鲜血，一边劝说乱作一团的军士，说："他是义士，别把他杀死！"可是无济于事。据说朱泚"哭之甚哀"，用三品官的规格礼葬了他。二天后，刘海宾也被抓获处死。只有何明礼没有暴露。后来何明礼在奉天重打谋杀朱泚的主意，也被朱泚发现，砍了头。德宗听到段秀实的死讯，后悔早些时候没能重用他。

段秀实死后，朱泚很快在长安称帝，改元应天，号大秦皇帝。他封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张光晟以下各有不同等级的封官。姚令言与源休共掌朝政。朱泚的战略谋划、军政事务、资粮财政都须经源休之手才能确定。源休鼓动朱泚杀绝留在京城的宗室以绝人望。一共杀了七十七人，都是郡王、王子、王孙。接着源休又要朱泚诛杀逃匿的朝士，以此树立权威 。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朱泚立朱滔为皇太弟，给他写信说："关中一带，很快可以得到控制。黄河以北的事情全交给你来办了。将来我和你在洛阳见面。"朱滔见信万分欣喜。

德宗派人向魏县行营告难。李怀光马上率军开拔，赶向长安。马燧等引兵回镇，李抱真退屯魏县西北的临洺。

朱泚亲率大军前去攻打奉天。他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副元帅，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还作了抵挡李怀光的部署。

邠宁留后韩游瑰、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根据指令到便桥拒敌，走到醴泉（陕西礼泉）与朱泚遭遇。游瑰兵少，急返奉天。朱泚尾随而至，双方在奉天城下交战，官军大败。于是朱泚围住奉天，在城外请西明寺僧人法坚制造攻城的工具，准备最后决战。朱泚的一支开赴襄城作战的部队突入潼关，到奉天来助战。朱泚有众数万，军势很盛。

李抱真退到临洺后，田悦、王武俊与马寔连兵来攻。李抱真派贾林离间王武俊说："临洺失守，地盘也归田悦；打不赢损失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回幽州去吧！"王武俊一听有理，辞别田悦与马寔北归。

此前，王武俊招来回纥兵马，让他们阻断李怀光的粮道。李怀光撤军后，回纥兵到了幽州北境。朱滔要求他们跟自己到河南作战，夺取洛阳，接应朱泚，并答应将取得的河南财产、人口分给他们一部分。朱滔的侧室是回纥人，回纥与他的关系很好，称他为五郎；这次又受到利益的诱惑，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武俊见朱滔西倚乃兄，北引回纥，势力坐大，便与马燧、李抱真约为兄弟相结。但外表仍对朱滔恭谨有礼，并和田悦等分别派出使者到河间（今属河北）去见朱滔，祝贺朱泚称帝。

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与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万人入援奉天。德宗不听浑瑊等人的建议，执

意要杜希全等从漠谷进军，被朱泚邀杀，全军溃败。城中派兵接援受到阻击。朱泚进军城下，缴获辎重甚多。接着环城掘堑，加紧攻城。

奉天城被围一个多月，资粮俱尽，十分困难。有一次德宗派人出城侦察敌情，这个人衣着单薄，跪请得一短袄、套裤，然后出城。德宗居然拿不出来，只有默然把他打发出去。这时提供给德宗的用粮每天只有二斛粗米，其它人可想而知。城中每伺外边的军队不注意，就把人从城上吊下去，让他们到城外采集野菜，专门送给德宗吃。德宗把公卿将吏找来说："我不能修德，受这些苦是应该的。你们无罪，应该早点解脱，还是去投降吧！"大家顿首流涕，表示愿意尽死。所以虽在危困之时，军队的锐气不衰。

德宗困在奉天，粮料使崔纵劝励李怀光率兵入援，并集敛军资与怀光同行。军士贪利财货，很快渡过黄河，西屯蒲城。李晟的援军也到了东渭桥，这支军队约有一万余人。

朱泚很清楚，东部援军给长安的压力很大，必须尽早结束奉天的战争。于是采用僧法坚制造的云梯前来攻城。这架云梯高、宽各数丈，可容纳五百名壮士，下面装有巨大的车轮，外边裹着犀牛皮，是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但是城中早已看出重型云梯也有所短，已经准备好了对策。他们储备了大批膏油、松脂和苇薪，并在云梯可能出现的方向上暗凿地道；事实证明，这些工作非常有用。攻城的那一天，北风甚猛。为了防止火攻，云梯上铺着潮湿的毡子，还悬挂着准备救火的水囊，两旁辅有攻城车，人在车下以柴木泥土填平前进道路上的沟坎，城中发来的矢石火炬无法杀伤攻城车里的人。朱泚军合力攻打城东北角，有人已经登上城来近身接战，双方死伤甚重。德宗在生死关头把御史大夫、食封五百户以下的一千多件空白告身即任命状交给浑瑊，让他用来招募敢死队拼死抵御；还赐给御笔，让他根据军士战功的大小，随时填写。如任命状不够用，则写在军士身上，作为以后补发的根

据。德宗对浑瑊说："今日可能就是我们告别的日子！"浑瑊低头流泪，德宗拍着他的后背嘘唏不已。当时士兵们又冷又饿，缺乏甲胄，但都奋力作战，终于在困境中发现了转机。攻城的云梯碾到了地道上，一只轮子陷入地下，动弹不得，风势也转为南向。城上的人喊声震天，把苇炬、松脂、膏油投掷下来，云梯起火。一会儿工夫，云梯和云梯上的人都化为灰烬。几里之外，都能闻到飘散的臭气。朱泚的部队开始向后撤退。官军从三个城门出兵反击，太子亲自督战，一战毙敌数千人。

李怀光从蒲城出兵沿北山西进，直趋泾阳。兵马使张韶衣着便装，怀揣藏有表章的蜡丸，先行来到奉天。城外的军士发现张韶，以为他是下等贫民，就让他和抓来的苦力一起去填整沟堑。张韶利用接近城墙的机会越过沟堑，跑到城下高呼："我是朔方军的信使，快放我进城！"城上的人用绳索把他拉上去，张韶已身中十几箭。德宗见到表章大喜，令人抬着张韶到处传播援军即将到来的消息，以此振奋军心，鼓舞士气。十一月二十日（癸巳），怀光在沣泉击败朱泚的部队。朱泚得到这消息，撤去奉天之围，回到长安。人们认为李怀光来得非常及时，再迟三天，奉天城就守不住了。

朱泚回到长安以后，为了守住京城，稳住人心，要人假作从外地赶来，散布已经攻克奉天的谎言，同时大肆散发府库的金帛，以取悦军士。在京城的公卿家属每月都有常俸。只是百官多缺，没人肯于就职。军士们倒是守其资货，争功效死。

李怀光从山东前来赴难，把泾原兵变的责任归咎于宰相卢杞以及赵赞、白志贞。他说："见到德宗，我一定要求杀了这几个人，以谢天下！"有人把这话传给王翃、赵赞，说："李怀光一路指责你们，如果德宗召见了他，你们的地位就保不住了。"王翃、赵赞和卢杞商量，决定阻止德宗接见怀光。卢杞出面对德宗说："现在敌人丧胆，我军势盛。如让李怀光乘胜进取长安可以一举灭贼，而

让李怀光前来朝见，一定还要赐宴招待，耽搁好几天。这样朱泚回到长安有了喘息之机可以从容戒备，再去攻城就困难多了。”德宗根据卢杞的建议，令怀光就屯便桥，立下期限要他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共取长安。李怀光本以为破朱泚，解重围，其功莫大，德宗一定会以殊礼来接待他，不想近在咫尺，德宗竟然避而不见，因此异常恼怒。他恨恨地说：“我被奸臣排挤，今后的结局可以预料！”说完，带兵离去。

李怀光在中途顿兵不进，不断上表揭露卢杞的罪恶，下面也议论纷扬，指责卢杞误国。德宗不得已，十二月九日（壬戌）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李怀光又揭发德宗信任的宦官翟文秀有罪，德宗为此把翟文秀杀掉。

德宗在奉天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朱泚，派人与田悦，王武俊、李纳联络，答应对他们释而不问，继续授予他们官爵。这些人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表示愿意重新归顺朝廷，但还没敢与朱滔绝交，各自继续称王。朱滔准备邀回纥兵渡黄河共攻大梁，并要田悦率兵与他同行。田悦暗中已与朝廷接上联系，决定不再与朱滔采取联合行动，口头上却说：“你们先行，我随后就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丁卯），朱滔率范阳军五万人，私人军队一万余人，回纥军三千人从河间出发，队伍浩浩荡荡，仅辎重首尾就有四十里。

可是大梁已被李希烈部攻陷。李希烈攻打大梁时极为残忍，因民工未能按李希烈规定的时间修好垒道，就把民工活埋在垒道之下。他把活埋的民工称作“湿薪”。打下大梁后，滑州刺史李澄举城投降。李希烈命李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在陆贽的安排下，德宗大赦天下，改换年号，发布了罪己诏。诏书在谈到关东藩镇时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都是有功劳的旧臣，他们各镇守一方。朕的统驭方法不恰当，使他们产生了疑惧，出现了对抗；都是在

上的过错给下面带来灾难，朕没有作好君主，别人又有什么错！对他们及他们所管辖的将吏我还会象以前一样善加对待。

朱滔虽是朱泚的弟弟，但两人天各一方，肯定不是同谋。姑念他是有功的旧臣，基本宗旨也是宽大的，只要他能效忠朝廷，同样允许自新。

朱泚颠倒君臣秩序，盗用帝王的身份和权力，破坏朝廷的陵寝，罪行无法述说。他获罪于朕的祖先，朕不敢赦免。受其胁迫的将吏百姓等在官军未到长安以前，只要能脱离朱泚，效顺朝廷，并回到原来的辖区或原来的军镇，一概属于赦免之例。"

罪己诏还说："响应诏命赶赴奉天以及继续收复京城的各军、各道将士，均赐予'奉天定难功臣'称号，免除他们的除陌钱、间架税，以及竹、木、茶、漆税、榷铁税等两税以外的附加税。"

诏书颁下后，王武俊、田悦、李纳自动削去王号，上表认罪。只有李希烈恃兵强财厚，还有称帝的心思。朱泚则把国号改为汉，称汉元天皇，年号也改为天皇。

朱泚派人向颜真卿咨询称帝的礼仪。颜真卿说："老夫作礼官的时候，记下的都是诸侯朝天子的礼仪，没见过称天子的礼仪。"给了他一个软钉子。但李希烈也还是称了皇帝，国号称大楚，改年号为武成。设置百官，以亲信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李绶、李元平为宰相。又把汴州改为大梁府，全境分为四节度。

李希烈派部将杨峰给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和寿州刺史张建封送去文书和礼物，希望解除敌对关系。张建封把杨峰抓起来在军中示众，拉到市中腰斩，还把陈少游与李希烈来往的情况报告给德宗。陈少游十分恐惧，德宗则很满意，委任张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李希烈见联合淮南道的做法受阻，就以部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让他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先取寿州，然后到江都（江苏扬州）上任。建封部将贺兰元均、邵怡二人守住霍邱、秋栅。杜少诚始终不能打通赴任的道路，便转而向南，攻打蕲州、

黄州，准备切断长江的财赋道路。这时受德宗之命督运江淮财赋的包佶正在蕲口，适逢杜少诚来攻。蕲州刺史伊慎率七千士兵在永安戍大破少诚，斩首约一万人，少诚逃去。包佶入朝后报告了陈少游劫夺财赋的事情。陈少游见势不妙，在所部收缴钱财，补偿了以前的劫夺。李希烈把夏口视为上游的要冲，派骁将董侍募七千死士进袭鄂州（湖北武汉）。刺史李兼偃旗息鼓闭门严守。董侍强攻反被已有准备的李兼击败。德宗委任李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从此李希烈东惧曹王李皋，西惧李兼，不敢再有觊觎江淮的想法。

原准备进攻大梁的朱滔率军进入赵州境地，王武俊大具犒享。到了魏州，田悦招待得比王武俊还好。正月五日丁丑，朱滔到了永济，约田悦在魏州东北的馆陶会军，一起渡河作战。田悦对朱滔的使者说："我倒是愿意随朱五兄南行，只是将士们不愿去，调遣不动。他们说：'我们的军队打了好几年仗，资粮储备早已用光，将士们不免冻馁，还有什么力量全军远征！'看来我在魏州局面都不一定安定，一旦离开魏州，弄不好会发生兵变。并不是我变了卦，情形在这儿摆着，下面的事不好办。我已命孟祐准备了五千步、骑兵，跟着你们打仗出不了多少力，作些后勤工作还是行的。"朱滔听了这些话，知道田悦在玩花招，大怒道："田悦这个逆贼，在你身陷重围的危急关头，是我背上叛君弃兄的罪名，昼夜兼程救了你。当时你把贝州送给我，我都不要。后来你又尊我为天子，我也没接受。现在你忘恩负义，骗我远道而来，又饰词不出，真是可恨！"当下布置马寔攻打宗城、经城（两城属贝州），杨荣国攻打冠氏（山东冠县），得取三城。又纵回纥军掠馆陶而去。

田悦引兵北围贝州（河北清河），大掠诸县；又拔武城（今属河北），贯通了德、棣二州，让这二州提供军粮。马寔将步、骑兵五千人进屯冠氏，以逼魏州。

朱泚在奉天兵败后回到长安。李晟谋取长安，军势颇盛。李

怀光心忌李晟独当一面，怕他真的抢了头功，便要求与李晟合军。李晟与李怀光会军于咸阳西部的陈涛斜。营垒刚修筑一半，朱泚的军队大举而来，李晟认为如果朱泚固守宫苑，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所以主张主动出击。怀光却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能以劳击逸，应避其锋芒。两人一见面就意见相左。李晟常与怀光一同派出军队，怀光军常劫掠当地的牛马，而李晟秋毫无犯。怀光军士见李晟的军队不下水，便将劫掠的牛马分一部分给他们。士兵们慑于军令，始终不敢接受。

李怀光在咸阳待了二个多月，不肯向长安进发；德宗派人催促，他就以士兵过于疲劳为由加以推托。李怀光还暗中与朱泚互通消息。李晟怕怀光兵变将其吃掉，屡请移军东渭桥。德宗对李怀光寄予希望，所以把李晟的报告搁置起来，不予答复。

怀光为了拖延进战的日期，提出了一个理由，说："供给各道军的物资和赏赐太少，远不如神策军丰厚，待遇不一致，将士有意见，无法作战。"德宗因财政困难，无法让各军与神策军待遇一致，又怕引起各军的不满，就让陆贽到李怀光军营作解释，同时找来李晟一同商讨办法。李怀光想让李晟主动要求减少供给，使他失去军心，难以成事，便说："将士们一样卖命打仗，不能受歧视，不然怎么能同心协力！"陆贽无话可说。李怀光频频示意李晟，让他讲话。李晟说："您是元帅，有权力发布命令。我李晟只统领一个军，服从军令就是了。至于军队衣食供给的增减，还是由元帅来裁定。"李晟辞正而气和，李怀光也不开腔，在大家沉默中结束了讨论。

陆贽从咸阳回到长安，对德宗说："朱泚缩在长安防守，一天天地混。李怀光乘获胜之势，很容易将朱泚彻底解决。可他按兵不动，眼看把军队拖疲了。这事让人很难理解。陛下对李怀光百般维护，而李怀光没有一点感恩知报的意思，如不想些办法慢慢限制他，只是姑息容忍，以求息事宁人，恐怕有了变故就措手不

及。在这事机危迫的时刻，不能不多想一想。前些时候李晟要求移军东渭桥，这个提议不错。李怀光在咸阳时曾说：'李晟打算到别处去，其实我这里也用不着。'他只管自吹自擂，言语间流露出轻视李晟的意思。我乘机问道：'如果圣上问起这件事，我该怎么回答？'李怀光这时无法改口，就说：'让他走，我这里没问题。'事情说到这份儿上，李怀光想反悔也难有理由了。"于是德宗下了一道手诏，以"分散敌军兵力"为理由，要李晟离开李怀光移军东渭桥。

李晟自咸阳结阵返回东渭桥，而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仍与李怀光连营结寨。陆贽又说："几支军队扎在一起无益于军事进展，只会生出事端。李晟移军后，如李怀光想并吞李建徽、李惠元就更容易了。现在借着李晟移军为理由，可顺便指令李建徽、李惠元一同行动。因为三支军队可为犄角之势，互相照应，防止朱泚截击。"德宗说："你说得非常对。可是李晟离开咸阳后，李怀光已有失落感，如再把李建徽、杨惠元派往咸阳东，李怀光难免要说话，这样反而不好调停，还是沉一沉再说吧！"

李晟认为："李怀光谋反的迹象已经明朗，应有应急的准备。西川与汉中的道路应保持通畅，请以裨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每人领兵五百以防未然。"德宗犹豫未决，想亲帅禁兵到咸阳，以视察慰问的名义催促诸将进攻长安。有人对怀光说："这是汉高祖游云梦而诛韩信的老办法。"怀光大为警觉，与朝廷更加离心。

二月二十三日（甲子），德宗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封，赐给享有特权的铁券，并派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人去传达这道圣旨。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把铁券掷在地上，借故大发脾气。朔方右兵马使张名振见状大喊："你不打朱泚，反而故意对中使发脾气，是真要谋反吧！这没有什么好处，今天我冒死向你进一句忠言！"

怀光听到喊声对张名振说："我并不想谋反，只是贼兵还很强大，还得要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怀光又以天子居住地要修护城壕为由，派兵修筑咸阳城壕。不几天，进占咸阳。张名振说："前几天你说不谋反，今天倾军来到咸阳，而不去攻打长安，到底为什么？"怀光说："张名振是个神经病！"说罢，让手下的人把他带出去勒死。

李卞等回到奉天，报告了李怀光的情况。奉天加强了戒备。随从的大臣暗自准备行装，等待撤离。

二月二十四日，为了防止李怀光突然反叛，加封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德宗认为授予的权力不够，第二天，又下令加封李晟为宰相。

同时，德宗作了随时转移到梁州（陕西汉中）的准备。山南节度使严震听到这个消息派人到奉天迎接，又派大将张用诚带领五千人马到盩厔（陕西周至）沿路迎卫。

用诚与李怀光暗通声气，已被拉拢过去，德宗很是担心。正好严震又派牙将马勋来上表。马勋知道这个消息，回成都请来严震的命符，将用诚解到梁州杖杀。

李怀光果然开始行动。他在一个夜晚派人袭击李建徽、杨惠元，进而控制他们的军队。李建徽逃去，杨惠元在逃往奉天的路上被李怀光派兵追杀。怀光公开宣言已与朱泚联合，反对德宗。

二十六日，李怀光派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城里，约定这天晚上派别将达奚小俊焚烧乾陵，由赵升鸾作内应制造紧张空气。升鸾找到浑瑊自首。浑瑊马上报告德宗，且请德宗赶紧到梁州躲避。德宗一边命令加强戒备，一边准备车马逃跑。说话间，出了城西。朝臣将士跟着德宗狼狈出行。

怀光立即派部将孟保、惠敬寿、孙福达三人率精骑火速赶往南山，截击德宗一行。在盩厔三将遇到诸军粮料使张增。几个人商量决定放德宗一码。于是由张增出面对军士们说："我在东面不

远的地方贮有大批粮草。”大家因之向东，纵兵剽掠。回去以后只告诉李怀光说没追上。为此，怀光将四人全部撤职。

在关中，只有李晟一支忠于朝廷的军队仍坚持在原地。李晟内无资粮，外无救援，以孤军处于朱泚、李怀光二个强敌之间。他对怀光辞礼卑逊，保持着一种微妙关系，令怀光不忍向他进攻。后来，李晟的军力壮大起来，怀光想自咸阳向东渭桥发起袭击，作了几次动员，但士兵们不愿作战。怀光知众不可强，问计于宾佐。都虞候阎晏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对军士们说：“我们先驻在泾阳，你们把妻儿老小从邠州接来。来了以后，大家一齐到河中去，待将春装置办好后，再回攻长安。东方各县都很富实，随便你们到哪儿抢掠。”军士们兴奋起来。

怀光令人到邠州去接军士的家属，并将留在邠州的一万余名士兵调来。韩游瑰与守将高固等举兵杀留后张昕，阻止这些人离去。这样韩游瑰在邠宁与奉天、蓝田等地驻军皆受李晟节制，晟军声势大振。

这时李怀光与朱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当初，朱泚为了联合李怀光，对他敬如兄长，相约在关中分别称帝，永为友好的邻国。但李怀光反叛以后，一些军队不听话，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朱泚改变过去的作法，开始用臣礼来对待他。怀光分外恼火，又怕李晟进袭、士兵再叛，遂烧营东走，掠泾阳等十二县，鸡犬无遗。到了富平，大将孟涉、段威勇等将数千人逃亡，投奔李晟。至于个别逃亡，在行军途中始终不断。

三月十六日，李晟被任命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对付李怀光。

三月二十一日，德宗到了梁州，在这里暂时避难。

兴元元年（784年）六月，李晟率军收复长安，朱泚率残部仓皇西逃，至彭原被其部将杀掉，首级献送长安，源休等也在逃亡之中被杀，至此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27—卷230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连兵》
《旧唐书》：《朱泚传》
《新唐书》：《朱泚传》《李怀光传》
唐·赵元：《奉天录》

李怀光败死

唐德宗在泾原之变后，逃到奉天避难。泾原兵奉朱泚为帅，占据长安。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发兵全力攻打奉天，一心想把德宗置于死地。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勤王，将处于危难中的德宗解救出来，立了大功。按照情理，德宗应亲自接见他，给予褒奖。但把持朝政的权相卢杞等得知李怀光曾声言泾原之变的责任要由他们来负后，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决定阻止怀光与德宗见面。不了解内情的唐德宗根据卢杞的意见，命令李怀光立即攻打长安。这使近在咫尺而无由觐见德宗的李怀光异常恼火，从此与朝廷离心。

李怀光离去后，屯兵咸阳，不肯进战，袭击由他辖属的李建徽、杨惠元二人，并吞了他们的军队。随后宣布与朱泚联合，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李怀光反叛后，德宗到梁州（陕西汉中）避难。梁州地薄民贫，自安、史之乱以来，盗贼攻剽，人口锐减，虽在山南节制十五个州，租赋不及中原数县。德宗来到梁州后，粮用颇窘，于是想转移到成都。但李晟等人认为那样会失民望，所以极力阻止。

兴元元年（784 年）三月二十九日，德宗下诏切责李怀光之罪，免除他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及朔方等诸道节度、观察使的职务。

四月二日，德宗下诏任命邠宁兵马使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第二天，德宗又任命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次日，德宗又加封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李晟的一

家老小及神策军士的家属都在长安。朱泚没有难为他们，还让李晟的族人给李晟带来平安家书。为了表示忠于朝廷的立场，李晟将来人斩杀。

数天前，浑瑊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浑瑊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威胁长安。韩游瑰也到奉天助战。

山南的气候比关中暖和，士兵们缺少春装，德宗也穿着夹衣服。五月，盐铁判官王绍把江淮的缯帛调运到山南，军队才换上新衣；又运来一百船粮食作李晟的军饷。当时，关中兵荒马乱，粮价腾贵，一斗米卖五百钱。这批粮食运到后，米价降至一百钱一斗。

五月二十日，李晟检阅部队，告诉大家要收复京城。姚令言经常派探子来打听李晟的动静，其中一些人被抓获。李晟让人把俘虏带到军阵之前，告诉他们大军就要行动了，然后将他们放走。随后李晟率军来到长安通化门外，与诸将商讨攻城的方略。最后决定绕过坊市，直接攻打有重兵把守的宫苑，然后北攻宫殿区。这样可以减少巷战给军队带来的损失，保证长安坊市的完整。李晟给浑瑊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发去牒文，要他们在指定时间内到长安城下集结。

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以西败朱泚将仇敬忠，斩首颇多。几天以后，李晟的部队开始向前运动，进入光泰门外的米仓村。二十六日，朱泚骁将张庭芝、李希倩趁晟军营垒未完，引兵大至。李晟最担心朱泚据城固守，打持久战；所以一见敌军积极寻战，特别兴奋。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纵兵出击。张庭芝等倾力攻打力量薄弱的华州营，这支部队最接近长安，因此最先受到打击。很快牙前将李演率精兵赶到，力战败敌，接着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光泰门外。夜晚，李晟敛兵还营。

第二天，李晟乘敌未定，再次出兵邀战。有人建议待浑瑊的

部队从西部赶来，一同夹攻较为有利。但李晟坚持认为，敌军已经丧胆，必须抓紧时机，乘胜进取。不然敌军成备，再作强攻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李晟继续作攻城准备，首先在光泰门外集结部队，派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牙前将史万顷将步、骑兵到紧贴苑墙的神麚村作突进的前锋。为了这次军事行动，事先已经派人以夜幕为掩护，凿开了二百步宽的苑墙。但当李演等率军赶到的时候，缺口已被树栅堵住，守军自栅中向官军刺射，占据着主动，官军的突袭行动难于施展。李晟大怒，发下军令说："冲不进去，就斩了你们！"史万顷硬着头皮率帅先进，王佖、李演骑兵随后冲过来，冲垮了敌军的防线，守军大溃，诸军分道并进。姚令言等仍在力战，希望挽回局面。但李晟又投入了一批军队，由决胜军使唐良臣率领，且战且前，打了十几个回合，姚令言支持不住，彻底崩溃。

朱泚部将张光晟与李晟一直有联系。官军冲进长安后，光晟动员朱泚逃亡。朱泚与姚令言率余众西撤，带走的人马仍有一万多人。张光晟将朱泚送出城，回头投降了李晟。李晟布置兵马使田子奇率部追击。然后屯于含元殿前，住在右金吾仗。李晟发布命令约束军队说："赖诸将之力打下长安，但不要震惊士庶，那样就失去了吊民伐罪的宗旨。我和大家与家室相见的日子就在眼前，但五天之内不能与家人通消息。"又让京兆尹李齐运出面安民。李晟大将高明曜抢走朱泚的营妓，尚可孤的士兵擅自牵走溃军留下的马匹，都被正法。从此控制了局面，再没有发生烧杀抢劫的事件。住在偏远坊市的居民，有人第二天才得知官军入城的消息。

同一天，浑瑊、戴休颜、韩游瑰也攻下了咸阳。

二十九日，李晟将各道部队安置好了之后，斩朱泚余党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朱泚逃跑后，打算到吐蕃去落身。带走的一万多人，随行随散，到了泾州境内，只剩下一百余骑。由朱泚委任的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不准朱泚进城。雪上加霜的朱泚在城

外说："你的职位是我给的，怎么能在这时背叛我？"田希鉴令人取出符节投到火里，对朱泚说："我把符节还给你！"追随朱泚而不知所归的骑兵茫然痛哭，彻底绝望。泾原的士兵杀了姚令言，拿着他的人头向田希鉴投降。只有范阳亲兵与幕府宾客、同宗族人跟着朱泚北奔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也不放朱泚进城。朱泚徘徊在宁州境内，最后在彭原县西城屯，被部将梁庭芬从背后射伤，韩旻向前将其刺杀。

六月七日，李晟将朱泚宠任的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斩首。同时表彰了守节不屈的刘迺、蒋允等。

为表彰光复之功，德宗加封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有升迁，田希鉴被正式任命为泾原节度使。梁州改为兴元府。

李晟主持长安各项事务，为朝廷百官重返长安作准备，还要亲自到凤翔去迎接德宗。德宗不许。

七月，德宗从山南来到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为张光晟虽一度附逆，但灭朱泚也有功劳，所以多方保全，但德宗还是将他杀了。

朱泚败死后，李怀光打发儿子李璀到凤翔请罪，要求束身归朝。德宗批准了这一请求，给事中孔巢父受命给李怀光送去任命他为太子太保的诏书，其它人则恢复原来的官爵。

七月十八日，孔巢父来到河中。李怀光脱去官服，表示待罪。孔巢父没有按常规礼节对此事加以阻拦，反而在军中公开咨询可以取代李怀光的人选。这一作法惹翻了怀光的亲信，他们未等宣诏完毕，就将孔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杀死。李怀光重新整军，作拒守河中的各种准备。

德宗命浑瑊、骆元光到同州进讨李怀光。怀光派所部徐庭光以精兵六千人驻守长春宫，抵挡官军。浑瑊几次吃败仗，无法前进。朝议主张赦免李怀光不再讨伐他，未能得到同意。李怀光的

妹婿娄廷珍守晋州，牙将毛朝扬守隰州，郑抗守慈州。官军改变策略，采取劝降的办法，诱使这些人归顺朝廷。由于局面有了进展，德宗加浑瑊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加马燧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二人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进攻李怀光。晋、慈、隰节度使本是康日知，他还未及上任，三州投降了马燧，所以德宗让马燧兼领节度使。

由于李怀光反叛，度支停发所部数万人的冬衣。德宗提出朔方军将士受李怀光挟持，不应责罚，十月间下诏表示：为李怀光控制的朔方军及诸道军的冬衣及饷钱已经准备出来，待道路通畅了，马上运去。

十月十八日，李怀光将阎晏进攻同州，官军在沙苑兵败。韩游瑰率六千邠宁军赶来增援。

闰十月八日（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李晟刚到凤翔，田希鉴即派专使前来参候。李晟对使者说："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吐蕃入寇，州兵有力量抵御吗？我想给泾州增加点兵力，不知田希鉴意下如何？"田希鉴中计，果然请求援兵。李晟派得力心腹彭令英戍守泾州。不久又托言巡边，亲自到泾州去。田希鉴出迎，李晟和他并辔入城，道旧结欢。田希鉴的妻子称李晟为叔叔，而李晟称田希鉴为田郎，关系似乎极为欢洽。李晟命人准备三天的伙食，说："三天后，没什么事我就回凤翔。"这些假象麻痹了希鉴。三天后，李晟设宴辞行，希鉴和泾原将佐都来送别。彭令英早把泾原诸将的情况密报给李晟，于是将石奇等三十多个经常闹事的人抓起来杀头，刑前对他们说："你们经常作乱，残害忠良，天地不容！"这时田希鉴还在席间，李晟对他讲出真言，说："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他们有罪，你也有责任吧……"希鉴为求身首得完，令人缢杀。其子田尊也在被杀之列。李晟入营告知大家田希鉴的死讯，镇慑了泾原军。原来，泾原地接吐蕃，

镇兵经常杀害主帅，生出乱子，极难控制。自建中元年（780年）起，先后发生过刘文喜拒命、泾原之变及田希鉴擅杀节度使等几件大事。李晟决定杀一批人，给其他人一个儆戒。

其中刘文喜拒命一事，在这里补述一下。

建中元年，宰相杨炎用前相元载的遗策决定修筑原州城，以抵御吐蕃。为此下诏命当时的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移军原州。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泾原士兵得到这个消息很不满意。原来这些戍边的士兵大多来自邠州。他们在当地已经建立了生活基础，具备了耕桑的环境，又受命移屯泾州，在泾州设立军府，重新开荒，十几年未得休养生息。现在又让他们放弃泾州到原州去，许多人当然很恼火。刘文喜利用军队的不满情绪，占据泾州，不受李怀光节制，并上疏请恢复段秀实为节度使，否则委派朱泚也行。朝廷与刘文喜妥协，改任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免去了对李怀光的任命。但刘文喜的本意是自己要作节度使，所以对朱泚也不买帐。当年四月一日，刘文喜据泾州叛。五月，朱泚率军攻打泾州。刘文喜以子为质，向吐蕃求援。吐蕃与唐正处于修复关系的时期，不为刘文喜出兵。部将刘海宾见城中势穷，杀刘文喜而将这一事件消解。

后来又是泾原兵在长安兵变，致令德宗逃离京城，避乱山南。此间，朱泚、姚令言劝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要他一同反叛，河清斩其来使。田希鉴是冯河清手下的大将，他密与朱泚来往，杀河清而以军府附于朱泚。李晟早就想杀他，这次作了周密的布置终于动手。

贞元元年（785年），李怀光的部将吕鸣岳秘密与马燧联系，准备投降。怀光将其全家杀掉。事情牵连到幕僚高郢、李鄘。这二人见密谋败露，索性畅所欲言，也被怀光抓起来。马燧采取行动，败怀光于陶城，进逼河中。

四月十八日（壬午），马燧、浑瑊破怀光兵于长春宫南，并立

即掘堑，将李怀光围在宫城之内。怀光诸将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李怀光知道军心已散，坚持不了多久，就向士兵们表示正在准备顺服朝廷，已经准备了一批财货和运输所需的车马，一旦道路畅通，马上入贡。

当时连年发生旱灾和蝗灾，度支难于提供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朝议中，有些人主张赦免李怀光，结束战争。李晟上言，提出赦李怀光有五不可。第一，河中距长安很近，只有三百里，同州是两地之间的要冲。在这里设置的军队太多则显得朝廷对李怀光还没有足够的信任，太少了又不足以防范应变。一旦李怀光再次叛变，夺取同州，朝廷无法控制局面。第二，赦免李怀光，必定要把已由官军控制的晋、绛、慈、隰几个州还给他。这样，作为河中、绛州节度使的浑瑊及晋、慈、隰节度使康日知自然失去属地。安置这两个人又成为困难。第三，现今边疆也是多事之秋。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边还有李希烈。赦免李怀光就是向他们表示了朝廷的软弱，使他们产生朝廷兵屈于人而自罢战的印象。这将使朝廷在处理与这些方面有关的事务上处于被动地位。第四，赦令颁布以后，对朔方将士还应叙勋行赏。而府库空虚，满足不了这些人的欲望，还会重新激起他们的反叛之心。第五，罢兵之后，各道兵得不到应有的赏典，也会产生怨愤。无形中，朝廷增加了新的对立力量。现在河中一斗米卖到五百钱，粮草已经用光了，饿死了许多人，只要官军围而不打，用不了多少时间内部就支持不住了。事实证明了李晟的判断。

李晟又请发兵二万，自备资粮，独力与李怀光作战。德宗贞元元年七月，马燧也表示只要发给他一个月的军粮，一定讨平李怀光。

八月，马燧到了前线，径至城下呼守将徐庭光，要他投降。庭光不答，伏泣而已。

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瑰进军逼河中，焦篱堡守将尉

玭率七百人投降。当晚李怀光举火，诸营不应，徐庭光投降。

八月十二日，马燧率诸军到河西。朔方军早已乱了，到处是谣言，没人听李怀光的号令。在这种情况下，李怀光自缢身亡。

李怀光的儿子李璀为监察御史，深得德宗的喜爱，李怀光在咸阳尚未谋反时，李璀对德宗说："我父亲早晚要有所行动，请您提前作些准备。"德宗说："我知道李怀光很喜爱你。作儿子的可以尽力作一些弥合的工作。"李璀答道："我父亲肯定疼爱我，我也爱我的父亲和我的宗族，但在这件事情上尽了心力恐怕也难挽回局面。"德宗又问："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你自己得到解脱？"答道："这次进言并非为我自己留后路，一旦父亲失败，我也得和他一齐死。"德宗说："不要想得那么悲观，再到咸阳去一趟劝一劝李怀光，使君臣父子都得到保全不是一件好事么？"李璀从咸阳回来说："没办法了，您作善后的准备吧！父亲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主上无信，决非我贪图富贵，不造反就是死，难道你要陷我于死地吗？'"这段对话可以使人窥见当时李怀光的心态。后来德宗说："我所以一再主张赦免李怀光，也是为了保全李璀的缘故。"及李怀光死，李璀先杀二弟，然后自杀。

朔方将牛名俊割下李怀光的首级出降。

平定李怀光后，宰相陆贽提出，肯定有人好大喜功，要求乘胜征讨李希烈，这是不明智的。他说："如果说只有一个人我不敢担保他一定顺从朝廷，这个人就是李希烈。但我推测他并不是顽固到底，不打算悔改前非。只是以前他已窃居了帝号，即使现在发现当时考虑不周，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下去。目前李希烈已成了独夫民贼，对内没有兴兵起事的理由，对外没有与他结盟的伙伴，最多只能厚抚部曲，偷容时岁。只要诸镇各守封疆，他就不会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下诏，加马燧兼侍中，浑瑊为检校司空。同时要求邻境藩镇，只要李希烈不动手，不必主动攻打淮西。而李希烈如愿意

投降，可以免他一死。

贞元二年正月，李希烈将杜文朝进攻襄州，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三月，李希烈别将进攻郑州，被义成节度使李澄击破。李希烈兵势日蹙，不久生了病。四月七日，大将陈仙奇指使医生陈山甫将他毒死。接着杀尽李希烈的兄弟妻子，率众投降。四月二十五日，陈仙奇被任命为淮西节度使。

贞元五年，德宗追思李怀光功，以怀光子孙全被杀光，立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名李承绪，授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让他供养怀光妻王氏，祀守李氏宗祠。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29—卷233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连兵》

《新唐书》：《李怀光传》

吐蕃劫盟

代宗之世，唐蕃边境时常发生冲突，吐蕃也时有使者前来讲和。因吐蕃扰边不止，代宗曾将先后来唐的八名使者扣在长安。

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新即位的德宗希望改善唐蕃关系，主动将仍健在的使者放回。八月八日，德宗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随同送回的还有在历次边衅中擒俘的五百余名吐蕃军士，行前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以示德怀。

建中元年（780年），战俘回到吐蕃，吐蕃赞普大为意外，对唐使韦伦作了隆重的欢迎，并立即派使者随韦伦到长安朝贡，送来很多礼物。同年五月，朝廷任命韦伦为太常卿，二十二日，再次派他出使吐蕃。韦伦要求以德宗的名义书写外交文书，但同平章事杨炎认为唐与吐蕃并非对等的政权，所以指定由郭子仪起草，德宗在文书上面写了一个“可”字给予批准。

杨炎还要求用前相元载的计划，在原州筑城，以防止吐蕃的进犯。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认为：“现在边备空虚，筑城可能成为吐蕃进犯的理由，不是时机。”杨炎大怒，以为段秀实存心拆台，把他调任为司农卿；而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到原州（甘肃固原）驻军，同时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

为了筑城，李怀光亲自在原州坐镇，朱泚、崔宁二支军队在后方作防卫。同时下诏要泾州提供筑城的材料和工具，引起了泾州士兵的不满。刘文喜因军心不安，据守泾州不受诏，还上疏要

求恢复段秀实的职务，否则由朱泚担任泾原节度使也行。结果，朝廷同意刘文喜的要求，任命朱泚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

其实刘文喜一心要作节度使，新任命下达之后，刘文喜正式与朝廷决裂，拒城叛变。他把儿子送到吐蕃作人质，请吐蕃发兵救援。但吐蕃正与唐朝修好，不肯出兵。泾州城孤立了，难以支持，部将刘海宾等杀刘文喜传首京师。一场兵变烟消云散，但原州筑城的事终于不了了之。

韦伦来到吐蕃后，唐蕃关系进一步改善。德宗建中元年十二月，韦伦回长安，吐蕃派宰相论钦明思等人贡。

建中二年三月，德宗派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赞普因德宗敕书中使用了“贡献”、“赐”等词汇，完全是用对待臣下的礼节对待吐蕃，要求修改敕书；还提出云州以西，当以贺兰山为边界，崔汉衡不敢作主。十二月，崔汉衡派判官与吐蕃使者一起到长安说明情况。德宗修改了敕书的辞句，还同意了吐蕃提出的划分边界的办法。

建中三年四月，吐蕃将历年虏掠的八百余兵民遣还。九月，殿中少监崔汉衡回长安。赞普派大臣区颊赞随崔汉衡入朝。十月，朝廷派都官员外郎樊泽出使吐蕃，通报结盟的日期。

建中四年正月，受唐政府委托，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会盟。盟文规定：“唐的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翔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以东为汉界。吐蕃在兰、渭、原、会四州设守，西至临洮，东至成州，直到剑南西界磨些山诸蛮、大渡河西南为蕃界。”

四月，德宗要宰相、尚书与区颊赞在丰邑里会盟。区颊赞借口清水之盟未将疆界确定下来，不肯在盟誓上签字。这样，崔汉衡只好再到吐蕃，请赞普讲话。

六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从青海回来，向区颊赞讲明疆界已经划分清楚，同时要他回国。

七月，朝廷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

出使吐蕃是个苦差事。奸相卢杞忌李揆有才望，故意把这个责任交给他。李揆当然不满意，他委婉地对德宗说："路远一点倒无所谓，我就担心死在路上，完不成使命。"德宗也觉得这个安排不妥当，对卢杞说："李揆作使者是不是老了一点？"卢杞说："老臣更有经验，办事练达，出使远夷正是合适人选。况且，如果李揆这次去了的话，以后，年轻的人也好差遣了。"

十月，发生泾原兵变，泾原兵请正在长安赋闲的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兵变首领。朱泚据长安自称权知六军。几天以后，朱泚登宣政殿，称大秦皇帝。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癸酉）。德宗下诏罪己，赦河北藩镇，集中力量攻讨朱泚。

正月，为表示和好诚意，吐蕃尚结赞请求出兵援助唐朝攻打朱泚收复京城。德宗派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同意吐蕃出兵。

吐蕃相尚结赞说："根据吐蕃的法律，发兵须主兵大臣同意，你带来的制书没有李怀光的署名，吐蕃军不敢发兵深进。"德宗命陆贽通知李怀光，要他在制书上署名。李怀光固执以为不可，他说："如果收复长安，蕃军纵兵焚掠，谁能挡得住！这是一害。以前朝廷有敕旨，收复长安的士兵每人赏一百缗钱。如果他们派五万兵来，并援引敕旨要钱，这五百万缗钱到那里去筹措！这是二害。蕃兵来了以后，肯定不会主动力战，他们勒兵自固，坐观胜败，我们胜了，他们跟在官军后面袭杀讨贼，分取军功；败了，他们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能信任。这是三害。"所以，说什么也不肯副署。尚结赞也不敢发兵。

不久，李怀光反叛。德宗避居梁州，任命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为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罢去李怀光军权。

浑瑊率诸军从斜谷出击，攻打朱泚。崔汉衡劝吐蕃发兵助唐。

尚结赞说："邠军不出动，我们发兵会受到后方的袭击。"邠宁节度使韩游瑰得到这个消息，派出三千名邠军由大将曹子达率领去与浑瑊会军。吐蕃发兵二万随曹子达一同助战，在武亭川大破朱泚将韩旻。五月，吐蕃破韩旻后，大掠而去。

六月，朱泚败死。德宗请吐蕃出兵的时候，许以成功之日将安西、北庭之地划归吐蕃。这时，吐蕃来人索要土地。德宗准备将安西、北庭二镇的节度使郭昕、杨元忠召回长安，而将二镇土地划给吐蕃。李泌谏道："安西、北庭二镇，人性骁悍，地控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能分散吐蕃的军势，使它不能调动全部军力东侵泾、邠、歧、陇诸州。这块土地无论如何不能拱手相送。而且，这二镇的人们，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坚守边疆近二十年，实在令人哀怜。如果把他们交给戎狄，他们一定会深深地怨恨朝廷，以后跟随吐蕃前来侵扰，一定会象报私仇那样拼命。再说，以前吐蕃观望不前，暗中与朱泚交通，不仅大掠武功，还接受了朱泚的厚赂才离去，他们根本没有功劳可言，也没有再给土地的道理。"朝议都同意李泌的看法，德宗拒绝让出安西、北庭。贞元二年（786年）八月，吐蕃尚结赞大举进攻泾、陇、邠宁四州，割走庄稼，掠去牲畜、人口。西陲紧张起来。浑瑊率万人，骆元光率八千人在咸阳集结，准备应变。

九月，吐蕃的游动骑兵到了好畤。形势危急，诏令全京城戒严。朝廷增派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驻咸阳。民间传言德宗准备再次离开长安。

李晟派部将王佖率三千骁勇在汧城设伏。李晟告诉王佖："吐蕃经过城下的时候，不要攻击他的先头部队。如果惊动了主力，我们是难于抵御的。必须让过先头部队，发现打着五方旗，穿着虎豹衣的中军时，出奇不意地打击中军，一定能大获全胜。"王佖按照李晟的打法将尚结赞击溃，军士们不认识尚结赞，才让他逃掉。

尚结赞对手下的人说："唐朝只有李晟、马燧、浑瑊三个人称

得上良将，我们应当用计将他们搞掉。”

十月，唐将李晟派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率五千人马奔袭吐蕃摧沙堡。

王佖等攻克摧沙堡，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烧了城中的积存物资后撤军。尚结赞引兵北去，自宁州、庆州到了盐州。

十一月，吐蕃进逼盐州城（陕西五原）。他们对盐州刺史杜彦光说：“我们只要州城，人马你可以带走。”杜彦光率众撤到鄜州。

十二月，吐蕃西侵夏州（内蒙白城子），也象在盐州一样，驱走刺史托跋乾晖及其所部，占据州城。接着，深入银州（陕西米脂西北）。银州一向没有城墙，吏民见吐蕃军大至，一下跑光了。吐蕃放弃银州，进陷麟州（陕西神木）。长城沿线的四州尽被吐蕃占据。

韩游瑰建议派兵攻打盐州，如吐蕃从麟州方向回军救援，就让河东军在后面袭击。十二月，诏命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步骑兵一万二千人会同韩游瑰的邠宁军攻打盐州。又命马燧出动河东军袭击吐蕃。马燧出兵到了石州（山西离石）。

吐蕃尚结赞得到盐、夏二州，每州留下一千多人戍城后退屯鸣沙县。冬春之际，粮运不继，羊马多死，又听说李晟攻克摧沙，马燧、浑瑊也派兵逼过来，尚结赞见情况不妙，屡次派使者请和，朝廷不许。于是尚结赞转而向马燧求和，答应重新在清水会盟，并归还入侵的土地。马燧相信了这些话，留驻在石州，不再渡河西进，同时向朝廷要求同意吐蕃议和。李晟说：“戎狄无信，必须打击。”韩游瑰说：“吐蕃支持不住了才来求盟，决非出于诚意。”韩滉说：“河朔蕃镇的问题大体已经解决，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解决西部边防。如果在原、鄯、洮、渭四州筑城设防，派李晟、刘玄佐这些人率十万军队戍边，河、湟二十几个州很快就可能收复。这件事所需要的资粮军用，由我来解决。”在李晟、韩游瑰、韩滉的影响下，德宗坚持用兵的方针，催促马燧赶紧进兵。

在朝臣中，除了政见的分歧外，还夹杂着私人的矛盾，影响着朝廷对吐蕃的态度。主要是李晟和宰相张延赏的矛盾。大历十四年李晟在成都带回一名叫高洪的营妓。西川节度使张延赏颇有醋意，将高洪追了回来，这下子，两人结了仇。后来德宗召张延赏为相，李晟不同意，挑了张延赏的好多毛病。当然，马燧和李晟二人也不和。这时韩滉突然死去，马燧、张延赏乘机反对李晟，坚决主张与吐蕃议和。在大臣中，李晟的意见不再占上风，和战的关键决定于德宗的态度。

德宗只恨回纥，对吐蕃没有成见。宝应元年（762年），德宗还是雍王的时候，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讨史朝义，在陕州与回纥可汗相会。可汗责雍王不拜舞，认为：唐天子与回纥可汗约为兄弟，回纥可汗可算雍王的叔父，雍王应该拜舞。但雍王认为：中国的储君没有向外国可汗拜舞的道理，而且玄宗、肃宗死后都还没下葬，不应该拜舞。双方争执起来，回纥可汗将雍王手下的四个人各打一百鞭，其中二人当场被打死。此时德宗只想与吐蕃和好，共同打击回纥，所以倾向于马燧、张延赏的意见，于是决定与吐蕃和盟。

张延赏一再说："李晟不宜长期主管军事。"德宗决定让李晟自己确定一个取代他的人选。德宗说："我为百姓着想，决定与吐蕃和盟。你既然不同意，就不要回凤翔去了，留在朝廷随时辅佐我也好。经过李晟的推荐，任命都虞候刑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德宗给李晟加了太尉、中书令等头衔，而将他的全部军权收回。

李晟在凤翔的时候曾经对僚佐说："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是我仰慕的楷模。"行军司马李叔度劝道："文人们可以那样干，有功德的武臣当面锣对面鼓地坚持不同意见不大好。"李晟严肃地说："你失言了！我身为将、相，只图保全地位，不言朝廷得失，还算什么大臣。"所以，李晟在朝廷中，只要德宗垂询，一定极言无隐，也不把君臣交谈的内容泄露给外人。三月二十七日（辛亥）马燧

回长安述职。主帅既已离开了前线，各军都紧闭营门不再出战。尚结赞利用这个机会把被截在鸣沙县的吐蕃军队撤走。

唐朝使者崔浣到吐蕃，责备吐蕃犯唐负约。尚结赞说："吐蕃击破朱泚后，未曾得到赐赏，我们是为了求赏而北去的。唐土各州闭守城池，不让通行，我们的要求无法让朝廷知道。后来盐、夏二州的守军自行撤退而把州城让给我们，吐蕃并没有动用武力去夺城，不能说吐蕃有什么错。今天您来重修旧好，和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希望由一贯与吐蕃友好的浑瑊以及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三人来主盟。

崔浣得到朝廷的答复后，四月十七日（辛未），再次来到吐蕃，通知尚结赞："杜希全守卫灵州不能出境，李观已不再担任泾原节度使，不宜主盟，现由浑瑊到清水会盟。"同时要求吐蕃将盐、夏二州交还唐朝。

五月一日，浑瑊被任命为清水会盟使。五月（戊子），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会盟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六月（己丑），浑瑊率二万人前往盟所。

这时尚结赞派人来言："清水不是个吉利的地方，希望把会盟地点改在原州的土梨树。至于盐、夏二州，当在盟后交还。"德宗未加思索，同意了这些要求。神策军将马有麟提醒说："土梨树地形复杂，不如把盟所改在地势平坦的平凉川保险。"这时来人已回吐蕃去了，于是派人快马驰追，通知吐蕃使者会盟地点改在平凉川。

和盟的决定激起了一些武将的抵制。以前韩滉荐言李晟和刘玄佐可将兵收复河、湟地区的二十余州，刘玄佐也表示愿意出力。可是韩滉一死，情况大变，刘玄佐也变卦了。他说："吐蕃兵势正强，这个仗不好打。"不再积极用兵。德宗派中使去安抚、慰问，刘玄佐竟然躺着接待，暗示不再与朝廷合作。张延赏见到刘玄佐终不可用，便把河、湟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抱真。李抱真也

百般推辞，不肯受命。情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浑瑊从长安出发的时候，李晟再三嘱咐他，要他在盟所周围加强戒备，不要掉以轻心，为吐蕃所欺。张延赏背后说："李晟当然不愿意看到和盟圆满成功，所以他要浑瑊严加防范。我们怀疑人家，人家当然也要提防我们，双方都不表现出诚意和信任，这个和盟还怎么能搞好！"德宗马上把浑瑊找来，指示他一定要推诚相待，不要自怀疑忌而辜负吐蕃方面和盟的诚意。

浑瑊送来奏报说，吐蕃决定在闰五月十九日会盟。宰相张延赏见后大喜，他把百官们找来，拿出浑瑊奏表得意地炫耀说："你们看这是浑侍中的奏表。李太尉总说吐蕃没有和盟的诚意，可人家反应很积极，这不是已经把盟日定下来了！"形成对比的是，李晟情绪低落，他对亲信们说："我生长在西部边陲，与吐蕃人打交道还有点经验；所以一再表示我的看法，只是担心朝廷被犬戎欺侮罢了。没想到成为人家的口实！"说罢，伤心地流下眼泪。

德宗命骆元光在距盟所七十里的潘原驻军，韩游瑰在洛口驻军，以此作为浑瑊的援应。骆元光对浑瑊说："军队离盟所太远，一旦有情况，大家都措手不及，而且后方也很难及时得到情报，还是我和你一起到盟所附近驻军为妥。"浑瑊严守诏命，不准元光前去。说来说去，双方形成一个妥协方案。浑瑊与骆元光二人在距盟所三十多里的地方连营扎寨。元光在营寨周围修筑工事，壕深栅固，还在营地西边埋设伏兵，以备不测。韩游瑰也派出五百名骑兵在营旁埋伏下来，准备一旦有变奔袭吐蕃控制的柏泉，以分散吐蕃的力量。可是浑瑊却毫不介意，修筑工事极为草率。

尚结赞与浑瑊相约，盟坛东西两侧，双方各安排三千甲士，只有四百名身着普通服装的随从可以到盟坛之下。闰五月十九日(辛未)，会盟之前，根据吐蕃的提议又规定，双方各派数十名流动的骑兵互相检查。吐蕃利用这个规定派出巡查骑兵在唐军中穿来穿去，自由出入。而唐军骑兵一进吐蕃军列便被拿下。浑瑊等

人一点没有察觉，到帐幄里更换礼服。只听三声鼓响，吐蕃军蜂拥而至，把宋奉朝等人杀死在帐里。浑瑊从帐后逃出，见到一匹马，骑上就跑，一跑就是十几里，这才脱险。唐军将士纷纷东逃。吐蕃纵兵追杀，杀死数百人，擒去一千多人。崔汉衡也在被擒人中。

浑瑊逃到营地，军队跑光了，已成空营。

骆元光出动伏兵，列阵以待。追来的吐蕃军见唐军早有准备，一时不敢轻动。韩游瑰的骑兵按预订计划奔袭柏泉，吐蕃军开始退去。骆元光拨给浑瑊一批军械物资，帮助他收拾逃散的军队，也向后方撤去。

这一天德宗临朝，对几个宰相说："今天能与吐蕃和盟，平息兵争，应是国家的福气。"只有马燧附合称是。柳浑说："戎狄豺狼成性，盟了誓也不一定天下太平。况且今天的事还是让人放心不下。"李晟说："柳浑说得有道理。"德宗面带愠色地训斥道："柳浑是个书生，不了解边疆方面的知识，李晟你怎么也这样讲话！"大家都伏在地上顿首谢罪，就这样提前散了朝。

当天晚上，传来韩游瑰的急奏，报告吐蕃劫盟，军队打到邠宁附近。德宗大惊，急令衔使把韩游瑰的奏表传给柳浑看。第二天，他对柳浑说："你是个书生，却能料敌如此准确，真不可思议！"德宗准备离开长安躲避吐蕃，被大臣们劝拦下来。

二十一日，德宗派中使王子恒给尚结赞送去诏书。吐蕃根本不让入境，王子恒只得回来。

二十二日，尚结赞来到原州故城，召人把崔汉衡等带来，说："我的囚具原本是为浑瑊准备的。这次没抓到浑瑊，只好拿你们应付，献给赞普。"又对马燧的侄子马弇说："胡人靠马匹生活，我在鸣沙县的时候，正值冬春之交，草还没生出来，马无法行动。那时如果马燧从离石出兵，渡河掩杀，我们早就全军覆没了。这次求和，真要感谢马侍中的一份功劳。现在我们安全返回，怎么也

不能把你也抓起来。”便命马弇与宦官俱文珍、浑瑊部将马宁一同回唐，而把崔汉衡等分别囚禁在河、廓、鄯州。俱文珍回京后，将尚结赞的话告诉给德宗，德宗从此不再信任马燧。

六月初，诏令免去马燧副元帅、节度使的职务，让他改任司徒兼侍中。

张延赏自知也应承担责任，遂称病不再视事，不久死去。

此后四十年间，唐朝正是河北藩镇割据时代，吐蕃乘机年年扰边，南至川西，北至秦陇河湟，西至安西、北庭，边警不息。

贞元十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招附南诏，合击吐蕃，逐渐收复了一些城镇。

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以后，吐蕃发生内乱，国势日衰。大中三年（849年），安史之乱时没于吐蕃的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也向唐廷投降，这是唐代西北边防的重大胜利。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26—卷232

《通鉴纪事本末》：《吐蕃叛盟》

《旧唐书》：《吐蕃传》、《李晟传》

《新唐书》：《吐蕃传》、《李晟传》

唐与回鹘交好

回鹘，又称回纥，是我国西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即今日维吾尔族的祖先，从唐后期起，回鹘开始成为新疆地区的主体民族。

传说回鹘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公元四世纪时，回纥一族始见于史籍，北魏时，称袁纥、敕勒、铁勒，又因其俗喜坐高轮车，又称高车。其部众善骑射、骁勇善战，逐水草而居，以游牧、抢掠为生，共有十几个部落，散居于鄂尔浑河流域。

隋朝时，突厥强大，回纥臣于突厥。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因突厥处罗可汗诛求无厌，滥杀无辜，回纥部落之一的韦纥会同仆骨、同罗、拔野古与突厥决裂，由此始称回纥。

回纥姓药罗葛氏，居于薛延陀以北，距长安七千里，部众十万，军队五万。这时，众人推举时健俟斤做首领。时健俟斤死后，众人认为其子菩萨贤能，拥戴他继为君长。菩萨其人有胆识，善筹策，作战英勇，每次对敌临阵，必定身先士卒，常以少胜多。其母乌罗浑为政严明，善断争讼，因此回纥对外战争不断取胜，国内政治安定。自此，回纥开始强大起来。

唐贞观初年，菩萨与薛延陀部联合起来，共攻突厥，菩萨大破突厥颉利可汗，将其逐至天山以北，此时，北方唯回纥、薛延陀最强，回纥附属于薛延陀，互为唇齿，菩萨号为活颉利发。

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回纥部始来长安朝拜。菩萨死后，酋长吐迷度率诸部与唐军共攻薛延陀，大破多弥可汗，并其部众，尽占其地。唐政府将漠北地区划为六府七州，各置都督、刺史管

理当地事务。以回纥之地为瀚海府，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及瀚海都督。这时，吐迷度已自称可汗，设置了官署、官号，名称皆效法突厥；同时又修建了一条由回纥至中原的大道，名之为“参天至尊道”。唐太宗被诸少数族尊称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回纥与唐朝政府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贞观二十三年，吐迷度被其侄所杀。太宗封其子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继承父职，统领瀚海都督府，婆闰助唐军平定叛乱，收复北庭，征讨高丽，因功升为右卫大将军。

唐玄宗开元年间，骨力裴罗立为回纥首领。

此间，突厥内部为争汗位互相残杀。为平定突厥内乱，玄宗令左羽林将军会同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各部共同出兵，平定突厥内乱。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部大败突厥，杀掉了突厥汗王骨咄叶护，并推举突厥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自封为左右叶护。突厥余部又拥立了乌苏米施可汗，回纥叶护骨力裴罗派使者入贡，玄宗赐爵为奉义王。

天宝三年秋，拔悉密杀掉乌苏可汗，并将其首级送往京师。突厥人立乌苏之弟为白眉可汗，突厥内部又乱。回纥、葛逻禄不满意拔悉密所为，便合力攻拔悉密，杀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自立为汗，之后派人上书奏报唐政府，玄宗封之为怀仁可汗。嗣后，骨力裴罗日渐强大，不仅尽占突厥故地，又吞并了拔悉密、葛逻禄二部，加之原有的九部，共十一部，各部设置都督，立牙帐即大本营于乌德犍山。

天宝四年，回纥怀仁可汗攻突厥白眉可汗，杀白眉，大获全胜。自此之后，回纥占地愈广，东接室韦，西至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后来怀仁可汗死，其子继位，号为葛勒可汗，仍与唐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叛军势

头正盛，唐军无法抵挡。回纥可汗派使入朝主动要求出兵参战，助国讨贼，肃宗大喜，宴赐回纥使者。

肃宗派敦煌王李承寀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搬救兵。二人至回纥可汗牙帐，可汗热情款待，为表诚意，还将女儿许配敦煌王，并派重臣与二位唐使同归大唐面见肃宗。肃宗厚礼以赐回纥使者，并封回纥女号毗伽公主。不久，回纥可汗派葛逻支率军队协助平乱。葛逻支先派二千骑兵飞驰至范阳城下。十一月初八，回纥兵至带汗谷，与唐将郭子仪部会合后，在榆林等地大破叛军，斩首三万，俘虏一万，河曲之地平定。

至德二年，回纥可汗又派其子叶护率四千精兵至凤翔，肃宗犒劳宴饮回纥兵。肃宗求胜心切，急欲返回京师，便与回纥军约定：克城之后，土地士庶皆归唐，金帛子女都归回纥。回纥兵协助唐军收复长安后，叶护欲如约入城抢劫，广平王李俶拜于叶护马前恳切求道："今日刚刚收复长安，如果马上入城抢劫，只恐怕东都之人闻讯惊怕，拼死为贼守城，请将军权且忍耐，收复东京后再践约。"叶护见李俶言之在理，忙下马答拜，恳切地说："我立即发兵为殿下收复东都。"

十月，收复东都，回纥兵如约入城抢劫，贪求无厌，广平王深以为患。为使回纥停止抢劫，城中民众收集万匹罗锦收买回纥，平息了劫掠。十一月，唐政府封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并许诺每年赐帛二万匹。

乾元元年秋七月，肃宗册命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并答应可汗的和亲请求，将小女儿宁国公主许嫁，荣王之女为媵妾随嫁。肃宗以堂弟汉中王李瑀为册礼使，左司郎中李巽，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副使，左仆射裴冕护送公主远嫁。肃宗亲送女儿至咸阳，公主诀别时道："为了国家安定，女儿死且无恨。"肃宗闻言，泪流满面。

李瑀一行护送公主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衣胡衣胡帽，端坐

帐中，周围仪仗威严。入帐之后，李瑀并不下拜，可汗责备道："我与天可汗为两国之君，你等为臣，君臣有礼，为何不下拜？"李瑀慨然正色道："过去我大唐与诸国通婚姻，都是以宗室女封为公主出嫁。如今我大唐天子因可汗有功于国，特别开恩，将自己亲生之女嫁与可汗，恩礼至重，可汗自应感恩戴德，有何理由以子婿身份出此狂傲之言，稳坐榻上受册命呢？"可汗听罢，狂傲之态尽去，立即起身，恭恭敬敬拜受册命。第二天，立宁国公主为可敦，可敦即为王后，回纥举国庆贺。

同年八月，回纥又派骁骑三千助唐讨伐安庆绪，肃宗令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统领回纥兵。

乾元二年夏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卒，国人立其少子为登里可汗。回纥旧俗，夫死妻殉，回纥人欲让宁国公主为殉，公主道："我中国法，夫死即守丧三年，朝夕哀哭。回纥因慕中国风俗，才娶中国女为妇。如让汉女从回纥旧俗，又何必与唐结婚姻于万里之外。"言罢，剺面而哭。回纥为之所感，未使殉葬。同年八月，回纥以宁国公主无子为由，将其送返长安。另以其媵荣王女为可敦，号小宁国公主。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九月，代宗初即位，此时史朝义仍在河洛为乱，为彻底平定叛乱，代宗派中使刘清潭出使回纥，修旧好，请求回纥出兵征讨史朝义。这时回纥已听信了史朝义的蛊惑，以为唐家天子频有大丧，国乱无主，正好可趁火打劫，时唐使前来，正中下怀，便率部众南来。一路之上，见荒城无戍卒，州县为空垒，便大有轻唐之意。代宗令仆固怀恩入回纥行营拜见可汗及可敦。可敦为仆固怀恩女，肃宗收为养女，回纥毗伽阙可汗屡请与于婚，肃宗封之为崇徽公主嫁之，及毗伽阙可汗死，登里可汗立，成为可敦，这次与可汗同来。代宗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这时回纥兵屯河北，李适率僚属几十骑拜见可汗。到了陕州可汗牙帐，可汗怪罪雍王不行拜舞之

礼，李适随从药子昂答："礼节本不该如此。"回纥将车鼻道："大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就是雍王的叔父，为什么不可以下拜?"药子昂正色道："雍王为天子长子，如今为元帅，从没有国中太子向外族可汗下拜的!"双方相持不下，回纥恼羞成怒，便派人将子昂、李进等人各捶打一百下，有二人竟被打死。另以雍王年少不懂事，遣归唐都。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大破史朝义，朝义率残部逃走，回纥与唐军追击二千余里，枭史朝义首级而归。洛阳光复，回纥兵入城抢掠，闹得人心惶惶，城中人皆登圣善寺与白马寺以避灾祸。

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回纥可汗率众回归，所过之处，一片狼藉，稍不如意，便胡乱杀人，官府不敢过问。泽潞节度使为保本地不遭蹂躏，想以官府名义出面安顿回纥兵，但属下全闻之色变，不敢担此任，唯赵城尉马燧自告奋勇。马燧待回纥兵将至之时，先派人送重礼厚赂其渠帅，请其约束部下，渠帅下令禁止士兵抢劫，并授权马燧有犯令者可以自行杀戮。为儆戒回纥兵，马燧又取死囚若干，稍有犯禁，立斩不贷。回纥兵见此相顾失色，过其境时，皆安份守己，遵约而行。

同年七月，因回纥助唐平定叛乱有大功，唐代宗特下诏令册封回纥可汗为颉咄登密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官吏左右杀以下，皆另有封赏。

后来，仆固怀恩叛变，多次诱招回纥、吐蕃人侵。

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回纥可敦卒。七月，唐政府派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前往吊唁。回纥人收受了唐的祭礼，即当庭责问使者："我回纥于唐朝有大功，为何唐言而无信，购买我马匹，却不按时付钱?"萧昕道："回纥之功，唐天子早已报答了。当年仆固怀恩叛乱，回纥与吐蕃都出兵相助，直逼唐室。后怀恩死，吐蕃撤走，回纥势孤而向唐请和。我大唐不忘前功，宽容大度，并未计较，不然，一匹马的钱也不会给你。现在明明是回纥

背信弃义，哪里是大唐失信!”唐使的一席话，令回纥可汗无言可答，惭愧不已，从此不敢发难，厚遣唐使回京。

自乾元以来，回纥每岁都求互市，匹马换帛四十匹，动辄送来上万匹马，马皆老瘦无用，唐朝不敢得罪回纥，深以为患。

大历十年（775年）冬，回纥千余骑入寇夏州，大将郭子仪率军相救，众寇退去。

大历十四年，唐政府下令留居京师的胡人，必须穿各自民族服装，不得衣华服。这时，留住长安的回纥人常有上千人，而那些衣汉服与汉人杂居的又不知有多少，这些人在城中开店，购房舍，大获其利，且仗势欺人或诱人妻女，官府不敢过问。为防止胡人冒充汉人行不法，故政府下令胡人禁衣汉服。唐初，回纥民风淳朴，君臣等级不甚严格，且众志专一，强劲骠悍。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唐对回纥赏赐甚厚。至登里可汗时，文明程度渐高，始筑宫室居住，妇人亦知有粉黛之饰，风俗大变。

代宗死，德宗继位，派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报丧。登里可汗骄慢无礼，依附于回纥的众胡族别有用心地蛊惑登里可汗乘丧入侵。他们怂恿可汗说:“中国富饶，如乘其不备人侵，定可大有收获。”登里颇为所动。登里堂兄顿莫贺达干此时位居宰位，深明大义，反对伐唐，劝谏登里道:“唐是大国，又无负于我。前年，回纥人侵太原，获马羊数万，可谓大捷了。可路途遥远，粮草不济，士卒们还是徒步而行，马羊一点也未能带回来。如今举国入寇，万一打败，后果不堪设想。登里可汗不听，顿莫贺利用民众不愿南下作战的有利之机，发动兵变，杀掉了登里，吞并了九姓胡，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并派遣使臣聿达干与梁文秀回归长安人见德宗，表示愿为藩臣，以待册命。不久，唐德宗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八月，唐振武留后杀回纥使者突董等九百多人。突董，是武义可汗的叔父。代宗之世，杂居京师的胡

人日多，一些杂胡常冒回纥之名，骚扰百姓，为患京师。故德宗继位后，令突董等尽率其众归本国。突董一行归国途中，掳掠为患；至振武留居数月，竟不起行。回纥人不但诛求无厌，又纵牛马践踏民田，激起民愤。留后张光晟忍无可忍，密奏德宗，要设计尽杀突董等人，德宗因陕州之辱，衔恨回纥，又怕引出乱子，未置可否。光晟等洞悉德宗的心思，计杀突董等九百多人，独留二胡人归国为证。德宗封光晟为右金吾将军。后回纥索讨光晟为突董等复仇，德宗为应付回纥又将光晟贬为睦王傅，以表示歉意。

建中三年，德宗令可汗使源休护送突董等四人的灵柩归回纥，可汗派遣其相颉干迦斯相迎。颉干迦斯坐于大帐之中，令源休立于帐前雪中，以擅杀突董之罪责问唐使。源休等受尽委屈，几次差点丢了性命。五十多天后才允许他回国。临行前，回纥可汗派人对源休道："我国中之人皆想杀你以报突董之怨。然而突董等人已死，我再杀你，是以血洗血。如今我想以水洗血，作个干净的了结。所以决定放你回国，只愿唐将欠我的马价一百八十万匹帛，速速送来。"可汗派其将军康赤心随源休入见唐德宗。六月，一行人至长安，德宗令以十万匹帛，十万两金银偿还回纥马值。

德宗贞元三年，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屡派人请求和亲，德宗不忘陕州之辱，心恨回纥，未肯答应。正值此时，边将来告马匹缺乏，难以补充。宰相李泌便对德宗说："如果陛下用臣之言，几年之后，马价就会比当今便宜十倍。"德宗忙问其计。李泌道："望陛下出以公心，为社稷江山大计，屈己为人，臣才敢说话。"德宗道："卿不必疑虑，但讲无妨。"李泌道："臣认为陛下应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等国，这样吐蕃受困，马匹也就易于到手了。"德宗道："其它几国可以结好，只有回纥不行。"李泌道："臣早知陛下会如此，故不敢讲。从当今形势考虑，首先应考虑与回纥修好，其它几国反倒可以放在其次。"德宗不悦道："请卿不要再提回纥二字。"李泌道："臣位居宰相，责任重大，用

不用臣言都取决于陛下，何至于不许臣讲话！”德宗道：“朕对卿言无不听从，只有与回纥修好一事，以后再说，在朕之世，断为不可。”李泌道：“陛下如此痛恨回纥，是因陕州之辱吗？”德宗道：“正是！当年朕以雍王之身份会见回纥可汗，备受羞辱，韦少华等二人因朕之故受辱而死，此恨朕至死难忘，只因眼下国家多难，无暇报仇。与之和好，则断断不能答应。卿不必多言。”李泌道：“陛下不能这样想。当年害少华，辱陛下的乃是登里可汗，早已被现在的合骨咄禄可汗杀掉。今日可汗为陛下报了仇，本应受赏，为什么陛下反倒怨恨于他呢？况且张光晟杀了突董等九百多人，回纥可汗宽宏大量，不杀我大唐使者，对如此深明大义之人，陛下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德宗似有所悟：“如此说来，还是朕的不是了？”李泌道：“臣为大唐社稷着想，若不讲是非一味迁就陛下，臣有何面目见肃宗、代宗于地下？”德宗道：“让朕好好再想想。”

自此以后，李泌不断上书，无处不谈与回纥修好之事。谁知德宗生性倔强，就是不肯答应。李泌无奈，便对德宗道：“陛下既不肯与回纥和亲，臣请求告老还乡。”德宗道：“朕并非拒谏，只是想与卿论论理，卿何至于马上就离朕而去？”李泌道：“陛下让臣发言，是天下之福。”德宗道：“朕倒不怕委屈自己与回纥和好，只是辜负少华等人，于心不忍。”李泌道：“依臣之见，是少华辈负陛下，不是陛下负他们。”德宗一听不解，忙问其故，李泌道：“早先，回纥兵助讨安庆绪，肃宗只令臣下在元帅府设宴款待，直至大军即将出发，肃宗才与之相见，所以这样做是先帝深知戎狄乃豺狼之性，如今率大军入中国腹地，不可不防，陛下在陕州之时，少华等人行事欠考虑，不先与回纥议定相见时的礼仪，便让陛下以唐太子身份轻率造访可汗兵营，使回纥人肆行无礼，令陛下受辱，这不是少华辈负陛下吗，死都难偿其责。而且，平定安史之乱时，回纥有功于国。收复长安以后，回纥叶护想践约抢掠长安，先帝亲拜于马前制止，叶护不敢入城。因此在先帝之时，回

纥对大唐功多罪少。登里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以救中原之难，其意难免骄矜，对陛下失礼。而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屈。那时的情形，臣不敢往坏处想，假使可汗强留陛下于帐中，欢饮十日，天下人岂不心寒？然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服，可汗母喝退左右，赠陛下貂裘，亲送陛下乘马而归。以此观之，是回纥屈于陛下呢，还是陛下屈于回纥？”于是德宗心有所感，便问李晟与马燧二人：“朕素来怨恨回纥，今闻李泌之言，朕自觉少理，你二人以为如何？”二人答道：“如果真如李泌之言，回纥还可原谅。”德宗道：“你二人也变了主意，朕当如何是好？”李泌道：“臣以为回纥无可怨，以前的宰相却有责任。回纥人本有收复京城之功，如今回纥可汗又杀登里，解了陛下陕州之恨，何罪之有？而吐蕃见中国有难，非但不救，反而乘我之危，攻占了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受辱，此乃百世必报之仇。如今这个吐蕃赞普还在位，前任宰相不为陛下明辨是非，却要和吐蕃共攻回纥，简直是误国误民！这是上任宰相的罪过。”德宗又道：“朕与回纥结怨已久，听说回纥已与吐蕃结盟。如若派人与之和好，而被回纥拒绝，岂不被夷狄耻笑？”李泌道：“不会，当年臣在彭原之时，今日可汗为胡禄都督。他与当今回纥国相白婆帝都是叶护属下。臣曾厚待他们，关系融洽。因此听说臣作了宰相才派人求和，哪有相拒之理。臣要求与回纥书面约定五个条件，一要称臣，二要称子，三每次入使不得过二百人，四每年人马不得过千匹，五不得携带中国人及胡商出境。以上五条回纥都同意遵守，陛下一定要答应与之和亲。如此，我大唐就可稳住北边，慑服吐蕃。”德宗又道：“自至德以来，唐与回纥皆为兄弟之国，今日让其称臣，他肯答应么？”李泌道：“回纥与大唐和亲已很久了，其可汗、国相素来听信臣言，考虑问题不大。”

不久，回纥可汗派使节前来上书，称臣及儿，李泌所提条件一一答应。德宗大喜，问李泌道：“回纥人怎么如此驯服？”李泌

奉承道："这是回纥慑于陛下威灵。"德宗道："现在既与回纥和好，再进一步招抚云南、大食、天竺怎么样？"李泌答："我与回纥和好，吐蕃就不敢轻易进犯了，再招降了云南，就等于断了吐蕃的右臂。云南自汉以来一直臣服于中国，杨国忠无故侵扰，才使之反叛，臣于吐蕃。云南早就苦于吐蕃的赋役沉重，无一日不复思为唐臣。大食在西域最为强大，占地几乎半天下，其与天竺皆仰慕中国，世代与吐蕃为仇，臣知其定可招降。"不久，德宗答应将咸安公主嫁回纥可汗，并以绢五万匹为马值。

回纥可汗得唐许婚，大喜。贞元四年，派妹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以及国相等几千人来迎娶公主，礼节词语甚恭谨，口称："过去为兄弟，如今为子婿，是半个儿子。如吐蕃为患，儿定为父除之。"与此同时，回纥与吐蕃绝交。冬十月，回纥可汗上表请求改回纥为回鹘，德宗批准。同月，德宗册命咸安公主，封回鹘可汗为长寿天亲可汗，封公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并让嗣滕王湛然为婚礼使，与右仆射关播护送公主入回鹘。

贞元五年冬十二月，天亲可汗死，其子立，唐政府册命新可汗为登里罗没密施俱禄忠贞毗伽可汗。

这时，吐蕃联合葛禄、白服突厥等进犯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大军前去相救。

贞元六年，忠贞可汗之弟弑忠贞自立，因大相远征吐蕃未还，故次相率国人杀掉了篡权者，又立忠贞可汗之子为汗，这时新可汗阿啜年仅十五岁。

颉干迦斯与吐蕃之战不利，北庭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残部逃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率军归国，次相恐其有废立之举，便带可汗出郊相迎，见颉干迦斯后，二人俯伏在地，自述废立之状，泣道："今日只求大相宽谅。"可汗哭道："儿愚幼，若能幸立，惟阿多是从，不敢过问国事。"阿多即父亲。颉干迦斯感其卑屈，顿生悯惜之心，扶之痛哭。之后行君臣之礼，并将所赠尽分臣下，

自此之后，国中稍稍安定。

秋天，颉干迦斯举兵几万会同杨袭古攻吐蕃，意欲收复北庭，不想又被吐蕃击败，死者过半。杨袭古准备率余众退回西州。颉干迦斯阻拦道："请君先与我回牙帐，然后定送君还朝。"谁知颉干迦斯竟将杨袭古杀掉了。自此后安西、北庭皆失陷，只有西州仍为唐所固守。

贞元七年春二月，唐政府册命回鹘可汗为奉诚可汗。

贞元十二年春四月，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为人聪慧有勇略，自天亲可汗时就典兵马掌大权；大臣、诸酋长皆畏服。骨咄禄称汗之后，遣使入唐报丧，唐册封其为怀信可汗 。

顺宗永贞元年（805 年）回鹘怀信可汗卒，唐派使前去吊唁，又册命继位者为腾里可汗。

宪宗元和三年二月，咸安公主卒于回鹘，三月，腾里可汗卒。五月，又册命新可汗为保义可汗。

元和八年冬，回鹘发兵击吐蕃，兵临唐边境，边军防范甚严。

元和九年春，宰相李吉甫奏请重新设置宥州，以备回鹘，宪宗准奏。这些年来，回鹘屡屡派人请求和亲。唐廷以公主外嫁，费用浩大为由婉拒。礼部尚书李绛上书道："回鹘凶强，不可无备。如今江淮大县，每年收入可达二十万缗。一县之赋，就可满足公主外嫁之资，陛下何必因吝惜一县之赋，不用来羁縻强虏。回鹘若得许婚，必定大喜而无进犯之心，我方可乘此有利之机修城堑，缮甲兵，专意收复淮西之地，必有收获。如今不许和亲，反修军备，只能使回纥疑心，万一为患，淮西之地的收复就无时日了，即使取胜，其费用也定超公主外嫁之资。"而宪宗不听。

十二年，回纥要求和亲更加急迫，有关部门计算其费用要耗费五百万缗。这时中原正用兵，财政吃紧，宪宗又未准许。二月，朝廷派使人回鹘，转达此意，以宽慰其心。

元和十五年，回鹘求婚甚急，宪宗才算答应。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四月，唐政府册命回鹘嗣君为崇德可汗。五月，可汗派宰相等五百余人来迎太和长公主。太和公主是穆宗之妹。吐蕃闻听唐与回鹘和亲，进犯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率军反击，不久回鹘以万匹骑兵出北庭，以万匹骑兵出安西，击吐蕃，以迎公主。

长庆四年，回鹘崇德可汗卒，其弟曷萨特立为昭礼可汗。

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春三月，昭礼可汗被部下杀掉，从子胡特勒立。七年夏四月，唐政府册命其为彰信可汗。

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回鹘相安允合等谋反作乱，被彰信可汗所杀。其同党大相掘罗勿正在外率军作战，闻国内有乱，便借沙陀兵共攻可汗，可汗战败，自杀，国人又立㕎驭特勒为汗，这时回鹘别将句禄莫贺又勾结黠戛斯部落攻回鹘，杀㕎驭和掘罗勿，焚其牙帐。自此内乱之后，回鹘各部逃散，其势遂衰。

自唐初以来，回鹘与唐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其间难免有短时期的抵牾，但和睦友好始终为主流，在此期间，回鹘多次出兵助唐平乱，立有大功，唐亦先后以五位公主下嫁，谱写了一曲民族友好的史诗。

（于宝华）

参考资料：

《新唐书》：《回鹘传上、下》

《旧唐书》：《回纥传》

《通鉴纪事本末》：《回鹘叛服》

《资治通鉴》卷246—卷248

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方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朝中宦官专权气焰嚣张。人民处境悲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维持统治，一些较有远见的士人官吏试图改革政治，也作了几次大胆尝试。如德宗时宰相杨炎致力于改革，但阻力重重，除两税法外，其它内容均告失败。

德宗死后，顺宗继位。顺宗上台后，亲信王伾、王叔文得势，起用了刘禹锡、柳宗元、陆淳、吕温、韩晔、李景俭等人，形成一股革新派势力。王叔文等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为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藩镇；二是打击宦官势力，夺其军权；三为任人唯贤；四为废止弊政，放宫女还家等以缓和阶级矛盾。因这次改革在永贞年间，故史称“永贞革新”。

唐顺宗身体不好，贞元二十年（804 年）九月，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已得了风疾，不能讲话。

永贞元年（805 年）正月初一（辛未），诸王亲戚按照惯例人宫向德宗庆贺，只有太子因病未来履行这个礼仪。这使德宗十分感伤，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因此也生了病；病情日渐加重，在二十多天里，宫廷内外不通消息，外间无法了解德宗的健康状况。

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病死。仓猝之间找来翰林学士郑䌹、卫次公等人到金銮殿起草德宗的遗诏。有的宦官说：“皇储一直还没确定，遗诏怎样来写还须商量。”大家对此都犹豫起来。卫次公说：“太子虽然身体情况欠佳，到底是嫡长子，被大家公认。

万一太子不能继位，也应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李纯，不然非乱了套不可。”大家一附合，决定了遗诏的内容。诏书说：“皇太子李诵应该继承皇位，我在弥留之际，命你继统。你要继承前人的事业，安抚治下的百姓，不要辜负了我高祖、太宗开创的景天承命的基业。”

太子李诵知大家对他的存亡很关心，强拖着带病的身子，穿上紫衣麻鞋，走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

二十四日（甲午），在宣政殿宣读遗诏。太子着丧服见百官。二十六日（丙申）在太极殿即皇帝位，这就是顺宗。

顺宗在东宫的时侯，曾经和王伾学书法，王叔文以围棋娱侍太子，都很受信任。王叔文读过一些书，常常利用接近太子的机会，反映民间的疾苦。有一次谈起宫市的问题。所谓“宫市”就是宫中派宦官为购物使到外间买东西。照理说宫市也应按照物价给钱。可宦官们倚恃权势并不按行情给钱，后来甚至不再行买物品的文书。宦官们到市场中查看，只要他们认为好，就说一声：“这东西宫里要了。”商人就得老老实实拿出来，没人敢问他们是谁，给的价钱合适不合适，以致经常发生的宫市让人真假难辨。宦官们压低价格随便付值不说，还常索要货物进宫的门户钱和运送货物的雇脚钱。这种名为宫市的交换，其实已经成为赤裸裸的劫掠。太子说：“我正要向父王透彻地谈谈宫市的弊端呢！”人们都称赞太子为国为民，只有王叔文不讲话。人们散去后，太子把王叔文留下来说：“刚才只有您没有讲话，是不是有不同于别人的看法？”王叔文说：“叔文有幸侍奉太子，看到的事情怎么能不说！我认为太子的职事应当只限于关心皇帝的饮食和健康，不宜对外间的事情说三道四。皇上在位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如果怀疑你用这件事收买人心，那你恐怕就说不清楚了。”太子大惊，感激地说：“如果不是先生您指点我，我怎么也意识不到这一点。”从此对他言听计从。王伾、王叔文出入东宫，深得宠幸。德宗病情恶化以

后，王伾先入宫，用德宗诏召王叔文坐在翰林院中决定政事。

顺宗即位后，既已不能讲话，当然无法处理政务。他住在深宫之中，挂起一个帘帷，只有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奉左右。百官奏事由帷帐里传出顺宗的圣旨。这时王伾把王叔文的意见告诉李忠言，李忠言对外面说这是皇帝的诏命，要大臣们执行，真实情况外间当然不知道。

按照制度，新皇帝居丧三日就应视朝听政。但顺宗二月三日（癸卯）才在紫宸门接受百官朝拜。王叔文为了操纵国政，引韦执宜为相，自己在宫内与之呼应。

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待诏；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郑絪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冯伉为兵部侍郎；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归登为给事中、修撰。这些人都曾在东宫侍读，因是顺宗的师傅而拜官。

王伾相貌丑陋，用吴语讲话，顺宗与他不为礼节所拘，非常随便。王叔文则以任事自许，比较自重，又喜欢发表看法，所以顺宗对他的态度与王伾大有区别，也比较严肃。王叔文不能象王伾那样畅通无阻地出入宫中。王叔文只能到翰林院，王伾则可进入柿林院与李忠言、牛昭容一起商议事情。人们认为王叔文服从王伾，王伾服从李忠言，李忠言则请牛昭容作主。一件事先下翰林院，由王叔文决定可否，然后在中书省公布，韦执谊按决定执行。

王叔文得到太子宠信之初，曾向李诵推荐将相，他密结韦执谊及当时名士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生死的朋友，以为将来之用。王叔文用事后，启用韦执谊为相，以前交结的人，逐个得到提拔。有时一天同时就给好几个人加官。一些人为了迎逢新党，千方百计地向王伾、王叔文等人献殷勤。王叔文及新进的高官显贵家中十分热闹，昼夜

车马如市。候见王叔文、王伾的人甚至不得不寄宿在坊市沽酒贩饼的店铺中。每人交一千文钱才能住下。王伾被腐蚀，他热衷于纳贿，专门作了一个大柜，贮藏受贿的金帛，夫妻就睡在上面。

二月下旬，顺宗为庆贺新继位，宣布大赦天下，各种逃债一概蠲免，除正常的贡赋之外，其余各种进奉一律罢免。贞元末年的各种弊政如宫市及被称为小儿的五坊杂役之类一概革除，此举大得民心。

以前，五坊小儿在闾里张网捕鸟雀，多以暴横手段讹诈别人钱物。甚至有的在民宅门前张网捕鸟，不许人家出人，有的则在井口张网不许汲水。一旦有人接近罗网，他们便说："你惊跑了专供进奉的鸟雀!"随即痛打，直到被打人出钱出物求饶，他们才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有时他们在酒馆饭店里聚会，大吃大喝根本不给钱。有的店主不识相，找他们要钱，他们就拳打脚踢，又打又骂;更有一种人留下一袋子蛇作抵押，说:"这是捕鸟雀用的蛇，今天暂且留在这作抵押，你们好好给我养着，如果这蛇有三长二短，拿你们是问!"店主只有哀告求情，想办法把这些无赖打发走。

顺宗作太子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些深为民怨，所以即位以后首先查禁宫市和五坊小儿。

二十五日，顺宗诏令取消盐铁使月进钱。本来盐铁使的一切征敛都应放人正库，但主管者为了取悦皇帝往往买一些珍玩和时新物品作为进献，每年所进的钱物叫作"余羡"。到了贞元末年，余羡改为每月一进，叫作"月进"。现在把月进钱取消了。

三月，诏令出宫女。将后宫宫女及教坊女妓共三百人放回家，家中的亲戚可到九仙门去候接。宫女们与亲人相聚。场面十分感人。

十七日，朝廷下诏任命浙西观察使李琦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改由杜佑担任。不久任命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作杜佑的副手。任命诏书给王叔文很高评价，说:

"中书舍人王叔文，精识瑰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深沉有谋，特授盐铁副使。"

王叔文执政以来所作的各项改革深得人心，却触动了宦官们的利益。宦官俱文珍等见顺宗久病不愈，知他已不久于人世，就把希望寄托在顺宗死后夺权。他们要顺宗把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等召到金銮殿，起草立太子诏。而牛昭容等人不愿意立广陵王李淳为太子。双方对此不让步。郑絪不再论辩，直接在纸上写了"立嫡以长"几个字呈给顺宗看，顺宗点了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

四月六日，顺宗在宣政殿册封太子。王叔文心知这件事对他的事业和仕途预示着什么。他口不敢言而面有忧色，当下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表达了他的忧郁心情。但有些人却偷偷暗笑，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

宦官典掌军队由来已久，王叔文为夺宦官的兵权，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过了几天，王叔文下诏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王叔文希望利用老将范希朝的声望，让他挂名，实际由韩泰主事，从此把军权抓过来，但这一招想得未免天真。

五月二十三日，顺宗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继续担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但削去了他翰林学士的职务。这是宦官俱文珍的主意。王叔文见到皇帝的制书大为吃惊，对别人说："我每天都到翰林院商议公事，如果失去翰林职务，就没有理由再去议事了。"在场的王伾答应替他上疏，请求恢复王叔文翰林职务，未获同意。又一次上疏，才同意王叔文可以三、五天到翰林院去一次，但不再是翰林院学士。王叔文与归登二人同一天受赐紫色朝服，但只从宫廷内赐给归登衫、笏，王叔文因得罪了俱文珍而不得赐。由此可以看出王叔文已走下坡路，他的失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王叔文与部分朝官也有矛盾。宣歙巡官羊士谔被贬为汀州宁

化尉。他因公事到长安，在长安公开指责王叔文。王叔文听到后大怒，打算下诏斩羊士谔，韦执谊不同意，又改令杖杀，韦执谊还是不同意，所以把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尉。王叔文因此对韦执谊大为不满，与王、韦二人有来往的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在此之前，刘辟以剑南支度副使的身份将韦皋的意思告诉王叔文，要求都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他对王叔文说："韦皋让我向您致以小小的诚意，如果您把剑南三川授给他，当以死相助；如不给，也会给您报酬。"王叔文不堪要挟，想把刘辟杀掉，韦执谊不同意。刘辟这时还在长安恬然与人交游，一听到羊士谔被贬的消息，吓得赶紧跑回剑南。

韦执谊起初靠王叔文引荐作官，一心一意地依附他，得了相位之后，意欲掩盖过去的历史，又迫于朝廷的舆论，所以时时表现自己与王叔文不同。有时他让人向王叔文致歉说："不敢辜负旧约，只是想以不同的方式帮您成事。"叔文怒骂，不信这些话，两人从此结下怨仇。

六月中旬，韦皋为报复王叔文送来上表，提出："顺宗因德宗谢世而哀毁成疾，每天又要处理繁多的政务，所以身体一直没有康复。应该让皇太子监理政事，等顺宗的身体好转以后，再重新执政。"又给太子送来笺表，直接攻击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三人，说："这三个人肩负朝廷重任却赏罚任情，败坏纲纪。他们动用国货，贿赂权门，树置私党、潜结宦官。希望太子转告顺宗，将这些人驱逐出朝廷。"韦皋自恃身居要职，又在边远的西蜀，王叔文一时无法动摇他的地位，所以敢于尽情攻讦。不久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也上笺表与韦皋相呼应。反对王叔文的宦官、朝臣把这些藩镇作为外援，形成了气候。

王叔文让范希朝、韩泰主掌京西神策军后，边境上的将领们给护军中尉送来文状，说将听命于范希朝。这时宦官们才省悟，兵权被王叔文夺去。他们认识到，这是命运攸关的一步，密令使者

回去告诉诸将："不要把军队交给别人。"范希朝到了奉天，诸将无人前来听命。韩泰跑回去作了报告，王叔文无计可施，只是叹息无可奈何。

不久，王叔文的母亲病危。叔文决定归家探视，行前，备了好酒菜与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在翰林院饮宴。王叔文说："由于身任国事，母亲患病未能亲奉医药，今天准备告假回家侍奉。叔文竭尽心力，不避危难，完全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遇。一旦回去，各种诽谤会交相而来，在座的诸位谁能体谅我，给我一言相助？"俱文珍随着话音挖苦起来。王叔文不好辩驳，只得满杯劝饮，酒过数巡便不欢而散。依传统，父母死后须在家守孝三年，故叔文以母丧离职。

王叔文在服丧期间，韦执谊更不理睬他的话。叔文大怒，试图通过王伾重新执政。他声言："执政后一定先斩韦执谊，后杀与自己作对的朝士。"王叔文的话令他的政敌胆战心惊。

王伾每天与宦官和杜佑谈，要求起用王叔文为相，并总领北军，这事当然作不到。于是要求让王叔文作威远军使、平章事，还是达不成妥协。这一天，王伾坐在翰林院，上奏三次都没有答复，他知道希望已经不存在了。坐卧不宁的王伾到了晚上忽然中风，第二天回家便不再出门。

七月，在宦官俱文珍等人操纵下，朝廷任命礼部侍郎权得舆为户部侍郎，仓部郎中、判度支陈谏为河中少尹，王伾、王叔文的势力从此解体。

八月四日，宦官迫顺宗颁下制书，由太子李纯即皇帝位，顺宗自称太上皇。第二天，太上皇迁往兴庆宫居住。

八月六日，新皇帝李纯将王伾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不久，王伾病死在开州。第二年赐王叔文死。

九日，宪宗李纯在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

二王之党连遭贬斥。九月，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

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十一月，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韦执谊与王叔文有分歧，又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的女婿，所以最后一个贬官。

王叔文等人失势后，韦执谊已失去了维持职务的背景；他知道贬官的命运迟早要轮到自己头上，所以虽在相位，已没有任事的心情，直到被贬以前，听到人的脚步声就惊慌失措，毫无生气。

这时有人提出，王叔文一派的人，有人仅从员外郎贬为刺史，处分太轻。于是，再次下诏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因为这次遭贬斥的人涉及了王叔文、王伾和八位司马所以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派本意为改良政治，但由于他们力量微弱，在强大的敌 对势力面前无所作为，因此，掌权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与他们的天子一道，被政敌推下政治舞台，改革彻底失败。

（于宝华）

参考资料：

《新唐书》：《王叔文传》《韦执谊传》

《资治通鉴》卷236

韩愈：《顺宗实录》

《通鉴纪事本末》：《伾文用事》

《旧唐书》：《王叔文传》、《韦执谊传》

高崇文平蜀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度使 武王韦皋死；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刘辟指使诸将上表，请命刘辟为节度使，朝廷不许。新即位的宪宗命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十月下旬正式任命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入朝为给事中。刘辟不受命，阻兵自守。袁滋害怕刘辟，不敢赴任。宪宗大怒，贬袁滋为吉州刺史。

十二月中旬，刚刚即位的宪宗知刘辟兵强，估计尚没有足够的力量讨藩，正式承认刘辟自立的事实，同意他为西川节度副使，主持节度使事。右谏议大夫韦丹以为："纵容刘辟。朝廷的形象和权威将受到极大的损害，除了洛阳、长安二京之外，恐怕再也没有人肯于听命了。"宪宗决定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以为将来之用。

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刘辟要求兼领三川，朝廷不准。刘辟立即发兵围攻东川，将新任东川节度使李康包围在梓州。

宪宗准备讨伐刘辟，又怕力量不足，历久无功，公卿大臣多主张蜀道险固难攻，应该采取克制态度。只有翰林学士李吉甫劝宪宗用兵。宰相杜黄裳推荐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征蜀大将，要求不设监军，给他充分的权力。

高崇文有谋略，朴重寡言。年轻时著籍平卢军。唐德宗贞元年间跟随韩全义镇守长武城，治军有声，官累金吾将军。后来吐蕃三万人入犯宁州，高崇文率三千人往救，建有战功，被封为渤

海郡王。韩全义入朝后，高崇文主持行营节度事，接着被提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

宪宗元和元年正月，宪宗命高崇文率步、骑兵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刘辟。当时显功宿将甚多，人们都以为自己可能担当主将，而高崇文受命令许多人大感意外。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万年县人，进士出身，还考取过博学鸿辞科，后来作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宪宗与杜黄裳论及藩镇 。杜黄裳说："德宗被藩镇之乱搞得很头痛，后来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节度使死后，总是根据军镇的要求任命继承者。到了晚年，从来没有按照朝廷意见安排过节度使。"又说："陛下应该以贞元年间的旧弊为鉴，逐渐节制藩镇，然后天下才能大治。"这些话深深打动了宪宗，促使宪宗下决心讨藩。

高崇文屯守长武城时训练了五千士卒，常作临战准备，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精锐部队。高崇文接到诏命后，一个时辰就将器械粮草准备好率军出发。正月二十九日（甲午）高崇文由斜谷出兵，李无奕由骆谷出兵，同时进逼梓州。途经兴元（陕西汉中），有士兵在旅店里发脾气将食具损坏，被高崇文斩首示众。

这时刘辟已攻陷梓州，东川节度使李康被俘。二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攻陷剑州（四川剑阁）斩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从阆州（四川阆中）出兵进取梓州。梓州守将不战而退，官军进占州城。刘辟急将李康送回，以求高崇文收复东川治所梓州后，息兵不战。崇文以败军失守的罪名将李康斩首。

三月中旬，高崇文部攻克梓州的报告传到朝廷。第二天，朝廷下诏削夺刘辟官爵。

四月初，朝廷下诏，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主持节度使事，以便能够利用东川的资源有效地推进战争。

五月，刘辟在绵州与汉州交界的鹿头关集结了一万余人，以

拒高崇文。六月，高崇文在鹿头关击败刘辟；刘辟在关东的万胜堆设营。六月六日（戊戌），高崇文部骁将高霞寓攻夺万胜堆的营寨，连战皆捷。两日之后，高崇文破刘辟于德阳（今属四川），又败刘辟于汉州（四川广汉）。七月刘辟在玄武再败。

严砺的部队也在绵州石碑谷奏捷。

七月，宪宗下诏，令高崇文受命统领西川继援的一切军队。

九月，刘辟在鹿头关再败。

河东军将阿跌光颜接受命令赶往高崇文行营，由于时间紧迫不能如期到达；按照军律主将将被斩首。阿跌光颜自忖，只有建立奇功才能免除一死，于是不再前进，转而在鹿头关以西扎营，切断了刘辟守军的粮道。鹿头关军心大乱。刘辟所部绵江守将李文悦、鹿头守将仇良辅接连献城投降，投降的部队以万计。从此刘辟的防线被突破，高崇文长驱直指成都，所向披靡，军不留行。

九月，官军一路破关斩将，攻克成都。刘辟、卢文若率数十骑西奔吐蕃。高霞寓等随后追击，在羊灌田这个地方追上。刘辟走投无路，投江自杀，被打捞上来。卢文若先杀妻儿，随后系石自沉。高崇文进人成都后，严明军纪。士卒屯于通衢，市肆珍宝山积，秋毫无犯。刘辟被押送京师。刘辟大将邢泚、馆驿巡官沈衍被斩首。军府之事完全按前节度使韦皋的旧章程办。

刘辟有二个小妾，美丽无双。监军要高崇文献给宪宗。崇文道：“天子命我讨逆，当以抚百姓为先。如果用献美人的办法求宠，我是不肯干的。”

十月，朝廷下诏，任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于此同时，下诏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十月二十九日（戊子），刘辟被解送到长安，朝廷命令将他和他的族人一并处死。

讨平西川刘辟叛乱，是宪宗平藩计划的第一步，第二年，又平定了镇海李锜，于是唐政府威信大增，诸藩或主动归顺，或被

平定，帝国暂时统一。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36—卷237

《通鉴纪事本末》：《宪宗平蜀》

《新唐书》：《高崇文传》、《杜黄裳传》

李锜反叛

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刘辟、杨惠琳之乱平定后，镇海节度使李锜又叛。

李锜本是常州刺史，其人善于逢迎钻营，巴结上闲厩宫苑使李齐运。李齐运受其重赂达数十万之巨，故极力在德宗面前举荐。德宗听信李齐运之言，于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授李锜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利用职权，苛剥搜刮，并将其中一部分进献给宫廷，由此得到德宗的宠信。当然还有一部分则用来结交权贵，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有了保护网，李锜什么都敢干，盗取官财无数。所部官员许多人只因得罪了李锜而被无辜杀害。浙西百姓崔善贞到长安给德宗写了机密封章，揭露宫市、进奉钱和盐铁专利的时弊，这中间提到了李锜的许多不法之事。昏聩的德宗阅后不但不追查，竟然命人将崔善贞押回浙西，送交李锜处理。李锜得到消息，事先在道旁挖了一个大坑，待到崔善贞解来，连刑具都没打开，就把他扔到坑里活埋掉。远近之人听到事情结局都不寒而栗。李锜为经营自己的势力，广增兵众，建立了一支由身强力壮、善于射术的人组成的部队叫作"挽强"。另一支部队由胡人、奚人等少数民族士兵组成，叫作"蕃落"。这二支武装力量作为李锜的亲兵待遇极为丰厚，每月的赏赐是其它士卒的十倍。

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杜佑接任度支及盐铁转运使。李锜虽失去盐铁使的职务，但由浙西观察使转升为镇海节度使，所以

他对这一变动也能接受。

顺宗在位时间不长，当年八月顺宗颁诏退位，新皇帝宪宗继位。宪宗对李锜并无好感。十二月，刑部郎中杜兼调任苏州刺史。行前，他上书称："李锜很可能要造反，他会找借口奏请朝廷诛灭我的一家，希望朝廷注意。"宪宗同意杜兼对李锜的看法，把他留在朝中担任吏部郎中，不再去苏州赴任。

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刘辟、杨惠琳之乱平定，一些藩镇见朝廷势力强大，多求入朝。李锜也在这股潮流中要求入朝，被宪宗同意。朝廷的敕使到京口（江苏镇江）宣慰。李锜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仅仅作了一个准备入朝的姿态，却一再迁延行期，根本不打算到长安去。在朝廷使者及王澹的一再催促下，李锜上了一道表，说目前有病，请到年底再入朝。宰相武元衡对宪宗说："陛下刚刚临政，须建立权威。不能让李锜左右朝廷的决策。如李锜想入朝就可来朝，不想入朝就可不来，还怎么号令天下！"于是宪宗用诏书征李锜入朝。

王澹掌管留后，对军府事务的处置很得力，直接威胁到了根本不想离镇的李锜的权力。李锜暗暗组织亲兵准备干掉他。一天颁发冬服，李锜严兵坐镇营账之中。当王澹和敕使来到这里的时候，一群士兵在帐外大声鼓噪，说："谁叫王澹，在这里擅领军务，作威作福！"说着话将王澹拉出去杀死，大将赵锜出来劝阻也被杀死。十月再次下诏征李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锜报告说："军中发生兵变，杀留后王澹，大将赵锜。"

在此之前，李锜将亲信五人安插为五州镇将，他们分别是苏州镇将姚志安，常州镇将李深，湖州镇将赵惟忠，杭州镇将丘自昌，睦州镇将高肃。这些人各领数千军队，伺察刺史动静。这时，李锜让他们立即行动，将各州刺史杀掉。常州刺史颜防早有准备，他矫称朝廷已任命他为招讨副使，抢先动手斩杀李深，传檄苏、杭、湖、睦四州，要他们一同进讨李锜。湖州刺史辛秘招募一批乡闾

子弟，夜袭赵惟忠获得成功。苏州方面却被姚志安得手，刺史李素被擒。

事变发生后，朝廷削夺李锜官爵及其宗室属籍，命淮南节度使王锷统领诸道兵招讨。

李锜反叛后，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三将率兵三千进袭宣州。三将知李锜站不住脚，不肯用命。牙将裴行立是李锜的外甥，与三将立场一致。他们经过策划决定倒戈，逆袭李锜，由裴行立作内应。

三将在城外扎营。一天，他们以准备出发为名，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当众说："李锜叛逆，官军四集，目前形势很恶劣。宣武、武宁、武昌及淮南、宣歙方面的官军已从宣州出兵，浙东、江西的军队也分别从杭州和信州出兵，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如今远袭宣州无异以卵击石，弃逆效顺，才可转祸为福。我们现在只有回军反戈，才能自全。"大家都没有异议，于是当晚返军回城。在城内接应他们的裴行立举火鼓噪，把他们引入牙门。李锜听说张子良、裴行立等已经串通好了，杀进城来，知道大势已去，赤着脚，慌忙逃命。亲将李钧率三百"挽强"准备顽抗，被裴行立伏兵邀杀。李锜举家大哭，无路可逃。人们将李锜抓起来，用幕布捆裹，缒于牙城之下，解送京师。"挽强""蕃落"群龙无首，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尸相枕藉。很快镇海都知道李锜已经失败，没有发生大震荡。

十一月，李锜被解到长安。因他是淮安靖王的后裔，所以族人没有受牵连，但李锜的堂弟宋州刺史李铦等都被贬官流放。

宪宗亲临兴安门，当面审讯。李锜反诬张子良，说："我本不想造反，是张子良等教我造反。"宪宗说："你是元帅，张子良等是部将，他们如要造反，你为什么不将他们斩首，然后入朝？"李锜无言以对。审讯结束后，李锜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同被腰斩。

李锜死后，他的家财被有司抄没，输送长安。翰林学士裴垍、

李绛上言："李锜的家财系割剥六州之人而来，为了掠取当地的财富，许多人被枉杀。陛下如果哀矜百姓无辜无告，请将这些资财赐给浙西百姓，以代今年租赋。"宪宗听从裴垍等人的进言，免除了浙西一年的租赋。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37

《通鉴纪事本末》：《宪宗平吴》

《新唐书》：《李锜传》

宪宗讨成德

唐代后期，成德是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自唐代宗建立成德军后，其节度使始终父子相继，是朝廷难以辖制的割据势力。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 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故去，军中推其子王承宗为留后。宪宗意欲乘此时改变河北诸镇世袭军职的旧弊，由朝廷任命节度使。但宰相们意见不一致，因此议久不决。

七月，宪宗准备任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但要求成德镇分出德、棣二州另为一镇，以此削弱成德镇的实力；同时要求王承宗向朝廷提供二税，任命当地官吏，形式上也要向朝廷报告由朝廷批准。翰林学士李绛认为："德、棣二州归属成德已有历史，一旦划分出来将使王承宗及其将士难以接受。而邻道的情形与成德镇相似，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会暗中勾结，万一形成军事对抗，将难于措处，至于纳二税、请官吏二件事，也不必直接下指令，还是先派祭吊使到成德，让祭吊使以个人的意见向王承宗吹风。如王承宗愿意听命，则皆大欢喜，而王承宗不听，也不伤朝廷体面。"

这时淮西吴少诚病危，李绛劝宪宗集中精力解决四周孤立的淮西，而对王承宗网开一面。王承宗久未得朝命，累表自诉。八月朝廷派京兆少尹裴武前去宣慰。裴武回朝后，朝廷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节度使、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从飞报的口中最先得到这消息。他不愿成德听命于朝，便别有用心地派人对王承

宗说："薛昌朝经常私下与朝廷联络，所以这次得了节度使。"王承宗听后，立即派数百名骑兵马不停蹄地直奔德州，将薛昌朝抓起来，送往王承宗所在的真定关押。朝中的使节给薛昌朝送符节途经魏州，田季安假作欢迎姿态，连日宴劳，为王承宗的行动争取了时间。待到中使赶到德州，薛昌朝已被带走，符节无人接收。

宪宗只好再派中使与王承宗交涉，让他放人。王承宗不肯按诏行事。十月，宪宗决定削夺王承宗官爵，并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布署征讨行动。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以为，宦官可以作监军，但不得作统帅。而谏官御史也有不少人认为吐突承璀职名太重。宪宗不得已，削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吐突承璀从长安发兵，并命成德四周的藩镇一同进兵招讨。田季安给王承宗写信说："我如讨伐成德则河北义士谓我卖友，如与你联合则河南忠臣谓我反君，反君卖友的名声我都不能忍受。你们如能让给我一座城池，我就可以应付朝廷，我们也可以相安无事。"这样，成德让出堂阳。

元和五年正月，幽州刘济将兵七万率先进击王承宗，拔饶阳、束鹿。吐突承璀所部则频频受挫。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定进是一员骁将，他的死使官军士气大受影响。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本来极力主张出兵招讨，及各道出兵后，反而逗留不进，暗中与王承宗通谋。宪宗对他一时也没有办法。

不久，卢从史牙将王翊元入朝奏事，被宰相裴垍收买。王翊元回镇后又联络了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人，待机行动。卢从史一向贪婪，吐突承璀投其所好，不断送他一些珍玩。卢从史总是笑纳，关系密切起来。一天，吐突承璀引诱卢从史到营中赌博，乘机将他拿获，送往京师。从史营中的士卒闻变，立即操兵出阵，准备大战。乌重胤挡住军门，大呼："天子有诏，敢违者斩！"将士卒驱回部伍。宪宗为了表彰乌重胤，想把昭义节度使的职务交给

他。李绛以为不可，主张授乌重胤河阳节度使，而调河阳节度使孟元阳出镇昭义。这时吐突承璀已令乌重胤代为昭义留后。宪宗听从李绛的建议，将乌重胤调离本镇，卢从史则被贬为驩州司马。

七月，王承宗派使者向朝廷表示，过去被卢从史所离间，现在愿意向朝廷输送贡赋，并由朝廷任命地方官吏。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上表要求根据王承宗的悔悟表现，停止进一步招讨。宪宗也因师久无功，决定不再采取军事行动，同时答应仍让王承宗继续担任成德军节度使，并把德、棣二州还给成德镇。诸道兵全部撤回本镇，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束，朝廷赐发各军布帛共二十八万端匹。率先出兵的刘济被加封为中书令。

九月，吐突承璀撤军回到长安，仍旧担任左卫上将军，充神策中卫。裴垍上言："吐突承璀首倡用兵而无所建树，理应贬黜以谢天下。"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竟说："杀了吐突承璀也不为过。"李绛也说："此次不责承璀，如他日再有败军之将将无法惩治。"在这些人的要求下，宪宗罢去承璀神策军中尉的职务，将他降为军器使，一时朝臣相贺。

元和十年，摄蔡州刺史吴元济因匿乃父彰义节度使吴少阳之丧自领军务而被朝廷削夺官爵。宣武等十六道军讨吴元济。吴元济向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求救。王承宗派牙将尹少卿到长安为吴元济游说。少卿在中书省被宰相武元衡训斥出来。王承宗则上书诋毁元衡。六月的一天黎明，武元衡在入朝的路上，突然遭人暗算，随从惊恐逃跑。一伙强人拉着武元衡的马，行出十几步远，将他杀死。朝廷下诏四处搜捕。人们怀疑这是王承宗指使干的。神策将军王士则报告说，是王承宗派成德进奏院的恒州士卒张晏具体干的。吏人将张晏抓起来严刑审讯，张晏禁不住拷打，诬服杀宰相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怀疑其中有不实之处，没有人理睬。后来张晏被斩，还有十八人受牵连而死。其实这是一桩错案，武元衡之死与王承宗、张晏没有关系。

七月，朝廷下诏历数王承宗罪过，不再接受他的朝贡，但未下讨伐诏。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屯兵成德边境，屡为王承宗所败。弘正败怒之余，上表要求主动出击。十月，弘正进军贝州。

十一月，朝廷征发振武兵二千人，会同义武军讨伐王承宗。十二月，王承宗纵兵四掠，邻镇都要求出兵讨王承宗。这时朝廷正对淮西作战，再开辟河北战场为国力所不支，所以宪宗对于河北藩镇对局面的处置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听其自然进展。

元和十一年正月，幽州节度使刘总败成德兵，拔武强，斩首千余级。宪宗见河北形势有利，下诏削夺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

二月，昭义节度使郗士美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幽州节度使刘总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魏博败成德兵，拔固城、鸦城。

四月，刘总破成德兵于深州，斩首二千五百级；义武节度使浑镐破成德兵于九门，杀千余人。

七月，田弘正破成德兵于南宫，杀二千余人。其后，官军屡有建树。

十二月，浑镐引全师压成德境，直到距成德三十里的地方停下来驻军。王承宗则派一支突袭部队进入义武军控制的领地焚掠城邑。而浑镐在进逼恒州的战斗中失利，退回定州。

元和十二年，郗士美兵败柏乡，拔营回镇，士卒死者千余人。另一镇军队也因兵败退回沧州。由于战局恶化，宪宗决定撤消河北行营，让各军全部还镇。

元和十三年，吴元济被擒，征讨淮西的战役结束。王承宗再次通过田弘正向朝廷服软，表示这次真心诚服，愿送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一切都按朝廷的要求办。田弘正一再上表促成这件事，终于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四月，魏博镇派专人将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王知信及德、棣二州的图印送到长安。朝廷再次下诏恢复王承宗的官爵。

元和十五年，王承宗故去。魏博节度使接替了他的职务。由王氏父子世袭节度使的局面宣告结束。

（于宝华）

参考资料：

《通鉴纪事本末》：《宪宗讨成德》

《资治通鉴》卷237～卷241

《新唐书》：《藩镇镇冀列传》

魏博归朝

安史之乱到了肃宗时代大体已经平定。由于社会问题太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唐廷对许多事情只有牵就事实。譬如仍将河北一带的地方权力授予归降的安史叛将就是一例。其中割据魏博的田承嗣本是安禄山部下，也曾介入史思明之乱；安史之乱平定后，田承嗣被授为莫州刺史，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迁为魏博节度使。魏博镇传三世，节度使为田季安，此间魏博始终不受朝廷约束。

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八月，三十二岁的田季安故去。幼子田怀谏在其母元氏的支持下以副大使的身份主持军府事务。

宪宗得到消息，召集宰相商议对策。李吉甫主张兴兵讨罪。李绛以为从情势上看，可以不必用兵。宪宗最初支持李吉甫。李绛说出了一番道理，他说“我看两河藩镇只要搞地方割据，必定在内部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不把兵权交给某一个将领，怕的是下边的权力太重难于控制。地方内部虽然并不一致，但各个部将的势力无法取得绝对优势，大家互相牵制，主帅在上操纵，局面得以维持。如今田怀谏年龄太小，没有操纵大将的能力，其内部的暂时平衡很快就会打破。所以不必用兵急攻，只要不断施加外部压力，魏博镇不久就会有变化。”李吉甫则坚决主张用兵，他在延英殿上一方面陈述用兵的好处，一方面表示，已经筹集好刍粮金帛，军费不成问题。李绛说：“兵不可轻动，前二年兴兵讨恒州，四面发兵近二十万，还不算从京师派出的两神策军，一共花费了七万余缗军费，到现在也没有成功，这就是用兵并不一定解决问

题的最好证明。这些年难得有一、二年太平岁月，人们早已厌战，还是多多考虑民情为好。况且魏博镇绝不可能由田怀谏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长期统治下去，事情也是明摆着。”听了二个人的争论，宪宗转变立场，决定采纳李绛的意见。

田怀谏在魏博镇将一切军政事务交给家僮蒋士则处理。蒋士则对诸将的任用和调动完全出于个人好恶，搞得很多人不满意。牙内兵马使田兴颇得人心。田季安在世的时侯，曾将田兴调为临清镇将，还想找机会除掉他。田兴为了避祸，假装得了风痹病，炙灼满身，躲过了田季安的谋算。田季安死后，田兴被田怀谏召回，担任步射都知兵马使。一天，田兴到军府去，突然数千士兵大噪，发生兵变。兵变士兵围着田兴下拜，拥立他为留后。田兴慌忙趴在地上向大家叩头，表示不能遵命。大家围着他不散，不答应就不算完。田兴知道已经推托不掉了，就提出了四条要求：1. 保全田怀谏。2. 遵守朝命。3. 申报版籍。4. 由朝廷最后任命官员。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将蒋士则等十余人抓起来杀掉，田怀谏迁出使府。

十月，魏博监军将兵变的情况上报朝廷。宪宗再次把宰相们找来通报情况。他对李绛说：“你对事情预料得真准！”

对于魏博镇的善后处理，李绛与李吉甫也不一致。李吉甫的意思是先派中使宣慰，看看事情的发展再作下一步的决定。李绛则坚决反对，认为此时正应推心相待，结以大恩，不然敕使到了魏博镇，当地将士送来上表，一定要田兴作节度使，那时就被动了。李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梁守谦自然站在李吉甫的立场讲话。梁守谦说：“按照老规矩，都是先派专使前去宣慰。如果这次改了规矩，恐怕大家都不理解。所以还是按李吉甫的意见办为好。”最后，宪宗还是让中使张忠顺到魏博去宣慰，打算听听张忠顺的回音再决定如何处置。几天以后，李绛再次上言说：“朝廷恩威系于这次行动，这步棋一定要果断下好。想来张忠顺一行刚

刚走出陕州，要是明天早晨马上发出任命诏书还追得上他。请皇上在最后时刻再斟酌一下。”宪宗说：“不然先让田兴作魏博留后。”李绛说：“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朝命，态度非常诚恳，如不给予特殊的恩遇，就不能令他真心感动。”于是，宪宗决定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另派新使者到魏博送达任命诏书。张忠顺尚未到达魏博，星夜兼程的新使者已抢先赶到魏州。田兴感激涕零，从此诚服。

李绛又说：“五十多年来魏博始终在河北搞地方割据，今天举六州之地归朝，就如同剜开了河朔的腹心，断了这一地区频频叛乱的根子，如不重赏过望，就不足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由羡慕而效仿。请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作为魏博归朝的赏赐。”左右宦官认为：“这个数字太大，这个先例一开，将来有人攀比，国家承受不了。”李绛说：“田兴不贪六州之地，不顾四邻之患，决然归朝，必须给予重赏。钱用光了可以再来，机会失去不会再来。收聚人心的事情，不能惜小费而坏大计。假如国家发十五万大军，用了一年的时间攻取六州，其中花费的代价何止一百五十万缗。”这个道理颇为宪宗接受，他说：“我聚蓄财货正是为了平定四方，不然藏储在府库里有什么用！”十一月，宪宗派遣知制诰裴度到魏博宣慰，带去一百五十万缗钱赏给军士。魏博六州百姓免除一年劳役。

田兴待裴度极好，让他到所部州县到处察看。不久朝廷任命户部郎中胡证为魏博节度副使。田兴还报告部下缺少九十名官员，请有司登录姓名，拟定官职，同时废除以前推行的地方法令，行使朝廷的法纪命令，并向长安输送赋税。田承嗣以来建造的超过等级规定的过度奢华的居室，田兴一概避居，不肯继续享用。

郓州李师道、蔡州吴少阳、恒州王承宗相继派说客来见田兴，要他继续独立，终未奏效。李师道派人与宣武节度使韩弘联络，说：“我家世代与田氏有约，互相保全，彼此支持。现在的节度使田兴

并不出于田氏家族，又出头打破了河南、河北割据的格局，这对您也没有好处。我准备与成德全军讨伐田兴，希望您能配合。”韩弘回复说：“我没有考虑过此事的利害得失，只知奉诏行事。如果你的军队北渡黄河，我就出兵攻打曹州。”李师道因有后顾之忧，未敢轻动。

田兴安葬了田季安后，把田怀谏送往长安。十一月，田怀谏受命在长安担任右监门卫将军。

元和八年正月，宪宗赐田兴名田弘正。所以田兴在《新唐书》里，《本传》称为《田弘正传》。

元和十四年八月，田弘正入朝，与宪宗关系搞得很好。宪宗除让他继续担任魏博节度使外，还让他兼任侍中。田弘正辞去魏博节度使，要求只作侍中，宪宗不许。

田弘正不愿继续搞世袭割据，所以兄弟子侄全都弄到朝里做官，以免这些人搞地方割据。宪宗对来朝求官的田氏子弟一律擢居显列，朱紫盈庭，搞得当时人还很羡慕呢！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39

《通鉴纪事本末》：《魏博归朝》

《新唐书》：《田弘正传》、《藩镇魏博列传》

宪宗平淮蔡

唐宪宗时，政权内部比较稳定；由于两税法的推行，国家财政实力增强，为削藩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唐中央先后讨平剑南刘辟、江东李锜、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等，国势稍振。其中讨平吴元济的经过最富戏剧性。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部将陈仙奇指使医生陈山甫毒杀李希烈而取代其为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亲将吴少诚杀陈仙奇为之复仇。此后吴少诚为淮西留后。

贞元三年五月，吴少诚缮兵完城，经营地盘，判官郑常、大将杨冀诈为手诏要申州刺史张伯元等将吴少诚除掉。事泄，郑常等人被杀。

贞元十五年，吴少诚派兵袭唐州，杀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掠百姓千余人而去。

八月，吴少诚兵掠临颍。朝廷下诏削夺吴少诚官爵，同时命令诸道进兵讨伐。

贞元十六年，韩全义被任命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各道兵都受他的节制。但韩全义素无勇略，只知以巧佞货贿交结宦官，军事上却是个常败将军。十月吴少诚给官军的监军送来礼物和书信，希望与朝廷达成谅解。十月二十三日（戊子），朝廷恢复了吴少诚的官爵。

顺宗永贞元年（805 年）三月，彰义节度使吴少诚被加封为同平章事。

吴少诚特别宠信部将吴少阳，谎说他是自己的堂弟，相待如自己家人。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杀少诚子吴元庆，自为留后。当时朝廷正对河朔用兵，无暇顾及淮西，遂承认吴少阳为淮西留后。元和六年，又以吴少阳为彰义节度使。

元和九年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时为摄蔡州刺史，匿丧，自领军务。

魏博镇田弘正归顺朝廷，使淮西成为突出问题。十月，朝廷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军讨吴元济。

元和十年正月，削夺吴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军进讨淮西。严绶首先出击，小胜，却未料到淮西兵乘夜回袭，二月，双方再交手，严绶败于唐州以北的磁丘，全军后退五十余里，据保唐州（河南泌阳）。寿州团练使令狐通为淮西军所败，退守州城。寿州境内的营栅全被淮西军摧毁。

三月，李光颜在临颍及南顿二地大破淮西军。吴元济向王承宗、李师道等人求助。王承宗、李师道上表请赦元济，宪宗不准。宪宗让各藩镇出兵，唯独不调李师道的淄青军。李师道派兵三千前往寿春，声言协助官军的行动，其实是准备策应吴元济。

李师道平日豢养了数十名幕僚、刺客。有人给李师道出主意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如果派人将河阴转运院存放的江淮租赋一把火烧掉，对官军将是一大打击。另外还可以招募东都洛阳的流氓无赖劫掠都市，暗中放火，牵制朝廷的精力，这些对淮西都有帮助。"从此各处盗贼纷纷活动，有数十人攻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二万余斛，影响很大。

五月，裴度受命到各行营观察用兵形势。回京后，裴度极荐李光颜可用。

九月，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养敌自重，不愿速平淮西。李光颜在诸将中作战最力，韩弘欲结其欢心，在大梁全城访求到一美妇人，教她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派人送给李光

颜，光颜说："我对韩公的美意十分感激，但将士们远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作战，我一个人也没有心情享受声色之娱。"说罢，将这名歌妓退了回去。

十月，调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由高霞寓专事攻战，李逊负责调饷。

元和十一年三月，寿州团练李文通在固始击败淮西军，夺取鏉山。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在朗山杀敌一千余。然而到了六月，高霞寓在铁城大败，只身逃归。当时官军有一种很坏的风气，打了胜仗就虚报战果，打了败仗就默不作声。铁城大败无法隐瞒，只有向朝廷报告。宪宗追究高霞寓败军的责任，高霞寓声称李逊的粮饷跟不上影响了士气。七月，贬高霞寓为归州刺史，李逊也降职为恩王傅。

改任河南尹郑权山南东道节度使，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申、光、蔡、唐、邓观察使，并以唐州为治所。袁滋到了唐州，撤去监视敌情的哨兵，不准士兵有刺激敌军的行动，只是委曲求全地与淮西妥协。

朝廷见袁滋是个草包，十二月，将袁滋解职，改派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

李愬来到唐州，军队承袭着失败后的丧气情绪，士兵们都害怕打仗。李愬为适应这种情绪，对出来迎接的人说："朝廷知道我柔弱，能忍受耻辱，所以让我来抚慰你们。至于攻战进取，不关我的事。"大家相信了，安定下来。

李愬亲自到兵营探视士兵，慰问伤病员。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军队里有失威严秩序。有人讲这样军政不够严整。李愬说："我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有悖常规。袁滋被敌人看轻，我来以后必然增加防备。我故意显得不那么注重军威，他们一定以为我柔弱而懈惰，然后我们才可以图谋消灭敌人。"淮西军以为曾经打败过高霞

寓、袁滋，轻视声望和地位一向不高的李愬，就放松了防范。

李愬计划袭取蔡州，要求增加兵力。宪宗下诏把昭义、河中、鄜坊的二千步兵和骑兵补充给李愬。二月，李愬派十将马少良带领十多名骑兵巡逻。遇到吴元济的捉生虞候丁士良，接战之后将他抓获。丁士良是吴元济的一员骁将，时常骚扰唐、邓东境，杀死不少官军。大家要求挖出他的心，李愬答应了，把他召来讯问，刑前丁士良十分从容，没有一点惧怯的神情。李愬临时改变了主意，说："真是大丈夫！"令人给他松绑。丁士良深为感动，说："我本来不是淮西军士，贞元年间属于安州军籍，与吴氏交战被他们俘获，因吴氏释而不杀，而为吴氏父子效力。昨天交战力不能支，被您擒获，又得全活，当尽死效力，以报大德。"李愬委任他为捉生将。

丁士良对李愬说："吴秀琳拥有三千人马据守文城栅，是吴元济的重要力量。他的谋士陈光洽勇而轻率，喜欢单枪匹马地出战，如把陈光洽擒获，吴秀琳自然会投降。"李愬认为他言之在理，当下设计派丁士良擒获陈光洽回来。果然吴秀琳献上文城栅投降。

三月下旬，李愬派山河十将董少玢等分兵攻打各个营栅，董少玢攻下马鞍山，夺得路口栅。

四、五月间连续出击，又攻陷冶炉城、西平、楚城、青喜城等地。

李愬每得降兵一定引来询问情况，因此对敌情了解得很透。李愬厚待吴秀琳，和他商量夺取蔡州的办法。吴秀琳说："夺取蔡州没有李祐不行，我是无能为力。"李祐是淮西骑将，有勇有谋，据守兴城栅，常常凌暴官军。一天李祐率人到张柴村割麦，李愬部将史用诚以伏兵诱擒李祐。李祐被俘后受到礼遇。

李愬对攻打蔡州的计划极为保密，只把李祐和李忠义找来，避开旁人商议，有时谈到深夜。官军对李祐早有成见，流传着谣言说李祐给淮西军作内应，还说消息来源于敌军间谍。李愬担心这

些流言被朝廷知道处于被动，当众给他带上刑具送往京师，并附机密上表说明情况，上表说："讨平淮西，非李祐不可，如果杀了李祐，就不能成功。"宪宗下诏释放李祐，把他送还李愬。李愬见到李祐很高兴，拉着他的手说："你能保全下来，真是社稷有灵啊！"随即委任他为散兵马使。让他佩刀巡逻警卫，出入营帐，有时和他同宿，密谈到深夜。唐州、随州牙队三千人号称"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的精锐。李愬又派李祐担任六院兵马使。

按照以往的军令，窝藏敌军的间谍要斩杀全家。李愬采取怀柔政策，取消了这道军令，让人厚待那些家属，间谍反而把敌情报告了李愬，使李愬更加了解敌军的虚实。为了麻痹淮西军，李愬组织了一次攻打朗山的行动，结果失利。随即招募敢死军士三千人，号称"突将"，从早到晚亲自教练，让他们随时作好行动准备，突袭蔡州。由于长时间下雨，到处积水，一时无法采取行动。

吴元济见部下接连叛去，军事形势一天不如一天，便在六月上表请罪，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宪宗派遣中使送来诏书，特许不杀死他；但他受身边人的制约，不能束身归朝。九月二十八日（甲寅），李愬决定攻打吴房。按照阴阳家推算，这一天打仗一定失败。李愬认为正因为日子不吉利，敌人会掉以轻心，更便于袭击。于是出发，攻克吴房外城，斩敌一千余人。守敌退保子城不敢出战。李愬领兵撤退以诱敌，淮西将孙献忠果然带五百骁骑尾随追来。一些官军受惊，准备逃跑。李愬下马坐在胡床上，下令："敢退者斩！"调转旌旗方向，奋力迎战。孙献忠战死，淮西军败退。为了分散敌军力量，李愬最终放弃了乘胜攻取吴房的打算。

李祐对李愬说："蔡州精兵都在洄曲和四境拒守，留守蔡州城的都是老弱残兵，可以乘虚直抵州城，一举擒获吴元济。"李愬同意这个分析，派人到郾城向裴度报告了这个计划。裴度认为，军事出奇才能致胜，奇袭蔡州的方案可以实施。

十月中旬，李愬按预定计划令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

守文城栅，令李祐、李忠义率突将三千人为先锋，自己和监军率三千人为中军，令李进诚率三千人殿后，一齐出发。大家不知到哪里去。李愬并不说明，告诉大家："只管向东走。"走了六十里，天色黑下来。附近有个张柴村，官军迅速行动，将守卫士兵及烽候人员全部杀光，然后在这里稍作休息；布置丁士良带五百人破坏通往洄曲和各条要道的桥梁，义成军五百人留守张柴村，狙击朗山方面的救兵，大队人马乘夜出发，继续前进。将领们请示到哪里去，李愬说："进军蔡州城，活捉吴元济！"大家大惊失色，胆小的监军竟然哭道："果真中了李祐的奸计！"这时风雪弥漫，旌旗撕裂，沿途可以看到冻死的士兵和军马。大家心情紧张地急行军。大约走了七十里来到蔡州城下。风雪更猛了。近城处有个鹅鸭池，士兵们惊扰鹅鸭传来一阵戛戛叫声，掩盖了部队行动的声音。

自吴少诚拒命以来，官军已有三十多年不至蔡州城下，蔡州军队根本没想到眼下会有战事。四更时，官军抵达这里，城内没有一点防备。李祐、李忠义用铁锄在城墙上凿坑，边登边凿，一步步爬上城去，壮士随后而上。守卫城门的士兵睡得正熟，全在梦乡中被砍杀。只留下打更的人，让他继续打更。城门开了，大军进城；接着又进里城。城里的人毫无知觉，吴元济还在睡大觉。有人报告吴元济说："李愬已进据外宅！"吴元济还以为是俘虏在闹事，一点都没介意。又有人来报告全城陷落的消息，吴元济才起床，到厅堂询问情况。这时已传来官军军官的喊话："常侍传下号令……"近万官军应答受令。吴元济不解地问："是什么常侍，突然到这里来发令！"匆忙间率身边的人登上牙城拒战。

董重质据守洄曲还有一万多精兵。吴元济期待这支援军，不肯投降。李愬下力气察访董重质的家，厚抚家属，并让董重质的儿子带着书信去劝降。董重质接受招抚，宣布投降。

李愬进攻牙城，摧毁牙城外门，占领兵甲库，获取大量器械。

第二天继续攻击牙城，焚毁牙城南门。下午吴元济支持不住，在城上请降。官军将领李进诚放梯子让他下来。转天李愬用槛车把吴元济送往京师，并向裴度报告。这一天，申、光二州和其它镇兵共二万多人相继前来投降。

十一月，宪宗亲临兴安门接受献俘，把吴元济作为庙神的祭献，斩于独柳之下。

由于战功李愬被封为凉国公，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光颜等各升迁有差，李祐也被任命为神武将军，主管军事。

十二月，贬淮西降将董重质为春州司户。董重质是吴元济的谋主，曾屡破官军，又曾阻止吴元济投降，宪宗本意要杀掉他，因李愬曾许重质以不死，所以只落个贬官的下场。宪宗还想惩治其它降将，曾封一柄上方宝剑要下面执行。但裴度等人没有按宪宗的旨意去作，一批人得以存活。

（于宝华）

参考资料：

《通鉴纪事本末》：《宪宗平淮蔡》

《资治通鉴》卷 232—卷 240

《新唐书》：《藩镇宣武彰义泽潞传》

宪宗讨淄青

在宪宗忙于征讨吴元济之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又叛。

李师道是前节度使李师古的异母弟，不过两人关系并不亲密。师道喜欢绘画吹管，为师古所不齿，故把他外放到密州去作知事。

元和元年（806年），李师古病笃，他把判官李公度、高沐二人找来说："趁着我的神志还清醒，我想就节度使继承人的问题征询一下你们的意见。"二人相互瞥了一眼，谁也不开腔。李师古接着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按人情之常当然是非师道莫属。但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得其人而任之，不但败坏军府政务，而且将会倾复整个家族。希望你们再审慎地商议一下，提出一个方案。"不久李师古故去。高沐、李公度秘不发丧，派人到密州去迎李师道，奉他为节度副使。八月，因朝廷正致力于征讨刘辟，极力安抚藩镇，同意李师道为留后；十月，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

元和十年，吴元济反叛。李师道暗与之结，以助官军讨逆为名，派三千人马往赴寿春，与吴元济相呼应。由于时机不成熟，未敢公开起兵。他先指使人烧河阴漕院的钱粮，计钱帛三十万缗匹，谷二万余斛，仓百余区。又派人刺杀主张讨藩的宰相武元衡。八月，李师道在东都洛阳设置别邸，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这时淮西军正在洛阳东部与官军作战，官军主力布置在伊阙附近，洛阳空虚。李师道以别邸为基地，收纳亡命至近百人，打算焚烧洛阳宫殿，制造混乱，然后纵兵杀掠。头天晚上李师道烹牛享士，作行动的准备。不想其中有一个人向东都留守吕元膺告了密。吕元膺

亟召伊阙兵回洛阳包围了师道别邸。里边的人突围而出，伊阙兵尾随其后，不敢与之交战。这伙人从长夏门逃出入山，洛阳震恐。

洛阳西南地接邓、虢，到处是高山密林，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人彪悍，称为“山棚”。李师道的人马进入山林之后，与山棚发生冲突，哄抢了山棚所卖的猎物。山棚一面自发地聚合起来继续斗争，一面引官军前来袭击，将这些人全部杀获。审问的结果发现这些人的头领原来是嵩山寺僧圆净。圆净年八十余，曾为史思明部将，骁悍绝伦。被捕之后力士用铁锤击其胫骨，不能折。圆净自己把小腿绑好，教力士如何将它打断。刑前，圆净唯叹事不成，不得见洛阳流血。与圆净一同被处死的有数千人，其中留守、防御使的二名将领及八名驿卒都接受了李师道的署职，充当他的耳目。

吕元膺经过审讯，还证实了杀害武元衡的谋主正是李师道。元膺将证人槛送京师，还送上一封密奏。但这时朝廷正在讨王承宗，对武元衡之死的案件根本无暇过问。吕元膺上言：“有些藩镇跋扈不臣，犹可容贷，至于李师道谋屠东都，烧宫殿，悖逆尤甚，不可不诛。”终是书生发议论。

十一月，李师道派兵攻打徐州，在萧县、沛县等处打了几个胜仗。武宁节度使李愿委都押牙王智兴将其击破。十二月，王智兴再破李师道，斩首二千余级。

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官军讨吴元济颇有进展。李师道见形势不利，转向朝廷表示顺服。宪宗无力多边作战，有了台阶可下便与李师道和解，加封李师道为检校司空。

李师道欲知吴元济虚实，元和十二年派牙前虞候刘晏平前去淮西察看形势。吴元济见刘晏平来，百般笼络，日与宴饮结欢。刘晏平见蔡州在战争状态仍是一片歌舞升平，毫无忧患的气氛，知淮西不久必败。回来以后如实作了报告。李师道本以蔡州为援，不愿听到坏消息，所以对刘晏平的报告十分反感。不久，竟找一个

借口将刘晏平杖杀。

在李师道的军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判官高沐及同僚郭昈、李公度主张与朝廷妥协，而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则持相反的见解。

李师道支持李文会、林英，出高沐为莱州知事。林英、李文会又说："高沐暗与朝廷联络，怀有异心。"鼓动李师道将高沐杀死，郭昈也被囚禁。

吴元济失败后，李师道一度很惶惑，不知该怎样应付局面。李公度要他纳质献地，与朝廷修复关系。于是，师道遣使奉表，表示愿将长子送到长安，并献沂、密、海三州。朝廷自然同意，元和十三年正月派左常侍李逊到郓州宣慰。

李师道这个人十分专断，但对老婆的话却是言听计从。师道妻魏氏不愿儿子人质，就与能向李师道进言的婢女蒲氏、袁氏二人共劝师道不要割地，说："现全境十二州数十万人马仍堪一战，打不赢再献地也未晚。"师道大悔，囚李公度，缢杀李英昙。

李逊到郓州时，师道陈兵相迎。李逊心知事情有了变故，索性直来直去，要师道讲个何去何从的痛快话，回去复命。李师道回去一商量，觉得先答应纳质献地，将来再扯皮也不晚，就对李逊说："前些时候有些舍不得儿子，加上将士们不愿献地，所以把事情拖了下来。请你转告朝廷，我绝不会三心二意！"李逊看出李师道没有诚意，就不再多说，回去如实作了报告。不几天，李师道上表说军队不同意纳质割地，事情有困难。宪宗大怒，决意进讨。

五月开始，作了重要的人事调动，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改任为义成节度使；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改任为棣州刺史，加横海节度副使。六月，又以乌重胤领怀州刺史，镇守河阳。七月，调李愬为武宁节度使。七月朝廷正式下诏指控李师道若干罪状，令宣武、义成、魏博、武宁、横海几道兵马加紧进讨。

淮西诸军都统韩弘养敌自重，在征淮西的战争中很不积极。吴元济败灭后，韩弘为了有所表现，九月自动带兵击李师道，首先围攻曹州。接着田弘正率魏博军自杨刘渡黄河，在距郓州四十里的地方停下来扎营。

十二月，魏博军及李光颜的义成军大败李师道，获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为了分化敌军，朝廷命将这些人释放，愿意留在军营的可为官军效力，愿意回家奉养父母的可发给路费回家。于是又有一些人相继投降。

淄青镇的军事压力愈来愈大，一些人怀有怨气，归咎于李文会等。李师道不得已，出文会为登州代理刺史。

武宁节度使李愬与淄青道十一战皆胜，攻克兖州要地金乡。部下将这些坏消息封锁起来。兖州刺史派人送来的告急文书，都被扣压下来，李师道直至死也不知道真情。

元和十四年正月，形势进一步朝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韩弘攻下考城，杀二千余人；李愬拔鱼台；田弘正败淄青兵于东阿，杀万余人，接着又在阳谷打了一个大胜仗。二月，李听袭海州，克东海、朐山、怀仁等县；李愬拔丞县。

李师道为了加强防务，发民丁修治郓州城堑，役及妇女，民怨且惧。都知兵马使刘悟颇得人心。然而刘悟守阳谷以拒官军，屡遭败绩。有人劝李师道杀专收人心而不修军法的刘悟，以绝后患。但另一些人不同意，认为官军四合，妄杀大将，只能陷人更加孤立的境地。李师道将刘悟召来计事，留住了十几天，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把他打发回去。行前李师道厚赠金帛，对他进行安抚。然而刘悟脱险后，已与李师道彻底离心。师道因刘悟领兵在外，署其子刘从谏为门下别奏。刘从谏与李师道家奴混得厮熟，刺探到很多消息密报给刘悟。

在人们的劝说下，李师道决定杀掉刘悟，密遣二名使者送帖给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他执行。张暹素与刘悟相善，将这个消

息透露给刘悟，致使二个使者被执杀。

刘悟骑马回到营房，陈兵帐下，把诸将找来，说："李师道要取我的头，其次就轮到你们。我们不顾死亡与官军作战，无负于他，竟险些遭他的毒手！现在朝廷只诛李师道一人，我们卷旗束甲，杀回郓州仍不失富贵，诸公以为如何？"立于众首的兵马使赵垂棘沉吟良久，不无顾虑地说："事情真能成功吗？"刘悟不由分说，立即令人拉出去斩首。接着一个一个地要他们表明立场，凡迟疑未言的人全都被处死，还斩杀了三十余名不得军心的将领，将这些尸体有秩序地排在帐前。其余的人早已吓得缩成一团，都战战兢兢地说："唯都头之命是从，愿尽死！"刘悟这才下命令说："打进郓州，每人赏钱百缗，但不许抢府库。至于李师道私宅及其逆党的家财，听任大家掠取。有怨有仇的可以报仇！"当下令士兵饱食一餐。夜半三声鼓响，军队急行军，遇到路人就扣留下来，以防走漏消息。天还未明，已到城下。城门一开，刘悟声言奉帖进城，强行将队伍开进，没有遇到反抗，只有牙城有士兵拒守。但牙兵不过数百人，很快就支持不住，放弃抵抗。

刘悟勒兵进入使府听事厅，令人搜捕李师道。李师道和他的二个儿子躲在厕床之下，被搜索出来。刘悟令人对他说："我奉密诏把你解送京师，但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暗示他自杀。李师道不愿死，倒是他儿子李弘方说了句明白话："现在不是死不死的问题，能够不受折磨，痛痛快快地死就是前世修来的福！"不一会儿，刘悟指令手下的人将李师道父子斩首。另斩助李师道叛逆者二十余家。

刘悟回攻郓州前，曾将情况向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作了通报，并约定事成在城内举烽火相告，功劳归于田弘正，如事不成，则魏博有义务出兵相助。达成谅解后，魏博兵进据刘悟兵营，此时已见到烽火，忙派人前去祝贺。刘悟用木匣装了李师道父子三人的首级送到魏博军营。淄青等十二州很快平定。

李师道首级送到京师，朝廷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前往宣慰。

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南河北三十余州的藩镇自除官吏、不供贡赋，已有盘根错节的基础，至此，该地区藩镇割据的旧格局被打破，不再成为对抗朝廷的主要威胁。

（于宝华）

参考资料：

《通鉴纪事本末》：《宪宗讨淄青》
《资治通鉴》卷231—卷247
《新唐书》：《藩镇淄青横海列传》

杜佑撰《通典》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其曾祖、祖、父都曾在朝为官，门第显赫。因此，杜佑不必经过科举考试而以祖荫入仕。杜佑作官后最初被任命为济南郡参军、剡县丞。当时的润州刺史名韦元甫，早年杜佑之父杜希望曾对元甫有恩，因此杜佑途经此地特去谒见了韦元甫，元甫亦以待故友之子的礼节接待了杜佑的来访。一日，韦元甫接了一件棘手的案子，当时杜佑正在旁边，元甫为了试探杜佑学识，便令杜佑试着断案。杜佑从容剖析，所论所言都讲到关键之处。元甫大为惊叹，便向上力荐杜佑为司法参军。后元甫调任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都作为僚属随任，深受元甫信任。

随后，杜佑被召入朝中，历任检校主客员外郎、工部郎中、江西观察使、杭州刺史、御使中丞、容管经略使等职。

杨炎入朝为相时，令杜佑任度支郎中，兼和籴使、户部侍郎、判度支，掌管了朝廷经济大权。卢杞为相后，杨炎贬死，杜佑被贬为苏州刺史。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 年），杜佑入朝为尚书左丞，后任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长史、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等职。又因僚属争斗，而贬至岭南。

贞元十九年，杜佑再度入朝，拜为宰相。顺宗时，封杜佑为冢宰，不久又提升为检校司徒。宪宗时，杜佑仍袭冢宰之职，颇受宪宗信任。元和元年（806 年），册拜杜佑为司徒、同平章事，封

岐国公。这时，党项族会同吐蕃族人寇边境，很多朝臣主张出兵还击，杜佑则主张行安抚之策，不宜出剿，以免激化矛盾，其上书分析了双方的国力民情，论述了不能出击的根据，字字在理，宪宗阅后深为赞赏。

此时杜佑已届七十高龄，因年老多病，几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宪宗惜其才，就是不批准，并特许他隔几日去一次中书省，处理政务。宪宗尊杜佑德高望重，见面只称官职，不称其名。元和七年，杜佑因身染疾病，再也无法参政。六月，先后四次上书，请乞告老，情理至切，宪宗无奈只得同意，同时颁布诏书一份，对杜佑大加彰颂，又加封光禄大夫、太保尊号。

当天，宪宗派宦官至杜佑府第赐绢五百匹，钱五十万，以示恩宠。当年十一月，杜佑病逝，年七十八岁。宪宗为此废朝三日，另赐太傅尊号，谥号为安简。

杜佑自幼好学，并不因为可受父、祖荫庇入仕而放松学习。因为他始终不停止学习，故通古博今，并将掌握富国安人之术作为学习目标，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学习不止。尤为可贵的是，杜佑官至将相，位极人臣，仍手不释卷。他常常是白天接待宾客，处理政事，夜晚便在灯下研读。每次与宾朋谈论古今，在座者无不被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所折服。由于杜佑时时以先哲的言行修正约束自己，故其为政能出以公心，比较公正，因此其为人品行也同其学识一样，为时人所称道。

杜佑生平唯一一部著作是《通典》，其编纂大约开始于代宗大历年间，终于唐宪宗贞元十七年，其间共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杜佑的这部著作属于典志体史书，是受到刘秩的《政典》一书的启发，才开始编写的。

唐代盛行编写典志书及类书。典志体史书实际上就是《史记》、《汉书》等正史书中的书、志部分，这些书、志中记载的各代礼、乐、律、历、天文、地理、经济内容，实际相当于记录各

代经济、政治、文化的专史。后来，随着封建政权发展的需要，这些内容逐渐脱离正史独立出来，这就是典志体通史。隋唐以后，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出现了许多大部头的典志体专著，如《隋吉礼》、《隋江都礼》、《太宗政典》、《文思博要》、《稽典》、《唐典》，至开元年间成书的《唐六典》，内容就更加完备了。其后大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秩又在以上诸书的基础上撰成《政典》三十五卷。刘秩写书采集了经史百家之言，内容翔实，论述细密，因此大受时人赞赏。

杜佑得到《政典》一书，细心研读，欣赏之余，又感不足。他认为刘秩的书虽然很不错，但还有不少缺点，如过于简略，条目不广，许多内容没有写进去，由此萌生了自己动手修写一部贯穿古今、囊括各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典志体通史的强烈欲望。

杜佑在广泛搜集材料，博采众家之言的基础上，大约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开始动手，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正式成书，先后耗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呕心沥血，撰成一部不朽之作《通典》。《通典》问世以后，不仅对巩固封建政权极为有利，而且其内容和体例亦为编纂典志体史书开创了道路，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典》一书的体例类似于正史中的志书，记载的时间断限，上起于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唐代宗时期。全书二百卷，共分为九类，篇目是：食货典十二卷、选举典六卷、官职典二十二卷、礼典一百卷、乐典七卷、兵典十五卷、刑典八卷、州郡典十四卷、边防典十六卷，各类再分子目。对每一项制度，杜佑都能综贯古今，溯本求源，清楚地描述其历史沿革，而且作者写作态度客观，立论准确，极具参考价值，因此该书问世后，立即被广为传阅，许多读过通典的士君子们受益匪浅，许多人能够对当代礼乐刑政之来源了如指掌。

杜佑的《通典》同其它史书一样，是为适合封建统治需要而写作的。杜佑着手编该书的时候，正是唐代经过安史之乱，中央政权由盛转衰，藩镇跋扈妄为，宦官专权乱政，加之外族入侵，国内阶级矛盾尖锐，重重矛盾使唐帝国日渐衰落时期。杜佑编《通典》，目的就在于想让当权者吸取历代盛衰的统治经验和教训，来挽救帝国的衰亡。

杜佑认为，经济是统治的基础，因此他将食货卷作为全书之首，食货子目中又以田制为先，说明杜佑对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土地关系的变革，关系到封建政权的存亡有着清醒的认识，表明了作者的进步的历史观。

另外，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杜佑的《通典》，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文献材料。《通典》一书因为是通史政书，因此他每论及一事一制，总是按照年代顺序，追根循源，细细阐述，对后人了解这些制度的产生、历代沿革提供了详尽系统的材料，很方便后人的学习和研究。其中以《食货典》、《职官典》、《兵典》、《边防典》最好。如《食货典》中，杜佑将历代土地所有制形态的沿革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历代货币的变化、盐铁杂税的管理和兴起等有关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都罗列其中，并按照事物的性质，一类一类排列，有条有理，严整详密。《职官典》亦如此布局，将从古至今的官制沿革以及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的数额以及官阶都讲述得详尽清楚。在《兵典》中，材料更加珍贵。杜佑将唐代以前所有主要战争的胜负经验教训、兵法上的原理、要诀统统整理归纳起来，实际上相当于一部辉煌的军事史著作。《边防典》材料也很宝贵，杜佑将中原王朝的周边部族和国家，以出现的先后为序，共汇集了一百九十三个国家，并加以介绍，这对研究我国古代边防和民族关系、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很大方便。

杜佑是一位杰出的封建社会政治家、史学家，他治学严谨，为编纂这部巨著花费了多半生的精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故能传

之不朽。他好学不倦，尤嗜读书，虽位极将相，仍手不释卷的精神尤其令后人钦佩。然而作为封建社会的学者，其思想自有其局限性。例如他认为唐帝国的衰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礼崩乐坏，因此他在编《通典》时，将一大部分精力花在《礼典》上面，《礼典》共写了一百卷，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是全书材料内容最丰富的部分，然而仍旧挽救不了唐帝国的衰落和灭亡，因此，杜佑倾注精力最多，寄托希望最大、材料最丰富的地方，恰恰是其劳动效果最小的地方，这可能是杜佑本人万万始料不及的。

杜佑的《通典》问世，为后人编纂典章制度专史开辟了一条新路，后代史学家们纷起效尤，编纂同类史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宋郑樵的《通志》和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被后人统称为三通，后又完成《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通考》、《清通考》六书，清朝乾隆年间又下令续修三通，加上民国年间的《清续文献统考》共为十通，成为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典制文献。

（朱柳郁）

参考资料：

《新唐书·杜佑传》

《旧唐书·杜佑传》

《通典》

韩愈谏迎佛骨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父韩仲卿无名位，早死。韩愈三岁为孤儿，由嫂嫂郑氏抚养成人。他幼而好学，发愤刻苦，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以文章名世。

韩愈为人真率，多次因直谏犯颜遭受贬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任监察御使，当年关中大旱，韩愈上书请求宽民徭，免赋税，罢宫市，未获理睬；书生气十足的韩愈上书不止，结果贬为连州阳山令。

宪宗元和初年，韩愈被召还朝中，由国子博士累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 年），韩愈随宰相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出谋划策，颇有功绩，入朝擢为刑部侍郎。

宪宗笃信佛教，元和十四年，大行迎佛骨之事。韩愈站在儒家立场上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几乎被处死刑。经裴度等人反复讲情才算保住性命，被贬为潮州刺史。直至穆宗即位，才奉诏还京。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韩愈任兵部侍郎，这时镇州发生兵变，韩愈奉诏前往宣抚，使局面转危为安，因功又升吏部侍郎，后人称为韩吏部。

韩愈的政治态度总体上倾向于代表世族利益的保守派，但由于其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地主家庭，因此与庶族地主之间情感上有不少联系，比较同情下层民众。

韩愈自幼学儒，以儒家正统自居，认为儒佛两派势不两立。为了与佛教对抗，他提出了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说。他认为天生圣

人为君、师，以仁义教化万民，建立理想的秩序就是“道”，代代相继即为道统。而自孟子死后，道统中断，至使国家动乱，现在自己站出来要将已中断的道统沿续下去，以保长治久安。这一主张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韩愈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佛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一个时期的依附与融合的过程，逐渐演变为被国人所接受的中国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曾有过一个迅速发展的辉煌时期。过分兴盛的佛教严重干扰了封建国家经济，引起统治者的警惕，导致北魏太武帝和北周太武帝曾先后两次毁佛，使佛教势力大受挫折。进入隋唐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又蓬勃发展起来。

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政治原因，强令各地修建大云寺，崇佛抑道，更促进了佛教的畸形发展。

代宗时，崇佛已达到荒唐的地步。据记载，每有西蕃入寇，代宗必令群僧齐颂“仁王经”，以却敌寇。此时中外臣民亦承流相比，争相废政事而事佛教，国政受到严重干扰

佛教作为一种精神麻醉剂，应该是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但如果其发展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适得其反，危害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佛教势力的膨胀，一方面耗费大量民间资财，另一方面由于寺院土地扩大和僧尼人数增加，减少封建国家的税源，其危害显而易见。因此有唐一代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佛教都持限制主张。

韩愈则站在世俗地主的政治立场上反对佛教，他以维护儒家的传统自居，其“道统论”即为反对佛教的重要武器。他屡屡上书，抨击佛教蠹民害政，属于反佛的激进派。

宪宗时，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珍藏释迦佛骨一节，被视为佛教至宝。传说该佛骨每隔三十年方可出塔一次，开塔之年，由于佛骨保佑，必风调雨顺，人泰国丰，宪宗对此深信不疑。元和

十四年，正值三十年周期，宪宗欲一睹佛骨灵光，便派中使杜黄奇率宫女三十人持香花，迎接佛骨入宫。佛骨自光顺门入皇宫瞻放三日后，再送往各个寺院轮流存放。这个时期，王公贵族们为讨好朝廷，都争先恐后施舍财物。佞佛的百姓则盲目附合，或拼命施舍以至倾家荡产，或自残肢体以示虔诚，宗教狂热因迎佛骨一事的推动而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

在这一片乌烟瘴气中，仍有一部分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韩愈便是其中一员。他冒死上疏，力谏宪宗，反对迎取佛骨，这篇上疏就是著名的《论佛骨表》，韩愈的上疏犹如以石击水在被宗教狂热席卷的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韩愈在疏中引古论今，力陈佛教百害而无一利，无情地撕开了佛教的欺骗嘴脸："佛教乃夷狄之法，上古中国未曾有。黄帝、尧、舜、禹、商汤、武丁、周文王、武王时期天下太平、君民安乐长寿，并非佛的保佑。佛自汉传入中国后，祸乱不止，明帝才在位十八年，之后国家乱亡相继，南北朝时，崇佛之风渐盛，然而国祚尤其短促。梁武帝时事佛最为虔诚，三次舍身，只为求福，然而最终侯景作乱，武帝被活活饿死，反而招祸，从以上看来，佛教不足信。

如今臣听说陛下下令迎接佛骨从凤翔入皇城，然后令各个寺院传递供养。臣虽愚，亦知陛下非真心信佛，只想以此祈求祥福，为百姓增添玩乐而已。然而百姓愚顽，不解陛下之意，见陛下如此，则以为真心事佛，必然争相效仿，舍身捐财，有的人为表虔诚自伤其身，尽散家财，人们争先恐后以示诚信，早晚不息，百业俱废。若不加以禁止，必有自残其身以事佛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此举误国误 民，贻害国家，非等闲之事。

佛本为夷狄之人，服制语言都与中国不同，既不懂先王之法，又不懂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如果他活着奉其国命，前来京师拜访，陛下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下，赐些物品，然后护送出境而

已，决不会让他迷惑民众，何况现在其人已死去多年，只剩一把污秽不堪的朽骨，如此污物，怎能让其进入宫禁。孔子言：敬鬼神而远之。上古诸侯祭祀祖先之时，必先令巫祝作法，祓除不祥之后再行祭吊。如今陛下无故令人取来此污秽之物，亲自前往观瞧，巫祝不事先驱逐不祥，群臣亦随意附合，御史亦不尽职劝谏，臣实以为这是国之大耻。臣乞求陛下将此骨销毁，永绝后患，不再使后人受其迷惑。这样，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圣明，大快人心！佛祖如有灵，能作灾祸，也只会降于臣身，与别人无妨。臣对天起誓，永不怨悔。"

宪宗读了韩愈奏疏，狂怒之极。第二天，他将疏奏取出尽示朝臣，准备对韩愈重重的处罚。宰相裴度、崔群与韩愈关系亲密，有意开脱，便奏报宪宗："韩愈忤逆圣意，自当处罚。然而如果他不是心怀忠恳，不避黜罚，何能有此胆量？望陛下稍稍开恩，减轻处罚，以开言路。"宪宗怒气不消道："如果韩愈只批评朕事佛太过，朕仍能容忍，至于他讲自东汉事佛之后，帝王都是短命鬼，这种话太刺耳，朕难以容忍。愈身为人臣，竟敢出此狂妄之语，决不可宽赦。"这时朝臣见宪宗怒气不解，不敢再言，这时一些国戚权贵出面替韩愈讲情，才稍得缓解，最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

不久，宪宗怒气渐渐平息。此时又接到韩愈的上表，表中自叙至潮阳之后的孤苦无依之状，忧国忧民之情以及自拘海岛，无法报国的遗憾，其文言真意切，感人至深。宪宗被奏表中的真情所打动，产生复用韩愈之意。于是他对宰相们说："昨日朕接到韩愈的到《潮州表》，因此想到他的《谏佛骨表》，现在看来，他当时上表果然是出于忠心，朕自然理解。只是韩愈身为人臣，讲君王事佛则短命这种伤人过重的话，朕才动怒。"宪宗讲完，便观察群相们的反应，希望由宰相们提出复用韩愈的建议。当时宰相之一皇甫镈素来厌恶韩愈骄傲直率，生怕有人提出复用韩愈，便抢先奏对道："虽说韩愈奏表出于忠心，但其出言不逊，终究过于狂

妄，陛下若有意宽宥，可令其调换一郡。”于是，改授韩愈为袁州刺史。

韩愈在潮州、袁州任刺史期间，询问百姓疾苦，为民解忧。在潮阳时，为民除郡西湫水鳄鱼之害；在袁州时破陋俗，赎出被沦为奴婢的男女民众，并宣布废除旧俗，严禁逼民为奴。因此，韩愈任地方官时间不长，却颇有政绩。

贞元十五年，韩愈被召还京，任国子监祭酒，不久改任兵部侍郎，正值镇州兵变，韩愈奉旨前去安抚。韩愈至镇州，对叛乱军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出色地平息了祸乱。后又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

韩愈为人豁达真诚，与人相交，从不分贫贱富贵。对社会上攀附权贵的利禄小人，嗤之以鼻。韩愈对那些一时得势的豪门权贵，视之如同仆隶，全不放在眼里，由此他颇遭一些权贵的排挤忌恨，引来一些人斥之为狂傲的指责。屡遭排挤，尤其是其谏迎佛骨的上疏，险些引来杀身之祸。佛教的恶性发展，终于引起当权者的警觉。武宗时的“会昌毁佛”，使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武宗一死，佛教势力又死灰复燃了。

（朱柳郁）

参考资料：

《旧唐书·韩愈传》
《旧唐书·宪宗本纪》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范文澜《唐代佛教》
《资治通鉴》卷237～卷241

元白新乐府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出现，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削弱。朝中宦官专权，南衙北司之争势如水火，朝官内部亦朋党相争，互相倾轧，朝政越发腐败不堪。国家衰乱，政治黑暗，受害最深的就是广大人民。面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当时有一部分诗人对人民充满了同情。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笔描绘出人民的种种苦难，以警醒当权者。然而唐代前期、中期兴盛一时的诗歌体例多为律诗和绝句，字数和格律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很难表现出更多、更为生动的内容。于是，他们提出用体裁更自由的乐府诗来描写社会现实，在这种背景下，新乐府诗应运而生。随着其影响的日益扩大，形成了一时的潮流，因之称为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诗是用新体裁创作之后，再附合乐曲使之成可歌唱的诗，和汉代古体乐府相对而称。由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宗旨在于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它不象大历年间诗人的作品那样境界狭隘，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十分亲切感人。正如白居易本人所说：乐府诗是为君、为民、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是为文而作。因而新乐府诗的出现，不仅发挥了文学应有的作用，而且丰富了唐代的诗坛。

乐府诗始创于杜甫，至元结、顾况时又有发展，他们可以算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中唐新乐府运动以张籍、王建、李绅等人的创作开始。张籍、

王建等人都以大量的乐府诗创作闻名于世。他们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揭露腐朽黑暗的政治，揭露封建统治者不顾民众死活，横征暴敛，写出人民孤苦无依的怨恨之声。他们的作品由于贴近生活、雅俗共赏，因此很有影响，并为元、白的创作开辟了道路。

写作新乐府诗成就最大的当属白居易和元稹。世称“元、白”，又因他们在宪宗元和年间为官时创作了大量作品，因此又称其诗为“元和体。”

白居易，字乐天，生于河南新郑县一小官僚家庭，十二、三岁时，因军阀朱泚、李希烈作乱，曾避乱越中。由于他是在民不聊生的混乱环境中长大，亲身经历和感受到人民的疾苦，因此在立场上接近人民。他反对战争，注重实际，耿直刚正。白居易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中进士，授校书郎。元和二年（807年），因宪宗欣赏白居易之才，将其擢拔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又提升为左拾遗，左拾遗为谏议官，白居易因宪宗破格提拔，感激涕零，决心知无不谏，以报效皇恩。

然而他的一片赤诚被冷酷的现实所粉碎。他在任期间，认真履行谏官的职责，几乎有违必谏，如先后建议减免江淮干旱地区租赋，取缔和籴，提出放部分宫女出宫，停止向河北用兵等。这时，河北王承宗叛乱，宪宗令神策军中尉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率军前去征讨，白居易上书力谏，宪宗不纳，居易继续又面谏宪宗，言辞直率，口称宪宗失误，令宪宗恼怒变色。罢朝后，怒气不解的宪宗，对宰相李绛道：“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亲自提拔的，竟敢如此无礼，朕忍受不了，必当重重处罚他！”李绛素与居易友善，当下为其开脱道：“陛下广开言路，群臣才敢议政之得失。此次若罢黜白居易，众人便会误以为陛下要杜塞言路，无助于发扬圣德。”宪宗打消怒气，但从此有意疏远白居易。

元和九年冬，居易又被任命为太子左善赞大夫。不久，宰相

武元衡被人暗杀，白居易上书进谏请求速派人抓捕凶手。当时的宰相认为白居易是越权进谏，犯了规矩。这时，一些平素就恼恨白居易的权贵乘机中伤，说白居易母亲因赏花坠井而死，而白居易却作《赏花》和《新井》诗，是忤逆不孝。这样，诗人为流言所伤，出为江州司马，从此开始消沉起来。

穆宗继位后，白居易又被召回长安，官至中书舍人，此时牛李二党互相倾轧，白居易牵连于党争之中，请求外任。长庆二年，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时他关心民众疾苦，组织当地民众修湖筑堤，颇有政绩。唐敬宗时，改任苏州刺史，也颇受民众拥戴。

以后白居易又在文、武二宗朝中任职，累官刑部尚书。晚年辞官闲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七十五岁卒。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零六首。

唐晚期另一著名诗人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与白居易齐名。

元稹聪明俊逸，入仕之后担任谏官，开始他与白居易一样，知无不言，认真进谏。招致当权者的怨恨被借故贬谪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不久，又改任通州司马。这时，白居易亦贬为江州司马，二地往来虽然不便，但二人互赠新作，唱酬应答不断。江南人士，争相传诵，一时为之纸贵。

元和十四年，元稹被召还京，为膳部员外郎。宰相令孤楚赏识元稹之才，遇之颇厚。元稹亦常为嫔妃们作诗歌以便诵唱，宫中皆呼“元才子”。

不久，元稹被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时的元稹已变得圆滑世故，再无早年的锋芒。他转而交结宦官，尤与知枢密魏弘简、崔潭峻相善，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不久，元稹作了工部侍郎。长庆二年，穆宗又将其擢至相位。时有人告发他与人合谋，欲刺杀宰相裴度，于是被贬为同州刺史。二年后，又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明水秀，又有不少文人雅士，元稹常率众人出外游赏山水、唱酬应答，产生了

不少好诗，至今称为兰亭绝唱。

文宗太和初年，改任检校礼部尚书。太和三年（839年）为尚书左丞。四年又任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太和五年七月，暴病而亡，年仅五十三岁。元稹的著作名《元氏长庆集》，收录其所作的诗赋、杂文等共一百卷。

元、白二人不但私交最厚，而且在诗歌主张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对新诗歌进行理论总结的又属白居易成就最大。

白居易不但写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还提出了许多符合现实主义基本精神的文学理论，这一理论成为新乐府诗的创作纲领。

白居易认为诗歌的产生，缘于人们对某些事、物有感，动之以情，进而兴于嗟叹，于是形成了诗歌，诗歌的产生是客观事物触动了人的感情的文学结果，这种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白居易认为诗歌创作应直接反映出时代的盛衰和社会的弊病，即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反对为“文”而作的毫无思想内容的写作方法。他认为诗歌应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可以揭露弊端、补察时政。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有同情民众、揭露黑暗的积极意义。

白居易最仰慕的诗人是陈子昂、杜甫，常以陈、杜自比，就是因为陈子昂提倡建安风骨，诗歌多有兴讽，而杜甫的作品则以风赋比兴为主，诗歌中多关心民众疾苦之作。

白居易除了写讽喻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等。白居易的讽喻诗约有一百七十多首，其中新乐府诗占了五十首，在乐府诗中又以《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最为著名，感伤诗中以长诗《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最广。

由于白居易的乐府诗通俗易懂，流利畅达，故雅颂共赏，广为流传。白居易亦得意地自称：自长江至江西，三四千里，凡有学校、寺院、舟车、旅店之处都有吟题白诗者。千百年来，仰慕

白乐天诗风及为人的文人才子不可胜数。

元稹的成就稍次于白居易，他的乐府诗《织妇词》、《田家词》都反映了民众的疾苦，比较有名，最有名的作品是《连昌宫词》，讽喻唐明皇与杨贵妃奢侈淫乐的生活，是一首著名的讽谏之作。

由于元、白二人作品多、政治地位高、又有明确的文艺主张，因此在新乐府运动中起的作用最大，其影响也比早期乐府诗作者们更为深远。

（朱柳郁）

参考资料：

《旧唐书·白居易传》
《旧唐书·元稹传》
《新唐书·白居易传》
《新唐书·元稹传》

古文运动

我国古代散文在先秦时期就有辉煌的成就，两汉散文继承先秦散文的传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佳作。然而两汉辞赋兴盛，散文受到汉赋的影响，逐渐开始骈化，至魏晋时，骈文体裁初步形成。骈文讲究写作技巧，讲求声律、对偶和句子的完整，是一种有格律的诗化的文体，因此读起来琅琅上口，看起来赏心悦目。骈文的出现，丰富了文学体裁，本来有积极意义，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骈文畸形发展，越发具有形式主义趋向。南北朝时，文坛掌握在贵族文人手中，这些人的作品无非是留连良辰美景、风花雪夜之作，甚至一些应用文字也用骈文书写，这时期除少数较好作品外，多数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只有小说、历史、地理学著作，还采用散文形式。隋、唐建立以后，南风北渐，骈文更加泛滥，然而随着中下层地主势力的增长，反对骈文的呼声开始出现。隋代的苏绰、李谔便提出反对骈文，开创了古文运动的先声。此后经过初唐时的陈子昂、盛唐时的肖颖士、中唐时的独孤及等进步文人的努力，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基础，他们用古文从事创作。至大历、贞元年间，文人们争相效法汉代扬雄、董仲舒的文风，写作了许多古文作品，为韩愈、柳宗元等人发动古文运动打下了基础。但由于骈文流行时间久，已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顽固的势力影响，而且早期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概排斥骈文，未能批判地吸收骈文的艺术技巧，加之文体改革也未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因

此在韩柳之前，骈文仍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韩、柳二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致力于古文运动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建设，终于成为古文大家，掀起了古文运动的高潮。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嫂郑氏抚养成人。韩愈自幼发愤学习，通古博今，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以文名世。他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后随宰相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尚书。不久，又因上书力谏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继位后，奉诏还京。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有才名。二十一岁中进士，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王伾、王叔文用事。王叔文一派代表中下地主阶级利益，面对宦官专政、朝政败坏的状况，力主改革图新。具有进步思想的柳宗元积极参加了二王集团，任礼部员外郎。二王先后罢除了侵害民众的宫市、五坊小儿和“月进”、“进奉”等弊病，又放还一批宫女回家，很得人心。二王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藩镇势力、反对宦官专权。他们在削夺宦官兵权之时，遭到宦官和旧官僚势力的顽强抵抗。以宦官为首的旧势力逼迫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将二王的支持者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十四年，死于柳州任上，年仅四十七岁。

韩愈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反对改革，主张恢复古制，以鼓吹和维护儒家道统自居。柳宗元则主张改革政治，属于改革激进派。尽管二人政治主张全不相同，但他们在反对骈文，提倡恢复古代文化传统方面则是一致的，并且用他们的如椽之笔，写出了不朽之作，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光辉旗帜。

韩愈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最擅长的是论说文。其论说文逻辑严密、结构紧凑，曲折变化，流畅明快，《师说》是韩愈论说文的代表作。

韩愈还擅写杂文，以一时一事为题，借题发挥，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愤。如《杂说·四》中，他以千里马比喻贤才，讽刺了钻营拍马的利禄小人，文笔辛辣犀利。

韩愈的记叙文也很有特色，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栩栩如生，如《柳子厚墓志铭》则为其记叙文中的佳作。

韩愈的抒情散文中，悼念亡侄的《祭十二郎文》，文笔曲折，感情真切，哀婉动人，是悼文中的名篇。

总之，韩愈的作品风格雄壮豪放，一反当时拘泥死板的文风，抒意立言，气势雄伟，开创唐宋古文运动的先河，加之韩愈为人豁达真诚，鄙视豪门权贵和利禄小人，颇受时人推崇。更为可贵的是，他虽反对骈文，但也注意吸收骈文的优点，恰当地使用排比对偶方法，使其文章散骈相间，更富于变化，因此韩愈被尊为一代文学大家。

柳宗元的作品较之韩愈更具有人民性。他的寓言小品，讽刺了种种社会腐败现象，深刻辛辣，一针见血，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脍炙人口的《黔之驴》为代表之一。

他的纪传体散文多取材于下层人民，作品中表达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在《捕蛇者说》中，将赋税与毒蛇相比，揭露出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甚于毒蛇，蒋氏父子宁愿死于蛇害，亦不愿承担苛重的赋役，该文是柳氏传记散文中的名篇。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唐代散文中独树一帜，使山水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氏在贬官永州期间，政治失意，寄情于山水，共写了八篇游记，称为《永州八记》，这些作品以清新秀美之笔描绘了当地的自然山水，同时表达了作者政治上受迫害的激愤之情。

韩愈、柳宗元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地摹仿古人，而是吸收古人著作的长处，融汇贯通，发展合乎时代的古文。韩愈的文章，卓

然树立，成一家之言。柳宗元则吸收古代名家的长处，兼容并蓄，其文章颇受时人推重，时人多争相效仿，涌现出了大批古文作品。终于，围绕着韩、柳出现了一个古文创作的高潮，这对长期以来骈文独霸文坛的现象是一大冲击，但由于旧的顽固势力的抵制，唐政府的制诰表章等文字仍用骈文书写。直至北宋中期古文运动再掀高潮，古文才大体上通行于世。

北宋建国以后，新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欧阳修倡导之下，再掀古文创作新高潮，涌现了一大批古文大家，其中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苏轼六位最具影响，加上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共计八人，被合称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北宋时期古文比唐代古文运动影响更深远，革新更彻底，终于完全取代了骈文，而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流，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朱柳郁）

参考资料：

《新唐书》：《韩愈传》
《新唐书》：《柳宗元传》
《韩昌黎集》
《柳河东集》

牛李党争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政治腐败，朝纲紊乱，社会动荡，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甚一日。在地方上，藩镇割据，与中央争夺权力，在宫廷内部则是宦官专权，皇帝成为傀儡，朝官之间，更是朋党林立。朝官们不是团结一致对付宦官，而是各自依附宦官以为后援，使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这种争斗的结果自然使朝政更加混乱不堪。

唐代的朋党之争，以所谓的“牛李党争”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李党以李德裕为代表。这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从穆宗时起至唐懿宗继位时止，其间两派势力此消彼长，反复较量，断断续续近四十年之久，对唐晚期政治影响极大，直至李党骨干李德裕贬死崖州，李党势力瓦解，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党争方告平息。

两党之争缘起于宪宗元和年间，当时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为宰相执掌政事。元和三年（808 年）策试贤良方正，考生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在策文中指摘时政、抨击当权，极为大胆，主考官杨於陵等素与吉甫不睦，将牛僧孺等策为中等，并且乘机借题发挥，发泄不满。李吉甫得知后，认为这些人合伙攻击诽谤自己，便向宪宗哭诉。宪宗大怒，将几位主考官贬斥，牛、李等人亦长期不被任用，此即双方结怨之始。

党争的表面化是在穆宗长庆年间。长庆元年，杨汝士与钱徽主持贡举。段文昌与李绅曾写信，嘱钱、杨照顾其亲朋。结果，段、

李所荐之人未被录上，于是段文昌怒火中烧，便向穆宗反映，说此次科举录取不公，杨汝士、钱徽等有受贿舞弊之嫌，建议另派官员复试。穆宗不能断，便征询朝臣意见。杨汝士、钱徽与李宗闵友善，而李德裕、元稹素恨宗闵，于是德裕、元稹便回秉穆宗说段文昌之说言之有据，李绅更是随声附合。结果钱、杨二人被贬出京城，李宗闵亦受牵连贬为剑州刺史。这时，有人鼓动钱徽将段、李二人请托信公开，或许可使皇上了解事实真相，收回成命，但钱徽认为公开私人信件不符合社会道德，君子不为，所以不仅没这样做，反而断然将二人的来信烧毁，此举为钱、李二人赢得了不少同情。从此，朝官中各分朋党，倾轧达四十年之久。

牛党的另一重要骨干是牛僧孺。牛僧孺素受穆宗看重，初任户部侍郎。一个偶然事件使牛氏威望大增，更被穆宗信任。右骁卫将军韩公武死，幼孙韩绍宗嗣为家长，清点财产时，发生争执，归了官府。穆宗亲自过问此案，令人将韩家财产出人帐簿取来自己审阅，发现许多朝臣接受过韩家贿赂，这时在一本帐册中又发现一行小字：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阅后大喜，叹道："朕果然没有看错人！立即下诏，提升牛僧孺为相。

牛党上台，李德裕马上被贬为浙西观察使，李氏认为此次僧孺人相，自己被贬，必是牛党骨干李逢吉蛊惑穆宗所致，衔恨不已，从此两党结怨更深。牛党李逢吉、牛僧孺为相，内结大宦官王守澄，权倾朝野。只有翰林学士李绅敢直言上谏，深为牛党忌恨，不久也被贬为江西观察使。

穆宗死后，敬宗即位。牛僧孺见宦官专权，皇帝荒淫，很看不惯，又怕直言进谏获罪，一再要求出京去作地方官。宝历元年(825 年）正月，牛僧孺以同平章事的身份充任武昌节度使。宝历二年二月，素与李逢吉不睦的裴度人朝为相，牛党大惧。牛党失势，李党占了上风。十月，贬牛党李程为河东节度使，十一月，贬李逢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久，敬宗为宦官所杀，文宗继位。

文宗时期，两党争斗日益激化。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被征诏入朝任兵部侍郎，不久又被裴度力谏拜为宰相，这时李宗闵也因得宦官之助，同时拜相。太和四年，李宗闵又荐引牛僧孺入朝，共同对抗李党。

同年，裴度因年老多病，主动辞职，牛党势力占了上风。李宗闵怨恨裴度推荐李德裕入相，便不顾裴度对自己亦有荐用之恩，蛊惑文宗贬裴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月，贬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李德裕至西川以后，立即察看地形，询问军情，不到一个月，对当地山川道路城邑了如指掌。德裕又修整工事，精选军队，严格训练，积粮完甲，以备边患。吐蕃知西川有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西川稍稍安定。

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率众请降，率其部众投奔成都。维州乃蜀地入吐蕃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重要，军事意义极大。德裕大喜，忙令维州刺史虞藏俭率兵占据维州城，并好生安抚悉怛谋一行。奏表上报朝廷以后，百官都同意德裕的作法，惟有宰相牛僧孺出于党派之见，违心地说："吐蕃地方大得很，丢失一座维州，算不了什么，接纳悉怛谋归降，便是违背双方盟约，如惹翻了吐蕃人，他们大举入寇，不几日就会临近京师，西南远在几千里之外，得一百座维州又有何用。此举有害天利，匹夫尚且不为，何况天子！"糊涂的文宗听信了牛氏的胡言，竟令李德裕将维州城与悉怛谋一行交还给吐蕃人，其结果可想而知。吐蕃人将悉怛谋及归降将士惨杀于边境之上，极其残忍，从此以后李德裕更加深恨牛僧孺一派。

太和六年，李党成员段文昌任西川节度使，其监军宦官王践言几次对文宗吹风，说上年缚送悉怛谋一行还吐蕃，是极其愚蠢之举，如此对待归降之士，以后绝对无人再敢前来归降。文宗果然大悔，这时又有人直言牛氏此举只因忌恨李德裕之功，文宗从

此便开始疏远牛僧孺，十二月，贬牛氏为淮南节度使。与此同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被诏入朝中任兵部尚书。

自德裕还朝后，因其才干被文宗视为心腹，有入相之望，李宗闵恐其得势，想方设法排挤诬诅德裕，结果都没有得逞。

太和七年，李德裕拜相。德裕入朝谢恩，文宗与他谈起朋党之事，德裕便说当今朝士中有三分之一为朋党，文宗大有同感，李氏便借机将平素与自已不睦者尽数排挤贬斥，牛党一时失势。李德裕又提拔同党郑覃为御史大夫。六月，李宗闵被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拜相以后，作风专断，渐渐引起文宗对他不满。这时，牛党骨干依附大宦官王守澄亦乘机入相。王守澄、奸人郑注、李训素厌恶李德裕，知李宗闵为德裕死敌，便向文宗力谏宗闵入朝，以抗德裕。不久，李宗闵得势，入朝为相，立刻排斥李党。贬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面见文宗，自陈请留京城长安，文宗同意，诏令改任李德裕为兵部尚书。李宗闵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制诏已经发出，不能因本人要求再行更改任命，文宗无奈，只好又令李德裕改任镇海节度使，并不许他再兼任宰相，牛党再度得势。在此期间，凡同情李德裕的，一律被贬斥。如牛党成员王璠、李汉诬奏德裕阴结漳王，图谋不轨，文宗查问，宰相路隋只说了一句公道话，便惹恼了牛党，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而京兆尹河南贾悚，则因与李德裕有隙，又与权臣李训、郑注友善，就被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二人为大宦官王守澄推荐入朝，又博取了文宗皇帝的信任，权倾一时，他二人为把持朝政，凡其厌恶之人，他们都指斥为牛、李二党，加以贬逐。太和九年，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

郑注、李训事败后，文宗又逐渐起用部分被郑、李逐出朝廷的两党成员，两派骨干相聚朝中，牛李党争进入高潮。开成二年(837 年)，李党成员陈夷行为宰相。开成三年，牛党杨嗣复、李珏

同任宰相。文宗任用两党同朝执政，本意为不偏不颇，兼听两派之言，谁知两派结怨已深，凡朝中议事之际，必是非锋起，凡牛党认为对的，李党必起而抨击，李党为是者，牛党必反对之，于是无所谓对错，皆以党派之间的爱憎为标准，如此，朝政焉能不败坏？如杨嗣复入相之后，想援引李宗闵入朝，便先让宦官征问文宗，于是文宗临朝提议应授李宗闵一官，李党郑覃立即反对，陈夷行也起而响应，讽刺宗闵以朋党乱政，陛下为何怜惜如此小人。文宗无奈，建议给李宗闵一个州官，郑覃又说，给他一州太优待了，至多只能给个州 司马。于是李党、牛党就此事互相攻击不止。如此这般，每次朝中议政，不论事情大小，都要吵得一塌糊涂，宰相分为两派，意见从不一致，文宗往往不能决断。这种朋党争斗倾轧严重干扰朝政，影响中央决策的正确性，对此文宗十分头痛，每每对人哀叹："平定河北贼不难，平定朝廷朋党太难了！"开成四年，郑覃、陈夷行因直言得罪了文宗，双双罢相，于是牛党杨嗣复等一时得势。开成五年，文宗死，武宗继位。

武宗欣赏李德裕的才干，上台后便着手起用李党一派，牛党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相。接着，诏令李德裕入朝。李氏入朝后，立即被拜为宰相。会昌元年（841 年）三月，陈夷行亦拜为宰相。

武宗本为颍王，为大宦官仇士良等拥立，杨嗣复、李珏本想立安王或陈王，对此武宗记恨不已。如今将二人贬斥仍不解恨，又将他们再贬出朝，杨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李珏为桂管观察使。不久，在仇士良的怂恿下，武宗又准备派人诛杀杨、李二人，李德裕闻知此事，立即入朝力谏武宗收回成命，免二人死罪，武宗勉强答应，只将二人再次贬官了事。

武宗一朝，李党势力达到顶峰，而且李德裕主张加强皇权，整饬武备，削平叛乱，打击佛教势力，因此武宗一朝在李德裕主持下，政治上略见起色。

会昌三年（843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子刘稹恃军妄图胁迫朝廷封自己为留后。武宗问计于群臣，众人皆言边患未平，对刘稹应迁就其意。独德裕坚决反对，力主以武力讨伐，武宗亦赞同德裕的主张。李德裕协助武宗，运筹帷幄，选将任能，最终平定了刘稹之乱，收复了泽、潞一带，朝廷的威望一时大增。会昌初年，回鹘内乱，回鹘将嗢没斯率部众归降朝廷，一些边将为邀功主张讨伐，德裕则识大局，顾大体，主张以安抚为主，最终平息了回鹘寇边问题。

会昌三年五月，李德裕奏报李宗闵曾与刘从谏交往，欲行不轨，于是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会昌四年，德裕奏报牛僧孺闻刘稹势败，出声叹息，武宗大怒，贬牛僧孺为太子少保，贬李宗闵为漳州刺史，当月，再贬牛为汀州刺史，李为漳州长史。十一月，再贬牛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一个多月之中，连续三次贬官，是历史上罕见的，由此可见两党之恨已痛入骨髓，刻骨铭心。

会昌六年，武宗死，宣宗继位，李德裕任冢宰。宣宗为光王之时，就厌恶李德裕的专横。宣宗登基之日，德裕奉册侍立一边。仪式结束后，宣宗问左右道："刚才我身边的是李德裕吧？他一看我，就让我毛发倒立。"众人便知李德裕即将失势。

四月，宣宗听政，一上任便宣布贬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李氏在位日久，位重有功，谁也没想到宣宗如此大胆，群情惊骇，不久宣宗又将德裕一党的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尹薛元龟贬出朝廷。同时起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相。白敏中上台后，立即援引牛党成员，于是被贬斥的牛僧孺、崔珙、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等同日北迁。九月，再贬德裕为东都留守，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再贬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同年九月，前永宁尉吴汝纳为其弟吴湘喊冤，控告李绅与李德裕欺瞒武宗，枉杀吴湘。牛党以此又作文章，借机再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九月，再贬德裕为

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一月，德裕贬死崖州，李党势力瓦解，牛李党争方告结束。

唐代党争，可以说是历史上士族与庶族斗争的延续，但是经过二百多年科举制的推行，一批庶族地主的社会地位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上升为大官僚地主，因此这时的党争又不同于以前的士庶斗争。争斗中，两派都援引宦官作靠山，一旦得势，便不遗余力排挤政敌，拉帮结派，实际上是官僚地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无任何积极意义，其结果只能使固有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具体分析起来，两派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例如，在对待科举制的问题上，两党态度根本不同。由于科举制的推行，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中心，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同期登弟的称同年，考生与主考官之间称门生和座主，这些人互相援引，形成新的官僚集团，往往一人得道，众人沾光，共同排挤旧世族。而李党骨干李德裕出身公卿家庭，袭侯伯者六朝，门第很高，他自恃出身高门，瞧不起寒门子弟。因耻于与众生同试科举，便以门荫步入仕途。他一贯主张朝廷显官应由公卿子弟担任，其党徒郑覃亦力倡此说，他们攻击进士浮华，常举南朝陈后主、隋代炀帝浮华误国的例子，攻击科举。加上此时科举制受腐败政治的影响，屡有舞弊现象，为李氏一党反对科举找到口实。

牛李二党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态度也截然不同。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两党对藩帅叛乱所持的态度泾渭分明。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就力主摧抑方镇势力，故宪宗一朝平定藩镇成就最大，一度国家统一。武宗时，李德裕力主征讨刘稹之乱，终于收复了泽、潞之地。李党的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利于历史的发展。牛党在这一问题上与李党主张恰恰相反，由于牛党一派与地方节度使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他

们对藩镇一贯采取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李党的讨伐之举，牛党则极尽破坏之能事。对于藩镇叛乱，牛党主张“因而抚之”，反对征讨，如太和五年，杨志诚作乱，驱逐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对此牛党不但不同意征讨，反而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太和九年，幽州军赶走杨志诚，推举史元忠为留后，牛氏主张照样承认这一事实。

另外，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两派也存在明显分歧，武宗会昌年间，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毁佛运动。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后，迅速发展。唐代从武则天起，大肆尊佛，致使佛寺、僧尼遍天下，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许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看出佛教畸形发展必将危及封建政权，纷纷提出裁抑佛教的主张。这次毁佛，拆毁绝大多数寺院、兰若，勒令绝大多数僧尼还俗，收缴天下佛象，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势力，史称“会昌毁佛”，牛党对此不以为然。宣宗朝，牛党一上台，便宣布废除禁佛的法令，佛教势力又迅速发展起来。

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两党作法又出奇的一致，不约而同地都拉拢宦官作后台。如李逢吉、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是靠着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的，由于他们与宦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敢，也不可能真正打击最腐朽、最反动的宦官势力，反而成为宦官在朝中的代言人和操纵大权的工具。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待科举问题上，牛党的观点优于李党。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李党的主张又优于牛党。在对待佛教问题上，李党的主张亦优于牛党，对封建国家有利。因此评价牛李两党之争，谁是谁非，只能就事论事，很难得出一个总的结论。

唐代后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政局更为混乱和昏暗。党争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与分裂，使政治更加腐朽、黑暗，愈加深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使

得统一的大唐帝国最终瓦解。

（朱柳郁）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37～卷 249

《新唐书》：《李德裕传》、《牛僧孺传》

《旧唐书》：《牛僧孺传》、《李德裕传》

刘蕡对策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生活糜烂，不理政事，遂致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窃取权柄，宦官高力士等日见其重。安史之乱后，唐室衰微，国柄渐渐操纵于家奴宦官之手，于是出现了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唐肃宗、代宗都信用宦官，德宗时，更将禁军兵权、国库财权交给宦官，这使宦官如虎添翼，以致连皇帝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

宦官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如盘剥百姓，收受贿赂，陷害忠良，结党营私，无所不为。甚至能废立天子，毒杀皇帝，唐代自肃宗以后，除了哀帝，皆为宦官所立，而顺、宪、敬、文宗等皆死于宦官之手，这种现象为历代所罕见。

宦官专权以后，不仅朝纲败坏，且堵塞了仕人正常的仕进升迁之路。官吏的进退取舍、学子的入仕之权皆为宦官把握，仕人若想爬到高官显位，非依附宦官不可。如权相元载、李鄘、皇甫镈、元稹等都是由宦官援引拜相的，相反，如不与宦官合作，不仅会被打击报复，常常性命难保，而宫中宦官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又往往与外藩勾结，里应外合，互为党援，于是宦官势力更加根深蒂固，难以铲除。

在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皇帝与朝官们不甘心受阉人控制摆布，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多次密谋消灭宦官势力，出现了几次朝官与宦官斗争的高潮。因唐代朝官署府设在皇城，处于南面，而宦官机构设在宫城内，处于北面，因此历史上将这两派的斗争又

称之为“南衙北司之争”。

朝官与宦官抗争的结果，都以朝官一派惨败而告终。朝官一派屡屡惨败的原因在于宦官手中有禁军。而朝官一派只是一批文人，刀斧面前，如何抗拒得过？结果自然是朝官一派大批被杀被贬，而宦官的势力则权倾内外，越发难以节制。

到了唐昭宗宰相崔胤执政时，勾结了强藩朱全忠，密谋尽诛宦官势力，宦官为此也勾结了凤翔李茂贞。结果，朱全忠打败了李茂贞，于是崔、朱二人尽杀宫中宦官和各道军队的宦官监军。彻底消灭了宦官势力。长达一百多年之久的宦官专权局面方告结束。

宦官专权之时，士人中的卑劣之徒为了个人私利，鲜廉寡耻，攀附阉竖，为正直的士人所不耻。另有一批正直鲠骨之士，为了国家利益，不计个人生死，直言上书，指斥朝政，为时人所推重。

宪宗时，士人皇甫湜作《制策》直言指出执政者偷合苟容，方镇怙众行贿，宦官胡作妄为。其言痛切直率，令执政者恼怒。

另一篇著名的策论是大和年间的刘蕡对策，刘蕡在策文中痛责了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跋扈，朝外方镇独断专行，选官不选贤才，任人唯亲，天下百姓困苦不堪，兵农分离，文武对立，必将导致分裂，祸乱在即。他又自比汉代忠臣晁错，苟利社稷，死而无悔。这两篇策文，是唐代正直明智之士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深刻揭露，以其大胆尖锐引起了朝野的震动。

唐宪宗元和后期，权纲弛迁，政治日非。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奉承宪宗，月进羡余，又以厚赂交结宦官吐突承璀，被任命为宰相。制令一下，朝野无不嗤之。裴度、崔群极言不可，宪宗不听。裴度耻与小人同列，上表辞职，未被批准，裴度的上疏说：“皇甫镈、程异两人本是掌管钱谷事务的官吏，靠佞巧而为宰相，大家都认为是笑话。皇甫镈作度支时，裁损淮西粮料，差点闹出乱子。程异虽人品庸下，但心地平和，可让他管一些具体事务，不能为相。至于皇甫镈，生性狡诈，天下

共知，他能迷惑圣听，足见奸邪之极。臣如不退，天下人要说我不知廉耻。臣如不言，天下人要说我有负恩宠。现在退既不许，言又不听，让人很为难，愿陛下以天下为重，早作裁决。”宪宗认为裴度心胸狭窄，不予理会。

皇甫镈知大家瞧不起他，更加注重玩弄权术，取悦宪宗。

宪宗晚年喜好神仙之术，诏求天下方士。宗正卿李道古通过皇甫镈告诉宪宗，山人柳泌能制长生药。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二十四日（甲戌），宪宗下诏让柳泌住在兴唐观炼制药物。柳泌对宪宗说：“天台山是神仙出没的地方，生有很多灵草。我虽知道这个情况，却无法将灵草采来。如能让我做那里的地方官就没问题了。”宪宗于十一月七日（丁亥），任命柳泌代理台州刺史。谏官不同意，说：“没听说过皇上喜欢方士，就让方士做地方官的。”宪宗说：“如能尽一州的人力财力而能使皇帝长生不老。你们说有什么可惜的？”群臣由此不敢进言。

元和十四年柳泌在台州驱吏民采药，无所得；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将他捕送长安。皇甫镈、李道古出而保护他，宪宗仍旧让他作翰林待诏，只是吃了他的药更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假使真有神仙，一定深藏岩壑，畏为人知。而伺候权贵之门，自吹自擂的人，大抵都是徇利之徒。况且药是治病用的，不能常食。如果真有长生不老之药，那末让献药的方士试一试就辨出真伪了。”

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在未立太子的情况下暴死于中和殿。人们都说是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但宦官们不这样说，只说是药发而死。宫廷以外的人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中尉梁守谦与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澧王李恽及谋立澧王的吐突承璀。为了争取军队，赏给左右神策军每人五十缗，六军及威远军每人三十缗，左右金吾每人十五缗。闰正月三日（丙午），穆宗在太极殿东序即位。四日，

改变在西宫临朝的惯例，把群臣召集到月华门外，贬皇甫镈为崖州司户。九日（壬子），杖杀柳泌及僧大通。其它方士都流放到五岭以外，又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为循州司马。

二月五日（丁丑），大赦天下。

八月，穆宗服丧期满，即去游乐打猎，沉湎于声色之中。

十月十三日（壬午），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皇帝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而边事紧张，一旦有紧急奏报，都不知皇帝在哪里。"穆宗虽然表示愿意纳谏，却并不实行，依然我行我素。

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穆宗与宦官在禁中击毬，有个宦官从马上跌下来，吓得穆宗中了风不能下床。从那以后，人们得不到皇帝的消息。为此群臣请速立太子。十二月八日（癸巳），诏立景王李湛为太子。随后，穆宗的病情渐渐有了起色。

长庆三年，一个名叫郑注的人，开始引人注目。郑注，翼城人，眼睛很小，但他巧谲倾谄，善揣人意，医道也不错。徐州牙将把他介绍给节度使李愬。李愬吃了郑注的药觉得很灵验，对他特别信任。郑注后来作了牙推，参预军政。他擅作威福，大家对他很不满。监军王守澄把大家的意见反映给李愬，希望李愬把他打发走。李愬说："郑注虽然不得人心，可也是奇才。你不妨跟他见一面，如真无可取，我就把他打发走。"郑注按照李愬的要求去拜访王守澄，坐下一谈，果然不同凡响，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第二天，王守澄说："李愬的评价果然不错。"从此郑注又多了一个靠山。后来王守澄作了枢密使，带着郑注到了长安。穆宗生病后，王守澄专制国事，权倾中外，郑注日夜出入其家，私室谋议；人们逐渐发现郑注说话很有分量。后来郑注在朝中成了十分显要的人物。

长庆四年正月，穆宗旧病复发，死于寝殿。遗诏以李逢吉摄冢宰，正月二十六日（丙子）敬宗在太极殿东序即位。

敬宗游戏无度，狎昵群小，除了喜欢击毬之外，还爱好手搏。禁军及诸道投其所好，纷纷给宫廷送来力士，还拿出近万缗钱交给内园令，让他们再召募些力士。这些力士昼夜不离敬宗之侧。而敬宗脾气特别坏，一些力士常因侍奉不周而被配流、籍没。宦官也时常挨打。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八日（辛丑），敬宗深夜打猎回宫后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毬将军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敬宗在席间起身入室解手，殿上的蜡烛忽然熄灭，苏佐明等人在室内将敬宗杀死。刘克明等矫称圣旨，命翰林学士路隋书写遗诏，命绛王李悟暂理军国事务。十二月九日（壬寅），绛王在紫宸外庑当着百官的面宣读了这份遗诏。刘克明还打算撤换一部分当权的宦官。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李涵入宫；又征召左右神策军、飞龙军捕捉刘克明等人。克明赴井，被捞上来斩首。绛王被乱兵杀死。

翰林学士韦处厚为江王登基作了安排。首先发出江王平难的布告，树立形象，然后群臣三表劝进，最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令册命江王为皇帝，是为文宗。

文宗即位后，深知穆宗和敬宗二朝之弊，去奢从简，励精图治。为节省开支，下令释放了三千多名宫女。裁汰了二千多名冗官，即位前下诏征索的组绣及雕镂器物一概停征。敬宗每月只点缀式地临朝一、二天，文宗开始按照以前的规矩每逢单日临朝，垂问政事，辍朝、放朝都用偶日。这些新气象给一些求治的朝官带来希望。

太和二年（826年）文宗主持科举考试，贤良方正刘蕡在对策中抨击宦官。他的对策大意说："陛下如要杜绝有人篡弑皇帝，应当亲近百官，疏远宦官，任用耿直忠正的大臣作宰相，主持朝政，并使各个环节都能人尽其用。而现在却是五、六个宦官专政。不改变这个局面，宫廷必然酝酿祸乱。我担心宦官废立的事情可能

还会发生。”又说：“长期以来，忠贤没有被作为亲信，宦官却把握废立的权力，致使敬宗不得善终，如今陛下为宦官所立。也不能算堂堂正正的继位。”又说：“陛下应该摈斥亵狎的宦官，让他们重新去干扫除门户的事！以前治理失宜，今后应该纳人正轨。没有堂堂正正的开始，应有堂堂正正的结果，这样才能恭守先王之教，承继帝业。”又说：“朝政应该统一，现今官分中官、外官，职分南司、北司，政出多门。有人在南司犯了法，到了北司就不算犯法，有的在外官用刑适中，却不符合中官的法律，这样人们就失去了准绳。”又说：“现今兵部不理兵籍，只能作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只能空拿勋阶俸禄。观军容使全由宦官执掌，诸监军使也都由宦官控制。这些宦官掌管兵权以后，视文官如仇敌，视农夫如草芥，到处耀武扬威。他们没有翦除凶逆的智谋而有作威作福的狡诈，没有保卫社稷的勇力而有侵暴闾里的残忍。他们指挥藩臣，势凌宰相，践踏王法，紊乱朝纲，一方面利用军队的势力挟制皇帝，另一方面又用天子的名义驾御群臣。我并不是不知道说这些话马上就有灾祸，只是痛感社稷危难，人民困苦，不忍心姑息丑恶，去换取一官半职！”

结果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玙、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都得到了官职。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看了刘蕡的对策都从内心里佩服，但因畏怕宦官，不敢取为进士。诏命公布之后，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不公道。谏官、御史本想向文宗奏报，被当权的宰相扣下了。李郃说：“刘蕡未中榜，我们这些人登科能不惭愧吗！”于是上疏，认为：“刘蕡的对策是汉魏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因为刘蕡指责了宦官，主管考试的人不敢报告，这样只怕忠良之臣再也没有办法，朝廷纲纪将为崩坏。况且我的对策远不及刘蕡，我请求朝廷收回已经授予我的官职，用它来表彰刘蕡的忠直。”这道上疏也没有报告给文宗。李郃字子玄，后来作过贺州刺史。

刘蒉对策后七年发生甘露之变，令狐楚、牛僧孺做山南东、西道节度使时，都要刘蒉作过幕府，授秘书郎，按照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但宦官们深嫉刘蒉，将他诬陷治罪，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刘蒉死于贬所。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监》卷240—卷243

《通鉴纪事本末》：《宦官弑逆》

《旧唐书》：《刘蒉传》

《新唐书》：《刘蒉传》

甘露之变

唐中期以后，朝政日渐腐败，其中皇帝阘弱，宦官专权是重要原因之一。

宦官专权局面，主要是从宦官执掌禁军开始。安史之乱时，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有功。开始接管了一部分军队。肃宗返京后，李辅国权势更盛。禁军全在他掌握之中，从此宦官势力日长，直至依仗手中的禁军，操纵朝政，排斥异己，甚至废立皇帝，无所不为。朝官们借助于皇权向宦官夺权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文宗时发生的甘露之变就是宦官与朝官之间的一次血腥搏斗，斗争的结果以宦官获胜，朝官惨败而告终。

甘露之变以后，皇帝成为傀儡。宦官集团完全掌握了军政大权。

穆宗、敬宗都是宦官杀死的，文宗即位后，杀死二位皇帝的宦官仍有人在文宗左右，他们势力很大。其中王守澄是宦官的中坚，他统领禁兵，招权纳贿，极为跋扈。有个叫郑注的人倚恃王守澄出入禁军。卖官贩权，人们对此奈何不得。文宗受不了宦官的挟制，私下里与翰林学士宋申锡发了些牢骚。宋申锡给文宗出主意，要他一点一点地解除宦官权力。文宗认为宋申锡很可靠。提拔他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830 年），宋申锡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

太和五年二月，文宗与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荐引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并将文宗的想法告诉了他。没想到王璠却将了解

到的情况泄露给王守澄等人。郑注、王守澄抢先一步，令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李湊，豆卢著是郑注的表亲，文宗不知其中有诈，立时大怒，这一天正是旬休的日子，文宗命中使临时把宰相们召到延英殿。路隋、李宗闵、牛僧孺、宋申锡来到中书东门，宦官拦住申锡道："没有叫你。"申锡知道有了麻烦。望着延英殿以笏叩额而退。这时文宗在延英殿把王守澄转来的豆卢著奏折拿给宰相们看，大家相顾愕然。为了成狱，王守澄抓捕了宋申锡的孔目官张全真及家人买子缘信等。又到十六宅和市肆抓捕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申锡亲事王师文等，师文逃跑，晏敬则自诬服罪，称宋申锡派王师文向漳王致意，图谋不轨。

狱成，文宗召宰相及议事官面询此事。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罗泰、蒋系、裴休、窦宗直、韦温，拾遗李群、韦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要求将这个案子交给外廷审查。文宗说："我已与大臣们把案子定下来了。"玄亮叩头流涕道："杀一匹夫尚须慎重，何况宋申锡是个宰相呢？还是再复查一下好。"文宗的态度缓和下来，说："我再和宰相们议一议。"牛僧孺说："人臣不过宰相。宋申锡已作了宰相，假如他要谋立漳王，目的又是什么呢？恐怕他不会这样作。"郑注怕交给外廷复审会露出马脚，就劝王守澄放弃斩杀宋申锡的要求，只将他贬黜就算了。结果贬漳王湊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飞龙使马存亮为了表明自已的看法，即日求致仕。受此事牵连而被处死或流放的有近百人。不久宋申锡死在开州。

郑注为邠宁行军司马，投靠宦官王守澄，权势很大，太和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弹劾郑注，十几天里上书数十道。王守澄让郑注躲藏在右军避风。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都厌恶郑注。有人要求韦元素以请郑注医病为名，将他骗到左军杖杀，不想郑注到了左军以后，一番甜言蜜语将韦元素说得谛听忘倦，最后竟送给他一大批礼物，把他放走。

十二月十八日（庚子），文宗中风竟至不能讲话，王守澄荐郑注前来诊医。文宗吃了他开的药，病情好转。由此郑注得到文宗的宠信。

太和八年，郑注被征调到京师。太和九年被任命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宋申锡获罪后，宦官更加肆无忌惮。文宗对宦官的一些作法，越来越不能容忍。善揣人意的李训、郑注很快就发现了文宗的真实思想。李训借着进讲的机会，以微言打动文宗，文宗见他很有才辩，认为是个可靠的人，又因李训、郑注都是王守澄推荐来的，宦官也不会怀疑，就把心里话对他们合盘托出。李训、郑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积极策划。文宗对这二人言无不从。郑注经常住在宫廷里，有时休沐回家，宾客填门，大都是来送礼的。外人都以为李训、郑注以宦官为靠山擅作威福，却不知道文宗也是他们的后台。

王守澄与另一个宦官、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不合，李训、郑注就让文宗提拔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分夺王守澄的权力。

时人都认为郑注作宰相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侍御史李甘在朝里说："如果下诏书让郑注为相，我非把诏书撕了不可！"不久，贬李甘为封州司马。但李训也不愿郑注权力太大，千方百计不让郑注作宰相。

七月下旬，侍讲学士李训又加了兵部郎中、知制诰两个头衔。

八月四日（丁丑），太仆卿郑注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郑注爱穿鹿皮裘衣，常摆出一种恬淡的姿态，给文宗一种假象。有一次文宗问户部侍郎李珏，是不是认识郑注。李珏说："岂但认识他，还深知他的为人。其人奸邪，和他混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我从来不和他来往。"此话传至郑注耳中，不久，李珏被贬为江州刺史。

传言杀死宪宗的宦官陈弘志已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要文宗

把他召到京师。陈弘志路经青泥驿，被朝廷派人杖杀。

郑注想作凤翔节度使，李训也怕郑注留朝日久，势力太大，极力促成郑注到凤翔赴任。

九月下旬，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省事王守澄被任命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实际上给了王守澄一个虚衔，而将他的实权夺去。

九月二十七日（己巳），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两人都作了宰相，舒元舆作御史中丞时，是李训、郑注的一个打手，凡是李、郑二人讨厌的朝官，都被舒元舆弹劾，所以这一次能作宰相。

李训权力很大，已经把持了朝政。宰相王涯等对他的意旨，不敢说半个不字，宦官自中尉到枢密使，以及禁卫诸将见到李训都深怀敬畏之心，迎拜叩首。

十月，李训、郑注认为时机成熟。决定除掉王守澄。于是要文宗派中使到王守澄家，令他饮鸩而死。随后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人们对王守澄之死感到高兴，认为活该。但对由王守澄一手提拔起来的李训、郑注二人也不加恭维。

十月，郑注被任命为节度使，赴凤翔上任。

李训等人虽然扶植一批言听计从的人任高官，但对有人望的重臣如裴度、令狐楚、郑覃等也能加重用。所以士大夫阶层确有人以为李训等能有所作为给国家带来太平盛世。

郑注到了凤翔积极准备政变，按照预先与李训的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戊辰），王守澄在浐水入葬之时，郑注以送葬为名，带亲兵将宦官一网打尽。李训想，如依照前约行事的话，事情成功后，头功要被郑注夺去，所以决定提前发动。

十一月二十一日（壬戌），文宗在紫宸殿视朝。百官按照班秩站好之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没有象往常一样报告平安，他说：

"左金吾衙门后边的石榴树上留有昨夜降下的甘露,我已将这一祥瑞的事情通过一道道守卫宫门的宦官作了报告。"李训、舒元舆在一旁鼓动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乘坐软舆从紫宸门出来,留在含元殿。他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先到左金吾厅堂后面去察看。过了好一阵子,李训才来报告说:"我和众人前去验看,不象是真甘露,不好草率宣布。"文宗故意问道:"真有这么回事吗?"回头要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宦官离去后,李训马上召集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河东节度使王璠,要他们"过来接圣旨"。王璠胆怯,哆嗦着不敢向前,只有郭行余拜受殿下。二人事先组织好的几百名部曲已拿着武器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提前派人通知这些人进殿受诏,偏偏只有王璠麾下的河东兵进来,郭行余的邠宁兵却没有来。进殿的士兵无法差使,派不上用场。

仇士良等来到左金吾察看甘露,韩约神情极为紧张,满头是汗。仇士良很是诧异,问道:"将军为什么这个样子?"暗自有了警觉。

一阵风吹来,掀动了幕布,显露出后面有武装的士兵,又传出武器的声响。仇士良等发觉有变,惊恐外逃。门前卫士正要关大门,被仇士良喝住,门闩终未扣上。逃回含远殿,仇士良报告文宗已有兵变。李训见状,急呼左金吾卫士上殿,说:"赶紧保卫皇帝,每人赏钱百缗!"宦官则要求文宗立即还宫。他们抬起软舆,迎上前将文宗按在软舆上,然后打坏殿后的雕饰屏障,越过去向北边的宫区奔逃。

李训攀住软舆高呼:"臣奏事未完,陛下不可回宫!"金吾卫士已来到殿上,京兆尹罗立言率三百余名京兆巡逻兵从东面冲来。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二百余人从西面冲来。都已到了含元殿。士兵们乱斫乱杀。宦官流血喊冤,死伤了十几个人。文宗的乘舆跌跌撞撞地抬向宣政门,李训攀着软舆呼唤得更加哀切,被文宗喝住,宦官郗志荣奋拳猛击李训的胸口,将他打倒在地。乘

舆一溜烟地进了宣政门，门随即关闭，宦官们在门内高呼“万岁！”百官惊愕地逃散。

李训知道兵变已告失败，换上从吏脱下的绿衫，骑马出逃，没有人对他有什么怀疑。王涯、舒元舆、贾餗几个宰相回到中书省，在一起猜测，认为出了事，一会儿皇帝还会重开延英殿召他们议事，留下未走。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问宰相出了什么事。几个人答复说：“不知有什么事，你们去留随便吧！”

仇士良等从李训的行为中看出文宗参与了策划，旁敲侧击地说了很多闲话。文宗内心有愧，一点儿也没有反驳。

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五百禁兵，持刀杀出阁门反击。王涯等几个宰相正要在政事堂吃饭，有吏人前来报告说：“士兵们从禁内出来，逢人便杀！”王涯等放下碗筷，起身出逃。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及金吾吏卒一千余人争挤出门。宫门关闭后，有六百余人来不及逃出，全被杀死。仇士良分兵掩闭了所有的宫门，在各处搜索李训之党。各衙门的吏卒和进宫卖酒的商贩被捉到后，全被杀死，又杀了一千多人。到处是尸体和鲜血，一片狼藉。南司各衙门的官印及图籍、帐幕、器皿等被洗劫一空。城中也在大索逃亡。舒元舆改换服饰只身骑马逃出安化门，被禁兵追获；王涯在永昌里茶肆被神策左军抓获。王涯已七十多岁，熬不住一顿毒打，自诬服罪，称与李训合谋叛逆，尊郑注为帝。王璠回到长兴里私第，关闭大门，以河东兵护宅。神策军将到门前唤喊，声称：“宰相王涯等谋反，已被抓获；右神策护军中尉鱼志弘要我前来致意，准备启用王璠作宰相。”王璠一开始很高兴，出来相见。神策军将并不多言，只是急切地催王璠赶紧去见仇士良。王璠心知事情不妙，不得已垂泪而行。一到神策左军，见到被羁押的王涯，王璠说：“老兄自己造反，为什么要牵扯我？”王涯说：“老弟当年作京兆尹的时候，如果不把宋申锡的计划泄露给王守澄，哪能有今天？”王璠低头不语。又在太平里收捕了罗立言。

王涯等人的亲属奴婢也被囚系起来，已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家中富有，禁兵觊觎他家的财产，以搜捕贾𫗧为理由，抓走胡证的儿子胡溵将他杀死。又到左常侍罗让、詹事浑镃、翰林学士黎埴等人的家里抢掠财物，将这几家洗劫一空。坊市里的地痞恶少乘机报私仇杀人，抢劫财物，还互相劫贼，搞得乌烟瘴气。

二十二日（癸亥），百官上朝。只准朝官带一名随从进去。禁兵手持武器列于两旁。百官到了宣政门，门还紧闭着，没有宰相、御史领班。百官全无秩序。文宗在紫宸殿上问：宰相为什么不来？"仇士良答道："王涯等几个宰相谋反，已经关进监狱。"接着把王涯的亲笔供状呈交上去。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殿，把王涯的供状拿给他们看，并问："这是王涯手书吗？"令狐楚等回答："没错。"文宗说："真是这样，罪不容诛！"于是命令狐楚、郑覃留宿中书省，参决机务。还命令狐楚起草诏书，公告朝廷内外，令狐楚把王涯、贾𫗧谋逆的情节写得很含糊，未令仇士良满意，因此没能当上宰相。

长安坊市的剽掠活动还没有停息，左右神策军将杨镇、靳遂良等奉命各率五百禁兵分屯交通要道，击鼓警众，杀了十几个人，才稳定下来，贾𫗧变换装饰，在民间混了一天，自知无处可逃。便身着素装，骑驴来到兴安门，主动说明："我是宰相贾𫗧，被奸人败坏，可送我到神策二军！"守门士兵把他带到神策右军。李孝本在逃往凤翔的路上被追获。

李训与终南山 和尚宗密很有交情，前往投奔。宗密想要为他剃发，把他收容下来，可徒弟们不同意。李训出终南山，逃往凤翔，被周至镇遏使宋楚抓获，戴上刑具，送往京师。李训怕到了神策军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就对押送的人说："抓到我就能换取重赏。听说禁兵到处搜捕，一旦遭遇他们肯定会把我抢走。不如砍下我的头送去。对你们来说也安全。"押送的人同意，砍掉他的脑袋送往长安。

左神策军出动三百名士兵，以李训首级为前导，后面跟着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军出动三百名士兵，押着贾𫗧、舒元舆、李孝本到庙社祭献，然后到东、西二市示众，最后在独柳之下腰斩，百官接到命令，都去观看行刑。死者的首级挂在兴安门外，随风飘动。全体犯官的家属不论亲疏，一概处死，小孩子也不放过。妻子不杀死的，没为官婢。围观的百姓有人对王涯搞的茶叶专卖不满，向他投掷瓦砾，进行发泄。

同一天，任命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代理京兆尹。几天里，生杀任免完全由两个护军中尉决定，文宗一点儿都不知道。

在此以前，郑注已带领五百名亲兵从凤翔出发，来到扶风。扶风令韩辽了解郑注的行动意图，不作接待准备，带着官印和吏卒跑到武功，郑注获知李训已经失败，又回到凤翔。仇士良等派人给凤翔监军张仲清送来密诏，让他将郑注处死。张仲清惶惑，不知如何下手，押牙李叔和献计道："我去为您把郑注找来，告诉他我们没有恶意。来了以后，乘郑注松懈之机，于席间将他干掉。"张仲清听从了这个建议，埋伏好甲士等待郑注，郑注倚恃有亲兵护卫，来见仲清。李叔和逐渐把郑注的亲兵引到外边吃酒，郑注只和几个人在里边，吃过茶，李叔和抽刀将郑注斩杀，接着关上外门，将郑注的亲兵全部杀死。这时拿出密诏向将士公布，并将郑注一家处死。又杀了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一千多人。

朝廷尚不知道郑注已死，二十六日（丁卯），下诏削夺郑注官爵，由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并命邻藩作好军事部署准备应变。二十七日（戊辰）夜，张仲清派李叔和把郑注的首级送献长安，悬挂在兴安门外，至此甘露事件告一段落。

此后，宦官的权势更大，宰相只是遵命行文书而已。

开成元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质询王涯等人的罪名，他

指出："王涯等都是儒生，地位很高，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他们不会造反。李训等人搞甘露之变，目的是要除掉宦官。仇士良等为了逃避被杀而将王涯等人杀死。指控他们谋逆恐怕罪名不恰当。"又说："假如宰相真有谋逆的计划，应当交给御史台等主管部门，按照刑典处罚，怎么能由宦官擅自带领军队，为所欲为地劫掠杀人！这一次大屠杀死难者以万计，许多百姓无辜受到伤害。我本想亲自到朝廷，当面说明是非，恐怕也被宦官所害，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时下要治理好我所管辖的地域，训练军队，内作皇上的心腹，外作国家的藩屏，如奸臣难以驾驭，我一定豁出性命去清君侧。"

二月二十六日（丙申），加封刘从谏为检校司徒。刘从谏又派牙将焦楚长上表辞官，说："我先前陈奏的事情关系国家大体，如果有道理，则应为王涯等人恢复名誉，如无道理则不应随意使用赏典。"接着传扬仇士良等人的罪恶。

三月二十二日（辛酉），文宗召见焦楚长，给予安慰和解释，把他打发回去。

刘从谏上表后，仇士良等气势有所收敛。因此宰相郑覃、李石大体还能掌权。李石曾说："宋申锡为人忠直。被奸人谗诬，应予昭雪。"文宗低首良久，流涕泫然，说："我早就知道这件事处理得不对，是奸人逼我这样作的。这里有宦官也有朝臣，我自己也没有把是非搞清楚。如果是汉昭帝的话，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冤案。"在悔恨的心情下，文宗于九月下诏恢复宋申锡的官爵，让他的儿子宋慎微作了成固县尉。

仇士良对李石非常反感，开成三年派人刺杀他，未能成功。李石吓怕了，上表辞职。文宗知道其中的原因，却没有办法，只好调他去作荆南节度使。

在宦官包围下的文宗心情忧郁，渐染重病。开成四年文宗有一次在思政殿与翰林院学士周墀饮酒，文宗忽然问道："朕和前代

哪一个皇帝差不多?”周墀答道:“陛下是尧舜那样的人主。”文宗说:“朕怎么敢比尧舜。朕问你朕与周赧王、汉献帝比,地位如何?”周墀大惊道:“他们是亡国之君,怎么能和圣上相比!”文宗道:“周赧王、汉献帝受力量强大的诸侯的控制,现在朕受家奴控制。这样说来,朕恐怕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说着泪下沾襟,周墀也跪在地上流泪。从这以后,文宗不再视朝。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43--246

《通鉴纪事本末》:《宦官弑逆》

《旧唐书》:《仇士良传》

《新唐书》:《宋申锡传》

武宗平泽潞

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为被杀的宰相王涯等鸣不平，并暴扬宦官仇士良等人的丑事。仇士良则指责刘从谏窥视朝廷。武宗即位时，刘从谏献来一匹高九尺的良马，武宗不受。刘从谏认为定是仇士良从中作了挑拨，怒杀良马，由此对朝廷产生怨愤。他招兵买马，缮完兵械，邻境都加强防范提防着他。刘从谏生病后对妻子裴氏说："我以忠直对朝廷，朝廷却不把我作忠臣，邻道也与我们十分对立。我死以后，别人在军府里掌了权，刘家非遭殃不可。"于是和幕客张谷、陈扬庭等计议效法河北藩镇，以刘从谏的侄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家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

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死去。刘稹秘不发丧，逼监军崔士康奏称刘从谏病重，请命刘稹为留后。武宗谋于宰相，宰相们多以为边境上回鹘的残余力量还在活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讨伐泽潞，以现有的国力难以作到，所以希望同意刘稹作留后。只有李德裕看法不同，他说："泽潞与河朔三镇的情况不同，河朔割据已有历史，局面不易改变，泽潞近处腹心之地，朝廷的影响很大，有条件讨平。"李德裕还认为，只要成德、魏博二镇不支持泽潞，刘稹肯定不能成事。

武宗支持李德裕的意见，决定讨泽潞。为了稳住河朔，李德裕受命草诏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对他们说：

"泽潞的情况与你们不同，不要为了保住你们子孙世袭的地位而支持泽潞。只要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自然福及后昆。"

武宗还派中使解朝政到泽潞去给刘从谏看病。朝政到上党要见从谏。刘稹推辞说刘从谏病情严重，无法亲来受诏。解朝政不听他的解释，直向里闯。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守在门前，凶相十足。朝政见势不妙，退了回来。刘稹送他价值数千缗的礼物，把他打发回朝。朝廷还派供奉官薛士干到泽潞传达朝廷的安排，一要刘从谏到东都洛阳养病，二要刘稹入朝。薛士干与解朝政不同，根本不问刘从谏的病情，给人一种他已确知刘从谏死讯的样子。刘稹于是发丧。

唐廷为刘从谏之死辍朝一日，并命刘稹护丧到洛阳。又召见刘稹的生父刘从素，要他给刘稹写信，转达朝廷的意见。刘稹不从。

四月，调任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邠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

五月十三日（辛丑），削夺刘从谏及刘稹的官爵，以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讨，军事行动采取得极为迅速。

以前对待河北藩镇并不是这样。一个节度使死了。先派吊祭使、次派册赠使，再派宣慰使商议确定军府的继承人。如藩镇不听命，自立节度使，然后再出兵。所以常常耽搁半年，令所在藩镇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这一次，宰相还想按旧章程办事，武宗则要求立即用兵。王元逵受诏后，立即出兵进屯赵州。

六月，王茂元派兵进据天井关南的科斗店，刘稹派衙内十将薛茂卿率亲军二千前往拒战。十九日（丙子），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受诏于七月中旬齐进，并不得接受刘稹求降的要求。

以前对河朔用兵，各藩镇因出兵离境由度支提供军费，有的藩镇贪图度支的供给，常与敌军串通，占据对方的一个县城或一个军事据点，长期拖延。这一次要求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许他们攻占县城。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徐州出兵，行动迟缓，又要求增加兵力并在绛州休整。李德裕认为他没有讨叛的诚意，所以一切要求都不批准，并严令他立即进军翼城。李德裕还任命天德防御使石雄为晋绛行营副使以牵制李彦佐。

刘稹上表说："我父亲刘从谏因为反对宦官仇士良而被权阉所疾。他们说我父亲潜怀异志，多方中伤，所以我不敢入朝，希望陛下宽察，放我一条活路。"何弘敬也上表为刘稹说情。这些奏表都被李德裕留下，未转给武宗。

河北三镇接到朝命后，成德镇行动很快。王元逵攻陷宣务栅后进击尧山。刘稹派兵救尧山，再败。朝廷一方面加封王元逵为同平章事，以元逵之功激励官军，一方面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迅速进战。

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向官军投降。有人担心李丕诈降，李德裕则认为，不管是真降也好，诈降也好，都要厚赏以劝来者，只是心存防范，不把他安置在军事要地。

王元逵前锋进入邢州一个多月，魏博镇尚无动静。李德裕命王宰将忠武军精兵穿过魏博镇的相、魏二州直抵磁州，与焚掠晋、绛的泽潞军作战，其实是想利用这一部署给魏博施压，令其迅速动作。

不久，昭义衙内十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共破坏十七座军寨，一直打到距怀州十几里的地方才休兵。因没有刘稹的命令，薛茂卿未敢轻率攻城。朝议以为刘稹未可轻取。武宗支持李德裕继续用兵，说："谁再动摇我的决心，我一定把他送到前线斩首！"

何弘敬怕忠武军进入魏州境内，军中有变，仓皇出师。八月下旬，何弘敬奏报说，已率全军渡过漳水前赴磁州。李德裕攻心伐谋之术获得成功。

自科斗寨之败后，河阳军怯战，欲收兵退保怀州。而河阳军一旦退去，各军士气势必受到打击，洛阳也会受到威胁。于是诏令王宰不要再赴磁州而转援河阳。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驻扎在万善。刘稹牙将张巨、刘公直会同薛茂卿合攻王茂元，约定九月一日发起总攻。八月底，刘公直越过万善，攻下南面五里的雍店。张巨随后赶来，他发现万善守备薄弱，便想独自抢功，因此抢先一步攻城，直到黄昏才向刘公直通报战斗情况。刘公直见天色已晚，未赶来会战，而张巨攻城不下，只能退去。这一天，天色昏黑，下着细雨，在登山的途中，不知谁开头喊起来："追兵来了！"队伍大乱，许多人被挤落深崖。

九月，何弘敬攻下潞州以东的肥乡、平恩二县。武宗对李德裕说："何弘敬已投入战斗，既已杀伤大量昭义兵马，再想观望投机已不可能。"于是加封他为检校左仆射。

九月，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病死。二天后朝廷任命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使、怀孟观察使，投入战斗的河阳部队由河阳行营攻讨使王宰统领，敬昕只负责提供粮饷。

朝廷又令石雄代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命他从冀氏县出兵攻打昭义治所潞州。石雄受命的第二天即率兵进战，攻破五个敌寨，杀获以千计，接着向潞州进发。

薛茂卿在科斗寨为昭义军打败官军立了战功。可有人说："薛茂卿作战过于深入，杀伤官军太多，激怒了朝廷，使原来很有希望在节度使问题上与朝廷达成谅解的局面变得遥遥无期。"因此未能按功获赏。茂卿甚为愠怒，密与官军通谋。十二月三日（丁巳），王宰率兵攻打天井关。薛茂卿出兵小战，作了作样子，随即率军退走。王宰进据天井关。天井关周围的军寨纷纷后撤。茂卿

退到泽州给王宰捎去口信要他进攻泽州，自己愿为内应。王宰怀疑是诱兵之计，不敢草率行动，到了约定的时间仍在观望。这下子害了薛茂卿。刘稹得到情报，把薛茂卿诱至潞州，族灭全家。兵马使刘公直代替了薛茂卿的职务。

十二月十四日（戊辰），王宰攻打泽州，失利。刘公直一个反击收复了天井关。二十日（甲戌）王宰再次进战，大破公直，随即围攻泽州东北的铜川县。河东军也攻克了石会关。

洺州刺史李恬是河东节度使李石的堂兄。李石新到太原赴任，刘稹派军将贾群捎来李恬的亲笔信。信中称："刘稹愿带全族人向李石投降，护奉刘从谏丧车归葬洛阳。"李石留住贾群，把信送达朝廷。朝廷以为，官军四面合击，天天都有捷报，所以刘稹假装诚服，以此缓和官军的攻势，待得到整备的时间后再进行较量。因此要李石给李恬回信，要李石担保刘稹能拿出投降的实际行动，李石不敢以一家百口作担保。朝廷同时诏命各道乘泽潞上下离心，加紧进兵攻战。右拾遗崔碣上疏要求接受刘稹投降的要求，被贬为邓城令。

朝廷根据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的要求，命河东军增派二千人赶往榆社。而河东已无兵可派，连仓库守员和工匠都已从军出发。李石召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由都将杨弁率领前往榆社。十二月，杨弁等率领戍卒来到太原。按照旧例，士卒出征每次人给绢二匹。可是前任节度使刘沔调任时已将府库所藏全部带走，新任节度使拿不出物资来分发，只得把自己的旧存取来，每人只能分得一匹。士兵们要求过了正月初一再走，但监军吕义忠不肯，一再催逼大家立即动身。杨弁因众心怨怒，又知道太原城守备空虚，正月初一率兵剽掠市场，杀都头梁季叶，占据军府。李石逃往汾州。杨弁把贾群放走，要他和自己的侄子去见刘稹，相约为兄弟。刘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闻知太原兵乱，向刘稹献关投降。

李石由汾州来到晋州。武宗下诏让他回太原行营。又诏王逢

把太原兵留在榆社戍防，而以易定、宣武、兖海兵讨杨弁。同时命令王元逵率五千步、骑兵自土门入太原，接应王逢。

榆社河东兵见客军攻打太原，怕城破之日家属受难，自动拥监军吕义忠攻打太原。很快打下太原，生擒杨弁。

王宰与石雄关系不和。如王宰强攻泽州，将吸引昭义军的主力，而使石雄乘虚攻打上党，可以轻易得手，可是王宰却在泽州南部迁延了二个多月，不肯决战。三月初朝廷下诏催促王宰进兵。同时任命石雄为河中节度使。

闰七月，刘稹心腹大将高文端投降，向朝廷透露了泽潞乏粮等内部情况。

刘稹年轻懦弱，军府的事务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操纵。他们专事聚敛，却不肯拿出一部分来分给有功的将士。因此人心离散。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担心刘稹要垮，打算把在山东主持军务的弟弟裴问找来掌管军政。李士贵为了继续掌权，只说山东的事情仰赖裴问，根本不让他来。

王协主张向商人征税，每州出一名军将专门主管这件事，名为向商人征税，其实是统计编户的家财，以至于把杂物都不加遗漏地统计进去，折算成绢匹，十取其二，还经常往高估值。人们竭尽浮财和粮食去纳税，还不够数，都啧有怨言。

军将刘溪尤其贪婪残忍，刘从谏弃而不用；刘溪厚贿王协，王协因邢州富商最多，就让刘溪主管那里的征税。裴问所统领的军队号为“夜飞”，多是富商子弟。刘溪来了以后，把这些人的父兄都抓了起来。军士们请裴问说情，刘溪不许，以小人得志的傲慢态度给了裴问一个答复。裴问大怒，暗与刺史崔嘏定计。闰七月下旬，崔嘏、裴问关闭城门，斩城中大将四人，以邢州向王元逵投降。

洺州都知兵马使王钊很得军心，而且常常不受使府的约束。有一次使府赐给洺州军士每人一端布，不久又下使帖说折充冬天的

例供。这时税商军将来到洺州，大家对征税的事情议论纷纷很不满意。王钊对军士们说："刘稹年纪小，政令都由别人作主，税商的事情行得不妥。现在州库充实，足供十年之用，怎么能不散发一部分，以慰劳苦的将士！使帖的办法不能用。"随后打开仓库，发给士兵每人一匹绢，十二石谷，士兵们异常欣喜。稳住军心后，王钊向何弘敬议降。安玉在磁州，听到邢、洺二州已经易帜，也向何弘敬投降。

潞州人获知三州倒向官军，都知大势已去。郭谊、王协策划杀掉刘稹向朝廷请罪。刘稹从堂兄中军使刘匡周兼任押牙，郭谊认为是障碍，决定先夺刘匡周的权。他对刘稹说："刘匡周在牙院诸将不敢讲话，怕被猜疑而获罪。山东三州丢掉也是这个原因。只有匡周离开牙院，大家才敢尽言，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扭转局面。"刘稹要求匡周不再到牙院去，匡周怒道："我在牙院，诸将才不敢有异图；一旦离去，大家全得完蛋！"说完，愤愤离去。

郭谊让刘稹的亲信董可武去问刘稹今后怎么办；刘稹说："现在城里还有五万人，当然要闭门自守。"董可武说："孤注一掷不是好办法，不如暂由郭谊作留后，您向朝廷投降。这样不但可以保住身家性命，而且还可能得一个刺史一类的官职。将来带着家产接太夫人和全家到洛阳去，不也很好吗！"刘稹问道："郭谊肯不肯负这个责任？"可武说："我已和郭谊谈好，他愿意出头，而且保证不作对不起你的事情。"刘稹把这个方案告诉了母亲。他母亲说："归顺朝廷当然是好事，只遗憾太晚了。我自已的弟弟都不能保证可靠，怎么能指望郭谊，你自己决定吧！"于是刘稹用他母亲的名义委任郭谊为都知兵马使。王协早已命令诸将站列在外厅等待消息。郭谊拜谢刘稹出见诸将。李士贵闻讯率后院兵数千人攻击郭谊，不成被杀。

郭谊更换将吏，部署军士，当晚全都安排妥当。第二天董可武来见刘稹，说："请您去商议公事。"刘稹问："为什么不在这儿

谈呢？”答道：“怕惊动太夫人。”说完拉着刘稹走出牙门，来到北宅，置酒作乐。酒酣，董可武说：“今天所要谈的是想保全你的一家，须你自己决定该怎么办！”可武向前紧按住刘稹的双手，崔玄度从后面将刘稹斩杀。接着把刘稹宗族的人全抓起来，自匡周以下到襁褓小儿全都处死。还杀了刘从谏父子亲厚的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韩茂实、王渥、贾庠等共十二家，他们的子侄甥婿一个不漏。韩茂实、韩茂章是韩约的儿子；李仲京是李训的哥哥；郭台是郭行余的儿子；王羽是王涯的侄孙；王渥是王璠的儿子；贾庠是贾悚的儿子。甘露之变后，李训等被杀，李仲京等亡命投奔刘从谏，至此被诛杀殆尽。凡军中与郭谊结有小怨的人，郭谊每天都要杀一批，杀得流血成河。

郭谊的使者带着给朝廷的降表及刘稹的首级向王宰投降。刘稹首级通过泽州，刘公直举营恸哭，也向王宰投降。

刘稹首级送到长安。朝廷下诏：“昭义五个州免除一年赋役，军队所经过的州县免除当年秋税。自刘从谏以来，昭义镇随意增加的赋敛一概不算数。造册的上团人员全部遣返归农。各道的有功将士，按等级给予赏赐。”

郭谊杀了刘稹以后，天天盼着朝廷的任命，可一直没有消息。不久石雄来到，郭谊等前来参见。敕使张仲清要求各高级官员当晚到牙院领取任命状，只有郭谊的任命状说是要到第二天才能来。晚上，郭谊等来牙院听命，点名引进，凡凶暴狡诈，或顽抗官军的将领全都抓起来送往京师。刘从谏的尸体被从地下棺椁里扒出来，暴置于潞州闹市三日，后又移到球场，用刀剁烂。

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等被斩首。泽潞之叛的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47—卷248

《通鉴纪事本末》:《武宗平泽潞》

《旧唐书》:《李德裕传》

《新唐书》:《李德裕传》、《藩镇宣武彰义泽潞列传》

会昌毁佛

开成五年（840年）五月四日，文宗皇帝暴卒于太和殿。

文宗早年曾立王妃之子为庄恪太子。后王妃失宠，太子被杨贤妃谗废，便又立陈王成美为太子，尚未行册命之礼，文宗已暴病不起。这时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便先下手为强，拥戴皇太子成美监国。此时唐廷之内宦官专权已久，南衙北司之争势如水火，这时眼见朝官们占了上风，宦官们自然不肯相让。于是太宦官仇士良、鱼弘志依仗掌管禁军之势，又矫诏迎立文王之弟颍王李炎为帝，李炎即位是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

武宗作颍王时，便热心于道术，乐此不彼。因此于即位当年的秋天，便邀请名道士赵归真一行八十多人入宫，在宫中作道场。武宗亲临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虔诚至极。武宗笃信道教，对佛教却极为反感，终于在李德裕的支持和赵归真等人的怂恿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行毁佛，致使佛教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有唐一代宗教事业兴盛，以佛、道二教为主，另有摩尼、祆教等同时流行。因宗教的麻醉作用，各代君主往往兼容并蓄各教，只是有时崇佛抑道，有时崇道抑佛，二教的势力亦随当权者的好恶而消长。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唐初太祖太宗皆因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与唐宗室同姓，便自称是老子的后人，对道教大力提倡，奉之为国教。高宗时，又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作为上古祖先，顶礼膜拜。而对佛教亦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利用其维护统治。

武周统治时期，将佛教作为篡位夺权的舆论工具，因此崇佛抑道，佛教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武则天授意僧人法明编一部《大云经疏》，书中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的化身，应当称帝。于是，武后下令全国各州修建大云寺以收藏大云经，并由高僧讲经，以传经的名义为武氏篡权大造舆论。

玄宗时，重新提倡道教，稍抑佛教。下令颁行老子的《道德经》于全国，并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另给老子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帝"。

安史之乱以后，肃、德、宪、穆、敬、文宗几代君主都笃信浮屠，致使佛教恶性发展，至武宗继位之时，天下遍布数不清的大小寺院，僧尼队伍日渐庞大，许多两税户为逃避政府赋役纷纷出家作僧为尼，致使国家赋税大量流失。

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僧尼人数的增长，大量减少朝廷的赋税来源；各地广建寺院和兰若，耗费大量民间钱财，因此自李唐建国以来，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都预见到佛教过份发展的危害，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例如付奕、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淑明、韩愈等，不过这些人只是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并未付诸行动，因此没有多大实际作用。

武宗时反佛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安史之乱后，佛教发展过于急剧，严重破坏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加之武宗时平定刘稹的叛乱、回击回鹘，先后打了两次大仗，虽说最终取胜，但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唐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而此时天下财富多聚集于寺院，因此打击佛教，没收寺院土地财产，对缓解政府财政困难大有帮助，正由于以上原因，武宗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毁佛行动。

开元五年九月，武宗任命原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德裕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朝辅政。李德裕为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之子，出身世家大族。早年任地方官，治理地方颇

有政绩。穆宗长庆年间，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他体恤民情，关心民众疾苦，常亲至民户问饥寒，当他得知当地百姓赋税过重，便毅然上书朝廷请求蠲免民赋，又感于当地佛教浸蔓，寺院林立，夺民之食，蠹国之财，果断下令拆毁寺院淫寺两千五百多处，有力地遏制了佛教的恶性发展，结果浙西经济明显好转，为此赢得很高声誉。文宗时，李德裕又改任西川节度使。西川乃中原防范吐蕃的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德裕至西川后，不仅深入民众，且常出外勘察地形地貌，以此作为加强防务、建立工事、布防的依据。与此同时，又整顿军队，裁汰老弱，招募精壮，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军队训练，很快就建立了一支全国最精税的军队。另外在当地拆毁若干寺院，没收其财物，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民众。经过李德裕一年多的苦心经营，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经济恢复，边防十分巩固，并将沦陷达四十二年之久的人蕃咽喉要地维州收复。武宗一向欣赏李德裕的才干，因此刚一登基，便召德裕人朝为相，主持政事。会昌元年（841 年）三月，武宗又进位李德裕为司空。

李德裕一向主张，保卫边境平安，打击藩镇势力，加强中央权力；裁汰冗员，节省开支；打击佛教势力。这些主张都得到武宗的认同和大力支持，德裕亦决心协助武宗重振朝纲，由于君臣的共同努力，会昌年间呈现出崭新的政治局面。

李德裕执政后，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将自己在浙西、西川二地毁佛的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史称“会昌毁佛”。

会昌二年十月，勒令触犯戒规的僧人还俗。下令将僧尼的田地钱谷尽收人官府，对不舍其财的，允许本人还俗。限制僧尼蓄养奴婢的人数，僧只可蓄奴一人，尼姑只可蓄婢二人，其余的奴婢令其各归其家，无家的收人官府。同时下令禁止度儿童为僧尼。

会昌三年，宣布废除摩尼教，此教亦为西来宗教的一种。四月，下令杀掉全部摩尼师，京城七十二女摩尼皆死，回纥摩尼教徒被流放至各地，死者过半，烧摩尼经书，尽毁摩尼寺院，财产

没入官府。

这时，太子詹事韦宗卿不识时务，竟撰成《涅槃经疏》、《大圆伊宗镜略》两部宣扬佛教的书进献，武宗大怒，下令立即将书稿焚烧，又下诏斥责："佛本西戎之人，讲死不讲生，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其说利国利家。你本一儒士，却不潜心研究儒学，反而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迷惑毒害百姓，定当重罚！"

同年，又下令将皇宫内所藏佛经尽数烧毁，佛像埋于地下，禁止僧人在长安讲习佛经，迷惑民众。

会昌四年三月，下令各寺禁止供养佛牙，又特下令五台山、终南山诸寺、泗州普光王寺、凤翔法门寺有佛指的寺院不许供养。民众布施一钱的，杖打二十，僧尼受一钱的亦杖二十，各州县官府送布施的亦严加处罚。诏令一下，无人再敢入寺舍钱，诸寺之前门可罗雀。

接着武宗又下令毁各地道场佛经、佛像，换上天尊老子像；禁止僧人入宫禁宣讲佛经；禁止僧尼夜出，出外者必须在打钟之前回归。

七月，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小寺院的僧尼尽令还俗。长安城内拆毁佛堂三百多所，全国无计其数。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尊胜石幢僧墓塔全部被拆毁。

十月，武宗下令拆毁天下小寺院，经佛并入大寺，钟送至道观。被拆寺院的僧尼，除年老德高的归入大寺外，其余的全部勒令还俗，这次，长安城内又拆小寺三十三处。

会昌五年三月，禁止天下寺院设置庄园，同时下令检括各地寺院的财物及奴婢人数。

四月，检括出全国有寺院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僧二十六万五百人。

从四月一日起，下诏勒令僧尼还俗，至五月底，长安再无一名僧尼。接着，又令外国僧尼无度牒者还俗，名僧天竺人难陀、宝

月，日本人圆仁亦因无牒被迫还俗。

七月，诏令合并全国佛寺，上州留寺一所，长安、洛阳二都每街留寺两所，长安城左右街共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各寺限留僧三十人。又令将各寺废铜像交盐钱使作铸钱之用，铁佛像改铸农器，金银佛像送度支以充府库，令官吏百姓之家交出所有家藏佛像，违者依照禁铜法处罚。

接着，又勒令大秦、穆护、祆教等教徒二千多人还俗，回归本籍充作两税户。

此次大规模毁佛，共计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招提兰若四万多座，还俗僧尼二十六万多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的有十五万人，对佛教以致命性的打击。

八月，武宗下诏大谈佛教之害，自汉魏之后，佛教日盛，耗蠹国风。至唐代两京寺院众多，竞相豪华，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致使国力衰竭，物力凋弊，有鉴于此，故志在必革，彻底剪灭这一祸根，以利国家。

宰相李德裕亦上《贺废毁诸寺表》，盛赞会昌毁佛之功。

武宗虽然对佛教深恶痛绝，对道教却笃信不疑。赵归真人宫讲道，武宗亲临谛听。不久又召衡山道士刘玄清入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道士邓元起入宫，传授长生不老之术。武宗不仅常与归真等研习道术，而且在宫禁之中修筑了望仙台，拜赵归真为师。赵归真每次与武宗谈话，必抨击佛教讲死不讲生，只教人如何涅槃，让人受苦，妄妖之词，毒害民众，应及早去除，武宗颇为赞同。因武宗崇道过甚，谏官们屡屡劝谏，不能奏效。武宗口称自己摒弃声色狗马，十分寂寞，如今让道士们出入宫禁只为说话解烦。至于军国大事，绝对不会受道士蛊惑。

武宗崇尚道法，却终为道法所害。他笃信长生不老之术，服食了道士炼的所谓仙丹，结果药性发作，喜怒无常，后来病重十多日口不能言，非但未得长生，却于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驾崩，

年仅三十三岁。

宣宗上台后，李德裕失势被贬出朝廷，赵归真等道士被杀，被毁佛寺又相继恢复，佛教势力卷土重来，会昌毁佛的成果付之东流，唐朝政治再加趋于腐败。

会昌年间的毁佛行动，实质是唐朝中央政府同寺院地主争夺土地、劳动力和财富的斗争，这次毁佛的胜利，扩大了政府的财源，财政困难大大缓解，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会昌末年，全国共有税户四百九十五万多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因此，武宗会昌年是自安史之乱后，国家最为强盛的时期。

（朱柳郁）

参考资料：

《旧唐书．武宗本纪》
《新唐书·武宗本纪》
范文澜《唐代佛教》
《资治通鉴》卷246—卷248

吐蕃衰乱

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乘中原国势衰微，多次大股入侵骚扰，唐政府采用剿抚结合两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维持住局面。

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吐蕃彝泰赞普死。彝泰生前体弱多病，不能理政，继任赞普二十多年，一直委政于大臣，因此国力转衰，无力攻伐，仅能自保，因此多年来唐朝边境晏然，边民安居乐业。

彝泰死后，其弟达磨被立为赞普。达磨为人残暴荒淫，尤嗜田猎，不理政事，国人全都不拥戴他。加之此时灾异频仍，国中地震，岷山山崩，平地涌泉，且人牲瘟疫流行，死者相枕，人们皆以为是达磨无行，故天降罚于吐蕃，自此人心更加离散。

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达磨赞普死，吐蕃派论普热入唐告丧。武宗派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前去吊唁。

达磨赞普生前宠信一佞臣为相，达磨无子，该佞相与达磨妃綝氏不顾国人反对，私立綝氏兄长之子乞离胡为赞普，既不与朝臣们商议，也未得大唐政府的册命。佞相与綝氏自此开始独断国政，首相结都那见到乞离胡并不朝拜，而且当庭抗争："赞普宗族甚多，为什么要立綝氏之子？谋权篡位之人国人不服其令，鬼神不享其祀，如此下去，国家必亡。近来灾异不断，是天降罚于吐蕃。老夫不能正乱以报先赞普之恩德，只求一死。"言罢，拔刀割面，恸哭而出。佞相大怒，下令杀掉结都那，并灭其宗族，更激怒了国

人。

这时，吐蕃洛门川讨击使为论恐热，该人生性强悍残忍。多有计谋，得知朝中有乱，便想乘机起事。他对其属下发令："如今贼人不立国族而立綝氏之子，且残害忠良，乞离胡未受大唐册命，怎称得上是赞普？我决心起义兵，入朝诛綝氏及佞臣，以正国家。我此行顺天行道，必定成功。"论恐热派人游说其它部落共同起兵，结果有三个部落同意协助。论恐热共召集了一万骑兵，便于当年自称国相，与青海节度使联合起兵攻打綝氏一党。

大军行至渭州，与綝氏国相尚思罗军相遇。一仗下来，尚思罗大败，弃辎重向西松州方向逃窜，论恐热便在渭州抢掠屠杀民众。尚思罗不甘失败，又纠合了苏毗、吐谷浑、羊同等部落八万人在洮水与论恐热军隔河对峙，焚桥自保。论恐热便隔河对不明真相的苏毗等部落民众进行说服瓦解："如今贼臣乱国，上天遣使诛讨，你们为何不替天行道，反而帮助逆贼。如今我已为宰相，握有大军，你辈如不反悔，定将灭你部落。"论恐热之言，果然令苏毗等无心再战，恐热乘机率军过河，苏毗等投降，尚思罗要逃走，被追兵赶上杀掉，恐热尽收其部众十万人，之后又行杀掠。自渭州至松州，一路之上，所过残破不堪，死者枕藉。

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代任吐蕃相。婢婢为人好读书，不喜名利，备受国人敬重。四十岁时，彝泰赞普强令其出山，尚婢婢无奈，作了鄯州节度使。婢婢为人宽厚，多有谋略，其训练的军队骁勇善战。

论恐热起事名为举义兵，诛国贼，实际上想谋国篡位。他贼人胆虚，怕婢婢识破诡计袭击他，便于会昌三年六月，率大军攻打婢婢军，士兵及牛马遮天蔽地，不见其后，走至镇西途中，忽然刮起大风，雷电交加，击杀将领十多个，牛马百多头。论恐热觉得出师不利，便下令队伍停止前进。婢婢与部下谋划道："论恐热今日率大军前来，视我部如蝼蚁一般，以为胜券在握。今日天

意助我，恐热犹豫不前。我看不如假意退却，以骄敌人之志，待其不加防备之时，我再进行反击，定可取胜。"

为了麻痹对方，婢婢令人送金帛及牛酒等物犒劳恐热之师，并修书一封，写道："相公起义兵以匡正国家，境内之民谁不拥护！相公只须派一使节前来说明情况，婢婢哪敢不听命！何必劳烦众人一路辛劳，亲至敝处。婢婢生性愚钝，只好读书，不懂军事。前赞普强行令臣守藩，实非本愿，日夜盼求退居。相公若能赐婢婢回归故里，乃臣平生之愿。"

恐热得婢婢书信后，大喜，将婢婢的信遍视群臣："婢婢只知读书，是个书呆子，哪会用兵？"于是放下心来，引军回归。婢婢闻听恐热中计，大笑道："国无明主，我则归顺大唐，怎可事此等犬鼠之辈！"

秋九月，论恐热军屯住大夏川。尚婢婢派将领庞结心和莽罗薛吕率五万精兵袭击。莽罗薛吕率四万军队埋伏于险要之地，庞结心率万人埋伏在柳林之中，另以一千骑兵登山讨战，并将谩骂信用箭射人恐热营中，以激怒对方。恐热果然中计，盛怒之下，率几万军队追击。庞结心佯败而逃，时而又假装马匹困乏，不能前进，于是恐热追得更紧，不知不觉已追出几十里地，这时伏兵齐发，阻断了恐热的归路。此时又风沙骤起，溪水流溢，恐热军大败，伏尸五十里，淹死士兵不计其数，恐热单骑仓皇逃归。

恐热部下将领岌藏丰赞早已不满恐热的残虐无道，投降了婢婢。恐热心中愤恨，又发兵挑战。婢婢以五路大军进击，恐热退守东谷，婢婢以木栅栏包围，恐热突围逃走，余下部众都投降了婢婢。

恐热不甘心失败。会昌五年，又纠合了残部攻婢婢，婢婢派庞结藏率五千军队抵御，恐热又败，只剩下几十骑遁去。婢婢派人在河、湟二地广发文告，历数恐热残虐百姓的桩桩罪行后道：你们本是汉人，吐蕃今日无主，你们就应归附大唐，千万不要被恐

热驱赶役使犹如狐鬼一般。于是，许多跟从恐热的人开始离他而去，另找出路。

宣宗大中元年（847 年）夏五月，论恐热乘唐有国丧，纠集部分党项、回鹘寇犯河西，朝廷令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军讨伐。王宰令沙陀朱邪赤心军作前锋，从麟州过黄河，与恐热军大战于盐州，恐热大败而逃。

大中二年，凤翔节度使崔珙破吐蕃，收复清水。论恐热又派部下莽罗急藏率军二万西侵，尚婢婢派将领拓跋怀光在南谷大败其军，急藏被迫投降。

大中三年春，论恐热驻军于河州，尚婢婢驻军于河源军，两军对阵。婢婢手下部将因连连获胜，遂有急躁轻敌之念，纷纷要求与恐热决战。婢婢道："不可，我军刚刚取胜，必然轻敌，而恐热军陷于死地，必舍命相拼，此战必不利于我军。"众将听不进去，婢婢知其战必败，便率众在桥头等待败军回归，众将果然大败，婢婢收起余众，焚桥退归鄯州。

这时，吐蕃的秦、原、安乐三州以及石门等七关的民众归降唐朝。宣宗令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同时下令泾源、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军出兵应接。六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等接取原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七月初六，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州。十三日，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得萧关。二十三日，凤翔节度使李玭取了秦州。

八月初八，宣宗驾临延喜门城楼接见前来归降的河、陇老幼千人。唐帝亲自接见欢迎，令众人欢呼雀跃，当即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人众备受感动，皆山呼万岁。宣宗下令：归降的百姓自行开垦三州、七关的土地，五年免纳租税。自今以后，凡京城罪人应流放的都发往三州、七关。能够率兵在营地上垦田的将吏，由政府发粮种及牛，鼓励其屯田。在以上十处驻守的戍卒仍二年一代替，留驻期间加倍配给粮食衣服。修建道路，有商旅来

往及戍卒传递家信的，官府不可阻拦。山南、剑南等边境地区仍陷没吐蕃手中的州县，允许地方量力收回。

十一月，宰相以收复河、湟二地之功，建议加尊号，宣宗道："宪宗一直对收复河湟之地耿耿于怀，但当时中原有乱，无力出兵，一直心愿难遂。如今收复失地，完成了先王之愿，同意增顺、宪二庙的尊号以彰昭烈。"

会昌四年春，令秦州隶属于凤翔。

九月，吐蕃论恐热派僧人莽罗蔺真率部众在鸡项关南造桥，以便在白土岭攻伐婢婢军。婢婢派将领尚铎罗榻藏率兵相拒，初战失利，婢婢又派磨难黑子、烛卢巩力率军据守氂牛岭抵抗。巩力建议军队按兵不动，占据险要之处，伺机出奇兵断对方粮道，使其进退不得，不过十天半月，其军必溃败。黑子不听，巩力知其必败，便道："我宁愿作不用之人，决不作败军之将。"便自称有病，离军归家回到鄯州。黑子率军硬拼，果然战败身死。婢婢粮草缺乏，留拓跋怀光守卫鄯州，自己率二千人转移至甘州西就食水草。恐热闻听婢婢弃鄯州，便率五千骑兵追击，至瓜州，听说怀光守鄯州，便转而大掠鄯、廓等八州，所过之处，残杀青壮，残害老弱妇人，攒杀婴儿，焚烧房屋，赤地千里。

大中五年春，沙州刺史张义潮前来归降。张义潮，本是沙州百姓，他早就有归降之心。当时吐蕃大乱，他就私下结交豪杰，准备乘机夺取州权，归附大唐，终有一日，义潮率领众人披甲持武器集聚于州门，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州官见状，惊惶逃走，于是义潮自称节度使，并遣使上书朝廷请求归降，朝廷封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论恐热为人残暴贪虐，失掉人心，因此他的许多部下叛离，婢婢部下拓跋怀光知恐热内部人心不稳，乘机派人混人其部劝诱说服，结果恐热部众人心更加散乱，有的回归到本部落，有的向怀光投诚。恐热见众人纷纷离去，自己势力日渐孤单，便对众人扬

言道："我马上就入朝大唐，借大兵五十万诛杀叛逆，然后定都渭州，请唐帝封我为赞普，看谁敢不听从我的命令！"五月，恐热果然入朝长安。宣宗派左丞李景让至礼宾院慰问，并询问恐热有何要求。恐热自恃兵强马壮，气色骄妄，言语荒诞，张口便要求做河渭节度使，被朝廷拒绝。朝廷见恐热其人狂妄不才，未加以重任，赏赐犒劳一番后，就将他打发回去了。恐热此行，未能如愿，只得怏怏而返，自此心怀不满。回到落门川以后，又纠合旧部，骚扰边境，正值此时阴雨连绵，粮草匮乏，部众又有离散，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恐热于是率残部奔逃至廓州。

冬十月，沙州张义潮出兵收复了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十个州，之后派遣哥哥张义泽奉十一州的图籍入见宣宗，自此之后，陷落吐蕃手中多年的河、湟之地又尽归于唐。十一月，令归义军隶属于沙州，令张义潮为沙州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又令义潮的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自河、湟回归后，朝廷每年赋税收入达九百二十五万缗。

大中十一年冬，朝廷令秦州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名将李光弼的孙子。

不久前，吐蕃酋长尚延心率河、渭二州的部众归降，被封为武卫将军。李承勋见延心所部牛马众多，起了贪心，想攫为己有。于是，他与部下计议陷害对方，计划诬蔑延心谋反叛乱，将其逮捕，再夺取全部财富，然后将其部众尽行驱赶于蛮荒之地。不料，这一阴谋被延心侦知，便在一次军宴之上对承勋道："河、渭二州，土旷人稀，难以为生，因此唐人多内迁，吐蕃人皆远离，故而此地二千里无有人烟。延心愿人见天子，尽率部众迁入内地，作为大唐百姓，使西部边境永无祸患，亦不枉费张义潮收复河、湟之功。"承勋犹豫之间，延心又道："延心入朝，部众内迁，只怕秦州军势孤单了。"听此言，承勋与部众一时哑口无言。第二天，诸将与承勋商议此事，众人道："大人在此地开营田、设使府，拥有

万兵，军费皆由度支供给，将士们无有守战的辛劳，却可多得一份耕田之利。若象延心所言，西陲长年安全无患，朝廷必撤掉军府，撤回军队，将秦州隶属凤翔，我等就难有今日之利了。”承勋细细一想有道理，便收起谋害延心之心，奏报朝廷请求封尚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率领部众留住其地。

懿宗咸通三年（862 年），嗢没入朝纳贡。嗢末本为吐蕃奴隶的称号，当初，每次吐蕃发兵作战，富家往往派家奴从战，多者一户达几十人，因此吐蕃作战军卒众多。及至吐蕃论恐热作乱，家奴多散乱无主，于是这些人相继纠合组成部落，散布于甘、肃、瓜、沙等各州，吐蕃贵族势力微弱的反而依附他们。

咸通四年春三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报，率蕃、汉兵众七千人收复凉州。

咸通七年春，论恐热居于廓州，他贼心不死，想纠合周围部落，再行作乱寇边，因其暴虐无道，倒行逆施，众人皆不从命。拓跋怀光闻知论恐然已陷于仇人众多、孤立无援的境地，便发兵攻之，大败其军。十月，怀光率五百骑兵冲入廓州，活捉了恐热，先砍掉双脚，再历数其罪恶后斩首，将其首传往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又被尚延心于中途袭击，余众尽迁岭南。

咸通八年春，张义潮回归长安，被封为右神武统军，唐懿宗又赐义潮田地及府第，以彰其收复失地之功。十三年，义潮卒。

吐蕃论恐热作乱二十多年，其内部相争连年不休，致使吐蕃日渐衰亡，论恐热死后，乞离胡君臣亦不知所终。

从公元六世纪初至九世纪中，三百年间，吐蕃不断为患西北边境，由于唐政府的长期抵抗，最终胜利，自此衰微的吐蕃再难为患。

（朱柳郁）

参考资料：

《新唐书·吐蕃传》

《旧唐书·吐蕃传》

《通鉴纪事本末》：《吐蕃入寇》《吐蕃叛盟》《吐蕃衰乱》

《资治通鉴》卷 243—卷 249

回纥之亡

回纥又称回鹘，是北方一游牧民族，自唐贞观年以来，一直与唐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自从在唐军的协助下灭东突厥、薛延陀汗国之后，回纥一族尽占突厥故地，成为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骨力裴罗时，被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自此之后，每一位新可汗继位，均由唐政府加以册封和任命。安史之乱爆发时，回纥可汗多次主动派兵协助平乱，立了大功，为此，唐政府先后将五位公主嫁与可汗，双方关系极为密切。

但从公元八世纪末叶起，回鹘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危机，内部矛盾加剧。德宗贞元十一年（795 年），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是为怀信可汗。骨咄禄本姓跌跌氏，与可汗族药罗葛氏并非一族，旁族上台，实际上是改朝换代了。

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夏四月，唐政府将太和公主下嫁回鹘崇德可汗，这是唐与回纥和亲的最后一位公主。长庆四年，崇德可汗死，其弟曷萨特勒立，是为昭礼可汗，自此以后，回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便趋于白热化。

文宗太和六年（832 年），昭礼可汗为部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是为彰信可汗。

文宗开成四年（839 年），回鹘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谋反作乱，被彰信可汗杀掉。此时其同党国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作战，闻国内有变，安允合等被杀，便开始反叛。他以三百匹马为赠礼，买通沙陀人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战败，自杀身死。

国人另立厖驳特勒为可汗。当年，天降大雪，气候奇冷，牛马多死，回纥值此天灾人祸的打击，开始衰败下去。

此时，西域伊吾之西，焉耆以北有一游牧部落，名黠戛斯。其族人悍勇善战，君长称阿热，牙帐建在青山，距回鹘可汗牙帐有骆驼行四十天的路程。吐蕃、回纥等常对其族封官行赏，极尽拉拢。以前因回鹘强大，阿热不敢轻举妄动。此时，黠戛斯闻听回鹘内乱，无暇他顾，便自立为可汗，狂傲起来。回鹘相国多次派兵前去征讨，先后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无法取胜，黠戛斯可汗得意之下，口出狂言，辱骂回鹘："你天数已尽，我有朝一日定要夺取回鹘可汗的金帐。"

如今相国掘罗勿攻杀可汗，引起部分贵族不满。为打败掘罗勿，别将句录莫贺便勾结黠戛斯大兵十万攻掘罗勿，大获全胜，杀掉了掘罗勿与所立可汗，其牙帐被焚烧荡尽，回鹘部众四散逃亡，汗国覆亡。相驳职与庞特勒率十五部投奔葛逻禄，余下一部分迁到安西都护府境内，一部分进人甘肃西部，投靠了吐蕃。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帅本部族人逃到唐朝天德关塞下，与当地人杂处，要求归附大唐。十月，天德军使温德彝上表奏报：回鹘溃众已抵达城下，人多势众，当地民众因回鹘至，皆惊恐不安。文宗接报后，立即令振武节度使刘沔屯军云阀关以备溃兵来犯。

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春，离可汗牙帐较近的十三部共同拥戴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并在错子山安营。

八月，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等想出战求功，便上书朝廷，请求出兵。武宗令大臣们发表意见。多数人认为回鹘将嗢没斯等叛可汗而来，不可收纳，应该出兵。武宗问宰相李德裕，德裕不以为然，奏道："俗语道，困鸟人怀，犹当让其活命。况且回鹘于我大唐世代立有大功，如今国家覆灭，部众逃散，嗢没斯等无处投奔，欲奔天子，实为明智之举。且其诚心来降，并未侵扰

百姓。为什么要乘其危而攻之？臣以为陛下应派使前去安抚，再发运粮食赈济他们，这正是汉宣帝收服匈奴呼韩邪单于的作法。”

朝官陈夷行极力反对，以为此乃助长强盗之势，不如出兵击之。

李德裕道：“如今边境无力量抵御回鹘，那些吐谷浑军根本指靠不上，有利皆争先恐后，无利则顿作鸟兽散，哪个肯真正为国家出力！如今天德守军才有几千，出战必败，战败城必沦陷，因此不如以恩义安抚，不使其为患，纵使回鹘散兵入寇，也须等待诸道大兵会集后再行征讨，哪里可以只让天德一军抵挡！”这时候正值鸿胪卿张贾去回鹘居处巡察未归，武宗便问德裕：“嗢没斯等在关外请降，是否可以相信？”德裕道：“朝中的人臣信义尚不可保，况且是千里之外的戎狄！然而将嗢没斯等叫做回鹘叛将则不大合适，若可汗在国，他前来投降当然不可接受。而如今其国败落无主，部众离散，或投奔吐蕃，或投奔葛逻禄，惟此一支千里迢迢，皈依大唐。观其上书，言词恳切，如此明智之人，怎可叫作叛将！愿陛下令河东、振武军严加防范，倘有进犯，再以武力驱逐。注意不要轻易动兵，即使回鹘对关外吐谷浑等诸族小有抢掠，亦不必官军干涉。严令田牟、仲平等天德守将，切不可邀功生事，失信于回鹘。若怀柔措施得宜，即使戎狄之人，亦应感念我大唐之德威。”于是武宗下令田牟等加强警戒，严禁士兵及各族人士冒犯回鹘。

德裕又奏请以三万斛粮慰劳回鹘，武宗不能断，又召请宰相们商议。陈夷行又屡言不可助盗贼之势，德裕道：“如今各路大军尚未征集完毕，天德孤危，如今不发运粮食赈济安抚回鹘，其情急生事，率众入寇，天德城陷，责任由谁来负？”陈夷行哑口无言。于是，武宗下令运粮三万斛赈济回鹘。

十一月，李德裕又上奏：今回鹘国破亡，朝廷不知太平公主今在何处，如不派使节前去寻访，戎狄就会以为大唐不爱惜外嫁

公主，既辜负公主，又伤害戎狄之心。因此臣推荐通事舍人苗缜人见嗢没斯，一可以寻访公主下落，二可以探知嗢没斯等人的逆顺真情。"

当年，黠戛斯攻破回鹘之时，得到太平公主。因黠戛斯自称是西汉将领李陵之后代，与大唐皇室同姓，便优抚公主，又派达干等十人护送公主回归大唐。乌介可汗闻知，出兵截击了达干等，夺回公主作为人质，此时亦在天德关外。这时，公主也遣使上书武宗，言乌介可汗已立，请求册封。乌介可汗又派国相颉干迦斯等上书，要求借振武城让公主与可汗居住。十二月，朝廷派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前去慰劳回鹘，又赐粮二万斛，又赐可汗书，建议可汗率部众，恢复旧有疆域，不应总漂泊在外，并以未有先例为由，拒绝了借振武城的要求，只同意公主人境。

会昌二年春正月，朝廷派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察核各军将领职能。二月，河东节度使苻澈修筑工事，以备回鹘人寇。朝廷又增兵遣将，以壮天德之势。此时，回鹘又上书借振武城，朝廷再次拒绝。

三月，李拭巡边结束回到朝廷，力陈振武节度使刘沔是个人才，可予以重任。此时正值河东节度使病重，朝廷令刘沔接任。又令苗缜出使册封乌介可汗，但因回鹘时时侵扰边境，不能成行。

嗢没斯等向田牟告发赤心要谋反，杀掉了赤心等人。那颉啜收赤心余众七千余帐向东逃去。这时河东派人奏报："回鹘兵至横水，杀掠百姓，今驻屯释迦泊东。"德裕分析敌情后奏报："释迦泊距乌介可汗营帐三百里，不知这支回鹘军是那颉部下，还是可汗部下？如今就声称这支军队非可汗部下，侵略边境，令刘沔、武仲等出兵征讨，这样师出有名，挫败此军，也可使可汗震怵。"

四月，天德都防使田牟报告说，因回鹘侵扰不已，未及奏报，已发兵三千出战。李德裕闻知奏报道："田牟不是个将才。戎狄凶悍善骑射，利于野战，不擅攻城。田牟之职，只应坚持守城，以

待援军。如今全军出战，万一失利，城内空虚，何能保全，望陛下急派使制止交战，如已交兵，速令周边各族协助官军。回鹘部已流亡二年，粮草断绝，人心不稳，应速令田牟招诱降者，发粮赈济。嗢没斯等是否真心诚意来降，虽不敢妄定，但要及早加以封赏，即使是假降，也可起离间敌方的目的。远近诸蕃闻知，定会认为出兵讨伐是因为可汗冒犯了大唐天威，并非朝廷要尽灭回鹘一族。石雄其人善战无敌，请陛下准其入天德军，协助田牟防守。”武宗皆从其言。

因采纳了李德裕的安抚政策，不久，嗢没斯就率国中特勒、宰相等重臣二千二百多人前来投降。五月，朝廷派鸿胪卿张贾等安抚嗢没斯一行，册封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它人员皆有封赏。另赐其部众粮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那颉啜率部众进犯，被卢龙节度使张仲武等击败，其属下七千帐全被收降，那颉啜逃，被乌介可汗擒获杀掉。

乌介可汗势力虽微，但其部众仍称十万人马，驻牙帐于闾门山。这时，可汗又上表向朝廷要粮，而且要求朝廷送还嗢没斯等人。朝廷复信道：“粮食已发运过三千斛，足以偿付马价，牛是国中耕地牲畜，禁止宰杀，羊中国也少有，无法给你们。而且嗢没斯等自从国家破败，投奔塞下已有二年，惧怕可汗猜疑，不得已才归顺朝廷。以前正由于可汗猜疑残虐，才导致内离外叛，国家覆亡，如今可汗尤应吸取这个教训。如果再次骨肉相残，那样可汗周围必定人人自危！朕出于爱人之心，才受其降，如此朝廷对可汗不失恩宠，于朝廷也不失信义之名，这岂不是两全其美，愿可汗深虑。”

六月，嗢没斯入朝，命其所率军队为归义军，嗢没斯本人被封为左金吾大将军、充军使。七月，嗢没斯置家太原，与诸弟为朝廷守边效力，武宗令刘沔安抚其家。

乌介可汗又上书朝廷，要借兵协助复国，又要借天德城，再

次被朝廷回绝。开始，可汗往来于天德、振武之间，剽掠各族，朝廷都宽容，未出兵剿讨，只是屡次派使节传旨，令其速还漠南故地，可汗拒不听令。李德裕以为因那颉啜在北方骚扰，可汗不敢北还。那颉啜败死，可汗仍不离去。人们又以为回鹘人是等收回马价，于是将马价付足，谁知仍不离去。八月，可汗率众攻入大同，驱掠河东各族，抢得牛马无数，吐谷浑、党项各族人都逃入深山避难。刺史张献节闭关自守。朝廷只好下令各路大军屯太原及振武、天德，待明年春共攻回鹘。

为催促回鹘归国，武宗又赐书可汗道："自从回鹘国被黠戛斯攻破后，可汗率众投至塞下，朝廷安抚无所不至。如今可汗仍在塞下，不但不早日离去，反而侵掠州县，蹂躏各族。中外将相都请求出兵剿讨，朕不忍为此，惟望可汗速择良策，回归故里。"

武宗又令李德裕替刘沔给回鹘相颉干迦斯修书一封，信中道："回鹘千里迢迢，投归大国，应仿效汉代匈奴呼韩邪单于的作法，派儿子入侍宫中，再亲自入朝朝觐，并令太和公主入朝谒见太皇太后，求大国哀怜，才不辜负大唐对你部的援救抚恤。然而自你至塞下以来，窥视边城，桀骜不驯，欲望无餍，肆无忌惮，犹如在你本土。如今又深入边境，侵扰各族民众，既然口口声声要与唐继续友好，乞求援助，又哪能如此行事！如今你方又来信相威胁，自称胡人生性难安，如恼羞成怒，无法控制。当年回鹘国被黠戛斯部所破，全国将相尸体遗弃在草莽之中，累代可汗坟墓被远隔天涯，黠戛斯与回鹘乃不共戴天之仇敌，你们的忿怒之心不向他们发泄，反而蔑视仁义道德，如此肆行无忌，天地神灵都不容。过去郅支单于与大汉为敌，最终灭亡，请可汗引以为戒！"

李德裕又上书道："现在驱逐回鹘有两个方案，请公卿们商议，择取其一，第一是如前诏所议，令河东等三道严密守备，等明春回鹘人困马瘦时发兵驱逐，又可使官军免除寒冬之苦，采取这个方案，就应令幽州兵屯于本道等命。第二，如果怕河水结冰后，回

鹘又进犯，则应趁天气未进寒冬及早驱逐，必须抓紧时间，令河朔兵援助河东，两个月内争取收兵。如今议论纷纷，各执其辞，望公卿们畅所欲言，拿出良策。”集议结果，多数认为第一种方案可行。

九月，令刘沔指挥诸道军队，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各路大军会于太原，刘沔军屯于雁门关。

过去，奚、契丹各部都受回鹘统辖，各部都驻有回鹘监察使督收贡赋，张仲武派牙将石公绪统管奚、契丹二部，将回鹘监察使八百多人全部杀掉。

几天后，李德裕奏告：“河东奏事官孙俦报告，回鹘移营南进四十里，恐有不测之举，应发兵驱逐，请发兵助大同军，尽驱回鹘。”武宗下令河东、幽州、振武、天德等各军发兵驱回鹘。李思忠又率契苾、沙陀、吐谷浑等番兵协助合力追击。

冬十月，黠戛斯派将军踏布合祖至天德军，奏报不久前派使护送太和公主回归大唐，至今杳无音信，不知公主如今已至长安，还是被奸人所劫持，如公主未归大唐，我等上天入地，必寻得公主。”

天气渐寒，武宗派人赐太和公主冬衣，并修书一封，告诫公主：“先代君王与回鹘和亲为的是利用回鹘抵御外侮，保国家安宁。今日回鹘所作所为，极不合情理。公主身为国母，应约束本族，如任凭回鹘南犯，姑难道不畏惧高祖、太宗的威灵，不怀念太皇太后的慈爱！若回鹘仍不思改悔，则是与大唐断绝姻亲关系，望公主好自为之。”

十二月，李忠顺等击回鹘，大破之。

会昌三年春正月，乌介可汗率众侵逼振武城下，刘沔派石雄、王逢率沙陀、契苾、拓跋三千骑兵袭击可汗牙帐，刘沔自率大军后继之。石雄至振武军，登城观回鹘动静，只见毡车几十辆，从

者都穿华衣，好象华夏人，忙问探子，方才得知是太和公主的车帐。于是石雄传令道："公主至此，欲回归大唐。现在出兵攻伐可汗，望公主一行停车不动，以保安全。"

当晚，石雄率人在城墙上凿了十几个洞，潜出城去，乘夜色掩护直奔可汗牙帐。兵到帐下，可汗才发觉有异，大惊失色，慌乱之中，尽弃辎重，率众奔逃。石雄紧追不舍，在杀胡山大败回鹘，可汗受伤，率几百骑遁去。石雄此战斩首一万级，俘获二万多人。之后，石雄迎太和公主回归本土。公主至京师，武宗下令宰相帅百官出迎。并改封为安定大长公主。

二月，黠戛斯派使送来名马二匹，求册命。武宗犹豫未决，恐怕加封可汗后，黠戛斯便不再行君臣之礼，并效仿回鹘之行强行卖马及讨索岁贡。李德裕主张与黠戛斯修好，便上奏武宗道："如今黠戛斯已自封可汗，如今要借助其力保国，便不可吝惜此名义。回鹘有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朝廷才岁赐帛二万匹，并互市贸易。黠戛斯于朝廷无功，哪里敢与回鹘攀比，求取贿赐！如果怕其不再称臣，可先与其约好，同意称臣后再行册命，此外，还可与其续同姓之亲，让其执子孙之礼。"武宗接受了德裕的建议。

三月，任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赐可汗书一封："自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入朝称臣以来，直至天宝年间，朝聘不绝，后为回鹘所隔阻，才断了往来。如今可汗能复仇雪怨，功高无量。如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流窜山谷，为绝后患，可汗须尽早发兵，彻底翦除。又听说可汗与大唐同族，欲加封美号，但不知可汗之意，待另行遣使。"

六月，黠戛斯遣使入贡，武宗赐书要求速平回鹘。

会昌四年春三月，黠戛斯又遣使前来，声称准备攻打回鹘，要求朝廷出兵协助。

此时回鹘内部上下离心，何去何从意见不一，乌介可汗想归安西，其部众因亲戚都在大唐愿归顺唐朝。会昌六年，回鹘发生

内乱，国相逸隐啜杀乌介可汗，立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春，因屡破回鹘有功，加封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为同平章事。五月，张仲武又大破奚族，使回鹘更失依靠。六月，黠戛斯被册立为英武诚明可汗。

大中二年，回鹘部众因诸奚受创，无所依托，只得又投靠了室韦族，此时部众耗散，所有重臣不足五百人。张仲武又发兵攻取回鹘，遏捻可汗闻讯，连夜率妻带子西逃，部众追赶不及，大哭不已。室韦于是将回鹘部众一分为七，归七大姓分管。三天后，黠戛斯又发兵七万，大败室韦，又将回鹘部众收归漠北。仅有几户逃入山林为盗，回鹘另有别部庞勒原在安西，此时自称可汗，自此后，回鹘种族衰微，再不为患。

大中十年春三月，宣宗下诏曰："回鹘有功于国家，与大唐世为婚姻，称臣纳贡，北方安定。会昌年中，奸臣当政，回鹘丧乱，故加以翦灭。近来有降者称安西庞历已自称可汗，待其归复牙帐，当另行册命。"

十月，宣宗遣使至安西镇抚回鹘，此时，回鹘可汗已遣使纳贡。十一月，册立为怀建可汗。懿宗时，黠戛斯又遣使前来要求征讨回鹘，朝廷未准。

僖宗乾符之年，命册立使郗宗莒入其国，然而，此时回鹘又为吐谷浑所败，可汗率部众四散而逃，不知所踪。

回鹘汗国覆灭之后，其部众大部分西迁到了西域各地。在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今日维吾尔人的祖先。

（朱柳郁）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回鹘叛服》

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

《新唐书·回鹘传上下》　《旧唐书·回纥传》

南诏寇唐

南诏，位于今云南一带。西北接吐蕃，南连交趾，北抵益州，东北联黔、巫之地。其族人自称是汉代哀牢人的后代。蛮族称王为诏，唐初该地区有六个最强大的部族合称为六诏，其中蒙舍诏位于最南端，又称为南诏。开元时，蒙舍诏最为强大，其君皮罗阁取得唐政府的支持，统一了六诏。玄宗赐皮罗阁名为归义，又册封其为云南王，并赐其锦袍、金钿带等物品，此后双方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皮罗阁死后，阁罗凤继位，南诏一度降于吐蕃，为患西南，三十多年以后，即德宗贞元年间，南诏王异牟寻对吐蕃的横征暴敛日渐不满，加之西川节度使韦皋对南诏抚慰有方，南诏与吐蕃绝断，又转而与唐重修旧好，此后六十多年南诏多次协助朝廷攻打吐蕃，唐政府重新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此后双方基本相安无事。

唐宣宗大中年间，因安南经略使李涿肆行无道，激起少数族的怨怒，于是南诏再次反叛，成为西南一大边患。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李涿为安南经略使。其为人贪婪无道，依仗权势，盘剥少数族，如他常与当地居民强换牛马，一匹牛或马只给盐一斗，致使民怨沸腾。李涿为压制反抗，又借故杀掉当地酋长杜存诚，促使矛盾激化，终于导致反叛，这些人怂恿南诏人寇边境，攻陷了安南都护府。

峰州有一少数族部落七绾洞蛮，其首领名李由独，由独常年协助朝廷戍边，定期输送贡赋。峰州原本有戍兵六千，这时有人

向李涿建议，为节省开支将戍兵撤回，只由李由独派人戍守。戍兵撤走之后，由独势单力孤，难以自存。南诏闻知，派人前去招降，以外甥女嫁给由独之子，并封官许愿，由独便率其族人投降了南诏。自此之后，边患日烈。

韦皋守西川时，推行与少数族和睦的政策，政绩斐然，他组织修建了西川至云南的青溪道，成为云南各部自蜀入贡之路，沟通了两地的交往。他又在成都设立学馆，选择一些蛮族子弟轮流学习诗书礼教，实行汉化教育，如此五十年不间断，学成的蛮族子弟达到千人。但花销较大，军府不愿支付这笔费用，而且少数族每次入贡，从行者众多，颇费赏赐，也令当权者头疼。大中十三年，杜悰接任西川节度使。为节省开支，便奏请朝廷下令限制南诏每次入唐朝贡的人数，南诏王丰祐闻讯大怒，从此后非但不按时朝贡，并将正在成都学习的子弟全部召还，还时时骚扰边境。

此时正值宣宗驾崩，朝廷派使者人南诏报丧。正巧，南诏王丰祐也刚刚死去，儿子酋龙继位。酋龙斥责唐使道："我国也有丧事，朝廷也不派人前来吊唁，而且诏书上还写着我父王的名字！"待唐使极不礼貌，礼遇甚薄。使者归唐后，将详情一一秉告，懿宗一怒酋龙藐视天尊，不遣使前来告丧及吊唁宣宗，二怒酋龙之名与玄宗名隆基音同犯讳，便未对酋龙按惯例行册封之礼，酋龙于是更加不满，终于自立为皇帝，国号为大礼，改元建极，并进军侵扰，攻陷了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安南蛮族与南诏合兵三万人攻打交趾城，不久交趾失陷，安南都护李鄠与监军仓皇逃奔武州。

咸通二年春，朝廷令邕首及周边各道兵马急速发兵救安南。六月，又任命盐城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这时，李鄠已重新组织了兵力进行反攻，打败蛮族，收复了安南，但终因安南失守，朝廷降罪，将李鄠贬官。这次蛮族作乱，皆因李鄠处事不妥引起。安南蛮族中杜氏最为强盛，李鄠忌其强，一至安南便借故杀掉了其

酋长杜守诚，激怒了杜氏族民，才勾结蛮族及南诏作乱。朝廷得知详情，为了边境平安，决定惩治李鄠以平蛮族之怨。朝廷先加封守诚之父杜存诚为金吾将军以示安抚，又将李鄠再次谪贬，以杀守诚之罪长期流放崖州。

七月，蛮族又入寇邕州，邕州城陷。本来朝廷规定以三千兵力驻守邕州，三年一轮换。经略使段文楚为图其利，要求自己在当地募招军队，结果只募集了五百人。为了吃空额，他又遣散了原有戍兵，只让五百人守卫左、右江，其兵力只相当于过去的十分之二、三，蛮族得知情况便乘机来攻，新任经略使李弘源无兵可领，只好与监军双双逃奔峦州。蛮军退去后，李弘源等才回到邕州。不久，因失城之罪，被贬为建州司户。

这时，宰相杜悰上书懿宗："南诏与唐修好七十多年，这期间蜀中平安，群蛮宾服。今日西川兵力薄弱，臣以为不应轻易与南诏绝裂，臣建议朝廷应早派使臣，前去吊唁，并告之因新王之名犯玄宗讳，故未行册命，待更名后，立即册封。"懿宗准奏，但此时正值南诏再次大举入寇，使者未能成行。

咸通三年春，南诏军又大举进犯安南。朝廷令能征善战的原湖南观察使蔡袭代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率各道兵马三万人抗击，南诏军很快败逃。

蔡袭率重兵防守安南，引起了新任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的忌恨。蔡京只怕对方手中有兵，再次立功，便奏报朝廷："南蛮已远远逃走，不会再来作乱了。蔡袭为了邀功，占用戍兵，白白浪费犒饷。安南荒僻偏远，朝廷难知实情，袭才肆行奸邪。臣请求朝廷遣还各道兵马。"朝廷准奏，蔡袭得知忙上书力争，声称蛮族伺机中原多年，随时可能入犯，不可不防，请求留下戍兵五千，朝廷不准。蔡袭又上书言南蛮必入犯，而安南兵力粮草两缺，守卫者必死无生，蔡袭的奏章投到中书省，但朝廷相信蔡京之言，终不省悟。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刻，并设炮烙之刑残伤兵民，民怨沸腾，终有一日，被邕州的军士驱逐。蔡京自征兵士反攻，兵败。被朝廷贬谪为崖州司户，并让郑愚接替他任节度使。

不出蔡袭所料，十一月，南诏方面听说安南大军已经撤回，便以五万大军再次寇犯安南，来势凶猛。蔡袭遣使告急，朝廷令各道援军速至邕州，由郑愚指挥。

为保护粮道通畅，蔡袭受命屯兵海门，郑愚分兵防御。十二月，蔡袭又求援兵，山南东道派千名弓弩手速往增援，然而为时已晚，南诏兵已将交趾城团团围住，援军无法接近，蔡袭率众在内固守。

咸通四年春正月，由于寡不敌众，交趾城终于陷落。蔡袭与众人拼死冲杀，最后只剩他一人，身中十箭。蔡袭无法再战，想乘监军的船退走，谁料船已离岸，最后因伤势过重溺死海中，其幕僚樊绰携带官印渡江逃去。

城破后，有荆南、江西、襄州等地的将士四百多人，奔逃至城东海边，无船可乘，进退维谷之际，荆南虞候元惟德对众人道："如今我们无船，入海只有死路一条，与其这样死，不如回城去和蛮族拼命，一命换两命也值得！"众人赞同，于是几百人回头又冲回城里，出奇不意杀死蛮兵两千多人，元惟等人都英勇战死。

南诏兵两次大规模进犯，共杀掳边民十五万人，周边少数族奚洞夷、獠等摄于南诏的威势都投降了，南诏留兵二万令将领杨思缙守交趾城，朝廷又将各增援军队全部召回，退保岭南东、西道。

三月，南诏又兵犯左、右江，逼近邕州。节度使郑愚害怕了，他忙上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不懂军事，请求以武将代替自己，朝廷准奏，令义武节度使康承训接替郑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同时发荆、襄等四道兵马万人与康承训同行。

冬十二月，南诏又进犯巂川。

咸通五年春，南诏进犯巂州，刺史喻士珍大败敌军，俘获一千多人。朝廷令右神策兵五千人和诸道兵驻守。

朝廷又增兵海门镇兵至二万五千人，令容管经略使张茵率军进取安南。

二月，又令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为宰相，充任西川节度使。

三月，康承训至邕州任所，蛮患更加严重。朝廷令许、滑、青、汴等八道兵马由承训指挥。康承训至邕州，既不设侦察兵，又不设防。不久南诏纠集群蛮近六万人大举入侵，承训派六道兵马近万人迎敌，结果因准备不足，大败。五道兵八千人全军覆没，只有天平军因晚到一天，才得以保全。康承训得知大军覆没，自知罪责难逃，惶惶终日，不知所为。节度副使李行素头脑还较为冷静，他知敌人会来包围，忙带领众人修栅栏，挖壕沟，作防守准备，刚刚作完这一切，南诏兵已将官军团团包围。

这期间，将士们又作好了突围准备，请求乘夜色分兵出击，袭击敌营，康承训不同意，后经天平军小将争之再三，才勉强答应。当夜，天平小将率三百勇士，悄悄出城，各处放火，尽烧敌营，乘乱杀敌五百多人。蛮众遭此袭击，阵容大乱，慌忙解围逃走，这时康承训又派军队追击，又杀了三百多个南诏的追随部族士卒。战后，承训立即向朝廷报捷，夸口说自己率军大破蛮众，朝廷大喜，中外皆贺。四月，为嘉奖承训破蛮之功，朝廷加封他为检校右仆射，其余受赏获功的人，都是康承训的子弟及亲信，而功劳最大的天平小将却一级未能升迁，军中将士怨言沸腾。

七月，西川又奏报，大败南诏，蛮族首领杜守边率众投降朝廷。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对康承训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为主持公道，便将实情原原本本上书宰相，康承训也自知理亏，作贼心虚，多次上书以疾辞职，于是朝廷令他为右武卫大将军。命容管经略

使张茵接替他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这时，南诏知邕州府军空竭，入侵无利可图，便不再入寇，张茵也久久不敢出兵进取安南。

因张茵怯弱不称职，夏侯孜便力荐骁卫将军高骈接替张茵。高骈是高崇文之孙，能征善战，高骈至治所，尽收张茵之兵。

咸通六年夏五日，南诏又入犯嶲州，当地土族两林蛮开城门降敌，南诏军将官军士卒杀了个干净，刺史喻士珍被迫投降。喻士珍为人贪婪残忍，利用职权肆意掠夺两林蛮民众，众怒难犯，故有今日之祸。

七月，高骈在海门组建训练军队，未发动攻势。宦官监军李维周素来与高骈关系不好，希望高骈失败，便不怀好意屡屡催促高骈出战。高骈无奈，只好率五千人先过河出战，约定好随后李维周即发兵接应。谁料高骈出兵后，李维周竟不发一兵一卒接应，坐观高骈之败。九月，高骈军至南定，正值峰州蛮众近五万人忙着收获庄稼，高骈军犹如自天而降，蛮众大乱，官军大获全胜，还缴获了大批粮草补充军粮。

咸通七年春，朝廷令原河东节度使刘潼任西川节度使。南诏上次进犯嶲州之时，东蛮浪稽部曾力助南诏，致使南诏军屠城，尽杀百姓。卑笼部族人很多死于此祸。卑笼部为报父兄之仇，便诱导忠武军戍兵袭击灭掉了浪稽部。自此以后，南诏更加怨恨官军。

不久，南诏派清平官董成至成都拜谒原西川节度使李福，李福隆重接见。按照惯例，南诏使者拜见节度使，应拜伏于庭。然而这次董成自恃强悍，拒不行此礼。于是双方就礼节一事，从早上至中午一直争议不决，李福大怒，令将士们将董成一顿痛打，枷索狱中。刘潼至西川后，得知此事，忙下令将其放还。

高骈进击南诏军，屡屡获胜，捷报送至海门李维周处，李维周出于忌恨皆藏匿不报，结果一连几个月朝廷得不到高骈的消息，懿宗奇怪，便问李维周是怎么回事，李维周便诬告高骈驻军峰州，

玩军不进。懿宗闻听大怒，立即下令让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同时召高骈还朝，准备重重处罚。这时，高骈正率军与南诏军苦战，最后将敌军团团包围于交趾城中。

高骈军围交趾十多天，城中蛮军已陷于绝境，交趾指日可下。正在这关键时刻，高骈接到王晏权的军牒，得知王晏权与李维周已从海门发大军前来赴任，高骈便将军队交给部下韦仲宰带领，自己带几百随从北归。当交趾大捷之时，高骈、韦仲宰分别派使北上报捷，二位使者行至中途，忽见海中旌旗一片，一探问，方知是新任经略使与李维周的船队，二人怕维周又扣压捷报，便藏匿于岛中，待船队离去，才出来直奔京师报捷。懿宗得捷报大喜，下令仍由高骈镇守安南，高骈行至海门返还。

王晏权为人懦弱，李维周贪暴，众将士不服从听令，于是军心涣散，交趾之围自行瓦解，蛮众逃亡过半。高骈回来后，又重新组织将士攻城，大获全胜。杀了三万余众，南诏军逃去，高骈又灭二支依附于南诏的土酋，杀其酋长，众土蛮见状归顺的有一万多人。

十一月，懿宗下令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自保守疆域，不得自行攻打南诏。并令刘潼告知南诏方面，如答应与朝廷重修旧好，既往不咎。自李涿侵扰群蛮导致南诏为患至今将近十年，才算暂作平息。

咸通十年，南诏派使者杨酋庆来西川对节度使刘潼释放董成以示感激。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想激怒南诏人寇以邀功，便借故杀掉了酋庆。李师望为人贪婪残暴，私聚百万钱的财货，戍卒们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欲生吞了他，朝廷见状，忙以太府少卿接其任。谁知新任的窦滂贪婪残虐更胜李师道一筹，军心更加涣散，因此敌寇未至而定边军已自困。

十月，南诏酋龙又反，倾全国兵力大举人寇，大败官军。十一月，进犯嶲州，定边都头安再荣率众抵抗，与蛮军隔大渡河相

射九日八夜，蛮军又分军至沐源川，窦滂派兖海将黄卓率五百军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十二月十四日，蛮军穿兖海军服装，伪装成黄卓部下败卒，呼船过河，对岸官军以为是自己人，将他们渡过河后，才发现不对劲，然而为时已晚，蛮兵攻陷犍为，焚掠陵、荣二州，接着攻陷嘉州，官军溃不成军。

定边军节度使窦滂自率大军拒守大渡河。南诏骠信酋龙派使者假意请和来麻痹窦滂，窦滂果然中计，未作防范。正值他与南诏使谈判之时，外面忽报蛮军渡江而至，官军仓皇抵抗。窦滂知败局已定，罪责难逃，竟在军帐之中上吊自杀，被将领苗全绪及时发现，救将下来后，便弃阵单骑逃走。苗全绪、安再荣等率众继续抗敌。但寡不敌众，难以取胜，这时几个将领商议道："敌众我寡，若天明再战，决无生路，不如乘夜晚袭击，扰乱敌军，方可退敌。"于是众人趁夜潜人敌营，乱箭齐发，蛮众大惊，官军乘乱撤离。不久蛮军又攻陷了黎、雅二地，杀戮抢掠一路，军资都没于蛮军之手。朝廷令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兵援助。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民众闻听蛮寇将至，纷纷逃往成都。节度使卢耽与前泸州刺史组织军民修建防御工事，选择将校，修缮兵器，训练士卒，严密警戒，作好应战准备。又以高官厚赏召募壮士组建敢死队，应募者云集。

庆复鼓动士卒道："你们都是军人子弟，年轻勇猛善战，和平时期难以进取，今日蛮敌人犯，正是你们立功建业谋取富贵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众人听后皆欢呼雀跃。庆复又会众人各试所能，从中选出精壮三千人，号称"突将"作为克敌主力。

正月初五，南诏军至眉州。卢耽派使节持书见南诏权臣杜元忠，打算与其约和，未成功。南诏军至新津，进人定边的北部边境。卢耽又派使致书于杜元忠，问其来意，与此同时，派人向朝廷告急，建议与之和谈，以解一时之患。于是，朝廷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主持和谈之事。因卢耽恭谨有礼，蛮

军延缓了进攻，为成都军民争取了时间，借这一时机，成都城的守备工作大致完成。

正月十一日，南诏军长驱北上，攻陷双流。十七日，卢耽又派使求见杜元忠，杜元忠态度傲慢，语言狂妄，声称酋龙欲留住蜀王厅，和议不成。

正月二十日，蛮军攻到成都城下。前一天，卢耽已派人致汉州搬救兵。此时，已有兴元军六千、凤翔军四千集结汉州待命。正值窦滂率残兵四千也逃至汉州，他自知失地罪责难逃，便希望成都也失陷以分担责任，故而每每阻止援军南下，每有军队北来，他便恐吓道，蛮军胜过官军几十倍，官军长途疲惫，最好不要前去送死。将领们听信了窦滂之言，都犹豫不敢南下增援，此时蛮军攻势更紧，成都军民舍命抵抗，盼援军望眼欲穿。

二月初一，蛮军从四面以梯攻城，城上守军用钩子将梯子钩近，再以火油烧之，攻城蛮军全被烧死。卢耽又命将领乘机率突将出战，杀伤蛮众二千多人。又烧掉攻城器具三千多。蜀人本性怯弱，可这些突将勇猛无敌，一由于庆复的激励，二由于厚赏的引诱，因此人人思战，渴盼立功，未被选中出战者皆郁郁不愤。过了几天，蛮军又想出新花招，他们拆毁民家篱笆，用水浸湿弯曲如蓬状，人藏其下，以此为掩护攻城，石矢不能伤，火不能烧，庆复又率民众熔铸铁汁，浇于篷上，攻城者再次失败，死伤惨重。

二月初三，支详遣使与蛮军约和。初五，蛮军收兵请和。初六，蛮军遣使迎支详。颜庆复自恃援军将至，便对蛮军使者质问道：你本应受诏在定边约和，如今你军包围成都，与诏书旨意完全背离。而且朝廷同意约和，是希望你不再进犯成都，而如今矢石昼夜相攻，这就是和吗?”蛮军见官军和使未至，又重新攻城。直至初九，城中兵将冲杀出来，蛮军方退去。

当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采用招抚南诏以抗拒吐蕃的政策，南诏人不会制兵器，韦皋便令汉人工匠教其制作，久而久之，蛮族

中甲弩兵器皆精利起来。其中有东蛮三部与唐友好，出兵协助韦皋破吐蕃立有大功，韦皋离去后，地方官吏对待其极不友善，遂生怨唐之心。南诏反叛后，东蛮归附南诏，常助南诏寇边，每逢捕获唐人，必定虐杀泄恨。

朝廷因失地之责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统领援蜀诸军。二月十一日，庆复至新都，蛮军拒守。十二日，庆复大败蛮军，杀二千多人，几千蜀民争相以木、石、刀、棒参战，协助官军，喊声震野。十三日，蛮军数万骑兵又到，正巧宋威率二千忠武军来到，诸军会战，大败蛮军。杀五千多人，敌军退守星宿山。

这时蛮军又派使者至支详处请和，支详提出，必须先解围退兵。蛮使回去后，并未解围。城中人消息断绝，不知援军是否来到，但见蛮使数次请和，便知援军必然获胜了。蛮军知官军援军已近，便更加紧攻城，君主以下全部参加战斗。二月十八，援军来到，与蛮军大战，蛮军败阵。当晚，烧掉了攻城器具后逃走，至天明官军方才发觉。

开始，朝廷令颜庆复出兵救成都，令宋威驻屯绵、汉州为后继。宋威为抢头功，先乘胜攻至城下，立了大功，庆复便心中不快。蛮军逃走后，宋威欲率军追击，庆复却夺了宋威的军队，强令其回汉州，使蛮军得以逃归，蛮军狼狈不堪，一路之上，甲兵、器物尽失。

颜庆复在退敌之后，便教给蜀人修瓮门城，护城河等城防工事，蛮军自知蜀中有备，从此后不再进犯成都。

咸通十四年，南诏又寇犯西川、黔南，黔南经略使秦匡谋抵抗不过，弃城而逃。被荆南节度使杜悰斩首，籍没家资。

僖宗乾符元年（874 年）十一月，南诏又寇犯西川，作浮桥渡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率军待蛮军渡至河中便发兵攻打，蛮军大败，断桥而逃。蛮军为渡河，让中军多张旗

帜，吸引官军的注意力，而令上下二军分别至上下流二十里处，乘夜偷渡，至天亮全部过了河，乘官军无备，袭击了官军营地，夹攻黄景复军。景复力战三日后，假装败走，于中途设下三道伏兵。蛮军不知是计，皆尽精锐追赶，至蛮军来到，伏兵齐发，蛮军大败，被杀二千余人。蛮军逃归途中，适逢国内援军来到，于是新旧军会合，回头再次进犯大渡河，与唐军隔水相望。为麻痹官军，蛮军假意求和，又派军从上下流偷偷渡河，蛮军过河后又与黄景复军连战几日，西川援军迟迟不到，而蛮军越来越多，景复寡不敌众，最终溃败。

十二月，南诏军乘胜进犯黎州，黎州失陷。蛮军进人邛崃关后，接着攻打雅州。大渡河残兵败将奔入邛州，惊扰了民众。成都百姓争相入城或逃奔他州。杨庆复组织军民在城中严阵以待，工事、沟堑更加坚固。这时，南诏君酋龙派使节授书节度使牛丛："我并不敢寇犯大唐，只不过想借道入见天子，以申几十年来为谗人所离间的冤情，如蒙天子体恤，当与大唐永敦邻好，此次借道，只想在蜀王厅留住几日，随即东上。"牛丛生性懦弱，又被南诏的谎言迷惑，本想答应。但杨庆复认为万万不可，于是斩了南诏使者，只留下随从二人，让他们带上回信回南诏，信中历数南诏之罪。牛丛惧怕蛮军到，便提前烧毁了城外的民房，蜀地百姓苦不堪言。朝廷又下令河东、山南东道等道军队人援西川。

乾符二年春正月，朝廷任命高骈为西川节度使。高骈行至剑州，便派人先至成都打开城门。有人劝高骈："现在蛮军逼近成都，大人离成都还远，万一他们发生冲突，怎么办?"高骈笑道："当年我在交趾破蛮军三十万，令蛮众闻风丧胆。如今听说我来，只怕逃命都恐不及，哪个敢再进犯成都！再说如今天气渐渐转暖，几十万人聚居城中，脏污拥挤，必定形成瘟疫，因此放民众出城刻不容缓。"使者至成都，打开城门，百姓争相出城，各复其业，守城士兵也解掉甲胄，民心大悦。蛮军这时正攻打雅州，闻听高骈

来，果然停止进兵，派使前来求和，退兵而归。高骈又奏报朝廷，将各道援军陆续遣还。

高骈一到成都，便发兵五千追击南诏军，一直追至大渡河边，大获全胜，单酋长就捉了十几个，全部斩首。重新修复了邛崃关、大渡河城栅，又在蛮夷入蜀要道上建了两个小城，各派几千士兵戍守。高骈又以大渡河失守之责问罪，腰斩黄景复以正军纪。自此之后，南诏不再入寇。高骈又要求率六万大军进击南诏，朝廷不准奏。

乾符三年春，南诏派使者至高骈处请和，同时又不断骚扰边界。高骈怒斩其使者。这时，南诏又将当年进犯交趾时俘获的安南经略判官杜骧之妻李瑶送回。李瑶并带给高骈一封南诏的书信，信中语辞极为傲慢。高骈回信，历数其辜负历代圣恩之罪，并以安南、大渡河的惨败羞辱南诏。

十月，高骈打算修建成都的外城，便让僧人景仙规划，周长二十五里。高骈令县令募人修筑，明令官吏收取贿赂百钱以上者处死，严令取土时不得毁坏农田，从役之人十天一轮换，百姓十分满意。因此修城时，不用官吏督促，人人卖力，只用了两个月，外城便修好了。修城期间，为了防止南诏侵扰。高骈又派僧人景仙入南诏，游说酋龙归顺，南诏人笃信佛教，闻高僧前来，酋龙果然率百官出迎。景仙以许配公主为饵，说服酋龙归附大唐，酋龙果然动心，二人便商议各种礼仪，拖延了不少时间。高骈又扬言将要巡边。烽火朝夕不息，实际上并未出行。蛮众不知是计，终日惊恐，因此直至成都外城修好，边境都平安无事。

自酋龙继位南诏君以来，为患边疆二十多年，双方都感疲弊，乾符四年，酋龙卒，其子法立，谥酋龙号为景庄皇帝。法嗜好田猎、宴饮，不喜处理政事，因此国政全部委任于大臣。改元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自号大封人。

闰二月，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奏报南诏派使请和，朝廷许其

和，并将部分戍兵遣还。

乾符五年夏，南诏派贵族赵宗政来请求和亲，同意称弟不称臣。僖宗召集百官商议此事，礼部侍郎崔澹等表示：南诏骄妄无礼，高骈等人派僧人诱其使前来，不识大体，如果同意其请求，只恐怕垂笑后代。高骈闻知此言，便上表与其争辩，僖宗无法决断谁是谁非，结果不了了之。

五月，辛谠又派摄巡官贾宏等出使南诏。

十二月，赵宗政归南诏。

乾符六年春正月，贾宏等人未至南诏，相继死于途中，从者亦死亡大半。这时，辛谠又患了风痹之病，不能行动。他召来摄巡官徐云虔，拉着云虔的手呜咽道："我已奏报朝廷遣使入南诏，不料使者相继亡故，我辈既为官就要思报国。不知你愿意为使继续入南诏吗？谠不能行动，无法拜谢了。"云虔非常感动，当即表示：士为知己者死，自己为辛谠所提拔，一直恨无缘报恩，此次定当从命。辛谠闻听大喜，忙令人为其准备行装。

二月，云虔一行来到南诏都城善阐城。只见几十骑簇拥一绛服少年，经介绍方知他就是南诏王法。法接受了副使的下拜。

南诏王派二臣至云虔处道："贵府要求我王称臣，奉表贡献方物。如今我国已派人入见唐帝。与唐天子约为兄弟，不成就为甥舅，兄弟甥舅之间，书信金帛就足够了，哪用得着奉表贡方物！"云虔正色道："王是景庄之子，景庄帝的兄弟是王的叔父，然而如今王为君，叔父们仍为臣，叔父且如此，更何况王的兄弟与甥舅！王之先人，受大唐的恩助，才合六诏为一，其恩泽深厚，岂可忘怀，如今双方偶有小冲突，责任全在边防守兵。如今王欲与唐修旧好，不可违背祖先的旧制。顺从祖先是孝，事奉大国是义，停息战争为仁，恪守名分为礼。四者皆备即为德，王难道不应努力作到吗？"南诏王因有诚意修好，待云虔等人很友好，但仍然不答应奉表纳贡称臣。

广明元年（880年）春三月，朝廷令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代替崔安潜。

南诏使赵宗政回南诏之后，崔安潜曾上书朝廷支持崔澹不与南诏修好，理由是："南诏是个小蛮族，仅仅占云南一郡之地，如果朝廷派使前去请和，蛮族必定以为中国怯弱，如果他们再得寸进尺要求娶公主，就不好拒绝了。"僖宗不好决断，令群臣们商议。宰相卢携、豆卢瑑素与高骈友善，都力主和蛮之议。二人先后上言："大中年之末，库府充盈。自咸通以来，南诏多次进攻，致使上下疲弊，府库空竭，十几年来，租赋大半无法人京师，士兵多死于瘴疠，百姓困沦为盗贼，都是蛮人入侵之故。前年冬，因赵宗政求和未归，去年冬，因云虔为使人诏，南诏未来进犯，说明唐与南蛮和好有望。如今安南军队有乱，士兵多半逃亡，邕管客军又减少了一半，如果不与其修好，今冬蛮寇前来，如何抵御？因此臣认为，应该派使回访，这样即使蛮君不答应奉表称臣，也会减轻敌意，不致于大举人寇。"僖宗认为言之有理，便令节度使陈敬瑄通知南诏，朝廷同意与南诏和亲，亦不强迫其称臣，另外增赐金帛。同时，令李龟年为宗正少卿作正使，徐云虔为副使，人南诏传达朝廷旨意。

中和元年（881年）秋，李龟年等自南诏返还。南诏王上书表示，一切遵从诏书所言。

第二年，南诏上书要求和亲，朝廷以正在商议礼仪婉言回绝。

中和三年秋，南诏派使杨奇肱前来迎娶公主，朝廷令陈敬瑄以"帝出外巡幸，礼仪物品未备，待帝回长安，再出嫁公主为由再次推托。"可是奇肱不肯答应，朝廷无奈，只得于当年十月，封一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出嫁南诏，自此边患稍息。

（朱柳郁）

参考资料：

《新唐书·南蛮传上、中》
《通鉴纪事本末·蛮导南诏入寇》
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
《旧唐书·南蛮传》

裘甫起义

唐代后期，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课役不均，政治黑暗，促使唐末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封建国家苛刻的掠夺压榨，地主对农民土地的疯狂兼并逼得农民无以为生。浙东地区本是富庶之乡，唐代自宣宗起，就将这一地区作为财富的重点搜刮地区，因此浙东地区民众受到的盘剥压榨较其它地区更加严重，而浙东地区又是唐政府军事力量的薄弱地区，军队数量少，且士兵久不习战，没有什么应变能力，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唐末农民起义首先在浙东地区爆发。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 年)，宣宗去世，懿宗即位。正当朝中忙于宫廷皇位更迭的时候，民间起义的风暴已经形成。当年(859年)十二月，裘甫率先在浙东起事，攻陷了象山。官军无备，屡为裘甫所败，明州(浙江宁波)城门昼闭，只能采取守势。裘甫军约一百多人进逼剡县(浙江嵊县)，震撼了浙东。浙东观察使郑祗德匆忙派讨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领兵三千与台州军一起前去镇压。

懿宗咸通元年(860 年)正月，刘勍、范居植在桐柏观(浙江天台山)被裘甫击溃，范居植败死，刘勍只身逃跑。十四日(乙丑)，裘甫乘胜率众一千余人攻克剡县，开府库，募壮士，部队很快扩大到数千人，震动了越州。

郑祗德兵力不多，所剩军队不足三百人，加上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武器也多朽钝不堪。为了应付眼前的局面，郑祗德 急忙招募新兵，补充兵员，但由于军吏腐败，借机受贿，招募来的大都是病弱

的男丁，根本没有战斗力。郑祗德顾不得这些，再派沈群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等率五百新兵进击裘甫。二月，双方在剡县城西接战。这里有三条溪流，裘甫在三溪之北布阵迎敌，在三溪之南暗设伏兵，并在溪流上游加以壅塞，使下游溪浅可涉。开战以后，裘甫佯败，诱官军尾追。在官军涉越溪水时，上流决壅，溪水涌来，冲垮了这支队伍，沈君纵等三将全部战死，官军几乎全军覆没。

从这以后，裘甫的影响迅速扩大，军队扩充到三万人。这三万人分为三十二队，其中的小帅以刘暀最有谋略，刘庆、刘从简最有勇力。裘甫号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的印文是"天平"。农民军屯聚大批粮食财物，召募上等工匠，修治军械，声震中原。

郑祗德作战无能，连连上表告急，又向邻近的官军求援。浙西军派牙将凌茂贞率四百人、宣歙军派牙将白琮率三百人前来支援。这两支军队开始屯驻外城及东小江一带，后来风声吃紧，进驻城内。郑祗德怕他们不肯出战，发给的军俸极为优厚，比度支规定的多十三倍，而这二军将士仍嫌给得太少，他们要求以当地军队为前导，去和农民军作战。几位将领为了避战，有的称病，有的假装骑马跌伤，制造出种种理由；答应出战的将领先在军职、勋级上提出条件，作为出战的前提，满足了这些条件后，他们还是不出兵。农民军的游动骑兵已经到了平水东小江，城里的人准备好舟船存放粮食。夜坐待旦，随时准备逃命。

鉴于郑祗德的怯懦无能，朝廷商议选派武将撤换他。有人提议前安南都护王式担当此任，得到几个宰相的认可；于是，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征郑祗德为太子宾客。

三月，王式入朝奏对，懿宗问他："讨贼有何方略？"王式说："只要兵多，就能破敌。"站在一旁的宦官说："军队征调太多，国家负担不起。想办法少出兵，减少军费才是道理。"王式辩解说："兵少了怎么能打赢？浙东邻近江淮，局面拖长了，如果影响到江

淮，造成交通断绝，那么，上自帝王的庙俸，下及十军的开支，都成了问题。那时损失就不是一点点军费的问题了。”懿宗表态说：“应该给他派兵。”于是下诏征发忠武、义成、淮南等几道兵，交由王式统领。

裘甫抓住战机，进略衢州、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率兵在险要之地拒守，农民军一时无法攻人。这样，他们分兵转进明州。明州也作了固守的准备，营栅、沟堑都已修好，主要桥梁都拆毁了。裘甫派兵攻台州，破唐兴。三月十九日（己巳），裘甫亲率一万余人进掠上虞，放火烧城。二十三日（癸酉），农民军攻入余姚，杀死县丞、县尉，然后东破慈溪、进人奉化，抵达宁海，占领了这一地区。接着又分兵包围了象山。

刘暀在一次饮宴中提出了一项战略计划。他说：“我们有这么多军队而没有一个长久的打算实在太可惜了！听说最近王式率兵前来。不出四十天就到这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赶在前面作安排，我的意见是赶快带兵攻取越州作为根据地。然后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与官军对峙。只要我们守住西陵（浙江萧山西）就可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还应征集舟舰，谋求发展。有机会就进取浙西，进而跨过长江，掠取扬州的财富充实军用。那时石头城（江苏南京）就成了我们的据点，长江就成了我们的防线。这个局面一形成，宣歙、江西方面肯定会有响应，形势会很有利。我们的方针应是沿着海边向南发展，割据江南，袭取福建。这样，向朝廷提供贡赋的主要地区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只怕子孙们守不住，我们这一辈子保险不会受制于人了。”裘甫敷衍道：“今天大家都醉了，有事明天再商议。”刘暀看出裘甫不以为然，很不满意，假装吃醉酒提前离席。农民军中有个进士叫王辂，裘甫把他当贵客看待。王辂对裘甫说：“刘暀出的主意，一言以蔽之，是孙权偏安江东的一套作法。孙权乘天下大乱，所以能割据江东；如今时代不同，国家没有乱子，这个办法不大容易行得通。不如保持军力，凭

有利地形，加强防守，平时陆耕海渔，形势危急就逃入海岛。这是审时度势的万全之策。”裘甫在战略选择上犹豫不决。

四月中旬，王式来到越州城。接收权力后，为郑祗德设置酒宴，说："今天开始由我主持军政，我不能饮酒，监军陪着各位宾客尽情畅饮，大家一醉方休。”到了晚上点燃蜡烛，继续酒宴。第二天，在远郊为祗德饯行，再次畅饮而归。从此严明军令。这是王式采用的恩威并施的手法，笼络了一批人，也慑服一批人。说军饷不足的人，要求提升职务的人都不作声了。称病居家不出的人病都好了。

裘甫别帅洪师简、许会能率部下向官军投降。王式利用这支部队，要他们作攻打裘甫军的先锋，并许诺如果作战有功，就向朝廷报告，授予官职。

在此之前，裘甫的探子经常出入越州城。军吏们把探子藏起来，还供给他们饮食，因为这些军吏脚踩两只船，为自己安排后路，他们与裘甫暗有联系。为求城破之日保全家属能免一死；有的故意带领农民军将领来假投降。真实目的是窥探城中的虚实，城中密谋私语农民军都能知道。王式知道后，访察到农民军探子就抓起来杀掉，还查办了一些将吏；同时控制起城门的警卫。如无证明，就不准出入，夜晚的城防出入尤其严格。这样一来，农民军很难象以前一样洞悉官军的行动。

王式为了收买人心，命令各县打开粮仓，赈济贫民。

官军缺少骑兵，机动性差。王式要人从观察使府的簿籍中查兑放逐到江淮一带的吐蕃人和回纥人；这些人长期离开家乡，在新的环境中受到歧视，生活相当困苦。王式把他们收为骑兵。为了让吐蕃和回纥人拼死效力。王式作出姿态，除了先加犒宴之外，还周济他们的父母妻子，让他们感激涕零，由此收得一百多骁健壮士。后来用同样的方法又征来不少吐蕃、回纥骑兵。

准备好骑兵之后，又整顿土团。越州城没有防守的军队，便

著籍了一千多人补充土团。接着命令宣歙军将白琮、浙江军将凌茂贞率本军，北来将领韩宗政等率土团，合起来约一千人，由石宗本率骑兵为先导，从上虞疾奔奉化，为象山解围，号称东路军。又派义成军将白宗建、忠武军将游君楚、淮南军将万璘与台州唐兴军合在一起，号称南路军，准备与农民军作战。

与此同时，农民军却无所作为，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明显地朝不利于农民起义的方向转化。

四月二十三日（癸卯），南路军攻陷裘甫设在沃洲（越州境内）的军寨。二十四日（甲辰），又陷剡县境内的新昌寨，击败农民军将毛应天，进抵唐兴。

五月，双方交战，官军东路军在宁海得手，农民军连连受挫，官军南路军在唐兴南谷连败刘暀、毛应天。毛应天被杀。

就在农民军接连失利的时候，朝廷派遣的忠武、义成、昭义三支军队又来到越州。忠武军将张茵屯驻唐兴，切断了农民军南出的道路，义成军将高罗锐及台州土军赶来与裘甫主力决战，昭义军将跌跌戣及东路军切断宁海进人明州的道路。当月十九日（庚申）起义军在海游镇严重受挫，退人甬溪洞。立刻被随后赶来的官军包围，困在洞中的人无法突围。第二天，官军将领高罗锐又袭击了裘甫别帅刘平天的兵寨。至此，农民军先后十九败，处境困难。刘暀对裘甫说："以前要是听我的意见夺取越州，怎么会有今天的窘境！"王辂等几个进士仍在农民军中。刘暀一怒之下，把他们全杀了，以发泄一腔怨愤。

高罗锐攻克宁海，收聚从裘甫那里逃散的民众，得七千余人。他们估计农民军将人海转移，便在海口设置了军队，用水军巡海。农民军未曾料到水军拦截，弃船进人深山。

裘甫失掉宁海，率众屯驻南陈馆，还有一万多人。二十九日（戊寅），浙东东路军在南陈馆围攻裘甫。裘甫损失数千人，遂于六月帅余部自黄罕岭逸去，转人剡县，为了拖延官军的追击，裘

甫沿途丢掷缯帛，诱官军拾取。六月，裘甫率领余部回到郯县。

官军对裘甫的去向，茫然不知，四处打听不到消息。后来抓到一个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裘甫军的下落。在裘甫人据郯县的第二天，官军赶到。六月十二日（辛卯），官军包围了剡县城。城中防守极为坚固，双方形成对峙。官军谋议断绝溪水，使城中失去水源，逼裘甫出城交战。其后，三天双方交战八十三次，农民军损失严重，官军也打疲了。

裘甫派人与官军约降，实则争取时间休整，准备再战。后来又交战三次，裘甫军连连失利。最后裘甫、刘昨、刘庆以及一百多随从人员出城投降。他们隔着一段距离与官军将领对话，但在离开城门几十步后，官军突然插人，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裘甫等人束手被擒。二十三日（壬寅），裘甫等被解送到越州；王式把刘昨、刘庆等二十余人腰斩，把裘甫囚送到长安。

剡城还在农民军手里。裘甫却已被俘，官军见城中群龙无首，不再设防，刘从简率五百壮士突围逃去。诸将追至大兰山，刘从简在此据险防守。七月九日（丁已），刘从简失去最后阵地。台州刺史李师望诱募农民军残部以杀捕别的农民军士兵为自赎的条件，先后招诱了几百人，有人把刘从简的首级献给李师望 。至此，历时八个月的浙东农民起义遂告失败。

八月，裘甫被解送长安，在东市处斩。

这次农民起义本来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因裘甫在有利的时机未能采取积极进取的方针给了唐朝调整力量的时机。当王式组织政治、军事力量的同时，裘甫却无所作为，听任敌对力量的发展，终于形成不可逆转的敌众我寡的局面，失败成为不可避免。

唐朝镇压了裘甫起义，并没有使社会基本矛盾得到调整。八年之后，终于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徐宿农民起义。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50

《通鉴纪事本末》：《裘甫寇浙东》

庞勋起义

唐代后期，不断发生与南诏的战争。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南诏攻占交趾（越南河内西北），唐募徐泗兵三千人赴援安南，分其中八百人戍守桂州（广西桂林）。戍卒的家属留在故里的冻馁恓惶，盼亲人早归。戍守岭南的士兵在艰苦的生活中更是想念故乡。按照规定戍卒三年就可以换防回乡，但到咸通九年七月，戍卒已远戍六年，而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仍要他们再戍一年。戍卒怨愤，无法忍耐，终于推庞勋为都帅，杀都头王仲甫，发动起义，自行北归。

徐州一带风土雄劲，甲士精强，王智兴在徐州时，曾招募二千多强悍的壮士，号称银刀军、雕旗军、门枪军、挟马军等七军。王智兴日常用其中的三百多人作自己的警卫，给予特别的待遇。后来的节度使大都是儒臣，不象王智兴那样能管束银刀军，倒是银刀军时常闹事，令节度使难堪。朝廷了解这个情况，改任手腕强硬的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

这是咸通三年，王式刚刚镇压了裘甫起义。由王式带到浙东的忠武、义成二军尚未回镇。懿宗下诏要王式带着这二支军队去徐州赴任。王式来到徐州接管政事后第三天，犒享两镇将士，让他们马上回到本军，换上衣甲，迅速把骄兵包围起来，杀个干净。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一同被杀。

八月二十八日（甲子），下诏说，建立武宁一道的本意是钳制淄青、光蔡。自从平定了淮西，增出武宁这一道反而成了叛乱的

根源。所以将徐州改为团练使，隶属兖海节度使，并把濠州划出，归淮南道管辖；同时在宿州设宿泗都团练观察使。原来的士兵留下三千人驻守徐州，其余分别隶属兖州和宿州。任命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责成王式和监军杨玄质分配将士去留，待将隶属兖州、宿州的将士全部派发完毕，再将忠武、义成二道兵带到滑汴，遣回本道。逃藏的银刀军将士，允许他们在一个月内自首，一切不再追问。

咸通九年，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听信都押牙尹戡的主意，以为军府空虚，派兵换防花费太多，要把已经戍边六年的戍卒再留戍一年。

桂州戍卒获悉这个消息，立刻炸了营。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以前都是徐州的草莽英雄；州县无力讨伐，把他们招抚过来，补为牙官。这时桂管观察使李丛移官湖南，新观察使还未到任。许佶等杀死都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头领，抢了武器库的兵器，自行北归徐州。朝廷知道这消息，派内侍省高品张敬思表示，不问他们擅自北归之罪，愿意分批把他们送回徐州。戍卒这才停止骚掠。

庞勋等带着队伍来到湖南。监军用计诱庞勋将武器衣甲交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派兵严守要地，监视他们沿途的行动。徐州戍卒不敢入境，乘船沿江东下。许佶等人商议说：“银刀军的下场很惨。我们比银刀军的作法还过分，朝廷所以赦而不问，是考虑到我们或沿路劫掠，或溃散四方，有棘手的问题。如果回到徐州，会对我们采取什么措施，那就难说了。现在应该先下手为强！”于是各人拿出自己的钱制造衣甲、武器、旗帜。过了浙西，进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怕他们闹事，派使者前去慰劳，供给粮草。

都押牙李湘对令狐绹说：“徐州戍卒擅自北归，肯定要作乱。藩镇大臣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也能根据临时出现的事态作出必要的决定。淮南有地形之利，高邮两岸高峻而江水深狭，在

这一带伏兵袭击，肯定可以将他们全部抓获。不然，让他们渡过淮河，回到徐州，与当地早已不满的军众结合在一起，再发生军变就难以解决。”令狐绹说：“他们在淮南没有暴力行为，就让他们自由通过，别的事我们管不着。”

庞勋招集逃藏的银刀等军士及各色逃亡人员，多至千人，藏在船中。九月二十七日（丁巳）来到泗州，刺史杜慆在毬场宴请庞勋，由戏子在宴会上致辞，徐州兵认为这是拿他们开玩笑，抓住戏子要杀，满座皆惊。杜慆事先有准备，徐州兵不敢乱来。

庞勋避开官军主力，利用藩镇割据的有利形势，于九月顺利地到达徐城县境。以前朝廷为了安抚庞勋，不让他产生疑虑，曾派使者频繁奔走于道路，传达朝廷释而不问的宗旨。庞勋为了稳住朝廷也一再呈报文状，言辞礼仪非常恭谨。到了徐城后，庞勋和许佶等人才把真实意图告诉大家。他说：“我们自行回来，是因为想念亲属，并不想造反。现在听说徐州军已经接到皇帝密诏，到了徐州就要把我们支解灭族！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被天下耻笑，何若大家戮力同心，赴汤蹈火，干他一场！城中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城外一招呼，他们在城内一定会响应，我们会成功的！”大家跳起来叫好，但也有赵武等十二人担忧害怕，打算逃跑。庞勋把他们抓起来，全部杀头。又派人把十二人的首级封装起来，送给崔彦曾，还写了申状，说：“庞勋等远戍桂州六年，大家非常怀念故里，赵武等十二人利用大家的思乡心理，萌生奸计，图谋不轨。将士们发现已经受骗，决定诛杀首恶分子，弥补过失，现将赵武等人的首级送来，望鉴察。”十月，庞勋使者携首级来到彭城，崔彦曾把他抓起来严厉审问，得到真实情况，于是把他囚禁起来。庞勋见计谋败露，只好又一次通过邮递传送申状，这一次说：“将士们身负罪过，各怀疑惧，现在已到了苻离，但是还不敢脱下衣甲；主要是因为军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狡诈多疑，对我们似乎有想法，希望将这三人停职，以安军心。”

这时戍卒距彭城仅有一百二十里路，全城恐慌起来。崔彦曾忙招诸将来商议。大家哭道："近年来银刀军的凶悍名声早已远扬，消灭银刀军时冤枉了不少人，现在冤痛之声未已，看来又要出乱子，如若放任庞勋等人进城，一定会发生兵变，徐州全境又要死不少人。不如乘他们远道疲惫，主动出击，彼劳我逸，必传捷报。"崔彦曾犹豫未决。团练判官温廷皓是强硬派，他对彦曾说："得失之机，在于今日，难于下决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出击有三个不好解决的问题。第一，皇帝已经下诏赦罪，我们却擅自诛讨，这对上上下下不好交待。第二，我们的军士与城外的戍卒多有血缘关系。率父兄而讨子弟，这个仗不好打。第三，惩治起来，株连钩延，刑杀涉及的范围太大，也不好办，可是不下决心害处更多。归纳起来至少有五条。第一，戍卒擅自回家而不惩办，将来其它士兵起而效法，就不好制裁。第二，他们一路剽掠，自制衣甲武器，招纳四方亡命，不加以惩治难以维持秩序。第三，他们杀害军将，为了保证将领的权威性不受损害，也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第四，我们军中的将士都是戍卒亲属，银刀军的余党躲在山泽，如果庞勋与这二部分人联络好，内外夹攻，我们肯定吃不消，无法支撑。所以还是主动出击好。第五，最近，他们又采取威胁的方式，要军府将他们忌恨的三个将领免职，还要求单独设立军营，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驳回这些要求，他们就有了借口，一定会抢先发动进攻。我们必须抢在前面。所以虽有三个不好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早下决心为好。"崔彦曾被说动，决定使用武力。

这时城中有四千三百名士兵，崔彦曾命都虞候元密等率三千人进攻庞勋，他向士兵许诺："伐罪只及一人，决不连坐。"接着命令宿州出兵苻离，泗州出兵虹县（安徽泗县），半路截击，还向朝廷写了奏表，对擅自出兵进攻庞勋作了解释。

十月八日（戊辰），元密从彭城出发。将领们怕交起战来，伤害留在庞勋军营的朝廷使节，所以行至彭城西南三十里的任山附

近，就屯兵不进，想采取出奇不意的行动将朝廷敕使夺回。他们打算埋伏在这里，等庞勋来到任山，进入客舍休息时，突然袭击。为此，派人打扮成当地的居民，背着柴草侦伺庞勋的行动。日暮，庞勋带着队伍来到任山。他们见客舍空无一人，又没有粮草等用品，感到十分可疑，又见周围有人背柴草，派人抓来拷打，得到将被袭击的情报。于是作了一些假人放在山下，偷偷转移。到了晚上官军发现庞勋及其部队已不在这里，怕这些人在周围埋伏起来，深夜从小道来偷袭，就退回城南休息，第二天早晨才出兵求战。

这时，庞勋等已经到了苻离，戍守宿州的五百名军士在濉水边上望风奔溃，庞勋等跟着来到宿州。这时宿州刺史空缺，观察副使焦璐代理州事，城中再也没有什么军队。庞勋等未遇抵抗，顺利地进入宿州。他们把城中的财富集中起来，让百姓来领取。一天之内，四面八方的百姓云集宿州，就在这些人中选募士兵，从早晨到日暮，招得数千人，有些人是在强迫状态下当兵的。于是整军上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过了二天官军才来到宿州。庞勋守备已严，无法再攻。此前，焦璐听到苻离兵败的消息，决开汴水阻断北进的道路，庞勋到宿州时水尚浅，涉水还可趟过去，等到官军来时水已经深了。

十二月，元密带着官军渡河，准备围城。庞勋利用大风天气，用火箭射击城外茅屋，大火延烧到官军兵营。官军进退不得，向前冲遭受城上的矢石打击，向后退被水火拦住，伤亡了三百人，元密等认为庞勋一定固守城池不敢出战，只作攻城的准备。却没想到晚上庞勋让妇女打更麻痹官军。悄悄用早已准备好的三百艘大船，满载资粮，顺流而下，转移而去。

庞勋送给敕使张敬思一千匹缣，派人骑马把他送到汴州东境，放他回长安。

第二天早晨，官军发现庞勋已经撤离，深感意外，没顾上吃

早饭，慌忙追击，追上的时候，已经又饥又乏。庞勋把船停靠在堤下，在堤外列阵迎战，同时船中还留有一千人。官军追来时，列阵士兵往堤里跑。元密以为庞勋势弱怯战，纵兵追赶。不想船中忽然涌出一批人马，来势甚猛，双方力战，从午时战到申时，庞勋终是以逸待劳，将官军杀败。元密率部逃跑，跑到荷渲这个地方，跑不动了，被庞勋追上。元密及近一千名官军战死，其余士兵全部投降，没有一个人跑回徐州。庞勋向投降的士兵询问彭城（江苏徐州）的情况，知道没有设防，于是放弃了原先人走江湖的想法，准备攻打彭城。

十五日（乙亥），庞勋带兵北渡濉水，翻山奔袭彭城。这天晚上，崔彦曾得到元密兵败消息，急忙向邻道发出求救的文牒。第二天，关闭城门，召集丁壮，选募军士，匆忙守备；到处人心惶惶，没有人相信能守住城池。

隔了一天，庞勋率六、七千人来到城下，城外喧噪声震天动地。庞勋对城外的居民作了安抚，保证无所侵扰，人们争相前来归附。不到一个时辰，攻克了外城。崔彦曾退保内城，民众赶来助庞勋攻内城。他们用草车堵住城门，点火烧车，延烧城门。彭城陷落了。崔彦曾被俘，囚禁在大彭馆。庞勋将尹戡、杜璋、徐行俭剖腹凌迟，族灭了这三姓。

观察府厅里设置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文武将吏前来跪见，当天城中归附庞勋的有一万多人。

十八日（戊寅），庞勋把温廷皓找来，让他起草求作节度使的表文。温廷皓不肯，庞勋并没有处罚他，说："这么大的徐州城，还怕没有人给我起草表文！"便把他放了。

有个叫周重的人，常以才略自负，被庞勋奉为上客。周重为庞勋草写表文，称："徐州是汉高祖发迹的地方，最近因为节度使侵剥军府，刑赏失去标准，致使士兵驱走主帅。陛下取消徐州节度，解散徐州军队，军士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戍，无数人蒙受冤

枉。现在听到崔彦曾等又想杀人，将士们异常痛愤，推举臣下暂任兵马留后，统制十万军队，镇抚四州土地。臣下以为见利乘时，是帝王所为，伏请圣上赐予节度使。不然，挥戈曳戟，直趋长安。”

庞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游弈使，其它人分别补为牙职，分领诸军；同时部署旧将刘行及率一千五百人屯驻濠州，李圆率二千人屯驻泗州，梁丕率一千人屯驻宿州，剩下的要害县镇抓紧修葺城防，加强守备。徐州军民以为，起事之后，朝廷一定会妥协，不过一个来月，庞勋就能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人们纷纷从各地赶来效力献策，以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各处的草莽英雄都兼程赶来，挤满了全城，不过十天时间，徐州城里的米价腾涨到二百钱一斗。庞勋伪造崔彦曾的上表，公开散布，其梗概说：“徐州军的凶悍军士，一个一个都要杀掉，彭城等五县的愚民，应该分别流放服役。”又伪造诏书，批准了这道奏表，在境内传布。徐州人都深信不疑，归怨朝廷，说：“如果桂州将士不回来，我们都将成为官军刀俎上的鱼肉！”

刘行及来到与濠州隔淮水相望的涡口。一路上参加刘行及队伍的人越来越多，而濠州兵只有几百人。刺史卢望回事先并无准备，临时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只有打开城门，备好牛酒，出城迎降。刘行及入城后，将卢望回关押起来。按照庞勋的指示，接管刺史事务。泗州刺史杜慆获悉庞勋起义的消息，一边准备迎战，一边向江淮方面求援。受庞勋之命而来的李圆先派一百名精兵进泗州查封府库。杜慆派人假意迎劳，把这些人诱入城内全部杀死。第二天，李圆赶到，立刻派兵包围全城，城上早有准备，矢石齐发，并不出战。李圆又损失了几百名将士，于是收兵屯于城西。

泗州处于江淮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庞勋加派军队助李圆攻城，起义军已达一万余人，但一直未能攻下来。

朝廷获悉庞勋起事的消息，派高品康道伟送来诏书，进行软化。十一月，康道伟抵达彭城。庞勋出城到郊外迎接。为了显示

力量，从任山到内城沿路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声、金鼓声此起彼伏，响震山谷。城中青壮男子全都来到城上，极为壮观。庞勋在毬场设宴接待康道伟。席间，有几千人声称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来降附。这时各营又有几十人送来捷报。庞勋踌躇满志，写了一道求作节度使的奏表，交康道伟带给朝廷。

庞勋征募百姓当兵，人们为各种目标所鼓舞、所诱惑，争相赶来，以至父亲打发儿子，妻子鼓励丈夫，把锄头加工磨利，带来应募。

邻近的藩镇听到庞勋占领徐州，各自派遣军队占据要害之地，以图自保。但官军人数不多，庞勋的力量一天天地发展，力量对比对农民军极为有利。农民军作战连连奏捷，攻破鱼台等差不多十个县。人们躲到徐州和宋州交界的磨山，被庞勋部将张玄稔包围。这一年天旱，山泉枯竭，许多人找不到水而渴死。

有人给庞勋出主意，说："您要想争取节度使这个职务，应当给皇帝一点面子，多尽臣子之礼，当然还要巩固自己的地盘，安抚百姓，收聚士兵，这样才有把握。"庞勋虽然不能象这个人所说的那样，极尽臣子之礼，但在国忌的日子仍设斋焚香，犒赏士兵一定先面朝西向宫阙方向谢恩。十一月，探子送来情报。庞勋得知朝廷的使者已经人境，以为定会送来任命诏书。不想，第二天敕使到来，只是责备崔彦曾和监军张道谨失职，贬了他们的官。而对庞勋的事情只字未提。庞勋极感失望，当下把敕使囚禁起来，不让他回长安。

懿宗下诏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还给他们派发了大批人马，交由这三人指挥。康承训还要求让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自率领他们的军队随同自己行动，懿宗也同意了。

庞勋因李圆围攻泗州久攻不克，派部将吴迥接替他。十一月

十七日（丙午），吴迥再次向泗州发起猛攻，昼夜不停地攻打。敕使郭厚本率一千五百名淮南兵增援泗州，来到洪泽镇，听说泗州吃紧，不敢前进。泗州派人到洪泽请郭厚本赶快出兵，被郭厚本拒绝。第二天，吴迥加强了攻势，城中几乎支持不往，再次派人向郭厚本求援。郭厚本答应分拨五百名士兵前往泗州。

庞勋派部将刘佶率数千精兵帮助吴迥攻城，刘行及在濠州派部将王弘立领兵与吴迥会师。与此同时，救援泗州的官军也开来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午），镇海节度使杜审权令都头翟行约率四千人助泗州解围。第二天，翟行约率军赶到泗州。庞勋的部队在淮河南岸迎战，将翟行约包围。城中兵少，自顾不暇，眼看行约全军覆没，不敢出城会战。此前，令狐绹派李湘率数千人马来援泗州，与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驻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吴迥等消灭了翟行约后，乘胜包围都梁城。十二月五日（甲子），李湘等领兵出战，大败。吴迥等乘势攻陷都梁城，生擒李湘和郭厚本，把这二个人送往徐州。庞勋的部队占据了淮口，漕运和驿路都不通了。

官军主帅康承训驻兵于宋州的新兴镇。庞勋部将屯军于亳州的柳子镇，双方对峙。这时官军的各道兵马仅有一万来人开到，康承训因寡不敌众，退屯宋州。庞勋见这路官军一时不足为患，便分派部将丁从实等各率数千人，南击舒、庐，北侵沂、海，攻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还攻陷了滁州，杀滁州刺史高锡望。接着进攻和州。和州刺史崔雍自知无法抵抗，用牛酒等前去慰劳农民军，并和农民军将领一起到楼上饮酒。他命令军士放下武器，仅指认他所器重的二个人为自己的晚辈，请求保全，其余听任农民军处置。于是城中秩序大乱，发生了抢劫，八百多名和州军士被杀。

泗州断绝了援军，粮食也快吃光了，城里的人只能吃稀粥。有个叫辛谠的人，率十名敢死之士，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长斧，乘

小舟，砍坏庞勋水寨，偷出城去。他们到扬州见令狐绹，到润州见杜审权，求兵求粮。泗州音讯久绝，有传言说已经被农民军占领，四面八方已不再把泗州视为官军的一个据点。辛谠与润州接上关系后，杜审权派押牙赵翼率二千甲士与淮南道共同提供五千斛米；五百斛盐，运往泗州。泗州被困的处境得到改善。

另一路官军有三万人马，由戴可师率领。他们从北方开来，渡过淮河，转战前进。庞勋未对淮河南岸作周密防守，戴可师进展顺利。他想先夺取淮口，然后再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壬申），官军包围了都梁城。城中农民军不多，为求缓兵之计，他们在城上遥施拜礼，表示："都头们正在讨论出城投降，请城外暂缓攻城。"戴可师见大功即将告成，当日退军五里。农民军乘夜撤退，第二天早晨只留下一座空城。可师以为农民军示弱，不设防备。唾手得来都梁城的戴可师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转天大雾，庞勋部将王弘立率数万军队从一条捷径突然出现，奔袭官军。可师来不及布阵，因此大败。官军士兵或被杀死，或掉进河里溺死，只有几百人逃出去。王弘立缴获了大批器械、车马、资粮。戴可师及监军、将校的首级被送到彭城。

庞勋大喜，当下作文告，散发到乡村和兵营，宣告农民军无敌于天下。淮南士民见战事不息，纷纷逃到江南避难。令狐绹怕庞勋向扬州方面进击，派使者向庞勋致意，假称要为他向朝廷奏请节度使。庞勋便停止进攻，等待朝命。令狐绹争取到时间，迅速收聚逃散的士兵，加强了守备。

这时出入汴州的道路已被战争阻断。江、淮往来都经由寿州（安徽寿县）。庞勋消灭了戴可师后，乘胜围攻寿州。朝廷贡品及商旅财物常被劫掠，寿州的道路也被切断了。

诸道官军在宋州（河南商丘）大规模集结，徐州方面受到强大军事压力，应募的士兵逐渐减少，而各个营寨不断要求增兵。为了开辟兵源，庞勋派人到乡间搜集丁壮，补充军队。很快军队又

增加了几万人，这几万人的物资和粮草供应又成了问题。庞勋采取向富户和商人摊派的办法解决，按照财产十取七、八。有几百家因隐匿财产，逃避征敛而被全族处死。

王晏权因部众屡次败给庞勋，不久被撤职。朝廷命泰宁节度使曹翔接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讨使。

魏博节度使何全皞派部将薛尤率一万三千人攻打庞勋，曹翔把军队安置在滕县（今属山东）、沛县（今属江苏）一带，薛尤把军队安置在滕、沛以南，更靠近徐州的丰县（今属江苏）、萧县（今属安徽）。

咸通十年正月，各道军的主帅康承训在柳子镇的西面集结了七万多部队，从新兴镇到鹿塘镇之间三十里，军营连成一片。徐州兵在四境分散防戍，城中不过几千人，庞勋知道形势严峻起来。百姓们都在挖地穴，藏匿壮丁。即使派人到处搜索，一天也只能抓到二、三十人。

这时，戍守丰县的孟敬文密谋背叛庞勋，更加剧了形势的紧张。孟敬文狡悍而兵多，本是庞勋的一员干将。他自为符谶，以为得了天赐神授，可成大事，便想独树一帜，自立门户。庞勋曾派心腹将率三千人协助孟敬文防守丰县，敬文与他约好共同打击魏博军，但在这支军队与魏博接战之后，孟敬文却带兵撤退，故意让该军溃灭。庞勋当然很恼火，却佯作不知。他派使者对孟敬文谎称，王弘立已攻占淮南，庞勋准备亲自去淮南镇守，眼下徐州缺乏主将，物色的对象正是孟敬文。使者对孟敬文说："庞勋要立刻见你，准备在诸将而前提拔你。"敬文大喜，骑马直奔彭城，去接受盼望已久的职位，离城还有几里路，被等候多时的伏兵擒获。下场当然只有一个：杀头！

朱邪赤心率三千沙陀骑兵赶来，担任康承训的作战先锋。沙陀军骁勇异常，是农民军的劲敌，康承训曾在涣水之滨中了农民军的埋伏，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被沙陀骑兵救出，由此沙陀军受

到重视。康承训突围后，利用沙陀几次击败农民军。

消灭了戴可师的王弘立自淮口率所部三万余人进击康承训。咸通十年二月，王弘立的军队渡过濉水，夜袭鹿塘寨。黎明，寨子被团团包围。王弘立站在阵前观望，以为胜利就在眼前，放松了警惕。突然，沙陀军冲来，冲乱了农民军的阵脚。寨内的官军随后出击，将王弘立杀败。这一仗王弘立全军溃灭。二万多农民军战士阵亡，拉来的壮丁溃逃后不再回军营，大批粮食、武器丢弃在路上。为了分化农民军，朝廷下诏要求在战场上俘获农民一概释放，让他们回家。这一招果然起作用。自此，两军一旦相遇，总有一些不情愿的农民士兵乘机逃亡，农民军的战斗力被削弱。

庞勋、许佶因王弘立骄惰轻敌以致军败，想杀掉他。曾为庞勋起草奏表的周重说："王弘立有二次战功，从未加以犒赏，这一次打了败仗就加诛戮，不大公平。王弘立是一员勇将，杀了他是为敌人报仇，令亲人痛、仇者快，使诸将惊惧离心，不如赦免他，让他继续效力，对大局有利。"

庞勋打消了这个念头。王弘立收聚溃散的士兵仅得数百人，他请求攻取泗州，将功补过。庞勋给他增拨军队，派他进取泗州。

康承训打败王弘立后，进逼柳子镇，频频邀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交战数十次。三月月末的一天，农民军将领姚周率军渡过涣水，受到官军突袭。姚周撤回对岸，官军尾随其后，包围了柳子镇。这一天刮大风，官军利用风势纵火烧寨。姚周只好弃寨撤退，半路受到沙陀骑兵的截击，被屠杀殆尽，自柳子镇至芳城，死者相枕，部将刘丰阵亡。姚周率数十人投奔宿州。宿州守将梁丕与姚周有前怨，这次开城放他进来，将他杀掉。

庞勋见王弘立、姚周相继受挫，大怒，他与许佶商议准备亲自率兵出战。周重说："柳子镇是战略要地，我们放置的是强将精兵，如今都没能守住，看样子形势是不大好。为了增强号召力，要有自己的名号，求朝廷赐给节度使是不可能了。必须自立名号，然

后倾军四出，决死力战，或许能打开局面。”周重还劝庞勋将崔彦曾杀掉，以断绝人们对朝廷残存的幻想。术士曹君长也说：“徐州山川不容两帅，今观察使崔彦曾尚在，所以庞勋就不能发达。”庞勋手下的人都认为崔彦曾必须要杀。四月初，庞勋听从劝告，杀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及其亲属、宾客、仆妾等。还把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牙李湘的手、足砍断，送给康承训，以示决战到底，不再与朝廷妥协。庞勋又把军队都召集起来公开讲话，说：“我以前只是想作节度使，并不想背叛朝廷。如今的形势看，不造反不行了！从此以后庞勋与大家真的造反了！我们要彻底发动境内的力量，戮力同心，扭转局面，建立功业！”群情沸腾，大家一齐叫好。于是下达命令，把城中男子全部集中到毬场，还分头派遣诸将挨家挨户地搜索，谁敢隐藏一个男子便将全家杀头。这样大规模地动员，又发展了三万军队。接着，制造旗帜，发给精良武器，完善装备。许佶等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大明会王。庞勋辞去大明会王，只称天册将军。

庞勋以父亲庞举直为大司马，让他和许佶一同留守徐州。有人说：“庞将军正在显示军威之际，不可因父子的关系，失去上下的礼节。”于是命庞举直来到庭前趋拜，庞勋坐在案前受礼。

庞勋的第一个军事目标是围攻丰县之敌——魏博军。四月按预定布置，庞勋率军从徐州出发，深夜来到丰县；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入城，魏博军一点也没觉察。魏博军分扎在五个营寨，靠近县城的一个屯有数千人，已被庞勋纵兵包围。其余各寨出兵支援，被伏兵在要路劫杀，官军损失了二千余人，幸存者纷纷逃回营寨。但庞勋也未将近城大寨攻破，到了晚上，只好解围回城。官军见农民军人多势众，投入了新的力量，又听说庞勋也来了，知道这个仗没法打下去，几个军营不约面同地利用夜晚撤营退去。曹翔正要攻打滕县，听到魏博军败的消息，连忙带领军队退回兖州防守。农民军将曹翔遗留下的物资粮草全部运走，充作军用，然后

将其城栅彻底毁坏，他们对这次胜利特别自豪，从此称官军为“国贼”。

马举率三万精兵来援泗州。四月十八日，官军分三路渡淮。为了壮大声势，他们在河中大声鼓噪，让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喊声。农民军听到这声音，不知来了多少人，为了应变，决定收缩兵力，集中驻扎在城西的兵寨里。这是一步致命的错招，马举到达之后，就势将城西寨四周封锁，纵火烧寨。农民军被火一攻，无法组织战阵。慌乱中，数千士兵阵亡。王弘立战死，吴迥退保徐城。被农民军围困七个月的泗州缓过手来。

六月，马举自泗州领兵攻打濠州，夺取了淮河沿岸的招义、钟离及其以南的定远。刘行及在濠州城外设寨拒守。濠州与钟离仅隔一道淮水。马举先派轻骑挑战，刘行及见官军人少，出兵击敌，受了诱兵之计，马举派大军数万人绕到刘行及的背后，焚烧了他的兵寨。刘行及只好人城固守。马举得手之后，虽能在濠州周围三面掘沟，形成半月形包围，但濠州靠近淮河，仍能与徐州相通。庞勋派吴迥帮助刘行及防守濠州。吴迥屯驻在淮河北岸的渡口，与州城相呼应。但不久马举派兵与吴迥力战，平毁了渡口的军寨。

再说庞勋在丰县获捷以后，留住了几天，准备西出打击康承训。军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马上就是暑天，养蚕收麦正急需人手，不宜再战，应休兵聚食，然后再图进取。”另一种意见认为：“庞勋亲自出战只几天的时间，就摧败官军七万余人，应乘战胜之势，赶走康承训，不可失去大好时机。”庞举直也写信劝庞勋乘胜进军。庞勋决定支持第二种意见。四月二十日，庞勋自丰县发兵，二十三日（庚戌）到达萧县（今属安徽）。他与襄城、留武、小睢几个军寨约好，于二十九日（丙辰）黎明联合进攻柳子镇。这几部人马合起来有五、六万人。可是，这个重要的时间表并没有成为机密。庞勋军中的淮南俘虏兵逃回康承训的营帐，报告了这个消息。康承训得以预先准备，秣马整军，设伏以待。二十九日

那一天，襄城等营寨的军队先到柳子镇，被伏兵击败。庞勋来迟了一步，这时还在三十里以外；赶到柳子镇的时候，目睹败军四逃，给士气带来极大损伤，庞勋军中的市井之徒见官军势盛，不战而逃。士兵自相蹈藉，溃不成阵。官军骑兵越到前面拦击，步兵在后面追杀，一直杀出几十里。庞勋变服解甲，一路收拾散卒，才得三千人，带回彭城。

庞勋刚起事的时候，下邳土豪郑镒聚众三千人，自备资粮、器械，响应农民军。庞勋用郑镒为将，称所部民兵为“义军”。五月徐、泗北邻的沂州（山东临沂）派兵来攻下邳，郑镒率所部正式加入庞勋的队伍。

七月，康承训攻克亳州境内的临涣；接着襄城、留武、小睢等军寨也相继落入官军之手。曹翔攻下滕县（今属山东），进击丰、沛。庞勋军寨的士兵不少人结队逃亡，保聚山林。外出抄掠的农民军士兵经过这里，便被他们杀掉。这种情形在五八村尤其严重。有个叫陈全裕的人作这个团伙的头。凡是从庞勋队伍里叛逃出来的人都投靠他，很快就发展到几千人。这里攻战防守的器械应有尽有，周围数十里范围，农民军不敢靠近。康承训派人将这几千人招抚过去，农民军更加削弱。

蕲县土豪李兖杀农民军守将，率一城人向康承训投降。沛县也发生类似献城事件。沛县裨将朱玫趁守将李直到彭城与庞勋商议事情的空隙，向曹翔投降。李直自彭城返回沛县，被朱玫用武力赶跑。沛县落人曹翔之手。庞勋派部将孙章、许佶各率数千人攻打陈全裕、朱玫，都没有成功，退了回来。康承训乘胜再取第城驿，进抵宿州之西，筑城设防。

庞勋十分烦躁，对梁丕擅杀姚周尤其恼火。他撤了梁丕的职，由徐州旧将张玄稔代理州事；又派亲将张儒、张实等统领城中的几万军队，与官军抗衡。张儒等在城外设置了好几重营寨，环靠河水构成防御体系。一天，张实派人给庞勋送来书信说：“现在大

批官军开来，集中在城下，其后方必然空虚。如庞将军能出其不意采取行动，出兵掠取宋州、亳州的郊县，他们一定撤围西去。那时您在要道设伏邀击，我们带领城中的军队随后出动，一定能破敌！”这时新向官军投降的朱玫为了有所表现，已经攻占丰县、徐城、下邳；庞勋正不知如何应付战局，得到张实的来信，立即作出反应，他按照信中的建议，部署庞举直、许佶防守徐州，自己亲率部队西去。

八月下旬，官军攻宿州，康承训用火攻破了城外的营寨，张儒等退到宿州外城防守。官军强攻，数千人战死，却不能破城；于是想出了招降的主意，派善辩的说客到城下喊话。驻守内城的张玄稔成边时曾立过功，虽在农民军中，却是动摇份子。在围城的日子里，他在考虑自己的出路，于是召集几十名亲信商议归降朝廷。这些人分头扩散，很多人加入进来，并与康承训取得了联系。他们约定九月三日（丁巳）发动叛变，献城投降，官军则以树青色旗帜为接应信号。到了那一天，毫无觉察的张儒等人在柳溪亭饮酒，被闯来的乱兵杀死。城中大乱，随同张儒被杀的还有几十个人。张玄稔将部队集合起来，公布了投降的计划。到了黄昏秩序稍稍安定。第二天一早，开城出降。承训大喜，立即宣读敕诏，拜张玄稔为御史中丞，赐赏特别丰厚。

张玄稔为了立功，提出利用附近地区尚不知道宿州献城的消息，用张玄稔的部队骗取苻离和徐州。宿州原有三万军队，康承训给他增派了数百名骑兵，配合行动。

九月五日（己未）拂晓，宿州城点燃几千束薪草，浓烟冲天，远远望去，好象城被攻破的样子，宿州军在张玄稔的带领下，直奔苻离。苻离守军不知真情，果然开城接应。他们进城后，先擒杀守将，镇慑余众，然后发布命令要大家服从。这样又收得一万余人，往北扑向徐州。庞举直、许佶得到消息，环城固守。

两天后，张玄捻至徐州，陈兵彭城。他们向城上喊话，大意

不外是："朝廷只诛逆党，不伤好人，你们要放下武器，如有迟疑，马上丢掉性命。"一些人听了喊话，丢掉衣甲、武器，跑下城去。混乱中，崔彦曾的故吏路审中打开城门，放官军进城。庞举直、许佶退守内城。黄昏时分，困在内城的人开北门突围，结果庞举直、许佶被杀，很多人跳水溺死。随后，张玄稔把戍守桂州军士的亲族抓起来，杀了几千人。

庞勋率二万人自石山西去的行踪，官军九月六日（庚申）才知道。于是派步骑兵八万人向西追击，由朱邪赤心的骑兵为先锋。庞勋进袭宋州（河南商丘），陷宋州南城，刺史郑处冲守住北城。他们见北城有备，一时难以攻下。便移师南渡，越过汴河，准备掠取亳州。沙陀军追来，庞勋带着队伍沿涣水东行，折回彭城；到了蕲县，涣水上的桥梁都被官军破坏，庞勋一时不知再到那里去，来到县西，大批官军赶来，四面合击，近万名农民军阵亡，好多人溺死，只有一千人投降。庞勋也战死，可当时人们都不知道，几天以后才发现他的尸首。

宿迁等地的农民军见大势已去，杀死守将出来向官军投降。只有吴迥守住濠州，是最后的堡垒，官军攻不下来。马举攻打濠州，从夏天打到冬天，战争极为残酷。城中粮食吃光了，杀人吃人肉，官军深挖濠沟作战略围困。十月中的一个夜晚，吴迥率众突围而出，在招义战死。历时一年的庞勋起义至此宣告最后结束。

但直到乾符元年，仍有庞勋的残余力量，在故里活动。他们分散在兖、郓、青、齐之间，继续坚持斗争。朝廷派徐州观察使夏侯瞳前去招抚。

五月，懿宗令百官商议处置徐州的行政办法。因徐、泗长年攻战，结衅已深，决定徐州依旧为观察使，统徐、濠、宿三州，泗州为团练使，割隶淮南道。十一月，复以徐州为感化军，置节度使。

庞勋领导的桂林兵变虽然失败，但给唐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为即将来临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50～卷 252

《通鉴纪事本末》：《庞勋之乱》

王仙芝、黄巢起义

咸通末年，连年灾荒，黄河以南，饥民聚啸山林，比比皆是。

乾符元年（874年），僖宗继位，僖宗年少，权柄下移。官僚们对严重的社会问题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除了奢侈享受，勒索赋敛之外，就是上下相蒙，粉饰太平。官吏们对潼关以东的水旱灾情，并不如实向朝廷报告，致使这一地区百姓老弱转死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社会问题相当严重。而该地区原本军队不多，加之承平日久，兵不习战，官军与饥民接战经常受挫。这一年濮州人王仙芝聚众一千人在长垣起事。

乾符二年六月，王仙芝、尚君长攻陷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今山东曹县北），兵众达到几万人。天平节度使薛崇发兵进讨，被王仙芝打败。此前，有民谣说："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王仙芝起事后，这首民谣更加深入人心。

冤句人黄巢也招聚了几千人响应王仙芝。黄巢世代贩私盐，颇有资财。他喜欢骑马射箭，还涉略过诗书经典，但几次赴试科举却没能考上。这时他与王仙芝一道攻略州县，横行山东。被沉重赋税所困弊的百姓都争相投奔他们，几个月间，黄巢的人马达到数万。

左金吾上将军、兖州节度使齐克让率兖州军攻打王仙芝。仙芝避其锋芒，转向淮南，势力发展很快，达到三十万人。僖宗诏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加紧讨降。

乾符三年七月，诸道行营招讨使宋威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与

王仙芝交战，仙芝大败逃遁。宋威奏报说：仙芝已死，便自作主张，不待朝命，即遣散了各道军队，自己回到青州。群臣得到这个消息都入朝称贺。然而，三天之后，传来州县奏报，王仙芝还活着，并且依然不停地攻略州县。这时各道兵刚刚回家。又下诏重新征发，军士们极为不满，官军战斗力削弱。

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势力接近东都洛阳。僖宗担心洛阳的安全，急诏各道兵加强防卫。诏令凤翔、邠宁、泾原军守卫陕州、潼关，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昭义节度使曹翔率步骑兵五千与义成军一道守卫东都宫殿，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兵二千人守住汝州、邓州的要道，而令忠武节度使崔安潜主动出击。

王仙芝进逼汝州（今河南临汝）。九月二日（丙子），攻陷汝州，活捉刺史王镣，东都大震，洛阳的百官携家出逃。面对这种情势，九月十一日（乙酉），僖宗下诏赦免王仙芝、尚君长之罪。为了招降，还答应给他们授官。

但此时王仙芝又攻破阳武，包围郑州，军队集结在汝州、邓州一带。十月，王仙芝南攻唐州（今湖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十一月陷郢州（今湖北钟祥）、复州（今湖北沔阳）。十二月，分兵攻打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庐（今安徽合肥）、寿、舒（今安徽潜山）、通等州，势力进一步扩张。

宋威私下里对曾元裕说："咸通年间，消灭了庞勋，讨伐庞勋的大将康承训随即获罪，我们即使能消灭王仙芝，也不能不想一想前车之鉴。"因此保存实力，顾望不前。

吏部侍郎郑畋向僖宗奏言："宋威报捷以来，王仙芝不但没死，反而更加猖狂，各道很不服气。现在他又坐守亳州，毫无进讨的迹象；招讨副使曾元裕拥兵防守蕲州和黄州，早已作了望风退缩的打算，这样的将领不足以统军应敌。而王仙芝如果攻下扬州，朝廷就失去了江南，这事关系很大。不如改换有威望的良将，尽早

结束目前的军事疲软状态。”僖宗颇采其言，任用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并以前鸿胪卿李瑑为招讨使取代宋威，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为招讨副使代替曾元裕。

王仙芝攻打蕲州（今湖北蕲春），蕲州刺史裴偓是王铎主持科试时所选拔的进士。而王铎又是已被王仙芝活捉的汝州刺史王镣的堂兄弟。王兄在王仙芝军中，为王仙芝写信劝说裴偓。裴偓提议，双方收兵不再交战，裴偓为王仙芝向朝廷求官。王仙芝同意这个协议。于是，裴偓敞开城门，邀请王仙芝、黄巢等三十多人进城。裴偓备办酒席，还拿出很多财宝赠给王仙芝，并向朝廷上表说明了这个情况。

在王铎的一再要求下，僖宗答应让王仙芝作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并派中使把授官告身送到蕲州。

王仙芝得到任命告身极为高兴。王镣、裴偓都来庆贺。大家兴致正浓，黄巢因自己没得到封官，已面带怒容。他质问王仙芝：“你作了高官，让这五千人马怎么办？”说着动起武来，打伤了王仙芝的头部。下面的士兵也跟着喧噪不已。王仙芝担心兵变，就拒绝了朝命，接着烧掠州城，裴偓逃奔鄂州，送告身的使者逃奔襄州，王镣被扣留。王仙芝、黄巢由此分裂，其中三千多人跟随王仙芝和尚君长，二千多人跟随黄巢，各分道而去。

王仙芝、尚君长人陈、蔡；黄巢北略齐、鲁。乾符四年二月，王仙芝攻落鄂州（今湖北武昌），黄巢攻陷郓州（今山东东平）。三月，黄巢又陷沂州。

四月，僖宗颁下《讨草贼诏》，对王仙芝诱降。诏书说：“根据最近诸道的报告，江西、淮南、宋、亳、曹、颍等州，草贼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劫掠商旅，抢夺进奉，他们时聚时散，虽一时可以为所欲为，终归还须战战兢兢地度日。有限的逆党早晚要被强大的王师消灭干净。朕宽弘治民，视天下苍生皆同赤子，恨不能匀出自己的衣食，使黎民百姓都生活得更好，怎么还能忍心

用刀枪去杀戮人民！所以发下文诰，务求招抚，如果不能奏效，再用兵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王仙芝及诸道草贼首领等，你们见到诏令后，应该洗心悔祸，解甲收兵，到所在州府去降。已经命令州府及时奏报，一定会超授官爵，厚赏赀财，让你们永作忠臣，常居禄位。王仙芝属下的头领也可在大藩镇内，根据他的才能，授予相适合的职务及衣粮赏赐。那些抛弃田园，胁从而来的人，也当妥善安排，抚绥慰劳，让他们回到田园去务农。这是弃暗投明，得生逃死的光明之路，是最好的选择。如果顽傲不悛，凶强自恃，不放下武器，继续为患乡间，使田者不得耕，蚕者不得织，那就要为民除害，这绝不是穷兵黩武，擅用佳兵！

现令各道节度使选练骁勇将卒，分兵截道，合力进讨，必务翦除，不得纵玩！

讨伐草贼的主兵大将如能擒杀一大草贼，消灭贼众三百人以上，得超授将军，另赏钱一千贯文；如斩杀草寇多于此数，大破贼党，收夺草寇资财器械，经核查属实，据其功绩高下，另行授官赏财。如遇寇不追，临阵不战，畏葸逡巡，坐令军战失败者，主管州道应认真调查，以军法处分。地方上如有勇决之才，能纠率丁夫，捍御寇贼，搴旗斩将，而破阵立功，则委所在长吏迅速奏闻，也将授官优赏。这已有前例，朝廷必不食言！”

七月，王仙芝、黄巢攻打宋州，将宋威围困在宋州城内，因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七千官军赶到才解围。

十月，郑畋对僖宗说：“宋威欺骗朝廷，隐瞒军情。又听说王仙芝七次请降，宋威不为奏闻，朝野对此议论纷纷，以为早就应该以军法处分。这种情况下，再不能让宋威负责军事行动，还是尽早罢免的好。”僖宗不听。

十一月，招讨副都监杨复光派人向王仙芝劝降。王仙芝派尚君长与杨复光联系，但宋威派兵在半路将尚君长劫走。十二月，宋

威向朝廷奏报说：他与尚君长等在颍州西南交战，活捉了这几个人献给朝廷；杨复光则向朝廷说明，尚君长等其实是来投降，并非作战时被宋威所擒。僖宗诏命侍御使归仁绍等审讯，结果没办法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狗脊岭将尚君长斩杀。

乾符五年正月六日（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在申州（今河南信阳）打败王仙芝。王仙芝损失二万余人。朝廷以宋威长期生病为由，下敕书免去他的招讨使职务，让他回青州。同时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

二月，曾元裕在黄梅击溃王仙芝，王仙芝被追杀，五万多人战死，仙芝余部逃散。

黄巢正在攻打亳州。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附黄巢，推举黄巢为领袖。黄巢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年号为"王霸"，职官建制正规起来。

黄巢袭取了沂州和濮州。不久，屡为官军所败，就给天平节度使张裼写信请降，要他向朝廷奏报。结果任命黄巢为右卫将军，命令他到郓州解除武装，黄巢最后却没有去。

三月，黄巢从滑州进取宋州（今河南商丘）、汴州（今河南开封），转攻叶县、阳翟（今河南禹县）。僖宗下诏征发一千河阳兵开赴东都洛阳，与宣武军、昭义军的二千人共同警卫洛阳宫殿。任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任东都应援防遏使，统领河阳、宣武、昭义三镇的军队，还允许他在洛阳招募二千士兵。又诏曾元裕带兵直接回洛阳，加派三千义成军防守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伊阙（今河南龙门）、武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河阴，严密布署了洛阳的防卫。

于是，黄巢领兵渡过长江，进入江西，攻陷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

八月，黄巢打到宣州，为宣歙观察使王凝所败，便转人浙东，

开辟了七百里山路，转战福建。

十二月，黄巢攻陷福州。

乾符六年正月，镇海节度使高骈派部将分道攻击黄巢，收降了黄巢的将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京等数十人。黄巢于是向广南开去。

五月，黄巢给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写信，要求作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他向朝廷奏报，朝廷不许。黄巢又上表要求作广州节度使，僖宗诏命大臣们讨论这件事。左仆射于琮认为："广州是海上贸易和财富集中的地方，这种地方不能给黄巢。"就商量另授其它官职。六月，决定委任黄巢为率府率。

九月，黄巢得到率府率的告身，极为恼火。他下令急攻广州，即日攻下，捉住节度使李迢。黄巢自号"义军都统"，发布文告说，将要打到长安，还指斥宦官专权，官吏贪污，科举黑暗，要求禁止贪污，惩治贪官污吏。

黄巢在岭南，士兵染上瘴疫，病死了十分之三、四，部下劝他返回北方再图大事，黄巢听从了这个意见。从桂州（今广西桂林）编造了几十个大筏，沿湘江而下，经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十月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守将李系不敢迎战，黄巢猛攻，仅一天的时间就攻陷潭州。黄巢杀光了戍守的士兵，尸体布满江面顺水而下。

尚让乘胜进逼江陵，兵众号称五十万。江陵四面无援，守军不足一万人。王铎借口与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襄阳，留下部将刘汉宏防守江陵。王铎去后，刘汉宏在江陵大肆抢劫。房屋焚荡殆尽，百姓逃到深山里躲起来。适值大雪，僵尸遍野。十多天之后，尚让才赶到。刘汉宏是兖州人，这时他已率军回北方作强盗去了。

黄巢占据江陵以后，打算进一步追逼王铎，就率师奔袭襄阳。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合兵屯于江陵与襄阳

之间的荆门，以阻挡黄巢。黄巢军开到后，刘巨容在树林中设伏兵，由曹全晸以沙陀五百骑迎敌，他们假装败退，而于林中发动伏兵；黄巢抵御不住，大败，追到江陵，黄巢军已损失了十之七八，十二名大将被擒，黄巢与尚让收拾残部，南渡长江，向东转移。有人劝刘巨容穷追到底，刘巨容说："朝廷惯于作过河拆桥的事情，还是把他们留下来，这虽是朝廷的不幸，我们却安稳些。"所以不再追击。

曹全晸准备渡江追击。恰好朝廷下诏免去他招讨使职务，改由泰宁都将段彦谟担任，曹全晸也就不追了。这样，黄巢得以重新组织军队，攻克鄂州，进而东略饶、信、池（今安徽贵池）、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杭等十五州，军众又达到二十万人。

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淮南节度使高骈派部将张璘等与黄巢交战，屡有战功。朝廷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高骈传送檄文，征调各地军队，还广泛募兵，聚得淮南土兵和各道客兵共七万人，颇有声势，深得朝廷的倚重。

四月，张璘渡江作战，黄巢军将王重霸投降。其后黄巢连遭败绩。

五月，黄巢屯军信州，遇疾疫流行，大量士兵死去。张璘加紧对黄巢猛攻，黄巢在逆境中向张璘行贿，并给高骈写信请降，要他向朝廷保奏。高骈希望招抚黄巢，答应代他请求节度使。这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都到了淮南，高骈怕客军分去自己的功劳，就奏报说，黄巢不日可平，不必调动各道军队，可将客军全部遣还本道，这个要求得到朝廷的同意。

黄巢侦伺到各道军队已经北渡淮河，就宣告与高骈断绝联系，还要求决战。高骈很恼火，命令张璘进战；张璘战死，黄巢军的势力又一次发展起来。

六月，黄巢别将攻占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

华），六月二十八日（庚戌），进占宣州。

七月，黄巢自采石渡江北上，围攻天长、六合，兵锋甚锐。淮南军将毕师铎对高骈说："朝廷的安危倚重于您，现在几十万贼军乘胜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如不利用险要的地形将他们击溃，听其越过长淮，就再没有办法控制局面，一定会给中原造成大患。"高骈因各道军队已经遣回，张璘又死，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制敌，畏怯不敢出兵，只是命令诸将严加防范，守住自己的地盘就行，还上表告急，说："六十多万贼众集结在天长，离我驻守的扬州不到五十里。"在此之前，宰相卢携说："高骈文武之才过人，如把兵权交给他，平定黄巢不在话下。"朝廷内外虽然有人认为高骈并不值得完全信赖，但对他还寄有几分期望。高骈的奏表一到，上上下下都失望了，朝臣一片恐惧。诏书指责高骈遣散各道军队，以致黄巢乘官军没有设防而渡过长江。高骈上表说："我是奏报朝廷之后才遣散军队的，也不是自作主张。现在竭尽全力保卫我所管辖的范围还是办得到的，只是担心贼军迤逦渡淮西进，直奔关陕，最好赶紧敕令关东各道将士尽早作好防御准备。"然后高骈声称患了风痹病，不再出战。

朝廷接到高骈的奏表，赶紧命令河南各道派军队屯驻溵水，又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驻汝州，防备黄巢；另任命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九月，曹全晸率军众六千人与黄巢交战，以军力不敌，退屯泗上，想等待各道官军赶到，合军再战；黄巢军号称十五万人众，而高骈始终不来救援，黄巢乘机将曹全晸打垮。

赴屯溵水的徐州兵一向有凶狠的名声。这次徐州派出三千军士途径许昌，因被安置在毬场住宿而闹事。节度使薛能到内城的城楼上询问情况，徐州兵答复说，接待的条件太差，所以闹事。薛能慰劳了好半天，才平息下来。许昌人大为恐惧。这时许昌的忠武军也派大将周岌到溵水去，刚刚出发，周岌听到徐州兵闹事的

消息，夜间领兵返回许昌，天明进城，将徐州兵全杀光。周岌恼恨薛能宽待徐州兵，把他赶跑。薛能打算投奔襄阳，被乱兵追杀，他的家属也被杀死，周岌自称留后。

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怕遭到周岌的袭击，带兵回兖州去了。这样，屯驻溵水的各道兵全都散去。黄巢放心大胆地率全部人马渡过淮河，军纪极好，一路上不抢掠，只是招收壮丁，扩大武装。

十月，黄巢攻陷申州，进人颍州（今安徽阜阳）、宋州、徐州、兖州的境内。

十一月十日（庚申），东都洛阳奏报黄巢进人汝州境内。

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奏报，黄巢号称天补大将军，派人向各道转送文牒说："各军最好保守自己的军营，不要和我作对。我将开进东都洛阳，然后到长安向朝廷问罪，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僖宗得到消息，忙召集宰相计议。豆卢瑑、崔沆主张征发关内各镇及左右神策军严密防守潼关。十二日（壬戌）中午，僖宗开延英殿，面对宰相落泪。观军容使田令孜希望僖宗人蜀避难，就提出一种更消极的方案，说："可以挑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防守潼关，由我来担任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僖宗说："侍卫用的神策军不象关内诸镇的军队，没有进行过征战训练，恐怕不顶用。"田令孜挑明了说："以前安禄山造反，倒是有过玄宗入蜀避难的先例。"田令孜这样一说，崔沆、豆卢瑑都改变了主意。崔沆说："安禄山只有五万军队，黄巢却有六十万军队，现在的情势比当年更紧急。"豆卢瑑说："潼关是守不住的。当年哥舒翰拥有十五万军队都没有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有那么多军队，而潼关的守军绝没有十五万，怎么能守得住呢？田令孜的话，倒是为社稷着想。眼下三川的府帅都是田令孜的亲信，比起玄宗仓猝入蜀，我们是有准备的撤退。"僖宗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奈，就说："你先去为朕发兵防守潼关。"

当天，僖宗来到左神策军，亲自和神策军将士见面。田令孜

推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可用。僖宗召见这三人，以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王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赵珂为勾当寨栅使，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第二天又传来齐克让的奏报。齐克让说："黄巢进入洛阳境内。我已收缩兵力，退到潼关，在潼关外设营防守。官军经过多次战斗，物资储备早已用光。关东州县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人烟几乎断绝，四面八方看不到老百姓。士兵们饥寒交迫，兵械损坏，人人思念家乡。如不及时发送资粮和援军，军队随时可能溃散！"

僖宗命令选派左右神策军弓弩手，选得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等带领去潼关增援。

十七日（丁卯），黄巢攻陷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谒。黄巢入城后，慰抚了一番，然后才去休息。街市平静，毫无惊扰。

直到二十一日（辛未），陕州才将洛阳陷落的消息传报到长安。二十二日（壬申），僖宗任命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率左右神策军去同黄巢作战。几天里，田令孜招募了几千坊民补充神策二军。

二十五日（乙亥），张承范等带领神策军弓弩手离开长安。神策军士都是长安富家子弟，以向宦官行贿的手段在神策军籍簿上挂名，领取优厚的供给和赏赐。他们只会穿着漂亮的衣服纵马兜风，倚仗神策军的势力逞威风，从来没有经过战阵。听说要出征，父子聚在一起哭泣，许多人出金帛雇用坊里的贫民作替身，代替他们出征。雇佣来的人往往连武器都不会拿。

僖宗到章信门楼为这支军队送行。张承范向僖宗提出要求说："听说黄巢发动几十万大军，擂着战鼓向西杀来，齐克让把一万名饥饿的士兵安置在关外扎营，又派我带着这二千人屯驻关上，却没听说有供应粮饷的准备。凭这点军队来抵御黄巢，实在令人寒

心。希望催促各道精锐部队早日前来支援。”僖宗说：“你们只管出发，援军马上就到。”

二十七日，(丁丑)，张承范等到了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裴虔余正在这时调任宣歙观察使，军民都逃进华山，城中十分冷落，州库只剩下尘埃鼠迹，幸亏粮仓里还有一千多斛米，军士们每人带了三天口粮继续前进。

十二月一日（庚辰），张承范等到达潼关，在草木丛生的地方搜出百来个村民，让他们运石汲水，作防御的准备。但张承范军与齐克让军都已吃光了军粮，士兵没有斗志。这一天，黄巢前锋部队抵达关下，白旗遍野，看不到边际。齐克让出战，黄巢军稍稍退却。一会儿工夫，黄巢赶到了，全军呐喊，声震山河。双方激战，从午时打到酉时才各自收兵。官军饥饿难耐，喧闹吵嚷着，烧营溃退。齐克让逃回潼关。

潼关左面有一道山谷，平时禁止人们往来，专门用作官府征税的卡子，称为“禁阬”。黄巢军来得迅速，官军仓猝，忘了派人在这里把守。溃退的士兵从这条山谷逃回。谷中灌木老藤茂密如织，一夜之间踏成平坦的通道。

张承范把随军辎重和私人行囊散发给士兵，派使者到长安告急。张承范的上表说：“我离开京城六天了，援军未见一人，馈饷全无消息。关外的军队饥饿溃逃，已踏开了禁阬。我仅以二千余人守关，抵御六十万大军，情势危急。一旦潼关失守，我个人固然要负责任，但出谋划策的朝臣不是太可耻了吗？有消息说陛下已经准备向西撤退。如果銮舆一启动，军队马上就会土崩瓦解。我冒死进言，希望不要轻易撤离长安，赶紧征调军队救援潼关，这样，唐高祖、唐太宗创下的基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愿黄巢继安禄山而亡，而我也有比哥舒翰更好的下场。”

二日（辛巳），黄巢加紧进攻潼关，张承范等待援军，尽力抵抗；从寅时战到申时，战场形成僵局。

关外有禁阬这条天堑。黄巢军要一千多平民跳进去，掘土填坑，不大工夫就填平了。他们偷偷度过天堑，夜晚放火烧关，把潼关的关楼烧毁。张承范分出八百士兵要王师会去守禁阬，这支军队赶到的时候，迟了一步，黄巢军已经越过禁阬。

第二天早晨，黄巢夹攻潼关，关上的士兵纷纷逃跑，王师会自杀，张承范改换服装率余众逃走。到了野狐泉，奉天派来的二千援军陆续赶到，张承范说："你们来迟了！"撤军回到长安渭桥。他们看到田令孜招募的新军穿着又新又暖的皮衣，发怒道："这些人凭什么功劳能有这样好的待遇，我们却在第一线受冻挨饿！"于是发生火并，抢劫了新军，有人还为黄巢作向导，让他们尽快打到长安。

黄巢攻打潼关的时候，唐廷确曾派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负责运送军饷。但萧廪声称有病，执意不干，后来他被贬为贺州司马。

黄巢进入华州，留下华州将领乔钤守城。河中留后王重荣也向黄巢请降。四日（癸未），下制书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

五日（甲申），田令孜获悉黄巢已经入关，恐怕僖宗责备自己，就归罪于宰相卢携，把他贬降，同时推荐王徽、裴澈为宰相。任命结束，百官退朝，街上已传来黄巢军入城的消息。官员们分头逃窜躲藏。田令孜率五百名神策军护卫僖宗从金光门出城，只有福、穆、泽、寿四王以及几个妃嫔跟随出走，百官都不知道。僖宗昼夜不停地向前跑，随从的官员多跟不上队伍。

僖宗既已离去，军士及坊市居民争相进入府库盗取金帛。

黄昏时，黄巢前锋将柴存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带领文武百官几十人到霸上迎接黄巢。黄巢乘坐黄金装饰的轿子，士兵们用红缯扎起披散的头发，身穿锦绣，手执武器跟在后面。甲士和马队形成一道人流，辎重塞满了道路，千里络绎不绝。

尚让一边走一边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象李氏皇帝那

样残暴地对待你们，你们尽管好好过日子，不用害怕。”

黄巢经春明门，走进太极殿，数千宫女前来迎拜，称黄巢为“黄王”。

黄巢住进田令孜的府第。士兵们见到穷人常把金帛送给他们。但几天以后就大掠坊市，焚烧市坊店铺，到处杀人，黄巢无法控制。他们尤其憎恨官吏，只要抓到就杀死。

僖宗逃到骆谷，凤翔节度使郑畋在路上迎接，请僖宗留住凤翔。僖宗说：“朕不想过于靠近巨寇，暂且先到兴元（今陕西汉中），然后征集军队再图恢复。你东面抵御黄巢的进犯，西面安抚诸蕃部落，责任很大，要联合附近的藩镇，努力建立勤王中兴的功业。”郑畋说：“道路阻塞，不便行走，奏报难以保障畅通，请给予临机处置的权力。”僖宗答应了。九日（戊子），僖宗到壻水镇下诏给牛勖、杨师立、陈敬瑄，告诉他们长安已经失守，僖宗将去兴元，如果形势继续恶化的话，将去成都，要他们预先作好接待的准备。

十一日（庚寅），黄巢把留在长安的李唐宗室杀得干干净净。十二日，（辛卯），黄巢进人皇宫。十三日（壬辰），黄巢在含元殿即皇帝位，绘事黑缯作为皇帝的礼服，击响几百只战鼓代替金石之乐。士兵手执长剑大刀列成仪仗，完成了仪式。黄巢登丹凤楼，颁赦书，大赦天下，名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三品以上的唐官全部停任，四品以下的官员照旧任职。以妻曹氏为皇后，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与崔璆、杨希古四人都是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兼军容使，费传古为枢密使，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

二十日（乙亥），黄巢下令，百官到赵璋府第登记名衔，只要登记，都可以恢复官位。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使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来不及出逃，又不去登记，躲藏在民间，被黄巢搜获，全被杀掉。

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然臣事黄巢，但招纳亡命，又把公卿藏于夹墙，也被黄巢杀死。

（于宝华）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 252—卷 254
《旧唐书》:《黄巢传》
《新唐书》:《黄巢传》
《唐大诏令集》:《讨草贼诏》
宋·缺名《平巢事迹考》
《通鉴纪事本末》:《黄巢之乱》

黄巢之死

黄巢攻人长安后，僖宗经兴元（今陕西汉中）来到成都，将西川府舍作为行宫，这一天是中和元年（881 年）正月二十八日。

追随僖宗的大臣们逐渐集中到成都，南北司朝见僖宗的大臣接近二百人。各道和四夷频频送来奉献，成都府库充实，俨然是一个小长安。这里赏赐不匮乏，士兵们倒也欣然。

早在兴元的时候，僖宗就已下诏要各个方镇动员全部兵力收复长安。

首先是淮南节度使高骈。僖宗派使者催促高骈出兵，从河南方向攻打黄巢。使者道路相望，但高骈就是不出兵。僖宗到了成都，仍寄希望于高骈有所作为，诏命高骈发现作战有功的刺史和将领，在监察到常侍的职官范围，听任他用墨敕随时授予官职，事后再向朝廷奏报。

接着，僖宗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继续让他担任行营招讨使，希望河东军从北面出兵攻打黄巢。代北监军阵景思率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几部赴长安救援，准备在绛州渡黄河。绛州刺史瞿稹也是沙陀人，他对陈景思说："军事形势仍向有利于黄巢方面发展，不能轻进，不如先回代北多募些兵再说。"这样，他们又返回雁门。

瞿稹、李友金到代州，十几天工夫就招募了三万人，都是北方杂居的胡人，这三万人屯驻在代州崞县西边，他们犷悍暴横，瞿稹和李友金控制不住。李友金对陈景思说："我们空有几万兵众，

却没有良将统驭，这还能成。我哥哥李国昌和他儿子李克用勇略过人，是兵众们所信服的。您要是真能奏请天子赦免他们的罪行，把他们找来作这些人的统帅，那么，一个命令，代北的人就全能响应，平定黄巢不在话下。”

李国昌是忠武节度使。他的儿子李克用是沙陀副兵马使，乾符五年（878 年）戍守蔚州（今河北蔚县）。当时黄巢正在河南作战。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认为，天下大乱，四方不守朝廷号令，正是地方割剧的好机会，就策划拥李国昌、李克用割据代北。此时正赶上代北饥馑，漕运跟不上。大同防御使兼水陆发运使段文楚减发军士服装和军粮，执行军法又过于苛峻，引起了士兵的不满。李尽忠派康君立偷偷跑到蔚州鼓动李克用起兵，杀段文楚而代之。李克用说：“我父亲在振武，我先和他打个招呼。”康君立说：“事态急迫，夜长梦多，来不及了！”李尽忠当晚率牙兵攻打牙城，把段文楚和判官柳汉璋抓起来，自己管起军州事务。他派人去找李克用，李克用急赴云州，一边行军，一边招募士兵扩大力量。到了云州，已有将近一万人，屯驻在城外斗鸡台下。过了一天，李尽忠派人把符印送来，请李克用作防御留后。第二天又给段文楚等五人带上刑具，送至李克用驻地。李克用让士兵们将这几个人剐死，吃他们的肉，并让骑兵践踏他们的尸骨。示威之后，才人府舍视事，还让将士上表，请朝廷承认既成的事实，追加敕命，朝廷不许。

李国昌在振武上表要求朝廷迅速任命大同防御使，说：“如果李克用不听朝命，我就率本道军讨伐他，绝不为了儿子辜负国家。”朝廷正准备让李国昌调解此事，见到李国昌的上表，就派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让李国昌告诉李克用，如果李克用敬奉朝命，一定给他一个满意的职务，同时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同年四月，因李克用仍占据云中，所以将李国昌和卢简方对

调，由卢简方任振武节度使，而由李国昌任大同节度使，认为这样李克用总不能不服从李国昌的管辖。

但这只是朝廷的如意算盘。李国昌其实要父子并据两镇，所以撕掉制书，杀死监军，拒绝朝命；同时与李克用合兵攻破遮虏军。进击宁武军和岢岚军。

十月，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等合兵到蔚州讨伐李克用。十一月，任命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

崔季康与昭义节度使李钧同李克用交战，李钧战死，二镇兵败，昭义军退回代州，其余的部队从鹳鸣谷退回上党。

广明元年（880年）六月，朔州守将高文集扣留李克用派来调兵的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向官军投降。七月，李克用来攻高文集。在半路被官军截杀，死七千人。官军乘势进入雄武军境内。蔚朔节度使李琢与赫连铎进入蔚州，李国昌溃逃，与李克用举宗北入鞑靼。

鞑靼本是靺羯的别部，位于阴山一带。赫连绎派人告诉鞑靼豪帅，李克用父子才用过人，久留阴山，必有吞并鞑靼之意，要鞑靼杀掉李氏父子，免除后患。李克用知道后，借与豪帅游猎之机，百步穿杨，射无不中，令鞑靼豪帅心悦诚服。接着置酒畅饮，酒酣耳热，李克用道："我得罪天子，无法效忠。听说黄巢北来，已成中原大患，如天子赦免了我，我愿和你们一起南向定天下，总不能老死在这个荒僻的地方。"鞑靼知道李克用并无久留阴山的意向，就打消了加害李克用的念头。

陈景思果然说动了朝廷。沙陀酋长李友金派五百名骑兵到鞑靼送诏书，迎李克用。李克用率鞑靼各部一万人来到代州。李克用称奉诏率兵五万讨伐黄巢，通牒郑从谠要他缘道接应，设置邮传。郑从谠关闭城门，防备李克用偷袭。李克用在城下扎营五日，求得资粮钱米之后，纵沙陀兵剽掠居民，接着回代州去了。直到

中和二年，李克用才重新奉诏将军四万出河中，与黄巢作战，

中和元年四月，朝廷还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要他进战立功。给郑畋的诏书说："不管是蕃军还是汉军将士，只要赴难有功，一概听任郑畋用墨敕委任官职。"郑畋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布置与黄巢交战。

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出击作战。朱温攻陷邓州，在邓州戍军，控制住了荆州和襄州。但在关内的战斗中，黄巢失败。唐弘夫设伏大败进攻凤翔的尚让、王播，在龙尾陂斩首二万多级，伏尸数十里。

四月，黄巢任命的邠宁节度使王玫被邠州通塞镇将袭杀。

这时，唐弘夫屯军渭北，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屯渭桥，河中留后王重荣屯沙苑，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周至。唐弘夫乘势进逼长安。

四月五日（壬午），黄巢率军向东撤退，程宗楚从苑城西边的延秋门率先入城，相继入城的还有唐弘夫、王处存。坊市居民欢呼着出迎官军。有的人用瓦砾投击黄巢的人，有的人拾取落箭交给官军使用。程宗楚进城后，害怕其它将领分夺战功，不向凤翔节度使郑畋、鄜延节度使李孝昌、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通报已经破城的消息。官军士兵放下武器到府第宅舍掠取金帛、妓妾。王处存命令军士在头上扎系白带为记号，以与进城各军相区别，坊市少年有人乘乱冒用这个记号，扎起白头带和官军一起抢劫。黄巢军在霸上露宿，侦伺到官军纪律混乱，而且各军缺乏协调和联系，立即引兵回袭，从各个城门分头进城，在长安城里大战，官军抢来的东西太多，跑不动，败得很惨；程宗楚、唐弘夫败死，士兵十之八九丧命。王处存收拾余众回营。

十日（丁亥），黄巢又回到长安，他对民众帮助官军十分恼火，纵兵杀人，血流成河，叫作"洗城"。这时官军各部全部退出长安，

黄巢军重新占上风。

十三日（庚寅），黄巢与拓跋思恭、李孝昌战于土桥，又一次获胜。

人们给黄巢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黄巢军将王播围攻兴平，邠宁节度副使朱玫撤到奉天和龙尾陂，西川黄头军使李鋋率一万人，巩咸率五千人进屯兴平，修筑了二个军寨。黄巢与他们交战，屡无建树，后来同平章事陈敬瑄又派了二千人增援官军。

僖宗初到成都的时候，赏给蜀军每人钱三缗。宦官田令孜担任行在都指挥处置使后，每当四方贡献金帛，就只颁赐给随同僖宗而来的各道客军，不再赏赐给蜀军，蜀军颇有怨言。七月二十日（丙寅），田令孜宴请蜀军和随同僖宗来蜀的各道客军都头。并把行酒用的金杯赏给大家。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乘机说：“我们将领每月领取俸禄，丰赡有余，常想国恩难报，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但蜀军与其它军队一同执行警卫，赏赐的差别太大，军士们有怨气。希望军容使把给诸军的赏赐均给蜀军。使蜀军和各军一样有受赏的机会，那就皆大欢喜了。”田令孜顾左右而言他，问道：“你以前立过什么战功没有？”郭琪答道：“我生长在山东地区，应征戍边，先后与党项作战十七次，与契丹作战十余次，满身留下被武器击中的创伤；出征吐谷浑时受伤最重，当时胁部受伤，露出肠子，用线缝合伤口后继续作战，有一些战功。”田令孜听后亲自把另一个杯子里的酒，让郭琪喝下去。郭琪心知这酒有毒，不得已还是喝了。回到家里，郭琪杀婢，以婢血解毒，吐了几升黑汁，终是没死，因此率众作乱。七月二十一日（丁卯），焚掠坊市。田令孜护僖宗到东城据守，同时命令各军还击。郭琪回营后，又受到押牙安金山的攻击，便乘夜突围出城，逃往广陵，投奔高骈去了。

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都曾在神策军任职，最初高骈把周宝

当兄长看待。后来高骈职位先高起来。对周宝就不那么尊重了。镇海与淮南相邻，常为琐碎的事情发生摩擦。高骈传檄周宝要他人援京师。周宝准备好舟船，却不见高骈有准备出发的迹象。有的幕僚对周宝说："高骈趁黄巢起事，天下大乱之机，想吞并江东。他说是人援京师，是不是打我们的主意倒也未可知，还是提防点好。"周宝不大相信，派人察伺高骈，高骈确无北上的意思。这时，高骈又派人约周宝在瓜州商议军事。周宝认定这是高骈设置的陷井，就称病不赴会。两人恶语往来，结下深仇。虽朝廷屡次催促高骈出兵，但高骈以周宝和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为理由，收兵回到扬州，其实他从来也没想出兵。

中和二年，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但同州仍在官军手中，黄巢要朱温自已去取。二月，同州刺史米诚逃往河中，朱温进据同州。先此，朱温与尚让在东渐桥将李孝昌、拓跋思恭打跑，又与孟楷在富平袭击鄜、夏二军，二军兵败，逃回本道。朱温占据同州后，进攻河中，被王重荣所败。

到了四月份，诸道行营都都统王铎率东西川和兴元军集结感灵寺，泾原军在京西，易定、河中军在渭北，邠宁、凤翔军在兴平，保大、定难军在渭桥，忠武军在武功，对黄巢军形成包围。黄巢将朱温据同州、李详据华州，黄巢号令所行，不出同、华。

六、七月间，黄巢与官军交战，互有胜败。八月，有三十艘河中粮船道经夏阳，被朱温抢到。王重荣派重兵赶来，朱温被围。朱温屡请增兵解困，被知右军事孟楷扣下，不向黄巢报告。朱温见黄巢已走下坡路，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就杀掉监军严实，九月十七日（丙戌），举州向王重荣投降。朱温投降后，王铎根据朝廷制书委任他为同华节度使。据守华州的李详见王重荣待朱温不错，也想投降，被监军告发，黄巢将他杀死。黄巢的弟弟黄思邺担任了华州刺史。后来，李详旧部赶走黄思邺，以华州镇将王遇为主，举州投降王重荣。

十月，僖宗赐朱温名全忠，任命他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东行营招讨使。

黄巢的兵势仍很强大，王铎用墨敕召李克用带兵与黄巢军作战，并通知了郑从谠让他不要阻拦。十一月，李克用率沙陀军一万七千人从岚州、石州这条路赶往河中，不敢进人太原境内，只和几百名骑兵来到晋阳城下与郑从谠告别。朝廷接到王铎的报告，任命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以前被南山寺庙的僧人杀死，他的仆人浑进通投奔了黄巢。李克用到河中后，派堂弟李克修先率五百士兵渡过黄河试探黄巢军虚实。黄巢军对李克用颇为忌惮，因其将士身着黑衣，就称他们"鸦军"，说："鸦军来了，应当避其锋芒。"还捕来南山寺庙的十几个僧人，派人送交李克用，同时利用浑进通同李克用讲和，为此送去了诏书和大量财物。李克用为李克让之死痛哭了一场，杀了僧人，接受了财物，但焚毁了诏书，把黄巢的使者打发回去，带兵从夏阳渡河，进驻同州。

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部将李存贞在沙苑打败黄巢的弟弟黄揆。正月二日（己巳），李克用进据沙苑。王铎根据制书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以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田令孜想重用宦官，就说王铎与黄巢作战迄无战功；是听了杨复光的话，召来李克用才打败了黄巢，随即削夺王铎的兵权，下制书只让他作义成节度使。田令孜还把僖宗人蜀，收传国宝等作为自己的功劳，要宰相和藩镇共同向僖宗要求给他加赏，僖宗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

二月十五日（壬子），李克用进占乾阬，与河中、易定、忠武军会合。尚让等率领十五万兵众迎敌，屯于梁田陂。第二天发生恶战，从午时杀到申时，尚让大败，损失了数万人。

黄巢部王璠、黄揆袭取华州，被李克用围困在城内。

几次失败，军粮又吃光，黄巢秘密作出撤退的决定，并派出三万部队对蓝田加强控制，以便通过蓝田撤退。

三月六日（壬申），李克用、王重荣在零口迎战尚让，将他打败，华州失援。三月二十七日（癸巳），李克用等攻取华州，黄揆弃城脱逃。

李克用常令部将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长安，烧仓库，抓俘虏，搞得人心惶惶。后来李克用与忠武军将庞从、河中军将白志迁带兵率先进城，与黄巢在渭南同时打了三个大仗，黄巢均失利：义成军、忠武军乘黄巢兵败，紧跟上来，有了斗志。

四月八日（甲辰），李克用等从光泰门攻入长安，黄巢全力抵抗，自卯时战到申时，终于支持不住，便烧了宫室，从蓝田退入商山。士兵投降的，战死的不计其数。官军暴掠与黄巢军没有两样，长安的室屋居民所剩无几。黄巢一路上丢弃不少珍宝，官军为了争抢这些财物，不再理会黄巢；黄巢争取到时间，顺利逃脱。

杨复光派使者向僖宗报告收复长安的消息，百官入朝庆贺。僖宗诏命留下忠武等军二万人，交给大明宫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从异分配。守卫长安。

五月，加封朱玫、李克用、东方逵为同平章事。陕州建制升为节度，王重荣为节度使，又在延州设保塞军，李孝恭为节度使。李克用这一年才二十八岁，在诸将中最年轻，而破黄巢收复长安功劳最大，军力最强，别的将领都怕他。李克用有一只眼睛有毛病，时人称他“独眼龙”。

黄巢在长安的时候，陈州刺史赵犨就预感到，一旦黄巢兵败，一定向东溃退，重返山东，而陈州则是必经之地，忠武军与黄巢的关系又一直不好，所以作了很多防范准备，修城完兵，坚壁清野，把六十里之内有财产粮食的民户都迁入城里，还募集了很多精壮兵勇，由他弟弟赵昶翊，儿子赵麓林分别率领。

黄巢退出长安后，以骁将孟楷为前锋，带领一万人攻取蔡州，

逼节度使秦宗权向黄巢称臣，与黄巢连兵。

随后，孟楷移攻陈州。赵犨先向孟楷示弱，乘其不备，发动袭击，孟楷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俘杀。

黄巢得到孟楷死讯，大怒。六月，与秦宗权合兵攻陈州。他们在陈州城外掘了五道壕沟，用各种方法攻城，却攻不下。赵犨还派精兵出城击战，有时小有战果，这使黄巢更加恼火。他在州北扎下军营，设立宫室和各种衙门，作长期围困的打算。民间没有积存的粮食，就掠人为粮，把人投于碓境中舂磨，连同骨头一起吃，供给粮食的地方叫“舂磨寨”，为了得到军粮，便放任军队四出劫掠，给周围的州县留下严重的创伤。

十二月，赵犨派人向邻道忠武节度使周岌、东面兵马都统、感化节度使时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求救。

黄巢兵力还很强，周岌、时溥、朱全忠自顾不暇，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中和四年二月，李克用率五万蕃兵和汉兵穿过天井关，但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河阳桥不坚固为由，拒不放行，李克用回军从陕州、河中渡河向陈州靠拢。

三月，朱全忠攻克瓦子寨，黄巢将李唐宾、王虔裕投降。

黄巢围困陈州近三百天，与赵犨打了大小几百仗，迄未克城。李克用赶来与周岌、时溥、朱全忠会军，联军攻尚让，四月三日（癸巳）攻下太康。接着攻打黄思邺，西华落人官军手中。黄巢失去两路的支持，退军到陈州北面的故阳里。

朱全忠见黄巢北撤，急回军大梁。五月三日（癸亥），天降大雨，故阳里积水三尺，黄巢军营被大水湮没，又听说李克用来了，就带兵向东北汴州方向转移。尚让派五千骁骑进逼大梁，在繁台被朱珍、庞师古阻住。朱全忠向李克用告急。六日，李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从许州出发，八日在中牟县北面的王满渡与黄巢军遭遇。李克用乘黄巢军没有完全过河的机会，猛烈冲击，黄巢军溃败，阵亡一万余人。尚让率部投降了时溥，别将李谠、霍存、

葛从周、张归霸和归霸弟张归厚率部向朱全忠投降。黄巢越过汴河向北败退。九日，(己巳)，李克用追到封丘，又把黄巢击败。十日（庚午），天降大雨，黄巢东折，经胙城、匡城向兖州方向败逃。跟随黄巢的残余将士只剩下一千多人。李克用轻骑追击，一个昼夜跑了二百多里。追至冤句，能跟上他的骑兵也只有几百人，人疲马乏，粮食吃光，于是回到汴州。这一仗，李克用捉到黄巢的幼子，缴获了黄巢的乘舆器服符印，还收容了裹在军中的男女人众一万余人。

五月二十日(庚辰)，时溥派部将李师悦率一万人众追踪黄巢。

六月十五日（甲辰），李师悦与尚让在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南）和黄巢打了最后一仗。黄巢寡不敌众，伤亡殆尽，退人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境内)。十七日（丙午），黄巢的外甥林言割下黄巢兄弟妻子的首级准备向时溥投降，遇到博野军，被他们夺去首级，林言也被博野军杀死。

七月二十四日(壬午)，时溥派使者献来黄巢及其家人的首级，还有黄巢的姬妾。僖宗在成都大玄楼受献，他当众问姬妾们："你们都是勋贵的子女，世受国恩，为什么还要从贼?"为首的一个人说："当时的形势，陛下有百万军队还守不住宗庙，往巴蜀逃跑呢。陛下您现在以不能拒贼来责备我们女人，又将置公卿将相于何地?"僖宗哑口无言，将他们全都拉到市中斩戮。人们纷纷给行刑的人酒喝。别的人都吓得要死，昏醉万状，只有居首位的那个女子不饮酒，不落泪，从容就刑，神色肃然。长安宫室焚毁，僖宗仍留住成都。京兆尹王徽招抚流散，缮治宫室，百官衙门大体安排就绪，十月，关东藩镇请僖宗回京城长安。

僖宗于光启元年（885 年）正月从成都起驾，二月到凤翔，三月十一日（丁卯）回到长安。战乱后的长安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一片凄凉。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 253—卷 256

《旧唐书》：《黄巢传》

《新唐书》：《黄巢传》、《沙陀传》

《通鉴纪事本末》：《黄巢之乱》、《克用归唐》

宋·缺名《平巢事迹考》

王建据蜀

唐代末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一系列的混战中，有的军阀一败涂地，丢了性命，有的站稳脚跟，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朱全忠建立后梁以后，割据一方的军阀纷纷称王称帝，国家进入五代十国大分裂的历史时期。

十国之一的前蜀建立者是原唐西川节度使王建。大顺二年（891 年），王建打败了其它几个军阀以后，将四川大部攫为己有。开平二年（907 年）王建在成都自立为帝，国号为蜀。

前蜀领有剑南、山南五十四州之地，物产丰富，地势险要，具有得天独厚的割据自然条件。

王建，字光图，舞阳人，先世为饼师。王建少年无赖，曾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排行第八，因此乡亲们称他“贼王八”。

唐末，王建从军，被忠武节度使杜审权提拔为军校。僖宗避居成都的时候，忠武军将鹿晏弘率八千人随监军杨复光与黄巢作战。黄巢失败后，杨复光将这八千人分为八都，王建、鹿晏弘等为其中的都头。

中和三年（883 年），杨复光死于河中。八都将鹿晏弘在兴元驱逐了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王建依附鹿晏弘为属州刺史。不久，鹿晏弘正式获得节度使位置。他怕手下的人抢权，采取了一些狭隘的作法，引起部众离心。观军容使田令孜派人以厚利诱王建等归依成都，并把他收为假子。僖宗回长安后，王建等分典神

策军。

光启元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与田令孜开战，僖宗再次出逃兴元。田令孜知祸由己出，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就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己去作西川监军。杨复恭掌权后，排斥田令孜的人，放王建为利州刺史。

王建骁勇，不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所容；光启三年他见阆州（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可为根据，就招合洞溪彝落，得八千人，沿嘉陵江而下，袭取阆州，自称防御使。杨守亮对他无可奈何。

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在神策军共事，关系不错。顾彦朗常派使者问存，馈送军食。

田令孜的哥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见王建与顾彦朗相友善，怕他们合兵对付西川，就和田令孜商量对策。田令孜说："王建是我儿子，他是让杨守亮逼的，才出此下策。今天我写一封信把他叫来，就是我们的人。"

王建得信大喜，到梓州来见顾彦朗，说："阿父田令孜让我去成都。我如见到陈敬瑄，求他给个大州刺史，也就心满意足了。"就把家属托付给顾彦朗，自选精兵二千人，与侄子王宗锴，假子王宗瑶、王宗弼、王宗侃、王宗弁驰奔成都。

西川参谋李乂对陈敬瑄说："王建是只老虎，说什么也不能引到家里来。"一语点醒了陈敬瑄。他急忙派人阻止王建来成都，沿途增加了守备，可是王建已到了鹿头关，见守关人不放行，大怒；破关而进，拔汉州。顾彦朗闻讯，列军相助，王建又拔德阳。陈敬瑄派使者责问王建，王建说："阿父田令孜让我来，到了家门口，又不让进；要是顾彦朗也对我采取同样的办法，我连退路都没有了，只好破关而前。"田令孜在城楼上说好话。王建在清远桥上答礼，说："我既没有退路，只好作贼了。"顾彦朗的弟弟顾彦晖是汉州刺史，派兵助王建攻成都，打了三天，退回汉州。陈敬瑄把

这事报告给朝廷，朝廷派中使和解，双方都不听。

文德元年（888年），王建进攻彭州（四川灌县），无功而还，大掠西川十二州。

昭宗即位，王建、陈敬瑄还在交战，朝廷的贡赋因此断绝。王建给昭宗上表，要求作邛州刺史，并请自讨陈敬瑄以赎罪。顾彦朗也上表请朝廷赦免王建，把陈敬瑄调走，以使两川保持和平。

昭宗原为寿王。随僖宗入蜀的时候，因黄巢来得急，诸王大都是徒步跑出来，在深山里，寿王跑不动了，躺在岩石上休息。从后面赶来的田令孜催寿王快走，寿王说："跑得脚痛，请你给我一匹马。"田令孜说："深山里哪来的马？"边说，边用鞭子抽他，寿王回头看看，不敢说话，心中充满了怨恨。即位之后，昭宗马上派人作西川监军，替换田令孜。田令孜不奉诏。昭宗知道，田令孜敢于抗命，依恃的是陈敬瑄。所以得到王建和顾彦朗的上表后，在六月间，任命韦昭度兼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征调陈敬瑄为龙武统军。

这时王建在新都驻军。绵竹土豪何义阳、安仁、费思恐等在当地拥兵自保，多的有一万人，少的也有几千人。王建派王宗瑶招降了他们。这些人向王建提供资粮，使王建的势力得以发展。

七月，韦昭度来到成都，在城下亮出了西川节度使的旗帜。但是陈敬瑄不认帐。韦昭度说："新节度使来了，你们为什么不开门？"陈敬瑄让手下的人答道："我们有先王的铁券，你们难道要违抗先王的遗命吗？"韦昭度进不了城，只好在城东设置行府。

十二月，朝廷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招讨副使，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又将邛、蜀、黎、雅四州从西川划出来，另置永平军，由王建为节度使，治所设在邛州，王建同时充任行营诸军都指挥使。第二天，削夺陈敬瑄官爵。

龙纪元年（889年）正月，王建在新繁大破眉州刺史山行章，

杀获一万余人。山行章是为救援威戎节度使杨晟而到新繁来的。杨晟失去援兵，从彭州撤到三交。山行章屯于蒙阳，与王建相持。十二月，山行章及西川骑将宋行能在广都再次兵败，宋行能撤回成都，山行章回到眉州。不久，山行章坚持不住，向王建投降。

大顺元年（890年）正月十五日（壬寅），王建进攻邛州。大将杨儒受陈敬瑄之命率三千人助邛州刺史毛湘守城。毛湘出战屡败。杨儒看出王建已成气候，遂率所部投降。王建收他为养子。为他改名王宗儒。十八日（乙巳），王建把永平节度判官张琳留下来作邛南招安使，自己带领军队返回成都。

陈敬瑄在犀浦、郫县、导江等地分兵布寨，加强守备。城中壮丁白天抢修工事，夜晚击柝巡警，不敢稍懈。

韦昭度的行府设在城南荷圣寺。王建的军营在东阊门外，王建对韦昭度毕恭毕敬。

正月二十四日（辛亥），简州将杜有迁押着刺史员虔嵩向王建投降，王建让杜有迁主管州事。

二月，资州将侯元绰效仿杜有迁投降，王建让侯元绰主管资州事务。

四月，陈敬瑄眼见失利，忙派蜀州刺史任从海率兵二万救援邛州。战败后，任从海也想献州投降，被陈敬瑄杀死。十一日嘉州刺史举州投降。二十一日黎道土豪文武坚缚献戎州刺史谢承恩投降。

六月，资简都制置应援使谢从本杀雅州刺史张承简，举城投降。

八月，王建退屯汉州。

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亲吏，他看邛州城守不住了，对都知兵马使任可知说："我不忍心背叛田令孜，吏民也不应无辜受害，你可以把我杀了，拿我的人头向王建投降。"九月九日（壬戌），任可知遵命斩毛湘及其二子，吏民都为毛湘忠义两全的行为所感动。

任可知开城门投降，王建持永平旌节进入邛州。十月一日（癸未），王建带兵回成都。蜀州将李行周赶走刺史徐公铢，举城投降。

大顺二年，韦昭度率各道兵马十余万人讨伐陈敬瑄已有一年多，饷运难以为继，朝议打算休兵。三月，朝廷下制书恢复陈敬瑄官爵，令顾彦朗、王建各率所部回镇所。

成都被围，城中粮食匮乏，满街都是被遗弃的儿童。百姓中有人偷偷跑到韦昭度的军营买米带回城里，被巡逻的士兵发现，韦昭度并不深究。陈敬瑄当然也欢迎。这样贩米的人愈来愈多。但贩卖的数量很小，不过斗升之间。他们把竹筒截成直径一寸半，深五分的卖米量具，每筒米可卖一百多钱。因为无钱买粮饿死了很多人。抢劫现象也时有发生。军民各自以强凌弱，将领和官吏杀了好多人也禁止不住。于是采用更残酷的刑法，抓住以后，有的腰斩，有的斜劈，不断有人被刑杀，可还是看不到以强凌弱的现象绝迹。人们见到的死人太多了，什么也不怕。吏民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很多人想出城投降。陈敬瑄把这些人的族党抓起来全都杀掉，气氛十分恐怖。

停战的诏书传到了成都，王建说："大功即将告成，不能停战。"就上表表示："陈敬瑄、田令孜抗拒朝命，罪不可恕。我愿尽全力把他们讨平。"韦昭度因王建不撤，也不好回长安。王建希望韦昭度快走，由自己独攻成都，以便据而有之。就对韦昭度说："现在关东藩镇互相吞并，您应该早点回朝，与天子商议怎么解决好这件事。陈敬瑄不过是疥癣小患，交给我办就行了。"韦昭度仍不能决定去留。四月二十一日（庚子），王建暗令东川将领唐友通等在行府门前把韦昭度的亲吏骆保抓走，凌迟处死，说他盗窃军粮，韦昭度知道这件事的含义，便称病把印节交给王建，书具文牒委任王建为三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交权当天就启程返回长安。王建把他送到新都，跪在马前献酒，泪拜而别。韦昭度刚出剑门关，王建立刻派兵守住，不让离去的军队再回来。韦昭度到长安后，授

职东都留守。

韦昭度离去后，王建加紧进攻成都，环绕成都城设置烽火沟堑绵延五十里。有个叫王鹞的杀狗屠夫假装获罪，混入成都城。王鹞拜见陈敬瑄、田令孜说："城外师老无功，兵疲食尽，已是强弩之末，不久就会撤军。"他用这番话麻痹陈敬瑄等，在坊市里卖茶的时候又盛赞王建英武兵强，制造紧张空气，动摇人心。王建又派京兆人郑渥假投降，以侦伺敌情。陈敬瑄命他为将，让他登城巡视。郑渥了解了城中的部署，回去报告给王建，这使王建在军事上更加主动。陈敬瑄出战即败，成都附近的州县大都为王建所占有。只有彭州还在陈敬瑄的势力控制之下，威戎节度使杨晟不时从彭州向陈敬瑄运送粮食。王建派兵占据新都，断绝了成都与彭州的通路，于是成都成了无援的孤城。

八月，穷途末路的田令孜登上城楼向王建喊话："老夫以前对你甚为厚待，你为什么这么和我们为难？"王建说："养父之恩怎敢忘！但朝廷命我讨伐不受朝命的人，我不能违抗朝命。假如太师您改变态度，我怎么会和您过不去呢？"田令孜得到保证安全的暗示后，当天晚上亲自带着西川印节到城外的军营交给王建。军中将士为结束战争而高呼万岁。王建流泪感谢，表示还和以前养父养子一样，敬奉田令孜。

在此以前，王建在军营里常说："成都城象花锦一样繁盛。有一天我们占据了成都，城内的金帛子女随便你们掠取，节度使和你们按日轮做。"八月二十五日（壬寅），陈敬瑄打开城门迎接王建。王建委任部将张勍为马步斩斫使，让他先进城维持秩序。随后对将士们说："我和你们经过近三年上百次苦战，今天才得到成都。你们不愁没有富贵，可千万不要焚掠坊市。我已派张勍前去保护市面。对于不听我命令的人，他若是抓来向我报告，我还能赦免你们，若是他先斩后奏，谁也没办法，你们一定要好自为之。"

不久，发现还是有人触犯军令。张勍拘拿了几百人，都用杖击

胸部的刑法把他们打死。尸体堆放在市中，果真起到了镇慑作用，没有人敢再违反军令。因此，当时人们称张勍为“张打胸”。

张勍入城的第二天，王建率军入城，自称西川留后。小校韩武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在节度使厅上马，管理使牙的人劝阻他，他还天真地说：“王建答应与我轮流做节度使，在厅堂上马算什么！”不久，韩武被刺杀。

陈敬瑄据守成都的时候，田令孜想乘机窃取他的军政权力，便假意对陈敬瑄说：“三兄您是尊贵的人，军务琐屑繁劳，不如全交给我来办，我每天把所做的事记下来向您呈报，您只要高高在上，安闲享乐就可以了。”陈敬瑄昏庸无能，欣然答应下来，从此军务都不由陈敬瑄作主，以至于彻底失败。王建上表请任陈敬瑄的儿子陈陶为雅州刺史，陈敬瑄随儿子到了雅州，第二年罢官回来，寓居新津。用这一县的租赋作陈敬瑄的开支。

王建对手下的人各有封赏；对陈敬瑄的部下，只要有才干，也都以礼相待，加以重用。

十月，朝廷任命永平节度使王建为西川节度使。与此同时又宣布取消永平军的建制。

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死后，军中推顾彦朗的弟弟顾彦晖为留后。十二月，朝廷正式任命顾颜晖为东川节度使。派中使宋道弼送来节度使的仪仗。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令绵州刺史杨守厚扣押宋道弼，夺了东川节度仪仗，发兵攻东川。十二月二十七日（癸卯），顾彦晖向王建求援。王建派部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等率兵救东川。王建对这几个人暗授机宜，说：“你们打败了杨守厚，顾彦晖一定会来慰问，你们在行营设宴答谢，宴席上把他抓起来，省得以后费事。”王宗弼杀败杨守厚，顾彦晖果然来慰劳，诸军要设答谢宴，王宗弼把机密泄露给顾彦晖，所以顾彦晖称病不赴宴。王建虽未能得计，而图东川之心却更加执着。

景福元年（892年），威戎节度使杨晟与杨守亮相约攻打王建。

二月二日（丁丑），杨晟出兵攻略新繁，并派部将吕荛率二千人会同杨守厚打梓州，吕荛兵败被斩。

二十六日（辛丑），王建派嘉州刺史王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使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等率五万人马攻打彭州，杨晟迎战失败，被王宗裕包围。杨守亮为救杨晟，派部将符昭直扑成都，在汉州金堂县的三学山扎营。王建急召华洪回军，华洪赶到三学山时，后面的军队还没跟上来，为了迷惑对方，他让几百名士兵夜晚在远处到处敲响更鼓。符昭以为西川大军到了，袭击成都的计划不能实现，当晚带领军队撤退。

三月，杨晟给杨守贞、杨守忠、杨守厚写信，让他们进攻东川，以解彭州之围。杨守厚与戍守梓州的神策都将窦行实暗中联络，要他作内应。但在杨守厚发兵到涪城的时候，这个阴谋就已败露，窦行实被顾彦晖斩首。杨守厚的军队还没出境就退回去了。杨守贞、杨守忠的军队赶到以后，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在绵州和剑州之间盘桓。王建乘隙派部将吉谏、李简分头袭击不知所措的杨守贞、杨守忠，二杨兵败而逃。

七月，王建继续围攻彭州。百姓都逃到深山里避难。各寨每天出去抓人抢劫，他们把这件事称为"淘虏"。抢来的东西先由将领们选取，剩下的由士兵们分掉，这已成为规矩。

军士中有个叫王先成的，是新津人，本来是书生，世道不太平，就当了兵。他忖度诸将中只有北寨王宗侃最贤明，就去游说道："彭州本是西川的巡属，陈敬瑄、田令孜分出四个州交给杨晟，伪署他为观察使，与他共拒朝命。现杨晟虽仍占据彭州，但彭州民众知道西川是各州的会府，司徒王建是他们的父母官，所以大军一到，民众不往城里跑，而往深山跑，他们在等待招安。几个月来，不但不招安，还放纵军队"淘虏"。官军夺人货财，驱人畜产，百姓饥渴交加，没有归宿，使人们绝望，我们正在失去人心。"王宗侃听罢，不觉细问了几句。王先成接着说："问题的严重性还

不仅在失去人心。现各寨每天早晨出去六七百人入山“淘虏”，傍晚才回军寨，如果城中有人利用军寨空虚的时刻倾城杀出，那可就不得了！”王宗侃说：“你看现在怎么补救？”王先成提了七条措施。“一，招安山中百姓。二，各寨的军士及其子弟，不得外出“淘虏”。在离军寨七里的地方设立标志，七里之内随便活动，不得干涉砍柴放牧，越过标志，格杀勿论。三，设置招安寨，慎选遴干的将领为招安将。每个招安寨可容几千人，由招安将率三十名士兵武装巡卫。四，必须有一个人总管招安这件事，不然，人人打着招安的旗号进山，非乱了套不可。五，四方军寨应将以前掠来的人口，不分男女老幼集中起来，让父子、兄弟、夫妻自相辨认，务使团聚，然后统计好人数，造成名册，分批送到招安寨，隐匿不报者斩。有在交战中投诚的彭州士兵，也要酌给军粮，分批转送招安寨。六，在招安寨内设置九陇行县，作为临时治事部门，负责安抚百姓，从中选择精明强干的子弟，发给文帖让他们进山招徕亲戚，并给予妥善的安置。七，彭州盛产麻，百姓回到自己的住处应鼓励他们把以前沤好的麻拿出来卖掉，作为生活的开支，逐步恢复生产。”

王宗侃把这七条措施写成文状，报告给王建。王建要求按照文状的内容马上实行，并授命王宗侃负责招安事务。

第二天榜帖发下来，威令赫然，再也没有人敢冒犯军令，再去“淘虏”。第三天，深山里的百姓纷纷出来，象散了市一样涌向招安寨，寨子容不下，又把寨子拓宽；后来有了集市，大家拿出麻来卖。招安寨里的人见不再发生抢劫等暴力行为，慢慢辞别招安县令，回到自己原来的住所。一个多月以后，整个招安寨全空了。

乾宁元年（894年）五月，被围困中的彭州生活极端困难，城中人吃人，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城投降。王先成献攻城之计：沿着城上的短墙修建龙尾形磴道。五月十五日（丙子），西川兵沿

龙尾形磴道登城。杨晟仍率众拼死抵抗，被刀子都虞候王茂权斩杀。

七月，绵州刺史杨守厚死，绵州将常再荣举城向王建投降。

乾宁二年五月，王行瑜、韩建、李茂贞各率精兵人朝，逼昭宗将河中节度使授与王珙。

昭宗出避南山，九月，王建派简州刺史王宗瑶等率兵赴难，九月下旬，王宗瑶部在绵州停驻，其实王建是以赴难为名，借机扩张势力。

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攻下利州（四川广元）。

十二月二日，凤翔将领阆州防御使李继雍、蓬州刺史费存、渠州刺史陈璠各率所部投奔王建。

王建消灭了杨晟，又得到了利州和阆州，便专注于对东川用兵。王建借口顾彦晖不派兵赴难，却掠取他的辎重，还派泸州刺史马敬儒切断峡路，要求朝廷同意兴兵讨伐东川。六日（戊子），华洪在楸林大捷，斩俘东川军数万人。

十四日（丙申），王建别将王宗弼在进攻东川的战斗中被俘，顾彦晖将他收为养子。十六日（戊戌），通州刺史李彦昭率所部二千人向王建投降。山南西道的通州治所即今四川达县。

乾宁三年正月，王宗夔攻陷龙州。闰正月五日（丁亥），果州刺史张雄向王建投降。

五月六日，昭宗派宦官到梓州要王建与顾彦晖和解。王建虽遵照诏命回到成都，但仍不停止军事行动。荆南节度使成汭与其部将许存沿长江溯流攻略，把长江沿岸的州县全都夺去。泰武节度使王建肇放弃黔州，退守丰都。许存又率军西取渝州（四川重庆）、涪州（四川涪陵）。成汭安排部将赵武为黔州留后，许存为万州刺史。赵武连续攻打丰都，王建肇支撑不住，与许存一同向王建投降。王建知许存有勇有谋，担心将来为患，想杀掉他。掌书记高烛说："您现在必须延揽人才，方能成就霸业。许存走投无

路前来归附，可不能杀了他呀！”王建把许存派去戍守蜀州，让主持蜀州事务的王宗绾监视他。王宗绾为人宽厚谨慎，他向王建讲了不少好话，说许存忠勇廉谨，有良将之才，王建才放弃加害许存的念头。他把许存认为养子，为他改名王宗播。

八月，朝廷任命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攻打李茂贞。

乾宁四年二月，王建派邛州刺史华洪、彭州刺史王宗祐率五万人马攻打东川。李茂贞与东川关系密切。为了将顾彦晖拉入自己的联盟，李茂贞曾请朝廷在顾彦晖节仗被杨守厚抢走后，第二次给东川送去节仗。王建又命戎州刺史王宗谨为凤翔西面行营先锋使，与李茂贞假子李继徽在梓州西面的玄武交战，将李继徽打败。不久，王宗侃取渝州，王宗阮取泸州，凤翔将李继昭被王宗播击擒。

四月，朝廷派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使。调解王建和顾彦晖的关系。王建不接受和解方案，一心要夺取东川。五月，王建命节度副使张琳留守成都，亲自率五万人马攻打东川。

六月，李茂贞上表指责王建不听诏命。朝廷解除了王建职务，将他谪贬为南州刺史。第二天，下诏任命李茂贞为西川节度使，同时任命覃王李嗣周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不肯离开凤翔，拒绝调任。这样，只得又恢复王建西川节度使的职务，还让他兼平章事。

宣谕使李洵来到梓州，进行调解，王建指着手握大旗的士兵说：“将士们一定要打，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根本不容李洵说话，调解搁浅。

王建与顾彦晖争夺东川，已经打了五十多仗，士卒疲于阵战，百姓困于军役，双方仍在僵持。东川的很多州县被“群盗”把持，顾彦晖为了对付王建，以这些人为自己的援应，采取了一概承认的态度。所以，虽然梓州被围，周围的环境并不太严重。

王建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反措施，派人与“贼帅”联络，归附者赏以官，不服者派兵征讨。

十月，占据遂州的侯绍率所部二万人、占据合州的王仁威率所部一千人分别向王建投降。凤翔将李继溥本是来援救东川的，他见大势已去，也向王建投降。

王建扫清了外围，加紧攻打梓州。十月，大势已去，困守城中的顾彦晖把宗族的人和他收养的假子找来一同饮酒。席上他把王宗弼放回；又命假子顾瑶将酒席宴上所有的人，包括顾彦晖自己全部杀死，然后顾瑶自杀。王建进驻梓州时，城中还有七万人马。王宗绾受命派出几股部队向昌州、普州等地通报顾彦晖的死讯，要他们听命于王建。

王建任命王宗涤为东川留后。十二月，王建率部众离开梓州，回到成都。

光化元年（898年）正月，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刘崇望为同平章事、充任东川节度使。五月，朝廷获悉王建已用王宗涤为东川留后，就把刘崇望召回去，仍任兵部尚书，王宗涤继续作东川留后。

九月，东川留后王宗涤因东川幅员太大，封疆几千里。公文往返常常要用几个月的时间，便向王建要求将遂、合、泸、渝、昌五州分出来，另置一镇。王建上表说明了这件事。

十月，朝廷接到王建上表，便正式任命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王宗涤就是王建的部将华洪，乾宁三年五月，王建收他为养子，为他改名王宗涤。

光化二年六月，朝廷任命西川大将王宗佶为武信节度使。

光化三年二月，王建兼任中书令。七月，朝廷命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东川、信武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

天复二年（902年），岐、汴兵争不息，王建趁机出兵。二月，昭武节度使李继忠放弃利州，逃往凤翔；王建任命剑州刺史王宗伟为利州制置使。

八月，西川军队请求从兴元（陕西汉中）通过，出师勤王。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在三泉（利州东北）设军防守。八月，西川

军主动出击，西川前锋将王宗播攻三原，未克，退保山寨。王宗播作为降将，知道不拼死效力就自身难保，所以特别奋勇，殊死击战，连克金牛、黑水、西县、褒城四处军寨。军校秦承厚攻打西县的时候，矢贯左目，王建亲自为他舐创放脓。王宗播又攻马盘寨，李继密战败，逃回汉中，西川军乘胜追至城下，王宗播不敢抢头功，由王宗涤率先登城。李继密投降，被安置到成都，恢复了王万弘的本名。诸将凌辱他，连戏子都讽刺他，王万弘受不了环境变化给他的刺激，借酒排忧，醉投池水而死。

王宗涤有军功，得人心，入屯汉中后，朝廷任命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成都兴修节度使府，大门都用朱丹涂成红色，蜀人把使府称为"画红楼"。王建心忌王宗涤，故意说："是华洪楼。"华洪是王宗涤的旧名。善揣人意的王宗佶乘机谗言相谤。王建把王宗涤找来，要他解释外间的流言。王宗涤知难逃一死，便说："三蜀大体已经平定了，大王听信流言，诛杀功臣，是时候了。"王建令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当晚给王宗涤送来一餐酒席，酒后将他勒死。消息传出，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人。

九月，武定节度使李思敬献洋州投降。

十月，王建攻下兴州，任命军使王宗浩为兴州刺史。

天复三年四月，王建乘李茂贞式微，出兵秦、陇，并派判官韦庄入贡朝廷，还与朱全忠通好，互相聘问。

八月，为了拉拢王建，朝廷加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进爵蜀王。

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逼昭宗迁都洛阳。昭宗用绢写了一通手札，向王建告难，说："正月二十二日，汴军士兵不由分说，拥迫我东去洛阳。"王建命邛州刺史王宗祐为北路行营指挥使，率兵会同凤翔军去迎昭宗，在兴平与汴州军遭遇，无法继续前进，退回成都。王建从此用墨制授予手下人官位，说："等昭宗

回长安后再上表通告朝廷。”

四月，朱全忠将昭宗劫迁洛阳。闰四月，昭宗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祐。王建与朝廷断绝了音讯，所以仍称天复年号，以这一年为天复四年。

六月，王建与李茂贞、李继徽合兵攻讨朱全忠。诸将中有很多人劝王建攻取凤翔。但王建认为李茂贞虽不具备与朱全忠争霸的实力，守地一方还是不成问题的，可以作为三川的屏障。所以决意与李茂贞结好。后来，王建与李茂贞结成儿女亲家，王建的女儿嫁给了李茂贞的儿子天雄节度使李继崇。

八月，朱全忠指使枢密使蒋玄晖等在椒殿夜杀昭宗。

天祐二年十一月，朝廷派告哀使司马卿向王建通报昭宗的死讯。至此三川才与朝廷接上联系。王建要武定节度使王宗绾对司马卿说：“蜀中将士世受唐恩，去年听说昭宗被朱全忠劫迁洛阳，前后上表二十次，都没有回音。不久有从汴州方面逃出来的人说，先帝已被朱全忠杀害。蜀中将士日夕枕戈，准备为先帝报仇。不知你来成都有什么事要讲？希望你懂得去留。”司马卿听了这话，马上返回洛阳。

天祐三年十月六日，王建在成都设立行台，并用榜帖通告所属藩镇州县，在朝廷诏命难以通达的情况下，用李晟、郑畋的旧例，根据诏制在行台拜封官员。

开平元年（907年），昭宣帝禅位于梁。

九月，王建与将佐谋议称帝。二十七日（己亥），王建即皇帝位，国号大蜀。二十九日（辛丑），任命前东川节度使王宗佶为中书令，西川掌书记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阆州防御史唐道袭为内枢密使。

前蜀国主王建虽起于军伍，目不知书，但好与书生谈论经典，粗知书中的道理。当时，唐朝的好多衣冠大族在蜀中避乱，王建都能礼而用之，让他们整理历代的治国成例，以资推行国政的参

考，所以前蜀的法令制度很有唐朝的遗风。王建死后，传位王衍，王衍素不成才，只知奢侈荒淫，以残酷刻剥民众知名。925年，前蜀为后唐所灭，共传二主，历时三十五年。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55—卷264

《通鉴纪事本末》：《王建据蜀》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王建传》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前蜀一·高祖本纪》

杨行密据淮南

唐末，在朱全忠、李克用争雄的四十年里，江南逐渐形成了地方割据的新格局。其中杨行密占据的淮南道后来发展为十国中的吴国。杨行密割据淮南这件事，要从僖宗时代的淮南节度使高骈说起。

高骈晚年好神仙之术，重用方士吕用之。用之本是鄱阳茶商的儿子，长期寓居在广陵（江苏扬州），熟悉民风人情，在炼丹之暇，常与高骈谈论治道的得失，很为高骈看重，逐渐受到信任。

吕用之为了专权，用计离间高骈旧部，使高骈杀了旧将陈珙一家，夺了梁缵的兵权；高骈对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等也疏远起来，这些人过去都是高骈极信赖的。

吕用之又引荐术士张守一、诸葛殷，三人合谋用道术蛊惑高骈。高骈与宰相郑畋有矛盾，吕用之欺骗高骈说："有个宰相派剑客今晚来行刺。"高骈忙问："该怎么办？"吕用之说："张守一先前曾经学过法术，可以制服剑客。"他要高骈身着女服，躲藏在另一间屋子，由张守一睡在高骈床上。夜半，张守一抛击铜物，发出铿锵的响声，又把早已准备好的猪血洒在地面，伪造成格斗的场面，故意让高骈听、高骈看，张守一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次险些失手，不过总算把刺客杀死了。"高骈居然相信这套把戏，感激不尽地说："先生又给了我一条命，救命之恩，终生难报！"吕用之常常作出呼风唤雨的样子，仰望着天空作揖，说是正有神仙乘云过来。高骈也虔诚地与他一起下拜。为了达到长期蒙骗的目的，

吕用之买通了高骈的左右，让他们伺察高骈的动静，合施骗术，高骈无法察觉。只要有人稍有异议，即被用之陷于死地，人们只能冷眼旁观，不敢说破。

高骈把吕用之倚为左右手，凡事无论公私钜细，都按吕用之的主意办。用之随意刑赏，退贤进不肖，政事因此大坏。

广陵城里怨声载道，吕用之害怕有人揭发他的私弊，就要高骈设置巡察使。高骈命吕用之掌领此事，征募了一百多险阴狡狯的流氓无赖，分布于广陵闾巷之间，称为“察子”。民间呵妻骂子的事情他们都访察得一清二楚。

吕用之又想掠取百姓的财货和民间的美女。只要被他看中了目标，就把这一家诬为叛逆，然后动刑取供，判罪杀人，从而将这一家的财货妇女据为己有。广陵城有几百户人家因此被搞得家破人亡。

镇慑诸将要有军队，于是吕用之要高骈在诸军中精选二万骁勇，组成二支新军，号称左、右莫邪都。张守一和吕用之分别为左、右莫邪都使，二人可以象节度使一样自行任命将吏。莫邪都武器精良，军装华丽整齐，吕用之、张守一每次出门总有近千名军士前拥后呼，开路保镖，威风极了。

吕用之家有侍妾百余人，豪华铺张，用度不足，就把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发运给朝廷的贡赋往自己家里运。

为了防止上面的事情败露，吕用之想方设法不让高骈理事。他对高骈说：“成仙不难，遗憾的是学仙的人不能断绝尘俗的拖累，也就成不了仙。”高骈在吕用之的诱导下，屏去姬妾，谢绝人事，不与外人往来，宾客将吏都见不到高骈。对不得不见的人，则要求他们沐浴斋祓，然后才引入相见；客人刚刚行完拜礼，立刻就被打发出来，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于是吕用之得以擅作威福，无所顾忌，以致淮南境内知有吕用之而不知有高骈。

曾把吕用之介绍给高骈的俞公楚因吕用之不得人心而受舆论

的责备。公楚难免要告诫吕用之几句，让他收敛一点，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怨气。吕用之对此怀恨在心。右骁雄军使姚归礼是个直脾气，有时当面批评吕用之的所作所为，常想亲手杀了他。有一天晚上，吕用之和张守一等在娼妓家玩乐，姚归礼派人烧了这家房子，杀掉了几个与吕用之长相差不多的人，却让吕用之跑掉了。第二天严厉追察这件事，发现放火的人都是骁雄军士。于是吕用之想出了一条毒计。时隔不久，他说动高骈让俞、姚二将率左、右骁雄军三千人去庐州境内的慎县攻袭"贼寇"。他自己却偷偷通知庐州刺史杨行愍说："俞公楚、姚归礼要袭取庐州。"杨行愍出奇不意发动进攻，俞、姚二人未曾防备，一下子全军覆没。吕用之把这件事说成是二将叛乱，被杨行愍迅速平息。高骈不知其中有阴谋，居然重赏杨行愍。

光启二年（886年）十二月，寿州刺史张翱派兵攻打庐州，被杨行愍打败。高骈让杨行愍改名为杨行密。

光启三年，淮南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与淮宁军使郑汉章、高邮镇遏使张神剑举兵讨吕用之。

以前毕师铎有一个小妾，貌美无双，吕用之总想一睹芳容，毕师铎不准；吕用之趁毕师铎外出的机会，私下和她见了一面。毕师铎失了体面，心生怒火，将小妾休掉。由此，毕吕二人结下了怨仇。毕师铎心存疑惧，担心被害。至此决定起兵，自称行营使。

四月五日（戊申），毕师铎、郑汉章从高邮出发。七日（庚戌），侦察骑兵将这个消息报告给高骈，但被吕用之隐瞒下来。以至毕师铎突然出现在广陵城下，城内乱作一团。吕用之悬以重赏要手下的精兵出城力战，将毕师铎稍稍杀退，城中才争得时间断开城桥，堵住城门，设备防御。这一天，高骈在延和阁上听到喧噪的喊声，才知毕师铎率军到了城外。高骈大惊，忙把吕用之找来细加询问。吕用之若无其事，继续欺骗高骈说："毕师铎带到高邮的部队想回广陵，被城门的卫兵拦住了，问题已经解决，估计

一会儿这支军队就会散退。假如他们还在城外不走也不足虑，只要动用九天玄女的一个力士就够了。尽可放心。”高骈说：“近来我觉得你有很多事在胡来，这一次要处理好，不要让我象镇海节度使周宝最近那样，搞得众叛亲离，被乱兵赶跑。”说完，失神了好半天，吕用之无言可对，赧然退去。

毕师铎退到广陵城北的山光寺扎营。他看到广陵城防坚固，兵力众多，懊悔这一次行动有些草率。四月十日（癸丑），毕师铎派属将孙约和他儿子到宣州，求观察使秦彦发兵助战。并许诺一旦攻下广陵城，迎秦彦为节度使。毕师铎正在懊丧，馆客毕慕颜从广陵城内逃出来。他告诉师铎说：“城内人心离散，吕用之极为孤立，只要继续攻城，用不了几天，城内就会起变化。”这个消息如同一支兴奋剂，使毕师铎振作起来。

这一天，天还没亮，高骈又把吕用之找来，盘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吕用之无法再隐瞒，才将实情道出。高骈说：“我不想以兵戎见分晓，你可选派一个温良诚实的大将，拿上我的手札去交涉。如他们坚持不退，回来再想办法。”吕用之退下来自忖：诸将都与自己敌对，派他们去联系肯定会与城外串通。无论如何不行，还是要派自己的部下去。天亮后，便派所部讨击副使许戡带着高骈的手书、吕用之的誓状、以及酒肴等，以劳军的名义出城，毕师铎本来盼着高骈旧部出来，那样在对待高骈的态度上有共同的立场，可以自由地交换一下看法。但来人却是许戡，令毕师铎失望。师铎一腔怨愤，迎头便说：“旧将梁缵、韩问怎么不来，让你这个下贱东西来！”未等许戡回话，就令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十二日（乙卯），毕师铎用箭将书信射入城上，似乎要与高骈直接对话，吕用之不让启封，就地烧毁。这个办法未能奏效。

十四日（丁巳），吕用之带着一百名武装士兵到延和阁下去见高骈。高骈不知怎么回事，吓坏了。他藏在卧室里听动静，过了好一会，知道没危险才出来。他训斥吕用之道：“你好大胆！无故

带着武装士兵到节度使的住所，是不是要造反？”随即命令侍卫将他们赶走。吕用之见高骈动怒了，仓皇从内城的南门出来，手举马鞭指着内城发誓：“我绝不再进这个地方！”从此两人不再合作。

当天夜里，高骈找来侄子前左金吾卫将军高杰秘密商议军事。第二天，高骈临时任命高杰为都牢城使，把自己的五百名亲信交给高杰差遣。

吕用之命令诸将搜查城内壮丁，即使是朝士、书生，搜出来一律用绳索牵绑，驱赶到城楼上，分拨守城。这些人一天到晚不能回家，吃饭要由家人送到城上。吕用之怕有人与城外私通，经常让戍城的人变换防地，家人送饭，往往找不到人，致使戍城者经常挨饿。人们只恨毕师铎不能早日进城。

高骈派大将石锷带着毕师铎的幼子和他母亲的书信，以及高骈的文书来到扬子，告诉毕师铎城里发生的事情。毕师铎让儿子回广陵，给高骈带来口信，说：“只要斩了吕用之和张守一，我以妻儿老小为质。决不会与您为难。”为了防止吕用之将毕师铎家属杀掉，高骈让他们迁到节度使的府院来住。

十八日（辛酉），秦彦派牙将秦稠率三千人援助毕师铎，来到扬子。

第二天，秦稠率领部众攻打南门，第三天，秦稠率众攻打罗城东南角，城内十分紧张。第四天，攻势更猛，罗城西南角守军哗变，烧毁防守的木栅，迎毕师铎入城。吕用之率所部一千余人在三桥北顽强反击，毕师铎抵挡不住；这时高骈的侄子高杰带着牢城兵从子城杀出。两向夹攻，吕用之大败，开参佐门向北逃去。高骈要梁缵带领昭义军一百人保卫子城。

二十二日（乙酉），毕师铎放任军士抢掠。高骈奈何不了。索性令军士撤去守备。高骈以主人待客的仪式在延和阁下与毕师铎相见，让毕师铎担任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还按诏命曾经给予的权力封毕师铎为左仆射。

左莫邪都虞候申及献计说："毕师铎人马不多，有的城门还没人把守。趁这个空隙赶紧从教场门出城，然后发动各镇军队回师广陵，是一个逆转形势的机会。过一二天广陵稳定下来，一切都不好办了！"高骈下不了决心，终于还是留在广陵城里。

二十三日（丙寅），毕师铎果然分兵封锁了各个城门，到外捕杀吕用之的亲党。毕师铎住进节度使院。秦稠派出一千名宣州军分别把守使院和各个仓库，并派人去迎秦彦。

二十四日（丁卯），高骈自动要求解除节度使职务。由毕师铎兼理府事。

有人对毕师铎说："吕用之奸邪暴虐，将高骈玩于掌股之上，人人憎恨。这一次您兴兵除暴，顺应人心，现在吕用之已彻底失败。这个叛将不足虑，只要一纸檄文，就可以把他抓回来斩首示众。下一步应当抓住使府兵权，虚尊高骈。这样，既有实权又没人敢于违抗号令，不然总有很多麻烦。昨天，秦稠抢占仓库，又匆匆忙忙去迎秦彦，可见他和我们利益并不一致。再说如让秦彦作了节度使，庐州的杨行密、寿州的张翱，未必听他的指挥。弄不好还要开战，一打起来，后果很难预想，不但淮南士民肝脑涂地，恐怕您的功名成败也在未知中，不如赶紧阻止秦彦渡江。他要是自知利害，肯定不敢贸然进兵。即使将来秦彦责备我们负约，我们还可以说是高骈的忠臣。"毕师铎不能接受。第二天毕师铎将这番话告诉了郑汉章。郑汉章认为此人是个智囊，但在广陵城的茫茫人海中，再也找不到献计的人了。

二十五日（戊辰），毕师铎将高骈迁到靠南的府第，派一百名甲士给高骈作警卫，其实是将他软禁起来。这一天宣州军因没达到索求宝货的要求，放火将进奉楼的数十间房屋烧掉。五年以来高骈不向朝廷输纳贡赋，积存的财富统统贮藏在这里。至今，扬州的精华全部化为灰烬。

二十六日（己巳），毕师铎到节度使府视事。没有兵权的官吏

恢复旧职，又让高骈迁到东府。城陷以来，诸军日夜大掠，直到这一天才设立静街使，禁止抢掠。

二十七日（庚午），毕师铎抓获术士诸葛殷，用棍棒打死，弃尸道旁。与诸葛殷有怨仇的人将尸体的舌头割下，眼睛挖出，以解心头之恨。残尸又被人用石头轧烂，后来，竟形成了一座碎石小坟。

正当广陵城忙于抢劫和报仇的时候，庐州刺史杨行密率军开过来了，原来，毕师铎进攻广陵的时候，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给杨行密发去牒文，任命他为行军司马，要他赶紧率部救援。杨行密看到这是扩大实力的好机会，将庐州军全部带上，还向和州刺史孙端借调了一部分军队，合起来有几千人马，匆忙杀向广陵，五月到达天长。

再说吕用之从广陵城逃出后，准备攻下淮口作立身之地。郑汉章的妻子早有防备，吕用之一时攻不下来。郑汉章得到淮口的情报，从广陵发来救兵。这使吕用之陷人背腹受敌的境地，听到杨行密军到了天长，吕用之率军投奔杨行密。

与毕师铎、郑汉章一同起兵讨吕用之的高邮镇遏使张神剑与毕师铎是儿女亲家。他对这次起事持投机态度，所以在毕师铎、郑汉章发兵攻广陵的时候，张神剑故意留驻高邮，不出兵。其理由是，在高邮一则可为毕、郑的援应，二来可为前方补给粮饷。这当然使毕师铎不快，只是尚未成事不便发作。郑汉章出来打圆场说：“张神剑的想法也好，只要大家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大家分享。”这才形成了一个暂时的联盟。

及至广陵城陷，张神剑引前约向毕师铎要财货。毕师铎推托说，这要由新节度使秦彦来安排，他无法作主。张神剑很恼火，与之决裂，也率众投靠了杨行密。此时投奔杨行密的还有高骈的旧将高霸等。杨行密的力量迅速扩大，军众达到一万七千人，由张神剑运高邮粮作给养。

五月二十一日（甲午），秦彦率三万宣歙兵乘竹筏沿江而下，赶往广陵，在上元（江苏南京）被赵晖截击，损失近半。二天后秦彦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事，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补池州刺史赵锽为宣歙观察使。

二十五日（戊戌），杨行密率各路军来到广陵城下，在城外设了八个营寨。秦彦闭城自守。

两军相持了二十天，六月十六日（戊午），毕师铎、秦稠率八千人出战；秦稠战死，士兵阵亡十之七八，毕师铎大败而归。广陵城粮食匮乏，又无法外出打柴，生活极端困难，有消息说已经开始吃人充饥。

苏州刺史张雄的军力很强，秦彦为了争取张雄的支持，把仆射告身授给他，又把三份尚书告身授给裨将冯弘铎等。这些空白告身都是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时朝廷给的。

张雄带来了广陵急需的粮食。广陵被洗劫时大批宝货流落民间，这时人们竞相用珠玉金缯到张雄军营换取粮食。一斤黄金、一条通天犀带只能换五升米，一条锦被只能换五升糠。张雄军富起来，不愿再作战。

八月二十六日（丁卯），秦彦只好再派毕师铎、郑汉章率一万二千人出战，这一次声势很大，军阵延绵数里。杨行密从容布置，在军营里摆好金帛粮食，然后佯败诱敌，趁广陵军哄抢的时候，发伏兵出击，大获全胜。自此，秦彦只能保守城池，不敢言战。

高骈为了设法逃离居处，用金钱收买守卫，被毕师铎发现，不久要他迁往道院里住。高骈每天得到的食品极少，高骈手下的人没有粮食吃，就以道院的木像为燃料，煮皮带充饥。毕师铎、秦彦出兵屡败，他们怀疑可能是高骈施用了巫术，他的诅咒带来了晦气，外边的攻势愈来愈紧，又怕高骈的亲信有人作内应，这使他们觉得除掉高骈即使不能马上在军事上获得转机，也总会少些后患。有个叫王奉仙的妖尼对秦彦说："扬州上空的星象预兆有大

灾大难，必须死一个大人物才能逢凶化吉。"九月四日（甲戌），秦彦使部将刘匡时将高骈及其子弟甥侄，无论老少一齐杀死，挖了一个大坑统统埋掉。第二天，城外的杨行密获悉高骈的死讯，焚纸奠酒，缟素向城大哭三日。

秦彦杀死高骈后，派郑汉章率步、骑兵五千人去攻打张神剑、高霸，果真大胜。张神剑逃回高邮，高霸逃回海陵。

广陵城被围将近半年，秦彦、毕师铎与杨行密打了大小数十仗，总不能破围，城中极端缺粮，一斗米竟值五十缗钱。可吃的草根和花木果实都被采光，最后只能用堇泥团成饼充饥。饿死的人超过了一半。宣州军抓到人象对待牲畜一样驱绑屠割，送到店铺里出卖，一直杀到街上、城中没有一点动静，静得令人恐怖。坊市里到处都是积骸和尸血。秦彦、毕师铎坐困愁城，终日一筹莫展。

城外的攻势仍很猛烈，但也和城内一样，耗尽了全力。杨行密见师老无功，一时难以奏效，准备撤围还军。然而最后的关头还是来了机会。十月二十九日（己巳）早晨，吕用之的部将张审威率部下三百人隐蔽在城外壕沟，到了晚上，他们趁守军换防的机会，以夜幕和狂风大雨为掩护，爬上城楼，打开城门，迎杨行密入城。广陵守军不战而溃。秦彦、毕师铎弃城逃往东塘。

杨行密要高骈的侄孙高愈代理节度副使，并将高骈一族重行安葬。广陵城此时只剩下几百户人家，侥幸存活的人虚弱得不象个人样。杨行密自称淮南留后，临时将广陵城西军寨里的粮食运来赈济坊民。

刚刚休整了一天，秦宗权的弟弟秦宗衡率一万人马渡过黄河，来与杨行密争夺淮南。秦宗权的蔡州军是淮南以北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秦宗权其人也值得详细介绍一下。秦宗权，上蔡人，初为许州牙将。广明元年（880年），黄巢渡过淮河，准备进攻洛阳。忠

武节度使薛能派秦宗权到蔡州去调发军队。但在秦宗权离开许州后，薛能因姑息奉诏赴溵水戍守的徐州兵在许州闹事，而被忠武大将周岌逐杀。于是秦宗权以赴难为名，选募士兵，赶走刺史，把蔡州变为自己的地盘。周岌当了节度使，姑息事实，正式任命秦宗权为蔡州刺史。

中和元年（881年），黄巢攻陷长安，忠武节度使周岌向黄巢投降。秦宗权在蔡州拒不服从周岌要他投降的命令。监军杨复光带领三千名忠武军到蔡州，要秦宗权和他一同讨伐黄巢。秦宗权派部将王淑率兵随杨复光攻打邓州。王淑逗留不进，被杨复光斩首。杨复光将二军合起来，分为八都，分别由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人率领。杨复光率这八都人马与朱全忠作战，攻克了邓州。

杨复光向朝廷要求将蔡州升格为奉国军，以秦宗权为防御使，实际就是奉国节度使。

中和三年，黄巢被李克用打败，退出长安。五月，黄巢军骁将孟楷率一万人为先锋，攻打蔡州，秦宗权迎战失败，随即向黄巢称臣，与黄巢连兵。

六月，黄巢与秦宗权合攻陈州，未克。

十一月，秦宗权围攻许州。

中和四年六月，黄巢败死，但秦宗权继续出兵攻打邻道。据史书记载，秦宗权异常残暴，出征打仗，常常用车子载着腌制的人尸作军粮。这些人到处杀人放火，经过的城府变为废墟，其暴行骇人听闻。僖宗准备回长安，把秦宗权视为大敌。

光启元年（885年）二月，秦宗权称帝，自设百官，僖宗下诏任命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讨伐秦宗权。

六月，秦宗权攻陷东都洛阳。

七月，秦宗权攻陷了邻道二十余州，只有距蔡州不过百余里的陈州，虽然兵力很弱，但有朱全忠的支持，秦宗权就是攻不下

来，陈州刺史赵犨因此被任命为蔡州节度使。赵犨为了感谢朱全忠的援助，就与朱全忠结为亲家。

其后，秦宗权与朱全忠争夺河南，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

秦宗权的兵力有朱全忠的十倍，却总打不赢，很是恼火；光启三年，倾全力攻汴州，朱全忠兵力不足，派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东去募兵，并任命他为淄青刺史。

朱珍到淄青非常顺利，不过十来天，就招募了一万多人，又袭击青州，缴获一千匹马，很快返回大梁。朱全忠增添了新的力量，迅速组织反击，蔡将张晊、秦贤未作防备，损失二万余人。蔡州军大惊。

这样，秦宗权一边率郑州精兵与朱全忠会战，一边继续向南扩张。

十一月二日（辛未），秦宗衡率军抵达广陵城西，占据了杨行密原来的军寨。没来得及运进城内而留在营寨内的军械、粮草都被秦宗衡缴获。刚从广陵城逃出来的秦彦、毕师铎到东塘后，因苏州刺史张雄闭城不纳，想过江先回宣州，经秦宗衡相邀，二人带领人马折回，与之连兵。

不久，秦宗权因在河南频频失利，召秦宗衡回蔡州，以对付朱全忠。秦宗衡的副将孙儒看出秦宗权已露败象，知道他的势力维持不了很长时间了，就以生病为托辞，留在淮南拒不撤军。秦宗衡一再催逼孙儒回蔡州，直令孙儒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十一月五日（甲戌），孙儒借与秦宗衡一同吃酒之机在酒席上将秦宗衡杀死，还把秦宗衡的首级送给秦宗权的对手朱全忠。

孙儒分兵抢掠附近的州县，兵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因广陵一带缺乏粮食，就与秦彦、毕师铎合兵攻打高邮。十二日（辛巳），高邮镇遏使张神剑抵挡不住孙儒的攻势，率部下二百人逃往广陵。十七日（丙戌），孙儒在高邮城大屠杀。

十九日（戊子），高邮残部七百人突围来到广陵。杨行密怕这些亡命而来的士兵会出乱子，就把这七百人拆散，由诸将各管一部分。后来在一个晚上将高邮兵全部活埋。第二天杨行密在府第将张神剑杀死。

杨行密怕孙儒乘胜进取海陵，令海陵镇遏使高霸将海陵军民全数迁往广陵，下死命令说：“谁拒绝离开家园就斩灭全族！”海陵数万户居民放弃田舍资产，扶老携幼向广陵转移。二十九日（戊戌），高霸和他的弟弟高晦，以及部将余绕山，前常州刺史丁从实等到达广陵。杨行密出城迎接，与高霸、高晦约为兄弟，并把海陵来的将士安置在法云寺。

过了几天，杨行密想把高霸派往天长去和孙儒作战，谋士袁袭说：“高霸是高骈的旧部，反复无常，观风投机，我们胜了，他前来归附，败了极可能反叛。现在要把他安排到天长，这一仗打不赢，就不能指望他回头，没有把握，不如把他杀掉。”杨行密认为袁袭所言有道理，便设计将高霸、丁从实、余绕山杀死，又派一千名骑兵到法云寺将高霸所部数千人尽数袭杀。法云寺外几条街的地面都被鲜血染红。高晦暂时漏网，第二天也被抓获杀掉。

后来袁袭死了。杨行密哭道：“上天为什么让我痛失肱股？我好宽，袁袭常劝我以杀，所以刚柔相济，这大概就是袁袭死去的原因所在吧？”

杨行密收拾了张神剑、高霸之后，又将已投降的吕用之处死。吕用之在天长时曾欺骗杨行密说：“我的住处埋有五万锭银子，等到攻克广陵的时候，愿意献出来作庆功酒席的酒水钱。”结果却兑不了现。吕用之被腰斩后，怨家报仇，族党也被杀尽。

杨行密看到广陵城饥荒严重，无法据守，根据袁袭的建议，派和州将领延陵宗带所部二千人回和州，又令指挥使蔡俦率一千人押着几千辆辎重回庐州，作了将来退军的准备。

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他派内客

将张廷范给杨行密送来朝命，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又任命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派牙将郭言带一千名兵士送李璠赴任。感化节度使时溥资格比朱全忠老，官职做到都统，却被朱全忠抢去了淮南，很不满意，尽管朱全忠写信请时溥放行，时溥还是不让李璠通过。李璠到了泗水，被时溥的军队赶回。时溥、朱全忠为此结了怨。文德元年（888 年）二月，朱全忠奏请朝廷任命杨行密为淮南留后。

秦彦、毕师铎、郑汉章等归附秦宗衡后，还有二千多人马，后来，逐渐被孙儒吞并。裨将唐宏知道这几个人早晚有杀身之祸，就下井投石，诬告他们暗中与朱全忠联络。孙儒将秦彦等人杀死，给了唐宏一个马军使的职务。

四月，孙儒攻占广陵，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暂时退到庐州。

八月，孙儒进逼庐州，赵锽得取宣州。杨行密决定避开孙儒，先破薄弱之敌。他厚币卑辞，鼓动和州孙端、上元张雄从采石渡江人宣州境骚扰。杨行密率诸将自庐州境内的糁潭渡江，在曷山击败赵锽将苏塘、漆朗，进而围攻宣州城。赵锽的哥哥赵乾之从池州率军来救宣州，杨行密令陶雅将赵乾之在九华击退，赵乾之逃往江西。

龙纪元年（889 年）六月，杨行密围攻宣州，城中粮尽人相食。指挥使周进思赶走赵锽，据守宣州。赵锽在逃往广陵的路上被杨行密部将田頵追获。过了几天，城中的军士拿下周进思向杨行密投降。朝廷获得这个消息后，任命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

十月，杨行密派马、步都虞候田頵攻打常州，常州在钱镠的控制下。十一月，田頵偏将李友掘地道入城，擒制置使杜稜。田頵以三万军众戍守常州。十二月，孙儒从广陵渡江，逐田頵，取常州。孙儒将刘建锋守常州，孙儒回广陵后，刘建锋又赶走钱镠任命的润州制置使成及，夺取润州（江苏镇江）。

大顺元年（890年）正月，汴州将领庞师古率军号称十万人马渡过淮河来援杨行密，攻下天长。二十五日（壬子）攻克高邮。

二月，庞师古深入淮南，与孙儒战于泰州兴化县的陵亭镇，师古兵败回军。

杨行密乘孙儒北御庞师古无暇兼顾，派马敬言袭据润州，又派李友攻打常州。

三月，赐宣歙军名号宁国，以杨行密为节度使。

六月，孙儒获悉蔡将申丛将秦宗权的双脚打折、囚禁起来，向朱全忠投降；蔡将郭璠争功，杀申丛，将秦宗权送到汴州。后来秦宗权在京师被处斩。孙儒设法与朱全忠修整关系，求情通好，朱全忠表请孙儒为淮南节度使。没过多长时间，朱全忠杀了孙儒的使者，两家又成仇敌。

八月孙儒南攻润州。

闰九月，孙儒派刘建锋攻陷常州，进围苏州。十二月，攻陷苏州，杀苏州镇将李友。安仁义等得知消息后，烧城夜遁。孙儒派沈粲守苏州，又派归传道守润州。

大顺二年正月，孙儒发动淮、蔡的军队渡江，从润州转战南进。田頵、安仁义连连败退，孙儒将李从立迅速杀到宣州城东的宛溪。宣州守军不多，事先未作有效的防御准备，情况危急。杨行密夜派部将台濛率五百人在溪西反复奔行呐喊，以为惑敌之计。李从立见杨行密有大队人马开来，急忙率部退走。孙儒的先头部队在溧水被杨行密将李神福杀俘一千余人。

四月，杨行密派部将刘威、朱延寿率兵三万攻打孙儒，在宣州北部的黄池兵败，孙儒进驻黄池。五月，山洪暴发，淹没了黄池军营，孙儒退回扬州，安排康暀据守和州，安景思据守滁州。李神福攻和州，康暀投降；攻滁州，安景思败逃。

七月，朱全忠与杨行密达成协议，夹攻孙儒。孙儒自恃兵强，想先灭杨行密再与朱全忠抗衡。他向各个藩镇传送檄文，历数杨

行密、朱全忠罪状，并说："等我讨平杨行密、朱全忠，一定率兵入朝，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接着，焚庐舍，杀老弱，驱赶丁壮妇女撤离扬州。杨行密派别将张训、李德诚迅速赶往扬州，扑灭余火，抢救出数十万斛粮谷，用以赈济饥民。

泗州刺史张谏向扬州借粮，张训受杨行密之命，借给张谏几万斛粮食，这使张谏十分感激。

十二月，孙儒焚掠苏州、常州，大军直逼宣州，号称五十万人众。钱镠派兵增援苏州，又向杨行密提供衣服和食品，暂时遏止了孙儒的攻势。

景福元年（892 年）正月，杨行密与诸将计议攻守方略。说："孙儒的兵力有我们的十倍，我们频频失利，是不是避其锋芒，撤到宣州西部靠近长江的铜官（安徽铜陵）?"刘威、李神福说："孙儒大军远途而来，利在速战。现在最好的策略是在险要之处加强守备。坚壁清野，拖垮对方；同时出动轻骑，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夺取他们的军粮和掠来的物资。这样他们向前没有交战的机会，后退无法得到撤军所必须的粮食，我们以逸待劳，擒获孙儒可以马到成功!"戴元规说："孙儒与我们争夺淮南，已经打了五年仗。几年来，胜负互见，消长相当。现在他们动员全部力量与我们决战。目的是要分出胜负。如果我们望风弃城，不战而退。那就遂了孙儒的心愿，孙儒降兵及淮南士民跟随军队渡江的人很多，您最好派人将这些人送回淮南，让他们恢复生产，安居乐业。孙儒军士听到淮南的情况，都会产生思乡之情，这是攻心之计。军心动摇了，怎么能不失败!"杨行密听后，很赞赏这些意见，一一布署实施。

二月，孙儒围攻宣州。五月，杨行密几次挫败孙儒，攻破了孙儒在广德安设的营寨。已经袭取了常州的张训出兵控制住湖州附近的安吉。这二步棋彻底切断了孙儒的粮道。

孙儒军吃光了军粮，军营里流行瘟疫，生病的人愈来愈多。孙

儒派刘建锋、马殷分头到各县去抢掠。杨行密获悉孙儒正在生虐疾，六月六日（戊寅），发起攻击，这一天大雨滂沱，天昏地暗，孙儒军大败。安仁义攻破孙儒五十多个军寨，田頵在阵前抓获孙儒，将他斩杀，首级送往长安。孙儒的人马大部投降。刘建锋、马殷收拾残部七千人南逃洪州（江西南昌）。二十五日（丁酉），杨行密从宣州出发，回军扬州。七月十四日杨行密到达扬州。

在此以前，扬州富庶甲天下。当时人称扬州居第一，益州（成都）居第二，由于从秦彦、毕师铎到孙儒、杨行密的多年战争破坏，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昔日的繁荣被一扫而光。

八月，朝廷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根据杨行密的表请，任命田頵为宣州留后，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淮南经历长期战乱之后，士民流离，人烟稀少，物资极端匮乏。杨行密做了淮南节度使，赏赐将吏帛不过几尺，钱不过几百，他能够以勤俭的原则维持开支，不是公宴，从来不动用女乐。这在当时是很值得称道的。他注意恢复生产，招抚流散的劳动力，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几年，淮南又富庶起来，差不多赶上了太平盛世的年代。

自景福元年杨行密任淮南节度使起，淮南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行密死后，诸子皆无作为，传至杨渭时，公开建立国号称为吴国；再传至杨溥时，政权被徐知浩篡夺，吴国灭亡，共计传四主，历时四十六年。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54—卷259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之乱》、《杨行密据淮南》

《新唐书》：《高骈传》、《杨行密传》、《孙儒传》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吴一·太祖世家》

李茂贞尽占十五州之地

龙纪元年（889年）昭宗即位。昭宗还是寿王的时候，就对宦官没好感；即位后，政事总是和孔纬、张濬等几个宰相商议。执掌军权的宦官杨复恭倚仗援立昭宗起过很大作用，十分骄横，总是乘坐轿子到太极殿。昭宗和宰相对此虽很恼火，但因他有兵权，怕他造反，不便立刻削权，便提拔杨复恭假子天威军使杨守立，企图通过杨守立削弱杨复恭的权威。

杨复恭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兵，专制朝政；他的许多假子都是节度使、刺史，还有六百名宦官儿子作监军。国舅王瓌出入禁中，颇用事，被杨复恭排挤，后出为黔南节度使。王瓌行至吉柏津，被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沉到江里。昭宗知道是杨复恭指使干的，极为恼恨。

昭宗赐杨守立国姓，为他改名李顺节，委以重任。李顺节权力上升后，成为杨复恭的政治对手，杨复恭失势已成必然。

大顺二年（891年）八月，出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杨复恭不肯屈就，称病要求退职。昭宗答应他的要求，给他一个上将军的虚衔，让他退职，还赐给几杖表示荣宠。使者在送达诏书返回的路上，被杨复恭派人刺死。

杨复恭失势后，退居昭化里私第。这里靠近玉山军营，杨复恭与其假子杨守信来往颇密。这个杨守信是玉山军使，于是有人诬告杨复恭与杨守信酝酿谋反。十月八日（乙酉），昭宗到延喜楼，派李顺节率禁军攻打杨复恭府第。杨复恭、杨守信连兵御战，李

顺节一时难以得手。到了晚上，杨复恭、杨守信携家出通化门，逃往兴元（陕西汉中）。到了兴元以后，杨复恭与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及绵州刺史杨守厚以讨李顺节为名，一同举兵抗朝。杨守贞等三人都是杨复恭的假子。

李顺节获得权力后，也同杨复恭一样骄横，常常带着军队出入宫庭。同年十二月，两军中尉刘景宜、西门君遂在得到昭宗允许之后，将李顺节骗杀。这次兵变使长安又受到一次骚掠，事变平息后，百官按惯例上表称贺。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等五节度使联合上表，要求讨伐杨复恭、杨守亮，并请加封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朝议认为李茂贞得到山南，朝廷也难节制，就下了一道旨在调解的诏书，可是双方都不听。

景福元年（892年），李茂贞、王行瑜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向杨复恭开战。李茂贞仍坚持要做山南西道招讨使。他在给杜让能、西门君遂的信中，措辞傲慢，昭宗接受不了，在延英殿召集宰相、谏官商议对策。这时宦官里有人暗结李茂贞、王行瑜，宰相们害怕商议的内容泄露出去，心存顾忌，不敢讲话。给事中牛徽说："僖宗多难，李茂贞有翼卫之功。这次攻讨诸杨，出发点也是除恶，但不当不俟朝命。近来听说军队在山南杀人太多，如不授予招讨使，用国法约束他，山南之民快要被杀光了。"昭宗说："也是道理。"于是决定要李茂贞担任山南西道招讨使。

七月，李茂贞连克山南西道的兴州（陕西略阳）和洋州（陕西西乡）。八月攻下兴元（陕西汉中）。

景福二年正月，李茂贞上表要求镇守兴元。于是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武定节度使，又把果州（四川南充）和阆州（四川阆中）划归武定军；同时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本想兼领凤翔节度使，所以不执行诏命。

九月十日（乙亥），覃王李嗣周率三万禁兵护送凤翔节度使徐

彦若赴任，在兴平停驻。李茂贞、王行瑜合兵六万人，屯驻在周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禁兵都是新招募来的市井少年，李茂贞、王行瑜所率领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边兵。两军战斗力相差甚远。九月十七日（壬午），李茂贞等进逼兴平，禁兵望风逃溃。李茂贞等乘胜进攻三桥，引起京城长安的极大震动。士民逃散，市人守在宫门前要求惩罚首倡用兵的人。

崔昭纬忌妒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暗中给李茂贞写信，告诉他："用兵不是昭宗的意见，全是杜太尉的主意。"崔昭纬，进士及第，昭宗朝历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史书说他性奸险，忌前达，内结宦官，外连藩镇，为李茂贞在朝中的耳目。其实，讨李茂贞确实不是杜让能的主意。昭宗不能容忍李茂贞的跋扈，曾于七月间要杜让能全权负责讨李茂贞。杜让能估计朝廷实力不足，自知难有取胜的把握，曾予劝谏。昭宗心不能平，说："朕不能甘心为孱弱之主，愔愔度日，坐视陵夷。你只管为朕调发军粮，用兵的事由朕委托覃王来办。成败没有你的责任。"杜让能仍怕身后之祸，不敢独立负责，说："陛下一定要用兵，可使宫廷内外的大臣协力来干，不当把这个重任完全交给我。"昭宗说："你位居元辅，当然要由你来干，你也不要推辞。"杜让能流泪说："陛下所做的，正是当年宪宗削藩的遗志，臣下决不敢推辞，只是担心将来可能有晁错之诛，而不能弭七国之祸。陛下这样信任我，我豁出去了！"于是留在中书省计划调度，有一个多月没回家。杜让能的一举一动全让崔昭纬报告给李茂贞、王行瑜。九月十九日（甲申），李茂贞在临皋陈兵，上表指责杜让能，要求诛罚。杜让能说："我早已预料到了，还是用我来作解兵的理由罢。"昭宗束手无策，止不住泪下，无奈地说："和你告别了！"这一天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诏书将贬放杜让能的理由说得很含糊，只说是赞辅乏力，奸幸频闻，为了平息舆论，给予贬降。

同一天，还把观军容使西门君遂流放到儋州，内枢密使李周

潼流放到崖州，段翊流放到驩州。二十日（乙酉），昭宗在安福门斩西门君遂、李周潼、段翊三人，再贬杜让能为雷州司户。昭宗派使者对李茂贞说："蛊惑朕用兵的是被杀的三个人，不是杜让能的罪过。"

二十七日（壬辰），任命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崔胤是前相崔慎由的儿子，他外表宽弘而心存机巧，十分阴险。因与崔昭纬关系很深，而得以担任宰相。

李茂贞聚兵不退。一定要昭宗杀杜让能，作为退军的条件，崔昭纬配合李茂贞极力说杜让能的坏话。十月，赐杜让能和他弟弟杜弘徽自尽。又下诏布告朝廷内外，说："杜让能等四人结为奸党，以防备山南为名，主张用禁军攻讨藩镇，倾危宗社。这种谗构忠良的做法包藏着祸心，大臣们不断有封章表示反对，列藩也有恳切的申辩。朕亲加鞫问，查明杜让能的罪行昭然，必须按照宪章给予制裁。"诏书还指责杜让能，手操国柄，政以贿成，举枉错直，卖官鬻爵，聚敛超过巨万，放债收取倍息等等。

杜让能等死后，朝廷彻底失去权威，从此一举一动都听命于李茂贞、王行瑜。南北二司往往依附这二个人，以求昭宗的恩幸。

有二人叫崔铤、王超，是李茂贞、王行瑜的判官。只要天子表示过意见，而有的人不满意，就去运动崔铤、王超，这二个人教李茂贞、王行瑜上奏章纠缠，朝廷稍有异议，李茂贞、王行瑜的辞语就带出威胁的成份。

昭宗又任命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李茂贞的愿望得到满足。这样，李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州、陇秦等四镇十五州的属地。

邠宁节度使王行瑜要求作尚书令。韦昭度密奏道："唐太宗即位前是尚书令，即位后，这个职位取消了。只有郭子仪以大功拜尚书令，郭子仪终身避让。王行瑜那有资格要尚书令的职位！"十

一月，以王行瑜为太师，赐号“尚父”，还赐给享有特权的铁券。

尽管朝廷采取姑息迁就的政策，王行瑜仍不满意。不久，王行瑜联合韩建、李茂贞三镇入朝，演成了与李克用的另一场冲突，这已是后话了。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58、卷259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之乱》

《旧唐书》：《杨复恭传》、《杜让能传》、《崔昭纬传》

《新唐书》：《杨复恭传》

《旧五代史》：《李茂贞传》

朱玫、襄王煴败死

唐僖宗中和四年（884 年），农民军首领黄巢在泰山狼虎谷被杀，历时十年之久、纵横全国的唐末农民大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却给腐朽的唐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中央政权已名存实亡。由于朝廷暗弱，故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出现了许多新藩镇。

黄巢起义后期，各藩镇已将自己的辖区变为独立王国。河南、河北、江淮等地区都不再将赋税向朝廷交解。三司转运已无财赋可调，度支只能征到同州、华州、凤翔等有限几个州的租税，收不敷出，军队的供给往往不能按时发放，财政上急需开辟新的财源。

以前，河中镇安邑、解县的池盐都隶属盐铁司，设官专卖。黄巢占领长安以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把专卖权收去，每年只上缴三千车盐作收回专卖的补偿。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想把安邑、解县的池盐专卖权重新收回。光启元年（885 年），下诏把两池盐的专卖权仍交盐铁司办理。这一年四月，田令孜兼两池榷盐铁使。

王重荣不肯放弃盐利，上表争权。僖宗虽曾派中使去解释，王重荣仍不放弃由河中镇垄断盐利的立场。

五月，田令孜采取调换节度使的办法，将王重荣调离，具体安排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调任义武节度使，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调任河中节度使。为了防止王重荣拒命，还诏命李克用河东军向王重荣施加压力。以支持王

处存赴任。

王重荣与田令孜早有过节。田令孜的养子田匡祐在河东镇受到厚待，但其飞扬跋扈，军士们都不满，也惹恼了王重荣。王重荣便把对田令孜的一腔愤恨发泄出来。责骂田匡祐无礼，后来把他驱逐出去。

王重荣在收复长安、平定黄巢的过程中出力不小，这次被田令孜借机倾轧，很不甘心，就连连上表，说田令孜离间君臣，并给他总结了十大罪状，却不去兖州接任。

应该调到河中任节度使的王处存借口易州、定州形势还不安定，也不赴任。他上表表示：王重荣对唐室有大功，又没有犯什么罪，不应该随便将他调离，不然，会给其它藩镇带来心理震动。但朝廷不改初衷，并催促王处存赴任。在诏书的催促下，王处存于八月带军赴任；来到晋州，晋州刺史冀君武不让进城。王处存有了理由，乐得回军。

十月，王重荣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五个月前，李克用在上源馆因细故被朱全忠围袭，差点送了命。为此，李克用诉之于朝，朝廷不为辩曲直，所以李克用对朝廷也有怨愤，正在选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攻打汴州。李克用给王重荣回信说："等我消灭了在汴州的朱全忠，回头再来收拾这些鼠辈，他们大可不必放在心上。"王重荣说："等您从关东回来，我恐怕已成俘虏了，还是先除君侧，回头再攻朱全忠为妥。"当时的形势是，田令孜借助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王重荣对抗，而朱玫、李昌符又暗结朱全忠。李克用上表说："朱玫、李昌符与朱全忠串通。阴谋消灭我，我不得不自救，已经发动了蕃兵、汉兵十五万人，部署明年渡越黄河，从渭北绕过京城，讨伐朱玫、李昌符。这次出兵不会使京城受到惊扰，可以放心。回师以后，我再消灭朱全忠，以雪仇耻。"朱玫则想让朝廷讨伐李克用，好几次派人潜入长安，烧毁仓库物资，刺杀僖宗近侍，说是李克用干的，搞得京城人心

惶惶，日有讹言。

田令孜派朱玫、李昌符率本军和神策、鄜、延、灵、夏等军共三万人，来到沙苑，讨伐王重荣。王重荣一边发兵拒敌，一边向李克用告急。两军相持了一个多月，李克用的援军赶到。十二月，双方会战，朱玫、李昌符兵败，逃回本镇，溃军一路焚掠，李克用进逼京城。田令孜一看情况紧急，慌忙挟僖宗自开远门出奔凤翔。

光启二年正月，李克用把军队撤到河中，与王重荣一道上表请僖宗回京，接着列举田令孜的罪状，请求治他的罪。僖宗把曾被田令孜排斥的飞龙使杨复恭也任命为枢密使，以给李克用等一个姿态。

田令孜要僖宗到兴元（陕西汉中），僖宗不去。正月八日晚，田令孜带兵入宫，把僖宗劫往宝鸡。跟去的黄门卫士只有几百人，宰相朝臣都不知道。只有在宫中值班的翰林学士杜让能及时听到消息，步行出城十多里，找到一匹马，骑马追到宝鸡才找到僖宗。

第二天，又有太子少保孔纬等几个人随后赶来。僖宗命孔纬为御史大夫，让他去京城把百官找到宝鸡。

孔纬来找宰相，萧遘、裴澈因田令孜在僖宗身边，不想到宝鸡去，只说有病，根本不见他。孔纬要御史台的官员通知百官到宝鸡去，百官们推说没有笏袍，迟迟不动身。孔纬把三院御史找来，流泪说："人怎么能这么势利，布衣百姓有了急难还要去看一看，哪有天子流离，臣子置若罔闻的道理！"御史只好说："大家要置办一下行装，缓几天再去吧！"孔纬拂衣而起，道一声："大家好自为之。"便不再烦言，自回宝鸡复命去了。

不仅百官不愿去宝鸡，就连朱玫、李昌符也耻于再被操纵僖宗的田令孜所利用。朱、李二人又见李克用、王重荣兵力强大，就调转立场，与河东、河中军讲和，反过头来派兵追逼田令孜。邠宁、凤翔的军队在潘氏打败神策指挥使杨晟，宝鸡已经能够听见

两军激战的金鼓之声。田令孜赶紧拥着僖宗从宝鸡向兴元（陕西汉中）撤退。刚刚过了散关，朱玫就包围了宝鸡，接着击溃石鼻守军，攻打散关。襄王李煴是肃宗的玄孙，因病留在石鼻被朱玫发现，带回凤翔。一月三十日（庚戌），李克用回军太原。

二月，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又一次上表要求惩处田令孜。朱玫、李昌符指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险要处烧毁邮驿，拦路设立栅障。僖宗只好从行人稀少的旁路入川。小路崎岖，蜀道难行，朱玫的军队尾随追逼。僖宗经历了许多艰难，还是到了山南。石君涉见僖宗来了，放弃山南西道，逃往凤翔。

朱玫见僖宗不妥协，田令孜终不可去，就对萧遘说："我是根据您的命令迎僖宗回京才出兵的。现在局面倒象是我在胁逼皇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屈服于弄权的宦官。唐室的后裔还很多，为了社稷的长治久安，我们可以作另外的选择。"萧遘说："僖宗践位十几年，没有大的过错。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受田令孜胁迫，身不由己，如果尽心王室的话，就应该引兵回镇，拜表迎銮。至于废立的事，我不敢听命。"这时朱玫已下了废立的决心，出门便对大家说："我立皇室的一个王，谁要反对就斩头！"

四月三日（壬子），朱玫迫使留在凤翔的百官拥戴襄王李煴暂理军国大事，根据僖宗的诏制进行封拜、指挥。并派人到兴元迎僖宗回京。朱玫要萧遘书写拥立襄王的册文，萧遘以文思荒疏为由，让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书写。六日（乙卯），襄王李煴受册。郑昌图因书写册文有功，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判度支、盐铁、户部；三司各置副使，统归郑昌图一人主管。朱玫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率百官拥李煴回长安。在河中的百官崔安潜等给襄王上笺表，祝贺他受册。

田令孜知道自己失去了人心，就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掌管军权，自己作西川监军，到成都找他哥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去了。

五月，朱玫大行封拜，以取悦藩镇，受其命者十之七八。淮南节度使高骈也奉表劝进。

在拥立襄王的过程中，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始终与朱玫同谋。朱玫作了宰相，独揽大权，冷落了李昌符。李昌符与之决裂，不受襄王命封而向兴元的僖宗通表。僖宗立即加任李昌符为检校司徒。

朱玫要部将王行瑜率last方邠宁、河西军助攻散关，杨晟弃关败走，王行瑜进屯凤州。

这时各道的贡赋仍旧运往长安。兴元财政枯竭，开支难以维持，迫切希望调整关系，改变局面。杜让能对僖宗建议，利用杨复恭的弟弟杨复光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旧交，说服王重荣归顺朝廷。僖宗立即同意，并派右谏议大夫刘崇望出使河中，给王重荣送去诏书。王重荣为了表示诚意，献来十万匹绢，还主动要求讨伐朱玫，将功赎罪。

二十日（戊戌），襄王李煴派使者到晋阳向李克用颁赐诏书，说："僖宗走在半路，六军兵变，发生骚乱，僖宗在突然事件中死亡，我被藩镇拥戴，现已受册。"朱玫也给李克用写了一封信，李克用听说这些事情都是朱玫策划的，大怒。河东大将盖寓给李克用出主意说："僖宗出奔，国人都把罪责推给我们，现在不诛朱玫，黜李煴，就无法洗清自己。"李克用听了这话，立刻把诏书焚毁，囚禁了使者，向邻道送去檄文，说："朱玫竟敢欺骗藩镇，公开说僖宗已经死亡。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已派发了三万蕃、汉兵进讨凶逆，当一起建立大功。"

李克用又给朝廷送来奏表说："我准备派兵渡河，扫除逆党朱玫，迎接圣驾回京，希望诏命诸道，与我协力讨贼。"

朝廷任命感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率领二万军队从金州出发，与李克用、王重荣共同攻讨朱玫。杨守亮本叫訾亮，是杨复光的假子，杨复光为他改名杨守亮。

此前，山南的人都说李克用与朱玫是一伙，纷纷表示不安。李

克用的上表送到以后，僖宗拿给随从的官员们看，并通报给山南诸镇，从此舆论平息了。但李克用仍提到制裁朱全忠的问题，僖宗让杨复恭写信告诉他说："待京畿消停下来，会重新作出处分。"

李克用与朱全忠结仇的事情发生在中和四年(884年)。这时，黄巢虽然退出长安。但兵力仍很强大。负责征讨黄巢的周岌、时溥、朱全忠支持不住，共同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于五月到达汴州，在城外扎营。朱全忠一再邀请李克用进城，让他们在上源驿休息。朱全忠还亲到上源驿置办酒席，带来了声伎舞乐和美酒佳肴，周到有礼。李克用乘酒使气，言语凌人，令朱全忠难以接受。傍晚，酒宴结束，随从们都喝得烂醉。朱全忠与宣武将杨彦洪经过策划，把车子连起来堵住周围的道路，然后派兵围攻李克用的住所上源驿。外边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李克用大醉，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几个人拼死格斗，争取了时间；侍者扑灭烛火，把李克用藏在床下安全的地方，用冷水浇头，令他醒酒，告诉他大难临头。李克用这才睁开眼睛拿起弓箭，想办法突围。这时，四周的烟火已经合拢，幸好老天有眼，下起大雨，一时大火还烧不过来。雷电交加，天地晦冥，给突围带来了机会，薛志勤用箭射死了几十名汴军，搀扶着李克用翻垣出逃，后面跟着几名亲兵。汴军把守着渡桥，在闪电中，经过激烈的战斗，史敬思控制了守桥，让李克用先行，自己断后。史敬思战死，李克用缒城得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都被汴军所杀。

李克用的妻子刘氏很有智略，先期从城里逃出来的人报告城内有变，刘氏不动声色，先将来人杀掉，暗召大将集合军队准备应变。天亮的时候，李克用回来，准备率军与朱全忠拼个你死我活。刘氏说："这次我们是救人之急，竟遭朱全忠的谋害！但如果举兵相攻，是非曲直就难以说清，还是先报告朝廷，让朝廷来处分。"李克用听了刘氏的话，引兵退去，只是给朱全忠送去一封信，表示抗议。朱全忠回信说："昨天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是朝廷

派使者背着我和杨彦洪商量的。现在杨彦洪已死，望你鉴察。”

七月，李克用回到晋阳，一面修治甲兵扩充军力。一面向朝廷上表，说：“李克用破黄巢有大功，却被朱全忠暗算，将佐以下三百人被杀，朝廷授予的牌印被抢去，朱全忠还在东都洛阳以及陕州、孟州等地张贴公告，说我已经死了，军营中的人马溃散，让各地拦截河东兵，见到就杀，不许一个漏网。军中将士悲愤已极，请求报仇。我知道朝廷是最公正的，应该听朝廷的命令，所以极力克制，不让士兵胡来，带着他们回到太原。我恳求朝廷派使者查问这一事件，派兵诛讨朱全忠。我已让我的弟弟李克勤在河中准备了一万名骑兵，等待朝命。”

这时黄巢刚刚平灭，朝廷对方方面面采取姑息的态度，接到李克用的上表，对朱全忠却也无奈，只是派使者给李克用说好话，要他和朱全忠不要把怨结得太深。李克用前后八次上表，强调：“朱全忠妒功嫉能，是个阴谋家、野心家，总有一天是国家的祸害。如果朝廷无力发兵，请求下诏削夺他的官爵，我自率本道兵去攻讨，不用度支发给粮饷。不然，姑息养奸，贻害无穷！”僖宗几次让杨复恭等转答朝廷的立场，说：“我深知这次你受了委屈，但现在国家在忧患时期，还是要顾全大局！”朝廷不敢主持公道，李克用一直愤懑不平，这一次李克用旧事重提，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光启二年九月，长安百官太子太师裴璩等上劝进书。十月，李煴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贞，遥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

这时李煴的军事形势并不好，不但丢了兴元，十二月又被诸军攻下凤州。杨复恭向关中传发檄文说：“谁能拿到朱玫的脑袋，就赏他作静难节度使。”这道檄文使连连兵败的王行瑜动了心。王行瑜和手下的人商议说：“打了败仗回去要被治罪，杀了朱玫却可以做上节度使，后一条显然是可取的。”大家表示愿意听从王行瑜的指挥。十二月十日，王行瑜从凤州自行领兵回长安。朱玫正在

处理政务，听到这消息，大怒。他把王行瑜召来，斥责说：“你擅自领兵回京，难道想造反吗？”王行瑜说：“我不想造反，是要诛灭造反的人！”说完把朱玫抓起来斩了，一同被杀的有朱玫的同党几百人。各军大乱，焚掠长安，遍地都是缺少御寒服装而冻死的士民。裴澈、郑昌图率百官二百多人拥着襄王李煴奔河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以迎接的名义，把李煴抓起来杀了，把裴澈、郑昌图关押起来，百官几乎死了一半。王重荣把李煴的首级用匣子装起来送往山南，献给僖宗。光启三年正月，邠宁都将王行瑜心满意足地作了静难军节度使。

三月，下诏将李煴的宰相萧遘、郑昌图、裴澈等三人在当地集众斩首，还有一批朝官也被处以极刑。

六月，僖宗在返回长安的途中，驻跸凤翔。曾与朱玫合谋拥立襄王的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烧行宫再叛，兵败逃据陇州。

八月，陇州招讨使李茂贞奏报，陇州刺史杀了李昌符一族，举城投降。

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多灾多难、身心交瘁的僖宗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为防止有变，一行人匆忙从凤翔出发，二十一日（己丑）赶回长安。为了庆贺，改年号为文德，同时颁诏大赦天下。两周后，这个生不逢时的傀儡皇帝，便在皇宫的灵符殿死去，结束了可悲、可叹的一生。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56—卷259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之乱》
《新唐书》：《朱玫传》、《王重荣传》、《十一宗诸子传》

韩建矫杀十一王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晚年对部下用法苛严，曾处罚了一个叫常行儒的人。

光启三年（887年）六月，怀恨在心的常行儒率兵袭攻王重荣府舍，重荣趁夜逃往城外别墅，第二天被常行儒捉到，随即被杀。

常行儒推王重荣兄王重盈为帅。王重盈既立，杀常行儒及其同伙。

乾宁二年（895年），王重盈死，军府推王珂为留后。王珂是王重荣另一个哥哥王重简的儿子，后来过继给了王重荣。王珂也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女婿。李克用上表说："王重荣有功于国，应该让他的儿子王珂作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的儿子王珙不服，厚结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华商节度使韩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三人上表说："王珂不是王重荣的儿子，河中节度使应授予王珙。"昭宗已答应了李克用的要求，就不再同意王珂与王珙调换职务。

王行瑜、韩建、李茂贞为王珙求节度使而不能得，觉得丢了面子，五月，各带精兵入朝。王行瑜乘机将韦昭度杀死，韦昭度曾力谏昭宗，不给王行瑜尚书令职，因此而死。昭宗被迫同意王珙为河中节度使。三人达到了目的，回到本镇。

王行瑜还让弟弟匡国节度使王行约进攻河中，王珂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听到三镇进京兵谏的消息，马上派了十三个人调发北部兵，六月，大举南下。

李克用上表指责三镇兴兵犯阙，杀害大臣，要求讨伐。又给

三镇送去檄文，王行瑜等人慌了手脚。李克用来到绛州，十几日就攻下了州城，杀刺史王瑶及守城拒战的军民一千余人。七月一日（丙辰），李克用到了河中。

匡国节度使王行约在同州东面的朝邑兵败，七月三日（戊午）放弃同州，退往长安。次日，王行约进入长安和弟弟左军指挥使王行实大掠西市。王行实奏称同州、华州失陷，要昭宗出避邠州。第二天，枢密使骆全瓘则要昭宗去凤翔。昭宗说："我得到李克用的上表，说他还在河中，未到同、华。即使沙陀军来京城，也有人保护我，你们不必操心；管好自己的军队，别让他们骚动就行了。"

李茂贞的假子、右军指挥使李继鹏与骆全瓘想把昭宗劫往凤翔，加以控制；而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则要把昭宗劫往邠州。五日晚，李继鹏一再催逼昭宗离京，于是王行约等率左军与右军开战，长安城里炸开了锅。

昭宗在捧日都头李筠的护卫下，登上承天楼，劝两军停战。李继鹏率凤翔军转攻李筠，乱箭险伤昭宗。昭宗慌忙避险，急调已在京师的盐州六都军入卫。两军惮畏，分别退回邠州和凤翔。城中大乱，互相剽掠，失去了秩序，昭宗与诸王近臣住在李筠的兵营，以求保护。护跸都头李居实率军赶来，人心稍安。

有消息说，王行瑜、李茂贞要亲自出马来抢昭宗。昭宗怕被挟持，由李筠和李居实护卫保驾，慌出长安南面的启夏门到南山，住在近郊的莎城镇。

李克用打败匡国军，进入同州，向昭宗奉表问安。昭宗令李克用和王珂各派一万骑兵到邠州新平讨王行瑜，令彰义节度使张𫓩派泾原兵堵住凤翔军。

李克用欲攻华州，韩建吃紧。有人报告李茂贞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的军队也到了兴平，离长安都不远。李克用便放弃攻打华州的计划，移兵营驻渭桥。

昭宗已从莎城镇转移到石门镇。李克用派史俨率三千骑兵到石门保护昭宗。另一支部队由李存贞为先锋，深人邠州境攻下永寿。接着李存信、李存审会同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打王行瑜在长安北面的梨园寨，擒其将王令陶等。

李茂贞尚未交战先已胆怯，杀了李继鹏，把首级送给昭宗，上表请罪，还派使者向李克用求和。昭宗派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给李克用传话，让他与李茂贞和解，二人合力攻打王行瑜，讨平王行瑜后，再和李克用商量该怎么办。还命二王拜李克用为兄。

十四日（戊戌），削夺王行瑜官爵。几天以后，朝廷又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镭为西面招讨使。李克用让儿子李存勖去见昭宗，存勖才十一岁，昭宗对存勖的外貌称奇不已，抚摸着他说："你将来是国家的栋梁，要尽忠于唐室。"李克用上表请昭宗还京，昭宗要李克用派三千骑兵驻扎三桥作为警备。二十七日（辛亥）回到长安。

河中留后王珂被正式任命为本镇节度使。

九月，李克用率军猛攻梨园寨，王行瑜向李茂贞求救。李茂贞除派一万士兵进屯邠州境内的龙泉镇，为梨园的援应外，自将兵三万屯于咸阳边上，威胁长安。李克用要朝廷削夺李茂贞的官爵，下诏让他回镇所，并想分兵攻打李茂贞。朝廷在李茂贞杀李继鹏后，和他达成了谅解，不愿再采取削夺官爵、兴兵进讨的办法对待他，只是下诏让李茂贞回镇，并让李克用和他和解。

河东将史俨在云阳打了一个胜仗，擒云阳镇使王令诲。十月三日（丙戌），李存贞在梨园北又败邠军，斩杀一千余人，自此梨园寨闭垒不敢出战。

李克用令不久前被任命为四面行营副都统的李罕之及李存信等加紧攻打梨园。梨园城内粮食吃光了，邠军弃城而去。李罕之半路邀击，歼杀一万余人，连克梨园等三个营寨，还俘虏了王行

瑜的儿子王知进及邠军大将李元福等。李克用开进梨园。

王行约、王行实见败势已定，烧宁州逃跑，邠州东部失援，只有李茂贞还有五千军队驻在龙泉寨西，又被李罕之击散。十一月五日（丁巳），龙泉寨陷落，五千邠宁精兵被歼，王行瑜逃回邠州城，派人向李克用请降，说："劫持昭宗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与我没关系，您还是调转军队找李茂贞问罪，我愿束身入朝，听朝廷发落。"李克用答复道："王尚父，您不要太谦虚了，我受诏讨伐三位贼臣，您是其中的一位，现在要束身入朝，不是我作得了主的。"十五日（丁卯）王行瑜举族出逃，李克用进入邠州，命指挥使高爽临时巡抚军城。河东军纪律极好，人心安定。王行瑜逃到庆州境内被部下所杀，首级传送京师。

李克用回军渭北。十二月三日（乙酉）李克用的军队来到云阳。十三日（乙未），进封李克用为晋王。

李克用派军府的掌书记李袭吉入朝谢恩。李克用秘密传话给昭宗："王行瑜已平，乘胜扫平凤翔，可给关辅地区带来长久稳定。良机不可失，我在渭北屯军，等待朝廷的命令。"有人认为，消灭了李茂贞，沙陀强大起来，朝廷也不好办。所以昭宗下的诏书只是褒奖李克用忠心耿耿，但以李茂贞自知其罪，不忘国恩为由，不同意李克用攻打凤翔。李克用只得作罢，他私下对诏使说："看朝廷的意思似乎对我还有疑虑。只是不除掉李茂贞，关中永无宁日。"

果然，李克用返回晋阳后，李茂贞、韩建改变了对朝廷的态度，不仅进献的贡品逐渐减少，态度也骄慢起来。

河西州县多为李茂贞所据，他指派部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昭宗从石门回到长安后，在左右神策军外，又增设了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四军，补充了数万人，由诸王率领；延王李戒丕、覃王李嗣周还征募了几千名亲军，以增强王室的宿卫力量。李茂贞怀疑这是针对凤翔军的措施，极为不满，他调动军队，扬言要到朝廷论理。长安士民预感到要爆发战争，纷纷避居深山。昭

宗命通王李滋及李戒丕、李嗣周分将诸军，警卫近畿；李戒丕屯军三桥。

李茂贞上表说："延王无故兴兵伐我，我现在带兵入朝请罪。"朝廷急忙派人向李克用告急。六月，李茂贞的军队逼近京畿，覃王在娄馆败绩。

七月，李茂贞进逼长安。在延王李戒丕的劝说下，十二日（辛卯），昭宗颁诏出走，十三日（壬辰）离开长安到渭北，准备从鄜县渡河到太原。

韩建派儿子韩从允上表要昭宗去华州，昭宗不肯。韩建接连上表。从官和昭宗不愿远去，十四日（癸巳）来到富平，昭宗派宣徽使元公讯召韩建，面议去留。十五日（甲午），韩建来到富平，顿首流涕说："现今骄横跋扈的藩镇不止李茂贞一个人，到处都是。陛下如果离开宗庙园陵，渡河远去，什么时候再回来就难说了。华州兵虽少，但地势险要，足以自固。我在华州经营了十二年，离京城也不远，请陛下先到华州，慢慢再图恢复。"于是昭宗到华州，以府署作为皇帝的行宫。韩建迁到龙兴寺处理政务。

李茂贞占领长安。长安自黄巢起义后，经朱玫、襄王煴之乱，宫殿和市肆屡毁屡葺，这一次又遭受严重破坏，燔烧俱尽。

在华州的宰相摄于韩建的淫威，不敢放手处理政事。八月八日（丙辰），下诏让韩建参议朝政，但韩建目不知书，治郡以后才开始学习识字，难于参政，只得上表推辞。韩建最终未能入朝议政。

韩建给各道藩镇送去檄文，让他们把资粮贡献送到华州。李克用得到华州的消息后说："早听我的话，昭宗那有今日！"便虚言将与邻道发兵入援，写了一道上表。

八月十八日（丙寅），朝廷让韩建兼中书令。

九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充武安节度使，出镇湖南，这是韩建的意思。崔胤暗中向朱全忠求援，还向朱全忠献策，教他

营建东都宫阙，然后上表接昭宗到洛阳。于是朱全忠与河南府尹张全义上表请昭宗迁都洛阳。又说崔胤是忠臣，不宜调到湖南；还要率兵二万前来华州迎驾。为了缓和气氛，韩建又要昭宗恢复了崔胤的相位。

十月，朝廷下令命韩建代理京兆尹兼把截使。几天前，孙偓被任命为行营节度使、招讨使、处置使等职。十一日（戊午），李茂贞上表悔过，愿自新，又献助修宫殿钱。昭宗在华州总想回长安，每花朝夕月，与群臣属咏歌诗，嘘唏流涕，感伤不已 。李茂贞的表现打动了昭宗，韩建从旁帮李茂贞说情，保证三年内把宫殿修好。于是以韩建兼领修创京城使。韩建在华州督理輦运工作，重修大明宫。讨李茂贞的军事部署不了了之。

乾宁四年正月八日（甲申），韩建奏报："据华州防城将张行思等的报告，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要谋杀我，将昭宗劫往河中。"其实，韩建想剥夺诸王的兵权，有意指使张行思等诬告。昭宗接报大惊，想把韩建找来问个明白，但韩建称病不来。昭宗只好让诸王到韩建那里去消除误会，韩建仍避而不见，并上表说："诸王忽然到我的治所，不知要干什么，我反复考虑，还是不和他们见面为好。"又说："陛下如以亲族的原因加以宽容，应该按照开元、天宝年间的旧制，让他们回到十六宅，精心挑选师傅，教给他们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掌管军队，参预朝政。"同时明确要求遣散诸王的军队。

韩建估计昭宗可能不答应他的要求，就派手下的精兵包围了行宫，等待消息。昭宗为情势所迫，不得已，在当天晚上下诏遣散诸王所领各军，军中士兵全部遣回田间故里。诸王回十六宅，他们原有的衣甲、兵器由韩建接收。韩建得寸进尺，进一步要求遣散殿后四军。他又说："陛下选贤任能，足以清除祸患，平定战乱，何必别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殿后四军。况且征募的四军士兵都是坊市无赖奸猾之徒，只能惹事生非，真正有了事情也不

顶用，让这些人拿着武器在陛下身旁，我实在看不过去。我看也一起解散了罢。”昭宗只好照办，把殿后四军也遣散了。这样，天子的亲军不复存在了。

捧日都头李筠石门护驾，推功第一。韩建逼昭宗同意，将他斩于大云桥。

韩建把诸王软禁在十六宅。知道昭宗很不满，就奏请立德王为太子，以缓和关系。正月十一月（丁亥），德王李祐被立为太子，改名为李裕。

太子詹事马道殷通天文，将作监许岩士通医术，二人以专长得到昭宗的信任，韩建将马道殷、许岩士治成死罪。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偓，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朴因与马道殷、许岩士交往而于二月三十日（乙亥）被罢相。孙偓、朱朴也是昭宗宠信的近臣。

四月，刑部尚书张祎等几人因与韩建关系不好而被贬官。

六月，任命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西川节度使，覃王李嗣周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拒绝调任，并将前来赴任的覃王包围在奉天（陕西乾县）。

七月，韩建写信给李茂贞。李茂贞收信后，撤去奉天之围，覃王又回华州。

昭宗此时还想亲到奉天讨李茂贞，八月，令宰相讨论这件事。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方案，没有得到响应。

延王李戒丕从太原回到华州。韩建知李克用不会发兵勤王，上了一道奏表说：“自陛下即位以来，诸王执掌兵权，军队到处生事，致与京畿附近的邠、岐、同、华等藩镇关系恶化，最后不得不离开京城，流离华州。前些时候我奏请削夺诸王兵权，也是为了防止变故。现在又听说延王和覃王还在搞阴谋，希望陛下果断决策，在尚未发生变乱的时候，下决心解决，这对大唐社稷是有好处的。”昭宗说：“怎么至于这么严重呢?”所以扣下韩建的奏表，几天不给答复。韩建就和知枢密刘季述矫诏发兵包围十六宅，诸王披头

散发，有的蹬梯子、爬柱子，有的翻墙头，上屋顶，到处躲逃。还狂呼："皇上快来救我！"韩建把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等十一王押到石隄谷，全部杀掉，然后向唐昭宗奏报说他们因谋反而被处死。

经过这场事变，唐室更加衰微了。

（于宝华）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259—卷261
《通鉴纪事本末》：《藩镇之乱》
《旧唐书》：《王重荣传》、《昭宗十子传》
《新唐书》：《王重荣传》、《王行瑜传》、《沙陀传》
《旧五代史》：《梁书·韩建传》

崔胤诛宦官

宦官专权是唐中后期政治的一大特点。唐初朝廷曾明确下令不许宦官参与政事。至玄宗开元末年，宫中宦官增至三千名，权力渐大，开始干涉朝政，如高力士就备受玄宗宠幸。安史之乱后，皇室衰微，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宦官们掌典禁军之后，不仅控制了中央军权，在地方各道兵中，也都设宦官监军，使他们的权力更加扩大。宦官们利用职权废立皇帝、逼杀皇后，迫害朝臣，压榨人民，使唐王朝的政治更加腐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

面对朝中宦官势力的日益膨胀，官僚集团自然不甘于政治上的失势，他们不断地攻击宦官，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宦官势力，宦官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时刻反击，于是南衙北司之争势如水火，直至唐末崔胤、朱温尽诛宦官而止。

崔胤字重休，宰相崔慎由之子。慎由晚年无子，到处求仙问佛以求后嗣，后遇一怪异和尚，为其祷祝，不久便生了崔胤，乳名缁郎。崔胤成年后，科举进士及第，后作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其人喜玩弄权术，外表仁厚简重，内心阴险狠毒。他善于利用各派矛盾，挑拨离间，从中渔利。崔胤不仅受唐昭宗宠信，还外结藩镇，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正由于他的巧心钻营，故在昭宗一朝，曾四次拜相，权震中外，人称"崔四入"。

昭宗光华三年（900 年），崔胤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因痛恨宦官专权，便与昭宗日夜谋划诛灭宦官势力，昭宗为宦官杨思恭所立，自被立为天子之日起，就日夜生活在宦官的淫威之下，名为

一国之主，实为囚徒。他处境孤立，愤懑忧郁，百思不得良策。当时最得势的宦官是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这二人专横跋扈，操纵朝政，昭宗十分愤恨。结果崔胤与昭宗的密谋被宦官侦知，导致宦官与朝官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这两派势力为了寻求靠山，纷纷勾结藩镇打击对方。当时的另一位宰相王搏为人公正沉稳，遇事头脑冷静，有良相之称。他担心崔胤这样搞，会出乱子，便进谏昭宗："君主应当明大理，公正无私。宦官擅权由来已久，谁不知道。如今其势力正强，很难一下子翦除，望陛下三思。"崔胤得知王搏之言后，十分不满，便对昭宗诬蔑对方，说王搏早已为宦官收买。昭宗始终犹豫不决。不久，崔胤因从兄崔昭纬之故，被免去相位，便猜疑必定是王搏排挤自己，从此对王搏更加恨之入骨。

崔胤本来与朱全忠友善，罢相失势后，便写信向全忠诉苦乞援。此时全忠军权在握，正希望朝中有自己的代言人，便上书昭宗，胁迫天子谪贬王搏，恢复崔胤相位。昭宗迫于全忠之势，不得已下令崔胤还朝复相，将王搏贬为工部侍郎，宦官枢密使宋道弼被贬为荆南监军，景务修被贬为青州监军。不久，又贬王搏为崖州司户，二枢密使长期流放，当日又令三人自尽。自此后，崔胤操纵朝政，势震中外，宦官们战战兢兢，个个心中愤愤不平。

昭宗在华州之时受了重大精神刺激，回长安后，心理反常，常郁郁不乐，动辄杀人，性格暴戾，近侍宦官皆惴惴不安。于是宦官左军都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几人密谋废掉昭宗，另立太子。

十一月，昭宗游猎后饮酒过量，夜深后乘醉而归，酒后暴怒，手刃无辜近侍数人。第二天早上，无人开宫门。刘季述等便对崔胤等人说："宫里一定出事了，让我率禁军入宫。于是率禁军千人破门而入，方知昨晚之事。刘季述等见机会来了，便对朝官们宣布："如此天子，怎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为古来之理。这是为国

家社稷着想，并非叛逆。”崔胤等朝官为保性命，不敢违抗。初六，刘季述陈兵殿堂后，召百官入朝，拿出百官请求太子监国的联名状；逼朝官们署名，崔胤等迫不得已签了名。

这时昭宗在乞巧楼，不知朝中有变。刘季述先派一千士兵埋伏于门外，自已率十几人入内宣布废立。这时，将士们在外大声呐喊，竟冲入宣化门至思政殿前，遇宫人便杀。昭宗见士兵突入内宫，大惊失色，掉下床来。刚要逃走，被刘季述等人赶上按住坐好听宣。这时皇后也急急赶来，拜见刘季述道：有事请军容慢慢相商，不要惊了皇上。刘季述便取出朝官联名状念给昭宗听；并解释道：“陛下厌倦政事，因此举朝上下盼望太子监国。请陛下退居东宫，静心休养，这并非臣下的主意，而是南司众人请托，不能制止，愿陛下暂居东宫，待情况好转，再迎陛下复位。”何皇后表示愿意听从军容的安排，旋即取来传国宝，交给刘季述。之后，昭宗与皇后同车，嫔妃侍从十几人，来到少阳院。刘季述此时一改往日的谦卑之色，凶相毕露，历数昭宗之恶，如某月某日不从宦官之言一类小事都被列为罪状，先后数说昭宗罪状几十桩不止。刘季述泄过私愤之后，便锁上少阳院院门，并熔铁水浇铸，另外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将少阳院包围，任何人不得接近。院内昭宗稍有动静，李师虔就向刘季述等报告。昭宗等人被囚禁院中，院门打不开，便从院墙捣洞以递送饮食。刘季述下令，凡兵器、针刀等铁器一概不得入内，昭宗向刘季述要钱帛、纸笔，刘担心昭宗要写诏书，坚决不给，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寒冷，嫔妃、公主无冬衣御寒，号哭之声终日不绝，昭宗无衣可换，只好夜间洗晾，早上再穿。十一月初七，季述假传圣旨，宣布太子监国。昭宗退位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初十，太子即皇帝位，下令将少阳院更名为问安宫。

刘季述自知废立天子，罪不容诛。因此，在朝中一方面给百官加官进爵，参与政变的将士们都各有犒赏，以求媚于众；另一

方面又大开杀戒，凡是受昭宗宠信的宫人、左右侍卫、方士、僧、道等尽行杀戮，又杀睦王倚，常常是夜间杀人，清晨以车载尸出宫，有时多达十几车，见者无不胆战心惊。刘季述本心想杀崔胤，但又畏于朱全忠之势，不敢擅杀，只是解除了崔胤的职权。

刘季述等宦官的逆行使宦官与朝官集团的冲突白热化。许多朝官、士大夫都四处积极活动，以图诛灭刘季述，迎昭宗复位。崔胤也写密信给朱全忠，劝其率军入长安，拥昭宗复位。这时，朱全忠军正在大梁。刘季述派养子刘希度拜见朱全忠，宣读了太上皇的诏书，又许全忠以大唐的社稷江山拉拢全忠。全忠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召集僚属们商议此事。天平节度使李振力主出兵征讨，他认为，如今王室有难，正是建立霸业的好机会，如能匡复天子，就是当今的齐桓、晋文公了。刘季述只是个宦官，竟胆敢废立天子，如全忠此时不出兵征讨叛逆，见死不救，将来又有何资格号令诸侯！李振之言，令全忠茅塞顿开，于是他囚禁了刘希度与李奉本，又派李振入朝，与崔胤联络密谋。

太子继位后难以服众，因此藩镇的表牒多数不按时呈报。而中尉王仲先生性苛刻，他知左右军将士多有贪弊，便对众人严刑逼问，逼取财物，将士们皆惊恐不安。

崔胤听说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常为昭宗被废愤愤不平，便派心腹石戬与之交往，以探其真情。每次酒醉，德昭都为此事悲泣。石戬知其真诚，便对德昭道："刘季述废天子，中外上下人人切齿痛恨。如今反贼只有刘季述、王仲先二人，如能诛杀此二贼，迎上皇复位，就可流芳百世。如不早下决心，让别人抢了头功，后悔也来不及了。"德昭表示拼死效力。得崔胤手书后，便联结了其它将领，于夜间在安福门外埋伏下了士兵。

天复元年（901 年）正月初一，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门时被孙德昭捉住杀掉。德昭随即派人至少阳院叩门，大叫：反贼已除，请陛下出来慰劳将士！里面不知真假，直至献上王仲先首级，帝后

方才相信，破窗而出。崔胤迎接昭宗至长乐门楼，百官齐贺。将领周承诲捉住了刘季述、王彦范，刚要讯问，已被乱杖击毙。另一首犯薛齐偓跳井自杀。昭宗下令灭四元凶全族，并诛杀其同党二千多人。宦官献出国玺，昭宗下令免太子裕之罪，降为德王。

正月初三，崔胤被提升为司徒，因匡复之功，昭宗更视之如腹心，恩宠无比。孙德昭为同平章事，赐名李继昭，周承诲、董彦弼亦因匡复之功被任为节度使。

刘季述、王仲先被诛以后，禁军两中尉空缺，这时，宰相崔胤，陆扆便想乘机夺权，他们劝昭宗道："前日宫中之变。全是因为宦官掌管禁军而起。望陛下下令崔胤掌左军、陆扆掌右军，从此不让宦官统领军队，则天下太平，王室益尊了。"昭宗犹豫未决。藩镇军阀李茂贞闻知，极力反对，昭宗又与李继昭等人商议，这些人也反对朝官统领禁军。于是昭宗对崔、陆二人婉言回绝，命宦官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分别为左右都尉。韩全诲原来也是凤翔监军，与李茂贞本相识，为了寻找藩镇作靠山，全诲便利用茂贞此次入朝之机，与之结为深交。崔胤见全诲勾结茂贞，便感受到威胁，从此与朱全忠关系更加密切，与李茂贞便成为仇敌了。

昭宗复位后，将国政全委托给崔胤，事无巨细，全按他的意思办，宦官为之侧目。崔胤总想尽除宦官，翰林学士韩偓处事沉稳，总是劝告他不应操之过急，恐怕又生祸患。崔胤总是不听。

六月十七，昭宗单独召见韩偓道："宦官中恶人成林，你看怎么办？"韩偓道，即便有恶人该处罚，也应在当时，如今已过时了，不应再追究不断。昭宗又问韩偓，为什么不提醒崔胤，多诛些恶人。韩偓道："臣见陛下的诏书中有：'除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概不问的话，才没提此议。人主所重的是信义，既然下了诏书，就应兑现。如再多杀一人，则人人自危了，帝王之道，应以厚重、公正取信于众。况且如今朝廷之权分散四方，若能收回此权，则无

事不成了。”昭宗深以为然。

闰六月，崔胤又上书请昭宗下令尽诛宦官。以宫女代替宦官管理宫内杂役、起居之事。宦官得知后，惶惶不安。韩全诲等人向昭宗哭泣哀求。每次宴侍之后，众人相泣诀别。

为防止走漏消息，昭宗令崔胤有事以表奏报，不要讲出来。以免宦官偷听。谁知宦官安插在昭宗身边的宫女识字，偷看了奏章后告诉了宦官，结果崔胤的计划全部泄露，宦官们对崔胤恨之入骨，也在谋划除掉对方。

崔胤这时任三司使，韩全诲便煽动禁军将士们闹事，向昭宗诉苦，控告崔胤克扣财物，减损冬衣。昭宗不得已，下令解除崔胤盐铁使职务。

这时，众藩镇中数朱全忠、李茂贞势力最强，两人都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朱全忠想挟帝入洛阳，李茂贞欲天子幸凤翔。这时朝中崔胤知诛宦官的机密泄露，急切希望朱全忠火速进京。全忠接信后，于七月初五急速发兵。

韩全诲等为保全性命，阴谋以武力挟制昭宗，于是与李继诲等宦官结为死党，自恃握有禁军，气焰日渐嚣张。昭宗为抑制其势，采纳韩偓建议，贬放一些宦官就外任，这些人竟不遵旨出行，昭宗亦无可奈何。听说梁王朱全忠发大兵入朝清君侧，昭宗知一场恶斗不可避免，不禁愀然泪下。

韩全诲等得知朱全忠大军将至，忙令李继诲、李彦弼等劫持昭宗至凤翔，行前禁止朝官入宫，重兵守宫门，出入检查甚严。

十月二十五日，昭宗在韩全诲等人的挟持下召集百官，被迫宣布废除正月丙午赦书，该赦书是昭宗复位后颁布的，其中规定恢复大中旧制，朝官议政时，宦官不得在场。于是，一切又如前，当天，韩全诲等上朝，与朝官们共议朝政。

二十九日，韩全诲派人先秘密将诸王、宫人送往凤翔。神策军指挥使李继筠部下将府库抢劫一空。

三十日，朱全忠军至河中，派人上书请昭宗临幸洛阳。城中士民听说朱全忠大军即将入城，人心大乱，纷纷逃往山中，百官不再入朝，宫中寂静无人。

禁军将领中唯李继昭反对韩全海的作法，全诲便不许他再与昭宗见面。李继昭率士兵将崔胤府第保卫起来，以防不测。城中民众多避难其中。

十一月初四，全诲等人陈兵殿上，对昭宗说："如今朱全忠大兵逼近京师，欲劫持天子至洛阳，臣等请求陛下至凤翔，组织兵力讨伐叛逆。"昭宗无奈，只得与皇后、妃嫔等上马出行，痛哭声不绝，凄然回首宫中，已火光冲天。

朱全忠听说昭宗已西行，便引兵还赤水。这时，一名叫张濬的官吏劝全忠说："韩建是李茂贞一党，如此时不除，必有后患。"于是朱全忠率军逼至韩建城前。韩建单骑出迎，对全忠解释道："臣不识字，凡有奏章，都是僚属李巨川执笔。"全忠便杀了李巨川以儆戒韩建。之后，派韩建为忠武节度使，又将二年来韩建搜刮到的九百万缗钱财全部取走。

天子西行凤翔，崔胤等人并未随行，仍留京师，所以此时京城无天子，天子身边无宰相。崔胤组织二百多朝官联名上书全忠，请其出兵迎圣驾还朝。

全忠入长安后，百官出迎。全忠对李继昭之功大加赏赐，第二日离京西行。

全忠派手下人见韩全海，自称受密诏，帅兵入朝，韩全海假传昭宗圣旨，称天子自愿避难至此，并非宦官劫持，密诏为崔胤伪造，令全忠速归本镇。茂贞又派军阻止全忠进发，被全忠击败。

十一月二十日，朱全忠军至凤翔城下。李茂贞当即登城与全忠对话："天子至此只为避灾，并非臣下劫持，公勿听谗人之言。"全忠回答："韩全海劫持天子，全忠前来问罪，迎天子还朝。公若不与其预谋，何必多言！"李茂贞等人多次矫诏令全忠归镇，全忠

拒不听令。

李茂贞、韩全诲自知军力不敌全忠，便派人向另一大军阀沙陀人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五千骑兵入援，与全忠军大战。三十日，全忠至三原。

十二月初五，崔胤亲至三原会见全忠，催促其速迎天子还朝。

朱全忠入关之时，韩全诲曾派宦官前往戍昭节度使冯行袭处联络，征兵共击全忠。冯行袭权衡利弊，认为全忠实力强，决意投靠全忠，便杀掉宦官，将诏令送给全忠。韩全诲又去与军阀王建联络。王建阳奉阴违，大耍两面派。

天复二年（902年）四月，崔胤至河中，向全忠哭诉，催促全忠速迎圣驾，担心时间一久，茂贞一行将天子劫持至蜀地。全忠设宴招待崔胤，崔胤为讨好全忠，亲自执板为之歌唱助兴。

五月，凤翔民众听说全忠大军将至，人人惊恐，争相进入城内。

六月初三，朱全忠驻军于虢县。初十，李茂贞亲率大军与朱全忠交战，茂贞大败，损失一万多人。十二日，全忠将孔勍攻克凤州。十三日，全忠军抵凤翔城下，全忠身着朝服向城里朝拜哭泣："臣只求奉圣驾还朝，不愿与茂贞争斗。"

茂贞从弟李茂勋率兵救援，被全忠部下击败遁去。六月二十一，茂贞又率大军与全忠战，大败，全忠军穷追不舍，差点进入凤翔西门。九月，因天气阴雨不断，士卒多病。且李茂贞坚壁不出，一时难以取胜，全忠便召集部将商议准备退兵，他们认为双方争雄一年多，如今茂贞已兵困马乏，如此关键时刻，怎可功亏一篑！季昌并建议派人混入城中，诱敌出城。全忠终被说服，依其计而行。

全忠下令各军兵马吃饱喝足，不得随便出入。第二天一早，全部兵营偃旗息鼓，寂静如无人一般。只见骑士马景率几个人冲出营地，纵马西行，扮成逃亡兵士进入凤翔城中，马景向茂贞报告

说，全忠率大军逃走，只余伤病员近万人，不堪一击，请速速发兵歼灭。茂贞大喜，忙开城门倾全城兵力攻全忠兵营。这时全忠大军齐发，又派人据守住凤翔城门，结果茂贞军进退不得，自相践踏，死伤殆尽。李茂贞受此大挫，灰心丧气，便派人与全忠议和，并答应奉昭宗返京。

十月，李茂贞假子李彦询、李彦韬相继投奔全忠。

十月初八，朱全忠派使节入城见昭宗，继而又派人献上食物、绸缎等物品。又派使与李茂贞议和，请天子还京。

十月二十一日，茂贞又出兵袭击全忠军寨，大败。全忠优待俘虏，茂贞手下兵士和民众很多人前来投奔，茂贞与全忠作战，屡战屡败。

十一月，李茂勋率众救李茂贞。朱全忠派部下乘机袭击了茂勋的后方鄜、坊二州。拔二州后，优抚李茂勋及其将士家属，茂勋闻讯，忙率兵归去自保。

此时全忠军已将凤翔孤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为使城中不得安息，全忠军每逢夜间便鼓角齐鸣，城中地动如震。时值寒冬，天降大雪，城中久困，食物断绝，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有的还未咽气，肉已被人吃掉，城中公开贩卖人肉，一斤一百钱，而狗肉一斤五百钱。茂贞存粮亦尽，只好让昭宗吃犬肉充饥，昭宗将自己和小皇子的衣服都卖掉了，处境十分凄惨。

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忠派人将城外草都割尽以困城中人。二十二日，茂贞增兵把守行宫门，宦官们眼看灾祸临头，互相埋怨悲泣。

十二月，李茂贞看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派人向全忠求降。为求解脱，便将罪责全推给宦官，密谋诛全诲等自保。昭宗亦催促李茂贞等速与全忠和解。城内士兵亦大骂韩全诲。

天复三年春正月初六，李茂贞单独入见昭宗，请求诛韩全诲等人与全忠和解，奉车驾返京。昭宗大喜，立即下令逮捕韩全诲

等二十多人，派韩偓等带着这些人的首级入见全忠，全忠亦派使奉表入谢。

李茂贞见杀了全诲，全忠仍未解凤翔之围，便怀疑是崔胤怂恿全忠必取凤翔，便让昭宗下诏令崔胤速速入朝，谁知崔胤并不上当，称病不至。茂贞忧惧，只得亲自给崔胤写信，言辞极为谦卑。全忠亦写信召崔胤前来，自称不认识天子，请其来辨识真假，崔胤才来到凤翔。

此时李茂贞山南州镇皆入王建之手，关中州镇尽为全忠所据。只剩一座孤城。为寻求靠山，便为其子求娶平原公主，昭宗被迫答应。

这时凤翔城中已诛杀宦官十二人，全忠又令人将离职不从行的宦官九十多人诛杀。

正月二十二日，昭宗车驾出凤翔城，临幸全忠兵营。全忠身着素服，自称罪人，昭宗宣其无罪，令身着官服入见。全忠顿首谢恩，泪涕满面，昭宗亦落泪，君臣相对而泣，昭宗道："大唐宗庙、社稷全仰仗卿力得以保全，朕与宗族，蒙卿相救得以再生。"言罢，亲赐玉带于全忠。

昭宗上路，全忠亲送十多里，后又派朱友伦将兵护驾，自己殿后。正月二十七，车驾至长安，昭宗令崔胤官复原职。

二十八日崔胤请求尽诛宦官："国家安定之时，严禁宦官典兵干涉朝政。自天宝以来，宦官势力滋长，贞元末年，宦官始掌禁军，从此后，他们干涉朝政，篡夺百司之权，狼狈为奸，共行不法，大者勾结藩镇，倾复国家，小者卖官鬻爵，蠹害朝政。王室衰微，皆由此而起，不彻底翦除此辈，祸患不止，因此臣请求废黜各内司使，其权尽归南衙，各道宦官监军也应尽快召回，免其干涉军务。"昭宗准奏。当日，朱全忠便将第五可范等几百个宦官尽行捕杀，冤号之声不绝。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尽被所在地官府诛捕，只留下三十多个年龄幼小的，以充宫内杂役。自此后，宦

布诏令等事项皆由宫人执掌。昭宗又哀怜第五可范等人无罪被杀，命人作文祭祷。至此，除河东、幽州、清海、西川几道监军因与节度使关系密切，得以保全性命之外，其余宦官基本上被杀光了。唐代中叶以来历时一百多年的宦官专权局面，至此结束。

（朱柳郁）

参考资料：

《通鉴纪事本末·朱温篡唐》
《资治通鉴》卷257—卷266
《新唐书·崔胤传》
《新唐书·朱温传》

朱温篡唐

朱温，宁州砀山县（今安徽砀山县）人，其家世代学儒，父亲朱诚曾以教书为业，家势日渐破落。朱诚早死，年幼的朱温便跟随母亲到地主家为佣，备受欺凌。朱温成年后，游手好闲，成为乡里流氓，其为人狡诈残忍，野心勃勃。黄巢聚众起义，朱温断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便主动参加了起义部队。随农民军转战南北，因作战有功，逐渐被提升为大将。黄巢进驻长安后，令朱温为同州防御使，率军守卫长安东面的安全，同时进取河中。朱温按黄巢的命令几次进军河中都被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败，朱温惧怕黄巢的处罚，便在农民军与唐军即将决战的关键时刻，率部投降了唐政府，迫使黄巢撤出长安，成为导致起义最终失败的罪魁祸首。

朱温叛降后，被唐政府封为左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僖宗赐名全忠，后又被授予宣武节度使之职，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在这期间，朱温也同其它军阀一样，利用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先后吞并了秦宗权的领地及徐州；又夺取朱瑄兄弟的兖、郓二州，成为东方势力最大的军阀。他与关中军阀李茂贞、沙陀人李克用鼎足而三，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从此兵祸连结，大无宁日。

唐昭宗天复年间，宦官中尉韩全海与李茂贞相勾结，劫持昭宗至凤翔，宰相崔胤一向以朱全忠作靠山，便悄悄致书全忠，让他出兵从李茂贞手中抢回昭宗。朱全忠便率军西进，以七万大军

围凤翔，李茂贞屡战屡败，最后弹尽粮绝无计可施，只好交出傀儡皇帝，全忠兵挟持昭宗回返长安。这次较量中，茂贞一败涂地，关中之地尽入全忠之手，山南之地又被另一军阀王建乘机夺去，李茂贞从此失势。

天复三年（903年）春，昭宗返回长安。全忠和崔胤立即以皇帝诏书的名义，将朝中宦官一律诛杀，又诏令诸镇将各镇监军宦官全部杀掉，这样朝廷内外宦官基本被杀光，唐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专权局面至此方告结束。

二月，昭宗赐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称号，进爵为梁王，其部下僚佐都各有封号。崔胤官复原职，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领三司。

全忠等又下诏令废除昭宗在凤翔时授予的官职，又将随同昭宗入凤翔的三十多名朝官一律贬逐。另外又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宫女、僧、道共计二十多人全部杖杀，崔胤更借机排除异己，逼迫同平章事苏检、吏部侍郎卢光启自杀，又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傅为太子宾客分司。

崔胤、全忠二人又逼迫昭宗命年幼的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全忠自任副帅，便于控制。自此后，崔胤以全忠为外援，挟制天子，权倾天下，赏罚皆由其爱憎所出，中外畏惧。大批朝官被诛逐，剩下的都成了全忠、崔胤的奴仆和同党，昭宗这次回长安后，成了彻底的孤家寡人。

昭宗身边曾有一贤臣韩偓，其人刚直不阿，忠心耿耿，被昭宗视为知己。此次回长安后，昭宗有意任他为相，韩偓不愿接受，却推荐了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崔胤怕赵、王二人与他同时为相，分享权力，十分恼火。于是他挑动朱全忠人朝对昭宗兴师问罪，全忠大骂二人无才无德，韩偓为什么可以随意推荐！昭宗见全忠怒火冲天，不敢申辩，只好违心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临行前，昭宗悄悄送行，与韩偓洒泪而别，韩

偓道："臣不忍看贼人篡位弑君，如今能贬死远方，实为幸事。"

朱全忠又将戍守京师及禁卫军队的武将都换为自己的亲信，令侄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心腹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自此，全忠之党遍布朝中、禁卫军及京辅、后宫成为牢笼，皇帝、后妃、诸王、百官都被严密监视起来。宫中稍有动静，全忠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全忠将一切安排妥贴之后，准备回归本镇。二月二十七日，昭宗设宴为全忠饯行，二人和诗纵酒，挥泪而别，文武百官恭送全忠至长乐驿。

朱全忠与崔胤内外勾结挟制天子，独擅朝政，引起河东军阀李克用的强烈不满。然而李克用因近年来屡败于朱全忠，自知此时兵力敌不过全忠，不敢出兵干涉，只恨恨地咒道："崔胤身为人臣，不忠心事君，却外结强贼，内挟天子，既执掌朝政，又抓兵权，权重势强则怨生祸至，崔胤破家亡国之日，就在眼前了。"

崔胤利用全忠的力量，独揽了大权，但他又不愿处处受全忠的节制，于是二人之间开始出现分歧。为稳固自己的地位，崔胤打算掌握一支军队，于是，他奏报昭宗，要求征募六千六百人，组成戍卫军，昭宗自然批准。全忠闻知崔胤擅自组建军队，十分不满，开始对崔胤产生猜忌。

十月，掌管宿卫军的朱友伦在与人戏耍中落马而死，朱全忠悲怒之余，便怀疑是崔胤有意设计陷害的，自此后更与崔胤离心。

此时的全忠势力如日中天，威振天下，篡唐之志已路人皆知，与此同时与崔胤二人之间的矛盾越发激化。尽管崔胤在表面上对全忠亲厚如故，实际却同床异梦，为了再组建一支军队，归自己指挥，崔胤对全忠道："长安离李茂贞很近，李克用也伺测时机，不能不防。如今过去的六军十二卫都只剩空名，应该募兵恢复旧制，保卫京师，这样您亦无西顾之忧。"全忠知其用意，便假意应允。待其招募之时，全忠派自己手下的兵士冒充平民前去应募，结

果崔胤的军队里混人许多全忠的耳目，原计划不仅落了空，反而为全忠增加了宿卫京师的兵力和耳目。从此全忠对崔胤的一行一动都了如指掌，而对这一切，崔胤都一无所知，他忙着与京兆尹郑元规一道夜以继日地训练兵士，修缮武器。全忠知道崔胤已与自己离心，最终决定除掉崔胤。

第二年春天正月，朱全忠密奏朝廷：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京兆尹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伙同作乱，请朝廷诛杀以上几人，昭宗迫于全忠的压力，只好下令贬崔胤为太子少傅分司、郑元规为循州司户、陈班为溱州司户。正月十二日，朱全忠又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亮率兵包围崔胤府第，将崔胤、郑元规、陈班以及崔胤的几个亲信全部杀掉，并将崔胤主持招募的军队全部遣散。

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与全忠有私怨，见全忠如此跋扈，便派人激李茂贞出兵，于是二人联兵，以援救唐室为名，逼至长安城下。

正月二十一日，朱全忠派使上表，借口杨、李二军兵逼京畿，请昭宗迁都洛阳。昭宗哪敢说个不字，这时宰相裴枢也收到全忠的书信，催促文武百官立即东行。第二天，兵士上街，强行驱赶长安民众东迁，百姓扶老携幼，蹒跚于路，到处是哭骂之声："贼臣崔胤引来强贼，朱温倾复国家，为害百姓！"

二十六日，昭宗车驾离开长安。朱温令心腹将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坏长安宫室、民宅及百官衙门，从此繁华富丽的长安名城沦为一片废墟。

二十八日，昭宗车驾至华州，华州民众夹道迎候天子，欢呼万岁。昭宗含泪对民众道："不要呼万岁，如今朕已不再是你们的君主了！"转而又对身边侍臣道："朕如今漂泊异乡，不知将归于何处！"言罢泪流满面。

二月初十，车驾至陕，朱全忠人见昭宗与何皇后，何后哭道：

"自此后我夫妻二人性命都握在全忠手中了。"此时，因洛阳宫室尚未峻工，昭宗一行暂留在陕州。

三月二十二日，昭宗悄悄派人怀绢诏前去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军阀联络。诏令他们帅军速来征讨，否则一至洛阳就将被全忠幽闭，诏命敕令皆出于其手，局势将更难控制。

四月十六日，朱全忠上书奏报洛阳宫室已修好，请车驾早日进发洛阳，昭宗派宫人回复全忠说皇后刚刚生产，须静养一段时间，要求十月再出发。全忠怀疑昭宗有意拖延时间，以待外援，怒气冲冲，令人赴陕马上令昭宗出发。

闰四月初三，昭宗被迫出发。初八，全忠在新安迎接昭宗。这时，全忠得知昭宗打算十月人洛阳是因司天监奏报星气有变，不利东行的缘故，极为恼怒。于是指使人告发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等人欲谋害元帅，然后加以逮捕诛杀。

这时，昭宗身边随侍人员都被换成全忠的人，只剩下二百多个击球、供奉的小黄门，朱全忠连这些园内小儿也不放过。他预先挑选了二百多个大小形貌类似的小儿备用。然后以食物引诱小黄门们前来，全部缢杀后，令预选者换上他们的衣冠，代之侍卫，因二者极为相象。昭宗开始未察觉，几日后才发现身边的变化，从此昭宗更加陷人绝望之中。

闰四月初十，昭宗人洛阳。第二天，昭宗诏令大赦天下，改元，令陕州更名兴唐府，下诏征讨李茂贞、杨崇本。朱全忠的心腹都被安插到重要岗位上，蒋玄晖、王殷、张廷范、韦震、朱友恭、氏叔琮等分别执掌宫廷内外及京师的军权，朱全忠本人则被任命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全忠虽挟制天子于掌股，但毕竟作贼心虚，总怕昭宗谋害他，因此昭宗请全忠在内殿宴饮，竟托辞不去。全忠令亲信蒋玄晖为枢密使，监视昭宗行动，稍有动静便密报全忠。

昭宗自离开长安之后，日夜担扰一家人的安全，尤其担心朱

全忠杀害爱子德王李裕。太子李裕曾于光化三年被宦官僭立为帝，不久昭宗复位，李裕被贬为德王。这次全忠迎昭宗从凤翔还长安时，看见德王李裕年纪已长，眉清目秀，十分厌恶，便悄悄地对崔胤说："德王僭篡帝位，怎么还不赶快杀掉!"崔胤将朱全忠的话告诉了昭宗。昭宗问全忠可有此事，谁知全忠不肯承认，口称陛下父子之间的事，臣怎敢随便议论，一定是崔胤诬陷臣下。昭宗心中自然明白，终日忧愁。为麻醉自己，只得与皇后终日借酒浇愁或相对而泣，蒋玄晖问昭宗为何忧伤?昭宗便直言相告："德王是朕的爱子，全忠为何要执意杀他?"言罢，悲泣不已。全忠得知这一切后，坐立不安，对昭宗更加放心不下。

这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等藩镇都恼恨朱全忠挟持天子，便暂时联合起来，以图归政昭宗。朱全忠想率兵征讨，又怕昭宗乘机生变，破坏了他篡位的计划，于是他决定杀害昭宗，另立幼主。

八月十一日，蒋玄晖派部将史太率人夜叩宫门，声称有要事秉报，夫人裴贞一开门便被杀死。昭宗刚饮了酒，闻外边有乱，忙起身逃命，也被史太杀掉。何皇后向玄晖苦苦哀求，才被放过一命。

十二日，蒋玄晖等宣布裴贞一等谋弑昭宗，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监理国政，又矫皇后令，命太子即皇帝位，是为昭宣帝。当时，宫中充满恐怖，人人自危，对昭宗之死竟无人敢哭出声来。

十月，朱全忠等闻听昭宗被弑，装作十分吃惊，倒在地上放声大哭，大骂蒋玄晖、朱友恭等人让他背上恶名。十月初三，全忠亲赴洛阳，伏棺痛哭流涕。十月初四，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原名李彦威，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接着又令二人自尽。李彦威临死前大骂全忠将他作为替罪羊，必将断子绝孙!

昭宣帝天佑二年春二月，朱全忠派蒋玄晖请昭宗九个儿子德王、棣王、虔王等至九曲池赴宴，乘他们酒酣之时全部缢杀，投

尸池中。

这时，独孤损、裴枢、崔远、柳璨同为宰相，前三人为朝廷宿望。看不起柳璨曲颜附势的奴相，柳璨便怀恨在心，常向全忠说他们的坏话，不久三个人全被罢相。从此，柳璨狐假虎威，胡作非为。

五月初一，慧星出现，占卜者观了天象后说："星变表示君臣都有灾，应该杀人顺应天变。这时柳璨、李振二人觉得机不可失，就将自己平素怀恨的朝臣列了名单，建议将这些人统统杀掉，李振曾屡试进士不第，因此平生最忌恨世族和科举出身的官吏。他也对全忠说："朝政就是这些浮薄之徒给搞乱了，而且王要图大事，这些人也是一大障碍，不如借机都除掉。"全忠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再次将独孤损、裴枢、崔远贬为刺史，贬陆扆、王溥、赵崇、王赞为司户，其它凡出身高门、或以科举及第人仕，名声稍大一些的朝官，都被柳、李一伙指斥为浮薄之徒加以贬逐，结果朝中缙绅之士被清除一空，不久再贬独孤损等三人为司户。

六月初一，朱全忠将裴枢等被贬朝官召集到白马驿，将这三十多个朝官全部杀掉。李振出身寒素，最恨世族，尤恨缙绅之士，这时他怂勇全忠尽杀衣冠缙绅仍不解恨，便对全忠提议："此辈常自称清流，应该将他们扔进黄河，让他们成为浊流！"全忠闻言大笑，令人将裴枢等人尸首扔人黄河。这批结党营私、昏庸腐朽的官僚们遭到如此下场本不足惜，但从此在士人的心中朱全忠的形象越加凶恶，李振更被认为是衣冠人士中的禽兽。

朱全忠急切想做皇帝，让蒋玄晖为他谋划。玄晖找柳璨等人商议，柳璨献策说，从魏、晋以来，历代易号的惯例都是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再行禅让，应该一步步来，不可操之过急。全忠一听大怒，有两个官吏名叫王殷和赵殷衡的平日忌恨蒋玄晖、柳璨专权，这时便乘机向全忠大进谗言，说蒋玄晖、柳璨心怀异志，借机故意拖延岁月，以待外援，朱全忠暴跳如雷。蒋

玄晖听说后知全忠心狠手辣，心中害怕，忙到全忠处进行解释。全忠道："难道我不受九锡，就不能做天子吗？"玄晖道："唐天数已尽，世人皆知。臣与柳璨并不是有意违命。只是如今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各镇兵力尚强，王如马上称帝，他们必然不服，不如循序渐进，然后行禅让，创万代之业。"全忠怒叱道："奴才果然反了。"蒋玄晖慌忙辞归，与柳璨商议马上行九锡之礼。

柳璨、蒋玄晖在朝上建议为朱全忠加九锡，朝上皆心怀怨愤，只有礼部尚书苏循投其所好，大讲梁王应受天命，朝廷应快点揖让。朝士们无人敢反驳。当天，封全忠为相国，领二十一道，进爵为魏王，加九锡。全忠只想作皇帝，怒不接受。十二月，柳璨入大梁，向全忠报唐帝禅位之意，全忠假意拒绝。

因柳璨为人阴险卑鄙，害人过多，朱全忠很厌恶他，这时柳璨与蒋玄晖、张廷范三人结为死党，日夜为全忠谋划禅让之事。何太后派宫女阿秋、阿虔密见蒋玄晖，乞求唐帝让位之后，保她母子性命平安，玄晖答应了。这时王殷、赵殷衡二人又向全忠密报说蒋、柳、张三人在积善宫夜宴，与太后焚香发誓，复兴唐社稷。全忠深信不疑，下令将蒋玄晖收捕斩首，削为凶逆百姓，令人揭尸焚烧。又将太后害死，废为庶人，宫女阿秋、阿虔也被杖杀。

十二月二十九，贬柳璨为刺史，张廷范为司户。第二天，将柳璨斩首，将张廷范车裂于都市之中，柳璨临刑前大呼："负国贼柳璨，该死该死！"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生病，在府中静养。正月二十七日，唐昭宣帝派御史大夫薛贻矩入大梁慰问，薛以臣礼相见，拜舞于庭，朱温侧身避过，心下暗喜。

唐昭宣帝又派宰相下诏，宣布二月将帝位禅位梁王，朱全忠再次假意推辞。

二月，唐满朝文武共同奏请唐帝逊位，二月初五，宰相率百官至朱全忠府第劝进，其余藩镇、各道、朝臣劝进者不断。

三月十三日，唐昭宣帝再派使传禅位之意，百官再入大梁劝进。

三月二十七日，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王，令百官奉传国宝入大梁，拜见朱全忠。

四月初四，梁王朱全忠始登宝殿，称孤道寡，接受百官朝贺。四月十六日改名为朱晃。十八日，全忠着御袍，正式即皇帝位。之后，全忠宴饮百官，众人皆诺诺。全忠又设宴招待亲族，全忠之兄名朱全昱，全昱醉醺醺斜视全忠道："朱三，你能作天子吗？你本砀山一小民，跟随黄巢为贼盗，天子任你为四镇节度使，已富贵至极，为什么还要灭人家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全昱尽揭了朱全忠的老底，令他十分不快。

十九日，祭告天地。二十二日，宣布大赦，改元，国号为大梁，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遵循历代旧制。将济阴王迁往曹州，令军队把守，软禁起来。

开平二年春，派人将济阴王毒死，追谥封号为唐哀皇帝。

朱全忠即后梁太祖，唐代三百年的统治至此才算正式结束，从此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

（朱柳郁）

参考资料：

《通鉴纪事本末 · 朱温篡唐》

《资治通鉴》卷257～卷266

《新唐书 · 奸臣上下》

《新唐书 · 朱温传》

梁晋相争

唐朝末年，藩镇混战，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在各派军阀中，占据汴州一带的宣武节度使朱温（又叫朱全忠、朱晃）越战越强，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天佑四年（907 年），唐昭宣帝下诏禅位。朱温遂在汴州（河南开封）称帝，建元开平，国号大梁，朱温就是历史上的梁太祖。

朱温登上了皇帝宝座，未给天下带来太平；相反，唐末长期存在的军阀混战，更加激烈。当时，割据一方的藩镇如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淮南节度使弘农王杨渥等都不承认朱梁政权。特别是李克用，同朱温的矛盾由来已久，唐僖宗中和四年（884 年），李克用因追击黄巢，途经汴州，在城外安营。朱温再三请克用进城，把他安排在城内的上源驿居住，盛宴款待。不料，李克用在宴席上意气凌人，侮辱朱温，当晚，朱温用车辆阻塞道口，发兵围攻上源驿，企图袭杀李克用。李克用突围，随从数百人全被杀死。从此以后，两家势成水火，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斗争。

梁晋相争初期，由于李克用战略失误，御下无方，晋接连失利，特别是在唐昭宗末年，梁军竟两次兵临李克用的统治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城下。光化四年（901 年），朱温发兵六路大举攻晋，连下沁、泽、潞、辽等州，直逼晋阳，使城中军民人人惊恐，幸亏连日大雨，加上朱温粮草缺乏，不久梁军撤围而去；次年正月，李克用伐梁复仇，又被朱温击败，晋军死伤万余人，梁

军乘胜追击，包围晋阳。李克用亲自登上城头督战，还一度打算弃城逃走，被诸将劝止，后来梁军虽解围而去。但李克用多年不敢再与朱温争锋。

朱温称帝后，李克用当然不肯向梁称臣，却也不敢出兵相攻。开平元年（907年）六月，梁军八万人在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的率领下攻打潞州（今山西长治），晋将李嗣昭闭城拒守。康怀贞率兵昼夜攻打。半月不克，便筑垒围城。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率军救援，梁晋遂在潞州展开大战。八月，梁太祖朱温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康怀贞为潞州行营都统。李思安接任后立即率兵西上，到达潞州城下，在这里修了一道城墙，意在防止潞州城内的晋军突围，又可以防御城外的援军，称为"夹寨"，周德威常派兵骚扰梁军。使梁军疲于应付，李思安只得闭垒不出。

次年二月，李克用病重，立其子李存勖为嗣，临终前以三箭赐之，嘱咐他说："梁国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燕王刘仁恭是我所立，契丹耶律阿保机曾与我结为兄弟，可二人都背晋归梁，忘恩负义。不能报此三仇，是我终生遗憾。给你这三支箭，你千万别忘了你父亲的心愿！"李克用还一直挂念着远在潞州城内的李嗣昭，要李存勖办完丧事后，倾全力火速前往援救，说："若潞围不解，我死不瞑目。"随即病卒，李存勖袭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

李存勖继承晋王王位时，才二十三岁，地位很不牢固。李克用生前为了笼络部下，曾经挑选勇敢善战的将校作为养子，对于其中的几个人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们都比李存勖年长，拥有自己的军队，对李存勖继承王位心怀不满，企图通过李克用的弟弟、当时担任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的李克宁发动政变，逮捕李存勖，然后归附后梁。李存勖得知后，当机立断，在监军张承业等人的支持下，逮捕并处死了李克宁等人。其后，李存勖大力整顿军队，严明军纪，令州县举荐贤才，宽刑薄赋，抚慰孤寡，境内大治，李存勖本人也胆识过人，善于骑射，敢打敢

拼，使晋军很快扭转了战局，成为梁的劲敌。

梁将李思安屯兵潞州城下，久战无功，损失将校四十余人，士卒以万计。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中，士卒疲敝，逃跑的很多。梁太祖怀疑李克用诈死，想下诏退兵，又怕晋军追击，就亲自去泽州（今山西晋城）接应，又命匡国节度使刘知俊率兵到泽州。三月，梁太祖到达泽州，任命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削夺李思安官爵，勒令他回原籍服役，斩监押杨敏贞。

晋将李嗣昭被围困在潞州城中半年多，粮草渐感缺乏，军心不稳，为安定人心，他登上城头同诸将饮酒为乐，以示从容。有流箭射中李嗣昭的脚，嗣昭一声不吭，暗中把箭拔下来，诸将都没察觉，于是城内人心稍安。梁太祖多次派人给李嗣昭送去诏书，劝他投降，嗣昭烧掉诏书，斩了来使，向将士们表明坚守到底的决心。

梁太祖在泽州住了十多天，感到围攻下去没有取胜的可能，便派使者到潞州城下同诸将商议退兵之计。诸将都认为李克用刚死，李存勖忙于嗣位，潞州难以再有援军，坚持一段时间会有战果，梁太祖答应了众将的要求，命令后方增运粮草犒劳将士。刘知俊率精兵万余人攻击晋军，杀敌甚多，十分得意，上表说皇上如回京城，他愿意独自留下来攻潞州。梁太祖怕关中空虚，岐王李茂贞可能会乘机进犯，命刘知俊退驻晋州（今山西临汾东北），到五月再回镇。

四月，晋将周德威率大军回晋阳的消息传来，梁太祖认为晋援军既去，孤立的潞州城指日可下，便离开泽州返回大梁（即汴州），静待克城捷报，夹寨内的梁军也以为稳操胜券，不加戒备。

晋王李存勖对诸将说："潞州是河东的屏障，丢失潞州，就难保河东，再说朱温所怕者只有先王一人，今听说先王已死，我刚即位，认为小孩子不懂军事，必有骄怠之心，如果我们挑选精兵昼夜兼程赶往前线，出其不意，肯定能打败梁军。取威定霸，在

此一举，不能丧失这个机会!”遂检阅军队，任命丁会为都招讨使，然后率周德威等人从晋阳出发。

五月初一（辛未），晋王李存勖率军到了三垂冈下，距潞州还有十多里，天色已晚，命将士们稍作休息，隐蔽待命。次日清晨，直逼潞州。恰好大雾迷漫，咫尺之外不见人影，晋军立即叫喊着攻向夹寨。梁军毫无戒备，士兵尚未起床。在晋军的砍杀下，乱作一团，仓皇南逃，梁招讨使符道昭马倒，立时被晋兵砍杀，士卒死伤一万多人，丢弃军用物资如山。梁太祖闻讯，大惊失色，感叹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于我的儿子们，不过像猪狗一样!”他对晋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周德威乘胜攻向泽州，梁泽州刺史王班一向不得人心，大家都不愿为他卖命。一些人乘机闹事，把王班赶到牙城，准备迎接晋军。龙虎统军牛存节此时正奉命从洛阳来接应夹寨溃兵，途中得知泽州危急，对部下说：“泽州是要害之地，不能失守。我们虽未奉诏，也应不失时机地前去援救。”大家不想去，说：“晋人锐气正盛，难以抵挡，何况我们人太少，去了也没用。”牛存节说：“见危不救，就是不义；畏敌怯战，就是无勇。无义无勇，怎么算得上军人!”遂力排众议，率军抢先到达泽州，城中人正在放火叫喊，企图倒戈，牛存节一到，城内立时安定下来。不久，晋军来到城下，围着城墙挖了很多地道，向泽州发动猛烈进攻。牛存节率梁军奋勇抵抗，激战十三天，使晋军一无所得。刘知俊从晋州率兵来援，周德威破城无望，只好烧掉攻城器械退走。

开平三年，梁迁都洛阳。

开平四年，梁太祖怀疑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通晋，派供奉官杜廷隐率兵三千人至深（今河北深县）、冀（今河北冀县），名义上帮助赵王防守，实际上却想趁机消灭他，杜廷隐到深州不久，便尽杀赵王戍兵。赵王派使者到晋阳，与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治定州，今河北定县）一起共推晋王李存勖为盟主，要求合兵攻梁。李

存勖召集部下商议，大家都说："王镕长期以来一直臣服于朱温，每年都要送给梁人大量财物，两家还有姻亲关系，交情极深。这肯定是个骗局，应当先看看再说。"李存勖说："他王镕也不过是根据利害关系而决定自己的立场罢了。王氏先人在唐朝时尚且时服时叛，王镕怎会死心塌地地做朱氏的臣子呢！朱温的女儿怎能比得上唐朝的寿安公主！现在王镕连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了姻亲关系！我们要是怀疑他而不出兵相救，正好中了朱温的诡计。应该赶快发兵。晋赵合力，就一定可以打败梁人。"遂下令立即出兵，派周德威率领经井陉前往赵州（今河北赵县）。

十二月初三（己未），梁太祖得知赵晋合兵，晋兵已进屯赵州，遂派名将王景仁率兵四万攻伐，出发前，梁太祖对王景仁说："王镕反复无常，必为子孙后患，我现在把精兵都交给你，镇州（今河北正定，成德节度使治所）城即使是用铁打成的，也得给我攻下来。"王景仁很快便攻到柏乡，王镕再次向晋告急。

晋王李存勖接到王镕急报，亲自率兵东下参战。十二月二十五日（辛巳），晋王到达赵州，与周德威合兵一处，然后前进到距柏乡三十里的地方停下来，李存勖派周德威到梁军营前挑战，梁兵不出。二十七日（癸未），晋军继续前进，直到离柏乡五里的地方，在野河北安营。晋军派人到梁营前挑战，并肆意辱骂，梁军大怒，大将韩勍率步兵、骑兵三万人分三路追击挑战的晋军，梁军将士的铠甲与头盔上都披着缯绮，雕着金银，光彩耀目，晋兵看到后都很丧气。周德威对将李存璋说："梁人的目的不在战斗，只是想炫耀一下兵威。不挫败他们的锐气，我军便不能振奋起来。"于是遍告全军说："他们都是汴州天武军，及一群乌合之众，衣甲虽然鲜明，十个人不能打你们一个人，大家如果能捉住一个梁兵，就足以发大财，这可是难得的收人，机不可失啊。"周德威亲自带着一千多名精锐骑兵攻击梁军阵势的两端，在梁军中来回冲杀，俘获了百余人，边战边退，一直退到野河边上，梁兵也退走了。

周德威对晋王李存勖说："敌人兵势正盛，应按兵不动以待其衰。"晋王说："我们孤军远来，救人之难，三镇既已合兵，利于速战，您竟想按兵不动，为什么呢？"周德威说："镇州、定州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而我们依仗着骑兵的优势，最适合在平原旷野上冲杀。现在逼进敌人的营门，骑兵难以发挥特长，且敌众我寡，一旦使敌人知我虚实，就很危险了。"晋王不高兴，退卧帐中，诸将都不敢再说什么。周德威又去找张承业，说："大王因夹寨之胜而轻敌，不估计自己的实力却想速战速决。现在我们离敌人很近，仅隔着一条野河，如果他们渡河来攻，我们很快便会被全歼。不如退到高邑，诱敌离营，他们出战，我们便回营坚守；他们回营，我们就在后面追击，再派轻装骑兵夺取敌人的粮草，不过一个月，肯定能打败他们。"张承业十分赞同，立即掀帐而入，抚摸着晋王说："现在是大王睡安稳觉的时候吗！周德威是一员老将，熟悉军事，他的话不可不在意。"晋王猛然坐起，说："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此时梁兵闭垒不出，有投降来的人，果然说："王景仁正在赶造大量浮桥。"晋王对周德威说："正和您说的一样。"晋军立时拔营，退保高邑。

柏乡近来不储存草料，梁军只得靠割草自给，晋军每天派小股骑兵抄掠割草的梁军，梁军不再出营。周德威派胡骑围着梁军军营一边射箭一边辱骂，梁军怀疑晋兵有埋伏，更不敢出来，只好把屋顶上的茅草和坐席铡碎来喂马，马死掉很多。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二（丁亥），周德威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等率精锐骑兵三千人又到梁营门前漫骂，王景仁、韩勍大怒，立时带着所有梁军出战。周德威等转战到高邑南，晋将李存璋用步兵在野河边列阵，梁军绵延数里，争着向前夺桥，负责阻击的镇州、定州兵眼看力不能支。晋王对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说："敌人一旦过了桥就不好办了。"李建及立即挑选了二百步兵端着长枪叫喊着冲上去，杀退梁军。晋王登上一座土山观战，说："梁兵虽然争着向前可太

杂乱，我军严整而沉着，我军一定可以取胜。”两军从上午打到中午，不分胜负。晋王对周德威说：“两军既已交战便不易罢手，我之兴亡在此一举。我替您先冲上前去，您可以随后跟上。”周德威拉马劝道：“我观察了梁兵的情况，认为可以用以逸待劳的办法制服他们，不易凭勇力取胜。他们离开营地三十余里，即使带着干粮也顾不上吃，日落之后，必然又渴又饿，疲惫不堪，不想再打下去，到那时候，我们再派精锐骑兵冲杀，肯定大胜，现在还不到时候。”晋王这才作罢。

当时梁军在东边列阵的是魏州、滑州兵，在西边列陈的是宋州、汴州兵，到日落的时候，将士们因一天水米未沾，渐无斗志，王景仁见状，便率兵想退。周德威趁机大喊：“梁兵逃走了。”晋兵立即叫喊着往前冲，东边阵地上梁军率先退走，李嗣源又在西边对梁军喊话：“东阵已走，你们还呆在这里干什么！”梁兵十分惊恐，立时溃散。李存璋率领步兵在后边追赶，大声喊着：“梁人也是我们的人，父兄子弟运送军粮的不杀。”于是梁军竞相脱掉铠甲，扔下兵器，响声惊天动地。赵人痛恨梁军屠杀深州、冀州戍卒，顾不上抢夺财物，只是一心追杀溃兵。梁龙骧、神捷精兵几乎被杀尽，自野河至柏乡，僵尸遍地。此战梁军被杀二万余人。王景仁、韩勍等率几十个骑兵逃走，使梁朝野上下，大为震惊。更为重要的是，高邑之战后，梁军将士对晋军产生一种畏惧心理，梁晋相争的局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晋的方面转化。

同年十月，梁太祖以连战失利，誓雪其耻，亲自率军北讨，可一无所获。途中还未遇到敌兵，因有人误报“沙陀兵来了”，士兵便纷纷逃走，严刑不能禁，后来得到确切情报，知道晋兵根本没有出动，人心才安定下来。梁太祖见将士们如此畏晋，心情很烦躁，功臣旧将往往因犯有小过而被杀。十一月，梁太祖只好回师。

乾化二年（912 年），晋大举攻燕，燕主刘守光向梁求救，梁太祖认为有机可乘，决定亲自率兵攻晋。二月，梁太祖从洛阳出

发，文武百官因太祖日益烦闷暴躁，任意杀人，多数都害怕随行，梁太祖听说后，更加愤怒。这一天，大军到达白马顿，赏赐随从的官员吃饭，可很多人没有赶到。梁太祖派骑兵在路上催促，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最后来到，梁太祖下令把他们处死。

梁太祖率军日夜兼程，三月初二（辛巳），到达下博南，登上观津冢。赵将符习带领数百名骑兵巡逻到这里，不知道是梁太祖，立即逼上前来。有人报告梁太祖："有大批晋兵来攻。"梁太祖惊慌失措，顾不上带走帐幕，连忙率兵奔赴枣强。与大将杨师厚的军队会合。

此时杨师厚、李周彝正指挥梁军围攻枣强。枣强城虽小，却很坚固，赵人聚集数千精兵防守，拼死战斗。杨师厚多次猛攻，难以奏效，却死伤一万多人。城中矢石将尽，商量着要投降，有一个士兵奋力喊道："梁贼自从在柏乡丧师以来，把我们看成死敌，现在去归顺他们，无异于自投虎狼之口。窘迫到这个地步，还要身体做什么！我请求独自前去试探一下。"夜里，这个士兵缒城而出，到梁军营中诈降。梁大将李周彝召他来询问城中的防守状况，他回答说："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是不容易攻下的。"又请求说："我既已归顺朝廷，希望能得到一把宝剑，届时拼死登上城头，取下守将首级。"李周彝没有答应，只是派他在军中负责挑担。这个士兵找个机会挥起扁担猛击李周彝的脑袋，李周彝立时倒在地上，幸亏身边的人及时来救，才免于一死。梁太祖得知后，十分愤怒，命杨师厚率军昼夜猛攻，到了三月初七（丙戌），终于攻陷枣强，城中不论老幼全部杀死，流血盈城。

当初，梁太祖率兵渡过黄河后，扬言有大军五十万，晋忻州刺史李存审驻扎在赵州，担心寡不敌众，裨将赵行实建议入土门关（即井陉关）躲避，李存审不答应，及梁将贺德伦攻打蓨县（今河北景县），李存审对史建瑭、李嗣肱说："我们晋王正在用兵于

幽蓟，没有军队派到这里来，南方的战事就靠我们自己了。现在蓨县吃紧，我们怎能坐视不救！假如梁贼攻占蓨县，必定会西侵深、冀，危害就更大了。我们应当用奇计打败他们。”李存审率军把守下博桥，派史建瑭、李嗣肱兵分几路去捕捉梁散兵，史建瑭把部下分为五队，每队一百人，一队往衡水，一队往南宫，一队往信都，一队往阜城，自己率一队深入敌后，与李嗣肱一块儿专门捕捉打柴割草的梁兵，共捉住几百人。第二天他们在下博桥会合，把俘获的梁军全部杀死，只留下几个人把胳膊砍掉后放走，说：“替我告诉朱公：晋王的大军来了。”此时蓨县还未攻下，梁太祖带着杨师厚的五万大军前来，会同贺德伦一起攻城。梁军刚到县城西边，还没有来得及安营，史建瑭、李嗣肱便各带三百名骑兵打着梁军的旗帜穿着梁军的衣服混进了打柴割草的梁军中间。天色将要黑下来时，他们来到贺德伦营门前，杀死守门卫兵后，放火呐喊，乱发弓箭，到处冲杀。天黑以后，才割掉被杀梁军的左耳、押着俘虏离开。梁军营中大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被砍掉胳膊的那几个梁兵又来报告：“晋军大队人马来到了。”梁太祖大惊，马上烧掉营垒，连夜逃走。因迷路，在路上折腾整整一夜，狼狈不堪，蓨县的农民痛恨梁军残暴，纷纷拿起锄头、棍棒追赶，梁军抛弃的军用物资不可胜数。不久，梁太祖又派骑兵前去侦察晋军的动静，回来报告说：“晋军其实并没来，只不过是史先锋的流动骑兵。”梁太祖不胜惭愤，病情随之加重，只好回师南下，五月到达洛阳，

梁太祖看着晋一天天强大，可他自己病情又一天天加重，十分忧虑，对近臣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年，想不到太原余孽竟能如此猖狂！我看他的志向不小，老天又不肯让我多活几年，我死以后，我的几个儿子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一边说一边哽咽，以至晕绝，片刻之后才苏醒过来。

正当梁晋相争，梁已处于劣势之时，梁室内部又发生了一系

列动乱，更加削弱了梁朝的统治，梁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了。

（侯仰军）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 255～卷 268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唐书·武皇本纪》、《唐书·庄宗本纪》

《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唐庄宗本纪》

李茂贞据凤翔

唐朝末年，朝政日益腐败黑暗，宦官专权，朋党相争，使唐朝中央政府内部一片混乱，而地方上又是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终于激发了黄巢农民大起义。起义失败后，藩镇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唐朝政府软弱无力，早已控制不住局势，唐朝廷几成虚设。公元 907 年，朱温灭唐自立，其后即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五代十国时期就只有先后称雄于黄河流域的梁、唐、晋、汉、周五个中原王朝和割据于南方的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及太原一带的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而实际上，当时的独立王国不止于此，有的势力还很强大，只是没有被列入“十国”之中。在没有被列入“十国”的割据势力中，占据陕西凤翔一带的岐王李茂贞是最强大的一支。

李茂贞本来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他年轻时即投身军旅，后因随从凤翔节度使郑畋镇压黄巢起义，升任军校。光启元年（885 年），唐僖宗为躲避战乱，被迫再次逃出长安，次年到达兴元（今陕西汉中）。李茂贞以击退叛军追击，护驾有功，被授以武定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茂贞”。唐僖宗回长安，他又率兵护卫。车驾至凤翔，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放火焚烧行宫，发动叛乱，兵败逃走，他奉诏讨伐，杀李昌符，唐僖宗大喜，拜李茂贞为同平章事、凤翔节度使。唐昭宗即位后，又封陇西郡王。李茂贞一旦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也像其他藩镇一样，拼命扩展自己的势力，对朝廷的号令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

大顺二年（891年），宦官杨复恭因得罪唐昭宗，逃奔兴元，投靠其养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然后举兵叛乱。李茂贞想趁机攻占山南西道，遂上表朝廷，要求出师讨伐，希望再授给自己一个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官职。朝廷惟恐李茂贞得到山南西道后难以控制，没有答应。李茂贞不听诏命，擅自兴兵讨伐。次年二月，唐昭宗为安抚李茂贞，只好任命他为山南西道招讨使。七月，李茂贞连克凤、兴、洋三州，八月攻克兴元，杨复恭、杨守亮逃走。李茂贞在这些新占领的地区，都安排自己的子弟镇守，然后上表朝廷，要求亲自镇守兴元。唐昭宗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同时令宰相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上表的目的在于兼有三镇，岂肯放弃凤翔！遂不奉诏，在给昭宗的表奏中还十分骄横。昭宗大怒，准备讨伐他。李茂贞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再次上表，羞辱昭宗，昭宗更加恼怒，下决心出师讨伐。景福二年（893年）九月，唐昭宗令嗣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禁军三万讨伐李茂贞。李茂贞与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合兵近六万相拒。李茂贞的军队都是些边兵，身经百战，而禁军乃新募之市井少年，一触即溃。李茂贞遂乘胜逼进长安。唐昭宗无奈，只得答应李茂贞的条件，杀宰相杜让能等人，并让李茂贞兼任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从此尽占凤翔、兴元等十五州之地，成为唐末的又一强藩。

光化二年（899年），李茂贞兼任彰义节度使。

天复元年（901年），李茂贞进爵岐王。

随着势力的增强，李茂贞日益骄横，动辄干预朝政，稍不如意，便兵临阙下，而当时的强藩尤其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偏不相让，两镇之间遂爆发一场大战。天复二年，朱温率兵包围凤翔，李茂贞每战必败。闭城不敢出，关中城镇一时丧尽；西川节度使王建趁机派兵攻取兴元，尽占山南西道。李茂贞坐守孤城，粮草俱竭，只好请和，把被宦官劫持来的唐昭宗交出。经过这场战争，李茂贞元气大伤，再也难以与朱梁争锋。

开平元年（907年），朱温迫使唐昭宣帝禅位，自称皇帝，国号大梁。当时只有河东、凤翔、淮南、西川四镇不服，依旧用唐朝年号。不久，西川节度使王建也于成都称帝，国号大蜀。李茂贞因兵弱地小，不敢称帝，只是扩建岐王府，设置文武百官，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作宫殿，妻子称皇后，令部下上书称笺表，其他方面也多仿照帝王的形式。

李茂贞待人宽厚，对将士们也很随和，有人告发部将符昭造反，他便亲自去符昭家，把随从们支走后，安然大睡，就这样一连好几夜，大家无不悦服。可他的部队纪律性太差。这也是他势力日渐衰弱的一个原因。

开平二年，蜀帝王建派兵联合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存勖共讨朱温，合攻梁之雍州大安府（即长安），梁大将刘知俊率兵抵抗，大破岐兵，三镇遂退兵。次年三月，梁军反攻，连占李茂贞所属之丹（治今陕西宜川）、延（治今陕西延安东北）、鄜（治今陕西富县）、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等州，李茂贞势力更弱。恰在此时，刘知俊叛梁附岐，才给李茂贞以喘息之机。

刘知俊作为梁之忠武节度使（开平二年，梁改同州匡国军为忠武军）因屡立战功，威名很盛，他看到朱温称帝后猜忌心越来越重，动辄杀害功臣，十分不安。这年五月，朱温准备伐晋，急征刘知俊入朝，想任命他为河东西面行营都统，加上刘知俊有攻占丹、延之功，也可趁机厚加赏赐。刘知俊的弟弟刘知浣此时随从朱温在洛阳，暗中派人对刘知俊说："回来必死。"同时又向朱温请求自己率弟、侄前去迎接刘知俊，朱温答应了。六月初一（乙未），刘知俊上奏，声称"被军民留住，难以脱身。"便以同州（今陕西大荔，忠武节度使治所）依附李茂贞，把监军及不听从命令的将校一并逮捕，械送凤翔，又派兵袭击华州（今陕西华县），驱逐梁刺史蔡敬思，防守潼关，同时暗中派人贿赂梁长安守将，请他们逮捕佑国留后刘捍。长安诸将痛恨刘捍陷害死佑国节度使王

重师，遂把他逮捕交给刘知俊，刘知俊把刘捍押送到凤翔处死。刘知俊派使者向岐王李茂贞请求发兵支援，也要求晋王出兵攻梁，在给晋王的信中说："不过十天，可以收复两京，恢复唐之社稷。"

朱温派近臣问刘知俊："我对您一向优厚，为什么突然造反呢？"刘知俊回答："我怎敢造反，只是怕像王重师一样遭灭族之祸。"朱温又派人说："刘捍说王重师暗中勾结邠、岐二镇，我现在后悔莫及，刘捍死有余辜。"刘知俊不再回话。不久，朱温下诏削夺刘知俊的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率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鄩等讨伐。朱温也随后赶赴前线。

刘鄩等率兵到潼关东，捕获刘知俊在关外安置的侦察兵蔺如海等三十人，既而把他们释放作为向导。刘知浣因在途中迷路，耽误了好几天才来到关下，守关的将士把他迎进关内。蔺如海等人随后赶到，也得以入关。刘鄩的部队乘关门大开之际乘机而入，攻克潼关，并追上刘知浣，把他逮捕。

朱温派刘知俊的侄儿刘嗣业带着诏书到同州招谕知俊，知俊想去行在向朱温请罪，被其弟知偃劝止。杨师厚等攻至华州，刘知俊的部将开门投降。刘知俊听说潼关失守，梁军将到，惊慌失措，立即率领全族人逃奔凤翔，杨师厚率兵赶到长安时，岐兵已抢先占领了城池，杨师厚派奇兵从南山急进，进入西门，一举攻克长安。朱温下令，让刘鄩暂时担任佑国留后。

刘知俊来到凤翔，岐王李茂贞对他十分优待，拜为中书令。可李茂贞的地盘毕竟太小，没有藩镇可以安置他，只好多给俸禄而已。

开平三年十一月，岐王李茂贞想攻取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以安置刘知俊，并作为牧马之地，遂派刘知俊带兵攻打灵州。梁朔方节度使韩逊告急，朱温诏令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率兵攻打邠、宁以牵制岐兵。康怀贞每战必捷，连克宁、衍二州，拔庆州南城，刺史李彦广投降。梁游兵一直攻掠到泾州

境内。刘知俊听说后，解灵州之围，率兵回去了。朱温急诏康怀贞回师，并派军队到三原迎接。康怀贞到达三水，遭到刘知俊的伏兵袭击，幸亏勇将王彦章奋力拼杀，才得以通过。康怀贞与部将李德遇等人分道并进，沿途都没有遇上援兵，至升平，刘知俊早已在山口设下埋伏，梁军大败，李德遇等人全军覆没，康怀贞也仅以身免。岐王遂任命刘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守泾州。

李茂贞与蜀帝王建关系密切，常常向蜀索要财物，王建有求必应。李茂贞又要巴、剑二州，王建说："我对李茂贞，也够优厚了。如果割让给他土地，那是弃民，宁可多给他点东西。"于是又送给李茂贞丝、茶、布、帛七万斤（匹）。

王建的女儿普慈公主嫁给李茂贞的侄儿秦州节度使李继崇。公主派宦官宋光嗣带着绢书来见王建，说李继崇骄横嗜酒，很难再与他一块生活，要求回成都。乾化元年（911年）正月，王建召公主归宁。公主到成都后，便被王建留下，不再回去。又以宋光嗣为閤门南院使。李茂贞大怒，岐蜀断交。

三月，岐王李茂贞在靠近蜀国东部的地方聚集军队，蜀帝王建对群臣说："自从李茂贞被朱温打败以来，我常在他危难时帮助他，现在竟然忘恩负义，入侵我国，谁替我攻打他？"兼中书令王宗侃请战。王建命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王宗佑、王宗贺、唐道袭三人为招讨使，发兵十二万，三路并进，讨伐李茂贞，声势十分浩大。李茂贞在对蜀用兵的同时，又以温韬为养子，授以义胜节度使之职，让他率兵攻打长安，却很快便被梁军击退。

岐蜀交战就不像岐梁交战那样简单，四月初一，岐兵攻打蜀之兴元，被唐道袭击败，蜀诸将乘胜进兵，屡败岐兵，可是到了八月，李茂贞命刘知俊、李继崇率兵反攻，大破蜀兵于青泥岭。马步使王宗浩逃奔兴州，唐道袭逃奔兴元，王宗侃、王宗贺则收集散兵，退守西县，而西县随后被刘、李包围。王建闻讯，立即派出援兵，与唐道袭合兵，大破岐兵于明珠曲。第二天再战，斩杀

岐成州刺史李彦琛。岐蜀交战处于胶着状态。

王建令太子监国，然后赶赴前线督战。蜀将王琮击破岐兵，斩首三千五百级；彭君集也攻破岐兵二个营寨，斩首三千级。王宗侃又向蜀帝告急，王建派兵赴援，击败刘知俊，局势开始好转。

十一月，蜀将王宗弼在金牛打败岐兵，攻下营寨十六个，俘斩岐兵六千人，活捉敌将郭存等人。不久，王建来到兴元，令各路蜀军向西县岐兵发起猛攻，王宗侃又趁机向外冲杀，岐兵在蜀军的夹击下大败，连失二十一寨，狼狈逃走。唐道袭预先已在斜谷设伏，再破岐兵。

刘知俊等人回到凤翔，岐王李茂贞身边的人石简颙趁机向李茂贞说刘知俊的坏话，岐王便夺去刘知俊的兵权，李继崇对岐王说："刘知俊是一位壮士，危难之际投奔我们，不应该因谗言而罢免他。"岐王便杀掉石简颙来安慰刘知俊。李继崇请刘知俊率全族到秦州居住。

此后，岐蜀再次交兵，岐又失利。乾化四年十二月，蜀将王宗铎攻岐阶州（今甘肃武都东），破十一寨，斩首四千级，王宗俨破岐四寨，斩首二千级。

贞明元年（915年）八月，蜀帝王建看到岐王李茂贞国力日衰，乃下诏大举伐岐，以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王宗播为招讨使，攻打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以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王宗翰为副使，攻打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十一月十三日（己巳），王宗翰率兵出青泥岭，一举攻克固镇。然后与岐秦州守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战败，只得退保鹿台山。十五日（辛未），王宗绾等人在金沙谷击破秦州兵，乘胜指向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攻克阶州，岐阶州刺史李彦安投降。十八日（甲戌），王宗绾攻克成州，活捉刺史李彦德。蜀军到达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崇迎降，王宗绾遂入秦州。此时岐大将刘知俊正在围攻梁之邠州，半年未克，听说秦州已经降蜀，妻子儿女都被蜀军迁往成都，马上

解邠州之围回凤翔，可又怕遭祸，夜里便率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投奔蜀军。不久，王宗绾攻下凤州。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蜀兵连占阶、成、秦、凤等州，李茂贞的领地多没于蜀，势力更弱。

祸不单行，岐义胜节度使李彦韬（即温韬）看到岐王衰弱，又以耀、鼎二州降梁。

贞明二年，蜀帝王建再次下令伐岐，蜀军二十二万人，分为两路：一出凤州，指宝鸡，以攻凤翔；一出秦州，指向陇州。至十月，蜀将王宗绾等人出大散关，大破岐兵，俘斩一万多人，攻占宝鸡，随后包围凤翔，岐兵不敢出战。另一路在王宗播率领下，出故关，至陇州。岐保胜节度使李继岌害怕李茂贞猜忌，率其众二万放弃陇州，投奔蜀军。恰巧天降大雪，王建下令回师，李茂贞才松了一口气。

贞明三年七月，王建调兵遣将，准备再次伐岐，后虽作罢，却使李茂贞时刻担心吊胆。次年，李茂贞只得遣使向蜀求和。不久，王建死，太子王衍即位，是为蜀后主。蜀后主不亲政事，奢侈无度，搞得朝政混乱不堪，自然减轻了对岐的威胁；而梁晋相争，正在黄河两岸打得不可开交，谁也无力西顾。李茂贞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得以苟延残喘。

龙德三年（923 年）十月，唐庄宗李存勖灭梁，进入大梁。岐王李茂贞自以为与李克用义犹兄弟，遣使致书于李存勖，祝贺他灭梁。李茂贞以季父自居，辞礼十分傲慢。不久，李存勖迁都到洛阳，岐王李茂贞听说后，惟恐唐兵西伐，立即派儿子李继曮到洛阳进贡，上表称臣。李存勖认为岐王乃唐朝遗老，与父亲李克用平起平坐，故对他特加优礼，在给他的诏书中只称岐王而不称名。李继曮看到唐甲兵甚盛，回凤翔后作了汇报，李茂贞更加恐惧，再次上表要求把自己作为藩臣对待。李存勖仍优诏不许，并进李茂贞爵为秦王。

同光二年（924 年），秦王李茂贞死，遗奏以其子李继曮权知凤翔军府事，不久，唐正式任命李继曮为凤翔节度使。但李继曮再也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割据一方了。到了长兴元年（930 年），唐明宗借李继曮入朝陪祀的时机，把他调职为宣武节度使，而以宣徽使朱弘昭为凤翔节度使。这样，就结束了凤翔镇李氏父子长达四十四年的统治。

（侯仰军）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 256～卷 277
《旧五代史》：《李茂贞传》

晋王灭燕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自昭宗乾宁二年（895 年）割据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以来，在两面都是强敌的环境中总算维持了十几年的统治，可他晚年过于骄侈贪暴，因担心幽州城不牢固，便在城西的大安山上建筑新宅居住，说："此山四面都是悬崖，可以以少制众。"房屋建得十分壮丽，可以与皇宫相媲美，并挑选大批美女充实于其中。又与方士炼丹药，以寻求不死之术。刘仁恭还大肆搜刮钱财，搞得民间怨声载道。他把境内流通的铜钱都搜刮来埋在大安山的山顶，下令民间改用粘土铸钱使用；禁止江南茶商入境，自采境内草叶制茶，并售给百姓以牟取暴利。

刘仁恭有爱妾罗氏，长得十分漂亮，可儿子刘守光也十分喜爱她，便与罗氏通奸。刘仁恭知道后，大怒，杖责了守光，并把他赶出家门，父子结怨。

开平元年（907 年），朱温派亳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率兵攻打幽州。梁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直抵幽州城下。此时刘仁恭还在大安山，幽州城中没有防备，几至失守。刘守光闻讯，马上带兵入幽州，上城坚守，打退了李思安的进攻。刘守光遂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元行钦率兵攻打大安山，刘仁恭派兵抵抗，被李小喜战败。不久，刘仁恭本人也被俘获，被带回幽州城中关押起来。其亲信将领，凡平时为刘守光厌恶的，全部被杀。大将王思同、李承约逃奔晋王李克用，守光的弟弟守奇先逃往契丹，既而也投奔李克用。

朱温称帝建梁后，刘守光慑于梁朝的声威，立时派使者向梁请命。朱温顺水推舟，便任命刘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

刘守光的哥哥义昌节度使（治所在沧州）刘守文听说弟弟守光囚禁了父亲，召集部下开会大哭，说："想不到我家竟生出这样的不孝之子！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战死沙场，我发誓要与大家一起讨伐他。"乃出兵攻打刘守光，互有胜负。

梁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对部下说："刘守光因处境危险而投靠我国，刘守文孤立无援，必然恐惧，沧州不战而降服。"于是，罗绍威给 刘守文写了一封信，晓以利害，刘守文也担心梁朝乘其后方空虚来伐，马上遣使请降，并以儿子刘延祐为人质。梁太祖朱温大喜。拍着手说："罗绍威一纸书信，胜十万精兵。"遂给刘守文加官中书令，抚慰一番。

开平二年十一月，刘守文再次调兵攻打幽州，刘守光向晋求救，晋王李存勖派兵五千人赴援。刘守文兵至卢台军，被守光击败；再战于玉田，又败，只好退兵。

次年五月，刘守文因连年攻打刘守光不胜，乃大规模调集军队，又以大量财物请来契丹、吐谷浑之兵，共有四万之众，进屯蓟州（今河北蓟县）。刘守光迎战于鸡苏，被守文击败。不料，正当守文部下将士追击逃敌时，刘守文却单马立于阵前，呜咽着对大家说："千万不要伤着我的弟弟！"刘守光的大将元行钦认出了刘守文，趁势冲上前来将他擒住。守文的军队失去统帅，立时溃败。刘守文被守光囚禁在一间小房子里，周围都插上荆棘。

刘守光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举刘守文的儿子刘延祚为统帅，登城拒守。六月，刘守光派使臣向梁太祖朱温上表告捷，并说："一旦沧、德方面的战事结束，就为陛下扫除并州敌寇（指晋王）。"他又写信给晋王李存勖，说愿与晋王一起消灭伪梁。不久，梁太祖进封刘守光为燕王。刘守光要求派他的儿子中军兵马使刘继威安抚沧州官民。梁太祖便任命刘继威为

义昌留后。

到了十二月，刘守光围沧州已经半年，可一直攻不下来，就把刘守文带到城下给沧州人看，要他们投降，然而广大将士依然固守，城内粮食早就吃光了，老百姓吃堇泥，士兵吃人，驴马则互相吃鬃尾。吕兖找了一些瘦弱的男子和妇女，给他们吃些酒曲、麦粉，然后便把他们煮熟供给士兵们食用，称为“宰杀务”。

开平四年正月，刘延祚终于支撑不住，开城投降，当时刘继威年纪还小，刘守光就派大将张万进、周知裕辅佐他镇守沧州。刘延祚和他的手下将士被迁往幽州，刘守光下令，把吕兖灭族，释放孙鹤。

刘守光替他的父亲刘仁恭请求退休，梁太祖下诏，以刘仁恭为太师，准许退休。不久，刘守光派人暗杀了刘守文。八月，刘守光兼任义昌节度使。

燕王刘守光自攻克沧州后，自以为得到上天的佑助，更加荒淫残暴。每次惩罚人，都要放在铁笼子里用火烤；又制成铁刷子来刷犯人的脸。乾化元年（911 年）二月，他听说梁朝军队在柏乡战败，就派人对赵王王镕和王处直说：“听说你们二镇和晋王一起打败梁兵，发兵南下，我也有精锐骑兵三万人，愿意带着他们来给你们引路。然而四镇军队联合作战，一定要有个盟主，我若到了那儿，怎么来安排我呢？”王镕很忧虑。派人把这件事报告给晋王李存勖。晋王笑着说：“赵人告急时，刘守光不派一兵一卒去救援，等到我们胜利了，竟想凭武力离间我们三镇，实在太愚蠢了！”诸将都说：“云、代二州和燕接壤，他如果扰乱我边境。就会动摇我军军心；我们千里出征，缓急之际也难以应付，这也算是心腹之患了。不如先攻灭守光，然后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南下攻伐了。”晋王说：“好”。

燕王刘守光曾穿着红袍对部下说：“现在天下大乱，各地英雄你争我斗，互不相让，我兵强马壮，地势险要，也想尝尝当皇帝

的滋味，诸位看怎么样呢？”孙鹤劝谏道：“我们现在内部刚刚安定，公私都很困乏，太原的李存勖正窥伺我们的西部，契丹则在北方待机而动，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筹划称帝，恐怕不合适。大王您只要广招贤才，爱护百姓，训练军队，多积粮食，德政既修，还怕天下不臣服吗？”刘守光很不高兴。

刘守光又派使者婉言劝说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要他们尊奉自己为“尚父”。赵王王镕将此事告知晋王，晋王勃然大怒，立刻想发兵讨伐刘守光。诸将都说：“这个刘守光实在是罪大恶极了。应该灭他全族。但我们现在不如先假装推重他。尊他为尚父。使他恶贯满盈。”晋王连连称善，便与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振武节度使周德威以及天德节度使宋瑶六个节度使一起奉册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

刘守光看不透形势，以为六镇确实害怕自己，于是沾沾自喜，更加骄横。他又上表给梁太祖朱温说：“晋王等六镇一致推尊我，可我受陛下厚恩，不敢冒昧接受。我考虑再三，不如陛下封我做河北都统，这样，并州、镇州就不值得平定了。”梁太祖也知道他狂妄愚蠢，就任命他为河北道采访使。并派阁门使王瞳、崇政院受旨史彦群前去册命他。

刘守光命令僚属们草拟尚父、采访使受册封的礼仪。六月初三（乙卯），僚属拿来唐代册封太尉的礼仪呈给他。说尚父受封，用册封太尉的礼仪。刘守光看了看，问道：“怎么没有郊外祭天、改元的事宜呢？”僚属回答说：“尚父虽然高贵，毕竟还是臣子，怎么能够祭天、改元呢。”刘守光大怒，将册子扔在地上，说：“我拥有的土地方圆二千里，精兵三十万，就做河北天子，难道还有谁能阻挡我！尚父有什么值得做的！”命令部下赶快准备即皇帝位的仪式，把王瞳、史彦群以及各道的使者都带上枷锁，投入监狱，但不久他们又被释放出来。

燕王刘守光就要登基称帝了，他的将士与僚属们私下议论纷

纷，都认为不可以。刘守光便在大厅中放了斧头和砧板，怒气冲冲地说："敢谏者斩！"孙鹤从容不迫地说道："大王您攻破沧州时，按道理我就该被处死，但您宽宏大量，赦免了我，我才能够有今天，我怎么敢怜惜自己的生命而忘记您的大恩大德呢！我认为您现在不能称帝！"刘守光大怒，命武士们把他按倒在砧板上，割他的肉吃。孙鹤大声呼喊道："不出一百天，一定会有讨伐你的大军来到。"守光命人用土堵住他的嘴，一寸寸地把他割死。刘守光如此凶残，使得他人心丧尽。

八月十三日（甲子），刘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元应天，封梁朝使者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群为御史大夫，即位的当天，契丹攻陷平州（今河北卢龙），燕国人都很惊恐。

晋王听到刘守光称帝的消息，放声大笑，说："等他占卜在位年数的时候，我便要取而代之了。"张承业请晋王派使者去幽州，向刘守光祝贺，以便使他更加骄横，于是晋王派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往，李承勋到幽州后，用邻藩通使之礼拜见，燕国负责接待的官员说："我们大王称帝了，你应当称臣并在朝廷上觐见。"李承勋说："我受命于唐朝，官居太原少尹，燕王尽可在他自己管辖的范围内称帝，怎么能让别国的使者称臣呢！"刘守光很生气，就把他关进监狱，几天后又放出来，问道："向我称臣吗？"李承勋说："燕王若能使我们大王称臣，那么我就称臣，不然，惟有一死而已。"刘守光到底没能使他屈服。

十一月，刘守光召集将吏商讨攻取易、定之事，幽州参军冯道认为不可，刘守光大怒，把他投进监狱，后经人救助，才被释放出来。冯道不久便逃往晋地。刘守光决心已定，遂率将二万人向易、定进犯，攻打容城。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向晋告急，晋王派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率兵三万攻燕，以救援易、定。

乾化二年正月，周德威东出飞狐（今河北蔚县东南），与赵王部将王德明、义武将领程岩在易水会师。三镇的军队攻下了燕国

的祁沟关，接着便包围了涿州。涿州刺史刘知温据城防守。刘守奇的门客刘去非在城下大声呼喊。对刘知温说："河东小刘郎来为父讨贼，与你何干！你替谁坚守呢！"刘守奇脱下头盔向刘知温问候，刘知温在城头上叩拜刘守奇，随即投降。周德威嫉妒刘守奇的功劳，便派人到晋王面前诬陷他，晋王召见刘守奇，刘守奇担心被治罪，就与刘去非及进士赵凤一起投奔梁朝。在此之前，刘守光将境内的壮丁登记入册，一律在脸上刺字为兵，连读书人也难以幸免。赵凤扮成和尚逃奔晋地，被刘守奇收留为门客。

梁太祖任命刘守奇为博州刺史。后刘守奇与梁大将杨师厚率兵逼近沧州，迫命沧州守将让出城池。在杨师厚的推荐下，刘守奇担任了顺化节度使，镇守沧州。

周德威率兵来到幽州城下。因兵少不能攻城。晋王就派李存审带领吐谷浑、契苾骑兵前去增援。同时，晋将李存晖、李嗣源分别率兵攻打瓦桥关、瀛州，很快便攻下来。

五月，刘守光派大将单廷珪率精兵一万人出战，在龙头冈与周德威的军队遭遇。单廷珪说："今天一定要活捉周杨五（周德威的小名）献给皇上！"开战后，他看到周德威正在阵中，立即持枪单骑冲上前去，枪尖一直刺到周德威的背部。周德威侧身避开，奋力挥杖向单廷珪打去，单廷珪躲闪不及，立时掉下马来。被周德威活捉，放在军营门外，燕兵见状，都慌忙退走。周德威率轻骑乘胜追击，燕兵大败，死者三千人，单廷珪是燕国的一员猛将，他被俘后，燕人士气大伤。

乾化三年正月，周德威攻克燕顺州，既而又克安远军。不久，李存晖等率兵攻下檀州，檀州刺史陈确投降。三月，周德威夺取燕芦台军，刘光濬攻取古北口，燕居庸关使胡令圭等人前来投降。

刘守光见局势危急，一面命令大将元行钦率七千骑兵，在山北牧马，并招募山北兵来接应契丹；一面任命骑兵将领高行珪为武州刺史，作为外援。晋将李嗣源分兵征讨山后八军，全部攻克。

晋王命他的弟弟李存矩做新州刺史，总领山后八军。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珪献城投降，元行钦听说后，率兵攻打高行珪，高行珪派他的弟弟高行周作为人质，向晋军求救。李嗣源率兵赴援，元行钦只得解围而去，李嗣源与高行周在后边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广边军，双方共打了八次仗，元行钦力尽投降。李嗣源见元行钦十分骁勇，很喜欢他，收为养子。

四月，周德威率军逼近幽州南门。刘守光见难以招架。派人给周德威送去书信求和，言辞低三下四，又分外哀伤。周德威对使者说："大燕皇帝还没有行郊外祭天之礼，怎么就这样低声下气，没有一点威风了呢！我受晋王之命率军讨伐有罪之人，难道还要同他握手言欢吗！"连信也不回。刘守光更加害怕，再次派人去苦苦哀求，周德威这才向晋王作了汇报。

随后几个月内，燕军更是节节败退。晋将刘光濬攻克平州，活捉了刺史张在吉，既而又攻下营州，营州刺史杨靖投降。六月，张承业受晋王派遣到幽州城下和周德威共商军事，刘守光派使者拜见张承业，说愿意交出幽州作为投降的条件。张承业认为刘守光不讲信用。没有答应。其后，晋王院军使李信攻克莫州，活捉燕将毕元福。

九月，刘守光率兵在夜里突袭晋军，夺回顺州。十月初一(己巳)，他又率五千人于夜间出兵，打算夺回檀州。周德威听说后，急忙从涿州赶来截击，大破燕军。刘守光带一百多名骑兵狼狈逃回幽州，其部下将士投降晋军的络绎不绝。

卢龙镇下属各州县都被晋军攻占后，刘守光困守幽州城中，惶惶不可终日，只好向契丹求救。然而契丹认为他反复无常，不讲信义，拒绝出兵。刘守光又多次向晋求降，晋以为这不过是他惯用的一种欺骗手段罢了，也置之不理。刘守光走投无路，就登上城头对周德威说："晋王来了，我就大开城门，伏道请罪，听从晋王之命。"周德威让人将这些话报告给晋王。十一月初六(甲辰)，

晋王让监军张承业留守晋阳，暂时负责军府事务，自己率兵赶往幽州。二十三日（辛酉），晋王单人匹马来到城下，对刘守光说道："朱温篡逆，我本想与你一道联合河朔五镇之兵共同兴复唐朝。然而你考虑不周，竟然也效法他僭越帝位。镇、定二帅都俯首贴耳听你发号施令，你却不体恤他们，因此才有现在这场战争。大丈夫在成败兴亡关头必须决定何去何从，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刘守光说："我现在是俎上之肉，听凭大王处置。"晋王顿生怜悯之心，当场折箭为誓："你只管出来见我，保你不发生意外。"刘守光推辞说过几天再投降。

在此之前，刘守光的爱将李小喜给刘守光出了许多坏主意，刘守光对他言听计从，故李小喜在燕境内权势极大。现在刘守光准备降晋。小喜竭力劝阻。当天晚上，李小喜却一个人爬出城墙向晋军投降，并说城中守兵已粮尽力竭。二十四日（壬戌），晋王亲自督率各军从四面攻城，一举拔之，捉住了被软禁多年的刘仁恭及其妻妾，刘守光带着妻子儿女逃走。二十五日（癸亥），晋王进入幽州。

刘守光携家眷一路行色匆匆，直向沧州投奔刘守奇。十二月的北国，天寒地冻，刘守光的脚都冻肿了，又迷了路，竟来到燕乐县（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燕乐庄）境内，他们白天不敢露面，只好藏在坑谷里，几天没有吃上饭了。刘守光实在饥饿难忍，就让妻子祝氏出去要饭。祝氏来到农民张师造家，张师造看到这女人举止不同寻常，顿生疑窦，一问，祝氏便实说了。于是，刘守光及其三子全被抓获。

十二月初六（癸酉），晋王正大宴宾客，将吏押着刘守光来到。晋王对刘守光说："你作为主人，怎么可以这样躲避我这个客人呢！"遂把刘守光和刘仁恭一起安置在馆舍里，并送给他们衣食用具。晋王命令掌书记王缄起草称作露布的晓示天下的捷报文书。王缄不知道露布的旧例，便将捷报直接书写在一块布上，并派人拉

着。(露布实即不加缄封之文书)

晋王想从云州、代州回晋阳，赵王王镕以及王处直请求他经中山、真定再取道井陉回晋阳，晋王答应了。十二月十三日（庚辰），晋王从幽州出发，刘仁恭父子都戴着枷锁站在露布之下。刘守光的父母边往守光脸上吐唾沫边破口大骂，说："逆贼，你把我们家败坏到这种地步!"刘守光只是低着头而已。十七日（甲申），晋王一行来到定州，在关城内住下。十九日（丙戌），晋王和王处直拜谒北岳庙，当天抵达行唐，赵王王镕在路边迎接。

转眼到了乾化四年，正月初一（戊戌），王镕到晋王营帐中为晋王上寿敬酒，并提出希望能见刘太师一面，晋王让人给刘仁恭、刘守光卸下枷锁，带来与自己一同饮酒。

正月十五日（壬子），晋王用白绢捆绑着刘仁恭父子，高唱凯歌，进了晋阳。十九日（丙辰），晋王将刘氏父子献于太庙，并亲自监斩刘守光。刘守光大声叫道："我刘守光死而无憾。然而教我不投降的是李小喜。"晋王把李小喜叫进来对证，李小喜瞪大眼睛斥骂刘守光，说："你囚父弑兄，奸淫亲属，行同禽兽，难道也是我教的吗?"晋王见李小喜太无礼，很生气，先把他斩了。守光又说："我擅长骑马射箭，大王想成就大业，一并天下，为什么不留下我以效犬马之劳呢?"刘守光的两位妻子李氏、祝氏责备他说："皇帝，事已如此，贪生又有何益!"说完即引颈就戮。刘守光一直到死还是哀号乞怜不已。晋王又命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把刘仁恭押送到代州，刺其心上血以祭先王李克用之墓，然后再把他斩首。至此，燕彻底灭亡。

晋王灭燕，暂时减轻了南下攻梁的后顾之忧，但是，他却消除了一道横在自己和北方契丹之间的屏障，从总体上来看得不偿失。其后，只要契丹南下，晋就不得不派兵抵御，以至疲于奔命，边境始终不得安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倒不如先稳住刘氏，

让他们去抵挡契丹的侵扰，待灭梁之后再予以解决。

（侯仰军）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260—卷269

《通鉴纪事本末》：《晋王灭燕》

《新五代史》：《刘守光传》

梁室内乱

当梁晋相争的战局出现逆转、梁军连战皆败的时候，梁室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动乱，从而加速了朱梁政权的垮台。

梁太祖朱温为人嗜杀成性，心狠手辣，猜忌心强，他自己是凭武力夺取帝位的，自然要严防部下也这样做。即位之后，一些手握重兵、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重臣多被他杀掉，使得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官员们每天上朝之前，都要与家人诀别，回府之后就庆贺一番，真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因此，梁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而朱温又生性荒淫好色，晚年尤甚。原配夫人张氏（后追封为元贞皇后）在世时，他慑于张氏的威严，尚不敢任意妄为。张氏为人聪明贤惠，足智多谋，朱温对她甚是敬畏，不幸早逝，张氏死后，朱温不立继室，一味纵情声色，以至像禽兽一样淫乱。他不但任意奸污大臣的妻女，对自己的儿媳也不放过。他把儿子们派到外地镇守，让儿媳们轮流进宫侍寝，完全丧失了礼义廉耻。朱温有八个儿子，长子郴王朱友裕早死，其次便是养子博王朱友文。朱友文本姓康名勤，虽为养子，却很受朱温喜爱。开平三年（909 年）正月，梁迁都洛阳后，朱温让他留守东都大梁，并兼任建昌宫使，再其次是郢王朱友珪，因生母是亳州营妓，颇为兄弟们鄙视，也不受朱温宠爱，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第四子是均王朱友贞，生母乃元贞张皇后，任东都马步都指挥使。朱友文作为养子，名位在朱温诸子之上，这就引起诸子尤其是朱友珪的不满。而朱友文的妻子王氏长得漂亮，在几个儿媳中又最受朱

温宠爱，王氏恃宠，难免要给朱温吹些枕边风，要求立友文为太子。朱温虽没有正式立友文为太子，但心中常有这个想法，朱友珪得知后，更加不满。朱友珪曾犯小错，受到朱温责打，内心十分不安。朱温晚年长期有病在身，友文妻王氏与友珪妻张氏日夜在身边侍候。乾化二年（912 年）五月，朱温病重。他自知生命垂危，对王氏说："我快要不行了。你赶快去东都大梁叫来友文，我要与他告别。"张氏得知后，密告给丈夫朱友珪，说："皇上把传国宝交给了王氏带往东都，我们活不了几天啦。"夫妇二人相对而泣。身边的人劝道："急中生智，何不趁早想个办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六月初一（丁丑），朱温命宣政使敬翔贬朱友珪为莱州刺史，勒令他立即离开洛阳，圣旨已下，而正式公文还没有发出。朱温为人刚强暴躁，晚年更是喜怒无常，当时凡被贬官者，肯定会有后命，往往要赐死。朱友珪大为恐慌。

六月初二（戊寅），朱友珪偷偷来到左龙虎军，找到统军韩勍，把情况告诉给他，请他与自己一起发动政变，韩勍看到朱温即位以来功臣宿将多以小错被杀，担心自己生命难保，立即与朱友珪合谋，朱友珪长期以来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梁以侍卫亲军为控鹤军），调动起皇帝亲军来得心应手，于是，朱友珪联合了一部分控鹤军。韩勍调来五百牙兵，汇合到一处，埋伏在宫中。到了半夜，朱友珪带兵斩关而入，闯进朱温寝殿，侍疾者见状都慌忙逃走，朱温惊起，喝问："是谁胆敢造反？"友珪回答："不是别人！"朱温骂道："我本来就怀疑你这贼子，真恨自己不早把你杀掉。你干这种悖逆之事，天地会容你吗！"朱友珪也骂道："老贼，我先把你碎尸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立即上前去杀朱温，朱温只好绕着柱子逃跑。冯廷谔连砍几剑，都砍在柱子上。而朱温毕竟年纪大了。又有病在身，终于支撑不住。倒在床上，冯廷谔一剑刺进朱温腹中，剑尖从朱温背上穿出，肠胃流了一床，立时毙命。朱

友珪拿了个破毡子包上朱温的尸体，就在寝殿中挖了个坑草草埋起来，秘不发丧。又派供奉官丁昭溥迅速赶往东都，命均王朱友贞杀掉朱友文。

六月初三（己卯），朱友珪假造朱温诏书，声称："博王朱友文谋反，派兵闯进殿中．幸亏郢王朱友珪忠孝，及时率兵入宫，诛杀友文，保全朕躬。可由于朕受此刺激，病情加重，宜令友圭暂管军国之事。"韩勍为友珪出了个主意，从府库中取出大量金钱布帛赏赐将士及文武百官，以收买人心。

六月初五（辛巳），丁昭溥从大梁回来，说朱友文已被杀死，朱友珪放心了，乃为朱温发丧，宣布遗诏，即皇帝位。

时朝廷新有内难，人心不稳，许州军中议论纷纷，可匡国节度使（治许州、今河南许昌）韩建既不追查，也不防备。不久，马步都指挥使张厚发动叛乱，杀死韩建。朱友珪因统治不稳固，不敢讨伐，反而任命张厚为陈州刺史。

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幼弱，大权掌握在牙内都指挥使潘晏手中。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正屯兵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天雄节度使治所），早就想取罗周翰而代之，可慑于朱温的威严，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及朱友珪弑帝，杨师厚认为时机已到，立即捕杀潘晏，率兵占据牙城，以天雄节度使的名义发号施令。朱友珪不敢得罪杨师厚，遂任命他为天雄节度使，徙罗周翰为宣义节度使。

朱友珪的软弱无能，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篡位的痛恨，地方上叛乱更多。八月，戍守怀州的三千龙骧军溃乱，向东逃走，一路上到处抢劫。朱友珪派兵镇压，擒杀其首领，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至于朱温的一些老部下，看到朱友珪弑父篡位，都很愤怒，虽然朱友珪多方笼络，可他们终究不高兴。当告哀使到达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护国节度使治所）的时候，护国节度使冀王朱

友谦作为朱温的养子，闻知噩耗，极为悲愤，哭着说："先帝开创基业数十年，竟不幸死于贼子之手，祸起萧墙，实在悲惨。我作为朝廷藩镇。不能讨贼，十分耻辱。"朱友珪乃给友谦加官侍中、中书令，下诏书自我辩解，并征他入朝。朱友谦对使者说："是谁立他当的皇帝？先帝去世，丧事还未办好。我将要到洛阳问罪，还要他征召吗？"朱友珪大怒，命令大将康怀贞，韩勍率军讨伐，朱友谦便投靠了晋王，并向晋求救。晋王李存勖派部将李存审等人率兵来救，在胡壁击败梁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梁军对朱友谦的威胁。河中城在梁军的攻打下，十分危急，朱友谦再次向晋求援，晋王遂亲自率军来救，大破康怀贞，斩首千级。梁军解除对河中的包围，退保陕州。朱友谦亲往晋王营中拜谢，为表示对晋王的忠诚，他只带几十名随从，没有任何防备措施，又认晋王为舅。晋王晚上大摆宴席招待朱友谦，朱友谦喝得大醉，留宿晋王帐中，一夜安寝，宛如自己家中。梁遂失去河中之地。

再说梁大将杨师厚既夺得魏博之兵，又兼任北面都招讨使，不但部下多为精兵良将，诸镇兵也有权调发，威势日重。他打心眼里看不起朱友珪，遇事往往专断，并不上报。朱友珪很担忧，下诏书要他回朝。说："有北方的军机大事，想同您面商。"杨师厚将要动身进京，心腹将领都不让他去，说："入朝必有不测之祸。"杨师厚说："我了解他的为人，即使去了，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遂率精兵万余人，渡过黄河直趋洛阳。朱友珪十分恐慌。不过，杨师厚率兵来到洛阳城门外，却把大军留下，仅率随从十几人入宫觐见。朱友珪大喜，对杨师厚甜言蜜语地抚慰一番。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并赏赐大量财物，然后打发他回镇。

乾化三年正月，朱友珪下令大赦，改元凤历。

朱友珪一旦得志，马上变得荒淫无度，朝廷内外无不愤怒，虽赏赐大量金钱布帛，人心不附。驸马都尉赵岩，是朱温的女婿；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是朱温的外甥。赵岩奉命

到大梁，均王朱友贞私下同他商议杀朱友珪之事，赵岩说："此事成败，在于招讨使杨师厚一人，有他一句话来晓谕禁军，我们的事情立时可以办成。"朱友贞便派心腹马慎交到魏州劝说杨师厚。马慎交对师厚说："郢王篡弑，人心归于均王，您若按照民心所向拥立均王，乃不世之功。"又许下诺言，事成之后，赐犒军钱五十万缗。杨师厚与部下将领商量该怎么办，说："当初郢王弑君，我不能立即讨伐，现在君臣名分已定，又无故改变主意，可以吗？"部下有人说："郢王亲弑君父，就是贼寇，均王举兵复仇，就是仁义，奉义讨贼，还管什么君臣名分！他们如果一旦破贼，您无一寸讨贼之功，将何以自立？"杨师厚说："你说得很对，我几乎要误事。"便派部下王舜贤去洛阳，暗中与袁象先谋划，又遣招讨马步都虞候朱汉宾率兵屯驻滑州，作为外应。赵岩回到洛阳，也与袁象先私下定计。

自从去年怀州龙骧军溃乱后，朱友珪一直搜捕其余党，抓到后一律灭族，至此仍不停止。当时龙骧军有驻守大梁的，朱友珪下令把他们调到洛阳，均王朱友贞趁机派人激怒他们："去年怀州戍兵叛乱，可到现在天子还要追捕你们这些无辜的人，竟要把你们押送到洛阳全部活埋。"大家都很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朱友贞便上奏朱友珪说龙骧军疑惧，不肯前往。两天后，龙骧军将领拜见朱友贞，哭着请求指出一条活命之路，朱友贞说："先帝与你们一起征战三十余年，才建成帝王之业。现在先帝尚且被人杀死，你们又能到哪里逃命呢！"于是拿出梁太祖朱温的画像给他们看并且哭着说："你们能去洛阳为先帝报仇雪耻，就可以转祸为福了。"大家都高兴得直喊万岁，请求发给兵器，朱友贞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汴兵还未到达洛阳，城中禁军已进行暴动。乾化三年二月十七日（庚寅）早晨，袁象先等率禁兵数千人冲进皇宫。朱友珪听说禁军叛变，立即与妻子张氏和冯廷谔跑到皇宫北部的城楼下，本

打算越墙逃走，后想到难免一死，便命令冯廷谔先杀张氏，后杀死自己，冯廷谔随后也自杀。洛阳城中随即大乱，诸军十余万人在都市中大肆抢劫，文武百官纷纷逃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及侍讲学士李珽都被乱兵杀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和宣政使李振受伤。直到傍晚，城内才安定下来。

袁象先、赵岩带着传国宝到大梁迎接均王朱友贞，朱友贞说："大梁乃先帝创业之地，何必要去洛阳！"遂于大梁即皇帝位，复称乾化三年，追废朱友珪为庶人，恢复博士朱友文的官爵。朱友贞即为历史上的梁末帝，三月，梁末帝改名为朱锽，后又改名为朱瑱。梁末帝给杨师厚加官为兼中书令。并赐爵邺王，十分优待，事无大小都要向杨师厚请教然后施行，又遣使招抚朱友谦，朱友谦复向梁称藩，奉梁年号。

一场内乱总算平息，但梁晋相争的局面并未改变。摆在梁末帝面前的是更加恶劣的局势，朱梁政权已是江河日下、难以挽救了。

（侯仰军）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 268

《旧五代史考异》

《五代会要》

《旧五代史》、《太祖本纪》、《梁末帝本纪》、《后妃列传》、《宗室列传》

《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

后唐灭梁

梁室内乱以后，朱梁政权进一步衰落。加之梁朝君臣一再失策，内部斗争又日益激烈，终被晋很快灭掉。

丢失魏博是后梁君臣的第一大失误。自唐朝中叶以来，魏博镇（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一直以地富兵强闻名天下。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梁晋相争，梁军虽然屡次溃败，但是只要保住魏博，首都汴京就不会受到威胁；而晋王李存勖要想灭梁，不夺取魏博就难以达到目的。可要夺取这一强镇，并非易事。

不料，梁末帝朱友贞却意外地帮了李存勖的忙。贞明元年（915 年）三月，天雄节度使（即魏博节度使，唐昭宗末年改魏博镇为天雄军）杨师厚死。杨师厚晚年依仗兵强功大，擅自占用国家财赋，又选拔军中勇健之士组成亲兵，名“银枪效节都”，共有几千人，待遇十分优厚，企图恢复以前的牙兵盛况。梁末帝表面上对他很优待，内心里却很猜忌，听到他死的消息，十分高兴。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对梁末帝说：“魏博镇二百多年来一直为唐腹心之患。罗绍威、杨师厚占据此镇后，朝廷依然难以控制。陛下不乘此良机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像俗语说的那样，‘去疽不尽，脓血复生’，又怎能保证后任者不成为第二个杨师厚呢？不妨把魏博六州分成两镇从而削弱它。”梁末帝很赞同，遂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新置昭德军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割澶、卫二州归它管辖，任命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又把魏州的军队、财

物分出一半给相州。贺德伦、张筠二人赴镇后，朝廷恐怕魏州人不服，派开封尹刘鄩以讨伐镇州、定州的敌人为名，率兵六万从白马津渡过黄河，威慑魏人。

魏州兵长期以来都是父子相袭，彼此之间由于多代联姻，关系盘根错节，他们不愿分迁。贺德伦多次催促，应迁者无不叫苦连天，军营的士兵常常聚在一起痛哭。不久，刘鄩率兵进屯南乐，离魏州仅有四十里左右。他先派澶州刺史王彦章带龙骧军骑兵五百人进入魏州，驻扎在金波亭。魏兵相互议论道："朝廷设计使我们自行残破，与其骨肉流散，不如拼死一斗。"当晚，魏州军作乱，他们到处放火、抢劫，并包围了金波亭。王彦章突围后逃走。第二天早晨，乱兵攻入牙城，杀死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人，然后把贺德伦劫持到一座楼上。效节都中有一名叫张彦的小军官，带着部下制止了城内的抢掠。

梁末帝派供奉官扈异前往魏州安抚魏军，许诺给张彦一个刺史的职位。张彦要求恢复相、澶、卫三州旧制，罢昭德军，仍隶天雄镇。扈异回朝后，向梁末帝说张彦容易对付，只要命刘鄩进兵，立时可把张彦传首示众。梁末帝因此不答应张彦的要求，只虚言安慰一番。使者回来后，张彦大怒，立即撕碎诏书，并对贺德伦说："天子愚昧，听任别人牵着他的鼻子走。我们兵甲虽强，若无外援，难以抵抗，必须投靠晋王。"于是迫令贺德伦写信向晋求援。

晋王李存勖立即率兵进屯永济，张彦挑选了五百银枪效节兵护卫着自己前去拜见，一个个如临大敌。晋王登上驿楼对张彦说："你胁迫主帅，残害百姓，几天之间到我马前喊冤的就有百十人，现在我带兵前来，只为安抚百姓，并不贪图土地。你对我虽然有功，我却不能不杀你以安百姓。"遂把张彦及其同党七人斩首，其他无不两腿发抖，惊恐万状。晋王又把他们召来。安慰说："就惩治他们八人，其余不问。从此以后，你们要尽力为我效劳。"大家

都趴在地上行礼呼万岁。第二天，晋王也不带兵器，身穿便服骑马而行，让张彦手下的这些士兵全副武装跟随在自己身边，表示对他们十分信赖，于是这些士兵转而死心塌地地效忠晋王。一支劲敌，转眼成了灭梁的突击队。

刘鄩听说晋军来了，立即挑选精兵万余人，赶往魏州西面三十五里的魏县。晋王留下李存审屯临清，派史建瑭驻扎到魏县抵抗梁军，然后亲自率亲军到达魏县，与刘鄩隔河对峙。

六月初一（庚寅），贺德伦率部下请晋王入魏州城。进城后，贺德伦呈上节度使大印和旌节，请他兼领天雄军节度使。晋王一再推辞说："因听说贵镇受到汴寇侵逼，我才亲率军队远来相救。您竟把印节给我，实在辜负我的好意。"贺德伦再拜，说："如今敌人大兵压境，城内新遭大乱，人心未安。我的心腹亲兵被张彦杀戮几尽，势单力薄怎能驭众！若一旦有变，岂不有负于您的大恩。"晋王这才接受下来。贺德伦率将吏拜贺后，晋王即承制授他为大同节度使，命他前去上任。于是，晋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天雄这样一个大镇，直接威胁到大梁（即汴州，也称汴京，汴梁）的安全。

当时魏州城中的银枪效节都仍然十分骄横。晋王下令："从今以后，凡胆敢结成朋党、散布流言蜚语及残害平民百姓者，杀无赦！"任命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李存进上任后对于讹言惑众和强取人钱者，一律枭首示众，城内十分安定。

晋占有天雄镇后，又派兵袭占梁之德州、澶州。

刘鄩看到晋兵全在魏州，估计晋阳空虚，想以奇计袭取晋阳，潜师西上。晋军看到刘鄩的军队几天不出，又没有动静，十分奇怪，派骑兵察看，城内没有烟火，只见城头上不时有旗帜往来变换。晋王断定其中必然有诈，派人再去察看，竟然是用柴草扎成的草人拿着旗帜骑着驴在城头上来回走动。经审讯城内老弱之人，才知梁军已走两天了。晋王说："刘鄩长于袭击，短于决战，估计

他们的行程，也不过到了太行山下。”便立即派骑兵追赶。恰值连天阴雨，梁军西上的道路又很险要，路上的淤泥深达一尺有余，士兵们只好抓着藤葛前进，走得很慢，不少人生了病，死掉十分之二三。晋将李嗣恩倍道兼行先入晋阳，城中知道梁军来袭，赶快准备迎敌，刘鄩到达乐平，粮草将尽，听说晋阳有备，后有追兵，大家都很恐慌，军队眼看要溃散。刘鄩劝告大家说：“现在我们离家千里，深入敌境，前后都是敌人，加上山高谷深，如同坠入井中，散伙后你们又能逃到哪儿去！只有拼死战斗才有活路，若万一战死在这里，也对得起皇上与父母了。”将士们都哭了，没有人再想逃走。晋将周德威听说刘鄩西上，从幽州率骑兵千人救晋阳，到土门（即井陉口）时，刘鄩已整顿好军队下了太行山，从邢州陈宋口渡漳水向东，屯兵于宗城。刘鄩这次偷袭没有成功，损失却不小，战马死掉近一半。

此时晋军缺粮，刘鄩知道临清有存粮，想占据临清来断绝晋军粮道。宗城离临清仅有几十里，周德威听说后，率兵急追，两天后赶到南宫，离临清也仅有几十里。周德威派骑兵捉住几十个放哨的梁兵，砍断手腕后把他们放走，让他们报告刘鄩晋军已占临清。第二天早晨，周德威冲过刘鄩军营进入临清。刘鄩只好转进贝州。不久，晋王率军屯于博州，刘鄩屯堂邑，两军相距四十里。周德威攻打梁营，没有攻下。第二天，刘鄩移营向西，准备逼近魏州，驻扎到莘县，晋军随后跟来。刘鄩遂于莘县挖壕防守，并从莘县筑甬道通到黄河岸边，以保证粮饷运输畅通无阻。晋王在莘县西边三十里安营，与梁军烟火相望。晋军多次到梁营下挑战，刘鄩始终不出战。晋军便攻断梁军甬道，并用一千多把战斧砍斫营寨，逃出来的梁兵都被晋军俘获。

梁末帝下诏责备刘鄩，说他迁延不战，师老无功。刘鄩上奏：“我曾想以奇兵袭取晋阳，回来后攻占镇、定二州，再用十天半月时间肃清河朔之敌，无奈连天大雨，粮食缺乏，士兵疲病，只得

退回；后来又想占据临清断其粮道，也未成功。目前退保莘县，目的是休整军队以待进取。我看晋军人数很多，熟谙骑射，实为劲敌，不可轻视。若有隙可乘我怎敢偷安养寇！”梁末帝又问刘鄩胜敌之法，刘鄩说：“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愿皇上给每位将士十斛粮食，就可以破贼了。”对于刘鄩的持久战术，梁末帝十分恼怒，派中使前去督战。

刘鄩招集诸将问道：“皇上深居宫中，只与几个少年新贵商量国事，他要我们出战。而现在敌人还很强大。出战肯定不利，怎么办呢？”诸将都说：“不管胜负都应当决一死战，拖下去又有什么用！”刘鄩不再说话，闷闷不乐地散会。事后对亲信说：“主暗臣谀，将骄卒惰，战局可想而知。”

过了几天，刘鄩率万余人偷袭镇州、定州兵的军营，镇、定兵大恐。不料晋将李存审率二千骑兵冲杀过来。李建及又以银枪兵千人助战，刘鄩大败逃回。晋军一直追到梁军营寨下，杀俘一千多人。

梁末帝做均王时，娶河阳节度使张归霸之女为妃，即位后，想立张妃为皇后。张妃以皇上尚未行南郊之礼为由，一再推辞。九月二十四日（壬午），张妃病危，梁末帝册封她为德妃，当晚德妃就病逝了。

梁末帝的弟弟康王朱友敬图谋篡位。十月二十四日（辛亥）夜，德妃将要出葬，朱友敬派遣几名心腹潜伏在寝殿中，准备刺杀末帝，末帝察觉后，赤脚翻墙逃出，召来卫兵在殿中搜查，抓到刺客后亲手把他们杀死。次日，把朱友敬逮捕处死。

从此梁末帝疏忌宗室，着重依靠赵岩及德妃兄弟张汉鼎、张汉杰和从兄弟张汉伦、张汉融，让他们在自己身边担任要职，参预机密，只要出兵就派他们担任监军。赵岩等人仗势弄权、卖官鬻爵、离间旧日将相。敬翔、李振主持政务而无实权，李振常常称病不管朝事，以避让赵、张两家。

梁末帝多次派人催促刘鄩出战，刘鄩一直闭垒不出。贞明二年二月，晋王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营，自己去贝州抚军，声称要回晋阳。刘鄩听说后，便上奏说要袭击魏州。梁末帝答复道："社稷存亡，在此一战，将军多多努力吧！"刘鄩令澶州刺史杨延直率兵万人到魏州会战。延直半夜刚到魏州城南，城内立即挑选五百名壮士偷偷出城来袭，梁军未加防备，很快溃败。第二天天明后，刘鄩从莘县带着所有人马赶到魏州城东，同延直的溃兵会合。此时，晋将李存审已带着莘县西的军队尾随而来。晋将李嗣源又率城内兵出战。晋王也从贝州赶来。刘鄩看到后大惊，就说："晋王未回晋阳！"引兵稍退。晋王在西北李存审在东南布成方阵。刘鄩在两阵之间布成圆阵。经过长时间的厮杀，梁兵大败，刘鄩只带几十名骑兵突围逃走。梁步兵七万逃到黄河边上，不是被杀死，就是淹死河中，所剩无几。刘鄩收集散兵从黎阳渡河，退保滑州。

匡国节度使王檀见晋军主力尽在前线，秘密地向梁末帝建议调发关西兵偷袭晋阳。梁末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调动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共三万人出阴地关，突袭晋阳，昼夜急攻。城中没有防备，征发诸司工匠及市民登城防守，有好几次晋阳城眼看就要陷落。负责留守的晋监军张承业大为恐慌。曾跟随晋王李克用多年的代北故将安金全此时正退休在家，前去拜见张承业，说："晋阳城是我国的根本之地。若一旦丢失，大事去矣。我虽老了，又有病，却不能不忧家忧国。请给我一些兵甲。我替您破敌。"张承业便给了他一些兵甲。安金全率领自己的子弟及退休将领的子弟们共几百人于夜间出了北门，到羊马城袭击梁军，梁军大惊，赶忙后退。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听说梁兵正在围攻晋阳，立即派牙将石君立带五百名骑兵来救。石君立朝发上党，夕至晋阳，一天之间疾驰五百余里。梁兵扼守汾河桥，被石君立击溃。石君立赶到城下即大喊："李嗣昭将军率大军来到了。"遂入城。夜里，石君立与安金全等人分别率军从各个城门出击，梁兵死伤十分之二三。

第二天早晨，王檀便率军大掠而归。晋王为人骄傲自大，因为此战不是他出的主意，故安金全等人都没有得到奖赏。

梁末帝听说刘鄩战败的消息，又得知王檀偷袭晋阳劳而无功，悲叹道："我大事已去矣。"

不久，晋接连攻占梁卫州、洺州、磁州之地，八月，又攻占相、邢二州，九月，再取沧州、贝州。于是黄河以北尽归于晋，只有黎阳一地，因靠近黄河加上刘鄩坚守，还在梁控制之下。

贞明三年十一月，黄河结冰。晋王说："用兵多年，苦于黄河难渡，不能南下。今黄河结冰，天助我也。"立即前往魏州。十二月二十三日（戊辰），晋王率步兵、骑兵踩冰渡过黄河，攻打杨刘城(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北古黄河南岸)。梁有精兵三千人戍守杨刘，沿着黄河几十里都是梁兵树立的栅栏，晋王率兵猛攻，栅栏皆毁。晋兵攻打杨刘城，用步兵砍断鹿角，填平护城河，四面围攻。晋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杨刘陷落。梁末帝此时正在洛阳，闻知杨刘失守，十分惊慌，赶忙罢郊祀之礼，回到大梁。

贞明四年正月，梁末帝回到大梁，晋兵在郓州、濮州一带掳掠后撤兵。

不久，梁将谢彦章率兵数万人反攻，企图夺回杨刘。晋王闻讯，从魏州赶到黄河边上，谢彦章害怕晋军的骑兵冲击，乃决开黄河，使几里之内一片汪洋，晋兵难以靠近。

六月，晋王到杨刘慰劳军队，亲自坐小船测量黄河水的深度，发现其深度仅可没枪，晋王对诸将说："梁军不想打仗，只是想利用黄河水来阻挡我们，时间一久，我们就会精疲力尽。应当趁早涉水去攻打他们。"晋王遂率亲军先涉，诸军随后跟来，人人披甲横枪，结阵而进，恰好这天水位下降，深才及膝，梁将谢彦章率军在岸边迎击，晋兵难以上岸，渐渐后退，梁军追赶，到了中流，晋军突然大喊着回过头来，与梁军展开激战。彦章支撑不住，回头上岸。晋军跟上来搏杀，梁兵大败，死伤不可胜数。这天，梁

军沿河四寨都被晋军攻克。

晋王准备大举攻梁，令周德威率幽州兵三万，李存审率沧景兵一万，李嗣源率邢洺兵一万一起伐梁。王处直派人率易定兵一万赶来参战。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等都派兵助战。八月，各路大军在魏州与河东、魏博之兵会师。晋王举行大规模检阅，声势十分浩大。随后，晋军到达杨刘，攻略郓州、濮州。随后，沿着黄河而上，驻扎在麻家渡。梁将贺瑰、谢彦章率兵驻扎在濮州北面的行台村，相持不战。

晋王喜欢率轻装骑兵到敌营前挑战，常常遇险。一天早晨，晋王又要出营，都营使李存审拉马泣谏："大王应当为天下考虑而自重。冲锋陷阵是将士们的事，我们这样的人干就行了。大王不必代劳。"晋王揽辔而归。过了几天，他趁李存审不在，打马急出，回头对左右的人说："这老头就会妨碍别人出去游戏。"晋王率几百名骑兵直奔梁营前。谢彦章在堤下埋伏了五千精兵，当晋王带着十几个骑兵过堤的时候，伏兵齐出，把晋王包围了好几十重。晋王在重围之中奋力冲杀，后面的晋兵又在外攻打，才得以突围。正好李存审来救，梁兵乃退，晋王这才认为李存审的话是对的。

晋王想直趋大梁，可梁军堵住去路，一直闭垒不战，就这样过了一百多天。十二月初一（庚子），晋王率军逼近梁营，在离行台村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

梁将贺瑰善于指挥步兵，谢彦章善于统率骑兵，可贺瑰忌贤妒能，因谢彦章与自己齐名而暗恨之。一天，贺瑰与谢彦章在野外练兵，贺瑰指着一处高地说："在这里可以立栅。"晋兵来到后，恰好就在那块高地上立栅，贺瑰便怀疑谢彦章与晋兵通谋。贺瑰多次想出战，对谢彦章说："皇上把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了我们二人，社稷存亡，全在我们身上。现在强敌就在门口，怎能不出战。"谢彦章说："强寇压境，速战只对他们有利。我们只要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之地，他们就不敢深入。若轻易出战，万一失利，大事去

矣。"贺瑰暗向梁末帝进谗，然后与部下曹州刺史朱珪密谋，借犒劳将士之机，设下伏兵，杀谢彦章及其部将孟审澄、侯温裕。孟、侯二人，也都是骑将中的佼佼者。随后，贺瑰便向梁末帝上奏，诬蔑称谢彦章等人谋反，梁末帝不辨真假，下诏奖励朱珪，提升他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

晋王听说谢彦章被杀，十分高兴，说："敌人将帅自相残杀，离灭亡没有几天了，贺瑰残暴，失去军心，我若率兵直捣其国都，他们怎能再按兵不动。若他们出战，我们肯定会打胜的。"遂決定率一万骑兵直捣大梁。周德威说："梁人虽杀上将，可军队并未受到损害。急于求成，未必是好事。"晋王不听，下令军中老弱全部回魏州，然后毁营而进，号称十万大军，直指大梁。

贺瑰听说晋军已经西上，也弃营随后追来。晋王征发了魏博镇的三万平民随军，专门负责修建营栅，不论到了哪里、大家一停，营栅随即建好。不久，晋军到达濮州胡柳陂（在今山东鄄城西南)。第二天早晨，侦察兵来报，说梁军从后面跟上来了，周德威说："敌人匆匆赶来，还没安营，我们营栅坚固，防守起来绰绰有余，既然深入敌境，就应当慎重行事，不可大意，这里离大梁很近，梁兵都挂念自己的家，看到我们攻打到这里，肯定很愤怒，要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若不用计策，难以取胜。大王当按兵不战，我率骑兵进行骚扰，使他们无法休息。若等到傍晚他们的营房还不能建好。饭也做不成，肯定十分疲惫，届时我们用全力猛攻，可一举歼灭他们。"晋王不听，说："以前在黄河边上，我们直恨见不到贼兵，现在贼兵来了，还要等什么呢？您一向勇猛善战，今天怎么这么胆小了？"回头对李存审说："命令辎重先走，我为你殿后，破贼后再走。"随即率亲军出击。周德威无奈，只得率幽州兵跟上，对儿子说："这一仗，我们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贺瑰带着梁兵布成阵势赶来，横亘几十里。晋王见状带银枪都冲进敌阵，来回拼杀，就这样往返十几里。梁将王彦章的骑兵

支持不住，首先败走，往西逃奔濮阳。不料，晋军辎重正在阵西，士兵们看见梁兵冲来，以为要进攻自己，立时惊溃，逃向幽州兵的阵地。幽州兵被乱军一冲，也乱成一团，自相践踏，周德威控制不住局势，与儿子一起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与辎重一块转移，也被梁兵杀死。

晋兵乱时，梁军趁机围攻，其势甚盛。晋王登上一座高丘收集散兵，到中午，才重新振作起来。胡柳陂内有一座土山，被贺瑰带梁兵占领。晋王对将士们说："今天夺得此山就胜，我与你们一块去夺。"然后率骑兵先登，李从珂与银枪大将李建及率步兵随后跟来。梁兵纷纷下山，晋军遂把土山夺到手。

到了傍晚，贺瑰在山的西边列阵，晋兵看到后都有点害怕，诸将以为各路大军没有全部来到，不如收兵回营，明早再战，大将阎宝说："王彦章的骑兵已经逃向濮阳，山下都是梁的步兵，天色晚了都想回去，我们若居高临下发起攻击，一定可以打败他们。现在大王率大军深入敌境，偏师又出战失利，若再退兵，必被敌人所乘。其它各路军队还未来到，若听说我军再次失利，将会不战自溃。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把握有利形势，形势一旦有利，就不要再犹豫。大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能取胜，即使收集余众北归，河朔之地也不是您的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敌人没有营垒，天晚了一定想回去，只要用精锐骑兵骚扰他们，使他们吃不上晚饭，等他们一退，再派兵追杀，肯定能打败他们。我们如果收兵回营，他们回去后休整一下再来，胜负就难说了。"李建及穿着铠甲拿着长矛而来，说："贼大将已逃，而大王的骑兵一无所失，以我们的精锐骑兵攻敌疲乏之众，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大王只管在山上观战，我替大王破贼。"晋王愕然，说："若不是你们劝告，我几乎要误事。"李嗣昭、李建及遂率骑兵大喊着冲向梁军，诸军随后跟进，梁兵大败，阵亡近三万人。晋军也损失了三分之二，可谓两败俱伤。其后几年，晋军不敢冒险深入梁境，双方只在黄河

岸边进行小规模的争夺战。

蜀、吴二国与李存勖联络劝他称帝，诸将及藩镇也劝进不已。梁末帝龙德三年（923年）二月，晋王李存勖设置百官。四月，遂即皇帝位于魏州，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即是历史上习称的唐庄宗。唐庄宗下令大赦，改元，以天佑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又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于太原府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此时后唐共拥有十三节度，五十州。

后唐建国后，对于能否灭梁，庄宗君臣并无把握。正在此时，梁郓州守将卢顺密前来投降，密报郓州守兵不满千人，可用偷袭之法攻取。唐庄宗大喜，立即派李嗣源率精兵五千前往郓州。唐军到达杨刘时，天色已晚，又下着雨，路上一片漆黑，将士们都不愿再走。高行周说："这是天赐良机，敌人肯定没有防备。"唐军连夜渡过黄河到达郓州城下。郓州人一点没有觉察。李从珂首先爬上城墙，杀守卒，打开城门接进城外的唐军，然后进攻牙城。城中一片慌乱。第二天早晨，李嗣源的军队全部入城，攻克牙城，守将刘遂严，燕颙逃奔大梁。李嗣源慰谕城内官民、严禁部下杀掠，又逮捕知州事节度副使崔筜、判官赵凤送往兴唐府，唐庄宗大喜，说："嗣源真是奇才！"即任命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

郓州失守，直接威胁大梁的安危。梁末帝斩刘遂严、燕颙于市，罢免天平节度使戴思远的职务，又派使者责备段凝、王彦章等人，催促他们赶快进战。敬翔知道梁已经很危险，死谏王彦章为大将。梁末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仍以段凝为副使。

唐庄宗听说后，亲自率领亲军屯驻澶州，命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胜（今河南濮阳），告诫他说："王铁枪（王彦章平时打仗，常用两杆铁枪，一杆放在马鞍上，一杆拿在手中，运转如飞，所向无敌。传说每杆枪都有一百斤重，人称"王铁枪"）勇猛善战，乘愤激之气，肯定要来拼杀，你要小心防守。"

梁末帝召问王彦章破敌的时间，王彦章回答说："三天。"左右皆失笑。从大梁出师抗击唐军，三天尚难以到达黄河前线。故大家认为他说的是大话，不料，王彦章出大梁后，两天时间即急行军二百一十里，赶到滑州，然后大摆宴席招待将士，暗中却在杨村准备了一些船只。夜里，命令甲士六百人带着巨斧从杨村顺流而下，直趋德胜。宴席未散，王彦章假装出去上厕所，率精兵数千人沿着黄河南岸赶往德胜，当时正下着小雨，朱守殷不加防备。船上的梁兵烧断河上的锁链，用巨斧猛砍浮桥，岸上王彦章则趁机攻打德胜南城。浮桥砍断后，南城即被梁军攻破，斩首数千级，此时距王彦章受命正好三天。朱守殷用小船载甲士渡河援救，已经来不及了。王彦章乘胜进攻潘张、麻家口、景店各寨，都一举拔之，梁军声势大振。

随后，王彦章、段凝来到杨刘城下，以十万大军猛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止。梁军又把巨型战舰九艘连在一起，横放在黄河渡口处，以阻拦唐援兵。

守将李周派人来澶州向唐庄宗告急，请求庄宗日行百里前往援救。唐庄宗率兵去救。说："李周在城内，我很放心！"每天只走六十里，边行军边打猎。几天后，唐庄宗来到杨刘。见梁军深沟高垒，防守严密，知形势严重，忙向郭崇韬问计。郭崇韬说："王彦章认为只要据守津要，即可坐取郓州，若我军不南下，郓州确实难保。我请求在博州东岸筑城保卫渡口的安全，还可以接应郓州，分敌兵势，只是担心王彦章知道后前来攻打。以至城筑不起来。望陛下招募敢死之士，令他们每天都去梁营前挑战，若王彦章十天不东下，城就修成了。"此时李嗣源守卫郓州，与黄河北部唐军的消息断绝，人心渐散，朝不保夕。恰好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秘密地向李嗣源请降，送来蜡书。康延孝本是太原胡人，曾为晋军士兵，因犯罪，逃奔梁军，现在段凝麾下，李嗣源派押牙范延光把康延孝的蜡书送给唐庄宗，并向庄宗建议："杨刘城防守

严密，梁军肯定攻不下来，请在马家口筑城以打通郓州之路。”唐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派郭崇韬率兵一万人连夜出发，加倍赶路，直趋博州，从马家口渡过黄河后即在岸边筑城，昼夜不止。唐庄宗为牵制梁兵，在杨刘与王彦章昼夜苦战，郭崇韬在马家口筑城六天，王彦章才知道，立即率兵数万人赶到那里，猛攻新城，又把十几艘巨型战舰连结起来，放在黄河中流来阻拦唐援兵。此时筑城的夹板刚刚拆下，城墙还很低矮，沙土土质又差，没有守城器械，但郭崇韬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奋勇抵抗，同时派使者向唐庄宗告急。唐庄宗从杨刘率大军来救，在新城西岸列阵。城中唐兵看到后，勇气大增，大声喝叱梁军。梁兵慌忙砍断索链，把河中的战舰收拢回来。唐庄宗正要率军渡河，王彦章解围，退保邹家口，郓州这才与唐庄宗联系上。

不久，唐庄宗率兵沿黄河南下，王彦章放弃邹家口，再回到杨刘。既而解除对杨刘的包围，退保杨村，唐兵在后面追赶，屯驻德胜。自王彦章出师以来，前后攻打各城，梁军被杀死、淹死，中暑而死者近一万人，丢弃的粮草、兵甲、锅幕不可胜数。但唐军损失也很大，杨刘城解围时，城内已断粮三天了。

王彦章一向痛恨赵、张等人专权乱政，担任招讨使后对亲近的人说：“等我成功回京，一定尽杀奸臣以谢天下！”赵岩、张汉杰听说后，暗中商量说：“我们宁愿死在沙陀人手中，也不能被王彦章杀死。”遂一起设法倾轧王彦章。段凝一向嫉妒王彦章的才能，讨好并依附赵、张等人，在军中动辄与王彦章作对，王彦章有什么计划，段凝必定多方阻挠，惟恐他立功，又暗中察控王彦章的过失报告梁末帝，每当前线传来捷报，赵、张都把功劳归于段凝。王彦章在这种形势下，到底难以成功。及梁军退保杨村，梁末帝听信了谗言，又担心王彦章一旦成功难以控制，便把王彦章调回大梁，然后派他率兵会同董璋攻打泽州（今山西晋城）。

这年八月，梁末帝下令在滑州决开黄河大堤，水淹曹（今山

东曹县)、濮、郓等州以阻挡唐兵。

段凝用大量财物向赵、张等人行贿，以求担任招讨使。梁末帝听信赵、张之言，不顾老臣敬翔、李振的坚决反对，竟让段凝替代王彦章担任北面招讨使。于是宿将们人人愤怒，士兵也不服。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奭对梁末帝说："我作为副元帅，虽然年纪大了，还足以为陛下保卫北方边境。段凝是个晚辈，功名不足以服人，大家听说他任招讨使，都议论纷纷，恐怕对国家不利。"敬翔说："将帅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现在国势已危险到这个地步，陛下还能再不留意吗?"梁末帝不听。

段凝率着五万大军驻扎在王村，然后从高陵津渡过黄河，在澶州诸县抢掠一番后，到达顿丘。

梁末帝又命王彦章率保銮骑士及其他军队共一万人屯驻在兖州、郓州一带，想法夺回郓州，并派张汉杰监军。

唐庄宗闻讯，从兴唐府率兵进驻朝城。几天后，梁将康延孝率领百十个骑兵前来投降。唐庄宗解下自己的锦袍玉带赐给康延孝，任命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庄宗把身边的人打发开，向康延孝询问梁朝的情况，延孝回答说："梁朝地面不是不大，兵也不少，可看他们的现状，肯定要败亡，为什么呢？梁帝本已懦弱无能，可赵、张等人又专权，他们内结宫廷，外纳贿赂，官职大小只是依行贿多少来决定，根本不管一个人的才能、德行或功劳。段凝无勇无谋，一旦位居王彦章、雷彦威之上，专以克扣将士为能事，以便向权贵行贿。梁帝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常派近臣随军监视，将帅的行动计划动辄受监军的左右。最近我听说梁朝要分几路来攻，令董璋率陕虢、泽潞之兵从石会关攻太原，雷彦威率汝、洛之兵从相卫、邢洛攻镇定，王彦章、张汉杰率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率主力军抵挡陛下，准备于十月份大举出兵，我私下认为梁兵集则不少，分散则不多，望陛下养精蓄锐等待他们分兵作战，然后率精锐骑兵五千从郓州直抵大

梁，活捉伪皇帝，不出一个月，天下可定。”唐庄宗十分高兴。

不久，段凝攻至临河县南、澶州之西，相州之南每天都有梁军来袭扰，自从德胜失利以来，唐军丧失粮草几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横征暴敛以供军需，以至唐境内百姓大量逃亡，租税更少，仓库中的粮食不够支撑半年。军事形势也不能乐观：泽潞尚未攻下；卢文进、王郁勾引契丹多次攻到瀛州、涿州之南，并传闻待冬天草枯冰合之际大举入侵；又据康延孝说梁军也要分几路大举反攻。唐庄宗面对这种局势，十分忧虑，便招集诸将商议，宣徽使李绍宏等人认为，郓州城门之外，都是敌境，孤远难守，有了还不如没有，请求用郓州换取梁占领下的卫州与黎阳，与梁朝讲和，双方以黄河为界，然后给军民一个休息的机会，待财力有了富余，再图进取，唐庄宗不悦，说：“如果这样办，我死无葬身之地了。”乃罢会，独召郭崇韬商议。郭崇韬说：“陛下不梳洗，不解甲，一心征战，已经十五年多了，目的全在于雪家国之仇，现在陛下已正尊号，河北人民每天都盼望过上太平生活，刚夺得郓州尺寸之地，却不能守住它，怎能占有中原呢！若放弃郓州，就怕将士一旦解体，届时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谁替陛下防守！我曾向康延孝详细询问了河南的情况。把敌我双方的形势反复地进行了对比，日夜思索，认为事情的成败就要在今年判定。梁已把精兵全部交给段凝，占据了我南部边境，又决开黄河阻挡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军便不可渡过。依仗这些，梁内地便不加防范。他们派王彦章逼近郓州，其用意也在于希望有人能在城内响应从而夺取郓州。段凝本不是将才，不能当机立断，没有什么可怕的，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大梁无兵，陛下若留下一部分兵力守魏州，坚守住杨刘，然后带着精兵与郓州之兵合在一起，长驱入汴，他们城中空虚，必定望风而逃。若伪主投降或被杀，梁将都得投降。否则，今年秋天收成不好，军粮将尽。陛下不下决心，大功怎能告成！俗话说‘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应运而兴，必有天命，就在于陛下

下决心了。”唐庄宗说：“这正合我意。大丈夫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的决心定了。”司天官上奏：“今年天道不利于深入敌境，肯定不成功。”庄宗不听。

王彦章率兵渡过汶水，将要攻打郓州，李嗣源派李从珂率骑兵迎战，击败梁军前锋，俘获三百人，斩首二百级，王彦章退保中都（今山东汶上县）。捷报传到朝城，唐庄宗大喜，对郭崇韬说：“郓州捷报，足壮我气。”然后命将士一律把家属送归兴唐府。

十月初一（辛未），唐庄宗命魏国夫人刘氏、皇子李继岌回兴唐，同他们诀别说：“事之成败，在此一战，如果我战败，你们就把全家招集到魏宫自焚。”

十月初二（壬申），唐庄宗率大军从杨刘渡过黄河。初三，到达郓州，唐军连夜前进，以李嗣源为前锋，半夜时渡过汶水。次日早晨，与梁兵遭遇，唐军一战即胜，一直追赶到中都并包围了该城，城内没有守备，不一会儿，梁兵就从城内突围逃走。唐兵追击，再败梁军，王彦章带着几十个骑兵逃跑，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在后面追赶，听出了王彦章的声音，说：“前面的就是王铁枪。”立即拔矛刺去。王彦章受重伤，马倒，遂被擒。唐军又活捉都监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裨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多人，斩首数千级。

王彦章曾对人说：“李亚子乃斗鸡小儿，何足畏！”至此，唐庄宗便问王彦章：“你常说我是小儿，今天服不服？”又问：“你是一员名将，善于带兵，为什么不守兖州？中都没有高墙，怎么防守？”王彦章回答：“天命已去，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庄宗很看重王彦章的才能，想让他为自己效劳，便给他药品治伤，多次派人劝他投降。王彦章说：“我本是一个普通百姓，蒙梁帝恩德，位至上将，与唐帝交战十五年，今兵败力竭，死是应当的，即使唐帝可怜我而让我活下去，我又怎么有脸再见天下之人呢！岂能朝为梁将，暮为唐臣！投降不是我能干的事。”唐庄宗又派李嗣源去劝

说，王彦章躺在床上，也不起来，对李嗣源说："你不就是那个邈佶烈吗？"王彦章一向看不起李嗣源故直呼其小名。

诸将向唐庄宗庆贺，庄宗举酒给李嗣源，说："今日之功，全靠您和郭崇韬。如果当时听了李绍宏的话，大事就完了。"

唐庄宗又对诸将说："我们从前担心的只有王彦章，现在他已被活捉，这是天意灭梁。段凝还在黄河边上，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诸将都认为："虽然我们听说大梁没有防备。但不知真假，现在东方诸镇兵都在段凝麾下，所剩的只是一座座空城。若以陛下天威临之，无不投降。不如广占土地，然后待机灭梁，可保万无一失。"康延孝力主直取大梁。李嗣源说："兵贵神速。今王彦章被捉，段凝肯定还不知道，即使有人去报告，他要证实一下还要三天，假如他知道了我们的意图，立即发来救兵，走直路则被决开的黄河水拦住，必须从白马津南渡，可数万大军，船只一时难以解决。这里距大梁很近，又没有山险，大军组成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两夜就到。恐怕段凝尚未离开河岸，朱友贞已被我们活捉了。延孝建议，请陛下率大军慢慢走，我愿带一千骑兵作为前锋。"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一下，诸军都踊跃愿行。

这天晚上，李嗣源率前军加倍赶路，直趋大梁。十月初五（乙亥），唐庄宗从中都出发，令人抬着王彦章跟在后边。唐庄宗派中使问王彦章："我这次能成功吗？"回答道："段凝有精兵六万，虽主将无能，但将士们也未必倒戈，恐难以成功。"庄宗知道王彦章到底也不会为自己出力，就把他杀了。

初七（丁丑），唐军到曹州，梁守将投降。

王彦章的败卒有逃到大梁的，向梁末帝报告："王彦章兵败被俘，唐军将要来到。"梁末帝聚族而哭："天命完了。"召来群臣问计，无人回答。梁末帝只得对敬翔说："朕平时不听您的话，以至于此。现在形势危急，您不要怨恨我。该怎么办呢？"敬翔哭着说："我受先帝厚恩，已经快三十年了，名义上是宰相，其实是朱氏老

奴，侍奉陛下如同侍奉郎君（门生故吏下至僮仆，呼上人之子皆为郎君）一样，我前后劝谏，无不尽忠。陛下要任用段凝时，我反复说不行，可小人狼狈为奸，才有今日。现在唐兵将到，段凝的大军又被黄河水阻住，难以来救。我想请陛下出外避敌，陛下必不听从；若请陛下出奇兵迎击，陛下又拿不定主意。即使张良、陈平再生，谁又能为陛下想出什么好办法呢！我希望陛下先让我死，不忍心看着宗庙毁灭。”君臣二人相对痛哭。

梁末帝派张汉伦飞马出城去追回段凝的军队。张汉伦到滑州时，掉下马来，脚被摔伤，后又被黄河水拦住，不能前进。

此时大梁城中尚有控鹤军数千人，朱珪请求率兵迎战，梁末帝不答应，命开封尹王瓒驱赶市民登城防守。

梁末帝登上建国楼，挑选了一些亲信，厚加赏赐，然后让他们穿上普通百姓的衣服，带上蜡诏，去催促段凝赶快回师。可这些人刚辞别末帝，就先后逃走，有人请求梁末帝逃往洛阳收集诸军抵抗，那样的话，唐军即使攻陷大梁，其势也难以久留；也有人请梁末帝投奔段凝。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说：“段凝本来不是将才，靠她妹妹当上大官，在此危难之际，要想让他临机制胜，转败为功是不可能的。再说段凝听说王彦章失败，早已吓破了胆，怎能保证他为陛下尽节呢？”赵岩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下此楼，能保证谁的心不变！”梁末帝只好作罢。梁末帝又召来宰相商量，郑珏要求带着传国宝去唐军那里诈降以救国难，梁末帝说：“我当然不敢再爱此宝，但按照您的办法，事情就可以了结吗？”郑珏俯首良久，才说：“恐怕不能了结。”两边的人都缩头而笑。梁末帝日夜哭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把传国宝放在了卧室内，却突然不见了。其实早已被身边的人偷走去迎接唐军了。

十月初八（戊寅），有人报告说唐军已过曹州，路上但见尘土蔽天，赵岩对随从们说：“我对温韬不错，他肯定不会出卖我。”遂逃奔许州。

梁末帝对皇甫麟说："李氏与我家为世仇，决不可向他投降，不能等他来杀，我又不能自杀，您把我的头砍下来吧。"皇甫麟哭道："我为陛下抗击唐军而死则可，却不敢奉此诏。"梁末帝说："您想出卖我吗？"皇甫麟想自杀，梁末帝赶忙抱住他说："与您一块死。"皇甫麟遂杀死梁末帝，然后自杀。梁末帝为人温和，生活俭朴，没有荒淫的过失，但他宠信赵、张等人，使他们得以专权横行；又疏远敬翔、李振等老臣，不用其言，终至灭亡。

次日早晨，李嗣源率军来到大梁城下，攻打封丘门，王瓒开门投降。李嗣源入城，抚慰城内军民。当天，唐庄宗从梁门入城，梁朝文武百官到马前迎接，拜伏请罪。庄宗慰问一番，令各复其位，李嗣源前来迎接并向庄宗庆贺，庄宗不胜欢喜，一边用手拉着李嗣源的衣服，一边用头碰他，说："我拥有天下，是你们父子的功劳，我要与你共分天下。"唐庄宗命寻找梁末帝，不一会儿，有人献上梁末帝的头来。

李振对敬翔说："有诏书赦免我们，一块儿去朝见新君吧？"敬翔说："我二人为梁宰相，君昏不能谏，国亡不能救，新君若问，该怎么回答！"次日天未亮，有人报告敬翔："崇政使李太保已经入朝了。"敬翔叹道："李振枉为大丈夫！朱氏与新君世为仇敌，今国亡君死，纵使新君不杀，又有何面目再入建国门呢！"遂上吊自杀。

赵岩到许州，温韬把他迎进府中，斩首献给唐庄宗，赵岩带去的大批财宝都被温韬据为己有。

段凝闻知大梁失守，立即率大军降唐，为向新主子邀功，又主动上奏要求严惩赵、张等人。唐庄宗立即下诏，把敬翔、李振、赵岩、张汉伦、张汉杰、朱珪等人一律灭族。赵、张等人专权乱国，落了一个可耻的下场，而李振苟且偷生，毫无气节，也难免一死，只是便宜了段凝、温韬等人。庄宗又下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毁其宗庙神主。

不久，唐庄宗派使者宣谕诸道，梁朝任命的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人贡，唐以新官命之，梁朝彻底灭亡。

十二月，唐庄宗迁都洛阳。

自开平元年（907年）四月梁朝建立至龙德三年（923年）十月后唐灭梁，梁朝共历二帝，十六年。

（侯仰军）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269—272。

《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旧五代史》：《梁书·末帝本纪》、《唐书·庄宗本纪》

庄宗灭蜀

梁开平元年（907年）九月，西川节度使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王建即位后，劝课农桑，减轻赋税，优待文士，统治比较清明，境内人民得以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大蜀在对外战争中，由于措施得当，加上其有利的地理形势，往往得胜。特别是在岐蜀战争中，蜀屡破岐军，占领大片土地，还曾一度包围凤翔，迫使岐王李茂贞遣使求和。贞明四年（918年）六月，王建死，太子王衍即皇帝位，是为蜀后主。后主昏庸，奢纵无度，不亲政事，又专门信任小人，故蜀政事紊乱，国势渐衰。

蜀后主常列锦步障，与近臣击毬于其中，即使远游外人也不知道。又在山上广建宫殿，遍布缯绣，名为缯山，有时缯被风雨弄坏，便用新缯代之。在缯山上玩得痛快时，就十几天不下来。山前开了水渠通向宫中，夜里乘船回宫时令宫女端着一千多支蜡烛站在前面的船上，水面映照得宛如白昼。太后、太妃则各出教令卖刺史、县令、录事参军等官，每有一官缺，很多人争相送礼，谁送的钱多谁当官。小人一旦得志，便胡作非为，无不以苛剥百姓为能事，人民怨声载道。而后主又喜欢游历，沿途州县不得不广为采办，花费大量钱财。他平时在京城内常化装成平民百姓，酒肆、倡家无所不至。百姓何康的女儿将要出嫁，后主听说她长得很美，便强行占为己有，其未婚夫为之痛哭而死。军使王承纲的女儿快要出嫁时，也被后主抢进宫中。王承纲要求把女儿放出，后主大怒，把承纲流放到茂州。承纲的女儿听说父亲被流放，自杀

身亡。蜀后主又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珣为狎客，让他们陪着自己游宴，与宫女们杂坐在一起。他们有时作艳歌互相唱和，有时彼此之间谈笑戏谑，低级下流，无所不有，可后主却很快乐。

当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人专权，任意欺压百官，一意讨好后主以便专权。宰相王锴、庾传素等人明哲保身，不敢制止。潘在迎常劝后主杀进谏的人，说他们诽谤国家。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阁图，并作歌讽劝；贤良方正蒲禹卿对策时语词切中时弊，后主虽没有治罪，可也不听。

一次，蜀后主在宣华苑宴请近臣，酒喝得正高兴，嘉王王宗寿趁机向后主进言说社稷将危，流泪不止，韩昭、潘在迎都说："嘉王有酒后流泪的习惯。"于是大家说笑一阵即罢。

蜀国内政如此，灭亡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梁末帝龙德三年（923年）十月，唐庄宗灭梁。消息传来，蜀后主十分害怕，恰好此时彗星又出现在舆鬼星附近，长达丈余。舆鬼五星，当秦雍之地，于是蜀司天监预言国家有大灾，蜀后主下诏在玉局化设道场，以求免灾。右补阙张云上疏认为："老百姓的怨气上冲于天，所以才出现了彗星，这是亡国的征兆，不是靠祈禳能消除的。"蜀后主大怒，把张云流放到黎州，张云死在赴黎州的路上。

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三月初一（己亥），蜀后主在怡神亭宴请近臣。酒酣，君臣及宫人脱下帽子，大声喧哗，旁若无人，知制诰李龟祯劝谏道："君臣沉湎于此，不忧国政，恐启北敌（指后唐）之野心。"后主不听。

四月，唐庄宗派客省使李严出使蜀国，李严在蜀君臣面前盛赞庄宗的威德，说唐有统一天下之志，还说朱温篡唐，诸侯都不曾发兵勤王。王宗俦认为李严的话污辱了蜀国，请斩李严，蜀后主没有答应，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奏说："晋王有侵略我国之心。

我们应选将练兵，驻军边境，存粮草，造战舰以待之。”蜀后主乃任命宋光葆为梓州观察使，并充任武德节度留后。

五月，蜀后主打发李严回唐。当初，唐庄宗命李严借入蜀之机，用马换取蜀宫中珍玩，可蜀国法令规定禁止锦绮珍宝流入中原，只有那些低劣品才允许输出，称为“入草物”。李严回去后向唐庄宗一汇报，庄宗大怒，说：“王衍难道能免做入草之人吗！”李严便对庄宗说：“王衍愚昧荒纵，不亲政务，疏远元老，亲近小人，其执政大臣王宗弼、宋光嗣等人，只会阿谀逢迎，专权跋扈，又贪得无厌，以至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侈淫佚相尚，就我看来，只要我们大兵压境，蜀国就会土崩瓦解。”庄宗很赞同。

八月，蜀后主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锷为招讨马步使，率二十一军屯详州；又命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屯驻利州，以防备唐军。

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俦看到蜀后主失德，与王宗弼谋划废立之事，王宗弼犹豫不决。不久，王宗俦忧愤而死。宗弼对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人说：“王宗俦曾让我杀你们，现在不用担心了。”宋光嗣等人趴在地上一边哭泣一边拜谢。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听说后，对别人说：“我家难以免祸了。”

蜀后主听从宣徽北院使王承休的建议挑选诸军中的勇健者一万二千人安置在直属自己管辖的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里，兵械及待遇都比其他军队优越，又任命王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裨将安重霸为副使，旧将无不感到愤怒羞耻。安重霸为人狡诈，惯于讨好贿赂王承休，故王承休对他很喜爱。

为进一步了解蜀国的情况，唐庄宗又派使者李彦稠到成都。两个月后，蜀后主派翰林学士欧阳彬至唐通好，两国关系表面上亲热起来。

蜀后主看到两国友好，不再戒备。十一月，撤走戍守威武城

的士兵，召关宏业等二十四军回成都。又罢武定、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不久，再罢天雄军招讨，命王承骞等二十九军还成都。十二月，蜀后主又罢金州驻军，命王承勋等七军还成都。

唐朝僖宗、昭宗之世，宦官势力虽盛，却不曾有建节者，可蜀后主却开此先例，安重霸劝王承休出任秦州节度使，承休便向蜀后主说："秦州多美女，请为陛下选来献上。"后主答应了，遂任命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封鲁国公，以龙武军为承休牙兵。

后主不遵王建遗嘱，又任命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掌握兵权。徐延琼以外戚的身份代替王宗弼居旧将之上，大家都不服气。

同光三年（925 年）六月，唐庄宗即有伐蜀之意，下诏在全国收买战马。九月，乃与宰相商议伐蜀。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即段凝，降唐后赐姓名李绍钦）一向善于讨好宣徽使李绍宏，李绍宏便推荐他率兵伐蜀，说："绍钦有盖世奇才，就连孙武、吴起也不如他，可委以大任。"郭崇韬说："段凝乃亡国之将，奸谄绝伦，不可相信。"大家又推举李嗣源，郭崇韬说："契丹正嚣张，总管不可离开河朔。魏王作为储副，未立大功，请按先例，任命为伐蜀都统，以成就其威名。"庄宗说："我儿年幼，岂能独自前往，还应当找一个人作副都统。"既而又对郭崇韬说："没有人比您更合适的了。"遂以魏王李继岌充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中大事都由郭崇韬负责。又以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曮为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为行营副招讨使，陕州节度使李绍琛为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为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为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为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为西川管内招抚使，率兵六万伐蜀，同时下诏让高季兴率兵夺取夔、忠、万三州作为荆南巡属，都统置中军，以供奉官李从袭担任中军马步都指

挥监押，高品李廷安、吕知柔为魏王府通谒。既而又以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参预都统军机。其中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都是宦官。

郭崇韬为了报答北都留守孟知祥过去曾推荐他的恩情，临出发时对庄宗说："孟知祥忠厚诚实，又有谋略，如果我们夺得西川后派人镇守，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又推荐说邺都副留守张宪谨慎稳重，有见识，可以做宰相。不久，大军西行。

蜀后主毫无察觉，依旧我行我素。安重霸劝王承休请后主东游秦州（治今甘肃秦安）。王承休到任后，即毁掉府署，修建行宫，大兴土木，又强取民间女子，教给她们歌舞，然后画上像送给韩昭，让韩昭上奏；并献上花木图，极力称赞秦州山川风土之美，蜀后主得知后，便决定去秦州游玩。群臣劝谏的很多，一概不听。王宗弼上表劝谏，后主掷其表于地；太后痛哭，吃不下饭，想阻止他东游，仍不听。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表，洋洋洒洒二千字，大体上是说："先帝艰难创业，想传之万世，可陛下从小生长在富贵之中，荒于酒色。秦州羌胡杂居之地，多瘴疠之气，陛下巡游，必定使那里的人民苦于供役，凤翔镇久为仇敌，将趁机寻衅；唐国刚刚通好，恐产生怀疑。先帝从不无故巡游，可陛下却频频外出。昔秦始皇东狩，銮驾未回；隋炀帝南巡，龙舟不返。蜀国强盛，雄视邻邦，边境上无烽火之忧，可境内却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公行。过去李势占据蜀地，后被桓温消灭；蜀汉称帝成都，也不免于投降邓艾，由此看来，山河险固并不足以凭借。"韩昭看到后，对蒲禹卿说："我先把你的表章放好，待皇上回来后，让狱吏字字问你！"王承休的妻子严氏长得很美，蜀后主与她私通过，所以后主才这么急于东行。

十月，排阵斩斫使李绍琛（即康延孝，降唐后赐姓名李绍琛）与李严率精骑三千、步兵一万为前锋伐蜀，招讨判官陈某到达宝鸡即称病请留。翰林学士李愚厉声道："陈判官见利则进，惧

难则止。动摇军心，应斩首示众。”于是军中没有人再敢于观望不前。

蜀后主率兵数万从成都出发东巡，第二天到汉州。此时武兴节度使王承捷报告说唐兵已经西上，后主还认为是群臣合谋阻拦自己，不信，大声说：“我正要显示一下军威。”遂东行。在路上与群臣赋诗为乐，毫不在意。

李绍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挥使唐景思率兵出降，得城中粮二十万斛。李绍琛先把败兵万余人放走，然后日夜兼程指向凤州。与此同时，李严还写信给蜀守将王承捷，劝其归降。

凤翔节度使李继曮倾其镇所有来供应唐军，仍不够，部下既忧虑又恐惧。郭崇韬率兵入散关（即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指着山说：“我们这次入蜀若不能成功，便回不到这里来了，必须决一死战。现在粮草供应将尽，当先攻取凤州，夺取蜀军的粮草。”诸将都说蜀地险固，不可长驱直入，应当按兵不动，寻找机会，郭崇韬询问李愚，李愚说：“蜀人因其主荒淫，吃尽了苦头，没有人尽力。应当乘其人心离散之时长驱直入，使他们闻风丧胆。到那时虽有险阻，又有谁去防守！兵势不可缓。”正在这时，李绍琛派人来告捷。郭崇韬很高兴，对李愚说：“您料敌如此，我还担忧什么呢？”乃加倍赶路前进。第二天，王承捷带着凤、兴、文、扶四州印节迎降，唐军又得兵八千，粮四十万斛，郭崇韬说：“一定可以平蜀了。”即以都统的名义使王承捷为代理武兴节度使。

蜀后主到利州，见到威武城中逃来的败兵才相信唐兵已来。王宗弼、宋光嗣对蜀主说：“东川、山南之地兵力齐备，陛下只要以大军扼守利州，唐兵怎敢孤军深入？”蜀后主听从了他们的建议，遂命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率兵三万迎战。随驾兵从绵汉到深渡，千里不绝，都很怨愤，说：“龙武军粮饷优厚，其它军队怎能御敌？”

李绍琛等过长举，蜀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琏率部下士兵五百人

来投降，并且提出先修好桥梁、栈道等待唐军，于是唐军再不用担心险阻。既而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逃走，唐军遂克兴州。李绍琛率唐军到达兴元三泉，与蜀三招讨相遇，蜀兵大败，唐军斩首五千级，得粮十五万斛，由是军用充足。

蜀后主听说王宗勋等人大败，赶忙从利州兼程西逃，拆断桔柏津上的浮桥，又命中书令、判六军请卫事王宗弼率大军守利州，并下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

李绍琛昼夜兼行前往利州，蜀武德留后宋光葆给郭崇韬写信说："请唐兵不要人境，我将以所辖诸州县归附，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协约，我就背城决战来报效本朝。"郭崇韬回信答应下来，并安慰了他一番。第二天，魏王李继岌到达兴州，宋光葆率梓、绵、剑、龙、普五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率洋、蓬、壁三州，山南节度使王宗威率梁、开、通、渠、麟五州，阶州刺史王承岳率阶州，全部投降。其他城镇也望风归附。

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准备从秦州袭击唐军。安重霸说："出师不利，则大事去矣。蜀中有精兵十万，天下险固，唐兵虽勇，能过剑门关吗？可您受国厚恩，闻难不能不去，愿与您一块儿赶赴成都勤王。"王承休一向信任他，认为说得很对。安重霸又建议向羌人买路，以取道文州、扶州，王承休答应下来。让安重霸率龙武军及所募兵一万二千人随后，出发前，秦州人在城外给王承休饯行。王承休上了路，安重霸却在马前拜见说："国家竭尽全力才夺得秦、陇，我若跟着您回朝，谁来防守！您走吧，我替您防守。"王承休业已上路，无可奈何，只好与招讨副使王宗讷自扶、文南行。两州皆不毛之地，路上又不断有羌人抄掠，王承休率军且战且行。将士们又冷又饿，到达茂州时仅剩下二千人，安重霸遂以秦、陇二州投降唐军。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常想攻取三峡，可慑于蜀峡路招讨使张武的威名，不敢前进，现在即乘唐兵势，让其子行军司马高从诲理

军府之事，自率水军进入三峡攻取施州。张武用铁链封锁了长江航道，高季兴派勇士乘船去砍。恰巧大风吹来，船被铁链挂住，难以进退。蜀兵矢石交下，把战船摧毁，高季兴乘小船逃走。张武继而听说蜀北路已失陷，便以夔、忠、万三州投降魏王。

郭崇韬给王宗弼等写信，向他晓以利害。李绍琛未至利州，王宗弼已经弃城率军西归。王宗勋等三招讨使在白芀追上王宗弼，王宗弼从怀中拿出诏书给他们看，说："宋光嗣令我杀你们。"四个人抱头而哭，然后合谋降唐。

十一月初七（丙申），蜀后主回到成都，文武百官及后宫妃嫔到七里亭迎接。后主把妃嫔们按回鹘的形式组队，然后带她们入宫。第二天，后主在文明殿接见群臣，泪下沾襟。君臣相视良久，竟没有一个人说句解救国难的话。

李绍琛至利州，修好桔柏浮桥。昭武节度使林思谔早已弃城逃奔阆州，此时又遣使请降。魏王李继岌至剑州，蜀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唐。

王宗弼回到成都，登上大玄门，严加戒备。蜀后主及太后亲自去慰劳，王宗弼很傲慢，不再像个臣子。次日，王宗弼把蜀后主及太后，后宫、诸王劫持到西宫，收其玺绶，派亲信在义兴门劫取内库的金钱布帛，全部运回自己家中。其子王承涓带剑入宫，把蜀后主的几个宠姬抢回家里。王宗弼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

李绍琛到达绵州，仓库及民房都被蜀兵烧掉，绵江上的浮桥也被拆毁。绵江水深，没有船只。李绍琛对李严说："我们孤军深入，利于速战。乘蜀人破胆之时，只要有一百个骑兵过鹿头关，他们迎降都来不及，更不用说组织抵抗了。如果等着修好桥梁，一定要呆上好几天，其间倘若有人教王衍坚守鹿头关，挫我锐气，拖延上十多天，胜负就难以预料了。"乃与李严乘马浮水渡江。随从将士渡过去的仅一千人，淹死水中的也有千余人。李绍琛立即进入鹿头关，然后占领汉州（今四川广汉）。三天后，后军才赶到。

王宗弼派使者送金钱、马、牛、酒犒劳唐军，并把蜀后主的书信交给李严，信中说："您来了我就投降。"有人对李严说："您最先提出伐蜀的建议，蜀人对您恨入骨髓，不能去。"李严不听。很高兴地进入成都，抚慰官民，告诉他们唐大军将要来到。蜀君臣及后宫无不大哭。蜀后主带李严去见太后，以母亲妻子相托。王宗弼还在城墙上守备，李严命他把楼橹一律撤掉。

十一月二十日（己酉），魏王李继岌到达绵州。蜀后主命翰林学士李昊起草送给唐庄宗的降表，又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起草送给唐军的投降书，然后派兵部侍郎欧阳彬带着去迎接李继岌和郭崇韬。

王宗弼声称蜀君臣早就想归附，可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迷惑蜀主，遂斩此四人，把头装起来送给魏王。又谴责文思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成都尹韩昭奸佞谄谀，把他在金马坊门外枭首。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团练潘在迎、嘉州刺史顾在珣及贵戚之家都很惶恐，无不尽其家中金帛伎妾来贿赂王宗弼，才得以免死。凡王宗弼不喜欢的人，都被杀死。

李继岌至德阳，王宗弼派人奉上书信，说已把蜀主迁于西宫，安抚城中，专等王师。又派儿子王承班来，把蜀主的后宫美女和珍玩送给李继岌和郭崇韬，请求让自己担任西川节度使。李继岌说："这都是我家的东西，还要献什么！"遂接收下来，而把王承班打发走。

李绍琛在汉州停留八天等待魏王李继岌的到来。二十五日（甲寅），李继岌至汉州，王宗弼赶忙前来迎接拜见。次日，继岌到达成都。李严带着蜀后主及百官、仪卫出降于升迁桥。蜀后主穿着白衣，衔着玉璧，牵着羊，并用草绳缠着脖子，文武百官则穿丧服、赤脚，抬着空棺材，大声哭着听候李继岌处置。李继岌受璧，郭崇韬解绳，并焚烧棺材，然后按唐庄宗的旨意宣布免罪，

蜀君臣朝着东北方向拜谢。唐军进入成都时，郭崇韬命将士们不得抢掠，故市井不惊。唐军从出师至克蜀，共用七十天，得到十个节度，六十四个州，二百四十九个县，三万士兵，兵甲、钱粮、金银、缯锦等数以千万计。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听到蜀国灭亡的消息时正在吃饭，匕箸为之落地，说："这是我的过错，我不该劝唐帝伐蜀。"谋士梁震说："不必担忧，唐主得蜀后更骄，离灭亡也没几天了，怎能知道这不是我们的福份呢。"

楚王马殷听到蜀国灭亡的消息也很恐惧，赶忙上表声称："我已在衡山脚下准备了一块菟裘之地养老，愿意献上印绶以尽天年。"唐庄宗下诏抚慰。

十二月十四日（癸酉），王承休、王宗汭到达成都，魏王李继岌责问道："居大镇，拥强兵，为什么不抵抗？"回答说："害怕大王神武之气。"那为什么不投降？""王师未入境。""一起入羌者几人？""一万二千人。""现在回来的有多少？""二千人。""那你们要抵偿那一万人的命了。"遂下令把王承休，王宗汭及其子斩首。

闰十二月，唐庄宗下诏，凡前蜀所任命的官员，四品以上的降级使用，五品以下又没有才能的就罢免回乡；先投降和有功的官员，则委托郭崇韬任用嘉奖。又赐诏给蜀后主王衍，大意是说："一定裂土分封，决不会亏待你。日月星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同光四年正月，魏王李继岌派李继曮、李严护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前往洛阳。二月，王衍到长安，庄宗下诏不让他继续东行。三月，伶人景进等对庄宗说："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还不安宁。王衍族党不少，他们听说皇上东征，有可能发动叛乱，不如杀掉省事。"唐庄宗便派中使向延嗣带敕书前往长安杀王衍，敕书上说："王衍一行，并从杀戮。"已经盖上大印并画押，枢密使张居翰复看时，认为杀降不吉利，便在殿中柱子上擦去"行"字，改为"家"字，于是蜀百官及王衍仆役获免者一千多人。

向延嗣至长安，把王衍一族尽杀于秦川驿。王衍的母亲徐氏在临死前大喊道："我儿以一国迎降，仍不免于灭族。一点信义都不讲，你们还能不遭殃吗？"

蜀后主王衍骄奢淫逸，不学无术，终于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统计自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王建据蜀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王衍亡国，前蜀共存在三十四年。

（侯仰军）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266—卷274
《旧五代史》：《王建传》、《王衍传》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
《通鉴纪事本末》：《庄宗灭蜀》

邺都之变

后唐灭梁，震动远近各国，不少割据势力遣使入贡，表示归附；而中原人民经过长期战乱，也渴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安居乐业。此时，若后唐君臣刷新政治，励精图治，消除割据，恢复统一也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可唐庄宗李存勖志得意满，拒谏饰非，亲近小人，诛杀元勋，终于让天下人民失望了。不久，邺都乱兵振臂一呼，后唐政权立时土崩瓦解，李存勖众叛亲离，遂落了一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伶官弄权，是唐庄宗时的一个弊病。唐庄宗从小擅长音律，喜欢唱曲演戏，对伶人十分宠爱。庄宗有时自己也搽脂抹粉，与伶人一起在院子里演戏，来取悦刘夫人，还给自己起优名叫“李天下”。这些伶人一旦受宠，便随意出入宫庭之中，侮弄群臣。文武百官虽很气愤，却没有人敢吭声，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捞取名利，反而投靠伶人，四方藩镇也争相贿赂伶人。伶人中最会乱政害人者，当推景进。景进喜欢打听民间小事报告庄宗，而庄宗也很想了解外面的事情，就把景进当作耳目。景进每次奏事，庄宗总把身边的人支开，景进乃得以诬陷别人，干预政事，连将相大臣都害怕他。梁亡国之将段凝无才无德，可由于他托景进向宫中行贿，竟被任命为泰宁节度使。当然，伶人中也有好的，如敬新磨，便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庄宗曾在中牟打猎，任意践踏百姓庄稼，中牟令实在看不下去，拦马劝谏说：“陛下作为百姓父母，为什么要踏坏他们的庄稼，使他们因饥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

呢?”庄宗大怒，喝斥他走开，并准备杀他。敬新磨赶忙把中牟令追回来，捉到庄宗马前，装模作样地责备他说:“你当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皇上喜欢打猎吗?为什么要纵任百姓耕种，来妨碍皇上呢?你的罪太大了，应当处死!”一席话引得庄宗哈哈大笑，中牟令得免一死。但伶人中像敬新磨这样的又有几个呢?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听说庄宗灭梁，马上前来朝贡。不料唐庄宗身边的伶人、宦官反复向他勒索财物，高季兴很气愤，回去后对部下说:“新朝历经百战方夺得河南，可唐主竟对功臣举手说:‘我于十指上得天下。’如此自夸，其他人都无功了，谁能不离心!又天天迷恋于打猎和女色，怎能长久!我不用担心了。”

同光二年(924年)正月，唐庄宗下令:“宦官不应在外居住，前朝(唐朝)宦官不论现在担任诸道监军还是躲藏在民间，也不论贵贱，一律来朝。”庄宗身边本来已有宦官五百人，至此多达近千人，庄宗都给以优厚的待遇，并作为心腹使用。自从唐昭宗天祐年间以来，内诸司使都用士人，至此复用宦官，宦官又渐渐干预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来朝时，军府之政便由监军处理。监军仗势争权，凌视主帅，搞得藩镇人人愤怒。

二月初一，唐庄宗到南郊祀天，大赦。租庸副使孔谦想多搜刮财物讨好庄宗，凡赦文蠲免者，仍照样征收，从此每有诏令，人们都不相信，老百姓怨声载道。

郭崇韬刚到汴梁、洛阳时，大量接受藩镇赠送的财物。亲信有人提出劝告，他说:“我位兼将相，朝廷给我的俸禄与赏赐上百万，又何必依赖外财。只是考虑到伪梁之时，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都是梁朝旧臣，如果拒绝他们的财物，他们心中能不恐惧吗?我只不过是为了国家而把财物暂时放在自己的家里。”及庄宗到南郊祀天，郭崇韬带头献出劳军钱十万缗。此前，宦官劝庄宗把天下财赋分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作为军政经费;方镇进献者入内府，以便举办宴会、游玩，赏赐左右。外府常常空虚而

内府财物多如山积。等到有关官员筹办郊祀，缺乏劳军钱，郭崇韬便对庄宗说："我已把家中所有财物拿出来助办大礼，愿陛下也拿出内府的钱来交给有司。"庄宗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在晋阳自有储存，可以令租庸使运来助办大礼。"于是从李继韬的家中取出金帛数十万运到洛阳。当初，李继韬的父亲李嗣昭跟着晋王李克用起兵于晋阳，故在晋阳有府第，后李继韬因反叛被杀，家财没官。将士们都心怀不满，开始怨恨唐庄宗。

郭崇韬位兼将相，又领有节旄，以天下为己任，权侔人主，每天门前车马不断。他性格刚直急切，遇事不会隐忍。庄宗的宠臣近侍有什么事求他，多被他当面拒绝。宦官们仇视他，常常在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郭崇韬很愤慨，可又无可奈何。豆卢革、韦说曾问他："汾阳王郭子仪本是太原人，后迁往华阴，您居雁门，是不是他的旁支？"郭崇韬趁机说："由于战乱，谱牒丢失，不过我听先人说，上离汾阳王只有四世。"豆卢革说："那还是从祖呢。"郭崇韬从此以后便以士族自居，常区别门第，引荐浮华之士，鄙弃勋旧之臣。有人求官，郭崇韬说："我深知您有才干，可您出身太低，不敢任用，以免被名流耻笑。"于是庄宗幸臣恨之于内，勋旧之臣怨之于外。郭崇韬多次提出把枢密使一职让给李绍宏，庄宗不同意；又请求分枢密院一些职权归内诸司，以削弱自己的权力，可宦官不断地造谣诽谤他。郭崇韬郁郁不得志，与亲信商量着回自己的藩镇以避祸，亲信说："不行，蛟龙失水，蝼蚁足以制之。"此前，唐庄宗想以刘夫人为皇后，可正妃韩夫人尚在，太后又一向讨厌刘夫人，郭崇韬也多次劝谏，庄宗只得作罢。此时亲信便劝说郭崇韬："您如果请立刘夫人为皇后，皇上肯定高兴。内有皇后之助，则伶宦们不能中伤您了。"郭崇韬听从了这个建议，与宰相一起率百官上奏要求立刘夫人为皇后。庄宗大喜，遂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刘皇后出身寒微，富贵后专门蓄积财物。她在魏州时，连柴草果菜都进行贩卖。当了皇后，四方进贡的东西

都要一分为二，一份给天子，一份给自己。刘皇后的钱财堆积如山，只用来抄写佛经和施舍僧尼。当时，皇太后的诰令，皇后的教令和庄宗的诏书并行于藩镇，具有同样的效力。

孔谦贷钱给百姓，却让百姓们用丝偿还，把丝价压得很低，并多次命令州县官员督办此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奏说："梁朝时租庸使赵岩曾借贷于民而大肆征敛，从而结怨于民。陛下革故鼎新，为民除害，而有司不改梁之弊政，恰如赵岩复生。今年春霜害稼，茧丝甚薄，百姓们只纳正税还可能要逃荒要饭，何况再加上偿还贷钱！我只听天子诏令，不理租庸使的文书，今皇上敕旨未颁，可租庸使的文书连连下发，还愿陛下早降圣旨。"唐庄宗不理。

胡柳陂战斗中，伶人周匝被梁军俘获，庄宗常常想念他。唐军进入汴梁时，周匝到庄宗马前拜见，庄宗十分高兴。周匝哭着说："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全亏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救助，望陛下给他们两个州刺史的职位以报答他们的恩情。"庄宗答应了。郭崇韬劝谏道："与陛下一块儿打天下的都是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刚成，还未来得及封赏一人，却先以伶人为刺史，恐怕会失去天下人心。"此事便搁置起来。一年后，伶人多次向庄宗提起，庄宗便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周匝了，若不兑现，不好再见这三个人。您的话虽对，可也应为我适当妥协一下。"遂任命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亲军中很多人随从庄宗身经百战，也没有得到刺史，见状无不愤叹。

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疏，认为："天下诸道僭位者还有很多，征伐之事，不可停止；士兵长年征战，但赏赐不多，不少人生活贫乏，应从四方贡献的钱财和南郊余钱中拿出一些来再加赏赐；河南诸军都是梁朝的精锐，恐怕敌国会暗中用厚利引诱，应妥善收抚；天下户口流失严重，应宽徭薄赋以安集流民；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建筑，应当停工；选择空地牧马，不要践踏京畿民田。"庄宗

不听。

六月，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并任蕃汉内外马步总管。

八月，唐庄宗任命租庸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租庸副使。孔谦从此以后便为所欲为，重敛急征，以至民不聊生。可庄宗很欣赏他，不久，赐号“丰财赡国功臣”。

同光三年正月，唐庄宗从洛阳出发，来到兴唐。去年李嗣源北征契丹时，经过兴唐，听说东京府库中有供皇上用的细铠，便发下公文给副留守张宪要走五百领，张宪认为军情紧急，来不及上奏便给了他。唐庄宗大怒，说：“张宪没有奉诏，擅自把我的细铠给了嗣源，什么意思呢！”罚张宪俸禄一个月，让他亲自到李嗣源军中要回细铠。

二月，徙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治镇州，今河北正定）。

唐庄宗刚强好胜，不愿权在臣下，定都洛阳之后，听信伶宦们的谗言，对功臣宿将颇为疏忌。李嗣源家在太原，为了照顾自己的家庭，要求任命养子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即晋阳）内牙马步都指挥使。庄宗大怒，说：“李嗣源握兵权，居大镇，可军政由我掌管，怎么能为儿子奏请！”便把李从珂降为突骑指挥使。李嗣源既忧且恐，上表申诉，过了很长时间庄宗才解气。李嗣源乞请来东京朝见庄宗，庄宗不允许。郭崇韬因嗣源功高位重，也很嫉妒他，私下对人说：“总管令公李嗣源不是久为人下的人，皇家子弟们都不如他。”密劝庄宗把他召来作为宿卫，罢其兵权，又劝庄宗把他杀掉，庄宗都不答应。

洛阳宫殿宏大深幽，宦官们想让庄宗多纳妃嫔，造谣说夜里在宫中看到鬼怪，庄宗想让巫觋逐鬼，一个宦官说：“我曾侍奉过唐僖宗、唐懿宗两位天子，当时，后宫的人不下一万。现在后宫中大半空虚，鬼怪才在里面游来荡去。”庄宗乃命宦官王允平、伶人景进出去挑选民间美女，远至太原、幽州、镇州，以充实后宫。

共挑选了三千人，也不问她们的来历。庄宗从兴唐回洛阳时，便用牛车拉着她们走，一路上挤得满满的。张宪上奏："魏州军营中的妇女有一千多人失踪，恐被护驾亲军挟持走了。"其实这些妇女都已被带进宫中。

唐庄宗回到洛阳，下诏复以洛阳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

这年六月，天气湿热，唐庄宗在宫中挑选高凉之处，都不合意。宦官趁机劝庄宗大兴土木，又说："郭崇韬常为费用不足而发议论，恐怕陛下虽想营建楼台，终不可得。"庄宗说："我自用内府钱，不用朝廷出资。"可还是担心郭崇韬劝谏，于是派中使告诉郭崇韬说："今年天气太热，朕过去在黄河边上与梁人打仗时，行营低洼潮湿，披甲乘马，亲当矢石，也不如今天热。现在身居深宫之中而难以度暑，怎么办？"郭崇韬说："陛下昔在河上，强敌未灭，深念仇耻，故虽有盛暑，也不介意；今外患已除，海内宾服，虽有清凉的台榭，却仍感酷热难当。陛下倘若不忘艰难之时，则暑气自消。"庄宗默然不语。宦官说："郭崇韬的府第，不次于皇上所住的宫殿，所以很难体会到皇上的炎热。"庄宗终于命令王允平建楼，每天役使一万人，耗费钱财无数。郭崇韬劝谏说："今黄河南北或涝或旱，军粮不足，望暂停此役，以待丰年。"庄宗不听。

到了九月，唐庄宗与宰相商议伐蜀之事，遂以皇子魏王李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充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率军六万伐蜀。军中大事一由崇韬处理。

北都留守孟知祥曾引荐过郭崇韬，郭崇韬不忘旧恩，在伐蜀前对庄宗说："孟知祥忠厚诚实，又有谋略，如果我们夺得西川需要派人去做统帅，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又推荐邺都副留守张宪谨慎持重有见识，可以做宰相。不久，唐军出师西上。十一月，大军至成都，蜀后主王衍出降。

平蜀之战中，李绍琛立功最多，官位也在董璋之上，可董璋

与郭崇韬关系好，二人多次单独议事。绍琛很是不平，对董璋说："我有平蜀之功，而你不过是跟班的，却整天到郭公门下窃窃私语，图谋陷害别人。我为都将，难道不能用军法斩你吗?"董璋便向郭崇韬诉说此事。郭崇韬上表推荐董璋为东川节度使，解除他的军职以保护他。李绍琛更加愤怒，说："我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险阻，平定两川，却让董璋坐享其成!"乃面见崇韬说："东川重地，工部尚书任圜有文才武略，应表请为帅。"郭崇韬大怒，说："你要造反吗?怎敢违抗我的命令!?"李绍琛无奈退下。

当初，唐庄宗派宦官李从袭等人跟从魏王李继岌伐蜀，李继岌虽为都统，军中之事悉归郭崇韬。郭崇韬终日处理公务，前去拜见的将吏宾客盈门，而都统府除清晨大将们例行晨谒外，牙门寂无一人，李从袭等人感到很耻辱。等破蜀后，蜀国的贵臣大将竞相用财宝女伎贿赂郭崇韬及其子郭廷诲，可魏王得到的不过是一些马匹、布帛、唾壶、尘柄而已，李从袭等人更加不平。

蜀大臣王宗弼自称西川留后时，曾贿赂郭崇韬求任西川节度使，当时郭崇韬为安抚他，敷衍地答应了。唐兵进入成都后王宗弼一直没能当上西川节度使，便率领官民拜见李继岌，列举很多理由，请留郭崇韬镇守蜀地。李从袭等人趁机对李继岌说："郭公父子专横，现在又派蜀人请求让自己为帅，其心难测，大王不可不作些防备。"李继岌对郭崇韬说："皇上把您当作靠山，不让您离开庙堂，岂肯把元老弃于蛮夷之地!再说此事也不是我敢于过问的，请各人面见皇上再说吧。"于是李继岌与郭崇韬相互有了疑心。

唐庄宗任命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要他立即赶到洛阳。庄宗同群臣商议让谁担任北都留守，枢密承旨段徊等人讨厌邺都留守张宪，不想让他来朝廷中当宰相，便说："北都非张宪去不可。张宪虽有宰相之器，可国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眼前，事有得失，可以更改，不像北都那样系一方安危。"

乃徙张宪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又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知邺都留守事。王正言年老糊涂，庄宗让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史彦琼本是伶人，很受庄宗宠爱。魏、博等六州军政、财政全由史彦琼掌管，他遂得以作威作福，欺压将吏，王正言以下都竭力讨好他。

当初，唐庄宗得到魏州银枪效节都近八千人，作为亲军，都勇悍无敌。夹河之战，多亏他们浴血奋战，屡立殊功，庄宗曾许诺一旦灭梁，当大加赏赐。平定河南后，虽赏赐不止一次，可士卒仍然不满。这一年饥荒严重，百姓大量逃亡，租赋收上来的不多，加上到处是积水，运输困难，东都仓库的粮食吃光了，无法再供应士兵。租庸使孔谦每天都到洛阳上东门外去等诸州漕运来的粮食，只要一到就立即分发。士兵们由于极度缺乏粮食，竟有人典妻卖子，老弱之人则成群结队出去挖野菜，常有人饿死，于是怨声载道。可庄宗却游猎不止。十二月二十日（己卯），庄宗猎于白沙，皇后、皇子、后宫妃嫔全部跟随；二十四日（癸未）还宫，当时大雪铺地，有的士兵冻死在路上。伊、汝一带饥荒更加严重，卫兵们所到之处，都要百姓供应食物，一旦得不到，便把家俱砸毁，把房屋拆掉，比强盗还要凶恶，县吏都逃进山谷之中。

因军粮不足，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认为："古人量入为出，计农发兵，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无匮乏之忧。现在即使不能蠲免租税，若除去折纳、纽配之法，农民也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庄宗虽命有司按李琪说的办法办，可到底没能执行。

郭崇韬一向厌恶宦官，曾私下对魏王李继岌说："大王有朝一日得天下，当尽去宦官，专用士人。"宦官们知道后都恨透了崇韬。

当时成都虽被唐军攻取，可蜀中盗贼蜂起，布满山林。郭崇韬惟恐大军一走，再成后患，命任圜、张筠率兵分道讨伐，以此多停留了一段时间。唐庄宗派宦官向延嗣去催促，郭崇韬不出城迎接，见面后又很高傲，向延嗣很恼火。李从袭趁机对向延嗣说：

"魏王是太子，皇上又健在，可郭公却如此专权。郭廷诲每天带着爪牙出出进进，与军中骁将、蜀地豪杰饮酒作乐，指手画脚。近来听说他劝父亲上表要求任命自已为蜀帅，又说'蜀地富饶，大人宜善自为谋'。今军中将校都是郭氏之党，魏王无异于寄身虎狼之口，一旦有变，我们这些人的骨头不知要扔到何处了。"于是相对落泪。向延嗣回京后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了刘皇后，刘皇后哭诉于唐庄宗，请早日救出李继岌。

此前唐庄宗得知蜀人要求让郭崇韬为帅心中已不满，现在又听了向延嗣的话，不能不怀疑。庄宗查看蜀地的府库帐本，说："人们都说蜀中珍宝无数，怎么这么少呢？"向延嗣说："我听说破蜀后，珍宝都被郭崇韬父子夺走。崇韬有黄金一万两，银四十万两，钱百万缗，名马千匹，其他财物无数，郭廷诲得到的东西，还不在其中。这样陛下就所得不多了。"庄宗遂怒容满面。及孟知详将要从洛阳赴蜀，庄宗对他说："听说郭崇韬要造反，您到那儿后，替朕杀了他。"孟知详说："郭崇韬乃国家功臣，跟随陛下多年，不应当有这事。等我到蜀地看一看，若无异常举动就让他回来。"庄宗同意了。

孟知详从洛阳出发后，庄宗又派衣甲库使马彦珪骑快马赶赴成都观察郭崇韬的动静，如果奉诏班师则已，若再拖延或表现出飞扬跋扈的样子，就与李继岌一起想法杀掉他。马彦珪见到皇后，劝说道："我看向延嗣所说蜀中形势危在旦夕，可皇上当断不断，成败之机，容不得半点犹豫，怎么能到时候再请示于三千里之外呢！"皇后便又向庄宗提出杀郭崇韬，庄宗说："传闻之言，不知真假，怎能仓促地作出决定呢？"皇后的要求没有被批准，退下后就自己下令给李继岌，要他杀郭崇韬。孟知详走到石壕村，马彦珪夜间叩门宣诏，催促他赶快赴镇。孟知祥暗地里叹道："大乱就要发生了。"遂昼夜兼行。

同光四年正月，魏王李继岌将要从成都班师回朝，令任圜暂

且负责留守之事，以等待孟知祥。诸军部署已定，正要出发，马彦珪来到成都，把皇后的教令拿出来给李继岌看，继岌说："大军就要出发，郭崇韬又没有什么过失，怎可做这样的亏心事！你们不要说了。再说皇上没下敕令，仅凭皇后的教令杀招讨使，行吗？"李从袭等人哭着说："既然已经有了这个事情，万一郭崇韬听说后，在中途发动叛乱，就更不可挽救了。"大家反复地陈述利害关系，李继岌不得已，便答应了。正月初七（甲子）早晨，李从袭以李继岌的名义召郭崇韬商议事情，李继岌登楼躲避。郭崇韬正上台阶，李继岌的随从李环上前砸碎了他的头，并杀其子郭廷诲、郭廷信。外人还不知道此事。都统推官李崧对李继岌说："今行军三千里外，没有圣旨而擅杀大将，大王怎能干出这样的危险事！怎么不能忍到洛阳呢？"李继岌说："您说得很对，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崧便召来几个书吏，登上楼去，撤掉梯子，假造了皇帝诏书，又用蜡制成中书省印，盖了印，然后宣告军中。军中粗定。崇韬的亲信都慌忙逃走，只有掌书记张砺到魏王府中痛哭很久。李继岌命任圜代替郭崇韬总管军政。

马彦珪回到洛阳，庄宗乃下诏宣布郭崇韬的罪状，又杀其子郭廷说、郭廷让、郭廷议。于是朝野上下无不惊骇惋惜，议论纷纷。

景进对庄宗说："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有人来京揭发，说李继麟与郭崇韬谋反。宦官们趁机劝庄宗除掉李继麟。庄宗乃徙李继麟为义成节度使，当天晚上，又派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兵包围其住处，把他押到徽安门外杀掉，恢复其原名，仍叫朱友谦。朱友谦有两个儿子：令德任武信节度使，令锡任忠武节度使。唐庄宗下令命魏王李继岌到遂州杀朱令德，郑州刺史王思同到许州杀朱令锡。河阳节度使李绍奇到了朱友谦家中，朱妻张氏率家人二百余口出见，说："朱氏宗族应当死，只是不要牵连别人。"便把奴婢与家仆挑了出来，有一百人，然后以其家族百口受刑。张

氏又取出铁券给李绍奇看，说："这是皇上去年赐给的，我是妇人，不认字，不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李绍奇也为朝廷的失信而惭愧。朱友谦的老部下史武等七人当时都任刺史，也受牵连而灭族。

当时洛阳诸军饥寒交迫，乱造谣言，伶官听说后便上报于唐庄宗。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也被谣言牵扯进去，庄宗派朱守殷去察看。朱守殷私下对李嗣源说："令公您功业震主，应想法辞去藩镇避祸。"李嗣源答道："我心不负天地，来祸来福，无处躲避，都听从天命了。"其时伶官横行，功臣旧将人不自保，李嗣源多次险遭大祸，赖宣徽使李绍宏多方救护，幸得保全。

魏王李继岌留下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等戍守成都，然后率大军归朝。

魏博指挥使杨仁晸率兵戍守瓦桥（今河北雄县西南），期满后回镇，走到贝州时，唐庄宗考虑到邺都（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空虚，惟恐士兵回来后闹事，便下令让他们留驻贝州。

当时天下人不知郭崇韬之罪，民间传言说："郭崇韬杀了李继岌，在蜀地称王，故朝廷灭了他全家。"

杨仁晸部下有个士兵叫皇甫晖，夜里与同伙赌博输个精光，在无奈何的情况下，趁人心不安，发动叛乱。他们挟持住杨仁晸说："皇上之所以能夺得天下，靠的是我们魏博镇。魏军人不解甲、马不去鞍十多年，立下大功。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旧功，反而猜忌我们。我们远离家乡戍守他地一年多，正为换防回镇而高兴，可是离家近在咫尺，竟不让我们与亲人团聚。今听说皇上弑逆，京城已乱，将士们愿与您一块儿回镇，然后上奏朝廷。若天子还活着，发兵讨伐，以我魏博兵力足以抵抗住，怎知不能由此带来富贵呢！"杨仁晸不答应，被皇甫晖杀掉；又劫持住一个小校，小校也不依从，也被杀。效节指挥使赵在礼听说兵乱，来不及系上衣带就要跳墙逃走，被皇甫晖追上。皇甫晖抓住他的脚把他从墙上拉下来，拿杨仁晸和小校的头给他看。赵在礼很害怕，答应了他

的要求。乱兵遂奉赵在礼为帅，在贝州烧杀抢掠。第二天早晨，皇甫晖等人拥着赵在礼南下临清、永济、馆陶，一路上到处抢劫。

二月初四（壬辰）晚上，有人从贝州来到邺都，告知士兵哗变，将要来犯。都巡检使孙铎等人立即去见邺都监军史彦琼，请求发给兵甲登城备战。史彦琼怀疑孙铎等人不怀好意，说："来人说今天乱贼才到临清，估计一下他们的行程，二月初六晚上才能来到，那时候备战也不晚。"孙铎说："贼既作乱，必定乘我不备，昼夜兼程，怎么还会按常规行程去走！请您率兵登城，我招募精兵千人埋伏在王莽河边迎击，贼一旦受挫，必定逃散，然后可以追捕了。若一定要等他们来到城下，万一有奸人做内应，就危险了。"史彦琼说："只要严加防守，何必迎战！"不料，当天夜里乱军前锋已至邺都城下，并攻打北门，乱箭猛射。史彦琼率兵正在北门楼上睡觉，听到乱兵的呼喊声，大家立时惊溃。史彦琼单骑逃奔洛阳。

二月初五（癸巳），乱兵攻入邺都，孙铎等人抵挡不住，只得逃走。赵在礼住进宫城，任命皇甫晖及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纵兵大肆抢掠。

邺都留守王正言正在公案旁召书吏起草上奏的文件，可没有一人来，王正言大怒。其家人说："贼已入城，在市面上大肆杀抢，吏员都已逃散，您还叫谁呢？"王正言吃惊地说："我还不知道呢。"赶忙找马，也找不到，只得率领手下官员走出府门去见赵在礼，再拜请罪。赵在礼回拜，说："士兵想家了。王尚书您德高望重，不要这样卑下。"遂安慰一番，把他们送走。

二月初八（丙申），史彦琼逃到洛阳。唐庄宗问李绍宏谁可作为大将前去讨伐邺都，李绍宏再次推荐李绍钦，绍钦即是后梁亡国之将段凝，降唐后赐名李绍钦。庄宗同意了，命李绍钦讲述一下自己的计划。听到李绍钦请求任用的偏裨之将，都是梁朝旧将且是绍钦喜欢的人，庄宗起了疑心，不再派他出征。皇后说："这

是小事，不必麻烦大将，李绍荣就可以了。”庄宗便命归德节度使李绍荣率三千骑兵到邺都招抚赵在礼，同时征发各道的军队，以防备其不受招抚。

魏王李继岌率大军回朝，到达武连，遇敕使，告知朱友谦已被杀，令董璋率兵到遂州杀朱令德。此时李绍琛率后军在魏城，听说此事十分惊慌，认为庄宗不委派自己去杀朱令德而派董璋，表明对自己已不信任。既而董璋率军经过李绍琛的军营，也不拜见。李绍琛大怒，乘酒兴对诸将说：“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都是郭崇韬出的主意和我的战功；至于去逆效顺，与我们构成犄角夹击敌人，终至灭梁，则是朱友谦。今朱郭二人都无罪而被灭族，回朝之后，又轮到我了。天啊，这太冤枉了！怎么办呢！”李绍琛率领的后军多是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人在军门前大哭，说：“西平王朱友谦有什么罪，竟被满门抄斩！我们若回朝，也要与史武一样被杀，决不再走了。”这天，魏王李继岌到达泥溪。李绍琛到达剑州，派人告诉继岌说：“河中将士号哭不止，想造反。”二月初九，李绍琛率兵从剑州西还，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声称奉诏代替孟知祥招抚蜀人，三天之间人数已达五万。

二月十一日（己亥），魏王李继岌到达利州，李绍琛派人拆断桔柏津。李继岌听说绍琛已反，命任圜为副招讨使，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廷安率步兵、骑兵七千人追讨。

二月十三日（辛丑），任圜派兵攻下剑门关，以防被李绍琛招守。

李绍荣至邺都，攻打南门，并派人拿着皇帝的诏书招抚赵在礼。赵在礼用羊、酒犒劳唐军，在城头上拜见说：“将士们思家，擅自回来，还望相公上奏时多美言几句，使我们免于一死，敢不自新。”遂把诏书内容遍告军中。可史彦琼却举手大骂说：“你们这群死贼，破城后一定要碎尸万段。”皇甫晖对大家说：“听史彦琼这话，皇上是不会赦免我们的。”于是群起大呼，抢过敕书，把

它撕碎，然后坚守城头。李绍荣攻城不利，奏报庄宗。唐庄宗大怒，说："城破之后，一定杀个鸡犬不留。"乃调集大军讨伐。李绍荣暂时退驻澶州。

二月十六（甲辰）夜，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掉军使，准备叛乱被逮捕后处斩。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优人，优名叫郭门高，唐庄宗与梁军在德胜对峙时，招募勇士去梁营挑战，郭从谦应募，俘斩梁兵而还，从此后更得庄宗宠爱。唐庄宗挑选诸军骁勇者作为亲军，分设四个指挥官，叫从马直；郭从谦自军使累功迁至指挥使，当时郭崇韬执掌大权，他便把崇韬作为叔父对待；睦王李存义又收他为养子。及郭崇韬、李存义获罪。郭从谦几次出钱宴请从马直诸校，当着他们的面流泪，说郭崇韬冤屈。王温作乱后，庄宗跟郭从谦开玩笑说："你依附郭崇韬、李存义，又教王温造反，胆子不小！"郭从谦更加害怕。退下后暗中对诸校官说："皇上因王温造反之故，待邺都平定，要把你们全部活埋。家中有钱财都买酒肉吃吧，不要做长远打算了。"从此后亲军都心中不安。

二月十九日（丁未），李绍荣率领诸道士兵再攻邺都。裨将杨重霸率兵几百人爬上城去，可后面无人跟随，结果杨重霸等人都战死。城中乱兵自知不被赦免，坚守不降。朝廷很忧虑，每天都派中使催促魏王李继岌东还。可李继岌把中军的精兵都已交给任圜追讨李绍琛。自己留在利州等着，不能东归。

李绍荣讨伐邺都久而无功；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又据城造反，自称安国留后。既而沧州兵哗变，小校王景戡平叛后，却又自称留后。当时河朔一带各州县告乱者一个接着一个。唐庄宗想亲自率兵征讨邺都，宰相、枢密使都说京师乃根本之地，不可轻易离开，庄宗说："诸将中没有合适的人出征。"大家都说："李嗣源作为跟随陛下多年的功臣，最为合适。"庄宗对李嗣源一向不放心，又不便明讲，借口说："我舍不得让嗣源去，想留他在我身边。"大家又说："其他人都不行。"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也说：

"河朔多事，时间一长更麻烦，应当令李总管率兵进讨。若倚仗李绍荣，成功无期。"唐庄宗见群臣都这么说，便命李嗣源率亲军讨伐邺都。

董璋率兵二万屯驻绵州，会合任圜讨伐李绍琛。庄宗派中使崔延琛到成都，途中遇上李绍琛的军队，就骗绍琛说："我奉诏召回孟郎，您若缓兵，定可得蜀。"可崔延琛一到成都便劝孟知祥加强战备。孟知祥挖深护城河，树上栅栏，然后派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率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率二千人讨伐李绍琛。

这天，任圜率军在汉州追上李绍琛，绍琛出兵迎战。招讨掌书记张砺提出把精兵埋伏在后面，用弱小的士兵诱敌，任圜听从了他的建议，派董璋带东川弱兵先战，然后再撤退。李绍琛轻视任圜是个书生，又见其兵弱，奋力追赶，伏兵突然冲出来，大破李绍琛，斩首数千级。从此李绍琛躲进汉州，闭城不出。

三月初六，(壬戌)，李嗣源率军到邺都，在城西南安营。初八（甲子)，嗣源下令军中，明天早晨攻城。可就在这天晚上，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率众大呼，杀掉都将，焚烧军营。天亮后，乱兵逼进中军大帐，李嗣源率亲军抵抗，难以招架，乱兵更加猖狂。李嗣源大声斥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回答说："将士们随从皇上十年，百战方得天下。今皇上不施恩惠却滥发威风，贝州守兵想回家，皇上不赦免，竟说'克城之后，当尽坑魏博之军'。上月从马直几个士兵闹事，皇上又要大肆屠杀。我们并无叛心，只是怕死罢了。现在大家商量好要与城内守兵一起击退诸道之军。请皇上统治河南，令公您称帝于河北，为军民之主。"嗣源流泪劝告他们，可没人听，只得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就随你们的便吧，我自归京师。"乱兵拔刀围住他，说："这些人都是虎狼之辈，不管尊卑，您又能到哪儿去?"于是拥着李嗣源及东北面诏讨副使李绍真等人入城。城中不纳外兵，皇甫晖迎战张破败，把他斩杀，外兵皆逃散。赵在礼率诸校迎拜李嗣源，哭着谢罪说："将士们对不

起令公，敢不惟命是听！”李嗣源骗赵在礼说：“凡干大事，须有兵力，今城外之兵流散无处去，我替您把他们招集起来。”赵在礼便听任李嗣源、李绍真出城，住在魏县，散兵渐有来者。

汉州没有城池，只是树木为栅。三月初九（乙丑），任圜进攻其栅，放火烧之。李绍琛率军迎战于金雁桥，兵败，与十多个骑兵逃奔绵竹。任圜乘胜追击，抓获李绍琛。孟知祥亲往汉州犒劳军队，与任圜、董璋大摆宴席，然后把关押李绍琛的槛车拉来。孟知祥倒了一大杯酒给李绍琛，说：“您拥有节旄，又有平蜀之功。还怕不富贵，何必要进这个槛车呢！”李绍琛说：“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又取两川，没犯什么罪却被灭族，像我这样的还能保全吗！故不敢回朝。”魏王李继岌既捉住李绍琛，便率兵加倍赶路东下。

李嗣源被乱兵逼迫时，李绍荣正率兵一万人驻扎在城南，嗣源派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召他，想一起讨伐乱兵，可李绍荣怀疑李嗣源欺诈，把使者扣留住，闭垒不出。及李嗣源进入邺都，李绍荣率兵退走，李嗣源在魏县，兵不过百，又无军械。李绍真的五千镇州兵听说李嗣源得以逃出，纷纷来归，李嗣源兵势渐振。李嗣源流着泪对诸将说：“我明天就归藩，上奏皇上，听候制裁。”李绍真及中门使安重诲说：“这个办法不合适。您作为元帅，不幸被乱兵劫持，李绍荣不战而退，归朝后肯定会拿您作借口，您若归藩，就成了据地邀君，正好使谗言得逞，不如连夜回朝，面见天子，也许可以解释清楚。”李嗣源说：“好！”乃率兵从魏县南下相州。途中遇上马坊使康福，得到战马几千匹，方能成军。

当时宦官任诸道监军者都恃宠与节度使争权，及邺都兵变，各道纷纷杀掉监军。

由于粮食缺乏，租庸使缩减了军粮供应，京城军中流言大起，宰相们很恐慌，率百官上表说：“今国库空虚，可皇上的内府有余，

诸军妻子儿子不能相保，若不救济，恐有离心。望陛下出钱救济，待来年丰收，何愁没钱！”唐庄宗本想答应下来，刘皇后却说："我们夫妇君临万国，虽说凭借武功，也是天命。命既在天，别人又能对我们怎么样！”宰相又在便殿面奏，刘皇后躲在屏风后偷听，过一会儿，刘皇后拿来了自己的梳妆用具和三个银盆，又抱出三个小皇子，说："别人都说宫中钱财多，其实四方进贡的东西都随时赏赐出去，就剩这些了。请把他们卖掉后供应军队。”宰相慌忙退下。

李绍荣从邺都退保卫州，上奏说李嗣源已经叛变，与贼合兵，李嗣源派人上章申诉，一天好几次。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任金枪指挥使，唐庄宗对李从审说："我深知你父忠厚，你到他那里传达我的旨意，让他不要多心。”李从审到了卫州，被李绍荣逮捕，想杀掉他，李从审说："你们既然不相信我的父亲，我也不想前去，请让我回京继续担任宿卫。”李绍荣便放了他。唐庄宗很喜欢李从审，赐名李继璟，待他如子。此后李嗣源的奏章都被李绍荣拦截住，难以送到皇帝手中，李嗣源不能不疑惧。石敬瑭说："凡事都成于果断而败于犹豫，哪有上将与叛卒一起进了贼城可后来又安然无事的呢！大梁，乃天下之都会，愿您给我三百骑兵先去攻打。若一旦占据该城，您就率大军立即前往，这样才可保全自己。”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皇上无道，军民怨恨，您听从大家的建议就可活命，若一味守节则死路一条。”李嗣源便命令安重诲移檄诸道，集合军队。

其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泰宁节度使李绍钦、贝州刺史李绍英驻扎在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驻扎在奉化军，李嗣源一一派人召之。李嗣源的家属住在真定，虞候将王建立先杀掉监军，家属得以保全。李从珂从横水率部下赶到镇州，与王建立合兵后，倍道兼行，投奔李嗣源。因李绍荣在卫州，李嗣源准备自白皋渡过黄河，分出三百骑兵让石敬瑭率领作为前锋、李从

珂为后卫，于是军势大盛。李嗣源的从子李从璨自镇州率兵南下，经过邢州时，被邢州人奉为留后。

唐庄宗连忙下诏命令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骑兵扼守河阳桥，又拿出金钱布帛赏赐诸军。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人也都献出一批金钱布帛。士兵们接过东西就破口大骂："我们的妻子儿子早就饿死了，还要这干什么！"李绍荣说："邺都乱兵已派其同伙翟建白占据博州，企图渡过黄河袭取郓州、汴京。望陛下驾临汜水关以东招抚他们。"唐庄宗同意了。

三月十九日（乙亥），唐庄宗从洛阳出发。二十二日（戊寅），派李绍荣率骑兵沿黄河东下。李嗣源的亲属凡在唐庄宗身旁的多已逃走，有人劝李继璟早逃，李继璟不肯走，表示情愿死在庄宗面前以表诚心。庄宗强派李继璟渡河召见李嗣源，途中李继璟被李绍荣杀死。

二十五日（辛巳），李嗣源到达白皋，遇上山东上供绢数船，没收后赏赐军队。安重诲的随从争船，被行营马步使陶玘斩首示众，于是军纪严整，无人敢犯。李嗣源渡过黄河，到了滑州。知汴州孔循派人奉表西上迎接唐庄宗，同时又派人偷偷地北上给李嗣源送信，说："谁先到，谁将得到大梁。"

本来，唐庄宗已派骑将西方邺守卫大梁。石敬瑭派部将李琼率精兵冲进封丘门，自己紧随其后，一举攻克大梁。西方邺投降。石敬瑭派人催促李嗣源，李嗣源随即进入大梁。

这天，唐庄宗到达荥泽东，命令龙骧指挥使姚彦温率三千骑兵作为前军，说："你们都是汴州人，我进入你们的境内，不让其他军队作前驱，是怕他们扰乱你们的家园。"出发之前，对他们厚加赏赐。不料，姚彦温马上率军叛归李嗣源，对嗣源说："京城十分危急，皇上受李绍荣蒙蔽，大势已去，不能再侍奉他了。"李嗣源说："你自己就不忠，何必乱说呢？"立时夺其兵权。指挥使潘环守卫王村寨，那里有粮草数万斛，庄宗不放心，派骑兵前去察

看，潘环也逃奔大梁。

唐庄宗来到万胜镇，离大梁还有几十里，听说李嗣源已占据大梁，可自己的军队又不断叛逃，十分沮丧，登上高处叹道："我不行了！"遂命令回师。唐庄宗出关时，扈从兵二万五千人，及回，已损失万余人，乃留下秦州都指挥使张唐率步兵、骑兵三千人守卫汜水关。次日，唐庄宗回师经过罂子谷，道路狭窄，每遇上卫士带兵仗者，就用好话抚慰一番。大家并不感德，庄宗只有流泪而已。庄宗又找袍带赏赐随从官员，内库使张容哥说赏赐已尽。卫士斥责张容哥说："使我们皇上丢天下的，都是你们这批阉竖。"随即拔刀追赶。幸亏有人救护，张容哥才得以逃脱。张容哥对自己的同伙说："皇后吝财，事情才到了这种地步，可人们却归咎于我们。若大事一去，我们便会碎尸万段，我不能等着这一天。"于是投河而死。

二十八日（甲申），唐庄宗回到石桥西，置酒而哭，对李绍荣及诸将说："你们随从我多年，甘难无不与我共之；今事已如此，竟无一计相救吗？"诸将百余人都割掉头发扔在地上，誓以死报，无不大哭。当天晚上，庄宗进入洛阳城。

李嗣源命石敬瑭率前军前往汜水收集抚慰散兵，自己随后跟来。李绍虔、李绍英率兵前来汇合。

三十日（丙戌），宰相、枢密使一起上奏："魏王率军将到，陛下当率兵扼守汜水关，收集散兵以等待援军。"唐庄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亲自到上东门检阅骑兵，告诉他们天明后出发。

四月初一（丁亥），大军将要出发，骑兵在宣仁门外列阵，步兵在五凤门外集合。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道睦王李存乂已死，想拥戴他为首叛乱，即率部下士兵在营中拔刀大喊，与黄甲两军攻兴教门。唐庄宗正在吃饭，听说士兵哗变，便率领诸王及近卫骑兵反击，把乱兵赶出兴教门。当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骑兵在外面，庄宗派中使急召，想与他一起击败乱兵，可朱守殷不来。乱

兵烧毁兴教门，爬城而入，庄宗身旁的近臣及诸将都扔下兵器逃走了，只剩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等人。俄而庄宗被流箭射中，鹰坊人善友扶庄宗从门楼上下来，到了绛霄殿廊房中，拔出箭来。庄宗既渴且闷，要水喝，刘皇后不仅不去亲自看望，还派宦官送来乳浆。据说凡中箭伤血闷者，饮水可活，饮乳浆速死。过了一会儿，庄宗死去。善友搜集廊下的乐器盖在庄宗尸体上，点火焚烧。刘皇后把金宝装好系在马鞍之上，与申王李存渥及李绍荣率七百骑兵烧掉嘉庆殿后逃走。于是诸军在洛阳城中大肆抢掠。

这一天，李嗣源到达罂子谷，听说庄宗已死，大哭，对诸将说："皇上一向深得军心，只是受小人蒙蔽，才落到这个地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四月初二（戊子），朱守殷派人骑快马报告李嗣源，说："京城大乱，诸军焚掠不已，望快来救助。"次日，李嗣源进入洛阳，住到自己府中，下令禁止焚掠，并把唐庄宗的遗骨从灰烬中捡出来入殓。

李嗣源对朱守殷说："您好好守卫着皇宫，以待魏王归来。韩淑妃、伊德妃尚在宫中，供应当丰厚些。一旦埋葬了先帝，国家有了嗣君，我就回藩为国家守卫边疆。"

豆卢革率百官上表劝进，虽再三请求，李嗣源不允许。

李绍荣想到河中投奔永王李存霸，随从的士兵逐渐逃散。到了平陆，只剩下几个骑兵，遂被人逮住，送往洛阳，被李嗣源处死。李存霸率了一千多人弃镇奔晋阳。

四月初五（辛卯），魏王李继岌到达兴平，听说洛阳已乱，又率兵西归，打算退保凤翔。

向延嗣至凤翔，以庄宗之命杀李绍琛。

文武百官多次上表请求李嗣源监国，李嗣源这才答应。四月初八（甲午），李嗣源入居兴圣宫，开始接受百官班见，命令称"教"，百官称他为"殿下"。庄宗后宫还剩下一千多个宫女，宣徽

使挑出年轻貌美者数百人献给李嗣源，李嗣源说："要他们干什么！"回答道："宫中事务不可缺人。"李嗣源说："负责宫中事务的人要熟悉过去的典章制度，这些人懂得什么。"乃一律使用老年人补上，年少者放出去与亲人团聚，没有亲人者听凭去留。蜀中所送宫人也按这个办法处理。

李嗣源下令各地寻找诸王，不料安重诲等人为防止人心不一，保证李嗣源即位，把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全部杀死。申王李存渥、永王李存霸到晋阳后也被士兵们杀掉。刘皇后在晋阳当了尼姑，却难免一死。薛王李存礼及庄宗的四个幼子不知所终。诸王中只有邕王李存美因中风得病半身不遂，幸免于难，住在晋阳。

李嗣源列举租庸使孔谦奸佞惑主、盘剥军民之罪，将他斩首。凡孔谦所立苛政之法，一律废止。并废掉租庸使及内勾司之职，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由宰相一人专门负责。又取消诸道监军使。因唐庄宗信任宦官而亡国，李嗣源命诸道尽杀之。

魏王李继岌从兴平退至武功，宦官李从袭说："祸福尚未可知，退不如进，请大王赶快东下以救内难。"李继岌听从了他的建议。大军东下，至渭水，浮桥已被权西都留守张篯拆毁。他们沿河浮渡，当天到达渭南，可李继岌的心腹吕知柔等人都已暗中逃走。李从袭对李继岌说："大势已去，大王自己看着办吧。"李继岌一边徘徊，一边流泪，后来只得趴在床上命仆夫李环将自己勒死。大军由任圜率领继续东下，李嗣源命石敬塘前去慰劳他们。将士们都没有什么意见，归顺了李嗣源。

不久，李嗣源于唐庄宗柩前即皇帝位，改元天成，国号仍为唐，李嗣源即是历史上的唐明宗。唐明宗一扫庄宗时期的弊政，令中外君臣不得奉献鹰犬珍玩之类，酌情留下后宫一百人，宦宫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人员一律送出皇宫；免除夏秋税省耗（旧例，夏秋二税每斗加一升谓之省耗）；罢免贪污官员；奖励功臣，为郭崇韬、朱友谦等人平反昭雪，

使后唐政治出现了新的气象。

（侯仰军）

参考书目：

《资治通鉴》卷 272---275 卷

《通鉴纪事本末》：《邺都之变》

《新五代史》：《伶官传》

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

大概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我国历史上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为了做皇帝，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臣称儿，出卖燕云十六州国土。然而，关于事情的来胧去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了。

石敬瑭，西突厥后裔沙陀部人。其父臬捩鸡于后梁时依附晋王李克用，随从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鸡生有一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石敬瑭。石敬瑭为何姓石，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不必考究。石敬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军阀混战，弱肉强食，是个造就草莽英雄的时代。石敬瑭沉稳寡言，作战勇敢。李存勖（后来作了后唐开国皇帝，即后唐庄宗）起兵反梁时，曾在清平（今山东临清）被梁将刘鄩包围，情势危急，石敬瑭率十余骑兵奋勇突围，击杀刘鄩，救出李存勖，由此名冠三军。天祐十五年（918年），在胡柳（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之役中，又随从李嗣源（后来即位，即后唐明宗）于危急中击败梁兵，为李嗣源解了围。李嗣源是李存勖父亲的养子，他喜欢石敬瑭，就把后来是永宁公主的女儿嫁给他。大概石敬瑭当时并没有料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婿，反正，自从娶了永宁公主，石敬瑭跟随岳父大人，混得不错，带领了一支军队——左射军。

同光四年（926年）二月，后唐邺都军将赵在礼在贝州（治今河北南宫）起兵反叛。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受庄宗命前往讨伐，至魏（今河北大名）时，士兵哗变，劫持李嗣源，逼他造反。李嗣

源犹豫不决，甚至想回朝面见庄宗，以表白自己之忠诚。石敬瑭说："军队发生兵变，岳泰身为主帅，回去会有好下场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犹豫寡断乃兵家之大忌。事已至此，不如起而反之。愚婿愿率三百骑兵为先锋，攻取汴州（治今开封），则大业可成了。"李嗣源听从他的建议，与赵在礼达成默契，倒戈南下，以石敬瑭率三百精骑为前锋，一举攻下汴州。四月，挥师入洛。二十日（丙午），李嗣源于洛阳即位，是为后唐明宗，改元天成，拜石敬瑭为保义军节度使，赐号为"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

明宗虽然也是靠兵变夺取皇位的，然而，他似乎懂得一些"马上得天下而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在位七年期间，勤于政事，不溺声色，不乐游猎，爱人恤物，兵革粗息，这于五代之君中是少有的。在这位并不昏沉的老岳父面前，就算石敬塘有多大的野心，有多狠的阴谋，他还得表现得规规矩矩。据史书记载，石敬瑭在陕州（治今河南陕县）做保义军节度使时，为政清廉，享有声誉。当时，各地军政长官多不奉法，邓州的陶玘、亳州的李邺等人因贪污被处死，明宗下诏褒奖几位廉吏，如晋州的安崇阮、洺州的张万进、耀州的孙岳等人，这其中就以石敬瑭为廉吏之首。天成二年（927 年）十月，拜为宣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统帅禁卫军，改赐为"耀忠匡定保节功臣"。天成三年四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唐尹，位登丞相。五月，拜驸马都尉，还兼六军诸卫副使。当时，六军诸卫使是秦王李从荣，李从荣是明宗第二子，手握兵权，桀骜不驯。石敬瑭预料他迟早会引祸上身；担心殃及自己，所以，不愿意任他的副职。正好，契丹、吐谷浑、突厥人寇中原，石敬瑭趁 机请缨杀敌。明宗任命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镇守太原。太原是后唐的北面陪都，原叫晋阳，自北朝以来，历来是中原之朝的战略要地。石敬瑭担任河东节度使，又担负起后唐西北部边

防统帅的重任，这是他日后发迹的关键一步。正是在这里，石敬瑭一方面养精蓄锐，一方面与契丹国勾勾搭搭，上演了一幕献燕云十六州的丑剧。天成四年十一月，李从荣为了同宋王李从厚争夺皇位，趁父皇明宗病危之际，发动政变，企图逼明宗让位给他，不料事泄被杀。石敬瑭的顾虑得到应验。

长兴四年（933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戊戌），明宗经不住疾病的折磨和爱子从荣兵变之打击，终于一命归天。此后争夺皇位的斗争更加激烈。事先在宫的明宗第五子、宋王李从厚联络宦官，先发制人，取得皇位，是为后唐愍帝。愍帝大概不是做皇帝的料，他无力控制动乱的局势，做了不到四个月的皇帝，应顺元年（934 年）二月，明宗养子、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就起兵造反。四月，挥师入京，废杀愍帝，是为后唐废帝。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登位之后，自然要翦除异己，培植亲信。更何况愍帝、废帝是篡权夺位的呢？愍帝上台不久，就把石敬瑭改任为北京留守。废帝反于凤翔，进军洛阳，愍帝出逃，渡河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遇见来京朝贡修山陵的石敬瑭，石敬瑭顿起杀念，尽杀愍帝随从者一百多人，并把愍帝幽禁在卫州。石敬瑭阴险狠毒之心于此终于暴露。废帝登基，石敬瑭依例来京朝见新天子，不料废帝迟迟不放他回太原。这也难怪，废帝与石敬瑭两人，虽说一个是明宗的养子，一个是明宗的女婿，是明宗早年的左右臂膀，侍从征战，皆以勇力闻名。然而，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疙疙瘩瘩可不少。现在，废帝做了皇帝，能不防着点石敬瑭吗？再说，废帝的亲信故朋大都劝他不要纵虎归山。石敬瑭觉察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惴惴不安。可是，我们毕竟不能低估石敬瑭的能耐。他很有一套伪装自己的本事，叩见废帝时，总要装出一副忠诚不贰的姿态；平日饮食起居，表现出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在废帝的亲信故朋面前，显得恭恭敬敬的样子。这一切是那样的自然而不露雕饰的痕迹！正巧，石敬瑭由于久患疾病，

瘦弱得不象个人样，石敬瑭的老婆永宁公主和岳母曹太后又一个劲儿地向废帝讲石敬瑭的好话，甚至废帝的亲信韩召胤、李专美两人也对废帝说："我朝新立，人心浮动，方镇诸将拥兵自重，窥伺皇位，宣武军节度使赵延寿近在汴州，虎视耽耽。石敬瑭乃先朝重臣，又是皇亲国戚，如被猜忌，则人心必失，天下之乱因此起矣。况且打草惊蛇，徒劳无益。诚请皇上三思。"纵使废帝对石敬瑭的甜言密语存有疑虑，可是，他怎会一点不考虑永宁公主、曹太后和自己亲信的言语呢?纵使废帝对石敬瑭的忠诚深表怀疑，可是，他怎能料想到瘦弱无比的石敬瑭会有多大的能量呢？于是，废帝渐渐地对石敬瑭不在意起来，对韩召胤、李专美说："石郎乃寡人密亲，又从小与朕同甘共苦。朕今为天子，弃石郎不用，还用何人?"因而，下诏任命石敬瑭继续为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清泰二年（935年）六月，石敬瑭在京城洛阳挨过了近十五个月的艰难日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太原。

脱离了虎穴的石敬瑭夺权的计划在一步一步地、极其秘密地实施着。首先，猎取朝廷情报。石敬瑭利用两个儿子在宫城做官的机会，叫他们去贿赂曹太后及其左右，讨得她们的欢心，再让她们去刺探废帝的机密。这样，不论是大大小小的情报，石敬瑭都了如指掌。同时，石敬瑭利用自己有病的条件，会客访友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身体虚弱，不胜政务，以遮人耳目，暗地里扩充兵力，积蓄军粮。当时，后唐政府为了防御北方契丹国的侵扰，把大部分中央禁军布防在幽州和并州。借口备边，石敬瑭请求朝廷增兵，又要朝廷替他向河东富裕人户征粮。另处还向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征收五万匹绢送给他的总管府，说是用来换买军粮的。还要镇州、冀州（治今冀县）捐献一千五百辆车运粮到他辖内的代州（治今山西代县）。这样，石敬瑭借口防御契丹，向朝廷索要了大量兵力和军粮，并以朝廷的名义搞了许多额外的摊派。这样，石敬瑭不仅获得了好处，又避开了百姓不满的视线，让他们把怨

恨转向废帝。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石敬瑭搞阴谋活动的消息传到废帝耳中，他疑心石敬瑭会造反，于是，调任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领兵镇守代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分割石敬瑭的兵权，并牵制石敬瑭。清泰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癸丑），这天是废帝的生日，废帝设宴庆贺。石敬瑭派老婆晋国公主赴宴，晋国公主就是永宁公主，清泰二年被改封为晋国公主。晋国公主向废帝祝寿完毕，顺便向他辞行。这时，废帝喝得醉醺醺的，对她说："何不多住些日子呢？这样匆匆忙忙地回去，想帮助石郎造反吗？"这下可好，天机泄露。酒醒之后，废帝后悔莫及。石敬瑭听老婆一说，更加紧了造反的准备工作。三月份，石敬瑭将他在洛阳和各地所存的财产全部运到太原，说是用来增补军费的。

废帝也在与近臣商讨制服石敬瑭之策。给事中李崧问计于同僚吕琦，吕琦认为石敬瑭会同契丹结援，建议归还被俘契丹将领，把李赞华送回契丹国内，去争夺王位，并每年向契丹提供礼币十多万缗，抢先同契丹睦邻修好。两人把这个主意对废帝一说，一筹莫展的废帝喜不自禁，连称两人是忠臣，马上要他们起草议和书。可是，当废帝把这个主意对枢密直学士薛文遇一说，薛文遇反对说："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难道不感到耻辱？依历代惯例，我国与契丹议和，契丹则必定向我求亲，皇上能拒绝和亲吗？"废帝一听，主意遂变，急召李崧、吕琦两人，怒斥他们说："爱卿博古通今，该知道为臣当忠诚侍主。朕一女尚幼，卿欲弃之于异国沙漠吗？又欲以养兵之财币输送虏廷，居心何在？"李崧、吕琦两人吓得汗流浃背。不久，废帝将吕琦降为御史中丞。可怜李崧、吕琦两人好心不得好报！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和亲之事。这里补充一下，上文所说的李赞华是已故契丹国王阿保机长子突欲。阿保机死后，述律太后执政，立次子德光为王。突欲怨恨便逃到后唐。这的确是废帝可以利用的一个人，可惜他一直没有利用。

五月份，石敬瑭为了彻底摸清废帝的底细，又故伎重演，一再上表废帝，声称自己身体十分虚弱，不能胜任河东节度使的重任，请求调往它镇。废帝不知其计，想把石敬瑭调任为天平节度使，镇守郓州（治今山东东平）。李皓、李崧、吕琦等大臣坚决反对，薛文遇私下对废帝说："众人各为自身计，都不肯说真心话。臣认为石敬瑭调任也反，不调也反，其造反之时近在旦夕，皇上不如先发制人。"废帝认为薛文遇是辅佐贤臣，立即下诏调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以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任命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去督促石敬瑭到郓州上任。在此紧要关头，石敬瑭同将佐、幕僚商量说："自从先帝授我河东节度使以来，时日已久。单说去年当今皇上授我此职时，亲口答应我终身不调离，今无故自食其言，恐怕果真是象今春寿宴上说的那样，怀疑我造反了。我石某本不想作乱，可朝廷逼人太甚，我能束手受擒吗？"幕僚段希尧、节度判官赵莹主张遵命赴任。都押牙刘知远说："明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士卒归心，兵强马壮，又据战略要地，若起兵举事，帝业传檄而定！岂能因一纸诏书而自投虎口？"掌书记桑维翰说："皇上初即位时，明公入朝，皇上难道不知蛟龙不可放深渊的道理？然而，皇上还是授予明公河东节度使之要职，这是老天要成全明公啊！先帝遗嘱愍帝继位，皇上却以庶孽篡立，人心不附。明公乃先帝爱婿，皇上却以反逆待公，此过岂能宽恕？明公要为自身安危着想那！契丹国王素与先帝约为兄弟。今契丹人近在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应州（治今应县），公如果能推心屈节事奉契丹，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于是，石敬瑭决定造反。刘知远，突厥族后裔沙陀部人，不知何时起迁居太原，少与石敬瑭皆事明宗，成为石敬瑭手下的一员亲信干将，后来做了后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桑维翰，河南人，长得很丑，身短而头长，少有宰相之志，后来进士及第，被石敬瑭辟为河阳节度掌书记，成为他的主要谋臣。

石敬瑭上表废帝，指责他作为养子，不能继位，请立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益是明宗第四子。废帝当然不肯，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并调兵遣将，讨伐石敬瑭，任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都署，前任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阵使，统兵三万驻扎晋安乡（在今太原市南）。七日，各地政府军云集太原周围，石敬瑭急忙密派使者向契丹求援，让桑维翰起草议和书，表示向契丹王称臣，并以父礼相待，称契丹王为父皇帝，并约好事成之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雁门关西雁门山）以北诸州土地给契丹。刘知远觉得称父割地太过份，说："称臣可矣，认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刘知远毕竟还有些人的尊严、民族正义感和责任感。然而，石敬瑭一心想着做皇帝，哪里听得进！据载，石敬瑭当时四十五岁，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三十四岁。老子比儿子小十一岁，真是闻所未闻！耶律德光接书一看，大喜过望，立即复书石敬瑭，许诺到八月份时倾国赴援。

八月三日（己未），张敬达开始向太原发起攻击，筑长围困城。石敬瑭命刘知远为马步军指挥使，负责守城重任。刘知远严明军纪，身先士卒，因而兵无贰心，奋勇杀敌。石敬瑭也亲临城上，指挥作战。刘知远说："我看张敬达高垒深堑，欲为长久之计，这种消极围困的办法，没有什么害怕的。守城一事，有我知远一人就可。愿明公派间谍去加强外事，联络契丹，巩固外援，瓦解敌军。"石敬瑭拉着刘知远的手，赞叹不已。废帝听说契丹要派兵支援石敬瑭，就一再催促张敬达猛攻太原。张敬达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发起攻击，可连连受挫，唐军开始泄气。刘知远虽然暂时守住了太原，可一座孤城毕竟难守。不仅将士们体力日衰，而且城中储粮日乏，因而，城中的境况也一天天窘迫起来，现在的希望是契丹援兵快些来，可这胡人会不会不讲信用呢？石敬瑭、刘知远等人

开始焦急起来。按理说，唐如能抓住时机，一鼓作气地继续攻城，攻陷太原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为人猜忌、不讲信用的废帝早已失去人心，文武大臣庸庸碌碌，对于石敬瑭造反大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尤其是那些骄兵悍将，各怀鬼胎，企图篡权夺位者大有人在，有几个愿意拼死拼活地为废帝卖命？自五月至八月，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雄义都指挥使安元信、振武戍将安重荣、彰圣指挥使张万迪等将领相继叛降石敬瑭；其次，后唐政府对契丹毫无戒备，在雁门关诸路险要处竟无一兵一卒把守，再加上统帅张敬达采取消极围城的保守战略，所以，强大的唐军在太原城下，拖延时日，贻误了战机。

九月，契丹国王耶律德光终于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杨武谷（在今山西原平县西北）向南进发，旌旗绵延五十余里，一路并无伏兵堵击。后唐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望风自守。十五日（辛丑），耶律德光兵临太原，于汾水北岸的虎北口（在今太原市北）安营扎寨。耶律德光派人对石敬瑭说："我想今日就去破敌，可以吗？"石敬瑭急忙派人去告诉他："敌军兵强，不可轻敌，等明天议战也不为晚。"石敬瑭的使者还没有到达，耶律德光就已经与唐将高行周、苻彦卿交兵，石敬瑭派刘知远带兵助战。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率步兵部署在太原西北山下，耶律光派轻骑三千直犯其阵，又佯装败退，唐兵见其老弱疲惫，就争着追赶。至汾水，契丹兵渡水北去，唐兵沿河两岸继续深人，忽然，契丹伏兵自东北面杀过来，把唐兵截断为二，北岸的步兵多被斩杀，南岸的骑兵慌忙退回晋安寨。契丹乘胜追杀，唐兵大败，死亡步兵近万人，幸亏骑兵生还。张敬达收拾残兵败将退保晋安，契丹兵也暂时退回虎北口。这天晚上，石敬瑭出城北门，拜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拉着石敬瑭的手，大有相见恨晚之叹。石敬瑭问耶律德光："皇帝远来，士马疲惫，却马不停蹄地与敌军交战，大获全胜，这是为什么？"耶律德光回答说："我启程南来之时，认为唐兵一

定在雁门关诸险要处埋有伏兵，以阻止我军南下。我派人侦察，并无发现有埋伏，就认定大事必成，因而长驱直入，两军遭遇，我军气盛，敌军气馁，如不乘机狠狠打击，旷日持久，胜负就难说了。这就是我一战而胜的道理，不可以兵家劳逸常理论之。”石敬瑭听他一席话，叹服不已。十六日（壬寅），石敬瑭引兵与耶律德光包围晋安寨，在晋安南面安营扎寨，长一百余里，宽五十里，用绳索系铃，饲养军犬，一旦晋安寨中有人外出去联络，则铃响犬吠，根本无法通过。当时，张敬达麾下尚有五万人，马万匹，竟然不知所措，困守孤城，与外界完全断了音讯。废帝大惧，慌忙调兵遣将，派彰圣都指挥使苻彦饶率洛阳步骑屯驻河阳（今河南孟县），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率魏州兵两万进军榆次，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率幽州兵出击契丹兵后，耀州防御使潘环纠率兵出慈州、隰州，共救晋安张敬达主力。二十一日（丁未），废帝下诏亲征。二十四日（庚戌），废帝派枢密使、忠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率兵二万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市），前往督战。二十五日（辛亥），废帝到达怀州（治今河南沁阳），一筹莫展，仍无解围之策，整天借酒浇愁，有人劝他继续北行，他哭丧着脸说：“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十月份，两军相持，无甚战事。

十一月十二日（丁酉），耶律德光于柳林（今太原市附近）扶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亲手脱下自己的袍帽，替石敬瑭穿上。石敬瑭正式割让幽州（治今北京市）、蓟州（治今天津蓟县）、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莫州（治今河北任丘）、涿州（治今河北涿县）、檀州（治今北京密云）、顺州（治今北京顺义）、新州（治今河北涿鹿）、妫州（治今河北怀来）、儒州（治今北京延庆）、武州（治今河北宣化）、蔚州（治今河北蔚县）、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市）、寰州（治今山西朔州东北）、朔州（治今山西朔州）、应州

(治今山西应县)十六州土地给契丹，并答应每年向契丹纳帛三十万匹。十四日(己亥)，石敬瑭改元天福，任命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等等，立晋国公主为皇后。这样，石敬瑭算是当上了后晋王朝的皇帝，不过是个傀儡皇帝。当时，后唐诸道行营都统赵德钧驻扎在团柏谷(在今山西祁县东)，时已逾月，距晋安寨才百里之地，可就是按兵不动，坐视张敬达被困。赵德钧是后唐军队中实力派人物之一，领重兵驻防幽州，负责后唐东北面防御契丹的重任，可他同西北面防务主帅石敬瑭一样，素有阴谋，欲趁乱篡权夺位。西进途中，他一路并吞兵马，并趁机要挟废帝，要求将其养子赵延寿调任为成德节度使，驻防镇州，以便接应自己。赵延寿也是明宗的女婿，拥有重兵。废帝不允，赵德钧仍一再强求，惹得废帝大怒："赵氏父子执意要镇州居心何在？如能击退胡寇，欲代我位，我也甘心。若勾结胡寇，欺君瞒上，恐怕要犬兔俱毙。"赵德钧听说，更是怀恨在心。

闰十一月份，赵德钧密派使者谒见耶律德光，以重金贿赂，请求他立己为帝，联合出兵平洛阳，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并表示愿意让石敬瑭仍做河东节度使。耶律德光也感到自己孤军深入敌境，晋安并未即刻攻下，赵德钧兵力强大，唐军另一大将范延光在己东面，各路援军正云集而来，所以，他想答应赵德钧的要求。消息传到石敬瑭耳中，还不差点把他吓死？在目前战事胶着状态，哪一方得到契丹的援助，哪一方就准能赢。石敬瑭火速派桑维翰去拜见耶律德光。桑维翰说："大国举义兵来救孤危，一战而使唐兵大败，退守弹丸之地，粮尽力竭。赵德钧父子不忠不信，素怀异志，又畏大国之强，他静观其变，见危不救，非以死殉国之人，何足敬畏！大王怎能信其虚妄之辞，贪毫末小利，而弃垂成之功！我大晋王朝欲得天下，将尽我国之财以奉大国，非其小利可比。"耶律德光说："我非背信弃义，但兵家权谋千变万化，我不得不防着

点。”桑维翰说：“大王以信义救人之急，世人瞩目。今为何出尔反尔，使大义不终？臣认为不该如此”。说完，跪于帐前，自旦达夕，涕泣号哭，如丧爹娘。耶律德光终于答应了桑维翰，手指帐前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许石郎，除非石烂，否则，永不悔改！”

唐军统帅张敬达所部五万人被围晋安，自九月至闰十一月，已近四个月。高行周、苻彦卿几次引骑兵出战，试图突围，都未成功。援兵迟迟不来，粮草俱竭，不得不削木淘粪以喂马，甚至到了马相食的地步，一旦饿死，将士们就煮来分食。张敬达身为统帅，拥兵五万，马万匹，竟然无所作为，其智谋之不足，可谓甚矣！可他为人刚直，忠君如一，人称“张生铁”。副帅杨光远和大将安审琦劝张敬达投降，他说：“我受明宗和当今皇上厚恩，身为主帅而打败仗，罪过已大，怎么还能叛国投敌！援军马上会到，再坚持一下吧。万一走投无路，诸位斩我首级，自谋出路，也为时不晚。”九日（甲子），杨光远趁人不备，斩杀张敬达，率诸将上表投降。耶律德光收拾晋安近五千战马、五万铠仗，送回国内，把所降将卒移送给石敬瑭。随后，耶律德光和石敬瑭挥师南下，后唐各路援兵皆作鸟兽散，或逃或降。至上党（山西长治），耶律德光举酒与石敬瑭说：“我远来徇义，今大事已成。我若继续南下，河南人们必定大为惊慌，你自领汉兵南下，百姓就不会太恐惧。我让太相温带五千骑兵送你到黄河边，谁愿意过去，就听其自便。我暂且留在此地，等你音讯，一旦有险，就去救你。等你夺取了洛阳，我就北归”。说完，这两个假父假子竟然执手相泣了好一会，约好“世世子孙勿相忘”。

再说废帝北上亲征，停驾怀州，未能扭转局势。晋安失陷后，他吓得魂飞天外，匆忙南撤。十八日（壬申），至河阳，试图垂死挣扎，无奈大势已去。二十三日（丁丑），至洛阳仍是四面楚歌，惶惶终日。二十七日（辛巳），带着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

以及宋审虔等将领登玄武楼自焚身亡。这日晚上，石敬瑭杀入洛阳，正式作了后晋王朝的皇帝。

这就是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的前前后后。这十六州以幽州、云州为中心，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幽州在辽时也叫燕京，北宋末还建立过燕山府，因此幽云十六州又叫燕云十六州。

（易图强）

参考书目：

《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桑维翰传》、《唐庄宗本纪》、《唐明宗本纪》、《唐愍帝本纪》、《唐废帝本纪》、《刘知远传》

《通鉴纪事本末》：《石晋篡唐》

《资治通鉴》：卷 278—卷 280

《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契丹传》、《张敬达传》

契丹灭晋

耶律德光得知自己的臣儿石敬瑭攻下洛阳，正式作了大晋王朝的皇帝，也就从上党暂时回国去了。这是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年底的事情。

耶律德光得到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和每年三十万匹帛的岁献，以及对后唐作战中缴获的大量战利品，使契丹国的疆域扩大，国力大大增强。后晋天福三年，耶律德光建契丹国号为辽，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并实行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改革。辽逐渐成为十世纪我国东北至北部的一个最强大的王朝。

耶律德光的臣儿石敬瑭攻下洛阳后，见洛阳宫室残破，迁都汴梁（今开封市）。石敬瑭当然想安安稳稳地坐天下，可他办不到。他这个大晋的皇帝是靠耶律德光扶立起来的，还不得受耶律德光的摆布？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夫之这样评论石敬瑭：“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惟契丹之虚声以恐喝臣民而已……惟其无以自主而一倚于契丹，故人即持其长短以制之。”这就一针见血地刺中石敬瑭的要害：狐假虎威、俯仰于人。石敬瑭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从不亏待耶律德光。入洛之后，石敬瑭派大臣赵莹向耶律德光致谢。天福三年，又派宰臣冯道、左仆射刘昫等人持节册立耶律德光及其母氏族徽号。使节携带卤薄、仪仗、法服、车辂等物，在契丹国内为耶律德光举行册立大礼。耶律德光大喜，遣使奉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又让石敬瑭不必上表称臣，来往书札用家人礼即可，可以只称“儿皇帝”。石敬瑭认为这

是主子对自己的莫大恩赐，自然感到无比荣幸，又送重金厚帛表示感谢。契丹国一有喜庆、吊唁之事以及岁时节日，石敬瑭从不怠慢。然而，耶律德光还是要百般挑剔，一有不尽人意之处，就遣使来把石敬瑭训斥一番，而石敬瑭还是屈己侍奉。总之，石敬瑭是个实实在在的傀儡，地地道道的奴才。

可是，奴才的卑躬屈膝并不能消除主人的无穷贪欲，豺狼终竟想吃掉绵羊。耶律德光正积极蓄积着力量，等待有利时机。

石敬瑭晚年，主仆两人的关系恶化起来。石敬瑭有一员藩将，叫安重荣。此人朔州（今山西朔县）人，有勇力，善骑射，早年为后唐振武巡边指挥使。石敬瑭反唐时，他投靠石敬瑭。后晋建立时，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镇守镇州（今河北正定）。安重荣以一个下层军官暴至富贵，见后唐废帝李从珂，后晋皇帝石敬瑭都以藩镇之将做上了皇帝，就常对人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为之耳！"遂怀篡夺之志。安重荣是个跋扈的武夫，可他不乏爱国心和民族气节，他对石敬瑭割地卖国，称臣子之事感到愤怒，常讥笑石。每见契丹使节，必箕踞谩骂，甚至暗中刺杀。又招诱契丹境内的吐谷浑人，吐谷浑酋长白承福率本族千余帐投奔安重荣。吐谷浑原本在今山西、河北与内蒙古交界一带游牧，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后，吐谷浑也就隶属契丹。吐谷浑不堪契丹虐待，思归中原。安重荣正好要招兵买马，就把这股部族招诱去为他卖命。天福六年夏，安重荣把路过他镇州的契丹使者拽剌抓起来，又派兵攻夺契丹幽州南境，屯军博野（今河北蠡县）。并上表石敬瑭，长达数千言，内容大抵是斥责石敬瑭对契丹俯首帖耳，主张联合吐谷浑、突厥、党项等族力量一起讨伐契丹。安重荣所作所为既令石敬瑭十分恼怒，又惹得耶律德光大动肝火，耶律德光连连遣使斥责石敬瑭。十二月，安重荣纠集其境内饥民，聚众数万，举兵南向汴梁。天福七年正月，安重荣被部将杀死。石敬瑭让人把他的头颅刷上油漆，用盒子装着送往契丹，向耶律德光邀功请罪。

石敬瑭本认为替耶律德光除掉了一大仇敌，会得到耶律德光的欢心。可哪里想到，耶律德光仍然找他的不是。耶律德光以后晋招纳吐谷浑为借口，遣使来责骂石敬瑭。这吐谷浑族原本附安重荣，后被刘知远诱骗过去。刘知远是石敬瑭的一员干将，此时正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拥有重兵。令石敬瑭遗憾的是此人也有野心，是位危险分子。石敬瑭上有主子压力，下有藩将离心，真不知如何是好，忧郁寡欢，五月，染疾上身，六月十三日（乙丑），驾崩，享年五十一。

石敬瑭死时，一子尚幼，宰臣冯道和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拥立石敬瑭侄子石重贵为帝，是为晋少帝，史称出帝，少帝这年二十九岁。晋少年比起石敬瑭来更加昏庸无能，朝廷更为腐朽脆弱。将相大臣尸位素餐，方镇诸将横征暴敛。老天也不争气，旱灾、蝗灾双管齐下，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天福八年灾情特别严重，单在这年九月，就有二十七郡发生蝗灾，饿死几十万人。

契丹眼看着后晋国内沸沸扬扬，就想趁火打劫。卢龙节度使、燕王赵延寿企图做中原的皇帝，一个劲儿地催促耶律德光赶快南侵。赵延寿这个人就是后唐大将赵德钧的养子。赵德钧曾想联络耶律德光反唐，曾遭拒绝。后唐亡后，父子两人被押送至契丹。赵德钧被述律太后奚落嘲笑一通，不久郁郁死去，而赵延寿却心安理得地做了契丹的大官。

促使耶律德光正式决定南侵的有两个人物，一是石敬瑭的儿女亲家杨光远，一是晋少帝的宠臣景延广。杨光远，就是先前杀后唐统帅张敬达投降石敬瑭的那一位。他以迎降之功和平定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叛乱之功，受到石敬瑭的宠信，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晚年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镇守青州。可杨光远是位不安分的家伙，他勾结契丹，阴谋夺位。少帝即位后，他与实权派人物景延广大闹不和，于是，向耶律德光诉说晋少帝的不是；又说

大饥之后，国用空虚，此时一举可以消灭后晋。耶律德光获悉这个情报，并得到杨光远这个内应，南侵的胆量就更大了。景延广，即是上文所述与冯道拥立石重贵的那个人。石敬瑭在位时，景延广为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天平节度使。少帝初即位，任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以拥立少帝之功，居功自傲，不可一世，力图树威专权。少帝即位后，大臣们认为按规矩少帝要奉表称臣于耶律德光，惟有景延广一个人表示反对，他认为致书称孙即可，不要称臣。大臣们明知这样做会得罪耶律德光，但慑于其威，只好按他的意见办。耶律德光览书大怒，遣使质问晋廷："为何不事先禀告我就擅自立帝？"景延广答复时又出言不逊。更有甚者，他肆意侮辱契丹使者乔荣。乔荣原是后唐河阳牙将，后从赵延寿入契丹，被任命为回图使，即商务代表，往来于两国之间贩运、贸易，在汴梁建有邸店。少帝即位后，景延广劝说少帝拘捕乔荣下狱，没收他邸店中的货物，又杀尽在后晋国内作生意的所有契丹人，抄没他们所有的财产。在大臣的劝说下，少帝释放了乔荣，遣送回国。景延广对乔荣说："你回去以后，转告你们国王：先帝为你朝所立，故称臣奉表，而当今皇帝为我朝所立，本不关你朝事，但看在先帝与你朝订立过盟约的份上，所以还是向你朝通告一下。为邻称孙，已经足够，决无称臣之理！你朝国王勿信赵延寿狂言而觊觎中原。我国士马精良，这是你耳闻目睹的。爷爷有怒就来战吧，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将来爷爷被孙打败，贻笑天下，不要后悔。"乔荣害怕回去被治罪，又担心口说无凭，就说："先生这一席话，我是记不住，就请先生写在纸上吧。"景延广照办。乔荣回去把纸条转交给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勃然大怒，决定发动侵掠战争。

耶律德光征集燕云诸州兵五万人，拨给赵延寿统率，向他许愿：征服中原后立他为帝。赵延寿欣喜若狂，使全身解数为耶律德光卖命。后晋朝廷察知契丹与杨光远勾结，遣专使到南乐（今

属河南），就近征调兵马防御契丹。

开运元年（944年）正月一日（甲戌），契丹前锋赵延寿寇沧州，二日（乙亥），逼向贝州（治今河北南宫）。贝州是水陆要冲，为后晋军粮储备重地。当时贝州守将永清节度使王令温回朝，前任复州防御使吴峦担负起守城重任。吴峦体恤士卒，指挥军民顽强抵抗，打退了辽兵的进攻。可是，吴峦系一介书生，又单马赴任，手下无可用之将。下级军官邵珂骗取吴峦的信任后，叛国投敌，引辽兵由南门入城。吴峦苦战力尽，投井死，城中军民万人死难。

契丹攻陷贝州，便大举南犯，从雁门关到恒州（治今河北正定）、邢州（治今邢台）、沧州诸道，兵分几路向南推进。后晋朝廷派老将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统率禁军，抵御贝州来犯之敌。耶律德光兵临邺都（今河北大名）城下时，晋少帝下诏亲征，任命景延广为御营使，前任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当时，用兵方略、号令都是景延广一人把持，他颐指气使，凌侮诸将，就是少帝也对他奈何不了。景延广毫无指挥战争的经验，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怎能不误大事？少帝又任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为副使。晋少帝至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遣使致书耶律德光，请求媾和修好，遭到拒绝。

辽军由后晋降将、博州刺史周儒为向导，从马家口渡过黄河，攻郓州（治今山东东平），试图与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会合。杨光远已在青州起兵反晋。晋廷急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让怀率兵一万阻击，沿河水陆俱进。当时，高行周部在戚城（在今河南濮阳县北）被辽兵围困，景延广却命令各将分地守御，不去援救，高行周部几乎全军覆灭。李守贞部抵达马家口时，辽兵营垒未完，主力留守河西，数千艘船正运来兵粮。李守贞趁机发起攻击，辽兵大败，溺死者数千人，俘斩数千人，西岸辽兵恸哭撤走。三月一

日（癸酉），耶律德光率兵十多万屯于澶州城北，准备与晋军决战。高行周部前军在戚城南面与辽兵激战一下午，互有胜负。耶律德光率精兵向晋军中军杀来，晋少帝也出阵迎战。耶律德光见晋军人多势众，好生奇怪："杨光远说晋兵半数已饿死，哪来这么多兵？"耶律德光以精骑冲击晋军两翼，只见晋军万弩齐发，飞矢蔽地，辽兵不得不退却。耶律德光又攻晋军东翼，仍未能成功。苦战至黄昏，两军死伤不可胜数。黄昏后，耶律德光终于引兵退去，在三十里外安营扎寨。三日（乙亥），撤兵北去，兵分两路，一路出沧州（治今冀县），退往辽境。景延广疑其有诈，不敢乘胜追击。晋军也鸣金收兵。历时两个多月的契丹第一次南侵被击退了。

此后九个月，两国无甚战事。晋廷在这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调整人事。免去景延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之要职，外调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官场失意，又见契丹强盛，担心国破身危，遂日夜纵酒。当初声称要与契丹决战的景延广原来是个怯懦颓废、嗜权如命的庸夫！重新起用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都交给他处理。桑维翰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早就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重威为都招讨使，督十三节度使防备契丹。刘知远也是耶律德光喜爱的人物，他怀有野心，慎守本境，保存实力，坐视契丹蹂躏邻境而不救。第二，为补充国库，朝廷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搜刮民财。使者与地方官吏同流合污，携锁械、刀杖闯人民宅，名为收税，实同抢劫。闹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第三，扩充兵力。把诸州乡兵改编成正规军，号武定军，共七万余人。

十二月，契丹发动了第二次南犯。这次仍以赵延寿为前锋，耶律德光率大军殿后。他们包围恒州，分兵陷鼓城、元氏、栾城、柏乡等县，直抵邢州。河北诸州纷纷告急。晋廷惧辽兵之盛，下令前线诸军稍稍南撤。不料造成极大恐慌，晋军弃甲丢兵，狼狈逃

窜，一路焚掠，至相州（治今安阳），仍溃不成军。开运二年正月，辽兵陷邢州、洺州、磁州，沿途杀掠殆尽，逼进邺都境内。十五日（壬子），晋将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大军屯于相州安阳水南面。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兵前往侦探，至邺县，准备渡漳水而进，不料与数万辽兵遭遇。两将且战且退，至榆林店，辽兵铺天盖地而来，晋军驻足布阵苦战，双方伤亡惨重。面对十倍于己的辽兵，二将毫不畏惧，奋勇冲杀，相约以死报国。眼看夜幕降临，安阳诸将仍不见皇甫遇回来，非常着急。安审琦请求去支援，身为北面行营马步军都监的张从恩畏敌不许。安审琦率所部骑兵径往救援。辽兵见尘烟大起，以为晋军主力赶到，解围而去。正在邯郸的耶律德光闻讯，逃往鼓城。张从恩不准追击，反而主张退兵黎阳仓，倚河而守。不待诸将商议好，张从恩就部署行动，造成混乱。幸亏相州守将符彦伦当机立断，设疑兵迷惑辽兵，赵延寿才引兵北退。

晋少帝下诏亲征。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马全节提议趁辽兵立脚未稳之机，大举袭击幽州，获得少帝的赞成。幽州（今北京）为辽国南京，即南面都城。二月十二日（己卯），马全节等率军依次北进，十九日（丙戌），诏令顺国节度使、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以本道兵会同马全节诸军共进。

赵延寿引辽兵经恒州北返，途经祁州城下，祁州刺史沈斌出兵堵击，被辽兵截断归路。城中所剩守兵不多，赵延寿一面攻城，一面亲到城下招降，沈斌义正辞严地答道："你忍心残害父母之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何脸面见人？我沈斌宁可血战到底，以身殉国，也不效你所为。"奋战一昼夜，次日城陷，沈斌自刎而死。三月九日（乙巳），杜重威、马全节诸军在定州（治今定县）会军。十四日（庚戌），晋军向辽兵发起进攻，辽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投降，十八日（甲寅），攻占满城，俘获契丹酋长没刺及所部二千人。十九日（乙卯），攻占遂城。正在晋军节节胜利之时，一个辽军降

兵报告说耶律德光在虎北口，正准备率八万余骑反击，杜重威怕得要命，赶快撤兵退保泰州。二十二日（戊午），辽兵至泰州。晋军继续南撤，退到阳城（河北清苑）。二十四日（庚申），辽军主力抵达阳城。两军交战，晋军追杀辽兵十余里，辽兵渡白沟而去。二十六日（壬戌），晋军结阵南撤，契丹铁骑汹涌而来，晋军又停下来大杀辽兵一阵。这一天，晋军人马又饥又渴，勉强行军十几里。二十七日（癸亥），晋军至白团卫村，不得不安营扎寨。辽兵重重包围晋军，又出奇兵从营后断了晋军的粮道。饥渴难忍的晋军在营中打井取水，眼看井中来水了，不料塌方井坏，晋军只得取井中泥土，用帛包着，绞汁而饮。至天亮，风势特猛，破屋折树，耶律德光坐战车指挥作战，大声吆喝："晋军主力在此，把它消灭掉，然后直捣大梁！"大梁就是后晋的都城汴梁（河南开封）。接着，耶律德光下令号称"铁鹞"的精锐骑兵下马清除晋军设置的障碍物，持短兵击杀晋军，又顺风纵火助其攻势。晋军主帅杜重威竟然甘愿挨打，不准反击突围。士兵们无不愤怒，大喊："主帅为何还不下令攻击？让弟兄们白白送死！"诸将也纷纷请战。杜重威说："等风小了再说。"马步都监李守贞说："敌众我寡，借助风沙混战才可脱险。大风会助我而胜。若等风停，我军早已束手就擒。"说完，高声呼喊："诸将齐心杀贼！"又对杜重威说："令公善于守御，就让我率中军去决一死战吧。"马军左厢都排阵使张彦泽和大多数将领也主张风停以后再出击，马军右厢副排阵使药元福说："敌军以为我军不会逆风作战，我们偏要来他个出其不意，方可转危为安。"马步左右厢都排阵使符彦卿也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以身殉国。"于是，符彦卿、张彦泽、药元福和左厢都排阵使皇甫遇四将率精骑出西门突击辽兵，诸将紧紧跟上，辽兵被迫后退数百步，符彦卿等率万余骑兵纵横冲杀，夹着北风，尘土飞扬，地动山摇，在白昼仍昏晦如夜。李守贞令步兵拔掉营前障碍物，冲杀助战。步骑俱进，杀得辽兵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辽

军丢弃战马铠仗无数，一气跑了二十余里，直到阳城东南河岸，仍惊魂未定。杜重威遣精骑乘胜追杀。耶律德光坐车中逃了十几里，又换上一只骆驼，骑上逃命。晋军诸将主张继续穷追，统帅杜重威说："遇贼被劫，幸而没有送掉性命，何必赶上去讨还衣包，惹贼人发怒！"副帅李守贞说："两日以来人马甚渴，今暴饮之后，脚重难行，宜收兵回定州，方为上策。"于是，晋军退还定州。

耶律德光逃回幽州，才算立稳脚跟。耶律德光差点作了俘虏，大发雷霆，对各级将领各杖打数百，只有赵延寿一人幸免。二十九日（乙丑），辽兵从定州境内全部退回辽境。四月十六日（辛巳），晋少帝也从澶州返京，三天后，返回汴梁。经过四个月的交战，契丹的第二次南侵好歹还是被击退了。

后晋接连两次打退契丹的侵掠，尤其是阳城之捷给契丹以沉痛打击，晋少帝由此滋生骄志，以为天下无事了。他扩建宫室，搜罗四方珍奇玩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又格外宠赏优伶。优伶，指伶官，即戏子。皇帝宠爱伶官和伶官干政是五代史上的突出现象，欧阳修曾专门写过《伶官传序》，痛斥伶官。桑维翰对少帝宠信伶官不满，上谏说："陛下亲征胡寇时，前线战士受了重伤，赏赐也不过帛数端，而在谈笑间往往赐给伶官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如令战场将士见了，能不感到失望吗？他们会说：我们冒枪林矢雨，冲锋陷阵，折筋断骨，难道不如一谈一笑之功！这样，士卒解体，军心溃散，谁来保家卫国？"桑维翰是个民族败类，可他这一席话句句在理，少帝不听。少帝这时候宠信的大臣是冯玉，冯玉是个阿谀奉迎的家伙，原为户部尚书、枢密使，这年八月份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乘势弄权，贿赂公行，因而朝政更坏。桑维翰受到冯玉、李守贞和宣徽北院使李彦韬的排挤，被少帝罢黜枢密使、中书令的职务，降为开封尹。桑维翰遂称足疾，杜绝宾客，不问朝事。

后晋这一批君臣正在夺利争权，境外的契丹却正在积极准备

发动第三次侵掠。本来，契丹连年入寇，接连失败，辽国也充满反战情绪。有一次，述律太后问儿子耶律德光："如果汉人为我主，行不?"耶律德光说："不行。"述律太后又问："那你为何想当汉主?"耶律德光说："石氏忘恩负义，不能容忍。"述律太后说："你即使得了汉地，也不能住在那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悔也来不及啊。"述律太后又对文武大臣说："汉儿怎么会一直睡眠不醒呢？自古以来，只闻汉人与胡人讲和，不闻胡人与汉人议和。石氏汉儿如能回心转意，我愿意同他媾和。"耶律德光听不进母亲的忠告，仍然决定对晋用兵。

这次南犯，耶律德光接受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变得狡猾起来。他指使赵延寿伪降后晋，并送假情报引诱晋廷。开运三年七月，一个从幽州来的人在汴梁传言赵延寿有意归国。枢密使李崧、冯玉信以为真，赶紧命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致书赵延寿，相约议和。九月，耶律德光又让其瀛州刺史刘延祚致书后晋乐寿监军王峦，谎称举城投降。刘延祚信中说："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城契丹守兵不满千人，请晋廷派兵袭击，我为内应。又今秋多雨，自瓦桥（即瓦桥关，在今雄县西南）以北积水无际，耶律德光即使闻关南有变，而被潦水阻隔，也不能及时赶来相救。"王峦与杜重威屡奏朝廷可乘机偷袭契丹瀛州、莫州（治今任丘），深州慕容迁献《瀛莫图》。冯玉、李崧又信以为然，欲发大军接应赵延寿、刘延祚两人。十月十四月（辛未），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统率大军北上。晋少帝下诏虚壮军威说："此行先收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由于自六月以来，一直下着大雨，给行军及后勤给养带来许多困难。

杜重威、李守贞于广晋（今河北大名县东北）会师北上。杜重威蓄谋夺权，借口"深入虏境，必资众力"，频频要他老婆宋国长公主向晋少帝请求增援兵力，晋少帝就把禁军全部拨给他。宋国长公主是石敬瑭的妹妹，晋少帝的姑母。十一月十日（丁酉），

晋军抵达瀛州，只见城门洞开，寂若无人。一打听，原来辽将早已主动撤离。杜重威派马军都排阵使梁汉璋率骑兵两千追赶，至南阳务，与辽兵遭遇。梁汉璋以寡敌众，苦战一天，中箭阵亡。杜重威不仅不发援兵，反而引兵南撤。当时辽国控制的束城等几个县求降，杜重威等人不予接受，却焚其庐舍，掠其妇女而还。耶律德光见晋将中其奸计，遂率主力自易州、定州向恒州扑来。杜重威率大军退至武强，闻讯想经冀州、贝州南下，恰好彰德节度使张彦泽从恒州率军来会，声言辽兵可敌。杜重威便派张彦泽为前锋，再向恒州进发。二十七日（甲寅），抵达中度桥（在今河南光山县），桥已被辽兵占领。张彦泽率骑兵与辽兵展开一场争桥的战斗，辽兵焚桥而退。两军夹滹沱河而阵。辽兵争桥不胜，又见晋军兵多势众，害怕晋军即刻渡河与恒州兵会合发动攻势，因而想引兵撤退。不想晋军筑垒为持久计，辽军遂据北岸不退。杜重威身为主帅，又为皇亲国戚，率大军滞留不进，诸将也袖手旁观，唯主帅之命是从。身临前线，将帅们竟然整天置酒作乐，罕议军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建议："我军离恒州城近在咫尺，如多以三股木置河中，积薪布土其上，桥可立成。同时密约城中举火相应，夜募勇士破敌营而入，里外配合，敌军必定逃跑。"诸将表示赞成，统帅杜重威认为不可，派李谷南至怀州、孟州去督促军粮。耶律德光以主力阻挡在晋军正面，密派萧翰、刘重进两将率百余骑和老弱病卒迂回到晋军背后，截断晋军的粮道和归路，晋军十分恐慌。萧翰、刘重进两将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栾城之下，城中守兵一千余人束手投降。十二月一日（丁巳），李谷密奏少帝，极言大军危急之势，请求少帝亲征。三日（己未），少帝才知道大军屯留在中度。四日（庚申），杜重威又上奏请求增派兵粮，少帝把守卫宫城的几百人给了他，又下诏要河北各州、滑州、孟州、泽州、潞州调发粮草五十万石支援前线。各州督促紧迫，闹得人心沸腾。五日（辛酉），杜重威又派张祚等人回京告急，这一

行人在归途中被辽兵捕获。从此，朝廷与前线断了音讯往来。

晋军粮道和归路俱被截断，困守中度，一筹莫展。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向杜重威建议："我军距恒州五里，却死守此地，难有作为，营孤粮尽，必定不战自溃。卑将愿率步卒二千为前锋，夺桥开道，令公率诸军随后推进，到了恒州，就有救了。"杜重威同意了，派王清与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宋彦筠在前突围。王清率众奋战，夺桥而进，辽兵抵挡不住，开始退却。不料杜重威拥兵不进。宋彦筠被辽兵击败，浮水抵岸，捡回一条命。王清率部在河北岸力战，双方互有杀伤。王清屡请增援，杜重威始终不派一兵一卒去救他。王清愤怒地对部下说："主帅手握重兵，却见死不救，肯定有野心。我们弟兄要以死报国！"部卒感奋，个个奋勇杀敌。直至黄昏时分，双方仍在厮杀。契丹援兵赶到，王清与部卒全部壮烈牺牲。八日（甲子），耶律德光派兵团团包围晋营，晋军内外断绝，军粮也快完了。杜重威、李守贞、宋彦筠密谋投降契丹，先派亲信去辽营试探，耶律德光谎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怕做不了中原的皇帝。杜重威如能降，就立他为帝。"杜重威喜不自禁，遂决定投降。十日（丙寅），杜重威伏兵营中，召集诸将，向他们出示降表，逼他们签名。诸将惊骇，然莫敢言，只好俯首听命。杜重威立即集合全军，士兵们认为要出战，都十分踊跃，哪知杜重威宣布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投降契丹，士兵们恸哭不已，声震原野。耶律德光要赵延寿穿红袍至晋营抚慰士卒，对他说："这些都是你的人马了。"晋军诸将跑到杜重威马前去问候，也让他穿上红袍在晋军面前示众，杜重威不知大家在戏弄他，还自鸣得意地了不得。赵延寿、杜重威这两个活宝，被耶律德光当猴耍，还以为是莫大的荣耀。

晋军主帅既降，恒州、代州、易州、定州、邢州相继望风而降。耶律德光派降将张彦泽率二千骑兵为前锋，直扑汴梁，一路并无阻挡。十七日（癸酉），自封丘门斩关而入，京城宿卫空虚，

如履无人之境。少帝急得要投火自焚，被亲军将薛超拦阻，只好召翰林学士范质起草降表，向耶律德光称臣孙请罪。张彦泽纵兵大掠，流氓地痞也趁机烧杀抢劫，折腾了整整两日，都城为之一空。张彦泽所居之处，堆满金银财宝，日夜寻欢作乐，出入随从数百人，旗帜上写着“赤心为主”四个大字，见者无不耻笑。军士抓到人，他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只瞋目竖三指，军士们立刻会意是要将人斩为三截，就拉出去断其腰、颈。张彦泽素与阁门使高勋不和，乘醉至高勋家，杀其叔父及弟，横尸门首，士民不寒而栗。又杀桑维翰，并把少帝赶到开封府囚禁起来。少帝与太后李氏所上耶律德光表章，须经张彦泽首先过目。少帝派人到内库去取几段帛，主管人员不给，说：“这不是皇上的东西。”少帝向李崧讨酒喝，李崧推辞不给；派人召见李彦韬，李彦韬也找借口不见。落魂的主子，丧家的狗，还不知新主子怎么个发落旧主子哩，谁人愿意去管少帝？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了，这就是新主子耶律德光。他派人对少帝说：“孙勿忧，我一定使你有饭吃、有衣穿。”少帝这才开心起来，上表连连感谢皇帝爷爷的大恩大德。

耶律德光进抵相州，立即派兵往河阳捉拿景延广。景延广仓猝无所逃匿，于封丘拜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训斥他说：“两国交恶，全由你所致。十万横磨剑在哪儿？”又召乔荣与他当面对质。乔荣就是当年被景延广侮辱的那个契丹回图使。乔荣提起陈年老帐，共有十条，景延广不承认，乔荣就拿出当年景延广书写的纸条，景延广不得不承认。他每承认一条，耶律德光就给他一筹码，至八筹，景延广吓得以面伏地请死。耶律德光派兵把他押送回国，在陈桥这个地方，景延广趁无人注意，扼喉而死。景延广这个人的毛病在于爱吹牛而不实际，又贪财奢侈，但骨头还算是硬的。

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一日（丁亥），耶律德光着貂皮帽子、貂皮大衣，耀武扬威地进入汴梁，百姓莫不惊呼而逃。耶律

德光派人宣告百姓："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会使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我无心南来，是汉兵引我来的。"这自然是骗人的鬼话，不过也有实情，如果不是杜重威等几个卖国贼开门揖盗，他耶律德光能沾到多大的便宜？高勋控告张彦泽冤杀了他家人，耶律德光也知道张彦泽树敌太多、结怨太深，就把张彦泽抓起来，向后晋文武百官宣布其罪过，又问："该死吗？"大家都说："该死。"百姓也争着控诉其罪。三日（己丑），斩张彦泽于北市，京师雀跃，莫不拍手称快，竟至人人争着破其脑，取其髓，烤其肉而食的地步。

七日（癸巳），耶律德光自赤冈引兵入宫，向晋群臣夸下海口说："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当下宣布废东京，降开封府为汴州。九日（乙未），耶律德光改穿汉人服装。又分遣使者，赐诏给后晋藩镇将领。可恨这一帮社稷的保卫者，都纷纷上表称臣，被召者莫不奔驰而来投效。耶律德光召集后晋百官，假惺惺地说："我辽国，幅员数万里，设酋长二十七人治理。今中国之俗异于我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大家明知其意，都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夷夏同心，我们都愿拥戴您为皇帝。"耶律德光故意推辞再三，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二月一日（丁巳），耶律德光戴通天冠，着绛纱袍，登崇元殿，即皇帝位，下诏改后晋国号为大辽国，改辽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大赦天下。耶律德光终于灭亡后晋，当上中原的皇帝。

再说晋少帝被张彦泽赶出宫外，先囚禁在开封府，接着转移到封禅寺，然后，被押送到契丹。至中度桥，见杜重威营寨，少帝惋哀不已，说："我家何负苍天，而为杜贼所破！"至契丹，被迁到建州（在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北宋初年死去。

（易图强）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契丹灭晋》

《旧五代史》：《契丹传》、《晋少帝纪》

《新五代史》：《晋出帝纪》、《景延广传》、《吴峦传》、《安重荣传》

《资治通鉴》：卷283—卷285

《五代史略》（陶懋炳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

刘知远复汴京

契丹灭亡后晋后，一面烧杀抢掠，蹂躏中原人民，一面又发布文告，安抚人心。尤其是对于那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将领，耶律德光是一万个放心不下。进据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没几天，他就分头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招抚藩将。这一批社稷的保卫者，争着上表称臣，只要耶律德光一声召唤，莫不奔驰而至，只有彰义节度使史匡威据泾州拒命，雄威节度使何重建斩契丹使者，以秦州（治今甘肃秦安北）、成州（治今甘肃成县）、阶州（治今甘肃武都东）投降后蜀。后蜀是当时的割据政权之一，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省大部、陕南、甘南一小部分。在这诸多藩镇将领中，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既不对契丹过于俯首帖耳，也不公然抗拒契丹，而采取一种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态度，守御本境，静观局势的发展。这个人就是河东节度使、太原王刘知远。

刘知远，也是西突厥沙陀部人，不知何时其祖先迁居太原，改姓刘氏。史书上说他"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后唐时，与石敬瑭俱事李嗣源。梁、晋争战于德胜时，刘知远舍身救护石敬瑭。李嗣源即位（即后唐明宗）后，石敬瑭把刘知远招在自己麾下，任为牙门都校。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以刘知远为都押牙，视为心腹。石敬瑭在太原策划造反，刘知远和桑维翰是他的左右臂。后唐张敬达大军进攻太原，刘知远以五千之众抵抗住了十倍于己的敌兵。石敬瑭攻占汴梁，当上后晋的皇帝，以刘知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统率禁军。天福三年（938

年)，刘知远与石敬瑭的妹夫杜重威同加同平章事，他因有佐命大功，耻与庸劣无功的外戚杜重威同列，故愤然不乐，拒不受命。石敬瑭大怒，欲罢其兵权，后经群臣劝说，石、刘二人达成妥协，但从此刘知远与石敬瑭离心离德。天福五年，石敬瑭任刘知远为邺都留守，把他调出朝廷，但仍让他兼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天福六年，又改任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完全免除其统率禁军的权力。

刘知远是个有心计，也很手辣的武将。当初，桑维翰向石敬瑭献计，提出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儿称臣，割让土地，刘知远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反对割让幽云十六州土地确实是刘知远远见卓识之处。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招诱吐谷浑族白承福部，刘知远又以重金把他们引诱过去，安置在太原东山和岚石之间，表荐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收其精骑隶属于己。后来契丹入寇，刘知远担心这股外族势力为患，就称这些人通辽谋反，杀白承福及其家族四百余人，尽夺其牲畜财货。契丹侵掠中原，他利用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的有利条件，扩军积粮，固守本境。契丹侵犯河东领土，他就坚决还击。例如，开运三年（946 年）九月，三万契丹兵侵犯河东，刘知远率军于杨武谷（在今山西原平县西北）传捷，斩首七千。但战火如在境外燃烧，他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阳城之役，晋军与辽兵杀得难解难分，他不发一兵一卒救援，却收诸军散卒数千人为己用，由是河东富强位居诸镇之首，步骑至五万人，晋少帝屡诏他出兵配合晋军作战，他虽任北面行营都统，却置之不理，晋少帝不再让他参与军国大计，刘知远不以为意，依然是我行我素。羽毛丰满了的刘知远还怕少帝不成？

开运三年十二月，契丹攻陷后晋都城汴梁。刘知远分兵河东四境，防备契丹。天福十二年（947 年）正月，刘知远派客将王峻

奉三表拜见耶律德光，一，祝贺耶律德光攻占汴梁；二，说明自己不来朝见的理由：太原夷夏杂居，几万大军驻守在境，因而不敢离镇，以免发生意外；三，说明自己没有向耶律德光进贡的原因：本来应该进贡，但契丹将刘九一自土门（即井陉口，在今河北获鹿县西南）西入境，现正驻扎在南川，对太原造成威胁。等这股军队被召还之后，道路畅通了，必定进贡。刘知远的做法显然与众不同，既上表称臣，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上述后两条理由虽然不过是借口，但也合情合理。所以，耶律德光不仅没有生他的气，反而赐诏褒美，称呼刘知远为“儿”，赐给他木拐一根。赐木拐是契丹的习俗，以示优礼大臣，如同汉族皇帝赐给大臣手杖一样。在契丹，只有伟王一人因叔父之尊才得到过木拐，可见刘知远是荣耀至极。本来，耶律德光早就青睐刘知远。当年耶律德光护送石敬瑭南下时，曾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这位将军非常勇猛，无大故不要舍弃他。”刘知远不仅勇猛，而且很有谋略，他的做法既未得罪耶律德光，又争取了人心，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刘知远同那帮对耶律德光俯首帖耳的文武百官、藩镇将领不一样，是一位能忍辱负重的、有民族气节和独立人格的大丈夫。不久，刘知远又派北都副留守白文珂向耶律德光贡献奇缯、名马，而他自己仍不去朝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当然明白刘知远在徘徊观望，就让白文珂转问刘知远：“你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还等什么呢？”蕃汉孔目官郭威说：“胡人很怨恨我们。”王峻认为契丹贪婪、残暴，会丧失人心，肯定不能在中原长期呆下去。有人劝刘知远立即发兵夺取中原，刘知远胸有成竹地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军十万，虎踞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

以后形势的发展正如刘知远所言。耶律德光灭亡了后晋，当上了中原的皇帝，十分得意洋洋，广受四方贡献，纵酒作乐，对

后晋文武大臣说："你们国家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国的事情，你们就不知道了。"赵延寿请耶律德光给辽兵发放粮饷，耶律德光说："我国没有这种做法。"于是，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因此，自汴梁、洛阳及郑州、滑州、曹州、濮州数百里之内，财畜殆尽。又括借汴梁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还分遣使者数十人到各州括借钱财，蓄之内库，准备运送回国内。契丹的残暴与贪婪终于激起中原军民的愤慨，纷纷起来驱逐侵掠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先前是反抗后晋暴政，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奋起抗击契丹兵，多者数万人，少者不下千百人。

眼看契丹侵掠者在中原大地上声名狼藉，行将崩溃，刘知远就盘算着怎样实现其称帝中原的计划。当初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契丹使者，以秦州、成州、阶州投降后蜀的时候，刘知远就故作姿态地叹息说："胡虏践踏中原，中原无主，藩镇将领叛降别国，我身为一方诸侯，不能拯民于水火，感到惭愧呀！"刘知远手下的将佐、幕僚深知他的弦外之音，都劝他称帝建国，以号令四方。刘知远认为时机未到，没有答应。耶律德光派兵押送晋少帝北上去契丹国内，刘知远又假惺惺地击腕表示愤慨，声言要出兵井陉（即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为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的要隘），迎归少帝。二月十一日（丁卯），刘知远下令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集合各军，通告将士们出师迎帝的日期。士兵们都说："今契丹陷京城，执天子，天下无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谁？宜先正位号，然后出师。"于是，高呼"万岁"。刘知远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当且建功业，士卒何知！"下令诸将加以制止。五代时期，士兵哗变，拥立将帅称帝的事情司空见惯。士兵们谁不梦想着跟随自己的主将享享荣华富贵呢？十三日（己巳），行军司马张彦威等部属三次上笺劝说刘知远建号称帝，刘知远还是迟疑不决。心腹郭威与都押牙杨邠说："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合，此乃天意。王不乘此机会而取天下，一再谦让，恐怕反而会

失去人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知远听罢，下了决心，十五日（辛未），刘知远于太原称帝，为遮人耳目，收买人心，仍沿用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天福”，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十六日（壬申），下诏：“一律罢除为契丹搜括钱帛者。晋臣被胁迫为契丹使者者赦免不问，令其自寻出路。对契丹人一概格杀勿论。”十八日（甲戌），刘知远亲自率兵东迎晋少帝，至寿阳（今属山西），听说少帝一行几天前就已过了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就留兵戍守承天军（藩镇名，治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而还。口口声声要迎回晋少帝，竟如此凑巧，这又是一幕精心策划的假戏！二十二日（戊寅），刘知远返回太原，打算征取民财来赏赐将士。夫人李氏进谏说：“陛下凭藉河东而创大业，应该体恤民情，广施恩惠，不可夺民生之资。不然，恐怕就不是新天子救民之意了。今府中所有库存可以都拿来慰劳将士。即使赏赐不厚，将士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刘知远大为赞赏：“好！”立即停止征收民财，倾内府蓄积以赐将士。这一举措深得人心，天下闻之，大悦。刘知远所作所为终于赢得了中原军民的信赖，加上他平日的地位和声望，各地抗辽的军民纷纷上表归诚。早在刘知远称帝之前，契丹将领刘愿为保义节度使，为政暴虐，陕州（治今河南陕县）人怨声载道。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两人商量说：“今胡虏乱华，正是我辈奋发有为之时。河东刘公德高望重，名闻天下。我辈如能杀刘愿，举陕州投靠刘公，为天下先，取荣华富贵就易如反掌！”赵晖、侯章两人一致赞成。一天夜里，王晏带着几名勇士潜入府中，偷出武器，斩杀刘愿，悬首示众，又杀契丹监军。众人推举赵晖为留后。刘知远称帝后，耶律德光任命赵晖为保义留后，赵晖斩杀契丹使者，烧掉耶律德光诏书，派赵矩奉表赴太原朝见刘知远，刘知远大喜说：“先生举咽喉之地来归我，天下指日可定了！”赵矩趁机劝刘知远尽快引兵南下，以孚天下之望，刘知远同意了，任命赵晖为保义节度使、侯章为镇国节度使、王晏为绛州防御使

和保义军马步副指挥使。此外，滏阳起义首领梁晖偷袭相州（治今安阳市），杀数百契丹兵，攻占相州，自称留后，上表归诚。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大将药可俦杀节度副使骆从朗，推刘知远所派使者张晏洪代理留后。镇宁节度使契丹人邪律郎伍贪婪、暴虐，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人不堪其苦，下级军官王琼联合起义首领张乙逐杀辽兵，占领南城，奉表向刘知远求援。各地有爱国心的将校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燃烧成熊熊烈火，沉重打击了契丹侵掠者，尤其是汴梁以东起义诸军来势猛烈，攻克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密州（治今山东诸城），直接威胁耶律德光在汴梁的统治，汴梁北面的澶州发生王琼起义，又使耶律德光感到归路有被截断的危险。耶律德光如坐针毡，惊慌失措，大为哀叹："想不到中原人民如此难以制服！"而且，耶律德光曾经垂青的刘知远也称帝太原，招兵买马，人心归服，陕州兵变又为刘知远打通了南下的缺口。所以，耶律德光更是十分的恐惧。刘知远称帝于太原之后，耶律德光赶快任命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企图控制战略要害，防止刘知远南下。

三月三日（戊子），耶律德光召集后晋百官，说："天气就要热起来了，我不能久留此地，想暂时回国省视太后。"百官提议把太后接来，耶律德光说："太后族大，如古柏根，迁移不便。"十五日（壬寅），耶律德光从汴梁启程回国，随从者有后晋百官几千人，诸军吏卒几千人，宫女、宦官几千人，尽载府库珍宝。十九日（丙午），自白马（即白马口，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耶律德光对宣徽使高勋说："我在国内，以射猎为乐，到这里却闷得慌。如能回到国内，我死也无憾。"契丹败退之际，更加残暴嗜杀。四月四日（己未），契丹攻陷相州，兽性大发，见男子即杀，见妇女即抢，又掷婴孩于空中，举刀接之以为乐。高唐英留守相州，搜巡城中，得城中残活居民才七百余人，后来，节度使王继

弘收集城中尸骨埋葬，统计有十万余具。

契丹昭义节度使耿崇美屯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准备向潞州推进（治今长治市）。刘知远闻讯，派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史弘肇率步骑万人前往援救。刘知远获悉契丹准备撤兵北归的情报，决定出兵南下，经略河南，命史经肇为前锋。又派谦万进出兵北方，以分散契丹兵势，配合史弘肇的行动。耶律德光派船数十艘载后晋军械铠仗，自汴渠（水道名，自今河南荥阳县北接黄河）人黄河运往国内，命宁国都虞候武行德率兵一千余人护送。至河阴（今河南孟津东），武行德对将士们说："我们弟兄身陷胡虏，此去将离乡背井。人生一死，岂能作异国之鬼！胡虏肯定不能久留我国，我们弟兄与其去作他乡之鬼，还不如齐心协力，驱逐胡虏，坚守河阳（今河南孟县），以待天命之所归者而臣之，不是很好吗？"将士们都支持他。武行德立即给大家发放武器，杀死契丹监军使。恰好，契丹河阳节度使崔廷勋带兵护送耿崇美到潞州去了，武行德乘虚占领河阳，被部属推举为河阳都部署。刘知远署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十五日（庚午），耿崇美、崔廷勋抵达泽州，听说史弘肇已抢先占领潞州，不敢前进，引兵南退。史弘肇派先锋马诲追击，耿崇美、崔廷勋与契丹奚王拽剌退保怀州（治今河南沁阳）。

耶律德光得知武行德发动河阳兵变，更加恐惧，哀叹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当初，耶律德光为防范后晋藩镇将领起兵反抗，就将他们征调到汴梁，留而不遣；又下令"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可他哪里料到社会下层很快掀起一场汹涌澎湃的反抗斗争，他不得不急急忙忙把藩将派回各镇，可为时已晚。惊悸忧郁的耶律德光至临城，生了病；至栾城，病情恶化，高烧不止，聚冰于胸腹四肢，又嚼食冰块，体温还是降不下来，二十一日（丙子），死去。契丹人剖其腹，倒进

几斗食盐，以防腐烂，载之北去，汉人谓之“帝羓”。

耶律德光死后，契丹诸将拥立永康王兀欲为帝，而赵延寿不知。他自称受耶律德光遗诏，代理南朝军国事，并布告天下，又仍然给予兀欲与其他将领一样的待遇，于是，兀欲对他怀恨在心。赵延寿这个后唐的降将拼命为耶律德光出力，就指望当中原的皇帝，不料耶律德光自食其言，把他当猴耍，赵延寿自然怏怏不乐。现在，耶律德光死了，他想大干一场，可是，契丹人并不信任他这个汉人。五月一日（乙酉），兀欲设宴招待赵延寿、张砺、段凝、李崧、冯道等人。兀欲妻素以兄待赵延寿，兀欲不动声色地对赵延寿说：“妹从国内来了，你想见她吗？”赵延寿毫无戒意地与兀欲离座入室。过了好一会，兀欲出来了，对大家说：“燕王谋反，我把他抓起来了。”又说：“先帝在汴梁时，送我一筹码，许我代理南朝军国事。驾崩前夕，不再有遗诏，而燕王擅自宣布代理南朝军国事，岂有此理？”几天过后，兀欲召集契丹、后晋两国大臣，宣告所谓的遗诏：“永康王兀欲，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

契丹节节败退，又遇国丧，刘知远决定用兵进取中原。关于从何处出兵，将佐、幕僚与刘知远意见各一。将领们主张出师井陉，奔袭镇州（治今河北正定）、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他们认为先定河北，河南则拱手自服。刘知远本人主张自石会出师，经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市）而南下。蕃汉兵马孔目官、副枢密使郭威认为：“契丹主虽死，然其兵力仍然强盛，各据城而守。我军兵出河北，兵少路远，又无接应。如敌兵联合行动，我军必定进退两难。一旦粮尽路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兵出井陉一线是危险的。师出上党一线，山路险峻，沿途粮少民凶，后勤给养无法跟上，这条路线也不可取。近邻陕州、晋州两镇相继归附，师出两镇，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洛阳、汴梁可定。”刘知远说：“爱卿说得好！”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逢吉等人说：“史弘肇大军

已屯上党，胡虏继续北逃，不如出师天井（即天井关，在今山西晋城市南太行山上），奔孟津为好。”司天官奏：“太岁星在午座，不利南行，宜由晋州、绛州（治今山西新绛）抵陕州。”刘知远终于决定走晋州、陕州一线。

十一日（丙申），刘知远从太原举兵南下。十三日（丁酉），史弘肇上奏说已攻克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市）。起初，史弘肇进攻泽州时，刺史翟令奇据城坚守，未能攻下。刘知远以为史弘肇兵少，攻城困难，就想召回史弘肇。苏逢吉和枢密使杨邠说：“今陕州、晋州、河阳都已归化，崔廷勋、耿崇美随时都会逃跑。如果召还史弘肇，河南人心就会动摇，而胡虏的声威，又会壮大起来。”刘知远拿不定主意，派人询问史弘肇本人，史弘肇说：“兵临此地，势如破竹，可进不可退。”三人的意见不谋而合。翟令奇禁不住强大军事压力，不久投降。驻守怀州的崔廷勋、耿崇美和奚王拽剌联合进攻河阳，张遇率兵数千援救，于南阪战死。河阳节度使武行德出城迎战，也遭败绩，于是闭城自守。拽剌要攻城，崔廷勋说：“今北军主力已撤退，得此一城何用？杀一夫犹可惜，何况一城之人呢？”又传来史弘肇已经占领泽州的消息，遂放弃河阳，依然退守怀州。史弘肇引兵向怀州进军，崔廷勋等人匆忙拥众北遁，过卫州（治今河南新乡市），大掠而去。其余留守河南的契丹兵也都望风而逃。史弘肇与武行德会师。史弘肇，郑州荥泽人，为人骁勇，走及奔马，梁末被征为兵，后为刘知远手下一名军校。刘知远称帝于太原时，代州王晖拒命，是史弘肇领兵把他打败，因此拜为忠武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他沉毅寡言，带兵严厉，部属稍不从命，就格杀勿论。士卒所过，犯民田及系马于树者，即斩杀。因而，军中战栗，莫敢犯令。刘知远自太原挥师入洛阳与汴梁，一路无阻，兵不血刃，史弘肇立了很大功劳，深得信赖。可是，攻占汴梁后，史弘肇其暴虐的一面令人发指。

十七日（辛丑），刘知远抵达霍邑（今山西霍县）。二十日

（甲辰），至晋州。二十四日（戊申），绛州刺史李从朗举城投降。二十七日（辛亥），至陕州，保义节度使赵晖亲自为刘知远牵马入城。六月二日（乙卯），至新安，留守西京洛阳的后晋各官前来迎接。三日（丙辰），至洛阳、汴州后晋百官奉表来迎，刘知远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汴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和王淑妃。五日（戊午）刘知远从洛阳启程。十一日（甲子），入汴梁，后晋藩镇诸将相继来降。十五日（戊辰），下诏大赦，契丹任命的各级官职，上至节度使，下到将吏，各安其职，不再变更，复以汴州为东京，改国号为汉，年号仍用天福。这样，刘知远正式当上了后汉朝的皇帝。

（易图强）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契丹灭晋》附《刘知远复汴京》

《新五代史》：《汉高祖本纪》、《史弘肇传》

《旧五代史》：《汉高祖纪》

《资治通鉴》：卷286—卷287

郭威建周

刘知远建立的后汉王朝是一个极其短命的王朝，只维持了近四年的时间，就被郭威建立的后周王朝取而代之。

郭威（904—954年），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人，少孤，依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市）人常氏。潞州留后李继韬招募勇士为军卒，郭威恃勇力应募，时年十八岁。郭威为人负气，好喝酒。潞州城中有一屠夫总爱欺负人，有一天，郭威喝醉了酒，吆喝着屠夫给他砍肉，故意刁难，稍不如意，就破口大骂，屠夫也不示弱，撩开衣服，拍拍胸膛，冲着郭威说："你有胆量，敢把我杀了？"郭威仗着酒意，二话没说，取刀把他杀了，市民惊呼，而他自己却怡然自得，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李继韬看重郭威的侠胆，故意让他逃跑，风声一过，又把他召回去。后唐庄宗灭梁，李继韬遇难，郭威因通晓书算而被补为军吏。他爱读《阃外春秋》，略知兵法，后为侍卫军吏。刘知远为侍卫亲军都虞侯时，十分赏识郭威。刘知远为后晋河东节度使时，郭威随从侍奉，为其心腹。刘知远篡晋建汉，拜郭威为枢密副使。

刘知远建立后汉政权后，立即实施软硬两手策略，一、残酷镇压人民。把各地反抗契丹侵掠者的起义群众视为最主要的敌人，降下旨意：抓到"盗贼"不管"赃物"多少，一律处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逢吉起草诏书"凡是做'盗贼'的，连同四邻同保，统统全族斩首。"因众官反对，仅删掉"全族"两字。有个捕"贼"使者张令柔在平阴县杀掉了十七个村庄的所有居民。卫州刺

史叶仁鲁抓了十几个百姓，硬说是“贼”，割断他们的脚筋，陈列示众。这十几个人痛得遍地打滚，叫喊了几天才断气。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领禁军巡逻京城，抓到嫌疑犯，不问青红皂白，便用割舌、断腿、抽筋、决口、腰斩等毒刑处置。有一天，太白星（金星）在白天出现了，人们传言这是祸乱的预兆，有个人抬头望了一下，被士兵发现抓住，断腰而死。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恐怖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刘知远对于卖国降辽的文武将吏却宽容姑息。委任大卖国贼杜重威为归德节度使，杜重威拒不受命，杀伤很多官兵，最后被迫投降，刘知远仍封他为楚国公，授以冗职，安置汴京。直到刘知远病危，方下令诛杀杜重威父子。又委命卖国贼李守贞为护国节度使，加中书令。甚至对勾结辽朝、兴兵作乱的死人杨光远也要抚恤，赠尚书令，追封齐王，又为他追谥树碑。

刘知远这样做，不外乎是为了做太平天子，可是，他命薄，做皇帝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如从天福十二年（947 年）六月十一日进驻汴京时算起，到乾祐元年（948 年）正月二十七日（丁丑）病死时止，就只有七个多月的时间，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哩。刘知远儿子承祐继位，史称隐帝。隐帝即位时只有十八岁，年青轻佻，狎于近习，专事荒淫，根本比不上老子刘知远。在位三年期间，外有三镇叛乱，内有大臣勾心斗角，终于身败国亡，政权被郭威夺去。

何谓三镇叛乱？三镇叛乱是指晋昌镇（治今西安）赵思绾、凤翔镇（治今凤翔）王景崇和护国镇（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李守贞的联合叛乱，史称三叛连兵。赵思绾原是晋昌节度使赵匡赞手下的一名军校。刘知远在世时，赵匡赞就起兵叛乱。赵匡赞是赵延寿之子，受辽官职为护国节度使。刘知远篡晋建汉后，仍命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镇守长安（今西安）。赵匡赞恐终不为朝廷所容，就起兵降蜀，后被刘知远招抚入朝。隐帝继位后，征调赵匡

赞所部牙兵入京，下级军官赵思绾联合王景崇发动兵变。王景崇原是后晋将领，后投奔刘知远，被任为右卫大将军。赵匡赞反叛，王景崇受命率禁军讨伐，以战功得兼凤翔节度使。隐帝继位后，任王景崇为邠州留后，赵晖为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不满，举兵反叛。原与杜重威同时降辽的后晋宿将、后汉护国节度使李守贞联合赵思绾、王景崇两人，密通辽朝，自称秦王，据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叛。赵思绾、王景崇两人受李守贞官爵，又联合后蜀为援。此为后汉西部三镇叛乱。

后汉朝廷的几位关键人物是：杨邠、史弘肇、王章、郭威、苏逢吉、苏禹珪。杨邠，少为州掌籍吏，长于吏事，但不喜文士，常言："治国的要务不过是实仓廪、强甲兵而已，至于文章礼乐都是虚浮无用，不足介意。"后来他渐渐知道文化有用，叫人抄写史书，想懂点史事，却为时已晚。王章，也是小吏出身，有一套理财的本事，供应军费，从无缺乏，但暴敛盘剥，激起百姓的怨恨。旧时每石粮附加二升"鼠雀耗"，王章改为"省耗"，加到两斗；缗钱原来以八十文算满"陌"，他改为收进时以八十为"陌"，付出时却减少三文；人民触犯了盐、酒、矾专卖禁令，不论多少，都被他处死。王章只知钱粮，鄙视文人，声称："文人连算盘都不会摆弄，于国何益?"因而，对文人出身的官员，他十分刻薄，发放俸禄时，"皆取不堪军资者给之，谓之'闲杂物'；命有司高估其价，估定更添，谓之'抬估'"。史弘肇是个行伍出身的一介武夫，蛮横暴虐更是出了名。他也歧视文士，声言："安朝廷，定祸乱，只须长枪大剑。"苏逢吉，京兆长安人，早年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节度判官，善伺人意，长于谄媚、奉迎，又嗜杀、贪婪成性。刘知远建汉后，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建国之初，制度草创，朝廷大事皆出于苏逢吉。苏禹珪与苏逢吉同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庸庸碌碌，与苏逢吉一个鼻孔出气。这两人虽为文人出身，而无治国安邦之才，只会拍马屁、括

钱财。

苏逢吉为相，选官行贿受贿，又任官太滥，杨邠对此很有意见，上奏弹劾他虚费国用。苏逢吉自然对杨邠不满意。隐帝继位后，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在苏逢吉的授意下，上疏隐帝："今关西三镇叛乱，外御为急。而且，枢密使杨邠、枢密副使郭威皆佐命功臣，官虽贵而家未富，应授以要害大镇。枢密院事情，皇上可以自己裁决。苏逢吉、苏禹珪自先帝时就已任事，所以，皇上也可以交付他们处理。"苏逢吉为什么又要逐走郭威呢？原来苏逢吉随郭威征邺时，曾侮辱过郭威，所以，苏逢吉时刻防着他。杨邠、郭威听说要把他俩贬出朝廷，立即叩见李太后，声泪俱下地说："我们随先帝艰苦创业，不想皇上听信谗言，要把我们赶出朝廷。今三镇叛乱，我们怎能忍心自图安逸，贪恋财富，而不顾社稷安危呢？不让在朝廷任职，就让我们去守护先帝陵寝吧。"李太后大怒，责骂隐帝："二枢密是国家勋旧，怎能轻信人言而弃之！"李太后，即后汉高祖刘知远皇后，太原人，出身农家，通达事理。隐帝不敢得罪母亲，遂罢黜李涛，遣还私第，又重用杨邠、郭威，任命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和同平章事，仍为枢密使，升郭威为枢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从此，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隐帝都让杨邠全权处理。杨邠成了实际上的宰相，又统管军事，执掌军政大权，是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臣。七月，隐帝又加郭威同平章事。这样，原先专管财政的王章和只管军事的郭威也都有了管行政的权力。苏逢吉、苏禹珪虽然名义上仍为宰相，但已无实权，备位而已。

李涛上疏隐帝与郭威、杨邠泣诉太后都以三镇叛乱作为自己立论的一大理由。当时三镇叛乱的消息传到汴京，举朝震惊。隐帝政府遣将讨伐，但不置主帅，因而事权不一，诸将又怯懦畏敌，互相猜防，以致师出无功。昭义节度使常思屯潼关，河中行营都部署白文珂屯同州（治今陕西大荔），都畏惧李守贞，不敢进逼河

中府。凤翔节度使赵晖屯咸阳，按兵不动。永兴行营都部署郭从义和河中行营都监王峻逼近长安，本可一举攻克长安，而两人闹摩擦，势同水火，都不肯进攻。因之，各路讨伐军形成了旷日持久、自相牵制的被动局面。到八月六日（壬午），隐帝不得不任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节制西征诸军。

郭威到了前方，注意收聚人心。交接宾客，或与大将宴语，则褒衣博带；巡视城垒，身临阵前，则幅巾短衣，与众无异；临矢石，冒锋刃，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对立功者，厚加赏赐，对受伤者，则亲加抚慰；还广开言路，不论来人贤与不肖，只要有所建议，就和颜悦色地接待，让对方畅所欲言；人有过失，也从不介意。所以，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愿意为他出力卖命。在战略上，郭威奉行"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把主要力量用来攻击声望最高、兵力最强的李守贞。李守贞久掌禁军，素有威望，因而，自恃功高，以为禁军一到城下，只消他三言两语，就会倒戈投降。不料，后汉官兵一到城下，扬旗击鼓，指名大骂李守贞，守贞大惊失色。为了防止叛军西逃后蜀，郭威亲率牙兵阻击后蜀兵，后蜀兵不战而退。叛军失援，陷于孤立。为了严肃军纪，郭威斩杀了违禁饮酒的爱将李审，又撤换无将才的常思。乾祐二年七月，郭威攻克河中府，李守贞自焚死。长安的赵思绾被迫投降，被处决。十月，赵晖攻克凤翔，王景崇也自焚死。至此，三镇叛乱终于被平定，郭威凯旋回朝。隐帝大加慰劳，赐给他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说："臣受命平叛，至今时已一年，仅克一城，何功之有？而且，臣率兵在外，离不开巩固的后方和充裕的给养，而这些都是朝廷大臣们的功劳，臣怎敢独得赏赐？请赏赐所有有功之臣。"隐帝又让郭威兼领方镇，他谦让说："杨邠位在臣上，未领方镇，臣怎敢领方镇？运筹帷幄，我也不能同史弘肇相比。"九月二日（壬寅），隐帝听从郭威的建议，遍赐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侍卫使共九人，奖品都同郭威一样。隐帝仍想特别

赏赐郭威，郭威又谢绝说："运筹帷幄，靠朝廷大臣；发兵供粮，靠藩镇将领；冲锋陷阵，靠诸位将士。皇上让臣独擅其功，臣如何担当得起！"于是，隐帝加郭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书令；加窦贞固司徒，苏逢吉司空，苏禹珪左仆射，杨邠右仆射；又加天雄节度使高行周守太师，泰宁节度使符彦卿守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忠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铢并兼侍中，加武宁节度使刘赟同平章事，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人得道，人人享福，上起朝廷大臣，下至藩镇将领，都跟着郭威加官受赏，谁不高兴？于是，郭威博得朝廷内外的交口称颂，威望大大提高。

三叛既平，朝廷内部大臣间的倾轧、隐帝及其左右佞幸与大臣间的争斗尖锐起来。

乾祐三年四月，后汉朝廷鉴于契丹人寇，横行河北，藩将拥兵自守，不予抗击的情况，准备派郭威镇守邺都（今河北大名），督导诸藩防备契丹。史弘肇主张郭威仍领枢密使，苏逢吉认为从来就没有这种做法，表示反对。史弘肇说："领枢密使就可以便宜行事，诸军畏服，号令可行。"苏逢吉说："以内制外，合情合理；今以外制内，岂有此理？"最后，隐帝听从了史弘肇的意见，任命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仍为枢密使，又下诏：河北兵甲、钱粮事都受郭威节制。第二天，朝廷大臣宴饮于窦贞固宅邸，为郭威饯行。史弘肇举杯厉声对郭威说："昨日廷议，想不到意见不一！今日敬弟一杯！"苏逢吉也举杯说："意见不一，都是为国家，何足介意！"史弘肇又厉声说："安定国家，只需长枪大剑，用不着毛笔！"从此，将相间隐藏的矛盾公开化。五月十六日（癸丑），王章宴请朝臣，酒酣猜拳行酒令，史弘肇不在行，由身旁的客省使阎晋卿教他。苏逢吉笑着对史弘肇说："旁有姓阎人，就不用担心喝罚酒啦"。史弘肇妻子姓阎，原是酒店里妓女，史弘肇疑心苏逢吉在讥笑他，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苏逢吉并不还口，史弘肇

要揍他，逢吉起身离去。弘肇气不出，取剑要去追杀。杨邠哭着劝阻说："苏公是我朝宰相，又是皇上喜欢的人，公把他杀了，将置皇上于何地？公要三思而行。"史弘肇这才上马回家，杨邠送他到家。从此，将相之间势同水火。隐帝派宣徽使王峻设宴劝和，也没效果。苏逢吉想出镇地方，避开史弘肇，转而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说："我一旦离开朝廷，只消史公一声招呼，我就粉身碎骨了。"王章是这次宴会的主人，自然也怏怏不乐，想求外官，杨邠、史弘肇一再挽留。

不仅将相间的关系闹得很僵，隐帝及其侍从佞幸、外戚集团同朝廷大臣间的关系也在恶化。隐帝即位时只有十八岁，父皇刘知远临终托孤给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四位佐命大臣，让他们辅佐隐帝。李太后也对隐帝严加管教。然而，隐帝并不想做木偶，尤其是平定三镇之后，隐帝力图摆脱约束的心态逐渐强化，常与左右佞幸鬼混取乐。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茶酒使郭允明因谄媚而获宠，隐帝喜欢同他们说隐语、讲脏话，受到太后多次训诫，太常卿张昭远上谏，要他"亲近儒臣，讲习经训。"不仅隐帝左右佞幸日渐用事，太后家人亲戚也干预朝政，杨邠、史弘肇等大臣屡屡对他们加以抑制。太后有一故旧的儿子求补军职，史弘肇怒而斩之。太后弟、武德使李业想做宣徽使，隐帝和太后授意大臣们予以方便。杨邠、史弘肇认为内使官调任有序，不能从外戚超任，就没领这个情。隐帝亲信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久不升官，都怨恨杨邠等人。隐帝服完了三年丧，就听乐观舞，并赐给伶人锦袍、玉带。伶人穿着锦袍，系着玉带，去拜见史弘肇，史弘肇见状勃然大怒，痛斥说："士卒守卫疆场，浴血奋战，还没得过如此贵重的赏赐，你们这些人有何功劳而受赐！"于是，没收归官。隐帝想立自己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杨邠反对。耿夫人不幸去世，很想按皇后礼来安葬，杨邠又不同意。隐帝已二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又是一国之主，自然十分怨恨这些个大臣们

对他左一个不是，右一个反对。有一次，杨邠、史弘肇同隐帝议事，隐帝提醒他们说："慎重点吧，不要让人说闲话！"杨邠公然说："皇上只管闭口，有我们臣子们在，怕什么？"如此目无天子，冒犯龙颜，这还了得！隐帝愤愤不平，左右佞幸乘机进谗说："杨邠、史弘肇等人专权放肆，迟早会作乱。"隐帝哪能不信？一天夜里，隐帝听到作坊里传来铁器的敲打声，疑心有人阴谋作乱，通宵未能入眠。苏逢吉本与史弘肇不和，见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等人恨史弘肇，就向他们煽风点火，说史弘肇的坏话。于是，隐帝与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等密谋铲除杨邠、史弘肇等。商量好了，便去禀告太后，太后说："如此大事，岂可轻举妄动？与宰相商议再说吧。"李业说："先帝曾说：'朝廷大事不可同书生商量，他们怯懦误事'。"太后还是劝他们谨慎从事。隐帝终于火了，气冲冲地说："国家要事，娘们哪里知道！"说完，拂袖而出。

十一月十三日（丙子）早晨，大臣陆续来上朝，忽然，从广政殿冲出几十名士兵，杀死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聂文进急召文武大臣到崇元殿，宣旨说："逆臣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谋反，现已伏诛。朕与爱卿们同喜同庆！"又召诸军将校到万岁殿前，隐帝抚慰说："杨邠、史弘肇把朕当小孩耍，朕把他们杀了。从今，朕就是你们的统帅，你们不会再担忧了。"又召前节度使和前刺史升殿，加以安抚。接着分遣使者领兵捕杀三人的亲戚和同党。遣供奉官孟业携密诏去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南）和邺都，令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杀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杀郭威和监军、宣徽使王峻。王殷是史弘肇的亲信。急诏天平节度使高行周、平卢节度使符彦卿、永兴节度使郭从义、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匡国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虔裕、陈州刺史李谷回朝。

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被杀之后，朝中就剩下苏逢吉一个资格最老了，再加上他凭着阿谀奉迎的本事讨取了隐帝的宠爱，隐

帝自然重用苏逢吉，让他主持枢密院。这样，苏逢吉掌管行政，又执掌军事。隐帝又任命原平卢节度使刘铢代理开封府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权判侍卫司事，内侍省使阎晋卿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的弟弟李业等人又命刘铢杀郭威、王峻家属。刘铢这个人极其狠毒，两家婴儿无一幸免。

十四日（丁丑），孟业到达澶州，李洪义胆小怕事，不敢去杀王殷，反而引孟业谒见王殷。李洪义是太后弟。王殷拘禁孟业，派副使陈光穗送隐帝密诏给郭威。郭威马上召见枢密使吏魏仁浦，给他看密诏，问："怎么办？"魏仁浦回答说："公是国家大臣，今被小人诬陷，祸出意外，即使有理也辩不明，有冤也洗不白。现握强兵，据重镇，不可坐以待毙。"于是，郭威召集郭崇威、曹威和其他将领，告诉他们事变的经过，矫诏说："皇上要杀我们邺都将士。"又说："我与遇难诸公披荆斩棘，随先帝夺取天下。又受托孤之任，竭诚以卫国家。今诸公已死，我怎能忍心独生？你们取我首级去朝见天子吧，我不连累你们。"将领们既愤怒，又感动。郭崇威说："天子年青，这次事变一定是他身边小人所致。如让这些人得志，国家还能安宁？我郭崇威愿随您入朝上诉，扫荡鼠辈，清净朝廷。您不可蒙冤而死，负千古罪名！"翰林天文赵修己也说："无辜而死，有什么用？不如顺从人心，拥兵南下，这才符合天意。"于是，郭威留养子郭荣镇守邺都，命郭崇威率骑兵为前锋。郭荣，即柴荣，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世宗，他本是郭威内侄，后被收为养子。十五日（戊寅），郭威亲率主力南下。

隐帝听说郭威举兵南下，准备发兵迎战。原开封尹侯益献计说："邺都戍兵的家属都在京城，官军与其草率出战，不如闭城自守，挫其锋芒，再让邺都戍兵的家属招诱敌兵，可以不战而胜"。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则认为侯益老而无用，"所言乃懦夫之计"！于是，隐帝派侯益、阎晋卿、吴虔裕和原保大节度使张彦超向澶州进发，阻击郭威。慕容彦超是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

十六日（己卯），郭威至澶州，李洪义接他进城。王殷也来迎接郭威，让自己部队随郭威渡河南下。隐帝派鸾脱来刺探情报，被郭威捕获。郭威给隐帝上表，放在鸾脱衣领里，让他回去呈交隐帝。表中说：臣昨得诏书，引颈待死。然而，郭崇威等将领不忍杀臣，他们说这是皇上身边小人所为，于是，逼臣南下，向皇上申冤。臣求死不得，又无力制止他们，只好南下。臣几天内就会入朝拜见皇上。皇上如果认为臣有罪，臣也不敢逃避刑罚。如果真有奸臣小人，就希望把他们执缚军前，绳之以法，以平民愤，快人心。这样的话，臣必定说服诸军，退归邺都。”十七日（庚辰），郭威向滑州进发。十八日（辛巳），义成节度使宋延渥迎降。宋延渥是刘知远女婿，隐帝的姐夫。郭威取滑州库藏慰劳将士，又说：“据悉，侯令公已督诸军北来。两军一旦相遇，我军迎战的话，就违背了此次南下的本义；不迎战的话，就会被消灭。所以，我想成全你们的功名，你们还是杀了我吧，我死而无憾。”将士们都说：“国家负公，公不负国。所以，我们奋勇争先，如报私仇。侯益之徒哪能成大事！”王峻向军中宣布：“大家要尽力作战，攻下京城以后，十天之内听任大家剽掠！”士兵们为利益所诱惑，欢呼雀跃，踊跃向前。这一天，鸾脱回到了京城。隐帝览表，既悔恨又恐惧，私下对窦贞固说：“这次行动也过于草率。”李业等人请开府库赏赐诸军，苏禹珪不同意，李业说：“相公不要为天子吝惜！”于是，赏赐给禁军每人二十缗，下军每人十缗，将士在郭威处者，就赐给他们的家属，并让家属们劝阻他们停止行动。

十九日（壬午），郭威部队抵达封丘（今属河南），逼近汴京。惊慌恐惧的气氛笼罩着京城，到处呈现一派末日来临的景象。李太后哭哭啼啼地说：“不听李涛的话，要家破国亡了。”慕容彦超自恃其骁勇，向隐帝吹牛说：“臣看北军象蠛蠓一样，不足害怕，臣为皇上生擒其首”。蠛蠓是一种很小的昆虫，又叫醯鸡。慕容彦超退朝后，遇见聂文进，向他打听北军实力和将校姓名，一听，马

上畏惧起来，说："这也是强盗嘛，不能掉以轻心。"隐帝又派左神武统军袁鳷、原威胜节度使刘重进等人率禁军与侯益诸军会师，屯于赤冈（在今开封市东北）。慕容彦超率大军屯七里店（今新乡市七里营）。

二十日（癸未），南北两军于刘子陂（在今封丘县南）遭遇。隐帝想出城慰劳军队，李太后阻止说："郭威是我家勋旧，如果不是大祸临头，怎么会拥兵到此？不要出去，只管按兵守城，并立即下诏劝慰郭威。我观其志趣，他肯定会好言答复，那么，君臣之礼尚能保全。"官兵骄悍无比，太后派人劝诫聂文进："千万不可大意！"聂文进说："有臣在，就是有一百个郭威，也能把他们擒住。臣不须同他们交战，只须一声吆喝，就能把他们吓回去。"这真是吹牛不要脸！

二十一日（甲申），隐帝又想出城迎战，太后一再劝止，不听。两军摆开阵势。郭威告诫部属说："我来诛小人，清君侧，而不是来对抗天子，千万不可抢先出击。"僵持了一段时间，慕容彦超终于沉不住气，率轻骑气势汹汹地杀来。郭崇威与原博州刺史李荣率骑兵迎击。厮杀中，慕容彦超坐骑跌倒，差点被俘，于是不敢恋战，引兵退走，手下死了一百多人。官军丧气，一个接一个地开小差，逃往郭威部队。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鳷、刘重进等将领都秘密地拜见郭威，郭威将他们一一打发回营，只对降将宋延渥说："皇上正有危险，你是皇上近亲，应率牙兵前去保卫皇上。顺便面奏皇上，希望皇上赶快来臣营，以免发生意外。"途中乱兵纷扰，宋延渥不敢进而还。到傍晚，官兵大多投奔到了郭威部队。慕容彦超率十余骑逃回兖州。

这天晚上，隐帝与苏逢吉、苏禹珪、窦贞固三相及侍从官数十人宿于七里寨（今新乡市南七里营），其他人都逃散了。二十二日（乙酉）早晨，郭威望见高坡上有天子旌旗，就下马免胄去见他，走到那里，隐帝已经离去。隐帝策马回宫，至玄化门；刘铢

在城门上问帝左右："兵马呢？"说完，射杀隐帝身边人。隐帝不得不回马逃走，至城西北的赵村，追兵赶上来了。隐帝下马躲入百姓家，被乱兵杀死。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都自杀而死。聂文进逃跑，被追杀了。李业逃往陕州，后匡赞逃往兖州。郭威听说隐帝遇难，号陶恸哭，说："老夫之罪呀！"郭威至玄化门，刘铢箭如雨下，不得不转从迎春门入城，由原曹州防御使何福进领兵守明德门。诸军大掠，烟火四起，整整折腾了一个通宵。军士闯入原义成节度使白再荣家，尽掠其财，割其首级而去。甚至抢走吏部侍郎张允身上穿的衣服，张允活活冻死。右千牛卫大将军赵凤制止士兵烧杀抢劫，说："郭侍中举兵南来，欲诛小人，清君侧，以安国家，可你们如此胡来，同强盗有何两样？这哪里是郭侍中的意思呢？"于是，执弓矢，坐胡床，把守胡同口，见抢劫的来了，就射杀他们，因而，这个胡同里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下来。王殷、郭崇威对郭威说："不停止剽掠，恐怕到今天晚上京师就成一座空城。"于是，郭威下令各将禁止部下烧杀抢掠，违令则斩杀。到第二天下午四时左右，骚乱才平息下来。

二十四日（丁亥），郭威率百官到明德门去问候太后，请求："军国纷乱多变，请早立嗣君。"太后说："河东节度使刘崇、忠武节度使刘信两人是高祖之弟，武宁节度使刘赟、开封尹刘勋两人是高祖之子，可让百官从中选择一位。"此后，郭威、王峻又到万岁宫拜见太后，请立刘勋为帝。太后说："刘勋一直患病，虚弱得不能起床。"郭威与王峻就商量着拥立刘赟为帝。刘赟本是刘崇子，刘知远疼爱他，就收为养子。二十六日（己丑），郭威率百官上表请立刘赟继位。太后通告有关部门择吉日，备法驾，准备迎刘赟继位。郭威奏请派太师冯道、枢密直学士王度、秘书监赵上交赴徐州奉迎刘赟。

二十七日（庚寅），郭威率群臣上言："新帝抵京，尚需十余天时光，请太后临朝听政。"二十九日（壬辰），太后临朝听政，任

命王峻为枢密使，袁巍为宣徽南院使，王殷为侍卫马步军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曹威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陈州刺史李谷权判三司。

刘铢、李洪建及其党羽都被枭首于市，而家属得到赦免。郭威对公卿们说："刘铢屠杀我家，我又屠杀他家，如此反反复复，怨恨永远也不会了结。"因此，数家得以赦免。后匡赞逃到兖州，慕容彦超把他杀了送给朝廷。李业逃到陕州，其兄保义节度使李洪信不敢窝藏，李业又逃往太原，至绛州，盗贼谋财而害其命。

镇州（治今河北正定）、邢州（治今邢台市）守将报告说："契丹主率数万骑兵入寇，攻内丘（今属河北），后因五百戍兵叛降契丹，引契丹兵入城，内丘陷落。接着饶阳（今属河北）陷落。"太后令郭威率大军抗击契丹，把国事托付给窦贞固、苏禹珪、王峻，把军事托付给王殷。窦贞固、苏禹珪曾与隐帝被困在七里寨，他俩命大，逃脱了。窦贞固与苏逢吉、苏禹珪、同为朝廷三相之一，杨邠、史弘肇弄权，李业、聂文进等人作乱时，他当和事佬，因而保全了一条性命。

十二月一日（甲午），郭威从汴京率大军北上。

四日（丁酉），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当初，郭威率军平定三镇叛乱时，每见朝廷诏书写得很漂亮，处事的措施很恰当，就问使者："谁起草的？"使者答："翰林学士范质。"郭威赞叹说："此人有宰相之才。"攻入汴京后，郭威派人访求得范质，大喜。当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郭威就脱下身上的紫色袍给范质穿上。

武宁节度使刘赟留右都押卫巩延美和元从教练使杨温守徐州，自己随冯道、王度、赵上交西来入朝，一路仗卫的规格同诸侯王，左右高呼"万岁"。郭威率军北上抵御契丹，到滑州，停留数日，刘赟遣使去慰劳。郭威手下将领受刘赟之命时，并不行对嗣君之礼，他们私下议论说："我们这些人屠灭京师，犯下滔天罪

行。如果刘氏复立为帝，我们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十六日（己酉），郭威听说这个消息，立即引兵向澶州进发。

十八日（辛亥），朝廷遣苏禹珪到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迎接刘赟。

十九日（壬子），郭威过黄河，歇于澶州城内。二十日（癸丑）清晨，郭威正准备启程继续北进，忽然，屋外有数千将士喧闹起来。郭威立即叫人关上房门。将士们翻墙越屋，闯入室内，说：“天子必须让您来做，我们已与刘氏结仇，不能再立刘氏为帝。”说话时，就有人撕下黄色军旗，披在郭威身上。刹时间，将士们一涌而上，把郭威捧起来，高呼“万岁”，如雷贯耳，地动山摇。接着，将士们簇拥着郭威转身南下。郭威上书太后，请求奉行刘汉宗庙，并事太后为母。二十三日（丙辰），至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下书抚慰汴京士民，大意说：我郭威渡河南下，沿途秋毫无犯，希望大家不要有所顾虑。二十五日（戊午），至七里店，窦贞固率百官出城来迎接，并劝他即位。郭威不敢贸然而进，暂屯皋门村。这时，刘赟已到宋州。

王峻、王殷听说澶州发生兵变，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率七百骑兵往宋州，又派原申州刺史马铎领兵往许州巡检，以策应郭威。郭崇威出其不意地到达宋州城下，于府门外摆开阵势。刘赟见状大惊，匆忙关闭城门，登上城楼质问郭崇威，郭崇威撒谎说：“澶州发生兵变，郭公担心陛下还不知道消息，就派我来保护陛下，并没有别的意思”。刘赟召郭崇威上楼，郭崇威不敢上。冯道出来同郭崇威说了几句，他这才上楼去了。刘赟握着郭崇威的手，哭泣着，郭崇威以郭威意好言安慰。不久，郭崇威出去了。徐州判官董裔说：“观郭崇威言行举止，必有阴谋。我们一路上听说郭威已为帝，而陛下仍深入不止，大祸就要临头了。请陛下马上召见张令超，晓以厉害，让他晚上带兵去劫持郭崇威，夺其兵马。明天，剽掠睢阳（今河南商丘县）金帛，招募士卒，北奔太原。郭

威初定京邑，无暇追我。此为上策”。刘赟犹豫不决。张令超为护圣指挥使，率兵宿卫刘赟。这天晚上，郭崇威暗中招诱张令超，张令超率兵投靠郭崇威。刘赟大惧。

郭威致书刘赟，说自己受诸军逼迫而被迫南下，并召冯道先回朝去，留赵上交、王度奉侍刘赟。冯道辞行，刘赟说：“寡人这次之所以西来，就是为公是三十年旧相，又亲自来迎，因而，我不猜疑。现在郭崇威夺我卫兵，局势危急，公有何计谋?”冯道默然不语。客将贾贞几次示意刘赟杀掉冯道，刘赟说：“你们不要鲁莽行事，此事与冯道无关。”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河间）人，通文墨。后唐明宗时，做了宰相，以后又历仕后晋、后汉、后周，长达三十年，共仕四朝十君，都是宰相之职，是个地地道道的不倒翁。他精通为官之术，这就是：临难不赴，遇事模棱两可，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冯道为人能节制，因而又博得宽厚长者的美名。郭威攻入汴京时，身为太师的冯道又同往常一样，率百官谒见郭威，郭威也不敢怠慢这位元老，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冯道仍同往常一样，受礼之后，慢慢吞吞地说：“郭侍中此行不易!”现在，对待刘赟，他又采取临难不赴的态度。郭崇威把刘赟迁到别处，杀其心腹董裔、贾贞等数人。二十六日（己未），太后宣告：废刘赟为湘阴公。二十七日（庚申），太后又宣告：以侍中郭威监国。百官、藩镇将领相继上表劝郭威即位。

广顺元年（951年）正月五日（丁卯），李太后再次宣告：授监国郭威玉玺，让他即皇帝位。郭威从皋门入宫，于崇元殿即位，下诏说：“朕是周朝虢叔的后裔，国号应该叫‘周’。”史称后周。改元为广顺，大赦天下。这样，后汉王朝终于被郭威建立的后周王朝取代了。

（易图强）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郭威篡汉》

《新五代史》：《周本纪·太祖郭威》、《汉本纪·隐帝》、《苏逢吉传》、《史弘肇传》、《杨邠传》、《王章传》、《冯道传》

《旧五代史》：《后周太祖纪》、《杨邠传》、《史弘肇传》、《苏逢吉传》、《后汉隐帝纪》

《资治通鉴》：卷287—卷289

周世宗改革

后梁龙德元年（921 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一个婴儿在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的一个柴姓人家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名垂史册的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

柴荣小时在姑母家长大，姑父郭威当时无子，又见柴荣长得聪明伶俐，就收为养子，改姓郭。柴荣跟郭威学会骑射，略通书史。成年后，为郭威处理庶务，经常外出经商，往返于中原和江淮一带。天福十二年（947 年），刘知远建立后汉，郭威因佐命功被授予枢密副使，柴荣也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禁卫军将军），时年二十八岁。乾祐三年（950 年），郭威为枢密使、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为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协助郭威处理军务，成为郭威的得力助手。这年十一月，郭威挥师南下，直驱后汉都城汴京（今开封市），留柴荣安抚百姓，筹措军需，悉心治理后方，为郭威免除后顾之忧。广顺元年（951 年）正月，郭威篡位建周。柴荣被任命为澶州节度使，独立主持地方军政。二年十二月，被任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三月，被任为开封尹，封为晋王。从此柴荣跟随郭威左右，协助处理国家要务。显德元年（954 年）正月十七日（壬辰），郭威去世，遗嘱柴荣继位。二十一日（丙申），柴荣在郭威灵柩前即位，时年三十四岁。他死后，被谥为"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为世宗，故称周世宗。

周世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在位期间（显德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至显德六年六月十九日），他继

承郭威的事业，征淮伐辽，力图削平割据，统一全国；同时革故鼎新，废除弊政，成效斐然。

周世宗的改革是从整军强兵开始的，整军强兵又是从高平之战结束后开始的。

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逝后，北汉刘崇趁机联络契丹，准备来攻后周。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堂弟，为北京留守（后汉以太原为北京）、同平章事，镇守后汉的发祥地河东地区。郭威攻入汴京之初，立刘知远养子、刘崇亲生子刘赟为嗣君，但不久废杀刘赟，自立为帝，建立后周。刘崇闻信，仰天恸哭，发誓要报杀子之仇。郭威称帝十天后，刘崇也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北汉占有并州、汾州、代州、忻州等十三州土地（相当于今山西北部和中部的一部分）。刘崇北结契丹，与契丹约为父子国。广顺元年，刘崇两次派兵攻后周边城晋州（治今山西临汾），都被后周守军击退。显德元年二月，刘崇亲自率兵三万，会同契丹杨衮率领的一万多骑兵，浩浩荡荡进攻后周边城潞州（治今长治市）。潞州守将李筠派部将穆令均率步骑二千迎战，被北汉军前锋将领张元徽击败，穆令均阵亡，损失士卒千余人。李筠据城坚守，向朝廷告急。

大敌当前，又值国丧，后周朝廷一片惊慌。一场围绕周世宗是否亲征的争论在后周君臣之间展开了。周世宗坚决主张亲征，痛击北汉军。然而，四朝元老冯道反对周世宗亲征，他说："刘崇两次从晋州败逃后，元气大伤。这次南下只是虚张声势，定不敢亲自前来，皇上刚刚即位，先帝柩入陵之日临近，人心浮躁，所以，皇上不宜亲征，还是派其他将领抵御为妥。"大臣们也附和冯道。周世宗说："刘崇欺我年轻新立，趁我国丧，企图一举夺天下，他必定亲来。而且，刘崇以为朕有孝在身，不会亲征。善用兵者出其不意，朕偏要去亲征。"又说："先前唐太宗平定天下时，奸雄并起，他总是要亲征，朕怕什么！"冯道仗着自己是三十年的老臣，

壮着胆子说："皇上能学太宗么？"世宗说："刘崇乌合之众，朕率兵亲征，如山压卵，他必败无疑。"冯道还不罢休："不知皇上做得了山么？"世宗忍无可忍，呵斥道："冯道，象你这等相公，真是少见！"冯道只得低头退下。

三月十一日（乙酉），世宗亲征。十九日（癸巳），两军相遇，于高平列阵相持。这时，后周河阳节度使刘词率领的后军还未赶到。后周将士见刘崇兵多势众，面有惧色。世宗泰然自若，镇定指挥，令义成节度使白重赞和侍卫马军都虞侯李重进率左军居西，与杨衮相对；命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和步军都指挥使何徽率右军居东，与张元徽相对；令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和宣徽使向训率精骑居中。世宗自己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的骑兵护卫下，监阵督战。刘崇下令张元徽率千余骑兵直冲后周右军。两军刚一交战，樊爱能、何徽见北汉军来势凶猛，竟率骑兵临阵脱逃，剩下千余步兵逃跑不及，便一个个面对刘崇，高呼万岁，解甲投降。在胜负垂于一发之际时，世宗策马上前，冲入敌军。亲军将领赵匡胤、禁军统率张永德各领兵二千，两路出击。后周将士冲上来奋勇冲杀，北汉军节节败退，到傍晚，后周将领刘词率后军赶到，世宗发起新攻击。北汉军一败涂地，大将张元徽、枢密使王延嗣阵前被杀。刘崇率百余骑兵经江猪岭（在今山西长子县西）逃跑。

高平告捷，世宗乘胜北进。不到一月，北汉所辖十二州便丧失一半。五月初，世宗下令猛攻太原，刘崇据城坚守。中旬，契丹援军数千骑兵南下，袭击后周军，后周先锋将史彦超阵亡，士卒死伤甚众。六月初，世宗下令班师南撤，二十八日（庚午），回到汴京。

世宗亲征北汉，取得了生死攸关的高平之战的胜利，从而保住了后周政权。但高平之战充分暴露了后周军队将骄兵惰的问题。樊爱能和何徽是禁军高级将领，身为前线指挥官，竟然临阵畏敌逃跑，几乎造成全线崩溃。泽州刺史李彦崇奉命扼守江猪岭，本

可阻止刘崇从这里逃跑。但李彦崇听到樊爱能和何徽两将败退的消息，不等命令，便擅自撤兵，致使刘崇逃脱。樊、何两将逃跑途中，驱散民夫，抢掠后周军后继辎重；世宗遣使制止，使者反被二人杀害。他俩又散布谣言："契丹援军大至，我军大败，其他将士逃跑不及，都已投降刘崇。"途中遇刘词率后周军北上，樊爱能又以谎言阻止，幸亏刘词不相信。后来听说后周军传捷，两人悄悄返回高平。世宗下令收捕两将及所部裨将七十余人，依军法斩首。军中大惧。然而，军队中将骄兵惰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后来进攻太原失利，撤军南下之时，军纪复坏。后周数十万大军竟相溃退，造成一片混乱；集结于太原城下的数十万粮草不得不焚毁；各军还相互剽掠，损失极大，所得北汉州县又失去。唐末以来，国家衰败，政变频仍，大多由骄将惰兵肇其端。军士哗变，拥立主将在五代时期司空见惯。远的不说，单说后周太祖郭威就是被哗变的士兵以黄旗披身，拥上皇帝宝座的。现在，周世宗尝到了骄将惰兵的苦头，甚至差点因此而亡了国，所以，决定首先着手整军强兵。

首先，明赏罚，肃军纪。七月三日（乙亥），即回到开封后的第五天，世宗就下令，对从征有功的将领符彦卿、刘词、李重进、张永德、药元福、白重赞、韩通等人都加官进赏。八月，将擅自撤兵的泽州刺史李彦崇贬职。九月，将放纵吏卒苛敛百姓的右屯卫将军薛训除名，流放沙门岛（今山东长岛县西北庙岛）。十月，赐死纵部下扰民的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诏令一下，就有人上奏说情："孟汉卿不能约束部下，理当治罪。但罪不至死，望皇上宽恕。"世宗说："孟汉卿之罪，朕也知道。但他身受国恩，不思报答，反纵部下扰害百姓，如不严惩，何以明赏罚？何以诫诸将？何以振军威？何以肃军纪？"

其次，精选禁军。自唐末以来，藩镇将领蓄养强兵，而中央禁军多从市井无赖、富家子弟中招募来，这些兵养尊处优，缺乏

训练，战斗力薄弱。因而，世宗决定检选禁军。十月十八日（己未），世宗亲自登上讲武台，大阅禁军，挑选武艺超群者留在军中，编为殿前诸班，下辖有号称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各军。又下令禁军各级将领从龙捷、虎捷等军中精选兵员，老弱疾病者汰除。几天之后，有大臣提出异议说："军中传言：皇上精简禁军，违背历朝之规、先帝之制。"世宗答道："侍卫兵士，累朝相承，老少参半，强懦不分。这是由于姑息纵容，不能选练所致。今春，在高平之战中，我军与刘崇及契丹军相遇，竟有临阵不听指挥，畏敌不前者。要不是朕亲当敌阵，恐怕就全军覆灭，乃至亡国了。今百户农夫还不能供养一甲士，岂能用民脂民膏养此无用之兵！兵在精不在多，应该严加点选，强悍勇猛者留下，老弱怯懦者听其自往。这样，既可强兵，又可省费。一举两得，朕岂能不为！"于是，世宗又下诏招募天下豪杰，到京师应选；不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布衣平民，只要强悍勇猛，都可应选。经过阅兵精选，后周中央禁军无不精当，其兵甲之盛为唐末五代以来所未有。这支强盛的军队在以后的西攻后蜀、南征南唐和北伐契丹的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巩固边防。世宗在位时，后周北有契丹和北汉，南有南唐，西有后蜀，从各方面威胁后周安全，尤以契丹威胁最大。如何对付契丹南下侵掠是五代君主们颇感头痛的一件事。后晋以前，一道长城横亘东西，中原王朝驻兵戍守，契丹人塞骚扰并不严重。从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冬天开始，卖国贼石敬瑭为了当中原的皇帝，不惜把幽云十六州的领土割让给契丹，以换取契丹的武力援助。从此，契丹铁骑通过长城，直驱南下，横行河北。支持石敬瑭篡位建立后晋的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三次南犯，终于灭亡后晋。后汉时，朝廷不得不派郭威带枢密使职出镇邺都，节制河北诸军，以防御契丹。后周建立后，契丹发兵助北汉攻晋州、围潞州、守太原，又南下攻掠冀州、定州、镇州等地，使北境无安宁之日。

世宗决心制止契丹铁骑南下骚扰，而且，世宗确定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步骤是先南后北，因而，他必须稳定北部边防，以保障对南唐的战争无后顾之忧。显德二年正月，世宗得到上书说：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和冀州（治今冀县）之间有条胡卢河，横亘数百里，久已淤塞，如能疏通，派兵戍守，可以阻止契丹骑兵南下。世宗立即令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带领士兵，征发民夫，疏通胡卢河。又听从德州刺史张藏英的建议，派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招募边民一千余人，组成一支边军，巡边防御契丹。又下令在李晏口（在今河北景县东北）夹胡卢河修筑城垒，派兵戍守。三月，在李晏口设立军镇——静安军。疏通胡卢河，设静安军扼守要害，又组建一支机动精锐的边军，从而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强兵岂能离开富国？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周世宗当然明白：要想保障统一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要有充裕的粮食。而且，自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大地兵戈不息，烽烟四起，加上旱灾、蝗灾、水灾接连不断，经济生活已经崩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乃是当务之急！

世宗在即位的第一年忙于战争与整军，无暇顾及生产。一到继位的第二年，世宗立即把恢复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乙未），新年的气氛还未完全消失，世宗就颁布了招人垦荒的诏书。规定：凡是逃亡人户的庄田，当地农民均可向政府申请承佃耕种，并交纳租税。如田主流亡回来，在一定年限内可以取回部分土地。具体办法是：田主在三年内归来的，可以取回桑田和庄田的一半；五年内归来的，可以取回三分之一。但承佃户自己盖的房屋、种的树木和种植的园圃不再交还。五年以上归来的，除田主的坟地外，其余耕地都不许取回，但承佃户无力耕种的荒芜桑田，仍可取回。北部边境各州的百姓常遭契丹掳掠，所以，对于从契丹境内回来的田主，政府给以优待。具体办

法是：如田主在五年内归来，可取回桑田和庄田的三分之二；十年归来的，可取回一半；十五年内归来的，可取回三分之一。招抚流亡人口，奖励耕植，将流亡农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上，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国家赋役得到保证，也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

四月，下诏扩建开封。开封是一座历史名城，古称大梁，春秋战国时期是很有名的城市，此后地位下降。但从唐末五代以来，开封的地位又日趋提高，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首都，惯称为汴梁或汴京。然而，开封久历战乱，破坏严重，急待修复。世宗即位后，旧开封城破旧的城郭、狭窄的街道、混乱的布局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决定扩建开封。

这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扩大城区、整顿街巷、美化市容，世宗诏书中说："其京城内街道阔（宽）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以下至于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怎样进行这项巨大工程呢？世宗规定两大原则，一是不误农时，整个工程都在农闲时施工；二是统筹规划，逐步进行，不急于求成。世宗诏书中说："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识（志），俟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或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就近征调民工，于每年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这是不伤民力、不误农时的好办法。又说："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识七里外，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城、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整个工程有规划地进行，有利于美化市容。显德三年，征发京城近郊、滑州、曹州、郑州民夫十余万筑新罗城，派曹州节度使韩通指挥全局。扩建过程中，必定要迁坟。人们对此很有怨气，甚至有人指责世宗不孝道。世宗说："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意思是说："最近扩建京城，确实惊扰了不少亡灵，引来一片怨恨、指责

之声。所有罪过都由朕自己来担当好了！将来人们会知道朕所作所为是对人有利的。”

扩建开封工程前后进行了三年，到显德五年基本完成。扩建后的新城墙周长为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比旧城墙长了二十八里八十三步。城内屋宇整齐，街道宽阔，树木成荫。从而，为开封在北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显德二年五月六日(甲戌)，颁布抑制佛教的诏令。五代时期，战乱频繁，许多人为了逃避兵役赋税，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便削发为僧尼，使寺院和僧尼恶性膨胀，大大减少了封建国家的纳税户和服兵役户。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就有一个小官员李钦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从而主张灭佛，但未受到重视。周世宗终把灭佛的问题提上议程。他颁布的抑佛诏令中规定：各地寺院除少数特许保留之外，其余一律废止；被废寺院的殿堂屋宇由官府查封收管，其余资财归还原主；今后城市乡村、山林名胜古迹之处，都不许修建寺院，违者处以刑役，并勒令僧尼还俗；王公贵戚、地方官吏今后不得奏请建造寺院和开设戒坛，违者由御史台劾奏。关于出家、还俗的问题，诏书规定：除停废寺院的僧尼一律还俗之外，自今以后不得私自度人出家。男子十五岁以上，女子十三岁以上，经所在地方官吏测试，能念诵一定数量的经文，才许可出家；只准在开封、洛阳、大名府（河北大名）、京北府（陕西西安）、青州（山东益都）五地设戒坛剃度出家，其它地方不许；僧尼中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燃灯等各种毁坏肢体、迷惑百姓的做法一概禁止；男子有父母、祖父母在世而别无儿媳奉养者不许出家；背弃父母、逃亡奴婢、恶逆徒党、山林亡命等各种违法犯罪分子和逃避兵役者不准出家。关于僧尼人的管理，诏书规定：地方政府每年造僧尼名簿两册，一册上奏，一册呈送祠部，每年四月十五日以后，各县上报本县僧尼数目到州，五月底以前由州造册呈交到京。僧尼簿内无姓名者

一律还俗。抑佛诏令实施后，当年保留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从而增加了纳税人户，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

九月一日（丙寅），下诏毁铜器、铜佛铸钱。由于佛教兴盛，铜器、铜佛售价很贵，投机商人熔铜钱铸器，以牟取暴利，因而，钱荒很严重。周世宗继位后，一面让官府采矿冶铜，铸造钱币，一面销毁铜器、铜佛，熔铸铜钱。诏书规定：自今以后，除朝廷法物（庙堂乐器、仪仗、天子车驾等）、军器及寺庙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铜佛自下诏之日起五十日内全部送交当地官府，销毁铸钱，官府可按斤两付钱。如果过期隐藏不交，五斤以上者则处死，五斤以下按斤两多少处以刑役。诏书一下，天下议论纷纷，怎能毁佛像铸钱呢？要是菩萨降罪下来怎么办？也有大臣上谏劝阻。世宗毅然回答："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意思是说：爱卿们不要因毁佛像而疑惧。佛像并非就是佛，即使是佛，也不要紧。朕听说佛专门教人行善，以利人为本，只要于人有利，就是头颅、眼睛也愿意施舍于人。朕虽不如佛，然若舍朕身可以济民的话，朕也在所不惜。在佛教盛行的封建时代，世宗能有如此卓越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这段史事时，非常感慨地说："周世宗真是一个仁慈的君主，不爱自身而爱百姓；周世宗真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不因无益之物而废止有益之事。"毁铜器铸钱，使钱荒问题得到解决，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显德三年和显德四年，周世宗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征南唐的统一战争中，但仍然没有忘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大事。

显德三年，世宗采取了两项便民的赋税措施。这年十月，命三司通告各地政府："今后夏税从六月一日起征，秋税从十月一日

起征，永为定制。”五代以来，封建政府征收夏秋两税，往往不等庄稼成熟，不等收割完毕，就开始征收。农民没有收人，交不出税，只好忍受高利贷盘剥，借债还税。不少农民因为还不起债而破产流亡，从而影响农业生产。周世宗改变过去征敛无常的弊病，农民自然受益。同年，世宗还下诏各地政府："凡是商贩贩卖耕牛，不论是黄牛还是水牛，所过之处，都不准收税；如果赶到市场上出卖，则依据卖价每一千钱收税钱二十，除此之外，不准额外收税。”耕牛是古代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牲畜，而且，五代战乱，耕牛损失不少。这一措施对于耕牛的互通有无提供了很大方便。早在显德二年八月，大臣张昭、田敏就根据世宗减少“太牢”（祭祀用牛）数量的旨意，将每年祭祀用牛从二十二头减到三头。

在统一战争中，世宗也运用赋税措施招揽人心。显德二年十一月，后周西征后蜀，收复后晋时失去的秦州、凤州、成州、阶州四州领土。世宗下令：四州之民除夏秋两税之外，其它后蜀所派苛税一律罢免。显德五年四月，后周夺取南唐江北淮南大片领土之后，又废除南唐政府所有两税之外的暴敛。

显德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乙酉），世宗下诏疏通汴河，使汴河水往北流入五丈河（西起开封市，东入山东梁山泊）。显德五年，为征南唐的需要，开鹳河（在今江苏淮安县北），连通淮河和长江；又浚通汴河口以通淮河。于是，江淮之间舟楫畅通。显德六年，再次发民夫浚通汴河和五丈河，使河水往东经定陶流人济水（流经河北、山东），连接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和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之水运。这样，开封水路南通江淮，东达齐鲁，使阻塞已久的大运河漕运得以畅通。早在显德元年，世宗为了改变黄河经常决口、造成水患的局面，派宰相李谷主持征民夫六万治理黄河。显德六年，又派吴延祚发民夫二万再次治理黄河，从而减轻了黄河水患。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有利于农田灌溉，疏通漕运也有利于繁荣工商业。

显德四年七月十九日（甲辰），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世宗下诏规定：今后凡有田宅、婚姻等方面的诉讼，一律在十一月一日至下一年三月三十日内进行，农忙时间，此类案件不受理。

显德五年，世宗颁行《均田图》，并均平赋税。《均田图》是世宗根据唐代同州刺史元稹的《均田表》制成的。元稹为同州刺史时，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许多农民的田地受河沙侵蚀，不长庄稼，变为荒地，可官府仍按原有田地数量向农民征租税。农民被迫逃亡，官府又把逃亡户的租税摊派在未逃农民身上，而豪强地主却设法隐漏田产，逃避租税。于是，元稹上《均田表》，建议免除逃亡户及被河沙侵蚀的田地的租税，将全部税额分摊到耕地上去，各户按田亩的实际数量交税。世宗非常欣赏这种按田亩多少均平赋税的主张，就让近臣据表制成《均田图》，于这年七月八日（丁亥）遍赐各地节度使和刺史。十月二十日（丁酉），派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前往均定河南六十州的赋税。均定工作进展很快，到次年三月，使者们纷纷回报说河南六十州的田租均已均定完毕。仅开封一地就查出隐漏赋税的田地四万二千余顷。曾为后汉宰相的司徒窦贞固退休在洛阳，地方官府“以民视之”，并不免除他的赋税。甚至连“圣人”孔子的后代曲阜孔府也被编人户口，与平民一样纳税，这是前所未有的。均平赋税免除了农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

显德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庚子），为了树立农事为先的观念，世宗让人刻耕夫、蚕妇的偶像，树立在殿庭上面。周世宗对朝拜的大臣们说：“仓廪充实，衣食丰足，国家才能安宁。朕欲收复幽云十六州失地，爱卿们要注重农桑，优恤耕田之农夫和养蚕之村妇，使国富民安，助朕统一天下。”

无论是强兵，还是富国，都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一大批安邦治国的人才。所以，世宗改革的一大内容是整顿纲纪、澄清吏治、广选人才。

五代吏治极为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不法，败坏纲纪，搞得民不聊生，国不安宁。世宗继位后，为了澄清吏治，对那些贪赃受贿、仗势欺人、违法渎职的官吏一律严惩不贷。例如，显德元年十月，将徇私枉法、冤杀平民的供奉官（内侍官员）郝光庭斩首；显德二年五月，将检括民田失实的刑部员外郎陈渥赐死。世宗还亲自查看案件记录。显德二年六月初，汝州颍桥镇百姓马遇的上告状纸引起了世宗的注意。马遇的父亲马温和弟弟马福超被本镇镇将史彦铎诬陷，冤死狱中。马遇多次上告，谁也不理睬。世宗派人召见马遇亲自询问案情。查明核实后，下令惩办有关官员，替马遇一家平反，赐给马遇粟、麦各十石、绢三十匹，以示抚慰。马遇四处称颂世宗神明。这件事在官员中引起很大反响，为澄清吏治开了风气之先。

显德三年和显德四年，在征南唐的紧张过程中，世宗仍然不忘对吏治的整顿。显德三年正月，殿中监（掌管天子车马衣食等事的高级官员）马从赟因侵吞外孙女霍氏的资财，被人告发，世宗将他撤职。六月，御史中丞（监察官）杨昭俭、知杂侍御史赵砺、侍御史张纠三人因审察刑狱失实被停职。十二月，下诏褒奖清正廉洁的已故襄邑县令刘居方。

显德四年三月，削夺违法乱纪的原许州行军司马（地方官员）韩伦的官职，将他流放到沙门岛。韩伦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禁军高级将领）韩令坤的父亲，曾任许州行军司马，不久免职，住在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当时，韩令坤兼任镇安节度使，镇所即陈州。韩伦依仗儿子权势，干预政事，贪赃枉法，聚敛民财，作威作福，地方官吏无人敢言。项城（今沈丘，属陈州）百姓武都等人上告到京。世宗命殿中侍御史（监察官）率汀前往陈州查办此案。韩伦谎称“已奉诏书，将自往京师”，阻止率汀调查。率汀如实上奏。世宗大怒，严令继续追查。核实之后，作出上述严惩。六月，世宗下令处死贪赃枉法、离间大将的行濠州刺史齐藏珍。

显德五年七月七日（丙戌），下诏将新编的刑律《大周刑统》颁行天下。

唐末五代以来，法律紊乱，刑罚酷滥，到后晋、后汉而至其极。郭威建周后，开始整顿司法，并编纂法典，但以承袭后晋、后汉法典为主。周世宗继位后，认为现行法典沿用多时，文意晦涩，条目繁杂，前后矛盾，因而给执法者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显德四年，他命中书门下删繁存要，制定简明易懂的法典。知杂侍御史张湜等十人根据现行法典，重新编纂。编纂成书后，由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和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审定。到显德五年七月，由世宗颁行天下。世宗又禁止酷刑，抚恤刑狱。早在显德元年，世宗就诏令天下在囚犯人无家人供食者，每人每日给米二升；囚犯如有疾病，要派人医疗，等等。

进行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改革，从事宏伟的统一事业，归根到底在于一条：要有人才。

周世宗刚即位的时候，雄心勃勃，年富力强，因而事事躬亲，高平之战后，更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断。显德元年六月，河南府一个叫高锡的小官上书劝谏世宗不必事事躬亲，应择人授职，协力治事。世宗对军国大事放心不下，未予采纳。然而，外事兵戎，内兴改革，百业待举，一人精力毕竟不足，所以，到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辛卯），世宗颁布了求才诏令："在朝文官各举荐能胜任县令、录事参军（地方守令的属官）者一人，即便是姻族近亲，只要他是人才，也不嫌疑。"这是世宗继位后首次颁发的招揽人才的诏令。

二月二十三日（壬戌），颁布求谏诏书。诏书中说："善理政者，不可能十全十美；善处身者，也难免有过失。即使是尧、舜、禹、汤这样的圣君，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这样的明君，也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何况后人远不如这些圣君明主呢？朕虽居至尊之位，然阅历尚浅、经验不足。继位一年，朕定有不少差

错，朕自有察觉，爱卿们岂能不知？可是，时至今日，并无一人指出朕之过失，无一人上书论及时政之是非，这都是朕未能求谏之过。从今以后，爱卿们可将朕所见所闻上书论谏，尽可指出朕之过错，朕决不怪罪。爱卿们不必顾虑。朕要按爱卿们陈力之轻重和上谏之臧否来决定升降。”四月，又以安定内部、削平割据为旨意，令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篇。世宗采纳比部郎中王朴的建议，确定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

此后，世宗多次颁布诏书，令文武百官举荐人才，并一再强调：不论资历深浅、门第高低，即使曾犯有过失，只要确有才干，都可以举荐。世宗又在朝堂上放置小匣子，下诏准许平民布衣中的有识之士直接投书匣中，发表对改革和统一的见解。一个叫赵守微的平民鼓起勇气，投书匣中。世宗把他召入宫中，亲自考问，发现他有些学问，第二天就授给右拾遗的官职，又加赏赐。虽然后来赵守微被岳父告他嫌妻恋妾而被流放，但投书匣中发表政见者越来越多。显德二年十一月南征南唐开始后，世宗发现李谷的军报辞理明白，文采生辉，一打听，是李谷属官李昉所作，便提拔李昉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在广开渠道，选拔人才的同时，世宗采取相应的防止腐败的措施。显德二年正月，他规定：举荐人才的官员要负连带责任。被举荐者受官之日，同时署上举荐者的姓名。如果被举荐者为官贪浊不任、懦弱不理，就根据其情节轻重，对举荐者加以惩罚。显德三年十月，他在诏令各官署自行选拔人才时，特意规定：被选者必须聪明能干，文章和德行都要好，选中者先送吏部复试，再送中书省审核，才能授职。对于自荐者，他并不轻易授官，而是先令近臣或亲自反复面试。

显德四年十月五日（戊午），采纳兵部尚书张昭的建议，下诏设置制科。制科是为了招录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而设置的一种

非常设的考试科目。它根据需要随时设置，对选拔专门人才很有益处。五代以来，制举停废。世宗决定恢复制科。他设立三种制科科目，即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和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并规定：不限资历门第，现任官员和平民百姓都可参加制科考试。

对于五代以来名存实亡的科举制度，世宗也加以整顿。为了防止进士科考试舞弊，他作出规定：应考者如果贿赂监考官和主考官，或请人代作文章，经查实后，就罚做苦役，永不进用；代作文章者、受贿考官及其他有关人员都酌情定罪。世宗亲自验看新科进士及第者的诗赋、文论、策文等试卷，如果发现不合格者，就予以免除。显德二年三月，世宗第一次验看新及第进士十六人的试卷，发现十二人才学未精，就予以勾落，并对主考官礼部侍郎刘温叟严厉批评。显德五年三月，正在淮南前线的世宗让右谏议大夫刘涛将当年新科进士及第者带到淮南，亲自召见，并令人复试。

显德六年三月十四日（庚申），枢密使王朴突然病逝，年五十四。正在淮南前线的世宗惊闻噩耗，禁不住用手中的玉钺连连叩击地面，失声痛哭。王朴，东平（今属山东）人，进士出身。世宗镇澶州时，王朴为节度掌书记。世宗即位后，为比部郎中。献《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深受世宗赏识。显德三年，升为枢密使。王朴为人刚果，明敏多才智，博古通今，当世之务，阴阳律历，无所不通，受世宗信赖。他内修法度，制乐定历，扩建开封；外图统一，运筹帷幄，是世宗的得力助手。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王朴不幸去世，世宗怎能不悲痛？

在重病中，世宗仍然不忘选拔人才。显德六年六月十四日，即世宗去世前五天，他准备任命魏仁浦为宰相。魏仁浦这个人有才能，但他出身贫寒，既不是高第门第，也不是科举出身，他从小吏逐步升官。世宗要任命这样一个人为宰相，这是违背惯例的，所

以不少官员反对说：“魏仁浦不由科第，是不能为相的。”世宗反驳这种陈规陋习之言：“自古选任辅佐，只看其有无真才实学，岂能尽由科第！”于是，下诏以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即宰相，又为枢密使。

经过世宗的努力，后周朝廷人才济济，呈现一派新气象。宋代史学家欧阳修编撰王朴传时，赞叹说：“王朴才能确实出众，但如果不是遇到周世宗，他能施展才能吗？周世宗在位时，外事征伐，攻取战胜；内修法度，议刑法，定律历，讲求礼乐，用的都是五代的人才。这些人在周世宗以前都默默无闻，难道他们在后晋、后汉时愚昧怯懦，而一入后周就变得才智兼备了吗？不是，是周世宗知人善任的结果。”

五代以来，封建军阀以兵马夺天下，从来尚武轻文，周世宗继位后，一改重武轻文之风，倡导文治。在位期间，派大臣编纂《大周刑统》；制订历法，亲自为王朴编撰的《显德钦天历》作序；让王朴考撰雅乐，恢复唐太宗时期的雅乐——旋宫八十四调；让翰林学士窦俨集文学之士编撰《大周通礼》、《大周正乐》；访求图书，编撰史书，整理典籍，命张昭远主持修撰后周太祖郭威、后梁末帝朱友贞、后唐末帝李从珂三朝实录，命张昭远、田敏等大臣同国子监官员一起，校勘唐代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三十卷，并雕版印行；废除后汉政府对文臣俸钱的克扣，增加文臣的收人等等。世宗重视文化事业，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

周世宗在继位的短短五年半时间里，怀抱一统天下之宏图大志，励精图治，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实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尽管统一的壮志因英年早逝未酬，但他的改革成效已经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易图强）

参考书目：

《五代会要》：《逃户》、《泉货》、《街巷》、《城郭》、《租税》、《京城诸军》、《定格令》

《册府元龟》：《赋税》、《俸禄》

《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刑法志》、《刘崇传》、《王朴传》

《新五代史》：《后周世宗纪》、《王朴传》

李小树、黄崇岳《周世宗柴荣》（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卷291—卷294

周世宗征淮伐辽

削平割据，统一天下是周世宗柴荣的宏图大志。可是，那么多割据势力和敌对势力，首先向谁开战呢？周世宗在位时期，在后周西北部有北汉，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南边从西到东，与后周接壤的依次是后蜀、荆南、南唐，另外，在今浙江、上海和苏南有吴越，在今广东、广西有南汉，在今湖南有楚等等。

选择正确的出兵路线，关系到统一战争的全局。显德二年（955年）四月，周世宗诏令近臣二十余人各撰《平边策》一篇，就统一问题发表见解。比部郎中王朴的策论最受世宗的赏识。王朴说："至于谈到统一的步骤，应该先易后难。南唐与我国接壤近两千里，防线极长，很容易被我军骚扰。我军从其无备之处开始骚扰。彼备东，我则扰西；彼顾西，我则扰东。对方疲于奔命之间，必然暴露出强弱虚实。我军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如此反复数次，对方就兵疲、民穷、财竭，我军趁机取之。南唐江北是富庶之地，我军如能先夺其江北，增强实力，下江南就容易了，南唐一亡，南方诸国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再挥师北伐，燕云十六州失地可望风而内附，如其不附，就移兵攻之，定能席卷而定。北汉是死敌，不可以恩信诱导，一定要用强兵讨伐。自高平之役后，北汉元气大伤，不足为患，可先放一放，待天下平定后，再收拾它。我军精选之后，兵强马壮，武器充足，纪律严明，将士效力。等秋收之后，可沿边贮粮，相机出师。"王朴之外，翰林学士陶谷与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等人也主张用兵江淮。世宗同他们讨论之后，

依王朴之议，确定统一的战略步骤为先南后北，即首先出兵南唐，再挥师伐辽。

南唐是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吴国权臣徐知诰篡夺杨氏政权而建立的割据政权。徐知诰篡位后，把都城从扬州迁到金陵（江苏南京）。徐知诰原姓李，他自认是唐高祖李渊的后裔，就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徐知诰即位后，恢复李姓，改名昪。后晋天福八年，李昪中毒死，长子李璟继位。到后周建立时，南唐拥有今鄂东、安徽大部分，江苏大部分，江西全部，延及闽东，是当时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

李璟是个文学才子，却是个有名的昏君。他不理政事，宠信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五个佞臣。这五个人诡计多端，阿谀奉承，仗势欺人，强夺民田，大兴力役，侵扰百姓。南唐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称之为"五鬼"。到后周时期，南唐政事混乱至极。后周显德元年，南唐发生大灾荒，哀鸿遍野，饿殍塞路，社会更加动荡。南唐在北部边境的防守上也大为失策。本来，每年冬天，两国界河淮河浅涸，为了防止中原王朝趁机南下，南唐都派兵戍守，称为"把浅"。显德二年十月，南唐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监军吴廷绍认为疆场无事，派兵戍守只能虚耗军资，要求撤去淮河戍守。南唐宿将、清淮节度使刘仁赡上表力争，李璟不听。于是，南唐北部边防空虚起来。

显德二年十一月一日（乙未），周世宗下达命令。以宰相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战时总指挥），以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行营副部署。督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率领大军出征南唐。

李璟听说后周大军南下，慌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五鬼"之一的魏岑推荐少谋寡断的神武统军刘彦贞为统帅。李璟即命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兵两万赴寿州；又命奉化节度使皇甫晖为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率兵三万屯驻定远（今

属安徽)，以为策应。

这时，李谷已率后周军在正阳（今安徽寿县西南正阳关）架浮桥，渡过淮河，直逼南唐北疆重镇寿州。接着，后周军在寿州城下及附近山口镇、上窑等地连连击败南唐军。将寿州城团团围住。然而，寿州从南北朝以来久经战火考验，城池坚固，南唐老将刘仁赡据城坚守，连连挫败后周军的攻城战。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寿州是后周大军南征的第一座城池，如果在此受阻，势必挫伤后周将士的元气，并影响整个战局。于是，到显德三年正月六日（庚子），周世宗不顾大臣和皇后符氏的劝阻，下诏亲征。出发之前，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训权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朴为副留守，全权处理后方政务；命彰信节度使韩通权点检侍卫司及在京内外都巡检，负责京师内外安全；又命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领兵先赴正阳，命河阳节度使白重赞率兵三千屯颍上。八日（壬寅），世宗从开封出发。

这时，寿州战场发生了突变。南唐统帅刘彦贞率陆路援军到达来远镇，距寿州仅二百里，又派战舰数百艘溯淮而上，直驶正阳，准备夺取后周军架设的渡淮浮桥。后周总指挥李谷闻讯，担心背腹受敌，便下令焚毁粮草辎重，退保正阳。

世宗行至圉镇（在今河南杞县南），得知李谷想撤至正阳，急忙遣使制止，十三日（丁未），至陈州（治今河南淮阳），令李重进兼程进军淮上。

世宗派出的使者赶到前线时，李谷已经退回正阳。李谷上奏说："今淮河涨水，敌舰逼近。万一我军粮道被断，后果不堪设想。请皇上暂时驻跸陈州、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待李重进到达，与臣商议后，再行决定。臣认为最好厉兵秣马，等冬去春来，再举大军，取之不晚。"世宗读罢奏章，不乐。下令李重进火速进军。

李重进奉令日夜兼程，抢先赶到正阳，率军开过浮桥，在淮

河南岸摆开阵势，严阵以待刘彦贞军。

南唐统帅刘彦贞一向骄贵，不谙兵法，不识战阵，方略皆无。刘彦贞手下裨将咸师朗、武彦晖、张廷翰也都有勇无谋。他们听说李谷撤兵，大喜，率军直扑正阳，一路上辎重旌旗绵延数百里。寿州守将刘仁赡和池州刺史张全约对这种轻率的行为加以阻止。刘仁赡派人对刘彦贞说："公统兵赴援，军未至而敌先退，其意难测，不可冒然追逐。万望慎重！"刘彦贞扬言："敌我之势非汝辈所知。违我令者，军法处治！"刘仁赡仰天长叹："我军败矣。"于是，下令加固寿州城防，增加守兵，准备死守寿州。

刘彦贞率军赶到正阳，只见后周军已抢先过桥布阵。他急于求胜，不顾士卒未吃早饭，饥饿疲惫，便命将士立即布阵决战。南唐兵依刘彦贞令，横布拒马（拒马是一种木制的可以移动的防御障碍物），支上利刃，用铁索连接起来，又在用木头雕刻的野兽上涂上五颜六色，立于阵前，号曰"揵马牌"；又用皮囊装上铁蒺藜撒在地上（铁蒺藜是一种铁质尖刺的防御障碍物）后周将士见敌军以木兽御敌，大笑其胆怯，便奋勇杀敌。南唐军一触即溃，四散逃命。刘彦贞措手不及，被斩于马下，咸师朗等将被俘。南唐军被杀万余人，伉尸三十里，损失军资器械三十万。

正阳之战，刘彦贞一败涂地，南唐军民惊恐至极。池州刺史张全约收拾残兵败卒奔往寿州，皇甫晖、姚凤也从定远慌忙撤军。退守清流关（在今安徽滁县境内），滁州刺史王绍颜弃城逃跑。

后周军正阳一战告捷，军威大振。十八日（壬子），世宗到达永宁镇，派人安抚寿州附近百姓，要他们各安本业。二十日（甲寅），至正阳，重新部署围攻寿州，以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代替李谷统帅军队，让李谷管理占领区的行政。

二十二日（丙辰），世宗抵达寿州城下，在淝水（今西淝河）北岸安营扎寨，命令诸军围寿州，又下令撤正阳浮桥到下蔡。二十三日（丁巳），征发宋州、亳州、陈州、颍州、徐州、宿州、许

州、蔡州壮丁数十万向寿州城发起猛攻，昼夜不息。这时，南唐兵万余人集结涂山（即当涂山，在今安徽蚌埠西淮河岸边）脚下，准备接应来增援的南唐战舰。二十六日（庚申），赵匡胤奉命派百余骑兵于涡口（在今安徽怀远东北）大败涂山之敌，斩杀南唐将何延锡等人，夺战舰五十余艘。

接连几天，寿州城被重重包围，后周的攻城战极为猛烈。可是，南唐寿州守将刘仁赡智勇双全，能攻能守，又赤胆忠心。尽管州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仍神色自若，从容部署，又亲临城防，督兵坚守，使后周军攻击频频受挫。

世宗见寿州久攻不下，十分忧虑。后周出师已近百天，但一州未克。眼见雨季将至，这对远征在外的后周军将十分不利。于是，世宗决定改变战术。分兵攻取南唐江北各州。以扩大地盘，彻底孤立寿州。二月三日（丙寅），世宗派赵匡胤率兵奔袭滁州（治今安徽滁县）。滁州扼南唐京师金陵的西北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滁州城外的清流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唐将领皇甫晖和姚凤从定远撤兵后，率所部十万精兵扼守此关。赵匡胤率数千后周兵赶到清流关，在关外与敌兵展开大战，被击退。皇甫晖见天色已晚，也不追击，准备来日再战。

赵匡胤硬攻不下，便决定智取。他找来村中一教书先生，人称赵学究，向他打听地形。赵学究说："关下有一荒径，绕山背而过，无人知晓。现西涧涨水，如趁夜派奇兵从小径到西涧，再浮水渡涧，可直抵滁州城下。"赵匡胤听罢大喜，便亲自率兵沿赵学究所指小径悄悄急进。

第二天大明之时，皇甫晖、姚凤正准备与关前后周军交战。忽然，赵匡胤率上千后周兵出现在关后，两将大惊，慌忙撤军，退回城中。赵匡胤跃马挥兵涉水而过，直抵城下。皇甫晖在城上大喊："你我各为己主，请让我出城列阵而战。"赵匡胤笑了笑，答应了。皇甫晖整军而出，摆开阵势。赵匡胤策马上前，突入阵中，

大贼："我只杀皇甫晖，不杀他人！"说话间，手起剑落，击中皇甫晖脑袋，未死，把他俘虏，接着，又生擒姚凤。随即，攻克滁州，清流关不战而下。

滁州失守，十万精兵败北，南唐帝李璟慌了手脚，急忙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牙将王知朗携书到滁州议和。书中说："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岁输货财以助军费。"世宗得书，不予理睬，继续进兵。十五日（戊寅），命前任武胜节度使侯章等人攻寿州水寨。又探知南唐东都扬州守备空虚，便于十六日（己卯）命韩令坤领兵去袭击扬州。

李璟闻讯，急忙改派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和文理院学士、工部侍郎李德明带重礼到寿州城下求见世宗，愿意奉表称臣。世宗素闻钟、李两人能言善辩，猜想他俩是来游说他撤兵的，便决定给两人一个下马威。钟谟、李德明两人走进世宗营帐，只见戒备森严，刀枪林立，不由得心惊胆颤，赶忙呈上礼单、国书。又听世宗厉声说道："你们国主自称唐室后裔，就该与别国不同，应该知晓礼义。可是，与朕只隔一水，从未愿意睦邻修好，反而遣使勾结契丹，弃华夏而事胡狄，礼义何在？今见朕大军压境，便派你俩来游说朕撤军么？朕非六国愚君，岂会被巧言利舌所迷惑？回去告诉你们国主，叫他速来见朕，谢过请罪，方保无事。否则，朕要挥师直捣金陵，借汝国府库之物慰劳我军。到那时，你等君臣，不要后悔！"钟谟、李德明两人吓得战战兢兢，说不出话，只得唯唯听命。

这时，后周将韩令坤正奉命东向扬州，二十二日（乙酉），到达扬州城外，先派部将白延遇率数百骑兵突入城中，城中竟不知觉。随后，韩令坤亲率大军杀入城中。南唐东都营屯使贾崇急忙焚烧官府、民房，弃城南逃。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来不及逃跑，便匆匆披上袈裟，躲进庙里装和尚，被后周军搜查出来。占领扬州后。韩令坤乘胜攻占泰州（今属江苏）。南唐天长（今属安

徽）守将耿谦见南退之路被切断，便以粮草二十万投降赵匡胤。

再说李璟派钟谟、李德明两人奉表去向世宗称臣之后，转念一想，又后悔起来。谁愿意真心作奴才呢？他还是想到了契丹。如果契丹从北面出兵，后周军背腹受敌，还敢不撤军么？这样的话，或许自己还能趁机抢占点后周的地盘哩。于是，他立即要侍臣写下求救书，用蜡密封好，派使者送往契丹。不料，使者到边境时，被后周静安军节度使何继筠截获。现在，后周军连下扬州、泰州，又奋力围攻寿州，这下，李璟真是绝望了，到三月一日（甲午），只得又派司空孙晟和礼部尚书王崇质携礼奉表前往议和。

就在孙晟、王崇质两人前往议和之时，后周军又捷报频传。三日（丙申），后周将领何超上奏说南唐光州刺史张绍弃城逃跑，都监张承翰以城降。四日（丁酉），后周将领郭令图拔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南唐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守将李福举城降。形势对后周军十分有利。所以，世宗对李璟派孙晟、王崇质来议和，仍不予理睬。李璟闻讯，赶快派使者去告诉李德明、孙晟等议和代表，愿意放宽条件，除向后周称臣外，还愿意割让寿州、濠州（治今安徽凤阳）、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光州（治今河南潢川）、海州（治今江苏东海）六州领土。而且，每年贡献金帛百万请求世宗罢兵。世宗意在夺取整个江北，仍不同意这个谈判条件。李德明请求说："我主不知贵国兵力之盛，请给我五天时间，让我回去禀告我主，并说服我主献出整个江北。"世宗就派供奉官安弘道送李德明、王崇质回金陵，并分别致书李璟和南唐将相，要他们认清形势，指出：只有割让整个江北，后周才能罢兵。

李德明返回金陵后，大谈后周兵力之强大和世宗之英武，劝李璟割让整个江北。李璟听了不高兴。枢密使陈觉、副枢密使李征古一向与李德明不和，便叫王崇质诬告李德明所言不实。他俩趁机进谗言说："李德明卖国求利"。李璟一听，大怒，当即下令

将李德明斩首。同时，任命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李景达统兵拒周，以陈觉为监军使，以前任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议和谈判彻底破裂，双方依旧兵戈相见。

进入四月份，战局又发生了变化。首先，由于南方梅雨季节的来到，大雨倾盆，淝水暴涨。后周营地积水数尺，器械、士卒损失不少，粮草运输跟不上，士卒也久战疲惫，寿州围攻战进入艰苦阶段。其次，后周东线战场也频频告急。南唐后卫将军陆孟俊率兵万余人反攻泰州，后周守兵被迫撤走。接着，又攻扬州，后周守将韩令坤也被迫弃城撤退。

面对这种战局的逆转变化，世宗当即命令韩令坤再夺回扬州，又令张永德率侍卫亲军火速增援扬州。又令赵匡胤带兵两千屯六合（今属安徽），以策应扬州。世宗本人也离开寿州，移驾濠州城外，就近指挥东线战事。

韩令坤见援军大至，便回师扬州，大败南唐军，生擒陆孟俊，接着，又在湾头镇击败南唐楚州兵万余人，俘虏南唐涟州刺史秦进崇。张永德也在曲溪堰（在今江苏盱眙西南）败南唐泗州兵万余人。

南唐军统帅李景达统兵两万从瓜步（今属江苏）渡江，进至距六合二十余里的地方，便畏惧不前。屯驻六合的后周将领赵匡胤率不满两千之兵，占据有利地形，等待来犯之敌。几天后，李景达沉不住气了，便壮着胆子攻打六合，后周军以逸待劳，奋勇冲杀，以一当十，大败李景达军，毙伤、俘虏近五千人，剩下的一万多人落荒而逃，渡江时，落水溺死者甚众。

南唐在东线的反攻被击退了。二十四日（丙戌），世宗把宣徽南院使向训从开封召到淮南前线，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兼沿江招讨使，韩令坤为沿江副招讨使，镇守扬州，以巩固东线战果。这时，后周军又在涡口（在今安徽怀远东北）新筑一道浮桥，成为渡淮的又一要道。二十五日（丁亥），世宗从濠州往涡口视察，筹划进

一步攻取整个江北。宰相范质泣谏说："今王师在外半年，连连征战，未得休息。将士疲惫，粮草短缺。雨季又至，暑热潮湿，易染瘟疫。江北一时恐难尽取，请皇上先班师回京，再从长计议，才是万全之策。"将领们也纷纷劝谏世宗班师。

五月一日（壬辰），世宗在涡口设置镇淮军，以加强防御。七日（戊戌），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继续围攻寿州，自己从涡口动身北归。二十四日（乙卯），回到开封。

然而，世宗班师不久，后周淮南战局又急转而下。后周军南征之初，深受南唐人民欢迎。当时，南唐政府对百姓横征暴敛，除正税外，还强用茶、盐换取百姓的粟、帛，称为"博征"。又在淮南大兴营田，掠夺百姓田产。所以，后周军一到，南唐人民奉为救星，争献牛、酒等物劳军。但是，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后周将士日骄，军纪松弛起来，抢掠百姓的事时有发生。当地人民非常失望，便纷纷聚结山林湖泊之中，修寨筑堡，袭击后周军。他们用农具作武器，用白纸相叠作衣甲，人称"白甲军"。"白甲军"多次击败后周军，因而，后周军受到很大牵制。

南唐政府军趁机反攻，接连收复舒州、蕲州等州。寿州守将刘仁赡也出其不意地出城袭击后周军。后周将领李继勋的营寨被攻破，攻城器具被焚毁，数百将士战死。后周沿江招讨使向训在扬州得报，立即奏准世宗，移兵寿州城下，准备攻破寿州，再图进取，扬州驻军一撤，滁州孤立，守军弃城撤往寿州。这样，后周所占南唐江北六州丧失殆尽。

世宗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扭转被动局面。首先，严明军纪，收回人心。六月十一日（壬申），颁布诏令：后周军所在淮南诸州，原南唐政府的苛捐杂税、额外徭役一概废止；赦免南唐淮南诸州囚犯；淮南诸州现行政令有不便于民者，地方官吏要上奏改进。七月，又诏令向训严肃军纪，禁止将士扰害百姓，违者军法从事。向训下令处死了几个劫掠妇女、抢夺财物的士兵，在军中引起强烈

震动。从扬州撤退时，向训又下令封闭府库，由扬州牙将巡查城中，全军撤出，秋毫无犯。扬州百姓十分满意，都背着干粮送给后周将士。与此同时，世宗又命令南征诸军集结寿州，集中兵力猛攻已围困半年多的寿州城。李璟闻讯，急派李景达统兵五万增援寿州。

李景达在六合被赵匡胤击败后，畏敌如虎。他统兵五万到达濠州后，便安营扎寨，对寿州遥为声援。濠州距寿州近两百里路，谈何声援？而且，李景达名为统帅，军令却出自监军使陈觉，李景达只在命令上署名而已。倒是南唐将领林仁肇和郭廷谓有些胆量，他俩接到李璟增援寿州的命令后，率所部水陆两军直奔下蔡。下蔡和寿州隔淮相望，这里有后周军渡淮的浮桥。下蔡守将是后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他率众击退林、郭二将的进攻。战后，张永德采取护桥措施，用铁索系上巨木，在离浮桥十余步处横放水中，封锁河面，使战舰无法靠近，十月，张永德击退南唐水军的进攻，然而，不习水战的后周军仍然不能消除南唐水军的威胁。

为此世宗下令在开封西面的汴水边造战舰数百艘，让投降的南唐水兵教后周军练习水战，为继续南征作准备。

显德四年正月，寿州城下重兵集结，淮河两岸战云密布。

寿州被围一年多，城中人疲粮尽。屯兵濠州的李景达不得不派应援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率部增援。三将率兵数万，溯淮而上，驻军于寿州城南的紫金山，连珠般地扎下十几个营寨，燃烽火与城内晨夕呼应。为了给城内运送粮食。他们修建了一条甬道，绵延数十里，就在甬道快到城下时，后周将李重进领兵袭击，大败守军。斩杀五千，夺得两寨。

二十日（戊申），世宗下诏二月份亲征淮南。南唐寿州守将刘仁赡见援军不能解围，寿州危如垒卵，主张率众与后周军决战，强行突围，统帅李景达不许。刘仁赡欲守不支，欲战不能，忧愤成疾。刘仁赡幼子刘崇谏贪生怕死，出城逃降，被南唐军截获。刘

仁赡一听大怒，下令按军法斩首。寿州军民感奋不已，都愿意死守城池。

南唐援军云集寿州城外，刘仁赡挥泪斩爱子的消息传到开封，在后周朝廷引起强烈震动。一些大臣上书世宗，请求撤兵。世宗锐意进取，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派大臣范质、王溥去探望病榻上的宰相李谷，与他商讨对策。李谷上疏说："寿州久被围困，危在旦夕。如果此时御驾亲征，全军将士必然振奋。南唐援军必然震恐，寿州就指日可破了。"世宗一看，正与己意不谋而合。大悦，遂下决心亲征。

二月十七日（乙亥），世宗从开封出发。同时，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数千水军自闵河沿颍水入淮河。这支新建的水军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已经能熟练地作战，纵横水中，同南唐水军毫无差别。船队在正阳驶入淮河后，便首尾相接，浩浩荡荡，顺流而下，直驶寿州，南唐军大惊。

二十七日（乙酉），世宗抵达下蔡。三月二日（己丑）晚，渡过下蔡浮桥，直抵寿州城下。三日（庚寅）天明，披甲戴胄，亲临前线，后周军顿时士气大振，世宗当即命令赵匡胤领兵攻击紫金山上南唐军先锋寨和山北一寨。赵匡胤领兵登山而战，连破数寨，斩首三千余，并切断南唐军甬道。于是，南唐军首尾不相接。至傍晚，世宗下令收兵，部署各军驻守各寨，然后，返回下蔡。

南唐军在损兵数千，山寨失守之际，不但不齐心御敌，反而暗中争权夺利。北面招讨使朱元恃功自傲，不听统帅李景达调度。监军使陈觉与朱元不和，上表李璟，说朱元无将兵之才。李璟令武昌节度使杨守忠代其职。朱元气愤之下，遂于四日（辛卯）夜与先锋寨使朱仁裕等率军万余人投降后周军。

五日（壬辰）天明，世宗停驾赵步（在今安徽凤台县东淮河北岸），指挥后周诸将猛攻南唐紫金山寨。南唐军苦心经营的山寨被全部攻破，死伤万余人，大将许文稹、边镐、杨守忠被俘。余

众沿淮河仓皇东逃。世宗亲率数百骑兵沿淮河北岸追杀逃兵，其他将领率步骑沿淮河南岸追击，后周水军也百舸齐发，顺流而下。南唐逃兵走投无路，战死、溺死和投降者近四万人。后周军夺得战舰、粮船数百艘、钱帛器械不可胜计。这一战，世宗一气追杀二百余里，直到下午四时左右，才在荆山洪（在今安徽怀远西南淮河畔）勒住马头。当晚，宿于涡口。六日（癸巳），侍从官员陆续赶到。七日（甲午），下令就近征发壮丁数千在涡口夹淮河处各筑一城，把下蔡浮桥迁到这里，以切断濠州往寿州应援之路。

驻军濠州的南唐军统帅李景达和监军使陈觉闻紫金山败讯，慌忙丢下军队，抱头南窜，逃回金陵。

李璟见前方大败，声言要亲征。中书舍人乔匡舜上书谏阻，李璟认为他沮丧人心，就把他流放到抚州（今属江西）。神武统军朱匡业、刘存忠也摇头叹息，吟诵起唐朝诗人罗隐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李璟大怒，将朱匡业贬到抚州，将刘存忠流放到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李璟束手无策，只好听天由命，不再提亲征之事。

世宗在涡口视察期间，任命向训为武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都监，帅兵戍守涡口。十二日（己亥），世宗从涡口返回下蔡。十三日（庚子），致书刘仁赡，要他认清形势，自择祸福。十七日（甲辰），下令齐集各军，耀兵于寿州城北，以威慑寿州守军。

这时，寿州守将刘仁赡病情严重，不省人事。十九日（丙午），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人以刘仁赡名义写下降书，派人送到后周军大营。二十日（丁未），世宗致书刘仁赡，派閤门使张保续入城宣谕，刘仁赡子刘崇让出城谢罪。二十一日（戊申），世宗陈兵城北，周廷构等人抬着刘仁赡出降。刘仁赡已奄奄一息，身不由己。世宗见状，不禁慨叹，赐给玉带、御马，依旧让他回城疗养。二十四日（辛亥），下诏任命刘仁赡为检校太尉，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刘仁赡未及受命，便去世。世宗又遣使

吊祭，追封他为彭城郡王。又改镇淮军为忠正军，以褒奖其忠节。

寿州归服后，世宗下令抚慰百姓，赦免州中罪人，聚结山林抵抗后周军者概不问罪，免除近城五十里内百姓当年的夏秋两税，又开仓赈济饥民。

二十九日（丙辰），世宗自下蔡班师。四月十二日（己巳），回抵开封。

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世宗说："皇上首征江淮，一举而取八州；二征江淮，即平寿州。御驾所至，无往而不胜。今我军强盛，唐军势弱；我国大治，唐政混乱。如再次发兵江淮，则可望一举统一。"世宗听言决定第三次南征江淮。

十月十日（壬申），世宗领兵从开封出发。十一月四日（丙戌），抵达涡口。当夜五更时分，渡过淮河。五日（丁亥），抵达濠州城西。

寿州得手后，濠州成为后周军争夺的第一个目标。南唐濠州守将郭廷谓在城四周筑堡立寨，又派战船在城北淮河中巡守。城东北十八里处有个浅滩，郭廷谓在此设一水寨，四面环水，易守难攻。

六日（戊子），世宗亲自指挥后周军攻击州城东北的水寨。他命内殿直康保裔率数百士兵，乘骆驼涉水，派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率骑兵后继，一举攻破水寨。这时，李重进也攻破濠州南关城。十一日（癸巳），又命水军攻击城北水军，南唐七十余艘战船被焚毁，二千余人被杀，城北的羊马城也被攻下。濠州城四面营堡被后周军一扫而光，南唐守城将士莫不震恐，郭廷谓致书世宗说："我的家属在江南，如马上投降的话，全家便会被唐主诛杀。请许我先派人回江南稍作安排，然后投降。"世宗表示同意。

十九日（辛丑），世宗得到情报说，有南唐战舰数百艘停泊在涣水（今浍河）东，准备来营救濠州。世宗以赵匡胤为先锋，连夜带兵出发，水陆俱进。二十一日（癸卯），在洞口（在今安徽凤

阳东）杀敌五千余，降敌两千余，夺得战舰三百余艘。接着，乘胜追杀，于二十三日（乙巳）东抵泗州城下，赵匡胤命令攻泗州城门，破水寨，夺月城，并亲自登上月城城楼，督导诸将攻城。到十二月三日（乙卯），南唐泗州守将范再遇支持不住举城投降。

世宗得到情报说有数百艘南唐战船停在洞口，于是立刻派兵袭击。这支水军开始向清口（泗水入淮河之口，在今江苏淮阴西）转移。六日（戊午）清晨，世宗命令赵匡胤率步骑沿淮河南岸，其他将领率水军沿淮河，世宗本人率亲军沿淮河北岸，三路齐进，前往求战。八日（庚申），追上南唐兵，顿时金鼓齐鸣，杀声阵阵，声震数十里。一路且战且进，九日（辛酉），至楚州西北，又大败南唐军。南唐军所剩数艘战船继续沿淮河东下逃窜，世宗又命赵匡胤为先锋，率兵追杀六十里，生擒南唐泗州、濠州、楚州、海州四州应援使陈承昭。这次追歼战，世宗率兵从濠州出发，以摧枯拉朽之势，奔驰四百余里，消灭大量南唐军，俘虏七千余人，所获战船，除烧毁、沉没者外，还得三百余艘。至此，南唐在淮河上的战船全部损失。

这时，南唐濠州守将郭廷谓的使者从金陵返回，说朝廷无力援救，于是，郭廷谓举城投降。后周得其降兵万人，粮食数万斛。

十日（壬戌），世宗渡过淮河，至楚州城下，扎营城西北。十三日（乙丑），南唐涟水守将崔万迪投降。十六日（戊辰），世宗下令进攻楚州城，当即破其外围月城。十八日（庚午），派将领武守琦率骑兵数百奔袭扬州，李璟强令扬州军民渡江南迁。又闻泰州无备，便发兵偷袭，于二十五日（丁丑）攻占泰州。

显德五年正月五日（丁亥），后周右龙武将军王汉璋上奏说攻克海州。

李璟见江北守不住了。决定退出江北，死保江南。世宗抓紧时间向南推进。可是，一道北神堰（在今江苏淮安市北）横在楚州北面的运河中，使后周战船无法经运河入长江。世宗亲自勘察

水道，规划工程。就近征发民夫疏通楚州西北的鹳水（在今江苏淮安县北）作进军的通道。不到十天，数百艘战舰通过鹳水，沿运河，驶入长江。南唐兵见状，大惊失色，以为神兵自天而降。

与此同时，后周军猛攻楚州。南唐楚州守将张彦卿也是一员硬汉，尽管外援断绝，仍顽强抵抗，儿子劝他投降，被张彦卿斩首。后周军苦战四十多天，楚州岿然不动。二十五日（乙巳），世宗亲自坐镇城下，指挥大军强攻，二十七日（丁未），终于攻破楚州。张彦卿与监军郑昭业坚持巷战，最后与部下一千余人全部战死。世宗盛怒之下，下令屠城，城中居民万余人被杀。

二月六日（戊午），世宗从楚州出发。南下巡视，十五日（丁卯），至扬州，令韩令坤发民夫万余人重建被南唐军付诸一炬的扬州城。

三月一日（壬午），世宗抵达泰州。十日（辛卯），西至迎銮镇（今江苏仪征），屡至长江口，指挥水军击南唐战舰。十二日（癸巳），赵匡胤率水军直追南唐战舰至长江南岸，十三日（甲午），后周将慕容延钊、宋延渥大败南唐水军于东沛州（今江苏启东县北吕泗镇一带）。同时，世宗又派李重进率兵去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

至此，南唐江北只剩下舒州、黄州、蕲州、庐州四州未被占领，后周军已进逼长江南岸，南唐君臣无不惊恐失措！李璟弟、嗣君李景连上十表，辞去嗣君，齐王李景达也辞去元帅，明哲保身。李璟只好派兵部侍郎陈觉奉表携礼拜见世宗，请求让位给儿子弘冀听命于周。陈觉见后周兵强，便派阁门承旨刘承遇回金陵，劝说李璟献出江北所剩四州。李璟无可奈何，只好重写降表，愿意削去帝号，称“唐国主”，献出四州，每年贡物数十万，请求划江为界和后周息兵。

世宗赐书李璟，宣布撤军，李璟得书大喜，忙派宰相冯延巳到江北献上银、绢、钱、茶、谷共百万两，犒劳后周军，不久，又

派大臣徐辽代己前往为世宗祝寿。为了避讳，他改名景，因为，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高祖叫郭璟。并正式下令削去帝号，称国主，改用后周年号。一切安排妥当，便心安理得地做起附属国之主来。

四月四日（乙卯），世宗从扬州北返。二十一日（壬申），抵达开封。

从显德二年十一月到显德五年三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世宗三次亲征南唐，取得南征的全胜，后周夺得南唐长江以北的所有领土。共十四州，六十县。人口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户。

南征胜利后，世宗立即把北伐契丹，收复失地的目标提上行动日程。

自后晋初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至此，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中，沦陷区人民深受契丹贵族的残暴统治，期待回归中原王朝。河北和中原的百姓也时受契丹铁骑的蹂躏，盼望中原王朝制止契丹南下。所以说北伐契丹，收复失地是人心所向。南征胜利后，后周大大增强了军事、经济实力，同时，又解除了南方诸国的威胁，使北伐无后顾之忧。而且，自后汉建立时起，辽国就陷入混乱之中（后汉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建国号为辽）。后周时期，辽国皇帝是耶律述律，即辽穆宗。辽穆宗少年继位，好游戏，不理政事，每夜酣饮，白天却呼呼大睡，被辽国人称为“睡王”。他即位不到一年，臣下谋反事件就接连发生，先后有太尉忽古质、政事令肖眉古得和宣政殿学士李浣、政事令娄国和林牙敌烈等人作乱。辽国内乱为世宗北伐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到显德六年三月，离南征结束已经一年了。经过充分准备，后周国内政治稳定，财力充足，兵力强盛，将士体力得到恢复。于是，十八日（甲子），世宗下诏宣布：将于本月率军北伐。二十一日（丁卯），命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等将率水陆两军向沧州（今属河北）集结。二十八日（甲戌），世宗从开封出发。

四月十六日（辛卯），世宗抵达沧州。见各军已集结待命，便马不卸鞍，甲不离身，挥师直指辽国边境。十七日（壬辰），到达乾宁军（治今河北青县），辽国宁州刺史王洪举城投降。二十二日（丁酉），命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从水陆两路大举北进。世宗也乘龙舟顺流而进。二十四日（己亥），到达独流口（今天津西南独流镇），再溯流而西。二十六日（辛丑），到达益津关（在今河北霸县），辽守将终廷辉投降。自益津关往西，水路渐窄，龙舟不能航行，世宗就弃舟登陆。他策马驰进，露天而宿，侍卫亲兵不到五百人，成群的辽兵出没在营帐周围，世宗也能泰然处之。二十八日（癸卯），赵匡胤率兵直抵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西南），辽守将姚内武投降。世宗也随即到达瓦桥关。二十九日（甲辰），辽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辽淤口关（在今霸县东信安镇）守将也不战而降。

五月一日（乙巳），后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将率大军陆续赶到瓦桥关。辽瀛州刺史高彦晖投降。至此，瓦桥关以南失地全部被后周军收复。

二日（丙午），世宗在瓦桥关举行庆功宴会。世宗主张一鼓作气，直捣辽国南京（辽以幽州为南面陪都，幽州即今北京市）。有些将领反对说："皇上离京三十二天，兵不血刃，便取燕南失地三州十七县，真乃盖世之功。现在，契丹骑兵集结幽州之北，我军远离后方，不宜深入。"世宗听罢不乐，收复失地，一统天下是自己的宏图大志，怎能就此而止？他决定继续北进。

宴会之后，世宗派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率兵出发，很快在瓦桥关北击败辽数百骑兵，又攻下距幽州仅一百二十里的固安（今属河北）。

然而，就在凯歌高奏之时，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世宗支持不住了。他强打精神，坚持到固安北边的安阳水视察，命令架桥，以备大军通过。四日（戊申）后周定州节度使孙行友上奏说已攻克

易州，并献辽易州刺史李在钦，世宗下令将其斩首。五日（己酉），下诏以瓦桥关为雄州，以益津关为霸州，征发滨州、棣州民夫修筑霸州城池。六日（庚戌），派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率兵出土门（今河北获鹿南），入北汉境，防止北汉出兵援辽。七日（辛亥），任命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任命义成节度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

八日（壬子），世宗病情转重，不得不从瓦桥关南返。三十日（甲戌），回到开封。回开封后，病情日益恶化。

六月十九日（癸巳），一代明君周世宗柴荣怀着对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统一大业的无限眷恋和壮志未酬的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

（易图强）

参考书目：

《通鉴纪事本末》：《世宗征淮南》
《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
《新五代史》：《后周世宗纪》
《资治通鉴》：卷 292—卷 294

钱氏据吴越

相传大禹治水时，划全国为九州，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水乡定为扬州，取江水波扬所及之意。春秋时，吴、越二国领域大致与古扬州相当，两家毗邻争霸。战国时，属于楚。秦始皇灭六国，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会稽郡就在吴、越故地。东汉顺帝时，以钱塘江为界划郡为二，南仍为会稽，北增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南朝梁升钱塘县（今杭州前身）为临江郡，陈改为钱塘郡。隋朝废郡设州，从此杭州载入史册。隋文帝凿大运河，从涿郡（今北京市）通杭州，杭州因此得以迅速发展，为以后成为吴越国都城奠定了基础。唐代，吴、越故地始属江南东道，后由两浙共领。降至唐末五代，钱氏借古州宝地，两霸威名，割据一隅，建都立国，几近百年。

吴越国创始人钱镠，字具美，唐大中六年（825）生，杭州临安（今属杭州市）人，年轻时，他擅长射箭使槊，骁勇强悍，以贩盐为业，涉迹绿林。

乾符二年（875 年），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因立功无赏，带领部下劫掠府库，兴兵叛唐。这件事改变了钱镠的志向，石镜镇将董昌募集乡兵平乱时，他应召投入军旅，被任命为偏将。不久，钱镠领兵击败王郢，得到董昌赏识。乾符六年，黄巢拥兵二十万转战江南各地。钱镠劝董昌按兵自保；同时率三百多乡兵与黄巢军前锋周旋，从此小有名气。

广明元年（880 年），杭州设立八都军。董昌掌管临安都，钱

镠为副帅。很快，升为都知兵马使（总指挥），董昌为杭州刺史。这时黄巢大军逼近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各地藩镇势力纷纷拥兵割据，战火四起，董昌团练八都兵，由钱镠统领。八都兵成为后来钱氏创业立国的本钱。

中和二年（882年），与董昌不和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屯兵西陵（今属浙江省），图谋进攻浙西。这给钱氏势力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钱镠率领八都兵征讨，历时三年，杀败刘汉宏，占领浙东，从此，他的声望超过董昌。

光启元年（887年），唐廷授钱镠为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授董昌为越州（治在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同年，钱镠派兵攻克润州（治在今江苏镇江），平定刘浩之叛。又击败六合镇将徐约，攻下苏州，具备了较为雄厚的军事实力，征战之余，钱镠命人修筑杭州新城，稳固后方，作长久打算。

大顺元年（890年）八月，钱镠被加封为吴兴郡开国男。闰九月，对杭州旧城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新筑城墙达五十余里，历时三个月完工。这一年，孙儒与杨行密为争夺常州、苏州屡战不休。唐政府加授钱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目的是利用他节制孙、杨，稳定一方。大顺二年（891年）春，即在杭州新城完工不久，孙儒自淮南重返苏南，取苏州等地欲乘胜攻杭州。钱镠出动水军抵御，孙儒改变策略。十二月，烧掠苏南，进逼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市），围攻杨行密。杨行密派人向钱镠求援，钱镠送去干粮、兵器，并出兵苏南，扫除了孙儒部分力量。然后与杨行密会合，在宣州与孙儒主力决战，孙儒被杀。不久，杭州建制升格为武胜军，钱镠任本军团练使，苏、杭等处观察处置使；越州升为武胜军，董昌任节度使。

景福二年（893年）七月，钱镠调集十三都（八都之外又增紫溪、保城等五都）兵卒以及二十万力役筑杭州罗城。这是对杭州第二次扩建。新城东南沿江，西濒钱塘湖（今西湖）、霍山，西南

至六和塔（后建），东北至艮山门外范浦，城墙共七十余里。整个罗城开十道城门：朝天门（吴山下今镇海楼）、龙山门（今六和塔西）、竹车门（今望仙桥东南）、新门（今炭桥东）、西关门（故雷峰塔下）、南土门（今荐桥门外）、北土门（旧菜市门外）、盐桥门（今盐桥西）、北关门（今夹城巷）、宝德门（今艮山门外天星桥）。城楼建筑高大、壮观，又具实用性。如朝天门，叠石楼台，高达三丈，东西五十六步，南北二十八步。正中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两边三十四根木柱靠壁而立。楼台之上有平敞的武台可容纳一百多兵士。武台左右有两道石阶通楼上，城楼高达五丈，连楼台约八丈。城楼之上设置钟鼓、刻漏，用以掌握时辰。罗城修竣后，又增设六座屯营，分守要道，后来，杨行密想吞并杭州，派了一个和尚侦察杭城地形与守备情况，得知钱氏城池坚固，军容整齐，未敢轻动。

乾宁元年（894 年）唐廷授钱镠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赐之私门立戟。次年进封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权位显赫。这时，威胜军节度使董昌息兵已久，看到旧时部下钱镠日见封授，修城开府，颇有独霸东南之势，就乘唐朝无力顾及之机自称皇帝，国号大越罗平，改元顺天，意为顺应天命，立国繁昌。他册封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又将军卒外衣绣上“归我”二字。

唐政府不容董氏擅自称帝，下令削除他的官爵，封钱镠为彭城郡王，令其出兵进讨。钱镠是由董昌一手提拔起来的，后来居上，现在更不把他放在眼里。相反董氏反唐自立，给钱镠扩大地盘带来了新的机会。钱镠割据一方，名义上还是唐朝将相，所以奉朝廷之命讨逆是他最好的出兵借口。六月，钱镠发兵讨董昌，董昌求助于杨行密。杨行密分兵袭击苏州、嘉兴、湖州等地。以减轻越州方面压力。钱镠攻守两胜。乾宁三年五月，董昌去帝号。钱镠将顾全武、许再思攻破越州城，俘董昌。董昌在送往杭州的途中，投水自尽。他对押送他的人说：“我与钱公俱起自乡里，曾经

还比他地位高，今天有什么脸到杭州去呢?”

灭董昌后，钱镠下令散府库金帛以赏将士，开仓廪以赈贫乏，在越州很得人心，唐改越州威胜军为镇东军。钱镠任节度使。乾宁四年六月，钱镠去越州接受节度使职。七月，回到杭州，定越州为东府，董氏多年苦心经营的越州尽为钱氏所得。钱氏还派顾全武领兵克复苏州，攻下松江（今属上海市）、无锡（今属江苏）、常熟（今属江苏）、华亭（今属上海市）等地。八月，唐廷赏赐钱镠铁券：恕其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钱镠及其继承者与中原政权一直保持较好的君臣关系，是钱氏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钱镠在上表唐廷谢赏铁券时表示：“臣谨当日慎一日，诫子诫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买祸。”朱全忠执政的唐政府则对他百般拉拢，依靠他的实力节制其他藩镇，尤其是杨行密。乾宁五年，从钱镠之请，移镇海军于杭州（原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封他为“定乱安国功臣”。光化二年（899年），升杭州为大都督府。次年五月，封他为南康王；天复二年（902年）五月，又封为越王。勾践之旧疆与名分正式归于钱氏。

钱氏封为越王这一年，内部出现叛乱。钱镠发迹之后，曾在杭州附近筑衣锦营，寓衣锦富贵，后来改为衣锦城，这年，他亲巡衣锦城，整治沟洫。八月初，准备回府城杭州，犒赏将校；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策反，以身体不适为辞，想留在衣锦城，等钱镠走后再发动。钱镠有所觉察，命他先回杭州，自己暂时留在衣锦城。没料到，徐绾先走后即叛乱，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自杭州出兵，相迎同叛。二人快到内城时，王子钱传瑛关起城门，领兵抵抗。钱镠一行走到杭州附近的龙泉，才听到事变。于是急驰城北，悄悄入城，又派人火速向杨行密求援。而徐绾抢先一步，邀杨行密的宣州镇将田頵攻杭州。钱镠亲自登城督战，多次击退叛兵及田頵兵的进攻。田頵久攻不下，拔营退走，准备渡过钱塘江，截断东府与杭州的要道。越副指挥使盛造、朱郁率兵追击，大败

田頵。这时，杨行密也派人警告田頵："再不收兵，我将遣人代镇宣州。"田頵见攻城掠地无望，率部偕徐绾、许再思回宣州。杭州之围遂解。不过，钱镠破费一百亿，送给田頵作为犒师钱，又以王子钱传瓘作为人质，这是钱氏发迹以来受挫最重的一次。

天复三年七月，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县）刺史陈询再叛钱氏，举兵攻兰溪（今浙江兰溪），被都指挥使方永珍击败。之后不到两个月，田頵等叛吴，吴王杨行密反求于越。钱镠命方永珍等屯兵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堂弟钱镒屯兵宣州以接应吴兵。十一月，田頵战败被杀，其母将钱传瓘送还。钱镠命人在杭州城内虚白堂旧址建八会亭，以纪念杨氏、钱氏平吴定越，讲武计议，八次在此会盟。后来更名为都会堂。

可是，好景不长。天祐元年（904年）起，吴、越再度交恶。十二月，越衢州（今属浙江）制置史陈璋叛，降吴。次年正月，钱镠派兵再讨睦州叛将陈询。杨行密乘机派遣西南招讨使陶雅等攻新安（今浙江淳安县）。钱镒与顾全武、王球率兵抵御，失利，钱镒、王球被俘。陈璋与陶雅合兵后，攻陷东阳（今属浙江），进兵至暨阳（今浙江诸暨）。从此，吴、越兵戈不息。

朱全忠建立后梁后，封钱镠为吴越王，满足了钱氏的宿愿。早在天祐元年，钱镠就向唐昭宗求封吴越王，昭宗没有答应，当时也是朱全忠执政，就作主封他为吴王。朱梁代唐，虽然名不正、言不顺，被多数割据政权所不耻；但后梁毕竟是中原朝廷，钱镠并不计较表面上的臣属。有人劝他拒命，他笑着说："吾岂失为孙仲谋邪！"就接受了封号。著名诗人，镇海节度判官罗隐（833—909年）是钱氏重要谋士，他也劝钱镠起兵讨梁。钱镠深知两浙兵力有限，并不想卷入与己无关、事实上又不可能有所成就的纷争；与吴长期争夺苏、常一带，主要在于保全两浙。因此，他不肯采纳罗隐的主张。

开平元年（907年）八月，朱全忠授钱镠兼淮南节度使、杨州

大都督，充淮南四面招讨制置使。钱镠派进奏官王景仁奉表到开封，陈取淮南之策。王景仁临走时，朱全忠问他："钱王平生有何喜好？"他回答说："好玉带、良马。"朱全忠笑着说："真乃英雄也。"于是，赐给钱镠玉带一匣、打毬御马十匹。

开平三年，吴兵围攻苏州，钱镠派弟钱镖等领兵救援。钱镖与苏州守将孙琰内外夹攻，俘获吴兵三千人；又夺得兵器、牲口三十万件（头），战船二百余艘。接着，钱镖等又追败吴逃将周本、吕师造于皋天荡（今属江苏）。此战，吴军大大受挫，长时间不敢南窥。

杭州地处钱塘江之滨，沿海、沿江居民深受潮水之患，开平三年八月，钱镠开始修筑重要的水利工程——捍海石塘。早在秦汉时期，潮患就见于记载。每当大潮涌来，钱江南北两岸数十万亩田地都遭潮水淹没。自汉以来，每届地方官必以治潮为要任。五代以前，修筑了一些河塘，但都不能消除潮患。唐代杭州刺史崔彦曾，在杭城东南修过长约五里的沙河塘，由于它的规模小、基础不牢，难以阻挡潮水冲击。钱氏治潮患，先在岸边两丈以内的江内，用罗山巨木打桩六层，然后用竹筐装满石头充填其中，这样构成泥塘，减缓了潮势；又在岸边修建石堤，阻止江水蔓延。泥塘、石堤构成了牢固的石塘。这条石塘自六和塔延伸到艮山门，杜绝了潮水对杭州的危害，后人称为"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钱氏在修筑海塘的同时，还建了候潮、通江等城门，又设置龙山、浙江两闸以控制江水倒灌入运河的流量。还凿平钱塘江中的石滩，保证了内河、外江航运的畅通。这一系列工程，不失为千秋功业。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

同一年，即在修筑石塘之前，钱氏还对杭州进行了第三次扩建。这次扩建主要是大修台馆，筑子城，进一步促进了杭州的繁荣。过多的劳役令士卒颇有怨言，有人晚上在王府大门写了一段顺口溜"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意思是：刚修好子

城、又要开石塘，负担太重！钱镠看到后，叫人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意思是，修城开塘都是为了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

乾化三年（913年）春，吴将李涛领兵进攻吴越衣锦军（衣锦城升格为军），王子传瓘将其击败，俘李涛及其部下八千人。五月，吴宣州刺史花虔又攻衣锦军。钱传瓘再显身手，捕获花虔及部下七千余人。九月，三位王子传瓘、传璙、传瑛领兵攻常州，败于吴将徐温。

贞明元年（915年），钱氏在各州设置都水营使，主持水利；又募卒为都，称"撩清军"或"撩清"。光是太湖流域就设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门从事兴修水利。从嘉兴、松江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一带，在每条入海小河上都修建堰闸，百姓遇旱则导水灌田，涝则引水人河。

兴修水利是钱氏统治吴越时突出的贡献。除捍海石塘外，较大的水利工程还有：武义（今属浙江）长安堰，灌田万顷；鄞县（今属浙江）东湖周围八十里范围内的塘堰，可灌田五千顷；越州鉴湖周围五十八里内的塘堰，灌田九千余顷。吴越还在河湖岸边，农田周围筑堤修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形成圩田；这种圩田不仅能扩大耕种面积，还能有效地保证收成。

贞明五年吴越、吴重燃战火。这年二月，吴越王钱镠命子钱传瓘率战舰五百艘，大举攻吴。四月两军交战于狼山江（今属江苏），吴兵大败，百胜军使彭彦章战死。六月，沙山之战，吴越兵败。七月，钱传瓘率三万人进攻常州。吴丞相徐温命陈璋率水军从长江入海口出发，绕道袭击吴越兵背后，双方在无锡发生大战，吴越兵败，指挥使何逢、吴建战死，钱传瓘退兵。八月，执掌吴国权柄的徐温，为了保境息民，不愿再和吴越残杀，没有乘胜逼攻杭州，反遣客省使欧阳汀到杭州请求通好。吴越出兵不利，正是求之不得，自此两国休兵二十余年，三十余州百姓得以安居乐

业。

龙德二年（922年），钱镠在闽门之右设天下元帅府；又在天真山后建大真院，其旧址名登云台，亦名拜郊台，是郊祀皇天之所。钱氏建国之志渐明。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后梁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吴越正式建国。其仪卫、名称多如天子制度。国王所居称殿，府署称朝廷；教令在国内下达称敕；国称吴越国。这年钱镠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他命其子传瓘为镇海、镇东留后，总揽军府大事；在朝廷设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使等。

后唐建立后，钱氏仍对它行臣礼。同光二年九月，钱镠遣使向后唐入贡大批地方特产，这些都是吴越手工业生产的精华。有银器、越绫、吴绫、龙凤衣、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缎、秘色瓷器等。此外，还厚赂后唐权要，求国王金印、玉册以及诏书不名。

虽然已建国，钱镠还是希望得到中原朝廷（后唐）的承认。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强藩面前毫无办法，曲从其意，授以吴越国王。同光三年八月，钱镠用后唐册礼使送来的黄金印、玉册，遣使册封新罗王、渤海王；其他海上诸国，也册封其国君君长。

十二月，钱镠遣使至吴，通报受玉册、金印诸事；吴国认为其国名与自己国名相同，有不敬之意，拒受吴越国书，又在边境戒严，不让吴越使者及商旅通中原。天成二年（927年），吴越通和使到达朝鲜半岛的高丽、后百济。钱氏多次派人出使海外，对中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及文化交流有积极的意义。

钱镠晚年对杭州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修筑白堤。以后，再无较大的整治，致使西湖葑草蔓合，水位日浅。钱镠置撩兵千人，专门芟草浚泉，重筑旧堤。不久，西湖恢复了唐时盛景。

长兴三年（932年）三月，钱镠病逝，享年八十一岁，谥号武

肃王。他在位四十一年，对两浙的开发很有贡献。历千余年，传在口碑。

钱镠死后，他的第七子钱传瓘继位。钱传瓘，字明宝，即位后改名钱元瓘。元瓘有勇有谋，屡立战功，深得钱镠信任。徐绾之乱，曾在田頵营中作人质，解杭州之急；后守卫衣锦军，两次大破吴军，显示出治军才能。即位以后，他奉行钱镠遗命撤消国仪，用藩镇制，遵中原朝廷年号（钱镠时曾用“天宝”年号私行境内）；免除荒废民田的租税；设置择能院，选举官吏。这些措施的实行，使钱氏外受中原朝廷的信任，内得民心。钱元瓘还能妥善地处理下属的矛盾。当时，内牙指挥使刘仁杞与陆仁章久被重用，颇为众人所忌，有人跑到军府门前蜚短流长，要求杀掉他们。钱元瓘让侄子钱仁俊告诉诸将：“不要逞私恨杀人。”后来，二人虽没有留在都城，也都任以刺史职，众人心服。他的弟弟钱元珦为顺化军节度使、明州通判，元珦用铁床炮炙属吏，部下不堪，钱元瓘不徇私情，免除他的职务，把他关了起来。

长兴四年七月，后唐遣使封钱元瓘为吴王。次年，又册封其为吴越王。钱元瓘向后唐进贡白金五千铤、绢五千匹。不久，又贡锦绮五百匹。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件。金棱秘色瓷器是吴越最有名的特产。

越州瓷器久负盛名，陆羽《茶经》将越窑瓷器列为上品，称“越窑类玉”。钱氏据吴越后，越窑瓷器继续发展，在工艺、技术上承唐启宋。秘色瓷器在越窑中最为精美，唐代晚期开始烧造。陆龟蒙《秘色越器》诗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吴越钱氏置官监窑，烧造秘色瓷，专供吴越宫廷及中原朝廷。民间不得使用，故称“秘色”。当时的秘色瓷器，在胎质、釉色、纹饰及造型上都别创一格。从现存余姚窑秘色器看，施釉技术已达到可以控制色彩的程度，青翠悦目。比之唐代秘色器，釉色青中泛灰蓝，更为清亮。造型有盘、碟、瓶、碗、茶托、枭首杖等。装

饰技法有印花、划花、贴花等。不过，秘色器还是以釉色取胜。从吴越上贡秘色器来看，当时产量相当大，尤其是吴越后期。金棱秘色瓷器指贴金或镶金的器物，这种器物更是难得。钱元瓘墓中出土了高达半米的雕龙贴金大瓶，极为华丽。

在吴越上贡物中，丝织品也是大项。其质量精美，品种繁多，数量很大。吴越的绫罗除中原朝廷、钱氏宫廷、官宦享用外，还大量出口到境外、海外，对商业的繁荣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天福二年（937 年）四月，后晋封元瓘为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副元帅、赐金印。钱元瓘即国王位，建国；制度同钱镠建国时一样。他下令免除境内当年租税的一半。十月，贡后晋天和节大排方龙座金腰带一只，御衣十三件。天福三年十月，又贡后晋金器五百两、白金一万两、吴越异纹绫八千匹、金条纱三千匹、绢二万段、锦九万两、大茱脑源茶二万四千斤，用以谢恩。

钱元瓘继位八、九年，安兵息民，国家无事。

天福五年二月，闽中大乱。闽王王延羲之弟王延政在建州称帝，遭王延羲重兵压迫。王延政求救于吴越。钱元瓘派遣内牙都统军使仰仁诠等率兵四万救建州。不料，未等仰仁诠等到达建州，王延政已破闽王福州兵。延政惟恐吴越兵乘机袭建州，就奉献牛酒，请其回师。仰仁诠等在建州城外安营扎寨，没有同意。王延政没有办法，又调头向闽王王延羲求助。王延羲不仅书面上谴责吴越侵犯闽中，还派出大军前往建州，另出轻骑截断吴越兵粮道。吴越兵因时节久雨，粮食不给，病者居半，被王延政、王延羲联兵攻击，大败，遭俘获、斩首的兵卒数以万计。此役使吴越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次年七月，后宫丽春院大火。延烧内城，宫室、府库焚毁殆尽。钱元瓘见城内无处不火，十分惊惧，得了癫狂，不久重病而死，死后谥为文穆王。

文穆王死后，其第六子钱弘佐继位。弘佐年仅十四岁，由丞

相曹仲达摄政，他虽然年少，却很精明，辅佐之臣也无害国之心，故吴越仍能繁盛如先。弘佐即位后迁居思政堂，他传令境内免征赋税一年，各关卡、桥梁禁制全部废除；凡隶属于道宫、佛寺的田园，不再征税。天福七年十一月，遣使贡后晋银铤五千两、绢五千匹、丝一万两；又进细甲、弓弩、扇子等。不久，又进献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鞵履、粗姜、细纸等物。这种细纸，就是温州产的"蠲纸"，纸质细腻，洁白坚滑。钱氏对生产蠲纸的人户蠲免赋役，故称蠲纸。

同年，钱弘佐在杭州建报国千佛院。开运元年（944 年），又建龙华宝乘院、宝相寺华藏院。开运二年，在杭州北山建鹫峰禅院。吴越境内佛事渐盛。

开运三年，福州将李达拥立僧卓岩明为天子，为王延政所伐。后来，李达杀卓岩明，自称威武军留后，一面向南唐称藩，一面向后晋进贡。南唐则受王延政之邀，派兵助围福州。十月，李达遣部将徐仁宴、李廷谔到吴越，奉表称臣，乞求援兵。大多数将领认为不能出师，只有内牙都监使水丘昭券认为闽中当救，出师有利可图。钱弘佐不顾建州之嫌，对众人说："唇亡齿寒，《春秋》明义。我身为天下元帅，不能解救邻难，有何用处；诸将肤马食肉。难道就不肯以身先我？有异议者斩！"钱弘佐出兵福州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南唐对自己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这着棋的确走得高明。水丘昭券、丞相元德昭、统军使张筠等统兵三万水陆俱进，前往福州。十一月，至福州，与李达合兵抵御南唐。交战不利，福州被南唐兵团团围住，形势危急。次年三月，钱弘佐派大将余安领兵自海道增援福州。福州海滩积有淤泥，加上南唐兵乱箭如蝗，难以登陆。南唐将冯延鲁好大喜功，对部下说："相持不下，徒劳我师，不如放他们登陆，然后一举歼灭。援军一败，福州城不攻自破。"没想到吴越兵登岸之后奋力拚杀，南唐兵抵挡不住；城中出兵夹击，大破南唐兵，冯延鲁弃众而逃。这次吴越获得兵器数

十万件。余安带兵人城，李达举城降附吴越。

开运四年，弘佐病死，年仅二十，谥为忠献，在位七年。他年少即位，恭勤政务，发摘奸吏，人不敢欺。他奉行轻徭薄赋政策。一次，他问仓廪官还有多少蓄积，仓廪官说可用十年，便下令免除境内三年租税。

弘佐死后，钱元瓘第七子弘倧即位。中原后汉主封弘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吴越王等。钱弘佐在位时，将校骄功枉法，私行诛杀，一般都受到宽大处理。弘倧性情严急，即位后不久就杀掉杭州、越州不法官吏三人，引起将校不满。开运四年十二月，威武军节度使李孺赟叛，被杀。内牙统军胡进思伙同指挥使诸温、斜滔也在内廷叛乱。胡进思自恃有功于弘倧，干预政事，引起弘倧反感。一天，钱弘倧在王府夜宴将吏，胡进思以为图己，就率内牙亲兵全副武装地进人王府，将弘倧锁在义和院。然后，矫称弘倧中风，传位于弟弘俶。钱弘倧在位不到六个月。

胡进思之变，钱弘俶（北宋建立时，改名钱俶）登上了王位，成了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他是钱元瓘第九子。虽因政变被推上台，但钱俶并不愿受制于人。乾祐元年（948 年）二月钱俶杀参预胡氏之变的大臣何承训。胡进思忧惧病死；斜滔被放黜到处州（治今浙江丽水）。钱俶在农业生产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农民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下令免除当年无力上交的租赋，不再转到下年；募民开垦荒田，不取租税，使吴越境内无废弃之田。他还置营田卒数千人，在淞江辟土而耕。由于着力开垦田亩，加上便利的灌溉条件，粮食产量增加，一石米只要几十文钱，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乾祐二年三月，后汉授钱俶为吴越王，杭州、越州大都督。十一月，吴越向后汉人贡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等大批物产。

广顺元年（951）正月，后周建立。三月，后周太祖郭威封钱

俶为诸道兵马都元帅。广顺二年，又授钱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显德元年（954）七月，加授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后周所封，无“吴越国王”。

显德二年十一月，郭威命司空李谷伐南唐，诏令钱俶出兵会击金陵。次年正月，郭威亲自东征南唐淮南之地，命钱俶出兵，分路进讨南唐。与南唐交战，吴越负多胜少；又得向后周贡献财物，国内财物、兵力均显不足。钱俶准备检括境内民丁补充师旅，被弟钱弘亿劝止。此后，频频用兵，朝贡不绝，使得富庶、安宁的吴越愈加力不从心。

显德五年二月，周世宗柴荣诏令吴越将水军调到瓜步迎鸾镇、长风涉（今属江苏）等处。钱俶不敢怠慢，派上直都指挥使邵可迁、路彦铢率领战舰四百艘、水师二万人会合周兵。另外，还向后周贡御衣、犀带及军粮稻米二十万石。四月，杭州又一场无情大火将官衙府署几乎烧得不剩，另有一万七千余家民房被毁。大火才灭，杭城尚有余烟，钱俶即向后周贡绫、绢各万匹、白金一万两。七月、八月、十二月，不断进贡，贡使不绝于途；金银绢帛，动辄万计。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称帝。吴越贡奉量更多于以往；奇器精缣，皆制于官府。直到钱氏归宋，吴越上贡的物品有：赭黄犀、龙凤龟鱼、仙人鳖、山宝树等物及犀带七十余条，皆稀世之宝；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件；水晶、玛瑙、玉器四千余件；三尺五寸高的珊瑚十株；金银饰陶瓷器十四万余件，白龙脑（樟脑）二百余斤、玉带二十四条、金银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万件、紫金狮子一只，黄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两，锦绮绫罗数以万计。举朝文武皆有馈赠，钱氏竭十三州之物以供中朝大国，务得欢心。吴越由是而渐贫，百姓以是而得安，宋太祖面对大量贡物并不领情，他说：“此吾帑（国库）中物，何须献为？”

钱俶倡导佛教，在位时修了不少佛塔寺庙。杭州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 年），世为江南名刹。唐时，灵隐寺与洛阳伽兰寺齐名，钱俶曾命僧延寿主持扩建，增修僧房五百间，后晋广顺元年（951 年），钱俶再命扩建，增僧房八百间，命名“灵隐新寺”，一时僧众多达三千，还在飞来峰沿灵隐涧依岩造像，现存有弥陀、观音、大势至三尊小佛像。建隆元年，钱俶命重修，建四座石塔，上刻石经。现存两座，八面九层。

杭州自定为吴越都城以来，塔寺日增月益，不可胜数。显德二年（955 年），周世宗柴荣诏令各地寺院非敕额者，全部废弃；检括杭州寺院，共存四百八十余所。其中著名的有：灵峰寺（原鹫峰禅院）、净慈寺（显德元年建）、昭庆律寺（天福三年建）、云栖寺、六通寺等。钱俶在宋初除重创灵隐寺外，还修复了在后周时暂废各寺。乾德二年（964 年），重建城南宝塔寺，供武肃王、文穆王、忠献王铜像。乾德三年（965 年），建城北宝塔寺。开宝六年（973 年）建总持寺。

杭州建塔之风，亦盛于吴越。钱镠时，曾在梵天寺建七级木塔，初建三层，登塔即摇晃不止。建筑名匠喻皓建议每层铺上厚木板，用宝钉加固，塔果然不动。钱俶时，杭州建造了三座名塔，即：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

六和塔，座落在钱塘江畔月轮山上，当时钱江潮有时溢出石塘，钱俶命高僧赞宁、延寿主持建塔，以镇遏江潮。塔建于宋开宝三年（970 年），高九层五十余丈，撑空兀突。登塔远眺，钱塘风光尽收眼底。塔顶还装有明灯，导海船、江船夜航。

保俶塔也建于宋开宝年间，由吴越丞相吴延爽主持。初名应天塔，九层，石体实心。建成后不久坍塌。北宋咸平（998—1004 年）中，僧永保募缘重建，十年而成。因他戒行高尚，人呼“保叔”，故称塔为保叔塔。后人称保俶塔，则附会保佑钱俶在开封平安一意。保俶塔耸立在宝石山上，晨迎朝阳，夜伴静月；人虽不

能登其上观西湖盛景，然行走在闹市之中，游览西湖之上，不能不痴凝那娇姿倩影。明人闻启祥诗云："湖上两浮屠，宝石如美人，雷峰如老衲。""宝石"即保俶塔。

开宝九年，钱俶黄妃在南屏山雷峰之上建塔，奉藏佛螺髻发。原打算建十三层，高达百丈，开工觉得财力不足，就建了七层，后来又听风水先生之言，折除两层，剩五层。塔名黄妃塔，又因地产黄皮木，被人讹名为黄皮塔，后人俗称雷峰塔。雷峰塔造价六百万缗，含砖灰、土木、油钱、瓦石、造像及装饰等用费。塔高四十余丈，兀立层霄；塔身金碧璀灿，重檐飞栋，又悬以风铃，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横空，此景最佳，誉为"雷峰夕照"。

钱氏在境内大兴佛事，军事上则疲于为中原政权效命，乾德二年（964 年）十一月，北宋伐后蜀，钱俶命亲从都指挥使、行军司马孙承祐等领兵助攻。

开宝元年（968 年）三月，宋太祖封钱俶为吴越国王。钱氏虽受金印，地位已非往日。开宝三年（970 年），宋太祖命翰林学士陶谷出使吴越，钱俶设宴款待，掌膳师烹调蟹类蝤蛑、蟚蜞等十几种，一一上到席上，陶谷说："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以此讥讽钱氏。钱俶不动声色，命人进上葫芦羹，对陶谷说："这是先王时的品味，厨人依样而做。"陶谷在中原时，有人作诗嘲他。"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所以钱俶以此回报。

开宝五年（972 年），钱俶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彝朝贡，宋太祖对黄彝说："你回去告诉元帅（指钱俶），江南倔强不朝，我将要发兵讨伐，元帅当练兵助我，不要受'唇亡齿寒'之言迷惑。"李煜曾使人劝吴越，要求两邻和好，不要出兵攻唐并有"唇亡齿寒"之语。宋太祖还特意命人在薰风门外建造一座大宅，连亘数坊，栋宇宏丽。他召吴越进奏使钱文赞说："朕数年前令学士承旨陶谷起草诏书，现已在城南建成离宫，赐名为'礼贤'宅，以待李煜及钱王，先来朝者赐之。"钱俶明白其弦外之音，上表致谢，

坐待宋太祖出师之诏。后来，宋灭南唐，吴越有包抄之功。

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下诏攻南唐。十月，授钱氏为东南招讨制置使，赐剑甲、鞍马，又命丁德裕为军监，督促钱氏攻常州。钱俶亲率五万人，从杭州出发，分兵攻南唐常州、江阴（今江苏江阴市）、宜兴（今江苏宜兴市）等地。次年四月，南唐常州守将禹万诚降，李煜再次修书，劝止钱俶进攻，钱俶不理，反将书信呈送宋太祖。五月，宋太祖授为太师、尚书令，又赐袭衣、玉带、鞍马各一、金器二千两、银器一万两、绵绥一万段，以示亲宠。

开宝九年（976年）正月，钱俶去开封朝见宋太祖，宋太祖待他甚厚，赐居"礼贤宅"。名为"礼贤宅"，实际上就是降附者的幽所。宋太祖在宴会上抚着钱俶的背说："誓不杀钱王！"钱俶呆在开封，一直不敢提出回杭州。直到四月，宋太祖对他说："南北气候不同，快近炎暑了，卿可早发。"他这才敢走，离开开封后，打开宋太祖亲赐的黄缎包袱一看，里面都是宋朝大臣的上书，要求将钱俶扣留在开封，钱俶不禁大惊失色。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钱俶二进开封。宋太宗赵匡义在长春殿设宴，命南汉国君、恩赦侯刘𬬮，南唐后主、违命侯李煜陪坐，安排很有深意。钱俶请求取消吴越国王、元帅等名号以避祸。五月，宋丞相崔仁冀发出警告，劝他赶快纳土，否则将遭不测。钱俶断然以所属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余户、十一万五千多士兵降宋。宋太宗兵不血刃而得两浙，赐钱俶誓书，大加赞赏：钱氏自献疆土，将三千里锦锈山川、十三都鱼盐世界，皆归于皇帝、尽属有司……还许以特权：钱氏到日，如朕亲行。钱俶归宋后，一直住在礼贤宅，待遇甚优。端拱元年（988年）八月二十日病逝，年六十岁，谥为忠懿王。

钱氏据吴越，计三世五王，前后九十八年。

（程定飞）

参考资料：

《十国春秋》卷77—卷89

《通鉴纪事本末》：《钱氏据吴越》

《旧五代史》：《世袭列传》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六章

刘氏据岭南

岭南又称岭表、岭外、岭海，泛指五岭以南地区。唐朝贞观年间设置十道，开元年间设置十五道，岭南道均为其中之一，治所在广州（今广州市）。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置岭南五府经略讨击使，为玄宗边防十节度经略使之一；至德二年（757年）始兼岭南节度使名号，形成岭南方镇，直辖广管诸州（约今广东钦山港以东大部地区），兼领桂、邕、容、安南四管（今属广西）。咸通三年（862年），岭南分为东西两道：广管为岭南东道节度使；邕管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兼领桂、容、安南三管，五代刘氏最盛时，几乎占据了岭南全部。

刘氏据岭南起自刘谦。其父刘安仁本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后举家迁往福建泉州，经常到广州与南海诸国客商做生意发了大财。咸通年间（860—874年），刘谦为广州牙将，受到岭南两道节度使韦宙的赏识。乾符五年（878年），黄巢大军攻破广州，旋即转战湖南，但岭南各地小股农民武装仍很活跃。刘谦镇压了数处起义军，以功被岭南东道处置观察使刘崇龟表为封州（治今广东封川）刺史、贺江镇遏使，防御梧州（治今广西梧州市）、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以西。一年以后，刘谦就拥兵万余，战舰百艘，成为岭南较为强大的一派势力。

乾宁元年（894年）冬，刘谦死，贺江将校中有人企图变乱夺权。刘谦长子刘隐，时年二十一岁，一夜之间杀掉一百多人，稳住了阵脚。清海军节度使、岭南东道观察处置使刘崇龟召补刘隐

为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不久，表为封州刺史。第二年，刘崇龟死，唐宗室、薛王李知柔代为清海军节度使。他行至湖南，得知广州牙将卢琚、谭弘玘发动兵变，不敢再进。谭弘玘叛乱后出守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市），很信任刘隐，将女儿许配给他，借以扩充实力。刘隐满口答应婚事，命封州兵藏在船舱内，假装迎亲，夜入端州，杀掉谭弘玘。紧接着，他又领兵袭击广州，斩卢琚。广州乱平后，刘隐摆出一派威严的军容迎接李知柔入府听事；李知柔表请他为清海行军司马。

光化元年（898年）十二月，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市）刺史曾衮与广州将王怀合谋 攻广州，被刘隐一战击破。数年后，太保、门下侍郎徐彦若代李知柔为清海军节度使，表请刘隐为节度副使，让他执掌军政。

天复元年（901年）冬，徐彦若死，刘隐暂为清海军留后，这时岭表诸管纷纷割地自据；曲承美占交州（治在今广西境内）、刘士政据桂州、叶广略据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市）、庞巨昭据容州（治今广西容县）。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卢光稠拥兵数万乘徐彦若病死之机攻下韶州，让儿子卢延昌据守，卢氏还向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市）进攻威胁广州。刘隐派兵将其击退，又想乘势夺取韶州，在韶州城南遭虔州将谭全播重兵伏击，大败。

天祐元年（904年），唐政府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军节度使。崔氏行到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惧怕岭南纷乱及刘隐不会听命，不再南下，后被唐廷召回做了宰相，而刘隐为了争取节钺，多次派人重赂梁王朱全忠，并劝他自立代唐。朱全忠启奏唐昭宗；刘隐如愿以偿，当年即向唐昭宗进贡了南海佛哲国、诃陵国等所献的香料，刘氏据岭南自此开始。

后梁建立，朱全忠因刘隐屡有劝进拥戴之功升他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刘隐向梁进献了二十万缗助军钱及其他实物。

开平二年（908年）后梁命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为官告使。诏命刘隐为清海、静海等军节度使及安南都护。

开平三年，后梁封刘隐为南平王。次年进封为南海王。

乾化元年（911年）三月，刘隐病死，年仅三十八岁，后被追尊为襄皇帝，庙号烈宗，他自贺江平乱到正式为清海军节度使，正好整十年。其间，他多次以功升职，又因善事朱全忠，终于获得节度使衔。入主广州后，他治军有方，用兵使计，势力得以不断发展。

刘隐很注意礼贤纳士。当时，唐室濒亡，中原大乱，许多人就来到岭南，认为岭南距中原最远，比较安宁，可以作为避难之所。还有一些人在岭南任职，因乱无法回朝。再者，岭南有不少唐朝谪居名臣的后代。这些人成为刘隐主要的招纳对象，其中有"容管巡官王定保、刘崇龟之子刘濬、太学博士倪曙、司农少卿周杰、邕管巡官杨洞潜等。后梁官告使赵光裔、李殷衡到广州后被刘隐硬留下来。他的弟弟刘岩继位后，同样重视网罗人才，虽然刘岩以残暴著称，但对这些人还是礼遇备至。赵光裔原耻事刘氏，常常郁郁思归，刘岩仿其笔迹，遣使至洛阳，把他的两个儿子及其亲眷接到广州，使他十分惊喜，为之尽力。刘氏兄弟之所以如此，是欣赏他们经世治国的本领，让他们为掠地建国出谋划策，这些士人由于受到刘氏兄弟的诚心礼待，多尽心尽责，为刘氏占据岭南立功不少。赵光裔留下来后，刘隐任命他为节度副使，刘岩任命他为兵部尚书、门下侍郎，与杨洞潜、李殷衡同为同平章事（即宰相）。他在南汉做了二十余年宰相，使得南汉府库完实，政事清明，四邻和睦，素有"贤相"之称。杨洞潜受刘隐师礼相待，是刘隐的得力谋士。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握时机。刘岩时，他首倡刺史不用武流，当延揽中原人士，置于幕府，选为刺史。韶州将黎求杀主帅卢延昌自立，旋又暴死；杨洞潜建议出兵，一举夺取韶州。后来，湖南马殷出兵争夺岭南西道，刘岩用杨洞潜等

人计谋，累战俱捷。刘岩即帝位，他用赵光裔等人为相，设立学校、开贡举，使得南汉小国粗有秩序。杨洞潜死后，刘濬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濬清简执持，常劝刘岩养民息兵。

刘隐据广州较大的成就是继续进行海外贸易，招徕商贾。广州的海外贸易在两晋南北朝期间就逐渐发展起来。唐代的广州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来广州的客商有东南亚、南亚及波斯、阿拉伯人。

刘隐死后，刘岩继位，刘岩是刘谦的小儿子，在其兄刘隐的发迹过程中，他一直是得力助手。韶州失利后，刘隐就把兵权交给刘岩掌握。当时除交、桂等较大的割据势力外，广州附近还有七十余寨。刘岩各个击破，首先制服这些小股力量，使刘氏成为岭南霸主。刘隐弥留之际，任他为清海军留后。

乾化元年五月，后梁授刘岩清海军节度使职。他采纳杨洞潜建议，以文官充任刺史，巩固了对各州的统治。同年十二月，刘岩得知虔州名将谭全播病、韶州帅卢延昌被部下杀死，发兵攻取韶州。接着又与马殷争夺岭南西道。马氏取得昭、贺、梧、蒙、龚、富六州，刘氏得容管及高州，但总的来说，刘氏不是马氏的对手。马殷早在光化三年（900 年）就已出兵攻下桂管，降刘士政。至此，已占领岭南西道大部分地区。

乾化二年（912 年）四月，后梁派遣广潭和叶使到广州，杨洞潜等力劝刘岩与马楚 联姻；不久，刘岩又派供军巡官陈用拙出使杭州，与吴越通好。这样，刘氏减少了边境之忧。这一年，刘岩贡后梁金银、犀角、象牙、杂宝货、香料、银茶等物，共值五百多万缗。次年三月，后梁封他为南平王。

贞明元年（915 年）刘岩认为吴越王钱镠已是国王，而自己不过是郡王，就向后梁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职。后梁不许，刘岩大怒，对僚属说："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廷。"遂停止了对后梁的朝贡。

贞明二年八月。刘岩称帝，国号大越，定都广州，改元乾亨。他以赵光裔为兵部尚书，杨洞潜为兵部侍郎，李殷衡为礼部侍郎，这三人都是同平章事；又任唐末太学博士倪曙为工部侍郎，后改为尚书左丞。他还设立三庙，铸乾亨重宝钱。贞明三年，刘岩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由于财政不足，刘岩又铸造铅钱，以十当铜钱一。

贞明四年九月，后梁削除刘岩南平王等官爵，命吴越国发兵征讨。钱镠因与之无仇无怨，又远隔千里，只受命而不出兵。

贞明五年，刘岩从杨洞潜之请，开始设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以后每年如此。

刘岩立国后，虽尽力与诸藩列国保持友好，但对中原朝廷却很蔑视。后唐同光三年（925年），他派遣宫苑使何词到洛阳探虚实，称“大汉国王致书大唐皇帝”。何词回到广州说，后唐主骄淫无度，无所作为；刘岩大喜，从此不再与中原朝廷接触。岭北富商大贾到广州，刘岩每每召至宫殿，示以珠玉之富。他自称家本咸秦，耻在蛮土为王；后唐皇帝则被他称为“洛州刺史”。

天成三年（928年），马楚大举水军进攻南汉，围封州。刘岩命左右街使苏章将神弩兵三千人，战舰百艘救封州，在贺江大败楚兵。

长兴元年（930年），刘岩遣将梁克贞、李守鄘伐交州，俘获静海节度使曲从美。梁克贞留部将李进守交州，自己带兵攻到占城（今属越南），大掠财宝回广州。次年十二月，爱州（治今越南清化西北）将杨廷艺叛攻交州，刘岩遣承旨程宝将兵往救，程兵未到，交州已陷，李进逃回被杀。程宝反围交州，战死。

清泰元年（934年），刘岩在内宫建昭阳殿。殿顶、地面、椽柱等分别以金、银、白金涂饰。殿旁开水渠，渠内投放珍珠。又用水晶、琥珀雕琢日月，分别安置东西玉柱之首。刘氏交通四邻（达到西蜀、南诏等），掠于南越，加上海外商客所纳，聚结珍宝

无数，为大肆挥霍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交州牙将皎公羡杀安南节度使杨廷艺自代。次年，杨廷艺部将吴权自爱州举兵攻皎公羡，皎公羡向南汉求救。刘岩想借机攻下交州，于是以子刘弘操为静海军节度使、封交王，领兵奔交州；自己则率领大军屯于海门（今越南海防市安阳北），作为接应。不想，交州未沾上边，刘弘操就被吴权大败，战死，刘岩只得收兵回广州。

天福六年十二月，刘岩得病。他取《周易》“飞龙在天”句，造字“龑”（读岩）为名，以图吉利。天福七年三月，刘岩病死。年五十四，谥为“天皇大帝”，庙号高祖。

刘岩在位三十二年，大部分时间内，由于受到名臣辅佐，他能交好四邻，南汉境内安定，府库充实。但到晚年，他猜忌士人，认为士人都是为了子孙着想，不可靠；专门任用没有子孙的阉人，因此南汉宦官成患。刘岩生性奢侈，凡宫殿皆饰以珍宝、翠羽、金银等物，如昭阳殿、秀华宫，用费巨万。晚年建南薰殿，耗费更大。它的二十四根大柱通体镂刻，各柱础置炉燃香，香有气无形。刘岩还以酷刑虐杀著称。他使用的刑具有铁镬、铁床等。用刑之法则有灌鼻、割舌、锯解、刳剔、剥炙、烹蒸等。有时，他在水中聚集毒蛇，将犯人投入其中，名为“水狱”；有时，他将人投进汤镬之后立即提起，放在烈日下曝晒，又在身上浇盐卤，犯人的皮肤、肌肉都已糜烂，但仍能行走，数日才死。他还常常以看到犯人遭锯解时血肉横飞、冤叫满庭为乐。

刘岩死，第三子刘弘度即皇帝位，改名刘玢。其父刚死，他就纵情声色，在宫中以裸露男女为戏乐，终日不理朝政。

天福七年七月，张遇贤起义，岭南慌乱。张遇贤是循州（治今广东惠阳东南）博罗县小吏，他利用巫术将当地小股农民武装统一起来，自称“中天八国王”。攻陷循州后，他改元“永乐”，置百官；以黄伯雄为副帅，景全和尚为军师。起义军身着绛衣，声

势浩荡，继续攻占潮、惠二州沿海地带。刘玢派遣越王刘弘昌、循王刘弘杲领兵镇压。起义军数万人将他们围困起来，双方进行一场血战，矢下如雨，兵卒死者无数，裨将万景忻、陈道庠奋力拚杀，才突出重围，保住了刘氏二王的性命。其后，起义军在岭南受到南汉重兵追剿，屡屡失利。张遇贤只得率部越过大庾岭，袭击虔州南康县。南唐百胜军节度使贾匡浩开始还不以为然，毫无防备，等起义军连陷州县，人数增至十几万人时，他乱了手脚，谨守虔州。张遇贤在地势险要的白云洞（在今江西于都县西）安下据点，建造宫殿、营房，并分兵四出活动。后来，南唐调集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和通事舍人边镐领兵赴虔州围剿。边镐等从白云洞背后小路袭击，大败张遇贤，张遇贤、黄伯雄、景全被叛将李台抓住交给南唐军，三人最后在金陵被斩。

刘玢虽然赶走了张遇贤，却未能保住自己的脑袋。他即位刚到一年，都指挥使陈道庠就在其弟刘弘熙操纵下布置了力士刘思潮、谭令禋、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五人，将他杀掉。

刘弘熙杀掉刘玢后，改名刘晟，即皇帝位，改元应乾。他比其父刘岩更为残暴。他担心自己因弑而立，不能服众，便借助滥杀和酷刑威慑众心。即位不到两个月，他害怕诸弟与其子争国，就听从宦官林延遇的谗言，杀掉其弟、循王刘弘杲。此后，又陆续杀掉十几个弟弟及他们的儿子，将女眷充人后宫。昔日助他弑兄篡位的陈道庠及五力士也一一被杀，甚至遭到族诛，他开设的酷刑有汤镬、铁床、刳剔等，号称“生地狱”。刘晟对内杀人无度，对外不断用兵。在军事上却很有起色，占据不少新地盘。

后汉乾祐元年（948 年）八月，刘晟派工部郎中、知制诰钟允章向楚求婚，楚王马希广没有答应，刘晟就问钟允章：“马公还能经略南土吗？”钟允章回答说：“马氏兄弟正在争斗不暇，根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刘晟说：“马希广懦弱无能，其兵卒忘战已久，这正是我进攻的大好时机。”这时，楚王马希广正在应付其兄马希

势，无力顾及来自岭南方面的威胁。十二月，刘晟遣巨象指挥使吴珣、内常侍吴怀恩领兵入楚境，攻下贺州（今属广西）、昭州（治今广西恭城西北），又侵桂州境，转掠全州（治今广西全县），收兵。

广顺元年（951年），后周建立。十一月，刘晟以内常侍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领兵驻扎在桂州边境。桂州主帅马希隐命指挥使彭彦晖屯于龙峒（今属广西），以备南汉兵。这时南唐已灭掉楚国，兵入长沙。吴怀恩乘蒙州刺史许可琼回守桂州之机，攻取蒙州（治今广西蒙山），大扰桂管。接着吴怀恩兵逼桂州，马希隐等人弃桂州奔全州，桂州陷。不久，又攻下宜、连、严、富、昭、柳、龚、象等州。南汉这才尽据岭南诸地。十二月，刘晟又派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领兵攻郴州（治今湖南郴州市）。南唐将边镐发兵救援；潘崇彻大败唐兵，攻取郴州，将所俘唐兵砍掉一只胳膊后放归。

战场上的得志使刘晟更加放纵，无所不为。他密令巨舰指挥使暨彦赟领兵入海为盗，掠夺商贾金帛，这使得进出广州的商旅苦不堪言。他建了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等离宫，不可胜数，日日与群臣在宫中射兽、饮酒作乐。一次夜宴，刘晟大醉，将瓜放在伶人尚书楼颈上，然后拔剑试刃，结果自然是瓜裂颈断。第二天酒醒，召尚书楼侍饮，才知他已死于非命。

广顺二年，南唐派统军使侯训、全州刺史张峦进攻桂州。桂州守将在山谷伏兵，大破南唐兵，侯训战死。十二月，湖南将王逵率部及洞蛮五万大举进攻郴州。刘晟调潘崇彻领兵增援，两军半路相遇，湖南兵大败，横尸八十里。

显德五年（957年），一代暴君刘晟在久病后死去。死前一年，他听说南唐屡次败于后周，很惊慌，想遣使入贡后周，又受到湖南、南唐阻隔。因此，他大治战舰，修武备。后来，他说："只要

我自己得免就算万幸了，哪有工夫考虑后世呢。”从此纵酒作长夜之饮。他死时三十九岁，谥为文武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

刘氏政权传到后主刘𬬮手里又延续了十四年。

刘𬬮原名刘继兴。刘晟长子，曾封卫王，即位时年仅十六岁。他的政事都委于宦官龚澄枢、陈延寿、李托及才人卢琼仙。卢琼仙原是刘晟的女侍中之一，甚为得宠。台省各官只作充员，不能参与机密。刘𬬮奢侈与其祖、父齐名。即位不久，就大兴万政殿，其中一柱的装饰就用白金三千铤（每铤重五两）。

显德七年，刘𬬮提拔中书舍人钟允章为尚书左丞，参与政事，钟允章不知深浅，建议他杀违法乱纪的龚澄枢等人，刘𬬮不敢答应。宦官知道后，人人切齿。十一月，内侍监许彦真诬告钟允章谋反，刘𬬮杀掉钟允章及其两个儿子。之后，刘𬬮以玉清宫使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大师，军国诸事都取决于他。刘𬬮也认为群臣有家室，时时要为子孙着想，所以不能尽忠，只有宦官亲近可任。这样，群臣想受到重用，只有先自阉割才有机会。他将军政大事交给龚澄枢后，自己则和一名波斯女天天淫戏宫中，赐她“媚猪”之号，又自称“萧闲大夫”。后来，陈延寿又把女巫樊胡子带到宫中，声称玉皇降在胡子身上。刘𬬮便叫人在内殿设置幄帐，其中陈列珍宝；樊胡子头戴远游冠，身着紫霞裾，坐在帐中，宣谕祸福，刘𬬮深信不已。从此，国家大事都得向这位女巫请教。卢琼仙、龚澄枢等人争相附和。当然，刘氏的荒唐远不止这些。

南汉政权在这班人的操纵下暗无天日。酷刑名目有烧、煮、剥、剔及刀山剑树等。刘𬬮还常常让犯人与恶虎、猛象相斗。赋敛也十分繁重，各州争相掠民。邕州百姓进城，一次人得输钱一钱。琼州（今属海南省）每斗米须纳税五钱。刘𬬮还在合浦县（今属广东省）设置媚川都，共七八千人，专门入海采珠。一次采珠人数往往多达七百人。采珠人用石头坠在脚上，沉入海中达五百尺，不

少人因此溺水而死。刘𬬮下令在广州城内通行乾亨铅钱，城外则用乾亨铜钱，严禁混钱出人，违者处死；百官俸禄，除非特别恩典，否则都发铅钱，这是刘氏用铜过量的结果，他命人给自己及诸子铸造大铜像，安置在玄妙观。铜像稍有偏差就杀掉冶铸工匠，第三次铸得维妙维肖，刘𬬮才满意。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北宋建立。刘𬬮不知所措，既不修武备，也不通好，却仍然干着蠢事。三月，陈延寿对他说："先帝之所以能传位给陛下，是由于杀尽了诸弟。"于是，他无端也杀掉其弟桂王刘璇兴，上下抱怨，宗室惶惶。

乾德二年（964年），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兵攻陷郴州，刘𬬮稍有醒悟，起用内常侍邵廷琄为招讨使，出兵洸口（今属广西），防御宋。邵廷琄招还亡叛，修整武备，宋军一时不敢贸然进攻。次年六月，邵廷琄因遭人诬告谋反，被昏愦的刘𬬮赐以自尽。曾以礼贤下士，善遇人才而著称的刘氏兄弟，没想到其孙辈竟不能容下最后一个难得的将才。这样的政权，可以说，多存在一天就是意外了。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起，宋军大举进攻南汉，势如破竹，先后攻下贺、桂、连、韶、英、雄等州。开宝四年二月，宋军逼近广州城，刘𬬮穿素衣，骑白马出降。龚澄枢、李托等人事先纵兵放火，烧毁所有宫殿、府库。宋帅潘美当场杀掉前来献媚的宦官一百多人，并将所俘获的刘氏宗室，文武大臣及龚澄枢、李托等九十七人送往开封。

宋灭南汉，得州六十，县二百四十，户十七万多。南汉政权存在了五十五年，但从刘隐算起，刘氏据岭南共六十七年。

刘𬬮到了开封后被封为恩赦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死，也只活了三十九岁。

他是个亡国之君，但颇有几分灵性，他到开封时带了四十六瓮上好的珍珠，闲而无事，便用珍珠编成戏龙状的鞍勒，极为精

妙，名为“珠龙九五鞍”，进献给宋太祖。宋太祖给了他一百五十万钱，对左右说：“（刘）铱好工巧，习已成性；倘以习巧之勤移于治国，岂至灭亡哉！”这段话极为精辟，可惜他的后代宋徽宗也重演了这个悲剧。

（程定飞）

参考资料：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资治通鉴》卷266—卷294

《通鉴纪事本末》：《刘氏据广州》

《十国春秋》卷58—卷66

王氏据福建

唐朝末年，僖宗被黄巢大军赶人西蜀，天下大乱，江淮义军纷起，寿春（今安徽寿县）屠户王绪与妹婿刘行全聚众五百，占据寿州（治寿春）。不久，兵力发展到一万多人；王绪自称将军。攻下光州（治今河南潢川），收王潮、王审邦、王审知三兄弟。王氏三兄弟在县内以才气知名，人称“三龙”。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原为县佐吏。王绪任命他为军正，主管财物；军中上下都很信任他。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春，黄巢带领十五万人撤出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转战河南。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广招兵马；王绪以寿、光二州应募。秦宗权任命他为光州刺史，并令他率部攻黄巢。王绪想保存实力，迟迟不肯出兵。秦宗权发兵攻光州；王绪自知不敌，带兵南逃，经浔阳（今江西九江市）、沿赣水（今赣江），到达福建，攻取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县），所到之处，并不久留，都是洗劫一空而去。

王绪性格残暴，忌才妒能。到漳浦（漳州治所，今福建漳浦）后，王绪因道险粮少，又怕受地方武装袭击，就下令军中：老幼随军者斩！恰恰王氏兄弟带着老娘，受到责难不算，王绪还要行斩。王潮兄弟三人怒火中烧，不忍眼睁睁地看着老娘被杀，就请求先死；众将也纷纷求情。王绪见众怒难犯，只得收回成命。行军途中，一名术士说军中有“王气”，王绪更加猜忌诸将。一路上，凡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人多被他借口杀掉，其妹婿刘行全及弟

刘德全、刘待全亦不能免，部下日益恐惧，人人自危。

行军至南安（今属江西）时，王潮对前锋将说："我辈抛弃祖坟、妻子儿女为盗，是受王绪的逼迫，并非出自本心。现在，他猜忌贤能，苛刻不仁；将吏中有本领的必然要死在军中。如此朝不保夕，怎能成就大事？你老兄才气绝众，须眉尤美，真不知将死于何时！"这位前锋将恍然大悟，与王潮抱头痛哭；二人暗中商定计策。王潮让他挑选几十名壮士，埋伏在篁竹丛中，没过多久，就一举擒获王绪，反正成功。众人推王潮为主帅，王审知为副帅。他们计划绕道交广，进军巴蜀，匡扶末唐王室。

光启元年（885年）八月，泉州（治今福建泉州市）富豪张延鲁不满刺史廖彦若贪暴；听说王潮治军有法，便发动一班长老奉牛酒犒劳，请他留据泉州。王潮等人遂改变初衷，率部重进漳浦。由于他整饬军纪，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这支武装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在漳州有了安身之所。接着，王潮引兵围泉州。次年八月，攻陷州城，杀廖彦若，王氏兄弟在福建有了第二块地盘。

为了能在福建长久立足，王潮投靠了福州观察使陈岩。陈岩是建宁（即建州，今属福建）土豪。他曾聚众千余人，号称"九龙军"。赶走黄巢将，占据福州（治今福建福州市），势力逐渐强大。

陈岩上表唐廷，请王潮为泉州刺史。王潮甫得泉州，招怀流散，均赋缮兵；他得到军民的拥护，同时也深得陈岩信任。陈岩病重期间，就打算将福州兵权交给王潮。

大顺二年（891年），陈岩死，其妻弟范晖自立为福州留后。范晖骄侈失众，陈岩旧将大多数都投奔王潮，并说福州可取。王潮原以为福州在握，不料冒出个范晖来；他命令王审知及堂弟王彦复带兵攻福州。福州境内百姓对范晖不满，纷纷输米饷馈泉州来兵，平湖洞及海滨各族也出兵船相助。范晖向越州威胜军节度使董昌讨救，负隅抵抗，福州经年不下。王潮志在夺城，派人鼓励

前方将士：兵尽益兵，将尽益将；兵将皆尽，吾当自往。他令王彦复拚死猛攻。

景福二年（893年）五月，范晖将牌印交给军监，夺围而逃；王潮入据福州。建州将徐归范杀掉刺史熊博以州降；汀州刺史钟全慕举籍听命；闽南二十余起地方武装也相继降附。至此，王氏已拥有福建境内五州，即：漳、泉、建、福、汀。同年九月，唐昭宗授王潮为福建观察。乾宁（894--898年）初，王潮派大将李承勋领兵千人，剿灭黄连洞蛮（少数民族武装）二万人，福建境内安定下来。

王潮平定福建后，采取了一系列保境息民的措施。在境内，招还流亡，核定租税，并常常派遣幕僚佐吏巡视州县，劝课农桑；对外，王氏谨奉中原，交好邻道。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乾宁三年（896年）九月，唐政府升福建为威武军，拜王潮为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

乾宁四年，十二月，王潮病重。将军府大事托付给其弟王审知。不久，王潮去世；王审知自称福建军留后，奉表告唐。

王潮有延兴、延虹、延丰、延休几个儿子，但他并没有传位给他们，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他很了解其弟的为人，可谓德才兼备，定能有所成就。果然，在后来的三十年内，王审知将福建治理得有声有色。世人皆称王潮能知人善用。

王审知，字信通，排行老三；又因他常骑白马，故在军中号为"白马三郎"。光化元年（898年）三月，唐授他充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十月，授金紫光禄大夫、左仆射、本军节度使。光化三年二月，唐加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右仆射。

天复二年（902年），王审知下令筑福州外罗，周围四十里。同年，唐昭宗赐他十二支武库戟，列于私门。

天祐元年（904年）四月，唐加他检校太保、封琊邪王。他在福州建报恩定光多宝塔，以示谢恩。这一年，他还命人开通新港。

诸姓割据江南，使福建与中原陆路常受阻隔，岁贡只得走海上，因此整治港口就显得十分迫切。闽江人海口黄崎山岸边，风平浪静，只是附近多怪石，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命彭城人、威武节度判官刘山甫率领役卒凿石开港。新港开成后，唐室赐名为甘棠港。王氏还利用便利的港口条件，发展对外关系。

泉州自唐代就成为著名的港口。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执政泉州二十六年，修治港口，招徕南海商贾，致使泉州富甲一方，时人称他为“招宝侍郎”。不过，王延彬受僧人浩源怂恿，渐渐骄纵。贞明六年（920年），他秘密遣使从海道进贡后梁，求置节镇，被王审知罢黜。

王氏与海外的交往始终不断。光是天祐年间（904—907年），来福建的就有佛齐国（都城在今巨港）使者、印度高僧声明三藏等。后来福建内乱不止，但仍有海外来客。王延钧妃刘华墓中出土了三件孔雀蓝釉陶罐，它们都是敛口、广腹、小底、肩部有三或四个环耳，腹部贴饰半圆弧线或绳纹。这些陶罐，在器形、釉色、纹饰上均与近年在伊朗发现的伊斯兰陶器相同，无疑是来自阿拉伯国家。

天祐二年（905年），王审知命人筑福州南北夹城，称为“南北月城”，与大城连成一体。大城、月城之上都建有敌楼、回廊、更铺等设施。栏杆勾连，参差焕然。

天祐三年七月，王审知命工匠铸三座鎏金铜佛像，安置在福州开元寺寿山塔院。一座高一丈六尺，另外两座高一丈三尺。

天祐四年正月，王审知在开元寺大殿设斋饭，号称“无遮”。僧众就食者达二十万人次。

开平三年（909年）四月，后梁加王审知为中书令、福州大都督长史，进封闽王。八月，吴使者张知远来福州，举止傲慢；王审知杀了他，与淮南绝交。

开平四年，王审知命疏浚侯官县（今属福州市）西湖，周围

扩大至四十里，灌溉民田无数。后来又在长乐县（今福建长乐县）修筑海堤，以御海潮。海堤开设十道闸门，旱则积水，涝则排水；提内尽成良田。他在位时，还治理了连江县东湖，东湖周围二十里，可灌溉农田四万顷。

汀州宁化县出铅。贞明元年（915年），王审知奏请后梁，在宁化设置铅场。次年，铸造铅钱，与铜钱并行境内。龙德二年（922年），铸大铁钱，径寸余，粗重，文为“开元通宝”，五百文为一贯。

龙德三年，王审知命人在福州城西建造十三座冶炉，炼铜锡三万余斤，铸释迦牟尼、弥勒等佛像。由此可见，福建的采矿、冶铸规模是相当大的。

同光三年（925年）十二月，王审知病死，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九年。他被谥为忠懿，第二年尊为昭武王；后来，王延钧又尊他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

王审知统治福建时，取得了良好的政绩。首先，他注重招揽人才，士皆为用。唐末，中原名士因遭战乱及梁王朱全忠忌，纷纷出奔；其中避地福建者甚众，著名的有李洵、韩偓、王标、夏侯淑、王淡、杨承休、王滌、崔道融、王拯、杨赞图、杨沂丰、归传懿等人。王审知、王审邽命王延彬设置礼贤院加以安顿。天祐二年（905年），唐进士韩偓举族人闽，侨居南安，虽不愿任职，王审知同样以礼相待。唐宰相杨涉的堂弟杨沂丰，与唐乾宁进士、蒲田人徐寅及唐故相杨溥之子杨淡同居幕府，倍受推崇。唐末进士黄滔，诗清淳丰润，赋堪称一时绝调。天复元年（901年），受王审知用为威武节度判官，王氏能安据闽中，他出力不少；时与吴越罗隐齐名。福建境内金石志铭及重要著作多出自黄滔手笔，中原避地来闽的名士，在他面前，只得甘拜下风。王氏用人，除唐末骚客外，还有福建籍人（如徐寅）、光州故旧等。张睦，光州固始人。王审知授他三品官衔，领榷货务（主持商业、贸易）。他在

王氏初创福建之际，雍容下士，招徕蛮裔商贾，不加暴敛，使福建日以富饶。

其次，王审知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谨奉中原，交好邻道。有人曾劝他称帝，他说："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愿作闭门天子。"但为了防御，他多次修筑福州城，增强了它的抗敌能力。此外，整治港口与农田灌溉工程也是王氏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

再次，他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天祐元年，王审知下令管内军、州搜集民间遗书，抄写上交。天祐二年四月，他命人在寿山奉藏佛经，凡五百四十一函，五千零四十八卷。龙德二年，他命僧人辗金银万余两，抄写《佛四藏经》各五千零四十八卷。这些措施，拯救了大批珍贵古籍。故在宋初，福建成为全国藏书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他创办了四门义学，挑选闽中优秀的士人加以培养，使福建境内人才辈出。

作为一个并未称号的君主，王审知是难能可贵的。他奉行节俭，府舍简陋，衣着平常；宽刑薄赋，劝课农桑，使福建公私殷实。

王审知之后，福建乱事连篇。

王延翰即位没几天，汀州民陈本就聚众三万，围攻汀州；王延翰派遣右军都监柳邕等领兵将其镇压，斩陈本。

同光四年(926年)三月，后唐庄宗授王延翰为威武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十月，他拿出《史记·闽越王无诸传》给将吏看，说道："闽地自古为王国；我今不王，何待之有！"于是，他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用物皆模拟天子制，群下称他为"殿下"。称王之后，仍奉后唐为正朔，但他日益骄淫侈靡。他跨福州西湖修建宫室，长达十余里，称之"水晶宫"，常常携领后庭游宴其中。他又广采民间美女；其弟王延钧上书极谏，不听。十二月，王审知养子、建州刺史王延禀与王延钧合兵攻福州。王延禀顺流先到福州，败指挥使陈陶，冲人王府，将王延翰捕杀。王

延钧从泉州逆上福州后，王延禀开门迎纳，推立他为威武留后。

天成二年（927年）正月，王延禀还据建州。临走时，他对王延钧说：“善继先志，勿烦老兄再下。”王延钧色变。

天成二年五月，后唐明宗授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守中书令，封琅邪王。

天成三年七月，王延钧进封为闽王。十二月，他度民二万为僧。同时，他命人丈量田地，分为三等：膏腴上等给僧道，从此有寺田之名；次等给土著；最次等给流寓。其赋税制度仿效唐代两税法，但有所加重。

天成四年冬，王延钧派人进贡后唐银器六千五百两、金器一百两、锦绮罗三千匹以及犀牙、玳瑁、珍珠、龙脑、笏扇、白氈、香料等物，以示谢恩。次年，又贡白金七千两，金器百两等。

长兴二年（931年），福建内战再起。四月，王延禀乘王延钧生病，以次子王继昇为建州留后，自己率长子王继雄（时为建州刺史）发水军袭击福州。父子二人分头攻西门、东门。福州楼船指挥使王仁达伪降，杀王继雄，枭首西门；王延禀看见儿子首级，拚死攻杀，最后还是战败而逃。他被追获后，王延钧对他说：“果烦老兄再下。”五月，王延钧将王延禀斩首，遣弟王延政去建州抚慰吏民。王延政就是后来的富沙王。

王延禀之变后，王延钧沉湎于道教、巫术，日益昏愦。他将道士陈守元、巫士徐彦朴及盛韬引为知己。长兴二年六月，建造了“宝皇宫”，以陈守元为宫主，凡事都听命于“宝皇”。十二月，陈守元传“宝皇”之命，对王延钧说：“王避位授道，可做天子六十年。”于是，他让长于王继鹏暂掌军府，逊位受箓，取道名“元锡”。第二年三月，王延钧复王位。六月的一天，他遣陈守元问“宝皇”：“六十年后将如何？”陈守元传“宝皇”话：“六十年后将大罗仙主。”徐彦朴等人也在一旁添油加醋。从此，王延钧更加自负，飘飘欲仙，开始筹划称帝事宜。他上表后唐，要求授尚书令

衔；后唐没有理会，他就停止朝贡。

长兴四年（933 年）正月，王延钧改真封宅为龙跃宫，另建东华宫，穷极工丽，工匠力役达万人。宫殿完工后，他就跑到“宝皇”受册命，即皇帝位，国号大闽，改元龙启。他自己改名王鏻。后来南唐使者将绫改称为“花绢”，意避其讳，实则对他讥讽。称帝之后，他照例大赦境内，追尊父祖，立五庙，封授官爵；他还许诺提供三百万僧次斋饭，缮写经文二百藏。

长兴四年五月，福州地震；王延钧又一次避位修道。七月，他复帝位，任命中军使薛文杰为国计使；薛文杰聚敛求媚，不择手段。这时，建州土豪吴光入朝；薛文杰准备立个罪名处治他，剥夺他的家产。吴光怨怒，率领族人及乡兵投奔吴国，请吴兵攻闽；王延钧也向吴越求援。九月，王延钧以谋反罪杀掉侄子王继图、枢密使吴勖。十二月，族诛侄子、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王仁达曾在平定王延禀之变中立下了大功。沉醉道术、大兴土木不过使自己赢得了昏君的名声，但滥杀亲臣却将自己推上了绝路。

应顺元年（934 年）正月，吴信州刺史蒋延徽领兵围建州，建州垂危。但这时吴执政徐知诰（即南唐烈祖昪）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筹备称帝代吴；他怕蒋延徽取建州后势力增强，会拥戴吴临川王杨濛，复兴杨氏，急令他退兵。蒋延徽攻城正在兴头上，忽然改攻为退，军心涣散，又受到闽兵追击，大败而归。徐知诰随即遣使与闽通和。

清泰二年（935 年）十月，王延钧病重。其长子、福王王继鹏与皇城使李倣合谋，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王延钧及其子王继韬、幸臣归守明等人。王延钧在位十年，福建三乱。

王继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名王昶，授李倣判六军诸卫事。李倣杀掉王延钧等人后，心里不安，蓄养了一批敢死亲信，以防不测。王继鹏也视他为心腹之患，十一月，王继鹏借一次宫廷享军之机，命拱宸指挥使林延皓埋伏卫士将李倣执

杀，李倣的敢死亲信抢走他的人头，逃到吴越。

王继鹏在奢侈、昏愦、苛敛、滥杀等方面很快就超过他父亲王延钧。

天福二年四月，他命工匠建紫微宫，饰以水晶。其工程耗费是“宝皇”宫的一倍，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他使出了各种手段，先是派人检括隐匿人口；然后严令境内：百姓隐瞒年龄者杖背，隐瞒人口者死罪，逃亡者族诛；又命吏部侍郎、判三司蔡守蒙纳贿授官，财物上交；听任医工陈究以“空名堂”名册鬻爵。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赋税。各州征“计日钱”(又称“身丁钱”)，百姓凡年十六至六十岁均得交纳。泉州、漳州两地将它折米五斗，五斗相当于北宋时官斗七斗三升。江湖、陂塘、山林都要征赋。

天福三年（938年），王继鹏遣使贡后晋天和节暨重午节，有金银珠宝、犀角象牙、香料海产等物，数目可观。十一月，后晋封他为闽国王。

天福四年四月，巫士林兴胡言：王氏宗室将乱；王继鹏就让林兴领着若干壮士，杀掉他的叔父王叔武、王延望及其五个儿子。他听从道士陈守元之言，在宫庭建三清殿；内铸宝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共用掉黄金数千斤，每天都焚烧龙脑、薰陆等香料。这时，政无大小皆由林兴传“宝皇”命决断；王继鹏则在宫中欢饮。他常常强迫群臣饮酒，不醉不忠；醉则令有司治罪。其堂弟王继隆就是因醉失礼，被杀。他的叔父王延羲装疯避祸。

天福四年七月底，北宫大火，不久果然发生内乱，恰被林兴言中，内乱正是由于王继鹏猜忌，诛戮宗室而又怠慢将领所致。大火过后，王继鹏怀疑控鹤军使连重遇参与纵火之谋，准备杀掉他；连重遇索性联合拱宸军使朱文进，火烧长春宫，迎立王延羲。王延羲的侄子王继业将王继鹏抓获，勒死。道士陈守元、吏部侍郎蔡守蒙等人也在这次政变中命赴黄泉。

王延羲是王审知第二十八子，他被迎立后，自称威武节度使、

闽国王。改年号为“永隆”。他遣商人绕道奉表，称藩于后晋；境内，设置百官，皆如天子制。

王延羲虽是叔继任位，却也不是正经的主儿。上台后，他骄淫暴虐，猜忌宗族，寻仇报怨。其弟王延政多次上书强谏，他不仅不听，反而怀恨在心。天福五年（940年）正月，他派心腹邺翘、杜汉崇分别监建州军、南镇军。南镇军在福、建二州交界，扼南北往来。一天，邺翘因议事意见不一，呵斥王延政：“公想造反？”王延政大怒，要杀他，他逃向南镇军。王延政发兵攻南镇军，邺翘与杜汉崇双双逃回福州。

天福五年三月，王延羲发兵四万攻建州。王延政求救于吴越；吴越王钱元瓘派大将仰仁诠、薛万忠等率兵四万奔建州。四月，吴越兵到建州时，王延政已经击退了福州兵；他就奉献牛酒，请仰仁诠等人班师。仰仁诠等不愿无功而返，就在建州城西安营扎寨，伺机攻城。王延政见吴越兵临城下，只得回头向王延羲讨救，吴越兵受内外夹击，大败，王氏兄弟暂结城下之盟，但仍然嫉恨如故。

天福六年正月，王延政扩建建州城，周围二十里。王延羲封他为富沙王；他自己称镇武节度使。

六月，福州方面，凡是与王延政有关的宗族、勋旧都相继遭杀戮。其中有侄儿王继业父子、八十多岁的老臣杨沂丰及全家。另外一个侄子、泉州刺史王继严却因得众心而被杀。福州从此人不自保。

七月，王延羲称大闽皇，与王延政交战不休。福、建之间，尸骨遍野。

十月，王延羲贡后晋白金四千两、葛五十匹、象牙二十株，其它不计其数。福州内外交困，国用不足，他就卖官鬻爵。

天福七年夏秋，福州、建州各自发动重兵，再度厮杀于汀州、建州城外，福州兵大败。王延羲送给建州金器九百余件，钱一万

缗求和，遭到王延政拒绝。

战事稍息，王延羲就日日纵酒作乐。他命工匠锻造银叶杯，形如冬爪片，名为“醉如泥”。斟满后，只有端着喝干才能放手。群臣往往因酒醉被杀。他还铸了“永隆通宝”大铁钱，径一寸四分，钱质恶劣，以一当铅钱百。各地方官也是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境内民不聊生。泉州刺史余廷英矫诏抢掠良家子弟，本该死罪，他向王延羲献上“买宴钱”一万缗，送给皇后一万缗，结果，不仅无事，反而还做了宰相。

天福八年，王延政称帝，国号大殷，改元天德。

天福九年三月，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因其党控鹤都指挥使魏从朗被王延羲醉杀，又因王延羲对他们咏白居易诗句“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可料”，恐怕遭杀身之祸，就先下手为强，把王延羲杀掉。朱文进自立为闽王，据福州。王延政派兵攻福州，不克。八月，后晋授朱文进为威武节度使，封闽国王。

泉州方面：十一月，指挥使留从效与州将王忠顺、董思安合谋，杀掉刺史黄绍颇，请王延政主持军府事，王延政以王继勋为侍中，领泉州刺史，留从效、王忠顺、董思安为都指挥使。

这时，漳州将程谟杀刺史程文纬，拥王延政侄王继成掌州事，汀州刺史许文稹奉表降王延政。这样一来，王延政就拥有建、泉、漳、汀四州。

同年十二月，朱文进派兵攻泉州；留从效开门迎战，将其击溃。接着，王延政出兵攻福州；朱文进以子弟为人质，向吴越求援。

南唐见福建大乱，派出洪州营屯都虞边镐、枢密副使查文徽等人领兵入闽，相机得利。王延政部将吴成义遣人进福州，谎称南唐就要以大军助攻，朱文进自量福州难保，就向吴成义献玺投降，连重遇、朱文进等先后被部将杀死。吴成义领兵进福州。

开运二年（945 年）正月，王延政下令以福州为南都，授其侄子王继昌督南都内外诸军事。同时，复国号为闽，抽调南都侍卫及拱宸、控鹤两都精兵一万五千人来建州，防备南唐。

开运二年三月，南唐派天威都虞候何敬洙、将军祖全恩，姚凤等领兵数千人增援边镇。兵至建州附近的赤岭，与建州兵隔水相望；两军对峙了十几天。后来，建州将陈望受仆射杨思恭催逼，涉水挑战，大败；陈望战死，杨思恭仅以身免。王延政非常惧怕，闭城自守；急召泉州将董思安、王忠顺领兵五千驰援，分守要害。

正当建州忙得不可开交时，福州又演出了一场闹剧。著作郎陈继珣与指挥使李仁达合谋，拉拢镇遏使黄仁讽杀掉王继昌及大将吴成义。李仁达等人立僧卓岩明为天子，称藩于后晋。王延政杀掉黄仁讽全家，命统军使张汉真领水军五千人会合泉、漳二州讨卓岩明。开运二年四月，张汉真到达福州城下。黄仁讽得知全家遇害，开门力战，大败三州联兵，杀张汉真。不久，李仁达向卓岩明诬告黄仁讽、陈继珣谋反，二人被杀，他独掌军权。五月，李仁达乘阅兵之机，派人刺杀了卓岩明。他自称威武留后，奉表称藩于南唐，也遣使人贡于后晋。

七月，有人告诉王延政福州援军有叛乱之兆；王延政将他们遣还福州，又在半道设下伏兵，将他们一一杀掉。他们是正月赴建州增援的，原有一万五千人，与南唐交战后还剩下八千多人。这批精兵被杀。使建州防御力量大为减弱。

八月，南唐先锋道桥使王建封率先领兵登上城墙；建州陷落，王延政出降。南唐将纵兵大掠，焚毁宫室庐舍。建州百姓原先因苦于王氏之乱及杨思恭暴敛（杨思恭设法盘剥百姓，山泽田亩、鱼盐蔬果，无不加税，百姓称他为“杨剥皮”），伐木开道，迎接南唐兵，城破后，百姓大失所望。

九月，汀州、泉州、漳州都先后降南唐。十月，南唐将王氏宗族迁往金陵。

王氏据福建，历七主，共五十三年。

南唐灭王氏政权后，以重兵围困福州。李仁达向吴越求助。吴越王钱弘佐派大将水丘昭券等领兵三万人进福州。开运三年（946年）三月，吴越余安领兵从海道增援；余安在福州城外大败南唐冯延鲁部。进人城内，李仁达举城献；吴越分到福州。

泉州降南唐后，留从效保存了较强的兵力，自领泉、漳二州留后。他对南唐将说："泉州租税仅够自给，不劳大军久驻。"强行在泉州郊外设宴，为南唐将士饯行。南唐兵久战已疲，只得退走。南唐政府做了个顺手人情，升泉州为清源军，授留从效为节度使兼漳、泉观察使。不久又授他同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封晋江王等。

实际上，留从效继王氏之后成了福建境内的一股割据势力。他据泉、漳二州十五年，颇有惠政。他实行保境养民政策，重视发展生产、平准市价，尤其注重海外贸易，将境内所产的陶瓷、铜铁等器输出海外，换取黄金、香料等物。他还重新版筑了泉州城，在城郊遍植刺桐，所以后来泉州有"刺桐城"之称。泉州能在宋代继续成为繁荣的港口城市，留从效功不可没。

建隆二年（962年），留从效病死，他的部下陈洪进接管泉、漳二州。陈洪进每年要向宋进贡大量财物，日子很不好过。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陈洪进无力维持，降宋。宋收泉、漳二州，共得十四县、十五万一千余户、一万八千兵。

（程定飞）

参考资料：

《旧五代史》：《王审知传》、《王延钧传》、《王旭传》、《王延羲传》

《新五代史》：《闽世家》

《通鉴纪事本末》：《王氏据闽中》。

《资治通鉴》卷266—卷294

《十国春秋》卷90—卷99

高氏据荆南

十国当中，荆南最小。区区弹丸之地，处在夹缝之中：北倚中原，南面马楚，东邻淮南，西接两蜀。但它骑江而治，四方通途，加上高氏灵活的策略，硬是存在了四十年，共历四代三王两侍中。如果从高季昌初任荆南节度留后算起，高氏据荆南共五十七年。

高季昌，字贻孙，陕州峡石（今属河南陕县）人，他早年为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市）富豪李让家僮。后李让以家财献梁王朱全忠并做了朱全忠养子，改名朱友让，朱全忠见高季昌有才，就让朱友让收他为养子，改姓朱，从军。

天复二年（903 年），朱全忠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节度使李茂贞闭城死守。高季昌让敢死卒马景带领数骑叩击凤翔城门，对守军说："汴兵将要东退，前锋已走了。"李茂贞信以为真，命部下打开城门追击，城门一开，马景等人即行拚杀，汴兵随后涌入，一举占领凤翔。高季昌因此知名。次年，朱全忠拜他为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县南）团练使，不久升为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市）防御使。

天祐二年（905 年），朱全忠命杨师厚攻荆、襄二州。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樊市）节度使赵匡凝奔吴，其弟、荆南留后赵匡明投蜀。次年十月，朱全忠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据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高季昌为荆南留后，据江陵（今湖北江陵县）。高氏据荆南自此开始。

荆南方镇始置于唐至德二年（757年），辖境屡有变动。较长时间领有荆、澧、朗、峡、夔、忠、万、归八州。自唐僖宗、昭宗以来，荆南数为诸道蚕食，残破不堪。江陵斗米曾卖到四十千钱；一个金锭只换米一合一撮（十合为一升），人谓“通肠米”。文德元年（888年）。归州刺史成汭（曾因乘醉杀人，为仇家追捕，落发为僧，改名郭禹）举兵攻下荆南，唐廷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成汭初到时，江陵兵荒之余只存十七家民户。他励精为治，鼓励通商，恢复农业生产；到他晚年，江陵已有近万户人家。当时，各藩镇只顾残杀，不管百姓死活；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民，劝课农桑，数年之间，民富兵足，时人有“北韩南郭”之称，即指韩建、成汭。

天复二年（903年），马殷与朗州将雷彦威乘成汭援救鄂州（今湖北武昌）杜洪，后方空虚，联兵袭击荆南。一度复兴的江陵再受一番劫难，大批军人、百姓、职掌、伎巧、僧道、伶官等被虏往长沙。成汭在君山（洞庭湖上）战死，雷彦威占据江陵。不久，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赶走雷彦威，以其弟赵匡明为荆南留后。次年，王建派兵攻下夔、忠、万等州，占领三峡。高季昌始据荆南时，归、峡二州也已归蜀，澧、朗二州归雷彦恭（雷彦威弟），只剩下荆州，而实际上只不过江陵一城而已。兵灾之后，江陵一派凋零。为了在荆南站稳，高季昌只得仿效成汭，招集离散，复民旧业。开平元年（907年）五月，朱全忠升任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六月，高季昌向朱全忠进献了几十个瑞橘，表明荆南有了转机。

高季昌刚升为荆南节度使，就受到雷彦恭与马殷联兵攻击。他引兵屯公安（今湖北公安），截断雷彦恭粮道，雷彦恭败走，湖南兵亦退。开平元年十月，高季昌奉梁太祖命，派遣牙将倪可福配合秦彦晖攻朗州、澧州。结果，朗、澧二州被湖南先得，高氏只好悻悻收兵而去。

开平二年四月，吴将李厚侵荆南，兵至马头（公安北），被高季昌击败。九月，高季昌屯兵汉口，阻绝湖南朝贡之路；马殷派许德勋进讨，在沙头（今属湖北）大败荆南兵，高季昌急忙求和。开平三年八月，梁叛将李洪兵侵江陵，被倪可福赶走。次年六月，高季昌在油口（今湖北公安县北）击败入侵楚兵，斩首五千。

高氏据荆南最初几年，以谨慎自守为主，并不轻易出兵。几次防御获胜，显示出一定实力；阻楚朝贡，旋又请和，开始打出交通要道的王牌。

乾化二年（912年），朱全忠死。高季昌见后梁日益衰弱，自己又得倪可福等为将帅，梁震、司空薰、王保义等为宾客，就想阻兵自固。他先开挖江陵城濠，不久又筑江陵外城，建雄楚、望江两座敌楼。参加修城的军民有十几万，而砌城用砖则掘自方圆五十里内的墓冢。

修好江陵城后，高季昌便不安分起来。先出兵攻归州（治今湖北秭归）、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市东北）。被蜀将王宗寿击败；其后，又声言助梁击晋（晋王李存勖），出兵攻襄州，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

乾化三年八月，后梁帝朱锽封高季昌为渤海王，又赐他衮冕、剑佩。高氏踌躇满志，造了五百艘战舰，修饬攻守战具，并招募流亡，扩充兵力。

乾化四年正月，高季昌以夔、万、忠、涪四州旧隶荆南为由，兴兵攻前蜀，遭到蜀夔州刺史王成先、招讨副使张武反击，大败而回。此役，荆南兵五千人被斩，还有不少人被淹死、烧死。高氏受此大挫，将精力放到境内建设上。

贞明三年（917年），高季昌筑堤一百三十里，以防襄水、汉水之患。后人称之为“高氏堤”。龙德元年（921年），命倪可福重修江陵外城。

同光元年，后唐建立，司空薰等劝高季昌入拜新主。他不听

梁震劝阻，留下两个儿子守江陵，自己改名高季兴（避后唐庄宗的祖父李国昌讳），带领三百骑兵去了洛阳。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试探后唐对自己的态度及后唐的实力。到洛阳后，他受到庄宗李存勖的厚待。李存勖原想将他扣在洛阳，然后出兵收下荆南；后来考虑到，为了得到小小的荆南而扣留他，未免显得太小气了，就放他走了。高季昌离开洛阳后，心有余悸，倍道兼行。走到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市），他对左右说："此行有二失：我来朝，一失；唐纵我去，一失。"果然，高季昌走了近十天，李存勖非常后悔，急令襄州节度使刘训伺机擒拿。等到刘训接到诏书，高季昌已快走出襄州境，怎么也无法赶上了。

回到荆南。高季昌对梁震说："不听君言，几不免虎口。"又说："唐主百战占取河南（指中原），矜夸自满。他对人说'我于手指上得天下。'荒于游猎，政事多废。这样荆南可以不怕他了。"在洛阳，高季昌就已经探出后唐的战略意图。李存勖曾问他："唐已灭梁，今天下顽固不化的只有蜀、吴。朕将出兵讨蜀，蜀地险阻，而江南只隔一江；朕想先征江南，如何？"高季昌说："蜀地富饶，征之可得大利；江南国贫，地狭民少，得之徒劳。宜先伐蜀，臣请以本道充当先锋。"高氏正想利用后唐伐蜀的机会，向西发展，收回荆南故地。于是，他加紧备战，修缮城池，贮积军粮，招纳后梁旧兵。

同光二年（924年）三月，后唐加高季昌为中书令，进封为南平王。对此，他不以为然，一语道破后唐用意："这是怕我与蜀连衡。"荆南虽小，却大有利用价值。

同光三年九月，后唐伐蜀。李存勖任命高季昌为西川东南面招讨使；许以夔、忠、万、归、峡五州，令他出兵。高季昌早就想占领三峡，只是敬畏蜀峡路招讨使张武的威名，不敢贸然动手。现在有后唐壮胆，便让其子高从诲留守江陵，自己领兵攻蜀。十月，高季昌统水军逆江过峡，取施州（治今湖北恩施）；再欲前进

时，被张武阻在江中，大败而回。同时，夔、忠、万等州都已降后唐。十一月，后唐灭蜀，高季昌听到蜀亡，非常懊恼，叹道："这是老夫之过！倒持太阿（剑），以柄授人，现在该如何是好？"梁震对他说："蜀亡，不足为忧。唐主得蜀，更加骄纵，安知不是我福。"

同光四年四月，孙光宪由梁震荐为掌书记，高氏又添一名得力谋士。孙光宪曾任唐陵州判官，后入江陵，他是五代时期著名的文人，著作丰厚，有《荆台集》、《玩笔傭集》、《橘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等。另外，他擅长诗词，《花间集》收入他的词六十余篇。

高季昌同其他几位君主如王审知、钱镠等一样，很注意招致人才。唐末进士梁震，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人，梁开平初，他不愿为官，回蜀。路过江陵时，高季昌看中他的才识，把他强留下来。但他只为宾客，不受官职。高季昌很尊重他，称呼先辈。而王保义、司空薰等人已先于梁震效力于荆南。高季昌依靠这些谋士的帮助。再加上倪可福、鲍唐等名将，在荆南立稳，形成了一方割据势力。

同光四年六月，高季昌乘后唐发生魏州兵变、庄宗毙于流矢之机，向入洛称帝的李嗣源提出将夔、忠、万等州归属荆南的要求。后唐大臣多认为，高季昌在灭蜀时兵出无功，没有理由得这些州。但李嗣源新立，不想惹麻烦，就答应了。天成二年（927年）二月，高氏得到夔、忠等州后，又提出由荆南任命刺史，遭李嗣源拒绝。于是高季昌派兵强行进入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县），杀掉原先戍守的兵卒，将后唐任命的夔州刺史西方鄴拒于城外。占据夔州后，又出兵后唐涪州（治今四川涪陵县），没有攻下。

当初，后唐灭蜀，韩珙押送价值四十万贯的珍宝、金帛等物，顺江而下；高季昌派人在峡口将韩珙等十余人杀掉，将财物据为己有。这次，高季昌连续两次攻后唐，使李嗣源非常恼火，派人

追问杀人越货的事，高季昌说："韩珙等人行船下峡，逾越险阻，共数千里，你现在要想知道翻船溺水的原因，最好去问水神！"李嗣源听到这个不软不硬的答复，一气之下，削除了高季昌的官爵。诏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忠武节度使夏鲁奇，率兵四万大举进攻江陵；东川节度使董璋、夔州刺史（空衔）西方邺领兵下峡；湖南马氏出兵助攻，形成三面夹击之势。只是董璋并未出兵。

天成二年三月，刘训兵至江陵，湖南将许德勋领水军屯岳州（治今湖南岳阳市）。高季昌闭城不战，派人向吴讨求救兵。吴立即发水军西援。江陵低湿，又值春夏之交，天气多雨，后唐将士不能适应，大多染上疾病，刘训也卧床不起。五月，后唐枢密使孔循受命至江陵督战，他指挥唐兵对江陵城多次猛攻，结果均告失败。他还派人到城中劝降，高氏不理。这时，后唐遣使赐湖南行营夏衣万套；又赐楚王马殷鞍马、玉带及行营军粮等物，这些东西都在中途被高氏没收。其后，楚贡使史光宪从洛阳返长沙，带着后唐明宗赐给楚王马殷的十匹骏马、二个美女路过荆南，连人带马都被扣住。五月底，后唐明宗（即李嗣源）见久攻不下，徒损兵力、财物，只好命刘训退兵。

六月，西方邺在西面败荆南兵，后唐将夔、忠、万三州收回。

这年，高季昌筑江陵内城，名为子城。

天成三年（928年）三月，楚王马殷派遣六军使袁铨、副使王环，由马希瞻监军，领水军攻荆南，楚军在刘郎洑（今湖北石首县境内）大败高季昌；继而进逼江陵，高季昌奉还史光宪求和，楚军退走。

马殷责问王环为何不乘胜取江陵，王环分析说："江陵在中朝、吴、蜀间，是四方交战之地，应该留着作为御敌屏障。"荆南能存于四强之中，原因之一是各国都看上了它的地理价值：攻，可以作为跳板；守，可以用为屏障。正因为有了荆南，两蜀与吴、南唐没有发生战争；楚与中原也未曾有较大的冲突。

楚兵刚退，高季昌就出兵会合吴将苗璘、王茂章攻岳州，兵败，吴二将被俘。天成三年六月，高季昌不听其子高从诲劝阻，以荆、归、峡三州向吴称藩。这是后唐不能容忍的。明宗李嗣源诏令楚兴师向罪。马殷遣许德勋率兵进人荆南，在沙头击败荆南兵，高季昌再度求和。九月，楚兵退后，高季昌又攻楚，在白田（今属湖南临湘县）败楚军，俘获了岳州刺史李廷规并送到吴国。后唐决心除掉高氏，任命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又调发诸道兵马聚集襄阳，伺机进攻江陵。

天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高季昌病死，享年七十一岁。他自唐末为荆南留后，人据荆南二十二年。

高季昌死后，其长子高从诲继位。后唐就没有向荆南用兵。高从诲，字遵圣，为人明敏，工于权计，他不仅继承了其父灵活多变的策略，更注重地理位置的利弊。袭位后，吴加授他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不久，他便委婉地与吴断绝了臣属关系。

高从诲本来就反对向吴称藩，曾对其父说："唐近而吴远：舍近臣远，不是良策。"这时，他看到与楚交战，每每不利；又怕受后唐大军压境，就派人使楚，请马殷代为请命后唐。此外，他还修书致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求他保奏，重修职贡；又派神牙刘知谦奉表至洛阳，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向后唐进赎罪银三千两。后唐明宗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拜他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追封高季昌为楚王，谥为武信。故荆南又有"北楚"之称。同时，高从诲派人使吴，对吴王说，高氏祖上在中原，担心一旦受讨，吴国救援不及，辞却了吴王给他的封号，吴虽然恼怒，却也拿他没办法。

长兴三年（932年），后唐封高从诲为渤海王。次年，改封为南平王。

后晋、南唐建立后，高从诲均与两家交好。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设有官邸，供使臣居住。终后晋之世，十几年时间，荆

南基本上未动干戈。只是其间高从海为了得到郢州（治今河南正阳县），耍了一次手腕，极为精彩。

后晋山南东道节度安从进谋叛，高从海暗中参与。天福五年（940 年），后晋翰林学士陶谷作为国信使至江陵，贺高从海五十生辰。高从海设宴于望沙楼，并在楼下江中陈列许多战舰，对陶谷说："吴（这时已是南唐）、蜀不臣已久，我修整武备，演习水战，就等着朝廷出师之期了。"陶谷回到开封，把高氏的话对石敬瑭一说，石敬瑭大为高兴，又遣使至荆南，赐战马一百匹。天福六年（941 年）四月，安从进反晋，向荆南求援。高从海拒绝出兵，并将此事通告后晋，主动提出出兵助晋平叛。十一月，他遣使贡晋金器一百两、九炼纯钢金花手剑二口、银五百两等。十二月，后晋诏令荆南与楚助讨襄州，高从海发水军数千人至南津（今属湖北宜昌市），还向后晋提供了一批军粮。天福七年（942 年）八月，后晋将高行周攻陷襄州，安从进举族自焚。这时，石敬瑭已死。高从海向后晋求辖郢州，遭新帝石重贵回绝。高氏费尽心机，戏弄了安从进，自己什么也没捞到，为此，他耿耿于怀。

后汉建立前，高从海派人到太原劝北平王刘知远称帝。希望刘氏得到天下后，自己能得郢州，刘知远一口答应。开运四年（947 年）二月，刘知远称帝，高从海马上上表，祝贺刘氏登极；进献金花银器一千两、异纹绮锦、法锦三百匹、筒卷白罗二百匹、九炼纯钢刀一口，仍然要求领辖郢州，结果还是被拒绝。高氏吃了大亏，白白浪费一批贡物。他受到刘知远的愚弄，便拒受后汉封职，转向南唐、后蜀称臣。

与后汉绝交后，北方商旅不再往来江陵，荆南很快就显得贫乏起来。乾祐元年（948 年）六月，高从海遣使谢罪；进后汉金二百两、银器二千两、细锦五十匹、罗二百匹、龙脑香二斤。

乾祐元年十一月，高从海病死，享年五十八岁。他在位二十年，能够知人善用。清泰二年（935 年）三月，梁震再三恳求退职，

自称荆台隐士；他特意在江心沙洲给梁震建了一座房子。随后，政事都由孙光宪参谋。荆南地狭民贫，侈靡必亡，故高从诲很注意节俭。清泰二年正月，左右称楚王马希范豪奢，他也很羡慕，叹道："马王可谓真大丈夫！"孙光宪接着说："马氏奢侈无度，亡国有期，有何值得仿效呢？"高从诲深以为然。他善于外交，所向称臣献贡，借此获得各大国的赐与。一次，他贡后唐银茶若干，求战马；后唐明宗赐给他二十匹御马，还了银茶。他遣使上贡契丹，也获战马百匹。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很少用兵，保持了荆南境内的安定。他还和其父一样，为了求财不择手段。南汉、闽、楚皆奉中原朝廷为主；岁时贡奉，来回多经过荆南，高季昌、高从诲父子常常扣留使者，掠取财物，心安理得地享用；一旦受人兵讨或书责，即刻还物和好，面无愧色。时人称高从诲为"高赖子"或"高无赖"。就是指他称臣索赐、断路取财而无所愧耻。

高从诲死，其第三子高保融继位。后汉授之为起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节度使等。后汉派翰林茶酒使郭允明来江陵吊丧，赐衣、币。郭允明的车服、导从都如同节度使制，每当宴集，则厉声索要御酒。他还暗中派人步测江陵城池高深，荆南惶恐。

广顺元年（951年），后周建立，高保融上表恭贺郭威登极，贡白金一千两、法锦二十匹；郭威封他为渤海郡王。显德元年（954年）正月，进封为南平王。

高保融即位之初，没遇上战争。他为了自守，在纪南（今湖北江陵县西北）城北修江陵大堰，后改为北海，放江水入内。

显德三年，周世宗征淮南，高保融遣指挥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今武汉市汉口）呼应。高保融还充当了后周的说使，派人送信给南唐中主李璟，劝其归附后周。显德五年，周世宗得到由高保融转交的南唐称臣国书，一下子就赏给他绢万匹。他还劝后蜀称藩后周，结果两次都没有成功。

建隆元年（960年）八月，高保融病死，享年四十一岁。

荆南自后唐建立以来，每年只贡中原朝廷一次，数量也不大，中间还停过两回（高季昌、高从诲在位时各一回）。高保融继位后，贡奉渐多，到显德（954—959年）时，无岁不贡，数量大增。非仅如此，高保融为取信后周，还将其弟高保仲送到开封作人质，认为金帛皆土地凡产，不足以表诚义。北宋代周，高保融更加不安，一岁三贡。

高保融死，他的弟弟保勖袭位，宋太祖拜他为荆南节度使。高保勖自幼体弱多病，但颇有治事本领。高保融在位时，军政大事多交给他去办。掌节度使权柄后，却不理政事，骄奢淫逸，日日作乐后宫，他还喜欢营造台榭，用度极大。他的所作所为，使荆南军民怨恨。孙光宪上书切谏，不听。

建隆三年十一月，高保勖患久病死，在位仅三年。死后宋追赠为侍中。

而后，高保融长子高继冲接任节度使职；荆南已是风烛残年。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宋太祖命慕容延钊率师平湖南，以李处耘为都监；诏令荆南发水军三千赴潭州（今湖南长沙市），高继冲即令亲校李景威领兵待命。

宋廷用的是伐虢灭虞之计。在此之前，宋太祖派大臣卢怀忠出使荆南，要他探明荆南实力。卢怀忠回到开封后，对宋太祖说：荆南兵甲虽整，但能拉开强弓的不过三万人；虽然年年五谷丰登，但百姓因暴政更加贫困；它又处在四强之中，往往顾此失彼，取之易如反掌。恰逢湖南张文表叛，周保权求援于宋；宋太祖对宰相范质说：荆南四分五裂之国。今出师湖南，假道江陵，顺势平定，我看是万全之策。

二月，李处耘军至襄州，遣其部将丁德裕到江陵借道。李景威极力反对宋军过境，自杀身亡。孙光宪看出荆南已不可救药，只能委曲求全，对高继冲说："宋帝已有统一大志，不如早纳土归附；

否则难以免祸。”高继冲急忙让他叔父高保寅、军校梁延嗣奉牛酒至荆门（今湖北荆门市，距江陵百里），犒劳宋军。李处耘待他们不错；梁延嗣立即派人飞报平安。当晚，慕容延钊在帐中设宴款待高保寅一行；李处耘则率领数千轻骑径奔江陵。原以为无事的高继冲听到禀报，慌忙出迎于陵北十五里。李处耘命令他就地迎候慕容延钊。自己带兵从北门入城。待高继冲回城时，宋兵已分守各个要点。荆南军吏只有束手听命的份了。他只好将牌印奉交慕容延钊，以一府、二州、十七县、十四万三千三百户降宋。此外，还将钱五万贯、绢五千匹、布五万匹及境内所有粮草献纳。荆南灭亡。

高继冲降后，在宋任职近十年。开宝六年（975 年）病死，享年三十一岁，宋追赠为侍中。

参考资料：

《旧五代史》：《高季兴传》、《高从诲传》、《高保勖传》
《新五代史》：《南平世家》
《资治通鉴》卷 266—卷 294
《通鉴纪事本末》：《高氏据湖南》
《十国春秋》卷 100—卷 103

马氏据湖南

安史之乱后，唐在湖南设置方镇。初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大历四年（769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辖领潭、衡、郴、永、连、道、邵等州，相当于今湖南省长沙市以南及广东连江流域。湖南在唐代算是边远地区，散文大家柳宗元即曾谪居永州。那时，各族杂处，虽苦唐苛政，但也多年不遇战事。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下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室流离。武陵洞蛮、荆南小校雷满率部窜至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市），招得数千人，杀刺史自据，始割据湖南。各地土豪纷起效尤，据州自立，日寻干戈，湖南自是不安。

中和元年（881年），唐室命江西牙将闵勖戍湖南。闵勖赶走湖南观察使李裕，自称留后，据潭州。唐廷无奈，升他为镇南节度使。中和三年，唐升湖南为钦化军，仍由闵勖节度。光启二年（886年），衡州刺史周岳攻陷潭州，杀闵勖。唐改钦化军为武安军。景福二年（893年），闵勖旧将、邵州刺史邓处讷联兵雷满，夺取潭州，杀周岳。其后，马殷随刘建锋挺进湖南，湖南渐归马氏。

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原先是木匠，唐末遭乱投军。中和年间，他在孙儒及刘建锋军中，以勇猛著称。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叛唐后，派孙儒、刘建锋等领兵万人，受其弟秦宗衡节制，攻淮南（相当今安徽、江苏的江淮之间大部分）。孙儒杀掉秦宗衡，领兵攻取高邮（今江苏高邮县）等地，逼使杨行密退据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市）。孙儒自己率主力围攻宣州，

另派刘建锋、马殷等剽掠旁县。结果孙儒兵败战死，马殷等收拾残部七千余人，推刘建锋为帅，以行军司马张佶为谋主，马殷自己为先锋指挥使，转攻豫章（今属江西），掠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势力一路发展至十几万人。

乾宁元年（894年），刘建锋等率部进入湖南，武安节度使邓处讷调发邵州兵守回龙关（今属湖南）。马殷劝降守将蒋勋、邓继崇，打着蒋勋帅旗，伪装成守关兵，直奔潭州。来到潭州东门，守卒以为关兵戍还，打开城门。刘建锋、马殷等径入军府，邓处讷正在夜宴，束手被斩。刘建锋自称武安留后。次年，唐僖宗授他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为内外马步都指挥使。蒋勋自以倒戈之功，请任邵州刺史，遭刘建锋拒绝。蒋勋就联合邓继崇，攻占邵州，又率兵攻湘乡（今属湖南湘乡市）。马殷受命讨邵州蒋勋。

刘建锋原是平庸之辈，得志后不能镇服部下。他常常嗜酒不视事，与亲兵狎饮狂欢；另外，又好色无度，与亲兵陈赡妻私通，被陈赡袖铁檛击杀。这时马殷正在攻邵州，军中推张佶为帅。张佶刚要进帅府，忽然被坐骑踢伤，不能受礼。张佶躺在床上对众将说："马公勇而有谋，又待人宽厚，我比不上他。他才是我们的主帅。"诸将杀掉陈赡，派姚彦章去邵州迎立马殷。马殷留亲从副指挥使李琼攻邵州，自己回到潭州，被拥为武安留后。这是马氏据湖南的开始，时为乾宁三年五月。同年九月，唐廷授马殷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

光化元年（898年）二月，张佶领兵攻下邵州，生擒蒋勋。三月，唐廷授马殷为武安节度使。当时湖南管内七州；杨思远据衡州、唐世旻据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县）、蔡结据道州（治今湖南道县）、陈彦谦据郴州（治今湖南郴州市）、黄巢将鲁景仁称病留据连州（治今广东连县），马氏所得只是潭、邵二州而已。五月，马殷以李琼、秦彦晖为岭北游奕使，张图英、李唐为副使，领兵攻下衡州，斩杨思远。接着，转战永州，围攻一个多月，唐世旻败

逃。马殷任命李唐为永州刺史。

光化二年，马殷派遣李唐攻道州。蔡结聚集当地少数民族，大败李唐兵。后来李唐命部下焚烧山林，使蔡结的少数民族兵惊逃，一举攻下道州，斩蔡结。同年十一月，李琼领兵攻陷郴州。杀陈彦谦；又攻占连州，鲁景仁自杀。这样，湖南管内七州都由马氏占领。

光化三年十月，静江军（治今广西桂林市）节度使刘士政得知马氏悉平岭北，大为恐惧，命副使陈可璠率兵戍守全义岭（在今广西兴安境内）。不久，马殷派遣秦彦晖、李琼领兵七千攻岭南。兵至全义岭时，刘士政又命指挥使王建中屯兵秦城（今属广西兴安县），声援陈可璠。全义岭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要拿下它，须先攻下秦城，绝其援路。陈可璠暴掠县民耕牛犒军，县民怨忿，就向秦彦晖报告了一条仅通单骑小路，距秦城仅五十里。秦彦晖立即派李琼领六十轻骑、三百步卒夜袭秦城，活捉王建中。回到全义岭后，秦彦晖割下王建中首级，扔进桂兵壁垒。桂兵见失去后援，心无斗志。李琼等乘机攻岭，杀陈可璠及兵卒二千余人。秦城以南二十余壁望风奔溃。湖南兵进围桂管（今广西桂林市），刘士政投降。马氏取得桂管所属桂（治今广西桂林市）、宜（治今广西宜山）、严（治今广西来宾）、柳（治今广西柳州市）、象（治今广西柳州市东南）五州。

天复二年，唐加马殷同平章事。

天复三年四月，杨行密遣使说马殷共讨梁王朱全忠。大将许德勋说："全忠虽不道，然挟天子以令诸侯，未可轻易进讨。"马殷赞同这个建议。他结好中原朝廷，与吴越钱氏同出一辙，意在受其封赏，得之庇护。这样，马氏就可名正言顺地拥有湖南。得到湖南、桂管，马氏仍嫌不足，又打起了荆南的主意。这年五月，杨行密攻鄂州（治今武汉市武昌），朱全忠命荆南节度使成汭及澧（治今湖南澧县）、朗二州将雷彦威领兵赴援鄂州。马殷借口救鄂

州，派许德勋领水军伙同雷彦威乘虚袭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将大批军人、百姓、职掌、伎巧、僧道、伶官虏归长沙。回程经岳州（治今湖南岳阳市），刺史邓进忠无力抵抗，献牛酒犒师，举州降。马氏不费一兵一卒，轻得扼守洞庭湖出长江的重镇——岳州，为长沙竖起了一道屏障。

天祐二年（905年），马殷发兵侵淮南（指杨行密的地盘），被淮南内牙指挥使杨彪击败。次年三月，淮南将陈知新攻陷岳州，任为刺史。

天祐四年，朱全忠废唐帝自立。马殷即刻遣使修贡，又因有劝进之功，被拜为侍中、兼中书令，封楚王。

开平元年（907年）五月，吴王杨渥派鄂岳观察使刘存、岳州刺史陈知新、庐州观察使刘威等统率水兵三万人进击湖南。马殷命秦彦晖领兵屯于湘江上流、水军副指挥使黄璠以三百只小船埋伏在浏阳河口（在长沙附近）。六月，黄璠等大败吴兵，缴获战舰八百艘，补充了湖南水军实力，同时还夺回岳州。同月，马殷联合雷彦恭（雷彦威之弟）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屯兵公安（今属湖北），截断雷彦恭粮道，雷彦恭退走，湖南兵只得退回。七月，雷彦恭偷袭岳州，投靠淮南。后梁诏令高季昌与马殷出兵进讨。马殷觊觎澧、朗已久，立即派秦彦晖与荆南兵合攻朗州。杨渥派兵援助雷彦恭，被岳州守将许德勋击退。开平二年（908年），秦彦晖先于荆南兵攻进朗州，又招降澧州刺史向环。马氏又得到澧、朗二州。

长期征战，使湖南财政发生困难。开平二年六月，马殷听从节度判官高郁的建议：听任境内百姓向北方出售茶叶，征收茶税供给军需。七月，马殷奏请朱全忠，在汴（今河南开封市）、荆（治今湖北江陵县）、襄（治今湖北襄阳旧城）、唐（治今河南唐河县）、郢（治今河南正阳县）、复（治今湖北天门）等州设置回图务，官运茶叶到黄河南北，换取缯纩、战马等物，每年向后梁贡

茶叶二十五万斤，获得许可。当初马氏交结朱梁已得军事大利，现在又以茶叶开通中原的商路，使官府、百姓都大为获利。湖南每年因此可以增收几十万缗，保证了军用开支。

九月，荆南兵屯于汉口（今湖北汉口），截断湖南向中原朝贡、通商之路。马殷派名将许德勋攻荆南，兵至沙头（今属湖北），荆南放路求和。同时，马殷派遣大军进攻岭南，与南汉刘岩前后交战十几次，夺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马氏所占地盘，大大超出湖南范围。马氏对外征战掠地，对内则与民生息，湖南境内一直比较安定。

开平四年六月，后梁朱全忠授马殷为天策上将军。马殷开天策府，设置官属，以其弟马賨、马存为左右相。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开炉铸天策钱，文称“天策府宝”。其铜质浑厚，径一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在境内通行。

龙德三年（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马殷让儿子马希范出使洛阳，向后唐献上洪、鄂二州行营都统印以及湖南将吏名籍。李存勖向马希范问到洞庭湖有多大，他回答道：“车驾南巡，才堪饮马。”李存勖听了这话，假意夸奖他的才能，“近来风闻湖南要被高郁僭取，马氏有你这样的人才，高郁哪能得逞呢！”这番话实际上意在离间，为高郁之死埋下了祸根。高郁，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市）人，明敏多谋。乾宁（894—898年）初，任为马殷谋主，深得信任。马氏得湖南，高郁劳苦功高。平定湖南并占领桂管时，成汭据荆南、杨行密据淮南，马殷惧怕，想和他们结成金帛之好。高郁建议：“成汭不足畏。至于杨行密，是您的大仇家，即使送万金给他，他也不会援助我们，不如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训卒厉兵，用以稳固霸业。这样，谁还能和我们作对呢！”马殷听从了这个建议，确定了以保境息民为富国强兵的策略。不久，即在潭州东面二十里处筑龟塘，可灌溉农田万顷。

开平年间，高郁劝马殷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设置

邸务（即回图务）售茶，获利几十倍。马殷初据湖南，长时间不征关税，四方商旅闻风辐凑；又因湖南出产铅铁，高郁建议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后来又铸“乾封泉宝”铁钱，九文一贯，以一当铜钱十，只在境内通行。商旅出境，因钱制不同，只能带货。湖南用本土特产交换四方百货，日益富饶。马殷还接受高郁倡议，令百姓以帛代钱纳税。湖南境内原先不事桑蚕，由此机抒大盛。其他手工业特别是制瓷业也在这种保境息民政策下得以恢复和发展。

长沙窑在唐代就以首创釉下彩绘而闻名。马氏据湖南时，它的装饰手法、产品式样、产量都有所提高。长沙窑器成为当时中国外销瓷的大宗，在国内外有大量出土。岳州窑的盘碗烧造技术较之唐代也大为改进，由垫饼烧改为支钉烧。除烧造盘碗外，还有瓶、灯等其他产品。长沙子弹库五代墓出土的浮雕莲瓣纹瓶，端正修长，口呈洗形，腹部翘起一层莲花瓣尖，釉色匀净，造型优美，最能代表当时的岳州窑水平。

马氏得以安据湖南，与高郁的谋略是分不开的。因此，他被马氏敌手视为钉刺。南平王、荆南节度使高季昌也屡造谣言。他在衡阳王马希声（马殷子）面前大赞高氏之功；又派间谍对马希声说：“高公听说楚重用高郁，大喜，认为马氏必定要败亡在高郁手里。”后来，马希声矫杀高郁，使马氏失去了一位得力谋士。马殷得知消息后，不禁叹道：“我也将不久于世了。”

天成二年（927年）六月，马殷向后唐建行台要求，后唐封他为楚国王。八月，马殷改潭州为长沙府，择宫殿，置官属。制度都和天子一样，只是名称不同，翰林学士称文苑学士，群下称楚王为殿下，令称教，又知制诰称知制辞，枢密院称左右机要司，马殷以弟马賨为静江军节度使；长子马希振为武顺军节度使。次子马希声为武安军节度副使、长沙通判；以姚彦章、许德勋为左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潘起为吏部侍

郎。

天成四年三月，马殷将军、政大权交给次子马希声，他可以先斩后奏，自马希声掌权，湖南祸起，内外不安。七月，高郁被杀。

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马殷病死，享年七十九岁，谥为武穆王。马殷自被推为主帅，入主潭州，惨淡经营，历三十五年。之所以能稳据湖南，又跨桂越岭、辖二十余州，是和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李琼、高郁、秦彦晖、王环、拓跋恒等都是一代将相之才。马殷死后，其子如众驹争栈，功臣冤死，国势随之衰落下去。

马殷有数十个儿子。长子马希振较为贤能，但次子马希声却以母袁德妃得宠而立为继承人。马希声袭位后，后唐授他为武安、静江两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他品性恶劣，居丧期间，面无悲容，却效法梁太祖朱全忠嗜食鸡臛（带汁的鸡肉），命厨师每天烹调五十只鸡供膳。朝臣潘起讥讽说："晋代阮籍居丧食蒸豚，世上到底不乏贤者啊！"他还贪财好杀。一次，有个海商到长沙卖犀带，其犀带价值数百万钱，昼夜发光。马希声派人把那商人杀掉，将犀带据为己有。他在位不到三年，就病死。

马希声死后，马殷第四子马希范继位。长兴三年（934年），后唐授他为武安军节度使、兼侍中，次年封为扶风郡侯、楚王。

后晋建立后，对他又有封赐。天福四年（939年），后晋授他为天策上将军，赐印绶、开府。十一月，马希范开天策府，设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以诸弟及将校充任各职，他还仿照唐太宗天策府文学馆，设立学士员，选拓跋恒、李宏皋、廖匡图等十八人为学士。

与此同时，马希范命静江左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领兵五千攻掠溪州（辖区包括今湖南永顺、保靖、龙山、古丈，分上、中、下溪州，以下溪州为都誓主，统其他相等的十九州，实

际上是土家族部落联盟形式)。在此以前,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仕愁曾引溪州土家族万余人袭击辰(治今湖南沅陵)、澧二州,并遣使向后蜀求助,后蜀以路远为由没有答应,他只好退回。这次彭仕愁受到攻击,兵败后逃到山寨自保。山寨四周绝壁,刘勍等架梯猛攻,一时难以攻下,廖匡齐战死。天福五年(940年)正月,刘勍再度进攻,用火箭焚寨,彭仕愁带部下钻进深山。不久,彭仕愁让他的儿子彭师暠领着各部首领,献纳溪、锦(今属湖南)、奖(今属湖南)三州印,向刘勍投降。二月,马希范命刘勍班师,带彭师暠回长沙为人质,任命彭仕愁为溪州刺史,刘勍为锦州刺史。

溪州西接牂牁(唐设郡,治今贵州黄平县西北)、两林(今属云南),南通桂林、象郡(今属广西);马希范自称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于是效法马援曾在交州(治今广西梧州市)立铜柱一事,在溪州铸立铜柱。溪州铜柱,高一丈二尺,埋入地下六尺,用铜五千斤。它的铭文由天策学士李宏皋撰写,共二千一百一十八字,内容反映立柱原因、目的。主要是声明马氏恩典、并告诫土家等族要顺从马氏王朝,从溪州铜柱铭文中可以看出,马希范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继承了马殷的剿抚兼举、恩威并重的政策。马殷在平定衡、永、道、辰、溆等州后,授职于各族首领,听任各族保留其民族习俗,在边远地区少数族州县征收的赋税都低于其他州县。此后长时间内,湖南境内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保持安定。

自得溪州后,宁州(治今云南曲靖市)莫彦殊以所部十八州、尹怀昌率所部昆明(今属四川盐源县)等十二部、牂牁张万濬率彝(今属贵州)、播(治今贵州遵义市)等七州先后降楚。这是继马殷之后一次较大的扩展。马氏势力伸至今贵州北部、四川东部等地区。

开运四年(947年)五月,马希范死,谥为文昭王。他在位十

四年，开始置天策府时，选了十八名德才兼备的人充任学士，礼待甚厚。后来，他渐渐刚愎自用，大兴土木，纵情声色，使湖南由强变弱、由富变贫。

位于长沙城北的天策府，兴建时就包括天策、光政等十六座楼阁，天策、勤政等五堂。它们的装饰极其豪华，栏杆饰以金玉，墙壁涂以丹砂。天策府内后来又建成一座大殿，殿内用沉香刻成八条龙，龙身镶嵌金玉宝石，每龙长达十丈，相对环抱大柱。马希范身处大殿之中，看着龙腹燃香、龙嘴吐雾，满殿香气缭绕，心里十分得意，把自己视为一龙，故称大殿为“九龙殿”。另外，马希范还建有会春园、嘉宴堂、金华殿等，用费钜万。他为了显示国富，挑选了富家子弟八千人编为银枪都，长枪大槊，都鎏上白银。

除在湖南境内大肆挥霍外，马希范每年还向后晋进贡大批财物。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贡御辇一乘、绢二千匹、银锣（或酒器、或锣类，后人说法不一）四十面，重二千两；土绢、土绝、吉贝布共三千匹，麸金五十两。天福六年，贡吉贝布三千匹、白腊一万斤、朱砂五百斤、漆器万余件。其它多次贡项，不可胜数。

湖南物产丰富，自马殷以来，金银、茶谷等颇有积贮。经过马希范的折腾，湖南入不敷出。马希范便在境内增加赋税，百姓不堪，纷纷逃离家园；他下令登记逃田，募民耕种。百姓舍弃故地，耕种新田，收入仅能自存。马希范还让人输财买官，以财物多少定官位高低。百姓有罪，富者输财、强者为兵、贫弱者受刑。他还听从孔目官周陟建议：除常税外，令大县每年贡米三千斛、中县千斛、小县七百斛；无米以布帛抵。此举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殿下长在深宫之中，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鞞之音，驰骋遨游，雕墙玉食。府库已空，而用费更大；百姓穷困，却厚敛不已。俗话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希望殿

下罢输米令，杀周陟以谢州县，摒除不急之务，减少百姓劳役，免得一旦祸起败国，遭四方耻笑。”切直强谏，枯石动容。但马希范不仅一字未听，反而十分恼怒。直到卧病，他才意识到拓跋氏的一片苦心。

马希范死后，马殷第三十五子马希广继位，受后汉封为楚王。他是个懦弱无能之辈，即位不久，其兄马希萼就开始争夺王位。

乾祐二年（949年）八月，马希萼将朗州壮丁都编为乡兵，称为“静江军”，还造了七百艘战舰，准备进攻长沙。马希广听到消息，想让位与他，被谋臣刘彦瑫、李宏皋等谏止。接着，马希广任命岳州刺史王赟为都部署战棹指挥使、刘彦瑫为监军，领水军攻朗州，在仆射洲（今湖南北部湖域）大败马希萼部，缴获战舰三百余艘。马氏兄弟正式拉开战幕。

仆射洲之败后，马希萼改变了策略。乾祐三年六月，他以长沙国库丰实诱使辰（治今湖南沅陵）、溆（治今湖南溆浦）二州等少数民族攻益阳（今湖南益阳市），楚指挥使陈璠战败身亡。八月，马希萼又使用各族兵攻破迪口（今属湖南），杀镇将张延嗣及楚援将黄处超。九月，马希萼向南唐称藩，南唐授他同平章事职；命楚州刺史何敬诛出师相助。这时，南汉、荆南也出兵攻湖南。十一月，马希萼让其子马光赞留守朗州，自己率全部兵力向长沙大举进攻，马希广向后汉告急求援，后汉因内乱没有出兵。马希萼长驱直人，很快攻陷长沙。长沙几十年未遇兵祸，这次沦陷，马希萼放任朗兵、蛮兵大掠三日，杀人放火，无所不为。马殷父子所积宝货，一抢而空；宫殿屋宇，化为灰烬，昔日繁荣的长沙，一时成为焦土。

马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等。他命人将马希广及谋臣李宏皋、邓懿文等处死。他以武力夺取王位后，得意忘形，将主要精力放在报复旧怨仇敌上，杀戮无度，又纵酒荒淫，不闻政事。其弟马希崇掌管军府，蓄养

亲兵，刑政紊乱。朗州旧将见马希萼无所作为，渐生离心叛志，导致了马氏的灭亡。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三月，马希萼命朗州将王逵、周行逢带领朗兵修治宫室。士兵辛苦而无犒劳，怨声四起，王逵、周行逢就领兵奔回朗州。当时，马希萼正大醉不醒。第二天，他才命湖南指挥使唐师翥领兵追击。王逵等在中途设下埋伏，唐师翥大败，仅以身免。

同年九月，马希萼命令马步都指挥使徐威等在长沙附近的湘江上设立栅栏，以防备朗州兵，但对他们同样礼待不周，不加抚慰。一天，马希萼在端阳门置酒欢宴，徐威等率兵冲入王府，将他抓了起来，后来又把他囚禁在衡山县（今属湖南衡阳市）。马希崇被推立为威安留后。这时，辰州刺史刘言（已被王逵等人推为武威军留后）听到政变，立即起兵，直奔长沙。刘言兵到益阳西时，马希崇十分惊惧，发二千兵阻挡，同时派人向朗州求和。刘言听从幕僚李观象的意见，暂缓进兵，先发布檄文，声言取马希崇首级，再逐步剿灭马希萼旧将，然后完全占据湖南。马希崇见到檄文，十分狼狈，赶紧杀掉都军判官杨仲敏、掌书记刘光辅、都押牙黄勍等亲南唐及参与政变的十余人，割下他们首级，派人送到朗州。这些人的首级送到朗州时已腐臭难辨，刘言、王逵故意说是假的，不答应退兵。但因形势有变，他们也没有马上出击。

马希崇虽惶惶不可终日，仍然纵酒荒淫；他又杀臣求和，更失将心。这时，马希萼被彭师暠等人立为衡山王，以县为府，断江设栅，编竹造舰，又召募徒众，数日内达万余人。他还派人向南唐求援。徐威见马希崇成不了大气候，又惧怕来自朗州、衡山两方威胁，就想杀掉他，另谋出路。马希崇知道后，坐立不安，也向南唐邀兵。

南唐早想将湖南收为自己版图。这年三月份，马希萼派掌书记刘光辅出使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刘光辅对南唐中主李璟说：

“湖南民疲主骄，可以轻取。”当下，李璟就命边镐屯兵袁州（治今江西宜春市），伺机入湘。接到马氏兄弟双双请求后，李璟立即命令边镐领兵万人自袁州奔长沙。十月初，边镐兵进驻长沙城外，马希崇派天策学士拓跋恒向他递交了降书。不久，边镐入城，湖南旧将多弹冠庆贺。时湖南境内发生饥荒，边镐命开仓赈济，甚得人心。南唐的南昌节度使刘仁赡收岳州时，安抚降附，楚人竟无亡国之忧。由此可见马氏失民心的程度。

十月底，边镐下令将马希崇及其宗族、部将等千余人押往金陵。行前，马氏族人相聚而泣，重赂边镐，乞求留居长沙。边镐微微一笑，说：“唐楚世为仇敌，但我们从不觊觎湖南；而今你们兄弟相斗，自取困境，要是再有一、两回，恐怕就有不测之祸了。”马氏据湖南数十年，家世显赫，如今一下子成为他人阶下囚；一帮亡国之徒，只得悲恸登舟，远离故土。

十一月，边镐在衡山俘获马希萼，命他及部下万余人自潭州东下，朝拜南唐中主。

马氏据湖南，共历二世六王，凡五十五年。马殷在位，外拓疆土，内积财货，湖南富强，雄于江南列国；马希声短命，湖南尚不足忧；马希范奢侈无度，府库告罄，百姓失业；马希广、马希萼、马希崇兄弟相斗，同室操戈，致使将士离心，民怨沸腾，湖南每况愈下，又引狼入室，终致国亡。

边镐灭马氏后，还想召刘言归顺南唐，王逵对刘言说：“武陵（即朗州州治，今湖南常德市）负江湖之险，带甲数万，安能拱手受制于人。”刘言拒绝服从边镐，还派王逵与行军司马何敬真等人分路进攻长沙，大败边镐。边镐一走，湖南故地除郴州、连州被南汉占领外都一一被刘言据有。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刘言将武平军治所从长沙迁回武陵，后周太祖郭威升武平军在武安军之上，授刘言为武平军节度使、王逵为武安军节度使。王逵因有推立之功，不愿受刘言节制，二人产生矛盾。广顺三年，王逵先诱

杀了刘言的左右臂——何敬真、朱全琇，然后举兵袭朗州，杀了刘言，刘言镇湖南三年。

刘言被杀后，王逵自称武平留后，统治湖南。后周太祖郭威授他为武平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柴荣征淮南，拜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命他攻南唐鄂州（治今武汉市武昌）。兵过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奉待甚谨；王逵部下向潘叔嗣求赂，遭拒绝，就谗言诬谄。王逵当着众将面，把潘叔嗣骂了一顿。叔嗣惧恨交集，对部下说："王逵战胜而还，吾辈不存也。"他乘王逵在鄂州之机举兵袭朗州；王逵乘轻舟归，与潘叔嗣战，败死。王逵镇湖南也只有三年。

潘叔嗣杀掉王逵后，仍回到岳州，他派人去长沙将周行逢迎到朗州，推为主帅。周行逢到朗州后，自称武平留后，召潘叔嗣为行军司马。潘叔嗣很不满意，称疾不至，周行逢对人说："他老兄又想杀我。"于是，就许诺他任武安节度使。潘叔嗣这才到朗州帅府受命。他万万没想到，刚到帅府就被周行逢执杀。显德三年二月，周行逢自称武平、武安留后。七月，周世宗授他为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宋初，除原职外，另加兼中书令。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周行逢病死，他据湖南近七年之久。

周行逢出身农家，知民间疾苦。在位时，他励精为治，公而无私。女婿唐德向他求官，他告诫说："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就送给一些农具，把女婿打发了。他自俸甚薄，常常对人说："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尚足效乎？"但他用法太严、恣行诛戮。不仅杀掉拥戴他的潘叔嗣，还杀掉王逵的子弟、部将共百余人。一次，他听人说十余名大将图谋作乱，就召集他们宴饮；饮酒正兴时，他突然下令将这些人拿下，全部杀掉。百姓一旦犯罪，不管大小，都得处死。所以，他在位时，湖南虽然仓廪充实，自己却失去了民心。他的妻子严氏执意不肯留在他身边，要回到老家去，

并说："公用法太严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仓促祸起，田间易逃死尔。"道出了周氏统治的危机。

周行逢死，他的十一岁儿子周保权继位。宋太祖授他起复检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军节度使。

建隆三年十一月，即周保权继位后不到一个月，衡州刺史张文表叛乱，周保权按其父遗嘱："文表必乱，宜以杨师璠讨之。"命杨师璠出兵进讨；另外，又向宋太祖求救。宋军到达江陵时，张文表已战败被杀，乱平。宋军不顾湖南兵的阻挡，长驱直入，先后攻下朗州、岳州等地，俘获周保权。周氏镇湖南共历二世、八年。

宋平湖南，得十五州，六十六县，九万七千余户。在被宋征服、降服的列国或藩镇中，湖南人口最少。

（程定飞）

参考资料：

《旧五代史》：《马殷传》、《马希范等传》、《刘言传》

《新五代史》：《楚世家》

《资治通鉴》卷266—卷294

《通鉴纪事本末》：《马氏据湖南》

《十国春秋》卷67—卷76

李氏建南唐

南唐脱胎于吴国，只不过移了都城、换个国名而已。它的建立使李氏名实俱全。

杨行密经过多年苦战，征服了淮南（今安徽、江苏的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江东（今苏南、皖南）、江西（相当于今江西省），形成了一方强大的割据势力。天复二年（902年），唐政府封他为吴王，但杨氏真正掌权的时间并不长。天祐二年（905年），杨行密去世，其长子杨渥继位，而大权很快落到徐温手里。

杨渥昏暴好杀，荒淫奢侈。居丧期间即昼夜酣饮作乐。他常常点燃十围大烛击毬，每烛费钱数万。至于政事，他不闻不问。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杨渥大怒说："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泣谏不行，张、徐二人就实行兵谏。一天早上，他们俩带着二百名亲兵，全副武装地来到杨渥面前，杨渥说："你们果真要杀我呀?"张、徐二人说："我们怎敢动大王，只是要替大王清除左右乱政的人。"于是，他们杀掉杨渥的十几名亲信，杨渥无力制止。这样军政大权归于张、徐。后来，二人又合谋杀掉杨渥。杨渥被杀后，张颢想投靠后梁，自立为王，被徐温杀掉。徐温把罪名推到张颢身上，独掌大权。他立杨行密次子杨渭（即杨隆演）为淮南、东面行营诸都统。实际上，杨渭只是一个傀儡。徐温命其子徐知训驻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处理日常政事；又命养子徐知诰驻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作为呼应；自己则常坐镇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决断大事。吴地内外均为徐氏控制。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人。他沉毅寡言，罕与人交。杨行密起兵合肥，他是其部属，与刘威、陶雅等人称“三十六英雄”，虽没有赫赫战功，却很有智谋。杨行密取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市），诸将急取金帛，徐温独据米仓，煮粥赈济饥民。此举深得民心，也得到杨行密的高度信任。执政后，他采取较为温和的治国政策，发展生产，减少战事。后梁贞明五年（919年），吴军在无锡（今江苏无锡市）大败吴越，诸将力请乘胜攻杭州。他说：“天下离乱已久，民困已甚；况且钱公未必就可轻取。何不让两地百姓各安其业，君臣高枕？”他不仅下令退兵，还遣使向吴越求和。此后，与吴越长期没有发生战争，保证了边境的安定及境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一年，徐温拥杨渭为大吴国王，置百官、社稷、宫殿等，皆用天子礼，吴国正式建立，改元武义。徐温做了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他死后，徐知诰继续执政。

徐知诰字正伦，小字彭奴，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本姓李。六岁丧父，因遇战乱随其伯父到了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母丧后由开元寺收养。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攻占濠州，见他聪明伶俐，收为养子。后来，杨行密的几个儿子不容他，只好把他交给徐温领养，改姓徐氏，名知诰。到徐家后，由于他天资颖悟，很得徐温怜爱。长大后，徐温先让他主持家务，不久便投人军戎。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徐知诰由元从指挥使升为升州防遏使兼楼船军使，受命在升州（治今江苏南京市）备造战舰。开平四年，徐知诰被授为升州副使、知州事。乾化二年（912年），又以功迁升州刺史。

当时江南、淮南初定，州县官吏为攻战守备之名都尽心赋敛，徐知诰却能课民农桑，褒扬廉能，招延宾客并倾身礼遇；他为人节俭却轻财好施、无所悭吝。宋齐丘、王令谋、王翃、曾禹、徐

融等成为他的宾客；马仁裕、周宗、曹悰成为他的亲吏。

乾化四年，徐知诰开始扩建金陵。贞明四年（918年）夏，金陵修建完工。徐温前来视察，见它城隍浚整，楼堞完固，府署内外，井然有序，对徐知诰十分赞赏，升他检校太保、改为润州团练使，自己移至金陵。徐知诰并不想离开金陵到润州去，既然被迫调出，他要求改镇宣州，独自发展自己的势力，徐温没有答应。

徐知诰到润州不久便发生了扬州事变，给他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徐温的儿子徐知训专制扬州，任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通判军府事。他为人悍愚无知，骄淫失众，时常凌侮诸将，甚至对杨渭也动辄辱骂殴打，杨氏及诸将只得忍气吞声。徐知训的胡作非为给自己引上了死路。当时，杨行密的老部下朱瑾位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互相忌恨。徐知训在泗州（治今泗洪县东南）设静淮军，调朱瑾任节度使，朱瑾不服，心中更加愤恨。临行前，朱瑾邀徐知训夜饮，假意致谢。第二天，徐知训到朱瑾家拜谢，朱瑾又捧觞敬酒，以宠妓献歌助兴，并把自己的爱马赠给他作为寿礼。徐知训大喜，无所防范。朱瑾乘他不在意时用朝笏猛击其后脑，然后呼出伏兵将其斩首。朱瑾立即提着他的首级去见杨渭，要他亲政；杨渭吓得半死，说："这是舅舅自己做的事，我可不敢担事。"（朱瑾与杨行密的朱夫人同姓，故杨渭称他为舅）朱瑾很快受到层层包围，只得自刎而死。

马仁裕得知事变，立即驰告徐知诰。徐知诰当天就率领州兵飞奔广陵定乱，杀掉朱瑾全家，代徐知训为淮南节度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控制了广陵。他勤俭宽简，一反徐知训的暴政。不时地派人察视民情，凡遇婚丧而经济困乏的人家，往往加以补给。自己的生活也比较简朴，盛夏酷暑，他不用人操扇，也不用张盖。有次外出，左右为他张盖（撑伞盖），他说："士卒尚多暴露，我何用此！"正因为这样，虽然徐温在金陵遥掌权柄，徐知诰却笼络

到吴人民心。

徐温拥杨渭建吴国后，拜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据传，徐知诰这时嫌自己不够老成，恐怕不能弹压众人，就服用丹药，使他的短髭鬓发一夕成霜，真可谓用心良苦。他更加注意招贤纳士，时时表现出一个贤君的气度：在府署内建造"延宾亭"，接纳名士，四方豪杰翕然归附。政事之余，他与这些人饮酒谈天，咨访缺失。

后梁龙德元年（吴顺义初年，921年），徐温加授他为同平章事，领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观察使；不久在江州设奉化军，即以徐知诰为节度使，但他并未离开广陵。金陵行军司马徐玠，工揣摩捭阖之术，他看出徐温有意培养徐知诰为接班人，多次劝徐温用亲子徐知询辅政，不宜让异姓掌管大权。徐知诰刺探到消息，大为惶恐，准备上表辞去政事，出镇江西，表还没有来得及呈上，徐温病重，徐知诰也无所顾忌了。徐温死，徐知询嗣为金陵节度使、诸道副都统。徐知诰早有防备，谨守扬州，权力一分不让。他还诱使徐知询来扬州朝吴王，徐知询一到，就被扣留起来，名义上任他为左统军，实则夺了他的全部兵权。吴王杨溥任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浔阳公，后改封豫章公。徐知诰这才将大权独揽。

后唐长兴二年（吴大和三年，931年），徐知诰出镇金陵。他也和徐温一样，将儿子景通（即后来的李璟）及宋齐丘、王令谋留在扬州。清泰二年（935年），徐知诰被加授尚父、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进封齐王，以升、润等十州为齐国。第二年，他在金陵开大元帅府，置僚属。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徐知诰改名为诰。十月，逼吴主杨溥退位，徐知诰当上了皇帝。尽管执掌权柄，位极至尊，但做皇帝是他梦寐已久的事。有一天，徐知诰临镜理着短髭，叹息道："功业成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站在一旁，悟出他的意思，就请到扬州暗示吴主退位，同时也征求宋齐丘的意见。宋齐丘早就知道徐知诰的心事，但他妒忌周宗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就上谏反

对。徐知诰由于宋齐丘的反对，心里既后悔又惧怕，一度想听从宋氏意见，杀周宗了之。马仁裕、徐玠竭力为周宗说情，徐知诰还是把他降了职。即帝位后，徐知诰改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升元元年，定金陵为西都、扬州为东都；他尊吴主扬溥为让皇，上册自称“受禅老臣”，又追尊徐温为太祖武皇帝，后改尊为义祖。“徐氏篡吴”圆满成功。

天福四年（升元三年，939年）正月，徐知诰复李姓。二月，改国号为“大唐”，并改名昪。李氏南唐正式确立。

李昪做了皇帝，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大权握紧。一些重要职务还是由吴旧臣担任，如任命吴平章事张延翰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及同平章事、原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为同平章事，这些人相对来说更便于控制。对勋旧老臣并不加以过高地提拔。周宗只不过枢密使，宋齐丘更不如意，只加了司徒一职。在宣布任命时，念到“布衣之交”句，宋齐丘大声说：“臣布衣时，陛下也只是一个刺史！今日做了天子，就不可用老臣了！”遂拂袖而出。还有一次在宴席上，宋齐丘忽然对李昪说：“陛下中兴，臣之力也，奈何忘之？”李昪作色道，“公以游客的身份为朕做事，今位至三公，也应知足了。”第二天，李昪为了抚慰他，任命他为镇南节度使。宋齐丘到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后，大营宅第，穷奢极侈，民不堪命。

天福六年七月，李建勋被罢免。李昪曾在吴专权并取代吴，所以最忌宰相权重；李建勋做宰相已久，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将他罢免，对他人可起到警诫作用。

李昪在农业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天福四年四月，诏令全国：百姓种桑达三千株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达八十亩者，赐钱二万，二者在五年内免收租税。天福五年正月，又诏令罢除营造力役，以免妨碍农事。六月，下令免征宣州岁贡木瓜杂果。天福六年十一月，李氏定民田税，以土地肥瘠为标准，民间称其平

允；调兵、兴役及其赋敛，都以税钱为根据。这些措施的实行，促进了南唐农业的发展。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唐以新的面目出现。李昪即帝位时，就以和平姿态遣使至南汉、闽、吴越、荆南，通报即位；同时，还友好地接待了来自高丽、新罗、契丹等国使者。一次契丹王弟丹东王遣使入贡南唐，另外还带了三万只羊、二百匹马来换南唐所产的罗、纨、茶、药等物。当然，在对外关系上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如何对付中原朝廷。李昪的基本策略是：积蓄力量，以守图进，待机北伐。在一次廷议中，他道出了北伐大志，他说："天下之势，低昂如权衡，首要之务当以河山为腹背，腹背奠定后手足才能伸展。朕借杨、徐遗业，抚安东夏，地势不便，好比绘画，窘于边幅，虽有手笔，无所纵放；毛遂说，锥未处囊中就是那样，如处在囊中，则必脱颖而出。"他认为南唐尚未"得处囊中"，也就是说北伐的时机没有成熟。甚至原后唐将卢文进自契丹奔南唐、后晋安州节度使安金全率部来降，李昪也没有贸然行动，只是出兵接应而已。至于南方各国，李昪不主张动武。天福六年，南汉遣使相约攻楚，然后均分其地，遭到李昪拒绝。同年，杭州大火，宫室府署焚毁殆尽，吴越王钱元瓘惊悸而死。宋齐丘等人上言趁机攻杭州、灭吴越，李昪不愿利人之灾，反倒遣使厚持金帛，前往杭州慰问。南唐疆域广阔，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拒长淮，凡三十余州，南方列国中它是最为强盛的一个。

李昪在位期间还有一个明显的施政特点，那就是不以外戚辅政、宦官较少且不得干预政事。

天福八年二月，李昪因长期服用方士史守冲等人的金丹，背生毒疽，但秘不外闻，暗中医治，仍坚持听政，不久病重而殂，享年五十六岁，谥为光文肃孝武高皇帝，庙号烈祖。后世常称他为南唐烈祖或先主。

李昪死，长子李璟（原名景通）继位，是为南唐元宗（又称

中主)。李昪代吴时，封他为吴王，后又改齐王，授为诸道兵马大元帅。天福五年立为太子。李昪对他非常满意，称他“守廉退之风，帅忠贞之节；有子如此，予复何忧”。事实上，李璟即位不久，南唐便令人担忧了。

天福八年（南唐保大元年）十月，岭南张遇贤率领起义军越过大庾岭，攻掠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打破了南唐边境的安宁。虔州守将贾匡浩毫无防备，无法组织抵抗。李璟闻讯，急调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及通事舍人边镐领兵赴援。最后起义军被剿灭，张遇贤等人被斩。此后，南唐兵事渐多，保境息民的政策暂时搁在一边。

天福九年（保大二年），福建大乱，南唐趁机出兵。这年十二月，李璟诏令枢密使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共同进军福建。南唐的首要目标是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王延政。一开始，南唐并不顺利，交战多败。第二年二月，李璟以何敬洙为福建道行营招讨、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诸军都监，领兵会合查文徽等攻向建州，在赤岭（今福建崇安县南）大败闽兵。八月，南唐兵攻克建州，俘王延政，灭闽。建州升格为永安军。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县）、漳州（治今福建漳浦）、泉州（治今福建泉州市）也先后降南唐。开运三年（946年），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取代王继勋，成为泉州刺史。十月，留从效兵进漳州，平赞尧之乱，以裨将董思安权知州事。留从效据有泉、漳二州，实力强大，渐渐不受南唐调遣，但名义上还是南唐的清源军节度使。因此，南唐在二州留兵监视。后来，留从效乘南唐兵败于福州之际，向唐将提出“不烦大军久驻于此”的逐客令，第二天又设宴饯行，南唐屯将只得悻悻领兵离去。取得建、泉、漳、汀等州后，南唐以重兵围攻福州，福州将李仁达向吴越乞援，结果吴越在福州城下大败南唐兵，斩杀二万余人，缴获军资、器械无数。这样，南唐出兵福建，真正所得惟建、汀而已，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可以说，得不偿失。

灭闽之后，湖南乱起，马氏兄弟同室操戈，争斗不休。南唐出兵湖湘，再灭马楚。

后周广顺元年（保大九年，951年）二月，楚王马希萼派遣掌书记刘光辅进贡南唐。到金陵后，刘光辅对元宗李璟说："湖南民疲主骄，可以轻取。"李璟册封马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又命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为湖南安抚使，领兵屯袁州（治今江西宜春），伺机入湘。十月，武安留后马希崇向南唐求援，边镐立即发兵，进驻醴陵。马希崇遣使犒军，命天策学士拓跋恒向边镐递交降书，边镐遂领兵进据长沙。与此同时，武昌节度使刘仁赡率水师攻取岳州（治今湖南岳阳市）。一个曾经雄于列国的强藩就这样被轻易地灭掉，但是，南唐同样没有得到好处。

南唐初灭马楚，尚能博得人心：边镐人潭州（即长沙）时，湖南旧吏多互相庆贺，又开仓赈饥民，深得信赖；刘仁赡取岳州，抚纳降附，人忘其亡。后来，南唐朝廷不仅将马氏宗族（包括马希崇）、旧将等虏往金陵，还命边镐等人悉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舟舰、亭馆、花果之美者，送回金陵。另外，还派都官郎中杨继勋等征收湖南租赋以赡养戍兵，杨继勋等务为苛刻，湖南人大失所望。

广顺二年（952年）十月，湖南旧将刘言趁民怨沸腾，命部将王逵、周行逢攻占长沙，武安节度使边镐弃城而逃。刘言另派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权、监军任镐弃城逃。短短一年功夫，南唐将士就在湖南弄得声名狼藉。边镐逃回后，被流放到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宋德权、任镐等败将则被斩首。

后周的建立，给南唐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南唐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在一次廷议北征中，韩熙载道出了出征的不利。韩熙载说："郭氏奸雄，虽建国时间不长，但其势力已根深蒂

周。要是轻率举兵，不仅无所成就，而且十分有害。”出兵湖湘，原意在扩充地盘，增加兵力、财力，稳固后方，结果不仅一无所获，而且实力大减。面对后周的进攻，只好慌忙应战，每战必败。

后周显德二年（保大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周世宗下诏南征，遣大将李谷、王彦超、韩令坤等人侵淮南。第一站就是淮南重镇寿州（治今安徽寿县）。李璟当即拜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统帅二万人奔赴寿州；以奉化节度使皇甫晖为北面行营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领兵三万，屯于定远县。显德三年正月，周世宗柴荣亲自出征。李璟命刘彦贞、刘仁赡抵抗周军。周将李谷焚掉粗粮，退守正阳关。当时周世宗正在圉镇（今属安徽），得知李谷退军，料定南唐兵要追击，遣将李重进急趋正阳关增援。刘彦贞虽是将门子弟，却不知兵法，又无实战经验，不过箭法娴熟，号称“刘一箭”。他听到李谷退兵，以为是自己率师到阵，敌人心怯，故急忙追赶。快到正阳关时，李重进已捷足先登，南唐兵空腹而战，大败，刘彦贞战死，裨将咸师郎等人被擒。

元宗李璟在金陵得报，十分恼火，准备自己率师抗周；中书舍人乔匡舜极谏不可，被贬放临川（治今江西抚州市），亲行计划亦取消。

正阳关大捷后，周世宗来到寿州城下，调集、指挥诸路大军围寿州；另外还征宋、亳、陈、颖、徐、宿、许、蔡等州民丁几十万人，以攻寿州，昼夜不息。在涡口（今属安徽涡阳），赵匡胤大败南唐兵，都监何廷锡战死；同时，鄂州（治今武汉市武昌）也受到武平节度使王逵的攻击。

显德三年二月，后周将司超在盛唐（今安徽六安市）大败南唐兵，俘都监高弼。周兵又倍道兼行，袭击清流关（今属安徽定远县），皇甫晖败，退保滁州（治今安徽滁州市），城破后，与姚凤双双被俘，滁州刺史王绍颜逃。

李璟见后周攻势愈猛，南唐招驾不住，就遣泗州牙将王知朗奉书至徐州，向周世宗求和，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愿以兄事，岁输万物。”周世宗不纳。其后李璟又派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等人奉表至下蔡（今安徽凤台县），向周世宗称臣，请求罢兵；另贡后周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锦绮绞白千匹、牛五百头、酒二千石及御衣、犀带、茶药等。但后周还是不理睬，仍然进逼南唐东都。

二月下旬，后周攻陷扬州，擒获副留守冯延鲁。据传，南唐侍中周宗家财富足，常在淮河两岸通商，以物换中原羊、马；周世宗柴荣大举渡淮时，就加以利用，让军卒蒙上羊皮，人牵一马，伪装成商旅，以渡淮河浮桥，接着再运过兵甲。扬州失陷后，南唐将领纷纷降于后周。李璟命园苑使尹延范护迁让皇杨溥一族于润州，尹延范杀掉六十名男子，遂绝灭杨氏；尹延范也被斩。泰州（治今江苏泰州市）随即陷落。这时，吴越也受后周之命，乘机侵常州、宣州。静海制置使姚彦洪投奔吴越。

三月初，李璟再次派遣司空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出使后周，请求按两浙、湖南例奉周为正朔；另进金千两、银十万两、罗绮千匹。周世宗仍不答应。光州（治今河南潢川）、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相继被后周占领。只有燕王李弘冀麾下稍有起色，其将柴克用在常州大败吴越兵，俘斩万计。

四月，南唐收复泰州。

五月，周世宗还驾。

周世宗征淮南时曾多次告诫将士要安抚百姓，结果诸将专事俘掠，视民如草芥，激起了江淮之间百姓的反抗。他们以农具为兵器，折纸为铠甲，群相保聚，称“白甲子”或“白甲军”，给后周军带来相当大的威胁。七月，南唐趁周世宗暂时收缩阵线，收复东部扬州及舒、蕲、光、和、滁州，不过，寿州之围更紧。

十月，后周杀害南唐使者孙晟及随从二百余人。

十二月，李璟遣陈处尧从海道北上，向辽求援，辽主拒绝出兵。

显德四年正月，李景达派遣许文稹、边镐、朱元领兵救寿州。三月，周世宗再度亲临寿州城下。这时，南唐监军使陈觉忌恨大将朱元，密谋夺其兵权，朱元遂举寨率万余人降后周。后周兵将乘机大举出击他寨，南唐兵战死、溺死及降者近四万人；许文稹、边镐、杨守忠等被俘，李景达及陈觉逃回金陵。寿州主帅刘仁赡闻讯，重病不起，副使孙羽等开城降后周。十二月，濠州、泗州降；后周军重下扬州、再克泰州。

显德五年正月，南唐改元中兴；后周陷海州、静海军。接着，周世宗亲率诸将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守将张彦卿、郑昭业率十万将士坚守城池达四十天，最后城破，全体阵亡。后周攻下楚州，大肆屠城，焚庐舍殆尽。三月，李璟大赦境内，改元交泰，企图重振旗鼓。可惜没过几天，愿望就落空了。这时，周世宗来到长江北岸的迎銮镇，并命令在江口举行水军演习，借以镇服南唐。李璟果然怕他们南渡，就遣枢密使陈觉奉表贡物，并提出传位给太子弘冀，以南唐为后周附庸。周世宗这才比较满意，答书称："皇帝致书敬问江南国主"。李璟又遣阁门承旨刘承遇上表，称唐国主，尽献江北尚未失陷的地盘，岁输土贡数十万；乞求海陵（今江苏泰州市）盐监归南唐，遭拒绝。后周后来每年给南唐赡军盐三十万石。周世宗这才允许南唐奉后周正朔，罢兵，并让李璟继续在位。其后，李璟命冯延巳等出使后周，贡献银、绢、钱、茶、谷等，共值百万缗，用以犒军及买宴。五月，李璟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去交泰年号，称显德五年。凡是天子仪制一律降格；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讳。又下令罢冯延巳、严续、陈觉等人官职；赠刘仁赡太师、封卫王，孙晟太傅、追封鲁国公，刘彦中书令，张彦能侍中，其余死于国难的将士也分别得到追赠。十月，后周放

还冯延鲁、许文稹、边镐、周廷构等人，李璟皆不再用。十一月，暴宋齐丘、陈觉、李征古三人罪状，放逐宋齐丘归九华山，陈觉置饶州，李征古削官爵。不久，陈觉、李征古都被赐死；宋齐丘幽于青阳，绝食数日而死。

李璟采取这项果断的措施是很正确，只是太晚了点。宋齐丘在李璟即位后被任命为左丞相，陈觉、魏岑等人深相附结，文武百官当中，多布私党。国家善政，同党就说："这是宋公之力"；如遇不妙，同党就说"不用宋公之言"。冯延巳也与其弟冯延鲁及魏岑、陈觉、查文徽结成朋党长期擅权，时人称之为"五鬼"。南唐出兵福建、湖南，都是由他们提出来的。后刘言反攻南唐，李璟本想主动收兵，冯延巳说："本朝出偏师平一国，宇县震动。今一旦三分弃其二，伤威损重，非所以示天下。"他还建议元宗遣使于长沙征调兵赋，由此重失民心，使刘言得以攻占长沙。到了后周征淮南，冯延巳等人却不知所措，只好听任半壁江山被人宰割。

显德六年正月，李璟派钟谟等进贡后周。钟谟临回时，周世宗对他说："吾与江南，大义已定，只是恐怕后世不能容，你们为子孙计，可在我在世时修城隍，治要害。"于是李璟便下令重修金陵城，并在诸州增加戍兵。七月，李璟想迁都洪州豫章（今江西南昌），说："建康与敌境只一江之隔，迁都豫章是个上策，可以据上流而制根本。"群臣多不赞同，只有枢密使唐镐拥护。

建隆元年（960年）宋代周。三月，李璟遣使贡宋绢二万匹、银万两，贺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七月，贡宋金器五百两，银器三千两，罗纨千匹，绢五千匹；又遣礼部郎中龚慎仪朝宋，贡乘舆、御衣等物。从此，贡献频繁，岁费以万计。

建隆二年二月，李璟立第六子、吴王从嘉（即李煜）为太子（长子弘冀已死），留守金陵，自己迁往南都豫章。三月，到达南都，但南都不如金陵宏大，宫殿、府署甚为窄小，群心思归。李璟退朝之暇，北望金陵，常郁郁不乐。又廷议东迁，尚未及行，李

璟染病，不能进膳，靠饮蔗浆等物度日。六月，病殂，年四十六岁。后主李煜迎其梓宫还于金陵，次年葬于顺陵。经宋同意，谥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

元宗多才多艺，尤以诗词见长。在位几二十年，史称其仁慈恭俭，礼贤爱民。然天性儒弱，素昧威武，又用人不当，致使用兵闽湘，胜而无功；后周南侵，淮南尽失。

元宗晏驾，李煜嗣立于金陵。他派户部尚书冯谧贡宋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纱罗缯綵三万匹，表陈袭位，凡奉朔、称号等礼，悉遵后周旧制；下令罢诸路屯田使，使屯田佃民免受公吏之扰。

李煜做后主很是尴尬。当初元宗虽臣于中原，只不过去帝号，其它仍用王礼，到了李煜时就不同了。他见宋朝使者时穿紫袍，使者一走，仍穿黄袍；金陵殿阙原先都用鸱吻，乾德（963—968年）后，宋使者来则去之，使者一走又还原。

乾德二年（964年）三月，铸行铁钱，篆文由徐铉书写，大小钱文一同"开元通宝"，以六比四的比例与铜钱并行，公私便利。后来民间多只用铁钱，就将铜钱收藏不用，到南唐末年，铜钱一值铁钱十，南唐亡国时，诸郡所积铜铁累计达六十七万缗。显德六年七月，元宗因周师南侵，割地称臣，岁贡方物，府藏空竭，钱货益少，就采纳钟谟建议，铸大钱，以一当十，称"永通泉宝"等。此钱有三品：其一，文称"永通泉宝"，八分书，径一寸五分，重八铢七参，背面肉好，皆有周郭；其二，文称"永通泉货"，篆书，径一寸三分，重五铢七参，轮廓厚重，铜色昏暗；其三，而为篆文"永通泉货"，背为龙凤形。不久，又铸"唐国通宝"钱，二当"开元通宝"一，每千钱重三斤十二两（旧衡制），数年以后，民间盗铸成风，每千钱仅有一斤余，以一文钱置水上不沉，虽严禁，不止。所以，李煜听从韩熙载建议，开铸铁钱；然民间同样盗铸，铁制轻小，环外芒刺，虽绳之以法，但盗铸者愈多。乾德二年十

一月，左仆射殷崇义上言指出，泉布屡变，容易招乱，且豪民富商，不能使财产保值，更会思乱；上言毫无结果。

开宝二年（969年），下令普度众僧。一天早晨，李煜在禁中听到内道场小和尚撞钟很有节奏，就派人把他召来，允许他剃度为僧，那小和尚说："小僧不敢独受恩泽，愿陛下如佛慈悲，广覃诸郡。"于是，诸郡佛事盛起。而在烈祖、元宗时，南唐是不度僧尼、不兹医卜的。开宝三年春，李煜命境内崇修佛寺。又改宝公院为开善道场，李煜与后常常戴着伽帽，着袈裟，诵佛经，跪拜佛祖。金陵城中僧徒一下子增加到数千人，皆由官家供应廪米、钱帛。

开宝四年十月，李煜听到宋灭南汉，屯兵于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大为惊惧，立即派遣太尉、中书令韩王李从善朝贡，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又请将所用唐国印改为江南国主印并诏书呼名。这时，有个商人告诉李煜说，宋人造了数千艘战舰停靠在荆南一带，请派人将其秘密烧毁；李煜怕惹大祸，不敢动手。

开宝五年二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改诏为教，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院为修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大理寺为详刑院，客省为延宾院；官号也相应改变，以避讳中朝；去除殿阙鸱吻，不再加设。同时，为了贺宋长春节，贡钱三十万缗。

开宝六年四月，宋学士卢多逊来使，求江东诸州图经；宋还把李从善留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任命为泰宁军节度使，意欲征李后主入朝。李煜心中愤怒，想兴师抗宋。后又遣使上表，求封爵位，内史舍人潘佑上书切谏不可入朝，却受责自杀；与之交厚的户部侍郎李平受牵连，被下狱，自缢而死。

开宝七年秋，李煜遣使求宋归李从善，被宋拒绝。宋还派阁门使梁迥来金陵，对李煜说："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礼，国主宜往助祭。"李煜并不理会。其后，宋太祖又派人持诏而来，称"朕将以

仲冬有事圜丘，思与卿同阅牺牲。”还暗示宋将出师，宜早日入朝。李煜以疾病相辞，且说：“臣事奉大朝，希望成全宗祀；没想到今天到这个地步，只能等死了。”而此时，宋已从上游水陆并进了。

开宝七年十月，李煜派江国公李从镒贡宋帛二十万匹、白金二十万斤等，同时筑城聚粮，准备抗宋。

开宝七年闰十月，宋军攻陷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市），李煜下令戒严，去开宝年号，称甲戌年。不久，宋军攻下芜湖（今安徽芜湖市）及雄远军；吴越也应宋诏大举攻常、润二州。李煜修书告吴越王钱俶，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赏功，你吴越王也只不过是一个布衣而已。”吴越王钱俶也身不由己，将这封书信送到宋太祖手里。宋太祖下命继续进攻，宋军到达采石矶，破南唐兵二万人，逼近金陵，屯于城南十里。

开宝八年二月，宋军攻占金陵郦城。三月初，吴越兵攻常州，州将禹万诚降；宋军、吴越军合攻润州，留后刘澄降。两军一同攻金陵。李煜身处内宫，并不知宋军已迫近。一日，登金陵城，见敌人列栅于城外，旌旗遍野，大为恐惧，才知近臣封锁了消息，一怒之下杀死了主管军事的皇甫继勋；同时急令镇南节度使朱令赟驰援。直到秋天，朱令赟才率兵十五万人浮江而下。军到皖口（今安徽安庆市西），即遇宋军，朱令赟命倾倒火油焚宋船，不料北风吹起，回焰自焚，军遂溃败。朱令赟及战櫂都虞候王晖被俘。

外援既绝，金陵日益危蹙。宋军加紧攻城，昼夜不息。城中斗米万钱，死者枕藉。李煜先后两次遣徐铉使宋，厚贡财物，请求缓兵，均无结果。十一月，城破，李煜率司空、左右内史事殷崇义等肉袒出降。当初，李煜拒命不朝，曾有大志，对臣下说：“他日王师见讨，孤当躬披戎服，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室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倘若他真有这个志气，也该身先士卒，早些设防，终不致这么快就沦为阶下囚。当日，宋军就催他北上。李煜举族冒雨乘舟，船到江中，远望石城，不禁

凄然泪下，赋诗云："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开宝九年正月，李煜到达汴京，宋太祖给他封了个"违命侯"，后宋太宗即位，去掉"违命侯"之封，封陇西郡公。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七日，李煜被宋太宗赐服牵机药而死，享年四十二岁，赠太师，封吴王，葬于洛阳北邙山。牵机药是一种慢性毒药，前后服十几次，最后头足相就如牵机之状，故名。

李煜多才多艺，精通音乐、书法、绘画，尤以诗词见长，他的词，无论从格律、还是从意境上看，都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见另一章详述）。继位之初，南唐只剩半壁江山，他能宽待百姓，蠲赋息役，整饬军队，加强防备；又生性奢侈，沉湎于歌舞宴乐，笃信佛教，颇费政事。他有心抗宋，却又一味贡物，贪求暂安，耗去大量财物，最后还是归为北虏，做了他乡之鬼。可以说，他是一个聪明的昏君。

李氏南唐自烈祖改元升元，至后主国灭，历三主，凡三十九年。

（程定飞）

参考资料：

《旧五代史》：《李昪传》、《李景传》
《新五代史》：《吴世家》、《南唐世家》
《资治通鉴》卷266—卷294
《通鉴纪事本末》：《杨行密据淮南》、《徐氏篡吴》
《南唐书》（马令撰）
《南唐书》（陆游撰）
《十国春秋》卷1—卷34

艺苑奇葩

唐朝末年起，博大中华再度受列国分治、诸姓独裁。兵燹之余，科技、文化的某些领域还是得以继续发展，尤其是在工艺美术、文学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工艺美术中，绘画独占鳌头。

建筑集科技手段、文化背景、装饰艺术于一体，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唐末——宋初这段时期的时代特征。这时期，各国为防御计，广修城池，杭州、金陵、福州、广州、长沙、江陵、成都、开封等皆成为一方名城；又出于奢侈享乐，大建宫殿，穷极工丽，如南汉刘岩的"南薰殿"、楚王马希范的"九龙殿"等，可惜后来均被焚毁。这时期，佛道盛行，特别是佛教，倍受推崇，出现了延寿、赞宁、恒超、贯休、齐己、巨然等一批高僧；同时，塔寺建筑纷纷崛起，仅吴越都城杭州在后周显德二年（955 年）一次检括中，就存有寺院四百八十余所，著名的有灵峰寺、净慈寺、昭庆律寺、灵隐寺等；另外，吴越境内还有苏州虎丘塔，杭州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等。建筑师喻皓即以建塔闻名，并有《木经》一书问世。宫殿、塔寺建筑以外，园林也有了新的发展。吴越王钱镠的儿子元璙镇苏州时，建南园，设流水奇石、古木环亭、曲径通幽，是当时最大的私家园林。

五代科技上明显的成就还有雕版印刷大量儒佛经典、猛火油（石油）及火药首用于军事等。至于瓷器，则更注重其观赏价值，为宋代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工艺基础。

越窑青瓷在唐代就已久负盛名，吴越时烧造金棱秘色瓷器，专门作为贡品，臣庶不得使用。《宋稗类钞·古玩》载："……越器致语云'金棱合宝碗之尖，秘色抱青瓷之响'。"秘器不仅质量精美，其色泽、造型、装饰手法均超过了前代青瓷，而且产量高，光是进贡中原朝廷就动辄万计。江西地区，虽然唐代的洪州窑逐渐败落，但昌南镇（今景德镇市）附近的胜梅亭窑、石虎湾窑、湖田窑等炉火正旺，烧造青瓷、白瓷，到了宋代，这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青白（影青）瓷系。湖南境内的长沙窑，素以釉下彩绘及青釉褐绿斑点装饰手法取胜，产品远销海外，成为当时输出瓷器的大宗；岳州窑、衡阳窑也是湖南的名窑，只是南唐灭马楚后，这些瓷窑也随之收场。这时的北方尚未形成完整的瓷系，但后周柴窑却极具神秘色彩。柴窑即周世宗柴荣的御窑。相传，窑官请示瓷色，世宗御批道"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博物要览》评柴窑器物"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柴窑不见有成器传世，故其瓷片在后世也非常珍贵，清人有"斤柴值千金"之说。

丝织工艺方面形成了南唐、吴越、西蜀三个中心。南唐的丝织品最讲究染色。传说李后主时，宫中伎妾有次将织品染成碧色，晾在户外，晚上忘了收回，结果一夜经露，其色泽愈加鲜明。于是宫中便竟相贮集天露，将衣物染成浅碧，故称"天水碧"。后来此法传到宫外，金陵城内的染坊大多打起了"天水碧"招牌。吴越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质量也很精美，主要有片纹绫、盘龙锦、金条纱及绢、锦绮等。而西蜀则是织锦盛地，锦官城成都有"四十里尽铺锦绣"之美誉。

工艺品中文房用具类，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几样宝物。南唐所产的澄心堂纸、龙尾砚、李廷珪墨，称为"文房三宝"、"冠绝天下"。李后主所用纸都是当时新创，其中有会府纸，长二丈、宽一丈，纸质绵厚；又有鄱阳白纸，质如白练；而澄心堂纸最为著

名，色如卵膜、坚洁如玉，细密光润、宋初书画大家多用仿制澄心堂纸，而真品则十分昂贵，也很难得到。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县产砚由来已久。传说在唐代开元年间，猎人叶氏追逐野兽进了山里，见一堆垒石光净可爱，就挑了一块带回家中，后来他的孙子把它献给了县令，这位县令也颇识货，请匠人刻成砚，试用后，觉得其温润程度胜过端溪砚，于是歙砚始兴。到了南唐元宗时，歙州刺史上献歙砚，并推荐砚工李少微，元宗看砚后很满意，将李少微提拔为砚官。后来南唐后主命人在龙尾山下开坑采石，精制成砚，更是歙砚中的上品。李廷珪本姓奚，易水（今属河北）人，唐末随父奚超迁居歙州。易水在唐代就以产佳墨著名，世称“易水法”。奚超、廷珪父子南渡后，采用皖南名松，烧烟制墨，在吴王杨渥、杨溥在位时就已出名。南唐建立，全家赐姓李。李廷珪被任命为墨务官，所造“李廷珪墨”极受南唐二主欣赏。南唐其他比较有名的墨工有耿文政、耿文寿、盛通、盛真等人。除南唐的“文房三宝”外，吴越温州产的“蠲纸”也甚为名贵，这种纸洁白坚滑，类似当时的高丽纸，钱氏蠲免这些造纸人户的赋役，故称“蠲纸”。

文房用具既是实用品，又成了艺术品；它们的发展和绘画艺术是同步进行的。

绘画是这一时期突出的文化成就之一。大致可划分为三大区域：西蜀、南唐及吴越、中原。以画家的身份，又可分为院画、布衣画（隐士画）、释道画。这时期绘画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王室的重视及参与，画院正式建立；二是隐士画家的成果显著。

前蜀创始人王建设置了宫廷图画库，专门收藏名画；他还注意网罗绘画人才，诗画僧贯休在唐末避乱入蜀后，大受器重，被赐以紫衣大师、禅月大师法号。前蜀后主王衍常常授予画家翰林待诏职、专事绘画。明德二年（935 年）后蜀主孟昶创翰林图画院，设待诏、祗候等职，为中国正式画院之始。

南唐元宗李璟即位后，也仿西蜀建翰林画苑（院），设待诏、司艺等职。保大五年（947年）正月初一，瑞雪飞扬，元宗雅兴大发，召集太弟李景遂、同平章事李建勋、中书舍人徐铉、勤政学士张义方等人登楼观赏，赐宴赋诗，呈现出一派祥和气氛。他召来绘画高手，即兴作画：高冲古主绘真容，周文矩主侍臣法部丝竹；朱澄主楼阁宫殿；董源主雪竹寒林；徐崇嗣主池沼禽鱼。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绘画笔会，画成之后，一时称绝。至于李后主，本身就酷好文艺，精通绘画，他在位时，南唐绘事极盛。

吴越王钱镠虽出身武夫，但也旁涉翰墨，擅长草隶，兼能画竹，境内画家不少，如蕴能工佛像，王耕善写牡丹，罗塞翁以画羊著称。

中原地区由于战争频繁，朝廷轮换，宫廷绘画不及江南、西蜀，但其隐士画家极有成就，出现不少标名大手，尤其在山水画方面。

山水画有荆、关、董、巨四大家。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今山西沁水）人，唐末隐居于山西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潜心山水，博采古人之长，自成一家。其笔墨并重，爱画云中山顶，四面峻厚，布局磅礴：远取其势，近取其质。今存《匡庐图》。

关仝，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早年师从荆浩，为入室弟子，晚年笔力超过荆浩。他善于画秋风寒林，配以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泽，意境深远，超然脱俗。其笔愈简，气势愈壮；取景愈少，意境愈长。元人黄公望题其《层峦秋霭图》道："群峰矗矗暮云连，萝磴透迤鸟道悬；落叶深深门半掩，疎花历历客犹眠。岩端飞瀑为青雨，江上归舟溯碧烟；应识个中奇绝处，昔年洪谷属君传。"（《元诗选二集·大痴道人集》）现存作品有《山溪待渡图》和《关山行旅图》。后人称荆、关山水为唐宋之冠。

董源、巨然是江南山水的代表人物。董源（？—962年），字

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曾为南唐北苑副使，人称“董北苑”。他以山水为长，兼工人物、牛、虎；水墨师法王维，着色学李思训，但又有创新，最后自成一家，开江南山水画派。他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十分壮观。流传下来的真迹有：《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夏山图》、《寒林重汀图》、《豁山行旅图》等。他的工笔人物也非常精彩。一次，李后主坐在碧落宫，召冯延巳论事；冯延巳走到宫门，犹豫再三不敢进。后主派人催，他说：“有宫娥穿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故不敢冒失。”那人陪他走近，才知道是董源所作的八尺琉璃画屏。虽是传说，却说明董氏技艺之高妙。

巨然，僧人，生于金陵，幼时受业于开元寺，后师法董源，得其真传。他多写江南山水，以竹篱茅舍、断桥危栈映衬烟雨峰峦，全是一派山间景趣。陆放翁诗赞：“峰顶夕阳烟际水，分明六幅巨然山。”南唐亡，随后主李煜入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住开宝寺，曾为学士院作巨壁山水，当时称绝。今人尚可见到《万壑松风图》、《秋山问道图》等幅。

这时北方山水大家还有李成。李成（919—967年），字咸熙，唐宗室，唐亡后避乱迁居山东益都营丘（今属山东昌乐县），人称“李营丘”。其人博涉经史，放意诗酒，寓兴于画。凡飞流危栈、断桥绝涧、风雨晦明、云烟雪雾，皆吐于胸中，写于笔下。按宋初评论，称关仝、李成、范宽（主要活动在宋）为“三家山水”。三家山水在宋代山水画中居支配地位，其中又以李成最受推崇。北宋画家许道宁、郭熙、王诜等人画法，与李氏一脉相承。直到元代，李成仍被视为北方山水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伪本极多，流传至今。题名李成所作的画有：《寒林图》、《瑶峰琪树图》、《寒林平野图》、《晴峦萧寺图》等，真伪难定。

这时期山水画家，特别是大家巨擘，不愿受小朝廷羁縻，而甘处隐逸，真正投身于山水之中。

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是西蜀的黄筌、南唐布衣徐熙。二人各领一派，风格迥异，世有“徐黄异体”之评。

黄筌（？—965年），字要叔，成都人。自幼喜爱绘画，成名较早。天祐年间（904—907年），长安画家刁光胤入蜀，他与孔嵩同拜其门下，学习竹石、花鸟。后来，孔嵩只学得师，别无新意，而黄筌除师法刁光胤外，还兼习孙位的龙水、松石、墨竹以及李升的山水、竹树，渐渐超过了他的老师，时人有“孔类升堂，黄得入室”之说。黄筌十七岁时即被前蜀后主王衍看中，授他为翰林待诏。广政（后蜀孟昶年号，938—965年）时，孟昶加授他检校少府监，赐金紫，累迁如京副使，掌管画院。有一次，南唐送来六只仙鹤，孟昶命他写于殿壁。他画完后，六鹤形态逼真，神情各异，分别定名为唳天、警天、啄苔、舞风、疏翎、顾步；孟昶也将大殿改为“六鹤殿”。至此蜀中豪贵前来求画者接踵，谚传“黄筌画鹤，薛稷减价。”黄筌以写真画鸟知名，同时也精于人物、山水。他的作品至今流传的只有一幅《珍禽图》，上有龟鳖秋虫、鹡鸰黄鹂，个个活脱可捉。他的儿子黄居宝、黄居采也是花鸟画高手，在后蜀同为翰林图画院待诏。

徐熙（生卒年不详），金陵人，家本江南世家，但性素高雅，以处士自居。他善画花木、禽鱼、蝉蝶、蔬果，均妙夺造化。李后主北上为虏时，带着他的画献给宋廷；宋太宗赵匡义见到他画的《石榴树图》，大为赏识，对人说：“花果之妙，吾独知有徐熙，其余不足以观。”

宋人郭若虚说：“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的确是徐黄异体的主要所在。二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导致作画的对象及画法都不相同。黄筌所画，多是奇花怪石、珍禽异兽；徐熙所画，无非汀花野竹、园蔬药苗、飞禽游鱼等。黄筌作画，常先用淡墨细线勾勒，然后填以实彩，称为写生；徐熙作画，主用重墨，略傅淡彩，落笔纵横，意在神趣，称为没骨。其子（或谓孙）徐崇嗣的花鸟

画在南唐、宋初也很有名，他直接以粉彩画花卉，无丝毫笔墨骨气，更是趣味生动。徐氏这种没骨画法在宋代画院受到排斥，但后代模仿的人很多，清代大家恽寿平即完全采用这种方法。

徐、黄二派之外，其它花鸟画家不少。吴越唐希雅，善画花鸟、妙竹，号称"江南绝笔，徐熙、唐希雅而已。"南唐处士钟隐，善鸷禽榛棘。西蜀滕昌祐随僖宗入川，工画花鸟蝉蝶、尤长于画鹅。他的徒弟赵昌以写生花果知名。宋初有人评论：黄筌之画，神而不妙；赵昌之画，妙而不神；徐熙则二者兼有之。

人物画家中，莫过于南唐巨匠周文矩、顾闳中。

周文矩（生卒年不详），建康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事元宗、后主为画院翰林待诏。工画人物、车马、房舍、山川，尤精仕女图。其手法近于唐代周昉，只是周昉设色浓艳，丰润有余，周文矩则喜施淡色，更增纤丽。保大五年，元宗赏雪，周文矩主绘侍臣法部丝竹，作《赏雪图》，曲尽其妙。后来又受李后主之命作《南庄图》，写山川气象，亭台景物，精细详备；后主归宋，特意将它献给宋太祖，藏于秘府。周文矩现存的人物画《重屏会棋图》被后世奉为珍品，另有《宫中图》，二者据传都是宋人摹本。《重屏会棋图》，绢本，设色。画中有两人对弈，两人旁观，一童侍立。高冠正坐者是李后主（一说为元宗），盘边其他三人为李氏兄弟。李后主背后有一画案，案后有一长方单屏，屏又画有三折屏，三折屏上有景物及妇人。借屏为景，扩大了视觉空间，其手法甚为巧妙。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善画，独见于人物，事南唐二主为画院待诏。《韩熙载夜宴图》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杰作。韩熙载，字叔言，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后唐同光（923－926年）进士，因其父谋叛获罪，逃奔吴。他曾对人说："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后却屡遭排抑。李煜继位，拜他为兵部尚书，又想用他为相。这时，宋太祖统一大志已定，南唐已处

在风雨飘摇之中，韩熙载很清楚，如果就任，一旦国亡，势必为人笑端。于是，他便托疾不朝，畜妓四十余人，终日纵情声色。李后主为了考验他是否胜任相职，就密遣顾闳中、周文矩、高太冲三人夜探韩府；顾闳中等目识心记画下了韩府乐舞夜宴情景，名为《韩熙载夜宴图》（周、高各绘一本，均失传）。李后主派人送去这幅画，韩熙载看后泰然自若；后主不满，将他降为太子右庶子，派往南都（今江西南昌）。韩熙载降官后才放了心，尽遣诸妓；李煜很高兴，复其兵部尚书职，又想大用他。那知，韩老旧病复发，又收回诸妓。李煜无奈，感叹道："孤亦拿他没办法了。"《夜宴图》分五个段落，结构处理自然，情节生动完整，人物神态各异；画了衣冠文物，樽俎灯烛，俱是如实写照。

南唐其他人物画家还有顾德谦、厉昭庆等人，他们的画也很被李后主看中。

这时的写真人物画（描绘真容，即画像）也出现不少妙手。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得知晋王李克用占据河东（今属山西），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就密派一名画工入晋，伺机画像。不想这位画工到了河东，就被识破、抓获。李克用先是大怒，后来一想：我一只眼睛瞎了，看他怎么个画法。于是，命人召来画工，对他说："淮南派你来绘我真容，必定是个好手。现在我命你画，如有丝毫偏差，阶下就是你的毕命之地。"画工不敢怠慢，提笔画下李克用背弓捻箭之状，一只眼微闭，好象在审视箭杆的曲直。李克用一看，非常高兴，不但没有治罪，还送给不少金帛，让他回到淮南。

西蜀画家常重胤也擅长绘写真容。唐僖宗自蜀中回驾之日，他受命在成都大圣慈寺绘御容，一写而就；内外官属，无不叹服。接着僖宗又命他在中和院壁上绘随驾文武臣僚；君臣共一百余人，没过多久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壁上。常重胤由此被授为驾前翰林待诏、赐绯色鱼袋。

宗教题材的绘画，即释道画，在五代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尤以西蜀为最。《益州名画录》所列画家五十余人，多数都曾画过释道题材，著名的有孙位、张南本、张素卿、贯休等。中原的张图也以此类见长。

西蜀自古为天府之国，虽山高路险，文人士大夫仍孜孜向往。广明元年（880年），唐僖宗迫于黄巢兵势，携宗室勋旧入蜀避难；会稽处士孙位随驾前往，定居成都。其人举止粗野，超然旷达，善画人物、龙水、松石、墨竹，擅天王鬼神。他曾在成都应天寺门厅左壁画天王及部从神鬼，笔力狂怪，形制诡异，三十年内无人敢比。后蜀时，匡山处士景焕游到应天寺，见此画兴大发，就在右壁另画天王，二艺相对，甚为壮观。后来诗僧云游到此，大为赞叹，吟诵长歌。不久，草书僧梦归风闻前来，在廊壁上书写一笔狂草《画歌行》。成都人称画、诗、书为“应天三绝”。孙位被宋人黄休复列为蜀中逸格唯一，可见他的影响；黄筌曾学他画龙水、松石、墨竹。

在唐末入蜀的画家张南本也精于绘画佛教人物、龙王鬼神。相传他在金华寺大殿画《明王》八躯，刚刚完工，有一僧走进寺来，以为大殿着火，吓得跌倒在地，起来仔细一看，才知是画。当时孙位画水，南本画火，无人能比。僖宗回驾之后，南本应邀在宝历寺水陆院画天神地祇、三皇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仙、自古帝王，又画蜀中诸庙一百二十余座，加上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千奇万怪，时称大手笔。

道士张素卿，简州（今四川简阳县）人。他只画道门尊像，作品有《老子过流沙图》、《五岳朝真图》、《九皇图》、《五星图》、《二十四化真人像》等见载。他又作了不少壁画，简州开元观画容成子、董仲舒、严君平等二十真君像，各写其当初卜卦、卖药、书符、导引之态，笔踪洒落，傅彩得当。王建修青城山丈人观，请他在丈人真君殿上画五岳、四渎、十二溪女、山林、诏溪、树木、诸神及岳渎曹吏，诡怪之状，生于笔端；进殿观画，顿觉阴森恐

惧。

画僧当中应首推贯休（832—912年），他是婺州（今浙江兰溪市）人，本姓姜，字德隐。唐天复年间避乱入蜀，蜀主王建赐他“紫衣大师”及“禅月大师”名号。他不仅工画，书法、诗文亦精，其书法被当时人比之怀素，称为姜体。他绘画师法阎立本、尉迟乙僧，用笔遒劲，线条紧密。释画是他的特长，传于后世的有《罗汉图》十六帧，各罗汉或庞眉大目、或腮颐隆鼻、或倚松石、或坐山水，皆胡貌梵相。另有《释迦十弟子》传世。

后梁张图曾在朱全忠手下掌行军粮籍，是中原最有名望的寺院壁画家之一，人称张将军。善事释道人物、泼墨山水，尤其是鬼神大像。他的画多用浓墨粗笔，如草书颠掣飞动，气势豪放。代表作有《释迦像》、《紫微朝会图》，一道一释，皆是大家风范。

这时期的绘画除上述山水、花鸟、人物、释道各门外，界画同样富有成就。

南唐的朱澄在保大五年的那次赏雪盛会上就主绘宫殿楼阁，可见他是一位很有功力的界画家。卫贤则是南唐的一位界画大师。他是长安人，事李后主为内供奉，擅长楼、观殿、盘车、水磨。《宣和画谱》卷八《宫室·叙论》对他评价极高：“（宫室）虽一画一笔，必求诸绳矩，比他画为难工。故自晋、宋（刘宋）迄于梁、隋，未闻其工者。粤三百年之唐、历五代以还，仅得卫贤，以画宫室得名。”《闸口盘车图》描写了一个官营水磨场，准确细致地绘出水磨及其装置结构。他的人物画也很有情致，《春江钓叟图》深得李后主青睐，上有后主金索书《渔父词》二首，其一“阆苑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快活如侬有几人。”其二“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其他作品还有《望贤宫》、《滕王阁》、《盘车》、《水磨》等，今均失传，只有《闸口盘车图》尚存。

中原画家郭忠恕（？—977年）也以界画著名。他画殿阁楼观，

为一时之绝；上下折算，一斜百随，咸取砖木诸匠本法。现存于世的《雪江行图》，是界画珍品，描绘江上两艘停泊的大船，极其细致。传说，喻皓在开封造十三层开宝寺塔时，郭忠恕以模型底层折算，到顶层多出一尺五寸，不能收杀。喻皓连夜重新测算，结果和他所说的丝毫不差。黎明时分，喻皓来到郭家，长跪拜谢。

五代绘画在山水、花鸟、人物、释道、界画等类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同期的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对后世的绘画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

（程定飞）

参考书目：

《益州名画录》
《宣和画谱》
《图画见闻志
《圣朝名画评》
《画鉴》
《十国春秋》;《拾遗》等
《中国陶瓷史》第三章
《古玩指南》
《宋稗类钞》卷八:《古玩》、《丹青》

五代词坛领风骚

五代时期的文学形式无外乎诗词歌赋等，其中以词成就最大，独领风骚。唐诗、宋词是五代前后两大朝代的基本文学特征，五代时期完成了诗、词主次的递嬗，确立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词在唐代前期就已产生。唐代不少诗人如盛唐李白、韦应物、张志和，中唐白居易、刘禹锡，晚唐杜牧、温廷筠等都善于作词。他们的词，或描写塞外景象、江南风光，或言情伤别，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只是这些大诗人，多是诗重于词。直到唐末、五代，词才得以大兴；西蜀、南唐更是词人辈出。词集也纷纷问世，合集有《花间集》、《尊前集》，专集有温廷筠《金荃集》、冯延巳《阳春集》、和凝《红叶集》、李珣《琼瑶集》等。

《花间集》由后蜀赵崇祚辑，录有十八位词人作品。除温廷筠、皇甫松（一作嵩）、和凝、孙光宪外，其余都是五代时期的西蜀词人。温廷筠、皇甫松二人对蜀词影响较大，故《花间集》称皇甫松为"皇甫前辈"，而温廷筠也可以说是花间派的元老，他们未人五代便去世。

和凝（898—955 年），字成绩，郓城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后唐进士，仕后晋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仕后汉为鲁国公，仕后周为侍中。著有《红叶稿》等集。他的词是典型的艳体，所以他虽然身在中原，也被列人花间派并作为代表人物之一。《花间集》收人其词二十首。如《临江仙》：披袍窣地红宫锦，莺语时啭轻音。碧罗冠子稳犀簪，凤凰双飐步摇金。肌骨细匀红玉软，脸

波微送春心。娇羞不肯人鸾衾，兰膏光里两情深。刻画了女子媚态，汤显祖评："精工宕丽，足分温韦半席。"（见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又如《何满子》：正是破瓜年纪，含情惯得人饶。桃李精神鹦鹉舌，可堪虚度良宵。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细腰。极写怀春少女的外貌及心态，艳绝一时。"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细腰。"被视为和词名句。

荆南词人孙光宪，贵平人，仕唐为陵州判官。天成初（约926年）避地江陵，后受梁震荐仕高季昌为掌书记，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等。入宋后，任黄州刺史，乾德末年（约968年）卒。他性嗜经籍，乱世辅政之余，仍搜集数千卷；勤于读书、写作，著有《北梦琐言》、《荆台笔傭》等数集。他的词不象和词那样浓艳，风气清新、朴实，而且题材较广。《花间集》收入其词达六十首。有的词描写女子娇憨之态，曲尽其妙，如《浣溪沙》：乌帽斜欹倒佩鱼，静街偷步访仙居，隔墙应认打门。将见客时微掩敛，得人怜处且生疏，低头羞向壁边书。

孙光宪十分善于写景，以景衬情，境界深远，另一首《浣溪沙》就是这类作品：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意潇湘。

他的《酒泉子·凭吊古战场》写得极为凄凉，读罢不禁酸鼻：空迹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

《花间集》所列的大词人韦庄，与温廷筠齐名，实际上他也不是蜀人。韦庄（836—910年），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广明元年（880年），应举人长安，恰逢黄巢兵至，他作《秦妇吟》，中有联"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时人称他为"《秦妇吟》秀才"。韦庄讳此浑名，携家南游。其游踪所至，自金陵到扬州、苏州、浙西、两湖、江西、安徽等地，皆有题咏。景福二年（893年），他回到长安，次年中进士。乾宁四年

(897年)，奉使入蜀，不久返回。天复元年(901年)再次入蜀，被王建挽留，任掌书记，时年已六十六岁，此后便寓居成都。他的词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紧密联系，写离乱、写思归、怀旧，往往意中有意，言外有言。南游之际，他写了一首《浣溪沙》，表达了早日安定的愿望：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奉使入蜀后，他充满希望，想早归长安，匡扶唐室，因此写道：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菩萨蛮》)

后来他听说中原沸乱，加上王建劝留，就暂居西蜀，仍寄希望于乱平，又作《菩萨蛮》一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据清人张惠言《词选》，这里“江南”即指西蜀，下同)

朱全忠篡唐，韦庄绝望，但词反而显得放达开朗：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菩萨蛮》)

韦庄的《荷叶杯》、《小重山》等词，情意凄怨、真挚。据传，韦庄留蜀，身旁有一宠妾，姿质艳丽，善于词翰；王建以教内人为由把她强夺去，故韦庄追念悒怏，只得寄情于词：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荷叶杯》)

西蜀花间派词人欧阳炯、顾夐、李珣等人的作品，风格各异，其中不乏优秀之篇。

欧阳炯的词婉约轻和，如淡妆西子，肌骨倾城。如《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期。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又如《南乡子》：

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

顾敻的《诉衷情》被视为柳派之滥觞：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急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花间集》收入顾词五十五首。顾敻的艳词，多用质朴的言语，艳中有清，清而不俗，深受后世推重。“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被评为透骨情语。

李珣的词以清取胜，常用平铺直笔，却极尽形容之妙。《花间集》收入其词三十七首，自己另有《琼瑶集》。名篇有《巫山一段云》、《河传》等。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云雨朝还暮，烟花复春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巫山一段云》）。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客船。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河传》）。

词中情景交融，感慨万端。

牛峤的《定西番》与艳词无缘，不失为一篇佳作：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这首词为塞上曲，有盛唐遗音，味如边塞诗。它描绘了塞外雪夜戍卒思乡之情，明月残星平添了几分寒意。

南唐词人以冯延巳、南唐二主最著名，其他文人多不见传词于后世，有的（如徐铉）只存若干竹枝词。潘佑的词尚有半阙《失调名》：楼上春寒 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东风一半。

李煜在宫中建红罗亭，四面栽植红梅；红梅盛开时，他命侍臣作艳词相记。时淮南已失，潘佑应命作此词，借以讽谏。

冯延巳（904—960年）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官

至南唐宰相，数次执掌权柄。他在政事上无所作为，执政时纲纪颓弛，又广结私党，不得人心。他的词却很有成就，有《阳春集》问世；词风清新流畅，少雕琢、堆砌之弊，有婉约之气，然而自成一体，开宋代晏殊、欧阳修一派。五代时（不包括李煜），冯延巳是个作词大家，人们比之温、韦。《鹊踏枝》词流传最广：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提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下林新月人归后。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这类词如同一幅金碧山水，一片空濛；造句优美，独具匠心。他的《归自谣·寒山碧》也见称于世：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明朝便是关山隔。

冯延巳的词另一高明之处就是常在有意无意之间，以闲情、春愁之貌寄托君臣、家国之事。《谒金门·风乍起》一阕是其中佳作之一：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栏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此词第一句，用字非常巧妙、生动，有破空而来之势，暗寓周人兴师南侵。有一次，元宗李璟设宴内廷，问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于卿何事？"冯延巳对答："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表面上看起来是君臣戏语，实则道出南唐的危机。可惜，冯延巳和南唐二主一样，有忧国之心，无救国之志。

南唐元宗（即中主）李璟善事文墨，词写得很精彩，只是他的词多失传，现仅存数首。《浣溪沙》有二首：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碧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干。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金陵名妓王感化善讴歌，声韵悠扬，清振林木。元宗继位后，常宴乐击鞠，荒于政事。一次，元宗乘醉命王感化唱调助兴，王感化只唱“南朝天子爱风流”一句，借以旁敲。元宗有所感悟，倒掉杯中物，说：“假使孙（皓）、陈（叔宝）得此一句，不当有衔璧之辱！”遂手书二词赠王感化。后主即位时，王感化将词札上献。

通览五代词，南唐后主李煜的作品达到高峰。王国维评论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是位典型的文艺君主，诗词、书画、音乐，无一不精。他的书法作颤笔樛曲之状，落笔瘦硬，遒劲如寒松霜竹，谓“金错刀”或“金索体”；写大字，不用笔而直以卷帛，世称“撮襟书。”

元宗在位时，南唐貌似强盛，出兵灭王闽、降马楚，但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南唐实力。后来，后周南侵，南唐不能组织有力的抵抗，一败再败，终于割让淮南，降号称臣，“失了东风一半”。李煜即位时，宋人已志在统一，南唐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面对强敌，李煜曾有复兴之志，一面蠲赋息役，增修武备；一面尊事中原，竭尽恭维。但他生在后宫，长在后宫，终被后宫羁縻，又酷好浮屠，崇尚塔庙；一罢朝，便换下朝服，焚香拜佛，或在宫中强作歌舞升平，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最后，宋军压境，他举足无措；一旦城破，只得肉袒出降，归为人虏。

李煜的词，以宋兵围城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多写宫中盛景、女子艳情，风格较为欢快，无所控捉。如《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开，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这首词上阕写凤辇出游之乐，下阕叙鸾舆回归之乐，通篇显

示一派富贵、排场景象。词中“霓裳”指盛唐遗曲《霓裳羽衣曲》，天宝年后失传，后主昭惠后善歌舞，得其残谱，审定缺坠音符，用琵琶奏出，遗曲得以再现。末句写到“烛花红”，据传后主宫中从未点过蜡烛，每晚高悬夜明大珠，光照一室，如同白昼。

《菩萨蛮》二首，则是专门描写小周后的“可怜”姿态。李煜继室小周后（昭惠后妹），神采端静，才思敏捷，深得宠幸。其中一首如此赞道：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如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儿，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虽刻画逼真，神态活现，但它只能算是一首风流雅韵，与花间婉约同类。

宋兵围城后，李煜词风大变，多写“恨”与“愁”，凝重中愈见神韵，而格调也更为工整。

开宝七年（974年）十月，宋军进围金陵，第二年十二月，金陵城陷，南唐亡。李煜在金陵受困期间写过《临江仙》一首：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画帘珠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衣，回首恨依依。

久遭围困，金陵尽失昔日繁华；寂寥空巷，处处残烟衰草。此词“凄凉怨慕，真亡国之音也。”（苏辙语）

金陵城破，李煜携群臣出降，旋即被迫北迁，“无愁天子”不再无愁。辞祭九庙，听教坊离曲，诀别宫娥，最是伤心时刻；追忆此事，他作《破阵子》一首：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琼枝玉树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李煜冒雨乘舟，行至江中，回首石城，仍不禁凄然泪下，吟出一诗：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到达宋都汴京后，李煜受尽凌辱。宋太祖给他封了个“违命侯”。一次，宋太祖命他献诗，他沉默许久，吟出其咏扇诗“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宋太祖问他：“满怀之风却有多少？”又说他“好一个翰林学士。”李煜羞愧难当。昔为人主，今为臣虏，可谓天壤之别！他将满腹愁思寄于词中：

遥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

上阕工于写景，风收残雨，用“约住”二字，极妙。下阕写情思，慨叹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处，忧愁无际。

李煜在宋都，常常心情沉郁，每当想起故国、旧人、离愁别恨就涌上心头。据传《浪淘沙》便是为思念宫娥而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南唐旧臣听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时，多黯然落泪。《望江南》是另一首忆昔妙词：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当年南唐繁盛，今日国主孤凄，一欣一戚，跃然纸上。他的两首《乌夜啼》也是绝妙大笔，一为“愁绝”、一为“恨绝”。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

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久居汴京，如陷囹圄，故忧愁日甚一日。一年七夕（李煜生在七夕），李煜让故伎奏乐，想稍稍解闷，岂知声闻于宅外；宋太宗知道后大怒，派人呵斥。（一说李煜因此而死）李煜悲伤至极，写信给江南旧宫人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他在晚年，写成一首千古绝唱——《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据传，这是李煜的最后一首词。宋太宗听说这首词后大为不满，加上其他原因，就赐他服牵机药而死。

李煜是个仁爱昏君、误国英才，其为君、为人之道无可赞誉。但他和同期词人一起，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这是值得肯定的。

（程定飞）

参考书目：

《花间集》

《南唐二主词》

《全唐五代词》（张璋、黄畲编）

《蕙风词话》（况周颐著）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

《词林纪事》（清·张思岩、宋棣辑）

《词学》（梁启勋著）

陈桥兵变

五代末期，有一个华山道士陈抟，据说曾在武当山学神仙术，有一门拿手功夫龟息功，练将起来便昏昏然，如同冬眠一般。世人说："陈抟善睡，三年不醒。"哪里知道他是在练功？后来在华山隐居，本该万事不萦于怀了，却偏是心热，自石晋以来，每次改朝换代、新君即位，他都颦眉蹙额，不胜其忧。有人问起，却又瞠目不答。这一日骑驴出游，来到华阴县境，见市人闹闹嚷嚷，奔走相告。说道："赵点检做天子了。"陈抟心中惊喜，不觉哈哈大笑起来。有人问道："有什么好笑？"陈抟不答，只自言自语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此天下太平了。"

原来后周时，禁军兵权掌于殿前都点检，由于权任过重，加上时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人心不定，早就流传着"点检做天子"的谣言。时赵匡胤出任殿前都点检已久，此人随周世宗征讨，多立功业，而"功业日隆，谦下愈甚"[1]，更兼他豁达大度，早已是众望所归。免不了有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及别具慧眼、有胆有识的人，一齐出来，推波助澜，为他奔走。这种事，僧道历来最是热心。有个殿前指挥使张永德，好结交道士，其中一个告诉他："以后见到两个属猪的人，好好对待，可保三十年富贵。"张永德牢记此言，仔细打听，才知赵匡胤兄弟二人的属

①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相都是猪，这才倾心替他们办事。至于道士是有意为赵氏兄弟说项，还是果真能善察命相，就无人得知了。赵匡胤是涿郡人氏，自高祖以来，世代为官。父弘殷骁勇善骑射，后周显德年间(954—959)，积功受封为检校司徒、天水县男。赵匡胤是赵弘殷的次子，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洛阳夹马营。成年后容貌魁伟，雍容大度，能骑烈马、挽强弓，追随周太祖郭威屡立战功。到世宗柴荣时，官拜殿前都指挥使、义成军节度、检校太保。世宗北伐，在道批阅四方呈奏的文书，在一个革囊中发现一块木版，上题“点检做天子”数字。时任殿前都点检的是大将张永德，世宗特意撤了他的职，以赵匡胤任都点检。他万没想到不管谁做点检都有可能造反做天子。

事情发生在显德六年（959）十一月，后周北部边境的镇、定二州上奏朝廷，说有契丹兵入侵，又有北汉兵自土门（今河北井陉）东下，与契丹兵会合。第二年（960）正月初一日，周恭帝派遣赵匡胤率领宿卫将领，出兵迎敌，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领前军先期出发。当时周世宗去世不久，恭帝年才六岁，新即帝位，正是所谓“主少国疑”的时候。都下传言：“出兵的日子册立点检为天子。”人人心知届时必有一场屠杀抢掠，纷纷逃离京都，藏匿货财，以求躲过这场无妄之灾。惟有朝廷懵然不知。

正月初三，大军出发，由京城北的爱景门北上。市民看到军队纪律严整，秩序井然，悬着的一颗心才松下来。当晚，军队在汴京北的陈桥驿（今开封县东北四十里）宿营。

随行军将中有一位列校苗训，曾随洛阳人王处讷学习天文占星术。王处讷久为司天监正，精通此技。见太阳已运行到亢宿附近，以为亢宿性刚，其神为龙，与太阳性神相近，都是人君之相。若太阳继续与亢宿靠近，到二宿并驾时，预示将有新君出现，以与旧君并列。苗训将这些话谨记在心。恰巧出兵这天早晨，二日并出，想到“两君并列”的话，深以为然。指着这种奇

异现象，对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新天子出现，看来是天意。"楚昭辅对他的话外音自然心领神会。在陈桥驿宿营后，当晚诸将议论纷纷，以为："天子是个娃娃，我等纵然出死力为国杀贼，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破敌，也不算晚。"都押衙李处耘将这些情况反映给赵匡胤之弟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赵匡义。匡义知道情况紧急，立刻携李处耘一同找归德节度掌书记赵普商议对策。商议未了，诸将已突门而入，闹闹嚷嚷，言词激切。赵普与匡义先晓之以大义，说道："太尉[①]一生忠义，赤心为国，要是知道你们逼他做这等犯上作乱之事，岂能轻饶。"诸将哑口无言，互相观望，知道此言不虚，有的已悄悄溜出门去。眼看事态便可平息，哪知只片刻功夫，离去的人又都返了回来，而且各执兵刃，有人高声叫道："按军中刑法，相对私语者灭族。如今我等私议立点检为天子，还有命在吗？事既做下了，反正是死，只好做到底了。点检若不依了我们，今日死在他面前就是。"众人同声附和。赵普眼看这等声势已不可阻遏，搞不好要闹出军变来，只有先稳住形势再说。于是大声喝斥道："策立天子这是何等大事，务要考虑周详，推究出个万全的法儿来。不发则已，发则必中。你等怎敢这般撒野胡闹！"众人听他这般说，知道他一向处事稳健，才陆续归座。赵普又道："如今外寇压境，谁能知道以后如何？弄不好是会亡国的。诸位何不先携手御敌，待击败外寇，凯旋而归时，再从容议论此事如何？"众人哪里肯依，纷纷说道："如今政出多门，诸事难料。等到打退外敌，谁知朝中会是什么样子？不如把军队撤回京城，扶太尉登了基，做了皇上，我等再北上御敌，量来不会有事。太尉若不依了我们，六军将士无论如何是难以齐心上阵，拼命杀敌的了。"赵普听完，望了匡义一眼，悄声说道："事既如

[①] 指赵匡胤。恭帝即位时，封为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开国侯。

此，已不可避免。只有俯顺众心，因势利导，才能使大家有所约束，不致乱来，你以为如何？”匡义点头赞同。赵普回头对众人道：“改朝换代，兴王易姓，虽说是天命攸归，实在靠的是人心所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不半途而废，还怕事不成功吗？如今诸位应当认清的是：慕容将军率领的前军已经过河，还有四方节度使各拥兵马，独据方面。虽说不少人是太尉的知交故旧，是否也与我等心意相同，愿立太尉为天子？这等大事，谁也不敢担保。如若处理不善，使京都生乱，不但外敌会乘机深入，四方兵马也会以平乱为由，大兴问罪之师，那时局面就不可收拾了。诸位若能严饬部伍，约束士卒，入京城后禁止烧杀抢掠，使都城市民不惊，人心安定，四方兵马必不敢乱动。只有这样，你我才能够长保富贵。诸位意下如何？”众人点头答应，这才商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决定先派遣衙队军使郭延赟连夜潜回京都，通知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此二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如今又是留守京都的禁军重要将领，此事不可不预先告知。延赟去后，赵普与匡义商议如何去劝赵匡胤。诸将不敢散去，各持兵刃，环立营中，以防不测。不觉金鸡长啼，天已黎明。

当夜，赵匡胤醉卧帐中，对外面发生的事竟半点不知。天色既明，军士等了一夜，焦急难耐，四处呼叫，声震原野。赵普、匡义见不能再等，唤醒匡胤，正欲把昨晚发生的事禀告清楚，军士已经顶盔贯甲，全副披挂，手持兵刃，直扣寝门而来。匡胤问是何故？众人答道：“诸将无主，愿意策立太尉做天子。”匡胤闻言大惊，急忙披衣而起，一面筹思该如何回答。未及开口，众人已一拥而上，连扶带架，把赵匡胤抬了出来。有人把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叩见万岁”。众人呼啦啦一齐跪倒，“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响彻庭宇。赵匡胤仍要挣扎，众人如何能依，一齐把他扶到马上，欲拔帐起营，向京都进发。赵匡义拦在马前，低声说道：“事已至此，大哥不如依了众人。

乘众人心切，立下规矩，免得到了京城无法收拾。”赵匡胤此时心神已定，略一沉吟，在马上高声说道：“你们贪图富贵，强立我为天子。无须我说，你们也知道，这是要家灭九族的。念在与诸位往日的交情，纵有万千艰险，我也只有免为其难了。但是我有几句话要说，诸位若能听从，我便舍了身家性命，也是心甘；倘若不从，今日之事，万难成功，还不如眼下被诸位逼死了省事。”诸将士齐声答应：“愿听号令。”赵匡胤道：“好！那么随我起誓。”说着与将士一齐下马，赵匡胤道：“少帝和太后都是我的君父；朝中大臣与我同殿称臣。入京以后，你们对他们不可施以强暴，侮辱欺凌。近世以来，新皇帝入京，全都是纵兵抢掠府库，劫夺路人。这一次再不可如此。事定以后，我必重重有赏，不愁没有富贵；如违号令，决不轻饶。”众人一齐起了誓，这才向京城进发。

正月初五，赵匡胤率军自仁和门入京，秋毫无犯，市民不惊。首先派遣楚昭辅同殿前都点检府去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会见执政，把军士拥戴的意思告诉他们。

再说朝廷一方，先是风闻军士拥赵匡胤为帝，极为不安。命人把赵匡胤府中家属全部抓来，作为人质。赵匡胤母杜氏等人先在定力文院[①]中，家人走报说：“点检做天子了。”人人心中既惊且喜，只有杜氏处之泰然，不见颜色。家人问故，杜氏道：“我儿素怀大志，早知会有今天，有何惊慌？”不一时传说朝廷要来抓人，主僧把杜氏等人引到阁楼之上，将阁门锁好，搜捕的官兵已到了前厅。原来他们到点检府中搜捕，不见人迹，跟踪追寻到此。向主僧查问，主僧道：“方才点检家人是曾到院中来着。听说官军搜捕，一轰而散，四处逃命去了。”军将命搜上一搜。

---

① 一名定力院，见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此处从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符命》。

士兵从前院往后一路搜将下来。到阁楼之下，正欲招呼主僧开锁上楼，其中一人道："看楼门上尘土这般厚，还挂着蛛网。不知有多久没有开过了，不像是藏人的地方。我等省了这番手脚吧。"说着嘻嘻哈哈，走了出去。

朝廷闻说赵匡胤家属没有抓到，正要责罚，有人报说，点检率兵入城了。本欲派人前去责问，为何班兵回朝？人报点检使者潘美求见。时正早朝，文武百僚，会集朝堂。听潘美将军士如何拥戴、如何黄袍加身的话说了一遍，人人悚惧，瞠目结舌，不能出一言。宰相范质握着王溥双手，深自痛悔，失声说道："仓促点兵，全没料到会有今天，你我好不糊涂！"直握得王溥双腕几乎出血。王溥却无一言回答。原来外间传言"点检做天子"，王溥久有耳闻，又见赵匡胤屡立战功，上下归心。五代年间天子更迭，像走马灯一般，不几年就发生一次。谁有兵权，又有人缘，便是皇帝。这事他见得多了。早知会有今天，私下里着意结交赵匡胤。赵匡胤在淮南有一处上好园林，名为都园，便是王溥所赠。不过这事骤然发生，仍令他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所以，任凭范质握住双手，难答一言。这时朝堂上另有一人，也如范质一般地忠于周朝，听了潘美之言，匆匆出朝而去。

此人名叫韩通，官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在京巡检。自恭帝即位，韩通与赵匡胤同掌宿卫禁军，而军政大事，多决于韩通。此人刚愎自用，言多迕物，人心不附。因此众人送他一个外号，叫做"韩瞠眼"，是说他动辄瞪起眼睛训人的意思。膝下一子，幼年患了佝偻病，留下残疾，人呼为韩橐驼。身体虽残，却是颇有心计。见赵匡胤人望日隆，知道早晚为害朝廷，时常劝韩通早拿主意，免生后患。韩通不听，如今果然出了事。韩通想尽快回府，调兵遣将，与赵匡胤周旋一番。但是为时已晚，赵匡胤兵既入城，又派了使者入朝，朝外岂能无人。按苏辙《龙川别志》的记载，韩通出朝后，"以亲

卫战于阙下，败死”。“阙下”是指宫阙之下，不是京城的城阙之下。其他书大多说是韩通出朝，路遇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王彦升跃马追赶。韩通驰归府第，未及闭门，被王彦升杀害，随即又杀了他全家。若是偶遇于途，王彦升为何追杀于他？韩通身为禁军大将，身边岂无侍卫？即便只身一人，王彦升一个下级军将，又如何能杀他全家？显系赵匡胤或匡义、赵普辈，派王彦升率士卒包围朝堂，不放一人出朝。韩通强行突围，双方格斗，韩通寡不敌众，被王彦升所杀。王彦升不杀韩通，放他回府，则获重罪；杀了韩通，有违赵匡胤回兵时的誓言，同样有罪。遇到这种尴尬事，做臣子的只有自认倒霉。以后果然把杀人的罪过全都推在他身上；而兵围朝堂的事，由于形同逼宫，有伤“圣德”，宋朝史官记述此段事自然含糊其辞，说是路遇王彦升云云，这叫做为君亲讳。倒是《龙川别志》这一家所记，更可信一些。

再说赵匡胤入京后，在诸将保护之下登上明德门，望城中诸军，见无人前来归顺，老百姓也无人头顶香案，前来祝贺，只好下令所部军士无职事者暂且归营，自己也脱去黄袍，回到点检府。不一时，将士簇拥范质等人而至。赵匡胤一一与众人见礼毕，痛哭流涕道：“我受世宗皇帝大恩，如天高地厚，没有尺寸报答。却为将士所逼，到了这步田地，实令我愧对天地。诸君为我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范质等人还没来得及回答，身后将士罗彦瑰等已挺剑而出，厉声说道：“将士无主，今日必欲立新天子，你们不要错拿了主意，免得大家麻烦。”赵匡胤喝退罗彦瑰。当此情势，范质等人已完全没了主张，彼此相顾，不知如何是好。王溥首先走下堂来，向上叩拜。范质不得已，只得一同拜了下去，呜咽说道：“事已至此，也是天意，我等岂敢违天行事。自古帝王有禅让之礼，今日正可施行。只是不要过于仓促，惊了少主。还望太尉受禅以后，能视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千万不可辜负了先帝的旧恩。”赵匡胤含泪应允。范质等才重新跪拜，

口呼万岁毕，军士便簇拥着向崇光殿而去。范质知道是要立刻行禅代礼，方才赵匡胤还答应不可太仓促了，不料竟是一句空话。但是，到了这种地步，怎敢再加阻拦。只得附和众人，帮同排列文武班次，直忙到傍晚，才发觉少了一篇禅让的礼文。这是一篇以恭帝口吻写成的文书，内容要有恭帝自责的话，还要对新皇帝赵匡胤颂扬一番，最后再表明恭帝自愿将皇位让于赵匡胤。满朝文士都是周朝旧臣，这种话如何说得出口？赵匡胤手下多是武臣，如赵普等虽然文字功夫有限，写这等东西还能应付得了，可是又身份不对。若范质、王溥自已来写，片刻之间，哪里能就？眼看禅代礼当日无法举行。正然着急，文臣中走出一人，却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只见他不慌不忙，从衣袖中取出一纸，说道："禅代制书在这里了。"众人知道他是要在新皇帝面前献个殷勤，抢立一功，这才预先把禅代制书写好。直到这时才拿出来，则是有意给众人一个出其不意，更显得他心思细密，尽心尽力。其实赵匡胤却为此大是瞧他不起。这是后话。

当下宣读禅让制书，宣徽使引导赵匡胤到龙墀之下，北面拜受。然后由宰相扶掖升殿，人东序换上皇帝冕服，回来登上皇帝宝座，群臣拜舞称贺毕，封周恭帝为郑王，太后符氏为周太后，迁到西京居住。这个亡国的小王子于建隆三年（962）又被迁到房陵郡（今湖北竹山）；开宝六年（973）死时才 21 岁。由于赵匡胤即位以前受封为宋州节度使，故定国号为宋。接着是改元、大赦、颁赏、诏告天下等例行公事。当时赵匡胤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局势稳定，清除因政权更迭产生的不安、动乱，即位当日，就下令开浚京都漕河的民夫糗粮，由官借给；奸民有乘机攘夺者，斩数人。正月八日，以礼埋葬韩通，追封为中书令；并治王彦升违命专杀的罪行，后来由于众人的劝解才饶恕了他。正月十一日，加封石守信等人官爵，奖励拥戴他做皇帝的有功人员。正月十二日，普赐文武近臣、禁军大校衣物。十三日，释放南唐

降将回唐……等等。新建立的宋王朝越来越巩固了。直到正月二十九日，镇州守将上疏说，入侵的北汉兵也撤退了。至今谁也不知道这次入侵的真相，它没有占领周朝的一寸土地，却导致了周朝的灭亡，导致了一个延续三百年的新王朝——宋朝的诞生。陈抟说："从此天下太平了。"天下太平的真正开端就是北汉"入侵"的这场战争。当然，也可以说是"陈桥兵变"。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纪事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1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元·脱脱《宋史》:《太祖纪》、《后妃传上》、《周三臣传》。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符命》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太祖代周》

破上党李筠

建隆元年（960）正月，赵匡胤以陈桥兵变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宋朝以后，诏告天下，遣使四方，向节度使、领兵诸大臣致意，通报禅让即皇帝位事。节度、大臣陆续表示归服。四月，使者来到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镇守潞州的是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筠。潞州古名上党郡，李筠治潞州已有八年之久。此人勇猛善战，但是残暴好杀人。在潞州召纳亡命，恣意横行，无视国法，周世宗顾全他多立战功，不与计较。宋使者入潞州后，照例向他通报受禅、登基的消息。李筠欲不迎见，左右亲信苦苦相劝，说以天下大势。李筠这才勉强对使者下拜。接着迎使者升堂，大摆筵席，杂陈伎乐，款待使者。

宾主欢洽，宴饮正酣，不料李筠心病未解，终于难以掩饰，忽然命人取出周祖郭威的画像，悬挂在墙上，对着画像痛哭流涕，悲哀不已。左右陪宴的众宾佐既惊慌，又害怕，忙向使者陪笑解释说："令公[1] 酒喝多了，醉后乱性，他自己也不知在干什么，万望不要见怪。"

北汉主刘钧由此知道李筠对宋朝首鼠两端，正处在委决不下的时候，因派人持蜡丸书见李筠，劝他降汉。李筠身为后周大将，长年与北汉作战，杀北汉将士无数。如今要他降汉，心实不

---

① 李筠受封中书令，左右因称之为令公。

愿。可是，降宋一样是心不能甘。自立山头，另起炉灶？……他反复掂掇，自知力不能及。最后决定将蜡书送交赵宋朝廷，表示他已一心归宋，使宋朝不再对他设防，好争取些时日做起兵的准备。谋大事不顾细嫌，降汉就降汉好了。

李筠长子名守节，知他要起兵反宋，哭诉哀求，要他切不可如此。李筠不听。赵匡胤得悉此事后，颁下诏书抚慰李氏父子，并封守节为皇城使。李筠心中暗怒，隐而不发，决定令守节入朝述职。临行殷切嘱咐守节，朝廷有何动静及时派人送信回来。守节只得答应。

守节入朝，赵匡胤派人迎入。冷冷说道："太子光临，不知为了何事？"守节听了，只吓得浑身哆嗦，扑通跪倒，前额碰地，连连叩头道："不知陛下为何说出这等话来？必有谗邪之人在背后说了为臣父子的坏话。"赵匡胤快人快语，直接说道："你不用替他隐瞒，你父要你来朝中卧底，当我不知吗？我虽身在汴京，你父子一言一动，休想逃出我的眼睛，否则我还坐什么龙廷！让你们父子耍着玩是了。"赵匡胤眼见守节吓得瘫在地上，连叩头的力气也没有了，温言说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会杀你。我知道你苦苦劝父，不可造反。可恨那老贼不仅不听忠言，反而把你送到汴京，想借我的手杀你。我岂是那种忠奸不分的人？我看你还是快回潞州，有一句肺腑之言，借你的口转告你那老子：我没当天子的时候，掌管禁军，任他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我若论起真来，他岂能活到今日！如今六军将士推我为天子，我也是被逼无奈才答应下来。就算是做错了，难道非要与我兵戎相见，就不能小让我这一次吗？"

李守节回到潞州，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李筠，李筠自知难以久瞒，更是加紧准备。

四月十四日癸未，李筠囚禁了朝廷委派的监军亳州防御使周光逊和闲厩使李廷玉，遣部将教练使刘继冲及判官孙孚，将他们

押送到北汉。以此与北汉结好，并请求援兵。光逊、廷玉都是后唐将门之后，父祖曾久镇太原，宋初太原还有他们祖上旧宅。二人被押送到太原后，北汉主刘钧释放了他们，还厚加赏赐，命还旧宅居住，表示结纳的意思。

李筠又遣兵袭取泽州（今山西晋城东北），杀刺史张富，占领了州城。正式起兵反宋。部下从事官闾邱仲卿献策说："如今咱们是孤军作战，形势十分危险。虽然北汉可做外援，但泽、潞离太原千里之遥，又道路崎岖，缓急未必指望得上。而且谋大事者应当首先求诸己，然后才是求诸人。汴梁甲兵强锐，难以抵敌。为今之计，不如西下太行，直趋怀州（今河南沁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进据洛阳，以兵塞虎牢关（今河南汜水西北），而后东向争天下。此是上策。"李筠不听，说道："我是周朝旧将，追随周祖，算将起来，与世宗皇帝如同亲兄弟一般。汴梁中的禁卫军将都是我的知交旧部。只要我义旗一立，他们必然会倒戈来归。况且我部下有儋珪枪，胯下有泼汗马，取天下也不是难事，怕什么汴梁兵马。"儋珪是李筠爱将，善使枪，勇冠三军；泼汗是骏马名。以往征战，李筠多以此取胜，所以才这般轻敌。

宋枢密院得到李筠反叛的正式消息后，枢密使吴廷祚对赵匡胤说道："潞州多山，地势险峻。倘若反贼固守不战，短期内还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李筠素来骄傲，勇而无谋。若迅速向他进攻，他必然自恃勇猛，出城迎敌。只要离开巢穴，抓获他就易如反掌了。"赵匡胤接受他的建议，决定亲征。四月十九日戊子[1]，由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率领前军先行。临行，赵匡胤对石、高二人面授机宜道："你们只要扼守要塞，不让他兵下太行，就肯定能打败他。"

四月二十七日丙申，任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二

---

[1] 一说在四月二十四日癸巳发兵。

人为前锋军转运使，负责筹集军需。赵匡胤召见三司使张美，命他调集军粮。张美说道："泽潞与怀州毗邻，怀州刺史马令琮早已料到李筠必反，日夜筹集、积蓄粮草，专等大军讨伐时支用，朝廷不必另调军粮。"赵匡胤大喜，立刻下令，升任马令琮为团练使。

宰相范质说道："怀州不是团练州，升任团练使便当调任他州。如今大军北伐，正要借重马令琮之力供给军粮，调任多有不便。"于是，四月二十九日戊戌，下令升怀州为团练州，即以马令琮为本州团练使，兼先锋都指挥使。

这马令琮原名令威，避周祖名讳改为今名。原籍大名人。其父马全节历任节度，令琮追随帐下，多积战功。世宗时领建州刺史，赵匡胤即位后，改任怀州。暗察李筠招降纳叛，断定日后必反，泽潞城下免不了一场大战。因此日夜积粮，以备后用。果然被他言中了，才有今日的封赏。

五月初二日庚子，殿前都点检、镇宁节度使慕容延钊驻澶州（今河南濮阳），彰德军留后王全斌驻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匡胤命二人各以所部兵由东路攻李筠，与石守信、高怀德合兵。又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杨承信驻守下蔡（今安徽凤台），后于五月十七日乙卯来京朝见皇帝，赵匡胤即命他领泽州西面都部署，从西面牵制泽潞。李筠见大军来讨，密遣使者持蜡书入北汉告急，请发援兵。时杨廷璋为建雄军节度使，治晋州（今山西临汾），中途将蜡书截获，连同使者一起解送到汴京，并向朝廷献平泽潞方略。赵匡胤随即委派杨廷璋为经略泽潞使，按方略而行。此后赵匡胤亲征时，命他率本部人马从北面佯攻，以分李筠兵势，届时便可形成对泽潞四面合围的态势。

五月三日辛丑，以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南）团练使郭进为本州防御使，兼西山巡检。时大军欲西出怀、孟，再北攻泽潞。为防备北汉兵东逾太行，直逼汴京，才升郭进为防御。

北汉主刘钧得知宋兵攻泽潞，遣内园使李弼持诏书、金帛、骏马赏赐李筠。李筠因遣刘继冲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见北汉主，请求发兵南下，自己愿为前导。北汉主欲驰使契丹请援，刘继冲转致李筠意，希望不用契丹兵。北汉主应允。即日大阅军队，准备倾国出动，自己亲自率领，由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南）南下。群臣于汾水岸边设宴饯行，左仆射赵华说道："李筠做事，轻举妄动。这次起兵，必无所成。陛下这样大举赴援，以微臣看来，恐有不妥。"北汉主听了很不高兴，愤然对赵华说道："此事朕意已决。你怎么知道必不能成功？若另有高见，不妨说出来。为何这般泼冷水，扰乱军心？"赵华正欲开说，北汉主拂袖上马而去。行到太平驿（今山西长治西北，距潞州80里），李筠亲自率官属及地方耆老来迎。北汉主封他为西平王，赞拜不名，位次在北汉宰相卫融之上。又赐给马三百匹，还有许多服玩珍异物品。李筠献给北汉主的物品也大略相当，此外对北汉主身边文武大臣也各有赠品。

李筠亲见北汉主随身仪仗、护卫，少而且弱，与王者身份不相称，后悔当时不该以他为强援，做出这等事来。北汉主数次召李筠商议军情，每谈到起兵的原因，李筠则唏嘘流涕，说道，周祖对他有大恩，决不答应赵匡胤欺侮幼弱，做出对不起周氏的事来。直说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全不想周与北汉是世仇，既已归服北汉，如何能仍然对周不肯忘情？况且既已对北汉主称臣，还有何颜面再说不负周氏？李筠武人，全不计此，只管厚颜说下去。果然使北汉主大不高兴，心道，你既不负周氏，降汉全是迫于无奈了。等我北汉军士打退宋军，替你挡了这场灾，莫非仍要做你的周臣吗？心中已有怀疑李筠的忠诚之意。只是表面不露声色，回晋阳以前，又赐给他战马、铠甲及其他衣装器具无数，却留下宣徽使卢赞作为李筠部队的监军。李筠更加不满。那时，他厩中有战马三千匹，日夜加紧训练，声言要直捣汴京。当卢赞的

面，对左右将士大言说："汴京的将士都是我旧时的部曲，只要宋兵来到城下，我阵前一呼，他们自会解甲归伏。"卢赞大怒道："如此还要我等有何用处?"拂衣而去。北汉主听说卢赞与李筠不和，特地派遣宰相卫融前来劝解。李筠已知北汉兵不足恃，回思闾邱仲卿的建议，越想越觉有理，于是决定留下长子李守节守潞州，亲率大军三万南下泽州。然后自泽州南下趋怀、孟，进占洛阳，实现闾邱仲卿的战略设想。

五月五日癸卯，前军石守信等初战告捷，说是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与李筠的军队遭遇，斩首三千余级，攻占了敌人的大会寨。

五月六日甲辰，下令免去李筠的所有官爵。

五月十九日丁巳，以亲征泽潞诏告天下，命枢密使吴廷祚留守京都，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吕余庆为副留守；皇弟赵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守卫皇宫；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增率兵屯于河阳（今河南孟州西），先期准备御驾到军中以后的各项事宜。

五月二十一日己未，皇帝赵匡胤从京都汴梁起身，二十四日壬戌来到荥阳（今河南荥阳西南），西京留守向拱前来迎驾，建议大军急渡黄河，兼程北进，乘李筠兵未集结，一鼓作气将它击败。愈往后拖，它的兵势愈盛，再要胜它就费力多了。赵普也说：李筠以为国家新建，百事待举，必然腾不出手来出征。若大军别道而进，出其不意，乘其不备，必能一战而克。赵匡胤听从他们的意见，命军士卷甲急行。二十六日甲子到河阳，二十八日丙寅到怀州。果然李筠率兵正要南下，得知大军已到，仓皇归保泽州城。至泽州城南，与前军石守信、高怀德所部遇，一场大战，李筠兵失利，河阳节度使范守图被宋兵俘获，监军卢赞被杀，李筠走入泽州，闭城固守。

这一月，为了牵制北汉军，配合泽潞战事，永安军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县）折德扆从背后向北汉频频进攻，攻破北

汉沙谷寨（今山西保德县境），杀军士五百余人。

六月初一己巳，赵匡胤亲自到泽州城下，指挥攻城。

李筠自泽州城南战败以后，有部将汾州团练使王全德率所部退入潞州城，与李筠子李守节共同防守潞州。及至宋军包围泽州，王全德惊恐异常，寝食不安。终于率亲友数十人偷出潞州，来到宋营投降。又有龙捷指挥使王廷鲁也从潞州逃了出来，投降宋军。李筠部队的士气受到很大挫伤。

但泽州城小而坚，宋军仍然久攻不下。欲穴城而人，那时的穴城方法是先造一辆大木轮车，上搭木板，再覆一层铁板或牛皮。军士隐身车中，将车推到城下，挖城不止。城上矢石水火都难以伤害。这种木轮车称为洞屋，又有贲辒、木驴等名称。宋军以殿前都指挥使、泰宁军节度使王审琦亲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指挥挖城。不幸为炮石所伤。赵匡胤前往探望，忧形于色。前后攻城已十余日，终因不得要领，劳而无功，而且军士伤亡颇重。赵匡胤有些动摇，欲暂且缓兵不攻。军中有一名列校，官封内殿直都知，任控鹤军左厢都校，领果州团练使，名叫马全义。幽州蓟县人，自十余岁学习击剑，精于骑射，勇冠三军。听说赵匡胤有缓兵的意思，亲到御帐前献计。赵匡胤在御榻前以御食款待他，殷切问计，马全义说道："如今李筠困守孤城，已经智穷力竭，只要再坚持一下，城破就在旦夕之间。如若缓兵，贼兵养成锐气，更难对付。而且我军无功而退，岂不是更长了贼志气，为今之计，应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打开缺口后，再向两旁扩大战果。"赵匡胤听了，不觉兴奋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立刻下令加紧攻城。另于军中选拔数十名勇士，组成敢死队，由马全义率领，在大军猛攻的配合下，强行登城，手攀城堞而上。城上矢石如雨，殿前散都头指挥使蔡审廷足被飞石击伤，仍力斗不止；马全义臂被敌箭射穿，浑身血迹斑斑，马全义伸手将臂上箭拔出，掼于地下，大呼酣战。宋军受二人豪气激励，越战越猛，

登城者越来越多，终于打开城门，大军拥入城中，泽州陷落。

再说李筠在城中指挥守城，宋军久不退兵，城中日渐危机。有一名小妾刘氏在城中，忽然问道："城中还有健马多少匹？"李筠道："怎的想到问这事？"刘氏说："这座孤城，日渐危机，城破不过是旦夕之间事。若有好马数百匹，你就能与腹心将士一起突围出城，走保潞州。那时再派人向河东北汉王求援，未必没有生机。如今坐以待毙，终非良策。"李筠以为有理，召左右将士计议。城中尚有马近千匹，打算当晚出城。计议已定，有人私下对李筠说道："此时在帐中计议，每人都说得好听，要誓死保护令公出城。但是人心难测，等打开城门以后，那就难说了。倘有人劫公出降，岂不是后悔莫及了吗？"李筠听了此话，犹豫难决，当晚没有出城。第二天城被攻破，再想走已然不及。于是放火将房屋点着，刘氏欲与他一同赴火，时刘氏已有身孕，李筠坚执不肯，强行把她赶了出去，自己纵身入火而死。后来刘氏果然生了，李守节死后，由刘氏所生子接续了李氏香烟。

城破时，北汉宰相卫融在城中，也做了宋军的俘虏。赵匡胤入城后，下令掩埋战死士兵的尸体，免除泽州百姓当年的田租。

六月十七日乙酉，宋军自泽州北上，进攻潞州。十九日丁亥，李守节出城投降。赵匡胤赦免他的罪过。潞州原为昭义军，是军州级的建制，赵匡胤命升作团练州，由李守节为本州团练使。当日，赵匡胤车驾进入潞州城，在行宫大张宴席，犒劳从行官兵将士，李守节在宴会上从容应酬，心中有什么感受就无人能知了。开宝四年（971）死时才33岁，连儿子也没留下一个，以刘氏所生子做了继承人。

北汉王听说李筠败亡，自太平驿匆匆忙忙逃回晋阳，见到左仆射赵华，想到他当日说过的话竟然一丝不错，说道："李筠不能成事，果然如卿所料。万幸的是我能全师而归，只可恨失去了卫融、卢赞二位爱卿。"赵华只是一个书生，料事如此，使北汉

主从此尊重文学士人。

六月二十五日癸巳，安国军节度使李继勋到潞州朝见皇帝，二十七日乙未，赵匡胤任命李继勋为昭义节度使。二十九日丁酉，自潞州起程，七月十一日戊申回到都城汴京。自四月十九日戊子初发兵，到六月十九日丁亥李守节出降，宋军兵伐上党首尾共61天，李筠由于不知大势，轻举妄动，夜郎自大而又临事不决，终致兵败身死，为后人耻笑。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脱脱《宋史》：《王审琦传》、《石守信传》、《向拱传》、《杨廷璋传》、《慕审廷传》、《马令琮传》、《马全义传》、《李筠传》。

平叛维扬

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以后，天下新定，人心不安。尤其执掌兵权的周朝勋旧、节度大臣，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心理状况大要有三种：一是与赵匡胤素无恩怨，周朝皇室对他们也无大恩德的人，对宋朝持观望态度。只要新皇帝能使他们过得去，他们也就乐于听命。皇帝姓赵还是姓柴，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对他们的态度如何，能否使他们不丢官职。对这部分人只要发一道诏书，表示安抚就可以无事了。二是与赵匡胤渊源较深的人，闻赵匡胤即位而欢喜雀跃，自不待言。三是与赵匡胤素不相能，或者积恶太多，害怕新皇帝即位，拿他们试刀。这部分人数目虽少，于天下安危却最是重要。处理不善就会干戈相见。不管谁胜谁败，免不了杀人放火，使社会受损害。宋朝皇帝对此种人的处置可说是得失参半。韩通被杀，赵匡胤归咎于王彦升，为韩通赠官、礼葬。不论是真情还是假意，总之事做得利索、漂亮，显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是处理得好的一例。还有一个保义节度使（治陕州）袁彦，听说赵匡胤即位，日夜缮治甲兵，赵匡胤遣潘美为监军，要他相机除掉袁彦。潘美受命后，单骑入陕州，劝袁彦入朝见驾。袁彦知朝廷无意加害，便听从劝告，束装入朝。虽是由于潘美胆略过人，非出于赵匡胤本意，总是避免了一场干戈，也是处理得较好的一例。对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处理则算是失当的一例，使十里扬州又遭一场兵火的洗劫。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久随郭威四方征讨，以功升

为节度使。郭威临死前，将世宗柴荣托付给他，要他善自辅佐。所以李重进在后周算是一位顾命元勋。在世宗时期，打过许多硬仗，屡立战功，官至检校太傅兼侍中、天平军节度使（治郓州）。恭帝即位后，加检校太尉，移镇淮南（治扬州）。时天下沸沸扬扬，盛传点检为天子。李重进自天平军赴淮南任，路过泗州，泗州刺史张崇诂恭谨迎接，乘间殷殷劝说道：如今天子年幼，宿将擅兵，谣言四起，时事很难预料。在这种时候，将太尉公调任淮南，实有深意。淮南扬州为水陆要冲，东南利薮。太尉不仅是本朝勋旧，又是皇亲，握兵居于扬州，可为朝廷声援。望太尉公能体会此意，赴任后招兵买马，修筑城池。果如此，什么"点检做天子"的无稽之谈若不幸而言中，太尉可提兵伐罪，天下自然闻风响应，万事就不足为忧了。李重进只唯唯答应。

李重进与赵匡胤起初都是周世宗倚任的将领，分主内外兵权。由于赵匡胤声名日盛，人心渐归，李重进对他早有几分忌惮。如今虽赴淮南任所，仍然兼领禁卫兵的兵权，不肯卸任，就是暗自提防的意思。听了张崇诂的一番话，自然首肯。但赵匡胤是否真要叛乱？叛乱后他李重进据守扬州能否力挽狂澜？心中无底，十有八成怕是不行。因此张崇诂要他预做准备什么的，他也没十分放在心上。最好是这种事不要发生。不幸的是当真发生了。赵匡胤即位之初，于诸臣普加官职的同时，也给他李重进加了官，头衔是中书令；同时却撤销了他的禁卫军职务，由韩令坤代任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他立刻警觉到，已不存在做不做周朝声援的问题，首要考虑的该是如何自存？于是主动提出入朝晋见皇帝。这原是表示愿意归顺的意思。不料赵匡胤对他也忌讳，因为二人身份相同，又素来不睦，如今赵匡胤做出这种逼宫的事来，既不能像对范质、王溥那样，痛哭流涕，表示愧疚，并做出许多承诺，请求对方谅解。又不能像对待部下那样，端起架子，受他的朝拜。礼数高了，心中不愿；低了，亦觉不妥。所以决定暂不

与他相见。命翰林学士李昉起草一道诏书，其中说道："君是元首、头顶，臣是四肢、股肱。虽分处远方，仍然是一体难分。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君臣名分，使永不见背；而入朝觐见只是末节细事，何必急急于今日？"李重进接到诏书，细细品味其中语言：连君臣名分也不可保，那是什么意思？愈想愈是不安。于是开始招集四方亡命之徒，收为士卒，开掘城湟，增筑城墙，积聚粮草，暗暗做起兵变的准备了。

时宋与南唐隔江相峙，防守边界的是一员宿将，名叫宋延渥。周世宗时，曾率舟师与吴人大战。宋初虽官封至检校太师，仍领水军，在江上巡弋防守。扬州城密迩江畔，李重进这些活动如何能逃得过宋延渥的眼睛？因而早已把他准备叛乱的种种异动飞章报入汴京去了。赵匡胤闻报，由于倘不能确切证实李重进已经叛乱，朝廷不便先期发动，又不得不早为预防，使命宋延渥屯兵于海陵（今江苏泰州），密切注视李重进的行动。

建隆元年（960）四月李筠在泽潞起兵以后，李重进派遣亲信翟守珣间道而行；秘密与李筠联系。也是他无知人之明，或者是一时走了眼，派出的翟守珣原是个卖主求荣之人。只因他曾与赵匡胤相识，往还潞州道经京城时，便偷偷去见枢密都承旨李处耘，要求见皇上。赵匡胤召见了他，询问李重进的动向。翟守珣于是将李重进如何自请朝见，被拒后如何心不能安，密谋反叛，而今如何与李筠勾结，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赵匡胤沉吟道："我没准许他入朝晋见，另有别情，并非不能相容。他既误会了我的意思，你看如何可以挽回？倘若赐给他铁券誓书，表明朕的心迹，他还能相信吗？"翟守珣道："以微臣看来，他终究必反。虽赐铁券，只缓得一时罢了。"赵匡胤道："朕正要他缓得一时。如今李筠叛于西北，东南再出乱子，二凶呼应，分我兵势，虽最终难逃天诛，眼下却着实棘手。卿回扬州，可设法劝他缓上一缓。若能成功，便是大功一件，朕必不吝封赏。"翟守珣一口答应。

赵匡胤吩咐，重重给赏。

翟守珣回到淮南，果然鼓动如簧之舌，向李重进分说李筠如何轻举妄动，如何不足与共谋大事。因劝李重进要养威持重，待机而发，不可与李筠为伍，坏了大事。李重进信以为然，没有及时发动。

赵匡胤平定泽潞以后，决定着手解决淮南的问题。建隆元年(960) 九月十二日 (戊申)，改任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 (治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境)，预料李重进必因此增加疑惧，隔日后遣六宅使陈思诲带着铁券誓书，前往淮南，宣赐给李重进，并加慰勉。使他能安心移镇，不可妄生猜疑。

陈思诲来到淮南后，李重进之弟重赞劝重进即刻治装上路，服从朝廷调遣，随同陈思诲入朝。而左右亲信以为此行如蛟龙失水，必然凶多吉少。于其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听任宰割，不如早做决断，轰轰烈烈干上一场。李重进犹豫不决，拖了很久。最终才认为：自己是周朝皇室的近亲，赵匡胤既已背叛周朝，终究放自己不过。于是，将陈思诲拘留不遣，加紧制造战具；一面派人与南唐联络，向唐主求援。唐主李景与中原的恩恩怨怨已非一日，显德二年 (955)，周世宗亲征淮南，麾下大将主要便是赵匡胤父子、韩令坤与李重进。尤其李重进，吴人称之为“黑大王”，正阳一战杀江南兵万余人，获戈甲三十万。又连克寿春、濠、泗、楚等州。李景大惧，自请割让江北土地，与后周划江为界。并向后周称臣，岁贡土物。而心中实愤恶异常，将一时大臣如宋齐丘、陈觉、李征芈全都杀死。江南将士也从此失了锐气，不断逾江来降。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以后，对江南一度实行抚慰政策，如将江南降将周成等三十四人遣归南唐；优崇南唐使者；赐给李景生日礼品等。李景对赵宋也是事之维谨。两相比较，李景岂能与宿仇李重进结好，而失赵宋皇帝的欢心？此外，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料定李重进必然一无所成，所以李重进的使者入南唐，

南唐闭门不纳，李重进立刻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又有右屯卫将军安友规为扬州都监，都监就是总监军的意思，是朝廷派到地方，监视节镇行踪的官员。李重进不能忍受安友规的监视，对他颇怀忌恨。及将起兵叛宋，安友规恐先遭祸，带领亲信数人，密谋斩关而出，逃出扬州。遭到守城兵的阻击，安友规只身出城而已，投奔宋营。李重进由此怀疑部下将领都不肯附己，有背叛降敌之心。下令将嫌疑的军校数十人拘禁入狱。军校愤慨呼叫道："你口口声声，要兴兵伐罪，为周室复仇。我等都是为周室屯戍而来，为何不让我们也效力沙场？"李重进不听，将十人全都杀死。

九月二十三日（己未），李重进反叛的消息正式传到京都，赵匡胤遣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以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副职，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保信军节度使宋延渥为都排阵使。率领禁军先期出发，一面准备御驾亲征。

九月二十七日（癸亥），颁布诏命，削去李重进一切官爵职务。

十月四日（庚午），扬州都监安友规从李重进营中逃出后，千里迢迢来到京都，向朝廷报告李重进反叛的情状。赵匡胤任命他以滁州刺史的身份监护前军，讨伐李重进。

一日，赵匡胤与枢密副使赵普谈及扬州事宜，问赵普对扬州战况如何估计？赵普说道："从今日情势看，李重进只凭借长淮地势，修缮扬州城孤垒，并无向外扩展、寻求外援的趋势。可知他鼠目寸光，全无雄才大略。再加上此人素无恩信，士卒离心；刚愎自用，不听人谋。如今已是外无救援，内乏粮草，处于坐以待毙的形势之下。陛下无论急攻还是缓攻，击破扬州都是势之必然。只是兵法主张速决，臣以为不如陛下亲征，早日结束扬州战事。"

赵匡胤以为有理，十月二十一日（丁亥），下诏亲征。以皇弟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负责宫廷安全；以吴延祚权东京留守，吕余庆为副职，楚昭辅为京城巡检，李处耘为行营兵马都监，韩重赟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此外，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同平章事兼侍中、天平军节度使韩令坤，检校太师、忠正军节度使赵赞以及李重矩、崔彦进、张廷翰、刘廷翰等将校也都从行出征。临行，赵匡胤晓谕文武大臣说：朕对周朝旧臣并无疑忌，满心希望与他们共享太平。李重进不能体会朕心，自怀反策，使得六军将士暴露疆场。朕只得亲自前往，以抚慰我将士。

十月二十四日（庚寅），大军自京城出发，六军将士及随行军政各机构人员，一概乘船，顺汴水东下。二十七日（癸巳）到达宋州。时扬州兵有家在宋州者，父母妻子听说他们随李重进造反，如今皇帝亲率六军前去平叛，到了宋州。推想首先要拿家属问罪。人心惶惶，满城惊慌。赵匡胤派遣中使四出安抚，人心稍定。

十一月三日（戊戌），赵匡胤到达宿州（今安徽宿县），守中书令、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徐州）郭从义谒见于路旁，请求扈驾从征。此人为沙陀族人，曾在唐、晋、汉、周四朝为将。为人忠厚，有谋略、多伎艺。赵匡胤要他谨守地方，防敌脱逃，不必随军。郭从义领命而去。

九日（甲辰）到达泗州（今安徽盱眙），舍舟登陆，命诸军一路鼓行而进。十二日（丁未）到大仪驿（今安徽大仪集）下榻，扬州已经在望。前军都部署石守信派人飞马来报："扬州城旦夕可破，请皇上到城下观战。"赵匡胤立刻起行，当晚赶到扬州城下。六军将士见到天子黄罗伞盖，群情激昂，杀声连天。赵匡胤也不避矢石向城下冲去。殿前直长米信手执弓矢，紧守在侧。宋军见皇帝如此，人人感奋，前赴后继，直扑城头。忽见城上缒下一人，砍翻宋军一名副将，夺了马匹，直向赵匡胤冲来，

锐不可挡。宋将一齐惊呼，欲上前救驾，离得远了，已是鞭长莫及。正然危急，只见米信张弓搭箭，嗖地一声，那人应声落马。宋军齐声欢呼。这米信是奚族人，本名海进，自少年起便以勇悍、善射闻名军中。周朝时，屡立战功。赵匡胤掌管禁军后，将米信置于麾下，委以腹心。即位后，升他为殿前指挥使，不久又迁为直长，仍作扈驾亲随，今日才得了他的大助。

眼看城池将破，李重进部下乱作一团，有人愤然说道："宋使陈思诲在押，不如先把他宰了。反正是死，大家一起死了干净。"此时李重进死志已决，暗思：我一生杀人无算，如今到了这步田地，难道还无半点慈心？凄然说道："杀他一人，又有何用？放他去吧。"这时左右匆忙来报："城门已破，请令公火速定夺。"李重进再无迟疑，支开左右人等，唤出合家老小，点着房屋，全家自焚而死。部下悲痛已极，仍将陈思诲杀死。史书说李重进为人鄙吝，"未尝有觞酒豆肉及其士卒，下多怨者"[1]。看部下所为，便知是不实之辞。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谋事不成，什么脏水都要往他头上倒是了。

宋军入城后，以重金购求翟守珣。按照赵匡胤先前的许诺，封他为殿直官，不久又加封为供奉官。李重进兄重兴，为深州（今河北深县南）刺史，得知李重进谋反，先已自杀，弟解州刺史李重赞、子尚食使李延福没来得及自杀，都被赵匡胤处死。此外，又捕获李重进之党数百人也一并杀掉，一个不留。然后于十一月十五日（庚戌）下诏：凡李重进的家属、部曲免罪不咎，逃亡在外的听自首归籍，战死而尸首暴露者，官为掩埋，为大军服役，死于城下者，每人赐绢二匹，其家免税役三年。建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甲子），又杀掉了曾劝李重进起兵的张崇诂。

这场平定维扬叛乱的战争，自九月二十三日（己未）初发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十一月丁未"纪事。

兵，到十一月十二日（丁未）城破，首尾49天。李重进之所以失败，除了人心思治、力量悬殊等大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策略上的错误，十一月二十五日南唐户部尚书冯延鲁曾谈及此事说：当赵匡胤初立为帝，人心未定，李筠反于泽潞，赵匡胤亲提六军前往征讨，双方相持于泽州城下，此时李重进不反。待泽潞罢师，人心已定，天下无事的时候，却欲以“残破扬州，数千敝卒”，与宋军万乘之师相抗衡，没有不败之理。倘若当初李筠能听取闾邱仲卿的建议，直下洛邑，以兵塞虎牢，并不计私嫌，与北汉合力；李重进乘此时起兵，与南唐会合。共以吊民伐罪为口号，齐向汴都进军，就很难说鹿死谁手了。但是人心易散难合，要使这四股力量合势，谈何容易！非有翻天覆云手不可，时无枭雄，使二李不得成功，天下也免去数十百年的混战和割据，实是幸事。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

脱脱《宋史》：《石守信传》、《王审琦传》、《高怀德传》、《韩重赟传》、《赵赞传》、《宋偓传》、《吴延祚传》、《李崇矩传》、《楚昭辅传》、《李处耘传》、《崔彦进传》、《张廷翰传》、《周三臣传》、《南唐世家》。

杯酒释兵权

自唐代安史之乱起，四方领兵的节度使禀王命，不受朝廷约束，拥兵割据。延续到五代十国，大臣篡政更是时常发生，宋初有人慨叹说，朝为比肩之人，暮时便有了君臣名分，政权更迭如同走马。宋朝建国之后自然会想到如何避免以上情形重演。有一天，赵匡胤与赵普从容谈论天下事，赵匡胤问道："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皇帝换了八个姓氏，有十二个皇帝僭窃相继[1]，以致战争连年，兵革不息，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今我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永不再发生以上事情，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赵普回答说："陛下能思虑这些问题，实在是天下苍生的福气。天下之所以僭窃相继、战争不断，道理很简单，就是节镇权力太重，只要稍夺其权，天下就会自然安定了。"赵匡胤点头道："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从此赵匡胤定下了削夺节镇兵权的决心。

赵匡胤初即帝位时，除了四方节镇各主本镇兵权之外，执掌禁军兵权的，在内是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的心腹，

---

① 八姓指五代皇姓：朱、李、石、刘、郭、柴氏及李唐和赵宋，以僭窃取得帝位的十二个皇帝指后梁太祖朱温、郢王朱友珪、末帝朱友贞，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再加李唐末一个皇帝哀帝李柷与宋太祖赵匡胤。若将割据的十国算在内，远大于此数。

是发动陈桥兵变、拥他为帝的有功人员。在外的还有两个，一个是镇安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韩令坤，陈桥兵变时，他正率领一支禁军在北部边境巡逻；一个是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他是作为赵匡胤的前军先期出发，离开京城的，赵匡胤驻兵陈桥，他的军队已渡过黄河。为了争取这两支队伍的支持，赵匡胤对他们非常客气，先是遣使告诉他们可以“便宜从事”，不必受朝廷节制。二人表示愿意听命以后，立刻破格升迁，以韩令坤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昭化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殿前都点检是禁军总统领，赵匡胤便是出此职成为皇帝的，如今授于别人，心实不安。可是事逼于此，又不得不授。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平定维扬李重进的叛乱以后，便将二人在禁军中的职务全部免除，改任慕容延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韩令坤为成德军节度使。而且，殿前都点检一职，从此以后永不授人。当赵普告诉他“节镇权力太重”，应该“稍夺其权”的时候，他又经走完了削夺节镇兵权的第一步。这时候，掌握禁兵权力的是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此外便是四方节度使。两者比较，当然是解决禁军问题为当务之急。

前面说过石守信等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是他们把赵匡胤扶上皇帝宝座的，照理应该信任他们。是赵普帮他纠正了这种牵于世俗情理的迂腐认识。赵普曾屡次建议削去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起初赵匡胤不能理解，说：“这些人绝不会背叛我，卿为何对他们如此放心不下?”赵普道：“臣也不担心他们自己会叛乱，但是我观察已久，知道他们都没有驾驭部下的才干。一旦部下有人作孽，迫使他们去干蠢事，就会身不由主了。”赵匡胤才恍然大悟。其实这类事五代时频频发生，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被部下挟制做了皇帝的，末帝李从珂以“清君侧”为由率兵入京，也是在一片“劝进”声中做了皇帝。连赵匡胤自己也是因军士哗变而黄袍加

身的。所以道理甚明，一点即透。赵匡胤决定首先收回禁军兵权。

七月某日，晚朝罢，群臣散去。赵匡胤特地留下石守信等人宴饮。酒过三巡，赵匡胤忽然长叹，惶惶不乐。石守信等人问故，赵匡胤屏退左右伺候的下人，说道："若不是你等全力扶持，我如今也难得做皇帝，你等对我的好处，我是毕生难忘的。可是，做皇帝也不是件容易事，以致使我常常不能安枕而卧。比较起来，还是做节度使更快乐些。"石守信等人不解道："如今天下太平，虽有汉唐等国未下，也不过是早晚间事，什么事使皇帝这等忧心？"赵匡胤道："汉唐都是垂尽之国，早已在我算中，倒是不必担忧。我所忧者其实也不难理解，你们想，做皇帝在众人眼中是何等风光，有多少人日夜惦着这个宝座。稍有不慎，丢了皇冠倒也罢了，只怕身家性命都不可保。叫我如何不忧？如何不战战兢兢，寝不安度、食不甘味？想快乐还能乐得起来吗？"石守信等人听了，早已惊得呆了。这明明是怀疑他们要造反，不觉一齐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连声说道："陛下为何要这样想，如今天命已定，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天命既定，还有人敢再作孽吗？"听这话好像是对赵匡胤服服帖帖了，其实，石守信等人岂是易与之辈？赵匡胤即位以后，曾极力向人表白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并非以武力欺负世宗皇帝的孤儿寡妇所致。如此做作，几乎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如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出行，有人埋伏于路，用箭射伤了从人，左右大惊，要他回辕，赵匡胤却大笑说道："教他射，教他射，做天子是要有天命的，既有天命，他如何射得着我。倘若他有天命，让他做天子好了。"为了了解下情，他常常微服私行。大臣劝告他，这样做太危险了。他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强求不能得，拒绝也不能够。周世宗时，见诸将有方面大耳者都要杀掉，防范可算是严密。我整天在他身边，他还不是毫无办法？所以天命应为天下主，谁也无奈他

何，不应为天下主，纵然天天闭门不出，也免不了让人杀头。”又常说：“谁有天命，这皇帝的位子可以任意来坐，我绝不禁止。”如今竟担心别人做皇帝了，所以石守信便拿“天命”的话回敬他。

赵匡胤听了，故作不知，以前说过的话全当是忘了，继续道：“我知道你们不会对我有异心，但是谁能保部下没有人贪图富贵？倘若他们一旦昏了头，将黄袍强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虽不愿干，又有什么办法？”这明明是将以前石守信等人做过的事来挤兑他们。事实上，石守信等人以前虽曾做过逼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事，但赵匡胤带兵多年，是何等精明！自己若不愿意，有谁敢在军中胡来？直等到石守信等人闹到中军帐中，他始终“沉醉”不醒，装模作样，做作得已经过了头。当时无人揭破，他非但不心存感激，反而以为得计，皇帝自己来做，造反的恶名全都推给众人。如此无赖，天下少有。不过石守信等人此时已分辩不得：若说不是他们所做，“推戴”之功不是全泡汤了吗？况且恶名不由他们承当，反而推给皇帝，性命还想要吗？可恨的是赵匡胤占尽了便宜，这时又拿这事挤兑他们。本来可以回答说：“若不是你有天命，我们又如何能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一句话便可以搪塞过去。但石守信等人久为人臣，知道此事难以用口舌争。皇帝今日既绝口不提天命，必有“深意”，不妨听一听他的意思再说。于是又连连磕头，做出惶惑恐惧，以致因莫知所措而焦急涕零的样子，一齐说道：“臣等愚昧，想不到这一步。万望陛下慈悲，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赵匡胤要的正是这句话，于是直截了当地说道：“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转眼即过。忙忙碌碌，所为何来？不过是‘富贵’二字。富贵是什么？还不是要多积金帛财物，终生享乐不尽，而且使后世子孙，永不贫乏？既然如此，你们为何不解除兵权，选择一个繁华富庶的所在，去做藩镇。在那里可以多多置买些最好

的土地园宅，为子孙立下万世不动的基业，再多买上些歌儿舞女，终日借酒当歌，安度晚年，那是何等美事！我跟前有几个儿女，你们若不嫌弃，咱们可以结为儿女亲家。我从此不再担心你们会黄袍加身，你们也可以完全信赖我，咱们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该有多好！”石守信等人你望我，我望你，无话可说。每人追随赵匡胤已久，深知他的脾性。他既如此说，那是无法挽回的了。因此一齐拜谢道：“陛下为臣等想得这般周到，深恩大德，如同再造。臣等还能有什么话说？听凭陛下吩咐是了。”第二天，一个个都借故有病，请求罢职。赵匡胤自然恩准，而且每人离职，都重加赏赐。对每人的“疾病”，抚慰存问不绝。至于真病还是假病，自然是不加考究了，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七月初三日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治宋州，今河南商丘）；殿前都指挥使、义成军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治所为东平府，今山东东平），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治所寿春，今安徽寿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治濮渊郡，今河南濮阳）。都削去禁军职务，保留节度名号。据载只有石守信保持了侍卫都指挥的名号，其实兵权已经削去，只留了一个空名。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从此也永不授人。乾德元年（963）二月，赵匡胤想以天雄节度使（治魏郡，今河南安阳）符彦卿典领禁军，时赵普为执政，执意不同意，理由是符彦卿名位已高，不能再掌兵权。赵匡胤不答应，把批复符彦卿管领禁军的文件——“宣”，强发了下去，赵普将这份“宣”揣在怀中去见赵匡胤。赵匡胤已猜出其来意，说：“还是符彦卿的事吗？若如此你别来见我了。”赵普道：“另有别事。”将“别事”奏毕，才从容从怀中取出那份“宣”来。赵匡胤道：“果然还是为了此事。我既已批复，如何还没下发，难道敢违抗朕命吗？”赵普不慌不忙说道：“陛下既命臣处分政事，事有不便，理应向陛下区分明白。惟愿陛下把此事的

利害想清楚，免得以后悔之不及。”赵匡胤知他说得有理，又素知他的脾性，用三两句大言是吓他不倒的。无可奈何地说道："卿如此怀疑符彦卿，究竟为了什么？朕待彦卿不薄，彦卿岂能负朕？你尽管放心好了，朕是信得过他的。”赵普见已无转圜的余地，便单刀直入地说道："你确信符彦卿不会辜负你，当初周世宗不是也确信你不会辜负他？结果如何呢？世事有许多不可逆料，谁也不能一竿子插到底。要在早做提防，才不致措手不及。”赵匡胤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作罢。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当时的禁卫兵制没有废除，禁卫兵权总是要有人掌管的，不交给符彦卿、石守信辈，就要交给别人，石守信等人是赵匡胤的患难之交，结义弟兄，符彦卿的女儿是赵匡胤的弟媳，难道还有谁能比他们更可信任？赵普却不这样认为：可否信任在于势，不在于私情。势之所逼，虽父子兄弟不免篡窃杀戮；势不相及，虽寇仇不能为害。这里说的势是对功劳、地位、人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和概括。所以赵普力主解除以上诸人的兵权，另以新进掌握禁军。这样皇帝便安全得多。

赵匡胤于杯酒之间解决了宿将主兵这个问题，接着又要以同样的形式解决节度使的问题。不过当时天下还没统一，有许多事要仰仗节度使去做。赵匡胤深知：决不可操之过急，必须慢慢来，日砍月削，使节度使势力日减，然后一举便可成功。于是先从县镇着手。五代以来，节度使往往在属县委任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权力相同，凡公事有权直达于州，不必禀县令裁决。建隆三年十二月，赵匡胤按赵普的建议，下令中书门下省，于每县设置县尉一员，地位略低于县主簿，俸禄与主簿相同。原由镇将处理的盗贼、斗讼等公事，改由县尉和主簿处理。从此，县镇职事重又归于县吏。

乾德元年（963）春正月，始命以文臣知州事。五代以来，节镇这类武臣主州政，朝廷难以驾驭。每当须要将他们调移别处

时，先要委派近臣前往，委曲劝谕解说，再发兵护送新任州官前去上任。即使这样，仍然有抗命不遵，拒绝离任的事发生。如今改任文臣，便容易得多了。夏四月，又在诸州设立通判官，州中军政、民政，都有权处理。地位与知州相同，有事可直接上奏朝廷，不受知州约束。大州有的设通判二员。当时节镇大都兼知州事，设立通判，对他们自然是个很大限制。但是，非节度州却也不得不连带设立通判，使政出多门，职事不修。终宋一朝，流毒不尽。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记述仁宗庆历间，永兴军一府，有三名州官，以致“公吏往来”，“不胜其扰”，便是一例。这是赵匡胤始料所不及的。

不久，又下令节镇所属的支郡，直接隶属京都，政事得以直接奏闻朝廷，不再听命节镇。时符彦卿久镇大名府，政事一概委任牙将刘思遇，此人贪婪狡诈，仗势聚敛，一府收入大多进了私囊，符彦卿毫无觉察。又节度使收取租税，例由亲吏主持，大都于计量斛斗时做些手脚，多收的部分便被他们鲸吞。大名所在的镇宁节度尤为严重，老百姓不堪其苦。赵匡胤得知后，特意从朝廷中选派一名有决断、手段强的常参官到大名府为官，多收租的事才算杜绝。赵匡胤便以此为由，把选派朝官出任地方长吏，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从此，节镇在所属州县中的行政权大大削弱了。

乾德三年三月，又在诸路设置了转运使官，这也是针对节镇而设。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节镇多屯聚重兵，为维持军需，常将一路租税截留，只有极少一部分上缴国库。五代期间，更加肆无忌惮，派遣部曲、亲信，主持仓场税务；增收赋税，重敛百姓。赵匡胤早就知道这种弊病。建国后，应赵普请求，命州县估算所需经费，其余金帛钱谷，全部送交汴京，不许占留。每次逢镇帅出缺，朝廷便乘机派遣文臣主持该地的仓场税务。从此，一路财政都归转运使执掌，无论是节度使，还是团练、观察等使，

甚至是一州长官刺史，都不再染指钱谷等财利事。节镇财权从此收归中央了。

对于军权赵匡胤更为重视。建隆二年五月，命殿前、侍卫二司及诸州长吏检阅所部士兵，骁勇者晋升等级，老弱怯懦者作为剩员，给半俸，用作其他役使。以后又多次检阅，沙汰老弱。有沙汰便需有增补。乾德三年八月一日（戊戌），初命天下州县选择本部兵，骁勇者送到京城，补充某军缺额。一面在禁军中挑选强壮者作为兵样，分别送到各州，依样选择。后来改用木梃，按长短分作若干等级，称为“等长杖”。依等级分送不同军种。这样精锐士卒全被禁军吸收，州郡所余，多是老弱。又不加训练，渐渐地只能用作杂役了。还对禁军实行更戍法，轮流到边城戍守。你来我往，使不断奔走于道路之中，不得安处。表面说是要令战士习勤苦，均劳逸。实际是通过士兵的大轮换，使将、兵之间不能建立牢固的联系。军将不能得士兵的死力，便不敢铤而走险，发动军变。这样做固然减少了由于削弱镇兵造成的禁兵过盛、无法制遏的副作用，却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大为削弱，此后不得不改行将兵法，也是赵匡胤所始料不及的。

此外，节镇在辖境之中还有一项专杀权。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对宰臣说道：“自五代以来，藩镇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不敢过问，设立刑部还有什么用处？人命关天，是件大事，纵然姑息藩镇，也不该到这等地步。”于是下令：自今以后，诸州审刑，凡死罪定案后，必须将案情录送朝廷，由刑部审查后执行。

这样，自建隆到乾德末，数年之间，州县行政、财政、军政、司法诸大权都已渐归中央，由朝廷派文官（儒臣）管领。赵匡胤认为：“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然全都是贪赃枉法之辈，也及不上藩镇所干坏事的十分之一。”是否用文官治州县比用节度使这种武官更好一些，暂且不论。至少有一点可

以肯定，文官对皇帝的威胁比武官要少些，削弱藩镇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这期间，宋朝出兵灭掉了湖湘周氏、西蜀孟氏；吴越南唐也表求归顺，又对北汉频频出击，取得一些战役的胜利。解决节镇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开宝二年（969）十月，诸藩镇入京朝见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在后苑盛宴招待他们，饮酒正酣，赵匡胤从容说道：卿等都是国家的功臣宿将，戎马一生，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至今仍不辞辛苦，为国家居守大镇，使朕优待贤能的素志不能实现，朕心中着实过意不去。说到此处，赵匡胤稍微停顿一下，环视众人有何反应。正要再说下去，座中有一位凤翔节度兼中书令王彦超早已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要众将交出节镇兵权。环顾宴会中，知无一人能与天子抗争。既然如此，还是爽爽快快的好。于是离席说道："为臣本来没什么功劳，居此重任，都是皇上的恩宠。很久以来，心不能安。如今年已衰朽，万望皇上恩准我这把老骨头，回家园享几年清福，便是遂了我的心愿。"

正所谓响鼓焉用重锤敲，在座的谁也不是傻瓜，有赵匡胤方才那段话，又有王彦超这几句话的启示，立刻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回想一生，出生入死混到眼前这步田地，是容易的吗？杯酒之间就要交出兵权，变成普通百姓，如何能想得通？又都是武臣，最是受不了气、忍不得事的，立刻七嘴八舌，嚷嚷起来。谁也不去想王彦超为何这等豁达？原来后汉时，王彦超曾为复州（今湖北沔阳）防御使，时赵匡胤落难投奔他，王彦超不予收留。宋朝建立后，赵匡胤曾当面质问他：为何拒我于门外？王彦超慌怖异常，磕头解释说："复州是个小郡，杯水不能留神龙。要是收留了你，你怎会有今天？看来不收留你，是上天有意成全你今日的大业。"这一套奉承话说得赵匡胤十分高兴，没再计较。但是王彦超也从此萌生退志。赵匡胤一有此意，才立刻提出辞职。其他人与赵匡胤没有这番过节，心境便不相同。七言八语，一句

话是：不愿辞职。赵匡胤一旁听着，默然不语。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赞、安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人越说越觉冤屈，越说越是声高，争相夸耀如何攻战，如何历尽艰苦。赵匡胤再也听不下去，冷冷说道："都是前朝的事了，陈谷子烂芝麻，有什么可说？"众人听了，犹如当头一棒。的确，他们的功绩大多是前朝旧事，宋朝初建，他们立功有限。如杨廷璋、郭从义等人在征泽潞或扬州时虽然略有微劳，宋朝已给了他们高官厚禄，数年来，荣华富贵，享乐已多，还有什么可说？况且如石守信等人那样的开国大功臣，还不是一样的解除兵权？殷鉴不远，再说糊涂话非闹个灰头灰脸不可。

第二天，赵匡胤命众节镇全都留居京城，改任环卫官或其他散职；武行德为太子太傅，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等。原来的节度使职全都免除。其他未曾预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也相继罢任。据记载，保留兵权的节度大臣只剩下了潘美一人。并不是赵匡胤惟独对他网开一面，而是这潘美摸透了赵匡胤的心理。每次赴镇，都把妻子亲属留在京城，只带数名仆妾前往。妾或生子，必遣妾与子回京城居住，并奏请皇帝"多多关照。"赵匡胤既有人质在手，不怕他造反，节度使职自不必免了。被免职的节度使头顶着一个不管事的千牛、万牛将军，各自回乡，过起富家翁的日子来，有的二十多年不入京城，史家说这是赵匡胤"保全功臣"。功臣是否也自认为赵匡胤保全他们，那就无人能知了。还有的说他们回乡后安享富贵荣宠。这些暗噁叱咤的将军们生活中是否能容得下一个"安"字，却是大有疑问的。至少他们要按照赵匡胤许的条件，多置田产，多买歌儿舞女，用更地道些的话说，前者叫做"兼并土地"，后者叫做"买卖人口"，二者都是宋代法律所不允许的。宋人按身份不同只允许占有规定数量的土地，超过限制在前朝有的要没收归公，或者课以重税。如唐朝前

期就曾数次检括土地。宋朝就不行了，因为皇帝曾亲口许诺要他们多置田产，作为释去兵权的条件，如何好意思再翻悔？这样宋代经济制度中便有了一个异于前朝的大特点，叫做“田制不立”。以后成了造成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大因素，作为节镇释去兵权的代价，似乎也太昂贵了一些。但是，皇权巩而国家贫弱，与改朝换代而国家富强，二者相比，只怕任何一朝统治者都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而史家又众口一词地对此加以讴歌，这正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其实这是一个削弱地方权力的老问题，自汉以后一直在进行。地方权力太大，则尾大不掉，不利于封建集权统治；但地方权力太小，失去了对中央的辅翼、屏藩作用，危害也不小。唐安史之乱时，州县毫无抵抗能力，叛军长驱直入，就是一例。赵匡胤对此有极深的理解，作为以对“杯酒释兵权”的善后政策，对于某些关乎国防的节度使、防御使、刺史等地方官员，权力不仅不予削夺，而且要大大加强和扩充。如节度使赵赞屯延州，刺史姚内斌守庆州，通远军使董遵诲屯环州，防御使王彦升守原州，节度使冯继业守灵武，以上述五人防守西夏；防御使李汉超屯兵关南，防御使马仁瑀驻守瀛州，成德军节度使韩令坤镇守镇州，刺史贺惟忠守易州，防御使何继筠守棣州，以上述五人防守辽国；又有防御使郭进控扼西山，武守琪守晋州，都巡检李谦溥守隰州，昭义节度使李继勋镇守潞州，以此四人防北汉。在以上十四人防守的州军，凡应由国家专卖、专营的工商等业如盐、酒、茶的专卖，冶金、采矿等的专营，全部交给他们经营，听任自行贸易，而且命所过州县免于征税，每次入朝，赏赐又格外优厚。因而，这些人个个是腰缠万贯，饶于财富。能够募养死士，委派间谍，收买爪牙。敌方一举一动无不洞晓，作战时才能无往不胜。这正是赵匡胤在位期间，西、北边境无有忧患的诀窍。

后世的宋代皇帝，只知道祖宗“杯酒释兵权”的“伟绩”，

一意削弱领兵将帅的权力。忘却了祖宗“优宠”节镇的先例，以致贻害无穷。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说过：由于收节镇兵权，禁军没有统帅，靖康间召兵卒勤王，无人响应。响应者又无统一指挥，以致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南宋曾稍增将帅职权，但朝中大臣以祖宗故事为借口，每有异论。终于有秦桧削除三大将兵权的事发生，使宋人恢复的大业成为泡影。所以，“释兵权”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也许是必须的，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是功是过，却委实难以骤断呢。

（刘洪涛）

参考资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2《收兵权》
《宋史》：《石守信传》、《王彦超传》等。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
宋·王巩《随手杂录》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

平荆湖

“平荆湖”，荆是指荆南氏政权，湖是湖南周氏政权。高氏的割据始于后唐时的高季兴，被封为荆南节度使、南平王，治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地狭兵弱。宋初，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在位，史书说此人“性迂阔淹缓”，就是迂腐迟钝的意思。所以，把所管辖地区内的大小政事，全都推给他的胞弟高保勖。建隆元年（960）八月高保融去世后，自然政权落入高保勖手中。宋朝按惯例给他加了节度使的封号。受封号表示高氏承认是宋的藩镇，按期纳贡，境内事务仍由高氏专决。高保勖在辖境内搞得乌烟瘴气。他有两大毛病：一是淫逸无度。此人瘦弱多病，于色情事是没多大“能耐”的了。偏偏他的名堂多，每日召集许多娼妓到府中来，选择一些壮健士卒，混在中间，任凭他们胡闹，高保勖与众姬妾躲在帘后观看，从中取乐。二是好营土木工程，造台筑榭，无止无休。这二条都是古代帝王最忌讳的事，有其一足以亡国。高保勖兼而有之，那是非亡不可。可是算他幸运，建隆三年十一月就死掉了，时年39岁，距继任节度使才两年。接任高保勖的名叫高继冲，是高保融的长子。当时荆、归、峡三州老百姓对高氏政权怨声载道，宋朝出兵灭高氏是完全顺应民心的。

湖南的割据也是自后唐开始，时马氏据有湖南二十余州地。那时所说的湖南，包括今日的湖南省大部，以及广西、广东省的部分地区。后周太祖时，马氏被南唐所灭。世宗时，这地区的统

治权落人周行逢手中，为武平节度使，治朗州（今湖南常德）。而所辖地区除全州（在今广西境）外，已不出今湖南境，约有十州大小。周行逢为政公正勤勉，也比较俭朴，因而能得民心。但也有短处，就是性多猜忌，好杀人，以致夫人严氏不肯与他同居，独自在乡下务农。说："你如此嗜杀，必不能得民心，早晚有一天要大祸临头。在乡下比较容易躲过这场祸事。"所以，周氏的灭亡也有必然性。

总之，荆、湖地区的高、周二氏割据政权，地小力弱而无道，宋朝进行统一战争时，首先灭掉他们是顺理成章的。

建隆三年九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势垂危。弥留之际，把几位亲信将吏召到病榻前嘱咐说："我出身于一个庄户人家，与我同时做团兵又一起打天下的十人，因凶狠不大听话，几乎全被我杀掉了，唯有一个张文表健在。我死之后，文表必反。如今我把我的儿子保权托付给诸公，希望能尽心辅佐他。实在不得已时，可以举家归附宋朝，不可让他落入文表的虎口之中。"

周行逢死后，张文表果然叛乱。时张文表为衡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得知周行逢死，其子保权继位为权知朗州，十分生气，说道："我与行逢同样是自贫贱中挣扎出来的，一生不知立了多少战功，才混到这步田地。居周行逢之下，倒也罢了。周保权小儿有什么资格要我听命于他？"于是准备叛乱。

乾德三年十月，周保权派兵去永州，接替在那里戍守的士卒。路过衡阳时，张文表便胁持这些代戍的士兵发生叛乱，使每人身穿孝服，伪装成去武陵（即朗州，今湖南常德）奔丧。道经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廖简为知潭州留后，素来轻张文表。周行逢遗言中已明言张文表必反，却毫不介意。张文表带兵过潭州时，他正宴请宾客，部下呈报说："张文表率兵到城外。"廖简对座上宾客大言说："量他不敢入我潭州城，诸君只管痛饮。只要他走进城中一步，便生擒这小子给诸君下酒。"众人哄堂一笑，

宴饮如常。不久，张文表率兵直入刺史府，廖简已喝得酩酊大醉，见文表走来，急取弓矢。双臂乏力，已不能引满，只剩下了泼口大骂的力气。张文表将廖简连同十余名座上客全都杀死。搜出刺史印符后，自称权知潭州留后，并向周保权呈递文书，声明此事，还扬言要直取朗州，尽灭周氏。周保权派大将杨师璠率领朗州的全部兵马出战。时周保权才十四岁，出发前，哭着对杨师璠说："先父真称得上有知人之明，临去世说张文表必反，如今坟土未干，文表果然反叛。军府安危，就在此一举了。望诸君看在先父份上，多多费心。事情过后，我绝不会忘了诸公的好处。"小小年纪，说得有情有致，杨师璠也止不住眼中落泪。出来对军士说道："你们见过新继位的周大人的郎君吗？小小年纪，竟然如此贤德，真是天下少有。"当下把周保权的话重复一遍。军士也人人感动，士气大增，都要为少主出力报效。周保权仍担心事有不济，派使者分别向荆南、宋朝请求援兵。

十二月四日（丁亥），宋封武平节度副使、权知朗州周保权为武平节度使。

二十一日（甲辰），又命中使赵璲带着诏书到湖南调解潭、朗之间争执。告知张文表，若愿入汴京，朝廷可以接纳。同时命荆南高氏发兵帮助周保权。

乾德元年（963）正月七日（庚申），赵匡胤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行营都监。派遣使者十一人往安州（今湖北安陆）、复州（今湖北沔阳）、郢州（今湖北钟祥）等十州发兵，命会兵于襄阳（今湖北境），讨伐张文表。

起初，赵匡胤派遣卢怀忠出使荆南，临行前嘱咐他说："凡是江陵地方的人情世事，山川地形，我全都想知道，你务必留心，回来后向我报告。"已有出兵荆南的打算。卢怀忠如何能不理解？因此，出使回来就向赵匡胤报告说："高继冲甲兵虽然整

齐，数日不过三万人，年景虽好，收成不坏，而百姓赋税沉重，异常贫困。江陵东面与南唐相邻，南边有长沙周氏，西与巴蜀孟氏接境，三边都是强邻。北边更要向我朝纳贡称臣，四方受迫，又国小民贫。我看它所处形势已是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了。灭掉荆南，易如反掌。恰于此时，周保权请求出兵援助的文书来到，赵匡胤立刻在心中产生一个"假道灭虢"的行动计划。召见宰相范质，与他商议道："江陵四面皆敌，可说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如今我向它借道出兵湖南，回兵时，乘其不备，一举灭掉荆南。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九日（壬戌），李处耘辞行，赵匡胤便将这套计划告诉他，要他按计执行。

二十七日（庚辰），任命荆南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高继冲为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怎会知道，朝廷给他加官晋职的同时，一面张开的网正向他兜头罩来。

杨师璠讨伐张文表，开始时受些挫折。双方相持既久，朝廷与荆南出兵讨伐张文表的消息陆续传来，张文表部下军心开始动摇。张文表一面派人与朝廷使者赵璲解释说，他是率部下去朗州奔丧，路过潭州，受到廖简的轻侮，双方私斗才夺了他的潭州城，并不是要造反。一面急急出城挑战，想尽快结束与杨师璠之间的战事，灭掉周氏。朝廷失了正主，就拿他没有办法了。这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军心已经动摇，如何还能再战？果然被师璠打得大败，潭州失陷，张文表也做了俘虏。

再说赵璲听说张文表并未反叛，愿意归顺朝廷，心中大是高兴。以为此番出使，弭干戈于无形，功劳不小。先派人去潭州安抚张文表的将士，说自己随后就到。杨师璠兵入潭州后，纵部下焚掠。赵璲恰于此时来到潭州，对杨师璠兵很是不满。询问张文表现在何处，答说："在押"。赵璲命"少时带他见我。"杨部将士答应了。赵璲本身是来慰抚张文表将士的，见事已至此，总不能空走一趟。决定仍然大排宴席，不过慰抚的对象已改为杨部

了。也是这赵璲头脑有些不大灵便，时刻惦着自己的使命是来调解双方纠纷的，席间仍絮絮叨叨劝双方和解，全不想此时局面已根本不同，哪里还有和解可言？他的话早已使杨师璠部下将士担心。其中一个指挥使名叫高超，悄悄离席到外间对手下将士道："瞧赵中使的意思是要释放张文表，带他入京。倘若这狗日的在京城做了官，还不天天念叨我们的坏处？那时咱们朗州的弟兄还有活头吗？"众人议论纷纷。高超问："弟兄们说眼下怎么办？"一起答道："愿听将军吩咐。"高超道："好！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宰了这狗东西再说。"当下将张文表拉到市中心，零刀碎割而死。五代以来，士卒是暴横惯了的，将人凌迟处死，那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手软。更兼先已吃过张文表的亏，就有人将他边割边食，片刻间将一个活人割食而尽。宴会散后，赵璲要召见张文表，高超答说："张文表图谋脱逃，杀了看押他的几个士兵，被其他前来拦截的弟兄乱刀砍死。"赵璲只惊得目瞪口呆，没有话说。

二月一日（甲申），荆南高继冲得知朝廷要派兵讨伐张文表，大军通过荆南时，少不了有一笔花费。于是以"供应王师"为名，在境内加征钱帛，赵匡胤闻讯，下诏书禁止。

高继冲继位以后，自知年幼识浅，将境内的刑政赋役等事都交给节度判官孙光宪处理，军事方面的事情委托给衙内指挥使梁延嗣。对这二人异常信赖，常常对人说，只要事事能使孙梁二人满意，我就放心了。

李处耘奉命讨伐张文表，来到襄阳城，而慕容延钊正病魔缠身，既受命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无法动身。赵匡胤命人用轿子抬了他上路，此时也来到了襄阳城。李处耘先期派遣阁门使丁德裕，到荆南通知高继冲，大军讨伐张文表，要路过江陵，军中自备有口粮，只请他准备些柴薪、茶水就够了。高继冲召集府中僚佐商议，外军入境，历来为人所忌。僚佐们如何不知道其中凶

险？一致建议拒绝宋军入境。于是高继冲以“百姓惊恐”为理由，只答应在城外百里处招待大军，还说：不只供给薪水，连刍粮都已备齐。李处耘知道，这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说不定高氏对他的战略意图已有觉察。如此可就糟了。但又想到这是皇帝的意思，出自圣裁宸断，纵有艰难，也应坚决执行。于是派丁德裕二次前往，说服孙光宪、梁延嗣二人，务请他们允许大军借道。荆南兵马副使李景威私下对高继冲说道：“我们以这样优厚的条件款待宋军，只求他不入江陵城；而宋军宁愿放弃这些条件，也要路经江陵。宋军的目的已十分明白。假道收复湖湘只怕是幌子，灭我荆南才是真情。臣愿为此效犬马之劳，请主公给我三千人马，在江陵道上择一个险要去处埋伏下来，让他们插翅难以飞渡。同时，主公另派军马入湖南，生擒张文表，献给朝廷。那样，主公的功劳就大了。如若不然，只怕主公要有灭国灭族的大祸。”

高继冲听了，沉默不语。过了许久才犹豫道：“我家每年都向朝廷进贡，毕恭毕敬，不敢有半点差池，朝廷也许不会对荆南下手。况且，真要打起来，你我也不是慕容延钊的对手，他们纵然强要入江陵，怎能阻止得了，何必要说借道？如若他本无恶意，我等妄加猜测，搞得兵戎相见，岂不坏了大事？”李景威知他心存侥幸，难以理谕，就用天命鬼神说服他道：“咱们荆南地区故老相传：江陵各处总计有九十九个洲，一旦满百，就有王者兴起。武信王[①]初起时，江心深处就曾忽然生出一洲，成百数。近来此洲已渐见漂没，荆南气数将尽，可能要遇到大危难，实在令人担忧。这种时候如何能不加倍小心？”孙光宪一旁听了，对继冲道：“圣人不言天道。李景威只是生长峡江的一介草民，懂得什么天数，真是乱弹琴。以臣愚见，中原自周世宗时已经有统

---

① 指高季兴，谥武信，曾被封南平王、渤海王等号，故有此称。

一天下的意思。宋朝建立以后，各种措施、政策，无不规模宏远，与苟且为政者绝不相同。如今提兵南下，讨伐文表，可以说如以泰山压卵，必能马到成功。湘中平定以后，回师京城，岂有第二次向荆南借道的道理？必然顺势夺取江陵。荆南三州之众，怎是宋军之敌？与其这样，不如自以疆土献给朝廷，撤去境内巡逻的兵卒，查封府库，等待宋朝廷处理。如此不仅荆楚可以免除一场兵祸，主公也能不失富贵。"高继冲认为此话有理。景威见自己的主意不能被采纳，知道荆南不久就要灭亡，痛心已极，独自走出高继冲的节度府，仰天长叹一声道："全都完了。眼见乡土沦丧，我竟一筹莫展，真是愧对列祖列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想到这里，用双手扼紧自己的颈项，生生扼死。且不说该不该这等对待自己，这样的烈性汉子实是天下少有。

李景威死后，高继冲命梁延嗣和他的叔父高保寅，带着牛肉、烈酒前往宋营犒劳士卒，一面暗中观察宋军的意向。

九日（壬辰），宋军在荆门（在今湖北境）屯驻。李处耘会见梁延嗣等人，殷勤抚慰，礼数十分周到。并告诉他们第二天可先回江陵。梁延嗣等人大喜，暗想：宋军若有异谋，岂有不拘留他这样的荆南要人之理？看来以前是多虑了。于是命人火速驰归江陵，向高继冲报告喜讯说："一切正常，只管放心。"荆门距江陵约百多里路程，当晚，慕容延钊召见梁延嗣等人，在中军大帐中摆设盛宴，热情劝客。宾主互敬，觥筹交错，灯红酒绿，好不热闹。与此同时，李处耘亲率轻骑数千人，衔枚急进，真如兵法说的"其疾如风"，"侵掠如火"。百余里路程，顷刻便到。

再说高继冲自遣梁延嗣、高保寅入宋军以后，心中惴惴，倚门而望。直到得了梁延嗣的平安报告，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专等梁、高二人回来，这场大事就算平安大吉了。想到李景威把宋军来意说得如此可怕，当真好笑。正在胡思乱想，忽有亲随来报："宋军骑兵一支，直向江陵而来。"继冲闻言，好似是五雷轰

顶，惊得呆了。急忙吩咐人等，布置防务。自己先打马出城，迎接宋军，看能否把宋军挡上一挡，给城中多争取些准备时间。在距城十五里处与李处耘相遇，继冲策马而前，正要招呼询问，李处耘已到身边，马上一拱手道："高将军请了。慕容将军有事要与你商谈。他随后就到，相烦少等。在下要先行一步了。"高继冲正要出言拦阻，李处耘身后转出两人，其中一人伸手抓住他的马缰道："我领高将军去见慕容元帅。"另一人横身将高继冲与随从隔开。这时高继冲再说不去见慕容延钊，哪里能够。只见李处耘头也不回，率领将士入城去了。城中队伍尚未召集到一起，李处耘已登上北门城楼。直到日上三竿，慕容延钊才与大队一起缓缓向江陵而来。待高继冲回到江陵，各处街巷、要道路口，都已被宋军占据。不得宋将命令，在城中寸步难行。高继冲暗暗叫苦，想要不降，已不可能。只得把他荆南节度使的印牌符信等物取出交给慕容延钊，一面遣客将王昭济，将归降朝廷的事通知归、峡二州。至此荆南三州十七县地没发一矢，没交一战，全部投降宋朝。

十日（癸巳），宋军既收复荆南，捡择荆南三州兵中的勇健者，一起日夜兼程向朗州进发。周保权闻讯，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召见观察判官李观象商议，李观象道："前些时向朝廷请援，是为了讨伐张文表。如今张文表已诛，朝廷兵马不肯回朝，明摆着是要灭亡湖湘，占领这里的州县。以往我们之所以敢割据一方，靠的是北面有荆楚在，彼此唇齿相依，缓急间能相互照应。如今高氏已经降宋，朗州势单力孤，必不能独存。不如也像高氏一般，只身入朝，拱手听命。若然有幸，还能不失富贵。"周保权犹豫不能决。指挥使张从富等一帮武臣坚决反对，彼此商议抗击宋兵的策略。虽然都无必胜的把握，一人一言，人多智广，比起高氏君臣束手待毙已是高明得多了。

慕容延钊照例于军队到达之前，先派丁德裕入朗州安抚军

民，宣布朝廷的威德。所谓“文事济之以武，武事辅之以文”，慕容延钊的确不是凡庸之辈。只此一招已令朗州君臣不知所措：让丁氏入城，必人心瓦解，丧失武备；不让入城，等于公然与朝廷为敌，以后慕容延钊诉诸武力，便是出师有名。众人各执己见，议论纷纷，还是众武臣占了上风，张从富等人拒绝丁德裕人城，尽拆境内桥梁，凿沉船只，伐木塞路，到处布满鹿角、拒马等路障。宋军再想像在荆南那样长驱直人，已完全不可能。丁德裕不敢擅作主张，先行退回，等待朝命，再定行止。慕容延钊早已将这里的情况飞报入朝了。

十七日（庚子），慕容延钊处理荆南事务的表章送到京城，赵匡胤仍然任命高继冲为荆南节度使，增派枢密都承旨王仁赡为巡检。高继冲官号、俸禄虽不变，权力已转归朝廷命官王仁赡了。二十八日（辛亥），又加封原高氏诸臣：梁延嗣为复州防御使，孙光宪为黄州刺史，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又听说李景威拒降自杀，死得极为悲壮。很是感动道：“这是个忠臣。”命王仁赡到江陵后，从优抚恤他的家属。这在赵匡胤是有意劝勉部下，为主尽忠。但如梁延嗣那等降官降将，不知又作何想？

赵匡胤得知湖南情势后，遣使劝谕周保权和他的众将校说：“本是你请我发兵，我才派将士来解救你的危难。如今张文表虽诛，我对你总算有恩。大军已发，难道你连入境也不让吗？如此薄情，将士一怒，是你自取祸患。可怜的是湖湘百姓也受牵连，你要三思才是。”周保权已被身边武臣挟制，这些话便不生效验。赵匡胤不得已，下令讨伐。慕容延钊先命战棹都监武怀节等分兵攻岳州。在三江口一战，湖湘兵大败。宋军俘获战船七百多艘，杀敌军四千多人。接着攻陷岳州。

三月，张从富军在澧州城南与宋军遭遇。未曾交战，张军已望风而逃。李处耘挥兵追杀，追到敖山寨，张军又弃寨逃走。不及逃者都做了宋军的俘虏。李处耘命于俘虏中挑选出数十名身体

肥胖的，一起上笼蒸了，让士兵分食；年少力壮的全都在脸上刺字后放回朗州。这批人入朗州后逢人就说：宋军如何把人捉了分吃。直讲得人人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守城，一起纵火将城中房屋烧了，驱赶老百姓向深山谷中逃去。

十日（壬戌），宋军入朗州，在西山下活捉了张从富，将他斩首示众。另一名将领汪端保护着周保权和他的家属从朗州城逃出后，藏匿在沅江南岸的一所僧舍中。李处耘得知消息后，遣麾下将领田守奇前往抓捕。汪端只身逃走，田守奇将周保权捕回营中。这样周氏灭亡，湖南地十四州、一监，共六十六县全部归顺宋朝。

湖南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在这一带，那时统称为蛮。其实有僚族、瑶族、苗族等，种类很多，时常骚扰边郡。周行逢统治湖南时，用的是笼络政策，遍封诸洞蛮酋长为司空、太保等号。有人讥笑他境内"司空满州，太保遍地"就是指此而言。赵匡胤平定湖南后，急欲寻找一个通晓蛮情，熟悉这一带地形、有勇有谋的人，管理这些地区。后来得知有一个瑶族人秦再雄，身高七尺，勇健多谋，为蛮人所信服，周行逢统治时就屡立战功。赵匡胤把他召到京都，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知道此人确是大有用处。便任命他为辰州（今湖南沅陵）刺史，允许他自己选择、委任刺史诸佐官，一州租赋也全归他使用，又赐给许多物品。秦再雄感激涕零，表示誓死报效朝廷。到辰州任所后，便每日训练士卒，得到精兵三千人。史书形容说他们"捷如猿猱"，历山险如平地。又亲自选择二十名校官，分别到各溪洞中传达朝廷要他们归顺的意思，洞酋信任秦再雄，便听他劝告，纷纷向朝廷写了降表。赵匡胤特意把秦再雄召到京都，面加奖励。改任他为辰州团练使，负责辰、锦、溪、叙、巫等五州地区的治安。秦再雄尽心尽力，使五州地方不增一卒，终太祖赵匡胤一朝，这地区不出边患。虽说是由于秦再雄武勇有

谋，赵匡胤任人有方也是极重要因素。

平定荆湖为宋朝灭西蜀、南汉、甚至南唐奠立了基础。

（刘洪涛）

参考资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上》、《湖南周氏》、《荆南高氏》。

欧阳修《新五代史》：《楚世家》、《南平世家》。

王全斌伐蜀

自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十一月乙亥王全斌率兵离京，到乾德三年正月庚辰西蜀孟氏奉降表入宋营，宋军灭蜀首尾共用了66天，是宋朝统一活动的一次重大胜利。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曾对皇弟赵光义谈起他对统一过程的设想说："中国自五代以来，战争连年，祸乱不断。搞得国家穷困，库藏空虚。要统一中国，必须先灭西蜀，再取荆广和江南，得到蜀中和江南财富，然后才能对契丹这个大敌作战，收复燕云十六州。"此后虽然他大致是按这个战略决策行动的，只是世事常常出人意料，建隆三年（962）武平节度使周行逢去世以后，发生了张文表叛乱，宋军不得不首先出兵荆湘。乾德元年荆湘叛乱既平，赵匡胤便着手准备灭蜀了。

蜀中皇帝孟昶于明德元年（734）即位，此后不久契丹兵南下，中原连年旱灾、蝗灾，民不聊生，国力虚弱。孟昶便以为天下惟蜀中强大。从此日渐奢侈、骄纵起来。任用王昭远、伊审征、韩保正、赵崇韬掌管机要，统理军政大事。孟昶的生母李氏原是后唐庄宗宫内的宫女，赏赐给孟知祥后随孟知祥一起来到蜀中的，不但熟知后唐政事，又亲眼看到孟知祥经略蜀中的经过，对孟昶说道："我曾见庄宗和你父灭梁、定蜀，那时主持军政的官职，除非有功者不授，所以士卒对他们人人敬畏、服从。如今你任用的这些人，王昭远出身贫贱，不过是你幼时身边的一个杂使役；审征、保正等人也都是世胄子弟，在福中长大，从不知

兵。一旦边境吃紧，这些人能有什么智略？靠什么去退敌？依为娘看，高彦俦是跟随你父办事的旧人，秉性忠实，为人正派，经历的事也多，缓急只怕更有用一些，应该多加委任才是。”孟昶不听。

宋兵平定湖湘以后，蜀中宰相李昊对孟昶说道：“臣见宋朝建立以后，所作所为与后汉、后周都不相同。统一天下的大任，说不定会由它们完成。不如早向中原述职纳贡，这是使蜀中安定的一条良策。”孟昶欲接受他的建议，王昭远坚执不肯，极力阻止。于是决定在峡州一带屯驻重兵、增加水军，截断入川的通道，防止宋军入境。赵匡胤得知后，认为伐蜀的事已刻不容缓，时日愈久，蜀中准备愈充分，等到根基一成，就更难摇动了。首先委派华州团练使张晖为凤州团练使（治所在今陕西凤县），措办伐蜀的诸项准备。张晖到任后，将蜀中虚实、各处地形险易，一一调查清楚，上报朝廷，赵匡胤大喜。

这期间蜀山南节度使张廷伟向知枢密院事王昭远献策说：“枢公久在皇帝身边，皇帝知公大才，破格录用，使掌管军政大权。虽然皇帝的信任是不会错的，如公久居高位而功业不立，以前又没有为国建立过什么大功勋，如何能塞得住众人悠悠之口？那时，各种闲言碎语一起向公飞来，纵然皇帝有心保全，恐怕也不能够了。如今不如与北汉通好，请他们发兵南下；咱们以全蜀自黄花（在陕西凤县北，今为镇）、子午谷（今长安县南，为入汉中通道）出兵响应，使中原腹背受敌。那时，崤函以西（今河南灵宝以西）的土地将不难占有。”这王昭远原是成都东郊一处寺院的僧童，孟知祥饭僧时见他聪明伶俐，便留下来作为儿子孟昶的小伙伴。孟昶即位后，封他为卷帘使、茶酒库使等官，仍然是替他管些杂事。如今骤然用作枢密要职，常常担心别人瞧他不起。张廷伟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他的心事。他就说服蜀主孟昶，派遣赵彦韬等人带着蜡丸书，秘密进入北汉境，与北汉商议共同起

兵的有关事宜。谁知赵彦韬直入汴京城，将蜡丸书献给了赵匡胤。

赵匡胤自决定伐蜀以后，密切注视蜀中动静，以选择最有利的出兵时机。军中派出的密探每次自蜀还朝，赵匡胤都要亲自召见，详细询问蜀中发生的任何事情。有一个密探曾说：听说成都近年来满城都在诵读朱长山的《苦热诗》，其中有两句："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最是上口，人人能诵。赵匡胤听了，喜道："这是蜀中百姓苦于孟氏暴政，希望我出兵讨伐，前往解救他们。"又有一人名叫穆昭嗣，是荆南高氏的御医，宋军灭荆湘以后降宋。赵匡胤命他为翰林医官，数次召见他询问蜀中地理情形。穆昭嗣说道："荆南就地势说，犹如是西川、江南、广南的都会。如今皇上已克荆南，水路、陆路都能入蜀。"赵匡胤听了很是高兴。这一次又得到赵彦韬所献蜡丸书，哈哈大笑道："我正愁出兵无名，孟氏自己送到刀口上来了。还有什么话说？"次月十一月二日（甲戌），便派兵点将，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步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职，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此一路由北路入川。另以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从东路入川。各领步兵、骑兵三万人，两路合六万人。又以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操办北路军需；以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筹措东路军需。因蜀中军士多是北方人，于是，发布文告，劝谕他们早日弃暗投明。有能为大军向导、供给粮草、率众投诚、举城归降等项者，从优升赏。下令宋军所到之处，不得焚烧房屋、殴打抢掠百姓以及掘人坟墓、砍伐桑枣等，违令者按军法从事。赵匡胤料定此次大军一出，蜀主孟昶必降。下令在宫城右掖门以南，临汴水建造房屋五百多间，室内装修、家具，一应用物，全都配备齐全，说道："听说孟氏家族庞大，人口必多，入京后不要令他心有不足。以

后南唐李氏、吴越钱氏归降，也都一例对待。”

十一月三日（乙亥），王全斌等人辞行，赵匡胤在崇德殿设盛宴为他们饯行，按诸将官职等级分别赏赐给金带、玉带、衣服、绢帛、鞍马、军器数目不等，又颁给王全斌等人军用地图及入蜀方略等画图。席间问王全斌道：“卿以为这次出兵，前境如何？”王全斌庄严回答道：“臣等仰仗天子威德和神机妙算，西蜀克日可定。”部将中有一个右厢都指挥使名叫史延德，上前说道：“那西川要是在天上，咱们是没办法了。只要它是在地上，咱们就有法去，去了就能把它平定，天子爷只管放心是了。”诸将听了纵声大笑。赵匡胤对他的一腔豪气颇为欣赏，口中嘉奖不止。又对王全斌道：“凡攻陷城寨，只须将器甲、刍粮登记入册，其余金钱、布帛，全都分赐将士，不可吝啬小气，朕所欲得到的仅仅是蜀中这块土地。”王全斌等人一一答应了，拜别上马，率领大军，铿铿锵锵，向西而去。

十一月三十日（壬寅），蜀主孟昶得知宋军分两路入川，也调兵遣将，分别迎敌。以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左右卫圣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都监，山南节度使韩保正为招讨使，洋州节度使李进为副招讨使。孟昶对王昭远说道：“宋军来伐，全是你招惹的结果。如今你一定要尽力，为朕立功。”王昭远满口答应。出发那一天，孟昶又命宰相李昊等一帮大臣到城外饯行。只见王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三军，洋洋洒洒，意气风发，好不兴头！王昭远平时好读兵书，自以为足智多谋，常以诸葛亮自比。这此统兵出征，满朝文武为他送行，自是喜动颜色。饮酒半酣，借着三分酒力，卷起袖子大言说：“这次出征，本帅不只要阻宋军入川。还要率领麾下这二三万雕面恶少年进取中原。说什么汉军矫捷，宋军勇猛，统统不在话下。在本帅看来，取天下易如反掌。”

自古说“入蜀两条路”，一条是北路自陕西入川，经凤州、兴州（今陕西略阳），过剑门关（在今四川北）达成都；另一条

是东路由湖北沿江入川。路侧绝崖上各有一条木栈道，凌空盘曲，其险无比。仁宗时有一个举子作诗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蜀中别是一乾坤"。可见这两条通道何等重要。

先说北路宋军在王全斌率领下，十二月十九日（辛酉）连拔蜀军数座营寨，接着攻陷兴州城。败敌兵七千多人，缴获军粮四十多万石。兴州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在今四川境，地舆不详)。王全斌又连下二十多寨，一路追将下来。

蜀招讨使韩保正得知兴州陷落，将山南军寨全都弃了，也撤到西县。宋将史延德此时已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又领了先锋印，率军首先赶到西县城下。这韩保正是个纨袴子弟，见宋军戈戟如林，先已怯了。遣兵万人出城，依山结营，与城中守兵成犄角之势，自己缩在城中不敢出战。史延德先将城外兵击溃，然后挥兵攻城。城破，生擒韩保正和副招讨使李进，得军粮三十多万斛。后继到来的宋将崔彦进与马军都监康延泽提兵追杀溃逃的蜀军，直追到嘉川城（今四川广元东）下。百余里间碧血如云，积尸成丘，蜀军被杀无数。蜀主命烧绝栈道，退保葭萌县（今四川昭化)。

东路宋军在刘光义[①] 的率领下，进入峡路（长江三峡通道）以后，接连夺取了蜀军的松木、巫山诸营寨，杀蜀将南光海等。蜀兵被杀约五千余人，还活捉了蜀军的战棹指挥使袁德宏及士兵一千二百人，夺战船二百多艘，斩杀和俘虏水军六千多人。起初，蜀军在夔州锁江架设一座浮桥，桥上设敌棚三重，可遥望数里江面。夹江于两岸架炮石，封锁江面。宋军出发时，赵匡胤取出地图，指着此处对刘光义说："我军乘船溯江而上，行到此处，切不可以舟师争胜，否则死伤必多。可先用步兵、骑兵逼近浮梁，将岸上守敌击退以后，再以舟师夹击，敌军必败无疑。"刘

① 《宋史·曹彬传》作刘光毅，是避太宗讳，今改。

光义率舟师来到此处后，按照赵匡胤所授方略，在离锁江三十里处舍舟登陆，沿两岸前行，夺取浮桥。然后牵舟而上，来到白帝城下驻扎。守城的宁江节度使高彦俦对副使赵崇济、监军武守谦说道："宋军从远道涉险而来，利于速战。我军应当坚壁不出，待宋军疲敝，然后寻找机会破敌。"武守谦道："敌军已来到我们城下，不出击还等待什么。"十二月二十六日（戊辰），武守谦独自率领麾下千余名士兵出城迎敌。刘光义遣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引兵与战，双方在猪头铺对阵。武守谦败走，仓皇逃回城中。张廷翰尾随追击，乘机一鼓作气登上城头。高彦俦连忙整众出战，但是张廷翰的士卒已经入城。高彦俦拼命厮杀，不能取胜。身上负伤十余处，左右随从士兵都已四散逃走。高彦俦不得已奔入节度使府。节度判官罗济劝他乘宋军大军尚未入城，单骑突围到成都去。高彦俦叹息道："以往我守秦川，战败后弃城而去。如今又不能守，纵然皇帝不加重罪，我有何脸面再见蜀中父老？"罗济又劝他降宋，高彦俦道："我全家老幼百余口人都住在成都，如若降敌，岂不是送了全家人的性命？到了这步田地，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说完将兵符印信一齐交给罗济道："你是降是逃，自己拿主意吧。"待罗济出屋，反闭房门，将衣冠穿戴得整整齐齐，向成都所在的方向跪倒行礼毕，登上楼顶放火将房屋点着，自焚而死。数日以后，刘光义等人从灰烬中寻到他的遗骨，念在他是一条汉子，以礼安葬。

北路宋军由于蜀人烧绝栈道，一时无法行进。商议分兵而行：一路绕行罗川险隘，一路修复栈道，双方在深渡会兵。然后一路破敌，到大漫天寨，俘虏了寨主义州刺史王审超、监军赵崇渥以及三泉监军刘延祚。蜀军都统王昭远、都监赵崇韬引兵来战，三战三败。王昭远不得不率军逃回剑门。十二月三十日（壬申），王全斌率领宋军进入利州城（今四川广元），得军粮八十万斛。

宋朝廷命西川行营发布文告：被克复州县中的原伪蜀官员和将士，若有逃匿民间者，限一月内自首免罪。

这一月汴京城中连降大雪，天气奇寒。赵匡胤在讲武殿处理政事，门、窗、墙壁都挂上了毛毡制成的厚厚帷幔。赵匡胤身着紫貂裘，头戴貂皮帽，火盆中炭火熊熊，仍觉双手冰冷。忽然若有所思，对左右随从说道："我穿这些衣服，还觉寒冷，西征将士冲霜冒雪，怎能禁受得了？"于是把紫貂裘帽全都脱下来，派一名小太监用包袱包了，立刻赶到西川前线去，赐给王全斌。并转告他说："朕只此一套紫貂裘，诸将不能人人都有，朕心中实在过意不去了。"王全斌设大礼跪拜以后，接过貂裘，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中，不由得心中感动，泪下如雨。

乾德三年正月初二日（甲戌），宋朝廷命令：阵亡的蜀中将士，由所在地的宋朝地方官负责收殓埋葬，不能让他们尸骸暴露在外。宋军将士受伤的，由主帅发给缯帛，表示慰抚。

蜀主孟昶得到前线传来的噩耗：王昭远战败，退守剑门。心慌意乱，决定以重金招募士兵去守剑门，并命太子元喆到前线去当领兵元帅，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前武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张惠安二人为副元帅。共募得带甲士兵万余人，为了壮大声势，军中旗帜都用绣花绸制成，连旗杆也用文锦包裹了。本来应是衣甲鲜明、旗帜光亮，很有生气的一支队伍。谁知天公不作美，临出发突然落了一场雨，元喆怕旗帜被雨淋湿，命令把旗子解下来。队伍行了一程，雨霁云收，又命重新把旗子挑起来。行军途中，匆忙之间竟有不少人把旗子穿倒了。挑在空中，旗上花纹、文字都朝下，呼啦啦地随风飘动，倒也别致。旧史家以为这是兵败的一个坏兆头。其实真正的坏兆头是元喆本人的纨袴子弟作风。这次出发，他不但把所有姬妾都带在身边，还把唱曲的、演戏的乱七八糟数十名伶人编成队伍，随军而行。一路吹吹打打，见到这番景象，无人不暗暗耻笑。

再说王全斌率大军自利州城逶迤前行，到剑门关前不远名为益光的地方安下营寨，策马前往察看地形。见这剑门关两侧奇峰插天，中间只有一线可通，果然险峻。当晚召集诸将，商议破敌策略，说道："剑门天险，自古以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真是名不虚传。诸位将军有什么破关的妙策，不妨说出来让众人参详，若果然可行，也是奇功一件。"议论半日不得要领。这时末座一个侍卫司的军头名叫向韬的，起身说道："降卒牟进曾经说过，从益光向东翻越几重大山后，有一条很窄的山径，当地人称为来苏道。顺来苏道南行有一条江流，水不太深，对面西岸有蜀军的一座营栅，涉过江流后继续南行到青疆店与官道会合，青疆店已在剑门关南二十余里。到了这里，什么剑门之险就全无用处了。但不知这牟进说的是真是假，请元帅定夺。"王全斌听了大喜，说道："就让牟进领路，多派几个人盯紧他，量来他不敢撒谎。"当下计议已定，从数万军中挑选出轻兵一支，由史延德率领，直奔来苏道而去。大军留在原地佯攻，约定轻兵到青疆后，回兵与大军夹击剑门。这支轻兵果然顺利到达青疆，王昭远闻讯，急忙亲率蜀军出剑门南行，到汉源坡（今四川剑阁东）驻扎，欲在这里狙击宋军，只留偏将一员守关。哪知还没走到汉源，宋军已经攻破剑门关。王昭远听到这个消息，两腿颤抖，连道也走不动了。宋军很快追到汉源坡下，双方排开阵势，宋军见王昭远斜倚胡床之上，暗暗纳闷。他时常自比诸葛亮，诸葛亮临敌是坐四轮车的，他怎么坐胡床？而且歪歪斜斜，全没个坐模样？原来王昭远见宋军布阵严整、气势猛壮，自料不敌，早已吓得瘫了。倒是赵崇韬不含糊，跃马出阵，一场厮杀，赵崇韬兵败被俘。王昭远见势不对，早已不学诸葛亮，改学关云长败走华容道了。悄悄脱去盔甲，丢了兵刃，落荒而走。王全斌率军一路追击，杀蜀军万余人，一口气拿下了剑州城（今四川剑阁）。王昭远逃到东川（今四川东部），藏在民家一座仓房中，想到数

月之间，全军覆没，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该怎样打发？不自禁涕泪长流，直哭得天昏地惨，双目尽肿。但雅人总归是雅人，一边哭，还一边不住口地吟咏罗隐的诗句："运去英雄不自由"，"运去英雄不自由"……。不久就做了宋朝追兵的俘虏。

太子元喆与李廷珪等人率军前行，好在有姬妾陪伴，又有数十名伶人随行，一路吹拉弹唱，左拥右抱，倒也不算寂寞。那就索性缓缓而行。走到绵州，听说剑门已破，这才慌了神。打算退保东川。到第二天，听说宋军已到东川，知道再"缓缓而行"，免不了要做俘虏。便丢下军队，率领若干亲信，日夜兼程逃回成都。一路见房就烧，庐舍仓廪，全都付之一炬。

蜀主孟昶听说剑门已失，太子逃归，惊慌不知所措，连忙召集左右人等，询问有何计较。有一名老将石奉頵说道："宋军远来，必不能持久。不如调集军队，坚守成都。宋军日久自敝。"孟昶听是这样一条计策，不禁凄然，说道："我父子守蜀，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如今遇敌，不能为我向宋兵放上一箭，砍上一刀，却要我闭门守城。即便我依了这计策，到时是否有人为我拼命守城，还真叫人把握不定呢。"宰相李昊因劝孟昶封闭仓库，投降宋军。孟昶只好应允，因是李昊出的主意，即命李昊起草降表。当日写了，正月七日（己卯），派宣徽北院使伊审征将降表递交到宋营中去。事也蹊跷，当初前蜀灭亡时，向孟知祥递交的降表，就是李昊起草。如今后蜀孟氏灭亡，降表又是李昊起草。蜀人以为滑稽，便乘夜在李昊家大门上题下一个响亮的字号："世修降表李家。"成都人传为笑谈。

正月八日（庚辰），宋朝廷得知孟蜀已降，下令蜀中，宋军行营所经过的州县长吏，亲奉牛酒，犒劳将士。

正月十三日（乙酉），王全斌在魏城（今四川绵阳东北）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一面派遣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火速入朝奏捷，一面遣康延泽率百余骑兵赶赴成都会见蜀主，安

抚成都军民百姓。康延泽在成都三日后返回军中，一切顺利无阻。

再说东路军刘光义等人从夔州向西进发，一路所过万、施、开、忠（都在今四川境）等州刺史都开城投降。来到遂州（今四川遂宁），知州陈愈也开城投降。刘光义打开府库，将金银钱帛全都分给将士。原来，根据五代以来的旧例，士兵攻下敌方一城一镇，必纵兵屠戮百姓，抢掠财物。东路军入川后也要循例杀掠，曹彬严令禁止，才免去了川中百姓的一场场血光之灾。只是不杀不抢就阻断了将士发财的门路，将士千里赴敌，也是不易，不可太令他们失望。于是根据赵匡胤当初的许诺，到遂州才打开仓库，使将士发上一笔大财。赵匡胤听说东路兵始终秋毫不犯，纪律严明，十分高兴，说道："当初选将选对了。"特意颁发诏书给曹彬，着实夸奖勉励了一番。

正月十九日（辛卯），王全斌率北路宋军来到成都郊外的升仙桥，孟昶按亡国之君的礼仪，就是脱光上衣，用绳子缚了双手，再在背上插根荆条，跪着走进军门，向宋军请罪。王全斌以朝廷的名义给他松绑，免去罪过。孟昶又派他的胞弟保宁节度使、雅王孟仁赞到汴京向朝廷呈递表章，请求宽恕和优待。

正月二十四日（丙申），田钦祚回到汴京，奉上孟昶的降表，其中请求对他祖先的坟庙和老母多加关照。赵匡胤命人写了回答的诏书，对孟昶的请求一一应允，并命令原西川的兵将、官吏和百姓安静如恒，不可自相惊扰。

正月二十五日（丁酉），在蜀境内宣布大赦，免除百姓拖欠的官税，减少租税，降低盐价、赈济贫乏、访求逸民等等，诏书一道接着一道，无非是宣布德政，使蜀中百姓有一个改天换地的印象。宋朝灭蜀后得州 46 个，县 240 个，百姓共 534092 户。

自王全斌入成都，数日后刘光义率领的东路军也到达成都城。孟昶按照对待北路军的礼数对待他们：给将士送礼，犒赏士

卒的规格全都相同。不久朝廷诏书又到，对诸军颁赏，两路军也都一例对待。这样，两路军由于争功，矛盾就产生了。

北路将帅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在蜀，昼夜饮酒作乐，把军政事务全都抛在脑后。怂恿部下将士，四出抢掠子女、劫夺财物，蜀中百姓叫苦连天。曹彬屡次请求撤兵回汴都，王全斌如何肯听？这样的日子只怕一世再也遇不到第二次了，怎能不多乐几日？

二月二日（癸卯），朝廷派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二人都是很强干的官员，到任时，征蜀将士自恃有功，胡作非为，王全斌已无法管束。蜀中百姓到处揭竿而起，与宋官兵周旋。一日，成都药市刚刚开始，管理集市的官吏报告说：有一名宋军军校喝醉了酒，持刀抢夺商人货物。吕余庆命人立刻将军校逮捕杀头。军士从此才有所收敛。冯瓒到梓州不几天，遇到原蜀军小校上官进纠集逃亡的士兵等三千余人，又驱赶村民数万人，乘夜攻城。城中只有三百守兵。冯瓒命将城门闭了，分兵把守。攻城的人数虽多，一时却也攻不进来。冯瓒见这些人手持木棒，知道是乌合之众。乘夜来攻，是想抢劫一通，并无斗志，天明必散。因悄命更夫在城头报更时，将更次缩短。不到半夜，已报了五更。城下听到更鼓，以为天色将明，必有援军来到，各自散去。冯瓒纵兵追赶，擒获上官进，斩首示众；又招降千余人，赦免罪过，命复业为农。成都、梓州百姓多亏了这两位地方官才安定下来。

二月十九日，孟仁赞到达汴京，呈上孟昶的表章。赵匡胤知他投降后仍有许多顾虑，重又下了一道诏书，申明优待条款。诏书用语十分客气，对孟昶不直呼其名，称昶母为国母。命孟昶尽速起程入京，一面命沿途增置驿站，多备驿夫舟船，妥善运送孟氏的随身行李。又下令入川任职的文武官员，不许携族眷同行，随从仆使也要预先在枢密院登记，发给文卷后，才能起身。目的

是怕滋扰蜀中百姓。他怎知蜀中百姓所受滋扰已经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起初，朝廷命投降的蜀兵入汴京，每人从优发给衣装钱，作为沿途花费。王全斌等擅自减少衣装钱，又怂恿兵士将已经发放的数目少得可怜的衣装钱抢回，蜀军人人愤怒。三月，归京的蜀兵走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已忍无可忍，便一起造反。抢劫附近县城，人数多达十余万，自称“兴国军”。适逢文州刺史全师雄携着亲眷入京，路过绵州。此人曾经带过兵，在蜀中名声不错。遇到这次叛乱，他本人生怕被卷进来，家眷也不顾了，只身逃走，在民间隐藏起来。不料还是被叛兵搜出来，强推为帅。王全斌闻讯，派遣马军都监朱光绪带领七百名骑兵前往招安。朱光绪到绵州后，将全师雄的亲眷全都杀死，只有一个爱女被强占为妾，又将他的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全师雄愤怒已极，至此已无路可走，决心与官兵周旋到底。先率众攻绵州，不胜，转攻彭州（今四川彭县），州都监李德荣战死，刺史王继涛负伤逃往成都。全师雄占领彭州后，成都周围十县起兵响应。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开设幕府，设置官守；派出二十多名节度使，分治灌口、导江、新繁、郫县、青城等县的要害地区。崔彦进与步兵都指挥使张万友、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通事舍人田钦祚等分道攻讨，被全师雄军击败，高彦晖战死。王全斌又派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步兵都监张煦前往，同样大败而还。宋军退保成都。全师雄势力更盛，分兵把守绵州、汉州（今四川广汉），截断成都通往汉中的阁道，要使宋军匹马无归。还沿泯江设立营寨，声言进攻成都。从此邛、蜀、眉、雅、陵、简、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七州都起兵响应全师雄，与京城的联系也被切断，王全斌才害怕起来。当时城中还有降兵近三万人没有发遣，暂屯于大教场中。王全斌担心他们也响应全师雄，先移入内外城之间的夹城之中，准备全部杀掉。康延泽建议，选老弱

有病者七十多人留在城中，其余按朝廷命令，以重兵护送，沿江东下入京。全师雄若于中途劫夺，或者有其他意外事发生，当即杀掉，也不为迟。王全斌不听，四月一日（辛丑），这批无辜的冤魂便全都升天了。

起初，赵匡胤派遣使者到江陵迎接孟昶，五月十五日（乙酉），孟昶一行到达京都，皇弟赵光义到郊外玉津园迎接慰劳。十六日（丙戌），赵匡胤在宫门前盛陈兵仗，以显示他大宋天子的兵威，孟昶与弟仁赞，子元喆、元珏，宰相李昊等共 33 人，身穿罪人的素色服装，在明德门外等待皇帝降罪。赵匡胤下诏书赦免他们的罪过，赐给成套冠服将身上素服换了，在崇元殿以礼接见他们，赏赐颇为优厚。

六月五日（甲辰），封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封其长子元喆为泰宁节度使，伊审征为静难节度使。九日（戊申）又封昶次子元珏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其弟仁赞为右神武统军，仁裕为右监门卫上将军，仁操为左监门卫上将军；李昊为工部尚书等。

十一日（庚戌），孟昶死，时年 47 岁，距他向宋军递降表首尾才 152 天。赵匡胤为表示哀悼，停止五天不升朝，追封他爵为楚王，赠给官号为尚书令，议谥号为“孝恭”，给布帛千匹为赙礼，丧事一切用度由官府供给。昶母李氏数日后也死掉了。起初李氏随孟昶入朝，赵匡胤命人用宫廷中使用的轿子抬入宫中，行走由宫嫔扶持，赵匡胤亲自为她斟酒，安慰说：“要把心放宽，不要思念乡土，过些日子就送你回蜀中去。”李氏道：“妾家原在太原，若能准许我回太原，死也心满意足了。”当时北汉未平，太原在北汉刘钧手中，赵匡胤久有灭北汉的打算，如今听李氏这样说，以为是个好兆头，心中大喜，说道：“待平定刘钧，立刻送你回去。”又赏赐给她许多财物。至孟昶死，李氏不落半滴眼泪，只以杯酒浇地，默默祈祷说：“国破时，你不能为社稷而死，

如此贪生，活到今日，已是多余。我因为你还在世，忍死到今日。你既去世，我已无所牵挂，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从此绝食，不几天就死掉了。赵匡胤得知后，也颇伤感。他对孟昶实不如对这老妇人恭敬。对于孟昶礼数虽极周到，那是做给南唐李煜等割据帝王看的，借此劝他们也赶快投降。心中实在是瞧他不起，他曾经见到孟昶的一件七宝装饰的便壶，立刻命人撞碎，说道："以七宝装饰便壶，盛饭家什该用什么装饰？如此胡闹，若不灭亡，那是没有天理了。”

自乾德三年三月全师雄起兵，蜀中大乱。对于王全斌等人恶迹及蜀中形势，赵匡胤不会不知，却始终泰然处之，似是不闻不问，既不撤换王全斌，也不往蜀中增兵（直到第二年正月，才增派数千人赴川)，任其自生自灭。这正是赵匡胤手段高明、处事练达的表现。王全斌胡作非为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心中自然害怕。朝廷若于此时撤军，有可能使他因疑惧铤而走险，引起兵变；若不闻不问，王全斌势必全力以赴，平定叛乱，以求将功折罪。待平定蜀乱后再命撤军，清算旧帐，就稳妥多了。但王全斌在蜀中已成怨府，人人切齿，以他为主平定叛乱已不可能。考虑到孟氏已举家入京，蜀中叛党已是群龙无首，一时啸聚，易合也容易分，闹不出个什么名堂来。只要朝廷在蜀中多行善政，叛乱者自会瓦解星散。针对以上情况，赵匡胤对付蜀中叛乱的政策主要有三条：第一，王全斌继续留蜀。第二，当年十一月，委任原征蜀将领康延泽为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客省使丁德裕为西川都巡检，作为平定蜀乱的领导人物。第三，委派强干的州县官吏入川，推行朝廷善政，瓦解叛军的社会基础。这些政策极有效验，尤其第三条，对叛军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为了保证它的实施，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前面说到派了吕余庆、冯瓒做地方官，吕余庆原官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职，派到成都做州官，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此后又有绵州刺史成彦饶、均州刺史曹

翰、渝州判官卞震、汉州刺史安守忠、兴州刺史王晋卿等，对平定蜀乱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乾德三年五月下令：伪蜀时官仓出纳用斗不同，大斗进，小斗出，自今都改为十升斗。

十二月，命川峡诸州监军、巡检，不得干预州县事务。

乾德四年二月，命西川诸州夏租减半征收，遇灾伤的全部免收。

三月命川峡各州县长官，调查伪蜀时百姓缴纳的苛捐杂税有尚未免除者，可自行决定免除，不必呈报官批。

五月又命川峡诸州，伪蜀时的所有暴政凡害民者，已屡次下诏书革除。官吏有的没能奉行，自今以后应当尽力执行；不许任用部曲亲随主持州县中事务；州县官不许在部内经商贸易，与民争利。

七月，命川峡诸州秋租也减半征收。

八月，命川中百姓有曾欠伪蜀官员私债者，全部免除。

九月，叛乱者的妻子家属免罪不杀。

十月，命蜀中诸州长吏告诫县令、尉等，不许借故扰民。

诏书一道接一道，蜀民久乱思治，叛乱者愈来愈孤立，全师雄于乾德四年病死于金堂县（在四川境），余党推谢行车为主。十二月被康延泽所破，蜀乱平定。

乾德五年正月，征王全斌等伐蜀将帅回汴京。赵匡胤自从蜀中发生兵乱，每有使者回京，必让他们禀告王全斌等人所干坏事。因此，对于事情原委了如指掌。诸将回京以后由于他们灭蜀立了大功，不便立刻问罪，只命中书省询问诸般情况。王全斌对自己的作为也不隐讳，将如何黩货、如何杀降一五一十交待得明明白白。于是将王全斌降职为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为昭化节度留后，王仁赡为右卫大将军。这王仁赡做人颇不地道，从蜀中回京后，向皇帝历数诸将过失，想以此减轻自己的责任。这自然办不到，赵匡胤质问他："按你所说，坏事都是王全斌等人所做，

那末，接受蜀将李廷珪馈赠的妓女，擅自打开丰德库，窃取金宝的也是王全斌吗?”王仁赡知道自己干的事，皇帝早已了解，张口结舌，半句回答不出。王仁赡只对皇帝讲了一个人的好话，说：“清正廉洁，做事谨慎，不辜负陛下的只有一人，就是曹彬。”曹彬从蜀中回京，行李中只有数卷图书，几件换洗的衣衫，一副铺盖卷而已。赵匡胤对他着实赞赏，加封为宣徽南院使、义成节度使。曹彬推辞说：“征蜀将士人人获罪，唯独臣一人受赏，于理不合，难以起到惩劝的作用。”赵匡胤道：“假若你有半点过失，王仁赡岂能放你过去。是赏是罚，国有常法，你不必再谦让了。”

灭蜀以后，正如赵匡胤当初所料，果然从蜀中得到大量财富。赵匡胤命将这笔财富分水陆两路运到汴京，有的书记载说，直运了数年方才运完。赵匡胤特命建立封桩库，单独存放。对宋朝以后的统一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刘洪涛）

参考资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宋史》:《王全斌传》、《王仁赡传》、《曹彬传》等。

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君范》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4、卷6。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

平南汉

乾德元年（963），宋军灭掉湖湘周氏的割据政权以后，于八月五日（庚申）委任原泰州团练使潘美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防御使，目的之一是对付南汉的入侵。南汉刘氏开始称帝是在后梁贞明三年（917），割据于岭南（今广东大部）地区。后向西扩展，占领原属湖南的容（在今广西境）、桂（今广西桂林）等州，又乘马氏内乱，攻占连（今广东连县）、宜（今广西宜山）等州，湖湘原有的今广西境内的十余州几乎全被南汉占领，至宋朝平定湖湘，南汉仍向北蚕食不止。潘美赴任潭州后，数次击退南汉对桂阳（即郴州，今湖南郴县）、江华（在今湖南境，为瑶族自治县）的进攻。

那时的南汉主名叫刘鋹，是一个懦弱而又昏庸的人，一切政事委任给宦官龚澄枢和后宫的一个才人卢琼仙。有时刘鋹处理某事，批示可或者否，实际都是卢琼仙在背后出的主意。刘鋹独立干的“政”事就是与后宫的波斯籍妇女或其他宫人终日鬼混。又有宦官陈延寿把一个名叫樊胡的女巫引入宫中，说是玉皇大帝派来的，为的是要加封刘鋹为太子皇帝。刘鋹为她在宫中装点出一个神坛，用层层帷幔围绕，周围摆设各种珍玩，中间供着玉皇大帝座。樊胡头戴远游冠，身穿紫衣、紫霞裙，在玉皇大帝座的旁边落座，为人说吉凶祸福。曾经说卢琼仙、龚澄枢、陈延寿等人都是受玉皇大帝的派遣，来到人世辅佐刘鋹这个太子皇帝的，有过失不可治罪。又有梁山巫师马媪、何拟等人出入宫廷，与樊胡

相唱和。每次设坛作法，刘𬬮都跪拜听命。仿佛他真的就是玉皇大帝的太子，因此飘飘然起来。此外，宫中妃嫔、宫女等都穿戴外廷政府官员那样的官服，也有太师、太傅、太保、中书令、尚书仆射等名号，按品级不同，分别管理朝廷各种政务。宫中宦官多达七千人，最高官称也有三师、三公等。单只各种名义的“使”，就多达二百余人。各在官名前加上一个“内”字，以与外廷官员相区别。而称外廷官员为“门外人”，以示轻蔑。

古人说：“十室之中，必有忠信如丘者”。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乏有识之士，当时宦官中也是如此。南汉政府中有两个宦官：内常侍禹余和宫使邵廷琄屡次劝告刘𬬮说：“后汉是乘石晋天下大乱的时机建国的，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值得庆幸的是中原多事，战乱不息，无暇顾及南汉这块国土。所以一直国家无事，没遇到过大的战事和灾祸。安佚的日子把人骄惯坏了，至今士卒不认识什么是旗鼓，人主不知道什么是存亡。久乱必治这是常规，是天数，天下该当太平了。如今民间盛传‘真主已经出现’，真主出现必然混一四海，统一天下。对此南汉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早做准备，加强军事力量，一旦天下有变，逐鹿中原，北向争天下；二若自忖力不能及，及早派遣使者，不惜重宝，与中原结好，纳贡称臣。这样做虽不如眼下割据快活，实是一条自存的良策。”这番话本是金玉良言，刘𬬮听了，全不当一回事：什么统一天下？那是哪一辈子的事？与我何干？对于南汉面临局势的危机感他是半分也无。邵廷琄二人只当是对牛弹琴倒也罢了，刘𬬮反而以为这番话是骂他“不知存亡、骄纵无知，”从此恨透了邵廷琄。不过，邵廷琄二人的话很快就兑现了。乾德二年九月十五日（戊子），宋朝将帅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潭州防御使潘美，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与衡州刺史张勋等率兵攻陷郴州，南汉郴州刺史陆光图和招讨使暨彦赟阵亡，余众退入韶州（今广东省曲江）。这时，南汉主刘𬬮才感到大事不妙，想起邵廷琄二人

“及早加强武备”的话，大有先见之明。于是命邵廷琄为招讨使，率领水军在洸口（今广东英德）屯驻，防宋军长驱南进。此时宋军忙于征蜀，无力在岭南开辟第二战场，小胜以后，便即退却。邵廷琄抓住这有利时机，加紧训练士卒，招集、安抚流亡人口，南汉国民心中稍安。

昏君当政，大臣难立事功，这是至理名言。邵廷琄正辛苦操练士卒，有人向朝廷投匿名书，侮说他要图谋不轨。刘铱不辨真伪，信以为真，乾德三年六月遣使到洸口，宣布诏书，赐邵廷琄自杀。士卒听到这消息，挤破军门，一起来见使者，诉说邵廷琄冤枉。质问使者有何证据说邵帅谋反？请求朝廷派官考察、问明白，再定罪名。不能糊里糊涂，置人于死地。使者不许，冷冷说道：“你们要闹事吗？邵军使训练出的士卒果然有胆量，这还不是图谋不轨的证据？”邵廷琄只好劝谕士卒归营。后自杀而死。士卒闻讯，悲痛难抑，共同商议在洸口为他立庙，岁岁祭祀，享受人间香火。

八月二十七日（甲子），南汉宦官莫少璘等七人入宋营投降。

还在丁德裕、潘美等攻陷郴州时，抓到一名俘虏余延业，见他鬼里鬼气，赵匡胤询问在南汉身居何职，答说是“扈驾弓箭手”。赵匡胤不理解这等人毫无武勇，怎么能做得了扈驾亲兵？命人取一副弓给他试试，奋力拉扯，直弄得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咬牙怒目，还是拉扯不开。赵匡胤见状，哈哈大笑。问他南汉朝廷中的事，倒是一五一十，有问必答。赵匡胤越听越怒，不觉拍案而起，愤然说道：“刘铱这条狗，太也无法无天。我一定要兴兵拯救岭南一方百姓。”

无怪赵匡胤愤怒，这刘铱确是无恶不作。比如他制造了很多酷刑，有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类。还让罪人与老虎、大象生死相搏，以此取乐。群臣稍微有些过失，或者是僧道、士人有点小小才气，能做朝廷顾问的，都押到蚕室阉割以后作宦者使用。又

极奢侈，因此岭南的赋税极重。邕州百姓凡入城者，人人交税一钱；琼州地区买米一斗，税达四至五钱。还专门组建一支军队，共八千人，取名为媚川都，为他下海取珠。由于海水极深，要用大石系在脚上，沉到海底五至七百尺的深度之后，才能采到珠蚌，剥取珍珠。动作稍缓，便溺死水中。自媚川都组建以来，溺死的人不计其数。刘𬬮内库中的珍珠也由此越积越多，无处使用，宫殿中的梁栋、帘箔，便都用珍珠装饰，穷尽华丽。前文提到的宦官陈延寿是个手艺很高又心思机巧的人，刘𬬮任用他制作物什，每天都要花费数万金。在宫城左右建离宫数十座，刘𬬮逐宫游赏，常常月余不出宫门，少者也要十余日。所需一应宴会、犒赏费用，分命京中豪富承担。五代君臣论奢侈残酷，刘𬬮算得上第一人。不过，赵匡胤虽然慷慨激昂，要除暴救民，毕竟不能意气用事。他有自己的战略安排，说过也就算了。

开宝元年（968）九月，宋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王继勋又上表说：刘𬬮昏庸暴虐，岭南百姓久被毒害。近年来屡次出兵，骚扰边境。请求朝廷出师讨伐。赵匡胤考虑到兵凶战危，岭南又是烟瘴之地，中原士兵对那里的气候很不适应。不到万不得已，仍不肯出兵。只命南唐主李煜劝告刘𬬮，把这些年来侵占的湖南州县归还朝廷，纳贡称臣，以后不再怙恶，便可彼此相安无事。李煜比刘𬬮乖巧得多，自知不敌，早已归顺宋朝。对赵匡胤的话自是尽力去做，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派专使送到岭南，备述战降利害，情切意诚。最后说：纵是君臣之间，情意笃厚，见有不妥，不过是再三谏阻。三谏不听，便可以终止了。我对你已经再三劝告，朋友间的道义已尽。若仍然不听，只好与你绝交了。刘𬬮见信大怒，扣留来使，由驿站寄回答书，言词很是无理。李煜把这份答书转呈赵匡胤。赵匡胤才决心诉诸武力，派兵南下。

开宝三年九月一日（己亥），任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为副都部署，道州刺史王继

勋为行营马军都监。另遣使到诸州发兵，约定在贺州城下会齐。

二十九日（丁卯），潘美向朝廷奏捷说：击败南汉兵众万余人，并攻克了富州（今广西昭平）城。

那时，南汉宿将大都遭诬陷而死，宗室也因被疑忌杀戮已尽，带兵的只有数名宦官。平时国家钱财都用来装饰宫馆池沼了，楼船与器甲却破烂不堪，军备极差。等到宋军屯兵境上，对阵的贺州刺史陈守忠派使者告急，内外一片震惊和惶恐。刘铱派龚澄枢往贺州慰问将士，士兵已久戍边境，贫困不堪。眼见战事将起，朝廷派重臣前来慰问，按例该有一笔重赏。因而人人欢欣鼓舞，眼巴巴地盼望钦使到来。哪料到龚澄枢带来的仅仅是一纸诏书与一些不痛不痒的空话。士兵心中不满，自行解体，仗也就没法再打。宋军进拔冯乘（今湖南江华西六十里），前锋军到达芳林渡（今广西贺县北）。龚澄枢害怕做了俘虏，跳上一叶轻舟，飞快逃回广州去了。宋军于当月十五日（癸丑）进围贺州。

刘铱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一致推荐潘崇彻率军御敌。潘崇彻原是南汉旧将，立了许多战功，刘铱即位时任西北面都统，由于流言诽谤，受到刘铱的猜忌。开宝元年时，曾命专使郭崇岳调查他的“罪行”，并密嘱郭：稍有形迹，就地将他处决。由于潘崇彻防范严密，才没有遭他毒手。郭崇岳回朝复命时，说潘虽无反迹，终日作长夜之饮，不理军政。刘铱不论真假，就夺了他手中的兵权。潘崇彻为此事好不怨恨！如今宋军兵临城下，急切间拿他出来挡灾，如何肯干？推推让让之间，刘铱早已看出，潘崇彻是乘国难当头之际，端端架子，拿一把，以解昔日之恨。心中自然生气，愤然说道：“何必一定是潘崇彻？伍彦柔不是比他强得多吗？”于是伍彦柔率兵前往贺州应援。

二十日（戊午），宋军得知伍彦柔军来援贺州，退军二十里，以奇兵埋伏在南乡（今广西信都）附近的贺江岸侧。彦柔兵乘船而来，深夜到达，舶舟于贺江边上。天亮后携带兵器登岸，伍彦

柔坐在胡床上指挥士卒离船。这时伏兵突然出现，伍彦柔再也稳不住阵脚，除被打死者外，余一轰而散，伍彦柔遭生擒。宋军割下他的脑袋号令城中，城中人仍然坚守不降。随军转运使王明对潘美说道："应该抓紧时间，把城拿下来。否则再有援兵来到，与城中兵夹击我军，我军已师老兵疲，胜负就不可逆料。"其他将领怕强攻伤亡太重，犹豫不决。王明顶盔贯甲，只率领部下百余名运粮士卒和千余名丁夫，手持铁锹、土筐等，一齐动手，转瞬把城壕填平，直攻到城门之下。城中人知道已不可守，开城投降。宋军督率战船，声言要顺流而下，直取广州。刘铱已是黔驴计穷，再也顾不得脸面，加封潘崇彻为内太师、马步军都统。让他率兵三万，屯在贺江岸边，阻宋军直逼广州。其实宋军只是虚张声势，并无东下的意思，而是要西出昭州（今广西平乐）城。潘崇彻气尚没消，对此也不理会；刘铱既说叫他守贺江，其他的事天塌了也与他无关。反正手中有三万士兵，足可保自己安全了。

十月二十三日（辛卯），潘美奏称：行营马军都监、道州刺史王继勋死。此人勇猛善战，临阵时常用铁鞭、铁槊、铁挝，军中号为"王三铁"，不料死于征汉途中。赵匡胤命郴州刺史朱宪代理他的职务。宋军继续进发，先与昭州城外的南汉开建寨军接战，斩杀数千人，生擒将军靳晖。昭州刺史田行稠见势不妙，弃城逃走。桂州（今广西桂林）与昭州接境，刺史李承进也不甘落后，望风而遁。宋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昭、桂二州。

十一月，宋军又攻克连州（今广东连县），南汉招讨使卢收退入清远县（在今广东省境）。刘铱闻讯不忧反喜，如释重负一般说道："昭、桂、连、贺原是湖南的地盘。湖南归宋，自该转属于宋。如今欠他的他全都拿去了，自然心满意足，不会继续南下了。"

哪知宋军并不"心满意足"，而是马不停蹄，长驱直进，很快来到韶州（今广东曲江）城下。

韶州是南汉的北部门户，非同小可。见宋军到来，由都统李崇渥率军十余万，在城外莲花山下结营，把国中压轴重戏——象军也抬了出来，与宋军决战。原来，南汉与缅、越接境，便仿照他们训练成一支“象军”。这种每只足有数千斤重的庞然大物，的确具有一种威慑力量，常能使敌人不击自溃。使用方法，是在临阵时结成象阵、每头象身上骑着十几名士卒，各执兵刃，与大象一起在前冲锋，步军随后赶杀。这次如法炮制，以为必能“象到成功”。哪知是遇着了克星。宋军早知南汉军有这一招杀手锏，预先筹思好了对策：以强弓硬弩对付。象军一出，便矢如雨集，齐向大象射去。虽说那东西皮糙肉厚，射在身上毕竟不大舒服，吊头就跑，汉军反而被践死无数。这一下应了“玩兵如玩火，不戢必自焚”的话，被自己训练的象兵“打”了个落花流水。李崇渥只身逃走，韶州陷落。留在城中的刺史辛延渥、谏议大夫邹文远等，一起做了俘虏。辛延渥早已有心投降，一入宋军，便抢立头功，派人秘密入广州劝刘铱投降。刘铱昏庸，倒是无可无不可，六军观军容使李讬却坚决反对。南汉军民听说朝中在争论降与不降，人心惶惶，自相惊扰，已不能再战。刘铱看不出这形势，下令军士加浚城濠，准备固守。环视众臣，却见无一人是带兵打仗的材料，不觉叹息。宫监梁鸾真向他推荐自己的养子郭崇岳。刘铱已无可选择，便任命他为招讨使，与大将植廷晓一起统兵六万，在马迳（在广州城北）驻扎，列栅为营，与宋军相抗。从马迳到番禺（南汉都城，今属广州）不过百余里路程。

开宝四年正月，宋军自韶州南下，又攻下英（今广东英德县东）、雄（今广东南雄）二州。南汉都统潘崇彻知大势已去，投降宋军。宋军自英州南下，行十五里，到达泷头水。潘美见这里沿路两侧，崇山夹持，飞湍击石，极为险峻。暗想：南汉若在这里伏兵一支，我们可就匹马无归了。正不知该如何区处，报说南汉使者到。原来是南汉主刘铱遣使求和，要宋军暂且缓兵，条件

尽可商量。潘美想：看来这里没有伏兵。不然，怎会这样低声下气？暗笑：南汉果然无人。但是为更稳妥计，命人“把使者绑了，在马前引路。要是弄鬼，先把他杀了。”军士簇拥着汉使，飞快渡过山口，一起大笑说：“潘将军给我们找了块挡箭牌。”正月二十七日（甲子）便到达栅口，二十八日（己丑）来到马迳，在双女山下安营，这里地势高畅，可以俯视郭崇岳军的营盘。

郭崇岳本来就没有将才，太监梁鸾真推荐他是出于对养子栽培、爱护的一片好心；郭崇岳大胆应命也是由于这大小是个官，比在家赋闲好得多，哪里懂得其中厉害。部下士兵又多数是从韶、英等州逃回来的败兵，刚刚脱离虎口，如今又把他们逼近了狼窝，心中如何不惧？宋军游骑日日出来挑战，他们只是缩头不出，斗志是半点也谈不上的了。这样的将军带这样的兵，正如盲人骑瞎马，无论如何看不到“胜利”二字是什么模样。植廷晓数次请兵出战，郭崇岳坚持不肯，只下令坚壁自守。问他：“如此何以退敌？”答说：“自有妙法。”再三问“是何法？”也不肯说。其实很简单：每天夜里他都虔诚祈祷，请求鬼神保佑，逢凶化吉。这“妙法”如何说得出口？

南汉主见宋兵已迫临城下，找来十几条大船，将宫中金宝、妃嫔一齐塞进去，打算下海。以为有钱、有宫女，国家灭亡也没什么了不起，下半生照常可以享乐不尽。谁知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他平时无恩于人，如今国家既亡，谁还理会他这个皇帝？宦官乐范领着千余名卫兵，悄悄将这些大船开走了。刘𬬮这才傻了眼，面前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投降。于是派右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手捧降表到宋军营前乞求投降。潘美将他们护送入汴京，去见皇帝赵匡胤。

刘𬬮在宫中等候回音，左等右等，不见萧、卓二人回转。不由心中害怕，急忙下令郭崇岳再次戒严。

二月一日（丁卯），又派遣胞弟判六军十二卫、祯王刘保兴

率领封国内的士兵前来助战。植廷晓对郭崇岳建议说："宋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而我军人数虽多，大都是伤残之余，惊弓之鸟，无法对敌。古人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应该把士兵放在一个凶险的去处，逼他们拼死抗争，或许能有一线生路。"

于是在二月四日（庚午），植廷晓把前锋军带到江边，背水为阵。郭崇岳殿后，防止士卒奔逃。哪知对于南汉军队，兵法竟也失灵。将士同在死地，并不一起拼命，求取胜利。接战以后植廷晓战死阵中，郭崇岳逃还营栅，坚守不出。宋军一时拿他无法。潘美巡视后对王明说道："敌方营栅是用竹木编成，若用火攻，必然吓他个手忙脚乱。乘敌扰乱，再挥兵而攻，当可一战而胜。"当下命丁夫每人持火炬二根，乘夜取小道逼近敌栅，一齐将火炬点燃，向敌栅掷去。正是月黑风高时候，突然间万炬齐发，烟焰蔽天，敌营大乱。宋军一冲，南汉军大败。营寨焚毁，郭崇岳死于乱军之中。祯王刘保兴见独力难支，也弃营逃归城中。龚澄枢、李托与内侍中薛崇誉等人商议，龚说："宋军不远千里，攻打我国，是贪图我国中的珍宝。不如一把火全都烧了，只剩一座空城，宋军自然退兵。"大家一起称赞说："高见。"于是命士兵将府库、宫殿全都放起火来，一夜之间，刘氏数十年的经营，南汉数十万百姓世世代代的血汗，化成了一片焦土。宋军却仍是不退。二月五日（辛未）继续进军到白田，刘铱只好穿上囚徒的服装，开城请罪投降。潘美照例以宋朝廷的名义免去他的罪过，将队伍开入广州城。将刘铱、刘铱的家属以及俘虏的南汉官员共 97 人，都安置在龙德宫集中看管；刘保兴起初逃遁出城，在民间躲藏起来，不久也被抓获；又有宦官百余人，都是刘铱宫中顶尖儿的人物，细心穿戴起来，个个衣服光鲜、仪态华贵，一齐出来求见潘美。心想：总得给新主人留下个好印象。不料潘美说道："这里太监太多了。我奉诏伐罪以及刘铱之所以有今日，都是由于你们的缘故。"命令士卒道："全都给我拉出去砍了。"

一面命人张贴告示，安抚百姓；一面遣人入京城告捷。安排已毕，拔寨起行，回京城而去。二月二十三日（己丑），回到京城。二十四日（庚寅），群臣上朝祝贺，赵匡胤大喜，赐宴嘉奖。

自开宝三年九月一日己亥点将发兵，到开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己丑）奏凯回朝，首尾共171日。灭南汉后，得到州60个，县城214座，户口增加了170263户。

赵匡胤下令在原南汉境内州县免租赦罪，凡政令害民者一切废除。四月七日（壬申），任命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副都部署尹崇珂同知广州；二十七日（壬辰），命广州选择人才分任各州的知州。岭南逐渐安定下来。

潘美遣使押送刘鋹等去汴京，路经公安县（在湖北境），管理县邸的官员庞师进前来谒见。刘鋹向学士黄德昭询问："他是何人？为何要来见我？"黄德昭说："他是南汉的官员，自然要晋见陛下。"刘鋹道："我朝官员，怎么会在这里？"黄德昭道："高皇帝[①]时每年向中原大朝纳贡，道经这里。便命他在此设置官邸，制造车乘，转运贡品。"刘鋹感慨道："我在位十四年，从来没人给我说过这些话。今日才知祖宗的山河原来便是大朝的领土。如今重归大朝，又有何怨。"入京后住在京郊玉津园，赵匡胤派参知政事吕余庆审问说："为何遣使请降后重又反叛？为何放火焚烧府库宫室？"刘鋹糊涂一世，忽然"福"至心灵，把罪过全都推在大臣身上，自己原是一身"清白"。说道："这都是龚澄枢、李托、薛崇誉的主意。"再问龚李薛等，三人只是不语。南汉谏议大夫王珪说道："在广州你三人把持朝政，什么事不是你们所为？火也是由内廷燃起，不是你们这帮宦竖，谁能进入宫中？事情做下了，又不敢承担，难道还想推给旁人？"越说越是

---

① 指刘隐。刘龑称帝后，追尊为襄皇帝，此处称高皇帝为尊称。梁封刘隐南平王，因而每年向中原朝贡。

气愤，想到亡国之痛，想到以往所受屈辱，竟是怒不可遏，再也不顾什么体面，上前撕扯起来。五月一日（乙未）将刘𬬮等人以帛系颈，牵入太庙，行了献俘礼。这份耻辱，西蜀孟昶等因被赦免，都没“福”份享受，刘𬬮算是第一个。礼毕，赵匡胤登明德门，命刑部尚书卢多逊再次责问烧府库等事，刘𬬮道：“臣在岭南僭位时才14岁，龚澄枢等人都是先父时的旧人，事事由他们做主。臣名义上是国主，实际是臣下；澄枢等人名为臣下，实际却是国主。”于是赵匡胤命人把龚、李、薛推出去斩首，赦免刘𬬮罪过，赏赐给冠带、鞍马等等，封为太保、右千牛卫大将军、恩赦侯。从此随朝伴驾，刘𬬮也乐此不疲。一日赵匡胤驾幸讲武池，其他官员尚未来到，刘𬬮一早便奔来了。赵匡胤赐给他一杯御酒。刘𬬮在南汉时，常常以鸩酒赐给臣下，把他们毒死。如今见赵匡胤也赐给他一杯酒，心想：不好！怕是现世报到了。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臣承祖宗基业，抗拒朝廷，罪大恶极，固然该死。但陛下先已赦免臣罪，臣但愿在大梁做一个平民百姓，享受太平盛世的福气，这杯酒万万不敢饮。”赵匡胤弄明白他的心思后哈哈大笑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怎能做那种事？”说完将刘𬬮那杯酒接过来，一饮而尽，命人另斟一杯递给刘𬬮。刘𬬮自觉羞惭，连连道谢。后不久出兵北汉，为此在宫禁中设宴招待近臣，席间刘𬬮说道：“朝廷的武功和恩德，远被四方。今日，来自各地的伪皇帝都在坐。不久攻下太原，又要添一个刘继元。为臣入朝最早，请求赐给一根棍子，封我为降王长。哪个不肯听命，我就用这根棍子敲他们。”众人哄堂大笑。

史书说刘𬬮这个人“有口辩，性绝巧”，由以上数事，倒可用另外八个字描述他的为人，就是“贪生怕死，无耻之尤”。这种人做皇帝，岭南百姓的境遇可想而知。宋军平南汉，不仅顺应历史，亦且有功于岭南百姓，是件造福苍生的功德事。

（刘洪涛）

参考资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宋史》：《潘美传》、《王继勋传》、《南汉世家》等。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杂录》

曹彬下江南

开宝七年（974）九月，宋太祖赵匡胤委任曹彬为西南路都部署，率兵南下，渡江灭南唐。八年十一月，南唐国主李煜投降。南唐自李昇立国，至此割据了39年而国亡。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周世宗显德五年（958）以后，南唐内政不修，专事媚敌。而中原的政治势力日益强大，尤其宋朝建国以后，双方力量愈加悬殊，南唐国的灭亡久已是意料中的事了。

建隆元年（960）正月，宋朝建国，赵匡胤即皇帝位于汴京（今河南开封）。二月，南唐国主李景派遣使者，带着绢二万匹、银一万两的贡品到汴京朝见赵匡胤。当年六月，平泽潞李筠；十一月，平扬州李重进，李景都遣使贡金、银、绢帛等表示祝贺。那时宋朝在汴京城南的迎銮镇操练水军，李景心中害怕，派遣儿子从镒与户部尚书冯延鲁到扬州犒劳宋军。酒宴间，赵匡胤声色俱厉地喝问说："你们国主与我叛臣李重进相勾结，是何道理?"李从镒闻言，早已吓得浑身筛糠一般，抖个不住。冯延鲁从容说道："陛下只知道我国曾与李重进勾结，李重进谋反也是与我们一同策划的，就不知道了吧?"赵匡胤惊疑道："此话当真?"冯延鲁道："千真万确。李重进的使者当时就住在微臣家中，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微臣知道得一清二楚。"赵匡胤道："那你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冯延鲁道："当时国主命微臣对李重进的使者说：'男子汉不得志而反叛，这是常有的事，谁也不会怪你。问题在于干这等事要审时度势，有时候能干，有时就不能干。比如

宋朝初建，人心未安，李筠起兵于泽潞，那时候你不反叛。如今人心已安，大局已定，宋朝四方无战事。你却要以座残破的扬州城，数千名疲惫不堪的士兵，与中原万乘兵众抗衡。纵使韩信、白起复生，也不能获胜。我南唐国虽有兵有粮，也不能对你有半点支持。'李重进终因没有外援而失败。陛下看，我国主替李重进策划的还算高明吗?"赵匡胤点头道："原来这样。可是——"他略一沉思，辞锋又起，道，"如今诸将纷纷劝我，乘士卒斗志旺盛，大举渡江。你以为如何?"延鲁听了这话，站起身来，郑重回答说："陛下神圣英明，若统帅六军，大举南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如弹丸般大的小国，怎能与陛下抗衡。可在我国主有侍卫军数万人，都是先主下的亲兵，誓与国主同生共死。如陛下不惜伤亡，愿意经此一番血战，不妨试上一试。况且有大江风涛的险阻，倘若陛下过江后，攻城不下，后路继绝，粮草不继，不免也会有些麻烦。"赵匡胤闻言，哈哈大笑道："好一张利口！我不过说句玩笑话，你倒说了这么一大篇，难道是你们国主有意要你游说来的吗?"

那时，南唐有一个下级官吏杜著，颇有几分口才，假扮作商人，从建安（今江苏南京）偷渡长江，投奔宋朝；又有一个彭泽令薛良，因罪贬官为池州文学，也来投奔宋朝，都向朝廷献了"平南策"。李景更是害怕，以为宋军旦夕之间就要过江。赵匡胤知道杜著这等小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徒然使南唐增加戒备，毫无益处。下令将杜著斩首于下蜀镇（今江苏句容北），薛良发配为庐州牙校的奴隶，以安抚南唐。李景终是心惊胆战，因而枢密副使唐镐建议迁都到南都豫章城（今江西南昌）。

建隆二年二月，南唐都城自建康迁到南都，以太子从嘉为建康留守，左仆射严续、知枢密院事汤悦为辅佐。李景到达南都后，见城邑狭窄，连官府衙门也安插不下。纵要组织人力，重新兴建，无奈一街二市，到处是民居，到哪里寻觅出一块空地？文

武大臣，怨声载道，日夜盼望重回建康。李景也十分恼火，声言要杀掉那个出了馊主意的唐镐。唐镐恐惧担忧而死。六月，李景也死在南都。七月，从嘉在建康即位为唐国主，改名李煜。文武百官各有封赏不提。

这李煜聪明好学，作得一手好诗词，又工于书画，善晓音律，是个才子皇帝。无奈对政治是个外行。即位后，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下令国中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官员，每天二人轮流等候召见。一些中下级官员，尤其那些才高位下的人，以为有了一个表露胸中才华的机会，喜不自胜。一时间提了许多建议。可是要把这些建议付诸实行，谈何容易！众人提了建议，不见下文，不禁失望起来。

建隆三年五月，南唐将士投降宋朝，有的家属仍在江南。赵匡胤诏命李煜，把这些人的家属送到江北来。七月，又从投降宋朝的南唐士卒中，捡择出老弱不能作战的数千人送回南唐。

乾德元年（963）八月，南唐以吏部尚书游简言知尚书省事，不久又提升为右仆射。十月，在泉州割据的陈洪进，表求宋朝册封为清源节度副使。十一月，宋颁诏书与江南，说明陈洪进归降的情形，表明将授给陈洪进节度使的职位，赐给钺相应的旄等仪仗法物。十二月，南唐主李煜上表，揭露陈洪进首鼠两端，归顺的事未必可信，请朝廷暂不要赐给旄钺。隔日，又表请朝廷诏书直呼己名，不要再以国主相称。

乾德五年三月，南唐主分命两省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勤政殿学士等轮流在光政殿值夜，每晚与值夜的人一起闲聊，常常聊到夜分以后。李煜崇信佛法，在宫中建造不少寺院，和尚、尼姑常达数百人。前代宫中妃嫔，全都让出家做尼姑。每日退朝后与后妃一起穿僧服，诵佛经，烧香拜佛。由于跪起频繁，两膝磨出了茧子，也不厌其烦。僧人犯罪，不绳之以法，礼佛三百，就免除罪行。有的寺院造塔和佛像太过奢侈靡

费，李煜责怪他们，住持僧回答说：陛下不读华严经，怎会知道佛的富贵？李煜也就不再追究。上行下效，国中崇佛可想而知。大臣中许多人不食荤腥，持戒奉佛。有一个中书舍人张洎，由于善谈佛法，受到李煜重用。金陵城中的僧尼不下万人，都由官府供给食用。宋太祖知道这些情形后，选择一些有辩才的年轻僧人，南渡去见李煜，给他讲论因果性命的佛家学说，直听得李煜失魂落魄，称他们是“一佛出世”。从此不再把治理国家、守卫边疆的事放在心上。

开宝元年（968）三月，南唐以枢密使右仆射汤悦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汤悦平素对清辉殿学士张洎礼敬有加，可是这张洎最善于说人短长，见汤悦四个儿子分别在三省、枢密院做官，向李煜递了一道秘表，说三省、枢密院是政府腹心要害部门，如汤悦这般一家四口，都在这些部门任职，对朝廷不利；又说汤悦没有经国治世的才能，不宜居相位。李煜以为汤悦是文学旧臣，张洎非毁大臣，理当治罪，免了他的学士职。不过没几天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五月，以勤政殿学士承旨、兵部尚书韩熙载为中书侍郎、百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这韩熙载颇有才华，幼年时与李谷为同窗学友。后来李谷在周朝为官，韩熙载辅佐南唐李景。时南唐雄据江淮三十余州，兵精粮足。韩函告李说：“江南若用我为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李谷答书也说：“中原若以我为相，破江南如探囊取物。”后李谷果然做相，辅助周世宗攻取了南唐的淮南十多个州郡。李谷派陶谷出使南唐，先使人通知韩说：“我们这位陶大学士才高八斗，常人很难入他的法眼，你们莫要慢待了他。”陶谷到江南后果然趾高气扬，终日绷着脸，对谁都不理不睬。宴会间轻易不开一句口，礼数稍有不周则呼喝不止。使接待他的人很为难。韩熙载一旁观察了半日，说道：“我看这位陶大学士才气虽高，并非正人君子，这种人不难对付。”于是找来一个颇有姿色的妓女，装扮成驿卒的寡女，自称秦弱

兰。不二日便使陶谷上了钩，二人如胶似漆，难分难离。临行，陶谷特意写了一首小词《春光好》相赠。后数日，南唐在澄心堂设宴款待陶谷，他仍然把架子端了个十足。国主李景命人敬酒，无论怎样，不肯举杯，搞得局面很是尴尬。这时韩熙载请求：命妓歌舞助兴。只见远远一人，怀抱琵琶，嫂声唱道："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正是他做的那阕《春光好》，不觉大惊，仔细看时，唱歌的妓女正是秦弱兰。起初只当她是好人家的女儿，原来是个妓女。那么驿亭中的卿卿我我，不过是场闹剧了，越想越是有趣，不禁捧腹大笑起来。他知道：出使宿娼，是犯法的。消息传到江北，他这顶乌纱就戴不成了。一定是南唐另有高人，设就的圈套捉弄他。从此后再不敢端架子，只要有人劝酒，每劝必饮。嘴巴几乎成了漏壶，常被灌得呕吐狼藉。再也无人尊重他，回国时，只派了几个政府小吏到郊外送行。后来，才知是韩氏手段。暗道：此人若在江南得志，怕是不易对付。可是，韩熙载见南唐政事日非，心渐凉了。逐渐以声色为事，后房妓妾多达数十人。每有宾客，以姬妾相伴，视礼教如无物。南唐主久有用他为宰相的意思，终因他遭物议而止。后来乘有奏章弹劾他的机会，将他赶到外地去做地方官。韩熙载这才把姬妾遣散，上表承认错误。李煜很是高兴，让他官复原职。但不久就故态复萌。李煜慨叹道："我算拿他没有办法了。"

十一月，李煜立周氏为后。她是原宫中昭惠后的妹妹。因为有这层亲属关系，周氏不断出入后宫，与李煜有了不正当关系。时昭惠后身有重病，忽然见到周氏，问是何时到宫中来的？周氏年幼无知，随口说了实话道："已来数日了。"昭惠后很是气愤，翻身面墙而卧，再也不理周氏。不久病死，李煜便索性立周氏为后。花烛之夜，大宴群臣，韩熙载等人赋诗取笑，李煜也不加怪罪。这周氏不但姿容秀美，还精通音律，与李煜原是天生一对。

自入宫以后，李煜算是有了知音，二人日日讲究音律。《霓裳羽衣曲》自唐贵妃死后，久已不传。周氏按谱整理，使这首古曲重现于人间。李煜留意声色，与教坊艺人的交往也就多起来，常常打算把原户部侍郎孟拱辰的一处宅舍赏赐给教坊艺人袁承进。监察御史张宪极力反对，上疏数落他道："往常你颁布条法、教令，要文武大臣廉洁朴素。可是你自己在宫中做了些什么？留意声色，追求奇巧，这也罢了。又扩建教坊，为他们增筑宅舍。如今还传言要把户部侍郎孟拱辰的宅舍赐给教坊使袁承进。过去高祖皇帝要封一个会舞蹈的胡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满朝文武传作笑谈。如今虽不是封袁承进为侍郎，赐给侍郎宅舍也是一样的事，难道你不怕群臣见笑？"李煜再三解释，又赏赐给他帛三十段，作为直言进谏的奖励。却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我行我素，毫不改正。

开宝二年正月，南唐左仆射平章事汤悦罢相，封为镇海节度使。汤悦不愿做节度，上表求解职。于是改封为太子太傅、监修国史，仍遥领节度使。三月，以右仆射游简言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这游简言做官倒是认真，连簿籍文书都亲自管领，对部属督责也较严厉。只是不明大体，不识大局，所以下属对他畏而不敬。他自知下官不服，诸事难成，屡请辞职。李煜非但不肯，如今又命他兼领了宰相职务。七月，李煜遣弟从谦向宋朝进贡，以水部员外郎查元方为辅佐，掌诸笺奏的起草。赵匡胤命知制诰卢多逊接待来使，双方会见于胙城县（在今河南延津北）。彼此无事，燕会之余，就是下棋消遣。一次棋毕，卢多逊问查元方："如今江南的境况究竟如何？"这话听似简单，却很难回答。说好，明明是宋朝的属国，迹近吹嘘；说不好，或者不好不坏、境况一般，在外人前说这等话是对本国不满，也不合适。查元方见问，整衣而起，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江南臣服中原十余年，极尽君臣之礼。除此之外，不知更有其他事。"这就给卢多逊碰了

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意思是：我们是宋朝的属国，除了尽臣子之礼，还能有什么事做？你这般问，不过是想让我说一些国中的“小道消息”，那不是要我背叛本朝吗？未免太也瞧人不起。卢多逊见他如此郑重回答，知自己的问话太唐突了，连忙道歉谢过。并十分感慨地说：“谁说江南无人，这查元方就是个人物。”十一月，李煜在青龙山（在江苏江宁县境）打猎，归来时路过大理寺，亲自审理关押的罪犯，许多人被赦罪出狱。中书侍郎韩熙载说道：“审理刑事案件是大理寺官员的事。君侵臣职，大是不该。有功当赏，有过当罚，君臣一般。臣请罚陛下内库钱三百万作为军备费用。”李煜哈哈一笑了之。

开宝三年七月，韩熙载死，李煜追赠他为平章事。这样一位江南大才，死后算是做了一任宰相。这一年，宋朝先出兵灭荆湘，九月又对北汉作战。南都留守林仁肇向李煜呈递密表请求说：“宋朝前年灭蜀，今又用兵岭南，往返数千里，士卒疲敝已极。淮南诸郡的守兵每郡多不过千人。臣请提兵数万过江，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北渡淮河，进据正阳（在今河南省境），周世宗时失去的两淮故地可以一举收复。纵然敌有外兵来援，臣据淮立垒，足以相抗。为保万全，臣起兵时，陛下可奏闻宋朝，说我是举兵外叛。事若成功，利归国家；不成，请灭臣族，以表明陛下无叛宋之心。”李煜害怕事不成功，徒然惹火烧身，不肯答应。还有一位宜春人卢绛，曾向枢密使陈乔献书，受到陈乔的器重，一路升迁到枢密承旨，又做了沿江巡检。在任时招募亡命之徒，操练水军，演习水战。曾伏击吴越王钱氏的军队，在海门（今江苏南通以东）一带俘获敌船达数百艘。这时也对李煜说：“吴越是南唐的敌国。以后肯定会做宋军的向导，与宋军一前一后向我进攻。应及早把它灭掉，免致后患。”李煜道：“吴越是宋朝的属国，我们怎敢对它用兵？”卢绛道：“臣请以宣州、歙州诈叛，陛下声言讨伐，并向吴越借兵。吴越兵入境后，陛下正面拒敌，臣

举兵攻其后，吴越必亡。事若不成，可推在臣一人身上，与国无害。”李煜仍不答应。

李煜能够做的只有卑躬屈膝，每闻宋朝出师、凯旋，或有节日喜庆事，必遣使前来犒师、修贡。遇大喜庆还要以买宴为名，另献珍玩。

开宝四年十一月，遣弟从善朝贡。并自动削去“唐”国号印文只称“江南国印”，请求宋朝赐给江南的诏书直呼其名，连“国主”二字也不必称了。宋朝答应了他的恳求。李煜曾以银五万两贿赂宋宰相赵普，赵普不敢隐瞒，请示赵匡胤如何处理？赵匡胤道：“这笔银子不可不接受，写封回书表示感谢就是了。”赵普一时想不明白，以为是要他收下贿赂，那是万万不敢，不住地叩头推让。赵匡胤明白说道：“他们给你些贿赂也要推推让让，不敢接受，那不是失了大国的体统吗？只要你自己不贪便宜，又有何惧！受了他们的贿赂，你又没占便宜，让他们莫测高深，岂不是好？”赵普这才恍然大悟，将银子收下。这次从善来朝，除了按常例赏赐以外，又密赐白银五万两。果然搞得李煜君臣不知所以然。

这一年，占城、都婆（都在今越南境）、大食（阿拉伯人）等国的使者到江南，送了些当地的土产。李煜不敢接受，派使者转送到宋朝。赵匡胤下诏说：“以后不必如此，只管收下是了。”这时候，宋朝已经灭掉南汉，打算收复江南。适逢从善来朝，便把他留在江北，不许回国。李煜闻讯，慌了手脚，以为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宋朝，立刻反躬自省，改正过错。

开宝五年二月，李煜命改革制度：从此以后在国中下达文件，不再称“令”，改名为“教”，表明不敢以国主自居，只是以一个“师长”的身份劝诱属下。又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院为修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弟起初封王的都改为国公，就连宫殿原有的脊饰

兽吻也命除去不用。以此表明江南只是宋朝的附庸，不敢自称为国。

闰二月，宋封江南进奉使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在汴京赐给宅院一所，并要他致书李煜入朝。李煜自是不肯，只答应增加每年进贡的数目。

赵匡胤知道，林仁肇是个人物，以后必为进兵江南的障碍。决定设计除掉他。先买通林仁肇的侍者，盗取林的画像，悬挂房中。引江南使者观看，问道："知道此人是谁吗？"答："是林仁肇。"说："林仁肇要投降朝廷，先命人送来这张画像，"又指一指这座房子道："这处宅子就是赏给林的，如今专等他早日入京了。"李煜听了使者的禀报，赐毒酒给仁肇，于是江南又少了一个可用之才。

开宝六年四月，李煜任命汤悦知左右内史事。汤悦看到南唐将有大难降临，以年老为辞，不肯就职。李煜不许。九月，内史舍人潘佑、户部侍郎李平攻讦大臣、搅乱朝纲，惧罪自杀。潘好神仙术，李懂得一些修炼丹药和吐纳练气的事。二人互相推重，关系密切。李自称能与神仙交往，还说看到了潘已死的父亲做了仙官，他本人与潘也都是仙官。于是各自在家设了静室，挂上神仙鬼怪的图画，披发裸身，祭神弄鬼。李对潘说：六朝大臣的坟墓中埋葬的宝剑、宝镜等，佩带在身，能辟鬼邪。鬼邪不侵，就成神仙了。潘到处搜集这些东西，终难得到，直急得他心如火燎。恰巧，前文提到的清辉殿学士张洎也是个神仙迷，与潘佑一起买了一块鸡笼山前的乱坟地，约有数十亩大小，在上面盖了一座别墅。每逢朝休沐假日，带领仆夫，拿着锄头铁镐，到这里挖坟。每得到一二件古器物，便传观把弄许久，兴趣不衰。潘佑忽然向李煜提了一条"治国方略"说："治国之本在于厚农桑，厚农桑就要恢复上古实行的井田制，以抑制土地兼并。又按《周礼》应该造民籍，还应造牛籍。"为推行这些措施，他推荐好友

李平为判司农寺官。这样一条散发着古董味的政策直搞得江南百姓叫苦不迭，上下难安。李煜不得已下令停止执行这些政策。潘佑以为是执政大臣在背后搞自己的鬼，上书诋毁大臣，说他们与武臣勾结，早早晚晚要发动一场政变。还说国家不久就灭亡，非由他潘佑出任宰相，挽救危局不可。好像他真的成了宰相，要行使用人的大权了，说尚书省是个要害部门，他的好友李平可以做个“知尚书省事”的官，司天监的杨熙澄可掌管枢密院，军校侯英可掌管禁卫军。李煜自然不能准奏。潘佑更加气愤，疏请将宰相汤悦等大臣数十人斩首示众。李煜这才下一道诏书，告诫他，不可胡言乱语。潘佑从此不肯上朝。在家中仍不能安生，又把矛头对准了李煜，上表说道：“陛下既不能自强，还不能弱？不如率兵十万，去帮助宋朝收复河东。然后率领百官，朝见宋天子。这是保国的一条良策呢。”这般挖苦话李煜如何禁受得了？倒也亏得他好涵养，仍不治潘佑罪，只从此对他的表章不再理会。潘佑又多次请求辞官，声言入山避难。十月，潘佑写了他的第七份表章，其中说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已连上表章，陈述奸臣罪行，言辞明白，证据确凿。不料陛下包庇奸臣如同骨肉，使国政昏暗，如日将没。像你这样的昏君，连桀纣也不如。桀纣作恶，以致身死国亡，但恶是由己出，是按自己的主张干出来的；如今你作恶，却是受群奸的挟制，不得自由，可说是连作恶的本事也没有，怎能与桀纣相比？我终不能与这些奸臣为伍，替一个昏君、一个亡国之主做事，这官我是一天也不当了。”直把李煜骂得狗血喷头，再也包不住火，下令说：潘佑如此狂悖，实与李平有关，先把李平送大理寺狱关押，再逮捕潘佑。潘佑闻讯自杀，李平也在狱中自缢死去。潘佑的家属发配到饶州居住。事后李煜说，杀潘佑的事我直考虑了十多天，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明年，就要将他的家属赦免，还要供给廪食。杀潘佑是张洎一手促成的。张与潘一起发掘古墓时，交情何等亲密！后来一起

做了中书舍人，张洎便时时有相凌的意思，潘佑不能忍受，给张洎写信说道："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意思是，实在难与你共事。潘佑之死是罪有应得，但是江南刑政不立，潘佑如此张狂，若没有张洎鼓动，李煜也未必杀他。张洎很受李煜宠信，封为清辉殿学士。清辉殿在皇宫后苑中，李煜不愿他离开身边，才封他这么个官职，以便随时召见。此外还有一座澄心堂，也在宫中，张洎与太子太傅徐辽、太子太保徐游时常聚在这里密谋策划，许多宫中秘旨都是从这里产生，再由徐游的从子元楀传宣出去。中书省、枢密院这些政府的核心机构形同虚设，半点核心作用也难发挥。

开宝七年五月，自从善被留居江北，李煜思念不已，所有宴会都停止举行。又写了一篇《却登高》文，抒发他的感慨。当年派常州刺史陆昭符到江北进贡，特意托他带上自己的亲笔书信，求请赵匡胤放从善回江南。赵匡胤不许。六月，封从善的随从掌书记江直木为司门员外郎，同判兖州事。其他僚佐也都封了官职。不久又封从善的母亲凌氏为吴国太夫人。陆昭符在江南与张洎有些过节，赵匡胤得知后，对昭符说道："你们江南国窃弄政权的是一个大喉结的小子，名叫张洎对不对？为何不派他做使者？你回去后传我的话，叫他来一趟，我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张洎权势炙手可热，陆昭符避之犹恐不及，这些话他怎敢传递？不传又是失职，赵匡胤更是得罪不起。思前想后，左右为难，于是决定留在宋朝，不回江南述职了。这正是赵匡胤所求之不得。七月，江南落第举人樊若冰投奔宋朝。樊若冰在江南举进士，没有中第；向朝廷上书献计献策，又没有回音。百无聊赖之际决定投奔江北。知道宋兵南下那是迟早的事，自己不能空手入宋，总得立些功劳。于是，伪装成在采石矶旁的长江中捕鱼，驾一叶扁舟，在江面上来来往往。别人只道他是一个勤于生业的渔户，哪晓得船上载了一根丝绳，自江南岸扯到北岸，扯来扯去，

一连扯了好几年，把个长江水面宽窄，水流缓急摸了个透熟。这才来到江北，向朝廷献上伐江南的计策，大要是：自采石编舟为浮桥，就能使大军往来江上，如履平地。赵匡胤听了大喜，说道："这样的人才在江南竟然不能中第，考进士还有何用？你去我们的学士院考上一考，看是如何？"不要说，那是一考则中：赐樊若冰进士及第，授了舒州团练推官的实缺。若冰道："老母和亲属都在江南，起兵之后，必为李煜所害。烦请陛下把他们接来与臣团聚。"赵匡胤满口答应，下一道诏书给李煜，要他把樊的家属护送入朝。李煜哪敢违抗，急忙照办。也是樊若冰乖觉，及早把家属接走。后来江南人知道是他献计灭了自己的桑梓之邦，恨之入骨，把樊氏在江南的几代坟墓全都刨光。若有亲属留在江南，焉能得了好去。数日后，赵匡胤又加封樊若冰为赞善大夫，派遣八作使郝守浚率领工匠到荆湖地区，按照樊若冰的计策，督造大船和黄黑色相间的龙头船共数千艘，以备使用。

还在数年以前，赵匡胤就命人在城南薰风门外建了一座离宫，栋宇宏丽，规模很大，约占了数坊大小的土地，赐名为礼贤宅。许下诺言："李煜与吴越王钱俶，谁先归降，这座宅院便赐给谁居住。"又对吴越王的使者黄夷简说："回去转告你们主人：江南倔强，不肯入朝，不久我将兴师问罪。要他早做准备，训练甲兵，帮我作战。且不可听信他人言语，妄生疑心。"吴越王又遣钱文赞来朝贡，归国时赵匡胤赏给钱俶许多器物钱币，并把出兵江南的日期悄悄告诉了他。

九月十八日（癸亥），宋遣颍州团练使曹翰先期率兵赴荆南，计划自上流沿江东下灭唐。二十一日（丙寅），又派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共同领兵随后到达。

宋太祖赵匡胤调兵遣将已毕，一时找不到出兵的借口，不便动手。打算先派使者到江南召李煜入朝，要是答应，把他留在汴

京，江南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若不肯答应，再出兵算是有了借口。只是这出使江南的人不免会遇到些危险，一旦江南君臣窥破了宋朝的居心，岂能轻易放他生还？必得一个有谋又有勇的人方可。朝廷中有一个负责起草文告的知制诰李穆，与参知政事卢多逊同师求学，赵匡胤曾与卢多逊谈论人物，说李穆此人"性情和善，除了文辞之外，大约别无用处。"卢多逊却说："据臣所知，此人操行端直，不会因生死改变节操，是一个仁而有勇的人。"赵匡胤惊奇道："假若真是这样，我倒要试他一试。"如今遇到这档子事，赵匡胤便想到了李穆。二十二日（丁卯），派李穆出使江南。到江南后，李穆反复解说，李煜已经打算随李穆一同起身。属下有一个光政使、门下侍郎陈乔却坚决不答应，说道："先帝去世前，把江南托付给陛下，并要臣辅佐陛下，治理江山。如今陛下入宋，必被拘留，江南社稷无主，该怎么办？臣辜负先帝嘱托，就算死了，也没脸见先帝于地下。"清辉殿学士张洎也劝李煜不可入朝。陈乔、张洎都是李煜极为信任的人，他们既如此说，李煜就改变了主意，托病不朝。李穆再怎样说，李煜只是不允，道："以前我小心谨慎，供奉大国，为的是能得到大国的保全。如今，大国既要灭我国家，还有什么可说，我只有一死是了。"李穆见终难成功，撂下几句硬邦邦的话道："朝或者不朝，国主自己拿主意是了。不过我有一句话对国主说：朝廷兵强马壮，粮草充足，闹翻了，恐怕不易阻挡。国主要深思熟虑，免得后悔。"回朝复命去了。赵匡胤以为李穆这次出使，当说的话已经说尽，完成了使命；卢多逊果有知人之明，后来升他做了宰相，这是后话不提。李穆归来的当天，赵匡胤又派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侍卫步军都虞候刘遇、东上阁门使梁迥等一同领兵到荆南会齐。二十九日（甲戌），任命太子中允、知荆湖转运使许仲宣兼南面随军转运使，便是兵伐江南的总军需官了。

兵伐江南的一切准备就绪，十月十二日（丙戌），江南国主

李煜又派遣亲弟从鉴，携带重金过江朝贡来了。还带有一笔买宴钱，要设宴款待宋朝君臣，真是咄咄怪事。

曹彬与诸将一起入宫辞行，赵匡胤在讲武殿设宴为他们饯行。酒过三巡，曹彬等人离座，请求面授机宜，赵匡胤对曹彬说道："江南的事，全都托付给你了。卿要牢记：不可妄杀百姓；要广布威信，最好是使州郡自降，不要贪图速胜，强攻城池。那样做双方伤亡都会很重。王全斌伐蜀时，朕没把这些话交待清楚，以致他杀降屠城。至今想起，仍觉不安。这次不要再令朕失望了。"曹彬等人叩头接旨。赵匡胤又从袖中取出一个封好的信笺，说道："我把命令写了装在这里，自副将潘美以下，有不听命令者，你拆开此笺，照此执行，但杀不妨，无须再奏闻朝廷。"潘美等人听了此言，一个个面无人色，难出一言，吓成"呆傻"了。曹彬敬谨答道："臣接旨。"

十八日（壬辰），曹彬等自荆南出发，直向金陵（今江苏南京）。

二十三日（丁酉），以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赐给战马二百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又派客省使丁德裕领禁兵千人作为钱氏的前锋，也算是朝廷派去的监军。

二十五日（己亥），曹彬等人率军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西北）渡江，破江南峡口寨，杀守卒 800 人，生擒 270 人，池州城派来的牙校王仁震、王宴、钱兴三人也做了俘虏。

三十日（甲辰），正式任命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行营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为何直到此时才任命将帅？这就是赵匡胤诡谲之处了。不正式命帅，谁也不会想到能出兵，江南君臣就上了这个恶当。起初宋军沿江东进，直趋池州（今安徽贵池）。一路经过处的江南戍兵，都以为是宋朝的巡江兵，以前来来往往惯了的，谁也不以为意。只照惯例闭城自守，还派人送上酒肉犒劳。后来才觉出与往日不同，但

为时已晚，池州守将戈彦弃城逃走。

闰十月五日（己酉），曹彬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池州城。

郝守濬在荆南打造好大船，载着竹索，还有在朗州打造的黄黑龙船，一起驶向采石矶，打算在那里架设浮桥。有人表示疑问，说："江宽水深，自古以来，从没有过在长江上架浮桥的先例。一旦不成，对战事的影响太大。"曹彬命人先在石牌口一带的江面上演试。成功以后，命令曾任汝州防御使的陆万友率兵守护。十三日（丁巳），曹彬等人率兵与江南的军队大战于铜陵（在安徽境），缴获战船二百多艘，俘虏八百多人。十八日（壬戌），攻拔芜湖，将兵推进到当涂县（在安徽境），守官魏羽开城投降。宋军遂到达采石矶。二十三日（丁卯），江南二万多人迎战，不胜，被俘一千多人，包括马步军副都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这些高级将领。还有战马三百多匹也被缴获。江南本无战马，每年向宋朝廷进贡，宋朝廷便赐给战马一百匹。累年所积，数目已经不小。此时驱赶出来，作为前锋，与宋军作战。被缴获时，原宋朝在马身上烙下的官马印记还没褪尽，真可说是物归原主了。

十一月一日（乙亥），宋朝的地方军队潭州兵入南唐境，进攻萍乡（在江西境），被萍乡守将制置使刘茂忠击败。李煜随即提升刘茂忠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九日（癸未），将原泰宁节度使李从善所辖的军队及其他江南归附的水军，共一千三百多人改编成禁军，起名为"归圣军"。

十日（甲申），赵匡胤下诏，命将石牌镇的浮桥移到采石矶。条条大船，首尾相接，用竹索牢牢钉在一起，三日而成。与樊若冰设计的尺寸不差分毫。潘美率步军踏桥而过，如履平地。

初建浮桥的时候，江南国主李煜闻讯，转告清辉殿学士张洎，张洎道："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没听说过有这等事，必不能成功。"李煜也说："我也以为这么干如同儿戏。"于是，派遣

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水军一万人；天德都虞候杜真率领步军一万人，堵截过江的宋军。临行，李煜告诫他们说：“水陆两军相辅相济，必能成功。宋军插翅也难以过江。”

十四日（戊子），吴越王钱俶遣使者到宋朝进贡，献上李煜劝他叛宋的书信，大意是说：“今日无我李煜，明天你钱俶就要倒楣。等到南唐国亡，‘明天子’下一步酬劳诸将功勋时，你就不再是南越王，而是汴梁城中一个平民百姓了。”这些话很有见识。但不知宋军兵伐南汉时，李煜又为何殷勤助宋，说降刘铱？可见万事知之不难行之难。若能将心比心，就不会给钱俶写这种信。以致把这样深刻的道理、动听的语言白白糟蹋了。

十五日（己丑），知汉阳军李恕率当地军队击败了江南鄂州水军三千多人，缴获战船四十多艘。

二十日（甲午），曹彬军捷报说，在新林寨（今江苏江宁西南）击败江南军数千人，缴获战船三十艘。

二十八日（壬寅），堵截宋军过江部队的郑彦华和杜真部与宋军遭遇，杜真的步兵首先接仗，眼看不敌，郑彦华的水军竟然坐视不救，杜真军大败而归。李煜倒是有先见之明，早就告诫他们要“相辅相济”，却无奈诸将不听。金陵难免吃紧了。

十二月，金陵戒严。李煜命令国中废除“开宝”年号，只以甲子纪年，当年称甲戌岁。又大量招募民兵；有自愿献出粮食和其他财物帮助国家的，视数目多少封给官爵。表示破釜沉舟，与宋军决战到底，不再存任何侥幸心理了。

四日（丁未），江南鄂州水军三千多人向北进犯，至江北岸，被宋汉阳兵马监宁光作率军击败。

吴越王钱俶率兵围常州，俘获南唐守军二百五十人，马八十匹。二十日（癸亥），攻破利城寨，破军三千多人，俘虏六百多。

二十三日（丙寅），曹彬等人在新林港口大败江南兵，杀死二千多人，焚毁战船六百多艘。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兵南伐，国中必空虚。于是大张旗鼓地做了一番准备，把境内军士子弟凡是年龄超过十七岁的，都签发为士兵；凡百姓所养马都强制作为战马。兵马既足，便遣代州刺史蔚进提兵南下，攻宋平阳城（今山西临汾西南）。宋地方官权知晋州武守琦率众抵御，二十七日（庚午），双方在洪洞县（今山西境内）遭遇，一场大战，北汉兵五千多人大败而归。

二十八日（辛未），吴越王钱俶在常州以北败江南李煜兵万余人。

契丹见宋朝渐强，打算与宋朝改善关系，遣使告诉北汉主刘继元说："如今中原与北汉强弱不同，不要随便出兵南侵。"北汉主听了恸哭失声，以为有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契丹非但不助他南下，还阻止出兵，太是不该。气愤之下，便欲与契丹翻脸成仇。宣徽使马峰再三劝阻，刘继元才稍解怒气。

开宝八年正月三日（丙子），权知池州樊若冰在州界中击败江南兵四千多人。

曹彬出兵以前，赵匡胤就把韶州（今广东曲江）刺史王明调任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并面授王明方略。王明上任后，立刻动员州中人力，修城浚池，训练州兵。当时谁也不知他这般忙忙碌碌，却是为何？等到曹彬出兵，首先任命王明为池州到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八日（辛巳），王明派兵马都监武守谦等人领兵过江，在武昌城下击败江南兵一万多人，杀死七百多人，夺取了樊山寨。同一天，曹彬遣行营左厢战棹都监田钦祚攻栗水（金陵属县），江南统军使李雄把他的几个儿子叫到面前，嘱咐说："如今国家有难，我必为国而死。你们不可为我担忧，应该各自努力，为国立功。"父子八人全都战死于军中。

十七日（庚寅），曹彬率大军直攻金陵，部将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率所部渡过秦淮河，以大船满载芦苇、柴草，顺风纵火，驶向江南水寨。水寨火起，一片大乱。李汉琼挥兵进击，夺取了

水寨，杀敌数千人。起初，宋军到达秦淮河畔，江南兵水陆共十多万人，背城为阵。宋兵没有渡船，只能与江南兵隔江对峙。潘美下令说："我率领数万虎狼之师南下以来，战必胜，攻必取，所向无敌。岂能被这条衣带一样宽的小河阻隔不前！"当下率亲随将士泅水而过。士兵见了，踊跃赴水，一齐涉流渡河。江南兵败。宋军沿浮桥源源过江，江南军溯流而上，欲抢回浮桥。潘美纵兵与战，神卫都军头郑宾等七人被宋军活捉。

二月十三日（乙卯），宋军攻破金陵外城，千余人被杀，其余的争入内城，在护城河中溺死的又不下千余人。天德军都知兵马使张进等几人，见大势已去，投降宋军。

起初，陈乔、张洎为李煜献计，命各地坚壁清野，宋军因粮草不继而师老兵疲，终于要自江南收兵。所以，李煜对宋军出兵一点儿也不担忧，每日里在后苑招引一些僧侣道士讲经说《易》，高谈阔论，不把政事放在心上。各地军情紧急，呈上来的告急文书，不经过徐元瑀难以到达李煜手中。宋军攻到金陵城下一月有余，李煜还半点不知。那时，南唐的老将都已去世，李煜把兵权交给老将皇甫晖的儿子皇甫继勋，任命为神卫统军都指挥使。可是他年纪尚轻，又出身贵家，骄奢惯了，根本没有为国效死的决心。宋军来攻，无计御敌，只盼李煜早日投降，可保大家平安无事。只是这话如何说得出口？平时与同僚或下级谈论，就不免露些口风，每每说："北军如此勇猛、顽强，哪一个能抵敌得了？"听到南唐兵败，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就高兴异常，说："我早就知道不是宋军对手。"皇甫继勋的侄子皇甫绍杰官为巡检使，与皇甫继勋很是亲近，皇甫继勋曾命他向李煜献密计投降宋军，李煜不听。部下偏裨将校有招募敢死士，夜出劫宋军营寨者，只要被皇甫继勋知道，必是挨上一顿鞭子，然后关押起来。因此，群情愤怒。皇甫继勋又推说军中繁忙，很少人朝晋见李煜。有时李煜召见，他也不一定前往。五月，李煜亲自巡城，看到宋军列

营城郊，旌旗遮天蔽日，才知道被左右臣僚蒙蔽，一时之间，既惊慌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先命人把皇甫继勋关入大牢，搜集到他素常说的“不敌宋军”的话，定了个“流言惑众”的罪名，连皇甫绍杰一起斩首示众。军士对他们早已愤恨入骨，如今才有了泄愤的机会，你一刀，我一刀，顷刻间把他割食而尽。皇甫继勋被杀后，军事命令都自澄心堂颁下，打的是李煜的招牌，其实出自于张洎等人。城下宋兵之围既不能解，于是遣使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率领上江戍兵入援京城。朱令赟是江南老将朱业的儿子，拥众十万，屯于湖口（在江西境，为鄱阳湖之口，因名）。接到李煜的求援诏书后，部将建议乘涨江的机会，率兵速赴金陵。朱令赟道：“我若赴金陵，敌人必乘虚断我后路。在金陵城下若一战不胜，背后粮道又绝，大是可忧。”于是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命他代镇湖口。柴克贞有病在身，迁延不肯行。朱令赟也就不敢进兵。李煜一再催促，朱令赟只作不知。

九月，江南都虞候刘澄以润州投降。润州就是今日的江苏镇江市，由于与金陵毗邻，地势很重要。李煜以为应当选良将镇守，选来选去，选了一个他即位以前在他王府中任事的亲信，就是这个刘澄了。李煜对他说：“我舍不得离开你，你也舍不得离开我。但润州非你去镇守不可。只得要你去为朕分忧了。”刘澄感动得涕泪交流，说一定不辜负陛下信任。临行，把家中金银珠宝载运一空，有人问他，是去打仗，带着这些东西有何用？刘澄慷慨说道：“这些都是陛下平时的赏赐。如今国家有难，应该把它们散给有功的将士。”李煜知道后，很是高兴，以为是托付得人。后吴越兵来攻，立营未成，部下请求出兵掩杀。刘澄道：“胜了固然好，败了立时会成人家俘虏，还有什么好。”不肯答应。其实他久已有降敌的打算，把家中金银财宝带在身边也是为此，说什么散给将士，全是胡扯。终于在九月九日（戊寅）投降宋朝，使江南陷入危机。

十六日（乙酉），宋将丁德裕押送润州降兵到金陵城下，许多人中道逃亡。曹彬发布檄文，诱使来归，渐有一些人重新归队。不久，曹彬怕他们闹事，将这批人又全部杀掉。然后向朝廷报捷说："在升州（即金陵）城下击败润州溃兵数千人，斩首七百级。"自然算是大功一件了。

润州降后，围城的宋兵再无顾忌，攻城更急。李煜派使者到宋廷求缓兵。使者有二人，一是道士周惟简。以前在洪州西山隐居，李煜把他召入京城，住在紫极宫，时常给李煜讲解《周易》。张洎推荐说他有"谈笑弭兵锋"的本事，才派他做了使者。第二个是修文馆学士承旨徐铉，江南有名的大学者，又有辩才。临行前，李煜传令停止上江兵入援。徐铉道："臣此行未毕就能为国家排难解纷，城中人日夜盼望援兵，为何下令停止入援呢？"李煜道："你们此行是为求和而去，若征调援兵，对你们的安全不利。"徐铉道："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重，臣等的安全置之度外是了。"李煜十分感动，正所谓日久见人心，国难知忠臣。想到平时只以文士相待，封了个学士承旨的官职，不令参预国政，亏待他了。下令加封为左仆射，参知左右内史事。徐铉道："臣此行吉凶未卜，况且国难当头，臣无尺寸之功，如何能受此封？"执意不肯接受。李煜又以周惟简素来清高，不求名利。到了宋廷是否能为国事力争，实所难言。亲自写了一个"奏目"，约十余张纸，要他按奏目向宋廷奏禀。

十月初一日（己亥），徐、周入宋营。曹彬遣使将二人送到汴京。徐铉知道这次出使是要以口舌退敌数十万兵，一路绞尽脑汁，思前想后，做了各种推断，务要把宋朝君臣驳得哑口无言，自动退兵，方才罢休。宋朝诸臣听说徐铉入使，猜想必是来做说客，慑于他的名气，心中不安。告诉赵匡胤，要做好准备，免得出丑。只有赵匡胤不以为事，心想：历来文武兼济，方能成事。从未见过武事不备，专靠口舌能够屈人的。徐铉入朝后，唤他上

殿，吩咐有话不妨细说。徐铉口如悬河，滔滔不绝，说了一遍。大要是，这些年来，李煜对宋朝是以小事大，毕恭毕敬，如同以子事父一般，从无半点过失。宋军兵伐江南，是出师无名。赵匡胤待他说完，缓缓问道："你说李煜对宋朝如同以子事父，既是父子，分作两家居住也是应该的吗？"徐铉张口结舌，不能回答。周惟简只把李煜写好的奏目呈上，竟是一言不发。

二十日（戊午），江南援兵终于起行了。朱令赟从湖口出发，编木为筏，长百余丈；乘坐的战船大者可容千人。一行十五万人浩浩荡荡，顺江流东下。打算先破采石矶浮桥，再解金陵之围。宋将王明闻信，屯兵独树口邀截。自知兵势不敌，遣使飞报入朝，请求增造战船三百只。赵匡胤道："朱令赟兵旦夕便到金陵，如今打造船只，怎能应急？"便遣密使传令，让王明在沿河洲浦处多多树立长木。这朱令赟为将，最是多疑，谨慎有余，果决不足。远远看到这些长木，如同桅杆一般，怀疑是宋军的伏兵，迟疑不敢前行。时当初冬，江水一日浅似一日。朱令赟乘坐的大船，高十几层，上面立着大将旗幡，看似威武，转动已很是不灵。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皖口（今安徽怀宁西，为皖水入江口），论路程还不足全程的四分之一。便遇到行营步军战棹都指挥使刘遇部的猛烈攻击。宋军船小，船帆贴令赟船舷而过，令赟命人举火焚敌帆。宋军船帆起火，江南兵正自得意，不知不觉间风向倒转，由南风转而刮起了北风。着火的几只宋军小船，直向朱令赟大船冲去，江南军一片大乱。不一时大船着火，其余船只各自溃散。宋军乘势攻击，朱令赟及战棹都虞候王晖都做了宋军的俘虏。金陵守军日夜盼望这支军队来援，如今全成泡影。只剩下孤城一座，又无援兵，日子更加难过了。

十一月三日（辛未），李煜重新派徐弦、周惟简到宋朝求缓兵，赵匡胤在便殿接见他们，徐铉仍是那番话：江南事大宋之礼未缺，宋军出师无名，请求缓师等等，赵匡胤如何肯依，徐铉反

复陈请，一连数日，渐渐地由于情切而直，辞语变得厉害起来。暗想国家将亡，此番出使若再无功，我这条性命是不要了。于是痛斥宋朝依势压人，不讲道理。赵匡胤大怒，手按剑柄说道："依你说，怎的才是讲道理？不错，江南国是没有罪，没有罪就不能讨伐他了吗？如今天下一家了，江南国主却要自成一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就是道理，别的不要再说了。"徐铉见到了这地步，还有何话可说，慌忙退下。赵匡胤又责备周惟简，惟简道："臣本来隐居山野，并非追求升官发财而来，是李煜强派臣到此。臣平素听人说终南山中有许多罕见药草，他日得为王民，愿陛下允许臣在那里定居。"原来他是为自己谋后路来了。李煜所用之人多如此辈，安得不亡？赵匡胤对他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二人仍是无功而归。

宋军围金陵，自当年正月以来，至今已近一年。城中尽管存粮充足，烧柴已大成问题。城中兵数次出战，都大败而归，士气弱了，已难再战。但曹彬牢记赵匡胤临行前的吩咐："不可强攻城池"，"让州郡自降"。每当城将攻破，麾兵自退。这样紧紧松松，拖了一年，曹彬派人入城告诉李煜："一年来，我已仁至义尽，不能再等。本月二十七日城必破。是战是降，你自己斟酌是了。"李煜这才失了主张，约定先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仲寓到宋朝洽谈投降的条款。又迟迟不肯出城。曹彬每日派人催促道："只要令郎来到我的营寨，即刻下令停止攻城。"李煜身边的臣僚你言我语道："金陵城高壕深，宋军攻了一年没能成功，如今说二十七日破城，一厢情愿罢了，岂能当真？"李煜又失了主意，只得通知曹彬说："仲寓行装未备，宫中还要设宴为他饯行，大约二十七日就可出城。"曹彬对来人道："我已说过二十七日破城，二十六日仲寓再出，已然不及，更不要说二十七日了。"李煜不听。

起初，赵匡胤数次托军使捎口信：不要杀害金陵城中百姓，

若势逼无奈，至少要保护住李煜的一门老小，不受伤害。如今决定强攻金陵城，士卒必有伤亡，伤亡则愤怒。城破之后，愤怒的士卒焉有不杀人泄愤之理？纵然严令约束，怕也无济于事。他曹彬能有几双眼睛，管得了这数万大军的一举一动？思前想后，不得善法。心中郁闷，竟然病倒。大小将士前来探望。有的还要介绍名医为他诊治。曹彬道："我这病非药石所能治疗，诸位不要费心了。"众将听了，以为是病势沉重，不免伤感。虽然仍强颜慰勉，不由得个个虎目含泪。有心细的人问道："元帅这场病究竟是怎样得的，难道真就无药可医了吗？"曹彬叹道："其实也不难治，只不知诸位肯不肯尽力。"众将听了，心中大喜，纷纷说道："元帅只管说是了。只要你能康复，要我等火里水里，皱皱眉头，便不是汉子。"曹彬这才说道："只要诸君对天起个誓，城破之日，不妄杀一人，我这场心病也就好了。"众将哈哈大笑道："原来元帅是为城中这帮罪民求情来着。这有何难，我等起誓便了。"于是共同焚香立誓，第二日，曹彬病愈，下令攻城。

二十七日（乙未），金陵城破。江南与宋军对抗，主谋是陈乔、张洎二人。城将破，二人约定，与国共存亡。可是张洎心中并不打算去死。这一日，带着妻子儿女和大包小包的行囊，与陈乔去见李煜。陈乔道："是臣辜负了陛下，愿陛下把我当众处死。以后中原朝廷问罪，就推在臣身上是了。"李煜道："是我江南国的运数已尽，卿死有何益处？我不怪罪你是了。"陈乔道："陛下纵不杀臣，臣有何面目活在人间。"说完自缢而死。张洎道："臣与陈乔共掌国政，该当与陈乔共死。但以后朝廷问罪，谁为陛下辩解？臣今日不死，就是为了做这件事。"

曹彬整众入城，秋毫无犯。李煜率江南群臣跪迎于门前。曹彬以宾礼相待，李煜自言罪孽深重，万死难赎。曹彬百般开解勉励一番。又对李煜道："你入朝以后，奉禄虽多，毕竟是有数的钱财。以后花费必多，不如先回宫去，多带些行装。不久，有关

人员就要登记财物，一旦入了籍帐，再想取一分一文也就不易了。”李煜答应了，曹彬命人把他送回宫去。一面吩咐，挑选精兵千人守护宫门，任何人不得入宫门一步。部将梁迥、田钦祚等人说道：“放李煜入宫，只怕不妥。假若他一时短见，取了自尽，这责任我等如何担当得起。圣上一再吩咐，要保护李煜一门老小，元帅忘了不成？”曹彬笑而不答，梁、田等人一再请求把李煜追回，曹彬道：“诸君不必担心，李煜素来没有决断，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再忍受耻辱来营中与我见一面？”梁、田等人听了，深服曹彬见事明白。曹彬又委派五百人为李煜运载行装，可是这李煜伤心国亡，哪有心思放在钱财之上，把宫中黄金、财物一古脑儿分给了近臣，自己所剩已经有限。偏偏就有不识好歹之人，有个右内史学士张佖得了李煜的黄金，跑到曹彬跟前告状说：“金陵既降，所有财宝都是朝廷之物。李煜私自分送近臣，是对朝廷不忠。自己怎能受这等不义之财？愿把这事申报朝廷，有本人所得黄金为证。”曹彬说道：“你不过是邀名，我成全你是了。”命左右将他所得黄金收入官库，又道：“至于上奏朝廷，那就不必了。宫中财物尚未入籍，李煜有权处理他的财产。”张佖碰了个灰土灰脸而去。

曹彬入城后，申严军令，禁止抢掠。城破时，士大夫家妻女有被抢掠者，一旦得知，立命追还。仍怕有脱漏，下令在军中大搜，严禁藏匿人家妻女。城中仓廪府库，诸般财物，委派转运使许仲宣按籍帐、文卷查收，自己一概不问。撤兵回京时，曹彬船中只有一副衣被、数卷图书而已。曹彬为人廉洁谨慎，盛名之下，善于自处。因此得赵匡胤信任，始终不衰。这是事实。但史书渲染，说他灭江南、西川、广南、湖南四国，未尝妄杀一人，就言过其实了。《梅硐山诗话》引曹景建《金陵乐官山诗序》说：曹彬初破江南，大摆酒宴庆功。把城中乐官全都召来，歌舞弹唱，以助酒兴。这些艺人们想到，国家为人所灭，自己反而要为

他们歌舞庆祝，心中悲愤伤痛，泪流不止。众将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都杀掉，埋在山脚下，后人因称此山为乐官山。有人作诗道："城破辕门宴赏频，伶伦执乐泪沾巾。骈头就戮缘家国，愧死南朝结绶人。"乐人为国一哭而见杀，曹彬万难辞咎。前面说到的润州杀降，也是曹彬下的命令。所谓"兵凶战危"，统一江南的战争，江南百姓是付出了沉痛代价的。

十二月一日（己亥），平定江南的捷报传到汴京，宋朝新得州城 19 座，军 3 座，县城 108 座。群臣都来称贺，直把赵匡胤乐得老泪横流。群臣不解原故，问道："江南平定，天下一统，陛下正该高兴，为何反而落泪？"赵匡胤自知失态，讪讪说道："天下分崩离析，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统一，虽是好事，攻城时，必有无辜百姓，横遭战祸，实在叫人可怜。"命令国库出米十万石，赈济金陵城中百姓。

开宝九年正月四日（辛未），曹彬派翰林副使郭守文押送李煜及其子弟、官属 55 人入朝，赵匡胤在明德门接受献俘。朝臣有的建议按照献俘礼的仪式进行，就像对南汉刘𬬮那样。赵匡胤道："李煜一直使用中原年号，本就是中原属国，与刘𬬮不同。"一切仪式全都免了，只让李煜穿白衣纱帽在楼下请罪。赵匡胤下令免去他的罪过，另赏给冠带、鞍马等物，授给官职为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爵位为违命侯。接着召见徐铉，声色俱厉地责备他不及早劝李煜投降。徐铉从容答道："臣为江南大臣，不能免国家灭亡，是我的大罪。却不应该以劝主投降的事责备我。"赵匡胤早就欣赏他的忠直不二，听如此说，更是高兴道："果然是个忠臣，是我失言了。希望以后对朕能像对李氏一样忠心。"命他在一旁坐了，又安慰一番。唤来张洎问道："是你唆使李煜，拒不投降，对抗至今日，你知罪吗？"说了，取出张洎起草的召上江援兵蜡丸书，丢给张洎自看。张洎磕头请死，说道："这的确是臣所写。岂不闻'桀犬吠尧、吠非其主'的话，蜡丸

书只是臣做的一件事，其他还有很多。今日一死，正是臣子份所应得，其他就不必再说了。”赵匡胤本来打算杀了他，以惩戒江南反叛的罪过。如今见他从容不迫，慷然不屈的神志，言词又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念，说道：“卿的胆量不小，竟然不怕杀头。好，朕也赦免了你，不过以后对我不要改变了以往的忠心才好。”

曹彬衾书归国后，命监门者向朝中递了一个折子道：“曹彬等自江南办事回。”赵匡胤闻报，哈哈大笑说：“曹国华（曹彬字国华）如此谦恭，大有儒将风度。”急命人迎接人宫，设宴庆贺。行酒二周，曹彬怀中取出一个大信封，起身离座，跪倒在御榻前，说：“臣等赖陛下鸿福，得以成功。早日面授文字，不敢私藏在家，现缴还陛下。”赵匡胤接了，见是曹彬下江南前，请求面授机宜时所赐。当时吩咐他，自潘美以下不尊号令，可拆此信封，径行斩首。看来是无一人犯法，所以信尚未拆。赵匡胤顺手将信拆了，抽出一张纸来，众人看时，却是一张白纸，连半个字也没有。一时呆了。曹彬微愕之间，已明白这是赵匡胤玩弄的权术，以为诸将见曹彬得了这个信封，只道是有专杀权，必不敢犯令；设若有人犯令，曹彬拆开信封，见是一张白纸，定会面奏请旨。说到底，是不肯赐他专杀权罢了。叩头说道：“陛下英明，臣等万不能及。”赵匡胤哈哈大笑。其余诸将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赵匡胤命人将纸收起，对此再也不提一字。

二月，大封平江南功臣，以曹彬为枢密使领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以山南东道节度使领宣徽北院使；李汉琼领镇武节度使；刘遇领大同节度使等。曹彬起行前，赵匡胤曾私下对他说：“待讨平李煜，我就封你为使相。”宋代以节度使加平章政事为使相，地位在宰相以上，是最高品级。江南平定后，潘美预向曹彬祝贺，曹彬道：“哪有这样的好事？我根本不做此想。”潘美道：“曹公何出此言？这不是天子亲口许下的吗？”曹彬道：“第一，

这次出兵，全是仰仗天威，遵守朝廷的成算，才得以成功，吾个人没有半点功劳，怎敢妄想有这么高的官封？第二，难道你不知道使相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吗？”潘美莫名其妙道：“是最高级别那又怎样？”曹彬道：“太原还没平定，陛下怎能以此授人。”到宣布南下诸将官封的第一天，念到封曹彬职衔，果然不是使相，潘美不禁佩服曹彬的见识，望了他一眼，两人相视而笑。赵匡胤自知对人不起，早就双眼盯着曹彬的反应，见二人暗做鬼脸，忙问潘美是什么意思？潘美不敢隐瞒，把曹彬的话说了。赵匡胤只好招认，哈哈笑道：“曹爱卿所见不差。如今太原未下，卿若得使相，品位已极，怎肯再为我力战？虽然这样，我也不会亏待爱卿。”说完传命，赐曹彬钱50万。曹彬归家后，见赏赐给他的铜钱堆了满满一间屋子，自我解嘲道：“人生何必要做使相，好官也不过是多得金钱罢了。”

四月二十一日（丁巳），江南的最后一个据点江州被宋军攻破。李煜投降后，曹彬曾要他命令其余州郡投降。各地接到命令相继投降。江州刺史谢彦章也要投降宋军，军校胡则、牙校宋德明杀刺史，号召军士坚守。曹彬命先锋、都指挥使曹翰前往讨伐。江州城高池深，竟是屡攻不下。自头年冬天直到来年四月，宋军死于城下者不计其数。后胡则卧病在床，无人指挥，城被攻破。军士改为巷战，直到全部战死。胡则在病床上被俘，曹翰责备他：“为何抗命不降？”胡则爽朗答道：“犬吠非主，这有什么可怪的。”曹翰大怒，将他拦腰斩为两段，又杀了宋德明。起初赵匡胤知江州必破，委任右补阙张霁为江州知州事，城破时，与曹翰一同入城。曹翰兵有乘乱抢掠者，百姓到州衙喊冤。张霁查明真相，将士兵斩首示众。曹翰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为攻城死了这么多士兵；如今城破了，又敢到州衙告状，好个刁顽的百姓！于是下令屠城，被杀有数万人之多。以致死尸把城中的井池沟坎全都填满，剩余的便投于江中。被杀者家中财产不下亿万，全被

曹翰据为己有。怕张霁告发，便恶人先告状，诬奏张霁一些罪名。朝廷竟不辨黑白，将张霁调任饶州。曹翰又奏请将江州境内的庐山东林寺中，五百座铁铸罗汉像移往颍州。为此调发了十多艘大船。移运罗汉其实是个幌子，曹翰将他掠得的金帛财物一起装入大船，运回江北，这才带累罗汉遭了殃。据载赵匡胤在城破前曾派使者到江州，宣布诏命，禁止曹翰入城后杀戮百姓。当使者行到长江北岸的独树浦时，大风刮了一日，无法渡江。等到风平浪静，再过江去，曹翰已将江州百姓杀了个干干净净。史家说，这是“运数”！

（刘洪涛）

参考资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宋史》:《曹彬传》、《潘美传》、《世家一·南唐李氏》等。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
岳珂《桯史》卷1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叶梦行《石林燕语》卷5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4、卷8。
李元纲《厚德录》卷1

治理黄河

黄河自发源地，以涓涓细流，逶迤穿行于今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等省的崇山峻岭间，到潼关以后开始东流，沿途汇集大小河川百余条，水势渐渐博大起来。到了今河南汜水西北一带的虎牢关，已经是一条莽莽苍苍、汪洋恣肆的大河。从此处向东直到入海口二三千里之间，一马平川，再没有峰峦丘陵的限隔阻滞，一任它奔突驰骋。一路携带的泥沙也开始沉淀。所以在这二三千里之间，不断泛滥成灾。《宋史·河渠志》说，黄河灾害“宋为特甚”。并不是说黄河特与宋朝过不去。而是宋朝以前各朝，凡延续较久的，大多奠都关中，对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开发很不够，一般是任黄水横流。除水灾较大者，大多不载诸史册。宋朝建都汴京，与河为邻。小有灾害，京城中便难民成群，政府不得不时时动用国帑，调发丁夫，治理决河。再加上北面与辽国为邻，为了阻止辽骑南下，宋朝守边将领在太行山以东到渤海之间，引内河水制造了许多湖塘淀泊，又调兵耕屯，开了许多水田。若是黄河水漫过，泥沙沉淤，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白地。所以治理黄河，关乎国防大计，朝廷不敢有半点轻忽。史官对水灾的记载也就格外详尽，一般是小大不遗，有灾必记，仿佛宋代水灾比以往各朝更多一样。黄河水灾是宋朝廷面临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宋徽宗时一个官僚任伯雨曾经说过：“自古以来，竭尽天下之力以治理黄河的，都不如本朝。”道出了治理黄河给宋朝造成的沉重负担。北宋九朝约一百六七十年间，

载于《宋史·河渠志》的黄河决口次数达七八十次之多，平均每二年决口一次。而事实上差不多是年年决口，还有的一年数决。只有上次决口未塞，河水毫无阻滞，下次决口的时间才拖得久一些。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六月，滑州河决，直到仁宗天圣五年（1027）十月才将决口堵塞，第二年（1028）八月，黄河又决于澶州王楚埽。自天禧四年到天圣六年共八年多，《宋史》中便无河决的记载。治河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是大得惊人，以至欧阳修有“开河如放火”的说法，每次治河动用人力少则调自数郡，多则数十郡，就如同年年“放火”，一烧就是数郡、数十郡，如何得了？但详细说来，北宋九朝“放火”的方式却很有些不同。

宋真宗以前，治河的方法主要是填塞决口、修建遥堤。是宋代治河的第一阶段。

还在后周显德初年（945），黄河曾经大泛滥，先是自孟州（今河南孟县）到滑州，冲开了八个水口；又自杨刘镇（今山东东阿北）到博州（山东聊城）百余里间连续决口。虽经堵塞，从此黄河不由故道，派分为二支。一支南流，经滑州（今河南滑县）、澶州（在今河南清丰西南）、郓州（今山东郓城）等入海，一支北流为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派使者巡察黄河故道，由于工程浩大，无法完成，不得不放弃挽河水入故道的念头，改命沿河百姓修建遥堤。遥堤就是远离河床的堤防，作为水势大时使用的预防工程。距离河床的远近根据水势和地形等因素从一里到数十里不等。自这项命令发布后，年年修建，直到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才停工。可见修遥堤是这个时期预防河患的主要方法。

乾德二年后，黄河连年决口。四年，遣禁军大将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亲督丁夫数万人修治滑州决口；五年正月，又调发京城附近各县丁夫缮治河堤。从此以后，每年自春正月到三月都缮治河堤，成了一项制度。又不断确立筑堤的组织机构：乾德九年

正月，命孟州以下沿河17州府的长吏兼任本州河堤使；开宝五年（972）三月，为河堤使配置了佐官，即以上17州的通判充任河堤判官。后周旧制，沿河州县课民种桑、枣。这一年，又命增种榆柳或其他适合当地水土的树种，作为填塞决口的材料。并按户籍中的五等户分为五等：一等户每年种50棵，以下每等递减10棵。多种不限，孤寡茕独户免种。

当年五月，黄河在濮阳地区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宋太祖调集丁夫和士兵五万人堵塞，以颍州团练使曹翰为主官。临行时，太祖对他说："如今阴雨连绵，下个不休，又听说黄河开了口子，朕每晚都要对天祷告：'倘若灾害流行是天意，愿天把灾害降到朕一人身上，不要苦害百姓。'"曹翰连连叩头说："古时候宋景公不过是一个诸侯，说了一句好话，灾星为此逆行，退出宋国的分野。陛下贵为天子，如此为百姓着想，一定能感动老天，黄河决口必不能成灾。"太祖自然知道，这不过是一句善祷善颂的话，黄河既决，怎能不成灾害？可是又无法可想。六月，便下诏书征集治河的方略：不论缙绅还是草野百姓，只要有治河良策，能较长时间地使天下免除水灾，都允许乘驿站的车子来京上书，量加奖励。有一个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隐者，名叫田告，曾编纂过一本《禹元经》，共十二篇。太祖听说后，立即把他召入京城，询问治河方法。太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打算封他官职，田告以父母年迈为理由，不愿为官，才放他回籍。

太宗即位后，太平兴国二年（997）七月，黄河先在孟州温县（今河南境）决口，接着郑州荥泽（在河南境）、澶州顿丘（今河南浚县）相继闹水。第二年滑州灵河（今河南滑县西南）的黄河大堤刚刚修复，重又决口。七年，河水陡涨，北到清河（在今河北境），南到郓州（今山东郓城），数百里间同时告急，郓州甚至堵塞城门以防河水入城。第二年，终于在滑州韩村冲开一条很大的口子，使澶、濮、曹、济诸州（今河南北部、山东东

部之间）化为一片汪洋。民田、房屋不用说是全都毁了。大水漫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向东南流，从淮河入海，才算有了归宿。朝廷调发丁夫，堵塞决口，可是毫无用处。自乾德二年修遥堤，到如今已搞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宋太宗决定派使者前往调查。使者回朝后上了一道奏章说："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这是宋代第一次提出了治水的新方略，具体办法是：由于滑州到澶州（今河南濮阳）之间堤防狭窄，最易泛滥，在这一带的南北两岸，各开一条分水河，北面一条与王莽河相连入海；南面一条由灵河入淮。在分水河两岸设置斗门（放水的闸门），随时启闭，不仅能灌溉农田，还能通舟货运。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方案，不过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宋太宗被滑州决口搞得昏头昏脑，很久不能堵住决口。实在无法可想了，便派枢密直学士张齐贤带着白马、玉璧，到白马津祭祀河神。似乎河神给朝廷开了一个玩笑，当年十二月堵住了决河口。第二年春天，正在举朝称贺、上下欢腾时，滑州房村重又决口。河神收下了白马、玉璧的贿赂，只把决口从韩村移到了房村。宋太宗以长年施工，民力凋敝，改派士卒五万人前往堵塞，大约这一念善心使河神受了感动，不久将决口堵塞。

淳化二年（991）三月，严命水官监视河堤，及时修复。若有玩忽职守导致河水溃决者，从重治罪。四年十月，黄河又在澶州决口，冲垮了澶州的北城墙，毁民房七千多处。巡河供奉官梁睿上书说："滑州一带土质疏松，刚性太差，筑成堤防，很容易被河水冲垮，以致连年水灾。不如自迎阳镇起，开凿一条水渠，引河水绕过滑州，到黎阳重与黄河汇流，渠长不过40里，工程不算太大。"太宗批准了这项建议。淳化五年正月，新渠竣工。太宗又调丁夫十七万人，自滑州以东的韩村河埽开口筑渠，到州西的铁狗庙入河，全长15里。作用与梁睿渠相同。这种渠虽然算不得分水河，不过起了加宽河身的作用，但总是标志着宋代治

水已由纯粹的筑堤堵水向着开河疏导转变了。

真宗即位后，距后周显德初黄河改道已有半个多世纪，新河道淤积已久，到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河底已高出民房一丈有余。河堤虽越筑越高，灾害的发生却越来越频繁。这时，著作佐郎李垂向朝廷献了一本《导河形胜书》，分三篇，还附有说明图，阐述颇为详尽。大意是主张将河水引入西面的黄河故道，使向东北方，流入赤水，入于海。然后自魏县（今河北境）向北开一条支渠，入御河道；大伾山（在今河南浚县东南）以北也开一条支渠，向东行入海。这样黄河水被一分为三，流入正河道的水量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三四，水灾自可大大减少。而北行的支流，由于与衡漳（即横漳）、滹沱等水系相合，流过恩、冀、邢、洺等州（都在河北省），对于巩固北部边防、开发河北水利都大有好处。是继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巡河使者提出分流方略以后的又一个系统的导黄方略。遗憾的是提交朝中大臣研究以后，没获批准。不过，积五十年的实践，证明原来实行的筑遥堤治河的方法效果不大。于是大中祥符七年（1014），诏命停止修筑河堤。当年八月，河决澶州大吴埽。第二年，京西转运使陈尧佐建议在滑州附近的杨村开一条小河以分黄河水势，朝廷派使者视察以后，除了同意他的建议之外，另于滑州上流增开汶河。可见，分水导河的治水方案朝廷原则上是接受的，只是对于李垂提出的那种工程浩大的方案，尚无把握，因而犹豫不决。这也难怪，真宗时处于宋代治水由第一阶段的筑堤塞漏，向第二阶段的疏河分流过渡的时期，还缺乏分流的经验，自不敢贸然从事大规模的分流工程。

天禧三年（1019）六月，黄河自滑州西北的天台山旁决口，不久又把城西南的河岸冲开了一条七百步长的口子，河水漫过滑州州城，向东淹没了澶州、濮州、曹州、郓州，注入梁山泊，又向东流入清水、古汴河，由此入淮。受灾军州县达三十二个，朝

廷大发兵夫合九万人治理，第二年二月，决口堵塞。举朝祝贺、刻石记功。适于此时，李垂第二次上书，提出他的修改以后分流治河方案。一个人人陌生的方案，加上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当然地又被朝廷拒绝了。这一年六月，黄河重在天台山下决口，直淹没到徐州、济州（今山东巨野）的地区，灾害比上一次泛滥更大。由于上年泛滥，经水诸州治水的物料已经用尽，民力已竭，一时无法再兴大役，只好听任黄水漫流。

真宗以前，在筑堤堵漏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了大量的治河经验。首先，在沿河诸州建立了一套治水的组织机构，如前面说到的河堤使者、河堤判官，又有巡河供奉官、主埽使臣等等。

其次，有一套动员人力、物力的合适方法。一般是小灾调丁夫，民力疲则役士卒，大灾则军民合力。这一套参用军、民的方法，相对减轻了百姓负担。治河物料主要是芦荻竹木，各有专名。如伐芦荻称为茭（同刈），伐山木榆柳枝叶称为梢（读shāo，中原方言，与“削”同义）。因此把芦荻称为茭，树木枝叶称为梢。此外将芦荻与竹子杂辫起来，名为索，只用竹子辫成的称为巨索。还有薪柴、石料、木料等等。每年人秋（七月）开始，由濒河州县的地方政府向百姓征集，来春而止，称为“春料”。设专场贮存、专人管理。征集的方法一般是出钱收买。可是在权力社会中，买卖与权力相比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有时也就无偿取用，白拿白要。《宋史·赵昌言传》记载，赵昌言为天雄军（今河北大名）知府，黄河从州境流过。豪民收贮茭草柴薪等物料，专等黄河决口，高价卖出，牟取暴利。还收买“奸人”扒堤决防，以致年年有灾。赵昌言获悉后，每遇水灾，命官吏直接到豪家存物料的地方取用。水灾从此变少了。政府不但按时征集物料，还制定了扩大物料来源的政策，如前文说的课民种树等。

再其次，有了一套适合当时条件的筑堤堵漏技术。《宋史》记载的堤有所谓直堤、月堤、正堤、遥堤、遥堤、金堤等名目。

不仅用堤阻水，还通过改变它的结构以扩大用途，如为减少水的流速，建成马头堤、锯齿堤；为防止堤岸被水冲刷倒塌，又造成木堤、木龙等等。马头是一种短堤，一端与岸相连，另一端深入水中，形状类似于城墙中的马面，用以约束水流方向。河堤向水的一面排木而成，名为木堤，或称木岸；木龙是天禧五年滑州河决后，知州陈尧佐创行的方法，大要是将埽岸中的横木凿孔，穿以立木，插入地底，加固河岸。堵漏就是堵塞决口，方法用预先制成的埽相叠压成为埽岸。制埽法是先选择一处宽敞的场地作为埽场，把前边说的用竹和芟辫成的芟索一条挨一条地排开，上面铺一层梢，梢上压一层土和碎石，再在中间顺芟索的方向摆上一根竹巨索。然后把这三层东西卷成一卷，两头用大芟索捆扎起来。竹巨索处在这个埽卷的中轴线上，称为心索。再在与心索垂直的方向上穿过几根竹索。心索与旁出的竹索都是为了使埽与埽间能彼此相压，牢固地连在一起，而不致滚动移位。埽的直径高达数丈，长度大多是直径的二倍。使用时由数百、数千人一起把埽抬起，口中喝着号子，下到决口处，并在水底打上木椿以免埽滚动。埽与埽相叠成岸，每层埽之间顺埽的方向埋入长木，增加纵向的坚固性；在垂直于埽的方向上也水平埋入长木，使埽与岸土能牢固结合成一体。埽岸成，决口也就堵塞了。埽岸不似土岸易于冲塌，所以水流急处往往设置埽岸。真宗时，自孟州至棣州沿河11州府有埽岸共45条，每条长数百步到数十里不等，由都水监官员分管。

在长期治河的过程中，人们还积累了由物候判断水势的方法。如立春以后，东风解冻，河边人观测春水初下时的深度，每水深一寸，夏秋水深可达一尺。由此预测水势，极有效验。一年四季，水涨有时，如二三月桃花始开，此时冰雪融化，加上春雨所积，使水势暴涨，因称为桃花水。此外，又有菜花水、麦黄水、瓜蔓水等等。所谓“水信有常”，人们就可由四季物候（即

水信）确定防水的办法。此外对水的性态以及水中泥沙随四季的不同也有细致观察。

自仁宗时起，宋代治水进入了以疏河分流为主的第二阶段。

庆历元年（1041），仁宗诏命暂停填修决河，商议开分水河以杀水势的有关事宜。尚未动工，说也凑巧，恰于此时，黄河水自分为二。消息传入朝廷，便认为这是天意，遣使到河口报祀河神，分水工程也因此耽搁下来。八年（1048）六月，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宽达 557 步，公制约有 930 米。到皇祐元年（1049）时，漫流的河水才自己找到了归宿：注入永济渠，东北流，从乾宁军（今河北青县）流入渤海湾。第二年七月又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村决口，到皇祐四年正月，虽然堵塞了郭固村的决口，举朝上下仍是忧心忡忡，因为下游永济渠渠身狭小，泄水有限，上流滑、澶等州，河水宣泄不畅。隐患未除，再次决口只是旦夕间的事。于是开六塔河以分水势的建议产生了。其结果是遭到了惨痛失败。仿佛是给热衷于分水的官员们当头一棒喝，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再敢议论河事。

嘉祐五年（1060），从商胡埽决出的黄河水，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条分水的支流，就是在今河北魏县以北的二股河，河身宽约二百尺。东北行流过魏、恩（今河北清河）、德（在今山东境）、沧（在今河北境）等州入海。二股河以东又派分出一条支流，向北流过魏、恩、德、博（今山东聊城）四州，因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向朝廷献上四界首、二股河图，请加疏浚，以避免黄河上流壅滞而发生水灾。从此缄口不论河事的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

由于黄河水北流，河北境内的水系渐被泥沙壅塞，水灾有向北移的趋势。英宗即位后，始命疏浚二股、五股河，以解恩、冀二州受水灾的隐患。

神宗熙宁元年（1068）六月，黄河在恩州乌栏堤决口，又决

于冀州的枣强埽，向北流入瀛州（今河北河间）。七月，又溢出瀛州的乐寿埽（乐寿在今河北献县西南）。如此下去，终有一天流入契丹境，黄河险阻便不再被宋朝独家所有，辽人可以在境内从从容容地建造起黄河浮桥，然后逾河南下。宋神宗咂出了其中滋味，召近臣司马光等人商议对策。都水监丞李立之建议在恩、冀、深、瀛等州新造河堤，约水东流。有关人员计算后认为堤长总367里，若动员人夫八万三千多人，工期一月可成。当时河北自商胡埽决口以来，受灾伤已久，要组织这么大一支施工队伍，谈何容易！另一位都水监丞宋昌言与太监屯田都监程昉共同建议开浚二股河，导水东流。待东流水渐多，北流水渐涸后，再封闭北流河道。而提举河渠王亚等人认为，北流水入海口阔六七百步，水深八九丈，其他地段也有三四百步宽，五六丈深，待其自然干涸，绝无可能。而且这样宽的河道，是天赐给宋朝的限制契丹的武器，为何要自毁天险，劳费人力，旁修新河？从此，是令黄河北流还是东流的争论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数十年。起初，由于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坚主东流，东流之议颇占上风。按照宋昌言的建议，在二股河西建造上约，约束河水东流，由二股河，经魏、恩、德、沧等州入海。预想由于东流水多而急，冲刷河道渐深。而北流水由于水量减少，流速降低，泥沙沉淀得更快，日久河道就会渐浅。愈浅水流愈少。待支流水量增至全部黄河水量的八分（十分之八）左右时，全部东流入二股河，就可将北流河道堵死。熙宁二年八月闭北流水，全部东流入二股河，司马光等“有功人员”都受了朝廷的嘉奖。但不久就从上流许家港决口，黄水东流，淹没了大名、恩、德、沧、永静（今河北东光）五州军的地区。四年七月，北京大名府新筑河堤第四、五埽被河水冲破，馆陶、永济、清阳等县农田、房屋尽被漂没。八月，在澶州曹村决口，十月又在卫州王供埽决口。河水东流以后，水灾频频，新修河堤六道已有二道被水冲垮。泛滥的河水向北奔流，过

恩州、冀州，与御河合流。御河是漕运边粮的交通要道，一旦被黄河泥沙淤塞，关系非小。神宗心中不安，自秋至冬，数度遣使视察河势和灾情。而朝论纷纷，人人都说疏导黄河是治河的最好办法，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说："二股河地势最低，又有旧堤防可以利用。如今被淤河堙塞处不过三十多里。若加疏浚，再保留清水镇（今山东冠县东北）处的河道以分水势，河患则易平，决口也不难堵塞。"神宗认为颇有道理。十二月下令河北转运司开浚二股河上流的淤沙，堵塞大名府第五埽的决口。熙宁五年二月动工，四月毕事，工期 74 天。疏浚以后的二股河深 11 尺，宽 400 尺。河水重入二股河，上流决口也堵塞完毕。不过才经月余，即当年六月又在大名府夏津县（在今山东境）决口。自引水东流以来已三年有余，工役不息而水灾不止，神宗心中彷徨不定。闰七月某日，对执政王安石道："听说京东诸州调丁夫修河，百姓有因此破家的；河北地区征调急夫，破家的更多。如此搞法，倘若河水再要决口，该怎么办？朕以为河水决口也罢，不决也罢，所占不过是一河身之地。东流在东，西流在西，那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听其自然，卿以为如何？"王安石道："若决河不塞，占田何止一河身之地。修二股河的花费若与水灾相比，可说是微乎其微。更何况二股河完工后，公私田土免于水浸，盐碱地、沼泽地都成了良田，这不是治河的大利吗？至于征调急夫，破人家产的事，今年已比去年大大减少了。再努一把力，将堤防进一步加固些，河北征调的役夫就更少了。"神宗虽被王安石说服，但他不问东流，北流，任河自行的思想具有一定代表性，成了徽宗以后治河的主导思想。

熙宁六年四月，成立了疏浚六河司，六河，黄河之外，尚有汴、洛、蔡、御河等等。时河已东流入二股河，欲保无事，首要是时常疏浚河道，免使淤积。因而成立了这个专门机构。那时，有选人李公仪发明了铁爪龙扬泥车，用以疏浚河道，经宦官黄怀

信改进制成浚川杷，构造大致相当于耙地用的铁齿耙。长 8 尺，齿长 2 尺。上面压上巨石沉入水底。杷两旁系绳，各与停在水中、相距 80 步的两支船上的绞车相连。以人力转动绞车，牵杷在两船间的水底来回移动，杷齿将水底泥沙泛起，顺水冲到下流。这样自上游向下游一段段地做下去，就能达到浚流的目的。起初浚河的方法是修直河。某一段河道淤浅了，就在这段河道旁开一段新河，将水引入新河，绕过淤浅一段后，与原河道汇流。待淤积地段干涸，起土上岸。浚毕放水入原河道，再将新河关闭。这一段新开的河道就是直河。王安石说：由于直河与原河道离得近，才掘数尺，便见积水，很难施工。若在淤积处布置数千个浚川杷，很快就能使河道疏通，省费不下数千百万。十月，都水外监丞王令图建议，在大名府第四、五埽等处修直河，将水引入二股河。朝廷除接受这项建议外，又命将所有退背、鱼肋河[①]填死，加大二股河的流量，使流速增加，以提高浚川杷的使用效果。然后命人用浚川杷疏浚二股河和清水镇河。效果大约还算可以。自熙宁六年到十年上半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河灾。只是浚川杷产生初期，就遭到一些朝臣的冷遇，独王安石鼎力支持。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继任。所谓“人在法在，人亡法亡。”浚川杷不再见于史集记载，大约也随王安石一起“离任”了。

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先后在卫州（治所在今河南汲县）王供埽、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等处决口。仿佛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次次小决之后，终于在澶州曹村冲开一道很大的水口，使澶渊（今河南濮阳）以北的黄河水流断绝，全都向东流入梁山张泽泊（在今山东境），然后分成二支，一从南清河入淮，一从北清河入海。淹没郡县城 45 座，濮、齐、郓、徐

① 因淤积而干涸的河床称为退背；未尽干涸，只余数道细流从河床上流过，称为鱼肋河。

四州县受灾尤为严重，毁坏农田30万顷以上。八月又在郑州荥泽决口。文彦博认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力不至”造成的，上书请求制裁失职的都水监官员。直到元丰元年（1078）四月才将决口堵塞。三年七月，澶州孙村埽、大吴、小吴埽又决。都水北外监丞陈祐甫建议说：“自庆历年间澶州商胡埽决口，至今三十余年没有堵塞。新冲刷成的河床也已淤积，致使堤防修得一年比一年高，还是不能免除水灾。如今应该修治的有三处：一是商胡埽，二是横垅埽，三是显庆初年水灾后废弃的那条禹迹旧河道。前二处地势高平，土质疏松，纵然修治完竣，不久又会决口。只有第三处的禹迹故道，夹在大伾和太行两山之间，地势卑下而又形势险固，真宗皇帝时的李垂与今日任深州知府的孙民先都曾建议修复禹迹故道，望朝廷委派孙民先与河北漕臣一名，调查这条故道的现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元丰四年四月，澶州小吴埽又一次决口，河水自澶州涌入御河，直奔恩州，恩州城岌岌可危。六月，神宗颁诏书说：“黄河东流的河道已经淤塞，无法修复；小吴埽的决口也不必堵塞，候将来冲刷出新河道以后，再沿流酌建堤防。细节可由李立之经划后奏闻。”又对辅臣说：“黄河闹灾这是很久以来就有的，后世人大都是发生灾害以后才加治理，堵堵截截，不得要领。水性趋下，这是个极简单的道理，不违其性才是治水的根本原则。基于此，若能任水自流，与城邑有害者则迁移城邑以避之，还有什么水灾可言？即令神禹复生，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段话其实是重复了熙宁五年闰七月他与王安石的谈话。观念的改变是何等困难！以后便在李立之的主持下，筑堤障水，引黄河入故道。

总之神宗在位的熙宁年间，治河的主题是如何封闭北流的河水，使其东流；元丰以后，是要把河水引入禹迹故道。而神宗本人的主张则是顺从水性，任其所之。

哲宗即位后，小吴埽的决口尚未堵塞，大名府小张口又决，

河北诸郡都程度不同地遭了水灾。于是由知澶州王令图首先倡议放弃禹迹故道，引水东流，重入二股河水道。元祐元年九月，诏命秘书监张问到河北调查水道详情，归来后也说“禹迹难复”。另如知枢密院事安焘、太师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等都主张引河东流。安焘说：“引河东流，朝廷害怕劳民伤财，犹豫不行。却将北流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置于不顾。小吴埽决口以前，黄河入海口虽屡有变动，却全都在中国境内。朝廷得以仰为天险，与辽人抗衡。景德年间，辽骑南下，直到澶渊，与京都只有黄河一水之隔，始终不能飞渡，就是一例。如今河身日渐西移，河尾则日渐北移，已经到了与契丹接境处。这样下去，终有一天，黄河南岸也成了契丹的辖地。那时它就会在自己境内修造桥梁，守以州郡。一旦出兵南下，直抵汴京，中间再也无险可守。想到这些，实在令人心惊。而今朝廷以东南财富的一半左右，招募军队，驻守河北，备急防患，意义实深。假若敌人从自己境内就到了河南岸，这些驻军反而被隔在河外，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治河只求省费便事，不考虑国防，是大大失策。”文彦博等的认识与此相类。也有人反对东流，中书舍人苏辙便是其中一个，他曾尖锐地质问右仆射（宰相）吕公著：“黄河改道北流，对此先皇帝尚且无力阻止，而诸公却要使它东流，难道自以为智慧、力量超过了先皇帝？”这种话咄咄逼人，简直有点儿不怀好意。吕公著只有随声附和，唯唯称是。其他如右相范纯仁、尚书王存以及胡宗愈、曾肇等也都反对东流。王存说：“假如黄河东流一定能够做到，为求经久大利，无论怎样劳民伤财，都可以不去计较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完全是少数人心存侥幸，贪功生事。如今朝廷财力困乏，只有祖宗留下的那点儿封椿钱可以动用，而外路州郡有许多已是囊空如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再动用数千万物料兵夫，去干那些毫无把握的事？自景德以来，国家与契丹通好已八九十年，人工设险，殊无所谓；倘若双方交恶，有险也不

足恃。耶律德光曾一举攻下汴京，当时的石晋政府岂无黄河天险?”苏辙对于东流的理由逐一批驳说：“持东流说者理由不过三条：第一是，北流使御河淹灭，失去了运输的利益。殊不知御河淹灭一二百里，早已成了事实。如今再大兴工役，纵然能够挽河东流，哪里还有运输的利益可言?第二，是说北流使恩、冀以北的公私农田受到损害。臣以为黄河有害亦有利，利害相半。水来败田是其害；水去以后，淤土肥沃，则是其利。北行河道，占夺民田，是其害；而今故道退出的土地已是桑麻千里，岂不是利?第三说万一黄河自契丹境入海。中国失了边防之利。这话也无道理。以前黄河东行入海，河北守将建造许多水塘限制契丹。若黄河北流，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路就更少了，对于边防的好处不言可知。议者担心的是黄河入海口一旦移入契丹境，契丹人就能在自己境中造舟修桥。这也是杞人之忧。臣闻契丹境内河流全都是自北向南流，是由于地势北高南下的原因。如此黄河便无北行之道，更何况如今的入海口既深且峻，断无移入契丹之理。”朝廷曾派范百禄等人沿东西两河实地调查，还开掘井筒，测量地平高度。结果也认为东流河床比北流高得多，欲使黄河回流东去，决无可能。建议修一条减水河，分北流水势以减水灾也就够了。元祐四年（1089）正月，朝廷诏命停止引河东流的工程。因争论未止，修减水河的事也一并停止。当时的水官吴安持、李伟都是主张东流的，当年七月，冀州南宫地区水涨，他们便以此为由，开河道、进锯牙，说是救灾，其实是导水东流。停止东流的诏书成了一纸空文。苏辙屡次上书请求撤销修河司，罢吴安持、李伟官，“正其欺罔之罪”。甚至说“修河司不罢，李伟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

元祐七年十月，吴、李穷数年之力，大河终于东流。朝廷也不追究东流工程已停为何能够东流?反正东流是件好事，于是奖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官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延长一任。宋制都

水使者是从八品官，赐三品官服自然是很大的荣誉。自真宗以后，官员任满后要入京考评，根据政绩，或升或降，或者不升不降。得到新官以后，等候有了空缺才能上任。由于僧多粥少，改官、候缺很是困难，常达数年之久。这时间又无官俸，所以上任以前就已债台高筑，不堪其苦。李伟轻轻易易地就得连任，虽未升官，实惠着实不小。但是这样的运气岂是靠得住的？

元祐八年七月，反对东流的范纯仁重为右相；九月，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死；第二年，即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听政，皇帝初管事，要庶政一新，三月，撤了宰相吕大防。倘若把太皇太后高氏比作东流诸官的总后台，吕大防便是一根台柱，如今全垮了。六月，右正言张商英奏称："先帝（按：指神宗皇帝）曾经说过，神禹复生，也不能回河东流。于是敕命不得复议回河闭口等事。元祐初，文彦博、吕大防以为先帝的话不对，拔用吴安持为都水使者，把回河东流的事交给他办。从此，京东、河北地区的百姓沿河五百里内出丁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物料；斩伐沿河榆柳。搞了八年，没有一尺一寸功效。如今换了个王宗望代替吴安持，东流种种措施都已失败，仍欺骗朝廷，谋为退路。望朝廷遣使查验虚实，追索回河以来公私所费钱粮梢草，按照仁宗朝惩治六塔河败事大臣的先例治其罪。"

十月，王宗望奏称："自奉行陛下明诏，堵塞北流水门，使河水全部东流以来，至今已历九个多月，新修金堤七十里，补修加固了阚村以下到海口之间的新旧堤防，将淤浅的河道疏浚一过，虽盛夏涨水也不致再有壅决。望宣付史馆，将绍圣以来陛下的英明决策载入史籍。"所谓投桃报李，他捧了哲宗一下，哲宗自不会亏待他，命他将部官的功劳具折奏明。其实当时东流堤防并不坚固，濒河常有水灾，流入京都的灾民往往以僧舍和御街两旁的御廊为家。只要没有大臣弹劾，哲宗也就装作不知。都水监官员的贺表依旧是一份接着一份地呈上朝廷，庆功、升赏，折腾

个没完没了。

元符二年（1099）六月，黄河在内黄（在今河南境）河口决口。东流工程中有两个重要河口，一是内黄河口，在河上流，河水由此北行，所以当闭；一是梁村口（梁村镇在今山东高唐县北）在下流，为东流河口，当开。如今内黄河口大决，河水北流，以致东流全部断绝。自哲宗即位以来，十余年"东流"之功，废于一旦。主张北流的大臣岂能善罢甘休！左司谏王祖道上书，请求治吴安持、郑祐、李仲、李伟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哲宗已无法庇护，颁诏书曰"可！"宋代治河的第二阶段至此结束。

这时期治河工程表面看都失败了，无论仁宗时的六塔工程，神宗时的"东流"、"北流"，哲宗时的"东流"等无不以失败告终。其实不然，那时治河还做不到一劳永逸，时有泛滥是正常现象。人们殚精竭虑、耗费巨额物力，能使河水泛滥次数有所减少，就算达到了目的。从这个角度看，这时期的治水是成功的。人们以分流、疏浚为主，结合筑堤约水，治理河患，积累了丰富的与水灾斗争的经验。首先是组织机构的进一步完善。起初中央设官，工部下虽设有水部郎中、员外郎，主要是掌管物料计帐和水事的赏罚，直接负责水事的除了地方官兼带水事者外，在三司管下有一个河渠案，名位职权都很小。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才设立了都水监，主官为判监事和同判监事，分别由员外郎以上和朝官[1] 充任。下设丞二人，主簿一人，由京朝官[2] 以上资格者担任。两个都水丞轮流到河工现场领导治水。又在澶州置局，称为都水外监。元丰新官颁行后，主官改称都水使者，丞 2 人分

---

① 朝官：即常参官。指文臣通直郎，武臣修武郎以上。

② 京朝官：京官与朝官。京官：凡在朝为官，上自宰相下至监仓场杂务者都是京官。

别名为南北外都水丞，另设都提举官8人，监埽官135人。为领导浚河，神宗熙宁六年又专门成立了疏浚六河司，治水的组织管理更加完备了。技术细节，主要是在分流和浚河两方面的成就，分流除了开掘减水河、直河以外，还与筑堤防相配合，如将“马头”伸入河身，帮助分流，另有上约、下约、软堰、硬堰、蛾眉埽等都是与堤防同类的建筑物，为分水所必须。疏浚方面除前面说到的浚川杷之外，还采用集水冲沙法，即尽可能封闭一切泄水口，以加大干河水的流速，冲刷河床。如神宗元丰末，王令图奏称：“大河水流散漫，河内无有急流，所以，泥沙沉淀，产生滩碛。建议调查澶州附近水系状况，使尽可能还复故道。”哲宗元祐元年曾以王令图领都水监。四年，范百禄奏述黄河流入宋辽界河的情况说：“水性是往低处流，流得快就会自己刮除河床积沙，使水愈来愈深，这与前汉书中所载大司马史张戎之的议论相同。”可知这是古来旧法。元祐七年，赵偁上书说应“封闭宗城泄水口；废除上、下约，避免河水旁流；并阚村河，使黄河水流湍急而且直，如此则河道自深。”分流或者疏浚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关键，就是测定地平高度差。这在今天是极简单的事情，宋时是用井筒法。大要是沿河道一定距离开掘两个井筒，中间开沟连通，注水其中，从两井筒中的水面量到井口，其尺寸差就是两井筒间的地平高度差。这法子较为笨拙，但准确实用。为加强对堤防的管理，并对灾害加以预测，宋人在标准化方面也做了些工作。如制定了所谓“三等向著”、“三等退背”。迎水而立的堤防为第一等，顺水为第二等，远离水流，距离在一里之内者为第三等，这是“三等向著”；去河最远为一等，次远为二等，最近但在一里以上者为三等，这是三等退背。向著等次越高越安全，退背等次越低越安全。标准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徽、钦二宗时期是宋代治河的第三阶段。主要特征是倡导“治河当行其所无事”。这是宋朝财政困乏、国力虚弱在治河方面

的反映。徽宗初即位时，中书舍人张商英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治河当行其所无事，连堤防也不必使用。若用堤挡水，犹如塞儿口以止啼。"当年（1100）二月，朝廷起用他做了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崇宁元年（1102）做了执政。自大观四年（1110）起，还做了两年宰相，他的话是有代表性的。此外，建中靖国元年左正言任伯雨向朝廷建议的治河方案是："应因河水所向，远远地立一道堤防，涨水时能稍起一些拦水作用，使不致大段漫流，这就够了。"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这一段治水主要是修补原有堤防。大观元年（1107），曾命南、北两外都水丞司联合开过一条87里长的直河，算是大工程了。其余过于琐碎，不再详述。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河渠志》、《职官志》、《宰辅表》等。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4《治河》

烛影斧声，千古之谜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夜，宋太祖赵匡胤与晋王赵光义于烛影之下，一夕长谈。当晚赵匡胤暴死，赵光义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宋太宗。这是怎么回事？是谋杀？是巧合？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千余年来，这件悬案一直折磨着人们的好奇心。要想知道事情的原委，得从头说起。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二月，新即皇帝位的赵匡胤尊母杜氏为皇太后。杜氏是定州（今河北定县）安喜（在定县东）人，生了五个儿子，依次是：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长子匡济和幼子匡赞幼年夭折，其余三个中，匡胤、光义都追随周世宗，匡胤官至殿前都点检，光义为供奉官都知。匡胤在光义等人支持、策划下，于建隆元年正月通过陈桥兵变做了皇帝，建立宋朝。那时候杜氏年已 59 岁，匡胤 34 岁，光义 22 岁，光美 14 岁。杜氏为人严毅、有决断。陈桥兵变时，消息初传入京，说“赵点检做了天子”，这是灭族的重罪。杜氏处之泰然，道：“我儿平时就有大志，如今果然做出来了。”这一次做皇太后，是大喜的事，杜氏仍淡然处之，看不到半点欢乐之情。赵匡胤在殿上行册封太后礼时，向杜氏下拜。杜氏双眉紧锁，愀然不乐。赵匡胤问道：“臣曾听人说过，‘母以子贵’的话。如今儿子做了天子，为何反而不高兴？”杜氏道：“我也曾听人说过‘为君难’的话。天子身在万民之上，如果治理得法，臣民欢悦，这位子固然尊贵；如若不得其法，天下失控，分崩离析，那时想做一个普通

百姓也不能得。故而我才深感担忧。”赵匡胤重又下拜道：“我一定牢牢记住皇娘的这番教诲。”

建隆二年六月三日（甲午），皇太后杜氏病死于滋德殿，享年60岁。初病时，赵匡胤伺候汤药，不离左右。后来病势日渐沉重，自己知道大限已到，不久于人世了。这一天，精神比往日稍好，只觉得灵台一片空明，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从心头掠过，像镜子一样清晰明朗。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回光返照吧？”心中却不惊慌，暗想：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儿子是皇帝，我是皇太后。对于一个女人，不可能有更大的奢望了。但她总觉有些不安，那是什么？她尽力回忆着……。终于想清楚了，她是不放心赵光义。常言说：妇人爱幼子。杜氏有点不同，幼子光美太小，一生没受过多少苦难，以后也没人敢给他亏吃。两个哥哥比他大得多，都会像父亲一样地待他。匡胤也不用她操心，他太强了，一生走南闯北，有那么多朋友，谁都会帮助他，况且如今又做了天子。这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心中最疼爱的是二儿子光义，他聪明伶俐，知书达礼；或文或武，几乎是无所不能。尤其是他心细如发，善解人意；又性格内向，与同龄孩子不合群，因而从不惹事生非，这些都讨人喜欢。长子匡胤就粗犷豪迈得多，总是结交些粗鲁汉子，动不动就舞刀弄枪，让大人时刻为他担心。责怪多，疼爱就少了些。光义的父亲赵弘殷曾在滁州患了一场大病，府中有一个军事判官，也是姓赵，名叫赵普，细心照料他，煎汤熬药，不辞辛苦。弘殷病愈后很是感激，便与他认了同宗，不再以下官对待。赵匡胤典领禁兵后，赵普随匡胤当判官，从此就一直追随匡胤。匡胤为同州节度使，赵普为节度推官；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赵普又任节度掌书记。这赵普为人沉默寡言，办事十分老到，事事叫人放心。又比匡胤大着几岁，加上与赵弘殷的交情，杜氏便不把他当外人，一直称他为“书记”，从不直呼其名。每有大事，总是拍着他的肩膀道：“赵书记你多费心了。我儿子

少不更事，你要多关照他们。”最让她牵肠挂肚的是二儿子光义，所以，更常常把光义托付给赵普，甚至还规定：不与赵书记同行，不许出门一步。即便这样，仍不放心，出门之前就限令他几时几刻返家，并在晷表上亲自刻下印记。晷表是古人测量时间的用具：在一个圆盘上刻有十二个时辰的标记，盘中心垂直立有一根针。太阳照在针上就会在盘上留下影子。由影子在圆盘上的位置直接读出时刻数。杜氏不知有多少次守着晷表发呆，盼望针影快些移到预先刻下的地方，那时光义就会从门外走进院子。现在想来觉得奇怪：为什么匡胤外出，有时是彻夜不归，也不怎样挂念，光义迟归一刻就那样感到揪心？她绝不承认不疼爱匡胤，都是父母所生，十根手指一样长，咬哪一根都觉心疼。但是此刻她才意识到与光义的心似乎贴得更近些。

如今她快要离开人世了，油然觉得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光义。自从哥哥做了皇帝后，这孩子仿佛有什么地方与从前不一样。尽管他什么也不说，但是她能知道。她对这孩子是太熟悉了，无须用眼睛看，只用一颗母亲的心就能清楚地感觉出光义心灵中有一种深沉的哀伤。尤其逢到大朝会，光义随文武大臣一起向哥哥行三跪九叩大礼、山呼万岁、万万岁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清晰。她为光义感到难过，深深感到他受了委屈。她最清楚：弟弟无论哪一方面也不比哥哥差，我的儿子都是好样的。为什么非要让弟弟这样委屈一生呢？哥哥做皇帝他是出了大力的，江山也有他一份。

这时她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得帮他，我不帮他谁帮他。这孩子太可怜了。”

“可是——”转念一想，她有些为难了。她不是那种感情冲动、不讲道理的妇女，心想：总得讲出些道理，家有家法，国有国章，这是国事，总得说出个里表。略一沉思，觉得并不难办：上古就有“兄终弟及”制嘛，如今为什么不能实行？要是我大宋

实行兄终弟及制，匡胤完了是光义，光义完了是光美。光美完了呢？当然该是匡胤之子德昭、德芳……，再后是光义之子、光美之子。第三代、第四代都这样轮下去？……她有些迷惘了：以后出了五服、亲属关系淡薄，还能这样顺利轮下去吗？因此起了争执，甚至互相残杀，岂不是罪过？

稍一犹豫，她的心立刻又刚硬起来，人生百年，哪能管得了那么久的事！后人自有后人的缘法，我只管眼前是了。两个儿子我一样看待，谁受委屈我都一般心疼。我不能看着不管。

可是怎样管呢？她知道匡胤虽然粗率，却极为孝顺。只要我说了，他心里不同意也会照我说的办。不过，我死之后，日子久了，难保不有变化。兄弟虽亲，父子更亲。朝中大臣不要说都是向着匡胤的，免不了他们会说短论长。有谁会帮光义？想到这里更为光义难过。

“不行，我得托付个人，帮光义一把。”托谁呢？自然又想到了赵普：“对，赵书记打从光义小时候就一直照顾他。如今我把这事交给他，必能不负我托。”主意打定，便命人去传赵普入宫。

少时赵普入见，礼毕，杜氏说道：“我怕是不行了。你们也不用难过，人哪有不死的道理？我把这看得很淡。只是临去前有几句话要说。把赵书记请来，就是要麻烦你把我的话记下来。”赵普连忙答应，在一旁备好纸、笔、墨、砚。他如今官居枢密副使，在宋朝这是副宰相的职务。虽然此时还没定下副宰相的名字，职务大体是相同的。杜氏称他为书记，是仍把他当作亲人看待。不由得心中高兴，却不露声色。赵匡胤早已哭成泪人一般。杜氏问道：“你可知道你为什么会得天下？”赵匡胤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心中却在琢磨：母亲为何要问这话？一时猜想不透。听杜氏嗔道：“我是年老而死，你哭有何用？现在我在给你说正事，难道你只是这样一个劲儿地哭吗？”赵匡胤不敢再哭，抽抽噎噎地道：“那全是先祖、先父还有太后积下的阴德。”杜氏摇了

摇头。赵匡胤又道："是柴氏前世有什么冤孽，天不欲他们有天下？"杜氏又摇了摇头。赵匡胤茫然。杜氏道："没有什么天意，全是人谋。柴氏把天下传给了那么一个娃娃，众心不附，你才捡了这个现成便宜。倘若继位的是个年长的人，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赵匡胤一边点头，一边想："我儿德昭今年已经14岁；幼子德芳3岁。我如今正在盛壮之年，至少还有20年的天子做。那时，我两个孩儿无论哪一个继位都不是娃娃了。不知太后这番话是何用意？"却听太后继续说道："你与光义都是我亲生，兄弟一体，无有彼此。千秋之后，你要传位给光义。天下这么大，治理非易。能立长君，是国家的福气，社稷的福气。"赵匡胤骤然惊呆了，回头看赵普，赵普也正愕然地望着他。都想问对方一句话："怎么办？该怎么办呀？"眼见杜氏说得累了，张口只顾喘气，不时发出一两声低咳声。声音虽轻，却能听出是那样艰难，仿佛是从小腹，经过重重阻碍才到达喉端的。这一丝微弱的气息只要再碰到半点阻滞，就再也上不来了，那时便是他这位饱经风霜的老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刻。他还能说些什么？见杜氏喘气稍停，正眯着一双呆滞无神的眼审视着他。他无论如何不能使这双眼睛绝望，脱口说道："我一定按太后的意思办，一定……"仿佛骤然给人钉上了沉重的枷锁，背都快要压弯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却见杜氏眼中闪出欣慰的光芒，但是很快便消失了。这眼神是赵匡胤看惯了的，她从不在他们弟兄面前过分地流露喜悦或伤感，现在她依然能控制自己，赵匡胤心中稍觉宽慰和平安。杜氏又缓缓说道："赵书记，你把我的话都记下了？""记下了！太后。""你也在后面署个名，做个证人——"杜氏若有所思地说道："一个临死前的老婆子说的话，你们尽可以不听。但是我是郑重的，你们也都签了名，那就不能再当耳旁风了，是不是？怎么，你不肯签？"她眼望赵普，说不出是什么感情，是绝望，是求肯，是责怪、吃惊、疑惑……，或者都不是？赵普眼望赵匡

胤，赵匡胤点了点头，赵普才提笔写了自己的名字，拿到杜氏眼前，见纸端大书“誓书”二字，下面有两行小字，纸尾押“臣普记”三字。杜氏笑了，笑容仍然是一瞬即逝。口中却不住喃喃而语：“这就好了，可怜的孩子。这就好了，……”声音渐低、渐轻。头一侧，再不言语了。

赵匡胤没有哭，他已隐隐感觉到他要为今日的承诺付出多大的牺牲。但是他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了。他已让她得到了最后的满足。办完丧事，把这份誓书装人金匮之中，交给一个谨慎的宫人保管起来。

这份誓书成了后世史家的一段公案，人们有理由怀疑：嫡长子继承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怎能轻易由太后一言而定？若是当作国事，朝中三个宰相都没预闻此事，反而召来赵普这个第二流人物？若作家事，只需亲近人参加，何以不让当事人光义知晓？赵匡胤对此事态度如何？若是心中所愿，为何又写誓书，又找证人？若是被迫答允，史书所载有许多匡胤打算传位光义的话都是伪造的了。况且这誓书是有是无也大成问题：若说有，至今无人知道是什么内容，后人胡乱猜测。司马光《涑水记闻》说：太后欲传位二弟，其意谓太宗及秦王廷美也。《宋史·杜太后传》只说：百岁后当传位予汝弟。“汝弟”与“二弟”是不同的，李焘《长编》等书都理解为只传光义不包括廷（光）美。誓书的说法出自赵普，而赵普此人心胸狭窄，屡兴冤狱，给人捏造罪名。他的话可靠性如何，后人不敢确定。若说根本没有誓书这回事，正史又明明有记载，也不大说得通。因此本文认为全是出于杜太后一个老妇人对于幼子的溺爱；找赵普做证人也是出于一个老妇人不懂朝章国典，把这样一件大事当作家庭纠纷处理了。兄弟分产，妇姑勃谿，找家族中的一个老人、长辈作证，是农家妇翁常用的法子，法律意义是很小的。以后赵匡胤变卦、光义抢班，有烛影之谜发生，都是起源于此。

此后，赵匡胤与赵普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赵普对赵弘殷有功，赵匡胤一直以长兄待他，呼赵普妻为嫂。升任赵普为宰相，真是言听计从。慢慢地，他开始轻视赵普，不再尊敬他。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若说是因为誓书，在誓书上签字是他同意的，照理不该怪他。他只隐隐觉得他是个“证人”，一个可恶的“证人”，一个替别人监督他的行动的“证人”。渐渐地轻视变成了仇恨。建隆末，赵匡胤欲改年号，命宰相选择一个前世从来没用过的名字，结果选了“乾德”二字。乾德初年，赵普为枢密使（副相），卢多逊为翰林学士。有一天，偶然间二人同时上殿奏事，赵匡胤说到前代帝王年号多有重复，不如本朝新改的年号，自古以来，从没使用过。赵普连声附和，说这名字如何如何好。卢多逊在一旁，只是不语。赵匡胤询问他，答道：“这是伪蜀使用过的年号。”赵匡胤大惊，急忙命人检索史书，才知半点不差。于是大怒，顺手抄起书案上一管毛笔向赵普脸上抹去。一边吼道：“你这不学无术的家伙，怎能与他相比。”赵普害怕极了。皇帝在他脸上抹的墨，是“御笔”，不奉御旨，怎能洗掉？直到第二天早朝，还是一个大花脸。从此赵普恨透了卢多逊。

开宝元年（968）修汴京，赵普当时是宰相，负责这件工程。设计图搞好后，送给赵匡胤审批。像这种事情由于关系太大，赵普若是一个晓事的官员，应先请求赵匡胤有何指示，再按他的意图设计。设计完了再拿给他修改。赵普当宰相后，独断专行惯了，直到设计完毕才去审批，碰钉子那叫做活该！不过从赵匡胤一方讲，宰相是天子副手，百僚之长，官职不小。天子对他应待之以礼，事有不当，讲明道理，命他重新去做，不能在众人面前扫他的面子。赵匡胤却不管这些，接到图纸后，瞥了一眼，见外城、坊市都方方正正，不觉大怒。取笔“哗哗”几下，抹了个乱七八糟。又命人取一方纸来，挥臂在上面圈了个歪歪扭扭的大圆

圈，旁边批了四个大字“依此修筑”。搞得赵普摸不着头脑。

开宝六年（973），赵匡胤到赵普家探望，正赶上吴越王钱俶给赵普送礼，说是“海物十瓶”。摆在正堂廊庑的下面。赵普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进屋。赵匡胤问：“那是什么？”赵普说是钱俶送来的海物。赵匡胤道：“钱俶所送，必是佳品，打开来瞧瞧。”赵普怎敢推辞，打开一看，全都惊呆了，原来装的一色是上等瓜子金。赵普惊定后急忙跪下磕头请罪，连声分辩说：“送来的书信臣还没有拆封，实在不知里面装有何物。”赵匡胤淡淡地说：“你只管收下是了，他以为国家事取决于你这样一个书生，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赵普听来，对他如此轻蔑，比受大理寺、刑部的重罚更叫他难堪。

赵匡胤一生俭朴，为了收回节镇兵权，破例允许他们多买“上好田宅”，“置歌儿舞女”。所以宋初大臣买田置产，经商贸财成风，赵匡胤毫不计较。赵普在西京洛阳也起了一座大宅，不敢太过张扬，外面编柴荆成门，进门是小小厅事三间。越往后规模越大，越富丽堂皇。最后是一座花园，花木挺秀、亭榭雄丽，极尽智巧。赵匡胤看了冷笑道：“这老先生处处是里表不一。”当时西京洛阳每年向都城修内司贡木料，常常不能如数上缴。赵匡胤曾下令调查原因，结果说是赵普建宅舍争购木料所致。如今赵匡胤亲自看到这一处宅舍，特意下了一道圣旨说：西京不要贡木料了，等赵普的房子盖好了再贡。赵普闻讯，自是急忙上疏请罪。

开宝六年六月，有人告赵普庇护堂吏胡赞等，赵匡胤特命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升都堂与宰相赵普同议政，分日主管中书大印、分日率群臣朝见皇帝。这三件事宋时分别称为升都堂、知印、押班，原是宰相的特权。赵匡胤的这项命令是有意削弱赵普权力，改变他独专朝政局面。八月，又免去赵普的宰相职，改任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宋代这类官（节度使加同平章事）称为使相，“不管事宰相”的意思。罢相的直接原因，史书没有

记载。《宋史》本传只说赵普违法牟利，许多人告发他。显然这也不是直接原因。李焘《长编》有一段记载说，赵普罢相后，上书为自己辩解说："外人说我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两全，有什么可议论的。况且皇太后临死时留下遗言，我是亲耳听到的，怎么可能再说三道四？愿皇帝明鉴。"赵匡胤把这封奏章也加封以后藏入金匮之中。那末，赵普的罢相必与传位光义的事有关。如何处理誓书，他自有打算，不愿别人妄加揣测。谁想迎合他的意思，乱出主意，他便毫不客气地给他钉子碰。赵普察觉时再想分辩已经晚了。

对于光义他是不动声色。

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杜氏死。

七月，宰相范质奏称，皇弟光义、廷美名位应该提高，否则于礼不合。所以在七月二十一日（壬午）以泰宁节度使兼殿前都虞候赵光义兼开封尹，同平章事；嘉州防御使廷美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乾德元年八月，以光义为郊天五使中的桥道顿递使。时天子将要在南郊祭天。光义此职是为此事整治道路、安顿宿营等事。

二年正月，赵普拜相，应该由宰相签书有关他拜相的文件，可是原来的宰相王溥等都已离任，赵匡胤遍问大臣该如何办理？窦仪认为赵光义的官名就是宰相职，可以签字。宋制节度使加平章事为使相，平章事名为宰相，实不任宰相职。所以光义任平章事一年半，无人知是宰相。八天以后，便以这位为宰相签发文件的人做了改卜安陵使。

六月四日（己酉）以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光义兼中书令；山南西道节度使光美（即廷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日（庚戌），以皇子德昭为贵州防御使。传统制度是皇子出阁（长大成人，离开皇宫独立生活）就要封王。因德昭年才十七岁，尚未加冠。虽出阁还不能算已长大成人，所以特意减低官封，只封了个

防御使。赵匡胤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成就他，要他知道仕宦的艰难，不让他产生太多的优越感。

开宝二年二月，由于伐北汉，赵匡胤要御驾亲征，以光义为东京留守，枢密副使沈义伦为大内部署。

四年七月，赐给光义门戟14枚。门前有执戟士，是诸侯王以上才能享受的待遇。光义尚没封王而赐戟，是优待。

五年十二月，光义得急病，赵匡胤到近郊打猎，归来时顺路前去探望他。

六年九月，封光义为晋王，光美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皇子德昭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沈义伦等也都各自加官晋职。

九年二月，命德昭迎接吴越国王钱俶于宋州。三月，皇子赵德芳封为贵州防御使。

由以上可见，自杜太后死，赵匡胤对于光义的态度，一是恩礼有加，但官封都是循例而行，多数是与光美以至大臣等一起升迁。二是再也不让他领兵作战了，十余年不出汴京一步，与武臣之间的关系自会受些影响。三是军衔终于殿前都虞候，自陈桥兵变后从未升迁。四是从来没有让光义继承皇位的任何正式表示，如封为皇太弟这类。蔡惇《夔州直笔》记述，赵匡胤曾经让光义在朝堂阶下的御马台上马，起初光义惊慌失措，不敢从命，赵匡胤悄声对他耳语说："以后你会经常在这里上下马，何必要推辞呢?"光义闻言，吓出了一身冷汗。赵匡胤又对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将来一定是个太平天子。"宋人笔记中的这类话很多。《宋史》中也有部分采录。古时确定皇位继承人称为"建储"，是件大事，要行册封礼才能算数。赵匡胤为何这样草率，不行册礼便到处张扬？很难说得通。

赵匡胤不让他与军方接触；光义怎肯束手就范。如田重进是一员武将，后周时就在赵匡胤部下，陈桥兵变后积功劳升任至刺

史。晋王有意结交他，有一次派人给他送酒食，田重进拒绝接受。送酒食的人说："这是晋王赏赐你的，为何不收？"田重进不识字，是个粗人，不知隐晦，脱口说道："我只知道有官家（指皇帝赵匡胤），谁个去吃别人的酒食。"宋代诸王结交文武大臣有罪，连田重进也知道这样做不应该。再如检校太师、镇国军节度使张铎是一个老资格的节帅，为人却极贪财，晋王便大量借钱给他，直到光义即位还有160万没有偿还。借而不促其还，性质是很明显的。开宝初年，有一个殿前都虞候奏称："晋王做京尹，率意行事，不尊法度，对属吏和仆人不加管束。又违法结交豪杰。"建议赵匡胤早作打算，免遗后患。赵匡胤说他挑拨他们的兄弟关系杀了这个都虞候，但晋王"结交豪杰"的罪名应该说是成立的。

杜太后遗言传弟，赵匡胤不遵誓书，赵光义暗结"豪杰"，准备继位，才发生了烛影斧声的事。

开宝九年十月，赵匡胤有病不愈。起初，周至县（在今陕西境）民张守真家突然有神降临，自称是来自天上，号黑杀将军，是玉皇大帝的辅佐。从此张守真只要斋戒上香祈请，黑杀将军必然应时降临，降临时能听到啸啸风声，说话如同婴儿，只有张守真能听得明白，说人吉凶祸福常能应验。张守真从此不再从事生业，当了道士，专门为人说吉凶未来。赵匡胤得知后，命人把张守真请到宫中。十月十九日（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在建隆观中，按道士黄箓醮的规格设立斋坛，令张守真请神，说一说赵匡胤的吉凶祸福。果然，黑杀将军又按时来了，说了两句话："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已开；晋王有仁心。"再问已无声息。这两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第一句是说天上为赵匡胤准备的住处大门已经打开了，赵匡胤不久就要升天；第二句是说应该传位给晋王。赵匡胤听了，当即召见晋王，嘱托后事。左右侍从人等都已被屏除在外，谁也没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远远望见烛影摇曳之下，

晋王时不时地起身离座，好像是有所推让的样子。一会儿，赵匡胤又起身，取下壁上挂着的大斧，戳得地面“咚咚”山响。大声对晋王说：“好自为之。”第二天二十日（癸丑）一大早，宫中便传出消息说：“万岁爷驾崩了。”

有的书记载说：夜分时，晋王回府，赵匡胤入睡后，侍寝的宫人听到他鼾声如雷，少时觉得有些异样，起来探视，已经死去多时了。急忙通报宋皇后，少不得一阵忙乱。夜四更左右，宋皇后命内侍王继恩把贵州防御使赵德芳召入宫来。赵匡胤先后立过三个皇后：贺皇后死于后周显德五年（959），生了魏王赵德昭，是赵匡胤的长子。王皇后死于乾德元年（963），生了三个儿女都没有长大成人。第三个就是这位宋皇后，为何要召赵德芳入宫？有的怀疑赵德芳是她所生，这绝无可能。宋皇后于开宝元年入宫时年仅十七岁，比赵德芳年长七岁，小于德昭四岁，赵匡胤死时她才 25 岁，骤经大变，早已吓得六神无主。暗想，凭我一个妇道人家这事无论如何办不了，丧葬大事，须有男人做主。这时便想命人召晋王入宫，于是传见内侍王继恩，话到嘴边，忽然觉得不妥：如今官家已经去世，我便是他的寡嫂。这黑更半夜的如何能去传见他？况且，父死子葬才是正理，怎能犯得上去找晋王？该去通知德昭才是。也是她平时不接触外人，腼腆惯了。德昭原比她大着几岁，每次见面德昭恭恭敬敬给她磕头，甜甜地喊上一声“皇娘”，就羞得她半天抬不起头来，周身都不自在。倒是那个次子赵德芳天真烂漫，虽也喊她皇娘，平时她像大姐姐一样地对待他，关心他，两人极是说得来，才不觉脱口说道：“快把德芳找来。”王继恩听了，颇出意料，愕然：“娘娘说去传见德芳，不是传见晋王？”宋皇后听他提起晋王，以为方才的心事被王继恩窥破，虽是满脸泪痕，仍掩不住两颊生晕，嗔道：“你这奴才，明说叫你传见德芳，谁叫你去传晋王了？”下边本想说：“你难道不知‘叔嫂不相援’的话，还有意瞎打岔？”“叔嫂”几个字却怎

么也说不出口。这王继恩久经风浪，后周世宗时已在宫中升到了内侍高品。入宋后，参加过平江南的战争，如今做官做到了武阶使臣一级，他想的与宋皇后可就完全不同。暗道：如今天子驾崩，她不传见晋王、也不传见德昭，却要传见德芳，那是何意？莫非她看德芳年幼，要拥他为帝，自己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要垂帘听政？这我是万万不能答应。可是要是我说不去传见，她不会再找别人？一旦德芳入宫，事情就糟了。盘算已定，当下满口答应了，出宫以后便直往晋王居住的开封府中奔去。远远看见医官左押衙程德元已守在开封府前。王继恩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答说："约二更天时，听见有人叩门喊：'晋王召见。'开门后却不见有人。我心中纳闷：莫非晋王有病要我去医治？才到这里看看。"王继恩觉得奇怪，似乎是鬼使神差。因把自己的来意也说了。二人共同叩开开封府的大门，把宫中事向晋王禀明了，要他急速入宫。晋王大惊，知道王继恩要他入宫是与匡胤的儿子抢夺皇位。事成王继恩自是大大有功；不成，一个太监，一个医官，所失有限。自己就不同了，身家性命，在此一举。一时犹豫不决，不肯前往。王、程二人一再催促，晋王道："我该与家人商量一下。"王、程只得依他。等了很久，仍不见从内堂出来，王继恩催说道："时间久了，宫中有变，就被别人夺去了。"时门外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住。晋王与王、程二人踏雪急向宫中而来。到宫门前，王继恩对晋王道："王爷在此稍候，我到里面通报一声。"程德元道："如今是什么时候，还通报什么，直闯进去是了。"晋王与王继恩以为有理，三人便直往禁中奔去。走到寝殿后面，宋皇后已听人禀报说王继恩回来了，远远就问道："德芳来了吗？"王继恩道："德芳没来，有晋王在此。"宋皇后见晋王突然出现，一时惊呆了，但很快知道事情有变。宋皇后虽少不更事，自幼熟读诗书，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相残的事，书中记载得多了。如今王继恩抗命不尊，自作主张找来晋王，显然与

皇位有关。两个皇子还不知讯息，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如何是晋王之敌。晋王夺到帝位以后，对他们母子会怎样发派？越想越是害怕。她已经完全屈服了，猛然对晋王哀求道："我母子之命全都托付给官家了。"晋王也是一惊，原来宫中只有对皇帝才称"官家"。宋皇后如此称呼，表示已同意他做皇帝。对这两个字虽然他还很陌生，却毫不客气地接受下来，说道："你不要担忧，有我在，大家就能长保富贵。"

二十一日（甲寅），晋王即皇帝位，为太宗皇帝，群臣朝见新皇帝于万岁殿东廊庑下。正堂上停放着赵匡胤的尸身，太宗一边接受朝贺，一边号啕大哭，直哭得天愁地惨，直到昏倒在地。

二十二日（乙卯），大赦天下，包括通常赦令所不赦的罪犯，一概赦免；命边境士兵不得出塞侵扰外境；群臣有要说的话，可以写成表疏，封奏朝廷，需要面谈者命阁门使即刻引见。又向群臣申明，先皇帝所定各项制度，朕必"遵承"，"不敢逾越"。然后是文武加官，近臣受赏之类，不必一一叙述。有一项重要措施是不该漏述的，就是二十七日（庚申），以皇弟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与太宗即位以前的官职完全相同，表明将来要由光美接替他的位置。人们便会想到赵宋的制度是兄终弟及，他赵光义继皇帝位便没什么不应该的了。同时给德昭、德芳也都加了官。还规定赵匡胤的儿子与他的儿子一样都称皇子，女儿都称皇女。表明兄弟之间极为友爱，不分彼此。

十二月，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

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增加科举取士名额和受官人数。太祖时科举沿袭唐、五代时的制度，每次录取人数不超过百人。一般是进士30人，经学50人，在80人左右。这一年，太宗亲试进士得109人，诸科207人，全都赐进士及第，又将被州县贡入京城参加考试15次以上而不中者184人（包括进士和诸科二类），全都赐给进士出身，总共录取500人，都从优授官。让士

人皆大欢喜。

官员加官，降王、节度使赐钱，让官员也皆大欢喜。

又光义即位后，分命亲信到全国各地去访察官吏的善恶，秘密奏闻。有不奉法者往往不问口供，即刻处死。历来“善恶”二字最是难言，这里大约主要指是否亲附于新皇帝；“不问口供擅加诛戮”，所犯自也不全是公法。新即帝位为何要这样做呢？显然是他这皇帝做得不怎么光明正大，外间有异议，使他食不甘味的缘故。

太平兴国初，卢多逊专朝政，屡次向太宗诉说赵普劝太祖立子、不立弟，不愿让晋王继大位的事。为此，赵普一直郁郁不得志，只做了个随朝班见驾的闲散官员。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原晋王府邸的旧僚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谋反，赵普自请处理此案，乘机向太宗说明他拥护晋王继位，由杜太后临终时的誓书与自己罢相时向赵匡胤写的自辩表章可以证明。据载，太宗打开赵匡胤封锢的金匮，看到了誓书和赵普的自辩表，原谅了他。但是除太宗和赵普之外，仍无任何人知道誓书写的是何等言语，是有是无，也就无从断定。即便有，赵匡胤不愿执行岂不是枉然？赵匡胤暴亡，加上赵光义即位不以其道，对烛影斧声的怀疑就是难免的了。

近来有人认为，赵氏家族有许多人不是夭折，就是暴亡，再不就是患精神病；赵匡胤死前又鼾声如雷。这些表明，他是死于一种名为躁狂性忧郁症的家族病引起的脑动脉破裂，即脑溢血症。这种谜难怪古人猜它不出。

（刘洪涛）

参考资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0《金匮之盟》

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玉壶清话》。

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诛谪》、卷2《奢汰》。

元·脱脱《宋史》：《后妃传》、《宗室传》、《赵普传》、《田重进传》、《刘文裕传》、《王继恩传》等。

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载1989年第6期《南开学报》

钱俶归国

钱氏自唐末占据两浙十三州[1]称吴越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降宋，割据了将近百年。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述说，钱氏在国中“重敛其民”，连“鸡鱼卵鷇”也要计日收税；又从海商那里抢掠得到一些香药宝货，都拿去向中原进贡。自五代以来，倾其所有，贡奉不绝。所以割据十国之中，除北汉以外，吴越灭亡最晚。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正月，赵匡胤由陈桥兵变做了皇帝，循例封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三月，吴越王钱俶派使者前来祝贺，从此以后，每年朝贡不绝。贡品比后周时还有所增加。

建隆三年八月，钱俶请求宋朝授给儿子钱惟濬岭南节钺，因封钱惟濬为建武节度使。

乾德元年（963），钱俶给宋朝的贡品是：白金一万两，犀角、象牙各十株，香药十五万斤，金银、珍珠、玳瑁器数十万种。宋朝赐给钱俶号为“承家保国、宣德守道、忠正恭顺功臣”。当年冬，宋行郊祀礼，钱俶又进贡以助祭祀。

开宝三年（969），钱惟濬入宋朝贡。正月，加封为镇海、镇东节度使。赵匡胤特在御苑设宴款待他，命与诸王同席而坐，由

---

[1] 十三州指：福、杭、越、苏、湖、温、台、明、处、衢、婺、睦、秀。其中福、秀二州是后唐时建置，初不属吴越。十三州地域包括江苏吴县以南，浙江全省以及福建福州以北的地区。

黄门演奏箫韶乐。宴罢，赐给白玉带、缀珠衣，水晶鞍勒、御马等。临回国，又赐给袭衣、玉带、金鞍勒马等。

开宝七年二月，宋右领卫大将军周广对赵匡胤道："朝廷每次遣使到江南，吴越王钱俶南向坐，在旁边设使者座位。钱俶虽贵极人臣，毕竟天无二日，南向为君位，钱俶不应该如此。而奉使者不予纠正，有辱国体。"赵匡胤道："你能不能把这事纠正过来?"周广慨然答应。于是在钱俶生辰时遣周广前往祝贺。钱俶仍按照惯例，设座，周广道："你我同殿称臣，这样摆设座位，在下不敢就座。"钱俶不得已将座位移到东侧，与周广对面分宾主落座。周广回朝后趾高气扬。以为建了不世功勋，邀朝廷厚赏。赵匡胤道："你不过倚仗朝廷威势罢了。何功之有?钱俶难道还怕了你不成?"周广羞惭而去。赵匡胤虽是对周广的骄横而发，说的却是实理，不论派遣怎样的庸才，吴越王钱俶都会奉如神灵的。

钱俶宋朝进贡。黄夷简在江南颇有诗名，被钱俶召人幕府二十多年，如今出使宋朝，临归时，赵匡胤对他说道："回江南后，转告元帅：朕在薰风门外建了一座很漂亮的离宫，占地约有城中的好几个坊市大，颇为壮丽。与江浙宫殿相比，毫无逊色。朕已赐名为'礼贤宅'。朕曾说过，元帅与南唐国主李煜谁先到汴京就把这座离宫赏赐给谁。如今李煜倔强，不肯来朝，朕将派兵讨伐他。元帅应该出兵助我，听说有人劝他，说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切不可惑于人言，舍大事小。他这根毛应该附在中原这块皮上，而不是附于南唐或两浙的土地上，否则将自贻伊戚。"开宝七年七月，钱俶遣钱文贽朝贡，赵匡胤已把建礼贤宅赐钱、李的事，命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写了诏书准备颁降。钱文贽既来朝，便把诏书草稿拿给他看。不久钱俶又遣行军司马孙承佑来朝贡，孙承佑是钱俶的妻兄，原是个弹唱艺人，如今专吴越国政，人呼为孙总管，是无所不管的意思，孙承佑归国时，赵匡胤

厚赐给钱俶一些器物礼币之类，并把出师南唐的日期悄悄告诉他，要钱俶发兵接应。

十月二十三日（丁酉），赵匡胤以吴越王钱俶为升州（即金陵）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赐给战马二百匹。另遣客省使丁德裕率领禁军步骑共千人，作为钱俶军的前锋，并以丁为钱俶军的监军。李煜闻讯，遣使者送书信给钱俶，其中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再度赏赐功臣，你就不过是大梁城中一个平民百姓了。"钱俶不加理会。

十一月十四日（戊子），钱俶遣使者入宋，恭谢招抚制置使的任命，同时把李煜的书信献给朝廷，赵匡胤颁诏书把钱俶夸奖一番。

钱俶接受宋朝委任后，以沈承礼权知国务，亲率大军五万进攻南唐常州城。丞相沈虎子谏阻说："南唐如同是我吴越国的屏藩，进攻南唐，就是自毁屏藩，以后还怎样守卫社稷呢？"钱俶不听，沈虎子解职去。钱俶以通儒学士崔仁冀代其任。

十二月十六日（己未），钱俶兵围常州，在城下俘虏了南唐军 250 人，马 80 匹。五日后（癸亥），拔除了城外的利城寨，击破南唐兵三千余众，生擒六百多人。又八日（辛未），在常州北境击败南唐兵万余人，从此南唐兵不敢出常州城一步。于是分兵进攻江阴和宜兴。

开宝八年二月，宋朝赐给吴越王钱俶军衣五万套，分给出征将士。

四月，吴越兵攻陷江阴、宜兴城以后，常州成了孤城一座。刺史禹万成仍全力据守，大将金成礼以兵劫持禹万成投降，常州城陷落。

捷报传入汴京，赵匡胤大喜。五月一日（壬申）加封钱俶守太师，钱俶子惟濬同平章事，惟治为奉国军节度使，行军司马孙承佑为平江节度使。而以丁德裕权知常州。吴越军攻下的常州

城，反以宋将为知州。钱俶略不介意。

五月十三日（甲申），钱俶遣使向宋朝廷报捷，南唐在江阴左右设立的沿江诸营寨已相继投降。

赵匡胤以军中劳苦，命钱俶回国。七月，钱俶命沈承礼率领吴越军配合宋军作战，并遣使入汴京谢恩，呈上贡品。

沈承礼与丁德裕率吴越军进围润州（今江苏镇江），八月，在润州城下击败南唐兵五千余人。

九月，润州守将侍卫都虞候刘澄开门投降。从此，南唐京都金陵城的东方门户大开。吴越兵与宋兵双方来到金陵城下，把金陵围了个水泄不通。

十一月二十七日。金陵城被攻破，李煜出降，南唐国亡。

起初，金陵城将破，赵匡胤召见吴越国进奏使任知果说："你国主助我攻破常州，立了大功。江南平定以后，可来汴京与朕相见，以慰朕平日对他的思念。住上几日，就让他回国，决不叫他久留汴京，只管放心是了。朕即位以来，三次行郊祭礼，都是亲执圭币，面对上帝，难道还能再失信于人，食言而肥吗？"吴越新任丞相崔仁冀也对钱俶说："宋天子英武过人，兵甲精锐，即位以来，四方用兵，所向无敌，如今两蜀、荆湘、南汉已相继灭亡，南唐不久也要入宋，天下事已经十分明朗。为了保民保家，臣附于宋，实为上策。"钱俶深以为此言有理。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丁卯），请求亲到汴京，参加来年二月十六日的宋太祖生日长寿节庆典，赵匡胤答应了他的请求。

开宝九年正月，宋封吴越将沈承礼为威武节度使，奖励他在围攻润州时的功勋。

二月，赵匡胤听说钱俶不久就要来朝，十四日（辛亥），遣皇长子兴元尹赵德昭前往睢阳（今河南商丘）迎接。用兵南唐时，丁德裕为吴越兵监军。倚仗朝廷威势，刚愎自用，不恤士卒，贪得无厌。吴越王钱俶曾把他的所作所为奏明朝廷。十八日

(乙卯)，赵匡胤下令，贬丁德裕为光州刺史。二十二日（己未），钱俶率领妻子孙氏，儿子惟濬等，举家入朝。赵匡胤在崇德殿接见他们，又在长春殿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赵匡胤亲到礼贤宅检查日用家具是否准备齐全，然后命钱氏全家住进礼贤宅。钱俶初入京，献上贡品：白金四万两，绢五万匹。长春殿赐宴后，又贡白金二万两，绢三万匹，乳香二万斤。另外为恭贺平定南唐，献上白金五万两，钱十万贯，绵一百八十万两，茶八万五千斤，犀角、象牙共二百株，香药三百斤。住进礼贤宅后，赵匡胤前去探望。又贡白金十万两，绢五万匹，乳香五万斤。江南十三州地所产白金等物不知能有几何？

三月四日（庚午），赵匡胤下诏，赐钱俶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又封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命惟濬宣读诏书。宋宰相道："异姓诸侯王的妻子，没有封王妃的先例。"赵匡胤回答说："自我朝开始，有何不可？这样做，是为表示对钱氏的特殊恩典。"

钱俶在汴京，赵匡胤经常召他与惟濬父子在后苑饮酒，射箭为乐，只命诸王相陪。钱俶每行跪拜礼，赵匡胤都命内侍扶起。一天，又在后苑宴射，只有两个皇弟：晋王光义、秦王廷美在座。钱俶身躯肥硕，举止厚重，赵匡胤赞赏道："好一个王公之才！"钱俶又跪倒叩谢，内侍上前扶起。赵匡胤命与光义各序年齿，结为兄弟。钱俶吓得绕席而走，连声推辞，以至感激涕零道："臣不过是燕雀一般的微贱之物，怎敢与鸾凤序翼？这是折臣的寿命。驱臣速死了。臣万死不敢从命。"赵匡胤只得作罢。

那时赵匡胤将要到西京洛阳祭祖，钱俶恳请扈驾随行，赵匡胤不许，又请求留居汴京，赵匡胤道："我已答允你回国，岂有留你在汴京的道理？只要你不背朝廷，尽我一世不会灭掉你的吴越国，你只管放心是了。"钱俶涕泣谢恩，愿意将长子惟濬留朝伴驾，赵匡胤这才答应。当日在讲武殿设宴为钱俶饯行。席间，对钱俶道："南北气候不同，汴京虽未入夏，江南怕已日渐炎热

了。卿宜早日出发，免得途中受苦。”钱俶又落了几滴感激的泪水，请求每三年入朝一次。赵匡胤道：“路途遥远，往返不易。还是等候诏书，要你入朝的时候再来吧。”钱俶连声答应了。当时朝中大臣上书，请求扣留钱俶，乘机取两浙土地的不下数十人，赵匡胤一概不允。钱俶临行，赵匡胤命人送来一个包裹严密的黄绢包袱，对他说道：“途中无人处，再打开观看。”钱俶答应了。赵匡胤特许他由仪仗队导从出城，从礼贤宅一直排列到迎春苑，旌旗甲仗，光鲜蔽日，好不风光，又赐给他金银器物及绫罗绸绢，不可胜计。归国途中，按赵匡胤的嘱咐，于无人处把黄绢包袱打开。见是文书数十卷。翻开一看，直吓得冷汗直流。原来全是朝中大臣的奏章，纷纷劝赵匡胤拘留他在汴京，乘机灭掉吴越国。他对这个结局入汴以前曾想了上千遍；在汴京时，还亲自向赵匡胤提出愿留在汴京。这些全是不得已。他何尝不知两浙为王比起在汴京做臣僚简直有天壤之别。可是国家弱小，何去何从，操在别人手中。与其被人强迫入朝，倒不如自己爽快些。所以，当赵匡胤拒绝了他留汴的要求时，心中犹如一块大石落地，说不出的轻松高兴。外表却假装出恋恋不舍，心有不足的样子，以此显示对宋朝的忠诚。这场戏他总算演下来了。当时觉得对手只有赵匡胤一人，险处虽多，都在眼前，看得清清楚楚，倒也不怎么可怕。如今见这些奏章，才知有这么多人从背后对自己下手，不觉有些怵然。他并不因此感激赵匡胤，知道一切遭遇都是自己争取的结果，是自己对宋朝的敬畏、谨慎，丰厚的贡品感动了赵匡胤。于是决心继续使用这些武器，却半点没有想到该如何自强。

往常钱俶是在功臣堂处理政事。这是他的先祖钱镠建造的一座类似于凌烟阁的纪念性建筑。其中立有纪功碑，正面文字记述吴越国创建的经过，及诸般丰功伟绩；背面刻有辅助钱镠建国的宾佐将校等功臣姓名五百多人。在这里处理政事，是要后人不可

忘记创业艰难的意思。钱俶此时所想却全是另一回事。这一天，突然命人把座位挪到东侧，侍从询问是何道理？钱俶道："西北是神京汴都所在的方位，天威不违颜，我两浙虽在千里之外，圣天子犹如时时在我面前一般。若在正位端坐，我心中怎能安宁？"又下令延聘高手工匠制作乘舆、衣服以及诸般珍玩，贡献宋朝。不要说每一件都手工精巧，费用不赀。而且，每次朝贡以前，还把这些贡品罗列在庭院中，亲自沐浴焚香，跪拜一番。以为这般虔诚恭顺，讯息传到江北，宋朝廷欢喜，他这个吴越王就能多做几日了。

五代时，在今福建地区还有一个割据政权，叫做闽，都城在福州，是唐末王审知创建。王审知死后，国中数经变故，属郡部分落人南唐李氏手中，部分入于吴越钱氏。宋初，只余漳、泉二州，归陈洪进统辖。陈洪进也久已臣服宋朝。听说南唐李氏因不肯入朝见驾，被宋军所灭，吴越王钱氏主动人朝，却平安归来。心中忖想，不能自安。决定先遣儿子漳州刺史陈文颢到汴京朝贡，并请求亲自入朝见驾。七月，陈洪进启程北上，途中得知赵匡胤驾崩，才返回泉州设奠致哀。

十月，太宗赵光义即皇帝位。

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钱俶派遣另一个儿子温州刺史钱惟濬到汴京朝贡，恭贺新皇帝即位。贡品有：御衣、通天犀带①、绢一万匹，金器、玳瑁器百余种，金银钔器五百多种②，涂金银的香台、龙脑檀香床、银质假水果、水晶质假花等共数千件，总价值不下亿万钱。此外又贡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药一万斤，干姜五万斤，茶五万斤。并请求增加每年的常贡，太宗不

---

① 用通天犀的犀角制成的革带。通天犀角中有白色星形斑。自根部直达顶部不断。旧说：佩通天犀，人水不濡。

② 镶金银器谓之钔器。

许，钱氏倾其所有，贡献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在世时曾经说过：“这些迟早是我府库中的东西，何劳你来进献？”虽如此说，并没真正阻止他。原因是一时不打算灭掉吴越，放在吴越自不如移到汴京好。如今太宗赵光义不许增贡，吴越前途是否有变？实为智者所堪忧。钱俶却是懵然不觉。

正月十八日（己卯），吴越国王妃孙氏死，朝廷遣给事中程羽为吊祭使到江南吊祭。

二月二日（癸巳），钱俶遣使朝贡。八日（己亥），以太祖葬事在即，遣使进奉赙礼，以助葬事。

三月三日（甲子），又派使者朝贡。

五月二十一日（辛巳），陈洪进北上入朝。

闰七月一日（庚寅），宋遣翰林使程德光前往宿州（今安徽宿县）迎接陈洪进。二十日（己酉），遣翰林学士李昉出使吴越。

九月，吴越王钱俶将要入朝，先遣其子惟濬到宋朝进贡。宋遣户部郎中侯陟到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迎接，惟濬入朝后，赏赐无数。

宋太祖赵匡胤曾对钱俶说过，无诏书召见，不令入京。如今钱俶要入京城，必是得了朝廷召见的诏书。前月余李昉出使吴越，自是他带去的诏书了。李昉久为侍从，是皇帝近臣，若只为传宣诏书，派上一个小黄门也就够了。李昉前往，必然另有重大使命，那就是劝钱俶归宋。陈洪进已经上路，钱俶怎敢再多耽搁？

太平兴国三年初，钱俶启程入宋。这一次与往时不同，能否归还，要看能不能打动太宗皇帝的恻隐之心，实无把握。离杭前一日，遍祀祖先陵庙，含泪祈祷说：“嗣孙钱俶不孝，不能长守祖宗祭祀，又不能为社稷而死。如今离国，前往汴京，朝觐宋皇帝，能否重返家邦，实不敢言。万一不能归来，重扫墓前松柏，愿先王英灵，各遂所安，莫要以香烟断绝为意。”祈罢，恸哭不已，几乎昏倒。

二月十八日（癸酉），朝廷遣四方馆使梁迥前往淮西迎接钱俶，三月，又命惟浚到宋州迎接。起初，钱俶曾遣孙承佑人朝奏事，太宗便命孙承佑负责对钱俶的各项供帐。钱俶入京后，齐王廷美在迎春苑设宴为他接风，接着在崇德殿晋见太宗，太宗赏赐给袭衣、玉带、金银器之类，颇为优厚。当日又在长春殿设宴，降王刘铱、李煜都来陪伴。钱俶献上贡品：白金五万两，钱一亿，绢十万匹，绫二万匹。另有绵、茶、越窑瓷器、钔器、画舫、龙舟、食案、御床、各种摆设，不计其数。

四月，陈洪进的幕僚刘昌言向陈洪进献计说："江南大国都已入宋，只有我闽中与两浙未降。闽中只两州地，实难与宋朝抗争，两浙也不足与宋较量，陛下与钱氏入宋只是迟早的事。如今钱氏也在汴京，看样子降与不降，尚首鼠两端，委决不下。若陛下于此时献出漳、泉二州，朝廷为了激励钱氏，必对陛下从重封赏。陛下若再迟疑，被钱氏抢了先著，境况就大不相同了。"陈洪进以为有理，将所属漳、泉二州十四县土地献给宋朝。太宗皇帝果然重重封赏，以陈洪进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宋代节度使加平章事称为使相，地位还在宰相之上，算是最高品级了。又遍封他的几个儿子文颢、文项、文显、文颢等为刺史、团练等职，其中文显，文颢仍分知泉、漳二州。

钱俶初离杭州时，已将国库中历年的积蓄全都搬载入京。犀象锦彩、金银珠贝等物分作五十大类，价值亿万钱。想以优厚的贡物买取皇帝欢心，放他回国。人朝以后，宰相卢多逊首先上奏，劝太宗拘留钱俶。不见回答，再上表，一连上了三十多道表章，太宗皇帝始终不给答复。正在太宗难以决断的时候，陈洪进上表献地，钱俶立时陷于尴尬局面。朝廷对陈又是封赏，又是庆宴，搞得轰轰烈烈。他钱俶总得表示一下态度。不加理会，这也是一种态度，他又怎么敢？思想再三，决定先将国中甲兵籍帐献给朝廷。觉得不妥，当天又上表请求撤销他的"吴越国王"、"兵

马元帅”等名号，废除“剑履上殿”、“书诏不名”等待遇。太宗不许。又上表请回杭州，太宗也不许。钱俶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是好。吴越宰相崔仁冀说道：“朝廷意思已经十分明白，是要陛下将二浙土地交出，如若不允，势必要大祸临头了。”左右僚佐极力反对，崔仁冀厉声喝斥道：“如今已在别人的掌握之中，离国千里，只有生了翅膀才能飞回杭州去，倘若不降，哪一个有办法使陛下脱离险境？”众人哑口无言。钱俶于是决定献出二浙土地，左右闻讯后，千余人恸哭失声。

钱俶归降，宋朝得到了吴越国所有的十三州、一军，共八十六县的土地。时为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太宗在崇元殿正式接受了他的贡献，改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并赐号为“宁淮镇海、崇文跃武、宣德守道功臣。”将礼贤宅赏赐给他做了在京城的居第。此外自惟濬以下直到吴越各臣僚都有封赏。

钱俶不能整文经武、自强自爱，一味搜括民脂民膏，取媚宋廷，固然可卑可恶之极。但最后能量力而行，献出土地，使二浙十三州土地免了一番凶杀。比起李煜，算是积了德了。端拱元年(988)八月，钱俶无病而死，年六十岁。钱氏在宋朝世代贵盛不绝。

（刘洪涛）

参考资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史》：《世家三·吴越钱氏》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3《世袭列传第二》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第七》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1《吴越归地》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1、卷7。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钱氏纳土》

征北汉

北汉自后周郭威称帝（951）立国，统治着今山西沁源以北、代县以南，昔阳以西、陕西神木以东的地区，那时分作忻、代、岚、石、宪、麟、并、汾、沁、辽等十州，都城是并州，又称晋阳、太原府等，治所在今山西阳曲县。由于国土狭小而又贫瘠，独力难与中原抗衡，便投靠契丹，结为后援。

宋太祖即位的那一年（960）夏天，上党李筠叛乱，欲结北汉为外援，将宋朝派到泽潞的监军周光逊等囚禁起来，押送北汉，并向北汉称臣。北汉主刘钧亲自到太平驿（今山西长治西北）与李筠会面，还派了宣徽使卢赞带领骑兵数千人帮助李筠。后来李筠兵败，卢赞被杀。派到李筠营中干事的北汉宰相卫融也做了俘虏，刘钧从太平驿仓皇逃回代州。

由于刘钧支持李筠叛乱，宋太祖赵匡胤平定泽潞以后曾经打算用兵北汉。建隆元年（960）八月，先问计于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张永德。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事家，后周时曾先于赵匡胤做过殿前都点检，他回答说："北汉兵虽少，却勇悍难斗，又有契丹为后援，一举灭掉它是很困难的。以臣愚见，不如每年春种秋收季节，多派散兵游卒入北汉境骚扰，使它的农事不修，再派间谍去离间它与契丹的关系，拆散它们间的联盟，然后灭掉它就容易多了。"大约这番话启发赵匡胤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对付北汉的战略方针。《宋史·赵普传》记载：宋初，赵匡胤夜访赵普，谈论进攻北汉的事，赵匡胤问赵普有何高见？赵普道："太原虽臣服契

丹，对契丹一样怀有戒心。所以它使我们在西、北两方免受契丹直接威胁。不如等割据的其它国家平定以后，再来对付北汉。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还怕它逃到天上去不成。”赵匡胤哈哈笑道：“这话正合我意，刚才问你，是考考你的见识。”这段记载把赵匡胤统一的方略说得很明白；进攻北汉应是灭掉其余各国以后的事。所以李筠亡后，宋朝没对北汉用兵。

但是，双方之间的小规模战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宋朝的守边大将荆罕儒就经常深入北汉境内，烧杀抢掠。由于此人勇悍无比，北汉的守土官员每闻他出兵，就各自关了城门，坚守不出。建隆元年十月，他再次出兵，带了千余骑兵，直攻到汾州（今山西汾阳）城下。满载而归。当晚在附近的京土原安营。北汉主遣大将郝贵超领兵万余前来拦截。荆罕儒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根本不当一回事，先命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迎敌，自己在营中宴飨士卒，左手把盏，右手持刀，割羊腿肉而食。听说阎彦进抵敌不住，正向后败退，抛下酒杯，翻身上马，麾兵向敌阵冲去。北汉人惧他威猛，远远站了，以戈投掷，荆罕儒中戈坠马而死。这对宋兵是个极大损失，皇帝悲痛之下，严惩他部下的将校，阎彦进等人贬官，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 29 人被杀。

建隆二年十二月，宋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在辽州（今山西昔阳）城下败北汉军千余人，斩首百余级，俘虏了辽州刺史傅廷彦的亲弟傅勋。

三年二月，刘钧出兵攻宋晋（今山西临汾）、潞（今山西长治）二州，被守军击败。

四年八月，宋将王全斌攻下北汉的乐平县，改名为平晋军。乐平是北汉辽州的州治所在地，刘钧屡次派兵来救，都被宋人击败。

……

自李筠失败以后，北汉主日夜担心宋朝要大举讨伐，因招聘

四方有智能的人准备防御。以赵文度为宰相，从太原附近的抱腹山招来一个道士即抱腹山人郭无为谏议大夫，参议中书事；又从五台山招了个和尚继颙做鸿胪卿，参议国事；枢密使段常和侍卫亲军使蔚进都封了同平章事。后来赵文度与郭无为不和，刘钧贬赵文度出知汾州，又杀段常、逐蔚进，朝政落入郭无为一人手中。宋朝初建国，契丹曾表示愿与宋朝修好，刘钧不理契丹意向，帮助李筠与宋为敌，已使契丹大为不满，又杀了亲契丹的段常，更使它光火，遣使责备刘钧道："你竟敢不遵我号令，犯下三条大罪：第一是擅改年号，第二私助李筠，第三是屈杀段常。究竟你想怎样？不如明说了吧。"只把个刘钧吓得七魂出窍，认罪不迭，恳求道："古语说'父为子隐'，儿臣有罪，望父王赦罪。"契丹人不予理睬。从此北汉派到契丹的使臣一概拘留起来，不放回国。刘钧既忧且怒，终于憋出病来，开宝元年（968）七月死时才43岁。

许多书都记载说，赵匡胤曾通过北汉的哨探对刘钧说："君家与后周是世仇，才割据称王。如今后周已亡，我大宋与你素无瓜葛，仍要割据，自是要与我争夺天下了。既如此，何不痛痛快快打上一架，以决胜负？何必畏畏缩缩，躲在太行以西，使这一方百姓受苦受难呢？"刘钧回答说："我占有的河东这块土地，不足中原的十分之一大，怎敢与陛下争夺中原？之所以仍要割据，不过是怕汉氏祖宗不得血食罢了。"赵匡胤听了这番话，动了同情心，对哨探说："回去告诉刘钧，我放他一条生路是了。"所以直到刘钧死后刘继恩即位，才大举进攻北汉。显然这是旧史家有意往赵匡胤脸上贴金。攻打南唐时，李煜数次遣使哀求缓师，赵匡胤不予理会。使者徐铉责备他攻打南唐毫无道理。赵匡胤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就是他攻打别国的道理！有什么同情心？迟攻北汉完全是战略的要求，与刘钧的几句话毫无关系。以上故事还有个更主要的目的，就是掩盖赵宋皇帝伐人之丧

的卑鄙行为。乘别人有丧事出兵付伐，春秋以来认为是不道德的令人羞耻的事。刘钧死时，南汉、南唐、吴越等国都没平定，却急急出兵北汉，与起初制定的战略方针相违背。为何要这样干？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北汉有了丧事，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旧史家才编造了上面的故事"为君亲讳"了。

再说刘钧死后，刘继恩即位。刘继恩不是刘钧亲生的儿子。刘钧有个妹子，石晋时嫁给护圣营的士兵薛钊，生了继恩。刘钧的父亲刘崇发迹后，为后汉高祖掌管禁兵，他这妹子便瞧不上薛钊了，住在娘家不肯回家，薛钊一怒之下，乘醉砍了她一刀，然后自杀。这妹子养好伤后，改嫁何氏，又生了个儿子继元。不久刘钧的妹子和何氏双双死去。那时刘钧无子，刘崇便把这两个外孙交给刘钧抚养，成了刘钧的养子。长子刘继恩生得大腹长髯，下身短，上身长，骑在马上俨然是个伟丈夫，十足一副皇王天子的气派；下得马来就成了个侏儒。加上懦弱无决断，由他做继承人，刘钧很是担忧。曾找来宰相郭无为商议说："继恩这孩子特别孝顺，对我与皇后晨昏问安，毕恭毕敬，没有半点失礼的地方。可惜没有济世才干，只怕承担不了我家这副重担。我真不知该怎么办。"郭无为不予回答。刘钧死后，继恩派使者入契丹，自称继嗣，得到契丹承认，然后即位做了北汉主。时在开宝元年(968)七月。

同年八月，赵匡胤下诏讨伐北汉。十五日（丙寅）命内客省使卢怀忠等22名将领率禁兵在潞州屯扎。十七日（戊辰）以昭义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为副职；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先锋，康延昭为都监。又以建雄节度赵赞为汾州部署，绛州防御使司超为副职，隰州刺史李谦溥为都监。

大敌当前，该当如何？刘继恩念念不忘的是当初刘钧与郭无为商量，说他难以担当继嗣的大任，郭无为竟然连句好话也不肯

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想除掉他，一时无藉口，于是先升他的官为司空。隋唐以来，司徒、司空、太尉合称三公，有官无职，名称好听，地位高，待遇优厚，就是没有职权。所以对郭无为这是明升暗降的意思。既对大臣开了刀，就该提防他报复才是。当时他的亲信都在太原府衙门，有人劝他召入宫中，代替原来的宫廷侍卫，在这关键时刻，他那临事不断的毛病表现出来了："这岂不是得罪了宫廷侍卫？"一时犹豫不能决。他每日身穿孝服在勤政阁中处理日常政务。这一天，与诸宗子宴罢，天色已晚，就便在阁中休息。不一时，供奉官侯霸荣率领十余名士兵，各持兵刃闯入阁中，反手将门拴了。刘继恩已经惊醒，一面呼救，一面绕着书堂屏风奔走，躲避侯霸荣的追杀。眼看外面侍卫的救援就到，侯霸荣急了，隔着屏风瞅得准了，一剑刺出，刘继恩的大肚子上便添了个窟窿，从此不活了。距初即位，才六十多天。郭无为得到信息，指挥士卒越墙而入，杀了侯霸荣及其党羽，迎接刘继元做了北汉主。侯霸荣原是江洋大盗，被北汉世祖刘崇收录为散指挥使，戍守乐平。宋将王全斌攻乐平，侯霸荣率部投降，朝廷封他为内殿直。不久又逃归北汉，做了供奉官。这次谋杀刘继恩说是要拿他的脑袋投奔宋朝，算是奇功一件，也有的说是受了郭无为的唆使，事成以后，郭无为又杀他灭口。总之，侯霸荣及其党羽既死，便是一桩无头公案了。

刘继元即位时，宋朝大军已入北汉境，匆匆派人到契丹请求救兵，一面遣大将刘继业、冯进珂等人统兵扼守团柏谷（又名团柏镇，在今山西祁县东南六十里），这是北上太原的要路。刘继业本名杨崇贵，就是评书《杨家将》中的杨令公。自幼追随北汉世祖刘崇，颇受信任，便给他改了名姓。监军马峰在洞过河[①]

① 又名洞锅、洞涡、同戈、铜锅等名，为汾水支流，源于山西平定县，西南流，经寿阳、榆次、徐沟等，在祁县北入汾水。

与宋军先锋何继筠部遭遇，北汉军大败。宋军夺了汾河桥，便来到了太原城下。九月二十七日（丁未）北汉佐胜军使李琼投降。

北汉内部的争斗仍未停止，刘继元即位后，先以私嫌杀了刘钧皇后郭氏，又杀了刘崇的几个儿子刘镐、刘奇、刘锡等。刘崇有十个儿子，此时只有个刘铣因装傻充愣活了下来。

开宝二年二月十六日（甲子），赵匡胤从京城出发，要亲征太原。二十七日（乙亥），因久雨不晴，驻屯于潞州。这时北汉刘继业、冯进珂屯兵团柏谷，遣牙队指挥使陈廷山率数百骑兵前来打探消息，与李继勋部前军相遇，便降了李继勋。刘继业、冯进珂知道抵敌不住，领兵退回晋阳。这是怕兵分力弱，被宋军各个击破，要聚兵京城，长期坚守的意思，原是一番好意，却惹得刘继元冲天大怒，夺了刘、冯二人的兵权。李继勋大军随后也到了城下。这时册封北汉主的契丹使者，也来到城下，刘继元夜开北门放他入城。第二天大张宴席招待契丹使，北汉群臣也都出来作陪，正在宾主互祝，群臣称贺，热热闹闹的当口，宰相郭无为放声大哭道："宋朝大军压城，契丹上国的援兵不见踪影。满朝文武却有心思坐在这里大吃大喝，谈笑风生，真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与其城破被杀，还是我自己了结了吧。"边哭边从侍卫胁下拔出佩刀，就要剖腹自杀。身旁的人急忙把刀夺下，刘继元亲自走下堂阶，拉着他的手到堂上落座，问他如今该怎么办？郭无为道："为何要以太原孤城与百万大军对抗。"人人听得出他是要投降宋朝，这般大哭大闹也不过是有意弄得人心沮丧，斗志全消罢了。刘继元默声不语。

三月十五日（壬辰）赵匡胤从潞州出发，二十一日（戊戌）来到太原城下。二十三日（庚子），赵匡胤巡视城南，听取宋将围城情况的报告。然后命在太原城周修筑长连城，作长期围困的打算。长连城就是在原城之外另修一条城墙，驻兵守护，使城内人不能外出，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时日久了，城内就会因柴

薪等物资缺乏而无力坚守。

二十六日（癸卯），北汉宪州（今山西静乐）判官史昭文开城投降，赵匡胤即命史昭文为宪州刺史，赐给礼服、玉带、鞍勒、马匹等物。二十八日（乙巳）巡视城东南隅，见城下死尸狼藉，尽是宋兵；旗幡委地，无非宋物。知道自围城以来，死伤惨重。而孤城依然屹立，竟是无奈它何。有人建议增兵，赵匡胤沉吟不语，他知道靠兵多强攻，城虽能下，死伤必多。精兵良将都死于太原城下，江南由谁来打，南汉由谁平定，统一大业岂不要付之流水！这时听身后一人道："陛下自有数千万兵在身边，为何不用？"赵匡胤回头看时，见是左神武统军陈承昭。赵匡胤不知他是何意，正要发问，见陈承昭以马鞭遥指汾水，恍然大悟，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陈承昭习知水事，入宋以后，数次率领水工修治京城河道。他的意思定是以汾水灌城了。如此可不伤一兵一卒，攻克太原，确是妙计。但是如何才能将汾水灌入城中？陈承昭定有办法，于是就命陈承昭负责办理。

二十九日（丙午），决晋祠水灌太原。

三十日（丁未），分兵四面逼城，以李继勋守城南，赵赞守城西，曹彬守城北，党进守城东。一旦汾水灌城，四面又有兵把守，岂不成了瓮中鳖？城中人如何不急。不等四面围实，便分别派兵突围了。先是乘月黑风高，从西门突城，赵赞率众拒守，北汉兵死战不退，赵赞弩箭贯足，血流匝地，仍大战不止。赵匡胤亲到西城登高观看，见宋兵久战不下，主将赵赞又已受伤，形势正然危机。遥见一支人马从西山滚滚而下，却是人无衣甲，士无弓弩。个个手中挥舞砍刀大斧，冲入敌群，锐不可挡。赵匡胤且喜且疑：这是何方来的兵马？眼见敌人抵敌不住，退入城中去了。急命人询问，才知是东城守将党进派都监李谦溥往西山伐木，听到战鼓声，便手执伐木工具冲下山来。

又有刘继业率骑兵数百从东面突城，党进翻身上马，只带随

身数十名骑兵前往迎战。这党进是宋初一员骁将，生得身材魁伟，膂力过人。平时看他憨直厚重，恂恂然是个老实巴巴的汉子；一旦甲胄着身，毛发皆竖，令人望而生畏，刘继业一柄金背大刀，竟是抵敌不住，急忙退走。党进穷追不舍。刘继业来不及从吊桥入城，纵身跃入城壕。正是月晦时候，夜色如漆，地面虽被火炬照耀如同白日，壕中仍是黝黑一片，党进怕遭了刘继业暗算，不敢跳下壕来。只在岸上诈喝诈呼，刘继业在壕中躲躲藏藏，也不敢上岸来，直到城中出来救援，刘继业才得逃回城中。

初，赵匡胤以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驻守曲阳(在今河北境)，以备契丹。四月，赵匡胤得知契丹分兵数路救北汉，其中一路由石岭关而来，急命何继筠来见，当面告诉他应敌计策，又拨给精锐骑兵数千人，说道："明日正午当破敌，我在城北那座土山上等候你的捷报。"此时已经入夏，天气炎热，暑气逼人，赵匡胤命太官御厨为何继筠做了二碗芝麻酱拌凉粉，吃了上路。芝麻酱拌凉粉是何时发明，已不可考，赵匡胤命御厨做了待客是有明文记载的，史书上的名称是"麻浆粉"。古称芝麻油为麻油；浆是酱的代用字。且说何继筠回阳曲后照计而行，果然杀得契丹兵大败，活捉了将领王破得、武州刺史王彦符等，斩首千余级，另外获杂人口百余，马七百多匹，还有许多铠甲等物。何继筠派遣儿子何承睿前去报捷。四月十二日（己未），赵匡胤登上城北土山等候，果见马上一人，自北方飞驰而来，派人迎问，果然是何继筠的报捷使者何承睿。北汉君臣苦守太原城，心中的一线希望就是契丹派来救兵，把宋军从城下赶走。赵匡胤命人将石岭所得契丹铠甲、首级悬挂起来，宣示城中。北汉将士见了，人人泄气，不知以后该如何是好。

二十九日（丙子）北汉麟州（今陕西神木）刺史结齐罗等开城投降。

五月，契丹兵又由定州（今河北定县）前来援救晋阳，宋朝

预先已派韩重赟为义武节度使，守在这里。契丹兵以为无人，长驱直进。韩重赟命士兵乘夜偷袭，人衔枚，马配勒，疾行而进。契丹兵骤然与这支生力军相遇。急忙退兵，韩重赟麾兵痛击，契丹兵大败，宋军缴获战马数百匹。

五月十二日（戊寅），命水军驾船载弩箭攻城，横州团练使王廷义中箭死；十五日（辛卯），殿前指挥使都虞候石汉卿又中箭落水死。

二十日（丁酉），攻城西仍无功而回。另派偏师一支攻岚州（今山西岚县），守官赵文度出降，赵文度就是前面提到的被郭无为排挤出朝的北汉前宰相，他的母亲还在太原围城之中，自己却投降了宋朝。

二十六日（癸卯），宋兵围城已久，城中外援断绝，宰相郭无为欲奔入宋营投降，请求亲率士兵夜袭宋军。北汉主为他挑选了精兵千人。派刘继业、郭守斌为副将，又亲自登延夏门送行。当天傍晚，天气晴明，谁知入夜后竟然风雨晦冥，以致刘继业尚未出城，所乘马的马足就扭伤了。刘继业以为此行不吉，带领部下退回城中。郭守斌据说是迷失了道路，郭无为又喊又叫，不见郭守斌的踪影。只剩下他一人，又是个文官，还劫个什么营？走到城北桥，只好重回城中。

闰五月二日，水从延夏门瓮城穿过外城的两重城墙，流入城中，城中大乱，眼看水口越冲越大，纷纷用竹笆、木桩等物前来堵塞。城外宋军弓箭手对准水口，万箭齐发，竹笆、木桩如何立得起来？正然危机万分，见城中水面上飘来一个草垛，北汉人见状大喜，数十人奔上来，将草垛直向水口推去，宋军弓箭射在草垛上，推草垛的人身在垛后，了无所伤，竟将水口堵塞。此时水深只差数版就要漫过城头，宋军却终于无法可想。

郭无为又劝北汉主投降，北汉主不听。宦官卫德贵控告郭无为谋反。时城中人心惶惶，北汉主刘继元便乘机杀郭无为以警

众，人心才算安定下来。一天半夜时分，突然宋军中传呼："北汉主前来投降。"赵匡胤果然见壁垒以外，人影幢幢，正向宋军营壁走来，赵匡胤命人把壁门打开。八作使赵璲在旁说道："古语说：受降如受敌。如今半夜三更，真假难辨，怎能这样轻易就信以为真？"赵匡胤醒悟过来，立刻传命，暂缓开门，命人登上壁垒盘问清楚再定行止。一问之下，果是假冒投降，前来冲营。

宋军自二月底围城，已将近四个月之久。从赵匡胤来到太原，也已百日有余，将士伤亡很大，士兵屯驻在甘草地中，正赶上酷暑天气，暴雨一场接着一场，直下得井池皆满，江河横流，以致饮水不洁，许多人闹腹病，仗是越打越困难了。恰巧在一次攻城中，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忠中了箭伤，几乎要死。几个相知悲愤填膺，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率领诸班卫士叩头请战，情愿冒死抢先登城，请求派兵接应。赵匡胤道："你们都是我训练出来的勇士，无不以一当百，是要做我的贴身卫士。我离不开你们，你们也离不开我，咱们有福同享，休戚与共，宁可不要这太原城，我也不忍心让你们冒矢石锋刃，陷于必死之地。"将士听了，自是感动得涕泗滂沱，趴在地上磕头不已，口中呼叫"万岁"连连。探事官又报告说契丹援兵不久又至，太常博士李光赞奏道："陛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往窃称帝王号者，大多成了陛下的臣子。河东蕞尔小国，巴掌大的地方，灭了它不足为武，不灭也算不得耻辱，用不着陛下亲自讨伐。愿陛下速回京都，派精兵屯驻上党，夏天入北汉境抢收麦田，秋天抢收它的谷田。过不了几年，北汉必亡。况且，如今天气炎热，暑雨不止。万一黄河泛滥，隔断了回京道路，輂运不通，粮草不继，局面就更不堪了。"赵匡胤又问赵普，赵普的看法也完全相同。于是决定回兵。

闰五月十六日（壬戌），赵匡胤自太原动身回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讨伐北汉的战争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北汉主命人决城外

水口放水，水落以后，城墙被水浸泡已久，失了水的浮力便大片塌落，契丹使者韩知璠见了这般景象，慨叹道："宋军只知引水浸城，却不知水落以后是什么样子。倘若是先浸后涸，太原城早被荡平了。"

契丹援兵在南大王率领下屯在太原城下。刘继业对北汉主献计道："契丹人贪利背义，从不讲什么信用，早晚我国要被它灭掉。如今援兵骄而无备，臣请率兵灭了它，可得战马万匹。然后投奔宋朝。不但晋人免于涂炭，陛下也能长享富贵尊宠。"北汉主不答应。数日后，南大王回兵，北汉翻箱倒箧，把大战后仅余的一点家底都拿出来作了给南大王的礼品。

此后，宋朝灭南汉，下南唐。吴越虽然未平，事实上早已是宋朝的属国，只有北汉没有归附。开宝九年（976），赵匡胤再次出兵，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步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八月十五日（己酉）出发，九月九日（壬申）到太原城下。接连打了几场胜仗。谁知十月十九日夜发生了"烛影斧声"的那场系人心魄的故事，第二天就换了新皇帝，赵光义初即帝位，一元开泰，普天同庆。于是下令停止对北汉的进攻，北汉又躲过了一场劫难。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朝廷重新商议征北汉事。赵光义问枢密使曹彬："周世宗和我太祖皇帝都曾亲征北汉，当时兵力强盛而不能成功，原因是什么？"曹彬道："世宗时，史彦超败于石岭关，人心惊扰，不得不班师回朝；太祖时，屯兵于甘草地，天热多雨，士兵多患腹病，才事败垂成。"赵光义道："我如今举兵讨伐北汉，卿以为怎样？"曹彬道："我朝甲兵精锐，翦除太原一座孤城，如摧枯拉朽，有何不可？"赵光义才定下决心。宰相薛居正却道："周世宗时，太原依契丹为援，坚壁不战，世宗师老人疲，这才撤军。太祖时，太原城虽未下，曾把北汉的白

姓迁到河洛之间，所以，北汉如今已是一个空架子，得了不足为喜，失了不足为忧。是否值得出兵，望陛下深思。”赵光义道：“如今敌弱我强，太祖皇帝迁其民空其国，正是为了今日灭掉它。朕意已决，卿等不要再说了。”十日（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攻太原城东，彰德节度使李汉琼攻太原城南，桂州观察使曹翰攻城西，彰信节度使刘遇攻城北。城西是北汉主的宫城所在，最为难攻，曹翰道：“我只是个观察使，朝班排在节度使刘遇之下，刘遇应攻城西。”刘遇不肯，曹翰坚执要换，久久不能决定。赵光义怕将帅不和，对曹翰道：“朕知卿智勇双全，城西非卿不可。”皇帝给了他这顶高帽子，他才答应下来。将骄如此，皇帝只用好言哄劝，当日的君臣关系就不难想见了。

十一日（辛卯）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堵截契丹援兵。

调拨已定，十五日（乙未）潘美辞行，赵光义在长春殿设宴，当面授予讨北汉的方略，要他依计而行。

二月十四日（甲子），赵光义从京城出发，前往太原，要御驾亲征，这是宋对北汉的第二次大规模讨伐。十八日（戊辰），车驾到达澶州，正要渡河，见前面一人，身穿绿袍，手持手版，拦在前面。喝道官不论怎样喝斥驱逐，也不肯退开，说是有“封事”[1]献给皇上。赵光义命呈上来，打开看时，见书尾署名是“临河主簿宋捷”。口中喃喃自语道：“宋捷，宋捷……”不禁哈哈笑道：“好一个宋捷！寡人亲自出征，宋汉大战，却有一个宋捷拦在前面。宋军大捷，这是天意了。传朕旨意，他送来一个好口彩，可加封为将作监丞。”

三月，分兵攻隆州、沁州、岚州等，隆州是北汉人依险新筑

---

①向皇帝上书，加袋密封者为封事，不密者为奏章。密封是为了防止泄漏。

的州城。

四月二十二日（庚午），赵光义到达太原城下，在汾水东岸驻营。第二天便到四面攻城的宋军营垒去巡视，慰劳将士。还给北汉主刘继元下了一道手诏，不过这手诏在北汉却不大管用，传到城下，无人理睬，就成废纸一张了。

二十四日（壬申）黎明前，赵光义亲到城西督军攻城，战事很是惨烈。

五月一日（乙卯），攻破城外的羊马城。北汉宣徽使范超出城投降，宋军以为他是出战，擒住了斩于帅旗之下。不久见北汉主将范超的妻子家人全都杀了，人头挂在城上示众，尸身抛出城外，才知是错杀了他。三日（辛巳），北汉马军都指挥使郭万超又出城投降。

四日（壬午），赵光义到城南督战，对诸将道："明日是端阳节，我们到刘继元的宫殿中吃粽子[1] 卿等以为如何？"将士一齐欢呼道："好！"士气更加高涨。

第二天，又到城南督战，将士争先抢攻，死伤很重。但见血溅城头，尸积如山，人人杀红了眼，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什么是同情，只知要在天子面前有个好表现。赵光义见士兵个个如疯似狂，知道攻人城后，势必有一场大屠杀，这与"圣天子"的德行有累。由于太祖皇帝死得突然，他当皇帝也与传统不合，朝野间说三道四的人着实不少。在这当口若发生屠城的事，实在得不偿失。因此，眼见城要攻破，急忙麾退将士，传命城中："以自动出降为妙！"北汉将士仍要固守，退休宰相马峰正卧病在家，听到消息后命人抬了来见北汉主，流着眼泪以"大势所趋"的话相劝，马峰是刘继元的老泰山，他的话怎能不听？刘继元这才答

---

① 粽子：宋人笔记中多称为角黍。端午吃粽子自古已然，宋代关于粽子的记述更多，不赘。

应投降。初夜，遣客省使李勋上降表，赵光义派使者入城安抚。然后在北城的城台上设宴犒劳将士和随从大臣，举行受降式。史官特意点明：时“夜漏未尽”。表示圣天子“端午入城”的话不虚。却忘了宋代历法是以夜半为子时，午夜以后就是初六了。

六日（甲申）平明，刘继元率领官属，白衣纱帽，在台下等受罪罚。赵光义照例下诏赦免他的罪过，唤上台来，抚慰一番。

北汉降后，宋朝得到十州，一军的土地，共41县。百姓35000多户，士兵3万多人，除了被契丹占领的十六州外，中国已经统一，唐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割据局面基本结束了。

五月十一日（乙丑），封刘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从降的北汉其他臣僚也各有晋封。北汉自刘崇称帝割据了29年而亡。淳化二年（991）刘继元病死于房州（今湖北房县），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三猪，遗表中将他托付给宋太宗赵光义，言词殷殷，读了令人心酸。正是不忧社稷忧三猪，好一个蠢材。

十三日，刘继元将宫女百余人献给朝廷，赵光义将她们分赐给立功将校。

赵光义下令毁掉太原城，改为平晋县，以原榆次县改为并州，而将原并州内的僧道富户都迁入洛阳。五月十八日（丙申），赵光义登上太原城北的沙河门楼，派人分片驱赶城内居民迁入新并州，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老弱不及出城，许多人被烧死在城中，太原百姓为统一付出了沉痛代价！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李继勋传》、《赵赞传》、《张永德传》、《赵普传》、《曹彬传》、《党进传》、《陈承昭传》、《孔守正传》、《曹翰传》、《北汉世家》等。

李焘《长编》卷1、9、10、17、20。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君范》

雍熙北伐

宋建国时，虽然群雄割据，只以契丹为大敌。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的策略便以对付契丹这个强敌为中心。此后，每攻灭一国，都将它的府库财物运到京城，单独存放，称为封椿库，声言数满三五百万就遣使到北汉赎回幽燕故土。倘若契丹不允，即散府库，招募勇士，在战场上与它较量。一些有志大臣、武将，也以收复燕云为一生最高目标，大将曹翰曾做《退将诗》说："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他终生憧憬的便是勒名燕山。宋太祖末年，曹翰曾精心拟了一套收复燕云的计划，宋太祖很是赏识，问赵普以为如何？赵普道："按此执行，必能克复燕云。但是必须世世代代都有如曹翰这样的大将，方能守住幽燕。"宋太祖听了将方案收起，从此不再言收复幽燕事。其实是宋太宗赵光义（时为晋王）势力渐大，太祖已指挥不灵的缘故，否则岂有赵普说出那等无礼的话，太祖不加申斥的道理，双方心照不宣是了。

太宗即位，时时想的也是收复燕云。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以后，便带领得胜之师北上，要一举拿下幽州。双方在幽州城下鏖战了十多天，后契丹援兵到来，这才无功而返。

太平兴国七年（982）辽圣宗即位，才十二岁。母萧氏以皇太后临朝称制。这种时候往往是一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萧太后曾对大臣哭诉说："母寡子弱，族属强盛，边防未靖，该怎么办呢？"显然这是她面临的三项难题，这些话传到宋人耳中，使那

些近视而贪婪的臣僚们来了胃口，如雄州知州贺令图，岳州刺史贺怀浦，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等，纷纷劝赵光义乘机兴兵伐辽。说什么“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大将韩德让宠幸专国政，辽人心中不满”等等。这纯是风闻之言。辽朝国事究竟如何，他们毫无所知。实情是萧太后临朝以后，委任耶律斜轸、韩德让，而把南部边疆事务交给耶律休哥处理，这二三大臣努力王事，加上萧太后精通治国之法，闻善必从，辽朝的国势已经一天天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耶律休哥主持南面事务以后，劝农桑，修武备，在士兵中又实行了更休法，边境百姓比宋朝一方的负担还要轻。赵光义新即帝位，急于边功，听信了贺令图等人那些没有真知灼见的话，雍熙三年（986）决定大举北伐。

中国的儒臣，即那些以文学起家的大臣对于边事历来不以为然。北伐的决定传出后，很快就有人反对。但他们也不了解辽朝实情，参政李至对赵光义说道：“幽州是契丹的右臂，若出兵讨伐，契丹必以倾国之力前来救援。我朝出兵当在数万人以上。兵多费广，首先是要准备足够的军粮。一般说，一日胜敌，要备十日军粮。不知幽州几日能下？陛下不妨算一算，需要多少军粮？如今北部边境的存粮够用不够？这是其一。幽州附近是一片平陆，距山陵比较远。而城墙高厚，攻击全靠弩石。而到哪里去弄这些弩石？这是其二，陛下一定要把这二条想清楚了，再定行止。倘若已决意北伐，臣以为京城是天下根本，愿陛下能坐守宗庙，身不离京都，派一将前往也就够了，这是上策；陛下若定要亲临，大名府是河朔的咽喉，不妨在那里驻跸，并扬言要亲自率兵，以壮军声。此是中策；若陛下亲临战阵，与敌撕杀，北有契丹援军堪忧，南有中国的大事待谋，陛下竟以身犯险，臣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古代贤臣劝君有曳裾断鞅的事，臣虽不才，也要学上一学的。”

又有吏部尚书宋琪，起初上书谈“入燕之路”和“平燕之

策”，大要是说出兵幽州不可走雄州、霸州这条平坦大道，而应西出易州，循山而行。接近幽州后，沿桑干河水流入高梁河，使它泛滥后，“弥漫百余里”，隔断契丹援兵，使幽州变成一座孤城。后来他又上了平燕十策，大要是主张在河北设一大将，总揽军务，而在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贝州（今河北清河）、磁州（今河北滋县）、相州（今河南安阳）分屯军队，成犄角之势。待初春时，新草未生，旧草已腐，敌马无力时再深入敌境，但是他同时还认为“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能精选使臣，使双方结盟通好，弭战息民，也是一条好的策略。不必定要诉诸武力。他们都不绝对反对出兵，即使反对，理由也不足服人。

太宗于是决意北伐，分兵三路：东路由曹彬、米信等率领，出雄州（今河北雄县）道，趋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率领出飞狐道（今河北涞源），趋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境），取云、朔、寰、应等州。辞行时，赵光义亲授方略，对曹彬等人道：“东路军以十余万大军出雄州后，持重缓行，声言要直取幽州。辽兵听到消息，必在幽州集结，不敢出援其他州县，这样西路和中路军，就可得手，待西路攻下云、朔等州后，东行绕到幽州背后，中路军攻破蔚州，也进抵幽州西侧；与东路大军会攻幽州，可一战成功。”

三月，潘美等出雁门，与契丹兵相遇，战了一场，杀契丹兵五百余人，直追到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南）城下，又杀五百余人。宋军将士十分顽强，神卫右军第二军都指挥使薛超身上受伤多处，血流濡湿衣甲，仍然指挥士卒，行若无事。十二日（庚辰），寰州刺史赵彦辛开城投降。

曹彬的中路军先攻下固安，然后来到涿州城东门与敌大战。部将环州团练使李继隆箭中左股，流血到足跟；幽州道前军先锋都指挥使范廷召也中了箭伤，都继续督战，不以为意，终于攻陷北门。十三日（辛巳），占领涿州。

田重进兵到飞狐城北，辽将大鹏翼率军来援。宋将西上阁门使袁继忠对田重进道："敌人多骑兵，利于平地作战。若将他们引入山地，借助有利地势，管叫那大鹏翼变成没毛鸡。"蕲州刺史谭延美也说道："敌人自恃兵多，骄横轻敌，略施小计，必能成功。"于是田重进亲自押阵，与敌交锋，边战边走，自早至晚，终于把辽军引入山中，大将荆嗣从西侧突出，背靠山崖，与敌短兵相接，辽军纷纷坠入山谷。荆嗣手杀一百多人，使敌军望风丧胆。有散兵千余人分布在对面山坡上，荆嗣指挥部下截断谷口，自己率数十兵卒从山上冲下，断喝一声，千余人束手就降。敌余部退屯土岭，裨将黄明与战，失利。荆嗣道："你且在这里屯扎，为我声援，我去把这帮家伙赶下岭去。"说完率领部众直冲过去。辽军不敌，退下岭来。荆嗣率众直追出五十多里，还顺势夺了辽军的小冶、直谷二座营寨，便在直谷驻扎下来。数日后，辽军派骑兵夺寨，田重进与荆嗣合兵，将敌击败。天黑之后又派大军来攻。荆嗣部下才五百人，辽军二万余众。荆嗣从间道前往小冶寨，请驻守在那里的谭延美部赴援。谭部仅二千人，也不足与敌人战，荆嗣因定计，使谭军列队在直谷附近的山间走动，多树旗帜，以为疑兵，自己重回寨中，率本部与敌战。一日之间，交兵五六次，敌不能胜，恰巧田重进率大军至，敌兵溃败，生擒了大鹏翼和监军马颙、副将何万通。其他士卒被擒者千余人。斩首数千级，得到铠甲马畜数万计。大鹏翼是契丹猛将，变成"没毛鸡"后，使辽军士气大丧。

曹彬军入涿州后，遣部将李继宣等率轻骑兵一支，渡过涿水，侦察辽兵虚实。十七日（乙酉），敌军前来攻击，李继宣在城南将敌击溃，斩首千级，获马五百匹，还杀了奚部宰相贺斯。

潘美军自寰州进攻朔州，（今山西朔县），知节度副使赵希赞开城投降。十九日（丁亥），转攻应州，（今山西应县）城中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也开城投降。

田重进军进围飞狐城，命大鹏翼到城下招降守将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吕行德不加理会，欲闭城坚守。田重进麾兵猛攻。二十三日（辛卯），吕行德与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开城降。宋朝廷颁诏书升飞狐县为飞狐军。降将吕行德等各予迁官。

四月四日（辛丑），潘美部克云州（今山西大同），斩首千级；田重进在飞狐军以北击败辽军的援兵，斩首也有一千多级，俘虏四百余人。

五日（壬寅），东路米信在新城（今河北境）击败辽军，杀三百余人。辽军重又集结，米信兵稍退却。米信麾下只有龙卫军卒三百人，被辽军团团围困，四面弓箭如雨，龙卫兵卒多被射死。傍晚，米信率麾下残兵百余人突围，手挥大刀，大呼而前，辽军挡者死，蹭者伤，连杀数十人。但辽兵太多，宁死不退。正然危急，见辽兵阵后已乱，知援兵到了，奋勇冲杀。果然是曹彬派李继宣来援，双方合力，辽兵大败，斩杀千余人，获战马一百匹。

八日（乙巳），田重进遣牙校把大鹏翼押送入京，赵光义封他为右千牛卫将军，领平州刺史。

十日（丁未），宋朝廷向新获州县委派了官吏，以驾部员外郎梁裔知应州，监察御史张利涉知朔州，右赞善大夫马务成同知寰州等等。

十二日（己酉），田重进又在飞狐城北击败辽军，杀酋长二人，士兵千人，缴获战马三百匹。十八日（乙卯），进兵到蔚州城下。城中守将遣使来告，愿意投降。田重进心中怀疑，蔚州是辽大郡，为何不交一战就要投降？先遣荆嗣率猛士数十人入城察看，才知投降是实。原来是因城中内讧。起初辽军精锐与后方的女真人作战，辽圣宗和太后都远在土河（今内蒙境内的老哈河）一带。接到驻守幽州的耶律休哥的报告后，匆忙南下。四月，来

到幽州北郊，闻知田重进部已到蔚州，命同州节度使耿绍忠前往协助守城。耿绍忠到达蔚州后，见宋兵势大，与守将萧多罗商议，决定率心腹将士退人幽州，其余不便随行的将吏全都杀死。不巧走露了消息。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提前发动，杀掉守将萧多罗和守兵千人，活捉了耿绍忠，然后来投降宋军。田重进得知详请后，接受了李存璋等人的降表。这时军中乏粮，正不知如何是好。荆嗣率领降兵，将蔚州存粮运入军中，才解了燃眉之急。仓库既空，李存璋知蔚州已不足守，率领吏民投入田重进军中。不久，契丹大军来援，荆嗣收城中辎重也运到大营中，率部与敌周旋。部下五名军校四人战死。转战到大岭，荆嗣奋力冲杀，敌军方退。蔚州城变成了一座空城。

这次宋军北伐，得到了边民的有力支援。许多年轻力壮的人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辽兵，或夜人敌人城中，割取守将首级，到宋营中报捷。太宗赵光义听说这消息很是高兴。专门立下赏格：百姓有能纠合，集结起来与宋军相呼应、配合者，官给粮草、兵甲；擒敌首领者，根据被擒者官职、级别高下，补授官职；俘获一般人口者，每获一人赏钱五千，得首级者赏三千；获马匹上等者赏十千，中等赏七千，下等赏五千；平定幽州后，愿从军者从优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从此响应官军者更加踊跃。

中路、西路军捷报频传倒也罢了，东路曹彬军也节节胜利，使太宗赵光义大为惊讶。因为，按他的战略意图是要曹彬持重缓行，牵制幽州辽军。似如此进兵神速，一旦粮草不继，十数万大军该怎样维持？果然，曹彬攻下涿州后十余日，粮食已尽，只得退回雄州，援助运粮军。赵光义听到消息，十分震惊，道：“岂有敌军在前，而回兵援救运粮兵的道理！”急忙遣使制止。要他们沿白沟河与米信军会合，养兵蓄锐，为其他两路军的声援。待西路潘美军尽得山后州县以后，再与田重进兵会合往幽州进发。可是，自赵光义即位后，对武臣姑息，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武臣

跋扈，已相当严重。攻北汉时，赵光义亲自率领，还有曹翰与刘遇争夺防务地段的事发生（参见《征北汉》文），曹彬怎能约束得了？部将得知潘美、田重进部节节胜利，而己方空有重兵，不能立尺寸功，都不甘心，于是议论蜂起，各述主张，又互相矛盾。曹彬难以决断，只好勉从众议，带五十日粮，重新进攻涿州。辽幽州守将耶律休哥派轻兵不断前来骚扰，专等宋营开饭时前来进攻，或者袭杀宋军落了单的小股部队，使宋军时时处于临战状态，自救不暇。后来不得不结成方阵，两旁挖了路沟才敢前进。队伍行进十分缓慢，自白沟到涿州约百余里路程，竟走了二十多天。时天气炎热，士卒乏水，从泥浆中漉水而饮，苦不堪言。虽然又一次占领了涿州城，终因粮草不继，不得不再次退出。曹彬想命部将卢斌率万人留在涿州坚守。卢斌恳切陈言说："涿州深入敌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城内百姓流徙，所剩无几，如何能守？不如一并退却更为有利。"曹彬便让他率领这一万人，驱赶着城中的老弱百姓一起，沿狼山山麓向南退却。这时萧太后率领的辽朝大军来到，曹彬队伍已无复行伍，匆匆忙忙，狼狈南逃。萧太后命轻兵锐卒追袭，五月三日（庚午）在岐沟关追上宋军大队。宋军两度往返涿州，兵力已疲，无力再战，只环绕粮车自卫。辽军不断冲击，宋军大败，好不容易坚持到天黑，曹彬、米信乘夜色率数骑逃去，余众四散溃逃。曹彬等涉过巨马河，召集亡散，在易水南岸结营。北岸宋军分散成许多支，其中一支李继宣部力战于巨马河上，辽兵稍退。李继宣率兵直追到孤山（今北京房山南）而还。另一支约数万人正在巨马河岸悬釜而炊，被辽兵追及，望风而逃，人马争相渡河，自相践踏，坠水死者过半，巨马河水为之不流，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的坐马陷于污泥中，儿子开封府兵曹刘利涉自后将保勋掀出，随后为士兵所挤，父子俱死水中。孔子的第44代孙孔宜随军押运粮草，也溺死在巨马河中，事后辽人沿河收集宋兵尸首，堆积起来筑成京

观，作为他们这次历史性胜利的纪念。

五月六日（癸酉），赵光义接见西路潘美军押送回来的投降将吏和应州、朔州百姓的代表时尚且兴高采烈。这些代表都是年高有阅历的人，善于言辞，说道："我们久在边城，有粮食不得吃，有子女不得养。万万没有想到垂暮之年重又见了天日。"赵光义听了大喜，赏赐给他们许多冠服器物。三日后，即到了五月九日（丙子），宫苑使王继恩自易州遣使到京城，报告了东路军败覆的消息。赵光义听了，嗒然若丧。急命东路各将领分兵在边境屯扎，召曹彬、米信等回朝面询，又命田重进率全军屯于定州，潘美撤往代州。

曹彬等尚未入京，武胜军节度使侍中赵普的奏章也到了，他把这次军事行动都推在"邪谄之辈"身上，说是他们蒙蔽了圣聪，才有北伐这种愚蠢的举动。口口声声说是骂"邪谄之辈"，却句句骂到赵光义的痛处，只骂得他一佛出世，又无法分辩，真是哑子吃黄连，只好把责任也顺势往外推，给赵普的答诏说："朕这次选将兴兵，是要曹彬等屯兵于雄州、霸州，以为潘美、田重进的声援。等一两月间，山后州县平定以后，三路会兵，再攻幽州。谁知将帅不尊成算，各行其是，带领甲兵，出塞远征，竟然回救粮草，以至往返劳敝，为敌所乘。完全是主将的责任。"一面又喋喋分辩说，"朕此番兴兵为的是拯救燕民于水火，丝毫没有穷兵黩武的意思，对此，卿务必要弄明白。"常言说："人怕输理猪怕壮"。赵光义输了理；这些话便十足是一副被告者的口吻，无法再保持皇王天子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了。

责任是推卸不掉的，出兵大事，赵光义竟然不与最高政府机构中书省商议，只与枢密院二三大臣合计几次，便贸然发动了。赵匡胤平南唐，举国出动不曾绝粮；曹彬的十万军队竟然屡因粮草不继而回兵，完全是没有中书省配合的缘故。六月一日（戊戌）日食，旧说这是天降的责罚，迫使赵光义自责，他对枢密使

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卿等看我以后的行动是了，看我还会不会再干这种事！"中书省的人既不在场，皇帝的自我批评，枢密院的人听了就刮面如刀，无疑是责怪他们无能，没有给皇帝当好参谋，史书说他们听了"咸愧惧若无所容"。这就是皇帝自我批评的妙处了。

宋军大败之后，赵光义料定契丹必大举入侵，任命左卫上将军张永德知沧州，右卫上将军宋偓知霸州，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知雄州，蔚州观察使赵延溥知贝州。张永德、宋偓等都是被罢了兵权的节度使，重新起用他们，足见朝廷处境的狼狈。

六月八日（乙巳）知制诰、知大名府赵昌言上书，请斩败军将领曹彬等。这话很合赵光义心意；他是不会治武臣重罪的。但若无人喊上一番，强调曹彬等人的罪过，自己的过失便无法减轻，也显示不出他"从轻发落"的恩德。所以赵昌言的奏章到京后，便下诏褒奖，还破格提拔他为御史中丞。

十九日（丙辰），曹彬等回到都城。二十一日（戊午），命翰林学士贾黄中、右谏议大夫雷德骧、司门员外郎李巨源，召曹彬等人到尚书省听审。结果，曹彬、米信等九名将领都定成死罪。赵光义又召百官共同讨论，都认为罪重当斩。曹彬等人脱去官服，等待治罪。这一切过场走足之后，七月三日（庚午），赵光义批复：曹彬降职为右骁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其余人也都降官了事，只有一个排阵使蔡玉，因临敌畏懦，换了便服逃跑，被除名，发配到商州居住。

七月十五日（壬申），遣枢密都承旨杨首一等到并州、代州等地，把自山后诸州投降的百姓护送到许（今河南许昌）、汝（今河南临汝）一带安置。共 8236 户，78262 口，及牛羊驼马等 40 多万头。

八月，又命迁移云、朔、寰、应四州百姓，由潘美、杨业等以所部兵护送。这时，宋朝的东路军已败，中路田重进部也已撤

回境内，契丹集中兵力对付西路军，萧太后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夺了寰州。杨业对潘美等人说："如今辽军士气正盛，不可与它交锋。朝廷只命迁移这几州百姓，可先告知云、朔二州守将，做好准备。云州路程最远，等我军从代州启行，便命百姓出城。我军到达应州后，敌兵必全军来战，这时云、朔二州百姓可乘机进入石碣谷，在谷口列强弩三百张，以骑兵在中途接应，可保三州百姓万无一失，安然撤人我国境以内。"西路军的监军王侁，官号是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极力反对杨业的建议说："我军有数万之众，难道不敢与契丹一战？以我看，应从雁门关北出，沿川中道鼓行而趋寰州，与那里的契丹兵堂堂正正地打上一仗。"顺州团练使刘文裕听他说得有气派，也表示赞成。杨业道："万万不可，这是必败之道。"王侁道："君号称杨无敌，从不畏敌。今日一反常态，说三道四，拖延不战，难道是别有打算吗？"

这话好不恶毒！杨业就是《征北汉》一文中说到的刘继业，原名杨崇贵。刘继元降宋后，太宗命他招降继业，并恢复了他原来的姓氏，改名杨业。可见名将也不易当，权势者竟把他的姓名改来改去，真是可笑。降将本就怕人说有二心，何况这说话的人是监军？杨业道："我杨业并非畏敌怕死，只是时机不利，徒令杀伤士卒，半点好处没有。如今王侁君竟责备我不能杀敌而死，那我就先死给大家看是了。"于是请求出战。临行前，心情激越，回首往事，不觉流下泪来。对潘美道："我杨业本是太原一降将，早就该死了。皇帝不但释罪不杀，还封我为连帅，授我以兵柄。人非木石，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岂能不知。如今是要等待一个有利时机，立些功劳，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并非是贪生怕死。"说了，在马上遥指陈家谷口（在山西朔县南）说："这次出战，必败无疑。诸君可在这里埋伏步兵，两翼多设强弓硬弩。我转战到此后，步兵齐出，或可有救，不然就死无遗类了。"潘美答应了，与王侁等领麾下兵众在陈家谷口列阵以待。辽军听说杨业兵

至，命大将萧挞凛在路侧埋伏，耶律斜轸迎敌。次日黎明，杨业兵果然杀到，耶律斜轸且战且退，逐渐把杨业引入埋伏圈。伏兵一起，杨业虽奋力冲杀，无奈辽兵太多，杀之不尽，反似越杀越多一般。好不容易冲出了包围，一路往陈家谷退将下来。辽兵紧追不舍。杨业自晨时接战，战到午时，又自午至暮，只杀得血染征袍，纵是铁人，也该累了。只觉得人困马乏，又渴又饿。遥望前边不远，便是陈家谷，心中大喜，拍马奔了过去，将到谷口，知道谷中有己方伏兵，有意诱敌入伏，尽可能多伤敌人。便在谷口勒住马缰，等待追兵。不一时，辽兵赶到，杨业渐渐往谷中退去。耶律斜轸突然醒悟，怕谷中有宋兵埋伏，有心麾退众军，但是人马如潮，急切间如何停留得住？萧挞凛道："元帅留在谷口，截下后面的人马，待俺领前面这些人冲进去吧。"耶律斜轸只好答应。萧挞凛大刀一挥，杀奔谷中去了。杨业一马当先，边走边向两边打量，但见空山寂寂，那有半点宋兵踪影？越走心中越冷，眼看前边就要出谷，仰天叹道："完了，想不到这些人竟不顾信义，我杨业死不足惜，身边这些将士岂不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回首一看，身后尚有百余名将士，对他们说道："伏兵既已撤去，今日我等定然有死无生。你们家中都有妻儿老小，赔我死了没半点益处。出谷后，我沿大路西行，引开敌人，你们抄小路南行，逃命去吧。回到朝中可替我报个口讯，就说我杨业有负圣恩，以后再不能为朝廷出力了。"众人听了，有痛哭失声者，有大骂潘美奸贼者，一人大声问道："元帅家中也有妻儿老小，难道没有半句话要我等带给家人吗？"杨业道："我杨业入宋后，无尺寸功劳，怎能再以家人烦朝廷？儿孙自有儿孙福，对他们我倒也不忧。"众人听了，不觉血如潮涌，纷纷道："元帅平日待我等恩德如天高地厚。今日事急，尚以国为念，全不顾及家人。我等若舍你而去，还算是人吗？不如也学元帅，把这条命交给朝廷是了。"杨业再三分说，众人只是不听，知道辽兵转瞬就到，不敢

多加耽搁，只好率领众人沿小路向南去了。

众人怨恨潘美却也有几分冤枉。这一天潘美与王侁等在谷中埋伏，自寅至巳直等了三个时辰，用今天的计时法说，就是从凌晨四点等到上午十点，不见杨业踪影。侁命人登上托逻台遥望，一样看不到半点痕迹。托逻台就是专门为望敌修筑的瞭望台，目力所及，方圆可达数十里。王侁猜想：定是辽军不敌，杨业向北追下去了。莫让他一人把功劳独占了去，反让我们在这里傻等。于是领兵离了谷口，潘美虽是主帅，对于监军却不敢得罪，只好率兵沿交河向西南行。走出二十多里，便有飞马来报说："杨业兵败。"急忙掉转马头，再往回赶。

再说杨业一行人，饥渴疲累已极，天色又黑，道路难辨，只好伏在鞍上，信马游缰，听任马匹自行前去，忽见杨业在马上遥指道："前面莫不是灯火吗？有灯火就有人家，咱们去讨碗水喝如何？"众人听了，这才有了精神，呼喝一声，打马向前奔去。走得近了，才知是一处数十户人家的山村。杨业分命部下到各家叩门找水，杨业也来到一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丈将他迎入屋中，一名老妇到厨下烧水。杨业打量屋内虽只茅屋数椽，收拾得倒也干净。说话间，水已烧好，老妇人端只粗瓷大碗，颤颤巍巍地递到杨业手中，杨业恭恭敬敬接了，道了声谢，正要喝茶，突然问道："我倒忘了向老丈打听，这里是什么去处？是辽境还是入了宋界？"老丈道："这村名叫狼牙村，向南翻过一道山梁就是宋境了。"老丈知他是宋将，听了这话必定欢喜。哪知他竟呆了，手中端只大碗，口中喃喃念道："狼牙村，狼牙村……"。哗啦一声那只大碗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杨业这才惊醒，怀中摸出一块碎银丢在桌上，口中连声道歉，转身向门外走去。老丈直追出来，边追边说："将军喝茶，喝茶，茶还没喝呢，怎地走了？"杨业竟是头也不回，吩咐亲随士兵，集合队伍，立刻出发。

原来宋人讲究忌讳，尤其武将，终日在枪林中讨生活，更是

如此，听到狼牙村三字，陡然一惊："我名叫杨业，羊却入了狼牙村，难道这是天意？"越想越是害怕，不觉跌碎了茶碗，才决意离开这个险地。

出了院门，见村外人影飘忽，不时响起战马喷鼻声，才知已被辽兵包围了。队伍尚未集结完毕，辽军已杀进村来。杨业翻身上马，杀人敌群中去。这一番恶斗自是不必说了，身边士卒眼看死伤已尽，杨业也受了数十处刀枪箭伤，犹奋战不已。忽然一箭射来，正中坐下马的前胸。那匹随他出生入死，不知打过多少恶仗的战马前蹄暴起，人立起来，长嘶一声，倒在地上。杨业心痛如绞，不觉落下两行清泪，拍拍马颈道："老伙计，看我给你报仇。"站在马前，绰刀在手，连杀数十百人，力尽被擒。辽兵将杨业押了，来见耶律斜轸。斜轸道："自北汉时，你便与我国为敌，今已三十多年。既已被擒，还有何话说。"杨业道："宋皇帝待我不薄，本欲守边捍城，多立战功，以报知遇之恩。不料为奸臣所迫，闹到这般地步，难道我还有面目再活吗？"从此三日不饮不食而死。

潘美军赶到时，但见衰草狼藉，碧血遍地，战事已结束多时了。朝廷闻讯，下诏书褒奖杨业，赠官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给家中布帛千匹，粟千石。杨业有七个儿子，长子延玉，一同战死，其余朝廷也都录用为官：供奉官延朗升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官延浦、延训升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封为殿直官。延朗后改名延昭。智勇善战，在边防二十多年，契丹人闻名丧胆，称之为"杨六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死时57岁。膝下三子，文广等都被朝廷录用为官，文广在边境也数立战功。南宋时，开始有人把杨家几代人守边的事迹演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

朝廷痛惜杨业的死亡，对肇事者给以痛惩：潘美官降三级，王侁除名后发配金州服役，刘文裕除名，发配登州。王、刘二人

倒也罢了，潘美一生为人谨慎，多立战功，也很讲义气。宋人王巩撰的《随手杂录》记述一事说：陈桥兵变以后，宋太祖入宫见宫女抱一小儿，询问知是周世宗的幼子。太祖问从人怎样处理？赵普等人都主张杀了，以绝后患，独潘美一言不发，再三相问才说："臣与陛下都曾在世宗朝称臣，若劝陛下杀他幼子，有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太祖便把这孩子给潘美做了侄子，以潘为姓，取名惟吉，一说名惟正，做官做到刺史。这样的人物，于雍熙北伐一事受累，便被千载唾骂，至今说到潘美，几乎家喻户晓，都知道是个"大奸贼"。人生一世，幸与不幸，实在难言。

雍熙北伐彻底失败了。宋朝以不能恢复幽燕为恨事，辽人以受此无端攻击为恨事，双方由此战争不断。导致了澶渊盟约的签订，导致宋朝的积贫积弱，影响极为深远。旧史家一直站在宋朝立场上说收复燕云是正义的。似乎还应从北方民众的立场问一声：他们究竟是欢迎统一还是战争？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赵普传》、《曹彬传》、《潘美传》、《田重进传》、《米信传》、《杨业传》等。

《辽史》：《耶律休哥传》、《耶律斜轸传》、《萧挞凛传》。

李焘《长编》卷 20、27。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3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 7、8。

王巩《随手杂录》

西夏立国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支，起初居住在今四川松潘县以西到青海中部的星宿海之间的地区，中心是青海东南部黄河曲折流过的河曲一带，《禹贡》中称为析支的地方。唐朝吐蕃强大后，党项人开始内迁，散居在今陕西和甘肃东部一带，分成许多部落，各有大姓做头人，如细封氏、费听氏、野利氏、折氏、拓跋氏等。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居住在夏州（今陕西横山以西）地区，因称平夏部，唐太宗赐姓李。唐末时，拓跋思恭镇守夏州，占据银（今陕西米脂西北）、夏、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东）、静（今陕西米脂西）等五州地。由于助唐讨平黄巢有功，重又赐姓李。此后李思恭的后人世代占有这五州地面，与中原政权相周旋。主要是臣服于中原政权，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等各种官号，也有冲突和战争。

宋初，李彝兴在位，加封为太尉。建隆元年（960）三月，北汉刘钧与代北诸部族联合进攻河西（今陕西北部地区），李彝兴遣部将李彝玉与宋朝麟州（今陕西神木以北）守军共同击败了北汉军的进攻，并遣使入朝，献马三百匹。赵匡胤大喜，当时正在攻玉作坊看玉工制玉带，问使者李彝兴腰围多少？使者说很大，并将尺寸说了。赵匡胤道："你们节帅好一副福相啊！"便命玉工按尺寸做了一条特长的玉腰带赐给李彝兴。

乾德五年（967），李彝兴死，宋朝追赠他为太师，封夏王，并停止朝会三日，以致哀悼，以李彝兴的儿子行军司马光睿权知

州事。不久，袭封为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

开宝九年（976），李光睿率领所部兵入北汉界，攻破北汉吴保寨，杀七百人，活捉寨主侯遇，缴获牛羊、铠甲数以千计。时太宗赵光义初即位。避“光”字讳改名为克睿。

太平兴国三年（978）李克睿死，朝廷追封为侍中，停止朝会二日。以克睿的儿子继筠权知州事，当年五月二十一日（乙巳），命李继筠为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讨伐北汉。三月，李继筠派遣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本部的蕃汉士兵，沿黄河扎营列寨，并不时渡过黄河，入北汉境，作为对宋朝军队的声援。

太平兴国五年，李继筠死。十一月三日（壬寅），以李继筠弟衙内指挥使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此后西夏发生内讧，李继捧统帅无术，已难在夏州立足，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率领族人到汴京朝见宋朝皇帝。自宋建国，西夏头人换了四代，从没朝见过皇帝。所以太宗皇帝以很高的规格在崇德殿接见他，赏赐给白金千两，绢千匹，钱千缗。他的祖母向朝廷献上玉盘一个，金盘三个。朝廷也给以优厚的回报。李继捧受宠若惊，将他与众叔父、兄弟间的矛盾纠葛，一五一十向朝廷说了个明白。还表示要将他管辖的四州（原西夏五州中的静州已废）八县土地交给朝廷，自已留在京城做官，宋太宗看到这是灭亡西夏的一个好机会，遣使到夏州将李继捧凡没出五服的亲属全都接到汴京，表面是使李继捧合家团聚，其实是要继绝李氏在夏州的势力。十一月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其余昆弟十二人也都封了官。

李继捧降宋，遭到部族中一些头人的反对。朝廷先下诏书，命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入朝见驾，授克宪官为单州刺史，克文为澧州刺史。克宪迟疑不肯听命，太宗遣将军袁继忠亲到那里，传达皇帝旨意，说明吉凶祸福，克宪才随他一起入

京。又有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开宝七年太祖授给他的官职为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继捧降宋时，才二十岁，听说要将李继捧五服以内亲属接入京城，便诈称乳母死，与亲信数十人抬着棺木出葬。到郊外后，打开棺木，从中取出枪刀武器，逃到距夏州东北300里左右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隐藏起来。

不仅头人反对，宋朝也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争取西夏百姓的支持。李继捧入宋的那一年，银州蕃落拓跋遇入朝，诉说本州赋役太重，请求移居内地居住。朝廷既不答应他的要求，也不减免赋役。这样西夏百姓很快站到了李继迁一边。

李继迁等逃入地斤泽后，不断有西夏人投入麾下，势力渐大。太平兴国八年，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使曹光实闻知他在地斤泽，乘夜偷袭成功，杀了五百多人，烧毁四百多座营帐，李继迁与弟继仲等逃走，母与妻却被宋军抓获。

李氏世世统治西夏，影响很深，李继迁虽败，仍有一些豪强大姓投奔于他。与他们结为婚姻，很快又强大起来。不过曹光实为银、夏、绥、麟府、平、宥诸州都巡检，兵力强盛，李继迁要有大的发展也颇不易。武力不足，便用诡诈。一日，遣人告光实说："我数次兵败，实在难以立身了。有心投降朝廷，公能给我这个机会吗？"曹光实大喜，与约定某日在葭芦川投降。以为是大功一件，不与任何人商议，带了数百名随身士卒前去赴约。刚出城门，就有十数人上前迎接，当先一人，正是李继迁。曹光实毫不怀疑，由李继迁引路，直向城北而去，数十里后，见前面萧萧瑟瑟，一片芦荡。知道葭芦川到了。这葭芦川古名诸次水，发源于内蒙鄂尔多斯，流经今陕西榆林境内，自佳县入黄河。沿流两岸百余里，长满芦苇，因称为葭芦川。曹光实见地势险恶，驻马不前，问道："还有多远？"继迁道："不过二三里就到了。巡检大人倘若以为不便，我去前面唤他们前来迎接是了。"说了狡

黠一笑。曹光实早已看在眼中，说道："李继迁，你道本都怕不成。你且向后看。"说了扬鞭一指，李继迁顺势望去，见不远处一片烟尘，苍苍莽莽，犹如黄龙见首不见尾，知道后有大军，相距不过一二十里之遥，不觉呆了。曹光实哈哈笑道："老夫用兵数十载，难道还能栽在你这娃娃手中，只要你敢有异动，后面这三万铁骑片刻即至。"李继迁不觉冷汗直流。但转念想到母妻皆死于他手，暗暗切齿道：今日不是鱼死，便是网破，就算搭上我这条命，也要先取了你的首级。脸上却笑道："巡检大人说哪里话来，吓破小人的狗胆也不敢乱来。"说着已入芦荡，逶迤而前，道路愈来愈窄。曹光实正要发话，见前面李继迁等人勒转马头，哈哈笑道："曹大人，今天你还想活命吗？"话音未落，从腰间解下一条长鞭，"刷"地一声抽了过来，曹光实侧身躲过，只听"咔嚓"一声，身后一名士兵马上驮着的两只木笼，一只被抽得木片纷飞，另一只"吧嗒"一声落在地上。曹光实惊魂未定，又是一鞭抽到，另一只木笼也变成一堆木片，但见木笼中四只飞鸽死在地下。原来李继迁早已将这两只木笼瞧在眼里，只是一时没有想到有何用场。待看到后面援兵，才明白是与援兵联络所用，这才佯攻曹光实，调开众人注意力，只两鞭就把四只飞鸽击死。然后鞭花一抖，一声爆响，四周芦苇丛中钻出许多头戴毡帽的西夏武士，足有千余人之众。曹光实等人如何能敌。一场撕杀后，全军覆没。曹光实死于乱军之中，李继迁率领这些人又袭击了后面的援军，援军惊溃，四散逃窜，只有曹光实的侄子曹克明押送辎重在后，听溃卒说曹光实已死，怕军队惊散，密遣人装作从北方来的传讯官，说曹光实有命，"著退军银州"。曹克明整军而退。没伤一兵一卒。

李继迁杀曹光实后，于雍熙二年（985）二月，袭取银州；三月，攻会州（今甘肃靖远），焚毁城外房郭而去。雍熙三年，辽圣宗以义成公主嫁李继迁，还封他为夏国王。雍熙四年，夏州

知州安守中率军三万，与李继迁战于王亭镇，大败而归。李继迁率领本部直追到夏州城下。

李继迁崛起后，西北边境屡屡告急，尤其葭芦川的惨败，使宋朝廷大为震动，起初李继捧在朝为官，李继迁与宋军作战，对宋军部署了如指掌。有人对皇帝进言说，必是李继捧泄露出去。朝廷也以为“非吾族类，其心必异”，留在朝中，终非善策。便改任他为崇信军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泾源），同时，改任克宪为道州（今湖南道县）防御使；克文原任博州（今山东聊城）防御使，留居京城。如今也催他到博州赴任。另于崇信、道、博三处，委派朝中常参官为通判，处理郡政，李氏三人成了只吃皇粮不任事的傀儡。端拱初（988），朝廷发兵讨伐李继迁，每次都失败了。宰相赵普建议起用李继捧，讨伐李继迁，使西夏人自相争斗，胜负与朝廷无损。于是召李继捧入京，将皇姓“赵”赐给他，让他改姓名为赵保忠，太宗皇帝亲自用五色金花笺纸给他写了官告，授任为夏州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监押蕃落使。加赐给金器千两、银器万两，以及钱帛、刍粟和田园等。辞行时，又在长春殿设宴为他饯行，赏赐给衣物、玉带、银鞍马各一副，锦采三千匹，银器三千两，另赐锦袍、银带五百副、马百匹。到任后数月，上奏说，李继迁又经改过悔悟，要归附朝廷。于是，朝廷授给李继迁官。端拱二年，赵保忠也因功升任为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实李继迁并无真心归降。

淳化初（990），赵保忠与李继迁战于安庆泽，李继迁中箭受伤，率军逃走。赵保忠请求朝廷添兵追击，朝廷派商州团练使翟守素前往。

淳化二年七月，李继迁闻朝廷援兵翟守素将至，势难抵敌，于是上表请降，朝廷授继迁官为银州观察使、也赐姓赵，名保吉。赵保吉向朝廷推荐弟继冲，又赐继冲姓名为赵保宁，官为绥

州团练使，封其母为网氏西河郡太夫人，子德明为管内蕃落使、行军司马。什么保吉、保宁，朝廷的姑息，只保了李继迁数年的吉庆、安宁，却保不了宋朝西北边陲的吉庆、安宁。数年后，李继迁创伤已复，重又骚扰起来。淳化五年正月，灵州（今宁夏灵武）和通远军（今甘肃陇西）都向朝廷报告说，赵保吉攻围堡寨，烧杀抢掠。赵光义十分生气，说道："李继迁作乱十多年，朝廷对他已仁至义尽；赐给国姓，封为观察使，俸禄优厚，赏赐加等，许与通商，又将绥、宥等州委任他们兄弟治理。对他如此宽容，仍这样跋扈不驯，朕只有决意用兵。"于是从北部边境调来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另以尚食使尹继伦为都监，讨伐保吉。

赵保忠久已与保吉暗自勾结，听说李继隆大军来讨，先向朝廷上书说，他已与保吉解仇，请朝廷停止进兵。太宗大怒，命继隆先灭保忠。宋兵大军压境，赵保忠岌岌可危。赵保吉见有机可乘，先将保忠的牙将擒了，夜人保忠牙帐。保忠全没想到保吉会对他下手，仓促间穿件睡衣，披散着头发，单骑逃回夏州，军中辎重器物都被保吉抢走。起初。赵保忠屡次遣部将指挥使赵光嗣到朝廷进贡。朝廷先封光嗣为供奉官，不久，又加封为礼宾副使。不知不觉间他就成朝廷心腹，保忠一举一动都向朝廷奏闻。保忠与保吉暗中勾结的事，赵光嗣也早看在眼里，知道早晚有一天要与他翻脸成仇。平日广散家财，结交士卒，约定共同效顺朝廷。如今赵保忠只身逃归，光嗣乘机发难，把他囚禁起来，然后打开夏州城门，迎李继隆人城。李打造槛车，将赵保忠送回都城。太宗仍不杀他，封他为右千牛卫将军、宥罪侯。

赵保吉大捞一把后，见李继隆已人夏州，知道势难抵抗，率部众远走沙漠。朝廷削除他的赐姓，重新名之为李继迁。另以赵光嗣为夏州团练使，高文岯为绥州团练使。高也是从保忠部下倒戈投降朝廷的将军。又下令拆除夏州城，将百姓迁人银、绥等

州，给官田耕种。以为这样就能避免西夏人的反叛，稍明事理便知这是徒劳。李继隆上书劝阻，太宗不予理睬。

李继迁远逃漠北，无法维持。当年八月，遣部将赵光祚、张浦等到绥州请求投降。后来又派弟廷信到朝廷分说：以前背叛都是保忠所致，请求朝廷赦罪。这时西蜀王小波、李顺起义，朝廷忙于蜀中战事，乐得息事宁人，答应了李继迁的要求，又厚厚赏赐一份礼物。命翰林学士钱若水写了一份诏书给李继迁，其中说："不斩继迁，存狡兔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赵光义对这些四六对句津津乐道，全不计适足以养虎遗患，战略上犯了大错误。

至道二年（996）春，朝廷命洛苑使白守荣押送军粮四十万到灵州，太宗亲授方略，要他把辎重分作三拨，丁夫各执弓矢自卫，士卒结成方阵，将粮草围在正中，缓缓行进；又命会州观察使田绍斌中途应援，可保万无一失。但是自太宗即位，姑息武臣，武臣不听号令的事屡见不鲜。白守荣嫌把军粮分为三拨护送，太也费事，便归并一起，一次送齐。李继迁闻信后在灵武以南的浦洛河伏击这支粮队。田绍斌又不加救援，于是四十万粮草全被李继迁劫走。从此李继迁气焰大盛。率部进攻灵州城，灵州城池虽坚，粮草却少，派人出城求援，又落人李继迁手中。李继迁由此得知灵州虚实，长围灵州不去。当时宰相吕端建议，调发环庆等州兵，分三路直捣平夏[①] 李继迁的巢穴，他就不得不从灵州撤围，这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参政张洎认为天热乏水，粮草难继，大军无法远涉沙漠，不如静以待之。所谓静以待之，就是放弃灵州的意思。接着他又写了一个很长的奏章，说明放弃灵州的道理，大意是说灵州绝水乏粮，无法与夏人争锋。那样的不毛

---

① 自银州、夏州以西，即今陕西米脂以西，到陕西定边、宁夏盐池之间，称为平夏，参见《宋史》卷264《宋琪传》。

之地，失之无损朝廷，得之将成为朝廷的不堪重负。原来这张洎专门看风使船，揣摩皇帝意旨行事。太宗起初有放弃灵州的意思，被他看在眼中便发了这通议论。哪知太宗已中途变卦，对他的奏折着实讥笑一通。这可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但是张洎竟能讲出一大通道理来，这些道理却不是张洎个人的发明，而是汉以来儒者对经营边疆的传统理论。后来还是这些理论占了上风。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太宗接受吕端的意见，九月，分兵五路，直捣平夏。第一路由李继隆率领，从环州（今甘肃环县）出发；第二路由丁罕率领，从庆州（今甘肃庆阳）出发；第三路为范廷召，自延州（今陕西延安）；第四路王超自夏州；第五路张守恩自鄜州（今陕西富县）。其中，环州距灵武最近，太宗要李继隆先自环州到灵州，解了灵州之围，然后赴乌白池（今宁夏盐池县境）与其余四路会齐。李继隆以为灵州道远，便从环州以北的青冈峡出兵，直接向乌白池进发。不久与丁罕部相遇，行十数日连敌兵的影子也没见着，只好回兵。张守恩部与敌相遇，却不交战，也引兵而回。只有王超、范廷召部在乌白池与敌遭遇，大小十余战，虽然打了些胜仗，终是无奈李继迁何。李继迁围灵州一年有余，城中粮绝，中使窦神宝在灵州，使人到河外籴粮，乘夜运入城中，又不断出城击敌，李继迁对灵州也是毫无办法。

至道三年春又要大举出兵，以步兵都虞候傅潜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户部使张鉴督发粮草。张鉴上书说，这些年来，关辅地区的老百姓为战争所累，已是“畜产荡尽，室庐顿空”。不是有粮不交，实在是无物可交。如今春耕大忙季节，再遣官吏督索，有百害无一益。灵州虽说是西部要塞，对于中国实无大用。不如给了李继迁，既使他怀恩不忘，又可免关辅百姓的负担。这番话与张洎所说相同，太宗仍不予理会。三月，刍粮已运入灵州，旋即发兵。不巧太宗病死，这次军

事行动才不得不半途而废。

真宗即位后，局面仍然相同，李继迁是有利则战，势危则降；朝廷对他是降则封官，既往不咎，战则奉陪。西北边事便永远没个结果。于是，朝中抛弃灵武的论调愈来愈高了。朝廷重又赐李继迁姓名为赵保吉，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而李继迁自称为西平王。

咸平四年（1001）九月，李继迁率军攻清远军。观察使杨琼驻兵庆州，坐视不救。都监段义逾城投降，清远军遂被攻陷。此城在灵州东南，落入李继迁手中后，灵州便成孤城一座。十二月，朝廷召朝臣讨论灵州当弃还是当守，众人议论纷纷。知制诰杨亿主张弃，理由仍是张洎那一套：不以无用之地罢（疲）敝中国。陕西转运使刘综以为当守，理由是：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部要塞，弃灵州则沿边州县皆不可保。朝中多数人持此看法。宰相李沆则说：只要李继迁不死，灵州迟早必失。因而主张，将灵州民迁入内地，使它变为空城。既可免内地戍守的负担，又可免除它对内地的威胁，是一种变相的弃灵州的主张。又问兵部尚书张齐贤，他认为城中百姓和守兵不可抛弃，应发兵救援，而且应当大发兵。真宗接受他的建议，闰十二月，从北部边境调大将王超，委任为西面行营都部署。以环庆路都部署张凝为副职，入内副都知秦翰为钤辖，率步、骑兵合六万人入灵州。咸平五年正月，又将张齐贤派赴西北，任邠宁、环庆、泾源、仪渭、镇戎军经略使，判邠州（今陕西彬县），原来的环庆（甘肃东部）、泾原（在环庆西）、永兴军（今陕西长安）等处驻守的军队都听张齐贤调拨。张齐贤欲引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助，奏请授他为邠宁等路经略判官。曾致尧对张齐贤说道：“如今西兵已有十万人，王超被委任为都部署，又委任公为经略使，你这个经略使不过是一介儒生领二三文臣罢了，公自忖王超能听你指挥吗？你我只能设谋略，不能自领兵，王超若不听命，那就毫无办法了。公

宜先奏明皇上，请求有节制诸将的权力，否则无益。”张齐贤把这番话奏明朝廷，真宗只答应他有调发州郡驻兵的权力。曾致尧便不肯从行。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也奏请说，遣张齐贤等为经略使，是宰相、枢密使不知兵事的缘故。于是在当月二十七日免去张齐贤经略使的职务。

在朝廷闹闹嚷嚷，什么事也决断不下的时候，三月，李继迁集中兵力，猛攻灵州。灵州知州兼团练使裴济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求朝廷救援，竟然久无救兵。结果被李继迁攻破，裴济战死。灵州失守不是宋朝某一员将官的责任，它是宋朝整体状态，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等各方面状况的总标志。政治上效率低下，互相扯皮；又宰相不懂军事，缺乏总体方略；加上将不用命，各行其是，各扫门前雪，甚至以邻为壑，落井下石，终于对付不了李继迁的数千之众，以致滋蔓成患。

李继迁得灵州后，改名为西平府，第二年（咸平六年）又把它作为都城。

景德元年（1004）正月，李继迁死，子德明继位，时年二十三岁。宋朝守边大臣请求乘德明新立，与宋朝无恩无怨的机会，下诏书抚慰，加强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朝廷如言而行，同时又鼓励河套以北、以西的蕃部各族归顺朝廷。规定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赏银万两，绢万匹，钱五万缗，茶五千斤。康奴、鬏移等部族纷纷来降。德明也遣使归顺宋朝。

自李继迁末年，宋朝就采取扶植西夏周围蕃部以抑制西夏的政策，使李继迁死前认识到没有巩固的后方，便不可能与宋朝和契丹抗衡。所以留下遗嘱，要德明先与宋朝结好，集中对付周围各蕃部，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因此，直到仁宗天圣九年（1031）十月德明去世以前，宋、夏之间没有发生大战争。景德三年，双方交换誓表，缔结盟约，宋朝册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

节度，银夏绥有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又赐给“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赏赐的银、绢、器物更是无数。德明不但归顺宋朝，对辽也取顺从姿态，受辽朝册封为大夏国王。集中力量向北、西发展，北面贺兰山一带及河套以西直到甘（今甘肃张掖）、沙（今甘肃敦煌）、西（今新疆吐鲁番、善鄯地）等州都是回纥人的聚居地。自大中祥符二年（1009）西夏开始进攻回纥，直攻到河（今甘肃临夏）甘二州。

西夏自李继迁时起，已经有自己的都城、独立的官僚机构和其他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所不足者一是没有正式称帝，二是还没有相对稳定的边境或疆域。三是没有正式的年号和国号。大中祥符五年，德明追赠李继迁为“孝光皇帝”，自己虽仍不称帝，明眼人早已看出，这一天的来临已为时不远了。仁宗天圣中，德明去世前不久，宋大将曹玮镇守定州（今河北定县），他善于相面。三司副使王鬷因事到定州与曹玮相见，曹玮道：“以相法论，君以后当做枢密使。我有一言奉告，愿君多多留意。早些时我在秦州做官，听说西夏赵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与我国互市，以贸易多少定赏罚。常常因此杀人，他的儿子元昊才13岁，劝阻说：‘我们西夏以羊马立国，反而给中原使用，换得的不过是茶叶、布匹之类轻浮无大用的东西，只能使我国民变得更加骄惰。如今又因此杀人，太也不该。以后茶布渐多，羊马日少，我国就会逐渐削弱。’德明从此才停止杀人。我感到奇怪，想知道元昊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派人画了他的相貌，果然是一条长相奇伟的汉子。德明死后，此人必为中国大患，那时君为枢密使。希望乘此时努力学习兵法，讲究边事，免得日后误事。”王鬷不以为意，后来果然因不明军事丢了枢密使官。

元昊后来改名曩霄，乳名嵬理。自幼聪明慧巧，善绘画，通佛经和法律，识得蕃汉文字，胸有大志。即位后，一面继承父业，继续向西发展，使疆域除了包括陕北五州，宁夏灵、盐等州

以外，还占领了甘肃的凉（今武威）、肃（今酒泉），瓜（今安西）沙等州。一面努力进行内部改革，大量吸收汉族士人加入他的政权，改革、完善西夏各项制度。宋朝人才外流，外患日深，却懵然不知，终日悠悠然，以老大自居。在外流人员中，为宋人所深惜者为张元、吴昊二人。据《容斋三笔》、《梦溪笔谈》等书记载，这二人史失其名，只知姓张，姓吴，都是华州（今陕西华县）人。还有一位姚嗣宗，是关中人。三人都很有才气，曾结伴踏勘西部地区，有立功边陲的打算。但是为人有几分傲气，不愿自求录用，希望有人来请。于在足迹所至到处题诗留字。景祐间（1034—1037），范仲淹淹经营边事，巡察来到崆峒山（在甘肃泾源东）界，在一处寺院的墙壁上看到一首诗："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仲淹大惊，知道这崆峒山叟并非遁世隐者，耳中既有五原金鼓的轰鸣，必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士人。再看下去，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等语，志量不小。署名都是他们三人，范仲淹却一个也不认得。后面又有一首《鹦鹉诗》，末两句写的是"好著金笼收拾起，莫教飞去别人家。"心中很不以为然，"学得补天术，售与帝王家"。应该为国立功，怎么能飞到"别人家"去？他受儒学传统思想的熏陶，习惯了这些忠君爱国的学说，哪里知道张、吴这类人想的却是：日月如梭，时不我待，大丈夫当及时立功，不见得只有替你赵氏做事才是忠君爱国。

意识不同，范仲淹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中。不久，张、吴又将自己的诗句刻在大石上，命人抬了，在大庭广众中行走，他们三人跟随在后，边走边哭，显然是要引起范仲淹等当政者的重视。范仲淹果然召见他们，谈话间方知是崆峒山题壁的三人，果然有些见识。有心录用他们，又不知人品如何？若动辄就想"飞人别人家"，大是叫人头痛。微迟疑间，三人已不能忍受，告辞而去。范仲淹命人监视他们的动向，有何举动，及时来报。目的是暗加

考察的意思。不一日，来报说，三人向北逃走，看样子是往西夏去了。范仲淹大惊，急忙派人去追，只追回了一个姚嗣宗，其余二人已走得远了。姚嗣宗被留在范仲淹幕府中，可怜一生碌碌无为。张、吴二人入了“蕃邦”，却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张、吴入西夏后，仍是着意引人注目，先将名字改了，一个叫张元，一个叫吴昊，连日在西夏都城酒楼痛饮，而后在墙壁上题字，署名道：“张元、吴昊，来饮此楼。”当时西夏国王是元昊，他们的名子便是将元昊拆开来叫，显然犯了忌讳。被官府传讯带到元昊那里，元昊道：“你们是汉人，又是读书的士子，难道不知‘入国问讳’的道理吗?”张、吴哈哈笑道：“姓尚不加理会，何况是名？有什么可忌讳了?”前文说过西夏国主原姓拓跋氏，唐帝赐他姓李，宋朝又赐姓赵，如今元昊姓的还是赵姓，张、吴笑他不能自立，反而要百姓避名讳，太无道理。元昊听这话，与他脱离宋朝的素志相合，不觉肃然起敬，从此重用二人，作为谋主，与宋朝对抗。起初朝廷不知道他们在西夏已成要人，只把他们的家属迁到随州（今湖北随县）监管，也并不怎样放在心上。后来西夏遣使假传诏书，要地方政府释放他们，又听说这两家一人西夏国境，便有乐队奏迎，才知张、吴在西夏已经发迹，后悔不迭。《容斋三笔》说，从此以后，边帅才懂得善待士人。这话就有些夸大了。

元昊利用汉人进行的政革，主要是根据汉制制定西夏的各种制度。如西夏官制也分文班、武班，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开封府等名，设官有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等等。还据汉文，制定了西夏文字，用以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在境内流传。又设置十二监军司，相当于宋制的十二卫，分统全国军队。而以豪族子弟武勇者选为贴身护卫，称为六班直，与宋朝的六班殿直也大体相似。此外还有建蕃汉学校、定官服，制礼乐等等。这一切都粗具规模以后，元昊便

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即皇帝位，定国名为大夏，年号为“天授”，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一个羌族人的政权建立了。

第二年，西夏把建国的消息正式通知宋朝，宋朝大为光火。在他们的意识中，西夏人一直是宋朝的附庸，竟敢自称皇帝，实在是胆大包天！其实呢，自李继迁逃入地斤泽时起，西夏已经是独立于宋之外的政权了。只是宋朝总在做着“万方来朝”的美梦，不肯承认罢了。经过三代人共六十多年的酝酿努力，西夏成了一个完善的政体，元昊也正式称了皇帝，宋朝仍是不予承认。所以此后，双方战争不断。但是不论宋朝统治者承认与否，西夏国终究是建立了。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夏国传》、《赵普传》、《袁继忠传》、《曹光实传》、《李继隆传》等。

李焘《长编》卷1、8、17、19—24、32、41等。

洪迈《容斋三笔》卷21《记张元事》

岳珂《桯史》卷1

苏轼《东坡志林》卷4

涪王之狱

涪王廷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幼弟。赵匡胤兄弟五人，长光济、幼光赞都死得很早，余三人：匡胤做了宋朝开国皇帝，再就是光义和廷美。匡胤死后，皇位怎样继承？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成了宋初一件大事。太宗光义以兄终弟及而即位。光义之后，该是涪王廷美即位。但是，光义死前将他清除，改行父死子继制，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恒。因而有了涪王之狱这段故事。

《王禹偁遗事》记载说：有一天在太后阁中举行家宴，杜太后、太祖皇帝兄弟三人及其子德昭、德芳等都参加了。酒宴间，太祖赵匡胤喝酒喝得高兴，为了讨母亲杜太后高兴，说道："百年后我要传位于晋王（指弟光义），晋王百年后传位于秦王（指弟廷美）。太后一人有三个皇帝儿子，千古以来，谁也比不上。太后以为怎样？"杜太后听了大喜，说："我老早就有这意思，只是事关重大，不知你们的意思如何，就没开口。如今你既这样说了，是天生孝子，遂了我的素志。"急忙命晋王、秦王向大哥致谢。二王叩谢毕，太后对二王道："你大哥从一个普通百姓出生入死，不知立了多少战功，才有了天下。做天子后也没得过一天安生日子，可说是无日不讨，无月不战，历尽艰辛，才有了今日这个局面。你们却是坐享其成，以后谁也不许辜负了你们大哥。"二王答应了，太后又对秦王道："不知秦王百年后传位何人？"秦王道："愿立南阳王德昭"太后喜不自胜连声说："对了，对了，

这就对了。难得你们兄弟如此孝义友爱。不过，这也许是天命。以后谁也不许翻悔，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老天必会给他报应。”赵匡胤忙唤来长子德昭，谢了太后，太后命传赵普来，将诸人的话写成誓书，作为凭据。

这段记载因与正史不合，史家并不完全相信。但是太祖死后，赵光义（太宗）真的做了皇帝，而且光义即位初的种种措施，也显示了要传位于廷美（秦王）以至德昭的样子。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癸丑），赵匡胤死。二十一日（甲寅）赵光义即皇帝位，二十七日（庚甲）封皇弟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以皇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政事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以贵州防御使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

赵光义即位以前的职衔是开封尹兼中书令。如今所封廷美等人的职衔清楚地显示了相互继承关系，即廷美继光义，德昭继廷美，德芳继德昭。不管赵光义有无诚意，做出这种姿态或承诺对于他非礼继位在朝野引起的不满情绪是一种安抚。

十一月五日（丁卯），又诏命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班位① 在宰相以上，暗示二人地位非比寻常。这与儒学倡导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合。不过由于太宗即位在前，投鼠忌器，谁也不敢出面指责。尽管这样，有些大臣的态度还是一目了然的。吕端就是其中之一。

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太宗将伐北汉。起初，太祖亲征，曾以光义为留守。如今顺理成章，要以齐王廷美为留守。开封府判官吕端私下对廷美说道：“皇帝栉风沐雨，以申吊伐。您身为国亲、贤王，应该为群臣做个表率，请求做皇帝车驾的扈从。留

---

① 班位：在朝堂上立班的位次，是按身份、地位高低排定的。在前、在左者位尊。

在京城做留守不大合适。”廷美因请求随驾北征。天子出京，以重臣或国之储贰（太子、皇太弟等皇位继承人）为留守，是历朝通规，吕说“不合适”，只能解释为他不把廷美当作皇位继承人，不论太宗皇帝做了怎样的暗示。

武功郡王德昭也随驾北征，平定北汉后，赵光义不顾许多人的反对，率领原班人马，进攻幽州，终于大败而归。匆忙间，赵光义乘驴车逃回。众人不知他的所在，以为凶多吉少了，有人提议立德昭为帝，所幸不久便知道了太宗的行止，才没立成。但这件事传到太宗耳中，仍使他很不高兴。回朝以后，对平北汉的立功将士，久久不颁奖赏。群臣议论纷纷。八月，德昭转告太宗，劝他及早颁赏。太宗正憋了一肚子火，大怒道：“你要奖赏他们吗？那好呀，等你自己做了天子，尽管赏是了。”德昭听了这种话，似是皇帝怀疑他。“收买人心，图谋不轨”。这还了得？心中惊慌害怕，回到自己住的王宫之中，问左右随从带刀没有，随从道：“王宫之中，不敢带刀。”德昭苦笑一声道：“是我糊涂了，怎的胡乱问这种话！”左右听了莫名其妙，王爷一时忘了宫中不许带刀，也没有什么奇怪，为何因这种小事如此自责？怎知他正为方才多问闲事而苦恼。但见他失魂落魄般地走向茶酒阁，麾退从人，将门关了。随从进来时，他已用桌上削水果皮的刀子，割断自己的喉管，倒在血泊中，死去多时了。太宗听到消息，急忙起来，抱着他的尸身，显得又痛又悔，失声哭道：“傻孩子，我说了你那么一句话，怎致于就走这条路？”追赠他为中书令、魏王。后来又改封吴王、赵王等。不论怎样，德昭是再也没有做皇帝的份了。

十月二十九日（乙亥）齐王廷美进封秦王，是对他参加征太原功劳的奖赏。

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十一日（己酉），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德芳死，才二十三岁。照例也赠官中书令，追封为岐王。

这个杜太后安排下的皇帝继承人的锁链，接连烂了两节，下一节显然该轮到廷美了。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廷美心中不能不因恐惧而颤抖。可是愈是这样，也就愈难保无事。这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使他的厄运提前降临了。那就是大臣赵普用他的命运做了敲开朝廷都堂[①]大门的敲门砖。

赵普在太祖时独掌朝政多年，有许多建树，但此人不读书，寡学术，气量不宏，执政时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伤了不少好人。同时也由于他与王位继承的事有牵连，渐渐为太祖所不喜，终于贬为河阳三城节度使，把他赶出了都城。太祖去世后，他以吊丧为借口，重回京都，想恢复他昔日的权势。可是，受宰相卢多逊的阻挠，数年来，一直郁郁不得志。这时他日夜想的就是如何才能冲破这命运的僵局，重新回到都堂。机会终于来了。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宣徽北院使柴禹锡，翰林学士杨守一，内酒坊副使赵镕等人，控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发动等事。柴、杨、赵等都是太宗即位前做晋王时，在王府中奔走的人，即所谓藩府旧人，自然是皇帝的心腹爪牙。太宗将他们安插到各个单位中做密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大都是势利小人，诬告、贪黩等是共同特征。如今共同出面揭发廷美是受了太宗的暗示，或者只是巧合，已无从得知。既有人告发，太宗惩治廷美也就有了借口。自然，从告发到定罪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需要有一个强干官吏才能把这事办妥。为此，太宗不找宰相商议，也不去找三法司[②]的官员，却找到了赵普。太宗对赵普太熟悉了，不但知他出身于下吏，虽无学术，却处事干练老辣，思虑周详，不留痕迹。又知道他失意多年，急于找一个表现的机会。他又是太祖时的重臣，与赵姓皇室有两代渊源。负责处理此事再合适不

---

① 都堂：宰相办公处，唐代名为政事堂，宋代名为都堂。

② 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合称三法司。

过了。将此事与赵普说了，赵普当即表示："臣愿意回到朝廷中枢，将此奸谋彻底查清。"这话很是滑头，他深知此事的分量，所以提出重回中枢，执掌朝纲做条件，价码不低。太宗没有立即答应，退朝后，赵普向朝廷写了密奏，不讲廷美案件，只讲他如何忠于太宗皇帝。又知太宗如今已做了皇帝，对这类话不会放在心上，便只说太宗即位以前他就是忠于太宗皇帝的。并列举了杜太后让他署名的传位誓书和他在太祖朝的一份奏章为证。据载，太宗按赵普密奏所说，打开金匮，找到了誓书和奏章。尤其那份誓书，足以使他做皇帝合法化，太宗得到后欣喜若狂，对赵普的感激之情也就毫不掩饰，召来赵普说："以前是亏待你了，但是人谁无过？朕不等到五十岁，已尽知前四十九岁中所做错事了。"十七日（辛亥），加封赵普为司徒兼侍中。

誓书的真伪后人无法得知了，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太宗初即位最需要这份誓书的时候找不到它。即使原来不知有这份誓书，太祖留下这个金匮，其中藏有重要文件，难道他也不知？在即位后的四五年间，就没有产生过打开来瞧一瞧的欲望？这金匮由谨密宫人收藏，太祖既死，宫人竟不把所藏传告新皇帝，又仿佛只有赵普一人知道此事。常言说一人为私，二人为官。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尽管怀疑，却是谁也帮不了廷美的忙了。赵普重被起用，廷美似乎也感受到了威胁。九月十八日(壬子)，奏请朝班在赵普之下。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廷美仍是忐忑不安。那时，朝廷有大的人事调动都由翰林院起草制书，称为内制；中下层官员的除罢则由中书舍人起草制书，称为外制。为防止漏泄，翰林院起草内制时要将院门锁了，禁止出入，称为锁院，廷美仿佛预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每日上朝路过翰林院，只要见到锁院，心中就是一阵剧烈跳动，急忙命人前往，隔着院门打听，翰林院孔目官倒也不敢不以实相告。当听说是某某人改官，与他本人无有干系，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十一日（癸卯），廷美早朝，见御座旁的麻案台上放着只朱红地花漆木匣，知道那是盛放白麻制书的。心中纳闷，暗道：今日学士院没有锁院，何来白麻制书？噢，是了，想必是黄麻制书了。学士院起草的制书，由院中书待诏抄在白麻纸上。放入木匣，由御药[①]带回禁中。中书起草的外制则用黄麻纸誊写。廷美想到这里，心中略宽。朝罢，果然命百官赴宣政殿听宣麻。廷美以为与己无关，不必听了。黄麻例由参政押麻，便向参政窦偁说了。窦偁道："今日并非下官押麻，王爷还是去听一听的好。"廷美道："难道是白麻，这就奇了。"窦偁微笑不语，只有随众人一起前往。来到宣政殿，见阁门使将匣上金锁开了，二名小吏打开一层锦袱，从中恭恭敬敬捧出一卷白麻纸。廷美暗道："果然是白麻，真是奇怪。"见两小吏已将麻纸展开，每人持一端站定了，通事舍人手秉笏板，居中而立，曼声念道："秦王廷美接旨。"廷美心中一惊，上前跪倒，其余文武官员也"噗嗵嗵"跪了一地，那通事舍人继续念道："秦王廷美著革去开封尹职，改任西京留守，择日上任，钦此！"宋代宣麻一般不全读，只拣首尾及姓名、官阶等主要部分唱念，改官缘由，事绩等都略去不读。廷美自然不知为何罢去了他开封尹的职任？但是却清楚地知道其中包含的意义；从此后他这皇帝继承人的资格算被免除了。这是何等大的打击。像是当头中了一棒，嗡地一声就昏了过去。他不知自己是怎样回到王府的，醒来时犹如做了一梦：那白麻是从哪里来的？是真还是假？他念念不忘的还是翰林院没有锁院的事。其实是翰林院欺骗了他。因为这一段日子以来，每次锁院，廷美必派人来问，院官又不敢不实言相告。可是这次起草的白麻与廷美本人有关，怎能再预先说知：所以，想了

① 御药：皇帝身边役使的小童。药即饮料。宋制迎客以茶，送客以药，又称汤，用甘草等中草药配制而成。

个主意：觑准廷美的轿子从门前路过时，将院门大开；轿子一过，立即关闭，轻轻巧巧就将他骗过了。

改官的原因后来也托人打听到了。原来朝廷在金明池中修了一座水心殿，桥梁尚未修成，太宗打算乘船前往游览。有人告发说，廷美打算乘此机会制住太宗，发动政变。若不成功，就诈称有病，待太宗到秦王府中探望时，再次作乱。据说，虽有人告发，太宗不愿把此事张扬出来，却又怕他留在京城，久必生乱，所以罢去了他的开封尹官，改任为西京留守，把他赶出了京城。

但是，太宗若不"张扬"，罢廷美开封尹便毫无理由。这样的大事，朝中大臣毫无一人敢说半个"不"字，包括起草白麻的翰林学士。宋制学士草麻有封还词头[1] 的权力。尤其对于命后、建储（即立皇后和皇太子）等大事，一般要先取得中书的认可，然后才命学士草麻。[2] 不说明理由就免除了廷美继承人的资格而又无人反对，可以想见太宗朝对此事讳莫如深、万马齐喑的状态。

三月二十日（壬子），赐给秦王廷美成套衣服、通犀带，以及钱十万、绢彩各万匹、银万两、西京上等宅第一处。又赐给随行的留守判官阎矩、河南判官王遹每人钱百万。算是一种安抚。

四月一日（壬戌），枢密使曹彬在琼林苑设宴为秦王廷美饯行，送他西赴洛阳上任。

三日（甲子），加封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杨守一为东上阁门使充枢密都承旨。是对他们告发秦王廷美的奖赏。

四日（乙丑），贬左卫将军枢密承旨陈从信为左卫将军，皇

① 封还词头：学士草麻的依据一是面受旨，皇帝召学士入宫，当面告诉他封某人为某官；二是根据皇帝降下的御封，称为词头。也有两种：一是中书进呈的熟状，函封后加盖御宝送学士院；二是皇帝亲写的手札，学士若有不同意见，可将词头封还，拒绝草麻。叫做封还词头。

② 宋·王巩《闻见近录》："故事：建储皆大臣议定，召学士锁院。"

城使刘知信为右卫将军，弓箭库使惠延真为商州长史，禁军列校皇甫继明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范廷召为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王荣为濮州教练使。罪名是交通秦王廷美或者是曾接受过秦王廷美私下赠遗的钱物，其中王荣贬官以后尚未赴任，有人告发他曾狂言说不久要当节帅，因此又把他削籍后流放到海岛。

该升的升了，该罚的罚了，秦王廷美也已被赶出京，皇帝继承人的指望，不复存在了。太宗皇帝满可以高枕无忧，把这事告一段落了。但是不然，前面说赵普受卢多逊的阻挠，多年郁郁不得志，看准了廷美案的机会，不但重掌了朝纲，当了宰相。他还要把政敌搞垮，出出多年来积在胸中的这口恶气。所以他要抓牢廷美案不放，大做一番文章。

赵普重任宰相后，曾多次给卢多逊透口风，要他主动引退，免得自讨没趣。偏偏卢多逊贪恋权势，自以为没有把柄落入手中，不肯退让。其实，什么把柄不把柄，欲加之罪，不患无词，官场中的事历来如此。不知赵普怎样打听到了卢多逊与秦王廷美交往的事，报告了皇上。皇上大怒，四月七日（戊辰），贬卢多逊为兵部尚书，将他下到御史台狱中听审。一面下令逮捕中书守当官赵白和秦王府当差的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和孔目官阎密等。命翰林承旨李昉、翰林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等人共同审讯。当此情势，卢多逊已有百口难辩，天大的事情他也只好招认了。审讯结果说，卢多逊多次将中书省机密事派赵白转告廷美；去年九月，又命赵白对廷美说："今皇帝死后，一定尽心尽力替大王办事。"廷美也派樊德明传言卢多逊说："承旨（指卢多逊）的话正合我意，我也但愿今皇帝早日去世。"又赠送卢多逊弓箭等物。阎密起初在廷美身边做事，太宗即位后，升任为殿直官，仍隶属秦王府。此人横蛮无理，不守法度，说过许多不尊朝廷的话。王继勋，更是廷美的亲信。廷美曾派他在民间访求声妓，就是购买善于唱歌的女子，

他便借机在外面放贷受贿，搞得赃污狼藉。樊德明平素与赵白交游，关系密切，卢多逊通过他与廷美拉上了关系。廷美又数次遣赵怀禄召见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廷美又曾派阎怀忠向淮海王钱俶索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也从中接受了钱俶的私赠物品，怀忠还曾受廷美派遣带着银碗、锦采等到廷美的妻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潘璘的营中去，为属下谋求一个燕地军校的差使。所有这些，有关人员都供认不讳。

四月十五日（丙子），诏命文武常参官① 在朝堂会同商议对廷美的处罚。太子太师王溥等 74 人联合上奏，说"卢多逊与廷美诅咒皇帝，大逆不道，应该处死，以正刑典。"十六日（丁丑）诏命削去卢多逊的所有官职，连同家属一起流放崖州（今海南崖县）；廷美勒令回家反省；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人都在京城郊外斩首，家财籍没入官。

十八日（己卯），下诏说，秦王廷美的子女从今后不再称皇子皇女，改称皇侄女。女婿除去驸马封号，全都发送西京与廷美一起居住。

十九日（庚辰），贬宰相沈伦为工部尚书。沈伦年老多病，已向朝廷递了请求致仕的折子。致仕就是退休的意思，太宗说他与卢多逊同为宰相，不能发觉他的罪行，就是有罪。所以，虽然老病，也难免受罚。

中书舍人李穆与卢多逊私交颇厚，秦王廷美被贬西京，向朝廷写的辞呈又是请他代笔。这也成了罪状，被人揭发出来后，贬为司封员外郎。著作佐郎刘锡知粮料院，擅自借米数千斛给廷美，二十六日（丁亥），太宗亲召刘锡查问，刘锡口称死罪，认

---

① 常参官：指朝官无职事者，每日朝会时到朝堂参见皇帝，称常参官。朝官宋初是指文臣中太子中允、赞善大夫、太子中舍、洗马以上，武臣自内殿崇班以上的官员。

罪不迭，太宗命人用棍子把他痛打一顿，直到昏死在地才停止。

五月二日（癸巳），又贬西京留守判官阎矩为涪州司户参军，前开封府推官孙屿为融州司户参军。理由是他们都是秦王廷美的属官，廷美既有罪，他们也就人人有份了。罪名定为“辅导无状”，虽然人人知道他们并无“辅导”秦王的责任和权力。

赵普心仍未足，指使开封府知府李符上奏说：“廷美在西京不思悔过，心怀怨望，请朝廷将其迁往远恶州军，以防生变。”五月二十五日（丙辰），降秦王廷美为涪陵县公，安置在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又委派崇义副使阎彦进为房州知州，监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每人赐给白金三百两，专门监视廷美的行动。

廷美迁往房州居住以后，赵普担心李符将受他指使的话泄露出去。八月四日（癸亥），以用刑不当为借口，也把李符赶出了汴京城，降职为宁国军司马，而命右正谏大夫边珝知开封府。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五日（壬戌），太宗乳母陈国夫人耿氏死。此人后来被太宗诬指为涪陵县公廷美的生母。

涪陵县公廷美到房州以后，终日担惊害怕，不知以后还有什么厄运降到身上，终于一病不起。雍熙元年（984）正月死于房州。十六日（丁卯），消息传进京都。太宗痛哭流涕，对宰相说道：“廷美幼时就性情刚愎，年长以后更是凶恶。朕因与他是同气连枝的至亲，不忍心绳之以法，原想让他暂住房州，煞煞性子，改过自新。他虽远在房州，我心中没有一刻不在惦念于他。原打算找个机会赦免了他，使他官复原职。怎料到他竟死在房州了。叫人好不伤痛，呜呜……”大臣们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见他哭得伤心，仿佛也受了感动。

太宗又下诏追封廷美为涪王，议谥号为悼，为他致哀，服丧，办理丧事等不必说了。人既已死，一切不妨从优，以示圣天子的宽容大度。此后，太宗与宰相闲聊，又说起涪王廷美的事，

道："廷美的生母是朕的乳母陈国夫人耿氏，后来出嫁给一个姓赵的人家，又生了军器库副使廷俊。朕因与廷美的这层关系，让廷俊在身边当差。廷俊便时时把宫禁中的事泄露给廷美。金明池水殿谋逆的那件事如果追究起来，依法惩治，廷美早就没命了。朕只让他在西京居住。可是他仍不思悔改，口出不逊。这才把他迁到房陵，这仍是想保全他，怕他再有过犯。就连廷俊我也没有怎样加罪于他，不过贬官了事。朕对廷美已仁至义尽，没有半分对他不起之处。"说着又不尽叹息起来。

宰相李昉不愧为朝廷大僚，说道："涪王谋逆的那些事，天下已是人人皆知。宫禁中的那些事，若非陛下宣示，臣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的。"意思是别人谁也不知，全凭你说是了。你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谁都与你争辩不得。

李昉说的"宫禁中事"主要指涪王廷美的身世。说他是太宗乳母耿氏所生，耿氏当时又已去世，无一人可以作证。相反，杜太后就曾亲口说过，廷美是她亲生，所以《宋史·后妃传》明确记述说，杜氏"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赞，燕国、陈国二长公主。"并不以太宗的话为然。元代有人说：若廷美为耿氏所生，必不令她再嫁；既已再嫁，必不会再有国夫人的封号。这话很有道理。退一步说，即使太宗所言是实，朝中无一人知晓，想来在这以前遮掩得极好。必是杜太后为了掩盖太宗之父赵弘殷与乳母的这段暧昧事，才将廷美认作己子。既然如此，太宗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把这事抖落出来，岂不是太也不择手段？

水心堂谋逆的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是柴禹锡告发以后，太宗曾经找赵普商议，谈到传位于廷美的事。赵普说："太祖不传位于子而传于陛下，就是个错误，陛下岂可再犯这种错误？"太宗这才定下决心，处理廷美的案子。可知所谓水心堂谋逆事可轻可重：仍要廷美做继承人，不妨遮盖过去；既不再要他做继承人，

则要大做一番文章。倘若果真是“谋逆”重案，亲生父子也不可恕，怎么还有通融的余地？可见所谓水心堂案，极可能是伪造出来的，涪王之狱是一桩冤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即都是赵普一手搞成的。这话说中了事情的关键。宋人传说，赵普晚年，久病不起，亲解所佩双鱼犀带，命贴身从人甄潜送到上清太平宫，请那里的道士为他设醮会，化解一生结下的冤仇。上清宫道录姜道元特地为他向阴世的幽都叩问，幽都神灵回答说：“赵普开国功臣，可是身有冤累，难逃劫难，又有什么办法？”姜道元又求问：“是何冤累？”神灵拿出一个很大的牌子给他看。但见浓烟笼罩，牌上只隐约现出一个“大”字。甄潜回府将此话如实说了，赵普道：“必是廷美中的‘美’字上边被遮了。廷美之死，并不怪我，他与卢多逊交通是实，我愿与他到阴司对质。”不久赵普便一命呜呼了。若真有此事，必是道士姜道元因廷美冤狱，从中弄鬼，赵普的话则反映出廷美之罪不过是交通大臣，虽然有罪，却也算不了什么。被折腾致死全是由于他担了个继承皇位的名分的缘故。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魏王廷美传》、《赵普传》、《卢多逊传》、《柴禹锡传》、《杨守一传》、《赵镕传》等。

李焘《长编》卷 17、19—25。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 5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

屯田营田

屯田、营田是政府组织的开垦荒地，兴办农业的两种经营方式。“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即组织士卒垦荒种田称为屯田，组织百姓垦荒种田称营田，两者是有区别的。但宋代屯田中有百姓参加，营田也动用士兵，区别已经很小了。

宋代经营农业有两方面的成就：一是参种稻谷。即北方多旱田，提倡治水田；南方多水田，提倡治旱田。北方种稻，南方种谷，使应付水旱灾害的能力提高了。其二就是屯营田。与边疆防备相结合，搞得颇有始终，不像其他朝代一样，只在国初和边境地区搞一搞，以解决军队给养问题。本篇就来说说宋代屯营田的始末。

自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出兵幽州以后，宋辽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被破坏了。以后不断战争，河朔地区成了战场。居民或被杀掳，或者逃亡，土地无人耕种，肥沃的农田成了无边无际的草莽。

人们逐渐发现，宋辽边境，自雄州（今河北雄县）以东至海，战事较少；自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以西直到太行山麓二百余里间，是契丹军南下的通道。推求原因，是雄州到海滨之间有许多河川沼泽，处处是积水，契丹的骑兵奔突不便；而顺安以西一马平川，骑兵来往就方便多了。于是许多人建议在顺安以西，开掘沟洫，种植水田，一则可省粮运，二则可限戎马。朝廷接受这些建议，于端拱二年（989），分别任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

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不料，陈恕却反对这项决议，对太宗说道："古时寓兵于农，寇来则战，无寇则耕。以兵营田固然是个好办法。如今则不同：士兵是国家招募来的，衣食都靠官府供给，以戍守和作战为专门职业。倘若逼使他们既打仗，又耕田，一旦闹出乱子来，就后悔不及了。"太宗认为他的话有理，不几天就另下诏书要陈、樊二人增修城堡，开浚沟渎，至于营田的事就不再提了。此外，又曾命知代州张齐贤经办河东（今山西省）诸州县营田事宜，如今也一同停止。

又有六宅使何承矩上疏说："臣自幼随先父征战，对北部边境的地形十分熟悉。倘若自顺安砦（在今河北高阳东）开通易河、蒲口，导易水东注大海，在所经东西约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之间，筑堤贮水，兴治屯田。不过一年半载，关南[①]地区的沼泽湖泊被水注满，临河塘的土地垦成稻田，就可以限制契丹兵往来奔突。那时，只需适当保留一些守城士兵，无须另发重兵驻守。边地不但军粮充足，还能使民力得到休息。不过数年工夫，就会出现敌弱我强，敌劳我逸的局面。顺安军以西则选精锐兵将驻守，如此，北部边疆可以高枕无忧。"太宗虽然对他的话很满意，由于河朔一带连年闹水灾，百姓流徙逃亡，主管官员认为很难再搞大的水利工程。不久，何承矩改任为雄州知州，又上疏说，应该因水灾后积水未退的时机，开掘陂塘，兴治水利，多种稻田。恰在这时，闽人黄懋也上疏说："闽地只种水田，由于地多丘陵，引水灌溉，十分困难，如今河北地区有许多陂塘，地又平坦无山，若种植水田，比闽地容易得多。三五年间，公私必能获得大利。"朝廷下诏书命何承矩先实地考察一番。考察结果与黄懋所说相同。于是任命何承矩为河北沿边屯田使，黄懋以大

① 指淤口关（今河北霸县以东的信安镇）、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以南，与汉唐所说关南不同。

理寺丞的资格充任判官。又从河北州军调发一万八千人作役夫。在雄州、莫州（河北任丘）、霸州（今河北霸县）、平戎军（今河北新镇）、顺安军等地，先后共修水堰长六百里，临堰设斗门[①]引塘泊湖淀水灌溉水田。第一年，因霜降太早，稻没成熟就被霜打死。朝臣本有不少人反对屯田；河北将士习惯于打仗，也以种田为耻。如今种稻不成，正成为他们的口实。一时间谤议大起，尽是说三道四之人，几乎将这件事闹砸了锅。何、黄二人总结经验，认为是由于河北地区霜降早，地气迟，江南普遍种植的晚稻九月成熟，很容易遇上早霜，导致颗粒无收。因此，黄懋建议引种江南地区的早稻，七月份即可成熟，不会遇上霜灾。果然，第二年八月，稻田喜获丰收。何承矩用车装载稻穗运到汴京，此时屯田的流言蜚语才停息下来。河北百姓不但有了水田的丰饶，更有了种植莞蒲、采捕蜃蛤等副业收入，日子好过多了。

度支判官陈尧叟在河北屯田成功的基础上，提出在河南及淮南北大兴屯田，说："汉、魏、晋、唐以来，都曾在陈、许、邓、颍以及蔡、宿、亳、寿春（西自今河南邓县、东到安徽寿县之间）等州屯田，至今遗迹尚在。应当善择官吏，大力兴办水利田。建议以江淮地方军和其他散兵，并招募百姓，充作役夫；用官钱买牛，置办农具；开沟渎、筑堤堰建成屯田。每屯二千人[②]，每人给田五十亩，牛一头。每亩约收三斛，每屯可得十五万斛粮。在上述数州间可设二十屯，每年得粮不下三百万斛。数年间，这一带就能仓廪充实，江淮漕运便可大大减省。倘若百姓有田未垦，也可由官府代耕；官田未耕，则可募百姓代种，收获

---

① 斗门：以水斗（用柳条编成的容器）为门称斗门。实则是水渠旁的分水口。

② 一作二十人，误。

以后，都按民间实行的主客分① 的成例进行分配。《傅子》书中说：旱田收成靠天命，尽管人力已尽，如果水旱不时，一年的功夫照样白花了；水田的收成取决于人力。只要功夫花到，就能尽得地利，而且水田虫灾比陆田少，所以水田所得要比旱田多一倍以上。”太宗读了陈尧叟的奏章，很是高兴，派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坐驿站车马到各地调查、筹划。但没来得及实行，就由于太宗“宾天”而停止了。所以太宗时期只有河北沿边七州的屯田卓有成效，其余地方没能实行。

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大理寺丞王宗旦曾经奏请招募百姓耕种颍州地区的陂塘荒地，共约一千五百顷，当地百姓应募者三百多户，朝廷特为下令，在他们正式缴纳租税以前，免除一切徭役。后来却是徒劳无功。汝州地区原来有个洛南务，辖有内园兵若干，种植稻田。太宗雍熙三年（985）时解散，将土地召民耕种。如今重又组织起来。委派京朝官专门掌管。募民二百多户，自备耕牛，按团编制起来，设立团长，垦地六万顷，引汝水灌溉。每年政府所得约二万三千石粮。虽名为团，与屯的编制相同。也是屯田。又有襄州知州耿望奏请：以本州旧有官田，加上部分可垦荒地，建为营田，分为上、中、下三务，调民夫五百人，修堤筑堰。另外自邻州调兵，每务二百人。分往荆湖各地购买耕牛七百头，分给营户使用。当年就有三百多顷稻田下种。

咸平四年，陕西转运使刘综请求在古原州的旧址上建立镇戎军，设置屯田。说道：“如今在这里戍守的士兵每年所需粮食和草料约四十多万石束②，茶盐五十多万斤。加上运输，实际花费

---

① 主客分：地主和佃客之间按比例分配收获物的制度，宋代有四六分和对分制，即主四客六，或主客均分，都叫做主客分。

② 石束：粮食以石为单位，草料以束为单位，合计数目为40多万，称40余万石束。

的数目更加庞大。若在军城四面设立屯田务，开垦荒田五百顷，命下军二千人，给牛八百头耕种，所需粮草可以自给。组织办法可在军城前后到水峡口之间设立堡砦，令屯兵分住，无寇则耕，寇来则战。以知军兼任屯田制置使，可自己选择使臣，充任四砦监押官，每砦辖屯兵五百人。”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古渭州地面也搞起了这种屯田。归附朝廷的西北部落民依屯砦居住，得以安心从事生产。这时，由于朝廷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凡是请求搞屯田、营田的，朝廷大都准许实行。规模较大的如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奏请在靖戎军（今河北遂城）以东引鲍河水入顺安、威虏（今遂城境内）二军。沿流设置水陆营田，朝廷命莫州部署石普负责这项工程，搞了一年多，便告成功。又有保州、定州、唐州（今河南泌阳）等也都搞了屯营田。

景德元年（1004），应京西转运使张巽的请求，下令不许役使屯田务的兵丁作他用，以便他们专力业农。第二年又定制：沿边有屯田、营田的州军，都以本州军长吏兼任制置屯、营田事，原有他官兼任者依旧。大中祥符九年（1016），改定州、保州和顺安军的营田务名为屯田务。各州军都派遣官员管理，另外设置吏员督办具体事务。

淮南、两浙地区起初也搞了屯田、营田，后来租给百姓耕种，政府坐收租税，只保留了屯、营田的名称。河北一带虽实有屯营田，每岁收入少得可怜，主要作用是以水田蓄水，限制契丹骑兵的南下。到天禧末年（1021），天下屯田总数不过四千二百多顷，河北地区屯田收入每年约为二万九千多石，其中保州所收占一半以上。

屯、营田是官办农业，像封建社会里其他官办企业一样，日久弊自生，都有管理不善的问题。官办手工业产品质量低劣，官办农业地不出粮。二万九千多石，其中保州所收占一半以上。

屯、营田是官办农业，像封建社会里其他官办企业一样，日

久弊自生，都有管理不善的问题。官办手工业产品质量低劣，官办农业地不出粮。以襄、唐二州屯、营田为例：咸平初，知襄州耿望倡议兴办，他的经营办法是调夫耕种，耕牛从附近百姓家租借，收入颇为可观；张巽继任后，改变耿望的经营方法，把土地分给招募来的水户耕种；景德中许逖继任后，又杂以兵夫，水户和兵夫都不以农为生，不善耕种，收成越来越差了。仁宗天圣四年（1026），曾命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前往调查，回来后说："自景德以来，襄州屯营田收获粮食总数为三十三万多石，折钱九万多缗；唐州总数为六万多石，折钱二万多缗。花费包括官兵俸廪，官牛用度等杂费，襄州共十三万多缗，唐州四万多缗，入不敷出。"朝廷只好下令停办，将屯营土地分给贫民耕种，每顷只收常税的一半。

仁宗时，陕西不断与西夏作战，朝廷开支浩大，命转运司选择空地经办营田，帮助解决经费的困难。又将同州沙苑监的牧场改作营田。永兴军（治所办今陕西长安）知军范雍以营田为理由，强制调发诸郡百姓的耕牛，搞得鸡犬不宁。朝廷怕引起民变，不久便下令停止营田。右正言田况奏请说："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原州（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方圆数百里，以往都是民田。如今久已荒芜。可在这里兴办营田，用保捷兵中不能打仗的士兵耕种。五百人编为一堡，每三堡或二堡设置一名营田官管理，按时播种，农闲时则练习武事。"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朝廷派户部副使夏安期等商议在今山西北部边境屯田，也无结果。

英宗治平三年（1066）时，河北屯田共三百六十七顷，每岁收谷三万五千石。神宗熙宁初期（1068）委任内侍押班李若遇为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熙宁三年（1070）秦凤经略司吏王韶上疏说："自渭源城（在今甘肃境）以下直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沿黄河五六百里间，荒芜的良田足有上万顷。只耕十分之一，每

年就有三十万斛的收成，望朝廷设立市易司，以商业赢利经治营田。”神宗提升他为著作佐郎，负责办理此事。知秦州李师中论奏说：“王韶所说都是招募弓箭手时拨出的有主土地，若兴办营田，必有一番争执。况且在西北极边地区搞市易司，恐怕秦州从此就更加多事了。”市易司为王安石新法的内容之一，与营田事搅在一起，便使营田带上了政治色彩。王安石支持王韶，将李师中贬官后改任知舒州。以窦舜卿代其任，另派李若愚调查此事。李若愚到秦州后询问王韶，他以前所说的荒地在什么地方？王韶回答不出。李若愚又亲自查勘，自渭源到秦州发现闲田总共只一顷零四十三亩。后来有人告发说，那也是有主土地，只好归还地主。若愚如实上奏，说王韶欺骗朝廷。王安石又将李若愚贬官，改派韩缜继续调查。当此情势，韩缜便是一只呆鸟，也该知道应怎样去“调查”了。果然，他的“调查”结果说，那里的确有古渭砦未曾拨给弓箭手的空地四千多顷，请按王韶的建议措办营田。搞营田竟然闹不清楚有无土地，也算是一件奇事。

熙宁四年，河北屯田司奏称：“丰年时，屯田收获的粮食倘不能抵偿花费的钱财。”于是下令，撤销沿边地区的水陆屯田务，土地出租给百姓耕种，屯田的士兵收归州郡厢兵。其实陕西有许多闲旷土地没有耕种，屯田既废，戍兵又不可撤，军需从内地运至，对朝廷是个很大负担。延州知州赵卨奏请招募百姓耕种，以减轻朝廷负担。朝廷命大臣讨论，又回到了王韶那种局面中。经略安抚使郭逵道：“延州境内只怀宁砦（今陕西清涧）新得地百里，已用来募弓箭手，别无闲田。”幸好赵卨是当地地方官，一再奏请，已检括出闲田一万五千多顷。用这些土地招募得番汉兵五千多人，划分为八个指挥，各设指挥使管领。朝廷为此重赏了赵卨。熙州王韶又如法炮制。但他们搞的都不是屯田，是以土地为报酬，招募士兵，士兵编为指挥，指挥只管军事，与屯田兵的屯田务完全不同。

熙宁七年时，才委派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在熙河路（今甘肃西南部临洮、临夏、临潭、岷县、陇西地区）兴办屯田，准许其奏置属官。而枢密使吴充上疏说："如今搞屯田，经验证明，难以成功。不如搞助田法。古时一夫给田百亩，为私田。另加十亩为公田。私田所收归私人，公田所收归政府。必先耕公田，后治私田，称为助田法。今授给弓箭手土地可仿照此法，私田之外另给公田。熙河路四州土地不下一万五千顷，取十分之一为公田，约有一千五百顷。按中等年成亩收一石计算，每年所得约十五万石。官府不须任何费用，即使遇到大灾荒年景，颗粒不收，官府也无损失。"提点刑狱郑民宪认为，屯营田之所以不成功，是由于执行中有许多弊病。如厢军不善耕种，不熟水土，有的还强占民田，强借民力和百姓耕牛。不但收成不好，得不偿失，而且扰民。因而也认为不如推行助田法。但又认为弓箭手应募而来，原无家业，种子和口粮都无法自给。再要他们种植公田，会造成人心摇动。应过些时日，弓箭手有了积蓄，日子稍宽裕了再加推行。他既如此说，大约这次营田也是不了了之了。熙宁九年，命熙河路弓箭手耕种剩余的土地，由经略安抚司点集厢军佃种，官给耕牛、种子和农具，每人一顷，岁终根据弓箭手所种土地收获的状况，决定对承佃厢军的赏罚，超过弓箭手土地收获量的赏，不及者罚，营田佃租就近在本城砦缴纳，免除支移、折变等杂征。

元丰二年（1079）时，将定州屯田司改为水利司。熙宁中，章惇筑沅州城，也建立了屯田务。这时也一并废除，改为召民佃种。元丰五年，命提举熙河路弓箭手司、营田司、蕃部司合并为一司，其余陕西诸路也都一并办理，合并后隶属于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奏请："陕西新收复的土地，请朝廷派官丈量划界，选取通晓农事的厢军，每人授给一顷。其余给弓箭手耕种，每人增给一顷，有马的再加五十亩。每五十顷编为一营。

厢军不足者，可从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取。一厢兵及马递铺兵愿受田者每人发给装钱① 二千。”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同时又有太原知府吕惠卿给朝廷上了一道《营田疏》，说：“葭芦（今陕西佳县）、米脂一带，良田不下一二万顷，西夏人称为真珠山、七宝山，就是由于富产粟米。以前不敢耕垦的原因是守卫薄弱，害怕西夏人前来抢夺。如今若在葭芦、米脂各修一砦，驻守重兵。其间120里修筑许多小堡，各有铺兵守望，彼此相通。那么，延州的义合（今陕西绥德）、白草（在义合附近），以及石州（今山西离石）的吴堡（今陕西境，离石西）、克明以南诸城砦，都变成了内地，河外的荒闲土地都能耕垦了。其他为夏人所侵，弃而不耕的土地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重新垦辟。”元丰七年，吕惠卿雇用陕北五县耕牛，调发西北将兵，按照他设计的上述方法，开垦葭芦、吴堡间的肥田沃土，号为木瓜原的地区，得地五百多顷。又有麟府丰州（今陕西府谷北）的土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百姓无力耕垦以及宋夏接境两不耕的土地九百六十顷。吕惠卿以为效果很好，请求朝廷在陕西推广。枢密院却不以为然，替他算了一笔细帐说：“去年耕垦木瓜原，用将兵一万八千余人，马二千多匹，费钱七千多缗，谷近九千石，干粮近九万斤，草一万四千多束。又有保甲守御费：钱一千三百缗，米三千二百石。役使耕民一千五百人，雇用牛一千具。而收获的禾、粟和荞麦总计一万八千石，草十万束。总之是入不抵出。此外，借转运司的钱谷作种子，至今尚未偿还。考虑到经略司来年仍要耕种，请朝廷早加约束。”朝廷诏命吕惠卿不可再搞下去了。其实，是朝廷虑事不明，枢密院胆小怕事，吕惠卿的办法是成功的。不搞屯田，将兵人马还不是照样吃喝花费？搞了屯田，便要这些花费全由屯田的收入中支出，不足便是得不偿失，哪有这种道理？

---

① 装钱：即行装钱，为制备行装所用。就是今天所说的搬家费。

南宋渡江以后，国土小了一半，各项支出却有增无已。尤其高宗时，战事频繁，军需更是朝廷的一项大事。绍兴元年(1131)朝廷漂泊未定，就着手经办屯营田。先命荆南知府解潜推荐的宗纲、樊宾二人专门管理此事，以宗纲为荆南府镇抚使司措置五州① 营田官，樊宾为副职。此后荆州地区的军食，一半是由营田供给的。绍兴三年，镇抚使陈规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复州（今湖北沔阳西)、汉阳军（今湖北汉阳）一带，参照古屯田法兴办屯田，凡军士一律是有守有耕，耕作所需费用一律官给，收获全部入官，按数发给口粮。百姓水田征赋每亩粳米一斗，旱田征豆麦。夏秋各征五升。二年内不拖欠田赋的，将所耕地授为永业田。兵民分别居处，不使杂居。流民复业者也设堡立寨，使相聚屯田。屯田事由营田司兼管，营田事由府县官兼领。朝廷又将陈规的这套办法改进后加以推广，大要是每丁受田百亩，五丁编为一甲，另授蔬田五亩，作为营建宅舍，种植蔬果所用。缺牛者，由人代耕，二人拉一犁。兵屯由大使臣以上官管理，民屯由县令兼管。每年以收获多少作为考核他们政绩的标准。

又命江东西路宣抚使韩世忠筹办建康营田事，可仿照北宋的陕西弓箭手受田的方法办理。韩世忠上疏奏道："沿江一带荒田虽多，大多是有主之田，很难按陕西弓箭手授田法执行。请朝廷准许实行募民承佃法。"都督府也认为募民承佃法可行。于是定制：承佃者三年之内免租，五年以上无田主认领者，土地给现佃者为永业。承佃者免徭役和科配。湖南、浙西、江西都按此法办理。

绍兴五年，命在淮南、川陕、荆襄一带屯田。第二年，都督

① 荆南府五州：指江陵郡（今湖北江陵县)、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荆门军（今湖北当阳)、公安军（今湖北公安)。

张浚奏请改江淮一带的屯田为营田。营田法是：不论官田或者逃田，全都登记造册，每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承佃者每五家为一保，立保长，每保共佃一庄田。官给牛五具，以及相应数量的家具和种子。另给十亩地为菜地园圃。贷给钱70缗，分五年偿还。命樊宾、王弗为具体负责人。不久，又命五大帅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以及在江淮、荆襄、利路等地任职的其他帅臣都兼任营田使。起初，提升樊宾为司农少卿，仍任提举江淮营田职，为他在建康设立了营田司；王弗升为屯田员外郎，仍作樊宾的副职。由官府提供耕牛和种子，招募流亡、逃移的人口，大搞营田。一年之间，收谷三十多万石。但是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岳李寀等人都上疏论述这等搞法的害处，集中一点就是扰民。张浚因请求撤销营田司，由各路监司①兼领营田事。这才有命帅臣兼领营田的事发生。九月，因川陕宣抚使吴玠修筑废堰，建营田六十庄，治田八百五十四顷，每年收谷二十五万石，减轻了国家供应军粮的负担，特颁诏书嘉奖。绍兴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向朝廷建议说："荆、湖二支大军驻守襄汉，粮饷数目浩大，供应为难。襄阳地区原有二条灌渠：长渠可灌溉农田七千顷，木渠灌溉三千顷，建炎（1127—1130）以来，由于兵荒马乱，逐渐堙塞了。如今可将这两条水渠重加疏浚，招募边民和老弱士卒耕垦沿渠荒地，官给耕牛、种子和农具，由河北、京西转运司操办。既可减少政府对军粮的供应，又起了安置流亡人口的作用。"朝廷批准了这项建议。

孝宗隆兴元年（1163），大臣有人总结州县营田成败的关键，

---

① 监司：宋制每路设立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都有监察地方官员责，因称监司。

共有十项：择官必精、募人必广、灌渠必深、乡亭[1]必修、家具必备、土地必肥、食用必充、耕具必足、赋税必轻、赏罚必行。朝廷还要为招募人口营田设立赏格，并停止广西的马纲[2]三年，改为买牛。恰巧此时有人向朝廷反映襄阳屯田扰民的状况，孝宗又打算废除屯田。工部尚书张阐上奏说："荆襄屯田的害处在于当地无有耕田之民，招募一些游民前往耕屯。数目仍然不足，便强制百姓舍弃自家原有熟田，去耕垦官府的生田，或者从数百里外驱赶百姓前来代耕。还有的搞所谓'双丁抽一'，家有二丁就要强制抽一丁屯田。甚至以双丁为名，将强壮者抽走，家中留下老弱无人抚养，以致搞得人怨沸腾，人心骚动。废除屯田的确是英明之举。但是，自去年以来为荆襄屯田朝廷已花费了十多万钱，包括置备耕牛、农具、疏浚长、木二渠等，一旦废弃，荆襄土地仍无法耕种，实在可惜。臣见从两淮逃难来的百姓，动以数万计，官府无力收容，老弱者饥饿而死，强壮者又转走他方。不如使这些人到荆襄去耕垦，不仅使他们免于流离，而且，中原百姓知道朝廷有力量收容他们，必然扶老携幼前来归顺朝廷。"于是朝廷命虞允文、王珏二人经办此事。

隆兴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奏请：在淮河流域，选择荒废的官田，标旗立砦，使无籍百姓任意耕种，官府代为购买耕牛、农具，不收租税。数年以后，垦地必多，粮价必贱。又到处有村砦，既可防止盗贼奔，又可免除运送军食之劳。实是守淮的良策。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

屯营田的土地都是官田。南宋自高宗起由于战争，军费开支

---

① 乡亭：乡村基层组织，如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之类，宋为乡里制，乡下为里，亭当吏在里下。

② 马纲：官设买马的机构，买得的马匹，要编纲运送到指定地区，因称马纲。编纲运送，就是分批运送的意思，一批称一纲。

很大，大臣们想出一项绝妙的生财之道，就是出卖官田。官田出卖后，仅仅田主的名字换一换，官府照样可以收税。由于田税比田租略低，有租官田出卖后，田租收入略有损失。但是官田有许多原来就是没有租税的新垦田，卖给私人后反而可以收税。更何况数额比租金大得多的地价钱可救朝廷的燃眉之急，所以执行颇为卖力。屯营的土地是被卖官田中的大宗。乾道二年时，户部侍郎曾怀奏请出卖江西路营田。四年四月，又命江东路减价出卖，而且限定三个月内卖完。直到这年的八月，才下令停卖。改办官庄，召人佃种，但没真正执行。九年，命司农丞叶翥出卖浙东西路官田。登闻检院张孝贲出卖江东西路官田。淳熙六年（1179）下令，诸路转运司，常平司负责将本路所有的没官田、营田，以至沙田、芦荡，全都立价出卖。光宗绍熙四年（1193），由于臣僚反对，一度暂停出卖。宁宗即位后，重又开卖。这对屯营田事自然有很大影响。孝宗以后，一般不能长期屯营，土地既垦，不久便即出卖，或召人承佃。

南宋屯营田不能持久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营不善。淳熙十年时，副都统制郭杲曾上疏说："襄阳屯田搞了二十多年，无大益处。并非因为土地不肥沃，而是人力有所未尽的缘故。""人力未尽"实际是指经营管理不善，不便明言罢了。余玠守蜀，修筑褒城堰灌溉，治为屯田，百姓并不以为有大利。后漕臣郭大中改由百姓自己耕种，官收其租，每年的收入反而比屯田时多。

总之，宋代屯营田主要起到了固定人口、垦辟荒地，从而巩固边防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政府军费负担。南北宋相比，南宋搞得好一些，首先由于二个时期的政府官员对屯营田所持观念不同：北宋时尤其初期，武将以屯营田为耻，文臣要员也不愿亲理此事；南宋时由于是军需所出，大将都兼营田事，宰相如张浚等也都亲自督理。其次，南宋营田税轻。北宋一般是三分取一，南宋每亩一斗，是古时的什一之税。再其次，由于南宋的

战争环境，能提供较多的人力，屯营田的数目比北宋多，分布也更广泛。最后一点是南宋出卖官田的结果，使屯营土地与私田之间的转换更为频繁，管理方面的弊病造成的恶果小一些，屯营田的效果也就好一些。

说到管理的弊病，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主管官贪功喜事，因而滥用职权、不择手段、弄虚作假；二是不负责任。这是官营企业的通病。其次，还应注意到屯营田与个体所有制相矛盾，两者必互相影响。屯田借助政府权力侵犯个体所有制下的农户，个体所有制也在观念等方面影响屯田，使它效率低下，以致难以维持。南宋时，由于战争和卖官田的政策加速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使相互影响更为深刻。南宋屯营田的方式，主要是招佃收租，与北宋屯营置务的形式已不大相同。而与个体所有的形式更为相近。北宋神宗时吴充倡行助田，也是寻求国有屯田向个体所有转化形式的表现，不幸没有实现。虽然实现后未必有大效果，但它毕竟是寻求转化的尝试。连尝试也没有实现，终北宋一代，屯、营田自不会有大进展了。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食货志》、《张齐贤传》、《陈恕传》、《何承矩传》、《王韶传》等。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营屯议》

至道建储

这一段讲的是宋太宗立皇太子的事。

《涪王之狱》一段曾经说宋太宗即位后，将他即位前的官职封给弟涪王廷美，又将廷美原官封给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德昭，而将德昭原官封给德昭弟德芳，造成一种“兄终弟及”的假相，以塞众人之口。其实太祖和太宗都是要传位于自己儿子的。不过太祖暴死，没能来得及，不必说了；太宗传子，情理不顺办起来就颇费周折。

苏辙《龙川别志》有段记载说：“楚王元佐是太宗的长子，太宗要立他为继嗣（就是皇太子），元佐坚执不肯，请求立太祖之子。因此被废黜。当时人们说他被废是由于有狂病，实际不是那么回事[①]。”乍看起来，这段话有些毛病：正史记载元佐被废是在雍熙二年（985）九月，而太祖长子德昭死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八月，次子德芳死于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元佐被废时，太祖已经无子，如何会有请立太祖子的事发生？所以有的史家不相信这条记载。可是，不妨反转来问：苏辙于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此后屡为文字官（如著作佐郎、校书郎、翰林学士之类），多与文书档案打交道。为何会有这般荒谬的记载？其实是后人错会了那段话的意思。它的原意是说，元佐被废，并

① 这一段是译文，原文见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非由于患了狂症，而是由于当初主张立太祖的后人，失了太宗的欢心，后来以病为由，把他废掉了。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元佐病狂时好时歹，太宗正当壮年[1]，诸子年幼[2]，立嗣的事不是刻不容缓，放弃对元佐的治疗，毫无道理。那么，这条史料反映出太宗立子的打算是产生于德昭兄弟死掉以前的初即帝位时期。既如此，以后发生的德昭横死，涪王冤狱以及太宗对建储的事讳莫如深等事，就都不难理解了。下边就说一说太宗建储的经过。

雍熙元年（984）正月，廷美死于房州，太宗兄弟及太祖诸子都已不在人世，皇位的继承人顺理成章该当落在太宗诸子身上了。

夏四月，泰山地区的一群乡绅，自称"泰山父老"，共一千多人来到京都，请求太宗行封禅大礼。事隔二天，群臣也联合上表章，请求于当年十一月封禅，太宗欣然应允。自古功成德洽而后封泰山，什么叫"功成德洽"？就是天下太平，天子心中再无大事牵挂于心了。太宗此时幽燕未复，刚刚在幽州城下吃了败仗，怎能说无事牵挂？必有比幽蓟未复更为重要的事得到了妥善解决，太宗心中以为天下已不足虑，包括幽燕未复这样的事也已算不得什么了。这是什么事呢？雍熙元年时，这样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廷美死后，皇位继承问题已不再是个难题。可见，廷美死后太宗心境是如何欢畅。

但是，太宗对于皇位继承的事向来谨慎，这样得意忘形未免太露形迹。当年五月，雷击乾元、文明二殿，太宗以此为由宣布停止封禅大礼。

十月，华山隐士陈抟来京城朝见皇帝。宗教借政治而发展，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凡名僧道士，大都与朝廷相往还。这个

---

① 雍熙二年废元佐时，太宗 47（虚）岁，止是俗所谓的虎狼之年。

② 元佐被废时 19，太宗九子，元佐居长。

陈抟每到关键时刻，就必有他的形迹出现。太宗初即位时他曾奉诏入京，那时太宗需要他，他也需要太宗；是什么原因使他又重新入见？史书说：陈抟自言，“庆幸天下太平，所以前来朝觐。”为什么说这时天下才太平？真实原因必不如此。以情理推测，该当与继嗣的事有关。魏泰《东轩笔录》记述说，太宗曾使陈抟遍相诸子，帮助他选择继承人。虽不一定是这时事，陈抟料到他以后有对此事发言的机会，先来朝廷探访一些迹象，也是可能的。

雍熙二年九月，太宗长子楚王元佐被废为庶人，史书记载被废原因是：涪王廷美获罪以后，大臣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只有元佐极力表白廷美无罪。太宗不听，元佐一直郁愤不平。后来听说廷美死于房州这种蛮荒偏远的地方，悲痛愤激，得了狂病。朝会时常常缺席，在王宫中多行不法事，身边人吏稍有过失，必亲手杀害，仆从人等从院中经过，往往弯弓射死。无论太宗怎样喝斥，总不肯改。这一年夏秋二季，病得更为厉害。入九月以后，病势转轻。太宗十分“高兴”，向全国发布了消息，让普天同庆。九月九日（庚戌）重阳节，太宗举行家宴，将几个儿子召到一起，饮酒射壶取乐，直到天黑方散。说是由于元佐大病新愈，没有让他参加。陈王元佑宴后回府，从楚王宫前经过，元佐才知自己遭了冷落，对陈王说道：“你们与至尊一起宴射，不要我参加，明明是君父不要我这个儿子了。我活着还有何益？”回宫后越想越是气愤，狂病便又发作了。恨声说道：要死大家一起死是了。于是将宫中媵妻一起锁在房中，放上一把火，直烧了个满天通红，一宵未止。太宗心知这场大火必是元佐所为，遣人将他押赴中书，派御史审问，将大刑的刑具往他面前一摔，不用怎样恐吓，元佐就一五一十地招认了。太宗遣人内都知王仁睿来对他说：“你身为亲王，富贵已到了极点，竟然不知珍惜，如此穷凶极恶，杀人放火。我还怎能庇护得了你？家有家法，国有国章，只能照章行事，你我父子之情从此断绝。”元佐竟是一言不发。

陈王元佑以下，至于宰相近臣都痛哭流涕，极力营救。太宗也流泪说道："朕平日读书，每见前代帝王子孙不遵教诲，行凶作恶，时常扼腕长叹，止不住心中气愤。谁知如今我自己家里也有了这样的事！朕为国家大计，断然不能轻饶。"于是，颁下制书，将元佐废为庶人，发配到均州（今湖北均县）居住。庶人，就是普通百姓，从此元佐就是一介百姓，不再是王子王孙了。太宗对宰相说道："如今天下无事，内外安宁，本想享几天福。哪知出了元佐这当子事，竟然在宫中纵火，实在令我痛心。"宰相宋琪说道："尧舜圣帝，也不免有丹朱、商均这样的不肖子。元佐与陛下圣德，毫无牵累。况且，元佐是因为有病，不是故意做这些事，希望陛下原谅他。"十六日（丁巳），宋琪率领百官，一齐在殿阁前跪倒，向太宗呈上表章，请求将元佐留在京城。太宗不许。百官连上三表，他才答应下来，元佐已北行到了黄山。当时自京都赴均州有两条路可行，一是沿汴河南下，入淮、入江，再逆江、汉而上，到均州。这条路较远。一条是北行入黄河向西，到关中后沿商洛道到均州。黄山在河南汲县西北，宋代黄河正从汲县北流过，元佐所行当是后一条道。太宗圣旨追到黄山，把他召回，安置在南宫居住，派内使臣监护，完全与外界隔绝。原楚王府的官佐们，如王府谘议赵齐、王遹，翊善戴元等，都因辅导不善，请求治罪。太宗道："朕亲自教训，尚不听从，何况你们。"全都赦免不问。太宗心中雪亮，元佐发病乱行，是不能用礼教约束的，他如此煞有介事的什么国法、家法，训诫一通，真正原因只有他和元佐明白。

太宗共有九个儿子，长子元佐获罪后，继承人的身份该落到次子元佑身上。不过佑与佐字相对，终觉有些不祥。雍熙三年七月，命陈王元佑改名元僖。为了不将事情做得太过露骨，连带将三子韩王元休改名元侃，四子冀王元俊改名为元份。十月九日（甲辰），便任命陈王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确定了他继嗣的地

位。又命户部郎中张去华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太宗亲自召见张、陈二人，说道："卿等是朝中行为端方之士，才命你们做陈王佐官。官职虽小，责任却重。希望你们好好辅佐我这个儿子，朕定不亏待你们。"每人赐给钱百万。后来，张去华已升任为左谏议大夫，仍兼任开封府判官。左谏议大夫是从四品官，开封府判官只是个从六品的职务，看似"大材小用"了。为此太宗特命枢密院官王显转告张去华；要他仍做判官的用意在于使陈王道德有成，是皇上对他的特殊信任，是"大用"而非小用。

开封尹是太宗即位前所受职务，即位后曾转授给秦王廷美。谁都明白，这是"衣钵相传"的意思。如今又转授给陈王，自是表示陈王的继嗣地位已定。哪知竟有奇事发生，淳化年间(990—994）又有人上书，请求皇上早立皇太子。接着度支判官左正言冯拯、尹黄裳，右正言王世则、宋沆，右拾遗洪湛五个言官，伏阁上疏请立陈王元僖为皇太子。"伏阁"是大臣向皇帝提建议的一种方式，跪在阁前，立等答复，不答复就长跪不起。不是特别重要的事不会采取这种方式。立太子算是国家大事，太宗即位已近二十年，此事早该办理。可是谁都知道，开封尹与皇太子的意义相同，陈王既为开封尹，此事已经解决，为何又这般闹腾一番？太宗大怒，将这些人全都贬官，赶出朝廷，改任到岭南做官：冯拯知端州（今广东高要），尹黄裳知邕州（今广西南宁），王世则知蒙州（今广西蒙山），宋沆知靖州（今湖南靖县），洪湛知容州（今广西容县）。回到宫中，太宗仍气愤不止。皇后问起，太宗说了，皇后也觉是一帮狂人，小题大做。内侍王继恩在旁，欲言又止。这王继恩对太宗继位的事立了大功（参见本书《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篇），太宗视为心腹，问他有何话说？王继恩道："以奴才看，这冯拯等人是一番好意。"太宗惊奇道："这话怎讲？"王继恩道："自从涪王获罪，奴才风闻朝中有那么

一帮爱嚼舌根的小人，说涪王本无罪。皇上初封涪王为开封尹，是要传位涪王，后来变卦，要传位于皇子，才给涪王捏造个罪名。其实，这都是胡说，皇上即位是太后所命，太祖亲许。涪王即位，那个许给他了？如今封陈王为皇太子，再搞得热热闹闹的，好叫从人得知：开封尹就是开封尹，皇太子才是继承人。涪王得罪是罪有应得，与皇位继承的事无关。"太宗听了，不住点头，暗道：好一个王继恩，看不出心里还真有点儿道道，以后不妨交给他些大事去办。却是不露声色，把脸一板道："涪王的事你是听谁所说，为何不早禀报？"王继恩吓得浑身抖颤，噗嗵跪倒，连声说道："奴才该死，该死！……奴才先曾打听来着，后来没有结果。再者，奴才想，即便打听出来，皇上重重治他的罪，虽能解了心头气愤，却把他们那些混帐话也张扬出去了。比较起来，还是大事化小，不闻不问，装痴作聋的好。所以就没敢惊动圣驾。"王继恩边说边偷觑太宗脸色，他深知这个皇帝自负、好名、喜欢奉承，又加一句道："奴才又想，这种事皇上说不定早就知道了，如今不动声色，自有一番计较。奴才愚鲁，过一阵子，就把这事忘了。"太宗莞尔笑道："这种事不用你说，朕也能推想出来。不过以后还是要及时禀报，不论朕知与不知。站起来吧。"王继恩道了谢，重在一旁站了。皇后道："这样说冯拯等人倒是有功无过，快传旨把他们召回京来吧。"太宗沉吟不语，回头对王继恩道："你以为如何？"王继恩躬身道："奴才不敢。"太宗道："但说不妨，说错了朕不怪你就是。"王继恩道："谢皇上。……奴才想，贬就贬了。皇上处分三五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还用得着朝令夕改？叫人笑话。况且是功是过，本就难说。说是功呢，他们为皇上想了个好主意，可以冲淡一些人对治涪王罪的不满；说是过呢，他们也真的并非全无过错。立皇储这是多大的事，皇上自有圣断，他们竟敢说三道四，淆乱朝纲，处罚再重也不为过。"太宗笑道："这倒说得是，不过，功就是功，罪就是

罪。如你所说，岂不是‘嘴是两张皮，怎说怎有理’了吗？那还成什么话?”王继恩连忙叩头道：“皇上圣德，奴才不及。”

数日后，太宗对近臣说道：“近来屡有人上书请求立皇太子。朕好歹也读过几本书，对于前代治乱的原因有些了解，知道这是关乎天下安危的大事。怎能不放在心上？只是近代以来，人心不古。若立太子，宫僚对太子都要称臣，太子府内设官等次，也与朝廷相同。一些奔兢之徒必在中间播弄是非，徒然惹得人心混乱。再加上太子年幼，还没有成人之性，更容易出事。其实立谁为太子，朕心中早已决定，为他选择最有德行的人为属官，包括他使用的仆从走隶，都仔细拣选过，不让奸险、佞恶的小人在他身旁。平日安排他读书听讲，都有一定课程。待他长大，朕自有妥善安排。言事者为什么不能体谅朕的这番苦心呢?”近臣对于请建太子的人，自然又骂了一通，说他们狂妄，自作聪明等等。此事就算掩饰过去了。

淳化三年七月，赵普死，而且死得阴森可怖（参见本书《涪王之狱》篇）。说是他屈杀涪王，涪王冤魂找他讨命，赵普情愿与他到阴间对质，不几天就死去了。他有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赵普死后，一定要出家为尼，太宗再三劝慰，执意不听。只好由着她们。出家后，太宗亲自替她们拟了名号：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将门之女，双双为尼，对此已是人言藉藉，说是涪王廷美死得冤屈，赵普虽死，难免在阴司受苦，二女为与老父念佛消灾，才立志出家等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十一月，开封尹元僖早朝，见天色尚早，宫门未开，照例先在宫门外的待漏院安坐等候。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先还忍耐，渐觉不可，吩咐随从一起回王府，一面命人报告皇帝，今日早朝是不能参加了。太宗早朝罢，没有还宫，急忙到元僖府中看望，见他昏昏沉沉躺在床上。向太医询问病情，太医只是摇头。太宗扑到床前，大声呼唤。元僖睁开眼

来，轻声答应。太宗见状，以为定然有救，吩咐去太医院把最好的御医唤来。御医来时，一摸腕脉，才知人已死去多时了。太宗悲痛欲绝，扶尸大哭。左右人等也只好跪在地上，一起痛哭。听皇上边哭边数落道："长子已疯，次子又暴亡，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孽，让我遭如此报应。天呀！有报应落在我一人身上是了，不要再作践我的儿子了。"身旁亲随有人见他在德昭自杀时就是这样边哭边数落；廷美死，又是这样边哭边数落。不过前两次都是数落死者如何不应该，哭声虽响，却不感人。这次是怨老天不该了，仿佛真的受了老天的委屈，哭声极是凄惨。爱饶舌者不免背后又说元僖是被涪王或德昭勾了魂去。太宗虽有耳闻，记得王继恩的话，要大事化小，只好装作不知。心想，皇太子不立，人心终是不定，涪王的事就难免有人议论。

淳化五年九月，有隐士王得一辞官而去。他原是个算学家。古时算与卜是相连的，善卜是件大本事，最易扬名。太宗把他从隐居处召人朝廷，官封崇议副使。可他不愿为官，坚请还山。太宗只好应允，临行与太宗长谈。太宗询问后事，王得一劝他立襄王元侃为皇太子，太宗点头称是。

不几日，寇准自青州回朝。这寇准刚正敢言，胸有丘壑，最受太宗赏识。十九岁举进士，三十一岁就提拔他做了参政。后曾因事贬官知青州，太宗心中时常念着他，终于又把他召回京都。当时太宗脚上生疮，寇准人见，太宗命他坐了，说道："朕不能起身，卿莫要嫌我简慢。"说了卷起裤脚给寇准看疮。寇准逊谢一番。太宗埋怨道："自你离开京都，我是无时无刻不念着你。有人说你在青州过得很自在，并不想念于朕。看来不假，否则为何至今才来看我?"寇准连忙叩头道："只因臣尽心国事，得罪人不少，那是恨臣不死的人有意说臣的坏话，万岁断不会相信。臣虽时常想念陛下，身为贬官，怎敢私自人京?"宋朝的制度是，外官非朝廷召见，不可擅自人京。太宗思念寇准心切，竟忘了这

条规矩，口中却不认错道："许久不见，卿还是这般精明，知道我不会相信。"寇准道："陛下待臣，有天高地厚之恩，臣死生不忘。更何况陛下圣明，岂以谗言为意？如今已把臣重召回京，就是谗言不灵的明证。"太宗哈哈笑道："你倒是诡谲得很，朕若不召你回京，就是听信谗言的昏君了？"寇准连忙叩头道："臣不敢。"太宗道："朕与你说笑，莫要认真，快快起来，我还有事问你。"寇准起身，仍一旁坐了。太宗续道："你既知朕对你一向信赖，朕有话问你，就当如实回答，不可躲闪。"寇准道："陛下说得是，臣虽肝脑涂地，难报陛下知遇之恩，决不畏祸躲闪。"太宗道："好，我来问你，我几个儿子之中，依你看，谁作继子最为合适？"

寇准虽然年轻，却不糊涂。知道太宗继位以来对继嗣的事最为敏感，从上到下，无人敢提一字。冯拯等人上书只是请求早立皇太子，便被贬官到岭南。如今虽是他主动来问，谁知他心中想的是什么？说得对了，闹不好会落个邀功固位，说错了就有杀头的危险，刚才虽然说了不畏祸躲闪，互相敷衍罢了。皇帝说过的话向来不作数，德昭、廷美还不是一个个杀了。做臣子的也不可太拘泥了，事当从权。于是说道："陛下选择继嗣，是为天下择君，这是何等大事，与妇女、宦官商议不妥当，与亲近大臣商议也不妥当，只应由陛下亲自选取能负天下希望的人。"这话很是乖巧，明知太宗多疑，不会轻易听信人言，自己是决不发表意见了。同时也断绝了他与别人商议的路子，免得以后搞出权臣专权，后妃或宦官专权什么的。要皇帝自己决断，自己又不肯苟同，随便皇帝选个什么人出来，都山呼万岁。所以，明确提出一定要选出能满足天下愿望的人出来，否则那后果就不必说了。在这样的局面下，要天子自己选择继嗣，任何人，包括奸臣大恶都能说得出来，加上后面这个尾巴却只有寇准才能说得出。太宗听了，低头想了很久，将左右侍候的人等屏退了，又低声问道：

“卿看襄王怎样?”寇准道：“知子莫若父，皇上既以为可，但愿立即决定下来。”太宗已知寇准打定主意，不置可否，把一切都推在自己身上。如今说出“愿立即决定下来”几个字，便是同意了。就不再言。当即拟旨，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数日后，又诏命寿州为大国，位次在晋国之下，燕国之上。晋国是太宗即位前的封地，理不可超越；燕国是太祖妹曾嫁高怀德的秦国大长公主的封地，于寿王是姑母行，一般不应超越。既命在燕国之上，储君的地位算是确定了。

至道元年（995）八月十八日（壬辰），颁下制书，以开封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太宗曾向近臣解释，不立皇太子是由于诸子年幼，待其长大，自有安排。元僖死时二十七岁，尚未封皇太子，当然是“没有长大”了。而元侃此时也恰恰二十七岁，不知为何，却算是长大了？好在皇帝们的话无人敢斤斤计较。

自唐天祐（904）以后，由于局势动乱，中国就没再举行过立皇太子的仪式，到至道元年已经将近百年了。上上下下当作一件大事，都为立皇太子的事奔忙。尤其京城百姓，元侃走到哪里都有百姓围观，自然各种夸奖的话如潮水一般，有的说：“好一个少年天子!”有的说：“果然是龙子龙孙，与普通百姓子弟不同。”有的说：“看面相倒善良，只怕百姓有好日子过了。”百姓本来是最爱做梦的，说些梦话倒也罢了，太宗听在心里又不舒服起来。连日愁眉不展，情绪低沉。实在忍无可忍了，找寇准陪他喝起闷酒来。寇准不知内情，不敢多问，心道：你既把我找来，总会对我说点儿什么。若不想说，问也白饶。索兴便不张口。太宗果然忍不住，埋怨道：“寇老醯（xi 希）子呀，你把我坑苦了。”醯就是醋，寇准是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太宗心情不好，连“爱卿”也不叫了，直接以陕西老醋相称。寇准初时惊呆了，听他又絮叨道：“你让我立襄王元侃为太子，如今可

好了，人人都在谈论皇太子，天下仿佛就只有皇太子一人，还有谁把我这天子瞧在眼里了。”寇准这才明白，他是在吃太子的醋。心中暗笑，只好安慰道：“陛下选择继嗣，是为天下择君，为大宋社稷择主。人心归向太子，正说明陛下选择得人，是天下苍生的福气。水大漫不过船去。太子声望越高，越可见陛下圣明。陛下该当高兴才是，为臣向陛下道喜了。”太宗听了才转愁为喜。急忙人宫，向后妃等人说了：自己如何选择得人，太子如何深得人心等等。皇后以下六宫妃嫔齐来道贺。太宗才乐滋滋地出宫，重新与寇准饮酒，直喝得酩酊大醉而罢。

几天以后，任命翰林承旨宋白为册封皇太子礼仪使，规定皇太子与宫僚的关系，与朝廷关系等，都按唐代开元年间的成例执行。

至道三年二月，太宗身体欠安，不能上朝，只在便殿处理日常政务。

再说内侍王继恩，这时已官封宣政使，对于元侃为皇太子颇不以为然。史书说是因为忌元侃太过聪明。可是当初他择立太宗，不肯按皇后意旨召见德芳（参见《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篇），太宗比德芳聪明得多，何独忌恨元侃的聪明？看来是另有内情。且不论什么原因吧，总之是他不喜元侃，就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共同谋划，欲立楚王元佐为继嗣。宫廷内元侃的生母李贤妃早已去世，明德皇后李氏主持内廷事务，她也是支持元佐的。

三月，太宗死于万岁殿。太后命王继恩，召见宰相吕端，商议新皇帝的人选。吕端随王继恩匆匆向宫中而来，尚未走出家门，忽然对王继恩道：“皇帝曾赐给我墨诏一道，其中有关于立皇子的嘱托，放在书阁中。你稍等片刻，我去取来。”王继恩怕墨诏中有对立元佐不利的话，以致生出枝节，自己该先过目。连忙说道：“相爷老迈，腿脚没有下官灵便，这跑路的事还是由下

官代劳吧。但不知相爷能不能信得我过?”吕端呵呵笑道:“王内使这话就见外了,中书省哪一件御书不是内使差部下送来的?我那书阁你是常去的。墨诏就放在案头书筐之中,有劳内使走一趟吧。”王继恩高高兴兴答应了。转身向书阁而去。在案头书筐中翻了个遍,哪有墨诏的半点影子?心想莫非这老儿忘了放在何处?该去问上一问,又嫌来回费事。正然踌躇,听阁门“吱”地一声响,接着“咔巴”一声,仿佛上了锁。王继恩大惊,忙向门口奔去,一边大喊:“是谁大胆,难道不知阁内有人吗?”门外一人略带揶揄地说道:“我家相爷说事情紧急,他先走一步了。要内侍爷在书阁中稍待,他片刻即回。”听声音是相府管家。王继恩任凭怎样威吓,要他打开书阁门,他只是不肯。正然相持,又来了十几名士卒,个个挎刀带箭,分立门前窗下,竟将书阁围了。王继恩知道争也无用,这才不语。

原来吕端早知王继恩等人的密谋,先设计把他监禁起来,匆匆向宫中而去。李皇后见了,说道:“如今皇帝去世,该立新皇帝继位。立嗣以长,是自古明训;废长立幼,于事不顺。爱卿以为如何?”吕端道:“先帝当日立皇太子就是为了今日。如今刚刚断了一口气,怎能就另生异议?”皇后无话可对。

吕端在太宗病危时曾到御榻前探望,见太宗病势沉重,太子却不在身旁,就怀疑会有变故发生。因事情紧急来不及另具书函,顺手从腰间取出上朝用的笏板,在上面写了“大渐”两个字,命身边亲随立即送往开封府面交皇太子,不可走露了风声,皇帝病危称为大渐。皇太子得讯,如何不急?又见吕端如此隐密,知道有变,早已命王府的人做了准备。只是没有奉召,不许入宫,只能在宫外守候。吕端命人传见皇太子,很快就来到宫中,就在太宗柩前即皇帝位。吕端率领文武百官朝见新皇帝,只见灵堂上竹帘低垂,隐隐听得帘后有人低声抽泣。想必就是新皇帝元侃了。殿头官高声唱道:“百官向新皇帝行礼,一拜,兴;

……”官员们平时做惯了的，听见这唱念声，有人就倒身拜了下去。却见吕端挺立在前，不肯躬身。不禁惊异，不由得也一齐停止跪拜。只听帘后李皇后说道：“吕爱卿不肯行礼却是为何?”吕端躬身说道：“如今新君即位，老臣为百僚之长，没见新君之面，不敢行礼。请皇后恩准，让新君卷帘与群臣见面。”李皇后听了，赞叹道：“果然是社稷之臣，卷帘。”左右宫女将竹帘卷起，见皇后（如今已是皇太后，只是还没有正式册封）身旁坐着一人，嘤嘤哭泣，正是元侃，吕端这才率领群臣跪了下来。拜舞已毕，新皇帝就算即位了。

起初，宋太宗欲提升吕端为宰相，有人说：“吕端这个人有点儿糊涂。”太宗说：“吕端对于小事糊涂，大事却不糊涂。”如今新皇帝即位，就表现出来了。每一步都思虑周详，对每一个人的表现都看得清清楚楚，半点也不马虎。你看他在新君垂帘前挺立不拜的姿态，虽古代名宰相也有所不如。此后便有了“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谚语。

总之，为了至道间新皇帝即位的这一刻，太宗皇帝几乎费了半生心血，终于如愿以偿了。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宗室传二》、《吕端传》、《寇准传》、《冯拯传》、《洪湛传》等。

李焘《长编》卷25—27、32、33、36、38、41等。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魏泰《东轩笔录》卷1

交州之变

交州，自秦汉以来或称为交趾。所指地域也因时代而不同，西汉武帝时设交趾刺史，辖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包括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地区。东汉称交州，唐称安南，置都护府。宋初交州辖有苏茂州、驩州、峰州等共12州地面，陷于混战之中。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部领逐渐统一各部，被推为交州帅，号称大胜王。时为宋太祖乾德年间。从此以后，直到宋亡，统治交州的先后有丁氏、黎氏、李氏、陈氏四姓，都对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受宋朝册封，相互之间在边境开展“互市”贸易。其间也有冲突和战争，大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宋太宗时期，黎桓篡夺丁氏政权，宋朝要例行宗主的义务，出兵讨伐黎氏，希望能代丁氏讨回公道。后来以宋朝的妥协告终，承认了黎氏在交州的统治权。第二次是神宗时期，交州李氏当权，李氏自第三代日尊开始称帝，势力不断膨胀，蚕食宋朝南部疆域。神宗在国内执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对边事也十分重视，双方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本篇就着重介绍这两次战事，它是宋和交州长期友好相处中发生的两次变故，所以题名为交州之变。

丁氏部领死后，儿子丁琏即位。七年后，听说宋朝灭掉南汉，便派遣使者到宋朝进贡，并上表请求内附。朝廷因降制书，封丁琏为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丁琏死后，弟璇继立，称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丁璇年纪尚幼，权力落

在大将黎桓手中。他逐渐树立私党，终于发动政变，将丁璇及丁氏族党都囚禁起来。自己成了交州统治者。时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

那时，宋朝太常博士侯仁宝知邕州。侯仁宝之父是五代时的名将，周显德年间告老回到西京洛阳。所以侯氏在西京有良田美园、高宅大第，侯仁宝自幼优游其间，享尽了清福。后来又娶了赵普的妹子为妻。赵普做宰相后，就提升他做西京河南府的知府。但是，“花无百日红”。开宝年间，赵普罢相，政敌卢多逊执掌朝政，就把侯仁宝改任为邕州知州。邕州就是今广西省的南宁市，当时是属于岭南蛮荒之地。对于侯仁宝这个锦衣玉食的纨袴子弟，名为做官，实同发配。侯在邕州，一连九年不得改任。明知赵普若不东山再起，他就休想离开这烟瘴之地，心仍不甘，暗道：难道我要老死于岭南不成？我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内兄赵普绑在一起。该怎么办呢？只有立功，有个好表现，升了官，或许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恰巧这时交州黎氏篡权，他就给朝廷上疏说：“交州主帅被害，发生内乱。只以偏师一支，灭掉交州，易如反掌。臣愿回到京都，向朝廷面陈机宜。”满以为，邕州是南疆要地，只要回到京都，朝廷一发兵必以主帅兼任邕州地方官，自己就不必再回到这个倒霉地方了。太宗看了他的奏疏，心中大怒，决意发兵平乱。命侯仁宝乘驿传车马，火速回京。谁知那卢多逊是个厉害角色，一眼就看出侯仁宝的居心，向太宗奏道：“交州内乱，是天赐良机，出其不意，以精兵袭击，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必能一举灭掉交趾。倘若召仁宝回京，就会走露风声，交趾人早做防备，那就不好办了。臣以为，不如命仁宝负责筹划此事，兼管运送粮草。从朝中另选武将，自荆湖地区调发士卒一二万人，长驱而进，势如摧枯拉朽，必能破敌。”太宗以为有理。

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六日（丁未），任命侯仁宝为交州

路水路转运使，以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郝守浚、鞍辔库使陈钦祚，左监门卫将军崔亮为邕州路兵马都部署，由陆路入宁州（今越南境内）；以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僎为廉州（今广东合浦）路兵马都部署，由水路进兵。水陆二路一同进发。九日（庚戌）孙全兴等人上朝辞行，太宗命引进使梁迥在玉津园设宴，为诸将士饯行。

十一月一日（庚子），黎桓派遣牙校江巨璟、王绍祚带着交州的土产到宋朝进贡，还带来了以丁璇名义写成的表章，大意说："丁氏受朝廷委任，治理交州，一直谨慎，勤修职责，不敢有半点怠惰。如今丁璇受军民推戴，暂摄任为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请求朝廷正式加封。"这样看来，交州已经无事，宋朝就不必出兵了，至少也要调查一番，弄清楚了再做决定。但宋太宗一眼看出这奏章是假的，目的是要朝廷延缓出兵日期。便不加理睬，继续进兵。

十二月二十二日（辛卯），交州行营奏捷说，破交州兵万余众，斩首2345级。

太平兴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乙未），又传来捷报：在白藤江口，破交州兵一万五千人，斩首一千多级，缴获战船二百艘，铠甲上万计。

打了胜仗，侯仁宝岂能放过这机会，领了本部士卒，率先进军。主将孙全兴等屯兵于花步（在越南境），等候水军刘澄等。仁宝屡次催促进军，孙全兴无法拔营，直候了七十多天，好不容易把刘澄盼来了。二军合并，同由水路进兵到多罗村，却不见敌人踪影。刘澄又不顾侯仁宝死活，擅自撤回花步。侯仁宝孤军在前，闻报说黎桓率众投降，不觉大喜，领水兵出迎。入了埋伏圈，方知上了恶当。见四面都是敌船，船上士兵手持木牌标枪，鼓噪呐喊，一齐向宋船冲来。宋军大败，侯仁宝中箭落水而死。时天气渐热，交州地面水深林密，瘴雾四塞。宋兵不习水土，中

瘴毒而死者一日多似一日。侯仁宝军一败，交州兵士气大振。宋军要在短期内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广南转运使许仲宣奏请朝廷停止这场战争，而且不等朝廷答复，下令军队在广南诸州分别屯驻；并打开仓库，赏赐有功将士。延医买药，治疗伤病。一面起草檄文，告谕交州：大军必再来荡除，继续顽抗，决无好处。一面向朝廷上疏，请求处罚自己擅做决定的过错。私下对人说："我不能使这么多客死此地的人生还中国，已是惭愧。朝廷若是怪罪，罪我一人。若待朝廷批复再撤军，数万士卒早死于炎瘴之下了。我不能因爱我一家人性命而置数万人的性命于不顾。"朝廷接到他的章疏，不但没有惩罚他，还颁诏书给以嘉奖。

侯仁宝军初败，有二名逃归的士卒最先到达邕州。以为是为国征战，九死一生，有了功劳，便不可一世，公然在市面抢劫起来。广东转运副使周渭在邕州，闻讯，命人将这二名逃卒捕获，当场杀掉。然后命人守住城门，败军士卒必先解除武装，才准许入城，所以败军虽多，无人再敢犯法。看来，邕州百姓得遇周渭这位干吏，实在是侥幸。否则，不论邕州是否被交州人攻破，都注定要遭受一场劫难了。

朝廷得许仲宣奏报后，追究这次兵败的责任。时水路军的王僎已经病死，刘澄、贾湜都在邕州处斩；陆路军的孙全兴等下狱听审，不久也被杀掉；陈钦祚、郝守浚、崔亮都贬为边州团练副使，陈在庆州，郝在磁州，崔在岚州。只有侯仁宝赠官为工部侍郎，二个儿子延龄、延世也都加官为斋郎。其实，侯仁宝贪功轻敌，使部众丧生，全军失败，死不足以塞其责，功劳更谈不上了。此外朝廷将数万大军交给孙全兴这么个小人物，各部军队他都指挥不动，以致无法协调作战，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这是宋太宗决策的错误。论根源还是在于朝廷不敢把指挥权交于一人，既要诸将领共同打仗，又要他们互相牵制，这就难免吃败仗了。

交州人害怕宋朝再次兴兵，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仍以丁璇的名义派使者到宋朝进贡，并上表谢罪。次年五月，又派使者赵子爱前来进贡，并说占城国派马军、象军数万人，分水陆两路进攻交州。已被交州军击败，杀死与俘虏数千人。使者所呈表章中黎桓自称为权交州三使留后。三使指节度使、观察使、处置使，是朝廷封给丁氏的官职。黎桓尽夺三使职权，但没经朝廷任命，所以只称权三使留后。黎桓表中还说明他受此职的原因是：去年十月，丁璇与母率领军民，亲自手捧三使印信转授给他，他才答应暂摄府事。宋太宗只好退一步，为黎桓指了二条路：第一，"丁氏既以卿为心膂，卿又无辜负丁氏之心，朕便令丁璇为名义上的统帅，卿为副职。而诸大事的裁决，全部听凭于卿。等丁璇长大成人后，再将权力还给他。卿辅导丁氏的功劳，朕必不忘，定会重加封赏。"第二条路是"卿若以为丁璇才无可取，终不足于治交州。虽然这样，他家累世受朝廷节钺，又无有过失，骤然变成与普通百姓一样，与理不合，朝廷也于心不忍。卿可将丁璇母子亲属一起送到朝廷中来，由朝廷另封官职。只要丁氏母子一到京城，朝廷即刻把交州的节钺正授给卿。以上两条路，卿可任择其一。"时黎桓已经完全掌握了交州的军政大权，确立了自己的牢固统治，对这两条路都不肯接受。宋太宗也毫无办法。

雍熙二年（985），黎桓派遣牙校张绍冯、阮伯簪为使者，来朝廷进贡，并请求朝廷准许他正式接任为交州节镇。第二年秋，又来进贡。朝廷用兵既已失败，丁氏在交州恢复也已无望，黎氏一再来朝廷进贡，朝廷只好答应黎氏的请求，于雍熙三年十月颁制书，封黎桓为检校太保，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安南都护、充静海军节度、交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爵位是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户（即以三千户的赋税为俸禄）。又赐号为"推诚顺化功臣。"从此交州丁氏彻底垮掉了。宋和交州的第一次交锋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黎氏以承认宋朝的宗主地位为条件换得了宋朝的承认，

此后，于端拱元年（988）、淳化元年（990）、四年朝廷先后遣使到交州给黎桓加官晋爵，交州也遣使朝贡。随着黎氏势力的巩固和膨胀，自至道元年（995）以后开始北侵，骚扰和蚕食宋朝的南部边境，但和好仍是主要方面。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黎桓死，几个儿子争夺继承权，发生内乱。广州知州凌策请求只用本部二千士卒灭掉交州。太宗以为黎桓一向忠顺，屡次向朝廷进贡，如今新丧，又有内乱，朝廷出兵，太不像话，没有同意。而是派邵晔为沿海安抚使，调解交州内乱。邵晔告诫各方，若仍这样互相鱼肉，继位者久久不能自定，朝廷就要兴师问罪了，那时玉石俱焚，尽灭黎氏，可怨不得别人。诸子畏惧，才共推龙廷为主。宋朝的特殊地位，对交州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龙廷极为暴虐，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被亲信大校李公蕴所驱逐。李公蕴自称留后，遣使到宋朝进贡，并请求加封。真宗以为黎氏以不义而得政，如今李氏如法炮制，虽手段可恶，蛮俗中风俗历来如此，不足多怪。就将一大堆头衔又转授给李公蕴，交州开始了李氏统治时期。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李氏的第三代统治者日尊继位。宋神宗初，封他为南平王。熙宁元年（1068）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第二年他又自称皇帝，追尊李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建国号大越；年号宝象，不久又改为神武。熙宁五年三月，日尊死，子乾顺、乾德相继即位。

自李氏统治交州，虽也不断向宋朝进贡，却不断蚕食宋朝边境，乾德即位后终于大举向宋进攻，时为宋神宗熙宁八年。

宋朝一方，自太宗时，侯仁宝、孙全兴战败以后，经真、仁、英三朝皇帝，一直对交州采取姑息政策。这主要由于西、北两方有强敌压境，不愿在南方另开战场。神宗即位后雄心勃勃，利用王安石改革内政。青苗、免役等新法的推行，使朝廷经济面

貌有所改观，对边境事务也就不肯再委曲苟安。还在仁宗时期，萧注在邕州为官数年，曾向朝廷上疏说："交趾虽向朝廷纳贡，其实是包藏祸心，惟以蚕食我领土为事。天圣年间（1023—1031），郑天益为广南转运使，曾经斥责交趾擅自收取云河洞的赋税，至今才二三十年，云河洞已落在交趾边界以后数百里，就是它对中国年侵岁吞的结果。臣在邕州多年，对交州情状、要害都已摸清，愿入京面陈方略，灭掉交州。今若不取，必为后患。"朝廷当时没有答复他。神宗又看到这份奏章，很是高兴，重新起用他为桂州知州。当时盛传交州被占城击败，兵不满万人，很容易对付。神宗问他有何法？萧注说："此话断不可信。当初臣上书说交州可取，是由于臣在那里经营数年，当地溪洞兵无不以一当十，又到处是我的亲信，敌有动静，必先报知。如今事隔15年，这两个有利条件，已都不具备。而交趾经过这15年的生聚教训，已非昔比。"答应上任后相机行事。萧注在桂州，首先加强与各溪洞部落酋长的联系，搞好相互关系。李乾德一举一动，萧注必能预先得知。所以，每次入侵，都讨不到便宜。只是若有人建议他南征，萧注又必不听从。朝廷见他久无动静，改派沈起知桂州。沈起先已吹大气说："交趾不过是南疆一小丑，无有不可攻取的道理。"上任后，妄称受神宗密旨，命边境州县官吏到各部落溪洞中去点集土丁，编成保甲，授给阵图，让他们岁时排练。后又命各路指使官，借督运盐的机会到海滨去调集船只，教以水战。又禁止交州人与边地州县贸易。与交趾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交趾开始集结兵丁，准备大举入侵。邕州苏缄上奏朝廷，请求废除保甲，停止水军，恢复互市贸易。沈起不听反而弹劾苏缄阻碍进兵交趾。朝廷将沈起贬职，以刘彝代替他的职务。这刘彝在广州做官时曾经扣押交州呈递朝廷的表章，与交州关系很是紧张。调任桂州后，更增加了交州人对朝廷疑惧。终于分兵三路，大举入侵。一自广州，一自钦州（今广西灵山），一自昆仑关

（在今广西境），接连攻陷钦、廉（今广西合浦）二州，杀害士丁8000人。朝廷闻讯，将沈起再贬为团练使，安置在郢州（今湖北钟祥）居住，后来死在秀州。刘彝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居住。后又除名为民，隶属于涪州（今四川涪陵）。

熙宁九年正月，交州兵围邕州，号称万人。邕州知州苏缄检阅州兵才2800人，百姓闻讯四出逃散。苏缄将仓库所积以及个人财物全都摆出来，告诫居民说，兵械财物都很充足，敌人攻不进来。应该坚守等待外援，下令私出城者斩。他的儿子名叫苏子元，官居桂州司户参军。因公事来邕州，携带妻子亲属就便来家省亲。公事既完，应返回桂州。苏缄道：子元因公事而来，可以出城。所携家属前来探亲，是私事，被强留下来。众人见知州如此，谁也不再出走，决意守城。交州兵久攻不下，苏缄昼夜指挥士卒，在城上用神臂弓射敌，交州兵死伤很多，已无法攻入邕州。这时，是宋援军使交州人得了转机。原来。苏缄把求援的书信制成蜡丸，经历千难万险送出城去，求刘彝援救。刘彝派张守节带兵赴援，张守节却惧敌不前。苏缄又以蜡丸书向提点刑狱宋球求救，宋球督守节进兵，张守节才仓皇移屯于大夹岭，不幸中途与交州兵遭遇。还没来得及结阵，就被击溃。交趾人闻知被俘的宋军中有人善于攻城，就用高价收买他们。在他们的主持下制造出了云梯等攻城器械，又教给交州兵挖掘壕洞等攻城方法。这些都被苏缄一一击破了。后来又有人替交州兵想了以土袋叠城的方法，顷刻间叠城高达数丈，与邕州城高相同，交趾人很容易地登上城墙，邕州无法再守了。苏缄不愿让家人做交州人的俘虏，将全家36口人全都杀死，藏尸于土坎之中，自己纵火自焚而死。交州兵入城，杀郡民5万多人，每一百具尸首积成一堆总共有580堆之多。宋太宗对这次守城给了很高评价。对苏缄的儿子说："若不是你父坚守42天，敌兵长驱而进，桂州、象州都会落

入敌手。唐时安史之乱，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使江淮免遭涂炭。你父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因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诸子孙也都加了封。

交州兵攻下邕州后，到处张贴布告（那时名为露布），指责宋朝推行青苗法、助役法等，声言要出兵拯救生民出于水火。王安石大怒，以天章阁待制赵卨为招讨使，决意出兵讨伐。另派内侍李宪为副职。内侍就是太监。大将出征，必派一名太监作副职或监军，监视大将的行动，这是自唐以来的弊政。果然，尚未出兵，赵卨已感觉到与李宪意见不合，以后难与相处，请求换人。朝廷问他谁可代替，赵卨建议说，郭逵久在西北边境作战，熟悉边事，自己情愿做他的副职。神宗于是改任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以赵卨为副职。临行在便殿赐宴，又赐给皇帝亲卫军——中军的旗帜衣甲等，以表示宠信和优待。哪知赵卨与郭逵意见也不一致，赵卨主张出兵以前，先安抚、结纳两江一带溪洞的洞丁，从基础上瓦解交州人的统治，然后以武力相征讨。郭逵则主张速战速决，直接诉诸武力。赵卨又建议派人到交州军占领地去张贴敕书、布告之类，瓦解敌兵，也被郭逵否定了。郭逵率军行到长沙（今湖南境），遣部将率军南下，恢复廉州、邕州，亲率余兵直攻广源州（在今越南谅山西北，与广西龙州接界），守将刘应纪投降。继续进攻拔决里隘，又乘胜攻取了桄榔门州。直抵富良江。起初，攻占广源州后，郭逵要分兵三路，齐头并进。赵卨则以为：广源到交州治所龙编（今越南北部），不过300多里，应该出其不意，兼程而进。分兵则弱，进展必缓，缓则敌人有备。郭逵不肯听。由于进兵缓慢，交州兵沿富良江集结起来，布列战船数百艘，宋军无法通过。赵卨使将士伐木制成攻城用的抛石机，古称为石炮，能发射数十斤重的大石到数十百步远，交州战船多被击碎。又以老弱士兵将敌人引入埋伏圈，毙敌数千人，王子洪真也被杀掉。乾德这才慌了

手脚，上表请降。时官军八万人。冒着酷热毒瘴，深入敌境作战，死伤在一半以上，终于赢得了胜利。但是，富良江与交州治所，即与敌巢穴只一江之隔，郭逵却始终不敢过江。闻敌既降，匆忙撤军，以致骑兵、步兵互相践踏，多亏康州团练陶弼殿后，才免于受交州兵追袭。这一战官军除将交州人攻占的宋朝州县全部夺回外，还攻占了交州所属的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共四州一县地。其中的广源州、门州原是宋的羁縻州，被交趾人强占了的。桄榔原是溪洞，宋改称为县。郭逵因玩寇不进，被贬为左卫将军，安置西京居住；赵卨也被贬为直龙图阁，桂州知州。

朝廷改广源州为顺州，所得四州一县地都派官兵将士驻守，而不起用本地人。派驻的官兵将士不服水土，终于难以生存下来。以顺州为例，史载朝廷以西上閤门使陶弼为顺州知州，顺州距邕州二千里，地多毒草瘴雾，戍卒中毒病死者占总数的十分之七八，陶弼也染上重病，死在顺州。朝廷认为这些地方对宋朝终无用处，就将这血战得来的四州一县地又全都还给了交州。交州人反而借口四州疆界未定，不断兴兵侵犯。元丰五年（1082），遣使入朝进贡，献上驯象、犀角、象牙等物；六年，以追捕叛臣侬智会为理由，出兵侵犯宋朝的归化州（在今广西境）。就这样外示恭顺，实际却不断生事。桂州知州熊本为避免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下去，征得朝廷同意后，将广西八隘以外的保乐六县和宿桑二洞割给乾德，熊本对朝廷说，那是"八洞不毛之地。"后来的事实证明，割地弭患如同是割肉饲虎，愈割虎愈壮，愈要伤人。朝廷追论此事，熊本贬官一级，调任杭州。直到哲宗即位后的元祐年间，乾德仍不断上表，请求割让勿恶、勿阳等洞的土地。朝廷不许，乾德也不敢大闹。总之，自神宗熙宁出兵以后，宋和交州的关系逐渐稳定下来了，又恢复了先前的那种朝贡关系。徽宗大观初年（1107），交州派使者到宋朝购买书籍。政和

末年（1117），朝廷下令放宽与交州和市贸易的禁令。南宋绍兴二年（1132）乾德死后，宋交之间再没发生过战事。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交趾传》、《侯仁宝传》、《许仲宣传》、《郭逵传》、《周渭传》、《赵禼传》、《沈起传》、《刘彝传》、《熊本传》、《陶弼传》、《苏缄传》等。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5

蜀　　乱

宋仁宗时，成都府有一“狂”生，名叫何宗韩，向枢密直学士、成都知府蒋堂献上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截断剑门烧栈阁，此中别是一乾坤。”意思是以兵阻塞剑门，烧掉通往蜀中的栈道，西蜀就是一个谁也奈何不了的小天下。这明明是劝蒋堂造反，那还了得？蒋堂不由得先吓出一身冷汗，下令逮捕何宗韩，解送到京城治罪。蒋堂这等胆小，是由于“西蜀割据”是朝廷历来最忌讳、最敏感的事体之一。就像诗中所说西蜀易守难攻，太容易割据了。汉唐以来，先后有公孙述、刘备、王建、孟知祥等在蜀中称王称帝。宋朝灭蜀以后，为避免再出现这种局面，曾将蜀中州县城濠全都毁去。以后地方官为了防嫌，谁也不敢修复。宋朝廷以为这就可保蜀中无事了。哪知最先生乱的还是蜀中。北宋前期，蜀中就有两次大乱，一次是宋太宗淳化年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另一次是宋真宗咸平年间以王均为首的戍卒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宋朝人就有了深刻认识，许多文人笔记中都说是朝廷对蜀中的搜括政策造成的。宋灭蜀以后，曾把王氏、孟氏积攒了数十年的财物，全都运入开封。为此征调大量人力，重货由水路出蜀，轻货沿陆路设立“传置”，每四十人编成一纲，互相传递，称为进纲。这样，水陆兼运，直运了十多年，把蜀中仓库运了个空空荡荡，使那里失去了对灾害的自我调节能力。蜀中盛产丝织品和茶，宋政府又在那里设立博易务，实行官买，禁止私相贸易。因此，商贾不行，使一大批以此为生的

人生路断绝。据载王小波就是个“贩茶失职”的贫苦商贩。再加上淳化年间，蜀中连年大旱，“两蜀（蜀东、蜀西）大饥”，濒临死亡的蜀中百姓只好铤而走险了。

淳化四年（993）二月，永康军青神县（今四川眉山南）百姓王小波，率领一些贫若百姓，约有百人左右，揭竿而起，一轰占领了县衙门。王小波对众宣布说：“我特别嫉恨的就是贫富不均，如今就要为你们均上一均。”这话很有号召力，许多贫苦百姓都投入他的队伍中来。王小波率领众人先北上攻下彭山县，县令齐元振是朝廷刚刚嘉奖不久的“廉”官，算是个模范县令。其实，一样地贪赃枉法，爱钱如命。起义军从他家搜出一车铜钱，将他的肚子剖开，抓起大把铜钱，边往肚子里塞边说：“叫你爱钱，叫你爱钱。”然后将仓库打开，分给贫苦百姓。这样一来，军声大振，骤然发展到万余人。十二月，北攻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与前来镇压的西川巡检使张玘恶战一场，杀了张玘，不幸王小波前额也中了流矢，不久病死。妻弟李顺被众人推为首领，继续完成王小波的未竟事业。他先率众西攻蜀州（今四川崇庆），杀了监军王亮和其他州官十多人。又向西南，攻陷邛州（今四川邛崃），杀知州桑保绅、通判王从式和他们的一帮同僚，赶走了都巡检使郭允能。不久，郭允能纠集部众，重与起义军战于新津江口（今四川新津附近），也被起义军杀掉。同巡检使、殿直官毛俨徒步逃走，算是拣了一条性命。起义军愈战愈强，已发展到了数万之众。

特别难得的是起义军纪律严明，在李顺率领下，继续执行王小波制定的“均贫富”政策。每攻下一城，首先召集富人大姓，要他们自己招认家中财产总数，然后计算全家人口生活所需，其余全都用来赈济贫乏。所以，很受百姓拥护。

起义军接着攻下了属永康军（今四川灌县）的双流、新津、温江、郫县（以上均在四川境）等县城，分别派遣自己的官员镇

守。然后进攻成都府，放火烧掉了成都西郭门。但是遇到了成都守军的顽强抵抗。起义军只好撤围，北攻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县），使成都府陷于起义军的包围中，然后回兵再攻成都。西川转运使樊知古与成都知府郭载终于招架不住，率领僚属突围逃走。时间是淳化五年正月十六日（己巳）。樊知古丢了成都，又忧又怕，不久病死；郭载率余众从梓州逃往剑门。这郭载其实刚上任不久。初上任时，走到梓州（今四川三台），他心血来潮，要算命先生（宋时称为“日者”）给他算上一卦。算命先生说：“成都不可去，去必遭祸，迟去几日，其祸可免。”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受朝廷委任到这里做地方官，岂能因避祸故意迁延。”大有与成都共存亡的气概。谁知入成都没几天，就溜之乎也了。

成都古为益州治所，是蜀中核心。落入起义军手中后，割据的形势已形成了一大半，眼下当务之急应该断绝蜀中与外界联系，阻止宋朝援兵入川。其余未攻下的州县便能传檄而定。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方法很简单，像开头那首诗说的，只要“截断剑门烧栈阁”就可以了。可是起义军忽略了这个战略环节，进入成都后，以为大势已定，忙于设官建职，分配权力。李顺自称大蜀王，建国号为大蜀，年号应运，设立了各种机构，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应运通宝”，“应运元宝”。许多大好时光都浪费在这些事上了。待诸事完了，仍未想到“截断剑门烧栈阁”，而是派兵四出，攻夺成都附近州县。果然许多州县都是传檄而定，起义军的文告一到，守城官便开门投降。北起绵州（今四川绵阳），南到巫峡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起义军手中。

起义军发展之快使宋朝廷大为震惊，急忙召大臣商议对策。多数人主张招安，认为武力镇压没有把握。只有新上任的参知政事赵昌言力请发兵镇压。朝中议论纷纷，久不能定。起义军又连续攻下了嘉州（今四川乐山）、眉州（今四川眉山）。宋太宗以为

不可再事迁延，决定用兵。淳化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甲戌），命昭宣使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分路讨伐。以雷有终为峡路转运使，供应军需。

二月，又使马步军都军头王杲由陆路趋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剑门关），崇仪使尹元由峡路沿长江溯流入川，两军都受王继恩指挥。还下令官军所到之处，“贼党”有敢对抗者，杀勿论；先被胁从而能归顺者，免罪。这时，李顺才想到剑门之险，派遣部将杨广率数千众，兼程北上，进攻剑门。上官正为剑门都监，手下只有数百名老弱残兵，还有部分从成都逃出的军队。倘若起义军尾随成都败兵而至，剑门关唾手可得。此时再攻，就难多了。守兵得知王继恩大兵不日即至，自会殊死坚守。双方在关下一场大战，起义军反而不敌，大部战死，余众三百多人退回成都。李顺深知这一战的意义，所以，对这次失败非常恼火，把这三百败兵全部斩首。待要重新派兵，已来不及了。宋朝廷起初最担心就是起义军占领剑门和巫峡后，把剑门和巫峡外的入川栈道各放一把火烧掉，就是所谓“截断剑门烧栈道”，那时朝廷兵虽多，也是无用武之地了。听说上官正剑门大捷，格外高兴。太宗皇帝亲颁诏书嘉奖，赐给袭衣、金带等物，即刻提升他为六宅使、剑州刺史充剑门部署。由于阁道无阻，官军长驱而入，起义军所处形势急转直下了。

还有一件事起义军大失战机，就是久围梓州不下。梓州知州张雍自王小波起兵，料知梓州城下终有一战，就着手做守城准备。城中有兵三千人，又招募得千余人，每日训练守城法不止。从绵州运来金帛财物充实梓州仓库。命推官陈世卿打造守城器械，掌书记施谓和榷盐院判官谢涛负责砍伐树木，毁钟铸箭，把布匹扭绞成索，又派人入朝求援……这之间，起义军攻州夺县，建号称王。然后才派部将相里贵率军十万来到梓州城下。先以老弱诱敌，张雍与监军卢斌登上城楼遥望，见起义军都是老弱疲惫

之众，又无铠甲，卢斌就要开城出击。张雍害怕中了圈套，不肯答应，决计只守不攻。起义军用云梯、冲车等各种攻城器械昼夜攻城，都不能成功。围城长达 80 多天，直到王继恩大兵入川，起义军才不得不撤去。历朝起义军有许多屯兵坚城之下，久而无功，终致造成很大损失的例子。如隋朝的杨玄感，唐朝的黄巢等。李顺的梓州之围又添了惨痛的一例。宋太宗对此战很是欣赏，有关人员都加了官，张雍升为给事中。其实，这张雍并无大才干，在三司任度支等使时，文书簿籍各自标上“棱前急”、“马前急”、“急中急”等名目，传为笑谈。宋太宗听了也大笑说：“张雍竟庸俗到了这等地步。”另派王嗣宗取代了他。起义军梓州失利主要是由于战略决策的错误，又缺乏战术的灵活性。

起义军贻误战机，正孜孜于梓州一地的争夺之中，王继恩先后攻陷了剑州、绵州、阆州（今四川阆中）、巴州（今四川奉节东）、蓬州（今四川仪陇东南）等。五月进围成都。起义军十多万人英勇守城，终于被官军攻破，一万多人被杀。李顺被俘，在解往京都途中，被杀于陕西凤翔县。也有其他说法，如沈括《梦溪笔谈》说，城破后，李顺逃出成都，四十年后，有人在广州发现他的形迹。官府不欲张扬，将他逮捕后秘密杀害。所以正史等书都不见记载。

再说官军中从峡路进军的一支，在雷有终、尹元等率领下溯江而上，打了一些胜仗，进兵到广安（今四川境）、渠州（今四川渠县）、果州（今四川南充北）一带，再也难以向前推进了。

王继恩虽然攻下成都，起义军的势力仍然很大，城门十里以外就是起义军的势力范围。众人推张余为帅，重又攻下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犍为）、泸州（今四川泸县）、渝州（今四川巴县）、涪州（今四川涪陵）、忠州（今四川忠县）、万州（今四川万县）、开州（今四川开县）共八州地。又乘胜攻夔州（今四川奉节），不巧，朝廷增派如京使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

率精兵数千，沿江入川。行到夔州，正遇到起义军攻城，从背后袭击起义军。夔州巡检使解守颙乘势从城中杀出。起义军腹背受敌，被杀二万多人。

这王继恩虽是个太监，与最腐朽的官僚一般无二。入成都后，就享起清福来。手握重兵，久留成都不去，终日以宴饮为事。每出入帅衙，前簇后拥，以乐队相随，又吹又打，好不气派。前后还有骑兵手捧棋枰和博局相随，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摆上一局，或者掷上一把。身边仆从奴使，更狐假虎威，专横跋扈。部下士兵公开抢掠子女金帛，州县不敢治罪。这种队伍自然难以再打仗了。起义军余部散布周围山谷间，有的把落入官军手中的州县重又夺回。王继恩手下有一个内侍高品王文寿，王继恩派他率领虎翼卒二千人追讨起义军的余部，此人驭下苛虐，士卒颇为怨恨。一天晚上指挥使张嶙率领几名亲信士兵排闼而入，割下王文寿的脑袋。怕天色昏黑，出了差错，点上蜡，仔细观看后道："就是他，一点儿不错。"这才从容出营，率部投奔张余而去。张余势力由此大盛。太宗大怒，要把张嶙部士卒的家属全都处死。近臣力劝，才没干出这愚蠢而又残忍的事来。改派巡检程道符告谕投降张余的士卒，杀张嶙立功免罪，可免家属一死。

王继恩兵久无功，起义军余势不衰，宋太宗对蜀中局势几乎绝望。八月某日，参政赵昌言主持太庙祭仪，斋宿于中书省。太宗把他召到滋福殿，说道："西蜀本来自成一国，太祖出兵强制它归入我朝，至今已经三十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只怕——"太宗犹豫片刻，下面的话没有出口。赵昌言冰雪聪明，早已明白太宗有意放弃西川，这怎么可以？急忙说道："如今国家兵精粮足，无往不克，西川不过是些乌合之众，草莽野人，根本不值得惹陛下担忧。"太宗道："以卿之见，该怎么办？"赵昌言当即把平定两川的方略一五一十地讲给太宗听，太宗大喜，转天就任命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在蜀中作战的宋朝将士，自王继恩以下全

都听他指挥。赵昌言推辞一番。太宗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定要他亲自出征。赵昌言只好从命。

九月，宋太宗以为川中局势除武力镇压之外，还应加强文治。工部尚书辛仲甫曾在成都为官，颇得人望，打算派他重新出马。可是辛仲甫老迈多病，已无法启程，闻命后主动递上了请求致仕（即退休）的奏章。参政苏易简推荐枢密直学士张咏可承担此任。因命张为益州（即成都）知州。并允许他到任后便宜从事，即有独行独断的权力。

再说峨眉山有个和尚，名唤茂贞，由于法术灵验，很受太宗赏识。赵昌言被派征蜀后，他曾对太宗说，从相法看，赵昌言鼻折山根，是一副反叛者的相貌，不该委派他带兵出征。太宗尚未十分在意。过了十来天，又有人奏说："赵昌言素负重名，很有声望，又无子女拖累。如今手握重兵，到蜀中这种远离朝廷的地方去，朝廷对他怎样控制？"太宗又想到茂贞那番话，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来到北苑，召来宰相说："早几天遣赵昌言入蜀，朕后来细想，觉得不妥。蜀中贼寇，不过是些跳梁小丑；赵昌言是朝廷大臣，如何能够轻动？应即刻下令叫他驻兵凤翔，作为诸军的声援也就够了。另派内侍押班卫绍钦，带着我的亲笔诏书前往指挥军事，事情就能成功。"此时赵昌言率大军已到凤州（今陕西凤县），不日就要入川了。诏书追及他后，命他原地驻扎，以待后命。太宗皇帝器量之小和虚妄、多疑，于此可见一斑。

为安抚蜀中百姓，太宗下了一道罪已诏，对蜀中政策失误的原因做了一番自我检讨。诏书是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亲自删定。其中说："蜀中祸乱是由于朕委任不当，看事不明。以致地方官不以惠和为政，管理管榷（官买官卖）的官员惟以刻削百姓为功。使善良百姓，变成了作乱的狂寇。我一定深自反省，改弦更张，永以此事为教训。"说得多漂亮！可惜不大靠得住。

张咏受苏易简的推荐做益州知州，此人颇有几分才气，个性也很特别，自己起了个别号叫“乖崖”。乖就是不合时宜，办事总有点刺刺辣辣，与众不同；崖是有点儿崖岸自高，不易接近，不大合群的意思。性子又急躁刚强，有的书记载说他三暑天吃馄饨，一低头，帽带垂下来，落在碗里，他用手掠到背后，再低头吃，帽带又落了下来。几次三番，不由大怒，一把将帽子脱下，捺在碗中道：“你吃，你吃，老子不吃，都让你吃。”筷子一扔，走了出去。惹得人一场大笑。但是正如俗语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么一个怪物一样的人办事能力却是极强。到益州上任后，见王继恩已搞得乌烟瘴气，士卒骄横，法令不行，谁肯听他这么一个文职官员的话？暗想：要打开局面，当务之急是提高个人威信，加强众人对他的信赖，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为此，决定先做几件漂亮事。细心观察后，见城中驻兵的军粮是从陕西运来，终日车声辘辘，运粮车络绎不绝，军中却无半月存粮，时感缺乏。加上脚夫作弊，在粮中掺人砂土充数，军士叫苦不迭。而城中私家却多有存粮，惟盐价太贵，百姓也是苦不堪言。于是下令降低盐价，命百姓以粮换盐。不到一月，就得到好米数十万斛。然后上表，请求停止运送陕西军粮，说益州军粮，足够二年支用。太宗大喜，对人说：“往日益州几乎天天上表说军粮缺乏，此人到任不久，就有二年的存粮。有此本事，还愁什么事干不成！”益州士兵和百姓更是高兴：士兵喜的是饭食中没了砂子，不再为军粮发愁；百姓喜的是盐价降低，从此不再淡食，家家受惠。军民都说：知州大人真能办事！张咏听了暗喜，心道：再不用担心我的命令无人执行了。那时益州城外便是起义军的势力，大白天城门不敢打开。王继恩终日宴饮，不再讲打仗的事。而每日战马支付粮草饲料就是地方政府的很大负担。张咏下令改支铜钱，不再支给草料。王继恩大怒说：“国家战马难道是吃钱的吗？”张咏道：“草是长在郊外的。若开城击贼，怎会少了粮草？

我已写好奏折，打算上报朝廷。若有不妥，甘愿领受罪责。”王继恩听了，先就软了半截。怎敢让他上报朝廷？说是战马没有草吃吗？那成什么话。还不一下就露了馅？不仅不敢再与张咏争执，反而说小话央求他不要呈递奏章。正赶上卫绍钦奉太宗命来到蜀中，也督促王继恩出兵。王继恩只好四面出征。起义军人数虽多，毕竟是些普通百姓，缺乏训练，装备又差，不足与王继恩率领的官军精锐相抗。双顺寨、安国镇、蜀州等地相继又被官军夺去。王继恩抓获30多人送交张咏治罪，说是“盗贼”。张咏将他们全部释放。王继恩大怒责问道：“莫非知州与盗贼相勾结吗？为何私纵盗贼出狱。”张咏笑道：“即便是盗贼，原来也是良民百姓。是李顺把他们变成了盗贼，你我再把他们变成百姓，有何不可？”王继恩无话可说。王继恩部下士兵多出外抢掠，张咏不愿与他把关系搞得太过紧张。私下吩咐州衙将吏，凡抢掠居民的士兵，抓获后不须报告，悄悄处死，填入井中就是。从此士兵才有所收敛。王继恩不知是张咏的主意，也不怪罪于他。百姓有了张咏这样的地方官，勉强可以度日了。

至道元年（995）二月，四川都监宿翰在嘉州击败起义军，张余被俘，这次起义逐渐被镇压下来。王继恩被召回朝，另委上官正、雷有终为四川招安使，四川局势渐渐稳定下来。

起义虽然失败了，对宋朝社会却起了一定作用。主要是杀了一批贪官污吏，使朝廷受到很大震动；逼太宗皇帝下罪己诏，对蜀中政策做了全面检讨。此后，对蜀中的搜刮不能不有所减轻。如至道二年五月，石普受任为西川巡检，时起义军余部尚散布各地。石普认为百姓起义是赋敛所迫，请求朝廷允许他到任后捐免赋税，太宗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此外便是对人心的影响。这样大规模的反对政府的武装斗争，不可能不在人心中留下痕迹。真宗咸平年间王均等少数叛兵能够形成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斗争，就主要是受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影响，人心思乱的缘故。

咸平年间，宋初大将符彦卿的儿子符昭寿在西川做官，官名是益州钤辖、凤州团练使。他是贵公子出身，自幼骄纵惯了的，终日除了宴饮，就是游玩。他有一座很大的宅第，宅后有座大花园，他常穿着便服，纱帽素氅，在园中一关就是数天。军务是根本不管的了，有大事必须裁决时，就命家人传个口讯。最爱的是上好缎匹，召集许多织锦女工，就在他的宅第中张机织造。各种珍奇织物，什么龟壳六铢，鹿胎透背，织了一样又一样，没完没了。缺什么东西就使人到集市上拿，常常半年几个月才偿还物价。有时干脆命人去抢。连军校也时常受他和他的亲随的凌侮。无独有偶，益州知州牛冕也是个不管事的。对下级宽而无威，又政事不修。驻守益州的神威军卒有二指挥①，分别由王均、董福统领。董福对士兵管理严格，军纪较好；王均却是贪杯好赌。上行下效，王均所管士兵也大都与他犯同样的毛病。军饷喝干赌净，仍然不够，再把军装脱下来换钱。咸平二年（999）十二月十五日（甲子），符昭寿和牛冕不知为何发了昏，要在校场阅兵。这可是件新鲜事，周围看热闹的百姓人山人海。二指挥士兵列队以后，人们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董福一军衣服光洁、旗帜鲜明，军容整肃；王均一军却破衣褴衫松松垮垮。相比之下，王均士卒不免又羞又愤，当场就有人大骂起来。二十九日（戊寅）除夕，牛冕大张酒宴，犒劳州衙士卒；符昭寿对神卫军卒却毫无表示，士兵更加愤怒。这么多怨愤日积月累加在一起就要出事了。于是赵延顺等八人密谋造反。

咸平三年正月初一（乙卯），有一位自峨眉山还京的中使路过益州，符昭寿吩咐赶车的驭卒准备鞍马，要亲自送行。赵延顺等人悄悄松开马缰，几匹马便在院子里又跑又跳，闹腾起来。赵延顺等假装追马，一齐登上正厅，杀了符昭寿和二个仆人，接着

---

① 指挥：宋代军队的编制单位名称，有都，有指挥、指挥的长官为指挥使。

夺取了甲仗库。大年初一，牛冕正在州衙与属官互祝新年，听说神卫兵卒造反，也不问个子午卯酉，一轰而散，拔腿就跑。与转运使张适一起从城头缒城而下，一口气逃到汉州（今四川广汉）。益州城中无主，乱子就闹大了。有个都巡检使刘绍荣曾与叛军格斗，已被叛军活捉。赵延顺等人自知资浅，不足服众，想让刘绍荣作他们的头人。刘绍荣大骂，宁死不依。赵延顺不知该如何是好。左手提着符昭寿的人头，右手持剑：是一剑将刘绍荣杀了，还是继续奉劝？正在举棋不定，王均来到了出事地点。他本是要劝众人不可闹事，平息了这场叛乱。哪知他与众人平常气味投合，闹惯了的。见他到来，一齐欢呼，不由分说，把他推上了主座。有了头人，声势更大。其他驻军如骁猛、威武等军也都参加进来。刘绍荣自己吊死，其他不肯从乱的多被杀死。王均占了益州，索性大闹起来。建了国号，也称为大蜀，与李顺的国号相同，年号定为化顺。大约是把李顺的意志化为现实的意思。也许是顺利之顺，这就无人能知了。其余主要人员各自封了官，还选拔一名神卫军小校张锴做军师。他原在太原服役，与西夏作战多年，富有智计，颇为众人推服。

王均内部部署妥当后，率众北上，攻下汉州，又攻绵州，不能成功。到底是些士兵，懂得怎样打仗。绵州攻不下，便绕城而过，直取剑门。剑门附近的剑州知州名李仕衡，听说王均反叛，知道剑州城无法坚守，将仓库中的金帛财物全都运入剑门，不能运的一把火烧掉，率州兵退入剑门，与剑门都监裴臻共同准备御敌。这剑门关极为险要，两旁山崖壁立，中间只有一径相通。若非出其不意，根本无法攻陷。李仕衡既已有备，王均再来强攻，便注定要倒霉了。结果是数千人被杀，随从百姓投降一批，逃走一批。王均兵力单弱，又已疲惫不堪，只好暂回成都。

正月十六日（甲申），真宗皇帝得知王均叛乱，遣户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伦等为巡检，

给步兵、骑兵共八千人，前往讨伐。又以上官正为东川都钤辖，李继昌为峡路都钤辖，高继、王阮等为益州都监，都隶属于雷有终，受他指挥。

蜀州知州杨怀忠得知王均叛乱后，立即调集乡兵，会合附近各州巡检所属士兵，一起进攻益州。先败了一阵，又传檄嘉、眉等七州，会兵再攻，又胜了一场。自知终于无法攻入益州，便在离城不远的鸡鸣原安营扎寨，等候雷有终大军到达。王均也紧闭城门，准备坚守。

二月，绵、汉、龙、剑四州都巡检使张思钧攻陷汉州，王均所署刺史苗进战死。张思钧继续进兵益州，雷有终率大军也来到益州城下。数路官军齐攻益州，王均危急万分。十九日（丁卯）王均悄悄打开益州城逃走，哪知早被官军瞧在眼里。雷有终、上官正、石普等人率领官军，一拥进了益州城。李继昌拦住雷有终马头说："敌人不攻自去，须防其中有诈。"上官正一旁哈哈大笑说："李将军忒也把细了。他逃走是怕成了瓮中鳖呗，那有什么奇怪！你若不信，留在城外观战是了。"话音未落，打马进城去了。雷有终也一起进城而去。李继昌心中终有疑团难解，吩咐部下原地不动，列队待战。不到一顿饭工夫，听得城中一阵鼓响。遥见城门轧轧关了起来，隐隐听得城中传来一片喊杀声。心知大事不好，可是他部下不足千人，济得什事？只有在城外枉自着急。

原来官军入城后，雷有终想着李继昌的话，下令"搜城！"将士听了这命令，欢喜跳跃，各自去了。雷有终心中有事，竟然忘记"搜城"就是纵部下公然入民家抢掠的意思，这是以往官军做惯了的。谁知挨户"搜"下去，却是家家无人，户户室空。将士气得直骂倒霉，心中却不相信：外有重兵把守，偌大一座益州城难道数日间全都搬走了不成？忽听一阵鼓响，声如闷雷。奔到街上看时，两头都已用桌椅、门板、床榻等物堵了。只留可供一

人出人的通道，那是明摆了过一人杀一人的架势。官军分散在各条街巷间，力单势孤，如同是俎上鱼肉，只有任人宰割了。这一战，官军死伤大半，巡检李惠被杀，雷有终被叛军追得沿城堞而走，失足坠落城下。虽然带伤，却保住一条性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知道眼下益州已无法再攻，召集亡散，退入汉州城内去了。

城中百姓知道，官军决不会善罢甘休，乘官军远退，纷纷出城避难。王均下令追杀，有的被活捉回来，当众肢解。还有的一人逃亡，全族被杀。王均这伙人核心人物原是官军中的败类，作践百姓的手段自与官军有些不同。官军不过抢掠，他们又使抢掠中加上些血腥，城中百姓可就遭大难了。王均是想以此恐吓百姓，留在城中为他守城。却忘了"民不畏死"的话，愈是杀戮，逃亡愈多。雷有终对城中百姓采取招抚政策，凡自逃出城者，由官军在衣衿上画上标记，从此既往不咎，释为良民。每天都有数百人逃出城来，城中防守力量愈来愈弱。

官军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集结，终于在这年十月攻下益州，王均率余众二万多人乘夜出城。雷有终闻报，率军来到城下，见城门大开，却不敢进城。常言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上次吃了大亏，至今还心有余悸。先派小股士兵入城纵火，确知没有埋伏，才驱军入城。将曾替叛军做过事的数百人捕获后，当众烧死。连当时宋朝官员也认为雷有终此举太过残忍，这些人死得太也冤枉。

王均出城后，过河拆桥，过路断路，过城烧仓，凄凄惶惶，好不狼狈，又好不狠毒。雷有终派杨怀忠率虎翼军卒一路追击，直到富顺城（今四川自贡东南）。宋代戎州、泸州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称为戎泸蛮。富顺在两州之间，朝廷在这里设监管理。每年十月，命富顺监官员大张宴席，款待归附朝廷的部落酋长。这一日，宴席刚刚布好，王均率余部来到，那是不用客气的

了，将官员和酋长赶走，饱餐一顿。打算搜罗船只，编制木筏，渡过沱江，便是少数民族居住地。那时，朝廷可就无奈他何了。恰于此时，杨怀忠追兵赶到。他兵不过千人，王均哪将他放在眼中，对一名部将说："快去把他们收拾了，捉些活的回来替咱们挑担。"杨怀忠在江边布阵，又分兵在附近一座土山后设伏。对士兵说道："石普将军的援兵不久就到，且记不可使叛军过江。"双方接战后，伏兵一冲，叛军大败，四散逃走。杨怀忠张旗鸣鼓进入富顺城，王均部将已有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王均耳听得一片喊杀声，知道已身陷重围，万难逃脱，找根绳子，悬梁而死。杨怀忠招降余众六千多人。然后打扫战场，割下王均首级向朝廷请功去了。朝廷闻报，雷有终、杨怀忠等一干将领各有封赏不提。

王均叛乱自不能与王小波、李顺率领的起义军相比，他不过是乘李顺之后，利用人心思乱的局面，图谋蜀中割据。又军纪极差，日久自会被百姓唾弃。但是最初只有数名叛卒，起而倡乱，朝廷虽派大兵追剿，竟然让他坚持了近十个月之久，南北转战千余里，真是不可思议。那时不仅西川，内地也发生一些百姓和士兵的反叛。如端拱年间（988、989）关中地区的侯和尚、刘渥，淳化年间（990—994）山东半岛上的百姓起义等，都搞得轰轰烈烈，官军费了很大功夫才得平定。这除了由于官府刻剥的原因外，黄州知州王禹偁曾经上疏谈到另一个原因，说："太祖、太宗平定南唐、吴越、闽等国后，大臣献计，命江淮郡县都拆毁城隍，收回甲兵，撤除武备，至今已长达二十多年。又命书生做知州、郡守，大郡给20人，小郡15人，作为随从，称为长吏。这样做虽是为了尊京师，抑郡县，加强中央权力，却并不是一个恰当合适的政策。州县损抑太过，以致盗贼发生时，州县无法应付。臣以为如今江淮州县的大患有三条：一是城池倒塌，二是兵器甲仗不齐，三是士兵不加训练。为此臣请求陛下恩准诸州郡根

据城池大小，配备数目不等的守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常加训练，并逐渐修复城池，配置兵器甲胄。这样，州郡就有了防乱的办法了。”由这段话可见，中国自秦汉以来，历朝皇帝都致力于加强中央、削弱地方，措施逐渐完备。到宋朝时，这种政策的效果已开始向反面转化。由于削弱太甚，地方虽然无力与中央抗衡，起到了维护统一、避免分裂的作用，但也无力维护中央，起到屏藩和爪牙作用。任何地方小有风波，都会危及中央统治，使中央八面受敌，穷于应付。宋代以后，中国积弱，究其原因，与这种兵力内耗的局面有很大关系。可惜，蜀中这两次变故给人提供的这种启示只有王禹偁等少数人感受到了。朝廷仍是我行我素，地方在继续削弱，皇权继续膨胀，中国也就愈来愈弱。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王继恩传》、《卫绍钦传》、《石知颙传》、《樊知古传》、《郭载传》、《张鉴传》、《许骧传》、《张雍传》、《上官正传》、《卢斌传》、《张咏传》、《雷有终传》、《马知节传》、《符延寿传》、《牛冕传》、《张适传》、《张思钧传》、《李仕衡传》等。

李焘《长编》卷35—39，卷45—47。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4、5。

宋·吕祖谦《紫薇杂记》

宋·曾巩《隆平集》卷20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

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母萧太后亲率大军南下攻宋，宋、辽双方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南）会盟，约定宋每年向辽纳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三十万两匹，称为岁币；又约为兄弟之国。史称澶渊之盟。宋、辽为何要打仗？宋朝为泱泱大国，辽是“番邦”，宋朝怎么会答应与它岁币，还称什么“兄弟?”这次事件的过程和影响如何？听在下慢慢叙述。

五代时辽朝帮石敬瑭做了皇帝，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便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包括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地势高峻，历代被中原政权倚为险阻。辽朝得到这些地方后，俯瞰中原，黄河以北地区便无险可守。宋朝建国后，每代皇帝都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就是为此。辽朝一方，自以为帮了石敬瑭的大忙，得到燕云十六州的酬谢，那是天经地义，受之无愧。而后周世宗曾提兵北伐，攻陷益津（今河北霸县）、瓦桥（今河北雄县南）、淤口（霸县以东信安镇）三关和关南的瀛（今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北）二州。瀛、莫都在十六州数内，辽人以为是奇耻大辱，便不断南下，声言要收复关南地。这样，双方便战争不断。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二次大举攻辽；辽人国力稍增，也兴兵南下。倘若读者一定要问：宋辽战争究竟谁是谁非？这就难言了。旧史家以为辽人南下是夷狄乱华，固然荒唐；“新”史家们也有不少是站在宋朝一边：宋人北伐，认为是为完成统一大业。辽人南下，则说是使中原人民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什么“异族”?

都是中华民族！辽宋统治者争城掠地，胜者王侯败者贼。幽燕土地属宋，或属辽，老百姓一般都没有好日子过，有何是非可言？

自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北伐，辽人大胜一场后，辽朝国势逐渐强大。为报宋人北伐这“一箭之仇”，辽军便不断南下。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南下，宋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傅潜拥步骑八万众，畏懦不敢战；辽人在瀛州，攻杀宋将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然后驱马南行，经过今天河北地区的无极县、赵县、邢台、永年等地，折向东北，从今山东陵县、惠民一带渡过黄河，直攻到山东历城、淄川地区。自是一路烧杀，给宋朝地方政府以很大打击。宋真宗亲自迎战，到大名府，连契丹人的影子也没见到。

统和十九年十月，契丹人再次南下。这次只攻到满城（在河北境）便即回兵。宋朝史官记述说，宋朝的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显在遂城（在河北境）大败辽军，杀二万多人。辽朝史官却说辽军在遂城击败宋兵，进攻到满城，由于路途多泥淖而回师。

二十年三月，又派北府宰相萧继远南伐。先败宋军于梁门（今河北徐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又破宋军于泰州（今河北清苑）。

二十一年，也就是宋真宗咸平六年四月，辽朝的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南下，在定州望都县（今河北境）与辽将萧挞凛一起活捉了宋朝的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这王继忠是真宗即位以前所在的寿王府旧人，真宗只道他已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当真痛悼一番。

契丹兵一次次南下，真宗皇帝深以为忧，每日于便殿延见大臣，访问方略，常常自早到晚，饭也顾不得吃，仍无半点眉目。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死，中书无宰相。欲用寇准，又嫌他年轻。想找一个年高有德者替他押阵，于是选中了翰林侍

读学士兼秘书监毕士安，先提升他为参政。毕士安入朝谢恩，真宗道："先不忙谢，过几天还要用卿为宰相。"接着问道："除卿之外，朝中还有谁能胜此任？"宋制：宰相定员一般是三人，都加同平章事，以兼官定职位高下：首为监修国史，次为昭文馆大学士，复次为集贤殿大学士。若只有二人，则以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为上相。如今三相齐缺，真宗才向毕士安延访宰相人选。毕士安道："寇准为人忠义，善断大事，有宰相才。"真宗道："听说他好刚使气，不知是真是假。"毕士安道："此人处事方正，慷慨有大节；为国忘身，疾恶如仇。朝中大臣无人可比。因此，才不为流俗所喜，说三道四，在所难免。如今边境多事，需要的正是这种不为身谋，敢切敢拉的人。"真宗大喜，说："卿言极是。可是，他要成事，终需借重卿这样年高有德之人。"毕士安推荐寇准，算是为真宗找到了敌御契丹的良策。

寇准是华州下邽（今陕西境）人，十九岁中进士，三十岁为执政。才华横溢，疾恶如仇。宋太宗曾经说，他得寇准，如同是唐太宗得了魏徵。可是他本人却不是唐太宗，终因寇准刚直太过，把他由执政贬为邓州知州。真宗即位后，才辗转升任为三司使。真宗久有大用他的意思，毕士安一席话才最后定下决心。三十天后，毕士安与寇准同时命相，毕士安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寇准为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这一着棋使得宋朝对辽战事化险为夷，这是后话。

这时，北部边境传来消息：契丹的小股士兵经常在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无极）一带侵掠，稍遇不利，便逃窜而去。寇准道："这是契丹人撩逗于我，目的是探听虚实，后面必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愿朝廷整顿武备，加紧练兵，选择精锐军队防守要塞。"

闰九月八日（己未），契丹果然倾国出动。十二日（癸亥）驻兵固安（在河北境），将抓获的宋军间谍绑在立柱上，乱箭射

死，称为射鬼箭。这是大出兵时的重要仪式。十二日（甲子），又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然后杀气腾腾地开进宋朝边境。

边境急报如雪片一样飞入京城，《宋史》说，急报"一夕凡五至"，举朝上下，一片惊慌；举国上下一片惊慌！惟独寇准谈笑自若，一切急报掷于一旁，不理不睬。朝臣大为不满，第二日早朝便奏明皇上，真宗很是惊疑，问寇准道："爱卿真是这样不以国事为意吗？"寇准道："不发急报，谈笑自如那是有的；轻忽国事，微臣岂敢。以臣看来，契丹倾国南下，是自取死路，对我大宋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该当庆贺才是。臣不知众人为何这样自惊自扰？况且臣为群官之首，若临事张皇，何以负陛下的期望？"真宗听了，暗挑大指："好一个寇准，果然不负我的信任。"口中却道："你说得也是，夷狄入侵，不过是小丑跳梁。身为大臣，不该惊慌。"说完，瞟了一眼满朝文武，见一个个低下头去，脸有愧色。其实，真宗自己也惊慌失措，吓得要死。对群臣便不忍再加责备。又说道："可是你说契丹南侵，该当庆贺。那是什么意思？可否向满朝文武解释清楚？"寇准道："臣遵旨。想那契丹，连年兴兵，穷兵黩武。如今已是国力虚弱，捉襟见肘。这次倾国出动，由国主（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其实不过十万左右。我朝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超拥兵十万驻守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二州，足以抵敌。此外，保州（今河北清苑）张凝、莫州石普、北平寨（今河北完县）田敏等各有重兵。还有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魏能、遂城杨延昭，辽人百战不胜，数万人围之不下，号称"铜梁门①、铁遂城。"有兵若此，又何足忧。况且，兵法说：'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如今辽军千里赴敌，孤军深入，必败无疑。敌国之忧，我国之喜，难道不该庆贺吗？"真宗越听越是有理，胆气

① 梁门为徐水古名。

壮了起来，脸上不觉现出喜色，正要出言夸赞，文臣班中一人朗声说道："相公[①]说得好不轻松。殊不知沙场拼搏与庙堂之上大言取宠、虚声惑众完全是两码事。去年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南下，我方部署与今完全相同。而耶律奴瓜不过是辽朝一将，与这一次辽圣宗、萧太后亲自统领，完全不能相比，我军已难以阻挡，以至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部全军覆没。这该如何解释？"真宗以为也有道理，又担忧起来。附和道："对呀，这该如何解释？"

寇准睐眼看时，见是参知政事王钦若，知道此人伶牙利齿，博学有文，不可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多所辩驳，免得惑乱人心。说道："参政所说去年兵败之事虽是实情，但时隔事移，岂能一例看待？臣已有计较在此，容后书奏。陛下若听臣之言，五日之内，强敌必退。"王钦若虽知他不可能有什么回天妙计，但他既说要奏明皇上，自己不便再问，只好作罢。真宗听了寇准之言，却是心急难耐。不等"书奏"，当晚就把寇准召入宫中，询问有何妙计？寇准不慌不忙道："以往我军以多挡少，战则致败的原因是士气不如的缘故。尤其自雍熙三年，曹彬兵败以后，我军将士不少人谈辽色变，如此怎能获胜？"真宗道："对呀，我军对付叛乱百姓那是一以当十，对付辽人可就弱了。辽人弓马娴熟，来去如风，诚不易抵挡。你有何妙计能御辽寇？"寇准道："说也容易，壮我士气是了。臣请陛下御驾亲征，六军将士见到陛下车驾，士气大增，以一当百，何愁强敌不破？"真宗听了，愕然不语。过了好一阵才道："容朕三思。"寇准去后，真宗立刻召见毕士安，将寇准的话说了一遍，道："依卿看，此计是否可行？"毕士安也力赞皇帝亲征。真宗这才定下决心，要驾幸澶渊，以壮军威。第二日，又召集辅臣将此意说了。要众人各抒己见。自然是

① 宋代称宰相为相公。

有人叫好，有人反对，有人说也好也有纰漏，还有的不置可否，只是摇头叹息，所谓“筑舍道旁，三年不成”，任何事要众人品评，意见都难一致。这也不必多说了。

朝廷一面下令永清节度使周莹为天雄军（治大名）都部署，兼知军府事；洺州团练使上官正知沧州，兼部署。又命代州副部署元澄待契丹军南下后，率领所部北攻契丹境，以牵制东面敌人。而命并代州副部署雷有终领兵由土门（即井陉）赴镇州与河北大军合，暂驻兵于平定军（今山西阳泉东南）。一面悬赏河北吏民集结强壮，袭杀契丹，又派使者到河北劳军。宫中出三十万两贸易军粮等等。

闰九月二十日（辛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移大军在唐河（今河北境）一线驻扎。

契丹兵统军、顺国王萧挞凛引兵攻掠威虏军（今河北遂城）。顺安军魏能、石普等人率兵往援。魏能先与契丹前锋军相遇，契丹兵败，魏能杀契丹偏将，缴获了他的印鉴、旗鼓以及随军辎重。转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北平寨总管田敏率部御敌，契丹不胜。又东攻保州，州中的振武军小校孙密率领十余名士兵外出打探敌情，归途恰与来攻保州的契丹前锋军相遇。孙密等退入树林之中，隐蔽起来，张开弓弩，等候敌人。契丹兵见宋兵人数不多，追到林边，跳下马来，抽出兵刃，准备短兵格斗，定要生擒宋兵，以显契丹武士的勇猛。孙密等一言不发，眼见敌人口中呼喝叫骂，手中挥舞短刀，往乱木丛中横劈竖砍，一路奔将过来。弩箭齐发，数人应声倒下。其他契丹兵寻声赶来时，孙密等人已在别处隐蔽起来。这样，杀数人换一处，不一时已有十数名契丹武士死于林中。其余众人连半个宋兵的影子也没见到。难道遇到了鬼魅？想到这里，不觉毛骨悚然，再也不敢往前搜索，发一声喊，退出林去，上马逃走。契丹人笃信鬼神，回大队报告后，以为出师不利，不敢再攻保州，退往别处去了。孙密等人检

查死者尸身，发现其中一人佩着右羽林军使印，必是领队军官。才知方才军士逃走，多半也是看到军官已死，否则纵然害怕，也是不敢后退的。捷报入京，真宗道："士兵如此，只要将领得人，契丹不足为忧。"其实，单独一人是强者，集合起来就是弱者，正是宋军可悲之处。

这一日，萧挞凛与辽圣宗、萧太后会兵攻定州，王超屯重兵于唐河，距定州不过数十里路程，不敢前往应援。部将请行，王超便捧出皇帝诏书，说是奉诏陈兵唐河，诏书中既不言往别处应援，便不许乱动。敢违诏命者斩。契丹见唐河兵不出，知道主将胆怯，声势更盛。但定州守兵顽强坚守，契丹兵仍讨不到半点便宜。正然久攻不下，有一支轻骑兵受到宋军袭击。锐气已挫，便将大队东移，驻兵于阳城淀（今河北望都东南）。

寇准上书说：由边报，敌人游骑已到深、祁二州以东，而我方大军集结在深祁以北的定州。其余诸将，如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集结在更北面的威虏军一带，大名以北的东路没有驻兵，深为不便。请自大名驻兵中调一万人，北屯贝州（今河北清河），由周莹、杜彦钧、孙全照统领。若大名兵力不足，只调五千人马，由孙全照一人统领亦可。若敌军由深、祁继续南下，可命孙全照相机掩击，并与北面驻守莫州的石普、驻守顺安军（今河北高阳）的阎承翰相呼应。由石、阎率本部兵，或另募强壮百姓入契丹境，焚烧村落城镇。并多派密探伺察敌人动静。将以上行动及时上报朝廷，兼报天雄军府（治所在大名）。一来可安定人心；二可张我军势，牵制敌人；三来是振石普、阎承翰部军威。四是使孙全照部与邢（今河北邢台）、洺二州驻军形成犄角之势，构成大名的北部屏障。臣还请朝廷下诏书，御驾出动以后，扈从军士职在保护陛下安全。任何情况下不可贪功与敌野战。如今大名到贝州一线守军统共才三万人，万一敌人闯入贝州以南，可命定州大军拨出三万军队，由桑赞等人率领，结阵南

下；再命暂驻平定军的雷有终部，度土门关与定州大军会合，酌量形势移镇于邢、洺二州之间，这时御驾方可启行。此外可命王超在定州城外结营，与定州守军以及北面的魏能等部相呼应。万一敌人结营于镇、定二州之郊，王超兵便不得再向邢、洺移动。可命魏能等部南下，傍城屯驻，牵制敌人。使其有后顾之忧，不敢轻议南下。朝廷一一准奏。

自从寇准定议御驾亲征，朝议纷纭，反对最力的是参知政事王钦若、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等。由于契丹军队日渐深入内地，这些人的活动也就愈益频繁。王钦若是江南人[①]，劝真宗皇帝到金陵去，以避契丹锋芒；陈尧叟是蜀中人[②]，则劝真宗避难成都。真宗不知如何是好，征求寇准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都在身边，寇准心知是这二人的主意，却故作不知，问道："是谁为陛下出的主意？"真宗道："先不要问谁的主意，你只说说看哪个主意更合适？"寇准道："两个主意都不怎么样。如今陛下神武，将相一心，若御驾亲征，士气高涨，敌军有败无胜。纵使不御驾亲征，出奇兵扰乱敌人的谋略，坚守不战，使敌师老人疲，然后出兵邀击。敌劳我逸，以逸待劳，胜算仍在我方掌握之中。为何要建议陛下抛弃宗庙社稷，远避楚蜀这等偏远的地方？那时候，人心崩溃，契丹再乘势深入，天下还能保吗？出这等主意的人必是存心不良，陛下应立即将其斩首，取血衅鼓，以作'为臣不忠'者戒。"一席话只说得王、陈二人面色苍白，冷汗直流，从此恨透了寇准。寇准也知道这二人终日守在真宗身边，不会有好事。尤其王钦若，更是个厉害人物，朝中留他不得，须要想个主意才是。一日，真宗对寇准说道："天雄军是京都门户，一旦有失，不但河朔地区沦为敌有，京城也会受到威胁。以卿看，谁

---

① 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人。临江：今江西清江县；新喻：今作新余。

② 陈尧叟为阆州阆中人，在今四川境，为川北重镇。

可以为朕坚守天雄军?”寇准立刻想到机会来了。于是说:“敌人攻到大名,形势已很危急,纵有方略,也难以施行。所以古人说:‘智将不如福将’,那时全凭主将的福气了。臣观满朝大臣,惟参知政事王钦若方交红运,福泽正盛,可以守城。”真宗一笑,未置可否。

寇准当即拟好敕命,宣王钦若进府,把皇帝的意思说了,将敕命交给他,要他立即启行。王钦若身为执政大臣,无缘无故,突然降职到外地做知府;那里又正在打仗,他本人是个文臣,何曾懂得守城是怎么一回事?手中捏着那张敕纸,惊得呆了。还没来得及想该如何对付,寇准说道:“皇帝将要御驾亲征,非臣子避难偷安的时候。参政是朝廷执掌权柄的大臣,一定深知其中道理。车马都已预备齐全,候在门外,也不用再入宫辞行了。希望你轻装上路,早早启程,免皇上担忧。皇上不忧,你个人才得身安。”说完命人斟了两大杯酒,说道:“来来来,我敬你一大杯,就叫做‘上马酒’吧。”王钦若被搞了个措手不及,听寇准说,“皇上不忧,个人才得身安。”明明是说:若要迁延,不肯上路,将有大祸临头。心中又慌又怕,半点对付的办法也想不出。只痴呆呆地接过酒杯,随寇准一起饮了,拜别辞行。寇准答拜,他也不觉。左右簇拥着他登上车子。耳边听得车声辘辘,出城而去。心中一片茫然,又隐隐觉得有一种轻松感。心道:他是宰相,我留在朝中,早晚落人他手中。倒不如远远走开的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王钦若到大名以后不久,已是胡骑满野。《宋史》说,他不知该如何守城,只命人把城门堵了,终日在知府衙门中正襟危坐。七日后契丹退兵,他以“守城功”当上了宰相。虽有些过甚其词,无功受赏,却是实情。

前文说到咸平六年,契丹兵南下,活捉了宋朝的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朝廷只道他已遭杀害,其实不然。萧太后看他为人

忠勤谨慎，很能打仗，又是真宗亲信，说不定早晚有用他处，便着意招降他。后来成了萧太后的亲信。这次随军南下，毕竟是故乡热土，眼看城邑被焚荡，村落遭屠杀，有些不忍。一日，见萧太后因前锋不利，正自烦恼。便乘机劝说与宋朝结好。古人说："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契丹连年用兵，境况也是不妙。《辽史·食货志》说，辽圣宗时，由于战争，庄稼熟了，无人收割，民力已经凋敝。这次南伐，不过是强自支撑罢了。而且，萧太后已是年高之人，出兵以后，终日鞍马劳顿，加上处处遇到抵抗，颇不顺利，只觉得心力交瘁，如牛负轭，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场战争。听了王继忠的话，觉得不妨一试。便派小校李兴等四人，带着辽军信箭和王继忠的书信到莫州去见守将石普，请他转呈王继忠给朝廷的密奏一封。石普不敢怠慢，当日遣人飞送入京，真宗拆阅后，见其中写道："去年臣奉诏命，为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战，自早晨战到傍晚，当日营帐未立，资粮没到，人不解甲，马无粮草，士卒二日水米不曾沾牙。又过一日，臣整顿队伍，再上沙场，邀击敌人偏锋。虽有小胜，损折也颇严重。当时王超大军在后，竟不来援。终于为北朝所擒，臣实恨之。不仅痛恨王超辈轻敌寡谋，凉薄自私，也痛恨我自己临事莽撞，进退无节，终于为小人所卖，受此终生耻辱。往事都过去了，再提还有什么益处？所幸北朝念臣早年曾服事陛下于藩邸，后来又将边事寄托与臣。不仅许臣不死，还给以特殊恩宠，使我与诸臣同列。臣还记得，往年赴任时，与陛下面辞，陛下谆谆教诲，要臣以息民息兵为事。如今北朝听说陛下圣德，愿与陛下重修旧好。恳请陛下俯允。"

真宗读毕，沉思不语，少时，将信给左右辅臣传观毕，说道："朕思以往，即使是全盛的朝代，也是以与戎狄和好为利。如今更该如此。朕初即位时，吕端等就曾建议，借太宗皇帝丧事的机会，遣使向北朝告讣。北朝若能遣使吊祭，双方便可缔结盟

好。后来何承矩又请求朕告诫边臣，乘大战之后，双方厌兵，可各自与北朝修好。但是朕念结好缔约是双方的事，对方有无诚意，未见表示，不可强求。否则，徒自取辱。况且，自古以来，北方异族就是中原大患。若不是对他们有大恩德，或者以大兵相威胁，犷悍的本性如何能改？就没照他们的建议做。王继忠这封信也是一样，虽然言词恳切，仍不可相信。”

宰相毕士安道：“近岁来降的契丹人都说，契丹国畏惧陛下神武和本朝雄富，害怕有一天举兵恢复幽州。所以才南下侵掠，抢个先手。如今兵锋已交，屡受挫折。有心退兵，又怕国人耻笑，才通过王继忠请求和解。以臣看来，求和之情倒不似虚假。”

真宗道：“卿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敌以兵事无成而来求和，固然是真。可是，如若答应他的请求，后面必又提出各种罢兵的条件。为使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其他条件倒也罢了，朕都可以屈己从人。要紧的是关南土地，曾经属于辽方，必然借此机会，提出归还。朕是万不能允。和谈终究是一场虚幻。不如及早治兵誓众，与他们武力见高低是了。”于是，写了一道手诏，命石普交给李兴转给王继忠。王继忠见诏书中大意是说，朕是一国之主，岂有不希望停息干戈的道理。卿若真有此意，不妨奏明契丹主，要他们通过边臣转达朝廷是了。言外之意就是：要和，你们派使者来是了。你们主动求和，就不能再提其他条件。王继忠复信，求朝廷先派使者。自然被真宗拒绝了。双方第一轮接触就此失败。

闰九月二十五日（丙子），宋朝廷任命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东面贝冀路都部署，杜彦钧为副都部署，綦政敏为钤辖；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王隐为副部署，孙全照为钤辖。其中孙全照颇得真宗信赖，此人生得五短身材，性格强悍刚烈，治军严毅，通晓兵事。真宗特地召见他，命他除了任西路钤辖外，兼任天雄军驻泊和东南贝冀等州钤辖，还要留心北

面的军机事务，随时奏闻。本来已任命了主官，却要再找这么个人留心军机事务，随时奏闻，原是宋朝皇帝约束、牵制大臣的惯用手段，不足为训，也不必多说了。孙全照倒是有一番气魄，奏道："敌骑一旦逼近魏城（今河北魏县），臣请得骑兵数百，多则千人，小施方略，必能杀他们一个片甲不回。"真宗对他的勇气，极为欣赏，吩咐主官周莹，若孙全照击敌，分兵给他，不要阻难。

此后西北战事捷报频传。二十八日（己卯）岢岚军使贾宗奏：在草城川败敌数万人。十月四日（甲申）麟府路钤辖韩守英等奏：知府州折惟昌奉诏率本部兵人朔州契丹界，前锋破大狼水寨，杀了许多契丹人，生擒四百多人，缴获牛马羊驼和铠甲数万计。二十五日（乙巳），保州、莫州、岢岚军、威虏军、北平寨等都奏称，以偏师人契丹境，各掳获人口、牲畜、铠甲、器仗数万计。

真宗又做了一系列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安排。十月八日（戊子），遣使到滨州（今山东滨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德州（今山东陵县）、博州（今山东聊城西北）等地安抚、召集流亡的百姓。一面命青（治所山东益都）、齐（山东历城）等州的地方政府告谕本部，不要自相惊扰。十日（庚寅），任命兵部尚书知青州张齐贤兼青、淄、潍三州安抚使，知制诰、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三州安抚使。二人又兼领本部转运和兵马事。这两人都颇有行政能力。时契丹军队南下，百姓惊慌逃亡，纷纷渡河南来。黄河杨流渡口的船家贪图厚利，不肯按时开船。丁谓从死囚牢中取一罪犯，斩于河上，假称他是个贪利的舟子。从此船家畏惧，逃难百姓才得顺利渡河。丁谓又将沿河百姓组织起来，分段守卫，各执旌旗、锣鼓、呼喝相闻，声传百余里。契丹军见有防备，才退出这一地区。十五日（乙未），命王超率部向真宗将要停留的澶渊地区靠近。又担心西夏兵乘御驾亲征的机会有所行

动。命知永兴军府（治陕西长安）向敏中兼管凤州兵马，可便宜行事。十六日（丙申），随驾军士有需先行赴澶州或缘河州郡驻扎者，发给装钱。

王继忠得到真宗的手诏以后当即奏知萧太后。不久又通过石普转告宋朝廷说："契丹兵已围困瀛州，这原是契丹旧疆，必欲得之而后已。朝廷要是有意讲和，可速遣使来。若等契丹攻下瀛州，可就晚了。"二十六日，真宗闻奏，对辅臣说道："瀛州城早有准备，倒是不必担忧契丹的攻击。我在想，与契丹和谈的事，双方都不肯先派使者，终究如何了局？我朝先派使者，又能有何损害？"于是写了一道手诏，募军士李斌，带着信箭，将手诏送入敌营，决定派使者入辽营谈判。一面命枢密院物色使者人选。

宋朝皇帝做事大都虎头蛇尾，旧史家已有许多论述，这件事又是一例，先派使者与后派使者的利害关系，宋真宗心中像镜子一样明白。起初坚执不肯，不料没过一月就变了卦。

再说枢密使王继英向真宗推荐说："殿直曹利用曾经说过，若能奉君命出使外国，生死无所避。"真宗道："契丹首先表示与我朝通好，使者前往不会有什么危险。但他这样一个小官，听说朝廷有事，主动请命，值得嘉奖。"于是提升他为阁门祗候，连升了六级。又让他以崇义副使的名义出使契丹。临行，真宗嘱咐说："契丹南来，不求割地，则求贿赂。关南地归中国已久，不可再入契丹；贿赂，汉朝就有以玉帛赐单于的先例，不妨给他一些。"曹利用对契丹南侵，颇为愤恨。说到给契丹财物，大为不平，道："若契丹妄有所求，臣宁不生还，决不答应。"真宗见他出语雄壮，必能不辱君命，颇为赞赏。

二十七日（丁未），以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二十八日（戊申），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刘师道为随驾三司使，兼转运使。

起初，契丹军攻定州不利，东行驻扎在阳城淀。然后缘胡卢河到关南，于十月六日（丙戌）到达瀛州城下，兵势很盛，昼夜

攻城，击鼓、伐木的声音响彻州城四方。制造了各种攻城器械，驱使奚人背负门板，手秉火炬，攀缘登城。瀛州知州李延渥率领州兵和民夫，又有贝、冀州巡检史普部下士卒共同坚守，巨木礌石从城上滚滚而下，城下士卒死伤无数。辽圣宗与萧太后亲自擂鼓催众，调集弓箭手向城上远射以掩护攻城，矢如雨下，守城兵夫竟不稍退。直攻了十多日，双方都死伤惨重。契丹兵不得已撤退，宋军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计。捷书传入朝廷，十一月一日（辛亥）升李延渥为本州团练使，其余将士各有升赏。

十一月五日（乙卯），北面部署奏称："契丹军队自瀛州城下撤退以后，众尚二十万人。欲乘南部空虚，直抵贝、冀二州和天雄军一带。"真宗诏命诸路军和澶州戍兵在天雄军集结。

自从契丹军南下以来，河朔诸州城都是闭门固守，只有冀州知州王屿早就想与契丹一决雌雄，每日操练军队，如今终于有了机会，便大开城门，百姓出人与平日相同。曾上书说："敌若到来，必战而胜之，愿朝廷不要为冀州担忧。"契丹游骑来逼城。果被王屿击败。

十八日（戊辰），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葛霸为副职，孙全照为都钤辖，张旻为钤辖；以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王隐为副职，秦翰为钤辖。

二十日（庚午），宋真宗车驾自京城出发，往澶州进发。

再说曹利用奉命出使契丹，行至天雄军。契丹攻瀛州不下，正大举南侵，向贝冀等州进发。孙全照以为契丹对和解毫无诚意，劝王钦若扣留曹利用不放。契丹兵屡失利，又命王继忠奏请朝廷求和，并说北朝屯兵不敢劫掠，专等朝使到来。王继忠与驾前东面副排阵使葛霸去信，请他速将此意奏明朝廷。当晚，真宗见到奏书，以手诏通知继忠：已遣曹利用启行。要契丹遣使到天雄军迎接。一面派人催促曹利用上路。王继忠得悉曹利用被扣天

雄军以后，奏请朝廷自澶州另派使者，以免误事。

二十一日（辛未），真宗车驾来到长垣县（在河南境）。二十二日（壬申）到韦城（今城已废，址在河南滑县东南），命滑州知州张秉、齐州知州马应昌、濮州知州张晟，巡视所属地区内的黄河防务，并派丁夫凿开冰凌，防止契丹人踏冰过河。

再说王钦若知天雄军，得知契丹人将到城下，全城一片惊慌。与同僚议论如何守城，可就难了。人人知道契丹兵从北方来，防守北门最为要紧，也最危险；南门面向京都，最为安全。城中武官便争着防守南门，谁也不愿守护北门。亏得王钦若"大才"，想了个主意，让众人抓阄。抓了北门的守北门，抓了南门的守南门。各安天命，不可埋怨。天雄军钤辖孙全照却说："我是将家出身，老爹生我就是为了对付这些王八羔子的。阄是不必抓了，你们挑剩下的归我。"于是孙全照被派去守北门。王钦若自报奋勇，要守南门。孙全照道："那如何使得。参政是一城之主，号令所出，谋划所决，应该坐镇中央。否则，南北城间相去二十多里，往来报告，必大费功夫，耽误时机。"王钦若暗道："这'号令'、'谋划'什么的，你们是不必指望了。'坐镇中央'倒要试试。"便痛快答应下来。孙全照平常训练士卒极严，根本不许拣择作战处所。士卒中的弩手每人手执朱漆弩，可以洞穿两层以上铠甲。随所指挥，应用无常。接守北门后，大开城门，放下吊桥，专等敌人到来，契丹人对孙全照闻名已久，竟不敢进攻北门。绕到东门口进攻。一时无法攻入，又绕过东门奔天雄军故城。心知即使攻入城中，有孙全照在，仍难讨了好去。于是乘夜在南门外的狄相庙设下伏兵，大队人马沿官道，向南直奔德清军而去。王钦若听说敌人离城，以为是个机会，急忙点将，带领城中精兵追击。孙全照闻讯，痛悔失声道："这可惨了。敌人自退，必有埋伏，或有精兵断后。这是兵家常识，参政何以不察？"王钦若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果然不一时报说：追兵在狄相庙

遇伏，进退不得，请求救援。城中除了四门守兵，已无兵可派。王钦若抓耳搔挠，不知如何是好。孙全照道："派出的都是精兵，万一触了霉头，天雄军再没指望了。我看契丹兵既退，北门没什么守头了。参政率领老弱在那里照料一下就得，我到狄相庙去走一遭。听说庙里供的唐相狄仁杰，他也是中原人，和尚不亲帽子亲，还能不偏着我老孙几分。"说着在一片大笑声中走了出去。孙全照带着北门守兵赶到狄相庙时，天雄追兵已被团团分割，危急万分。孙全照率部冲人重围，如虎入羊群，左冲右突，不一时把契丹伏兵杀伤略尽。但天雄追兵所剩也不过十分之三四，已无力再追强敌。契丹大队轻而易举地攻占德清军。知军张旦与其子张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战死。

朝廷召王超部大军南移，向澶州进发。命令下达已一月有余，仍无动静。南下的契丹兵知宋军主力远在背后，更加肆无忌惮。真宗驻驾韦城，距契丹占领的德清军不过百余里，快马不足半日程。真宗再没有胆量继续前行，驻在原地也是日夜不安。随行人员中主张南下金陵等地者又活跃起来。真宗心中动摇，召寇准问计。寇准应召入见，尚未进门，听到随行妃嫔对真宗道："外间这些大臣们要把皇上带到哪里去？前边就是契丹军营了，还不赶快回京城！"寇准进屋后，真宗将群臣劝他"南巡"的话说了，问他以为如何？寇准道："群臣胆小怯懦，处事与乡下佬或妇人无异。如今敌寇已经迫近，四方危机。陛下可以进尺，不可以退寸。河北驻军日夜盼望见到陛下銮舆，那时士气增长百倍，契丹何足忧惧？如果陛下后退，人心瓦解，敌寇趁势追击，金陵还可以去得成吗？"真宗仍然犹豫不定。寇准退出屋来，在门屏间遇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道："太尉受国家厚恩，今日是否想该怎样报答？"高琼道："我是个武人，愿为国家报效而死。"寇准悄声将方才的事说了，高琼也觉寇准的话有理，便随他一起去见真宗，寇准道："陛下若以臣为文官，对臣的话信不

过，何不再去问问高琼这些老将军？他们与前方将士的心最为接近。”真宗于是把方才的话又说一遍，问高琼以为如何？高琼道：“寇准说得对。随驾军士的父母妻子都住在京城，有谁愿意抛弃了随陛下去金陵？只怕陛下没到金陵，军士已逃跑干净。愿陛下别再犹豫，尽快赶到澶州。臣等尽死力保护陛下安全。一到澶州，契丹便不难击败。”寇准道：“机会不可失，应赶快启行。”真宗见他与寇准同时进屋，话又相同，怕是预先教好了的。向身后一望，是带御器械王应昌守候在旁，真宗问他以为如何？王应昌道：“陛下代天讨贼，所向必克。再这样逗留下去，敌势更加猖狂。倘若陛下以为过河太过危险，可在河南岸驻扎，发诏书催促王超军队南下，敌人必然自退。”真宗这才打定主意。二十四日（甲戌），车驾启行，继续向北进发。这天，天气异常寒冷。左右取来锦帽貂裘，真宗拒绝穿戴，道：“将士和大臣都顶霜冒雪，不畏寒苦，朕怎能独自穿戴这些。”当晚行到卫南县，遣翰林侍读学士潘谨修先赶赴澶州。那时的澶州城被黄河从中隔断，分为南城，北城。潘谨修传达诏书说：北城将帅、知州等人，不得擅离屯所，到南岸迎接皇帝车驾。

真宗早些时候，曾给王继忠诏书，答应遣使和谈，王继忠如今又写了奏章，托石普转达。石普遣散直官张浩送呈真宗，张浩途经契丹营寨，被截获，引见辽圣宗和萧太后。张浩说明来意后，二人对张浩客气之极，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亲热了好一阵子。然后要他带着真宗给王继忠的诏书，先到天雄军去催曹利用启程。王钦若见张浩从契丹营中来，带的是给王继忠的诏书，而不是给天雄军或给曹利用的诏书，怎敢应承？张浩又独自返回契丹营中，将结果说了。辽圣宗和萧太后命王继忠连夜又赶写一道奏章，大意是要宋真宗在澶州另派使者，和议不可再拖。交张浩一起进呈。真宗拆阅后，重下诏书给王钦若，要他放曹利用启程。又给王继忠写了答诏，而后对辅臣道：“从来函中看，契丹

是有诚意的，朕以安民息战为念，答应和谈的要求。只是他们仍然率重兵继续深入我国土不知何意？如今天气寒冷，河冰渐合，兵马已能踏冰而过，一定要加紧防守。朕决心已定，和谈中敌方若有非分要求，朕必亲励士卒，决一死战。天地神灵必能助我一举翦灭此寇。”

契丹既攻陷德清军，当日推进到澶州城北，直逼宋军大营。将宋军三面包围了，由轻骑从西北角突进。李继隆等部分军士，排列成阵，将强弓硬弩，压住阵脚，等候敌军冲阵。契丹顺国王萧挞凛，机智有谋，勇敢善战，部下都是契丹精兵。契丹屡次南侵，都以他为主力：统和四年（986），擒获杨继业，逼得不食而死的是他；二十年（1002），攻破泰州城的是他；二十一年，在望都生擒王继忠的也是他。杀戮汉族百姓更是不计其数。这次围城，他又是先锋官，根本不把宋军放在眼里。率领亲兵，直逼阵前。身后那根“顺国王”的大旗呼啦啦飘动，于万军之中特别招眼。宋军中有一名威虎军头张瑰守在床子弩边，于旌旗掩映之下，见萧挞凛驱马来回走动，指指画画，旁若无人。眼看他愈走愈近，觑得准了，手拨机牙，“嗖”地一声，萧挞凛应声落马。契丹将士数十人急忙抢前，把他抬了回去。见箭头射中前额，深已入骨。这床子弩何等厉害！宋军中有一种神臂弓，以强力闻名，有效射程不过120步。宋太祖时曾在郊外试床子弩，射程竟达700步。既射在头上，哪里还有命在？当晚萧挞凛就乌乎哀哉了。

二十五日（乙亥），真宗将宫廷保存的两副阵图交给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一副是行进间排列的阵图，一副是不动时排列的阵图。又赐给诸军缗钱、甲胄等。

二十六日（丙子），真宗从卫南出发，到达澶州。欲以驿舍为行宫，要在这里住下来。寇准坚执请去北城，说：“陛下不过河，人心仍怀畏惧，敌气也不会受到震慑，不是威敌取胜之道。

如今四方镇兵汇集，越来越多，陛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高琼也请求过河，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喝斥道：“高琼不可无礼！你不过是个武人，连皇上行止也要干预吗？一旦出了事，你有几颗脑袋!”高琼怒道：“我是武人，那是不错。不像你靠文章做了两府大臣。如今敌骑满郊野，还责我这武人无礼。你倒是有礼，何不做诗一首，吓退敌骑，却要我这武人冲锋陷阵?”说了，也不再请，麾卫士进辇。真宗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到了入北城的黄河浮桥口。真宗传命驻辇，问是到了哪里？高琼以戈击辇夫道：“还不赶快过河！到了这时，还有什么可犹豫?”真宗无法，只得下令进辇。既到北城，登上北城门楼，将天子的黄龙旗抖开了，在城上一摆，城下驻军望见了，群情振奋，一起山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斗志骤增。契丹军眼见这种局面，已知万难取胜，不觉气沮。真宗接着到各营壁巡视，又召李继隆以下诸将慰劳抚问一番，赐给诸军酒食缗钱等，自当日起便在北城行营安顿下来。

这时契丹屯兵于城郊，调王超的主力部队南下，久久不见踪影；澶州宋军虽击毙了萧挞凛，兵力单弱，真宗每日胆战心惊。使人探视寇准，回报说：寇准每晚与知制诰杨亿痛饮讴歌，打趣说笑，彻夜喧哗。见宰相如此胸有成竹，才觉心安。当时人把寇准比作东晋的谢安。

曹利用自天雄军来到辽军营寨，见契丹主与宰相韩德让及群臣等同坐在一辆车中，只有前行、后行之别，礼仪很是简单，质朴。契丹主命人在两付车轭上架起一块木板，摆上食物。给曹利用在车下设了座位，边吃边谈。双方意见颇为不同，契丹主亦不强求，只命左飞龙使韩杞带着国主的书札与曹利用一起返回宋营，来见真宗。到宋营麻烦事就多了，先由翰林学士赵安仁杂取以往制度，制定出一套觐见契丹使者的仪式，由澶州知州何承矩到郊外迎接，又命赵安仁为接伴使，专门陪伴契丹使臣。

十二月一日（庚辰），韩杞去见真宗。先在行宫前殿跪着献上书函，阁门使接了，交给内侍省副都知阎承翰拆封，由宰相宣读。真宗听了道："我早就担心他们索要关南土地，如今果然这样，卿等看该怎么办？"辅臣全都附和真宗，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真宗道："朕的意思不必再说，给契丹的答书也不必说得这般详细，只命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就可以了。"

幸好赵安仁还记得太祖时期国书的体例，否则只怕连封回书也无法写了。

赵安仁将国书写了，交给韩杞，朝廷又赏赐给韩杞一些礼服，金带、鞍马、器币等物。第二日辞行，韩杞仍穿着契丹服装上朝。赵安仁以为非礼，定要他穿上朝廷赐给的汉人礼服。每年给人数十万财物，可以不争，朝廷面子那是非争不可的。韩杞只得换了衣服重新上殿。真宗又单独召见曹利用，把意图分说明白。曹利用问道："若万不得已，答应岁给契丹金帛，数目最多可给多少？愿陛下明示。"真宗沉吟道："必不得已，虽达百万也只好答允了。"

宋真宗曾与寇准商议岁币事，寇准主张半点不给。而且为朝廷制定了击败契丹的方略，说道："这样做可保朝廷百年无事。若许给岁币，是养虎自贻患。虽能得眼前安宁，数十年后，必然再起争端。"真宗道："能得数十年安宁，我就心满意足了。数十年后必有新的对付契丹的办法。"寇准无奈，想知道真宗打算给契丹多少岁币，见曹利用入行宫，早已候在外面。见他退出行宫，迎面拦住问道："天子所许岁币，每年多少？"曹利用道："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允。"寇准道："你仔细记住了：虽有天子明诏，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下你的脑袋来，告谢于国人。"

曹利用第二次到契丹营中时，契丹仍坚持索要关南土地，萧太后道："后晋感我大辽的恩德，已将关南地割给大辽。周世宗无礼强取，如今理应归还。"曹利用道："石晋割给辽朝，周世宗

重又取回，都不关我大宋朝事。我们只知关南地归宋已久，再要割给辽朝，利用断不敢回朝复命。若每年要些金帛财物，倒还可以商议。”辽朝政事舍人高正始道：“我们这次兴兵南来，为的就是关南土地，不达目的，则愧对国人。”帐外武士齐声道：“对，不达目的，愧对国人。”契丹本无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礼数，帐中议事，帐外竟是闹闹哄哄。有人拔刀出鞘竟要往帐中闯。更多的人用契丹话咕咕噜噜，骂声不绝。萧太后一旁只是冷笑不语。待人声稍寂，曹利用淡淡说道：“曹某受命而来，本就没打算生还。难道国主以这等卑恶小技胁迫于我吗?”辽圣宗知不可屈，向身后人望了一眼，有人出帐驱散围观的武士，周围才算安静下来。曹利用又道：“话到此处，已经说尽。北朝若定要割地，只有一战。前些时双方已斗了几场，各有胜负。以后如何，尚难预料。倘若南朝获胜，或者得了个不胜不败的局面，北朝割地固然绝无可能，连岁币也不能得。那时一无可获，焦头烂额而归，是否于国人有愧，还望诸君三思。”辽圣宗和萧太后听了，知道得地已无可能，退而谈论岁币多少。曹利用紧守三十万的大关，终于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共计三十万两匹定议。辽圣宗又命王继忠会见曹利用，表明：辽国主年少，愿与南朝约为兄弟；近见南朝边臣开河浚壕，北朝怕宋人别有举动，希望宋皇帝立个誓，永不进攻北朝。并派亲信大臣将誓书送到北朝来。曹利用要他把这些写入国书，可代呈朝廷。若怕国书写不清楚，北朝可以再派使臣。于是辽又遣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带着国书与曹利用一起来到宋营。朝廷仍以赵安仁为接伴使。这姚柬之颇为傲慢，言谈中把辽朝兵力强盛，战胜攻取的武功吹了个十足。若论斗嘴磨牙，他岂是中原汉人官僚的敌手！赵安仁立刻就给了他个钉子碰，说道：“听说你博学多才，难道没有读过《老子》这本书？其中说：‘精锐的军队，这是不祥的东西。圣人万不得已才使用它。虽然得了胜利也不以它为美。否则就是以杀人为乐事了。乐杀人者必

不能得志于天下。'”从此姚柬之不敢再吹兵强。又屡次夸奖王继忠的才干，王继忠是宋朝降将，岂不是对宋朝的讥讽？但他既是契丹大臣，契丹人夸他，是完全合理的，宋朝人不便硬说他无才。赵安仁对这种场面，也有招法，那就是假装不知，说：“王继忠早年在寿王府做事，听说稍谨慎一些，其他就不知道了。”

十二月六日（己酉），真宗接见姚柬之，姚献上国书。真宗答应王继忠的请求，命近臣奖州刺史李继昌以左卫大将军的名义，带着誓书到契丹营缔约。又答应，契丹撤退时，宋军不沿路邀击。

曹利用初回时，到行营向真宗报告双方议定的岁币数额。真宗正在进食，没有立刻接见他。又急于知道岁币的数目，派一个小太监前来询问。曹利用道：“这是机密大事，应该面奏皇上，岂是胡乱说得的。”太监回复以后，真宗又派人来问，说：“你先说个大概，朕既派他去问，就该相信他。”曹利用仍不肯说。再三相问，只伸出三个指头支在前额上。内监回明真宗说：“他只伸了三根手指。莫非是三百万吗？”真宗惊呼道：“啊呀，太多了！”过了一会儿了，又道：“只要能结束这场战事，也只好如此了。”这座所谓行宫实则是一所很狭窄的房子，室内说话，曹利用在外听得清清楚楚。但他有意给真宗一个大欢喜，真宗进食毕接见他时，一再问岁币数，曹利用只顾叩头道：“数目太多，臣罪该万死。”直把真宗急得心如火燎道：“究竟是多少？”曹利用才道：“银绢共三十万。”真宗长长透了口气道：“原来如此，你把朕可急坏了。”真宗以为才三十万是占了个大便宜，对曹利用厚加赏赐，提拔他为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在京城赐房屋一座。东上阁门使为正六品官，自十月丙午初受任到十二月丁亥共41天，曹利用由正九品的殿直官升到正六品，在正常情况下要经过数十转才能做到。

十二月九日（戊子），真宗因战事已了，即将返回京都，做

了一首“回銮诗”，命近臣赓和；又到北寨慰劳将士，君臣之间自有一番“推让”。李继隆道：“戎虏来到澶州城下时，诸将都认为该入城固守，惟陛下英明，要诸军在城外结营，才得以将挞凛击毙。”又说：“契丹退兵，群臣都要乘机袭杀戎寇，惟陛下有好生之德，以安民息战为念，不令邀击。这次能不战而胜都是陛下英明所致，臣等无尺寸功。”真宗道：“自古北边为中国大患。今天能使契丹畏惧中国之威，深服中国之义，息兵安民，朕心中甚觉快慰。这都是卿等之力。”你一言，我一语，君臣互贺。仿佛得了岁币，而不是给人岁币一般。

北面州军报道：“契丹北去，又不立即退出塞外，日日派游骑四出掳掠。贝州、天雄军居民颇其害。”真宗诏命高阳关副部署曹璨率所部取贝州、冀州路开赴瀛州，途中若见契丹军掳掠，痛击无舍。另遣张凝为缘边巡检，李继和为副，自天雄军中选拔二万骑兵，为后援，尾随契丹军而行，直到把他们送出国境。又给王继忠手诏，要他转告契丹主，把所掠老幼人等放还。

王超曾因坐视不救，使王继忠全军覆没，做了契丹俘虏，朝廷没给半点惩罚。这次又违抗诏命，逗留不进，使契丹得以深入，直到澶州城下，对真宗北行产生很大威胁。真宗道：由于南北通好，可从轻处罚，撤销三路都部署职，改为崇信军节度使。

十四日（癸巳），在行宫大宴群臣。宰相毕士安因病没随驾北行，这一天也赶来朝贺。群臣有的认为岁币三十万，数目太多。毕士安道：“数不多契丹就不会看重，和好也不会长久。”

十五日（甲午），真宗自澶州起驾还朝，十八日（丁酉），到达陈桥。与契丹交换誓书的李继昌归来，契丹使丁振带着契丹的誓书也一同来朝。真宗赐宴后，命曹利用送出境。张凝等奏称，契丹军沿途不敢再四出侵掠，已退出境外。十九日（戊戌），真宗回到京城。在真宗北上澶渊前后，寇准处理许多事情与真宗意图不符，于是主动向真宗请罪，由于事情已有圆满结果，真宗不

但不罪，反而更加信任他。不过寇准年轻好胜，末了又半真半假地说道："臣虽违诏有罪，但是若不违诏，澶渊之盟岂能缔结得这样快捷。"真宗大笑道："你不是向朕请罪，是讨赏来了。"寇准也大笑，君臣间更加融洽了。

寇准曾说：岁币只能保数十年安宁。数十年后，必再起争端。他所料半点不错。仁宗庆历间，辽朝乘宋对西夏用兵，提出增加岁币，使宋朝又一次蒙受耻辱。从此岁币就像一副枷锁，成了宋朝的沉重负担。而且，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辽朝灭亡前，宋朝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旧史家还认为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役就是受了澶渊之盟的恶劣影响。如这次辽兵没能过河，靖康时宋朝大臣也认为金兵不能渡河；这次不战而和，靖康时宋臣也把希望一直寄托在和谈上；这次对契丹退兵，不加袭击，靖康时，金人邀割三镇，退兵时也不加袭击等等。可以说澶渊之盟，流毒无穷。于是后人深悔寇准"使宋朝百年无事"的方略没能得到执行。史集虽没留下这条方略的具体内容，不过并不难推断。想必是命李继隆在澶渊城下牵制住契丹军队，而命王超的主力军北上，直捣幽州。幽州既下，回兵与李继隆夹击契丹军队，一举可灭契丹。对于宋朝廷固是良策，但伤亡必大。若从宋辽百姓的利益考虑，与澶渊之盟后双方在边境互市，数十年无战事相比，究竟谁得谁失，倒也不易判断呢。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寇准传》、《毕士安传》、《曹利用传》、《王超传》、《孙全照传》、《周莹传》、《魏能传》等。

李焘《长编》卷56—59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4、5。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4

元·脱脱《辽史》:《圣宗纪》、《萧挞凛传》。

真宗封祀

真宗自即位到大中祥符初年以前（998—1007），朝中几位贤宰相相继离职。如咸平元年（998）十月，吕端以病离职；景德元年（1004）七月，李沆死；三年（1006）二月寇准免职等。宰相定员三人，自寇准免职后只剩了一个唯唯诺诺的王旦。宋代有名的奸臣王钦若、陈尧叟等却相继做了执政。朝廷难免要出事了。

李沆在位时，王旦为参政。那时在西北边境正与西夏人打仗，整日忙得饭也顾不上吃，王旦感慨说道："你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稳日子？到那时，终日悠游无事，该有多好！"李沆道："以我看，还是有点儿事好，可以使人心不生怠惰。倘若有一天，四方边境宁静了，朝廷内部未必也能宁静。"为什么呢？王旦想不通，后来与契丹和好，边境真的宁静下来了，朝廷无事可议，大臣们悠哉游哉起来，也没见有别的什么事发生，王旦问李沆道："如今不是很好吗？"李沆道："眼下倒是好，怕只怕边患既息，皇帝追求奢侈的心意会慢慢产生。"王旦不语，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此后，李沆每天都把四方州县呈报上来的水旱"盗贼"等事，一桩桩地奏明皇上，王旦道："这些琐碎事不值得麻烦皇上。"李沆道："不然。如今皇上正当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精力旺盛，我要让他知道四方百姓生计的艰难，使他心有所系。否则太安逸了，精力无处使，你想会怎样？一是留意于声色狗马，二

是热衷于兴办土木工程或者发动战争，再不然就是求仙祷神，装神弄鬼，天下可就堪忧了。我已年纪老迈，活不到那时候了。参政适当其时，只怕这事要成你的心腹之患呢。"

后来事实证明，李沆不幸言中了，宋真宗走上了"祷神弄鬼"这条路。他倾全国之力，封泰山，祀后土，祷祭鬼神，搞得劳民伤财，使宋朝政治经济状况恶化起来。本篇就是讲的宋真宗封祀的事情。

封祀起于寇准被贬。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入侵，直打到黄河沿岸，与京都汴梁只有一水之隔。朝中人心惶惶，王钦若、陈尧叟辈主张放弃北方的半壁河山，迁都江南或到蜀中避难。宰相寇准力主御驾亲征，辅佐真宗来到澶州前线，双方签订了澶渊盟约，契丹退兵，宋朝廷转危为安（参见本书《澶渊之盟》篇）。事后，真宗皇帝对寇准更加信任，以为他为朝廷立下了不世功勋。这使王钦若极为嫉恨。某日早朝以后，宋真宗以既敬且爱的眼光目送寇准离开朝堂。王钦若不禁妒火中烧，出班奏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难道是以为澶渊结盟，寇准对社稷有功吗?"真宗道："不错。"王钦若道："澶渊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微臣实在弄不明白。"真宗闻言，脸孔骤然拉长了，很不高兴地说："卿是何意?"王钦若余恨未消，毫不掩饰地说："城下之盟，《春秋》这本圣人经典中说是一种耻辱。皇上身为万乘大国的君主，签订这种城下之盟，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人耻辱?"真宗一言不发，心中很是不快。这使他的自尊心受了极大挫伤。他不仅把澶渊一战当作寇准的功劳，更当作是自己的伟业、壮举。是他"御驾亲征"，才迫使契丹退兵，使国家转危为安的。如今反说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又是经典中早就说过的，让人无法分辩。这怎不叫人沮丧和难堪？王钦若并不是与天子过不去，这样激怒他为的是要他迁怒于寇准。于是又道："陛下见过赌博吗?"真宗道："那又怎样?"王钦若道："赌

博的人输急了眼，就会罄其所有，全都押在赌桌上。败则一次输光，胜也是一次翻过本来，叫做孤注一掷。澶渊这一仗，陛下就是寇准的孤注。他逼你亲自出征，胜是他的功劳，一旦失败，连陛下也输给契丹。陛下能安然坐在这里，完全是侥幸啊！”真宗回想起在澶渊受的惊吓，翻然醒悟。对寇准不但不敬，反而有些怨恨。不久就把他贬为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上任去了。

真宗仍是不开心，终日郁郁不乐。王钦若道：“陛下还在生寇准的气吗？”“不，我在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澶渊既订城下之盟，契丹人一定以为朕怕了他们，背后不知怎样耻笑我呢？”“陛下说得是。”“我一定要雪去此耻。”真宗恨声说道：“卿有什么妙计，可以教寡人。”王钦若知道真宗害怕打仗，故意说道：“这个好办，陛下亲提大军，一举灭辽，夺回幽州是了。”不知为何，这样豪迈的事，由王钦若说出来，却叫人混身发栗。也许是使真宗重又想起了在澶渊时，听到、见到的胡马嘶鸣的惨状，沉吟许久，说道：“如今河朔百姓，刚刚过上几天安生日子，朕怎忍心再把他们驱上战场？卿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王钦若道：“四方百姓无不敬奉鬼神，崇尚祭祀。祭事以封禅为大，陛下不如行封禅礼，必能镇服四海，使周围各国心生仰慕。”真宗听了，心中一亮。知道所谓封禅就是封泰山、禅社首[①]的意思。封泰山就是给泰山封土使更高，是一种古老的山川之祭。后世多借此祭天，与郊坛一样，是一种祭天活动。社首是泰山下的小山，禅社首就是在社首祭后土（地神）。两者合称为封禅。封禅与郊天祀地的不同是：按照传统，只有德洽天下的有道之君才得以行封禅大礼。据说秦始皇封泰山，中途为风雨所阻，不能成礼，为后世所笑。此事的另一面就是：凡行了封禅之礼的皇帝，就表明是有道之君了。所以，自古帝王无不把此事看得很重。封

---

① 禅社首：时代不同，所禅不同，如禅梁父等，意义都相同，见下文。

禅时要刻石纪功，流传后世。天下不太平，不统一，朝廷不富足，不敢行此礼。听王钦若要他封禅，不由得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正要一口答应下来，听王钦若又道："不过，自古以来，必须天降祥瑞，才能封禅。"祥瑞是指河出图、洛出书，醴泉涌，甘露降，芝草生，佳谷见等等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据说是天有意识降下的表示天下太平、吉祥如意的征兆。"可是……"，真宗感到为难。王钦若不等他话出口，抢先说道："可是谁能知道天什么时候才能降下祥瑞来？所以，前代有以人力制造祥瑞的。关键在于人主要对它深信不移，推崇尊奉，并把它宣示天下，使人人都以为真为其事。那么，就与真事完全一样了。比如河图洛书，陛下真的认为像《易经·系辞》中说的那样，有龙马从黄河水中背出一幅图来，神龟从洛水中驮出一部书来吗？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圣人借神道教育后人，即所谓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沉吟不语，以为这话也有道理。"以神道设教"是《礼记》中的话，出自圣人之口，当非虚言。可是，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毕竟理不直，气不壮，心中发怵。想了片刻说道："这么干瞒得了别人，怎能瞒得过宰相王旦，他会答应吗？"王钦若道："臣告诉他是皇上意思，照理他必不敢反对。"王钦若把王旦的为人看了个透，果然他虽不满意，却不敢表示反对。倒是真宗仍然犹豫不决。看来一个人做好事难，做坏事也不容易。所以，古人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才持续了这么久，这是题外话。再说真宗正在彷徨之际，这一天来到秘阁，见直学士杜镐在秘阁当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值班。真宗以为他是个老儒，知多见广，就问道："古人说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怎么回事？"杜镐上了年纪的人，脑筋不大灵便，猜不出皇帝为何骤然要问这种事，只就事论事回答他说："这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见他也这么说，看来圣人"撒谎"是实。那末我又何必太拘泥呢？这才打定主意。心中仍担心王旦出面反对，就召王旦入宫一同饮酒。君臣之间你敬我一

杯，我敬你一杯，直喝得意兴淋漓，心胸欢畅。真宗道："爱卿可否知道今日喝的是什么酒？""老臣知道，是御酒。"真宗哈哈大笑道："不论什么酒拿来朕喝，都是御酒了，朕何必问你？我是说爱卿知不知道这酒的来历？""老臣略知一二。这酒原名为蒲中酒，是蒲州（今山西永济）所产。太祖皇帝即位前最爱喝此酒，即位后便作了宫中御酒。"真宗道："爱卿觉得味道如何？"王旦不住咂舌赞道："好极了，平和淳厚，酒香沁人。老臣今日只怕要醉倒宫中，大大地出个丑了。"真宗哈哈笑道："爱卿所言极是。蒲中民谣说：'蒲中酒，快闭口'。就是珍惜它的香味，莫叫从口中走了。只从鼻中缓缓呼出，淳香缕缕，熏熏醉人，真如在云端里一般。爱卿只管放开量喝就是，醉倒了朕送你回府。再与你带回一坛，与家人一起细细品尝。只是切记莫从口中走了真味，否则就与村酿无大区别了。"王旦连忙谢了，回府时皇上真的送他一坛御酒，命随从抬了回去。谁知打开坛口封泥看时，却是一色小指肚般大的珍珠，不禁惊得呆了。回想宴间皇上说的闭口香等语，已明其意。原来是皇上贿赂他要他免开尊口。从此王旦对朝廷诸事不敢再有丝毫异议。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某日，真宗在崇政殿西侧召见宰相王旦、知枢密院王钦若等大臣，说道："朕的寝殿中帘幕帐幔都是青绝[①]做成，纵在白天，若无灯烛，也是不辨五色。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将到夜半时分，朕正要上床就寝，忽然满屋明亮。朕起身看时，见一位神仙模样的人，头戴星冠，身穿绛袍，对朕说道：'快在正殿建一个黄箓道场[②]，做法事一月，就会为你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此是天机，不可泄露。'朕正要答话，已踪影不见。忙提笔将他的话记下来。自十二月一日开

---

① 青绝：就是黑色丝布，绝，指粗绸似布。

② 黄箓道场：道士所做法事中，场面较大的一种。

始，朕每天不再食荤腥，在朝元殿设了黄箓道场，搭起九层彩坛，用木雕了轿子，镶以金宝，专等神仙能有所赐与，好抬了回来。过了一月多仍不敢撤去。心中正然焦躁，皇城司来奏，说在左承天门南房角上有一条黄帛，上端挂于房顶的鸱吻上。朕急忙命中使前往观看，回来奏道：帛长约二丈余，中间系着一物，如同书卷，上缠三道青丝缕，打结处加有泥封，字迹隐隐可辨。朕也不知是何吉祥，诸位爱卿一同参详一番如何？”王旦想起王钦若的话与那一坛珍珠，已明就里。率领众臣说道：“陛下自即位以来，以至诚奉天地，以至孝奉祖宗。恭己爱人，治理天下，孜孜不倦。以致四远邻国，来修和好；溪洞诸蛮，请求归顺。如今干戈止息，时和年丰，都是陛下辛勤治理的结果。臣等曾私下议论说：天道不远，对陛下治绩必有回报。这黄帛书卷，必是上天所降，作为保佑有德者的明证。臣等为陛下道喜了。”说完一起山呼万岁，叩头拜舞。真宗率众要往承天门奉迎天书，有人奏说：“天书所载，不知何语。众人皆知，恐有不便。还是只率一二大臣前往，其余人等回避了吧。”真宗道：“天书中若是指责朝廷政事，朕与卿等都应恭聆教诲，以思悔改；若只责备朕一人，卿等当督促朕侧身自修，更应让卿等知晓。为何要掩盖起来呢？”众臣一听了，暗挑大指：“好一个有道明君。”只有王钦若与王旦心知是怎么回事。只是王钦若面色恭谨肃穆，行若无事；王旦却是一脸的不自在，心中痛苦，不堪名状。

到了承天门，君臣一起焚香跪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爬上屋顶，取下天书，交与王旦。王旦跪倒在地，手捧过顶，献给皇上。皇上对天拜了，接过天书，放在那顶用珍宝装饰起来的木轿中，与宰相王旦一起步行为前导。皇上那柄行不离身的黄罗伞盖也不用了，其他仪仗也一起撤去。直领到朝元殿摆下的黄箓道场中。由知枢密院陈尧叟亲自启封。众人目光灼灼，紧盯着那个黄帛卷，不知其中是什么物事。要说都相信是天书，那可是小

觑天下士人。其中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只是见天子、宰相、知枢密院事都煞有介事，知道此事非同小可。都是在官场中混得久了的，看风使舵原是扎根功夫，谁敢去触这霉头，自找苦吃？不怕死的也不是一个没有，那也要看准机会，才好说话。若于此时出言阻止，让天子下不了台，岂不是自己找死？所以人人恭谨，鸦雀无声。陈尧叟将黄帛从书卷上解下，又除去泥封，丝结，高高举起，献给皇上。众人这才看清黄帛上有一行文字，写的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翻译出来就是："赵匡胤受上天之命，从宋城（今河南商丘）兴起，做了皇帝，到如今已该传位于赵恒（恒是真宗本名）。赵恒居守皇帝神器，按正道行事，能子孙相传，共七百世，九九大位（即皇帝之位）不会倾倒。"真宗跪在地上，接过书卷。命右谏大夫、翰林学士晁迥宣读。晁迥跪奏道："臣识字有数，世间书尚不能读尽，怎能识得天书？请皇上另择高明宣读吧。"你瞧，这就是一个不怕死的。直把真宗气得暗咬钢牙。在今天这种日子又不便发火，只好改由陈尧叟宣读。众人不禁佩服晁迥的勇气。耳听陈尧叟念那天书，语气像是《书经》中的《洪范》篇，又像是老子《道德经》。内容也无甚希奇，不过是善祷善颂，满篇谀辞而已。读毕，真宗仍跪着接过来，用帛包好，放入金匮。群臣由王旦率领在崇政殿祝贺，接着皇帝赐群臣宴，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把当年年号改为"大中祥符"；群臣加官；京城百姓自二月一日起，赐酺五日；又将发现天书的左承天门改名承天祥符；朝中特设了天书仪卫扶持使的官号等等，忙碌了好一阵子。

前文说的"赐酺五日"，就是准许百姓聚众饮酒，五天之内，不加罪责的意思。自然还有其他活动，如官府军营，各官营手工作坊工人放假，命教坊乐队和京城钧容直班的艺人当街演奏等等。总之，在王钦若、宋真宗的导演下，"天降祥瑞"这出戏算

是成功了。上行下效，此后普天下的地方官都争向朝廷报告祥瑞。也有一些正直的大臣不信这一套，如龙图阁待制孙奭对真宗说："孔夫子说：天何言哉，日月行焉，四时序焉。天是不会说话的，它以日月运行，四季交替表现它的意志。更不会写书，怎么会有天书出现?"真宗默然无语，不予回答。

天瑞既降，下一步就是封禅了。当年三月，兖州地方的绅耆父老一千二百八十七人来到京城请求封禅。接着是各地赴京应试的举子，在兖州进士孔谓等人的倡导下，共八百六十四人伏阙上书，请求封禅。大臣自然也不肯落后，在王旦率领下，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以至州县官员、蕃落头人等共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先后五次到东上阁门呈递表章，请皇上行封禅大礼。真宗召见权三司使丁谓，询问经费有无困难，丁谓答说："足够有余。"于是决定当年十月封禅。命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布告天下。

四月，提升王钦若为参知政事，与另一位参知政事赵安仁同为封禅经度制置使；以丁谓筹划粮草；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筹划沿途营寨道路；以翰林学士晁迥、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待制陈彭年等，会同太常礼院一起制定封禅的有关礼仪制度等等，开始做起了各项准备工作。

自古有识之士都反对搞封禅，认为是一项劳民伤财、诞妄不经的活动。诞妄不经无须多加解释了，下边说一说它劳民伤财的状况。

自决定封禅，沿途州县尤其泰山所在的兖州，要为天子的居处做许多准备。所以自四月起，朝廷拨给兖州公用钱，每月二十万。

自京至兖州有两条路，一是直接向东北方，经过今山东曹县、单县等地到兖州，称为南路；一是由京城北行，经过今河南濮阳、山东郓城等地到兖州，称为北路。朝廷命专使沿途调查二路状况，发现北路沿途邮传驿站的设施比南路好。所以行南路虽

近，花费却比北路大，决定走北路。四月，下令沿途不许修建行宫。这自然只是官样文章。不建行宫，天子住在哪里？州县照建不误。五月，京东转运使奏称，沿途修造行宫须用筒瓦，请求由京城运给。真宗批示：运送筒瓦，太过麻烦，改用普通板瓦。即便用板瓦建造，自京城到泰山千余里路程，每隔三五十里就要建（或修）一座"行宫"，花费已非小数。更兼地方官借这机会大捞一把，有的以建行宫为理由，侵占民田、林木，拘百姓供役等。此外还有祭坛、祠庙等建筑，花费也不在少数。当年四月，就命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一座昭应宫，供奉天书。五月，确定了泰山祭坛的式样：在山顶者圆形，高九尺，直径五丈，四面各有台阶，用青色装饰，坛上颜色各与方色[①]同。坛四周建壝，宽一丈，以青绳三周围绕。坛东方建燎坛，方形，边长一丈，高一丈二尺，坛顶南向开门，门前另建方六尺的平台，以建台阶，称为除道。山下祭坛分为四层，仿照京城郊天圆丘的式样建造，也是四方各有台阶，每层台阶分三梯，四层共十二梯。周围有三重短墙围绕，称为壝。坛东南方也有燎坛一座，形制与山顶燎坛相同。禅梁父的坛建成八角形，分三层，外面也有三壝，形制与京城祭地的方丘大体相同。随行官吏、将士等人沿途在驿站、官府以至庵观寺院居住。由于人数众多，驿站自需大大扩建修葺一番。工程量也必不小。

沿途道路、桥梁的修建也是一项大工程，朝廷专门设立了桥道顿递使的官职负责此事。普通道路要拓宽、布土，经由州郡等人多处，还要在两旁加设栏木，禁止行人或车马经过。登泰山的道路更要加意修筑一番。为了安全，泰山以北到齐州一段自四月就派兵巡视，禁止通行。

---

① 方色：按五行理论，以五色配五方；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中央黄，称为方色。

随从、仪仗也是一大宗花费。五月定制：登泰山、行封祭礼仪仗队用黄麾仗，旗幡、衣饰都用黄色。天书出京直到泰山下，一路用道士百人组成的仪仗队护送，后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皇帝仪仗队用鸾驾二千人，有前后部鼓吹；不仅文武百官、僧道蕃部，连同六军将士也要随行，总共不下数十万人，粮草供应就是一件大事。仪仗中车是一大项，天子乘车有五种，称为五辂。其中金辂、玉辂高二丈三尺，宽一丈三尺，一般州县城门、桥道无法通过。桥道使赵安仁曾请：城门、桥道狭窄者预为拆除重建。真宗命绕道而行。虽如此说，必有一些不可绕行者，拆桥毁城，势不可免。六月，御辇院又奏请新制一种“升泰山天平辇”。为皇帝登山所乘。真宗看了图样，以为太重，命缩小尺寸。后来造成，比原定式样减去七百多斤。此辇大小于此可知一二。制造封禅用的玉，工程量也很大。只玉牒、玉册就有七种。文思院玉工说，十月封禅以前，无论如何制造不出，请求以珉石代替。真宗不允。后来发现，太宗皇帝也曾经打算行封禅礼，命玉工预先制玉牒玉册，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得成功。后来封禅礼没有举行，所制册牒存于崇政殿库中，才解了这一难题。其他物品如坐褥、拜垫等也都重新制作。四月，命沿路州县一律酿酒，供扈从官兵饮用；五月，又命各自增加屯兵，增给缗钱、酒食和其他犒赏；八月，命扈从人等，包括官吏、军士及僧道，蕃官等都发给装钱，数量比往时天子巡视时加一等；九月，命外州军士到京城服役者，役毕以后各赐给锦袍，从驾军士给鞋钱，随从登山的官兵给钉鞋。鞋钱并非买鞋之钱，而是一种赏赐名目。由于数目太大，士兵无法携带，丁谓特为请求设置“随驾使钱头子司。”“头子”是一种文券，士兵支钱改支头子，持头子到指定处取钱，十分方便。为了封禅还附带进行大量的其他祭祀活动，除宗庙之祭外，还规定，沿途旁边十里之内所有神庙、桥道等都加祭祀。其中名山大川、先代帝王功德大者，朝廷派专使致祭，其余山所在州代

祭。又于封祀前的第七日，派官分别祭祀天齐渊等八神[1]，以及云云、亭亭、肃然、徂徕、会稽五山；在泰山下望祭[2]以前曾经进行封禅的所有帝王；封祀前一日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等。

总之，土木工程，制造仪仗，器物，随从食用，犒赏，以及各种祭祀，每一项都是很大一笔开支。

一切准备妥帖后，十月四日（辛卯），真宗自京都启行了。这一日，天尚没亮，抬天书的仪仗队和随行大臣已在乾元门前排列等候。有关官员从宫中“请”出天书来，到乾元门前放入玉辂之中。黄麾仗、前后部鼓吹以及道士组成的仪仗一起启行。先到乾元殿前，随行大臣拜请御驾登程。不一时皇帝从殿内走出来，只见他头戴通天冠，衣穿绛纱袍，威仪棣棣，好不认真。登上大辇后，仪仗队吹吹打打，出宫而来。御街两旁围观的百姓早已是人山人海，他们虽生长在皇王都城，平时也难得见到这种排场，比一台大戏有趣多了。当日，车驾驻在郊外的含芳园行宫。第二日住陈桥驿，距京都不过四十里。如此经韦城（河南滑县东南）、卫南（滑县东六十里）、澶州（今河南濮阳）、濮州（今河南范县南之濮城镇以东）、郓州（今山东东平以北）等地缓缓行来。一路上王钦若等人不断奏报各种祥瑞，如泰山芝草生，黄河上游虽多雨而不泛滥，五色云起于泰山之上等等。终于在十月二十日（丁未）来到泰山脚下的乾封县（今山东泰安），皇帝住在奉高宫中。二十二日（乙酉），知制诰朱巽与负责山顶祭坛事的官员带

---

① 八神：由《史记·封禅书》指天主，祭于天齐渊，在山东临淄南；地主，祭于泰山梁父；兵主，祭蚩尤，在东平陆（今山东汶上）监乡；阴主，祭于三山；阳主，祭于之罘山（今山东烟台北）；月主，祭于莱山（今山东蓬莱）；日主，祭于成山（今山东荣成以东）；四时主，祭于琅邪（今山东境）

② 望祭：祭祀的一种，山川之祭必遥望而祭之，因称望祭，此处也是遥望而祭的意思。

着玉册、玉牒等物，先登上山顶。由于途中自回马岭到天门一段山路格外难行，每人给横板两块，束在身前、身后各一块，板上系有采帛，由亲随士兵前引、后推而行。

二十三日（庚戌）黎明前五刻，皇帝开始登山。先穿戴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带着大型仪仗队（法驾）到山门。换上平时穿的靴袍，改乘步辇。仪仗队留在这里，只率领少数随从官员上山而去。自山根直到太平顶，每二步就有一个士兵守卫，夹杂彩绣等物为装饰，把一条长达数十里的登山道搞成了一条彩绣胡同。

二十四日（辛亥），在山顶的祭坛上祭了昊天上帝。以太祖、太宗的灵位配祭。仪卫使手捧天书，站立在上帝牌位的左方。皇帝穿衮服，戴冕旒，行祭奠礼。其他侍从、导祭之类全都省去。由摄中书侍郎周起宣读玉册、玉牒上的文字。读毕，皇帝饮福酒。然后，摄中书令王旦跪祷说："上天赐给皇帝太一神策[①]，周而复始，永远不断。"祭罢，将玉册、玉牒各放入玉匮、金匮之中，封妥。由王旦放入石匣，太尉冯拯抱到坛下，由将作监官员率领工役封土掩埋。皇上察看毕，回到山上的临时住所中，司天监必来奏报说有祥云绕坛等等，宰相便率领从官前来祝贺，山上山下一起大呼万岁，务必使声震山谷，才够气派。当天，皇上回到奉高宫住所。

二十五日（壬子），在社首山禅祭地神皇地祇，仪式与祭昊天上帝相同。不过由于社首山很矮，皇上身穿袍靴，步行上山。臣僚一再请求乘步辇，皇上道："祭祀就是与神会面，前面不远就要与神会面了。我怎能再大模大样地乘辇而行。"坚执不肯。将盛玉册、玉牒的石匣掩埋后，司天监说是有紫气蒙坛，黄气绕

---

① 太一神策：太一为天帝别名，策指封册。太一神册就是上天封某某为天子，给他的册封简册，或者说是凭据、证件。

天书等等。然后，在山下释放各地贡献的珍禽异兽，皇上回到奉高宫。

二十六日（癸丑），皇上在奉高宫以南的朝覲坛上接受随从群臣的朝贺。不仅文武百官，还有皇亲国戚，四方使臣，蕃客父老，僧尼道士等各界人士都前来祝贺。皇帝当即宣布大赦和赏例：普通大赦所不及的重罪犯也一并赦免；文武官都加官晋级；致仕即退休官按本品给全俸一年；京朝官三品以下穿绯服和绿服满十五年以上者，允许改变服色，原穿绿者赐绯服，穿绯者赐紫服；兖州、郓州免来年夏秋税和屋税，其他所过州县免来年夏季屋税的一半等等。

二十七日甲寅，皇上起驾回京。从这一天起，恢复日常饮食，不再吃斋饭了。皇上召见王旦等随从大臣，一面发给紫花绒袍等衣物，一面慰劳说："自出京以来，有劳卿等与我一起吃素斋。如今祭事已毕，可以食荤了。"王旦等人一边口中答应，一边跪倒拜谢。只有知枢密院事马知节秉性粗直，不肯附和，一旁说道："皇帝不必道劳，吃素斋的只有你一人，臣等来时都带了不少牛肉、猪肉，一起吃了素斋，私下里再吃肉食。吃素斋不过摆摆样子罢！"皇帝愕然问王旦说："真是这样吗？"王旦只好招认说："是！"皇帝又好气，又好笑：欺君慢神，法该斩首。可是——他自已又何尝不是偷吃荤食？原以为做得聪明，把群臣都瞒过了，谁知群臣也是一般心思。好在大家互相欺骗，谁也不吃亏。况且法不责众，只好一笑了之。

十一月二十日（丁丑），皇上车驾回到京都。丁谓又将天书送入大内供奉起来，百官休假三日。然后是各种庆赏。至到年底，这次封禅活动就算结束了。从天书降临以来，举国忙碌将近一年。

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进士薛南与当地士绅、僧道一千二百九十多人，联合上书，请求皇帝到

汾阴（今山西荣河镇北）祭祀后土。节度使宁王元渥也上书请求，真宗皇帝没有答应。七月，文武官、将校、僧道、士绅等三万多人又联合三上表章，请祭后土。于是八月一日（丁未）诏告天下：于来年春祀汾阴。

乍看起来，真宗决定祀汾阴是被动的，其实就像王旦等人吃斋一样，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祭泰山以后，真宗就以为郊天而不祀地，失了对偶之义。既已祭泰山，汾阴祭地势在必行。于是命陈彭年搜辑有关历代祭后土及停祭后土的事实，并把上述认识转告了宰相。宰相既知皇帝意向，百姓上书的事随之出现。与天书的事一样，完全是官方导演的把戏。

此后，便是各项准备活动。首先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兼任河中府知府；以翰林学士李宗谔作副手。另外任命龙图阁待制王曙、昭宣使刘承珪为计度转运事，负责物资运送和供应；以客省使曹利用、西京左藏库使张景宗、供备库使蓝继宗负责修建沿路的行宫、道路。然后，调发陕西、河东（今山西省）地区的士兵五千人到汾阴充力役；沿途增设急脚递铺、驿传等，以保证讯息的及时传递。为此增加的驿卒、铺卒共8450人。又命翰林学士晁迥、杨亿，龙图阁学士杜镐、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等人与太常礼院的有关官员一起研究制订祀汾阴的礼仪制度。

以后的准备活动与封泰山相同。不再赘述。只讲其中一件事，以概见祀汾阴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九月，太监入内高品江守恩为祀汾阴押运石车，行到郑州祖村寨时，干了许多不法事：时麦苗刚刚出土，他便出钱强买百姓来年夏收小麦，称为市青苗，就像后来王安石实行的青苗法那样；私自调动役夫六百人，到民田中抢收禾穗；还擅自调他们做其他私事，稍不如意，就是鞭打杖棰。役夫不堪忍受，逃亡二百多人；又命役夫蔡文义到村中买驴，没有买到，就把蔡活活打死。虽然由于闹出了人命官司，江

守恩抵罪而死，类似强役民夫、占民财物的事却是十分常见的。更由大中祥符三四年间，天下大旱，京城和附近郡县谷价翔贵。这种时候搞封禅，更是对朝廷的嘲弄：一边是地方官、大臣接连不断向朝廷奏报祥瑞，什么黄河清，庆云见，仙鹤翔；一面是赤地千里，万民愁叹。官府不外要在人心中造成一种天下太平、时和年丰的景象，事实如何是从来不管的。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从一个封建文士的角度论述祀汾阴违逆事理的十种表现：一、按照传统封祀大事，要“卜征”五年。五年之内，时和年丰，天下无事，祥瑞屡现，才能举行。不然，应继续修德，推行善政，再卜五年。如今封泰山刚毕，又祀汾阴，大是不该。二、祀汾阴的事自古少见。只有汉武帝想封泰山，又怕遭人反对。才先封中岳，又祀汾阴，然后才到泰山之下。不过是要由渐而致，是把礼汾阴当作了过渡的台阶。如今既已封泰山，再祀汾阴，大可不必。三、《周礼》以圆丘祭天，方泽祭地，就是今日的南郊、北郊。汉初以前只有五畤祭天，汉武帝时才在汾阴祭地。元、成二帝时，接受大臣建议，把汾阴的祭祀移到北郊。以后，帝王很少再有祭汾阴的了。如今既有北郊的祭地活动。又要祭汾阴，实为蛇足。四、西汉建都于长安，距汾阴很近，不妨到那里祭祀。如今都城距汾阴不下千里之遥，陛下远离京城根本之地，跑到那里去祭祀，一旦有事，鞭长莫及。实在不妥。五、河东是唐朝兴起的地方，建都长安以后，仍时时到河东巡视，汾阴是沿途经过的地方。所以唐明皇（玄宗）也祭过汾阴，不过是顺路而为罢了。陛下去祭汾阴却是毫无道理。六、天下有自然灾害，朝廷行事便格外谨慎小心，这是周宣王能够中兴周朝的原因，历朝奉为经验。如今数年以来，水旱灾害不断，陛下正宜谨慎修德，以回答上天的谴责。不应听信奸邪的话，远劳百姓，萧鼓盘游。七、二至八月之间打雷是正常现象，它是人君贤否的象征。如今冬天有雷，明明是天对

陛下的警告，陛下却执迷不悟，要祀汾阴。八、民是神的主宰，所以，先王先成民事而后才致力于神。如今国家土木工程连年不断，水旱灾害很多，而要劳扰百姓，祭祀神祇，是本末倒置了。九、陛下一定要封祀，不过是要学汉武帝、唐明皇刻石颂功罢了。不该务此虚名，有害治道。十、朝中大臣要陛下效仿唐明皇，以开元故事为榜样。实则唐明皇宠嬖后宫，信任奸邪，终于搞得国家大乱，自己也播迁流亡，不足以为陛下榜样。不久又上疏说："为祀汾阴，搞得京城民心不宁，江淮百姓也疲于调发。土木工程尚未停息，已是四方盗贼公行。先帝曾要封祀，由于天灾没有实现。大臣便要陛下继承先帝遗志，实行封禅。其实先帝的真正遗志是北平幽蓟，西取继迁。对此无人献一谋，设一策。反而卑辞厚币，向契丹求和；以高官重爵，姑息李继迁。如今又制造祥瑞，假托鬼神，鼓动陛下，实行久已废弃了封禅大礼，劳民伤财，虐害百姓。实在令人痛哭长叹！"

不管孙奭的表章说得多么痛切，真宗还是我行我素。于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丁酉），离开京城，带着他的仪仗队，带着六军将士和僧道蕃官，由供奉天书的仪仗队引路，浩浩荡荡，向西而去了。经洛阳，出潼关，北渡渭水、黄河。于二月十二日（丁巳）到达宝鼎县（今山西荣河镇），下榻于奉祗宫。从第二天开始斋戒三日，十六日（辛酉），登坛开祭。四月一日（甲辰）回到都城，来回六十八日。

宋朝建国后，平泽潞李筠用了六十天，平扬州李重进用了四十九天，平湖湘高氏和周氏总共用了六十三天，平西蜀孟氏用了六十六天。而祭礼汾阴，出动数十万人的队伍，却用了六十八天！若再加上祭祀的准备时间，更是叫人不堪数计了。

孙奭上书中说，他为大臣鼓动真宗皇帝制造祥瑞、假托鬼神而痛哭长叹。大约任何正直的人都是如此。史书记载王旦身为宰相，每次大的祭祀活动都让他为天书使，手捧天书，在前面引

路。他又明知这是作假骗人，心中的悲哀无以名状，何止痛哭而已。有心揭破这场骗局，当初受了真宗贿赂，错走一步；若请求退职，又觉得真宗待他不错，无缘无故，撒手而去，对真宗不起。因此终日不乐，回想起当初李沆的忠告，常常赞叹说："李沆真是一个圣人。"临死以前对儿子说："我从政一生，对任何事都问心无愧，只有天书一事，觉得万死莫赎。我死以后，愧对列祖列宗，你们把我的头发剃了，穿上僧衣入殓，不得再列于士流。"可见他心中的伤痛是何等深刻。有人把他比作冯道，不免太过。利用政权，作假骗人，不知起自何时。王旦还能有些自愧之心。待所有当事人都心安理得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不可救药了。

封祀无疑对宋代社会有很大影响，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由于封祀还伴随着赐功、大赦、推恩之类，使朝廷制度破坏，政府机构膨胀，政治效率降低了。封建社会每个朝代初建时都实行节俭政治，力求息事安民，与民休息。进入中期后才变得奢侈起来，皇帝往往追求虚名，好大喜功，讲排场，爱铺张。同时，这些现象也是社会趋于繁荣的表现。真宗封祀就表明宋朝开始进入这个新时期了。所以，它对宋朝的影响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标志了上层机构腐化、政治趋向形式化的开始，可以说北宋是自真宗封祀才种下了走向衰落的隐患的。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王钦若传》、《王旦传》、《李沆传》、《陈尧叟传》等。

李焘《长编》卷68—70、73—75。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22

尊奉圣祖

宋真宗封泰山，祀汾阴，搞得轰轰烈烈，全国到处献祥瑞，一片赞颂声。虽有一二反对者，倒是无碍大局。祭祀神祇最后总是要与尊祖和加强君权相联系的，真宗也不例外，这才有了尊奉圣祖的事。圣祖就是皇族赵姓的老祖宗。唐朝宗室曾把道教的创始人李耳做祖宗，赵姓没有这样一个现成的显赫人物，只好制造一个出来。真宗既与王钦若合谋假造了天书，那时是初次作假，还有些犹豫不安（参见《真宗封祀》篇）。第一步既已迈出，再制造个祖宗出来就丝毫不在话下。与此相关的还有修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以及五岳之祭和祭老子等。玉清昭应宫和景灵宫是供奉圣祖的香火地。五岳和老子的祭祀是祭祀圣祖的余波，它开了宋代崇奉道教的先河。下面以时间为顺序介绍一下这几件事的本末。

尊奉圣祖的事起自一个疯道士王捷。他是汀州长汀县（在今福建境）人，咸平年间（998—1003）做生意来到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在旅店中碰到一个道士，自言姓赵，传给他黄白术。黄白术就是炼丹术，因为炼丹是把五金八石炼制成为可以服用的长生不老药，而五金八石之中主要是黄金和白银，所以才称为黄白术。由于旅店中人多耳杂，道士只把炼丹的大概情形讲了一遍，就分手了。当年冬天，又在茅山相遇，道士要他到集市上买来铅汞等物，手把手教他炼丹方法。开炉后，果然铅汞变成了黄金。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几句，铅汞为何能变黄金？炼丹术是

丹家不传之秘，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人记述这类事大多语焉不详。宋人李攸《宋朝事实》说他是将铅汞炼为黄金。而沈括《梦溪笔谈》则说是用铁炼为黄金等等，都不对。丹书中说炼黄金不离铜盐，炼白银不离矾石。铜溶于汞生成铜汞齐，当铜溶解得足够多时，铜汞齐成为固态，外表具有铜的特征，而比重比铜大得多，类似于黄金；矾石多是含铝的复盐，铝溶于汞生成铝汞齐，外观具有白银的特征。这是炼黄金、白银的基本道理。所以，说以铅汞炼黄金是不大准确的，且不管它。再说道士教会王捷炼假黄金以后，又带他游历和州（今安徽和县）诸名山，教他采集仙药和配制方法。临别赠给他一柄小环神剑，再三叮咛说："除了遇到天子，不要轻易露了你的本事。"王捷辞别师傅后便北上京都，求见天子。他不过一介白丁，要见天子，谈何容易！万般无奈，想了一个主意，不如去犯罪，罪大了必能惊动天子。于是就装起疯来，整日沿街大呼小叫。——他又错打了算盘，犯罪未必能见天子。官府审理后，把他直接发配岭南，服役做苦力。他如何能够甘心，不久就逃回京城。官府发了海捕文书，各处张贴，要捉拿他归案，搞得他无处藏身。幸好，有个阁门祗候谢德权，知道他是个有道术的人，把他藏匿在家，找机会奏明皇上。皇上派内监刘承珪前来察验，询问他究竟有何道术？他以师命不许泄露为理由，声言必要见天子才能说出真情。刘承珪为他改名为中正，奏请天子在龙图阁接见他。真宗见他果有本事，授为许州参军，居住在皇城司的官舍内。这时，他还不大受重视。每日无事，独自一人在街上游逛。不久有人发现，在他独居的屋中常有一个道士模样的人与他对谈，不见是怎样进来的，也不见外出。询问时，王中正只说是他的传法师傅。谁也无法见他一面。也不知他们谈论什么？慢慢地，传入刘承珪耳中。刘承珪提出要与他师傅见面。王中正要他在僻静处另建房屋，祷请师傅降临。刘承珪一一照办。于是景德四年（1007）五月十三日，赵道士首

次在新居正堂的纱帷中降临，与外人见面了。但见他头戴道冠，腰下佩剑，穿一身青色道服。从此以后，就常常降临。由王中正把他的话传达出来。别的也无神异处，只是凡有祥瑞，他必预先知晓。真宗封泰山以后，赏赐天下，也没忘了这位赵道士。加封他为“司命天尊”，他就是后来的圣祖。赵姓道士被王中正捧成神仙已是福气不小，如何又变成了皇室的祖宗呢？多亏了真宗皇帝的两场梦。这事暂且不提，还是按时间顺序说下去。

自从真宗买通王旦，与王钦若合伙伪造天书以后，天书一再出现，一年之中连降三次：第一次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三日，降于皇城左承天门顶。第二次是四月一日，降于皇宫大内功德阁。第三次是六月六日，降于泰山醴泉亭北。第二次降天书以后，于四月十六日（丙午），真宗便命于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一座昭应宫供奉天书，命皇城使刘承珪和入内副都知蓝继宗负责督造。此时还只是打算建造一座普通宫殿，作为存放和祭祀天书处。后不久，有了第三套天书，又有了圣祖的事，三司使丁谓便主张把昭应宫的规模扩大，极尽富丽宏敞。许多大臣不同意，以为敬天之道在于心诚，不在奢侈。别人反对倒无所谓，真宗害怕的仍是宰相王旦这一关过不了。便与丁谓商量，丁谓是个大奸臣，奸臣而加“大”字，自必有几分才气，对真宗说道：“陛下富有一国，建一宫以祀上帝。有什么不可以？况且陛下至今没有皇子，在宫城西北方乾位建座宫殿，正可为陛下祈福，早生贵子。若有人反对，陛下只管这么对他说，看他还有何话讲。”后来王旦上书劝真宗不要这样大兴土木，真宗把丁谓那番话讲了，王旦果然不好再说什么。天子为求皇子建宫殿，谁敢再说三道四？倘若真的皇帝绝了子孙，这责任谁能负得了？真宗见丁谓的主意生效，心中大喜，任命他为修昭应宫使，翰林学士李宗谔为同修宫使，原来任命的两个宫使刘承珪和蓝继宗改为副使。时间是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四日（己亥）。

从此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从郑州（今河南境）贾谷山采掘石料，用车辇运载入京，工程浩大。有人建议改入汴河水运。一装一卸，工程同样浩大。木材主要靠秦州（今甘肃天水）供应，宋时是羌族居住区。太祖时，高防为知州，建议朝廷在那里设立采造务，调军队采伐大木，水运入京。西夏酋长尚波于率领部众争夺，不少士卒被杀伤，造成了这个地区的动乱。朝廷不得不改任吴延祚为知州。如今又要大规模采伐，有人担心重起骚乱。秦州知州杨怀忠建议多给羌族酋长茶叶和丝绸，收买他们，把宋朝的疆域向西扩充百余里，所得木材就取用不尽了。真宗道："岂有拓疆百里而不使用武力的道理？"枢密副使马知节则主张用武力拓疆，然后派兵防守。这等于又开辟了一个战场。宋真宗不同意。最后议定，用茶、帛购树木。昭应宫施工约五年半，花费难以数计。

起初，民间百姓有用铜钱点药制造鍮石，牟取暴利者，朝廷严刑禁止。鍮石是一种铜锌合金，称为黄铜，外观类似黄金。自从建造昭应宫，凡是需要用铜件镀金的都改用鍮石。为此在陕西大量开采炉甘石（即菱锌矿），作为点造鍮石的原料，另设专门机构点造鍮石。景德年间，京城中的东西二窑务已经撤销，为建昭应宫，命东窑务重新开张。

经过一段备料筹措，五月十二日（丙寅），昭应宫正式破土动工。起初，对工程估算后，预计需 15 年才能完工，丁谓道："我令工匠夜以继日，昼夜不停，那么七年就能完工。"开工后果然昼夜不停，督促极严。旧制三伏天为工休日，丁谓奏请不许休假。宰相王旦反对，只有作罢。此外西染院使谢德权起初也是工程负责者之一，由于工匠劳役太重，看不过眼去，天天与其他负责官员争吵。但丁谓是主要负责人，谢德权虽满腹牢骚，终无回天之力。只好辞职而去。又有知制诰王曾，写了一道很长的表章，说这项工程有"五不便"：一是工程规模庞大，所用木材，

多是楩楠等珍贵树种，远从豫章（江西南昌）运到京都，耗费大量人力；二是花费大量钱财。虽然府库中钱财山积，不会有太大困难，但都是民脂民膏，多年积聚而得。一旦挥霍而尽，再想积聚起来，就不大容易了。三是数万工匠集中在皇城之下，从事这样沉重的劳役。天气又如此炎热，一旦有不逞之人，乘时而起，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四是王者行事，必顺时令。四月孟夏，不兴徭役，不做土木工程，不伐大树，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如今一切都置于不顾了，以至阴阳不和，雷电疾风成灾。瘟疫疾病流行。五是天书中有"清静育民"的话，如今这么搞，与天心有违。真宗皇帝毫不理睬，工程仍是昼夜进行。

昭应宫规模原已很大，六月，丁谓奏请再加扩充，总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由于这一带都是黑土，刚度较差。决定从京都城北掘取新土，把这一带的黑土换掉。深度据建筑需要而定，浅不过三尺，深者有的到一丈六尺左右。命三司供给船只，沿广济河将黑土运出，新土运入。不妨算算这笔帐，为简便计，假设换土一律深六尺，开掘土方约 741378 立方米，粘土的比重是每立方米 1600 公斤。为便于计算，只取整数为 1500 公斤。按李诫《营造法式》中的工程估算法，运土装船，搬运在六十步以外者每一百五十担为一工，每担 60 市斤，算得为二十四万七千一百二十六工，新、旧土，一装一卸合计约一百万工。若将掘土地也计算在内，还要再加上二倍，若有万人参加施工，单这一项，工期就需三百天左右。

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十八日（辛未），将宫名改为玉清昭应宫。

大中祥符四年四月，真宗祭汾阴归来以后，应华州士绅的请求，曾遣近臣前往祭谢西岳神祇。东岳泰山已经受封，西岳华山又已受祭，五岳诸神，地位一般尊贵，身为天子，如何能这样偏心？于是，当年五月二十二日，颁诏书册封五岳，就是给五岳神祇都加上一个动听的名号：东岳为天齐仁圣帝，南岳为司天昭圣

帝，西岳为金天顺圣帝，北岳为安天元圣帝，中岳为中天崇圣帝。以见圣天子雨露无私的意思。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人与礼官一起制定所需礼节和仪式。

九月二十一日（辛卯），命资政殿大学士，刑部尚书向敏中为东岳奉册使，兵部郎中孙奭为副职；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薛映为南岳奉册使，给事中钱惟演为副职；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知制诰晁迥为西岳奉册使，刑部侍郎查道为副职；礼部侍郎冯起为北岳奉册使，太仆少卿裴庄为副职；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为中岳奉册使，光禄少卿沈继宗为副职。玉册也就是五岳神祇新受官的官诰，其形制规定与宗庙中使用的给祖宗加谥号的玉册相同。

十月八日（戊申），皇帝正式把五岳玉册授给五岳奉册使。这一天，在乾元门外排下了二个仪仗队，一个是五岳奉册使的一品卤簿，另一个是天子授册用的黄麾仗。旁边停放着五辆彩车和五顶龙凤大轿。天子穿着黄龙袍，戴着通天冠，登上乾元殿。满朝文武身穿朝服，分班序立两旁。少时，中书侍郎引着五名内侍，各人手捧五岳玉册升殿；后边是宫中尚衣率领五名宫人，各自手捧衮冕。侍郎和尚衣分立御案两厢。天子起身肃立。侍中宣奉册使、副使上殿，立于丹墀下的香案前，然后朗声唱念制书。奉册使副一字排开，向上跪倒，叩头谢恩已毕，五位奉册使从东阶升殿，在御座前接了玉册，从西阶下殿；五位手捧衮冕的宫女这时来到丹墀之上，将衮冕分别交给五名副使。奉册使副手捧玉册、衮冕走出乾元门，仪仗队肃立奏乐，又有歌者唱和，称为登歌。奉册使副在乐声中分别把玉册放入彩车，衮冕放入轿中。脱下朝服，换上骑马时穿的袴褶①。前簇后拥，上路去了。到达五岳所在州，自然还有一番派场，不再赘述。

---

① 袴褶：袴（kù 裤），无裆裤，俗称叉裤；褶（dié 迭）夹衣。

大中祥符五年七月，朝廷打算在京都新城的南熏门内靠东处修一座五岳观，供奉五岳神祇。为此在京都旧城的朱雀门以东另开一个保康门，将汴河上的广济桥迁到相国寺前，改名为延安桥；在保康门南流过的惠民河（即蔡河）上建一座安国桥，与延安桥、保康门相对。这样就将相国寺和五岳观连结起来。

为了铸造玉清昭应宫正殿的神像，起初命江淮发运使李溥遍访江南巧手工匠，最后决定由杭州冶工张文昱等人在建安军（今江苏仪征）西北的小山下立炉。这李溥也是王钦若、丁谓一类人物。八月十一日（丙午），奏称铸神像的道场前有神雀盘旋飞翔，又有庆云缭绕不散。真宗立刻派遣丁谓前往祭谢，设宴犒赏官吏将校，工匠也各有赏赐。李溥又根据丁谓的意向，在江南广搜奇木怪石，以及各类能工巧匠，送往京城。丁谓对他极为赏识，上奏朝廷说："李溥自从监铸圣像以来，一直奉斋素食，尽心尽力。"皇上特地颁诏书嘉奖他。

十月二十四日（戊午），又发生一件稀奇事，但也是预料中事。这一天，司命天尊降临于延恩殿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八天以前，宋真宗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景德年间曾向他指示天书降临的那位神人，又向他传达了玉皇大帝的命令说："先命你的祖先赵玄朗授给你天书一部。你要像唐朝供奉玄元皇帝李耳那样，供奉你的这位祖先。"第二天又梦见那位神人传达司命天尊的话说："在我座位的西面，应该再斜放六个座位。"于是皇上命在延恩殿摆设道场，按司命天尊的嘱咐新增了六个坐位。二十四日这天黎明五更一筹时，先闻到一阵异香。不一时，有一片黄光自东南方冉冉而来，殿上灯烛全都失了光彩。忽见仙家的几名侍者个个手中拿着琴、剑、拂尘之类，分列两旁，手中器物全都光耀人目。然后天尊也来到殿中，但见他道冠鹤氅，样子有些像道观中泥塑的元始天尊。身后又有六人，都手持笏板，其中四人穿仙衣，另二人戴通天冠，穿绛纱袍，赫然是帝王气象。真宗在殿

下跪拜行礼，忽见殿上一片黄雾升起，雾散后，见天尊与身后六人都已就座。侍者沿东阶站立。真宗皇帝从西阶上殿，再次向天尊叩拜。又要向其余六人叩拜，天尊吩咐道："拱手而揖就行了。一个个拜下去，拜到哪阵子算完。"又命侍者："设榻，要皇帝坐下说话。"真宗坐了，一名侍者手捧碧玉盘，上边托了一只碧玉杯，躬身放在榻旁矮几上，轻声道："请皇上饮碧玉汤。"真宗端起，见杯中汤白如乳酪，呷了一口，甘美芳香，不觉口中生津，一口气饮了下去。直觉得回肠荡气，妙不可言。耳听天尊说道："我是人皇氏九人中的一个，也就是赵氏的始祖。第二次降生到人间时，就是黄帝轩辕氏。世间都知道黄帝是少典氏的儿子，姓公孙，名轩辕。其实不然，轩辕氏母受了雷电的感应，又梦到与神人交会，才在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八里）生了轩辕氏，与姓公孙的少典氏没有关系。唐朝某年七月一日，再次降生人间，管理尘世中所有赵氏家族，到如今已有百年之久。皇帝应努力治理天下，不可中途懈怠。"说完起身离座，脚下生出一朵彩云，飘然而去。天亮以后，真宗把方才的见闻对大臣们说了。还领他们到延恩殿上，将神仙降临起坐的地方一一指给他们观看。把修玉清昭应宫副使李宗谔、刘承珪，都监蓝继宗等也召来一起观看。

二十五日（己未），把这件奇事宣示天下。为表示庆祝，实行大赦。并将来年两京百姓的夏税免去十分之二，其他州县免十分之一；退休官员一年之内发给全俸；先已决定停职的州县幕职官员，暂留五百人，延长一任，任满再停。并命参知政事丁谓、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等人与太常礼院官员一起，商议如何尊崇天尊，应采取什么制度和办法，将商议结果从速奏闻。

二十六日（庚申），群臣到崇政殿道贺一毕，皇帝在万岁殿摆宴，款待宗室诸亲。凭空给赵氏找了位祖宗，他们能答应吗？在宴会上皇帝势必做些解释。大家认可了，然后遣使祭告天地、

宗庙、社稷等，不必细说。

闰十月五日（己巳），给司命天尊加封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这头衔比起初阔多了！只是最要紧的是“圣祖”二个字，它标志着那个只有通过王中正，才能与外界发生联系的采药道士，骤然间成了皇室的祖宗。攀上这门亲，岂有不阔的道理！有关人员闻命，立刻又来锦上添花，请求以玉清昭应宫中的玉皇后殿作为圣祖正殿，东厢房命名为司命殿，作为圣祖办公的处所。

八日（壬申），颁下诏书说：圣祖名玄朗，这两个字从今后谁也不许随意唐突，人名、文书等凡用了这两个字或其中任一个者，一律改为他字，叫做避讳。又以七月一日圣祖的生日和十月二十四日圣祖降临延恩殿的日子，分别定名为先天节和降圣节。届时各放假五天，听任士民宴乐；正日张灯一晚；假期内禁止屠宰，官府停刑；两京与诸州治所在处，提前七日招集道士，建道场，设醮会；改延恩殿名为真游殿，并重加修饰一番。第二天又下命令，天下府、州、军、监，原都建有天庆观祭祀天书，如今再增建圣祖殿，恭祭圣祖。

尊奉圣祖，是为了抬高皇室或皇帝的权威，这个大前提是片刻不能忘的。所以，十二日（丙子），群臣上疏，请求也给皇帝加尊号为“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比圣祖的尊号还多了四个字。虽说是后来者居上，终究有些欺师灭祖。不过是不会有人追究的，皇帝高兴了，人人有赏。

十四日（戊寅），由于黄帝降生的寿丘在兖州曲阜县境，将曲阜县改名为仙源县，并在寿丘兴建景灵宫和太极观，分别作为圣祖和圣祖母的香火地。命由供奉官周怀政与本州长吏共同操办。规模都规定为南向开三门，正门有两重，东西建廊，中为正殿，前后接拥殿（即副殿），廊外侧院建道院和斋坊等，拥殿和道院数目视情形而定。总之，观比宫的数目要少些，男尊女卑

嘛。

京城也应有圣祖的香火地。前文说把圣祖安插在玉清昭应宫的玉皇后殿，毕竟是寄人篱下，于是命丁谓择地另建。最后选中了大内南部的锡庆院，位置与天上太微宫南部的天庙星相应。将原有房屋拆除另建，也定名为景灵宫。

前面说，江淮发运使李溥在建安军督造昭应宫神像，共造了四座，为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各装入一只大船，迎奉使副分别监护玉皇、圣祖两船，都监则分别护送太祖、太宗船。船上用帐幔搭了彩殿，各有内侍负责神像前的香火供具。两岸列黄麾杖，是一支由二千五百人组成的仪仗队。另有五百人的庞大乐队，都在岸上随船行走。后面还有十只船分载道士和门旗幢幡等杂物。每到一处州县，随行道士便大声唱赞，两岸乐队中的吹鼓手鼓起肚子一个劲地吹。州县官必到十里以外迎接，把本州县的道士和乐手集中起来，也是大声唱赞，一个劲地吹。一呼一应，声震十数里。地方官迎送跪拜礼数是不必说了，还要禁屠宰七天，停刑二天。大人们几天不吃肉算不了什么，以屠宰为生的小百姓赚不到钱，不能买米下锅可就不妙了。朝廷派宰相王旦为奉迎大礼使，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迎接圣像，宗室迎接到城外的故驿，群臣迎接到通津门外。太常礼院早已在城外搭起帐篷，把编钟、编磬等称为宫悬的大型乐器架好，神像一到，那番热闹场面与沿途州县自又大不相同。

道士们从祭祀五岳中已经捞到不少好处，但是时机易失难求，岂能就此罢手。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二十日（己酉），亳州官吏、父老2360人到京城请求皇帝朝谒太清宫，祭奠道门祖师老子。真宗在崇政殿召见他们。二十八日（丁巳），文武百官也集体上疏请求；圣祖是个道士，道教祖师是非祭不可的。真宗这才答应下来。八月一日（庚申），命在京城建坛，准备朝谒太清宫后，按南郊祭天的仪式恭谢天地。二日（辛酉），以参政丁谓为

奉祀经度制置使，翰林学士陈彭年为副职，筹划谒太清宫的名项准备工作。亳州离城虽近，天子既然亲行，就有大批随从，吃饭拉屎的地方总是要有的。各种细事都要思虑得到，有所准备。此外，什么大礼使、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桥道顿递使即所谓“大礼五使”更是不可缺少。修行宫、治道路、增宫属等等，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御驾起行，才能算完，不必一一细说了。

大中祥符七年正月15日（壬寅）真宗车驾自京城动身东下亳州。临行下令：十日之内，禁天下屠宰。四天后（丙午）到达亳州，下榻于奉元宫。先在迎禧殿斋戒三日，这之间由奉礼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召集道士，在太清宫做大醮会，算是天子奉谒前的准备活动。斋戒毕，二十二日（己酉）夜三鼓，天子动身去太清宫，按法驾规格组成的仪仗队早已候在门外，自奉元宫到太清宫十余里间，夹路两旁灯笼、火炬排列得密密层层。上半夜下了一场大雪，四野茫茫，映着烛光火炬，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天交五鼓开始行礼：献玉币、酌酒、献酒、读册文、封玉册石匮等等，依次做完。又遣官员把太清宫中供奉的其他仙道也都祭祀一番，如真武星君、张天师、通元真人文子、冲虚至德真人列子、洞灵真人庚桑子、南华真人庄子，连唐明皇、唐文宗也都分了一杯羹。上清宫事既毕，又分遣宰相王旦等人到附近道观殷勤一番，向三清观供奉的三清灵宝天尊，先天观供奉的元始天尊、元母经师，广灵宫供奉的先天太皇，洞霄宫供奉的先天太后、龙女等，都献了玉币，聊表芹意。真宗也到先天观、洞霄宫、广灵宫等处上了香，然后回到奉元宫，颁布恩赏：亳县与所过郡县流放以下罪赦免，死罪上奏后据实情减免；免除税役一年半，永远免除赋税的十分之二；亳州升为集庆军，老子的家乡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东十里）改为卫真县，免除租税徭役二年；改奉元宫为明道宫；道士女冠赐给紫衣师名号，道童正式允许披度人道，总计八十人。接着是真宗皇帝吟诗作文，这是要刻石流传的，万万缺

少不得。

二月五日（辛酉），回到京城，奏告天地、宗庙等，又忙乎一阵，才算结束。自头年八月至此，举朝忙碌已经半年有余。

十一月三日（乙酉），玉清昭应宫终于完工了。群臣齐到崇德殿祝贺，自宫使王旦以下都有赏赐。文官之外，监修宫殿的步军都军头邢兴以下各级军校、工匠，迁官者913人。

这座宫殿自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到七年十一月，共用了五年零七个多月的时间，每天都有三四万人参加施工。共有房屋3610间，不但规模恢宏，而且极尽工巧。有人把它与秦始皇修阿房宫、隋炀帝修洛阳宫相比，从它备料的情形看，此言不虚。如它用的木材有秦州、陇州、岐州、同州（今甘肃天水，陕西陇县、凤翔、大荔等地）所产松木，岚、石、汾阴（今山西岚县、离石、荣河）产的柏木，潭、衡、道、永、鼎、吉等州（今湖南长沙、衡阳、道县、零陵、常德和江西吉安）产的檪、楠、槠木，温、台、衢、吉等州（今浙江永嘉、临海、衢县、江西吉安）产的梼木[①]，永、澧、处等州（今湖南零陵、澧县和浙江丽水）产的槻、樟木，潭、柳、明、越（今湖南长沙、广西柳州、浙江鄞县、绍兴）等州产的杉木等等。所用石料有郑、淄二州产的青石，衡州产的碧石，莱州（今山东掖县）产的白石，绛州（今山西新绛）产的班石，吴越产的奇石，洛水中的鹅卵石等。所用颜料有宜圣库储存的银朱，桂州（今广西桂林）产的丹砂，河南产的赭土，衢州产的朱土，梓、信二州（今四川三台、江西上饶）产的石青、石绿，磁、相二州（今河北磁县、河南安阳）产的黛青，秦、阶（今甘肃武都）二州产的雌黄，广州产的藤黄，孟、泽二州（今河南孟县、山西晋城）产的槐花，虢州（今河南灵宝南）产的铅丹，信州产的土黄，河南产的胡粉，卫州（今河南汲

---

① 梼木：梼，俗名刚木。

县）产的白垩，郓州（今山东郓城）产的蚌粉，兖、泽二州产的墨，归、歙二州（今湖北秭归、安徽歙县）产的漆，莱芜、兴国（今山东、江西境）产的铁等，几乎遍及全国。但是秦始皇、隋炀帝都搞得身死国亡，真宗却能得善终，这主要由于真宗承太祖太宗之后，仓库中已小有积蓄；除了四处奔走祭祀、搞些土木工程之外，在其他方面还算谨慎，不穷兵黩武，不迷恋声色苑囿，不搞严刑峻法；虽然宠信丁谓、王钦若等奸臣，于一二直臣如王曾、孙奭能曲意保全；其间多数时间里是用王旦为宰相，王旦虽然贪图禄位，不敢仗义直言，但此人宅心仁厚，讲究实际，他执政的时期内，除了封祀天书等事外，朝廷无大过失。

尽管这样，真宗弄虚作假，媚于鬼神，滥兴土木，除了给宋朝经济、政治状况投下阴影之外，也给他自己的形象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去世不久，他的这些得意之作便被后人一一否定。如天书，真宗去世时，王曾建议说："天书本为先帝（按：指真宗）而降，不应该仍留人间。"于是全部与真宗一起埋葬。王曾的本意十分明显，他以为留下天书对后人是一种耻辱和负担，才设巧词全部毁掉。玉清昭应宫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六月遭雷击焚毁，三千六百多间殿屋只剩了长生、崇寿二个小殿，距竣工时间（1014）不到15年。刘太后十分痛心，含泪对大臣说道："这是先帝费了许多心血建成的，谁知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枢密副使范雍听出她言外之意是要重建，大声说道："不如把剩下的两座小殿放把火，一起烧了吧。"太后愕然，问："那为什么？"范雍道："先朝时，竭尽天下之力造成这座宫殿，骤然间化为灰烬，可见是天降的惩罚。一起烧掉正是顺天意行事。若重加修复，百姓必不堪命，不是敬从天戒的道理。"宰相王曾、吕夷简也都这样说，太后也就无话可说。真宗制造的圣祖也不大为人欢迎，据载景祐元年（1034）四月，由于连年自然灾害，仁宗皇帝认为，必是有什么事违了天道，让臣僚揭发。于是有人上奏说：早年陈

彭年等人定下的醮会制度是，圣祖大尊地位在天极之上。北极为紫微帝君，总领万物。圣祖不过是司命真君，怎能在紫微之上？打从有了这条制度，天下郡县，常遭灾伤。希望重新制定政策。朝廷命礼院研究解决。礼院也很为难。圣祖既是皇室祖宗，放在北极之下，处在陪祭位置也不大合适。于是搞了个折衷方案，来个“不见面，两头大”。即分开祭祀。有圣祖殿的只供奉圣祖和六位仙官，无圣祖殿的别设醮位，不与其他道家供奉的星官相杂。这样，圣祖与祖宗牌位就毫无区别了。南宋时官方都采用这种祭法。真宗若泉下有知，眼见自己的一件件得意之作被人视为弊政，不知作何感想？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丁谓传》、《孙奭传》、《刘承珪传》等。

宋·李焘《长编》卷68—72、78—84、108。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11《宫室土木》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7《道释》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2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0

丁谓乱政

丁谓自景德二年（1005）为三司使掌财政大权，大中祥符五年（1012）为参知政事，天禧三年（1019）为枢密使，四年为宰相，直到真宗去世，执政十年多，是真宗朝的一个重要人物。

丁谓（966—1037）字谓之，后改为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少年时起，就以才气横溢，远近闻名。诗文受到王禹偁的称赞，说是自唐代韩愈、柳宗元以下三百年无此文。淳化三年（992）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历任大理评事、饶州通判、福建路采访使、峡路转运使、夔州路转运使、三司盐铁副使、知郓州等，政绩都很好。尤其在夔州、郓州任上，更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后来却成了宋朝有名的大奸臣。究竟做什么事，使得他这样名噪一时？这要从真宗封祀说起。

自大中祥符初（1008）以来，他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启迪真宗皇帝东封西祀，装神弄鬼；又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等，耗费民脂民膏，不可胜记，当时人称为“五鬼”。详情在《真宗封祀》和《尊奉圣祖》两篇中已经记述。这时他蒙骗上司，坑害同僚的本事已露端倪了。据记载，有一次朝廷大宴群臣，还召来一帮杂技艺人，以助酒兴。节目主要是魔术、手技之类，如遮藏、弄碗盏酒注、吞丸、挑珠等等。由于表

演精彩，气氛极为热烈。丁谓对知制诰夏竦说道："久闻舍人[1]诗名，这弄碗注的事还无人吟咏过，舍人何不口占一首，让我们饱一饱'耳福'呢？"这话本有三分揶揄，夏竦听了，微微一笑，并不推辞，即席吟道："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谓听了，知道是影射他瞒过天子一人，胡作非为，尴尬万分，又不便发作，只好暂且隐忍下来。这时还有比他官职更大的官员挡道，时时有所顾忌。要在官场中继续攀登，就得把这些人一一扳倒，他开始下手了，目标首先是宰相寇准。

隋唐以来，官场中十分看重门生和座主的关系，甲是乙提拔起来的官员（通过科举、荐引等方法），甲便自称是乙的门生，以乙为座主，或者说是甲出自乙之门。丁谓就是出自寇准之门。寇准推荐丁谓，费了不少气力。当初首相李沆不喜丁谓，寇准一再向他推荐，李不理会。寇准十分生气，当面质问他："在下已屡次向相公推荐，相公终不肯用。是认为丁谓无才呢，还是以为鄙人的话不足听信？"李沆道："丁谓确是有才，但他这种人，你认为能让他位居人上吗？"寇准道："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以为终于能将他压在人下吗？"李沆无可奈何地一笑说："他日后悔，就知道我今日之言不虚了。"

丁谓对寇准自是感恩戴德。后升到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为正二品的高级官员。寇准为人颇有豪气，不拘小节。尤其到宴会桌上，大杯饮酒，大块吃肉，什么礼节也不讲了，常常是不醉不休。有一次中书省会餐，喝得高兴，直弄得汁水淋漓，连胡须也沾了不少菜汤。丁谓坐在他身旁，站起身来笑着说："相公醉了，竟用胡须喝汤。来，来，来，待下官替你擦干净了。"说着就伸衣袖替他揩拭。寇准舌头都大了，却不肯认输，一手把盏，

---

① 即中书舍人，是对知制诰官员的尊称。

一手将丁谓推开，说："谁说我醉了？你，你给我走开。身为参政，是国家大臣，却为，为长官拂须吗？什，什么话？"这本是一句戏言，无奈丁谓人缘太坏，众人巴不得他出丑。听了此言，哄堂大笑起来。丁谓一张脸刷地红到耳根，又不便发作，呆呆坐在凳上发傻，心中恨透了寇准。

还有一个武臣曹利用，澶渊会盟时出使契丹有功，不断升迁，直到枢密使。宋代枢密院、中书省对掌大政，号称"两府"。枢密使与宰相同是朝廷要员。但澶渊之盟时寇准已经做了宰相，曹利用不过是鄜延路的一个走马承受，即通报消息的下级官员，资历相差太远，见识更及不上寇准。寇准便不把他放在心中，说话不免口上无德，伤人太重。如平时论事意见不合，寇准常说："君是一介武夫，只知就事论事，哪晓得国家大体？"曹利用心胸不广，也早把寇准恨在心上。后来与丁谓都做了枢密使，二人便合谋对付寇准。另外有个翰林学士钱惟演，是降王钱俶的儿子，家学渊源，有文才而无德行，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见丁谓官声颇盛，便与他结为姻家，共同排斥寇准。而钱惟演妹嫁了章宪皇后刘氏的哥哥刘美，又沾了皇亲，有刘皇后做靠山。刘美宗族在蜀中横行不法，强占百姓盐井，真宗由于刘皇后的缘故，不加追究。寇准却执意要绳之以法，这就得罪了皇后和钱惟演。

真宗晚年，卧病在床，说话很困难，记忆力也日渐丧失，主要由皇后刘氏主持政事。古时称为妇人干政，颇为忌讳。寇准身为宰相，不能不深为忧虑。天禧四年（1020）六月，奏请真宗说："皇太子威望很高，希望皇上以社稷为重，传位于皇太子。此外，丁谓为人奸险，不可让他辅佐少主，应另选行为方正的大臣为羽翼。"真宗一一答应下来。第二天，寇准按照与真宗商定的事，找来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由于事关重大，杨亿极为谨慎，入夜以后，遣散身边服侍人等，独自关在屋中，挥笔疾书。任何人不放入屋内，就连剪去烛花，也要亲自动手。事情还是泄

露了，据说是寇准酒后失言，也有的说是杨亿对家人走漏了消息。丁谓获知后，立刻入宫上奏，说寇准如何恃权横行，如何罪大恶极，图谋废立，心怀不轨等等。废立本是真宗同意了的，寇准拟表上奏，不过是走走过场。但是真宗把昨天的事已忘得干干净净，听了丁谓之言，以为有理，很是气愤。丁谓因而请求撤掉寇准的宰相职务，真宗便糊里糊涂答应了。天黑以后，召知制诰晏殊起草制书，将丁谓起草的词头给他看。晏殊见是要废寇准，说道："宰相去职，应由翰林草麻，不是臣职权以内事。"宋制宰相、枢密使以上封官或罢官，由翰林学士用白麻纸起草制书，称为草麻，为内制。其他官员由中书省知制诰用黄麻纸起草制书，为外制。寇准罢相而召晏殊，是真宗又做了糊涂事，只好再把翰林学士钱惟演召入宫。钱惟演当真宗面把寇准说得一无是处，劝真宗从重治罪。真宗不理，只道："按例应降何官？"钱惟演只得说："王钦若罢相，封太子太保。"真宗又问："优一等是何官？"答说："国公。"忙从袖中取出一个册子，翻到小国名号那一页，摊在真宗面前。真宗顺手指了个"莱"字。钱惟演又道："如此，中书只剩了参政李迪一个，是否该另外任命宰相？"真宗道："以后再说。"钱惟演只好作罢。

晏殊由于看到了寇准改官的词头，害怕走漏消息，承担责任，不敢归家，当晚在翰林院借宿。第二日降麻，得知寇准改官莱国公，很是吃惊，私下说与他看到的词头不同。别人问他看到的词头是封何官？晏殊自知失言，连忙改口。他既不说，别人也就无由知晓了。不过可以断定：从晏殊退下到另召钱惟演这么一会儿功夫，寇准的官号已变。可见真宗已糊涂到何种程度！

七月十七日（丙寅）以李迪为宰相，冯拯为枢密使同平章事（使相），寇准为太子太傅，依旧为莱国公。这也是一桩糊涂案。起初真宗欲用冯拯为参政，召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制书。杨亿道："这不是臣职权以内事。"真宗道："卿职权内是何事？"答："命

枢密使、同平章事。”真宗点头道：“那就让他做枢密使同平章事好了。”杨亿不敢再争，只好从命。枢密使原已有丁谓、曹利用二人，又加冯拯为三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于是丁、曹都要求解职。真宗这才知道是自己搞错了，召知制诰晏殊商议办法。晏殊又说道：“这不是臣职权以内事。”只好再召学士钱惟演，钱乘机推荐丁谓入中书，以曹利用为使相。于是廿一日（庚戌），诏命枢密使、吏部尚书丁谓为宰相（平章事），枢密使检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使相）。

寇准虽然罢相，仍留京城，又任太子太傅。真宗已是风烛残年，半死不活的了，一旦圣驾归了西，太子即皇帝位，大权岂不是仍落在寇准手中？丁、曹、钱三人如何不忧？于是，日夜谋划，不久就有周怀政的案子发生。

周怀政是个太监，职务是入内副都知，英州团练使。既是太监，职务不论多高，也是皇帝的奴才。自大中祥符末年真宗患病以后，到来年二月，病势日渐沉重，自己觉得不久于人世了。有一天，头枕在周怀政屁股上与他商议，打算要以太子监国，就是要太子代理朝政的意思。周怀政正管理着太子左右春坊的事，自是欢喜，忙找太子太傅寇准商议如何办理。寇准道：“这种事靠皇帝说句话不行，应该先有奏章，皇帝批复了才能作数。”于是找来学士杨亿起草奏章。不知为何又走漏了风声，因与太子相关，丁谓等人不便给周怀政加什么罪名，只不让他再与皇帝接近。周怀政被疏远后，昼夜不安，打算铤而走险：杀掉丁谓等人，以寇准为宰相；逼真宗传位与太子，奉真宗为太上皇；废掉皇后刘氏。与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商议，悄悄与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阁门祗候杨怀玉等共同合计，定于本月廿五日发动。哪知头一天晚上，杨崇勋、杨怀吉便跑到丁谓家里告了密。丁谓深更半夜穿着便服，乘妇女坐的车子，到曹利用家商议。天亮以后，曹利用上殿奏明皇后，时周怀政在殿东庑立班，皇后命

卫士将他拿下。命宣徽北院使曹玮与杨崇勋在宫中御药院审讯。只数刻功夫就审问清楚。真宗坐于承明殿再亲自询问，周怀政无话可说，只一个劲儿磕头，请求饶命。既已招认，怎能轻饶，即推到城西普安寺中斩首。

丁谓怎能放过这机会，不把火烧到寇准身上誓不罢休。不久就查出周怀政与朱能伪造天书的事。天禧元年时（1017），寇准因罪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本道巡检朱能伙同周怀政假造天书。在那以前，天书已经降过三份（参见《真宗封祀》、《崇奉圣祖》），每次朝廷都信之不疑，与天书有关的人都升了官。朱能也想升官，便假造天书。其实，哪一份天书不是假造的？只因与寇准有关，他就倒霉了。与寇准有何关系呢？原来朱能将假天书上报后，真宗与王旦商议，王旦道："最初不信天书的只有寇准。如今天书在他管的地盘内出现，不如命他奉天书入朝晋见。"寇准知道这是他官复原职，重新执掌朝政的机会，便放弃了以往的立场，将天书亲送到京城。可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为名利所动是何等困难，连寇准这种一向以刚正不阿著称的人也不免动心。伪造天书，有欺君之罪，朝廷立即派人前往逮捕朱能及其他有关人员。廿八日（丁丑），太子太傅寇准受牵连降为太常卿，相州知州。女婿王曙、知交好友盛度，亲吏张文质、贾德润等，凡与寇准关系亲厚者都罢官落职。杨亿与寇准交情最深，请太子监国的奏章又是他所起草，寇准罢官后，丁谓召杨亿到中书，杨亿自知不幸，加上平日就羸弱多病，经不起精神上的重压，一到中书，不知不觉间便液俱下，面无人色。丁谓知道他是一介文士，不会害人，也无能力害人，说道："杨公不必害怕，在下不久就要升官，想借重公的大笔，为我写一张好麻。"没受株连的，算只杨亿一人。

八月初，寇准再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当初寇准与李迪同在中书省，李迪对寇准颇为恭敬。丁谓既扳倒寇准，颇不把李

迪放在心上。某日，奏请真宗将寇准贬往边远州县。真宗批复："与小州。"丁谓传达说："奉圣旨，以寇准为远小州知州。"李迪道："圣旨无'远'字。"丁谓当面斥责说："君是亲耳听皇上说了的，如今想擅改圣旨，莫非要庇护寇准吗?"李迪虽不再争，分歧从此表面化了。

朝廷遣使逮捕朱能，朱能不肯就擒，驱部兵反抗，后兵败自尽而死。丁谓以此为借口，又贬寇准为道州司马。道州就是今天的湖南道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朝廷把他的所谓罪恶揭榜朝堂，传告天下。但是，人心自有公道在，寇准一向官声很好，骤然间很难把他搞臭。在上任途中，路过零陵郡（今湖南境），行囊被附近一个部落抢劫一空。酋长得知被抢者是寇准，大惊道："怎么抢了咱们贤宰相的行李!"当即命人送还。史书说，寇准连遭三贬（一贬相州，再贬安州，三贬道州）都不是真宗本意。过了一年多，真宗忽然问道："很久没有看到寇准，是怎么回事?"官员们害怕丁谓，谁也不敢照实回答。这样丁谓算是清除了一个政敌。下面该是李迪了。

十一月，真宗身体稍康复，在承明殿朝见群臣，说："太子年德渐长，更兼皇后贤明，可以辅佐太子。朕不愿再为国事劳心，欲使太子临朝治事，皇后居中辅佐，卿等以为如何?"群臣自然从命。然后命学士起草制书，真宗批复后执行。少不了群臣加官，庆贺一番。别人加官都还罢了，惟给李迪加官，丁谓如何情愿？他原官是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又在中书已久，照理当迁中书侍郎，某部尚书，少傅、平章不变。丁谓只给了他一个中书侍郎兼左丞。按惯例，从来没有两省侍郎兼左、右丞之说。李迪平素对丁谓专权就极为不满，对同列宣称说："我李迪自一个普通百姓，十数年间升任为宰相，只要对国家有利，要我去死也是心甘。岂能趋附权臣以保官位呢?"如今遇到这种事，自不肯俯首听命。第二天在待漏院等候早朝，丁谓又说起，

要把他的一个知交林特提升为枢密副使。李迪大怒说：“林特去年迁右丞，今年改尚书，又做了东宫官，都不合规矩。众人议论纷纷，至今未止。况且，前日已经上奏，以他为太子詹事，尚未批复，又要迁枢密副使，难道你要一手遮天，一点王法也不讲了吗？”二人三说二说吵起来。由吵而骂，骂不解恨，又动起手来。丁谓这个江南士子如何是李迪这位燕赵壮士之敌，李迪手持笏板，劈头打来，先就占了上风。丁谓只有落荒而逃，被李迪直赶了个驴推磨，团团转。其余诸臣苦苦劝阻，毫无用处，二人直扭打到天子临朝的长春殿上。时太监从宫内抱出一摞制书，放在真宗面前。真宗道：“这是你们辅佐太子的加官制书，朕已批复过了，都有升赏，为何还要打架？”李迪道：“臣请求不受此官，要与奸臣丁谓辩个清楚。”于是将他如何结党弄权，中外畏惧，敢怒而不敢言的事说了一遍，如林特枉杀人命，家属告到京城。由于是丁谓一党，无人敢于处理；寇准无罪，连被贬官，是由于得罪了丁谓；钱惟演身为外戚，祖宗成法：外戚不得为执政。只因与丁谓是姻亲，做了执政大臣枢密副使。又说曹利用、冯拯也是丁谓一党等等。曹利用向来居功自傲，如何肯依。当即反唇相讥道：“别人得官都是靠结党，只有你李迪是于国家有功得的官？我看就未必。若以片文只字，写个诗呀赋的，臣不如李迪；若论赤手空拳，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营，李迪就不如臣了。”他又卖弄起出使契丹那回事了。闹闹嚷嚷，真宗也难辨曲直。问道：“难道中书有什么事做得不对吗？”众人道：“别的也没什么不对。”真宗道：“那就都给我退下。”惟独留枢密使、副使询问这场风波的由来。真宗十分气愤：两个宰相竟然像泼妇骂街一般对骂，而且又抓又搔，成何体统！要把二人交付御史台治罪。曹利用、冯拯知道李迪这般闹法，正是要与丁谓同归于尽。劝道：“宰相下狱，骇人听闻，影响太大。况且，丁谓本来没与李迪争辩，是李迪一人在闹腾。一起对辩不大合适。”真宗道：“是非曲

直未分，不对辩怎成？”虽如此说，经二人一再解劝，真宗的气渐渐平息下来，说道：“卿等退下吧，朕自有处理办法。”吩咐学士刘筠起草制书，丁、李二人各降一级，免除宰相职务，丁谓改任河南府知府，李迪改郓州知州。李迪为此在承明殿求见皇上，又求见太子，说了些什么，无人得知。丁谓一心想留在朝廷中；钱惟演也怕丁谓离京后，失了强援，也求皇上，挽留丁谓。为不使皇上生疑，只好连李迪一起挽留。说是：“契丹使不久入朝，两个宰相同时免职，群官无首，不大好看。为免二人继续争执、不妨中书再加一个宰相。冯拯久在朝中，最为合适。”真宗一一答应下来。明日，命丁、李复职。时刘筠起草的免职制书尚未发出，又要起草复职制书。由于时间紧迫，只命舍人院起草个外制了事。外制尚未颁下，又发生了变故：丁谓在承明殿见皇上，皇上询问与李迪争吵的经过，丁谓道：“不是臣与他争，是李迪当众辱骂臣。臣以为不该与他同时免职，请皇上把臣仍留朝中，得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丁、李复职，真宗原已答允了的，对丁谓这番话，自无异议，点了点头说：“你坐下来说吧。”丁谓谢恩已毕，一旁侍候的小太监搬过一张绣墩放在他身边。宋制：皇上赐坐宰相坐杌子，其余大臣为绣墩。丁、李免相，众人皆知，所以小太监才给他搬了一只绣墩。丁谓立刻说道：“有圣旨，重又做了平章事。”小太监只得重新给他换一张杌子。这一切都是当着皇上面发生的，皇上不加否认，宫内官员自然认为丁谓确实官复原职了。丁谓辞别皇上时，按照礼节，就由入内都知张景宗送回中书省。中书省属吏也由此知道丁谓复职。只有丁谓一人知道，他这个宰相仍是冒牌货，并未降麻。众人尚不知李迪也已“复职”。丁谓要利用这个时机，将假的做成真的。于是召来学士刘筠为他复相草麻，刘筠道：“任命宰相，应由皇上当面说了，才能作数，你自己说那怎么成？”不肯答应。丁谓无法可施，另召学士晏殊。不知怎样威胁利诱，晏殊竟然给他写了白麻制书。

刘筠不知晏殊作何答复，候在门外，专等他出来时询问明白。晏殊心中有愧，连招呼也不敢打，从旁边溜走了。

丁谓既为真宰相，是中书省主官，而舍人院是中书省所属机构。真宗初命舍人院起草丁、李同时复职的制书，本来不合手续，丁谓自可堂而皇之地命舍人院将那制书作废，并以中书省名义催促李迪尽早离京，到郓州赴任。而真宗糊里糊涂，对这种结局恍然不知。曹利用、冯拯、钱惟演辈知道真宗命李迪复职的人，不会找真宗质问；而李迪的知交又不知内情。李迪只好抱屈离京了。

但是，要说李迪冤案完全是丁谓利用了真宗糊涂造成的，也不尽然。真宗久病，记忆力已开始衰退，若事事像李迪案一样，糊里糊涂，那还了得？其实朝中另有明白人管事，就是皇后刘氏。真宗管事，只是个样子，不妥处另由刘氏裁决。刘氏冰雪一样聪明，诸事过目不忘。偏偏对于李迪案，视如不见，任丁谓折腾，其中自有缘故。真宗由于患病，喜怒无常。一天，突然对辅臣大发脾气，说："宫中所有的人都跑到刘氏那里去了，只剩下朕一人在宫里，真是可恨，可恼。"群官听了，谁也不答话。明明是皇帝在吃刘氏的醋，他们夫妻间的小小纠纷，别人有什么话好说？偏偏李迪不知好歹，接口道："国有国法，家有家法，皇上不喜，以法办事是了。"刘氏恰在屏风后偷听，对李迪免不了心中怀恨。如今见丁谓捉弄李迪，她也就不管不问，听之任之。

丁谓还有一个政敌是王钦若，他比丁谓资格老得多。大中祥符间，他引导真宗弄虚作假，伪造天书，祭神祀鬼，丁谓帮了大忙。所以，王钦若极力提拔丁谓。哪知丁谓入了两府，便不再理会王钦若。王钦若虽然痛恨，一时间却也无奈他何。王钦若官太子太保，丁谓虽为宰相，才是太子少师，只论东宫官，反而在王钦若下。如今太子将要主政，东宫官何等重要，丁谓如何心甘！一日宴会，真宗看到王钦若，把他的事全都忘了，只觉得十分熟

悉，仿佛是个大臣。问道："这些日子卿为何不到中书来？"王钦若道："臣不是宰相，怎敢到中书？"真宗道："这有何难，我派人送你去是了。"转脸对入内都知说："你带他到中书省上班。"王钦若心中大喜：没料到当宰相竟这等容易！抬眼望丁谓，丁谓大声吩咐从人："皇上恩准王公到中书视事，快去安排宴席，等候与王公道喜。"王钦若惟一怕的就是丁谓横生枝节，出面拦阻。听他如此说，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御宴之后，入内都知带着王钦若到中书省上任，丁谓却使人拦在门前说："没降白麻，如何能到中书省来？还是暂且请回吧，等学士院起草了制书再来。"王钦若只好暂时归家。而入内都知向皇上回了话，皇上顺口吩咐说："著学士院从速起草制书。"入内都知向学士传达圣旨。可是，只知道是王钦若封平章事的事，兼官如何处置，却不知道。白天被中书挡了驾，中书必知详情。于是，向中书询问，回答说是封王钦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而且下了正式文函，加盖有中书省都堂大印。学士草制有三种情形：一是皇上当面吩咐了，学士记录下来，请皇上过目后，回到学士院作为草麻的根据，称为面谕。二是皇上写了，函封以后，差内监送入学士院，作为草麻依据，称为词头。三是中书写了，奏请皇上批准后，加盖御宝，也函封了送学士院，称为熟状。如今有了中书文函，内使口传，二者相合，都是说封王钦若平章事，与熟状相同，于是起草了制书。第二天，真宗听说朝罢降麻，是大臣王钦若封拜的事，只道是封了平章事，也就不再多问。哪知平章事与节度使同平章事却大不相同，前者是宰相，后者是使相。王钦若得了个使相，还要到河南府上任，连京城也不许呆了，还不如做太子太保，真是有口难言。

丁谓从此没了顾忌。二府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外朝的事可说是大权独握。天禧五年春，翰林学士刘筠暗道：皇上久病，糊里糊涂，奸臣乘机弄权，这样的局面怎可再为朝官？便上书请求

外任。丁谓巴不得他赶快离朝，打发他到庐州做知州去了。

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戊午），真宗死于延庆殿中，仁宗即皇帝位。群臣听皇后刘氏传达真宗遗言说："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然后由参政王曾整理成文字稿，形成正式文件。丁谓主张把"权听取皇太后处分"的"权"字去掉。王曾道："政事取决于后宫，这已是国家的不幸。有这个'权'字，还勉强可以向后人交待。去掉'权'字，成什么样子？况且，先帝的遗言犹在耳中，怎么能随便更改？"丁谓无话可答。王曾又道："尊淑妃为皇太妃的事不是当务之急，不妨以后再议，暂不写入遗书之中。"丁谓听了，很不高兴，暗道："我要去掉一个字，你说什么'言犹在耳'，不能随意更改。你却要将整句话删除，岂有此理！"愤然说道："参政难道要擅自更改制书吗？"王曾道："你是宰相，这不是与你商量吗？何谓擅自更改制书？"三言两语，又吵起来。只是朝中多是丁谓一党，无人帮王曾说话，王曾只好作罢。二人既已闹翻，此后，凡有大事，王曾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丁谓一时之间，倒也无法可想，只有稍加收敛。

遗书既要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皇太后想与仁宗皇帝同殿听政，要二府大臣制定有关礼仪制度。王曾根据东汉章帝、和帝皇后窦氏、邓氏等临朝的先例，请太后每隔五天在承明殿听政一日，皇帝坐左侧，太后坐右侧，门前挂竹帘，群臣在帘外奏事，太后与皇帝在帘内共同决断。皇帝降圣旨说："可以这么办。"以后丁谓忽又提出新方案，要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次临朝，与群臣相见，有大事则由皇帝、太后共同召见辅臣决定处理办法。非临朝的日子遇到的小事，由中书处理后，命内侍雷允恭送到宫禁中批复。王曾道："这样，皇帝和太后两宫不在一起，不免会有异同，中书与宫廷的联系单靠宦官雷允恭一人。以后必有祸乱发生。"丁谓不听。他这样做，是要由他这个中书首相与

宫廷共同处理政事，让其他官员谁也插不上手。

廿四日（癸亥），太后降下手书，决定按丁谓意见办。太后难道不知丁谓的奸计吗？为何采用他的决策呢？太后有自己的想法：若按王曾意见，与皇帝同殿听政，当时裁决，易出差错；按丁谓意见，在宫中慢慢处理，又有中书的初步处理方案可作参考，与皇帝有了分歧，尽可慢慢商量，不必立即做决定。

廿九日（戊辰），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罪名是与周怀政交通；户部侍郎、郓州知州李迪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副使，罪名是朋党。王曾对此大不以为然，问丁谓："是否处分太过了？"丁谓注视王曾，感到惊诧，没想到他敢公开为寇、李说情，道："怎么，可怜他们了吗？你这居停主人恐怕也罪责难逃，不知有没有人可怜你？还是少说两句，安分一些好。""居停主人"就是"房东"的意思，寇准曾经租王曾的房子居住，丁谓凭这一条就能把王曾当作寇准一党，撤职查办。王曾不再出言。丁谓要知制诰宋绶起草文告，宣布寇准罪状于天下。宋绶请问寇准罪名，丁谓道："《春秋》中说的'无将'[①]，汉法中的'无道'[②]都很适合。"宋绶暗想：这怎能挨得上？又不敢不用，只有将这几个字变换后使用出来。丁谓看了，很不满意，道："舍人连做文章也不会了吗？"宋绶只好道谦，自称不才，请求圈改。丁谓按自己意思删改一番，其中说："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致沉剧。"意思是寇准等犯法时，正赶上真宗生病，受了惊吓，因而一病不起。换

① 无将：见《公羊春秋·庄公32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颜师古解释说："将，有其意也。"所以"无将"意思是不要有反叛的念头。全句可译为：即使是国君父母，也不可有反叛的念头，否则一样要杀头。丁谓话中的无将是指反叛或打算反叛。

② 汉法中的"无道"指手段残忍一类的罪行。如无罪而杀一家人三口以上，肢解人，放养蛊毒等都称'无道'。

句话就是真宗皇帝是被寇准吓死的，还不是罪大恶极？

丁谓必欲将寇、李二人置于死地而后快。贬书初下时，特命中使带剑前往宣读敕书。来到道州时，寇准正与州中官吏宴饮，一起起身迎接。中使与众人一一见礼，惟独不与寇准交一言。众人见中使马前挂一锦囊，内装宝剑，料定是御赐宝剑，前来处决犯官。寇准看来凶多吉少了，不禁担心他会在宣敕以前自杀。这样就正合了丁谓心意。哪知寇准为人豪放，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这套把戏吓他不倒。先派人询问中使："来到道州，有何公干？"中使不予回答，又使人说道："倘若朝廷赐我寇准自尽，把敕书拿出来？我照办就是。若无敕书，你躲躲闪闪又有何用？"中使不得已，才把贬书取出，寇准看了，见是把他贬为州雷司户参军，是个从九品的小官，已经不能再小。一言不发，将贬书恭恭敬敬放在案上。他也没穿官服，无法行礼谢恩，就从身边一个录事参军那里借了一套绿衫，穿带起来。寇准是关中大汉，衣服才及膝盖长，他也不以为意，朝案上贬书行礼毕，脱下绿衫，继续与众人一起喝酒，直喝到日暮才罢。中使一旁看了，也不禁为之心折。李迪就不这么豁达了，见中使作出那番姿态，决定自尽。不过被儿子东之发现，救了下来。凡有人来见李迪，中使便把名姓记录下来；送来食物，放至腐烂，也不转交李迪。其实并不是朝廷旨意，是中使故意作恶。若据理力争，他也就没咒念了。但李迪却不敢。这时恼了一人，名叫邓余。原是李迪富贵时养的食客。李迪获罪后，不愿离去，与他全家一起到了郓州。邓余指着中使大骂道："你这小子是想逼死李公讨好丁谓吗？别人怕死我邓余不怕。你若敢杀李公，我必杀你为李公报仇。"一路护送李迪直到衡州，从不离开半步。李迪这才得以不死。有人对丁谓说道："假若李迪被逼死于贬所，你就不担心天下人说些对你不利的话吗？"丁谓哈哈笑道："纵有一二个好事书生记述这件事，也不过说'李迪之死，天下惜之'罢了，有什么可怕？"

古语说："天道无亲，惟向善人"。若把天道理解为自然规律，这句话大抵是正确的。作恶的终究不会有好结果，丁谓的厄运不久就降临了。

丁谓与内侍雷允恭勾结，独霸朝政。真宗于乾兴元年二月去世，丁谓身为宰相，按照惯例，当了山陵使，就是为真宗造坟墓的总负责人。宫中大小太监纷纷走门路，托人，在工地上觅一份差事。嘴上说是对先帝的一片忠心，其实是借机捞点儿油水。说也奇怪，只有雷允恭半点差事没抢着。这并非丁谓不给面子，而是皇后无论如何不放他出宫。雷允恭岂肯罢休，哭求太后道："先帝在日，对我不薄，奴才死不足以报先帝大恩。如今我想为先帝的陵墓出点儿力，不过是尽一点儿奴才的孝心。太后却横竖不允，奴才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这样惩罚我，叫我终生不安？"太后笑道："你也不要说得这么好听，每个人心里都像镜子一样明亮。你不过是想求份在外的差事，别人都有了，难道舍不得给你？那就想左了。我是觉得你自幼入宫，从没在外边历练过。如今官品又高，小差事怕委屈了你，大差事担的干系太大，一旦出了差错，岂不是害了你？"雷允恭仍哀告不已，刘太后无奈，让他与另一个内监张景宗共同"管勾山陵一行事"，即是修山陵的宫中全权代表。派两个人，是让他遇事有个商量。哪知他与丁谓一起专横跋扈惯了，根本不把张景宗看在眼里。本年三月，司天监官员邢中和对雷允恭说道："若能将墓穴位置向北迁移一百步，风水更好，后当多子多孙。"雷允恭道："那好呀，为什么不迁？"邢中和道："担心地下多石，水位也浅。"雷允恭道："事有大小。先帝只有当今皇上一个儿子，人丁不旺。比较起来，有石有水算什么。"邢中和道："先帝陵寝是件大事，规定七月完工，半天也耽搁不得。若要迁移，势必重新勘察、验证、报批等，麻烦得很，万一不能如期完工，干系非小。"雷允恭道："这没关系，你只管迁移是了，我备快马入宫去见皇太后，皇太后保管一百个欢

喜。只要她老人家说句话，不就没事了？”他既这么说，还有谁敢道半个不字？墓穴位置就这样改变了。雷允恭对太后说了，太后道：“这是件大事，怎能轻易改变呢？”雷允恭道：“只要能使皇上多子多孙，这算得了什么？”太后不大同意，又不愿意由自己出面制止，说道：“去与山陵使商议一下，看他怎么说？”雷允恭就去找丁谓，二人是老搭档了，丁谓虽知事大，不愿意扫了他的兴，每次问起都支支吾吾，推说要他自己决定。雷允恭暗想：“只要你不反对，就算是答应了，何必定要你说出‘同意’那句话。”于是报告太后说：“山陵使同意了。”太后自然无话可说。

哪知新墓穴施工后，果然地下尽是大石，很难开凿。日夜施工，待凿穿大石，石下又出了水。时间已到了五月下旬，工程进展很慢。众人议论纷纷，抱怨不已。只是畏惧丁、雷势力，不敢明言。时步军副都指挥使、威塞军节度使夏守恩任修奉山陵部署，是施工的直接领导人。怕不能按期完工，责任不小，把工程情况如实上奏了朝廷，要求改变墓穴位置，否则难以成功。时间是五月廿三日（辛卯）。若是这样，雷允恭难脱干系。丁谓为了替雷掩饰，主张迁就着干下去，不必把实情报告皇上和太后。二十五日（癸巳），一个在工地当差的小太监入内供奉官毛昌达回宫办事，皇太后问起工程状况，毛如实说了一遍。皇太后大惊，派人询问丁谓。丁谓知已露馅，不敢再瞒，建议遣蓝继宗为按行使，王承勋为副使，到工地调查后，决定处理办法。二十七日（乙未），太后加派内侍押班杨怀玉与蓝、王一起调查，对丁谓的人事安排已经不大相信。第二天，又派出入内供奉官罗崇勋、右侍禁阁门祗候李维新就山陵所在地巩县审劾雷允恭罪状，上报朝廷，听候处理。雷允恭想带着施工图纸亲自见太后分辩，太后不许。六月三日（辛丑），增派内殿承制马仁俊一同审讯。

丁谓见案情日渐严重，命朝中大臣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鲁宗道等人都到工地察看，回来

后商议现墓穴还能不能使用？以为只要能勉强使用，雷允恭就无大罪。谁知众人一致认为已不能使用，当改用原定墓穴。丁谓又让参政王曾前往观看。王曾岂不知他的用意？也说众人所议不差。雷允恭擅移皇堂的罪名也就成立了。其他罪恶也相继揭发出来，如盗库金三千一百一十两，银四千六百三十两，锦帛一千八百匹，珠四万三千六百颗，玉五十六两。还有拟用于陪葬的物品：犀带一条，药金七十两；又有皇帝命取来赏赐辅臣的玉带，他从中吞下三条等等。由此看来，国家的东西对于他这权势者来说与自己的没什么两样。只要政治上不垮，谁敢说个不字？政治上垮下来，那就新帐、陈帐一起算了，这是封建制度的弊病之一。闲话少说，再说丁谓，雷允恭虽倒，他仍可无事。不过，他得罪了上司皇太后，即使没有雷允恭的事也好不了，何况有了这个茬口？他如何得罪了皇太后？经过是这样的。仁宗即位时才13岁，有时睡得晚一些，第二天上朝起不来。皇太后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自己独自临朝。有一天，命内侍传旨，把这意思告诉群臣。不知道是太后故意选了这么个日子，还是凑巧，这一天宰相丁谓恰巧请了事假，没有参加朝会。其余大臣如冯拯等人谁也不敢表态，匆匆把丁谓从家找来，让他拿主意。丁谓表示："此事断不可行，有皇帝在，尽管他什么事也不懂，全都要太后代他处理，群臣仍然是朝见皇帝，太后只是帮助天子处理国政；倘然天子不在，太后单独升朝，性质就完全变了。此例一开，后患无穷。"这使皇太后大不高兴。另一件事是丁谓曾与大臣议定：宫廷内的花费应有个标准，逐月由国库支付。对此太后也很反感。心道："你在外廷大权独揽，我看在先帝份上，不找你的晦气。你却处处与我过不去，真是可恶！"这刘太后即章圣明肃皇太后，是个厉害角色，手段之强不在丁谓之下。当时隐忍下来，二话没说。

还有个参政王曾，与丁谓的矛盾由来已久。出了雷允恭的

事，看准了是扳倒丁谓的机会。但若当众奏明太后，丁谓必然申辩，太后就难以定他的罪。再有他的爪牙从一旁帮腔，说不定还会引火烧身。最好的办法是单独奏明太后，只要太后有了主见，答应调查丁谓奸情，那就好办了。可是怎样才能单独见太后呢？丁谓对此防范很严，倘若知道有人单独入宫告他的御状，只怕不等皇上降旨，就把你搞倒了。王曾深思熟虑后，想了个主意：空闲时与丁谓聊家常，故意装作为难的样子，几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丁谓道："公有何事，这样为难？"再三询问，王曾才嗫嚅道："幼弟王子融最近被派往外地做官，老母十分疼爱他，放心不下，茶饭无心。为此事我很着急，又毫无办法。"丁谓心中暗笑：真是个书呆子，做官做到参政，连这点儿事也办不了。本来丁谓对吏部说上一句话，也就解决了。可是二人一向明和暗不和，他绝不肯帮王曾半点儿忙。暗想：能给他找些麻烦，还要他感恩戴德，才是本事。于是说道："这有何难？明日早朝后，你对太后说一说。妇人爱幼子，太后是能体谅的。只要说句话，其余的事你就不要问了，一切由我代劳就是。"王曾再三谢了。丁谓心中想："亲弟到外地做官不愿去，说什么'老母挂念'，做官的谁个没有父母？哪家父母愿意让儿子远行？难道外官就不派了吗？让他到太后那里碰钉子去吧！"想到这里暗暗高兴。

第二天早朝以后，百官无事，一齐退下，独王曾要求留下与太后面谈。丁谓离去时目视王曾鼓励他大胆对太后说。王曾点头答应，面有感激之色。等众官退尽，王曾这才奏道："丁谓包藏祸心，指使雷允恭将皇堂（指真宗墓穴）移到绝地，意在断皇家风水，倾复社稷，实是大逆不道，请治其罪。"太后大惊，心中却是大喜，表示一定严办。

过了几天，丁谓不见王曾弟王之融改官的批示，心想一定被太后克了一顿，没有答应。不由得想知道太后说了什么，好向其他官员漏点儿口风，出出他的丑。于是通过关系向太后身边的内

侍打听，这才知是王曾告了他的状。第二天早朝罢，也要求留下来向太后辩解。众官退尽后，跪在地上，朝上叩头，而后一五一十说起来。殿上宫女一个个掩口而笑，其中一人道："丁大人是对谁说话呢?"说完走上前去，把竹帘高高卷起。只见御座空空，只余下兽炉中的香烟袅袅，皇上和太后已离去多时了。丁谓目瞪口呆，头脑中一片混乱，不知该如何是好。俯在地上朝上磕了个头，起身而去。

六月二十五日（癸亥），辅臣在资善堂聚宴，商议事情，惟有丁谓没有被召参加。知道是祸事临头了，八方奔走请托，四处求告哀恳。钱惟演道："丁公只管放心，我们一定为你尽力，不会有大事的。"冯拯在一旁直给钱惟演使眼色，钱才恍然而悟，脸色骤然拉长了，嘴上也改了口，敷衍几句，把丁谓打发走了。钱、冯都是丁谓的死党。可是这些猪狗朋友，哪一个是靠得住的？后来在承明殿朝见太后，太后对冯拯等人道："丁谓身为宰相而与雷允恭交通，该当何罪?"遂把丁谓托雷允恭，命宫中巧匠打造的金酒器，以及雷允恭求丁谓授给他三司衙司等官的状头，一件件地让群臣传观。然后说："以前丁谓让雷允恭到宫中奏事，每一件都说是与众爱卿商量好的，便都按他的意思批了。近日才知他在中间捣了鬼。为先帝修坟陵，这是多大的事！为人臣者本应该尽心尽力，他却敢伙同雷允恭擅自改易，几乎误了大事。"冯拯马上附和道："自先帝去世，政事都是丁谓与雷允恭商议妥后，告诉我们是奉了圣旨的。我们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好照办。如今幸好他的奸谋败露，真是上天有眼，国家和社稷的福气。"这显然是把过失推到丁谓一人身上，为自己洗刷。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丁谓的罪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正如古人说的："纣虽不善，非如是之恶也。"墙倒众人推罢了。太后越听越气，决定杀他以平众愤。对此大臣却不同意，太祖有不杀大臣的遗训，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开了这个头，那还了得！冯拯

当即奏道："丁谓固然罪大，但是新皇帝刚刚即位，诛杀大臣，恐惹天下震动。况且，平心而论，山陵事丁谓不过是包庇雷允恭，没有及时上奏罢了，要说他想谋逆叛乱，恐怕太过。"太后的满腹气愤才稍平复了些，命冯拯等就在一旁商议该给他什么样的处分。任中正主张：丁谓是先朝旧臣，应按法律中的"八议"[①]条目定罪。王曾道：丁谓不忠，得罪于先帝和宗庙，已入了"十恶"[②]之内，还有什么"八议"可讲。最后定议：免去宰相职，以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赶到洛阳去了。按规定宰相罢官，应该由翰林学士草麻，太后不愿再见到他，为了尽早执行，召当天值班的中书舍人，草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堂上，就算生效了。然后再布告天下，补办手续。

如冯拯所说，丁谓在修皇陵中犯的罪并不大，王曾为了扳倒他采用的手段却不大光明。但是，天下人不以丁谓获罪为冤，也不以王曾"要阴谋"而责难他，主要由于丁谓执政间浊乱朝政的原因。

丁谓既离京都，有王曾和太后在，岂能就此罢休。七月，先将丁谓的儿子、党羽贬官后赶出京城。然后逮捕有关的人审讯，把他以前假造符瑞、装神弄鬼、贪污受贿的事一件件弄清了，连家庭中的丑事也揭了出来。于是他的官职一贬再贬，最后贬为崖州（今海南崖县）司户参军。这一次要把他的罪状布告天下了，起草文告的仍然是宋绶，他想到"《春秋》无将"，"汉法无道"那两句话，挥笔写道"'无将'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史书说，天下人对这两句都拍手称快，认为典故用

① 八议：有八种人犯罪，可奏请朝廷，商议减免，奏请后执行。流罪以下，可减罪等。犯十恶罪者不包括在内（十恶见后注）。八种人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② 十恶：隋唐以后历朝法律中规定的十种不可赦免的重罪。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

得贴切。起初，京城流传一首民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到半年，丁谓贬官。

崖州在海南岛的南端，是最边远的地方了。丁谓上路后，终日凄凄惶惶，好不悲凉。

这一日入了湖南境，在鼎州以北官道旁有一座甘泉寺，依山枕溪，景色清幽。丁谓一行人在寺中客寮歇了，寺僧端来茶水，丁谓喝了几口，就要到殿上礼佛。见左右两壁尽是行人题留的诗句，想到昨日荣华与今日惨状，感慨万千。命从人取来笔墨，也在壁上留下一首诗，末尾题上"丁谓之"三字。顺便浏览下去，忽见对面墙上有数行字，笔势遒劲。没看内容，先看押字，赫然是"寇平仲"三个字，原来是寇准所题。寇准是前年八月贬道州，到如今才二年，自己就闹了这么个下场。心中又羞又愧，再也无心观览，吩咐立刻上路。仁宗时，殿中丞范讽到这里做地方官，看到寇、丁二人的题壁，想到二人的争斗，心中暗笑，也在墙上题了一首诗道："平仲酌泉方顿辔，谓之礼佛继南行。层峦下瞰岚烟路，转使高僧薄宠荣。"

再说丁谓一行不久路过雷州，正要觅店住宿，见一人拦在马前，拱手说道："大人可是从京都来的吗？"丁谓抱拳还礼道："正是。"那人冷笑道："那么必是大名鼎鼎的当朝宰相丁谓之大人了。"丁谓面色刷地红到耳根，见那人向身后一摆手，路旁二人抬过一个朱漆食盒，那人打开来，捧出一只蒸羊，说道："我家老爷没想到丁大人能到这里，仓促之间，无以为敬，谨备蒸羊一只，请笑纳。"丁谓道："你家老爷姓什名谁？"那人道："另有书信一封，阅毕自知。"丁谓命从人将蒸羊接了，打开书信，见其中写道："谓之台鉴：京都一别，忽已再秋。不意于此边徼之地重逢，且惊且喜。正欲扫榻相迎，不意身边从官粗使十数人，闻公过境，揎拳捋袖，欲效那博浪一击、桥下惊驷故事。仆以会宴为名，已拘之宅第矣。然今日之后，夫复如何？特兹奉告，早

为之计。另备蒸羊一口，望乞哂纳，是幸。寇平仲拜首，年月。”大意是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本打算要接待你一番的。可是身边几个随从官吏和粗使僮仆要拦住揍你一顿。我已摆了宴席，把他们关在家中喝酒。今天是没事了，可是以后如何，我就难说了。先告你一声，好有个准备。丁谓读完，吩咐从人道：“今夜不在这里歇息，再往前行！”送羊的三人已远远站定了，指指画画，边笑边骂。丁谓不敢惹事，约束从人，匆匆去了。

丁谓在崖州直住了三年，才迁到雷州，五年后又迁道州。明道二年（1033）三月，因皇太后刘氏病危，仁宗为太后祈福，大赦天下，允许他以秘书监资格退休，在光州（今河南潢川）居住。景祐末年（1037）死在光州。自乾兴元年（1022）起被放逐了15年，境遇之苦，自不待言。但他一直处之泰然，在崖州时作诗说“且作白衣菩萨观，海边孤绝宝陀山。”竟把崖州比作宝陀山，自比于白衣菩萨，自然是个恶菩萨。心境的旷达于此可见。这期间写了大量诗文，如《青衿集》、《天香传》等。至死鬓无白发。

丁谓无疑是个很有才气的人，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真宗初期，政治清平，他做了些好事；后来装神弄鬼，弄虚作假，丁谓也就成了五鬼之一；再往后，刘后要专权，与寇准等人有了矛盾，他才得以排寇准，逐李迪，独霸朝政。终因与刘氏的矛盾也垮了台。宋人不敢骂真宗皇帝和皇后，便把丁谓拉出来示众，说其为真宗后期腐败政治的肇事者。其实他只是只替罪羊。自然他个人是有责任的，正因为此，本篇的题目仍按传统说法叫做《丁谓乱政》。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丁谓传》、《王钦若传》、《寇准传》、《李迪传》、《王曾传》等。

李焘《长编》卷95—104、107、110、112。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8《真宗末年》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2、3。

章献明肃垂帘

梆子戏中有一出《铡郭槐》，又名《打死狸猫换太子》。唱的是宋真宗朝，李娘娘宸妃生下皇太子后，被刘皇后伙同太监郭槐设计掉包，李娘娘也惧祸逃入民间。直到包拯陈州放粮，在寒窑中遇李娘娘告状，回京巧审郭槐，沉冤才得昭雪。历史上李娘娘、刘皇后都实有其人，皇子的事虽不像戏中那样骇人听闻，也真有一番曲折，一段隐情。刘皇后就是本文中的主角章献明肃皇后，一个了不起的女姓。

刘皇后先祖是太原人，后来迁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华阳县，因称华阳人。祖刘延庆在五代时做官做到右骁卫大将军，父刘通做到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宋初曾随潘美征广南刘𬶐，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伐北汉，死在路上。刘皇后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刘通死时她才九岁，母庞氏也早已死去，孤苦伶仃，无法过活，只有投奔外家。外家也是穷困潦倒，难养闲人，把她嫁给本地一个银匠龚美做了童养媳。那时蜀中战后不久，一片萧条，龚美难以谋生，听说京城繁华，便带了这个未圆房的媳妇不远千里，来到京城。满心只望从此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谁知他这个外来的“土”银匠，京城人根本看不到眼里，生意清淡得很。经人说合，又把她转嫁到王宫指使张耆家。

张耆在襄王宫里做事，襄王名德昌，就是后来的真宗皇帝。有一天，襄王对身边幕僚说：“听说蜀中妇人聪明美艳，不知是真是假？”左右讨好道：“王爷在后宫里选上几名不就知道了？”

襄王讪笑道："蜀中离京千里，谈何容易！能得一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张耆恰在一旁，道："京城繁华，八方人物，辐辏而至。蜀中女子，京城还怕少了？怎用得着远到西蜀选取。"襄王闻言大喜，当即把此事交给张耆办理。不久，张耆访知银匠龚美来自蜀中，家中有一女娘才十三四岁，生得明艳照人，又聪慧绝伦，知书识字，善奏鼗鼓。鼗鼓就是俗语说的货郎鼓，带柄，两旁有耳锤，摇动时耳锤前后击鼓发声，是一种舞具，边舞边击，煞是好看。张耆听说有这样的良材美质，自是大喜过望。只是不知性情如何，不敢贸然说是为襄王娶妻，只说是自己买妾，差人前往龚美家关说。龚美正穷得走投无路，张耆又舍得花大价钱，自是一说就成。张耆择日差顶轿子将刘氏抬到府中，派人教她宫中礼节、歌舞弹唱等，并从一旁观察她的性情人品。才发觉样样都叫人满意。料想以后必得襄王宠爱，从此对刘氏，加意奉承，毕恭毕敬。刘氏有了好日子过，只一年多的光景，出落得更加不俗，当真如《诗经》说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尤其是举动中礼，进退合度，更显得落落大方，顾盼生姿。张耆向襄王说了，襄王一见，果然欢喜。这时刘氏才15岁，由于得襄王宠爱，免不了遭人怨恨，风言风语，确也不少。襄王有乳母，封秦国夫人，为人严整，把这些话听在耳中，心中不快。便奏明太宗，说刘氏为民间女子，出身低贱，不是襄王佳配。太宗命襄王把刘氏赶出宫去。襄王虽心中不舍，怎敢不从？刘氏已无亲属，只好仍命张耆领回家去。张耆知道刘氏得襄王专宠，怕惹嫌疑，从此留在衙门里，不敢归家。襄王得知后，给他白银五百两，另买一处宅院安顿刘氏。直到太宗死后，襄王即了帝位，才又把她接回宫中。

景德元年（1004）正月十日（乙未），封刘氏为美人。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封为修仪，不久进封为德妃。德妃身边有一个侍儿李氏，生得端庄贤淑，寡言少语，颇得真宗信赖，封

她为司寝。后来怀了身孕，生下一子，德妃命人抱来，对李氏道："你好好将养身子，孩子让我带吧！"李氏心虽不愿，怎敢说出口来？只得谢了。从此这皇子就由刘氏收养，外人少有知道内情的。

当时，章穆皇后郭氏已死，六宫无主。真宗有心立刘德妃为后，向大臣征求意见，大臣多数反对，翰林学士李迪屡次上疏谏阻，说刘氏出自寒门，不可母仪天下。无奈刘氏为人精明能干，通晓古今，朝廷大小事务入耳不忘。真宗每次出巡，必命她同行。原因是遇到不便与外人说的事，好有个商量。刘氏也尽心尽力，不骄不惰。穿着俭素，看上去与普通宫女没有两样，更令真宗钦佩。这样一直拖下来，直到大中祥符五年，中书门下省官员屡次上书请真宗早立皇后，真宗坚持非刘氏不立，大臣只好让步。十二月，刘氏终于做了皇后。从此更加努力辅佐真宗，每日退朝，真宗在内廷批阅天下奏章，时常到半夜方止，刘皇后必在一旁陪伴。真宗有时将朝廷事情说给她听，试着让她裁决，她必博引典故，区别原委，分拨得明明白白。真宗很是满意，对她更为信赖。渐渐命她代批奏章，刘后不再是宫中普通一女子了。

天禧以后，真宗得了风症。估计是脑栓塞一类疾病，行动和言语都不大灵便，又颇健忘，章奏送入宫中，只好由刘后代劳，刘后的权力越来越大。皇后干预朝政，是犯忌讳的事，尤其对那些以道统自任的"正直"大臣，更是不能容忍。唐朝武则天干政，宋代史家评论说是"妇人干政"如同"牝鸡司晨"，就是俗话说的"母鸡打明"，是不祥的象征。对于刘氏参政他们自然不会坐视不问，首先是动员皇帝早立皇太子，先由卫尉寺丞陈执中写了三篇《复古要道》献给皇帝，从理论上阐明早立皇太子的重要性。天禧二年（1018）八月，群臣又联合上表请求立皇太子，真宗不答应。群臣也不让步，连上三表。真宗只好妥协，立升王受益为皇太子，并为他改名为赵祯，就是司寝李氏所生被皇后刘

氏收养的那个皇子，此时他还蒙在鼓里，只道刘氏是他的生母。直到真宗死后许久才知道真相，这是后话不提。

太子初立时年七岁，还不能构成对皇后干政的威胁。随着时日流逝，太子越来越成了大臣对抗皇后干政的王牌，王后与太子、与大臣间的矛盾也愈来愈大。天禧四年六月，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寇准兼任了太子太傅，便奏请真宗皇帝传位与太子，又在蜀中对不守法纪的皇后宗族严绳以法。此时刘皇后已认了带她入京的龚美为兄长，朝廷赐龚美姓刘；翰林学士钱惟演（吴越王钱氏的后裔）将妹子嫁给刘美，以世胄旧族与这个新发迹的银匠国舅结了亲。钱惟演便秉承皇后意旨与奸臣丁谓联合，排挤、打击寇准，终于寇准罢相而去。另一个宰相李迪也曾劝真宗以法治刘皇后罪，丁谓、钱惟演又联合挤掉李迪，由丁谓做了独掌朝纲的宰相。皇后与大臣的矛盾是由他（她）们的相互地位决定的，尽管丁谓与皇后以前有那样深的渊源，一旦执掌朝政，仍难以与皇后和睦相处，后来也终于倒台。

再说刘皇后虽然利用大臣间的恩怨，把妨碍她干预政事的人一个个搞掉，但是她岂能不知，横在他面前的最大障碍是皇太子？唐武则天为了走这条路，曾不惜将亲生儿子一个个地下狱，刘皇后面前也明摆着这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多亏了一位善于斡旋的大臣王曾。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真宗一度病危，天下人寄希望于皇太子，而朝政落入皇后一人手中，中外大臣一片忧虑。王曾对钱惟演开导说："太子年幼，若无中宫皇后的保护，难得安全；而中宫皇后离了皇太子，天下人心不附，也难得安全。所以太子安全就是刘氏安全，安刘氏就要先安太子。"钱惟演把这番话传达给皇后，皇后与太子间的关系才没破裂。但刘后不是呆子，除了博取真宗欢心以外，深知控制太子的重要性，《通鉴长编》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太子动息，后必躬亲调护；暂去左右，则继遣询问；至于乳保小臣，皆择谨愿岁久者，旦夕教其恭恪。"意

思是，太子平日一动一静，皇后都要亲自过问；将太子绑在她身边，寸步不离，哪怕暂时离一会儿，也要一拨又一拨地派人前往询问；对于太子身边的人控制更严，连粗使小臣，她也要亲自挑选才能放心。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死，按照他的遗言，太子赵祯即皇帝位，就是仁宗皇帝；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事权且由她处理；淑妃杨氏为皇太妃。

新君即位，朝中难免乱上一阵，宰相丁谓等为一方，参政王曾为另一方，闹闹嚷嚷，争论不休。皇太后刘氏依然稳坐钓鱼船，运用她的一贯手法：一是利用大臣间的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二是抓住新皇帝（即原来的皇太子）不放。既由皇太后权且处分军国事，朝臣征求她的意见：在哪一座宫殿办公？答说："新皇帝处理事务，我应寸步不离，新皇帝在哪里我在哪里好了。"二府商定皇太后听政的具体做法，王曾援引东汉故事，请求每隔五天，在承明殿朝见群臣一次，届时皇帝坐左边，太后坐右边，隔着门帘与群臣商议政务。既有先例，太后只好降旨同意。哪知不久，丁谓为独霸朝政又提出新方案，建议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皇帝会见群臣。平时有大事则由皇帝、太后共同召见辅佐大臣商议。一般事务则由朝廷处理以后，通过太监雷允恭转奏宫中批复。王曾坚决反对，认为太后与皇帝不在一起办事，而由太监奔走传达，是取乱之道。

丁谓的主意可以减少太后直接面对大臣的机会，使大臣对宫中裁决分不清是出自太后还是出自皇帝，缩小将她与皇帝间的分歧暴露在众人面前的可能性。因此，对太后更为有利。尽管王曾极力反对，既是宰相的奏请，她尽可毫不理会。若有不当，拿宰相做替罪羊是了。所以，虽然圣旨已批复按王曾建议执行，太后忽又降下手书，改按丁谓的意见行事。

太后既执政，首要是尊崇外家。真宗在位时，太后为表示谦

让有节制，屡次给刘美加官都被她推辞了。如今已经不必。但刘氏宗族已无人可封。真宗死后月余，封仁宗乳母林氏为南唐郡夫人。这林氏原是刘美家仆妇，被太后选中照料仁宗的。不管如何，也算是太后娘家人了。才隔一天，又提拔刘美的女婿马季良为馆职。马季良家本是茶商，出身低贱，而馆职是清望官，天子侍从，不轻易授人，至少，非科第出身人不授。为此命马季良补试，先取得出身后再就职。哪知考试没毕，太后就命太监带着酒食来到考场，"慰问"考官来了。太监一边斟酒道劳，一边传达太后懿旨，要考试尽快结束。可是考生没有答完试卷，又怎能结束得了？要是不及早结束，违背太后懿旨，那还了得？亏得主考大人晏殊是当世大才，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召集诸位考官，将试卷分了，每人一纸，分头做将上来。做得好了，太后有赏；做得不好，哼哼……，那就不必说了。一面吩咐人转告考生马季良：你的考试已经结束，回家静候佳音是了。结果如何，也就不必说了。又过三天，传旨加赠太后家三代人的官职。

这一年六月，太后传旨中书省，说皇帝年幼，早晨贪睡，不能早朝，以后由太后单独朝见群臣。这可是件大事，适逢宰相丁谓休假，参政冯拯不敢作主，强把丁谓请了出来。丁谓坚执不同意。太后与宰相丁谓的矛盾明朗化了。终于以陵寝事件罢了丁谓的宰相职，将丁谓党羽赶出朝堂，在《丁谓乱政》一节中已经述及。

丁谓垮台后，冯拯继任宰相。朝臣又连续上表，请求恢复王曾建议的五日一朝群臣的制度。初时太后不允，但丁谓既倒，外朝失了强援，这也是有一得必有一失，没有法子的事。迁延到八月，只好答应群臣的请求。

刘氏亲属钱惟演是个势利小人，与丁谓沆瀣一气，做了不少坏事。眼见丁谓要垮，又倒戈挤兑丁谓。冯拯厌恶他的为人，上表说，钱惟演是太后姻亲，按祖宗制度外家不得干预朝政，请求

将他放为外官。钱惟演之妹也就是太后寡嫂向太后哭诉说："朝中大臣你只有这一个亲人了，他们又要把他赶出京去，那是对着你来的呀！你怎能不管？"太后凄然一笑道："虽是如此，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怎能不依？"第二天便降下制书，以枢密使钱惟演为保大军节度使，河阳知府。朝中人人称贺，太后心中却一片凄凉，明知道这是大臣们砍了她一只手臂，不给她面子，却无如之何。她深知一个妇道人家执掌朝政的困难，处事格外谨慎，不愿轻易与大臣破脸。岂能因为一个钱惟演，输了理给他们？或胜或负，不在乎这一招一式的得失。她心中时时琢磨一个问题：唐朝武则天是怎样成功的？丁谓垮台后的事使她渐渐明白，武则天有个李义府，还有个许敬宗，帮她清除异己；她却只有一个丁谓，一旦大权在手却又来勒啃她。能不能也找一个李义府或许敬宗出来？能的，一定能。

天圣元年（1023）八月，钱惟演入京朝见皇帝，乘机活动，希望出任宰相。他原是枢密使，做了一任外官，循例升一级做了平章事，若仍外官，是为使相；留任朝中，便成了宰相。太后自然希望他留下。监察御史鞠咏闻讯上奏，极言钱惟演如何奸邪。太后将奏章拿给钱惟演看，要他自己想办法。钱惟演竟束手无策。鞠咏又在朝中扬言，若用钱惟演为宰相，他必在朝堂上当众将任命的白麻撕掉。钱惟演听到这消息，匆匆离京而去。

太后知钱惟演才气不足，应变能力太差。不得已，打算起用王钦若。王钦若是真宗时期有名的奸相，史书说他"智数过人"，"性倾巧"，善于"委曲迁就以中帝意"，"敢为矫诞"，前两句说他机智过人，后一句说的是他"撒谎从不知道脸红"。因与丁谓争权被挤出朝，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出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太后起用他目的很明显，是要在朝廷中找一个听话而又有能力的人，走的是与武则天相同的路子。只是她做事向来稳妥，不自作主张，能隐忍等待机会。有一天，仁宗练习飞白书。飞白书

是一种字体，相传是东汉蔡邕见到工匠用白粉刷墙发明的，写来字画中丝丝露白，因称飞白书。太宗、真宗都擅此技，算是宋皇室的家学，仁宗自然要努力练习。正练到兴致浓时，适巧有王钦若的一本奏章送到，仁宗将它撂在一旁不予理会。抬眼见封面上署名“王钦若”三字，便顺手用飞白书写了下来。这原是练字人常有的手病：见到什么写什么。太后却从中做起文章来，将这三个字悄悄放在汤药盒中，密封好了，以免泄露，像钱惟演那件事一样，惹起朝中御史饶舌。派一名心腹内监送给王钦若。并传懿旨，要他入京晋见。王钦若千里迢迢赶往京城，外人无一人知晓。直到进了京都城门，守城军士才传报说王钦若求见。宋制：外官无故不许入京。若朝廷见召，必须经过中书，没有内廷私下召见的道理。太后急传圣旨，说要调王钦若为润州（今江苏镇江）知州。宋制：官员新调任要面见皇帝，称为陛辞。王钦若既是调任，入京就是合法的了。而且太后已经料定，以王钦若的为人，若是升职，说不定会有人反对；降职，朝臣十有八九会装作不知。所以调他知润州，比起江宁知府小了一级。待他入京以后，又忽然传旨，以宰相冯拯多病为由，罢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以王钦若为平章事（宰相）。

新宰相上任，果然身手不凡。太后贫贱时曾经路过玉泉山景德院（寺院），一个老僧精通相法，预言她日后贵不可言，还赠银相助。后来做了皇后，也不敢张扬。直到真宗死，新天子年幼，她以太后垂帘听政，胆子才大了起来。派内侍到景德院赏赐白金三千两，要他们就近买田，供奉寺院香火。但宋朝旧制，禁止寺观私买田产，只凭内侍的一句话，院僧如何敢违了法令？这笔银钱竟是不敢接受。本路转运使闻讯也向朝廷上书说：祖宗旧制，寺观不许买田侵农。仁宗因是太后的意思，对宰相王钦若道：“景德寺买田是为了给先皇帝种福，不可拘泥于以往的法令，下不为例是了。”王钦若自然不会反对。说是“下不为例”，饰言

罢了，此后后妃、公主、诸王大臣都舍田寺中，为身后种福，称为福田、功德田等，成了宋代一大弊政。徽宗宣和七年（1125）不得不下令，限制天下寺院土地的数目，规定每寺在京都者不得超过五十顷，在外郡者不过三十顷。这都是王钦若的“德政”。

再说太后自此以后，大修寺院，先派罗崇勋主持，大修景德寺。据记载，替太后相面的老僧后来成了长芦寺主持，太后派人询问，要感谢他昔日相助之德，若有所需，尽管开口。老僧道：“出家人别无所需，只是景德寺无僧堂，长芦寺无山门，太后酌量办是了。”修僧堂倒还罢了，修山门当真费了大事。这长芦寺临江而建，山门建在水中，屡建屡坏，不得已先化铁水数万斤为地基，才建了起来。此后，又为真宗建资圣浮屠（塔），以内侍张怀信主持，由于督役严峻，领工的州将假称有病，不敢与他见面。京城附近州县中的唐代古碑、石碣十有八九被砸坏，做砖石用。直到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这股兴修寺观之风才停止下来。真宗时崇道教（参见《尊奉圣祖》篇），太后掌权后就大兴佛寺，这与唐朝时唐高宗崇道教，武则天兴佛法的情形完全相同。她能够搞得起来，自然也是王钦若的襄助之功了。

刘太后垂帘，处处走武则天的路子，这也是事不得已，不如此则权威不立，号令难行。但是刘后与武则天遭遇毕竟不能完全相同，行事也就不得不异。王钦若做宰相只一年多，得急病死去，刘太后重又处于外朝一班“直臣”的监督之下。她曾问参知政事鲁宗道：“唐朝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答说：“是唐朝的罪人，差一点败坏了唐朝社稷。”太后默然不语，她从这断然的回答中已知道，若走武则天的道路将会受到多少阻碍。武则天做皇帝以前，“劝进”的人一拨跟着一拨，固然是武则天诱导有方，也由于朝中没有强有力的反对派。刘太后也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却不能得武则天那样圆满的结果。起初一个低级官员，名叫方仲弓，上书请求太后立刘氏七庙。旧制：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立

七庙。劝太后立刘氏七庙就是“劝进”的意思。太后要大臣发表意见，登时朝堂上鸦雀无声，无人敢放“第一枪”。当时谁也不知太后是何主意，她要是已决意做女皇，为了立威，势必拿首先反对立七庙的人开刀。谁敢冒此大险？可是偏偏有人不怕死，还是那个鲁宗道出班奏道：“倘若立刘氏七庙，国无二主，当今天子该当如何安排？”太后只好作罢。还有一次，太后与天子一同到慈孝寺降香，太后要乘辇先行，鲁宗道又出面劝阻，说：“妇人有三从四德，‘夫死从子’这是大道理，太后应该尊重天子，让天子车驾先行。”太后身边的人称鲁宗道为“鱼头参政”，就是比喻他处处作梗，使太后不能稍离法度。不仅只有一个鲁宗道，天圣五年正月一日，新春伊始，按惯例应是大朝会的日子，群臣齐集朝堂，向天子祝贺新禧。但是仁宗建议，先率领群臣向太后拜寿，然后举行大朝会。太后说：宜先公后私，行完君臣之礼再拜寿。参政王曾奏道：“陛下的意见是以孝道奉母仪，太后的意见是以谦让保全国家大体。请皇帝按照太后的意见办。”皇帝坚持不许，一定要先太后而后国家。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天圣七年，仁宗又要如法办理，秘阁校理范仲淹预先上书谏阻说：“天子行孝道，是家人之礼，宜在家门内实行。如今天子亲率大臣在朝堂上行礼，有亏人君体统，损害君主威严，不足以为天下和后世人作表率。”这些话比王曾尖锐、爽快多了。一时吓坏了御史中丞晏殊，对范仲淹说道：“我推荐你做官，你竟然不安分守己，胡言乱语，哗众取宠。一旦太后怪罪下来岂不是连我也要受你连累吗？”范仲淹道：“大人推荐我，想必是要我正身立朝，为国兴利除弊。我时常害怕辜负了大人的信任和期望，万没想到会因忠直受到大人责备。”晏殊张口结舌，无话回答。范仲淹接着又上书，请求太后撤帘，停止摄政，将大权交还仁宗。这时仁宗皇帝已经19周岁，长大成人了，在情在理，太后都不应该再做监护人的角色。所以范仲淹的话义正而辞严，无可挑剔。可是，因为

涉及到权力这个最敏感的问题，若非有胆有识，是万万不敢的。皇帝和太后对他的奏章都觉得难以回答，便不加理睬。范仲淹请求解职，以此表示抗争。结果朝廷将他调任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范仲淹虽被赶出京城仍不畏惧。第二年（1030）二月，又一次呈上奏章，说皇帝已经长大成人，太后继续执政，不是好事，希望她还政于天子，在长乐宫颐养天年。太后仍不理睬。另有林献可上书，也请太后还政于天子，太后大怒，将他流放到了岭南。

正由于有鲁宗道、范仲淹等一帮不怕杀头、丢官的直臣，敢于仗义执言，使太后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像武则天一样，任用酷吏，广兴大狱，将这帮限制她行动的障碍彻底清除，要么是循规蹈矩，事事收敛，只做一个摄政的母后，再不可越雷池一步。太后选择了后一条路。这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与王曾、吕夷简等一帮大臣善于斡旋，始终保全太后与天子两宫间的关系，使年幼的天子不致受到伤害有关。

王曾的事在《丁谓乱政》等篇中已经提及，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仁宗初，任参知政事，与王曾共同建议将真宗在位时的“天书”全都随真宗遗体埋葬。理由是：这些“祥瑞”是上天为真宗一人而降，不可使留在人间。这样，给真宗那些荒唐事堂而皇之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时太后为表示对真宗的哀思，还要将他平生穿著、使用的衣服、器物、玩好等一起随葬；打造银罩，覆盖真宗牌位，花费不可胜计。吕夷简又上奏道：“这些都不足以报答先皇帝的恩德。如今天下政事取决于太后和皇帝两宫。皇帝年幼，先皇帝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太后若能疏远奸邪，奖励忠直，辅导皇帝长大成人，使政事没有大的失误，才是对先皇帝最好的报答。”吕夷简做宰相以后，玉清昭应宫失火，太后含着眼泪说：“这是真宗皇帝费数年心血建成的，如今化成了灰烬。我们活着的人怎可使先皇帝的遗愿落空?”意

思是要重新兴建。吕夷简深知土木工程不但劳民伤财，还可移人心志，使当政者产生奢侈、狂妄的念头：以为如此浩大的工程尚可成就，天下有何事不能为？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于是婉转劝说，将《洪范》中五行运化成灾的道理讲了一遍，王曾等大臣也都谏阻，太后才打消了初念。还有一件事，足可见吕夷简辩论婉转而能服人：明道元年（1032）二月，仁宗生母李宸妃病死。李宸妃生下仁宗以后，被太后抱养，慑于太后权势，无一人敢将此事告诉仁宗。真宗死后，李宸妃以一个先朝宫嫔的身份默默无闻地打发着无聊的岁月。一直过了十年，到明道元年二月病危，太后才发了善心，将她升为宸妃。哪知封诰才下，李氏已成了泉下人，才46岁。太后打算按一般宫女的规格，抬到宫外治丧。吕夷简闻讯去见太后，说李宸妃的丧礼应该从优。太后听了大惊道："这也是宰相应该管的事情吗？"不待回答，一手扯起仁宗，拂袖而去。仁宗回宫后，太后又独自出来召见吕夷简，问道："不过是一个宫女去世，你身为宰相，为何说要为她厚葬？"吕夷简道："臣身为宰相，事无不统，不论宫内宫外，应该说话时就要说话。"太后暗想：想必他对李宸妃的事已有耳闻，否则如何敢这样说话？不觉转生愤怒道："你这是何意？难道要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吕夷简从容说道："陛下若把刘氏安危毫不放在心上，臣便无话可说；若为刘氏担心，臣以为李氏丧礼应该从优。"太后是何等聪明，立刻明白了其中厉害，说道："依你之见，该如何办理？"吕夷简道："臣以为应当按一品夫人礼，在宫中发丧、挂孝，用宫中仪仗，权且殡于洪福院。"太后点头应允，命入内都知罗崇勋办理。吕夷简又特意对罗说："宸妃入殓要穿皇后衣装，棺中盛水银，免使尸身腐败。若不听我言，以后追究起来，莫怪我不有言在先。"罗崇勋如言办理。太后死后，仁宗叔父元俨将他系李宸妃所生之事透露给他，还说李宸妃生前受太后排斥，死得如何凄凉等等。仁宗听了，痛哭失声，数日不上朝，

颁布诏书，自责自怨，其实是怨恨太后行事歹毒。又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议谥号为“庄懿”。亲自到洪福院祭告，打算给她换一口棺木，重新按太后礼安葬。没料到打开棺木后，见宸妃身穿皇后衣服，面色如生。仁宗深有感触地说：“人言岂可轻信，险些错怪了刘太后。”从此对刘氏的礼数更加优厚。若非吕夷简善于周旋，仁宗与刘氏母子只怕早已翻脸成仇了。

明道元年十二月，决定于来年二月，天子行躬耕藉田礼，在这以前要太后先到宗庙行香，恭谢祖宗。按旧礼制，只有天子才有权祭宗庙，从未有过太后祭宗庙的事。为此特命直集贤院王举正、李淑等人与太常寺礼官共同制定有关礼仪制度。太后主张穿皇帝礼服入太庙行祭；参政晏殊认为王后礼服，《周官》中有明确记载，不可违经乱制。太后很不高兴。其他大臣既怕太后怪罪，又不敢坏了制度，所以长期不能决定。参知政事薛奎对太后说道：“天子衮冕是男子的衣服，太后穿了入太庙行礼时，跪地还是不跪？”原来宋时男子行跪拜礼，女子只拜不跪。宋初时太祖赵匡胤曾问宰相赵普，为何有这种规定？赵普回答不出。遍问群臣，前宰相王溥的儿子王贻孙回答说：“古诗有‘长跪问故夫’的话，古时女子也是行跪拜礼的。自武则天以妇人做皇帝以后，才规定女子拜而不跪。”这就给刘太后出了个难题：穿男子衣当行男子礼，可是，她以太后之尊，如何能学男人跪地行礼？只好答应不穿皇帝服装。礼官议定：天子衮服，花纹有十二章[①]；太后也穿衮服，惟比天子减两章。天子戴冕，前后各垂十二旒；皇太后所戴冠，前后也各垂十二旒，取名为仪天冠。不同在于天子

① 十二章：十二种花纹。天子衮服，上衣下裳，衣上花纹是绘制，有六种：日、月、星三辰，加上山、龙、华虫。山以山上的动物獐代表，华虫指雉；裳的六种花纹是刺绣而成，指藻、火、粉、米、黼、黻。藻指水草纹，火为半圆形纹，黼为白黑相间的斧形纹，黻为青、黑相间的“巳”字纹。一说粉米合为一章，加宗彝（虎纹）仍为六章。

冕旒是用五彩丝绳穿五色玉而成；仪天冠改玉石为珠翠。为免行跪地礼，太后只好同意这些小小的变动。后人著文说：宋代礼制天子入太庙，行九拜礼，根本没有跪地之说。太后不知，上了薛奎一个恶当。若有人向太后奏明此节，薛奎岂能有好果子吃？然而竟无人奏明。可见人心所向，这也是刘太后最终不能成为武则天的原因。

行礼完毕，命宰相张士逊撰写《谢太庙》和《躬耕藉田记》，以纪念这次盛大的礼制活动。检讨官宋祁奏称："皇太后祭太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足为后世效法。"《谢太庙》的文字也就免了，只撰了一篇《躬耕藉田记》。

这一年三月，皇太后身体不适，仁宗为此颁行大赦，为太后免灾。时太后已经不能说话，口唇屡动，说不出声。仁宗知她有所嘱托，再三追问，不得要领。又见她以手扯衣，仁宗细看太后衣服，不见任何异状。正自焦急，太后将头一侧，撒手西去了。宫中上下，一片哭声，自不待言。仁宗猜不透太后死前的动作是何含义，终是不安。来到外朝请大臣们一起参详，参政薛奎说道："莫不是因为衮冕的事吗？穿了那身衣服入殓，叫她在阴世如何去见祖宗？"仁宗这才恍然大悟，吩咐替太后穿了皇后衣服入殓。太后还留下遗言，尊杨太妃为太后，与皇帝同议国政。御史中丞蔡齐对执政说："皇帝已经年长，岂有让太后一个接一个地垂帘听政，那成什么话！"殿中侍御史庞籍则请求将"垂帘听政"的所有礼仪制度底本一把火烧个干净，以免再有这类事出现。于是，执政决定，从太后遗言中删除"同议政"的话。办完丧事，四月份仁宗第一次单独处理朝政，下令停止修建寺院，将太后亲信太监罗崇勋等免职，起用范仲淹等直臣。朝中臣僚纷纷指责刘太后临朝时的弊政。为保全朝廷大体，经范仲淹奏请，才下令禁止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四月二十八日（癸亥），议定刘太后谥号为"章献明肃"，仁宗生母李氏谥号为"章懿"。宋代

皇后谥号只有二字，自刘太后始有四字谥，此后成为定例：凡垂帘者都是四字。

章献明肃太后刘氏垂帘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前面说她行事类似武则天，武则天做了女皇；刘太后晚年要天子率群臣朝贺，服天子衮冕，距女皇也只有一步之差。固然最终没成女皇是受了朝臣的阻碍。但是，从她清除寇准、李迪表现的才干看，要清除这些障碍并非难事。但她没有这样干，一方面是由于她不像武则天遇到了褚遂良等一帮强硬对手，逼得她非做生死抉择不可；另一方面也由于刘太后外家无人，不像武则天，有诸武立朝，为了武氏须向李氏争夺。刘太后摄政时已 50 多岁，是孤苦伶仃一个老太婆，她为谁而争？为谁而斗？设若刘氏家族人丁兴旺，那结局可就难说得很了。宋朝对于防止地方割据，将相擅权，有许多建树，而对于防止女主干政却无善法。这是忠孝矛盾在政权中的体现，是封建制度的固有矛盾，很难克服。一直到进入近代社会以前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几乎可以说，只要有封建制度，就有出现垂帘听政的可能性。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章献明肃传》、《张耆传》、《王钦若传》、《吕夷简传》、《钱惟演传》、《刘美传》。

宋·李焘《续通鉴长编》卷 69—112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 24《明肃庄懿之事》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1

郭后之废

这一篇讲的是宋仁宗婚姻的一段悲剧。

宋仁宗13岁即皇帝位，太后刘氏垂帘听政，大权自是握在太后手中。太后对这个小皇帝照顾得无微不至，皇帝身边的人，哪怕是个干粗活的宫女、小太监，太后也要亲自替他挑拣一番；皇帝的饮食、起居那是不用说了，连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皇帝的随从向她报告，恨不得把皇帝拴在她的裙带上。对仁宗而言，母爱是足够而有余了，转而变成一种束缚和钤制。眼看他一天大似一天，婚姻问题便成了大事。

仁宗与张美人相恋已久，偏偏刘太后以为张美人不是皇帝良配，不肯答应，亲自为仁宗另定一门亲事郭氏。这郭氏世家出身，曾祖郭崇在后周是拥兵一方的节镇，入宋以后，官至中书令，赠太师；祖郭守璘娶了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的胞姐为妻；父郭允恭官至崇义副使、常州知州。所以，与仁宗为婚还算是亲上做亲。此外，刘太后还别有想法，她曾对辅臣说："自古以来，外戚很少有能长保富贵的，大都因为宗族太盛、权势过大而招祸。我特意从衰微了的旧族中选郭氏为皇后，免得以后她的族人干扰朝政。"这是刘太后的切身体会：若非刘氏宗族衰微，如今朝中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仁宗无奈，只得与郭氏成亲。天圣二年（1024）十一月，立郭氏为皇后。常言说：强扭的瓜不甜。郭氏虽做了皇后，仁宗碍于太后严训，也对她颇为尊礼，却是敬鬼神而远之，谈不上什么

情分。郭氏心中凄苦，自是可想而知，免不了拿其他宫人撒气，这就更不讨人喜欢。史书说她“挟章献势，颇骄后宫”，是不大公道了。章献倒是体贴她，始终替她作主，为了撮合这一对夫妻，禁止其他宫女与仁宗接近。仁宗正当青春年少，精力旺盛，却又毫无办法。刘太后既死，仁宗犹如羁鸟出笼，感情骤然得了解放，后宫妃嫔不下千数，任他召唤，郭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宫嫔中有尚氏、杨氏二人最得仁宗宠爱。郭氏独专后宫将近十年，如今见她二人与皇上亲热，自己反被冷落，如何忍受得了：那股醋劲难免要对二人时时发作。而尚、杨二人也不是好相与的，个个聪明机智而又锋芒毕露，既得皇帝宠爱，如何把一个失了势的皇后放在眼中。双方明着是言来语去，暗中却是唇枪舌剑，争斗不已。古人说：风月场不下战场。这话就是对三人之间关系的写照了。有一天，三人陪侍仁宗，尚氏仗着仁宗宠爱，将战争升了级，竟当面讥刺郭氏。那还得了：古代后妃的关系如同妻妾，而妻妾关系类似于主仆。妻对妾打得、骂得，而妾对妻不敬便是以奴欺主，法律是不允许的。宫廷中的妃后与普通人家妻妾的不同是又增加了一层君臣关系，宫外以皇帝为君，宫内是以皇后为君，尚氏不敬皇后便是以下犯上，以臣欺君，罪名不小。郭氏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心道：你不过仗了皇帝宠爱，寻常间暗中撒野，我抓你不着，皇帝又护着你，倒也罢了。如今你当着皇帝面辱我，这样最好，看我撕烂你的嘴，抽出你的后蹄筋。有国法、家法在此，看皇帝还能护得你不能。想到此处，揎拳捋袖，就要粉拳痛打尚美人。尚氏纵有天大胆子也不敢与皇后对打，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可怜巴巴地望着仁宗求援。在仁宗眼中却不当她是以下犯上，以臣欺君，只不过是大、小老婆争风吃醋罢了。既不愿扫了大老婆的面子，更不愿小老婆受了委屈。原以为尚氏的不是多一些，见郭氏动了手，也就不再计较，毫不犹豫地做起了护花使者，伸臂拦在二人中间。郭后见皇帝护持尚氏，更加气

愤，必欲痛打尚氏一顿，以消胸中恶气。三人正撕撕扯扯之间，忽听“啪”地一声响，既清脆又响亮，不由都惊呆了，怔怔地站在当地。只见仁宗双手捂着左边面颊，眼中如要喷出火来；郭后既惊且怖，两眼发直，口中“我，我……”了半天，始终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扑通”一声跪倒在仁宗面前，“呜呜”哭了起来；尚氏一对乌溜溜的眸子在郭氏、仁宗脸上不住转动，始而幸灾乐祸，少时也恐惧起来，知道事情闹大起来，她也难辞其咎。原来，三人撕扯之间，郭皇后赶打尚美人，却一巴掌结结实实打在皇帝脸上。仁宗怒极，一时却不知该如何发作，“哼!”地一声，拂袖离去。

仁宗回到屋中，拿起铜镜一照，见脸上赫然五个指印，火辣辣地疼痛。越想越是生气，骂道：“非要废了这个贱人不可!”内侍阎文应正在一旁伺候，知道这是骂皇后。方才的事他都一一看在眼中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方才一场闹剧的是非，他比仁宗看得更清楚：尚氏欺主，郭后要打尚氏是完全正当的；尚氏逃开更是错上加错；仁宗搅在中间，有失君臣体统，挨了一巴掌叫做咎由自取；郭后错就错在误伤了仁宗，罪不致废。可是他不以正理引导仁宗，一味顺着仁宗说话，这大约是太监的职业病。一旁插话道：“皇上要废皇后，事体不小。方才的事，大臣又没亲见，不知皇上受的委屈，如何能依？再过两天，陛下面上掌痕一消，再无证据。外间大臣还道是皇帝只不过是夫妇间生了一场闲气，谁也不会相信皇后竟把皇帝打成这等模样。”仁宗道：“依你说该当如何?”阎文应道：“以奴才说，不如马上把宰相传来，见了陛下的面伤，看他有何话说。”仁宗听了，默默不语。这种事毕竟不算光彩。寻常男人被老婆打了，也不愿指着伤处向旁人告状，何况天子？阎文应善体人意，立刻猜中了天子的心思，慌忙说道：“奴才该死，原不该说这种话。只是见皇上与相爱的人在一起，皇后时常从中打横，不要说闹得皇上不开心，连

我们做奴才的也替皇上不平。似这等局面，何时是了？奴才心痛皇上受委屈，才大胆劝皇上这么做的。要不，只怕再难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仁宗点头称是，立刻吩咐，传宰相吕夷简晋见。

吕夷简将事情经过听了一遍，暗叫一声“好，皇后终有一天撞在我手中，看你如何逃过此劫？”吕夷简如此痛恨皇后是由于他与皇后早先有一段过节。

明道二年（1033）三月，太后去世后，仁宗开始独理朝政，他雄心勃勃，一定要搞出个样子来，说明他的能力不比母后差。宰相吕夷简针对刘太后临朝时的弊政，提出八条施政方针，包括什么端正纲纪，禁止贿赂、辨别奸佞、停止劳役、节省冗费等，仁宗以为切中时弊，把他当作心腹。为了把太后任用的“奸佞”驱逐出朝，仁宗找吕夷简商量，共同拟定一个贬官人员名单。计议已定，仁宗乐呵呵回到后宫。郭皇后一面服侍他宽衣洗漱，一面问他为何这般高兴，仁宗把他与吕夷简商定清除太后党羽的事说了一遍。没想到郭后对太后感恩戴德，最不乐意听人说太后的坏话。当下心中不满，又不敢对皇帝发作，难免迁怒于吕夷简，说道：“别人是太后党羽，他吕夷简就不是太后党羽了？他的宰相是如何做的？还不是太后提拔他，如今反倒说短论长，只不过比别人滑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罢了。”仁宗一想：这话也不错。自宰相张知白去世，太后亲手把吕夷简从开封府知府提拔为宰相。数年来，别人的官职升升降降，他屁股下的宰相交椅却像是生了根一般的牢固。太后对他言听计从，哪一件事不是先与他吕夷简商量妥而后颁行的？于是在免官人员的名单末尾又加上了吕夷简的名字，命人送到学士院起草制书。

第二天早朝，文武官员各按朝班站定，适逢吕夷简押班。众人已经风闻今日将有大的人事变动，个个心中惴惴，不知吉凶。只有吕夷简神态安详，步履从容。一些自忖免官有望的人看到他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心中不住暗骂。早朝罢，听宣赞舍人宣读

制书，命枢密副使夏竦知襄州，参政陈尧佐知永兴军，枢密副使范雍知荆南军，枢密副使赵稹知河中府，参政晏殊知江宁府，枢密使张耆判许州。吕夷简数了数，共是六人，知道所拟名单已经念完，正要宣布散去，阁门官道："相公且慢，还有一道白麻未宣"。吕夷简不禁诧异，正自猜想，宣赞舍人已开读道："着门下侍郎、平同章事吕夷简，以使相判许州。"吕夷简头脑中"嗡!"地一声，直惊得目瞪口呆。头脑中一片混乱，简直不知道是如何回到了宰相府。

清醒过来后，回到家中，一面吩咐打点行李，准备到许州赴任，一面四处托人打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拟定的贬官名单，把他自己也贬出了京城。这个跟头栽得太大，不弄清楚，死不甘心。终于从入内都知阎文应那里得知，是皇后说了他的坏话。从此，心中恨透了郭皇后。

谁知当年八月，他就重新担任了宰相职务，十二月就碰上了郭后误打仁宗面颊的事。吕夷简暗自庆幸道：这真是六月债，还得快，皇天有意让我报了这一箭之仇。于是对仁宗说道："陛下不要为此事烦恼，帝后不和，自古有之，为臣马上按陛下旨意拟定诏书，将皇后废去也就是了。"仁宗万没想到会这么容易，仍不放心道："外间大臣不致——，"话未说完，吕夷简已料到他的心意，胸有成竹地说："陛下放心，此事交给为臣办是了。汉光武帝、唐高宗都是一代明主，免不了有废后的事发生，算得了什么大事？光武帝也有个郭皇后，只因为失宠怨恨，便被废掉，更何况是打伤了陛下？"仁宗这才理直气壮起来，要吕夷简马上去办。

吕夷简说得轻松，心中却明白此事的分量，知道办起来必定棘手。但出于对郭后的愤恨，他是豁出去了。先吩咐有关人员，凡御史台、谏院所呈奏章，一概不许收受，免得皇上看了动摇。一面匆忙草拟诏书，说是皇后郭氏心向黄老，自请入道，特封为

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迁入长宁宫静修，赐名清悟。消息传出，御史台、谏院官的章奏果然一封接一封地呈了上来，由于吕夷简预先吩咐过不许收受，又都原封退了回去。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大怒，决定率领台、谏官孙祖德、宋郊、刘涣、蒋堂等十人，一起到垂拱殿前"伏阁奏事"。伏阁是宋代奏事的一种形式，指跪在殿阁前，请求召见，不达目的，宁可跪死也不罢休。一般是朝廷有重大失误，下情不得上达时才有这事发生，被当作朝廷大事。不过吕夷简对郭后成见很深，无论如何他也要干到底，吩咐殿门官将殿门关了，不许向天子通报。孔道辅膝行而前，抓住殿门上的铺首铜环，扳得殿门山响，一面大声呼喊道："皇后被废，这是何等大事，天子为何连台谏官一句话也不肯听？"尽管吕夷简不许向天子通报，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仁宗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消息，传命台谏官一起到中书省，听宰相解说废后的原因。众人来到中书都堂上，听吕夷简将经过说了一遍，孔道辅道："人臣与帝后，如同子女与父母。父母不和，子女只有从中劝解，怎能帮助父亲惩治母亲，劝他们离异？"吕夷简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况且汉唐以来，这种事屡见不鲜，无须大惊小怪。"孔道辅道："你身为大臣，应该以尧舜的事勉励皇上，怎能以汉唐皇帝失德的事要皇帝效法呢？"吕夷简无言回答。范仲淹道："君是天下之父，后是天下之母。天下之母可无罪而废，是天下之父也可无罪而废了？"吕夷简大怒，拍案而起道："这是什么话？简直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范仲淹毫不退缩道："是谁无父无君，我与你朝堂上说个明白。人心自有公道在，难道谁还能一手遮天了不成。""一手遮天"显然是指责吕夷简拒绝接收台谏章奏而言，他心中虽然恼怒，却无法辩驳，便以恼怒遮脸，"哼"地一声离开都堂，将孔、范等人凉在那里。

范仲淹一语提醒了孔道辅，原来在朝堂上当众辩驳，也是宋时奏事的一种形式，称为"廷争"。"宰相既不讲道理，何不与他

廷争？这种事若不争到底，要我们台谏官何用？”当下与众人商议，第二天早朝时邀留文武百官廷争。第二天，孔、范等人满怀信心地来到宫门前，在待漏院中等候早朝。突然阁门使传宣，有诏书到。众官匍伏在地，静听诏旨，却是一道贬官的通知。原来吕夷简也不是凡庸之辈，从范仲淹的话中猜出他们将有廷争之举。若以宰相之尊闹到与谏官当众辩论这一步，实在不大光彩。于是先发制人，禀明皇上，说伏阁不是太平美事，孔、范等人竟敢随便伏阁奏事，有辱圣朝，应当惩戒。皇帝点头称是。吕夷简当即拟了诏书，皇帝批复后发下来，凡伏阁官员或贬或罚：孔道辅贬知泰州，范仲淹贬知睦州，其余各罚铜二十斤。按照惯例，御史中丞罢员须由官告院颁布告辞。这次孔道辅被贬，吕夷简为要他火速离京，破例只由宫中降下一张敕纸便即生效。孔道辅刚从朝堂前回到家中，敕纸随即也就降下了。朝廷又派了专使押送孔、范二人出城。并颁诏书说：“谏官御史自今以后只许秘密奏本，不许再干伏阁的蠢事，以致使人心不安。”台谏官如何心服？侍御史马绛奏请说：“孔、范二人忠于职守，反被贬官，虽贬犹荣，我马绛心中赞佩，请朝廷连我一起贬了罢。”待御史郭劝、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以及将作监丞富弼也都上书谏阻，段少连书中说：“臣听说两府大臣商议，要使皇后入道。皇后乃一国之母，如若有罪，当明告天下，废为庶人，岂有使她入道之理？消息传出，一日之中，京都震动，喧腾不已。孔、范等人恐诏命一下，铸成大错，难以追改，率群臣伏阁上书，竟遭贬逐。又有诏书说，永不许伏阁。伏阁有什么错？唐朝时王仲舒伏阁，为陆贽雪冤；崔元亮伏阁为宋申锡雪冤。史家以为美谈。今朝廷禁止伏阁，此后朝廷再有大事，谁还敢冒死申言？请皇帝好好想一想，孔、范的行为究竟是忠或不忠？该不该如此降罪？如若大臣人人享朝廷俸禄，面对朝廷的失误不加谏阻，小臣也都畏罪不肯开口，朝廷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又说：“臣等听说使皇后入道，

降为净妃，都是某大臣的主意。臣等上书请求召见，又被拒绝，明明是有奸邪小人阻断言路，离间陛下与外廷的关系。陛下若不明察，必为奸邪所误。"这是指着吕夷简的鼻子叫骂，朝廷只是不予理睬，只得作罢。就这样郭后终于被废，吕夷简和仁宗都遂了心愿。

从此尚、杨二美人更加肆无忌惮。景祐元年（1034）四月某日，忽然有一名小太监来到开封府中，要开封府官员跪听"教旨"。当时侍御史庞籍任开封府判官，心中暗想：皇帝传旨称圣旨，刘太后临朝时传旨称教旨。如今刘太后已死，皇后又被贬，何处又有教旨？小太监宣读以后，才知是尚美人传命开封府免除工人交纳的市租，庞籍心中既愤怒又好笑：一个宫中美人也传什么"教旨"，要我们做这做那，当真是不自量力。当即将太监拘留，随即奏明皇上，要他处理。仁宗知道是尚美人胡闹，只好下令将小太监打一顿棍子，又命政府各部门，此后宫中传命，不得接受。尚美人被扫了面子，如何肯依，在宫中闹了个天翻地覆。三日后，仁宗下令，以尚美人父继斌为右侍禁，叔伯继因、继能为右班殿直，算是给尚美人陪礼，这才罢了。

仁宗废了郭后，私生活失了牵制。当年八月，王曾自天平节度使改任枢密使，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以书信劝他谏阻仁宗，其中说，自从废了郭皇后，道路传言，说仁宗皇帝好近女色，失德的事越来越多。七月、八月以来，流言更多，说他与众妇人在宫内聚淫，饮酒无时节，歌舞连昼夜。又有人说仁宗近来身体不适，时常有病，这就是《春秋》经传中所说的蛊惑之疾。石介这些话并非虚言，自郭后被废，尚、杨二人每天不离仁宗寝宫，搞得仁宗日渐消瘦，食欲减少，甚至数日不进食。宫内宫外，人人忧心忡忡，都说尚、杨是罪魁祸首。首先是杨太后告诫仁宗，要他治尚、杨之罪，不可留在宫中。仁宗口中答应，心中不愿，所以迟迟不见行动。其次是入内都知阎文应，不分早晚，天天在仁宗耳

边絮聒，请求贬斥尚、杨。只听得仁宗心乱耳烦，有心治阎文应罪，又知他是一片忠心，自己近来也确实感到精神恹恹，神思不属，知道长此下去，必然不妙。只是色欲之心太盛，不能割舍。终于有一天被阎文应说得不耐烦了，顺口敷衍道："好，好，贬了她二人就是，只要你能叫我耳根清静。"好一个阎文应，明知这是仁宗搪塞之言，过后必不肯照办。便不再言，私下招呼几名小太监，推了二辆毡车，要将尚、杨二人载出宫去。尚、杨哪里肯依，哭哭啼啼，不愿上车。阎文应老大的耳光扇了过去，口中骂道："贱婢，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不容分说，将二人塞入车中，推了出去。当晚，仁宗不见尚、杨二美人，阎文应道："奴才已按陛下吩咐，打发她二人出宫了。"仁宗张口结舌，没有话说。心中却恨阎文应不已。正要发作，报说："太后驾到。"原来阎文应早料到此着，先已请了杨太后前来劝说。仁宗只好作罢。第二天颁下诏书，命净妃郭氏迁到瑶华宫居住；尚美人也着命人道，在洞真宫居住；杨氏安置于别宅。一面按太后吩咐，命参政宋绶草拟诏书，要在天下有德的门阀世家中，选择堪为皇后的女子。

九月，有人推荐寿州茶商的女儿陈氏入宫。这陈氏生得千娇百媚，明艳照人。仁宗一见，止不住意马心猿，当即应允，择日成亲，立为皇后。宋绶闻讯，上奏说："陛下要臣草拟的诏书中说，要择世家女子立为皇后。如今墨迹未干，为何改变初衷，选了一个寒门女子，岂不是失信于天下吗？"枢密使王曾、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也相继谏阻，接着是侍御使杨偕、知谏院郭劝等上书反对。仁宗知道这门亲事万万难成了。只好命陈氏出宫。司马光《涑水纪闻》中记述的这件事更有意思，说陈氏的父亲名叫陈子诚，走杨太后的路子把女儿送到宫中，杨太后和仁宗对陈氏都很满意，答应将她立为皇后。已经送到掖庭，准备入皇

帝寝宫了，被阎文应的儿子[1]阎士良知道了消息，阎士良也是太监，在宫中掌管御药院，知道此事不妥，又无法阻止。灵机一动，想了一个主意，就去见仁宗。仁宗正在翻百叶图，选择让陈氏陪宿的日子。阎士良道："听说陛下要纳陈氏女为后，真有此事吗？"仁宗道："不假，你有何话说？"士良道："陈氏父号称陈子诚，是由于他的职务是子城使。陛下可知子城使是做什么的吗？"仁宗道："不知"。士良道："大臣家中的奴仆头儿，有一等称子城使。陛下若纳这等人的女儿为妻岂不令大臣耻笑？"宋代法律中有一条，良人不许与奴婢为婚，否则有罚。何况是天子。仁宗急忙命人将陈氏赶出宫去。"子城使"与名"子诚"自是两码事，阎士良将二者连在一起，触动仁宗的忌讳，达到逐陈的目的，是够聪明的了。

数日以后，决定立曹彬的孙子曹氏为皇后。曹彬于宋初曾率兵灭西蜀、南唐等国，官封检校太师、枢密使，赠韩王。有七个儿子，次子曹珝娶了秦王德芳的女儿兴平郡主为妻。曹氏是第五子曹玘的女儿，门第之贵盛，天下少有其比，群臣再也没有话说。至于仁宗是否喜欢，就无人理睬了。

这位曹夫人是将门虎女，大约仁宗对她的"虎"劲不怎么赏识，以至婚后不久就怀念起被废的郭皇后来，不断派人到瑶华宫去探望她，有时还带给她几道亲笔写的乐府诗词，以表思念之情。郭氏也以韵唱和，却是抒发她幽居生活的凄苦和哀伤。仁宗读了，更增悔恨。史书还说，仁宗曾私下遣使召她入宫相会。郭氏岂是苟且之人，轻易去赴他这种桑间濮上的约会？回答说："若要团聚，除非在朝堂重新颁下册立的诏书不可。"宫中既有了曹后，如何能再册封郭氏？仁宗好不为难。正犹豫间，早已被阎

---

[1] 唐末太监有势力者，都选良家子为假子，将其阉割后带入宫中，以承继自己的衣钵。有父子之名，而无血缘关系。

文应知道了消息。自知郭氏被废，他出力不小。一旦郭氏重新入宫，岂能与他善罢甘休！恐惧害怕之际，转而起了杀机。景祐二年（1035）十一月，郭氏身体微觉不适，仁宗命阎文应带了御医前去看望。数日后，郭氏突然死亡。宫内外都怀疑是阎文应将郭氏毒死，苦无确证，难以诉诸法律。仁宗伤痛，命以皇后礼安葬。开封府知府范仲淹久为郭氏不平，出了这件事更是愤怒，便根据传言上书论述阎文应的罪恶。仁宗正愁无处发泄，得了奏章，也不问有无证据，便下令将阎文应流放岭南。士大夫有谁肯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可怜的人在途中就死掉了。

宫廷中的婚姻悲剧无代无之，但与郭后被废的事相比较就会发现，前后是有不同的。唐高宗热恋父皇太宗的宫嫔武则天，阻力自然也很大。但高宗即位后，终于如愿以偿，废掉了世家出身的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热恋没过门的儿媳，也遂了心愿。宋朝仁宗却不得不屡屡将不相干的人立为皇后，心爱的人倒是或死或散，可知宋代礼教比前朝深化了。皇帝如此，常人更可想而知，这是宋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其次，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宦官在宫廷中起的作用。宋人常以本朝没有发生汉唐时的宦官之乱而自豪，以为是祖宗"家法"优于前朝。其实这些家法对宦官的限制是有限的。到清代设内务府主持宫廷事务，以满洲大臣或王公任内务府总管大臣，属官也以上三旗包衣充任，使宦官只出劳力，不掌事权，算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但到了晚清，随着政治的日渐腐败，宦官左右政治的作用也愈益显著了。宦官问题是封建制度衍生的痼疾之一。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郭后使》、《杨德妃传》、《宋绶传》、《孔道辅传》、《吕夷简传》、《富弼传》、《范仲淹传》等。

宋·李焘《长编》卷113—115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25《郭氏之废》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声，是北宋时期的一次重要事件。

庆历新政与其他任何政治改革一样，都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自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政以后，面临着复杂的局面，知制诰李淑之描述这种局面说是国用未足、滥官未别、冗兵疲马等三个方面。国用未足是指经济方面的困难，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连年自然灾害。明道二年，江南、淮南大旱，百姓四处流亡。接着又是时疫流行，死亡人口占了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二三。史书说，政府设粥棚救灾，染上时疫的百姓喝了粥就死，有的村落人口全都死亡，化为一片废墟。此外两川（今四川境）、山东等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受灾。其次是由于政府用财不当，横赏浮费造成的。宝元二年（1083）十一月，刑部员外部宋祁曾上书说，朝有三冗三费。三费：一是指道场斋醮，无日不有，每次少则七日，多到四十九天。所费香蜡纸烛，菜蔬酒面钱帛，不可胜计，都由官府供给。或托言为皇帝祝寿，或为民祈福，其实无非欺骗。二是京城寺观，所费衣粮、所置官司，比普通州县寺观多二倍以上。岁时供帐䊐，又施给田产，装饰神祠，增修塔庙，僧徒不徭不役，花费也不在少数。三是不问边疆内地，到处设立节度藩镇。宋制：节度藩镇，国家支给公用钱，为的是让他们赏赐有功，招纳宾客贤士。内地所设藩镇，既无兵可带，又无须招纳宾

客，公用钱照领，都入了私囊。其实，横赏浮费，远不止以上三条。经济困难的第三条原因是由管理不善造成的，国家财赋收入的大项：茶、盐和运法都存在许多漏洞，当收不收，不当出而出，使国家财赋遭受很大损失。康定元年（1040）五月，权三司使郑戬曾上书说，建国八十年，人口增加，土地垦辟，山泽之利与国初相比，增加十倍以上。而国家的实际收入反而减少，究其原因是有法不能行，官吏不称职，赏罚不严明。以铜盐茶酒为例，前一年税收与额定数字相比，减少了数万贯。支出却年年增加，导致三司匮乏。自真宗天禧三年定制，由内藏库每年出缗钱六十万帮助三司，诏书再三告诫，不得复有增加。而自仁宗明道以后，四年之间三司借内藏钱帛达九百万多，平均每年多达二百多万。自然冗兵、冗官也增加了财政困难。宋建国初有兵二十万，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增到一百二十五万，相当于国初的六倍多。这对国家是个很大负担。贾昌朝说，他曾在京都附近的畿县为官，那里驻禁兵三千人，须留一万户的租税赡军，刚刚够用，军队的岁时赏赐还不包括在内。按他的估计：朝廷每年用度，有三分之二用来养兵。由于西、北二方驻兵防边，河北路租赋收入全部用于当地养兵，只够十分之三；陕西租赋只够当地驻军花费的十分之五。官僚机构的膨胀也成了朝廷一大害。太宗初朝官不论文武，在册者才二百人；真宗初就翻了一番，为四百人；仁宗天圣元年已超过千人大关。此后继续增加，其势不衰。不单单增加了财政负担，还使人浮于事，败坏了吏治。

新政除了上述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仁宗即位后十余年，一直处于刘太后控制之下，一旦亲政，希望使政治一新，干出一番事业来。宰相吕夷简投其所好，上书陈述新政八事，如端正纲纪、禁止贿赂、辨别奸佞、停止力役、节省冗费等。不久吕夷简下野（参见《郭后之废》篇）。再相之后，出现

了郭后被废的事。吕夷简以私废公，遭到朝臣的反对。他自顾不暇，早把“八事”抛到脑后了。仁宗先后起用李迪、王曾等正直老臣，一个个都被吕夷简挤出朝去，终于吕夷简站稳了脚跟。他其实不是新政派，而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奸邪”之徒，站稳脚跟后，引导仁宗制礼作乐，歌咏升平，闹腾了很一阵时间，直到庆历新党主持政事为止。

庆历新政的第一步便是仁宗把范仲淹等庆历党人推上朝廷中枢。此事一波三折，颇多阴难。最早可上推到郭后被废时的明道二年，范仲淹因上书谏阻被贬，许多大臣为他鸣不平，这是新党形成的开始。景祐元年（1034）末，范仲淹重被起用。这时吕夷简独霸朝政，大臣进用多是由他举荐才能成功。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上书说，官吏封迁贬斥都有一定次序，皇帝应该按规矩行事，不应该把权力全都交给宰相，由他任意胡来。范仲淹还绘了一张《百官图》，在朝堂上指着图说，由某官升某官叫做序迁，不如此叫做不次升迁。序迁是按公道办事；不次升迁，其中必有私情。这等于指着宰相吕夷简的鼻子骂街，他自是恼怒，借故在仁宗面前毁谤范仲淹，说他行事迂阔，好名无实。范仲淹闻知后，写了四篇大论献给仁宗，指责朝政的失误。其中说汉成帝信任张禹，导致了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中也有张禹，坏陛下法度，以大为小，以易为难，指鹿为马，不可不早日辨别。吕夷简大怒，到仁宗面前分辩，并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也上表分辩，二人互相指责，言词愈来愈激烈。范指责吕，所说都是公事，每一件都是仁宗批准了的，是或者非仁宗骤然间难以分辨；而吕指责范的事，至少越职言事这一条是铁案如山，凭谁都得承认。因为按规定，朝廷政事有无失误，只有御史台、谏院中的“言官”才有权议论，其他官员没有特旨是不能乱说的。范仲淹为开封府知府，无权指责朝政缺失。因此仁宗将他贬官为饶州知州。侍御史韩渎讨

好吕夷简，吕既说范"荐引朋党"，不可不把他的朋党一网打尽。于是上书请求将范仲淹朋党的姓名揭榜于朝堂，以戒百官越职言事。仁宗批复"照行"。自此朝堂上刮起一股惩治朋党的恶风。士大夫害怕吕夷简的权势，范仲淹离京，竟不敢前往送行。独有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二人不惧，载酒担肉，前来饯行。有人警告他们会被误认为范的同党，王质笑道："范仲淹是位贤人，若能成为他的同党是我的幸运。"显然，吕夷简的压制，促使朝中朋党的形成。

范被贬，御史、谏官无一人敢出面救援；言官以外的人出面，就是"越职言事"。直过了六天，一些正直大臣再也隐忍不下，秘书丞余靖首先上书说："范仲淹指责大臣，对与不对，在于陛下抉择。对则听纳，不对可以不理。若因此遭贬，于陛下纳谏的圣德有累。"吕夷简将他贬为监筠州酒税；秘阁校勘尹洙更上书说："臣因范仲淹为人忠直，一向与他交往，我二人义兼师友。朝中正在追查党人，我当然是他的同党。虽然国恩深重，'党人榜'中没有我的名字，细想起来，余靖与范素无交往，尚被指为朋党，我若幸于苟免，岂不心中有愧？因此情愿与范仲淹一同贬官。"还有个夷陵县令欧阳修给右司谏高若讷去一封信，说范仲淹为人刚直，以谏诤获罪，你身为言官，不但对朝政缺失闭口不言，范获罪后，仍无一言相救，依旧出入朝中，侧身于士大夫之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他书信呈给皇上，大叫冤枉。欧阳修因被贬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蔡襄为此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盛称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高若讷为不肖。蔡襄是个大才子，诗做得很漂亮，京都人互相传写，真有点儿洛阳纸贵的势头，书商们大赚了一笔。泗州通判陈恢上书请求惩罚诗的作者；左司谏韩琦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陈恢是"越职言事"该当治罪。契丹使者恰于此时入朝，将此诗买走，贴于幽州使馆。事情越闹越大了，吕夷简已

不敢像先前那样，凡为范仲淹说句公道话的一概贬官。而同情范仲淹的人上书不已。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罗列史实，论证治范仲淹罪、阻断言路的害处。甚至指责说，皇帝“一面诏书屡降，求群臣直言，还设立了让臣下直言的匦箱（如同今检举箱一类的东西）、以及直言极谏科等，一面将敢于直言的范仲淹等人问罪，一定是大臣从中壅蔽皇上聪明，堵塞忠良之口。”矛头所向，已经昭然若揭。但他还嫌不够明白，进一步点出宰相二字来，说“纳善进贤是宰相分内事。像今天这么搞法，臣担心秦时赵高指鹿为马的事将重新出现。”

当年四年四月，吕夷简罢相，推荐了二个不了事的人王随、陈尧佐代替他，为以后复相设下伏笔。十二月，西北忻、代、并三州发生大地震，连续五天不止，墙倒屋塌。忻州死 19742 人，代州死 759 人，并州死 1890 人，伤者更多。余震直到京都汴京城。同情范仲淹的大臣又有文章可做了，右司谏韩琦、直史馆叶清臣都上书说：“地震，是上天对于大臣专权现象的谴责。”仍把矛头指向吕夷简。叶清臣还说：“自从范仲淹、余靖以论事被贬谪，天下人闭口不敢言朝政，至今已近二年。愿陛下深自反省，以答天谴。”仁宗因而下令将范、余等人从贬官的处所往近处迁移。范仲淹改任润州知州，余靖改为监泰州酒税，欧阳修改为光化县令。

这一招既然灵验，就有人继续以天灾大做文章。第二年即宝元元年（1038）正月，直史馆宋祁说，去年以来，天灾屡见，如九月份群星西南流，是百姓流离的象征；月行黄道、地震边州，是臣下擅权、后妃将盛的象征；火焚兴国寺塔，燃烧烧至艺祖神御殿，是神不感通的意思。天象既现，距离灾祸的出现远不过十年，近者才三四年。陛下应善思对策，消弭灾祸才是。于是仁宗下诏，求天下人直言朝政缺失。大理评事苏舜钦上书说：自从范仲淹以直言得罪了奸臣，遭贬谪以来，朝廷频下诏书，不许越职

言事。民情汹汹，私下相聚，议论朝廷缺失，而大臣缄口，不敢出一言。惟有上天一再告诫陛下：地震星流，都是天对陛下的告诫。陛下应该勤于政事，亲近刚正耿直的大臣，疏远奸邪小人。明主的职责首要是求贤。满朝文武不必尽是大贤，几个重要职位却必须由贤人充当。王曾去位后，吕夷简推荐王随做了宰相，王随此人，虚妄、平庸、喜谄谀逢迎，不是个正派人，不应居此重任。石中立以诙谐自任，油嘴滑舌，没什么威信，不应做执政。御史中丞张观和司谏高若讷，此二人性格都属温和儒弱型，没有刚正敢言的气质。以这样的人为言官，纯是辅臣的一片私心，故意要言官保持缄默的缘故。

此外，直史馆苏绅、叶清臣，校书郎张方平，右司谏韩琦等也都上书，或指责宰相奸邪、或指责执政疲软。仁宗终于受了感动，三月，王随、陈尧佐罢相，石中立、韩亿罢参政。以张士逊、章得象为宰相，王鬷、李若谷为参政。

吕夷简贬范仲淹，如今吕夷简罢相，吕夷简所荐王随、陈尧佐也已罢相，大臣们仍然没完没了，动辄范仲淹如何如何。仁宗心中十分反感。十月，下诏书说："范仲淹贬官，是由于他密请立皇太弟为继承人，并不只因为诋毁大臣吕夷简。如今朝内外大臣屡次称赞范仲淹，实在令人不解，难道这不是朋党的表现吗?"下令将范仲淹贬往岭南。参政李若谷劝解道："近年来，风俗不淳，有人专以朋党污蔑良善。本来君子小人各以类相从。若天子也听信'朋党'这类话，君子将无法立于朝堂了。"仁宗这才没有广所株连。

直到康定元年（1040）正月初一，发生了一次日食，知谏院富弼奏称：日食是臣下蒙蔽圣明的象征。应付天变的最好办法不如通下情。仁宗以为有理，诏命除去"越职言事"的禁令，命朝内外大臣畅言朝廷事务的不当处。五月，张士逊罢相，吕夷简重任宰相。

庆历三年（1043）三月，增加谏官员额，并以欧阳修、王素、蔡襄为知谏院，以余靖为右正言。蔡襄这位《四贤一不肖诗》的作者很是高兴，以为从此言路敞开，但又担心难以持久，对仁宗说道："任命谏官并不困难，难在听从谏言，听谏虽难，用谏更难。欧阳修、王素、余靖三人忠诚刚直，必能知无不言。为臣只怕朝中奸邪给他们捏造罪名，不外有三种：说他们好名、好进，或者说是张扬皇上的过失。愿陛下能看透这些人的用心，不要使今日任谏之心半途而废。"这番话是把说欧阳修等人坏话的那些人的路子预先堵死，可说是用心良苦。出人意外的是仁宗与欧阳修十分投缘。欧阳修论事切直，不顾情面，许多人视之如仇，谗毁、诋污者无数。仁宗一概不理，常对侍从道："像欧阳修这样的直臣，天下如何能找出第二个来？"

欧阳修极端推崇范仲淹，仁宗待欧阳修如此，范仲淹的厄运必不久长了。四月，命夏竦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韩、范二人的提升固是好事，夏竦任枢密使却使朝臣哗然。这夏竦很有才华，真宗初的名宰相王曾曾经极力推荐他，在朝居官有不少建树，后来由于与吕夷简不合被挤出朝。他才术固然过人，只是做官心切，不免时时耍些手腕，玩点儿权术，不能以诚待人，因被当时人视为奸邪。欧阳修、蔡襄听说调他入朝做枢密使，交替上书说：此人在陕西，负责与西夏间的战事，无尺寸功劳。骤然出任枢密院主管军事的主官，朝廷将如何激励世人？仁宗以为使他做枢密使这样的高官是任其才，不是奖功，所以不以欧、蔡二人的话为然。二人苦谏不已，仁宗起身而去。御史中丞王拱臣伸手扯住仁宗的衣裾，请求仁宗让二人把话说完。这时报说夏竦已到都城门外，来得好快！大臣顿感惊慌，纷纷请求暂不要召他见驾，朝廷议定了再做区处。右正言余靖道："夏竦在陕西，屡次向朝廷告病，请求解职。听说召他做枢密使，什么病也没有了，日夜兼程赶来京都。对这么一个有心计的人，朝廷若不

及早作出决断，等他见了皇上，势必有一番说辞，使皇上动摇，再加上朝廷中有些人替他帮忙，就再也拿他没有办法了”。大臣排挤夏竦更急，本章一道道呈递上来。仁宗无法再坚持原议，只好命夏竦重回陕西，改任杜衍为枢密使。夏竦回到陕西后，上了一道万言书为自己辩解，明知已与事无补，只作为对言官们对他的攻击的回答。蔡襄对仁宗说道：“陛下不用夏竦而用韩琦、范仲淹，士大夫与百姓私相祝贺，欢声如潮。如今天下形势如同一个病人，陛下已得良医，往后的事便是看如何信任医者之言，切实做下去，不但疾病可愈，还能健身长寿。否则，纵然良医也是无济于事的了。”

吕夷简自从第三次出任宰相，已垂垂老矣。这年五月，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说他三年来，不更改一事，以姑息为安，以避免朝臣的指责为智。如今陕西将帅，屡屡兵败；北面的契丹人乘此机会要挟朝廷增加岁币；刺史州官不得其人，已是府库空竭，百姓怨愤。大好河山闹成了这副样子。听说吕夷简以病求退，说什么“四方已宁”，他要默默退出朝廷。如此欺枉天子，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书其罪。终于罢相。

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富弼任枢密副使。至此，晏殊、章得象为宰相，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等同为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人为谏官，庆历新政的第一步——人事变动已经走完。

仁宗皇帝一心要干出番事业来，对范仲淹备极信任，屡次向他询问当世的疑难事务。范仲淹深为感动，又觉为难，曾私下对人说：“皇上对我恩深义重，已经无以复加。但是如今天下积弊已久，要彻底扭转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操之过急。”无奈皇上一再相询，又专为他开天章阁，准备好纸笔，要他写出自己的施政意见，或召辅臣商讨。提出全面改革方案的事已迫在眉睫，不可再拖。于是范仲淹上书，提了十条改革方针：名目为明黜陟、

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前五条都是讲的改善吏治，第六、七条是发展生产和整顿武备以加强军事力量，八、九二条是加强中央权力，第十条是减轻百姓负担。可见他这套方案是把改善吏治作为改革重点。在他看来，天下事之所以办不好，主要是办事的各级官吏不得力，冗官太多，贤愚同滞造成的。不过他的措施比较缓和，"明黜陟"，是针对官员的磨勘制度而发。认为现行磨勘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问职务劳逸，不分内官外官，年头一到，就可升官。所以"坐致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因而他建议有大功大善者，破格升用，不受磨勘限制；而绝大多数无大功大善的碌碌之辈，则主张凡由举荐或差遣而任职的，依旧按原制磨勘，文武仍三年一迁。此外不再"非时进秩"。而对那些不听差遣，另外"陈乞"得官的官员，改为五年一磨勘。此外对于磨勘年限的计算法，虽比原来严格，也还算合理。"抑侥幸"是针对"荫子"制度而发。自真宗以后，每年遇朝廷举行郊天大礼或皇帝生日（圣节），大两省官（中书省、门下省五品以上官）至知杂御史以上官，每人可奏请一子出任京官；少卿监奏请一子充试衔；其他正郎，带职外郎及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官，遇大礼可奏请一子任斋郎。无子者可以骨肉亲属充。范仲淹计算说，按照这种制度，一个学士官任职二十年，一家之中子孙兄弟就有二十人出任京官，因此搞得冗官充塞，有才能者却无缺可补。这的确是宋代一大弊政。范仲淹的改革办法是：两府（中书、枢密）、两省（门下、尚书）官遇大礼依旧奏请一子充任京官，如奏弟侄，则降一级给试衔，遇圣节不再奏请；以下官员增加任职年限的限制，一般是连续任职二年者方许奏请。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时局"积弊已久，非朝夕可革"，急则生变的基本认识。虽可减小改革阻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可知他的改革并不彻底，效果不会太大。

当时西北二方用兵，损兵折将。仁宗特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富弼上书言当时世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核心是以进用贤才，黜退不肖，塞侥幸之路、去除宿弊为本，并且主张把监司一级中上等官僚中不任事的人逐渐撤换掉，改用有才德者，使各自沙汰本部吏员，达到精简官吏的目的。监司是朝廷官员中最重要的一个层次，要搞全面人事清理、更换，不是小事。史书说："于是小人始不悦矣。"新旧之间矛盾从此激化了。

枢密副使韩琦也奏请七事：清政本、会边计、擢贤才、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不久又上书论救弊八事：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他主要是针对当时边事的紧急状况，提出的选才任贤，以固边防的措施，不是全面的改革方案。自韩琦为枢副，知无不言。有些事是中书职以内的事，他也要指陈得失，使同事之间，多有微词，说三道四的人不少。惟独仁宗对他信任不疑。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纲领提出后，下一步便是把它付诸实践。欧阳修建议设立按察法：从内外朝官（常参官)、三丞（太常丞、秘书丞、殿中丞）及郎官中，挑选强干廉明的人为按察使，巡行州县，遍见官吏。廉洁者用红笔在名下做记号，平庸者以墨笔做记号，每年呈报朝廷一次，以作赏罚黜陟的依据。当年十月，便派出了张昷之、王素等第一批都转运按察使。范仲淹、富弼又请命中书省、枢密院，每路都委派转运按察使，让他们自己选择该路知州，由知州挑选该州知县，不称职的一概罢免。范仲淹选任各路按察使时，将朝臣姓名簿摆在面前，从头至尾浏览一遍，以为不称职的，顺手一笔将姓名勾掉。富弼道："你顺手勾去一个人名，容易得很。是否知道被勾者一家人将为此而痛哭。"范仲淹道："一家哭要比一路百姓哭好得多。"于是将被勾者全部免官。

接着又改革官吏的考核升迁制度，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磨勘

法。废除宋太祖时制定的年限满则迁官的旧制，建立审官院，专门负责考课中外职事官。凡任满者都到审官院磨勘，年劳和政绩二者皆俱，才得升迁。但是所有的京朝官都由审官院对政绩作出评断，谈何容易！日久必然流于形式。所以，后来又作了修正：规定文臣任满五年，武臣满七年，不犯赃私罪，都与迁官；曾犯赃私罪者，文臣任满七年，武臣十年，分别由中书省、枢密院呈报皇上，由圣旨决定是否给以升迁。并以法律形式将这种规定固定下来。审官制度，于太宗淳化年间设立过磨勘司，曾一度实行。但当时就不严格，每遇朝廷有郊祭等庆典，百官不经磨勘即得晋升。真宗时便撤销了磨勘司，每年举行郊祀等大典时，皇帝便普施恩赏，百僚皆得加官晋爵。所以不仅冗官多，高官和荫官也多。只要熬足年头，例能升为高官。于是范仲淹、富弼建议待制以上官满六年没有过犯，才能继续升迁，到谏议大夫（从四品官）而止；京朝官满四年始与磨勘，升到前行郎中（从六品官）而止。前行郎中以上、谏议大夫以下的卿、监官限额七十员，不足额才能增补。卿监官以上官员的升迁完全由皇帝决定。可见新法磨勘的核心是延长磨勘年限，增加升迁限制，借以达到减少冗官的目的。

十一月又下令改定荫子法，范仲淹、富弼议定：凡选人（幕职州县官）遇郊祀恩加官，要经过铨曹考试，不考试者不许加官；皇帝生日（圣节）不再施恩荫子；长子荫官不限年龄，其余诸子孙必须年过十五岁，弟侄过二十岁，才有资格受荫恩。

范仲淹受仁宗信赖，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划，不辞辛劳。但是按察使制度的实行，刷去大批官吏，不能不遭怨恨；此后实行的任子制、磨勘法都限制了普通官员的升迁机会，于是毁谤、怨恨之辞不胫而走，诬陷他们最容易的罪名就是“朋党”，妄说升迁不公、有亲有疏等等都是“朋党”二字的佐证。庆历四年(1044)夏，仁宗曾专门与执政大臣议论朋党的事。范仲淹解释

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各自成党。但君子结党是为了行善，不可禁止。"虽然说得堂皇，仁宗无话可答，但也自己承认确实结了朋党，仁宗心中不能不有微嫌。若再加上小人从中制造事端，范、富就难于做人了。夏竦就是这样看准事机，对他们下手的。

有个国子监直讲石介，平生疾恶如仇，遇事敢做敢为。范、富等人执政以后，他以为正人在朝，从此太平有望，心中高兴，作了一首很长的《庆历圣德诗》。上自仁宗，下至庆历新党诸要人，逐个儿歌颂一遍。其中难免有些虚张不实、夸诞太甚的话；他又曾给富弼上了一篇奏记，鼓励他努力政事，希望他成为伊尹、周公一类的大贤臣。夏竦使家中一个女奴习练石介笔迹，将石介奏记中的"伊、周"二字改为"伊、霍"，霍指辅佐幼主的霍光，一字之差，奏记就变了味儿，成了石介鼓励富弼废掉仁宗，另立幼主的大逆不道的话。此外，他还假作了一篇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也要女奴以石介笔迹抄写出来。以此为据，飞报朝廷。仁宗自然表示不信。但是上上下下，人言藉藉，富弼与范仲淹又想到仁宗的朋党之问，心中难以自安。为了表明心迹双双上章，请求到西北边境巡视。实际是要交出政权，免人猜疑。仁宗哪里肯依？二人一再请求，适巧边疆报说契丹出兵西夏，边境应该相应做些部署。六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将富弼留了下来。说是让二人一主内事，一主外事，仍是信之不疑的意思。

范仲淹先赴陕西，路过郑州。时吕夷简在郑州赋闲，年事已高。范仲淹念他是两朝大臣，顺路前往探望。吕夷简问他："什么事这样匆匆离京？"范仲淹将天子要他暂且到陕西、河东经抚边事，事毕则还朝的话说了。吕夷简摇头叹息道："未必，未必！"范仲淹问是何意？吕夷简道："如今你正面临危机。身在朝堂，手握政权，尚不知能否应付。一旦离去，岂能再有重回朝堂

的机会？若只为了处理边事，还是在朝廷中处理妥当些。”一番话说得范仲淹张口结舌。他完全没料到这一层，要说不信，知道吕夷简是政界老手，深通世故，岂是轻言之人？若是相信，心里却是琢磨不透：有富弼在朝，难道还能有什么变故？

果然，范仲淹去后，朝中攻击他的章疏一封接着一封。富弼虽为他极力解说，别人原说他们是朋党，这解说也就失了分量，仁宗对他们已不能不心生芥蒂。富弼在朝中也难以立足，请求巡边。八月，仁宗批准富弼离朝，委任他为河北宣抚使。石介见富、范都因他离朝，也请求外任。朝廷批复他为濮州通判。

九月，朝廷委任杜衍为宰相，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为参政。杜、贾倒还罢了，陈执中却不是新党中人，因真宗时曾建请早立太子，得到仁宗信赖。谏官如蔡襄等人连续上章反对陈为参政，说他刚愎不学，不堪委以政事。仁宗力排众议，命中使携带敕告，到陈执中任所青州宣读，谏官反对，为时已晚。

十一月，仁宗颁诏书，告诫朝臣勿结朋党，互相攻讦；告诫按察使，不可太过苛刻；告诫文人，不可肆意出言，恣行怪事。这是对新法第一次明确表示不满了。

范仲淹、富弼出朝后，攻击他们的人愈来愈多，新法也受波及，有些难以为继了。多亏杜衍从中弥缝。而杜衍刚正无私，好抑侥幸，颇遭怨恨。他有一个东床娇婿苏舜钦，官为监进奏院，育文章，是个大名士。而文人无行，不免口上无德，言语议论多有侵伤权贵处；还有个集贤校理王益柔，与苏是同一类人。在一次祠神会上，苏舜钦以卖故纸所得公钱，请来一班伎乐以娱宾客，王益柔又即席戏作一首《傲歌》，出语癫狂，有点儿不雅，有失士大夫风范。苏、王恰恰都是受范仲淹推荐才得做官的。宋制：官员有罪，举主要连坐。所以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便想通过惩治苏、王，株连范仲淹。先唆使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上书弹劾苏舜钦、王益柔。又与张方平列奏状，请诛王益柔。时宰相章得

象、晏殊对此事不置可否，参政贾昌朝对苏、王等新进文人的放荡样子，瞧不上眼，背后支持王拱辰。只有韩琦深知王拱辰的险恶用心，对仁宗说道："王益柔不过说了几句狂话，有什么大不了？王、张都是陛下近臣，如今天下有多少大事，二人不向陛下论奏，却共同列状攻击一个小小的王益柔，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他们不过是要借此株连范仲淹罢了。"仁宗这才恍然大悟。只将王益柔贬官监复州酒税，将苏舜钦除名。杜衍见女婿被废，自知不为同僚所容，上书请求解官。范仲淹虽未受株连，也心不能安，奏请解除参政职务。仁宗欲答应他的请求，宰相章得象道："范仲淹素有虚名，如果一次请求解职，就答应了他，天下人会误以为陛下轻慢了他这个'贤臣'。如今也不知他请求解职是真是假，不如暂且不允。若他仍坚持辞职，便是真辞；若顺势送上一张谢恩表，就是以欺诈之心，要挟君上，以此罪名罢他的官，天下人就无话可说了。"仁宗按这番话行事，范仲淹果然呈了谢恩表。时为庆历五年正月。富弼出使河北还朝，将到京城，章得象唆使右正言钱明逸弹劾富弼、范仲淹擅更祖宗制定的法度，搞得天下不安；又在朝中多树朋党。杜衍再为解说，陈执中又弹劾杜衍包庇二人。仁宗很不高兴，连杜衍一起罢官，以范仲淹知邠州，富弼知郓州，杜衍知兖州。

二月，仁宗诏命废除范、富搞的京官保任叙迁法、磨勘法、荫子法等新法。

三月，韩琦罢官，出为扬州知州。不久欧阳修、余靖也相继罢官。庆历新政就这样失败了。

对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史家说是由于它没有致力于解决地主与农民阶级这一对根本矛盾，触动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封建社会的改革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如何。在已经出现了改革的客观需要的前提下，皇帝个人的素质、秉

性、能力等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仁宗对改革派的信任有始无终，在众多反对派的攻击下，他的信念动摇了，才使改革半途而废。再者这次改革的基础本来就不牢固，若以改革为头等大事，主持改革的主要人物却不是政府最高长官；若不以改革为头等大事，这等更张法纪，改造政府的行动如何能够成功？总之，范、富等人的改革是在有了必要的客观要求，却无合适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才失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但它毕竟是一次大胆尝试，为以后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范仲淹传》、《富弼传》、《夏竦传》、《陈执中传》、《贾昌朝传》、《王益柔传》、《苏舜钦传》等。

李焘《长编》卷 112—154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 29《庆历党议》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 4

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上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 2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

贝州之乱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患，可以预防，内患的危害远大于外忧。又说内患有两种，一是兵叛，一是民叛。丰年多兵叛，荒年多民叛。二者只要不同时发生，国家总能对付得了。这些话形成了宋朝治国的基本方针，即轻外重内，对外患姑息、妥协；对内患却是坚决镇压，这一篇说的是宋朝镇压兵“叛”的事。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国贫、军弱的状况没得到改善。古人说玩兵如玩火，不戢则自焚。军力弱是由于管理不善，管理不善就是不戢，就难免要出乱子了。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二十日，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卒王则发动了军变。

王则原籍涿州（今河北涿县），幼年逃荒来到贝州。自五代到宋朝原有文身的习惯。文身就是用针在皮肤上刺花纹。后周太祖郭威，外号叫做“郭雀儿”，就是他在脖颈一边刺了一双雀儿，另一边刺一个谷穗，据传说有一天雀儿跑到另一边去吃谷穗，他这郭雀儿也就闻了名；《水浒传》中又有九纹龙史进等，也都是在身上刺花的例子。这王则由于要流落异乡，生母怕以后长大成人，难以相认，在他后背上刺了一个“福”字。穷人家的孩子能有什么福？流落到贝州以后，仍无以为生，便插草自卖为奴。由于年幼，每天为主人牧羊。河北是防御契丹的前线，百姓按户籍出兵，或二丁抽一，或三丁抽一，组成乡兵，编有兵籍。或死或

逃，概由本户代补。富庶之家，便以钱雇人，或由家中奴仆代充。禁军、厢军虽名为招募，其实也半是强制。总之，像王则这种人，年长以后十有八九要入军籍。果然，庆历年间，侍卫司在河北等路组建宣毅军，王则成了其中一名小校。

贝州、冀州（今河北冀县）一带流行着佛教的一支旁门，传习《五龙滴泪经》，还有其他专门预言未来的图谶书籍。其中说释迦佛已经衰败，将有新佛弥勒出世，世道要变了。老百姓对现状不满，人心思乱，希望世道有所改变。这类稀奇古怪、无根无底的话就特别容易流传。也不知为何，突然传说王则背上刺的“福”字鼓起来了，就有人说他必是大福大贵之人，不明真相的百姓们对他奉若神灵，追随的人越来越多。贝州有两个州吏，名叫张峦、卜吉，与王则私交甚深，就一起谋划：联络附近德（今山东德州东）、齐（今山东济南）等州信徒，在庆历八年正月初一日起义。届时将澶州（今河南濮阳）的黄河浮桥烧断，使宋朝军队无法北上，料定河北地区可席卷而有。庆历七年下半年，眼看起义的日期将到，部众加紧活动。当时的北京（今河北大名）是河北重镇，宋朝驻有重兵。他们派潘方、净怀二人怀揣利刃，前往会见北京留守贾昌朝，只望能说服他一同起义，河北州县便可传檄而定。倘若贾昌朝不允，二人就地取他首级。也是他们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二个素不相干的人怀揣利刃前来求见，贾昌朝焉能不疑？早就有了防备。所以，话不投机，潘、净二人正要动手，伏兵早出，将二人捆了个结实。

潘方、净怀被擒，王则知道机密可能泄露。于是决定提前在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戌）冬至节动手。这一天，贝州知州张得一乐呵呵地与众官属一起，到天庆观行香上祭，王则率领徒众一哄而起，抢了兵器库中的兵器，向天庆观而来。张得一闻讯，仓皇逃到州兵营房骁捷营，义军尾随而至。骁捷营中的军士也多是王则一伙，在内外夹攻下，很快烧毁营门，攻了进来，将张得

一当场抓获。兵马都监田斌率领亲从士兵与义军巷战，因寡不敌众，眼看也要做俘虏，急忙退出城去。刚刚出城，城门就关闭上了。随后而至的提点刑狱田京，怀揣官印，连家也顾不得要，逃到这里，还是迟了一步被关在城中。他见城中正乱，溜到城上，缒城而下。赶到南关后，立刻集合军队，要与起义军抗衡，其余的官吏都落入起义军手中。

知州张得一被俘后，囚禁在州衙门西院的偏房中。想想自己好不容易讨了这份差事，上任才八天，就遭到这场劫难，不住自叹"倒霉！"但料想自己上任不久，并无恶迹，也许不会太为难他。心中暗自祈祷："但愿佛菩萨保佑，渡过这场难关，阿弥陀佛，……"正在口中念念有词，忽听门锁"哗啦"一声，房门打开，进来二人：甲在前，满脸怒容，气势汹汹。张得一知道是灾星到了，心中吓得突突直跳，脸上却是若无其事。谁知走在后面的乙抢上一步，满脸堆笑地对他说："张大人受委屈了。真是对不住。我们大王说了，等这一阵子乱劲过后，就放大人出来。大人若有什么话，尽管吩咐是了。唔，看来还没用膳。来人！"应声从门外走进一个士兵，乙对他说道："快去给大人端饭，以后一日三餐，不许少了。"士兵答应了，少时提进一只饭盒来。张得一见有了转机，猜想果然是菩萨显灵，如何再敢端他那大老爷的架子？拱手说道："不知大王派两位来，要下官做何事？但说无妨。"甲站在一旁，仍是怒目而视，一言不发，乙道："先吃饭，吃了再说。"张得一已经一日未食，可是当此情景，如何吃得下？坚持事后再吃。乙道："也好。其实算不了什么事。大王说有件公事，要借州印一用，用过立即奉还。"张得一颇感为难，稍一迟疑。甲上前一步，伸手抓住他的衣领，一边吼道："大哥休要与他罗嗦，将这厮一刀杀了，到衙门中排屋搜去就是。那州印还能飞上天去不成！"乙忙拦阻说："二弟不可动粗，张大人岂是那种不识时务的愚人？量来不会不给咱哥俩面子。"张得一早

已抖个不住，怎敢再有半分怠慢，从身上取出一枚钥匙，将藏印的地址说了。甲、乙这才离去。张得一抹了一把额上冷汗，暗自庆幸：亏是见机得快，否则哪里还有命在？官印虽然重要，丢了还可以回乡种田，怎及得上肩膀上吃饭的家什更重要。官印既失，再无牵挂，从此打定主意：对义军毕恭毕敬，有问必答。义军对他也倒客气，三餐不缺，还时常唤他到衙门议事厅上问话，赏给一个坐位。这时他必先向王则抱拳一揖，然后落座，口中大王长、大王短的不住声喊。起义军占领贝州城后，着手建立一套机构和制度，以鼓舞和安定人心。王则自称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号为安阳，年号为得圣。因为宋朝自以为于五行为火德，水能克火，十二月属水。起义军便自制历法，以十二月为正月。把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老百姓都编人军队，面上刺上“义军”、“破赵”、“得胜”等名目，以别部伍。看起来这很荒唐残忍，其实是宋朝通例，官军个个都在面上刺字，没什么稀奇。此外，起义军的旗帜、号令等都从佛书中取名；又将城内划分为若干区域，各以州郡为名，分派部下管辖，也称为知某州、知某府之类。有的一楼便是一州，惹得旧史家耻笑。其实呢，这也无可厚非。唐长安有金城、安邑等坊，宋汴京有梁、郑、封丘等门，蔡、汴等河，独义军城中不许以州为名？况且，史书说张得一投降后，“为贼讲僭拟仪式”，意思是说，他为起义军制定制度出了不少主意，说不定上面这些招法是出自这位官大人的训示呢？张得一如此卖力，义军自然也不亏待他，议事时也让他站立一旁。

再说北京大名府有一名武官三班奉职、北京指使马遂，听说贝州士兵造反，第二日天刚黎明，便到留守府请战。留守贾昌朝不知贝州虚实，不敢妄动，稍一凝思，挥笔写了一张榜子，就是布告之类的东西，交给马遂，要他人贝州面交王则，劝他投降。如若不允，再议征伐，这叫做先礼后兵。其实不过是贾大人的

"缓兵"之计罢了，他要"缓"上一缓，看看风声再说。马遂是武人，怎懂得这些官老爷的心机，昂然走进了贝州城。王则倒也客气，盛服出见这位官方使者。茶毕，问马遂来此何意？马遂献上榜子，一面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不过是要王则等识逆顺、知祸福、不可犯上作乱等语。王则不答一言，只是冷笑。马遂知道难以成功，便想铤而走险，突然袭击王则。只是手中没有兵刃，不能一击置王则于死地。转眼见张得一立在一旁，对他连使眼色，意思是要他帮忙，一起干。也不知他懂还是不懂，起初乍然一惊，立刻宁定下来，低眉垂目，再不向马遂看上一眼。马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势已不能再拖延下去，突然间将手中茶杯向王则掷了过去，王则将头一偏，险些击中。马遂争的就是他躲闪的片刻功夫，随着扑了上来。王则再想躲时，已然不及。脖颈被马遂两只大手卡得死死的，渐渐呼不出气来。王则的随从先是一惊，接着抽出兵刃，纷纷向马遂身后砍来。马遂一边躲闪，一边呼喊张得一从旁相助，双手却始终不从王则脖颈上松开。那张得一知道马遂是玩命，生怕牵连自己，不但不上前相助，早已乘乱抽身躲了起来。说是迟，那时快，马遂双手既不能动，在众人围攻下焉能坚持得久？数招之间，便听"咔嚓！"一声，一只手臂被卸了下来，鲜血如泉水一样涌出。马遂另一只手仍不肯松，片刻间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众人七手八脚把他的手指掰开，拉在一旁。王则脖颈被扼出血，已是说不出话来。此后养了数日，方才痊愈。自然不能轻饶了马遂，将他支解而死。

起义军恨透了旧官吏，把抓到的贝州宋官叫来，挨个审问降是不降。一面打开州狱，释放被囚众犯。其中一人是被司理参军王奖诬陷成罪，心中恨透了这个贪赃枉法的官僚。恰巧见王奖已成阶下囚，正被审问。一股怒火，再也难以按捺，当场将他杀死。此外，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湊等因不降被处死。还有一个掌管军资库锁钥的通判董元亨，得知王则起义后，

别人各自逃散，只有他从天庆观中拍马赶回衙门中来。起义军十多人随后破门而入，将他围住。其中一人讥讽道："通判大人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是对仓库钥匙放心不下吧！大王有令，要你把钥匙交出来。"董元亨暗想：交出钥匙，是犯了死罪，朝廷岂能放过我？不交也是死。既然这样，那就死得光荣一些吧，可别做了孬种。想到此地，胆子也就大了，故作糊涂地问道："大王是谁？要钥匙何用，库中所藏是本州全城百姓的税钱，还有镇库帑银，不相干的人看上一眼也是要杀头的。你们竟敢索要钥匙，难道要造反不成。"众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大汉喝道："睁开你的狗眼瞧一瞧，看看我们哥们如今做的什么营生？造反有什么了不起，你道大爷不敢吗？那就先造给你瞧瞧。"话音未落，已将蒲扇大的巴掌抡圆了"拍！"地一声打了通判一记耳光，鲜血顺嘴角立时淌了下来。大汉又要再打，先前说话的那人伸手拦住，说道："先不用忙，通判大人还没有省过味来，如今城中一切都归大王所有，自然是与帑银最'相干'的人，'看上一眼'是无妨的。你若不交钥匙那可大大'有妨'了。"回头对众人道："让他再想一想吧。"说完，将董元亨在一所房子中关押起来。董元亨挨了一掌，受伤不轻，却没想到竟没杀他，又暗中庆幸。心道：大约因为我没交钥匙，他们怕钥匙失落，才不敢杀我。若将钥匙交出，再也用我不着，说不定反倒危险。想到这里，便将主意拿定，钥匙是无论如何不能交的了。知道起义军不敢杀他，胆子也越发壮了。义军每次派人来要，他都破口大骂。一天，听得门上锁响，接着"咣啷"一声门被推开。进来数人，当先一个正是打得他满口鲜血的大汉。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又要张口骂人。哪知大汉不再提钥匙的事，道："他奶奶的，狗官威风惯了，只道我们不敢杀你。那好。那好，老子就做个样给你看。"说着醋钵一般大的拳头插了下来。董元亨把心横了，大骂起来。大汉怒道："好你个狗官，看你脑袋掉了还能不能骂

人”，说着掏出匕首，将董元亨的脑袋割下，身后众人一哄而上，在董元亨尸身上搜出钥匙，出门去了。董元亨当作护身符的这把钥匙终于没能救他一命。

再说宋官府一方，先是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以东）都部署王信听说贝州军乱，立刻率领本部兵马赶来。十二月四日（甲辰），到贝州城下安营。北京留守贾昌朝早已将贝州造反的事奏明朝廷。仁宗闻讯，急命中书省、枢密院派兵点将前往镇压，一面命贝州附近诸州如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等处官军预做准备，免使起义军往四面扩张。十二月二日，遣入内押班麦允言、西京作坊使王凯前往贝州镇压起义军，命贾昌朝发北京精兵作为护卫。四日，任命王信为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官军在调兵遣将，而起义军却在建立组织，封官许愿，失掉了乘宋朝官府惊慌失措向周围发展的机会，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随着官军云集城下，谁都能看出，起义军只有贝州一座孤城，迟早难免失败。城内百姓害怕城破后受了池鱼之殃，开始偷偷向城外逃亡。城门久已关闭，就用绳索缒城而下，起义军中也渐渐有人逃走。王则不得已，命守城的军士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保，组织起来，互相监督。一人缒城，其余全部斩首。

十二月七日（丁未），诏命王信、麦允言、王凯等人攻城。十日（庚戌），又将左谏大夫权知开封府明镐派往贝州城下，封为河北体理量抚使，全盘指挥各路攻城官兵。

逃出贝州城的军民人等纷纷投降官军，满以为有了官军这把保护伞，从此可以免祸，哪知道官军久驻城下，无尺寸战功，无法向朝廷请封领赏，便想了一个绝妙主意：将投降的军民杀掉，上报朝廷说杀贼若干，功赏也就到手了。可怜军民，惧怕得祸，大祸总是最先降临到他们头上。十二日（壬子），朝廷风闻此事后，命贾昌朝、王信等严加禁止，再有人这么干便以军法从事。十三日（癸丑）又下令，贝州城内军民，如有能从城上缒下绳

索，引官军入城，因而攻克贝州者，官封诸卫上将军，赏钱二千贯。十四日（甲寅）调任沧州知州高继隆为贝州知州。

官军自七月攻城，久攻不下，朝廷念及贝州城临近边境，日久恐引来外敌，急于结束这场战事。十四日遣内侍何诚用带着招安的榜文，诱降起义军。御史中丞高若讷闻讯，大不以为然，上书说："河朔地区向来朝廷屯驻重兵，以备契丹。在这里出了王则一伙人闹事，若朝廷不能以武力平定，不但使后来者更加张狂，只怕还会惹契丹人讥笑。"朝廷不听。王则等人也不会相信朝廷的花言巧语，招安自然无效。官军仍攻城不止。只是贝州城高濠深，官军死伤无数，难以攻入城中。庆历八年正月，有人建议用古攻城法：在城外筑土山，高与城齐，然后自土山上搭木为架，向前倾斜，渐到城头，名为距堙。官军可沿木架进入城中。估算需用工二万，一月而成。好不容易将土山筑成，开始搭造木架。城中见状，命人也在城头上搭战棚，向外微倾，起义军戏称为：喜相逢。是说它终可与距堙木架相接，谓之为"喜"，含有揶揄讥讽的意思。后起义军乘官军不备，将距堙木架用火箭点燃，大火连烧三日夜不息，使二万人的功夫毁于一旦。朝廷追查责任，将负责看守距堙的军官三班奉职李兴斩首示众。

距堙不成，又有人建议自南城挖地道入城。为分散起义军的注意力，另派人从北城佯攻，牵制守城军民。这时城中还出了奸细，州民汪文庆、郭斌、赵宗本、汪顺等人，从城上将约降书缚在箭杆上，射向明镐所住营帐。大意是说，此数人愿降官军，于入夜后将绳索从城上放下，要官军沿绳入城。明镐依言而行，至夜分，果有数根大绳从城上垂下，埋伏在城外的官军悄悄向城上爬去。登城的人越来越多，眼看已有数百人之多。哪知这些官军争功心切，不愿让别人争了功去，纷纷呼喝，要最后上城的士兵放火，将绳索从中烧断。喊声、火光惊动了巡城的起义军，立时将爬上城头的数百名官军团团包围，斩杀殆尽。汪文庆等知道已

不能成功，与残余数人顺绳索缒到烧断处，冒死跳下，才捡回一条性命。

河北兵是宋军的精锐，合数州兵，进攻贝州一个弹丸之地，竟然久不成功，固然由于王则部队原是宋军，对宋军作战、攻城法及装备等情形了如指掌，同时也由于朝廷政治的腐败。时夏竦为枢密使，主军政，与河北安抚使明镐不和，凡明镐有所奏请，夏竦百计阻挠。明镐觉得事事掣肘，所以久而无功。仁宗皇帝忧心如焚，召大臣问计，参知政事文彦博主动请缨，愿为皇帝分忧。仁宗大喜，任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以明镐为副职。文彦博深知夏竦为人和明镐不能成功的原因，临行，向仁宗请求：凡贝州军事得以自行裁决，无须禀命朝廷，免得往返误事。仁宗为示慎重，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允许文彦博便宜从事。又拨了一笔款项赏军，也要文彦博带往贝州城下，以增加士兵对他这个新官的好感；文彦博从朝中挑选将作监主簿鞠真卿等三人为亲从官，掌管机要文书，仁宗也欣然答应。

自王则起兵，深州（今河北深县）士卒庞旦一伙人打算于庆历八年元旦杀掉本军的军校，起兵响应。不幸头一日被人告发，知州王鼎当夜命该军校到别城办事，使庞旦等失去起事的借口，一面秘密做了应变的准备。第二天，照例大摆酒宴，与州内同僚、官吏等庆贺元旦，庞旦等人暂未动手。王鼎调查属实以后，将首谋十八人送入狱中，欲待转运使来州内巡视时审决。宋代一路州县刑事案件的决断权归提点刑狱，但提点刑狱官不常设，缺员即由转运使代理，所以王鼎要等转运使判决，这是宋代的法律程序。可是自庞旦等被囚，军心浮动，一时间，沸沸扬扬，众怒不止，传言要劫牢反狱，搭救庞旦等人。王鼎召集同僚官员说："当下只有先把首犯杀掉，绝了众人指望。至于未经转运使审决，擅杀狱囚的罪名，由我一人承当便是。"于是将十八人中的首犯数人立时斩首，深州士兵的起义才归失败。

王则既无外城响应，更加孤立。打算挑起契丹与宋朝的纠纷，借以转移宋朝的注意力。起初，欲劫持契丹贺正旦使，消息走漏，宋朝提前通知契丹，要使者改道来京。王则对于为何会走漏消息毫不追究。元旦过后，又要劫持归去的使者。消息很快又传入宋营之中。明镐遣殿侍安素领兵埋伏在西门外，王则派出的劫持契丹使的三百名士兵刚出城门，就被伏兵全部擒获。

正月十六日（乙酉），新任河北宣抚使文彦博来到贝州城下。这时宋军正集中力量攻打贝州北门，另使人从城南挖掘地道，城中起义军丝毫不觉，终于挖到了城中。

闰正月初一（庚子）夜，文彦博选拔壮卒二百人，由右班殿直曹竭引导，从地道进入贝州城中，登上城头，杀掉守军，将绳索放下。城外官军迅速攀援而上，然后打开城门，放官军入城。王则等急忙率众堵截。城门既开，官军如黄河决口一般从城门涌了进来，如何能够堵住！忽然，一阵梆子声过，起义军分列两旁，从后面冲出数十头火牛，牛角上都绑缚尖刀，牛尾束着稻草，稻草已经点燃。受惊的牛群，沿着南门城内大街，直向南门外冲去。官军一声惊呼，纷纷后退。当时人如潮涌，一时间如何后退得动，火牛直冲而前，官军撞着的非死即伤，走在前面的官军，瞬时间呼啦啦倒了一片，个个肚破肠流，血如雨注，惨呼声响彻云霄。后面的官军已知遇上了火牛阵，急忙后撤，前面的官军才得缓缓退出城来。眼看城门就可重新关闭，王则等人长出一口气，心道：多亏弥勒佛保佑，今日之事才能有惊无险。由于前头官军后退缓慢，不少人接连倒下。余下的人无路可走，只有奋力反抗。有一名军校杨遂身强力壮，武艺高强，若在平时，一、二头牯牛他还真不放在眼中。如今数十头尾上点火的黄牛发疯一般乱冲乱闯，如何对付得了？但事已如此，只好沉住气应战，只见他东窜西跳，在牛群中躲躲闪闪，手中一杆大枪抖开来，如天女散花一般，枪枪刺中牛身。只是那牛皮粗肉厚，更兼尾上火烧

痛疼，再刺身上，已浑如不觉，依旧向前冲闯。忽然一只大牯牛向他直冲过来，由于离身太近，收枪不及，危急间掉转枪杆向牛鼻打去。只因用力过猛，只听"啪"地一声，枪杆折断。那牯牛一声痛吼，掉转过头向后冲去。杨遂惊定以后，恍然大悟，原来牛鼻为周身感觉最灵敏处，他误打误撞——枪杆击在牛鼻上，那牯牛再不顾尾上痛疼，仓皇逃走。既明此理，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大枪，"唰唰"几声，接连数头牛鼻中枪，也都掉头而去。前边几头牛往回一冲，后面牛群也跟着回过身，一起向城里冲来。王则等人骤然间不知牛群为何"通敌叛国"，竟然反戈一击起来。却知道这"牛脾气"实在难治，只得由它。众人四散逃走，以避其锋。王则知道大事已去，叹道：殷纣王因前徒倒戈丢了天下，我王则因"前牛倒戈"失了贝州。比较起来，我所失甚小，倒是占了便宜。也不放在心上，打开东门出城去了。迎面碰到阁门祗候张絪，双方相持已久，他是认得王则的。见他要逃走，拍马追了过来。王则怒道："听说攻我贝州城的是参政文彦博，倒也罢了。你不过是从七品的小小祗候，芝麻大的官儿，难道也来欺我吗?"说了舞刀与战。交手数合，张絪自知不是敌手，勒马就走。王则也不追赶，自顾打马而去。张絪见他不追，又回马来战；战不数合，拍马又走。如此打打走走，二人沿着城壕，耗将起来。王则不由大怒，暗道："不杀这狗头，我焉能走掉?"放马直追下去。张絪以为他不久又要回头逃走，并不快跑。没想到王则这次改了主意，片刻间已追到马后。张絪再想逃，已然不及，被王则一刀劈于马下。王则这才松口气，正要前行，遥见四周灯笼火把，不计其数。才知方才只顾恋战，行踪已被官军发现，从四面包围过来。只好打点精神硬冲过去，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是了。——终于在突围中，被招捉都部署王信擒获。余部逃到附近村舍，知道数百里间无山无林，无处躲藏，只好在村舍中隐蔽下来，不久被官军发现，知道难以抵抗，自焚而死。起义全

部失败，自首至尾坚持了65日。

此后，文彦博因镇压这次起义升任宰相，一路官运亨通；明镐、贾昌朝、王信、麦允言等人也各自升迁不提。闰正月二十七日（丙寅），王则在汴京城受磔刑（分尸）而死。

这次起义以神怪、佛说为号召，没有严密组织，所以屡次走漏消息，因而陷于被动局面。起义以后，也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指导原则，只是忙于建官设职，即位改元，贻误了战机，在强敌围困下，应付无策，只是困守孤城，坐以待毙。加上河北地区，宋朝军力雄厚；又地势平坦，起义军无险可守，战事一开始便处于战不能战，逃不能逃的困境中。再者，宋仁宗时政治虽然已开始腐败，财力、军力不强，尤其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更多些，起义并非是无端而生。但仁宗毕竟还不是昏庸已极，国事也不是已不可为；百姓赋役虽重，也还可以活下去，而中国的百姓不到生死关头是不肯揭竿而起的。所以王则以佛教异端宣传世道要变了，百姓很爱听，从者如云；当要他们拿起武器时，又纷纷跳城逃走。贝州坚守65日，除了士兵庞旦等外，百姓少有响应者。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规模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总之，这次起义是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及不合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它的失败也不可避免。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明镐传》、《文彦博传》、《贾昌朝传》、《王信传》等。

李焘《长编》卷161—163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贝州乱卒》

狄青平南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深秋，京东道上。马蹄声碎，车声辘辘，一行数十人正风尘仆仆地向前进发。当先一人挥鞭遥指说："那黑压压的一片，便是陈州了？"身边一人拱手道："回狄爷，那就是陈州，去此不过二、三十里路程，紧一紧天黑前也就到了。"那"狄爷"在马上长叹一声道："只怕这就是我的葬身处了。"身边那人惊道："狄爷何出此言？想您一战灭了侬智高，使岭南数十州百姓免遭涂炭，这是何等大的功劳！天子爱重，军民景仰，这才执掌西府[1]，成了二府重臣。如今不过迫于流言，暂贬到此，过上一年半载，自然重回京都，执掌朝纲，怎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狄爷"苦笑一声道："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子，名叫'青沙烂'。青沙烂，青沙烂，……岂不是注定了我狄青要烂死于此吗？"左右随从听了，神色惊慌，纷纷说道："狄爷说的是哪里话来？想你率军平南，那广西地面瘴雾四塞，山险水恶，也没把狄爷怎么样了。这小小陈州地面，还能翻了船？"狄青摇头道："平南的事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众人道："狄爷不提，百姓岂能忘记！"身后车夫也都暗暗点头："狄爷平了侬智高，对岭南百姓积下大德了。朝廷贬了你的官，百姓却会世代记住你。"

---

① 宋以枢密院为西府，中书省为东府，合称二府，枢密院主官为枢密使。

平侬智高发生在宋仁宗皇祐四五年（1052—1053）间。在今广西省西南部左江流域生活着一支少数民族——壮族。宋代称为广源蛮，居住地称为广源州，原是宋朝的羁縻州。由于西北边境多事，对这里控制不免放松，交趾人便成了实际统治者。这里的土著原有韦、黄、周、侬四大姓。宋仁宗时，侬姓头人侬智高在这里建立了大历国。交趾闻讯，出兵袭击，将侬智高俘获，后将他放回。从此侬氏与交趾成了冤家。四年以后，侬氏建立南天国，交趾人再来讨伐。由于侬氏预先有准备，交趾人便讨不了丝毫便宜。皇祐元年（1049），侬氏向北发展，进攻邕州。皇祐二年广西运使萧固委派邕州指使亓赟了解敌情，亓赟轻敌，擅自发兵进攻，结果成了侬智高的俘虏。侬智高向他询问朝廷虚实，他以为建功的机会来了，口沫横飞地把宋朝如何强大夸张一番，目的是要说服他投降朝廷。侬智高的大仇是交趾，知道自力难敌，听了亓赟的话，暗想：不如倚宋朝为靠山，报交趾这“一箭之仇”。于是向朝廷请求纳贡称臣，其实不过要朝廷代他“顶缸”罢了。朝廷不愿结怨交趾，拒绝了他的要求。时为皇祐三年二月。同年三月，侬智高向朝廷献驯象，生熟金银等物，朝廷通过广南西路转运司转达说：广源州隶交趾，若能与交趾一同进贡，朝廷才能接受。此后侬智高又用黄金打造了一封书函，委托邕州知州陈珙转呈朝廷，也遭拒绝。从此又对朝廷生了怨恨之心。开始招纳亡命，准备造反。以广州落第进士黄玮、黄师宓为谋士，还有爪牙侬建中、侬智中等人，聚在一起，日夜策划。首先，他们遣人四出，用破旧衣物换取谷物，散布说：峒中遭灾，部落已经离散，使邕州官府不再戒备。起事以前，又将部落积蓄全都焚毁，对众人道：“如今生计已绝。要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随我夺取邕州，再向东进攻广州，以广州为根本，自立为王。否则必死。”

皇祐四年四月，侬智高率兵众五千人，沿郁江向东攻取横山

寨（今广西邕宁东八十里），杀了寨主张日新和邕州都巡检高士安及钦、横州同巡检吴香等。五月，攻破邕州（今广西邕宁县治），知州陈珙及通判王乾祐、广西都监张立等都被活捉，士兵被杀千余人。侬智高查看邕州的军资库，发现了他献给朝廷的那封金函，怒对陈珙道："我托你转呈金函，不过求朝廷封个一官半职，以便管辖各个部落。你竟不肯，至今还锁在库中，是何道理？"陈珙连忙解释说："已向朝廷奏报过，是朝廷不允，不关我事。"那黄师宓是个喝过墨水的，通晓朝廷事务，问道："你既说已奏明朝廷，把奏章底稿拿来我看。"陈珙命人去找，却哪里找得到！原来邕州偏僻，文事、武事都不修举。文书档案无专人管理，奏章的底稿早不知被哪位官太太、小姐剪成鞋样子了，如何找得着。侬智高大怒，命人将陈珙等拉出去砍了。陈珙吓得直喊："万岁饶命。"还说愿意"带罪立功"。侬智高一概不听，连同王乾祐、张立等也一起杀掉。

侬智高既得邕州，在这里重又称帝，建国号"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年号启历。黄师宓以下也都按宋朝廷的官制封了官。接着一路向东又攻占贵州（今广西贵县）、龚州（今广西平南）、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广西苍梧）、封州（今广东封川）、康州（今广东德庆）、端州（今广东肇庆），不到一月，占领了数州地面。五月二十日（丙寅），进围广州。南部州县自南汉灭亡，数十年来没有打过仗，根本谈不上武备。一州之中不过百余、数百名兵卒，侬智高一到，州官纷纷弃城逃走。不肯逃走的也不过是用生命博取微名罢了。广州可就不同了，它是宋朝的南部重镇，海路枢纽，虽然起初也毫无防备，急切间侬智高却是难以攻下。

宋朝廷得到侬智高叛乱的急报后，第一个措施是命进奏院不得走漏消息。知制诰吕溱上书道："边防有警，应让诸路尽早知道，好作防务，如今却是掩盖起来，不要人知，真是莫明其妙。"

第二个措施是于六月二日（己亥）起用余靖为秘书监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杨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贼盗。这二人都正在家守丧，由于号称“知边事”，强令二人述职，可见朝廷无人；再者，从朝廷的安排看，是要余靖守住湖南，以免侬智高叛军向岭北发展。而叛军的战略目标很明显，是要占领广州，作为根本。当务之急是要守住广州，而朝廷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又足见朝廷无能，形势就很严峻了。

七日后，朝廷知道不妥，改任余靖为广南西路安抚使，知桂州；以原资州刺史张忠为广南东路都监。十三日（丙戌），以原知越州魏瓘知广州，给禁卒五千，可以便宜行事。把注意力开始转向广州。

这时期还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六月十四日（丁亥），彰信节度使、延州知州狄青由于久在西北边境，屡立战功，升任为枢密副使。这狄青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原是禁军兵士，自宝元初（1038）宋与西夏战争开始后，四年之间，经历了大小战争二十五次，收服西夏族帐二千三百座，俘虏生口五千七百人，杀伤无数。此人身材魁伟，面目却极俊秀。为了对敌人增加威慑力，每次战斗，他都披头散发，戴上一个绘着真武星君像的铜面具，出入敌阵，所向披靡，勇不可挡。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以及经略判官尹洙都很器重他，范仲淹还赠给他《左氏春秋》等书，告诫他说：“为将不知古今，不过匹夫之勇。”从此狄青努力读书，终于成了一个有谋略、知兵法，又勇猛善战的人。十余年间升任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宋制于禁军面上刻字，再涂上墨，称为黥面，以免逃亡。狄青做了马军副都指挥使，是正五品官，属高级官员了，脸上还带着做士兵时刻下的文字。不少人劝他：傅上点儿药，就能把字除去。狄青不肯，反而以酒洗面，使黥文更加清晰。如今又做了枢密副使，是正二品官，宋代称为执政，与中书主官相合称宰执，仍然脸上带着那两行字。宋

仁宗亲下敕命，叫他除去，狄青道："陛下以军功把臣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不计较臣的出身门第。臣之所以有今日，全是由于当初面上有了这两行字。臣要把它留下来，使士卒人人知道：只要奋勇杀敌，多立战功，前途岂可限量！"仁宗听了，不再勉强。正是这个脸上刻字的人，使岭南免除了重新割据的危险。下面慢慢再说。

宋军在广州城下开始时打了几场败仗，死了几个官员，逐渐由惊慌而安定，把个广州城守得铁桶相似。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苏缄闻广州有警，率兵往援，离广州二十里扎营，将黄师宓的老父提来，斩于城下；又把乘乱劫掠的盗伙六十多人杀掉；被侬智高胁迫从军的六千八百多人，诱使复业。侬智高的气势渐渐弱了。由于屡攻不胜，便集中数百支船改从水路进攻南城。番禺县令萧注先已在海上招募渔民二千多人，乘海船集中在上流，等待时机。恰恰有一场飓风袭来，萧注带领这帮人顺风举火，把侬智高的船支烧了个片帆不存，士兵烧死无数，史书形容说"积尸甲如山"。周围各县援兵、援助物资，也乘乱一拥入城。广州久被围困，缺粮少水。如今得了补充，士气大振。侬智高知道已不可能取胜，七月十九日（壬戌）撤围而去。自五月二十二日（丙寅）围城，共围了五十七天。

侬军撤离以后，自清远县（今广东境）横渡北江，沿旱路西归。攻贺州（今广西贺县）不下，继续西进，在白田（在今广西平乐）与广东都监张忠部遭遇，张战败被杀，其他巡检、监押被杀者数人。又与广东钤辖蒋偕部战于路田，官军又败。朝廷不得已悬下重赏：捕获侬智高及黄玮、黄师宓等人，获侬智高者授正刺史、赏钱三千缗、绢二千匹，其他人依次差减。这自然是毫无用处，官军仍是节节败退。朝廷仍担忧叛军北上，八月十九日（辛卯），宰相庞籍亲荐知秦州孙沔为湘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以石全彬为副职。不久，又以余靖为提举广南东路甲兵。这

是朝廷做的第二轮人事安排，仍然是以防守为主。九月六日（戊申），侬智高袭杀广南东路钤辖蒋偕于贺州太平场。十八日（庚申）又攻破昭州（今广西平乐），知州柳应辰弃城逃走，广西钤辖王正伦等战死。昭州城北有几个大山洞，每个约能容纳数百人。百姓听说叛军将到，纷纷到这里躲藏。侬智高攻下昭州后，堵死洞口，一把火全都烧死在洞中。

朝廷已无法可想。有人建议：侬智高不过是想做邕、桂等七州节度使，达到目的就会投降朝廷，"何必惜一官职而闹出这么大乱子来？"枢密副使梁适深知其中厉害，坚持不允，道："果真让侬智高做了七州节度，两广都会沦入他手，那时更加棘手。"仁宗向宰相庞籍问计，庞籍第一个把狄青推了出来。狄青自从到京城做官，周身都不自在，老百姓把他的事迹传为神话，走到哪里，都有人围观；那些科第出身的大小官僚们，对他这个面上刻字的执政又不大瞧得起，御史中丞王举正就曾公开反对说："让士兵出身的人做执政，是祖宗以来没有的事。传扬出来，会惹四方国家耻笑。"如今听到岭南吃紧，他就主动请求出战，道："臣是行伍出身，离开战场就难以报效国家。愿得西北蕃落的骑兵数百人，再加上一些禁军，活提贼酋来见陛下。"仁宗听了这等豪言壮语，喜动颜色。九月二十八日（庚午），封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路经制贼盗事。按照惯例还要给他派一名宦官做副职，实际是"监军"。谏官李兑道："在军队中派监军，使主将处处掣肘，是晚唐弊政。臣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将军队交给狄青，不应再使他受限制。"又有人说：狄青武人，不可独任，应派文人做副职。宰相庞籍力保无事。仁宗接受他的建议，才把军中权力交给狄青一人。

十月五日（丙子），按狄青要求，诏命西北边境从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选择打过仗的蕃落骑兵五千人，派使者一名带领，到广南行营报到。有人认为岭南多山，不适合骑兵作战。狄

青深信骑兵必能成功。

十月六日（己卯），朝廷拿出空名宣头和札子各百道，还有锦袄子、金带、银带各二百件，交狄青以备赏赐军功使用。“空名宣头”填上名字就能到兵部注册做官；札子则是到兵部领赏的凭据。都交给狄青，表示朝廷对他任之不疑。

九日（庚辰），狄青辞行，仁宗在垂拱殿为他设宴饯行。此后仁宗对辅臣道：“狄青久享威名，这次出征，敌必闻风丧胆。一定要保护好他的个人安全，饮食、起居都要处处小心在意。”朝廷专门派遣使者把这番话转告狄青。此外还有一些戒勿多杀人，尽可能地诱贼众归降等语，这些罗嗦事暂且不提。

这期间侬智高又打了一些胜仗。十月六日（丁丑）攻陷宾州（今广西宾阳），知州程东美弃城逃走。十二日（甲申），重又打回邕州。从此日夜伐木造船，声言要再攻广州。

余靖在广南，担心侬智高与交趾合兵，并与其他种姓的部落酋长相勾结。便先派人与交趾首领李德政约会，合兵讨伐侬智高；一面又与九溪诸峒的部落酋长联系，许给各种官职，要他们协助官军讨“贼”。朝廷也同意他的部署，颁下缗钱二万，作为李德政出兵费用；还表示击败侬智高后再赏二万缗。狄青闻讯，急忙上书说：“李德政扬言出兵五万，骑兵一千，助官军讨贼，这种话不可信。况且以外兵除内乱，自古以来害多利少，只有使外人轻视朝廷。恐怕会一乱未平，一乱又生。”于是与交趾的联合中断。

再说狄青大军在广南会齐后，兼程向邕州进发。由于广南军队数次被侬智高击败，人无斗志。狄青传令：“所有将领，不得擅自与叛军交兵。”过了桂林，已渐近敌境。侬智高从广州退兵，曾从这一带经过，时与官军战后不久，但见田间断矛残戈，处处皆是；死尸无人掩埋，兽撕鸢啄，惨不忍睹。狄青部下虽是西北劲旅，见了这般景象，也不免发怵。知道士气已不如初时高昂，

又无可奈何。

一日，遥见一座黑压压的庄院，走近了才知是座庙。虽是战后，仍见出出进进，香客不绝。狄青派人询问，说是庙中供奉的神灵有效验，四方数百里内村民都来问吉问凶。狄青道："这真是再好不过。我们远离京都、家乡，与叛军作战，正不知是吉是凶，何不也请神灵指示清楚？"众将士有的以为新鲜，有的觉得正合心意，要一起去看个明白。狄青从寝帐中出来时，已换了一身洁净衣服，只带一名随身士卒。还没出营，身后已呼啦啦跟了一群。狄青也不禁止，一起来到庙中。在神座前焚香叩拜毕，朗声祝道："此次出征，吉凶未卜，军心不安，求神灵指示明白。我这里有铜钱百枚。"说了从身后亲兵手中接过一支白布口袋，摇一摇，哗啦作响。继续说道："若能旗开得胜，上兵无伤，人人立功，我这百枚铜钱撒在地上，要全都字面朝上。"这时一名军校附耳对狄青道："一旦不灵，恐对士气有所妨碍，请元帅三思。"狄青朗声说道："四方百姓人人信奉，岂有不灵之理？将军再莫说这种对神不敬的话。"那校官颇为尴尬，但也不肯示弱，申辩道："即便神灵有验，怎能保军士人人有功？你这铜钱撒出，势必有背有面。还卜它做什？"狄青道："我正要向将士宣布：以前是按照斩敌首的数目计功，既不能人人都提上一颗叛军的脑袋，当然不能人人立功。但是，这样做有许多漏洞：有的割了平民百姓的脑袋来领功，有的为争脑袋自己人打得不可开交。在前冲锋的岂有等割了敌人脑袋再冲的道理？只有留给后方士卒去捡现成便宜了。种种弊端，不一而足。行前我已奏明皇上，改变计功办法：胜敌后，人人有功；军败则人人有罪。冲锋在前者功大，败退在后者罪轻。"围观的士兵不待说完，已叫起好来。那军校退在一旁，不再出言。狄青将口袋举起，摇了几摇，口中又默默祈祷一番。围观将士人人瞪大双目，大气也不敢出，生怕将铜钱吹出一颗钱背来。但见狄青手腕一抖，袋中铜钱哗啦一声，

飞了一地。众人看时，竟掷了个“满堂红”。数了数，正好一百枚，每枚都是字面朝上。不觉如山崩一般地齐声欢呼起来。狄青从随从那里取来一百颗长钉，将这一百枚铜钱依原样钉在地上，吩咐人做了一个纱罩，罩在上面，亲自写了封条封好。又唤来地方官，派人好好保护，说大军凯旋时，再来取钱谢神。这件事成了众人议论的话题，人人知道这一仗必胜，士气也就高了。

皇祐五年正月，狄青率众到宾州（今广西宾阳），与孙沔、余靖会兵。沔、靖的军队早已到这里等候，沔、靖都是书生，朝廷虽给他们加了提举广南东路甲兵，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的名号，如何把地方的“甲兵”提举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余靖管下有一个广西钤辖陈曙，也是终日无事，闲极思动，暗道：“何必一定等狄青来了再打仗，那时功劳都归了他，岂不可惜?!附近有个昆仑关，是入邕州门户，守关的不过千把号人。我不如先把它取了，建个头功，好叫狄元帅知道我们岭南地方军不是白吃饭的。”他把这意思对余靖说了，自然争功的话是要瞒过不说的。余靖没有反对。陈曙带了自己部下的八千人马向昆仑关进发。他这支部队于头年十二月在金城驿与叛军交过一次手，结果是吃了个大败仗，前锋军五百人全军覆没。到如今不足一月，士卒惊魂未定，又被驱使重与叛军对垒，自是人无斗志。两军才交，纷纷逃散，连将领殿直袁用等也都仓皇逃走。

狄青到宾州听到这消息，慨叹说：“军令不齐，绝难打胜仗。”传令第二日辰时诸将到堂前议事。第二天，诸将齐集，行过参见礼，分坐两旁。狄青将朝廷对这次战事的忧虑简要说了，然后起身到陈曙面前深深一揖道：“陈将军，请你站到前边去，我有话说。”陈曙以为要分派任务，依言起身，大步走到帅案前站了。狄青又叫出袁用等三十二人也一齐出座。然后说道：“兵法以‘五校’决胜负，其中之一就是法，法令不行、赏罚不明，是取败之道，这是诸位都知道的了。”说了稍作停顿，向众人环

视一眼。陈曙等人站在中间，听话音已隐隐觉得不妙，偷眼左顾右盼，见数百名卫士分列两厢，个个腰下佩刀，手按刀柄，杀气腾腾，心中不禁发毛。听狄青又道，“先前我已传下号令，不许擅自出战。有人就是不听，结果损兵折将，伤了将士的锐气。陈将军，你有何话说。”陈曙脸色刷地变了，跪倒在地，叩头道：“末将知罪！”不等再问，站在前面的其余三十一人一齐跪倒，磕头如捣蒜，声声哀告，请求饶命。陈曙已知今日定然无幸，倒也是条汉子，昂首道：“昆仑关之战是我一人主张，与他们无关。请元帅将我从重治罪，以儆后来，饶了他们吧。”狄青道：“身为元帅，我岂不知罪各有责？攻打昆仑关的事他们是奉命而行，自不会怪罪他们。”转脸对袁用道：“袁将军，”袁用不仅胆小如鼠，更是一个善于逢迎拍马的势利小人。听得唤他，向前爬了几步道：“小人姓袁，将军什么的就免了吧。元帅老爷圣明，知道我们是奉命行事，饶了我们这条狗命，回去一定早晚三炷香，恭祝元帅老爷……不，是元帅公公，元帅老祖宗，万寿无疆、长命百岁，多子多孙、福禄双……”，狄青听他越说越是离谱，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道：“哼！谁说饶了你的狗命。我问你，你既奉命攻打昆仑关，理当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却是临阵脱逃，率先抛了旗子兵刃，这也是奉命而行吗？”袁用听了，狠狠抽了自己两个耳光道：“小人该死，小人知错了。元帅老爷……不，是元帅公公……”狄青不再听他胡扯，喝道：“一旁跪下！”两厢各走出二名卫士，把他架到一旁。狄青分别将其余诸人罪过说了一遍，人人供认不讳。然后说道：“既犯军令，我已无法庇护你们。念你们久在军旅，勤劳王事，多少都是立过功的，还有何事放心不下，只管说是了，自有我替你们办理。”这些都是屡战屡败之将，有几个是有胆量的？早已瘫在地上，缩成一团。纵有“老母”、“爱妻”什么的，也已不放在心上了。狄青喝令道：“既无话说，推出去斩了。”两旁卫士，一拥而上，四人对付一个，三

五下将人绑了，连拉连拖，推出门去。座上众人眼见这等声势，既惊且怖，一齐呆了。余靖离座躬身说道："陈曙出兵，是奉我之命，元帅饶了他吧，末将愿承一切罪责。"狄青望了他一眼，见他虽身着戎服，掩不住满脸书卷气，不料一介书生竟有这般胆气。又知他做谏官时，为人刚直；还曾三次出使契丹，果然是个不怕死的脚色，心中肃然起敬。又见他年事已高，起身回礼，将他扶回座位，说道："舍人[①]是文臣，打仗的事不能要你负责，不必再说了"。然后传令粮料官准备十天口粮。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将到，军士休整十日，过节以后再赴邕州。一面告谕地方官，上元节放灯三日，大开城门，军民同乐。宾州城距昆仑关不过三五十里路程，消息早已由密探传入守关的侬智高军中去了。

宋代三日放灯，照例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狄青传令：第一夜将佐会宴，第二夜士卒会宴，第三夜军校会宴。务必彻夜欢饮，不醉不休。第一夜，狄青亲自把盏为诸将劝酒，果然热热闹闹直到天亮才散。第二天，仍是狄青主宴，殷勤劝酒，士卒猜拳行令，喧声震天。约二更天气，狄青对身旁将领孙元规道："孙将军暂代我行酒，我到后面休息片刻就来。"别人只道他连日主席，有些累了，也不生疑。左等右等，竟不再出。孙元规着人请了二次，都说少时就来。孙元规仍未在意。也是欢饮夜短，悲戚漏长，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孙元规命人散了，撤去宴席，来见狄青。却见元帅帐中残灯如豆，空无一人。向士兵询问：元帅哪里去了？都说不知。这可慌了手脚，又不敢张扬，找来几个将领商议，也是束手无策。消息还是传了出去，诸将士闻讯前来探视，有的猜想是被敌人擒了去，有人猜想是去城中观灯，醉倒某家店房里了。正要派人四处寻找，报事兵卒来见说：

---

① 舍人：中书省官名。余靖以秘书监出知桂州，秘书监立班在中书舍人后，称他为舍人是尊称。

"昨夜三更，元帅领数百亲卫兵卒，夺了昆仑关，命诸位过关后再吃早饭。"众人听了，齐声欢呼：这位黥面枢密简直是神鬼莫测！

原来关上守军对城中事"了如指掌"，知道狄青要士兵休整十日的期限未满；又要大宴三日，第一日闹了一宵，第二日是上元佳节的正日，料想无论如何是不会出兵的了。所以毫不戒备，有的聚在一起饮酒，有的蒙头酣睡，甚至有的换上寻常百姓服装，入城观灯去了。狄青带了三百贴身护卫，个个是千中挑，万中拣的精英豪杰，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关去，将一千多守关士卒打死一批，活捉一批，剩余的一轰而散，败回邕州，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昆仑关。

大军过了昆仑关，到邕州城外的归仁铺安营。正月十七日，侬智高率军迎战，狄青整军而待，先传谕军中道：有不待命令而动者，斩。诸将应了。见叛军列成三锐阵，逐渐逼近，每人右手持标枪，左手拿着一个大盾牌。这种盾牌他从昆仑关守兵那里已经见过，是用藤条编成，蒙上一层生牛皮，既轻又韧，刀枪不人，是一件利器。又见叛军身着红衣红裤，红布包头，连盾牌也用红漆漆了，远看去，遍山红云，锐不可挡。前军右将孙节请求冲阵，狄青道："小心了，若势不敌，不要恋战。"孙节答应了，率领部下五百名士兵杀人阵中。三锐阵是由士卒排成的三个三角形阵。中间三角最大，是主阵；两旁的较小，是辅阵，都是尖角朝前。孙节在阵中冲突来往，行到哪里都有数十柄标枪一齐向身上攒刺。他挥刀砍劈敌人，却多数砍在盾牌上。尽管力大刀沉，虽把敌人砍了个筋斗，但是打个滚，重新爬起，盾牌和人都丝毫无伤。他知道已断难取胜，想到狄青"不可恋战"的话，几番要从两侧冲出阵去，都被两侧的辅阵挡了回来。不一刻功夫，五百士兵与孙节全都死于阵中。侬智高见胜了一场，手中大旗一摆，三个大三角一齐向宋军大营压了过来。宋军见五百名弟兄顷刻间

被标枪戳死，心中怯了。知道抵敌不住，渐渐后退。好在这些士兵久经沙场、训练有素，虽败不乱。但是敌人攻得近了，再想不乱，如何能够？眼见败局已定，人人心急如焚。狄青站在高坡上，孙节虽然战死，他也看清了敌阵的变化，知道前面和两侧都难撄其锋，阵后却是薄弱环节。心中计较已定，已是十万火急！再也延误不得。便抢下高坡，顾不得由传令兵转达口令，亲自奔到中军，接过指挥大旗向两边一阵挥舞。宋军两翼骑兵已明其意，从敌两侧绕过，飞驰到叛军阵后，然后左军向右奔驰，右军向左奔驰。易位之后，又各自奔回。每次穿插，敌军被马踏枪刺，都死掉一批。如此奔驰来去，直把敌军闹得眼花缭乱，死伤越来越多。再也稳不下来，发一声喊，纷纷向四方逃命去了。后阵既乱，前阵也发生了变故。宋军先锋官是右班殿直张玉，左军将领是如京副使贾逵，右军将领是左藏库副使孙节。孙节战死后，贾逵知道：部下都是当地土兵，数次败在叛军手下，心怀畏惧，斗志很差。待叛军冲近了，万万约束不住。眼见左前方是个土丘，兵法说，先据高者胜。有心占据这个有利地形，又想到狄青军令如山，不得号令，怎敢擅动？眼见敌兵迫近，再不容丝毫犹豫，率部冲上了土丘。等叛军离得近了，挥剑大呼，从土丘上冲下。正是居高临下，势如建瓴，锐不可挡。叛军大阵被冲成二半。这时先锋张玉，见到狄青挥动大旗，要他从正面杀出，便率军迎面扑了上去。这张玉久在狄青麾下，是著名的勇将。有一次西夏猛将率兵三万挑战，张玉手持一根铁锏，单骑出斗，取了他的首级和战马而归，从此得了个外号叫做张铁锏。这次挥锏而出，真是所向披靡。后面还有一支宋军飞出，是孙沔部下，人人手持长刀大斧，正是叛军盾牌的克星。这孙沔是个有心人，早就备下这些武器。叛军前阵已抵敌不住，后面骑兵又不住向阵头推进。侬智高心知大势已去，丢下手中旗子，咕咕噜噜吆喝几句，数十名叛军随他一起飞奔入城去了。狄青见大获全胜，不能令敌

人喘息，大旗一挥，全军将士追了下去。叛军是步兵，虽善于奔走，如何抵得过宋军的马快？侬智高刚奔入城，宋军骑兵随后到了。抢了城门，放宋军大队入城。狄青来到时，城中已是一片火海。知道叛军放火，必是要逃，分命诸将紧守四面城门，一面指挥士兵救火。忽有军士来报，敌军一支，从南门冲了出去。忙问："侬智高可在其中？"军士道："没有！"狄青心中纳闷，暗想：莫非他化妆出逃，军士于纷乱中认他不出？不敢怠慢，一面命人在城中搜索，亲率精兵追了下去。直追出邕州城南五十余里，眼见山深林密，已无法再追，才回到城中。

这一战，斩首二千二百级，侬智高的党羽、亲属如黄师宓、侬建中、侬智忠等被杀死者五十七人，俘虏五百多人。此后又招降逃散叛军，劝使归农，共七千二百多人，缴获的其他金帛、杂畜不计其数。黄师宓虽死，仍使人将首级割下，悬挂城头。又打扫战场，于归仁铺和邕州城二处得敌死尸五千三百四十一具，在城北隅筑成京观[①]，作为对这次重大胜利的纪念。有人发现一具尸体，身穿金龙衣，认为必是侬智高，请狄青奏闻朝廷，是大功一件。狄青道："怎能证明不是侬智高使的诈？我宁可失去这份功劳，不能欺骗朝廷。"左军将领贾逵前来请罪，狄青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道："你看我可是那种拘泥不化的人？军有奇正，事有权宜。你见到对作战有利，能不计个人安危，从权办理，取得胜利，是功劳一件，何罪之有？"

叛军既破，狄青一面派人飞奏朝廷，等待准许班师回朝，一面将所有民事及其他善后事宜都交余靖办理，自己终日与诸将喧呼饮酒，仿佛局外人一般。这样不贪权利，甘于淡泊，使诸将更加信服。

---

① 京观：将死尸迭成高台，外面封土，称为京观。京是大的意思；观，又名阙、象魏等，是一种高台建筑。

二月五日（丙子），宋仁宗得悉狄青破敌，心中大喜，命辅臣尽快商量如何赏功，说道："赏迟就失了赏功的意义。"一面对宰相庞籍道："狄青破敌，都是你推荐、信任的结果。"传命封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庞籍道："枢密同平章是使相职，为武臣极品。国初曹彬灭南唐。太祖皇帝尚不肯封为使相。狄青不过灭了个侬智高，怎能给这样的高官？"仁宗道："他原来已是节度使、枢密副使。节度之上再升一级便是同平章事，难道还能不加封不成。"庞籍道："不如在节度之上加护国二字，使品位在节度和平章之间。"仁宗只好答应。二月十二日（癸未），加封宣微南院使、彰化节度使狄青为护国节度使枢密副使，宣微南院使职依旧兼任。孙沔、余靖等人也相继加官。

狄青得旨率师凯旋，行到桂州南的大庙，依旧扎营结寨，与众将士到神前取那百枚铜钱，先命人取下封条、纱罩，拔下长钉，再捡铜钱。一名将士惊呼："啊，原来是双面钱。"其他将士争相传看，只见这钱双面是字，怪不得一把撒出，全是字面。狄青一旁微微一笑，不出一语。四月三日（壬申）回到京都，朝廷在垂拱殿设宴为他接风。五月六日（乙巳）终于加封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其中又有别的原因，就不足道了。

至和初（1054），留守广西的余靖遣人深入蛮人居住地区，俘获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弟智光和两个儿子继宗、继封，送到京城。至和二年六月斩首。侬智高自邕州逃回广源州后辗转逃到云南大理国，一度曾有流言，说他到大理借兵，要出兵蜀中，搞得人心惶惶。邕州知州萧注招募死士出使云南，说服大理国王杀掉侬智高，将头颅函封后送到京城，侬氏这次叛乱彻底平复。

狄青虽做了枢密使，终不为诸大臣所容，对他的毁谤越来越多，说他家里狗长了角，夜里有火光等等，人言藉藉。朝廷也不能不对他生疑，便以"保全"他为名，贬到陈州去了，嘉祐二年（1057）死在陈州，刚满四十九周岁。

对侬智高起兵性质的认识目前还有很大差异，也就牵涉到对狄青的认识，本文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对他的是非功过评价一番，只是要说是狄青避免了当时两广割据，使宋朝国土免于分裂。与南宋岳飞交相辉映，都是历史上不世出的人才。两人相比，狄青刚烈不及，谦恭过之。岳飞生于衰世，为奸臣所害，那也罢了。狄青如此谦恭，又生于仁宗盛世，仍遭疑忌而死，不能不说这悲剧是封建制度的发展造成的。自宋以后国力长期不振，难道不是同样的原因吗？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狄青传》、《张玉传》、《孙节传》、《蛮夷三·广源州》、《余靖传》、《孙沔传》、《杨畋传》等。

李焘《长编》卷 170—181

宋·周煇《清波杂志》卷 2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 10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 4、卷 10。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 1《帝德》、卷 24《名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12《记事》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7、卷 9。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 1《武备》

英宗之立

皇帝无子，过继宗室近支亲属的儿子继承皇位，许多朝代都有这种事情，因而是历史典型事件之一。它会引起一些连代效应，使我们对封建社会有较深刻的认识。本文专述宋英宗的有关故事。

宋仁宗即位后，久不生子。直到景祐二年（1035）二十五岁时候，后宫佳丽三千，仍无一人传来喜讯。就有人建议抱养近支亲属的子孙为继子。最早提出此项建议的人已难考察了，有的说是明州鄞县（今浙江鄞县）的一个县尉，名字没有流传下来。这一年二月，仁宗将宗室子宗实接到宫中抚养，他才四岁。是商王元份的孙子，江宁节度使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人称为十三使。所谓“母以子贵，子以母抱”，大约由于他的生母任氏地位卑贱，父兄都不拿他当作本家子弟。仁宗委派内夫人到允让府中挑选继承人时，他竟不在被选之列。起初，内夫人遍阅诸子，无一人中意。将要登车回宫，见到一个孩子独自在门屏间地上爬着玩耍。内夫人一见，心中欢喜，问明原委，才知是宗实。就将他抱人宫中，暂由曹皇后抚养。后来，仁宗生子，又把他送回允让府中。

仁宗生有三个儿子，可惜都相继死亡了。长子褒王昉，是景祐四年（1037）俞美人所生，当天夭死；次子豫王昕，是宝元二年（1039）八月苗妃所生，活了二岁半，于庆历元年（1041）二月死；第三子鄂王曦于当年八月生，母亲是朱才人，也活了二岁半左右，于庆历三年正月初一病死。此时仁宗已经三十四岁，丧

子之痛接二连三而至，对他的打击很大，整日郁郁寡欢。皇祐五年（1053），建州（今福建建瓯）博士张述上疏说："陛下春秋已四十有四岁，社稷的继承人仍无所托。大臣们怕惹嫌疑，对此事讳莫如深，都是不忠的表现。臣冒死陈请：早择宗室子为螟蛉，使人心有所属，社稷有所托，天下幸甚。"没得答复。至和二年重又上疏。先后上疏七次，言词一次比一次激切，无奈人微言轻，他这些话是否传到仁宗耳中已不得而知，十有八九是被大臣们压下来了[1]。

仁宗终于忧思成疾，于至和三年（1056年，当年九月改元为嘉祐元年）正月病倒了。宰相文彦博知道他的心事，可是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只好劝他仍从宗室中抱养一个儿子。仁宗点头答应。哪知尚未办理，病情好转，又把这事撂开了。仁宗以为，自己年方47岁，正是虎狼之年，说不定还能生子；再者，一旦有病就匆匆忙忙选择继承人，也大不吉利。哪知偏偏有人不怕犯忌讳。五月，知谏院范镇愤然说："天下还有比此事更大的事情吗?"于是上疏道："朝廷从宗庙、社稷的大计着想，才设立谏官。而谏官遇到宗庙、社稷的大计怕犯忌讳，不敢进言，必是贪生怕死之人。臣不愿做这种人，虽明知会因此获罪，还是要说句话：当初太祖皇帝不立他的儿子为皇帝而立太宗，是出以公心，而且是天下最大的公心；真宗皇帝在亲生儿子周王祐死后，曾经选择宗室子养于宫中，是为国家和社稷的前途考虑，是天下之大虑。臣愿皇上能以太祖大公之心，行真宗选立宗室子的故事。此后若皇上有了亲生嗣子，不妨仍送他还家。"仁宗不与理会。范镇接二连三上疏，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文彦博私下对他说："你这是何苦？难道想学古代那些求名图进的人吗?"范镇答书说："听说近日彗星在心宿附近出现，近日必有刀兵等祸

① 洪迈《容斋二笔》记述此事说："当时及后来未有知之者，为可惜也。"

事发生。我身为谏官，理应为言事而死，不愿白白死于乱兵之下。如今朝廷有这样大的事没办，正是我求死的时机，难道还害怕别人说我求名图进这些闲话吗?”又说：“陛下接到臣的上疏，并未扣押在宫中，而是批付给中书省了，明明是要中书省商议奉行。臣两次到中书省打听，大臣都寻找借口，搪塞于我。才知是陛下要为宗庙、社稷的大计着想，而大臣们不愿这样做。究其原因是怕天子中途变卦，因而得祸。以臣之见，天子变卦，大臣不过一死。倘若不预立皇子，国本不固，万一如天象预示的那样，发生变故，死于刀兵之下，纵死也难逃罪责。这两种死法，选择后面一种，不是大大失计吗?但愿将臣的章疏宣示大臣，让他们自己挑选是了。”话竟说到了“亡国”的地步，胆子不小。别人无不为他捏一把汗。仁宗不但不怪罪，反而升任他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以为，意见未被采纳，反而升官，那算什么事?不肯接受。文彦博劝道：“如今反对的意见已经传入皇上耳中，再做起来就难了，你还是适可而止，不要再坚持了吧!”范镇道：“事情应讲该做还是不该做，不应讲难还是易。中书省诸公以为今日做此事比前日难，更该知道他日再做比今日更难。”范镇凡三次面见仁宗，反复剖析利害，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仁宗被他感动，也在一旁流泪道：“朕知卿是一片忠心，道理也完全对。只是想过二三年再办此事。”范镇坚持以为不能再拖。前后上疏十几次，声言：若以为他所言有理，就该照行；无理，他甘愿受罚。朝廷应于二者之间择其一，不能不声不响，不了了之。从此“待命”于家，不答复决不罢休。结果在家“待”了一百多天，苦心焦虑，以致须发皆白。朝廷知他不会妥协，不得已罢了他知谏院的官职，改任为纠察在京刑狱。从此不再任言官，失去了向朝廷进谏的权力。范镇只好作罢。

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也曾议论皇子的事，但他官职低微，只有一旁声援范镇，鼓励他以死相争。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说：

"陛下即位三十多年，未立嗣子，是历史上少有的事。汉文帝即位后，群臣曾经请求册立太子，没有什么忌讳，文帝也不怀疑臣下别有居心。五代时，后唐明宗最讨厌别人提册立太子的事，大臣无人敢言。而文帝立太子以后，做了许多年皇帝，天下太平无事，被称为汉太宗；明宗不早定太子，致使秦王因觊觎皇帝的大位而陷于祸，导致天下大乱。可见并无吉与不吉之可言。陛下还有什么顾虑而犹豫不定呢?"殿中侍御史包拯、吕景初、赵抃，知制诰吴奎、刘敞等也都上疏，极力主张早定皇子。于是宰辅大臣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等相继劝仁宗不要再拖下去了，仁宗却是一概不听。

嘉祐三年（1058）六月，起用韩琦为宰相。群臣请求早建皇子的事已持续数年，韩琦既为宰相，也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早定。乘便向仁宗建议道："皇上的嗣子，关乎天下祸乱安危。自古以来，因不早定皇嗣导致祸乱的事屡见不鲜。陛下为何不肯为宗庙、社稷早立根本呢?"仁宗道："后宫已有怀孕者，等一段时间再说。"不久传出消息说，后宫生了个女儿。韩琦怀揣《汉书·孔光传》又去见仁宗，将《孔光传》指给他看说："汉成帝无子，立了胞弟定陶恭王的儿子为嗣子。他不过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还能这样做，何况陛下？只要对社稷有利，是否亲生又有什么关系？陛下能像太祖皇帝那样，就不会以此事为憾了。"

当月任命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大夫，权御史中丞。他上任后，也向仁宗建议说："东宫太子的位置久缺无人，天下人都为此事担忧，而陛下不作任何处置，不知皇上究竟有何打算？世间万物都有根本，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立，祸患无穷。希望陛下莫再犹豫了。"仁宗道："卿对此事如此着急，是否早已有了人选？你想要立哪一个为太子呢?"包拯闻言大惊，想到自己的一片忠心，不惧反怒，昂然说道："臣以樗栎之材，出任言官，职责是为国进言。请求早建太子，是因为这有

关国家安危，不得不言。而陛下问臣要立何人，是怀疑臣通过拥立少主图谋私利。臣今年已 70 岁，还有几年好活？膝下又无子息，不是那种邀求后福的人。”仁宗自知理屈，只得陪笑道：“爱卿说的事，朕不久就要与大臣合计了。”

嘉祐四年十一月，宗实的生父汝南王允让死，追封为濮王，谥号安懿。仁宗有意以宗实为嗣子，对允让的追封比常例才更为优厚。

六年六月，以司马光为知谏院。宋朝制度：新任朝官要“入对”，外官要“陛辞”，都是与皇上见见面，相互叮嘱一番。司马光“入对”时首先问道：“臣在并州通判任上曾向皇上上书三章，务求皇上果断施行。”仁宗沉思很久才说道：“莫不是要朕挑选宗室子弟为继嗣的事吗？这是爱卿的一番忠言，通常人怕涉嫌疑，不敢多说。”司马光道：“臣当时也以为上书后必死无疑。不料陛下能开诚采纳。”仁宗道：“这有什么呢？皇上过继宗室子弟为子的事，自古有之，朕不会怪你。”司马光暗道：看来皇上已下决心。听仁宗道：“朕将卿所奏，交付中书执行便了。”司马光道：“这样不好，还是陛下以自己的意思，命中书办理吧。”司马光处事谨慎，这番话是为避免邀功的嫌疑。若是也遇上包拯那样的麻烦，又不像包拯那样年老无子，岂不是百口莫辩了吗？谁知过了十日，仍无下文。司马光又奏道：“陛下已答应臣的请求，至今未见施行，必有小人向陛下说了闲话。臣认为不过是说：‘陛下年富力强，后必多子多孙，不该做收录继子这种不吉利的事情’。这是小人无远虑，或者是有意要陛下不立嗣子，以便于仓促间援立他们亲厚之人即位。陛下万万不可听信。唐朝自文宗以后，立嗣子多出于近习小人之手，以致有称为‘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危害不可胜言。”仁宗听了，这才醒悟，当日下诏书命中书办理。司马光又随入中书，督促宰相韩琦等人说：“诸公若不尽早办理，一旦天子有何不测，从宫禁中传出一寸宽的纸条，

说要立某某为天子，虽明知不可，天下人都不敢说半个不字。那时后悔可就晚了。”韩琦等人连声答应。当时江州知州吕海也上疏请求立皇嗣，韩琦带着司马光、吕海的两道疏文去见仁宗，当面读给他听。仁宗道：“朕久有此意，卿看宗室子弟中，谁最合适？”韩琦听了此言，慌忙跪倒，说道：“这不是臣等该说的话，应当由陛下亲自决定。”他也是怕招嫌疑。听仁宗道：“宫中曾经收养过两个孩子，小的一个生性单纯、朴实，以致叫人觉得不大聪明；年岁大些的倒是可以。”韩琦知道是说宗实，仍问道：“但不知叫什么名字？”答说：“宗实。”韩琦这才敢极力称赞宗实何等贤德。这时，宗实守丧未满三年期限，朝廷特命他起复，出任知宗正寺。“起复”是宋朝制度：大臣遇有丧事，应辞官奔丧，丧期满了才能复职。如若朝廷有大事必须此人处理，便要他提前复职，称为起复。宗实不肯答应，坚执要丧期满了再上任。仁宗无可奈何，问计于韩琦，韩琦道：“由于他品德高尚，陛下才挑选他为继嗣。不骤然答应，正说明他器量、识见远大，非一般贪图名利者可比。只要朝廷坚持，他终会答应的。”仁宗这才坚定下来。宗实前后上疏十八次，最后只好同意起复。

七年八月，立宗实为皇子，天子给他起名为赵曙。起初，宗实三年丧期已满，韩琦对仁宗道：“自从任命宗实为知宗正寺，天下人都知道他日必为皇子，不若将这名份确定下来吧。”仁宗点头应允。韩琦回到中书，立刻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王珪道：“命皇子这是大事，应该天子当面吩咐，只凭宰相一言，敝职不敢从命。”第二天亲见天子以后才答应起草，欧阳修得知后，赞不绝口道：“像王珪这样，才是真学士。”诏书颁下后，宗实又连续十余次上书推辞。他的亲信官吏记室周孟阳问他，为何这般推辞？宗实道：“为了避祸不得不如此。”周孟阳道：“天子要你做皇子，已闹得举朝皆知。假若改选别人做皇子，你以为就没有祸事了吗？”一句话如醍醐灌顶，说得宗实栗栗畏惧，暗道：多

亏孟阳提醒，新皇子为了稳固地位，说不定会将我除掉，以绝人望。我这么干岂不是将性命交在别人手中？此时，司马光对仁宗说道："要宗实做皇子，他竟推辞了将近一月的时间，说明他不贪富贵，远比常人品德高尚。可是，按道理：父召无诺，君命召不待车驾而往。愿皇帝把这些大道理讲给他听，他必能依从。"仁宗依言而行，宗实便不再推辞。临入宫，对管理家务的舍人说："你照看好这座院子，皇上有了亲生子，我立刻回来居住。"说完，乘一顶小轿入宫，随从良贱，总共不到三十人。行李简薄，不过有几架图书罢了。朝野上下，都以为得了个贤储君，互相称贺不已。

嘉祐八年（1063）二月，仁宗病倒在床，不能临朝，中书、枢密二府大臣有大事则到宫中福宁殿西阁面陈。三月，仁宗暴死于福宁殿。曹皇后，就是《郭后之废》篇中说的那位将门虎女，把皇宫中各门的钥匙全都收缴上来，不放任何人出宫，以免走漏消息。黎明，差人召皇子入宫，即皇帝位。皇子骤然间得知讯息，惊慌失措，再三道："曙不敢当。"全不想，你不敢当谁敢当？众人强迫他即帝位，只吓得他回头就跑。韩琦等人上前拉住，连扯带掖把他搽在皇帝的宝座上，新皇帝就算即位了，是为英宗。

四月初一（壬申）英宗即位，三日后即四月初四日便一病不起。第二天，尊曹皇后为皇太后，由她权同处分军国事，像明肃刘皇后那样垂帘听政。此时太后48岁，正当盛年，人又能干，每日里四方章奏不下数十份，她能一一记得大概内容。随手剖决，从无阻滞。虽遭新丧，又立了个病秧子皇帝，宫内宫外，依旧秩序井然。

二十九日（庚子），立高氏为皇后。高氏是侍中高琼的曾孙，曹太后的亲姊所生，自幼在宫中由太后抚养成人，宗实入宫后，也由太后抚养。二人同岁，仁宗曾说将他们配为夫妻。年长后，

便在濮王宫中成了亲，封为京兆郡君。已经生了三个儿子，才被立为皇后。

《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篇已说过，赵宋皇室有一种家族病：躁狂忧郁症。喜怒无常、猜忌多疑是它的主要症状之一。不仅仁宗暴死与此有关，英宗的疾病也实由于此。发病后喜怒无常，伺候他的大小太监可就倒足了霉，人人恨透了这个新皇帝，又拿他没有办法，便寄希望于太后。于是有人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短长，又在皇帝面前说太后的短长，好让他母子火并一场。从此两宫的关系便恶化了。英宗对太后不满处，是他初入宫时，名分未定，处处受人监视，甚至饮食不继；即位后，太后不以礼对待他和皇后，有时夫妇二人前往问安，太后不予理睬，双方都觉无话可说；又听说英宗患病期间，太后想另立新皇帝，由于韩琦等人反对才没成功。英宗病愈以后，太后撤帘，却迟迟不把御宝交出，怀疑她仍有废立之心。太后对英宗的不满是：英宗患病中，说了一些对太后无理的话，虽是病中之言，毕竟是心有所思，才能发为言语；对仁宗的丧祭之礼，英宗不能尽人子之责。比如大葬后的虞祭，英宗以病为借口，不肯参加。而太医说他六脉平和，已经康复。英宗对仁宗留下的五个公主也不能尽礼。曾强迫仁宗公主搬出宫来，腾出房屋让自己的女儿居住等等。由以上可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若是亲生母子，双方都不会计较。如今却成了解不开的死结。一日韩琦、欧阳修在太后帘前奏事，太后止不住心中伤痛，呜呜咽咽哭了起来，把英宗的不是，一五一十讲给他们听。韩琦劝道："这是因为皇上有病。儿子有病，做母亲的难道不能宽容他一些吗?"太后仍然心中不平。欧阳修又劝道："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贤德、宽厚，天下闻名。想当初张贵妃得宠，是何等专横！太后却能处之泰然。如今与自己的儿子反而不能相处吗?"这高帽子尺寸大小，恰到好处，太后戴了，怒气早就消了一半。欧阳修又道："先帝在位多年，恩德布于天

下，因此，天下人拥戴新皇帝才这样尽心竭力。试想，太后不过是一妇人，臣等不过是几个书生，若不是先帝要我们主持朝政，谁肯听我们指指画画？”言下之意是说，新皇帝是先帝所立，我们谁也改变不得。太后冰雪聪明，知道这是要她“另立新帝”的话无法出口。于是默然许久，不发一言。韩琦更进一步威胁道：“臣等在外，宫中事无由得知。倘若皇帝失于调护，恐太后难辞其责。”太后大惊道：“你这是什么话？我比谁都希望他尽早康复。”外朝大臣得知后，对他二人的调停无不暗挑大指，既惊且佩。

数日后，韩琦又单独与皇上相见。皇上诉起太后的苦来，说是待他无恩。韩琦道：“自古以来，贤明的帝王不计其数，人们惟独称舜为大孝子，难道其余的帝王都不孝敬父母吗？当然不是。父母慈而子孝，是很平常的事，不足称道；惟有父母不慈而子女不失孝心，才值得称赞。其实，世间哪有不慈爱的父母？只要陛下尽到孝心，太后不会不善待陛下。”

七月，英宗病势渐轻，在紫宸殿朝见群臣，韩琦请求他出宫祷雨，好让京城人知道皇帝身体康泰，以安人心。十月，仁宗葬于永昭陵。十二月，开经筵，英宗皇帝听侍臣讲经史。先由翰林学士刘敞讲《史记》，开篇是《五帝本纪》，他边读边讲，读到尧以天下让于舜时，刘敞拱手肃立，解释说：“舜只是一个普通百姓，至微至贱。尧一旦将皇位传给他，天地保佑，百姓拥戴，别无原因，仅仅是因为舜是个大孝子，天下闻名的缘故。”英宗听了，很受感动，肃然改容。太后也深为这个“教书先生”会说话而欢喜。两宫间的矛盾渐渐缓解。

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身体已见大好。儒臣最忌讳妇人干政，所以宰相韩琦想要太后撤帘，还政于英宗。先选择十多件事禀告英宗，英宗处理得恰到好处。然后到太后那里，将英宗处理的情况说了一遍。太后很是满意。韩琦借机提出辞职说：

"先帝坟茔覆土以后，我就该退隐归乡了。念在皇上有病，迁延至今。如今皇上病体已复，老臣已不必挂心。愿解官归隐，或者让老臣管理一乡一郡也就够了。"曹太后道："朝中怎能没有相公？倒是老身理应深居宫中，却天天跑到这里来，实是事不得已。还是让老身先退吧。"韩琦满心想的就是这句话，立时称赞说："汉朝的马太后、邓太后也曾垂帘听政，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德夫人，却都不免于贪恋权势。像太后这样，又是马、邓所远远不及的了。"说后双膝跪倒，磕头道谢。又说："近日御史、谏院也有人上疏，请求太后还政。但不知太后打算何日撤帘？"太后不愧是将门虎女，定了的事，决不拖泥带水，起身说："就在此时好了。"韩琦当即高喊仪鸾司官员，立即撤帘。太后还没有转到屏风后面，垂帘已经撤下。这是韩琦生怕中途有变，不过也无须如此步步紧逼。从太后一方着想，辛苦一场，未免叫人心寒。英宗独持朝政后对韩琦自是青眼有加，加封他为尚书右仆射。一旁恼了枢密使富弼，他倒不是为太后鸣不平，而是为韩琦的专权不平。原来仁宗嘉祐年间，韩琦与富弼同时为宰相，有大事必先与枢密使商议而后行。英宗即位后，富弼做了枢密使，韩琦便一改旧规：除了皇上命两府（中书与枢密）合议者外，不再与枢密使会商。富弼颇为气愤。太后撤帘的事发生后，富弼大惊道："其他的事倒也罢了，如此重大的事情韩公也不能预先给我打个招呼吗？"其他官员也以为是韩琦自专，不能与人共事。韩琦道："撤帘是太后临时决定的，与我无关，让我如何与他商量？"显然这是搪塞之言，富弼更不高兴。自知这个枢密使做得也太乏味，第二年七月，便以腿痛为由要求辞职，这是后话。

再说太后撤帘以后，皇上以太后所居宫名为慈寿宫，是要她安度晚年、得享眉寿的意思。

两宫不和，前面说与皇上身边的太监两面翻嘴扯舌有关。其中重要人物就是入内都知任守忠。仁宗初立英宗为皇子他就不乐

意，主张立一个年龄小的，他好从中谋利。英宗即位后，他又制造皇上与太后两宫间的矛盾。太后既撤帘，任守忠失了怙恃，知谏院司马光首先上疏论任守忠的罪恶，请求将他斩于市曹，以正国法。吕诲也有同样的表文。英宗采纳了他们意见。但韩琦知道，此事有碍太后，执行起来颇为不易。第二天，取空头敕书一道，上面不写人名和事由，让参政欧阳修签字。欧阳修也不多问，提笔签了；又要参政赵概签字，赵觉得不妥。欧阳修道："你只管签是了，韩公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赵概才勉强签了。然后，韩琦端坐政事堂，召任守忠立于庭院之中，对他道："你罪当处死，念在你多年苦劳的份上，从轻发落：赶出京都，到蕲州居住去吧。"说完，取过那张空名敕书，填上任守忠的名字和事由、处分结果等项，签上自己的名字。有两个参政、一名宰相签字，处分任守忠的这份敕书也就有效了。当日差人将任守忠押送出京。韩琦这么搞是担心太后从中插手，他就不便处理了。是非、法律、人情、关系，四者之间原就不易区分，做官就是在中间搞平衡游戏，做得好坏要看各人的才气了。如韩琦可算其中高手。

英宗即位产生的两宫不和，赖有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斡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还有一个更棘手的事引起朝廷一场大争执，就是英宗该如何对待生父、生母的问题。

知谏院司马光早已预料到英宗亲政以后，势必提高对他的生父、生母礼仪的规格，曾借一次奏事的机会，给英宗开陈道理，好好上了课。他说："汉宣帝继昭帝即位，并不追尊本生祖父戾太子和本生父史皇孙；东汉光武帝继汉元帝而有天下，也不追尊本生祖父钜鹿都尉刘回和本生父南顿令刘钦。这是万世不变的定规。"不久韩琦上书说："礼的主要特征是重本原，即不可忘本。濮王是陛下之本，理应提高礼仪规格。请颁圣旨，命有关单位商议具体办法，包括对濮王夫人王氏、韩氏，皇上生母仙游县君任

氏等人，应该执行相应典礼，以与陛下对本生父母的尊仰之情相符。"这番话与司马光迥然不同。仁宗命丧期满了再做商议。

治平二年四月，丧期已毕，英宗命群臣商议提高对濮王的礼仪规格问题。以翰林学士王珪为首的皇帝侍从班子，知道此事关乎皇上本人利益，搞不好是要惹"龙颜震怒"的。所以，你看我，我看你，都一言不发。独有司马光奋笔而书道："'为人后者为人子'是古来成规。一个人对父母的爱心应该专一不二，自秦汉以来，帝王无子自旁支亲属挑选继承人。即位后，凡是追尊本生父母为帝、为后的，都遭当时人所非议，为后世人所讥笑。臣等万不敢引述这些人为榜样，要皇上效法。更何况这类继承者大多是皇上过世以后，由母后、或大臣册立为帝的，与原皇帝的亲情甚淡。今皇上则不同，仁宗皇帝正当盛壮之年，从宗室中挑选陛下，授以皇位。陛下即位以前已是仁宗之子。濮王虽是陛下生父，有血统之亲，养育之恩，但陛下能够端冕临朝，为天下主，而且能子孙相承，世世为帝，都是先皇帝的恩德。臣等认为，对濮王应该按照以往对待皇室近支亲属的先例，封给高官、为大国诸侯，夫人王氏等都封为太夫人。与古今事例相参照，这是最合适的做法。"王珪等其实是赞成这种意见的。既已有人出头，不必再隐晦，差人将司马光的奏章作为侍从班子的结论呈了上去。中书省批复："王珪等人所议没有明确指出对濮王应取何种称呼，皇帝是否应该像对普通臣下一样直呼其名？"王珪等只好再议，认为"濮王为仁宗之兄，皇帝应称之为皇伯，不直呼其名。"

参政欧阳修也上了一道奏章说："按《礼记·丧服大记》中的话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意思是过继给他人的人，对于生身父母，原应该按斩衰亲属服三年丧，现应降为期亲，只服一年丧；不改变原来的称谓，仍然称为父母）。这明明是说，服丧的规格可以降低，而父母的称呼不可改变。将本生父母改称皇伯的事，历史上绝无先例。封生父

为大国诸侯也没任何根据。请朝廷会集三省、御史台共同商讨。”太后命人送来手诏，责问执政为何久不能定？这是表示对皇帝的关怀，皇帝便不得不谦让一番，下诏书说：“听说朝臣对此事意见不一，不如暂且停止商议，待有关机构详细查阅典故后，向朝廷奏明，然后再议。”

直到治平三年正月，仍无结果。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坚持己见，毫不退让，认为王珪说得对，请朝廷执行。先后七次呈上奏章，朝廷均不予答复。于是共同弹劾宰相韩琦专权、引导朝臣谄媚于皇上，理应治罪。其中说：“仁宗皇帝坟土未干，便要追崇濮王，使陛下厚生父、薄继父，抬高小宗地位而贬低大宗。”又说：“欧阳修首倡谬论，以邪魔歪道游说皇上，陷陛下于不义，有负先皇帝的恩德。而韩琦、曾公亮、赵概等人都附会他的邪说。请朝廷贬其官，治其罪。”仍无答复。中书省却上书说：“请皇上明令中外，说明称濮王为皇伯绝无根据，决不可行。如今争论的焦点是加濮王于什么样的名号？朝廷的本意是，以濮王为皇父，仅此而已，其他如在京城为濮王另立宗庙等违纪乱统的事，都不是朝廷的主张。”

英宗皇帝自然以为中书的意见更合适，要他呼生父为皇伯，实在是强人所难。但又说不出口，谁叫他贪图别人基业，做了皇上呢？所以他迟迟不做决断，任凭双方争吵下去。还是皇太后爽快，颁手诏给中书省，要他们尊称濮王为皇帝、夫人为皇后，皇帝称他们为父母。英宗自愧有点儿小家子气，让太后占了先。只好也急忙表态，谦让一番。下诏书说：“不称皇帝、皇后，只称父母；在原坟墓的周围立庙，以濮王的儿子宗朴为濮国公，主祭祀事；令天下臣民避濮王名讳。”当时人以为太后手诏与皇上的谦让都是中书宰相做就的圈套，使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便再开口，所以心中不服。吕诲等人将委任自己为御史的敕诰上缴，回家待罪，其实是辞职以表抗议。英宗命阁门官员送还给他们，劝他们

复职。吕诲等人坚持不肯，无论如何御史台的官职是不做了。说道："凡事都有曲直是非，若中书辅臣的意见对，台臣理应治罪，若台臣对，辅臣错，也应有所表示。御史与辅臣势难两立。"英宗不知如何是好，向计于执政的辅臣，韩琦、欧阳修道："御史既认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应该将御史留在朝内。"显然，他们是主张将御史贬黜出朝的。但这对英宗的脸面有损，他犹豫了很久，终于无法可想，还是将御史贬了出去：命吕诲为蕲州知州，范纯仁为安州通判，吕大防为休宁知县，那时赵鼎、赵瞻、傅尧俞三御史出使契丹刚刚还朝，先曾与吕诲商议过尊崇濮王的事，彼此意见相合。便也上书，请求与吕诲同贬。朝廷只得贬赵鼎为淄州通判，赵瞻为汾州通判。英宗对傅尧俞一向有好感，不但不加贬黜，还加封为侍御史知杂事。傅尧俞道："吕诲已被逐出朝，臣义不当独留。"英宗只好任命他为和州知州。当时称此三人与吕诲等为"六御史"，一时名声大噪。知制诰韩维和司马光上书表求挽留吕诲等人，没能做到。于是也上书，请求与吕诲一同贬官。御史官已贬了六人，再贬知制诰，那成什么话？朝廷不许。侍读学士吕公著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纳谏的事没有听说过，贬斥言官的事倒是屡有所闻。皇上要给天下人做个什么榜样呢?"英宗读了这样的奏章势必面上青一阵、红一阵，而又无可奈何。只好不予答复。吕公著也请求出朝，不愿与这种人朝夕相对了。于是，又贬吕公著为蔡州知州。从此，濮议引起的风波才算平息了。

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因面封建制要绝对维护大宗的主导地位。宗法制规定子继父宗。一般情况下两者能够吻合。英宗的事提供了一个不能吻合的例子：小宗子孙过继给大宗为嗣子，是无条件维护大宗呢？还是部分地继续"子继父宗"?显然这是封建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要英宗完全站在大宗一边，由于与长期的宗法制度下形成的传统或人情不附，他做不到。所

以，他与太后有隔阂，与濮王不能绝情，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英宗时导致御史大辞职；明世宗时还造成大刑狱，成为明朝由盛入衰的原因之一。而汉宣帝和光武帝时期的反应却不及宋与明强烈。可见随着封建礼教的强化，矛盾是愈来愈深刻了。待到封建制度所有固有的矛盾都不可克服时，也就是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曹后传》、《韩琦传》、《曾公亮传》、《包拯传》、《欧阳修传》、《吕诲传》、《范镇传》、《任守忠传》等。

李焘《长编》卷 199—208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 34、36。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 5《仁宗立嗣》

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下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 1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1、4。

王安石起废

王安石是宋神宗时期一场大改革的策划人。他与亲家翁吴充相互唱和时，写过一首咏雪诗，至今读来，想见其一生事业和风采，令人不胜怅往和钦迟。诗道：

> 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汉涌。北风散作花，巧丽世无种。黐昏得照耀，尘滓归淹拥。荒林无空枝，幽瓦有高垅。分才一毛轻，聚或千钧重。飞扬目已眩，摧压听还凶。渔舟平系舷，樵屏没归踵。空令物象莹，岂免川涂壅？争光嫦娥妒，失色曦和恐。赖逢阳气蒸，转作水波溶。舞庭称贺严，扫路传呼宠。冲游谢少壮，避卧甘闲冗。吴侯绝俗唱，韩子当敌勇。胜负观两豪，吾衰但阴拱。

他以一介书生，是怎样以“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汉涌”的磅礴气势，掀起改革大潮的呢？这要从头说起。

王安石（1019—1086）字介甫，晚年自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西）人。与其他同时代的士子一样，他也是自幼读经学文，由于才华横溢，少年时已颇有些名气。朋友建昌（今江西南城）名士曾巩把他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大加称赏，当年便考中了进士科上第，授予淮南判官的职务，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按惯例，中进士上第的人，出任外官满一任就可以向朝廷献文，请求考试得到馆职，四转可得御史，就有人省府、升任宰执的机会了，这是仕途捷径。但是，王安石偏偏不走此路，他要多

做几年地方官，了解民情，积累从政的经验。所以，改任为鄞县（浙江宁波）知县。在这里，他组织百姓筑堤叠堰，挖掘陂塘，大搞水利工程。而且进行了改革的尝试：青黄不接时，将常平仓的积谷贷给百姓，到收获的季节再本息一起偿还。不仅使常平仓的粮食不断更新，避免了陈腐的隐患，还使百姓免于高利贷的盘剥。因此，官声很好，百姓立生祠纪念他。不久改任舒州通判。文彦博认为他名利心淡泊，在官场中十分难得，请朝廷破格录用他，为那些四处奔竞、钻营的人树立个榜样。朝廷为此召他先考试得到馆职以后，再破格提拔他，因为连京官也不是，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王安石又放弃了这个机会。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王安石推说祖母年老，自己不能以身许国，出任谏官不合适，不肯就任。欧阳修又荐他为群牧判官，王安石仍然推辞，他只愿做一个地方官，宋代称为外官。而宋代外官多半是由京朝官出任的，像他这样不是京朝官而任外官，一般是前途渺茫。但王安石毫不在乎，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后改任为提点江东刑狱。这之间遇到了大学者周敦颐。他的一套“无极而太极”的学说惊断学林。王安石年幼时曾三次到他门下就学，据说周知他心高气傲，有意使他多碰些钉子，三次都闭门不见。王安石愤然道：“你又有什么了不起？你的学问出自六经，难道我不能从六经也悟出些玩意儿吗?”从此再不见他。如今王安石做了提点江东刑狱，为监司主官；周仕途偃蹇，不过是他的下级。两人相见后，各言所学，日夜不休。过后王安石细细琢磨周敦颐的话，以致废寝忘食。他是一个善思考的人，决不会轻信周敦颐那一套，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过他苦苦钻研一番后，学问大有长进。

由于王安石颇有文名，做地方官后，口碑又好，士大夫人人想望他的风采，希望他在政界能有所作为，刷新政治，一洗官场颓风。但是朝廷屡次命王安石考试馆职，都被他拒绝了。士大夫认为他无意于仕进，声望更高，人人以不识王安石之面为憾事。

而朝廷授他的官职也就愈来愈高愈美。并且每次都担心被他拒绝。嘉祐五年（1060）五月，王安石受任为三司度支判官，士大夫得知消息，无不额手称庆。王安石也颇自信，以为为国掌钱谷，是个重要职务，要大干一番，不可辜负了众人的期望，就向朝廷上了一道万言书。大意是说：如今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风俗愈来愈败坏。究其原因是不知法度，不能效法先王的政治。所谓效法先王的政治，在于效法先王立法的思想，而不是生搬硬套上古帝王那些过了时的制度。只有不生搬硬套，才能制定出合乎时用的新制度；只有效法先王立法的思想，才能制定新制度而不致骇人耳目，减小推行的阻力，能顺利推行而又不离先王正道。如今当务之急是应动员天下人的力量为天下生产财富，并取天下财富以供天下使用。自古以来，从没有过为钱财不足而发愁的事，只有因治理钱财不得其法才感到困难。在朝者人才既不足；在野的也无可用之材，社稷的重托，守卫疆宇的重任，陛下交付给何人？难道只靠侥幸“天下无事”过日子吗？愿陛下改变眼下因循苟且的弊病，命令大臣制定政策、措施，渐渐与当世变化了形势相符合。

总之是要变法改制，挽救时局。这些话与庆历新党的主张无大差别，而他变法的基本原则：“动员天下的力量为天下生产财富，取天下财富以供天下使用”又未引起重视。基于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大都认为是老调重弹，迂阔熟烂而不切实际，于是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书当然地束之高阁了。

当时有一种制度，中书所属的舍人院不得申请改动制诰敕令等文件中的文字。王安石道：“舍人院是起草文件的机构，既无权改动其中文字，只能按照大臣的吩咐，照猫画虎，失去了应有的监督、牵制作用。如今的大臣懦弱者不敢为陛下坚守法令；强梁者又恃陛下一言半语任意伪造法令。谏官御史无人敢于反对，再剥夺舍人的监督权力，臣实在为陛下担忧。”这些话对执政大

臣颇为不恭，使他们大为光火。自然王安石的话不但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恰于此时，王安石母亲故世，他就借机离职而去。

丧满以后，已是英宗当政，仍然一再召他复职。王安石知道尚不到时机，不肯出山。知制诰韩维及龙图阁学士吕公著兄弟都一再称赞他的能力和才学。那时，神宗赵顼尚未即位，受封颍王，韩维为颍王府记室，每次有所议论，受到赵顼称赞，韩维必说："这不是我所说，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话。"后韩维升任东宫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替他原来的职务。这样日积月储，使赵顼也产生了对王安石的渴慕、向往之心。即位以后，立即召见王安石。王安石仍然不肯应召。神宗对辅臣道："先帝在位时，屡次召王安石入朝，他都以病为由，不肯应命。有人说他对朝廷不恭。如今朕召见，又不肯来。是果真有病，还是端起架子要挟朝廷呢？"宰相曾公亮为他辩解说："王安石有做宰辅的才干，必不会说谎欺骗陛下。"执政吴奎却道："王安石任群牧判官时，臣曾与他共事，知道此人颇为自信，不肯认错。行事又多迂阔不切实际。朝廷起用他，必然紊乱朝纲，后果不堪设想。"神宗不以为然。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当时大臣都以为王安石必不听命，哪知他闻命即往，谁也不知原因何在，甚至责怪他进退失据。其实，这是王安石的一惯做法；深知在朝与大臣不相得，必事事受阻，一无所成；做地方官反倒能任其施展，有所作为。九月，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时韩琦连任三朝宰相，多有人指责他专权。宰相曾公亮便极力推荐王安石，说他有宰相才等等，不过是借此表示对韩琦的不满。韩琦只好自请退位，神宗不得已，让他以司徒兼待中的身份出判相州。临行入对，神宗依依不舍道："侍中一定要抛下寡人而去，寡人也无别法，已按卿的意思让学士院起草制书了。只是爱卿离京后，朝中大事应该托付给何人？王安石可以胜任吗？"

韩琦道："王安石做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做宰相则不足。"神宗沉默不语，韩琦知道神宗必是不以为然，也不再多说。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自江宁来到京城，距离颁布他为翰林学士诏书的日子已有七个多月了。当时许多大臣都等待皇帝接见，神宗将已经安排了的接见一律推迟，急不可待地宣王安石入对。见面后，神宗便问："据今日形势，治理天下，应当以何事为先?"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即首先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神宗又问："像唐太宗那样的皇帝怎么样?"答道："陛下当以尧舜为楷模，不应只以唐太宗做榜样。以尧舜为楷模似难实易，因为尧舜之道简而不烦，要而不迂，容易做到。只是后世学者不得要领，以为它高不可攀，以致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罢了。"神宗很受鼓舞，道："卿可算是责难于君了。朕自以为渺小不足道，深恐辜负了卿对朕的期望。卿不妨尽力辅佐朕，让咱们共同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吧。"有一天，侍读学士讲经已罢，群臣相继离去，神宗惟独留下王安石道："朕想与卿随意聊一聊"。顺口说道："朕读经史，见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必有贤臣辅佐。如唐太宗有魏徵，汉昭烈帝有诸葛亮。像魏徵、诸葛亮都是不常见的人物，多少代不出一人，可惜，可惜!"王安石道："倘若陛下能做尧舜，天下必有皋陶、夔、后稷和契；陛下能做商高宗，天下必有傅说。至于魏徵、诸葛亮二人，在有道之士看来，实在是萤火微光，何足道哉!如今天下这般大，人口这般多，建国百多年来，世道安定，没有战争，士大夫都舍剑就学，以致学者多如牛毛。然而时常为无人帮助治理天下而犯愁，原因何在呢?就在于选择贤才的方法不对头，任用贤才的心意不坚定。纵然世间有皋陶、夔、后稷、契、傅说一类的贤才，也必然会受到小人的压制和阻碍，远远躲藏起来，不肯出世了。"神宗道："哪一个朝代没有小人?就算尧舜时候，不是也有共工、驩兜、三苗、鲧所谓四凶吗?他们为何不能压制、阻碍皋陶、后稷、契等贤人?真有大

贤，岂是小人所能压制得了？”安石道：“小人固然与贤人一样无代无之，问题在于能否辨别小人而加惩处。尧之所以为古圣帝王，原因正在于此。假若四凶不除，让他们在朝中作威作福、胡作非为，皋陶、夔、后稷、契又怎肯为了几斗米的俸禄，苟且居于朝廷之中，终生隐忍屈从下去呢？”仁宗无话可说。

这年十一月举行郊祭，照例应该对群臣普施恩赏，执政奏请：由于河朔（今河北、山西）一带大旱，国家财政困难，用度不足，暂免赐群臣金银布匹。神宗征求学士们的意见，司马光道：“为救灾而节省费用，理应自贵近大臣开始，好为天下人做个榜样。执政的建议是对的。”王安石道：“唐朝制度：每天日出时，由内厨房赐给宰相家御馔。唐代宗时，常衮为宰相，自请停止赐馔。当时人认为：御馔是天子赐给宰相的食物，如同俸禄一样。常衮若自以为不称职，应该辞去宰相职务，而不应辞去宰相俸禄。如今事体正与常衮事相同。国家用度不足，是由于没有善于理财的官员，不是由于旱灾。因旱而乏用，执政应辞职，不可辞天子恩赏。”司马光道：“什么是‘善于理财’？不过是头会箕敛（按：按照人头计算税收数目；官员手拿簸箕，挨门敛取赋税。形容官府刻剥百姓，小大不遗）罢了。”王安石道：“不然，善于理财者，无须增加赋税而国家富足。”司马光道：“天下哪有这种道理？世间财富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官多则民少，官少则民多。所谓不加赋而国富足，不过是另外寻找刻剥百姓的办法是了，其危害更甚于加赋。原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载入《史记》以讥笑它的荒谬，不料今日又有人老调重弹。”王安石自也不肯相让，二人争论不已。神宗道：“朕以为司马光说得对。但是执政停止郊祭恩赏的事暂不批准。国用不足，由执政另行设法筹措。”看来天子也不易当，不赞成王安石的意见，却又不愿太驳了他的面子，只好施展骑墙的本事了。不巧，答复执政的诏书轮到王安石起草，他毫不客气地把常衮的事写了进

去，两府有苦难言，这场争论实际是王安石得胜了。

神宗有心重用王安石，宰相曾公亮又极力推荐他，可是也有不少人极力反对，参政唐介便是其中之一。神宗问他："你说王安石不可重用，是由于某一方面有缺陷吗？以你看他是文学才能不如人，经学知识不如人，还是施政能力不如人？"唐介道："王安石博学而有文，人所不及。但却泥古而不化，不知道与时变通。如若执掌朝政，势必如王莽一般，以古制变革今制，闹得纪纲紊乱，天下扰攘。"唐介又对曾公亮道："王安石若得重用，天下必因此而困扰。我有言在先，到那时诸公都难辞其咎。"神宗又征求侍读学士孙固的意见道："你看王安石能不能做宰相？"答说："王安石文才出众，品德高尚，做翰林、台谏一类的侍从献纳官，是再合适不过了。宰相则不同，须要有肚量、能包容。这恰恰是王安石的缺点。臣认为陛下若要选择贤宰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合适人选。"神宗对这些话都不以为然，于熙宁二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对他说道："许多人不了解卿，以为卿只知经术，不明白世务。"王安石道："经术之所以称为经，正由于它可以用来经理世务的缘故。不明世务还算什么通经术？"神宗道："卿如今做了执政，第一步要做的事是什么？"王安石道："臣认为如今风俗是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所以，改变风俗、树立法律制度，是如今当务之急。"神宗以为很有道理。

四天以后，商议推行新法的事，王安石道："周朝设立发行货币的机构泉府并置相应官员，以控制兼并，均平、赈济贫苦百姓，变通天下财物。后世只有汉代桑弘羊、唐朝刘晏的做法与此粗合。学者不能由他们的施设中推知先王立法的用意，反而指责他们是与民争利。如今要经理天下财政，就应恢复周朝泉府遗法，将天下利权收归朝廷。"神宗采纳了他的建议。王安石又说："人才最难得，也最难知，如今若委派十人管理天下财政，其中

有一二人不胜任，攻击新法的人就会乘机而起，说短道长。上古尧与群臣共同挑选一人治理洪水，尚难免挑错了人，使治水失败。更何况如今挑选理财的人非止一人，岂能没有失误？最主要的是区分利多还是害多，希望陛下他日不要为攻击新法的异论所迷惑。”神宗道：“有一人不称职就将推行的新法废除，等于是因噎废食，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卿只管放心，朕不会做这种事。”于是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天下财务，并负责制定新法，以沟通天下财利。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为主官。

起初，有一位泉州人名叫吕惠卿，任真州（今江苏仪征）推官。任满后人京述职，与王安石邂逅相逢，一起谈经论史，意见大多相同，于是成为知交。王安石主管三司条例司以后，就向神宗推荐说：“吕惠卿是个有用之材，纵是前世大儒也难与他相比，当今学先王之道而又会应用的，独吕惠卿一人而已。”于是神宗任命他与苏辙二人共同担任中书省检详文字官。从此，事无大小，王安石必先与吕惠卿商议，每向朝廷提出一项新建议，都由吕惠卿代为起草奏章。王安石又起用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作为左膀右臂。诚所谓“分才一毛轻，聚或千钧重”，有这么一帮人聚在王安石周围，就可无往而不利了。王安石每次设计出一项新政策，群臣如若反对，曾布等人必为神宗反复剖析、分辨，使神宗不为众议所动。因此，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项新法，相继问世。令人心驰目眩，不暇应接。对于一般习惯于安旧守常的士绅们不能不造成一种威压的气势，所谓“飞扬目已眩，摧压听还凶。”于是嫉妒者有之，惶恐者有之，如《雪诗》所描绘：“争光嫦娥妒，失色曦和恐”，就难免七言八语了，连王安石往日的朋友，面对新法，也难免倒戈，与他反目成仇了。如王安石起初与刘恕私交甚笃，打算推荐他到三司条例司任职，刘恕以不懂金谷等财政事为理由，婉言拒绝。还说：“如天子对你很信任，有意

把天下大政委托给你。你应该恢张尧舜之道，辅佐明主，使天下太平。不应该把财利事放在首位。”王安石道：“自孟子以来，关于义和利的辩论持续一千多年了。其实义和利是相辅而不悖的。只要运用得法，讲求财利，就是尧舜之道。”刘恕不服，将新法最遭众人反对的一一罗列出来，劝王安石一仍旧惯。自然也毫无用处。此后刘恕每每当面指责王安石，直气得王安石面色铁青。许多反对新法的人都被王安石赶出了朝堂，只有对刘恕，王安石顾念往日情谊，隐忍包容，不予惩罚。刘恕并不因此有所收敛，反而逐步升级，闹到于大庭广众之中怒目相向，责备王安石如何如何，终于二人绝交。对王安石素有成见的人，在新法出现后对他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御史中丞吕诲就属这类人。王安石初任参政时，由于他素享盛名，士大夫一片欢呼声。吕诲独以为不然，说他“不通时事”，不该重用。为此特意请见天子而陈，途中与司马光相遇，司马光悄悄问他今日又要弹劾何人？吕诲拍拍衣袖道：“弹劾的文本在这里了，是关于新任参政的事。”司马光愕然道：“众人都认为这个人选合适，中丞为何反要弹劾他？”吕诲道：“君实（按：司马光字君实）也认为他是合适人选吗？王安石此人名声虽好，只是思想偏激、轻信奸佞，喜人奉承。听他说话句句在理，付诸实际就一条也难行通。用他做宰辅，天下人必受其害。如今新皇帝刚刚即位，所依赖的不过是二三个执政大臣。若任非其人，必成大害。此等大事，我身为御史，如何敢隐忍不言！”后来，他把他“袖中弹文”呈给神宗，神宗打开一看，竟是满纸诋毁的言语，一件实事也没涉及。如其中说王安石的为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表好像很朴实、真诚，其实心中却包藏巧诈；行事则是“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倘若陛下喜欢他的才辩，久而久之倚靠、信任于他，就会使“大奸得路，群阴汇进”，以致“贤者尽去，乱由是生”。并危言耸听地预言道：“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神宗对安石的信任尚不致因这么一篇

弹文动摇，读后将它原封退还给了吕诲。吕诲于是请求解职。王安石得知吕诲向皇帝递了弹劾他的本章，按照惯例，他也向朝廷递了辞呈。神宗颇觉为难，对宰相曾公亮道："若将吕诲贬出朝堂，又怕安石顾忌舆论说他不能容人，而不能安于职守。"王安石听到消息后，对神宗表示道："臣已以身许国，只要陛下处置得正确，臣怎敢为了避免舆论的小小嫌疑，轻易离职呢?"于是将吕诲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县）知州，时为熙宁二年六月。从此，王安石的地位更加稳固。随着新法的不断出台，一些守旧大臣对王安石更加憎恶，司马光对吕诲的"先见之明"也就愈加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年八月，又将知谏院范纯仁逐出朝堂，起初贬为河中府知府，再贬知和州。又贬了侍御史知杂事刘述等六人。

九月，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上书谏阻说："吕惠卿为人，善于巧言谄媚，品德不佳。使王安石遭受中外毁谤的，就是此人。以这种人为东宫辅佐，大不合宜。"从这番话可见司马光的确是老谋深算，见到攻击王安石的人相继离职，知道撼他不动，便另辟蹊径，从离间变法派之间的关系人手，肯定王安石而排斥他的左右手。神宗爱重王安石过甚，听到"中外毁谤王安石"数字，便急忙为他分辩道："据朕所知，王安石不贪高官，不图享受，生活俭朴，是个贤者。"司马光道："王安石的确是个贤者，但是不晓事务而又过于自信，这是他的短处。更不该信任吕惠卿这种奸邪小人。王安石以他为谋主，事事听他出主意，王安石在前台执行，以致天下人连王安石一起也指为奸邪了。近来王安石主政，官员升迁不按次序，舆论反映颇为强烈。"神宗道："吕惠卿才思敏捷，头脑清楚，好像也是个美材。"司马光道："陛下所言不差，单以才能而论，吕惠卿诚为不可多得的人材。可惜他用心不正，才愈大为害也就愈深。汉人江充、唐代李训岂无才干？使两朝天下大乱的正是此二

人。”神宗听了，沉吟不语。司马光又寄书于王安石道：“那些善于谄谀逢迎的小人，今日对您的确有顺从、适意的好处，但是您一旦失势，出卖您的也必是这些小人。”王安石读了很不高兴。

七月，宰相富弼罢官。由于神宗信任参政王安石，他这个宰相已无大用处，便时常泡起病号来，又多次提出辞职。神宗问他：“卿若辞职，朝中谁可代理你的职务？”富弼道：“文彦博。”神宗听了，一言不发。沉默许久道：“王安石怎样？”这一次轮到富弼一言不发了，他也沉默了很久。然后不欢而散，到亳州上任去了。神宗选择了陈升之代替富弼为宰相，问司马光道：“近日以陈升之为宰相，外间有何议论？”答道：“人们说闽人狡猾凶险，楚人轻薄易变。如今两位宰相（按：指曾公亮，泉州人；陈升之，建州人）都是闽人；二个参政（按：指王安石，临川人；赵抃，衢州（今浙江衢县）人）都是楚人。他们势必援引提拔自己的同乡，不久就会出现闽楚之士充塞朝廷的情况，天下风俗又怎能得以淳厚？”神宗道：“陈升之有才智，又通晓民政。”司马光道：“他唯一做不到的就是临大节不可夺。凡用有才有智的人，必须另外以忠正刚直的人加以制约，这是历代明主用人的诀窍。”神宗又道：“你看王安石怎么样？”答道：“人们说王安石是奸邪小人，言之太过。他只是有些不明白事理，又固执不化罢了。”

司马光对于吕惠卿、陈升之的为人都不幸而言中了。得志之后，他们都背叛了王安石。那又如何呢？人才各有短长，王安石还是靠了这些“小人”的长处，才有了他的一生事业。如果不靠他们，而靠那些“临大节不可夺”的“君子”，如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辈，却是什么事也做不成。况且，若不是这些“君子”的频频活动，陈、吕对王安石的背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司马光曾引江充、李训事说明“小人”的才能适足以济其恶，而司马光的“知人之明”，也适足以构成对新法的破坏；王安石知人不明却提成就了这次变法。

再说司马光等人攻击王安石本人，或者离间他与变法派间的关系都失败了。随着变法的深入进行，他们又改以新法执行中的缺点攻击新法。正如《雪诗》所说："空令物象莹，岂免川涂壅？"大雪使万物变得晶莹明彻，功同再造，却难以避免有壅塞河川和道路的缺点。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又岂能没有偏差和错误！

还在熙宁二年九月颁行青苗法时，苏辙就曾指责青苗法说："以钱贷民，本意是要救民，可是于钱财出纳之际，难免官吏从中作弊，纵有严法也难禁止。钱到百姓手中又不免胡乱使用。到还钱时，便是富户也难保按期归还。因此州县催逼，鞭笞刑罚必不可免，从此州县衙门就不得安静了。"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利弊时，司马光攻击青苗法说："平民百姓放债出息，尚能蚕食下等户，使他们饥寒流离。更何况是县官放债，以刑法催逼本息了！"吕惠卿道："青苗法贷钱是自愿的，不愿贷者并不强迫。"司马光道："百姓愚蠢，只知贷钱时的好处，全不顾还债的难处。自愿或是强迫都是一样的。私家放贷又何尝不是自愿的？太宗平定北汉时，那里米价低廉，十钱一斗。因此制定籴法，要民卖粮于官府，官府以高价偿民钱。当时百姓对这项政策很满意。如今物价已贵而籴法依旧，成了河东百姓世世代代一大害。立法时有这等好处，流弊倘如此之深，何况青苗法初立法就不大好，其恶果必然更甚。"神宗道："陕西推行青苗法已久，百姓并没说过不好。"司马光道："臣就是陕西人，只见到它的害处，从没见有何益处。起初青苗法在陕西由地方官府私自推行，朝廷并未认可，尚有这许多害处，如今朝廷准许他们这么干，更是要无法无天了，危害只有更大。"

对新法的这些攻击还都是假定之词，这些"正人君子"们难得民间走一遭，新法纵有许多缺点，他们也难得知晓，仅是凭个人好恶，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所以对新法并不能构成大的阻

碍。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新法的真正缺点和危害总是有一部分传入他们耳中的，对新法的攻击也就愈益深刻。

熙宁三年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上书说："朝廷颁发的散青苗钱诏书说：'务在对小民有利，避免富人乘小民急难时放高利贷取息，盘剥小民。而并不是官府要通过放青苗钱获利。'而实际执行的情况是，官府定下条规：乡户自一等以下都规定了借钱数量，三等以上户准许多借。臣认为上等乡户与城镇有房地产的坊郭户，从来都是兼并之家，并无借钱的必要。官府规定要他们借钱一千，还一千三百，等于是官府放贷取息，与诏书所说'不是官府要放青苗钱取利'的话不符。又诏书规定，放青苗钱不许强迫，可是不强迫上户必不愿贷，而下户贷了又无力偿还，势必出现借贷者与保人均赔的状况。以后无人愿做保人，下户也就无法再贷。臣以为陛下以节俭治天下，自会国用不乏，何必派兴利之臣四处奔走，搞得天下汹汹，人言藉藉呢?"他是第一次以河北地区的实际例子说明青苗法强迫百姓借贷的情形，神宗颇受震动说："朕起初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想不到这样害民。青苗钱，顾名思义，是播种时怕百姓因无钱购买种子，使农田缺苗，才借贷给他们的。坊郭户不种庄稼，何需青苗钱？一定让他们借，太无道理。"王安石一旁听了，很不高兴道："坊郭户只要愿意借，虽名青苗钱，借给他们又有何妨？汉代桑弘羊收天下利权，以供皇帝私用，史家才称他们为兴利之臣。如今陛下按照周公旧法，散青苗钱，抑制兼并，赈济贫乏，利国利民而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怎能称为兴利之臣?"可是韩琦所说强散青苗钱的话，因为是实情，王安石难以搪塞，神宗便始终以为韩琦说得有理。王安石也学富弼泡起病号来。神宗命执政废止青苗法，参政赵抃请求等王安石"病"愈后再执行。王安石闻讯，要求辞职。神宗命司马光代为起草一份答复的诏书，其中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的话。前四字是司马光的自我感受，后四字就有些夸大其词

了。王安石因此上表章辩驳。神宗也以言事失实而自咎。变法首先是神宗自己的主张，王安石是设计师，是执行者，所以他不能放王安石离朝，命吕惠卿前去劝说，王安石才答应留职。新、旧二派之间的这一次交手，新派第一次被迫处于守势，王安石险些失手，不得不以辞职相要挟才挽回败局。旧派一击而中，便想从青苗法打开缺口，将新派击败。此后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相继论争，王安石建议将他们一一罢官，数日之间，台谏为之一空。朝廷不能不作些调整。五月，诏命沿边州郡不实行青苗法，又废除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合并入中书省。从此，王安石不再单靠条例司一个机构，开始着眼于整个朝廷的人事安排。九月，王安石荐新派的曾布为崇政殿说书，改变了以往由司马光等人独家控制的局面。不久曾公亮罢相，翰林学士司马光贬知永兴军，范镇告老还乡，新派的韩绛、王安石同时出任宰相职。神宗久有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的意思，王安石一再推辞，至今才答应上任。

熙宁四年三月，下诏书访察奉行新法不力的官员，或贬或撤。四月，直史馆苏轼因议论新法不便贬为杭州通判。旧派人纷纷落马。同时，由于神宗的支持，新法向纵深铺开。新派势力急骤扩展。受改革大潮的裹挟，难免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色人物都倒向新派。新旧两派的矛盾也愈加深刻和残酷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倡言："不诛异议者，则法不行。"熙宁五年正月，京城专设巡逻士兵，察访毁谤时政的人，处以罪罚。六年，华岳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是由于新法与民争利，上天对朝廷降下的警告。王安石却说是上天为了那些阻碍、诋毁新法的小人而发。但按传统理论，上天只对天子示警，臣子却没有资格接受天的警告，旧党于是又发现了一个攻击新法的武器：天灾。适巧，自这一年七月，直到第二年四月，天久旱不雨，神宗忧心忡忡，以为又是上天惩罚他，打算对法令全面检讨，改正那些对民有害的部

分。王安石开导他说："水旱灾害是很正常的事，尧时洪水连续九年成灾，汤时大旱三年，可见圣帝在位，也难避免。陛下即位以来，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如今旱灾虽久，也不难对付，只要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是了，无须为此担忧。"神宗道："朕所担忧，正是由于事情做得不好。如免行钱收得太多，以致怨声载道，从近臣到后族，都对我述说它的害处。"参政冯京道："臣也有所闻。"王安石道："士大夫反对新法的人以冯京为首领，所以这类话独有他才能听到，臣从来没听到过。"

这时，又有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冒了出来，使王安石防不胜防。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曾被王安石提拔，心中感激，一心要尽忠报国，回报王安石的知遇之恩。任满后入京述职，安石向他询问在州县有何见闻，郑侠道："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边疆的军事状况，都不大妙，使在下心不能安。"王安石以为话不投机，不再询问。郑侠改任为监安上门。安上门是汴京新城的城门，新城南门有三个，中为南薰门，东为宣化门，西面的一座名为安上门。监安上门是守门的门官。这几年大旱成灾，颗粒不收，四方饥民，流入京城谋食，每日出入城门，填塞道路。从城上看去，但见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络绎不绝。人人面黄肌瘦，家家衣不蔽体。还有的披枷戴锁，负瓦扛木，为官家服役偿债。凄凄惨惨，不忍卒睹。郑侠将看到的惨象画了一幅图画，再加上一道表章对图画加以说明，认为都是新法造成的。其实呢？那种年头，遇上这样的大灾荒，什么法也免不了百姓流离。不过适巧推行新法，便一股脑儿推在它身上，皇帝和官老爷们就能心安理得了。即便没有新法，而是遇上了其他事，也是照样要推的。总得找个替罪羊出来，这叫做自欺欺人。郑侠的法儿正是发扬了这个传统，所以很容易被皇上接受。神宗反复看图，长叹不止。特别是那份表章写得有情有致，实在感人。其中说：陛下南征北战，将士总是将战胜攻取的形势画成图献给陛下，从来无人

将百姓迁移流亡、妻子不保的愁苦困顿状况画成图献给陛下的。臣算是第一人。所绘为在安上门每日常见的景象，与实情相比，百不能及一。然而，绘入图中的这一点点情状，已足催人泪下。陛下看图之后，若能按照臣的请求，废除新法，治新党诸人之罪，十天之内，若不天降大雨，请斩臣之头，挂在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后人读史，读到这里，必定会想：他为何有这样大的把握？即便上天有灵，他怎知十天之内天降大雨，第十一天就不行？其实他是个亡命徒，不过要用自己的脑袋与新法作赌罢了。这一招还当真把神宗震住了，使他深受感动，一夜不眠。第二天便命开封府放免免行钱，命三司调查市易法有何不便，命司农寺打开常平仓，赈济贫乏，命暂停追还青苗钱和免役钱，废除方田、保甲法等等，总共采取了 18 项措施。据说民间为此欢呼庆贺。恰巧，这一天下了一场透雨。第二天，群臣入朝纷纷致贺。天旱了这么久，下一场透雨，还不应该祝贺？只是偏于此时落雨，就像是在王安石心上戳了一刀。神宗将郑侠的《流民图》和表章拿给群臣看，说都是郑侠的功劳。还问王安石认识不认识郑侠？王安石道：“是臣的学生。”群臣听了，惊诧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嘲讽揶揄者有之。王安石心中在滴血，面上却是神色木然。退朝后便上表辞职。

新派诸臣恨郑侠入骨，找了个借口将他送入御史牢狱。吕惠卿、邓绾等一齐劝解神宗说：“陛下数年来废寝忘食，才搞成了这一番事业，天下百姓，受益匪浅。如今一个狂夫说了那番无踪影的话，便将一切废除，使前功尽弃，难道不觉可惜吗？”说到动情处，围着神宗恸哭起来。神宗的确为新法倾注了数年心血，爱护新法的心情不比任何人差。终于又被吕、邓的话打动，新法一项又一项地重新恢复起来。只有方田法暂且停罢。

王安石已提出辞呈，神宗再三挽留。王安石自知已成众矢之的，若不稍退，必纠缠不已，与新法不利，所以坚持辞职。皇帝

中太皇太后曹氏也对皇帝说："王安石虽有才学，怨恨他的人太多，为了保全他，不如暂且放他到外地做官，避一避风头。"神宗只得答应，以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吕惠卿指使新派官员纷纷上章挽留他，这一番好意使王安石深为感动。提举市易务吕嘉问、直舍人院张谔等人正与曾布吃官司，多亏王安石斡旋，才免于治罪。闻王安石罢官，手扯王安石衣袖痛哭起来，王安石安慰道："不要担忧，我已推荐吕惠卿为执政了，诸事一定能与我在时一样。"

神宗按王安石的推荐任命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执政。二人谨守王安石创立的一切法度，半点也不走样，当时称绛为"传法沙门"，吕为"护法使者"。这自然又是旧派诸人的把戏。虽然执法与王安石在时相同，人际关系方面就难保没有变化了。吕惠卿与曾布不和，王安石在时，闹不起来。王安石去后，五月，二人就折腾起来。吕惠卿首先利用吕嘉问一案，将二人同时贬官：三司使曾布出知饶州，吕嘉问知常州。改以章惇为三司使。吕惠卿大权在手，深觉快慰。自忖：只要王安石不重为宰相，朝中大臣，无人是己的敌手。他就能率意而行，无人可挡。因而慢慢有了搬倒王安石，自成一家的打算。七月，按照他的胞弟吕和卿的主意创行了手实法，令百姓自报家产，造册登记，通计一县役钱，按百姓家产多少分摊。又要实行给田募役法，目的在于改变王安石制定的免役法。还奏请说，王安石主持编订的《三司令式》不便，请求重新编订等等，搞得纲纪紊乱。宋人著书说：至此，"天下之人，复思荆公（荆公，王安石爵号）。"吕惠卿心不自安，把底牌亮了出来。亲自出面奏述王安石兄弟二人的失误，想把事情挑明，割断神宗对王安石的依恋。

所谓"王安石兄弟二人的失误"是指吕惠卿制造出的二件刑案。一是郑侠案，由此株连王安石弟王安国。王安国平素不赞成乃兄的变法主张，人各有志，这也无什么稀奇。熙宁八年正月，

监安上门郑侠又画了一幅图给皇上。他是属猫头鹰的，吃死食。早先画流民图震动不小，这一次画的是唐朝忠臣魏徵、姚崇、宋璟和奸臣李林甫、卢杞传，各为一轴，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分别与宋朝廷大臣的行事相比附，也是另外附了一道表章加以说明，还推荐冯京，说他可以做宰相；又说宫中有人身披甲胄，登殿大骂等等。宫禁中就是实有其事也是说不得的，他不懂忌讳，胡言乱语，吕惠卿很容易就给他安了一个“谤讪”的罪名，流放到汀州居住。冯京与吕惠卿二人不合，而王安国又素与郑侠有些交往，吕惠卿便想通过郑侠案一箭三雕。一面要侍御史张琥弹劾冯京与郑侠交通有迹，将他贬知亳州；一面将王安国贬为平民。第二件是李逢案。起初蜀中有个李士宁，会做气功，古称导引术，自称年已三百岁，又善于预言吉凶，与王安石有些交往。王安石出镇江宁后，山东揭发出李逢、刘育谋反案，牵连到李士宁。吕惠卿想进一步由李士宁牵连到王安石身上。神宗识破了吕惠卿的用心，将他的奏章送给王安石看，并要他回朝复职。王安石深知迟则生变，时机稍纵即逝，接诏书后，日夜兼程赶往京都，七日到达汴京城。十月，吕惠卿罢官，出知陈州；三司使章惇以依附吕惠卿出知湖州。九年七月，御史中丞邓绾贬知虢州，直舍人院张谔降官停职。

《雪诗》说“赖逢阳气蒸，转作水波溶。舞庭称贺严，扫路传呼宠”。可见王安石复职时的轻松、得意的心情，以及大臣趋附、奉迎于他的热闹场面。但他不久就发觉虽然复了职，时过景迁，新派的境况已非昔比了。多数人于王安石离职时都依附过吕惠卿，吕贬官后，人人自危，离心离德。有才者不可信，可信者又无才。与宰相韩绛议事多不合，只有与儿子王雱商议。不久，王雱病死，王安石伤痛之余，知天下事已不可为，屡次上书辞职。神宗初时挽留，久则生厌，批准他以使相重判江宁府。而以吴充、王珪同为宰相。吴充之子娶安石女为妇，是王安石的亲家

翁。但素不满安石的作为，出任宰相后，欲有所变改，请求朝廷召回司马光、吕公著等数十人。但是有神宗在，新法暂时可以无虞。哲宗即位后，新法才归失败。

王安石在江宁，居住在白下门外，日与宾客游钟山，往事已不堪回首，不再过问朝廷事。《雪诗》末二句道："吴侯绝俗唱，韩子当敌勇。胜负观两豪，吾衰但阴拱。"吴侯指吴充，韩子指韩绛，王安石自言志气已衰，只拱手做个旁观人了。但是虎老雄心在，风风火火，半生政治生涯，一时间又怎能全都抛撇得开？有人说他闲来时时对空虚画"福建子"三字，猜想他定是为吕惠卿所误而痛悔不止。可是这段疑案已无法弄个明白，谁能断定他不是为将吕惠卿贬官而痛悔不止呢？还是那句话："分才一毛轻，聚或千钧重"。复相以后，他没能将新派重新凝聚在一起，结果呼啦啦全都垮了下来。孙固曾批评他肚量小，不容人，也许是对的。总之，他终日陷于对往事的深切忏悔中：变法使朝廷财政状况有所好转，部分改变了民贫国弱局面，是古来变法中较为成功的一例，这些都足以使他自豪；但终于由于旧派的阻挠，新派内部的纷争，总之是由于政府机构的腐朽而失败了。对此，他自己也是难辞其咎的。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王安石传》、《曾巩传》、《韩绛传》、《韩维传》、《唐介传》、《吕公著传》、《吕嘉问传》、《刘恕传》等。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5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15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

元祐更化

神宗皇帝在位十八年，任用王安石变法改制，国家状况得到好转。但是，新法部分限制和违背了官僚贵族的利益，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官僚贵族把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再加上推行新法时，对官员的管理不善，贪官污吏以刻剥百姓请功邀赏，百姓的负担有增无减，以致怨声载道。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在旧官僚的一片呼声中逐项废除新法，恢复仁宗时旧制，这就是史家所说的元祐更化。

高氏垂帘，新皇帝即位，照例要赏赐群臣。退休后在家赋闲的宰相文彦博以及贬官在外的执政大臣张方平、吕公著、吕惠卿，学士孙固、韩维等人也都受了恩赏。翰林学士司马光，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多次交手，罢官后，在洛阳闲居已经15年，闻知神宗皇帝驾崩，也想入京。但是外官不奉诏而擅入京城是有罪的，况且他也怕人说乘神宗去世之机，别有图谋，迟迟没有启程。他有一个知交好友，名叫程颢，知道他的心思，劝他早日动身；又看到学士孙固、韩维等已经入京受赏，也就不再犹豫。在京城，他是反对新法的知名人物，卫士们首先认出他来，兴奋不已，以手加额说：“原来是司马相公！”一些受新法危害的百姓闻讯后，也簇拥到他的马前，呼喊着要他留在京城做宰相，辅佐新天子，拯救百姓，不要再回洛阳去。每天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百姓围观，常达数千人之多。他是做官的人，知道这是有罪的，胡

乱给他加个罪名，便吃不消。于是打算早日离开这块是非地。正巧朝廷有令，外官入朝奔丧者，离去时免于辞谢。就是无须再入朝见驾告辞，可自行离去。决定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洛阳去，正要启行，太皇太后高氏派内侍梁维简来到他的下榻处，寒暄、慰劳一番后，向他询问："在今天这种形势下，要治理天下，首先应做什么事？从何处入手？""考试题目"既然下来了，他略加筹思，便写成一篇长长的章奏，呈了上去。其中说："《周易》说：天地相交称为泰卦，不交称为否卦。意思是天地交融则安泰，隔离则凶险。皇帝与臣民相比，皇帝为君是天，臣民是地。两者和谐、融洽，国家就兴旺发达；君臣限隔，离心离德，国家就要遭殃。"这司马光道德、文章，可说是古今独步，没有可说的。只可惜治理天下非其所长。别的不说，上边这番话，神宗即位时他就说过一遍，如今哲宗即位，又一字不差地端了出来，也不嫌絮烦。在表文中他接着说："如今新君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初发号令，不可不谨慎从事。臣见近些年来，士大夫以偷安苟且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以致下情壅蔽不能上达，皇上恩意也不能下通。百姓愁苦，痛心疾首，皇帝不能得知；而皇上宵衣旰食，勤于政事，一心要将天下治好，百姓也不能知。因而上下交困，公私两敝，盗贼一天多似一天。侥幸的是这些年无大灾荒，因而人心没有大散，否则真不知天下会成为什么样子。上下不通都是群臣的罪过，而无知百姓往往归咎于先帝，这令臣异常痛心。臣以为当前最紧要的事是应明颁诏令，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凡是认为朝廷政令有失当处，知道民间有何疾苦者，都有权利写成奏状，加封后上报朝廷。各级官府不得以任何方式威吓阻拦。皇上于听政之暇，捡择可行者予以采纳录用，不可行者也不加责罚。这样，好的建议会越来越多，下情也就不会壅蔽了。"这些话说来好听，其实难以执行。要天下人都来上疏，谈何容易！武则天曾大开告密之门，搞过一次，弄得天下骚然；此后皇帝虽有

人颁发过广求直言的诏书，大都流于形式。如今高氏年老，哲宗幼弱，大丧在身，百事丛杂，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即令做，也必流于形式。司马光曾指责王安石不晓事，于此看来，他恐怕更有所不如。这番话的真正作用是唤起众人对新法的不满，为全面恢复旧制做好舆论准备。

四月，朝廷下诏说："先皇帝在位19年，制定许多新政策，为的是使天下百姓蒙受福泽。由于官吏执行不当，搞得天下骚动，百姓得不到实惠。特此申令中外各级官吏，协同努力，奉守法令，不要辜负了先帝惠养百姓的遗志。"这其实是宣布新法罪状，区别责任，作为废除新法的试探。

五月，诏命百官对朝政得失发表意见，并揭榜于朝堂，使人人得知，鼓励官员对新政进行非难。新派官员如何能够坐视？因此建议增加六项限制措施：凡是别有用心、行为过分、动摇朝廷机事、迎合已行政令、观望朝廷的意图以求侥幸进取、眩惑百姓以求虚名，以上六条干犯其中之一，必罚无赦。太皇太后将大臣草拟的关于颁行这六项措施的诏书拿给司马光看，司马光道："这不是求群臣发表意见，而是拒绝他们发表意见。因为除非闭口不言，只要说话就难免触犯其中的一条。"太府少卿宁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按照榜于朝堂的诏书，对朝政发表意见。新派官员欲加惩治，以儆其余，就以越职言事的罪名，每人罚铜三十斤。司马光出面阻止，于是议论朝政的事，风风火火搞起来了。有趣的是庆历年间，反对新政的人曾以越职言事的罪名阻止新政的推行，范仲淹、余靖等人都曾因此获罪。不意时到今日，新派官员反而要把这项帽子戴在政敌头上，人事的变幻真是叫人不可思议。

不久，任命蔡确、韩缜为宰相，章惇为知枢密院事。又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司马光入朝辞谢，又改任为门下侍郎，位为执政，是朝廷中执政八大臣之一。蔡、章二人在《宋史》中是人

了奸臣传的；韩缜是个装腔作势的人，史书说他做官"外事庄重"，而"寂无功烈"，说白了就是爱装样子而无本事；司马光就无须多说了。从高氏挑选的这个领导班子可以想见，这位老妇人志在于恢复，只要愿意把新法砍掉，使一切恢复到仁宗、英宗时的模样就可以了。在这个前提下，顺从、听话、有虚名，就成了她选择、使用人的基本条件。

不久，又召程颢入京，受任宗正寺丞。程颢也颇有名气，符合高氏的上述用人条件，又是司马光的挚友。难怪自监汝州盐税，骤然升任为丞郎。不过他的流年不利，不及上任就死掉了。

七月，吕公著从扬州知州任上被召回，改任为侍读学士。高氏遣使迎接，问他对朝廷有何建议，答说："先皇帝（指神宗）的本意是为了宽省民力，才下令推行免役、青苗等法令，而制定法令的王安石等人却是为了刻剥百姓，侵民利权，结果反而害民。又不能容忍不同政见的人，把他们全都罢官贬职。时日愈久，危害愈深。如今若能得中正贤德之士从中主持，讲求天下利病，同心协力，纠正'新法'造成的恶果，为时尚不算晚。"又上书讲了对朝廷的十条请求。分别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除奢侈、无贪安逸等，第一次为元祐更化提出了系统的施政纲领。高氏大喜，入京后就改任为尚书左丞，也是执政之一。吕公著与司马光原来就是新法的反对派，如今同任执政，正是志同道合，如鱼得水，上任后，很快就对新法斧斫锯伐起来。

先下诏书废除保甲法。

十一月废除方田法。

十二月废市易法。又除保马法。

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右司谏王觌上书说："国家安危，取法于执政大臣。如今执政八人，奸邪之徒占了一半，如何能搞得好？"接着痛陈蔡确、章惇、韩缜、张璪四执政如何朋

比为奸，排斥正人。连续上了数十道表章。此外，右谏议大夫孙觉、待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人也都上书论蔡确如何奸邪。说他在神宗熙、丰年间，兴冤狱、行苛政，如今却对人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欲归罪于先帝。自司马光、吕公著为执政，废除烦法苛政，万民欢喜。蔡确又说是他首先提出的，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因而为公论所不容。太皇太后把他贬为陈州知州。众言官所说的烦法苛政自然是指王安石的新法了。其实，蔡确既非新法派，也非保守派，而是一个骑墙派。所以元丰五年，神宗以永乐败师，惊骇成病，他以行新法得能出任宰相；哲宗即位后，又以反对新法升任首相。但新旧双方都不会真正拥护他，王安石盛时，他难得重用；如今保宗派一方声势已成，势必要向他兴师问罪了。罪名却不是骑墙，而是新法，是有些冤哉枉也。

蔡确既贬，升司马光为宰相，代理他的职务。这时司马光已病入膏肓，新法还有青苗、免役、将官三项未除，西北边事未了，司马光目之为四害，说“四害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月，首相韩缜罢官，司马光升为首相。与吕公著书信说：“我如今将病体交给医生，家事交给儿子司马康，只有国事无所托付，打算交付给你。”把一切都交付给别人，他这首相做得倒也轻巧。况且，宰相三人中，他与吕公著之外，还有一个官封平章军国重事的文彦博，资格比他二人都老得多；八执政中吕大防、范纯仁、韩维等也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文章、政事、道德都足可信赖。却说是“国事无可托付”，只托给吕公著一人。可见这老先生有时也是会弄点权术，要点儿把戏的。

御史、谏官们搞掉了蔡确，又集中火力攻击章惇。太皇太后把他由执政贬为汝州知州。

所余三项新法，即司马光所谓四害中的三害，执行已久，百姓已经习惯。再加废除，实在不易。连司马光的同道们也持异

辞。如关于免役法的争论就持续了许久。

三月，司马光请求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把州县现有的免役钱拨为常平本钱。于是，朝廷命修定役书，为差役法的实行做好准备。而免役钱和十分之二的宽剩钱暂且照收，只将额外多收的部分免除。不久又颁诏书，耆户长、壮丁等依旧招募。由于保甲法已经废除，保正、甲头等役不再招募也不派差。此外，侍御史刘挚请求参用差法，立场已比司马光退了一步。又有监察御史王岩叟请求制定诸役相助法，中书舍人苏轼请求实行给田募役法。显然，他们都不赞成差法，而又碍于司马光这位首相大人的面子，才设想出这些折衷方案来，实际都难以实行。

司马光坚持己见，必欲废除免役法才肯罢休，上书论免役法有五害："以往上等户充役，固然有赔钱贴补等事，但是服役一年可得数年休息；免役法规定出钱代役，则是年年出钱，不得休息，其害一。下户旧不服役；免役法规定同样要交免役钱，其害二。以往行差役法，所差都是土生土长的良民，知根知底，有家有业，不敢违法胡来；免役法尽改为招募，应募者多是无业流民，无赖混混，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其害三。要农民出把力气比较容易，出钱就难了。尤其灾荒年，为了交纳免役钱，甚至不得不变卖庄田、耕牛或农具，其害四。官府惟求多收役钱和宽剩钱以为功劳，使百姓备受刻剥、损害，这是第五条危害。"因而，坚请仍行差役法，"由县令佐定差，自身不愿服役者可以雇人代役。惟有差充衙前役一项最重、最难，若担心力难独任，可按旧法使官户、寺观、只有一个壮劳力的单丁户、无男丁的女户等类人家，有庄田房屋等产业者，各按贫富程度缴纳助役钱。若担心四方居民，人数不等，因而差役轻重不均，人多者役轻，少者役重。可以放宽尺度，允许监司、守令自己权衡，差法是否可行？可行则即刻执行；不可行者，县给五日期限，筹划应增加什么措施才能执行，上报州衙门；州给一月期限上报转运使；再申报朝

人雇人充任，其他一概实行差役法。而无坊场河渡处或者坊场河渡收人微薄的地方衙前仍无人充任。不久就将这种雇法又改为政府出钱的招募法了。

范纯仁也曾对司马光说："治理天下，只要除去那些危害过甚的事就够了。恢复差役法的事，尤其应当深入讨论，从缓实行。如若不然，就会害民。但愿公能虚心采纳众论，不必事事都要谋自己出。否则那些逢迎拍马之辈就会钻你的空子。倘若议论实在难以统一，不妨先在一路实行，观察利弊如何，然后决定是否向全国推行。"这话恳切而又老到，无奈司马光听不进去。范纯仁道："你这样固执己见，是存心不让别人说话。你以为别人会闭口不言吗？我若能这样，王安石执政时就大福大贵了，如何能到今日！"狠狠给了司马光一个钉子碰。又对司马光道："熙宁年间根据王安石的建议实行的，审问时能自首则与减罪的法律，如今既已得到改正，但所定条文过于严厉，判死刑的人数比往年增加数倍。先王制定刑法的原则是宁有遗漏，不错刑民。如今这么做与先王立法的本意不合。"这位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行事刚正不阿，酷似乃父。他素与司马光志同道合，过从密切。及至论事，却是寸步不让，字字有声。

朝廷下令恢复差役法，限期五日。众官都说太过仓促，只有开封府知府蔡京在五天期限内把开封府包括畿县以内的免役法全部改成了差役和雇役，无一例相违背。然后亲到政事堂回报，司马光大喜道："假如人人像你一样奉法守制，还有什么事不可做到！"这个大奸臣竟然轻易哄得司马光如此兴奋。

司马光自执掌朝政以来，凡是王安石、吕惠卿制定的新法，不问利弊，一概革除。对此不少人向他提出忠告。有人说："不论如何，那是神宗皇帝亲自下令实行的制度，而今皇帝是神宗的儿子，他日若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皇上，只怕你吃不了兜着走。"司马光郑重回答说："若天不绝宋，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否

则，那是天意，只有听其自然了。”可见他是一意孤行，完全不计后果如何。还有一个卫尉寺丞毕仲游给司马光写信说：“王安石变法是由于国家财政不足，所以，凡是可以增加收入的办法无不实行。如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盐法等，都是以增加收入为目的。财政不足而思变法，这是人之常情。若不能改变国家财政不足的状况，从根本上杜绝变法产生的根源，仅仅以行政命令强制废除新法，那是行不通的。如今新法已经全部废除了，假若有人以国用如何不足，有什么急事应当做而因无钱不能做，说给皇上，别说皇上是个有思想的活人，就是一块顽石也会改变主意的。所以应该及早设法杜绝这种事发生。为今之计，只有大举计算天下财富，确切知晓有多少财富，用多少，余多少，州县所余全部收入国库。倘若天下余财足够二十年使用，再过数年，所余更多，而不是坐吃山空。再有人以国用不足为借口变法改制，天子就不会相信了。新法才能永不恢复。”他还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朝廷内外布满了的他的党徒。如今要废除新法，而朝廷侍从以及各职司部门的官员，十有七八仍是王安石的党徒。虽然起用了几位反对新法的旧臣，但不足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势必难以成功。今公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所以，人们不敢以公所为为可喜。譬如人久病在床，稍有好转，其父子兄弟仍不能喜动颜色，是知道病尚未除的缘故。”司马光读了这封信耸然心惊，却又不知如何是好。要国家财政节余够二十年所用，岂是一句空话？要把拥护新法的官员全都赶出官场，不但需要魄力、手段，更需要时间。他如今已人暮年，又多疾病，是朝不保夕之人，又怎敢作如是想，想了又如何能够做到？只好听其自然了。还有执政韩维也认为差役法不便。

六月，将吕惠卿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建州（今福建建瓯）居住。中书舍人苏轼起草将他贬官的制书，说他“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等等，士大夫以为脍炙

人口，传诵不绝。《宋史》也将他归人奸臣传。其实，此人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士大夫憎恶新法，王安石又素享盛名，许多所谓正人君子如司马光等都与王安石私交甚深，对他的才学和为人曾经赞不绝口。于是便归怨于吕惠卿，说王安石干的坏事都是他出的主意。平心而论，他做的唯一错事是乘王安石落水之际，踹了他一脚。正如苏辙所说，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即他的升迁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唐宋之间对这种关系都特别注重。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格外为士大夫所不耻。此后新党再执朝政，章惇、曾布、蔡京相继为相，而对吕惠卿这个新政的设计者，却都畏如蛇蝎，不敢引人朝中。他为自己的错误已付出了很大代价。苏轼对他这样一个已经落水的人驰骋词藻，痛加诋毁，实在有失恕道。

这时，新党如吕惠卿、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都已贬斥为地方官，而朝中的“正人君子”们仍然不肯罢休。范纯仁看不过眼去，对太皇太后道：“对别人的过失，不宜太看重了。如此揪住不放，与圣朝仁厚之政不合。”太皇太后才下了一道诏书：“前朝所有附会新法的人，不再追究，言官不许再加弹击。”吕惠卿等人得以稍安。有人对吕公著说：“如今除恶不尽，将生后患。”吕公著道：“治理天下不过是要去其太甚者。汉文景时期，崇尚宽简，刑网极疏，有所谓网漏吞舟之鱼的说法，但史称为盛世。况且，人材难得，为什么不给他们一条自新之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呢?”

八月，司马光病休在家。执政范纯仁由于政府财政困难，请求建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法”，就是将常平仓所储钱谷于青黄不接时借贷给百姓，收获时加息偿还。限定州县于正月份将所储贷出一半为定额，麦收以后，随夏税一起先偿还一半，息一分。不能偿还一半，俟交纳秋税方能偿还者，息二分。这其实就是青苗法。所以，言官如刘挚、上官均、王觌、苏辙等都上疏论述此

法不当。司马光初闻讯说："先帝散青苗钱，为的是便利百姓，可以采取自愿的原则，借与不借听其自便。而官府贪功，务求多散，强迫百姓借贷，才成了害民之法。如今实行常平钱谷给敛出息法，只要禁止强迫借贷，就有益无害。"苏轼奏道："青苗法未尝不禁止强迫借贷，实际却造成这样大的危害。原因很简单，普通民家若能量入为出，虽然贫穷，总还可以过得去。若官府设定一个可以借贷的机会，百姓可于分外得钱，花费就会增加。因为百姓愚昧，只图一时花钱痛快，全不思还钱时艰难，所以，这样等于是设法网民，诱民上钩。不是好政策。"司马光听了，带病上朝，向太皇太后说明此法不可行。于是朝廷颁诏书：常平钱谷州县止许按旧时方法粜旧籴新，不得散作青苗钱。已散者只收本钱，除去二分利息，随数多少，分批与二税一同交纳。从此青苗法被彻底废除了。

九月初一日（丙辰），司马光病死。这位老先生感激太皇太后对他的信任，欲以身殉国。处理政务，不分昼夜，终于劳瘁而死。

元祐二年（1087）四月，宰相文彦博请求告老还家，诏命十天到都堂一次。三年，宰相吕公著也以年老辞职。三位宰相一死一归，只剩了他一个管事的，朝廷怎能答应？便给他加官晋爵，以示挽留。超拜他为司空，还在中书省政事堂以南特为他建了一座宅院，开北门与政事堂相通，为的是让他赴政事堂处理政务更为方便。又特为定制：三省、枢密院事由他总理，不必每日参加早朝，隔日参加一次即可。逢入朝时，顺便到政事堂走一遭。这一切都是常礼所无。尤其兼管三省和枢密院，更与宋代祖制不符。由此也可见高氏垂帘的不易，她是全靠这些老臣了。

这时，新党骨干虽然全都贬逐出朝了，遍布中外的中下级官员仍为数不少，并时时批评朝政，对政府造成威胁。鸿胪丞常安民曾给吕公著写信分说其间危害，以为"其后必将有大忧"。应

该“搜致海内英才”，使聚于朝廷之上，在人数上对“小人”造成优势，方能免祸，吕公著颇受启发。不久，任命吕大防、范纯仁分别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就是左、右宰相的角色。

四年二月，吕公著死。高氏对辅臣痛哭失声道：“司马相公已死，吕司空又亡，真是国家不幸啊！”哲宗小皇帝也在一旁流泪。当时朝中关于朋党的说法颇为盛行，右相范纯仁一再向朝廷奏明朋党之说的危害，毫无用处。适逢知汉阳军吴处厚将蔡确的《安州车盖亭诗》呈给朝廷，说其中语涉毁谤，太皇太后主张严加惩处，执政多数都附和她的主张。只有范纯仁与尚书左丞王存以为不可，争论不决。太师文彦博要把他贬到岭南，范纯仁对左相吕大防说：“自真宗末的乾兴年间，近七十年来贬官已不行此路，我等如今若开了先例，只怕会自食其果。”后来决定将蔡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范纯仁在太皇太后帘前说：“圣朝应该行宽厚政治，不应该由语言、文字间一些暧昧不明的东西，诛窜大臣。一举一动，都要成为以后的榜样。这件事万不可行。”又到哲宗跟前面陈，还是难以挽回。吕大防奏请：“蔡确有不少同党，也应一同治罪。”范纯仁上奏说：“是否同党，实难分辨，一般把与自己意见相同者称为正人，不同则称邪党。既以‘我’为准，往往真伪不分，贤愚倒置，成为国家隐患。王安石便是因为喜同恶异以致黑白不分的，至今已成风俗，士大夫害怕及祸，谁都不肯表明己见，而以观望踌躇为能。执政大臣应当永为鉴戒。对蔡确不必穷治党人。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要举用正人，不正者自然遁迹。若一定广所株连，穷治不止，必伤仁政。”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等人一齐弹劾范纯仁为蔡确开脱，是蔡确同党。范纯仁只好自请辞职。六月范纯仁罢职，贬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范纯仁任右相才一年零两月。

五年正月，文彦博以老罢职。这时新法除将兵法以外，虽然

都已废除，关于新法的争论并未结束，尤其对于役法的争论更为激烈。苏轼说："天下人都认为差役法不便，这并不难理解，以中等人家为例，只要计算一下，他们按以往的免役法应纳钱多少，按今日的差役法所费多少，两相比较，灼然可知。更何况农民在官服役，官吏任意蚕食勒索，与雇人充役相比，其苦在十倍以上。"户部尚书李常也曾奏称："法不分新旧，便民者便是善法，一定要百姓出钱代役，贫下户就难以应付；一定按差役法使百姓出力，富户会深感不便。况且差役法废除已久，版籍簿书都已不存，实行起来必定轻重不均。宽乡人多处还能轮番服役，得到休息的机会；狭乡人少就会常年在官服役，不得休息。望朝廷能折衷差、雇二法而行之，使愿出钱者出钱，愿出力者出力。"朝廷颁诏：差役法有何不完善？命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提点户曹文字刘安世共同讨论，说明利害，奏明朝廷。刘安世乘机将对差役法不满的人痛骂一番，说"法度贵在统一"，对差法不可稍有动摇。宋自开国以来实行差法已经历了六世，效果一直很好，岂有今日行不通的道理？都是那些"奸邪之人，内怀顾望，造播横议"，影响那些"一二小臣，敢执偏见，妄进邪说"，才有了今日的议论不决的局面。

熙宁新法是由社会矛盾产生的，最大的矛盾是国家财政不足，支大于收。矛盾没有解决，单纯以行政命令取消新法，便注定了不能成功。在这个矛盾面前，不但新党，连新党的反对派也会站出来为新法呼吁。失势的新党更要不时对执政加以攻击。文彦博罢职后，吕大防独居相位，一时难以招架，与执政刘挚主张对新党人物稍加任用，以缓和双方矛盾，称为"调停"。太皇太后对此犹豫不决；苏辙则面斥其非，坚决反对，上书说："君子小人，势同冰炭，不可同处，同处必争。争斗的结果又必是小人获胜。原因是小人能够忍耻居位，君子则洁身自爱，稍受挫折就会自动辞职。作为臣子，罢官、被祸都无所谓，臣所惜者是祖宗

创下的这个基业，不忍眼看着重被小人败坏殆尽。”旧党诸人自然也蜂拥而上，群起指责。“调停”便只能停而不调了。

元祐六年二月，刘挚升任为右相，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位为执政。王岩叟是个坚定的反新法派，上任后首先申明太皇太后主政以来采取的废除新法的措施深得人心，应当信之不疑，守之勿失。“调停”之说不可行，是危亡之基。

十月，一群言官共同弹劾这项“调停”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刘挚，理由之一是朋党不公；二是对亲戚赵仁恕、王讯罪罚不当；三是与新党勾结，为自己预留后路。根据是与邢恕有书信往来，又在家中接待过章惇的儿子。实情是刘挚与邢恕私交甚好，邢恕被贬永州后，回家守丧，丧满再赴贬所，路过京城，不敢面辞，只给刘挚去了一封信，表示辞别，并无他意。刘挚也不敢前往送行，回了一封信，要他“为国自爱，以俟休复”。“休复”是休息、复元的意思，邢恕新经大丧，必多劳苦，劝他为国保重，多加休息，以俟康复。不过是几句很得体的官样话，敷衍搪塞而已。可是不巧得很，回信误落人言官手中，便将“休复”解释为“复之明辟”之复，就是等待复辟机会的意思。太皇太后闻言大怒，面责刘挚首鼠两端。刘挚引咎辞职，虽经吕大防、王岩叟一再为他解说辩白，还是于十一月贬知郓州。

元祐七年五月，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因徇私废法、父子预政等事，贬为郑州知州。六月补苏颂为左相，与吕大防同主政事堂，以苏辙、范百禄、梁焘、郑雍、韩忠彦、刘奉世为执政。第二年又召范纯仁为右相。朝廷频频换马之际，哲宗已逐渐年长，对太皇太后的政策颇不以为然，一场潜在的危机正在酝酿着。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范纯仁传》、《韩缜传》、《李常传》、《蔡确传》、

《章惇传》、《吕惠卿传》等。

李焘：《长编》卷353—473。

宣仁之诬

元丰八年（1085）正月初，宋神宗病倒在床。月末，稍见好转，上朝听政，据说是病后虚弱，感了风寒，重又病倒。自此日甚一日，到二月末，眼看是不行了。举朝上下忙着为皇帝安排后事，自然也有人打算趁新旧皇帝更代的机会捞上一把。

这时朝廷中以王珪、蔡确为左右相，章惇、张璪为参政，吕公著为枢密副使（枢密使自元丰四年正月冯京罢任后缺员），韩缜、安焘分别为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事，李清臣为尚书右丞（左丞缺员）。按旧史的说法，可说是忠奸各半。皇室的情况是神宗生了十四个儿子，八个早死，余下的六人以第六子延安郡王赵傭（后来的哲宗皇帝，改名煦）最为年长，才只十岁。其次是第九子赵佖，更加年幼了。正因为此，神宗迟迟不立太子，宰相王珪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中。此外神宗皇帝还有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与神宗都是宣仁后高氏所生。

神宗病既重，以王珪为首的三省、枢密院主官齐到宫中探望，王珪见皇帝口不能言，神志倒还清楚，朝廷大事若不乘此时预定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奏道："延安郡王今春出阁[1]已经长大成人，请皇上及早定为皇太子。"神宗点头答应。又奏道："请命皇太后权同听政，朝廷大事暂禀皇太后决断。等皇上圣体

---

[1] 出阁：皇子年长后，搬出皇宫，另建府第居住，称为出阁。

康复，仍由皇上处理。”神宗又点了点头。这时皇太后高氏、众皇子、皇后、朱德妃等人都在帘后等候。皇上既已准许，王珪即时请高氏“走马上任”，出来办公。高氏再三推辞，太监领班人内都知张茂则劝说道：“皇上有病，国事无人处理，为了国家和社稷的利益，太后义不容辞，理应挑起这副重担。”高氏听他以大义相责，只好答应下来。王珪又道：“去年冬天，皇上曾命皇子到集贤殿赴宴，臣等曾经见过一面，如今想必又长高、长大了，请太后准许臣等再见上一面。”高太后暗道：好个王珪，你是怕皇上晏驾后，宫中有人搞那偷梁换柱的事，先要把未来的小皇帝相貌认准了。办事这等牢靠，不愧是国家栋梁。当下答应了，命诸皇子出来一一相见不提。

高太后知皇上病死不过是旦夕间事，自己既答应听政，该首先为皇上安排后事。于是对太监梁惟简道：“回去叫你媳妇[1]做一件十岁左右小孩子穿的黄袍[2]，及早送来，记住不许走漏风声，否则我惟你是问。”梁惟简口中答应，心中却想：“做十岁孩子穿的黄袍，自是为延安郡王登基做准备了，这也不用瞒人。”

大经学家程颢有个学生名叫邢恕，游于司马光、吕公著之门。右相蔡确料到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吕公著必得重用，有心结纳。此时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为皇帝侍从，而宰相是政府首官。按照宋制，两者不得私相交往。于是蔡确通过邢恕致意于司马光、吕公著。司马光不予理睬，而蔡、邢之间的交往却日渐密切。神宗病危后，二人商议如何才保得住官运长通？谁都能想到，要是在新皇帝继位这件事上立一大功，以后的数十年富贵当不成问题。然而，有大矛盾才能立大功，由前边的叙述可知，朝廷虽未立太子，以延安郡王为皇太子的事已经定下来了，并无人

---

[1] 自唐以后，太监多娶妻、认子，自然是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其实。

[2] 宋制：士庶不得着黄。只有天子才能穿黄衣，黄袍是天子袍服。

反对，还有什么功可立？可是对于邢恕这些政界人物，没有机会可以制造机会，没有矛盾可以编造矛盾，这就是“本领”。皇太后有两个侄子，一是光州团练使高公绘，一是宁州团练使高公纪。邢恕与他们有些交往。蔡确命邢恕将二人请入府中，想通过他二人在高太后身上做些文章。但宋代外戚交通权贵有罪，公绘、公纪二人是个本分人，不肯答应。蔡确想了想，也觉由自己直接出面不妥，决定命邢恕代为致意。第二天，命吏召二人到中书堂都堂议事。二人以为，既是公事，不可不往。到中书堂以后，蔡确寒暄一阵，末了说：“已将事情吩咐了邢职方（邢恕为职方员外郎，故有此称），你二位一问便知。”职方官属尚书省兵部，二人就到兵部去寻邢恕。这里怎是商量秘事所在？邢恕有心把二人请到家中，又恐二人不肯，便道：“下官家中有一株桃树，昨日怒放，竟是满树白花，如粉妆玉琢，煞是好看。”二人道：“桃花都是粉红花蕊，白色花倒是少见。”邢恕见二人虽如此说，并无兴致，又道：“谁说不是呢？这白桃花不但颜色奇特，用途更是奇特。”二人顺口敷衍道：“哦！这倒没听说过。”并不深问究竟奇在何处，心中想的却是：“宰相说有公事吩咐我二人，你不肯谈论公事，却扯这些不咸不淡的鬼话，真是岂有此理。”听邢恕道：“早些日子读道经，其中说，白桃花可治人主一切疾病。以下官之见，若说治一切疾病，叫人难以相信，但《唐本草》中载得桃花主治‘杀注（蛀）恶鬼’。治一切邪症，这白桃花的功效最著，说不定是真的。”二人听了，相互望了一眼，都觉有理。

在《烛影斧声》篇中已经说过，赵宋皇室患有遗传性家族病：躁狂忧郁症。这种病后遗症是脑溢血或脑栓塞，发病后或急剧死亡，或失喑、直视等痴呆症状，神宗所患当是脑栓塞一类疾病，双目直视，口不能言，那时说是中了恶鬼邪症。所以，先在大庆殿请来一道士作了七天的消灾祈福道场，接着又命宰相以下至于寺监长贰官员，分头在郊坛、宗庙、社稷坛及京城各寺观内

祈祷，都是按照邪症治疗的。公绘、公纪二人听了邢恕之言，觉得与皇上病状相符，说不定白桃花就是对症良药。但犹不敢过信，当下问明：白桃花治主上疾病到底出自何书？邢恕说是出自《道藏》某某部某某书。二人再无可疑，说当晚要亲往一观，“若果然能治愈皇上疾病，是你大功一件。”邢恕欣然答应。谁知到邢恕家一看满院桃花，尽是粉红。问道：“白桃花在哪里？”邢恕满脸陪笑道：“右相蔡确蔡大人有心结交二位爵爷，恐二位不肯赏脸。知二位一心忠于皇上，才编了这法儿，果然灵验。二位爵爷千万不要见怪。”二人听他口口声声呼喊爵爷，其实二人不过是个小小的团练使，那是敬重之极了。不便过分忤了他的情面，只得问：“相爷究有何事。”邢恕照直说道：“相爷的意思是如今皇上病势沉重，应及早安排后事。皇子延安郡王年幼，难当社稷重任。此外皇弟雍王颢、曹王頵都已年长，又颇贤德，本朝向有兄终弟及的惯例，可以继位为君。希望两位爵爷禀明太后，从中作主。朝廷中相爷可以一力承当。内外合力，此事必成。那时两位爵爷策立新君的功劳，相爷是不会忘记的。”公绘、公纪二人听了，早吓得魂飞魄散道：“邢职方是要灭我九族吧？这种事如何与我兄弟商量？”说完掉头就走。邢恕百般挽留不住，知道这一着算是泡汤了。

那蔡确一时没有主意，倒也罢了。邢恕却是心热得很，一心要做拥立新君的功臣。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伙同一位退了休的内殿承制官王棫，散布谣言说，雍王颢有觊觎皇位的野心，而高太后将要废掉延安郡王，立赵颢为帝。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人心不宁。又知蔡确与左相王珪不和，乘间问蔡确：“如今皇上病势如何？”蔡确道：“渐渐见好，不久就能上朝了。”邢恕讥讽道：“自从皇上再次病倒，病势日渐沉重，口不能言，双目直视，已经安排好了后事。听说宫内是太后作主，朝廷是首相王珪王大人作主。你身为次相，纵然不能主事，难道这种大事决定以后，连

个招呼也不给你打吗？一旦皇上驾崩，宫中颁下四指宽一张纸条，说是遵遗诏，以某某人为嗣君，恐怕蔡大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直说得蔡确寒毛直竖，道：“以君之见，该当如何？”邢恕道：“皇上去年冬天曾答应，要延安郡王今年春季出阁，蔡大人何不率领同列官员首先倡议，请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皇上必然不会拒绝，皇太子因相爷的请求而立，千秋万岁后能少了相爷的好处吗？”蔡确心想：“王珪虽然请求皇上在延安郡王出阁时立为嗣子，时日已久，至今未能兑现。我再请求，拥立新君的头功就是我的了。此计可行。”邢恕又道：“难道大人就这么上朝请求吗？”蔡确诧疑道：“君以为该怎样请求？”邢恕道：“外间传言，太后有废立之意。相爷请立延安郡王岂不是自讨没趣？说不定还会有性命之忧。下官以为相爷应当与参政章惇大人联合，预做准备才是。”蔡确道：“多谢指教。”

于是蔡确与章惇密议，由开封府知府蔡京率领壮士在朝堂外埋伏；蔡确提出动议，命群臣商讨以延安郡王为储君的事。若有人反对，立刻斩首。

这一天三省、枢密院官员一起到福宁殿探望皇上疾病，然后倡言在枢密院南厅议事。王珪心中疑惑：我是首相，群臣议事我怎会不知？当下随众人一起来到南厅，蔡确先说了一通开场白，王珪才知是议论建皇太子的事。心知其中必有文章，欲静以观变，一言不发。哪知蔡确很快就把火引到他身上，要他立时表态。王珪道：“本官以为是……是……”王珪素来口吃，对这样的大事想不清楚，不肯轻易回答，说起话来比平日更加期期艾艾起来。蔡确一心想抓到王珪回答中的半点漏洞，先将他杀掉立威。不由着急，追问道：“是什么？请说。”王珪道：“是……是这样的。”“怎样？”“皇上自有子，建太子的事无须群臣议论。”群臣听了，才知这次会议是蔡确一人策划的，首相为群官之首，既说无须议论，纷纷附和，责怪这次集会是小题大做。蔡确抓不

到把柄，这次暗藏杀机的集会才草草结束了。

王珪、蔡确、章惇重新入宫，把请求立延安郡王为太子的事奏明皇上和太后，皇上、太后双方应允。出宫时，蔡、章心中老大不是滋味。事情竟是这样平平淡淡，不搞出点儿波澜，如何显出我二人的功劳？正在毫无办法，迎面遇到雍、曹二王入宫，章惇立刻有了主意。厉声说道："下官等人已得圣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二位王爷以为如何？"心道："只要他二人态度稍显暧昧，立刻吩咐随从将其拿下，仍是大功一件。"哪知二王闻言，面向宫中叩拜，说道："这是社稷之福，天下苍生之福，臣由衷向陛下祝贺。"这样，蔡、章等人胸中这篇大文章终究无处落笔。可是事后仍散布说：多亏他们预作布置，一场宫廷废立的大事件才没发生。言下之意他们仍是立了大功。这话传到太后耳中，太后如何肯依！这是后话。

三月初一（甲午），皇太后垂帘登朝，皇太子立于帘外，与执政见面。太后对太子赞不绝口，说他明俊好学，《论语》已读到了第七卷；不爱玩耍，酷好读书写字；又很孝顺，自皇上有病，亲手抄写佛经二卷为皇上祈福。说着将太子抄的佛经拿给王珪等人看。对太子疼爱之情自然流露，大臣才知，外间谣传说太后有废立之心，纯是一派胡言。当日宣布了立太子的制书，命太子改名为煦。群臣拜贺，一片祥和。太后殷殷嘱托道："皇太子已立，大事算是定了。卿等要用心辅佐，以后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神宗病久不愈，吃了道士送的一粒龙寿丹后，于三月五日（戊戌），死在福宁殿的御榻上。当天皇太子即位，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忙碌一阵后，廿一日（甲寅）群臣请求太皇太后与新皇帝临朝听政。蔡确知道，新皇帝不过是个十岁的娃娃，大权握在太皇太后手中，自己这个宰相位子能否坐得牢，要看太皇太后是否高兴，怎么也须在她身上下一番功夫。太皇太后叔父高遵裕在元

丰四年（1081）时曾率兵攻西夏，至灵武城下，由于嫉贤妒能，兵败而归，被贬官为郢州团练副使。于是，蔡确奏请高遵裕官复原职。太皇太后道："当年灵武兵败，百万生灵涂炭。先皇帝半夜闻报，披衣而起，绕床榻而走，直到天亮，不能成眠。从此受了惊吓，一病不起。推源祸首，是由于高遵裕。不杀他的头，已是便宜了他。如今先皇帝尸骨未寒，我怎能因为他是我的亲属而不顾天下人的公议呢?"蔡确讨了一场没趣，只得罢了。

太皇太后临朝以后，重用司马光等人，废除王安石新法，恢复仁宗旧制（参见《元祐更化》篇），得失如何，可暂不论。她那种克己奉公的精神实在感人。哲宗元祐元年（1088），为神宗立庙。为了不扰百姓，她把英宗庙后的一片园池献出。而这一片地是留作日后为她自己建庙用的。她宁愿把自己的灵牌供在英宗庙中，不另建庙。元祐二年，神宗丧期已满，大祥礼毕，为她举行受册大礼。按照章献明肃皇后的先例，应在文德殿举行。她下了一道诏书说："章献明肃皇后辅佐真宗皇帝，保护仁宗幼主，功德丰茂，理应受到特殊的礼遇，在皇帝正衙文德殿接受册封。而我不过是先朝遗留下来的一个老妇，功德凉薄，怎能与她相比。册礼的规格应该降低，可改在崇政殿举行。"元祐三年八月，邢恕替太皇太后侄高公绘起草一道奏章，大意是由于太皇太后临朝听政，请求对高氏破格尊礼。太皇太后看了，大怒，追查出是邢恕的主意，将他罢官，赶出朝堂。当年闰十二月，又下诏说：以往每逢皇帝、太皇太后生日、年节以及举行祭祀天、地、宗庙等大礼的日子，外戚、大臣例有恩赏，子弟加官，以致冗官成患。从今以后，高氏亲族的恩赏减少四分之一，皇太后向氏、皇太妃朱氏亲属也都照此执行。此类事情，不一而足。

太皇太后既行仁宗之政，将熙丰年间执行新法的大臣贬逐殆尽，不免有些罚不当罪，矫枉过正。元祐元年，蔡确贬为陈州知州，第二年以弟蔡硕罪，谪降安州（今河北高阳），后来又改任

邓州知州。在安州任上住处西北隅有一个车盖亭，下临涢溪，隔溪与白洮山相对。蔡确喜它景致清幽，夏日蚊蝇不至。每逢闲暇，便到亭下休息。也是文人积习，耳目所接，心有所感，便形诸篇什，写在木牌上，插在那里。倘若这蔡确成了大人物，这就成了当地名胜，千古佳话了。可此时是个罪臣，适成了招祸的根苗。知汉阳军吴处厚，曾在蔡确幕中为官，职掌书笺文书，想要蔡确推荐他做个馆职官，蔡确不许，从此记恨心头。蔡确赴邓州任后，吴处厚就在安州搜访蔡确的劣绩，发现了他留下的小诗，注释后上奏朝廷。说他包藏祸心，讥讪朝廷，上及君亲，为大不恭。其中两首，尤为恶毒。比如咏涢溪上郝处俊钓台诗："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斯公抚碧湾。"吴处厚解释说：郝处俊封为甑山公，是唐高宗时大臣。上元年间高宗多病，意欲传位与皇后武则天。郝处俊谏阻说：天子治阳道，皇后治阴道，如日与月，各有所主，不可侵夺。如果乱了次序，就会天示责罚，降灾祸于人间。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曾明确制定法令，不许皇后临朝。陛下为何反而要传位于皇后呢？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陛下应谨守社稷，传之子孙，无权随意传与外人。高宗接受了他的建议，才没传位给武则天。如今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与唐朝的荒乱政事完全不同，而蔡确处今之世，思古之人。偏偏又不思其他古人，只思这个郝处俊。可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另一首诗是："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这是一首描写涢溪水势涨落的小诗，写得颇有气势。吴处厚却解释说'沧海扬尘'事出于葛洪《神仙传》，比喻时运大变，寻常诗中多不敢出此言，不知蔡确身为贬官，为何要发这样的感慨？难道也希望沧海扬尘吗？

此事发生后，大臣态度明显不同，左谏大夫梁焘说蔡确，上欲离间太皇太后和皇上两宫之间的关系，下欲破灭群臣忠义之

心。因此“清议沸腾，中外骇惧”，是不道、不敬[①]的大罪。两宫有什么地方对蔡确不起，竟使他怨恨如此，不顾生灵涂炭，而希望发生沧海扬尘的大变故？汉宣帝时杨恽被贬，作诗说：“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是要及时行乐的意思，汉宣帝说这不是臣子应说的话，杀了他的头。蔡确诗比杨恽诗恶毒万倍。主张处蔡确以极刑。

苏轼在杭州，上书说：“此事处理如何，关系很大。若处理太轻，人们会说皇帝陛下见人毁谤圣母，不加嫉恨，于陛下的孝名有累；处分太重，人们又会说太皇太后无容人之量，于圣母仁政有累。臣以为应由皇帝下诏书，命官痛治蔡确罪恶，再由皇太后出手诏赦免他的罪过。可以两全其美。”

中书舍人彭汝砺认为，蔡确诚然有罪。但是因吴处厚告发而得罪，会助长天下小人告讦之风，使风俗不淳。

还有人主张治吴处厚告讦之罪。议论久不能决。

五月，太皇太后对执政说，蔡确的案子久不能定，是由于朝廷中有许多是蔡确的党羽。宰相范纯仁辩解说，没有蔡确的党羽。而另一位宰相吕大防和执政刘挚却附和太后说蔡确有党。隔了一日，御史中丞李常和侍御史盛陶都因对蔡确事不表态而罢官，中书舍人曾肇也因教彭汝砺“援救”蔡确而左迁。

五月十二日（辛巳），蔡确贬为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朝中的争论并没结束，左谏大夫梁焘、左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等以为处罚太轻；中书舍人彭汝砺则以为，以诗文这种疑似之言治人罪，有伤政体；听信告讦之言，有累风化。太皇太后召集大臣商议对蔡确重新定罪，宰相范纯仁以为不可。理由

---

① 不道、不敬，在宋律中都是属于“十不赦”的大罪。按窦仪《刑统》：杀一家非死罪之三人以上，以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称为不道；指斥乘舆、对捍制使、无人臣之礼称为不敬，又称大不恭。

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后患无穷。太皇太后不听。十八日（丁亥），又贬蔡确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安置于新州（今广东新兴）。宋代由于新州地处岭南，为烟瘴之地，就连上张严惩蔡确的吕大防、刘挚也为他说情道："蔡确家有老母，希望远贬不要过岭。"太皇太后道："山可移，州不可改。"吕大防不敢再说。范纯仁又请求尚书左丞王存与他一起劝说太皇太后，不应将蔡确置于死地。并对吕大防说，自仁宗初丁谓被贬，此间七八十年间不见贬官。先例一开，恐怕不久，我们这些人也会在这条路上跋涉了。

太皇太后定要从重治蔡确罪，根本原因是蔡确自称有"定策"功，即是说哲宗得即帝位是他蔡确的功劳。如此就把太皇太后与哲宗对立起来了，那还了得？以"诗文"获罪仅仅是一个借口罢了。蔡确纵然目不识丁，太皇太后也会以其他借口置他于死地的。政治斗争历来如此。

此后，又要惩治蔡确党羽，不同意治蔡确罪的官员，如彭汝砺、范纯仁等纷纷罢官。邢恕也被贬谪为监永州（今湖南零陵）酒税官。

六年（1091）十一月，刘挚也以文字罢官，原来他与邢恕私交甚好。邢恕被贬，路过京城，不敢拜见他，只派一名随从送了一封辞行书信。刘挚也不敢前来送行，只写了封回信，差人送到他的座船上。不巧这封答书落人坏人手，从中挑出一句话："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这话本意是说永州地方不坏，不妨到那里去休养一下，以使多年来因奔走宦场的劳累被伤害了的身心得到恢复。坏人把他解释成：要邢恕到永州暂避，等太皇太后死后就让他官复原职。即将"休复"解释成"复之明辟"。还从《易经》中找出"休复"这两个字的解释作证据。又以他的儿子与罪臣章惇的儿子相交往作旁证，太皇太后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交往非人"，把他贬到郓州（今山东东平）去了。距离蔡确以诗

获罪才二年半，当时他曾力主对蔡确从重处罚。这真是“六月债，还得快”。

八年（1093）八月，太皇太后病，宰相吕大防、范纯仁（当年七月范纯仁由贬所升任为右相）、尚书右丞苏辙、郑雍，知枢密院事韩忠彦、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等一起到崇庆殿探望病情，临别，太皇太后独留范纯仁，说有话要对他讲。这时哲宗皇帝已经18岁，由于太皇太后垂帘，即位八年来从未独立处理过一件事，早已深为不满。眼见太后病危，说不定这是与大臣见的最后一面。心道：有什么话要避开首相吕大防，单独与范纯仁一人交谈？其中必有私情。于是命吕大防等全都留下来，听太皇太后有何嘱咐。太皇太后心知皇上对她有猜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万料不到她临死前要与人单独说几句话也不能够。心中不由得一阵伤感，对众人道：“老身受神宗皇帝嘱托，与官家[①]共同临朝处理政事，已经九年，卿等不妨说一说，这九年中老身有何事是为了我们高家的私利，而不是为朝廷秉公处断？这些年来我含辛茹苦，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成那样子，平时没有功夫照看，临死连看他们一眼也顾不上。我究竟图的是什么？……”说着嘤嘤哭泣起来。吕大防劝道：“太皇太后把心放宽，不要如此伤心。太医说您的病势已有好转，按时服药就会逐渐康复。”这只老狐狸，对太后九年来的劳苦竟是一个字也不肯提。太皇太后道：“我自己的病自己知道。今日官家与众卿都在这里，我不妨把话挑明了。老身死后，势必有些爱嚼舌根子的人对官家说短论长，调唆是非。官家千万不可听信。众卿都是我所信任、提拔之人，我死后应自动退位，好让官家另行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说到这里，老妇人已是肝肠寸断。可是由于哲宗就在身边，她“所信任、提拔之人”连一句安慰的话竟也不敢出口。世态炎凉，竟至于此。

---

① 官家：宋代宫中对皇帝的称呼。

太皇太后也不再言。这一天是八月廿三日（戊巳），宋代称为社日[1]，世俗各家都做社糕、社酒，称为社饭。宫中也不例外。太皇太后命宫女将宫中社饭取出来，对吕大防等人道："卿等都去尝一勺宫里的社饭，但愿明年吃社饭时，对老身能有一些思念。"

九月，太皇太后死。大臣不断上书哲宗，要他记住太皇太后的好处，不可听信小人之言。如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书说：太皇太后既死，必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该更改皇帝的政令，撤换先皇帝所用大臣。这些都是挑拨离间的话，陛下千万不要听信。十月，中书舍人吕陶又上表说：太皇太后垂帘时，贬斥恶人，裁抑侥幸，革除一切横恩滥赏，凡是小人都为此心怀怨恨。今太皇太后既死，他们势必播弄是非，迷惑陛下。不外说太皇太后更改政事，斥逐旧臣等等。陛下应以仁宗对待明肃皇后垂帘的事为榜样，命臣下不得擅议垂帘的时事，以保全与太皇太后之间的亲情。

这些话当然都是有所指的。哲宗要变更元祐制度，被太皇太后贬斥的大臣跃跃欲试，图谋东山再起。这些早已被元祐大臣感觉到了，所以他们频频以皇上与太皇太后之间的亲情，以太皇太后临朝时的辛苦为理由，劝阻哲宗。但是，毫无用处。太皇太后对神宗不讲亲情；对政见不同的两派大臣不能妥为调处；对政敌裁抑过甚，如前所述，甚至以诗文、语言放逐大臣，上上下下，积怨已久，势必会发泄出来。

十月，吕大防提升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杨畏首先弹劾吕大防的政敌范纯仁，范纯仁不得不提出辞职。然后，杨畏上书说："神宗皇帝创立新法，改革制度，为子孙万世奠立了基业，

---

① 社日各代不同，宋代八月下旬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元祐八年的社日为八月廿三日。

应该永垂不朽。请朝廷对神宗时的法制重新研究，可行者应该实行，以成陛下‘子继父志’的孝道。”哲宗立即召见他，凡神宗朝的大臣可用者，要他具名上闻。杨畏于是将太皇太后放逐了的章惇、安焘、吕惠卿、李清臣、邓温伯等人的名字全都报了上来，每个名字后还加了一段品题，并推荐说章惇可做宰相。哲宗一一应允。

十二月，将贬为通议大夫的章惇升为资政殿学士，将贬为散官的吕惠卿升为中大夫、提举崇福宫，议定太皇太后谥号为“宣仁圣烈”，史家因称太皇太后为宣仁皇后。

绍圣元年（1094）三月，吕大防罢相。在宣仁垂帘期间，吕大防任首相长达六年多，哲宗年岁渐长，吕大防从来没有提出过让宣仁后还政与哲宗的建议。朝臣对元祐政事的不满也都归咎在他身上。殿中侍御史来之部请求首先驱逐吕大防，以破除朝中朋党，然后进用神宗信任的大臣如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于是吕大防请求辞职，哲宗很快批复下来，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资格出任颍昌知府，二天以后又改为知永兴军。

这年殿试，策问进士，哲宗说：“神宗皇帝在位十九年间，制定了各种礼乐法度，极为完备，足可垂于后世。朕即位已经十年，废除了神宗时的三舍法，恢复以词赋取士的旧法，而士人的素质未见提高；废除了青苗法而农民不见富裕；雇役还是募役，争论多年，到今没有定论，役法不能统一；治河有的主张引河东流，恢复黄河故道，有的则主张顺水势任河北流，两种意见都试行过，河患仍然不止；朕宁肯舍弃边境土地以换取西、北二边的安宁，但羌夷的内侵仍然不断；废除市易法，让利于民，而商贾之路仍然不通。此外如官吏冗滥，兵备不修，饥馑等灾害不断，寇盗一起连着一起。所有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朕以为政策对时局有利，不妨继续执行；有害则应改革，不必顾及是熙丰新法还是元祐法度，一切以对时局是否有利为原则。你们可以各陈所

见，不必忌讳。”这段话是按照中书侍郎李清臣起草的底稿说的，是哲宗改变宣仁垂帘时的政策，恢复熙丰新政的宣言。

十一月，蔡确已死在贬所，追复为观文殿大学士。

绍圣四年十月，以邢恕为御史中丞。王珪已死十多年，追贬为万安军（今广东万宁）司户参军。这王珪号称“三旨相公”①，是个典型的只吃俸禄不管事的滑头宰相，为何死后十多年还被贬官呢？这是邢恕制造的一起冤案。

原来，邢恕被贬后，心中怀恨，仍念念不忘做定策功臣。自贬所河阳专程跑到邓州谒见蔡确，商议如何证实宣仁后与王珪图谋废立的事。一切细节都已商量妥当，只可惜没有证据。只好暂且分手，回到河阳。适巧，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入京，路过河阳，邢恕以计骗得司马康称颂蔡确有定策功的手书。当神宗去世前，请立哲宗（当时的延安郡王）为皇太子的事蔡确是参预者之一，说他有定策功并不为过。司马康所说的定策功仅此而已。邢恕却把它解释为宣仁、王珪要废延安郡王，改立雍曹二王中的一人为帝，蔡确力争才没得逞。这样的“定策功”可就大不一样了。不久梁焘受命为谏议大夫路过河阳，邢恕将蔡确的这种“定策”功称颂一番，而且拿出司马康的手书为证。他要制造舆论，要未雨绸缪，要在正式发动这场政治攻势以前使尽可能多的人心中先有个印象。

但仅有一份被曲解了的司马康手书，毕竟还嫌证据不足。后来，邢恕改任中山堡（今陕西延安境）守帅，高遵裕的儿子高士京也在这里担任一个小小的军职。邢恕摆酒宴招待他，说道：“令堂做官做到团练使，宣仁后是你的堂姊。本朝有推恩之法，

① 三旨相公：有事需解决，则拟成公文，进呈皇上，说是“取圣旨”；皇上批复后，则说“领圣旨”；然后把批文交给有关官员执行，说是“已得旨”，他本人任何决定也不做。因此，人称“三旨相公”。相公，是宋代对宰相的称呼。

世胄子弟都能由亲属的恩荫得官，你为何至今还在军中做这种芝麻官呢？”士京道：“虽有推恩之法，下官这个官职却是全靠自己挣来的，没沾别人任何便宜。”“那是为何？”“还不是太后临朝时定的规矩，别人家的子弟都能由恩荫得官，只有姓高的例外。”“外人都知，太后这是一心为公。只是让你们受了些委屈。”“哼！——”士京脸有愤恨之色。邢恕看得出，只用上边那几句话就激得他对宣仁后大为不满。心道：“这是一个傻瓜蛋，可以在他身上做些文章。”接着道：“我倒有个办法使你飞黄腾达，不过还要看你肯不肯照我的话做了。”士京立刻来了精神，道：“大人若肯提携，下官万死不辞。”“这就好。我记得你还有兄弟？”“不错，下官有一个哥哥，名唤士充，已经故世了。”“哦？这就不好办了。”士京顿时着急起来：家兄的死与自己的飞黄腾达有什么关系？还有没有办法挽回？再三询问，邢恕看他神情，知道已到了火候，说道：“据我所知，令兄在世时，曾为王珪传过话。当时王珪身居首辅，是当朝大宰相，想立雍王为太子，命士充传话到宫中，与宣仁后商议。这件事你知道吧？”士京摇头道：“不知。”邢恕道：“那完了。士充要是健在，由他作证，倒也好说，他既下世，你又不知，这事没有证据，你升官的事也就别指望了。”“别忙，让我仔细想一想。年数多了，记不清楚，也是有的。不过……我心里倒是有一点儿印象。”士京马上改了口。邢恕又进一步引诱道：“你再想一想，倘若记得这件事，你封侯封王都有指望。实在记不起那就没有办法了。”到了这地步，邢恕让士京说记得男人生过孩子，公鸡下过蛋，他也会拍着胸脯出来作证的。这时朝廷中又有变化，吕大防、范纯仁都已罢相，章惇独掌朝纲，蔡卞做了尚书右丞。章惇有心报元祐年间受旧派朝臣弹劾的一箭之仇，一心要将元祐朝臣一网打尽，就破格提拔邢恕为助。先把他从知青州任上召入京城，升为刑部侍郎，再迁为吏部尚书兼侍读，三迁为御史中丞，做了台长。于是他命王棫替高

士京做了一篇奏章，其中说，士京的父亲高遵裕临死时对他说："神宗弥留之际，王珪派士充来问：'不知皇太后要立谁为新君？'我将士充喝斥一顿，说'天子自己有儿子，这还要问吗？'将他赶了回去。"恰巧这时给事中叶祖洽也上章说，王珪在册立哲宗为帝时，有过不同意见。哲宗一怒之下，追贬王珪为司户参军，而追封高遵裕为奉国军节度使。

元符元年（1098）三月又制造了另一个冤案。文彦博为四朝元老，任将相五十年，却生了个不肖子文及甫，文及甫怨恨刘挚曾经弹奏他，使他由京官放了外任；又曾谏阻文彦博为三省长官，以为与刘挚有两世怨仇。文彦博死后，他守丧三年，期将满，想重新做京官。可是吕大防、刘挚在朝执政，他心中无底，满腹忧愁，便与挚友邢恕写了封信，其中说，当政者对他猜忌很深，他们党徒又多，"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必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可为寒心。""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是指吕大防对他不怀好心，这事众人皆知；"济之以粉昆"，指又有粉侯的哥哥帮他。宋人呼驸马为粉侯，"昆"是昆弟之昆。时韩嘉彦为驸马，其兄韩忠彦在朝，粉昆指的是韩忠彦；"眇躬"是文及甫自称，自以为孤立无援，渺小孤弱，才称眇躬。全句是说，吕大防必欲将他贬到偏远处所，方始甘心快意。邢恕曾将这封信拿给蔡确的弟弟看。绍圣四年八月，又重新拿了出来，加以曲解。要蔡确的儿子蔡渭上奏朝廷，作为刘挚、吕大防陷害他的父亲，图谋不轨的证据。章惇见到奏章后，自不肯轻易放过，命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同权吏部侍郎安惇在同文馆开审。蔡京知道章惇是要借此把元祐大臣整垮。办得好了，对他自己有利。所以百般罗织、引诱。加以文及甫对刘挚等也有仇怨，很容易就按照蔡京的意思把那封信重新做了解释说，这是他父亲文彦博出于对朝中政事忧虑说过的一番话。刘挚图谋废立，故喻为司马昭；王岩叟面白，称为"粉"；梁焘字况之，况字偏

旁是个兄字，与昆同义。所以粉昆指王岩叟和梁焘；眇躬指幼帝哲宗。这样一来，刘挚等人便有了叛逆大罪。这连哲宗也不敢相信，说："元祐大臣真是这样的吗?"蔡京、安惇道："文彦博是当时重臣，一定是有所感才说这些话。不过是反形示露，陛下不知罢了。"当时刘挚、梁焘已死于贬所，无从对证。就下诏书将他们的子孙禁锢于岭南贬所，永不许北归；王岩叟、朱光庭等有关人员的儿子全都罢官。蔡京一心要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升任执政，极力将案情扩大，广所株连。这正合了章惇的心意。

由吕大防、刘挚再扩大，势必把宣仁后牵连在内。章惇与蔡京之弟蔡卞合谋，勾结宫中内侍郝随，共同诬陷宣仁后曾经想废哲宗另立新君。宣仁阁中的两名主事太监一为陈衍，已发配朱崖(今广东琼山东南)；另一个名叫张士良，已归隐郴州（今湖南郴县)。先将张士良召回审讯，仍由蔡京、安惇主审。蔡京命在刑堂上支起铜鼎、油锅，排列刀、锯、斧、凿各种刑具，对张士良道："宣仁危害皇上的事你只要说一声有，立刻让你官复原职，仍在宫中主事；如果说没有，这里的刑具叫你一件件地受，直到下铜鼎煮，入油锅炸。"张士良听了，仰天大哭说："我怎能亏了良心诬陷太皇太后？世人可欺，天地鬼神却不可欺。死了岂不要入拔舌地狱？你们把我杀了吧。"蔡京百般用刑，张士良只是不肯招。最后只好以一件琐事上奏说："陈衍曾将皇上身边太监刘瑗排挤出宫，目的是要翦除皇上的心腹羽翼，实为大逆不道，罪该处死。""翦除羽翼"，还是"危害皇上"的意思。哲宗也不知是真是假，拿不定主意。蔡卞、章惇自己起草了诏书，废宣仁后为庶人，请求皇上签发后执行。时皇太后向氏还没入睡，听到消息立刻穿衣下床，召见皇上，说道："我每天都在崇庆宫中侍候宣仁后，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完全是诬陷。天日在上，可以为我的话作证。皇上如果一定要把这些罪名加在宣仁后头上，宣仁所做任何一件事都与我商议过，把我也一起处治了吧。"哲宗这才

知宣仁废立的话是无稽之谈。向太后又把当日王珪如何请建太子、宣仁后如何预制小儿龙袍，如何在大臣面前夸他纯孝好学，手抄佛书等事说了一遍。那时哲宗年已十岁，这些事本就记得，经向太后重新提起，感受更深。于是将章惇、蔡卞草拟的诏书和奏章，当着向太后面在烛火上烧掉。太监郝随当即把此事透露给章惇、蔡卞。第二天，二人重新写了奏章，坚请按诏草执行。哲宗大怒道："你们莫不是存心要我死后无颜入英宗太庙吗？"将奏章扔在地上，不许再提此事。这件事才算结束。

女主垂帘在封建社会是一件不正常的事。也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因为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大事，皇上一人说了算。皇上纵然年幼或由于疾病等原因，不得不由母后代理朝政，但年幼或患病的皇上毕竟是个有思考能力的人，与垂帘的母后不能不有异同，有异同就是有矛盾。宋代宣仁以前还有仁宗初的刘后、英宗时的曹后都曾垂帘听政，也都与皇上有大小不等的矛盾。大臣若能善加弥缝，矛盾有可能得到克服；倘若大臣也搅在中间，事态就要闹大了。宣仁后垂帘期间对神宗新法以及执行新法的官员不能正确对待，使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把自己也束缚在反对新法人物一方的战车上，另一方自然要把她作为政敌，利用她与哲宗间的矛盾加以诬陷，企图将她打垮，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宣仁之诬是神宗以来新旧两派斗争的继续，或者说是自真宗末以来，朝廷中党派斗争发展的继续，是朝廷政治日趋腐朽的表现。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王珪传》、《文及甫传》、《邢恕传》、《章惇传》、《蔡确传》、《高后传》等。

李焘《长编》

黄以周《长编拾补》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宣仁之诬》

孟后废复

哲宗以后，由于朝中党争波及宫廷，使皇帝本人的母子、夫妻等亲情关系均不能保，这篇是讲哲宗夫妻关系因此破裂的史实。

元祐七年（1092），哲宗皇帝已经17岁，尚没大婚。太皇太后宣仁高氏垂帘听政已久，对此事如何能不重视？她可不愿使哲宗即位后，因婚姻不如意，怨她一世。所以，老早就对大臣说了，既要门当户对，又要年命相当。与天子做亲，要找门当户对的大是不易，虽不是定要女家也是天子后裔，至少也要是个世家出身，有封爵的。先听说京城有个帽子田家，一门之中有十个妇女被封为县主。高太后急忙命人打听，才知他这县主都是用钱买来的，每五千贯买一个。太后立刻打消与他家缔亲的念头。年命相当也是不易，要勘得三命六壬皆不相冲，这就不易。有的大臣认为勘婚不必太过，只要六壬（生辰）卦变能得生气，百事都可不避，比如仁宗与光献曹皇后，一是戌时生，一是辰时生，戌和辰都属阳，阳与阳相冲。但变卦以后有生气，也是美满姻缘了。太后不依，说寻常人家不勘婚也就罢了，皇帝的婚事不勘婚谁敢担当？指着宰相吕大防道：公等身为执政，能担当得了吧？谁还敢说半个不字？这样千挑百拣，选中了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孟元的孙女、阁门袛候孟在的女儿孟氏。吕大防道："只恐勘婚，又难成就。"这倒说中了高太后的隐忧。所谓三命六壬，是指降生年、月、日、时的干支阴阳都不能错了，比如十二地支中有六阴六

阳，阴阳各占一半，阴与阳相合那便无事，倘是皆阴皆阳便是相冲，单只时辰相合已然不易，要年、月、日也都相合谈何容易！宣仁后高氏已不敢再坚持初衷，说道："近来台谏官都有人上奏，请求不用阴阳之说，正要与卿等商议，卿等以为如何？"吕大防才道："祖宗已来，俱未尝勘婚。"签书枢密院王岩叟也道："古圣人不信阴阳小道。"这才定下来立孟氏为皇后。虽未堪命，宣仁后对此事的重视是很明显的。

四月七日（己未），宣仁后对执政道："孟氏女子能执妇道，应该正位中宫。"命翰林学士起草制书。又认为近世皇家婚礼太过简略，命翰林院、台谏、给舍这些侍从官与太常礼院官员共同商议，皇帝大婚的六礼该采用什么样的仪式才更风光些。所谓六礼是指男女缔婚过程的六个阶段：先由男方遣媒人到女家提亲，女家同意后，男方遣使者送贽礼称为纳采；然后男方询问女子的大号（不问乳名），生辰八字，以便卜问吉凶，称为问名。男方将女子的姓名八字在太庙中卜得吉兆，可以成婚，就派人把此消息告诉女家，称为纳吉，纳吉以后，男家对这门亲事没说的，算是定下来了，就派人到女家下定礼，称为纳征。纳征后，男方到女家请求婚期，一般讲究男倡女和，即婚期由男方择定，告诉女方，女方若无干碍，表示同意，喜期也就定了，称为请期。到日子时，男方前往迎娶，称为亲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合为六礼。不论贵贱都是如此。宣仁后有意将婚事大办，任命宰相吕大防兼任六礼使，执政韩忠彦为奉迎使，苏颂、王岩叟为发册使，苏辙与皇叔祖宗景为告期使，皇伯祖宗晟与翰林学士范百禄为纳征使，王存、刘奉世为纳吉使，梁焘、郑雍为纳采、问名使。哲宗皇帝亲登文德殿，行册封皇后礼。宣仁后对哲宗道："我所以把你的婚事办得这般隆重，是因为这是你一生大事，草率不得。"这门亲事虽经她一再拣择，她心中还是不能十分满意，私下叹息说："孟氏为人贤淑，人品是没得说，可惜

福薄。他日国事有了变故，灾祸必是落在此人头上。”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宣仁后这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当然不是。但是她垂帘期间，疾恶太甚，把政敌全都罢了官，有的发配岭南。结怨如此之深，待她百年以后，国事要有“变故”，有反复，这是不难想见的。而她是皇上的老祖母，谅来对她本人谁也不敢怎么样。而她如此抬举这个皇后，别人的一腔怒气还不出在她身上？

她既作出这样的估计，皇后是她的贴心人，自无疑问。却未必也是哲宗的贴心人。孟后比哲宗大着三岁，世俗讲究“女大三，抱金砖”，皇帝却不讲这一套，他早就有了自己的心上人，宣仁后这般费心为他操办婚事，他未必承情。

果然宣仁死后不久，哲宗就要算这旧帐了。

绍圣三年（1096）八月，先将范祖禹贬为昭州别驾，安置于贺州（今广西贺县）居住；刘安世贬为新州别驾，安置于英州（今广东英德）居住。罪名是在元祐年间“构造污谤，靡有不至”。原来，元祐四年八月左谏大夫刘安世先奏了一本，说外间纷传哲宗皇帝已经有了女宠，宫嫔中已有怀孕的了。这时哲宗虚岁14岁，周岁才只13岁，太不像话了。他要宣仁后好好管管这档子事。接着给事中范祖禹也奏了一本，从古说到今，历数早近女色的坏处。自是把哲宗训了个够。宣仁后问这事从何说起？根据什么说皇上有了这种事？查问的结果是刘安世找了一名牙媪（贩卖人口的老妇人），想为他嫂子买一名乳母，就是负责给孩子喂奶的奶妈子。牙媪答应后，过了一月多仍无音讯。刘安世找来牙媪发一通脾气：官老爷交办的事，这等拖延还不是罪过？哪知牙媪自有道理，说：“不是我老婆子不肯尽心，只因这些天来宫中内东门上吩咐下来，要找十个乳母，今日方才办齐了。”言下之意是你这个官老爷与皇帝老子相比，自然该往后放一放。刘安世听了不由纳闷：“皇上才14岁，没有大婚，要乳母何用？”再

三询问，牙媪道："内东门要我们在官府立了军令状，这消息是半点不能走漏的。"刘安世通过朋友终于查出，果有此事。加以外间早有传言，说皇帝已近女色，必是有宫嫔将要生产了，才找乳母。这才奏了一本。宣仁后解释说：这是没有的事。找乳母是因为先帝（神宗）留下来的一二个小公主尚未断奶的缘故。对外虽如此说，对皇帝身边的几个女侍，宣仁后却丝毫不放过，逐个叫去训了一通，直训得人人眼中含泪。哲宗虽心中不忍，却也无法。这事过了时候也就算完了。对于刘安世、范祖禹，他们是言官，天子侍从，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即不论事之有无，闻风即可请奏，奏错了也是无罪的。谁知哲宗亲政以后，任用章惇、蔡卞，打出了绍述神宗政事的旗号，把宣仁垂帘的元祐年间执行的政策全都翻了个个儿。元祐间曾把神宗时赞成新法的人全都治了罪，如今章、蔡二人也要如法炮制，要把元祐时的大臣也一概治罪。这就需要寻找借口。而宫中孟皇后无宠，哲宗所喜是刘婕妤一人。于是章、蔡就说，元祐四年范祖禹、刘安世上奏说皇上好女色，是指皇上与刘婕妤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目的是要拆散他（她）们。皇上和婕妤如何不恼？于是就把范、刘二人赶到岭南那种烟瘴去处去了。

算了旧帐，然后就来解决眼前问题了。九月，废皇后孟氏。孟氏既失宠，免不了与刘婕妤之间磕磕碰碰，闹出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孟氏虽受委屈，使皇上不高兴的还是她。比如，有一次孟后率领宫中妃嫔到景灵宫行礼，完事后，孟后就座，其余妃嫔在两旁侍立，这是宫中规矩。只有刘婕妤，既没位子坐，也不甘心在孟后身边竖枪一样地站着，爱理不理地背对孟后立于帘下。阁中司仪陈迎儿喝斥她无理。刘婕妤仗着身后有皇上宠爱，竟然不理，惹得阁中妃嫔人人愤怒。不久至是冬到大节，孟后又率众妃嫔朝见向太后于隆祐宫，礼毕赐坐。按规矩孟后坐的是朱漆金饰墩，刘婕妤以为这座位风光，也想要。阁中侍儿不敢得罪她，就

给她换了一个相同的坐墩。众妃嫔见了，心中自是不平，又无办法。适于这时司仪唱道："皇太后起驾。"向太后与众妃嫔见见面，叙叙礼，就要起身走了。孟后与众妃嫔一起站立，送太后出阁。刘婕妤自然也要起立。妃嫔中有人要刘婕妤出丑，暗命身边侍儿将刘婕妤的朱漆金饰墩移到一旁，众人一起就座时，刘婕妤坐了个空，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妇人聚在一起，即使都做了天王老子也免不了叽叽喳喳，遇到这样的事，岂有不叽叽喳喳之理。众人哄笑一场。刘婕妤满肚子气无处泄，便都撒在孟皇后身上，定说是孟后捉弄她，从此不再朝见皇太后，还对皇帝哭诉说皇后如何奸恶。她身边有个亲信太监郝随劝道："不能因生皇后的气不去朝见太后。失了太后欢心便不合算了。无须为皇后那点事生气。如今圣上无子，大家（宫中对妃后的称呼，家读如姑）若能为圣上早早生个儿子，那朱漆金饰墩还不就是您的？何必如今定要去争呢？"

不久孟后的亲生女儿福庆公主生了病，孟后有个姐姐，颇通医道，曾治好过孟后的一次大病，因此皇上允许她出入后宫。如今公主病了，太医久医无效，就请她来治。也一般无效。总不能眼看着皇娘娘的爱女送了性命？也是病急乱投医，什么法儿都想试一试。这位皇姨就将道士治病的符水带入宫中，替小公主治病来了。用符水治病，要按道上的法子设坛作法，这在宫中是犯大忌的。孟后急忙制止说："姊姊应该知道宫里有禁令，与外面不同，怎能这么干？"正在这时，小太监唱道："皇上驾到。"孟后匆匆忙忙命人将符水收藏起来。皇上早已看在眼中，就座后询问："何事张皇？"孟后不敢隐瞒，如实说了。皇上道："这也是人之常情，皇姨不知道宫里规矩，以后不再犯也就是了。"孟后答应了，当着皇上面把道士给的符纸烧了。但是，从此宫中就纷纷传说孟皇后在宫中搞那最忌讳的厌魅之事。厌魅就是借巫术施灾祸于人的法子，通常是用偶人（土偶、木偶、布偶等不一），

写了不喜欢的人的名字及生辰八字，每日烧香、礼拜、画符等，然后对偶人施酷刑：如针刺、刀斫等，不喜欢的人也会有受刑的感觉。汉代因此在宫中兴起一场大狱，所以历代宫中对此都严加禁止。如今有了这种流言，可不是小事情。只是并无证据，皇上也不放在心上。也是孟后合该倒霉，不久又生出事来：孟后的养母燕氏见孟后失宠于皇上，事事受刘婕妤挤兑，日子颇不好过。请了一个尼姑法端，一起在宫里为孟后祈祷，不过是要佛菩萨保佑孟后时来运转，早生贵子之类。不过祈祷就免不了烧香、磕头、做法事之类。立刻有人报告：孟后又搞厌魅了。皇上对孟氏素来不喜，毫不客气，命入内押班梁从政将燕氏和法端逮捕后，押送皇城司审问，受牵连的太监、宫女、妃嫔达三十余人。审问时，用尽各种酷刑，有的胳膊腿断折，有的还将舌头割了。如此审问法，还愁得不到所要的口供吗？这样将审判结果呈了上去。皇上初时不信，因为皇后是一国之母，还有什么事不满足，要搞厌魅？况且虽对孟后不喜，二人是结发夫妻，对她的禀性是十分熟悉的，她不是那种阴刻狭隘的人，又不是不懂规矩，不知厉害，傻子也不会干这种事。于是命御史董敦逸再审：一是怕有差错，再者也是怕处罚皇后时，外廷大臣不服。谁知将一干案犯提到御史堂下时，人人都已气息奄奄，只剩了一口气，竟无一人能出声说话者。董御史手握朱笔，心中不免生疑。太监郝随等人见他不肯在文书上签押，威胁说："这是刘娘娘吩咐下来的，谁要是有意作梗，决讨不了好去。"董御史道："下官知道宫里有个孟娘娘，怎么又有一个刘娘娘？"郝随哂道："谁不知道孟娘娘是宣仁后作主定的亲事，皇上素来不喜。刘氏虽封婕妤，其实，她才是真娘娘，孟氏挂个名儿罢了。如今宣仁作主的事还有不翻个儿的吗？除非瞎子，凭谁也看得出，她这名儿挂不多久了。谁要不服气，那就试试。"董御史一想不错，朝中章惇、蔡卞掌权，天子对他们也是心有所向。即使扳宣仁不倒，孟后的位子是决难坐

稳的。可是，自己若在这张狱案上签了名，就成了这桩冤案的制造者，如何得了？不签名呢，刘婕妤眼前就放他不过，只要她在天子耳边吹几口风，他这个小小御史还有好果子吃吗？越想越是害怕，手中朱笔不觉哆嗦起来。终于打定主意，还是眉毛上失火，顾眼前的为是。就在狱案上签了字。于是天子下诏书，废皇后孟氏为华阳郡主，赐号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出居于瑶华宫。燕氏、法端斩首，其余诸人或贬秩或罚金不等。孟后的父亲孟在贬为荥州刺史添差邓州。

这件冤案据史书记载说是由于章惇有意诬陷宣仁后有废立之心，而孟后是宣仁后最亲近的人。再者他有意依附刘婕妤，想要哲宗以刘婕妤为皇后。刘婕妤这才派出亲信内监郝随与章惇勾结，共同策划了这场冤案。天下人都知孟后有冤，可是慑于章、刘权势，台谏官多缄口噤声，不敢道半个不字。可是，毕竟那时距宣仁垂帘不久，朝中仍不乏敢言之士，不久就有个殿中侍御史陈次升上书奏道："废后的诏命下达时，士庶惶惑，都说孟后罪不至废而陛下将她废掉。有的口虽不言，却弹指嗟叹。为何会有这种事发生？臣以为是由于案子的审理没有经过司法机关，后来虽派了董敦逸复审，事情做得很秘密，朝中大臣不知复审时的详情，这就怪不得人心不服。臣认为自古以来，狱讼都由外廷政府的司法机关审理，从无皇宫中自行决断的事儿。只由几个太监审一审，万一其中有情弊，蒙蔽陛下视听，岂不令后世讥笑？臣请陛下选侍从或台谏官中的公正无私、无所阿附的人，组成一个专门机构，对此案重加勘验审理。如孟后果有重罪，人们便不会再有怨言。"

到十月六日（壬戌），那位一时害怕、昧了天良的董敦逸御史终于良心发现，上书说："孟后的案子必有内情，废后的诏命下达时天空阴云密布，是天心不欲废后；路人为之流涕，是人心也不欲废后。臣曾受命查验这件案子，署名之后，越来越觉得此

事不妥，深恐得罪于天下和后世，故陈请陛下留意。”哲宗大怒，将他的奏章批付给三省。堂吏说，宰相章惇与枢密院官要一起上朝与董御史分辩。第二天上朝，哲宗听了章惇等人的话后，怒道：“像董敦逸这种人出尔反尔，不可再任为言官。”曾布、章惇等却说：“此事宜尽量减小影响，避免事态扩大。如若贬了董敦逸，其他御史势必议论不绝，闹得满城风雨。”哲宗道：“闹也不过是董敦逸的一伙，怕他何来！”蔡卞等见皇上发怒，便顺竿上爬，火上浇油，说不贬敦逸，朝中事便是非不明。曾布、章惇一再从旁劝解，要哲宗略示宽容。不然，反而令小子成名，这才罢了。

但是，要另立刘婕妤为后，却不大容易。此风一露，就有朝臣指桑骂槐起来。有个皇亲洛阳郡王宗景死了妻子，要将侍妾杨氏扶为正室。中国士大夫有一个很奇怪的理论，认为中华是礼仪文明之邦，老婆可以随便娶，妻子只能有一个，其余的老婆都称为妾。妾虽照样为男士生儿育女，供他寻欢作乐，地位却低得多。妻妾关系犹如主仆，名分是万万乱不得的。宋律以妾为妻有罪。对于皇上，皇后为妻，其余妃嫔都只是妾，以婕妤为后照例是违法的。可是皇上喜欢，别人有什么法儿？正在这时有了宗景这档子事，群臣自然要批评一番。《诗》有风雅颂，借宗景说皇上，也是《诗》家旧法，称为风谏。皇上无法，只好罢了宗景的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等官，立刘婕妤的事也暂告停罢。元符二年（1099），刘婕妤生了个儿子，取名赵茂。时皇上无子，这可是立了大功，还管什么规矩不规矩！九月八日（丁未），皇子茂将满月，诏命立刘氏为皇后。为了堵朝臣之口，将皇太后向氏的手诏请出，说是奉了太后之命，哪个还敢反对？偏有个右正言邹浩，却上书抨击章惇，是祸是福，全都不顾了，就连这件事一并抨击起来，说：“国家自有仁祖故事可做榜样，仁祖时郭后与尚美人争宠，郭后既废，尚美人也一起获罪，这才公道。后来

立后不从妃嫔中挑选，而选于世家贵族，也是为了避嫌，免得外人误以为郭后被废是由于皇帝有了新宠。这等处置办法要为后来万世做榜样。陛下废孟后与此事完全相同，起初人人怀疑陛下会立刘氏为后，后来有了宗景立妾为妻的事，陛下重治其罪，又曾下诏书说立后要别选贤族，人心才得释然。如今却突然又立刘氏，说过的话不算数，岂不与圣德有累？臣见制书中说立刘氏为后的理由，不外是刘氏有子。又引了汉明帝永丰年间立马贵人为后，以及本朝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立刘德妃为后的先例。这些都不足为据。马贵人、刘德妃被立为后都不是由于生了皇子，马贵人是由于品德冠于后宫，又是贵臣马援的后人，与常人不同；刘德妃也出身甲族，又无废后的嫌疑。与今日之事迥然不同。去年冬，刘婕妤祭享景灵宫，虽是冬季，却天降雷声；今年宣读册封她为皇后的制书时，又霖雨冰雹，下个不止。自将她封后事奏告天地、宗庙以来，阴雨连绵，无有晴日。上天的意思还不是昭然若揭吗？无论从人事或者天意来看，册刘氏为后都是错误的。”

哲宗狡辩说：“册妃为后，是有先例的，并不是朕率意妄为。”指的还是真宗立德妃刘氏那件事。邹浩毫不客气地说：“祖宗盛德，可以效法的事很多，你不去学，为何专拣小毛病来学？”哲宗十分尴尬，却忍怒不言，手拿他的奏章，犹豫不决。终于决定将奏章交付外廷，商定处理办法。章惇对邹浩正恨得牙根发痒，说他以真庙立刘后为小疵，太过狂妄。将他罢官除名，押赴新州（今广东新兴）管制。尚书右承黄履上书援救说：“邹浩是陛下亲自提拔的谏官，如今不怕忌讳，直言进谏，是出于一片忠心。陛下却把他贬到那种地方，实与处死无异。以后谁还为陛下讲求得失利弊？纵使他果真有罪，也希望陛下稍加宽容，贬到一个好些的去处，使有自新的机会。”朝廷不听。

邹浩有一个挚友，名叫田昼，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士。二人以气节互相激励，意气颇为相投。刘婕妤立为皇后以后，田

昼对人说："邹浩身为御使，对这种事不出一言谏阻，贪权畏祸如此，怎配做我的朋友？从此我要与他绝交了。"后来听说邹浩以上书谏阻获罪，心中大为钦佩，亲自候在途中迎接他。邹浩颇为伤感，田昼郑重说道："岭南虽远，又有什么大不了！纵然你安居京城为官，受点儿风寒，发不出汗来，不过五天也就死了。难道只有岭外才能死人吗？这件事你是做对了。愿你不要自满，大丈夫该做的事还很多。"邹浩被他一席话说得茫然若失，道谢说："君对我希望太大了，在下怎敢不自努力。"

邹浩上书以前，知道是件大事，预先把消息透露给好友宗正寺簿王回，王回道："还有比此事更大的事情吗？我知道你上有高堂，颇不放心。一片纯孝，实在感人。但我想移孝心为忠心，正是太夫人希望你做的事。"后来邹浩南贬新州，因为是得罪了天子和宰相，无人再敢和他交往。王回主动出面在朋友间奔走，为他敛钱整备行装，安慰、劝说他的老母。有人将此事上报，说他结交罪臣，将他逮入大狱。众人深为他担忧，而王回泰然处之，毫不介意。御史盘问他与罪臣邹浩有何勾结，王回道："邹浩上书，我曾参预谋划。"御史有心为他开脱，说：定无此事，别人避之惟恐不及，岂有主动往自己身上揽之理。定是他头脑出了毛病，说的话算不得数。王回道："此事千真万确，不信听我把邹浩的奏章背给你听。"于是子午卯酉地背了起来，一口气背了二千余言。御史还能有何话说？只有如实报了上去，结果将王回也罢官除名。王回徒步出京，行了数十里，儿子才得知消息追了上来，将家中几件疑难事说给他听，问他走了之后应如何处理。王回一言不发。朝中知音说，他这是表示：已将身许国，不再以家事萦怀。

还有一人名叫曾诞，曾三次去函劝邹浩上书谏阻废孟后事，邹浩不听。到邹浩因谏获罪，曾诞写了一篇《玉山主人对客问》，批评邹浩不能谏阻废孟后的事，直待朝廷已有人过然后进谏，结

果身获罪谴而又与事无补，实在是不知机之极。

总之，朝野名士对此事议论纷纷，无不认为朝廷废孟后已错，立刘后是错上加错。后来，哲宗也颇后悔，对人说："章惇坏我名节。"就是指他受章惇之愚，废后立妃事。

闰九月，刘后所生皇子茂死。

第二年（元符三）正月，哲宗死，因无子，立弟端王赵佶为帝，就是徽宗，尊刘氏为元符皇后。

哲宗死时，章惇坚欲立哲宗的同母弟神宗的第十三子简王赵似为帝，向太后主张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章惇道："按礼立亲，应立简王；而按年长当立神宗第九子申王佖。无论如何，不该立端王。"太后道："申王有目疾，不宜做皇帝。至于说立亲，诸王都是神宗之子，何亲疏之有？"知枢密院曾布等人怨恨章惇独断，不预先与他们商量，有意拆他的台，力赞太后主张，赵佶才得即位。即位后，如何能放过章惇？先要他循例做了山陵使。按照惯例，既做山陵使，皇帝下葬后便须辞职。

四月十四日（庚戌），徽宗追问元符废后的事究意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废孟后、立刘后都曾奉了太母向氏手诏。向氏却说，哲宗曾与她商议，她说这是大事，要哲宗仔细，并没降过手诏。查询的结果，都是太监刘友端、郝随搞的把戏。此后，便有人陆续上书抨击章惇、蔡卞假托绍述神宗政事以行其私的罪过。章惇上书辞职，不许。五月，又有布衣何大正上书论孟后被废的冤屈。十日（丙子），诏命恢复废后孟氏的皇后名位，称为元祐皇后，刘氏称为元符皇后。有人更提议废元符皇后刘氏，曾布道："刘氏皇后的名位是哲宗所立，废刘氏是彰哲宗之短。哲宗人都死了，这又何必？况且皇上与刘氏为叔嫂关系，以叔废嫂，究竟有些不顺，还是不废为好。"这才保住了刘氏的名位。孟氏坐了一辆车重新入宫，行至宫门，向太后先使人送来了皇后衣装，换好了才入宫中，内外一片欢呼声。

崇宁元年（1102）五月，左相韩忠彦罢任，出知大名府。闰六月，右相曾布罢任，出知润州。七月，蔡京出任右相。宰相定员三人，此时只剩了蔡京一个，他独揽朝纲后，又打起了绍述神宗政事的幌子，全盘否定诋毁元祐年间的政策。八月，对元祐大臣及其子弟实行大清洗。于是元符皇后阁中的内侍郝随劝蔡京重新废元祐皇后孟氏，作为否定元祐政策的一个方面。蔡京一时找不到借口。十月，御史中丞钱遹请求治元符末年主张复孟后、废刘后的诸大臣，上书说："哲宗死后，太母（向氏）听政，当政大臣都主张变更绍圣年间的政策以逞私欲，泄私愤。由一个普通百姓何大正的几句狂言，竟恢复了废后孟氏的皇后位号。当时就物议汹汹，可见此事为天下公议所不容。古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先朝时称皇后，如今称元祐皇后，是其名不正；先朝废而陛下复，与事为不顺。考察典故，这种事为古今所无；询于师言，又不合经典，与理不合。这样的事虽人主之尊，也不能擅自实行，更何况区区臣下，怎敢轻易变动。况且一朝同时有二个皇后，为《春秋》所讥笑，如今太平盛世，怎能让春秋乱世出现的那种事发生！"右相蔡京、门下侍郎许将、尚书左丞赵挺之、右丞张商英等都主张重废孟后，向太后虽力争，也无济于事。十月二十三日（甲戌），孟后重又被废，出居瑶华宫。有关的宰臣韩忠彦、曾布降官，追贬李清臣为雷州司户参军，黄履为祁州团练副使。此外，翰林学士曾肇、御史中丞丰稷，谏官陈瓘、龚夬等十七人安置于远州居住。贬了一个孟后，朝中大臣倒了一大片，这才是孟后废复的真正原因。

当初，邹浩谏阻立刘氏为后，直声动天下，此事不究，刘后地位如何能稳？孟后重废的事也不能成立。于是将邹浩自新州召入京城，徽宗问他谏立刘氏的奏章草稿何在？邹浩说已经烧去了。陈瓘得知后顿足说道："这可大祸临头了。以后朝中奸人随便杜撰一份章奏，安在你名下，你就百口莫辩了。"蔡京果然使

人伪造了一份邹浩的奏章，其中有"刘氏杀了宫人卓氏，而夺其子，假托是自己亲生。欺骗世人罢了，怎么能够欺天。"这是对刘氏的污蔑。既然如此，其他的话自然就一概是胡说八道了。既胡说八道，主张复孟后、废刘后的人就理该治罪！

孟后既重新被废，刘后地位更为尊崇。十二月，追谥刘后所生子茂为献愍太子。第二年（崇宁二）二月，尊刘氏为皇太后。宫名改为崇恩，不再以元符称。

可是，这刘太后岂是个省事的？据记载平日她就十分自负，每每责备仁宗初垂帘听政的章献明肃刘后太无胆勇，为何不裹起幞头作男士打扮，公开朝见百官呢？徽宗一日对蔡京说："前几天我病了一场，那人（指刘太后）便有垂帘听政的意思。朕不得不严加关防，吩咐人提剑守在殿门。非朕宣召，无论何人擅自入殿斩勿赦。"不久，又得知刘氏行为不谨，徽宗怕闹出丑闻，深以为忧。蔡京道："近来宫内多处动工修造，闲杂人入宫者比较多，失于防护那是有的。过些时停工了也就好了。况且即使出了事，宫中自有法律在，陛下也不必担忧。"何执中却说道："刘太后应多加人员侍奉。出了这许多事，太后不过一妇人，设或因恐惧而寻了短见，陛下便有杀嫂罪名。"徽宗愕然良久说："一时朕也不知该对她如何处置，今晚再召卿等商议。"到傍晚，辅臣入宫商议，打算废了她的太后名号。突然传来消息说：刘太后在帘钩上吊死了。原来皇帝既对她有猜疑之心，太监、宫女也就落井下石。最后被逼无奈，只好自杀了事。徽宗不欲张扬，对外说是"刘太后暴崩"，即说她得急病突然死了。又为她议谥号为昭怀。

靖康元年（1126），金人入京，按照宫中花名册把皇室所有人全都抓获，只有两人漏网：一是康王赵构出使在外，被宗泽等人留在营中；第二个便是孟氏，因被贬在宫外居住，宫籍中没有她的名字，才幸存下来。第二年金人北归后，伪帝张邦昌请出孟氏主持大局。孟氏手诏康王入京即皇帝位，是为高宗。

孟氏对高宗即位有功。建炎元年（1127）五月，诏命尊孟氏为元祐太后。八月，因孟氏祖名孟元，为了避讳改称隆祐太后，是以所居隆祐宫的名字命名。此后，便与高宗政府一样在江南流亡，躲避金兵的追袭。直到建炎四年，高宗才命人将她从虔州迎回。绍兴元年（1131）四月，这个随着朝廷的党派之争而浮沉一世的老妇人终于离开了人世。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蔡京传》、《后妃传》、《范祖禹传》、《刘安世传》、《董敦逸传》、《陈次升传》等。

李焘《长编》卷 436 等，黄以周《长编拾补》卷 13—16、卷 32 等。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 47

方腊起义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冬，睦州人方腊率众起义，东南震动。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史书说他“家有漆林之饶”，还有的书说他“曾为吏胥”，是出身于中产之家。今人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一本《桂林方氏宗谱》，其中说方腊本是歙州（今安徽歙县）人，到青溪县去为人佣工，是个贫苦人。不论如何说法，方腊是个中下层普通百姓，受尽了徽宗暴政的盘剥，这是促使他起义的内在因素。

此外，江浙一带有起义所必需的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一带很早就有魔尼教流行，当时称为食菜事魔教。据说先在福建传播，后流入温州，渐及两浙。教规主要是食菜、事魔两项。食菜是指不吃酒肉，不大会宾客；事魔指不信神佛，但拜日月，以日月为真佛。此外还有不事厚葬、主张平等互助等等。在世俗人看来，不近人情，所以称之为邪教。比如不事厚葬，按教中规矩人死时，先穿戴齐整，衣冠楚楚。将入殓，二人坐于尸旁，其中一个问道：“来时有冠否？”“来时”是指初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另一人答道：“没有。”于是将死者的冠去掉。又问：“有衣否？”答：“没有。”又将死者的衣服去掉，直到一丝不挂。又问：“来时有什么？”答道：“有胞衣。”于是用一只布袋将尸身装了埋掉。又主张互助，教中人若有贫者，众人便共相周济，每人出一物，积少成多，必使此人家道人于小康而后止。若有人出门

在外或路经某处，只要是同教中人，不必相识，必茶饭招待。家中物什，尽管取用，不分彼此，都是一家人。不厚葬、不食荤酒、提倡互助，对付天灾人祸的能力更强。所以，教中人的日子比起不在教者，一般要好过些。因此，受到百姓的拥护。组织情况有所谓魔王、魔母、魔公等名。入教时举行很隆重的仪式，魔王在左，魔母在右。入教者每人 49 文钱，对魔王烧香、礼拜、立誓言等等。教众读《金刚经》，这是佛教经典，魔教将句读改变后，以适合本教教义。如将“众法平等，无有高下”改为“众法平等无，有高下”等。

官府对魔教的禁止十分严酷，一人入了魔教，虽家人不知情，也要流放到边远荒徼的地方去。将家产半数给告发者，其余入官。穷苦人家流放荒徼等于是判了死刑，株连又广，所以，入教者协力同心，以抗官府。州县官吏大多装作不闻不见，以免惹火烧身。这样，魔教的势力反而更大了。方腊起义就是魔教教众的起义。

此外，大唐朝时，睦州曾经发生过陈硕真起义，自称文佳皇帝，声势很大。到宋朝时，睦州尚有她的遗迹，如天子基、万年楼等。当地流行一本《沙门宝志谶记》，记述着各种预言，不过是天下大乱，真主出世之类。而方腊自降生之日起，人们就传说有各种怪事发生，比如相传他曾临溪照影，见到水中的影子穿着王者冠服等等。这些传言或称为谣言，一方面反映了百姓对时局不满，人心思乱，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方腊著意已久。这些为方腊起义做了较好的舆论准备。

青溪是睦州大县，县中有个帮源洞。所谓洞，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谷，或称为溪，并不是真正有个大山洞。帮源洞长宽各有四十里，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盛产漆、楮、杉等木材，聚居着许多百姓，已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而大量是汉族人口，还有许多富商大贾出没其中。方腊家有漆园，造作局成立后，官府刻

剥无度。又有花石纲，百姓怨愤，无处申诉。方腊平素乐善好施，贫乏百姓多受他周济，人心归附。他就乘百姓对官府不满之际，号召百姓。先约集万余人，对他们说道："普天下国与家道理是一样的，不妨以家事比喻国事。如果有这样一个家庭，子弟辛勤耕织，终年劳苦，得到那么一点儿粮食布帛。而父兄不耕不织，反而任意挥霍，稍有不满，就对子弟鞭笞相加，惨加虐待，至死不恤。对这样的父兄你们能忍受吗？"

众人一致道："不能。"

方腊又说："单是他自己挥霍，倒也罢了。挥霍不尽，稍有节余，便全都拿来送给仇人。仇人得了这些物资，日渐富裕，反来侵辱。父兄不能御敌，使子弟抵御。子弟力不能敌，父兄便谴责惩处，无所不至，而每年奉给仇敌之物却仍不停止。对此你们能够甘心吗？"

众人道："这算什么父兄！凭谁也不能甘心。"

方腊含泪道："如今的国事就是这个样子。君为父兄，民为子弟。我等百姓终岁劳苦，受官府重赋的刻削，农桑已不足以供应他们挥霍。我等赖以活命的不过是漆树、楮树，以及竹木等罢了。如今他们又来科取，锱铢不肯放过。老天生了百姓，又为百姓建立了百司尹牧各种官府机构，是为了养育百姓的。而这些官府机构却如此暴虐、刻剥百姓，天心、人心能不愤怒吗？更何况他们于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等等挥霍糜费以外，每年给西北二国银绢以百万计，都是我东南百姓的血汗。西北二国得了这些银绢，日益富足，更加轻视中国，年年兴兵侵扰。朝廷对他们更加恭顺，宰相反以为这是安边的良策。而我百姓终年劳苦，不免于妻子冻饿，求一日温饱竟不可得。你们诸位想想看，这叫人如何忍受得了？"

众人齐声道："你说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方腊道："近三二十年来，朝中元老旧臣已被贬黜殆尽，当

政的都是些肮脏邪佞小人，只知道以声色土木狗马，迷惑皇上心志，朝中大政，一概不恤。在外的监司牧守也都是贪鄙成风，不理民事。东南百姓，受苦难已久。近年又有花石纲，更使人不堪命。诸位若能仗义而起，四方百姓必然闻风而动。过不了十天半月，数万人的队伍就能建立起来。州县官对我们必是招徕安缉，不敢贸然申报朝廷，以免丢了官职。我等将计就计，拖上他一月两月，江南州郡可一鼓而下。而朝廷得到申报后，也不可能立即发兵，要召集群臣，商议对策；要四方征兵，调集人马，准备粮草。怕要半年，方能一切就绪。那时距我们起兵已久，早在东南站稳了脚跟，还怕他何来？况且，朝廷每年奉给西北二边岁币不下百万。全国用兵，经费又不下千万，全都依靠我东南百姓。我们在东南起兵，使它财源断绝，势必加紧对中原百姓的搜括。中原百姓如何负担得了？这就逼得他们起来造反。中原一乱，西北两国就会乘乱南下。宋政府腹背受敌，那时，纵是伊尹、吕尚在世，也是应付不来的了。我们只要划江而守，轻徭薄赋，就会人心归附，四方来朝。十年之间，必能统一天下，混一中国。这比起伏首低眉，徒死于贪官污吏手中，不是要强上百倍吗？究竟何去何从，诸位自己拿主意是了。”

众人齐声说：“好，我们都跟着你一起干。”于是方腊把众人组织起来，以诛奸臣朱勔为名，发动了起义。先杀了里正方有常，焚烧公署衙门，杀官吏、公使人等。尤其憎恶和尚，见光头就杀。穷苦百姓受官吏侵渔，正有苦无处诉，骤然有了这个发泄机会，心情无比欢悦，十数日间发展到数万人。

十一月初一（戊戌），方腊组建自己的政府，自称“圣公”，改年号为永乐，以该月为正月。设置官吏将帅，按头巾颜色不同，自红巾而上分作六等。部众没有弓矢甲胄，全仗着“神”力或者说是勇力，奋勇作战。两浙都监蔡遵、颜坦率兵镇压，在息坑战败被杀。东南地区久不见兵事，官府武备极差，在徒手百姓

面前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百姓一旦揭竿而起，他们的虚弱也就露了馅，简直不堪一击。

廿八日（己丑），睦州知州张徽言因方腊起义被罢官撤职，改任青州知州曾友蕴知睦州，专门负责对付起义军。廿九日（丙寅），起义军攻陷青溪县。县令陈光弃城逃走。

十二月二日（戊辰）攻陷睦州（今浙江建德），杀官兵千人。附近寿昌（今浙江境）、分水（今浙江武盛）、桐庐（今浙江境）、遂安（今浙江境）诸县也很快被起义军占领。十八日（甲申），占领歙州（今安徽歙县）休宁县（今安徽境），活捉了县令鞠嗣复。鞠嗣复是个清官，薄有名声，颇受百姓爱戴。起义军想迫使他加入起义队伍，当着他的面杀了二人，问他降是不降？鞠嗣复骂道："自古妖贼没有能够长久的，你们应该舍逆从顺，求我向朝廷引荐，朝廷或许会赦免你们的死罪。怎能颠倒了劝我降贼？"他贼长贼短地骂了个够，数次求起义军将他杀了。起义军道："我等都是休宁县人，知道你是个好官，在你以前的几任知县都不能与你相比，所以不忍杀你。"知他终不肯投降，就释放了他。朝廷以为他防"贼"有功，给他加官二级，升任睦州知州。睦州已在起义军手中，他力不能敌，又被起义军打伤。想渡江向宣抚司求援，没有上路就死掉了。

廿日（丙戌），占领歙州，东南将郭师中被起义军击毙。狱曹掾栗先被俘，口出恶言，被起义军杀死。歙州附近几个县城如婺源（今安徽境）、绩溪、祁门、黟县（均在今安徽境）等处的官吏闻风而逃。四天以后，起义军又攻占了富阳（今浙江境）、新城（今浙江城阳镇）二县，逼近了杭州。

廿一日（丁亥），朝廷以谭稹为提举措置捕捉睦州青溪县"贼"事，遣威武军承宣使、婺州观察使、步军都虞候王禀前往节制。从谭稹这一串任命的官号可以看出，直到今日朝廷还以为起义的只是青溪县一个小小县城的"盗贼"，其实起义军已占领

二州十几座县城了，只“提举、措置、捕捉”睦州青溪县贼，顶得甚事？

廿二（戊子），北路起义军在八大王率领下攻占了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逼近宣州。

廿九日（乙未），东路起义军占领杭州，知州赵霆早已弃城逃走，廉访使赵约、制置使陈建城破被杀。杭州是东南大郡，藏污纳垢，势宦麇集。所以，也成了东南百姓的怨府。起义军攻占杭州后，杀官吏、烧衙门，狠狠出了口恶气。《宋史纪事本末》说，城破以后，起义军“纵火六日，死者不可胜计”。又说：“凡得官吏，必截断四肢，碎割身体，开膛破肚，探取肺肠。或者是将尸身下锅熬油。还有的将官吏绑缚起来，乱箭射死，直射得混身像刺猬一般。总之是想尽各种残酷手段，以发泄怨恨之心。”这段文字其实是断章取义，原文出自《宋史·陈遘传》。陈遘向朝廷的奏章中有上述一段话，紧接着又说：“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今官污吏，依靠权势，侵食百姓，不知餍足。以致不平[illegible]民心。一旦发泄出来，才有如此威势。”

我们无须为起义军的杀戮辩解，不[illegible]不是好事。但这是末节，回头看[illegible]何？面对这种形势该做什么？[illegible]

域纪要》说，宣州“陪辅金陵，衿带杭歙，阻山控江，形势便利。据险而守，择利而动，纵横南北，亦创起之序也。”如由宁国进占宣州，利用宣州的有利地势，顺江而下，一二日间可达金陵城下，实现吕奖的战略设想是不成问题的。放弃这条战略路线，东向杭州，已是错了一步。由杭州北进要经过许多大郡，会给占领金陵增加许多困难。但据当时情势而言，由于王黼隐匿军情，朝廷没有派重兵前来；江南久不知兵，州县武备薄弱，方腊挥军北上，集中兵力夺取金陵，也是可以做到的。直到此时，吕奖的建议，仍有实施价值。遗憾的是方腊没有接受吕奖的建议。如前所述，在起兵的初期，方腊对形势和方针都有他自已的一套，即认为宋朝大规模的调集兵力前来镇压，总得在半年以后，在这样长的时期内，他可以占领东南大部州县，从而与宋政府隔江对峙，那时就不怕宋军的镇压了。这种割据东南的思想，表明对于长江天险的重要性他是有一定认识的。起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宋朝政府的反应也证明了他对宋政府办事效率的推断完全正确。因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按照方腊自己的战略决策，逐个占领东南主要郡县，最后也能获得胜利。但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实把一切都改变了，而对这个事实方腊一直懵懂不觉。又拒绝了吕奖提出的抢占金陵，夺取东南形胜的最佳方案，只有归于失败了。这个事实就是，在王黼、童贯的策动下，宋朝与女真人缔结了秘密的海上之盟，宋朝为实践盟约调集四方军队，特别是西北劲旅，集于京城，准备北伐。一旦获知方腊起义军势力大盛，用这支军队迅速南下，使方腊预计的“半年集结”的计划落了空，方腊没有获得发展所需的充分时间便被扼杀了。下面再慢慢叙述。

宣和三年正月，方腊连陷数州的消息王黼终于隐瞒不住，举朝震动，徽猷阁待制陈遘道：“方腊始起青溪，众不满千人，易于扑火。如今他的队伍已经过万，又有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等

寇盗响应，势力已非昔比。而朝廷东南兵弱，必非其敌。朝廷应急调京城的北伐兵和鼎、澧二州的枪牌手，兼程前往，庶几不致滋蔓。”徽宗皇帝依言而行。御史中丞陈过庭道：“导致睦州寇盗产生的人是蔡京，养寇使蔓延不可制的人是王黼。臣请求朝廷贬窜此二人，寇盗自平。又朱勔父子不过是刑余小人，区区宦竖，竟然交结势官，窃取朝权，以花石纲蛊惑陛下，罪恶盈积，天人共愤。臣请将朱勔父子处死以正典刑，以谢天下。”徽宗虽不能照行，已知东南肇乱的原因所在。正月七日（癸卯），诏命停止北伐，以领枢密院事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率西北劲兵15万南下。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延庆为宣抚司都统制，统率诸路兵马。临行，徽宗握住童贯的手嘱咐说：“东南事务卿可全权处理。必要时，可以御笔的形式，以朕的名义发布诏命。”

十九日（己卯），东路起义军北进，攻陷崇德县（今浙江境），进围秀州（今浙江嘉兴）。由方腊将方七佛率兵六万，号称十万，距秀州三十里下寨。统军王子武登城固守。

廿一日（丁巳），童贯以御笔的名义提高捕获起义军将领方十三等人的赏格：能生擒或杀掉方十三者，白身（无官职的人）补为横行防御使，另赏银、绢各一万匹两，钱一万贯，金五百两。杀获其他用事人一名者，白身补为武翼大夫，银、绢五千匹两，钱五千贯，金三百两。杀获起义军中有名目的小首领一名者，白身补为敦武郎，另赏银、绢一千匹两，钱三千贯，金一百两。以上人愿补文官者听从自便。若不是白身而是文武官吏、将校、兵级等人，也按以上标准在原官职级别的基础上递增。“盗贼”中人获以上功劳者，本身特与免罪，仍按以上标准给赏，防御使是从五品官，武臣按正常转官法自三班借职以上要经过33转才能升到这一级，可见朝廷为镇压起义军是下了血本了。

同一天，童贯到达镇江。

廿五日（辛酉），童贯又以御笔名义下令停止收买花石，关

闭苏杭造作局，在他处设局者也一并关闭。限十日内将帐目结算清楚，工匠拨归原处，已制造或买到的物件就地封存，奏明朝廷，听候处理。以后再有以供奉为名刻剥百姓者，以违御笔罪论处。

花石纲、造作局、应奉局之类危害东南百姓已非一日，至此算是了结了。不能不说这是方腊的一大功劳。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岂可单以成败论英雄，只此一项救了东南数百万百姓，便是一件殊世功勋。

廿八日（甲子），童贯使王禀援秀州，秀州知州宋昭年、统军王子武率州兵与王禀夹击起义军，起义军大败，被杀九千人，不得不退回杭州。起义军向北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向南却是节节胜利。这一月，起义军先攻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又攻衢州（今浙江衢县），州中无兵守御，官吏望风而逃。知州彭汝方有心为国尽忠，与同僚段处约登城防守，自然无济于事。城破后，起义军杀了他，使他“尽忠”的心愿得偿。

二月十七日（壬午），北路起义军攻占了旌德县（今安徽境）。

东路方七佛退到杭州后，王禀率军尾随而至。二月七日（壬申），前锋到达清河堰，双方列阵再战。起义军装备很差，与朝廷的西北劲旅远不能比，但仍然英勇奋战，直打了六日夜，终于不支，死二万多人。杭州已不足守，起义军放火烧了官舍、学宫、仓库后，于十八日（癸未）退出杭州，王禀率官军入城。朝廷派陈遘在杭州开府，经制江南七路财赋以供应官军的军源物资。物资供应有了保证，起义军所处形势更加不利了。

三十日（乙未），南路起义军攻陷处州（今浙江丽水），处州缙云县（今浙江境）尉詹良臣被俘，劝降不听，被杀。起义军进逼信州（今江西上饶）。

三月初一（丙申），东路起义军反攻杭州，又被王禀击败。

官军乘胜西进，在桐庐县与起义军遭遇，起义军又败。

初三日（戊戌），童贯命谭稹驻守镇江，亲率中军赴金陵，他对金陵和镇江的战略地位比方腊认识深刻多了。

起义军自桐庐向西败退，入衢州、婺州。而其余各地仍不断有百姓起义，响应方腊。如兰溪县（今湖北蕲水）人朱台、吴邦起兵响应于处州，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的魔尼教众在仇道人的率领下，还有台州仙居县（今浙江境）人吕师囊，方岩山（今名方城山，在浙江温岭县西北）人陈十四公等都起兵活动于温（今浙江永嘉）、台（今浙江临海）诸县。三月七日（壬寅），吕师囊攻破仙居县。

十三日（戊申），官军在刘延庆率领下自金陵西出到宣州泾县（今安徽境），与起义军八大王相遇，起义军战败，退入歙州。官军攻城，城陷。与此同时，吕师囊等起义军攻台州，无功而去。

十六日（辛亥），官军刘镇、杨可世在歙州潘村与起义军遭遇，起义军前后各万余人夹击官军。官军分兵与战，至夜半，起义军败走，死一千四百多人。吕师囊等部的起义军再攻台州，仍是无功。

十七日（壬子），刘延庆军在宁国击败起义军。东路官军在王禀率领下一路西进，先后攻克富阳（今浙江境）、新城、桐庐，三月二十七日（壬戌）攻陷睦州。

四月二日（丙寅），官军刘延庆遣部将刘光世率部入衢州，起义军将领郑魔王被俘。

四日（戊辰），起义军吕师囊部三攻台州，遭到通判李景渊的顽强抵抗，仍不得成功。

七日（辛未），刘光世率官军由衢州东进婺州，才出城二十里，起义军集中精锐还攻衢州，留守衢州的官军将领叶处厚迎战，遇到伏击，溺水而死。刘光世闻讯，急忙回军，起义军又

败。十七日（辛巳）刘光世攻占婺州。十九日（癸未），官军王禀部攻下了青溪县。方腊退入帮源洞。

童贯已率中军移镇杭州，与王禀、刘镇等诸将约定，会兵于睦、歙二州之间，从四面包围帮源洞。到四月廿四日（戊子）已经完成了对帮源洞的包围，决定点火为号，前后夹攻。时刘镇率领中军，杨可世率领后军，还有王涣率领马公直及众裨将赵明、赵许、宋江等人堵在洞后。王禀领中军、辛兴宗领前军、杨惟中领后军以及裨将王渊、黄迪、刘光弼等都在洞前。起义军尚有廿余万人，分兵守险与官军相抗。血战一日，起义军伤亡惨重。第二日官军搜山，王渊部下偏将韩世忠深入溪谷间，从一个山野农妇那里问得方腊藏身处所，越过数道险阻，在帮源洞东北隅的一处石洞中活捉了方腊。当时徽宗悬下重赏，得方腊首级者封两镇节度使。韩世忠押方腊刚出洞口，就被守候在那里的辛兴宗截获。于是史书记载说，四月廿六日（庚寅），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及其妻子、兄弟、伪相、侯王共39人（一说52人）。这份功劳就这样被洞前几个将领瓜分了。后来凯旋回朝，杨惟忠为韩世忠说了句公道话，韩世忠升了个承节郎，堵一堵他的嘴就算了结。官军的腐败，于此可见一斑。

廿七日（辛卯），童贯分遣部将讨伐方腊余众。据《宋史》记载，吕师囊在黄岩县（今浙江境）被官军折可存部的将领杨震、何灌等俘获。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渐被扑灭了。

方腊起义平定后，宋朝廷的腐败又依然故我起来。御史中丞陈过庭曾上言说，方腊之乱是蔡京、王黼造成的，贬二人则乱自平。五月，朝廷毫不客气地把他贬为黄州知州。八月，童贯以平方腊功，封为楚国公，可是他“竟敢”在平方腊时下令关闭应奉局，停止花石纲，是可忍孰不可忍！不久王黼告了他一状，说他有意归过于君父。徽宗大怒，强迫童贯退了休，那时候称为致仕。王黼、朱勔重又得了宠。方腊起义，先后攻陷了睦、歙、

婺、衢、杭、处六州五十二县，使东南震动，却不能使朝廷政治有所改观，宋朝灭亡为时不远了。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童贯传》、《陈遘传》、《彭汝方传》、《陈过庭传》、《王渊传》、《韩世忠传》、《鞠嗣复传》等。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4《方腊之乱》

黄以周《长编拾补》

花石纲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亡国之君，颇具才学，宋徽宗便是其中之一。它于诗词、金石、书画、戏曲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算得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奇才。正是由于他身上的文艺细胞太多，对花石草木、宫室园囿有特殊偏爱，即位以后，委任宵小，孜孜以求，搞得民怨沸腾，终于亡国。在他统治期间，先后由朱勔等人主持，搜运天下奇花异石、草木禽兽，其水陆运输队伍，称为花石纲。

徽宗即位的第三年，即崇宁元年（1102）三月，便命宦官童贯在江南苏、杭二州设立机构，组织工匠，造作宫廷挥霍所用的各种器物。把诸如牙作角作、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作的高手工匠集中起来，每天都有数千人施工，所造器物曲尽奇妙，巧夺天工。所需诸色原料，都从江南百姓科敛。百姓不堪其苦。

崇宁三年二月，诏命天下坑冶采掘冶炼出的金银全都缴人宫中内藏库收藏。

四年十一月，童贯在苏杭创建的这些机构——应奉局、花石纲等由朱勔统领。朱勔是被蔡京发现并极力提携而发迹起来的“人才”。原为苏州人，父朱冲通医道，家境渐趋殷实。就造作园圃，结交游客，名声也响起来了。也有的说他是个叫卖商，被虎丘寺僧首先看中的。蔡京曾贬官居住钱塘（今浙江绍兴），入京来往路过苏州，时常住在虎丘僧舍之中。后来交了好运，发达起

来，便想为这个僧寺建一座殿阁。一来是对殷勤接待他的和尚们的答谢，再者也是对自己行迹的纪念。规模大致确定后，找人估算一下，单是大木料就需要数千根，耗资上亿钱。钱对蔡京不成问题，否则他也不敢做这种事，数千根大木却不易到手。寺僧献计道："施主若定要造此莫大福缘，非郡人朱冲不可。"蔡京立时召见朱冲，朱冲满口答应。不过数日之间，朱冲就命人请蔡京来寺中画地动工。蔡京心中纳闷：工料没有备齐，如何动工？谁知到寺中一看，数千根大木料已堆积庭下。蔡京从此知道他有才干。后来，蔡京把他和他的儿子朱勔一起带到京城。在童贯所管军队中挂了个名儿，算是入了军籍，而且都给了个官做。这时徽宗皇帝正沉湎于搜集花石，蔡京便授意朱冲，搜集浙中奇异花石进献皇上。起初他搞到三棵黄杨，用黄绢蒙了，献给徽宗。徽宗大大夸奖了一番。黄杨久为世人所重，是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又绿又厚，既不开花，也不结果。长得很慢，据说每年长一寸，而且遇到闰年便不再长，还要缩。因而木质坚硬，入水不浮，遇火不燃，是作木梳和印章的好材料。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砍伐时要在阴晦天气的夜晚，天上一颗星也没有。用这样伐得的黄杨木做枕头，不干不裂。汉魏以来帝王的棺椁讲究用黄杨题辏，就是用的这种木料。难怪徽宗这样欢喜。此后每年他父子不过朝贡一二次，每次所献只有五六种。可是渐渐大发起来，以致运送的船只，沿淮、汴首尾相接，络绎不绝。每发运的若干只船编为一纲，因称花石纲。在苏州设立应奉局，负责采买、发运，由朱勔统领。由于耗资巨大，积久生弊，朱勔支取内库钱银如同探私囊取物，每每以数十百万计数。于是渐取渐广，搜山掘谷，发幽抉隐，无处不到。又乘机祸害百姓，作威作福。凡士庶人家有一石一木稍堪把玩，便派健卒直入其家，说是应供奉皇上，贴上黄封，便成了御前物什，要主人好好护持。稍有损折，就给他加上个"大不敬"的罪名。好容易熬到启运时，有的

大树大石，转侧不便，就拆房毁墙，以拓宽道路。搞得墙倒屋塌，甚至家破人亡。因此，谁家有花木稍微奇特一些，算是倒了大霉，认为是不祥之物，急急忙忙把它们砍倒毁去，惟恐留下痕迹。还有一等花石生长在深山穷谷，或崇壑深渊中，那也一定要弄到手。为此动用人力，劈山凿石，车载肩扛，不到手不止。由于给的期限短，督促急，手段惨，摊上这种工役的人家，中等家资的无不破产，贫家或致鬻卖子女才能应付。运输更是艰难，自苏杭至京城，数千里路途，多是用船水运，有船的人家可就遭了灾。官船不够，科民船；民船不够，在河道上拦截运粮船或商船。粮船也是官府船或官府租用的民船，负责为京城运送江淮粮米，每年运有定数，期限也很急。但是政府的事急，皇宫的事更急；官府势大，皇帝的势更大，所以负责花石纲的官员对粮船也是照抢不误。花石纲船都高挑认字旗，上写运载何物，标明是花石纲船。船上的押运小吏凭此横行水上，所过州县的官吏对他们毕恭毕敬，极尽奉承，被呼喝来去，不敢反抗。稍不顺意，便延误行期，或损坏贡物，甚至凿毁船只，然后嫁祸于州县，州县官吏如何担当得起？

朱勔气焰更盛，真是炙手可热。一些佞人、宵小蝇聚于他周围，为他奔走吆喝，甘心为他作奴作仆。而凡有所求，必能如愿以偿。下自直秘阁，上至殿学士诸官职，要给谁便给谁。若不肯依附于他，祸不旋踵，立时罢官。当时称他的官邸为“东南小朝廷”。

大观四年（1110）闰八月，龙图阁学士张阁出知杭州，这也是个佞恶小人，起初依附蔡京得官，后蔡京贬职，他又极数其恶。谁知不久蔡京复为宰相，他就只好卷起铺盖走人了，得了个杭州知州的外官。为了得天子恩宠，自己请求兼领花石纲。从此，开了地方官兼领花石纲的先例，花石纲的危害更加蔓延、深重了。

政和四年（1114）八月，在皇城以北新建了一座延福宫。宫城西北隅原有一座延福宫，是朝廷开宴会的处所，建筑简陋，地方狭窄。蔡京要以宫室谄媚皇上，召来内侍童贯、杨戬、贾详、何䜣、蓝从熙五人，给他们讲述延福宫如何狭窄，如何不便。这五人都是宫廷中的头面人物，一点即透，遂请求另盖一座宫殿，仍用延福宫的名字，工程由他们五人承包。蔡京大喜，当即决定新宫建在宫城北门拱宸门外，每人划定一片地方，据自己财力高下，任意建造。这是一个讨好皇上的机会，哪一个肯落在人后？五人极尽心力智巧，宫殿一个比一个建得高大，装修一个比一个华丽，构思一个比一个巧妙。终于建造成功了，五人所建竟是难分轩轾，因取名为“延福五位”。

汴京城有内外三城，最内的名为宫城，中为旧城，外为新城。延福五位在宫城北门外到旧城北门景龙门以里。这一带原有内酒坊诸司、二座寺院和若干军营，为建延福新宫，将这些全都迁走。宫殿建成后，又堆土构石为山，引来金水河水逗趣，栽上从八方移来奇花异木，养一些普天下的珍禽异兽。一座皇家名园便具规模了。但见处处是怪石寒松，流泉飞瀑，点缀着一座座美仑美奂的亭台楼阁，宛若天成，不类人间。徽宗皇帝不是个俗人，他看腻了宫廷中的雕梁画栋，对建筑的奢丽富贵已不容易动心，转而追求林壑野趣。因而又在其中增建了村居野居，酒肆青帘。倚罢蟾宫玉槛杆，再来“青帘认酒家”，却是另一番情趣。每年冬至以后开始放灯，自宫城东门（东华门）以北，金吾不禁夜，市民可以通宵游观。街市两旁，尽是店铺酒楼，尽管吆五喝六，纵博豪饮，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日上元节以后。不久又将延福宫扩展到旧城以外。建成了“延福第六位”。跨城壕筑了二座虹桥，桥下叠石为固，舟楫往来；桥上行人如织，两不相妨。壕在景龙门外，因称景龙江。江岸遍植奇花珍木，岸外殿宇对峙。

政和七年七月，蔡京组建了淮南、两浙路御前人船所，负责

运送御前花石和其他物事。自政和四年以后，东南郡官、监司[1]、二广市舶司都有"应奉"的职责，还有的虽无此职责，照样"应奉"。他们将搜觅的花石等物送入都城，因无圣旨，不能直接献给皇帝，而是通过关节，交付宦者转呈。每送一批，联船北上，常有数十船之多。所运物：石有灵璧石、太湖石、慈谿石、武康石及登、莱的文石等；竹有二浙奇竹、湖湘文竹；以及福建的荔枝、橄榄、龙眼，南海的椰子，二浙的异花、海味，四川的佳果木等，都装载上船，下海渡江，运入都城。途中为使大木石通过，常常要拆毁桥梁、凿穿城郭。运入都城后，花木倒是多半都能成活。果品的运输则比较困难，要挑选善走的健卒，沿陆路一程程地传递，远者不过数日即达京城，果品的色香尚未改变。这与唐玄宗为杨贵妃运送荔枝是同样的法子。由于搞得天下骚然，徽宗不能不心有所忌。蔡京解释说："陛下于声色犬马，一无所好，所喜不过是些山林间物，俗人连看上一眼也不肯。仍然惹外间议论的原因，不过是由于办事的人不得其法，或者是官府任非其人。管理得好了，就不会有此情弊发生。"这才建议组建提举淮浙御前人船所，命内侍邓文诰经管。定下制度，以后凡有所需，直接由御前批下，提举人船所如数征集，运入京城。此外不许妄有进献。名义上说是为了便民，其实，一切都一如既往，害民如故。徽宗却因此心安理得了。

十二月，诏命在宫城东北隅筑万岁山。理由据说是由于徽宗无子，道士刘混康建议说，京城东北隅地势太低，按堪舆学说与皇嗣有碍。只要稍微增高，必有多子之祥。因而，命在东北隅筑了数仞[2]高的土丘。谁知果然后宫妃嫔喜讯不绝。徽宗从此对教士佩服得五体投地，命人在这一带大兴土木，加以朝中佞臣逢

---

① 监司：指转运使司、提刑使司、提举常平司，合称监司。

② 仞：八尺为仞。

迎附和，便倾尽国力经之营之了。这时，朝廷任命户部侍郎孟揆仿照杭州的凤凰山建造土山，名为万岁山。后来，巫师降神，说了句“艮岳排空”的话，改名为艮岳。

宣和三年（1221），由于东南百姓不堪应奉局、花石纲的烦扰，发生了睦州方腊起义，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地，天下震动。徽宗派童贯前往剿灭，临行许他以御笔的名义，发布诏命。童贯知起义主要由于花石纲的骚扰，命幕僚董耘以皇上口吻起草一份“罪己诏”，并下令关闭应奉局、造作局等，徽宗还将朱勔父子、弟侄等免官，东南百姓一片歌颂声。但是方腊起义平定以后，王黼对徽宗说道：“方腊作乱是由盐茶法。童贯说是由于陛下好花石造成的，是归过于陛下，妄加谤讪。望皇上不要听信奸言。”请求再建应奉局，由他专责管领。徽宗答应了，又命梁师成在宫内领花石事。与王黼一内一外，互相配合，花石纲又全面恢复了。二人上下其手、明侵暗夺，四方珍奇大都人了私囊，运人皇宫者不过十分之一。

宣和四年十二月，艮岳建造成功。周围约10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高约90步（约合150米），上建介亭。山分东南二岭，直与南山相接。山东西建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南为寿山，也分两峰，中有雁池、噰噰亭等景点；山西面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再往西是万松岭，岭腰筑搂，名为倚翠。岭上下各设一关，下关前是一带平陆，凿成大沼。沼中有东西两洲，东名芦渚，上建浮阳亭；西名梅渚，上建雪浪亭。沼水东西流，构为凤池、雁池。二池之间建有二馆，东名流碧，西名环山，山上建巢凤阁、三秀堂。东池（雁池）以北有挥雪厅。又沿磴道逶迤可至介亭，介亭左右各有附属建筑。山腰北坡可下瞰城外景龙江。江水被引人山间，曲折流注，又构成多处景点。徽宗亲自作了一篇《艮岳记》，说是由于山在宫城东

北艮位，因称艮岳。倒也能够说得通。

起初朱勔在太湖取了一块大石，长宽高各有数丈，一说长4丈多，宽减半，上有孔窍上千。装入一只大船，雇了一千多名丁夫拉纤，沿淮河、汴水北运，一路凿城断桥、毁堰拆闸，数月后才运到京城。这时宋金联合灭辽，依据条约，得到了燕京等地。虽是空城一座，且不能久，毕竟是个大喜讯。这块太湖石恰于此时运到京城，便得到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昭功敷庆神运石”，立于万岁山上。又建了一座绛霄楼与它映衬。前面又植二株桧树，其中一棵名白公桧，为唐白乐天手植，也是从苏州移来。

后来，用事的大小太监们不断增筑，山林岩壑，日渐幽深高峻；亭台楼观，不可胜纪。有人说：艮岳的土木构筑倒是宏丽不俗，奇花异木也栽了不少，美中不足的是，从四方历尽艰辛弄来的珍禽异兽，缺少驯服，整天鸡飞狗跳，奔突嘶咬，不大像话。有个耍猴戏的艺人，称为薛翁的，向童贯请求，愿意在其间驯养这些禽畜。获准以后，他每天招集皇帝的仪仗班子在其中经过，皇帝出行用的车舆伞盖、鸣跸喝道，这些排场一样不少。只是这个班子走到哪里，都是大盘盛着肉炙、粱米等，薛翁学着禽兽鸣声，召引禽畜。时日既久，这帮禽畜见到天子伞盖便不召自来，不再畏人。薛翁也凑趣喊道：“万岁山瑞禽迎接圣天子的大驾。”徽宗但见飞鸟从四面八方飞来，以为他这个圣天子真有这么大的面子，自是高兴异常，重赏薛翁是不在话下了，还专门为他成立了个“来仪所”，召集四方养禽畜的艺人都归他统领，他便俨然是万岁山的山大王了。

这样大的工程，其劳民伤财那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一土一石、一草一木都来之不易，都是民脂民膏。通过花石纲运到京师，一花之费达数千缗（每缗千钱）；一石之费达数万缗。修其中一座神保观（二郎神庙）时，殿基用土向京城百姓征集，倾城出动，不分男女，称为献土。负责催科的官员有的扮作二郎神殿

中的鬼判，挨门催讨。纳土的人流络绎道路，皇上登楼观看，好一幅壮观景象！对蔡京等人的办事能力赞不绝口。他当然看不到在这壮观景象背后的血泪事实。有人深为担忧，又不敢直言阻止，就对皇帝说："纳土、献土，这不是好词儿。要国人都来献土，这成什么话。"皇上听了，不禁毛骨悚然，立刻传命禁止纳土。提意见的人很聪明，利用皇上多忌讳的弱点达到了阻止这一害民活动的目的。相反，若是直言劝告，后果也就堪忧了。有一个太学生名叫邓肃的，就这么干过，他写了十首诗，劝皇上停止筑万岁山。其中有一句道："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风。"当时正是因花石纲搞得东南骚动的时候，诗的词语缓和，中肯，献诗的时机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徽宗立刻召见他，对身旁侍立的皇太子说："这是个忠臣。"可是蔡京出班奏道："此人攻击时政，若不砍头，恐不免有人效尤，以浮言乱天下。"徽宗不语，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宰相既然反对，他也就不便奖励邓肃，把他从太学中除名，撵回家乡种田去了。有皇帝赞许，尚且如此，否则恐怕真的难逃蔡京的屠刀。

商王汤曾经以三风十衍告诫后人说："士大夫犯了其中一风，则有国者亡国，有家者破家。"三风中有一风是"殉于货色，恒于游畋"，叫做淫风。即凡是迷恋珍奇之物和游猎者就是淫风，与徽宗花石纲正好对症，国家必亡无疑。靖康间，金人南下，围困汴京，时天降大雪，奇寒无比，城中百姓无柴取暖，无米下锅，许多人冻饿而死，谁来替皇上守城？徽宗这时才痛悔以往所为，下令将艮岳中的山禽水鸟十余万只捉了投入汴渠；杀大鹿数千头，犒劳守城卫士；拆屋为薪，给百姓取暖；凿石为炮，伐竹做成笆篱，送到城头上作为守城器具。二十多年经营起来的这片建筑，数月之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童贯传》、《朱勔传》、《王黼传》、《蔡京传》、《张阁传》等。

黄以周《通鉴长编拾补》卷19—45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花石纲之役》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0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2

岳珂《桯史》卷9

蔡京擅国

蔡京（11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境）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当过钱塘（今杭州纪家桥一带）、舒州（今安徽潜山）等地的地方官，出使过辽国，以功升为中书舍人，与弟蔡卞同掌中书文字，朝廷以为荣耀。后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元丰末年，与章惇、邢恕、蔡确共谋，欲借神宗立嗣事害首相王珪，图建定策功。虽然没有搞成，后来终于成了一桩谤案，流毒无穷。哲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尽除神宗时新法，遇到很大阻力。尤其免役、青苗、将兵诸法。司马光命于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改行差役，同列官员都认为期限太迫，无法实行。唯有知开封府蔡京，在他管辖的开封府和附近畿县中，五日内全部实行了差役法。并亲自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司马光兴奋异常，道："倘若人人像你一样奉守法令，何事不能成功！"众人却由此知道蔡京是个奸邪小人，为了取媚上级，毫不顾百姓死活。因而受到言官弹劾，离开京城，做了州县地方官，辗转于成德军（今河北正定）、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长安）、成都等地。哲宗绍圣初（1094），升为权户部尚书。时哲宗初亲政，有意恢复熙宁、元丰间实行的新法，起用章惇为左丞相。章惇欲变差役为免役法，设立专门机构研讨二法利弊，如同当年司马光变免役为差役时一样，议论纷纷，久不能决，章惇束手无策。蔡京对章惇说道："如今是恢复先皇帝旧制，又不是另立新法，根本无须研讨。"一

句话提醒了章惇，免役法得以顺利恢复。史家评论此事说：十年之间，司马光行差法，章惇行雇役，都仰赖蔡京才得成功。光、惇不可说不智，但对于这两个复杂而相反的事件都搔首踟蹰，一筹莫展；对蔡京却易如反掌。于此可见蔡京的才干，也可见蔡京的奸邪。

绍圣二年（1095）十月，蔡卞出任尚书右丞，位列执政，以蔡京为翰林侍读学士，兼修国史。这时章惇独相，欲兴大狱，陷害元祐年间执政的大臣，教蔡懋私拆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书信，诬谤梁焘、刘挚阴图不轨，命蔡京在同文馆立案审理，梁焘、刘挚都贬官而死，子孙被禁锢，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等大臣也受牵连贬官。从此，他开始有了问鼎宰执的资格和意图。

徽宗即位后，蔡京受言官弹劾，贬官为提举洞霄宫，居住杭州。供奉官童贯奉徽宗命到三吴一带搜求书画古董，在杭州居住数月，蔡京结识了童贯，二人日夜相处，交往极为密切。蔡京是个丹青妙手，书画都名噪一时，为童贯画屏障、扇带之类不计其数。童贯将这些东西送往宫中，免不了对蔡京极口称赞。徽宗也颇富文才，所谓惺惺相惜，对蔡京有了好感，有意要提拔他一番。又左、右相韩忠彦、曾布交恶，曾布想援引蔡京对付韩忠彦，奏请徽宗，授蔡京以翰林承旨。

神宗朝时，有一个以奉承王安石闻名的奸臣邓绾，元祐间贬死于邓州。其子邓洵武，徽宗时官为起居郎，也是家学渊源，总得物色一个合适人选，加意奉承一番，自己才好攀附龙尾，青云直上。不知为何，他选中了蔡京，对徽宗说道："陛下是神宗的儿子，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韩琦在位时，反对神宗新法最为卖力。如今韩忠彦仍然反对新法，这叫做子继父业。难道陛下反而不能继承父业吗？臣以为陛下倘要继承先帝事业，应该任用蔡京，只有他能对付得了韩忠彦。"又作了一个《爱莫助之图》献给徽宗，仿《史记年表》的体例，分为左、右两部分，各七

栏：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凡赞成新法的，书名于左七栏中；不赞成新法的，书名于右七栏中。按照他的分类，赞成新法的执政中只有温益、蔡京二人，其余各栏也是寥寥无几，多不过三四人。其余都是反对新法之人。从此徽宗决意任蔡京为宰相。

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罢相，出知大名府。十日后，执政陆佃也因反对惩治元祐党人罢官，改知亳州。第二日，以许将、温益为门下、中书侍郎，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同为执政。

宰相曾布原是王安石的得力臂助，元祐时被贬官出朝。哲宗亲政后，曾力助章惇恢复新政，惩治元祐党人。到了他自己任宰相的时候，大约看到伤人太多，终无善果，改行一种调和政策，兼用熙丰、元祐两党。所以，起初排斥蔡京这类极端人物，将他放逐在外。崇宁初，见徽宗心向熙丰，又引用蔡京打击政敌韩忠彦。蔡京是何等人物！岂能忘了他的“旧情”。就借故挤兑曾布。闰六月，曾布罢相，出知润州。七月，蔡京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宰相职。宰相定员三人，韩、曾二人都已罢官外任，只剩下蔡京一人独揽朝纲，朝廷从此多事了。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命令禁止元祐法制。五天以后，仿照王安石设立三司条例司的旧法，设置了讲议司，专门讲求恢复新法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八月，恢复哲宗绍圣年间实行的免役法。

九月，将宰执司马光、文彦博等二十五人，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等三十五人，其余官员程颐、谢良佐等四十八人，还有内臣（太监）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称为奸党，请御笔书名上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名为党人碑。又请求朝廷下诏书，按照哲宗元符末年日食时，群臣上奏朝廷的求言书中，对于熙宁、绍圣政事的评价，把群臣分作正邪

二类，共六等，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全都升官晋职；范柔中以下五百多人为邪等，一概贬官。

十月，任蔡卞为知枢密院事。与蔡京兄弟二人同执朝政，这是宋代建国以来很少见的事。

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止元祐学术以及其他“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宋朝实行文禁有两个时期，一是蔡京当政时，一是秦桧当政时，都是政治最黑暗时期。崇宁诏书所禁看似寥寥几项，其实凡当政者所不喜都是所以归人“邪说诐行”，作为被禁对象的。一般官吏再加发挥，以致忌讳重重，文人动辄犯讳。宋人记述说，当时州县学校考试，不论文章做得如何，先看是否犯了忌讳。只要有一二处犯忌，文章做得再好也是不予录用的。忌讳很多，如“休兵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及之役”、“清人仕之流”，这一类官场套话，以往不禁，这时也人了被禁之列。原因是口气与元祐党人相类，近乎对熙宁新法的指责。到政和年间，连同经书中的语言也被禁止了。如《尚书》等书中的话：“大哉尧之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等等都成了犯忌之言。原因说来可笑，如哉与灾字同音，所以“大哉”、“君哉”也连带被禁止；危、乱、凶、悔等字不大吉利，人不爱听，也要禁止。文网如此之密，可以想见，因为犯忌被祸的人定是多如牛毛。

哲宗元符年间，言官任伯雨等人曾经上书论述蔡京奸邪，蔡京一直耿耿于怀。崇宁二年正月，将任伯雨、陈瓘等言官全都贬到边远州县去做官。蔡京在成都时，有幕职官张庭坚颇有才干，蔡京做了宰相后，想提拔他作为自己的心腹，庭坚不肯，蔡京恨之不止，但他只是个幕僚，没有什么过失，却也无奈他何。这次遇到贬任伯雨等人的机会，便把张庭坚的名字也夹人贬官诏书中去，流放到象州（今广西境）居住。

三月，诏命党人子弟不许入京。不久又下诏书：元符末年上书的进士如今有充三舍生的，一概罢去。有以元祐学术聚徒教授的，由监司清查法办。凡元符间上书已入邪等的人不许再涉足京城。

四月，诏命把景灵宫中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郑雍、赵瞻、王岩叟等十人的画像毁去。八天以后，又命销毁范祖禹所著《唐鉴》以及三苏（轼、辙及父苏老泉）、黄庭坚、秦观的文集。

前面屡次说元祐学术，所谓元祐学术，主要指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经学。言官秉承蔡京的意向，对二程学术抨击不止，说其："专以诡异聋瞽愚俗"，近来入山著书，对朝政妄加讥评。于是这年四月，命将程颐除名。颐迁到龙门（今山西河津北）以南居住，对四方前来求学的学者说："各自按照自已知道的道理做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入我门中。"他是生怕这些无辜学子们受了连累。

八月，蔡京又亲自用大字书写党人名字，颁于郡县，刻石成大碑，立于监司、长吏厅中。长安石工安民说："我是个普通石工，不懂得什么道理，也不知为什么要刻此碑。但是司马光相公，曾经在这里做官，百姓们都识得他是个正直的好人，碑文却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这种文字。"官府不依，要治他以罪，安民不得已请求道："我既来服役，理应听从指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我请求碑末不署我的名字，以免得罪了后世君子。"这石工倒是非同小可，足可令那些顺风使船的士大夫们脸红了。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此言不虚。

三年正月，蔡京请求铸当十钱。自宋建国，有折二、折三、当五钱，从来没有铸过当十钱。如今铸造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不亚于对工商百姓的公然抢掠。一时使得宋朝府库富足，不要说这又是蔡京治国有方了。

自从神宗元丰间永乐败师之后，已有数十年边尘不惊，没有战争了。宋朝府库颇为充足，蔡京开始引导徽宗皇帝穷奢极侈起来。徽宗初时尚不习惯。史载有一次，徽宗从宫中拿出几只玉盏、玉卮说："这些器皿久已想在大宴会中使用，又怕有人说太过奢华，一直没敢拿出来。"蔡京说："臣以往曾出使辽国，见他们宴席中有玉盘盏，都是石晋时制造的。还夸说南朝必没有这些器皿。如今皇上拿出来，诸臣用他给皇上祝寿，合情合理，无人敢于指责。"徽宗又说："先皇帝在位时，曾想筑一个小小的台榭，台基不过数尺高。言官纷纷上书说，不应如此奢侈，朕对他们的话颇为赞赏。这些玉器制造已久，想到他们的话才未敢使用。"蔡京道："为人做事，只要合于道理，心无所愧，外人说些什么，何足介意？陛下为太平天子，应当享受天下供养，区区几件玉器，何足道哉！"徽宗从此胆子大了起来。蔡京常对徽宗说："今库中积钱已过五千万。常言说：和足则广乐，富足则备礼。天子应该制礼作乐。"于是开始铸九鼎、建明堂（祖庙）、修方泽（祭地处）、建立道观，制作大晟乐和定命宝（玺）。又大兴土木工役，凿穿大伾山三峰，使黄河道由曲变直；在河上架"天成"、"圣功"二座桥梁，用工役四十万。两河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蔡京却悠然自得，以为可以与先贤名臣稷契、周公、召公相比拟。又打算扩建宫城，增造宫殿台榭，于宫外堆石造艮岳。使童贯、朱勔等五人主其事。这些人搜尽天下奇珍异石，花木鸟树，装点新建的宫室。搞得东南地区骚动不安，方腊揭竿而起，天下震动。历朝积蓄被他败坏将尽。

又视官爵如粪土，任意施舍，毫不顾惜。

四月，撤销讲议司，事权合并入尚书省，按照神宗撤销三司的先例，讲议司官员40多人，全都优遇迁官。

蔡京又请求建立管理纸币——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专门机构：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制定了伪造交子的有关刑

法。规定：凡是知情、转用以及邻人知而不告的都有罪。私造交子纸的，罪至徒刑和流刑。不久，又命天下除闽、浙、湖、广以外，全部使用另一种纸币钱引。纸币的大量印制和流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体系受到严重破坏。

六月，将熙宁、元丰年间的功臣绘图于显谟阁。这一月，辟雍（太学行礼处）建成，朝廷下诏说："王安石是孟子以来儒学第一人，应该以王安石配祭孔子，位次在孟子后。"又将元祐、元符党人籍与上书邪等人合并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后树立朝堂，此外凡未入石刻者，一概不咎，不许再加弹奏。

七月，重行方田法。

九月，分别以赵挺之、吴居厚为门下、中书侍郎，张康国、邓洵武为尚书左右丞，为四执政。都是蔡京党羽。其中张康国帮助蔡京制役法，定党籍，商讨恢复新政等，几乎凡蔡京有所改作都与张康国有关，所以蔡京极力推荐他，使他自一个福建转运判官，不及三年升为翰林承旨，又拜执政。

四年正月，蔡卞罢执政。他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的胞弟。发达比蔡京早，如今居官却在蔡京下；又考虑到有蔡京在，他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宰相的，断无兄弟二人同朝为相的道理。因而对蔡京颇有微词，议论事情时多有不合。蔡京将他赶出朝去，贬为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三月，蔡京荐赵挺之为右相。赵挺之既相，反与蔡京争权，对徽宗陈述蔡京如何奸邪，并请求辞职，以免被他伤害。于是罢相，领了一份闲职：中太乙宫使。无论是亲兄弟，或者是心腹故旧，一旦意见不合，蔡京都要把他们踢在一旁的。

五年正月，老天开了蔡京一个玩笑，有彗星出现于西方天空，彗尾拖得长长的，由奎宿直贯昴、毕二宿，几乎扫过了整个天空，二十天后方才隐没。《天官书》说："彗星虹霓，天之忌也。"彗星出现是皇帝最为忌讳的事，表示他们做错了事，上天

将要责罚他们，人间就要有祸事了。皇帝只有修德、行善政，才能避免这场灾祸。不过搞来搞去，一般是把责任推到宰执头上。这一次徽宗皇帝起初也是照例避正殿不居，表示对这场天变的恐惧心情；减少饭食，表示思过、自责。然后颁诏书求直言，就是请求天下人对他所行政事提出开诚布公的批评。执政刘逵请求打碎元祐党人碑，放宽对元符上书人及其他邪等人的禁令。徽宗又忧又惧，初时心中尚犹豫不决，突然醒悟，认识到这一切都是蔡京奸邪所致。时方夜半，竟然等不及天亮，就传命黄门官到朝堂上将党人碑砸碎。第二日天亮，蔡京见了这种景象，既惊且怒，厉声说道："碑石可碎，党人之名不可除。"他还不知，他的厄运到了。又过一日，白天有太白星出现。按星经，太白星运行距日不超过45°范围，随日出没，不会昼见。除非是日色无光，才有昼见的可能。而日是人君之象，无光那是大不吉利的。《天官书》说："太白经天（按即昼见），天下革政。"要天下大乱，改朝换代了，徽宗如何不忧？再也不顾蔡京的反对，下诏书解除党禁；权罢方田法；停止州县向朝廷每年缴纳赋税以外的供奉物；崇宁以来贬官者，不论是死是活，全都恢复部分官职；有奉命迁往远方居住的，准许归籍。

二月三日（丙寅），蔡京罢相，也做了中太乙宫使，留居京城。当时天下已被他搞得不成样子，法制纷更，群贤远斥，官冗吏贪，务为奢侈。被贬后，赵挺之、刘逵同心辅佐徽宗，凡蔡京制定的法制一切禁止。但是朝廷中到处是蔡京同党，二人实难有所作为。

三月，彗星消失，徽宗的忧虑也随着烟消云散，下诏书停止直言，方田等法依旧恢复，慢慢地又有了重新起用蔡京的打算。

十二月，刘逵罢政，

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重被起用为左相。三月，赵挺之罢相。一些停止了的政策重又恢复，所恩、所怨蔡京一一加以

报复。

二年正月，蔡京加官为太师。

三年三月，知枢密院事张康国死。这时蔡京居相位已久，徽宗对于他的专横跋扈日有所闻，心生厌恶，命张康国对他稍加牵制，使不能为所欲为，并私下许愿，要升张康国为相。张康国自是乐于从命，与蔡京的矛盾尖锐起来。蔡京指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弹劾他，天子不听。一日早朝后，张康国竟突然患了急病，只是仰面向天，舌头伸得长长的，众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待漏院，要替他延医诊治，哪知抬到时已死多时了。人们怀疑是中毒而死，那末下毒的人便非蔡京莫属了。

六月，蔡京再度罢相。因为徽宗对他已经生厌，他又不能老实做人，言官不断上章论述他的罪恶；还有个太史局官员郭天信，颇受徽宗信任，每次奏报天象，都不忘归罪于蔡京。这一月，日中又有了黑子，便说是君弱臣强所致。徽宗倒是笃信天命的，蔡京才又倒了霉。朝廷任命何执中为左相，他是蔡京党羽，起初只知谄事蔡京，蔡京罢政时，才荐他代领其职。太学生陈朝老上书说："陛下深知蔡京的奸诈，下了他的相印，天下人为之鼓舞；及得知接任的是何执中以后，中外官员无不黯然失望，他其实是个极一般人才，毫无过人处。致位二府（中书省、枢密院合称二府）已是侥幸，再升宰相，如同命蚊负山，怎能胜任得了？"徽宗不悟。

十一月，蔡京以楚国公致仕（致仕，就是辞去职务，退回家中养老的意思），仍负责修《哲宗实录》事，每月朔望二次上朝，朝见天子。言官上书表求重加贬黜，徽宗一概不听。

四年五月，彗星又一次出现，侍从官员乘机论蔡京把持朝政的诸种罪恶，请求从重惩处。于是把他贬出京城，到杭州居住。

六月，命张商英为右相。张商英初因不附蔡京被贬，颇有人望。这时天旱成灾已久，彗星又长见不隐。及张商英为相，恰巧

彗星隐去，第二天又下了一场透雨，徽宗大喜，以为命相得人，亲写“商霖”二字赐给张商英。

政和元年（1111）八月，又任蔡京为太子太师，张商英罢相。

二年五月，命蔡京每隔三日一次到都堂处理政事。这是他第三次出任宰相了。为了避免再受言官攻击，每有裁决，必请御笔亲录以后颁行，称为御笔手诏，这样谁也不敢再加指责。时日既久，群臣纵有人看出笔迹不似御书，仍不敢出言反对。蔡京更加肆无忌惮。

八月，命焚毁元祐间舍人和学士草拟的所有制词。

九月，定新官名。以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为真宰相；三孤（或称三少：少师、少傅、少保）为次相。又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可是当时官员冗滥，再加上名称混杂，元丰官制到此时已被大大破坏。

六年，蔡京大兴土木，以致民不聊生，知枢密院郑居中屡次向徽宗诉说，徽宗对蔡京的专横已心中生厌，于是拜居中为太宰，监视蔡京的行动；又有中书侍郎刘正夫论事多与蔡京不同，徽宗封他为少宰。

宣和元年（1119），蔡京子蔡攸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他是徽宗皇帝的宠臣，经常与王黼参加宫中秘戏，穿着短衫窄裤，面上涂抹青红等色，杂在倡优等歌舞伎艺人中，胡乱说一些市井中的淫亵不堪语，逗皇上一笑。时常劝皇上便服出游，以取淫乐。徽宗从此多私自出宫，到民间、市井中鬼混，丑声传天下。

蔡攸既得皇帝信任，权势渐大，与父蔡京各立门户，几乎成了仇敌。

二年六月，蔡京以太师、鲁国公致仕。王黼独居相位。六年，王黼罢相后，朱勔劝帝再用蔡京。十二月，蔡京第四次登上了政事堂，已经78岁，两眼昏花，不能做事。全由他的小儿子

蔡絛代为处理，不但代他批阅文件，连入朝奏事也由他代理。因此每次蔡絛入朝，侍从官以下都向他作揖打拱，中书堂吏数十人怀抱案卷在后跟随。权势熏蒸得久了，便头脑不清，发起昏来，胡作非为，盗用威权，恶迹渐彰。首先引起蔡攸的嫉妒，数次劝徽宗杀他，徽宗不允。左右相白时中、李邦彦也不喜蔡絛，与蔡攸一起将他做的奸私事揭发出来。徽宗闻知后大怒，要将他窜逐边远地方，蔡京苦苦哀告，才罢去他的侍读官，追毁他的出身文字，成了一介白丁。蔡京本应引咎辞职，却是老而不知耻，装作没事人一般。徽宗派童贯前往传达皇帝意旨，他才上章辞职，口中仍不断絮叨，要皇帝再容他几年。童贯不许，只得将辞职书交付给他。徽宗顾及他的脸面，让学士代他写了三份辞职表，算是他连求三次，朝廷才恩准了他的要求，时为宣和七年（1125）四月。

钦宗即位后，边警日急，纷传金人不日南下。蔡京为了保命，举家南迁。激起天下人的愤慨，指他为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之首。侍御史孙觌等上书极言他的罪恶，朝廷连加贬黜，最后贬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居住，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守官是他的仇家，遂死于州境。无棺木入殓，从行使臣将他以青布裹尸，葬于漏泽园。

蔡京四度为相，恶迹累累。而其中最大的要数党禁了，直搞得正人去国，剩下的多是谄佞之辈。以致国家有警，朝中无人；其次是滥印纸币，搞乱了经济，失掉了民心。金人大兵压境时，真正出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局面。宋朝怎能不亡！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蔡京传》、《王珪传》、《文及甫附传》、《梁焘传》、《王岩叟传》等。

周煇《清波杂志》卷 2

洪迈《容斋三笔》卷 14、15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 49

群奸之窜

自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人兴兵南下以来，河北州郡相继陷落，告急文书密如雪片，朝廷文武大惊失色。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东路金兵已包围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战端一开，将何以御敌？徽宗皇帝回忆往事，才知蔡京、王黼等人标榜的太平盛世，童贯、蔡攸等人吹嘘的圣朝武功，都是靠不住的，金兵一来，稀里哗啦，全都垮了台。他本人是个才子，却不是政治家，满朝文武都一筹莫展，他还能有什么办法？二十二日（己未），先按照传统下了一道罪己诏，追悔自己的罪过：一是壅蔽言路，只听奉承话，臣下有意见没处提。二是恩幸持权、贪饕得志，朝廷大权把持在宵小、贪官手中。三是使缙绅贤士大夫陷于党籍之中。四是赋役沉重。五是多做无益之事，侈靡成风。……一口气说了十条罪状。然后哀求说，念在建国百多年来列代祖宗仁厚的份上，望四海百姓有力者出力，有策者献策，以救国家眼前之急。为表示诚意，当下颁布几项应急措施：撤销西城所，将没收的土地归还原承佃者；减少宫中掖庭经费，减发侍从官以上月俸；撤销应奉等局，将所得钱物留作籴军粮、赏军功、招募士卒使用；撤销道官，收回赏赐道观的房钱土地，停止一切斋醮道场；关闭都茶场、行幸局、采石场等等。

徽宗有几大弊政：一是搞应奉局、造作局、花石纲之类，以营建宫室和万岁山。二是建立西城所搜括土地。三是崇信道教等，从上述罪己诏可以看出，徽宗已有所认识，并决意改正。所

谓鼎铛有耳，主持这些事务的大臣如蔡京、朱勔、王黼辈也应该是有耳朵的，听了这些话该怎么办？稍有廉耻就会请求辞职，负荆请罪。然而这些人竟是无动于衷，若无其事。他们深信，朝廷中都是亲信，无人敢对他们起而发难。人一旦权欲迷了心窍，便耳目失聪，这话的确不假。皇帝都认了罪，难道你还能逃脱罪责吗？

二十三日（庚申），徽宗禅位，改称道君皇帝。太子赵桓登基，是为钦宗。金人的马队对此毫不理睬，依旧滚滚而来。西路粘罕军围困了太原府，东路斡离不进兵到真定（今河北正定），直指东京。朝中大臣或主守或主逃，还有的不守不逃，只想投降。乱乱糟糟，没有个正经主意。

二十七日（甲子），太学生陈东上书说："陛下新即位，百废待举，首先该做什么？臣以为尧即位首诛四凶而天下定，陛下也应该首先除掉如四凶那样的奸臣贼子。这种人我朝有六个，即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是为六贼。以蔡京罪恶最大。"接着历数六人的罪恶说："蔡京专权跋扈，陷害忠良，结交宦官，安插党羽，盘根错节，制造冤狱。王黼假应奉之名，四方贡物，尽入私家；卖官鬻狱，奸赃狼藉；挑起边衅，结怨金人。童贯本是宦者，朝廷用他带兵，每次出师，必随身带数十万金，绢帛以亿万计。回朝时金失大半，绢帛所余尽归私囊；不会用兵，赏罚不公；使将不先敌，士不用命，以致军败国辱，士卒陷亡，使祖宗以来的军政受到破坏，与邻国失去了友好关系。梁师成外示恭谨，中存险诈，独揽朝政，号称隐相，欲使天下士大夫都变成他的门生。正人端士，避之惟恐不及，无耻小人都投到他们的门下。王黼就是因他才成为显贵的，直到做了宰相，仍事事秉承梁师成意旨，不知有天子之命。此外朝廷中的执政侍从、监司郡守，也多出于师成之门。李彦继杨戬之后，以搜括民田为理由，在河北、京东、京西三路作威作福；夺民常产，重敛租

税，使三路百姓家破人亡，怨声载道；监司郡守都仰承颜色，不敢稍有违逆。时称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朱勔父子夤缘蔡京，结交宦官，才得成为显贵。以收买花石为名，侵吞内库帑银无数；破坏官舟，往来淮浙，贩运获利；烦扰百姓，以致拆屋扒坟；蔑视官吏，如同奴仆；东南百姓，怨入骨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方腊才得以乘机而起，搞得东南骚动，经岁乃止。"

"这六贼相继用事，搞得民心离散，盗贼四起，夷狄入侵，国家陷于危亡，社稷濒于颠覆。臣请求将他们明正典刑，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又说："六贼党羽，遍布中外。听说他们还私养死士数百人。陛下若稍加宽贷，除奸不死，止于流窜，恐怕变生肘腋，会产生不测之乱。昔日唐明皇若早诛杨国忠，就不会有安史之乱，陛下万万不可再犹豫迁延。"

这时，右正言崔鷃也上书说："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等官爵都由蔡京私意而得，他要谁生谁就生，要谁死谁就死，无人敢说半个'不'字。近日闻谏议大夫冯澥上书说：'士无异论，足见太学兴盛之极。'如今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竟还有人敢于说这种奸邪之言！'无异论'算是什么兴盛？以前王安石拒绝反对意见，搞得天下人众口一词。蔡京又通过学校驾驭士人，在学校里搞军队那一套，如同以军法管教士卒一样，一有人唱反调，学官也受连累。苏轼、黄庭坚的文章，范镇、沈括的杂说，都以严刑重赏禁止收藏，对士人思想的禁锢太厉害了。而冯澥反倒说是'盛况'，欺君罔上，莫此为甚。自从章惇、蔡京打着绍述的幌子欺骗皇上以来，'绍述'要统一道德，天下就统一到了谄佞中去；'绍述'主张同风俗，天下又出现了共同欺罔的'风俗'；'绍述'注重理财，公私困竭；注重培养士人则人才减少；注重开边而如今战火烧到京城之下了。元符年间，应朝廷号召上书议论朝政得

失的达数千人，蔡京派心腹对他们的意见一一作了鉴定，凡与他意见相合的列人正等，不合的归人邪等。冯澥就是被蔡京列人正等人中的一个。蔡京这一套把天下害苦了，怎能再让他继续害下去？他那一套酷似王莽，而朋党之盛又远远超过了王莽。若不痛惩，贻害无穷。愿陛下将他斩首以谢天下。"朝廷虽暂时没答应他们的请求，但是这些话大义懔然，颇为时论推重。

靖康元年（1226）正月，金兵攻浚州（今河南浚县），前锋到达黄河沿岸。三日（己巳），皇上下诏亲征，就要像真宗皇帝下澶渊那样，好大气势！当晚二更，道君皇帝却悄悄从通津门溜出城去，接着道君皇后、皇子、妃嫔也一个个溜了出来。道君初时乘船，欲顺汴水南下。嫌逃得太慢，改乘轿子，也嫌慢，又上了一艘运载砖瓦船，一夜行了数百里。身边只有蔡京的儿子蔡攸扈从。行到泗州时，高俅、童贯之徒才追了上来。而王子后妃则远远被抛在后面。道君皇帝如此，文武百官爱惜性命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也悄悄溜出京城，远走高飞了。王黼便是其中一个。他将家中细软收拾了，装车的装车，下船的下船，连个招呼也不打，逃了出去。朝臣闻讯，立时哗然，纷纷斥责其贪生怕死，辜负国恩。于是诏命贬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此外，又将朱勔放归田里，李彦赐死，王、李家财籍没人官。单只王黼一人家财籍得亿万以上。大臣吴敏、李纲请杀王黼，皇上命开封府尹聂昌办理。聂昌是蔡京党羽，素与王黼有怨，得了这道指令，即刻遣人追杀。王黼行到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城南二十里永丰乡辅固村被追及，那人割下他的首级回去复命。钦宗因初即位，顾及祖宗"不杀大臣"的遗训，托言王黼被盗贼所杀，布告天下。朝廷又下令籍没他的随身财产，乡民乘机入室抢劫去绢七千多匹，钱三千多万缗。官吏到来时已是四壁荡然，空空如也。

二月六日（壬申），陈东又上书说："听说上皇避难已到亳州

(今安徽境)。蔡京、朱勔二人都是举家从行，还有童贯率兵二万护送。臣深恐这几个贼子引上皇南渡，万一另生变故，闹出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实是叫人心惊。东南地区，沃壤千里，郡县不下千百座，京都乃至整个中原地区所需物品，许多都仰赖东南供给。那里风俗侈靡，人心易动。监司、郡守、州县官员又多是蔡京等贼的门生。童贯讨方腊时曾广市恩泽，邀买人心；听说他还私养死士。自从臣上书论六贼罪恶，他们自知法网难逃，反而心怨朝廷，这才鼓动上皇往江南避难。臣恐数贼到江南后，假借上皇名义，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关系，江南地区恐怕不能再为朝廷所有，后患岂是金兵所能比拟？望朝廷及早捉回数贼，明正典刑。另差忠信可靠的人护送上皇，以成全陛下父子恩情，保证宗庙的安全。”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钦宗听了，不住点头称是。可是童贯手中有二万士兵，如何能把数贼追回而不另生事端，却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金兵不久就会兵临城下，哪里顾得上这些事？直拖到二十八日（甲午），陈东再次上书说："臣去年冬天曾上书论六贼罪恶，前不久又上书论蔡京、朱勔父子与童贯等挟持道君皇帝南巡的危害，请求将数贼追还朝廷，明正典刑，至今未能施行。可能由于金兵日近京城，朝中无暇商议此事。臣以为，此事比金兵入侵事更为紧急。近闻道路传言：高杰接到他哥哥高俅、高伸的书信，其中谈到道君南巡的情况说，道君走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时，曾表示不愿再向南行。数贼不依，劫持道君南下。到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康熙时没入洪泽湖中）时，又假传道君御笔，命高俅守御淮河浮桥，其余诸人欲挟持道君渡过淮河，前往江浙。还把随驾卫士全都赶回，有人不愿离开道君，手攀船舷痛哭。童贯命亲兵引弓射杀，至近百人之多。高俅父子兄弟在一旁，仅能与道君皇帝彼此对望一眼，想说一句话也是不敢。路人莫不痛心流涕，议论说：想不到天子的父亲竟被奸贼挟制到这步田地，大是凄凉。数贼的党羽遍布东南，

而道君随从大臣如宇文粹中是蔡京的外甥女婿，他的弟弟宇文虚中贬官后也在江南居住；蔡京的儿子蔡攸守镇江，为江南千里山川的要害之地；宋晚是蔡攸妻党，领江浙漕运，手握数路金谷敛散的大权；童贯手中有亲随胜捷军；朱勔有乡党恶势力的支持，他与他们结交已久，目的就是为了危机时有所倚仗。这些人一旦南渡，擅扼大江天险，江南郡县必非朝廷所有。陛下父子亲情也难维持，只怕还会有更难预料的事发生。不知为何陛下仍迟疑不决，对这些人不及早处治？莫非是梁师成从中解救，对陛下说了什么话吗？陛下请听臣言，梁师成也是奸邪之辈，招权怙势，坏法乱纪，无所不作。威声气焰，震灼中外。他有个门吏名唤储宏，梁师成送他参加廷试。中进士以后，仍替他守门做门吏。宣和六年试进士，其中竟有百余人是富商豪右子弟，以及其他以特殊途径得官的人，他们以献书得到廷试资格，实际却是因每人献给梁师成七八千缗钱。又创制北司，搞一些不当急事务；专领书艺局，召聚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之辈，耗费国库帑银，暗夺皇上威权。只要不除梁师成，群贼必会依仗他为奥援，皇上即便想大明诛赏以昭示天下，也是不能成事的。"

二十九日（乙未），下诏书将梁师成勾结王黼等罪恶明告天下，并将他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华州（今陕西华县），派使臣押送贬所。行到八角镇（河南开封西南三十里八角店）时，将他用绳子勒死。一说是他自知难免一死，寻了短见。还有的说是赐死于八角镇。在钦宗即位以前，王黼曾策划立徽宗第三子、钦宗的次弟郓王楷为帝。梁师成极力保护钦宗，立下很大功劳。正因为此，徽宗南逃时，众邪臣宵小把徽宗当作保护伞，尾随着他蜂涌而去。梁师成却安然留在朝中，自以为钦宗不会对他动手。哪知国事危急，陈东等议论不止，布衣张炳还上书说他是唐朝的李辅国。钦宗迫于公议，已有些动摇。梁师成这才害了怕，从此寝食不离钦宗半步。即便钦宗登茅厕，他也候在外边，钦宗

竟不敢对他动手。适巧于本月郑望之出使金营归来，金人索要犒军金帛甚急，钦宗撤去宣和殿中的珠玉器玩，命郑望之与梁师成送往金营。梁师成以为，离开朝廷几日，也好避一避朝中弹劾他的风头，就答应下来。出使前照例要到中书省领取文书，梁师成以为他是朝廷使者，奉了皇上圣旨的，中书官员不敢把他怎么样，欣然前往。岂知钦宗已先命郑望之到中书递了话去，梁师成一到中书，就被扣留起来，朝廷这才传旨将他贬官，缢死于八角镇。

这一月，白时中罢官，李邦彦做了宰相，人称浪子宰相，金军围汴京，城内大括金银。

二月，发生了陈东上书请求恢复李纲职务，一时群情愤激，殴执政、杀内侍的事。十八日（甲寅），侍御史孙觌上奏说："蔡京四任宰相，前后共二十年，打着继志绍述的旗号，行蠹国害民的实事，祖宗法令已被他破坏殆尽。又行丰亨豫大之说，好大喜功，掀起穷奢极欲的风气，使朝廷积蓄，扫地以尽。还破坏朝廷封驳制度[①]，设置曲学科目，以致言路闭塞，小人充斥朝廷，忠良被诬为朋党。私生活也差劲得很：父子喧争，闺门浑浊，欺君罔上，任情予夺。自古大奸巨恶无人能与蔡京相比。上皇在位时，已洞察他的奸恶，曾四次撤去他宰相职务。无奈他羽翼已成，盘根错节，朝中群小，共同救援，使他始终无事。以致人心怨气充塞，上下解体。外敌入侵，如入无人之境。皇上已当机立断，把王黼等人明正典刑。而蔡京这个罪魁祸首，元憝巨恶，岂能轻轻放过？"

又论童贯、蔡攸的罪恶说："朝廷以童贯为宣抚使，率领数

---

① 封驳：宋制：朝廷颁发命令，由二制（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官员起草文书。二制官员若认为命令不当，有权将命令封还朝廷，并提出驳回的理由，称为封驳。

十万军队北伐，却被辽军残敌挫败，迁延了一年多，最后买回一座空城。他反而以恢复疆土的功劳受了朝廷的大奖赏。辽朝萧太后有意与朝廷结好，派使者韩昉到军营中会见童贯、蔡攸，提出不再要朝廷的岁币，以恢复往日的友好关系。这原是决定国家安危的重要时机，童贯、蔡攸竟擅自决定把韩昉赶出营去。韩昉大呼说：金人若灭辽国，紧接着就会灭宋。如今果然，不仅丢了幽燕数州土地，民力、财力也从而耗尽。”

“后来与金国结好，童贯、蔡攸又招纳叛亡，反复卖国，结怨于金人，给他们南下提供了借口。前年秋季，童贯屯重兵于太原，要取云中诸州县土地，毫无结果。去年冬季，重又出兵。如今金兵入侵，都是童贯一人造成的。蔡攸见边境吃紧，童贯自太原逃归，仍漫不经心，玩寇纵敌，才弄到后来的局面。如今敌人攻到汴京城下，童贯、蔡攸反而携带金帛，全家逃走，全无与国休戚与共的意思。二人的罪过，如天高地厚，愿陛下早日将二人绳之以法，以为乱臣贼子的鉴戒。”

自陈东上书论蔡京等六贼，不知已有多少人上书请求惩治蔡京罪恶。到这时朝廷已不能再拖，下诏书贬蔡京为中奉大夫、守秘书监，分司南京的名义，退休在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居住；贬童贯以左卫上将军的名义退休在池州（今安徽贵池）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

本月李邦彦罢官，张邦昌为宰相。朝中大臣多是六贼党羽，所以宰相换来换去，无非都是奸人。不久再贬童贯，安置于柳州（今广西境）居住。命吏部考核滥赏，凡由杨戬、李彦搞的搜括公田，王黼、朱勔搞的应奉花石等类，童贯、谭稹主持的西北用兵，孟昌龄父子的河防工程，夔、蜀、湖南的开疆，关陕、河东改造钱币，吴越、山东茶盐、陂田之利，宦官引荐的由于“献颂可采”、“效用宣力”、“应奉有劳”等名目参加殿试以及营缮宫观、池苑等名目所授爵赏，全部收回。

三月二十八日（甲午），监察御史胡舜陟等人上奏说：“陛下即位之初，把朱勔贬归田里，天下称颂。但是由于罪重罚轻，士论藉藉，颇为不平。伏望圣断，赐以死刑，籍没其家产，凡所引擢的官员，一概免职，以慰天下人心。”于是朝廷降诏书，将朱勔安置于广南居住，家产籍没。

二十九日（乙未），左司谏陈公辅等人又上奏说：“蔡京父子治国虽无才能，奸险邪佞，为自己打算，满朝文武谁也不能与他相比。若使留在京都附近，他日一旦奸谋得逞，朝臣旧党又都乐于依附于他，陛下再想控制他，也就不能了。愿陛下将他逐往边远荒徼的去处，以安天下公议。”诏命再贬蔡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德安府（今湖北汉阳）居住。对蔡攸先已贬为太中大夫，为劝上皇早日回京，特命蔡攸以此职名随从上皇。胡舜陟当即上书，认为处治不公，蔡攸处罚太轻。可是由于他是上皇随从，处罚太重，只怕未必能够执行。所以建议朝廷将群臣前后所上，论述蔡攸罪行的奏章转给上皇，使上皇知道蔡攸已为公议所不容，留之有百害而无一益。钦宗于是降圣旨召蔡攸入京，并命俟蔡攸到京后，三省另取圣旨，依旨施行。

四月十七日（癸丑）御史中丞陈过庭再奏说，刑罚不公，六贼之中，只有王黼受了大刑，蔡京、童贯都安置于善地居住。朝廷三贬蔡京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安置，再贬童贯为昭化军节度副使，于郴州（今湖南郴县）安置。陈过庭又奏：朱勔父子都安置于衡州一地居住，不妥。诏命移朱勔于韶州（今广东曲江）监管，其子朱汝贤、汝功、汝文、汝明、汝相、汝舟、汝翼以及弟勔分别安置于全州（今广西境）、复州（今湖北沔阳西）等地居住。

二十七日（癸亥），陈过庭再论蔡京父子和童贯罪，朝廷降诏书说：蔡京为众议所不容，可移韶州居住，已是对他第四次的贬逐。同时还移童贯于英州（今广东英德）、朱勔于循州（今广

东龙川），蔡攸贬为节度副使，安置于永州（今湖南零陵）。朱勔子孙分别安置于湖南路。

七月十一日（乙亥），蔡京被第五次贬逐到儋州（今海南儋县），蔡攸放逐到雷州（今广东海康）。凡蔡京子孙分别放逐到江西、湖南偏远州郡，虽遇大赦不得往近处迁移。

对蔡京一贬再贬，是由于臣僚对他的计智都颇为忌惮，认为他天资险谲，善以智计驾驭人主。徽宗时已知道他为人奸恶，不可以国事相托，屡次罢相，终究仍不免于起用他。每次罢职，他必入宫亲见皇上，叩头哀恳，赔罪不迭，毫不计大臣廉耻。徽宗虽不得已再用他为相，却又起用他的政敌如赵挺之、张商英、刘正夫、郑居中、王黼等人，相继任以台谏职务，以牵制蔡京。到晚年，蔡京患得之心更重，在朝中布满心腹，以至盘根错节，牢不可破。只要有立足之地，有丝发空隙，他必有办法感动皇上，再登朝堂。所以大臣一次次建议，必欲把他放逐到海岛之上，永无北还之日而后至。

十二日（丙子），童贯改移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

二十日（甲申），蔡京在赴贬所途中，行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于东明寺中，年八十岁。

二十八日（辛卯），诏命将童贯就地斩首，首级函送京城。童贯行到南雄州（今广东南雄），为使者追及。宣读诏书后就地斩首。不知他是天生异禀，还是练过什么功夫，皮肉如铁，连砍三刀不死。使者没有办法，只好使他枕在门槛上，用刀将首级切下，浸在水银中送入京城，枭示天下。

九月初一日（甲子），金兵攻陷太原城。九日（壬申），臣僚奏称："蔡京蠹国害民，罪恶累累。陛下将他远贬海外，人人抵掌称快。后虽死于途中，刑法已申。蔡攸罪恶，不减乃父。攻辽燕京这一仗，祸殃流被天下；又骄奢淫逸，为史所未有。若不窜逐海外，不足以正其罪。"朝廷因颁诏书，将蔡攸流放到万安军

(今海南万宁)居住。蔡攸行到岭南，皇上又遣使持手扎追至，赐蔡攸死。将其弟蔡修和朱勔一并处死。蔡修叹道："我蔡家误国如此，死有余辜，还有什么遗憾的。"痛痛快快地将御赐毒药一饮而尽。蔡攸却是难下决断，猜想服毒后那一刻，肝肠寸断，疼痛难忍，一定不是好滋味。迟迟不肯下咽。使者给他一条绳，就悬梁而死。

至此，六贼全部死去。王黼斩于辅固村，童贯斩于南雄州，梁师成斩于八角镇，李彦赐死，朱勔处斩，只有首恶蔡京病死于潭州东明寺。天下人都以为便宜了他。据说是由于潭州守臣与他素有冤仇，当他赴贬所路经此处时，便一再阻滞、折磨于他。谁知反倒是帮了他的忙。还有的说是由于蔡京一生作恶多端，但是也有微善，就是在他执政期间，建立居养宅、安济坊、漏泽园等公益设施，使穷苦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积了阴德。这自然是为蔡京涂脂抹粉，居养宅、安济坊、漏宅园的功过如何，当时人就有与蔡党不同的反应。如宋人记载，有一出宋杂剧，演儒释道三教斗法，儒者先登场，说他所学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有如何如何妙用，讲了一遍；道士又登场说，他学的是金、木、水、火、土，称为五行。又把五行长长短短地解释、吹乎一通。接着和尚登场道："我学的是生、老、病、死、苦，称为五化。法理深奥，都是你们没有听说过的，要不要我讲给你们听？"儒、道问："那好呀，敢问什么叫做生？"和尚道："内自太学辟雍，外至偏远州县，凡是秀才读书者，都叫做三舍生。他们住华屋，食美馔，月书季考合了格，再经过三岁大比，就能脱去白衣，换上绿衫。以后就前途无量了。为卿为相，都不足为奇。朝廷讲的'生'字，就是这个意思。"儒、道又问："什么是老？"和尚道："以往孤独贫困的人，必然沦于沟壑。如今建立了孤老院（即居养宅），奉养到死，不必再为衣食担忧。国家说的'老'字，就是此意！"儒、道问："那么病是何意？"

和尚道："人不幸而有病，家贫者不能得到治疗。于是建了安济坊，使病人有住处，并差医付药，务求将他们治愈。国家对于'病'字，就是这样解释的。"儒、道又问："那么死呢?"和尚说："死是谁也逃不掉的，无论贫富贵贱，终有一死。只是贫穷百姓，死后无所归依，暴尸街头，实在可怜。如今都挑选空荒闲地，建为漏泽园，埋葬穷人。无棺木盛殓者还给棺木。春秋二季，官府入园行祭，死鬼也能得沾恩泽。你们看这个死字如何?"儒、道相对而望，都自愧不如。又问："那么苦字呢?"和尚闭目不答，儒、道心想：必是更加深奥，孔夫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老子也说过：强行者有志。如何能不刨根问底，悉心求教?再三追问，和尚才蹙额皱眉，带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说："这个苦字嘛，就是老百姓一般受无量苦罢了。"居养宅等并不能解除百姓苦楚。

六贼虽死，无奈祸患已成。九月蔡京死，闰十一月，金兵再围汴京。第二年春，掳徽、钦二帝而去，北宋灭亡。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李彦传》、《童贯传》、《王黼传》、《朱勔传》、《蔡京传》、《张阁传》、《李邦彦传》等。

黄以周《续通鉴长编拾补》卷51—56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群奸之窜》

周辉《清波杂志》卷2

洪迈《夷坚志》卷7《优伶箴戏》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

二帝被俘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从宣化门（东京外城南三门中的东门）攻入京城汴梁，右仆射何桌要亲率都民巷战，宋使者李若水从金营归，传达金二帅的意思说：不过是要二河土地，别无他意。并要何㮚到金营议和。朝廷遣何㮚、济王赵栩为请命使，入金营，金人也遣使来宋廷，史称“和谈”。

所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如今宋朝都城已破，还有什么“和谈”可言？不过是金兵二帅为避免伤亡，采取和缓一些的方式要宋投降罢了。他们先是要求太上皇（已退位了的徽宗皇帝）入金营，太上皇哪里有这份胆量？改由钦宗亲入金营商谈。金人提出，要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缣帛二千万匹，作为犒军费。朝廷便下令群臣献金帛，诸王、内侍、宫妃，谁都不能例外。金人又向朝廷索要骡马，朝廷也立即下令，现任职事官可留马一匹，其余限三日内赴开封府交纳，隐留不交者，全家以军法论处，首告者有赏。连“御马”一起，总共搜括到七千多匹，全都驱入金营。然后金人又提出割让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解州（今山西境）。这是西路金人南下的通道，宋人的西部屏障，这时也顾不得了，满口答应下来。

其余的事都可答应，只有金银缣帛却不是答应一声就能办妥的。有人统计说，都城中连铜铁在内，也不足金人索要的数目。宋朝廷虽极力搜括，数仍不足，金人声言要纵兵入城自取。钦宗再次入金营求缓期。时为靖康二年春正月。

这时康王受任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四方勤王兵惟他的马首是瞻，不久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的中心。金兵虽锐，总不免一番血战，二帅如何不急？于是扣留钦宗，声言金帛数不齐，便不放还。朝廷闻讯，加紧搜括，不要说普通百姓，连福田院中的贫民、僧道、工伎、倡优各色人均不能免，到正月下旬，开封府汇集总数才得金十三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衣缎一百万匹，距离金索求的数目相差尚远。于是又在相国寺、定力院、保胜院、兴国寺四处设场，命京城百姓每人出米三升、钱六十二文，以抵金银之数。仍不能足，金人也只好作罢，答应二月份在军前交割，这事就算了了。哪知偏在这时，有教坊官员孟子著、周扎义，内侍蓝忻，医官周导隆等人自报说，有窖藏金银，请官府派人掘取。金人大怒说："你们君臣都说城中金银已尽数搜绝，为何还有窖藏金银？"于是下令再搜。十八天后，又得金七万两，银一百一十四万两，衣缎四万匹。已是山穷水复了，金人仍不罢休。二十七日（丁巳）又索要祭天礼器和图籍；二十八日（戊午）索要大成乐器、太常礼器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书籍图画等，无所不要，直搬了四天方才搬完。

自钦宗入金营后，都人每日迎接皇上，自大内到南薰门（旧都南正门）挤满了人，虽风雪不止。钦宗也每天派人回城报信。二月六日（丙寅），金人掘断南薰门道路，钦宗的报信人也久不露面，都人一片惊慌。监国皇太子传出信息说，明日太上皇将亲往金营催促皇上早日回城。不久，翰林承旨吴幵、吏部尚书莫俦从金营中来，传金帅命令说：金主吴乞买（金太宗完颜晟）已将皇上、太上皇废为庶人，命群臣推举赵氏以外的人做头领，由金人册封官号，还要太上皇等人到金营中去。太上皇正要起行，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道："皇上已一去不返，太上皇岂可再去金营。以臣之见，不如由臣挑选麾下精兵，保护太上皇突围，万一成功，可重建军队，再整河山。设或不幸，是为社稷

而死，岂不胜于落入夷狄手中吗?”这番话颇有豪气，但他忘记了太上皇原是贪生怕死的人，若有半分豪气，也不至落到如此地步。终于在巡检使范琼的督促下，与太后一起登上一辆牛车向金营而去，同行的还有郓王以下三千余人。什么王妃、公主都不能免。

都城陷落时，金人曾将宫中太监一起捉了去，经过一番审问，不管事的一概放回，管事的都留了下来。宋朝君臣只道是金帅要仿照宋帝的生活方式，要太监伺候几日，过一过皇帝瘾，毫不在意。这时，吴幵、莫俦传达了金帅的命令，要诸王、妃嫔等到金营中去做俘虏。太子少傅、京城留守孙傅想藏匿几人，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前去充数。谁知金人竟是按宫中名籍索人，少一个也是不成。才知金人日前留下管事太监的妙用。金人命开封府尹徐秉哲负责将宋朝宫中凡有名号的人，不论妃嫔公主，皇子皇孙，驸马国舅，一概押送金营，不得走漏一人。这徐秉哲办事倒也认真，把京城中每五家编为一保，使互相监督，不许藏匿宫廷中人。这样，搜得三千多人，徐秉哲把他们的衣衿结在一起，联成一串，送到金营之中。

在这以前，统制官吴革打算招募死士，保护太子突围。孙傅以为朝廷就这一条根了，太过危险，不肯答应。要把太子悄悄送到民间藏匿起来，另外寻找一名与太子长相差不多的人冒充太子，将他杀了。再杀掉二名太监，十来个死囚，将首级送到金营，伪造一套谎言说：太监欲携太子出逃，遇都中百姓争斗杀伤，误中太子，宋兵已将作乱者讨平，有首级为证。这倒是个好计策，汉高祖刘邦蒙难，就曾有一个与他长相差不多的纪信出来，替他顶缸，使汉高祖得以大难不死，东山再起。可是一连拖了五天，竟无一人主动出来替太子顶缸。又有吴幵、莫俦、徐秉哲、范琼这一帮“办事认真”的宋朝大臣不断催逼，只好作罢。孙傅道：“皇上离去时，要我做京城留守，我又是太子少傅。如

今太子入金营，我不能独留朝中，应与太子同生共死。”于是将朝廷事务委托给王时雍，随太子同行。无奈范琼不肯答应，走到南薰门就把他截了下来。孙傅从此住在南薰门下，表示与太子共患难的决心。后来太子随金兵北去，此公一直随行，不知身死何地。还有一人，值得一提，就是吏部侍郎李若水。钦宗第一次入金营，平安归来，第二次再去时李若水力赞其行，以为无事，自己也陪同前往。哪知这一次不同，再也不能回朝了。后来金太宗下诏，将钦、徽二帝废为庶人。金帅迫钦宗脱下龙袍，换上牛衣。李若水抱着钦宗双腿痛哭，大骂金人不讲信用，如同猪狗一般。金人将他拖出，好一顿棒揍，直打得他满脸开花，昏晕过去。粘罕看他是条汉子，命十几个金兵守护着他，说："无论如何要设法使李侍郎无恙。”李若水醒来后，不饮不食，金人劝解说："世上没有人不能做的事，到哪一步说哪一步也就是了。你这般口出恶言，元帅并不怪罪你。只要你肯稍微顺从些，富贵唾手可得。”李若水叹道："天无二日，忠臣不事二主。我李若水岂能做那不忠不义之人。”随身老仆也劝道："公纵不为自己着想，也当念父母都已年高。只要你肯屈从，还能与父母见上一面。”李若水道："我既以身许国，就不能再顾家了。”过了十多天，金人商议立异姓人为帝事，召李若水询问，李若水又是痛骂一场。粘罕命人把他赶出去，李若水一面挣扎，一面大骂。如此文弱一书生，到此地步，只剩下骂人这一招了。监军把他的嘴唇扯破，鲜血流得满口皆是，他将血吐出，仍是骂不绝口。金人用匕首割去他的舌头，切断他的咽喉，至死方才绝声。金人虽然杀了他，对他的忠肝义胆也颇为钦佩，私下议论说："辽国灭亡时，死义者十多人；南朝却只有一个李侍郎。”其实，这怪不得那些大臣们，田横死，五百壮士皆自杀，汉高祖闻讯后赞扬的是田氏能得士心，而不是五百壮士如何重义轻生。宋朝自立国后，便以大臣为寇仇，想尽各种手段削弱他们的势力，防范他们造反。太祖、

太宗等人甚至派遣秘探监视他们。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皇帝如此对待他们，怎能指望他们为朝廷死难？况且，皇帝不能死社稷，凭什么要求大臣为他们而死？大臣不忠、人心离散，正是宋代社会政策的合理反映。自然，像李若水这种满腔热血、刚烈忠耿的人物仍然是值得人敬佩的。

再说朝中大臣接到金人立异姓的决定后，集会商讨对策，人人不知计将安出。后来议定：暂且答应，随便从军中推出一人为帝，敷衍过这一阵子再说。可是都中百姓已经哄传，金人要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建都金陵。不久将命城中百官、市民、僧道等共同推举，倘若不举张邦昌就要屠城。大臣不知真假，适有左司员外郎宋齐愈从金营归来，众人向他打听金人意向，他写了"张邦昌"三字给众人看，众人才知传言是实。不久金太宗派使者韩正前来册立张邦昌，又遣吴幵、莫俦召集百官在皇城司集会，商议迁都于何处。众人提出二套方案：一是扬州，一是江宁（今江苏南京）。金人命以江宁为都城。

这场选举也真是不易。本来是金人一切都议定了的，册立使已来到都城。二十三日（癸未），又逼令群臣共同推举，立下议状，拜表向金主请求立张邦昌。多数人都在议状上签了字，有心中不愿，签字后又深以为耻，回家后就服毒自杀了的；也有少数人如孙傅、张叔夜等拒绝签字。二十八日（戊子），又命百官作劝进表，劝张邦昌为帝。自执政以下每人都写上一份表明态度，然后合写一份作正式公文，合写的这一份该由礼部员外郎吴懋起草，吴懋推说有病，不肯下笔。让别人代写，谁肯做这种缺德事？正在你推我，我推你之际，军器监王绍越众而前说："这事我早就料到了，赶早不赶晚，如何能拖到今日才写？"说着从袖中取出一纸文书，原来此公早就将劝进文写好了。众人不免私下里切齿痛骂他一番。吴幵、莫俦命司农少卿胡思润泽笔削后，呈到金军二帅那里。二帅见上面写的无非是赞扬张邦昌"学通天

人”，“名高今古”，“身兼众美”，要他不要自谦，免为其难，“上体大金择立存抚之意”，“下副国人推戴为主之望”等等，派人送交张邦昌。张邦昌看了，大骂城中百官不忠，并绝食表示抗议。金人明知他是做戏，也只得陪他玩一玩，假作不允，命十来个士兵守护他，免得他为宋朝“尽忠”寻了短见。

三月初一（辛卯），范琼率领百官、摆开队伍迎接张邦昌，金人派铁骑兵把张邦昌从金营护送到京城门而回，张邦昌与百官互相拜揖、寒暄、道劳不止，独有一个小官：司门郎中徐俯站在一旁，冷眼相看，对这一帮口是心非的家伙不禁作呕，又觉不胜悲哀，向权留守王时雍一揖，脱下官帽交给他，号啕大哭，扬长而去了。

第二天（壬辰），金人命吕好问、何昌言等人为事务官，负责张邦昌即位的准备工作，给三日期限，过三日不即帝位，就下令屠城。张邦昌又假惺惺地要寻死，有人劝道：“相公在城外时不死，如今要以死害满城百姓吗？”张邦昌才无话可说。初三日（癸巳），王时雍申报金帅，愿推张邦昌为帝，请早日行册封典礼。初七日（丁酉）群官齐集文德殿，金人册封张邦昌为帝，册文说张邦昌是“天命所归”，“人情所系”，因此才册封他为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南，除了西夏疆土之外，都归他统管，并要他“世辅王室，永做藩臣”。张邦昌自还有一番做作，不必细述。从此，世上算是又多了一个儿皇帝。石敬瑭地下有知，当不致再感寂寞了。

四月初一（庚申），金兵分两路撤退，将俘获的宋朝二帝、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余人也分作二拨，一拨由东路副元帅斡离不监押，包括上皇（徽宗）、太后（宁德太后郑氏）、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以及高宗生母韦氏、夫人邢氏等，已于头三日出发，沿滑州道北去；另一拨由西路副元帅粘罕监押，包括钦宗皇帝、皇后（朱氏）、太子、妃嫔、宗室以及尚书右仆射何

桌，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少傅孙傅，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御史中丞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大臣，沿郑州道北去，而把其余的如冯澥、曹辅、路允迪等人留给张邦昌。张邦昌率领百官在南薰门外与二帝告别，张邦昌首先恸哭失声，百官、军民也一齐大哭，一时也难得分清谁是真哭，谁是假哭。这时刮起了一天大风，只刮得漫天黄沙、拆屋拔木，更觉凄惨。被金人掠走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如帝后法驾、卤薄、冠服、车辂、大乐、教坊乐、祭器、八宝（印玺)、九鼎、圭璧以及各种文物、图籍(包括太清楼、秘阁、三馆图书和天下府州县地图)、府库积蓄、宫人、内侍、倡优、伎艺工匠等等，还有被驱掳而去的百姓男女不下十余万人。

离京以后，东路太上皇一行分乘百余辆牛车，驾车的都是女真人，彼此言语不通。西路钦宗乘马而行，钦宗以下，人人头戴青毡笠，身穿青布衣，饮食与军中奴仆相同，一路上凄凄惶惶，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兵将的侮辱。但是由于他们信任奸臣，搞得国家残破，老百姓受的苦比他们要深上百倍。如史载金兵南下，纵兵四出掳掠，东自沂（今山东临沂)、密（今山东诸城)，西到曹（今山东荷泽南)、濮（今河南范县南、濮城东)、兖（今山东境)、郓（今山东东平)，南到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汝（今河南临汝)、颍（今安徽阜阳)，北到河朔（黄河中下游以北地区，今河北及山东北部一带)。在这样广大地区中，金人“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京城百姓的状况，更是惨不忍睹，由于久被围困，疫疠流行，死者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城内物价高昂，米每升三百钱，猪肉每斤六千文，一只死鼠价至数百钱。虽是城市，仍是饿殍满地，百姓无以为食，椿、槐等树叶被采食尽，杀猫狗等畜为食，猫狗吃尽，就割饿殍为食，有的气尚未绝，就被剜剔而尽。死尸、残骸，所在枕藉。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闹到这步田地，都是出于这两个“圣

天子”所赐，让他们也受些苦楚还不是天公地道吗？

到幽州以后，金人命徽、钦二帝身穿孝服人阿骨打庙行礼，然后到乾元殿朝见金太宗。中原皇帝把邻国首领捉来后总爱让他们素服入太庙行礼，称为献俘仪。如今金人强大，就难怪他们要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了。接着金太宗封太上皇为昏德公；钦宗其昏加等，爵位降一级，便是重昏侯。这也是中原皇帝的“绝活”。隋文帝灭陈，封陈叔宝为长城公；宋灭南唐，封李煜为违命侯，都是这种把戏。不久，将他们迁到韩州（今辽宁昌图），给田十五顷，要他们自耕自食。绍兴五年四月，徽宗病死于五国城（地望说法不一，一说为吉林扶余）。据《南烬纪闻》所载，绍兴三十年，金主完颜亮与诸王宴饮，辽、宋诸降王都在坐。酒酣，完颜亮先射死辽主耶律延禧，后射钦宗，不死。而后完颜亮与诸王击毬竞射，钦宗死于乱箭马足之下。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徽宗、钦宗纪》、《何㮚传》、《孙傅传》、《张叔夜传》、《李若水传》等。

《续长编拾补》卷 57—60

《系年要录》卷 1—4

《宋史纪事本末》卷 57

黄冀之《南烬纪闻》

高宗嗣统

高宗，名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母韦贤妃。徽宗大观元年（1107）生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内宫中，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拜太保，遂安、庆源节度使，进封康王。康王博闻强记，有胆识。

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的西路军受阻于太原，东路军则势如破竹，于正月初七攻到东京城下。钦宗派知枢密院事李棁等到金军前求和。金军统帅斡离不要求宋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帛各百万匹；尊金主为伯父；割太原（今山西太原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中山（今陕西延安）三镇；以一亲王、宰相为质作为金退兵的条件。钦宗懦弱，一概答应，派少宰张邦昌等为计议使、康王为质，往金军议和。金人疑康王为将帅之子，冒名顶替亲王，要求改派肃王枢替换康王。康王回到东京。

当年八月，金以斡离不、粘罕统军，分两路再度南侵。

九月，西路粘罕军攻陷太原；十月，东路斡离不军攻陷真定府（今河北保定）。二人约定会攻东京。宋廷却是一片主和之声。十月初二，钦宗派资政殿学士、刑部尚书王云出使斡离不军前议和。此时斡离不已知康王确系亲王，要求康王前来议和，王云派随从先回东京奏告。朝中正商议拜康王为兵马元帅留在东京抗金，欲拥钦宗往南避敌。钦宗得到王云报告，只得命康王为议和使、冯澥为副使出使斡离不军前。尚未离京，王云回朝，改派王

云为副使。康王领命回府，对随从说："国家多难，君主忧辱，若可解决问题，义不得辞。"十一月十七日，康王率众离京往真定，经滑州（今河南滑县）渡过黄河到浚州（今河南浚县），金军已渡过黄河到了卫南县（今河南滑县境），距相州（今河南安阳）不过百里。金军派出四百名骑兵邀截康王，得知康王已过黄河数日，只得作罢。相州知州汪伯彦见情况紧急，领兵迎护康王一行入相州。相州军民告知康王，金军已渡过黄河数日，难于追及，请康王留在相州。康王说："受命北去，不敢止于半路。"北往磁州（今河北磁县），守臣宗泽率部出迎。磁州百姓痛恨王云卖国，劝康王说："王云是金人的奸细，想将大王献给虏人，大王千万不要前行，不如起兵勤王。"宗泽也说："肃王一去不返，今敌骑迫近，大王去也无益于事，不如留下。"康王不从。宗泽又请他拜谒嘉应神祠，拜毕出来，行到神祠前，百姓挡驾劝请康王不要继续北去。见王云跟在后面，厉声指责他："真是奸贼！"王云想跑，为百姓所杀，所带议和国书等均遗失。斡离不此时仍不断派骑兵到磁州寻找康王，汪伯彦闻讯，驰寄书信请康王回到相州去。又值参议官耿延禧、高世则也请康王还相州，康王这才同意。伯彦身服礼服，亲率步兵到黄河以北迎接。康王至相州，慰劳伯彦说："他日见到皇帝，一定首先推荐你当京兆尹。"伯彦从此得到了康王的宠信。

十一月二十八日，两路金军攻到东京城下，分驻于刘家寺、青城，将东京团团围住，东京危急！闰十一月，钦宗急派人传诏康王及河北守兵入援，均被金军擒获。相州一带百姓、土豪纷纷请康王募兵抗金，康王推辞道："奉使出来，未得圣旨不敢擅自起兵。"不几日，门下侍郎耿南仲出使割地经过卫州（今河南汲县），卫州人恨他议和，不让他进城。南仲便到相州见康王，诈称面奉皇帝圣旨：让康王尽起河北诸郡兵入卫京城。康王高兴地说："这下起兵有名了。"遂与南仲连衔出榜招兵，得三千民兵。

金军担心勤王兵日增，加紧攻城，以胁迫宋廷尽早议和割地。殿中侍御史胡唐老奏说："康王奉使到磁州，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请拜为大元帅，让他率天下兵马入援。"钦宗即下诏说："檄到之日，康王可充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府知府陈遘为元帅、磁州知州宗泽与相州知州汪伯彦为副元帅，尽起河北之兵入卫东京。"选派閤门祗候秦仔等八人送诏书给康王。八人缒城而下，陆续赶到相州，将诏书交给康王。康王读罢大哭，军民为之感动。随后，使臣刘定也寄蜡诏至，催促康王领兵入援，并告知京城危在旦夕。

十二月初一，康王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以耿延禧、高世则为参议官，河北都转运使张悫、东京转运副使黄潜厚为随军应副，信德府（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扬祖为随军转运使。康王此时有相州所募义士，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河北兵，太原、真定、辽州（今山西辽县）所招溃兵共计万人，分为五军。金军得知康王在河北，恐交割河北之地不成，派三千骑挟签书枢密院事曹辅传钦宗诏书来寻康王。时宗泽在磁州，屡请康王会兵李固渡南下以断金军归路。南仲、伯彦等却说："李固渡小而坚，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且敌归路不可阻挡。"主张去大名。康王允从，率兵渡黄河至大名。宗泽率部二千力战金军，破敌寨三十余座，踏冰渡过黄河，至大名叩见康王说："京城被围很久了，入援不可缓。"梁扬祖率兵三千也至大名，张俊、苗傅、杨沂中等将都在他麾下，康王兵势稍振。兴仁府（今山东曹县）知府曾楙将曹辅所寄诏书传与康王，大意是：金人攻城不已，今正议和好，请大元帅率天下之兵分屯近甸，不得轻动。康王召集部众议兵所向，伯彦等认为议和可信，独宗泽说："这是金军欺诈之计，不过想缓勤王之兵罢了。君父盼望救兵何啻饥渴？若相信他，后悔莫及。应急进军澶渊（今河北濮阳西南），次第前进以解京城之围。万一敌有异谋，我军则已在城下了。"伯彦等认

为金军十倍于宋而围城，控制要道，无以解围；元帅府仅有一万三千兵，应先安顿好康王，待河东兵会合陕西、江、淮之兵，然后两路兵马合力从东北、西南夹击，以解东京之围，主张移兵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伯彦等又忌宗泽主战，要将宗泽挤出元帅府，即请高宗派宗泽率所部进兵澶渊。适金兵进犯相州，康王庆幸自己已离相州，便更加宠信伯彦、南仲等；又闻曹辅还朝，恐金人知己所在，遂同意二人的主张，命宗泽率部进军澶渊。自此宗泽无法参预大元帅府的军政大事了。

靖康二年（1127）正月，康王率众至东平，东平府路安抚使卢益、转运使黄潜善迎入城内。宗泽则率部至澶渊，扬言康王在己军中。金军得报，派兵随宋之中书舍人张瀓至澶渊召康王回京。宗泽命兵士射杀，金兵与张瀓只得逃走。随后与金军进行了大小十三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于是寄信请康王进诸道兵会攻京城。康王只是与一班僚属在东平闲聊古今治乱、军中事情，不予理会。宗泽同时还致信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使范讷、兴仁知府曾楙等，请他们合兵入援东京，三人都视宗泽为狂人，不予理睬。宗泽无奈，只得孤军前进。至卫南，先锋报告前有敌军。宗泽率部迎战，大败敌军，挥兵往东。金军不断增加，前后夹击。宗泽号召："今天进退都是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无疑，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斩敌数千。金军大败，退却几十里。宗泽料敌必乘夜劫营，率部乘着暮色撤退。果然金军夜间劫营，却只得一空营，十分惊恐，自此害怕宗泽，不敢出战。宗泽乘势出其不意，大败金军，打破了金军的围剿。

康王渡过黄河，国人方知康王大致所在，于是勤王兵马纷至而来。康王到东平，已有兵马八万，号称十六万七千，分别由宗泽、杨惟忠、黄潜善等节制，分屯于济（今山东巨野）、濮（今山东濮县）等州。二月，康王派真定总管王渊以三千兵入援东京。康王收到张瀓所传蜡诏，命康王将兵马交给副元帅统管，令

康王回京。后军统制张俊说："这是金人的诈谋，不可信。现在大王在外，这是天意，怎么可以随便回京！"康王在东平一个多月，不知金军已将徽、钦二帝软禁，准备掳往金国，另立张邦昌为皇帝，得诏令不知如何是好。汪伯彦等原即有意请康王驻扎济州，此时趁机提出往济州，趁敌有破绽再进兵。适范讷、赵野合兵南京（今河南商丘）致书康王。康王既到济州，时军饷不济，采纳梁扬祖的建议，印卖东北盐钞，一个月不到，便得到商人纳资百余万缗，解决了军饷问题。

三月，京城金人对大臣吕好问说："康王是我们的眼中钉，已派五千骑兵去捉拿他。"吕好问赶紧派人告诉康王说："大王的部队，估计能击败金军，就打击他们，不能击败他们就远离他们。"又说："大王若不自立继承皇位，恐怕有不当立而立者。"随后，金兵分路进犯济州。康王命都统杨惟忠督兵以待。惟忠埋怨青壮士卒不愿向前，只推老弱之兵向前。康王安慰道："这只是金军的游动骑兵来探我们的虚实而已。"命惟忠督兵于城上，严阵以待；命中军统制张俊以所部为疑兵。金兵闻之而退。康王其他部属也不时与金军进行零星战斗。时黄潜善侦知京城情况，康王闻徽、钦二帝质于金军北去，金军扶立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大哭。汪伯彦乘机请康王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县），准备往江南逃跑。淮宁府（今河南淮阳）知府赵子崧请康王挥兵黄河，待金军半渡黄河时袭其归路，迎还二帝，并问罪僭越之人，极力阻止康王等欲渡长江、偏安南方的想法。康王以汪伯彦为元帅、黄潜善为副元帅，只令宗泽火速连结各路兵马和民兵袭击金军归路、迎回二帝。四月，金军掳走二帝及宗室三千余人，包括康王的母亲韦贤妃、妻子邢夫人，并大量金银财宝。宗泽在卫州得到消息，驰请康王率兵断敌归路，以期半路截击金军，迎回二帝。适宗泽接到康王命令，即率部到滑州、大名，余勤王部队没有一支前来会合，宗泽势单力孤，截击金军、迎回二帝的想法化为泡

影。康王只是传檄安定民心。宗泽只得率部还卫州，准备讨伐张邦昌，并上书请康王继位，重建宋朝廷，随后也到济州。

各路勤王部队纷纷往东京集结，各地民众也奋起抗金，金军加快了撤退步伐。考虑到自己难于统治中原，即将怯懦的宋臣张邦昌扶立为傀儡皇帝，建国号楚，取代宋，企图通过伪楚政权统治中原。但宋朝多数大臣都不愿归楚，张邦昌便也不敢过于放肆，凡事不敢自专。待金军退兵北归后，吕好问对张邦昌说："你应火速派人进推戴状推戴康王，这样城中之臣就是功臣；若为其他各道先推戴，那么城中之臣就是叛臣。为功臣或叛臣在此一举，不可稍缓！"侍御史胡舜陟也说："我看你正位为帝不是出于本意，只是对外迫于金军之威，对内为免百姓于涂炭之苦。现在金军已退，君臣大义怎可一日而废！勤王之兵云集东京，都是为赵氏王朝而来，怎么会听你指挥？应速正名位，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于内，你以宰相身份处理政务于外，派大臣迎请康王继位，并传告将士。"张邦昌料无他路可走，即将城内唯一未被金军掳走的徽宗近属、哲宗废后元祐皇后从私宅迎进宫中垂帘听政，自己行使宰相职权；收回伪楚所颁赦文等文告；封存府库，等待康王复辟；派吏部尚书谢克家携玉玺"大宋受命之宝"往济州劝进康王。勤王之兵正云集东京，大有进攻伪楚之意，张邦昌命修造守城器械。康王担心有人作乱或毁坏宗庙，下令各路兵马已近京城的，不得擅入；未至京城的，立即停止前进。伪楚大臣见状，纷纷请求还复原职，伪楚政权存在仅三十二天即告寿终。

此时被俘的钦宗派人致书康王，让他雪耻。宗室赵子崧请求康王率部移驻南京，说："国家制度没有亲王在外的道理，钦宗赋予大王大元帅的权力，这是天意。今若稍有犹豫，恐四方奸雄乘变而起，届时将难以平定。请大王遵从惯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继承皇位号召四方，这样便可在一个月之内传檄安定国家。"康王僚属也劝康王尽早继承皇位。而康王听说金军以郭药

师为枢密使，领兵一万五千保护张邦昌政权，很是担心，传谕部将不可轻举妄动。随后，在朝大臣、各路军政长官都纷纷劝进康王。谢克家也到了济州，将玉玺和张邦昌的劝进书呈给康王。张邦昌为自己辩解说："权宜一时，以保宗庙社稷。"又说康王有大德，请回东京继位。康王接过玉玺，大哭。僚属们又乘机劝进，康王即命谢克家回京城办理即位用的仪仗物品，此前由邦昌代理政务。元祐皇后又以冯澥为奉迎使、李回为副使，皇后之侄、康王母舅韦渊、邦昌外甥吴何等奉皇后手诏请康王赴东京继位。元祐皇后手诏说：

"由于敌国兴师入侵，致使都城失守，侵凌宫廷，使二帝被掳，并殃及宗室，这大概是神灵的旨意。群臣恐朝中无主，姑且让旧臣张邦昌料理朝政。虽然他义形于色，以死相辞，然而事迫于危难之中，而非得从权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内可挽救一城生灵于涂炭之中，外可缓解邻国威逼之难，保证了九庙的安全，避免了一城的火难。又在衰败的情形下，重建国家于凋敝之中，奉迎建立宫闱，劝进加冕尊位，实行徽宗尚在时的政策，成就钦宗希望兴复的决心。……这是天意，岂在人谋！尚期望中外同心协力，以转危为安，使人民生活逐渐安定，国家趋于太平。播告四方，使大家明确地领会我的意思。"

济州父老也来劝康王在济州继位，康王僚属讨论继位地点，有的说济州，有的说东京，有的说南京，计议未定。值宗泽和应天（府治为南京）知府朱胜非致书康王说："邦昌久在敌营之中，恐其暗中与敌结盟，不可太相信他。南京是太祖兴王之地，是四方的中心，漕运更是方便。"又有二帝派人传告："可告康王继大位，为宗庙社稷计。"康王遂决定往应天继承皇位。

康王率部前往应天途中，鄜延路（今陕西延安）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西道都总管王襄、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等路兵马来会康王。康王一行至南京，不几日，张邦昌、王时雍等奉元祐皇后

之命，令百官到南京谒见康王请罪。康王以客礼相待，安慰道："邦昌及奉命行事之人都不问罪。"内侍邵成章奉皇后之命，将皇帝车乘、服饰等仪物送至南京。康王准备在五月初一举行继位仪式，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1127），并命于府门外筑坛以备登位时用。拜太常寺主簿张浚为赞礼官。

五月初一，康王登坛祷告上天受命，大哭，遥拜二帝，继位于应天府治南京，是为高宗。大元帅府一班僚属朝贺毕，张邦昌领着旧朝百官朝贺。高宗继位，进行大赦：张邦昌及应命奉金之人俱不问罪，只有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不再录用；罢青苗钱；应王命而死者悉令推恩。拜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当天，元祐皇后在东京撤帘不再听政。随后，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生母韦贤妃为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为皇后，限大元帅府十日内撤销。高宗担心金人问罪，并认为张邦昌能随机应变，有功于宋室，拜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封为同安郡王，并令邦昌以天下不忘赵宋而归位于赵宋之意告诉金人。黄潜善、汪伯彦自以为有功于高宗，估计自己可以当宰相。奈二人威望不高，高宗自外召李纲，拜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右相）兼中书侍郎。前朝兵部尚书吕好问因多次劝进康王，时持元祐皇后手诏来贺，康王赞他有保全宗庙之功，被拜为尚书右丞兼门下侍郎。元帅部属都给予官职。此时勤王兵马都在行在南京，王渊、杨惟忠所部河北兵马，刘光世所部陕西兵马，张俊、苗傅所部帅府及降盗兵马，各部互不统一。高宗设立御营司主管行在兵马，以统领军政。命黄潜善兼御营司使、汪伯彦为副使，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韩世忠为左军统制，张俊为前军统制，杨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至此，一个以高宗为首的宋朝新政府重又建立起来了。

（何振作）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高宗嗣统》

《宋史·高宗纪》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朝北盟会编》

定都临安

北宋灭亡后的建炎元年（1127）五月，高宗在应天府治南京继位伊始，宋政权极不稳定。金军不断南侵，首都的奠定成为朝中和、战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主战者主张奠都中原、荆襄、巴蜀、关中等地，以求收复失地，恢复北宋江山；主和者主张奠都江南，以求苟安。及至两河、中原沦陷后，主战者主张奠都武昌、长沙、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地，主和者主张奠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高宗的态度是时战时和，对于奠都之地犹豫不决，最后仍倾向于和，主张奠都临安。

由于大臣们争论不休，高宗继位不久，就诏命成都、东京、襄阳、江宁（府治建康）、邓（今湖北邓县）、扬等州都准备巡幸。高宗的宠臣黄潜善、汪伯彦等极力主张巡幸扬州，认为扬州水运发达；临海，易于避敌；且东南久安，物资丰富。于是高宗下诏说，东京不可去，应当择日巡幸东南。东京留守宗泽则不断上书，请高宗还都东京，以坚守祖宗基业，顺应军民之心、鼓舞士气，最终收复失地。宰相李纲针对金军不断南侵的情况，提出暂都南阳（邓州州治），指出南阳西邻川陕可招兵将；北近京畿可为援，南通荆湖、巴蜀可获资财；东达江淮可运粮草；山川险固，民信物丰，又顺应民心。待收回失地再回京城。大臣朱胜非也认为巡幸东南将无以自保，主张巡幸襄阳。于是高宗又下诏巡幸南阳，表示只奉迎太后、六宫往东南，“朕一定与卿等留在中原，即使都城也可坚守，金贼来了也可与之战。”潜善、伯彦暗

中仍力主巡幸扬州，对高宗说："太上皇的儿子有近三十个，而到今天只存陛下一人，陛下不可不自爱。"高宗颇以为然，二人乘机进言巡幸东南。不久，大臣卫肤敏又上书，说东京遭金军破坏太大，不可再回；扬州太小，离金人不远，不可往；南阳城小，运取粮草困难，也不可往；金人以骑兵见长，不谙水性，而建康是古代都城，外运有江、淮，内控有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中心，有长江天险可据。且东南久安，财物丰富，应以建康为巡幸之地。汪、黄二人也给予支持，大臣们纷纷附和。高宗决意东南避敌，命副都指挥使郭仲荀往京城护卫元祐太后先赴扬州，六宫及卫士家属随行；派人到东京迎奉太庙神主牌位赴行在。八月，在潜善、伯彦等的极力功击下，李纲罢相，大批主和者被起用提拔，他们纷纷主张巡幸东南，主战者的意见都被压制。九月，金军进犯河阳（今河南孟县）、汜水（今河南汜水）。高宗慌忙下诏，择日撤往淮甸。因命淮、浙沿海诸郡增修城堡，招募训练民兵。谍报金军日益迫近，大臣许景衡也说长江天险可据，高宗命扬州守臣吕颐浩整修城池。不久，谍报金军准备进犯江、浙，遂下诏暂住淮甸，待形势稍定再还京城，有敢妄议、蛊惑阻止者，允许告发判罪，同谋与知情不告者斩。十月，高宗率文武大臣离开南京，经泗州（今安徽盱眙东南）到达扬州。

建炎二年（1128）正月，户部尚书叶梦得上书说："防御敌人的条件有三：一是形，二是势，三是气。形主要是指地理山川的有利地形；势以城池的坚固、粮草的充足、军器的精良为根本；气以激励将帅、士卒的斗志为主。形险固则可恃以保守，势强盛则可资以建立，气高涨则可以用兵。如此，敌人都在我们掌心里了。"接着请高宗"南巡，依据长江为险阻，以防不测"。高宗说："扬州离瓜州五十里，闻警报走不迟。"梦得说："扬州河道窄小，仅通一船，恐非一日可过"。又请"命大臣为宣抚使，一驻泗州，总领两淮及东方的部队严阵待敌；一驻金陵（即建

康），总领江、浙各地部队以备将来撤退的护卫之用。”高宗不以为然。五月，宗泽经营东京，联结各方义士，请高宗回京指挥北伐。潜善、伯彦作梗阻挠，宗泽忧郁成疾而死，金军南侵更是无以阻挡。十月，侍御史张浚请高宗先确定六宫居住地，然后陛下以一身巡四方图谋中兴。高宗命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宫、皇子去杭州，以将领苗傅、刘正彦为正、副扈从、副都统制。高宗遂在扬州寿宁寺祭祀其祖宗灵牌。又祭祀上天，以祖宗配享。为此派人到东京搬取大乐、登歌等法物仪仗赴扬州，就在江都筑坛祭祀。时祭祀所需的卤簿、乐舞等多未备齐，只权用军中金鼓代替。随即大赦天下。十二月，太后到达杭州，苗傅将所部人驻扎在奉国寺。此时朝野上下都有请罢潜善、伯彦的呼声，高宗置之不顾，反而拜潜善、伯彦为尚书左、右仆射（左、右相）兼门下平章事。二人入谢，高宗竟说：“潜善当左相、伯彦当右相，朕还担心什么国事不能成就！”金军横行山东，盗贼四起，二人既无谋略，又专权自恣，将东京委之于御史、南京委之于留台、泗州委之于郡守，议事与己不合的概不采纳，有请发援兵的也不告诉高宗。金军越来越逼近南方了，二人却认为是盗贼李成的余党，并不在意。金军了解到这种情况，南侵更无忌惮，并假称自己是李成部以迷惑宋军。大臣张浚认为金军猖獗，一定会来，请高宗尽早渡过长江，将府库所藏移至镇江。二人却嘲笑张浚过虑了。

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将粘没喝攻陷徐州（今安徽凤阳），知州王复战死。大将韩世忠正屯兵淮扬（今安徽邳县），即会合山东宋军驰援濮州。粘没喝得报，分兵万人进犯扬州，自统大军迎战。世忠兵微将寡，乘夜引兵退回驻地，粘没喝追击其后。至沭阳（今江苏境），世忠丢下所部逃往盐城，宋军溃散。粘没喝乘势进占淮扬，以三千骑兵攻取彭城（今江苏铜山），间道赴淮东，攻人泗州。二月，高宗将府库所藏装船，准备离开扬州，城内百姓见状，深为恐慌。高宗下诏，任士民之便躲避金

军。由于船只众多，以至水道堵塞，难以通过。高宗令刘正彦率部护卫六宫、皇子先往杭州。宋军此时毫无斗志，即便金军几百游骑到来，几万宋军往往望风溃散。粘没喝一路攻至楚州（江苏淮安），守臣朱琳出降。粘没喝乘胜往南，攻下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只百余里。内侍邝询得报，驰告高宗。高宗大惊，慌忙披甲乘骑离开扬州，随从只有御营统制王渊、内侍省押班康履等五六骑，城中大乱。吕颐浩、张浚等至瓜州镇（今属江苏江都）才追上高宗，乘小船渡过长江。至江南津口，镇江守臣钱伯言率府兵迎入镇江。此时的汪伯彦、黄潜善率领文武大臣刚听完和尚讲佛经，在都堂会餐，有人问前方情况，二人尚不以为意。及堂吏慌慌张张进来说："陛下已走了！"二人顿时傻了眼，赶紧穿上戎服，率大臣追赶高宗。城内居民也争门而出，被踏死踩伤的人无数。士民恨汪、黄二人入骨，以至司农卿黄锷赶到江边，军士们以为是黄潜善，怒斥说："误国误民都是你的罪过。"黄锷正想辩说，脑袋已被砍下。傍晚，金将马五率五百骑兵先赶到扬州，听说高宗已经南逃，急追至瓜州，未追上便返回扬州抢掠一空，然后屠城。宋君臣仓促出逃，朝廷的法物仪仗都丢失了。太常寺少卿季陵赶紧搬取九庙神主牌位出逃，出城没几里，城中烟火冲天。宋太祖的牌位遗失在路途。金军又将停在江中船上的物资抢掠一空。当晚，高宗宿于镇江府治，因慌忙出逃，护卫也没带几个，晚上睡觉竟无遮盖之物，只以随身所带一张貂皮遮盖。此时陆续赶到的文武大臣不过十分之一二。次日，高宗召集大臣讨论今后去向。吕颐浩请求留在镇江，声援江北的抗金部队，以免金人渡过长江后，宋廷更加狼狈。群臣附和。唯独王渊不赞成，说："镇江只可守一面，假若金军从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占据姑苏（今江苏苏州），那将如何是好？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可据。"于是高宗决定往钱塘（今浙江杭州）。张邵上书说："中原、东南都有抗金的条件，即使不马上图复中原，也应建都

金陵，凭借江、淮、蜀、汉、闽、广等地的物资，以图恢复失地。”高宗不予理会。离开镇江后，经常州、无锡到达平江（今江苏吴县），派人往江北召集卫兵；命朱胜非节制平江、秀州（今浙江嘉兴）兵马，张浚为其副手；又命胜非兼御营司副使，留王渊守平江。采纳胜非的意见，录用张邦昌的亲属，派阁门祗候刘俊民携邦昌原与金军约定的“约和书稿”出使扬州金军前求和。高宗到崇德（今浙江地），拜吕颐浩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让他率兵二千还屯京口（今江苏丹徒）；命张俊率兵八千守吴江。未几，高宗到达杭州，以州治为行宫，下罪己诏，征求意见，赦免死罪以下犯人，发还被贬谪的士大夫；唯李纲不赦，用黄潜善等的计策，以谢金人。朝臣又讨论巡幸地点，王燮请幸蜀，张浚请幸武昌，卫肤敏奏言：“余杭地狭人稠，终非可都之地，请幸都建康。今不如暂往钱塘，派人先经略建康再往。”高宗即派大将杨惟忠守金陵。和州（今安徽历阳）防御使马扩上书说：“前段时间的朝政，错误有四，过失有六。现在希望陛下往西幸都巴蜀，利用陕右之兵，留下大臣镇守江南，安抚淮甸，破除金贼的阴谋，挽回天下民心，是为上策；幸都据守武昌，以襟带荆湖之地，控制川、广之地，招集义兵屯扎于武昌上游，据扼险要的地理形势，暗中约合河南诸路豪杰，允许其将收复之地世袭保守，是为中策；幸都金陵，防守长江口岸，疏通漕运，精练水军，厚待激励将士，以求侥幸一胜，根据敌人的情况，来准备首都的迁徙与否，是为下策。如果依傍长江以为可以恃靠，侥幸于金军不来，在迁都问题上犹豫不决，待到秋冬，金贼再举南犯，驾驶战船在江、淮千里之地数路并进，到那时再来后悔，就无计可施了。”马扩奏言洋洋数千字，都切中要害。但并未引起高宗的注意，高宗只下诏准备巡幸江宁府。此时金军焚烧扬州而退，吕颐浩派陈彦率部渡过长江，袭击金军剩余散兵，收复了扬州。

潜善、伯彦把持朝政，嫉害忠良，罢逐李纲，压制宗泽。台谏、内侍斥责二人，二人即捏以罪名大加陷害。朝廷内外对二人恨之入骨，高宗却为二人甜言蜜语所蒙蔽，不能醒悟。御史中丞张澂上奏论证二人有大罪二十条，致使高宗狼狈出逃，天下愤懑，请高宗罢黜二人。朝廷上下都予以支持，高宗遂罢免二人，潜善为江宁府知府、伯彦为洪州知州，旋又落职宫祠；拜朱胜非为右相。三月，苗傅、刘正彦利用士卒的不满发动宫廷政变，强迫高宗退位，让太子魏国公与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胜非联合朝外的吕颐浩、张浚，组织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兵包围杭州。苗、刘二人见势不妙，引兵离去。高宗复位后，罢胜非，以吕颐浩为右相，命令追杀苗、刘，未几二人被杀。四月，高宗率文武大臣离开杭州，留下郑瑴保卫太后。至常州，颐浩、张浚等请幸武昌；张浩、滕康力主建康，说东南是当今根本。高宗即经镇江到达江宁府，改府名为建康；又派人出使金，表示愿去尊号为藩属，只请金退兵。高宗仍不放心，随后又派出几批使者使金求和。又担心金军再次南犯，于六月命江、淮等地引湖塘之水灌人所开沟洫，以期阻止金军。太后到建康后，高宗下诏说："由于迫近防秋，请太后率领宗室人员迎奉神主牌位去江表，政府各部门与军事无关的并令随行；朕与辅臣、宿将留下防御金军进犯；士民家属南迁的，有关部门不得禁止。"随升杭州为临安府。八月，太后离开建康。高宗得知金军日益逼近，又选派使者出使金军以期阻止金军继续南下，以京东转运判官杜时亮、修武郎宋汝为为正、副使，致书金帅粘没喝，哀求说："古代国家有迫于危难之际的，不过是坚守和逃跑而已。现在我要坚守却无人，要逃跑却无地，因此惴惴不安，希望阁下能怜而赦我。是故前段时间连奉书信，愿削去过去的称号，意思就是天地之间都是大金的国家，尊无二主，您又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呢？"闰八月，起居郎胡寅提出异议，上书说："陛下以亲王弟弟的身份，接受渊圣皇

帝命令，出师河北。二帝北迁，陛下应纠合义师，北伐迎还二帝。奈何一登上大位、建立了太子，就不还都进觐宫阙、省视皇陵，偷安岁月，没有一丝保卫国家的措施。及金骑乘虚入犯，便匹马南渡长江，一向畏畏缩缩，只计划远逃，以致军民怨言四起，这恐怕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因上七策：一、罢和议，修武备；二、置行台以区别轻重缓急的事务；三、务实效，去虚文；四、大举天下之兵以自强；五、幸都荆、襄以决定根本大计；六、选宗室中有贤能者，任之于封疆大吏以为国用；七、保存国家固有的纲常以建立国家体制。吕颐浩等恨他刚直，罢免了他。金军并未停止对宋的进攻，高宗想以建康为都，又担心金军从其他地方来犯。张俊、辛企宗即请经鄂、岳幸都长沙；韩世忠说："国家已失河北、山东等地，若又弃江、淮，将还拥有什么地方？"吕颐浩说："金人的用意是以陛下所至之处为战场，今应且战且避，奉陛下至万全之地。臣愿留在常、润（今江苏镇江县）死守。"高宗说："朕左右不可无相。"命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镇江，刘光世守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贵池）。时太后到达洪州（今江西南昌）。考功员外郎娄炤上书说："今日之计，当思量古人量力而行之语，了解军队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去向，力量可以保住淮南，则以淮南为屏障，权都建康，慢慢地图谋中兴；力量不可能保住淮南，则以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精蓄锐。"高宗于是一意幸都临安，不再防守淮南了。

高宗于九月离开建康到平江府，十月到达临安，旋至越州（今浙江绍兴）。金军对高宗的求和不予理会，并加紧造战船，准备从海路进犯江浙。高宗即下诏说："国家近遭金人侵逼，没有一年没有战争。朕继位以来，天天考虑父兄披难，民众没有安抚，不想使国家陷于战争之中，因此忍辱负重躲避敌人，希望其欲望得到满足而回去，以使国家稍得安宁。从南移至淮甸，从淮甸移至建康，进而到会稽（即越州），远远地避开敌人已到海边。

以卑下的言词、丰厚的礼物出使金人，以至还愿意去掉尊称，甘心受贬委屈自己，请用其年号犹如藩属，遣使苦苦相求罢战，极尽委曲以求全。即使金石无情也应有所感动，连年委曲求全，却始终未见允从，人民痛苦之声四起，何时能够安宁？今诸路兵马聚集于江、浙之间，朕不怕亲自出马扼据要害之地。假如金人尚容朕为你们的主子，则朕对于国事敢有不恭之处？金人若一定要用兵，窥伺我的行在，倾覆我的宗室，涂炭生灵，取尽东南的财物、人民，那么朕又怎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而不临战以实现我过去许下的诺言，保全众生！朕决定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往浙西迎击敌人。希望将士、民众念及国家养育之恩、二帝被掳之辱，避免烧杀抢掠之祸，与其束手待毙，不如齐心协力共同谋划，奋勇战斗以保存国家！”金军已几路并进，渡过长江，一路攻下吉州（今江西吉安），太后逃往虔州（今江西赣州）；一路攻下六安军（今安徽六安）。高宗大惊，至钱清镇（在浙江绍兴西），将往浙西亲征。满朝文武有的才到曹娥江，有的已到钱清镇。侍御史赵鼎极力劝谏高宗以其众寡不敌，不如避敌。高宗便又还越州。此时金军攻陷建康，情况紧急，吕颐浩献计取海路至明州（今浙江鄞县）避敌，说：“敌军多骑兵，不可能乘船追袭；江、浙之地又热，敌人不可能久留。待敌人退兵再还二浙。”高宗遂于十二月到达明州。金军至临安，得知高宗去处，追至明州。朝中决定航海避敌，高宗乘船至定海（今浙江镇海）、昌国（今浙江定海）等地。金军尾随而至，攻下二地，并以水军追袭高宗于海上，幸为宋水军击退，高宗方得脱险。建炎四年（1130）正月，高宗索性驾船于海上。二月，金军攻陷东京，宋继失两河又失中原。高宗随后到达温州（今浙江永嘉）、台州一带。金军在宋军和各地义军抗击下，大肆掳掠后退兵江北。高宗召集群臣讨论巡幸地点，吕颐浩说：“将来应幸都浙右，慢慢图谋进入蜀。”范宗尹说：“若进入蜀，恐怕东南、蜀地均会丧失。只有占据江表，图

谋关陕，则两得。"高宗称好，于四月至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七月，金人扶宋叛将刘豫建立齐政权，以为傀儡代统中原。八月，太后回到越州。十一月，高宗率百官遥拜二帝，自高宗渡江至此，才开始有此礼节，以后每年元旦都行此礼。

次年（1131）改元绍兴。四月，太后病死。九月，在明堂祭祀天地，以太祖、太宗配享，因驻在会稽不久，渡江带来的旧乐所剩无几，太常寺只权行望祭礼。十一月，吕颐浩请幸都临安。绍兴二年正月，高宗到临安。吕颐浩、义军首领桑仲等请兵攻齐，高宗不许，只要求和保江南。至绍兴四年（1134）九月，高宗在明堂祭祀天地，由于连年战争，祭祀所用仪物都非常简单，随着国势渐安，物资逐渐丰富起来，国子丞王普提请完备乐舞，礼乐之事又恢复起来。此时齐因屡攻襄阳不下，与金合兵南侵。高宗以赵鼎为右相，将后宫迁往泉州（今福建晋江），下诏亲征，前往平江府指挥，并定刘豫伪逆之罪。金齐联军在宋军抵抗下退兵，高宗于绍兴五年二月还临安，命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此时太庙神主牌位寓于温州，每年只派大臣祭祀。司封郎中林待聘说："祭祀神主的礼节应在都城进行，今新都城尚未奠定，请根据古代类似情况，将神主牌位迁至行都，以彰孝顺。"高宗即令在临安建太庙，派太常寺少卿张铢往迎神主牌位，高宗迎出城郊行款谒礼。侍御史张致远说："建太庙于临安，便失去了收复国土的大计。"殿中侍御史张绚也说："去年在临安建明堂，今年又建太庙，是想以临安作为久居之地，不再有意中原了。"高宗不予理会。至绍兴六年（1136），张浚上书，称"东南地理形势以建康为最重要，实是中兴失地的根本所在。倘使人主居此地，北望中原，不忘仇恨，时刻准备北伐，人们便不敢沉于安逸。临安地处偏僻之地，人主居于此，对内易生奢华，对外不足以号令远近之地、系住中原民心。请陛下幸建康，安抚三军，以图恢复失地。"高宗就于七月在建康建行营，命秦桧为行营留守、孟庾

为副留守。九月派人将神主牌位安置于平江，随下诏亲征伪齐。至平江，张浚又请幸建康，赵鼎则请还临安。此时韩世忠、岳飞大败伪齐，高宗尝到了一点抗战甜头，罢赵鼎，于绍兴七年(1137)正月下诏幸建康。三月到建康，岳飞请统帅淮西之兵收复失地，高宗本想支持，但秦桧担心岳飞合兵生变，即罢此事。四月，在建康修筑太庙。九月，将领王德叛齐，张浚被罢，复拜赵鼎为左相。赵鼎又请还临安，高宗便准备经平江到临安。绍兴八年（1138）正月，李纲上书，认为平江离建康不远，徒有退避之名，不应轻动，说："臣闻自古用兵以成就大业者，必先稳固人心，振奋士气，占据有利地形而不先退却，竭尽人力而不肯先屈服。因此楚汉相恃于荥阳、成皋之间，汉高祖虽然屡败于楚，但并不先退避尺寸之地；割让鸿沟后，项羽引兵往东，遂有垓下之败。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曹操虽然兵弱粮缺，但荀彧却制止他退避；待焚烧了袁绍的辎重后，袁绍引兵先退，遂大败于河北。由此看来，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而望风怯敌，竟自退避屈服？果然这样的话，回避之后，人心动摇，没有信心，士气萎靡，没有斗志了。我退彼进，则敌人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便归附敌人，敌人则如虎添翼。到那时，陛下即使想像从前那样返驾回辕，再建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就不可能了。如果敌军冲突而至，不得已以退避为权宜之计还说得过去。今疆场上并无警报，兵将并无失利，朝廷正可总结经验教训，修军政、严明号令，更加勤于固守。今却如此急忙退避，弃前功而蹈后患，这是自取灭亡，岂不是十分可惜的吗！"高宗并不理会，只召集大臣讨论还临安事宜。张守说："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城，气势雄伟，并可占据都会以经略中原，依据险阻抵御强敌。陛下在建康席子还未坐暖，今又准备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劳之苦，民力国用有烦费之忧。希望稍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赵鼎等则极力劝请

高宗还临安。高宗当即下诏离开建康，不几日到达临安，自此定都临安。

（何振作）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南迁定都》
《宋史·高宗纪》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朝北盟会编》

李纲辅政

李纲，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及第，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言事忤权贵而遭贬。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军大举南侵，李纲上御戎五策，得拜太常寺少卿。次年钦宗继位，李纲力主抗金，被拜为兵部尚书，旋被拜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在主和派的竭力攻击下，很快罢官。一时朝廷内外哗然，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力请恢复李纲职务，主持抗金。钦宗无奈，复用李纲。李纲复职后，全力组织军民抗战，打退了金军对京城的进攻，被拜为知枢密院事。主和派深忌李纲，怂恿钦宗任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督军支援被金军包围的太原城，其实是将李纲排挤出朝。李纲入援太原，徒有节制之名，军队皆听命于朝廷，以致出师未捷便被贬为观文殿学士、扬州知府，继又谪亳州、宁江等地。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军再次南侵。情急之中，钦宗又拜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开封府尹，召李纲回京任职。李纲遭贬离京至长沙接到命令，即率湖南勤王部队入援，尚未到京，京城已经失守，二帝被掳去。

建炎元年（1127）五月，康王在南京即位，是为高宗。因李纲德高望重，拜为尚书右仆射（右相）兼中书侍郎。主和派力阻李纲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连上三本奏章，说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为相。御史中丞颜岐更是连上五本奏章，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封为三公郡王，但还应加封同平章事，

以增重对他的礼遇；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任宰相，但应趁他尚未到任罢免之。”高宗则说：“朕继承皇位，恐也非金人所喜。”颜岐等语塞而退。却将奏章封好，派人送给李纲，以期阻止李纲至南京。黄潜善、汪伯彦自认为有辅佐拥立高宗的功劳，估计自己可当上宰相。不料高宗认为二人威望不高，自外召李纲为相，于是怨恨李纲。李纲接到任命以后，只率几百人前往南京，于路途中上书说：“兴衰拨乱的帝王，非有英哲不足以当此任。英即思想坚定，敢于面对一切困难，不因小的失败而动摇；哲即远见卓识，能大胆任用君子，不被小人离间。愿陛下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本朝太祖、太宗为榜样。”将到南京，收到了颜岐等的奏章。高宗派人迎接。六月初一，李纲到南京，一见高宗泪如泉涌，高宗颇为感动。李纲奏道：“金人不讲仁道，专以阴谋取胜。我们却不能悟解，一切都中了他们的计。仰赖天命未改，陛下总领军队于外，为天下所拥戴。内修外攘、迎还二帝、抚慰国人的责任在陛下和宰相。臣自视缺点很多，不足当此任。且臣在途中，颜岐送来劾臣的奏章，说臣为金人所恶，不足为相。外廷议论如此，臣怎敢当此大任，请让我回去吧。”高宗道：“颜岐曾说这些话，朕已斥退他，这事不用担心。”李纲还是力辞，高宗说：“朕知你忠义智略很久了，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你为相不可，请不要推辞。”李纲顿首拜谢，仍未接受任命。上书说：“当初唐明皇欲拜姚崇为相，姚崇以十事为前提，都切中时弊。如今济世救危，图谋中兴的大功都在陛下而不在臣。臣今也以十事进说，陛下看能实行的就付诸实行，臣方敢受命。”十事即：一议国是。中国防御周边国家的原则是能坚守方可与之战，能与之战方能与之和。而靖康末期抛弃了这一原则。现在想与之战则力量不够，想与之和则不可，不如先自治，专以守为策略，待我国政事修好，士气大振，方可议战议和。二议巡幸。陛下不可不往京城以谒见宗庙、安慰百姓，若实在不可往，再考虑

巡幸。根据当前形势，巡幸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应诏令有关部门预先筹备。三议赦令。前代帝王登极继位，所颁赦令都有一定格式。前日陛下登基所颁赦书，只是效法张邦昌的伪赦文，如赦恶逆罪及因罪罢官者尽复官职，都是泛滥不可行的，应全改正过来。四议僭逆。张邦昌为国家大臣，不能为国死，却挟金人势力改易国姓、国号，应正其典刑以戒万代。五议伪命。国家适逢此大难，很少有仗义死节之士，接受伪官、卑躬屈膝在伪廷者不可胜数。当初唐肃宗平贼，将受伪命者分六等定罪，应加以仿效以激励士风。六议战。国家军政久废，将士怯懦懒惰，应严明赏罚，使纪律一新。七议守。敌人贪婪狡诈，势必再来，应在长江、黄河、淮河沿岸严密设防，以扼制敌人进犯。八议本政。朝廷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应统一归中书，以保证朝廷尊严。九议久任。靖康年间起用或罢黜大臣太快，功效甚微。应慎重选择大臣并使之任职长久，以使功效显著。十议修德。陛下刚刚嗣统，应更加注意孝悌恭俭，以不负国人期望而达到中兴国家的目的。

次日，高宗将李纲所上十事交大臣们讨论，只有僭逆、伪命两事没有通过，其余付之实行。退朝后，李纲留下对高宗说："此二事是今日刑政中的大事。邦昌在徽宗朝中供职了十年，钦宗又提拔他为宰相。当国家祸难当头时，金人谋改国姓，邦昌如能以死守节，阐明天下人拥戴宋室的正义，以感动金人之心，敌人未必不悔而保存赵氏。邦昌自以为得计，堂而皇之地登上皇位，建立国号，居于宫中，擅降伪诏阻止四方勤王部队。待知道天下人不愿臣服他时，才不得已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奉迎陛下您继位。邦昌僭越的始末就是这样。而议论此事的人却有不同看法，臣请以《春秋》所立法规来论断此事：《春秋》法规是'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当初赵盾不讨叛贼，《春秋》论之为弑君。今邦昌僭位建号，敌人已经撤退却阻止勤王部队拦截，就不只是

将与不讨贼了。刘盆子因是汉朝宗室，被赤眉军拥立。随后他以十万兵归降，光武帝只优待他不死。陛下想成就中兴的事业，却尊崇僭逆之臣，以此昭示四方，天下忠义之人怎能不为之涣散？又有接受伪命的大臣均不问罪，如何激励天下的士大夫为国尽节？请尽早将此二事付之实行。”高宗道：“执政当中有与卿论不同的，以后再议吧。”李纲争道：“有与臣论不同的，请让臣与他们在殿中辩论。若臣理屈，将不再说此事。”高宗只得召黄潜善、汪伯彦、吕好问等上殿，将李纲的态度告诉他们。潜善竭力偏袒邦昌。高宗对吕好问说：“卿前时在围城之中，知道他僭越的原因，你认为怎样？”好问附和潜善，持论首鼠两端。李纲驳斥说：“邦昌僭逆，岂可留在朝中？假若他走在路上，人们都会指着他说：‘这也是一个天子啊！’”又悲愤地说：“臣不愿与邦昌同列朝中，倘与之同列，定以笏打他。陛下定要用邦昌的话，臣请辞官。”高宗很受感动。伯彦说：“李纲性格刚烈，臣等不如他。”高宗遂说：“卿欲如何处置他们？”李纲答：“邦昌之罪理当斩首，陛下因他自动归服，可免其死，将他贬至边远之地；受伪命之臣，则甄别其罪行大小，按等谪降。”高宗即贬邦昌为昭化军（今陕西安康）节度副使，后赐死于潭州。又将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李擢、孙觌分别贬于高（今广东茂名）、梅（今广东梅州）、永（今湖南零陵）、金（今广西桂林）、柳（今广西柳城）、归（今湖北秭归）等州安置；颜博文、王绍以下受伪命臣僚都甄别罪行大小判罪。攻击李纲的颜岐被贬至亳州（今安徽亳县）明道宫，范宗尹贬为舒州（今安徽潜山）知州。高宗又采纳李纲意见，在行宫外置检鼓院，传递四方奏章。李纲又奏说：“近来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道维护君臣礼义。靖康之难，仗义死节者，在朝内只有李若水，朝外只有霍安国，请加以追封。”高宗遂赠若水观文殿学士，谥忠愍；安国延康殿学士，刘韐资政殿学士。诏命各地：有死节者，寻访上报。

李纲这才接受任命，高宗又命他兼御营司使。李纲一上任，奏道："今国势与靖康时相比相差很远，但我们仍可依靠陛下英明决断于上，群臣合力辅弼于下，国势中兴不久便可图谋了。然若无规模和不了解轻重缓急的次序，则不可能成功。对外防御强敌；对内镇压群盗，治理军政，改变士风，增加国家财力，减轻人民负担，改正弊政，裁减冗官，严明号令以感动人心，赏罚有信以振作士气，选择将领搞好军备，选择地方官吏执行新政。待政事修好，然后可问罪金人、迎还二帝，这就是所谓的规模。至于当今居先的急务，则在于治理河北、河东，因为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治理得差不多了，中原便可保住，东南才能平安。今河东所失之地为恒（今山西大同）、代（今山西代县）、太原、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汾（今山西汾阳）、晋（今山西临汾），其余州郡尚存；河北所失为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都在我们手中。两路士民兵将都拥戴宋，他们决心很坚定，都推豪杰为首领，多的有数万，少的也不下万人。朝廷不乘机置司遣使大加抚慰，分兵解救他们的危急，恐他们粮尽力竭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援兵不至，危迫无处可告，也定会怨恨朝廷。金人乘机抚慰并利用他们，则成为金人的精兵了。不如在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选择有才略者充任，让他们去宣扬天子的恩德，表达不忍抛弃两河予敌国的决心。有能够保全一州、收复一郡者，任之为节度使、防御、团练使，像唐代方镇的制度，让他自加守卫。这不只是断绝他们从敌之心，且可凭借他们的力量来抵御敌人进攻，使得朝廷永无北顾之忧，这是今天最急要解决的问题。"高宗即下诏安抚百姓，蠲免赋役，改正弊政，招安群盗，惩办赃吏，召还靖康间被罢的忠勇敢言之士，设立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又问谁可任河北招抚司使和河东经制司使。李纲推荐主战又能战的张所为河北招抚司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司使。张所与潜善有仇，潜善不同意任用

张所，推荐亲信马忠，并要让他节制军队渡河与金军战，解两河之围。李纲指出，今我军尚弱，不宜立即深入，且马忠不堪此任，不如让他与张所共同负责此事。又做潜善的工作说："您能先国家而后私怨，这在古人也是很难的。倘您能这样，岂不是一件美事？"潜善这才同意，高宗遂任张所、马忠为河北招抚司正、副使。

高宗儿子旉降生，照例要大赦天下。李纲说："陛下登基大赦时，独遗漏了河北、河东。两河兵民为朝廷坚守边疆，朝廷所颁赦令却不及此地，人们都说朝廷已遗弃了此地，这怎能安慰那些忠臣义士！还有勤王部队在路途半年，拥甲荷戈，冒着风霜雨露，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加上还有病死的，恩惠却不施及他们。倘以后朝廷有急难，怎么使用他们？希望趁此大赦，将恩惠施及此地，广示朝廷对他们的恩德和仁义。"高宗从其请，于是两河兵民群情激昂，间有破敌捷报传来，金军往往引退而去。

针对军力的薄弱，李纲提出三议：其一募兵，其二买马，其三向民众募资补助军费。说："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内外禁军有五十九万；今却势单力薄，如何抵御强敌和镇压四方？不如向东南富庶之地募资财；向西北强壮丁口中募士卒，若能募得十万，交给将领们时加教练，不久就可成为精兵，这是最先的急务。"高宗即命陕西、河北、京东、京西路募兵十万，屯戍于要害州郡，轮流入卫行在；命河北西路括买官民马匹；向东南募资助军。李纲又在军队中建立严格的军事组织，以五人为伍，伍长用牌写下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用牌写下所属五位伍长姓名；百人为队，队将用牌写下所属四位甲正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用牌记下所属十位正副队将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用牌记下十位正副部将姓名。招募建立的新军和御营司兵一并如此组织，请诏陕西、山西各路部队也按此法组织。凡有命令，都按牌所记派遣。由此改变过去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现

象。接受右正言邓肃之请，在三省、枢密院设赏功司，申明军纪数十条，以明赏罚。极力保荐宗泽为东京府尹，让他重整京都，加强京都防卫。接着上书说："步兵难胜骑兵，骑兵难胜战车，请将战车造法、战法颁行于京东、京西路，让该地造出战车，教习战法。"请令各地修整城池，整治军器。希望在黄河、淮河、长江沿岸一带根据地方的重要性分别建立帅府、要郡、次要郡的武装力量，以期全国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发行度牒盐钞通商贾，使帅府有三年、要郡有两年、次要郡有一年的积蓄。根据金军不谙水性的特点，在江南造船，建立水军。高宗都给予支持。

在李纲的要求下，高宗生活节俭，减少地方进贡；募民耕种东南官田，受招安愿归农者也给田佃种；将陕西地方兵农时耕种、闲时操练、战时出兵之法推行全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将学官馆职数减少一半，常平司并入提刑司、市舶司归入转运司，罢诸州分曹制掾之职，县不满万户的不置县丞，朝官俸禄减少三分之一，执政官子弟荫子任待制官以下的悉予罢免。

靖康时，钦宗派张所携蜡诏突围出东京，到河北募兵。当地百姓高兴地说："朝廷抛弃了我们，还有一个张察院举用我们。"应募者达十七万，张所之名由此声震河北。高宗继位后，派张所视察宋室陵墓。张所返回后，上书说："河东、河北是天下的根本，当初国家误用奸臣计谋，始割三镇，进而割两河，当地民众对此恨之入骨，至今还愤愤不平。若乘势利用这种情绪，则可利用他们的力量保卫两河，否则两河兵民便无所寄望，陛下的事业也就远去了。"并请高宗还都京师，如此则有五利："一可奉祀宗庙、保卫陵墓；二可安定民心；三使四海之人觉得有希望；四可摒除人们认为朝廷有割河北的疑虑；五可早有安定之所，一意巩固边防。国家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和将相贤与不贤，而不在于迁都与否。若军队弱小、将士不贤，即使渡过长江南幸，也难以自

保!”张所因李纲推荐，任河北招抚使，赐内府金钱百万缗，并给空名千余道，拨给京西士卒二千自卫，将佐属官允许自己选任，一切事务可根据情况从权处理。张所请置司于大名（今河北大名），待一切准备就绪再渡黄河。高宗从其请，张所率部往东京筹备。张所到东京，招抚各地豪杰，提拔八字军首领王彦为都统制。此时岳飞上书说：“陛下已登大位，国家有了主心骨，已足以成功讨敌之谋，且勤王部队日集。金人向来认为我军弱小，应乘其怠慢之机攻击之。黄潜善、汪伯彦不愿执行陛下恢复国土的大业，天天谋划南幸，恐不负中原兵民之望。愿陛下乘敌人占领我地未稳，亲统六军北渡，则将士士气大振，中原便可恢复。”潜善、伯彦以越职论国事撤岳飞官职，岳飞便投张所。张所任岳飞为中军统领，又问岳飞：“你能对付多少敌人?”岳飞道：“勇不足恃，用兵在于先定计谋。春秋晋将栾枝以战车拖曳树枝假装逃跑之计击败了楚，楚之莫敖（官名）屈暇以不保卫砍柴人的计策击败了绞，都是先确定了计谋。”张所为之一振，说：“你绝非行伍中人。”岳飞趁机对张所说：“国家奠都汴梁，依恃河北来保持稳固。您若能率军兵临此地，我唯命是从。”张所大喜，借补岳飞为武经郎。

李纲的政策在朝廷内外的一些大臣的攻击中艰难地推行着。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为讨好黄潜善，上书说张所发放武器给士兵，骚扰地方；说自建招抚司于河北，该地盗贼更加猖獗。李纲驳斥道：“张所尚留在东京招集将佐，益谦怎么知道他骚扰地方?朝廷因河北民众无所归属，聚众为盗，才设立招抚司，以借其力为国效用，难道是由于设立了招抚司才有了盗贼?今京东、京西路盗贼四起，攻城夺县，难道也是招抚司的过错?今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朝廷欲有所作为，益谦竟敢如此攻击，肯定有人主使。”高宗命益谦反省。命令下到枢密院，伯彦、张悫仍以其奏请难招抚司。李纲痛加驳斥，二人无言以对。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公然指

责李纲募兵、买马、募民出资助军之事，高宗未予理睬。会朝中正惩办僭逆、受伪命者，齐愈因第一个劝进张邦昌僭越，遂受斩。

此时潜善、伯彦竭力主张巡幸东南，高宗即下诏，择日巡幸东南。李纲劝道："陛下巡幸之处，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即使不愿执行上策，也应执行中策到襄、邓之地，以昭示不忘故都、不负天下人心。不然，中原不再为我所有，陛下还京更是遥遥无期。"宗泽也反对南幸。高宗表示："只是想迎奉太后及六宫往江南，朕与卿等留在中原。"下诏准备还东京，闻者感动。不几天，高宗在潜善等鼓动下，又改变主意，准备巡幸东南。李纲极力劝阻说："自古中兴帝王，起于西北则足以占据中原而后拥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可能匡复中原而后拥有西北，因为天下的精兵良马都在西北。若弃中原于不顾，那将不仅是金人乘机进犯，盗贼也将蜂拥而起，跨州连邑，那时陛下想还都也不可能了，况还想治兵胜敌、迎还二帝？南阳（今河南南阳）是汉光武中兴之地，有高山峻岭可以据守、宽阔的城池平原可以屯兵，西邻川陕可招将士，北近京畿可入援，南通荆湖、巴蜀可获资财，东达江淮可运粮草。山川险固、民信物丰。请幸此地，待两河安定后还都汴梁，今计策无出于此。今乘船顺流到东南，固然很安全方便，只恐一失中原，东南不能保证无事，即使退保一隅也不可能。况曾降诏允许留在中原，人心大快，为何诏书墨迹未干就背弃那样大的信义！"高宗无奈，下诏准备秋末巡幸南阳，命范致虚为邓州知府，修整城池、营建宫室、储备金钱粮草。潜善、伯彦暗中仍力主巡幸扬州，适卫尉少卿卫肤敏说京城、扬州、南阳都不可往，只有建康才是巡幸的好所在。二人因他也主东行，便表示赞成，朝中大臣纷纷附和。高宗便又改变主意，准备巡幸东南。有人对李纲说："大臣们议论纷纷，说巡幸东南已经决定，南阳还可再提吗？且顺从他们，不然，事情可能有变

化。”李纲答：“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家存亡从此可以区分开了。如果是这样，我当以去就来据理力争。”李纲遂在朝后进谏说：“臣近来看见陛下屡次改变计划，已决定的也多未实行，肯定有人从中作梗。”又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疑则不用，用则不疑。高宗已不愿再纳李纲之言，只是劝勉李纲一番，李纲怅然而退。八月，高宗任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潜善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李纲曾与高宗谈论靖康时的事情，高宗问：“钦宗勤于政事，常常审批奏章通宵达旦，最后仍被金人掳去是什么原因？”李纲说：“皇帝的职责在于了解人，纳进君子、黜退小人，则大事可成。否则，再勤于政事都无济于事。”乘机勉励高宗对大臣应明察和宽容，生活俭朴以节约国家财用，英明果敢地决定大事。高宗很乐意地接受。李纲进言都很坦率刚直，高宗起初无不接受。至此因惑于潜善、伯彦之言，常将李纲进言的计划压下不用。吕中说：“自从李纲入朝为相以来，以英哲全德勉励高宗，以内修外攘为己任，多次上书抗说忠言，都切中时弊。和守之议确定使国策明确，惩办僭逆、伪命之罪使士气大振，都城的确定使人心安定。其他如改变士风、确定政策、改正弊政、招兵买马、占据险要；派张所招抚河北、王燮经略河东、宗泽留守京城；西顾关、陕，南治襄、邓，并派将领占据战略要地，以此作为坚守中原的计划。朱熹‘李纲入朝为相，方称得上朝廷’的说法，正是基于此。”

此时傅亮率部三千刚离开行在十几天，潜善等又攻击傅亮逗留不前，命东京留守节制傅亮，让他马上渡过黄河。傅亮上书说：“今黄河以北多被金军控制，而我尚未准备就绪便率此乌合之众渡河，不知何处可扎营、何处可筹粮，恐会误了大事。”李纲也为傅亮说明原因，潜善等不以为然。李纲说：“招抚、经制二司，是臣提议建立的，张所、傅亮也是臣推荐的。今潜善、伯

彦攻击了张所，又攻击傅亮，其目的就是攻击臣。臣每鉴于靖康时因大臣不和，以致误事，所以臣议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讨论后再实行，不知二人却如此用心。像傅亮这件事是很明了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高宗不听，只说傅亮违期多日，批示：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召傅亮还行在。李纲将御批奉上说：“像傅亮这种人才难得，他智勇双全，今尚未用他就罢免他，古人用将恐不是这样。”随上书请罢自己，高宗不语。李纲又奉上御批说：“陛下罢傅亮，请将御批交潜善执行，臣也请归田里。”李纲退朝后，听说傅亮已罢，又上书请罢自己。高宗仍不同意，说：“卿所争只是小事，为什么要这样？”李纲说：“皇帝职责在于选任一宰相，宰相职责在于荐进人才。当今人才以将帅为最急，恐非小事。若认为是小事，臣以去就为他争理，陛下却不同意，而臣又怎敢不离去？潜善、伯彦自认为有辅佐陛下登基之功，而陛下却虚相位以召臣，他们对臣已恨之入骨了。待臣议论伪楚，请求治理河东、河北两路，说陛下应留在中原，都与他们意见不合，他们更是对我愤恨不已了。然而臣是东南人，难道不愿陛下巡幸东南使臣更安全方便吗？只是考虑一离中原，后患是不胜言语的。愿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国人生命安全为念，以二帝尚未迎还为念，不要因臣离去而改变既定国策。臣即使离开陛下，也不敢一天忘记陛下。”又上书请罢己，悲痛地辞退出朝。有人对李纲说：“您以进退来请皇帝决定此事，对于礼义来说是得到了，但对于进谗言的人又会怎样看待您呢？”李纲说：“我只知竭力辅佐皇帝的道理，不行则保全进退之节，祸患是在所不辞的。”殿中侍御史张浚因恨李纲杀其友宋齐愈，又与潜善友好，于是也大肆攻击李纲，说李纲虽有才气、名望，却以私怨杀侍从，刑政不当，杜绝言路，独擅朝政，事无大小随意而行，买马扰民，招军残暴，劝纳之言不恭，结党为奸，擅改诏令，包庇姻亲，有伤新政，不可为相。潜善、伯彦等乘机竭力排斥李

纲，要求罢免李纲。高宗即命礼部侍郎朱胜非草诏罢免李纲，潜善授词胜非，极尽攻击之能事，罢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张浚犹不满足，仍攻击不已。高宗便又下诏贬李纲提举杭州洞霄宫。右正言邓肃极力劝留李纲，说："李纲治理不到一个月，兵民便有所集结；罢黜张邦昌等，叛党稍加治罪。今罢李纲，则二事将会怎样？两河无兵把守则强敌骄横，叛臣在朝则政事混乱，可说朝中不可一日无他。"许翰也说："李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辅佐中兴。今李纲被罢，臣留在朝中也无益。力请罢免自己。"高宗不同意，而潜善、伯彦已有驱逐二人出朝之意了。

李纲为相前后七十七天。李纲被罢后，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也撤掉了，凡是李纲规划推行的军民政事全部废除。金军在李纲为相时常打听李纲是否在朝中，至此便又大举进兵南侵，高宗巡幸东南，两河郡县相继沦陷。以至关辅残毁，中原盗贼蜂起。

李纲被罢，会太学生陈东奉诏至行在，尚未拜见高宗，就连上三书请挽留李纲，罢潜善、伯彦。未被采纳。陈东又上书请高宗率军亲征以迎还二帝，惩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振作士气；还都东京，不幸东南。潜善等大为恼怒，想以伏阙之事惩办陈东，却无把柄。值抚州（今江西抚州）布衣欧阳澈徒步至行在伏阙上书，激烈地抨击朝中执政大臣罢黜李纲。潜善等乘机激怒高宗，说："若不杀此二人，他们将会再次煽动民众伏阙闹事。"高宗即命杀二人，让潜善执行。行刑前，府尹孟庾召陈东议事。陈东请吃顿饭再行事，又写下处理家事的遗嘱，所写字体笔画宛如平时，交给随从说："我死后，你回去，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的亲人。"吃完饭，要上厕所。负责看押的小吏面有难色，陈东笑着说："我是陈东，怕死就不敢说，已经说了，肯逃死吗？"小吏说："我也知道您，怎敢相迫太急？"片刻，陈东整戴衣冠出来，告别同房间的人，才与欧阳澈共赴刑场受斩。四明的李猷将

尸首赎回安葬。陈东开始并不认识李纲，只是为了国家利益为李纲而死，认识与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流泪哭泣。

许翰见陈东被杀，说："我与陈东都是争留李纲，陈东被杀，我却还在朝中，可以吗？"于是连上八本奏章请求罢免自己。潜善等即劝高宗从其请。许翰遂被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不久，邓肃被罢，张所以罪被贬，傅亮也以母病归里。

(何振作)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李纲辅政》

《宋史·李纲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朝北盟会编》

宗泽守汴

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自幼性格豪爽有大志。哲宗元祐六年（1091）进士及第。做过几任县令、通判，颇有政绩。及宋金联盟，谋攻辽，宗泽为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预料天下自此多事，隐居于东阳（今浙江东南）山谷之间。辽灭亡后，金军大举侵宋，宋廷大为恐慌，徽宗内禅皇位给太子，是为钦宗。钦宗立即着手议和，御史中丞陈过庭等推荐宗泽为和议使。宗泽闻知，说："此行和议不成，定不生还。"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敌人能悔过退兵固然很好，否则我怎能屈膝于金而有辱君命呢？"朝中大臣知道宗泽刚烈不屈，担心影响和议，钦宗即任宗泽为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磁州在黄河以北，由于金军的南侵，朝中被任官于这一地区者多托故不去，而宗泽则说："吃国家俸禄而避难是不可以的。"磁州经金军掳掠，极为凋敝。宗泽一到，即缮甲治兵、修复城池，战斗在抗金前线。金军再次南侵时，钦宗派康王出使金军议和，在磁州为百姓和宗泽挽留。随后，康王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元帅。宗泽力主抗金，与金军进行了几十次战斗。徽、钦二帝被俘后，康王于建炎元年（1127）五月继位为高宗。宗泽至行在应天（今河南商丘）拜见高宗，慷慨陈说兴复国家大计。高宗想留宗泽在朝中，大臣黄潜善等竭力攻击宗泽，高宗只得任他为襄阳知府。宗泽至襄阳，听说潜善又倡和议，采纳金人议和条件，上书说："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陛下应兢兢业业，以传之万代，为

何又议割黄河以北和陕之蒲（今山西永济）、解（今山西解县）二州呢？今日应与金不共戴天。而自金再次南侵，朝廷未曾派一将一卒抗金，只听奸臣们朝进一言请和议，夕进一说请盟约，终于使二帝北迁，国家蒙受耻辱。臣想陛下应赫然发怒，将奸臣们全都罢黜，以振兴国家。今陛下即位四十天了，未听说有一个大号令，只听到刑部指挥说，不得将赦文发往黄河以东、以西，及陕之蒲、解，这是打击天下忠义人的士气，自绝于人民。臣虽年老无力，一定亲冒矢石，为诸将的先锋。倘能捐躯报国，也就如愿以偿了。”高宗很是欣赏，改任为青州知州。

六月，李纲任宰相，励精图治、整肃朝纲。恰巧开封府尹出缺，就对高宗说：“要匡复旧都，非宗泽不可。”宗泽由此被任为开封知府兼东京留守。此时的东京与金军骑兵隔黄河相望，金军战鼓之声朝夕相闻；京城内经金军掳掠一空，建筑大多毁坏，士卒与百姓杂居在一起，盗贼横行，人心惶惶。宗泽在黄河两岸向来有很高的威望。到任后，首先将通贼的几个官吏捉来杀了，下令“为盗者，不论赃物多少，均按军法斩首。”因此盗贼减少，人心稍安。宗泽乘势安抚军民，整治京城，多次出兵挫败金军的骚扰。于是上书请高宗还京。朝中正对皇上去向争论不休，持东南论者意欲偏安，持北幸论者意欲中兴宋土。高宗举棋不定，下诏书说，荆、襄、江、淮之地都准备巡幸。宗泽上书说：“开封物价、社会秩序渐如平时，将士、农民、士大夫心怀忠义者，都希望陛下尽早回京，以安慰人心。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无非是像张邦昌辈，暗中讨好金人罢了。希望陛下顺应民心，早日下诏还京。”这时，金人派使者以出使伪楚为名到开封，宗泽将他们全部拘留，上书报告，请求将他们杀了。高宗却命将金使安置在宾馆，给予礼遇。宗泽拒不执行，上书说：“金人以出使伪楚为名来到开封，实是来探看我们的虚实。臣请将他们斩首以破敌计，陛下却惑于人言要优加礼遇，臣不敢执行这个命令以显示我国的

怯弱。”黄潜善等都攻击宗泽拘留金使，尚书左丞许景衡辩护道：“原其本心是出于忠义。宗泽为开封府尹，其威望、政绩卓越过人，今之士大夫没有可与他相比的。请加以重用，以成大计。”高宗便未加怪罪，只命令宗泽放回金使。宗泽无奈，只得执行。

真定、怀（今河南沁阳）、卫之间，金兵很多，正暗修战具准备进犯宋地。宋朝将领却不修武备，宗泽很担心。于是渡过黄河，约请黄河以北的宋将共议军事，以图收复失地。在京城的四周，则分派使臣统领招集来的士卒把守；为对付金之骑兵，造战车一千二百乘，日夜教习战车的战法；根据京城外的地形，建立了二十四道坚固的防御工事；将在黄河沿岸的十六个县和周围州、军的部队相联系，结为连珠寨；并联络团结河东、河北山水寨的忠义民兵。顿时陕西、京东、京西诸路人马都愿听从宗泽的节制。宗泽又开五丈河、疏通濉河，以交通西北商旅，搞好各项运输。守御事务粗具规模，宗泽多次上表请高宗还京，斥责巡幸东南就是议和，议和就是投降。高宗置之不理，只听信黄潜善等的意见，决意偏安东南。七月，宗泽再上表说：“现在金军气焰仍很嚣张，群盗也方兴未艾，而到处都传闻陛下已有巡幸东南之意，恐怕会增加国人的疑虑，说朝廷置两河于度外，于是人心涣散，不知圣意如何？”又上书说：“陛下还都汴京，是人心所望，妄议巡幸是人心所恶。”高宗仍不理会。宗泽再上书大声疾呼：“祖宗二百年基业，陛下为什么要抛弃而留给狂暴的敌人呢？今陛下若回还京城，中兴国家和王室的事业便可成功。若认为臣是狂妄草率的人，那就请问问左右将士，不要只听信一两个大臣的意见，那将是天下的不幸！”宗泽的每一封奏疏，经由中书省、枢密院，常被潜善、伯彦扣押，二人看后，常嘲笑宗泽是狂人。只有张悫说：“像宗泽这样忠义的人，若能得到几个，天下就会安定了。”二人无言以对。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二人遥相呼应，力主抗战。高宗尚犹豫不决，待八月李纲罢相后，起用

主和者，李纲苦心经营的抗战计策都被废除，对宗泽的抗战要求更不予理睬，一意要逃往东南。

九月，金军进犯汜水等地。秉议郎岳飞犯法将受刑，宗泽见了，说他是个奇才，给五百骑兵，让他驰援汜水，立功赎罪。岳飞大败金军而还，宗泽提拔他为留守司统制，岳飞由此知名了。

金军大举南侵，高宗采纳潜善、伯彦的建议，逃往扬州。宗泽劝谏道："京师是天下的心脏，不可离弃。真宗景德年间，契丹进犯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南），王钦若是江南人，劝真宗巡幸金陵；陈尧叟是阆中（今四川苍溪）人，劝真宗巡幸成都；唯寇准毅然劝真宗亲征，终于使契丹退兵，臣愿陛下能效法真宗，不可南幸。"又上书论五事：朝中对各地将领支用军械妄加非议；对所招义士责问是什么人；黄河沿岸防御一定要仿陕西的方法；地方支办防御器材不拨给经费；潜善、伯彦等主南巡是错误的。斥责朝中权臣不了解情况，有意与抗金将士为难。时黄河以北多为金军攻陷，当地民众将爱国转为拥戴宋王室，纷纷起来组成红巾军，攻城夺隘，都用建炎年号，金军稍稍退去。待得知高宗要南幸后，没有不涣散解体的。高宗只安慰宗泽说，待四方稍稍安定便还京都。宗泽更是加紧备战，招安了大盗丁进等，任命为留守司统制，将其部老弱放回原籍；增加财政收入；京城周围郡县索求军需，都倾东京所有予以提供。及得知高宗到达扬州后，上书说："臣准备派阎勍、王彦等各领大军北伐，希望陛下早日还京，臣此举可保万无一失。希望陛下采纳臣的意见，不要让奸臣阻挠，耽误国家大计。"高宗不为所动。

十二月，金统帅兀术率军渡过黄河，准备先攻汴梁，分兵攻行在。宗泽督令增修守备，在城外千里之地坚壁清野；派统制官刘衍、刘达分领战车二百乘、士卒二万往援滑州、郑州，以分金军兵势，告诫二将不可轻动，尽力保护黄河桥梁，等待大军齐集北渡。兀术得知宗泽守备严密，率部连夜切断桥梁撤退。次年

(1128)正月，兀术率金军从郑州抵白沙镇（今河南中牟），离汴京只几十里。京城上下恐慌。宗泽正与客人对弈，僚属问守御计策，宗泽挥手让他们退下。僚属不解其意，只是分头布置把守，撤吊桥，披甲持兵登城巡逻，城内之人更加害怕。宗泽得报，命解甲归营，说："何事如此张皇？刘衍等在外，必能阻止敌军。"又选精兵数千，派将率领绕至敌后，埋伏在敌军归途中；下令城内张灯如平时，城中才安定下来。刘衍正与金军激战，援兵骤来，前后夹击，大败金军。乘胜追至滑州，金军败走。时丁进部屯扎在城外巡护京城，僚属等不放心，请宗泽派士卒暗中监视。宗泽说："此时更应以诚相待，即使木头、石头也可感动，何况人呢？"待他如故吏。丁进很感动，其部有欲作乱的，丁进亲自将作乱者抓来杀掉。另一路金军在粘没喝率领下，攻占了西京（今河南洛阳），与宗泽相持，并进犯东京。宗泽派阎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领兵驰援郑州，遇敌大战败北，中立战死、俊民投降、景良逃走。不久，宗泽将景良捉回，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尚可原谅，但私自脱逃，则使军中无主将。"斩之。俊民与金将持书来招降宗泽，宗泽对俊民说："你若战死，尚可褒奖。如今却替金人招降，有什么面目见我？"斩之。对金将说："你为金将，不能以死敌我？却想以儿女之语来招降我吗？"也斩之。会刘衍率部还京，金军又攻至滑州。宗泽得报，对众将说："滑州是要冲之地，丢失了则京城危险。我不想再有劳诸将，当亲自往援。"张㧑坚决请战，宗泽只好让他率五千精锐士卒往援，告诫不可轻易出战，坚守以等待援兵。张㧑到滑州，敌众我寡，难以匹敌，有人请稍避金军锋芒，张㧑则说："避敌偷生，有何面目见宗公！"力战而死。宗泽闻张㧑危急，派王宣率五千骑兵往援，已来不及，只击败金军。宗泽抚恤张㧑家属，命王宣为滑州知州。金军自此不敢进犯东京。

不久，宗泽部下活捉金将王策。王策本辽将，后降金。宗泽

将他松绑，说："契丹本是宋的兄弟之国，今女真凌辱我国，又灭亡了你的国家，你应与我们共同雪耻报仇。"王策很感动，愿效死力。宗泽乘机探问金军虚实。王策说："金军本部人马只有数万，其余都是胁从来的，他们盼望宋军打过去。"宗泽决定大举北伐，召来诸将，说："你们有忠义之心，应当共同谋划剿灭敌人，迎还二帝，建立功勋。"言罢泪如雨下，诸将群情激昂。宗泽上书请高宗还京，说："臣为陛下护卫京城，自去年秋至今年春又三个月了，陛下不早日还京，天下人如何依托拥戴！"高宗只授予宗泽资政殿学士而已。宗泽在黄河两岸声威日著，金军闻其名都很害怕，对宋人说宗泽，必称"宗爷爷"。

二月，河北义军首领杨进等聚众号称三十万，与丁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于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一带。宗泽派人晓之以祸福，此时都来归附。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众号称七十万、战车万乘，想攻占京城。宗泽单骑往王善营中，苦口婆心地劝说："现在是朝廷危难之时，假如有像你们这样的将领，难道还会有敌患吗！今天是你立功的时候，机不可失。"王善感动地说，"敢不效力！"即率部来归。适山东义军蜂拥而起，朝廷指之为借勤王之名，公然为盗贼。宗泽担心归附的豪杰涣散，上书说："四方安定，并无盗贼，请陛下澄清这种说法，以防失去人心。"高宗并不理会。这天，赵世隆、赵世兴兄弟率三万人来归附宗泽。宗泽离开磁州时，将磁州事务交给李侃主持，统制世隆却杀了他。至此，宗泽部属害怕他们作乱，宗泽说："世隆本是我手下一个校官，有多大能耐？"世隆一到，宗泽斥责说："河北沦陷，难道宋之法令和上下之分也陷没了？"命斩首。此时世兴佩刀站在旁边，其士卒也握着刀在庭下。宗泽缓缓地对世兴说："你哥哥被杀，你若能奋勇立功，足以雪耻。"世兴很感动。会敌骑至滑州，宗泽命世兴驰援。世兴欣然从命，率所部至滑州，出敌不意大败敌军，收复了滑州。不久，屯扎在京城

南面的丁进与北面的王善争斗，京城恐慌。宗泽派人劝解说："为国之心是这样的吗？应当临战立功，以决胜负高下。"二人羞愧而罢。宗泽又将归附或捉来的金军中的契丹人、汉人挑选出一些，晓之以忠义，劝谕他们共同灭金，以雪国耻，送给钱粮、凭证，让他们回去联络抗金力量，待宋军北伐时响应。他还派人到沦陷的州县和被掳掠的汉人中进行抗金宣传；同时修造宫殿，以待迎回二帝居住。

五月，宗泽招抚各地义军屯聚京城，联结四方义士，已有众百余万，储备的粮草也足用半年，于是对人说："大事可举了，待皇帝还京，我当奋勇争先。"召集诸将，约于六月乘金军怕暑热之时渡黄河北伐。诸将群情激昂，愿效死力。宗泽遂上书，大意说："祖宗基业应该珍惜，陛下的父母兄弟蒙辱北迁，日夜盼望救兵。西京皇陵为金贼攻占，今年寒食节竟没有祭享之地；而两河、二京、陕右、淮甸的百万生灵也陷于涂炭之中，陛下却要南幸。那些奸臣这样做，一是为金贼提供方便，二是因为自己的亲属都渡过长江，已安置在南方。今京城防御已加固、兵械已准备充分、士气已高涨，希望陛下不要打击天下同仇敌忾的斗志，而重蹈东晋灭亡的覆辙。"朝中听说信王赵榛准备领军到京城，高宗即下诏择日还京，没多久又改变主意。

起初王彦率领岳飞等十一位将领、七千士卒，渡过黄河攻新乡。由于金兵众多，王彦不敢前进。岳飞独自率所部与金军激战，夺获敌军战旗挥舞指挥，士卒们奋勇争先，收复了新乡。次日与金军战于侯兆川（今属河南辉县），岳飞受伤十余处仍不气馁，士卒也拼死作战，又大败金军。岳飞粮草已尽，请王彦拨给粮草，王彦不肯。岳飞只得率部更往北走，在太行山与金军作战，擒获金将拓拔耶乌。不几日又遇金军，岳飞单骑执丈八铁枪，刺杀金将黑风大王，金军败走。岳飞知道王彦不喜欢自己，率部再归宗泽，宗泽任岳飞为留守司统制。王彦因屡获胜仗，即

传檄各州郡。金军以为宋大军到来，急忙组织数万骑兵将王彦营寨团团围住。王彦见敌众我寡，率部突围出来，诸将逃散。王彦独率部退保共城县（今河南辉县）以西的太行山，派心腹联结两河豪杰，准备东山再起。金军急欲铲除王彦，王彦担心部众谋杀自己，日夜不安，以至晚上睡觉经常变换地点。其部众觉察此事，互相在脸上刺下“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并无他意。王彦十分感动，更加爱护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此时两河响应王彦，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纷纷归附，有众十余万，数百里范围内都受王彦节制。王彦缮甲治兵，准备北上进攻太原。并报告宗泽，请宋廷派兵配合。金军统帅至为恐慌，召集各部首领，欲以大军破王彦营寨。各部首领吓得跪下，哭着请求道：“王都统的营寨坚如铁石，不易攻破。”金军便改派骑兵劫夺王彦粮道。王彦领兵严阵以待，斩获很多金兵。至此，宗泽认为王彦孤军无援，不可独自前进，召王彦到京城议事。王彦得召，召集各寨将领进行布置，安排他们等待会合大军来到再北上。自己率万余人回东京，金军以重兵跟在后面却不敢进攻。王彦到东京，宗泽让他屯兵京城附近保卫京城。王彦遂屯兵于滑州沙家店。宗泽派王彦往扬州劝说高宗北上抗金，并上书说：“臣欲乘此暑月，派王彦等从滑州渡黄河，夺取怀、卫、浚、相等州；派王再兴等从郑州直趋西京保护皇陵；派马扩等从大名出发，夺取洺（今河北永平）、赵（今河北赵县）、真定；杨进、王善、丁进等各以所部并进。估计渡过黄河后，当地山寨忠义民兵响应的不下百万；金军中的契丹人、汉人也定会起来进攻金军；再派人出使夏、高丽国，请兵相助。请陛下早还京城，臣当亲冒矢石，为诸将先锋，中兴国家的事业定可马到成功。”奏人朝中，黄潜善、汪伯彦等担心宗泽成功，从中阻挠。高宗也不予理会。

宗泽自到东京，整治京城，招集各地义军，聚兵储粮，联结

中路忠义民兵，燕赵豪杰，自认为渡黄河收复失地、迎回二帝指日可待。无奈前后上奏二十余封，请高宗还京，都被潜善、伯彦等扣押。七月，潜善、伯彦又怀疑宗泽这样做是准备政变，任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监视宗泽。宗泽忧愤成疾，背上长疽，叹道："我志不能实现了！"诸将探问病情，宗泽充满期待地说："我本来没什么病，只因二帝蒙辱已久，愤然成疾而已。你们若能歼灭敌人，我死而无恨！"众将流着泪说："敢不尽力！"诸将出去后，宗泽叹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一句交待家事的话，只连呼"过河！"三声而逝，年七十岁。宗泽尚遗一表，请高宗还京。京城人民闻知，无不号啕大哭。讣告传至朝廷，朝廷赠宗泽观文殿学士，谥号忠简。宗泽一生正义，平素生活节俭，经常资助贫苦人。其子颖在宗泽幕府中也素得人心，京城人请高宗让宗颖继承父职。而朝中已命杜充代替宗泽，不许都人之请，只任宗颖为留守司通判。杜充冷酷无谋，到汴京后，将宗泽所作所为反而行之。宗颖屡劝不听，便请扶柩回家乡去了。于是豪杰离心，屯聚于城外的降盗又去剽掠了。

宗泽死后，王彦将所部交给东京留守司，只率亲兵赴行在，见到潜善、伯彦，力陈两河忠义人民引颈期盼王师，希望顺从民意大举北伐，言辞十分激愤。二人大怒，请高宗不会见王彦，只任他为御营平寇统领。王彦即称病退休回家去了。

宗泽辛苦经营的恢复大业终于失败。

（何振作）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宗泽守汴》

《宋史·宗泽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朝北盟会编》

金人渡江

建炎三年（1129）六月，金主吴乞买从兀术之请，大起燕、云、河朔之兵南侵。时，金军分四路侵宋，挞懒攻取山东及淮北地区，兀术由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下，从建康（今江苏南京）渡江追击宋高宗，拔离速、马五由今河南经湖南南侵，娄室仍攻陕西。是月，金军攻陷磁州（今河北磁县），宋权知磁州苏珪叛附于金人。

八月，宋高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赶忙派京东路转运判官杜时亮充任奉使大金军前使，进士宋汝为任副使，持高宗致金主书请和。书中言：愿削去旧号，是天下均大金国，亦何必劳师远涉。金主不答。

十月，金兀术分兵南侵，一自滁（今安徽滁县）、和（今安徽和县）人江东，一自蕲（今湖北蕲春南）、黄（今湖北黄冈）人江西。由于江西守将刘光世不战而退，致使江西州、军多为金有。

是月，高宗在南逃途中，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停留了七日后，又去了越州（今浙江绍兴）。

十一月，金兀术与李成合兵攻乌江（今安徽和县西南）。时杜充无应敌才略，只是整日闭门不战。统制岳飞曾谏请杜充视师至于泣下，杜充竟充耳不闻。后兀术攻取和州（今安徽和县）、无为（今安徽无为县），并率军自马家渡（今安徽和县南大江西岸）过江，破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这时，杜充才派都统制陈

淬及岳飞率军仓促迎战，结果为金军所败。兀术很快便率军攻人建康（今江苏南京），宋守臣陈邦光、户部尚书李棁迎降。杜充战败后，率军退保真州（今江苏仪征）。兀术遣人招降，许封以中原，杜充竟返建康降金。

宋高宗听到杜充反叛的消息后，惶恐地问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形势如此危急，该怎么办呢？"吕颐浩向高宗提出了从海路逃跑的应对之策。他说："敌多骑兵，必不能乘舟袭战。江、浙地热，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返二浙。彼出我人，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高宗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决定航海继续南逃。

十二月，兀术攻人临安，遣兵人海追击高宗，但这时高宗已逃往明州（今浙江宁波）了。

那时韩世忠自镇江退守江阴（今江苏境），江淮统制岳飞听说兀术率军将趋临安，便挥师邀击金军于广德（今安徽境），六战皆捷，俘金将王权及首领四十余人，并乘势纵击，大败金兵。

兀术听到宋高宗已逃往明州的消息后，急忙派阿里蒲卢浑率精兵四千进侵明州。浙东制置使张俊使统制杨沂中迎战，败金兵于高桥（今浙江宁波境内）。这时高宗已至定海（今浙江镇海），复至昌国县（今浙江定海）。

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军攻占了明州（今浙江宁波），便大肆屠城。起初，金兵攻城时，被宋浙东制置使张俊与守臣刘洪道击败，只得退守余姚（今浙江余姚）。后兀术率援兵至，再攻明州。张俊等人抵挡不住，只好率军赴台州（今浙江临海），刘洪道亦逃，金兵遂入明州屠杀。这时，宋高宗逃至台州章安镇（今浙江临海东南灵江北岸）。金人以舟师追击高宗三百余里。后由于遇上了大风雨，再加上被宋枢密院提领海舟所率的大船冲散，只得退回明州，并派人到临安向兀术报告说："搜山检海已毕。"时高宗已人温州，停泊于港口。

二月，金人既破江西诸郡，乃引兵进犯湖南，攻打潭州（今湖南长沙）。宋帅直龙图阁向子諲与宗室赵聿之率军抵抗，将吏王晾、刘玠等先后战死。金兵围攻八日，城破，向子諲率从吏自南楚门出逃，赵聿之自杀殉职。金人入潭州掳掠了六日后，屠城而去。

金兵据守明州七十日后北返，行前，放火焚城，仅城内东南角几座佛寺与僻巷居民略有幸存。兀术领金兵北上至临安亦纵火焚掠。虑所获辎重陆运不便，决定取道秀州（今浙江嘉兴）北归。

本月，金军游骑至平江（今江苏苏州）城东，宋统制郭仲威未交战即退。两浙宣抚使周望逃向太湖，守臣汤东野携家潜逃，以府印付郭仲威。金兀术攻入平江后，驻兵府治，掳掠女子财帛，纵火焚城，光照百里，火五日始熄。

三月，金兵于北返途中，受阻于韩世忠所部八千宋军。起初，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县），中军驻江湾（今上海宝山南），后军驻海口，以待金兀术回师时阻击。得知兀术由秀州赴平江后，乃移师镇江焦山寺（今江苏镇江北焦山），截断了金军北归的退路。

兀术欲渡江北返，急于遣使通问，且要与韩世忠约好交战日期。韩世忠同意了。他对诸将说："金军必会登金山龙王庙以窥我虚实。"于是他在庙中及庙外岸边各埋伏士兵百人，并令岸边伏兵听到鼓声后举兵先入，庙内伏兵继出，以合击金人。正如韩世忠所料，金军果然派出五人前来窥探宋军虚实，宋伏兵听到鼓声，迅速出击，擒获了两骑，另三骑仓皇逃回金营。其中有一身着红袍玉带的人坠马后，又上马逃走了。韩世忠审问所获的两个金兵，知此人即金军统帅兀术。

后来，宋金双方各自出动水师，在长江中激战。交战十数合，韩世忠率军英勇迎敌，其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其妻

梁红玉亲擂战鼓助威，打得金兵狼狈不堪，俘获了兀术女婿龙虎大王和许多金兵。金军终不能渡江。

兀术万般无奈，恐惧万分，只好低声下气地向韩世忠表示，愿意将在江南掠获的人口和财物如数奉还，以求假道北返，遭到了韩世忠的严辞拒绝，金兀术见从镇江渡江不成，只好率金兵乘舟沿长江南岸溯江西上，韩世忠则率宋军船队沿长江北岸与金军并行，且战且行，最后把金军逼进了离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江中）。黄天荡是条死水港，宋军船队将出口堵死，金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

四月初，兀术采纳了一个奸细的意见，出动大军，利用老鹳河（今江苏南京黄天荡南）故道，开渠三十里，逃出了黄天荡，奔向建康。宋将岳飞在牛头山设伏，大败金军。韩世忠军发现金军逃走，急忙追赶，又在建康北面的长江里，堵住了金军退路，双方又在长江进行了几次水战，金军仍无法突破宋军的防线。

金挞懒听到兀术北归受阻的消息后，赶忙派移剌古自潍州（今山东潍坊）引兵来援。当时，移剌古军在江北，兀术军在江南，韩世忠则以海舰泊金山下。交战时，韩世忠让健壮士兵手持大铁钩曳沉金舟。兀术日感穷途末路即将到来，多次派人恳请韩世忠放一条生路。韩世忠说："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放行。"兀术无话可答。

兀术见韩世忠军的海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日感形势危急，乃下令募人献破海舟之策。侨居建康的福建人王某为了领赏，教金军在船上载土，上铺平板，凿空船板安装船桨，既可增强船的稳定性，而且可以提高船行的速度。然后乘天气无风，海船行动不便的时候，靠近宋军的大船，利用火箭射宋军海船的帆篷，则宋军必败无疑。兀术采纳了这个建议，煞时间，韩世忠军烟焰蔽天，只得慌忙顺水败退，金军乘胜追击了数十里。

那时，长芦崇福院僧人普伦等及百姓千余人驻在杨家洲上。

得知韩世忠军队战败的消息后，驾着无数小船，头裹红巾，船插红旗，抵挡了金军的追击。这样，韩世忠所部才得以退还镇江，而兀术也乘机北返，屯于六合县（今江苏六合）。

这一仗，韩世忠以八千人抗拒金兵十万众，阻金兵四十八日，虽败，却使金兵从此不敢轻易渡江南侵了。

进犯江西的金兵听说兀术已渡江，也赶忙自荆门（今湖北当阳）引军北还。行至宝丰（今河南宝丰）时，宋军统制牛皋率领民兵大败金军于宋村，生擒了金将马五。

五月，淮南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知金军已北去，乃率所部邀击金军于静安镇（今江苏南京西北），获胜，建康府通判钱需亦率乡兵邀击敌后，然后随岳飞收复建康。

七月，金兵攻承州（今江苏高邮），兵马钤辖王林出城迎敌，随即败逃，承州沦陷。时金兵亦围楚州（今江苏淮安）。

九月，金兵破楚州。先是，兀术将北归，曾向知楚州赵立假道，赵立不从，且斩其使者。兀术大怒，乃设南北两屯，以断绝楚州的粮道，围楚州甚急。高宗命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督淮南诸将往援，东海李彦先军首先至淮河，受敌阻挠不能前进。而刘光世部下的王德、郦琼诸部则多不用命，惟岳飞军仅能为援，又众寡不敌。金知楚州宋军外援已绝，加紧进攻。赵立与士兵同甘共苦，每战必身先士卒。后中炮石死。死后旬余楚州陷落。

十一月，金挞懒既得楚州，又萌发了南渡的念头。先令金军攻打泰州（今江苏泰州）。通、泰镇抚使岳飞以泰州不可守，乃弃城去，率兵渡江，屯守于江阴军沙上。金挞懒率兵攻下泰州后，继而又破了通州（今江苏南通）。

绍兴元年（1131）三月，原在梁山泊组织义军抗金的张荣移军南下，至兴化缩头湖（今江苏兴化东）建立水寨。时金挞懒在泰州，欲渡江南侵，必先破此寨。于是，双方在湖上交战。正值湖水退位，金军船舰不能靠岸，义军弃船登岸，大呼杀敌，金人

溺水及陷泥淖者甚多，被伤五千人。挞懒收其余众二千余人，狼狈逃回楚州，退屯宿迁（今江苏宿迁），后经东平（今山东东平）等地北归。

自此，金兵既无力南侵，宋廷亦无意北进，江淮地区暂时稳定下来了。

（冷辑林）

参考资料：

《三朝北盟会编》卷 129—卷 145

《续资治通鉴》卷 105—卷 10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4—卷 43

《宋史·韩世忠传》

《宋史纪事本末》卷 64

《金史纪事本末》卷 10

中原沦陷

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了宋王朝，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是月，金娄室以重兵压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守臣席益逃走，贵州防御使、权府事郝仲连力战而外援不至，城陷后，他与其子郝致厚皆不屈而死。

六月，高宗以宗泽为知开封府。时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师不足二百里，金鼓之声，日夜相闻。宗泽到任后，严令："为盗者，赃无轻重，皆从军法。"于是盗贼屏息，人心稍安。

是月，邵兴据解州（今山西运城南解州）神稷山起义，屡败金兵。

时，宋高宗以马忠为河北经制使号召州县守臣，有能组织民众抗金保乡破敌者，即授以节钺为使者，地方财赋，官员任用，均可便宜行事。随后，宋政府于陕西、河北募兵各三万人，京东、西各募二万人，且令于京东西、河北东路、永兴军、江淮诸路均设置帅府以抗金。

七月，金军破磁州（今河北磁县），权领州事张显率众逃走。

九月，宗泽自河北率军还汴京（今河南开封），招募义士守汴。他派人造决胜战车一千二百辆，又依据地形在城外设立二十四壁，各屯兵数万。沿大河多设营垒；联结两河山水寨及陕西义士；开通五丈河以便利交通；京郊近河七十二里，命十六县分守御敌；于各县亦开濠，深广丈许，又置鹿角，以防金兵南下。此

外，他还团结班直诸军及军民之可用者，并力请高宗还汴京。

是月，河北招抚使，都统制王彦率俾将岳飞等七千人过河，奋力抗金，一举收复了新乡（今河南境）。金军疑是宋军大举进攻，聚集了数万金军围攻。不久王彦兵败，乃突围，转战数十里，收散亡卒七百人，据守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的太行山区，坚持抗金斗争。其军士均面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不久，两河忠义民兵与王彦军联成一气，屯驻绵延数百里，给南侵的金军以很大威胁。

十月，高宗自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经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宝应（今江苏宝应县），逃至扬州。

十一月，高宗以王伦为大金通问使，赴金求和。

十二月，金主听说高宗已南逃，便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令粘罕率军分三路大举南侵：右副元帅宗辅与其弟兀术率东路军自沧州（今河北沧县）渡河，攻山东；粘罕率中路金军自河阳（今河南孟县）渡河，直攻河南；西路金军由娄室率领，西攻陕西。

当时，宋西京统制官翟进扼清河白磊，而带御器械郑建雄守河阳，金兵不得渡河。粘罕乃屯重兵于河阳北城，以迷惑郑建雄，而暗中派万户尼楚赫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占领了河阳。

不久，粘罕据汜水（今河南汜水镇），引军而东，命尼楚赫分兵攻京西。宗泽闻金兵入境，乃派部将刘达赴援，未至，知郑州董痒弃城败走。随后，娄室渡河，攻占了韩城县（今陕西韩城）、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陕西华县）、潼关（今陕西潼关）等地。宗辅攻入西京（今河南洛阳），以李嗣本知河南府，屯兵西京大内，与宗泽军相持不下。

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南侵东京（今河南开封），至白沙镇（今河南中牟县东），为宗泽军所败。不久，金尼楚赫破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房州（今湖北房县）。娄室破长安（今

陕西西安)，宋守臣京兆路经略使唐重死难。随后，金游骑至东京附近，宗泽佯示以不备，金兵不敢入。统制官刘衍破金兵于板桥，并追至滑州(今河南滑县)。

是月，金兵破郑州，郑州通判、直秘阁赵伯振率兵巷战，中流矢坠马，被金兵剖腹杀死。随后，金兵又焚邓州(今河南邓县)，驱全城民众北去。宗辅又破青州(今山东益县)、潍州(今山东潍坊市)，但至千乘(今山东广饶)时，为滨州溃兵葛进等击败，只得弃青、潍州而去。

二月，金军再侵东京，宗泽派统制官李景良等领兵万余赴滑州、郑州，途遇金兵，为金兵所败。李景良因无功而逃，为宗泽所斩。不久，金尼楚赫破唐州(今河南泌阳)，遂纵焚掠，城市一空。接着，金军欲攻打冲要必争之地滑州。宗泽派右武大夫、果州防御使张㧑率军至滑州迎敌。张㧑以寡敌众，宗泽随后又派统领官王宣以五千骑驰援。未至，张㧑再与金军战，死之。后二日，王宣至滑州与金兵大战于北门，击败了金军。后尼楚赫破蔡州(今河南汝南)。接着，金人陷淮宁府(今河南淮阳)，知府向子韶率众与金军巷战，被俘不屈而死。

时，武翼大夫赵邦杰集忠义乡兵在庆源五马山(今河北元氏县西南)立寨自保，马扩率亲属十三人投奔山寨。初，赵构弟信王赵榛外逃，称姓梁，为人摘茶。马扩奉迎信王至五马山寨以号令乡兵。两河人民纷纷响应，愿受信王节制。

是月，娄室既破同州，系桥以为归路，并往西攻占了陕、华、陇、秦诸州。秦风路经略使李复生降金，一时间，陇右大扰。

三月，金人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初，中山府自靖康末年被金兵围困以后，军民坚持抗金三年，这时因粮尽人疲，为金军所陷。

不久，河南统制官翟进收复了西京(今河南洛阳)。

四月，翟进经宗泽推荐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时御营左翼统制韩世忠至西京，与翟进等兴兵一同对金作战。京城都巡检丁进夜袭金营，败归。旋与韩世忠又战金兵于文家寺，又为金兵所败。韩世忠只得收余兵数千人南返，这样，西京又沦于金人之手。

是月，金军攻占洺州（今河北永）。自此，两河州郡，在“外无救援，内绝粮储”的情况下，“悉为金所取”。

五月，宗泽闻王彦聚兵太行山，乃委以忠州防御使制置两河军事，并与诸将约王彦、马扩等忠义民兵共同抗金。

是月，金娄室大掠而东，陷绛州（今山西新绛）。

六月，南宋于沿江地区训练水军。时金人已破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陈（河南淮阳）、蔡（河南汝南），逼近淮河、汉水地区。宋廷因东南利于水战，于大江上如采石等地精练水兵，并增战舰，以求稳固江防。

七月，东京留守宗泽卒。高宗任命杜充为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以后，无意恢复中原，反而尽反宗泽所为，结果大失民心。

金人闻宗泽已死，决定再次大举南侵中原。金主令娄室平陕西，尼楚赫守太原，耶律余睹守云中（今山西大同），并令粘罕率大军南侵。

是月，金娄室遣军攻打解州（山西解县）的朱家山，为统领忠义军马邵兴聚义兵所败。

九月，金人陷冀州（今河北冀县）。

十月，高宗命韩世忠自彭城（今江苏徐州）至东平，张俊自东京至开德（今河南濮阳）以防金兵，并命马扩声援。时，马扩军曾攻清平（今山东清平县），被金右副元帅宗辅、左监军挞懒败于城南。入夜，清平人开门助金军，马扩军遂乱，信王不知所终，马扩败至扬州，被罢免军职。

是月，宋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翟进战死于伊水鸣皋山（今河南嵩县西北）。

十一月，金军攻陷延安府，自此，陕北诸州多沦为金有。

随后，金军攻破濮州（今山东鄄城北）。起初，金左副元帅粘罕率兵至城下，意以为小郡，甚轻之。宋将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金营，直犯中军。粘罕光着脚板仓皇出逃，仅以身免。后金军围城三十三日城始破，城中居民均为金军所屠。

紧接着，金人又攻开德府，宋知府王棣率军民防守。金人见一时难以攻下，便卑鄙地作伪书称王棣已降金，于是军民疑王棣，并想杀了他。王棣无奈，只得出走，但走至南门，即被军民践死，城被破，居民被金军“杀戮无遗”。

是月，相州（今河南安阳）因被金军围困日久，粮食皆绝，守臣赵不试开门投降，乞弗杀居民，金人许之。随后，赵不试即投井殉职。城陷。

时东京留守杜充闻金兵将至，乃决黄河水入清河（西起今山东梁县，东至于海），以阻截金兵。

十二月，金人侵东平府，宋守臣京东西路安抚制置使权邦彦遁逃，城破。

金人既得东平府，又攻济南府。济南守臣刘豫遣其子刘麟与金战，被围，通判张东率兵增援，金军乃退兵。后金以利禄诱降刘豫，城遂破。

是月，金左副元帅粘罕率军攻北京（今河北大名），宋河北东路提点刑狱郭永死难，而河北转运副使兼权大名尹张益谦与转运判官裴亿降金，北京遂为金有。

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人破青州、潍州，皆焚其城而去。

这时，宋陕西都统制军马邵兴败金人于潼关及虢州（今河南灵宝）。

六月，金破磁州。

七月，东京留守杜充因粮绝，决定弃汴京而返建康。当杜充离汴京时，岳飞曾力谏说："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们所有。他日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杜充不纳。

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陕西都统娄室以重兵陷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宋知府李彦仙率军力战。时娄室欲招降，李彦仙不从。城破，巷战，李彦仙左臂中刃，后坠河死难，所属宋官民无人降金。

二月，金人陷东京。初，河南北部已为金占，仅汴京及近畿地区仍为宋有，但那里缺粮严重。河北金军首领夏渊等常以食物与宋兵贸易，日久遂熟。后夏渊及其徒众夜登城北纵火，城乱。守臣上官悟及副留守赵伦仓皇出奔，于是金人陷东京。

至此，四京皆没于金军，中原沦陷。

（冷辑林）

参考资料：

《三朝北盟会编》卷 101—卷 137

《续资治通鉴》卷 98—卷 107

《金史纪事本末》卷 9

《宋史纪事本末》卷 62

苗刘之变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攻打扬州，宋高宗仓促渡江南逃，身边只有康履等五六人护从。起初，康履、蓝珪在赵构为康王时，就在康王府邸当太监。康王出使金营，他们也曾随从前往。后来，又在赵构的元帅府里主管机要。赵构称帝后，深受宠信，擅作威福。一些文官武将如行在都巡检使大将刘光世及保大军承宣使王渊等人，都因为交结康履等人而官运亨通。对于一般的将官，他们全然不放在眼里，甚至洗脚时，也让诸将站在身边。这时，康履等人更加居功自傲，极力主张高宗将都城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而为高宗采纳。

在南下途中，康履及其党羽竞相作乐，宛如一次平常的巡游。经过吴江（今江苏吴江）时，他们居然以射鸭为戏，比赛射猎的多寡。到临安后，又忙着去观赏钱塘江潮，宦官的帐篷，把道路都堵塞了。广大军民对他们苟安为乐的行径无不义愤填膺。御营统制苗傅咬牙切齿地说："就是这帮东西让皇帝到杭州来的，现在，他们还是那样醉生梦死，横行霸道！"苗傅的幕僚王世修也很痛恨宦官的恣意妄行，于是，就把苗傅的话转告了武功大夫刘正彦。刘正彦听后，气愤地说："有机会咱们一定要把这帮家伙干掉！"

二月，王渊被提升为枢密院事，执掌军事大权。这一任命，引起诸将的强烈不满。苗傅及刘正彦心中更是不平。刘正彦因为讨贼有功却受赏微薄，再加上因为王渊曾经夺了自己的兵权，对

王渊特别嫉恨。此时，他看到苗傅及众将反对王渊，便乘机与苗傅联合起来，并串通了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人。此外，他还联络了在高宗身边的浙西安抚司主管机要的时孟希及军器监叶宗谔等人，设计除掉王渊。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由苗傅派人骗王渊说，临安县附近有盗贼，请王大人带兵前去剿除。一旦王渊出马，便在途中将他干掉。可是，这一计划被康履的手下侦知，并告诉了王渊。王渊得知情况后，派了五百精兵埋伏在天竺寺，以防不测。苗傅等人眼看着计划即将流产，于心不甘。决定提前采取行动，将士兵埋伏在城北的桥下，等王渊下朝路过这里时，伏兵齐发，刘正彦当场将王渊杀死。然后，宣布王渊勾结宦官康履等人阴谋造反，派兵包围了康履的家。同时，又派兵四处捕杀宦官，凡是碰上没有胡须的就杀掉。接着，苗傅、刘正彦提着王渊的脑袋，率领兵士直奔皇宫而去。把守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也参与了这次政变，所以，大开宫门，放刘、苗等人进去。此外，他还引苗傅所派的使臣向高宗报告说："苗傅不是想造反，只是想为百姓除害。"

杭州知府康允之听说发生了兵变忙着护卫高宗上了城楼，文武百官也跟了上去。这时，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声对苗傅等人说道："皇上驾到！"苗傅等人远远地看见高宗的仪仗，便在城下高呼万岁。高宗靠着护栏大声询问苗傅兴兵的缘由。苗傅厉声回答说："陛下宠信宦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只要与宦官关系好的人就可以升官发财。可我立下了那么多功劳，只封了个外地的团练。现在我们已经把王渊杀了，请陛下把康履、蓝珪、曾择杀掉，以此安抚军心。"高宗说："我会把康履、蓝珪、曾择流放到海岛上去，你们尽可以放心地回到各自的兵营中去。"接着，高宗又说："现在我封苗傅为承宣使、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观察使、御营副都统制，军士都既往不咎。"可是，城下的士兵丝毫没有回营之意。高宗没了主意，急忙问身旁的文武百官

该如何应付。时孟希首先说："这场乱子是因宦官而起的，不把宦官全部除掉，就不能平息！"叶宗谔接着说："陛下何必顾惜康履呢！"高宗无奈，只得令吴湛派兵到清漏阁中捕捉康履，并随即将康履带到城楼之下，交给了苗傅。苗傅二话不说，当场就把康履拦腰砍断。

苗傅杀死康履之后，又毫不客气地说："陛下不该称帝，否则将来钦宗皇帝回来了怎么办？"高宗一听，赶忙叫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朱胜非顺着绳子缒到城下与苗傅商谈，让他退兵。可苗傅一直坚持要请隆祐太后出面听政，并派使臣与金人议和。最后，高宗被迫应允了，并当场下诏请太后垂帘听政。苗傅等人又进一步要求立皇太子为帝。张逵大声催促道："今天这事，应当为国家着想！"又说："天无二日"。大臣们听后无不惊愕失色。这时，时孟希在一旁敲边鼓说："如果能率领百官死战也行，否则，只有听从军士们的了。"杭州通判章谊极力反对，说："这是些什么话！千万别依军士们的话办！"高宗见大势已去，只好对朱胜非说："我应当退下去，等候太后的命令吧。"可朱胜非还在劝阻说："从来没有过这等事理。"这时，颜岐从旁说道："看来只有请太后出面才能平息目前的事态。"

当时，北风呼啸，城楼上既没有帘子也没有幔帐。宋高宗坐在一把竹椅上，冻得浑身打颤。当太后坐着小轿来到城楼时，宋高宗只得站到一旁的楹柱边上。

不久，太后来到城楼前，苗、刘等人施礼道："今天这事还望太后定夺。"太后说："徽宗皇帝重用奸臣蔡京、王黼，把祖宗的成法都变了。童贯轻启边祸，致使金人大举南下。当今皇帝没有失德之处，只是被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人蒙蔽，现在都已处置了，二位统制难道还不知道吗？"苗傅说："我们的计划是早就定好了的，岂可轻易更改！"执意要立皇太子。太后说："现在大敌当前，让我一个妇道人家抱着一个三岁的娃娃听政，怎么撑得住

局面呀！如果让敌国知道了，岂不会更加轻视我们！”苗傅、刘正彦号啕大哭，坚持要立皇太子，并对他们部下说：“如果太后不答允，那我们甘愿伏法。”说着，便要动手脱衣服。太后见状，连忙劝阻。苗傅说：“三军将士从早到现在都未吃饭，如果事情再拖下去，恐怕会惹出更大的事端来。”说着，回转头来看了朱胜非一眼说：“先生，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今日之事，你总应该明确地表示个态度吧！”可朱胜非硬是没吭一声。这时，颜岐走到太后面前，说：“陛下命我奏明太后，已决定采纳苗傅等人的请求，请太后下诏令吧！”太后仍不答应，而城楼下苗傅等人的言语更加尖刻了。

朱胜非哭着说：“我是国家重臣，理当为国而死，请让我到城楼下当面诘问苗傅、刘正彦。”高宗说：“你下去肯定性命难保。他们已杀了王渊，倘若又杀了你，那将把我置于何地！”于是，他挥手让左右的人稍稍回避一下，对着朱胜非的耳朵说：“咱们现在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如此，咱们也应当为将来谋划，如果到时谋划不成，死也不晚。”接着，高宗令朱胜非以四个条件来约束苗傅等：一是尊事皇帝如徽宗皇帝，供奉之礼，务尽丰厚；二是高宗禅位之后，诸事要听太后及嗣君处分；三是降诏后，将佐军士要及时解甲回营；四是严禁军士大肆抢掠，杀人纵火。如苗傅等人愿意遵依四个条件的约束，那么高宗即降诏逊位。苗傅等人一一答应了。高宗便下了逊位的诏令。苗傅、刘正彦等人才率军移屯祥符寺，士兵们高兴地喊叫：“天下总算太平了！”

当天，高宗在苗傅、刘正彦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自己退居显忠寺，只留下十五个太监随身侍候。其余全部打发出宫，并把蓝珪、曾择等流放到岭南。曾择在流放的途中被苗傅派人杀死。

这时，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在江宁（今江苏南京）接到了高宗

的内禅诏书。他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是必有兵变”。于是，一面派人到临安摸清情况，一面写信给张浚、刘光世，“痛述国家艰难之状。”

尚书礼部侍郎、节制平江府及常、秀、湖州、江阴军军马张浚读了苗傅等人所谓的檄文后，痛哭流涕。决意举兵征讨苗傅。

率军屯驻在吴江县（今江苏吴江县）的御营前军统制、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张俊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即率领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今江苏苏州），与张浚军会合。

张浚随即又派人送信给同签书枢密院事、知建康府吕颐浩及殿前都指挥使、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约他们共同讨伐苗傅等，并命令张俊率领二千精兵扼守吴江。

吕颐浩接到张浚的信后，哭着说：“果然没出我所料，这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当即给张浚及诸大将写了回信，要他们约好举兵征讨的时日。

于是，张浚传檄诸路，约吕颐浩、刘光世率军到平江会合。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等人闻讯，各率所部赶赴平江。

随后，张浚、吕颐浩等人屡次上疏，请宋高宗复位。苗傅等人闻讯，惊恐万状，忙令御营都统司统领官苗瑀、参议官马柔吉率军屯守临平山（今浙江杭州东北临平山），以拒各路勤王之师。然而，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逼近了临安。

这时，苗傅、刘正彦已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整日惶恐不安。他们逼请高宗给韩世忠下诏，“以缓外师”，并马上派杭州兵马钤辖张永载持高宗的手谕送到韩世忠手中。韩世忠对张永载说：“倘若让陛下复位，我们可以缓兵。不然，将与你们这帮贼党决一雌雄！”苗傅闻讯，更是惊恐不已。

起初，宋廷在苗傅、刘正彦等人的威逼下，改建炎三年为明受元年。

四月，隆祐太后下诏还政，高宗复位。接着，高宗复纪年为

建炎，并任命张浚为知枢密院事，苗傅、刘正彦为检校少保。

这时，吕颐浩、张浚的部队已推进到秀州（今浙江嘉兴）。苗瑀、马柔吉等率重兵“负山阻水为阵”，约韩世忠军交战，战前，韩世忠对他的将士们说：“今日当以死报国，贪生怕死者，斩！”于是，韩世忠的部队奋勇相战，大败苗瑀之军。

苗傅、刘正彦见招架不住，赶忙到高宗那里“请设盟誓，两不相害”，然后拥精兵二千人，连夜开涌金门夺门而逃。

苗傅等率军取道富阳（今浙江境）、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将南趋闽中”，一路上被宋军追杀得气都喘不过来。

五月，高宗又令韩世忠、刘光世率军追讨苗傅、刘正彦叛军。韩世忠率军至浦城（今福建浦城）北十里的鱼梁驿与叛军相遇，大败叛军，生擒了刘正彦，苗傅率残部落荒而逃。

六月，苗傅残部在福建地区到处流窜，但在宋军的追击下，到处都无立足之地。万般无奈，只好弃军而去，变姓名逃至建阳（今福建建阳），为当地土豪詹剽发现擒获，献给了韩世忠。

七月，苗傅、刘正彦在建康伏法。

（冷辑林）

参考资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卷25

《续资治通鉴》卷104—卷105

《三朝北盟会编》卷121—卷130

《宋史·高宗纪》

《宋史·叛臣上》

《宋史纪事本末》卷65

钟相杨幺起义

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人犯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军民与金军力战，但湖南安抚使向子湮弃城而走。金兵“大掠，屠其城”而去。金兵的烧杀抢掠，激起了洞庭湖周围人民的极大仇恨。

那时，宋廷招纳了一个溃兵土匪集团，号称有数十万众，在匪首孔彦周的带领下，由荆南府（今湖北江陵）长驱南下，直犯澧州（今湖南澧县）和鼎州（今湖南常德），遭到人民的反抗。鼎州城沦陷后，孔彦周在鼎州大肆屠城，抢劫财物，并强迫人民当兵。他们与金兵一样，同样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是月，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乘这“人情惊扰”的有利时机率众起义。

钟相“家赀钜万”，却好施与。他以行医为名，自号天大圣，并利用巫教做掩护，向群众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的这套理论得到了附近数百里农民的拥护。及钟相举兵起义的消息传开后，鼎州、澧州、荆南等地的人民纷纷响应。钟相遂自称楚王，改元天载，建国号为楚，并立妻伊氏为皇后，长子钟子昂为太子。

是时，鼎州阙守臣，而湖北提点刑狱公事王彦成逃，岳州单世卿携家顺流东下，仅以身免。起义军遂焚官府、城市、寺观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流皆杀之。很快便占领了鼎州、澧州、荆南府、峡州（今湖北宜昌市）、辰州

(今湖南沅陵)、岳州(今湖南岳阳)等六州一府十九县的广大地区。

随后，钟相派兵攻占桃源县(今湖南桃源)，杀了知县事钱杲。

是月，钟相还攻陷澧州(今湖南澧县)，杀宋守臣黄琮等十余人。

驻守鼎州的宋军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官吏士绅决定迎孔彦周入鼎州城以抗钟相。三月，权湖北制置使傅雱为拉拢孔彦周，任命他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负责镇压钟相起义的具体事宜。

孔彦周率军赴任，过澧州，在澧州南八十里的药山平被起义军打得大败，伤亡惨重，他本人仅以身免。

孔彦周抵达鼎州后，因"虑复有应者"，乃纵其军滥杀官吏军民，并占用官私仓库，大肆抢劫民财。此外，孔彦周还不时派军与钟相交战，"胜负略相当"。他见与起义军正面交战实难取胜，便花言巧语，放出要撤离鼎州的烟幕，并且派人"聚竹为筏"，摆出即将他去的架势。同时，派遣大量的奸细混入钟相起义军的内部。对此，钟相的部将杨太曾善意地提醒过钟相，"我观来者，衣蓝褛，献谄词，殆非善类，愿大王察之。"可日渐自满的钟相却对那些奸细"受之不疑"，"信之不为备"。结果给了孔彦周以可乘之机。后来，孔彦周乘起义军熟睡之际，率十万匪兵"乘筏夜渡"，向农民起义军大寨奔来。那些混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乘机里应外合，起义军仓促应战，结果战败，损失很大。钟相为保存实力，率领余众突围，向山谷转移。不久，遭到地主范颜的突然袭击，再次战败。钟相及妻伊氏和儿子钟子昂、钟子全、钟子绪等均被俘。孔彦周为"张大其功"，欲将钟相"解赴朝廷"，行至攸县，为湖南安抚使向子諲所杀。

钟相少子钟子义得仍与钟相余部在洞庭湖地区继续展开斗争。

四月，沿江制置副使李允文派统领官安和败钟相余党于湘阴（今湖南湘阴），杀获甚众，并生擒了其将裴宥等三百二十人。

六月，钟相余部杨华、杨太等聚众于龙阳（今湖南汉寿）。杨太因排行最小，楚人谓小为幺，故人们称之为杨幺。

是月，高宗任命程昌寓为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专门负责镇压钟相起义军余部之事。程昌寓接到任命后，即由荆南府（今湖北江陵）赴鼎州上任，途经龙阳附近的鼎口时，为起义军战败，他本人"仅能脱免"。后程昌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到达鼎州。但是，早在程昌寓到达鼎州之前，起义军已把这里的官衙、府库烧毁。他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而已。

十月，钟相余部在杨华率领下围攻桃源县，为程昌寓所败。

十一月，杨华等乘船至鼎州城下，声称要向政府投降。镇抚使程昌寓闻讯，忙派孔目官刘醇受降。刘醇刚一上船，即被起义军砍去脑袋，而杨华等人却摇着小船飘然而去。

绍兴元年（1130）六月，起义军杨华、杨广等率所部攻鼎州，为程昌寓的官兵所败。

八月，程昌寓的部将杜湛与起义军刘超所部交战于彭山，为起义军所败。随后，刘超即与杨华、杨广等合兵一处，再一次进攻鼎州，又为程昌寓率军打败。

十一月，程昌寓派杜湛败杨华部，杨华请降，成了起义军的叛徒。不久，杨广也为叛徒杀害。

绍兴二年（1131）正月，高宗以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权湖东安抚使，将所部开赴潭州。

二月，高宗任命李纲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后又任命刘洪道为湖北路安抚使，并指令他们合力进攻起义军。在官军的进攻下，起义军杨钦、夏诚等部均受很大损失。

是月，杨华再叛，扰鼎、澧、潭三州。

六月，利州观察使、蕲黄镇抚使孔彦周叛降伪齐。

十月，高宗诏令湖北安抚使刘洪道，知鼎州并力捕杨幺。

时，杨幺所部据洞庭湖，有众数万，大造车船及海鳅船，以抵御官兵，多至数百。车船两边装有车轮，置人于前后，以轮击水，"其速如飞"。每船可载兵数百人乃至千人。船上还设有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安辘轳操纵，遇官船靠近时，即放倒拍竿，以巨石将其击碎。此外，车船上还装有弩子、鱼叉、木老鸦等武器，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宋军在与起义军的交战中，因奈何起义军的车船不得，常招至失败。

绍兴三年（1133）四月，高宗诏令湖南安抚使折彦质节制鼎州、荆南府兵，速招捕杨幺。并严令潭、鄂、荆南、鼎、澧诸路合兵进讨杨幺，但各路官军皆因"粮道不继"，而相继引归。

时，起义军益盛，杨幺自称是"大圣天王"，并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重建政权。一时间，许多贫苦的农民和渔民纷纷前来投奔，起义军的人数很快就扩大到二十多万人。

六月，高宗任命王燮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今湖北黄冈）、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今湖北武汉），令他统领六万多宋军"讨荡杨幺等贼众水寨"。

十月，王燮率军进犯鼎口（今湖南汉寿），与杨幺水军接战。农民军使用高大的车船及弓箭、巨石、木老鸦等武器，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数，王燮本人也被流矢和木老鸦击中，他只好带着神武前军万余人，狼狈逃回鼎州。

是月，宋军统制石世达及刘湛兵合一处，在龙阳州大破起义军黄诚部。

十一月，王燮再次大规模进攻起义军。宋军分兵两路，西路由陆上进攻龙阳大寨，东路为水军，进驻洞庭湖东岸及湘江口一带。其计划是西路得手后，当起义军败退到湖东岸时，东路水军拦截，再东西两路夹击，企图全歼农民军。经过十几天的激烈战斗后，起义军从龙阳大寨撤退入湖。当探知东岸宋水军多为小

舟，不利湖中作战时，起义军便用几只车船隐藏旗帜军兵，乔扮成空船模样，引诱宋水军入湖。后来宋军果然中计，他们认为那些是起义军败下阵来的空船。便争先恐后地出港迎击。当官军小船靠近车船时，伏兵四起，拍竿、木老鸦，乱箭齐发，宋军的几百只小船顿时“尽淹没入水”，伤亡惨重，水军主力全被歼灭。

绍兴四年（1134）正月，知鼎州程昌寓派统制官杜湛与荆湖制置使王𤫊的统制官王渥所部合兵一处，共引兵破杨幺的皮真砦，获其舟三十艘。

二月，张浚至潭州。他令枢密院官冯檝为荆湖抚谕，俾同安抚使折彦质招安。然而，杨幺军恃水出没，其所据北达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界。他们“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

八月，王𤫊派忠锐统制崔增等征讨杨幺于鼎江（今湖南常德），均败。杨幺乘大水出击，攻破鼎州社木寨，杀宋守将许筌。

是月，高宗因王𤫊讨伐无功，降其职为光州观察使，然后授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代王𤫊为统帅征讨杨幺。

十月，伪齐将领李成受金主及伪齐刘豫之命，派使者到起义军周伦的大寨里要求订约，以联合攻宋。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农民军须水陆并进，与李成的人马一起，顺江而下，“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另外再给高官和犒赏物资。并且还许愿说事成之后，可以使杨幺“裂地为王”。周伦、杨幺等不受利诱，他们深明民族大义，严词拒绝了伪齐的要求。

十一月，夏诚率所部起义军攻打枝江（今湖北枝江），为官兵所败。

是月，金、伪齐统治者又派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大使团，带着官告、金束带、锦战袍等之类的东西，到起义军大寨，再三约起义军共同攻宋，杨幺大怒，令人“将来人以酒醉倒，尽行杀戮，沉尸入江中。”从此之后，金、伪齐的招降使者再也不敢到洞庭

湖来了。

绍兴五年（1135）二月，高宗以宰相张浚亲自主持镇压杨幺起义事宜，并调抗金主力岳家军入洞庭湖地区，以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全力镇压杨幺农民军。

张浚、岳飞到任后，加紧了进攻起义军的部署。一方面令湖南安抚使、统制官任士安以三千兵屯湘阴，以保护湘江粮道的畅通。并令统制官郝晸屯桥口（今湖南长沙县），王俊屯益阳旧县，吴锡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阳渡，马准、步琼留潭州，以大军压境，对起义军实行军事包围。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派人到起义军中进行利诱和恐吓，要起义军服从南宋政府的招安政策。此外，他们还对农民占领区“断其粮道，严行禁止博易”，实行经济封锁，并不断派出军队进行骚扰，使起义军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军需供给得不到保障。

四月，黄佐率众投降岳飞，岳飞大喜，称黄佐“知逆顺祸福”。随即令他潜回水寨，在起义军内部进行劝降活动。在黄佐的诱骗下，不几天，就有二千多起义军战士投降岳飞。

随后，黄佐率军突然袭击了周伦的大营。周伦败走，很多起义军被淹入湖中溺死，统制陈贵等九人为叛徒所俘。

不久，起义军中的杨钦、全琮、刘诜等部也相继投降了岳飞，致使起义军处境更为艰难。

六月，岳飞率军向杨幺的大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起义军虽势已大弱，但杨幺毫不畏惧，指挥车船奋力迎击。叛徒杨钦向岳飞献计说，大船非一丈深水不能行，杂草乱木也能阻车船之行进。于是，岳飞乃下令开放湖水，并用木头、杂草拥塞河道，致使起义军的车船丧失了作用。

其时，在岳家军的重重包围之下，杨幺仍在率军奋战。后起义军统制陈瑫又叛变，他劫走了太子钟子仪所乘的车船投降岳飞。杨幺见大势已去，便将钟子仪推入湖中，然后自己也跳湖自

杀，但未及死，即被宋军救出。杨幺、钟子仪被俘后即为岳飞杀害，余众二十余万人请降，起义最终归于失败。

（冷辑林）

参考资料：

《三朝北盟会编》，卷137—卷16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卷90，《续资治通鉴》卷107—卷115。

《宋史·高宗纪》

《宋史·岳飞传》

《宋史纪事本末》卷66

《杨幺事迹》

《钟相杨幺佚事》

伪齐立国

建炎二年（1128）正月，高宗任命刘豫为济南府知府。刘豫，景州人，北宋宣和末年曾担任过河北西路提刑。金军南侵时，刘豫弃官避乱，逃奔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后经中书侍郎张悫的极力推荐，被高宗起用为济南府知府。当时，山东盗贼遍野，是个首当敌冲的地方，刘豫不愿赴任，请求改派他到长江以南的某个州郡任职，但没有得到准许，最后还是不得不满怀怨愤地到济南上任了。

十二月，金挞懒率军攻打山东，很快便攻陷东平府（今山东东平）。接着，金军又攻打济南府。刘豫慌忙派儿子刘麟出战，但一出城门即被金兵重重包围，后经通判张东率兵拼死救援，金兵才退兵而去。金军见强攻济南府不下，便以高官厚禄诱降刘豫，刘豫心动了。他杀死济南府的骁将关胜，投降了金军。

建炎三年（1129）三月，挞懒攻占了山东诸郡后，以刘豫为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大名、开德府、濮、滨、博、棣、德、沧等州，又以刘豫的儿子刘麟为济南府知府。

建炎四年（1130）九月，金人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初，金主在听说高宗已逃往东南沿海地区的消息后，便派粘罕率军南伐，并下令说："待灭了宋室后，当立刘豫这样的人为藩辅，就像以前立张邦昌一样。"等到高宗南逃下海，兀术从江南北返后，金军诸将认为折可求、刘豫都可立。可刘豫为了当上傀儡皇帝，

派他的儿子刘麟以重金贿赂金左监军挞懒，恬不知耻地请求立自己为帝。挞懒同意后，便在掌握金朝最高军事权力的粘罕面前为刘豫极尽美言，可粘罕当时并没有马上表态。这时，粘罕有一个叫高庆裔的心腹在他面前游说：目前既然有意要在中原地区树立一个傀儡政权，你就应当明确地提出这事，并且要明确地指定要树立何人，以免得“恩归他人。”粘罕采纳了高庆裔的建议，并派他到刘豫的家乡景州（河北景县）和山东的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平府等地，咨问立谁做皇帝要妥当些。刘豫的同乡张浃首先表示拥戴刘豫，议遂定。金朝即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代对金称子礼，奉金朝正朔，设百官，国号大齐，都城设在大名府（今北京）。

随后，刘豫任用了一大批降金的宋朝文武大臣和地方官吏。

十月，刘豫册封其母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

十一月，刘豫改明年为阜昌元年。时博州判官刘长孺致书刘豫，劝其反正，归附宋廷，刘豫不从，竟把刘长孺囚禁起来。

绍兴元年（1131）五月，江淮招讨使张俊讨伐李成，李成众数万败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成投降了伪齐刘豫。

六月，刘豫以刘麟为大兵大总管、尚书左丞相，并在宿州（今安徽宿县）设置招受司，专门诱骗收容南宋逃过去的人。

十月，刘豫派其将领王世冲率领蕃、汉军队南侵，进攻庐州（今安徽合肥），为庐州守臣王亨所败，王世冲亦被斩，伪齐军死伤无数。

十一月，宋帅臣叶梦得招降了刘豫的将领王才。

时，伪秦风路的统帅郭振率军南侵，为王彦、关师古军所败。

是月，伪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知州薛安靖及通判李汇献州降宋。

十二月，金廷把陕西给了刘豫。至此，中原广大的地区尽属

刘豫了。

绍兴二年（1132）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今陕西商县）、虢（今陕西宝鸡）二州叛附于刘豫。

三月，忠州团练使、知河南府兼节制应援河东、北兵马使翟兴被刘豫收买的叛将杨伟所杀。先是，刘豫将移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由于翟兴屯兵于伊阳山寨（在今河南嵩县东南），十分恐惧。刘豫每次派人到陕西，均须假道金人地区，由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汲县），经太行山取道孟津（今河南孟县）过黄河至陕西，颇为不便。于是，刘豫便多次派人诱降翟兴，许以高官厚禄，但均遭到翟兴的严词拒绝。刘豫恼羞成怒，暗中收买了翟兴的部将杨伟。不久，杨伟杀害了翟兴，并携其首级投降了刘豫。

四月，刘豫迁都汴京，尊其祖父为徽祖毅文皇帝，父亲为衍祖睿仁皇帝，置于宗太庙。这天，暴风大作，屋瓦皆震，士民大为震惧。

时，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皆屯驻了金军，刘麟签乡民十余万为皇太子十三府军。伪齐赋敛苛重，刑法严峻，民不聊生。刘豫遣官尽情搜刮，两京民间窖藏及冢墓均遭破坏。

五月，宋利州观察使、蕲黄镇抚使孔彦周叛降伪齐。初，刘豫访得孔彦周母、妻及子，厚赠以银物，并使其舅卢某持书招降，孔彦周始有叛宋意。时，宋以权邦彦人枢密院，而孔彦周历来与权邦彦不合。又适韩世忠连破湖湘，顺流东下。孔彦周遂决定叛降伪齐，其部将陈彦明、郭谅不从，率千余人归宋。

十二月，襄阳镇抚所李横败刘豫兵于阳石，并乘胜杀奔汝州（今河南临汝），伪汝州知州彭玘献城降宋。

绍兴三年（1133）正月，李横起兵伐金，破颍顺军（今河南禹县），伪守兰和投降宋廷。不久，李横又败伪齐兵于长葛（今河南长葛）。

是月，李横还引兵急攻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伪安抚赵弼招架不住，只得弃城而逃。

二月，河南镇抚司统制李吉败刘豫将领梁进于伊阳台（今河南嵩县），并射杀了梁进。

三月，刘豫听说李横已入颍昌，欲收复东京（今河南开封）的消息后，大为恐惧，赶忙向金廷求援。金主派兀术率军驰援刘豫，刘豫也另派将领李成率兵两万与李横军鏖战于汴京城西北的牟驰冈（今河南开封西北），结果李横军因"恃勇无律"，遭到败绩，颍昌又重新沦于伪齐之手。

四月，李成率二万伪齐兵攻陷虢州（今河南灵宝东），俘获了南宋统制官谢皋。谢皋指着自己的腹部对贼军说："这是我的赤心。"说完，便自剖心而死。

是月，宋朝明州守将、水军都统制徐文投降了刘豫。徐文勇力过人，惯使一把重五十斤的大刀，所向无敌，众人称他为"徐大刀"。他以军功任淮东、浙西沿海水军都统制。当时有很多将领嫉恨他，诬陷他将叛逃伪齐。徐文有口难辩，遂率所部海舟六十艘，官军四千余人，自明州（今浙江宁波）沿海抵盐城（今江苏盐城），降于刘豫。他向刘豫献计说："宋廷在沿海地区没作什么防备，二浙地区可以袭取。"刘豫听后，大喜，随即任命徐文为莱州知州，并令他率军进犯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今江苏泰州）地区。

五月，宋高宗派韩肖胄，胡松年出使伪齐，刘豫欲以臣礼见，肖胄无以应。胡松年说："我们都是宋朝的大臣。"于是只长揖而不拜。刘豫见他们不肯屈礼，就想摆出一副自己为君主的高傲姿态。胡松年挖苦他说："陛下曾我和一起侍奉过高宗皇帝，犯不着在我面前摆架子。"刘豫很尴尬，只好怏怏地探问高宗的意向何在，胡松年回答说："高宗皇帝一心只想收复故疆。"刘豫听后，大为沮丧，面有惭色。

时，宋枢密院因已遣使与金议和，于是便下令约束沿边守将不得进犯刘豫。并严令襄、郢镇抚使李横等按兵不动、非奉朝旨，不得进兵。

九月，伪齐侍御使卢载阳议，应结交南夷以扰宋西南边地。刘豫乃遣通判齐州傅维永等五十人自登州（今山东蓬莱）浮海至交趾，册封交趾郡王李阳焕为广王，且结交诸溪洞酋长。金亦遣毛都鲁等二十余人偕行。

是月，宋川陕宣抚司统领官吴胜败伪齐兵于黄堆寨。

十月，伪齐李成率军陷邓州（今河南邓县），宋镇抚使李横因缺粮，只得弃襄阳（今湖北襄樊），奔荆南（今湖北江陵），后又入洪州（今江西南昌）。李成遂占领了襄阳。不久，随州（今湖北随县）、郢州（今湖北钟祥）也相继为金所有。

是月，伪齐贼将王彦先自亳州（今安徽亳县）引兵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有渡江南侵之意。刘光世率军进驻建康（今江苏南京），并派兵扼守马家渡，并令郦琼率所部驻扎在无为军（今安徽无为），以为犄角之势，伪齐军才返回。

十一月，金主派使者李永寿、王翊到临安来。永寿等人的态度非常傲慢，无理地要求南宋政府归还刘豫军的战俘及流民，并进而要求宋政府与刘豫伪齐政权"划江而治"。

时，广州监税吴伸上书高宗请讨刘豫，说："金人虽强，实不足虑，贼豫虽微，实为可忧。今敌使在廷，宜阳许而阴图之，乘其不疑，可一战擒也。"但高宗没有采纳。

绍兴四年（1134）正月，宋秦州观察使、熙河路马步军总管关师古率军自武都（今甘肃武都）袭击伪齐的大潭县（今甘肃武都北），至石要岭为伪齐军所败。关师古深感愧惧，单骑降伪齐。至此，宋失洮泯地区，仅剩阶（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二州。

五月，高宗以岳飞为荆南制置使，收复了襄阳。初，岳飞率

军渡江时，曾对部下起誓说："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李成闻讯后，十分畏惧，弃襄阳而逃，岳飞军进据襄阳后，乘胜收复了唐州（今河南唐河）。

六月，岳飞军收复了随州（今湖北随县）。初，岳飞曾令前军统制张宪攻随州，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未能攻克下来。后来统制官牛皋请求续攻随州，他仅让士兵带三日粮，结果，士兵们一鼓作气，在粮食还未用尽之时就已攻下了随州，并生擒了伪齐知州王嵩。

九月，刘豫勾结金兵大举侵宋。初，刘豫采纳了奉议郎罗诱所上的南征策，再加又闻岳飞已收复了襄、邓等州，内心十分恐惧，于是便请金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持。金主遂命宗辅为左副元帅，挞懒为右副元帅，兀术为前军之将，率兵五万南侵。刘豫亦派其子刘麟率军合兵南侵。

是月，金骑兵自泗（今江苏盱眙对岸）州攻滁州（今安徽滁县），金步兵自楚（今江苏淮安）攻承（今江苏高邮）。宋知楚州防御使樊序弃城而逃，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亦自承州退守镇江府。

十月，韩世忠奉诏屯驻扬州。他令统制解元守承州，以待金步兵，自己则亲率骑兵驻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以挡金骑。此外，他还令士兵伐木为栅，自断归路。这时，适巧高宗派暗通金廷的魏良臣出使金朝时路过这里，韩世忠令军士们撤去炉灶，并骗魏良臣说，有诏令让他率军移屯平江（今江苏苏州）。魏良臣北去以后，韩世忠赶忙率军移向大仪，并布成五阵，设伏二十多处，并约定各军听到战鼓声即应向金兵发起攻击。魏良臣到金后，即向金前将军聂儿孛堇报告了宋军的最新动向。孛堇听后大喜，随即引兵江口，别将挞不野则率骑兵过五阵东部。韩世忠见金军已入埋伏圈内，即令鸣鼓，向金军发起全面的进攻。时，韩世忠令背嵬军各持长斧，上砍人胸，下剁马足，大败金军，挞不野等二百余人被俘。

接着，韩世忠又派兵击败金军于天长（今安徽天长）鸦口桥。

时隔不久，金人又兵攻承州，解元率军在承州北门与金兵鏖战十数后，胜负未分。韩世忠闻讯后，即派成闵率领骑兵驰援，大败金军，俘获甚众。后，韩世忠又亲自率军追击金兵至淮（今安徽凤阳北之淮水），金军惊溃，“相蹈藉溺死者甚众。”

十一月，高宗听到韩世忠传来的捷报后，甚感欣慰。他亲至平江（今江苏苏州），欲亲自渡江作战，以励将士，抚慰人心。随后，即以张俊为浙西、江东宣抚使，王燮为江西沿江制置使，刘光世为淮西、江东宣抚使率军驻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江西制置大使赵鼎言：敌远来，利在速战。而刘豫没有亲率大军而来，只是派其子刘麟率军来侵，陛下犯不着亲自率军与贼兵一决胜负！高宗听后，乃止。

随后，宋高宗即下诏声讨刘豫。先是，金立伪齐时，宋正与金议和，乃称其为“大齐”。至是，始声讨伪齐，以励将士。

时，金兵已破滁州，宋军退守江南。淮西、江东宣抚使刘光世移军建康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率军移驻镇江府；浙西、江东宣抚使张俊移驻常州（今江苏常州）。

是月，宋知枢密院事张浚曾请高宗遣岳飞渡江人淮西，以牵制侵扰淮东之金兵，高宗应允。张浚乃视师江上。时金挞懒、兀术率军十万约日渡江决战。张浚应允，并留驻镇江以指挥诸军。

十二月，岳飞败金兵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北）。初，金军增兵侵扰淮右，兵围庐州。庐州守将仇悆率千人拒敌，败北，于是便向湖北制置使岳飞求援，岳飞很快就派统制牛皋、徐庆率二千人驰援庐州，金兵败走，死伤不可胜计。

是月，金兵决定退师，但又为韩世忠部所阻。当时因天下雨雪，金军的粮食匮乏，只好杀马为食，蕃汉军士皆怨气冲天。又听说金太宗患了重病，于是金将韩常向兀术建议说：“士无斗志，

君有笃疾，宜急归。”宗弼亦同意退兵北还。于是金军决定连夜撤退，并派人告知伪齐刘麟军。刘麟闻讯后，遂弃辎重而逃，昼夜行二百余里，至宿州（今安徽宿县），始敢停下来歇息。

绍兴五年（1135）正月，金军与伪齐之兵皆撤退至淮河以北的地区。

八月，伪齐军攻陷光州（今河南潢州）。九月，淮西宣抚司统制置官华旺败伪齐军于光州，并收复了光州。

绍兴六年（1136）二月，韩世忠自淮阳（今江苏邳县）南还。初，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率军至宿迁县（今江苏宿迁）。时，伪齐军刘豫聚兵淮阳，韩世忠率军猛攻淮阳，可淮阳敌坚守不下，而且刘豫还遣使乞援于兀术。当时韩世忠虽然也曾向江东宣抚使张俊请求增援，但韩世忠围攻了淮阳六日，张俊都没赴援。倒是伪齐及兀术的援军及时赶到淮阳。韩世忠自知不敌，乃率军还楚州（今江苏淮安）。是时，淮阳民众以韩世忠军南归者达万余人。

四月，伪齐王威率所部攻陷唐州（今河南唐河），宋团练判官扈举臣、推官张从之皆力战而死，城遂陷。

九月，岳飞率军收复唐州，且屡请高宗遣军收复中原，高宗未许，岳飞乃还至鄂州（今湖北武昌）。

是月，刘豫听闻高宗将亲征伪齐，连忙派人向金主求援。金廷领三省事宗磐说：“先帝立刘豫者，欲豫开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休息无期。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实收弊，奈何许之！”于是金主令刘豫自行抵御宋军，而仅派右副元帅兀术率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观望。

刘豫万般无奈，只好命其子刘麟率军由寿春（今安徽寿县）犯庐州（今安徽合肥），是为中路。又命其侄刘猊率军由紫荆山，出涡口（今安徽怀远附近），犯定远（今安徽定远），以趋宣（今安徽宣城）徽（今安徽歙县）州，是为东路。命孔彦周率军自光

州（今河南潢川）犯六安（今安徽六安），是为西路。共计签乡兵三十万，号称七十万。

时，宋江东宣抚使张俊驻扎在盱眙（今江苏盱眙）；杨沂中军驻在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军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屯驻；湖北宣抚副使岳飞军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安营；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军则在当涂（今安徽当涂）扎寨。当伪齐刘猊率东路军至淮东时，为韩世忠部所阻。刘麟自淮西渡江后，其军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与寿州（今安徽凤台）之间，为淮东宣抚使张俊所阻。而这时刘光世已决定弃守庐州，准备退守采石（今安徽当涂北），一时间，淮西大震。张浚闻讯后，派人星夜驰往采石告知刘光世：有渡江者斩！刘光世不得已，只得复还庐州，与杨沂中、张俊等部互相策应。

是月，刘猊以众数万过定远县（今安徽定远），欲趋宣化（今江苏南京江北）以犯建康，但其军前锋在赵家坊（今安徽定远西南）为宋杨沂中部所败。刘猊惟恐孤军深入，易为宋军所败，于是便与刘麟军会合于庐州（今安徽合肥）。

十月，淮西宣抚使杨沂中率军至藕塘（今安徽定远东）与刘猊军相遇。刘猊据山列阵，矢石如雨。杨沂中令摧锋军吴锡以劲骑五千冲杀其军，刘猊军招架不住，溃不成军。杨沂中乘机挥军掩杀过去，大败伪齐军，俘虏了伪齐军万余人。

刘麟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听说刘猊兵败的消息后，连忙拔寨北去。杨沂中及王德乘势追击刘麟至南寿春（今安徽寿春）而还。孔彦周亦解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围而北去。

由是，伪齐兵南侵遂败。金主听到刘麟新败的消息后，派人诘问刘豫的罪状，始有废黜刘豫的意思。

绍兴七年（1137）五月，伪齐陷随州（今湖北随县）。

八月，宋军统制郦琼率所部三万余人降刘豫。刘豫大喜，在文德殿召见了郦琼，并授给了郦琼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的官

职。郦琼向刘豫建议应抓紧有利时机南侵。刘豫心有所动，又向金人乞援。这时金人惟恐刘豫兵众难制，“欲以计除之”，于是便佯言郦叛降有诈，命刘豫立散其兵。

十一月，刘豫又遣使向金主报告说郦琼已降，可用他力向导，并力南下。金左副元帅挞懒却说，自刘豫主掌齐国以来，出兵辄不利，由于刘豫屡请金主兵，于是金主乃令女真万户束拔为元帅府左都监，驻太原（今山西太原），渤海万户挞不也为右都监驻河间（今河北河间），并令伪齐兵均要听从元帅府节制，遂将军队分布于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汝（今河南临汝）、亳（今安徽亳县）、许（今河南许昌）、颍（今安徽阜阳）之间。

时，金尚书省奏称刘豫治国无状。金主责问刘豫说：“建尔已八载，尚用吾兵，则汝何为?”遂废刘豫为蜀王。

是月，金主命挞懒、兀术以南侵江南为名，率金兵至汴京，先诱擒了刘麟，然后又以骑兵控制了宣德门等宫门，强迫刘豫至兵寨议事，并将刘豫囚禁于金明池，遂废黜刘豫。

时汴京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绢二百七十余万匹，金一百二十余万两，银一千六百万两，粮九十万斛，均为刘豫搜刮民脂所得，至是尽归金有。

（冷辑林）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卷 100—卷 11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卷 117

《宋史·叛臣上》列传第 234

《三朝北盟会编》卷 115—182

《宋史·高宗本纪》

张浚经略关陕

建炎三年（1129）五月，宋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主持川陕地区抗金战争。宣抚处置使为宋代掌管一路或数路军旅的方面大员，常以执政充任，有较大的自主权。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高宗授予他“承制”处理西北军政的大权，可以见机行事，奖励、处罚、提升、罢免官吏，统一指挥西北抗金斗争。

张浚出使川陕，是高宗廷臣针对当时的宋金形势作出的重大举措。高宗即位后，一味求和，不断南撤，很快至扬州，从扬州而镇江，镇江至临安（今浙江杭州），迫于朝野舆论压力，罢免黄潜善、汪伯彦。三月初，任命朱胜非为宰相，王渊主管枢密院。王渊为黄汪同党，将官苗傅、刘正彦对此不满，他们发动兵变，迫使高宗退位，拥立高宗三岁儿子为帝，由哲宗废后孟太后垂帘听政，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刘光世起兵，兵变很快平息。高宗复位，任吕颐浩为宰相，张浚知枢密院事，高宗询问兴复大计，张浚以为中兴当自关陕始，关陕是抗击金兵、复兴帝业的基地。金人若占有陕西，进军巴蜀，则沿流而下，攻取东南，指日可待，东南就会危在旦夕。因此，川陕事关抗金全局，自己愿意出使川陕，主持抗金。张浚同时建议高宗另派大臣与韩世忠镇守淮东，让宰相吕颐浩护驾，前往武昌，另以张浚、刘光世统兵首尾相随，张浚自己则置帅府于秦川。当时的抗战派普遍认为西北地区是南宋实现中兴大业，恢复宋朝对中原地区统治的基

础。李纲曾指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无法收复中原进占西北。"正当高宗犹豫不定之际，监登闻检院汪若海上书说："今日天下，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皆为脊背，今日以东南为首，怎么能起天下之脊背！图谋恢复，必在川陕。"张浚很高兴，他的主张更加坚定。面对金兵步步进逼，南宋朝野抗战情绪高涨，加上西北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确实重要，因此，宋高宗接受了张浚的建议，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授权他指挥西北对金作战。

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告别高宗君臣，离开行在所，他以刘子谋为参谋军事，王彦统率八字军相随，一行人自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溯江而上。至武昌时，吕颐浩改变初议，宋高宗未能前往武昌。同年十月，张浚抵达兴元府（今陕西汉中）。

张浚抵达兴元后，决定置司兴元，以图中原。在兴元，他上书宋高宗，指出："汉中地理形势，前控陕西六路之师，后有两川粮草供应，东通荆襄，可以得到财力上的支持，西出秦陇，可得良马补充军队，是一个号令中原，恢复国土的基地，臣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请陛下早下决心西行。"置司兴元后，张浚首先任免了一批将帅。他以端明殿学士知熙州张深知利州，充任利州路兵马钤辖、安抚使，而以明州观察使刘锡替代张深原职。不久，又以赵哲帅庆州，刘锜帅渭州，孙渥帅秦州，于是陕西诸路帅臣尽用武将充任。又以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本司前军统制王彦为利州路兵马钤辖。张浚初至汉中，要求诸将献大举之策。诸将皆以为胜利指日可待，惟独王彦持不同意见。王彦认为：陕西兵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没有严格训练，将帅与士卒未能熟悉，若轻率出兵，万一失利，则五路会全部丢失，不如屯兵利、阆、兴、洋等州，以固根本，若金兵入侵，则号召将帅互为应援，抵御敌人，如若不能获胜，亦不会有大的损失。张浚幕僚听了王彦的意见，相视而笑，王彦建议未能被采纳，请求离

去，故有是任。

置司兴元的当月，张浚即承制以提举川陕茶马事赵开为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随军转运司是宣抚处置使司重要属官，任务是供办军需，赵开曾在四川改革茶法，成效显著，素以善于理财著称于世。因此，张浚让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筹办粮饷。赵开谒见张浚，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川蜀百姓民力已尽，赋税锱铢不可加，只有商业仍有盈余。但商人奸诈，往往互相隐匿，只有不畏人言，敢做敢为，才有可能救一时之急。"张浚锐意兴复中原，对赵开委任不疑。于是赵开首先自成都府开始改变酒法。在此之前，商人以承包方式，从政府手中取得经营酒坊的权力，赵开改变这一经营方式，在原来酒坊所在地置隔槽，设置官吏，主管酿酒。酿酒所需器具及曲均由官府准备，酿酒户可带米前往自酿，政府收取加工费。酿米一石收钱三千，另收附加税头子钱二十二，只要交钱，酿酒的数量不加限制。取得成效后，赵开于四川四路实施新的酒法。以前，四川酒课年为 140 万缗，自是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同时，仿照成都府办法，于秦州（今甘肃天水）置钱引务，又于兴州（今陕西略阳）铸造铜钱，允许百姓以钱引（兑换纸币的证券和纸币）与铜钱进行交易。百姓感到很方便。此后赵开又改革盐法。对于变革存在不同意见，甚至有人上奏高宗。高宗转示张浚，张浚仍坚决支持赵开，没有退却。赵开理财，成效卓著，为张浚的恢复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张浚肩负重任，经常奖励士卒，以期士卒尽力报效国家，奖赏不可计数，资财常有余额，全仗赵开筹措。

十一月，张浚出行关陕，巡视各地。参议军事刘子羽举荐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盛赞吴玠有勇有谋，是位难得的将才。吴玠亦很自负，请求面见张浚。张浚与他交谈后，很赏识吴玠的才华，立即任命吴玠为统制，又以吴玠弟进武副尉吴璘掌管帐前亲兵。

十二月，张浚承制设坛，拜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曲端为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统制，知渭州。曲端登坛受礼，台下军士欢声如雷。曲端是一位在同西夏和金朝入侵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声威很高的将领。他长于谋划、能文能武，善于用兵，和另一位抗金名将吴玠在陕西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陕西流传着："有武有文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曲端及其军队可以说是陕西地区抗金的一面旗帜。但此人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轻视上级，动违节制，为其弱点。建炎二年（1128）六月，宋高宗以延安知府王庶为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并任命曲端为吉州团练使，充任节制司都统制，但曲端不愿服从王庶的领导。同年十一月，金兵攻陕西，延安失陷后，王庶带领官属及百余骑卫兵前往见曲端，曲端责备王庶只知爱身，而不知爱天子之城，他甚至想借陕西抚谕使谢亮之手杀掉王庶，谢亮不从。他却拘留王庶官属，夺其节制使印。从此与王庶结下了不解之仇。谢亮归朝，朝廷怀疑曲端有可能叛降，任曲端为御管司提举，曲端知道朝廷用意，拒不前往任职，这就更加使人表示怀疑。曲端有口难开，无以自明。张浚经理川陕，知道情况，愿以家族百人性命担保曲端不反。出巡关陕，更感到曲端与金人角逐，屡有战功，在陕西军队及百姓中有很高的威信，加上在接触中，张浚也感到曲端确实是一个将才。有一次，张浚到各地了解军队情况，曾到曲端军营视察，检阅军队，曲端呈上其所属五军军籍，张浚浏览之后，决定先点视其中的一军，要求立即集合。曲端以鸽子传达命令，他打开笼子，放出一鸽，所点之军迅速赶来，军容整齐，接着，张浚命令点视全军，曲端尽放笼子中信鸽，五军顷刻而至，使张浚赞不绝口。正是鉴于上述情况，张浚才重用曲端。

当张浚十月抵达兴元时，金兵已兵分四路大举攻宋，金将娄宿率兵西攻陕西，金兵很快攻破长安（今陕西西安）。十二月，

又往东围陕州（今河南陕县）。宋军在知陕州李彦仙的指挥下奋力抵抗，张浚令曲端出兵救援，曲端则毫无出兵之意，金军分成十队，轮番攻城。次年一月，陕州陷落，李彦仙牺牲。

二月，张浚领兵入卫。张浚知悉金兵大举南下，尾追高宗，南宋小朝廷危在旦夕，遂于二月率兵入卫，宣抚处制使司事务由参议军事刘子羽代行职权，举凡川陕军政民事皆得专决。三月至彦州（今湖北房县），获悉金兵已撤回江北，张浚乃引军还汉中，继续处理西北军事。四月，金兵破陕州后长驱入潼关。曲端命部将吴玠迎击金军，自己屯兵邠州（今陕西彬县），以为声援。吴玠与金人战于彭原店（今甘肃庆阳西南）。战役刚开始，吴玠击败金兵，金将撒离喝登高远望宋营，胆战心惊，忍不住哭了起来，此后，他被人称为“啼哭郎君”。后来，金军经过整顿，发动反攻，转败为胜，吴玠部将杨晟战死，曲端见吴玠兵败，退守泾州（今甘肃泾川），金人攻占邠州。事后，吴玠抱怨曲端不发援兵，大骂曲端，从此，二人之间产生矛盾。曲端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而弹劾吴玠违反命令，将他降职。张浚爱惜吴玠，不久以吴玠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入夏，金兵退守河东。

六月，张浚罢免宣抚处置司都统制曲端。张浚虽重用曲端，但外间以为曲端欲叛言论不断，加上曲端在同金人作战坐视不救援的行为，加深了张浚的疑虑。于是他派遣宣抚制置使司主管机要文件的属官张彬以招募补充禁军为名义，前往渭州（今甘肃平凉），观察曲端动向。张彬至渭州后问曲端：“曲公您常担心各路人马未能统一，财用不足以供军，现在张公（浚）来后，部队已统一指挥，军需已准备充足。金将娄宿孤军深入，我军会合诸路队伍，打败他会很容易。今天不主动出兵，将会坐失良机，等到粘罕调兵前来，金军会合，将用什么对付它呢？”曲端回答说：“不对，用兵之法先较敌我双方情况，现在敌军不利因素只有孤军深入一事，然敌之有利因素有四：士兵作战技能较好；士气高

涨；分合熟练；因粮于我，来去自如，因此常处于主动地位。我军情况，有利因素只有五路军马能随时会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一项，然而不利因素则有三：将帅刚刚更换，士兵缺乏训练，兵将素不相识，这些情况与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不能大举进攻，万一轻举，稍不如意，虽智者，亦无法善后。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改变不利因素：训练军队，按兵据险，经常派出一支部队，扰乱敌人，使敌人在关中春天无法耕种，秋天不能收获，迫使敌人取粮于河东。这样，不出一二年，敌人必自困毙，届时我军乘势出击，可以一举歼敌！”张彬回去后向张浚作了汇报，张浚对曲端的意见不以为然。张浚闻知金兀术率军在江淮逗留，以为金兵又会像头一年一样，将渡江南下，因此他决定出兵，分扰其势，牵制金兵，都统制曲端坚决反对，认为“平原旷野，利于敌人骑兵冲突、不利宋军步兵作战，且金人刚刚打了胜仗，士兵锐气十足、不可同他们争锋。我军应当加紧训练，进行防御，保卫疆土，决不可进行反攻。”意见与张浚严重分歧，张浚很不高兴，厉声问道：“将军持不战之说，怎么能当大将？”曲端也很生气，公开顶撞，遂交出大将军印。张浚本来就不信任曲端，这次曲端公开反对他的大举之策，使他无法容忍，因此，终于以彭原店失败的责任罢免了曲端，但仍以为参谋。当时王庶亦任参谋，二人关系不和，曲端坚决不肯接受任命，张浚于是以曲端为都转运使，随军而已。

七月，金兀术引兵赶往陕西。张浚害怕金兵再次南下，出师牵制。他下令赵哲攻鄜州（今陕西富县），吴玠领兵攻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金将娄宿进攻陕西，所克城邑，得而复失，要求增兵，金太宗表示同意，令讹里朵前往监军。又将兀术所部调往陕西。金兀术遂自六合（今属江苏）领兵赶赴陕西。

八月，金兵围攻楚州。宋高宗乃诏浙西安抚使刘光世遣兵防守长江，会合淮南兵力阻击金兵，并命令张浚出师牵制。这时，

吴玠已收复永兴军，赵哲已攻取鄜州。张浚出师告捷，十分轻敌，加上又得朝廷命令，于是他决计要与金人决一死战。

张浚的大举之策大为他的部下所反对。吴玠认为，高山峻岭，便于宋军驻守，敌骑甲马厚重，不便冲突。因此，他建议据险守关。参谋军事刘子羽甚至搬出临行前高宗让张浚到陕西“三年而后用师进取”的话来劝阻张浚不要轻举妄动。张浚则说：“事有不可拘者，假如万一有前日海道之变生不测，我辈虽欲复归陕西、号令诸将，怎么可能呢？”对于这些反对意见，张浚皆置之不理。由于张浚一意孤行，对他的“大举之计”，众将及幕客虽知不可行，却不敢公开发表意见，表示反对，即使偶尔表示不同意见者，迫于压力，也不会坚持己见。张浚遂移檄河东，向金左副元帅粘罕问罪，虚张声势。

九月，张浚获悉兀术将至，于是他下令永兴军吴玠、鄜延路赵哲、熙河路刘锡、秦凤路孙渥、泾原路刘锜五路宋军会合，以刘锡为都统制，合兵40万，马7万匹，准备迎敌决战。

张浚认为五路兵马一旦会合，不但可以打败陕西金军，而且可以乘胜追击，直抵幽燕，收复中原失地，心情十分高兴。问曲端认为如何，这次曲端再也没有讲述任何理由，只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必败。”张浚说：“如若不败，怎么办？”“若宣抚之兵不败，曲端伏剑而死。”曲端回答说。“可否立军令状？”张浚问，曲端索要纸笔，展纸疾书：“如若不败，甘愿军法从处。”张浚以为自己必胜，也毫不示弱，说：“我张浚出师若不能获胜，回来这颗头给你曲端。”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陕西五路宋军会合后，东向迎敌，大批民夫运送粮食辎重，浩浩荡荡，张浚亲自至邠州督战（今陕西彬县）。五路大军在刘锡统帅下进驻富平（今属陕西），摆开架势，准备与敌决战。诸路运送粮草农民也陆续到达，金钱粮帛，堆积如山，他们用车马掩护，以州县为单位，结成小寨。

刘锡召集各路将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吴玠竭力主张在高地扎营，使金军骑兵不容易发挥冲杀的威力。众将都很轻敌，以为我众敌寡，宋军营寨虽在平地，但军营前面有片长满苇草的沼泽，可以为屏障，防御敌骑兵，军营用不着迁徙。宋军就这样摆下了阵势，等待与金兵决战。

五路宋军进抵富平，摆好战阵时，金将兀术军入陕屯于距富平八十里的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娄室尚驻绥德军（今陕西绥德），两路金军尚未会合。有的宋将建议乘敌军未会合之机出击，张浚没有采纳，认为这样不妥，应当先投战书，事先选择好时间进行会战。张浚遣使投书，约金兵九月十四日会战。金兵两路会师后，娄室亲自率卫兵登山观察宋兵阵势，认为宋军虽然人数很多，然而营垒不坚固，千疮万孔，很容易攻破，才答应同宋兵会战。

到了会战的那一天，金兵却故意迟迟不肯出战，作出示弱的姿态。张浚以为是金兵胆怯，以为必会破敌无疑。他手下的那帮谋士更有人建议，以妇女巾帼之服给娄室，以示污辱。金兵看到宋兵已困骄而怠，毫无斗志，就在中午发起攻击。金兵主帅先派三千骑兵带上土囊，填平宋军以为万无一失，并不设防的沼泽，打开通道，向运送粮草的乡民小寨发起攻击，使农民四散奔走，逃入宋营，引起宋营一片混乱。

接着，金兵以娄室为左翼，兀术为右翼，分两路进攻宋军，兀术所部遭到了刘锜所率泾原宋兵的顽强抗击，刘锜所领部队杀死敌军甚众，兀术陷入了重围，大将韩常眼睛被流矢射伤。兀术、韩常力战才突出包围，右路金兵被迫退却。娄室的左翼金兵攻击南宋的环庆兵。环庆兵受攻击，其他各路宋军却环寨自保，并不支援，环庆兵主帅赵哲胆怯，临阵逃跑。士卒见主帅已逃，惊恐溃散。环庆兵的溃逃，牵动了宋军整个局势。各路宋军也跟着溃逃，溃兵丢下所有辎重，一直逃到邠州，见金兵未来追赶，

才稳定下来，这样，张浚所组织的五路合兵决战，以大败告终。

十月初一，张浚追究富平兵败责任，斩赵哲、贬刘锡，令各路将士各还本路，自己则上书待罪。富平兵败，在邠州督战的张浚召集刘锡等将领商量如何对待目前的败局。张浚立堂上，诸将站在堂下，气氛紧张严肃。张浚问诸将，富平兵败，谁当承担责任？众将都说是环庆兵败走，张浚下令将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赵哲当众斩首。又下令将富平之战总指挥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刘锡撤职降为海州团练副使，合州（今四川合川）安置。然后命令各路将兵归本路，宋军军心涣散，张浚命令刚刚出口，各路兵卒已纷纷离去，很快溃散。张浚则率领官属，在亲信卫队护卫下退往秦州。十月下旬，部分宋军投降叛敌。张浚在富平兵败后，推诿丧师责任，贬刘赐，斩赵哲，许多将官心存不服。赵哲被杀后，张浚以陕西转运判官孙恂权环庆经略使。孙恂按照张浚、刘子羽的旨意，对心怀不满的将官残酷迫害，以败军之名斩杀统制官张忠、乔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直至公开化，统制官慕容洧统兵进攻环州（今甘肃环县），张浚令统制官李彦琪以泾原兵救环州，慕容洧叛投西夏。张浚又令泾原经略安抚使刘锜追击。刘锜留下统制官张中彦、干办公事承务郎赵彬守渭州（今甘肃平凉）。张中彦、赵彬是曲端的心腹，对曲端被贬早已心怀不满，知道此时张浚已入秦州，担心金兵进攻，无法坚守，因此密谋驱逐刘锜、占据泾原。刘锜与慕容洧在环州对抗时，金兵已攻破泾州，进军潘原县。刘锜只好让李彦琪抗击慕容洧，自己则率精锐部队赶往渭州。行至瓦亭，金军已迫近，刘锜进不敢追击慕容洧，退不敢进入渭州，只好退往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张中彦、赵彬则在金兵压境时，公开投敌。

十一月，金人入侵德顺军，张浚焚毁簿书，遗弃辎重，退守兴州（今陕西略阳），仅有亲兵千余人护卫，士气十分低落，干办公事朝请郎杨晟惇建议张浚引兵前往金州（今陕西安康）、洋

州（今陕西洋县），等敌人退兵后，然后收复川陕。知兴元府王庶亦力陈保秦之策。张浚早已置陕西诸路于度外，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当时张浚幕僚有人建议退保夔州（今四川奉节）。参议军事刘子羽当场予以反驳说："孺子可斩！金人图谋已久，只因川江有铁山栈道之险，无法入蜀。今日不守此险，纵敌入蜀，退师偏远的夔州，将无法与关外互为声援，进退失据，后悔都来不及！宣抚使司只能留驻兴州，外系关中之望，内可使全蜀安心，当务之急在于遣使出关，召集诸将，收集散卒，据守险隘，坚壁固垒，随机而动，这样才能挽救时局！"张浚同意刘子羽的意见，采纳了他的建议，留在兴州。然而却无人敢出使关外，刘子羽主动请战，单骑出使秦州。兵败后许多将领不知宣抚使司退往何地，群龙无首，无所依归，忽然听说刘子羽来了，又听说宣抚司在蜀口，都很高兴，纷纷引兵前来。各路队伍很快集合，达十余万人，军复盛。张浚收编队伍后，慰问伤病，记录过去的功劳，批评自己的过失，使大败的人心逐渐安定下来。刘子羽建议张浚，让吴玠聚兵据险，据守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熙河兵屯驻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驻守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州（今陕西凤县）三州，以固蜀口。金人获悉宋军布防情况，知道宋军已有准备，因而没有突然进攻，于是引兵离去。

绍兴元年（1131）三月，金兵破福津，同时进逼宣抚使司所在地兴州。张浚退往阆州（今四川阆中），以张深为四川制置使与刘子羽一同前往益昌。王庶为利夔制置使，节制陕西诸路，知兴元府。六月，张浚以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金兵继续进攻，在没有遭到多大抵抗情况下，就占领了陕西五路许多以往未曾攻占的州县，至此，宋兵仅守住了阶、成、岷、凤、洮五州及凤翔府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等地方，陕西五路几乎丧失殆尽。

八月，张浚杀前威武大将军曲端。富平兵败后，张浚感到曲

端确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打算再用曲端为将，但却遭到了与曲端有积怨的王庶与吴玠的反对。他们在张浚面前挑拨离间。吴玠说："曲端再起，一定会对您张公不利。"王庶则对张浚说："富平之战前，张浚与曲端有胜负之约，今天你宣抚有何面目见他？曲端若得志，即使你是宣抚，他也敢斩杀你。曲端不可再用。"这刺到了张浚的痛处。吴玠又在手掌上写上"曲端谋反"四字，举手让张浚看。经过王庶，吴玠这么一挑唆，张浚也就产生了处死曲端的念头，但却苦于找不到罪证。于是王庶又进一步指出：曲端曾题诗，内有"不向关中兴帝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两句，指斥乘舆，这就是罪证。这样，张浚决定将曲端送往恭州（今四川红原）监狱，让一个曾受曲端鞭笞过，对曲端怀有刻骨仇恨的武臣康随为夔州路提点刑狱，负责处死曲端。曲端知道这一消息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仰天呼叫数声："我将死矣！"他有匹日行四百里的战马"铁象"，曲端对它连呼数声："铁象可惜！"然后就被押往恭州。曲端被押至恭州监狱，康随令狱吏将他五花大绑，糊住嘴巴，放入笼中，在四周架起大火，曲端干渴难熬，请求给些水喝，康随让人递上烧酒，曲端喝下，七窍流血，当场死亡。曲端被害身亡的消息传开，陕西将士都很心痛，不少人叛降金兵，严重削弱了宋军抗金实力，使金兵得到了一批熟悉陕西地理的向导。

绍兴二年五月，张浚以刘子羽知兴元府，保卫汉中地区。

九月，宋廷以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张浚杀曲端后，不少人为曲端鸣冤，朝廷怀疑张浚杀赵哲、曲端为无辜，又以张浚信任刘子羽、吴玠，用人不当。于是，乃以王似为副使，张浚感到不安，上疏求解兵权，又论王似难以胜任。吕颐浩很不高兴。朱胜非又以积怨在高宗面前说张浚的坏话，于是张浚被召为知枢密院事。

绍兴四年三月，张浚、刘子羽、王庶、刘锡等至临安。御史

中丞辛炳与张浚有私怨，他与殿中侍御史常同一道，上章弹劾张浚丧师失地，专横跋扈。张浚因此被免职，福州（今属福建）居住。

张浚经略关陕，以刘子羽为参谋，让赵开理财，提拔吴玠为大将，可谓知人善用。他一心想早日恢复国土，未能及时训练士卒，调和将领间的关系，会合五路兵力同金人决战，结果大败，陕西五路被金人占领，然江南金兵因此西调，东南赖此以安。

（宋三平）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张浚经略关陕》

《宋史·张浚传》

《宋史·刘子羽传》

《宋史·吴玠传》

《宋史·赵开传》

《宋史·曲端传》

《宋史·高宗纪》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3—卷 79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炎兴下秩 42；炎兴下秩 47。

周密：《齐东野语·曲壮闵本末》

《齐东野语·富平之战》

罗大经：《鹤林玉露·曲端》

丁传靖：《宋人佚事汇编》卷 14，卷 16。

吴家军

建炎四年（1130）九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会合陕西五路大军，与金兵在富平（今属陕西）决战，宋军惨败，全线溃退。张浚自邠州（今陕西彬县）退守秦州（今甘肃天水），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金兵步步进逼，川陕大震。吴玠为其弟吴璘招集从富平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士兵数千人，扼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肩负起了抵抗金军的重任，一支新军从此诞生了。

吴玠善于骑射，有勇有谋，是一位在与金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与曲端齐名的名将。张浚经略川陕，宣抚处置司参谋军事刘子羽举荐吴玠，吴玠被张浚任命为统制，吴璘也被重用，掌管宣抚处置使帐前亲兵。富平之战后，吴氏兄弟集兵屯守和尚原。

和尚原位于秦岭北麓的大散关东面，是金军入川的必经之地，具有屏蔽四川的军事价值。吴玠在宋军溃败的情况下，扼守和尚原，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战略眼光。他在和尚原积粟练兵，列栅死守。有人建议他退保汉中，扼守蜀口，以安定人心。吴玠不从，他说："我拥兵驻守在此，敌人怕我从后面袭击，决不敢轻易进军南下，这是保卫川蜀的最好办法。"这支守军起初兵力很弱，面对强敌，又与后方不通音讯，粮食匮乏，人无固志，处境艰危。有的将士甚至图谋劫持吴玠以降敌。吴氏兄弟知道后，召集诸将，歃血为盟，以忠义共勉，大家被感动得流泪，都愿尽力死战。吴玠曾任凤翔（今属陕西）知府，任职期间，他招抚流民，恢复生产，遗惠百姓，百姓对他怀有好感。此时，凤

翔虽落入金人手中，百姓知道吴玠驻军和尚原，纷纷在夜里偷运粮食接济他的部队。金人知道后，派出伏兵截击运粮百姓，又用连坐法严令禁止，百姓仍然冒禁运粮，支持吴玠守军。在百姓的支持下，吴玠逐渐摆脱困难，军心渐趋稳定，士气慢慢恢复。

绍兴元年（1131）五月，金军二路夹击和尚原，被吴玠军击败。自富平战后，金军东守西攻，加强西线力量，试图进入四川，造成对长江中下游的包围之势。金军要进入四川，吴玠守军无疑成了最大的障碍。绍兴元年三月，金太宗从侄没立开始领兵攻打和尚原，被吴玠击败。五月，金军兵分二路，没立自凤翔，乌鲁折合自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绕道出大散关，约日会攻和尚原，企图夹攻吴家军。乌鲁折合先至，吴玠令将士据险以待。金军进攻，山高路狭，乱石丛生，金军骑兵无法冲杀，只好舍马步战，被吴玠击败。没立所率金兵方攻箭筈关，吴玠派兵将他击败。这样，二路金军无法会师，大败而归。吴玠军取得了保卫川陕的头一次胜仗，大大鼓舞了士气。

十月，吴玠在和尚原再次大败金军。娄室死后，宗弼（兀术）成了陕西金军统帅。他对没立两战两败，感到气愤和耻辱。决计要拿下和尚原，打败吴玠军，雪耻解恨。十月，他会合各路大军十余万人，对和尚原吴玠守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兀术亲率金军自宝鸡（今属陕西）出发，在渭河上架桥渡河，直逼和尚原。吴玠、吴璘率将士迎敌，他们选派强弓硬弩，分番轮流射击，号称“驻矢队”。金兵猛攻，吴玠守军发射弓箭，矢下如雨，使金军无法前进。吴玠派兵截断敌军运粮道路，又在敌人撤退的必经之地神坌埋下伏兵。双方激战三天，金军筋疲力尽，只好退兵，途中又遭吴玠军伏击，金军大乱，死伤无数，兀术身中两箭，狼狈逃去。这是金军南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败。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承制以吴玠为镇西军节度使，吴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至此成了南宋第一位因抗金军功而建节的将帅。此次战

后，有一年多时间，金军只是与吴玠军对峙，不敢轻易进攻。

绍兴三年二月，吴玠率军救援饶风关。金兀术率残部返回北方后，金廷改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负责川陕战场。撒离喝与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合兵进攻巴蜀，他改变策略，避免正面进攻和尚原。绍兴二年十二月，撒离喝以宋叛将李彦琪屯秦州，攻仙人关，以牵制宋军主力吴玠军，他自己则率金兵主力，采用迂回战术，绕开和尚原，由长安出兵，东攻商州，破商州（今陕西商县）、取洵阳（今陕西旬阳），沿汉水溯江西上，进攻汉中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汉水中游地区是王彦的防区，他所领八字军惯用短兵器，很快被金兵击败，金军进占金州（今陕西安康）。知兴元府刘子羽急忙派统制田晟率兵守饶风关，一面派出使者向吴玠告急。吴玠军驻守河池（今陕西凤县东），他立即率领几千人，自河池出发，昼夜兼程，一天一夜行军三百多里，火速赶到饶风关。洋州（今陕西洋县）义士一万三千多人加入吴玠部队，王彦也率部赶来，与吴玠一起扼守饶风关。

为了打击金军士气，吴玠故意派人给撒离喝送去黄柑，并说："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原以为吴玠远在西线，知道吴玠已至饶风关，大吃一惊，将手杖使劲地敲地面道："你怎么来得如此之快！"于是，他下令金军全力攻关。金军身披重铠，顽强地仰攻，一人先上，二人继后，先攻者死亡，后者立即补上。吴玠军用弓弩乱射，又用大石滚压。双方苦战六天六夜，金军伤亡很大，死尸山积。这时，吴玠军中一个因违背军令受到责罚的偏将，投叛金军，他领金军沿小路从祖溪关绕至吴玠守军背后，居高临下，攻击宋军，宋军溃退，失掉关隘。金军攻入洋州，吴玠退守仙人关，王彦退往达州（今四川达县），刘子羽退守三泉（今陕西沔县西南），撒离喝率金兵入兴元府，至金牛镇，四川震动，形势危急。

刘子羽兵不满三百，食粮不继，他与将士均以草根树芽充

饥，士气低落。他给吴玠写信，要他一同来此守卫，信中说："子羽决心死在此地，与你永别了！"吴玠看后不禁泪流满面，但他考虑到仙人关为战略要地，没有马上行动。吴玠爱将杨政在营门大叫道："节使不可有负刘待制愿望，不然的话，我杨政也要丢下节使走了！"于是吴玠带兵从小路赶至三泉，与刘子羽会面。刘子羽建议吴玠一起驻守三泉，吴玠没有同意，他说："关外是巴蜀门户，决不可以轻易放弃。金兵怕我截断退路，所以不敢深入。如若大家都退往南方，敌人步步进逼，形势就会对我军不利。现在让我留在敌人后面，敌人料定我要用奇计，设埋伏，则会退兵，到那时我再出兵追击，可以逼使敌人逃走。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善败者不亡的道理。"刘子羽同意了吴玠的意见，吴玠率军回守仙人关。刘子羽收拾溃兵，退守潭毒山（今四川广元县北）筑垒防守。这时，张浚也派王庶赶到巴州（今四川巴中）布防。金军知道四川有准备，吴玠又在背后，不敢轻易出兵，只好退回兴元。金军深入，粮饷不继，杀马充饥，瘟疫流行。撒离喝进退两难，逗留一月后，只得退兵，从斜谷撤走。吴玠派兵袭击金军。山高路险，金军跌入山涧，死伤无数。金军只好抛弃辎重逃命，来不及逃走的则向宋军投降。五月，刘子羽收复兴元，王彦收复金州。恢复了战役开始前的局势，川陕地区又转危为安。战后论功行赏，以吴玠为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

饶凤关之战后，宋金双方都作了新的部署。吴玠考虑到和尚原远离四川，粮运不继，担心难以持久。他与刘子羽商量后，决定于川口仙人关侧近，修置山寨，号"杀金坪"，又根据吴璘的建议，考虑到杀金坪前阵宽阔平坦，后阵地势狭窄险峻，修了第二道防线，严阵以待。金廷则再次派元帅左都监兀术指挥川陕战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试图一举取胜，进入巴蜀。

绍兴三年十一月，金兀术率部南下，吴玠因和尚原粮饷不继，放弃阵地，金军遂占领和尚原。

绍兴四年三月，金兀术统兵十万攻仙人关，吴玠、吴璘领兵力战，再次大败金军。兀术占领和尚原后，于次年二月统兵南攻。他们自铁山凿崖开道，沿秦岭东下，直逼仙人关。仙人关地处凤州（今陕西凤县）与兴州（今陕西略阳）的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吴玠率领所部万余人，屯驻杀金坪，迎击金军。吴璘领兵自七方关人援，与金军转战七昼夜，才得以与吴玠会合。

金军首攻吴玠军，以云梯攻垒壁，吴玠部将杨政率领士卒以撞竿击碎云梯，又以长矛刺杀敌军士卒。这时有的将领建议选择别的地方防守，主张退却。吴璘抽出战刀在地上画了一圈，严正地对诸将说："死就死在这里，敢退走的斩首！"杨政也说："此地是四川的门户，宁死也不能失守。"

金军兵分二路，攻击宋军。吴璘率领精锐部队在两路金军之间，左攻右击，随机应变，打击金军。金军凭着优势兵力，将吴璘所领部队压人第二道防线，战斗更加激烈。金军的生力军身披重铠，用铁钩相互连结，不顾一切，鱼贯而上，攻击宋营。吴玠下令列队猛射，矢下如雨，金军死尸山积。金帅撒离喝驻马环视战场，察看地形。一会儿后，他说了声："我能取胜。"次日，他下令猛攻西北楼，宋将姚仲登楼酣战。激战中，吴玠令部将田晟、杨政率领精锐部队，以长刀大斧冲人敌阵，左右冲杀，至晚上，宋军在四面山上，点起无数火把，战鼓擂得震天动地。第二天，统制王武、王喜率兵分紫、白旗冲人金营，金军大乱。金军大将韩常左目被宋军弓箭射伤。至此，金人由进攻转为溃退。吴玠发兵追袭伏击，统制张彦率兵夜袭金兵横川寨，斩杀千人，生俘百余，统制王俊率兵埋伏于河池，又获大胜。金军大败，退回凤翔。

金人这一次出兵，以为一定能人四川，元帅以下连家属都一同前来，结果却事与愿违，大败而归。

捷报传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宋廷授吴玠为川陕宣抚使。

绍兴五年正月，吴玠获悉金兵进犯淮南，立刻派遣吴璘、杨政乘机出兵牵制。吴璘领兵攻秦州，金将撒离喝急令各路金军救援，杨政出兵拦击，将金援军击败。至四月，宋军又收复了凤、秦、陇三州。七月，朝廷对仙人关之战论功行赏，拜吴玠为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节度使，吴璘为定国军承宣使，杨政以下升迁各有等差。

吴家军在同金军的战斗中，连连获胜，不断壮大，至绍兴六年时，兵力已达六万八千多人，成了南宋绍兴时行营护军的右护军。吴玠成为南宋初年五大帅之一。右护军以兴州仙人关为大本营，是川陕宋军抗金主力。

吴玠与金军对垒十年，常患粮饷运输劳民伤财。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尽力裁减冗员，节省开支，同时，又治理屯田，年收谷物达十万斛。他又派士卒兴修褒城的水利工程，使数千顷农田得到灌溉，几万户农民得以恢复生产，从而吴玠及其部队更加得到百姓的支持和爱戴。

绍兴九年，宋金和议初步成功，宋高宗以吴玠功高，授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升任四川宣抚使，陕西地区的阶、成州听其调遣。被高宗派来传达诏令的宦官抵达仙人关时，吴玠已患重病，他在侍卫的搀扶下起来接旨听命。同年六月，吴玠病逝于仙人关，终年四十七岁。

吴玠从低级军官，逐步升任为独当一面、支撑一方的大将，吴家军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从开始的数千人发展至近七万人，这同吴玠的军事才能及用人政策有关。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但却很关心爱护自己的士兵；他虽身为大将，却毫无大将的架子，常到部队中去，和普通士兵站着谈话，虚心听取士兵的意见。因而，深得将士们爱戴，士卒乐于听命。他选用将校，不问关系，不信空谈，只凭功绩能力高下，因此，将校们都愿意在他的领导下作战，吴家军始终士气高涨，充满战斗力。

吴玠去世后一个月，文臣胡世将出任四川宣抚副使，主持川陕宣抚使司。胡世将到任后，召集将领开会，宣布一切按照吴玠留下的规章办理，自己不会作变改，因而人心安定。川陕大军分由吴璘、杨政、郭浩三大将统帅。三大将中，吴璘兵力最多达五万人；杨政次之，为二万；郭浩兵力最弱，仅万余人。

绍兴九年，宋金和议初步成功，楼炤出使陕西，命令三大将出守陕西，以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吴璘帅秦凤。吴璘表示反对，他指出："金人出尔反尔，令人难以信服。今天我们移师陕西，蜀口空虚，金人若再次南犯，直捣蜀口，我军将不战自屈。依我之见，应当依山为屯，控制要塞。等到敌人筋疲力尽，再慢慢图谋进据。"楼炤采纳了吴璘的意见，以吴璘屯兴州，杨政屯兴元，仅以郭浩一军屯延安（今属陕西）。

当时朝廷中一些人恃和忘战，想废弃仙人关，吴璘拜见胡世将，力陈利害。胡世将同意吴璘的看法，下令不得撤毁任何战备设施，并派大军镇守阶、成山寨。

宋金和议破裂，双方重开战火。绍兴十年五月，吴璘受诏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五月，金将撒离喝领兵渡过黄河，攻克同州（今陕西大荔），进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很快攻占许多州县，进据凤翔。南宋陕西守军被隔在敌后，远近大震。

当时川陕宣抚使司驻河池；胡世将急召诸将，商议对策。吴璘当时在河池，杨政、田晟很快赶来。将领中有人建议宋军避开敌锋，坚壁清野。参谋官孙渥认为河池不可守，建议退保仙人关。吴璘声色俱厉，当面痛责，大喝道："软弱之语，影响士气，应当斩首！我吴璘以家中老小百口之命，担保破敌。"胡世将表示支持，手指居帐对众将说："世将誓死坚守此地。"于是他下令诸将分兵据守渭南。不久，高宗下诏，令胡世将扼守蜀口。金兵进犯石壁砦，吴璘令杨仲领兵阻拦，击败金军。撒离喝令鹘眼郎君以三千骑兵冲击吴璘守军。吴璘派统制李师颜以骁骑出战，很

快击败金军，金军退人扶风（今属陕西）坚守。宋军破城，俘金军三名将官，士兵一百十七人。宋军攻破扶风，撒离喝大怒，亲自率兵出战，宋金双方在百通坊展开激战，宋将姚仲力战破敌，撒离喝只好率军退往凤翔。陕西屯驻宋军全师而还，吴璘因功被授为镇西军节度使，升任侍卫步军都虞候。

闰六月，宋金两军再战。撒离喝与吴璘、杨政隔渭河列阵，吴璘驻军大虫岭。撒离喝察看后说："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这里难与争锋。"他见宋军严阵以待，只好引兵前往邠州（今陕西彬县)。宋军主动出战，乘胜追杀。田晟遣将拒敌于青溪岭，胡世将又派王彦、杨从仪分道出兵，屡败金兵，撒离喝返回凤翔。不久，他又出兵攻打泾州（今甘肃泾川)，宋将田晟据山为阵，出奇兵打败金兵，俘获金军兵马无数，撒离喝只好再次逃回凤翔。

绍兴十一年九月，吴璘与金兵战于剡家湾，大败金将胡盏与习不祝。胡盏与习不祝合兵五万屯驻刘家圈，吴璘请胡世将下令出战。胡世将询问有什么办法胜敌，吴璘回答说："有新立迭阵法可以胜敌。办法为：每逢作战，用长枪的士兵在第一列，坐在地上，用障碍物拒马掩护；硬弓在第二列；强弩在第三列，都跪着等候发射；神臂弓在最后一列。敌人冲至百步之内，射程最远的神臂弓先发，到七十步内，再发强弓硬弩。长枪手依靠拒马的掩护，来对付经过大量杀伤后的残敌。每阵的四列士兵，以鼓为号，轮番射杀。战斗中布阵，则以骑兵在前冲杀掩护，布阵完毕，则骑兵退走。这就叫迭阵。"胡世将听后，表示赞同。然而有些将领心存疑虑，在私下议论说："我军难道就要这样被歼灭?"吴璘继续解释说："这种战术的长处在于战士心定，就会发箭准确，击毙敌人。"诸将都被说服，于是宋军进驻剡家湾。

九月，宋金双方在剡家湾发生战斗。金军据险坚守，营地前边是高山峻岭，身后控制着腊家城，地理位置对金军有利，因而

料定宋军不敢轻易进犯。会战前一日，吴璘召集部将，征求作战方案。部将杨仲分析了二军的情况，认为“两军在山上交战，宋军就能取胜。”吴璘同意杨仲的方案，于是通报金军，约日会战。金将接到战表后，哈哈大笑，认为宋军必败，自己则稳操胜券，十分轻视宋军。午夜时分，吴璘令姚仲、王彦带领部队向敌营进军，他们令士兵口衔木片渡河，以免士兵遇到意外，突然惊叫，暴露目标。宋军很快到达峻岭，约金将上岭决战。胡盏、习不祝来到岭上，寂无人声，感到纳闷。宋军早已列阵以待，正当金将左顾右盼之际。宋军万炬齐发，照亮了天际。金军大惊。习不祝善谋，胡盏善战，二人对于目前局势，意见存在分歧，不能统一。吴璘出兵挑战，胡盏果然领兵出战。吴璘使用迭阵法与金军作战，宋军不同队列士卒，轮番作战，使金军疲惫不堪。吴璘亲自上阵，驻马指挥战斗。士卒见吴璘亲临前线，士气高涨，没有人敢于松怠，都尽力死战。经过激烈战斗，金军被吴璘军击败，胡盏领兵逃往腊家城。吴璘下令部队乘胜追击，围攻腊家城金军。金军龟缩在城中，孤立无援，很快就会被攻破。这时宋廷秦桧当权，又一次与金人议和。绍兴十一年十月，宋金和议成立。双方停战，朝廷下诏令吴璘班师。君令不可违，吴璘只好放弃攻城，撤走部队，返回宣抚使司驻地河池。胡世将叹息不止。

绍兴十四年，宋廷将利州路分成东西两路，以吴璘为利州西路安抚使，治兴州。宋金和议成功，双方不再发生战争。不少将领从此再也不训练军队，吴璘却始终坚持严格训练士卒，使之保持强盛的战斗力，毫不松懈。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南侵，战事再起。五月，宋廷以吴璘为四川宣抚使，王刚中同处置军事，准备抗击金军。八月，金军西路元帅徒单合喜派兵扼守大散关，又派骑兵攻打黄牛堡（今陕西凤县东北），宋军守将李彦坚告急。吴璘带病让人抬上仙人关，至杀金坪，驻军青野原，下令各郡兵马分道进军，支援黄

牛堡，各路大军很快会合。李彦坚以神臂弓猛射金兵，金兵的进攻被打退。吴璘又派遣别将彭青至宝鸡渭河，夜袭桥头寨金军，攻克敌人桥头据点。接着又派兵出击收复失地，刘海复秦州，彭青复陇州。

吴璘病情加剧，返回兴州。总领王之望上书执政，说吴璘年老多病，请以吴璘侄子吴拱代替吴璘。朝廷没有准许，吴璘又一次上仙人关指挥战斗。

八月，高宗下诏吴璘出师汉中，吴璘军收复商州（今陕西商县）、虢州（今河南灵宝）。

绍兴三十二年二月，金兵进犯虢州，吴璘遣部将杨从仪等统兵攻击，又分兵扼守和尚原。金军败走宝鸡，吴璘派兵克河州（今甘肃临夏）、原州（今宁夏固原）、积石军（今属甘肃）、镇戎军（今甘肃镇县）。

与此同时，吴璘又派姚仲攻巩州（今甘肃陇西），王彦屯商州、虢州、陕州、华州，惠逢取熙河。姚仲因与金人相持，转攻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又过去四十天，仍未分胜负。吴璘以知夔州李师颜代替姚仲，又派儿子吴挺节制军马。吴挺与金军战于瓦亭，大败金兵，擒俘金将耶律九斤，另外俘虏兵卒一百三十七人。

金帅获悉，急令各路人马奔集德顺。吴璘亲奔前线督战，他令部队在形势险峻之地驻营，又派士兵沿黄河西岸修筑工事。开战前，他又亲临检查，对敢于不听从命令的部将，立刻斩首，以严肃军纪。一切准备就绪后，吴璘令十股骑兵出击，诱敌深人。金军在战鼓声中，倾巢而出，冲向宋军。吴璘军在事先修筑好的工事中迎敌战斗，士卒无不以一当百。两军恶战至傍晚，仍未分胜负。吴璘在阵地上督战，不时传呼某某作战不力，给将士施加压力，士卒更加勇敢奋战，终于打败金军。金军只好退回驻营地。第二天一早，吴璘又令部队出战，金军龟缩在营地不敢出

战。恰巧天气变化，风雪交加，宋军围城，金军供给困难，只好逃走。吴璘军前后只用了八天时间，就攻克了德顺城。吴璘入城，城市秩序井然，市不改肆，人心安定。宋军乘胜追击，吴璘部将严忠攻取环州，姚仲等人收复兰、会、熙、巩四州及永安军。至此，吴璘军共收复十三州、三军。吴璘返回河池。

金人不甘失败，屯驻于凤翔的金军重开战火，要与吴璘争夺刚被宋军收复的十三州三军。吴璘急忙赶至德顺备战。不久，金将完颜悉烈等领兵十余万攻吴璘军。金万户豁豁又率精锐部队自凤翔赶来。吴璘令部队驻筑东山防守，金军奋力争战，伤亡过半，终不能克。

这时，朝廷中史浩上疏："官军西讨，东不可过德顺。如若大军驻扎离川口太远，则一定会遭到金兵袭击。"于是朝廷有了放弃新复三路的打算。川陕宣谕使虞允文上疏反对，被罢免。

十二月，诏吴璘班师。吴璘令宋军南撤，金人乘机攻击，吴璘军伤亡惨重，损失士兵三万三千人，部将数十人。一时间，连营痛哭，声震原野，凄惨万分。于是吴家军刚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军三路十三州又被金人占领。

吴家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绍兴元年至四年，金兵重点攻川陕，吴家军几乎独立支撑危局，战功卓著。吴玠因功被封为节度使、成了绍兴年间五大帅之一。吴玠去世后，吴家军分成三部分，吴璘势力最大，兵力占绝对优势，战时，另外二支亦受其节制，抵抗金军，收复失地，只是由于朝廷当权者主张议和，强令班师，致使吴家军损失惨重。

（宋三平）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吴玠兄弟保蜀》

《宋史·吴玠传》

《宋史·吴璘传》

《宋史·高宗纪》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卷150

《三朝北盟会编》卷196《吴武安公功绩记》

顺昌柘皋之捷

绍兴十年（1140）二月，宋高宗任命刘锜为东京（今河南开封）副留守。刘锜率王彦“八字军”三万七千和殿司兵三千渡江北上。

此时，金朝内部发生政变，与南宋“和议”的挞懒一派被推翻，兀术一派掌握大权，立即撕毁和约，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不到半月时间，金军攻陷东京及其附近州县。

五月十七日，率军北上东京（河南开封）赴任的刘锜至顺昌府（安徽阜阳），知府陈规已得到东京失陷的情报，急忙通告刘锜，并问他如何应付？刘锜说：“只要城中有足够的粮食，我就能与你共守此城。”陈规说：“城中有米数万斛，足够军民长期食用。”于是，刘锜与陈规入城，共商御敌之计。

刘锜召集诸将问计，很多将领都说：“金兵势不可挡，请将军以精锐部队断后，我们顺江而下，撤回江南。”刘锜则坚定地说：“我本来是去东京赴任的，现在东京已失陷，但全军已到此，有城可守，为什么要放弃？我决心已下，谁敢再说后撤，定斩不赦。”部将许清也激奋地说：“太尉（刘锜）奉命驻守东京，将士们扶老携幼跟随而来，我们自己撤退是容易的，但忍心抛弃父母妻子不顾吗？如果带着他们同行，必然会被金军追上，又能往哪里逃？不如大家上下一心努力一战，于死中求生！”许清的话和刘锜的主张相合，刘锜大受鼓舞，众将也认为有理，大家决心坚守顺昌城。刘锜下令凿沉船只，自断退路，以示坚决抗敌之心。

刘锜把家人安置在寺庙中，让人在门口堆上柴草，对守卫的士兵说："如果金军破城，我家人无法走脱，就放火焚烧，免得被金人俘去受辱。"

刘锜决计坚守顺昌，对守城作了周密的部署。分命统制官许清守东门，贺辉守西门，钟彦守南门，杜杞守北门。招募乡人为间谍、密探，远布斥堠，以侦察敌情。刘锜亲在城上督工，修城墙，筑壁垒，设战具。下令拆民家门扉，绕城埋立，以代篱笆。城外有民居数千家，他下令焚烧掉，免为敌用。刘锜用了六天的时间，粗粗地完成了守城部署。此时，守城的将士士气高昂，男子准备上阵杀敌，妇人磨刀砺剑，纷纷表示："平时有人看不起我们'八字军'，今日应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五月二十五日，金军的骑兵侦探已出没顺昌城下。刘锜派兵在城下设伏，活捉了金军二将，审讯后得知金军的韩将军在距顺昌城三十里的白沙窝扎营。刘锜派兵千余人夜袭敌营，连战数阵，杀伤金兵千余而回，首挫金军的嚣张气焰。二十九日，金军三路都统葛王乌禄和龙虎大王合兵三万，至顺昌城下。刘锜下令大开四周城门，金军怀疑是计，不敢逼近。刘锜突然率军从西门冲出，城上又以破胡弓、神臂弩射击，内外协同作战，金兵被迫后退。刘锜不让金军有喘息之机，又令步兵冲击，金军狼狈逃回营寨，人马溺死于附近小河中不计其数。

六月二日，顺昌被围已有四天，金军越来越多，于是移营于距顺昌城二十里的李村。刘锜派遣骁将阎充招募壮士五百人，夜袭敌营。这天傍晚，天欲下雨，雷电四起，夜袭士兵见有发辫者就砍杀，金兵大败，后退十五里。第一次夜袭刚过，刘锜又招募壮士百余人，人衔一根竹管，再次突袭惊魂未定的金军营寨。夜袭将士以竹管吹声为号，时聚时散，乘闪电时见有发辫者就砍杀，闪电止则藏匿不动。金兵不测敌情，终夜各自为战，因而大乱，死者无数，积尸盈野，不得不退保老婆湾（安徽太和颍水北

岸）此后，金兵昼夜不敢下马，在马上寝食，并向兀术求援。

金军元帅兀术在汴京（河南开封）得到急报，率十余万金兵南下救援。刘锜闻报兀术大军将到，于是召集众将商讨对敌之计。有的将领主张说："我们的力量单薄，应乘着屡次胜利的形势，准备船只退军南归。"刘锜坚决不同意撤军的主张，他说："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是为了国家危急时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已经挫败了金军的锋芒，军威正盛，纵然敌我众寡悬殊，也应当有进无退。况且敌营距我们不远，兀术的大军又至，如果我军后撤，敌大军紧随其后，则会前功尽弃。如果让金军侵占两淮，震惊江浙，我们平生的报国之志反成误国之罪。"听了刘锜一席话，众将皆感动思奋，一致表示："我们听从你的命令！"

六月七日，兀术率军到达顺昌城外，扎营于颍河北岸，人马蔽野，连营三十余里。第二天，兀术责骂金军诸将前段时间用兵的失败。金军诸将皆说："南宋此次用兵，非昔日可比，元帅可到城下亲眼看看。"兀术来到顺昌城下，见顺昌城十分破陋，乃下令说："顺昌城壁如此，我可以靴尖把它踢倒。明天攻进城中吃饭，所得妇女玉帛，悉听自留，成年男子都给我杀掉。"说完，兀术折箭为誓；一定要攻克顺昌城。

刘锜派耿训赴金营给兀术下战书，兀术被激怒，他傲慢地说："刘锜凭什么敢和我决战？以我们的大军破你们的小城，可以说毫不费力。"耿训回敬他说："太尉不但敢和你决战，还说你未必敢过河，我们愿意献上浮桥五座，让你们过河和我们决战。"兀术答应明日过河与刘锜决战。

六月九日，刘锜果然在颍河上造了五座浮桥，并且命令士兵在颍水上游和草中放毒，告诫宋军将士即使渴死也万万不可饮河中之水。清晨，兀术率其大军合围于顺昌城下。刘锜见敌大军围城，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报效国家。乘着早凉，刘锜命令将士轮番在羊马城（大城外的小隔城）内饱食，养精蓄锐。不久，兀

术指挥金兵先攻东门。守城宋军以强弓远射，使金兵不敢靠近。这时，金军队列中有河北伪齐的士兵大声告诉宋军说："我们以前是宋的左护军，本无斗志，真正可杀的只是金军中的拐子马。"因此，刘锜知道兀术虽率有十万之众，但河北伪齐的将士多为宋之旧部，皆无斗志，真正劲敌只有兀术的亲兵拐子马，更增加了他取胜的信心。这时，正是六月炎暑天气，时至中午，酷热难熬。金军远来疲惫，昼夜不得解甲，又已在城壕外与宋军相持了半日，士困马乏，尤其是女真人组成的拐子马，素畏暑热，更加疲惫。金军饥渴难忍，不少人食水草后，纷纷毒倒。

刘锜先派小股宋军冲出城去，进行试探性攻击。金军毫无斗志，向后退却。刘锜知道大举出击的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将士饱餐，准备发动反击。当时围城的金兵，诸帅各统一部，各自为战。刘锜看到敌军的这一弱点，准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有的将领建议先反击韩常统帅的这一部金军，因为他相对较弱，容易取胜。但刘锜认为：即使击退了韩常，兀术所率的主力大军仍在，顺昌之围仍不能解，应抓住此难得的有利战机，先反击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兀术一退，其余金军就无能为力不攻自破了。

正午过后，天气更为酷热，金兵更加疲惫不堪。刘锜命令斗志旺盛的宋军从城中突然冲出。刘锜先派数百名将士杀出西门，以吸引金军的注意力。然后，派数千人杀出南门，并戒令将士不要呐喊，用短兵器进行近战。于是，宋军和金军展开了激战。兀术乘甲马，率领三千亲兵督战。金军主力皆披重甲，号称"铁浮图"，戴铁兜鍪，三人一组，以绳索相连，攻击前进，每进一步，即用拒马在后拥阻，人进，拒马随进，逼使他们不得后退。刘锜所率宋军，皆抱死中求生之心，人人奋勇，以枪挑去"铁浮图"的兜鍪，用大斧断其臂碎其首。宋军统制官赵樽、韩直身中数箭，仍不肯下阵，率领士兵在敌阵中奋勇杀敌。有些宋军将士甚至抱着金兵坠入城壕，与敌人同归于尽。最后，宋军大破金军

“铁浮图”。这时，兀术孤注一掷，派金军最精锐的拐子马，从两翼夹击宋军。拐子马军都是女真族骁勇善战者组成，专门用来攻坚，为金军最后攻击的部队，自用兵以来，战无不胜，号为“常胜军”。至此，被刘锜率领的宋军挫败。

金军主力被宋军打败后，其余金军更无斗志，纷纷后逃。刘锜命令宋军乘胜追击，深入敌营，大败金军。第二天，兀术拔营北退，刘锜派兵追击，又消灭金军数万。

顺昌一战，兀术率领的金军精锐主力十损七八，宋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但解了顺昌之围，迫使兀术退守汴京，而且大大鼓舞了南宋军民抗金的斗志。顺昌大捷，使金朝惊恐万状，赶忙把河北地区的重宝珍器运往东北，准备放弃河北。如果此时宋军诸将同心协力，分路追讨，可望活捉兀术，收复汴京。但此时宋高宗赵构却诏令班师，失去了良机。

金兀术自顺昌大败后，在汴京招集军士，以图再举。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兀术乘淮西宋军奉诏南归，再次举兵南下，攻陷寿春，渡过淮河，又攻陷了庐州（安徽合肥）。

二月，宋高宗闻报金军南犯，诏命张俊、杨沂中率军赴淮西拒敌。张俊等率军从采石过江，先后攻克了历阳和和州（安徽和县）。金军退守昭关（安徽含山北）。不久，宋将王德、田师中又攻克含山和昭关。这时，刘锜所率宋军也奉令从太平（安徽当涂）过江，与张浚、杨沂中会合于含山。

宋大军渡江会合后，金军大将韩常等命令金军在含山、和州一带的前锋徐徐后退，欲诱宋军到柘皋（安徽巢县西北）进行决战。因为柘皋地势平坦，利于金军发挥骑兵的优势。会师后的宋军，继续向庐州进发。

刘锜所率重甲步兵先行。二月十二日，刘锜部进军至石梁河（安徽巢县东）。金军拆毁桥梁，以阻碍宋军的前进，并在河对岸的柘皋列阵以待。金兵见刘锜部主要是步兵，十分轻视，斗志开

始松懈。石梁河通巢湖，阔两丈多。刘锜命令士兵曳来柴草叠桥，很快就叠起了数座草桥。刘锜随即命令将士迅速过河，以掩护大军过河。不久，杨沂中、王德、田师中、张子盖等率领的宋军相继过河。刘锜与诸将把宋军分为三支，分兵向金军冲击。金军抵挡不住宋军的攻势，开始后退，宋军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第二天，金镇国大将军韩常等十余万铁骑分为两部分，左右夹击宋军。宋将田师中见金兵人多势众，主张固守待援，等张俊率领的宋军赶到再反击。王德却认为战机不可失，更不能被动挨打，应立即主动反击，他建议说："金军右翼是主力劲旅，应当先集中兵力打败右翼金军。"众将都认为王德言之有理，遂对金军全面出击。王德亲率宋军攻击金军右翼，田师中率军随后接应。金军见王德率军冲杀过来，立即布阵以待。一金将披甲跃马，指挥金军列阵抵抗宋军的冲击，王德引弓发箭，金将应弦落马。金将毙命，金军无人指挥，阵势大乱。王德乘势率领宋军呐喊冲击，金军败退。这时，金军的精锐部队拐子马又从两翼增援而来，王德率军与其苦战。宋将杨沂中见状，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破金军拐子马的绝招，他命令上万士兵手执长斧和盾牌，排成人墙推进，与金军拐子马相战，先砍马足，再砍随马倒地的金兵。金军无计可施，大败而逃。王德和刘锜率宋军乘胜追击，在东山（龙泉山）又大败金军。金兵望见宋军旗帜，惊呼道："这是顺昌宋军的旗帜！"如惊弓之鸟，拼命逃跑。

金兀术见金军大败，退不可止，遂亲率金军在步店（安徽合肥县东）迎击追击的宋军，企图阻挡宋军的攻势，挽回败局。但宋将杨沂中等又在步店打败了金兀术。兀术仓皇北退，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寿春和庐州。

柘皋之战，宋军损失九百多人，而金军死伤数以万计。

宋军在柘皋之捷之后同顺昌之捷一样，未能乘胜扩大战果。三月，宋高宗赵构诏令张俊、杨沂中、刘锜班师。

班师的宋军刚起程不远，就接到了金军进攻濠州（安徽凤阳东北）的报告，张俊邀请杨沂中、刘锜回师，一起救援濠州。当援军距濠州还有六十里时，濠州已失陷。张俊召集诸将帅商讨应对之策。杨沂中主张继续前往濠州，与金军决战。刘锜则认为班师军队回师主要是救濠州的，现濠州已失，再贸然前往，金军以逸待劳，据城攻击，可能要吃败仗，不如退据关险，慢慢再设法收复濠州。诸将帅都同意刘锜的主张，于是三军鼎足扎营。

张俊派遣了许多侦探入濠州城侦察，回来报告都说濠州没有金兵。刘锜对张俊说："敌人得了濠州又突然放弃，必有阴谋，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张俊不听刘锜的忠告，并想自取功劳，命令刘锜留守营寨，而令杨沂中、王德率神勇步骑兵六万，直趋濠州。三月十日上午，宋军骑兵先至濠州城西岭上。金军早已在城两侧埋伏了铁骑数万，见宋军列阵未定，以城墙上烟火为号，突然从两翼杀出。杨沂中用马鞭指着附近的宋军骑兵说："那回！"宋军士兵以为命令他们赶快退回，纷纷南奔，不成队列。随后跟进的步兵见骑兵南奔，以为前锋已败，亦皆夺路而散。金兵乘势追击，宋军损失惨重。沿途宋军见前线溃败，皆拔寨南逃。

宋军濠州之败，朝廷急命诸军退保大江，放弃了顺昌之战和柘皋之战收复的淮西重地。张俊渡江据建康（江苏南京市），刘锜自和州渡江屯太平，杨沂中归临安。

顺昌柘皋大捷，是南宋抗金取得的重大胜利，它挫败了金军南下的攻势，鼓舞了南宋军民抗金的斗志。但在宋高宗和秦桧一伙主张"议和"的干扰和破坏下，不但未能乘胜扩大战果，夺取更大的胜利，反而不久又都丢失了得来不易的战果。

（耿曙生）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卷 122—卷 125

《宋史纪事本末·顺昌柘皋之捷》
《建炎要录》卷135—卷140
《宋史》:《刘锜传》、《张俊传》、《杨沂中传》、《王德传》。

岳飞之死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岳飞《满江红》中的词句，其中饱含的誓雪国耻，重整河山的悲壮情怀，至今读来，催人泪下，令人奋发。不幸的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才三十九岁，就死在狱中，数百年来，这颗寄托了民族希望的大星的殒灭，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限同情。

岳飞（1103—1141）是河南汤阴县人，世代以农为业，按照一生事业，可将他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建炎四年（1130）以前，是抵抗金兵入侵，挽救宋朝复亡的时期，为第一阶段。此时宋朝内部战和两派斗争激烈，岳飞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冲破主和派的层层阻挠，与金兵顽强作战，取得了新乡之捷、太行山之捷、黑龙潭之捷、汜水关之捷、牛头山大捷等等，为南宋的建立奠立了基础。绍兴六年（1136）以前是第二阶段，这期间，岳飞做了两件事：一是阻止伪齐政权的蚕食和颠覆；二是镇压江西，浙闽以及荆湖地区的割据武装，对南宋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自绍兴七年到十年是谋取恢复中原的时期，为第三阶段，是岳飞一生事业的高峰期。同时与主和派以及其他传统恶势力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朗和尖锐。绍兴十一年为第四阶段，是岳飞在厄运下生存的一年，事业被破坏，权力被剥夺，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直到死去。所以，要讲述岳飞之死应该从绍兴七年开始的第三阶段说起。

由于前二个阶段中的辉煌战迹，当时岳飞已经做了检校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副使，成了手握重兵，坐镇荆襄的方面大员，高宗皇帝对他信任有加，他曾上疏畅谈规复中原的战略打算，高宗高兴地说："有臣如此，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你尽可按你的打算去做，朕绝不从中干涉。"又把他召入寝阁，嘱托道："中兴大业，全都托付给你了。"

另外，各种矛盾和隐患也在产生。正月二十五日（丁亥）秦桧再入两府[1]做了枢密使；二月九日（辛丑），高宗在内殿召见岳飞，岳飞奏请立建国公伯琮为皇子。高宗无子，把太祖皇帝的两个第七代孙伯琮和伯玖，收养宫中，虽有立其中一个为皇子的意思，由岳飞说出立某某为皇子就使高宗大不高兴，说道："卿此言虽是为社稷着想，忠心可嘉。但你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立皇子的话不该由你嘴中说出。"岳飞听了，才知自己的话有拥兵废立的嫌疑，是灭族的大罪，颤栗而退。二十五日（丁巳），朝廷赏商虢地区的战功，岳飞升任太尉，第二天又升宣抚使。自宣和四年（1122）从军，到如今才15年，已从一个普通士卒升为太尉，不能不引起一些老资格官员的嫉恨。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对岳飞均有不满。尤其张俊，他在政和七年（1117）已经做了都指挥使，如何把岳飞看在眼中？岳飞对他们处处让步，日子久了，部下一些好胜肤浅的人大为不平，劝岳飞不必曲意迎合，降尊纡贵。岳飞听信他们的话，与张俊等人的矛盾愈来愈深。

二月二十八日（庚申），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因沉湎酒色等过失，受大臣弹劾，引咎请求解除兵权。高宗先已命岳飞节制光州（今河南潢川），暂领淮西军。而且，口头许诺把淮西军交他统领。

三月十三日（乙亥），由于伪齐刘豫政权渐失金人欢心，宋

---

[1] 两府：中书省、枢密院，是宋代分管军、政的两大机构，号称两府。

朝廷准备北伐。岳飞主张以十万人将伪齐与金人隔断。这样伪齐政权将不击自溃，宰相张浚却不以为然。刘光世正式交出淮西兵权后，岳飞因请求兼领淮西兵，由商虢路取关陕，然后东向，实施他的战略计划。高宗道：“按你的安排，多久可尽取河南地？”岳飞答说三年。高宗道：“把淮西兵交给你去打关陕，淮西防务薄弱，万一伪齐兵从这一带南下，朕如何还有安生日子过。”岳飞张口结舌，难以回答。

宋朝虽以枢密院主军事，高宗时，为了便于宰相统筹军、政两大事，另外建立都督府管军队，直接由宰相负责，岳飞贸然请求统帅淮西兵失败后，这支军队暂归都督府统辖。一日宰相张浚与岳飞商议淮西军的将领任免，张浚道：“王德是淮西旧将，向为淮西军所服，以他为都统，另派都督府参谋吕祉掌管淮西军，你以为如何？”岳飞道：“王德素与淮西军的另一将领郦琼不和，一旦将王德升为都统，地位在郦琼以上，两人的关系就更难处；吕祉尚书是个文人，不懂军事，由他统帅淮西军恐怕难以使将士信服。”张浚道：“那么淮东宣抚使张俊如何？”岳飞道：“此人性情暴躁，缺乏谋略。郦琼等人更是瞧他不起。”张浚道：“那么一定是杨沂中最合适了。”岳飞道：“杨沂中与张俊相差不多，岂能管理得了淮西军！”张浚很不高兴，道：“我早就知道，在你看来，淮西军的统领，是非你不可了。”岳飞听如此说，也怒道：“都督从正面询问，我便从正面答复，有一是一，不敢不从实回答。难道你认为我贪图淮西兵权吗？”二人不欢而散。二十二日(甲申)，张浚将淮西军分为六军，由都督府参谋吕祉节制。后来，果然由于吕祉统帅无方，郦琼杀掉吕祉，率淮西军四万人投降刘豫，张浚也因此罢相，才深服岳飞有先见之明。但此时却误认为岳飞对军权有野心。连高宗对他也有误解。岳飞一气之下，回鄂州（今湖北武昌）而去，路经江州（今江西九江），因母亲去世，请求解官服丧。又上疏说，与宰相政见不合，要求解除兵

权。并且，不待朝廷批复，挂起帅印，回乡守墓去了。

四月十九日（庚戌），朝廷命权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为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暂且管理岳飞所属军队。高宗对岳飞此举很为恼火。与大臣不时谈起此事，左司谏陈公辅上书说："臣以前听许多人说岳飞忠义可用，不料近日做出这等事来。不过，以臣看来，岳飞并无别意，他原是武将，一个粗人，遇事不肯委曲，也是有的。臣揣摩他的心意，大约以为其他大将多以玩兵为乐，延误时日，决意自己独建大功，才提出以十万大军横截敌境，隔断金、齐的设想。不论如何，这也是一种战略方案。陛下若以为不妥，可与他反复辩论，说明朝廷要先取河南的战略措置是何等正确，然后要他独当京西一路，他岂敢拒命不听？在此以前，朝纲不振，领兵将领不把朝廷当回事，所以岳飞才有与宰相意见不合的话，这不能单只怪他。如今应考虑的是如何革除旧弊，使人不敢轻视朝廷。如刘光世以罪去职，虽丢兵权，反而升了官。赏罚不明，众将如何能服？"这是遇了好人，说了这番好话，高宗的气才稍平复。派人催岳飞复职，岳飞却坚执不肯，高宗又命岳飞部属到墓前以死相请，僵持了六天，岳飞才答应下来。那位代理岳飞的张宗元也向朝廷报告说，他在岳飞军中数日，深感上下将士，人人心怀忠孝，将领和睦，士卒精锐，必是岳飞平日教训有方所致。高宗大喜，对岳飞擅自离职的罪过才揭过不提。

九月十三日（壬申），张浚由于郦琼叛逃。大臣弹劾他失谋误国，辞去宰相职。十七日（丙子），以赵鼎为宰相，将原宰相所属的都督府撤销，仍分隶三省。看来张浚罢相仍与军权有关。将军、政分离，宰相不管军事，这是宋朝大法。目的是避免宰相权重震主，是加强皇帝集权的重要措施。南宋初，由于战争，设了都督府，由宰相管领，实是事不得已。张浚又将淮西军直接隶属于都督府。秦桧屡次谈起都督府不应典兵，高宗才以郦琼事为

由撤掉他，借机撤了都督府。联想岳飞曾贸然请领淮西兵，实在是一步错棋。

此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十一月十七日（乙巳），金右元帅宗弼（就是金兀术）逮捕了刘豫之子、伪齐的尚书左丞相刘麟，第二天抓获刘豫，将他降封为蜀王。囚禁在金明池。伪齐没了国主，一时人心惶惶。《宋史》说宗弼这么干是中了岳飞的离间计，还有的说是中了张浚的离间计。其实应是金朝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刘豫被废后，岳飞上疏，请求乘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兴兵北上，夺取中原。朝廷不予答复。原来，金人已将被幽禁多年的宋朝和谈使王伦放回江南，让他转告宋朝廷，和谈的障碍已除，答应归还死在北国的徽宗皇帝和显肃郑皇后的棺木（称为梓宫），仍然活着的渊圣皇帝（钦宗）和高宗生母宣和皇后韦氏也允许还朝，此外，还答应交还原刘豫管辖的黄河以南土地。高宗皇帝大喜过望，也不问一问金朝这般慷慨，将会提出什么条件做交换。甚至说，只要归还梓宫，皇太后和渊圣皇帝，其余一切都不计较。有这样的背景，岳飞请战自然无用。而秦桧的投降活动却一步步展开了。

绍兴八年正月十八日（乙巳），宰相赵鼎说："如今士大夫大多认为是恢复中原的大好时机，若不乘时进兵，失了机会，以后不免遭人议论。"因而请求召大将商讨方略，高宗道："且不管众人如何议论，若不议和，梓宫、皇太后，渊圣决无还朝的希望。"左正言辛次膺上疏六七次，反对议和，高宗一概不理，辛次膺只好辞职。

三月七日（壬辰），枢密使秦桧升为宰相兼枢密使。

在这种情况下，岳飞却积极备战，并向朝廷请求增兵。高宗断然道："若以防守地段太长，兵力不足，可削减地段，兵不可增。"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岳飞听说枢密副使王庶检查边境防务，给王庶去信说："今年若再不出师北伐，我必缴还朝廷所授

节钺。从此赋闲隐居，再不问军旅事了。”王庶是个主战派，听了这话，以为是豪气干云，深可嘉奖。哪知第二日，高宗就下令提高接待金使的规格，并说：“只要有商量余地，就可早日休兵，这是朕的本意。”十月，不肯屈己求和的宰相赵鼎被秦桧排挤出中书省，以绍兴知府的身份做地方官去了。在中书主事的只剩下秦桧一人，双方和谈使者来来往往，毫无阻碍地搞起来了。大将韩世忠、岳飞都向朝廷提出忠告，岳飞说：“金人的话不可信任，和谈靠不住，如今大搞和谈是宰相决策的错误，必为后世人所讥笑。”秦桧对韩、岳二人暗恨在心，惟一时尚无良策惩治他们而已。

绍兴九年正月，以和谈成功，金人归还河南土地，行礼祭告宗庙社稷。二月，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也因和谈成功进官一级。岳飞上了一道谢表，名义是谢朝廷加官的恩惠，其实是一道声讨和议的檄文，其中不但讲到和议如何失策，还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的豪言壮语。朝廷要造成举国欢庆的气氛，不愿降罪，反而给他加官为开府仪同三司，想以此堵住他的嘴巴。岳飞坚执推辞，不肯接受，对朝廷说：“如今的情势是可危不可安，可忧不可贺，可训练士卒加强防卫而不可论功行赏。若反其道而行，以为从此可安枕无忧了，上下庆贺，徒惹敌人耻笑。”朝廷连下三道诏书，岳飞始终不理。高宗只好亲自与他面谈，才把朝廷赏的新官接受下来。

六月十四日（壬戌），朝廷向金人归还的河南州县选派官员，下诏书，谆谆告诫说：“金人割还河南土地是有诚意的。只怕留用官吏与新官不能和睦相处，心有彼此之分。这是不应该的。从此大家永为一体了。”另派皇叔赶赴西京、修整祖宗陵墓。岳飞派部下将士装扮为随从一起前往，欲察看金人动静，决定应付的策略。一边向朝廷上疏，解释这样做的根据说：“金人无缘无故请求和谈，必是国内有了变故，名义上把河南地割给我们，实际

是使我们武力夺取中原的行动缓上一缓，待内难平复后，再重新夺回，等于是将河南地寄存我们这里。所以，需要摸清敌情，不要中了圈套。”说来说去是对金人不信任。秦桧禀明高宗后，阻止了岳飞的这次行动。

绍兴十年正月，有大臣透露说，金人内部将往日主和的挞赖等人全都杀掉，故意抬高和议条件，又将宋使王伦重新拘留。这些迹象都表明金人要败盟，高宗不听，继续遣使和谈。五月十三日（丙戌），金兀术率兵人汴京，宋朝委派的东京留守孟庾投降，宋金和谈彻底破裂了。

金兵分四路南下，一出山东，一出陕西，一出河南（今河南洛阳），金兀术亲率重兵十万出汴京。宋朝经主战派张浚、赵鼎数年经营，军事力量已非昔比，战事发生不久金兵每一路都受到顽强抵抗，东京副留守刘锜在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兀术兵，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的军队直攻到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淮西宣抚使张俊军攻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也将进攻陕西的金军阻止在宝鸡一线上。

金人背盟以后，岳飞随即派部将张宪、姚政东援刘锜，派王贵、牛皋、杨再兴、李宝等分别进攻西京、郑州、汝州、曹州、光州、蔡州等地，派梁兴北渡黄河，召集那里的忠义民兵进攻河东（今山西）、河北的州县，自率大军长驱中原，在颍昌城（今河南许昌）下大败金军。这样，实际是岳飞一军抵御了中路金兀术和进攻西京河南府的两路金人的进攻。金兀术召集部下诸龙虎大王商议说：“宋军其余各路军都容易对付，只有岳飞军是劲敌，其势难挡。不如集中力量与他一决雌雄。”宋朝廷上下听到这消息都为岳飞担忧，高宗对岳飞道：“是进是退，卿自己量力而行吧。”岳飞却不以为然，道：“敌欲决战，说明已黔驴技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于是闹金人于郾城（在今河南境）日日派人前往骂阵。金兀术将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常的军队都集中到郾

城，排开阵势，与岳飞决战。岳飞先派养子岳云率骑兵冲阵。临行，告诫他说："如若不胜，先将你斩首以励将士。"这岳云天生神力，手使一对铁锤重八十斤。每次恶仗，岳飞必命他冲锋，只要岳云出战，势必获胜。因此，军中称他为"赢官人"。这一次出战，非同小可，岳云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杀进杀出，凡十数次，直杀得尸横遍野。他也受了十多处伤，但金兵百般阻截，不能成功，阵势大乱。岳飞麾大军掩杀。猛将杨再兴遥见金兀术大旗在万军中飘动，拍马而前，单人独骑，南取兀术。左右急忙簇拥金兀术后撤。杨再兴杀百余人而还。金兵败入城中，次日又战，金兀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拐子马。这是"特殊兵种"，战马和马上将士都身穿铁甲，每三匹用皮革绳索连成一排。临战时，数十百排齐头前进。由于身穿铁甲，刀箭不伤，那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这次共派出了一万五千骑拐子马冲锋，以为岳家军再强，也必被拐了马踏于蹄下，绝无幸理。哪知岳飞早知他的拐子马厉害，已预先想出了对付办法；命步兵手握麻扎刀，临敌时，不可仰观敌人，免得被敌军气势所慑，只管低下头往拐子马的马腿斫去。麻扎刀就是装着长把的大砍刀，用来砍敌军马腿再便当不过，只要一匹马被砍倒，同排其余二匹也就无法行进。马上战士由于身披重甲，寸步难行，也只有束手待毙。所以，一场大战，金兀术又败，拐子马被斩杀无余。金兀术痛哭失声道："我自海上起兵，全仗拐子马取胜，打过多少恶仗，遇过多少强敌，从来没有失败过。不料今日全军覆没，一切都完了。"金兀术添兵再战，岳飞部将王贵率领五十名骑兵偷巡敌营，中途正巧相遇，奋力冲杀，将敌将斩于马下。这时岳飞率四十名骑兵巡营，遥见敌营黄尘滚滚，杀声连天，也冲了过去，敌军大营竟被这九十骑军士杀得一塌糊涂，金兵士气全无，已被岳家军吓破了胆。

岳飞与王贵得胜回营后，将士犹沉浸在杀敌的兴奋之中，个

个眉飞色舞，谈论方才的战况。只岳飞沉吟不语，众将询问原因，岳飞道："我与金兀术对敌多年，深知此人机变百出，善于出敌不意，郾城之下，连连失败，岂能甘心？我料定他要回兵进攻颍昌。如今颍昌只有王贵一将驻守，怕非兀术之敌。"于是命岳云率骑兵一支，兼程北上。赶到颍昌城下时，果见金兀术正亲自指挥攻城。便树起岳家军大旗，呐一声喊从背后攻了上去。王贵守城正感吃紧，遥见敌后骚乱，知是来了救兵，开城杀出。前后夹击，金兵大败。第二天，金兀术整兵再战。双方在城西列阵，王贵率部下游奕军，岳云率领的是岳飞亲军即背嵬军。仍是岳云领骑兵当先杀出，步兵从左右翼继进。金兵是在郾城下被这位赢官人杀怕了的，那真是闻风丧胆，望风而逃。金兀术的东床娇婿夏金吾死于乱军之中，副统军粘罕、索索董、金兀术仓皇逃走。岳飞率军乘胜挺进到朱仙镇，距离汴京才 45 里。双方列阵再战，岳飞派部下骁将率领他的背嵬军士五百人出阵奋击，金兵又败，金兀术退人汴京，斗勇、斗智他都失败了。

岳飞派往黄河以北的梁兴，已与河东、河北两河地区反金的民兵武装建立了联系，其中力量较大的韦铨、孙谋固守山砦，专等宋军北上，配合宋军作战；此外，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率众过河投奔宋军。有这些人的帮助，北方金人的行止以及山川地势，岳飞无不了如指掌。河北地区的磁、相等州，山西地区的泽潞、晋、绛、汾、隰等州的民兵也都派人与岳飞约定日期，起兵与官军会合，还约定都用"岳"字旗号。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挽车牵牛，运送军粮，头顶香盆迎接岳家军。燕京以南，金人的号令已无人奉行。金兀术欲从民间征兵与岳飞作战，竟无一人应征。事势如此，金兀术已是一筹莫展。私下叹息道："自我大金从北方兴起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样的窘境，受过今天这样的挫折。"另一个金兵元帅乌陵思谋以机智多谋著称，此时也没了主意，连部下将士都已无法约束，只对他

们说："不要轻举妄动，等岳家军来时，一起投降就是。"一些任统制、统领的汉人将官，以至龙虎大王、千户等金人将领，都或明或暗地投降岳家军，连大将韩常也秘密与岳飞商谈，要率五万金兵投降。岳飞心中的兴奋自不言而喻。他原来好酒贪杯，酒量很大。高宗曾告诫他说："国难未平，好酒容易误事，卿宜戒酒。他日收复河朔，朕必亲自为你把盏。"从此以后，岳飞滴酒不再沾唇。可是此时心中兴奋，酒虫又在胸中骚动，不觉举起一只大碗，对将士说道："让我们再努把力，直捣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为金人都城），必与诸君痛饮。"众人知他酒瘾又发。均想，为国事他竟有如此大的克制力。不禁感动，一齐欢呼："直捣黄龙！直捣黄龙！"

金兀术在汴京，知军心、民心皆失，汴京已不可守。决定及早撤兵，退回黄河已北，免得做了俘虏。这一日，整顿好残余兵众，就要出城，忽有一名书生拦在马前，向兀术抱拳一揖，说道："四殿下[①]暂请留步，汴京城尚足可守，为何弃城而去？"金兀术对自己的失败并不讳言，说道："岳少保以五百名骑兵，击败我的五十万大军；汴京城中百姓日夜盼望他进城。为何说汴京仍然可守？"秀才笑道："岳少保不久就要撤兵了，殿下不必忧虑。"金兀术大惊，翻身下马，拱手说道："君是何人？怎知岳少保大胜之后会突然撤兵？"秀才道："在下草莽之人，姓名不足道。撤兵的事也不难知。试想：权臣在内，大将立功于外，自古以来有过这种事吗？如今岳少保能保住性命已不容易，还谈什么成功？"金兀术恍然大悟。邀秀才一同回府，秀才不肯，长揖而去。金兀术又强自支撑，留了下来。果然数日以后，形势大变。

岳飞如能以武力夺取中原，说明和谈的决策完全错了，秦桧的宰相也就难以做下去。即使朝廷不出一言，也须自动辞职。对

---

① 金兀术汉名宗弼，为金太祖阿骨打的第四子，因尊称为四殿下。

这种局面他如何能坐视不管？所以，先唆使言官奏请高宗，下令撤军，免得和谈破裂。岳飞当然不肯撤，上疏说道："如今金兵锐气尽失，丢弃辎重军械，仓皇渡河北去。天下豪杰向风归顺，士卒用命。收复河朔，指日可待。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稍纵即逝，万万不可撤兵。"秦桧知道单凭一纸命令，岳飞断不肯听，于是来个釜底抽薪，先从小处抽起。闰六月二十七日（己亥），将顺昌知府陈规改任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刘锜暂领顺昌府事，不久，又命刘锜为沿淮制置使，撤到淮河一线；二十八日（庚子），淮西宣抚使张俊据说是因大雨，从亳州撤军还寿春（今安徽寿县）；淮西宣抚副使杨存中也从宿州（今安徽宿县）撤到泗州（今江苏盱眙）。然后秦桧上奏说："岳飞孤军一支，不可久留中原，请朝廷下令班师。"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师。

七月，金兵得悉宋兵退到淮河一线，只余岳飞孤军，便调集各路人马，集中对付岳飞。岳飞难以支持，向刘锜告急。刘锜遣统制官雷仲出兵太康（在今河南境）牵制金军。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部将杨再兴、王兰、高林战死。杨再兴以三百骑与金兀术大战于小商河，杀金兵二千余人。死后岳飞将他的尸身焚化，得箭簇二升余，可知战况何等惨烈。

岳飞知独力难支，只好于七月廿一日（壬戌）退军。回想前事，多少血战，多少伤亡，如今全成泡影，不禁虎目落泪，悲叹道："自绍兴以来，枕戈待旦，至今已经十年。万没想到，全部努力，一日之间，全部落空。"大军启行后，老百姓夹道哭诉说："我等头顶香盆，迎接官军；解下耕牛，为官军运送粮草。如今官军说走就走，金兵岂能与我等善罢甘休！"岳飞也悲痛万分，从怀中取出诏书给众人观看，说道："君命不敢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于是，众人抱头痛哭，声震原野。岳飞命军士暂留五日，等候百姓一起南撤。一面申奏朝廷，将江、汉间的六郡闲田分给他们耕种。岳飞撤兵后，中原州县很快又落入金人手中。

岳飞命步将回鄂州，自率二千人渡淮到庐州。然后入朝，请求解甲归田。朝廷不许，以为又是他闹情绪，要挟朝廷。其实，他心中的伤痛有谁能知？高宗向他问长问短，他无话可说，只磕头拜谢而已。

绍兴十一年，岳飞在鄂州。金人占领中原后，又渡淮南下，直指庐州。高宗命岳飞率兵赴援，连续下了十七道御札。所谓冯妇旧技，见时则作。岳飞受了这么大打击，恢复中原的志意仍然不衰，看到这是一个机会，又向朝廷献策说："金人倾国南下，倘若自鄂州长驱京洛，直捣金人巢穴，不仅庐州之围可解，金人疲于奔命，可一举歼灭，恢复中原也大有希望。"高宗怎敢有此等奢望，火烧眉毛，解了眼前之急也就罢了，不许进兵。当时岳飞中了风寒，咳嗽不止，上书说："陛下若以为不暇远图，臣立刻赴蕲黄一带，商议攻取的策略。"高宗这才高兴，下诏书说："卿有寒疾，还能这样为国忘身，哪一个能有家卿这般忠贞！"岳家军一出动，围困庐州的金兵望见岳家军的旗帜，卷甲而逃。庐州是张俊的防地，张俊深以为耻，暗恨岳飞。岳飞驻兵舒州（今安徽安庆），等待朝命。高宗又颁御札，表扬一番，说他处事小心，不专进退，深得大臣之体等等。万没想到这次接连受表扬的行动成了岳飞一大罪状，这是后话不提。

金兀术自庐州回兵，顺路又攻濠州（今安徽凤阳）。张俊驻兵距濠州60里，以乏粮为借口，不敢援救；杨存中率兵往援，遇伏兵战败。高宗便要岳飞前往救援。金人听说岳飞要来，又拔营逃走。高宗下诏书表彰说："卿不顾绝粮的危险，慨然赴援"等，这正说到张俊的痛处，他以为是被岳飞出卖，更加痛恨岳飞。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采录了秦桧的党羽参政王次翁的记述，说是岳飞念在以前每次战胜，皇帝便降诏书命回兵，便以乏粮为理由，拒绝救援濠州。高宗下诏书央求他道："国家社稷的存亡，都在卿身上了。"岳飞这才起兵。不过，只行了30

里路又停了下来。总之，按秦桧等人的说法，岳飞是个不听使唤的将领。这才决意解除他的兵权。

四月廿三日（辛卯），以赏功为由，命三大将岳飞、韩世忠、张俊赴京听封。韩、张二人先到，秦桧担心泄了底，不敢先封韩、张。用王次翁计策，在西湖上置酒设宴，专等岳飞到来。直等了六七日，岳飞才姗姗而至。秦桧奏请朝廷，第二日就颁下制书：韩、张都封了枢密使，岳飞封了枢密副使。此外，还有一大串好听的名号，也不必去管它了。总之，官衔都封得很高，地位尚在参政之上。但是，秦桧耍了个手腕，既封三人为枢密使、副使，原来所领军队怎么办？制书中略去不提按以前惯例，每次加封，都是原领兵权不变。三人便生错觉，以为仍然不变，糊里糊涂地上殿谢了封赏。等到发现制书中没有“原领兵权不变”之类的话已经迟了。三个武人，哪有这般心计？上了个大当。不过，岳飞受封后立即上疏，请求缴还兵权。朝廷谦让一番，其实，他的兵权已经不在了。从此三人都在都堂上班，韩世忠自知反对和谈，得罪了秦桧怕遭毒手，入都堂时，将一字巾裹在头上，作文士打扮；出都堂便以亲兵自卫，如临大敌。岳飞却完全相反，便服出入，身边不带一个，态度雍容闲适，不将个人安危放在心上。在秦桧看来，韩世忠是以他为仇人，岳飞是表示对他轻蔑。对二人同样暗恨不已。

五月十日（丁未），诏命张俊、岳飞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将驻扎在那里的淮东军撤到镇江府，为以后的和谈扫清道路。这自然是秦桧的主意：因是韩世忠旧部，将韩留在御前听用，只派张、岳前往，是宋朝政府兵将分离的故伎。张、岳二人来到楚州后，张俊主张修筑楚州城壕，岳飞道：“你我当努力恢复中原，不该只着眼于防守。”岳飞检查兵籍才知，韩世忠部总计才只三万人，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侵犯，前此又直攻到海州。心中暗赞：“真是奇才！”按朝廷规定，楚州兵移驻镇江，还

有韩世忠的一支亲兵，即所谓背嵬军[①]，不在迁移范围内。张俊私下与岳飞商量，想每人一半，将它平分。岳飞道："这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岳飞岂能做这等不义之事。"张俊闹了个大红脸，暗暗骂道："早晚有一天叫你知道什么叫做不义！"平分背嵬军的消息不知如何传到了韩世忠旧部耳中，军吏景著对朝廷派来的总领官胡纺说："听人说二位枢密大人要平分韩元帅的军队，恐怕这样做会闹出事来。"胡纺将此言上报朝廷。那秦桧何等机灵，立刻想到机会来了。以煽摇军心、图谋作乱的罪名先将景著下人大狱，然后严加审讯，多方调查，定要将这把火引到韩世忠身上。岳飞闻讯，急忙派人送信给韩世忠。韩世忠怎敢怠慢，匆匆见高宗皇帝分辩。高宗不知秦桧用意，原谅了韩世忠，说他无罪。张俊将此事报告秦桧，秦桧才知这番功夫白费了，从此更恨岳飞。适巧金兀术自濠州撤兵以后，深感岳飞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暗使人给秦桧送信说："你朝夕向我大金请求和谈，而岳飞却要以武力夺我中原。必杀岳飞，方能言和。否则，终是无望。"秦桧这才定下决心，杀掉岳飞。

有一个开封原武县（今河南原武镇）人万俟卨（读 Mò qí xiè 音末其懈），曾任提点湖北刑狱。岳飞为宣抚使，是他的顶头上司。但岳飞瞧他不起，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调任湖南转运判官，辞行赴任时，与秦桧一席谈，说了不少岳飞的坏话。秦桧大喜，将他留在朝中做了监察御史，又升为右正言、右谏大夫等。此时便授意他弹劾岳飞。

七月十六日（壬子），万俟卨奏称岳飞有大罪二条：一是救庐州，皇上连下十七道御旨，岳飞迟迟不肯启行。后不得已启

---

① 按赵彦卫《云麓漫钞》解释，韩、岳都从本部选拔勇健者为亲随，称为背嵬军，地位很高，统制以下，与之亢礼。名称来源是燕北人呼酒瓶为亢，音讹为嵬。大将酒瓶，常命亲随负之，因称之为背嵬。

行，才到舒蕲就裹足不前。二是拒绝修筑楚州城，说楚州不可守，动摇军心，沮丧民气。请求撤销岳飞的枢密副使职务，贬到京城以外去做官。紧接着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都承秦桧意旨，相继上书论岳飞罪行。说他自任枢密副使，郁郁不乐，动辄请求解官，私下对人说：数年以前执政要我做此官，我尚不愿，何况现在。真是妄自尊大，肆无忌惮。万俟卨连上四道表章，还抄录副本拿给岳飞看，要他自裁。于是岳飞自请解职。

八月九日（甲戌），贬岳飞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宋代设立某某宫、观使，是专门安插那些被贬职或告老的闲散官员的，岳飞实际是个无职无权的闲官了。

秦桧仍不罢休，与张俊谋划，先引诱他的部曲亲兵，能告发岳飞者重赏。结果无一人应命。又听说岳飞曾要把部将王贵斩首，后虽免了死罪，却让他当众受杖。就诱使王贵诬告岳飞，王贵道："作为大将，受赏、受罚都在所难免，怎能因此与主帅结怨？"也不肯答应。后张俊访王贵私事，以此要挟。王贵害怕，才勉强答应下来。又有一个副都统制王俊，原是范琼部下，做士兵时因告密升为军头。从此尝到甜头，便上了瘾，专门讦人短处、告密状，人称"雕儿"。岳飞人朝后，鄂州军队由王贵和张宪共管，张宪知道他的为人，给他吃了些苦头，他就跑到秦桧那里去告。秦桧如获至宝，与张俊一起定计，由张俊写了一副状纸，交王俊和王贵告发，大意是说：张宪策划逼朝廷将兵权交还岳飞。由王贵将张宪捕获，送枢密院交张俊设刑堂，亲自审理。枢密院属官王应求对张俊说："按法律，枢院不可设立刑堂。"张俊有秦桧做主，哪里管什么法律！可怜张宪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说岳飞半句坏话。张俊只得自己写了口供，迫张宪画押，算是结了案，送大理寺复审。

张俊伪造的口供大意是说岳云给张宪书信，要他逼朝廷复岳飞官。秦桧据此将岳飞下人大理寺狱，由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寺

卿周三畏共同审理。何铸命将王俊、张宪等人的状辞、供辞给岳飞看了，道："国家哪些地方对你不起，为何要造反?"岳飞道："我自幼禀慈母严训，不敢有半点亏负国家，上有天日可证。"说了伸手把衣衫扯破，露出后背肌肤，上面赫然刺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为之动容，吩咐将岳飞暂下狱中，慢慢审理。

廿八日（癸巳），韩世忠上奏，论秦桧奸邪，言词激烈。众言官又是蜂拥而上，数落韩世忠的罪恶。韩世忠也自求免官，朝廷批复，撤销他的枢密使职务，做了醴泉观使。韩世忠知道，这是按照整岳飞的路子整他，下一步该是污他策动部下造反了。从此便杜门谢客，闭口不谈兵事。终日骑一头毛驴在西湖岸边游荡，身后两个童子挑着酒担相随，旧日部将难得见他一面。秦桧整倒韩世忠，对付岳飞更加肆无忌惮了。

何铸审理岳飞案，无丝毫证据，断定是一桩冤案。对秦桧说了，秦桧道："岳飞案子是皇上的意思，难道你要为他开脱吗?"何铸愤然道："我一生审案无数，岂在乎他岳飞一人。我是为大宋江山着想，如今强敌压境，无缘无故杀一大将，冷了将士的心，谁还肯为朝廷守江山?"秦桧无话可说，改任万俟卨为中丞，审理此案，万俟卨仍无证据，伪说岳云给张宪的书信已被张宪焚毁。但是，说倒不妨，终究是没有证据。有人教万俟卨从救庐州事入手，也可定岳飞有罪。又知高宗曾以手札表彰岳飞不专进退，处置得体。便命人把岳习家藏御札全都搜出，消除佐证；又逼部将孙革作证，给岳飞安上一个"违诏逗留"的罪名。但无物证，况且，自古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成规，"逗留"二字，难定死罪。所以拖了两个多月，无法结案。韩世忠冒着被牵连的危险，直入丞相府质问秦桧："你诬岳飞给张宪书信造反，证据何在？如今已把他关押两个多月，还能永远关押下去不成?"秦桧道："书信虽至今没有找到，事体莫须有。""莫须有"就是说不定有的意思。韩世忠听了，气愤道："莫须有三个字，如何

让天下人心服!”皇叔宗正卿赵士㒟上书，愿以家中百口人性命保岳飞无罪。秦桧获知后，示意万俟卨弹劾他交通大臣，贬为提举山崇福宫使，离京去了。秦桧仍不解恨，命党羽弹奏不止，终于将士㒟贬死于建州。大理寺定案，寺丞李若朴、何彦猷以为，岳飞应受徒刑二年。报大理寺卿周三畏，周转报御史中丞万俟卨，万俟卨道：“岳飞罪大如此，只受徒刑，你这大理卿还想做吗?”周三畏毫不畏惧道：“我只知依法行事，寺卿官职有什么可惜!”万俟卨奏明朝廷，将周、李、何三人都罢了官。总之，上至皇叔，下到百姓，都有上书为岳飞讼冤者，有的被罢官，有的被处死。虽如此，秦桧心中也不能没有压力。正如韩世忠所说，难道关押岳飞一世不成?眼看到了岁末，一日大雪，秦桧抱着火盆在书房东窗下筹思对策：继续关押岳飞越来越是不利；倘若释放，也觉不妥。反复思虑，不知该如何是好。顺手拿起一只火筷，在火盆灰烬中乱画。妻子王氏来书房探视，见他将一个“飞”字写了又涂，涂了再写，已知他心意，说道：“相爷是否为岳飞的事为难?”秦桧知道他这夫人颇富智计，顺口道：“不错，夫人以为该如何办是好?”王氏一听，拿起另一只火筷在火盆中写了“缚虎容易纵虎难”数字，秦桧看了不禁心惊肉跳，这才定下决心，写了一张字条，命人送交狱吏，将岳飞杀死在狱中，以畏罪自杀上报朝廷。《系年要录》记载，说是大理寺定案：赐岳飞在狱中自尽。究竟因何而死，已搞不清了。

岳飞既死，诏命将岳云、张宪在闹市中斩首示众，家产籍没入官，岳飞全家发配岭南。所有审案有功人员全都升了官。这时，徽猷阁待制洪浩出使金国，被拘留在燕山，以腊丸书向朝廷报告说：金人最害怕、最钦佩的人就是岳飞，称他为“岳爷爷”。闻知岳飞已死，金人相互举杯祝贺。

杀了岳飞，秦桧拔除一颗眼中钉。但由于手段卑鄙，受天下人谴责，他自己心理上再也难得平衡。古人说：为善最乐，就是

指的这种心理作用。据载，秦桧晚年携家游西湖，患了急症，似见一人厉声说道："你一生祸国殃民，我已在上天那里告发你，当在太祖皇帝殿下受铁杖刑。"从此秦桧便像受杖击一样，浑身疼痛，终于死去。不久，儿子秦熺也死掉了。家人这才害怕是有冤鬼作祟，请道士作法事消解。道士弄了一阵玄虚后，说要到阴司追查原委。结果说是先在阴司遇见秦熺带着一副大铁枷，向他打听秦桧去处，答说："在冥都受审。"寻到冥都，果见秦桧与万俟卨各带一大铁枷，囚在铁笼子里，忍受各种阴司酷刑。临别，秦桧要道士给夫人王氏带口信说："东窗事发了"，要她及早做准备。秦桧与王氏于东窗下密谋害岳飞，事颇机密，世上无第三人知晓，道士能说出"东窗事发"四个字来，世人便相信他真的到了冥都，这故事也就流传不衰，诗词、小说、戏剧中都有描述。撇开它的迷信成份，这故事反映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岳飞之死受到后人的无比同情，而秦桧和家人都为秦桧作的孽背负了沉重"枷锁"。

秦桧死后，朝廷曾有意为岳飞冤狱平反，由于万俟卨阻挠没有成功。绍兴末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日谋南侵，人们更加意识到妥协换来的和平不能长久，所谓国乱思忠臣，就更加怀念岳飞。太学生程洪图首先上书，为岳飞诉冤，朝廷命解除对岳飞家人的禁锢。后御史中丞汪澈任荆湖宣抚使，到任后，岳飞的旧部曲亲兵联合上诉，哭声如雷。孝宗害怕酿成军变，下令岳飞官复原职，赐钱百万，以礼改葬，岳飞后人全部加官。又在鄂州为岳飞建庙，号为"忠烈祠"。淳熙六年（1179），加谥号为"武穆"。宁宗嘉定四年（1211），又追封为鄂王。说到丧葬，也颇曲折。岳飞死后，狱卒敬他是个爱国英雄，将尸首偷运出来，葬在杭州九曲丛祠。孝宗时改葬，按他生时意愿，连同岳云等人棺木全都南向，表示他到死心向朝廷。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杭州同知马伟重修岳飞墓，将墓前一株桧树劈为二半，称为"分尸

桧”。以表示对秦桧的痛恨。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都指挥马隆又铸了秦桧、妻王氏和万俟卨三人的铜像，都是反绑双手，跪在地上。将铜像列于墓前。凡来游观者都在秦桧夫妇像的脸上留痰一口。此后约定成俗，据说直到“文化大革命”铜像被砸烂以前，这一对“贤伉俪”脸上一直痰涎不干。文革以后，按原样重铸了几尊铁像，为不使他们夫妇那副尊容倒了游人胃口，在周围加了铁链圈拦，算是沾了社会进步的光，才免了痰唾的灾厄。

秦桧身后受的惩罚虽是罪有应得，平心而论，将一切过错归于他一人却不公平。如前所述，岳飞之死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收三大将兵权是宋朝的一贯政策，张浚、赵鼎都这样干过，没有成功，秦桧干成了。并非说岳飞的这场悲剧与秦桧无关。若说是秦桧利用了这种矛盾，倒不如说是张俊利用秦桧报了个人仇怨。而张、岳矛盾能发展到生死相搏，则与朝廷的腐朽有关。还有一条，就是今人不断批评的岳飞的愚忠，他只知忠君，心无杂念，却于不知不觉中犯了忌讳。如他请求兼领刘光世的淮西军，请求立皇太子等，都不是一个手握重兵的人应该做的事。此外，加上他性情刚直暴躁，动辄辞职，使皇上心生不满。自然，在所有因素中，最大因素是他主战的坚定立场与高宗皇帝的妥协政策相矛盾。高宗曾表示：为了命名梓宫、太后还朝，非和议不可，为此可一切都不计较。杀岳飞自然他也毫不计较了。从罢三大将兵权，到治岳飞全家罪，每件诏书都是他批复的。岳飞身为枢密副使，没有皇上的认可，谁也不敢将他下入大狱。所以，高宗皇帝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不过是帮凶、同谋。数百年来，人们按儒者“为君亲讳”的信条，一直把高宗说成是受蒙蔽者，而要秦桧代他受过，这怎么可以？　　　　（刘洪涛）

参考资料：

《宋史》：《岳飞传》、《岳云传》、《何铸传》、《罗汝楫传》、

《张宪传》、《万俟卨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8—143

清·储人获《坚瓠首集》卷4《东窗事犯》

《雍正浙江通志》卷235引《杭州府志》

秦桧和金

建炎四年（1130），金兀术率领的渡江追击宋高宗的金军退回北方，宋高宗从温州移至越州（浙江绍兴）。由于临安（浙江杭州）遭到金军的严重破坏，只得升越州为绍兴府，暂作小朝廷的临时行都。

这年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来到南宋行都绍兴，开始了他献国求荣的罪恶阴谋活动。

秦桧在靖康之祸发生时，正在北宋朝廷中为官，曾经发表过激烈的抗金言论，反对金朝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被金兵与徽、钦二帝一起拘押北去。但是，他一到金朝就原形毕露，很快就卖身投靠女真贵族，成了金太宗之弟挞懒的亲信。金兵南侵，秦桧为挞懒参谋军事，并被任命为随军转运使。

挞懒率金军南下攻南宋楚州（江苏淮安），秦桧及其妻王氏随行。后来，他带着妻子王氏来到涟水军（江苏涟水），航海到了绍兴，投奔南宋朝廷。秦桧自己声称是杀掉了金朝的监视人员夺舟逃归的。当时，南宋的许多官吏都认为秦桧的说法破绽百出，对他的来历感到可疑。有人怀疑他和何㮚、孙傅等一起被金军掳掠北去，为何唯独他能回来？还有人怀疑他在金军大营中身单力薄，如何能轻易杀掉金朝监视人员？又如何能从楚州至涟水军这一段金军的势力范围内不被发现和追击？更有人怀疑他随金军南下，金人必以王氏为人质，怎能让王氏随军并和他一起逃走？尽管朝野议论纷纷，可宋高宗赵构对此不感兴趣，他急于想

知道的是徽、钦二帝的近况及与金议和的可能性。于是，秦桧到来不久，他就亲自召见。

秦桧对宋高宗的心理早已摸透，一见面就问："假如收复失地的大业成功，钦宗必将回来，到时候你将如何办?"宋高宗不积极抗金主张议和，这也是他的顾忌之处。秦桧见宋高宗无言以对，就将自己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献上，夸口自己跟随挞懒数年，深得他的信任，此书送去，定能化干戈为玉帛，使天下太平。听了秦桧的鼓吹，高宗高兴万分，庆幸自己在艰难时刻得到一位与自己主张相同的干将。事后，欣喜地对辅臣说："秦桧忠朴过人，我得到他，高兴得夜不能寐。他的归来，我既知道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一个难得的人才。"在此之前，南宋虽多次遣使去金，但且战且和，而南宋朝廷一心与金议和则从秦桧南归开始。

秦桧由于得宋高宗的宠信，官运亨通，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这时，范宗尹被罢去相位，秦桧很想得到这个位置，因而扬言说："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使国家安如磐石。"有人问："既然如此，何不讲出来?"秦桧别有用心地说："因为没有丞相，讲出来也行不通。"高宗听了以后，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命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右相）。秦桧如愿以偿地得到相位后，入朝谢恩，高宗急不可耐地问他："听说爱卿曾言有二策，能使国家有磐石之安，只因朝中无相，无法实行。现在卿已拜相，就应及时施行。"按照金朝的授意，秦桧答道："陛下如果想使本固邦宁，百姓无颠沛流离之苦，那就须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将河北人还给金朝，中原人还给刘豫，战争就可以停止了。"因为当时不仅赵构本人是"北人"，许多文臣武将和士卒也都是北方人，按此二策办理，不仅南宋政权和军队都要解体，高宗本人也将无所归，所以，尽管高宗本人也议和心切，却无法接受此二策。于是，高宗冷笑着说："你说南人归南，

北人归北，那么你是南人，当归刘豫，我是北人，当归何处呢？”秦桧被驳得哑口无言。

本来朝中一些大臣就对秦桧的议和主张竭力反对，并对他宠幸高升、恃宠专权不满，这时，以左相吕颐浩为首的一些朝官借机弹劾他。说他专主议和，阻挠恢复大业；结党专权，狂言蒙听，罪应黜逐。赵构任用秦桧为相十个月，对他的无所作为和他所提出的议和“二下策”，深感失望，便于绍兴二年（1132）六月罢了他的职，并揭榜于朝，示以永不复用。

绍兴三年十二月，金朝派李永寿、王翊使南宋，要求归还伪齐的俘虏及西北士民给刘豫，并要求南宋和刘豫的伪齐划江为界。金朝的这些要求，与秦桧前面的主张是一致的。更加明显地证明了秦桧是和金朝共谋的。

秦桧被罢相后，高宗并没有停止和金议和。但是，当乞和的宋使前往金营时，金将一再质问秦桧为何被罢相，挞懒还特意交待宋使说：“秦桧熟知我朝情况，有些事情你们可以问他。”这显然是对高宗施加压力，要他重新起用秦桧。高宗也感到没有秦桧，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议和的事迟迟不得进展，于是决定重新起用他。绍兴元年八月，高宗任命秦桧为醴泉观使兼侍读，建康行宫留守，并参决尚书省和枢密院的议事活动。

中原地区人民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刘豫无力镇压，被金朝废黜。绍兴七年，金主采纳了掌握金朝大权的挞懒的建议，决定把原刘豫统治的地区交给南宋，并以归还已死在金朝的徽宗梓宫（灵柩）、韦太后（高宗赵构生母）为条件，要南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高宗接到口信后，当即表示同意。考虑到秦桧深得金人信赖，和挞懒关系甚好，是一个难得的媒介人物，因此，高宗于绍兴八年三月，又把秦桧升迁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这年五月，宋使王伦与金使乌陵噶思谋等到达临安，金朝正

式提出议和的条件和要求。赵构表示屈己求和，唯金是从。群臣议论纷纷，反对议和，但高宗和秦桧互相勾结，乃一意孤行，加快议和的行动。七月，经秦桧的安排，又派王伦出使金朝，商定议和日期。为使议和事宜顺利进行，十月上旬的一天，朝议过后，秦桧独自留下，他对高宗说："臣僚们多是畏首畏尾，不足以成大事，和议问题请陛下与臣一人商议就行了。其他人不得干预。"高宗立即应诺。秦桧力主和议，虽有高宗为靠山，仍害怕群臣从中阻拦。中书舍人勾龙如渊看透秦桧的心思，竭力巴结，投其所好地建议秦桧说："相公施行的是天下太平的大计，但邪说四起，主要是没有得力人为台谏，进行反击。如果有人为台谏，对不利相公的言行进行反击，对反对相公主张的人进行弹劾，则事情就可顺利成功。"秦桧听了，大喜过望，立即擢勾龙如渊为中丞，专门弹劾反对和议的大臣。他们相互勾结，陷害忠良，在高宗的配合下，反对议和的参知政事刘大中和左相赵鼎先后被罢职。

金朝以张通古、萧哲为江南诏谕使，与宋使王伦一起南来。金使十分傲慢，极为轻蔑南宋王朝。进入宋境时，竟让沿途州县守臣像迎奉宋帝诏书一样迎奉金帝的诏书。南宋士大夫闻知，纷纷上书指责议和失策。枢密副使王庶连续上书，力陈议和之非，遂被免职。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大骂秦桧、王伦一伙祸国殃民，认贼作父，罪该万死。秦桧给胡铨加上"狂妄凶悖，鼓众犯上"的罪名，免职发配边远地区。

在外统兵的将帅，也极力反对和议，主张抗击金军。秦桧为了向金朝表示议和的诚意，命令江北韩世忠部撤驻镇江。韩世忠认为金军议和是假，麻痹我们是真，并主动请求率兵向金军反击，战死沙场，报效国家，但高宗和秦桧一心议和，没有答应韩世忠的请求。驻军永州（湖南零陵）的张浚也多次上书，力陈不可议和，都被秦桧私自扣压，不上报给高宗。

金使到达临安后，气焰十分嚣张，坚持要册封赵构为帝，并让他跪拜受封。消息传开后，群情激愤，朝野哗然，临安的守军更欲发动兵变。秦桧怕高宗迫于舆论压力而变卦，假惺惺地提出要辞职。高宗坚决不允，并在群臣面前夸奖秦桧一番，同时下诏威胁军民，不准闹事。

金使要宋高宗在满朝文武百官面前跪拜金主的册封，使高宗感到难堪。但不这样做，和议就会前功尽弃，秦桧虽深知赵构的苦衷，却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于是去找给事中直学士楼炤商议。楼炤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他向金使说明，高宗正居丧守灵，不能行礼，跪拜之礼可由宰相代行。秦桧把这一办法告知高宗，高宗连声称好，深感秦桧善解人意，使他从难堪中解脱出来。金使见南宋军民反对和议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代高宗在金使面前跪拜，接受了金朝的诏书。

绍兴九年正月，宋朝正式宣布了议和的内容：南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归还原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并送还徽宗梓宫和韦太后。和议告成，高宗和秦桧等欢天喜地。高宗认为秦桧和议有功，封官进爵，宠信有加。

但是，高宗和秦桧一伙的好梦不长。和议刚宣布不久，一直反对把河南、陕西地区交还给南宋的金朝兀术，在金朝发动政变，处死了挞懒，掌握了金朝的实权。兀术掌权后，向南宋提出了修改和议的要求。高宗和秦桧不听群臣的劝告，仍然主张和金朝谈判议和。

绍兴十年五月，金军大举南侵，意欲渡江灭宋。前线将士奋勇抗击，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率领“岳家军”先后取得了“郾城大捷”和“朱仙镇大捷”，刘锜、张俊、杨沂中等也先后取得了“顺昌大捷”和“柘皋大捷”。金军被宋

军阻击，连吃败仗，仓皇北撤。兀术甚至准备放弃中原和河北，退回东北根本之地。如果宋军此时能够乘胜追击，很有可能一举收复失地，雪靖康之耻。但此时的秦桧忧心忡忡，唯恐金人以后在谈判桌上向他问罪，想方设法阻止岳飞等宋军的北伐。他利用高宗只想保住南宋半壁江山的心理，建议高宗乘胜议和，金朝必然答应。一贯主张投降议和的高宗自然同意。因此，秦桧以高宗的名义命令刘锜、岳飞等前线部队立即班师，不可轻进。

秦桧知道岳飞不肯从抗金前线撤军，就先命令张俊、杨沂中等抗金将领率先撤退，然后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请求高宗给岳飞下达班师的命令。高宗在秦桧的请求下，竟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勒令岳家军立即退兵。

秦桧在力主议和中，经常担惊受怕的就是带兵在外的将领无法节制。一心想剥夺他们的军权。给事中范同对秦桧献计说：“把这些领重兵在外又不听宰相话的将领调入朝廷内的枢密府，那么他们的兵权就会自动被解除。”秦桧大喜，密奏高宗说：“把三大将召回临安，论功行赏。”绍兴十一年四月上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奉诏先后来到临安。秦桧和高宗串通一气，立即宣布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马上入府议事，不再返回军营。这表面上为提升官职，实际上是剥夺三大将的兵权。

岳飞在临安多次奏请高宗让他带兵北伐，收复失地，并痛斥秦桧一伙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秦桧认定，岳飞是他从事议和的重大障碍，实施阴谋的绊脚石，非置他于死地不可。乃指使贪功忌贤的张俊和他的同伙右谏议大夫万俟卨捏造岳飞“谋反”的罪名进行陷害。为了讨好金人，秦桧等杀害了著名抗金将领岳飞。

这年九月，金兀术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主动要与南宋议和。高宗和秦桧闻讯，欣喜万分，立即答应。宋、金双方于十月订立和议：南宋正式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

十五万匹，宋、金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二州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二州之半予金。南宋在军事有利的形势之下，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和约，使南宋军民蒙受了莫大的屈辱，同时也充分暴露了秦桧一伙投降派卖国求荣、贪生怕死的丑恶嘴脸。这个和议因为签订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史称“绍兴和议”。

秦桧一伙的议和活动，遭到了南宋军民的反对。地方官邵隆知商州十年，他招抚流散人口，把他们组织起来抗击金军，多次有力地打败了金军。“绍兴和议”后，商州割让给金。邵隆心中十分难受，迫不得已转知金州（陕西安康）。但邵隆多次出兵金朝境内，痛击金军。秦桧说他破坏和议，对他恨之入骨，把他调知叙州（四川宜宾东北），并派人偷偷地把他毒死。

绍兴十二年九月，宋高宗以秦桧议和有功，加秦桧为太师，封魏国公。十月，又晋封为秦、魏两国公。秦桧认为封两国公与北宋奸相蔡京相同，不肯接受。

绍兴十三年七月，曾为王伦副手使金的朱弁回到临安，宋高宗召见了他。他建议高宗要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以防金人败盟而措手不及。并告知高宗，金朝内部矛盾重重，国内人民不满金朝的穷兵黩武，纷纷反抗。最后又建议高宗说：“金朝实已外强中干，如若我们能抓住有利时机，是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高宗表面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称他讲得好。但秦桧却耿耿于怀，十分反感，奏请高宗给他任命了一个宣教郎直秘阁的闲职，朱弁在此位置郁郁而死。

秦桧自“绍兴和议”后，专擅国家权柄十五年之久，为了架空高宗，他建议高宗立太学、听讲《易经》、耕种农田等，让高宗整天陷人琐事之中。为了粉饰太平，他授意同党知虔州的薛弼，说当地的一百姓在朽柱中发现有“天下太平”字样的木纹。秦桧借此大肆渲染，因而各地天天有关于祥瑞的奏章。为此，高

宗大为高兴，为秦桧粉饰的太平所陶醉，不再议论军事。

秦桧的作为，激起一些正直侠义之士的愤慨，必欲杀之而心甘。殿前军士施全，乘秦桧入朝之机，挟刀行刺，但没有成功，反被捕入狱。秦桧曾到狱中问施全为何杀他，施全理直气壮地说："天下军民都要求抗金，唯独你不肯，所以我要杀你。"秦桧虽下令杀害了施全，但他从此胆战心惊，每次出行都要有五十个全副武装的亲信士兵保护，府第内外日夜重兵把守，轻易不敢外出。

秦桧晚年对一些曾反对过他议和的旧臣仍不放过。他曾经把赵鼎等人的名字写在一德格天阁，一心想杀了他们。赵鼎被安置在吉阳军，派人去告诉他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不会放过我，我死了，也许你们能逃脱，不然将祸及一家。"其后，赵鼎绝食而死。秦桧感到很遗憾。他仍不放过赵汾，罗织赵汾有"奸谋"罪名，把他逮捕入狱，指使手下对他酷刑逼供，并让他诬陷李光、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反"，构成大狱。但此时秦桧已重病缠身，奄奄一息，对这一"谋反"大狱已无力深究。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病死临安。

（耿曙生）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秦桧主和》

《宋史》：《秦桧传》、《王伦传》、《岳飞传》。

《续资治通鉴》卷117—125

《齐东野语·秦桧之收诸将兵权》

虞允文督师

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金熙宗，登上了皇帝宝座。

完颜亮篡位后，积极整治内政，一心想统一天下，南宋更是他首先想要鲸吞的对象。

对于完颜亮南侵的企图，虽然宋高宗等仍沉浸在“绍兴和议”的美梦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偏安生活而毫无所察，但南宋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出了完颜亮的野心。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东平进士梁勋上书，言金人有举兵之兆，劝高宗未雨绸缪，以防不测。高宗不但不听，反而勃然大怒，竟以诋斥和议、迷惑大众的罪名，将梁勋流放到千里之外。这时秦桧死去，群臣拍手称快，纷纷上奏章揭露他的罪恶，并要求为岳飞平反昭雪。但高宗毕竟宠信过秦桧，与金朝议和也是他自己的主张，“绍兴和议”的签订是他俩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下诏说：“和金人讲和之策是我本人之意，秦桧只是赞成我的做法罢了。”大包大揽，为秦桧开脱罪责，他同时宣布：“从今以后，有妄议边事者，要处以重刑。”

绍兴二十八年十月，金主完颜亮派遣左丞相张浩等人赴汴京（河南开封），开始大规模地营建宫室。南宋国子司业黄中使金回来后，立即上书说：“目下金人大规模地营建汴京宫室，金主必定要来此指挥金军南下。我们不可不早做准备。等到他将来果真到汴京时，金兵用不了几天就能抵宋境，那时再做准备恐怕为时

已晚。”当时的投降宰相汤思退不但不引起重视，反而认为他危言惑众。

金朝的南侵准备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绍兴二十九年五月，南宋礼部侍郎孙道夫使金还，临行前金主完颜亮恶狠狠地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国的皇帝，奉我国为上国，他心多有不诚。今略举二例。你国有民逃入我国境内，我国边境官吏都将他们遣还，而我国边民叛入你国者，我们的官吏去索要，你们往往托词不给，此为一也；你国在沿边盗买鞍马，修筑城池，是想和我们交战，此为二也。”这正是金朝准备南侵寻找的借口。孙道夫回宋后，如实地禀告高宗。高宗仍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从和议以来，事金国以臣之礼，从未故意冒犯，金朝是不会对南宋用兵的。高宗甚至天真地说：“我们对金朝有求必应，他们有什么借口可以用兵呢？”孙道夫一针见血地说：“金主完颜亮是个不讲信义之人，他弑君夺位都无所忌，难道兴兵南侵还需要什么正当理由吗？”其后，孙道夫每次见到高宗都提醒他要对金加强戒备，汤思退、沈该等一伙投降派非常讨厌和嫉恨他，不久，孙道夫被贬出朝廷。

在许多大臣都上书言金朝有南侵企图的情况下，高宗也有点放心不下。绍兴二十九年六月，高宗派王伦出使金朝，让他暗中观察金国的动静。王伦回来谎说：“金国恭顺和好，没有丝毫举兵迹象。”高宗听了，欣喜若狂，对金朝完全放心，并且说：“朝廷内外都有人建议我调兵遣将加强边境，假若轻举妄动，必然招致兵祸连结，幸好我没有听他们的话。”

绍兴三十年正月，金朝派遣施宜生出使南宋，祝贺正旦。施宜生是福建人，虽在金朝为官，却心向着南宋。这时南宋的间谍回报高宗，说金主完颜亮在大造舟船调兵遣将，金兵南侵已迫在眉睫。高宗仍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就派人到施宜生的住处套口风。施宜生用隐语回答说：“今日北风甚劲。”并且在几上连连扣

笔说："笔来！笔来！"向南宋透露形势紧张，金朝必定南来。施宜生回金朝后，被人告发，金主完颜亮处他以烹刑。八月，贺允中使金归来，他向高宗报告说："金人必定叛盟，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对此，宋高宗等依然无动于衷，并罢了贺允中的官。

绍兴三十一年三月，金朝南侵的意图已是路人皆知，在大臣陈康伯等人的坚持下，高宗才开始考虑防务问题，但所采取的措施也只是从川陕防线抽调三千人马戍守襄阳，命诸将画界各自为守而已。而这时幸存下来的刘锜、吴璘等战将，都已经年老多病，再也没有一个像岳飞、韩世忠那样的大将可以独当一面克敌制胜了。这是宋高宗为了投降而自毁长城的恶果。

五月，金主完颜亮派高景山、王全以祝贺天申节为名出使南宋，并要求宋割让淮（淮河南）、汉（汉水流域）之地。王全到临安后，还按照金主的授意多次当面指责、漫骂宋高宗，但毫无骨气的高宗并没有被激怒，只是对王全说："听说你是北方的名士，怎会如此？令我失望。"六月，完颜亮迁都汴京，准备大举南下。

当南宋朝廷还在犹疑不决之时，江北的人民已自发地组织起来抗金。这年八月，宿迁人魏胜率先起兵。魏胜智勇双全，当金朝大肆征兵之时，他率三百义士北渡淮水，并攻取涟水军。当时从北方金统治区投奔而来的士卒很多，魏胜同他们同吃同卧，毫不怀疑，并且对降卒周贫解困，使他们极为感动，投奔的人越来越多。金朝知海州（江苏连云港市）事高文富派兵捕捉魏胜，被魏胜击败，一直追到海州城下。高文富闭城固守，魏胜令人在城外多张旗帜、广举烟火为疑兵。又派人向诸城门喊话，说金人背信弃义，无名兴兵，晓以南宋的宽大之意。城中军民闻之，主动打开城门，魏胜率众冲入城中，唯独高文富及其子高安仁率亲兵抵抗。魏胜杀高安仁及州兵千余，活擒高文富，收复了海州。随后，魏胜又派人晓喻朐山（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怀仁、沭阳、

东海等县，诸县皆响应他，表示愿意归顺。魏胜在海州等收复地区免租免税，释放囚徒，开仓济贫，整肃军纪，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队伍迅速扩充。金朝多次派兵前往镇压，但都被魏胜率兵击败，成了金军南侵的心头之患。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颜亮兵分四路，大举进攻南宋。一路准备由海道直奔临安；一路由蔡州（河南汝阳）出发进攻襄阳及荆南；一路由凤翔出兵进军蜀地。完颜亮亲率金军主力渡淮南下。当金军主力渡淮之后，完颜亮顾忌魏胜在其后于金军不利，决定分兵数万围攻海州。魏胜请求李宝率领的水师增援，合军后在新桥大败金军，然后退守海州城。金军围城猛攻，魏胜率领军民坚守。魏胜为了激励士气，乘金军不备之时，单骑杀出东门，高声大呼，神勇无比，金骑五百望风而逃。魏胜一人追杀十多里，金兵惊吓逃散。金兵久攻海州城不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撤走。

当完颜亮率金军主力渡淮南下之时，宋高宗这才如梦方醒，仓促应战。他急忙任命重病在身的老将刘锜及贪生怕死的王权率军前往抵抗。王权根本没有斗志，在庐州（安徽合肥）不战而逃，全军溃退，退保和州（安徽和县）。刘锜在淮阴听到王权兵败而退的消息，恐怕自己孤军难为，也退兵至扬州。宋高宗一听王权前线兵败，抗金信心全无，准备下诏解散百官，让他们各自逃命，他自己又想走航海避敌的老路，只是由于新任宰相陈康伯的坚决劝阻，宋高宗才放弃亡命海上的念头，被迫下诏表示要率军亲征，并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到江、淮督战。

当叶义问于十月下旬离开杭州的时候，金朝内部发生了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在部分女真贵族拥戴下登上皇帝宝座，宣布废黜完颜亮。金朝统治区内的汉族、契丹族人民也掀起一个起义高潮。同时南宋的水师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李宝在率水师解海州

之围后，引水师至胶西（山东胶县）石臼岛。这时准备从海道奔袭临安的金水师已出海口，泊在陈家岛，与李宝水师仅一山之隔。李宝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士气高昂。李宝率南宋水师绕山出击，金军水师中操舟的都是中原遗民，他们把金兵骗进船仓，使金军不知宋军水师已杀过来。宋军水师突然出现在金军面前，风急舟快，破浪而来，金军水师大惊，仓促举帆应战。金军的船帆都是油布做成的，又让风浪把所有战船卷聚在一起，无法行驶开来。李宝抓住战机，命令士兵用火箭射金军的船帆，大火燃烧金军数百艘战船，烧死、溺死金兵无数。未被大火烧着的金军船只，仍想负隅顽抗。李宝命令宋军将士跃登敌舟，以短兵击杀。这一仗，宋军水师取得了重大胜利，俘虏金军三千多人，斩杀金水军统帅完颜家奴等六人，缴获了金军统兵符印、文书、器甲、粮食等不计其数。面对如此有利的时机，由于南宋朝廷的腐败，刘锜孤军在扬州作战，且又重病缠身，迫不得已撤回江南，整个两淮地区还是被金兵占领了。

幸好参赞军事虞允文是个有胆略而又懂军事的人。他受命到芜湖，宣布由李显忠取代王权的命令并犒劳将士。当他走到距采石（安徽马鞍山）十余里的地方时，王权已经逃走，李显忠还没有来。只见因王权逃跑而从淮西败退下来的宋军将士三三两两，无精打采地坐在路边。虞允文问士兵说："你们为何如此狼狈？为何不战而退？"士兵们说："王节使（王权）令我们弃马渡江，我们都是骑兵，现在已无马，又不善步战。"虞允文的随从都劝他返回建康，说："事至今日这种地步，都是王权失职造成的。你的主要使命是犒师，并非派你来主战。何必代他人受过？"虞允文不听，策马至采石，趋江滨望江北金营，连绵不见边际，而这时聚集在采石的王权残兵仅八千人，马匹数百而已，而且都无斗志，时刻准备继续逃跑。这时，完颜亮已作好部署。准备从采石渡江，虞允文见情势已相当危急，如果坐等李显忠的到来，必

将误国。一旦金兵渡江成功，南宋社稷就危险了。于是他召集统制张振、王琪、时俊、戴皋、盛新等人商量应对之策。虞允文对诸将说："万一金军渡江成功，你们想逃又能往何处逃？现在我们前控大江，凭天险之地利，何不于死中求生呢？何况朝廷养你们三十年，为什么不能与敌人一战以报效国家？"众将齐说："并不是我们不想同敌人决战，而是无人指挥。"虞允文自告奋勇地说："现在李显忠还没有到，金军即将渡江，我愿负责指挥大家与金军决一死战。而且朝廷让我犒师的金帛、官诰都在此。战斗中有功者即发钱奖赏，书写官诰授给。"众将齐声说："现在有人指挥，我们愿意同金军决战。"随后，虞允文立即布置迎敌。

虞允文命令诸将列步军、骑军大阵于江岸，阻击金军的登岸。同时，把所有的海鳅船和战船分为五支，以二支傍东西岸行；以一支驻江中流，载精兵以待战；以其余二支为预备队，以备不测。虞允文刚刚部署完毕，金军已大呼渡江而来。完颜亮手执小红旗，指挥数百条战船，乘风横冲。顷刻之间，七十余艘船驶抵南岸。宋军向后略退。虞允文进入宋军阵中，抚着统制时俊的背说："你的胆略名闻四方，立在阵后的就是你们的儿女啊！"时俊立即挥动双刀出阵，带领士兵与登岸的金军殊死战斗。这时江风忽止，中流宋军以海鳅船冲击敌舟。金军所用舟底阔如木箱，行动迟缓且不稳，又不谙江道，皆不能动，在宋军的冲击下纷纷沉没。这时从淮西溃败下来的三百宋军，自光州转来。虞允文即授他们以旗鼓，令他们授旗擂鼓从山后转出。金军疑宋援军到来，仓猝撤退回江北。虞允文见金军后撤，令宋军用劲弩尾追射杀，金军大败，退回和州（安徽和县）。

虞允文料敌虽败，明日必定再来，立即于半夜进行布阵。他派宋军的海船缒上流，另派盛新率水军封锁金军战船的入江口——杨林口，并授以方略说："如果敌船从河口出来，立即齐力射箭，不让一舟得出。如果河口无敌船，则以克敌神臂弓射北岸

之敌。”第二天早晨，金军果然复出。宋军舟师密箭阻击，金军弃船欲退上岸，但都陷入江边泥淖中，淹死射死不计其数。上流宋军水师，出其不意烧掉金军赖以渡江的三百艘船，金军又大败。

完颜亮采石惨败后，见武力难以取胜，就给王权写了一道诏书，让人渡江送到宋营。书中对王权说：“我提兵南下，以往你是望风而逃，可见你是识时务者。现在我已到江上，见南岸的宋军不多，只是我们的舟船不适用，未能迅速渡江，今见你的舟师进退有度，我很赏识。如果你能率军来降，高官厚禄我决不吝啬。如果你执迷不悟，我就移师到瓜洲（江苏六合）渡江，将来决不饶你。”宋军将士以为王权和金军暗中早已有约，大惊失色。虞允文识破了金军的阴谋，他告诉将士们说：“这是金军的反间计，是想离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上当。”这时，李显忠亦至芜湖，他认为要答复完颜亮，杜绝他的幻想，并约他决战。于是，虞允文复书说：“以往王权望风而退，使你能够嚣张一时。朝廷已将王权治罪。现在统兵的是李世辅（李显忠字），你难道不知他的名字吗？如果你移军瓜洲，我们将严阵以待，无须用虚言恫吓，我们时刻准备与你一决雌雄。”完颜亮接书后大怒，焚烧了宫人所乘的龙凤车，杀掉负责造舟的梁汉臣及二名造舟的人，然后转趋瓜洲以谋再渡。

虞允文得知完颜亮已率大军东移，对李显忠说：“京口（江苏镇江）无备，现在我想前往，你能分兵给我带往增援吗？”李显忠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分兵一万六千于他。虞允文率兵沿江而下。这时，宋高宗也以金字牌调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闵，急率军东驰，增援建康、镇江的守备。虞允文至建康时，建康守备张焘召集众将商议，派谁去镇江最合适。因为镇江是金军主力所图之处，故众将面有难色。张焘提议说：“虞舍人（允文）已立大功，可担此大任。”虞允文欣然从之。

虞允文至镇江后拜谒了招讨使刘锜，询问他的病情。老将刘锜拉着虞允文的手说："何必问我的病情，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自你这个书生之手，实在令我辈愧死。"刘锜随后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辞去军职。朝廷派刘锐代替刘锜之职，并加强泰州、舒州（安徽安庆）、福山、江阴江面等地的防守。

完颜亮坐镇瓜洲，分派重兵于滁河口（今浦口），仍欲作困兽之斗，以谋渡江。这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路军队已抵集镇江，计有二十万之众，一时军势大振。根据敌情，虞允文派张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冲；以苗定驻军下蜀（江苏句容），作为后援。虞允文恐怕车船（脚踏动力船）战斗时不能使用，派淮东总领朱夏卿和镇江守臣赵公称负责试用。宋军士兵踏车船，一直驰行到瓜洲岸边，又在江中绕金山三周。车船回转自如，快速如飞，金军见了惊吓不已。连忙禀报完颜亮。完颜亮率众将到江边观看，不相信这是真船，傲慢地说："这是纸船，不足为虑。"有一金将跪奏道："南宋军队已有防备，不可轻举。采石的江面比这儿狭窄得多，我军仍然失利。请求移驻扬州，徐图进取。"完颜亮大怒，拔剑要杀他。在众将的苦劝之下仍杖五十。完颜亮不顾众将的反对，下令三日后渡江，否则尽杀之。金军骁将高僧想率部下逃亡，被完颜亮觉察后斩首。然后，完颜亮下令："凡军士逃亡者，杀其领队；部将逃亡者，杀其主帅。"

由于南宋军队有效地组织了江防，使得许多金军将领清楚地看到，强行渡江必然失败。而刚愎自用、粗暴残忍的完颜亮又一意孤行，强行命令金军将士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渡江，否则将被处死。在这种情况之下，以金军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为首的一批金将密谋兵变。他们冲进完颜亮的大营，杀死了完颜亮。耶律元宜自为左领军副大都督事，负责指挥南侵金军，并派使前往镇江，和南宋议和。

金主完颜雍闻报完颜亮被杀，移驾燕京（今北京市），并令

南侵金军撤回北方。宋军尾随而进。十二月，成闵、李显忠收复两淮失地。其后，京西、陕西方面的金军也相继撤退。此时，就南宋而言，是乘胜追击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但高宗一味主和，乐于偏安，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有力反击，错过了良机。此后一段时间，宋金双方基本维持“绍兴和议”的疆界。

（耿曙生）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
《宋史》：《虞允文传》、《刘锜传》、《李显忠传》。
《续资治通鉴》卷128—卷135
《金史·海陵本纪》

高宗政事

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下诏改元为“建炎”，大赦天下。同一天，元祐皇后在东京宣布撤帘归政。历史进入了南宋时期。

这时金兵虽撤出东京，但仍控制着河东、河北两路的部分地区。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赵构不得不表示一下抗金复仇的决心，以顺应民意，首先任命抗金最力深孚众望的李纲为相。但同时，他又信任和重用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黄潜善、汪伯彦，甚至还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李纲为相后，多次力主对投降金人卖国求荣的张邦昌一伙伪官治罪。他对赵构表示说：“我决不能与奸臣张邦昌同列，如果陛下一定要任用他，请先罢我的官吧！”赵构也被李纲的凛然正气所感动，又迫于众臣和抗金军民的压力，不得不下诏贬了张邦昌的职，后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

北方军民心向南宋朝廷，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抗击金军。李纲为相后，设置了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两大机构，委派官吏，拨给钱钞，招募和组织河北、河东各地奋起的义军，抗击金军。

南宋朝廷从建立那天起，在对金和战的问题上就争论不休。赵构起初在这个问题上内心也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也想利用李纲抗金的威望，振作士气，维护南宋王朝的一点面子。另一方面，又与黄、汪二人一样，幻想用对金朝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

朝对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承认。金兵撤离东京后，赵构一直没有进城，只以宗泽留守收拾残局，自己却在应天府做起皇帝来了。应天府城小粮少，又无山川之险可恃，以此为都是万万不可的。究竟定都何处？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展开了争论。黄、汪二人主张放弃故都开封，把都城迁到有长江之险可恃的建康府（江苏南京市)。李纲则认为东京是宋朝宗庙社稷所在，天下之根本，万万不可放弃，待修葺之后，立即回都东京。实际上，赵构在即位之初就决定南逃。即位第二天，赵构就命翁彦国知江宁府，并赐钱十万，让他在江宁修缮宫室，以备南逃时使用。就在两派为定都问题争论不休时，赵构不顾李纲等人反对，采纳了黄潜善的建议，准备巡幸扬州。李纲气愤地对他说："如果陛下坚持巡幸东南，使中原的抗金将士大失所望，将来要收复北方失地就困难了。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只要陛下一天不罢我的官，我就非坚持到底不可！"

赵构对李纲坚持抗金的主张感到厌烦，对李纲阻止他南巡感到恼火。甚至同黄、汪一伙相互勾结，破坏和阻挠李纲的抗金布置。在这种情况之下，李纲感到自己在小朝廷中已不能有所作为，不得不提出辞职要求。宋高宗赵构也就顺水推舟，以种种无中生有的罪名，贬李纲为观文殿学士。李纲居相位只有七十五天。

当赵构决意向扬州逃命之际，不少臣僚上书反对，请他留在抗金前线，以鼓舞士气。赵构为堵人口，竟下诏说："如果有敢非议并阻止南巡的人，应迅速报告朝廷。知而缓告者，治罪。知而不报者，斩首。"

就在赵构决意南逃的时候，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如火如荼。抗金老将宗泽在东京招兵买马，制造战车，修城筑堡，积极备战，许多义军主动投到他的麾下，据说有一百八十万之多。开封的军势一时大振。两河地区还有"红巾军"、"八字军"等著名义

军在频繁活动，积极抗金，红巾军在一次袭击金军时，几乎活捉了金军将领粘罕。

面对如此活跃的抗金力量，金朝决定再次对宋用兵。在此关键时刻，赵构不但不积极组织军民抗战，却于十月一日乘船离开应天府，向南逃去，京师军民闻此消息，相聚痛哭，深知复国无望了。十二月，金军分多路大举南下。

建炎二年春天，赵构带着宠臣和后妃到达扬州。当金军气势凶猛地南下时，赵构和他的一帮宠臣都过着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赵构让黄潜善、汪伯彦做左、右相，并得意地说："潜善做左相，伯彦做右相，国家大事就用不着我发愁了。"建炎三年正月，金军前锋已攻下徐州，直驱淮东，随之，又克泗州（江苏盱眙东北）。金兵步步逼近的消息早已传到扬州，黄、汪二人却不奏闻，赵构仍整天沉醉于歌舞酒色之中。当他得知泗州陷落，金兵准备渡淮南下的消息后，惊恐不已，急令刘光世等率军守淮，阻止金军南下，岂料这支部队素质极差，刘光世本人也怯懦无能，还没有看见金兵的影子就狼狈逃窜了。粘罕率金军攻楚州（江苏淮安），守臣宋琳贪生怕死，出城投降。接着，粘罕又攻下了天长军（江苏天长），距扬州城仅六七十里。二月三日，天刚蒙蒙亮，天长军来报：金兵将至扬州。内侍邝询急忙跑进寝殿，竟忘了昔日宫廷的规矩，大声呼喊："金兵到了！"熟睡的高宗惊坐而起，不待细问，匆忙穿戴好盔甲，骑马而逃，护驾的只有王渊、张浚和军卒数人。赵构一口气跑到瓜洲（江苏六合东南），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急忙跳上去，往江对岸的镇江府（江苏镇江市）而去。金兵听说赵构已经南逃，从扬州尾随而来。赵构不敢在镇江府久留，二月四日，又向临安逃去。

赵构边逃边想，以为是赐死张邦昌得罪了金人，招致金兵大举南侵。于是，下诏录用张邦昌的亲属，派刘俊民携带张邦昌过去写的"贴金人约和书稿"去金营求和，并无耻地表示"愿削去

国号，天地之间都是大金国的地方。”同时，赵构还下了“罪己诏”，大赦天下，唯独治罪李纲，以讨好金人。

黄、汪二人任相以来，把持朝政，嫉害忠良，特别是他们不修军备，无法抗御金兵的南侵，以致宗室播迁，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御使中丞张澄上书赵构，历数了黄、汪二人的二十大罪状，请求罢免他们，迫于压力，高宗不得不“忍痛割爱”，罢免黄、汪。不久，宋军在陈彦的率领下，渡江打败金军，收复了扬州。赵构的小朝廷才在杭州暂时安顿下来。

高宗赵构罢免了民愤极大的黄、汪二人后，任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分别治政、治军。王渊性情暴躁，庸庸碌碌，素无威望，他被重用引起了一些将领的不满。禁军将领苗傅自负世将，刘正彦因功高柴薄，对王渊的升迁更是愤愤不平。又听说王渊的升迁是勾结平日作威作福的宦官康履的结果，出于对王渊、康履以及“信任宦官、赏罚不公”的宋高宗的怨愤，苗傅、刘正彦发动了兵变，杀死了王、康等人，迫使宋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高宗被迫出居显宁寺，不许干预政事。时过不久，反对兵变的吕颐浩、张浚等实力派将领率兵压向临安。苗、刘二人不知所措，问计于朱胜非。朱胜非将计就计，说众将联兵，难以抵挡，劝苗、刘二人立即反正，让赵构复位，可化险为夷，苗、刘二人无奈，亲去显宁寺迎回赵构。赵构复位后，令张浚、吕颐浩入朝议事。不久，苗、刘二人兵败伏诛。

宋高宗赵构复辟后，为了顺应朝野上下抗金的舆情，不得不在表面上作出抗金的姿态。他迫不得已地慢慢从临安北进到建康府，作出把行都设在此的姿态，下令在江淮一带开沟引水，以阻挡金朝骑兵。但实际上，宋高宗一到建康，就派人送信给金朝最有实力的军事首脑粘罕，表示愿意去掉皇帝的尊号，作为金国的藩臣。后听说金兵又将南侵，急忙派人分别送信给金国皇帝和粘

罕，言词卑下，苦苦哀求："自古以来每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不是守就是逃，可我现在守则无人，逃则无地，所以只求阁下可怜我，放过我吧。"可惜，这并没有换得金人的怜悯，反而暴露了高宗的怯懦和无能，助长了金军的嚣张气焰。同年六月，金朝以金主四太子兀术为统帅，再次举兵南下，准备捉拿赵构，彻底消灭赵氏王朝。

宋高宗赵构和将相大臣们商讨对策时，决定只守江而不守淮。他派庸碌无能贪生怕死的执政大臣杜充为建康行宫留守，负责长江下游的防务。赵构本人早已做好了返回杭州的打算，他一面布置江防，一面又升杭州为临安府，以备作为都城所在。一切安排就绪后，立即返回杭州。

由于杜充疏于防范，十二月间，金军已从多处突破长江，围攻建康。杜充为了活命，竟主动交出建康，迎金兵入城。杜充的投降，使南宋朝廷十分震惊，赵构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急召吕颐浩商议，寻找避敌之处，吕颐浩建议赵构到海上暂避一时，赵构完全采纳了吕颐浩的建议，急忙逃往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建康失守，使江浙一带门户大开。南宋将领岳飞虽在广德重创金军，但金兀术稍作修整，便从广德向临安进犯，一路几乎没有遭到抵抗，轻而易举地兵临临安城下。守将康允不战而逃。临安被金兵占领。

临安失守的消息传到越州，赵构慌忙逃往明州（今浙江宁波）。金兀术闻讯立即派精骑日夜紧追不舍。赵构急忙派人募集海船，下海避难。

赵构等人在海上颠簸了数十日。时值残冬，大雪纷飞，水面上寒气逼人，他们打算登陆过年。不料警讯传来，金兵已陷越州，吓得赵构慌忙转舟台州（今浙江临海）。面对如此凄惨的局面，赵构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建炎四年正月，金军攻下明州。金兀术得到赵构已到达昌国县（今浙江定海）的消息，派舟

师出海，准备袭击赵构的御舟，但遭到南宋提领海舟张公裕的抗击。赵构的御舟离开昌国后，辗转停泊在温州。

金兀术害怕在南方迁延过久对自己不利，引兵北撤，沿途烧杀抢掠，惨无人道。他们在镇江金山遭到韩世忠军的抗击，韩世忠在岳飞的支持下，将金兀术所率十万军主力围困在黄天荡（江苏南京市东北）四十八天之久，最后金兀术采用火攻，突袭宋军的战船，才得逃回江北。

赵构见金兵已撤，从温州移至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临时行都。直到绍兴二年（1132），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才重回临安。

建炎四年十月，随徽、钦二帝拘押到金朝后便卖身投靠的秦桧，受金朝的指派来到南宋越州行都。秦桧自己声称是杀掉金朝的监视人员，夺船逃来的。当时南宋的许多官吏都认为秦桧的说法破绽百出，对他的来历感到可疑。可赵构对此不愿深究，他急于想知道的是徽、钦二帝的近况及议和的可能性，于是在秦桧到来不久就予以召见。秦桧对赵构的心理早已摸透，一见面就将自己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献上，夸口自己跟随挞懒做议事官数年，深得其信任，此书送去，定能化干戈为玉帛，使天下太平。秦桧的议和主张正中高宗赵构的心意，从此官运亨通，先做礼部尚书，后又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右相），负责对金朝“解仇议和”的活动。秦桧按照金朝的授意，向宋高宗提出：假如议和，须“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将河北人遣送金朝，中原人遣送依附金朝的伪齐。如照此办理，来自北方的文臣武将、士卒及至高宗本人都要遣送给对手。宋高宗尽管议和心切，也不愿接受如此建议。这时，左相吕颐浩等乘机弹劾秦桧，高宗于绍兴二年八月罢免了秦桧宰相之职，并揭榜于朝，示以永不复用。

绍兴七年十一月，金朝因伪齐屡次发兵侵宋失败，废黜了刘

豫。此时，金朝大权掌握在挞懒手中，金主采纳了挞懒的建议，决定把原刘豫统治的地区交给南宋，以便让南宋来镇压民间的反抗斗争。并以归还已死在金朝的徽宗梓宫（灵柩）、韦太后（赵构生母）为条件，要南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赵构接到口信后，当即表示同意。考虑到秦桧深得金人信赖，和挞懒关系甚密，因此，赵构于绍兴八年三月，又把秦桧升迁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同年五月，宋使王伦与金使乌陵噶思谋等到达临安，汇报了金方正式提出的议和条件与要求，赵构表示屈己求和，唯金是听。群臣议论纷纷，反对议和，赵构大怒，先后罢免了反对议和的参知政事刘大中和左相赵鼎的职。

金朝极为轻蔑南宋王朝，遣往临安的两名使者张通古和萧哲，俨然是一副宗主国的口气和姿态。进入宋境时，竟让沿途州县守臣像迎奉宋帝诏书一样迎奉金帝的诏书。南宋士大夫闻讯，纷纷上书指责议和失策。金使到达临安后，气焰更加嚣张，坚持要册封赵构为帝，并非让他以臣服跪拜接受。消息传开后，满朝文武议论纷纷，京城百姓众心共怒，卫戍部队更欲发动哗变。赵构见此情景，惊恐万状，立即下诏威胁军民不准闹事。

对于金使的要求，赵构也很为难，让他在满朝文武面前跪拜金主的册封，毕竟很难堪，而不这样做，和议就会前功尽弃。给事中直学士院楼炤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让秦桧转告金使，说高宗正在居丧守灵，不得行礼，跪拜之礼可由宰相代行。金使也知南宋军民反对议和，便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代赵构在金使面前跪拜，接受了金朝的诏书。

绍兴九年正月，南宋正式宣布了议和的内容：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归还原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并送还徽宗梓宫、韦太后和钦宗。为了庆贺议和告成，赵构还给秦桧一伙封官进爵，大大热闹了一番。

"和议"刚宣布不久，金朝的挞懒败于政敌兀术之手，并被处死。兀术向来反对把河南、陕西地区交还给南宋，因此，议和又被推翻。

绍兴十年五月，金兵分四路大举南下。河南、陕西诸州纷纷陷入敌手。当兀术率十万金军抵汴京时，宋留守孟庾不战而降。金军占领东京后，继续向东南进军。当金军南下的消息传到临安，高宗才从苟且偷安的梦中惊醒，装出一副主战的样子，匆忙调兵遣将，进行抵抗。他下诏让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并收复京师。

岳飞奉诏出师北进，先后攻下颖昌（河南许昌市东）、蔡州（河南汝阳）、洛阳等地。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五万轻骑驻扎在郾城，与兀术率领的金朝精锐骑兵展开了决战。岳飞指挥将士用"麻扎刀"大破金军的"拐子马"，取得了郾城大捷。与此同时，韩世忠、张俊所部分别收复了淦州（江苏东海）、亳州（安徽亳县）；河北忠义民兵也收复了不少城池，并相约以"岳"字旗为号，等待岳家军渡过黄河配合进攻金兵。这些胜利，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切断了敌人的归路。

赵构是害怕金兵渡过淮河使自己无立足之地，才下令抗金的。他所要求的只是能保住半壁江山，成为金的属国就心满意足了。这时，宋高宗认为自己已有力量守住淮河，如果继续打下去，将促使大将久握重兵，造成尾大不掉的局势。于是就同秦桧商定，命令各路军队"班师"，岳飞不肯从抗金前线撤兵，高宗就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竟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立即退兵。岳飞不能违抗君命，只得率军退驻鄂州。前方已收复的城市，又重新沦人金人之手。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兀术以铁骑十多万渡淮南下，攻占许多城市，直逼长江。二月，宋将刘锜、杨沂中、王德等部大败金军于柘皋（安徽巢县）。岳飞、韩世忠派兵来援，金兵退回淮北。

宋高宗、秦桧等人认为军事上有利，又准备签订和约，恐主战将帅反对，便借口柘皋之捷，密诏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论功行赏”。三人到达临安后，高宗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明升其官，实则解除了他们的兵权。高宗对三大将的部下也放心不下，害怕他们不能听命，于是派张俊、岳飞二人到韩家军驻地视察。不久，又逮捕岳飞及其子岳云，岳飞部将张宪下狱。

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了和约，其主要内容是：宋向金称臣；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予金；宋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赵构、秦桧等人在军事有利的形势下签订的所谓“绍兴和议”。

为了讨好金人，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于十二月杀害了岳飞、岳云、张宪，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议和之后，金朝不时向宋高宗勒索金银宝物，高宗反而高兴。他说：“金朝尽是要金银宝物，说明金帝有侈靡之意，应尽量满足他的要求，让他奢靡亡国。”根据这荒唐的对策，宋高宗对金朝的随时索取，都尽量满足。这些巨额的贡物，自然都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宋高宗只许皇宫免税，百姓为了躲避苛捐杂税，往往在运输船上插上皇宫宫旗，甚至出现“粪船亦插宫旗”的滑稽事。与此同时，赵构不顾人民的死活，大兴土木，建造了各种神殿宫宇，举行盛大典礼，以粉饰太平。有个叫林升的诗人写了一首《题临安邸》诗，悲愤地咏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充分揭露了赵构等人只顾过醉生梦死的偏安生活，完全不想恢复北方领土的丑恶行径。

不过，好梦不长，金主完颜亮即位不久，便准备举兵灭宋

了。对于完颜亮南侵的企图，南宋一些有识之士早有觉察。绍兴二十六年，东平进士梁勋上书，言金人有举兵之兆，劝高宗未雨绸缪，以防不测。高宗勃然大怒，竟以诋斥和议、迷惑大众的罪名，将梁勋流放到千里之外。这时秦桧已死，群臣拍手称快，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平反昭雪。但高宗毕竟宠信过秦桧，和金朝和议之大计也是两人的"功劳"，因此特意下诏说："和金是我本人之意，秦桧只是赞成我的作法罢了。"并宣布："从今以后有妄议边事者，要处以重刑。"

金帝完颜亮并没有因高宗的驯服而放弃对南宋的用兵计划。绍兴三十年九月，完颜亮撕毁和约，率六十万大军"败盟南侵"。新的战争爆发后，南宋军民抗金情绪重新高涨。经过南宋军民的艰苦奋战，加上金朝内部发生政变，完颜亮"渡江灭宋"的计划被粉碎。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宋高宗，鉴于金人败盟宣告了自己和金政策的失败，考虑到朝野上下抗战声浪的高涨，觉得威信一落千丈，以后难以发号施令，便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想"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由，宣布退位。绍兴三十二年，举行了禅位大典，他的养子赵昚（宋太祖七世孙）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孝宗。宋高宗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居德寿宫。

宋高宗退位以后，仍然干预政事，特别是对待金朝的问题固执己见。孝宗即位后总想有所作为，每次去见高宗都力陈抗金复国大计，高宗总是不允，甚至斩钉截铁地说："你等我老死后再议论抗金吧！"淳熙十四年（1187），宋高宗赵构死于德寿宫，享年八十一岁，议谥为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借葬于会稽（浙江绍兴市）永思陵。

（耿曙生）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卷 95—卷 140

《宋史·高宗本纪》
《宋史纪事本末·建炎绍兴诸政》
《建炎要录》卷12—卷195
《中兴小纪》卷1—卷40

孝宗之立

宋孝宗被立为皇太子，以至登上皇位，中间颇多周折，既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宋孝宗名昚，字元永，是宋太祖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宋太祖死后，其弟赵匡义继位，是为宋太宗。宋高宗是宋太宗的子孙，怎么会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为太子呢？

起初，高宗赵构并非没有子嗣。但不幸的是，尽管后宫嫔妃如云，儿子却只有元懿太子赵旉一人，赵旉生于建炎元年(1127)，体质孱弱，自幼多病。时值金兵南侵，高宗赵构戎马倥偬，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照料他。赵旉幼小的年龄就随着高宗颠沛流离，辗转逃命，故此一直疾病缠身，不见好转。建炎二年苗、刘在临安（浙江杭州）作乱时，迫使高宗禅位于年仅三岁的赵旉。赵旉经此折腾和惊吓，病情更加严重。苗、刘之乱平定后，高宗为了顺应举国上下抗金的舆情，把建康（江苏南京）作为行都，率文武百官和后宫从临安移驻建康。重病在身的赵旉也随同前往。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到建康后有一天，一位宫女不小心碰翻了一只金香炉，香炉落地的响声，惊得赵旉当即抽搐起来，不几日便命赴黄泉。这位宫女虽受到了严惩，但高宗从此绝后。高宗在悲痛之余，把赵旉的尸体埋葬在建康城中铁塔寺法堂西边的一间小屋之下。

太子既死，高宗又在金兵南侵时逃亡途中受了惊吓，患了不育症，一时之间，皇储无人。皇储乃是封建国家的根本，储君不

立，国家不稳，朝野不能安心。大臣范宗尹上书高宗奏请早立太子以安天下，高宗自己虽然眼下无子，也有早立太子以安国家社稷之意，他对范宗尹说了自己的想法："太祖皇帝以其神明英武平定天下，可是子孙却未享其成，以至零落，其情堪悯。我如果不能效法仁宗皇帝，怎慰太祖在天之灵！"高宗此言，指的是仁宗传位给侄子英宗赵曙之事。

原来，高宗时，太祖一支已默默无闻，隐而不彰了。眼下北宋已经灭亡，太宗的子孙徽、钦二帝和大批宗室被掳掠北去金朝，或在战乱中生死不明，高宗唯一的儿子又早夭。眼见宋朝皇统将无人继承，为了保住赵家的江山，高宗所以发出了这番高论。

高宗此说一出，门禁大开，一时朝野大臣纷纷上书请求立太祖之后为太子。大臣李回上书说："太祖不以大位传其子，而传位于弟。足见手足情深。陛下选择继位人，不妨效法太祖。"另一大臣张守也上书说："太祖诸子并不是没有德行，可是他却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传位给太宗，高风亮节，胜过尧舜百倍。"上虞县丞娄寅亮更直截了当地上书说："太祖之后一直寂寞无闻，同庶民无异，于情于理，均不相合，请陛下在'伯'字行内选太祖子孙中有贤德者，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如果将来陛下有了皇子，再命他退为藩王。这样，上可告慰太祖在天之灵，下可告慰天下之人！"高宗读完他的奏章，认为考虑周详，允其所请。

绍兴二年（1132），高宗派遣主管宫庭宗族事务的大臣知南外宗正事赵令懬在"伯"字行中访求太祖之后。此时，太祖之后"伯"字行已达一千六百多人。赵令懬先在这些人中选出七岁以下儿童十人，把他们带回临安，再让其他大臣共同挑选。最后选中两人，送给高宗定夺。这两人一胖一瘦：胖者名伯浩，瘦的名叫伯琮，高宗粗看了以后，决定留胖去瘦，赐伯琮三百两银子让他回原地。伯琮捧着银子正欲出门，高宗又把他叫了回来，说是

没有看仔细。高宗让二人叉手并立，自己站在一旁反复端详。这时，一只猫从二人身旁经过，伯琮站立不动，胖孩子飞起一脚向猫踢去。高宗见此很反感，皱着眉头说："此猫偶过此地，又没有招惹你，为何踢它？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高宗又决定留瘦去胖。这样，伯琮便以储君候选人的身份被养育在宫中了。

伯琮于建炎元年生于秀州（浙江嘉兴）。传说其母张氏有天夜里梦见有人牵着一只羊送给她，不久就怀了孕，所以伯琮小名叫羊。他被选中入宫之时，方才六岁，需人照顾。高宗领着他径人后宫，去见张婕妤、潘贤妃、吴才人。三个女人正在环坐聊天，见他们进来，潘贤妃因刚丧亲生儿子元懿太子，不禁触起了隐痛，掉头向隅，惨然不乐，张婕妤一见伯琮就喜欢上了，笑着向伯琮招手，伯琮也很善解人意，便扑进张婕妤的怀里。于是，高宗就命张婕妤养育伯琮，赐名为瑗。吴才人孤独无依，也想抚养一个孩子。高宗就又挑选了一个太祖之后，名伯玖，赐名为璩，交由吴才人抚养。

为了培养伯琮，高宗应大臣赵鼎的请求，将新建的书院作为资善堂，让他在那里读书学习。赵鼎并推荐徽猷阁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负责教授和培育伯琮。朝野舆论认为，范、朱二人的学识和人品都是极天下之选。伯琮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勤奋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天性仁慈厚道，不但受到高宗的钟爱，而且也颇得朝臣的称赞。时岳飞曾到资善堂去见伯琮，回来后喜不自禁地说："社稷后继有人了，将来中兴的大业就落在他身上了。"

绍兴十二年，伯琮晋封为普安郡王，伯玖同时也被封为恩平郡王。随着年龄的增长，伯琮不免对政局发表一些意见。结果导致了奸相秦桧的不满，多次在高宗面前说他的坏话。一心想使高宗改变立伯琮为继承人的初衷。绍兴二十四年，衢州发生了强盗

抢劫事件，秦桧没有奏报高宗，便径自派殿前司将官辛立率兵千人前往镇压。伯琮把此事告诉了高宗，高宗大惊。次日，高宗追问此事，秦桧竟然搪塞说："区区小寇，不足烦劳圣虑。荡平之后，再奏报不迟。"秦桧知道这事是伯琮告诉高宗的，心中十分恼火，更加仇恨伯琮。此时伯琮和伯玖皆已长大成人，两人都是太祖之后，才能又不相上下，到底立谁为嗣，高宗踌躇不决，秦桧见状，认为有机可乘，就极力诋毁伯琮，推荐伯玖。秦桧还向韦太后和吴皇后吹风说伯琮的才德不如伯玖，让她们对高宗施加影响。高宗为了检验二人的优劣，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各赐宫女十人。伯琮的老师史浩看出了高宗的用意，便对他说："这是皇帝想借此考验你，千万谨慎从事。"伯琮点头称是。过了几天，高宗果然将宫女召回。检验之下，赐给伯琮的十人仍为处女，赐给伯玖的十人都不是处女了，高宗虽没将结果告诉别人，但内心已知道孰优孰劣了。

流年似水，转眼间高宗年岁已高，龙种已经无望了。他几次想立伯琮为嗣，但韦太后一直不肯表态，高宗也不好违拗母命，故立储之事一直迁延未决。

绍兴二十九年，韦太后撒手西归，高宗又想起立储一事，便征求大臣张焘的意见。张焘说："储君是国家的根本，天下大事莫过于此，请陛下早早确定普安郡王和恩平郡王的名分，谁为君，谁为臣，应当尽早晓谕天下。"高宗回答说："朕思念此事已经很久了，只因太后没有应允，未能及早施行，卿之言很合朕意，明年春天一定举行立储典礼。"这时，利州（今四川广元）提点刑狱范如圭收集仁宗至和到嘉祐年间名臣的奏章三十六篇，密封后献给高宗。这些奏章是仁宗末大臣劝帝建储的，高宗看了更坚定了立伯琮心意。不久，高宗任命伯琮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为建王。

绍兴三十年二月，高宗宣布立伯琮为皇子。更名为玮，并诏

告天下。三月，确定称伯玖为皇侄。皇位继承人至此算是确立了。当时边陲不宁，金人屡次入侵，高宗下诏亲征，两淮又告失守，朝廷一些大臣畏敌如虎，争相提出退避之计。伯琮听了非常气愤，上书请求率师执戎，充当讨金前驱。高宗也想让他熟悉朝中将领，就同意伯琮随驾亲征，一起前往建康（江苏南京）前线。

高宗自建炎元年即位，颠沛流离，半生戎马，年事已高，身倦神疲，厌烦政事。同时由于议和不成，南宋军民抗金热情高涨，使他难堪，因而萌生禅位之意。伯琮被立为皇子后，高宗几次表示要传位给他，他都流着泪坚决推辞。后来，因金海陵王完颜亮入侵，军务繁忙，此事便不再提起。金兵北撤后，高宗自建康返回临安，又提起了禅位之事。大臣陈康伯认为，此事不宜过于匆忙，应该先下建储诏书，正式立为太子，确定名分，使天下都知道圣上的意思，然后再举行禅位大礼。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命学士承旨洪遵为伯琮择字。洪遵一连拟了四字。高宗都不满意，高宗自己琢磨了许久，御笔赐伯琮字元永。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高宗下了一道诏书，正式册立伯琮为太子。诏书说："朕薄德鲜能，历经艰难。只因国家多难，未能从容卸却重担，退保康宁。如今边境稍安，干戈稍息，真是天遂人愿。皇子老成持重，社稷有托，朕心稍安。现立皇子为皇太子。改名为昚，敕命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到了六月，再下诏书说："皇太子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系民心。……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迁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同时又下诏封皇太子生父为秀王，谥安僖；封皇太子母张氏为王夫人。

高宗召来太子，当面劝他即位。太子不肯接受，退到大殿一侧的旁门，想返回东宫。高宗勉谕再三，太子方才答应。于是，便在紫宸殿行了禅位之礼。随后，高宗起驾回德寿宫，伯琮冒雨

扶辇送行，一直送到德寿宫门，在高宗的再三劝阻之下，方才止步。高宗回头对随同送行的群臣说："把国家托付给这样的人，我可以没有遗憾了。"

文武百官聚集在紫宸殿门外，聆听礼官宣读高宗的禅位诏书，然后按着官阶高低鱼贯进入大殿内迎接新皇帝。不一会儿，太子身穿朝服，在内侍扶掖下来到御座前，却拱手侧立不坐，内侍扶掖了七八次，才稍稍就坐。宰相率领百官朝贺，皇太子又从御座上站起来。大臣陈康伯说："请陛下面南正坐，接受臣僚的祝贺，方才不负太上皇托付之意。"太子悲怆地说："父皇之命出于独断，我怎敢即天子大位，还是容我退避吧！"群臣当然不依，大家又是一番苦劝。太子推辞再三后，方才听从所请，正式继皇帝位，是为宋孝宗。

后人评价高宗，说他一生行事，只有选太子，最为称善。然而一则有宋太祖的先例，二来自己没有儿子，所以选立孝宗，也实在是出于无奈。

（耿曙生）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孝宗之立》

《宋史·高宗本纪、孝宗本纪》

《齐东野语·高宗立储》

《续资治通鉴》卷 130—卷 140

隆兴和议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兵分四路大举进攻南宋，南宋将领虞允文率军击败了金军主力，取得了“采石大捷”。此时，完颜雍发动政变，取代完颜亮当了金朝的皇帝。完颜亮被前线金军将士杀死，金军撤回北方。

完颜亮南侵的惨败，使得南宋军民的抗战热情和朝野上下反对和议的舆论又重新高涨起来。宋金战场上形势的变化，使南宋朝廷面临着战与和的抉择。宋高宗既不敢抗金，又无法再继续推行他的投降政策，进退两难，只好以“体倦神疲”为借口，把皇位禅让给孝宗，自己“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去了。

宋孝宗在做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即位后更锐意恢复故国失地。多年来的宫廷生活，使他耳闻目睹了多次和战之争和高宗的忍辱求和。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发动抗金战争，必须首先扶正朝野的舆论，重用抗金之士，斥退秦桧余党。

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孝宗即位伊始，就召见抗金名将张浚，并对他说：“久闻张公大名，现在朝廷所要依赖的就是您了。”张浚，汉州绵竹（四川）人，他身经两朝，亲眼看到了“靖康之难”，生灵涂炭，一生不主和议，力求抗金，立下了赫赫战功。后因说秦桧昏庸无能，遭秦桧报复，二十年不受重用。朝野上下闻知张浚被贬，无不扼腕叹息。金人害怕张浚，唯恐他被重新起用，每次使者南来，必询问张浚所在。金将粘罕临终前曾遗言：“自从我进入中原以来，未曾有人敢于犯我兵锋，唯独张枢密能

和我抗衡。”张浚被召见后，力陈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对此，孝宗非常赞成，即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

为了伸张抗金正气，孝宗又下诏给岳飞父子平反，追复他们的官爵，依礼重新安葬，并且录用岳飞的子孙。孝宗此举顺乎民心，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和议既久，积重难返。孝宗倡议抗战，难免遭到阻挠和反对。此时主和最卖力的是右相史浩。此人是高宗旧臣，与高宗臭味相投，一昧主和。但他又是孝宗的老师，在孝宗立为皇子的过程中出过大力，自然受到新皇帝的信赖和倚重，史浩充分利用这一地位，对孝宗施加影响。

金主完颜亮南侵时，宋将吴璘从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陇三路。史浩拜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孝宗下令，让吴璘放弃新收复的陕西州郡，退守四川。他对孝宗说：“若离蜀太远，恐致金军潜袭，保蜀不成反而亡蜀。”远在川陕的虞允文反对撤军。他上书孝宗，剖陈利害说：“恢复旧疆，陕西应列在首位，一旦抛弃陕西，会使金军得陇望蜀，四川难保。”虞允文连续上书十五次，反复劝谏。孝宗因存了史浩的先人之见，没有采纳这一正确的意见，终于发出了令吴璘班师的诏书。

虞允文见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就昼夜兼程赶回临安（浙江杭州），面见孝宗陈述弃地的利害。讲到激动处，就用朝笏在地上比划起来。孝宗蓦然醒悟，惊叫：“史浩误我！”急忙派出使者通知吴璘，授权他根据形势决定进止。但为时已晚。

陕西前线的吴璘接到班师的命令，感到愕然和反常，手下的将官也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能轻易还师。吴璘料知朝内有人主和，再加上孝宗刚刚即位，自己握有重兵，不能抗命不遵，考虑再三，还是下达了撤军命令。宋军撤军之时，金军乘机邀击，吴璘惨败，伤亡部将数十员、士卒三万多人。宋军将士合营痛哭，声震原野，宋朝收复的秦陇三路之地，尽数被金侵占。

孝宗同金人较量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遭到了失败。

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传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两路军马，又起用因反对议和而被高宗、秦桧贬逐的辛次膺为同知枢密院事。同时，孝宗又命史浩为右相兼枢密使。这个战和两派组成的班子，表明了孝宗在抗金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以及对投降派的妥协和软弱。但这时的孝宗主流仍是主张抗金的。四月，孝宗召见张浚，询问恢复大计，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江苏南京），鼓舞士气，进行北伐。但史浩百般阻挠和反对，他说："目前形势下，先作防御，是最好的打算，而且与金是战是和，其主动权在金而不在我，倘若听信了浅谋之士鄙见，不但不能恢复，反而会含冤万世。"张浚对史浩的谬论针锋相对，他对孝宗说："史浩已经不可救药，不能再听他摆布，坐失良机。"面对两位重臣的争论，孝宗左右为难。他同意张浚的意见，但又无力说服史浩，更不愿罢免这位恩师。无奈，孝宗授权张浚出师渡江，绕过政府和枢密院，单独布置北伐。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又怎能瞒得了史浩，他得知消息后，不由大怒道："我是宰相，连出兵这样大事都不和我商量，还当什么宰相！"他上书攻击张浚擅权误国，并请求辞去相位。至此，孝宗感到已无法在两派之间调和，态度也强硬了起来。他同意了史浩的辞职，坚决支持张浚北伐。

但是，此时形势已起了变化，战机早已被高宗、史浩的一再拖延而失掉。本来从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金世宗完颜雍政变即位，到第二年的九月近一年的时间内，金军主力一直在北方镇压内部叛乱，金朝内部混乱不稳，正是宋军北伐的最好时机。但这时在位的高宗无意抗战，禅位前夕甚至撤销了为抗金而设立的军事机构"招讨司"和"宣抚司"，遗留给孝宗的是一个罢战求和的既成政局。孝宗虽主张抗金，但即位初期，信任史浩，惑于史浩的求和言论，因而举棋不定。孝宗也曾幻想不通过抗战就能与金取

得平等的地位，竟听从史浩的建议，派使臣前往金朝通报即位之事，希望双方关系有所改善。金朝当然不会同意，仍然继续坚持旧的不平等条件。宋使被迫退回，打破了孝宗的幻想。就这样，一直拖到了隆兴元年四月，这时金朝内部已经稳定，主力纥石烈志宁所部调驻睢阳（今河南商丘）。金以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前往南京（今河南开封），指挥南侵的金军，金军已抢在南宋之前做好了军事准备。

五月张浚命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李显忠军、泗州（今江苏盱眙）邵宏渊军分道出击，开始了北伐战争。

李显忠按计划收复了灵璧县，邵宏渊围攻虹县，不能下。李显忠派灵璧降卒招降虹县金守将，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献城出降。邵宏渊嫉妒李显忠抢了他的功劳，心中不快。当时有一位投降的金军千户长诉说邵宏渊手下夺去了他的佩刀，李显忠闻之大怒，斩杀了夺刀的士卒。邵宏渊更加不快。从此，两将不和。

李、邵两军会师后，共同进攻宿州（安徽宿县），宋军渡濠登城，攻进城中，奋勇巷战，杀敌数千人，擒敌八千人，一举收复了宿州城。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孝宗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心胸狭窄，因攻虹县无功，位在李显忠之下，心中极为不满。此后，金兵纥石烈志宁部自睢阳反扑宿州，被李显忠击败。金军继续增兵，显忠请求宏渊合力夹攻。面对强敌，前线将士本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敌，但邵宏渊却按兵不动。他对部将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都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披甲苦战呢？"士卒听了这样的话，再也没有斗志了。有些军官见主帅不和，竟领兵临阵脱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尽力抵抗，邵宏渊却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只好乘着夜色撤离宿州。金军尾随追击，追到符离，宋军大败。张浚仓促组织起的这次北伐，因符离之败而告终。

符离战败，张浚主动上书请罪，投降派官员也乘机大肆诋毁

他，孝宗开始动摇了。七月，孝宗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让其主持同金朝议和。汤思退延揽同党，排斥主战将领。张浚屡屡遭到弹劾，终被贬官，其他主战大臣也纷纷去官。宋孝宗求和的大局已定。

金朝在取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扬言宋朝若要议和必须割让海、泗、唐、邓等州地。八月，孝宗派卢仲贤到金军议和，临行前孝宗告诫他不可答应割四州之地。汤思退竟敢违抗君命，暗地里让他答应金军的要求。卢仲贤使金归来，果然答应了割四州之地。汤思退想立即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朝，具体商谈割地之事。这时，抗战派官员坚决反对割地议和，右正言陈良翰上书说："前使已经辱命，宰相不悔其过，仍再派使割地。这样，金国不损一兵就能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许。"张浚、虞允文、胡铨等人也上书力争，认为不可与金议和。在众口一词的反对声中，孝宗有所悔悟，他派使臣告诉金人，四州不可割，如果金国坚持割四州之地，就不再议和。金国不但不答应南宋的要求，还以失信的罪名拘留了南宋的使者。孝宗闻讯，气愤地对张浚说："和议不成，实是天意，从此可以专务恢复了。"

隆兴二年三月，孝宗重新任命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张浚大为感奋，即刻赶往江淮视师，加强战备。金人原在江淮驻扎重兵，想对宋朝进行威胁、恫吓。听说张浚再次出山，连忙西撤。可见，金朝此时并无能力大举南侵，南宋完全有力量抗御金军。

汤思退利用张浚出京视师的机会，怂恿孝宗继续谋求和议，并指使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币，抗拒皇命。大臣钱端礼也随声附和，大肆攻击两淮的守备。在汤思退等人的鼓动之下，孝宗再次动摇，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令他出判福州。在汤思退等人的建议下，孝宗还命令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受诏，也被召回解职。汤思退又下令解散张浚在两淮筹建的万弩营，停修海船，拆除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泗

两州守军，做出割地求和的姿态。

张浚被排挤出朝，忧郁病死在赴福州途中。张浚死后，汤思退更加肆无忌惮，立即派魏杞去金朝议和。兵部侍郎胡铨上书反对，力陈和议之非。太学生王质也上书批评孝宗，说他优柔寡断，战和不定，误国误民。汤思退等人唯恐抗战派官员继续反对，使孝宗再次动摇和议的想法，竟派人请求金兵渡淮，对南宋施加压力，促使南宋议和。汤思退等人和秦桧一样，已经成为可耻的卖国贼。

金军得到汤思退送来的情况，立即乘机渡过淮水。宋军对这次袭击毫无准备，加上许多部队被汤思退调离，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抗击。金军迅速占领了濠州、滁州，长驱直入，再次饮马长江，直接威胁着江南的安全。消息传到南宋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和痛斥汤思退等人祸国殃民，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痛斥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勾结敌人，请求孝宗把三人斩首。孝宗大怒，将三人革职。汤思退罢官归退途中，遭到沿途军民的唾骂，心惊胆战，惊吓而死。

孝宗罢免汤思退之后，任命陈康伯为左相兼枢密使，虞允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这时宋军在抗金前线也小有胜利。但是，被汤思退等破坏后的宋军毕竟不是十万金军的对手，加之孝宗背后还有一个主和的太上皇，不得已，只好派使臣赴金，屈辱求和。隆兴二年十二月，宋金重新订立和议，南宋不再对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南宋每年向金交纳的“岁贡”改称“岁币”，并减十万之数；双方重新确认“绍兴和议”划定的疆界，南宋把完颜亮南侵失败后由宋军占领的州郡通通割还金朝，这就是所谓的“隆兴和议”。此和议南宋的地位虽略有改善，但仍是屈辱的和约。

“隆兴和议”的订立，使得南宋许多有识之士对孝宗的希望破灭了。有个叫章甫的诗人写了一首《即事》诗，悲愤地咏道：“天意诚难测，人言果有不（指当时传言宋孝宗将割地求和）？便

令江汉竭，未厌虎狼求。独下伤时泪，谁陈活国谋。……余生偷岁月，无处避风尘。……儒夫忧国泪，欲忍已沾巾。"

隆兴和议后，南宋许多爱国之士继续提出收复失地的建议，孝宗也并不甘心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希冀改变宋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但此时崇尚空谈的儒臣居多，抗战将领日见稀少。乾道三年（1167），在当时算是凤毛麟角的名将吴璘也病死了。吴璘与其兄吴玠一生坚持抗金，经略四川多年，临终前上书孝宗说："希望陛下不要抛弃四川。"书中绝口不提家事。一生忠诚，受到人们的称赞。吴璘死后，有名的抗金将领只剩下老将虞允文一人了。虞允文虽是文臣出身，颇善用兵，不但指挥采石之战取得胜利，又先后在川陕、荆襄独当一面，也曾任职枢密院，威望很高。当时，孝宗正有志于复仇，虞允文就成了他可以依靠的少有人才。乾道五年四月，孝宗把虞允文从川陕调回临安，出任枢密使。八月，孝宗又任命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在此前后，孝宗积极备战，修筑沿边城池，打造军器，训练士卒，选择将帅。他自己也练武艺，以致有一次眼睛为弓上的断弦击伤，成月不能上朝。

乾道六年夏，孝宗在虞允文的支持下，派范成大出使金朝，要求归还河南的祖宗陵寝，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原来，在绍兴年间，金使携国书来宋时，宋帝须降座接受，屈尽陪臣之礼。孝宗即位之初，每当金使前来，只有宰相陪同使者携书进殿，孝宗不再降座。到汤思退为相时，他一味奉迎讨好金朝，又恢复了高宗时的旧例。孝宗对此极为懊恼，所以在军事上有所准备之后，即派范成大出使金国，要求金主改变受书之礼，同时要求金归还河南之地。

宋朝的要求虽然遭到了金廷的拒绝，但孝宗也丢掉了靠和谈来取得地位的幻想。他决心诉诸武力，收复中原，建立赫赫功业。他曾对虞允文说："我们君臣当同心协力，共雪和议之耻！"

虞允文也慷慨陈词，决心以恢复为己任。乾道八年，孝宗又任命虞允文为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派他到四川整军备战。临行前，孝宗又告以进军方略，约定将来会师河南。虞允文担心会节外生枝，将来双方不能相呼应，孝宗回答说："若你率先出兵而朕延误，即朕负于你，若朕出师而你贻误，则你负于朕。"君臣相约，同心协力，东西并举，同时北伐。孝宗举行盛大仪式，亲自把盏为虞允文饯行，希望能会师中原。

虞允文离开临安后，孝宗更加积极备战，多次检阅军队。孝宗决定以更改不平等的受书仪式为借口，寻机对金用兵。年底，金朝贺宋正旦使完颜璋来宋贺元旦，孝宗以受书仪式不合，下令改期。太上皇高宗听说，出面干涉，父在子不得自专，孝宗只好维持原议，暗中却派人潜入金使寓所，窃取国书。为了堵住完颜璋的嘴，孝宗又派人用重金贿赂他。不料事情被金主侦知，辱没使命的完颜璋被处分。宋金关系又紧张起来。孝宗火速派人持亲笔密信前往四川，特别谕令要面交虞允文，督促他快速出兵。但是，虞允文已经壮志未酬身先死，抱恨九泉了。

宋金形势虽然紧张，但金世宗却无意对宋用兵。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有名的明君。他在位期间，内修政治，外不轻易言战。淳熙元年（1174）三月，金世宗另派梁肃为宋国详问使，携带国书前往临安，追问究竟。他在国书中指责孝宗说："隆兴年间的和议免除了称臣、称名、两拜之礼，又减少了岁币，已经对宋很宽容了。当时曾议定接受国书仍用旧仪，由你亲接国书，此例已沿用了十年。今年我国信使到你处，不按例引见，反而令人夺走国书，这是侄国应当做的吗？"孝宗虽然心中不服，但此时虞允文已去世，再加上太上皇高宗的干预，只得同意恢复旧议，起立亲自受书。

孝宗和虞允文策划的北伐，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实施就宣告流产，中原的大宋遗民又一次失望，诗人范成大以开封的州桥为

题，写了一首《州桥》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表达了中原人民不甘做亡国奴，希望南宋真正能够取得北伐成功的心情。

淳熙年间，宋金之间重新维持相对和平的局面。孝宗虽然愤愤不已，不忘备战，但已无力回天，完全处于守势。

宋金之间的"隆兴和议"一直维持了四十年之久，直到宋宁宗时的"开禧（1205—1207）北伐"，形势才发生变化。

（耿曙生）

参考资料：

《宋史》：《孝宗本纪》、《史浩传》、《汤思退传》、《虞允文传》。

《宋史纪事本末·隆兴和议》

陈亮议恢复

宋孝宗即位之初，颇想振兴南宋，收复中原，一改高宗赵构在位期间宋朝衰弱被动的局面。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置都督府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统筹北伐事宜。隆兴元年（1163）五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为前锋北进，攻克宿州（今安徽宿县），宋人为之振奋不已。然而，捷报声中，李、邵二将彼此忌功不和，尤其邵宏渊有意阻挠军机，在金兵十余万步骑反攻宿州时，按兵不动，见危不救，且鼓动失败情绪，以致李显忠孤掌难鸣，被金兵击败，宿州得而复失。宋军退至符离（今安徽符离集），被金兵追及，士卒死伤遍地，军资尽失。

符离之败，动摇了孝宗的抗金决心，一批主和的大臣趁机进言，鼓动孝宗与金人议和，并促使孝宗夺了张浚的兵权，将其降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

金人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在和谈桌上当然占据主动位置，他们以武力相要挟，向宋人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宋人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岁币，向金称臣，并归还中原地区归附南宋的人士。是否议和，在宋廷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张浚、胡铨等人为首的主战派，认为"金人强则来犯，弱则收兵，进退不取决于和与不和。"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则极力主张议和是万全之策，可使军民得到休息的机会。

由于朝中执政大臣多主和，孝宗也倾向于和谈，使和议最终被确定下来。尽管如此，张浚与湖北京西宣谕使虞允文、起居郎

胡铨、监察御史阎安中等，仍纷纷上疏力争。其后婺州府试第一名陈亮也上《中兴五论》，力辩不可议和，但疏入内廷，没有回音。

陈亮字同甫，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很有才气，年纪轻轻就好论兵，曾著《酌古论》，辑录古人用兵成败之事，加以评论。郡守周葵得此书，对书中所言很感兴趣，便召陈亮交谈，就一些军事问题进行争论。他发现，陈亮的才学非同寻常，即延之为上宾，说："这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后来，周葵升任执政大臣，仍很抬举陈亮，让前来奏事的官员向尚无官品的陈亮作揖。陈亮由此也结交了当时一批俊杰，时常能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探讨治弊救时的方略。

陈亮在《中兴五论》不为皇帝所重的情况下，愤然离京，归故里著书立说，十年未还朝。这期间，孝宗与一些佞臣庆幸宋金已约和，可以偏安东南一隅了，他们根本顾不上收复失地、振兴国家，以致许多胸怀大志、甘为北伐捐躯的仁人志士抱恨不已，像辛弃疾登临建康赏心亭那样，忧思忡忡却无可奈何，"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一些有识之士先后上言论恢复中原，设想虽好，却难变为现实。朝臣张栻指出："欲复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采取措施取得境内民众之心。"孝宗称"诚当如此"，但没有实际行动。已退休的黄中进言："宋人暂与金人和，而抓紧时间备战，内修国政，外观时变，等待机会北进。"孝宗称善，但也不采取适当措施振兴国家。执政陈俊卿建议："扬州、和州各屯军三万，同时征招民兵，农闲时加以训练，一旦作战，正规军与民兵互为犄角，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沿江各郡都可采用此法。"孝宗也点头说可行。但不久，陈俊卿即遭贬谪。辛弃疾也曾入殿与孝宗谈南北形势，大凡顺逆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皆已言及，而孝宗以和议既定，不

肯实行。

孝宗口头上也时时挂着要收复中原，但心里害怕宋金交战，惟恐战败危及他的统治。然而，与金人约和，答应金人的苛刻条件，颇使宋孝宗感到屈辱。为此，他曾几次遣使入金，乞求金主答应宋人的若干无关大局的要求，但每次都遭到拒绝。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1170），范成大奉命使金，向金人提出两条要求：一为把河南巩县之地划归宋人，因为那里有北宋诸皇帝之陵；一为修改宋朝君主须起身下榻，站立接受金国使者的国书的仪式，以给宋主留点面子。金人严辞拒绝了宋人请求。次年，赵雄又奉命使金，提出同样要求，仍无结果。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1174），宋孝宗再派工部尚书张子颜等出使金朝，仍要求把宋帝亲接金使国书的仪式改为由他人转交。金朝廷中有人主张同意宋人所请，以免激化双方矛盾，其左丞相良弼指出："宋国由最初向金国称臣改为称侄，奏表也改为国书，金朝已经让了步，而宋人现在又提出修改宋主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绝对不能允许。"金主同意良弼所说，复信斥责了宋主一通。初后，宋朝还派汤邦彦为申议使入金，欲提归还河南之地的要求，但金主以武士拔刀控弦夹道"迎"汤邦彦，竟使之不敢争一言即匆匆南归。

金人对宋君如此蔑视，是建立在此前金兵屡胜宋军的基础之上的，宋主既然不敢以武力相争，就只好忍气吞声了。而对于当时宋朝臣民来说，宋君之辱就是国家之辱，也是他们个人耻辱，因而总会有人站出来出谋划策，为兴国灭金大声疾呼。沉默达十年之久的陈亮，虽然"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淳熙五年（1178），他终于抑制不住对国家前途的焦虑，署名"陈同"，再度上疏，慷慨陈辞。奏议中说："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与金人不共戴天，所以能在仓皇奔亡的形势下，挡住了金兵的进攻。自从秦桧当政、力倡和议之后，忠臣义士遭贬斥，天下人无不为之寒心，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十余年。陛下即位后，曾欲复

兴宋朝，但步履维艰，终难成就大业，至今又十七年了。一味通和，使人人苟安，对中原越来越淡漠。”

接着，陈亮回顾了唐后期以来，中原朝廷的诸多弊端，以及偏安东南一隅，终不会有好结局的历史教训，告诫孝宗不可不致力于北伐；而要北进收复中原，必先经营荆襄之地。因为这里“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进可取，退可守，为北进的前沿。江淮之间，则常备不懈，严防金人侵扰。这样准备数年，灭金之势必成。

陈亮对那些无所作为的当朝大臣也作了抨击。指出，现在的“儒士”，一心钻研心性之学，早把国家疆域沦丧的耻辱丢在脑后；现在的“才臣”自以为胸怀富国强兵之术，一味高谈阔论，却无真实本领。他疾呼：“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

陈亮的奏议，使孝宗深为震动。多年来，大臣议论恢复中原，还没有言辞如此激奋的。孝宗打算任用陈亮，但一些执政大臣嫉恨陈亮直言，纷纷加以阻挠。陈亮不在乎某些大臣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继续接二连三地上书。指出，皇帝即使有恢复中原之心，但“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仅用府库中的钱财，不足以满足北伐需求；仅按户籍征兵，不足以召来天下的勇者，由此导致国家一拖再拖，失去了大有作为的时机，臣为此不胜忠愤！”孝宗深为陈亮的忠诚所感，欲委以官职，而陈亮笑道：“我只是想为国家开创几百年的基业，而不是为博取一官半职。”他知道孝宗与那些执政大臣不会真正接受自己的主张，遂离京回乡，时常借酒消愁了。

在家期间，他几次遭那些主和者陷害，由于孝宗赏识他的才华，也由于辛弃疾等人为之奔走救援，才得以免死。此事反映了主和派对主战派的嫉恨。而陈亮锐意进取的斗志没有因此而削

弱，相反，他仍时常上书言事。高宗赵构死，金人派使者来吊丧，使者态度傲慢，举止狂妄，朝中大臣无可奈何。陈亮却憋不住一腔怒火，他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察看形势后，再次上疏，痛陈高宗驾崩，国之大哀，“而金人仅派一个使者，如临小国吊丧，哀祭之辞也寂寥简慢，义士仁人无不为之痛切心骨。陛下忍辱二十年了。难道还要忍下去吗？”他建议孝宗委任皇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年年巡视金陵，备战抗金，孝宗自己则坐镇朝中，精选人才，统筹抗敌事宜。陈亮言辞恳切，而此时孝宗正想禅位给太子，根本顾不上考虑北举之谋。陈亮虽忧国忧民，却无可奈何，而朝中许多大臣趁机交相上言，指责陈亮狂妄乱语。

终南宋之世，像陈亮这样忧虑国事、屡倡北伐者不乏其人，但终难有所作为。因为朝中积弊太多，几度兴兵，无所建树，给主和者推行投降政策以口实。加之宋主的偏安心理作祟，对他们来说，与其冒险兴兵招来金兵南下的威胁，不如无所作为，安然无事。于是，任你放声呐喊，出谋献策，从皇帝到权臣，终不会理会。

（陈益民）

参考资料：

《宋史·陈亮传》

《续资治通鉴》卷138—卷146

两朝内禅

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八十一岁的太上皇宋高宗忽然得病。九月就去世了。此时孝宗也已六十多岁。在位多年，已经对朝政感到厌烦，有意借服丧之机退位，大臣们苦苦挽留，才暂时没有禅位，但退居幕后之意却是不可动摇了。一天退朝，孝宗留下丞相府和枢密院二府的长官，谈及自己已经倦于政事，流露出禅位的想法。在座的大臣们多数赞扬孝宗的禅让之举，只有同知枢密院事黄洽一言不发。孝宗征求他的意见，黄洽回答说："皇太子圣德确能当此大任，只有太子妃李氏不能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孝宗被他说中心思，也暗暗担忧起来。他早就对太子妃不满，经常加以教诲，不见起色，反而与儿媳结下了怨仇。

淳熙十六年正月，金世宗完颜雍病死，他二十一岁的孙子完颜璟继承了皇位，按照"隆兴和议"的规定，金宋是叔侄之国，南宋皇帝对金朝皇帝自称侄皇帝。宋孝宗已经年过花甲，他不愿以老翁的身份向比自己小四十多岁的金章宗称侄。此时守丧也已期满，孝宗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于这年的二月在紫宸殿举行了禅位之礼，由太子赵惇承继皇位，是为宋光宗。孝宗退居重华宫当了太上皇，尊称寿皇。

光宗是孝宗的第三个儿子，与庄文太子赵愭、魏王赵恺都是郭皇后所生。孝宗即位时，赵惇被封为恭王，他的大哥赵愭被封为邓王，二哥赵恺被封为庆王。乾道元年（1165），邓王赵愭被立为皇太子。赵惇虽然也有将来登上皇位的强烈愿望，但见大哥

已被确定为帝位继承人，何况他之前还有二哥，一时心灰意懒。不料，乾道三年，太子得了伤暑病，太医又开错了药方，使病情加剧，三天后一命呜呼。赵惇见大哥已死，太子未定，悲痛之余又欣喜万分，心中暗下决心谋取太子之位。于是，他雄心勃勃，习文练武，处处表现自己。每次在王府与侍讲官员评论前代帝王为政得失，常常发表出人意料的高见，连讲官也自以为不及。赵惇的这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孝宗那里，孝宗非常赏识。按说，二子庆王赵恺理应继为太子，孝宗却认为他过于懦弱，难当大任。而恭王英武过人，很像自己，就想把他立为太子。因为要打乱皇位继承的顺序，孝宗不愿草率行事，便暂且放下，等时机成熟再说。

三年后，主管天文的太史上奏说："根据天象的变化，应立太子。"宰相虞允文也乘机请求孝宗早定储君，以稳国安民。孝宗回答说："朕也久有此意，太子的人选也早已确定。只是恐怕他当了太子以后，容易骄傲，放纵自己，不再勤勉学习，反而渐渐变坏。朕才迟迟不立太子，想让他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熟悉政务，博古通今，不致将来后悔。"第二年，虞允文再次上书请求孝宗立储。孝宗见条件已经成熟，便册立二十六岁的恭王赵惇为皇太子，同时改封赵恺为魏王，出镇外藩。册立太子的前一天晚上，孝宗把欲立恭王为太子的事告诉高宗。高宗怕赵恺不服闹事，立即派人把他召来，并让他留宿宫中。次日，赵恺返回自己王府后，见册封太子的诏书已经颁下，魏王赵恺立即回宫面见高宗，埋怨他说："翁翁把我留在宫中，却让三哥越过次序做太子！"高宗听了，抚摸着魏王的背安慰他说："吾儿认为皇帝好做，其实，做时可少不了烦恼。"木已成舟，魏王无法再争，恭王赵惇终于得到了皇太子之位。

不久，孝宗又命太子兼任临安（浙江杭州）府尹。起初的这段时间内，太子赵惇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关心民政，熟悉民

情，勤勤恳恳料理公务，多次受到孝宗的称赞和鼓励。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赵惇做太子的时间长了，就感到无聊，劝孝宗禅位吧，又难于启齿。对此，他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情绪极为反常。皇太后看到太子的变化，就向太子近侍询问因由，近侍直言不讳地说："太子大概是希望皇太后替他督促一下皇上吧。"过了几天，孝宗到太后宫中闲谈，太后对孝宗说："官家（宋朝宫内称皇帝为官家）年岁已高，也好早些享乐，把国事让给孩子去干吧！"孝宗说："我很早就想退休了。只是孩儿还小，不谙世故，所以不能放手。"太后不便勉强，就对太子说："我曾劝过你父亲，他说还早着呢。"太子听了，立刻解下头巾，迫不急待地说："看，我头发都白了。怎么还以为我是孩子呢？"此时，太子赵惇已经四十多岁了，胡子也有些发白。有一次，太子入宫侍奉孝宗，闲谈中暗示孝宗说："有人送臣一些染胡子药，我未敢使用。"孝宗嘴上说："胡子白怕什么，正好让天下人看到你的老成，何必染它。"但他心里明白，儿子在催他让位了。他想，等自己的太上皇一死，他就决定内禅，自己也当太上皇。

光宗即位后，太子妃李氏被册为皇后。李氏正位中宫，千方百计离间孝宗父子，报复孝宗，父子之间越来越疏远。光宗甚至一年不朝重华宫，孝宗为此怏怏不乐、郁郁寡欢。有一天，孝宗登上朝露台，听见有几个儿童在打闹，吵着喊叫赵官家。孝宗听了，心中十分难受，自言自语地说道："朕喊他尚且不应不至，你们白白地叫唤又有什么用呢？"孝宗为儿子的不孝而痛心，郁闷成疾，身体每况愈下。父子情深，病中的孝宗很想见儿子一面，可直到病危，光宗也不出面探望。绍熙五年（1194），太上皇孝宗在失望、孤独中病死，终年六十八岁。一生讲究孝道的孝宗死于不孝儿子之手，这样的结局，大概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群臣向光宗报告了太上皇孝宗的死讯，光宗无动于衷，仍不肯出宫。几天以后，孝宗大殓，光宗仍不肯出面主持丧礼。光宗

的行为，激起了朝中众多大臣的不满，群情汹汹，丞相留正等人只好上书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没有答应，只同意代光宗主持孝宗的丧礼。朝野上下，见此情景，人心惶惶，乱作一团，认为国家政事将会有大的变故。大臣叶适感到，如果不及早设法，局势将会更加动荡，甚至导致社稷危亡。就对留正说："皇上托疾不肯主持丧礼，怎能使天下人信服？现在嘉王（赵扩，光宗次子）已经成人，如能参预大政，就会解除天下的疑虑，安定人心稳定社稷。"于是丞相留正率群臣上奏说："皇子嘉王，天性仁孝，应该早日立为储君，安定人心，维系国本。"光宗看了，在奏章上批了"甚好"两字，未作具体安排。留正等再次奏请，当时传出御札，上写"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八个字。留正悉心揣摩，不得要领，便与宗室赵汝愚商量。赵汝愚建议，干脆请太皇太后下令让光宗禅位嘉王。留正认为光宗连立储的诏书都不肯下，现在的批语含糊其辞，担心将来出了纰漏，自己吃罪不起，便假托有病，溜出城去躲起来。大臣徐谊请赵汝愚早定大计，赵汝愚面有难色地说："现在丞相已去，我孤掌难鸣，能有什么法子呢？"徐谊建议说："今日之事，只有请太后出面，方能解决。韩侂胄是吴太后妹妹之子，请他出面禀明太后，下令内禅，事情定会成功。"他们去找韩侂胄说了，韩侂胄慨然答应，马上进宫求见吴太后，陈述利害。吴太后也意识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不得不亲自干预，决定次日在孝宗柩前接见执政大臣。消息传出，赵汝愚一面转告各位大臣，一面令人赶制皇袍。准备大典礼仪之物，以备明日嘉王登基。

第二天，是禫祭日，百官齐集，举行仪式，结束丧服。嘉王赵扩一身缟素，前来行祭，赵汝愚率百官来到寿皇灵柩前，见吴太后垂帘而坐，就上奏说："寿皇去世，皇帝又有病，不能主持丧礼，臣等多次奏请皇上立嘉王为皇太子，以安定人心。皇上先是批示'甚好'，继而又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八字，臣等

不敢擅作主张，请太皇太后定夺。”吴太后说：“既然有皇帝的御札，你们就按皇帝所说的去办吧！”赵汝愚说：“此事重大，必须有文字凭据才行。臣等已草拟了一篇懿旨，请太皇太后过目。”吴太后接过草拟的懿旨，见上面写道：“皇帝因为有病，不能亲执丧礼，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吴太后看完，立即点头应允说：“就照此办理吧！”群臣示意内侍扶嘉王进入帘内，吴太后勉励了他一番。嘉王一再推辞说：“恐负不孝之名。”吴太后又召韩侂胄入内，让他替太子披上皇袍。赵汝愚率群臣又一再劝进，太子这才接受百官的朝贺，当了新皇帝，连他自己也感到很突然。史称他为宋宁宗。

宋宁宗赵扩生于乾道四年（1168）十月。父光宗立为太子后，他也于淳熙五年（1178）被封为英国公。淳熙七年，开始从师学习。他虽是王子，并不娇惯骄横，从小就懂得尊重师傅，很守规矩，因而深得两宫（太上皇高宗和孝宗）的喜爱和大臣们的称赞。不过赵扩资质平庸，讷于言辞。淳熙十一年，赵扩已经十六岁了，按照旧例应该出宫另居，可是两宫对他十分爱怜，不想让他远离膝前，就在东宫旁边为他建了一处宅第。淳熙十二年，他被进封为平阳郡王。同年，他举行了婚礼娶夫人韩氏。韩氏是北宋名将韩琦的后人，贤淑通达，很受赵扩钟爱。淳熙十六年三月，光宗继位，他又进封为嘉王。随后，皇后李氏和宰相留正都曾分别请立嘉王为太子，但由于孝宗的反对而没有成功。

禅位大典举行完毕，新皇帝宁宗已正式登基，光宗还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新皇帝参拜他，方才知道。光宗本来无意禅位，只因孝宗病重时不曾前往探望，国人议论纷纷，只好将错就错，身为孝宗之子，连丧礼也不肯出来主持。他本想待事过之后，再在国人面前露面，哪里知道众人在他背后做了手脚。这时知道消息为时已晚，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只好对着

随侍新皇帝的韩侂胄大发脾气："你们这些做臣子的，事先竟不报告我，就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但既然是我儿子受禅继位，我也不用再说别的了。"话虽如此，光宗的内心却充塞着一种被玩弄、遗弃的感觉，久久咽不下这口气。

光宗迫不得已当上了太上皇，退居泰安宫。闲得无聊，时时回忆往昔的岁月，检讨自己的得失。有时心血来潮，难以自持，一会儿瞪目怒骂，一会儿又痛哭流涕。每逢此时，李后就为他把盏，借酒浇愁。为了避免引起他的烦恼，李后吩咐宫中所有人员要言语谨慎，不能涉及外面之事。有一年，宁宗完成郊祀之礼，车驾转回宫中，宫廷仪仗队的奏乐声传进了泰安宫。光宗闻乐伤感，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君临天下的盛况，明明知道是皇帝的乐队在奏乐，仍忍不住询问李后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李后轻描淡写地说："市里百姓在街上寻乐。"光宗一听，知是李后有意隐瞒，不由大怒，抬手就打，自己也失足跌倒。从此一病不起，加上心情不好，病情越来越严重，庆元六年（1200）八月，做了六年太上皇的光宗忧病而死，年仅五十四岁。

光宗统治南宋仅五年，此段时间内，边境无警，也未发生农民起义。他本可以有一番作为，但他受制于皇后李后，与孝宗不睦，又长期痼疾缠身，不能及时处理政务，朝政渐渐被李后勾结宦官所把持，越来越腐败，以此贻讥后人。最后，糊里糊涂地下了台。

宋宁宗即位后，统治南宋三十年。由于他昏庸无能，是非不分、忠奸莫辨，因而先有韩侂胄，后有史弥远专权，一生受制于权臣，无所作为。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病死于福宁殿，终年五十七岁。

南宋的两次内禅，反映了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现实。

（耿曙生）

参考资料：

《宋史》：《高宗本纪》、《孝宗本纪》、《光宗本纪》、《宁宗本纪》。

《宋史纪事本末·两朝内禅》

《齐东野语·孝宗圣政、绍熙内禅》

两宫失和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正式禅位于宋孝宗。孝宗虽非高宗所生，但叔侄之间情笃意重。孝宗心里明白，若不是高宗亲自下诏，到各地访求宗室，将他接到宫中，抚养成人，立为皇储，自己是不会登上皇帝宝座的。因此，孝宗即位后，不仅在政治上力图革新，铨选人才，制定法令，立志抗金，锐意收复失地，而且在宫廷生活中也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对高宗和吴太后十分恭敬孝顺。高宗则视孝宗如亲子，爱护备至。所以，高、孝两宫一向和睦相处，甚是融洽。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正式禅位给光宗，光宗在被立为太子前就很受孝宗的喜爱。故他能以第三子的身份打乱皇位继承的顺序被立为太子。此后，对孝宗一度非常恭敬，处理政事也颇勤勉。后来见孝宗久久没有让位之意，才表现出迫不及待的心情，但和孝宗关系仍很融洽。

光宗即位后，孝宗退居重华宫，被尊为寿圣皇帝，孝宗皇后谢氏被尊为寿圣皇后，高宗皇后吴氏被尊为宪圣皇太后，册立太子妃李凤娘为皇后，黄氏为贵妃，凤娘之子赵扩封为嘉王，并大赦天下。这时金朝的世宗皇帝已去世，即位的新皇帝章宗昏庸无能，宋金边境多年相安无事，光宗很想趁国泰民安，励精图治，振作一番。可好景不长，皇后李氏是一个悍妒跋扈、喜欢弄权的人，她掀起一场场宫廷风波，把光宗搅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她甚至搬弄是非，离间孝宗和光宗的父子关系，导致两宫（孝宗

和光宗）失和。

李后名凤娘，相州（河南安阳）人，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二女儿。李道原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后来成了威方的一个将领，金兵南下时，他投奔到宗泽部下。宗泽死后，李道又率军往依襄阳镇抚使桑仲，从此驻节湖北。绍兴十五年，李凤娘出生在湖北军营时，据说恰有一群黑凤凰落在李道营前的石头上，李道感到奇异，便给她起名为“凤娘”。

凤娘长到十多岁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李道听说游方道士皇甫坦擅长相面之术，能知人间吉凶祸福，便把他请到家中，让几个女儿出来拜见皇甫坦。及至凤娘出来行礼时，皇甫坦一见凤娘，忙离开座位，显得十分惊恐，说什么也不让她行拜见之礼。并告诉李道说：“令女相貌不凡，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李道本是一介武夫，不学无术，对皇甫坦的话深信不疑。从此，他对凤娘倍加宠爱，百依百顺，视为掌上明珠。凤娘在李道的娇生惯养下，唯我独尊，养成一种悍妒跋扈的性格。

本来皇甫坦的话纯属无稽之谈，但事情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皇甫坦与高宗赵构曾有一面之缘，绍兴三十一年冬，皇甫坦云游到临安，高宗听说他道术高超，又擅相面，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召见他。高宗见他身穿数套缯絮厚衣，问道：“先生为何那么怕冷？”皇甫坦道：“臣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当时正是金主完颜亮南侵失败之后，皇甫坦为取得高宗欢心，故出此言。高宗听后，满心欢喜，在皇甫坦给李凤娘相面之后不久，皇甫坦又云游京师临安（浙江杭州），主动朝见高宗。当高宗问他这次朝见的目的时，皇甫坦开门见山地说：“臣为陛下做媒来了。”高宗一听，脸上泛起一片疑云，心想自己在位已三十多年，如今年事已高，一个道士还来做什么媒？皇甫坦看出高宗疑惑不解的神情，忙接着说道：“臣为陛下寻得个好孙媳妇。”高宗忙问是哪家闺秀？皇甫坦在高宗面前把李凤娘着实夸奖了一番。吹嘘凤娘如

何端庄贤淑，高宗偏听偏信，遂聘凤娘为恭王赵惇之妃，封为荣国夫人，后又进封为定国夫人。

乾道四年（1168），二十三岁的李凤娘生下一男，取名为扩。乾道七年，恭王赵惇被立为太子，凤娘则被立为太子妃。孝宗考虑到太子刚立，宫中缺少姬妾服侍，便将贵妃谢氏宫中的一位侍女黄氏赏赐给太子。黄氏温柔贤淑，通情达理，对太子又关怀备至，很受太子宠爱。凤娘自恃生育有功，位尊势重，嫉妒之心，难以自已，总想寻机除掉这位情敌，以解心头之恨。

凤娘的悍妒跋扈，高宗、孝宗也有察觉。在她当太子妃期间，就把宫中嫔妃视为情敌，还经常在吴太后、谢皇后那里诉说太子左右亲信的坏话，弄得太子赵惇也事事让她三分。高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就对吴太后说："太子妃终究出身将门，悍妒成性，怎能母仪天下，我被皇甫坦的花言巧语蒙蔽了。"后悔当初不该答应这门亲事。孝宗也屡次教训凤娘说："你应该像皇太后那样抚育子女，宽厚待人，不要整天与太子急长论短。不然，便废掉你。"面对孝宗严厉的训斥，凤娘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疑心是谢后在背后捣鬼。因此，对孝宗和谢后恨之入骨。光宗即位后，凤娘被册立为皇后。既为六宫之主，儿子赵扩又晋封为嘉王，是当然的太子人选，位尊势重，便时时寻找机会，挟嫌报复。

光宗看到宦官为非作歹，干预朝政，便想借机诛杀，整肃朝纲。但他优柔寡断，迟迟未能下手，消息却很快泄漏出去。宦官们极为害怕，合谋离间三宫（即高宗皇后吴太后、孝宗、光宗），并恳求李后保护，李后欣然答应。以后每逢光宗对宦官有所举动，李后便从中作梗，光宗郁郁寡欢，渐渐成了心病。

孝宗听说儿子有病，焦虑不安。一面让御医细心调治，一面亲自翻检医书，按照药方采购良药，做成药丸，以便为光宗治病。本想派人送去，又怕李后阻挠，只好暂且收起，等光宗来问

安时当面交给他。宦官得知这一消息，便无事生非，在李后面前挑拨说："奴才们听说太上皇购得药剂，专等皇上过宫朝拜时服用。药能生人，亦能死人，万一出了意外，岂不危害大宋江山！"李后派人探察，果有此事，便极力阻止光宗到孝宗住的重华宫去省亲。光宗竟然听信了李后的话，不肯去见太上皇。光宗原本没有大病，调治几天，也就痊愈了。但父子之间的嫌隙已很难弥合了。

一日，李后在内宫为光宗病体康复设宴庆贺。宴会上凤娘酒兴勃勃，不觉面红耳热。便乘兴对光宗说："陛下龙体一向孱弱，现在刚刚痊愈，若再日理万机，事事操劳，势必旧病复发。扩儿既已长大成人，才干与日俱增，何不立他为太子，以助陛下一臂之力。"光宗见她说得颇有道理，就答应待禀告父皇后再行册立。凤娘听说要寿皇批准，心想寿皇处处与自己作对，时常想废掉自己，怕册立太子之事成为泡影，便怂恿光宗说："立储之事，乃祖宗常规，天经地义。陛下身为一国之君，难道没有这点权力，何须禀告寿皇，多此一举？"光宗不敢擅作主张，仍坚持禀告父皇后再作定夺。李后见光宗坚持己见，便忿然离席，宴会不欢而散。光宗深知李后饶舌多事，不通情达理，就事事谦让，从不与她争吵。只是立储之事关系国家根本，才没有应允。

隔天，爱子心切的寿皇听说光宗病体痊愈，便召他入重华宫赴宴，以叙父子之情。可是李后没有通知光宗，一个人偷偷跑到重华宫来。寿皇问她："皇上不是病好了吗，怎么没有同来？"李后显出很忧虑的样子，叹气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已经好了，今天又偶染风寒，臣妾只好一人前来见驾。"寿皇更为担心，忧虑地说："皇儿正值壮年，便如此虚弱多病，将来该怎么办呢？"李后一听，心中暗喜，趁机说："臣妾也正为此不安。依妾之见，皇上既然多病，不如立嘉王扩为太子，也好辅助皇上，为国分忧，不知父皇意下如何？"寿皇沉吟不决，面带难色地说：

"皇儿刚即位不久，政令尚待熟悉，现在就忙着册立太子，未免过于草率。嗣君事关社稷，应从长计议。再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便议论国事？"李后目的未能达到，又受了申斥，脸上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地说："臣妾系六礼所聘，扩儿是妾亲生，册为太子，名正言顺，有何不可？"原来孝宗不是高宗亲子，太后谢氏也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并非明媒正娶。李后如此无礼，指桑骂槐，直气得年迈的寿皇浑身颤抖，拂袖而去，李后也愤然离开重华宫。

李后用心良苦，反遭申斥，又气又恼。回到宫中，立即携带嘉王扩向光宗哭诉，并恶语中伤寿皇说："父皇不仅不答应册立嘉王为太子，还要废逐臣妾，另立中宫，我们母子就要见不到陛下了！臣妾只有以死相报陛下的知遇之恩。"说着就要以头碰柱，光宗和嘉王赶快上前拦住。李后的撒谎和哭闹，使光宗不辨真假，信以为真。他安慰李后说："朕自继位以来，海内承平，没有失德之举，量他不能将朕废去。朕既为天子，难道不能保护妻儿？从今之后，朕不再踏进重华宫半步！"从此以后，光宗与孝宗的矛盾日益加深，再也不去朝见寿皇了。

李后不但搬弄是非，而且悍妒成性。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的一天，光宗在宫中料理政事完毕，需要浣手洗垢，侍从便让一位宫女捧着水盆在旁边侍候。光宗见她皮肤白腻，指若春葱，不由得称赞了几句。李后知道后，心想黄贵妃未除，现在又添此情敌，岂能善罢甘休。不久，李后便派人将那位宫女的双手砍下，放在食盒内，送给光宗。当时光宗正在便殿批阅奏章，时间一长，便觉得饥肠辘辘，恰巧这时有人把食盒送来，光宗只道是美味佳肴，当他打开食盒一看，吓得目瞪口呆。光宗经此惆吓，便忧惧成疾，一病不起，多日不能上朝理政。

转眼到了冬至。按照惯例，皇帝须在这一天祭祀祖宗。光宗不得已抱病前往斋宫。李后一直把光宗所宠爱的黄贵妃视为眼中

钉、肉中刺，早想除掉这个情敌，一直苦于无机可乘。这次见光宗离宫，正是天赐良机，于是指使手下将黄贵妃杀死，然后以暴死上奏光宗。在祭祀那天，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祭坛上的蜡烛尽被风雨所灭，光宗无法行礼，只好作罢。光宗本来身体就虚弱，又遭此风吹雨淋。回到宫中，听到贵妃暴亡。天灾人祸的双重袭击，使他再次病倒，比上次更加沉重。李后趁机独揽朝廷大权，更加骄横跋扈，朝野上下，人人切齿。但李后我行我素，丝毫不加收敛。

寿皇得知光宗病重，亲自到宫中探望。来时光宗还来醒，寿皇吩咐左右不得惊动。直到光宗醒来，小黄门才上前报告，说寿皇已来多时，光宗慌忙下床磕头请罪，寿皇好言宽慰，父子亲亲热热了一番。忽然，寿皇发现李后不在宫中，询问宫人，才知她越俎代庖，忙着替光宗批阅奏章。按照宋朝惯例，皇后、妃子不得干预朝政，李后竟敢违犯祖宗之规，寿皇大为恼火，派人把她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通。孝宗还对李后威胁说："皇上乃关系宗庙社稷安危之大事，你不谨慎小心侍候，以至如此，若皇上万一不测，我就诛灭你家九族。"李后受到训斥，对孝宗的积怨更深了。

绍熙三年三月，光宗病体稍愈，开始在延和殿听政。宰相率领众官恳请他到重华宫去朝拜寿皇。光宗推说久病初愈，不能前往，其实是李后从中作梗，挑拨离间，光宗对寿皇又趋冷淡。百官闻讯，纷纷苦谏，流泪涟涟。光宗无奈，只好在四月份朝拜寿皇，做做样子。后来又一连半年不去重华宫，直到临近冬至节，按照宋朝礼节，皇上应该在节日偕同皇后到重华宫朝贺问安。兵部尚书罗点等上书请光宗依礼朝拜寿皇，光宗竟拂袖退朝。秘书郎彭龟年看不惯皇上的做法，慷慨激昂地说："寿皇当年侍奉高宗，极尽人子之孝道，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何况上皇今日只有陛下一人，听说陛下有病，不是亲自遣人四出求药，就是亲自过

宫探视，上皇拳拳爱子之心，不言自知。陛下长期不去省亲，上皇不得不降旨为陛下开脱，以免臣下窃窃私议陛下。而陛下却误听小人离间之言，使两宫疑隙日深。陛下应负罪以谢上皇，使父子重归于好，江山社稷永存。”宗室大臣赵汝愚也反复进谏。百官万言，也抵不上李后一句，光宗还得回宫去征求李后的意见。出乎光宗意料，李后竟一口答应。当然这并不是李后的孝心复萌。她本想回家参拜家庙，好好出一出风头，又怕大臣劝谏，只好同意先朝见寿皇，借机参拜家庙。寿皇却认为李后从此回心转意，分外高兴，父子二人久别重逢，无话不谈。直到天色将晚，寿皇才让光宗夫妇回宫。接着，李后便去参拜家庙。李后家庙修得富丽堂皇，不亚于太庙。李后的父、祖、曾祖三代都已封王，这次参拜又有亲属二十六人、故旧二百多人新授官职，甚至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李家门客，也都封了官，李氏的专权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李后参拜家庙的目的达到后，又继续挑拨两宫的关系，两宫的矛盾继续恶化，成了当时困扰君臣的难题。

由于李后拨弄是非，使光宗对孝宗若即若离，反复无常，时而朝拜，时而推病数月不去。不觉又到了绍熙四年的重阳节，百官上寿完毕，便请光宗去重华宫朝见寿皇，光宗没有得到李后的同意，不敢贸然答应。中书舍人陈傅良上疏苦谏，给事中谢深甫也慷慨陈辞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皇爱陛下，就像陛下爱护嘉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太上皇春秋已高，倘不去朝见，千秋万岁之后，陛下还有什么颜面再见天下之人?”光宗听后，也觉得这几年所做过分，当即传旨，前往重华宫。大臣立即喜形于色，皆班立两旁，听候起驾。不料光宗刚走出屏风不远，李后突然闪出身来，扯住光宗衣袖，说：“天气寒冷，皇上久病初愈，还是回去饮酒御寒吧，等明日再去不迟。”光宗不好执拗，只得转身退回。百官、侍卫见此情形，面面相觑，不敢言语。陈傅良出于对光宗的一片忠心，抢步上前，一把拉住光宗的衣角，

恳求说："车驾都准备好了，百官也已集合完毕，陛下千万不要还宫。暮秋天气，并不严寒，陛下还是前往吧！"李后一脚将陈傅良踢倒，急忙将光宗拉到屏风后面去了。陈傅良并不灰心，也跟到屏风里面，李后厉声叱道："这是什么地方！一个酸秀才难道不怕砍掉你的驴头！"陈傅良无奈，便退到殿下，嚎啕大哭起来，李后怒气未消，又派人追问："这是什么礼节？"陈傅良毫不让步地说："子谏父不听，所以才嚎啕大哭。"李后听了更加恼怒，遂传旨罢朝回宫。从此之后，不管是大臣苦谏、臣僚讽喻，还是数百名太学生集体联名上书，李后一概扣压下来，阻止光宗朝见上皇。朝野上下，市里街头，人情汹汹，议论纷纷，谴责李后。"皇帝老儿怕老婆"也成了临安市民的有趣话题。

风烛残年的寿皇，在重华宫中孤独寂寞，时刻想念光宗，日复一日，却不见光宗踪影，遂郁郁不乐，少言寡欢，郁闷成疾。到了绍熙五年四月，六十八岁的孝宗病势日趋严重。群臣多次恳求光宗过宫探病，以尽人子之孝。光宗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和李后同到玉津园游山玩水去了。大臣彭龟年等伏地叩头，血流满面，再三力谏，光宗仍然不从。五月，光宗迫于舆论的压力，才不得不让嘉王前往探病。尽管光宗对孝宗如此不恭，孝宗还是十分感动。

六月九日夜，孝宗溘然驾崩。次日，光宗上朝，赵汝愚奏知孝宗昨夜病逝，请光宗到重华宫成礼。光宗口头应允，至晚仍不肯过宫。十三日，是孝宗大殓之日，仍不见光宗车驾到来，群情汹汹，人心骚动。宰相留正等大臣只得请吴太后垂帘主持丧礼。

光宗托病不出，不肯主持孝宗丧礼，使大臣们心寒，对他失去了信心。宰相留正和宗室赵汝愚等人商议，请吴太后做主，让光宗禅位于嘉王。孝宗禫祭之日，也就是结束丧服换上吉服的日子，吴太后在孝宗灵柩前下诏让光宗禅位于嘉王，立即举行禅位大典，太子嘉王赵扩继皇位，是为宁宗。

（耿曙生）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卷152—卷153

《宋史》：《光宗本纪》、《孝宗本纪》、《光宗慈懿李皇后传》。

《宋人轶事汇编·李后》

韩侂胄专权

南宋绍熙五年（1192）六月，已退位的孝宗去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丧事，致使丧礼无法举行。经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的斡旋，光宗次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是为宁宗。宁宗登基后，任命赵汝愚为丞相辅佐朝政。赵汝愚招揽四方知名人士入朝参政。他首先推荐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入朝。朱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授读书史，讲说经义，充当顾问。随后，又请求宁宗遣使召还留正，恢复留正相位。

韩侂胄促成内禅，本以为自己会因此受任为节镇。没料到赵汝愚认为韩侂胄身为外戚，不应受赏，仅封他为汝州防御使。这使韩侂胄大失所望，对赵汝愚心怀不满。然而，因为韩侂胄曾进宫就内禅之事请求太皇太后，当时宫中的舆论都认为策立宁宗的功劳应归韩侂胄，韩侂胄得此美名，加上他又是宁宗皇后韩氏的叔祖父，接近宁宗的机会多，渐渐地韩侂胄被宁宗信赖。韩侂胄上下其手，趁机弄权，作威作福起来。

赵汝愚不肯重赏韩侂胄，当时就有人指出不妥。知临安府徐谊曾劝诫赵汝愚："韩侂胄以后定会给国家带来灾祸，你应该趁早满足他晋级为节度使的愿望，使他远离朝政。"赵汝愚不以为然。叶适听说韩侂胄因没有拜为节度使十分伤心失望，便和知阁刘弼一道劝说赵汝愚。赵汝愚仍不为所动。叶适长叹道："灾祸从此开始了。"于是，要求去地方任职，免得引祸上身。

左丞相留正恢复相位后，每天都在中书省都堂论政。这时韩

侂胄正阴谋干预政事，经常出人都堂，留正很反感，派人告诉韩侂胄："这议事的都堂可不是你知阁每天来的地方。"言外之意，你这个小小的知阁，也想每天来政事大厅?！韩侂胄面红耳赤，愤然离去。从此他对留正充满敌意，发誓要搞垮留正。恰好此时，留正在议事时有几件事惹得宁宗很不愉快，韩侂胄认为有机可乘，在宁宗面前讲留正的不是。绍熙五年八月，宁宗御批罢免留正。赵汝愚本来是依靠留正商议国家政事的，留正被罢，使他失去了依靠。因此，他怨恨韩侂胄没有及时通告，不然的话，他可以做些补救措施。一日，韩侂胄前来拜见，赵汝愚故意不出来接见，这使韩侂胄很不高兴。签书枢密院事罗点对赵汝愚说："你误会韩知阁了。"赵汝愚想了想，感到罢留正之事也不能全怪韩侂胄，因此他还是来到客厅接待了韩侂胄。尽管如此，韩侂胄对此事耿耿于怀。

九月，刑部尚书京镗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宁宗即位后，原想让京镗出任四川制置使，赵汝愚以为不妥。有一次对身边的人说："京镗威望不高，资历很浅，怎么可以当此重任！"京镗获悉后，对赵汝愚十分不满，怨恨赵汝愚轻视自己。韩侂胄知道京镗对赵汝愚不满，便设法拉拢京镗，使他成为自己反击赵汝愚的干将。京镗也改变以往的正直，附和韩侂胄，视正士为仇敌。

韩侂胄每天都在想如何去掉赵汝愚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知阁门事刘弼也因赵汝愚没让他参与内禅之事，愤愤不平。个人恩怨使他俩勾结在一起。刘弼对韩侂胄说："赵丞相想一个人独吞册立大功，您不仅得不到节度使职位，恐怕还免不了被发配到岭南。"韩侂胄听了惊愕不已，问刘弼有什么良策？刘弼说："只有掌握言路。让亲信出任台谏官，才能免去灾祸。"韩侂胄又问："如何才能办到这些事?"刘弼耳语："御笔批出即可。"所谓御批，也称内批，指皇帝在宫中决断事务，不经中书，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韩侂胄认为这方法很妙。绍熙五年冬十月，韩侂胄

的亲信、给事中谢深甫内批为御史中丞。不久，赵汝愚请大臣推荐御史。韩侂胄让谢深甫引荐其亲信刘德秀，刘德秀不久又被内批为监察御史。韩侂胄的亲信刘三杰、李沐等也随之而入，充任御史。一时言官都成了韩侂胄的党羽。

韩侂胄的用意，朱熹十分清楚。他担心韩侂胄危害国家，每每借着给宁宗读讲经义的机会，陈述韩侂胄的奸谋，提醒宁宗有所防备。还邀吏部侍郎彭龟年一道弹劾韩侂胄。并写信给赵汝愚，说他家乡福建有一种风俗，孩子断奶时，父母要用重金酬谢乳母。朱熹援用此法，认为赵汝愚既然在定内禅大计时选用了韩侂胄，韩侂胄又出了力，就应重重地酬劳他。不让他来干扰政事以防后患。赵汝愚为人粗心，认为韩侂胄掀不起风浪，对朱熹的建议没有采纳。右正言黄度与留正有隔阂，韩侂胄想让他弹劾留正。黄度对同行说："留正已经离开朝廷，挤掉他相当容易，然而我们怎么可以助长小人的嚣张气焰?"他准备上疏论韩侂胄的奸谋，被韩侂胄察觉，绍熙五年冬十月，御批罢黄度右正言，出知平江府。朱熹在给宁宗皇帝讲读史书后，说："陛下即位不到三个月，罢免宰相，更换台谏，全部御批独断，朝廷内外都说您左右有人窃取了权柄，我担心有碍国主威望。陛下本想治理好国家，结果反而招来大乱。"说着，朱熹情绪激动，声严色厉，宁宗大为不快。韩侂胄知道朱熹时常利用侍讲之便，弹劾自己，决计不动声色地让朱熹离开朝廷，踢开他专权路上的绊脚石。就选派艺人扮成儒者模样，在宁宗面前演戏。朱熹认为受了侮辱，要求辞职。绍熙五年闰十月，内批罢焕章阁待制及侍讲朱熹。赵汝愚求见宁宗，将御批从衣袖里取出还给皇上，皇帝不许。赵汝愚请求自己免职，也不许。去掉朱熹后，韩侂胄更加肆无忌惮。

御笔数出罢免大臣，朝中正直之士表示异议。知登闻鼓院游仲鸿指出："御批，只能用于非常时期。这段时间，陛下御批，接二连三将丞相留正、谏官黄度、侍讲朱熹罢免。从古到今没有

能不要宰相、谏官、侍讲官自己做到耳聪目明的皇帝。”他恳请宁宗召还朱熹，不要让小人得志酿成祸乱。王介也说：“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很多事是御批所定，最终招致靖康之难。宋仁宗时杜衍为丞相，经常将御批封还皇帝。现在宰相不敢封还御批，台谏不敢弹奏，这可不是长久治理国家的办法。”奏章被韩侂胄党羽扣下，没有上报，宁宗再也难以听到不同意见，对韩侂胄信任不疑。

十一月，宁宗以韩侂胄兼枢密院都承旨。

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见韩侂胄当权用事，权势大于宰相，遂于十二月上疏陈奏：“皇帝新政时期任用宰相，更换言官，都是有关大局的事。现在大臣们不知道的事，韩侂胄知道；因此作威作福，玩弄权术。不除去他，后患无穷。”宁宗看罢，吃惊地说：“侂胄，我把他当作心腹，信而不疑。想不到会这样！”于是，彭龟年和韩侂胄都请祠闲居。宁宗皇帝想罢掉两个人的职位，陈骙进言：“彭龟年因弹劾知阁门事韩侂胄而被免经筵，如何向世人交待？”宁宗不听，内批让彭龟年到州郡任地方官，韩侂胄晋升一级，在京任宫观散职。给事中林大中、同中书舍人楼钥陈奏：“陛下对前朝大臣以礼相待，登基之初，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后不到半年，前朝大臣有的死了，有的被排斥在朝廷之外，只有彭龟年一个人还留在朝中。现在又要去掉彭龟年，四方人士以为进言得罪于君王，恐伤政体。彭龟年、韩侂胄一去一留，彭龟年离京城越来越远，不再在您身边侍候；韩侂胄人内祠，可以随时得到您的召见。请求留下彭龟年为经筵官，而令韩侂胄外任地方官，才为合理。”宁宗在奏折上批道：“龟年已是优待，侂胄本无过错。”林大中和楼钥合奏彭龟年到外地当地方官算是优待，韩侂胄转承宣使，不是优待吗？如果说韩侂胄本没有过错，彭龟年论政事，实在是出于爱君的热忱，难道是过错？彭龟年既然已决定离去，韩侂胄也不应留在朝中，应让他外任官

职，或在外地人宫观，以平息公众议论。宁宗不听，从此韩侂胄更加骄横。

十二月，罢免陈骙知枢密院事，以余端礼代其职，京镗参知政事，郑侨同知枢密院事。陈骙任知枢密院事时，一向与赵汝愚不合作，两人在议事大厅从不说话。等到陈骙提起挽回彭龟年被罢之事，韩侂胄对人说："彭龟年不贪图好的职位，其意已决，陈骙还想充当什么好人?"于是，陈骙被罢免。新任诸官员绝大多数依附韩侂胄，丞相赵汝愚在朝廷中陷于孤立，宁宗也不像即位之初时那样信赖、依靠他了。

工部尚书赵彦逾曾向赵汝愚提议内禅，自以为对帝室有功，希望赵汝愚引他入政府。当他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时，勃然大怒，遂与韩侂胄合谋陷害赵汝愚。赵彦逾在就任蜀帅前向宁宗辞行，罗列朝廷大臣姓名，说通通是赵汝愚的党徒。而且煞有介事地说："老奴我今天就是被革职，也要向陛下您讲出这件事。"自此，宁宗开始怀疑赵汝愚在结党营私。

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罢相。韩侂胄要专权，右丞相赵汝愚无疑是最大的障碍，故而驱逐赵汝愚的欲望更加强烈。但他苦于找不到借口。韩侂胄向京镗寻求计策，京镗说："这好办，他是宗姓，以'阴谋危害国家'的罪名告他，就可以一网打尽。"韩侂胄提拔与赵汝愚有前怨的秘书监李沐为右正言，让李沐弹劾赵汝愚以宗姓居丞相之职，将对社稷不利。李沐按照韩侂胄的旨意，上书乞罢赵汝愚，以便皇上帝位安稳，杜塞奸源。赵汝愚当日就被罢相。出浙江亭待罪，不久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福州府。御史中丞谢深甫等又上书说赵汝愚因罪免职，不应加观文殿大学士盛名。应令他"奉祠思咎"，闭门思过。很快改命赵汝愚提举洞霄宫。直学士院郑湜在草拟罢赵汝愚制词中没有使用贬义词，也被韩侂胄免官。

赵汝愚被罢免后，一些敢于议论此事、替赵汝愚辩护的人，

韩侂胄将他们视为赵汝愚党徒加以罢免。宁宗曾问兵部侍郎章颖："谏官说赵汝愚危害社稷，你怎么看？"章颖回答说："目前国势未定，不可轻易罢免大臣，请陛下下诏宣谕汝愚，不让他离去。"国子祭酒李祥上书："去年孝宗去世，光宗因疾不能主丧，宰相留正离职，人心混乱，赵汝愚不计个人得失，决策拥立陛下，使天下局势重新安定，对社稷有功。今日不念其定策之功，反遭贬斥，使天下精忠正直之士失望，怎样向后人交待！"知临安府徐谊一向被赵汝愚器重，凡有政务，多向徐谊咨询，徐谊也随时给予有益的帮助，并不掩饰他和赵汝愚的关系。他曾劝赵汝愚早日退位，预防韩侂胄的阴谋，韩侂胄对徐谊恨之入骨。赵汝愚被罢免，徐谊马上与国子博士杨简一同上奏，抗论罢赵。李沐等在韩侂胄授意下，将章颖、李祥、徐谊、杨简指为赵汝愚的同党加以弹劾，于是这四人全部免职。

四月，大府寺丞吕祖俭上奏盛赞赵汝愚忠心为国，韩侂胄大怒道："吕寺丞竟然要来干预我的事！"吕祖俭自知上书会引火烧身，仍上封事说："现在进言的人，所恐惧的不是怕得罪君父，而是害怕违背当权者的意愿。大臣论说灾异，可以直言不讳，只因事不关权贵，御笔批出，宰执不敢违背，台谏不敢深论，给舍不敢固执己见，皆因事关权贵，言者害怕多嘴而获罪，断送自己的前程。我以为凡劝导陛下凡事御批的人，目的是借人主之威，窃威弄权。这样下去，将会政归权臣。陛下势力孤单，而能帮您维持社稷的正直之士越来越少。"果然，奏疏刚送上，吕祖俭就被免官，送韶州（今广东韶关）安置。中书舍人邓驲上奏，认为吕祖俭不当贬。楼钥侍讲，此时正好给宁宗进读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而进言："像吕公著这样的社稷功臣，十世子孙可以享受赦罪恩惠，祖俭才是他的孙子。现在就被投到南岭外，万一死了，陛下有杀谏臣的罪名。我很同情吕祖俭的遭遇。"宁宗问："吕祖俭上书说了些什么？"至此，人们开始知道吕祖俭被贬

韶州，并不是宁宗的意图。韩侂胄扬言："如果有人上言救祖俭，将被安置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居住。众臣无人再敢谈论此事。有人对韩侂胄说：天下人对赵丞相离去已咬牙切齿；现在又放逐吕祖俭到瘴乡，不幸死了的话，其怨言更多。韩侂胄也明白其后果，改送吕祖俭吉州（今江西吉安）安置。

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六人伏阙上书。替赵汝愚辩护，并指出"赵汝愚在国家危难之际，位居枢密院，掌握军政大权，要是有异心，做什么事不可以？还要等到国家安定了，才会有异谋？章颖、李祥、杨简等力辩其非，即遭排斥。望陛下念汝愚之忠心，察李祥、杨简不是什么同党，流放李沐以谢天下，召还李祥等以安人心。"疏上，诏杨宏中等六人全部送京城五百里外编管，时称"六君子"。中书舍人邓驲又上奏留下六人。当天，有圣旨：李沐提升为右谏议大夫，刘德秀提升为左正言。没多久，调邓驲知泉州。

六月，加封韩侂胄为保宁节度使。韩侂胄憎恨赵汝愚，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以平息人们的言论。七月，采用何澹建议，削掉赵汝愚观文殿大学士及宫观，监察御史胡纮上书："赵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上奏赵汝愚十不逊，还涉及到了徐谊。十一月，诏贬赵汝愚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徐谊贬为惠州团练副使，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安置。赵汝愚被贬后，坦然上路，行前他对儿子们说："看韩侂胄的意思是想杀死我，我死了，你们尚可免得一死。"走到衡州（今湖南衡阳），旧病发作，衡州守令钱鍪深知韩侂胄贬赵汝愚的用意，百般侮辱、刁难赵汝愚。庆元二年（1196）正月，赵汝愚去世。天下人听说赵汝愚已死，为他感到冤枉。赵汝愚曾梦见孝宗把汤鼎授给他，孝宗自己背负白龙升天而去。后来，宁宗是在孝宗发丧期间，素服即位，应了赵汝愚的梦境。赵汝愚因此获罪，死讯传到京城，宁宗下令恢复赵汝愚原有官位，

同意他归乡埋葬。

正月，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弹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行。第一就是引用伪学之说危害社稷。诏留正落职，罢祠。二月，刘德秀乞将道学语录之类尽行除毁。因此科举取士中，稍涉义理者，全部黜落。《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成了禁书。七月，吕祖俭等迁入内郡，移至高安（今属江西），不久即死。

庆元三年（1197）二月，诏昭庆军承宣使、内侍省押班王德谦为节度使。王德谦为宁宗藩邸内侍，深得宁宗欢心，很快被提拔，朝中有人开始依附于他。中书舍人吴宗旦平素白天待王德谦很小心，晚上便服进见王德谦。王德谦推荐吴宗旦任刑部侍郎、直学士院。韩侂胄见宁宗相信和任用王德谦，知道王德谦继续呆在宁宗身边会妨碍自己专权。表面上与王德谦结为义兄弟，相交甚好。一天，韩侂胄对王德谦说："哥哥你有大功劳，应拜为节度使。"王德谦半信半疑。问："我是宦官，有此先例么？弟弟你可别误了我的前程。"韩侂胄说："我已向宁宗奏请此事，马上就会宣布诏令。"王德谦满心欢喜。何澹这时是中丞，韩侂胄告诉他："王德谦苦苦要求拜为节度使，皇上几次拒绝。"已拟好制词，并秘密地指使何澹"尽快放逐他"。何澹依韩侂胄指教，合台谏上疏王德谦罪行，请将王德谦诛杀。宁宗不肯，诏王德谦在外宫观。王德谦拉着韩侂胄的衣袖哭着说："弟弟你害了我！"韩侂胄表现得心情沉痛，慢慢地说："哥你放心，大概出北关数里，便有诏令追回成命，只是要等到罢了何中丞。"王德谦还信以为真，嘱托韩尽快办理此事。后来临安府又劾王德谦为人求官，受贿钜万，衣着饮食都模仿皇帝。诏降王德谦团练使，抚州（今属江西）居住。最后，王德谦死在贬所。从此，内批都是韩侂胄所为。二月，吴宗旦因结交王德谦夺三官，送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居住。

庆元四年（1198）正月，以赵师罴为工部侍郎、知临安府事。赵师罴依附韩侂胄而知临安府。为取悦韩侂胄，无所不为。韩侂胄生日，宰执、牧守都争献珍异之物祝寿。直宝文阁四川茶马献上红锦壁毯、地毯，其宽窄与韩侂胄会客堂大小吻合；吏部尚书献上红牙果桌十张；工部尚书献珠搭当十副，光彩照人，胜过已故大长公主梳妆匣子里的物品，众人惊异称奇不已。知临安府赵师罴最后一个到韩府，他拿出一小盒说："寒生没什么好东西，以小果核进酒一杯。"打开盒盖，是粟金葡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骤然间，别的礼物相形见绌。韩侂胄有爱妾张、谭、王、陈四人，都被封为郡夫人，此外有名位的爱妾还有十人。有人送给韩侂胄四枚北珠冠，韩侂胄将礼物分给四位郡夫人。另外十位也想要，韩侂胄一时拿不出，惹得那十位爱妾很不高兴。赵师罴听说后，赶紧拿出十万缗购得北珠冠十枚，瞅着韩侂胄上朝时给十婢送去。十婢十分惊喜，各持一枚回房，韩侂胄回家，十婢都来道谢。第二天都市灯会，十婢戴着珠冠出游观灯，十分出众，被行人紧紧围着观看。她们感到异常快慰，游玩归来，纷纷替赵师罴求升迁："我们得了赵大卿珠冠，身价提高十倍，你又何必吝啬一官半职呢。"于是，赵师罴拜为工部侍郎。有一次，韩侂胄和客人在南园饮酒，路过山庄，看到四下竹篱草房，说："这真有田园景象，只是差鸡鸣犬吠声。"一会儿，众人就听见狗在丛生的树木间叫唤，一看是赵师罴在学狗叫，韩侂胄哈哈大笑，十分开心。

庆元四年五月，加韩侂胄少傅，赐玉带。八月，以谢深甫知枢密院事，许及之为同知枢密院。许及之为吏部尚书，百般巴结讨好韩侂胄，然而两年过去了仍没有升迁。许及之想，看来只好上门去要官了。他见到韩侂胄后，流泪叙说韩侂胄的知遇之恩。许及之衰老迟缓，说着说着，双膝弯曲跪了下去，韩侂胄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让许及之升任同知院事。又有一次韩侂胄过生日，

朝廷大臣全都赶来祝贺，许及之最后一个赶到。韩府守门人想将他拒之门外，许及之十分窘迫，趁门栓没上之际，弯着身子钻了进去。因此被人称作“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传为笑话。

庆元五年（1199）正月，韩侂胄听说一个叫蔡琏的人，曾任枢密院直省官，绍熙内禅时窃听到赵汝愚等人内禅之议，并将此秘密泄露出去，因此被赵汝愚免官放逐。韩侂胄如获至宝，马上派人找到蔡琏，授意他诬告赵汝愚等人在册立宁宗时有异谋。蔡琏很快捏造了一些大臣在册立时的言论，满满写了 70 多张纸。宁宗下诏，要大理寺逮捕彭龟年、曾三聘、沈有开、叶适、项安世等人以核实事实。中书舍人范仲艺认为这样做对韩侂胄不利，加上京镗、刘德秀也支持范仲艺的看法，韩侂胄这才将此事搁下。然而，彭龟年、曾三聘等人还是被削去官职，蔡琏被提为进义副尉。

庆元六年（1200）七月，陈自强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陈自强曾任韩侂胄的启蒙老师。庆元二年夏，他任光泽县丞期满，以“选人”资格入京等待选拔提升，通过旅店老板与三十年前的学生韩侂胄联系上。一日，韩侂胄请陈自强到韩府，当着朝中高级随从官员的面，让陈自强在厅堂的褥椅上就座，并行了弟子拜见老师的大礼，然后招呼众官一块坐下。众官见状不敢上前就坐，韩侂胄慢慢地说：“陈老先生满腹经纶，可惜埋没在外，沉沦下僚。”众官听罢，嘘嘘有声，似乎都在替陈自强惋惜。第二天，众官纷纷上章推荐陈自强的才干，陈自强很快就被任命为太学录，仅数月转为国子博士；升为秘书郎不到半年，即改为右正言；一个月后又拜为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又旋为签书枢密院事。从选人至执政，首尾仅四年时间。

九月，浙江婺州布衣吕祖泰上书请斩韩侂胄。吕祖泰是吕祖俭的堂弟，考虑到吕祖俭被贬，他自己上书论朝政会再次使吕祖俭遭罪名，迟迟不谈国事。吕祖俭死后，吕祖泰就击登闻鼓上

书，论韩侂胄有无君之心。他说："韩侂胄立伪学之禁，逐赵汝愚之党是要架空陛下。请尽快诛杀韩侂胄，罢逐陈自强，以周必大代之。"书下三省，朝廷议论纷纷。御史施康年认为吕祖泰受周必大指使才上书，弹劾在家闲居的周必大，周必大被贬官为少保。吕祖泰因"挟私上书，语言狂妄"，拘押连州（今广东连县）管制。右谏议大夫程松尝与吕祖泰一起游玩宴饮，害怕会牵连自己，单独上奏，落井下石。他说："吕祖泰有当诛之罪，纵不杀他，也当杖背黥面，流放远方。"于是，吕祖泰被杖一百，发配钦州（今属广西）牢城收管。

十月，加韩侂胄太傅。嘉泰元年（1201）八月，以张岩为参知政事，程松为同知枢密院事。张岩、程松都依附韩侂胄，程松巴结奉承之心更为露骨。自从当了钱塘县知县，不到二年被提为谏议大夫。一年过去了还没有升迁，程松整日闷闷不乐，于是买来一名美女，取名"松寿"，送给韩侂胄。韩侂胄很奇怪："这美人怎么与大谏同名呢？"程松答道："以后只要有人喊美人，您就会记起我的贱名。"韩侂胄很可怜他，升他为同知枢密院。

嘉泰二年（1202）正月，命苏师旦兼枢密院都承旨。韩侂胄为平江府兵马钤辖时，苏师旦当他手下的笔吏。苏师旦能言善辩，善解人意，深得韩侂胄的欢喜。宁宗登基时，韩侂胄把苏师旦的名字写在宁宗藩邸吏士中，苏师旦因此得官，并不断升迁，得都承旨后，权势日盛一日。

十二月，宁宗立贵妃杨氏为后。庆元六年十一月，韩皇后死后，杨氏与曹美人都受宠。杨氏颇涉史书，知古今，性警敏，而曹美人柔顺，韩侂胄劝宁宗立曹氏。杨氏知道韩侂胄反对宁宗立自己为后，心生怨恨。同月，加韩侂胄为太师，封平原郡王。最初，惠民局夏允中奏请依文彦博故事封韩侂胄为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重事官名，用以尊崇元老大臣，位宰相之上，不常置。在此之前，宋代只有文彦博等几人任此殊荣。韩侂胄认为自己的

资历和权威还没达到享受此官的地步，畏惧舆论，故上书辞谢，请求退休。宁宗安慰并挽留他，于是，夏允中被免。韩侂胄遂想笼络士大夫，收罗知名人士参政，薛叔似、辛弃疾、陈谦等先后被起用。

嘉泰三年（1203）五月，以陈自强为右丞相。这时，韩侂胄专权，他想做的事情，宰执怕被革职不敢有异议。陈自强为韩侂胄专权尽犬马之力，他甚至印空白敕札给韩侂胄，韩侂胄为所欲为，宰执也不让知道。于是，言路阻塞，台谏每月只是按察一、二个"小吏"，称作"月课"。言官上书泛论君德、时事时，都讲些众所周知、无关痛痒的话，敷衍塞责。陈自强口口声声说："自强只有一死，以报师王恩德"。他称韩侂胄为恩王、恩父。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想当平章军国事，但仍怕公众议论，陈自强领头上奏请求立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随后邓友龙也有所请。七月，诏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上，三天一朝赴都堂治事。于是三省印全部放在韩侂胄家中，并在他私宅中设置机速房，甚至假造御笔升黜将帅，事关机要也不向宁宗禀奏。面对这种现象朝中无人敢吱声。

韩侂胄专权既久，党羽遍朝廷内外，宁宗被架空。韩侂胄威行朝廷，权震全国，随时出入宫廷，在孝宗昔日思政之所居住，老宫人见了往往流泪。众官对韩献媚、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余嚞请加九锡、赵师睪请置平原府官属，韩侂胄都当仁不让。开禧元年冬，韩侂胄决意对金开战。开禧二年（1206）南宋初战略胜，五月正式对金宣战，然出师不利，宋军连连败退。韩侂胄后悔开战，几次遣使赴金求和，因金人索要苛刻，甚至要宋交出韩侂胄的头颅，使韩侂胄锐意用兵。到开禧三年（1207），尽管在战场上宋、金各有胜负，战事处相持阶段，南宋朝中主和派却急于求和罢战。十一月二日，史弥远和杨后等派人杀掉韩侂胄。

韩侂胄被杀之日，正是韩侂胄三夫人"满头花"的生日。韩

府设宴，众人酣饮至五更才散，干办府事周筠听说史弥远等密谋杀韩侂胄，赶紧以覆帖向韩侂胄告变。这时，韩侂胄已大醉，看过帖子后说："这汉又来胡说。"遂将帖子放在烛火上烧掉。第二天，韩侂胄准备早朝，周筠再三提醒他不要上朝，被韩侂胄喝叱："谁敢杀我！谁敢?!"于是登轿赴早朝。到六部桥，遇中军统制权殿司公事夏震带三百兵早已恭候，韩侂胄问："什么事?"夏震说："有旨，太师罢平章事，日下出国门。"韩侂胄说："有旨？御笔我所为，我为何不知？一定是伪造的。"话音未落，就被揪下轿，夏挺、郑发、王斌等率百名强壮士兵，拥着韩侂胄到玉津园夹墙内，把他杀死。

韩侂胄死后，南宋献其首向金求和，并满足金提出的一切条件，于是双方停战，订立"嘉定和议"。至此，韩侂胄从权力的顶峰骤然身亡，结束了他长达十几年的专权历史。

（余日蓉）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韩侂胄专政》

《续资治通鉴》卷153—卷156

《宋史》：《韩侂胄传》、《赵汝愚传》、《彭龟年传》、《留正传》、《吕祖俭传》、《黄度传》。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7

周密《齐东野语·绍熙内禅》

开禧北伐

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正月，韩侂胄确定北伐金国。当时，金国为其北部边境新兴的蒙古族所困扰，连年交战，兵连祸结，士卒涂炭，以致国库空虚，国势日弱。鉴于金国的形势，有人建议宋廷权臣韩侂胄出师北伐。立盖世功名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韩侂胄表示同意，于是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他下令积累财富，招募士卒，并拿出封椿库黄金万两，准备赏给立有战功的人。又令吴曦在四川练兵，准备出击。

时隔不久，安丰守臣厉仲方、浙东安抚使辛弃疾都上书，赞成北伐。韩侂胄十分高兴。嘉泰三年十二月邓友龙受命出使金国，此时也返回朝廷。他说：在他出使时，金国曾有人半夜求见，声言金国为蒙古部困扰，国势很弱，宋廷出兵，则会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大获全胜。这更坚定了韩侂胄北伐决心。

四月，韩侂胄下令在镇江（今属江苏）为韩世忠立庙。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以鼓励士气。六月，令沿江及四川诸位将帅加紧练兵补充兵力，准备北伐。

开禧元年（1205）四月，武学生华岳上书，认为朝廷应用兵与金开战，并且请求将韩侂胄、苏师旦、周筠斩首以谢天下。韩侂胄勃然大怒，将华岳逮捕至大理寺治罪，建宁（今福建建瓯）编管。

五月，金章宗完颜璟听说南宋将兴师北伐，召集诸大臣询问对此事的看法。大臣们都说：“宋败之余，自救不暇，恐怕不敢

撕毁协议，擅自发动战争。”只有完颜匡说：“南宋增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改元开禧，怎会忘记中原呢？”金章宗认为有道理，于是，命令金国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置司汴京（今河南开封），会合各路兵马准备同宋军作战。

八月，金国罢河南宣抚司。仆散揆到达汴梁，呈递官方文书到南宋，责问为何败盟。南宋三省、枢密院一边回答金国：“我边臣生事，已被贬黜，所置兵也已撤回。”一边诏内外诸军秘密行事。仆散揆相信南宋的答复。恰好，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濠州（今安徽凤阳）守将田俊迈引诱虹县（今安徽泗县）百姓苏贵等人前来搞离间计，苏贵等人对仆散揆说：“宋增戍守之军，为的是防备盗贼，等到您对他们有所谴责，更加害怕，不敢去防备边界，而且南宋兵士都是未入军籍的民兵，自带粮食武器，粮饷不继，死者甚众。”因此，仆散揆更加放松了警惕，他将苏贵等人的话禀告了金章宗完颜璟。这时，金国群臣都劝金主先发制人。完颜璟说：“南北和好四十多年，民不知兵，不可轻易发动战争。”等到听了仆散揆关于南宋军情的汇报后，下令撤销河南宣抚司，遣散新增加的部队。

就在金国撤罢河南宣抚司的当月，韩侂胄仍在进行他的准备工作。他令湖北安抚司招新兵，扩充神劲军。又以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九月，以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不肯受命。起初，韩侂胄在丘崈入奏宁宗时召见他，拿出北伐的奏疏近二千言给丘崈看，希望丘崈支持恢复之议。丘崈说：“中原沦陷近百年，我方固然应时刻牢记此恨，然而战争一旦爆发。胜败难卜，首事之祸谁能承担？一定是有人想趁机捞功升官，才出此下策。”当韩侂胄听说金人置平章宣抚河南时，请丘崈为签书枢密院事，宣抚江淮以便应付将要来临的战争局面。丘崈力辞所授官职，使得韩侂胄很不高兴。

十一月，金诏山东、陕西帅臣训练士卒，以银十五万两分给

边帅，募人侦察南宋举动。又派武卫军副都指挥完颜太平、殿前右卫副将军富察阿哩前往宋金边境，准备迎击宋军。

十二月，金派遣太常卿赵之杰为正旦使，来宋贺新年。韩侂胄故意使赞礼官冒犯金主父嫌名，以此惹恼使者。于是赵之杰在拜见宁宗时，态度也傲慢起来。韩侂胄请宁宗返回宫中，著作郎朱质请求将金使斩首，宁宗没有同意，诏金使改为正旦朝见。

开禧二年（1206）正月，南宋正旦使陈景俊准备从金国返回，金章宗派孟铸送行，并转告金主的话："大定初年（1161）宋金议和，确定金宋为叔侄关系。我国遵守至今，没想到你国连连进犯我边境，所以我才派遣大臣宣抚河南。等到收到你国公文，知道已罢黜边臣，抽走兵卒，我即罢河南宣抚司。不料，你们侵扰我边境反而比以前更厉害。群臣认为你国有改变盟誓的可能，我考虑到两国和好已久，对于你们来侵扰之事委曲包涵，怕侄皇帝不知详情，你回国后要告诉全部情况。"陈景俊回国后，先把这些情况告诉右丞相陈自强，陈自强警告他不能再说这些。于是，韩侂胄北伐的决心更加坚定。

三月，南宋朝廷任命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宣抚副使。程松统率三万军队，驻兴元（今陕西汉中）东部；吴曦统率六万军队，驻河池（今甘肃徽县）西部，同时仍负责节制四川财赋，并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又先后任命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御史中丞邓友龙为两淮宣谕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调三衙兵增戍淮东。

四月，南宋权礼部侍郎李壁奏言，秦桧首倡和议误国，应赶紧贬秦桧以示天下。于是，朝廷追论秦桧主和误国的罪行，削夺其王爵，改谥缪丑。

本月，金章宗听说宋皇甫斌分兵出击，打算收复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又令仆散揆驻兵汴梁，河南的兵

都听仆散揆调遣，准许他见机行事，同时调兵遣将分守要害地区。

这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与镇江都统陈孝庆攻取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约定时间出兵。金探听到宋出兵日期，提前关闭榷场，堵塞城门。毕再遇知道金军已有所准备，便与陈孝庆商议提前一日进取泗州。泗州有东、西两城，毕再遇令一部分兵佯攻西城，自己却率兵到东城南角，登城杀敌，金人大溃退。西城犹坚守，毕再遇立起大将旗，高声呼喊："我，大宋毕将军，中原遗民可快投降。"城中汉族官员投降，于是泗州两城都被宋军攻克，郭倪因此授毕再遇刺史官衔。毕再遇说："国家仅在河南就有八十一州，现在才攻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以后拿什么来奖赏我！"坚决辞却刺史之衔。同一时期，江州统制许进率军收复新息县（今河南息县），光州忠义军孙成收复褒信县（今河南息县包信镇）。五月，陈孝先收复虹县，南宋不宣而战，取得了对金作战的初步胜利。

韩侂胄得知宋军已攻取泗州、新息、褒信及虹县，于是请宁宗以北伐之事告于宗庙后下诏出师伐金。开禧北伐正式开始。

金章宗命其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元帅，陕西兵马都统使充为右监军，知真定府事乌库哩谊为左都监。金章宗考虑到东北新调之兵，和河南之众支撑不住战局，又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一万五千屯驻真定、河间、清县以便随时策应。

开战后，宋军主动出击。郭倪派郭倬、李汝翼攻宿州（今安徽宿县），金守军只有骑兵三千人，郭倬、李汝翼率五万宋军攻城。金军坚守，矢下如雨。宋军久攻不克，露宿野外，疲劳困乏，金兵以二百名骑兵袭击宋营，宋军大乱，死伤数千人。

与此同时，郭倪还令毕再遇攻徐州（今属江苏），行至灵璧（今属安徽）凤凰山，遇见陈孝庆的部队。陈孝庆因宿州兵败正准备退兵，毕再遇坚决反对。不久就接到郭倪退兵令，毕再遇主

动断后，率兵冲入金的追击部队，金兵见其旗，吓得大喊“毕将军来了”，闻风丧胆，于是金兵大败，死伤无数，毕再遇乘胜追敌二十里才撤回。

同期，京西北路招抚副使皇甫斌领兵攻唐州，被金将乌克逊鄂屯击败，建康都统李爽率兵围攻寿州（今安徽寿县），金军刺史图克坦义坚守寿州达逾月之久，河南统军判官奇珠及迈格等赶来支援，金兵内外夹击宋军，李爽大败而归。江州都统王大节攻蔡州（今河南汝南）也不顺利，很快溃败。韩侂胄盼望吴曦开战后迅速进兵陕西，造成北伐有利形势。而吴曦却早在南宋正式宣战前，就阴谋据蜀叛金。金也移书诱降吴曦，吴曦秘密地派姚淮源赴金，欲向金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以求得金封他为蜀王。宋金开战后吴曦按兵不动。六月，金封吴曦为蜀王。

同月，韩侂胄因师出无功，更换在外统军将领。罢免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以丘崈代之。丘崈进驻扬州（今属江苏）后，布置诸将，让三衙兵分别守卫江淮要害地段。韩侂胄派人来扬州与丘崈商议招收溃兵，且向丘崈寻求解脱的计策。丘崈建议韩侂胄申明苏师旦、周筠等煽动出师北伐的奸情，另将有丧师之罪的李汝翼、郭倬等人正法，并要求放弃泗州，返师盱眙（今属江苏），韩侂胄采纳了丘崈的建议。于是，王大节、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都因战败被贬官。郭倬在镇江（今属江苏）被斩首。

北伐出师不利，连吃败仗。韩侂胄开始怀疑北伐决策的正确性，感到自己上了苏师旦的当。一天，他召李壁饮酒，边饮边谈，谈到苏师旦最早谋划北伐之事。李壁先是很含蓄地试探韩侂胄对苏师旦的态度，见韩侂胄甚恼苏师旦，这才放开胆子说：“苏师旦首倡北伐，使您由此受到指责，不流放他，不足以谢天下。”韩侂胄表示同意。七月，苏师旦被罢官，流放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居住。

十月，金平章事仆散揆分兵九路，南下攻宋。他本人率主力

三万人进攻颍州（今安徽阜阳）、寿州；完颜匡率二万五千兵，攻唐州、邓州；纥石烈子仁率兵三万攻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涡水入淮水处）；纥石烈胡沙虎率二万兵，攻清河口；完颜充率兵一万攻陈仓；蒲察贞率兵一万攻成纪；完颜纲率兵一万攻临潭；石抹仲温率兵五千攻临川；完颜璟率兵五千，攻来远。

金将胡沙虎率金军自清河口（今江苏清江市西南）渡淮河，进围楚州（今江苏淮安），知盱眙军毕再遇奉命救楚州。这时，金军七万在楚州，还有三千人在淮阴守粮草。毕再遇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统领许俊等绕道赴淮阴，趁夜色烧掉金军五十多所粮库，金淮阴守军溃退，宋军活捉乌哩库帅勒、富察元努等二十三人。

十一月，南宋命丘崈签书枢密院，督视江、淮军马。这时，金人进攻淮南，形势急迫，又诏郭杲率兵进驻真州（今江苏仪征），准备救援。有人劝丘崈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和州（今安徽和县），退守长江。丘崈说："放弃两淮则与敌共长江天险，我当与淮南共存亡。"于是，宋增兵防守淮南。

这月，金完颜匡攻破枣阳（今属湖北）、光化军（今属湖北）、江陵（今属湖北），宋江陵副都统魏友谅突围奔往襄阳（今湖北襄樊）。

金仆散揆将引兵渡淮河，他派人秘密测量淮水深度，只有八叠滩可以涉水而过，故采用声东击西战术迷惑宋军。他派奥屯骧挥师至下蔡，假装强渡，宋将何汝砺、姚公佐信以为真，把全部守军屯扎在花靥（今安徽寿县西北），准备阻止金军南渡。金将完颜萨布则悄悄地从八叠滩渡河去攻击宋军。宋军大乱，自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仆散揆很快攻下颍口，占领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南）及霍丘县（今属安徽），进围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月，进攻庐州的金军遭到宋军田林顽强抵抗。而金纥石烈子仁也攻陷了滁州（今安徽滁县）。

十一月，金军攻破信阳军（今属河南）、随州（今湖北随县），又围攻襄阳府和德安府（今湖北安陆）。

十二月，金仆散揆部进攻和州时，其中军副都统穆延斯赍塔中流矢死。穆延斯赍塔英勇善战，所用枪长二丈，军中号为“长枪副统”。又善用手箭，以指钳取箭飞掷百发百中，屡建战功。金军攻克安丰、霍丘、花靥他功劳最多。金军在穆延斯赍塔死后从和州撤军，转攻六合（今属江苏），郭倪派前军统制郭僎援助六合守军。在胥浦桥被金人打败，郭倪放弃扬州。这月，金纥石烈子仁攻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宋军大惊，不战而溃，二万人被杀。至此，淮西县镇全被金人占领。

由于吴曦已经投降金国，只因程松屯住兴元，不敢公开行事，对于金军攻击，吴曦置之不问。于是金蒲察贞很快就攻下湫田堡，破天水（今甘肃天水西南），肆掠关外四州。十二月，蒲察贞进攻成州（今甘肃成县），吴曦焚河池，退屯清野原。金兵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吴曦下令撤巂关之戍，大散关因此失陷。

金兵从十月开始包围楚州。一直未能攻克。十二月，镇江副都统毕再遇奉命把守楚州。他考虑到楚州城坚兵多，短期内不会被攻破，而六合位置重要，故引兵到六合。当时金人屯竹镇，距六合二十五里，毕再遇在六合偃旗息鼓，伏兵南门，弓弩手隐伏城上。金军刚到城下，宋军众弩齐发，鼓声大作，金兵惊遁大败而逃。金仆散揆派完颜图拉与纥石烈等合兵十多万与宋军再战，把六合城围得水泄不通。又欲烧壩木，决濠水，均被毕再遇令劲旅击退。金兵进攻更急，宋军箭用尽，毕再遇派人戴青盖在城上来往，金人以为是宋的统兵官，争相射箭，宋军得二十多万支箭。金军增兵围城，营帐长达三十余里，毕再遇出其不意攻击金营，金兵溃退。其时，楚州被围达三个月，毕再遇又遣将分道袭击金军，于是金引兵离去，解除了对楚州的包围。

十二月，宋金开始议和。金仆散揆想议和罢兵，派遣一位自称是韩琦五世孙的韩元靓南下，被丘崈逮住。丘崈审讯韩元靓南行的原因，他露出讲和之意。丘崈派人秘密将他送回金国。丘崈将得到的金想议和消息报告朝廷。由于宋军屡遭失败，韩侂胄有些后悔兴师伐金，便拿出二十万家财助军。同时谕令丘崈选派得力人员持书、币赴金营议和。丘崈派陈壁充当小使持书前往。仆散揆提出议和条件是：南宋向金称臣，割地，交出首倡战争的大臣。丘崈又派王文前往对仆散揆说："用兵是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所为。不是朝廷的意思。这些人现在都已被贬黜。"仆散揆反问道："韩侂胄如果无意用兵，苏师旦等人岂敢擅自发动战争！"此后，丘崈又数次选人赴金营，并许诺送还淮北南移的百姓及当年的岁币。金才答应议和。金军退屯下蔡，只有濠州（今安徽凤阳），仍派一统军守卫。

十二月，诏镇江军都统毕再遇权山东、京东招抚使。宋军自出师后，将领们很少获胜，只有毕再遇多次立功，故有是命。

开禧三年（1207）正月，丘崈上疏，因金人已有议和之意，请移书金帅以成和议。同时提议：金人既指韩侂胄为首谋，如果撰写公文，宜暂免系衔。韩侂胄大怒，将丘崈免职，改以知枢密院张岩督视江淮军马。

这月，金仆散揆患病，金章宗命左丞相完颜崇浩兼都元帅，代替仆散揆指挥对宋战争。二月，仆散揆病死。

二月，宋以知建康府叶适兼江淮制置使。叶适上书："三国孙氏，曾以江北守江，自南唐才开始丧失江北，请兼节制江北诸州。"诏从之。战争期间，军事文书纷繁，叶适忙而不乱，处理事务如同平时，一船军需都由官府供应，百姓得以免受侵扰之苦。

开禧三年正月到二月，完颜匡围攻襄阳，无法攻下，士卒疾疫，恰好听说完颜崇浩到了汴梁，于是引师还。

二月，监兴州（今陕西略阳）合江仓杨巨源与安丙、李好义诛杀吴曦，将其首级、违制法物、所受金人诏印送到南宋朝廷。吴曦被诛后，金章宗十分沮丧。

而李好义则进兵关外，驻兵独头岭，他又会合忠义民兵夹击金兵，金兵死伤无数，李好义攻西和州，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整军入城，居民夹道欢迎。不久，宋将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金巩州钤辖完颜阿实战死。金章宗命完颜纲撤去五个州的金兵，退保要塞。李好义乘胜进军秦州。四月，金军再次攻破大散关。

四月，以方信孺为宋国信所参议官，前往金营议和。韩侂胄欲募人出使金国，其近臣举荐方信孺。于是方信孺被召入临安，自萧山县丞改为国信所参议官。临行前，方信孺问："我国首先开战，金人如果问首谋，该怎样回答？"韩侂胄惊顾左右而言它。于是方信孺带着张岩的书信北行。

方信孺到濠州（今安徽凤阳），纥石烈子仁把他关进监狱，虚声恫吓，百般折磨，要求方信孺答应他们议和的五个条件。方信孺说："交还俘虏、赔钱都可以，绑送首谋自古以来都没有先例。称藩、割地则不是我敢说的事。"纥石烈子仁很生气，喝道："你不想活着回去吗？"方信孺说："自受命出国门时，我就置生死于度外！"纥石烈子仁把方信孺送到汴梁。方信孺见到金帅完颜崇浩后返回住处，完颜崇浩派传令官前往方信孺住处。仍坚持五个条件，并说称藩割地可援先例。方信孺反驳，要求再见完颜崇浩。完颜崇浩在幄中陈兵接见方信孺，威胁他："五个条件不依从，金兵即南下。"方信孺不为所屈。完颜崇浩大声吼叫："你国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为什么？"方信孺答道："前日兴兵复仇，为国家；今日屈己求和，为百姓。"完颜崇浩无言以对。于是将一封信给方信孺说："和好还是继续作战，下一次来时再定。"

方信孺回到南宋，宁宗诏侍从、两省、台谏官商议如何复命。大家都同意归还俘虏、治罪首谋，增岁币五万。于是南宋决定再次派方信孺去金营，这时，吴曦已被杀，金国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但仍坚持初议的五个条件。方信孺说："你们所提的五个条件，我方已答应三个，从你我双方曲直来看，我国先兴兵，你国却在此之前诱降吴曦；从战场上看，你我各有胜负。如果你们仍要坚持全部条件，那我们只好再次开战。"方信孺义正辞严，态度强硬。金人见状只好退让，这才说："割地之议暂时不谈。但除增岁币还要另付犒师银，才可议和。"方信孺回朝复命。不久，南宋朝廷以林拱辰为通谢使，与方信孺一道持国书赴金。双方互不相让，议和仍未成功。方信孺带着完颜崇浩致宋朝的信，返回南宋。韩侂胄询问方信孺北行情况，方信孺告诉他金议和的五个条件。一割两淮；二增岁币；三索归正人；四犒银师；五不敢言，韩侂胄再三追问，方信孺只好如实禀告："金人想得太师的头颅。"韩侂胄听后大怒。九月，将方信孺贬官，遣往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居住。

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崇浩在军中去世。金命其左副元帅完颜匡代替完颜崇浩，在汴梁全权指挥金军。完颜匡是金军换的第三任主帅。金军完颜崇浩与仆散揆、穆延斯赍塔都是宿将，相继死去，加上战场三次易将，南宋不知乘此良机大举进攻，反而因求和未成举朝不安。在方信孺被贬后，又派王柟以右司郎中身份持国书北行求和。

韩侂胄听说金人想治罪首谋，又锐意用兵。九月，以殿前都指挥使赵淳为江淮制置使，取代张岩。张岩督战九个月，费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无寸功。

十月，宋礼部侍郎史弥远上奏："自北伐以来，蜀口、汉、淮百姓死于战乱的不可胜数，国力大大减弱。而韩侂胄意犹未尽，为此朝廷内外忧惧。"他力陈形势危急，不可再战，并请诛

杀韩侂胄。宁宗皇后杨氏因册立之事与韩侂胄有怨，也力主去掉韩侂胄。史弥远很快与杨氏勾结，他们让皇子赵竑出面，状告韩侂胄"再起兵端，将不利社稷。"杨后自己则在一边极力赞同，宁宗没有答应。杨后又请求宁宗，命令其兄杨次山选择群臣中可以信赖者，与他们共商去韩侂胄之事，宁宗才应允。杨次山转告史弥远，史弥远得此密旨，遂先后与钱象祖、李壁秘密商议，他们决定派主管殿前司公事的夏震伺机行事。

十一月的一天，韩侂胄入朝途经太庙时，被夏震所率三百兵截住。很快，韩侂胄被他们押到玉津园的夹墙内杀死。史弥远、钱象祖把杀韩侂胄之事禀告宁宗。宁宗下诏把韩侂胄的罪恶暴露中外。韩侂胄死后，钱象祖从怀中取出堂帖给陈自强："有旨，丞相罢政。"陈自强随即上马离去。诏贬陈自强永州居住。并于当月斩苏师旦。

嘉定元年（1208）三月，南宋恢复秦桧王爵赠谥，以示其求和诚意。

这月，王柟从金军营返回。王柟在韩侂胄被杀前赴金。他同意依靖康故事，金、宋两国建立伯侄关系，向金国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军钱三百万贯，等和议定下来之后再向金献苏师旦首级。完颜匡将王柟的话奏明金章宗。金主命完颜匡向宋索取韩侂胄首级。让宋以此赎回淮南等地。改犒军钱为三百万两银。刚好这时候，宋右丞相兼枢密院事钱象祖移书金帅府，告诉南宋已诛杀韩侂胄之事。一天，完颜匡问王柟："韩侂胄专权几年了？"王柟说："已十余年，他升为平章军国事才二年。"完颜匡又问："现在想去掉这个人，可以吗？"王柟答道："宁宗英明决断，去掉韩侂胄有何难。"完颜匡听罢开怀大笑，这才决定与宋和议，并让王柟回南宋去取韩侂胄首级。宁宗召集百官议论此事，权兵部尚书倪思认为献韩侂胄首级有伤国家体面。吏部尚书楼钥说："和议这等重要的事，就看此举才能决定。奸宄已毙之首，有什么可

惜！”因此南宋决定向金献出韩侂胄首级以换取淮、陕被侵之地。遂令临安府开棺取韩尸体枭于两淮。南宋派王柟将韩侂胄、苏师旦二人的首级送到金国。

六月，金章宗完颜璟亲自到应天门，备黄麾仗，接受韩侂胄、苏师旦的首级。金把韩、苏二人首级及画像悬挂、张贴在交通要道，令百姓观赏。然后，漆其首级，把它们藏在军械库，并命令完颜匡收兵，改元帅府为枢密院。遣使到宋归还大散关及濠州。

开禧北伐就这样结束了。

（余日蓉）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北伐更盟》

《续资治通鉴》卷153—卷156

《宋史》：《韩侂胄传》、《杨巨源传》、《丘崈传》、《李好义传》、《毕再遇传》、《吴曦传》、《安丙传》、《方信孺传》。

周密《齐东野语·诛韩始末》

史弥远废立

史弥远（1164—1233），南宋明州鄞（今浙江宁波）人，字同叔。淳熙六年（1179）进士。宁宗时历任太师右丞相、枢密使等职。开禧三年（1207），在杨皇后支持下，杀韩侂胄，向金求和，以后权势日盛。嘉定十七年（1224），趁宁宗病亡的时机，完成了废除皇子竑、拥立新皇帝的重大事件。

宁宗皇帝十七岁娶韩氏为妻，二十七岁受禅当皇帝，婚后十余年不生子。庆元四年（1198），收养了燕懿王德昭的九世孙，年仅六岁的与愿。并于开禧三年（1207）将他立为皇太子。不幸的是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病逝，谥号为景献。

嘉定十四年（1221），宁宗以国嗣（皇帝的接班人）未立，选太祖（赵匡胤）十世孙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者教育宫中。六月命皇侄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观察使贵和人宫，立为皇子，更名竑，进封祁国公。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九代孙希瞿的儿子，过继给沂靖惠王赵柄为嗣子。赵竑风流倜傥，爱好音乐，政治上对丞相史弥远在杨后的支持下，专横国政早就心怀不平。对此史弥远已有所耳闻，所以对皇子也有些不满意。为了刺探皇子行迹，用巨金买来一位会弹奏歌舞的绝色美人，献给皇子。皇子视为贤良夫人，信任不疑，心中所想均与倾吐。有时还将杨后及史弥远的事书写在桌子几案上："弥远当发配八千里。"以表自己的仇视心情。有时看宫壁地图有琼（今海南琼山县）、崖（今海南崖县西北，两地均为宋代流放罪人的地方）二州，对美人说："我若

得志，当置弥远于此地。”有时又呼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不发配弥远到新州，就是到恩州（今广东新兴县和阳江县）。美人把这一切全都转告了史弥远。为了验证真假，七月七日史弥远又进乞巧奇玩，皇子借酒醉全部摔碎。史弥远这才相信美人转告，感到一些恐惧，日夜思谋废立计策。而皇子却一无所知。

史弥远借口为沂王立嗣，劝说宁宗效法高宗选择普安王、恩平王的故事，多选一二人教育宫中，慢慢观察他们的德行智慧，然后择贤而立。优柔昏庸的宁宗皇帝，不但同意了史弥远的意见，还要他代为物色，挑拣人选，这正合了史弥远的心意。

史弥远回到私邸，事有凑巧，家塾中的教书先生余天锡请假回乡参加秋试。史弥远素来器重他为人谨厚，密与他说：“皇上欲为沂王立后，苦无适当人选，你往返故乡途中，留意物色宗室中的优秀子弟。”天锡行抵越州西门（今绍兴市西门），天降大雨，避雨全保长家。当全保长知道余天锡是史丞相家的先生，殷勤招待。余天锡见宴席间侍候的两位少年，人才非凡，问全保长如何称呼，回说：“是我的两个外孙，赵与莒和赵与芮。他们是真正的皇室宗亲，太祖的十世孙。曾请术士批命，也说二子前程远大。”余天锡没等全保长说完话，就高兴地和全保长说了史弥远的嘱托。全保长更是万分高兴，视为天外飞来的奇遇。卖田产为外孙置买衣服鞋帽，会集亲戚朋友特为送行。

史弥远善相人术，见了与莒、与芮十分惊喜，恐怕事情泄漏，命他们暂回故乡。全保长大为羞惭，邻里乡亲也讥笑他大事张扬，太过荒唐。

过了几个月，史弥远对天锡说，可以使与莒来京了。全保长怕再上当，不肯答应。余天锡再三说明原委，才将与莒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史弥远引与莒与宁宗相见，宁宗十分满意，要他改名贵诚，补秉义郎。

贵诚这时年已十七岁，端庄好学，懂文明礼节，入得宫来更

是言行谨慎，举动有度，很受大臣敬重。史弥远不时向宁宗夸奖，贵诚将来必成大器。十五年（1222）五月命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防御使。以赵竑为检校少保，进封济国公。

对于史弥远的废立阴谋，一些大臣也有所察觉。兼宫庭教师的大臣真德秀劝谏赵竑说："皇子若能孝敬母亲，尊敬大臣，就可能当上皇帝，否则那就很难说了！"赵竑根本听不进这逆耳忠言，仍沉醉于美人怀中做他的皇帝梦。

史弥远却加紧了阴谋活动，借为父史浩祈求阴间福分，在静慈寺设立经坛的机会，邀国子学录郑清之登上慧日阁，秘语说："赵竑嗜好声色，担当不了皇帝的重任；沂王嗣子贵诚很为贤明，请你当他的老师，善为教导。事成后，我以相位酬谢，不过事关重大，如有泄漏，我和你要遭灭族之祸！"清之答应。教贵诚学儒家文章，练习高宗书法，不到一年，学问大进。史弥远运用旁敲侧击办法，在宁宗面前诉说赵竑的缺点，大赞贵诚的优点。可惜宁宗始终不理解史弥远的用意何在。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宁宗有病。史弥远就暗中遣郑清之往沂王府，告诉贵诚将立之意，而贵诚却闭口不语。郑清之道："我跟随丞相多年，丞相以知己待我，所以将心腹话要我转告于你，你不答一语，教清之如何汇报丞相？"贵诚这才拱手说："绍兴尚有老母健在，我岂能自作主张？"

初七日，宁宗病势加重，史弥远背着宁宗，假传圣旨，立贵诚为皇子，又更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

十二日，宁宗死于福宁殿，年五十七岁。史弥远遣杨谷、杨石（二人是杨的亲侄儿）二人，将废立的事转告杨后。杨后吃惊地说："皇子是先帝（指宁宗皇帝）所立，那是不能改变的！"杨谷等人一夜往返七次，杨后仍然不答应。杨谷等人跪在地上哭奏说："内外军民，都已归心成国公，若不允许，祸变必生，那就没有杨家的活路了！"杨后无可奈何地问："新立的皇子何在？"

杨谷转告史弥远，宣新皇子进见。史弥远对传命的内侍说："今所宣召。是沂王府中皇子，不是万岁巷中的皇子，你等误宣，立即斩首。"

赵竑此时也闻知宁宗去世的消息，踮起脚在门前巴望，等待宣召。可是宣召的内侍走过门前，对他毫不理睬，赵竑深感疑虑。

赵昀人见杨后，杨后抚着他的肩背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接着令史弥远引赵昀到宁宗柩前举哀。然后才让内侍宣召赵竑。竑奉召，带领从吏人宫，每过一道宫门禁卫便挡驾，不让从吏人内，到宁宗寝殿时，只剩下赵竑只身一人，在柩前跪拜致哀。史弥远命殿帅夏震将他严加看守。然后传命百官立班，听宣遗诏。夏震引赵竑到旧班站立。赵竑说："这时还让我站在这里吗?"夏震假意说："未宣制前当在此，宣制后才可即位。"其实赵昀已经在御座上就坐。即位诏宣读毕，又宣百官拜贺新皇帝登位，竑气愤至极，不肯下拜。夏震用力将他的脑袋按在地上，使其朝拜。紧接着又奉宣遗诏：以竑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

赵昀托赖史弥远扶助当了皇帝，是为理宗。理宗感恩不尽，拜史弥远为太师，进封魏国公。废立大事至此可以说圆满成功。但深谋远虑的史弥远并不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因为赵竑活着，还住在京城。他一方面要理宗封赵竑为济王，离开京城，出居湖州（今浙江境）。另一方面要理宗褒奖老儒，起用一些忠臣，收揽人心。可是人心难收，每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

宝庆元年（1225）正月初九，湖州潘壬与弟丙、从兄甫，对史弥远假传圣旨，擅行废立，十分不平，欲起兵讨伐，立赵竑为帝。赵竑闻知，吓得钻在水洞中，被潘壬找到，簇拥来到州衙，黄袍加身。赵竑哭泣说："若打到京都你等能不伤太后（指杨皇

后）与官家（指理宗）吗?”潘壬答应，并伪造榜文，在城门前张贴，详述史弥远废立罪状，扬言有精兵20万水陆并进。州人一时轰动，黎明观看，只有城内的巡尉兵卒和太湖渔舟。

赵竑得到报告，知道难以成事，急忙与知州谢周卿商议：遣州吏王元春人报朝廷，又自率州兵讨伐潘壬。理宗也派遣殿司将领彭任讨伐潘壬。潘壬改名逃奔楚州（今江苏淮安），潘丙及甫都被州兵杀死。后来，潘壬也被淮右小校明亮捕送临安伏法。

乱事虽平，史弥远的心事却未平。这次湖州之乱，不就是赵竑所引起吗？一定要除掉他。于是制造谎言说济王有病，暗中令余天锡强逼医生到湖州，假称御旨，逼赵竑自缢，却对理宗说是因病死亡。不久理宗追贬赵竑为巴陵郡公，再降为县公。

史弥远虽然完成了废立大事，权倾朝野，却堵不住天下人悠悠之口。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相继奏称赵竑之冤。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真德秀当面规劝理宗说：“陛下登帝位不到一年，在他人的左右下，争夺废立、兄弟被害，对陛下影响十分不利。霅川（又名霅溪，在今浙江吴兴市南）之变，决不是济王本心；事情发生时他吓得藏躲在水洞中，后来又亲自率兵捕讨叛逆，事情始末十分明白。希望有司讨论雍熙（984—987）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太平兴国七年，赵普陷害秦王廷美，流死房州，雍熙元年追封涪王、官其子德恭等），谨慎处理。济王虽然没有儿女，你可以使他传宗接代，也可以使他成为绝户之人。一切都在陛下决断。”还说：“希望陛下能认识到这次错误，好好地修养学习，以赎从前的过失，以收众人之心。”傀儡的理宗岂敢实行，这些言语很快被史弥远闻知，当年十一月贬逐魏了翁，罢免真德秀。理宗为了报答史弥远立己之功，对史弥远惟计是从，任其摆布。

绍定六年（1233）十月弥远病死。理宗开始执政。十一月就贬逐了史弥远的党徒，人称“三凶”的莫泽、梁成大、李知孝的

官；罢免人称“四木”的薛极、聂子述、赵汝述、胡榘的职，对袁韶、赵善湘、郑损等人，也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处罚。

冤假错案很快得到纠正，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今福建境）；魏了翁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知泸州（今四川境）。

济王赵竑之冤也得到昭雪。端平元年（1234），诏复官爵。妻吴氏当了尼姑，名为惠净法空大师，每月给钵钱百贯。度宗时为济王选嗣立后，改封镇王，谥昭肃，赐田万亩，遣吏部侍郎王应麟致祭。

（张永然）

参考资料：

《宋史》：《史弥远传》、《镇王竑传》、《真德秀传》、《魏了翁传》、《恭圣仁烈杨皇后》。

《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

余玠守蜀

蜀，是四川省的简称，也是古代时的国名。西周中期，一位名为蚕丛的首领，始称蜀王。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并于秦。秦于其地置蜀郡。到北宋咸平四年（1001）改郡为路，名为川峡路。不久分置益、梓、夔、利四州路，合称为四川路。因为有“天府之国”的称誉，曾使战事频开，守御任重。

南宋理宗年间，自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队突入四川，绍定四年（1231）掠夺川北140个城寨，杀居民数十万开始，天府之国已成为民不聊生的地区。尤其是宋、蒙合兵消灭金国之后，蒙古更加频繁侵扰掠夺，一些守蜀大员在强敌面前阿谀逢迎，狐假虎威；或是贪生怕死，投降逃跑；或是残酷盘剥，中饱私囊。正如枢密院编修官兼权都郎官何式在淳祐三年（1243）向理宗所汇报的自宝庆三年失关外，端平三年（1236）蜀地残破，至淳祐二年（1242）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使四人，这些大员们争权夺利，各专号令，闹腾得蜀政日坏，民不聊生，及闻余玠入蜀，人心粗定，才有心情从事于农业生产。

余玠（？—1253），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人。出身寒士，因误伤人命，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在抗击蒙古军的战争中，战功卓著，名闻朝野。嘉熙三年（1239）在汴京、河阴战斗中，连获胜仗，升官三级。淳祐元年（1241）援安丰（今安徽境），升淮东制置副使。次年（1242）五月，理宗召见他，他对时政陈述己见。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现在朝野上下有一

种错误的认识，无论你是豪门世胄、文人学士、山乡农夫，一旦入伍当兵，都被讥笑为樊哙一类的粗人。这种重文轻武，对文武大臣不能一视同仁的认识，必然激起军人们的愤怒的对立，这对国家的治理是十分不利的。”理宗听了说：“爱卿的议论很不寻常啊！可以独当一面，留下来我要提拔重用于你。”六月就升余玠为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允许遇重大紧急事情可以与同事商量处理之后再行上报。十二月升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全蜀一切军政事务，权许便宜施行。这是何等的信任！余玠振奋而又鼓舞！

余玠到任后，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改革弊政，使四川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了报答朝廷的知遇之恩，为了四川的治理和对付蒙古军的侵扰掠夺，他一改封建王朝将相称霸一方、独断专行的风气，发动民众，群策群力，奖励出谋献策，建立招贤馆，招贤纳士，选拔人才，任用贤能。

播州（今贵州遵义市）有冉琎、冉璞兄弟二人，有文武才干，却隐居山乡。前后守帅请他们出山，都被兄弟俩婉言谢绝了。当他们见到余玠张贴到山乡的“招贤布告”，又了解到余玠贤明，兄弟俩翻山越江，跋涉数百里路程，来到重庆人府献计。余玠以贵客的礼节相待，安置在礼贤馆中居住。他们泰然寝食，安若无事。哪知过了数月，他们没向余玠献出半条妙计。余玠心中疑惑：“难道是我慢待了他们？”为表自己的诚意，特为准备了丰盛的宴席，亲自招待。吃喝到脸红酒热时，不远千里来献计的众多客人，纷纷竞言各自所擅长的职业爱好，而冉氏兄弟只是喝酒吃菜而已。余玠小声相问，仍是默然不语。余玠说：“你们是不是要看我待士之礼到底如何？”第二天安置兄弟二人住在招待朝廷大员的贵宾馆居住，还使人暗中观看兄弟俩整天在做什么事情。观看的人报告说：“兄弟俩不是相对而坐，用白色土块在地上画些山川城池的形状，就是到外面转转，观看山河城村。”余

玠听了也不理解其中之意。真是光阴似箭，十多天又过去了。兄弟俩要求，只和余玠一人相谈，说："我兄弟有辱明公的礼遇相待，终于商讨出一些有益于治守西蜀的意见，害怕被人讥笑，未敢在众人面前献丑。我们认为治守西蜀的关键问题，是迁移合州城（今四川合川县）。"余玠听了，没等说完就高兴地跳起来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过迁移到什么地方，还没想好位置。"冉氏兄弟说："蜀口（指四川北部）地区论地势险要，都不如钓鱼山（合川县东，三面临嘉陵江），迁移到这一带，选任一名干练的将帅，备下足够的粮食，谨守勿懈，远胜于十万雄师，四川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余玠大喜说："我没看错人。二位决不是一般的贤人智士。先生奇谋，玠不敢掠归己有。"秘密上报朝廷并请求破格提拔冉氏兄弟。于是，朝廷任命冉琎为承事郎，权管合州，冉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余玠将迁移筑城的事宜全权委任兄弟二人负责。任命一下，全府喧哗，众口一辞，山野乡人不可委此重任。余玠听了大怒说："筑城成功就能保卫四川的安全，建筑不成，我一人承担一切罪责，请各位不要横加干预。"冉氏兄弟组织民工筑成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座城池，都以山为垒，棋布星分，分配各郡作为治所（旧称衙门），屯兵聚粮为守城之计。

余玠还整肃军纪，重新设防，调金州（今陕西境）守军到大获，守卫蜀口；移沔州（今陕西境）守军驻防青居；兴州（今陕西境）守军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同防守内水；迁利州（今四川广元）守军驻防云顶，以备外水。这样的布防如臂使指，气势联络，遥相呼应，战斗时既利于指挥调动，又利于相互间的合作和支援，对守卫四川的安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又迁移嘉定（今四川乐山）俞兴人到成都平原垦荒种地，四川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起来。因此，淳祐四年（1244）正月枢密院特就余玠治蜀的情形上报理宗说："四川帅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

效，应按功行赏。”理宗还命余玠报上立功将士的名单，朝廷分别予以赏赐，又命余玠兼四川屯田使。四川军民在余玠的领导下，都在为四川的农业发展、边境安全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统王夔，是个生性残悍、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在汉州（今湖北境）吃了败仗逃回利州后，不是练兵自强，反而更加残害百姓。所到地方劫掠民财，每得富家，用什么“蜈蚀月”、“错系喉”、“干榨油”种种酷刑，非法刑逼财宝，稍不如意就擅杀人命。利州人民苦不堪言，骂他是“王夜叉”。朝廷知道他目无国法，由于山高皇帝远，对他也无办法。地方守帅给他处分，稍有过分或影响他个人利益，他就百般刁难，使你无所作为甚至名誉扫地。

余玠却要老虎头上捉苍蝇，借巡视边备来到嘉定（今四川乐山）。王夔得到报告，为使余玠对他屈服惧怕，精心安排了两种迎接方式，蔑视和威吓。而余玠应对都恰到好处。对着冷淡的、漫不经心的老弱二百人的迎接队伍，余玠既没感到十分难堪，反而以讥笑蔑视的语气说：“久闻都统兵精将强，今天看来都是误传而已！”王夔失态地回答说：“我是怕惊吓了诸位。”只见他一挥手，刹时间吼声如雷，江水如沸，声音刚停止，一座杀气腾腾的圆阵也就布成了。但见旗帜鲜明，器械森然。余玠的从吏人人吓得脸上变色，而余玠毫不在意，驾扁舟一叶，直入阵中。进入都衙后，从容与将士谈话，然后命吏颁赏。这一切都出乎王夔的预料。事后，他对同事说：“想不到书生中竟有这种了不起的人。”

余玠由此证实了川民的传说。欲为川民除去此害，又担心他久握兵权，一旦失手就会危及四川的安全。与亲将杨成商议，杨成说：“王夔久居四川，势力远在以前守边大帅之上，比我们强大。他还把你看作文臣，视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根本没把你看在眼里。今天若是不杀了他，以后养成更大的势力，那时

四川可就真的危险了。”余玠说：“我早就有心杀了他，可是我担心他那众多的心腹党徒发现了会闹事的。”杨成说：“王夔虽是四川有些势力和威名的地头蛇，与吴氏（指高宗时的吴玠兄弟）相比根本不值一哂。吴氏是在国家正当危难时，身经百战，打败了敌人，保卫了四川的安全，相传四世，恩威扬名，根基坚固，以致蜀人知有吴氏不知有朝廷。但是，一旦他们的子孙吴曦做了叛逆，众人就像对猪狗一样毫不顾惜地抛弃了他。而王夔没有吴氏那样大的功劳，却有吴曦一样的反叛之心。只靠他野兽一般的勇猛，不遵法度，纵兵残民，必然激起众怒。又没有吴氏那样得人心，若要杀他，一名有力气的勇士就行了，如果等他闹起事来再杀，那就困难了。”余玠这才下了决心，与杨成计议说：“我夜召王夔计议军事，你可进入都衙安抚他的部众。”王夔接到通知想：有什么大事，深更半夜开会呢？又一想：这是我的地盘，周围都是我的兵马，你余玠这几个人敢把我怎么样！他不带卫兵和随从，一人离营而去。杨成这时也单骑进入都衙，将士们惊疑相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扬成以守帅军令晓谕将士，众人一同拜贺。王夔到达余玠帐中，就被卫兵斩首。杨成又趁热打铁，以法严惩了王夔的几名主要爪牙。四川人民和利州守军从心里感激余玠为他们除此大害。余玠没有把功全归己有，他感谢杨成的帮助，也为了使杨成有更大的作为，推荐杨成为文州（今甘肃境）刺史。

一事刚完，它事又生。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守帅要举荐统制姚世安代替自己的职务，而余玠早就想改变军队中这种歪风邪气，就没有批准戎帅的举荐，还调三千骑兵到云顶山下，命都统金某往代姚世安的职务。姚世安不但不遵军令交出兵权，而且闭关不纳，危言对抗，怀疑余玠有意整他。姚世安为了报复余玠，费尽心血，终于想出了一条门路，求助丞相谢方叔的帮助。余玠对于姚世安的阴谋却一无所知，只集中精力治理四川和抗击蒙古

军队。

再说朝廷为了表彰余玠治理四川的功绩，淳祐十年（1250）十月，理宗颁发奖状说："余玠任职四蜀成绩显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岁丰收，川民乐业，望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特为奖励，进官二等。"十一年六月又下文鼓励："余玠治理蜀地，军纪严明，边防巩固，无论农事战事都卓有成绩。"

余玠没有居功自傲。十二年十月蒙古汪德臣领兵掠夺成都，围攻嘉定，严重地威胁着四川人民的生命安全，四川人民惊慌失措，恐惧不安。余玠亲自率领俞兴、元用兵马，半夜开关突袭敌人，终于打败了围攻的敌兵。十一月捷报传到京城，丞相谢方叔因子侄受到过姚世安的帮助，又加姚世安的重金贿赂，不顾事实，在朝廷散布谣言说："余玠治军无方，使利州守军人心丧乱，如果不去人调解，早晚要发生兵变。"还多次把姚世安的诬告之词报告理宗。理宗对余玠也产生了疑心。

宝祐元年（1253）五月，参知政事徐清叟又火上加油说："余玠专制四蜀，不知事君之礼，手握兵权失去士心，应召他进京问罪。"理宗不问青白，便下令召余玠进京，同时又命知鄂州（今湖北境）余晦为四川宣谕使。余玠得到命令，疑虑重重，郁闷成疾。六月，四川制置司报告朝廷，余玠病重，七月十四日夜间竟然暴死。四川制置司在报告中写道："余玠治理四川有方，因才任用，分工明确。任命都统张实负责军务，安抚王维忠管理财政，监簿朱文炳负责外交事务。各部门的工作都有制度。又办理学校培养人才，减轻劳役发展生产，减少税收发展商业，四川因此富裕起来。自宝庆以来，四川守帅没有超过他的。"可惜的是，他以四川局部的太平自慰，进献朝廷蜀锦，奏章中夸大事实，过分文饰。久据先斩后奏大权，不顾仇怨，没有功成身退，召来坏人诬陷；又设置逮捕惩治贪官污吏的机构，虽有一些廉洁的事情，然而众多的工作职员，难免有不法之辈。因此官吏们多

怀疑虑，恐惧不安。至于姚世安抗拒命令，已经使余玠威名扫地。听到进京的命令，一夜暴死，有人说是服毒丧命。无论是服毒还是病亡，四川百姓无不悲伤痛悼！而朝廷中却有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宝祐二年（1254）六月，侍御使吴燧诬告余玠，家中埋藏有搜刮来的金银财宝等七条罪状，理宗不加审查，就下令抄没家产，罚款三千万。其子余如孙，筹款累年，才得缴足。

余玠这位治蜀功臣的可悲结局，不仅祸及家庭、子孙，还殃及部下。宝祐二年八月，余晦诬告王惟忠通敌，使其党丁大全、陈大方严刑拷打，下人监狱，抄没其家。十月被杀害于都市。同月诏夺余玠资政殿学士职名。

余玠的悲惨结局使将士心寒，军心涣散。不久，全蜀被蒙古占领。宋朝灭亡的命运就不可逆转了。

（张永然）

参考资料：

《宋史·余玠传》

《续资治通鉴》

《纲监易知录》

史嵩之起复

史嵩之（？—1257），明州鄞（今浙江宁波）人。字子由。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绍定五年（1232）任安抚荆湖制置使。掌握一方军政大权后，当年十二月就在襄阳（今襄樊市）擅自接待蒙古使臣王楫，并与蒙古签订合力灭金协议。端平元年（1234）正月灭金后，又自作主张把河南（相当于今河南省和山东一部分）奉送蒙古。六月，朝廷拟收复河南，他极力反对。当朝廷发兵收复汴京、洛阳之后，他又从中破坏，不给前线部队运送军粮。洛阳、汴京守军无粮充饥，无力抗击蒙古军队的围攻，被迫弃城，退回内地，使收复河南的正义战争彻底失败。因此于九月，被停职反省。三年（1236）二月，起任为淮西制置使。嘉熙二年（1238）升为参知政事，三年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督视两淮、四川、荆湖南军马。淳祐二年（1242）进封永国公。理宗对他倍加宠爱信用，激起大臣们的强烈不满。三年，黄涛、刘应起等上书理宗说：史嵩之擅权专政，虚伪狡诈，不可任用。理宗不听。

四年九月，史嵩之父亲史弥忠病重，史嵩之初一日（癸卯）请假，初三（乙巳）史弥忠病亡。史嵩之本应谢绝人事，辞去官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若政事需要，可提前复职，称为起复或夺情（若为孝子，大多不肯起复），这是宋朝时的居丧制度。初四日（丙午）朝廷照例命史嵩之起复。史嵩之闻命即欲应召上任。朝廷大臣对于他的专权，久已不满，因而掀起了一场反史起

复的浪潮！这场反史浪潮酝酿已久，端平元年四月御史王遂说："史嵩之本不会指挥士兵战斗，却吹嘘自己战功卓著，实际他只会搞阴谋诡计，欺骗君王，祸害国家。"朝野上下都希望理宗能罢他的官，流放到边远地区，永不任用。理宗听而不闻。这一次史嵩之父尸未寒就急欲起复，不顾天理人伦，孔圣道德，更使满朝愤慨，群情激昂。以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为代表的一百四十四名太学生上书说："我们听说帝王和父母等同于天地，忠君爱国、孝敬父母没有古今之分。孝敬父母的人，做了官就能忠心于帝王。所以有史以来，忠君爱国的大臣必从孝敬父母的人家中挑选。不孝敬父母就不会成为忠臣。孔子的学生宰我（又名宰予）对守孝三年的制度不满，感到时间太长，应改为一年，孔子批评他没有仁义之心。臣等从没听说过父母有病不回家侍奉，父母死亡也不奔丧回家的人，凡有人心天理的，都不会如此。规定三年守孝，是表示对父母的亲爱之情。凡为人子，都不应像宰我一样，成为不孝的罪人。

"关于起复，圣人经书中没有记载，只是随时应变的礼节，是社会衰败时代出现的。我朝大臣，如富弼（1004—1083），肩召国家安危，进退关系天下命运，是真正的国家重臣，不可一天没有他。起复命令接连下达五次，他都以国家处和平时代不肯应命起复。天下至今赞颂不绝。至于郑居中、王黼之流，不知羞耻，为官贪财，甘心起复，绝灭天理，终于酿成靖康灾祸。无独有偶，往事今又重现。史嵩之是何等样人？他心术不正，行动诡秘。从前在督府掌权时，签订不平等和议，使将士灰心丧气。以重金贿赂，窃取宰相的位置；网罗天下小人结为私党；夺取天下大权，劫掠天下财富，险恶用心不可测知。在朝一日，便给朝廷留下一日的祸害。百姓万口只有一句话：'史嵩之尽快滚出朝廷。'朝野上下都希望陛下能借他守制之机，逐出朝堂，永不任用。陛下会说：这样做，有伤君臣恩义。可这是史嵩之罪有应

得。他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不马上回家守孝送葬；而是往来于朝中，安插奸邪小人于要害。结交贵戚，收买宦官，多方刺探皇上心意。直到断定能得到起复的诏命，才离官而去。如此心机，斥之何惜？

“陛下起复史嵩之，是因为他有扭转乾坤守御边疆的才能吗？没有。他只有控制朝廷的手段。蒙古因内乱、骨肉相残而撤兵，史嵩之却欺骗陛下，说是他打退了蒙古军的侵略，吹嘘只有他自己能抗击蒙古。并以此挟制陛下，服从他的摆布。

“是因为他有经理财政的能力吗？他也没这个能力，他只会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国家财源，以盐粮为重，而利归国家的十无一二，其余都归了个人。国家的土地天天减少，而史嵩之个人田宅却天天扩大；国家的财政日见困难，史嵩之的钱袋天天增多。陛下眷留史嵩之将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害处。

“史嵩之不顾一切地活动起复，说有史弥远的先例可以效尤。史弥远死的是庶母不是嫡亲；史嵩之死的却是亲生父亲。史弥远先奔丧而后起复；史嵩之是先谋起复而后才去奔丧。史弥远虽不愿离职，顾及人之常情，于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为庶母守丧，到二年五月才得起复；史嵩之对父亲的死亡，却是欺上瞒下，丧尽天良，不愿尽一日之孝！

“史嵩之为求起复，费尽了心机。当丞相时，他的父母已是八九十岁的年纪。自知死亡在即，就为起复制造舆论，寻找根据，做起复的充分准备。负责京城后勤的并不缺少人选，却要起复刚刚守孝的马光祖。能够胜任京口守卫的人很多，却要起复送丧未终的许堪。邻里编了十七字的断尾歌讽刺说：‘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大街小巷的平民百姓都知道史嵩之的用心，难道陛下就不知道吗？台谏官员不愿说，因为台谏是他的爪牙；给舍不愿说，因为给舍是他的心腹；侍从官不愿说，因侍从是他的左膀右臂；执政不愿说，是因为执政是史嵩之

的羽翼。史嵩之深知，提拔奸臣作为喉舌，就不会发生阳城毁麻之事；安插私党占据要害部门，就不会发生吕惠卿反咬一口的错误。

“自古大臣，被宠爱到三代人以上，就会亡人国家，汉朝的王莽、曹魏的司马氏就是这样。自史浩以后，史氏掌握军国大权，已经三世（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军队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周围的亲随侍官也是惟知有史氏。陛下孤立在上，太可怕了！如今他遇丧事，是天欲除去史氏，而陛下却要留他，堂堂中国，就没有正人忠臣，惟独相信一个小人而不醒悟？这是陛下必欲断送太祖（赵匡胤）三百年天下于史氏之手而后已。

“臣见起复史嵩之的麻制上记载：‘赵普是宋朝的开国丞相，朱胜非做丞相是在绍兴的困难年代，他们都能随机应变，立下大功。’史嵩之虎踞相位时，不要人们谈论边防军事。通州（今四川境）失守，一月后朝廷才知消息；寿春（今安徽境）有警，直到十分危急时才向朝廷报告。现在他为了起复，秘密传告亲信大臣，虚张边防危急的声势，挟制陛下听从他的摆布。五刑有三千条，不孝的罪恶最大，即使让他受刀斧之刑也难平民愤；他怎能与赵普、朱胜非二位贤相相比呢！

“我等与史嵩之没有个人间的私仇怨恨。之所以向陛下议论他的奸心，都是为陛下考虑，为纲常（即三纲五常）社稷进忠，也为尽臣子的责任。我等久受教育，知而不说，丧失人伦道德，与史嵩之还有什么区别呢？惟望陛下裁决！”

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寶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校教授卢钺，相继上书请求，理宗都没有答复。大臣徐元杰入朝面陈，要求理宗答应学生请求，并保护学生们的忠义行动。左司谏刘汉弼也人朝陈奏起复有害的理由，理宗才有所感动。史嵩之自知众怒难犯，勉

强上书请求为父守制。十二月，理宗批准史嵩之的请求，命范钟、杜范为左右丞相，起用元老大臣，朝廷一时有了些新气象。不料杜范在相位八十日就死去了。

淳祐五年（1245）六月，大臣徐元杰拜见范钟，范钟设午宴招待。下午归家时又到检察院刘应起家商议明日朝奏事情，徐元杰已感腹中难受，当晚到家，寒热交作，至夜四鼓，手指脚指暴裂，惨叫数声而死。次日，朝中士绅和三学诸生吊唁时，见尸体惨状惊惧伤泣，并上书说："历朝以来，小人陷害君子的方法是：流放到蛮烟瘴雨的边远地区，使其触冒烟瘴死去。如今蛮烟瘴雨已不在岭海，转在朝廷，望陛下明断。"理宗闻告说："徐元杰前日还侍立朝堂，没听说有病，怎么死的这样急呢？"令临安府查办此案。不久改由大理寺办理。并命殿中侍御史郑寀临督审案。大理寺正黄涛说是中暑而死。徐元杰的儿女直谅、直方请斩黄涛，说他假报案情。可谁人敢判？终于不了了之。不久，刘汉弼因为请除朝廷中的奸邪小人，又以肿疾暴亡，太学生蔡德润等173人，跪倒宫门上书喊冤。有人说右相杜范也是被人毒死。朝中哗然，官吏恐慌，一时间无人敢到食堂进餐。究竟是何人下毒，又无法确定。史嵩之的侄儿史璟卿，早先以书劝谏史嵩之要忠君爱国，退小人用贤臣。他不但不听，反而怀恨在心。史璟卿恰在这时中毒死亡。由此查出下毒是史嵩之主谋，由范钟暗中所为。谁敢把他们怎样呢？

六年（1246）十二月，史嵩之守制期满希望复职，理宗也有起用意思。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论说："史嵩之无父无君，名声败坏，行为肮脏恶劣，罪该诛死；不杀他已是不该，怎能让他进宫复职？臣以为应将他流放边远地区。"理宗不听，还以反对他的旨意，于七年（1247）正月罢了他们的官。此举，并未使大臣屈服。翰林学士李韶与同官抗疏说："春秋之初，郑庄公无君无亲，孔夫子并没有因为他是侯王

就不加笔伐。今陛下不能纠正奸臣的罪行，过错不在你一人。百官执事不能帮助天子惩治犯罪，我们也有责任。这种事件在春秋时就是不能赦免的罪行。请陛下以此为榜样，尽快作出对史嵩之的处理决定。”理宗在众大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谏下，终于悔悟，让史嵩之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

史嵩之终为公论不容，在家闲居长达13年之久，宝祐四年(1256)八月死亡。理宗封他为鲁国公，谥忠简，为避家讳改谥壮肃。恭帝德祐初(1275)因徐元杰的儿子、右正言徐直方的奏请，诏命除去谥号。

（张永然）

参考资料：

《宋史》:《史嵩之传》、《徐元杰传》、《刘汉弼传》。

《续资治通鉴》

《纲监易知录》

董宋臣、丁大全宠幸

董宋臣是南宋理宗时的宦官，人称董阎罗。善于逢迎拍马，诱使理宗奢侈享乐，颇受皇帝宠幸。

理宗后宫贾贵妃于淳祐七年（1247）去世，在董宋臣的帮助下，阎婉容得封贵妃。阎贵妃为报答董宋臣的帮助，时常在理宗面前赞赏董宋臣忠心任事，不辞劳怨，由此得到理宗的信任。

宝祐三年（1255）正月，董宋臣为了使理宗欢心，特意把西湖妓院里的妓女召进宫中，让她们陪同理宗欢度元宵之夜。起居郎牟子才上章说："元宵张灯搞得这等侈靡，已是不该。又使倡优等下贱之人，竟陈奇技淫巧，献笑于御前。这些低下淫荡的活动有污宫廷禁地。都是董宋臣之辈有意要破坏陛下的德行。前不久，冬季里天有雷声，必是上天震怒。愿陛下及早觉悟，疏远小人，亲近君子，天意才有转变的希望。"理宗表面听从，宠信董宋臣却是依然如故。监察御史洪天锡又奏道："如今天下祸患有三：一是宦官，二是外戚，三是小人。"接着以董宋臣、谢堂、厉文翁为例，把他们的罪恶痛陈一番，请求理宗治罪。理宗命吴燧再三劝解，洪天锡力争，不肯让步，说道："如今贵戚、幸臣，作奸犯科，不把纲纪国法放在眼里，又彼此盘根错节，互相回护，今日若不绳之以法，气焰更加高涨。他日酿成大祸，再加制裁可就来不及了。"理宗不得已，亲自写了手札，要洪天锡把奏章中过激的语言改一改，自己定会当面训斥、管教他们。洪天锡道："自古奸邪虽然都仰仗人主的宽纵，但是做了坏事，仍然害

怕人主知晓。倘若知道人主知晓他们做的坏事只不过将他们训斥、管教一番，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连上五次奏章，表示若不惩治这三人，决不甘休。要么制裁三人，要么处分他洪天锡滥奏之罪。跪到都门以外，等待朝廷降罪于他。理宗不得已，将厉文翁、谢堂贬为州县官，董宋臣也请求贬黜，但理宗怕洪天锡等人不肯放过他，竟不敢将董宋臣的奏请转交外廷。理宗下诏书对洪天锡道：“你弹劾三人，其中二人朕已将他们治罪，只余董宋臣一人，朕也不会放过他，你总该消消气了吧。”洪天锡道：“陛下若留董宋臣，臣当贬出京城；若以为臣言有理，留臣在京城供职，就该将董宋臣贬逐出京。望陛下早做决断。”理宗满口答应，其实是敷衍了事。过了一月多，天降一场浊雨，沾衣后尽是泥渍，那时说是“天雨土”。按《洪范》推五行，占卜吉凶，天雨土表示有小人作乱。洪天锡借机又大做了一番文章，把蜀中地震、闽浙大水灾等事也联系在一起，说阴阳不和是君子小人不辨造成的。“如今天下穷困空乏，远近百姓人人怨毒疾恨，只有贵戚、宦官数十人安享富贵，难道陛下只与这数十人共享天下吗？”恰在这时，有吴中百姓仲大论等人状告董宋臣抢夺霸占他们的田产。洪天锡身为御史，受理此案。将案子交给有关官员审理。不久，御前提举所呈文说，该田产为御庄所有，不属民事诉讼，不应该由御史台审理；仪鸾司也牒告常平司，说此案是由差役引起，应由常平司受理。洪天锡奏道：“御史台职在雪平冤狱，常平司职在均平徭役。而御前提举所、仪鸾司均是宦官主持的部门，竟敢对御史台、常平司的事务说短论长，若如此，内外台省还有何用？还有纲纪国法吗？”又说这是为董宋臣开脱罪责。又把董的罪恶痛斥一番。理宗仍有意替他遮掩，洪天锡道：“宦官主持的修内司，职务不过是在宫中修缮房屋罢了。近年来，动辄打起‘御前’的幌子，无论是贼污狼藉的老吏，天下缉捕的凶犯，只要一入修内司，官府便动他不得。以致其中藏污纳垢，狡

猾者献谋，横暴者出力，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干了许多坏事。受害的无非是陛下的善良百姓，陛下怎能毫不动心？但愿不要让史官记述说：'修内司的恣横自陛下临朝时始。'"洪天锡一连上了六七道本章，最后将御史印上缴朝廷，表示再不惩治董宋臣等宦官，他这御史的官儿是无颜做下去了。要皇上抉择：是为民除害，还是轻视给舍台谏官，轻视朝廷百司庶府，爱重北司。北司就是宦官衙门，是董宋臣把持的机构。理宗当此情势，颇觉为难，大有鱼与熊掌，不能得兼的意味。衡量再三，还是决定不要言官，要董宋臣。于是改任洪天锡为大理少卿，不再做言官，等于封了他的嘴巴。宗正寺丞赵崇嶓闻讯，写信责备丞相谢方叔连这种事也熟视无睹，对洪天锡不加救援，此后朝廷之上还有什么真理、正义之可言？董宋臣的党羽立刻上奏说："原来谢方叔是洪天锡的后台，怪不得赵崇嶓要他出面救援。"监察御史朱应元上书不仅攻击谢方叔，连参知政事徐清叟也一并弹劾。这一次理宗倒是十分痛快，立即罢了谢、徐二人的官。董宋臣仍不解气，厚赂言官、大臣，上书诋毁洪天锡、谢方叔，必要将二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同时还要让天下人知道，宰相、御史置官都是出自圣裁，是皇帝一个人的主意，与他们宦官无关。幸好宋朝皇上有不杀宰相的祖训，谢方叔被去一切职权后，给了个提举洞霄洞的散职。

理宗还有一个幸臣丁大全。此人是嘉熙二年（1238）进士，镇江府人。长了一张蓝瓦瓦的脸膛。相法说，这种相貌的人大都奸险狠愎。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就有这么一张脸，是入了奸臣传的。凑巧，这丁大全也像卢杞一样奸险狠毒。他娶了一个外戚的婢女做妻子，算是做了"皇帝国戚"；又巴结上了宦官董宋臣、卢允升，从此便官运亨通，不数年做了侍御史兼侍读，成了皇上的侍从官。时右相董槐，自以为受皇上知遇之恩，只要对国家有利，无所不言，无所不为。曾对皇上说："如今天下危害朝政者

有三件事：一是皇亲国戚不奉国法；二是执法大臣在位太久，擅作威福；三是皇城司和将帅不约束士卒，士卒多横蛮不法。亲戚不奉法则法令轻，法令轻则朝廷没有威信，执法大臣擅作威福则贤不肖混淆，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无忌惮，贤者不肯为朝廷所用；士卒横蛮就会发生叛乱等变故。这三事不加纠正，就会朝政日废，愿陛下好自为之！”皇上没有“好自为之”，倒是他将大臣得罪了一大片，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等无不暗恨这个多管闲事的右丞相。这时，理宗皇帝已五十多岁，年事已老，久居皇位，独断惯了，不愿听人教训他的话，对那些只说笑话，善于插科打诨的狎客，或者是善解人意、看风使舵的佞人，倒是颇为欣赏。而丁大全正是靠这些本事千方百计与皇上喜欢的各种人建立联系，借以窃取权柄，理宗毫无觉察。丁大全也曾想打董槐的主意，因为他身居宰相职位，举足轻重，对他大有用处。先派一个亲信去见董槐，表示了愿与董槐定交的意向。谁知董槐道：“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人臣无私交的话？我只知道替皇上做事，不敢与人私相结交。请你把我的话转告丁君，多谢他的一番美意了。”丁大全讨了这场没趣，料想以后有事，他决不会对自己通融，从此想方设法搜集董槐的短处，一心将这块绊脚石搬掉。董槐也深知丁大全不是善良之辈，一有机会便向皇上进言，说明丁大全的为人。皇上道：“丁大全从没有说过你的坏话，你何苦这样对他？不要再疑神疑鬼的了。”董槐道：“臣与大全无怨无仇，只是因为陛下将臣从众人中选拔出来，委以如此重任，倘若明知丁大全奸邪却闭口不言，是辜负了陛下对我的信任，对陛下不起。如今陛下既以为丁大全是忠臣，而臣以为他是个奸邪小人，怎能再与他同殿称臣?!”于是上书请求辞职，要告老还乡。理宗没有批复。丁大全听到消息后，对董槐恨之入骨，便上书弹劾董槐，不等皇上批示，擅自以御史台的公文调京城戍兵百余人，带着兵刃，半夜里闯入董槐宅院，将董槐抓了。说是要送他到大理寺听审，想以此

吓倒董槐。董槐自是丝毫不惧，欣然允诺，要与丁大全到大理寺公堂上分辨曲直。这帮人自不敢与他对簿公堂，一哄而上，将董槐塞入一座小轿，抬了直出北门而去。出了北关，将董槐赶下轿子，又一哄而散。堂堂宰相就这样被扔在了荒郊。董槐只得步行回城，走到接待寺时天已大亮。折腾了半宵，又饿又累，便到寺中暂歇，想找人入城报信，只望朝廷派人来接。谁知不久朝廷将他罢相的制书就颁布下来了。宣制时无人接旨，众人才知董槐先已遭了侮辱。丁大全竟敢如此跋扈，朝廷内外，无不骇然。从此，丁大全更加骄横，胆子越来越大了。时朝中还有个右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都是咬人不叫的"闷狗"。人们便把他们三人名字中的"大"字上加了一点，变成个"犬"字。称他们为"三不吠犬"。

丁大全有阎妃、董宋臣、卢允升为后台，虽不过是条狗，升官还是升得飞快。赶走董槐不久，就升了右谏大夫，又进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跻身于执政行列。旋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宝祐六年（1258），真拜参知政事。四月升右相兼枢密使。常言说"物以类聚"。这样的宰相，倚用的人不问可知。他曾荐拔袁玠为九江制置副使，此人与丁大全一样既狠且贪。到任后，看中了鄱阳湖上土豪的财富，率意刻剥，逼得土豪无路可走。适逢北兵入侵，众土豪渔霸便尽力用渔船帮助北兵渡江。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陈宗六人闻讯，联名攻击丁大全。丁大全嗾使御史吴衍，劾奏六人妄言乱政，遂使六人削籍，送远州拘管。且立碑三学，严戒诸生不得妄议国事。此时阎贵妃仗恃理宗宠信掌握全权，丁大全、马天骥在朝用事，南宋朝廷还有什么希望？有无名氏在朝门上题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宝祐六年（1258）召任牟子才权工部侍郎，子才却因丁大全与董宋臣里应外合，浊乱朝政，极力求辞，不敢上任就职。

开庆元年（1259）正月，国子监主簿徐宗上书："赏功罚罪，是国家的纲纪。……今通国所以失去赏罚大权的关键在丁大全、高铸之徒，而首恶则是董宋臣。近来大臣们愤慨上章，学生们敲打宫门询问，甚至有人想借尚方宝剑为陛下除恶。而陛下却放在一边不管不问，难道你真的要爱护这些人而伤害千万人的心吗？今天下的形势十分危急，朝廷的纲纪已坏，危害国家的首恶不诛杀，前方战士就不会勇敢杀敌。东南之一角地盘，一半就会坏在这些人的手中。"

九月边防报告天天传进京城，而且是一天紧似一天。蒙古兵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临安震动。董宋臣主张迁都四明（今浙江境）逃避敌人进攻。军器大监何子举对吴潜说："若皇上迁都走开，京城里上百万的老百姓靠谁来保护？"御史朱貔孙也说："皇帝后妃的车驾一动，守卫三边的将士就会军心丧乱，土崩瓦解，四方的盗贼就会蜂涌而起，是不可这样的。"恰在这时皇后也请求理宗留下来以安民心军心，理宗这才没有接纳迁都的主张。海宁（今浙江境）节度使判官文天祥上书，请求将董宋臣斩首示众，以安军民之心。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理宗对董宋臣的宠幸。十月在台谏官一再弹击下，免去了丁大全的宰相官职，党羽也渐被贬逐。但因董宋臣无恙，朝中仍是万马齐喑，无人敢言。只有太学诸生与学官间或上书论奏，但是谏章朝上，贬书夕至，竟是谁也动摇不了理宗对董宋臣的宠幸。

景定元年（1260）三月，出现日蚀，王府教授、校书郎马廷鸾与秘书省同守局，相与草书上奏。时贾贵妃得宠，其弟贾似道权势渐重。不数日，就将董宋臣送于安吉州（今浙江境）。董宋臣虽然出居安吉州，因党徒很多，在朝廷还有相当势力。新任丞相贾似道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许干涉朝政，董宋臣所推荐的林光世等也被逐出朝廷。六月阎贵妃死亡。不久丁大全在贬逐途中，被押送官毕迁挤入河水中淹死。

四年（1263）召回董宋臣，命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引起满朝争论。秘书少监汤汉上章奏说：“近些年来董宋臣的声威炙手可热，废黜台谏官员，排斥朝中大臣，结连奸邪小人。臭名远扬，朝野尽知。陛下明见，送他到外地。臣以为形体灭了，影子也就会没有了。谁能想到却是明灭而暗凝，冰解而再聚呢？……自古小人奸臣再度出任掌权，其害更大，后果更惨，他们会以复仇的心理，啸聚同党，颠倒宇宙。陛下的神威就会扫地，行动就会受到阻碍，结果是十分可怕的！”可是理宗根本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著作佐郎文天祥上书辞职，表示决不与董宋臣同朝办事，文天祥出知瑞州。

五年（1264）六月，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马院、御前酒库。理宗对他的宠爱信任一如既往。直到死去，又追赠为节度使。

（张永然）

参考资料：

《宋史》：《宦者四》、《贾似道传》、《丁大全传》、《马廷鸾传》等。

《续资治通鉴》

襄阳守城

襄阳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西北方向一千五百多里的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对，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它西连川、陕，东邻两淮，南接湘、赣，北通豫、鲁，是守卫南宋国土的重要门户。绍兴四年（1134），岳飞率军攻占襄阳，作为反攻中原的基地，进兵收复了唐、邓（今河南唐河县、邓州市）、随（今湖北随县）、郢（今湖北钟祥）等大片国土，使南宋获得了数十年的安定局面。历史证明，有襄阳则有南宋，襄阳亡则南宋亡。所以，南宋末年蒙古欲灭亡南宋，双方便在襄阳展开大战。

理宗端平三年（1236）三月，京湖制置使赵范守襄阳，信任蒙古降将王旻、李伯渊、樊文彬、黄国弼等人。宋军将领不平，两军发生一场大的械斗，蒙古降将王旻与李伯渊率兵纵火、焚烧城郭仓库，投降蒙古。宋军将领李虎等又乘火劫掠。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城高池深、户口日多，官民已达四万七千多人，库中所贮财物粮食，不下三十万，军器约二十四库，金银盐钞还不在内，如今尽为灰烬，襄阳成了一座空城。直到嘉熙三年（1239）三月，孟珙与蒙古三战才又收复襄阳诸城，并上书说："守卫襄樊的关键问题是要有足够的兵力，襄樊是保卫朝廷的大门，没有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就不能保卫襄樊的安全。"理宗得书，命孟珙可便宜行事。于是孟珙编蔡州（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西南）降人为忠卫军，襄、郢（今湖北钟祥）降人为先锋

军，分别选择险要地势驻扎，从此襄阳的防守才巩固起来，使襄阳城维持了将近三十年的太平。对于襄阳的战略地位，蒙古人也有明确的认识。蒙古襄阳军马万户李桢对定宗说："襄阳是江、浙和四川之间的重要关口；是宋的咽喉之地，是我们消灭南宋的重要基地。"

蒙古为了尽快实现他们消灭南宋的阴谋计划。景定二年（1261）世祖忽必烈编造谎言说：南宋扣留我派去和谈的使臣，还不断侵扰边境。事情曲直十分明白，各大臣要我举兵南伐。为两国的生灵考虑，以前我没有答应，现在是时候了。希望各位整顿士卒，磨砺刀枪，练好兵马，等到秋高马肥的时候，我们水陆并进，向南宋兴师问罪。景定三年（1262）七月，南宋叛将刘整献计给忽必烈说：用金玉贿赂宣抚使吕文德，要求在襄阳城外建筑一个商场。忽必烈按计照办。派遣使臣，赠玉带给吕文德说："南人不讲信用。安丰（今安徽寿县）等处商场，时常被盗贼偷窃，希望能同意我们建筑土墙保护货物。商场建成对双方都有利益。"吕文德同意后，请示朝廷，开商场于樊城之外。蒙古便筑土墙于鹿门山（今襄阳城东南），外通互市，内筑军营，在白鹤山下另筑一座军营，使襄阳南北运输受到控制。还时常在襄阳城外操练兵马，显示军威。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识破了蒙古建立商场的阴谋，但为时已晚。

度宗咸淳三年（1267）八月，蒙古都元帅阿术突袭襄阳，入南郡，取仙人（地名）、铁城等寨，俘获五万余人。夜晚用伏兵大败宋军，杀伤一万多人。长达五年之久的襄阳大战从此开始。

宋廷得到报告后已是十二月份。命吕文焕改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驻守襄阳。

四年（1268）六月，阿术报告忽必烈：骑兵不适应水上作战，应当派遣汉军（汉族人组成的军队）攻打襄阳。八月，忽必烈命刘整为都元帅与阿术共同主持军务。九月，刘整到达军营与

阿术商讨策略说："宋军擅长水上作战，我们学他们的长处，训练水兵、打造战船、建筑环卫襄阳的营垒。"他们来到虎头山（原襄阳县南），阿术指着汉水以东的白河口说："若在白河口筑垒，断宋粮道，襄阳就不难攻取。"遂督兵兴役，筑城白河口。吕文焕看到蒙古的军事部署，感到恐惧，遣人以蜡书求告兄长吕文德，文德回书鼓励说："即使敌人筑了营垒，也不用多虑。襄樊城池坚深，粮饷储备可供十年食用。叛贼刘整敢攻打襄樊，你坚守到过完新年，待春水一涨，我顺流来援，刘整可能就会逃走呢！"文焕无奈，只好练兵坚守。十一月，出城袭击蒙古军沿山各寨，被阿术打败，损伤严重。

五年（1269）正月，蒙古遣史天泽等增兵围攻襄阳。天泽来到襄阳城下，添筑长围，自万山（原襄阳县西）至百丈山（原襄阳县南）驻扎重兵把守，使南北不得相通。又筑岘山（原襄阳县南）、虎头山为一字城，联络每个营垒。这种围困封锁的办法，使襄阳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三月，蒙古又分兵围困樊城，筑寨鹿门。京湖都统张世杰，本蒙古将张柔从子，跟随张柔守卫杞州（今河南杞县），有罪投奔吕文德。文德见他忠勇过人，收留军中，提拔为都统制。命他率兵往援樊城，至赤滩圃（今襄樊市东南）为蒙古兵阻挡。两军激战，世杰孤军深入，难以取胜，只好败退。而度宗直到这时才得襄樊告急的报告，欲命高达援救襄阳。守将吕文焕以俘虏的几名哨兵，假报大获胜仗，使朝廷停止了援兵。到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汉水上涨，分遣舟师，出没东岸林谷间。蒙古帅阿术望见，对将士们说："这是兵书上所说的疑兵，不应与战。我料他必来攻新城，且调集舟师，专行等候便了。"蒙古围攻襄阳，共筑十城，新城是其中之一。等到第二天清晨，夏贵舟师进入新城，刚到虎尾洲，蒙古水军两路杀出，截击夏贵。夏贵不意敌兵突至，仓皇失措，不能抵抗，掉转舟头急奔。蒙古万户解汝楫追杀一阵，夏贵军战船 50 艘被敌俘

获，士卒淹死水中很多。都统制范文虎率舟师救援夏贵。正遇败退的夏贵。蒙古兵追杀过来，范文虎本是个没用人物，见蒙古兵这般强悍，吓得胆战心惊，忙乘轻舟逃走。吕文德闻援师连败，这才认识到允许蒙古建筑商场的错误，悔恨说："我实误国，悔已无及了。"不久病死。他的女婿范文虎逃回京城，贾似道升他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兵。

六年（1270）正月，调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转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救援襄樊。范文虎恐庭芝得功，自愿再援襄阳，送书给贾似道说："提数万兵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我不能听命于李庭芝的领导。若得托恩相威名，平敌获胜，大功当尽归恩相。"似道大喜，即提出文虎一军归枢密院领导，不受李庭芝指挥。李庭芝多次约会范文虎进兵，文虎只推说没接到圣旨，自与宠爱的妓妾踢球玩耍，朝歌夜宴，任情取乐。左丞相江万里，屡请增兵救援襄樊，起居郎兼吏部侍郎王应麟上言说："国家安危所依靠的是长江天险，而襄樊则是长江的咽喉，不能放松。可是朝廷从容如常时一样，错过时机。襄樊一旦被敌占领，那时还有安全可言吗？"贾似道不予理睬，仍在华堂锦帐中，寻些风流快事，甚至累月不朝。度宗接知襄樊求援急报，屡催他入朝议事，似道拖延不至。一次，似道与群妾斗蟋蟀，方在拍手欢呼时，忽报钦使到来，似道转喜为怒道："什么钦使不钦使？就令御驾亲来，也须等我斗完蟋蟀。"很久才出见钦使，似道答允明日入见。第二天入朝，度宗安慰他一番后说："襄阳被围，已近三年，如何是好？"似道佯作惊奇地说："北兵已退，陛下从何处得此消息？"度宗说："近有女嫔说及，朕所以召问师相。"似道不禁懊恼，半晌才答道："陛下奈何听一妇人？难道举朝大臣，都无耳目，反使妇人先知道么？"度宗不敢再说什么。似道查出多言的女嫔，诬她有暧昧情事，硬要度宗将她赐死。度宗无奈，只好令女嫔上吊自尽，之后边防形势更加危急，宫中再无人敢于进言。

十月，贾似道命范文虎统殿前司两淮各军，往救襄樊，襄樊虽已被围，尚有东西两路可通，城内守军，幸免冻饿。十二月，蒙古将张弘范献计史天泽说："应筑城万山，断绝襄阳西路；立寨灌子滩，断绝襄阳东路。东西阻隔，困死城内守军。"史天泽依计而行，襄樊更加困难。

七年（1271）四月，范文虎与阿术等，在湍滩大战，失败后统制朱胜等百余人被蒙古俘虏。六月，文虎带领卫兵及两淮舟师十万进至鹿门。蒙古帅阿珠在汉水东西列阵，别令一军赴会丹滩，攻打前锋。文虎督着战船，逆流而战，极为不利。蒙古军顺流冲击，文虎军大败而逃。所弃战船军器，不可胜计。

李庭芝闻知文虎失败的消息，上书承认是自己的错误，还请求选贤能代替自己。有诏不允许，还命令他驻军郢州。八年（1272）五月，庭芝侦知襄阳西北，有水名青泥河（今湖北谷城县南），命就河中筑造轻舟百艘，每三舟联成一舫，中间一舟，装载兵器。两旁舟有篷无底，重赏招收善于游泳的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三千人，用张顺、张贵为统辖。二人都有智勇，很为民兵所敬服，张贵号矮张，顺号竹园张。二人奉命，便号令士兵说："此行是九死一生，你们若有怕死的，可以退伍回家，不要败坏我们的事情。"三千人，人人奋勇。正值汉水上涨，顺流发舟百艘，由团山进高头港口，联结方阵，午夜三刻，拔锚起船，用红灯为号，张贵先发，张顺继进，乘风破浪，直入重围。至磨洪滩，敌兵布舟断江，无法前进，张贵令顺率领善泅水士兵，自船底下水，就波流中斫断敌舟铁链，再凿通敌舟船底，敌舟半解半沉，元兵十分惊惶。张贵乘势杀开血路，边战边行。黎明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军民欢欣鼓舞，大开城门迎接援军和物资。这时唯独不见张顺，数日后有浮尸漂水面，身被甲胄，手执弓箭，正是张顺，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城中军民惊以为神，结冢殓埋。

张贵进入襄阳，吕文焕想留下与其共守襄阳。张贵奋然道："孤城无援，不战也死，看来只好向范统帅处求救，等援军到来，内外夹击，或可退敌。"文焕也无词可说，令张贵设法求援。八月，张贵募得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付以蜡书，令泅水送给范文虎。范得书，答应发兵五千，驻扎龙尾洲，以便夹攻，仍令二士持书回报。张贵得到回报，九月辞别文焕东下，检视部队登舟，独缺一人，是有罪被鞭打过的卫兵。张贵大惊道："我谋被泄，应赶紧起行乘敌未备突破重围。"举炮发舟，鼓桨破围，乘夜顺流冲断拦索，竟然杀出险地。驶至小新河，遇到截击的敌船，张贵正指挥战斗，看见沿岸火把明亮，光烛天空，隐隐见有来船，已近龙尾洲，以为是范文虎援军，喜迎向前，谁知来船都是敌船，是阿珠、刘整两军杀来。躲避不及，已被困在核心，全军被杀。张贵身受数十处枪伤，力尽被捕为敌杀害。原来范军未到龙尾洲，因风狂水急，退屯三十里。阿术得到逃卒密报，抢先占据龙尾洲，以逸待劳，擒杀张贵，强逼四名降卒抬着尸体到城下示威，呼叫守兵说："认识矮张都统吗？"守军见是张贵尸体，无不痛哭失声，守兵丧气。吕文焕斩四降卒，将张贵与张顺合葬一起，建立双庙祭祀忠魂。

九年（1273），襄阳已被围五年，樊城也被围四年了。襄樊两城，本相倚为犄角，中隔汉水，文焕为防敌人偷渡，植木水中，锁以铁链，上造俘桥，以利往来援兵。敌帅阿珠督兵将植木锯断，并用斧劈开铁索，毁坏浮桥，文焕不能往援。阿术又用兵拦截河道，防备襄阳援兵，分出精锐部队进攻樊城。城中支持不住，敌兵破城而入。守将范天顺仰天叹道："生为宋臣，死为宋鬼。"遂悬梁自尽。副将牛富率敢死士兵百余人巷战，敌兵死伤无数。牛富等渴饮血水，转战而进，遇着火倒塌的房屋，身受重伤不能再战，以头触柱，赴火捐躯。副将王福见牛富壮烈牺牲，哭着说："将军为国而死，我岂可独生？"也赴火而死。襄阳失去

犄角，处境更加困难。守军拆屋作薪，把纸币缝在一起当作衣服。二月，吕文焕登城巡察城防，南望痛哭，期望朝廷援兵。贾似道至此，再也瞒不过去，上书自请防边，暗中令私党上章留己，监察御史陈坚等说道："师臣行边，顾襄就顾不了淮（指淮河地区），顾淮就顾不了襄，不如居中调度，较为得当。"度宗接收陈坚建议，留似道在都。贾似道仍然坐葛岭，在半闲堂歌舞淫乐，把襄阳置之度外。

襄阳愈加孤危，吕文焕朝夕登城，防守不懈。一天，刘整在城下劝降，文焕不与多言，暗令弓弩手瞄射刘整，正中右肩，幸亏甲坚未入，未能射死。接着阿尔哈雅（又名阿里海涯）用西域人所献的回回新炮法，移攻（因樊城也是新炮所破）襄阳，连弹施放，一炮击中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守卒多越城出降。刘整欲立破襄城，人擒文焕，报一箭之仇，阿尔哈雅道："且慢！待我再去招降。他若怕死投诚，何必多害生灵。将军不应记仇，彼此各为其主，何必计较呢？"言毕，招呼文焕道："尔等拒守孤城，至今五年，为主效力，也是应该。如今势穷援绝，城中数万生灵跟着受苦，若能纳款出降，全部赦免，不予治罪，而且还加提拔，这是我主的诏命，由我代宣，决不相欺。"文焕有些疑虑，阿尔哈雅见状，折箭与誓道："我若欺骗你，有如此箭！"吕文焕开城出降。至此襄阳保卫战已告结束。

襄樊失守，元军由汉（汉水）人江（长江），顺流而下，直取南宋京城，不久南宋被元灭亡。事实又一次证明了政治家们"襄樊失，南宋亡"的判断是正确的。

（张永然）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卷112—125，卷167—177，卷178—180。

《纲鉴易知录》

贾似道误国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是理宗贾贵妃的弟弟，南宋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年轻时就不走正道，每日出入妓院娼馆，夜晚游荡湖上。理宗一晚凭高远望，见湖中灯火辉煌，对左右说："一定是似道与妓女游乐湖中。"第二天一了解，果然没错。理宗命京尹史岩之去教训似道，岩之为讨好贾妃，报告理宗说："似道年少贪玩，但很有才气，将来会有大作为。"理宗信以为真。贾似道从此扶摇直上，不到30岁被任为湖广总领。30多岁升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宝祐二年（1254），升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连丞相董槐也惧他几分。四年升任参知政事。贾贵妃于淳祐七年（1247）去世后，朝中大权已落在："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的手中。这四人是害人有术，治国无方。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军攻宋，势如破竹。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后，朝野一片惊呼声。右丞相丁大全把紧急边报当作无事，不上报朝廷。结果相职被罢，改判镇江府。任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命各路出师，大出内府银币，犒赏军士。令贾似道进军汉阳为鄂州外援，并于军中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等似道行至汉阳，鄂州副都统张胜已经战死。幸好各路援军都已到达，城池才没失守。不过各路将帅都轻视似道。如襄阳都统高达，对部下说："他峨冠博带的像个人模狗样，实际上只会玩妓女，懂得什么军事，也敢来督视军马？"因此每次出战，必请贾似道向士兵

慰劳，不然就命士兵哗噪军门。曹世雄、向士璧一切军事行动都不向他请示汇报。只吕文德逢迎贾似道，动不动就训斥部下说："宣抚使在此，你等怎敢喧哗?"因此贾似道暗恨高、曹、向，视吕为心腹。似道见各路援兵到齐，正要出击敌人，朝廷传来命令，令贾似道移军黄州防守。

黄州在鄂州下游，正是两湖及江西的战略要地，不易防守。已有朝廷命令，只得冒险前往。统制孙虎臣率精骑送似道至葵草坪，侦察骑兵报说："北兵（即蒙古兵）来了!"贾似道吓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说："怎么好？怎么好?"虎臣说："使相不必着急！待末将去挡他一阵!"似道支吾说："你……你要小心!"虎臣本是有名勇将，毫不畏怯，前去迎敌。似道慌忙说："死了死了！可惜死得不明白。"黄昏时，侦骑来报："孙统制大获全胜，已先往黄州，迎候使相入城。"似道转忧为喜，连夜赶入黄州。孙虎臣汇报说："北兵只是一些老弱残兵，劫掠民间，由叛将储再兴为首领,现已擒住，候使相发落。"似道高兴地称赞了虎臣几句，命带入储再兴，摆了一番威风，斥骂几句才命推出斩首。贾似道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鄂州、潭州接连传来紧急警报，蒙古军又扬言兵发牛头山，直趋临安城。贾似道惊恐万状，十一月擅自做主，密遣宋京入蒙营求和。条件是蒙古军不再进兵，愿划江为界，称臣纳币，每年奉银、绢各 20 万。蒙古统帅忽必烈不肯应允，遣还宋京。

蒙古宪宗皇帝在这时死于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境)。合州(含四川合川）守臣王坚命阮思聪兼程来鄂，传告消息。似道将信将疑，再令宋京人蒙军营中求和，忽必烈仍不允许，部下郝经说："决不能错过了回国奔丧，夺取帝位的机会!"这才允许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忽必烈传令各路大军退兵回国。贾似道用刘整计，在白鹿矶渡口袭击敌人。蒙古兵无心恋战，火速飞渡，宋军攻断浮桥，殿后士兵一百多人。

景定元年（1260）三月，贾似道上表说：在他的指挥下已大获全胜，北兵逃命回国。江汉肃清，国家危而转安！理宗览表大喜，以有再造宋室江山的大功，令他还朝。当贾似道将到临安时，命文武官员到城外"郊劳"迎接，以示敬重。四月，理宗手令表扬说："贾似道像我的左膀右臂一样，担当重任，毅然拒绝敌人议和的要求，奋不顾身，英勇抗敌，保卫了百姓的生命，对王室的功劳也有同于再造。"特进封为少师、卫国公。其他人员也都论功行赏，满朝庆贺！理宗还要趁大庆的日子，立定太子。贾似道却利用昏君对自己的无比信任，官报私仇、排除异己。

左丞相吴潜是真正的忠臣。为了战略防御的需要，曾调贾似道防守黄州。而贾似道却认为是吴潜要置他于死地。就借吴潜不同意禥[①] 为皇太子，迎合理宗心意，暗中令侍御史奏请说："立忠王为皇太子是众人希望，吴潜一人不同意，居心难测。请以贾似道为左相。"理宗罢了吴潜，命贾似道以左相位专朝政。似道马上申请立定太子。六月，理宗立忠王禥为皇太子。

景定元年（1260）五月，忽必烈取得了蒙古皇帝的位置。七月，以郝经为使臣入宋通告，并催促实践和约等事。贾似道正令门客廖莹中等撰写"福华编"，颂扬鄂州大功，忽然接到宿州（今安徽境）报告：郝经南来，已使副使何源、刘人杰请示人国日期。似道想：郝经人都，求和之事，肯定败露，一切都完了。马上命人止住郝经。郝经却不甘心，写书给三省及枢密院，言词动人，情真意切。似道接了郝经书，深感事情难办。时元平章政事王文统欲谋害郝经，阴使降将李璮攻宋。李却以京东地降宋。贾似道仍借此诬郝经，说是他带兵攻宋。密令真州（今江苏仪征）忠勇军营，拘留郝经。理宗不知怎么听到了蒙古使来宋的事

① 理宗子夭亡后，再没男婴出世，就以弟与芮的儿子作为皇子，赐名禥，封永嘉郡王，越年封忠王。

情，对似道说："北朝使来，应该与议。"似道说："和议出于他们，不应轻易允许所请。若以交结邻国的目的而来，再让他入见不迟。"理宗没再追问，贾似道的奸谋又得成功。为防万一，贾似道又把理宗宠信的内侍董宋臣贬出京城。这时，阎贵妃已经去世，就严令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子弟、门客也不许在朝干政。台谏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为讨好贾似道，凡是贾似道的异己，不论官位多高，忠奸与否，一律罢免。朝廷内外大权，一切收归贾似道一人掌握，为所欲为，无所顾忌。

景定二年六月，贾似道命人逼死曹世雄、向士璧，罢斥高达。潼川（今四川三台县）安抚使刘整深感兔死狐悲，为求活路，把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十五郡、三十万户的版图，献给蒙古。

贾似道仍不知收敛，又借会计边费为名，诬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守边大吏侵掠、盗窃、藏埋国家资财，将他们罢官索偿。又将合州守帅王坚降知和州（今安徽和县），王坚愤而死。对这些理宗都毫无察觉，仍是一味地宠任贾似道。

八月，忽必烈以宋拘留使臣，接纳叛将李璮，破坏和约为理由，决定发兵南下攻宋。贾似道不以为意，仍要置旧相吴潜于死地。三年六月，命武人刘宗申把贬谪循州（今广东惠阳）的吴潜毒死。至此贾似道恨解仇消，却又生了聚敛天下财富的思想。正愁无计，适巧，于四年二月，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向贾似道献出买公田的计策。似道以为妙计，要理宗颁命实行。

一年多后，已是天怒人怨。五年七月，一个硕大的彗星夜四更时出现东方，日高方灭。朝廷官员纷纷上书，赵景纬说："百姓之心，即天心也。公田派买不均，下违人心，上违天意。"牟子才请停止买公田，更改七法。平民百姓也上书说："公田害民，致遭天变。"临安府学生叶李、肖规指名说："贾似道专政，误国

害民，以致上天谴责。”贾似道大怒，命人刺配叶李至漳州（今福建境），肖规至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刑罚吓不倒正人君子。秘书郎王应麟又论公田之害，建宁府学（今福建建区民县）教授谢枋得，摘似道政事为问目，其中有：“权奸专国，天心怒，地气变，民心离，人才坏，敌兵必至，赵氏必亡。”等语。似道令左司谏舒有开，诬枋得诽谤朝政，犯了大不敬罪，贬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公田之害未了，贾似道又请行经界推排法，凡江南土地，尺寸都有租税。并大量印造银关，用纸票代银，使民力更加困难。

十月，理宗病死，太子即位，是为度宗皇帝，改元咸淳。度宗以自己得为皇帝，功出贾似道，为报答他的恩德，授为太师，封魏国公。每当似道入朝，必起坐答拜，称为使臣。朝臣都称“周公”。似道以首相资格，主持办完理宗丧事和度宗即位大典后，于咸淳元年（1265）三月，莫名其妙地要弃官还越，却又密令吕文德假报蒙古兵攻下沱（今湖北枝江东南）甚急。朝中官员万分惊慌，度宗请似道入朝，贾似道装模作样，不肯答应。度宗与谢太后亲出手令恳请，这才答应入朝。他一入朝，“进攻”下沱的蒙古兵自然不击自溃了。

二年正月，又以解职还乡要挟度宗，急得度宗向他下拜。参知政事江万里拉住度宗说：“自古到今，没有君给臣下拜之理，陛下不可这样。似道也不可一再言去。”似道恨万里多嘴，下殿，举笏（大臣朝见皇帝时，手中拿的一种特制板子）谢万里说：“要不是参政指点，似道将成千古罪人。”更使贾似道怀恨的是，度宗在讲席上时常向他提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贾似道是一个也答不出，每次都是万里代为解答。度宗对夫人们说起，夫人们当作笑料传播。贾似道恼羞成怒，阴谋将江万里逐出朝廷。而江万里早知似道阴谋，先后四次上书要求退职。度宗无法，任命他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

三年二月，贾似道又故技重演，要回家养老。这时他不足五十五岁，根本没有资格养老。他十分清楚，忽必烈于景定二年八月发兵南下，“兴师问罪”，节节进逼，这时已开始增兵战略要地襄阳。许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曾明确说过：“襄阳失，南宋亡。”所以，他急着要退职养老。四年五月，又变了个花样，要求病退。昏庸的度宗皇帝，在他要求养老时已经动员满朝大臣请求他留下，而且授他为平章军国重事，三天上一次朝，在都堂处理公事。赐给西湖的葛岭为宅地。这一次已无可再封，只好痛哭流涕地苦苦哀求。贾似道深知他已完全控制了度宗。

贾似道在葛岭，纠集天下能工巧匠、珍奇材料，大起楼阁亭榭。建筑“多宝阁”，收掠天下奇宝。他了解到已故四川守余玠有一条玉带，陪葬埋人坟中，就令人掘墓取带。在精美典雅的“半闲堂”里，将自己的塑像，安置在神坛上，请来道士捧经礼忏；青楼舞女及庵院女尼，只要有几分姿色，都召人堂内，供他淫污。即使是宫女也不放过。宫女中有个叶氏，妙年佳秀，就被他弄入堂中，充作“小星”。度宗虽然知晓，也拿他没有办法。贾似道召集旧时赌友，从早到晚，赌博玩耍。男女混集，淫声浪语，不堪人耳。当初还五日一上朝，就便到都堂小息，把内外要紧公文，约略浏览；后来就深居简出，所有军国重事，令堂吏送人半闲堂，委托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代为办理。但是朝中官吏的升迁贬逐，台谏审案，交通运输一切事情都必须向他报告请示。朝中忠臣勇将、正人君子被他排斥已尽：太常寺主簿陆逵被害死，右丞相叶梦鼎被迫单车逃走，左丞相江万里罢职，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王应麟忧愤自去；六年三月，文天祥被排斥出朝。一班贪官污吏拉拢关系，相互提携，行贿受贿，成为风气。守帅、监司、郡守不顾国法，侵盗国家财宝，送礼贿赂。对于边防急报，置若罔闻，知而不报。守卫襄阳的吕文焕危在旦夕，立等援军到来。他哪知朝中文武大臣，争权夺利，朝歌夜舞，贾似道

已是整月不朝。度宗听说襄阳急报，几次请他入朝商议，他一直托词不理。一天，贾似道与群妾斗蟋蟀，正斗到热闹处，忽报钦使到来，原来是度宗听一宫嫔林氏说襄阳被围很长时间了，危在旦夕，贾似道强逼度宗将她赐死。可怜一个红粉弱女，因为关心国事，无端丧了性命。从此再也无人敢在度宗面前谈及政事。朝廷内外只知有贾似道，不知有度宗。

八年九月，度宗有事于明堂，命似道为大礼使。礼毕到景灵宫，适逢大雨，贾似道要度宗等到雨停了，再坐车回宫。偏偏大雨滂沱，越下越大。胡贵嫔的哥哥显祖跟随侍候，对度宗说："请如开禧故事，还是坐逍遥辇回宫吧。"度宗问："恐怕平章不允许。"胡显祖瞒哄说："平章已允许了。"度宗才坐辇回宫。贾似道知道后，立时大怒。对度宗说："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要我知道，我还干什么呢?"说完大步出朝，直向嘉会门外而去。度宗惊惶万状，婉言慰留，贾似道执意不肯，这固然是要挟度宗，此外还由于贾似道知道近年来襄阳战况吃紧，他又回天无术，急于找个借口，体面退出这场灾祸旋涡。襄阳战况是：自咸淳五年襄阳告急，群臣大多主张命高达率军前往应援，御史李旺劝贾似道勉从众议。贾似道说："我用高达，吕文德兄弟怎么办?"李旺叹息说："吕氏安，则赵氏就危险了!"襄阳守帅吕文焕也不愿要高达援助襄阳，他的门客献计说："要阻止高达来很容易。朝廷以为襄阳危急才派他来，我们只要以守城得胜的消息报告朝廷，高达就不会被派来了。"恰好刚刚捉了几名哨骑，文焕即以大胜利报告朝廷。面这时朝廷并没有急于援襄的意思。

五年（1269）十二月，吕文德悔恨地说："误国家者我也!"疽发背面死。贾似道把他的女婿范文虎提升为殿前副指挥使，总领禁兵。

六年正月，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这时援助襄樊的夏贵、范文虎都被蒙古军打得大败，听说李庭芝来，范

文虎给贾似道写信说："我愿领兵数万支援襄阳，一战即可打退蒙古军的围攻。但我不能听从李庭芝指挥，倘若事情成功，都归功于恩相的指挥。"似道随即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使其为难庭芝。庭芝多次约会进兵，文虎都以没有圣旨为辞，不予理睬，只与妓妾击球宴饮取乐，致使李庭芝失去多次战机，无所作为。十月，又命败将范文虎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往襄樊备御，赐犒赏士兵钱一百五十万。

七年四月，范文虎军战败，统制朱胜等一百多人成了蒙古军的俘虏。六月，文虎率兵及两淮舟师十万，大败于会丹滩，文虎乘夜逃跑，战船武器损失殆尽。

度宗对这些是一无所知，为了能留住似道，罢了胡显祖的官，并哭泣着把胡贵嫔送入尼姑庵做了尼姑。度宗自少淫欲过度，体质极差，所以即位后就以国事托付贾似道。此时，怕他逃走，加派侍臣日夜看守着似道的住宅。贾似道无法，只好答应留下。

八年底，襄樊守卫已经困难到极点，贾似道在举国一致责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做个姿态，上书自请兵，援助襄樊。仍暗中使台谏官员上书，要求留他在朝中。九年正月，樊城失守后，他又上书申请救援襄阳，度宗让公卿大臣讨论。监察御史陈坚等都说："师臣出兵援襄阳就照顾不到淮地，援淮地就顾不到襄阳，所以师臣不如居中指挥天下。"度宗哪能不同意呢？二月，守帅吕文焕举城投降元军（蒙古于1271年迁都今北京，建国号"元"），襄阳失守，消息传到朝廷，贾似道对度宗说："臣自襄阳被围时就请带兵防边，陛下不准臣离开朝廷，若早听臣的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即使如此结局，也是臣上下调度，联络气势的结果，不然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人降城失，还要说大话吹牛。度宗不知细情，信以为真，还说："师相怎么能一日离开我呢！"似道请建机速房，改革枢密院漏泄军情，延误边报的缺点。

这都是做样子给度宗看，欺骗度宗而已。六月，刑部尚收兼给事中陈宜中说："襄樊失守，都是由于范文虎怕死逃跑，请求斩首。"贾似道不允许，止降一官。监察御史陈文龙说："文虎失襄阳，又使知安庆府，这不是罚而是升赏。赵溍乳臭小子，不能当守帅，都应罢免。"似道大怒，罢免文龙。太府寺丞陈仲微仅在上书中说："襄阳失守……君相当分受其责……改正错误，天下事还是有希望的。"也被似道罢免为提点江东刑狱。

十年（1274）正月，贾似道母亲死，埋葬后即命他起复。六月，元帝忽必烈命将率兵南伐，历数贾似道负约、拘留郝经等罪。这时的贾似道抵抗无力，求和不得，被迫应战。七月，年仅35岁的度宗就做了"花下之鬼"（死于过度的性生活），贾似道又立只有四岁的㬎即帝位，是为恭帝。贾似道独掌朝廷军政大权，置南下的元军于不顾，依然歌舞湖山，粉饰太平。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指出："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仍酣歌深宫，啸傲湖山，虚度时光。"似道得书大怒，抛到地上说："瞎贼，如此狂言。"立刻将汪罢斥。

十二月，元军占据汉阳、鄂州，南下元军已成直捣临安之势，宋廷震惊。朝中群臣和三学生，都一致要求师相贾似道督兵迎敌。似道无法，只好应允。命令各路军马，开府临安，令孙虎臣总统各军，黄万石等参赞军事。又命天下勤王。是时已是咸淳十年的暮冬，似道仍在葛岭私第中，与妻妾等围炉守岁，还是花团锦簇，酒绿灯红，快快活活地过了残年。

第二年即是帝㬎即位的第一年，纪元德祐。宫廷中照例庆贺，热闹非常。当晚，就有警报传来，黄州降、江州（今江西九江）吕师夔降、安庆范文虎降，……贾似道得报十分苦闷，吕、范都是他的心腹爱将，竟是如此不争气。正在此时又得报：元将刘整死于无为军中。似道转忧为喜说："上天助我，岂容错过。"

德祐元年（1274）正月，贾似道抽各路精兵13万，装载金

帛辎重的船只与战船相接长达一百余里。传令大小官吏：小事自己决定，大事须先请示而后施行，不得擅专。以亲信韩震为后军，总领禁兵，统领浩浩荡荡，好不威风！说是要抗击元兵，谁知刚到达芜湖（今安徽芜湖市），即派人联系叛将吕师夔，请代为调和，吕没敢贸然答复。

二月，淮西制置使夏贵请见贾似道，还送上书信一封，信上有"宋历只三百二十年"语，似道低头不语，心想夏贵也不可相信。还是瞎子汪立信忠勇。即命他为江淮招讨使，令就建康（今南京）召集新兵。立信到芜湖请命，似道拍着立信后背说："悔不用公言，以致如此，现在该怎么办呢？"立信说："今江南已为元兵占据，无一寸干净土，我要找一块赵家土，死得分明，不失为赵家忠臣！"立信辞别后，似道自知不妙，想重演开庆故技，派宋京至元营请求称臣奉币。元军统帅伯颜不答应，并进攻池州(今安徽贵池县)。知州王起宗弃城逃走，通判赵昴发夫妇为国尽忠，都统张林献城投元。贾似道闻池州失陷，命孙虎臣领精兵七万驻防池州下流的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市东北)。夏贵领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领后军驻扎鲁港（今安徽芜湖市西南)。元军炮击虎臣，宋军动摇，虎臣首先带着爱妾坐小船逃走。士兵哗噪说："步帅逃走了！"宋军大乱。夏贵妒忌虎臣职位高于自己，不愿出力，驾小船冲向似道坐船，说："敌多我少，抵抗不住！"似道惊慌失措，忙鸣金收兵，退驻珠金沙，损失惨重。孙虎臣见似道，拍胸痛哭，说："我的士兵无一人奋勇杀敌。"夏贵微笑说："我从前与敌血战，也常这样。"贾似道说："说那些有什么用，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夏贵说："我军士兵已被元军打的失魂落魄，不能再战了。师相只有速入扬州，招集失散的败兵，迎驾海上，我在淮西死守。"会商毕，解舟自去。贾似道与孙虎臣单船奔向扬州。第二天，败兵蔽江而下。贾似道命人扬旗招集士兵上岸，非但不听，还有的恶语谩骂，贾似道束手无策。

贾似道率领的十三万精兵强将，几乎全军覆灭；数千艘战船和金帛辎重也全被元军夺去。贾似道败逃扬州，传命各郡到海上迎驾。又上书要朝廷迁都。而江汉守臣闻知贾似道惨败，不是弃城逃命就是献地投降，谁还管你什么命令传文。

朝中众官得知贾似道的失败和迁都逃跑的主张，怒火万丈。三月，陈宜中、陈过、潘文卿、季可等人纷纷上书，请朝廷严惩贾似道及其党徒。太皇太后说："似道勤劳三朝，不忍因一朝错误，严置重刑。"只罢免了平章、都督的职务，废除贾似道施行的各种错误政策，如将公田退还田主，放还流放贬谪的人员，追复吴潜、向士璧等人的官职等。又刺配翁应龙至吉阳军（今广东崖县西北），罢刘良贵、廖莹中、王庭、陈伯大、董朴等官。

七月，三学生及台谏侍从连章请诛似道，太皇太后仍不允许。似道也上表请求保全，还说自己是被夏贵、孙虎臣所害。误国到如此地步还不认罪，把罪责推向他人。好心的太皇太后为使他躲一躲风头，命李庭芝送似道回老家为其母守丧终制，不知好坏的似道却赖在扬州不回。王爚论说："似道既不为国尽忠，死于战场，又无人心为母尽孝，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应当严加责罚。"及命令下去，似道才动身回老家绍兴。绍兴守臣不让他进城。王爚又对太后说："本朝权臣祸害国家，从没有如似道这般利害。官吏草民，累书弹论，陛下统搁置不行，如此不惜人言，将何以谢天下？"太皇太后这才降贾似道三官，居住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婺人闻似道到来，急贴露布，要将他驱逐出境，不准居留。监察御史孙嵘叟等又以似道罪恶重大，处罚太轻，应当斩首以正国法。方回又上书论贾似道十大罪恶。朝廷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贬似道于建宁府。建宁府的人们说："建宁是朱熹讲解道学的地方，三尺童子都知道忠孝节义，闻似道的名字，都感恶心呕吐，哪能让他到这里来呢！"在朝野上下官民强烈要求下，朝廷不得已将他革职放逐循州，家产充公。

福王与芮向来痛恨贾似道，要找一个能够在押送路上杀死贾似道的人。会稽县尉郑虎臣为给父亲报仇，自愿请行。贾似道住在建宁府开元寺中时还有侍妾数十人。虎臣到后，全都放走了，路上使他曝行在秋日下。到福建漳州木绵庵后，虎臣问贾似道说："我为天下人要杀死你，你还有什么说的吗?"贾似道摇头不语，众人将他拉杀致死。

贾似道掌权三朝，欺骗横行了三朝。南宋元气大伤，似道死，南宋亡，是必然结果!

参考资料：

《宋史·贾似道传》

《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

临安陷落

襄樊失陷后，宋廷在长江上游的屏藩出现了一个大缺口。虽有长江之险，却很难抑制住元军的攻势了。其后长江上游、中游各重镇依次陷落，朝廷所在的江南也在元军北部和西部的两面进逼下沦陷，均与此有关联。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元主忽必烈下诏，兴“问罪之师”，水陆并进，大举攻宋。元军二十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浩浩荡荡出发了。他们分为两路：一路由伯颜与阿术率领，从襄阳沿汉水入长江，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另一路由博罗欢率领，自东道进攻扬州，以降将刘整为先锋。

宋将张世杰集中了汉水沿岸九个郡的精兵，在郢城设防。伯颜带兵绕过郢城，进攻沙洋，俘获守将王虎臣、王大用。继而攻克在汉水南岸的新郢，进至蔡店。

宋将夏贵率舟师分据汉、鄂一带各要地，阻挡元军。伯颜挥师接近阳逻堡，知此堡坚固难攻。但不将其攻克，大军将难以渡过长江。伯颜便派阿术带铁骑三千，乘船趁黄昏逆流而上，在距阳逻堡四十里的青山矶强渡长江。宋荆鄂都统程鹏飞前去迎战，失败而逃。阿术遂建起浮桥，挥师跨过长江，获宋军战船千余艘。得知阿术渡江成功，伯颜即命部下猛攻阳逻堡。此时，宋军军心大乱，未能守住该城堡。伯颜渡过长江，与阿术会师。在汉阳的夏贵得到元军渡江的消息，大惊失色，匆忙带战船三百艘顺流东逃。伯颜笑着对左右说：“我本想派使者将阳逻之捷告诉宋

人，现在夏贵逃跑，正可以起到我的使者的作用。”

元军乘胜进抵鄂州（今湖北武昌）城下。鄂州全恃汉阳为屏蔽，现在汉阳已为元军所有，又没有援军，鄂州成了元军围困的孤城。城中的程鹏飞、张晏然自忖不能坚守，只好献城投降。

鄂州一失，南宋朝廷更慌了手脚。权臣贾似道迫不得已，硬着头皮领兵迎战。他仍幻想与元军议和，派宋京前往元军军中，以称臣奉岁币为条件，请求停止军事行动。但伯颜给予的答复是：“未渡江时，议和人贡则可；今沿江州郡皆为我所有，你们可来投降，别提议和！”

德祐元年（1275）二月，贾似道派精兵在池州（今安徽贵池）下游的丁家洲迎战元军，被元军打得大败，贾似道逃奔扬州。元军所向披靡，一时沿江各地宋军土崩瓦解。镇江（今江苏镇江）、宁国（今安徽宣城）、隆兴（今江西南昌）、江阴（今江苏江阴）等地的守将，皆弃城逃去，太平（今安徽当涂）、和州（今安徽和县）、无为军等地守将，相继降元。

贾似道束手无策，即上疏请迁都，廷臣意见不一。时朝廷诏令各地勤王，诸将多不至，仅鄂州都统张世杰、江西提刑文天祥率师赴难。张世杰人卫京师后，迁都之议始息。

贾似道误国，民愤极大，被罢官，贬黜循州，途中被押解人杀死。

这年七月，忽必烈命令伯颜直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阿术进攻淮南，阿尔哈雅取湖南，宋都木达和李恒等攻江西，形成对临安大范围夹击的势态。

文天祥到达临安后，被任命知平江府。赴任前，他上疏认为：宋朝衰弱，关键在于没有得力的藩镇做屏藩，以致于敌人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如人无人之境。现在应在全国设四个征镇，分别置于长沙、隆兴、番阳、扬州，各自负责所在区域的抗敌事宜，中央则设都督，统御四镇。但文天祥的这一建

议被朝中大臣视为迂阔，未被采纳。

尽管元军节节胜利，但仍遭到了宋人的顽强抵抗。阿术兵临扬州城下，派降臣李虎持招降书入城，劝守城的李庭芝降，庭芝杀之，并派总制张俊出战，不料张俊反持叛臣孟之缙的招降书，回城劝降。庭芝大怒，焚其书，将张俊枭首示众。部将姜才率军出战，在三里沟打败阿术，乘胜追至扬子桥，双方夹水列阵。元将张弘范带十三骑渡水冲击姜才军，毫无效果。张弘范便佯退，引诱姜才部将回回跃马挥刀追杀，并用回马枪将其刺死。元军乘势进击，打败姜才，姜才退回扬州固守。阿术久攻扬州不下，便从扬子桥至瓜洲筑起一道长长的木栅，隔绝扬州城与外面的联系。姜才一度出兵二万人趁夜黑袭击扬子桥木栅，但交战不利，损失万余人。

在焦山（位于江苏镇江长江边），宋将张世杰、刘师勇和孙虎臣等，也与元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水战。宋军动用战船一万余艘，每十只船连为一组，用沉入水中的大铁碇将其固定在江中间，以示决一死战。但张世杰这一部署束缚了宋军的手脚，当阿术派一千名善射的士兵分乘两艘巨舰从两翼向宋军发射燃烧箭、自己又带主力乘船从中间进击时，宋军船只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燃起了熊熊大火，诸军拼力死战，终难持久，遭到惨败。宋军虽败，但将士们奋勇争先、视死如归的精神，颇为时人所赞叹。元昭文殿大学士姚枢即这样对忽必烈说："伯颜率师攻宋，西起蜀川，东至海隅，降城三千，降户百万，速度之快，自古罕见。然而，常州一城，久攻不下；扬州、焦山诸役，宋人殊死作战，我军虽胜，但伤亡亦多。宋朝亡国已成定局，而临安也不会轻易被攻破。因此，不能光靠武力征服，还须尽量采取招降纳叛的手段，平定宋土。"

姚枢提到的久攻不下的常州，确实是元军进军临安的一大障碍。自德祐元年夏天到秋天，元军一直未能将其攻占。十月，伯

颜分兵三路：右路由阿喇罕率领自建康（今江苏南京）出广德（今安徽广德），趋独松关；左路由董文炳率领，以降将范文虎为向导，出江入海，取道江阴，趋澉浦（今浙江海盐西南杭州湾北岸）；伯颜自己则率中军，以吕文焕为向导，进攻常州。三路兵马定期会师临安。

常州告急，宋廷急调张全带兵二千前去救援，文天祥也派部将尹玉、麻士龙和朱华率三千士卒随行。然而，张全不与尹玉等人合作，致使两支军队各行其事，不能协力退敌。麻士龙率军在虞桥与元兵接战，兵败被杀，张全见死不救，退还五牧。当时朱华屯军五牧，他建议在该地掘沟堑、设寨栅，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但张全不同意。不久，元兵到达，朱华率军与之交战多时，胜负未分。天黑后，元兵绕过朱华军，进攻山后的尹玉军。张全与尹玉隔岸相望，竟不发一矢，坐观虎斗。尹玉力战，杀敌千余人，终遭败绩。众败兵争相渡河，河中有张全部下的军船，入水的士卒纷纷用手抓住船舷，而张全下令部下挥刀斩断挽船者的手指，以致水中的士卒溺死不少。尽管局势严峻，但尹玉没有退却，收集残兵五百余人，继续与元军死战，自夕达旦，直至力屈被俘遇害，部下也全部殉难，无一人投降。

援军未能挡住元军，固守常州的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和刘师勇等，并不气馁，坚持抗敌。伯颜派人招降，遭到拒绝。他便役使城外居民，运土筑垒，甚至于连人一并筑入土中，还杀人煎油以润滑火炮。面对元军的残暴行径，守城军民斗志更坚。伯颜叱令诸军四面并进，日夜攻城不断，激战二日，攻破城池。姚訔战死，陈炤、王安节等犹进行巷战。有人对陈炤说："城北东门尚未被敌军围堵，还可从那儿冲出去。"陈炤断然拒绝，说："离城一步，就不是我的死所了。"最后，陈炤阵亡，王安节被俘，不屈而死，仅刘师勇率八骑突出了重围，奔往平江（今江苏苏州）。

就在伯颜攻打常州的同时，进攻广德四安镇的元军也频频得手，长驱而入。临安为之大震。右丞相陈宜中仓皇失措，匆忙征兵，城内凡十五岁以上男子，皆入伍，组成一支“武定军”，保卫京城。文天祥也匆忙从平江带兵回京护卫。

进攻江西的元将宋都木达也所向披靡，连克十一座城池。当他兵逼抚州（今江西抚州西）时，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不是组织人马抗敌，而是率先逃奔建昌（今江西南城）。都统密佑没有随黄万石逃跑，他率军迎战元军，虽陷于重围，身中四箭三枪，犹挥双刀勇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宋都木达佩服他的勇猛，欲招降他，关押月余，威逼利诱，密佑终不屈。宋都木达又让密佑之子去劝说道：“父亲若死了，叫我这做儿子的依靠谁呢？”密佑厉声喝斥：“你到街市上去行乞吧，只要说自己是刚直不屈的密都统之子，谁不会同情你！”他面不改色，最后毅然走上了刑场，连在场的元兵也为之动容，泪下沾襟。

不久，独松关又被元将阿喇罕攻破，临安危在旦夕。文天祥认为，目前淮东仍未完全被元军攻占，闽广之地亦完整无缺，应该用在临安的勤王之师三、四万人与元军决一死战，如果获胜，则命淮师截断元军归路，那末，国家仍有复兴的希望。张世杰和秘书监陈著等皆赞同其议，而丞相陈宜中不敢冒险，认为王师务必持重谨慎。他仍抱有和谈的幻想。

德祐元年十二月，宋廷派柳岳奉书前往无锡面见伯颜，请求议和，遭到拒绝。宋廷又卑躬屈膝，追封吕文焕的兄弟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并任命文德之子师孟为兵部侍郎。因吕文焕已降元，成为伯颜攻打南宋的向导，宋廷希冀通过吕文焕促成和议。

面对伯颜咄咄逼人的攻势，平江通判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不敢抵抗，遂献城投降。两天后，宋廷再次派柳岳、陆秀夫、吕师孟入平江，向伯颜求和，表示宋廷愿向元朝称侄纳币，后又进而降格愿对元朝自称侄孙，并请吕文焕从中斡旋。但这一切均无

济于事，伯颜坚持要使宋朝亡国。因此，其后宋廷再度降格，表示愿向元朝奉表称臣，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仍遭回绝。

元军节节胜利，不少将领要求尽快赴临安，掠夺财宝。郎中孟祺对伯颜说："宋人除了向南逃窜外，别无选择。如果我军进逼太快，对方逃窜也就急切。一旦他们混乱不堪，必然使临安遭到破坏，宋朝三百年来的宫廷财富积蓄，也会尽数散失。不如缓一些进军，以免对方惊惧不安。"伯颜说："你的话正合我意。"他一面遣使人临安去安抚宋人，一面缓缓地前进到皋亭山，与阿喇罕、董文炳会师。他的侦察兵则已到达临安北关。

此时，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已经陷落，宋湖南安抚使李芾死难。临安城内不断接到凶信，人心惶惶。朝中一些执政大臣，如参知政事陈文龙、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以及常楙、夏士林等，先后不辞而别，各自逃命了。丞相陈宜中也手足无措。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人海避敌，自己率众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同意。文天祥率群臣人宫请迁都，谢太后不同意，他便恸哭以请。黄昏时，太皇太后不得已而命准备行装，却迟迟不见陈宜中人宫，遂未成行。

数日后，陈宜中请谢太后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奉传国玺，向伯颜乞降。伯颜接受了传国玺，并遣使召陈宜中出议投降事宜，宜中不敢往，于当晚趁黑逃往温州。

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大将见朝廷不战而降，非常愤慨，各自带兵离去。张世杰行至定海，元将让降人卞彪前去劝降，世杰误以为卞彪是来投奔自己，非常高兴，设宴款待。酒过三巡，卞彪言及降事。世杰这才知道他的来意，不禁大怒，拔剑割了卞彪的舌头，并将其斩首。

伯颜坚持要宋朝执政大臣出来面议降事。德祐二年正月乙酉，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三天后，文天祥与左丞相吴坚等奉命前往元军营中议和。文天祥侃侃而谈，言辞锐利，出乎伯

颜意料。伯颜便遣返吴坚等人，而留文天祥在军中，天祥十分恼怒，数次要求离去，但被软禁。

二月，伯颜奉元主命，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派蒙古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事。又令程鹏飞取太皇太后手诏，谕各州郡降附。诸执政除家铉翁外，皆在檄谕上签了名。阿喇罕、董文炳、张弘范等入临安，封府库，收图籍，罢官署及宫廷侍卫军。宋朝廷成了元军的掌中物，任其摆布。宫女内侍及诸乐官，多为元兵所掠，赴水而死的宫人达数百人。

三月，伯颜入临安城，建大将旗鼓。他巡视城内外，在浙江（即钱塘江）观潮，又登狮子峰，观察临安地理形势，部署诸守卫之军。太皇太后及幼小的宋恭帝赵㬎求见伯颜，被伯颜拒绝。次日，伯颜派人入宫宣诏，强迫宋帝和全太后北行，去朝见元帝。诏文中有免宋帝"系颈牵羊"之语，听来虽令人心酸，但太后不得不哭着让宋帝跪拜谢恩。太皇太后因病暂留临安，其余在临安的皇族成员及部分大臣等，被驱北去。行至瓜洲，宋将李庭芝、姜才率众四万谋夺两宫未成功。真州守将苗再成也出兵劫驾，未果。

五月，宋主赵㬎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拜见忽必烈，被授以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为瀛国公。南宋至此，本该灭亡了，不料南方一些宋臣先后奉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为帝，遂使宋朝国祚又延续了三年之久。

（陈益民）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卷180—183

《宋史》：《瀛国公纪》、《文天祥传》、《张世杰传》等。

二王漂泊

“二王”赵昰、赵昺分别是宋度宗的长子和三子。赵昰生母是淑妃杨氏，赵昺生母是修容俞氏。度宗驾崩后，谢太后召臣入宫议立嗣君，多数人认为宜立长子赵昰，但权臣贾似道力主立君“以嫡不以长”，赵昰年龄虽长，但为度宗庶子，不如立全皇后生的嫡子赵㬎。这样，时年四岁的赵㬎被确立为帝。赵昰、赵昺则分别封为吉王和信王。

德祐二年（1276）初，元军迫近临安，已至离城不远的皋亭山，宋皇族宗亲建议尽快迁二王去闽、广一带，以免赵氏宗族全被元军俘获。朝廷遂徙封昰为益王，设府第于福州；徙封昺为广王，设王府于泉州。并派驸马都尉杨镇及杨亮节等护送二王离京。杨镇等人便带二王出嘉会门，渡钱塘江，奔往婺州（今浙江金华）。

元丞相伯颜入临安后，派范文虎带兵前往婺州，打算召杨镇带二王回临安。杨镇得知这一消息，急忙对杨亮节等人说：“你们赶紧带二王逃走，我前去阻止范文虎带来的追兵，延缓他们的前进速度。”杨亮节等人遂背着二王，带上杨淑妃等，徒步进入山中，藏匿了七天。宋将张全带兵数十人找着了他们，一行人便同往温州。途中，陆秀夫、苏刘义也从临安赶来，与他们同行。

这些人又派出使者，到清澳召来陈宜中，到定海召来张世杰。他们一起奉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号召各地民众起义兵，为复兴宋王朝而奋斗。当时，谢皇后被元军所迫，派两名宦

官、八名士兵来到温州，召二王回临安。陈宜中下令将他们处死。考虑到温州仍非安全之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又奉二王人闽。

曾任宋福建漕运使的黄万石此时已降元。他为了博取元人欢心，以邀大功，正策划将福建全境献给元人。汀州（治所在今福建长汀）、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等地的守臣，已准备接受黄万石的鼓动，向元称臣。但二王人闽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闭城抗拒黄万石。南剑（治所在今福建南平）守臣林起鳌则出兵攻黄万石，使之败逃。福建形势由此大变。陈宜中又虚张声势，传檄岭南各地，诈称宋将夏贵已收复沿江各州郡，元兵北归的道路已被截断。一时戍守岭南的元兵人心浮动，那一带的宋人则拍手称快。但这毕竟是虚的，此前夏贵实际上已经降元。

这年五月，陈宜中、张世杰等在福州奉益王赵昰即皇帝位，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赵昰时年九岁，政事主要决于左丞相陈宜中。尽管国难当头，局势不安，众人本应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但诸大臣间仍然多有不协。直学士院的陆秀夫本是景定元年进士，有才干，为镇守淮南的李庭芝所赏识，在庭芝幕府中为僚属多年，参预军事机密，熟知军务。赵昰即位后，陆秀夫尽心尽力辅佐军政要务。由于时常与陈宜中意见不一，陈宜中便鼓动言官劾奏陆秀夫，将其贬谪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枢密副使张世杰对此非常不满，责备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动不动就让台谏官弹劾大臣！"陈宜中这才赶紧召还陆秀夫。被元军扣押的文天祥，在被押解北上途经镇江时，寻隙逃了出来，历经磨难，几度艰险，抵达了温州。随即被召至福州，拜为右丞相。但他也与陈宜中议事多不合，遂出镇南剑州，任同都督。

益王称帝后，元军加紧了对各地未归附的宋人的进剿，而各地的宋军，也顽强地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吴浚、赵溍、傅卓、李珏、翟国秀等奉命分道从福州出战，各地宋军纷纷起来抗击元

军。当时，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婺州等地复为宋军所有，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也岌岌可危。董文炳对索多说："严州不守，临安必危，公往镇之。"索多遂率军前去攻战，历三个月，复破婺州、衢州，宋臣萧雷龙、黄巡检等逃奔入闽，途中被人杀害。收复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的宋将赵孟垒，随后也战败被俘，不屈而死。奉命出征的吴浚等最初进兵顺利，连克南丰、宜黄和宁都三县，翟国秀取铅山，傅卓进至衢县、信县，他们所到之处，均得到民众的响应。但不久，吴浚就失败了，翟国秀难敌元军，自动撤退，傅卓则兵败投降。

镇守扬州的宋将李庭芝素以好贤礼士著称，他的幕府中收罗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史称，当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他麾下多人才，自己又意志坚定，誓死抗敌，使得他所坚守的扬州城在临安已经陷落的情况下，依然屹立在元兵的重重围困中。元军逼迫宋太皇太后下手诏，谕李庭芝投降。庭芝登上城楼对城外的使者喊道："我奉诏命守城，从未听说有劝降的诏书。"宋帝赵㬎与全皇后被元兵押解上都，途经瓜洲时，太皇太后再次派使者去传达投降诏令，内称："我已下诏让你降元，你多日未给回音，难道还不明白我的意思？现在我与嗣君均已臣伏元朝，你还为谁守城呢？"庭芝不答话，命部下向使者射箭，当场射死一人，其余的人仓皇逃去。元将阿术怒，派兵守高邮（今江苏高邮），截断供给扬州的粮道。又派兵攻克泰州（治所在今江苏泰州）的新城，尽驱那儿的降卒到扬州城下，以动摇扬州守军的军心。李庭芝的幕僚中有人劝他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他却答道："我坚持到底，不过是一死而已。"阿术再次派使者招降，李庭芝放使者入城，却将其斩首，把招降的诏令也有意拿到城头上当着元军的面烧了。当时，淮安（今江苏淮安）、盱眙（今江苏盱眙）、泗州（今江苏宿迁东南）等的宋军因粮尽而投降，使扬州城更为孤立。城内极度缺粮，而李庭芝毫不动摇。适

逢福州派来了使者，他才决定留部将朱焕守城，自己带兵七千，准备经泰州入海，前往福州。但李庭芝刚离去，朱焕便献扬州降元。阿术派数路人马追及李庭芝，杀其部下千余人，李庭芝奔入泰州。因一些泰州守将开城降元，使李庭芝被俘。他随后与勇将姜才一起为阿术所害。

扬州一失，淮东其他地方也很快为元军所有。宋军的力量更为削弱。尽管宋主的号令实际上已不出闽广，但有许多不在闽广的宋臣仍在战斗，为宋廷效忠。远在四川的宋左武卫将军马塈，得知临安陷落后，即率领一支人马守卫静江。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元将阿里海牙进攻广西，马塈让一部分兵力留守静江，自率三千人守严关进行狙击。阿里海牙进攻不利，便以偏师入平乐，过临桂，从两面夹攻马塈，马塈兵败，退保静江。阿里海牙劝降，遭拒绝，遂发起猛攻。双方大小百余战，持续三个月之久，最后城被攻破，马塈又率众进行巷战，直至战死。

宋制置副使张珏亦在合州（治所在今四川合川东）组织人马抗元。元军围困重庆，张珏屡遣勇士潜入城，鼓舞守城官兵的士气，使之自秋至冬，坚守数月。其后趁元军内部不和，派兵入重庆。又挥师四出，收复泸州、涪州。其后，泸、涪等州复被元军攻陷。张珏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战斗到景炎三年，以兵败自杀。

在福州的小朝廷处境也很不妙。景炎元年八月，张世杰命都统张世虎率军前去与吴浚会合，两支队伍合计十万人，指望攻克建昌，但终被元将李恒打败。接着，元军分水陆两道进攻闽广，水军由阿喇罕、董文炳等率领，从明州出发，自海上南进；陆路为达春、李恒等率领的骑兵，从江西出发，向东南出击。宋军虽奋力抵抗，但终难力挽狂澜。十一月，处州（治所在今浙江丽水东南）、建宁府邵武军（今福建邵武）相继失陷，陈宜中和张世杰不得不收集船只，奉宋主及杨太妃入海南行，当时随行的军民

多达四十八万人。宋主至泉州，在泉州提举市舶司达三十年之久的蒲寿庚心怀异志，当他来拜见宋主时，有人劝张世杰将其扣留，下令所有海船不得再听从蒲寿庚调遣。但张世杰不同意。不久，新涌人泉州的军民因船只不足，便抢掠蒲寿庚属下之舟，并没收其财产。蒲寿庚怒，杀了在泉州城内的宋宗室成员及一些士大夫、军人，陈宜中等匆忙奉宋主赴潮州。

元兵从不同方向朝宋主所在的地方进逼，沿途许多宋臣献城投降。但也有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的，兴化军（今福建莆田）知军事陈文龙即是典型。这年十二月，元军在宋降将王世强的引导下，攻破福安（今福建福州），知府王刚中投降。元军又令王刚中领兵攻兴化军。王刚中与元军使者人城劝降，但陈文龙杀了王刚中，并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斥责王世强、王刚中卖国负朝恩，让使者带回。元将阿喇罕再次派使者人城，极言守城无望，但仍被陈文龙所杀。左右有人劝陈文龙献城归元，陈文龙答道："诸君怕死了吗？人总是有一死，但要死得值得。"他派部将林华出城，拒敌于兴化境外。没想到林华倒戈，反而当元军的向导，引元军至城下。而城内的通判曹澄孙也趁机开城投降，使兴化不攻自破，陈文龙被俘。元军软硬兼施，逼他投降，他却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面尽是气节贞操，你们再逼迫也是徒劳的。"阿喇罕无法使他屈服，便将他押送临安。到达临安后，陈文龙绝食而死。当时，陈文龙的母亲在福州，重病缠身，临终，左右的人极为悲痛，她却安详地说："我能与为国捐躯的儿子同时死去，死而无憾啊！"人们感叹说："有这样的母亲，当然会有坚贞不屈的儿子。"

宋主感到难与元军继续抗衡，在迁徙到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后，即派倪坚奉表向元将索多请降，索多便遣人带倪坚赴元大都。

元兵继续进剿不归附的宋军。景炎二年正月，元军攻下汀

关，文天祥逃奔漳州（治所在今福建龙海西）。吴浚自瑞金逃往汀州（治所在今福建长汀），他得知宋主早已渡海南行，感到复兴宋朝无望，便献城投降。元军派他去漳州劝文天祥投降，但遭到一顿怒斥，并被文天祥斩首。

当时，循州（治所在今广东龙川）知州刘兴、梅州知州钱荣之及广州县人赵若冈等，先后献城降元，使形势更不利于宋人。广州陷后，广东诸郡就相继望风而降。为扭转局面，一批宋将率兵与元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城镇的战斗。三月，文天祥收复梅州，继而领兵入江西，又收复会昌县；宋将陈瓒也起兵诛降将林华，收复兴化军。其后，张世杰也率军攻克了邵武军。广州亦回到宋人控制之下。

文天祥进军江西各地，得到当地民众的响应，节节胜利，进而包围了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为尽快稳定江西，元朝中央在江西设置了行中书省，任命达春为右丞，敏珠尔丹为左丞，李恒、蒲寿庚、程鹏飞等参知政事。八月，李恒一面派兵增援赣州，一面亲率大军袭击在兴国的文天祥。文天祥没料到李恒进军速度那样快，迎战不利，仓促逃奔永丰。但原来拥兵数万驻扎永丰的宋将邹洬已先被元军打败，文天祥不得不逃奔他处。至方石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的部将巩信挺身而出，持短兵器与元军搏杀，李恒见状，怀疑有伏兵，不敢冒进，巩信便安坐在巨石上，率侍卫兵挡住元军前进的道路，元军未敢轻易近前，遂乱箭齐发，射向巩信，而巩信巍然不动。待李恒派一支奇兵绕至巩信身后，进行突袭时，才发现巩信早已殉国，但虽死犹不倒下。

文天祥逃至空坑，部众尽溃，元兵追得很紧。部下赵时赏临危不惧，冒充文天祥，有意坐轿子让元兵捕获，使文天祥得以奔往循州。赵时赏被押至隆兴，誓死不屈，遇害。

九月，宋主乘船迁移至广州的浅湾。时邵武军再度被元兵攻陷，张世杰又派人进攻在泉州的蒲寿庚，但攻城不利，加之元将

索多赴援，张世杰只好收兵回浅湾。元军随即以达春、李恒、吕师夔等率步兵入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以蒙古岱、索多、蒲寿庚等率水师下海，分两路合追宋主。

索多领兵至兴化，在城外劝宋将陈瓒投降，不料城上矢石如雨而下，索多便下令用云梯、火炮强攻。城破，陈瓒又率众巷战了一整天，终因兵力单薄，被俘。索多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将陈瓒车裂而死，并屠城，城内血流成河。

索多继而攻克漳州。又泛海兵临潮州。潮州守将马发坚守城池，索多怕延误追击宋主的时间，没有攻城，前往惠州与吕师夔等会师，合兵进攻广州，宋制置使张镇孙等不敢抵抗，开城投降。

元军元帅刘深攻浅湾，张世杰迎战不利，急奉宋主逃奔秀山，宋兵战死、病死者甚多。继而张世杰奉宋主至井澳，途中海风大作，波浪滔天，舟船损坏极多，宋主也惊悸成疾。十二月，刘深攻井澳，宋主又逃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再次被元军打得大败，宋主侥幸逃生。

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二月，索多还攻潮州。知州马发坚守二十余日，杀死元兵无数，直至战死。索多再次血腥屠城。

时元朝廷命蒙古岱、索多、蒲寿庚在福建行中书省事，镇抚福建濒海诸州，另派哈喇岱为经略使兼左副都元帅，率舟师南征。广州形势稍缓，宋都统凌震、转运判官王道夫等收复该城。宋主乘船回广州，随后又迁硇洲（在今广东雷州湾外东海岛东南海中）。因长期处于动荡不安、颠沛流离之中，惊悸、劳累、疾病，终于拖垮了幼小的赵昰。四月，他在硇洲去世，时年十一岁，庙号端宗。

端宗一死，众宋臣成了一盘散沙，各自想自己的出路了。陆秀夫站出来说："度宗另有一子还在，我们百官具备，士卒尚有

数万，难道就不能齐心协力，共兴宋朝大业吗？”众人于是立端宗之弟、年仅八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早在上一年十一月元军进攻井澳时，丞相陈宜中即已逃奔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赵昺即位后，群臣天天盼陈宜中返回，但陈宜中终未至。遂由张世杰秉政，陆秀夫为其助手。

宋人还想有所作为，继续与元军作战，但终究是力不从心，无力回天。从琼州（治所在今海南海口）运粮往硇洲，途中辄遭元军拦截。出兵攻雷州（治所在今广东海康），又三战皆败。雷州是距硇洲岛最近的陆地，元雷州总管蒙古特镇守其地，等于扼住了宋流亡小朝廷的咽喉，因此，张世杰千方百计想将该地夺过来。六月，在再一次被雷州的元兵击败后，张世杰集中全部兵力，包围了雷州州治所在地。激战多日，城中粮尽，幸而元将史格及时调集其他几个州的粮食入城，才保住了城池。张世杰不得不退兵。

考虑到硇洲岛距雷州太近，雷州攻不下，硇洲也就难守，于是，张世杰奉宋主迁往有厓山，其地在今广东新会南八十里大海中，与汤瓶嘴对峙如门，形势险要，南宋初绍兴年间就已在此设寨，为控扼南海的门户。当时迁至厓山的军民达二十余万，他们多居处在船上，粮食器械均从广东沿海诸郡及海外四州调运。

元帝忽必烈认识到不铲除流亡海上的南宋小朝廷，闽广一带就不得安宁。他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在此之前，尚无汉人统领蒙古军的先例，张弘范是汉人，他怕麾下蒙古人不听指挥，忽必烈便赐上方宝剑，说：“若有不听命者，用它来处置！”张弘范领命，以李恒为副手，南行至扬州，发水陆之师二万，分道南征。

元军已征服的地方，许多民众并不甘心向元朝臣服，一直在寻找机会起兵。如这年七月，原宋湖南制置司张烈良、提刑刘应龙等在湖南起兵反元，一时不少郡县的民众起来响应，形成许多

支抗元力量，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拥兵也不下数千。但由于各支队伍比较分散，各自为战，很快被元军一一剿灭。而张世杰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派兵前去增援。

十一月，张弘范挥师拔掉三江寨，继而以水师走海道袭击漳、潮、惠三州。李恒率步骑由梅岭袭广州。阿尔哈雅也进军琼州。形势对宋军极为不利。

李恒进至清远，击败宋将王道夫，进而攻凌震，又胜。王道夫和凌震弃广州逃跑。十二月，这两人试图收复广州，在广州城外被李恒再次打败，落荒而逃。

文天祥屯驻潮阳，邹沨、刘子俊率军前去与之会师。他们一起打败了地方上的敌对势力陈懿等。陈懿便逃奔张弘范，引导张弘范走海道抵达潮阳。文天祥率众撤退，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张弘范的先锋张弘正追及，因张弘正来得突然，宋军猝不及防，全部溃败，文天祥被俘。

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张弘范由潮阳港乘船入海，带兵至甲子门，抓获宋军巡逻兵，得知宋主所在的地方，遂向厓山进兵。有人对张世杰说："元军若用水师堵住出海口，我军就进不得进、退不能退了，应先占据出海口，万一失利，我们还可出海西行。"张世杰担心在海上漂浮太久，人心不稳，一旦众人离心，必然散乱。他没接受建议，而是用一千余艘大船布置在厓山西部的水面上，水底置铁碇将船固定，船与船之间用大绳索贯连，船上起楼栅，如城堞，奉宋主居楼船中，示以决一死战。

厓山北边水面较浅，如果不涨潮，海船难以通行。张弘范便从东面绕至宋军南面的出海口布阵。他见宋军船只被固定，不能行动，便决定用火攻。他下令将许多船只装满干草，浇上油脂，点燃后纵船顺风飘向宋军船阵。但张世杰对此早有防备，宋军船只表面均涂有一层泥，难以燃着，船上还绑有一些朝外指的长木

杆，使元军的火船难以靠近。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弘范出奇兵截断宋军汲取淡水及樵采之道，这一招使宋军陷入困境。宋兵吃了十余天的干粮，实在干渴难忍，纷纷舀海水喝，而喝了海水便上吐下泻，士兵战斗力下降。当时，张弘范得到了张世杰的外甥韩某，便任命为万户府经历，先后三次派他前往宋营劝张世杰降。张世杰均予以拒绝。张弘范又让文天祥写劝降书，文天祥却写下了《过零丁洋诗》，内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张弘范知道再强迫也没用，只好又派人到厓山，对宋军民说：“你们的陈丞相已逃奔占城，文丞相被俘虏，你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而宋人仍不屈服。

张世杰率苏刘义、方兴等天天出去与元军接战，双方相持不下。李恒从广州带兵前来增援，与张弘范合守厓山北。诸将建议用炮攻，张弘范一心要把宋军一网打尽，他怕用炮轰会将固定不动的宋船打散，一旦对方四散而逃，元军分兵追击，必不能全歼敌人，从而留下后患。李恒分析说：“宋船困守海港，虽在我们的包围中，但潮水海天有涨有落，待他们的淡水和木柴完全用光时，他们必然会选择退潮的机会，拼命突围，到时候我们未必拦截得住。当务之急是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张弘范同意这一看法，便下令与宋军对攻。

二月癸未晨，张弘范布置诸将分四路对宋军发动决战。宋军东面靠厓山，李恒趁退潮的时机，从北而顺流向宋船冲击，张世杰亲率军中精锐淮兵殊死抵抗，矢石蔽空，呼声震天，战至中午，未分胜负，但此时开始涨潮了，南面的元军又顺流冲击宋船，使张世杰背腹受敌。然而宋军拼死抗击，竟使元军没占多大便宜。

宋军船阵的西南角是宋军防守重点，由大将左大乘大舰守卫。张弘范亲率船队进攻这个角。他用布帷幕将自己所乘的船的

四周围了起来，并让部下在船上奏乐，在此之前，张弘范已布置攻宋军船阵西北角的元军在听到奏乐后再发动进攻。张世杰听到西南角外一只元军大船奏乐，以为船上正在宴饮，没予以重视，而集中兵力去应付进攻西北角的元军。张弘范趁机接近宋将左大的船，左大下令射箭，箭只如雨，全扎在张弘范船的帷幕上。待宋军的箭用完后，张弘范下令元军诸船迅速进击，打开了宋军船阵的西南角，宋军大乱，战至日暮，宋军损失惨重。张世杰见败局已定，趁黄昏风雨大作之机，抽出精兵入中军，欲带宋主上自己的船逃跑。陆秀夫怕宋主被元军俘虏，遭受侮辱，执意不肯。而宋主的船只大，与别的船连在一起，不能行动，陆秀夫感到已无法逃脱，便背起幼主赵昺跳海，一起溺死。宋主时年九岁。随他们跳海而死的臣民甚多，七天后，张弘范在海上看到的浮尸达十余万人。

就在陆秀夫背宋主跳海时，张世杰与苏刘义等奋力斩断船与船之间相连结的绳索，带十余艘船突围出去。张世杰还想收集散兵再战，但终未成功。他感慨万端，遂跳海自尽。宋朝自赵匡胤至赵昺，共历十八帝，三百二十年，若从南渡算起，历九帝，一百五十二年。

宋朝至恭帝德祐年间，可谓亡局已定。然而仍有那样多的忠节之士转战岭海，希图复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应当承认，那些义士们的所作所为，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即无论环境多么险恶，精忠报国之心都毫不动摇。所以，古人有这样的感叹："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陈益民）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卷 182—卷 184

《宋史》:《瀛国公纪附二王纪》、《文天祥传》、《张世杰传》、《陆秀夫传》、《马塈传》等。

宋代科技

在中国科技史上，宋代是一个大发展的阶段，突出的新成就之一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此外，中医学、数学、天文学、农学、地学、纺织等领域也都有一些成就。

火药、火器的发展　在宋代，随着采矿、冶金等部门手工业的发展和抗击辽、夏、金战争的频繁，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北宋时，在汴京（河南开封）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宋仁宗时，由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载有三个火药方子：毒药烟球火药法：用硫磺十五两，焰硝三十两，木炭五两，草乌头五两，沥青二两半，以及少量的砒霜等等；蒺藜火球火药法：用硫磺二十两，焰硝四十两，碳末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桐油二两半，蜡二两半，以及麻茹、竹茹等；火炮火药法：用硫磺十四两，焰硝四十两，松脂十四两，以及淀粉、黄丹、清油、麻茹、竹茹、砒黄、黄蜡、桐油等。这些火药中硫和硝的比例已达一比二，甚至近乎一比三，已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接近。同时，又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料，以期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程序的记载。

北宋时利用火药制造的火器，主要是燃烧性的。北宋末年爆炸性的火器开始大量制造和应用，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这些火炮形制各不相同，

有纸制、陶制、铁制等种。无论是哪一种，也无论其大小，都还不是用火药放射的火炮，而是以埋藏、放置、抛石机投射并引爆的地雷、炸药包、炸弹一类火器。

到了南宋，发明了管状火器。如绍兴二年（1132）军事技术专家陈规守德安（湖北安陆）时创造了火枪，把火药放在竹筒内点火喷射，这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开庆元年（1259），宋军和蒙古军在淮河一线作战，寿春府（安徽寿县）军民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火器，在竹筒内放置火药后安上了窠，用火药的力量把子窠射出去，子窠类似子弹性质，用石子、铁块等制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枪。后来把竹筒改为铁管或铜管，叫做火铳。管状火器才是真正的火器，它的出现标志着火器制造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和航海造船技术　在北宋，指南针的使用已很普遍，当时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在《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五中，载有制指南鱼的方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放在炭火中烧到通红，以铁钳钳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再以密封容器收存。从现代的知识看，这是一种利用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磁化的方法。把铁片烧红，令“正对子位”，可使铁鱼内部处于较活动状态的磁畴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入水中，可把磁畴的规则排列较快地固定下来。而鱼尾略向下倾斜，可起增大磁化程度的作用。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贡献。

同时，在指南针的装置上也有很大的改进。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当时四种装置磁针的方法：即将磁针穿在灯芯草上浮于水面上放在指甲或放在碗沿上、悬在丝线上。经过检验比较，沈括认为以第四种“缕悬法”为最佳。此外，沈括还总结了以“看风水”为业的“方家”长期使用指南针定向的经

验和自己亲身观察的结果，发现磁针所指方向正南稍偏东的现象。这是关于地球偏角（即磁针子午线与地球子午线相交的角度）的最早记载。欧洲直到1492年才由哥伦布发现地磁偏角。

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一种当时流行的指南龟装置新法：将一块天然磁石安装在木刻的指南龟腹内，在木龟腹下挖一光滑的小穴，对准了放在顶端尖滑的竹钉子上，使支点处摩擦阻力很小，木龟便可自由转动以指南。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为了克服远渡重洋的困难，保证航船安全，至迟在北宋末年已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在南宋时，更出现了将指南针安装在刻有度数和方位的圆盘上的罗盘针，使海船上的舟师在白昼无太阳、黑夜无星月的情况下，也能凭借罗盘针辨认方向，安全正确地航行。

两宋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水陆战争的频繁，使得造船技术不断提高。首先，新的船型纷纷出现。宋代水军配备的战舰有海鳅、双车、十棹、得胜、水哨马、水飞马、大飞旗捷、防沙平底等各种战船。官方船只有暖船、浅底屋子船、腾浅船、双桅多桨船、大小八橹、海鹘船，以及破冰船、浚河船等特种船只。民间船型更多，或以用途取名，或以形状取名，或以设备取名，船型、名称有千百种之多。其次，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神宗时，荆湖地区最大的内河航行船叫“万石船”，载重量可达六百多吨。徽宗时造了两艘出使高丽的大海船，可载二万石以上，约一千一百吨左右。这种远洋海船都是尖底船。它的好处是吃水深，抗风浪的能力强。船头用碇石做锚，两颊柱中间安滑轮，用粗藤索吊着锚头，索长五百尺，以便抛锚起锚。如风急浪大，还要加抛“游碇”。船尾除大小正舵两种外，还有“三副舵”两个。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一百余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室。船舱间隔都采用水密隔舱，各舱严密分隔。这种

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的首创。

毕昇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自从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以来，到宋代更加发展，趋于鼎盛。它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雕版印刷虽然一版能印制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但费工费时，大部头书往往要花费几年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地方。印量少又不重印的书，版片用后便成了废物。人力、物力和时间都造成了浪费。

就在雕版印刷发展趋于鼎盛的时期，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原理，与近现代盛行的铅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他用胶泥制成泥活字，一小块胶泥刻一字，经过火烧变硬。并事先准备好一块铁板，用松香、蜡以及纸灰等混合制成粘胶敷在上面。印刷时，把铁制的框子放在铁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版，再用火烤版，使粘胶物熔化，随即用另一平板把字面压平，冷却后，就可上墨印书。一版印完，将铁板放在火上加热，松香和蜡熔化后即可取下泥活字，以备再用。为了提高印刷效率，毕昇采用两版交替使用的办法，一版印刷，另一版就可排字。第一版印完，第二版又已排好，印刷速度相当快。同时准备好几套泥活字，可以重复使用。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既能节省费用，又能缩短时间，非常经济和方便。它不但是我国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促进了世界的文明和进步。它是我国人民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

医学的全面发展　两宋医药学在唐代基础上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医学理论、医学教育、医学流派的形成、医学分科及诊断法、疗法，中药学、解剖学、医方学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中药学方面，由于外国药物大量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纂的医药书籍中，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宋太祖时编刻的《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一百三十三种；仁宗时所修《嘉祐补注本草》又增加新药八十二种。到北宋末年所编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新增加药品达六百二十八种。

南宋人宋慈于淳祐七年（1247）写成《洗冤录》一书，包涵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检查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书中对于自杀、他杀或病死的区别十分注意，案例详明。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曾被译成法、英、荷兰、德、朝鲜、日、俄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对法医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宋代的医药分科也更加完备，计有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眼科、产科、针灸科、金镞科、口齿咽喉、疮肿兼折伤共九科。有的科还有专门著作。如北宋杨康侯的《十产论》和南宋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是著名的妇产科著作。北宋钱乙的《小儿药症直诀》是重要的儿科著作。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针灸学的发展。我国针灸学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因长期辗转传抄，其中所载经络腧穴部位紊乱。宋仁宗初年针灸学家、太医局翰林医官王惟一总结了历代针灸医学的实践经验，统一了针灸穴位，并在铜匠师的合作下，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刻划经穴，标注名称，作为针灸教学之用；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三卷，不久又把图经刻石流传，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腧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识。

数学的辉煌成就　在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各学科中，数学的发展较为突出。可以说，宋代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新阶段，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宋代数学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在古代《九章算术》中记载

开平方、开立方算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具有中国古代数学独特风格的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首先创造这种新方法的是北宋时的贾宪，当时叫做“增乘开平方法”和“增乘开立方法”，它对宋元及后代数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欧洲，直到十九世纪初英国数学家霍纳和意大利数学家鲁非尼才先后提出了这种方法，比贾宪迟了大约八百年。

继贾宪之后，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一书中，绘出了一个叫做“开方作法本源”的图，即二项式定理中求系数的方法，这种方法欧洲直到十七世纪才发明。

在南宋秦九韶的著作《数书九章》中，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当时叫做“大衍求一术”）。在北方金统治区内的数学家李冶，著有《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两书。书中论述了“天元术”和“四元术”（“天元”指的就是问题中的未知数，“天元术”相当于现代的列方程），列出了一元或多元方程以及高次联立方程的消去法问题。高次方程的解法，较欧洲的“霍纳方法”早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去法要比欧洲早近五百年，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比欧洲早五百多年。可见两宋时代我国数学领域的研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苏颂和天文学　北宋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约百年之间，先后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工作，其精确度比从前有很大的提高。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前人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制造了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水运仪象台，并写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详细说明书——《新仪象法要》，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全部结构。水运仪象台利用漏壶水为原动力，以恒定的水流量推动复杂的齿轮传动机械，带动仪器自动运转。整个仪象台实际上是一座约十二米高的小楼，分三层，上层和露台一样，装有浑仪，仪中有窥管，用来观察天象。

中层设浑象，它自动旋转一周的时间与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相同，可以准确地再现出不同时刻的实际天象。下层是各种传动机械和报时装置。为了控制轮机按照恒定速度运转，苏颂等人设计了一套叫做天衡、天关、天权的杠杆装置，这是近代钟表中重要机件擒纵器（卡子）的前身。苏颂和韩公廉等所创造的水运仪象台和他们所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反映出十一世纪我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高度成就。

农业生产技术和植物谱录　两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南方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主要反映在陈旉《农书》中。

陈旉《农书》写成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是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区域农业生产技术的专书。它是隋唐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唐宋时期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水平。在育苗方面，陈旉论述了培育壮秧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培育壮秧的总原则。针对烂秧的原因，提出了防止办法，对秧田播种前的耕作施肥，对秧田水层深浅的论述，符合水稻秧苗生产的一般规律。他强调中耕的重要性，认为即使没有杂草，也要中耕。因为中耕可以使根旁板结的土壤变得松软。陈旉指出了烤田（如今称为晒田）的好处。烤田可使空气进入土壤，促进养分的分解和根系的生长，使茎叶健壮，增加对病虫害的抵抗力和防止倒伏。实际上育秧、中耕和晒田至今仍是水稻生产中的主要环节，陈旉的《农书》说明宋代的水田耕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宋代，植物志和谱录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与当时农艺和园艺业的高度发展是分不开的。宋代编植物志和谱录约有五十种，其中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刘蒙《菊谱》、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等书在农学和生物学上都有一定的

价值。它们大多是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品种、分类等，还有的兼及栽培法、品种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

纺织技术的提高　两宋的纺织技术高超，纺织机械先进，纺织品丰富多采，出现了“苏州宋锦”、“南京云绵”等著名产品。两宋的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三十多种。河北定州（河北定县）缂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山东单县）的薄缣，每匹只有百铢（四两）重，薄如蝉翼，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代表当时纺织最高水平的珍品。

除丝织业外，宋代棉花种植得到了推广，棉织技术亦随之提高。南宋时，滇、桂、粤等省的斑布已名闻全国。

随着社会对纺织品的需求量大大增高，提高纺纱的速度与质量已成为急待解决的技术问题。终于发明了用水力驱动的多锭大纺车。元代王桢《农书》中记载的这种纺车可以安装三十二个锭子，利用水力或畜力带动，大大地提高了纺织的速度和减轻了劳动强度。今人估计，可能创制于宋代或者更早些。

地图学　宋代对地图特别重视。北宋淳化四年（993）用绢一百匹制成的大型地图——“淳化天下图”，其规模之大，是很少见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保存至今的三幅宋代石刻地图（“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和一幅流传至今的北宋上石的“九域守令图”。

“华夷图”和“禹迹图”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碑刻于“刘豫阜昌七年”，即南宋绍兴六年（1136），分别刻在一块石碑的正面和背面。“华夷图”上记有“岐学上石”等字，说明这两幅图都是教学用图。“禹迹图”上有画方，“每方折地百里”，即每方的边相当于百里之意，为目前所见地图中最早的画方图。“禹迹图”上所绘河流和海岸线相当精确，代表了宋代测绘地图的水平。

“地理图”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淳祐七年刻成，黄裳所作。

图上山脉具有层峦叠嶂之形，赋有国画特色，立体观感极强，也是一幅较好的地图。

“九域守令图”是北宋宣和三年（1122）以前，在四川荣县刻成的。图中对山东半岛杭州湾和雷州半岛等的形状比南宋的地图标得更为准确，并且对四川的水系标得比较详细。还载有一千四百多个宋代地名。

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字存中，北宋杭州钱塘（浙江杭州）人，是我国古代以博学著称的科学家。他一生的论著很多，但大多已失传，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是他晚年所写的名著《梦溪笔谈》三十卷（包括《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在《梦溪笔谈》中，作者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到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泛的领域，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沈括的科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在兼管司天监期间，曾破格选拔平民出身的天文历算家卫朴进司天监任职，主持编修《奉元历》，以 365.24358 日为一回归年，虽比今天实测的 365.2422 日稍大些，但比当时通行的历法要精密得多。同时，他在《补笔谈》卷二里，还提出了彻底改革旧历法的主张：按节气定月，以立春为元旦，不管月亮圆缺，只管时令节气；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月相间，不置闰月。这种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月份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很适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七百年后，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历》，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气象局开始用于农业气候统计的历法《耐著尔·肖历》，都与沈括的“十二气历”大体相同。

在数学方面，沈括对“隙积术”和“会圆术”有较深的研究。“隙积术”是求解垛积问题，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对此，沈括创立了一个正确的求解公式，开辟了数学研究的一个

新方向。“会圆术”是一个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问题，沈括推导的求弓形弧长的近似公式，后来元代郭守敬《授时历》中的“弧矢割圆术”就是利用这个公式。

沈括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磁学研究上，他对指南针的四种装置方法进行优劣比较，并发现了磁偏角。他还曾认真地做过凹面镜成像实验，得出了物在凹面镜焦点之内时得正像，在焦点上时不成像，而在焦点之外时得倒像的结论。他还试图用小孔成像的原理，解释物在焦点外成倒像的现象，虽然这一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但他认为焦点起着相当于小孔的作用，是他在试图解释这一光学现象时取得的有识之见。

在地学方面，沈括也有不少贡献。北宋熙宁七年（1074）四月，他到浙东地区察访，看到了峻峰深谷的雁荡山地貌奇观，明确提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说。他还认为我国西部黄土地区沟壑密布的地貌特征，也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为这两个不同地区的地貌情况提供了科学说明。同年秋天，沈括到河北察访，在太行山麓发现螺蚌壳和鹅卵石，他机敏地推断此处为古时海滨，并进一步指出华北平原是泥沙淤积而成。这些都是沈括独到的见解。熙宁八年，沈括在观察边防地区时，曾用木屑、面糊堆捏地形，后因天寒又改用熔蜡制作成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沈括的这一方法立即得到了重视和推广。

对于药物学，沈括也有很大的贡献。他根据实物，对药物名称存在一物多名或多物一名的情况，做了证同辨异的工作，校正了前人认识上的错误，如指明杜若即高良姜，赤剑就是天麻等等。他十分重视验方的收集，编成《良方》一书，其中“秋石方”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荷尔蒙制剂的制配方法。

沈括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耿曙生）

参考资料：

《宋史》：《天文志》、《地理志》、《兵志》。

《武经总要·前集》卷12—卷15

《梦溪笔谈》

土木之技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的土木建筑处于一个理性的守成和发展阶段，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质。木结构继承了唐朝成熟的构架体系，装饰手法多样化。建筑风格上则体现自身精致小巧的特点，它从唐代的“和”的意境转向追求趣味性，追求工整柔美、华丽繁复、细腻精臻的特性。具体表现在：1、城市的结构和形式起了变化，打破了汉唐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度。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原有的里坊制度已无法适应需要，沿街设店成为最基本的形式，形成具有开放性质的商业街。2、建筑的结构和造型已经定型化、制度化。在唐代出现尺寸规格化的基础上，制订出以“材”为造屋标准的模数制，使木构架建筑的设计与施工达到一定程度的规格化，产生了标准的生产手段。3、建筑的群体布局上出现了若干新的手法，平面组合多样化，宫殿中出现了“工”字殿和千步廊，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的空间层次，以衬托主体建筑。4、建筑的装饰手法多样化。唐代以前，建筑的发展主要在结构技术方面，到了宋代，结构已趋成熟，于是便发展了装饰技术，总体上具有工细、华丽、小巧的特点，它与宋代社会所追求的趣味风尚是一致的。5、砖石琉璃的大量使用和高层建筑的发展，表明了建筑技术与艺术的提高。这时的砖石建筑主要是塔和桥梁，琉璃产品则主要是琉璃瓦及贴面用的琉璃砖。6、中国南北建筑的风格开始产生差异。7、辽代建筑在早期较多地继承了唐代建筑的手法，但在少数宫殿、佛寺和民居中采用东

向，保有契丹族原有的习惯。此外，辽代的墓葬平面常用八角形与圆形，也反映了其祖先居住“穹庐”式毡包的习俗。8、金代建筑一方面沿袭了辽代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宋代的影响，有的装修和色彩比宋代更甚，总体特征是宏大、精巧、富丽。9、元代建筑是民族融合和宗教影响的产物，发展了喇嘛教、佛教、道教与伊斯兰教建筑，结构与装饰形式由华丽趋向简洁，采用了弯梁与减柱造。10、园林营建活动兴盛，在建造中追求享乐情趣，是中国古典园林堆山叠石的高潮阶段，同时十分注重个人情趣的表现。

宋辽金元时期建筑的类型，主要有城市、宫殿、住宅、陵墓、寺庙、塔、园林等，其分别与史官文化、宗教文化与士大夫文化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史官文化是指中原特有的、少宗教色彩的、以伦理为本位的现世文化，它集中反映在城市和宫殿建筑中，如在汴京与元大都的设计营建中，“工”字殿与千步廊的建设上。宗教文化是指采取超人间的力量形式以支配人和生活的精神文化，它在建筑中则具体表现在寺庙、塔、陵墓的高度发展。士大夫文化是指有地位的文人追求个人志趣与抱负的情感文化，它主要体现在造园中理想的个人世界的充分发挥，以及追求享乐的情趣。

城市尤其都城是最具社会性的建筑形式。北宋汴京（今开封）的建设，是我国古代都市中的特例，它是在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定都“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相沿袭的。自公元963年宋重修东京城后，屡次将原城扩展、增建，使城墙有三重，每重城城外均有护城河。外城墙每百步设有防御用的“马面”，每座城门均有瓮城，上建城楼和敌楼。外城又称罗城，周四十余里，有水、陆城门二十座，其中水门七座。第二重为内城，周二十多里，有城门十座，主要布置衙署、寺观、府第、民居、商店、作坊等，东北隅有一座著名的大型园林——艮岳。最

里面的第三重为皇城，位于都城北部，是皇宫的所在地。皇城周九里多，每面设城门一，南为丹凤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拱宸门。丹凤门外为御街，两侧有御廊，是为后世千步廊的先形。丹凤门内的南北中轴线上则排列着主要宫殿：大庆殿、紫宸殿，其西侧又有作日朝和饮宴之用的文德、垂拱二组殿堂。此外有集英、圣寿、崇政、景福、延和诸殿，均有各自的庭院。汴京城内的主要道路呈网格状分布，另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水路若干，构成交叉发达的商业交通网，它采用沿街开设店铺的形式，并出现了按行业成街的情况，一些邸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也大量沿街兴建起来，打破了汉唐以来的里坊制和夜禁制度。城外也出现了形式自由的草市。这是宋朝手工业和商业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产物。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中，主要街道人烟稠密，屋舍鳞次，各种店铺应有尽有，是繁荣的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汴京城是随着南方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当时的水运中心，又具扼制北方的政治意义，因而在建设上既具军事的性质——筑城三重，又具经济的特征——将里坊制改为以商业为重点的街巷制，它的规划和建设，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影响着后世都城的建设。

今天的北京城的前身，是辽代的陪都、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元大都是唐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新建城市，自至元元年（1264）开始着手大规模建设，它有统一的规划和周密的建设计划。它的规划者是汉人刘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在设计中他们继承了古代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强调附会“周制”。《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是历代都城规划的准则，但只有元大都真正符合这一制度。大都城平面近方形，南北长七千四百米，东西宽六千六百三十五米。城门除北面为二门外，

东、南、西三面均为三门，城外绕以护城河。道路系统呈方格网式布置，整齐方正，均通向城门。道路之间为行政管理单位坊，但不同于汉唐时的封闭式了，已无坊墙和坊门，有了东西向的胡同，可起防火、采光、排水与防风的作用。宫殿是大都城的最主要建筑，皇城中有三组宫殿和太液池、御苑，皇城正门承天门外，有石桥和棂星门，再向南两侧建有千步廊。皇城东西两面则建有太庙和社稷坛，北侧有商业区，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原则的具体反映。

元大都建设的最突出成就有：1、水系工程的规划，是由水利专家郭守敬规划的。他一方面疏通了东面的运河——通惠河，解决了南资北运的问题；另一方面规划一条新渠，将西山的泉水引人宫北，汇成湖泊，即今中南海、北海的雏形，解决了城内的用水问题，又使宫殿处在风景地带。此外，砖砌的排水系统干支道分工明确，排水性能好。2、城市空间的创立。一是钟、鼓楼等公共建筑立于要道，成为某一地域的标志；二是布局中采用了对景的方法，如东墙齐化门对宫中的延春阁，西墙平则门对仁寿殿，宫内厚载门对宫外中心阁等；三是整个城市的平面几何中心中心阁是整个城市空间的制高点。

这一时期的城市除都城外，也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城市，如扬州已有灯火辉煌的夜市，洛阳也已出现了自由形成的草市。

住宅是建筑史上最基本、最大量的类型，是最真实的社会历史的写照，然由于年代久远，目前已无宋元时的实物存世。众多的宋画中提供了较详细、丰富的形象资料，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景定建康志》，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卷》以及《文姬归汉图》等。其中描述的住宅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平民的住宅，较为简陋，城内多为两面坡的悬山顶式样，平面长方形，梁架与装饰均朴素而灵活；农村许多住宅则仍是墙身很矮的茅屋，或是茅屋与瓦屋相结合的形式，布局上较

随意，多有正房和厢房，有的正房后带穿廊，与后房形成“工”字形布局。二是官僚地主的宅第，由门屋、厅堂、廊、庑等构成四合院布局。前厅和后寝常用穿廊相连，成“工”字形平面。由于宋代文人得势，一方面促成追求住宅的园林风趣成为一种风尚，另一方面则又重礼教，十分遵循礼教的整体秩序，因而宅第规模巨大，大家庭几代同居，上下尊卑有序，男女里外有别。司马温公的《居家杂仪》中是这样描述的：“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宾客不敢坐于正厅，升降不敢由东阶，上下不敢当厅。”“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仆洒扫厅事及庭，铃头苍下洒扫中庭，女仆洒扫堂室。”

园林建设中出现了堆山叠石的高潮，造园风气更盛，是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追求“享乐情趣”的反映。当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皇家的山水宫苑的兴筑，如北宋汴京的艮岳，金中都的琼林苑，元大都的太液池与御苑；二是士大夫们建筑写意山水园之风在宋代出现高潮，多为与第宅相连的私园，以求闹中寻幽。北宋东都洛阳的私园仅《洛阳名园记》中所录就有二十四处，南宋临安（今杭州）、吴兴（今湖州）、平江（今苏州）等官僚文人聚集处也均建有大量私园，《都城纪胜》及《梦粱录》所录临安私园有四十余处，《吴兴园林记》录吴兴园林有三十四处，平江则城内外均建有大量私园。

艮岳是宋徽宗于政和七年（1117）开始营建的大型宫苑，宣和四年（1122）竣工，初名万岁山，后因其地处宫城东北隅（即处于八卦中的“艮”位），改名艮岳，总面积约七百五十亩。它是由宋徽宗、朱勔及宦官梁师成等规划设计的，其大规模的用石叠山是前所未有的。且山石多取自太湖沿岸，江浙一带凡有奇石佳木，均要封起来运至东京，这就是导致北宋覆亡原因之一的

"花石纲"。据文献记载，艮岳地势是左山右水，后溪旁陇，苑内峰峦崛起，众山环列。大石最高有四丈名曰"神运昭功石"。中间为平地，上凿大方沼，沼水东出为"研池"，西流为"凤池"。园内亭榭台殿不可胜记，尤以亭为多。此外还因境设景，十分注重与植被环境的结合。惜于1127年金人攻占汴京后被拆毁。

艮岳的营建，给民间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它的造园技巧，在中国造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首先是它突破了秦汉以来宫苑"一池三山"的规范，把诗情画意移入园林，以典型、概括的山水创作为主题，是造园手法上的一大转变；其次是掀起了堆山叠石的高潮，提高了对山石的审美情趣；三是注重了建筑、山水与植物的配置。

宋朝私家园林因地域不同，其特色也有所不同。北宋洛阳园林，有花园、宅园、别墅性质，其实都属写意山水园形式。在面积不大的宅旁园地里，引水凿池，广种花草竹木，叠土为山但仍少叠石，亭廊建筑依景而设，布置自由而有章法，特别是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多采用借景的手法。南宋吴兴园林选址多依山傍水，利用自然风景，或筑山凿池，配以树、石。总体上追求精炼，在小的境域内着意经营，模拟自然，叠石技巧进步，假山和赏石成为园中的常见题材。而苏州园林已出现较多建筑，盛植花木，引水开池，叠石造山，特别注意了布局中的"值景而造"，即借重"对景"这一重要的造园手法。总之，由于文人参与了这一时期的造园活动，因而使得园林与文学、山水画的结合更加密切，因地制宜地表现山水真情和诗情画意，对后代的园林有深远的影响。

宗教建筑是信徒进行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场所，其中佛教建筑占大多数，有寺、塔和经幢等类型。我国目前地面保存的早期建筑多为宗教建筑，它成为了解中国建筑结构与艺术的最详细的实物资料。宋元存世建筑中，祠庙主要有：山西太原的晋祠圣母

殿，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山西万荣县汾阴后土庙，建于北宋景德三年（1006）；佛寺主要有：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观音阁，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山西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重建于金天眷二年（1140），下寺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建于辽，普贤阁、三圣殿和山门则建于金；道教建筑主要有山西芮城永乐宫，重建于元。

圣母殿是晋祠的主殿，是现存北宋的重要建筑。它位于晋祠的主轴线上，坐西朝东，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它在结构处理和艺术性上很有特色，采用有一排柱子的单槽形式结构，殿四周有回廊一周，即《营造法式》中所载的“副阶周匝”。室内以通长三间（六架椽）的长栿承载上部梁架荷重，减去了全部柱子，并采用彻上露明造，使内部空间完整高敞。在艺术气氛上，首先是立面突出明间，次、稍间渐窄，形成一种渐变的韵律感。此外，殿柱的侧脚与升起显著，檐口线从次间上翘，形成柔和且富有弹性的曲线，前檐柱上缠绕的木质雕龙，以及殿前月台处理成十字形的“鱼沼飞梁”的形式，均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被称为宋代的典型建筑——秀丽的圣母殿。

宋辽时期，佛寺的建筑群组布局基本上仍沿用唐代的格局，如开封大相国寺的主体为：前有山门（亦作三门，由佛经中“三解脱门”而来），内有一重至数重殿，后为阁，前方东西侧各有塔，即出现了塔寺分立或另建塔院的做法。主体建筑两侧建有若干个院。寺院中的贸易开始兴盛，“庙会”成为集市的一个重要形式。河北正定隆兴寺则前为山门，中为大觉六师殿与摩尼殿，后有佛香阁及其前侧左右的慈氏阁与转轮藏殿，最后有弥陀殿。隆兴寺中出现主要建筑向高空发展，使之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反映北宋高型佛寺建筑的特点。

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县城内，其山门与观音阁是辽代重建时的遗物，结构精妙，艺术超群。观音阁外观两层，重檐歇山顶，内实为三层，中间为一暗层。每层均有其独立的梁柱、斗拱系统，特别是上层，也有阶基（平座铺作）、屋身、屋顶三部分，构成叠加上的一座单层建筑。每层的平面大小不一，逐渐递减，下层面阔五间，长二十点二三米。由于上下层平面不一，因面造成上下层柱子不对位，暗层的檐柱落到斗拱承托的梁上，柱均有侧脚。在结构上，阁采用内外两槽的构架和明栿、草栿两套屋架，内外槽与两套屋架紧密连系，这与唐代的特征相一致。阁的中部，有一直通上下三层的空井，具有结构和功能双重作用，上层六角形，下层方形，不同的形状有助于防止空井的构架变形，加强了阁整体的刚性。空井中置一座高达十六米的辽塑十一面观音像，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塑像。

位于南方的保国寺大殿，是一座上承唐制下开宋风的建筑。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前有月台，属厅堂型构架。它的构架在中跨三椽栿下用顺栿串，阑额下加由额、蜀柱，长二跨的昂身，这是唐代做法的遗存。柱身作八瓣瓜楞柱、海棠瓣状的栌斗等，是宋代新出现的装饰性处理手法。

永乐宫是一组迄今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建筑群，其原址相传是唐代道教“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宅第，称吕公祠。元代重建时称“大纯阳万寿宫”，后改称永乐宫。它的总体平面沿中轴线对称布局，自南而北有大门、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三清殿既保留了部分宋代的特点，比例和谐，稳重清秀，屋檐和屋脊线呈柔和的曲线，柱身略有收分，柱有侧脚和升起，又开创了一些新的特色，结构上大胆采用减柱，屋面坡度大，出檐减短，上层梁架采用“草栿”，斗拱用材减少，柱间朵数增多，开始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建筑做法的一些雏形。

塔是供奉或收藏舍利、佛经、佛像、僧人尸骨等的高耸型点

式建筑，早期受健陀罗的影响较大，以后逐步中国化，出现了多种用途与类型。宋元时期主要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和喇嘛塔。其中楼阁式塔居多，有木构、砖木混合结构和砖石结构几种。主要有：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苏州报恩寺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杭州六和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福建泉州开元寺双塔，建于南宋绍定至淳祐年间（1128—1250）；河北定县开元寺塔，建于北宋咸平四年至至和二年（1001—1055）；河南开封祐国寺塔，建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等。这时期密檐式塔盛行于北方，主要有：河南洛阳齐云塔，建于十二世纪中期的金代；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建于辽大安五年（1089）；北京天宁寺塔，初建于辽。喇嘛塔是在元代随喇嘛教的发展而兴建起来的，主要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

楼阁式塔是印度窣堵波和中国高层楼阁相结合的产物。它们每层之间的间距较大，相当于一层楼阁的高度。每层塔身均以木构或砖石仿木构形式，制作出门、窗、柱子、斗拱、屋檐、瓦陇、平座等。塔内一般都有楼梯，可登临眺望。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目前唯一存世的纯木构大塔，修建在一个石砌高台上，高六十七点三一米，外观八角五层，内部另有暗层四层。其最下一层周围有副阶。它在结构上采用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殿堂结构金箱斗底槽”形式，加上内部的四层暗层，使得整个塔身体现一种刚性，坚固稳定。此外，全塔的造型构图比例严谨，第二至第五层内槽空间高广实用，以及形式多样的铺作结构，均具有较高的成就。

密檐式塔的高度、体量与楼阁式塔相似，仅外檐层数较多。它的第一层塔身最高，第二层起塔檐紧密相连，层层重叠，几乎看不出楼层，其塔身一般没有门窗、柱子等楼阁结构，塔内一般无楼梯，即使有，也不作眺览之用。自辽代起，一般都成为实心

的塔身，完全不能登临，下部普遍增加一个高大的须弥座，雕饰富丽的佛教图案。北京天宁寺塔即是辽代盛行的八角密檐式砖塔的典型实例。塔高五十点八米，最下部为须弥座，座上砌出平座，平座上砌出有三重莲瓣的莲台承托塔身。塔身八角形，砖仿木结构。塔身上有十三层塔檐，塔顶上的刹为砖刻两层仰莲，加上须弥座承托宝珠。此塔的整体造型极为优美，梁思成先生誉之为“富有音乐韵律”。

喇嘛塔是随着元代喇嘛教的广泛传播而建造起来的，它的形式是窣堵波的真实再创造，由双层塔座、覆钵式塔身和塔刹组成。因全身涂白色，故又称白塔。元代白塔的塔脖子较粗，无“眼光门”。北京妙应寺白塔是现存最大的元代喇嘛塔。全塔造型雄浑有力，基座高大，塔身收分少，相轮造型精壮，是早期喇嘛塔的最重要的实例。

宋辽金元时期的建筑，其建筑风格之所以朝着柔和绚丽的方向发展，是与材料、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意识形态下艺术的发展分不开的。北宋建筑在材料方面，砖和琉璃构件的大量增加，使得建筑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如塔发展了砖石结构和砖石仿木结构，贴面装饰技术也有所发展。木结构技术方面，总体上守成唐代的成就，但结构开始简化，斗拱的机能减弱，梁架柱网的布置趋于灵活。北宋崇宁二年（1103）政府颁布的《营造法式》总结了以前的技术经验，规定了模数制的制定和运用，强调了设计上的灵活和装饰与结构上的统一，以及严密的生产管理。南宋建筑实物虽少，但风格上偏于小巧、精致和工整。辽代基本上承唐，风格简朴、浑厚和雄壮，斗拱雄大硕健，出檐深远，细部雕饰较少，与宋建筑形象有别。金代建筑则具有宋、辽双重的风格，既规模宏大，又讲求雕刻与色彩。元代单体建筑总体上趋于简化和粗糙，喇嘛教艺术影响全国。在装饰艺术上，这时期的建筑构图丰富、雕刻精美，小木作技术十分发达，栏杆花纹已从过去的勾

片造发展为各种复杂的几何纹样的花板。室内“彻上露明造”的梁架、斗拱以及具有各种棂格的格子门、落地长窗等，既是建筑功能、结构上的需要，又体现了装饰作用。门的艺术、第五立面艺术与细部装饰艺术，相应的都十分发达，色彩的运用在彩画和琉璃瓦的应用上十分明显，较为华丽。总之，从北宋起，我国的宫殿、庙宇和民间建筑，其风格都向秀丽而绚烂的方向转变了。

（龚良）

参考资料：

《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

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建筑史论文集》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陈明达《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第二版。

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年。

宋元瓷器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当时，瓷窑遍布各地，并形成独具风格的瓷窑体系，争相斗妍。制瓷工艺有许多新创造，产量聚增，品种繁多，特别是瓷器釉色那凝重深沉的质感和沉静雅素的色彩装饰，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宋代瓷器不仅是民间普及的日用器皿，而且也是官僚士绅阶层把盏玩味的陈设物品，更是当时海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这一切曾使一些对中国瓷业史不甚了解的人产生错觉：中国出现真正的瓷器，是否应从宋代开始？

据解放以来的考古发现，宋代瓷窑在我国一百三十多个县均有分布。从各窑产品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异同，可将宋代的瓷窑体系分为六种，即北方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一带。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定窑。产品以白釉瓷器为主，装饰的花卉花纹繁富华丽。定窑首创覆烧工艺，提高了窑的单位产量。这种烧法对宋代瓷器的烧造有很大的影响。定窑瓷器由于采用覆烧，一些碗、盘的口缘部往往露胎无釉，俗称“芒口”。有些高级定瓷便在有芒处扣镶金属，把瓷器装饰得雍容华丽。定窑白瓷的上乘之作，很多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器物上往往刻有字款。

宋代烧造定窑风格白瓷器的窑场，在今山西平定、盂县、阳

城、介休，以及四川彭县都有分布。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专烧青瓷的民窑，地点在今陕西铜川市黄堡镇。铜川，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耀州窑瓷器胎质坚致，呈灰白色，釉色青翠润净。装饰花纹以缠枝或折枝的花卉图案为多见，刻印技法产生较强的浅浮雕效果。耀州窑产品，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且在北方民用青瓷中，首屈一指，享有盛名。因此，北宋年间耀州窑所烧瓷器曾作为贡瓷，常年例供宫廷使用。

宋时仿烧耀州窑青瓷器的窑场，在今河南省的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内乡等地均有分布。为满足瓷器大量外销的需要，在今广东省广州市西村和广西省永福等地，宋代曾在此设有烧制耀州窑风格的青瓷窑址。

钧窑在河南省禹县。文献记载，禹县是夏禹的都城。传说夏启夺位后，曾召集各部落的酋长在禹县北门外的“钧台”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他正式继位。宋时，这里瓷窑遍布，盛烧瓷器，钧窑由此而得名。钧窑瓷器的釉色非常独特，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状和不透明的感觉。主要釉色品种有天青、月白、海棠红和玫瑰紫四类。钧窑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瓷器上时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其形状好像一条蚯蚓在泥土中游走，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以绚丽的釉色取胜，不另装饰花纹。

宋时烧造钧窑系瓷器的窑址，在今河南省临汝县也有多处分布。

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产品以碗盘为主，是北方民间日用瓷的畅销品，尤以各种瓷枕最具特色。磁州窑瓷器胎质坚细、黄白釉釉下黑褐彩是其主要装饰。花纹种类繁多、构图清新洒脱，多用绘、剔、划等技法绘制。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属于该窑系的窑场广

泛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北宋末期靖康之变，北方磁州窑部分工匠南迁江西吉安，继续从事烧制瓷器。这种瓷器多以白地釉下彩绘为装饰，也有少量为酱褐釉地白花装饰，其总体风格仍属于磁州窑系。

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窑场集中分布在以龙泉县为中心的浙江南部地区，江西吉安和福建泉州也有少量烧造。宋代的龙泉青瓷种类很多，既有日常器皿，也有文房用具，还有仿古器物。更重要的是代表龙泉特色的粉青和梅子青釉色，如碧玉和翡翠一样凝润，达到了我国古代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工艺顶峰。

江西景德镇是宋代重要瓷窑之一，其以烧制一种独具风格的青白瓷而闻名于时。景德镇原叫昌南镇，因其地所产瓷器博得北宋真宗皇帝的赏识，大批生产写有“景德年制”字款的御用瓷器，于是昌南镇的地名逐渐为真宗年号景德所替代了。青白瓷的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又显青，一般还将青白瓷称为“影青瓷”。青白瓷器在北宋中叶到南宋期间，十分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器物造型优美而多样，釉下刻印花卉图案清新淡雅。

属于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窑系的窑场在江西的南丰、吉安、湖安和福建的德化、泉州、永春、安溪、同安、南安等地均有分布。

除上述烧造白瓷、青瓷和青白瓷的窑场以外，在宋代许多地方还烧造一种很普通的黑釉瓷器。当时烧造黑釉瓷最著称的窑场，在今福建建阳水吉镇，习称建窑。建窑产品以碗盏为主。最有特色的是，在其通体漆黑色的釉上，往往烧出闪银光的细条纹，状如兔毫；或烧出银光色的圆斑点犹如油滴。建窑黑瓷也曾一度为宫廷烧制，供斗茶所用。

宋代瓷业的兴盛，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各地瓷窑为了满足各阶层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烧制了品类繁多、

造型丰富、装饰精美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文化发达的时期，曾一时兴起金石考古之风气，瓷器中出现了仿先秦青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如鬲、鼎、尊、壶、觚、琮等，成为当时皇室宫廷、官僚士绅居宅之所的陈设用瓷。

生活用瓷当中，尤以瓶、壶、炉、盒、枕等造型各异，样式繁复，是宋代瓷器中具有时代特点的典型器物。瓶，可分为盛酒用具如梅瓶，佛前供器如净瓶，陪葬明器如龙虎瓶等；其造型则多样而奇特，如做成瓜棱形、葫芦形、橄榄形、胆式、花口式、双鱼耳式等。壶，是宋代生活用具中的酒器，其形式可分为瓜棱壶、兽流壶、提梁壶、葫芦式壶等。炉，是宋人常用的焚香薰燃用具，有鬲式、鼎式、海棠式、莲瓣式、镂空式等。盒，是宋代用途广泛的生活用品，有镜盒、药盒、香盒，以及妇女化妆用的油盒、粉盒、黛盒和硃盒。枕，是我国古代的夏令寝具，宋代瓷枕形式极多，特征明显，有长方形、椭圆形、八方形，也有塑成银锭式、狮虎式、孩儿式、卧女式等多种姿态。

宋代瓷器不仅以多彩的釉色和新颖的样式取胜，其瓷器上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别致。纹饰题材既有追求吉祥的龙、凤、鹤、鸳鸯、游鱼、飞雁等动物图案，也有象征富贵的牡丹、莲花、卷草、蕉叶、梅花等植物花草图案，还有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剪纸漏花、婴孩嬉戏、钱纹、回纹等图案。纹饰构图因器施画，笔法简练自然，富有时代气息。

宋王朝较为重视海外贸易，在东南沿海先后设立多处专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远洋造船业，使宋代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很大促进和发展。瓷器作为中国独有的商品和名闻海外的著名工艺品，成了宋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宋瓷外销，较之唐代不仅行销的市场有了扩大，而且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今日亚洲的日本、朝鲜、马来西亚、文

莱、菲律宾、巴基斯坦、伊朗和非洲的埃及、桑给巴尔、索马里、罗得西亚、坦噶尼喀等国家和地区都发现过宋代瓷器，这是研究宋代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文献记载，宋代尚有专烧宫廷御器的汝、哥、官三大名窑，传世的瓷器精美而珍贵，但目前仍未寻找到这三个名瓷窑的确切窑址，是我国陶瓷史上的悬案。

辽王朝是十世纪初，由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在我国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辽统治范围的南部，恰同中原地区的定州、磁州、邢州等制瓷历史比较悠久，制瓷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接近，加上契丹统治者很早就注意把具有制瓷等多种手工业技术的汉人有意俘掠安置，因此辽代制瓷业明显受到中原北方制瓷业的影响。

辽代瓷器的造型分二大类，一类大多模仿中原固有的陶瓷器皿样式烧造；另一类则仿照契丹族传统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而烧造。辽代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的瓷器有鸡冠壶、鸡腿瓶、桶式瓶、方碟等。鸡冠壶的形状模仿契丹族使用的盛水、盛酒的皮囊壶，壶上部有鸡冠状的孔鼻提梁，故称鸡冠壶。造型从实用出发，管状小口，肥身，底置圈足，使液体宜贮存，能保暖。器表贴塑类似缝制的皮条扣皮和装饰，保留着游猎生活的风格。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平底小口，上粗下细，是契丹族专用的一种贮藏器。桶式瓶，瓶作圆形直桶形，是仿造镟制木桶形器而制作的。方碟，碟作方形平底，侈口曲边，是仿造契丹人使用的木制筒式餐具。

辽代瓷器的装饰除受中原因素的影响外，也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特点。装饰手法上，有用雕釉、剔粉、填黑等法刻划的线条，或粗犷宽阔，或柔和纤细；比较普遍地把模印或手塑的部分花纹贴附于器坯的上面，再用色釉描画。辽瓷的装饰纹样，最喜用当时被种植在东北和河北地区人们的庭院中的牡丹和盛产在东北的

山野中的白芍药，以及莲花、菊花、卷草等花纹装饰器皿；装饰纹样的题材还有人物、兽面、火珠、蟠龙以及仿马镫壶上的皮条、皮钉、皮穗、皮绳、皮雕花饰等。

总之，辽代瓷器的工艺、造型和装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尤其是辽代畜牧业和农业经济及其生活的发展变化。

金代瓷器，以往由于历史文献记载中不见和实物资料的少有，一般均将其误认为宋元时物。只是五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展开，金代瓷器的面纱才逐渐被揭开。

金王朝是女真族建立的一个政权。金人灭辽、侵宋，统治范围在东北、华北地区。金代前期东北地区的瓷器，其烧造技术水平较落后，造型拙朴，釉色单调，极少花纹装饰，器物多属日用粗瓷。金代后期中原地区的瓷器，其烧制的窑口大多出自原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有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钧窑、陕西耀州窑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金代瓷器是北宋瓷器的继续，产品则失去了往昔的精彩。不过金代时期的瓷器，在工艺、造型和纹饰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金代窑工没有一味沿袭传统的"覆烧"工艺，创造了一种产量高、成本低的砂圈叠烧的制瓷新工艺。金代磁州窑系的虎形枕、方型双耳花瓶、狮子莲花座灯，耀州窑系的单耳洗，山东淄博磁村窑的黑釉白线纹器、安徽萧县萧窑的小件牛马鸡蛙瓷塑等，均是金代瓷器中风格甚佳的器形和器类。金代瓷器的花纹装饰较之宋代则日趋简单，常见的题材以各种折枝、缠枝花卉为主流，其次有水波、鱼雁、婴戏、牡丹或莲花、犀牛望月等。装饰技法有定窑瓷的浅浮雕刻划艺术和磁州窑瓷的用斑花石做颜料的笔绘艺术，代表了金代制瓷工匠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所做出的成就。

元代建立，统一了宋、金、西夏的对峙局面。其虽仅存在了九十多年，然在前代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及手工业等

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元代瓷器便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有种种突破性成就。一方面旧时生产瓷器的主要窑场，如钧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元代时仍继续生产传统产品，有些在产品数量、生产规模上甚至还有增多或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南宋末年，我国北方战事频繁，许多北方瓷窑的制瓷工匠为避乱，纷纷逃亡南迁。到元代，这些南迁的北方各窑制瓷匠人便集中在元政府在江西景德镇设立的官办制瓷机构——浮梁瓷局。工匠与技术的聚集，客观上促使景德镇窑的瓷业出现巨大的进展，并日渐成为全国的瓷器烧造中心。

元代景德镇制瓷业新成就主要是：首先，元代景德镇青白瓷的瓷胎料中加入了高岭土，由此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造出气势博大的作品，开始了瓷器由软质向硬质的飞跃。其次是元代景德镇窑烧造出具有划时代的产品——青花瓷和釉里红瓷。青花和釉里红均为釉下彩，其彩在釉下，不易磨损，且彩釉着色剂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金属元素。还有青花、釉里红色彩明净素雅，极具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使中国的绘画技巧、制瓷工艺及美观实用等特点在瓷器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元代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要产品，运销海内外，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其三，元代景德镇窑烧造的卵白釉、铜红釉和钴蓝釉等瓷器新品种，不仅标志着制瓷工匠此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制瓷工艺中各种颜色釉的运用，更有意义的是瓷器釉色的纷呈多彩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单调局面。

元代瓷器具有显著的时代风格，即形大、胎厚、体重。然元代瓷器的造型与装饰较之其他时代一样，则不乏制作精致和优美者。

罐、瓶、壶、盘、碗、匜和高足杯是元瓷的主要器类。罐虽

为常见器，但其盖、口、纽多有变化，如荷叶盖罐、兽耳狮纽盖罐、直口罐、洗口罐等。瓶类器物中则有丰肩的梅瓶、象耳瓶、戟耳瓶、蒜头瓶和玉壶春瓶等，样式精湛。壶有执壶、凤型壶、四系扁壶等，还有元代创新的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多穆壶、僧帽壶，以适合蒙、藏等族人民生活中贮盛奶液所用。高足杯是元瓷中颇具时代特征的器物，杯体呈小碗状，杯足作上小下大的筒节式。元代瓷器造型是十分丰富的，由于元瓷有体大、厚胎的特点，一般在器底可以看到有砂眼、刷痕和铁质斑点等缺陷，成为后世鉴定元瓷年代的一个小诀窍。

元代瓷器的装饰方法既采用刻、划、印、贴、堆等传统技法，又更多地采用雕镂、绘画等创新手法，其因器物造型以及产品胎、釉特性的工艺而宜，尽情发挥，烧造出美观实用的瓷器。

装饰花纹以元青花为例，取材甚广，极为丰富，有龙凤鹤鹿，也有螳螂蟋蟀；有牡丹莲花，也有松竹梅菊；有缠枝花草，也有锦地杂宝。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受元代戏曲小说的影响，瓷器装饰内容里，盛行许多历史故事题材，如周亚夫屯军细柳营、萧何月下追韩信、蒙恬将军、明妃出塞、三顾茅庐、吕洞宾修道等，给中国陶瓷装饰艺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明清两代制瓷业产生很大影响。

元代瓷器的对外输出，无论在品种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这些供海外贸易所用的瓷器，绝大部分是由今浙江、福建和江西景德镇地区的瓷窑烧制的。它们被用商船装载，通过海上交通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尤其是朝鲜、日本和许多东南亚国家。1977 年，在韩国木浦市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我国元代沉船，打捞出的瓷器达一万多件，元代瓷器外销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周裕兴）

参考资料：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

《陶瓷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年。

《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年。

宋词隆兴

太祖建隆元年（960）春正月，视察太学，对侍臣说："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臣民始贵文学。二年秋七月，罢石守信等人兵权，令文臣为地方官。开宝八年（975），太祖死后，太宗继立。太宗通晓音律，能自度曲，在位二十二年间，留心礼乐，制度大备。然而干戈之余，天下粗定，文士多为南唐、吴越、后蜀来归的废王降臣，词作不多，仅为晚唐五代遗绪。

真宗继立，在位二十五年，尤重文事，亲撰《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加以科举日盛，逐渐造成空前的重文社会风气，此时入宋已数十年，在前代遗老之后，宋朝自己的词人也已成长起来。先是王禹偁、寇准等偶为小令，算是开了宋词的端倪。继而真宗朝后期，范仲淹、晏殊、张先并起于词苑，入仁宗朝，渐渐拉开宋词发展辉煌的序幕。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先世邠（今陕西境）人，迁居吴县（今苏州市）。大中祥符进士，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率兵守边塞多年，西夏不敢犯，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作词乃范仲淹余事，今传仅六首，其《渔家傲》写边塞秋景，悲凉怀抱，突破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为后世豪放派先声。录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但在仁宗朝前期，这样的词还属仅见，那时天下“承平”，文人士大夫得意者安享富贵，闲情雅致，继承发扬了晚唐温（庭筠）、韦（应物），五代冯延巳以来的词风；失意者流连市井作狭邪游，仿俗歌小调创为新词，使词获得新的生命力。前者晏殊、晏几道父子为代表，后者最著名的为柳永一人。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七岁能文，十三岁以神童荐，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庭中，诗赋援笔立成，真宗异之，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朝官拜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一生官运亨通，卒谥元献。传世有《珠玉词》，名作如《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又如《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幙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他的词可谓闲愁万种，温厚舒缓中有一种雍容富贵的气象。这正契合一班官僚士大夫养尊处优、娱宾遣兴的心境，加以作者地位的影响，创作这种典雅的文人词成一时风气。重要的作家有晏几道、欧阳修等人。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生卒年无考。他是晏殊的儿子，但一生仕途坎坷，只做过一任小乡镇的监官。有《小山词》，与其父齐名，称“二晏”。他的词风也肖似乃父，但比较父亲显宦的闲愁，他所抒发的却是卑微小官的真哀愁了，只是不离女人与酒。例如：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

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他的词情真意切，风流妩媚出于自然，论者以为其“工于言情”处，还在晏殊之上。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吉安市）人。仁宗朝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主帅，词则为晏殊一流。有《六一词》传世，名作如《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比较晏殊，欧阳修词写情更深一些。后世“晏、欧”并称，其实欧词成就要略高一些。冯煦说他“疏隽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

宋初写作文人雅词而别有风调的是张先。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官到都官郎中。张先“善戏谑，有风味”，是个享高寿又极风流的词人，有《安陆词》传世。他最得意最为人传诵的词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等句，因自称“张三影”。他好为艳辞腻声，“秀艳过施粉，多媚生轻笑”。这两句词可以代表和形容他的词风了。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张先的词不过晏、欧的一个旁支。

仁宗年间，约与二晏、欧阳修、张先同时并立词苑，于雅词外别开新面的是柳永。柳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境）人。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喜作小词，薄于操行”。考进士不取，作《鹤冲天》：“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闻之，斥曰：“且去填词！”遂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后改名永，始登进士第，官至屯田员外郎，世号柳屯田，有《乐章集》词传世。

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秦楼楚馆，游冶四方，从市井生活，民间曲调汲取作词的营养，加以他的才华，遂创造了一种“铺叙展衍”、“旖旎近情”的通俗词风，流传之广泛，至于有说“凡有井水之处，即能歌柳词”的（叶梦得《避暑录话》）。相传柳词《望海潮》咏钱塘富丽，金主亮读之，“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钱塘遗事》）。但是，他的词却不受晏殊等正统派词人欣赏。《画墁录》载，柳永以《鹤冲天》词不得授官，去见宰相晏殊，“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从这里可以看出柳永与晏、欧词风趋向的不同。

柳词的内容约有两大类，一类写其游冶生涯与放浪心绪，一类写其旅程游况与眼中风物；风格也有雅、俗两种，体制则每为长篇的慢词，有的三叠达二百多字（如《戚氏》）。名篇如《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的词情景交融，层层铺叙，直裸酣畅，一泻千里。词到柳永，由士大夫文人自我表现的典雅小令的天下，一变而为抒发叙写市井生活情趣的浅切的慢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个很大革新。但无论晏、欧、柳永或其他词人，都未能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所唱的都是“靡靡之音”，风格柔弱无力，按照后人词分婉约、豪放二家的说法，大致都属婉约派，极少例外。

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以平易朴实之文取士，一时苏轼、苏辙、曾巩等进士及第并起于文坛。苏轼不仅是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更在欧阳修墨守

成规的词的领域里闯出一条新路。胡寅在《酒边词》的序中说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尘垢之外。"王灼《碧鸡漫志》则推崇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苏轼（1036—101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四川省县）人。仁宗朝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他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又与司马光等保守派不和，所以屡遭打击，入狱被贬，卒死于常州。他多才多艺，是中古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词有《东坡乐府》传世。他的词内容广泛，举凡怀古、咏史、说理、谈玄、感事、言情，无所不包，从而彻底打破"词为艳科"的传统；又"以诗为词"，风格多样，在内容和形式上赋予宋词以崭新的色彩，尤以豪放旷达之作最为突出。如《水调歌头》(前有小序不录)：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样的词旷达高远，雄浑博大，以自由奔放的气势，为豪放派开宗。但在当时并未影响成为风气，苏门文人中作词的不少，竟无一人能称得上豪放词人，反倒"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成为柳永以后婉约派的大师。

秦观（1044—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市名）人。元丰八年进士，官到太学博士、国子编修。仕途坎坷，有《淮海词》传世。秦观的词如少年公子，风度翩翩，近乎柳永，而轻柔婉约远过前人。名作如《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同时词人有黄庭坚、贺铸、毛滂、陈师道、晁补之、晁冲之等，争艳斗丽，风流辉映，成北宋词一代之盛。

徽宗朝，宋室积贫积弱至于极点，内忧外患连绵不断，而君臣宴安，享乐无度，徽宗本人吹歌弹唱、书画词曲，无所不好。崇宁四年（1105），设大晟府，整备改创乐曲词调，使词在音乐方面的发展达到顶峰，曲调益繁，格律益严，周邦彦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周邦彦（1055—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市）人。徽宗时仕至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美成博览群籍，尤富音乐和文学的天才，作有《片玉词》，又名《清真词》。他对词学的贡献，主要在曲调格律的搜求、推敲、考定，写作技巧也有所创新，使词风由柳永以来的俚俗再归于典雅、含蓄，在形式技巧的方面堪称集晏、欧以来婉约派之大成，而相应文人词的道路也就越来越狭隘了。他的代表作当推《少年游》：

并刀似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帷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只是少人行。

据说这首小令是周邦彦匿于床下，偷听道君皇帝（即徽宗）

狎昵名妓李师师的谑语后，隐括而成的。事虽不雅，但经作者写来，轻清工巧，明净婉媚，正所谓“清真”风韵，此所以他能越过柳永受到上层文人激赏而推为词坛盟主的根本原因。

徽宗朝与周邦彦同时稍后擅名词苑的还有伟大的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1081—1140?）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名士李格非之女，二十一岁嫁赵明诚，夫妻相得，皆好学能文。后赵明诚死，清照颠沛流离，历尽辛苦而卒。有《漱玉词》传世。她的词每写闺愁相思之情，婉媚流丽、机杼天成，最富女性幽柔深细之美，名作如《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都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在南渡以后还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她的词并没有写到“靖康之难”的沧桑巨变。所以，作为一位词人，她主要是为北宋词坛做了一个光辉的结束。

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陷汴京；翌年，金兵掳徽、钦二帝北去。本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是为宋高宗。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宋金对峙。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激起了南宋军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热忱，北宋百余年来或“娱宾遣兴”，或“浅斟低唱”的调子一时不好再唱下去了。南宋前期，由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应运盛行起来。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志士，把同仇敌忾、誓复中原的豪情化为词作，造成了宋词辉煌的黄金时代。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境）人。著名民族英雄，南宋抗金爱国将领，战功显赫，而冤死于投降派

的昏君奸臣之手。他一生只留下一首词，但千古绝唱，不仅为南宋爱国词开篇，而且足以彪炳词史了。词曰《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同时或稍后，张元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等，都是此类爱国词的名篇。它们或慷慨壮烈，或沉郁悲怆，或凄楚哀愤，表达了南宋抗金爱国军民的共同心声。但是，真正使豪放词光焰万丈的是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少年即参加抗金斗争，失败后南归，历任湖北、湖南、江西安抚使，力主抗金，但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始终未受重用，抑郁以殁。有《稼轩词》传世。《词苑丛谈》卷四引黄梨庄的话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他的词正是一位爱国志士光辉人格和心灵的真实写照。名作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又如《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词的豪放风格，更充实以现实政治的内容，使之富于战斗精神；写法上也由苏轼的“以诗为词”发展为“以文为词”，无论经史子集的语言，都根据表现思想感情的需要随手拈来，融化入词。他使词不仅可以即事抒情，而且可以议论，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和手段。《稼轩词》六百余首，虽成就不一，但整体上其可以雄视百代。加以当时陈亮、刘过等人的唱和，形成有力的羽翼，所以南宋前期数十年间，豪放词竟空前绝后地代替婉约派，成了词坛的大宗。后来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抗金斗争的连年失利，这一派词的作者渐稀，但直到南宋灭亡，最后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还写出了“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的壮词（《念奴娇·水天空阔》）。

但在南宋的词坛上，婉约一派仍悄然流行，并越到后来作者越多，渐渐又恢复到词的主流和正宗，它的代表人物是姜夔、史达祖、吴文英。这些作家在当时都名位不高，或为布衣，或为幕客、堂吏，但都有音乐和文学的天才，醉心于词的研究和创作，故能接续周邦彦以求格律派的传统并在词的形式技巧方面有所发展，甚至还写出了一些内容上也较为可取的作品，如姜夔《扬州慢》(有序不录)：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感时悯乱的主题和倾向是很好的，但即使这样的内容，作者还要扯到唐代杜牧在扬州的风流韵事，其不同于苏、辛一派词人是显然的。所以宋词到姜夔为又一变，这一变回到晏、欧、秦、周文雅词的老路，词的黄金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杜贵晨）

宋元杂剧

“杂剧”一词早在唐代时就已出现，当时又称作“杂戏”。唐代的所谓杂剧或杂戏，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戏曲，大抵是指如汉代“百戏”那类兼容各种花会、杂耍的表演集合体，其中还包括“参军戏”。参军戏是由参军和苍鹘两种角色表演的幽默小品。同唐代杂剧相比，宋杂剧虽然也包括多种杂伎，但每次同台演出的已不一定是一个个单独的节目，尤其是南宋时的杂剧，从内部结构看，它已具有了一个多部段的形式。这种多部段的形式，已经从其他杂伎中脱离出来，成为比较独立的艺术了。

宋杂剧的演出体制共分三节四段。第一节为一段，称“艳段”，又作“焰段”，是一简短的“寻常家事”的表演；第二节为两段“正杂剧”，为整个演出的中心部位；第三节为一段，称“散段”，为所谓“杂扮”表演。

杂剧的角色已由唐代参军戏的两种（参军和苍鹘）发展到五种，即：(1) 末泥色，(2) 引戏色，(3) 副净色，(4) 副末色，(5) 装孤色。其中副净和副末是一捧一逗的幽默角色。在实际演出时，并不一定五种角色都出场，可能只有两三个角色上台演出；有时一出戏中会有几个相同的角色同时出演，这就要视剧目的需要了。

古人有记载说，宋杂剧表演“务在滑稽”，即演出透着幽默的气氛，常有插科打诨穿贯其中。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从末杂剧所包括的副净和副末这两个从“发乔打诨”为职能的角色便可

知道。但是宋杂剧也确有许多严肃的正剧和令人心酸的悲剧，在这样的剧目中，滑稽表演则利于调节舞台气氛和强化戏剧效果。

宋杂剧演出通常是单本剧，但也有少数的连台本戏，如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便有这样的记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七夕"即农历七月七日晚。一出戏能够连演八九天，可见其篇幅之长了。《目连救母》演目连的母亲刘氏，因生前作恶，死后堕人地狱最底层，目连人冥间去救他的母亲，经百般周折将刘氏救出，但她已成为饿鬼，每到吃饭时，食物就变成烈火，于是目连设盂兰盆会，使她从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那天开始进食。这个剧目与唐代的《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属同一题材。这篇变文还在，但《目连救母》杂剧的剧本却不复存在了，不过与它同题材的南曲剧本还保留了下来，共有一百出，可见其规模是不小的。

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宋杂剧完整的文学剧本或演出本，只能从宋人笔记中知道当时的剧目是极多的。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载，仅通行的宋杂剧剧本名目就有二百八十种。这些剧目的题材相当广泛，有反映追求自由婚姻的，如《相如文君》、《裴少俊伊州》、《崔护六幺》、《莺莺六幺》等；有反映婚姻双方冲突的，如《王宗道休妻》、《李勉负心》等；有神话传说剧，如《柳毅大圣乐》、《郑生遇龙女薄媚》等；还有再现历史的剧目，如《霸王剑器》等。除此之外，像《门子打三教爨》是嘲讽儒、释、道教的，《钟馗爨》是歌颂传说中除邪袪鬼的形象之作，等等。

宋杂剧的表演手段已囊括了唱、念、做、打。它所使用的音乐大都从唐宋歌舞中来，如大曲、法曲等，另外有些音乐是从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借鉴来的。

宋金南北对峙时，宋杂剧实际上分为两支。宋杂剧原来是以东京汴梁为演出中心的，宋室南迁后，杂剧的中心便移到杭州。而在北方留下来的杂剧班子，也没有全暴散，金人入主中原北方

后，杂剧仍在上演，后人称之“金院本”。院本，一般认为是指当时艺人献艺的场所——“行院”所演出的剧本。由于当时南北分为两个朝廷统治，在不同的政区，南北演员交流的机会不多，所以南宋杂剧和金院本可能因其自身的发展，在演出时小有区别，但小异而大同。像宋杂剧一样，金院本也有五种角色，这便是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和装孤，无论从数目上，还是从称谓上，都是一致的。金院本又称“五花爨弄”。“五花”，指五种角色；“爨弄”，是表演的意思。除角色外，其他艺术因子，也大体相同，所以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元代离宋金时代不远，他似乎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据《南村辍耕录》载，金院本剧目达六百九十种之多，相当于《武林旧事》所载宋杂剧剧目的二点五倍。除少数剧目与宋杂剧剧目的题材相同外，大多数剧目则是独创的。陶宗仪将金院本共分为“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霸王院本”等十一大类，每类之下都标有十几种到一百多种剧名。和曲院本是以歌舞为主的剧目，上皇院本是演宋徽宗事，霸王院本则是以楚霸王项羽为主角的剧目，另外还有“诸杂砌”类，所标剧名均为以滑稽为主的短剧。院本的音乐也袭用法曲、大曲等曲调。表演手段上除歌唱外还有“散说”、“念道”、“筋斗”、“科泛”，可见也是唱、念、做、打，样样俱全。

宋代以杂剧命名的戏曲还有活跃于东南沿海温州地区的温州杂剧；因温州又名永嘉，所以它的另一名叫永嘉杂剧。永嘉杂剧滥觞于北宋末，于南宋初形成。它虽也称作杂剧，但一般认为与宋杂剧分属两个系统，其风格体貌有较大的区别。据明代徐渭等人云，它当是南戏的鼻祖。

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最光辉的历史阶段之一。元人说：一代有一代的文艺代表形式，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而元代的代表性文艺则是曲。可见元人对于拥有元曲是何等

的骄傲！其实何止元人，后代人同样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一辉煌成就颇感自豪。

元曲包括两种文艺样式：一叫散曲，它是一种歌曲样式，其唱词属于诗体；一叫剧曲，属于戏剧形式，这便是元杂剧。但散曲和剧曲也有联系，即元杂剧的音乐结构，与散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通的。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小令是单独的曲子；而套数（又称散套）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排列成一组套曲，用以抒发作者的某种情感或叙述某一事件。每本元杂剧一般由四折组成，合演同一个故事，每折则用一个套数，四折共用四组套曲。此外，每本杂剧有时还使用一两个楔子。楔子比折的规模要小，一般作为序曲放在一剧的开头，或放在折与折之间，用以贯串剧情。楔子中一般只用一两支曲子。有些故事曲折跌宕，一本不足以演完，就编成几本演出，这很像“连续剧”。如《西厢记》共由五本合演崔莺莺和张生爱情故事，共二十折，五个楔子，体制相当宏伟。

元杂剧的角色划分，比起宋杂剧、金院本来要细致。元杂剧以“正末”、“正旦”为主要角色。元杂剧以唱见长，全剧往往由一人主唱，或者是正末唱，或者是正旦唱；其他角色不唱，或只在楔子中有一两支唱曲。这是元杂剧角色分工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色。正末所扮演的是成年男性，正旦扮演成年女性。但不是所有的男性或女性均由正末或正旦扮演。其他角色还有“外末”，扮演次要的男人；“小末”，扮演男青少年；“俫”扮演男童；“孛老”，扮演老年男性；“外旦”，次于正旦的女角；“小旦”扮演小女子；“卜儿”，扮演老年妇女；“搽旦”扮演邪恶或不正派的女人；“净”和“副净”，一般扮演勇猛或狡诈的人物；“丑”，一般扮演善于戏谑者或狡猾人物；“邦老”，扮演强盗、流氓等不正派男人。另外还有“祗从”（官府的随从）、“孤”（一般官吏），“邦子”（乞丐）以及“大旦”、“老旦”、“旦俫”、“色旦”、“贴旦”

等。

同宋杂剧相比，元杂剧属于更加成熟的戏曲，它的出现是表演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元杂剧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就其戏曲形式而论，它是对宋杂剧、金院本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在它形成的过程中还吸收了说唱艺术（如诸宫调等）的手段，尤其在音乐体制上采用了新兴的歌体——散曲的歌唱结构，歌舞、杂伎等艺术也对元杂剧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元代涌现了一大批杂剧作家，仅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中就载有“名誉昭然”的剧作家九十余人，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中所录元代和由元入明的剧作家竟为上述数字的二倍，这些记载还不包括“无名氏”。元杂剧得以兴盛是与这批剧作家勤奋的创作分不开的。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对于汉人相当歧视，他们把当时的人划为四等，汉人（尤其是南宋治下的汉人）为末等。而汉人中的知识分子更受轻视和打击。据有关记载，蒙古统治者依据职业和身份将人强分为十级，儒者（即知识分子）被划在第九级，还不如娼妓，而仅强于第十级乞丐。读书人进身之阶的科举制，在元人也一度被废除；就是在恢复科举后，汉人知识分子若能考取，也必按规定低蒙古人一级录用。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满腹学问的知识分子便与下层百姓接近，投身于戏曲创作中，把他们的文化贡献于剧坛。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元杂剧剧目就有六百多种，其中保留下来的剧本，计有一百五六十余种。这些剧本中有反映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痛苦生活的悲剧，有表现人民理想和市井生活的喜剧和闹剧，有历史剧、神话剧、公案戏，有反映追求自由婚姻的爱情剧，有描写人民反抗统治者的英雄剧，还有嘲讽势利小人和吝惜鬼的作品，总之题材相当广泛，风格多样，具有非常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当然有些作品也宣扬了腐朽的封建思想，即使在一些

优秀作品中也不免流露出时代和作家的思想局限。

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之中，关汉卿是最杰出的大家。他是元代前期作家，总共创作杂剧六十多种。关汉卿不仅是杂剧作家，也兼导演，有时自己还粉墨登场，客串演出。当时大都（今北京）成立有“书会”组织，书会类似文学或戏曲创作的民间协会，关汉卿以其高超的创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被推为书会中的领袖。今存关剧十八种，其代表作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鲁斋郎》等。《窦娥冤》演述贫儒窦天章因上京求取功名，将自己的女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以抵还债物。端云改名窦娥，结婚后丈夫即死去，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父子因救过蔡婆婆，张父强与蔡婆婆成婚。张驴儿也想乘机霸占窦娥，但遭到反对，于是打算用毒药毒死蔡婆婆，然后占有窦娥。不想张驴儿反将己父害死，在霸占窦娥不成的情况下，竟诬告窦娥杀人。贪官桃杌受贿，用刑逼供窦娥；窦娥不屈服，但为救蔡婆婆，只得屈招。窦娥被判成死刑，临刑前正值三伏天，她发下三条誓愿：第一血溅白练，第二天降大雪，第三当地干旱三年。这三条誓愿均已实现。窦娥死后，冤魂不散，她向已经为官的父亲窦天章托梦，屈述其冤；窦天章杀了张驴儿，处理了贪官，为窦娥恢复了名誉。这是一出著名的悲剧。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官府的腐败和流氓的无法无天。窦娥作为一个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妇女，无辜被夺去年轻的生命，深刻地反映了普通百姓，尤其是妇女的悲惨命运，同时她所发下的誓言和她的灵魂不屈的情节，也曲折地表现了被迫害者顽强的斗争意志和复仇的决心。此剧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长久流传后世，明传奇和清以后的地方戏多有改编本上演。

《救风尘》则是一出喜剧。妓女宋引章听信阔商人周舍的谎言，嫁给了他，婚后遭到周舍百般虐待。宋引章在妓院时的好友赵盼儿得知后，特地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并谎言带了家财主

动嫁给周舍，但她提出条件是首先让周舍将宋引章休弃。周舍为得到赵盼儿，立即回家给了宋引章一张休书，然后来找赵盼儿，谁知赵盼儿已经带上宋引章走了。周舍想反悔，但聪明的赵盼儿早有准备，未使周舍得逞。见官后，周舍不仅没有得到她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反而挨了八十大棒。这出戏以轻松幽默的笔墨描写了赵盼儿利用风月场上的手段，巧妙地战胜了风月场中的老手周舍，表现出低贱者的聪明和富贵者的愚蠢；同时也歌颂了生活于社会最低层妓女们的真挚的友谊。轻松的笔调，却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在封建社会中，那些有钱的男人总想肆意霸占妇女，而妓女们又在极力摆脱现状去追求人身自由，他们正是利用妓女们的这种心理来欺骗她们，使她们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因此这出喜剧的背后，却演着一出悲剧。

《单刀会》所描写的是三国时代的故事。赤壁之战后，孙权为共拒曹操，将荆州借给了刘备。后来，曹、孙、刘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因荆州是战略要地，孙权与鲁肃商量邀请关羽渡江赴会，趁机索取荆州。安排已定，鲁肃不听乔公和司马徽的劝阻，立请关羽前来赴会。关羽明知东吴的意图，但仍毅然决然地单刀赴会，宴会上关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使鲁肃之计落空后，安全返回了荆州。这是一出优秀的历史剧，歌颂了关羽为维护“汉家”的基业上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聪明才智。戏里的关羽高唱“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他对鲁肃说：“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着：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代，剧坛上张扬“汉家基业”，高歌“倒不了俺汉家节”，无论关汉卿创作意图如何，总会对处于社会等级制度下属下等的汉人的心理产生异常的反响。

元代另一位创作大家王实甫，作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和《破窑记》三种全本和少数剧作的残篇。而他

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还是因为他创作了《西厢记》。《西厢记》是一出描写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剧。关于崔张故事，最早出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嗣后各种文艺形式均有改编。金代时董解元创作了一本《西厢记诸宫调》，对原作主题进行较大的改变，使它成为描写男女青年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作品。王实甫《西厢记》就是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作。剧述张生游学河中，在普救寺遇见崔莺莺，一见钟情。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崔夫人宣布谁可退贼兵，便把莺莺嫁给谁。张生写信求救于友人杜确，于是解围，可崔夫人却变了卦。莺莺叫丫环红娘问候张生，张生让红娘带回一封短信和一首诗，莺莺写诗回复。张生来与莺莺相会，遭到拒绝，于是害病。莺莺得知后又写柬派红娘送给张生，约定于夜间相会。崔夫人发现张生与莺莺私会的事大怒，企图痛责红娘，却被红娘讥讽了一顿，只得答应两人可以结婚，但提出的条件是张生必须做官。张生前去考试，莺莺于长亭送别。张生高中状元后，回来与莺莺成亲，崔夫人的内侄从中阻挠，经一番周折后，崔张二人终成夫妻。此剧歌颂莺莺和张生敢于冲破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寄托了王实甫“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崔夫人出于对莺莺的爱，企图按照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安排女儿的生活道路，恰成为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莺莺作为大家闺秀，不慕名门，甘心情愿地和自己心目中的情人结成姻缘，而当她真的迈向自主结合的前沿，又顾虑重重，这样塑造莺莺形象，是令人可信的。张生是一位执著追求爱人的青年，但在遇到困难时却显得束手无策；他爱莺莺的同时，又十分尊重她，确是一位可爱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红娘这个人物在整个崔张爱情故事中，一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她热情、机智、泼辣、无私，虽为崔张而受到崔夫人的责罚和莺莺的“防范”，但始终如一地帮助崔张成为夫妻。红娘的形象几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

《西厢记》打破了杂剧一本演一个故事的体制，而以五本合演一个完整的故事，从中体现出剧作家敢于突破杂剧一般规格的创造精神。《西厢记》中的文辞异常精美，人物刻画丰满细腻，具有超妙的艺术性，历来为人们所赞赏。

白朴也是元代前期的著名剧作家。白朴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县），后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真定是戏剧活动搞得非常活跃的地方，他在那里受到了戏剧的熏陶。金亡后，其父好友、著名诗人元好问带他到山东避难，在文学创作上他受元好问的极大影响。白朴创作元杂剧，现知有十六种，仅存三种，其中的《墙头马上》和《梧桐雨》影响较著。《墙头马上》描写尚书之子裴少俊，在洛阳骑马路过李家花园，当时李家小姐李千金正在墙头向外窥望，二人一见钟情。经过传书送柬，李千金毅然随裴少俊私逃，在裴家花园内隐居七年，其间生下两个儿女。裴尚书发现此事后，立逼少俊写了休书，将其子女留下，赶走李千金。裴少俊中状元后，来李家求千金重返裴府，千金执意不肯。裴尚书已得知千金是名门之女，也来陪罪，仍遭拒绝，李千金还把裴尚书奚落了一番。最后为了一双儿女，千金才与少俊重归于好。此剧的部分情节最早出于唐代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宋代时已将故事丰富，改编为话本和杂剧。金院本也有同题材剧。白朴即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创了这本《墙头马上》。这出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妇女形象，她不顾"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教律，公然无媒自聘，弃家私奔，在遭到极为沉重的压力和打击的情况下，也不屈服于封建礼教，而是据理抗争，全力反击。在元代杂剧所塑造的众多的名门闺秀中，她的性格最为倔强、泼辣，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白朴的《梧桐雨》一剧，演述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此剧将社会悲剧和帝妃的爱情悲剧交并而写，情调伤感，主题耐人寻味。

在元曲作家中，马致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有"曲状元"

之称，甚至有人说他“宜列于群英之上”，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高了。马致远写有杂剧十三种，现存七种，《汉宫秋》一剧尤其令人关注。《汉宫秋》所叙述的是汉元帝的妃子王昭君被嫁往匈奴的故事。王昭君本是农家的女儿，因长得美丽被选入宫中。但她无钱贿赂，被画工毛延寿把她的画像点出破绽，长期幽禁于后宫。后来汉元帝发现她长得很美，便封她做明妃。毛延寿逃往匈奴，将王昭君的真实画像献给了单于。单于见昭君貌美，一定要娶她，并说元帝如果不答应，就要南侵。满朝文武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反而劝元帝将昭君送往匈奴。元帝本对昭君有深厚的感情，在和亲还是留下昭君的问题上陷入无限的矛盾之中。结果昭君为免除国难情愿和亲；元帝因惧怕匈取，只好送别了昭君。此剧在主题上一反“女子误国”的传统说法，暗讽了满朝的文臣武将这些大男子们，连一个女子都不如。剧中还虚构了昭君在到达边界时，不肯远离故国、怀念元帝、最后投江而死的情节，进一步突出了她对汉朝的忠贞。剧作在同情并歌颂昭君的同时，还影射了匈奴的入侵野心，批判了汉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此剧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演出，应当说是有现实意义的。

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以郑光祖最为著名，他与关汉卿、白朴和马致远并称为“元曲四大家”。郑光祖在梨园界名气颇大，艺人界都称他“郑老先生”。他创作了十七种杂剧，以《倩女离魂》、《㑇梅香》和《王粲登楼》为代表作。《倩女离魂》写王生与倩女相爱，王生赴京应试，倩女的魂灵离身而去，跟随王生赶考；王生得中后，她又随王生回来，与她的病体合二而一，最终与王生结成永久夫妻。故事曲折离奇，生动感人。王生是在倩女的母亲逼迫之下才去应试的，母亲拆散了这一对情人，这给倩女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害了病。倩女一病不起，魂灵离去后，她的病体就成了一个“植物人”。如果说，倩女的魂灵象征

着古代妇女对新生活的热情追求的话，那么倩女的病体则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的结果，是它们把一个年轻的少女弄得死去活来。郑光祖的《王粲登楼》，是根据三国时王粲所著《登楼赋》加以改编的。剧中写王粲怀才不遇，在仕途上坎坷蹉涉。剧作家是借古人之酒以浇元代知识分子心中之块垒。因此这出戏在文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以上我们仅对元曲四大家和王实甫及其创作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明星当照，总有群星相映，这才形成美丽的星空。元代杂剧舞台，正是星光灿烂。除四大家和王实甫这些明星外，还有数以十计的有名作家，数以百计有名剧作涌现在元代剧坛上。比如康进之及其《李逵负荆》、李文蔚及其《燕青博鱼》、纪君祥及其《赵氏孤儿》，尚仲贤及其《柳毅传书》、李好古及其《张生煮海》、杨显之及其《潇湘雨》、孟汉卿及其《魔合罗》、乔吉及其《两世姻缘》、罗贯中及其《风云会》等等，都是令人瞩目的。还有不少作品，如《陈州粜米》、《朱砂担》、《生金阁》等，虽然已经不知出自谁人之手，但剧作还是久传不衰的。

元杂剧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所建立的戏曲表演体制为戏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杂剧剧本不仅成为历史上十分宝贵的文献，而且许多优秀之作被载入中国文学史中，并作为典范为后世学子研读。其中一些剧目被改编，曾经并且仍在不断地搬上舞台。元杂剧作家所提供的创作经验，还成为后世剧作家的借鉴，“元人之笔”竟成为后世曲家所刻意追寻的艺术境界。可以骄傲地说，不少元杂剧作品是完全能和国外的名剧作媲美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评论关汉卿《窦娥冤》和纪君祥《赵氏孤儿》时说过：“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并不是溢美之辞。这两个剧本很早就被译成多种外文，流传于欧洲；尤其是《赵氏孤儿》一剧，还被法国

大文豪伏尔泰根据本国国情，译改成《中国孤儿》，作为抨击法国封建王朝的武器。元代李行道所作《灰阑记》，被德国剧作家改成另一部《灰阑记》，用以宣传美好道德。在日本从十九世纪初便有人翻译《西厢记》，其后，《窦娥冤》、《倩女离魂》、《老生儿》等作品也被翻译介绍，并出现元杂剧选译本。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不少名学者着力研究元杂剧，有的成果卓著。

总之，元杂剧的兴起与繁荣，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世界文化史、戏曲史谱写了醒目的篇章。至此，在世界上，中国同古希腊、印度一样，成为了驰名的剧诗之邦。

（祥麟）

宋人风俗

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使宋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呈现出新的面貌。风俗民情则从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反映了宋人的精神面貌。

婚嫁习俗

宋人婚姻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进行。婚姻的第一步为议婚。男方通过媒人口头或书面向女家求婚，女家同意，则以草帖子通知男家。草帖子上写明女方的生辰八字及家庭情况，并写明随嫁田产及奁具数目。男家得到草帖子后占卜问吉，双方交换定帖。定帖又称细帖，细帖由男方先出具，由媒人交给女家，正式请求缔结婚姻。女家同意，则向男方回定帖。男方定帖写明三代名讳、官品职位，父母在堂与否，主婚人、议婚人排行及生辰八字，另外还要详列聘礼数目。女方定帖如前开写，并详具陪嫁田土、房屋、山园等资装奁物。男女双方交换定帖，然后进行相亲，也叫相媳妇。男家选择好日期，备好酒礼前往女家，或者选择园圃、湖舫、酒楼相见。男方若中意，就用一根金钗插在女子头发中，叫做“插钗”；若没相中，则送彩缎二匹给女方，称为“压惊”，表示婚事不成功。

“插钗”之后，开始行定聘之礼。男家用四幅销金有色纸写成三份婚启，一份礼物清单“礼物状”，封为二封，名为“双缄”，以红绿绣金书袋装盛，连同礼物一起装入绘有五男二女的木盒子内。礼盒一般为十个或八个，用彩色包袱包好，送往女

家。礼物随贫富差别而不同。富有人家，礼物多为珠翠、首饰、金器、绣金裙褶、缎、茶饼、双羊，另有酒四樽或八樽。女家接受定礼要将礼盒放在厅堂，备好香烛酒果，告祝天地祖宗，然后由家族中夫妇双全者开盒。女家接受定礼后，当日回礼。礼物一般为各色彩布、手帕、鞋袜等，另将男家所送羊酒茶果一半回赠。此外，女家还要用男方送来定礼的酒瓶，装上清水，内盛四条金鱼，又将一双筷子（箸）、两株葱插在瓶内，称为“回鱼箸”，送给男家。女家若为富室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箸，并以彩锦造像生葱二株，挂在鱼水樽外以为回谢。此后，有事则由媒人出面联络，每逢节日，男家送些酒果给女方，称为“追节”，女家则以女工巧作之类回赠。

定礼之后，择日由媒人以鹅酒，重则以羊酒送聘礼。聘礼无定数，视家境而定。富贵之家要用“三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若置办不起“三金”，则以银器或镀金代替。聘礼之后则接着下财礼，礼品较为简单，只是送给女家一些银铤官会。北宋时，男家送聘礼，下财礼，女方不会回赠，至南宋，女家富有者亦以礼回赠。

迎娶前三日，男方要向女方送催妆品，通知女家成亲的日子。催妆礼物有花髻、绣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盒、画彩钱果之类。女家回赠金银双脚御、罗花幞头、绿袍等物。成亲头一日，女家至男家铺房，悬挂帐幔，铺陈陪嫁之物。迎娶之日，男家约定时辰，由青年人担任行郎，雇请官私妓女及吹鼓手，抬着花轿，吹吹打打，前往女家迎娶新人。迎亲队伍到达女家后，女家要以酒礼款待，还要散发花红利市钱。乐队作乐催妆，茶酒司念一些吉利的诗词，催促新娘出闺房上轿。新人上轿后，轿夫不会立刻起立，炒咬利市，称“起檐子”，赏给之后，才会起步。

迎娶队伍回到新郎家门前，乐官、妓女、轿夫照例要乞讨市利钱，称为“拦门”。新娘下轿之前，有阴阳人手执花斗，将五

谷豆钱、彩果之类，望门抛撒，儿童争相抢拾，称作“撒谷豆”。此后才请新人下车，一妓女捧镜退往花轿，又以二亲信女仆，左右搀扶而行，踏青锦褥子或青毡花席，入室歇息，室中悬帐，称“坐虚帐”，也有的直接进入新房，坐在床上，叫做“坐富贵”。新房门楣上已横挂一段彩帛，下端已剪开，待新郎进入，众人争相扯彩帛条，争求市利，称“利市缴门”。新郎登床坐右首，新娘坐于左侧，为坐床富贵礼。礼官请新人出房，至厅堂拜堂。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倒行；女挂于手，面相向而行，谓之“牵巾”。新娘新郎并肩站立堂前，男方请本家族双全女亲，以秤杆或机杼将新娘盖头挑去，新娘这才露出花容。新人先拜家庙，次拜舅姑及尊长亲戚。参拜结束后，新婚夫妇回房交拜。新娘新郎再次坐床，礼官以金银盘盛装彩钱、杂果撒帐，又让人手执双杯，杯底以彩线相连，夫妇互饮，称为“交卺”、“交杯”，也叫“交杯酒”。行礼之后，以杯盏一仰一合安于床下，取大吉大利之意。男女并坐，各以头发少许合梳为髻，称为“合髻”，然后掩帐。

成婚后三日，女家将冠花、鹅蛋，又以金银缸盛油蜜、蒸饼往女婿家中，称为“送三朝礼”。新郎则于成亲后三日，或七日、九日前往女家行拜门礼。女家置办酒席款待新婿，叫“会郎”。女家又按时送食品、酒肴至男家，称“煖女会”，此后新娘娘家接女儿回娘家。婚后一月，女方要送满月礼，婿家备酒筵请亲家，为“贺满月会亲”，也称为“满月”。此后，礼仪简略，每逢节日，亲家互送一些礼物，若贫困无力置办，则不再行礼。

生育习俗

宋人妇女怀孕后，至临产当月，女方娘家以银盆或彩盆盛一束粟杆，用锦绣或彩纸覆盖，上面插上鲜花、通草，贴上五男二女图案，又以盘盒装送馒头，称为“分痛”，并作眠羊、卧鹿，又以生枣、栗果、彩画鸭蛋120枚、小孩绣花绷、彩衣送至婿

家，叫做“催生”。孕妇分娩产下婴儿后，亲朋则送上粟米、炭、醋等礼物。小孩产下七日为一腊，十四天叫二腊，二十一日为三腊。外婆家及亲戚家都送去猪腰、猪肚、猪蹄等食物。小儿满月，外婆家要以彩画钱，富有者则以金银、犀角、美玉及果子食物送往女儿家，大展“洗儿会”。亲朋毕集，将熬煎好的香热水倒入盆中，又以果子、彩钱、葱蒜等放入水中，用数丈彩帛绕盆，名为“围盆”。家中尊长以金银钗子搅动盆水，叫做“搅盆”，亲朋好友纷纷将金银钱币投入水盆，名叫“添盆”。盆中若有枣子直立，年轻妇女争抢着拿去吃，以为这样日后自己就会生男孩。小儿洗完澡，剪去胎发，胎发被放入一小盒内，收藏起来。随后，大人抱着婴儿，辞谢客人，入伯母或婶婶房内，称为“移窠”。这一风俗仅流行于富有人家，贫困百姓则不具备条件。小孩百日，家中备酒宴客，以示庆贺，称“百晬”。至来年生日谓之“周晬”。这一日，亲朋要送去礼物祝贺，主人家开筵款待宾客。周岁庆礼最主要活动是小儿“拈周试晬”。小儿家罗列绵席于堂屋，燃香炳烛，摆上食物、官诰、金银、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将小儿放在这些物品之中，看小儿先取之物，以为征兆。人们相信周岁“拈周”会昭示小儿一生情况。

宋代尤其是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有一种生子不育的风俗，当时称为“不举子”。荆湖北路的岳州（今湖南岳阳）、鄂州（今湖北武汉）乡村百姓，一般只生养二男一女，此后所生则溺杀。黄州（今湖北黄冈）的贫苦百姓，生子多“不举”，刚生下就放入盛水水盆中溺死。江南东路百姓，生育男婴多则杀男婴，女婴多则杀女婴，叫做“薅子”。这一习俗，以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歙县）为甚，江宁（今江苏南京）次之，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又次之。福建路人家生男孩至第三胎则刚生下就溺死，称为“洗儿”。两浙路的衢州（今属浙

江)、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百姓,每每忧人口太多,生子多不举。宋代统治者认为这一风俗,有伤风化,一再下令禁止,同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生子不育成了当时一些地区的一种风俗,多子多福的思想开始动摇。

丧葬风俗

宋人丧葬受阴阳家及僧道影响很大,人们相信风水,墓葬必卜吉地,选择时日,以为这关系到家族的兴盛、子孙的仕途、祸福等。当时有一些职业葬师。由于殡葬要择时选地,当时人们不论贫富,大多不会马上举行葬礼,而是先权且浅埋,以待日后改葬。浙东地区,则将灵柩停放在家中,岁时祭祀。绝大多数地区,将灵柩停放在寺院,时间一久,则无主名。危稹知漳州(今属福建),看到当地这一习俗后,下令限期安葬,无主名者达二千三百多,官府择地为义冢埋葬。神宗曾下诏,禁止将灵柩停放在寺院中,但收效甚微。

人去世后,则要礼佛,设道场请僧侣念经为亡者超度,出葬时往往以僧侣威仪引导。安葬之后,一些富有的家庭往往兴建坟寺、坟庵,供养僧尼,看守坟域,念经以资冥福,否则子孙会感到脸上无光,别人亦认为是"不孝"。两府大臣及皇亲贵戚,朝廷允许他们建功德寺(坟寺),为祖先资冥福。仁宗、神宗时曾下诏,对大臣建坟寺作了规定。

当时墓葬形式,除了土葬之外,由于受佛教影响,不少人采用火葬,火葬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葬俗。除僧侣以外的一般民众使用火葬,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至宋初已形成为一种风俗。赵宋立国之初,宋太祖曾下诏令禁止使用火葬,此后宋廷亦多次下令禁止,但这一葬俗却禁而不止。一些寺院中设有化人院,化人亭,专供火葬之用。实施火葬的人有贫苦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另外还有一些富有的社会成员。就地域而言,则遍布大江南北,主要是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山西等地。火葬之

后，骨灰及余骨，北方地区多放入寺院之中，南方则撒入江河湖泊，一些富有的社会成员，在火化之后，仍要举行葬礼，实施土葬。

节日风俗

元旦：正月初一，又称元日、旦日、正旦。俗称年节、新年。这是宋代最为重要的节俗。民间用鸦青纸或青绢剪成大小幡，由年长者佩戴，或者贴在门楣之上。士大夫互相祝贺新年，贫民百姓都穿上新衣服，往来拜节，并燃放爆竹。家家饮屠苏酒、吃面条。官府下令免收公私房租，并准许京城百姓关扑（赌博）三天。京城街巷，布满摊点，出售冠梳、花朵、玩具。夜幕降临后，贵家妇女走出家门，上街观看赌博，或者去食店宴饮。当日，朝廷要举行"正旦大朝会"，皇帝接受在京官员及外国使节拜贺。各地官员则来到官衙，依年龄大小互相拜贺新年。

元宵：正月十五日为元宵。当时又称上元节、元夕节。京城张灯五日，各地为三天。北宋初年，宋太祖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后，以"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宜令士民纵乐"，将以前张灯三日，改为五夜。京城开封，灯火通明。士民群集御街，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次栉比，在此演出的有魔术、杂技、讲史、杂剧等。人们搭起台阶状彩山，上面画有神仙故事，左右用彩绢结成文殊、普贤菩萨，张挂无数彩灯，灯上绘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用辘轳把水引到灯山顶端，以大木柜贮存，不时放水，如同瀑布飞溅。皇帝和妃嫔坐在宣德城楼上，百姓在露台下观看，通宵达旦，乐人不时引导百姓山呼万岁。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此风不减，节日晚上，灯火初上，就会有不少舞队（民间艺术团体）上街表演各种技艺。元宵节人们要吃用盐豉汤和绿豆粉做成的蝌蚪羹、圆子（糯米汤圆）、春茧等节日美食。此外还要祭祀门户，迎请紫姑神。

寒食节和清明节：自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为寒食节。当时又

称为“禁烟节”、“一百五日”、“百五节”。各地还有一些不同称呼，陕西人称为熟食日，太原地区称为一月节，京东则称为冷烟节。家家以柳条插在门上，称为“明眼”。不论百姓，还是官宦人家，子女成人，都在此日上头。寒食前一日称“炊熟”，家家以面粉和枣泥制成一种形似燕子的点心，称“枣锢飞燕”，并用柳枝串着插在门楣上，称“子推燕”。寒食节前后三天，家家禁火，人们往往多储备一些食物，所以当时谚语有寒食十八顿之说。又有谚云：“馋妇思寒食，懒妇思正月。”寒食节后三日，即为清明节。官员、百姓纷纷出城扫墓，将纸钱挂在墓旁树上。客居外地者，则登山望墓而祭，撕撒纸钱，称为“擘钱”。城市居民趁此机会出城春游，男子跨马，女子乘轿，携带酒食，于奇花异木之处或园亭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至日落才起身返回家中。

端午节：五月五日为端午节。自五月一日至端午前一日，市场上出售桃、柳、葵花、菖蒲、艾叶，节日当天家家铺设在门口。人们吃粽子、五色汤圆、茶酒等。粽子的种类很多，有角粽、尖粽、茭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等。北宋京城百姓以菖蒲、生姜、杏、梅、李、紫苏切成丝，加盐晒干，称为百草头，有的人以糖渍梅皮，以为酿梅，端午食用。人们将菖蒲刻成小人或葫芦，佩戴用以辟邪。这一天，人们又以木材做架子，外面糊以彩纱，做成食罩，也有人做小儿睡罩。市场上还有人画天师像出售。也有人用泥塑张天师像，用艾做头，用蒜做拳，挂于门首，以禳毒气。南方一些地区，端午节要赛龙舟。

七夕节：七月七日为七夕节。五代十国时北方地区以六日为七夕，宋初沿袭不变，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始改七日为七夕。七夕前十日，人们开始以水渍豆子，等到豆子发芽长至六七寸时，则置于小盆中，至节日长可达一尺左右，当时称为生花盆儿。自七月一日始，有乞巧市，出售乞巧物。乞巧物以摩睺

罗为最多。摩睺罗即泥塑幼童像，南方人称为巧儿。巧儿以苏州制作最为精致，甲于天下，进贡内廷的则以金银制作。是日，民间认为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日，富贵人家以彩丝结楼，称乞巧楼，摆上摩睺罗、鲜花、瓜果、笔砚、针线，姑娘个个呈巧，焚香列拜，称为“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有的人则以小蜘蛛装入盒子内，次日开盒观看，若结网圆正，称为“得巧”。

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又以此夜月色明亮，称为“月夕”。节前，酒店出售新酒，各店铺门面都已重新装饰。临安（今浙江杭州）御街店铺，皆铺设货物，竞相夸耀，称为“歇眼”。晚上，富家巨室，皆登楼台赏月，吃月饼，饮酒高歌，通宵达旦。贫苦百姓也不肯虚度，往往瞿衣买酒，欢度节日。街市买卖兴盛，玩月游人不绝。钱塘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如繁星闪烁。

重阳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此时菊花盛开，民间竞相赏菊。菊花的种类很多，达七八十种，有名的有万龄菊、桃花菊、木香菊、喜容菊、金铃菊、金盏银台菊。酒店都以菊花缚成洞户，处处都是菊花。人们将菊花、茱萸放入酒中饮用。民间又以糖和面蒸成糕，糕上插上小彩旗，镶嵌石榴子、银杏、松子肉之类，称为“重阳糕”，用来馈赠亲友。又以五彩米粉做成狮子蛮王形状，置于糕上，叫做“狮蛮”。妇女又剪彩缯为茱萸菊、木芙蓉花，赠送给亲朋。各僧寺都设斋会。北宋时，京城开宝寺、仁王寺设有狮子会，僧侣坐在狮子上，作法事，游人最盛，南宋时则无狮子会。

除夕：又称除夜。当时称腊月二十四为小年节，或交年节，家家于此日祭灶神。三十日为大年节，当天所有人家都要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帖春牌，祭祀祖宗。入夜则备有香、花等迎神供物，以祈新年家人平安。宫中举行大驱傩仪式，军士头戴面具，分别装扮成诸神。队伍达千余

人，自宫中出发，敲锣打鼓，直至城外，称为“埋祟”。百姓全家围炉团坐，斟酒唱歌，小儿嬉戏，终夕不寐，是为“守岁”。欲语云：“守冬爷长命，守夕娘长命。”

（宋三平）

参考资料：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吴自牧《梦粱录》
耐得翁《都城纪胜》
周密《武林旧事》
吕原明《岁时杂记》
陈元靓《岁时广记》
苏轼《东坡志林》
王得臣《麈史》
庄绰《鸡肋编》
罗大经《鹤林玉露》
周煇《清波杂志》
《宋史·礼二十八》
《古今合璧事类·丧葬门·伊川葬说》
《古今合璧事类·丧葬门·漳州义冢》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71，《葬论》
《东莱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梁谿集》卷132《报德庵芝草记》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30《与朱鄂州书》

契丹族兴起

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遥辇诸部落，号称“天皇帝”，从此开始以辽河流域为中心，逐步建立起了契丹族的政权。他的后继者，曾经先后改国号为“大辽”、“大契丹”等。历史上统称为“辽”。时间上，上承唐朝，下接金朝，辽与唐末五代以及北宋并存。从907年起，到1129年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所灭，大约历时二百一十八年。若与以后耶律大石在叶密里（今新疆塔城附近）一带建立的西辽（1125—1218）加起来，总共拥有三百余年的历史。

辽朝实际上是一个以契丹族为主的多民族政权。曾经在我国北方建立这个多民族联合政权的契丹族，原是由上古时代的东胡部落演变发展而来的。从商朝到西汉初年，东胡部落联盟一直活动在辽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地域。秦末，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大败，残余下来的人，一部分退居乌桓山（今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附近），一部分退居鲜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旗中翼西南）。从此，逐渐形成了两个新的民族，即乌桓人和鲜卑人。

开始，鲜卑人包括宇文部、慕容部和段部，都游牧于辽河流域的草原上。后来，慕容部强大起来，建立了政权，史称“前燕”。东晋咸康四年（338），前燕王慕容皝联合后赵王石虎，吞并了段部。过了六年，到了东晋建元二年（344），慕容皝又打败了宇文部。宇文部首领败逃漠北，自顾不暇，于是其支部契丹和

库莫奚便在这时候从鲜卑中分离了出来。所以，契丹往往被称作是东部鲜卑宇文部的一个支系。从鲜卑分离出来以后，契丹人活动在库莫奚的东面。北魏太祖登国三年（389）契丹人被北魏打败，退到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以北，继续过着游牧生活。

契丹族母系氏族时代的历史，已经没有文献资料可供考证了。关于它进入父系氏族制的情形，有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当初之时，有一名男子骑着一匹白色骏马浮土河而下，同时，有一名女子驾着一辆灰牛小车浮潢河而下，在两河交汇的木叶山麓相遇，结为夫妇，生育了八个儿子，以后他们的人口逐渐增加，依居住地域就自然形成了八个部落①。传说中的这个男子，就是契丹人所尊奉的始祖"奇首可汗"。后来，契丹人在木叶山建起始祖庙，经常去谒拜祭奠。

所谓奇首可汗的后裔，即契丹古八部，包括悉万丹部、何大何部、具伏弗部、郁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和吐六于部等。古八部时期，契丹人还没有形成部落联盟，对外交往和贸易，大多时候是各部落单独进行的。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起，契丹就与北魏形成了朝贡关系，但不是八部统一行动，而是各自以名马、文皮等贡献给北魏，并分别与北魏在边境交界地带设立互市，进行各种贸易，交换有无。

北魏太和三年（479），由于受到高丽和柔然的侵袭，契丹首领莫弗贺勿于被迫率部众一万余人，赶着车辆和各种牲畜投附了北魏，向南迁居到了白狼水（今大凌河上游）以东地区。

北齐时，因为在与北齐以及突厥的冲突中，契丹先后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一些部落就向东迁往高丽辖地。

---

① 《契丹国志·初兴本末》，《辽史》的《地理志》、《营卫志》等都有近似的记载。

经过长时期的颠簸离徙，到了隋朝时期，契丹各部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临时性的部落联盟。隋开皇四年（584），契丹部落的共同首领派遣使者前来隋廷朝拜。这时契丹各部统一行动，陆续又迁移到潢河流域逐水草而游牧，发展很快，分为十部，其中兵丁多的达三千人，少的也有千余人。

隋大业元年（605），隋与突厥联合发动了一次袭击，契丹有四万多的人口以及大批的畜产被掠走。经受了这些打击以后，契丹各部落开始进一步加强联合。到唐朝初期，契丹人已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比较固定的部落联盟。从此，契丹人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尤其是较大的对外征战，任何部落不得擅自行动，都需各部落商议决定。

大贺氏部落联盟，从唐贞观二年（628）到开元十八年(730)，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当时，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任期为三年，八部酋长每三年一会，聚议选举新的联盟首领；大贺氏族享有世选联盟长的特权，在这一个世纪中的历任联盟长，都出自大贺氏氏族的成员；联盟首领不仅统一指挥八部的军事和外交，平时还负责领导八部的畜牧业生产；八部酋长都得听命于联盟首领，但他们又都是具有选举或罢免联盟首领的权力的联盟议事会的成员。

唐朝在初期为了抵制突厥，便笼络和扶持契丹。贞观二年(628)，契丹首任联盟首领摩会率领部众前来降附。唐朝颁赐旗鼓给摩会，承认他为契丹各部的联盟长。到窟哥担任联盟长以后，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举部加入唐朝。唐朝便在契丹所在的地区设置了松漠都督府，让窟哥担任都督，并为其授爵号为“无极男”，赐姓李氏。同时，按照唐朝十州置一都督府的制度，改契丹八部为十州，以原来的各部落酋长（辱纥主，后称夷离堇）为州刺史，即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

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分为匹黎、赤山二州，松漠都督府所在的大贺氏也为一州。契丹十州，都属于松漠都督窟哥统辖。这样，一方面使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得到了新发展；一方面使契丹在行政建置上正式纳入了中原王朝体系，直接接受唐朝的统治。

设置松漠都督府的同时，唐朝又在营州设立了东夷都护府，置东夷校尉官，统摄契丹以及同时归附的奚族的事务。契丹与唐朝关系的不断加强，促进了各自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这种密切关系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波折，事实上，双方曾经历了几战几和。

唐显庆五年（660），松漠都督阿不固一度变乱。到了万岁通天元年（697），曾接受唐朝赐姓的契丹联盟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联合了别部首领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死唐朝派遣的营州都督赵文翙，举兵背叛唐朝。唐朝借奚族的兵力袭击契丹的后路，才最后打败了契丹。这次兵败以后，契丹贵族率部投奔突厥。不久，突厥衰落了下来，李尽忠的堂弟李失活，于唐开元二年（714）又率领部落归附了唐朝。唐玄宗对此表示十分欢迎，并特赐丹书铁券给李失活。接着，唐朝重新设置松漠都督府及其属下各州，以李失活为都督，授松漠郡王称号。不久，还设置了静析军，以李失活为经略大使。开元五年（717），唐朝将皇族外甥女杨氏嫁给李失活。第二年，李失活因病去世，唐玄宗派人专门前往吊祭。

李失活去世后，唐朝允许他的弟弟娑固承袭其所有官爵，契丹与唐朝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可是，契丹贵族之间在这时发生了内讧。还是李失活在世的时候，部落联盟中就开始有掌管兵马的军事首长可突于，其地位仅次于联盟首领。后来，试图与中原王朝分离的可突于，凭借自己直接掌握的军事权力，无视部落选举制的传统惯例，不经联盟会议而擅自确立、罢免或者杀

害联盟长。唐开元八年（720），他就杀害了娑固。接着，是郁于、吐于、邵固先后担任联盟首领，由可突于操纵联盟的军事权力。这样过了十年，到开元十八年（730），可突于又杀害了邵固，另立又一部落酋长屈列为联盟首领。从此，大贺氏部落失去了世代选任联盟长的特权，大贺氏联盟时代结束了。

大贺氏联盟瓦解以后，契丹便进入了遥辇氏部落联盟时代。新的部落联盟的建立，主要是由涅里（或作雅里、涅礼）这个人完成的。

可突于杀邵固，推翻了大贺氏以后，虽然另立别部酋长屈列（或作据埒、屈烈、屈剌）为联盟首领，但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使自己也惴不自安，便率部并胁迫奚族的一些人，投附了突厥。这样，多年来把利用契丹和奚族来挟制突厥作为北部边地政策的唐朝不再坐视，很快发兵进讨可突于。当时，契丹内部矛盾激化，曾经与可突于分别掌管过兵马军事的李过折（或作李遇折、郁捷），正在反对可突于。唐朝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便联合李过折，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打败了契丹。一度擅自凭借手中的军事势力操纵联盟首领废立的可突于，以及当时担任联盟首领的屈列，都被李过折乘机所杀。第二年（735），唐朝任命李过折为松漠都督，兼幽州节度副使，并封为北平郡王。由于内部连续动乱而导致实力衰弱的契丹，这才暂时获得了安定。就在这同一年，迭剌部酋长涅里又杀掉了李过折。涅里继而掌握了契丹兵马大权，由于仍然亲附唐朝，被唐朝任命为松漠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但是，涅里并没有自任部落联盟首领，而是支持遥辇氏族首领迪辇阻里出来担任了联盟长，称为阻午可汗。从此，以遥辇氏为首的部落联盟正式形成。天宝四年（745），唐朝诏命阻午可汗为松漠都督，授以崇顺王的称号，并赐姓名为李怀秀（或作李怀节）。

遥辇氏联盟时期，在制度方面有继承也有发展。传统的八部

组织形式，仍然被沿袭了下来。当时，阻午可汗和涅里将动乱以后仅存的五个部落，重新改组成为八个部落，即迭剌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涅剌部、突吕不部、突举部。其中，迭剌与乙室（或作乙室活）、突吕不与突举、乌隗与涅剌原来属于同一部落，改组时才被分成两部。而且，到这时候只有这六部是三组真正的近亲兄弟部落。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联盟成员一度曾达到二十个部落。与古八部时期相比，遥辇氏族为首的新部落联盟，其中除了原来属于大贺氏联盟的那些部落，还包括有旧联盟以外的部落，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明显减弱。

此外，世选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几乎接近于世袭制。阻午可汗出任部落联盟首领时，举行了一次十分隆重的再生、柴册仪式。所谓再生、柴册仪式，就是在一个经过认真选择的认为十分吉祥的日子，为新任联盟首领举行典礼。事前，用木材筑造起册殿和祭坛。木制的祭坛有三层台阶，下面堆砌着厚厚的积柴，上面平铺着华贵典雅的百尺见方毛毡。典礼开始，新选出的联盟首领走进再生母所在的再生室，举行再生仪式。紧接着，由所有的部落酋长前呼后拥，左右扶持着新首领来到册殿的东北角，祭拜太阳。然后，由母亲氏族的长老牵来骏马，新首领立即纵身跃马奔向附近的一块高地，下马时由随从的人赶上前用毡蒙住他。等到新首领在高地上站定，所有随员以及各部落的大小头目一律庄严列队，在高地下面注目遥拜。新首领便向部下发表就任演说，部下则齐声表示唯命是从。在即将结束仪式时，点燃积柴，映着熊熊烈焰，所有的人再向上天祈祷一次，最后还要垒土立石作为纪念。这种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礼仪，把联盟首领神圣化了。阻午可汗利用这种从氏族时代流传下来的礼仪，为遥辇氏族争得并巩固了世选联盟首领的特权。此后，一直到耶律阿保机建国以前，当选联盟首领的都属于遥辇氏族的成员。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耶澜可汗、巴剌可汗、痕德

堇可汗，再加上阻午可汗以前的屈列（后来尊为“洼可汗”），被总称为“遥辇九帐”。

除了联盟首领以外，由部落酋长兼任的联盟军事首长——夷离堇，也很快变成在同一氏族内世选产生的了。从涅里开始，整个遥辇氏联盟时代，统领兵马大权的夷离堇都出自涅里所在的迭剌部。

契丹社会当时出现的如上变化，都是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的结果。遥辇氏联盟建立以后，一度曾依附突厥。突厥不久衰落，契丹又被回鹘所控制。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发生内乱，耶澜可汗又带着契丹部落内附于唐朝。由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请，唐朝授予耶澜可汗“云麾将军”的称号，并给他颁赐了“奉国契丹印”。从此，一方面由于突厥等周边强邻相继衰落，进而摆脱了回鹘的压迫；一方面由于唐朝在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藩镇割据，本身自顾不暇，放松了控制。于是，契丹获得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放牧、渔猎，逐水草而居，传统上富以马而强以兵。到了遥辇氏联盟时代，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了重视，并有所发展。当初，涅里担任夷离堇时，他不仅统领兵马，而且还注意组织生产，倡导发展一些农业和手工业，教民耕织，并鼓励开发盐铁之利。在这个基础上，涅里改变过去草居露宿、无有定所的单纯的游牧生活，开始划地而居，分营置部。改组后的所谓“部”，开始与一定的土地相结合，已经由血缘氏族部落实现向地域部落的转化，既是在一定地域内从事畜牧和农耕的生产组织，也是合族而处的军事单位。部以下还划分有更小的基层单位，叫做“营”，叫做“石烈”等。继涅里之后的实权贵族匀德实、撒剌的、释鲁等，都是比较注意督促生产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比较迅速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日益增加，契丹社会逐步发生剧烈的变化。这期间，部落贵族不时地发

动对外掠夺，不仅从邻近的其他民族那里掳掠到无数的牲畜，而且先后俘获了大批的人口。越来越多的外族人进入契丹社会，扰乱了当地的氏族部落，促使契丹人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现实需要的社会管理秩序。

早在大贺氏联盟时代，奴隶制就开始在契丹社会中开始萌芽了。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贵族孙万荣叛唐，在败逃的途中，有一次他疲惫了，就跳下马来躺到一片树林旁边休息，结果被随从的家奴抽刀斩首。进入遥辇氏联盟时代，随着对外掠夺的不断进行，一方面部落贵族可以驱使大批外族战俘作为奴隶，另一方面对外战争促进了契丹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差别，一部分破产或者犯罪的本族人也被充作奴隶，接受部落贵族的奴役。同时，通过趋近于世袭制的世选制，再加上对外掠夺战争，形成了联盟可汗和军事首长夷离堇这样两大显贵家族，和以这两大贵族为中心的特权阶级。

总之，到了遥辇氏联盟后期，人口和经济实力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阶级分化相当剧烈，契丹走向了阶级社会。

（雷紫翰）

参考资料：

《史记·匈奴列传》

《契丹国志》：《初兴本末》、《国土风俗》、《并合部族》等。

《辽史》：《太祖纪》、《世表》、《营卫志》、《部族上下》、《礼志》、《食货志》、《百官志》、《仪卫志》、《地理志》、《刑法志》、《肖敌鲁传》等。

《魏书·契丹传》

《北齐书·契丹传》

《隋书·契丹传》

新、旧《唐书》：《契丹传》。

新、旧《五代史》：《契丹传》。

《五代会要·契丹》
《资治通鉴》隋纪、唐纪等。
《辽史纪事本末》卷1
《东都事略附录》辽国

阿保机建国

唐朝咸通十三年（872）的时候，契丹迭剌部耶律氏出生了一个名为阿保机的男孩。后来，他还取了一个汉名叫做耶律亿。传说，阿保机的母亲伊木沁在一次睡觉时，梦见有一颗太阳掉进了自己怀里，这样就有孕在身了。当阿保机出生时，整个幄帐里突然金璧辉煌，奇香袅绕。祖母认为很不平凡，以后她对阿保机十分爱护。耶律阿保机长大后，身强力壮，精明能干，竟然成了契丹政权的创始人。

实际上，契丹政权的建立，并不是神灵的意志。

契丹自东晋时从鲜卑中分离出来，以后经过了古八部时期，大贺氏联盟时期，到阿保机出生时，已经是遥辇氏联盟的中期。当时的契丹社会正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族外，掠夺战争越来越频繁；族内，阶级对立日益加剧，而且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在各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抗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就逐步产生了。

大贺氏联盟晚期，李失活担任联盟首领时就曾经任可突于和李过折作为正副二衙官，分别掌管部落联盟的兵马军事。遥辇氏联盟建立后，进一步建立制度，创设官职，并沿袭二衙而成立了二府，作为官僚的统领。当时，阻午可汗还认为涅里其人有智慧有本领而又忠实，让他在担任夷离堇负责军事的同时，兼管联盟内部的刑狱司法。

夷离堇这个官职出现以后，其权力逐渐增大，很快就和联盟

可汗一样，也是由一个部落或一个氏族中世选产生，就职时也要举行一定规模的再生礼和柴册仪。阿保机所在的耶律氏世代拥有选任迭刺部酋长的特权，并且，从涅里开始到阿保机，先后七世一直掌握着遥辇氏联盟的军事大权。这样，就使迭剌部的实力很快超过了联盟中的其他部落。当阿保机的叔父释鲁担任夷离堇时，大规模的北征南略，同时在占领的地区开始用版筑的方式建造城邑，让一些部民学习汉族人种植桑麻和纺织。到释鲁由夷离堇进而取得了总管军政大事的职权以后，更是产生了要广土众民，以耶律氏取代遥辇氏的打算。

在这前后，为了竞争夷离堇的职位，迭剌部贵族之间先后发生过三次激烈的争斗，使部落联盟的组织得以不断革新。唐咸通年间（860—874），习尔之被选担任部落联盟长，称为鲜质可汗。当时，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担任夷离堇，掌握着兵马大权。不久，以狼德为首的一些人起来夺权，杀死了匀德实。但是，由于狼德暴虐专横，与匀德实同族旁系的蒲古只便出来借以民心，用计诱捕并消灭了狼德等人，为耶律氏又夺回了世选夷离堇的特权。从这时起，遥辇氏联盟中，就出现了所谓的决狱官，专门处理部落贵族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新职位，世代由外戚部落审密氏（后称"萧"）担任，第一任决狱官，是曾经出使过唐朝的萧敌鲁的五世祖胡母里。

蒲古只以后，还有偶思、岩木、撒剌的、释鲁、罨古只等人先后担任夷离堇。其中，撒剌的就是阿保机的父亲，他负责联盟军事时，向所谓异种同类的邻居——奚族用兵，曾经俘获奚人七千余户。同时，他还"教民鼓铸"，开始冶铁，使对外征服力量迅速增强。到阿保机的叔父释鲁担任夷离堇以后，凭借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辖地迅速扩大。同时，释鲁一边开始大兴土木，筑造城堡；一边倡导民众在定居地种植桑麻，学习纺线织布，发展经济实力。释鲁怀着广

土众民的抱负，经过多年的内外经营，使契丹的力量比周围各族强大起来，同时使他个人的声威达到了相当显赫的地步。于是，联盟可汗创立了大于越府，让释鲁就任非有大功德而不授的于越一职。于越，是和汉族朝廷中的三公类似的一种具有崇高荣誉的职位，没有具体职分，但是位列于包括夷离堇在内的百官群僚之上，坐而议论，运筹帷幄，总揽军政大事。释鲁的权力上升以后，选拔和训练了一支亲信自己的精兵，组成侍卫部队作为护从，叫做“挞马”。由自己年轻勇敢的侄儿阿保机担任亲兵首领，即“挞马狘沙里”。于越所拥有的实际权势，逐渐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超过联盟可汗。比如，释鲁升任于越以后，罨古只被选任迭剌部夷离堇，在就职仪式上，罨古只刚刚入帐更衣准备举行再生礼，不料，早已伺机在旁的异母弟辖底抢过来穿起红袍，戴上貂皮帽，骑了白马出帐直接到了祭坛，让事先串通好的同谋们齐声高喊：“夷离堇出来了！”其余的人都不知已经抢权换人，糊里糊涂列队便拜。辖底就这样强行柴册礼，担任了夷离堇。其原因主要是他得到了释鲁的支持。

释鲁作为首任于越，其权势的空前膨胀，与传统的氏族贵族会议制度难免要发生矛盾冲突。有资格选任夷离堇的一些人，就以维护氏族民主选举传统的名义，起来反抗。曾经为匀德实报仇而消灭狼德集团的蒲古只的子孙纠集了三族人马，并且暗中勾结辖底，串通释鲁的儿子滑哥，与军官萧台哂一起谋杀了于越释鲁。

原先，匀德实被狼德等人谋杀于夷离堇位上时，其孤母寡妻等家属不得不逃匿于别部，在突吕不部的耶律欲稳处避难。匀德实的孙子阿保机出生以后，也怕遭到别人的暗害，不得不涂染了颜面，经常躲藏在突吕不部的帐幕里，不让出去见人。这一次，释鲁被谋杀在于越任上，就无需再等别人替他报仇，他掌握权力时扶持起来的亲兵首领、侄儿阿保机借助痕德堇可汗的命令，立

即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谋划了叛乱的蒲古只三族的头目遭到了镇压，对他们的家属也处以所谓的籍没之法，就是被遣送到部落贵族设置的集中营式的“瓦里”之中，充作家务奴隶。参与谋害释鲁的另外两个人——滑哥和辖底，却设法得以保全了性命。滑哥把责任全都推卸到了萧台哂身上，萧台哂被杀，滑哥得以豁免。而辖底看到事情败露，对方手中有兵，怕性命难保，便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迭里特和朔刮，赶紧逃亡到渤海国境内，装作双目已经失明的人，颤颤惊惊地保全了下来。

镇压了滑哥和辖底参与的蒲古只三族的叛乱以后，亲兵首领“挞马狘沙里”阿保机就得到痕德堇可汗的认可，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担任了军事首长夷离堇。阿保机上任伊始，集中力量专门进行对外征讨，当年就接连打败了室韦、于厥等，奚族首帅辖剌哥也被他征服，俘获很多人口和财物。天复二年（902）七月，又发兵四十万南下，出征河东、代北（今山西北部），攻下九个郡县，这一带的九万五千多汉人被俘，同时掠获的驼、马、牛、羊不可计数。天复三年（903）春天，打败女真以后，又攻克了唐朝河东怀远等州军。同年冬十月，带兵进攻蓟北（今河北北部），得胜俘掠而还。阿保机凭借三年来接连不断的对外征讨虏掠所建树的威势，被进一步提升，成为继释鲁以后的第二任总管军政大事的于越。

以夷离堇身份兼任于越，几乎操纵了联盟所有实权的阿保机，继续对外扩张。唐天祐元年（904）又出兵进攻黑车子室韦。当时，唐朝卢龙节度使（亦即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派遣养子赵霸率兵数万前来援救室韦。阿保机得到侦察情报以后，埋伏精兵，派人诈称是室韦酋长的特使，约唐兵来平原会师。待唐兵一到，契丹伏兵立即发动突袭，活捉了赵霸，击溃了其部下，并趁势对室韦进行了一番大规模的征讨。

第二年（905）秋天，与唐朝河东节度使原沙陀部人李克用

会盟于云州（今山西大同）。李克用与刘仁恭先前结有怨仇，想推动阿保机予以报复。这次会盟，双方觥觞交筹，易袍换马，结为兄弟，最后约定在入冬以后共同进攻刘仁恭。在第一次进攻刘仁恭时，阿保机一连打下好几个州，并强行迁徙那里的民众到契丹驻地。以后，阿保机又发动过对刘仁恭以及奚族的进攻。接着，在天祐三年（906）十一月，专门派兵出征奚、霫诸部以及东北部的一些尚未归附的女真人，大获全胜。

在朱温取代唐朝而自建后梁的这一年（907）春天，契丹部落联盟会议认为痕德堇可汗晚年不太胜任，决定进行重新选举。这次，在四处征讨中建树了功业的阿保机被推选成为联盟首领，从此，遥辇氏被取而代之。当时，阿保机的支持者耶律曷鲁极力鼓动阿保机说：星罗棋布的遥辇氏并不是没有人可以出任联盟首领，而是大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要推选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人。当年大家推戴夷离堇涅里，但是他却扶持迪辇俎里为阻午可汗，结果相传没有多少代人，已经局势混乱得难以控制，部民都疲于奔命。现在大家一致推戴您，真可谓是顺应天时人事，机不可失！阿保机便下令设坛燔柴告天，举行再生礼和柴册仪式，宣誓就职成为契丹强有力的新首领，自己号称“天皇帝”，他的妻子述律月理朵被称为“地皇后”①。

虽然号称“天皇帝”，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相当尖锐，阿保机的权力一时还难以稳定。面对这样的局势，阿保机很明智地在族内族外寻求一切有利因素，来支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族外，一方面进一步向周围邻近民族发动征服战争，以扩展辖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一方面，先后与唐末北边割据势力即后来的五代主李克用父子、朱温等人灵活交结，互相利用。在族内，安抚旧贵族势力，打击和拉拢反对派，加紧培植忠实支持自己的亲信势

① 述律月理朵，汉名“平”，故史书或称为述律平。

力。

阿保机一上台，就立即宣布：皇族耶律氏，只是作为第十帐来继承遥辇氏九帐。既向臣下表示他并非违背传统，而是合理的继承者；也给下台的遥辇氏一种荣誉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一些原可汗家族的不满。曾经参与谋害了释鲁的叔父辖底，这时早已从渤海返回故地。为了拉拢辖底为代表的这一显贵家族，阿保机在称帝之前还故意与辖底谦让了一番。称帝之后，阿保机让辖底就任了于越这个十分尊贵的职位。同时，让辖底的儿子迭里特担任迭剌部的夷离堇。虽然，这时阿保机实行集权，于越和夷离堇几乎有名无实，但毕竟都是相当尊贵的职位。

化家为国需要一个过程。阿保机陆续改革氏族部落联盟时代的旧制度，建立起适应社会新情况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天皇帝至高无上，以下依次为于越、惕隐、南北宰相、迭剌部夷离堇、决狱官、文班林牙等，称为北面官。另外，还设立了政事令、左右尚书、汉人司等，称为南面官。

北面官，主要负责处理以契丹为主的各民族重大事务。其中，南、北宰相直接辅佐皇帝，早在遥辇氏联盟初期涅里分八部为二府，北府五部包括迭剌部、品部、乌隗部、涅剌部和突吕不部，以迭剌部为首；南府三部包括乙室部、楮特部、突举部，以乙室部为首。现在阿保机开始任命这两大特权部落的贵族辖剌和欧里思担任南北宰相。即位第四年（910）又以皇后的哥哥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自从五世祖胡母里开始连任决狱官，从此又开了后族担任宰相的先例，进一步打破了氏族旧制度。惕隐，是阿保机即位第二年（908）设置的，其地位仅次于于越，负责掌管皇族政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氏族部落组织的传统职能。第一任惕隐，由阿保机的弟弟剌葛担任。决狱官，仍然由后族担任，以裁决族内矛盾。文班林牙，掌管文书。

此外，为了管理契丹境内的汉族人民，阿保机还设置了政事

令、汉人司、左右尚书等。南面官机构，最早分别由进人契丹的汉族官僚韩延徽、韩知古等人负责。

原先，释鲁担任于越时设置“挞马”，作为侍卫。现在则在皇帝的营帐设置“斡鲁朵军”即宿卫军，并从各部落挑选出来勇敢精壮的兵丁组成腹心部。宿卫军以及腹心部，就构成强劲的侍卫和禁军系统。为了可靠起见，阿保机让从小跟随他的亲信耶律曷鲁、述律皇后的哥哥萧敌鲁、弟弟阿古只，作为这支侍卫亲军的统领。并让迭剌部贵族斜涅赤，以及在阿保机幼年时保护过他全家性命的耶律欲稳等也参与侍卫亲军的领导。虽然都是侍卫军，但是当年的挞马作为于越的侍卫，削弱了联盟可汗的权力；而现在重新组建的宿卫军和腹心部，则加强和巩固着刚刚出现的契丹皇帝的地位。

皇权一经出现，本身就是对部落联盟会议选举制度的最严重破坏，定期改选轮换联盟首领的部落传统，逐渐趋于不复存在。另外，阿保机还任用汉人担任一些政府官职，也难免引起契丹贵族的不满情绪。结果，患起肘腋，阿保机即位后的第五年（911）开始，到即位第七年（913），这期间他的弟弟迭剌、寅底石、安端等以年纪最长的剌葛为首，与另外一些试图当选可汗的贵族（如辖底、滑哥等）相互勾结，接连发动了三次比较大的叛乱。

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等人第一次密谋叛乱，是在阿保机即位的第五年（911）的五月，这个情况，被安端的妻子粘睦姑知道后，立即报告了阿保机。事实很快就证明了粘睦姑提供的信息。但是，这场诸弟谋反活动被揭露以后，阿保机并没有以武力诛杀他们这些人。而是有意相约让剌葛带着诸位兄弟和他一起去登山，在云天浩渺的山顶上宰杀了一批牺牲，要求谋反者面对天地祷告起誓，以后和他团结一心，永不叛乱。然后，宣布赦免了这些人的谋反罪行。登山盟誓以后，让原来担任惕隐的长弟剌葛，改任迭剌部的夷离堇。同时，给及时报告了谋反实情的弟媳

粘睦姑授封号为“晋国夫人”。

即位第六年（912）的七月，阿保机亲征术不姑部。获胜后，又命令负责兵马的夷离堇剌葛和他分兵两路进攻平州（河北卢龙）。十月份获胜，回师途中，走在前面的剌葛又趁破平州后重兵在手，以兵阻道，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一次，剌葛除了与诸弟迭剌、寅底石、安端联合以外，接替剌葛而担任惕隐的释鲁之子滑哥也参与了叛乱，于越辖底仍然是煽动者和支持者。这样，就由于越、惕隐、夷离堇组成了一个力量强大的叛乱核心集团。按过去部落时代的传统，一般是每过三年就得重新选举联盟首领，现在阿保机已经掌握最高权力达六年之久，所以这些具有被选举权的贵族们总是难以甘心。针对这些情况，阿保机没有立即向剌葛等发动军事反击，而是先率军南移，避开叛军先锋后，很快于当日举行了一次“燔柴礼”①，作为重新选任可汗的仪式，以此来抵消剌葛等人发动叛乱的借口。第二天，阿保机正准备率兵去武力平叛，结果叛乱诸弟看到情势不妙，各自派人前来请罪，阿保机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再一次“许以自新”。

阿保机的两次让步，招致来的却是双方之间的一场武力决战。即位第七年（913）的正月，剌葛等人前来阿保机的驻地再次请罪乞降，表示诚服。阿保机穿起素服，骑上赭白马，并让侍卫列队肃立，十分庄严而又隆重地接见了他们。剌葛等回去以后，阿保机还多次派人前去抚慰。其实，剌葛等人利用乞降的方式进行蒙骗，以争取时间，等到认为已做好了准备，就发动了第三次叛乱。这更是一次经过周密谋划的大规模的武力叛乱，剌葛事先串通了另一力量比较强大的兄弟部落乙室部的贵族，准备直接夺取掌握在阿保机手中的最高权力。

三月，趁阿保机驻扎芦水行营之机，剌葛调动人马分三路行

---

① 燔柴礼，又称册仪。

动。首先，派出想当奚王的迭剌，与安端一起带着一千多骑兵来到行营，谎称前来拜见，准备入帐伺机杀害阿保机。阿保机识破了阴谋，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当初作逆叛乱，我特意给予宽恕，好让诸位改过自新，如果你们这样一再反复，无疑将严重危害我的利益！"便立即传令拘捕迭剌和安端等，并将他们带来的一千多人马分送给自己身边诸军。与此同时，剌葛已带着自己的追随者跑到乙室部的一个地方，制作了象征最高权力的旗帜和大鼓，准备自立为王。正在这时，有人传出消息说皇帝的车驾正在向这边而来，剌葛的随众闻讯四处溃散，剌葛本人也只好往北逃跑。阿保机立即派遣腹心部追击。可是，阿保机一出动，受剌葛派遣的另一叛乱头目寅底石就领兵很快闯进宫来，一边放火焚烧辎重、庐帐，一边纵兵大肆杀戮抢掠而去。留守行宫的皇后急忙派出追兵堵截，只在途中获得了寅底石等在仓皇撤退时丢下的皇帝旗鼓。在这种情况下，阿保机却驻屯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用以前所获的战利品奖赏将士，秣马休兵，表现出一副对目前局势并不在意的样子。当各级将领纷纷请战，要求尽快派兵追击剌葛的时候，阿保机沉着地告诉大家："等到他们越跑越远，随同而去的那些人就会开始思念故土，思乡之情一旦急切，那些人就难免会与叛首离心，在这时候率兵攻其不备，击溃他们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同年（913）四月，阿保机才指挥人马向北进发，去征讨剌葛。不久，从达里淀草地派出的轻骑兵一直追到培只河畔，缴获了叛乱者的大部分辎重和牲口。接着，派室韦和吐谷浑的酋长拔剌与迪里姑等五人提前分兵埋伏在剌葛进一步逃跑的路上；而让北府宰相萧敌鲁作为先锋，率兵从正面进击。剌葛首战即溃，退到柴河后自焚车辆庐帐，准备只顾逃生。结果遇到了伏兵，在前后夹击之下剌葛更是一败涂地，连原来派人从御帐中抢到的先祖神帐也没有顾上带走，就落荒而逃了。随他参与叛乱的库古只、

磨朵等人来不及逃走，只好一个个缚面投降。这时候遇到大雨，阿保机暂时先驻兵于水量暴涨的札堵河畔。

五月，派北府宰相萧敌鲁率骁勇骑兵为先锋，渡河继续追击。在榆河大捷中，俘获了叛乱首领剌葛和辖底，萧实鲁、寅底石等因兵败陷人绝望，但自杀未遂。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叛乱势力大大削弱，局势开始更有利于阿保机。

六月以后，陆续处治一些叛乱成员。活埋了刚刚俘获的叛乱集团重要成员雅里和弥里之后不久，阿保机因为养子涅里思跟随诸弟参与叛乱，让人用暗箭射杀，并将其六千名余党，分别按轻重论刑处治。接着，着手处治辖底父子，虽然被认为狡黠善辩的辖底是一次又一次"诸弟叛乱"的操纵者和支持者，但是作为叔父，阿保机不忍心看到当场被杀的情景，便下令让辖底自己投崖去死。由于辖底的儿子迭里特也参与了叛乱，让同时投崖自杀。八月，阿保机驾临龙眉宫，将二十九名叛乱成员处以车裂之刑。同时，将这些人的妻女赏赐给平叛有功的将士。下令把叛乱者所抢掠的珍宝、牲畜等，一律物归原主；清理偿还各种债务，欠债不能偿还者，充作部曲。十月份，以参与叛乱的罪责，乙室部的迪里吉、迷骨离部的特里等人也被处以死刑。年底，阿保机召集会议，决定由韩知古负责处理积压下来的刑事诉讼，并派人继续搜捕逃亡的叛乱成员。第三次"诸弟叛乱"，到此就算基本上被平定了下来。

但是，关于平定第三次叛乱的扫尾工作，却一直延续到了即位第八年（914）的秋季。这年正月，阿保机任命侍卫首领曷鲁为迭剌部夷离堇，让忽烈担任了惕隐。当时，于骨里部人特离敏带来了他们所抓获的叛乱成员怖胡、亚里只等十七人。这一次，阿保机亲自审理，顾及到大部分是宗室之人，便只杖杀了怖胡一人，其余的都一律获得释放。后来，将多次暗中谋划并直接参与和支持叛乱的滑哥以及他的儿子罕机都以凌迟之刑处死。还有辖

底的另一个儿子解里、剌葛的妻子辖剌己，都被处以绞刑。至于叛乱的首要头目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等，阿保机仍以兄弟看待而没有严格处治，有的受杖刑以后释放，有的干脆免于受刑。到七月份，处死了各帐族参与叛乱的三百多人，并将他们弃尸于市，以儆效尤。第三次平叛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最终宣告结束。

这次内乱，给契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民不聊生的程度，是契丹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当时，最后取得胜利的阿保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军队长期出征，致使供给严重不足，士兵只好煮食战马，十有七八的牲畜死于战乱，各种器械在战争中也损失无数。更不应该的，是让广大的契丹境内各族人民备受战乱的蹂躏，财产遭抢掠，草地和庐帐被破坏，物价又成十倍地增长，给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了很大困难。

不过，这次大规模武力叛乱的被平定，使迭剌部内部以维护部落传统制度为名而图谋夺权的那些守旧贵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乘着胜利之机，于即位第九年（915）阿保机又陆续平定和清洗了其他各部的叛乱分子。在与叛乱势力的斗争过程中，阿保机逐渐牢牢掌握住了契丹社会的最高权力。即位第十年（916）的二月，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八仙筒一带）正式设坛奠业，最终废除氏族部落选举制，代之以专制皇权，建元神册，国号契丹，以大圣大明天皇帝作为自己的尊号，并称述律月理朵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因此，阿保机后来被称为“辽太祖”。

阿保机正式奠基以后，任命曷鲁为于越，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对内对外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扩张统治范围，增加自己的权势。他把对外征服看得相当重要，很快就率兵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于神册元年（916）七月，以上诸部都被打败，俘虏了他们的酋长以及一万五千六百多人口，九十余万件铠甲、兵仗、器服，和无数的宝货、驼、马、牛、羊。接

着，又在神册三年（918）正月和天赞元年（922）六月，两次派人向西南诸部发动进攻。神册四年（919），以皇太子耶律倍担任先锋，攻破乌古部，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人口，以及牛马、车辆、庐帐、器物等，迫使其举族臣服。神册五年（920）八月，阿保机亲自出征党项诸部。天赞二年（923）征服奚部，派人管理。天赞三年（924）让皇太子耶律倍监国，而由次子耶律德光随从阿保机大规模出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九月份曾于回鹘故城（今鄂尔浑河上游西岸）勒石纪功；然后，击破胡母山诸蕃部。十月，进一步派兵越过流沙，攻下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南），尽取西陲边远诸部。十一月，俘获甘州（今甘肃张掖、山丹一带）回鹘都督毕离遏。

随着领土和人口的增加，阿保机对所辖部族进行了改编。称帝之初，就分别指定迭剌部和乙室部的贵族担任北、南宰相府的宰相。以后，又让北府五部以外的后族萧氏世代担任北府宰相。神册六年（921）任命他的小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从此开了皇族宗室担任南府宰相的先例。这样，就破坏了原来契丹八部平等议事和民主选举的传统，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后族和皇族实行统治。到了天赞元年（922），阿保机又认为迭剌部发展得过于庞大，难以管理，就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和六院两部，分别以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堇、绾思为南院夷离堇，仍然隶属于北宰相府。并且，开始实行行政区域划分，将契丹八部变成地域性部落，让各部在所划分的固定地区以内从事活动。

对于被征服和被俘虏的从事游牧渔猎的北边各族居民，打破其旧的部落组合也进行改编，使其成为隶属于契丹的八个新部落。新八部，各部名称之前再加上契丹八部的名称作为部号，由契丹八部贵族进行统治，成为一种被奴役的军事和行政单位。

当初和契丹同时从鲜卑分离出来的奚族，也一再受强大起来的契丹的侵掠。后来，阿保机将奚族完全吞并，但对所谓“异族

同类”的奚人给予了特殊政策，基本上维持了奚人原有的部落组织，由契丹皇帝专门设立奚王府管理，使奚族成为与契丹五院、六院、乙室部等同列的一个包括五部六帐的“大部族”。

在不断从契丹向西南诸部和西北诸部各民族所在地区用兵扩张的同时，阿保机还多次南下侵掠汉人，并向东征服渤海而将其变为契丹的属地。神册元年（916）八月，在出征西北诸部后回师途中，派出三十万重兵南侵，攻下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俘获后晋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十一月，又攻陷并占领了蔚（今河北蔚县）、新（今河北涿鹿西南）、武（今河北宣化）、妫（河北怀来境内）、儒（河北延庆）等五州。从此，自代北直到阴山以南，都成了阿保机的领地。他还将武州改称为“归化州”，妫州改称为“可汗州”，设置西南招讨司，选任有功者在此负责，准备继续向南扩张。第二年（917）二月，后晋新州将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李克用的儿子），投降了契丹。阿保机借机于三月份向幽州（今北京西南）用兵，后晋幽州节度使周德威指挥幽（今北京西南）、并（今山西太原）、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魏（今河北大名）五州的兵力，在居庸关以西进行阻击，双方于新州（今河北涿鹿西南）东部会战，契丹兵获胜，杀三万余人，进而围攻幽州城。但是，后晋由李嗣源率兵前来增援幽州，契丹因为兵少只好撤退。神册六年（921）十月，后晋新州防御使王郁率所属兵马来投降，使契丹兵得以入居庸关，下古北口，阿保机亲自指挥分别攻陷檀（今河北密云）、顺（今河北顺义）、安远（今天津）、三河（今河北三河）、良乡（今河北良乡）、望都（今河北望都）、潞（今河北通县）、满城（今河北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等十余城，将当地居民强迫向北迁徙到契丹辖境。以后，由大元帅耶律德光等人率领继续南侵，不断地攻城掠地俘掳人口。

对于从中原战场俘虏来的、或者强迫迁徙或者流亡而来的大

量汉人，阿保机基本上是采纳汉人韩延徽的建议，用设立州县的办法施行统治。就是依照其原来所属州县的名称，在契丹境内设置同名州县，让他们仍然聚居在一起，保留在中原时的风俗，筑城郭，立市里，恢复或重建婚姻家庭，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

其中，由皇帝直接设立的汉人州县，属于“斡鲁朵”。由那些宗室、外戚、大臣在随从阿保机出征过程中，俘掠来汉人后自置城郭进行管属者，称为“头下州军”（或作投下州县）。头下州军，必须要争取皇帝的承认，由朝廷赐予州名或军名、县名，否则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私城。头下州军的节度使或刺史由朝廷派遣，其他的官吏由本州主任命。它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武装，州主在本州军内向劳动者征收租赋。事实上，这是一种并非皇帝分封而由皇帝承认的贵族采邑和领地，它有贡纳租赋和战时应征等勤王义务。阿保机曾经为了护卫统治中心并开拓向南侵掠的基地，于上京临潢府东南一带，先后认可设立了檀州、泽州、惠州、三河县、密云县、潞县、龙化县、临潢县等。

通过对外军事征服，使辖地一直在迅速扩大，阿保机即位第五年（911）征服奚、霫等族以后，已经是北起潢水，南至白檀（今北京密云东北），东近海滨，西越松漠（今内蒙锡林郭勒盟东南部）了。过了才十年左右，更进一步发展到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同时，阿保机还在不断地进行政权建设，完善官僚体系，并且利用一切方式增强统治机能。神册三年（918）任命康默记为版筑使，负责营建皇都（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康默记是阿保机攻下蓟州（今河北蓟县）时俘虏来的汉族官吏，他利用中原先进的建筑工程技术，调工取材，只用了百余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座都城的修建。以后，经过进一步的扩建，这里就成了辽太宗时的“上京”。同时，为了进一步吸收中原的思想文化，以儒学为国教，后来还下令修建孔子庙、

佛寺、道观。

为了便于施行国家统治，于神册五年（920）正月颁布并开始使用“契丹大字”。这是由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等人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利用汉字隶书的偏旁，或者增添，或者简化，不断摸索而创制的。到了天赞年间（922—926），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又参考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当时，回鹘派使者来了，可是契丹人没有能完全听懂回鹘语言的，阿保机根据述律皇后的提议，让聪明的弟弟耶律迭剌负责接待回鹘使者。迭剌和回鹘使者友好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不仅熟悉了回鹘的语言，而且掌握了回鹘文的书写方法，在此基础上他仿照汉文和回鹘文又创制出了一套能为契丹人所理解的新文字。天赞三年（924），契丹兵占领回鹘故城以后，就曾经同时用契丹文、突厥文、汉文三种文字刻碑，记载阿保机的丰功伟绩。契丹大字和小字与汉字并用以后，就结束了契丹人要么刻木记事，要么全部借用汉字的时代。

在创制并颁行了“契丹大字”的第二年，即神册六年（921），阿保机就下令让有关的大臣着手草制并由自己来审定法律，用来统治契丹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他曾对侍臣强调并要他们知道制定法律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大小巨细的各种事务实在复杂极了，如果宪度不明，那么根据什么来施行统治？让广大的臣民又从哪里去知道国之所禁呢？受命起草所谓“决狱法”的，正就是契丹大字的创制者之一耶律突吕不。《决狱法》是契丹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在制定法律的同时，还设置了“夷离毕”，作为大法官来负责处理狱讼。

自从遥辇氏被取代，经过二十余年，到天显元年（926）阿保机去世之时，契丹的经济结构和文化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权力机构和政治制度等各方面，更是初具规模，一个以契丹贵族为首的国家政权在氏族制的废墟上被建立了起来。（雷紫翰）

参考资料：

《契丹国志》:《初兴本末》、《太祖大圣皇帝纪》、《述律皇后传》、《并合部族》等。

《辽史》:《太祖纪》、《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萧敌鲁传》、《康默记传》、《韩延徽传》、《韩知古传》、《耶律曷鲁传》、《耶律鲁不古传》、《耶律突吕不传》、《耶律辖底传》、《耶律滑哥传》、《部族表》、《皇子表》、《外戚表》、《营卫志》、《地理志》、《刑法志》、《国语解》等。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资治通鉴》唐纪、后梁纪、后唐纪。

《辽史纪事本末》卷1、2、3、4、5。

《全辽文》卷1

东丹王出走

耶律阿保机数十年征战，一面在为自己夺取和巩固政权，一面为契丹攻城掠地抢夺财富。一直到晚年，还一心想着向外扩张，把进一步征服占地辽阔的西部诸族和消灭渤海国，作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两件大事。从天赞三年（924）六月，到第二年秋季，他连续西征，先后占领单于旧地、回鹘故城，越过流沙攻陷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南），并回师获甘州回鹘，略党项及燕赵之地，大获全胜。这时，西北、东北诸族大都被征服，只剩下东边的渤海之地还没有用兵。为了解除契丹南征中原的后顾之忧，避免渤海从侧面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对阿保机来说先出兵东征已成为必然的事情。天赞四年（925）十二月，阿保机曾在所下的诏书中说："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于是，带着皇后和皇太子，发兵去亲征渤海。不久，就乘夜色包围了渤海重镇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境内）。第二年正月(926)，攻陷扶余城，诛杀了渤海守将。紧接着，派出惕隐安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等作为先锋，率领骑兵一万，击溃了前来抵抗的渤海军队。同时，让皇太子耶律倍、次子大元帅耶律德光、弟南府宰相耶律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等率兵随后，伺机又包围了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契丹兵临城下，渤海国王大諲譔被迫投降。对已经放弃抵抗，身穿素服，手中用草绳牵着贡羊，率领三百多名僚属出城来投降的大諲譔，阿保机予以优厚的礼遇。但是，他同时毫不犹豫地以契丹皇

帝的名义向渤海各郡县发布诏谕，宣布征服了渤海。

进而，康默记、韩延徽、安端等受命分兵征讨拒绝投降和降而复叛的渤海残余势力。契丹征服渤海，先后得地五千里，兵数十万[①]。为了巩固战果壮大声势，于当年（926）二月，阿保机在忽汗城主持举行盛大的庆贺赏功活动。按照契丹传统习惯，先用青牛、白马祭祀了天地，然后实行大赦，并打开渤海府库用大量的财物犒劳和奖赏从征将士，包括奚部首领等以及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部族中从征有功者，都得到了优厚的奖赏。就在这同时，阿保机宣布改元"天显"，改"渤海"为"东丹国"（即东契丹国的意思）。将原来渤海国的首府忽汗城也改称为"天福城"，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代天皇帝主持东丹国事；并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东丹国每年向契丹中央贡布十五万匹，良马千骑。阿保机说，他之所以让皇太子留治东丹，是为了体现自己对这个地方的重视。

所谓"渤海"，原为唐代的粟末靺鞨部所居之地。生活在粟末水（今淞花江）流域的粟末靺鞨人，晋代以后曾经一度被高句丽所统辖。后来，唐高宗征服高丽，设置了安东都护府，粟末靺鞨人移居唐朝东北重镇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都督府都督赵文翙激起了契丹等族人的强烈不满，契丹人李尽忠联合邻近各族起兵反唐，有不少粟末靺鞨人也被李尽忠挟迫参加了反唐队伍。当时，粟末靺鞨中的乞乞仲象等人渡过辽河自守，为了分化反唐力量以孤立李尽忠，武则天便封靺鞨首领乞四比羽为"许国公"，封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乞仲象之后，由他的儿子大祚荣继承。大祚荣曾经一度乘突厥犯唐之机，迅速向东发展势力，并在东牟山下挹娄故地为自己修建

① 据《辽史·地理志二》。

了一座都城（今吉林敦化敖东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大祚荣就在这里自立为震王。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赐其都名为“忽汗州”，加封忽汗州都督，成为唐朝统治下的一个民族自治区。从此，就有了渤海国之称。渤海国王以“大”为姓，此外还有高、张、杨、窦、乌、李等都属显要姓氏。这里的男子骁勇多智，有“三个渤海人当一虎”的说法①。大祚荣之后，有大武艺、大钦茂、大仁秀等先后在这里掌权。最强盛时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②，一度称雄辽东。到了大諲譔的统治时代，国势衰落了下来。天显元年（926）春天，被阿保机率领的契丹兵所征服，成为契丹的东部属地，开始由阿保机任命的东丹王耶律倍来管理。

契丹占领渤海以后的最初阶段，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在这里仍然保留了具有政府性质的整套官僚体系。东丹国建元“甘露”，即拥有自己的年号；东丹王被允许穿戴天子官服；除了左右大次四丞相由契丹天皇帝任命，其余各级官僚都由东丹王负责任免。当然，为了牢牢控制住这块东部属地，阿保机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机，比如任命自己的弟弟迭剌为首相即左大相，任命原渤海丞相为右大相，同时又任命渤海的大素贤为左次相，契丹的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这样的安排，既通过改组的形式部分地保留了渤海的原有秩序，以笼络和安定被征服者的上下民心；又让东丹权力阶层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以防止和避免出现分裂于契丹中央的现象。耶律倍在东丹称制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继续采用原来就在这里流行着的中原封建王朝式的统治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这里的汉化进程。

不料，阿保机从东丹启程回师途中，于天显元年（926）七

---

① 《契丹国志》诸蕃记。

② 《辽史·地理志二》。

月在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境内）因病去世。皇后述律月理朵临朝称制，决断一切军国大事。从此，皇位继承问题使契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随即暴露了出来。阿保机有三个儿子：耶律倍、耶律德光、耶律李胡。东丹王耶律倍作为长子，早在神册元年（916）就被立为皇太子，按理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次子耶律德光在对外战争中屡有功绩，于天赞元年（922）被册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逐渐掌握了军事大权，而且平时深得母后的喜欢。述律后打算扶持次子耶律德光继位，为了取得“众望所归”的合法性，她就下令召群臣集会，让耶律倍和耶律德光兄弟俩人同时骑马立于帐前，然后对诸位臣下说：“两个儿子我都很喜欢，所以无法决定他们哪一个继位才好，现在请你们来协助选择，觉得他俩谁适合继位就走过去牵住谁的缰绳。”大家早就明白了述律后的心意，便齐声回答：“愿意为大元帅效劳。”这等于是强制履行了选汗仪式。当时，也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但是遭到了述律后毫不留情的镇压，比如南院夷离堇迭里，就支持皇太子东丹王继立，提出帝位继承应该优先考虑嫡长。为此，皇太后下诏将其下狱审讯，指责其与东丹王结党，杀害后还对其家属处以“籍没之法”，罚作了奴隶。皇太子耶律倍看到母后心意已定，便无可奈何地对公卿们说：“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并带领一帮大臣随他前来皇太后处表示自己情愿让位。天显二年（927）十一月，耶律德光即位，号称“天皇王”，成为契丹历史上的第二代皇帝。而皇太子被排挤，仍然为东丹王。

东丹王耶律倍，虽然也曾数度跟随阿保机出征，比如从征乌古、党项诸部时，他曾担任先锋都统；从征渤海初战告捷占领扶余城以后，他曾劝阻阿保机先不要急于清查、登记户口，以免扰得民心不安，应乘胜直取渤海首府忽汗城，并且他与大元帅耶律德光同为先锋，夜围忽汗城，迫使渤海王大諲譔投降。但是总体上他主要还是一位文臣。从小聪明好学的耶律倍，曾用契丹文翻

译《阴符经》，懂得阴阳五行，熟悉音律，精于医药、针灸技术，擅长画契丹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等，流传到宋代时已视为珍品，被收藏到秘府之中。他不仅精通本族文化，而且倾慕和精通汉文化，深受中原制度文化的影响。神册元年(916)，阿保机正式建国以后，认为作为受命之君，应当事天敬神，于是向臣下征问：如果按功德大小而论，我在祭祀时应该以哪位圣贤为主为先？侍臣们都认为应该以佛为先为主。阿保机认为佛不属于中国教，不该以佛为主祀之神。当时，耶律倍力排众议，认为孔子是万世所宗的大圣，国祀应该以孔子为先。对耶律倍的这个主张，阿保机十分赞同，立即下令修建孔子庙，并让耶律倍以皇太子身份负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祭祀活动。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耶律倍，一直倾向于走汉化道路，主持东丹国事以来，更是切实施用近似于汉族王朝的制度。他过于明显的汉化主张，使当时的契丹贵族阶层尤其是述律后等人无法接受。因此，在皇位争夺中他失败了，成了所谓的“让国皇帝”。

作为父皇早已确立的皇太子，却在父皇死后被迫让别人去继承了皇位，当初耶律倍满腹苦恼，但是自己的势力单薄，在无可奈何中他想出走后唐，以示抗议，结果是很快就被皇太后他们发现。于是，只好继续去当他的东丹王。他平常爱好读书，而不喜欢射箭狩猎，初到东丹时就派人先后私人幽州，选购回来了大量中原汉文图书，据说多达一万余卷，在近海的一座风景秀美的山峰上修建了一幢名叫“望海堂”的藏书楼。这次未能继位，返回东丹以后，为了排遣郁闷，便经常在望海堂中读书赋诗，在这里所写的《乐田园诗》，一时广为流传。

但是，让位以后他仍然受到怀疑和排斥，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在时隐时显地进行。掌握了政权的耶律德光，或者亲自巡幸，或者陆续派人来东丹视察和抚慰，以随时了解东丹王的情况。东丹王耶律倍也先后多次人朝母后和天皇王，贡献礼物，观

察朝廷。天显五年（930）三月，小弟耶律李胡受命接替耶律德光而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四月，耶律倍曾经会同耶律德光前往祖陵谒拜父皇阿保机的亡灵。罢了以后，耶律德光怕耶律倍借机生事，便很快派人送他到东丹去。耶律德光疑心难消，为了便于防范和控制起见，后来让耶律羽之在东丹王人朝之时，将天福城（原渤海忽汗城）的东丹居民大都迁往东平（今辽宁辽阳），表面上却将东平升为“南京”，并设立仪仗，让耶律倍继续前往主持。耶律倍面对这些，一面让人撰写并刻立了《建南京碑》，以表示纪念；一面却从内心里进一步陷人了绝望和消沉。这时，后唐皇帝明宗听说了东丹王的处境以后，派人渡海来到东丹，带着明宗亲笔书信密召耶律倍前往。等到十一月份，后唐明宗的特使再次来到东丹时，耶律倍终于下定了告别契丹出走后唐的决心，他对左右臣僚感叹说：“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吾吴太伯之名。”于是，在海滨树立起一块木碑，上面刻上表达此时此刻他的心境的诗句，说：“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然后，携带他在东丹国娶的妻子“高美人”，用船满载着他收集储存的大量书籍，从海路投奔后唐而去。

初来乍到，后唐用天子的仪卫隆重迎接耶律倍。耶律倍在船殿里接受了后唐官员的祝贺。然后，前往洛阳，耶律倍拜见了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明宗为耶律倍赐姓“东丹”，赐名“慕华”，专门改瑞州为怀化军，任命他担任怀化军节度使，瑞、慎州观察使等职。并让原后唐庄宗的后妃夏氏和耶律倍成婚。不久，后唐明宗又为耶律倍赐姓“李”，赐名“赞华”，让他移镇滑州，遥领虔州，为义成节度使。可是，无论后唐如何礼遇，耶律倍都以所封皆空衔而不预政事，而且由于身处异国乡思渐浓。替他在后唐和契丹之间往来通信问安的使者接连不断，然而他的情绪却越来越恶劣，脾气暴躁到连他的妻妾稍有差错动辄就施以刲灼，到后

唐以后和他结婚的夏氏不堪忍受残酷的折磨，一度请求离婚去削发为尼。天显八年（933）冬十一月，后唐明宗去世，由其子李从厚继立。第二年（934）夏四月，明宗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去年继位的李从厚，而由自己称皇帝。在后唐发生内乱之时，耶律倍派人前往契丹通报这个消息，并给耶律德光上书希望趁机派兵征服后唐。天显十一年（936），在李从珂的逼迫下，后唐将领石敬塘反叛并向契丹求援，耶律德光便亲自率兵配合石敬瑭攻打后唐朝廷的军队。后唐的军队被打败，石敬瑭开始围攻洛阳，李从珂看到已经朝不保夕，急得准备自杀，但他要求耶律倍陪他去死，耶律倍不答应。于是，李从珂在自焚前派人杀死了耶律倍。

东丹王耶律倍出走后唐，是辽代前期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当时契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曾经十分尖锐；尤其是主张基本上保持契丹传统的当权派与倾慕和主张大量引进中原制度文化的东丹王一系之间的矛盾，一时达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同时，东丹王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之后，毅然出走后唐，也是中原汉族文化和北方契丹文化相互交流的一件大事。

（雷紫翰）

参考资料：

《契丹国志》：《太祖纪》、《东丹王传》、《诸蕃纪》等。

《辽史》：《太祖纪下》、《淳钦皇后述律氏传》、《义宗倍传》、《耶律安抟传》、《太宗纪》等。

《资治通鉴·后唐纪》

《辽史纪事本末》卷3、8、9、10。

《全辽文》卷1

太宗南征中原

辽太宗，即耶律德光。他是阿保机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建国初期随从阿保机出征时屡建功勋，天赞元年（922）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协助阿保机进行更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先后曾受命占平州（今河北卢龙），破奚族，掠镇、定，攻陷幽州（今北京）等地，以及跟随阿保机破于厥，定党项，出击山西，取回鹘单于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征服东部邻居渤海，进攻达卢古部等，东征西讨，几乎无战不从，每战皆有功。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在征服渤海改建东丹国之后凯旋回师的途中突然得病，于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境内）去世。第二年（927）十一月，在总揽军政大权的母后述律月理朵的极力扶持下，已经逐步握有兵马实权的耶律德光大行柴册仪式，继承了皇位，把他的哥哥、皇太子耶律倍排挤到了一边。他继位当了“嗣圣皇帝”以后，最初仍然沿用“天显”为年号，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述律后为应于皇太后，立皇太后的侄女萧妃为皇后。耶律德光掌握契丹政权期间，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次向南用兵，其中后唐、后晋等中原王朝的灭亡，都与契丹的军事进攻直接相关。

耶律德光当政之初，契丹内外的形势都不是太安定。内部，存在着权力斗争。外部，李存勖于天赞二年（923）消灭后梁而建立的后唐，已经将契丹以南的中原地区大都统一了起来，现在正值后唐明宗李嗣源统治时期，经济实力和军事防备都得到迅速

发展，明显优越于契丹。天显元年（926）十月，镇守在平州（今河北卢龙）的卢龙节度使卢文进，还带着所部数万人马投奔了后唐，这对初步掌权的耶律德光来说，无疑于当头一棒。

为了扭转形势，耶律德光于天显三年（928）春，向南发兵征讨平州（今河北卢龙）。当时，后唐义武节度使王都派人前来，说要贡献定州（今河北定县）投降契丹，于是契丹兵与王都会合一致。后唐急忙任命归德节度使王宴球为北面招讨使，组织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县）。战争一开始，契丹兵就在将领铁剌的指挥下打败了后唐的军队。但是，后唐又立即大量集结兵力，准备反击。在铁剌的请求下，耶律德光派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剌前来增援。七月份，后唐终于收复了定州，王都举族自焚，铁剌在作战中死去，涅里衮、查剌等数十名将领被俘。耶律德光认为这次是出兵的时间不合适，才导致了失败，便一面优厚抚恤战死的将士家属，一边在太祖庙祭祀阿保机以求保佑。

首次南征失利，耶律德光只好和后唐先改善关系，班师北去，再做充分准备。为了完全控制住东丹，以消除后顾之忧，同年（928）十一月，升东平（今辽宁辽阳）为“南京”，下令让东丹右次相耶律羽之趁东丹王在皇都之机，将大部分东丹居民迁来东平。可是，只过了两年，到天显五年（930）十一月，东丹王就泛海投奔了后唐。在天显四年（929）十月，耶律德光在检阅了军队以后，派弟弟李胡带兵讨伐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尚未归附的郡县。第二年（930），耶律李胡攻克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不久，被册封为寿昌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天显八年（933）春，又命皇太弟耶律李胡、左威上将军色克率兵进攻党项，并迫使党项人贡契丹。天显十年（935），吐谷浑的酋长表示依附契丹。一时间吐谷浑、女真等族都陆续向契丹入贡结好，契丹的势力在迅速增强。这时候，后唐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宗皇帝李嗣源去世，由其子李从厚继位；不久，李嗣源的养

子、潞王李从珂于天显九年（934）四月发动政变，派人缢死了李从厚而自立为皇帝。但是，李从珂执政无方，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契丹得到东丹王耶律倍派人通报的消息以后，于六月份派兵进攻后唐，拔河阴（今山西山阴西南）等地。当时，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作为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率重兵屯防在要地忻州（今山西忻县）。李从珂为了鼓舞士气，派人向士兵发放夏衣，士兵们表示感激，甚至有人连声高呼“万岁”。石敬瑭与李从珂关系本来就不太融洽，现在看到这种情形，便派部将刘知远处斩李晖等三十六名士兵，以平息心中的怒火。这事传到李从珂那里，猜疑更重，但为了应付眼下的战事，还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同时，以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率兵驻屯代州（今山西代县），来削弱石敬瑭的权力。这时，早已做好了军粮储备的石敬瑭拒绝接受命令，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准备叛唐自立。李从珂便一边派兵讨伐，一边杀掉了石敬瑭在洛阳的儿子和弟弟。石敬瑭听到这个消息，愤怒不已，为了打败李从珂便让书记桑维翰立即写信向契丹求援，表示只要契丹给予军事援助，就甘愿称臣，并以父礼事奉契丹皇帝，一旦帮助打败李从珂而由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将卢龙一带和雁门关以北诸州割让给契丹。耶律德光听了十分高兴，当下答应与石敬瑭联合。天显十一年（936）八月，耶律德光亲自率领五万人马，号称是三十万大军，从扬武谷向南开进。九月，契丹的人马人雁门，经过忻州（今山西忻县），很快到了太原（今山西太原），正值后唐派高行周、符彦卿率骑兵前来阻击，于是战斗立即开始。当时，后唐将领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等将大量步兵布置在太原城西北山下，准备配合骑兵作战。契丹却只派出三千轻骑兵，故意轻率出击，并很快就装作败退，冲过汾水扬长而去。后唐的军队不知是计，穷追不舍，结果契丹的伏兵从东北面发动突袭，将后唐的队伍拦腰截断，北岸的步兵大多被契丹兵所

杀。张敬达只好急忙收集残部去退保晋安寨（今山西太原西北）。当天晚上，石敬瑭拜见了耶律德光，进一步达成联合，双方开始以绝对优势兵力围困晋安寨。

耶律德光先封石敬瑭为“晋王”。十一月，再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与耶律德光执手约为父子，答应耶律德光提出的世为藩属的要求，同时约定割让幽（今北京）、蓟（今蓟县）、瀛（今河间）、莫（今任邱）、涿（今涿县）、檀（今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涿鹿北）、妫（今怀来）、儒（今延庆）、武（今宣化）、云（今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北）、朔（今朔县）、蔚（今蔚县）等十六州给契丹，还同意每年向契丹交纳三十万匹贡帛等。闰十一月，攻下晋安之后，耶律德光派迪离毕率领五千骑兵护送后晋高祖石敬瑭前往洛阳登基。后唐皇帝李从珂看到自己的军队节节败退，石敬瑭已兵临城下，便召原东丹王耶律倍同死，耶律倍不答应，就派人杀了耶律倍，然后带着全族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至此灭亡。十二月，耶律德光班师返回契丹，带走了后唐降将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等。天显十二年（937）十一月，耶律德光决定改元“会同”。会同元年（938）十一月，后晋派赵莹送来了燕云十六州的地图，契丹版图顿时扩大了好多。耶律德光便下令以皇都临潢府为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改原来的南京为东京（今辽宁辽阳），将刚从后晋接收过来的幽州升为南京（今北京）。同时，升南、北二院及乙室部夷离堇为王。会同二年（939）三月，封皇子耶律璟为寿安王。从此，所有公卿百官都开始仿照中原王朝的职官制度来设置。会同三年（940）十一月，下令有关方面教民重视播种和纺织，废除姊亡妹续的婚姻陋俗。十二月，还颁令允许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可以与汉人通婚。继会同元年（938）六月，下令修建日月四时堂，在两庑绘图并附文记述先祖事迹。之后，会同四年（941）二月又下令让有关机构编集《奇首可汗事迹》等，以保存

历史文化。可见，占领燕云十六州，对契丹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促进了契丹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迅速发展，一方面等于拥有了一大片进一步向南扩张时所需要的根据地。

会同五年（942）六月，后晋皇帝石敬瑭死去，由其侄子石重贵继位。耶律德光当时派使者前往后晋吊祭石敬瑭。七月，石重贵派金吾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前来答谢，在所上的书表中采用了景延广的建议而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对此十分愤怒，立即派客省使乔荣前来责问。景延广毫不掩饰地回答说，跟过去不同了，现在我们的新皇帝是自立的，为邻为孙还可以，要继续奉表称臣那是不行的。听了乔荣关于石重贵背盟的汇报以后，耶律德光便决定再次南伐。

第二年（943）十二月，得到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派人骑马来密报，说后晋国内发生严重饥荒，趁此机会进攻，一举可得。耶律德光便来到南京（今北京）商议并部署讨伐后晋，命令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为先锋，从沧、恒、易、定分道向南进发，主力部队也紧随其后。会同七年（944）正月，赵延寿、赵延昭的骑兵捷足入占任邱（今河北任邱）；安端入雁门，围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接着，赵延寿围攻后晋多年聚结军用粮草的水陆要冲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全力抵抗的贝州知事吴峦发现守将邵珂已经投降，并且打开城南门带领契丹队伍涌人，只好投井自杀。耶律德光到达以后，任命赵延寿为魏、博等州节度使，并封为魏王。

同年（944）二月，后晋博州（今山东聊城）刺史周儒投降，平卢（今山东益部）节度使杨光远暗中指引契丹兵从马家口渡黄河。后晋大将景延广立即派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薛怀让等率兵一万，沿河水陆并进，在马家口与尚未完全渡过黄河的契丹兵相遇，契丹兵战斗失利。同时发生戚城之战，后晋皇帝石重贵亲自指挥援救队伍，和围在城里的高行州、符彦卿、石公霸等将

领里应外合，使契丹兵不得不退走。三月，赵延寿认为后晋已在黄河沿岸设置了障碍，不宜作战。耶律德光便同意让主力部队直取澶州（今河南濮阳），并立即与赵延寿分左右围攻澶渊，和据守在这里的后晋将领高行周在澶州北面的戚城发生了激战。打了快要一整天，胜负难分，耶律德光开始怀疑杨光远不是说晋兵大半困累而死，现在怎么还有这么多人马呢？傍晚，听谍报人员说后晋在东面布置的守兵较少，而护城河沿岸的栅栏也不像别处那些牢固。于是，耶律德光急令火速向东转移并发动猛攻。结果，后晋军队前堵后追，契丹主力被打了个大败。一时无法扭转战局，耶律德光只好让赵延昭留守贝州（今河北清河西），自己带着俘虏的人口于四月份退驻南京（今北京）。准备稍作休整后，再次出兵。

过了七个月以后，耶律德光又下令征集各地兵马，再次发动对后晋的战争。先进驻古北口（檀州北），再围恒州（即镇州，今河北正定县），攻下恒州九县。会同八年（945）正月，分兵进攻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磁（今河北磁县）三州，一路大肆杀掠，进人了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境内。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和后晋的军队数次交战，互有胜负。二月，契丹兵包围魏州（今河北大名），后晋石重贵派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率兵反击。三月，杜重威和李守贞与赵延寿的契丹先锋部队在泰州（今河北保定）交战。杜重威和李守贞作战不利被迫南撤，在阳城（今河北完县东南）遭遇更大损失后，仍然重新组织步兵继续抵抗，结果全部被契丹的军队包围到了白团卫村（今河北完县阳城南）。当晚狂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待到拂晓时分，后晋士兵为了求生而全体呼吁主将率领拼搏突围。终于，在张彦泽、药元福、皇甫遇、符彦卿等人率领下，后晋士兵纵火扬尘、乘风呐喊出击，结果契丹队伍节节败退，耶律德光乘奚车退走十余里，晋兵急追，他又捉获一匹骆驼骑着逃跑了。白团卫村

一役，契丹大败，晋兵屯驻定州（今河北定县）。耶律德光于四月份退回南京（今北京），认为出师失利是各部酋长作战不力，将他们分别杖笞数百下。

会同九年（946），耶律德光再次集合了队伍，于八月份又亲自挂帅南征后晋。九月，在渔阳（今河北蓟县西）的枣林淀检阅了各路兵马以后，由前锋赵延寿从定州出兵攻击后晋将领张彦泽，首战告捷。

十一月，契丹准备进围镇州（即恒州，今河北正定），先以渤海人高模翰率兵分头从瀛州抄小路前进。这次，后晋以杜重威为元帅，以李守贞为副帅，组织抗击。面对契丹军队的进围，杜重威派出梁汉璋率兵截击，结果，梁汉璋兵败而死，杜重威便带兵退至中渡桥（滹沱河渡口）。当时，磁州刺史李谷劝杜重威渡河与恒州守军联合夹击契丹军队，杜重威没有采纳这一正确的建议，反而将李谷派遣去催运军粮，准备在中渡桥据守。同时，杜重威派出去的作战部队吃了败仗，将领王清、宋彦筠等在战败后落水而死。不久，后晋义武军节使李殷以城投降契丹，使后晋的力量进一步减弱。杜重威退守的中渡寨也很快被赵延寿率领的契丹重兵围困了起来。这时，契丹一面以主力挡道，一面派出外戚萧翰等率骑兵从后面截断后晋军队的粮道和退路，在所俘的晋人面部都刺上“奉敕不杀”四个黑字，然后释放回来，后晋运粮的人在路上看到以后，都吓得弃车而逃，致使后晋军队内外隔绝，食尽势穷。在这种情况下，耶律德光便以扶持杜重威做后晋皇帝为饵，诱使杜重威于十二月和李守贞、张彦泽等率部众二十万人，投降了契丹。在扶持做中原皇帝的这个诱饵下，赵延寿一直在冲锋陷阵，现在杜重威作为后晋元帅也因此而率部投降，耶律德光自然喜出望外。受降以后，耶律德光将其中一半后晋军队交给赵延寿统领，一半继续由杜重威带领担任邺都（今河北临漳西）留守，以李守贞为天平节度使。并且，立即以御使大夫解

里、监军傅柱儿和张彦泽为先锋直逼后晋都城。解里等日夜兼程赶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晋皇帝石重贵穿起素服，奉表称罪投降。张彦泽便纵兵大掠。当年，由契丹灭后唐而扶立的后晋，至此又被契丹所消灭。

第二年（947）正月，耶律德光以皇帝的仪仗进入了后晋都城（今河南开封），在崇元殿改穿中原汉族皇帝的服装，接受了百官的祝贺。然后，降后晋皇帝石重贵为崇禄大夫，并派人将石重贵及其母亲李氏和他的后妃、子弟、宫人等百余人送往黄龙府予以软禁。其余后晋百官依旧，任命副枢密使刘敏负责开封府。二月，耶律德光宣布改元"大同"，改国号为"大辽"，实行大赦。同时，以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提升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对其他内外官僚将士有功者分别予以赐爵和奖赏。

在契丹消灭了后晋以后，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汉。耶律德光便任命耿崇美、唐高英、崔廷勋为藩镇，分别占据要地防守。由于中原人民和一些官吏的强烈反抗，耶律德光不敢在中原久留，再加上天气逐渐变热而从北方来的契丹士兵不服中原水土，便于三月份将后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一律派人席卷送往上京临潢府。然后，任命外戚萧翰为宣武节度使让其留守开封，耶律德光自己则带着冯道、李崧、和凝、张砺等晋臣于四月份撤离开封，启程回辽。

耶律德光先后数次南征，中原人民深受战乱之苦，不断奋起反抗。当耶律德光在归途中，面对久经战乱之后政治废弛、土地荒芜、生活艰难以至于民不聊生的中原大地，竟然也不得不承认他千里出兵多次来中原作战的行为有三个不对的地方：一是纵兵抢掠牲畜和粮食，二是俘掠当地的劳动力和财货，三是没有及时

任命和派遣节度使到各地去治理。其实，何止于此！不仅中原人民首当其冲地被践踏得疲惫不堪，而且契丹本身的人畜伤亡也相当惨重，契丹人民同样叫苦连天。但是，当他的弟弟耶律李胡在途中派人向他请示以后如何打算时，他仍然声明：把镇州（今河北正定）升为中京，就是为了休整一段时间以后，准备再来征伐河东，让后汉也归命称臣。结果，他还没有回到契丹境内，不久就因病死于栾城（今河北栾城）。

（雷紫翰）

参考资料：

《契丹国志·太宗纪》等

《辽史》：《太祖纪》、《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赵延寿传》、《耶律李胡传》等。

《资治通鉴》后晋纪、后汉纪等。

《辽史纪事本末》卷1、5、8、9、10、11、13。

《全辽文》卷1

因俗而治

辽朝的政治制度，在辽太祖阿保机建国初期已经粗具规模，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执政时代就基本上逐步完备了起来。以后各代，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变化和发展。辽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因俗而治，官分南北，并且不断地仿效中原，以至于不断地在汉化。

契丹社会初创官僚制度，是从遥辇氏联盟初期开始的。最初，契丹主要由血缘氏族结成的八个部落组成，部落酋长称为“大人”。在唐朝初期，以势力比较强大的大贺氏族为首开始形成固定的部落联盟。联盟实行民主选举制，由八部大人组成联盟会议，定期从八部中推选出一个勇敢而有谋略的人担任联盟首长，称为“可汗”，来统管八部，在他所在的部落树立旗鼓作为首领的标志，也象征尊严。并且约定，联盟长不能由某一个人长期担任，得定期通过选举进行轮换。被选举的联盟长，一般都是某一实力较为雄厚的部落的酋长。如果遇到发生严重的灾害，或者疾疫流行，或者畜口大量衰亡等特殊情况时，要立即由八部大人聚会，选举出新的联盟长，并将旗鼓传给他。被替代者应服从惯例，而不得抗拒。大贺氏联盟末期，出现了专门分管兵马的正、副军事首长，其地位仅次于部落联盟长。遥辇氏族联盟代替大贺氏族联盟以后，阻午可汗指定势力强大的迭剌部酋长涅里为军事首长，称为“夷离堇”（和部落酋长的称号相同），并且让他负责刑罚。涅里起初全力支持阻午可汗掌权，现在阻午可汗委以重任，他便想着进一步加强可汗和自己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于是

借鉴邻族文明，开始创立制度，设置官属。为了便于显示和行使权力，将八部分编为二府，并由自己来总管。从此，契丹社会的官僚体系便逐渐地衍生发展起来。

由于联盟可汗和军事首长地位的优越，以及权力的不断增大，民主选举制自然被不断地破坏。历任联盟长，实际上总是从某一势力强大的部落中世选产生；历任军事首长、夷离堇也是由实力雄厚的迭剌部耶律氏族的首领等担任。柴册礼仪，作为传统的选汗仪式，逐渐地流于形式，不仅成为标榜选举显示权力神圣性的幌子，而且不时地干脆被用来当作夺取权力的工具。阿保机的叔父耶律释鲁担任夷离堇以后，军事首长的权利在不断的对外征服过程中得以显著的膨胀。不久，释鲁由负责兵马军事的夷离堇，一跃升任了新设置的地位十分显赫的“于越”一职，凌驾于诸部酋长和夷离堇之上，坐而议论，总管军国大事。后来，当了于越的释鲁竟然为自己建立了侍卫部队——挞马，由自己的侄儿阿保机担任侍卫首领，即“挞马狘沙里”。实际上，释鲁开始利用手中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来操纵契丹社会的主要权力了。释鲁升任于越，他的侄儿阿保机接替担任夷离堇。后来，释鲁由于权势过于显赫而招致了杀身之祸。阿保机利用武力迅速镇压了反对派，于越一职由他自己来兼任。唐朝被朱温建立的后梁所取代的那一年（907），契丹痕德堇可汗被担任夷离堇并兼任于越的阿保机所取代。

阿保机在南下征战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原封建制度的影响，在夺取汗位以后，他号称为“天皇帝”，开始实行集权专制。并且，任用一些汉族士人帮助他设法巩固和扩大权势。对此，他的几个弟弟和一些拥有选汗资格的贵族以维护传统选举制度为名，先后三次联合起来武力反对。阿保机并用武力镇压和笼络政策，平定诸弟叛乱，统一契丹诸部以后，于夺取汗位的第九年（916）在龙化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八仙洞一带）建元称帝，正式建立

了契丹王朝。他自己采用“大圣大明天皇帝”为尊号，他的妻子被称为“应天大明地皇后”，长子耶律倍被立为皇太子。总之，以世袭皇权的确立，宣告了部落联盟制度的被淘汰。

从掌握政权之初，阿保机就开始了官僚机构的建设，利用汉族人韩延徽、康默记、韩知古等，仿照中原，并以契丹的社会状况出发，制订了一些典章制度，先后改建和创设南、北宰相府、惕隐、汉人司等朝官，建立宫卫、腹心部作为侍卫，隶定族帐，改编部族，设置汉人州县和城堡等。当时，一律以南、北二部的形式设置朝官，其实，都是管理契丹事宜的。神册六年（921），阿保机还专门发布命令，颁定了各级官员的秩位等级，分别明确现有官吏的职权范围。天显元年（926）占领渤海以后，改称东丹，作为契丹属地，但是在那里基本上维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

阿保机晚年，辽的疆域已经东起海滨，西到流沙，北绝大漠，可谓是相当辽阔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排挤了皇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以后，进一步向外扩张，最主要的是通过数次大规模的南侵，先后征服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后唐、后晋等。当时，由于一方面在战争期间的各种情况下，大量的汉人包括一些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进入了契丹境内；一方面取得了以燕云十六州为主的长城沿线及其以南大片的农业地域，这些因素使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辽太宗几乎每次都是亲自带兵出征中原，不仅在平时占城掠地过程中，受到了不少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而且他曾经多次进驻中原重要城市，消灭后晋之后，于会同十年（947）正月进入了后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所在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一直到四月份才返辽。在撤离汴梁时，辽太宗还下令将后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以及铠仗，全都运往辽朝的都城上京。这样，在先后吸收中原制度文化的基础上，辽朝的官僚制度很快地

趋于健全和系统化。

随着辖地的扩大，两种不同的经济区域在辽朝同时并存了。一种是耕稼为食，桑麻为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定居农业区；一种是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为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区。对此，辽太祖和辽太宗都采取了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的政策。辽太宗时，除了东丹以及陆续建立的汉人聚居的头下州县等农耕生产为主的地区实行汉族制度，后来占取的燕云十六州也仍然保留原来的州县制度。而在契丹等族所在的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地区，一边吸收引进汉制，一边主要还是保持契丹的部族制度。这样，就奠定了辽朝双轨式的政治体制。

到辽太宗时代开始大致健全起来的辽朝中央官僚机构，是在皇帝以下对称地分别设置北面官和南面官。首先是北面官，它主要负责掌管契丹宫帐、部族以及属国的政治事务。因为属于这一系列的所有衙署都设在皇帝牙帐的北边，所以称为“北面官”。由于北面官掌握契丹一切军政实权，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都属于这些机构管制，实际上是辽朝的权力重心所在。自从辽太祖分别设置北、南宰相府，和划分迭剌部为北、南两大部院以来，官分南北两系成了制度，上起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等都分南、北。即使是北面官，包括北面官的核心部分即所谓“北面朝官”，同样也分北、南两系对称设置。但是在事实上，北面官不论是北系还是南系，都掌管的是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事务，只是所管辖的职权范围分别有所侧重而已。

北面官系列，分为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皇族帐官、北面诸帐官、北面宫官、北面著帐官、北面部族官、北面军官、北面边防官等。

北面朝官，是辽朝的权力中枢。包括有枢密院、宰相府、宣徽院、夷离毕院等一系列机构，类似于中原王朝的三省六部。具

体说来，其中：

北、南枢密院，又称为北衙、南衙，属于辽朝的最高行政机关，分别负责军政民政。北枢密院负责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大凡契丹兵马军事都属于它所掌管的范围；南枢密院负责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大凡契丹吏民之事都属于它所掌管的范围。所以辽朝有北衙不理民，而南衙不主兵的说法。北、南枢密使以下，各自都设有枢密副使、正副知枢密使事、同知枢密使事等十六个等级和分工不同的职官。此外，北、南枢密院还附设有一种特别机构，即北、南枢密院中丞司，各自由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司事，总知中丞司事等职官组成，负责点检督察百官。

北、南宰相府，属于辅臣，协助皇帝处理一切军国大事。各自设置有左、右宰相，总知军国事，知国事等。从阿保机即汗位的第四年（910）让妻兄萧敌鲁担任北府宰相开始，以后世代由国舅（后族）五帐选任北府宰相；从神册六年（921）阿保机让弟弟耶律苏担任南府宰相开始，以后由皇族（宗室）四帐世选南府宰相。

北、南大王院，专门负责掌管契丹部族的军队和民政。这是由当时契丹部族中势力最大的迭剌部酋长“夷离堇”演化而来的。天赞元年（922）阿保机因为迭剌部人多势众不宜管理，而分迭剌部为北院和南院；会同元年（938）耶律德光又将北、南二院部的夷离堇提升并改称为“大王”。北、南大王手下，除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等官僚以外，还各自设置有北、南三司：都统军司，由正副统军使和统军都监负责；详稳司，由详稳、都监、大小将军负责；都部署司，由都部署和副部署负责。这三司的职掌范围分别是：北、南院的从军之政令，北、南院部族军马之政令，北、南院部族军民之编置管理。

北、南宣徽院，最初于会同元年（938）由辽太宗设置，各自除了正、副宣徽使，还设置有知宣徽事和同知宣徽事等。北、

南宣徽使分别负责北院、南院的御前侍应之事。

大于越府，只设大于越一人，属于尊官，类似于中原汉族王朝的三公，没有具体的职掌，但是其地位显赫，班列于百官之上。大于越坐而议论，军国大事无所不及，除有非常之大功德者不得受此殊荣。首任于越，是阿保机的叔父释鲁，后来由阿保机接任。整个辽朝历史上，担任了这个尊贵职位的以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仁先三人最为著名，称为“三于越”。

大惕隐司，负责皇族的政教风化，禁止所谓不孝不义等现象，以维护等级制度和贵族利益。最早是辽太祖阿保机即位之初开始设置惕隐一职，后来的大惕隐司由惕隐、知惕隐司事、惕隐司事等官僚组成，其中长官惕隐又称为“梯里已”。

夷离毕院，是负责刑狱的司法机构。长官夷离毕以下，设有左、右夷离毕，知左、右夷离毕事，敞史、底掌狱等官吏。

大林牙院，是文秘机构，负责记录和起草文件。长官北面林牙以下，还设有北面林牙承旨、左右林牙等。

敌烈麻都司，是负责礼仪的机构。长官敌烈麻都以下，设有总知朝廷礼仪、总礼仪事等职官。类似于中原汉族王朝的礼部。

文班司、阿札割只等也属于北面朝官，这两个机构所执掌的具体事宜，后来人已无从可知了。其中，文班司，在长官文班太保以下，还设有文班林牙等职官。阿札割只，是遥辇氏时代的旧职，后来被并人了枢密院。

北面御帐官，包括侍卫司、北面护卫府、奉宸司、三班院、宿卫司、宿直司、硬寨司等。契丹人在没有城郭、沟池、宫室等防御设施的时候，以毡车为营，以硬寨为宫，因此为了维护首领及其营寨的安全，就产生了御帐制度。建国以后沿袭下来，仍然设置御帐之官，出身于贵戚者为侍卫，著帐为近侍，北、南部族为护卫；以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番宿（轮班夜守）为宿值；奉宸司负责皇帝的日常供奉，三班司作为皇帝朝会时的仪

仗和警戒，硬寨司从事早晚禁卫枪寨、下铺等工作。此外，还有负责皇太子宫帐内事务的皇太子惕隐司。

北面皇族帐官，包括大内惕隐司、大横帐常衮司、孟仲季父族帐常衮司、四帐都详稳司、舍利司、亲王国、大东丹国中台省、王子院、附马都尉府等机构。辽朝的皇族，有二院皇族和四帐皇族之别。所谓二院皇族，包括肃祖耨里思的长子洽昚一房的后裔组成的五院司，以及肃祖的叔子葛剌、季子洽礼和懿祖萨剌德的仲子帖剌、季子褒古直等四房的后裔组成的六院司。所谓四帐皇族，就是玄祖匀德实（辽太祖阿保机的祖父）的后裔，包括孟父房即岩木（阿保机的伯父）的后裔，仲父房即释鲁（阿保机的叔父）的后裔，季父房即撒剌的（阿保机的父亲）的后裔——因为阿保机称帝而有皇室，所以季父房其实是阿保机的弟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和苏及其后裔。阿保机的后裔称为横帐，也就是皇室。这样，皇室和皇室的嫡系总共是一帐三房，被合称为“四帐皇族”。皇族帐官，就是专门为负责四帐皇族和二院皇族的事务而设立的。

大内惕隐司，负责皇族四帐的政教。大内惕隐以下，还设知大内惕隐事、大内惕隐都监等。

大横帐常衮司，专门负责太祖皇帝阿保机的后裔的事务。横帐常衮（或称横帐敞稳）以下，设横帐太师、太保、司空等职。

孟、仲、季父族帐常衮司，分别负责岩木房族、释鲁房族和第三房族（阿保机诸弟及其后裔）的事务。

四帐都详稳司，是负责四帐兵马的机构，总管分设于横帐、孟父帐、仲父帐、季父帐的四个详稳司。都详稳以下，还有都监、大小将军等职。

舍利司，是负责皇族军政的机构。依次设有舍利详稳、都监、大小将军等职。

此外，还有亲王国、大东丹国中台省、王子院、附马都尉府

等，也属于皇族帐官。

北面诸帐官，包括遥辇九帐大常衮司、大国舅司、渤海帐司、奚王府、乙室王府等。北面诸帐官的设置，很能体现辽太祖等人的政治权术及其特点。阿保机取代遥辇氏以后，为了安抚和拉拢遥辇氏，宣布自己是继承遥辇氏九帐的第十帐，尊洼可汗、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一作嘲古可汗)、耶澜可汗、巴剌可汗、痕德可汗等遥辇氏九世可汗为前九帐。合并奚族以后，因原来同出于鲜卑，允许保留其原有部族组织而未加重新改编，并设奚王府统辖奚族六部，成为辽朝“四大部族”之一。而提高乙室部的地位，也作为“四大部族”之一，进面设立乙室王府，以其与奚王府并列，是为了达到一种有利于统治的相对平衡。灭渤海国以后，阿保机采纳皇太子耶律倍的建议，不括民户，也基本上保留其原来的族帐而未加改编。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统治基础，阿保机还特别重视充分利用具有传统威力的后族（国舅)，来协调比较难处理的皇族内部事务。

遥辇氏九帐大常衮司，负责遥辇氏九世可汗的宫帐事务。除了设有大常衮等一系列职官，还下设有遥辇帐节度使司、遥辇纠详稳司等。

大国舅司，负责国舅诸帐之事。耶律氏与审密氏一直为固定的通婚集团，审密氏包括乙室已和拔里二族。自从辽太祖阿保机娶了述律氏，外戚就包括乙室已、拔里、述律三族。辽太宗于天显十年（935）合皇太后述律氏二帐为国舅司。大同元年（947)，辽太宗从汴京准备返辽时，让一外戚将领留守担任汴州节度使，并按照中原汉族姓氏的习惯赐其姓萧（名翰)，从此，外戚国舅三族就都以萧为姓。辽圣宗于开泰三年（1014）又合并乙室已、拔里二司为一。大国舅司下设乙室已国舅太翁帐常衮、乙室已国舅小翁帐常衮，和拔里国舅大父帐常衮、拔里国舅少父帐常衮，

乙室已太翁帐详稳司、乙室已小翁帐详稳司，和拔里大父帐详稳司、拔里小父帐详稳司，以及国舅夷离毕司。辽世宗于天禄元年(947) 以其母后氏族剌只撒古鲁为国舅帐，并设国舅别部详稳司。

渤海帐司，是掌管原渤海王族事务的机构。辽太祖灭渤海以后，将大諲譔为首的渤海王室及贵族迁往契丹腹地，给予优厚待遇，并设置专门机构以掌管其事，仅次于遥辇氏九帐。但是，关于渤海帐司的具体建制情况，由于文献缺乏，后人无法详知。

奚王府和乙室王府，虽被列于北面诸帐官之后，实际还是获得特殊政治地位的两个势力较大的部族管理机构。

北面宫官，包括诸行宫都部署院、契丹行宫都部署司、行宫诸部署司、十二宫及文忠王府等。辽朝实行宫卫制度，由诸宫(契丹语称为斡鲁朵）分辖部族和蕃户，在诸宫设立宫官负责具体事宜。

诸行宫都部署院，总管契丹、汉人诸行宫之事，下设诸行宫都部署、副部署，知行宫诸部署司事、诸行宫判官等。

契丹行宫都部署司，总管行在行军诸斡鲁朵之政令。设有契丹行宫都部署、副部署，知契丹行宫部署事，契丹行宫判官等。

行宫诸部署司，掌管行在诸宫政令的机构。设置有行宫都部署、副部署，行宫部署判官。

十二宫，就是辽朝九世皇宫以及应天皇太后的永宁宫、承天皇太后崇德宫、孝文皇太弟的敦睦宫。除了诸宫设有正、副宫使等官员，分别还下设有某宫都部署司、某宫提辖司、某宫马群司等。

文忠王府，汉人韩德让[①] 在辽圣宗时辅政，官至大丞相，封晋国王，赐契丹姓名为耶律隆运并隶属横帐季父房，死后谥文

① 韩德让的祖父是韩知古，父亲是韩匡嗣，都为辽朝重臣。

忠王，拟帝后诸宫例建文忠王府。

北面著帐官，包括著帐郎君院、祗候郎君班详稳司、左右祗候郎君班详稳司、笔砚局、车舆局、御盏局、本班局、皇太后祗应司局、皇太妃祗应司局、皇后祗应司、近位祗应司、亲王祗应司、著帐户司等。这是北面官之中比较特别的一个系列机构。

遥辇氏联盟晚期，痕德堇可汗曾经因为蒲古只等三族杀害了于越释鲁，而将蒲古只三族的家属籍没人瓦里，即剥夺人身自由罚作宫室奴隶。辽太祖去世，应天皇太后述律月理朵总管国政，将这些人予以解放和安抚，并让负责宫室奴婢机构，男的为著帐郎君、女的为著帐娘子。著帐官隶属于皇太后、皇太妃帐。以后，内族、外戚以及世官之家犯罪者，一般都被处以籍没之法，使著帐官手下的奴婢户越来越多。其中，著帐户司负责从诸宫所属宫户中划分出来的一些人，以及各种犯罪者，为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位、亲王等服各种杂役。

以上都属于辽代中央的北面官系列。

与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的北面官相对，辽朝还有负责汉人州县、租赋、军马等事的一系列官僚机构。辽太宗在从石敬瑭手中取得燕云十六州以后，让这些地方仍然保持原有组织，并依照汉族官制在中央开始设置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等，一方面是扩大统治范围，一方面是招徕中原汉族士人来为契丹服务。因为这些衙署设在御帐之南，所以称为“南面官”。南面官又被称为“汉官”，官吏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贵族担任汉官的，会同三年（940）十二月辽太宗颁令允许契丹人任汉官者依汉族风俗，可以穿汉族服装，并与汉族人通婚。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与南班汉官穿汉族服装，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穿契丹服装。

辽朝中央所设南面官，主要包括南面朝官和南面宫官。

南面朝官，包括三师府、三公府、汉人枢密院等。

三师府，设有太师、太傅、太保。会同元年（938）辽太宗始设太傅、太保，分别以后晋降臣冯道、刘昫为首任。辽穆宗应历年间才有了太师，由唐骨德担任。

三公府，设太尉、司徒、司空。

汉人枢密院，负责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辽太祖当初设“汉人司”，由韩知古负责其事。辽太宗入汴，沿袭后晋开始设置枢密院，原来的汉人司就变成了汉人枢密院。

中书省，辽太祖曾经设置政事令一职，让韩延徽担任。辽世宗天禄四年（950），初建政事省。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为中书省。中书令以下，设有大丞相、左右丞相、知中书省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中书舍人院、右谏院等。

门下省，下设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给事中、门下侍郎和起居舍人院、左谏院、通事舍人院等。

尚书省，在尚书省以下设有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赋税及其他一般财政。

御史台，太宗会同元年（938）开始设置，设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职，负责监察官吏。

翰林院，与北面官中的大林牙对应，也是负责皇帝文翰的机构。设翰林都林牙、南面林牙、翰林学士、翰林祭酒等职。翰林院以下还逐渐设置并统属有翰林画院、翰林医官、国史院等机构。其中，国史院下设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

此外，诸殿、阁、文馆学士、宣徽院、内侍省、客省、四方馆等，也属于南面朝官。南面朝官的许多机构和官职，往往并不常设，也没有多少实际权力。

南面宫官，主要包括汉人行宫都部署院、十二宫南面行宫都

部署司。南面宫官出现比较晚，是辽圣宗时设置的。从此，汉官参与辽朝行政更为具体了一些。

汉人行宫都部署院，又称南面行宫都部署司。设有汉人行宫都部署、副部署，知南面诸行宫副部署，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事，同签部署司事，都部署判官。

十二宫南面行宫都部署司，设有某宫汉人行宫都部署、某宫南面副都部署、某宫同知汉人都部署。

辽朝的地方行政体制，也是按不同的经济区域分为两个系统即部族制和州县制。在契丹族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在汉人和渤海人聚居的农耕区，实行州县制。所谓的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的说法就是据此而言的。

辽朝的疆域曾经一度相当广大，东至于海，西至于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从辽太祖、辽太宗初步设立，到辽圣宗时代，地方行政区划及其官僚机构建置渐趋完备，大致包括五京官以及州、县和部族等。

皇都加上陪都，辽朝共有五京。上京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南京驻幽州析津府（今北京），东京驻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中京驻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城），西京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其中，上京作为皇都，既有组成中央政府的朝官，也有属于上京府的京官。其余四京，所辖的行政机构及其官僚的设置各自有一些不同之处，大体上西京多边防官，南京和中京多财赋官。

三京宰相府，是辽圣宗统和元年（983）以后，在东京、中京、南京分别设立的。三京宰相府以下，都设有左右相和左右平章事。

五京诸使司，包括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也称燕京转运使司）、西京计司，由朝廷派遣官吏负责各地的财政收入。此外，在燕云等

地区还分设有一系列财赋官，负责征收和运输赋税，其中诸钱帛司包括长春路钱司、辽西路钱帛司、平州路钱帛司等，分别由设在各地的钱帛都点检负责；诸转运司包括山西路都转运使司、奉圣州转运使司、蔚州转运使司、应州转运使司、朔州转运使司、保州转运使司、西山转运使司等，由各地的正、副转运使负责。

并且先后设置五京留守司、五京都总管府、五京都虞候司、五京敬巡院、五京处置使司、五京学等机构，分别负责五京行政、治安和教育等事宜。其中五京留守司兼府尹，分设有某京留守行某府尹事、某京副留守、知某京留守事、同知某京留守事等官职。

以上三京宰相府、五京诸使司、五京留守司兼府尹等，统称为“五京官”或称为“南面京官”。以五京为中心，辽朝将全国分成五大行政区域，称为“五道”，即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所有的州、县、军、城，都分属于五道，其官僚统称为“南面方州官”。

州县制，是在定居农业区实行的。州、县两级是辽朝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还有，在不足以设州、或者不足以设县，但是又不能没有行政设施的一些地方，设有军或者城堡。此外，在畿甸等要地也设府。辽朝在任命地方最高长官时，一般的都冠以某地方节度使称号，或者根据不同的情况冠以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具体在各州设有州刺史、同知州事、州录事参军等官吏，各县设有县令、县丞、县主簿、县尉等官吏。

辽朝除了在原渤海以及燕云一带设置的刺史州县，还有一种特别的“头下州县”（或称投下州县）。就是宗室、外戚、大臣们自己筑城，利用对外战争中俘掠来的渤海人和汉人，依照中原制度面建立的私属州县。一般只有横帐诸王、国舅、公主等所建州县，朝廷才赐名额予以承认。普通贵族官僚不得建城郭，有建者只属不被认可的私城而已。头下州的节度使由皇帝任命，以下官

吏由头下主人任免。头下州的酒税归于朝廷，需缴纳到上京盐铁司，其余从所有市井商贾征收的赋税归头下州主人。

由部落组织演变发展而来的部族制度，作为契丹族的传统制度，与后来的州县制一直并行。辽太祖阿保机在掌权之初，对契丹本族以及其他被征服的游牧民族进行改编以后，使部族不再是过去时代部落联盟中的那种自治性成员，而成为被确定了活动地域的地方行政组织。辽朝各部族的管理机构，大致是院或府、石烈、弥里等三级。所有部族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并不相等，因此，有四大部族和四十九小部族的分别。

四大部族，就是五院部、六院部以及乙室部和奚六部。天赞元年（922）迭剌部被辽太祖分成五院和六院两部。会同元年（938）辽太宗升五院部和六院部夷离堇为大王，隶属于北府宰相。从此，五院部在朝廷称为北大王院，简称北院；六院部在朝廷称为南大王院，简称南院。乙室部，在朝廷称为乙室王府。奚六部在朝廷称为奚王府。四大部族的最高官僚机构，分别是大王院或王府，各自设有某部大王，某部左右宰相，某部太师、太保、太尉、司徒（惕隐）。院、府下辖机构，首先是由某部正、副节度使，以及某部节度判官等职官组成的某部节度使司，和由某部族详稳、都监、大小将军组成的某部族详稳司；其次，是若干相当于县的石烈，和相当于乡的弥里。石烈，设置有某石烈夷离堇、某石烈麻普等官吏。弥里，设有辛衮，作为最基层的管理者。

四十九小部族，包括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吕不部、突举部、涅剌部、遥里部、伯德部、堕瑰部、楚里部、奥里部、南克部、北克部、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品达鲁虢部、乌古涅剌部、图鲁部、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特里特勉部、稍瓦部、曷术部、隗衍突厥部、奥衍女直部、迭鲁敌烈部等。小部族的各级

管理机构，包括某部族司徒府、某部族节度使司、某部族详稳司，以及某石烈、某弥里等。其中，各部族司徒府，都分别下设有某部族司徒、某部族司空等职官；各石烈设有令隐、麻普、牙书等官吏；各弥里同样是设一名辛衮作为负责人。

不论大部族的各级官员，还是小部族的各级官员，都统称为“北面部族官”。

辽朝建国以后能够不断地对外发动征服战争，甚至先后攻灭后唐、后晋等中原封建王朝，而在北方称雄二百余年，这与其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密切相关。辽朝实行的几乎是全民皆兵的普遍兵役制，境内所有居民大凡是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都一律具有兵籍，隶属于各种军事单位，随时都可能应征去作战。国家有正式军队，贵族有家丁。不仅所用的武器得兵士自备，而且人马的粮草供给也是兵士自己筹备，所以辽朝的兵士所到之处经常进行所谓的“打草谷”，即骑马出去四处搜寻抢掠粮草。一旦决定要发兵作战了，皇帝便率领蕃汉文武臣僚用青牛白马祭祀天地和太阳神，并让驻守在各地的贵族大臣就近祭告太祖及其以下所有皇陵、以及木叶山始祖之神位。各部队接到作战命令以后，先做好充分的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整装以待，兵符一到，便立即出动去集合，由皇帝或元帅调兵遣将，分配具体的作战任务。如果是皇帝亲征，便由一名亲王留守，处理国内军政大事。

辽朝在建国初期，其军事力量主要是由皇帝直接掌握的腹心部和部族以及州县军队两部分组成。自辽太宗以后，各宫帐、部族、京州、属国，都拥有军队。其中，部族虽经过改编后成了地方行政单位组织，但是其作为军事单位组织的机能一直保存，部族军一直是辽朝的重要军事力量。逐步建立、渐趋完备、形成系统以后的辽朝军事力量，主要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部族军、五京乡丁、边境戍兵以及属国军等。

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属于皇帝直接掌握的核心武装力量。

其中御帐亲军，是在辽太祖阿保机所建立的腹心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后来它包括大皮室军和属珊军两部分。士卒都是由各地挑选来的各族精兵组成，这支精锐部队始终是辽朝皇权的重要支柱，和对外征服战争的主力。

宫卫骑军，实际上是辽朝皇室的近卫部队。契丹语称“宫”为“斡鲁朵”，所以宫卫军也就是斡鲁朵军。辽太祖将他所出身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两部，并派皇族大臣去统领，这样就使身边的警卫力量显得有些空虚。于是，一方面为了加强自己的警卫队伍，一方面为了强干弱支，他便从各州县划出一块地方，又从各部族和各州县分出一些户丁，建立起了“斡鲁朵”，即宫卫。宫卫中设有官府，备有兵马，平时担任皇室日常警卫，皇帝出行时作为护从，皇帝死后由生前的宫卫军护从后妃宫帐并为皇帝奉守陵寝。如有战争需要时，宫卫中的精壮兵丁往往被调遣去参加作战。从此，建立宫卫相沿成为制度，辽朝所有皇帝在登基以后都为自己挑选地方建立宫帐。辽太祖建算斡鲁朵，即弘义宫；辽太宗建国阿辇斡鲁朵，即永兴宫；辽世宗建耶鲁盆斡鲁朵，即积庆宫；辽穆宗建夺里本斡鲁朵，即延昌宫；辽景宗建监母斡鲁朵，即彰愍宫；辽圣宗建女古斡鲁朵，即兴圣宫；辽兴宗建窝笃盆斡鲁朵，即延庆宫；辽道宗建阿思斡鲁朵，即太和宫；辽天祚帝建阿鲁盆斡鲁朵，即永昌宫。其间，还有为应天皇太后建立的浦速盆斡鲁朵，即长宁宫；为承天皇后建立的孤稳斡鲁朵，即崇德宫；为辽圣宗的弟弟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建立的赤寔得本斡鲁朵，即敦睦宫；和为汉族出身的大丞相韩德让（契丹名耶律隆运）建立的文忠王府。这就是辽朝历史上所谓的“十二宫一府”。

诸宫的宫户，既有契丹人，称为“正户”；也有契丹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人，称为“蕃汉转户”。宫户，是诸宫经济的来源，设置有州、县或石烈等机构进行行政管理。而宫卫骑军由诸宫提辖司统领。诸宫曾经先后在五京要地以及与中原王朝交接地带的

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河北卢龙）等地设置军事力量进行防卫。弘义宫、长宁宫、永兴宫、积庆宫、延昌宫、彰愍宫、崇德宫、兴圣宫、延庆宫、敦睦宫、文忠王府等十宫一府，先后都在南京设有提辖司。弘义宫、长宁宫、永兴宫、积庆宫、彰愍宫、崇德宫、延庆宫、文兴宫、积庆宫、文忠王府等七宫一府，在西京曾先后设置提辖司。弘义宫、长宁宫、永兴宫、积庆宫、彰愍宫、崇德宫、兴圣宫、延庆宫、文忠王府等八宫一府，曾经在奉圣州（今河北涿鹿）设置有提辖司。弘义宫、永宁宫、永兴宫、积庆宫、延昌宫、彰愍宫、兴圣宫、延庆宫、文忠王府等八宫一府，曾经在平州（今河北卢龙）设置提辖司。延昌宫、文忠王府，曾在中京设置提辖司。文忠王府于上京曾设置提辖司。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不要征调州县和部族的兵力，只下令将诸宫提辖司在五京二州的宫卫军集合起来，就差不多是十万左右的骑兵，足以进行平常的战争了。

大首领部族军，本来属于辽朝亲王大臣自建的私人武装，但是国家遇有战事时，他们的大部分应立即被交付朝廷，听从皇帝的调遣去出征作战。

众部族军，也就是辽朝所有的部族军。包括契丹诸部族以及奚族和其他被征服并改编的新旧部族的军队，分属于南、北宰相府，平常在各地驻守，战时被征调与其他队伍配合作战，是仅次于宫卫骑军的辽朝又一重要军事力量。

五京乡丁，就是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的民丁。因为契丹族的民户多隶属于诸宫帐和诸部族，所以组成五京乡丁的主要是蕃户转户和汉族户的兵丁。其中，上京、中京、东京的民丁，以蕃汉转户出身的为多；南京、西京的民丁，以汉族户出身的为多。遇有战事，乡丁随军伐园林、填道路等。

属国军，是被辽朝所征服的附庸诸族的军队。先后被辽朝所征服而依附的境外部族大约有五十九个之多，这些所谓的属国不

定期地向辽朝贡。辽朝遇有战争时，要么专门下诏，要么委托交往的使者，向附庸部族表示要征用他们的兵力。如果不同意派兵从征者，往往就要受到辽的讨伐。至于每次派遣从征的兵力的多少，是随各附庸部族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行事，一般并没有定额。

边境戍兵，是辽朝在沿边境地区设置的守军。

这样人数众多、种类较为繁杂的军队，没有一套相应的管理、训练和指挥机构是不行的。在辽朝中央机构中，北枢密院负责契丹兵马之政，汉人枢密院名义上也是用以负责汉人兵马之政，但是，全国实际的军事权力，掌握在由太子或者亲王担任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手中。辽朝由北面军官、北面边防官、北面行军官等组成一系列的各级军事统领机构，依次为：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置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和副元帅。由皇太子或者亲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总管全国军事。

大元帅府，设大元帅、副元帅，由大臣负责。

都元帅府，设兵马都元帅、副元帅，同知元帅府事等，由大将负责。

大详稳司，设大详稳、都监、大小将军、军校、队帅等，并下辖有左右北南皮室详稳司、属珊军详稳司、舍利军详稳司、北南王府舍利军详稳司、禁军详稳司等系列详稳司。

诸路兵马统署司，设诸路兵马都统署、诸路兵马副统署。

边防官，主要是为防范周边强邻而设置的。有的是专门设立的，也有的由另外一些军事机构兼领。其中，诸军都虞候司、奚王府、五院司、六院司大惕隐司、大国舅司、大常衮司等属十上京路诸司，都有管制诸奚族的任务。东京兵马都部署司，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东京都统军使司，东京都洋稳司等辽阳路诸司，有扼制高丽的边防任务。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咸州兵马详稳司、东北路都统军使等长春

路诸司，负责控制东北诸属国。南京都元帅府，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司等南京诸司，都隶属于元帅府，担任防御宋朝的任务。西南面安抚使司，西南面招讨司等西京诸司，负责控制西夏。西北路招讨使司，西北路总领司，领西北路十二班军使司，西北路兵马都部署司，西北路阻卜都部署司，西北路统军司，西北部镇抚司等西北路诸司，负责控制西北部诸属国。

此外，辽朝在行军作战时，还设置行枢密院、行军都统所、行军都押司、行军都部署司等。

辽朝的政治生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实行“四时捺钵”。这是一种皇帝分春夏秋冬四季出巡行营的制度。契丹人习惯上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的经济生活，这种习俗在辽朝建国以后不仅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对其政治生活也深有影响，辽朝皇帝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秋冬之季为了避寒，春夏之季为了避暑，随气候变化而迁徙，逐水草山林而渔猎，一年之内皇帝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春水秋山冬暖夏凉的行营之地，一边渔猎，一边处理政事。年年如此，成了一种制度。

春捺钵，是每年正月上旬从皇都上京出发，到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的鸭子河泺（今吉林嫩江上游月亮泡）一带，去凿冰捕鱼，纵鹰捕鹅雁，举行头鹅宴或头鱼宴，并不时出外弋猎。这样，一直在此度过六十天左右的时间，春末才返回。

夏捺钵，无定所。但多在庆州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庙汗山）地区的吐儿山和子河一带，一边避暑纳凉，一边与北、南臣僚讨论国事，空闲时间去游猎。一般是四月中旬准备前往，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到达，七月中旬离开。

秋捺钵，是七月中旬从纳凉之地起帐以后，来到永州（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西南）西北的伏虎林和泺水一带，捕虎射鹿。

冬捺钵，是在永州（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西南）东

南的广平淀（又名白马淀）。这里是一块四周有沙碛围绕，中间平坦暖和的小盆地，皇帝牙帐多在这里越冬。在冬捺钵期间，除了召集北、南大臣会议商讨国事，不时还出去比赛狩猎训练武功，同时曾在这里接受南宋和其他附庸部族的贡礼。

辽朝皇帝四季捺钵的时候，契丹大小内外臣僚、仆役以及汉人宣徽院所属诸司都要随从；还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只要宰相一人，枢密院都、副承旨二人，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各选择一人，随护出行。每年正月上旬皇帝的车驾及其随从启程前往行营时，宰相以下的其他官员返回中京留守，处理汉人一切事务，一般的事情由留守官员直接处理，重大事项向出行的皇帝汇报，请求指示。其中，每年的五月和十月，分别在纳凉行营和坐冬行营召集北、南所有臣僚进行会议，随时选官任职并处理各种重要政事。

辽朝在所辖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区域内，对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分别施行不同的政策，因俗而治，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各得其宜，这无疑是它能够建立和不断地利用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二百余年的较长时期的统治，并在五代和两宋时期称雄北方的重要原因。

（雷紫翰）

参考资料：

《契丹国志》

《辽史》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武溪集·契丹官仪》

《全辽文》

横渡之约

契丹的军队攻灭了后晋，辽太宗耶律德光作为胜利者，随即于大同元年（947）正月趾高气扬地进驻了后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入汴以后，辽太宗的雄心更加勃发，改元“大同”，建国号“大辽”，实行大赦。同时，一边封官赏功，升降杀罚，一边掠财聚宝。结果，他就难免地遭到了不堪困扰的中原民众的强烈反抗。不久，在发出了原来还不知道中原人如此难以统治的感慨之余，他不得不于这一年（947）的四月份，从汴撤离，委托外戚萧翰留守，自己则带着难以适应中原水土气候的左右人马，运输大批从中原朝野掠夺到的各种财物，往北回返辽地。途中还盘算着休整一年以后还准备再来征伐河东，谁知却患上了寒热病，不几日就在栾城（今河北栾县）去世了。于是，皇位继承问题，难免地引发了契丹皇室内部的又一场非常激烈的争斗。

当时，具有争夺皇位资格的，分别是耶律李胡、耶律兀欲和耶律璟三人。其中，辽太宗的长子寿安王耶律璟相对而言年纪尚小，所以斗争实际上主要在前两人之间进行。

耶律李胡（一作耶律鲁呼），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弟弟。因为是小儿子，其母述律太后十分溺爱。他从小强悍多力，但是为人却性格残酷，动不动就会把稍微惹他不高兴的人要么黥面，要么投入水火之中。耶律阿保机竟引以为自豪，称之为“吾家铁儿”。耶律李胡在早年因从征渤海有功，受封为“自在太子”，让他负责

向代北一带扩张地域。辽太宗天显五年（930）他出师云中（今山西大同），攻下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不久，被册封为“寿昌皇太弟”，受赐得领原来所俘渤海民户，同时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很明显，这就为耶律李胡奠定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

耶律兀欲，汉名阮，是东丹王耶律倍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于天显五年（930）十一月率部出走至后唐，但是，耶律兀欲却仍然留在契丹。他内宽外严，善骑射，乐施与，在当时的契丹皇室成员中是一个比较受人欢迎的人。会同九年（946），他随同辽太宗南下，参与了征服后晋的战争。进人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在大同元年（947）二月，被册封为“永康王”。同年四月中旬，辽太宗在回师途中病死于栾城（今河北栾县），便由耶律兀欲率部护送灵柩前往上京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由于辽太宗死得很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诏，一时之间没有了元帅，正在征途中的契丹军队人困马乏，不知所为。同时，刚刚征服不久的南方中原州郡，在这前后纷纷乘机叛辽而归于北汉。护送灵柩的队伍到了镇阳（今河北栾城北）以后，南院大王耶律吼与北院大王耶律洼秘密商议，认为皇位不可有一日空缺，如果请示了述律太后，那么这皇位就一定非耶律李胡莫属，可是耶律李胡平素表现过于暴戾残忍，他们便准备拥立永康王耶律兀欲继承皇帝位。但是，因为耶律李胡和寿安王耶律璟都具有继位的资格，并且都在朝廷有雄厚的实力，所以，耶律兀欲有些犹豫不决，缺乏足够的自信心。

这时候，恰好轮到与他患难相交的知己耶律安抟负责宿卫，耶律兀欲便找到耶律安抟商量对策。耶律安抟是耶律迭里的儿子，他的父亲曾在阿保机去世后公开表示支持东丹王耶律倍继位，结果，被一心要扶持耶律德光登基的述律太后所杀。因此，耶律安抟与耶律兀欲俩人自幼就交往密切。眼下，耶律兀欲受到诸将拥戴，耶律安抟自然表示极力支持，向耶律兀欲分析指出：

一方面你是太祖天皇帝的嫡长孙、人皇王（耶律倍）的嫡长子；一方面虽然太宗的嫡长子耶律璟等也有资格继位，但是你向来聪慧宽恕，至今已是众望所归。机不可失，要当机立断，否则，将后悔莫及！同时，耶律安抟立即去找南、北院二位大王，进一步敦促尽快成就此事，结果双方意向一拍即合，形成了决议。接着，便由南院大王耶律吼出面召集所有将领宣布：由于太宗不幸去世，致使神器无主，而永康王是原皇太子、人皇王的嫡长子，今日我们决定拥立永康王继位。如果你们有不服从者，将以军法论处！因为辽太祖去世后，述律太后就曾经借故杀死了部族酋长及将领数十人，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的将领们一听这话，立即争先恐后地表示欣然从命。这样，永康王耶律兀欲便在辽太宗的灵柩前宣誓即位，这就是辽世宗。

耶律兀欲即位以后，为了试探述律太后和留守上京的耶律李胡的反映，派天德、朔古、解里等率领一行人护送太宗灵柩在自己前面先赴上京临潢府。述律太后得到耶律兀欲已在镇阳（今河北栾城北）自行即位的消息，怒不可遏，嫌耶律兀欲的父亲东丹王曾经叛辽投奔后唐，她坚决表示逆人之子不当立，立即派遣耶律李胡率兵阻止，不让耶律兀欲北上。六月底，耶律兀欲一行进驻南京（今北京），五院夷离堇耶律安端、惕隐耶律刘哥等主动请求率兵先行开道，在泰得泉与耶律李胡的军队交锋，经过几个回合的激战，打败了李胡。耶律兀欲便继续北上，准备去皇都上京登基。闰七月，述律太后与耶律李胡带着重新整顿以后的兵马，赶到潢河（今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的重要关口横渡，将耶律兀欲阻挡在了潢河对岸。

耶律李胡在泰得泉兵败而回，恼怒不已便把耶律兀欲的家属及其臣僚作为人质全部抓了起来。这次将他们随军带到了横渡，并对看守的人说："要是我打不过耶律兀欲，就先杀掉这些人！"当时，人们都又惊慌又惋惜，认为一旦打起来，那可真是父子兄

弟互相残害啊!

双方隔河对阵，相持了好几天以后，在辽太宗时就曾负责过皇族政教、并且一直在皇室颇有影响力的孟父房贵族耶律屋质（或作耶律屋只、耶律乌哲）出来调解。耶律屋质首先向述律后提出建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和为贵。如果愿和，则百事可成；如果要战，那你们就尽管去相互残杀好了。可是一旦开战，整个国家必将遭祸不浅，因此，他还是劝述律太后承认耶律兀欲即位，说耶律李胡和耶律兀欲都是太祖的子孙，又不是把神器（即皇位）交给了别人，有什么不可以的?

耶律李胡在一边听了屋质这番话怒气冲天地说："我李胡在，怎能让兀欲即位?!"屋质也毫不客气地回答："因为你性格酷暴，至今已尽失人心，别人有什么办法!"述律太后看到不仅随太宗出征在外的主要将领及其人马都已被兀欲所控制，而且留守的这些朝臣也大都不愿支持李胡，只好无可奈何地对李胡说："过去我和太祖一直把你太溺爱了，正如谚语所说：'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现在，我并不是不想让你继位，而是我儿你不能够胜任呵。"这样，耶律屋质被允许去和耶律兀欲谈判。不久，被屋质说服的耶律兀欲带着宣徽使耶律海思，前来拜见了述律太后。虽然双方在见面之初怨言相加，似乎没有一点和解的意思，但是，处事老练的屋质一面巧妙地提起当年太祖阿保机去世后原来早已确立的太子人皇王受到排挤，而让受偏爱的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继位的这一旧事，使述律太后陷人被动；一面力劝耶律兀欲尽量克制不要激动，不要强词夺理。于是当面为双方调解，让他们各自先抒发出心中的怨恚，然后好捐弃前嫌。经过耶律屋质的反复斡旋，双方终于在横渡达成了和解协议，述律太后被迫承认由耶律兀欲称帝继位，各自收兵从横渡出发一起前往都城上京。

横渡和议之后，过了不久，耶律兀欲得知不甘心失败的述律

太后和李胡又阴谋准备夺权。为了消除隐患，他下令将述律太后和耶律李胡从上京迁出，送到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软禁了起来。同时，一面进一步清除述律太后的势力，处死了参与这次阴谋的司徒划设和楚补里等人；一面加紧安置和重用拥护自己的亲信功臣，以增强权力基础。八月，尊其生母萧氏为皇太后，以太后族刺只撒古鲁为国舅帐，并设置详稳来为其管理事务。将述律太后永宁宫的宫户，分别赏赐给北院大王耶律洼、南院大王耶律吼以及耶律安抟等拥戴他的主要功臣。从此，把耶律安抟视为心腹，让总领宿卫，并进而以安抟为首任北院枢密使，宠信无比，遇事都和安抟商量后再作出决定。另外，还把述律太后时无缘无故被罚作奴隶的铁剌的子孙从瓦里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原来的地位。九月，耶律兀欲先在怀陵为太宗皇帝举行安葬仪式；然后，再为自己举行柴册礼，作为登基大典，让群臣上尊号为“天授皇帝”。接着，改太宗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947），追谥其父东丹王耶律倍为“让国皇帝”，并且进一步给拥戴他的人封官授爵，让耶律安端主持东丹国事，封为“明王”，安端的儿子察割因为当初劝其两边摇摆的父亲支持了永康王，而被封为泰宁王，还让耶律刘哥任惕隐，汉人高勋为南院枢密使。这样，就组成了属于自己的统治中枢。

耶律兀欲终于争得了皇位，并使自己的权力逐步得到加强，这等于是曾经大力主张汉化的东丹王耶律倍一系取得了胜利。但是，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十分错综复杂的。耶律阿保机去世后，述律后之所以能够立即一手控制局面，操纵所有军政大权，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扶植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她借助了其开国创业的夫君的赫赫余威；同时，由于阿保机建国过程中她几乎始终随从身边出谋献策，在辽朝的第一代大臣中很有势力。相反，当时的皇太子耶律倍则喜爱读书不擅长射猎，手中没有掌握到兵权，尤其是主张大踏步地汉化，

为契丹贵族阶层难以完全接受。然而，述律后在掌握实权并扶持耶律德光上台的过程中，有些过于为所欲为，滥用杀罚。比如在阿保机去世之初，她因为自己变成了寡妇，竟然就不愿看到别人的妻子恩恩爱爱地拥有丈夫，于是杀害了左右百余名将领，还说让这些人到地下去代她拜见和侍从先帝。她还曾经把耶律铁剌的子孙们无故罚入瓦里，当作奴隶。再加上为了排挤不合她的意愿的皇太子好让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借口“党附东丹王”杀害了耶律迭里等。其实，早在阿保机晚年时，她就曾派人将去东丹赴任的耶律六哥之父寅底石杀害于途中。这样，她在契丹贵族之间结怨越来越多，只是好多人慑于威势按捺着不满情绪而已。因此，这次辽太宗一去世，有些大臣就背着她在外地拥立耶律倍的长子耶律兀欲即位，而从征在外和留守京师的各派贵族大都倾向于耶律兀欲，使她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可是，辽世宗耶律兀欲上台以后，契丹贵族之间的种种矛盾并没有轻易得到消除，尤其是主张尽量引进和吸收汉族文化与主张仍然保持以契丹传统为主的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起来。耶律兀欲倾慕中原汉族风俗制度，有不少后晋降臣如高勋等受到了他的重用，而契丹本族的酋长们却不时受到他的轻慢不礼，因此在契丹贵族中就不免有人产生了不满情绪，以致部族叛乱此伏彼起，不得不连年兴兵征讨。

天禄二年（948）正月，耶律德光的次子天德、述律太后的外甥萧翰、阿保机四弟的两个儿子刘哥和盆都等人谋反。发觉以后，辽世宗让耶律屋质负责审讯，最后以耶律天德被杀，萧翰被杖，耶律刘哥被流放边地，耶律盆都被罚出使遥远的辖戛斯国，而宣告了第一次贵族叛乱的被平定。同年四月，南唐朝廷派人奉蜡丸书来，辽世宗正面对着内乱频仍的动荡局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时还无暇南顾。

天禄三年（949）正月，萧翰又与妻子阿不里公主准备联合

主持东丹国事的明王耶律安端一起谋叛。阿不里公主，是辽世宗的妹妹，天禄元年（947）在镇阳嫁给了萧翰。萧翰出身后族，辽太宗南征灭后晋，然后于大同元年（947）四月回北返时，改后晋都城所在地为宣武军，以萧翰为宣武节度使镇守。948年正月，参与了耶律天德等人的谋反活动，事发后因为是皇帝的妹夫，只被施以杖刑就释放了，但是，仍然心怀不满。现在，耶律屋质又得到了萧翰和其妻阿不里公主写给明王安端，联络对方起来谋反的信件。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萧翰只好供认不讳。这次，辽世宗下狠心处死了萧翰，并把直接参与了谋反的妹妹阿不里公主也关进了监狱。

第二次叛乱被平定下来以后，辽世宗以为政局已经趋于稳定，便在这年（949）九月，召集群臣商议向南用兵的事。十月，就派兵出击后汉，攻克贝州（今河北清河西）等地，杀死了后汉刺史史万山，初战告捷，俘获甚多。天禄四年（950）十月，辽世宗又亲自挂帅南侵，攻下了安平（今河北安平）、内邱（今河北内邱）等城，也是获胜而还。

天禄五年（951）岁初，后周将领郭威取代后汉而自称为皇帝，建立了后周。同时，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后改称刘旻）也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北汉。六月，由于招架不住后周的进攻，北汉向契丹称臣求援。辽世宗把这当作进一步扩张的机会，一边派燕王耶律牒蜡、南院枢密使高勋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一边准备立即派兵与北汉一起征服后周。可是，在南征这个问题上，诸部落酋长，都不愿支持他。辽世宗便不顾反对，于九月份亲自率兵向南去进攻后周。不久，就进人了归化州（今河北宣化）。正式作战之前，他在详古山的行宫祭祀其父“让国皇帝”，并设酒宴款待左右。不料，群臣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泰宁王耶律察割乘机跑出去煽动辽太宗的长子寿安王耶律璟起来发动政变，遭到拒绝，便又去联合了耶律盆都等人，在这天夜里带兵冲进御

帐，杀死了萧太后和辽世宗。然后，察割迫不及待地宣布由自己称帝，百官之中有不服从者，就将他们的家属捉拿囚禁了起来。

耶律察割是个看风使舵、变化多端的人。几年前（947），耶律李胡与世宗争立时，察割看到世宗上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劝他的父亲安端拥护世宗。因此，世宗登基后，封察割为泰宁王。949年初得知萧翰和阿不里公主准备叛乱时联络过他父亲，便痛哭流涕地去向世宗揭发，结果安端被贬出朝外，而察割却从此被当成了舍父事君的忠臣，仗着世宗的宠信出入禁中，一边不断地向世宗献媚，一边在伺机叛乱夺权。对此，耶律屋质早已察觉，并且多次向世宗提醒，世宗却被察割顺从的假象所蒙蔽，认为这人是保证不会有二心的。可是，辽世宗最终是在耶律察割的刀下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切。

政变发生后，耶律屋质临危压阵，立即派人通知诸王集中起来以应付紧急状态，同时下令要禁卫军等武装力量全力讨伐叛乱者。这时候寿安王耶律璟闻讯后也弃宫帐而来，耶律屋质派其弟耶律冲专门迎接。年仅二十岁的寿安王虽然赶来了，但对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局面，还有些经验不足。耶律屋质在内鼓励犹豫不决的寿安王出马主宰国事，在外调兵遣将很快包围了叛乱者。耶律察割仓皇无措，派人在世宗的灵柩前杀死了皇后，准备交战突围，刚一出阵就被前来平叛的队伍逼着退了回来，眼见大势不妙，便准备再杀掉叛乱之初囚禁起来的诸将家属和部分官员。当时，被囚的群牧都林牙耶律敌猎表示，愿意和寿安王的弟弟罨撒葛一起充当使者，去要求寿安王豁免察割。结果是寿安王利用耶律敌猎去将察割骗出营帐，让世宗的弟弟耶律娄国将其脔杀。其余参与了武装夺权的叛乱头目耶律盆都、耶律牒蜡、耶律郎五等，都一一被诛杀。

平息了察割政变以后，由耶律屋质等大臣拥立，寿安王耶律

璟正式即皇帝位。

（雷紫翰）

参考资料：

《契丹国志》世宗纪等

《辽史》：《世宗纪》、《皇子表》、《耶律李胡传》、《耶律安抟传》、《耶律屋质传》、《耶律吼传》、《耶律洼传》、《耶律察割传》、《耶律刘哥传》、《萧翰传》、《耶律敌猎传》等。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2

《资治通鉴》后汉纪、后周纪。

《辽史纪事本末》卷13、14、15、16、17。

《全辽文》卷1

近侍暴动

天禄五年（951）九月，在南征后周途中，辽世宗耶律兀欲被宠臣耶律察割发动政变后，杀死于详古山（今河北宣化境内）。群龙无首之机，辽太宗的长子寿安王耶律璟被推上了前台，在处事老练的重臣耶律屋质等人协助下很快平定了耶律察割的武装叛乱。紧接着，他就举行了登基仪式，由群臣上尊号为“天顺皇帝”，改元“应历”。这就是辽朝的第四代皇帝穆宗。

辽穆宗耶律璟继位时二十岁，正值青春有为之机，但他作为皇帝却不去关心国事，成天喜好游戏，而且每夜饮酒往往至东方发亮才去睡觉，中午时才能起床，被人们称为“睡王”。他在位的十八年（951—969）时间里，贵族谋反事件空前的频繁，政局一直动荡不安。

应历二年（952）正月，就发生了太尉耶律忽古质叛乱。杀了忽古质后才过了半年，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由于对穆宗的统治不满，便与宣政殿学士李澣联合密谋南逃。李澣是后周太子宾客李涛的弟弟，在先已经通过其兄与后周取得联系。然而，这几个人的南逃密谋很快被发现。七月，政事令耶律娄国又发动政变，由林牙耶律敌猎、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人进行串联，准备事成后让东丹王的次子耶律娄国当皇帝，结果事情不久暴露，所有同谋被抓了起来。八月，辽穆宗判决上两个月发生的密谋南逃和策划政变这两大事件，下令杀死了萧眉古得和耶律娄国，耶律敌猎受凌迟，李澣受杖刑后被释放。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应历三年（953）十月，李胡的儿子耶律宛、郎君嵇干、敌烈等谋反，太平王罨撒葛、林牙华割等人牵连在一起，败露后都被抓获。于下一年（954）正月，处死了嵇干、华割等，把耶律宛和罨撒葛宽大释放。

应历九年（959）十二月，冀王耶律敌烈、前宣徽使耶律海思和萧达干等人又起来夺权。叛乱未遂，耶律海思、萧达干等被在狱中关押而死，只有穆宗的弟弟耶律敌烈被释放。事后，穆宗还大规模祭祀天地祖先，宣告这一次叛乱被平息。同时，召集群臣会议，以加强统治。

事实上，叛乱仍然接连不断地发生。应历十年（960）七月，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人谋反。十月，李胡的儿子耶律喜隐谋反。辽穆宗先将七月叛乱的首领耶律寿远和楚阿不都处以死刑；然后很快释放了耶律喜隐，而将与十月叛乱有关的喜隐之父李胡下狱关押而死。

辽穆宗即位以后，尽力地排斥世宗生前的政治势力，耶律安抟、耶律吼等大臣都因此而不再被重用，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由于他一味以游猎、酗酒为乐，不勤国事，不知下情，又随意杀人，刑法混乱，所以统治阶层内部的重重矛盾不断地暴露出来，在仅仅十年时间里，先后就发生了如上七起较大的贵族叛乱事件。这就足以让他手忙脚乱，可是，他竟一当上皇帝就开始对外用兵，与北汉联合进攻后周。

应历元年（951）十月，派遣萧禹厥带领大量人马与北汉的军队会合，从三面包围并昼夜攻打晋州（今山西临汾）。一直到十二月，晋州没能攻下，后周的援兵已到，辽与北汉的围兵被迫趁着黑夜逃走。

应历二年（952）九月，又派兵进攻冀州（今河北冀县）。由于后周军队的坚决抵抗，未能获胜。十月份，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幽（今北京）等地遭遇洪水侵袭，大量老百

姓失去了生计，后周趁机在边境地区赈济南下的灾民，于是成千上万曾被掳掠到辽的中原人又流入了塞内，使辽在这一带的实力顿时大为减弱。应历三年（953）正月，还派人去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县），同样遭到了失败。

应历四年（954）春，应北汉之约，趁后周太祖郭威去世、世宗柴荣新立之机，派政事令耶律敌禄和节度使杨衮率兵与北汉会师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去攻打潞州（今山西长治）。双方会战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周世宗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很快就打败了指挥混乱的辽与北汉的联合队伍。同年五月，北汉的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二州投降了后周，辽穆宗派南院大王耶律挞烈等前往救援，与后周的军队在忻口（今山西忻县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辽兵擒杀了后周将领史彦超。应历七年（957）十一月，辽派侍中崔勋率兵南下与北汉再度合攻潞州，未能取胜。

应历九年（959）四月，后周反过来派军队由韩通、赵匡胤率领对辽发动大规模进犯。辽穆宗便任命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负责阻击。结果，继宁州刺史王洪进献城投降之后，其他几个地方的辽朝守将也相继投降，益津（今河北霸县北）、瓦桥（今河北雄县旧南关）、淤口（今河北霸县东）三关先后被后周兵占领。五月，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等州又为后周所得。随即，周世宗下令要乘胜收复幽州（今北京）。这时的幽州已是辽朝的南京，辽穆宗便亲自赶来督战。只因周世宗突然得病去世，后周只好收兵。

一次又一次的内乱，一年又一年的对外远征作战，已经让契丹等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痛苦不堪了。然而，辽穆宗还比前几代皇帝更为愚昧和残暴。比如应历七年（957）四月开始，他听信女巫萧古的话，经常用男人的胆来为自己调制延年益寿药。到后来他终于发现上了女巫的当，可是几年时间里已有不少人被他取

胆而致死。尤其是到了应历十年（960）以后，辽穆宗更是喜怒无常，嗜酒如命，而视人如草芥，动不动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滥刑杀人。在皇室中从事各种杂役的奴隶们更是在劫难防，或因召唤近侍时未能及时赶到，或因奏对稍有不如意处，或因奉膳、掌酒者有饮食供奉方面的细小差错，或因掌兽者稍不留意将所看管和饲养的獐鹿、野豕、鹘雉之类的动物和飞禽走失或者伤亡等等，都要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如果有人触犯了他，左右那些无缘无故的人往往也会被杀死。而且刑法相当残酷，除了常用的炮烙、铁梳之刑，刺、斩、击、射、燎、断手足、毁肩股、打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以及活活将人筑封于地下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其中，应历十三年（963）正月，辽穆宗接连好几天昼夜饮酒，醉了以后杀了兽人海里，三月，杀了鹿人弥里吉，并将其枭首示众，以恐吓那些掌鹿者；六月，因为一名近侍不小心将一只獐子弄伤了，就被活活打死。应历十五年（965）二月，有一次因为抓获了一只鸭子，高兴得不得了，就宣布对鹰坊的人不再施用刺面和腰斩之刑；可是，三月里因为一名叫东儿的近侍给他递送匕筋晚了一点时间，就被随手刺杀；不几天，虞人沙剌迭因没有及时寻找到供他射杀的鹅子，就用炮烙、铁梳之刑残杀了这个虞人；十二月，只因为近侍喜哥私自回了一趟家，就杀了喜哥的妻子。应历十六年（966）正月，借故杀了近侍白海及其家仆衫福、押剌葛、枢密使门吏老古、挞马失鲁等。应历十七年（967）四月，先杀了鹰人敌鲁；过了几天举行用箭射柳祈雨的仪式时，又用凉水浇灌群臣；五月，杀鹿人札葛；六月，支解雉人寿哥、念古，并杀鹿人四十四人。每年都有不少人就这样惨死于酷刑之下，而且轻易被杀的人越来越多。仅从以上所举部分事例就足以看出辽穆宗是非常残暴的，真可谓是丧心病狂，杀人如麻。

辽穆宗的赏罚无章，不视朝政，使贵族大臣们十分不满，随

时准备着发动叛乱来取而代之。他的暴虐嗜杀，更使那些左右侍从们每天都心惊肉跳，以致忍无可忍。应历十九年（969）二月，有一次他发怒杀了一名叫未及益剌的前导，并抛尸于野外。这以后的第二天，他又一时兴起带着群臣去怀州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罕山）游猎。怀州，开始是辽太祖阿保机当年攻下扶余城和龙泉府以后利用俘虏筑造的一个营寨；会同年间（938—947）将不少从幽蓟一带俘掠来的人送到这里来作为劳动力，辽太宗去世以后就葬在这附近的山上，称为"怀陵"；辽世宗时才在这里置州。这一带山林茂盛，麋鹿成群，是辽朝皇帝的游猎之地。辽穆宗一行来怀州黑山游猎的当天，就猎获了一只大熊，高兴得狂饮至醉，才驰马返回黑山行宫。醉醺醺的辽穆宗一到行宫就传令要就餐，结果因为奉送不及时，他勃然大怒嚷着要斩杀庖人，使所有掌膳者都感到大祸临头了。这天晚上，近侍小哥、庖人辛古、剑盥人花哥等六人悄悄地随身挟带了刀具，捧着做好了的食物走进御帐，在不防之间杀死了辽穆宗。过去十几年里，他随意地屠杀奴隶，竟然没有想到他也有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奴隶起来推翻的这一天。

（雷紫翰）

参考资料：

《全辽文》卷 1

《辽史》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2

《资治通鉴》后汉纪、后周纪。

《辽史纪事本末》卷 16、18。

《契丹国志·穆宗纪》

景宗中兴

由于辽穆宗耶律璟沉溺于游玩、酗酒，对内赏罚随意，杀人如麻；对外用兵无策，损失惨重，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使辽朝的实力急剧衰弱下来。应历十九年（969）二月，外出游猎期间，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近侍奴隶起来造反，将他杀死于怀州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罕山）的行宫。穆宗被杀以后，世宗的次子耶律贤登基做了辽朝的第五代皇帝，他就是辽景宗。从此起，辽朝的政权就一直由原东丹王耶律倍一系的后裔掌握。

天禄五年（951）九月，泰宁王察割发动政变，正要去南征后周的辽世宗耶律兀欲和皇后在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的详古山行宫被杀。当时，次子耶律贤才四岁，由世宗的御厨刘解里将他裹进毡筒藏到积柴中，才得以幸存下来。辽穆宗上台，把耶律贤收养在永兴宫里。长大以后，他很关心时政，看到穆宗酗酒怠政，不满情绪不断增强，于是秘密团结力量，经常与韩匡嗣、耶律贤适、女里等人聚会，在自己的藩邸中议论和批评朝政。虽然韩匡嗣更能激烈地抨击穆宗的过失，而耶律贤适则每当这时候就起来劝阻诸位要适可而止，但是他们的政见都是一致的。应历十九年（969）二月，得到穆宗被近侍所杀的消息，耶律贤便立即和飞龙使女里、侍中萧思温、南院枢密使高勋等，率领精锐骑兵千余人一夜之间赶来怀州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罕山）行宫，准备平定叛乱。当时，起来造反的近侍在杀害穆宗后早已逃走，耶律贤就在穆宗的灵柩前宣布继承皇位、号称“天赞皇帝”，改

元“保宁”。他一边料理穆宗后事，一边追究宿卫不严的责任，将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和右皮室详稳萧乌里只以失职罪处斩。

辽景宗耶律贤在黑山行宫过了一个月，然后返回上京，开始整顿政治。他首先扶持亲信，任命侍中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南院枢密使高勋兼政事令，封为秦王；以韩匡嗣为上京留守，后改南京留守兼留守枢密使，封为燕王；耶律贤适为检校太保，赐称“推忠协力功臣”，作为自己的心腹。五月，立贵妃、萧思温之女萧燕燕为皇后[1]。十一月，举行了柴册仪式以后，下令升北院大王耶律屋质为于越。同时，还任命和册封了一系列重要官爵，很快组织起了自己的统治核心集团。可是，由于辽景宗在遭遇察割政变时曾经藏身积柴之下，从小时就有风疾，始终难以痊愈，所以，事实上有大部分时间是由皇后萧燕燕代替他处理国事。萧燕燕为人聪慧能干，懂得治国之道，任人不疑，信赏必罚，闻善必从，重用人才，并且比较熟悉军事，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驾驭众臣百官，让他们尽力效命，所以在景宗时期辽朝又出现了中兴的势端。

保宁二年（970）四月，辽景宗专程前往东京（今辽宁辽阳），致奠他的祖父“让国皇帝”和父亲世宗的祀庙。五月，在景宗西巡途中，北院枢密使萧思温被后族萧海只和萧海里所杀。七月，任命心腹右皮室详稳耶律贤适兼任北院枢密使。九月，查获了萧海只和萧海里，并处以死刑。因政事令兼南院枢密使高勋与此事有关，被下狱关押至死。让另一名汉族官僚郭袭接替高勋的职位。第二年（971）七月，又让耶律贤适以北院枢密使兼任

---

① 注释：《契丹国志·后妃传》称：“景宗皇后萧氏，名燕燕，侍中、尚书令萧守兴之女也；或以燕燕为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注引《仁宗实录》说燕燕为北府宰相萧思温女。《东都事略·附录》说辽圣宗母“燕燕姓萧氏，宰相思温之女。”《辽史·后妃列传》说景宗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

西北路招讨使。

保宁四年（972）四月，追封皇后的父亲萧思温为楚国王。保宁五年（973），还追封皇后的祖父胡母里为韩王。同时，赠皇后的伯父胡鲁古兼称政事令、尼古只兼称侍中。保宁八年（976）二月，通知史馆学士在记录或公布皇后之言时同样要称“朕”或“予”，并且，要求把这一条当作史馆的文书定式之一。以此，就可见皇后执掌国政之实。

当年的东丹王耶律倍主张汉化政策，因此始终遭到排挤。可是，后来的辽世宗以及辽景宗和他身后的几代皇帝都出自耶律倍一系，他们的政治倾向也都是主张学习汉族的封建制度。辽景宗时期，开始明显地重用汉人，不少汉族官僚得以担任相当重要的职位，并且有的还进而被封为王。比如，景宗一即位就任命高勋以南院枢密使再兼政事令等，封为秦王。后来，因皇后的父亲萧思温被杀一事牵连，高勋被下狱，但是被任命接替其职位的郭袭同样是汉人。早年帮助辽太祖专门负责汉族事务的韩知古的家族，这时进一步得到重用。景宗即位以前就与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交往甚密，当穆宗在外地被杀辽景宗要赶往黑山行宫平叛并接受权力之时，竟然就让韩匡嗣担任都城上京留守。后来，还不顾由皇室重要成员主持南京的惯例，任命韩匡嗣为南京留守兼摄枢密使，并封为燕王。还有，自辽太宗时就在朝中做事的汉人室昉，到景宗时因为发现这人通晓古今治乱得失之理，被视为“剧才”，从政事舍人很快被任命为南京副留守，并且不断提升，由工部尚书、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直至担任枢密使、北府宰相，并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979—982）初年，还以宰相身份监修辽朝国史。在这些受到重用的汉族官僚的直接影响下，从辽景宗时期开始，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逐步加快。

辽景宗时期对外关系的重心，是取代后周而在中原兴起的北宋王朝。开始，宋太祖赵匡胤乘辽景宗初立无暇他顾之机，出兵

进攻与辽结盟的北汉，结果几次都吃了辽兵的败仗。

保宁六年（974）三月，宋派使者来讲和，辽景宗让涿州（今河北涿县）刺史耶律昌术以侍中身份与宋使谈判达成了和议，从此，双方和平交往了两年多时间。北宋在这期间集中力量消灭了南唐，接着于保宁八年（976）再次向北用兵，辽派出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前去增援北汉，迫使宋兵退回。乾亨元年（979）正月，派挞马为特使到北宋去问进攻北汉的原因，双方未能谈成，宋太宗于二月份亲自率兵北征，首先分兵四路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辽一面以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耶律敌烈为监军赴援，又让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部和枢密副使耶律抹只一起前往助阵。一面下令给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要求带兵立即加强燕地一带的防守。三月，耶律沙等与宋兵在白马岭（今山西盂县东北）交锋。本来耶律沙率兵首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利用大涧可以阻击宋兵，只要等与后面的队伍会合以后就开战，不料耶律敌烈等以为立即渡涧进击为好，而宋兵已抢先发起攻势，正在渡涧的辽兵措手不及，刹时被打得溃不成军，冀王耶律敌烈父子、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详稳唐古以及都统耶律沙的儿子德里等将领一一战死，士卒伤亡更是相当惨重。幸亏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兵赶来，万箭齐发，才阻止住了宋兵的进攻。五月，宋朝又出兵，北汉失利，其将领刘继文、卢俊奔入辽。六月，北汉皇帝刘继元投降宋朝以后，宋太宗顺势准备收复幽、蓟之地，辽派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等联兵合击，结果沙河之战辽兵失利被迫退驻清河以北，宋兵包围了辽朝的南京（今北京）。代父留守南京的匡嗣之子韩德让急需救援。

南京（今北京）被围的消息传来，辽一面传令让耶律沙、耶律奚底和萧讨古等继续指挥努力抵抗，一面派惕隐耶律休哥率领重兵前来解围。七月，辽宋双方在高梁河（今北京西北）展开大

规模会战，等到宋兵开始出现退却时，辽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立即分左右翼实行两面夹击，宋兵大败，亲自督战的宋太宗退到涿州（今河北涿县）时才得以乘一辆毛驴小车逃走。辽兵乘机追击三十余里，又杀死了不少宋兵，并且俘获了兵杖、器甲、粮食、货币以及符印等各种大量的战利品。高梁河之战以后，辽朝对有关的各级将领都分别给予了赏赐和褒奖。

同年九月，辽朝任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开始分道向南出击北宋。并派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以及奚王抹只等率部一同出征。十月到达满城（今河北满城），与宋兵对阵。战争刚刚一开始，一部分宋兵就故意投降，辽营都统韩匡嗣不知是计，便接受了降兵。不料，宋朝将领刘廷翰、崔延进等看到韩匡嗣已被麻痹，便兵分前后，与很快赶来的李汉琼等突然发动联合夹击，这对韩匡嗣无疑是当头落棒，打得不知如何指挥是好，失去控制的辽兵纷纷抛弃旗鼓逃跑。满城之战，辽兵损失巨大，都统韩匡嗣受到了辽朝的严厉指责。当时，只有耶律休哥还算镇静，带领士兵稳住了阵势，所以，战后得到了设宴奖赏。

乾亨二年（980）正月，以惕隐耶律休哥为北院大王，前枢密使耶律贤适被封为西平郡王。十月，辽兵祭战旗战鼓，继续向南对北宋发起进攻，辽景宗还亲自前往南京督战，辽兵很快包围了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十一月，宋朝派来的援兵夜袭辽营，突吕不部节度使萧干等人首先迎击，取得了胜利；接着，耶律休哥在瓦桥关东部又取胜于宋兵。随后，被围在瓦桥关的宋兵突围出城，与耶律休哥展开了反复激战，结果宋兵失利，辽兵一直追到莫州（今河北任丘），杀伤很多。瓦桥关获胜，使辽景宗十分高兴，还师后，提升耶律休哥为坐而议论的当国重臣大于越。

乾亨三年（981）二月，辽景宗再次巡视南京（今北京）。在

这一年，任命韩匡嗣为西南面招讨使，并以南枢密使郭袭为武定军节度使，以辽兴军节度使韩德让为南院枢密使。经过一番准备，于乾亨四年（982）四月，他亲自指挥队伍要南征北宋，可是兵至满城（今河北满城）就遭遇失败，守太尉奚瓦里被流箭射死，统军使善补为北宋的伏兵包围，在枢密使耶律斜轸的援救下才得以解脱。辽兵被迫于五月回师。八月，辽景宗西巡。九月，来到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在祥古山游猎以后得病，不久，在焦山（今内蒙古丰南镇）行营去世。临终留下遗诏，由长子耶律隆绪继承皇位，因其年幼，由皇后萧燕燕摄政，总理军国大事。辽景宗在国势处于衰弱的情况下继承了皇位，在位总共十三年，但是他依靠心腹的支持很快就巩固了统治，与精明能干的皇后配合执政，注意赏罚有度，提拔人才，逐步扭转了衰弱的趋向，并且大量重用汉族官僚，使辽朝的封建化进程从此明显加快，为以后辽圣宗时期通过实行改革而进一步出现兴盛局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雷紫翰）

参考资料：

《全辽文》

《契丹国志》:《景宗纪》、《景宗萧皇后传》。

《辽史》:《景宗纪》、《景宗睿知皇后萧氏传》、《韩匡嗣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

《辽史纪事本末》卷 19、20、21、22、23。

辽圣宗改革

辽圣宗是辽代著名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进行了封建化改革，克服了某些弊政，辽呈现出中兴局面。

圣宗，讳隆绪，景宗的长子。自幼聪慧过人，爱好读书，十岁时就能写诗。景宗死后，他十二岁即皇位。他的母亲承天后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圣宗年幼，由承天后掌国摄政。

承天后小字燕燕，北府宰相萧思温的第三女。她羡慕中原文化，主张封建革新，有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景宗由于在察割政变中受到惊吓，不能处理朝政，政务大都由萧皇后处理。这一时期，她大胆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景宗死后，承天后继续推行原来的政策。并对人事安排作了重大调整，重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耶律斜轸、耶律休哥，让他们参与重大政务决策，取得了一系列政绩。承天后积极主张防御边境，任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总领南面军务。耶律休哥积极训练兵马，鼓励边境地区农业生产，积极做好战备。在辽宋战争中，取得岐沟关之战、飞狐口之战的胜利。辽军南征，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双方达成长期和议。这为辽朝推行封建化改革创造了安定的外部环境。

承天后大胆任用汉官，增强封建改革力量。依靠汉族地主势力加强统治，可以韩德让为代表。韩德让，蓟州玉田人，世代在辽朝担任要职。祖父韩知古在辽太祖时，就任中书令，帮助辽太祖建立各项制度。景宗时，其父韩匡嗣官拜上京留守、南京留守兼枢密使，封燕王，在军事上握有重大权力。韩德让智慧过人，

得到承天后重用，官封南院枢密使，统和元年（983）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999年耶律斜轸死后，兼北院枢密使，总知契丹、汉人两院事，拜为大丞相，晋封为齐王，总揽军政大权。承天后大胆任用以韩德让为代表的汉官，不仅仅因为两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其历史记载：萧太后年幼时，曾许嫁韩德让，后来景宗娶了萧燕燕，生了耶律隆绪。韩家世掌兵权，萧太后对韩德让说："我曾经许嫁给你，现在希望和你重续旧好，我儿子也是你儿子，咱们共同辅政。"从此，两人有了更加特殊的关系，萧太后愈加倚重韩德让。萧太后任用以韩德让为代表的汉官，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辽朝政治形势的需要。是为排除契丹守旧派的阻挠，从而能够顺利推行改革，稳定辽朝统治。她认为，要使辽朝强盛，必须重用汉人，学习汉人的一套统治经验和方法，加快辽的封建化改革，才能彻底扭转辽朝中衰局面。萧太后在以韩德让为首的汉官支持下，推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辽史》记载承天后摄政二十七年中，"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竭其忠。"为圣宗改革实施有效的统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辽圣宗在位四十九年（982—1031），是辽代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澶渊之盟后，他开始执掌朝政，广泛学习汉族封建统治经验。他认为唐朝是政治上最完美的朝代，唐太宗是中国五百年来最英明的君主。因而，学习唐朝成了一代风气。他亲自把白居易的《讽谏集》翻译成契丹文，召令百官研读。经常与朝臣讨论唐代贞观、开元的故事，希望以唐朝为榜样进行封建化改革。

辽圣宗针对契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奴隶制度进行改革，实行部族再编制。把原属于宫帐的奴隶户，改编为部族，取得部民的地位。经圣宗改编为部族的有：撒里葛部、窈爪部、伯斯鼻骨德部、稍瓦部、曷术部等。其中稍瓦部和曷术部，原来都是属于诸宫及横帐大族的奴隶。稍瓦在契丹语中是鹰房的意思，稍瓦部就

是原来居住在辽水以东地区掌管捕鸟的奴隶。曷术在契丹语中是铁的意思，曷术部就是改编而来的在海滨三黜古斯、柳湿河、首山等地冶铁的奴隶。还有乙典女直部、斡突盆乌古部、北敌烈部、迭鲁敌烈部、术哲部、颉的部等。这些部族原来是军事管辖下的奴隶，经过再编新部，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部族平民。同时圣宗发布诏令，新征服的各族人民不再编为宫户奴隶。开泰四年（1015）征服回鹘后，把回鹘民户编为薛特部，仍居本土。圣宗推行的部族再编制，大大削弱了奴隶制成分，劳动者人身地位有所提高，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

圣宗还推行了整顿吏治的改革。圣宗即位初年，在承天后和韩德让的主持下就开始了整顿吏治。统和元年（983），下诏谕给三京大小官员，要秉公办事，诸县令如遇州官或朝使无理征求，不要服从。以后三令五申禁止官吏受贿、请托，危害百姓，如有违犯，严加惩除。提拔那些勤于公事、居官清正的官吏。经过整顿，基本上克服了从前的弊政，形成了相对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

辽圣宗根据景宗以来汉官数量的增长，以及辽朝封建化的需求，建立学校，实行科举。辽代学校模仿中原，分为大学和郡县学，广泛传授儒家经典，为统治者培养人才。辽朝统治者起初实行科举，目的是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巩固辽朝统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选官制度。景宗保宁八年（976）下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准备实行科举。圣宗仿效唐朝开科取士，规模越来越大，进士人数猛增。把大批优秀的汉族地主阶级吸收到朝廷中来，扩大了辽朝统治基础，提高了契丹社会文明程度，加速了辽朝封建化进程。统和十四年（996）宛平（河北宛平）人张俭中了进士第一名。此后做官做到同知枢密院事、武定军节度使、南院枢密使、左丞相，进封韩王。科举制进一步冲击了残存于辽朝社会中的以血缘承袭为特征的世官制。圣宗以后科举扩大到契丹

人，成为一项完善的社会制度。

圣宗为适应封建化进程，在法律、赋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废除苛法、统一律令、实行封建的赋税制度。

辽朝初期刑法严苛残酷，并且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表现在法律上，同罪异论，在民族待遇上也有很大差别。契丹人杀死汉人，用牛马就可以偿付、抵罪，汉人杀人则必须偿命，并且把亲属降为奴婢。就法律而言，分为契丹法和汉法，契丹人和汉人犯罪按不同法律制裁。法律不统一，妨碍了政令的推行，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圣宗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改革，废除了契丹人与汉人同罪异论的法律，下令，契丹人犯十恶罪的，依照汉律处理，在奴主关系上，下诏令，严禁奴隶主擅杀奴婢，奴婢犯罪须送往官府处理，直接提高了奴隶的法律地位。律令比以前放宽，犯罪者减少。《辽史·刑法志》记载说："于是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故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至开泰五年，诸道皆狱空。"

辽朝统治者征服大量汉族人民，因无法改变汉族的农业定居经济，不得不沿用汉族封建租税剥削方式。并把这种方式扩大到实行奴隶制剥削的头下军州。契丹贵族在征服战争中，俘获了大批人口，往往建立城堡，用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加以统治，这些被俘人民称为头下户，契丹贵族称为头下主。头下户不编入国家户籍，为契丹主所私有。圣宗时下诏令，头下户须向国家交纳赋税，这样头下户迅速向获得部分自由的朝廷二税户转变。后来又下令，自穆宗以来被迫变为奴隶的，归入所在州、县户籍，这标志着奴隶此后不再是被奴隶主完全占有的私属，成了向朝廷纳税的编户齐民。人身束缚松弛，劳动积极性提高，社会经济繁荣起来。

圣宗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建立并完善辽朝封建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巩固了契丹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削弱了契丹

社会的奴隶制成分，并使契丹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转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辽朝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陈德军）

参考资料：

《辽史》

钦哀政变

辽兴宗的生母钦哀太后，原名萧耨斤。先祖是显赫的契丹贵族，著名的淳钦皇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妻）就出于其家。从淳钦皇后到萧耨斤世历五代，萧氏家族已降为一般契丹小贵族。向往昔日的显贵，希望家道中兴，成为萧氏家族的共同愿望。萧耨斤在幼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追求显贵、权力的野心，她的家庭也对她寄以厚望。据传萧耨斤的母亲做梦，梦见一根金柱，闪闪发射金光，擎天立地。她的几个儿子抱着金柱，怎么费力也上不去，年幼的萧耨斤来到后，沿着柱子升天而去。从此萧耨斤的家人对萧耨斤倍加重视。

数年过后，萧耨斤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被选入宫中，做了宫女，服侍圣宗齐天皇后，齐天皇后萧菩萨哥为人宽厚仁慈，萧耨斤有机会接近圣宗皇帝，渐渐取得圣宗皇帝的欢心，得到圣宗皇帝的宠幸，在开泰五年（1016）生了一子，就是后来的兴宗耶律宗真。齐天皇后曾生过两个儿子，不幸都夭折，齐天皇后便把耶律宗真抱养过来，当作亲生儿子抚育。萧耨斤也因为生子有功，被封为顺圣元妃。齐天皇后以自己的才学、贤能谆谆教诲兴宗，把他抚育成人，建立了深厚的母子之情。在封建社会里，母以子贵，因生子被封为顺圣元妃的萧耨斤，滋长了野心，内心深深嫉妒齐天皇后，妄图取而代之。在辽圣宗面前百般谗毁齐天皇后。好在辽圣宗为辽朝中兴之主，根本不听信她的谗言，并对元妃的作为有所警惕。临死前，立下遗诏，对后宫作了人事

安排，遗命齐天皇后为皇太后，顺圣元妃为皇太妃。萧耨斤在圣宗死后私藏诏令，不予公开。太平十一年（1031）兴宗即位，元妃自立为皇太后，即为钦哀皇太后，从此开始了篡权活动。

首先她打击功臣、异己分子。指令心腹亲信护卫冯家权、耶律喜孙等人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国舅萧匹敌谋反，牵连“齐天太后”，把这些人连同“齐天太后”一并拘捕审讯。兴宗还未成年，不能明辨是非，制止钦哀太后的暴行。兴宗回忆起“齐天太后”的抚育之恩，向钦哀太后求情：“齐天后服侍先帝四十年，又亲身把我抚育成人，应该立为太后。现在反而加罪于她，这合乎情理吗？”钦哀太后训斥道：“这个人如果不趁早除掉，一定成为后患。”兴宗反驳说：“皇后没有儿子，并且年纪大了，已不能做出不测之事。”钦哀太后陷害“齐天后”之心积聚已久，哪里能听得进去。当即派人把“齐天后”从中京押送到上京囚禁。大臣浞卜、萧匹敌以及牵连到的四十多人都被处死，家属沦为奴隶。钦哀太后屠杀大批朝臣，为其篡权摄政扫清了道路。从此，钦哀太后独揽政务，兴宗几乎成了傀儡，终日深居宫中，郁郁不乐。重熙元年（1032）春天，兴宗思念养母齐天后，借围猎的机会，前去探望。钦哀太后觉察后，决定斩草除根、先发制人，就派遣护卫抄道驰往上京，赐死齐天后。齐天后早已料到钦哀太后迟早有一天会对她下毒手，见到诏令后，坦然自若，对来使说：“天下人都知道我无辜而受害，诸卿请允许我沐浴后就死，去见先帝。”众人知道钦哀太后阴险毒辣，对齐天后顿起恻隐之心，默默退下。“齐天后”沐浴完毕，整顿好服饰，斩断对尘世的最后一丝留恋，从容自杀。钦哀太后得到“齐天后”的死讯，心中大喜，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从此滥封滥赏，朝廷要职几乎全被她的家人、心腹爪牙所占据。摄政后，又追封她的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亲为齐国王，诸弟也都封王，或官拜附马都尉，掌握兵权。如弟弟徒古撒结配燕国公主，哥哥解里结配平阳公主，陈六

结配南阳公主。为了牢牢控制兴宗，又把哥哥萧孝穆的女儿纳为兴宗皇后，弟弟高九的女儿为皇妃。后族家的奴隶爪牙没有功劳而授予官职的达四十多人，分别担任团练、防御、观察、节度使。他们伙同萧氏兄弟任意出入宫廷，凌辱朝臣，残害蕃汉民众，为所欲为。钦哀太后的姐姐秦国夫人看到长沙王谢家奴相貌英俊，就派人杀掉谢家奴的妃子，强迫谢家奴娶了她。妹妹晋国夫人喜欢户部使耶律元喜，同样也杀掉耶律元喜的妻子，强迫他娶己为妻。后族形成一股邪恶势力，权势灼天，使社会黑暗无比。

辽圣宗在位时进行封建化改革，取得很大成就，开创了辽朝的中兴局面。钦哀太后当权四年，便把圣宗时期建立的各项制度败坏殆尽，阻碍了社会进步发展，危害了契丹和汉族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引起一批朝臣的极大愤慨。兴宗本人也随着年龄增长，日益不满于钦哀太后专权，暗暗产生了废后之志。大批皇族及不满于钦哀太后专权的朝臣也凝聚在兴宗周围，与以钦哀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钦哀太后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她清醒地感觉到以兴宗为首的反对派对她已构成威胁，开始策划阴谋，废除兴宗、立少子重元为帝。重元为钦哀太后的第二子，由于兴宗自幼由齐天后抚养教育成人，与齐天后关系融洽，面对钦哀太后则相对疏远一些；对于两个儿子，钦哀太后比较喜欢少子重元。

重熙三年（1034）钦哀太后召集她的几个兄弟阴谋发动政变，废兴宗立重元。重元是个纯洁少年，他也不满于母亲的平素行为，激于义愤，把这个阴谋计划报告给兴宗。兴宗决定先发制人，急召殿前都点检耶律喜孙、护卫耶律刘三商议，进行了周密布置，兴宗亲自率领矫健护卫五百余人前往太后行宫拘捕太后。在离行宫二里的小山之上，坐镇指挥，由耶律喜孙等率兵闯人太后行宫，宣布诏令，废除太后，并迫使她登上一辆早已预备好的

黄布小车，秘密运送到庆州幽禁。然后分兵捕获萧氏兄弟及其党徒，按罪行轻重有的杀死，有的被流放边境。兴宗取得了胜利。

在废后斗争中，耶律重元因告密有功，得到兴宗的信任，被封为皇太弟。根据辽朝“兄终弟及”的惯例，重元也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这就为日后重元叛乱提供了契机。

（陈德军）

参考资料：

《辽史》

《辽史纪事本末》

重元之乱

耶律重元是圣宗的次子，兴宗的弟弟。重熙三年（1034）钦哀太后密谋废除兴宗，立少子重元为帝，重元告密给兴宗，取得了兴宗的信任，被封为皇太弟。其后历任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等要职。在权力不断增大过程中，滋长了政治野心，时刻窥视皇位，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阴谋集团。

重元阴谋集团的重新结聚形成与兴宗本人的昏庸腐化有极大关系。兴宗温柔敦厚，基本上是一个守成皇帝，缺乏他父亲的明智、果敢和创新精神。在废后斗争后，没有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根除后党势力。公元1039年，又亲迎钦哀太后回宫以致后党重新复兴。辽圣宗在政治上不求有所作为，坐享圣宗盛世之余，满足于太平天子的现状，不勤于政事，喜爱声色游乐。与教坊使王税轻等结为兄弟，经常微服出宫，进人市林酒肆，与众人称兄道弟，狂欢痛饮，在朝野上下造成极坏影响。他还喜欢佛法，对僧侣大加封赏。当时法僧拜为三公、三师兼政事令的多达二十多人，直接败坏了吏制。辽朝自耶律阿保机创立以来，历经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进行改革，尤其圣宗时期，对原有部落重新编制，进一步废除奴隶制残余，实行科举制度，在经济上实行汉族赋税制度，基本完成了辽朝的封建化。在这个过程中，辽朝统治阶层一直进行着汉化派和保守派的斗争。钦哀太后摄政，废兴宗，立重元的阴谋政变就是保守势力反攻的开始，兴宗胜利后，不图进取，沉溺于声色犬马，造成的吏治败坏，给

了保守派死灰复燃之机。

以重元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扩展，引起了兴宗的警惕。一天兴宗与重元赌博，以城作赌注，兴宗运气不佳，一连输给重元数城。兴宗还要赌下去，一个内侍指着局势对兴宗说："再赌下去恐怕连都城都要输掉了。"兴宗才猛然觉悟。兴宗一方面作了人事安排，另一方面稳住重元，使重元在兴宗统治时期不发生叛乱。一次兴宗宴请重元，兴宗酒醉，借机拍着重元肩膀，许诺将来传位给重元，重元听了满心欢喜，自以为兴宗酒后吐了真言，更加骄纵不法，引起大批朝臣的不满。兴宗为了使儿子耶律洪基在他死后顺利即位，不断地提高和扩大耶律洪基的权力和地位。重熙六年（1037）兴宗封耶律洪基为梁王，不久又进封为燕国王。重熙二十一年（1052），又给耶律洪基加尚书令，知北南院枢密使事，进封燕赵国王，后又进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主管全国军政。按照辽朝惯例，自辽太宗以来，各位皇帝在即位前都曾担任此职，这就从事实上宣告了耶律洪基为皇位继承人，从而进一步激化了以兴宗和耶律洪基为首的汉化派与耶律重元为首的保守派的矛盾，并使这种矛盾进一步表面化。重熙二十三年（1054）钦哀太后与兴宗接见宋朝使臣王拱辰时就反映出来。钦哀太后问王拱辰："南朝太祖与太宗是什么关系?"王拱辰说："他们是兄弟。"太后听后拍手称快说："太好了，这才符合道义。"兴宗也针锋相对，问王拱辰："南朝太宗和真宗是什么关系?"王拱辰回答："他们是父子。"兴宗说："好，这才符合礼义。"钦哀太后离去后，兴宗令左右退下，对拱辰说："我有一个骄横的弟弟，他日一旦做了皇帝，恐怕你们南朝就不能像现在太平无事了。"这预示着兴宗死后，必定会发生一次争夺皇位的斗争。

重熙二十四年（1055）辽兴宗南巡，在中途生病，预感到情况不妙，急召太子耶律洪基，为了不使皇权旁落，对重要人事作了安排布置，嘱咐耶律洪基以后要重用忠贞、果敢、通晓世务的

大臣萧阿剌和萧革。八月，兴宗病死，遗诏耶律洪基继承皇位。

耶律洪基即位后称道宗皇帝。他遵从父命，任命西北路招讨使平西郡王萧阿剌为北府宰相，仍兼南院枢密使事；萧革为北院枢密使，两人共执朝政。道宗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即位的当月就尊重元为皇太叔，得到“免汉拜”与“不名”的殊荣，使重元以“兄终弟及”夺取皇位失去借口，重元只得到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名，这就加剧了重元和道宗之间紧张关系。为了进一步稳定耶律重元，道宗又尊重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为重元夺取皇位提供新的依据。与此同时，道宗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权力矛盾，共掌朝政的萧阿剌和萧革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意见不合，发生冲突。萧阿剌是辽朝名臣萧孝穆的儿子，对朝廷忠心耿耿，通晓事务，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对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而萧革却是另外一种人，爱好权术，善于逢迎拍马，媚俗阿众。在兴宗时期，他就靠此得到兴宗的宠信，屡屡升迁，历任北面林牙、北院枢密副使、同知北院枢密使。据史载，萧革专权不法，他的同僚形同虚设。当时夷离毕耶律义先对萧革不满，曾向兴宗弹劾萧革。兴宗不听，反而更加看重萧革，拜萧革为南院枢使，封为吴王。兴宗临死前，召见萧革，密嘱以后事。道宗即位，萧阿剌与萧革共掌朝政，两人一正一邪，必然会发生冲突。处理政务，萧革多出于个人利害，有所偏私，正直大臣萧阿剌察觉后，就加以裁正，两人产生了矛盾。萧阿剌向道宗控告萧革，不按法行事，道宗不听。萧阿剌出于气愤，向道宗要求辞官回家，本来道宗也对萧阿剌寄予重望，听到萧阿剌说出这样的话，心中不满，于是就顺手推舟，令萧阿剌出朝，改任东京留守。清宁七年（1061），天大旱，道宗亲自求雨，这种仪式，当时契丹民族叫做行瑟瑟礼，皇帝一方面求雨祈求丰收，另一方面借举行求雨仪式的机会召见各地大臣评议朝政。按照惯例，东京留守萧阿剌朝见道宗，在朝会上萧阿剌慷慨陈词，针砭时弊，言辞过于激烈。道宗平时听惯了

萧革等人粉饰太平的谗言蜜语，听了萧阿剌这番话，心中很不愉快。萧革乘机攻击萧阿剌对道宗无礼，道宗大怒，命人当场缢死萧阿剌，群臣目睹了这一悲惨现象，不寒而栗，从此无人敢向道宗提出谏言了。这是辽朝政治走向黑暗的标志，对此后辽朝所出现的一系列政争有一定影响。评论者认为，如果道宗信任萧阿剌就不会出现重元、乙辛之乱。天长日久，萧革玩弄权术的奸计被道宗识破，道宗对缢死萧阿剌深感内疚，萧革受到罢官的处分。重元的儿子涅鲁古乘机入朝做了知南院枢密使事。萧革另寻靠山，勾结重元。与重元结为婚姻，让儿子做了重元的女婿，萧革以后参预了重元叛乱。萧阿剌与萧革之争削弱了以道宗为首的汉化派力量，从反面助长了保守派势力，形成以重元为首的包括涅鲁古、萧胡睹、萧革、萧达不里等人的奸党集团，他们开始了夺权斗争。

萧胡睹是重元奸党集团的骨干。清宁年间历任北南院枢密副使，在萧阿剌与萧革共执朝政期间，他不惜陷害族兄术哲，攀附勾结萧革。萧革失势后，又勾结涅鲁古，排挤改革派。当时耶律仁先任南院枢密使，有智有勇，忠于朝廷，敢于抵制保守邪恶势力，成为重元奸党集团夺权的一大障碍。萧胡睹为了排挤耶律仁先，上奏道宗，请耶律仁先出任西北路招讨使。道宗犹豫不决，大臣耶律乙辛因与萧胡睹有矛盾力保仁先，对道宗说："仁先是先朝大臣，德高望重，不宜外调。"道宗这才领悟，复拜耶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粉碎了奸党的阴谋。此后重元奸党更加快了夺取皇权的步伐。

涅鲁古向重元献计，让重元谎称生病，借道宗探视之际，刺杀道宗。老谋深算的耶律重元分析了形势，认为：道宗早有警惕，身边又有耶律仁先、耶律乙辛等有智谋的大臣辅佐，一定不会贸然探问，如果派大臣先探视，事情就会败露，便否定了涅鲁古的计划。

清宁九年（1063）七月，辽道宗率群臣前往太子山、滦河一带打猎。耶律重元认为时机到来，重元父子秘密策划，纠合党羽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萧胡睹，卫王西京留守贴不，林牙涅剌溥古，统军使萧迭里得，护卫左太保敌不古以及萧革等大小官员四百多人，率一部分弩手军包围道宗行宫，发动叛乱。历史上也把这次叛乱叫“滦河之变”。

重元叛乱蓄谋已久，只是因为道宗思想麻痹，没有作出防备。早在叛乱之前敦睦宫使耶律良就有觉察，他看见重元奸党集团暗地串连结集，就知道会发生事变。只是因为重元与道宗有骨肉之亲，恐怕不为道宗信任，反而招致杀身之祸，就秘密报告给太后。太后得知后，大惊失色，急令近侍速报道宗说太后生病，叫道宗速来。道宗来到后，得知此事，但他仍不敢轻信耶律良，正色喝问：“你竟敢播弄是非，离间我骨肉之亲！”耶律良发誓：“臣如果说谎，甘愿以头请罪，陛下如果不早做准备，恐怕会招致大祸。”道宗此时也拿不定主意，自言自语说：“如何确定他们要发动叛乱呢？”耶律良说：“臣有一计，可断定此事。现在他们发动叛乱仅在旦夕之间，派一使者去召涅鲁古，如果他不来，就说明他心虚，要发动叛乱。”道宗遂派使者去召涅鲁古，使者飞马赶到，在这关键之际，涅鲁古哪能去见道宗，喝令斩杀使者。使者察觉不妙，勒马便跑，飞报道宗。道宗这才深信不疑。道宗召来大臣耶律仁先商议，耶律仁先也说：“我也怀疑很久了，重元必反无疑。”这时重元逆党率兵攻打行宫，在宫外大喊献出道宗，道宗大惊失色，不知如何应付，要逃出行宫，到北南大王院。耶律仁先与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劝谏说：“陛下如要抛弃护卫从属，只身而走，叛贼必定尾追不放，这十分危险，况且南北大王态度不明。”耶律仁先的儿子劝父亲不要违背圣意，耶律仁先急得要杀掉儿子，道宗见仁先等忠心不二，决定留下，授权耶律仁先领兵平乱。在这次平乱中，耶律仁先表现出杰出的领导才

能。他和知北枢密院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及萧韩家奴、耶律良团结一致，率宿卫士卒一千多人，出宫迎击叛军，双方展开混战。叛军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心中恐惧，看到耶律仁先人多势多，纷纷倒戈投降，涅鲁古在乱军之中，被近侍详稳耶律阿思一箭射下马来，南京统军使萧德跃马前去，斩了涅鲁古首级。余众见涅鲁古被杀，吓得四散逃跑，重元也身负重伤，看到儿子被杀，乱了方寸，连忙退兵。这时叛党耶律撒剌竹正在附近围场打猎，闻讯后，率领猎夫赶来援助，叛军一时气焰汹汹，双方力量悬殊，形势非常严峻。耶律撒剌竹向萧胡睹建议："我方人多马强，乘他们未做准备之机，半夜出战，可一鼓作气攻下行宫。"萧胡睹反驳说："仓猝之中，黑白不分，敌我不辨，假若他们内外联军，我们必败无疑。等到黎明，再攻行宫，也不为晚。"重元采纳了萧胡睹的意见，派兵士四面巡逻，等待天明出击。实际上，重元叛军已经坐失良机。叛党集团当夜立重元为帝，萧胡睹为枢密使。

耶律仁先见敌众我寡，便撤回行宫固守，一面派飞马急召距离太子山最近的五院部萧塔剌集合军队来援。黎明时，重元率猎夫二千多人攻打行宫。恰巧萧塔剌率援兵赶来，耶律仁先指挥兵士摆好队形，严阵以待。重元叛军又人心不一，萧韩家奴在阵前对叛军喊话，展开攻心战术说："你们不要替重元卖命，现在援军到来，再顽抗下去，只能白白送命，连累家人。此时归顺还不迟晚，陛下答应赦免你们。"叛军听了军心大乱，猎夫们纷纷举起武器投降。耶律仁先见叛军乱了阵脚，果断挥军奋击，追杀二十多里，叛军大部分被歼灭。耶律重元仅率数骑逃入大漠，一时远离了追兵，停马休息，眼前太阳还未升起，冷风拂面吹来，疲兵败将顿感寒意。周围荒无人烟，一片凄凉。耶律重元不觉睹物伤情，想起往日荣华富贵，一朝云散烟灭，不由仰天长叹："全是孽子害了我。"感到大势已去，拔剑自杀。萧胡睹单骑出逃，

逃到十七泺，被大河拦住去路。后面追兵将至，萧胡睹走投无路，投河自尽。萧迭里得被擒伏诛。萧革、古迭被处以凌迟极刑，其他叛党也一并被擒拿、伏罪。辽道宗取得了平叛胜利。

重元叛乱，不仅仅是辽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辽朝内部汉化派和守旧派之间斗争的继续，有进步和反动之分。聚集在兴宗周围的大臣大都主张汉化，推行汉法；如耶律仁先等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他们能够顺应辽朝社会发展的趋势推行汉化，有助于社会发展进步。而耶律重元周围结集了大批落后、腐朽、守旧的旧契丹贵族，他们仇视汉人官僚，阻挠推行汉法，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成为必然。

平定重元叛乱之后，道宗封赏功臣。耶律仁先功当其首，拜为北院枢密使，加尚父进封为宋王。还命画滦河战图，表彰他在这次平叛中所建立的功勋。萧韩家奴、萧惟信、耶律良等也封官加爵，耶律乙辛因奏留仁先有功，参加平叛，也被拜为北院枢密使，为道宗所倚重。后来耶律乙辛又重蹈重元覆辙，擅权乱政，给辽朝造成了极大危害。

（陈德军）

参考资料：

《辽史》

《辽史纪事本末》

耶律乙辛乱政

自耶律阿保机建辽以来，契丹社会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辽圣宗在位期间大规模地推行封建化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辽朝社会出现了兴盛局面。到兴宗时开始走下坡路，社会危机已渐露机芽，发生了钦哀太后政变，虽被平息下去，但社会积弊无法根除。道宗统治时期社会危机激化，前期发生了重元之乱，后期出现权臣耶律乙辛擅权乱政，整个社会如同江河日下，迅速走向崩溃。在此过程中，耶律乙辛乱政是辽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环节。

耶律乙辛，字胡睹衮，五院部人。出身下层平民，他父亲被部落的人称为“穷迭剌”。相传耶律乙辛的母亲在怀耶律乙辛期间，曾梦见自己手抓羚羊，奋力拔掉了羊角。醒后找人解梦，解梦者告诉她这是个吉梦，羊去掉角为王字，生了儿子，他日一定为王。耶律乙辛自幼聪慧过人，气度非凡。父迭剌觉着这孩子非常神奇，将来定成大器。耶律乙辛自幼受到家庭的强烈期待，无疑会激发出耶律乙辛强烈的野心和权欲。重熙年间，耶律乙辛由文班吏陪从入宫，兴宗皇后见他相貌文雅，好像素宦子弟，就让他做了笔砚吏，因此他有机会接近兴宗皇帝。再加上他善于逢迎上意，在仕途中官运亨通，历任护卫太保、同知点检司事、北院同知、枢密副使。清宁五年（1059）为南院枢使，后改知北院，封为赵王，跻身于统治阶级上层。在以道宗为首的汉化派与重元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中，他权衡利弊，投靠汉化派，积极参

加平定重元之乱的斗争。平叛胜利后，他和耶律仁先、萧韩家奴、耶律良同列为功臣，受到封赏。耶律乙辛和耶律仁先同为道宗所器重，共知北院枢密事，权势很大。耶律乙辛登上了权力要峰，他的权欲和野心也随着恶性膨胀。他常常擅权行事，玩弄阴谋诡计，这受到功臣耶律仁先等公正大臣的制止。耶律乙辛对耶律仁先等功臣怀有忌心，千方百计排挤耶律仁先，耶律仁先被迫离开朝廷，任南京留守，后来又改任西南路招讨使。朝廷上失去了与耶律乙辛抗衡的大臣，耶律乙辛独揽了北枢密院大权。后来又加守太师，有权指挥全国军马，便更加专权横行，为所欲为。凡是阿顺者都得到荐升，忠直者都遭到迫害打击。大批功臣被耶律乙辛排挤离朝：耶律良出知中京留守，萧韩家奴迁为西南路招讨使等。朝中形成了以耶律乙辛为首包括汉人官僚张孝杰、契丹贵族耶律燕哥、萧十三等人的奸党集团，他们臭气相投，互相结为心腹，把持朝政，制造了一系列冤案，严重败坏了辽朝朝政。

首先他们制造了宣懿皇后被诬案。按照辽朝惯例，皇帝在太子继位前，总要让太子担任官职，处理政事。一方面作为从政训练，另一方面为顺利登上皇帝宝座铺下基石。一般多兼领北、南枢密院事，再做天下兵马大元帅。道宗的宣懿皇后萧观音，生有皇子耶律浚，六岁被封为梁王。咸雍元年（1065）册封为皇太子，确立了他的皇位继承权。太康元年（1075）太子浚兼领北南枢密院事，参与朝政，耶律乙辛的专权受到限制。因此开始策划废太子浚，为达到目的，首先向太子生母宣懿皇后发难。

宣懿皇后萧观音，贤淑端庄，美丽绝人，而且多才多艺，工于诗文，善弹唱。曾作名曲《回春院》，只有伶官赵惟一能够演奏，并能体会到这首曲子的寓意，被皇后引为知音。皇后身边有一宫婢名叫单登，善奏筝与琵琶等乐器，嫉妒皇后宠爱伶官赵惟一，经常在皇后面前与赵惟一竞技，比试高下，怨恨皇后不是伯乐。一次道宗召单登弹筝，皇后谏阻说："叛家奴婢（单登曾作

为重元妻子的奴婢）怎么能亲近陛下呢？”单登因此被遣送到直外别院，从此单登对皇后更加仇恨。单登的妹妹嫁给教坊朱顶鹤为妻，为耶律乙辛所昵爱。单登常对妹妹诋毁皇后，诬陷她与赵惟一私通。耶律乙辛听到后，便抓住此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大做文章，策划陷害。令人作了一首《十香词》，让单登求皇后亲笔书写。单登欣然答应。有一天，她见皇后心情畅快，装出对皇后敬佩的样子，恭敬地说：“我这里有一道宋国忒里蹇作的诗词，属于上乘之作，如果再有您亲笔书写，便算得上天下双绝。”皇后看单登面目恭顺，哪里知道这是一个阴谋。再加上皇后平素爱好书法，常常收集名家墨迹。因此对单登没有防备，便欣然接过，读完后连说：“好词！”随即令人取来笔墨，挥毫书写，最后又书写上自己所作的一道《怀古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人昭阳。”写完，赐给单登。单登跪谢了皇后，回去后，马上交给她妹妹。耶律乙辛得到宣懿皇后的手迹，又开始下一步阴谋行动，他把单登、朱顶鹤召集在一起，面嘱如何诬害太后，向两个许诺，事成后，必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二人也向耶律乙辛表示：完全按他的旨意去办。单登、朱顶鹤拿着《十香词》到北院去控告宣懿皇后与赵惟一私通，立时轰动了朝野。耶律乙辛密告道宗说：“外直别院宫婢单登和教坊朱顶鹤陈首，伶官赵惟一以弹琵琶为名，入宫接近皇后，受了皇后的恩幸。”道宗听了大怒，立召懿皇后，皇后平白无故遭受这等污辱，气得面色发白，痛哭流涕，向道宗申辩：“妾身为皇后，已经达到作为一个妇人的最高愿望。况且皇子立为太子，最近又生了孙子，我绝不会做出这种事。”道宗把《十香词》扔到宣懿皇后面前大声喝问：“这难道不是你这贱人所作，‘惟有知情一片月’，此句就是明证！”宣懿皇后说：“《十香词》是宋国忒里蹇所作，单登求我书写给她，后一首是我所作的《怀古诗》，句中出现惟、一两实属巧合。”道宗听了大怒，心想，果

然是这贱人写的，还想抵赖。顺手抓起铁骨朵猛击皇后，把宣懿皇后打得血流满面，几乎丧生。道宗下令，让耶律乙辛和张孝杰审理此案。这正中两个奸臣下怀，心中暗自庆幸却又齐声说："陛下，臣等尽力秉公办事，将此案迅速查明。"

耶律乙辛与张孝杰密谋策划后，首先审讯赵惟一等人，对他们动用酷刑，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不堪忍受，被迫屈招。宣懿皇后在朝野上下深孚众望，耶律乙辛等人的倒行逆施激起朝中忠直大臣的强烈不满。功臣枢密使萧惟信直接责问耶律乙辛、张孝杰："皇后身为一国之母，素以品行端庄，性情贤淑称闻于世，岂能听信一叛家奴婢的片言只语，草成错案？你们身为国家大臣，应替皇后雪洗冤污，以此报效国家。"耶律乙辛狡诈地说："现在人证物证都已查明，我作为受理者，理应秉公办事，此案属实。"萧惟信深感自己无能为力来挽救皇后，无奈离去。耶律乙辛把此案上报给道宗，公元 1075 年道宗下令，诛杀伶人赵惟一等人，赐死皇后。就这样宣懿皇后因耶律乙辛等人的陷害含冤而死。耶律乙辛为首的奸党集团，为了专权进一步控制道宗，密谋册立皇后，企图通过后族操纵宫廷，进一步废除太子。耶律乙辛向道宗进言："帝与后如天地相合，不可一日无后。"又大加称赞同党驸马都尉萧霞抹的妹妹萧坦思美貌绝世有贤德。道宗便把萧坦思选入宫中，册封为皇后。此时耶律乙辛的奸邪和野心已暴露无遗，一些正直大臣直接或间接地同耶律乙辛展开斗争。护卫萧忽古对耶律乙辛的险恶用心强烈愤恨，决心刺杀耶律乙辛。一天，萧忽古暗藏兵器，埋伏在一座桥下，等耶律乙辛过桥时，伺机行刺。不料下起大雨，桥被冲毁，刺杀计划没有实现。后来准备再次行动，不幸被耶律乙辛预先知觉，萧忽古被抓获，流放到边境地区。北面林牙萧严寿向道宗密奏："自太子参政以来，耶律乙辛和宰相张孝杰等人来往密切，定有异图。"告诫道宗，严加防范，不可让他们久居要位。道宗开始对耶律乙

辛怀疑，下令将他迁出朝廷，去做东京留守。这是耶律乙辛擅权以来，第一次遭受挫折。他委屈、哭泣着对人申诉："我有何错，只因朝中有人对我谗言中伤，才被贬出朝廷。"同党萧霞抹把耶律乙辛蒙受委屈、郁郁不得志的情况报告给道宗，要求道宗为耶律乙辛复职。昏庸的道宗毫无主见，反而怀疑萧严寿有意陷害耶律乙辛，竟把萧严寿贬出朝廷，任顺义节度使。在耶律乙辛生日时，道宗派大臣耶律白斯携带钦赐礼物去安慰他。他愈发装出对道宗的一片忠心，让耶律白斯转告道宗："臣乙辛见奸臣当朝，陛下势单孤危，虽身在千里之外，无法报效陛下，然而时刻为陛下担忧。望陛下能体会到臣乙辛一片忠苦之心，臣虽死无憾。"道宗深为感动，召集百官廷议，要把耶律乙辛召回。文武百官面面相觑，都惧怕耶律乙辛奸党，无一人敢异议。只有大臣耶律撒剌反对说："萧严寿说耶律乙辛怀有阴谋，不可为枢密大臣，陛下因此把他迁出。现在又听从他议，召回耶律乙辛。这样出尔反尔，恐怕会失信于天下，动摇人心。"道宗已被耶律乙辛所迷惑，固执己见。当年十月，召回耶律乙辛，官复原职，为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复职后，听说耶律撒剌反对他，就当面责问耶律撒剌。耶律撒剌从容回答："不是我单单反对你，我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把耶律乙辛说得哑口无言。耶律乙辛千方百计打击迫害异己，连被贬出朝外的萧严寿也不放过，把萧严寿流放到荒凉的乌隗路，终身囚禁。耶律乙辛权势灼天，朝中狡诈无赖之徒阴附耶律乙辛，借其权势，飞黄腾达。其中萧特里得巴结耶律乙辛官居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这些奸党分子为非作歹，遭到朝野上下的抵制反对，耶律乙辛奸党同时也加快了谋废太子浚的步伐。太子浚在皇后被冤杀后，仇恨在心，多次发誓，他日不杀掉仇人耶律乙辛，不为人子。两者的矛盾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耶律乙辛的同党萧十三对耶律乙辛说："太子现在深得民心，你本布衣平民出身，又身背皇后之死一案。将来太子当位，恐怕

你死无葬身之地。请您好好盘算这件事，与其他日为人所制，不如今日先发制人。”耶律乙辛说：“这件事我也考虑很久了。”于是两人密谋策划了谋害太子的方案。他们指使护卫太保耶律查剌去诬告耶律撒剌与萧速剌阴谋废除道宗，立太子浚。道宗非常震惊，派人详查，结果没有任何验证。但道宗仍不放心，把两人贬出朝廷。耶律撒剌被贬为始平军节度使，萧速剌为上京留守。耶律乙辛的阴谋虽没有完全得逞，却削弱了忠于太子的力量。一些奸诈分子竞相助纣为虐，为奸臣耶律乙辛献计献策。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多次想阿附耶律乙辛，求得高升，苦于没有机会，他觉察到耶律乙辛的意图，就自告奋勇，愿去做人证；耶律乙辛又指使耶律挞不也向道宗自首。道宗果然中计，大怒。授权耶律乙辛、张孝杰、萧十三等迅速审问此案。耶律乙辛即时派人拘捕了太子浚，太子平白受辱，自然不服，耶律乙辛得不到任何供词，对太子不能随便动刑，急向道宗汇报。道宗另派耶律燕哥审问太子。耶律燕哥也是耶律乙辛党徒，官拜左夷离毕，为人机智狡猾。开始时接近太子，表示对太子处境同情，妄图劝诱太子招供，这样骗得了太子浚的信任。一次两人谈话，太子浚对耶律燕哥说：“陛下立我为太子，对我精心培植，我哪会有这种异想，请兄顾念我平白受污，替我在陛下面前辩解。”耶律燕哥见劝诱无效，去找萧十三商议，萧十三说：“如果如实报告皇上，恐怕大事不成，反正皇上不了解实情，不知假说太子已经招供。”耶律燕哥按萧十三说上奏道宗。耶律乙辛又怕道宗生疑，对牵连此案的人都施以酷刑，这些人只望速死，被迫招供。道宗下令杀掉耶律撒剌、萧速剌、耶律挞不也。太子浚被废为庶人，囚禁上京。耶律乙辛恐怕事情泄漏，派人把萧讹都斡杀掉，萧讹都斡死到临头，方才醒悟，大骂耶律乙辛无义。萧讹都斡为虎作伥，最终落得一个反被虎食的可悲下场。杀掉萧讹都斡，耶律乙辛又和萧十三密议，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太子浚。派心腹萧达鲁古率领数骑，前往

上京杀害太子。上京留守萧挞得属耶律乙辛奸党集团。萧达鲁古到达上京后，找萧挞得商议，两人决定用计杀害太子，当夜两人带数名兵士前往太子囚室，两人谎说皇上下令赦免太子，太子浚信以为真，走出囚室后，被一兵士从背后一刀砍下头来，两个奸贼用匣装上太子首级，令人掩埋掉太子尸体。萧挞鲁古返回向耶律乙辛交令，上京留守萧挞得连夜派飞骑去告道宗，太子浚病死。道宗听到太子死讯，亲子之情油然而生，召见太子的妃子，来加以劝慰。耶律乙辛担心发生差错，又派人秘密杀掉了太子浚的妃子。可怜道宗昏庸至极，妻子、儿子都被耶律乙辛害死，仍不觉悟。太子浚死后，耶律乙辛、萧十三等奸党分子，为阴谋得逞，狂饮数日，一些奸党得到耶律乙辛的封官赏赐。

耶律乙辛为达到专权目的，控制道宗，操纵预立太子，他向道宗上言："臣乙辛认为，为安社稷，定国本，应立太子。皇孙耶律淳（兴宗次子和鲁斡的儿子）有才有德，宜立为太子。"君臣无人敢当面反对，这时北宣徽使萧兀纳、夷离毕萧陶隗据理力争。他们上谏道宗："如果陛下不立嫡传皇孙，另立他系，这无疑于把江山社稷拱手送给别人。"道宗对此事犹豫不决，耶律乙辛见道宗态度不明，又有朝臣反对，不敢轻举妄动，册立太子暂告结束。

太康五年（1059），道宗率群臣巡狩，耶律乙辛想趁道宗率群臣出外巡狩，朝廷空虚加害皇孙耶律延禧，向道宗上奏："皇孙年纪小，不宜跟从。"道宗也未加提防，听从了耶律乙辛的建议。大臣萧兀纳恐怕耶律乙辛等人从中作祟，上奏道："臣听说陛下出朝巡狩，要把皇孙留下。皇孙年幼，一旦有变，后悔就晚了。"道宗领悟过来，对耶律乙辛的用心大为怀疑，令皇孙耶律延禧随行。道宗这次巡狩，众臣随行，一路浩浩荡荡。途中，道宗发现，众臣多追随耶律乙辛身后，不觉对耶律乙辛深感厌恶，联想到皇后、太子等事件，对耶律乙辛更加怀疑。从此耶律乙辛

失去宠信，道宗开始有意识地削除他的势力。把他调离枢密要职，由魏王降封混同江王。太康六年（1080）又把他贬出朝廷，去做知兴中府。其他党徒也被贬官。萧十三被贬出朝廷，为保州统军使，张孝杰贬为武定节度使。太康七年（1081）耶律乙辛又被查出出卖禁物，以法论罪，被囚禁来州（辽宁绥中前卫），沦为阶下囚。张孝杰也因被查出私贩广济湖盐，擅改诏旨，被问罪削爵，贬到安肃州（今河北徐水），数年后才得还乡。太康九年（1083），太子浚平反昭雪，追谥为昭怀太子，标志着耶律乙辛一党彻底失败。耶律乙辛见大势已去，暗地里收集兵器，纠合兵马，准备逃到北宋。被人告密，道宗派人拘禁诛杀了耶律乙辛，其他党徒也被彻底肃清。

耶律乙辛奸党集团虽最终被铲除，但他们擅政多年，严重败坏了辽朝朝政，辽彻底衰败，道宗以后，只经历天祚皇帝一代，辽便为金所灭。

（陈德军）

参考资料：

《辽史》

《辽史纪事本末》

萧奉先误国

萧奉先是辽末帝天祚皇帝大臣，他的两个妹妹萧夺里懒、萧贵哥分别是天祚皇后、元妃，其中元妃深为天祚皇帝宠爱。萧奉先利用裙带关系，飞黄腾达，官至枢密使，封为兰陵郡王，掌握中枢权力，左右皇帝，对辽政局起了恶劣的影响。辽朝到天祚皇帝这一代，社会已经凋敝。天祚皇帝沉醉于犬马声色之乐，不理朝政，这才会出现萧奉先误国的现象。

正当辽走向衰亡之际，居住在辽东北部的女真族强大起来。女真族是今天满族的祖先，是我国一个古老民族。契丹族兴起后，臣附于辽。天祚皇帝统治时期，完颜部女真人强大起来，出现了杰出的首领阿骨打，领导女真各部发展生产，扩大军事力量，积极准备抗辽。此时女真人还维持着对辽的臣属关系，但他们已清醒看到辽内政腐败，国势衰落，已经不把契丹人当成主人了。天庆二年（1112）二月，天祚皇帝率领群臣到混同江一带打猎，在混同江钓得很多大鱼，天祚皇帝非常高兴，摆起头鱼宴，大宴群臣。按照惯例，附近的各族酋长，都要参加宴会，朝拜大辽皇帝，显示大辽国威。女真各部酋长也都来参加宴会。天祚皇帝接受各部落酋长的朝拜，洋洋得意，摆足了大国天子的气派。殊不知这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丝毫不能掩盖辽的衰弱。女真首领阿骨打面色冷峻，默默行过朝拜礼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大辽皇帝在这位首领心中早已失去昔日大国天子的尊严，只因时机不成熟表面上还维持着臣属关系。朝拜完毕，开始饮酒，

只听得一片觥筹交错之声。酒到半酣，天祚皇帝一时兴起，令各部酋长起舞。各部酋长离席，乘酒兴跳起不同风格的舞蹈，唯独阿骨打冷眼观看，不肯离座。天祚皇帝见状，遂令阿骨打跳舞，阿骨打再三推辞。天祚皇帝看到阿骨打一副桀骜不服的态度，心中大为不快，顿时起了杀掉阿骨打的念头。天祚皇帝召见枢密使萧奉先商议，天祚皇帝说："在前天酒宴上，阿骨打意气雄豪，轻慢我大辽，一定生有反骨。今日不杀掉他，他日必留后患，可以借口边境事情把他杀掉。"萧奉先身居相位，不谋国事，只一心钻营，哪会有远见？随口奉劝天祚皇帝："蛮人不懂得礼节，如果没有大的过错而杀掉他，恐怕会失去诸部的向化之心。假如他生有异志，小小女真也不会有多大作为。"天祚皇帝没有得到支持，反而被萧奉先粉饰太平的话引开，没有继续追究。这次头鱼宴正如鸿门宴一样，项羽失掉杀刘邦的机会，最后被刘邦追逼在乌江自刎，天祚帝也将遭同样下场。这是萧奉先误国的开始。阿骨打回到女真后，开始统一女真各部，他以"好则结为亲，以和取之；怒则加以兵，以强夺之"为指导方针，避免了过度内耗，成功统一了女真各部，积聚了反辽军事力量。天庆四年(1114) 女真人果然进行反辽斗争，阿骨打集合女真各部精锐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由于女真反辽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符合女真各部人民的共同愿望，女真军虽然人数少，但士气高昂；辽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辽政治腐败，军纪涣散，士气低落，毫无斗志。阿骨打兴兵后，首先攻打混同江东的辽朝东北边防重镇宁江州，一举成功，女真军士气倍增。宁江州的失陷，引起辽朝朝野一片惊慌。天祚皇帝派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为都统，率数万辽军讨伐女真。萧嗣先本无军事才能，他率领辽军与女真军在出河店（吉林扶余县境）展开会战。当时大风四起，沙尘蔽天，英勇的女真军乘风势暗渡混同江，进击辽军，俘获车马兵甲无数，萧嗣先望风而逃。萧嗣先兵败的消息传至朝廷后，枢密使

萧奉先爱兄弟之心胜过爱朝廷之心，害怕兄弟会因兵败被杀，向天祚皇帝上奏，请求赦免东征军。他说："东征军失败后，乱军害怕朝廷问罪，不敢回来，他们聚集在一起掠夺百姓，如果不加赦免，怕会造成祸害。"天祚皇帝对萧奉先言听计从，下令赦免东征军将士。萧嗣先作为东征军统帅，临战逃脱，仅仅受到免官处分，没有问罪。这次事件在辽军中影响极大，纷纷传言："战败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从此辽军更无斗志，女真军攻来，辽军不战而逃，辽朝国土大批沦丧。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号为大金，继续攻辽。天庆五年（1115），金太祖阿骨打在达鲁古城击败辽行军都统耶律斡里朵，接着又在涞流河（拉林河）击败辽将张琳，随后攻占了辽朝的北军事重镇黄龙府（吉林农安）。天祚皇帝惊慌失措，下诏亲征。他令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御营副都统，率蕃汉兵十万，号称七十万，东征女真，妄图和金军作最后决战。阿骨打率两万精兵迎敌，辽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辽朝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穷苦，从根本上败坏了辽军的士气，加上统治集团内部上下离心，所以，天祚帝亲征必然失败。辽军大部渡鸭子河（黑龙江肇县西嫩江一段）将向金军展开进攻时，辽将耶律章奴乘机率三百余人返回上京，发动政变，废掉天祚皇帝，另立魏国王、南京留守耶律淳。天祚皇帝闻讯，急令辽军退兵。阿骨打抓住有利战机，全线出击。辽军望风而溃，死者相属百里。金军获取了大批军械兵资。经过这一战役，辽军精锐损失殆尽，战局急转直下，辽朝统治者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防御了。金军乘胜进攻辽朝军事重镇东京、上京。在金军大兵压境，辽军如江河日下的形势下，枢密使萧奉先不为国家积极谋划，反而参加争权夺利的斗争。天祚皇帝有六个儿子，即晋王敖鲁斡、梁王雅里、燕王挞鲁、赵王习泥烈、秦王定和许王宁。其中晋王敖鲁斡是文妃所生，秦王定是萧奉先的妹妹元妃所生。文妃有姐妹三个，姐姐嫁给贵族耶律挞葛

里，妹妹嫁给副都统耶律余睹。在天祚皇帝的儿子中，晋王最贤明，在朝中很有威信。萧奉先为了使他妹妹元妃所生的秦王定继承皇位，策划了一起冤案。一天，萧奉先看到文妃的妹妹和姐姐在军中会聚，便马上派人去控告耶律余睹结驸马萧昱、耶律挞葛里等，密谋立晋王，逼天祚皇帝为太上皇。天祚皇帝信以为真，下令把萧昱、耶律挞葛里等诛杀，赐死文妃，只对晋王没有加罪。在国家危难之际，轻意杀死朝中重臣，这使本来就濒临崩溃边缘的局势更加恶化。群臣对天祚皇帝、萧奉先乱杀朝臣非常不满，增大了离心力量。耶律余睹在军中听到此事，对天祚皇帝、枢密使萧奉先极为愤恨，同时考虑到自己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下决心率本部兵马投降金国。这给辽军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天祚皇帝得到消息后，急派知奚王府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大常衮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和尚奴、四军太师萧斡领兵追捕。在闾山追上了耶律余睹。他们商议，耶律余睹也为宗室豪杰，只因被奸臣萧奉先陷害才走上绝境。现在主上信任奸臣萧奉先，把我们视如鼠辈，今日擒回耶律余睹，他日我们也会做耶律余睹第二，不如听之任之。诸将领兵返回，报告天祚皇帝，没有追上耶律余睹，耶律余睹降金后，把辽朝详情全部供给金，又做了金军先锋。从此金军南下西进，如同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大大加速了辽灭亡的过程。萧奉先恐怕辽将再有叛降者，劝天祚皇帝对将士加爵加赏，企图笼络众心，天祚皇帝因封萧遐买为奚王，萧德恭为试平章事兼上京留守，众将封为诸卫上将军。而众将不但不思进取，报效国家，反而因封赏不均，引起争执，结果适得其反。耶律余睹降金后，金军大振，公元 1122 年金军在耶律余睹的引导下，攻下辽朝军事重镇中京、大定府。刚从中京逃到燕京的天祚皇帝听到战报，极为恐惧，怕金军追击，急忙出居庸关，逃到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躲避。在这存亡危急之时，枢密使萧奉先又向天祚皇帝献策说："耶律余睹也是宗室裔，他领

金兵进攻，只不过想立他的外甥晋王为帝，如果陛下为国家社稷着想，不惜一子，把晋王的罪状公布于众，然后赐死，耶律余睹就不会再继续引领金兵进攻大辽。”天祚皇帝此时已经六神无主，不得不采纳萧奉先的计策，把晋王敖鲁斡赐死。晋王被赐死的消息传遍军中，人人都流泪叹息，深感大辽灭亡已迫在眉睫，人心更加涣散。杀掉晋王，并没有像萧奉先所估计的那样，相反，耶律余睹引金军分路向鸳鸯泊进攻，天祚皇帝惊慌失措，逃往西京大同府，又败走夹山。在一片众叛亲离的惨状下，天祚皇帝才知道萧奉先不忠。天祚皇帝大怒：“都是你把国家弄成这种样子，今天即使杀了你，也不解我心头之恨，只不过更引起军心涣散，你赶快离开我身边。”天祚皇帝气愤之极，把萧奉先驱赶走。萧奉先携带财物逃跑，中途被金兵抓获，押送给金主，半道上又被辽兵截回，最后萧奉先被处死。

萧奉先作为辽末帝天祚皇帝的权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辽朝朝政，加速了辽朝灭亡的进程。

（陈德军）

参考资料：

《辽史》

《辽史纪事本末》

天祚播迁

公元1101年正月，也就是辽朝寿隆七年，辽道宗在混同江行宫病死，他的孙子耶律延禧依照道宗遗命继承皇位，被称为天祚皇帝。天祚皇帝是辽朝的末代皇帝，他承袭了辽朝历代弊政，加上本人昏庸无能，拒谏饰非，重用奸臣，弄得朝政混乱。他统治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尖锐起来，辽朝自耶律阿保机建立以来历经二百余年，到天祚皇帝这一代走到了尽头。

天祚皇帝是以皇太孙继位的，他的父亲耶律浚即昭怀太子，被耶律乙辛奸党害死，追谥为顺宗皇帝；他母亲萧氏也被耶律乙辛奸党杀害，追谥为贞顺皇后；连同他祖母宣懿皇后一家三人死在奸臣耶律乙辛之手。他即位后，首先惩罚、清除耶律乙辛奸党集团。下诏令说：凡是受到耶律乙辛奸党集团陷害的官民，被免官夺爵的，朝廷为他们恢复官职爵位；被沦为奴隶的，恢复贵族平民身份；被耶律乙辛奸党陷害遭到流放的，由朝廷迎回原地。为表示对耶律乙辛奸党的仇恨，天祚皇帝下令，掘开耶律乙辛、萧得里特等人的坟墓，剖棺戮尸，诛杀他们的子孙，把他们的家属、奴婢分赐给受害人。天祚皇帝的滥杀并没能有效地惩罚耶律乙辛奸党分子。天祚皇帝即位后，任命敢于和耶律乙辛奸党作斗争的萧兀纳为辽兴节度使，加守太傅；任命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兼南院枢密使；北枢密院使耶律阿思加于越，执掌朝政。保守派分子天祚皇帝的叔叔和鲁斡占据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要职，被尊

为皇太叔。在天祚皇帝的权力结构中保守分派分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要职。他们积极维护个人小集团利益，不顾国家利害。在处理耶律乙辛奸党集团过程中，一些人营私舞弊。耶律乙辛奸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耶律塔不也、萧德里底等人秘密贿赂权臣耶律阿思，耶律阿思受贿后，积极为这些人开脱罪责，使他们获得了赦免。这说明天祚皇帝即位时起，就继承了道宗时期腐朽政治的衣钵，贿赂、贪污成风。天祚皇帝也是辽朝历史上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他和前代皇帝道宗同样沉溺于打猎、游乐之中，不理朝政，听信近臣的谗言，结果朝政日益混乱不堪。大臣萧兀纳常常直言上谏，规劝天祚皇帝，忠言逆耳，天祚皇帝对萧兀纳大为反感。佛殿小底王华诬告萧兀纳私自拿走内府库中的犀牛角，天祚皇帝大怒，下诏审讯萧兀纳，夺去萧兀纳太傅官职，降官为宁边州刺史，后又改任临海军节度使。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否善于纳谏，是政治清明的关键。天祚只有一个谏臣萧兀纳，却把他驱逐出朝廷，后来他信用大臣萧奉先，屡屡败事。天祚皇帝统治时期，整个统治阶级生活腐化，穷奢极侈，对人民残酷剥削，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天祚皇帝为了压制人民起来反抗，滥施酷刑造成了“盗贼四起”的危机局面。被当时视为“剧贼”的赵钟哥曾经打进皇宫，抢劫走宫女、御物。天庆三年（1113）四月，爆发了李弘起义，他们用宗教来组织人民，起义遍布五京地区。契丹贵族倾力镇压，才将起义烈火扑灭。女真族乘辽朝日趋衰败，危机加深之机起兵反辽。辽朝统治者为了削弱控制女真族人，对女真人采取民族分化政策，把一部分与契丹邻近汉化较深、比较强大的部落，强行迁人辽阳以南地区，编人辽政府户籍，这部分女真人被称为熟女真。松花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女真人跟契丹人接触机会较少，经济文化发展较慢，被称为生女真。天庆四年（1114）七月，生女真首领阿骨打经过一年的准备，集合精兵二千五百人，发动对辽战争，首先进攻辽朝东北边防重镇宁江州。

当时天祚皇帝在庆州打猎，听到女真犯境的消息，根本没有在意，只令海州刺史统领渤海军应援。结果辽军失败，女真军一举攻下宁江州，士气倍增。天祚皇帝得知宁江州陷落的消息后，下令以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节度使萧挞不也为副都统，率大军讨伐女真。两军在出河店（吉林扶余县境内）交接，展开会战。辽军又败。女真军士气高昂，乘胜又攻克咸州（辽宁开原）、宾州（吉林农安东北）、祥州（吉林农安境内）等地。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以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为都城。

东征军失败后，辽将萧敌里率领的辽军又在沃稜泺被女真军袭击，伤亡过半，萧敌里狼狈逃回。天祚皇帝下令免去萧敌里官职，命令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里朵为行军都统，副点检萧乙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章努为副都统，率辽军迎战。阿骨打率金军在达鲁古城击败辽军都统耶律斡里朵，在涞流河又击败辽将张琳率领的军队，乘胜攻克辽北方军事重镇黄龙府（吉林农安）。天祚皇帝闻讯惊慌失措，下令亲征。他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努为副都统，率契丹、汉兵士十万，号称七十万，东下誓灭金军，妄图跟金军决战，彻底消灭金军。前锋耶律章奴发动政变，辽军兵败，精锐几乎完全被摧毁。从此，战局急转直下，辽朝统治者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进攻了。耶律章努听到天祚皇帝兵败后，大大加快政变步伐，他派遣耶律淳的妻弟萧敌里和萧延留飞驰南京，把废帝之事告诉耶律淳。此时耶律淳对局势缺乏了解，因而犹豫不决。恰在此时，行宫使者携带天祚皇帝的御札也来到南京，耶律淳立斩萧敌里，萧延留乘单骑抄小道到广定淀（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去见天祚皇帝，表示对天祚皇帝忠心。

耶律章努看到耶律淳采取不合作态度，便率军攻占上京。然后祭告太祖庙，当众陈述他举兵宗旨，企图从道义上站住脚，取

得支持。然后率军西到庆州、饶州、祖州，都如法炮制，还对沿途州县发布文告。这样，就收揽了一部分民心。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之时，阶级矛盾尖锐起来。自金人起兵以来，辽朝统治者对劳动人民加重了剥削，为保证兵员，天庆四年（1114）下令括户出兵，又下令括马，人民再也无法忍受。公元1115年，饶州渤海人古欲聚众起义，起义队伍发展到三万多人。后来古欲被擒，起义失败，几千名起义战士惨遭杀害。随后又爆发了几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军作为第二条战线从内部冲击着辽朝统治者。在内外夹击下，辽朝统治摇摇欲坠。

自公元1115年平定耶律章努政变后，天祚皇帝再次布置军事抗金。派遣附马萧特默、林牙萧察喇率数万人进驻驰门。然而不堪一击，在金军的进攻下败下阵来。此时，辽将耶律章嘉努又率部叛乱。耶律章嘉努在天祚皇帝东征时任东征军都监。在金军大兵压境之际，宣布脱离辽军。锦州刺使耶律珠展起兵响应叛军。天祚皇帝被迫分兵，派遣侍御使萧挞不也讨伐耶律章嘉努，在祖州被叛军击败。天祚皇帝又派都部署萧特默率部讨伐，章嘉努联合起义军侯槪攻占高州。天祚皇帝被迫亲往讨伐，才平息了这次叛乱。在天祚皇帝忙于应付内乱之机，阿骨打率金军又攻下沈州（今辽宁沈阳），进而攻占东京（今辽宁辽阳）。东京州县的契丹贵族痕孛、铎剌、吴十、挞不也等十三人投降金军，辽南路及东京等五十四州县遂为金军所有。至此辽朝廷已无一人能独当一面。于是契丹贵族把视线推向魏王耶律淳。天祚帝在契丹贵族的压力下，命令耶律淳为都元帅，募军抗金。耶律淳在辽东招募饥民二万八千人，组成“怨军”，分置八营。另外又选燕、云、平州路禁军数千人也编人怨军八营，共计三万多人。天庆七年（1117）十月冬，天气寒冷，怨军没有御寒冬衣，兵士无法忍受，两营怨军举行反辽起义，掠劫乾州。耶律淳率军前往镇压，在中途遭到金军截击。怨军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一触即溃。金军长驱

直人，新州节度使王从辅降金。随即成州、懿州、卫州等相继降金。耶律淳退兵，金军尾追不放，耶律淳被追在蒺藜山（阜新市北）与金军战，结果怨军大败。

天祚皇帝听到怨军失败的消息，昼夜忧虑，对战争失去信心。命令内库三局准备后事，把珠玉珍宝打点成包，选择一千匹骏马时刻准备逃跑。他对左右近臣说："假如金军来攻，我有两千飞马，南可投靠宋国，北可投靠夏国，仍不失一生富贵。"左右近臣无不寒心，人们私下议论："作为一国之主，不为国家社稷思虑，而为个人进退作打算，辽灭亡恐怕已为时不远了。"在天祚皇帝被金兵追击，辗转流离之际，国内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山前诸路发生饥荒，老百姓以树皮为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汉人张宝儿、安生儿聚众二十万举行起义，大批饥民纷纷加入义军，攻打州县，再有金兵进攻，整个辽朝局面已不堪收拾，奚王回离保出兵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阿骨打称帝以后，采用杨策建议，称大圣皇帝，要求辽对金册封，派遣使者议和。天祚皇帝苦于应战，为求得喘息机会，不惜屈辱，同意对金册封。辽册封金国为大金，金主为大圣大明皇帝，辽帝须用对兄长的礼节对待金帝。同时每年辽送给金岁币银绢二十五万匹两，还把宋朝送到辽的岁币分开赠给金国。辽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金仍不满意，借口对金仍不敬重，继续发兵进攻。天庆十年（1120）四月，金太祖阿骨打率兵向辽都城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附近）进攻，辽将上京留守挞不也率众投降，辽都城被金军攻占。辽朝皇帝天祚帝仓皇出逃到西京大同。这时辽朝国土大半以上被金军占领，在辽朝危在旦夕之际，辽统治上层又发生权力之争。天祚皇帝有六个儿子，即晋王敖鲁斡、梁王雅里、燕国王挞鲁、赵王习泥烈、秦王定和许王宁。其中晋王敖鲁斡为文妃所生，秦王定为北院枢密使萧奉先的妹妹元妃所生。文妃有姊妹三人，姐姐嫁给贵族耶律挞葛里，妹妹嫁给副都统耶

律余睹。在天祚皇帝的六个儿子中晋王最有才能和威望。萧奉先为了使他妹妹所生的秦王定继承帝位，便派人诬告耶律余睹勾结驸马萧昱、耶律挞曷里等阴谋废天祚帝，立晋王。天祚皇帝信以为真，下令杀掉萧昱、耶律挞曷里，赐死文妃。耶律余睹听到后，率部降金。

天庆十年（1120），宋金达到了联合攻辽的协议，从此辽便处在宋、金夹攻的局面之下。金继续攻辽，辽将毫无斗志，不战而降。天祚皇帝昏了头脑，痛恨国人背叛自己，命令汉兵，遇到契丹就杀。按照辽朝旧制度，契丹人杀汉人无罪，汉人早已不堪忍受这种民族压迫，这下得到发泄的机会，抓到契丹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杀死。这种滥杀无辜，引起国中更大的混乱，人人自危，不知所归。保大二年（1122），金军在辽降将耶律余睹的引导下，攻下辽朝中京大定府（今辽宁陵源西）。此时天祚皇帝刚从中京逃到燕京，惊魂未定，听到中京失陷的战报，极为恐惧。为躲避金军袭击，仓皇逃出居庸关，到鸳鸯泊（河北张北县西北）躲避。并采纳萧奉先的建议，下令诛杀晋王。晋王之死在辽军引起了极大反响，人人流泪，深感辽朝真的无救了，从此人心更加涣散。事实正和萧奉先估计的相反，耶律余睹非但没有停止进攻，反而引领金军向鸳鸯泊进攻。天祚皇帝率五千卫士向西京大同府逃去，在金军的追击下，兵士大部分逃散，跟随的只有赵王、梁王三百多人。天祚皇帝逃到西京还未站稳脚跟，金军兵临西京城下。天祚皇帝又逃往夹山（内蒙萨拉齐西北）。此时天祚皇帝才觉察到萧奉先不忠，大怒说："你把我耽误到这种地步，即使杀了你，也不解我心头之恨，徒使军心涣散，你不要再跟随我了。"萧奉先急忙逃跑，逃了不到数里，被金兵擒获，押送给金主。半路又遇到辽兵，被截回。天祚皇帝害怕再出现第二个耶律余睹，下令将萧奉先处死。命萧挞不也指挥禁军，萧僧孝努知北院枢密使事，凡是忠心跟随者，不论官吏百姓，一律加官晋

职。天祚皇帝的滥封滥赏丝毫不能挽回众叛亲离的局面，以后出现了燕王独立，奚王北走自立的分裂局面。

天祚皇帝逃入夹山后，数日消息不通。秦晋国王耶律淳守南京深得人心。保大二年（1112）汉人宰相李处温对外联合怨军，勾结奚王回离保，策划立耶律淳为帝。耶律淳再三推辞，诸大臣说："现在天下大乱，天祚皇帝不知所往，百姓流离失所，不知所归，为安国家定社稷，理应称帝。"大臣李奭从旁边把赭色皇袍披在耶律淳身上，耶律淳在百官欢呼声中即位。群臣上尊号为天锡皇帝，改元为建福元年，降封天祚皇帝为湘阴王，称怨军为常胜军，耶律淳的妻子被封为德妃。分封百官，李处温官封太尉，左企弓为司徒，虞仲文为参知政事，回离保为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大石执掌军旅。这样就形成了包括燕、云、平等州及中京路等部分地区的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北辽。这个割据政权极不稳定，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当年六月，耶律淳患重病，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召见李处温嘱托后事。此时又风闻天祚皇帝传檄天德、云内等州，集合精锐兵马，攻打燕京地区。耶律淳大惊，召群臣商议，李处温提出迎立天祚皇帝的儿子秦王定，抗拒天祚皇帝进入燕京地区，契丹贵族提出异议，两派斗争公开化。耶律淳病危期间，奚王回离保到处活动，争取支持。李处温则暗中结集兵马准备事发。耶律淳死后，按照遗命立秦王定为帝，然而回离保拥兵自重，宣言应立耶律淳之妻德妃皇太后，无人敢持异议。德妃称制后，改元德兴，以北通金、南通宋为罪名杀掉李处温。耶律淳死后，宋朝趁机再次攻打燕京。辽常胜军将领郭药师投降宋军，为宋朝打开进兵燕京的道路，郭药师知道辽军不过万人，如果全军出战，燕京必定空虚，向宋军统帅刘延庆提出绕道袭击的计策。但是刘延庆领兵到了良乡，与辽兵仅有卢沟河相隔，不敢贸然渡河进攻。郭药师半夜渡过卢沟河，天明袭人燕京，与辽兵展开巷战，因刘延庆接应部队迟迟不

到，被迫退出燕京城。刘延庆隔岸望见火光，以为辽军要渡河进攻，慌忙烧营逃走。这次由于宋军配合不当，没有取得成功，不过为金军进攻创造了条件。金军乘机向燕京地区进攻，当年十一月，金军攻到奉圣州（河北涿鹿）。德妃上书金朝请和，遭到金军拒绝，德妃作了最后抵抗。派重兵防守居庸关，金兵临关，辽军望风破胆，不战而溃。金兵入关后向燕京逼进，辽朝大臣左企弓、虞仲文打开城门降金，金军占领了燕京。燕京失守后，回离保、耶律大石等一些契丹贵族率领残兵拥德妃逃出古北口，在关于行军路线上又发生分歧。回离保主张回他的老巢奚王府，耶律大石则主张投奔天祚皇帝。这样契丹兵跟随耶律大石、德妃西去，奚、汉、渤海兵跟随回离保北上。奚王回离保北上后，于公元1123年，在箭笥山自立，称大奚国皇帝。然而他的部下骚扰百姓，引起人民不满，后来回离保被部下所杀，大奚国垮台。

天祚皇帝败走夹山后，在金军追击下，到处流浪，辽朝将士不断投降。西南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附近州郡也纷纷效仿。西京陷落后，沙漠以南部族全都投降金军，天祚皇帝逃往讹莎烈。此时都统码克收集散亡契丹兵士在额勒锦立住脚跟，天祚皇帝封码克为知北院枢密使事。不久敌烈部反叛，天祚皇帝派码克领兵镇压了叛乱。在燕京失陷后，天祚皇帝估计金军必定大规模西进，于是便逃到四部族统治区域。不久又逃到天德军（呼和浩特市东），与耶律大石、德妃所余残部会合。天祚皇帝大怒，杀掉德妃，把耶律淳废为庶人。天祚皇帝进驻云内州，任命知北院枢密使萧僧孝努为诸道大都督，统领辽军，不久金军进攻居庸关，耶律大石被金兵俘获。金军乘胜围攻青塚寨（呼和浩特市昭君墓侧），这次辽军损失惨重，天祚皇帝的儿子秦王定、许王宁、诸王妃、随从大臣都被金军俘虏。只有梁王雅里在硬寨太保特母哥的护卫下逃了出来，来见天祚皇帝。当时梁王有兵士一千多人，超过天祚皇帝的兵力，天祚皇帝担心特母哥要发动政变，想以不

能保全诸王的罪名，把梁王杀死，手执宝剑逼问梁王雅里："特母哥告诉你什么事?"梁王回答："没有说什么。"天祚皇帝不再追问。后来天祚皇帝被西夏国王李乾顺请到西夏，辽将耶律敌烈和特母哥不满天祚皇帝，把梁王雅里劫走，向北逃到沙岭（河北宣化西），拥立雅里为帝。后来雅里患病死去，兴宗的孙子术烈继位，耶律术烈最后也被人杀死。在雅里病死之时，天祚皇帝从西夏回来，看到从金军逃回的耶律大石，责问说："我没有死，你怎么敢立耶律淳为帝?"耶律大石说："陛下以全辽之势不能抵抗金军，弃国远逃，百姓无所归附，就是立十个耶律淳，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胜于乞降他人吗?"天祚皇帝无言以对，只好赦免了耶律大石。保大四年（1124）天祚皇帝得到耶律大石所领的军队，又收集了阴山室韦谟葛的散兵，自以为得到天助，不自量力谋划出兵收复燕云失地。耶律大石对形势作了充分估计，规劝天祚皇帝按兵不动，道："当金人攻陷长春、辽阳时，御驾不往广平淀而迁都中京；上京陷落后，迁都燕山；中京陷落后，则败走云中，又从云中流离夹山。从前军队强大，却不作战备，致使举国为金所占。现在国势残破到这个程度，理应休养兵众，不可轻动。"天祚皇帝怒斥耶律大石怯战。耶律大石无法劝阻天祚皇帝，知道这次出兵无疑会失败，借口生病无法从军。后来他日益对天祚皇帝失去信心，乘机杀掉天祚皇帝的左右枢密使萧乙薛和坡里括，率领所部西走，建立了西辽。西辽，历时九十余年，一直到公元1218年为蒙古所灭。

耶律大石西走后，天祚皇帝一意孤行，强率军队出兵夹山，南下武州（山西五寨），中途与金兵相遇，辽军战败。天祚皇帝仓皇逃回，金军紧追不放。天祚皇帝穿过沙漠时弃掉了马匹，狼狈之极，后来乘坐大臣张仁贵的战马，才得以逃脱。到了天德，天降大雪，兵士无御寒衣物，几乎冻死。天祚皇帝冻得缩作一团，大臣术者献上貂裘帽，才感到稍稍暖和了一些。天祚皇帝领

众继续西行，经过地区全为荒漠，飞鸟野兽绝迹，也无草食可用。众人饥饿难忍，术者找来一点喂马剩下的麦麸和一些枣子献给天祚皇帝，众人只能靠饮雪充饥。天祚皇帝望着这种凄凉景象，回忆起从前的荣华富贵，如同过眼烟云，不由潸然泪下。天祚皇帝继续西逃，想投奔西夏避祸，金兵尾追不舍。保大五年(1125) 二月，逃至应州（今山西应县）东六十里，被金军统帅完颜娄室追上，除耶律大石率一部分人马西逃，全部被俘。天祚皇帝被解送到金都，降封为海滨王，送到长白山一带囚禁。天祚终年郁郁不乐，积忧成疾，在公元 1128 年病死。

（陈德军）

参考资料：

《辽史》

《辽史纪事本末》

西辽始末

天祚皇帝被俘前夕，宗室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契丹人西迁，在我国西北部重建辽朝。直到1218年为蒙古所灭，历史上称其为西辽。

耶律大石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代孙子。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文和汉文，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契丹贵族。天庆五年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应奉，契丹语把翰林称为林牙。所以耶律大石被称为大石林牙。他在辽朝历史上，历任泰、祥两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公元1112年，金军以降将耶律余睹为先锋攻辽，天祚皇帝仓皇出逃，不知音讯。耶律淳据守燕京地区深孚众望，耶律大石等人便拥立耶律淳为帝，继续抗金，耶律大石总掌军权。宋朝统治者乘机发兵进攻燕京，耶律大石亲率军迎战。宋军军纪腐败，又未做好战争准备，结果先锋部队被耶律大石击溃，宋军全线败退。耶律淳病死后，宋军又发兵进攻，辽常胜军将领郭药师率部投降宋军，为宋军打开进兵燕京的道路。郭药师率军一度攻人燕京，耶律大石组织辽军与敌展开巷战。宋军由于配合不当，孤军深人，被耶律大石击败。自耶律淳死后，辽内部发生矛盾，耶律大石等人拥立德妃，处死权臣李处温。燕京失守后，内部又发生争执，奚王回离保为个人打算，决心回他的巢穴奚王府；耶律大石等人主张投奔天祚皇帝，重整旗鼓，继续抗金。这样回离保率领奚、汉、渤海兵北上；耶律大石、德妃率领契丹兵西走。公元1125年二月在天德军汇合了天

祚皇帝，天祚皇帝大怒，杀掉德妃，把耶律淳废为庶人，耶律大石在居庸关之战中被金军俘获。十月，耶律大石从金军逃出，去见天祚皇帝，天祚皇帝责问耶律大石："你身为辽宗室大臣，怎么敢私立耶律淳，背叛我?"耶律大石反问天祚皇帝："陛下拥有全辽之众，不能抗金，弃国远逃，百姓无所归附。我就是立十个耶津淳为帝，这些人都是太祖子孙，难道不胜于乞降他人?"天祚皇帝于是哑口无言，不得不赦耶律大石无罪。从耶律大石言行中可以看出，耶律大石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以复兴大辽为己任，这就是他后来背弃天祚皇帝，西行大漠，建立西辽的原因。天祚皇帝得到耶律大石所领的军队，又收集了阴山室韦谟葛的散兵游勇，见人马渐多，自以为得到天助，不自量力，出兵东征。耶律大石分析了辽金战争的历程和现在的形势，劝谏天祚皇帝不要出兵，应待机而动。天祚皇帝没有听从耶律大石的建议，反而怒斥耶律大石。耶律大石料定天祚皇帝这次东征必定会全军覆灭，于是就借口患病不肯从行。耶律大石对天祚皇帝深感失望，杀掉阻拦出走的左右枢密使萧乙薛和坡里括，毅然领兵西走。正如耶律大石所料天祚皇帝东征失败，在败退中，被尾追的金军俘获。

耶律大石率部日夜不停向西奔走，渡过黑水（今蒙古百灵庙北艾不改河中），远离金军，到达安全地带。在这里白达达详稳床古儿（辽附属部族）献上马匹、骆驼羊等物品。耶律大石得到补充给养，进行了短期休整，然后辞别白达达部，率军继续西行。数日之后，到达辽西北重镇可敦城。这个军事政治中心，控制着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十八部族。为了团结安抚这些部族，耶律大石召集大黄室韦、敌刺、乌古里、阻卜等十八部族王众，向他们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耶律大石慷慨激昂陈词："我祖宗艰苦创业，建立大辽，历经九帝，二百余年。金本为我大辽臣属，受我大辽恩惠，然而其背信弃义，屠掠我大辽州邑，残害我大辽百姓，迫使我天祚皇帝四处流离，日

夜痛心疾首。现在我激于大义，西行到此，就是要与诸位复兴大辽，救我君王、百姓出水火之中。”耶律大石志在恢复辽朝的决心，感动了诸部酋长，他们愿出兵马帮助耶律大石，使耶律大石得到了一万多精兵。此后，耶律大石重建官僚机构，设置官吏，士气大振。这个时期，金发动了对宋的战争，无力西顾，只能通过争取西夏来稳定西北地区的统治，这种形势为耶律大石向西发展提供了条件。

公元1125年，耶律大石率领大军及突厥、通古斯等部众用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祖宗，举行隆重的仪式。然后，从鄂尔浑河畔出发，向西行进，一路浩浩荡荡。经过甘州时，向回鹘王毕勒哥写信要求借道，信中说：“我太祖北征时，经过卜古罕举城，曾诏见你们的祖先乌穆珠，对他说：你们思念故国，我替你们收复，假如你们不愿返回，我就拥有它，属于我就和属于你一样。你先祖曾向我先祖称谢，说国家迁移到这里已有十多代了，军民都安土重迁，不愿再回去。我们两国世代友好。现在我要西到大食，从你们国家经过，请你们不要疑心，让我们顺利经过。”回鹘王非常信任耶律大石，亲自迎他们到来，并宴请耶律大石及辽将领。临别，回鹘王又送给六百匹马，一百头骆驼，三千只羊，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耶律大石西走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对金仍是一个威胁。金害怕耶律大石和西夏联合，曾派耶律余睹率兵追讨。耶律余睹向沿途西北部族征兵，遭到西北诸部族的反对，追到兀纳水（鄂尔浑河上游）无功而回。后来金又派使者向西夏询问耶律大石去向。西夏国王对金使者说：“小国与和州地不相接，不知道耶律大石去了何处。”

耶律大石西行万里，沿途数国归附，所获骆驼、马匹、羊不可胜数。大军西行到叶密里（新疆塔城附近），征服了这一地区的突厥人，四万多户当地居民归附耶律大石，耶律大石就在此地

建了一座城市。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称帝，号葛尔汉，也称天祐皇帝。年号延庆。大封百官，册封其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建立了政权，历史称为西辽，也称黑契丹、哈剌契丹。从西辽采用汉文尊号、庙号、年号，官廷官府也使用契丹文，钱币、铸印用汉文，官制也分为南面官和北面官等现象来看，西辽是辽在新的民族地理环境下的发展和继续，也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公元1126年，耶律大石领兵到中亚的吹河（楚河）流域，这个地区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建立的哈拉汗王朝的统治地区，它常受到近邻突厥部族葛罗禄和康里的侵袭掠夺。葛罗禄居住在金山以东到巴尔喀什湖一带，康里居住在乌拉尔里河以东，到咸海以北一带。回鹘人听到耶律大石领兵到来，就派人向耶律大石陈说愿意归附西辽，请大石领兵迁入他们的都城，保护当地回鹘居民。耶律大石迁入后，把该城改名为虎思斡尔朵，正式定为都城，派遣官吏到各个区域施行统治。同时展开军事活动，扩展其统治区域。西辽征服了康里地区的突厥部族，便开始了东征，目的是恢复大辽。东征前耶律大石作了周密部署，任命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萧查剌阿不为副元帅，耶律燕山为都部署，耶律铁哥为都监。整编七万骑兵，誓师东征。他站在大军前作了演说："我大辽从太祖、太宗，历尽艰苦，创立大业。其后嗣君沉溺于玩乐，不理朝政，致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瓦解。我率军西迁朔漠，目的是复兴大辽……。"又对元帅萧斡里剌三令五申说："你率大军东征应当赏罚分明，与兵士同甘共苦，凡事量力而行。选择有水草的地方驻营。"耶律大石目送元帅萧斡里剌率领七万铁骑，浩浩荡荡东征而去。

辽军东征到喀什喀尔。从前这里本属辽地，现在原有辽朝的许多汉人和契丹人归属了亚哈默德王。他们受其役使，为亚哈默德王防守边界。他们闻听辽军到来，纷纷投奔辽军。辽军攻占了喀什喀尔，进而征服和阗，随后又进军和州。和州是畏兀儿人的

都城，畏兀儿是回鹘的一支，十世纪末他们建立高昌回鹘政权，统治辽阔的地区。东征军征服了畏兀儿后，在这里设立少监专管畏兀儿事务。辽军继续东进，所过地区大部分是沙漠，牛马多数饿死病死。大军缺乏给养供给，不得不退兵返回。东征受挫后耶律大石制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进军到阿姆河地区。当时这个区域广布着突厥部族，耶律大石西进过程中遭到他们的顽强抵抗。在马窝那哈儿，辽军和统治这个地区的国王马哈木德所领部族相遇，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击败了马哈木德，马哈木德逃到撒马尔干，重整军队，并恳求塞尔柱苏丹桑节尔的援助。呼吁回教国家联合起来，抗击异教徒，发动宗教战争。一时得到罗珊祃咱答尔、塞介斯坦、伽色尼以及其他回教国家的响应，组织了以塞尔柱苏丹桑节尔为统帅的十万突厥联军，声势浩大地越过阿姆河，迎击西辽军队。耶律大石面对来敌镇定自若，详细分析了敌情，认为联军不过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制定了作战计划，派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率二千五百人攻打联军右翼，枢密副使查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率兵二千五百人攻打联军左翼，亲率军队从中路突破。大战开始，西辽军三军同时展开攻击，联军惊慌失措，纷纷败退，战斗十分激烈。结果联军大败，桑节尔逃走，许多回教首领被俘。西辽军队击败突厥联军后，派萧查阿剌不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在西辽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花剌子模归附了西辽。这样，耶律大石通过长期的征服战争，在中亚地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地区，西辽沿用中原封建制进行统治，在赋税制度上沿用汉族、契丹的什一税和户调制，对臣属国实行不驻军队的羁縻政策。据记载只要该国国王用一块银牌系在身上表示对西辽的臣属就可以了。西辽的建立制止了南来游牧部落和诸城市雇佣军的骚扰，保护了西域各族商人的远程贸易，促进了西亚地区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公元 1143 年，耶律大石病死，皇太子耶律夷列年幼，皇后塔不烟执政，改元咸清。七年后塔不烟病死，耶律夷列执政，改元绍兴。在位十三年病死。皇太子年幼，耶律夷列的妹妹普速完执掌国政。改年号为崇福，自号承天太后。承天太后是都元帅萧斡里剌的儿子萧朵鲁不的妻子，她和萧朵鲁不的弟弟朴古只沙里私通，谋害了萧朵鲁不。都元帅萧斡里剌闻讯后大怒，率兵包围皇宫，杀死承天太后和朴古只沙里，另立耶律夷列的次子直鲁古为帝，改年号为元禧。元禧皇帝是西辽的末代皇帝，他在位三十四年。在他统治时期，西辽开始没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天禧二十五年，统治今阿富汗地区的郭耳王朝起兵入侵花剌子模，直鲁古派兵击退了来犯的郭耳人。但花剌子模在胜利后强大起来，日益不满西辽的统治，开始不向西辽纳贡，两者关系紧张起来。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策划推翻西辽。他领兵征服阿姆河北岸地区后，派出一支军队到其他臣属国煽动反辽，得到了辽附属国的响应。正当西辽境内出现混乱之时，蒙古族强大起来。蒙古族著名领袖铁木真（成吉思汗）征服蒙古各部族，公元 1204 年，乃蛮部太阳汗被铁木真杀死，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联合其他部族进行反抗，结果失败。公元 1208 年屈出律逃到西辽，受到直鲁古礼遇。直鲁古是个昏庸无能的统治者，他把女儿嫁给屈出律。屈出律为讨直鲁古欢心，由信奉景教改信了佛教。直鲁古允许乃蛮残部进入西辽境内，一时乃蛮部族纷纷涌入西辽，这为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打下了基础。屈出律看到西辽统治日趋衰落，企图收集散居在西辽境内的乃蛮部和蔑儿乞部的残余部众，伺机篡夺西辽政权。他向直鲁古请求说："我离开自己的部落已经很久了。我打听到我的很多族众和军队流散在叶密立、海押立和别失八里地带，我要到那里把他们召集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至于我，请陛下放心，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依照忠诚和道义，听从您的命令。"直鲁古被屈出律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对屈出律倍加信任。而且还供应屈出律一切费用去招集乃蛮、蔑儿乞残部。屈出律迅速组成了一支蒙古军队，势力大增。屈出律为篡夺西辽政权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首先他利用臣属国对西辽统治的不满，挑起花剌子模等国对西辽的战争，转移直鲁古的视线。他与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及撒马尔干王奥斯曼达成协议，商议东西夹攻西辽。穆罕默德和奥斯曼率联军从西部进攻，取胜后，从花剌子模到阿里麻里（新疆霍城县）和可失哈里的西辽领土归于花剌子模。屈出律率蒙古军队从东部进攻，如果取胜，从叶密立（新疆额敏县东）到费纳客特河（锡尔河）的西辽领土归于屈出律。战争开始后，西辽皇帝直鲁古派大军三万讨伐撒马尔干，结果联军失败。屈出律乘西辽军队调往西部之机，集中兵力从东部发动攻击，偷袭了讹迹邗城。直鲁古抽兵攻打屈出律，两军在真不只河展开激战，结果直鲁古又打败了屈出律。这时花剌子模国王默罕默德重又发兵进驻撒马尔干，与撒马尔干的奥斯曼合兵，进攻西辽西部重镇塔剌斯，西辽军队大败，城被攻下，守将塔延古被俘。八喇沙衮城内军民见无兵来援，失去守城信心也被迫投降。直鲁古的军队从东线被迫撤退夺回八喇沙衮城。为了报复，西辽兵大肆抢夺财物，屠杀无辜。当时西辽政府财政困难，统兵将领马哈默德抢掠了很多财物，害怕辽政府追回，因而下令士卒把掠夺来的财物收为官有，引起将士不满，很多人携带财物逃走，西辽军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屈出律乘机进军包围了直鲁古。天禧三十四年（1211），屈出律俘虏了直鲁古，夺取了西辽政权。仍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两年后直鲁古病死。屈出律夺取西辽政权后仍称西辽。不过许多原臣属国纷纷独立，西辽领土大大缩小。屈出律篡位后统治西辽七年。他统治时期，西辽境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宗教矛盾都非常尖锐。由于他是篡位者，喀什喀尔、和阗、叶尔羌等地人民不服从他的统治，他派军队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用武力迫使伊

斯兰教徒改信佛教，激起伊斯兰教民的反抗怒火。起义暴动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生产发展。公元 1218 年，成吉思汗西征，大将者别率领四万大军进攻西辽，屈出律仓皇出逃。者别在西辽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并保证不干涉当地居民生活，赢得了广大伊斯兰教民的支持。他们纷纷起来杀掉居住在老百姓家中的屈出律士兵，可散等二城的守城官曷思麦投降蒙古军，充当了者别大军的先锋，追击屈出律，很快占领了西辽都城。蒙古军追击到巴达岭(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擒杀了屈出律，西辽其他城镇也相继投降。西辽至此彻底灭亡。

（陈德军）

参考资料：

《辽史》

《辽史纪事本末》

金朝建立与扩张

女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商周时称为肃慎，两汉三国时称挹娄，北朝时称为勿吉，有七个部落并存。隋朝时称靺鞨。唐朝初年，以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最出名。粟末靺鞨起初依附于高丽国，后来独立称王，成为渤海国，传了十几代；黑水靺鞨部一直居住在原先肃慎族的领域，东临大海，南接高丽国。唐开元年间派使向唐皇朝拜，受封后设立黑水都督府。后来渤海国强盛了，黑水靺鞨部就隶属于它，停止对唐皇的朝贡。唐末五代，契丹族崛起于中国北方，建立了辽政权，全部侵占了渤海国领土。于是黑水靺鞨部也就随着附属于辽国，辽对其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一部分迁到辽阳以南入辽籍，称“熟女真”；另一部分生活在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之间，称为“生女真”。创立金国的完颜部就是“生女真”中的一支。

金朝将函普奉为始祖。他生活在公元十世纪初，那时已按父系计算血缘关系，说明至少从那时起，女真已进入了父系氏族制阶段。到六世景祖乌古乃时，完颜部已非常强大。辽国为了控制生女真，封乌古乃为生女真节度使。乌古乃虽然接受辽的官号，但始终借故不肯入辽籍。与此同时，他用高价从邻国购进铁器，修弓箭，造器械，开始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先后统一了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五国等部。到穆宗盈哥时，生女真各部逐渐统一起来。并募兵一千多人，形成了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就在这个时代，女真族的建国者完颜阿骨打诞生了。

太祖完颜阿骨打是金世祖劾里钵的第二个儿子，生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七月一日，母亲是后来被奉为翼简皇后的拏懒氏。阿骨打自幼就与众不同，生得力大过人，且举止端庄宁重，深得世祖喜爱。世祖曾抚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儿长大了，我可以无忧了。"连年的部落战争使阿骨打深受熏陶，养成了尚武精神。自童年起就喜欢引箭射猎，以善射闻名遐迩。有一次，一辽朝使者到完颜氏府上做客，恰巧有一群鸟从天空飞过。辽使者对世祖说："闻听令公子骑射技艺超群，可否当堂一试？"站在边上的阿骨打闻言，拉弓便射，只见弓弦响处，三只飞鸟应声而落。辽使大为叹服，连称阿骨打"真天下奇男子也"。不仅如此，由于他力大无穷，一箭便可射出三百二十步远，这更是别人所不能达到的。青年时期，阿骨打就随父亲四处征战。他作战勇猛果敢，功勋卓著，在女真各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父亲临死前拉着阿骨打的手，对自己的继承者盈哥说："惟有这个儿子可以了结契丹的事情。"意思是说将来只有阿骨打能统帅女真人摆脱契丹的统治和压迫，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自从女真隶属辽以后，辽统治者就以各种方式残酷地压迫和掠夺女真各部。只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征伐女真，一次就生获女真十余万人、马匹二十多万，还有各种财物不计其数。辽末时，契丹统治者已极端腐败，更加紧了对女真人的奴役和勒索，给女真人造成极大的灾难。女真每年向辽朝贡北珠、貂皮、良犬、俊鹰等，其中以海东青最受欢迎。海东青，是一种强健的鹰，产于女真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以东至乌苏里江口的松花江两岸）。它善于捕捉天鹅，是一种非常名贵的飞禽。契丹皇帝与贵族喜欢打猎，酷爱海东青，因此每年冬天都派兵去五国城，搜取海东青，女真人不胜其扰。到辽天祚帝时，责贡海东青更甚，女真人恨之入骨，常把捕海东青的使者射杀以示反抗。

此外，辽还在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头城子）设立榷场进

行不平等的贸易掠夺。在这里，女真人以北珠、生金、人参、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等土产进行交换。契丹经常以低价换取，并肆意抓捕、羞辱女真人，称为“打女真”。

最令女真人忍无可忍的是辽“银牌使者”的骚扰、羞辱。所谓“银牌使者”是指每当有紧急事件时，辽朝派来征发兵马的腰悬银牌的那些人。他们每到一地，不但贪纵骄横，而且每夜须由中、下层未出嫁的姑娘陪伴住宿（所谓“荐枕”）。后来使者络绎不绝，他们仗着大国的权势，自己挑选美貌女子，既不问人家有无丈夫，也不问是否女真贵族家妇女，这引起了女真各阶层的强烈不满，纷纷叛归阿骨打，要求聚兵与辽对抗。一场反压迫剥削的斗争在迅速酝酿着。

阿骨打在积极积蓄力量反辽的同时，也试探辽的反映。天庆二年（1112）春天，辽天祚帝前往春州，到混同江钓鱼。按照旧例，辽国境外的女真各族酋长，凡在千里以内的都要前来朝拜。辽主依契丹风俗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大摆“头鱼宴”（辽朝皇帝每年当冰解冻时，即赴江边，让人凿冰钓鱼宴饮为乐，称头鱼宴）。酒至半酣，天祚帝命来朝的酋长依次跳舞。轮到阿骨打时，他推说不会，拒绝接受命令。虽经再三劝说，始终不从。头鱼宴事件是阿骨打揭竿反辽的问路石。他从混同江归来后，加紧反辽步伐，吞并了附近的小部落。与此同时，为了麻痹辽统治者，他继续维持对辽的贡奉，还不时贿赂契丹权贵，使他的反辽行动不致引起辽朝君臣的注意。

女真对辽国的反抗已箭在弦上。阿骨打先向辽索要女真叛逃者阿疏，辽未允，阿骨打便以此作为口实开始大举反辽。阿疏是女真纥石烈部的首领。穆宗盈歌在位时，他的势力就被消灭了。后来，投奔到辽国，企图借助辽国势力东山再起，以阻止完颜部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完颜部几次要求交还阿疏，辽都未允。阿骨打就任女真首领后，又一再派人同辽交涉。使者在辽宫看到天祚

帝骄奢淫逸，国事日废，回来向阿骨打报告。阿骨打认为反辽的时机已到，便号令各部修整器械，建筑城堡，练兵牧马，做好伐辽的准备。辽得知女真各部厉兵秣马，派使来诘问。阿骨打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女真是小国，侍奉大辽丝毫未敢不尽心，而大辽却不施恩惠。今辽若不将阿疏交还，我们决不再束手被制。"

天庆四年（1114）九月，阿骨打高举起反辽旗帜，首先向辽北方军事重镇宁江州进军。先以二千五百人汇集于涞流河（今吉林省与黑龙江交界的拉林河），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历数辽的罪状。阿骨打说："我们世世代代侍奉辽国，恪尽职守，按时纳贡。还为辽平定了乌春、窝谋罕之乱，攻破了萧海里。但辽国不但有功不赏，反而侵夺侮辱我们，包庇窝藏罪人阿疏。今天我等要向辽兴师问罪，求天地明鉴，保佑我们一举得胜。"接着，他又告诫将士说："此次伐辽，你们要同心协力，奋勇杀敌。立功的，奴婢、部曲放免为平民；百姓加官授爵；为官的，依功劳大小予以升迁。若违背誓言，畏敌不前，不但自身要被处死，连家属也罪责难逃。"说完，命诸将传梃而誓。此时，辽天祚帝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秋山射鹿。阿骨打大军一路英勇奋战到了宁江州。他身先士卒，亲手射杀辽军前线大将耶律谢十，使人心大振。十月，宁江州破，俘获了辽防御使大药师奴。宁江州大捷是女真族反辽压迫斗争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为女真族后世广为传颂。金世宗时还特意在此建"大金得胜陀颂碑"以为纪念。

女真军攻下宁江州后，辽天祚帝派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不野为副都统，率契丹、奚军、中京禁兵及各路武勇七千人向出河店进军，准备在那里与女真军决战。两军在鸭子河（今松花江）对垒。关于此战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有天晚上，阿骨打刚要入睡，仿佛觉得有人在他头上抚摸三下。他一下子惊醒了，说："神明指示我连夜起兵。"女真军行到鸭子

河边时，见辽军正在破冰凌道。阿骨打命大军迅速渡河。刚渡了三分之一，便与辽军遭遇。突然间大风骤起，风沙弥漫，尘埃蔽天。女真军乘着风势，奋勇向前，把辽军杀得大败。传说虽然神奇，却说明阿骨打此战给了辽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出河店一战缴获了辽军的大批军用物资。使女真军势力大增，队伍也壮大到万人，为摆脱辽朝统治，建立金王朝奠定了基础。此后，女真军又乘胜进击，攻下宾州、祥州、咸州，在军事上形成了直捣黄龙府之势。

女真军连连胜利，壮大了声威，阿骨打之弟吴乞买及诸将纷纷劝进道："现在大功已建成，若不及时称帝建号，无以系天下人心。"阿骨打推辞一番后，于公元1115年即皇帝位。在定国号时，他说："辽国号称宾铁，宾铁虽然坚硬，终归会变锈而损坏。只有金既不会变锈，也不会损坏，况且金的颜色是白的，我们完颜氏部族在色彩上也正推崇白色，不如以金为国号。"于是国号定为大金，年号为收国。

金朝建立后，阿骨打又立即投人反辽斗争。他决定先进攻周围城寨，以断黄龙府外援。为此发动了达鲁古城（今郭尔罗斯前旗的塔虎城）战役。战前，他登上高地，眺望敌营。见辽军像灌木丛一样铺天盖地，回头对随从将领说："辽军已人心涣散。虽人数众多，并不可怕。"于是令金军选高处列阵，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敌营。辽师溃不成军，仓皇而逃。八月，阿骨打亲征黄龙府。《金史·太祖纪》记述说，当女真军行进到混同江边时，见江宽水急，白茫茫一片，又无渡江船只。阿骨打骑着他的赭白马对将士说："我先乘马渡江，你等看我的马鞭所指而行。"说着扬鞭冲入江中，大军在后紧紧跟随。奇怪的是江水只抵马腹，于是平安地渡过江去。后来再派人测量江水，却深不见底，金人传为神话。攻城时，将士们奋不顾身，英勇向前。辽军抵挡不住，弃城而逃。于收国元年九月攻克黄龙府。

消息传来，辽天祚帝大为惶恐，亲率契丹、汉军七十万进驻驼门。十二月，阿骨打率军到达爻剌，召集诸将会议说："辽兵号称七十万，仅带几个月的粮草，来势汹汹，看来要有场硬仗。我军远行至此，人困马乏，应先休整一下，深挖沟、高筑墙以待敌军。"战前，阿骨打为了激励女真将士，又依女族"嫠面"风俗，用刀把自己的前额划破，仰天大哭，与部众诀别说："最初我和你们起兵，是苦于契丹的残暴统治，要建立我们女真人自己的国家。今辽主亲自率军来战，该怎么办？不拼死决战，就不能挡住辽军的进攻。不如你们杀了我一族，拿着我的人头去投降契丹，或许可以转危为安。"众将士闻言，深受感动，不约而同地说："事已至此，我们坚决听从命令，与契丹军决一死战。"正当两军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辽先锋都监耶律章奴发动政变，打算拥立燕王耶律淳为帝。天祚帝闻知，忽忙从前线西还。阿骨打率军追击，在护步答冈两军相遇。当时，辽军号称七十万，金兵只有两万人。阿骨打对将士们说："敌众我寡，不能分散兵力。敌人以辽主所在的中军力量最强，只要打败中军就能取胜。"金军遵照阿骨打的指挥，两翼合力出击，辽军惨败。天祚帝退保长春州（今吉林大定县东南他虎城）。

辽军屡败，内部发生叛乱，各族人民起义和士兵厌战的情绪也不断高涨。东京辽阳府爆发了渤海人高永昌发动的叛乱，于收国二年闰正月，向金军求援。四月，阿骨打令斡鲁统率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占乃，会同咸州路都统斡鲁古，合力讨杀了高永昌。东京州县和南路系于辽籍的女真人也归附了金朝。至此，阿骨打实现了对整个女真族的统一。

金军占领东京州县后，开始向西夺取辽上京。天辅元年(1117)，获悉辽在上京道长春州和泰州方面没有任何准备。阿骨打立即命都统杲率宗雄、宗干、娄室等将兵一万进攻长春州。辽军不战自溃，金兵又乘势攻下了泰州（今吉林洮安县东北城四家

子）。

长期的战争实践磨练了阿骨打，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随着灭辽战争的胜利进行，他采取了一整套的以民族政策为核心的政治措施。收国二年正月，下诏说："自破辽兵以来，四方来降附的人很多，对他们应加以优恤。自今开始，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凡民已经归降的或被俘获、逃跑而又归来的，都不治罪。其酋长仍保留官职，生活上要予以妥善安排。"天辅二年又发布诏令："凡是新降附的各族人民都要加以安抚，发给官粮，使他们安居乐业。"对于辽统治下的汉人，阿骨打采取录用贤才的政策，选择优秀的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参加金朝政权。如辽朝旧臣、汉族士人左企弓、刘彦宗、韩企先等都受到器重，在金初政权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一系列的招抚政策使人心归附，加速了灭辽步伐。天辅四年，阿骨打再次兴兵伐辽，于五月占领了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第二年，又以忽鲁勃极烈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昱、宗翰、宗干、宗望、宗磐等为副，继续四出征伐，先后攻占了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老哈河北岸大名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使辽朝濒临最后灭亡。连年的征战使阿骨打积劳成疾，重病复发，于天辅七年（1123）八月去世。九月，阿骨打的同母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继承帝位，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继续兴兵伐辽。

金军攻克燕京，辽天祚帝率数千残兵败将仓皇北逃。天辅七年四月，宗望、娄室、银术可率领二千金兵，于青塚寨（今呼和浩特市昭君坟侧）围攻辽军大营，俘获了天祚帝的儿子秦王定、许王宁及诸妃、公主、从臣，缴获了大批战骑武器，天祚帝逃往西夏。天会二年（1124）七月，天祚帝自夹山出兵，南下武州（今山西五寨），遇金军。双方展开激战，辽军大败。天会三年

(1125) 二月，天祚帝逃至应州（今山西应县）新城东六十里，遇大雪，被尾随追击的金军统帅完颜娄室擒获。至此，女真人经过太祖、太宗两代帝王的顽强战斗，终于完成了先辈的夙愿，灭掉了辽朝。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始祖》、《景祖》、《世祖》、《穆宗》。

《太祖本纪》

《太宗本纪》

《金史纪事本末》：《帝基肇造》、《太祖建国》、《克辽诸路》。

《太宗灭辽》

《契丹国志》：《天祚纪》。

《辽史》：《天祚帝纪》。

宗翰乱政

金朝建立后，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以及汉族对女真族影响的加强，内部出现了新旧两派势力的长期斗争。最后以熙宗改革宣告了旧势力的彻底垮台。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宗翰。他出身于女真宗室家庭，是国相撒改的长子。在金朝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地位和声望都很高。宗翰十七岁时，就以勇猛善战著称。伐辽时，多与太祖意见相合，得到太祖的重用。公元 1117 年，太祖在边境上打败了辽军。撒改派宗翰和完颜希尹前来祝贺胜利，宗翰第一个称太祖为皇帝。当时宗室大臣极力劝进，太祖谦让不从。宗翰进言说："如今打败辽军，我军声威大振，您若不及时建立国号，就无法维系天下人心。"这些话说服了太祖，才即位建立了金朝。宗翰又奏说："辽君主已失去贤德，群臣都对他三心二意。我朝虽已建国，大敌未除，以后定会成为祸患。现在应乘他们来挑衅，举兵攻打，夺其土地。天时、人事都已具备，不可坐失良机啊。"太祖同意他的看法，马上命令各路备战。在欢宴群臣时，太祖对宗翰说："今天议论西征，你前前后后所说多合我意，宗室中虽有比你年纪大的，若选择元帅，没有谁可以取代你。你要整治军队，等候出兵之日。"说着，太祖亲自斟满一杯酒，命他一饮而尽，并要脱下御衣给他穿上。此后在取得临潢胜利时，各将领都产生了懒惰轻忽之心，宗翰却请求乘机攻取山西，并单独出兵，派六千军日夜兼程袭击辽军，取得了灭辽的决定性胜利。那时太宗已

继帝位，特赐宗翰空名宣头一百道，不用请命即可授予官爵。

宗翰虽在灭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太宗采纳宗干、宗弼等人的建议，准备进行社会改革时，却结成朋党，极力反对，成为旧奴隶主顽固势力的代表。为了南下伐宋，天会三年（1125）太宗设置都元帅府，分东、西两路军。西路军以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右副元帅、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宗翰与完颜希尹早有勾结，实是撒改、欢都两个有权势的家族的纠合。他们还纠集渤海人高庆裔、奚人萧庆以及原辽一些官僚集团，从而结合成一个庞大的派系集团。东路军统帅先后是宗望、宗辅为右副元帅，宗弼、挞懒也属这一路军。这样看来，西路军掌握在属于皇室远支亲属的女真贵族手中，东路军主要掌握在太祖近亲的手中。这两路军统帅虽在侵宋灭宋的问题上一致，在如何对待汉人的问题上却产生了矛盾。宗翰一派主张按女真习俗建猛安谋克制；宗望等则主张以汉官制统治汉人。太宗采纳了宗望等人建议，决定在女真人旧地和辽东的汉人，渤海人居住地区实行金人的猛安谋克制，而在燕京以南的汉人聚居区采用汉官制。

两派矛盾的深化还表现在对枢密院的控制上。天辅七年（1123）太祖命辽朝降臣左企弓依汉制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县）设立枢密院。太宗继位的第二年（1124）迁到平州。天会三年（1125）十二月，攻克燕京，枢密院也迁至燕京，改由刘彦宗主管院事。燕京一品以下官员都由刘彦宗承制授官，参用燕人和宋人，共同辅佐宗望的东路军。燕京枢密院的实权是掌握在宗望手中。天会二年（1124）二月，西路军统帅宗翰上书奏请太宗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另建枢密院。以时立爱主管院事，多任用辽旧官僚，不用宋人。人们称这两个枢密院为“东朝廷”和“西朝廷”。天会六年（1128）刘彦宗病死，东枢密院改由宗翰的心腹韩企先主管。不久，宗翰又将东枢密院合并到云中的西枢密院，由其心腹韩企先、高庆裔主管。这是宗翰一派发展和扩大势力的

重要一步，接着又抢先推荐刘豫做大齐皇帝，从而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区控制在宗翰一派手中。

宗翰继续扩展自己的势力。天会八年（1130）太宗所立继承人斜也病死。天会十年四月，宗翰对宗干说："皇位继承人的位置空虚已久。合剌是先皇帝的嫡孙，应当立为继承人。"还勾结完颜希尹和宗干，入宫进言。以太祖遗训为由，迫使太宗下诏，以太祖嫡孙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继承人），以宗磐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右副元帅宗辅为左副元帅。这样，宗翰一跃成为军事最高统帅。同时还规定：凡是军国大事一律申报元帅府，由都元帅决断。这使宗翰的权势达到了最高点。

太宗在位期间积极进行革新，以安定生产。如颁诏令：严禁女真士兵骚扰汉人，以误农时；严禁私役百姓，禁止将汉人变为奴隶。他颇重视农业，派劝农使到各地敦劝农桑，还多次减免农民的赋税。与此相对，以宗翰为首的守旧势力却对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掠夺。他们采用严刑峻法，以专杀立威。天会九年(1131)，宗翰采用大同尹高庆尹、高庆裔的建议，凡是窃盗赃一钱以上的都处以死刑。云中有人在市上拾了一包遗钱，便被杀头；萧庆知平阳府，有行人路过一片菜圃，拔了几棵葱，也被问斩。宗翰又令各州县设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层：死囚居下层；流放的犯人居中层；被笞杖的犯人居上层。外面建有夹城，围以壕沟。宗翰怕百姓南归及四方有奸细人境，接受高庆裔的建议，下令：诸路百姓不得擅自离开本籍。如要出行，须向五保邻人、百人长、巷长、次所司报告出行人数及所带行李，再申报州府才发给通行证。一路上经过市肆客舍被检验后才能饮食、住宿。到达目的地后，把通行证上交官府，返回时再换发新的通行证。这种种无理限制和恐怖，致使当时小商细民坐困乡里，大道上人迹罕见。

此外，宗翰还强迫汉人接受女真习俗，禁穿汉服，强令薙发，拒不从命者格杀勿论。天会七年（1129）六月，元帅府下令禁民汉服，削发不合式样的处斩。知代州刘陶在集市上抓住一个军人，只因他顶发稍长，大小不合式样即处斩刑；又有发现平民穿短裤的，也被指责成着汉服而处死。不仅如此，宗翰还大肆掠夺汉人做奴隶。天会八年（1130），宗翰密谕诸路：在同一天内大索两河人民。各州县都紧闭城门，抓路上行人，连抓了三日才罢。抓到的客户全部并籍人官府，在身上刺“官”字，用铁索链锁押到云中（今山西大同），散养在民间。或标价出卖，或赶到回鹘诸国换马，或卖给萌骨子、迪烈子、室韦、高丽做奴。被掳到云中的人关在城内不许出去，有的士大夫竟沿街行乞。宗翰闻知此情，怕城中贫民生事，就假说城外赈济粮米，诱使三千人出城。饥民们满怀希望向城外奔去，被早等在那里的甲兵团团围住，全部活埋。哭嚎之声震天，令人惨不忍睹。

宗翰实行淫刑毒政的同时，还在朝中树立党羽、排斥异己。天会十年（1132）三月，实行“磨勘法”，对官吏资格进行调查及勤务评定。韩企先“甄别人物”依据所谓的“君子”、“小人”，其实他们排斥的多是懂吏事，有实际才能的人。经过“磨勘”，许多有识之士被排挤出朝。“评定”实是高庆裔、韩企先等秉承宗翰之意搞派系专政，以为其在中原掠夺与奴役创造有利条件。

正当守旧派势力气焰嚣张时，天会十年（1135）正月，太宗驾崩，金熙宗继位。新旧势力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熙宗完颜亶，是太祖嫡孙，虽出身于女真皇族，但自幼接受汉族式教育。曾随韩昉等汉人儒士学习汉文经典、吟诗写字，雅歌儒服，醉心于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这样他就与女真旧的功臣良将产生了隔阂。旧的宗室大臣视完颜亶为“汉家少年”，完颜亶也鄙视他们“无如夷狄”，粗俗残忍。只有宗干和宗弼二人崇尚汉制，被看重。宗干是太祖阿骨打的庶长子，又是完颜亶的养父。他在开国

之初，追随太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太宗即位后，宗干受命为国论勃极烈，与谙班勃极烈斜也一起共辅朝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女真人的汉化打下了基础。宗弼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曾多次兴兵伐宋。在长期与宋交战过程中，他逐渐被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征服，多次上书要求进行汉制改革。

金熙宗继位，是由宗翰、宗干等提名为谙班勃极烈的，他能当上皇帝是守旧派与改革派共同拥护的结果，因此熙宗上台后，守旧派便以功臣自居，与改革派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面对这种情况，熙宗清醒地认识到：以宗翰、宗磐、挞懒为首的一派把持军政，为了维护传统的统治地位，他们反对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又强制把女真人落后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加在汉族人头上，对女真族发展不利。而另一派主张汉制改革，才是对金朝和女真族发展有利，也正与自己的意志相同。于是金熙宗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并决心铲除来自各方面守旧势力的阻碍。

天眷二年（1139）的一天，金熙宗在朝堂上与文武官员议论唐朝历代帝王的作为。他说："我每次读《贞观政要》都颇有感触，唐太宗和臣僚们的议论对策很值得学习。"翰林学士韩昉应道："是呀，每次对策都是唐太宗谦逊地提出疑问，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竭尽忠诚来回答。这书虽简洁，但很有价值。"熙宗又进一步问道："唐太宗固然是一代贤君，你觉得盛世之主玄宗李隆基又怎么样呢？"韩昉回答说："唐朝自太宗以后，只有玄宗、宪宗算比较开明，但对唐玄宗素有有始无终的说法。起初他临危受业，任用姚崇、宋璟等忠臣，励精图治，创立了开元盛世。可后来他沉湎于声色犬马，把政事委托给李林甫等奸佞，纲纪大废，致使唐朝终于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下走向衰亡。如果他的统治能善始善终，则可与贞观之风匹敌了。陛下即位以来，尽心追随贞观遗风，只要您重用贤良，必定能善始善终。"熙宗听后非常高兴，决心采取措施有步骤地消除守旧势力。

宗翰在太宗时骄横专权，又是守旧势力的代表，自然成为首先要冲击的人物。为夺他的兵权，熙宗“以相位易兵权”，任命宗翰为太保，封晋国王，解除了他国论勃极烈和都元帅的职务，以此将他架空。同时，把宗翰的爪牙韩企先、高庆裔、萧庆等调来京城任职。以元帅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削弱守旧派在地方的实权，把他们置于皇权的直接控制之下。

熙宗在同旧势力的斗争中，善于利用反对派之间的矛盾来削弱对手。他知道，宗磐本可以长子身份直接继承太宗的皇位，由于宗翰力荐，自己得以继承大统。因此，宗磐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深恨宗翰。除掉宗翰可借宗磐之手。于是熙宗授命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宗干为太傅并领三省事，使其位皆在宗翰之上，压制宗翰的势力。不仅如此，天会十五年（1137），熙宗让宗磐以贪赃罪杀死了宗翰的心腹尚书左丞高庆裔、转运使刘思，宗翰闻讯慌忙上书，请求免去自己的官职，为高庆裔赎罪，熙宗没有答应。宗翰见自己羽翼被削，大势已去，于当年七月在郁闷愤恨中死去。接着熙宗下诏以元帅左监军挞懒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宗弼升为右副元帅，封沈王。为进一步肃清宗翰的影响，熙宗令他设的云中枢密院事时立爱告老还乡。又于同年十月，下诏废除他谋划册立的伪齐政权，降刘豫为蜀王，迁于临潢府。

宗翰死后，宗磐居功自傲，跋扈骄恣起来。有一次甚至在熙宗面前要持刀杀宗干，被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为压服宗磐，熙宗提拔太祖子宗隽为左丞相，后又升为太保、领三省事。谁知宗隽反而与宗磐勾结，一起反对熙宗。于是熙宗决定利用宗翰一派的完颜希尹之手铲除宗磐和宗隽。天眷二年（1139）七月，宗干、宗弼与完颜希尹受熙宗之命以“谋反”为由杀了宗磐和宗隽，左副元帅挞懒也因与宗磐联合被降为行台左丞相。后他与翼王鹘懒

谋反，事觉被杀。在这次与宗磐的斗争中，宗干、宗弼始终是熙宗的得力干将。熙宗升宗干为太师兼领三省事，晋封为梁、宋国王；升宗弼为都元帅，晋封越国王。这样，金王朝的政治、军事大权掌握在以熙宗、宗干、宗弼为首的革新派手中。

熙宗决心彻底铲除掉守旧派，因此除宗磐后，转手杀向保守势力的残余。左丞相完颜希尹是宗翰集团的智囊，太宗时就想除掉他，但碍于他握有燕云重兵，一直没有成功。熙宗登位后，更是对他恨之入骨，伺机以除。完颜希尹依附宗翰，把持朝政，虽有些才略，但骄恣跋扈，深为朝中将士嫉恨。天眷三年（1140）九月，有人密告他目无圣上，言宣不道。熙宗便以此为借口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心腹萧庆和他的两个儿子。完颜希尹虽在宗磐事发后谨慎从事，仍未脱一死，也是新旧势力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熙宗为首的革新派势力越来越大。皇统四年（1144）田瑴被诛杀，标志守旧派彻底被铲除。田瑴是宗翰心腹韩企先提拔的。宗弼掌权后，被田瑴等人视为“小人”的汉族知识分子依附于宗弼，也受到崇尚汉文化的熙宗的恩遇。韩企先病重，宗弼前往探视，问道：“丞相年老多病，谁可以继任丞相之位呢？”韩企先推举田瑴，宗弼却愤然说道：“此辈该当诛杀。”是时，田瑴就在韩企先的住所，听说宗弼来，知道他瞧不起自己，事先躲了起来，此时一听宗弼此言，吓得汗流浃背。韩企先死后，田瑴出为横海军节度使。宗弼指使亲信许霖弹劾田瑴专权擅政。金熙宗闻讯正中下怀，借机大兴案狱。下诏处死了田瑴及与他往来密切的人等。并把他的妻子、儿女及亲朋好友三十四人流放到海岛上。至此，金熙宗取得了打击奴隶主贵族旧势力的彻底胜利，开始进行大张旗鼓的汉制改革。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熙宗纪》、《孟浩传》、《时立爱传》、《大金国志》、《太宗纪》。

《三朝北盟会编》：《金虏节要》。

《金史纪事本末》：《田瑴之狱》、《宗翰军谋》、《舍音宗翰辅政》。

《大金国志》卷6《太宗纪》

海陵篡位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毁誉参半的传奇皇帝——金海陵王完颜亮。他执政十三年中曾迁都燕京（今北京）、整顿吏治，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魄力；另一方面他又多欲嗜杀、穷兵黩武，是一个典型的淫君、暴君。最终因严刑峻法，积怨太多，死在自己部属的刀剑之下。海陵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一切都从他弑君夺位的政变开始。

完颜亮生于公元 1122 年，本名迪古乃，字元功，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辽王完颜宗干的次子。生母大氏是辽王侧室，渤海皇室的后裔，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完颜亮自幼师承母教，汉学造诣很深。可是自幼便猜忌残忍、老成持重。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完颜亮已长成一个雄健的青年，中等身材，高颧络腮，一双眼睛锐利有神。按女真风俗，他将头顶前半截头发剃光，脑后垂发，系以丝带，左耳饰金环。冬衣黑裘，貂皮帽；夏衣白色衫袄，腰挎宝刀，足登皮靴，俨然一个典型的皇族贵胄。

海陵风度端庄严肃，外表宽厚和善，内心则城府很深。金天眷三年（1140）海陵年满十八岁，因是宗室子弟，被熙宗封为奉国上将军，赴金国名将完颜宗弼麾下任职，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由于父亲宗干在金创业功勋卓著，在熙宗朝任太傅、太师，受封为国王，权倾朝野，海陵倍受青睐，在军中任职不久就成为行军万户，迁为骠骑大将军。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宗干处于万人侧目的顶峰时，突然死去，海陵也就孤立无恃了。但他凭着左右

逢源的本领，仍由光禄大夫、中京留守、尚书左丞、左丞相、右丞相，拜太保，领三省事兼都元帅，成为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一次，熙宗召见他，谈起家常，说及太祖创业的艰难，海陵装成忠诚的样子，呜咽流涕地说："太祖创业艰难，我们做子孙的，应效法太祖，光大国威。只要皇上有差遣，臣定万死不辞。"熙宗听了很受感动，对他的"忠诚"留下良好的印象。

可实际上，海陵一向自视很高，野心很大，根本不把熙宗放在眼里。他想，当初太宗传位于熙宗，主要因为熙宗是太祖的嫡长孙，我也是太祖之孙，他现在身登九五之尊，我却蛰居人下，真叫人难以心服。久而久之，他便动了觊觎神器之念。海陵自幼就习汉学，喜文辞，经常赋诗言志。刚封岐王时，出使办事，见驿道旁幽篁蓊郁，便借题发挥道：

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

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去梢拂碧穹。

吟罢又在墙壁题诗抒怀道：

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

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

又一次，他在卧室中见其妻几案间有岩桂植于瓶中，不禁又浮想联翩，诗兴大发：

绿叶枝头金缕装，稍深自有别般香。

一朝扔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

在这几首诗里，他把自己比作不同凡卉、直拂苍穹的碧竹；比作潜隐沧波，暂与虾蟆为伍的蛟龙。最后一首诗里竟毫不掩饰地说，有朝一日自己也要穿上天子的赭袍，不臣之心已灼然可见。

海陵既心怀叵测，便开始秘密结纳豪强，想有所作为。奚族人猛安（千夫长）萧裕是宗干的旧部，为人奸狠有谋。海陵想掌

握他这份力量，便加以笼络，两人时常谈及朝政，气味相投。这萧裕也从海陵的言词中看出他不满现状，怀有极大野心。于是他试探海陵说："留守您的先父是太祖的长子，德高望重，人所共知。天意将会有所属留守，您要善自珍重。"海陵一听，愤然道："你倒是说了句公道话，可是有几人抱这样的看法？"几句话萧裕立即探出海陵的真意。他也是个野心勃勃、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觉得和海陵交结，前途会大有作为，于是乘机煽动说："事在人为，只要留守有心举大事，在下定肝脑涂地，竭力追随。"从此海陵便把萧裕倚为心腹。

再说熙宗晚年，皇后裴满氏干预朝政，宰相大臣多是她的亲党，熙宗也为她所左右，内心十分不快，常酗酒使气杀人。大臣、皇族以及侍卫人等多无故被杀，弄得朝中人人危惧。海陵极力讨好皇后，使裴满氏对他颇有好感，不时在熙宗面前夸奖他。隔了一年，尚书右丞宗固因罪被罢，海陵接任并兼都元帅，成为右相，掌握了军政实权。他一方面引荐心腹萧裕为兵部侍郎，以所亲驸马都尉唐括辩为尚书左丞；另一方面则极力讨好朝中贵戚，引用勋望子弟，以结贵戚欢心，日久下来，在内外称誉下，海陵颇得人望。

当然，海陵在仕途上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熙宗皇统九年正月，海陵二十七岁生日，熙宗赐给他一幅掠自宋京的司马光画像、一条玉带及马匹等，派近侍大兴国前去致贺，皇后也附赠了些礼物。帝后二人本来不和，听说皇后也来附庸风雅，熙宗大怒，杖大兴国，并夺回赐物，使海陵惊惧不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年五月熙宗准备大赦，命翰林学士张钧草拟诏旨，参知政事萧肄却将草拟的诏旨掐头去尾，摘出几段呈给熙宗，说张钧语涉诽谤。熙宗追问张钧受何人指使，然后不问情由便将他枭首。左丞相宗贤因与海陵之父有仇，乘机进谗，说是出自海陵的授意。熙宗老大不快，下诏贬海陵出朝，任领行台尚书省。海陵

离朝去汴京，途经北京（今内蒙昭乌达盟宁城西大名城），对留守萧裕说："我打算在河南建位立号，先定两河（河北、河东）之地，然后举兵北上，请你联络诸猛安响应。"萧裕满口答应。但海陵从中京南下行至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良乡镇）即被熙宗召还。海陵莫测其故，非常恐慌。及至回朝，熙宗任命他为平章政事，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海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此下决心早日除掉熙宗。

熙宗以打杀立威，杖责平章政事秉德（宗翰之孙）、驸马唐括辩、大理卿乌带等大臣，斩杀宗室胡里，使朝中贵戚重臣心生怨谤。秉德、唐括辩遂与乌带密谋废掉熙宗。乌带把此事告诉了海陵。海陵伺机问唐括辩："你们如举大事，想立谁嗣位？"唐括辩回答说："自然是当今皇上之弟胙王常胜了。"海陵又问："除他之外，谁人可立？"唐括辩说："还有邓王之子阿懒。"海陵又摇了摇头说："阿懒是远支怎能为帝？"原来，阿懒的祖父宗杰系太祖阿骨打之子，父亲宗爽官封邓王，阿懒是太祖的曾孙，比海陵还低了一辈，因此海陵说他已属远支。唐括辩似乎听出了海陵之意，便反问道："如此说来，莫非你有问鼎之意吗？"海陵拍着胸脯说："如果真不得已，舍我其谁？"海陵等日夜密谋废立之事。护卫将军特思见他们形迹可疑，便报告给了皇后，皇后又告诉了熙宗。一日，熙宗召唐括辩叱责说："你和亮密谋何事，打算把我怎样？"熙宗越说越气，怒杖了唐括辩。唐括辩被杖责更惊醒了海陵。他认为如不及早下手，早晚要遭殃。于是紧锣密鼓，勾结熙宗侍从进行具体策划。熙宗御前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曾受恩于宗干，另一护卫十人长徒单阿里出虎与海陵是世代姻亲，都附和海陵。再有就是掌管寝殿锁钥的寝宫总管大兴国。大兴国的姻亲李老僧是海陵提拔任尚书省令史的。海陵利用李老僧的关系，说服大兴国参与逆谋。大兴国也因几次被杖，怨熙宗寡恩，答应从中协助。几个关键人物都被海陵收买了。于是相约于

皇统九年（1149）十二月九日晚，乘仆散忽土、徒单阿里出虎在熙宗寝殿值班之机发难。

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大兴国大开宫门，假传圣旨召海陵人宫。海陵率领唐括辩、乌带、秉德、李老僧等身藏利刃潜入到熙宗寝宫。宫中当值的几个卫士被唐括辩以利刃劫持，不敢作声。几个人进入寝宫后，直奔熙宗卧榻。熙宗已惊觉，见他们手持利刃，知情形不对，连忙去拿平常放置在床头的佩刀。不想这刀早被大兴国藏了起来。熙宗见情势紧急，大呼"卫士救驾。"话音未落，阿里出虎早一个箭步上去，当胸就是一刀，熙宗手无寸铁，无法抵抗，仆散忽土也上去一刀，熙宗受伤扑地。海陵狠狠地挥剑朝熙宗颈项刺去，鲜血立时奔了出来，熙宗登时毙命，死时才三十一岁。

海陵弑君成功，在血泊中黄袍加身。他怕众人不服，便诈传熙宗旨意，说召集大臣议立皇后。等大臣到齐，海陵便猝不及防杀了曹国王宗敏、右丞相宗贤。同时又加封秉德和唐括辩为左右丞相，升乌带为平章政事，仆散忽土、徒单阿里出虎、大兴国等也各封官爵。废熙宗为东昏王，改元天德。

海陵篡位，事属非法。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朝野上下虽迫于威势，无所异议，但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四方稽首，万众拥戴。若不加防范，日后难免发难，而防范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兴狱屠戮。他首先把屠刀对准了太宗一支。早在宗干与宗磐斗争时，海陵就嫉恨太宗诸子，怎奈太宗子孙官爵显赫，势力强大。海陵当政，时太宗之子宗本仍位居太傅之职，在朝中位尊望重。太宗还有十四个儿子和众多孙辈也都封王拜爵，位居要位。他们对于海陵非法篡位虽非公开反对，私下里不免议论。这使海陵心怀惴惴，寝食不安。于是他把秘书监萧裕找来，商量怎样才能消此心腹之患。萧裕为海陵出谋划策说："太宗子孙有七十余人。只有用谋反的罪名，才能一网打尽。"海陵阴险地点了点头说：

"我也正是这个主意。"于是，两人几度商量之后，定下一条毒计。当初伙同海陵谋逆的同党秉德，这时官拜左丞相，海陵对他心怀不满。因为在杀熙宗之后，众人拥戴海陵，一起罗拜，口呼万岁，表示效忠，秉德却犹豫不决，最后才肯下拜。对此海陵记恨心中。后来探得秉德常到宗本家宴饮，更招海陵疑忌。他决定诬陷宗本和秉德，图谋不轨，要拥立宗本为皇帝。计已设好，萧裕又自告奋勇去找一个告密的人。此人必须和宗本有亲密关系这才能令人相信。萧裕左选右选，最后相中了奚族人尚书史萧玉。他是宗本的旧部，又是宗本家的常客，由他告密最为适当。为做到万无一失，海陵决定"先杀后告"。在举事的那一天，海陵派人召宗本等到内苑击鞠（即击球，是我国古代的马术运动），宗本与大宗正事宗美奉召前来。海陵不容分说便下令砍了两人的首级。另一方面，早在头天，由萧裕约萧玉畅饮，乘机将萧玉灌得大醉，用车送到萧裕弟弟家，派军士围守。第二天萧玉酒醒，看到这情形，以为自己犯了大罪，惶恐地向萧裕求情。萧裕教他："要想活命，当皇帝召你时，只要你照我教你的话去说，告宗本谋反。否则，不但你性命难保，你的全家也都活不成。"萧玉在威胁下，只得遵命行事。海陵得萧玉告密，宣告中外，并借机杀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宗懿、北京（今内蒙宁城西北）留守卞、益都（今山东益都）尹毕王宗哲、平阳（今山西临汾）尹鼎、右宣徽使京等，还把他们的家属分置别所，每人只能以奴婢五人相随。既而使人在路途拦截，不论长幼，全被杀死。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老，人称"善大王"，海陵知他无能，打算留他以奉太宗宗祀。但过了几天，还是召至阙下杀死。至此，海陵共杀死太宗子孙七十人、宗翰子孙三十余人，使这两支竟至绝后。此外还杀了秉德一家十余口及一些看不顺眼的人。一时间血流中京，十分恐怖。

杀完了太宗子孙，海陵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乘机除尽宗

室勋旧大臣。他心中最嫉恨的二人，一个是太祖三弟斜也的儿子宗义，他任平章政事，颇得人望；另一个是开国宿将撒离曷，时在汴京为左副元帅，手握兵权，知兵善战。海陵决定将此二人一并除去，于是又故技重施。撒离曷与挞不野不和，而挞不野之女是海陵之妃。海陵叫挞不野陷害撒离曷。于是捏造了一封假信，作为撒离曷写给他儿子宗安的家书，内容指责海陵残杀宗室，要宗安和宗义联络，相机起事，共图废立。这封信故意遗落在宗安家门口，由都元帅府内遥设拾得告变。海陵据这封伪造的书信，罗织罪状，杀了宗义、谋里野、宗安以及太祖妃萧氏、子任王偎喝、魏王斡带孙活里甲等，撒离曷也在汴京被杀。结果，斜也子孙一百余人、谋里野子孙二十余人，统通毙命于海陵的屠刀之下。

海陵不但大杀宗室，连他的嫡母徒单太后也不放过。宗干有妻妾数人，正室徒单氏不曾生育，次室李氏生郑王充，第三房大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海陵。徒单氏收养充为己子，但也很钟爱海陵。熙宗朝海陵和充一起当宰相。虽然徒单氏与海陵的生母大氏相处很好，名分上毕竟有嫡庶之分。对此，海陵常心怀悒悒。当海陵杀君消息传布内外时，徒单氏正在太祖崇妃萧氏宫中，二人听到这消息非常惊愕，萧太妃说："皇帝虽然有许多事做的欠妥，但为臣子的，怎可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徒单氏也颇不以为然。她回到宫中，见到海陵，并没有向他道贺。对此海陵内心甚为不满，就与徒单氏结下了仇怨。到了天德二年(1150)，在其母大氏的劝说下，海陵才勉强将徒单氏也封为太后，和大氏分别住在永寿宫、永宁宫。海陵对徒单氏的嫉恨还因为一次在徒单太后的生日宴上，大氏尊敬徒单氏，跪着敬酒上寿。恰巧徒单氏与别人说话，让大氏等了好久，海陵看到这情景，不由拍案而起，盛怒而出。第二天，他便对凡是和徒单太后说话的公主命妇都加以杖责。大氏劝他不要这样，海陵怒气不息

说道："我现在已是九五之尊的帝王。您也是一国的太后，怎能与以前相比，我打她们，正是为了让她们明白这个道理。"到此海陵与徒单太后的嫌隙更深了。

自天德三年（1151）海陵命张浩仿汉人都城宫室制度修建燕京，三年完工。新建成的燕京宫城，宫殿九重，三十六殿，楼阁林立。还兴建了离宫园囿和行宫别苑，形成当时著称于世的燕京八景，即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道陵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海陵迁都中都后将大氏迎去奉养，而对徒单氏则不予理会，让她一个人仍居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这使徒单太后惊惧不已。每逢皇帝使节到来，她都毕恭毕敬地换上衣服待命。

隔了几年，大氏病重垂危，临终恳求海陵说："徒单太后待我有恩，我以不能见她最后一面为憾。我死之后，你必须将她迎来，要和奉养我一样孝养她，不然我死不瞑目。"大氏死后海陵遵母遗命接徒单太后到中都。他亲自率皇后和百官在郊外迎接太后，他像演戏一样，命左右拿一根竹杖，自己跪在徒单太后面前说："儿子不孝，久缺奉养，现在拿杖来请太后痛责，不然儿子心里不安。"徒单太后哪里敢打他，忙上前扶他起来说："庶民百姓有贤孝的儿子，不过置得百金的产业，父母尚且不忍心责打。我有你这样有孝心的儿子，还求什么呢？"车辇到了中都，海陵又率后宫、宰臣捧酒上寿，尽欢才罢。徒单太后居住在寿康宫中，海陵极为恭顺，亲自扶掖太后起坐，多次同辇而行。看见的人都认为他天性至孝，太后也深信不疑。其实这一切都是矫揉做作，暗地里海陵磨刀霍霍，正寻机置太后于死地。

后来海陵要伐宋，太后多次谏止，她见海陵一点也没有接受的意思，便试图用历史事实劝止他："皇帝，当年苻坚虽有投鞭断流的豪气，结果还是过不了长江，我看伐赵宋不是万全之策，不可轻试啊。"海陵听太后拿苻坚来比他，不觉怒形于色，说：

“太后这话扰乱我军心，如今我决策已定，不要再说这种泄气的话。”说完拔腿愤愤然地走了。这又加深了母子俩的裂痕。

正隆六年（1161）海陵驻跸汴京（今河南开封）。徒单太后也相随而至，为表关切，她派侍婢高福娘问候海陵起居。海陵反收买她去侦伺太后动静。枢密使仆散师恭征讨契丹时去向太后辞行。徒单太后对他说：“国家世代居住上京，已经迁到中都，又迁到汴京，现在又要渡江伐宋。我曾经极力谏止也无用。今契丹又兴叛乱，该如何是好？”高福娘把太后这话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海陵，使海陵大起疑心，他想：太后曾把充收为养子，现在充的儿子均已长成，而且师恭又将兵在外，太后若有异心，一定为患不小。想到此，决定杀徒单太后以免后患，他命侍从之臣大怀忠、虎特末、高福等带护卫四十人去杀掉太后及其左右。此时，太后正在宫中樗蒲（古代的一种博戏），大怀忠等排闼而人，口呼：“皇上圣旨下，要太后跪受圣旨。”太后大为惊愕，刚刚跪下，就被虎特末用铁骨朵在脑后一击仆倒在地。然而太后并未死，挣扎着要爬起来。高福冲上前去把她缢死了。接着，又焚太后之尸于宫中，弃尸灰于水中，海陵就是这样灭绝人性，弑母灭伦，可怜徒单太后活了五十三岁，不明不白地死在逆子手下。

海陵猜忌心重，不但弑母杀亲，就连其死党萧裕也死在他屠刀之下。海陵与萧裕合谋夺位后，一直以他为相，信任有加，并封萧裕的弟弟萧祚为副点检，掌宿卫军；妹夫耶律离剌为左将军，掌京城卫戍军。萧裕权势熏天，自然招人嫉妒，时常有人告他不法，近侍张仲轲对海陵说：“萧裕虽然忠于皇上，但他一门既掌相权又掌兵权，总不太好，不能不加防范。”海陵一想也对，于是将萧祚外放为益都尹，耶律离剌外调为宁昌军节度使。萧裕见海陵这一调动，以为海陵不再信任他，大为不安。同时海陵同母弟完颜兖官拜太师，与萧裕共领相府的内外事务，他见萧裕权太重，有时也加以抑制。这一切更加重了萧裕的疑心。萧裕知道

海陵主性猜忌嗜杀，自己早晚必被所害，性命难保。于是秘密与心腹真定尹萧冯家奴、女婿曷剌补等商议，想立故辽天祚帝之孙耶律裕为帝，取代海陵。萧裕暗结西北路招讨萧好胡，想利用他的军力起事，不想萧好胡怕事，上变告发。海陵得知大为震惊，找萧裕当面问话："你我当初共谋举大事，互相信赖。我待你不薄，你怎能做此叛逆之事？"萧裕叹了口气说："皇上和我以及唐括辩、秉德几人，当初相约同生共死。后得天之助，谋位成功。但不久，秉德和唐括辩就因皇上猜忌，被置于死地。这些往事我都一清二楚。今皇上也开始疑心我。我知性命难逃。谋反只是为了自保啊！"海陵分辩说："我并没有疑心你，只是你在疑心我呀。"萧裕又说："我自知一身罪恶，太宗子孙七十余人无罪被杀，都是计出于我，我死也是罪有应得。"海陵见萧裕说得坦白，迟疑了一会儿说："你有功于我，虽犯死罪，我还是决定饶你不死，但不得再做宰相。"萧裕摇了摇头说："我也无颜苟活下去，我看皇上还是将我绳之以法，以为不忠之戒吧。"海陵听萧裕这样，许久不语，考虑该如何处置他。最后他咬了咬牙，拔出佩刀向自己手臂一割，立时血流如柱，他将血涂在萧裕的脸上，说道："我本无疑你之心，是你背叛我，那么我们就此死别了。"海陵这一手是女真的风俗：对最亲近的死者，在送葬时，以刀割额，血流满面，哭嚎送别，名之为"送血泪"。海陵此时割臂涂血也正是这个意思。于是海陵送萧裕出门，杀于宫门之外，并杀其同谋数人。

海陵就是这样一个多疑嗜杀的暴君，他虚伪狂傲，又心毒手狠，在位十三年间，无数生灵死于他屠刀之下。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海陵王本纪》

《金史纪事本末》：《海陵淫暴》、《秉注·唐括辩措施》、《萧裕

乱政》。

《金史》:《萧玉传》、《宗义传》、《大氏传》、《徒单后传》。

岳珂《桯史·逆亮怪辞》

荒淫灭伦的海陵王

海陵不但谋位弑君，猜忌嗜杀，更以他的荒淫无耻著称。翻开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恐怕难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

海陵本来好色无行，但却善于伪仁义饰淫恶。初为宰相时，妾媵不过三人。等到一篡得帝位便原形毕露，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熙宗的嫔妃一律接受，使女嬖令色充积宫闱。为得到美媛名姝，他不惜诛杀大臣，夺人之妇，甚至上烝叔母，下淫姊妹。

海陵是一个玩弄女人的恶魔，在他的血液里充溢着最原始的冲动。早期游牧民族的风尚，伦常观念比较淡薄，除去生身父母、子女外，对于女子，父死子可娶其庶母，兄死弟可娶其嫂，至于其他堂姊妹甥侄女，更不在话下。可金从建国到海陵时期已有二十余年，已经相当汉化，儒家伦常的观念已渐建立。但厚颜无耻的海陵只凭原始冲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

海陵在大杀他疑忌的宗室大臣时，派内监巡视，凡宗室大臣妻妾有貌美的都暂时留下，准备纳入后宫。曹国王宗敏妻阿懒、秉德弟妻高氏、宗本子妇莎鲁剌、宗固子妇胡里剌等都有美色。海陵既贪其色，又要不居嗜色之名。于是暗示他妹夫左将军徒单贞，要他讽示宰相萧裕，说皇帝子嗣不广，希望他奏请皇帝收纳这几个罪女。萧裕以为这样未免太过，说："皇帝大杀宗室是出于不得已，这事已引起朝野议论。现在又要纳这些罪人的妻人，恐于圣德有亏。我如果上奏，也必定被人指责，这件事我不能做。"徒单贞将萧裕的话回奏。海陵大为不悦，说："我知道他不

会痛快地答应，你直接告诉他这是我的意思。”萧裕听徒单贞回来一讲，知道不照办不行，只好依照海陵的意思上了一道奏本。海陵还故意伪装推辞，三推四请才准奏。就这样公然将诸女接进宫去，封其叔母阿懒为昭妃、高氏为修仪，其余众女也都给予名位。此外，他还将死去的叔辈宗望、宗弼、宗磐等人的女儿一概收入后宫。海陵的姐姐庆宜公主，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被海陵族诛，特里连坐。庆宜公主有一女名叉察，本应连坐，大氏太后求情才将她留下。叉察嫁宗室乙剌补，海陵竟看上了叉察，要人告诉乙剌补离婚。事为大氏太后所知，训诫海陵说：“叉察是你的亲甥女，你是她舅舅，从小看她长大，舅就像父一样，这样荒唐之事绝不可为。”海陵这才暂时死心。可是后来大氏太后病故，海陵还是迫乙剌补离婚，将叉察收入了后宫。

海陵生性好色，原配徒单氏是太师斜也的女儿，可谓是名门闺秀，比海陵小两岁，虽不甚美，但性情温柔，对海陵百依百顺。海陵登位不久，徒单氏生子。海陵大为欣喜，取名为光英，立为太子。同时封徒单氏为皇后。徒单氏对海陵嗜色之癖，屡劝无效，也就索性不问。海陵却变本加厉，用皇后的名义，召见朝中大臣妻子进宫赐宴，借此机会观察众妇，有美貌的，就想办法把她留下来逼奸。被污的人屈于权威，无可如何。徒单后觉得说不过去，就找了一个机会劝海陵说：“皇帝后宫有那么多美女，还不够你享受吗？何必用这个办法淫人妻子？”海陵笑了笑说：“人生能活几年，我要趁现在阅尽天下美女。”徒单后说：“你尽可以选美，希望不要用我的名义宴请贵妇，遂其私欲。这情形传出去，我岂不成了帮凶！”“成了帮凶！”海陵闻言，大为恼怒，狠狠看了徒单后一眼，大声道：“你要做皇后，就得帮这个凶。不然你就别当皇后。”徒单后知道海陵的脾气，说得出做得到，哪里敢再表示反对，连忙陪笑脸说：“我只是和你商量，何必生气呢。从来我哪一件事不依顺你？”从此徒单后对海陵的荒谬行

为再也不敢表示丝毫反对。

海陵用这个方法，尽阅朝中众命妇，十分得意。内中当初帮海陵弑逆的功臣乌带，如今官为平章政事，其妻唐括氏名定哥，容貌美艳。海陵逼奸一次后，大为想念。但定哥吃过一次亏不再上当。海陵无法可想，发誓一定要把定哥弄到手。他派侍女贵哥用皇后名义赏赐定哥几件珠翠，并教她告诉定哥："古来天子也有两个皇后的，要是你杀死乌带，我就迎你进宫，立为左皇后。"定哥听罢大为震惊，低声说道："乌带是我丈夫，我怎能做这种事？况且乌带对皇上有功，你去告诉皇上，就放过我吧！"海陵的个性，越是到不了手的，他越千方百计想弄到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花招都使得出来。他又让贵哥传话，威逼道："若定哥不忍杀死乌带，我就族灭乌带全家，看是哪一样划得来。"定哥这一下可着了慌，她知道海陵说得出就办得到，但一想要她杀死自己的丈夫，如何下得了手？只得推称儿子乌答补随侍在乌带身边，她没有机会下手。海陵一听这话，立即下令任命乌答补为管理印玺的符宝祗候。定哥见海陵一步也不放松，更惶恐忧惧，知道再不动手，就要大祸临头。她眼含热泪默祷："乌带啊，你莫怨我，为了全家性命，我不得不要你的命了！"就这样，定哥在万般无奈中将乌带灌醉，命一亲信使女将乌带用被子盖头，活活闷死。海陵闻乌带已死，假装哀伤，厚葬乌带。隔了一段时间，迎定哥进宫遂其心愿。海陵自得定哥，与她同起同卧，宠爱有加，封为贵妃，答应过一段时间后，一定封她为左皇后。乌带就这样惨遭杀害。至死他也不知道自己诚心拥戴的人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独夫。自己赔了夫人，又枉送一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更可悲的是定哥的妹妹石哥也与其姐有着同样的命运。石哥是秘书监萧文之妻，海陵打起了她的主意。一日，海陵示意萧文庶母按都瓜氏说："你想办法要萧文休掉石哥，大家两好，不然

我就对他不客气了。”按都瓜氏将海陵的话告诉萧文，萧文哪里肯应，按都瓜氏最后警告说：“皇帝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要你离婚，已经是很客气了。乌带是怎么死的？你如舍不得石哥，乌带就是例子。”石哥在一旁见此情形，痛哭流涕，说：“我看不如我服毒自尽，死了皇上这条心。”按都瓜氏说：“你要是一死，萧文更活不成，甚至我们一家还要遭更大的灾祸。”最后萧文在无可奈何中，为了一家性命忍痛休妻。海陵顺利地将石哥接进宫，封她为丽妃。最可恶的是，海陵在内宫欢宴，还要把萧文找去取笑他，弄得萧文哭笑不得，海陵却以此为乐。

海陵这种强纳人妻的做法当然也有未得逞的时候。且说宗辅之子完颜雍，被封为葛王，官拜济南尹。葛王的正妃乌林答氏知书达礼，仪容端庄，葛王对她十分敬爱。海陵听说葛王妃美丽端庄又动了歹念，下令要召见她。诏令传到济南，葛王大为惊恐，夫妻二人急忙商量对策。葛王发愁地说：“想不到皇上的魔爪竟伸到我这里来了！”乌林答氏也说：“皇上无道，好色贪淫，他召我前去，不用问，没有好事。”“是啊！这可如何是好？你若前去，岂不是羊入虎口。”葛王忧心忡忡地说。“可我如不去就是抗旨，他就会怪到王爷头上来。后果不难想象。”乌林答氏咬咬牙，下了决心说：“王爷，这件事很明显，我如不去，皇帝一定会罪责你，我如死在济南，他也会杀了你。我不能连累王爷受害，还是奉诏前去。可我决不受他污辱，只要我死在路上，他就怪不到王爷了。我意已决，王爷善自珍重吧。”乌林答氏这个贤妇决定牺牲自己来救丈夫。在全家哭送之下她启程北上了。护送的人知王妃有求死的决心，一路防范严密，最后走到距燕京只有七十里的良乡（北京市房山县良乡镇），家人防范稍缓，乌林答氏自缢而死。葛王，也就是后来的世宗，对妻子这种牺牲成全的精神终生感念，他登上帝位，不再立后，以为报答。

海陵不但寡廉鲜耻，而且喜新厌旧，翻脸无情。昭妃阿里虎

的命运便是个代表。早先海陵曾在宗弼军中对宋作战。当驻军开封时，认识一个寡妇，她是宗室南家之妻，名蒲察阿里虎。阿里虎二嫁后又守寡，虽年近三十，可长得颇有姿色。海陵便大献殷勤，他这时刚二十出头。阿里虎见他年轻力壮，二人眉来眼去，互相吸引。南家之父突葛速是海陵的叔辈，也在宗弼军中任都监之职。海陵向突葛速请求愿娶阿里虎，突葛速很不高兴地说："你已有妻室，阿里虎虽然守寡，但我的儿媳怎能嫁你做妾，这事我不能同意。"海陵所谋不遂，大为失望，但一直念念不忘阿里虎。称帝后的第三天，就派专使到突葛速家，命送阿里虎回自己父母家。隔了一个月，便迎阿里虎进宫，封为昭妃。海陵性本无常，他所喜欢的女子到手之后，有了新人，就又转移了目标，时间一久，便把阿里虎冷落了。阿里虎长日寂寞，借酒消愁，酒瘾越来越大。她原本就比海陵大，此时已娇容失色，海陵哪里还看得上她。阿里虎有一女名重节，是她初嫁所生，已经十五岁，生得容颜标致，亭亭玉立，被海陵看到，他一双色眼怎肯放过。一天，趁阿里虎酒醉，便将重节引到他的寝宫加以奸污。日久，为阿里虎所知，大为愤怒，打了重节几个耳光。大骂道："他是畜牲，你也不知羞耻，如今母女共侍一男，真让我羞死。"阿里虎从此将重节看管起来，一步也不放松。海陵得知此情十分不快，无奈自己理亏也就隐忍未发。再说阿里虎二嫁南家，生有一子，阿里虎很想念他，派人送些衣物给儿子。这事被厨娘知道，偷偷地告诉了海陵。海陵宫禁严密，嫔妃使女绝不准和宫外交通。于是斥责阿里虎，阿里虎反唇相讥，海陵恼羞成怒，决意要杀阿里虎。阿里虎求得徒单后说情。海陵只冷冷地说："此例不可开。"过了五月，海陵便派人将阿里虎缢死，并宣告罪状以警告其余宫人。

海陵把嫔妃们牢牢地困在宫中，丝毫不容半点越步。奚人萧堂古的妻子耶律察八被海陵霸占，封为昭媛。察八想念丈夫，命

侍女送了两个绣花荷包给萧堂古。不想被人告密，海陵又大发淫威，并想通过此事，杀鸡儆猴，使宫中的女子再不敢和外面交通。这天，海陵在宫城宝昌楼上大宴群妃。酒过三巡，海陵把察八叫出来，问她可知罪？察八还不知海陵的厉害，辩称："我送点东西给我前夫，只是表示一点关怀之意罢了，皇上难道计较这个吗？"海陵把脸一沉："你有罪还不承认。"又转脸对众人大声说："你们今后谁要身居宫中，心在宫外，就看察八的榜样。"说着，抽出佩刀就给了察八一刀，从前胸直透后背。察八立时死在门楼上。海陵又命掷其尸于楼下。这一幕把众嫔妃都吓得花容失色、战战惊惊。

海陵迁都燕京后，又修建了更为雄伟华丽的宫城。为充实后宫，下令选美。凡官宦人家，女子年十六到二十岁，由州县初选后，送燕京复选，再由海陵亲自挑选。一共选了一百三十余人，使宫中美女如云。海陵还把宫中女子分成许多等级，各予名位，最高封为贵妃，次元妃、丽妃、昭妃、淑妃、柔妃、昭容、昭媛等。还想了一套办法严密宫规：凡后妃前侍女，一律服男子衣冠，须低头过胸，敢有抬头偷看者，一经发觉抉其眼珠。男子服勒，行动时不准单独行动。四人一组，互相监视，并以一人执刃监护。不论男女，行走不由路者斩，日没后有下殿堂台阶者斩。对告发犯禁的人赏钱二百万。男女行走误撞对方，先出声者有赏，后出声者死，同时出声的两皆不罪。海陵就这样以杀立威，对有功者加以重赏，使宫人相互监视，不敢作非分之想，从而得以长期过着荒唐的生活。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徒单氏传》、《昭妃阿里虎等诸嬖》、《世宗昭德皇后》。

正隆南侵

海陵是一位多欲的皇帝。海陵曾读到过《望海潮》一词，深为南宋词人柳永所描绘的钱塘（今杭州）旖旎风光所吸引，词中写到：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去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迭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风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给他以莫大的联想，他憧憬着江南西湖胜景，更有意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妙境地，加深了他投鞭渡江之意。当金朝派遣大臣施宜生出使宋国时，海陵暗中派遣画工隐藏在随从队伍中，让他描绘临安城邑及吴山西湖景色。归来后，令做成画屏，并图上自己的画像，策马立于吴山绝顶。海陵亲自在画上题诗：“万里车马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颐指气使，俨然以统一天下的皇帝自居了。还早在海陵篡位以前，有一次，他与宠臣高怀贞闲谈中曾踌躇满志地说：“我一生有三个志向：第一，一切军政大事由我自己决断；第二，率师远伐，逐鹿中原；第三，纳天下的天姿绝色为我一人享用。”海陵篡位后，通过排斥宗室勋贵，重建中央统治机构，重用汉族、渤海、契丹等族的有识之士，建立了强有力

的皇权，实现了个人独裁；他还利用手中权力，尽得国内的绝色女子。此时就剩下第三个心愿未遂了。海陵自然想到要诛灭南宋，好圆了他统一天下的美梦。

海陵身边的奸佞之臣张仲轲、李通、马钦、宦官梁珫等人，为了迎合他南侵的意图，极意盛谈江南如何富庶，女子玉帛如何的多。有一次，海陵召见张仲轲，与他一起谈论起《汉书》来，海陵若有感触地说："两汉之际封疆不过七八千里，而今我泱泱大国，幅员辽阔，有万里之余，可说是够大的了。"且说这张仲轲小名牛儿，本是市井无赖，以说传奇小说、俳优诙谐语为职业，被海陵引为左右百般宠信。他早已窥知海陵心机，便装作不以为然地说："圣朝疆土虽然广大，然而当今天下四分，南边有赵宋，西边有西夏，东边有高丽，如果将他们征服，一统天下，那我们的国土才真正广大呢。"宦官梁珫知道海陵喜美色的脾性，也趁机鼓动如簧之舌，说道："小的听南边来的人说，江南美女云集。皮肤娇艳白嫩，自有与北方美人不同的风韵。还听说宋高宗的刘贵妃更是姿质丰盈，美艳绝伦，为历代美人所望尘莫及呀。"这番话引得嗜色如命的海陵垂涎三尺，心想：南朝积弱，所凭借的只是长江天险，绝非金军敌手，凭我大金的国力，灭南宋，统一天下，携得刘贵妃，见识见识南方的美人，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念头一兴，更觉得大有可为了。

其实，还在海陵称帝之初便已露南侵之意了。那是天德二年(1150)，南宋派遣余尧弼至金国贺海陵即位。临回国，海陵让他把宋徽宗的一条玉带转交高宗，秘书郎张仲轲问："这是稀世之宝，陛下为何送给外人?"海陵毫不在意地说："江南将来一定会被我占有，只是放在外府罢了。"此话分明是说，有朝一日要对南宋大动干戈。

海陵南侵主意既定，开始寻找兴兵借口。正隆三年（1158）正月，南宋贺正使孙道夫来朝，海陵指使左宣徽使敬嗣晖警告孙

道夫说："近来你们的皇帝侍奉我圣上多有不诚，如你们的百姓逃入我国边境，我们立即遣回，而我国有进入你们国境的却索要不回。听说你们最近又在我国边境上偷买鞍马，演练战阵，可有此事？圣上非常生气。我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征服你们是轻而易举的。"孙道夫听了，吓得汗流浃背，连连说一定如实转告宋帝。

为了南下攻宋，海陵还广造舆论。有一次，他把吏部尚书李通、翰林直学士萧廉召来绘声绘色地说："我昨夜梦见到了天帝呆的地方，宫殿中人声细微，犹如婴儿一般。一会儿，有个身着青衣的人，捧着天帝诏旨说要授给天策上将，派我去征讨宋国。我接受命令出来，骑在马上，看到周围有鬼兵无数，我弯弓搭箭射击，万鬼都应声倒下，那声音像打雷一样响。一觉醒来，声音还在身边回响。急忙派人到马厩里探视，见我那匹战马汗如流水，再细数我囊中的弓箭，也恰好出了一支。这岂不是上天要借助我之力，让我去攻取江南吗？"李通等人明知是假，又不便说破，只连声道贺。

尽管海陵大造舆论，金朝内部对于南下侵宋意见并不一致。反对派以四朝元老重臣耨盌温敦思忠为代表。他在太祖起兵之初就随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海陵上台后，曾率文武大臣到思忠府第请他出山，拜为太师兼劝农使。撤销中书、门下之后，思忠又受命为尚书令，地位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侵宋问题上，海陵询问诸大臣，思忠挺身而出表示反对。海陵知道他在朝中颇有威望，他的意见代表了百官的绝大多数。于是很不高兴地对思忠说："你不要议论可否攻宋，只要告诉我征服赵宋需要多长时间？"思忠想了想说："要征服赵宋，至少需十年时间。"海陵听罢不耐烦地说："十年太长了，我想用月来计算。"思忠说："当年太祖起兵灭辽还用了几年时间。如今国内百姓倍受勒索，民不聊生。我们又师出无名。更何况江淮地区暑热潮湿，不宜久

居，于南下极为不利。这种情况下怎能以月为期?”海陵越听越气，顾视左右寻找刀剑。思忠大义凛然，面无惧色，厉声说到：“老臣历侍四朝，位至公相，今已是风烛残年，如果还能挽救江山社稷，死也无憾。”过了一会儿，海陵怒气稍消，对思忠说：“自古以来，历代帝王只有一统天下才能成为正统。你年老体衰，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儿子乙迭知书达礼，你回去问问他。”思忠义愤填膺地说：“早年太祖起兵之时，女真还没有文字，我们照样能纵横天下。如今我年已古稀，历尽坎坷，乙迭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岂值得我去向他请教?”

海陵见无法得到老臣的支持，又询问李通、翟永固、敬嗣晖、韩汝嘉四人说：“我打算再迁都汴京（河南开封），进兵江南，使海内一统。你们以为如何?”佞臣李通连忙奉承说：“此时正值天时人事齐备，机不可失啊!”海陵大为高兴。见翟永固在那里紧锁眉头便要他表态。翟永固迟疑了一下，慢吞吞地说：“我大金国从海上兴邦，屡次兴兵，百姓不见实施德政。如今宋室偏安江南，年年纳币称臣，此时远伐赵宋，师出无名，我以为不可。况且北京刚刚建成，已耗尽国库，人力疲敝。若再营造汴京，无异于投资去营建征战的废墟，我以为此举更为不可。”海陵再问其他二人，韩汝嘉赞成翟永固的意见，敬嗣晖赞成李通的意见。海陵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此时恰逢魏子平出使赵宋还朝，海陵问他：“你多次出使宋国，依你之见苏州与大名府（河北大名）哪个更好?”魏子平明白海陵之意，只得委婉进谏说：“江南之地低洼潮湿，夏天穿葛着丝还要热死人。怎么能和大名府比?”海陵听出其意，恼怒地将他屏退。太医使祁宰也极力反对南侵。他乘人宫行医之便，上疏劝谏海陵放弃南侵之念，结果被当众处死。早年颇受海陵重用的御史大夫萧玉也上疏劝道：“长江天险隔断南北，乘船作战不是我军特长。古时前秦王苻坚以雄师百万讨伐东晋都不曾渡过一

骑一卒，陛下最好不要重蹈复辙，前去冒险。”海陵看罢冲冲大怒，穷凶极恶地说：“大胆萧玉，你竟敢以苻坚军喻我大金将士，祸乱军心拉出去给我打。”至此，满朝大臣都迫于海陵威势，再没有敢进谏阻止伐宋了。

对于大臣的反对意见，海陵置若罔闻，他一意孤行，积极进行侵宋准备。首先他大兴土木，重修北宋故都汴京城，借以重建正统的地位，也作为南侵的桥头堡。以前海陵曾派参知政事冯长宁为留守，经营擘画，修葺宫室以为迁都之举。不料一场大火将宫室焚烧殆尽，海陵大怒，把冯长宁降为庶人，不久又将其杖死。正隆三年（1158）海陵再次诏令左丞相张浩和敬嗣晖重修汴京宫室。张浩以擅长营造闻名，但他不赞成营造汴京，便上书奏道：“过去营建中都，朝野上下无不尽心尽力。而今民力尚未得到恢复，再次劳工，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建成了。”海陵主意已定，哪里肯听，张浩也只好屈从。修建汴京共调民夫数十万、技术工匠两万人，运天下林木花石以充宫室。旧的宫室台榭一律拆除，一切皆重新建起。在营造过程中，海陵还多次派宦官梁珫来监察，稍不如法式便又全部拆除重建。几经反复，新建成的宫殿，金粉涂壁，玉砌柱石，华丽至极，耗资数以亿万计。正隆六年（1161）四月，海陵让百官先赴汴京治事，他本人也于同年六月到达汴京，指挥布置侵宋事宜。

海陵南征须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首先是征集足够的兵员，组成庞大的军队。1160年秋，他委派梁铼在女真、契丹、奚家三种民族的军队中征兵，不限数额，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丁都在征集之列，共征集二十四万人。其中精壮的十二万称为正军，体弱的十二万称阿里喜。一正军与一阿里喜搭配组成一军，共分为十二军。继而又派高怀正、萧彦良、王修、梁肃等人为宣差使到各路汉人与渤海人的居住地征兵抽丁，又凑集了二十七万人的队伍。此外，海陵还把猛安谋克军中精于射箭

的五千人挑选出来组成一支亲军，号称“硬军”或“细军”。这些军士享有极高的待遇，他们用茸丝联甲，其中又以紫茸为上，黄茸、青茸次之。细军都忠于海陵，勇猛善战，是此次攻略江南的主干力量。

战争中所需的兵器，海陵也遣使前往诸道总管府督造。又令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负责将各总管府贮存的兵器全部押运到行军要地，装备兵丁。另外，还以李通为总监，召集诸路工匠于中都打造兵器。为打造跨江攻宋所需的战船，海陵曾严令韩锡、张仲愈等人在通州潞河上督工匠日夜赶制。因工期短，所需数额多，就鞭打工匠昼夜连班，竟有七天七宵不得休息一刻之事。工匠的腿都泡烂生蛆，暴死水上者不计其数。军械物资都来自民间，以至“箭翎一尺至千钱”。逼得百姓只好屠杀耕牛，以供造军械用的牛筋、皮革、牛角。为集军费，海陵发狠地向各族人民征粮收税，巧立名目，竟有先借民间税钱五年之奇闻，使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建立一支铁骑军，海陵下令大括天下马匹，七品官员以上只能留一匹马，民间马匹一概征用。并规定居住东边的马匹调给西军，居住西边的马匹调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马狼藉于道。有些官吏因马匹死亡过多而畏罪自杀。马匹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的牵马夫役充斥道路。海陵又下令河南州县所贮粮米供给军队，不得挪作他用。马匹过境，田中放牧，致使禾稼荡然无存。就这样在全国征调马五十六万匹。

由于海陵为政刻剥无度，民不堪命，天下骚动，老百姓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起义。正隆五年（1160）三月，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张旺、徐元等因潦倒无寄，率数人杀死县令举行起义。海陵忙派新编水军去围剿，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才镇压了这次起义。到正隆六年（1161），整个北方地区起义军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山东临沂人赵开山、单州（今山东单县）杜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王九郎、济南府（今山

东济南）耿京、太行山陈俊，还有契丹人撒八、窝剌。在这些如火如荼的起义军打击下，海陵政权已摇摇欲坠了。

值此危局，海陵仍一意孤行、穷兵黩武。正隆六年（1161）九月，海陵按原计划在汴京誓师，兵分四路南下侵宋。第一路海陵亲率三十二万总管兵进军寿春（今安徽凤台），以太保枢密使昂为左领军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副；以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事乌延蒲卢浑为副，随海陵进兵。第二路，工部尚书苏保衡受命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为副，率领水军由海道进趋临安。第三路，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为副，自蔡州（今河南汝南）进攻荆襄。第四路，以河南尹徒单合喜为西蜀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为副，由凤翔（今陕西凤翔）攻取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待命进攻四川。另外，以左监军徒单贞率二万人攻淮阴（今江苏淮阴）。在进兵的同时，海陵下诏由皇后徒单氏与太子光英留守汴京，由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辅佐太子处理日常政务。就这样，海陵戎装骑马，妃嫔相从，大军六十万号称百万，浩浩荡荡大举南下。

李通在淮水上造浮梁，打算从清河口进入淮东地区，远近地区大为震动。海陵也以为大兵一到，四方就会束手来降，于是赋词一首《喜迁莺》："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充分显示了他骄矜、不可一世的姿态。

十月八日，海陵渡过淮水，进驻庐州（今安徽合肥）。就在此时，东京辽阳发生了政变。原来海陵南侵，女真兵多不愿从，逃亡的人络绎于道。大军到达山东，曷苏馆女真猛安福寿、东京谋克金住等率领一万多人逃回辽阳，并扬言说："我们回往东京，立新天子去了。"这个新天子就是后来的金世宗完颜雍。他当时任东京留守，封曹国公，趁海陵南侵之际抢先发难，与完颜福

寿、完颜谋衍等击杀了海陵派来的高存福，自立为帝，改元大定，宣布海陵杀死嫡母，杀宗室及北宋徽宗、钦宗子孙，焚烧上京宫室等十条罪状。

此刻的海陵正大举攻宋，宋方朝野震惊。投降派被罢，由陈康伯独任右相，起用身患重病的老将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率兵抵御金兵，刘锜命副帅王权进军寿春，王权畏敌如虎，刚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听说金兵大举而来，立即弃城逃跑了。宋高宗闻讯也吓得魂飞魄散，打算逃到海上去避乱，被陈康伯劝阻。宋高宗慌忙任命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今南京）督率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

金军刘萼一路攻宋频频得手，轻取通化军、蒋州和信阳军，徒单贞所部也一连攻下盱眙（今江苏盱眙）、扬州、和州。海陵亲到和州督战，命李通赶造船只以渡江进采石镇。由于督造很急，将士们日夜忙碌，不得片刻休息。还把城中居民的房屋拆掉作木材，煮死人膏作油。不久金军又占领真州（今江苏六合），王权逃往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刘锜退守瓜洲（今江苏扬州市南）。虞允文于十一月八日到采石犒军。此时王权已被撤职，继任的李显忠未到，三军无帅，士气低落。于是虞允文立即组织沿江布防，决定于采石与金军大决战。两军开战前，海陵在江北筑台，披金甲登台，杀黑马祭天，然后将一只羊、一只猪投入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卢浑说：“舟楫已齐备，可以渡江了。”蒲卢浑踌躇地说：“我见宋军战船很大且航速很快，我军船只则又小又慢，恐怕难以渡过江去。”海陵闻听冲冲大怒说：“过去你追随梁王（兀术）追赵构人海岛，难道也用的是大船吗？明天你和昂必须身先士卒，先渡过江去。”转天，海陵在岸上布摆黄旗和红旗来指挥作战。号令三军：红旗树起，军队必须前进；黄旗树起，军队必须后撤。在这种威逼下，不一会儿已有七十艘船抵达南岸，海陵以为此战可稳操胜券了。谁料对岸宋军英勇奋战，

杀死一名猛安，一百多名士兵。金兵见难以取胜，只好退到和州。恰在此时传来完颜雍在上京登基，改元大定的消息。海陵拍着大腿，叹了口气说："我本打算平定了江南，改元为大定，今日之事莫非是天意吗!"说着他取出平时所写的"一戎衣天下大定"的条幅给群臣看，并说打算留下一部分军队渡江，自己率军北还。李通连忙上前劝道："我们半途而废，无功北还，会给宋军以可乘之机，这绝不是万全之策。尤其圣上还师，必会使军心混乱，溃不成军。事到如今，不如先发兵渡江，然后烧了战船，绝了他们北归的退路，这时圣上再回师北伐，则南北都可以指日而定了。"海陵心乱如麻，束手无策，也只好采纳李通的建议。此时宋军方面积极备战，战中，虞允文派盛新用舟师在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截击金军，把金军杀得大败，烧毁金战船三百多艘。海陵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只好退兵扬州。这就是震烁千古的采石大捷。

再说金军在其他战场也都不顺手。进军川陕的西路军让吴璘打得大败，只好退守凤翔、大散关一带；中路军败给宋通化军，在樊城损失较大，只好改攻两淮，他们所积贮的粮食也被宋军烧毁；攻打临安的水军苏保衡一路，在密州陈家岛（今胶州湾）南三十里的石臼山遭宋军埋伏，被宋将李宝用火攻烧掉战船六百多艘，苏保衡仓皇逃窜，副统制完颜郑家在此战中丧命。至此，海陵南侵的金军已全部败北。

海陵驻扎在瓜洲龟山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五内俱焚。他想：唯今之计只有孤注一掷，渡江占领江南，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可金军已人心大乱，骁将高僧想率他的军队逃跑，被海陵得知。于是，海陵杀了高并号令军中："军士逃跑杀其头目蒲里衍；蒲里衍逃亡，杀其头目谋克，谋克逃亡杀其头目猛安；猛安逃亡杀其头目总管（蒲里衍是金军民合一的组织形式，五十户为一蒲里衍，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它既是

组织名称，又是首领名称)。并限定三日之内必须全部渡过江去，否则格杀勿论。”这一狠毒的连坐措施使金军人人恐惧。其中神武军都总管完颜元宜被指定为渡江先锋。军士们见归路将绝，非常怨恨。完颜元宜决定除此暴君，事成后投奔新朝。

正隆六年（1161）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完颜元宜亲率本部军马直人海陵行营。海陵措手不及，起初还以为是宋军夜袭，待见到射进御帐的箭，才知道是自己军队叛乱。近侍大庆山说：“情况紧急，陛下赶快出去躲避一下。”海陵茫然地说：“事已至此，还躲到哪里去呢?”海陵正要取弓，被乱箭射中，军士一拥而人，用刀乱斫，然后用衣巾裹尸埋了。同时被杀的还有海陵诸妃、近侍李通、郭安国、梁珫、大庆山等。完颜元宜自为左领军大都督，派人杀死太子光英于汴京，又宣布退兵三十里，遣使到镇江与宋军议和。不久，金军在荆襄、两淮的军队也都撤退北还。

海陵死时四十岁，统治十三年。他穷兵黩武，南侵赵宋，不但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反招致了自身的毁灭。完颜雍进人燕京建立新朝，降其为海陵郡王，谥号炀，尸体埋葬在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墓中，后又被降封为海陵庶人。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魏子平传》、《高怀贞传》、《李通传》、《张仲轲传》、《海陵王本纪》。

《三朝北盟汇编》卷 233

《金史纪事本末》卷 27《海陵南侵》

《桯史·逆亮怪辞》

金史上的“小尧舜”

翻开金国的历史，金世宗是金朝九帝中颇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在登位之初，即用强有力的手段，取得了稳定全国局势的重大成效。在其二十九年的帝业期间，他勤于政事，精于选贤，生活节俭，治世有方，使大定朝政治清明，百业兴旺，呈现出难能可贵的盛世景象。

天辅七年（1123）三月一日，上京会宁府的皇宫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这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孩子即是以后的金世宗完颜雍。他的父亲是太祖的第三子完颜宗辅，母亲是出身于渤海望族的李氏。传说他出生之时体重超常，相貌奇伟，胸部有七颗黑子，形如北斗。仅在他出生的五个月后，使他的家族荣登皇族的祖父完颜阿骨打就离开了人世。这时只懂得吃奶的完颜雍以本能的婴儿啼哭声，伴同长辈们的哀痛，为他的祖父致哀。儿时的完颜雍聪明伶俐，性格沉静，一直在金朝上京的王宫里享受荣华富贵。父亲长年征战在外，很少有机会与妻儿团聚，对小完颜雍的成长无暇过问。然而父王荣耀的经历、赫赫的战功、彪炳军政的威权却都成了智慧早开的完颜雍的启蒙表率和楷模。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不幸降临了。在完颜雍十三岁时，即天会三年（1135）年仅四十岁的完颜宗辅病死于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任所。这一突然袭来的厄运，使完颜雍母子在宫中即刻失去了往日受尊崇的荣耀地位。

完颜雍的母亲李氏，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知书达

理。入宗辅府后，她敦睦族亲、周济贫乏，深受宗室尊敬。宗辅死后，她又把全部心血花费在完颜雍身上，不但教他识文断句、吟诗赋词，还教导他做一个有作为的人。依女真的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应当嫁与同宗族人，可李氏不愿接受这种落后的习俗，便削发为尼，回了辽阳老家，在那里营建了清安禅寺，号通慧圆明大师。此后的完颜雍独留宫中，在皇族孤儿的处境中成长。他发奋自强，尤以骑射著称。每次出猎，都有许多人跟着去看，他的骑射技术被“国人推为第一”，并因此很早就投身军马生涯，追随完颜宗弼、完颜昌、完颜宗翰等金朝名将四处征战。在征战中，他为人宽厚，娴于指挥，颇得将士们的推崇。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8）完颜雍被授光禄大夫，封为葛王、兵部尚书。

完颜雍在其成功的道路中，还得力于他的贤内助乌林答氏。熙宗后期，时常酗酒，不理朝政，杀戮亲贵大臣，悼平皇后又擅政专权、肆其淫威。在这风风雨雨的仕途中，宗颜雍与乌林答氏同舟共济，他们把传家宝白玉带献给熙宗，博得了熙宗的欢心与信任。海陵篡立后，完颜雍屡受排挤。在乌林答氏的劝告下，他又将家中珍藏的辽朝骨睹犀佩刀、吐鹘良玉、茶器等稀世奇宝献给海陵，得以保全了性命。不幸的是后来海陵下诏令乌林答氏进宫，乌林答氏不屈强暴，在离中都七十里的良乡固结镇愤然自杀，遗言希望完颜雍卧薪尝胆，早图大举。妻子的惨死和临终遗言激发了完颜雍绝然奋起的决心。

其实，完颜雍早就胸怀大志。他与海陵都是太祖之孙，谁也不心甘情愿地服从对方，加之海陵后期的败政，完颜雍早想取而代之，只是苦于条件不成熟而已。他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首先，通过生母李氏，在身边集合了以舅父李石为首的渤海李氏集团。李家世为辽朝的高官、权臣，占据辽阳及汤阴（今河南汤阴）地区的土地千顷。李石本人敦厚寡言，胆识过人，是文武双全的三朝元老。他告老还乡，投靠东京留守完颜雍，为其巡察城

防，协办军事，成为完颜雍谋士集团的核心人物、得力干才。其次，完颜雍还通过联姻与辽金两代的大官宦张氏家族交结，从而得到了张氏家族的支持。就这样完颜雍在东京辽阳府居官五年，联结了李氏、张氏两大家族，逐渐形成了独居一方的势力。此外，由于完颜雍曾在京城及外地任文武官职多年，政治声望较高，有许多聚居辽阳的权贵武将前来归附，这些都成为他夺权的军事支柱。

虽然完颜雍任职辽阳，僻在一隅，但海陵并没有让他放任自流。正隆五年（1160）秋，海陵派内弟高存福带领李彦隆出任东京副留守，监视完颜雍的行动，必要时有权就地处置。正隆六年（1161）八月，括里在辽东起义，完颜雍表面上要率命征伐，其时是想趁此机会积蓄力量，修造兵甲，以夺取金朝最高统治权。完颜雍大造兵甲引起了高存福的怀疑，他一面派人去密告海陵，一面与李彦隆密谋，准备以击毬为幌子骗来完颜雍，迫其就范。幸好被高存福的家人听到，报告了完颜雍。经过一番商议，完颜雍决定将计就计，以讨论征伐括里的有关事宜为借口，将东京官吏召集到他母亲出家的清安寺开会，在此剪除高存福党。起初高存福不敢来，完颜雍多次派人催请才到，于是当场将高、李二人抓了起来。恰逢南征万户完颜福寿率部两万从山东赶到辽阳，婆速路总管完颜谋衍率领的镇压括里的五千军队也从常安（今辽宁沈阳东北）回师东京。于是在十月七日，各路军进城，杀死高存福、李彦隆，使军威大振。第二天，诸军官属来到留守府门前求见，完颜雍刚刚走出来，诸路官属在庭下高呼万岁。经过一番推让、劝进后，完颜雍赴太庙祭祖，在宣政殿登上了皇帝宝座，开始了金朝第五代皇帝的帝业，定年号为大定。

金世宗登基后，加紧进行政权建设，以参与政变和拥兵起事的主要成员组成中央政权。任命完颜晏为都元帅，完颜彀英为左副元帅，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

为元帅右监军。还任命完颜独吉义和李石为参知政事，掌管一切中央政务。与此同时，为了彻底肃清海陵的影响，金世宗下诏历数海陵杀皇太后、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孙、毁上京等几十条罪过，把他贬为海陵炀王；给熙宗除掉东昏王的称号，恢复名誉，改葬于思陵；修复被海陵毁掉的会宁府宫殿，恢复上京称号；下诏海陵王朝的原有官员一律继续任用，并多方派出内线人物，四处奔走斡旋，用不同方式进行策反。

世宗认识到要结束南北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偏安于东京辽阳并非长久之计。针对都城迁往何处的问题，世宗谋士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大金王朝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乘驭中原力不从心，主张迁都上京；但以李石、完颜独吉义、张玄素等有见识的大臣则主张迁都中都。李石在给世宗的上书中说："海陵穷兵黩武，黎民百姓怨声载道，境内盗贼蜂起，此及天赐良机，陛下应当机立断，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建万世不朽的基业。"完颜独吉义也上书世宗，在对时局进行了全面分析后说："现在海陵率军南侵，士兵已渡过淮水，正全力南下，无暇北顾，陛下应及早进踞中都。"金世宗面对两派意见进行了分析。他想："从形势来看上京偏于一隅，对于已进入中原地区的金政权来说，不利于控制全国，而且，上京女真旧贵族的势力很大，也不利于君权的集中。相反，南迁中都不但可以尽快瓦解海陵政权，而且可以驾驭全国。"想到这，金世宗决心采纳李石等人的南迁建议。

金大定元年（1161）十月底，金世宗亲率完颜允济、完颜允迪，及满朝文臣武将，拥兵两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地向中都燕京（今北京）出发。在进军北京途中，金世宗为笼络民心，诏令天下大赦：截止至 1161 年 10 月 8 日以前，除了杀祖父母、父母的大罪之外，罪无轻重一律赦免；从前因海陵朝签兵从军，致使穷苦百姓欠下了官钱或私债，甚至是卖掉了孙儿女的，当即进行放

免；被海陵征发到汴京修建宫殿的民夫，或因参加契丹起义军致使家属被罚做官奴的，经官府验定核实后发还本处，与家人团聚；因惧怕南征白白送死的逃亡官兵或因躲避徭役而逃亡在外的民夫与奴婢以及犯法外逃的人犯等免罪不惩，使回家乡操生业，若原先是在籍军人，还可以重回军中任职……这些诏令使所及地区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而且也在中都金廷朝野引起了极大震动。金世宗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元宜之变、海陵归天时，金世宗已率军进至河北榛子岭，他闻讯后急忙派使向南宋提出了就地停火的建议，并声言以归还海陵所侵占的领土为条件。至此由海陵一手挑起的南征伐宋战争总算告一段落。十二月十九日，金世宗率军长驱直入，顺利地进入中都燕京城，夺取了金朝的中央政权。

世宗即位正处于金朝危难之际。金廷政治动乱，割据称雄之事日多，倾轧厮杀，屡见不鲜。特别是海陵南征伐宋前的诸多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致使全国百业荒废，人民流离失所。面对朝廷内外的种种危机，他果断地采取各项措施，稳定了动荡不安的时局。首先，他竭力笼络前朝勋臣，多次下诏对那些被无辜杀戮大臣的家属，沦为奴仆的，予以恢复身份；对那些大臣的遗骨，派人到各处去访求，由官府收葬；对那些被海陵无故削职、降职的官员给予改正；祖宗时曾跟随太祖、太宗立下汗马功劳而未曾受到迁赏的五品以上的致书上奏，予以升迁，六品以下官员及不任职事者，由尚书省给以适当的升迁；宗室中有不担任官职者，也授予闲散官职，给予适当的俸禄。这些措施安抚、笼络了女真宗室贵族，团结了上层统治者。

其次，为稳定最高统治集团，金世宗一反历朝滥杀宗室贵族反对派的做法，对宗室贵族和海陵手下的高官，不记前怨，采取宽容的态度。如海陵重臣白彦敬、纥石烈志宁听世宗将在东京称帝，便联络军队准备攻打东京。世宗派使去招降。白彦敬、纥石

烈志宁不但不归附，反而杀了世宗的使者九人。世宗无奈只好派兵讨伐，白彦敬和纥石烈志宁全军投降。世宗向他们责问道：“海陵暴虐无道，人们已经对他绝望，我以太祖庶孙的身份继承皇位有何不妥？你们杀死我派去的使者，又不能为海陵死节，等到士兵厌战，恐怕发生不测的情况下才来降我。我现在杀了你们，你俩还有什么话说？”纥石烈志宁回答说：“我等受海陵厚恩，所以当初不曾受降，臣罪该万死。”世宗感慨地说：“你们忠诚于自己的君主，可喜可敬。以后事奉我，希望也要忠诚于我。”世宗不但没有杀他们，而且委以重任，使他们在日后镇压契丹起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金世宗对白彦敬和纥石烈志宁等前朝武将的重用，使所有新降大定朝的军将们震动非小，都深感世宗是颇能用人的明君。

对海陵朝尚书令张浩的招降，更显示了金世宗超人的政治魄力。张浩是金历事几朝的老臣。海陵朝时曾任宰相和南京留守，官阶一品，很有名气。他因力阻海陵伐宋受到杖责，失去海陵的信任。金世宗得知此事即派人前往汴京，劝说张浩早日归顺新朝。大定二年（1162）二月，张浩率数名官员来燕京。金世宗召见后，即刻拜张浩为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让他入朝可不拜，并在大殿东边设座，对他十分尊敬。对于张浩过去失误之处，世宗加以排解，给其才能以充分的肯定。并意味深长地劝勉说：“你为相十余年，对政务熟识练达，现在二度为相，望老臣自勉，尽心竭力，不辜负朕的厚望啊！”

不仅对于老臣良将如此，即使对海陵死党，世宗也采取挽救的态度。马钦、萧玉、敬嗣晖等都是海陵爪牙，他们为虎作伥，恶贯满盈。但世宗仍本着宽大的原则，只削夺了他们的官职，放归田里。像敬嗣晖，虽为人狡诈，但办事机敏，娴习朝中礼仪，世宗便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授予丹州刺史。临行前告诫他说：“海陵时你身为执政，阿顺奉迎，我非常看不起你。今后应

当尽心奉职，洗心革面。如果怙恶不悛，我决不轻饶你。”由于敬嗣晖尽心尽职，大定十年世宗封他为参知政事。

毫无疑问，金世宗的招抚措施，稳定了金廷上层，使权贵们为其统治效劳尽忠。与此同时，金世宗对国内的农民起义进行剿抚，使当时较为混乱的社会日益趋向稳定。

金世宗忙于称帝，给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契丹人移剌窝斡的牧民大起义威胁着金世宗的统治。世宗继位后，立即采取招抚和镇压两手来对付起义军。他先派移剌扎八去招降，结果扎八见窝斡势盛反而参加了起义军。1161 年底，起义军发展到五万之众，称帝改元，形成与世宗分庭抗礼之势。为此世宗又用武力镇压，结果大败。大定二年（1162）正月，金世宗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措施。一方面派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等统兵前去镇压；另一方面下诏晓谕契丹军：凡归降者都给以优厚条件，进行策反来孤立窝翰一人。这年秋天，窝斡被人出卖，捕至京师被杀。世宗又派人前去招抚契丹各族，并把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分别统入女真的猛安谋克各部，使之杂处通婚，便于统治。

至此，金世宗基本稳定了国内局势，开始大张其鼓地施展其政治手段，进行政治革新。其中尤以求言从谏，整顿吏治，选贤任能，倡导文明、节俭为代表。

金世宗是终金一代少有的从谏如流的皇帝。由于博览史籍，熟悉汉族皇帝的统治思想和办法，他决定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曾告诫臣下说：“我追慕古代的圣明帝王，虚心纳谏。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可以上奏，不要荒废政事，放任自流。”又说：“海陵正因为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而走向灭亡的。”世宗不但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也严格执行。早在他称帝之初，出于把女真大贵族尽快拉拢到自己身边的政治需要，最先重用了女真元老勋贵完颜晏，使他出任左丞相高位。但完颜晏才疏学浅，不堪重用。完颜守道上疏说：“陛下您刚登上位，天下方定，正是大有

作为之时，但晏非有雄才大略以应时事，如果您敬爱他，不如给他丰厚的赏赐，不要让他当此重任。”金世宗觉得建议很好，就封安颜晏为太尉的高衔，让他退休养老去了。还有，金世宗刚进大都时，想对辽阳起事有功的将士大加赏赐，但当时国库空虚，他便想到向民间征钱作奖励之资。完颜守道知道后又上疏谏道：“人们苦于海陵暴政很久了，刚松了口气，可陛下立足未稳，仁政未施，也要征敛，如何对待民心众愿？此举所需财物，宁可取之于宫中，也不要厚敛于民众。”于是，金世宗听从了他的话，放弃了重赏功臣的念头。大定七年（1167）十月，金世宗下令要给东宫凉楼前面再增建座楼阁，参知政事孟浩闻知，力言谏阻：“皇太子虽贵为储贰，然所居与宫室比尊等贵，恐怕不合祖制，况且陛下一向以俭示德。”金世宗觉得此话有理，就停止了这项工程。

金世宗提倡纳谏，并经常用历代著名谏臣的名言诫示臣下。他读过《贞观政要》后，深表要学习唐太宗纳谏之风，盛赞魏征的才智忠谏，更希望大金国中多有一些像魏征那样诤言直谏的大臣。他赞赏因谏阻海陵南侵而被杀的太医祁为“本朝以来一人而已”。为了更广泛地听取臣下意见，世宗还不断疏通和增设纳谏渠道。他废除臣下上书先由尚书省阅读，筛选再承上的旧制。规定：凡是臣下的上书，一律由尚书省具体上奏。同时下诏“无论文武官员，凡是其上书被有关部门阻止的，可以直接向我进表禀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大定二十六年（1186）金世宗改变了一切上书由尚书省上奏的惯例，规定由登闻检院接受上书后，经过皇帝的谋士集团学士院直接上奏皇帝。就这样，在金世宗的鼓励下，满朝文武纷纷上书言事，使政治气氛十分活跃。

金世宗重视朝臣的良谏，自然也想到必须具有一批远见卓识的良臣。他当上皇帝本非顺章袭授，而通过起兵而得。这过程中使他更认识到选拔人才，任人唯贤的重要性。他曾对宰臣说：

"春秋战国之际，群雄并起，不相上下，齐桓公之所以终成霸业，乃得于贤相管仲的辅佐。我自即位以来，夙夜忧虑，惟恐错失人才，以我泱泱大国，岂能无人，当务之急就是要选拔人才。"金世宗多次下诏，强令宰臣以及各级官员荐举贤才。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朝臣不荐人是因嫉妒，害怕被荐举的人胜过自己，抢走自己的禄秩。一次他对御使大夫李石说："御史台本来是用来区分邪正的。然而，我只见你们弹劾百官的恶迹，从未见举荐何人。难道是满朝上下就没有一位贤才吗？自今以后，宜派监察御史分别到各路，不但检举邪恶，而且要举荐贤良。"除此之外，金世宗还重视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下诏，规定"凡参加进士考试，文章列入优等的一律录取，不限制人数。"这些人中，再通过察访他们的品行政绩，对德才兼备的人授官重用。世宗通过科举考试，广招人才，壮大了其官僚队伍。

金世宗不但大力提倡举荐人才，选拔贤良，而且能不拘成规，知人善任。世宗指出："太宗以来，吏部循资选人，扼杀了大批人才。以参知政事孛术阿鲁罕为例，他自幼聪明伶俐，通晓契丹文和女真文，为人忠正沉厚，有才干，但由于出身低微，只能担任地方官。等到能担任宰相时，他已年老体衰，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才被耽误，难道不十分可惜吗？"世宗决定不拘资历提拔和重用有识之士，使许多有才干的人得以尽其才。像移剌道，为人宽厚，很有才干，通晓女真、契丹、汉三种文字。海陵虽然发现了他的才识，却不予以重用，只给他一个都督府长史的清职。大定初年，世宗见他练达有才干，提升他为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过了一段时间，世宗又发现翰林学士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清淡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又把他调任中都路转运史，其后屡有升迁，最后任为宰相。

金世宗在选拔人才的同时，对已有官僚队伍严加整顿，务使

大定朝百官勤于政事、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他常说：“对官吏应当不断考察政绩，然后加以提升。大定二十五年（1185）金世宗巡幸上京，一路上所过州郡，都征发众多的民夫大修桥梁驰道，以博得世宗赏赐，惟独同知北京留守刘焕，只派少量的民夫把道路修得平整些。金世宗对他的做法极为赞赏，升他为辽东路转运使，相反，对那些为官只知苟且因循或任职不谋事的，都降职使用。

金世宗大兴刷新吏治之举，尤注重改变海陵朝末期吏治败坏、贪污贿赂公行的局面。他对官吏中贪赃枉法、中饱自肥者深恶痛绝，一旦发现有些劣迹，无论皇亲国戚，勋贵元老，一定严惩不贷。李石，身兼国舅、国丈、元勋三种身份，大定三年(1163)，在任参知政事期间，冒留国家的粮食，被贬为御史大夫；徒单贞，世宗的亲家，在任咸平尹时贪污不法，累赃巨万被人告发。世宗派大理卿李昌图前去勘治，李昌图徇私舞弊，未将徒单贞停职察办。世宗闻知大怒，重新派人前去办理，惩处了徒单贞，追回赃款并处分了察办不力的李昌图。为了阻绝官吏的贪赃不法，世宗分别于大定三年（1163）、大定二十年（1180）两次下诏：凡是因贪污罪而被除名的永远不得重用。职官犯罪，同僚不能纠正，而又不上奏的同样受到惩处。通过严惩重处，使大定朝吏治较金各朝要清明得多。

金世宗重视吏治，还制定了官吏退休制度。规定大臣六十岁以后，便可以请求辞职；凡是年过七旬而辞官的，无论品位高低，一律发给一半的俸禄。金世宗通过以上种种吏治改革，稳定了金朝的封建统治，也壮大了统治集团。

金世宗在金朝皇帝中处于突出的地位，还在于他放弃了“本朝以神武定天下”的老传统，而“以文治修太平”了。他注重文明、兴学崇儒，逐渐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治世思想。即位后不久，他对文武大臣说：“海陵崇尚吏事，不兴仁政，当时的

官员也以案牍为功。你们今后要摆脱烦琐的吏事，多思考一些治国治民的办法。”金世宗要用忠孝仁义之道，去维护大金国上下统属、尊卑有序的贵族统治的等级制度，自然重视使女真人接受这些思想的文化教育。大定六年（1166）金世宗创建起大定朝第一所全国最高学府——太学。这是金国中央直接管辖正规学校教育的开端。此后，又相继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设置了地方学府——府学。此外还增设州学多处。至此，一套较完备的三级正规学校教育体系建成，为女真族全面完成封建化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学校里学习翻译成女真文的《易经》、《书经》、《论语》、《孟子》、《老子》等，并规定，猛安谋克只有学习过这些经书才能承袭父位。

金世宗在倡导儒家思想，袭用封建文明的同时，又自信女真族固有的古风遗俗和特有的骑射武功乃是传家立世之宝，直至当朝依然富有生气，弃之不可。为了恢复女真遗风、重振女真族的民族优越感，他致力于恢复金朝的发祥地——上京的地位，并多次表示要御临上京，一展女真遗风。大定二十四年（1184）金世宗率领诸王巡幸上京，于当年五月到达。直到大定二十六年（1186）春天才返回中都，前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在上京的日子里，金世宗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凭吊昔日先烈们英勇奋战的古战场，还多次宴请居住上京的皇族宗室、元老勋贵。晓谕百官，自己万岁之后，也迁来上京葬在太祖的陵旁。一次世宗在皇武殿宴请宗室宗妇，宗室妇女以及元老大臣纷纷依次起舞，为世宗祝酒。饮至半酣处，世宗兴致大发，说：“我来为你们唱一曲女真人的歌。”说着便唱了起来，歌声粗犷豪放，极言创业之艰难，继述之不易，及唱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时，慷慨悲激，泣不成声。宗戚、群臣感动不已，纷纷捧觞祝酒，山呼“万岁！”群臣同乐，通宵达旦。世宗要返回中都时还依依不舍，他语重心长地对前来送行的宗室戚属们说：“我久思故乡，很想多

呆几年，怎奈为君要以国事为重，不能长留于此，当今天下承平日久，你们不要骄纵奢侈，当不忘祖先创业之艰难啊！"

金世宗怀恋古朴民风，在位期间，极力提倡节俭。他多次下诏放免宫女，减除御膳。据说有一次他正在吃饭，一位公主前来请安，世宗竟没有多余的饭菜来招待女儿。当值的官员见此情景，劝他添些饭菜，世宗感慨地说："我身为天子，如果想奢侈豪华，即使每天吃五十只羊也不是一件难事。可这些东西都是民脂民膏，不应当妄费。现在的官吏只知耗费无度，不知这些东西自何而来。我年轻时屡次出任外官，深知民间疾苦。前代的许多君主在位之时，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但由于不知稼穑的艰难，往往失去了天下。"对于太子和诸位王子，世宗还经常地施以身教。一次，他指着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说："我这身衣服已穿了三年没更换了，现在还很完好，你们也应当记住要生活朴素。"世宗听说自己巡幸各处居住过的殿堂都封闭起来，不让别人住了，认为这样做太无聊而且太浪费，便颁布诏令：凡自己居住过的房子一律准许别人居住。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二十四日，金朝一代英主完颜雍病死于中都福安殿，享年67岁，尊庙号为世宗。同年四月，遗体葬于大房山兴陵。

金世宗一朝，以内安百姓、外和邻敌为治国总策。在内，恤民重农，减轻剥削，广开财源，使国家强盛起来；在外，停止对南宋的征伐，奠定金廷与南宋相继四十年和平共处的局势。还以忍让之态东和高丽，西睦西夏，给各族人民造成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对金世宗，无论是本朝，或者后世，历代史家无不给予较好的评价，称其统治时期为"小尧舜时期"，具有"汉文景风"。这些都显示出，金世宗确是金朝历史上具有远见卓识，不可多得的一位女真明君。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世宗纪》、《完颜谋衍传》、《完颜守道传》、《敬嗣晖传》、《李石传》、《张浩传》、《刘焕传》。

《金史纪事本末·世宗致治》

郑王镐王之杀

金朝自太宗继位以来，历代帝王即位之后，大都以屠杀宗室来稳固自己的皇位，兄弟、父子彼此倾轧之事常有发生。金世宗执政后，改变这一做法，对宗室兄弟采取了安抚政策，从而避免了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但他在太子死后，传位皇太孙的做法，却种下日后诸王争夺皇位的祸根。

金章宗即是以皇太孙的身份继立皇位的。大定八年（1168）春天，金朝皇太子允恭喜得贵子。消息传来，正率文武官员在金莲川消夏避暑的金世宗大喜过望，他急忙下诏起驾回京，亲临探视，并为此大宴群臣。在宴席中金世宗高兴地对李石和纥石烈志宁说："我虽然有很多儿子，但是明德皇后只生了皇太子允恭一人，今又幸有嫡孙，令朕十分快慰了。"就这样，章宗自幼便深得世宗重看，到十岁时就被册封为金源郡王。当时正值"太平盛世"，世宗怀思故土，率部分大臣巡幸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让皇太子留守中都，监临政务。这允恭自幼生长在深宫，只知埋头读书，对处理政务一窍不通。世宗北巡，朝中大事都压在他一人肩上，他只得日夜操劳，加上缺乏经验，忧心忡忡，终于积劳成疾，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六月逝于中都。世宗闻讯悲痛万分，急忙起驾回奔中都。此时中都皇宫中已乱成一团，前来吊唁的皇子、公主、王妃、文武大臣往来不断，尚未长成的金源郡王只知嚎哭。左丞相纥石烈志宁忙劝慰道："哭泣是常礼。但郡王身处冢嗣之位，岂能因为哀痛就置江山社稷于不

顾?”接着他又召来太子侍读完颜匡说：“你侍奉太子已经好多年了，可算是太子的近臣。现在郡王哀痛过甚，你应当劝劝他，保护好他，不要离开左右。”九月，世宗返回中都，整顿混乱秩序。进封金源郡王为原王，判大兴府（今北京城西南）事，以便让他熟悉地方政务。第二年五月，又授命他为尚书省右丞相。在他任职刚四天，世宗就派人将他召来，问道：“你处理政事有几天了?”他响亮地回答：“四天了。”世宗又问：“你认为在地方任职与在尚书省处理政事相同吗?”他回答说：“不同。”世宗微笑着点点头说：“你说得对，地方政务繁杂细小，尚书省执掌大政，你现在正年少，对于处理政务要好好学习。我让你担任右丞相，一方面是要试一下你的才干，另一方面是要让你熟悉朝政，你要好自为之。”说着世宗还拿出宫中存留的《舆地图》，让他了解金朝的版图及天下远近险要。大定二十六年（1186）十一月，金世宗下诏正式册立他为皇太孙，赐名完颜璟，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明德皇后只有你一个嫡孙，通过试用来看，你还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朕立你为皇太孙。但你要知道，立你是我，保守此位则在你。你应当德行端正，不近奸佞，对朕要至忠至孝，时时自勉，可不要辜负众人的希望啊!”在此后世宗病重期间，完颜璟以皇太孙的身份全权处理政务，并除授五品以下官员。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崩于福安殿，遗诏立完颜璟继立皇位，这就是金章宗。

章宗即位正值金朝盛世。他对世宗的文韬武略耳濡目染，上台后继续实行“仁政”，并不断将世宗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各种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了女真族的彻底封建化。对外，章宗北伐鞑靼，稳定了北部边疆；南征赵宋，签定“嘉定（宋宁宗年号）和议”，维持了宋金原先划定的边界。尽管章宗文治武功，勋业彪炳，但由于皇位继承问题，世宗诸子仍对他采取敌视态度。对于这种潜在的威胁章宗也早有察觉，为防止发生不

测，不断削夺他们的特权，并在诸王府设置王傅和府尉官。这一设置名义上隶属于王府，实际上是章宗安插在诸王身边的眼线，用以监视诸王的行动。

章宗与世宗诸子的矛盾由来已久，但真正对诸王大开杀戒还是在“经童做相，监婢为妃”时期，经他俩一手策划完成的。且说这宠妃名唤李师儿，她出身微贱，父名湘，母名王盼儿。由于其父刘湘犯罪，李师儿被没入宫监，又于大定末年被选为宫女。按照金朝惯例，宫女入宫后首先要学习识字和宫廷礼仪。学习时宫女与宫教以纱幛隔开，宫女在内，宫教在外，双方不能见面。宫女有不认识的字或不明白的问题在纱幛内提问，宫教在外回答。李师儿入宫时，担任宫教的是张建。李师儿聪慧好学，对所教的东西能很快领会，并善于质疑问难、举一反三，给张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由于隔着纱幛，他只知道那个嗓音清晰洪亮的宫女才思最为敏捷。一次，章宗问及张建：“宫女中谁最才华出众?”张建回答说：“有个声音清亮的宫女学得最好。”于是，章宗召见了李师儿，并对她的年轻貌美、聪明伶俐久久不能忘怀。不久，章宗接受宦官梁道的建议，将她纳为妃子。李师儿聪颖静雅，能诗会文，并且极善于察颜观色，深得章宗赏识。一次，她陪章宗静坐赏月。章宗突然雅兴大发，随口吟道：“二人土上坐，”旁边的李师儿应声对道：“孤月日边明。”这使章宗大喜过望，从此更加宠爱李师儿。明昌四年（1193）章宗封她为昭容，转年又进封为淑妃，她的父亲刘湘被追赠为上柱国、陇西郡公，哥哥李喜儿被授为宣徽使，赐名李仁惠，她的弟弟铁哥也被授为近侍局使。一时间，李氏兄妹荣宠有加，气势熏炫。朝中许多大臣竞争射利，纷纷拜在李氏门下，南京李炳、中山李著甚至不惜更易族谱与李氏攀上本家。章宗即位以前，结发妻钦怀皇后蒲察氏便命归黄泉，此后，章宗一直没有再册立皇后，此时有意要册立李师儿为皇后。朝中哗然，御史姬端修、御史大夫张伟、侍御

史路铎等官员上书章宗，言道："按照金朝惯例，皇后必须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等部族酋长的家中，今李淑妃出身低微，不能母仪天下，怎能立为皇后？"章宗无奈，只好立李师儿为元妃。她虽为元妃，但地位与皇后也不相上下，更加飞扬跋扈。元妃的嚣张气焰引起朝臣愤然，一次，章宗询问众大臣，汉高祖与光武帝谁优谁劣，平章政事张万公回答说："汉高祖优。"徒单镒则回答说："光武帝振兴汉室，再造帝业，在三十年中没有沉湎于酒色，而高祖宠幸戚姬，酿成大乱，就这一点而言，应举武帝为优。"其指责章宗宠爱李师儿之意尽在不言之中。

"经童做相"指的是朝中一权臣胥持国。按金代科举制规定：士庶子弟年龄在十三岁以下，能读大经两部、小经三部，又能读《论语》诸子，认识五千字以上的，经过考试合格便称为经童。胥持国就是经童出身，章宗即位以前曾任职太子宫，明昌年间，被授为尚书右丞。他见元妃李氏深受章宗宠幸，便曲意奉迎与之交结。这元妃李氏也明白自己出身低微，要想在宫中立住脚跟，必须得到朝中官员的支持，于是多次在章宗面前大夸胥持国，使他更得重用。就这样，明昌年间，元妃李氏与尚书右丞胥持国勾结起来，互为表里，把持了中央政权。并与章宗一起诛杀了对中央政权威胁最大的郑王和镐王。

郑王永蹈，母亲是世宗朝重臣李石的女儿元妃李氏。于大定十一年（1171）受封为滕王，后来又进封为徐王。大定二十五年（1185），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充大兴尹。章宗即位以后，他被改判彰德军节度使，进封卫王。接着又于明昌二年（1191）徙封郑王，改判定武军。郑王对章宗以太孙嗣位深怀不满。他有个家奴叫毕庆寿的得知郑王心意，便暗中勾结崔温、郭谏、马太初策划拥立郑王为乱。他深知永蹈迷信图谶，便私下对永蹈说："郭谏很会为人相面，王爷何不叫他来算一算未来吉凶。"永蹈一听非

常高兴，忙将郭谏召进王府，让他给自己和妻子、两个儿子相面。郭谏心怀叵测，迎合永蹈说："王爷相貌堂堂，王妃和二位公子也都是大富大贵之相，更何况王爷您又是元妃长子，非其他王爷可比，定非久居人下。"永蹈闻听飘飘然，又召来崔温、马太初观测、议论天象。郭谏、崔温乘机假传天意，鼓动永蹈起兵叛乱。他们煞有介事地说："臣观天象，丑年（明昌四年）之后寅年（明昌五年）之前，天下将有大乱，来年春天将有属兔的人登上皇位。"永蹈一听喜出望外，这属兔的人不正意指自己吗？于是对他们深信不疑，积极准备发动叛乱。

永蹈先收买章宗内侍郑雨儿以刺探皇上的言行，又任用崔温为主谋，郭谏、马太初往来游说，搜罗同谋，扩张势力。河南路统军使仆散揆，是永蹈长妹韩国公主的丈夫，他驻防河南，拥兵数万。永蹈要发动叛乱，急需仆散揆在军事上的援助。于是便与次妹泽国公主长乐密谋，让驸马都尉蒲剌睹致书仆散揆要他一同举事，但仆散揆没有答应。永蹈蠢蠢欲动，图谋不轨，引起了家奴董寿的怀疑。他前去劝说永蹈不要谋反，遭到拒绝，就告诉了另一家奴千家奴。千家奴知此事有关社稷安危，就密告了章宗。章宗与元妃李氏、尚书右丞胥持国商议。他俩力主借机剪灭诸王，以免后患。于是章宗下令将永蹈拘捕，命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参知政事胥持国、户部尚书杨伯通、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鞫问此事，由于牵连的官员太多，此案久悬未决。章宗又下令由完颜守贞一人全权鞫决此案。案情查清后，于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章宗下诏赐郑王永蹈及王妃卞玉、两个儿子按春、阿辛、泽国公主长乐自尽。处斩全部同谋蒲剌睹、崔温、郭谏、马太初等。仆散揆虽未参与祸乱也被解职，家奴董寿免死改隶监籍，赏赐千家奴铜钱二千贯，特迁五官杂叙使。郑王谋叛之后，章宗对诸王的限制更加严格，又增置诸王司马检查门户出入，连王府家奴的出入也要严加盘查，还下令限止诸王毬猎游宴。

镐王永中，是世宗长子，为元妃张氏所生。大定初年先后受封为许王、越王、赵王。后又任枢密使、大宗正事。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巡幸上京，特命永中辅佐太子允恭留守中都。章宗即位后，永中改判西京留守，进封汉王。章宗为笼络诸位皇叔，下诏赐给每人黄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钱两千贯、重币三百端、绢二千匹，此外另赐永中修公廨钱三百万，特加封永中的儿子石古乃为银青荣禄大夫、阿离合懑为奉国上将军。但永中并不领情。他自恃世宗长子，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对章宗不服不满，处处表现出不恭。明昌二年（1191）二月，章宗的生母孝懿皇太后去世，永中称病未来奔丧，章宗为此派人去王府将他责备一番，从此二人产生嫌隙。明昌三年（1192）永中被封为镐王，改判平阳府事。转年，郑王永蹈以叛逆伏诛，章宗增置王府司马检察门户出人。河东提刑判官把里海私自求见永中，章宗得知下令解除了他的官职，并杖责一百，由此永中对章宗更是不满。

故尚书右丞张汝弼，是永中母舅，其妻高陀斡，不满于章宗继承皇位，多次劝说永中夺取皇位，并将永中生母元妃张氏的画像挂在正堂，早晚供奉。她还施展邪术暗中诅咒章宗。明昌五年（1194）章宗以诅咒罪处死高陀斡，开始严密注意永中的行动，以寻机彻底解决永中尾大不掉的局面。机会终于来了，永中的第四个儿子阿里合懑，因不满于章宗对王府的种种限制大发牢骚，这些话传到章宗耳朵里。于是章宗以此借口下令查封了镐王府，诏令同签大睦亲府事壟、御史中丞孙即康前去查问。永中家奴德哥上书章宗揭发永中曾对侍妾瑞雪说过“我得天下之后，封你为妃”的话，章宗认为这事大逆不道，下诏赐死永中，并将他的两个儿子神徒门和阿里合懑斩首示众。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纪事本末》：《李妃干政》、《章宗嗣统》、《镐王郑王之杀》。

《金史》：《元妃李氏师儿传》、《世宗诸子》。

宣宗南迁

当金雄踞于北方边陲将近一个世纪时，随着蒙古的兴起和不断打击，它已失去了昔日那种挟雷携电、无坚不摧的气势，呈现出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破败景象。更何况此时当朝的金宣宗完颜珣（1163—1223）也远非中兴之主。他腐败无能，为政接二连三的失误，终于把一个好端端的王朝拖到了覆亡的边缘。宣宗迁汴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很重要的转折点。

蒙古是我国兄弟民族之一，属东胡语族后裔的一支，从很早的古代起，就游牧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一带。唐时，属于室韦的一部，后迁徙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驻牧，世隶属辽、金。金朝统治者对蒙古施行民族压迫政策。章宗承安元年（1196），封蒙古首领铁木真为“扎兀惕忽里”，随着蒙古的逐渐壮大，1206 年，铁木真被蒙古各部推戴为大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强大之意），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封建领主制的蒙古大汗国政权。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对外扩张的发展，1209 年蒙军长驱直人，攻破西夏的中兴府，迫使西夏降服，这也从战略上完成了对金的包围。

蒙金战争开始于金卫绍王统治时期。还是在卫绍王即位以前，他奉命到静州（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接受蒙古的贡物，那时成吉思汗与之相识并看出他庸懦无能。后来卫绍王即位，消息传到蒙古，成吉思汗轻蔑地说：“我以为中原的皇帝都是了不起的人才做得，像卫绍王那样庸懦之人也配做皇帝吗?”卫绍王闻

讯大怒，想等蒙古人贡时加以报复，蒙古发觉了这个迹象，便从此与金绝交。

大安三年（1211）二月，蒙古发动对金战争，卫绍王永济慌忙应对，一方面派西北招讨使粘合打去求和；一方面派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行省边地，指挥抵御事宜。蒙军来势汹汹，以者别为前锋，突然攻入金人刚修好的乌沙堡，打破了金高枕无忧的梦。接着又占领了乌月营。幻想靠边墙来抵御的金军失掉险隘，仓皇退兵。成吉思汗大军继续前行，进击桓、抚等州。八月间，卫绍王又任命完颜承裕主持兵事，率兵四十万，据野狐岭天险抗蒙。金军毫无主动出兵作战的勇气，为保“万全”，马、步大军齐头并进。成吉思汗得此消息后，将军队分为两翼，开向野狐岭的通道獾八嘴，在那里大败金军，完颜承裕仓皇逃至宣德州宣平县。宣平是金北边战略重地，那里既有天险可守，又有当地土豪愿领兵为前锋，但完颜承裕继续南退到浍河堡，蒙军随后赶到，两军在此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战了三天，杀得昏天黑地，金军损失惨重，主力被消灭，承裕狼狈而逃。九月，蒙古乘胜追击，攻下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县），十月到达缙山县，距中都只有一百八十里。与此同时，蒙古的另一路军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从西路经汪古部进兵，越过界垣占领净州（今内蒙古四王子旗西北），又过阳山（今内蒙古狼山），攻下丰州（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十月攻下去内（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沙尔沁）、东胜（内蒙古托克托县）、武（山西五寨县北大武州）、朔（今山西朔县西南）诸州，从西及西南威胁金朝的西京，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弃城逃回中都。此次蒙军危及中都，卫绍王接受主战派死守的建议，使蒙军屡攻不下，只好退兵，沿途大掠而去。

1213年，蒙军又大举南侵。此时，金廷正一片欢歌，庆祝金宣宗登基。这个在社稷危难中即位的天子就是完颜珣，他是世

宗的孙子，太子允恭的长子。太子未嗣位而病亡，世宗便把孙子接到宫中抚养。时光如梭，完颜珣出落成风度翩翩、仪态非凡的青年。他喜欢高谈阔论，汉学造诣较高，尤其长于写诗，赢得朝野的一致赞誉。作为龙子龙孙，他自然升迁得很快，二十六岁时进封为丰王，并多次掌管兵部、刑部，领兵外御，章宗时改封翼王、邢王、昇王。假如在海内升平、军旅不兴的时代，完颜珣很可能成为风流儒雅的名公臣卿，但是崛起于朔漠的蒙古人咄咄逼人的入侵，打乱了全国的统治秩序，完颜珣却因祸得福，一跃而爬上了天子的宝座。原来，即位只有五年的卫绍王永济，因御敌无方、指挥失误，被权臣胡沙虎所杀，而此时世宗子孙凋零殆尽，作为卫绍王侄子的完颜珣正在彰德（今河南安阳）。在蕃汉大臣一致上表劝进下，年过半百的完颜珣日夜兼程赶往中都（今北京），在叔父的血泊中即了帝位，改元贞祐。

正当金国君臣弹冠相庆之际，传来了蒙军南下消息。此次成吉思汗循旧路总戎南征，先攻下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县）德兴府，进至怀来（今河北怀来）。当时驻守在这里的是术虎高琪，他对内如豺狼，对外如羔羊，与蒙军一交战，便被杀得大败。蒙军追击至北口，进攻居庸关。金在居庸关设险坚守，成吉思汗留者别等在居庸，自己率大军向中都以南地区掳掠，一直杀到距燕京仅二百里的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紫荆岭）。随后兵分三路进攻：以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路军，循太行山西南，攻掠河北、河南、山西；以皇弟哈撒儿等为左路军，沿着海边向东，取蓟（今天津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等州及辽西（今辽宁义县一带）；成吉思汗与幼子托雷将中军，由河北中部直扑山东。蒙古军队倾国出击，攻势凌厉，而金兵多被派往山后（今河北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防守。河北、山东等处无兵可调，只得临时征发乡民为军，上城守御。蒙军得知此情，故意将抓来的金兵家属编成军，迫其攻城。让父

子、兄弟一攻一守在城头相见，彼此呼唤，使守城者无心防守。蒙军用此计，在数月之间连破金国九十多个郡，几乎踏遍黄河以北。除了中都、通（今北京通县）、顺（今北京顺义县）、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十一个城池外，其余都落入蒙军之手，未破城邑也都残破不堪。

当蒙军到达中都附近时，金军主帅胡沙虎想把他们诱至涿（今河北涿县）、易（今河北易县）之间，一举歼灭来犯之敌，然而蒙军一鼓作气迅速占领了涿、易二州。在此国家危难之时，金军内部又出现了内讧，原来此次金方主帅胡沙虎正患脚病，蒙军乘胜进攻，多亏金军将士同心协力，拼死苦战，才将蒙军打退。翌时再战时，胡沙虎因脚病发作不能出战迎敌，便命担任左监军的术虎高琪领乣军五千人出去应战。高琪畏怕蒙军如虎，竟延误时期不到。胡沙虎大怒，要将高琪斩首示众，多亏宣宗劝阻方才保得一条性命。于是胡沙虎命令高琪明日再战，胜了则赎了昨日失时之罪，败了则杀他个二罪归一，吓得高琪胆战心惊。第二天，高琪出兵拼死作战，谁知忽然北风大作、吹沙扬石，人连眼都睁不开。蒙军一见，便乘风纵火驰击，把高琪军杀得大败。高琪知此次回去必被胡沙虎所杀，必想：与其这样束手就死，不如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他领着乣军直奔胡沙虎的府第，杀了胡沙虎，然后拿着胡的人头来宣宗面前请罪。宣宗一向忌惧胡沙虎权倾朝野，疑其有谋反之罪，加之此刻正需靠高琪将兵退敌，不敢加罪。于是宣宗就势封高琪为左副元帅，下诏宣布胡沙虎为政之恶。此时成吉思汗的军队已到了中都的北郊，蒙军将领一致请求攻城。而成吉思汗此次南侵志在掳掠，还无意灭金，便遣使晓谕金国的君臣说："你国的山东、河北郡县都被我军占有，你们现在所守住的只有燕京，老天爷已意在亡金，我军也将你逼到绝路。但我现在决定回师，留你们一命，你们难道还不快拿些东西犒劳我军，来平息一下我军将士的愤怒吗？"惊慌失措的金宣

宗一听此谕，不胜感激，忙遣使请求议和。依蒙军所要，金送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给成吉思汗，又献上彩绣衣三千件，童男、童女各五百人，还有无数珠宝马匹。成吉思汗在掳掠了大批财物之后，决定返旆北归，懦弱的金宣宗还派丞相完颜福兴送蒙军出居庸关。居庸关雄峙于长城之上，虎踞龙蟠，地势险要。当时金将李雄拥兵百万在此扼守，打算在这里伏击蒙军。完颜福兴一到，便传宣宗之命说："南北已经议和，不许滋生是非。"就这样金军伏而未战，眼睁睁地看着蒙军掠带各种财物出关北去。

蒙军虽已拔营远去，金宣宗仍然心有余悸。他想："蒙古兵强劲剽悍，金兵远非他们的对手。况且长城以北的土地均为蒙军所占，金无险可守，中都就暴露在敌人面前。再加上距中都不远，蒙军若发兵南侵，金连备战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情况绝非长治久安之计，若不及早想办法，不知哪天蒙古人一到，金便会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可要想避开蒙古人，只有将都城南迁……。"正当他满怀惊惧、冥思苦想之际，大名府留守余崇义奏请迁都，以避敌人之锋。宣宗看罢奏章，正中下怀，便召集群臣商议此事，群臣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一派主张迁都，一派主张固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主守派一大臣慷慨陈词，说道："中京营造不易，岂能轻易放弃？如今畏敌远逃，皇帝銮辂一动，人心必乱，这样北方诸郡也就守不住了。更何况，我们能走，敌人也能走，若敌人再南下追来。我们又退往何处呢？依臣看来，唯今之计只能固守，只要中京不丢，河北、河南便可保住。否则不但中京、河北不保，连河南也难以自立。我们不如趁与蒙军讲和之机，聚集兵力，积贮粮食，训练士卒，固守京师。这才是上策。"这一派所说不无道理，但此时的金宣宗已成了惊弓之鸟，哪顾得长远打算，自然无心听取。迁都派也振振有辞地说道："中都虽处在全国中心，可现在已与敌境为邻，冒锋镝之险来守这样一座空城实在不合算，再何况京师一旦危急，我君臣

性命朝不保夕，那时又岂有江山社稷在？死守成规，实在不可取。唯今应当迁都备战，休整士卒，有朝一日再报仇雪耻不迟……。”这一派巧言善辩、委婉圆滑，把畏敌远逃说得如卧薪尝胆一般，令宣宗大为欣喜。善于察颜观色的大臣聂希古知道宣宗本心乐意迁都，便奉迎道：“都城我看是绝对应当迁的，这似乎已不必再议，还是讨论一下迁往何处好？”大臣俞宪之、雍迪附和说：“此言极是，太原土地贫瘠，又临近敌境，中山（今河北定县）离中都不远；永兴（今陕西西安）路程遥远，此三处都非宜迁都之所。要论商旅云集，人烟兴隆，只有大名（今河北大名）、汴京、洛阳三地。请陛下裁定。”另一大臣接着说：“臣以为汴京虽是个四通八达的要地，宋灭未久，迁都于此会人心思变，这一点我们不可不思。况且当初宋以汴京为都是以东南漕运物资来供给的，如今我们要是迁都汴京，是无东南物资供给的，不如迁都洛阳。”聂希古听罢，摇了摇头说：“若论地势条件，洛阳不如永兴，汴京不如洛阳。可是洛阳的宫殿废弃已久，若再加以修缮，国家也投资不起。与之相反，汴京的宫殿自海陵王修好以后，至今完好无损，不如迁都汴京，再慢慢图谋发展。”。大臣孝迪又站出来说：“汴京果然是建都的好地方，可是它离南宋朝廷太近了。迁都到那儿，恐为宋人骚扰，还是应谨慎从事。”学士孙大鼎又反驳说：“如今这事不容我们优柔寡断。汴京虽靠近南京，然宋国君臣胸无大志，已偏安江南，他们对韩侂胄失败之事还忧虑不已，哪敢再动兵骚扰我们。再说，我们大金国的军队虽与蒙古军不能匹敌，但要制服宋军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必为此忧虑。”迁都派你唱我和、振振有辞，固守派的大臣也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宣宗的侄子霍王从彝进谏说：“我大金国祖宗的陵墓、宗庙社稷、百官衙门都在中都，怎能舍此远逃呢？”然而宣宗此时已胸有成竹，决意迁都，因此说：“中都缺粮草，又调不来，现在迁都汴京不过是权宜之计，待一二年后粮食贮备足了，再迁

回中都不迟。"从彝见宣宗不纳忠言，一心只想逃跑，忧郁成病。元帅府经历官纳坦谋嘉也上谏说："河南地势狭窄、土地贫瘠，日后若宋和西夏合围攻我，那时河北定然保不住。如今应选诸王分别镇守辽东、河南，中都是万万不可丢的。"太学生赵昉等四百多人也在殿前上书陈说不可迁都，宣宗都置之不理，屏而不纳。

宣宗南迁主意已定，下令征调大车三万辆连载图籍文物，骆驼三千头装运珠宝珍玩先行起程，又任完颜承晖为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抹捻尽忠为副元帅，辅佐太子守忠留守中都。一切安排好后，于贞祐二年（1214）五月十八日，宣宗领着百官扈从，从中都出发逃往汴京。金朝的达官显贵害怕蒙古人的打击，把河南视为躲避蒙古人的"桃源圣地"，拉妇携子，带着金银细软之物，也蜂涌逃往汴京，从此金也就走上了北宋灭亡的老路。直到七月，宣宗君臣一行到达汴京，从中都搬运来的图籍、珍玩也陆续运到。汴京的老百姓见到这些文籍书画、图史珍玩大批运往城里，不无感慨地说："靖康二年（1127），这些图书字画被金人从这里掠去，才过了九十年，又都从中都搬运回来，真是时事变迁，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宣宗进到汴京也是百感交集：想当初，金朝初创，宗翰曾劝太祖建都于燕（今北京），精于天文地理的司天监郝世才曾反对说："燕京土质干燥、山高路远、缺乏水源，可作军事重地，但不宜作帝王之都。如处于战乱时期，可居此地指挥作战，至于太平守业时期，以此地作为文治中心，则一定会出祸乱。"章宗泰和年间传颂着一首童谣：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处，前后总迟留。也意在于说燕京不是久居之地。如今山河残破、社稷危机，自己从中都迁出，果然应验了这些说法。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感伤又有何用，也只有抖擞精神应付危局，好在蒙古军队离此尚远，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维系人心。想到这，宣宗先下了一道罪己诏，向

上天承认自己为政之误，假惺惺地说："一人不好，天下万民又有何罪，每每想到此，则倍加感伤！"又下诏给天下的莘莘士子，要他们在此危难之际，齐心合力，尽忠报国。尽管宣宗作了许多表示励精图治的官样文章，可实际上，他仍然纵情声色、玩物丧志。那些随行的大臣也多是趋炎附势、无耻奔兢之徒，根本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时人有诗讥讽南迁的君臣："州北风光艳绮罗，南来扈从北人多。梨园法曲怀双舞，月窟新声倩女歌。紫禁衣冠出金马，青楼阡陌瞰铜驼。"可见当时的金国大厦已被这些虫蚁蛀空，江山社稷处在风云飘摇之中。

再回过头来看宣宗南逃后的中都城，更是人心大乱，岌岌可危。宣宗离开中都不久，驻守在涿州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良乡镇）一带的契丹军和乣军即叛降蒙古。这时成吉思汗正驻军桓州（今内蒙正蓝旗西北），得到宣宗南逃的消息，勃然大怒说："既然已经与我军议和，今又南迁汴京，可见他们议合是假，我岂能受这种愚弄，还得南下进兵追之！"恰巧又得知乣军来降，喜出望外。贞祐二年（1214）八月间，成吉思汗命蒙古将领三木合拔都与金朝降将、契丹人石抹明安及涿州投降的汉人将领王楫等率军进攻古北口，以直逼中都。宣宗南逃的怯懦行动，早已使军心混乱，今见蒙古军杀来，立时土崩瓦解，望风而降。驻守在中都的右丞相完颜承晖见此情形，立刻用白矾书写奏章向汴京告急。宣宗得报派兵来援，以左监军永锡率领中山、真定、保（今河北保定）、涿等州之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率大名守军一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一万一千人、河北兵一万人救援中都。此外还命御史中丞李英护送粮草，相机御敌。按说这许多兵将足以解中都之围，可事实上这些官宦早已腐败透顶，不思政务，终使中都不保。且说李英在大名得兵数万，但他驭下既无纪律又嗜酒如命。三月间，他驻军霸州（今河北霸县）又喝得酩酊大醉，蒙军突然攻来，他哪里还能应战，结果金军被杀得大败，他自己也死

于乱军之中，所押运的粮食也都被蒙军劫去。乌古论庆寿、永锡二人行进中，得到李英部被歼的消息也都望风而逃了。

此时的中都城内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守将完颜承晖原是个文人，根本不懂排阵布将打仗的事，于是他把中都防御委派给右副元帅、平章政事抹捻尽忠。二人相约誓守中都，保住社稷。可久等外援不到，中都危在旦夕时，抹捻尽忠胆战心惊起来。他召来心腹、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商议，准备秘密出城，弃中都南逃。完颜承晖得知此事大为愤慨，但又拿抹捻尽忠无法。于是他派人把完颜师姑叫来说："我因为平章政事通晓战法，因此推心置腹，把守城的重任托付给他，并相约死守此城。中都不保，我二人则同城共生死，为社稷献身。现在他临难畏惧，想要逃跑，你可知他打算哪日逃跑？"师姑回答："定在五月二日黄昏时分。"承晖又问："他的行李打点好了没有？"师姑回答说："一切都已安置妥当了。"承晖听到这更忧愤交加，他拍案而起说："你们临难都弃城逃跑？那么我们大金的江山社稷怎么办？"于是下令将师姑斩首，然后自己也饮鸩自尽了。中都主帅已死，更是人心惶惶。宣宗留在中都的妃嫔听说尽忠要逃跑，都带着金银细软等候在城门口，准备随他一起南逃。抹捻尽忠驰马到城门口，一见她们，巧言哄骗说："我先出城，给你们打探一下消息，然后就带你们上路。"诸妃信以为真，尽忠带着他的妻妾亲朋出了城门，便挥鞭纵马狂奔，直到中山府才说："如果与诸妃一起出逃，哪能有这么快！"就这样，这位中都守将一溜烟跑到南京。懦弱的金宣宗也只装聋作哑，不问中都情况，仍任命尽忠为平章政事。抹捻尽忠刚刚逃走，蒙古军队便进了中都城，开始大肆烧杀抢掠。可怜宫阙壮丽的中都城在被抢劫后，为大火付之一炬。中都的丢失，预示着金国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汪香）

参考资料：

《大金国志·宣宗皇帝上下》
《元史·太祖本纪》
《金史纪事本末·宣宗南迁》
《中州集·州北》
《元史·木华黎传》

封建九公

宣宗南迁虽然失去了北方的半壁河山，全国元气并未大伤，还是相当强大的。当时，只要宣宗认真自省、整顿政治、训练军队，缓和一下金的元气，再与蒙军交兵，则鹿死谁手也未为可知。但由于宣宗南迁后接连不断的政策措施的失误，终于使金朝滑向覆亡的深渊。

南迁后的金朝政治更加腐败、庸堕，皇帝、重臣多沉湎酒色、乐于偏安，全无恢复金朝昔日雄威的志向。间或有些有识之士建议改革、励精图志、恢复国威，那些庸堕的重臣便出来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至于迁都后四方的灾异和民间的贫敝之困，大臣们也都互相推诿、隐瞒不报，还说这样是为了不扰圣上之心。更有甚者，连军机大事也拖沓不理，还美其名曰“养相体”。朝臣多是亲戚故旧相互提携而来，那些正直君子、有识之士根本不得重用，即使为官，也常被庸吏排挤，不久便辞官不做了。就这样，充斥金廷的都是一些不学无术、一肚子草包的庸才。他们两眼漆黑，毫无治国安邦之策。每当蒙古军队大兵压境，他们便束手无策，只会同懦弱的宣宗一道哭天抹泪；但一听说蒙军撤退，戒严解除了，他们便又故态复萌，继续饮酒作乐去了。更为可悲的是，那些位居要位的重臣大员们，有的竟连文墨都不通。一次宣宗问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他竟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一回到自己的府第便气亨亨地责怪下属说：“皇上今天问到纪纲安在？我全然不知，显得我为相失职，不重人才。你们

这些蠢才都是干什么吃的，皇上都知道的人，你们怎么从来没有领此人前来见我?”堂堂宰相竟全不知“纪纲”是指江山社稷，而当作了人名。这样的群臣之首可想而知。另一个丞相高汝砺则只知墨守成规。他胆小怕事，执政十余年，从未给朝廷出过一谋，划过一策，惟恐出言招惹祸端。当时朝廷内私下流行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讽刺他的。说有一天，天还没亮，高汝砺拿着蜡烛到院中，准备上早朝去，忽然有一朝廷官员满身朝服站在面前，他被吓了一跳，仔细辨认也不认识，于是忙问：“你是谁呀?”那个人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宋朝的欧阳修，那么你又是谁?”高汝砺说：“我是大金当朝丞相，你怎么都不认识?”那人大笑起来说：“修不识丞相，丞相亦不识修（羞）。”所谓“丞相亦不识修（羞）”云云，分明是嘲笑他只知守成，不图进取，又贪恋丞相高职不去，简直是不知羞耻。试想南渡后的金王朝已是千疮百孔、多灾多难，正值百废待兴之际，而宣宗却依靠此辈，指望中兴，自然是难上加难了。

与此同时，金廷内部相互猜忌、彼此倾轧之风有增无减。先说这金宣宗当初是蕃汉大臣上表得以为帝的，可说是立于权臣之手。他虽懦弱无能，却又好猜忌，动不动就猜疑大臣图谋不轨。只要发现臣子稍有过错，便严惩不贷。后来，他开始依重内侍，设立内侍臣，让他们作为耳目伺察百官。这些内侍得皇上宠幸，便胆大妄为起来。他们飞扬跋扈，无恶不作，搅得众臣惧惧，人心不安。再说那当朝权臣高琪，他自贞祐元年（1213）杀死胡沙虎有功进升为平章政事，逐渐把持了朝政。他专横跋扈、树立党羽、嫉贤妒能、自作威福。这都直接威胁宣宗统治的稳固，因而宣宗对高琪也深怀不满。由于高琪极力主张伐宋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完颜素兰乘机向宣宗密奏除掉此人。他说：“高琪本毫无功劳，也非众望所归。昔日因为怕死，擅自诛杀了主帅胡沙虎，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保身之举。他为政以来，专用胥吏、

树立奸党、窃弄权柄、自作威福，以臣之见，此贼变乱纲纪、戕害忠良、实怀祸乱天下之心。”宣宗赞同地点了点头。他接着又说：“昔日胡沙虎专横跋扈，目无先皇。其骄横之势虽为天下共知，但却都畏其权势，无人敢言。只有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简上书弹劾其罪，也未引起先皇重视，最后终受其害。当今丞相高琪结党营私、势倾朝阁远在胡沙虎之上，臣等身为监察御史，职责便是上书进谏。今朝臣迫于其势，多敢怒不敢言。事实上见到高琪贼倚势欺人，为非作歹，没有不恨得咬牙切齿、要将他千刀万剐。事到如今，陛下，您为何还不除此贼以绝后患？臣今一番忠言，并非不知祸从口出的厉害，然臣父子世仕圣朝，吃国家俸禄，不敢为一己之私而苟且偷安。劝陛下当机立断，除此奸贼，此乃我大金社稷之福啊！”一番慷慨陈词，使宣宗深受感动，于是鼓励他说：“你的一片忠心，朕已得知，所言正合我意，但要小心从事，不可泄露，免得惹出麻烦。”此时宣宗的第二子、平章政事英王守纯也要揭发高琪罪状。他密召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员外郎王阿里谋划要杀高琪。但由于高琪势大一直未敢行动。后来石鲁剌、胡鲁把此事告诉了都事仆散奴不失，奴不失则又告诉了高琪。适逢高琪的仆人赛不洞悉其奸谋，为了除掉赛不，高琪设计，派他去杀自己的妻子，然后罗织罪状送往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惧高琪不敢过问。事被发觉，宣宗便以此为由诛杀了高琪，并把向高琪告密的尚书省都事仆散奴不失除死，结束了高琪擅政的局面。除掉高琪这样的奸臣自然是大快人心，但也有忠良因受猜忌而遭不测。枢密副使仆散安贞系驸马都尉，祖孙三代世世为将，他本人在山东政绩卓著，是当时金朝得力的将领。兴定五年（1221），在伐宋的战争中，他出息州（今河南息县）攻克黄州（今山东黄县）、蕲州（今安徽巢县），将俘获的宋朝宗室七十余人献给朝廷。但他每俘获宋朝的士卒，不杀而放掉，前后达数万人。他的所作所为遭到宣宗的猜

忌。宣宗对宰臣说："仆散安贞的谋略固然不错，但获释的人岂有不思回归的道理？南京（今开封）离宋朝的国境很近，这样的降兵不都杀了，又往哪里安置呢？我打算把这些人驱逐到边境上怎么样？"宰臣们知道宣宗对仆散安贞不满，便都迎合旨意称是。这年六月，尚书省奏报仆散安贞谋反。仆散安贞得到消息，怕皇上听信谗言，便以玉带贿赂近侍局，请求他们为其秉公直言。不料此举反弄巧成拙，近侍局的官员知皇上心意，便拿着玉带上奏，这样反倒成了仆散安贞作贼心虚、行贿宫庭的证据。宣宗召来英王守纯说："我看了告仆散安贞谋反的奏章，多饰词不实，应再加复按。"于是尚书省再度曲意周纳，坐实仆散安贞谋反之罪。就这样，仆散安贞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被弃市斩首。宣宗在诛杀诏书中诬蔑他说："仆散安贞以前对俘虏从来是随俘随杀，而今惟独对宋朝宗室优容不杀，曲活全门。如此背弃皇恩与敌仇结欢，是为了将来卖身投靠宋廷。"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统治者之间的明争暗斗，无疑削弱了内部力量。仆散安贞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将就这样轻而易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使众将寒了心，此后其他将领更各自为政，不肯为朝廷效力了。

金统治者在政治上腐败堕落，经济上也不知生息养民，为了过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反而加重了对百姓的搜刮。河南久经兵革，生产早已凋敝，此刻宣宗君臣南逃至此，又凭空增加了几百万人口，人民生活更难以支撑。而对此情，统治者不但未开源节流，撙节费用，反而竭泽而渔、大肆掳掠。所收的赋税比以往还多三倍。更有甚者，禾稼还未登场已被征敛一空。宣宗还下令括田以赡养南迁的军户，结果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当时田野间常见催租税的官吏如狼似虎，动不动就棍棒相加。民不堪命，相率逃亡，有的地方十室九室，有的地方竟野无居民。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大批哀求无告的农民无以为生辗转沟壑，便纷纷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史书记载，当时河北、山东地区的红袄

军风起云涌，攻城掠邑，使金军难以应付。此外还有山东益都的杨安儿、潍州（今潍坊市）的李全、泰安（今泰安）的刘二祖、密州（今山东诸城）的方郭三、胶西（今山东胶县）的李旺、山西石州（今离石）的冯天羽等人领导的起义，把金统治者搅得焦头烂额。宣宗迫不急待地问大臣胡鲁："如今天下盗贼横行，如何可息？"胡鲁回答说："盗贼多是因为赋役太多，赋役停止了，盗贼也就平息了。"这正反映了当时赋役将人们逼得走投无路的状况。

再看南迁后的金朝军队，作为逃亡之师，士气低落，一触即溃。为了应付连年的征战，宣宗曾下诏强迫丁壮人伍，号为"签军"，结果弄得州县骚动、闾里不安。有的百姓家所有丁壮全被征人行伍，田地无人耕种，饥民嚎哭连天苦不堪言。宣宗末年，为守御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规定除现任官员外，所有致仕官员、莘莘士子都属于国家征兵之列。已经退居林泉的侍御史刘元规，以六十岁高龄仍被征召人伍。《归潜志》作者刘祁的父亲，已过古稀之年，竟也未能得脱。用这样的老弱之军应敌，胜败可想而知。更何况那身着铠甲的将帅也尽是没有韬略的膏粱子弟，平时看他们一个个腆胸叠肚、不可轻视，可一打起仗来便缩首缩尾、胆小如鼠。这样一支军队又怎能冲锋陷阵呢。无怪一和蒙军交起手来，野战则金军覆没，守城则被屠杀殆尽。朝廷的暗弱，使许多地主武装纷纷占据州县，拥兵自雄。贞祐二年(1214)四月，锦州张鲸聚众十万叛金，杀节度使，自称临海郡王；贞祐三年（1215）正月，蒲鲜万奴于东京叛金独立，建大金国，后改称东夏国，使广阔富饶的东北分割殆尽。至于齐、鲁、燕、赵之间的汉人地主武装，更是数不胜数，大者占据州县，小者聚寨自保。

面对国力孱弱，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宣宗君臣也是颇费心思。如何安抚这些地主武装？如何招纳北方抗蒙势力以保护金朝

统治的中心地域？贞祐二年（1214）大臣李英向宣宗献封建之策。他说："陛下您身居中原汴京，威镇四方，要派忠诚、贤良之臣把守各关隘以藩屏首都。"当时有个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有勇有谋，敢于与蒙军对抗，因此在当地颇得人心，威望很高。这苗道润自恃有功，派人到南京求封，宣宗十分不悦，河南转运使王扩进谏说："陛下要为天下社稷着想，今苗道润镇守一方有功，又得众望所归，您最好实行安抚，封他为一方总领。如果陛下不应所请，他必聚众反金，这可对我大金江山不利呀！"宣宗觉得有理，依计加封了苗道润，从而抚定了五十多个城邑。贞祐四年（1216），右司谏术甲直敦提出于河朔之地分封王侯，宣宗不肯，封建之事便被搁浅了。

且说元军进攻金朝的形势更加危急了。兴定元年（1217）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去，留得力干将木华黎经略太行以南。他受命之后，即发兵攻掠燕京以南的汉人地区。蒙古军一路过关斩将，连破蠡州（今河北蠡县）、中山（今河北定县）、新乐（今河北新乐）、赵州（今河北赵县）、威州（今河北井陉北旧威州）；马踏邢州（今河北邢台）、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河北永县东南）、大名。金兵不敢迎战，狼狈溃逃。十一月，蒙军势如破竹，又从河北进入山东，相继攻破滨（今山东滨县）、棣（今山东惠民）、博（今山东聊城）、淄（今山东淄博）、沂（今山东临沂）、益都、密州。转眼之间半个山东皆入蒙军之手，宣宗也无可奈何。与进攻山东同时，另一支蒙军向河东进军。十一月间抵达太原城下。多亏金将乌古论德升率军死守，蒙军才退去。兴定二年（1218）八月，木华黎率蒙军从太和岭（今山西朔县东）出发入河东，由代州（今山西代县）经岢岚（今山西岢岚县）疾驰南下，占领石州、隰州（今山西隰县）、吉州（今山西吉县）。然后率军北上，于九月又抵太原城下。这次虽经守军拼死抵抗，太原仍未逃脱覆亡的厄运。

面对太原失守，河北、山东州郡多半沦入蒙军之手的局面，宣宗忧心忡忡，急忙召集百官，欲求一长治久安之计。就封建藩镇以屏汴京问题，朝廷内展开了一场讨论。翰林学士承旨徒单镐等十六人联名上书道：“制兵有三种，一是交战；一是求和；一是固守。现在我军要想与敌交锋可兵力不足；要想与敌求和，人家又不答应；唯今之计，只有固守了。河朔州郡现已残破，不可能一概戍守，可下令：愿意迁徙的迁到河南、陕西，不愿意迁徙的可自己推举长官，保卫州郡以自存。”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等三人说：“河北与河南辅车相依，不可放弃。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解州（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是出入陕西的咽喉要地，如果迁民南撤，则毁了保卫首都的屏障。如今还是让各州郡选拔出才干出众、威望素孚的人把守关隘。同时授给土地耕种，挑选精壮训练作战，以图收复失地，这才是上策。”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二十一人也赞同道：“河朔各州，确应选能服众、有智有勇的人为首。危难时领兵作战；平时率众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更进一步指出：“今看太原的形势，虽暂时失守，也可能很快收复。朝廷应不吝官爵，选贤用能，授以大权，能收复一道则授以本道总管之职，能捍卫一州郡则授以本州郡长官之位。这样，人人奋勇，各保一方，才能使天下复安，百姓复业。”……宰臣们纷纷提出应分封王侯，以笼络人心为朝廷卖命，宣宗仍迟疑不定。说：“倘若他日国家安定了。要那么多王侯，岂不是与朝廷掣肘？”大臣完颜伯嘉说：“那也好办，将来国家安定了，就让那些公侯就任节度使，有何不可？”宣宗觉得有理，于是才下决心封建，置公府。

兴定四年（1220），宣宗为藩屏首都而“封建九公”，各有封疆，分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辖沧州、清州、观州、盐山、无棣、乐陵、东光、宁津、吴桥、阜城、蓨县；封河间路招抚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辖献州、蠡州、安州、深州、河间、肃

宁、安平、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封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辖中山、真定府、沃州、平定州、抱犊寨、乐城、南宫县；封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辖雄州、莫州、霸州、高阳、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宝坻、武清、安次；封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辖涿州、易州、安肃、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欢谷、东安寨；封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辖河北东路；封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辖平阳、晋阳府、隰州、吉州；封昭义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辖泽州、潞州、沁州；封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辖益都府路。这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限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等也都可便宜行事。此外还规定，除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亦归其管属。

九公封建，标志着金政权中央集权制的崩溃瓦解，封建地方割据已形成。尽管金宣宗曲意笼络，旨在"保境安民"、"以谋恢复"，但由于封建分散了抗蒙作战的统一指挥和行动，封建割据存在互相争夺的劣根性，这些人仍不能抵抗蒙古的进攻。金朝大厦更加摇摇欲坠了。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术虎高琪传》、《完颜素兰传》、《陈规传》、《把胡鲁传》、《李英传》、《苗道润传》。

《金史纪事本末》：《群盗叛服》、《封建九公》。

《归潜志》卷7、9、12。

励精图治　奋力抗蒙

金王朝到了哀宗时已处于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状态。但作为末代皇帝，哀宗并不甘心灭亡。他任用抗蒙将相，停止对南宋战争，与西夏和好……竭尽全力，想力挽狂澜。怎奈金王朝大势已去。

金宣宗有三个儿子，长子守忠，次子守纯，三子守绪。宣宗登基，年号贞祐，同年九月即册立守忠为皇太子。宣宗迁汴，曾令他留守中都。贞祐三年（1215）正月，守忠死。五月，宣宗立守忠子鉴为皇太孙，不幸又于十二月死去。悲伤之余，宣宗把目光投向另外两个儿子。守纯虽然年纪稍长，但才能平庸，心胸狭窄，难当此重任。与之相反，三子遂王守绪，性情宽和仁慈，自幼喜好读书，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善议古今治乱之事。况又系皇后养子，官居枢密使，总揽全国军政。于是转年正月，宣宗下诏立守绪为皇太子，仍控制枢密院事。

元光二年（1223）十二月的一天，宣宗病危。入夜时分，近臣们都已退去，偌大的隆德殿只剩下病入膏肓的宣宗和留下来伺候的资明夫人郑氏。宣宗感到自己快不行了，他知郑氏年老、可靠，便把她招到身旁，用尽力气、断断续续地说："快去将太子找来主持后事。"话才说完便咽了最后一口气。郑氏出了隆德殿，正碰上前来问安的皇后和庞贵妃，不由得心内一惊。原来这庞氏为人阴险狡诈，她的儿子守纯虽是二皇子，却未被立为太子，因

此怀恨在心。此刻若知皇上晏驾，恐她会图谋不轨。于是，郑氏急中生智说道："皇上正在寝室更衣，请皇后、贵妃先到那边房间稍事休息吧。"皇后和庞氏不知是计，随她走到侧室。等她们进了房，郑氏连忙将房门反锁上，并立即召集大臣，传达皇上遗诏，由太子继立皇位。当太子守绪入宫的时候，英王守纯早已赶到，并关闭了东华门。隆德殿上，剑拔弩张，空气紧张得快要炸开了。太子当机立断，命令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三万人屯于东华门街。进宫后，他又派四名护卫人员将守纯软禁在近侍局中，一切安排妥了，这才打开屋门将后妃二人放出，为宣宗发丧。就这样，守绪在灵前继位，改年号为正大。

哀宗继位，正值金朝多事之秋，成吉思汗的铁骑早已踏遍太行山，饮马黄河边了。面对衰世，哀宗没有怯懦消沉、坐以待毙，而是奋发图强，纠正宣宗时的错误政策，欲挽救金国大厦于将倾之际。他反复申明治国的基本方针，强调严明法纪。国家的定制，各级官吏必须严格遵守，秉公执法。对那些有法不依、循情枉法，使无辜之人妄遭刑罚的贪官酷吏一定要严加惩处。允许士人、百姓上书直言国家军政大事的得失，即使言辞激烈或出言不逊，也不加处罚。在整顿纲纪过程中，他以身作则，绝不循私。一次，内族人王家努无故杀死鲜于主簿，哀宗得知十分气愤，他说："英王是我哥哥，他敢无故鞭打哪一个人吗？我是一国之君，敢随便杀害一个无罪之人吗？如今国家正值危难，急需用人，而你却依仗皇家权势无辜杀死国家官吏，真是胆大包天。把他拉出去斩了，以正国法。"此事传开，使朝中整肃。

哀宗认识到金国之所以难敌蒙古的进攻乃是因为朝中奸佞、庸臣当道，忠臣、良将不得重用的缘故。他决心整饬吏治。首先，他处治了宣宗朝的两大奸臣。一个是执掌官吏考核、升迁大权的权吏部侍郎蒲察合住，另一个是左司员外郎庞古华山。这二人在朝中声势煊赫、为政苛虐，他们利用手中权力营私舞弊、敲

诈勒索，朝臣敢怒不敢言。哀宗继位后，决定除此二患使正气伸张、政局改变。他先将这两大奸臣赶出京城，改派蒲察合住为恒州刺史，庞古华山为同知桢州军州事。不久，又将蒲察合住处死。消息传出，士大夫喜出望外，举杯相庆。哀宗对庸臣也决不姑息。高汝砺为相多年，毫无建树。哀宗虽因恪守先帝成法未罢其职，但早已置之不睬，任用“为人忠实、忧国奉公”的把胡鲁为平章政事。哀宗的哥哥完颜守纯，身居平章政事的高职，但才能平庸，还压制人才，哀宗也罢免了他的相位。

与此同时，哀宗选拔了一大批抗蒙有功的将帅分掌军政。他任用原枢密副使完颜赛不为平章政事，赤盏合喜为枢密副使，负责全国军政，延安帅臣颜合达为参知政事，兼统京兆、河东两路。起复善谋略、力主抗蒙的致仕官，以张行信为尚书左丞，胥鼎为平章政事，李蹊为参知政事。这些人构成前期朝廷的贤辅良助。此外哀宗还注重、争取每一个对抗蒙有用的人才。武仙是宣宗朝封建的九公之一，为恒山公。他在一次对蒙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吃了败仗，被迫降蒙，与史天倪一起为蒙古国镇守真定（今河北正定）。哀宗继位后，武仙想回金朝，又怕金朝难以容他。哀宗得知此情，立即派人设法通知武仙，表示随时欢迎他回来。武仙得到诏谕深为感动，毅然杀掉史天倪，回奔金国。哀宗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于卫州（今河南省汲县）。此举也稳定了当时抗蒙地主武装。

哀宗熟读史书，认识到目前对金国最有威胁的敌人是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此刻必须停止一切对外战争，集中兵力，一致抗蒙。宣宗时，想利用北方地主武装共同抗蒙，同时向南侵宋以便为自己失败寻找退路，事实证明不抗蒙是没有出路的。宣宗把主要兵力放在南侵赵宋上的做法，不仅为自己树敌，“扩地”不成，反而使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况。哀宗即位后改变了这一战略错误，停止了侵宋战争。正大元年（1224）六月，哀宗派枢密

判官移剌蒲阿领兵到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四处张榜，告谕宋界军民，表示从今以后不再南伐。二年（1225），又下诏禁止宿州（今安徽宿县南）、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西北）等地的巡边官兵不得擅杀过路的红袄军，停止对宋战争，集中兵力抗蒙。

西夏这个金的属国，在宣宗时，与金构兵，削弱了抗蒙力量。为了联合西夏一致抗蒙，正大二年（1225）九月，金与西夏达成协定：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各用本国年号，西夏称金为兄，金称西夏为弟，互不侵扰。此举在朝中引起非议，认为这样有损大金国的尊严。哀宗面谕台谏完颜素兰、陈规说："赵宋时常侵扰边界，我派兵袭击他们，希望通过严惩求得和平安定。西夏从来是臣属于我金朝的，现在称弟议和，我不认为有什么有损大金尊严的。相反，如果能就此和好，使我百姓得到安宁，岂不省却兵马之劳？你们应当明白我的用意啊！"

哀宗调整好内外格局，采取一系列抗蒙措施，确实使金朝的兵力更加集中，作战能力加强起来，开始投入对蒙作战。正大三年（1226）秋，哀宗派遣枢密副使移剌蒲阿进攻山西，八月收复曲沃（今山西曲沃县）及晋安（今山西新绛县），蒙古守将刘德仁战败而死。四年（1227）二月，纥石烈牙吾塔领兵攻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蒙军出战，兵败逃回城中。蒙古平阳副帅、金降将夹谷常德乘机大开城门，迎接金军，就此收复平阳。五月，武仙率兵攻太原，金降军从城里内应，内外夹攻，杀死蒙古大将攸兴哥，收复太原。此次金军主动出击山西，一年间接连收复了平阳、太原等重镇，蒙古伤亡守将多人，金在西北战场的形势有所好转。

正大三年（1226），成吉思汗大军进攻西夏。十一月攻西夏的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西夏危在旦夕。哀宗闻讯急召陕西行省及陕州总帅完颜讹可、灵宝总帅纥石烈牙吾塔等来汴京商议军情。他果决地对各位将领说："倘若边境告急，内地也不会安

宁，有些事不当机立断，会酿成大患。因此，西北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可随机应变，不必事事上奏。”他再三叮咛将士们加紧陕西方面的军事守备，一定要守住边陲，确保金朝的社稷平安。夺取西夏中兴府后，成吉思汗挥戈南下，攻取德顺州（今甘肃静宁），正大四年（1227）五月，蒙军进攻临洮（今甘肃临洮县），金守将总管胡土门战败被俘，见蒙古军帅立而不跪，蒙军用刀砍他的膝胫，他至死不屈。哀宗接到战报，深为感动，下令为胡土门塑像，以表彰其抗蒙图强、英勇不屈的精神。

正大四年（1227）六月，西夏灭亡，蒙古军长驱入陕。屯驻泾、邠、陇三州间的是哀宗的爱将、岢岚节度使杨沃衍。他早已决心以身许国，平日他常说："做人不为国家社稷献身而为私家小事去死，不算男子汉大丈夫。"此刻，面对蒙军的大规模进攻，他镇定自若，往来于泾、邠、陇三州之间，鼓舞士气，安定民心，指挥作战。多次战胜蒙军，使其大军不能前进。正在这时，成吉思汗在甘肃清水县军中病逝，蒙军撤退，西北战事稍缓。

成吉思汗病逝，由他的幼子拖雷监国。金派知开封府完颜麻斤出前去吊慰。拖雷对金使说："你主长久不降，致使我先可汗累死戎马之间，此仇我必报。"正大五年（1228）夏天，拖雷继续领兵攻金。经过泾州（今甘肃泾川县东）进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此时负责西北边境防务的主将是平章政事、平凉行省完颜合达。面对蒙古来攻，他问军中诸将："今日出兵迎战蒙军于大昌原，谁愿为先锋？"话音未落，一将挺身而出道："末将愿往。"完颜合达定睛一看，不禁点了点头。这人便是军中骁将、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此人在宣宗时就曾领兵抗蒙。一次不幸被蒙军俘虏，押在狱中，但他并不灰心，乘夜半天黑，杀掉蒙古监卒，又逃回金朝。还有一次，他因为处理军中官吏殴斗的事情，被人诉讼入狱。哀宗知他是个将才，又逢边事日紧，便亲自下令释放陈和尚，任命他为忠孝军提控。这忠孝军是在蒙古军侵

掠中投附金朝的军队，由汉、回、女真等不同民族的士兵组成。这支军队勇敢善战，但很难统领。自从陈和尚被任命为忠孝军提控后，由于他统帅有方，军纪严明，使战斗力大大加强。这次陈和尚请命为先锋，打算与蒙古军决一死战，报效国家，也报答哀宗的知遇之恩。战前，陈和尚沐浴更衣，决心不胜决不回还。随后，他擐甲上马，头也不回，急出抗敌。大昌原之战，陈和尚率四百骑兵，疾如风雷，大破蒙古军八千之众，取得金蒙开战以来第一次大捷。捷报传来，三军为之雀跃，满朝为之振奋。哀宗特别传谕嘉奖忠孝军全体将士，提升陈和尚为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令他率领忠孝军驻守邠州（今陕西彬县），镇守北方边境。

正大六年（1229），窝阔台遵成吉思汗遗命继为可汗，进一步加紧了对金朝的进攻，使金朝抗蒙救亡斗争转入极其困难的时期。蒙军先取山西，攻下天成堡（今山西天镇县），经西京（今山西大同市），破雁门关、代州（今山西代县）、石州（今山西离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八月，金将武仙领兵打败进占潞州的蒙古军，夺回潞州。九月，窝阔台再遣万户宴只吉台与塔思等攻潞州，武仙退守卫州，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等率军围攻。哀宗忙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领兵十万来救卫州。完颜合达到后，先遣陈和尚率忠孝军及亲卫军三千人出击，蒙古军败退卫州，围解。陈和尚的忠孝军又立了一大功。哀宗亲自登城慰劳将士。

这年十月，蒙古大将赤老温帅师屯在庆阳（今甘肃庆阳）。为了争取时间集结力量，哀宗用缓兵之计，假意派使到蒙古军中求和。与此同时，秘密派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去邠州，告谕军队做好准备，等到明年初春进攻庆阳。还下诏移剌蒲阿等率军开赴庆阳。正大七年（1230）正月，金军与蒙军再战于大昌原，蒙古军败退，庆阳之围得解。

此后，窝阔台改变过去那种流动掠夺的作战方式，实行长久

占领中原的作战方针。正大八年（1231）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召集蒙古诸王将领商议灭金的战略。决定兵分三路，分别由窝阔台、斡陈那颜和拖雷率领，计划在次年春季三面大军合围汴京灭金。九月，蒙古军三路齐发。窝阔台率中军兵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蒲州镇），拖雷率领的主力军过凤翔（今陕西凤翔）南下。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军，金将领纷纷提出抗蒙对策。枢密判官白华主张调陕西兵守河中。他说："与其到汉水去防御，不如直接开往河中，黄河一日可渡。倘若作战顺利，蒙古军去襄、汉的军马必迟足不前，我们则可利用北方作战之机，使南方掣肘。"完颜合达自陕西上奏也主此议。哀宗召移剌蒲阿入京议事，他以为："如果金军北渡，蒙古兵必将辎重屯于平阳之北，放我军过河后，再断我归路与我决战，这样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如此未果，合达、蒲阿两军仍住陕西，只派一支军马出冷水谷（今陕西临潼东）声援河中府。十月，窝阔台猛攻河中府，守城金兵及援军拼死守城，血战数月。十二月初终因力尽城破，守将完颜讹可被俘遇害。

与此同时，拖雷率主力军四万人，攻破宝鸡、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侵入宋境。宋军弃守饶峰关（今山西石泉西），蒙军攻入，再由金州（今陕西安康）东南下，直指汴京（今河南开封市）。邓州（今河南邓县）告急。十一月，哀宗急诏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移兵屯邓州，陈和尚随行。到十二月初，杨沃衍领兵八千、武仙率军万人也来邓州会师，屯驻于顺阳（今河南旧淅川东北）。完颜合达在邓州两隘间设下伏兵二十万，与蒲阿军分别占据高山地势。令步兵在山前列阵，骑兵在山后列阵，计划在此夹击蒙军。这时蒙军渡过汉江到达禹山，拖雷得知金在此布下天罗地网，忙改变战策，留下大军辎重，只派少数轻骑从两翼绕到山后攻击。合达仗人多势重，列阵以待。蒙军见久攻不下，于是留下一支军队牵制金军，其余各军分散行进，向汴京迂回而来。一

路上，蒙军所到，诸县皆破，销毁金军粮草，断绝后方与邓州金军的运输线。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久待蒙军决战不至，待发现了蒙军动向，忙率骑兵二万、步兵十三万自邓州出发赶赴汴京。途中与杨沃衍、武仙军会合。金军一路上不断遭到蒙军邀击，不得休息又不得军粮，行至黄榆店（今河南禹县西南）时，遇上大雪不能前进，于是只好就地扎营。这时，哀宗圣旨到，令两省军全部开赴京师，合达、蒲阿立即启行。蒙古军采取疲劳战术，一路阻击金军。到了三峰山，天又下起了大雪。金军沿途作战，粮食又不足，十分疲敝，况且此时天寒地冻，早已毫无斗志。蒙古军却是燃薪煮肉，轮番休息。他们乘金军疲困，有意放开一条去钧州（今河南禹县）的路，放金军北走，然后出伏兵夹击，金军大败。张惠、樊泽、高英等将领相继战死。武仙率三十骑逃入竹林。移剌蒲阿率军北走，被蒙古军追上俘获，虽经多次劝降，最终不屈而死。

完颜合达与陈和尚率金军残部数百骑败入钧州。蒙古军重重包围。城破，合达战死，陈和尚被擒。这位骁将见蒙兵主帅，坚不跪拜。蒙军用力砍断他膝胫，他仍从容地说："我就是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大昌原战胜你们的是我，卫州战胜你们的是我，倒回谷战胜你们的也是我，今天我死也要让你们明明白白。"蒙古兵又砍下他的足胫，割他的嘴，直到耳边，陈和尚至死不渝，英勇就义。蒙古又派降将呆刘胜入钧州劝降杨沃衍，以封作大官为诱惑。杨沃衍闻听怒不可遏，斥责道："我出身卑微，蒙圣上大恩以致于此，岂能与你等贪生怕死之徒为伍？你今天来，莫非要玷污我的名节吗？"说着拔剑刺去，呆刘胜当场毙命。然后，杨沃衍向着汴京方向哭拜下去，说道："我今战败，无以报皇上大恩，朝廷重用，只有一死报之了。"说完，横剑自刎，壮烈殉国。钧州三峰山一战，金朝抗蒙将领大部血洒疆场，金军主力也全部崩溃。此后，蒙军一路势如破竹，向汴京杀来。

此刻汴京朝中主持军政大事是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他是世祖的子孙，于正大五年（1228）临危受命，回朝主持政务。此人并非济世之才，不但贪怯无能，而且还刚愎自用。当蒙军乘胜追汴京时，他不组织抗战，却令部众万人开短堤、决河水阻挡敌兵。工程还没完成，蒙古骑兵赶到，大加杀戮，修河丁壮得以逃脱的仅二三百人。

汴京被围困，十分危急。哀宗召集群臣商议守城事宜。原来宣宗时，考虑到汴京城阔远难守，便在城内又加修了里城。朝臣们多主张守外城，说一旦外城为蒙军占领，里城还可自守。可此刻城中只有四万人马，京城周长一百二十里，实在无法保全。于是哀宗下诏，征募京城军民二十万，分隶诸帅。在加紧备战同时，哀宗又幻想着求和以解汴京之围。适逢蒙军派使持国书前来招降，哀宗无奈，封荆王守纯的儿子讹可为曹王，到蒙古军营做人质。窝阔台和拖雷率蒙古大军北还，留军三万由速不台指挥继续围攻汴京。汴京城外，蒙军沿城壕设列木栅，用薪草填壕，顷刻间便填平十余步远。金军将帅怯懦无能，以议和为由不准出战。城中军民义愤填膺，不断在城中喧呼，要求出兵。哀宗为稳定民心，亲自出端门安慰军士。军士们一见哀宗纷纷跪拜，恳请说："蒙古军背土填壕已过一半了。平章传令不准放一箭，说怕坏了和议，如此下去汴京将难保，请求圣下传旨出兵，我等定与蒙军决一死战。"哀宗连忙解释说："等曹王到北国，蒙军若仍不退。你们再死战也不迟。"众人伏地大哭说："事情已经万分紧急，皇上不要只望讲和。"西水门千户刘寿拽住哀宗的马缰说："皇上不要相信贼臣呀。只有将贼臣杀掉才能退敌兵。"卫士们上前要打刘寿，哀宗叹息了一声，制止说："他喝多了，不要理他。"

经过充分修整，蒙军开始向汴京城猛烈进攻，哀宗命令大臣分守四城。庸懦无能的金军将帅早已乱了阵角，守城西北角的枢密使赤盏合喜，一听蒙军来攻，顿时吓得面无血色，语无伦次。

再说守西南角的平章政事白撒。战前，他命士兵修筑门外短墙以防止蒙军夺取城门，两墙间狭窄得仅能容三人通过。等到蒙军攻来，诸将请求乘夜色出袭敌营，可由于墙窄军士不能急速出去。待到出时已被蒙军发觉。后来白撒又用红灯为号出袭蒙军，还放纸鸢（风筝）送文书以招诱蒙古军中的金人。当时人们议论说："前日纸灯，今日纸鸢，宰相要想用此退敌根本不可能啊。"与这些无能的将帅相反，城中军民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他们制造了圆球石炮弹，在每一城角放置炮弹百余枚，还有一种叫做"震天雷"火炮，是用铁罐盛药，用火一点，炮起火发，可以穿透铁甲。此外还有飞火枪，注入火药，点火后火焰喷射可达十多步远，吓得敌人不敢接近。就这样，汴京军民群策群力，与蒙古兵激战十六昼夜，终于迫使蒙军停止攻城，保住了汴京。哀宗又派人去蒙军营求和，速不台见一时难以攻下，便说："既然已经讲和还相互攻击什么呢。"领兵退去。

蒙军退去，哀宗亲自登端门赏赐军士，并改年号为"天兴"。白撒不战误国，军兵纷纷请求罢其职，哀宗令其致仕。经军民浴血奋战，汴京虽得保住，但已成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一座孤城。再加上疾病流行，五十天内死亡几十万人。不用蒙军来攻，已经难以维持了。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哀宗纪》、《把胡鲁传》、《移剌蒲阿传》、《完颜合达传》、《武仙传》、《纥石烈牙吾塔传》、《杨沃衍传》、《完颜陈和尚传》。

《元史·太宗纪》

《金史纪事本末》：《哀宗守汴》、《博索误国》、《南渡忠谏诸臣》、《末造殉节诸臣》。

金朝灭亡

时危世乱，虽然哀宗致力于抗蒙斗争，怎奈金朝衰亡大势已定。蒙军长期围困和金统治者竭泽而渔搜刮后的汴京城已是百业凋敝，残破不堪，再加上蒙、金和议的彻底破产，哀宗决定弃汴出奔。由此，时代为金王朝奏响了丧亡的哀歌。

天兴元年（1232）十二月，哀宗召集群臣商议时局，他满怀忧患地说："如今蒙、金和议已绝，蒙军散处在河南各地，随时可能来攻。汴京已是一座孤城，且凋敝不堪。你我君臣将何以自处?"左司郎中白华献计说："现在耕地已经荒废，粮食也将耗尽，四处的援兵又没有指望。唯今，圣主可出就外兵，留皇兄荆王守纯在汴京监国，处理要务。圣主车驾离京后，可遣使告语蒙古，说我外出不是收整军马，只因军卒擅杀来使，使两国和议断绝，如今将京师交付荆王主持，我只求一二州之地养老而已。这样太后皇族可以保存，圣主便可以暂放宽心了。"哀宗听了觉得有理，决计出奔。但究竟到哪去呢？他还拿不定主意，于是又召集群臣商议。大臣议论纷纷，说法不一，有的说归德（今河南商丘市南）四面环水，可以自保，应去归德；有的说应沿西山入邓州（今河南邓县）；有的说速不台的蒙军在汝州（今河南临汝），不如取道陈、蔡路转往邓州。哀宗问白华的主意，白华说："归德虽城池坚固，但久居必粮尽无援，坐以待毙，决不可去。汝州有速不台挡路，邓州也去不得。今日之势，只有孤注一掷，背城而战，皇上应直赴汝州与蒙军决一死战，这样做外可以激励三军

的士气，内可以抚慰都城的民心。如果只是为了逃避而迁移，恐怕人们会顾恋家业、不肯追随。”哀宗基本同意白华的主张。第二天，传旨说京城粮尽，圣上拟亲出应战。将帅们闻知同声反对，上书奏道：“圣主不可亲出，只可命将出战，三军一定效死力保卫国家。”消息传到民间，人心浮动：“皇上要去归德，而将军士家属留在汴京，眼看城中粮草皆无，岂不要饿死城中？今皇上纵然去到归德，军马所费又能维持多少日子呢？”哀宗听到心情也十分沉重。

十二月二十五日，哀宗一行要从汴京出发了。行前他与皇太后、皇后、诸妃告别，彼此十分伤心。然后他登上端门，拿出府库及两府的器皿、宫中的衣服赏赐给留守军士，并深情地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不让你们进军汝州便没有功劳，社稷宗庙都在这里，你们只要保护好别出差错，将来领功受赏绝不会在参战将士之下。”军士们听了，纷纷落下泪来。时人元遗山有《车驾东狩后即事诗》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这天，哀宗一行正要西行向汝州进发，巩州元帅完颜仲德自金昌赶到，对哀宗说：“京西方圆三百里内无井灶，圣上断不可前往。”哀宗听其言，决定东行，不几日到达黄陵冈。在这，哀宗再次召集群臣商议去向。重新被起用的平章政事白撒主张去归德，元帅蒲察官奴说卫州有粮，便于屯驻。哀宗听从蒲察官奴之策，于天兴二年（1233）正月，命军士乘三万艘运粮船渡河北上，攻取卫州。正当哀宗及其随从军士渡河之时，突然北风大作，飞沙扑面，后面没来及渡河的军士，被蒙军追上，大部分战死。面对此惨状，右丞相完颜仲德拽住哀宗的马缰，苦谏道：“我大金存亡在此一举，卫州决不可攻啊！”哀宗听不进去，仍命白撒督军猛攻卫州。金军个个奋勇，怎奈卫州城池坚固，三日未

下，又闻蒙古援兵已到卫州西南，连忙撤退。蒙古军紧追不舍，双方在卫州城东的白公庙展开了一场激战。金军被杀得大败，大部分投降蒙军。白撒弃军而逃，在蒲城东三十里的魏楼村找到哀宗，说："金军已溃败，请皇上赶快去往归德。"于是哀宗在深夜四更，连侍卫都不及带，仓皇乘船逃往归德。白撒收得二万残兵败将随后赶去。哀宗将此次攻卫州失败的罪责归于白撒，将其下狱，七日不食而亡。元遗山有感卫州事，写诗叹曰："神龙失水困蜉蝣，一舸仓皇入宋州。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劫前宝地三千界，梦里琼枝十二楼。欲就长河问遗事，悠悠东注不还流。"

再说此时的汴京城，早已内外交困。城外速不台大军猛攻不断，城内粮食已尽，有的已易子而食。卫州战败的消息传来，引起一片骚动。人们对金王朝已失去了信心，整日惶惶不安。此时，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又在其党羽韩铎、药安国等人的协助下发动了政变，杀掉留守汴京的参知政事兼副枢密使完颜奴申、完颜斜念阿不二相。立卫绍王儿子从恪为梁王监国，自封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大封其党。然后据汴京城，投降蒙古，想做刘豫第二。速不台进兵汴京，杀荆王守纯、梁王从恪，将后妃送回蒙古。后来，崔立被其仇敌李琦、伯渊等人设计杀死。汴京陷落，使金朝失去了国都，金朝灭亡已指日可待了。

天兴二年（1233）春正月，哀宗来到归德，封归德知府石盏女鲁欢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这时河北溃军相继来到归德，归德出现军多粮少的严重问题。哀宗决定只留元帅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和都尉马用的二百八十人在城，其余军都赴徐（今江苏徐州）、宿（今安徽宿县北）、陈（今河南淮阳）三州就食。这为后来官奴之乱提供了契机。

蒙古将军特默岱率军来攻归德，官奴建议哀宗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哀宗不从。后来这官奴又请率军北渡，被女鲁欢阻

止，哀宗也不赞成。从此，官奴产生叛离之心。他放任军队四出剽掠，不加约束。左丞相李蹊、左右司郎中张天纲、近侍局副使李大节等人都说官奴有谋反的迹象，哀宗听报，摇了摇头说："官奴出身卑微，是朕提拔重用才有今日，想必他是不会辜负我的。"但又多少有些担心，便私下里派人暗中监视官奴。此事为官奴所知，加速了他的叛离活动。

三月的一天，哀宗考虑到官奴与马用有嫌隙，恐怕他们相互攻击造成内乱，便设下酒宴为二人调解。马用撤走了自己的亲卫。官奴乘其不备攻击马用，将他杀掉。又在城中乱杀军民。官奴派五十名士兵包围行宫，将所有朝中大臣聚集在都水摩和纳的住宅，派兵监管起来，又将参政女鲁欢赶回家中，搜尽他所有的金银财宝，然后将其杀死。接着，官奴又派都尉马实披甲执刃去哀宗处劫杀侍卫直长把纳申。哀宗见马实进来，将手中的宝剑掷于地上说："去告诉元帅，我左右只剩下把纳申一人了，就留下他侍候我吧。"马实不敢强迫，犹豫了一下退了出来。官奴杀朝官李蹊等三百多人，军民在叛乱中死者三千多，还有的大臣在叛乱中投水自尽。日暮时分，官奴带兵进宫见哀宗说："女鲁欢谋反，我已经将他杀掉了。"哀宗无奈只好答应，下诏封官奴为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总揽军政大权。官奴将哀宗软禁于照碧堂，不准他见朝臣，朝中也无一人敢入见。哀宗身被幽禁，思前想后，悲从中来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不死之君，只恨我用人不当，反被这奴才囚禁于此。"说着，泪如雨下。

后来，哀宗见官奴，说准备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去。官奴不答应，甚至扼腕顿足愤愤而出。哀宗见此情景，心想："官奴根本不把我堂堂帝王放在眼里，心怀叵测，若不及早除掉他，将来还要受他的害。"内侍局令宋齐诺、纽祜禄温卓等人早对官奴为乱不满，也在密谋除奸。六月的一天，哀宗与宋齐诺设下计谋，派人召宰相议事，令温卓埋伏在照碧堂门间，伺机刺杀官

奴。一会儿，官奴入见。哀宗见他进来，起身招呼一声“参政”。官奴还未及应声，说时迟那时快，温卓从门边闪出，从后背刺进官奴的肋间，哀宗顺势拔出宝剑，向官奴砍来。官奴受了重伤，慌忙夺路，跳下台阶要跑，这时，两名内侍赶上，将他杀死。哀宗下令杀掉官奴的几个亲信，赦免了忠孝军。并下诏按月发给官奴的母亲和妻子粮食。

当时，哀宗听说蔡州地处淮水支脉汝水上，城池坚固，兵多粮广，决计迁蔡。六月十八日，留元帅王壁守归德，哀宗一行又从归德出发，奔走蔡州。一路上，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军士们在泥水中行走，又没有粮食，只好捡青枣充饥。经过数日艰苦的行程，二十六日终于进入蔡州。

哀宗入蔡以后，发现蔡州根本无险可守。且面临南宋的威胁，形势十分不利，于是打算在此休整一番后，率军西征四川。在蔡州，哀宗任用完颜仲德为尚书右丞，总领省院事，主持军政。仲德得马千余匹，派使者到各路挑选精兵万余，还修缮器甲、严明军纪，使军威稍振。但是，此时的宋朝已与蒙军商定，联合灭金。

起初，哀宗闻蒙、宋联合进攻并不在意，说：“蒙古军之所以常能取胜，是借助于北方的马力，我金军难以与之抗衡。至于南宋军马则微不足道。我领兵三千，便可荡平江淮。”八月，宋军围攻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金军打得十分艰苦。守将乌古论黑汉一面坚守，一面派使求援，但援军被宋击溃，只打到弹尽粮绝，部下开城降宋，黑汉壮烈殉国。唐州攻破，哀宗才深感形势不妙，急忙派遣皇族阿古岱去宋朝修好借粮。他让阿古岱对宋朝人说：“我自即位以来，立即下令边将不准侵犯南界。当边臣生事，我都责罚他们。得自南宋的州县，也都随即交还秋毫无犯。今天你宋朝乘我疲惫，侵我寿州、邓州，又攻我唐州，你们的谋略也未免太短浅了。蒙古国灭国四十，接着就进攻西夏，西夏灭

亡了接着就来攻我金朝，一旦我金朝灭亡了，必然立即进攻宋朝。唇亡齿寒，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今宋朝若能与我联合抗蒙，既有利于金朝，也有利于宋朝。”宋朝仍拒绝和议，由孟珙率领宋师，配合塔察儿的蒙军，向蔡州攻来。

九月，蒙古军到达蔡州城下，形势十分危急。哀宗于九月九重阳日登台拜天，告谕群臣：“国家自开创以来，涵养你们一百多年了。你们或因先世立功，或因自己有功被起用，披坚执锐也已多年。当今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你们与朕同患难，忠心可鉴。现在蒙古兵将到，正是你们立功报国的好机会，纵然为国家社稷而死，才不失为忠孝之鬼。以前你们常常为朝廷不了解你们而苦恼，今日临敌，朕亲自坐阵，你们要好好努力呀！”说完，哀宗将一杯杯酒亲自赐群臣诸将，大家满含热泪，接过酒一饮而尽。蒙古军数百骑兵已到城下。金军将士个个热血沸腾，踊跃请战。哀宗下令分军防守四城；蒙古军攻城不下，筑起长围，准备长期围困蔡州。

十一月，宋朝派遣大将江海、孟珙率兵万人及粮食三十万石助元攻蔡。宋、蒙会师，力量更加强大。孟珙从俘虏那里得知，蔡州城中粮尽，便加紧围城，防止金军突围。蔡州城西十里有练江，城南三里有柴潭，都是蔡州城的天然屏障。宋军决开柴潭，将水放人汝水，然后用薪草加土填平，从潭上行军攻城。此刻蒙古兵也决了练江。宋军从南，蒙古军从东、西、北各面向蔡州攻来。十九日，蒙军攻破西城，金将完颜仲德在城中筑栅修壕，昼夜奋战阻挡蒙军。哀宗自知蔡州不保，国运已去，对身边的侍卫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觉无大过恶，死而无恨。只是祖宗传国百年，至我而绝，使我与那些荒淫暴乱之主同为亡国之君，这是唯一令人遗憾的。”又说：“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被人囚执，或受辱阶下，或幽闭空谷，朕必不至于此，我决心已下，你们等着看吧。”二十四日晚，

哀宗扮作百姓模样，趁夜色夹杂在数百兵士中，出东城准备逃跑。逃到城东栅界附近，与蒙军遭遇，不胜而返。

蔡州被围三个月，城中粮草已尽。哀宗杀厩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犒赏军士，还将自己的器皿赐予将士们。天兴三年(1234)正月初九日，蒙军在西城凿通五门，大军涌入城中，完颜仲德督军展开激烈巷战，直到傍晚才暂退。夜晚，哀宗召集百官，想传帝位给皇族承麟以免做亡国之君。承麟当然也不愿接受这个烂摊子，再三推让。哀宗下诏陈说其一片苦心说："朕将帝位传给你，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只因朕身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你灵活矫捷又有将略，万一能够逃出，可保国祚不绝，你要体谅朕的一片苦心啊。"承麟只得遵命。第二天早晨承麟受诏即皇帝位。正在行礼，宋蒙联军已经攻进城来，喊杀声震天，诸将急忙出去迎战。不一会儿，宋军攻下南城，蒙军攻破西城，激烈的巷战一直持续到近午。哀宗见大势已去，自缢于幽兰轩中。完颜仲德得知哀宗已死对诸将说："皇上已死，我们为臣的不能死于乱兵之手，你们好自为之，我随吾主去了。"说罢跳水而死。随死军将士兵达五百余人。宋兵蜂拥攻人子城，承麟也在混乱中被杀。至此，由阿骨打一手创建，历经百年的大金王朝灭亡了。

（汪香）

参考资料：

《金史》：《哀宗纪》、《白华传》、《蒲察官奴传》、《完颜仲德传》。

《续资治通鉴》卷 167

《金史纪事本末》：《宋元克蔡》、《博索误国》、《崔立之变》、《官努之叛》、《末造殉节诸臣》。

争战不休的漠北诸部

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分布着众多的部落。其中较大者，有蒙古部、塔塔儿部、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篾儿乞部、斡亦剌部、吉利吉思部、八剌忽诸部。

蒙古族的祖先是唐代的室韦——达怛人。随着部落的繁衍，他们沿着额尔古纳河，从呼伦贝尔草原，渡过呼伦湖，向西进到斡难河中上游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蒙古族内部又分成乞颜、别速惕、哈塔斤、泰赤乌、阿答儿斤、札答剌等许多小部，到十二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统一各部，开始称“汗”。

蒙古部的东面是塔塔儿部。在蒙古兴起以前，它是蒙北草原上最著名的大部。其主要营地在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附近。塔塔儿部共有七万家，内部又为秃秃黑里兀惕塔塔儿、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阔亦坛塔塔儿、迪列士塔塔儿、阿鲁孩塔塔儿六部。

蒙古部南面较大的一个部落是汪古部，亦名白达达部。它是辽的属部，辽亡后归附金朝。金朝皇帝为了防御蒙古、克烈、乃蛮和这一带游牧民，修了一道长城。将其委付给汪古部，命其守卫。成吉思汗攻金时，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引蒙古军入境。

蒙古族的西面是辽金时期漠北最为强大的一个部落——克烈部。其分布地域大抵东至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游之南，西

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至土兀剌河（今土拉河）和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南临大漠。其首领冬夏营地都在斡耳寒河上游附近，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大克烈人由克烈、只儿斤、董哀、撒合夷、土伯夷和阿勒巴惕六部组成，他们信仰基督教。克烈部的社会发展水平较其他部落先进，到十二世纪时已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

从克烈部再往西便是乃蛮部。它是蒙古草原西部一支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即《辽史》中的粘八葛、《金史》中的粘拔恩。其居地以按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和阿雷、撒剌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北与吉利吉斯接界；东与克烈部为邻；南面包括有今黑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金朝前期，乃蛮臣属于西辽。后来，其君长率部归降金朝。

在蒙古部的西北居住着篾儿乞人。篾儿乞部即《辽史》中的"梅里急"，他们居住在鄂尔浑河、色楞格河下游一带。在蒙古兴起以前，其势力曾达到不儿罕山地区，同为模北强部之一。

位于篾儿乞部的西北，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源，即今乌鲁克姆河上游地区居住着斡亦剌部。它由四个部落组成，居民通用蒙古语，并早已产生出国王和首领。他们同蒙古部保持有婚姻关系，互相嫁娶姑娘，相互间有着义兄弟姻亲关系。再往西北便是吉利吉思部，其居地仍然是谦河流域。

八剌忽诸部包括八剌忽、脱额劣思、豁里、秃麻等部落。它们分布在篾儿乞部之北，今贝加尔湖东面。八剌忽诸部与蒙古部有密切的通婚关系。

各部落的统治者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和土地，进行着无休止的相互掠夺和兼并战争，于是在模北高原构织了一幅群雄角逐的画面。

塔塔尔部投靠金朝，取得金朝政府的保护。而金朝则用挑拨

离间之计，鼓动漠北诸部相互争斗，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更加剧了漠北诸部的纷争。

塔塔儿人和蒙古人之间产生血仇的起因是这样：在合不勒汗做蒙古汗的时候，合不勒汗的妻子弘吉剌惕部人合剌一在忽的兄弟赛因一的斤患了病，为了治疗赛因一的斤的病，请塔塔儿人派来一个名叫察儿乞勒一讷都亦的珊蛮。他来施行了一次巫术，赛因一的斤却死了。珊蛮被痛打了一顿，才被打发回家。后来，赛因一的斤的兄弟们又去杀死了这个珊蛮察儿乞勒。这样，塔塔儿人同蒙古人成了仇敌，而合不勒汗的儿子们，由于他们同赛因一的斤的义兄弟有姻亲之谊，必须和应当来帮助他的部落。因此，他们同塔塔儿人之间发生仇视、敌对和战争，他们一再打仗。

十二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汗死后，其堂弟俺巴孩继立。一次，俺巴孩汗送女出嫁，途中被塔塔儿人抓获，送到金朝，金朝皇帝残酷地把他钉在木驴上，俺巴孩汗对金朝皇帝说道："是别人捉住了我，又不是你；你这样厚颜无耻地对待我，既不体面，也不值得夸奖，是很不高尚的。蒙古诸部全都是我的亲属，他们将要竭力为我向你复仇，你的国土将因此不得安宁。"金朝皇帝不听这些话，把俺巴孩汗活活钉死在木驴上，而仅仅将一个名叫不剌合赤的那可儿放回了家。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在一次战争中被塔塔儿人俘获，遭遇同样的命运。俺巴孩汗死后，蒙古部推选合不勒汗的另一名儿子忽图剌为汗。忽图剌汗是蒙古部人民酷爱的英雄。据说，他歌声嘹亮，犹如山中雷鸣；他力大无穷，能像折断弓箭那样把人一截为二；他胃口很大，一天能吃掉一只羊。于是，忽图剌联合俺巴孩的儿子合丹太师、侄儿也速该等攻打塔塔儿人，双方打了十三仗，仍然不分胜负。由于也速该作战勇敢，他继忽图剌之后成为蒙古诸部的首领，也速该就是成吉思汗的父亲。后来也速该在护送铁木真相亲回家的路上，途经塔塔儿部领地，亦被塔塔儿人下毒害死。

塔塔儿和克烈在整个十二世纪，一直处于激烈的相互争战之中。十一世纪末塔塔儿部的纳兀儿·盃禄汗攻击克烈部，掳其王马儿忽思盃禄汗，献给辽朝处死了。马儿忽思之妻为了复仇，伪装向纳兀儿·盃禄汗贡献羊一百只，牝马十匹，酸马乳一百大袋，袋中暗藏全副装备的勇士一百人。纳兀儿汗欢宴时，装载马乳的车子运到，袋中勇士跃出，与护送羊、马的人一起动手，杀死了他和塔塔儿部的大部分那颜[①]。后来，塔塔儿部的阿泽汗又攻击克烈部，十三岁的王汗和他的母亲就在这次被掠去做奴隶。

《史集》详细记载了另一次克烈人和塔塔儿人的战争。据说，按赤塔塔儿部的首领豁里台·答亦儿与曲歘思出兵与克烈部的撒里黑汗作战。曲歘思骁勇善战，率前锋先进，与撒里黑汗遇，虽三次打败后者，但他恃勇孤军深人，仅率三百骑兵追赶撒里黑。撒里黑军发现他并无后卫，于是奋勇进击，将其俘获，杀害。撒里黑既杀曲歘思，以为进攻塔塔儿人的时机已到，即命车队布阵于斡耳寒河上，夜间秘密集结军队。他的一个战士叛逃到豁里台·答亦儿处报告此事，豁里台·答亦儿于是率军进至斡耳寒河，突然攻击撒里黑军。撒里黑的四万大军全被歼灭，仅带四十人逃跑，投靠乃蛮别部帖乞之盃禄汗。盃禄汗以其女脱劣海迷失嫁克烈之忽儿札胡思汗，并命其子合的儿汗与撒里黑汗出兵攻按赤塔塔儿，夺回克烈部众，还给撒里黑。前此被俘的王汗母子亦于此次获救。

克烈和乃蛮境土相邻，彼此经常争战不休。王汗之父死后，克烈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斗争。王汗杀戮诸弟，夺取汗位。其一弟也力可合剌投靠乃蛮，乃蛮亦难赤汗发兵攻王汗，取其部众归也力可合剌。王汗兵败，逃至畏兀儿、西辽，后归漠北，与蒙古部铁木真、札木合等联合，声势复振，共攻乃蛮部，打到兀泷古河

① 那颜：蒙古语，汉译“官人”。

（今新疆乌伦古河），击败乃蛮不欲鲁汗。但在回军至拜答剌边只儿之地（今蒙古巴彦洪戈尔省拜达里克河上游）时，遭到乃蛮人的伏击，王汗、铁木真各自引兵退却，乃蛮人劫掠了王汗的部众、牛马。其后铁木真又援助王汗，夺回了被掠部众。把乃蛮人赶了出去。

克烈和北面的篾儿乞人也经常相互攻掠。王汗七岁时就曾被篾儿乞人掳去，做舂米的奴隶。后来其父忽儿札胡思打败篾儿乞人，才将他解救出来。十二世纪后期，王汗势力强盛。又两次出兵攻击篾儿乞，掳掠了他们很多牲畜、人口和其他财产。

蒙古部和篾儿乞部结怨甚深。由于也速该把阿秃儿抢了篾儿乞人刚娶的新妇（就是成吉思汗之母月伦），后来三姓篾儿乞人起兵袭击铁木真，包围不儿罕山，将他的妻子孛儿帖及其家属、财物抢去，铁木真投靠克烈部王汗，并联合札只剌部札木合，共同出动四万军队攻入篾儿乞人的牧地，屠杀了攻打过他的仇敌，抢掠了他们的牲畜和家室，将篾儿乞人的妇女儿童掳为奴婢。

不仅部与部之间，而且在同一部内的各家贵族之间，也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夺。克烈部王汗在父亲死后，杀害了许亲兄弟，夺取了他们的封地和属民。其叔古儿汗又将他打败，夺了他的地盘；王汗遂与蒙古部的也速该结成“安答”[①] 联合打败古儿汗。后来他的弟弟又连结乃蛮贵族，起兵攻他。乃蛮部的亦难赤汗死后，其子太阳汗与不欲鲁汗各据一方，互为仇敌。蒙古部的泰赤乌氏与乞颜氏的斗争，乞颜氏内部的主儿乞氏与孛儿只斤的斗争，都已完全撕破所谓亲族的面纱，暴露出相互争夺财富、牧地、奴隶和属民的目的。

战争的范围扩大了。从哈剌温山到按台山，各部都被卷了进来，按台山的乃蛮人和谦河源头的斡亦剌人参加了也里古纳河地

---

① 安答：蒙古语，意为“结盟者”。

区的札木合联盟，蒙古部和克烈部的军队打到了按台山之外，各个势力集团所控制的此疆彼界，各部落的闭塞状况，都被打破了。

各敌对阵营的组成也变了。已不存在单纯的亲族联盟，只有强有力的贵族们以利害关系为准则结合而成的集团。背叛、投靠、亲族相残，诸如此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日益激烈的争夺和兼并战争中，没有哪一个贵族可以照原样保有自己的产业，统治自己的属民，不是更多地获得，就是失去一切。克烈部的忽儿札胡思汗和乃蛮部的亦难赤汗在死去以前都担心儿子们守不住自己的产业和辛苦收集来的部众，正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

《元朝秘史》这样描绘当时蒙古草原的情景：

有星的天

旋转着

众百姓反了

不进自己的卧内

互相抢掠财物

有草皮的地

翻转着

全部百姓反了

不卧自己被儿里

互相攻打

贵族们利用这种极度混乱的社会形势，极力争夺别家的属民，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欲望已不满足于统治一部之民，各人都想取天下，成为众汗之汗。据《史集》记载：当成吉思汗还没有做皇帝而每部都有自己的首领和国王时，有一个伯牙乌部有远见的老人锁儿罕说："企图攫取帝位的人，一个是塔塔儿部的兀剌黑·兀都儿，另一个是乞颜·主儿乞氏的撒察别乞，第三个是

札只剌部的札木合·薛禅。这些人都野心勃勃，谋取帝位，但结果将是铁木真成为国主，各部都将一致拥戴他登位，在他的额前显现着上天的保佑和帝王的英武气概。”实际上企图争夺帝位者还有泰赤乌氏的塔塔儿忽台、乃蛮部的太阳汗以及克烈部的王汗。激烈的纷争又犹如产前的阵痛，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把“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推上了完成统一大业的地位。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太祖纪》

《金史》：《粘割韩奴传》、《内族襄传》。

《元朝秘史》第53、105、110、123、152、123、219、254节。

《史集》第1卷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1162年，正当蒙古部与塔塔儿部激战方酣的岁月，一位后来威震世界的巨人——成吉思汗诞生在斡难河旁的跌里温盘陀山。适逢他父亲也速该与塔塔儿人战罢归来，掳掠了大量牲畜、人口，并俘获其首领铁木真兀格等。为了纪念这次重大胜利，给新生儿取名铁木真。

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舅家"——弘吉剌部的斡勒忽讷兀惕氏族去求亲。按照蒙古人古老的习俗，订亲后就把铁木真留在岳父德薛禅家。也速该在回家路经塔塔儿人住地时，吃了他们下毒的食物，到家不久便死去。铁木真闻讯，急忙赶回本部。

也速该刚死，早就对他怀恨在心的塔儿忽台、忽邻拔都等泰赤乌氏贵族抛弃了他的寡妻弱子，夺走他的部众。一些乞颜贵族也离开铁木真，依附到泰赤乌氏方面。从此，蒙古贵族的联盟无可挽回地破裂了，强盛一时的蒙古兀鲁思陷入纷乱的内争之中。

少年铁木真一家暂时陷入困境，月伦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和仅剩的少数部众住在斡难河上游不儿罕山一带，他们靠采集野果、打土拨鼠和钓鱼度日。

日子一天天过去，铁木真兄弟渐渐长大了。泰赤乌氏贵族塔儿忽台担心铁木真家族东山再起，于是率领护卫军来进攻，抓走铁木真。幸亏泰赤乌氏的属民速勒都思人锁儿罕失剌暗中救助，他才脱离罗网，与母弟们会合，迁到桑沽儿小河（今克鲁伦河支

流臣赫尔河）附近住下，其后又迁到不儿吉之地（今克鲁伦河上游布尔肯小河旁）。

为了取得强大势力的庇护，铁木真来到土兀剌河黑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南）他父亲的“安答”① ——克烈部首领王罕处，贡献贵重礼品，并尊王罕为父，表示臣属。在王罕的帮助下，他开始积聚力量，阿鲁剌氏的博尔术来到他家做伴当，兀良合人札儿赤兀歹老人送其子折里麦来做他的门户奴隶。

就在铁木真羽毛未丰之时，又遭到三姓篾儿乞人的袭击，抢走他的妻子和家人。他求援于王罕和札只剌氏贵族札木合，结果王罕起兵二万，札木合出兵一万，并统领铁木真的一万军队，共同袭击篾儿人的营盘不兀剌川（今恰克图南布拉河地）。篾儿乞部首领脱脱毫无防备，部众全被打散，只带少数随从沿着薛良格河逃人八儿忽真隘。铁木真夺回了妻子和被掠家人，杀了许多仇敌，并将他们的妇女、儿童掳为奴婢。

经过这次战争，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一两年后，他就摆脱对札木合的依附，从斡难河中游的札木合营地迁到怯绿连河上游的桑沽儿小河，独立建营，许多蒙古部众被吸引到他这一边，其中有兀良合人速不台兄弟，札剌亦儿人合赤温兄弟和阿儿孩合撒儿父子，速客客族人速客该者温，以及伯牙乌族人等；有阿鲁剌族人斡歌来兄弟，忙兀族人者台兄弟，晃豁坛族人速亦客秃，速勒都思族人赤勒古台、塔海兄弟，把鲁剌思族人忽必来兄弟，别速惕族人迭该、古出古儿等，这些人聚集在铁木真周围拥戴他为领袖。

一些原来有名望的乞颜氏贵族也向铁木真靠拢。他们是合不勒汗的长支主儿乞氏的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汗之子拙赤汗和阿勒坛，也剌该之弟答里台斡赤斤，兄捍坤太子之子忽察儿等

① 安答：蒙古语，意为“结盟者”。

人。这些贵族投靠铁木真，企图借助他的力量去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他们有资格参加推举可汗的贵族会议，而且和铁木真一样有资格被推举为可汗。只是由于这时铁木真周围已聚集了强有力的那可儿队伍，他们还是不得不推举铁木真当上可汗，并表示臣服。

1189年，铁木真首次被推举为可汗。接着建立起一套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制度。他任命最早追随他的亲信那可儿博尔术和折里麦为那可儿之长，并分设带弓箭的、管饮膳的、掌管牧羊只的、管修造车辆的、管家内人口的、带刀的、掌驭马的、管牧养马群的、负责远哨近哨的和守卫营帐的等十种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除其弟外，几乎全是他的那可儿，他们全由铁木真"用人肉养着，用铁索拴着"，随时可以放纵出去捕噬猎物。

铁木真的强大引起札木合和泰赤乌氏贵族的恐慌。于是以札木合部人劫掠铁木真的马群而被射死为导火线，蒙古部贵族之间的一场大战——十三翼之战爆发了。

札木合与泰赤乌贵族联军三万进攻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札木合部下亦乞列思人索秃的报告，立即召集自己部众和各家贵族的三万人马，组成十三翼①，布列于答兰版来思之野，准备迎战。其中第一翼为铁木真之母月伦统率的亲族、属民、养子、奴婢和属于他个人所有的人们；第二翼为铁木真自己统领的诸子，诸那可儿和护卫；第三翼到第十一翼是乞颜氏各贵族所率领的族人和属民；第十二、十三两翼是归附的旁支尼鲁温氏族人组成。结果铁木真败退，凶残的札木合在战争结束之后，命令用七十口大锅烹煮归附铁木真的赤那思地方的贵族。与骄横的泰赤乌贵族相反，铁木真尽量笼络人心。在一次围猎中，故意将野兽驱入泰赤乌属部照烈氏的猎场，让他们多获，然后邀与结盟。照烈氏首领

① 十三翼即十三个古列延（营、圈子）。

本来就不满于泰赤乌贵族的欺凌盘剥，于是率部来归，接着兀鲁、忙兀、晃豁坛、速勒都思等族人都纷纷来附，铁木真的力量壮大了。

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塔塔儿部叛金。承安元年（1196），金遣丞相完颜襄统兵征讨塔塔儿，在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击溃塔塔儿部，余众逃向斡里札河。铁木真得知这一情报，立即报告王罕，率领自己的一营人马与王罕军会合，从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的纳剌秃失秃延，忽速秃失秃延之地。他们攻破正在修筑的塔塔儿人的寨子，捕杀其首领篾兀真笑里徒，尽掳其车马粮饷；同时还拾到一个带着金圈环儿、穿着貂皮做里儿的金丝纻肚兜的小孩，给了月伦做养子，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胡丞相”失吉忽秃忽。斡里札河之战不仅使铁木真打击了东邻的强敌，使塔塔儿部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在蒙古部中赢得“为父祖复仇”的美名，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金朝的封赏，从而大大提高铁木真的政治权力，使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

攻打塔塔儿凯旋归来后，铁木真乘胜征讨不肯听命的乞颜氏内部贵族主儿乞氏。主儿乞的营盘在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今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合流点之西的巴颜乌兰山南麓），铁木真大军一到，撒察别乞和泰出自然不能匹敌，只好带着少数人马仓皇出逃。以前合不勒汗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有勇的百姓”，遂全被铁木真兼并过来。成了他的“体己百姓”。其中就有日后为他立下赫赫战功的许兀慎氏人博尔忽、札剌亦儿人孔温窟哇兄弟及其子木华黎等。不久，逃亡的撒察别乞和泰出两人也被捕杀，铁木真将其处死。果断地消灭了亲族中最有权力的长支贵族，使他的可汗权力大大提高。从此他不断地削弱旧贵族的权力和地位，迫使他们逐渐降为从属于他的一般那可儿。

消灭主儿乞氏后，下一个与他争夺蒙古部众的对手便是泰赤

乌氏贵族。1200年，铁木真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发兵攻打泰赤乌。泰赤乌贵族则联合先前的敌人篾儿乞贵族，双方激战于斡难河上，泰赤乌氏失败，退至月良兀秃剌思之野（今前苏联赤塔南之鄂良古依河地），整军再战。结果，泰赤乌氏终于被击溃，其首领塔儿忽台等被杀，沆忽阿忽出等遁人八儿忽真隘。

泰赤乌氏被消灭后，王罕和铁木真的进取目标进一步转向东部地区。本属蒙古部落而恃强中立的合答斤、散只兀的首领们遂与朵儿边、塔塔儿、弘吉剌等部联合起来，在阿雷泉（今海拉尔河下游北）举行庄严宣誓，共同与王罕、铁木真对抗。铁木真得到其岳父弘吉剌人特薛禅的密报，即会同王罕军从斡难河附近的忽图泽出发，进至捕鱼儿海子。合答斤等部的抵抗极其顽强，但终因前次力量已被削弱，遭到失败，其部众、牲畜多被王罕、铁木真兼并、掠夺而去。随后铁木真驻军金边墙附近的彻彻儿山，继续收拾这一带的塔塔儿等部。

1201年，札本合网罗了一批溃散的贵族，包括塔塔儿、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泰赤乌、朵儿边、豁罗剌思等各部首领在也里古纳河与犍河（今根河）、秃律别儿河（今得尔木尔河）汇流处附近的忽兰也儿吉集会，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推举札木合为"古儿罕"。联盟决定汇集诸部之军进攻铁木真，但他们军马方动，就有豁罗剌思人将其谋告铁木真的部属召烈台抄兀儿，并帮助他驰还报告。铁木真得知，立即起兵迎战，在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的小支流帖尼火罗罕之地，击溃札木合军。参加联盟的诸部首领作鸟兽散。

打败札木合后，铁木真仍将注意力放在巩固新占的东部地区，1202年春，出兵征讨答谏捏木儿格思（今蒙古东方省贝尔湖南纳墨尔根河地）的察罕塔塔儿、按赤塔塔儿等部，穷追至兀鲁回·失连真河（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舍野日机果勒），将塔塔儿部消灭。

1202年秋，乃蛮部的不欲鲁汗联合篾儿乞部的脱脱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进兵东部攻打王罕和铁木真。札木合与泰赤乌、朵儿边合答斤、散只兀、塔塔儿等部残余势力，都汇集到乃蛮不欲鲁汗旗下，一时声势颇大。王罕、铁木真军从兀鲁回·失连真河地区退入金边墙，乃蛮联军至，大战于阙亦坛之野。王罕、铁木真凭据有利地形，而乃蛮军则因地势险峻，气候寒冷，不能作战，札木合等诸部军见势不妙，都星散离去，于是不欲鲁汗只得引军退还。经过这次战役，铁木真的地位更加巩固。同时，他与克烈部王罕的斗争开始公开化。

击退乃蛮后，铁木真移军出塞，驻于阿不只合阙忒哥儿之山(在今东乌珠穆沁旗西北或蒙古苏赫巴托尔省东南部)，与王罕驻地相近。铁木真为长子术赤向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的女儿求婚，遭到无礼拒绝，但此时的铁木真已羽翼丰满，不甘心再处于依附地位，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已成为势所必然。1203年春，王罕父子和依附他们的蒙古贵族计议，伪许婚约，请铁木真赴宴，乘机杀之。阿勒坛弟也客扯连的两个牧马人巴歹和启昔礼探知密谋，边驰奔铁木真报告此事，王罕谋泄，发兵来袭，铁木真仓促整军迎战，大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东乌珠穆沁旗北境）。和“形势强盛”的王罕相比，铁木真当时还处于劣势，虽经苦战，稍却王罕军，但终因众寡不敌，部伍溃散，他只带少数人从兀鲁回·失连真河退至答兰捏木儿格思，溯河而上，至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今哈拉哈河中游北）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四千六百骑。遂分军沿河而下，驻于董哥泽（当在贝尔湖之东）。至此始脱离险境。“合兰真沙陀之战”是成吉思汗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他第一次单独与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贵族势力进行了较量，尽管暂时受挫，但并没有被吃掉。当他驻军于班朱尼河(当在今克鲁伦河下游附近）时，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一匹野马走来了，有一个战友把它射死了。他们剥马皮当锅，击石取火，

汲取河水煮马肉充饥，铁木真举手仰天立誓说："如果我建树大业，定与你们同甘共苦。违背这话，有如河水。"这就是著名的班朱尼河之盟，它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史册。

合兰真之战后，王罕和追随他的蒙古贵族发生内讧，答里台和蒙古巴阿邻、嫩真二部、克烈撒合夷部投归铁木真，札林合等奔乃蛮。铁木真探知王罕正搭起金帐，宴饮欢娱，毫无防备。遂用偷袭战术，秘密包围折折运都山（当在克鲁伦河上游之南）王罕驻地，突然发起进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溃了王罕主力。王罕狼狈西逃，进入乃蛮边界，被乃蛮守将所杀。其子桑昆逃到西夏，被逐，又辗转至曲先（今新疆库车），亦被杀，强盛的克烈部的败亡，是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首领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至此，他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帝王"的基础基本上奠定了。

王罕的覆灭震惊了乃蛮统治者，外强中干的太阳罕决定出兵攻打蒙古，并遣使联络汪古部，约其夹攻。但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将使者缚送铁木真，报告了乃蛮人要来进攻的消息。铁木真了解到乃蛮国势虚弱，不难征服。于是在帖麦该川召集大会商讨对策，决定起兵迎战。此时各支蒙古氏族已被一一消灭，簇拥在他身边的都是听命于他的那可儿，无人能与他分庭抗礼；所有部众都是他的臣民，不再分属于各家贵族。他把军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将所有军队按千户、百户、十户统一编组，并成立护卫军，从而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格、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与昔日贵族联盟时代那种每家"一圈子"各自为政的松散组织形成鲜明对照。这套制度不仅加强了铁木真的权力，而且使追随他的那可儿们得到了大小官职，从而激励他们更忠诚更勇猛地为他的"帝业"战斗。

整顿完毕，铁木真率军逆怯绿连河西行，布列于萨里川，令每人燃五堆篝火以为疑兵。太阳罕原以为蒙古人少马瘦，可以轻取，及得前哨报告，又惊疑畏惧，虽勉强进军，渡过斡耳寒河，

然而军心已乱，札木合等又率部离去。这时铁木真已逼近，双方激战于纳忽昆山，乃蛮军大败，太阳罕受伤被擒，不久死去。太阳罕子屈出律率残部逃奔其叔不欲鲁汗。铁木真乘机征服了太阳罕所属的乃蛮部众。同年冬，铁木真北攻篾儿乞部，尽服麦古丹、脱脱里、察浑三姓部众，脱脱等也逃奔乃蛮不欲鲁汗。

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后，发兵攻按台山的不欲鲁汗，战于莎合于（今科布多河上游察里克河），将其消灭。依附不欲鲁汗的屈出律、脱脱等逃到按台山西的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一带。斡亦剌首领忽都合别乞不久后向成吉思汗投降。

在克烈、乃蛮、篾儿、乞等部相继败亡之后，札木合也完全丧失了部众，狼狈逃窜到傥鲁山（今唐努山）中，被他自己的五个那可儿捕送铁木真。铁木真说，侵害主人的人是不能留用的，先把他们在札木合面前处死。然后，由于札木合曾是盟友，使他“不出血而死”。这是一种恩惠，因为根据古代蒙古萨满教的观念，一个人的灵魂是住在他的血液里的。

在当时互争雄长的各部贵族中，札木合是铁木真最强劲的对手。自从他们两人分裂后，他多次纠集各部力量，和铁木真进行了十多年的较量。然而，在战争中，这些贵族竞相抢掠，一遇挫败，便率部离去，完全不能团结一致。札木合却始终热衷于组织这种各怀异志的松散联盟，以对抗不可阻挡的统一趋势，自然难免失败的结局。铁木真则顺应历史潮流，充分利用各部贵族与其属民和奴隶的矛盾和人民对部族林立、争战不休局面的厌恶，毫不犹豫地践踏贵族联盟时代的准则，极力加强汗权，把要与他分庭抗礼的各种贵族（包括乞颜氏亲族在内）一一予以消灭。他将力量的基点放在完全从属于自己的那可儿集团之上。这支那可儿队伍，只要他的桦皮箭筒一动，就毫不迟疑地集合起来，他的柳木弓弦一响，就从不后退地行动进来。铁木真正是驾驭着这支“用人肉养着，用铁索拴着”，如同猛狗饿鹰般的队伍，扫平了漠

北平原上一个个贵族营盘，完成了统一事业。

蒙古高原的统一，对于推动蒙古民族的形成，促进蒙古社会的发展，提高蒙古社会的生产力，丰富蒙古的文化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蒙古的统一也为日后蒙古的四处扩张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

（胡务）

参考资料：

《金史》：《宗浩传》、《完颜襄传》。

《元史》：《太祖纪》、《札八八火者传》。

《史集》第1卷第1、2分册。

《元朝秘史》第123、124、152、153、209、225、230节。

成吉思汗西征

1219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进行了第一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的直接导火线是讹答剌惨案。为表示对中亚强国花剌子模使团的回访，成吉思汗在派遣使团的同时，下令由四百五十名回回人组成商队，用五百头骆驼驮载金、银、中国丝绸、蒙古毛皮等物，前往花剌子模贸易。1218年春，商队到达花剌子模北境城市讹答剌。讹答剌长官亦难出贪图商队财物，竟诬指他们为间谍，将他们捉押起来，然后写信报告国王摩诃末，摩诃末命令将商人全部杀掉，货物没收，仅有一名商队的骆驼夫幸免于难，逃回蒙古，成吉思汗听到这个凶耗，又惊又怒，泪流满面，他登上山顶，脱下帽子，解开带子，置于脑后，然后跪伏地上，祈求“长生天”助他复仇，他不吃不食，一连祷告了三天三夜才下山。他先派出三个使臣到花剌子模，指责摩诃末背信弃义的行动，并要求交出凶手亦难出。摩诃末不但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下令杀死为首的使臣，将其余二人剃去胡须，逐出境外。于是，东西方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成吉思汗西征的第一阶段是占领河中地区。

了解到花剌子模的强大兵力以及国内情况后，成吉思汗对这次出征做了认真的准备。他派遣先锋哲别率领一支军队，去消灭盘踞西辽的屈出律，以扫除进兵路上的障碍，与此同时，他派去追剿篾儿乞残部的大将速不台等也胜利班师，并报告了与花剌子

模军队初次接触的情况。1219年春，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出发亲征花剌子模，除木华黎率领一部分军队继续攻金外，诸子、诸那颜和大部分蒙古军都参加西征，此外，还有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以及大批能工巧匠，畏兀儿、哈剌鲁两部首领也奉命率军从征。这次西征军总数近二十万。当时，花剌子模拥有军队四十万，经济力量亦相当雄厚。但是花剌子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军事贵族骄横贪暴，激起各地上层阶级和普通人民的愤恨；摩诃末本人既狂妄自大又怯懦无能，面对蒙古军队的到来，他随时准备放弃河中，退往阿姆河以南，这就使蒙古军可能不必经过激烈的野战，立即包围和攻取各个孤立的城堡。

1219年夏，成吉思汗在也儿的石河旁驻营。秋，统全军向花剌子模进发，抵其边城讹答剌。分兵四路：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指挥留攻该城；一路由术赤指挥沿忽章河而下取毡的；另一路由阿剌黑那颜[1] 率领南下取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南，锡尔河北岸）、忽毡（前苏联列宁纳巴德）等地；成吉思汗和拖雷统主力，越过沙漠，直趋不花剌。讹答剌城经过五个月的英勇抵抗，终于被攻破，守将亦难出自知杀害商队之仇，断难幸免，乃率余部退守内城，继续拼死抵抗了一个月，直到只剩下他一人，才被蒙古军捕获。蒙古军杀掠之后，夷平讹答剌城堡，将亦难出押送到正在撒麻耳干的成吉思汗面前处死。术赤一军攻下昔格纳黑（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契伊利东南）及其西北的八儿真，逼临毡的，守将弃城逃跑，城民自动组织抵抗，但因缺乏作战经验，很快被蒙军攻破，术赤命阿里火者为毡的城长官，镇抚降民，另遣一将分兵西进，攻取养吉干（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札林斯克南），于是锡尔河下游诸城尽被蒙古军占领。术赤

---

① 那颜：蒙古语，汉译"官人"。

率部驻于忽章河下游以北的哈剌忽木之地。

阿剌黑那颜等率领的蒙古军虽然很快就攻取别纳客忒等城，但进至忽毡时，却遇到顽强抵抗。守将帖木儿灭里率领精锐退到忽章河中一个岛上的城堡中，坚持抗战，屡屡杀伤蒙古军。直到成吉思汗攻下撒麻耳干，派兵增援，并驱迫讹答剌、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降民中的丁壮前来参加攻打，帖木儿灭里才因寡不敌众，率部弃岛登舟，向忽章河下游退却；沿途又遭到两岸蒙古军的追击阻截，乃弃舟登岸，与蒙古军接战，部卒散亡殆尽，单骑逃入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蒙古军取忽毡后，即移军攻占今费尔干纳地区。

成吉思汗与拖雷率领人数最多的中军渡忽章河后攻克讷儿等城，于1220年2月抵不花剌，守将率领一部分军队逃跑，蒙古军一部尾追至阿姆河，把他们消灭，不花剌城的教长、绅士们献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后，乘马直入回回礼拜寺，在那里设宴庆功，召城中歌妓舞唱佐饮，又纵使蒙古军用藏经箱当马槽，将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抛掷满地，任马蹄践踏。他还召集城民训话，宣布其国王背信弃义，声称自己是“上帝之鞭”，降罚于此国之人。当时，仍有一部分军据守内城不降，蒙古军在劫掠、勒索之后，纵火焚烧居民房屋，以孤立内城守军。并火攻内城，抵抗者三万人全部被害。昔日繁华的不花剌城被夷为平地，残存的人民、丁壮被签发为兵，驱使从征，其余的人亦无法在这荒城中安居，只得散逃于乡村。3月，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围摩诃末龟缩的河中首府撒麻耳干，察合台与窝阔台率领的一路军队也前来会合。摩诃末得知这一消息，慌忙逃离撒麻耳干，退到阿姆河之南。撒麻耳干的五万守军竟不敢应战，围城第三天，有一部分城民出城突击蒙古军，但中了埋伏，全部被歼。第五日，康里守军和城民决定献城投降。于是，蒙古军入城大肆抢掠。成吉思汗命令将投降的康里将卒三万多人包围在一处平野中，全部屠

杀；又从居民中签括工匠三万人分赐诸子、亲属，并选同样数量的丁壮随军作战，其余居民则在缴纳赎金后许其回城。契丹人耶律阿海受命为达鲁花赤[1]镇守此地。

攻下撒麻耳干后，从春末到秋初，成吉思汗先驻撒麻耳干城区，后移军于那黑沙不（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哈尔希）附近草原，休养士马，以备再战，等到秋高马肥，他就派遣察合台、窝阔台率领右翼军前去攻取玉龙杰赤，命术赤率本部兵从其驻营地南下会合；自己与拖雷统领中军向阿姆河挺进，兵锋直指呼罗珊地区。从而开始了西征的第二阶段。

1220年之初屯军于阿姆河南岸的摩诃末本想守住阿姆河一线。但在不花剌、撒麻耳干相继陷落以后，摩诃末惊慌失措，急忙逃到你沙不儿（今伊郎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路上几乎遭到部下将官的暗算，得知蒙古军已渡过阿姆河进入呼罗珊境内，他匆匆离开你沙不儿逃向可疾去（今伊郎德黑兰省加兹温）。哲别、速不台奉命专追摩诃末，因而一路上紧追不放。他们渡过阿姆河，进抵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城民纳款请降。于是留一将镇守，随即分兵向西追赶，沿途传檄谕降，除非遇到阻拦、反抗，并不攻城略地。1220年6月，哲别军至你沙不儿，蒙古军从城下通过，分几路踪迹摩诃末的逃跑方向。速不台军经徒思（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哈布商（今霍腊散省古昌）、担寒（今伊郎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至剌夷（今德黑兰之南）；哲别军经志费因（今伊朗腊散省札哈台），进入祃椤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攻破一些城堡后，也来到剌夷城下，剌夷法官等请降。蒙古军得知摩诃末已去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又尾追而前。摩诃末在敌军到达之前离开哈马丹，辗转隐藏于可疾去附近诸堡，最后逃到宽田

---

① 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汉译“宣差”。

吉思海（今里海）之南的祃桚答而境。蒙古军跟踪而至，摩诃末遁入宽田吉思海中的一个岛上。1220年底，摩诃末病死，死前传位于儿子札兰丁。

察合台、窝阔台各统本部及右翼诸千户军，经不花剌从东南方面进入花剌子模境，术赤率本部军从毡的南下，先后抵玉龙杰赤城下。因术赤与察合台不和，号令不一，连攻数月不能克，于是成吉思汗命令由窝阔台统一指挥。蒙古军攻入城中，用石油纵火烧屋。但他们每占一个城区都遭到城民的激烈抵抗，最后只剩下三个区，守者力竭请降。除工匠、年轻妇女和儿童外，其余全部被屠杀，随后又决阿姆河灌城，藏在城里的人也全被淹死。往昔繁华富裕的花剌子模首都，顿时变成一片水乡泽国。

成吉思汗和拖雷统领中军从那黑沙不出发，经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沙赫尔夏勃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南下。他命令拖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渡过阿姆河去取呼罗珊诸城；自己统率大军进攻阿姆河北岸要岸忒耳迷（前苏联捷尔海兹）。忒耳迷军民与蒙古军进行十一天的激烈战斗，后终被攻破，成吉思汗下令屠城。接着，分兵攻略附近城堡，并派军进入巴达哈伤地区抄掠。在阿姆河北岸驻冬后，1221年初，成吉思汗统兵渡河，抵巴里黑城下，接受城民请降。成吉思汗军由此进围塔里寒寨（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塔里寒军民拒守七个月，后来拖雷奉召与其父会合，才将其攻克，城内军民被屠杀殆尽。

与此同时，札兰丁率领少数军队，途经奈撒，击溃了一支屯驻该地的蒙古军，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又经过你沙不儿、也里等城，来到他原先的封地哥疾宁。驻扎在此的康里贵族阿明灭里所统五万军队归附于他，另一大臣赛甫丁变率四万军队来投，札兰丁声势再振，于是进驻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出击蒙古军，取得小胜。成吉思汗派失吉忽秃忽统兵三万

来攻，双方会战于八鲁湾川，蒙古军大败。但札兰丁部下将领为争夺战利品发生争执，一部分将领率部离去，札兰丁孤立，只得退回哥疾宁。这时成吉思汗统率察合台、窝阔台各路大军进向哥疾宁，札兰丁慌忙退到申河（今印度河），准备渡河进入印度。11月24日，成吉思汗大军发动猛攻，札兰丁军队大部分死伤逃散。札兰丁为蒙古军所困，从高崖上跃马投入波涛汹涌的申河，方得脱逃。成吉思汗看到这个勇敢的行动，对儿子们说："这才是你们应当效法的榜样。"

1222年春，成吉思汗命八剌等率蒙古军二万进入印度追击札兰丁，但一直找不到札兰丁的踪迹。夏天来临，蒙古军不耐盛暑，只好退兵。不久后，札兰丁也因不容于当地统治者，离开印度去波斯。

哲别、速不台统领的军队在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后，继续攻掠波斯，进兵钦察。

1220年秋，哲别、速不台统军进入阿哲儿拜占境。1221年初，他们入掠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共和国），败其守军。往攻篾剌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并屠其城民。1222年春，他们进至于札（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基洛瓦巴德东），索取币帛为赎金。随后攻入谷儿只境，哲别以五千军队设伏，速不台出战佯败，将谷儿只三万军队引入伏地，歼其大半，谷儿只统兵大将伊万只好退守梯弗利思。鉴于谷儿只地势险阻，蒙古军停止深入，转攻失儿湾首府沙马哈（今阿塞拜疆共和国舍马合），进取打耳班（前苏联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打耳班位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与宽田吉思海之间的隘口上，为南北往来必经之地，是一个商业城市。蒙古取打耳班后，伪请失儿湾国王遣使议和，使者至，即胁为向导，引蒙古军逾太和岭，入阿速、钦察部地。这时阿速人与钦察人联合抵抗蒙古军队。双方不分胜负，哲别、速不台遣使对钦察人说："你我都是同一语族，而阿速人为

异类。我们双方应缔约媾和，不相侵害。”并遣使送去大量礼物。钦察人信以为真，便率部离去。蒙古军击败阿速部之后，乘胜攻人毫无戒备的钦察各部，于是这年蒙古军驻冬于钦察之地。

忽滩汗率领一部分钦察人逃入斡罗思，向其女婿、斡罗思伽里赤王密赤思老求援。密赤思老召集乞瓦、契尔尼果夫等公国军队，并联合钦察人，共同迎击蒙古军。斡罗思军队虽多，但指挥不统一，诸侯各自为战。伽里赤王先击败蒙古军前锋，哲别、速不台引军退却，诱敌深人。1223 年 5 月，斡罗思军渡过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共和国日丹诺夫北卡里奇克河），伽里赤王以为本部军队即可取胜。不约乞瓦等国王侯，独自同钦察军向蒙古军队发起攻击，但很快就被蒙古军打败。败军向后奔逃，冲垮诸侯的营盘，斡罗思军大溃，诸侯六人阵亡。军队损失大半，伽里赤王逃归本国。乞瓦王密赤思老屯兵于阿里吉河对岸高岗上，坐视伽里赤军惨败，蒙古军遂进围乞瓦营，经过三天战斗，密赤思老见敌军增兵，乞请投降，哲别等先允以不杀，但在斡罗思人降后，即将密赤思老等王侯及其将卒全部杀死。蒙古军长驱直人斡罗思南部，烧杀掠夺；又沿黑海北岸进人克里米亚半岛，攻陷速答黑城。

1223 年年底，哲别、速不台率军东返，经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沿河南下，经由里海、咸海之北，与成吉思汗会师东归。1225 年春，成吉思汗统率大军回到蒙古。

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维吾尔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称为窝阔台汗国。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曷思麦里传》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湛然居士集》卷6《西域河中十咏》之九

《史集》第1卷第2册

《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

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西征，对中亚、波斯、钦察等许多文明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同时，西征也打开了东西方交通的孔道。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各族人士不断进入中亚、波斯等地。中亚、波斯、钦察、阿拉伯以至欧洲的人士也到达中国。这样，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开拓了自己的视野。

在西征的时候，成吉思汗就征召一些中原名士去到他的行营，其中声望最著的是耶律楚材和丘处机。

丘处机是十三世纪初全真道的代表人物。他是山东栖霞人，全真道创始人王喆的七大弟子之一，曾受金世宗召见，后回到山东，在当地招收信徒，宣扬教义。

贞祐二年（1214），金朝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次年，中都（今北京）落入蒙古军之手。贞祐四年（1216），金宣宗派东平监军王庭玉召丘处机前往汴京。明显地，危急中的金朝政府想借重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全真道。在金世宗和章宗两朝，全真大师们都把皇帝的召见当作十分荣耀的大事，但是，这一次丘处机竟拒绝了宣宗的诏命，不肯前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真道的政治态度也相应起了变化。兴定二年（1219），金元帅张林以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十二州归宋，山东成了蒙古、金、宋三家角逐之地。金朝再欲召丘处机，道路被张林所阻，不能得。兴定三年（1220）八月，南宋使臣来请，丘处机依然不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丘处机将南行，因为

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太多，况且语言不通，丘处机却一言不发。金廷将亡，南宋孱弱，精明的全真道领袖不肯把自己的命运同它们联系在一起，他在审慎地进行新的政治选择。过了不久，成吉思汗派遣侍臣刘仲禄悬挂虎头金牌，上面刻有“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几个字，并带蒙古随臣二十名，传旨敦请，丘处机“留不住”的时候到了。这位七旬高龄的老道士带上弟子，立即应诏西行，前往中亚谒见成吉思汗，从而揭开了全真道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向成吉思汗推荐丘处机的是善医药又会制作“鸣镝”的刘仲禄，他吹嘘丘处机已经三百多岁，有保养长生的秘术，以迎合这位叱咤风云的蒙古大汗的兴趣。但成吉思汗不是一个迷信宗教的糊涂虫，他很善于利用人民对天命的迷信，而自己却不受天命的摆布。他在获取大汗地位的斗争中，曾巧妙地利用了宗教势力，他对各种教派均加以利用，而不偏重于任何一教。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说他“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种宗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正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只要为己所用，他都收留；对全真道和丘处机，实际上也持这种态度。蒙古军队攻下金中都之后，成吉思汗于1217年委木华黎全权处理汉地军政事宜，自己于次年率师西征，占领了大片地域，以其有限的兵力占据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人民还没有完全臣服。而叛者众多，仅仅靠武力削平，势必耗费实力，迁延时日。在这种形势下，刘仲禄向他推荐一位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并称有“长生之术”，自然正合他的需要。

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动向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当时，蒙古铁骑进入中原，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与社会习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渴望摆脱社会危机，稳定社会秩序，但是，金朝政府奄奄一息，南宋政权腐败衰弱，只有大蒙古国的力量最为强大，故而汉族地主阶级纷纷投靠大蒙古国，他们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对大蒙古国的决策者施加影响。丘处机的中亚之行，正是这种动向促成的。这从耶律楚材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耶律楚材归附蒙古较早，当时随军西征。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佛道两途，但对于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一事，耶律楚材却是积极促成的，他说："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三圣人教皆有益于世者。"也就是说，儒、释、道三者对于蒙古统治者修文崇善都能起作用，而所谓修文崇善指的无疑是稳定社会秩序，接受中原地区原有的统治方式。这正是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耶律楚材也正好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才不计较教派之间的分歧，积极推荐丘处机。

全真集团对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有所认识。刘仲禄持诏一到山东，丘处机的大弟子、莱州富豪子弟尹志平就极力劝行，指出："用全真道拯救斯民的机会到了！"他们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刘仲禄与全真骨干分子在丘处机之前先赴益都，为他预选全真弟子十八人当助手，应聘弟子各有科品，集中了各种人才，刘仲禄本人则是他们的得力顾问。他们每到一处，常有士庶奉香火迎拜，前有客人引导，王公大人们进诗勉志。全真道士的行为从来没有产生如此广泛而直接的社会影响，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原汉地的各族地主阶级去向成吉思汗求情和说教。丘处机在决定西行之后，又惮于荒沙雪原，踌躇不定，但在本集团、本阶级利益的驱使下，他终于不顾古稀之年，踏上了漫长的旅程，跋涉年余。1221 年 2 月，丘处机从宣德出发，越野狐岭，先向北偏东北行，到呼伦湖，然后沿怯绿连河向西横穿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然后又沿天山北路一直往西，最后渡过阿姆河，1222 年四

月到达成吉思汗行营。当渡过阿姆河时，真人的感觉已是：“千山及万水，不知是何处。”

丘处机在行营住下后，成吉思汗当即接见。成吉思汗说：“你远行万里而来，我很赞赏。”长春真人说：“使我奉诏而赴的，是天。”成吉思汗听了很高兴。问道：“真人从远方来，有什么能使我长生的药?”丘处机说：“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听了并没失望，倒很赞许他的诚笃，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让他住在汗帐东面的帐幕里，并特许他见面时不用跪拜，进汗帐时折身叉手就可以了。在行营，丘处机前后讲道三次，讲道的内容大致有五个方面：一，保养之道在于戒声、色、欲；二，帝王乃天人下凡，伐天行道，有安缉百姓的使命，要善自珍重；三，山东、河北皆天下美地，得之者必为大国。大汗应学习金人初人中原时的经验，先立一刘豫式的傀儡政权，待熟悉情况后再亲主之；四，治天下施仁政，当选贤任能；五，历述信道的好处，宣扬全真独得道之根本。显然，丘处机所论已大大超出了“修道”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汉地统治阶级的政治愿望。

成吉思汗没有接受刘豫式皇帝的建议，但对丘处机的忠顺及其他几点意见颇为欣赏，倍加奖揄，他令大家呼丘处机为“神仙”，集诸王子面谕“神仙”所言，把丘处机作为一个可靠的宗教领袖加以信用。不过，丘处机的说教对成吉思汗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尽管成吉思汗觉得神仙的说教有些道理，但即使是个人的清心寡欲他也做不到。在丘处机离别前夕，成吉思汗出猎从马上跌了下来，丘处机劝告说：“天道好生。你年事已高，少出猎为宜，出猎坠马，是天的戒示。”成吉思汗说：“神仙说得对，但我们蒙古人自幼就习惯骑射，一下子改不了。”1223年，丘处机请准东归，成吉思汗允准全真教人可以免除赋税差役，可以招致流离失所的百姓。成吉思汗又任命丘处机总管天下道教，企图利用丘处机在广大道教徒中的威望来发展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

治。

雪山之行是全真道贵盛的起点。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得到种种宠遇，而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领导集团也竭尽心力，为蒙古汗廷效劳。

丘处机辞归，成吉思汗委派宣差阿里鲜等人护送，沿途官员将领争先恐后敬奉。1224 年春，燕京行省遣使者持疏恳请丘处机住大天长观，这是全真道在金人治下不曾得到过的优遇。丘处机立即答应，进住燕京，此后，蒙古统治者对他的褒赏有增无已。若有使者赴行宫，成吉思汗必问："神仙安否?"并曾经说："只要是我的地盘，他都可以随便居住。"1224 年夏季，又遣人传旨："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住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佳。"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咸得不等人又施琼华岛为道观。1227 年五月，有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令天下出家善人都隶属于丘处机，并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务交由丘处机全权处置。丘处机一生的事业至此达到顶点，大大超过了他的师傅与师兄弟。世人论全真，竟有以丘处机为全真祖师，而不知其师王重阳及其师兄马丹阳、谭长真等人者。当时四方尊礼者云集，"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就连旁门异户也无不归向。1227 年夏天，始展宏图的丘处机一病不起，凑巧的是，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在这年七月同月去世。

丘处机死后，弟子宋道安继主教事，但很快又让位给清和真人尹志平。尹志平掌教十年，1238 年传位于李志常，但他仍参与主持教事，直至 1251 年去世。在此期间，大蒙古国的汗位几度更迭，全真道的势力虽有所起伏，但总的说来还是继续上升。李志常当年曾将丘处机西游的言行和见闻记述传世，著成《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部游记写得简约而丰赡，文采斐然，涉及旅途中的山川道路，水土风气，衣服饮食，禽虫草木，人物事迹，等

等，并且载录了丘处机在旅程中所作的许多诗篇、偈语和言行。它是一部中世纪游记名作，也是研究中古时代中亚史地和十三世纪蒙元史事的重要典籍。

太宗窝阔台初即位时，全真道曾遇到一点挫折。1230 年，就在尹志平隆重安葬丘处机后不久，有人诬告全真道，清和被执，经李志常等人奋力营救，事始解，诬告者是谁，史无明言，但从后来的释道之争及真大道之不满来看，不外出自其他教派对暴发户全真道的嫉恨，在这一紧要关头，当年力促丘处机西行的尹志平觉察到全真必须谨慎行事，力争继续得到汗廷的支持，他谆谆告诫全真徒们："吾门之人，同得同失，一人进道，为教门之荣；一人作过，为教门之累，此尤不可不慎！"1232 年，窝阔台南征还，尹志平迎见于顺天，窝阔台赐坐论道。并且令皇后代祀香于长春宫，又赐道经一藏。这次晋见应是全真道史上继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之后第二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促成了以后二十年全真道的继续昌盛。"自是，四方学者辐凑堂下，皈依参叩，徐徐而来，唯恐其后。"

1235 年，全真道奉诏在和林修筑道院，其势力进入了蒙古汗廷的禁近。1238 年，李志常嗣教后，选弟子樊志应充道录，让他张皇教基，供奉朝廷。此人在争取汗廷信任的工作中，成绩卓著。1250 年前后，李志堂及侍丘处机雪山之行的十八弟子光膺宝冠去帔，下至四方名德，也获得了紫衣师号的殊荣，改观为宫。还有一个王志坦，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在 1244 年被李志常召为大度师，夏天，随志常北上。他用祈禳诃禁济人，并以医药和巫术取悦于皇室。长春宫还曾承诏教授胄子十八人，由丘处机的另一大弟子冯志亨主管，令其阅读《诗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后来都各有建树。这无论对于传播汉文化，还是对于扩展全真道的影响和势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全真道之所以能获得汗廷的恩宠，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以下两条：

其一是协助抚平汉地。丘处机一行始回至云中，即派尹志平随蒙古宣差阿里鲜赴山东，招谕抵抗者。1236年，尹志平兴建陕西祖庭。当时陕右刚定，许多遗民仍然隐蔽山林，当他们听说大师到来，相率归附，尹志平将他们抚慰安置如故。当年，正值蒙古军队大举攻掠南宋统治下的四川，全真道则协助安定了蒙古军队的后方，不用兵刃，为汗廷立了大功。尹志平等人招谕汉地的方法不外乎宣扬“北方气运将回”；天命有归，人们应当安时处顺，“顺命者不诛”。降城而获免，这是汉地旧统治阶级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一项政治原则，而这一原则之得以实行，也还有全真道一功，这是全真道受到汗廷垂青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其二是祈天永命。全真道辅佐新王朝的另一贡献则是道家传统的拿手好戏，即祭祀祈醮，代新王朝宣扬天命，收拢人心。成吉思汗在免除丘处机门人差发赋税的诏旨里，明确指出道士是“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岁”。这位马背上的英雄很懂得“神道”的政治作用。丘处机居燕数年，以近八十高龄之躯，曾亲为燕京地方长官作醮禳灾。还曾赴盘山主黄箓醮三昼夜，又数为祈雨醮。1236年，尹志平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并祈天承命。1238年，著名全真道士樊志应受命降御香于燕都师真纪堂，既为皇家祈福，又为自己增光。1246年，诏大醮于长春宫，全真道士纷纷预事。1251年，宪宗即位，“欲遵礼典，遍祭岳渎，遣中使李志常至阙下”。宪宗“亲信香”，手授李志常，“选近侍哈力丹为辅行”。“赐内府百金五千两以充其费”，赐李志常金符及倚付玺书，令掌教如故。李志常刚诚惶诚恐，遍祭五岳四渎，恭行醮事，其中岳衡山因当时尚在宋境，便“望祀之”，尽心竭力而归，昔日绕在金朝皇帝头上的神圣的灵

---

① 郭旃：《金元之际的全真道》，载《元史论丛》第3辑。

光，如今被道士们转移到蒙古大汗的头上来了。

全真道不仅受到蒙古汗廷的优遇，而且与当时北方的大小军阀关系也极为密切，金元之际，北方山头林立，许多大小军阀各自割据一方，表面上归顺蒙古，实际上是土皇帝，在各自的统治地区中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大小军阀在不同程度上几乎都与全真道有一定关系，对全真道在各地的发展积极加以支持。如陕西五路总管田雄，与全真道关系甚密，顺天（今河北保定）军阀张柔成兵亳州，“命官持疏”使金真道士修复并住持相传为老子祖庭的亳州太清宫，恭行祀事。山东东平军阀严实降蒙古，仍以汉法治东平，也不忘借助于神道，“特敬”天倪子、提点道教张志伟。张志伟乃全真道士，后来受到元世祖赏识，赐名志纯。

在蒙古汗廷和各地军阀的支持下，全真道势力日盛。在当时的各种宗教教派之中，全真道取得了特殊的地位，超过了佛教以及道教的其他派别。它所举行的一系列宗教活动，就正是这种特殊地位的表现。

首先，为丘处机举行隆重的葬礼。易长春宫之东甲第为观，号曰白去，“为葬事张本”。等到举行葬礼的时候，四面八方前来会集的道士和俗人达到一万多人，甚至官府不得不派兵维护秩序。葬毕，又有数千人要求人道，奉道之众复万余。

二是大兴土木，广建宫观，全真道的祖庭——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著名的山西永乐纯阳万寿宫、汴梁的朝元宫、北京的白去观等。都始建于这一阶段。宫观是道家组织联络的枢纽，宗都活动的中心，其数目与规模无疑是道家兴衰的标志。另一方面兼并了大量的寺观，迅速扩充了地盘。

三是祖庭会葬。1235 年，尹志平认为道教大兴，应归功于重阳祖师，于是留意祖庭，正好这时，京兆行省田雄来请，便于次年来到陕西，扩建祖庭。并布置准备会葬祖师王重阳。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树立圣人，收拢人心，招徕更多的信徒。这一活动经

历了1237年的“汰三教僧道”事件，并未受到阻止。1238年，全真大师于志道、李志远、綦志远奉旨复立终南祖庭。1240年，会葬条件已齐备，请尹志平董其事，尹欣然前往。次年，葬祖师于白去堂，会送者达数万人。这是一次全真道的盛会，其政治影响和宣传、组织的作用是巨大的。事后，敕赐祖庭曰十方大重阳万寿宫。尹志平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第四是刊行道藏。这件事主要由丘处机另一大弟子——披去真人宋德方主持完成。这是全真道以道家正统继承者的面貌出现，争夺道教领导权的一项措施，得到了主张汉化的蒙古贵族及一大批汉族官僚支持。其事始于1237年，终于1244年，影响深远。

全真道教门宏阐，前所未闻的局面开始于丘处机，而在尹志平掌教及辞职后辅助李志常掌教的时期达到顶峰。丘处机西游归来毕竟只活了不到四年，而且当时金朝与蒙古尚分民面治，未成一统。尹志平活动，二十余年，又经蒙古灭金，这一时期的全真道人才济济，在尹志平、李志常等人的领导下，在一个较为辽阔的区域里，创造了一个空前的局面，其兴旺发达，在道教史上可说是极为罕见的。

全真道初创之时，以苦修奇行骇世，以处士虚声惊动朝野，取得了社会的重视，王重阳规定：凡是人道之人，必戒酒、色、财、气。连登高望远都在禁戒之列，据说怕的是“意畅则情出”。到金元之交全真道的全盛阶段，丘处机等人马上对全真教义作了变通的解释，以便安享荣华富贵。他们宣称“道同时异”。即全真道的服务对象可以由金朝转向蒙古，全真大师的清规戒律也可以由荣华富贵来代替了。丘处机原来自称恐怕栋宇华丽的长春宫会使自己消福，后来却不仅安然住下，而且每日驰马万安宫，观鱼玩水。他曾经说：“事情有不得已的。开始自己无心这样办，而别人却巧意构成，自己就暂且顺从，这对我并没有多大害处。”

自丘处机以后，全真大师们个个显贵，很少再有人去"居环"清修。丘处机在临终时还志得意满地说："过去丹阳公曾经告诉我说：'我死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教之乡，你正处在那个时候，你还将住持大宫观。'他的话如今一一皆验，我现在已死而无憾！"其心底的欲念披露无遗。实际情况表明，如果论全真道士贵盛的话，当自丘处机始，后来，全真师姬志真赋诗送樊志应赴汗廷，满怀期望，勉励樊志应"衣锦归"。与丘处机之志可说是一脉相承。显然，金元之交的全真大师中很少有真正的清修之士。

（胡务）

参考资料：

《长春真人西游记》
元·耶律楚材：《六经谌丛书·西游录》。
元·王恽：《秋涧集》卷 56《尹志平道行碑》。
元·姚燧：《牧庵文集》卷 11《长春宫碑》。
元·元好问：《遗山文集》卷 35《紫微观记》。

蒙古东征高丽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此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所发动的连年征战，震撼了中世纪的欧亚大陆和阿拉伯世界。众多的国家和民族，都被迫卷人这股来自蒙古高原的战争旋风中，他们或是为战火所吞没，或是举城降服成为藩属。

然而，被西方一些史学家出神人化般描绘的蒙古军队，在对外征服的侵略战争中并不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蒙古东往高丽的侵略战争，先后延续了四十余年的史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蒙古对高丽发动侵略战争，与蒙古对辽东地区的经略是密切相关的。

辽东地区是女真的发源地，也是金王朝与高丽立国通好的门户，大批契丹降民亦世居于此。当蒙古南下伐金并东袭辽东之际，金王朝加强了对辽东地区的控制。金王朝在极力阻止蒙古军队东进的同时，特别加强了对契丹部众的提防，采取了“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等措施，防止契丹部众的反叛。然而适得其反，1212年，仕金为北边千户的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叛金，聚众十余万，营帐百里，威震辽东，等到蒙古军队到达辽东，耶律留哥遂率众归降了成吉思汗。

耶律留哥叛金并归附蒙古，这对金王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金朝政府屡派重兵前往剿火，以解除心腹之患。但是，金朝军队

却屡遭惨败，而且反叛者更多。1214年，金朝政府又命辽东宣抚蒲鲜万奴率重兵复攻耶律留哥，但仍未奏效。蒲解万奴恐金主责罪，且看金朝大势已去，于是据地自雄，建东真国与金王朝分庭抗礼。因此，金王朝对辽东地区的统治便大为削弱，而对蒙古统治者来说，辽东之地已是囊中之物，唾手可得[①]。

1216年，耶律留哥部发生兵变。金山乞奴等人趁耶律留哥往赴蒙古纳贡拜谒之际，率众自立辽国，杀死了成吉思汗派去征发质子的三百蒙古人。这一事变，迫使成吉思汗发兵辽东，助耶律留哥讨伐契丹叛众。金山乞奴等契丹叛众，由于受到耶律留哥和蒙古军队的攻击，不断向东败退。在与金朝军队战于开州馆时，金山曾派人告高丽北界兵马使，要求高丽以粮草助之，并以加兵相威胁，然而未得到高丽方面的理睬。

金山所率契丹叛众，在蒙古与金朝军队的夹击下，由于得不到高丽的资助，已无法在辽东割据，遂率众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此后，契丹兵连续攻占高丽边城数座，并于1217年攻占了高丽重镇江东城。当时，高丽朝廷的实权把持在崔忠献一门，精兵强将多为崔氏权臣私家所拥有，官兵羸弱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高丽方面对于背水一战的契丹军队，当然是难以抗御的。契丹兵侵入高丽后，辽东女真的另一支叛金军队黄旗子军亦侵入高丽，这使高丽边境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其后，女真黄旗子军虽被高丽智取失败，但占据江东等城的契丹军队却使高丽一筹莫展，成为边患。

鉴于辽东形势的骤变，成吉思汗决定彻底平定辽东。在收降蒲鲜万奴的东真国后，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元帅哈真和扎剌率蒙古兵一万，督统蒲鲜万奴所遣东真兵二万侵入高丽，讨伐盘踞在江东城的契丹叛众。同时请高丽发兵合围江城，并传达成吉

① 郝时远：《蒙古东征高丽概述》，载《蒙古史研究》第2辑。

思汗口谕："破贼之后约为兄弟。"蒙古出兵侵入高丽，一方面是为了剿灭契丹金山部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取代金朝对高丽的控制。

蒙古加兵高丽的行动，在高丽朝野引起了惊慌，很多臣僚都认为来者不善。但面对蒙古大兵入境的现实，群臣又难以提出对策。这时，高丽西北面元帅赵冲和兵马使金就砺则认为："国之利害正在今日，若违彼意，后悔何及?"赵冲即发米千石，命中军判官金良镜率一千精兵护送到蒙古军中，同时，赵冲与金就砺各率本部人马助攻江东城。

1219年，蒙古、东真和高丽合兵攻陷江东城，契丹首领喊舍自缢死，其余官兵眷属五万余众皆降。蒙古元帅哈真将少量契丹遗众分配给高丽，其余则遣送回辽东仍归耶律留哥辖制。蒙古军队降服契丹之后，便与赵冲、金就砺按约盟誓："两国永为兄弟，万世子孙无忘今日。"其后便开始撤军。高丽朝廷见蒙古军队如约行事，高丽立即派尹公就、崔逸为使送上两国结和的牒文，由哈真转呈成吉思汗。而以蒲里带完等十人组成的第一个蒙古使团，亦奉成吉思汗诏令前去见高丽王。

由于蒲里带完等人戎装披挂去见高丽王，并表现出十分的傲慢，这使高丽群臣对所谓的"兄弟"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因此，蒙古军队撤走后，高丽朝廷即派出谍者侦察蒙古的动向。同时派人分巡北界边域，检阅兵器，积储军资，加强了边界的防御，以备蒙古复来。

正当高丽准备抵抗蒙古军队再次入侵的时候，蒙古却因西域杀死蒙古使者而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成吉思汗把征服华北和继续对金作战的重任交给了国王木华黎，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出征西域。当时，蒙古对高丽的政策，就是要求称臣纳贡。正如成吉思汗对高丽的谕令所示："尔等如输纳赋役于我，才能守住此疆彼土。"成吉思汗出征西域后，马上就有蒙古、东真的小部队屯镇

高丽边城外，督纳岁贡。其后，蒙古使臣分别奉皇太弟铁木哥斡赤斤、国王木华黎、东征元帅哈真和扎剌等人的书信，不断入使高丽索取贡物。其入使之频繁，索要量之庞大，是十分罕见的。仅铁木哥斡赤斤本人，一次就索要水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纻二千匹，绵花一万斤，以及龙团墨、颜料、漆料、桐油等杂物若干。蒙古这种日甚一日的追逼贡赋，使高丽朝廷应接不暇，更难于如数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接替崔忠献在朝中权臣地位的崔怡，主张对接踵而至的蒙古使臣予以回绝，并利用手中的兵权，发南道州郡精勇、保胜军，在宜州、和州、铁关等要害之处筑城，防备蒙古的入侵，高丽朝廷中主战的气氛日渐浓厚。

当时成吉思汗西征已四年之久，仍无回师之意，经略华北的木华黎虽已基本上完成了对金的战略进攻，但他亦于 1223 年三月去世。这使蒙古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出现了放松的趋势。蒲鲜万奴的东真国，则趁此机会开始脱离蒙古阵营的活动。1223 年五月，东真国的使臣第一次单独入使高丽，并受到高丽的接待。次年正月，东真国又遣使赴高丽送上两道牒文。其一曰："蒙古成吉思汗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斤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二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置榷场，依前买卖。"这就是说，东真国已经和蒙古断绝了关系，同时要求高丽恢复原金王朝的边境贸易。东真国的这一举动，表明了蒲鲜万奴企图背靠高丽，西拒蒙古，独霸辽东的目的。对高丽来说，从蒙古阵营中分化出东真，这对抵御蒙古的入侵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当然，高丽虽然开始与东真直接交往，但还不敢公开对抗蒙古，对蒙古使臣仍按过去的礼仪接待。

东真国既然与蒙古绝好，也就下定决心要单独控制高丽，从而得到高丽的资助。因此，它必须彻底中断蒙古与高丽的关系。1225 年正月，多次出使高丽的蒙古使臣着古与等人，在从高丽返回蒙古的途中被截杀。这无疑是东真有意制造的事件。

蒙古使臣被杀一事，的确引起高丽朝廷的惊慌，深恐蒙古会兴兵来侵。然而，这种不安，很快随着蒙古方面的无声无息而消除了。当时，蒙古虽然派出使臣前往高丽调查这一事件，但又被东真人假扮高丽军队射阻于途。蒙古虽由此认定高丽背约反叛，但却一时无力征讨。成吉思汗继西征之后，又踏上了征西夏的道路，并在这场战争中去世。从蒙古使臣被杀以后，蒙古与高丽之间七年未通音信。

高丽与蒙古的关系中断后，由于没有受到蒙古的报复，反而增强了抗御外来侵略的信念。东真本想通过嫁祸于高丽的手段使高丽屈从，但高丽却对东真采取了强硬态度。东真的计谋落空，只好动用武力威胁高丽，而高丽则出兵抗御，毫不让步。双方打打停停，战事不断。

1231年八月，窝阔台命令元帅撒礼塔出兵高丽，以报高丽杀使背约之仇。当时，高丽对蒙古大规模的征讨，是缺乏精神准备的，特别是往年东真人时常假扮蒙古军队掳掠边城、威吓高丽，高丽边城军民对"假蒙古兵"已司空见惯，不以为然。所以对蒙古军队的进攻，仍像对待东真"假蒙古兵"一样全力抵抗，按照当时蒙古征服战争的习惯，攻城不降则要屠城。蒙古军队最初攻击的几个城池，都因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而未能免于屠城。其后，蒙古军队了解高丽军民的抵抗中还包含"假蒙古兵"这一因素后，便令降俘的高丽将领向其他被攻击的城池呼喊，"真蒙古兵来矣，可速出降。"尽管如此，高丽很多城池仍坚守不降。其中最突出者，是龟州城。蒙古军队在攻击该城时，用尽了各种攻城办法，但都遭到龟州守城军民的有力反抗。直到高丽朝廷被迫投降后，龟州仍在坚守。龟州的顽强抵抗不仅反映了高丽军民在抗击外来侵略方面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同时也使蒙古军队大为震动。待龟州奉高丽王旨出降后，一位年愈七十，身经百战的蒙古将领，看着龟州残破的城垒感叹说："吾结发从

军，历观天下城池攻战之状，未尝见被攻如此而终不降者。”

高丽王决定向蒙古投降后，蒙古除送上责高丽王书以及索取大量财宝和童男童女的诏书外，撒礼塔又于高丽京、府、县内设置七十二个达鲁花赤，对高丽实行监临统治。蒙古军队虽然撤出了高丽，但所设置的达鲁花赤却凌驾于高丽府道州郡的衙门之上，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这对高丽朝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种丧失主权的形势下，高丽朝廷感到前途渺茫，难以对付蒙古的盘剥和压迫，过去曾以主战派自居的权臣崔怡，看到这种朝不保夕的局面，出于保全他私人利益的需要，提出了“徙都避乱”的主张，并于1232年七月挟制高丽王及百官迁都江华岛。

高丽朝廷迁都海岛，这对高丽来说是一种消极抗战的行动，而对蒙古来说则无疑是一种公开的反叛。高丽王既然被迫迁都海岛，也就决定公开对抗蒙古，首先派人往北界诸城收缴蒙古达鲁花赤的武器，派去的人虽然被杀，但这一行动却鼓舞了在陆的高丽军民。其后不久，高丽西京宣抚使、大将军闵曦等人便尽杀蒙古所设达鲁花赤，消除了高丽国内的蒙古统治势力。当然，这一行动必将遭到蒙古的报复，所以在陆的很多高丽臣民纷纷迁居海岛避难。

蒙古得知高丽国内的这一变化后，窝阔台复令撒礼塔率军征伐高丽。蒙古大军入境，一边遣使投书高丽，责其降而复叛，迁都海岛，杀死达鲁花赤之罪；另一方面则猛攻高丽重镇。高丽朝廷迁于海岛，可免遭兵灾及被俘之辱，但在陆臣民则难逃蹂躏之苦。所以，高丽朝廷不断修书答复蒙古，极力解释两国间的误会和东真从中作祟之奸，乞求蒙古罢兵。正当此时蒙古元帅撒礼塔在指挥攻打水州属邑处仁城时，被一避兵灾于城中的僧人射中身亡。蒙古军队主帅一死，军心大乱，副帅帖哥遂率军回师。蒙古第三次征服高丽的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撒礼塔几次率兵征服高丽，号称权皇帝。高丽朝野对其多有

畏惧。然而高丽僧人金允候将其一箭射杀，蒙古军队亦因此败退，这对高丽臣民产生了极大的鼓舞。高丽王一面修书东真以求联合，另一方面开始安定国内消除隐患。在蒙古侵略高丽的过程中，一些高丽将领曾迎降于蒙古军队，并充为向导，往来于高丽朝廷与蒙古军队之间。如赵叔昌、洪福源等，因其投降了蒙古并受到蒙古的重用，在两国交兵期间高丽朝廷不但不敢责罪他们，反而委以高官，让他们为高丽的安危在蒙古方面进行斡旋。高丽打败蒙古的进攻后，随着国内抗御蒙古入侵的士气振奋，这些有反叛行为的将领便成为众矢之的。在高丽惩治内奸的行动中，洪福源只身逃到蒙古，赵叔昌被处决，甚至连代替高丽王出降蒙古的淮安公王侹亦莫名其妙地死去。

蒙古在高丽受挫之后，没有立刻派兵报复。但为了防止高丽与东真的联合，窝阔台派皇子贵由和诸王按赤带将右翼军进讨东真，同时诏发高丽，督令迁出海岛，令高丽王赴蒙古朝觐。蒙古平定东真擒杀蒲鲜万奴之后，正值对金的战略进攻接近尾声，其注意力放在了对金的最后攻击上，对高丽国内清除叛党、积极备战的情况，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的反应。

1235年春，窝阔台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除征西域和伐南宋的两支重兵外，以唐古为元帅，洪福源辅佐的第三支军队，又踏上第四次征服高丽的道路。是年闰七月，蒙古兵踏境的消息传到江华岛。高丽王即令前后左右四军沿江设防御敌，同时令百官臣僚每天自辰时至午时拜日禳兵。高丽朝野知蒙古此来，决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也下决心进行举国抵抗。这场战争进行了近四年之久。

1238年，蒙古军队已经攻占高丽北边数十城，其前锋已入高丽腹地。高丽王为免遭灭国之灾，是年十二月派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奉降表再次赴蒙古求和。蒙古方面则必以高丽朝廷返陆，高丽王赴蒙古朝觐方能休兵。双方互使不断，蒙古催逼责

难，高丽推委拖延，其间蒙古军队仍驻镇高丽，小规模的战事时常发生。这样形势一直延续了两年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高丽的社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百姓流落海岛，土地荒芜，国力已消耗殆尽。1241年，经朝中集议，高丽王决定用族子永宁公綧称为太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蒙古为人质，从而才结束了这场战争。高丽仍依前例，不断向蒙古交纳贡赋。同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其后，蒙古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又持续了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之间，蒙古对高丽的控制日益松弛，两国往来渐疏，高丽也停止了纳贡。

1246年七月，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在与拔都的斗争中捷足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次年七月，贵由先派元帅阿母罕将兵、洪福源辅佐再次东征高丽，蒙古统治者再次发兵的目的，就是要迫使高丽王出陆，否则高丽就不会真正臣服。高丽王对蒙古加兵的意图也很清楚，因而十分重视对海岛的保卫。在抵抗了蒙古的前期进攻后，高丽王遂命北界兵马使卢演尽迁北界诸城人民入保海岛。正当高丽准备死守海岛之际，贵由去世。蒙古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再次拉开帷幕，而高丽却又一次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在此之后的几年间，蒙古虽不断遣使去高丽督令出陆，但毫无成效。高丽对蒙古使臣尽力款待，百般周旋，以致有的使臣对高丽王说："你们国家的北部已经残破不堪，正如房屋没有了藩篱，怎么可以复都旧京？应当据海岛自守，我可以回去上奏皇后，不要再来侵扰。"

1251年六月，拖雷之子蒙哥登上了蒙古汗位。次年十月，蒙哥命诸王也古征高丽。其后又以剌儿带为东征元帅，以洪福源辅佐，连年不断地用兵高丽。这场战争延续了近八年。蒙哥这次对高丽用兵，旨在彻底解决高丽问题。因此，高丽朝廷虽多次表示臣服，不断施贿于蒙古将帅，尽力犒劳蒙古军队，但蒙古军队不断攻占高丽城池，掳掠高丽人民，必欲以高丽王出陆迎降才可

罢兵。这种局面的形成，是高丽王在权臣崔怡一门挟制下，以保全朝廷及个人安危为宗旨，而置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于不顾的必然结果。对高丽王来说，只要朝廷尚存，就能延续高丽王氏王朝。所以，当大多数朝臣都主张高丽王出陆迎降，或“遣太子以活民命”之时，高丽王仍虑蒙古会执其亲子于城下相挟，逼己出城。在崔怡父子相继去世后，高丽朝政摆脱了权臣的控制。百官臣僚再次恳请高丽王出太子于蒙古，救国活民，高丽王认可了这一办法，但提出了蒙古必须先撤兵的要求。

高丽应允以太子人质蒙古，满足了蒙古统治者的要求。蒙哥也同意了高丽的请求，蒙古军队开始陆续撤退。1259 年初，高丽王始令各州县守令率避乱民众出陆耕种，恢复家园。四月，高丽如约遣太子倎奉表到蒙古。因当时高丽国库枯竭，高丽王令“文武四品以上各出白金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以充其费。”与此同时，蒙古派使者去江华岛监督毁城之事。高丽朝廷移都抗战的二十多年历史，随着江华岛内外都城的拆毁而告结束。是年六月，高丽王去世。七月，蒙哥亦去世。在此之后，无论对于蒙古或高丽，还是对蒙古与高丽之间的关系，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 1218 年成吉思汗派兵入高丽讨伐契丹开始，到 1259 年高丽以太子出降蒙古止的四十余年中，蒙古为了征服高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在这旷日持久的征服战争中，高丽王国虽然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和蹂躏，但高丽军民在抗击蒙古的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和取得的胜利，却在世界历史的画卷中留下了为人瞩目的一页。

中统元年（1260）王倎死，忽必烈送王倎回国，嗣为高丽国王，并宣布不追究以前举兵反抗者。同时，为了进一步笼络高丽王室，忽必烈将女儿嫁给王倎之子王愖。至元十一年王愖袭位。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在高丽开始设置驿站。元贞元年

(1295)，王愖之子王源也娶元朝公主为妃。有元一代，高丽名义上臣属于元朝，在一段时期，元朝曾派达鲁花赤驻在王京，但不直接管理或干预高丽政事，只负责监视，有事则向朝廷报告。为了利用高丽的地理条件和人力、物力去攻打日本，至元年间元朝政府还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省。但征东行省与国内的行省不同，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担任，且得自辟官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都不变。所以，尽管元朝统治者不时粗暴地干涉高丽内政，甚至应高丽国王之邀派兵前去镇压高丽人民的起义，但总的说来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的地位。从忽必烈开始，高丽和中国传统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交往逐渐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耶律留哥传》、《外夷传》、《太宗纪》。

《高丽史》卷 22、23、24、29、103、119、130、129、121。

《学术丛编》卷 14《元高丽纪事》

蒙古灭夏

1038年，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史称西夏。在宋辽、宋金相继南北对峙的形势下，西夏维持着西北一隅的割据局面。其领土东靠黄河，西至玉门关，南临萧关，北达大漠，都城兴庆府内阻黄河，外有贺兰山为屏障。濒河诸州自古灌溉便利，唐来、汉源等大小渠道七十余条，可溉田九万余顷。河西走廊诸州也适于耕种，河套及河外阴山、河西凉州、黑水一带适宜蓄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说法。因而虽然境土不大，尚可耕牧立国。西夏拥有兵士六七十万，加上襟山带河的有利地形，足以抗衡邻境大国，与宋辽金成鼎立之势。西夏统治者利用宋辽、宋金的矛盾，既对双方都称臣，又时而联此击彼或联彼击此，从中获利，这样在南北两大国的争夺中保有自身的特殊地位。

由于境内党项、汉、回鹘、吐蕃、达怛等族人民的劳动，西夏经济得到相当发展。农业方面，各种农作物都适宜生长，畜牧业尤以盛产骆驼著名，羊马亦多；手工业主要有织毯、兵器、陶瓷、印刷等行业，骆驼毛织成的毡毯质地优良，马可·波罗曾夸之为世界最美、最好之毡，是西夏用于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党项贵族的汉化程度很高，其文化亦十分繁荣。但是，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同时，以党项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互争奢侈，并崇尚佛教，到处兴建寺庙，糜费财物，加重对各族人民的剥削。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也十分激烈。所以从十二世纪

中期以后，西夏国势渐衰，蒙古的入侵更使内外矛盾加剧，而腐败现象有增无已，终于导致亡国。

西夏北境与克烈、乃蛮两部接界，早有交往。王汗的叔父古儿汗被也速该和王汗联军打败后，曾逃入西夏避难。后来王汗为乃蛮亦难赤所逼，跑到畏兀儿，又从畏兀儿经西夏返回漠北。1203年，成吉思汗消灭克烈部，王汗之子亦剌合·桑昆也逃到西夏，途经亦集乃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一路以剽掠为生，被西夏人逐出，后来成吉思汗大举攻夏时，即以西夏曾纳仇人亦剌合作为借口。

成吉思汗经常和金国打交道，而且早在蒙古统一前，就有金国叛臣投奔到他的麾下，因此他对南边金、夏两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建国后，他马上就想进攻金国，但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金国毕竟是中原上邦，而西夏在金国之西，北与蒙古接境，如果与金合力，或从西面出一偏师北进，就可以成为对蒙古的极大牵制。成吉思汗为免除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威胁，采取先攻西夏，扫清外围的战略。这是符合他的一贯做法的。

1205年三月，成吉思汗消灭乃蛮后，率军第一次侵入西夏，攻破边境城堡力吉里寨，毁其墙垒，由此进至经落思城，又攻破该城，并略取旁近诸地，掠其牲畜人口。四月，蒙古军带着大量战利品和无数骆驼、羊、马返回漠北。这只是一次抄掠性战争。西夏修复了破坏的诸城堡，庆幸蒙古没有深入，大赦境内，将都城兴庆府改为中兴府。蒙古的这次抄掠，并未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对北方强敌的警惕，内部的派系争斗再次爆发。1206年，久专国政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罗太后合谋，废其堂兄桓宗纯佑，自立为帝，是为襄宗。

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纳贡称臣，第二次侵入西夏，攻破斡罗孩城，四出掳掠。西夏集右厢诸路军抵抗，蒙古军不敢深入，于次年春退回。

1209年秋，成吉思汗积极做侵金准备，为了防止来自侧后的威胁，必须先征服西夏。于是发兵第三次入侵西夏，从兀剌海西关口进入河西。夏襄宗安全以太子承桢为主帅，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率兵五万抵抗。蒙古击败西夏军，俘高逸，高逸不降被害。蒙古军进攻兀剌海城，守将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战，力尽被俘。蒙古军长驱直入，进攻中兴府外卫要冲克夷门。嵬名令公率西夏守军五万拒战，挫败蒙古军。双方相持两个月，待西夏守军斗志松懈，蒙古军设伏活捉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中兴防守坚固，不能攻下，蒙古军遂引河水灌城，居民被淹死无数。后外堤决，蒙古军营反被倒淹，只得撤围。成吉思汗派使者入城谈判，迫使安全纳女请和，每年向蒙古纳贡。西夏经过这次打击，向金求援又遭到拒绝，遂转而又取臣服蒙古、向金国进攻的政策。成吉思汗战略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他不但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取得经济上的补给，又可以利用西夏来夹攻金朝。

蒙古军退后不久，西夏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争夺权位的政变。1211年，襄宗安全被废，其子承桢也不得立，宗室齐王遵顼被立为帝，是为夏神宗。

在蒙古南侵的形势下，西夏与金国的一些人认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提出必须互相救援的意见。但两国统治者都鼠目寸光，乘人之危以谋己利，夏金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恶化。1209年西夏都城被蒙古包围时，遣使向金求援，金卫绍王竟说：“敌人相互攻击，是我们的福气。”不肯出兵。蒙古军撤退后，西夏立即派兵进攻金葭州（今陕西佳县），以为报复。1211年冬天，刚即位的遵顼得知蒙古军在獾河堡击败金军，直逼中都的消息，就派兵侵扰金泾、邠二州，并围攻平凉府。此后乘金国于蒙古攻掠之机多次深入金境，攻占州城，杀掠吏民，金朝也时时进行报复。

1216年，一支蒙古军经西夏国境进攻金国关、陕地区，西夏出兵配合蒙古，打下潼关。次年，蒙古征调西夏兵从其攻金，西夏军被金人打败，损失惨重。自降蒙以来，西夏虽借蒙古之势屡掠金国，但金人抗蒙不足，打西夏则绰绰有余，所以西夏获利并不多。而役属蒙古以后，蒙古的征发日多，使西夏疲于奔命，于是西夏朝内对这种政策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与蒙古的关系逐渐疏淡。

1217年，成吉思汗决定进兵西域，又命西夏出兵随征，被西夏拒绝，遂遣一支军队突人。此时西夏毫无边备，列城不能御，蒙古军再次包围中兴府，遵顼逃到西凉，遣人求降。成吉思汗决定暂时放下西夏，专事西征。所以不久蒙古军退走。

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后，木华黎受命经略中原，专征金国，不时遣兵假道夏境，并征召西夏兵从征。遵顼又甘心充当蒙古帮凶，以为金国大势已去，可以乘机取利，因此连年攻掠金国城寨。但西夏兵战斗力薄弱，屡为金兵所败。自遵顼即位以来，奉行附蒙攻金政策，夏金战争使交战双方两败俱伤。由于蒙古军的抄掠、征发，特别是长期的对金用兵，西夏国内人民耕织无时，田野荒废，饥民四处逃亡，国家财用困乏，虽妇人女子都知道国势濒于危亡了。但统治集团依然歌舞升平，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宫中的浮费，对勋臣贵戚的赏赐，仍未能加以节制。这时，有些人出来反对遵顼的政策。1223年，遵顼遣太子德任统兵攻金，德任认为金国兵势尚强，建议与金约和，固谏不从，遂请避太子位，想去当和尚，遵顼大怒，将他囚禁于灵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书切谏，痛陈时弊，并提出同样的和金意见，也被罢职。同年，遵顼派遣十万步骑协助木华黎进攻金凤翔府，金兵坚守，西夏统兵官见不能取胜，士兵厌战，遂不告木华黎，率军退回。蒙古遣使问罪，遵顼畏惧，急让位于次子德旺，自称上皇。

夏献宗德旺即位后，改变其父的政策，决定与金约和。1224

年春，夏、金达成协议，互为兄弟之国。德旺见成吉思汗统兵西征长期未回，以为有机可乘，竟然遣使去联络漠北诸部，共抗蒙古，但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

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奉命继续统军经略中原汉地，孛鲁去西域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密令他抓紧适当机会，征讨阴蓄异谋的西夏。1224 年秋天，孛鲁率大军攻破银川，消灭数万夏军，俘其大将塔海，掳掠牲口牛羊马驼数十万，

1225 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蒙古。1226 年，成吉思汗率军大举侵人西夏，兴兵的借口是西夏曾接纳仇人亦剌合·桑昆不送质子和拒绝征调。发兵之前派遣一名使臣到西夏，责其不派兵随从蒙古西征且出言不逊之罪。这时正值西夏抗蒙派得势，驳回了成吉思汗的恐吓，宣布准备迎战。蒙古首先攻下黑水等城，驻兵肃州之北，四出抄掠。接着进兵攻取沙州、肃州、甘州，诸州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蒙古军攻下肃州城后，进行残酷屠杀，幸存者仅一百零六户。甘州守臣曲也怯律之子察罕，十多年前就投奔成吉思汗，被收为养子。此次随征，遣人劝其父献城投降。而副降等杀曲也怯律，并杀蒙哥使者，城破，成吉思汗欲尽屠之。由于察罕进言杀使投降之事与百姓无关，才免于屠城。蒙古军进攻西凉府，守将力屈投降，于是进至河曲，攻取应里等县。目睹国破家亡，夏献宗德旺忧惧而死。其侄南平王睍被立为皇帝。十一月，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进攻灵州，睍遣嵬名令公率领十万军队来援。蒙古军渡河进击，消灭西夏军，杀死无数，尸体堆积如山。随后成吉思汗来到盐州川驻冬，蒙古军在驻营地附近大肆杀掠，居民有的打土洞、石洞避兵，得免于难者百无一二。

成吉思汗认为经过这次打击，西夏已不再有力量抵抗，因此只留一部分军队攻打中兴，并派察罕人城招降。1227 年正月，成吉思汗率军南下，进人金境，攻陷临洮府和洮、河、西宁、德顺等州，另遣一军入宋境抢掠。四月，驻扎于六盘山。六月，继

续向南进兵，至秦州清水县。七月，成吉思汗病死，终年六十六岁，葬于起辇谷。成吉思汗的墓地是由他自己生前选定的。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颗孤树，他在树下立了马，在那里心情喜悦。他于是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举哀时，当时听他说过这话的人，重复了他所说的话。诸王遂按照他的命令选定了那个地方。据说在他下葬的那年，野地上长起了无数树木和青草。后来那里森林茂密，已无法通过，最初那颗树和他的埋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甚至守护那个地方的老守林人，也找不到通到那里去的路了。临死前他吩咐：秘不发丧，以免被敌人获悉。等到西夏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刻出城时，立即全部把他们消灭。

蒙古军包围中兴半年，中兴军民坚壁拒守，但因城中食尽，兵民皆病，晛被迫投降，蒙古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之。中兴居民也遭到杀掠，因察罕力谏，才停止了屠杀。至此立国一百八十九年的西夏灭亡。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太祖纪》、《昔里钤部传》。

《金史·西夏传》

《史集·成吉思汗纪》

投下分封制度的确立

投下一词，语出辽代，或作“头下”；元代的投下一词，通常概指皇帝分封给诸王、公主驸马和功臣贵族的封国与汤沐邑。蒙元“分封”又称作“投下分封”，它是蒙古立国的三项基本制度之一，对有元一代的政治、国用、社会生产和社会矛盾诸方面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在大蒙古国的初期，成吉思汗实行“忽必一莎余儿合勒”分封制度。

“忽必”是一个蒙古词语，意为“分子”。按照蒙古部落古老的习俗，每个儿子都可以从父亲的遗产中分到一份，这就是“忽必”。早在蒙古兴起时，成吉思汗就同弟兄们商量好：“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把它看作是属于他父亲也速该家族地，凡是也速该的子孙都有权利享有一份。立国后不久，成吉思汗就给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儿子分了人户。分得这一份人户的成吉思汗的弟兄和儿子，称作“可卜温”，即王，或宗王。

以后，成吉思汗又划分了诸王领有的地域。成吉思汗自己的大营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上游和斡耳罕河流域一带。大约在1214年以前，他把自己大营以东的地方分封给了弟辈：别勒古台——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中游；合赤温——在金边墙外的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尔盖河）和合兰真沙陀一带，北接别勒古台分地，东至合剌温山（大兴安岭南脉），南抵胡卢忽

儿河（在今西乌珠穆沁旗）；合撒儿——在也里古纳河、海剌儿河和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一带；斡赤斤——在大兴安岭以东，一直延至嫩江、松花江一带。他们的后裔就是元史上的右翼（东道）诸王。西征以后，成吉思汗又把自己大营以西的疆土分封给了子辈：长子术赤——在也儿的石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向西马蹄所至之处；二子察合台——别十八里（在今新疆济木萨尔县境内）以西至阿姆河；三子窝阔台——叶迷立河（今新疆额敏河）流域和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后裔是右翼（西道）诸王。依承幼子受业的传统习俗，拖雷承袭自己的营地。

这样，诸王的“忽必”就包括了人户和分地两个内容。也称作“兀鲁思”。“兀鲁思”这个蒙古词语，最初的意思是“人民”，后来逐渐有了“人民—分地”、“人民—国家”的含义。这个词的词义的变化正好反映了大蒙古国初期分封制的发展过程。

“莎余儿合勒”是一个蒙古语词，意为“恩赐”。成吉思汗建国时委任了95个千户那颜（长官），这是“莎余儿合勒”——恩赐。这种恩赐是从成吉思汗和他的那可儿之间的主从关系中发展出来的。那可儿为建国立了功。对于有功的那可儿，成吉思汗任命他们为千户长，以示酬答。这种恩赐也给予主动归顺的部落首领和驸马，通过这种恩赐而形成的千户，有的基本上存有原来的氏族血缘关系，有的是收集当时没有归属的人户组成的，也有的是从各部落抽出部分人户重新编组成。

千户是大蒙古国的基本的军事、行政和社会单位。在最初委任千户长的时候，成吉思汗恩赐他们管理千户，实际上就把有关人户隶属于各个千户长了。这些千户长又分别归诸王、右翼万户博尔术和右翼万户木华黎管辖。后来，每个千户也都有自己的牧地。这种千户牧地的划定大约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从成吉思汗委任千户长的时候起业已开始，但大约直到窝阔台时期才得以完成。最后，恩赐的千户也包括了人户和分地两个内容。

大汗对于分与诸王的“忽必”和赐与千户长的“莎余儿合勒”都有最高的宗主权。但是，两者在名分和权位方面仍有一定的差别。诸王的“忽必”是分享的，大汗不能把它撤除。诸王有权参加可汗召集的库尔勒台，商议国家大事；有权在自己的兀鲁思内设置怯薛和政务机构，任命属官，审断案件。千户长的“莎余儿合勒”是领受的，大汗可以予以剥夺或重新赐予，千户长也参加库尔勒台，但是只有少数建有特殊勋劳的功臣才有较大的发言权。千户长之下只有大汗设置的军事—行政管理系统，其官长，非经大汗特许，千户长无权任免。千户长既然由诸王和万户管辖，他们的权位无疑要比诸王低下一头。

但是“忽必”和“莎余儿合勒”的基本单位都是千户。每个千户的内部结构都是一样的。千户之下，人户编组成百户和十户，又设百户长和十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以至十户长对人户实行严格的控制。千户长在自己的牧地范围内有权指定牧民在一定的地域内驻营和游牧，也可以封禁一定的地域。而编户的牧民则对首领具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行动的自由，擅离者处死。牧民拥有自己的牲畜，但必须在指定的地域内游牧，提供赋税差役，参加围猎，负担兵役、站役及其他征求。在成吉思汗时代，赋役没有定额，实际上是任意索取。在剥削和役使牧民的基础上，千户长向大汗奉献贡物，承担差役，维持驿路，凡遇战争，牧民自备鞍马随千户长应召出征，千户长并负责把掳掠到的人、马和财物献给大汗一份。

成吉思汗的分封制度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既采行了突厥民族流行的分封制度，又承袭了契丹的投下州军办法，大汗拥有无上的权威，而部族宗法的残余又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至于普通牧民，无论是被征服部族，或者是作为征服者的蒙古部的下层部民，他们都相继丧失了原来的自由民身份，开始牢固地束缚在领地之内，依附于领主。尽管在

他们身上往往还能看到一层氏族制度的薄纱，但它已无法掩盖奴隶制度下阶级的对立。

窝阔台统治时期，在继乙未籍户之后，又进行丙申分封，从而确立起投下制度。

当成吉思汗进行分封时，仅限于游牧民族活动的突厥—蒙古大草原，而对于华北、中原以及中亚河中撒马尔干、不花剌等农业定居地区，则仍视为皇帝的公产。蒙古统治者不懂得如何对内地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农耕和城居在汉地进行统治，而是把自己习惯的一套落后制度强加过来，甚至提出尽荒农田为牧地的主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经划下，开始着手整顿和改革华北地区的统治制度。他采纳耶律楚材设立十路课税所的建议，对中原汉民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税办法，取得了成效。为了继续推行这种剥削方式，以保证和增加国赋收入，大汗政府迫切需要掌握中原汉地的民户数目，改变过去那种诸侯将校私役人户，赋敛不入公府的情况。于是，1233 年，窝阔台派遣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检括中原民户，籍得七十三万多户。不过这次括户还很不彻底，诸侯将校占人民为私奴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1234 年金朝灭亡后，户口数及其分布情况又发生很大变动。为此，窝阔台下令再次括户，以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总领其事。1235 年（乙未），分遣官员赴各路括户。随外民户不论侨居土著，均在其所住州县入籍；僧、道、驿站等户分别登记，按规定免除差发；应属诸人的驱户，也通行立籍，附于本使户下。在括户中，许多蒙、汉官员、军阀慑于严令，不得不交出一部分擅占的私奴，编入民籍，使不少人民因而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共括得所籍诸路民户一百一十多万户，这次括户就是蒙元史上有名的乙未籍户。

忽秃忽籍上汉民户数之后，窝阔台立即下令实行分土分民，

根据成吉思汗的规定，分配民户的事仍由断事官忽秃忽主持。分配的原则一般是按成吉思汗时各人原封牧民户数的比例来确定应得中原封户的多少，但窝阔台可以按照己意增损其数。当年分拨给诸王、贵戚、功臣的中原诸州民户，总计达七十六万多户。这种户计称为位下或投下户。这次分封是在 1236 年（丙申）进行的，故称之丙申分封。

丙申年的分土分民与成吉思汗推行的“忽必”和“莎余儿合勒”分封制度在本质上一样。按照这种制度，受封者都可以各治其分邑，自征其分民，势必形成许多大大小小不相统属的领地。这与中原汉地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中央集权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同时也不利于加强大汗的皇权和巩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因此，耶律楚材提醒窝阔台，像这样裂土分民，造成尾大不掉，容易产生嫌隙，不如多多赐与金帛，足以体现朝廷对宗亲大臣的恩典。但分封业已实行，岂易改变？于是耶律楚材又提出折中的建议：“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窝阔台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命各投下只在分地设达鲁花赤监临，而由朝廷置官统一征收赋税，按其应得数额颁给他们，非奉诏不得擅征兵赋，根据耶律楚材所定税法中的丝料项，诸投下分民“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这就是五户丝制。蒙古语称之为“阿合探马儿”，有兄弟们享受之利益的意思。

与大蒙古国早期的“忽必”、“莎余儿合勒”分封制度相比，投下五户丝制限制蒙古贵族任意搜括，保证政府的国赋收入，加强中央皇权，因而它是比较适合中原汉地经济基础的剥削方式，标志着蒙古族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它是基于分土分民原则下的折中办法，在蒙古贵族的传统观念中，总是顽固地把分地民户视为自己的私产，尽可能地加以横征暴敛。因此，五户丝制一开始就不能严格执行。诸王、投下往往私自设官征敛，或不断

派遣使者到分地督索，凡有所需物色，皆科敛本管民户，并经常擅自招收户计，任意拘用工匠，甚至用武力劫夺民户。投下五户丝制的贯彻执行，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来保证，其中最主要的是必要的中央集权。忽必烈即位后，对投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

中统元年（1260）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由王文统主持，首先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规定：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者于中书省验数关支，改变了过去规定就征于州郡的办法；五户丝户每户纳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每五户合为二斤，因称“二五户丝”。可见与耶律楚材的创制比较，投下丝料的征收增重了一倍，忽必烈又利用李璮叛乱被镇压的政治形势，“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所有汉人军将的封邑，从此也就自动或被迫缴还，明令取消，在省并州县的同时，一些投下人户被并入所隶州城。对一些宗王的封邑也作了某些调整，而且“敕诸投下官隶中书省”。

至元八年（1271），尚书省颁行《户口条画》，对混乱的户籍进行了全面整理，其中明确地规定了有关投下户计的诸问题。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又将江南州郡先后分封给诸王、驸马和军将，作为食邑。时科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准中原五户丝数。成宗时增至二贯。

分封汤沐邑之外，忽必烈又先后封自己的儿子为王，使各镇一方。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镇关中；南木合力北平王，镇阿力麻里；阔阔出为宁远王，镇漠北；奥鲁赤为西平王，镇河西；脱欢为镇南王，驻扬州；忽哥赤为云南王，镇云南；汴梁以南至江，依安西王故事，以新王镇之。这些封王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不单是军事首脑，同时也参与行省事务。不过这种封王与忽必烈以前诸大汗分封兀鲁思的性质已经有所不同。忽必烈所封诸子，实质上多只是代表皇帝镇戍一方的军政领导，其独立

性已经有所削弱了。

中央管理诸王事务的机关的为内八府宰相。它设立于武宗、仁宗之世，秩为二品，内八府宰相由皇帝指派内侍宰臣兼领；其职司掌诸王、驸马与宗亲的朝觐、赐予，而这些工作中书省则无权参预。

投下内的统治，依受封者的地位与所受的特权不同，其设官授职也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投下用人的规定是：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得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投下官必须是蒙古人，其升迁不人常选，往往终身在任。元朝廷对于投下官员，具有核准、监察和依法惩处的最高权力。封邑的继承并没有明确的嫡长袭位的原则，而主要凭皇帝的诏令而定，但在事实上，诸王专擅自恣，无视地方官府，非法进行敛括，欺侵隐占人户，放纵鹰坊怯薛人等欺压百姓，甚到私置牢狱枷锁，授受本管人户词状，朝廷无法控制。

投下内的属民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朝廷明令拨赐的草地部民和内地的二五户丝户（民户），以及各种专业性的匠户、绵户、采珠户、打捕猎户等等。他们都是"赋为二等"的二税户，二五户丝户除丝料，其他专业人户除所规定的专业负担外，他们种田纳地税、经商纳商税，由有司征收。第二类是投下的私属，他们原是诸王将校在战争中掳自军前的驱奴，在历次的户籍检查中，被允许依例除民籍，除向本使缴纳钱物外，不当政府差役。但是这类人随着蒙古贵族向封建化的过渡，其经济地位也往往有很大变化。其中特别是某些有专长的工匠，如果在付清一笔相当的价钱后，也可以赎身而成为平民。第三类是投下利用权势通过投充、呈献、隐匿、招收等非法手段所征集的人户，这些人同样不属有司，他们原来的身份，有良有驱，有贫有富，情况不同，作为私属，他们的待遇也不一样。富家投充是为了逃避政府的赋役，穷人被欺隐则多由折债卖身，官场中也把人口当作馈

赠。投下经济上的权益来源于三大项：一是岁赐，指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二为横赐，它包括岁赐以外的特别赐予，立功有赏，喜庆有赐，灾歉有赈济，诸王为朝者各有赐予；三为领地内的苛征暴敛。在政治上，诸王投下在元王朝中央政府中，包括总理行政的中书省，掌司法的大宗正府和总领军事的枢密院中，都以不同的形式荐用私人，实际上即充当其代表，参决中央的政务。此外，元代皇位的继承，始终保存着部族民主主义的忽里勒台制度，它无疑或多或少地受到诸王投下的影响。

尽管忽必烈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但由草原游牧民原始的奴隶分封制演化而来的二五户丝制及诸王投下的特权制度等，仍然表现为政治制度上的一种逆转和倒退，而对于元朝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这些拥有很大独立性的诸王投下，一部分世居草地，构成一个庞大的游牧贵族保守集团，利用其政治特权，影响朝政，阻碍进一步改行汉法，革新政治；其二，无节制的赐予乞请，虚耗国帑，加重对全国人民的征敛剥削造成所谓“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恶果；其三，诸投下的非法横行，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加剧了本已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

元代分封制度具有：一、规模宏大，享封长久；二、草原宗法制和贵族领属贯穿其中；三、与汉法官僚制混存复合，同时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南北异制；四、制度条文与实际功能呈现较大偏差等四个特征。分封制度既促进了蒙古军事征服，又是帝国内乱分裂的渊薮。分封本身保留了较多草原旧制，严重影响朝廷政治军事。分封造成的民户多元隶属和无节制赏赐，对元代财政、吏治和中央集权发生了若干消极作用。蒙元分封与明初分封之间，也存在某些因袭或源流关系。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董文炳传》、《太宗纪》、《食货志》。

《元典章》卷25《户部》、卷11《投下五户不科要》。

元·王恽：《秋涧集·中堂事记》。

元·宋子贞：《元文类》卷57《耶律楚材神道碑》。

耶律楚材力主汉法

耶律楚材是我国十三世纪出身于契丹族的一位卓越的封建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动，对于引导蒙古走向汉化，促进蒙古剥削和统治方式的转变以及在恢复大蒙古国时期的社会生产等方面，都曾起过不少作用，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贡献。

耶律楚材（1190—1243），字晋卿，号玉泉，法号湛然居士。出生于契丹贵族地主阶级家庭，生长在燕京，是辽皇族东丹王耶律倍的后裔。这个家族，接受汉文化很早，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较深，最晚从他父亲耶律履时起，他的家庭就已完全汉化了。到耶律楚材时，甚至连契丹的文字都不能够认读。耶律楚材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诗书，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使他认识到传统的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于是他便开始树立以儒治国的志向和致君泽民的政治抱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更加孜孜不倦地学习。十七岁时参加科举考试，开始走上政治活动的道路，二十四岁时，便做了开州同知。从此，他经历了金末元初这一充满动荡的年代。连绵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不仅给各族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和痛苦，就是地主阶级有时也难免遭受损失。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威胁。为此耶律楚材从巩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于是他极力推崇儒家正统派的孔子和孟子，尤其是孔孟学说中的所谓仁义之道。这种仁义之道，就成为他倡导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

耶律楚材博览群书，通晓经史、天文、地理、律历、数术，

同时还擅长音乐、医卜。他不仅是一位学问极为渊博的学者，更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适应了历史的需要，他才不断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

1215年蒙古军攻占金中都时，耶律楚材是左右司员外郎。当时成吉思汗很注意访求亡辽宗室近族，闻知楚材名声，1218年在漠北召见。楚材身高八尺，美髯垂胸，声音洪亮，成吉思汗很赞赏。让他常处左右，称他为长髯人，而不直呼其名。成吉思汗西征时，他全程相随。他谋求以儒治国，但当时成吉思汗还顾不上这点，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因而在思想情绪上抑郁不满，更反对蒙古统治者的征服战争和野蛮掠夺。不过，他凭高明的星相占卜之术而博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和重视。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出师之日，雨雪冻积三尺，成吉思汗疑惑不解，耶律楚材说："玄冥之气，见于盛夏，这是克敌的征兆。"1220年冬天，雪声大作，成吉思汗又问他，耶律楚材回答说："花剌子模的国王将死在荒野。"这些后来都得到验证。当时有位名叫常八斤的西夏人，因为善造弓箭，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因此他常常自矜道："国家正用武，儒者耶律楚材有什么用?"耶律楚材回答道："治弓还必须用弓匠，打天下的人难道就不用治理天下的匠人吗?"成吉思汗听说后非常高兴，耶律楚材也逐渐受到任用。西域历人曾奏五月十五日晚上当出现月蚀，耶律楚材却说："不可能。"果然没有月蚀出现。第二年十月，耶律楚材预言将出现月蚀，西域人坚持说不会，到时果真见到月蚀。1222年八月，天空的西方出现长星，耶律楚材说："女真将替换国主了。"第二年，金宣宗完颜珣果然死去。成吉思汗每次征讨，都必定命令耶律楚材占卜，成吉思汗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1224年，成吉思汗率军到达东印度，驻扎在铁门关。见到一角兽，形状像鹿而尾巴像马，皮毛呈绿色，发出人讲话的声音，对成吉思汗的侍卫者说："你们的主人应该尽早返回。"成吉思汗不

知何故，于是询问耶律楚材，楚材回答道："这是瑞兽，名叫角端，角端讲四方语言，好生恶杀。这是上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是上天之子，天下之人都是陛下之子，希望您顺承天心，救活民命。"成吉思汗于是立即班师。

成吉思汗晚年曾指着耶律楚材对太宗窝阔台说："这人是上天赐给我们家的，你以后的军国大政要全部委托给他。"1229年秋天，太宗将即位，宗亲会集，但始终不能最后决定。当时睿宗拖雷是太宗的亲弟，所以耶律楚材对拖雷说："继位人选是宗社大计，应该尽快确定。"拖雷说："事情还没有办好，另外选择一个时间行吗?"耶律楚材说："过了今天就不会有吉日了。"于是最后确定决策，建立仪制，并告诉亲王察合台说："您虽然是兄长，但论地位则是臣下，按礼应当跪拜。如果您带头跪拜，那么没有谁敢不拜。"察合台深深地觉得耶律楚材言之有理。等到太宗即位之时，察合台率领皇族及臣僚拜于帐下，当他们退出以后，察合台抚摸着楚材的手说："您不愧是社稷之臣。"从此元朝开始确立起尊属有拜之礼。

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一朝受到了重用。他积极帮助窝阔台汗采用汉法，对蒙古原有的经济、政治等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实行了一些适应于汉地统治的措施，使蒙古统治者在统治政策上有所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采用中原地区的课税方式，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以别迭为代表的一部分大臣还主张把旧有的奴隶制和蒙古的游牧经济扩大到中原地区，耶律楚材则主张采用中原地区原有的剥削方式，统一课税。别迭等人认为："得了汉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全部驱杀，使中原草木茂盛，成为牧地。"耶律楚材劝告窝阔台说："在这样广大富饶的地方，什么东西求不到?怎么能说没有用呢?"他建议在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征收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等税。窝阔台同意他试行。1230年

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课税所，正副使都委派儒士担任，他还奏准军民财分职。“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这些都遭到蒙古权贵和汉人世侯的强烈反对。但课税所还是坚持了赋税的征收，第二年秋天，窝阔台到西京（今大同），耶律楚材将已征收到的银、币和米谷簿籍放在大汗面前，一共是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非常高兴，说：“你的本事真大，不知道南国是否还有你这样的人才！”当天将中书省印授给耶律楚材，让他负责黄河以北的政事。

建立定额赋税制度。为了确保税收，1234年，耶律楚材建议奏括户口，使籍为编民。在此基础上，1236年耶律楚材奏请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其课额：

户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交给官府以给国用；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给受封之主作为汤沐之资。除五户丝外，诸王不得擅自征收，此后就成为定制。

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每亩二升半，下田每亩二升，若是水田则每亩五升。

商税——征三十分之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

赋税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蒙古政权已逐步地采用适合于汉地统治的剥削办法。

开始恢复农业生产。1236年，蒙古统治者欲括民间母马，耶律楚材上谏指出：“种蚕的土地并不产马，如果括马，以后一定会引起祸乱。”窝阔台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劝告，为了恢复农业生产，1237年，耶律楚材在《陈时务十策》中提出了务农桑的建议，切中时务。全部得以施行。

逐渐改变屠城杀掠的风气。1232年，汴京危在旦夕，大将速不台奏请屠城。耶律楚材急忙加以劝阻，他说：“将士艰苦作战，想得到的无非是土地和百姓。如果占领荒无人烟的土地，还谈什么用处？”窝阔台认为言之有理，下令除完颜氏一族外，其

余的都免死。这样，当时避兵乱居于汴京的147万人口才免遭屠杀。从此以后，屠城政策逐渐放弃，屠城法改为只杀首恶。

窝阔台攻取中原之初，杀戮降俘和难民甚众。耶律楚材进言："山后百姓，与本朝无异，兵赋所出，缓急得用，不若将河南残民，贷而不诛，可充此役，且以实山后之地。"窝阔台肯定了耶律楚材的建议。1232年，蒙古军南征，将要渡河，窝阔台想招降陕、洛、秦、虢等州逃民，曾经下诏："如果前来投降，免除杀戮。"不少蒙古贵族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些逃民急则降，缓则跪，白白用以资助敌人，因而主张全部杀死。耶律楚材奏请制造数百面旗帜，发给逃民，命令他们全部散归已经投降的郡县，救活大批难民。河南刚攻下，人民多被俘虏，等到蒙古军返回，十分之七八的人已经逃亡。蒙古统治者对逃民采用连坐法，造成百姓惶骇，即使父子兄弟，一经俘虏，不敢正视。逃民无粮可食，许多人饿死在道路上。耶律楚材建议说："十余年来，存抚百姓，最因为他们有用，现在敌国已破，我们将何去何从？难道要因为一名俘虏，而怪责数百人吗？"于是窝阔台醒悟过来，下诏取消了这一道禁令。

谏阻裂土分民，建立军、民、财分治的中央集权制。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就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窝阔台即位以后，也想把所占领的中原地区的土地和民产，分赐给诸王功臣。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容易产生嫌隙，不如多给他们些金银珠宝。"窝阔台为难道："已经答应了他们，现在该怎么办？"耶律楚材回答说："如果朝廷设置官吏，征收他们应得的贡赋，年终发给他们，以免出现擅自科征的现象，这样办比较好。"为此才制定了五户丝制，从而把地方州县征税的权利夺回中央。

在窝阔台汗以前，蒙古的行政制度极其混乱，诸路长吏均兼领军、民、钱谷，权力甚大。为了限制这种势力，1230年，耶律楚材在《便宜一十八事》中，首先就指出："长吏专理民事，

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窝阔台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便制定了军、民、财分治的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

完善法制，稳定社会秩序。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只有习惯法。随着新占领地区的扩大和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蒙古的地方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贪暴之风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这些情况，在《便宜一十八事》中规定：“州县不奉上级命令自行科差者有罪；借贷官物进行贸易活动者有罪；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处死；监主自盗官物者处死；应犯死罪者，都必须向上级申报，然后处置。”这些法令的颁行，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

尊孔教，用儒术，始兴文治。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经常进说周孔之教，并向窝阔台说：“天下虽马上得之，而不可以马上治。”在他的建议下，窝阔台曾请名儒梁陡、赵万庆等人向皇太子和诸王大臣子孙讲解儒家经义。1232 年，汴京将要攻下，耶律楚材派人找到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奏封衍圣公。次年，窝阔台几次下敕修复孔庙。之后，耶律楚材又建议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以梁陡等人充任长官，专门编集经史。从此，在蒙古的统治中便开始兴起了文治之风。为了进一步采用儒术，扩大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政治出路，1237 年，耶律楚材建议窝阔台用儒术选士，试图在蒙古统治中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当年 8 月，窝阔台汗命术虎乃、刘中等人，以经义、词赋及论分为三科，试诸路儒士。经过这次考试，各路共得儒士四千三十余人，其中释放被俘的儒生约占四分之一。元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在元仁宗时期（1312—1320）才开始正式恢复，其实从窝阔台时期就开其端了。

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时期所建立的新制度只是初具规模，还处于草创阶段，但对以后忽必烈时期元朝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备

有着重大影响。它们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初步地稳定了蒙古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所以窝阔台曾经对耶律楚材说："我推诚任用你，是因为先王的遗令。如果没有你，那么中原就没有今天。我现在能够高枕无忧，全靠你的帮助。"

但是，耶律楚材对中原的治理受到蒙古游牧贵族守旧派和斡脱势力的破坏。斡脱，突厥语。意为"同伴"，"商帮"，蒙元时代专指西域商人。从成吉思汗起，斡脱已在大蒙古国形成一种社会力量。蒙古贵族依靠他们经理钱财，他们的商业高利贷活动得到蒙古贵族的普遍支持，斡脱放的高利贷，一年的利息与债本相等。年年本利倍增，称羊羔儿息，剥削苛重，导致不少家庭破产。耶律楚材奏请以官银代还民间欠债七万六千锭，并规定今后不论债务多久，"子本相侔，更不生息"，对斡脱高利贷剥削进行了很大的限制。然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守旧派的势力还是根深蒂固的。窝阔台本人在晚年满足于现状，终日与诸大臣酗酒，怠于政事，只是贪图增加国库收入。同意西域商人奥都剌合蛮等扑买课税。所谓扑买，就是由西域商人先支付高出某种税额的银两以取得某种税的征收专利权，他们自然要以大量增税的手段来获本取利。耶律楚材认为这样做必然导致严设法禁，阴夺民利，因而极力反对。他在窝阔台而前反复申辩，声泪俱下，窝阔台听得不耐烦了，说："你想搏斗吗?""你是为百姓哭泣吗?" 1240 年正月，窝阔台甚至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耶律楚材叹息说："从此老百姓要穷困了。"

1241 年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耶律楚材继续与奥都剌合蛮等面折廷争，但再也得不到支持。奥都剌合蛮要办的事，耶律楚材也不予理会。脱列哥那下旨："凡奥都剌合蛮建白的事，令史（指耶律楚材）如果不予书写颁布，斩断他的手!"耶律楚材表示："事情合理，自然奉行。如果是不能做的事，我死都不回避，何况截去手呢!"因为他毕竟是先帝老臣，脱列哥

那也无可奈何。1244 年，再也不能伸展己志的耶律楚材忧愤而死。有人谮言他在位时侵吞了天下贡赋的一半，脱列哥那命近臣前去查视。在他的住所，查视者只见到琴阮十余张以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十卷，没有别的财宝。所以在耶律楚材死后，蒙古人痛哭流涕，就好像自己的亲人离开了人世一样，和林为此罢市，一连几天都听不见音乐之声。天下士大夫，也都莫不涕泣悼念。至顺元年（1330），文宗赠耶律楚材为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懿宁王，谥文正。有子两人，耶律铉和耶律铸。

耶律楚材素好诗文，有文《湛然居士文集》传世。其子耶律铸亦好吟诗，著有《双溪醉隐集》。

耶律楚材的政治主张和活动，由于时代和阶级条件的限制，诚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的范围，也无法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不愧为大蒙古国初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事功卓越，操守谨严。在窝阔台统治时期，他主持了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统治者在适应中原农业的封建文明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在这个历史活动中，窝阔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大蒙古国的财政收人，他意识不到从战争中的掠夺转变到非战争的赋税征收的社会历史意义。而耶律楚材则不同，用中原封建文明去影响和改变大蒙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治国方法，是他的志向和抱负。耶律楚材的历史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地联成一片了。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耶律楚材传》、《元史·选举制》、《元史·太宗纪》。

《元典章·吏部》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 1。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3、6、12。
《赤文忠公全集》卷.32《立政议》

律令之定

在阶级社会中，法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法是上层建筑，它总是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元代的法也是如此。

成吉思汗为大蒙古国制订了大札撒，但是大札撒是蒙古早期游牧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不能用于蒙古贵族后来征服的汉族农业封建社会。窝阔台灭金后，不得不在中原地区沿用金朝的泰和律。但是有元一代，始终没有编成类似唐代或金代那样形成完备的法典。修定元律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因而断狱量刑基本上以断例为依据。与此相应，民事、行政等各部类的立法，也完全是以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形式颁布的。

忽必烈即位以后，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陆续议定了一些适合元朝建立后实际情况的新的条格。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颁布了当时尚书省奏定的条画，同时禁行金泰和律。但这个条画大概也只是收集了一些诏敕和条格，还不能算作新律。又过了二十年，忽必烈才命“家世业吏，习于律令”的右丞何荣祖“简除苛繁，始定新律”，编成了《至元新格》，并予以颁行。这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的事，距离忽必烈建元已过了三十年有余。

《至元新格》在元代法制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以当时陆续颁行的各种法规为依据，按照一般法典所通行的行文格式和体裁重新撰写，并加以系统的分类编次而书。全书共分为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

等十目，每目之下分列十数条，这些条文都具有行政法或其他有关门类的法规的性质。《至元新格》完书今虽不存，但其条文被著录于《通制条格》、《元典章》等书者即达近百条。由于它的全书原文仅不到数千字，但是这近百条引文当已基本反映该书全貌。从形式上讲，《至元新格》确实是按照一般法典规格编写而成的，这在整个元代法制史上属于仅见之例。但是从内容讲，它又过于单薄，不仅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刑法，其规模距离一部真正的行政法、民法或财政法的法典亦仍相当遥远。因此《至元新格》的成书和颁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元代法无定制的问题。所以，在《至元新格》颁布以后不久，就不断有人建议再修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仁宗皇庆、延祐年间（1312—1320），这件事不断有人在做，但是定不下来。在反复修订以后，到了英宗至治三年（1323）终于又颁布了《大元通制》。从《至元新格》到《大元通制》，中间又过了三十余年。

关于纂修《大元通制》之动议，最早可追溯到武宗即位时。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中书省臣奏："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尝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事，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仇归一，遵而行之。"由于历经世祖、成宗两朝，修订类似唐代或者金代法典的努力长期没有结果，元廷终于决定改变方式，转而采取折衷的办法，就便对现行格例加以整理增删，重加颁行，以利有司遵行。仁宗即位后，立即下令着手这项工作，从至大四年（1311）起到延祐二年（1316），书成，名曰《风宪宏纲》，又命廷臣复审，终仁宗之世仍未能公布。英宗临朝后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增删审核，于至治三年（1323）告竣，遂以《大元通制》为名，颁行全国。《大元通制》全书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分为制诏（九十四条）、条

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断例（七百一十七条）三纲，此外尚有别类（五百七十七条）一目。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看，《大元通制》直接继承了《宋刑统》和金泰和法典的传统。特别是金泰和法典，它分为律义、律令、新立敕条和六部格式。以《大元通制》与金泰和法典相比，条格相当于律令（令），断例相当于律义（律），诏制大体相当于敕条，只是不清楚别类是否相当于六部格式。

大致在编订《大元通制》的同时，元廷还纂修了《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它是江西行省下属文书机构汇辑的一部文书集。前集约刊布于延祐末年（1320），新集约刊布于至治三年（1323）。《元典章》是仿照《唐六典》编纂的元代制度法令的大全，不是专门的法典，但其中包括了许多法典的内容。

关于元代法制的另一部极其重要的史料，是文宗时修成的《经世大典》。自天历三年（1330）四月起设局编修此书，到至顺二年（1331）五月告竣，先由赵世延、继由虞集实际主持纂修。全书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十篇。编纂原则，是"仿六典之制"，"参酌唐宋会要之体，荟萃国朝故实之文"，即将各部门档案文书收集起来，分类编次并从文字上略微加以修润，使之"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繁辞"而已。其中的《宪典》也汇集了许多律令，不过那也不是作为法典专门纂修的。

《大元通制》颁布后又过了二十二年，顺帝至正五年（1345）又修成了《至正条格》，并于次年颁行。《至正条格》的性质与《大元通制》同。它包括制诏（一百五十条）、条格（一千七百条）、断例（一千五百零九条）三部分。关于这部书的名称，参与纂集之役的朵尔直班曾经提出过异议。他说："是书上有祖宗制诰，安得独称今日年号（指至正—引者）。又律中条格乃其一门耳，安可独以为书名。"但是当时丞相不满意，只是删除制诰

而已。所以这部书只有条格和断例两部分颁行天下。

比较而言，《至正条格》只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和补充而已。因而当《大元通制》编成时，元代的法典基本上就定型化了。以《大元通制》为代表的元代法典，从 1323 年算起迄至元亡，前后执行了四十余年。如今《大元通制》全书也已散佚，但其中的条格还有相当一部分保存下来。根据传世的《通制条格》，并参照《元典章》有关条文以及依照《经世大典·宪典》修成的《元史·刑法志》，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到元代法典的内容。

正如前代的法典一样，以《大元通制》为代表的元代法典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是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隋唐以来列为基本律文的五刑、五服、十恶、八议，元法典全部承袭下来了。五服是用法律规定了五类家族之间服丧的期限，是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恶不赦，维护从父权家庭到专制王朝的全部封建统治秩序。八议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和议宾，与皇帝沾亲带故，对王朝效劳有功的人都可以得到减刑或免刑的特权。五刑是笞、杖、徒、流、死。这个死刑，传统上有绞、斩和凌迟处死。《宋刑统》已规定只用绞和斩，这个规定为《大元通制》所沿用。自然，元代统治者继续使用全部五刑，其主要目的依旧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元法典中的如下条文也最典型地表现了它的阶级性："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诸有司征科急，民弗堪，致杀其征科者，仍以故杀论。""诸军官因公乘怒，辄命麾下殴人致死者，杖八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征烧埋银给苦主。"等等。

当然，元法典中也有不少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是反映了蒙古贵族的统治意识和蒙古社会制度的深远影响。首先，在元法典中增加了蒙古传统的法的内容。例如笞刑、杖刑，前代的刑

法从来以十结数（十、二十、三十、……一百十）。忽必烈即位建元后，为了体现“用刑宽恕”的意旨，笞、杖之制起了两个变化。一是沿蒙古旧制各减免三下，即所谓“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元代杖、笞都以七为尾数（七、十七、二十七，……一百七），因此成为定制。二是对于照金律当断笞三十以上的罪人降等执行刑法，结果就在实际上以笞刑取代了金杖刑。五十七下按原制应属于杖刑，现在改为折代杖刑的笞刑。这样，剩下的杖刑只有四等了，于是又往上加一等，就是杖一百七下。由于金代的杖刑在元代已被减省为笞刑，所以元初的杖刑实际上又成了金代徒刑的减省和折代。又如对偷盗牛马羊畜的蒙古人处以盗一赔九之罚。后来，汉、南人偷盗头口，也“依著蒙古体例教赔九个”；盗猪亦依偷盗牛马羊畜例处断。蒙古人屠宰牲口时，都将牲口四肢缚住，剖开胸腹，用手按住牲畜心脏至其死去。他们严禁抹喉放血的屠宰法，并将这条禁令强加给汉族及回回居民。从成吉思汗到元朝历代皇帝都一再强调上述法令，元朝和伊利汗国有不少回回人因违反这条禁令而被处死。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断罪量刑的实际过程中，将原来只适用于蒙古人的刑法施用于他族。例如对割破营幕或车帐而入盗者“以重法绳之”，无疑是产生于游牧社会的蒙古法。后来同一刑罚又可适用于偷盗“怯薛歹、诸色人等随从车驾及野处行营之家”的罪犯[1]。

其次，在元法典中对蒙古人色目人订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条文。蒙古人色目人犯罪，由专设的大宗正府治理，由蒙古人断罪行刑。在量刑时，对蒙古罪犯减轻处罚。例如犯盗窃罪，汉人南人要刺字，但蒙古人不刺字，“审囚官”将蒙古人刺了字，杖七十七，革职。又由于社会风习的不同，有些律文对蒙古人色目人是例外的。如婚嫁聘礼，律文有若干规定，但“蒙古、色目人各

[1] 怯薛歹：蒙古、元朝禁卫军人员。

依本俗"。又如律文禁止"有妻更娶妻"，但"蒙古人不在此限"。

第三，增加了划分民族等级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内容。蒙古统治者把全国居民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色目人包括畏兀儿、唐兀、土蕃以及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哈剌鲁、回回、康里、钦察、阿速、也里可温等等。这里的回回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当时也称木速蛮或木速鲁蛮；也里可温是指信奉景教和天主教的一些民族。所谓"汉人"是广义的，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和汉化的女真、契丹等族，并包括云南、四川的汉族。至于"南人"，是指忽必烈灭南宋时仍在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四个等级之中，蒙古人最为高贵；色目人低于蒙古人，但高于汉人、南人；汉人和南人处于低下的地位，而南人尤其卑微。这种政治上的等级划分表现在刑法方面便是：犯同样的罪，罪罚却有差别。如同样是盗窃，一般律令规定，"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但蒙古人、色目人犯者不刺。又如，同样是杀人，一般律令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诸王以私怨杀人，仅判处杖刑和流放。如果殴斗事件发生在蒙汉之间，处罪更不相同。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殴死汉人，征烧埋银，断罚出征；而汉人只要殴伤蒙古人，即予处死。而且，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报，只能陈诉，否则予以严惩。对各个民族等级还设置不同的司法机关。一般的司法机关是审理汉人、南人的，而对蒙古、色目则设有特殊的机关。

第四，增加了反映有关元代新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如元代的投下、驱口、斡脱等，在元法典中列有许多条文。驱口的主要来源是灭金过程掳掠过来的人口，又称"生口"，此外还包括因各种原因沦为奴婢的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归主人所有，犹如主人的牲畜和其他物品。他们被主人任意买卖和赠送，生命毫无保障。元代法律规定，主人打死奴婢，最多判刑一年；反之，奴婢杀主，一律斩首。主人犯了死罪还可以用驱奴抵命。驱口的

婚配也由主人掌握，奴婢婚生的子女仍是主人的奴婢。主人奸污奴妻，无罪；反之，奴奸主妻，处绞。元代还有直接隶属于蒙古贵族的人户，称为投下户，他们不向国家负担赋役，但他们是蒙古贵族的家内奴隶或私属领民，受到蒙古贵族的人身控制和经济剥削。

以《大元通制》为代表的元代的法典完全是同元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它沿袭了前代的法典，因为社会状况基本相同，所以沿袭的特点是“文辞各异、意义多同”。同时，元代社会毕竟有许多新的因素，它也反映了这些新的因素，而且这种反映是充分的和鲜明的。这是元法典的又一个特点。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纪事本末·律令之定》

《元史》：《成宗纪》、《武宗纪》。

元·欧阳玄：《圭斋集》卷7《至正条格序》。

成吉思汗选立窝阔台

成吉思汗的长妻、弘吉剌氏勃儿帖，给他生有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为蒙古帝国的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犹如帝国的四根台柱。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成吉思汗在晚年已考虑到他的继承人选。根据自己四个儿子的才能和特点，成吉思汗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职责：长子术赤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法令，三子窝阔台主朝政，四子拖雷统军队。从这种安排看来，成吉思汗有意立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

成吉思汗亲自选择三子窝阔台，是对蒙古旧风俗的重大改革。因为蒙古本土自古流行着幼子有优先继承权的习惯。一户蒙古家庭，长妻所出的幼子，蒙语叫做斡惕赤斤，意为"守炉灶之主"，是留守家业者。而他的兄长，在成年后则要到外面去另自成家。成吉思汗打破了这个传统，没有以四子拖雷为继承人，而是按窝阔台的治国才能选他为继承人①。

成吉思汗兴起前，蒙古各部落互不统属，相互攻杀。他结束了这个局面，使蒙古走向封建化的道路。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契丹、女真、汉族的影响下，他采取一系列封建化的措施，废除幼子继承，代之以封建帝王的亲自选定，是这些措施之一。但是，成吉思汗对此是有所考虑的，在一定程度上他还要遵守旧的风

① 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载《元史论丛》第1辑。

俗。《史集》的作者拉施特生动地叙述说：

“当成吉思汗考察了诸子的才能，并且发现他们各自适宜的职务后，他对帝位的安排有所犹豫，时而想到窝阔台合罕，时而又想到他的幼子拖雷汗。虽然古来蒙古人的风俗和习惯是，父亲的禹儿惕，即老营和家室，由幼子掌管，他后来却说：‘王位和国家的事是桩困难的事，让窝阔台去治理吧。可是，说到我的禹儿惕和家室，及我征集的军队、珍宝财物等，都交给拖雷管。’”

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宠爱之子，其父在征伐中必携与俱，称他为那可儿，也就是伴侣。采取上述的折衷做法，大概是成吉思汗给他的一种补偿和安慰。拖雷系因此拥有较多的军队和财富，对后来宫廷斗争有重大影响。同时，幼子继承的风俗也幽灵尚存，一直被一些宗王和大臣作为夺取汗位的根据。迄至阿里不哥向忽必烈争夺帝位，仍以此为理由。

成吉思汗正式向诸子提出继承人的事，是在西征的前夕，当场就暴露出四子之间的矛盾。在继位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诸子间营垒分明：察合台和窝阔台是一党、术赤和拖雷是一党。实际上，术赤长期跟察合台、窝阔台有矛盾，常发生争吵，而术赤和拖雷及其家庭友善，据说拖雷不嫌术赤是篾儿乞种。不管怎样，两党的对立由此形成，构成蒙古宫廷斗争的主线。两党的成员，为夺取至高无上的帝国权力，施展阴谋诡计，相互残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宫廷政变。

术赤和拖雷的表态，不能认为是心悦诚服；他们不敢违抗成吉思汗的命令，才不得不表示支持窝阔台。长子术赤的对抗情绪，很快便流露出来。

当成吉思汗踏上西征之途时，他把幼子拖雷留在身边，另遣其他三子往攻花剌子模的都城兀笼格赤。三子挥师至该城前下营。这时术赤和察合台发生冲突，因此攻不下该城。他们遣使向成吉思汗请示：“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成吉思汗教听窝阔台

调遣。继位人既已在西征前夕当着诸子和大臣的面确定下来，为什么还要请示以谁为首呢？显然，术赤根本反对窝阔台为继承人。他跟察合台的争吵，必定是为此而引起，以致闹到彼此不服。

在窝阔台的调解下，三子暂时团结起来，攻克儿笼格赤。然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往塔里寒与成吉思汗会合，术赤则赴他在也儿的石河的营地。原先，成吉思汗曾命术赤往征迤北钦察草原诸部，术赤违命不往，却私返他的营地。成吉思汗很生气，说："看不见他的面，我要把他宰了。"以后，术赤又以生病为由，拒绝去见其父，仅送去些牲口，致以歉意。不久，有个忙忽惕部的人从术赤的营地来，向成吉思汗报告说他亲眼看见术赤在某个山头打猎。成吉思汗更加火冒三丈，认为术赤反迹已明，说："术赤这样干是疯了。"他布置攻打术赤的兵力，以察合台、窝阔台为前锋，亲自殿后，但这时传来术赤的死讯，他才罢兵，感到后悔。术赤反抗成吉思汗的原因是什么？史家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是，完全可以估计得到，他是不满其父对继位人的选择。

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八月征唐兀期间。他临死前再把诸子召集到身边，要他们团结一致，服从窝阔台的领导。他一再给诸子讲一支箭易折，许多支箭难折，以及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这后一故事是说一个严寒的夜晚，多头蛇想进洞御寒，但一个头要进洞，别的头就反对它，结果谁也进不去，冻死在洞外；另一条一头蛇却顺利进洞，保全了性命。大概，成吉思汗觉察到诸子间的矛盾，为帝国的前途着想，他必须把团结的事叮嘱一番。

按照封建制度，帝王崩驾后立即由他指定的继承人登基。但是，由于蒙古的库里勒台制仍起作用，窝阔台不能因其父的遗命继位，而要等到库里勒台的最后决定。王位空缺的两年内，拖雷监摄国政。

库里勒台原是各部落首领举行的一种会议，也就是部落议事

会，以决定有关诸部的重大事件，如战争与和平、推选部落领袖等。例如，1201年合答斤等十一部的首领便在阿勒灰不剌阿之地聚会，共立札木合为古儿罕，准备向成吉思汗进攻。这种会议形式，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统治时期，演变为蒙古宗王大会，重要的臣子可参加。它仍然具有决策的权力，蒙古宫廷斗争往往在库里勒台上反映出来。

据波斯史家志费尼所说，从宗王会齐到窝阔台登基，共是四十天，头三天是用来狂欢，余下的是商量。那么，距原规定的日子仅两天还未决定，大会整整争议了三十五天。会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窝阔台的对手是拖雷。对继位人选，宫廷内有人恪守旧传统，主张立幼子拖雷，从而否定成吉思汗的选择。难怪窝阔台谦让道："虽则成吉思汗遗诏若此，然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能胜任此职，再者，遵照蒙古风俗，长室中的幼子是父亲的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是长斡耳朵的幼子[1]，始终日夜晨昏侍候成吉思汗，耳闻目睹和熟悉他的所有札撒律令。这些人既都健在，参与此会，我怎能继承汗位呢？"

拖雷已经监摄国政，岂肯轻易交出权柄，但术赤已死，察合台是窝阔台一党，在斗争中拖雷势孤不能取胜。到最后关键时刻，拖雷只有采取暂时退让办法，转而表示支持窝阔台，避免了双方的摊牌和一场宫廷内讧。因此，库里勒台上的斗争真相被掩盖起来。拖雷此举则得到普遍的赞扬。中外史家对拖雷都留下称颂之词。志费尼说他对其兄极其诚心，费尽心机把窝阔台拥上宝座，《元史》特别提到他拥立窝阔台的所谓"定册"之功，其实都是不真实的颂扬之词，否则，有成吉思汗遗命，宗王又一致推选窝阔台，何需拖雷以九牛二虎之力去把窝阔台推上汗位泥？

窝阔台即位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巩固了内政。同

---

① 兀鲁黑那颜：指拖雷。

时继续向四方遣兵，扩大了帝国的疆域。窝阔台曾经自我总结说："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①]，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②]。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沉湎于酒，一件听信妇人言语，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将有忠义的朵豁勒忽因私阴害了，一件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围拦住，致有怨言。"颇有反躬自省之味。《元史》记载，太宗窝阔台"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这一评价无疑有溢美之词，但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帝国得到蓬勃发展确是事实。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太宗纪》、《睿宗传》。

《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泽本）第44页

《史集》（余大钧译本）第2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

---

① 四件勾当：即四件事。

② 探马赤：指探马赤军，它是蒙古军的先遣部队。

蒙古灭金

1115年元旦，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在居地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南阿什河）地区建立国家，国号金。金朝在章宗统治时期就开始趋向衰落。蒙古攻入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早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迸发出来，导致了金朝的灭亡。

蒙古灭金经过了成吉思汗攻金、木华黎经略中原和蒙宋联合灭金三个阶段。

蒙金来往最早是金太宗时期合不勒汗应召入朝。随后由于合不勒汗杀死金朝使臣，双方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金朝或多次亲自出兵征讨，或令属部塔塔儿进攻蒙古，先后捕杀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合答安把阿秃儿等。蒙古忽图刺汗也率军攻金，挫败金朝军队，并夺取了一些地方。大定年间（1161—1189），燕京和契丹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金世宗听说后，下令每隔三年出兵围剿蒙古，是谓"减丁"。出征官兵多掳掠蒙古子女卖为奴婢。同时每年蒙古人贡时，金朝只在塞外接受，不许入境。因而蒙古人对金朝恨之入骨。金朝对属部实行民族压迫，引起他们的深刻仇恨，终于被成吉思汗利用作为鼓动部众进攻金朝的理由。

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因成吉思汗协助讨平塔塔儿部，

授予他“札兀惕忽里”[①] 的官号。虽有父祖之仇，金朝毕竟是中原上邦，成吉思汗对这个不大的官职仍十分看重，并常以官号自称来抬高身份；并且在一段时间保持了对金的臣属关系，直到他统一漠北做了大汗以后，还按例每年亲自到金朝边境上的贡场进奉。但此时的金朝已非昔日，其国势衰弱，它虽然压服了属部的叛乱，却不得不把边防线南移，再次役使兵民修筑壕障，以防范蒙古等部犯境，而听任克烈、蒙古去占领边墙以外的广大地区。就在这时，有些不满金朝统治的契丹和汉族人投靠蒙古，向成吉思汗报告了金章宗杀戮宗室，荒淫日甚和金朝不修边备、竞相奢侈的情况；往来于山东、河北各地经商的回鹘商人也向他具言中原民物繁庶，鼓动他南侵。因此，成吉思汗对金朝的情况早有了解。建国后，他就计划攻金，但还未敢轻动，而是采取首先攻掠西夏的战略。

成吉思汗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古城）进贡岁币，金章宗命卫王永济受贡。1208 年章宗死，永济即位，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知道新皇帝是他，就说：“我原以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才能做得，没想到此等庸懦之辈也可以当?”于是更加轻视金朝，不肯按照传统礼节跪拜受诏，乘马北去。永济得到使者回报，谋划等成吉思汗再次入贡时杀害他，然后率兵北伐蒙古。成吉思汗得到金乣军的密报，决定先发制人，于 1211 年春亲统大军南下攻金。

1211 年秋，成吉思汗军由达里泊进入金境，先锋哲别攻破金西北路边墙上的乌沙堡，取乌月营。金军统帅独吉思忠因失于备御，被解职，由完颜承裕主持军事。承裕见蒙古军势盛，从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往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于是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

---

① 札兀惕忽里：义为群乣统领。忽里，为金朝封授统领数部的首领称号。

城）、抚州三州之地尽失。成吉思汗至抚州，金朝以大军三十万驻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成吉思汗挥师进攻，金兵大败，死者遍野。承裕等慌忙觅路逃跑，蒙古军追踪至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将金军大部分消灭，金朝的精锐部队在这次战役中丧失殆尽。蒙古军前锋突入居庸关，攻中都不克，退出。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领另一路军队由西南路进入边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并充当向导，蒙古军攻下净、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今山西朔县）等州，抄掠后退去。金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纥石烈执中慌忙弃城逃回中都。

1212年，蒙古军乘胜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至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先为金守军所败，拖雷等奋勇攻城，拔之，抄掠境内诸城后退出。成吉思汗继续攻取山后诸州县，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北）防城千户刘伯林降；进兵攻西京，歼灭奥屯襄所率来援金军，遂围西京，为流矢所中，撤回。同年，派遣先锋哲别往攻东京（今辽宁辽阳），东京军民坚守，哲别假装撤退五百里，守者误以为敌退，不作任何防备，哲别连夜轻骑驰回，攻人城中，大掠而还。

1213年，成吉思汗会集大军，再入野狐岭，连下宣德、德兴诸城，进至怀来（今河北怀来东），与完颜纲、术虎高琪所率乣、汉守军激战，击溃金军，追至居庸北口，金军尸体堆集如烂木。这是蒙古攻金的第二次大胜利。因为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取迂回包抄战术，留怯台等攻居庸，自己则率领主力驰向西南，取紫荆口（河北易县西）入关。金朝发觉蒙古军意图，急忙遣兵赴援，但为时已晚。金军刚到，蒙古军已度关下至平地，遂破金军。哲别奉命率领精骑，出其不意地攻下南口，进至北口，与怯台军内外夹击，占领居庸关，逼近中都。成吉思汗攻下

涿、易（今河北涿县、易县）二州，命怯台等率一部分军队围攻中都，其余分兵三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军，沿太行山东麓而南，直抵黄河北岸卫（今河南汲县）、孟（今河南孟县）诸州，再从太行山西麓向北，掠河东南、北路诸府州而还；哈撒儿、斡赤斤等率左军向东，掠蓟（今河北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诸州而还；成吉思汗与拖雷率中军南下，掠河北东路、大名、山东东、西路诸府州而还，另遣木华黎一军攻陷密州（今山东诸城），屠之。

1214年春，三路军会合于中都附近，成吉思汗驻中都北郊黄甸，向金朝索要贡献。金宣宗献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等求和，成吉思汗引军退出居庸，驻扎于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泊），并遣木华黎、李秃攻取辽西、辽东诸州郡。

五月，金宣宗南迁。六月，驻守中都之南的乣军哗变，杀其详稳[1]，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遂遣三模合拔都领契丹人石抹明安、汉人王檝为向导，引蒙古军南下与乣军会合，围攻中都。中都附近州县守将和官员纷纷投降，前来援助的金军均被击溃，留守中都的主帅平章政事抹捻尽忠弃城逃跑，于是1215年5月，蒙古军进占中都。当时成吉思汗驻在桓州，得到报告，立即派遣失吉忽秃忽等籍中都帑藏，全部运走。留札八儿火者、石抹明安镇守中都。

与此同时，木华黎军攻取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北京路（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城）诸州县，大败金军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进克辽西重镇北京，派人招降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兴中土豪石天应等杀府官降蒙，义州（今辽宁义县）契丹土豪王恂及附近地区地主、土豪多率所部黑军乡党投降。锦州张鲸先是反金自立、后降蒙古，1215年初夏，被派随蒙古军攻

---

① 详稳：辽官名，来自汉语"将军"的转译。

打河北、山东地区，因企图叛逃被杀。其弟张致遂据锦州反蒙，攻下辽西许多州县，并占领兴中府，声势很大，坚持到1216年秋天才失败。

攻取中都以后，成吉思汗又派脱栾扯儿必统领蒙古军及投降的契丹、汉军抄掠河北、山东各地，遣三模合拔都从西夏趋关中，出潼关，大掠河南而还。他自己则于1216年春回到克鲁伦河的斡耳朵。

这个阶段战争的特点，是蒙古军以掳掠、烧杀为目的。1213年秋至1214年春，数月之间，共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戮殆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都被席卷而去。蒙古军攻下保州（今河北保定）时，尽驱居民出城，士兵以杀人为嬉戏，尸体堆集数十万。永清地主史秉直降蒙，命管领所掠降人十余万家，迁之漠北，路上冻饿而死者甚多。但在大部分州县，蒙古军都是杀掠后即离去，金朝又重新派官镇守，而其中一部分则落入当地土豪地主武装的控制中。

1217年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赐九尾白旗，使承制行事，命统札剌亦儿、弘吉剌、亦气列思、兀鲁、忙兀、汪古诸部军以及归降的契丹、女真、乣、汉诸军，专征金朝。成吉思汗对木华黎说："太行山以北，我自己经略；太行山以南，由你去努力。"授予他攻取中原的全权。1223年木华黎死后，由其子孛鲁继承他的职务。

这个阶段蒙金战争的特点是：一、蒙古更注重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如永清地主史天倪组织的清乐军，兴中土豪石天应和石抹也先分别招募的黑军；同时金朝也用高爵招徕各地土豪，往往是两方面地主武装之间展开了争城夺地的激烈斗争。二、蒙古方面除继续进行杀掠外，也开始注意占领城邑、安集百姓，为经久之计。三、战争的进展呈现拉锯形势。

木华黎受命专征后，继续奉行成吉思汗制定的笼络汉族地主

的政策，他手下的契丹、女真、汉族地主武装成为攻金的重要力量。

1217年，木华黎军攻河北、山东诸州，刘伯林、石抹也先等所部汉军随从，陷蠡州（今河北蠡县）、大名府、益都、密州等城。易州人张柔聚宗族数千家，选壮士组织队伍，结寨自保，金朝授以经略使职。1218年兵败降蒙，木华黎命他仍用旧职，统领本部兵马，于是张柔搜集部曲，攻下雄、易、安（今河北新安西南）、保等州，军于满城（今河北满城县西）。当时，河北地区兵力最强的地主武装是据有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武仙。武仙归附金朝，屡次发兵攻张柔，张柔也攻入武仙控制的地区。1219年，先已降蒙的董俊攻下真定，逐走武仙。1220年，金朝封武仙为恒山公，武仙得金朝援兵，打败董俊，复据真定。

1218年，木华黎统兵攻入山西，史天倪、史天祥兄弟等各领所部汉军从行，攻下太原、平阳、绛州等八十余城。1219年，金郭文振、张开军收复太原，胡天作军收复平阳。次年，金朝封郭文振为晋阳公，张开为上党公，胡天作为平阳公，让他们分疆守土，与蒙古军作战。

木华黎主力攻山西时，河北有几支地方武装夺据了许多地方，与降蒙派地主武装相互攻战，金朝也封他们为公。1220年，木华黎将攻略的重点转到河北，亲驻满城，遣史天祥攻真定。史天祥劝说武仙投降，于是真定复归蒙古，邢（今河北邢台）、相（今河南安阳）、卫、怀（今河南沁阳）、孟等州相继被蒙古军攻下。

山东是红袄军的活动地区。1218年红袄军领袖李全归附南宋，宋授以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之职，遂用宋朝名义招集义军，收复山东南部诸州。益都张林、济南严实都相继归宋，一时山东全境均为宋有。但南宋对李全一直不信任，支持不力，而山东各支武装力量名义上虽附宋，实际上则各据地盘，为自己的利益打

算，首鼠两端，游移于金、宋、蒙古之间。1220年秋，木华黎军入济南境，严实看见蒙古军强大而宋不可靠，于是将所控制的彰德、大名、磁、洺（今河北永年东南）、恩（今山东开城旧城）、博（今山东聊城）、滑（今河南滑县东）、浚等州三十万户降蒙，木华黎承制授以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使总管本部军民。严实的投降，使蒙古不战而取得大片土地，攻略山东的力量大大加强。严实协助蒙古军攻下曹（今山东菏泽）、濮（今山东鄄城北）、单三州；1221年入据东平，遂于此立行台。同年，益都张林、红袄军石硅等也相继投降蒙古。

1221年秋，木华黎率蒙古军主力及石天应、史天祥等汉军攻山西、陕西。由东胜渡河，征召西夏兵从战，取葭州，使石天应守之；攻延安不克，破绥德、鄜（今陕西富县）、坊（今陕西黄陵）等州，从丹州（今陕西宜川）东渡黄河，取隰州。1222年，蒙古军复取太原、平阳，皆设官置守。冬，木华黎率大军渡河而西，攻下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径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固守，蒙古军攻不下，遂西攻凤翔，再召西夏兵助战。凤翔军民英勇抵抗，木华黎围攻了一个多月，仍不能克，西夏军帅又率师离去，只得引兵退还，于1223年三月死于闻喜。

武仙降蒙后，木华黎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都元帅，治真定，以武仙副之。但两人势力不相上下，武仙对史天倪不服，常闹矛盾。1225年，史天倪攻取武仙部下所据山寨，武仙怕他进一步来收拾自己，就设谋请史天倪赴宴，将他杀掉，以真定地投归金朝。一时河北震动，许多州县都随着叛蒙附金。孛鲁命史天泽袭其兄职，招集史氏部曲攻武仙，并遣肖乃台率蒙古军助之，藁城董俊亦出兵会攻，武仙败走汴京，真定及河北诸州又为蒙古占领。

当木华黎率主力进攻山西、陕西的时候，原红袄军首领、后被南宋授为大名路总管的彭义斌于1222年出兵攻取山东州县，

严实的兵卒和所控制的地区多被他所得。彭义斌又攻败李全，得其降卒，兵势大振，遂于1225年围攻东平，严实被迫与他约和。彭义斌提兵西进，并与武仙联合，取真定。孛里海所统蒙古军至，严实率部投归孛里海，合兵攻彭义斌，战于内黄，义斌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严实与蒙古军收复所失州县。1226年，济南土豪张荣降蒙。当时山东东路大部分地区在李全控制之下，李全捕张林送于宋，进占益都。木华黎弟带孙统蒙古军和严实汉军攻益都；孛鲁亦领兵入山东援助。李全抵抗至1227年初夏，力尽出降，于是山东全境尽为蒙古所有。孛鲁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至此，金朝在河北、山东的地盘丧失殆尽，虽然在山西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平阳、太原等地，但已难挽回整个败局。正值此时，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在击溃西夏主力后，挥师入金，攻陷了临洮等府州。金哀宗赶紧派使臣带了大量珠宝向成吉思汗求和。不久，成吉思汗死于清水县附近。临死前，他制定了以下的灭金战略：假道于宋，进攻唐州和邓州，后直捣大梁，取下金精兵所据的潼关。

成吉思汗死后，在陕西的蒙古军继续向凤翔等地进攻。1228年，蒙古军八千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被金完颜陈和尚率领的四百骑军击败。金朝与蒙古打了近二十年仗，才第一次得到这么辉煌的胜利，颇起了一点振奋作用。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自出征金朝。

1230年秋，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漠而南，攻拔天成等堡，进入山西，渡过黄河，与陕西蒙古军会合，攻取凤翔。金哀宗命行省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从阌乡（今河南灵宝西）提兵出关救援，合达等兵至渭北，见蒙古军势盛，慌忙收兵入关。次年春，蒙古军攻破凤翔，金弃京兆，迁民于河南，潼关以西尽为蒙古所据。

1231年夏，窝阔台避暑于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大会诸侯王，商议攻金之策。当时，金以重兵把守潼关，不易攻破，猛将速不台在此接连受挫；黄河一线守备亦严，武仙一军屯于北岸卫州，史天泽曾率军攻之，不克。蒙古军进展缓慢。窝阔台采纳拖雷的意见，决定兵分三道进征：窝阔台自统中军渡河，由洛阳进；斡赤斤以左军由济南进；拖雷总右军，由宝鸡南下，通过宋境，沿汉水达唐、邓，以成包抄之势，定于次年正月会师汴京。

同年秋天，窝阔台军围攻河中府城（在今山西永济西），金兵拼命抵抗，打了两个月，才将城攻破。于是由白坡渡河，进屯郑州。金卫州节度使弃城逃到汴京，黄河一线的防御瓦解了。

拖雷出宝鸡，遣搠不罕使宋请借道，为宋边将所杀。于是拖雷提兵破大散关，攻入汉中，破凤州、西和（今甘肃西和）、沔州（今四川阆中），大掠而回。蒙古军进而从金州（今陕西安康）东下，取房州、均州，渡过汉水，进入邓州境。一个月前金朝已得到蒙古军由金州东下的报告，急忙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自阌乡驰守邓州。合达等以二十万大军据险设伏于邓州西禹山，小却蒙古军，即以大捷奏报。拖雷兵不满四万，遂避开金兵主力，率领轻骑直奔汴京。合达发觉后，立即从邓州率军尾追，路上与杨沃衍、武仙军会合，继续北进，入援汴京。拖雷出动骑兵沿途袭击，使金军疲备不堪。1232年春，金军进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集中精骑阻截。当时正值大雪，金朝军士身披甲胄僵立于雪中，枪矛都已结冻如椽，有的士兵接连三天没有吃饭。蒙古军乘其困惫，发起猛攻，金军大溃，武仙逃跑，移剌蒲阿被俘，完颜合达、杨沃衍走入钧州，蒙古军进攻钧州，沃衍自杀，合达在城破时被杀。

三峰山一战，金朝的精锐丧失殆尽，潼关守将也献关投降，河南十余州均被蒙古攻陷。不久，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

攻汴京。金哀宗及其军政大臣惊恐万状，向蒙古求和，而汴京军民则奋勇抗战，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药武器回击攻城的蒙古军，中炮死者极多，速不台引军暂退。这时周围州县都遭到蒙古军抄掠，难民纷纷逃入汴京，城中人口激增，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以上。同年秋，蒙古派遣唐庆等人城胁迫金朝投降，被金将士所杀，于是不议和。蒙古军在中牟击溃入援的金军，汴京至此粮尽援绝，有的居民以人肉为食。1233 年初，金哀宗带着一部分臣僚和军队出奔，辗转逃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撒吉思卜华率蒙古军追击包围，攻四月不下。金将官奴夜袭蒙古军营，撒吉思卜华军全部被歼。金哀宗出逃不久，速不台进围汴京，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等，献城投降。

当时，金朝虽然大势已去，但河南许多州县还在坚守，蒙古军攻中京（洛阳）、归德等城俱不能克。自三峰山败后，武仙又收集溃军得十万人，驻扎唐、邓山中。蒙古军经过长久作战，军力减弱，将卒病者又颇多；河南在战争中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得粮也很困难。蒙古统治者看到，单凭自己的力量，要最后消灭金朝并不是很容易的。因此，在 1232 年年底，蒙古派王檝使宋，建议联合灭金，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邹伸之往报，约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1233 年夏，武仙侵掠光化，宋襄阳守将孟珙败武仙军，进入金境，金邓州节度使等以城降宋。秋，孟珙再次出兵击溃武仙，武仙北奔山西，被杀。

1233 年夏，金哀宗从归德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史天泽所部汉军围之，再遣王檝请南宋出兵会攻蔡州。八月，孟珙自襄阳提兵北上，攻下唐州。金哀宗派使臣到南宋乞粮，并希望与宋连和，被南宋拒绝。十一月，孟珙率宋军二万，粮三十万石至蔡州，遂与蒙古军一起攻城。1234 年春，宋军攻破南城，蒙古军攻破西城，金哀宗自杀。自此，立国达一百一十九年的金朝宣告灭亡。

消灭金朝是蒙古统一中国的重要步骤之一。它使蒙古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从而为最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太祖纪》、《耶律阿海传》、《史天倪传》、《耶律楚材传》。

《金史》：《移剌蒲阿传》、《胥鼎传》。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

《郑澧神道碑》

长子出征

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派遣阔客歹、雪你台统率三万军队进征钦察、撒克辛（今伏尔加河下游）和不里阿耳。但由于钦察、不里阿耳人坚持抗战，使蒙古军未能征服其地。窝阔台不甘罢休，于是组织了长子出征。

1235年，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命令各支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遣长子出征，讨伐钦察、斡罗思等未服诸国。参加这次出征的有术赤子拔都、斡鲁答、别儿哥、昔班，察合台子拜答儿、孙不里，窝阔台子贵由、合丹、孙海都，拖雷子蒙哥、拨绰以及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等。出征诸王以拔都为首，实际统兵的主将是速不台，出征军共约十五万人。1236年春，蒙古诸王和速不台等率师出发；秋，抵达不里阿耳，与先已在那里的拔都兄弟会合。速不台率先锋部队进攻不里阿耳，诸王各自率领本部人马作战。蒙古军攻破不里阿耳都城，杀掠之后又将此城焚毁。

1236年冬，蒙哥率军逼近亦的勒河下游的钦察部。居住在札牙黑、亦的勒河间玉里伯里山的钦察部首领忽鲁速蛮先已遣使纳款，蒙古军到来后，其子班都察立即率部归降。而另一部钦察首领八赤蛮不肯投降，率领部下出没于亦的勒河下游密林中，不时袭击蒙古军队。到1237年春，速不台赶来增援，蒙古军击败八赤蛮，并以大军包围森林，八赤蛮只好退到亦的勒河口附近的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一个岛上。蒙古军追至海边，适水浅，涉

水登岛，全歼钦察军，活捉八赤蛮。八赤蛮在蒙古军面前不肯下跪，大义凛然地说："我作为一国之主，难道贪图苟且偷生？人身非骆驼，为何替别人下跪？"坚强不屈，终被杀害。消灭八赤蛮后，蒙哥继续征讨附近的阿速部。

1237年秋，拔都召集蒙哥、贵由、阔列坚、合丹、不里等诸王举行大会，决定共同进兵斡罗思。蒙古军途经莫尔多瓦，征服了这个小国。同年冬，进入也烈赞境，遣使谕降，令其贵族、人民各出财产的十分之一为贡。也烈赞侯玉里吉拒绝纳贡，准备抵抗外敌，并派人向弗拉基米尔大公求援，但遭到拒绝。经过六天的围攻，也烈赞被攻破，玉里吉等王公及守城兵士尽死，居民亦遭到屠杀，也烈赞城被焚毁。

1238年年初，蒙古军分兵四出，一个多月内连破科罗木纳、莫斯科、罗思托夫、速兹答勒等十余城堡。二月，进围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大公先已退守昔迪河，以待其弟乞瓦公和诺伏哥罗德公的援兵，城中由其子守卫。蒙古兵胁迫各地被俘的斡罗思人参加攻城，经过五天猛攻，城破；蒙古兵入城大肆烧杀抢掠，避入教堂的大公家属和城中显贵尽被烧死。三月，拔都派遣一支军队进攻昔迪河畔的大公军营，歼灭其部，大公战死。蒙古军自此进向诺伏哥罗德，由于前有森林、沼泽，地形不利，旋即退兵南下，抄掠斯摩棱斯克、契克尼果夫等地。科泽里思哥城军民坚守城池达两月之久，顽强地抵抗蒙古军，歼敌五千；后来城破，拔都军血洗了此城。

蒙古军继续向南，略取钦察草原西部地区。钦察部长忽滩战败，率余部四千家迁入马札儿（今匈牙利）境。1239年，蒙哥、贵由统兵进入阿速国，攻其都城蔑怯思，阿速人坚持抵抗近三个月，才被攻破。阿速国主杭忽思投降，蒙哥命签其丁壮从军。1240年春，蒙哥、贵由继续用兵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北，并派遣一军往攻铁门关。这年秋天，窝阔台遣使者至军，召贵

由、蒙哥东归。蒙哥令杭忽思仍守其国，而将其子阿塔赤及所部阿速军带回，其后从攻四川，灭南宋，镇戍中原，成为元朝很重要的一支色目军队。

拔都率领一军经略亦的勒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1239年中，曾遣兵复人斡罗思抄掠。大敌当前，斡罗思王公们却依然相互争权夺利，不能一致对外。弗拉基米尔大公一门尽绝后，其弟乞瓦王雅罗思老赶赴弗拉基米尔，宣布继承兄位，兼并其地，而契尔尼果夫王米海勒亦乘机进据乞瓦。1239年冬，蒙古大军从亦的勒河出发，长驱直人斡罗思南部，攻破别列雅思老勒、契尔尼果夫二城。在此次攻城中，蒙古军动用了巨型抛石机，用于抛击的石头大至需四人始能抬动。蒙古军进围乞瓦，遣使谕降，乞瓦城人杀害使者。米海勒恐惧，逃往孛烈儿（今波兰），伽里赤王丹尼勒至乞瓦，命其部将德米特尔守城。1240年秋，拔都亲统大军至，于是诸路军马云集，围攻乞瓦。乞瓦城三百年来一直是斡罗思的国都，城墙坚固高峻，德米特尔率军民顽强守御。拔都下令四周架炮，猛烈攻城，昼夜不息。十一月十九日，蒙古军打塌一处城墙，蜂涌人城，纵兵杀掠。德米特尔受伤被捕，拔都赞赏其忠勇，赦免不杀。攻取乞瓦后，蒙古军继续西进，进人伽里赤国，攻其都城弗拉基米尔——沃伦和境内其他城市，伽里赤国王丹尼勒逃人马札儿。

征服斡罗思后，蒙古军队进兵孛烈儿和马札儿。

时孛烈儿国已分烈为若干小国，国王博列思老都于克剌可夫，只能管辖直属之地，其余封国都各自为政，不听他的号令，无疑给蒙古军的进攻带来可乘之机。1241年春，蒙古军分兵两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合台等率领侵人孛烈儿，一路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等率领侵人马札儿。二月，蒙古军渡过维思秃剌河，攻破散多米儿城，进至克剌可夫城郊，大掠后退兵。不久，再人其境；三月，击败孛烈儿军，博列思老举家逃人莫剌维亚，克剌

可夫居民亦弃城逃跑。蒙古军放火烧毁克剌可夫后，进入昔烈西亚，乘筏渡过奥得河，攻其都城弗洛茨拉夫。昔烈西亚侯亨利先已退屯里格尼志城，集结孛烈儿军、日耳曼十字军与条顿骑士三万人，准备迎敌。蒙古军遂舍弗洛茨拉夫，进至里格尼志附近。四月九日，亨利率军出战，大败，亨利战死。蒙古军获胜后，南下攻入莫剌维亚境，波希米亚王遣其骁将雅罗思老来援，坚守斡勒木志城，蒙古军久攻不下，在焚掠附近各地后，遂向马札儿，与拔都会合。

拔都率领的蒙古军主力分三路侵入马札儿；昔班统一路从北面孛烈儿攻入，合丹统一路从东面摩勒达维亚攻入，拔都亲统一路从伽里赤直趋马札儿国都。当时马札儿国土甚广，北达斯洛伐克，东据特兰西瓦尼亚，南抵亚得里亚海，但实际上分裂为许多封建领地，诸侯均不受国王管辖。国王别剌四世都于佩斯城，他与诸侯、贵族之间矛盾很大，特别是他收容了忽滩汗所部钦察人，这些钦察人在境内为非作歹，引起人民的愤恨。蒙古军入侵时，别剌急忙召集主教、贵族们至布达城（与佩斯城相连，今合称布达佩斯）会商对策，诸人以钦察逃人招来外祸，将忽滩汗等钦察首领拘捕，并遣人四出征集援兵。三月，蒙古军进至佩斯城附近，马札儿兵一部出战大败，人民更迁怒于钦察人，将忽滩汗等杀死，于是钦察人与马札儿人相互仇杀，国中大乱。四月，马札儿援军稍集，至六万人。别剌率军出战，蒙古军退到撒岳河之东，马札儿军进至河西岸结营，以重兵把守桥梁。拔都遣兵夺桥，失利；速不台率军从下游结筏潜渡，绕出马札儿军之后，拔都军亦猛攻守桥兵，夺取桥梁，于是合兵包围了马札儿军营。马札儿军接连失败，别剌突围走，蒙古军追击，杀死马札儿溃军无数。进抵佩斯城，攻拔之，尽杀其居民，纵火烧毁城市。夏、秋两季，蒙古军驻营于秃纳河（今多瑙河）以东诸地，一面休养士马，一面分兵抄掠。七月，一支蒙古军进至维也纳城附近的诺伊

施达，遇奥地利公、波希米亚王联兵来御，旋即退走。十二月，拔都亲统一军涉水渡过秃纳河，攻陷格兰大城。1242 年初，遣亲王合丹分统一军追击马札儿王别剌。此时蒙古军已是强弩之末，无能力继续攻城略地。不久，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遂率军东还。

别剌先逃入奥地利，颇受奥地利公欺凌，又逃到克罗地亚，听说蒙古追军到来，急忙避入亚得里亚海岸边的岛上。合丹军追至海边，劫掠了斯帖剌托、卡塔罗二城，然后取塞尔维亚，与拔都军汇合。蒙古军徐徐东进，经过瓦剌吉亚、摩勒达维亚等地，于 1243 年初到达亦的勒河下游的拔都营地。

蒙古军于里格尼志大败孛烈儿军并进兵德国边境的消息，使德国人上下震恐；马札儿王别剌又遣瓦陈主教分别致书德国皇帝菲烈德里二世和教皇格烈戈里九世求援。但这时德皇与教皇正在互相攻战，仅以虚辞应付别剌，诸如表示同情，勉励他为保卫基督教奋勇作战云云。教皇和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们甚至把蒙古的侵略神为"天罚"，无可奈何，只能祈求上帝的怜悯。这也是使蒙古军能够从容地践踏欧洲许多地区的原因之一。

1243 年，拔都在亦的勒河下游的东岸，建筑了萨莱城，并以此为都城来统治他占领的地域，拔都的统治区叫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则称之为金帐汗国。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太宗纪》、《昔里钤部传》、《阿儿思兰传》、《杭忽思传》、《阿塔赤传》、《速不台传》。

《史集》第 2 卷

《世界征服者史》

脱列哥那皇后称制

在蒙元历史上，由于没有固定的皇位继承制，当原来的皇帝死去而新的皇帝又还没有推举出来之前，往往由原来的皇后摄国称制。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太宗后脱列哥那。在太宗窝阔台死后至定宗贵由即位之前，她监国摄政达五年之久，使得蒙古朝廷动荡不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原有的统治方式受到极大的破坏。

脱列哥那是兀洼思篾儿乞人，在她的丈夫、兀洼思篾儿乞部落首领带亦儿孙遇害之后被俘，并嫁与窝阔台。她是个能干，但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女人，在她称制的五年中，蒙古帝国被拖到崩溃的边缘。据记载，她“貌不出众，但极有权术。”“因为她不顾成吉思汗的遗诏，不听兄弟的话，她在兄弟及成吉思汗子孙中制造矛盾。”

当窝阔台在世时，脱列哥那已对朝中的几位大臣怀恨在心。结怨的原因可能是她企图干预朝政，遭到大臣的反对。当时驻波斯诸省长官阔儿吉思，还有牙老瓦赤，因得到丞相镇海的支持，他们根本不买脱列哥那的帐。现在脱列哥那大权在握，她就准备向这些人进行报复，以消心头之恨。

因此，脱列哥那首先派使者到契丹去取大臣牙老瓦赤，同时企图谋害镇海。镇海发现她存心不善，赶快逃之夭夭，投奔她的儿子、分地在唐兀的阔端。使者到契丹后，牙老瓦赤殷勤相待，拖延了两三天，然后用酒把使者灌醉，他也逃奔阔端。脱列哥那

遣使向其子索取这两人，阔端答复说："逃鹯之雀，丛草犹能生之，这些人到我这儿来，已在我的庇护下，要他们回去是不可能；突厥人或大食人都不能作为借口，库里勒台即将召开[①]，有罪到时再说，让他们在大会上受到应有的惩处。"脱列哥那三番五次遣人去索取，都遭到拒绝。她又生一计，企图唆使另一大臣，于阗的亦马都木勒克·穆罕默德出面揭发他们的阴私，罗织罪名，在库里勒台上定他们的罪。亦马都木勒克是个正直的人，不肯这样干，因此被脱列哥那囚于监狱，到贵由登基后才获释。牙老瓦赤的儿子麻速忽是畏兀儿等地的长官，他见事不妙，也逃往拔都的宫廷。阔儿吉思在赴哈剌和林的途中，因和察合台系的一个宗王口角，言语不逊，被逮至和林，脱列哥那借此机会把他杀死，派阿儿浑接替他的位置。

打击和残害大臣的同时，脱列哥那尽力引用她的亲信。最得到她宠信的是个名叫法蒂玛的女人。法蒂玛生于圣城麦什特，蒙古兵破波斯的徒思城时，被掠至哈剌和林。她不时到宫里走动，深得脱列哥那宠信，所言必从。一朝形势变化，镇海下台，她就在脱列哥那的纵容下参预机密，控制朝政，凌驾于大臣们之上。她重用奥都剌合蛮，派他去汉地取代牙老瓦赤。

这个奥都剌合蛮，在窝阔台统治后期和脱列哥那执政期间，是个活跃人物。他先以商人身份，由译史安天合荐引，扑买课税，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在脱列哥那时期，他由商而官，更是权势倾朝。《元史》记载说："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都剌合蛮以货得权柄，廷中悉畏附之。"脱列哥那甚至"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之"，交有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可见脱列哥那对他信赖到何等程度，耶律楚材反对奥都剌合蛮当权，几遭毒手，终

① 库里勒台：蒙古语，"聚会"之意。

于含恨而死。

贵由虽然登位，但朝政仍出其母之手。为争权夺利，母子间开始失和。贵由要夺过权柄，先需除去法蒂玛。贵由弟阔端，原本体弱多病，当时，贵由的师傅合答，有个名叫失剌的侍从，系哈里发阿里的后人，于是就由这个失剌出来揭发法蒂玛，说她用巫术蛊害阔端，使阔端多病。阔端从宫中归去，病势越发沉重。他遣使求他的兄长替他报仇。紧接着传来阔端的死讯。在贵由支持下重新上台的镇海，向贵由提醒这件事。贵由就派人向其母索取法蒂玛，但遭到拒绝，几次交涉均未获结果。最后，贵由逼着他的母亲交出法蒂玛。法蒂玛和奥都剌合蛮都被处死。脱列哥那哈敦因此很快便死了。

宫中的告发事件由此层出不穷。贵由死后，叶密立的阿里·火者指控失剌犯有同样的罪行：蛊害贵由子忽察。失剌被囚禁两年后受刑而死。蒙哥登基时，阿里·火者因为是忽察的臣子，也被拘捕，又有人控告他犯有类似的罪。他给活活打死，妻儿贬为奴婢。这些事件反映出宫内形势的动荡不安。

察合台的封地，东起畏兀儿地，西迄撒麻耳干，驻地则在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他是个执法极严的统治者，在世时宫内保持平静。但是，察合台死后，他的寡妻也速伦下命把丞相胡只儿和医师麦术督丁处死，宫内开始出现矛盾。察合台和窝阔台原以察合台之孙合剌旭烈为继承人，也速伦和大臣哈巴失也赞同这个选择。可是，贵由登基后，因和察合台子也速蒙哥相好，说："有子怎能由孙继承？"他把合剌旭烈废黜，立也速蒙哥承袭察合台的封地。这造成察合台系的分裂，宫内的臣僚也分为两派，哈巴失支持合剌旭烈，另一廷臣巴哈丁支持也速蒙哥。及至窝阔台系和拖雷系大搏杀时，察合台系内两派各自投人不同的阵营，相互残杀。

最后，在脱列哥那称制时期，还出现斡赤斤阴谋举行政变的

事件。铁木哥斡赤斤是成吉思汗的同母幼弟。成吉思汗西征时，他留守蒙古本土。他的封地在东方，称为东方大王。

"大丈夫能屈能伸"，斡赤斤想乘窝阔台死后的混乱时期，以兵夺取政权。他率领一支军队赴窝阔台的斡耳朵，但当他接近时，成吉思汗之孙灭里斡兀立以兵相迎，使他后悔失策。他以前来赴丧为由，替自己开脱。同时，有消息说贵由正从钦察草原返回他的封地叶密立，斡赤斤更是悔之莫及。斡赤斤的举兵使军队和百姓充满惊恐，脱列哥那遣使对他说："我们是你的媳辈，仰仗于你，你率兵甲到来何为？百姓和军队都惶惶不安。"她派灭里斡兀立和斡赤斤之子斡鲁台前去相迎，挫败了斡赤斤的阴谋。

贵由即位后，斡赤斤受到审讯。这次审讯事关宗王，不能由外人进行，于是由蒙哥和术赤长子斡鲁朵主持。在罪证确凿后，一群武将把斡赤斤处死。斡赤斤的孙子乃颜在忽必烈时期再次叛乱，根源当在于此。

宫廷内的骚乱，使蒙古帝国的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这个时期内，诸王各自为政，大臣各自依附于一党。《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把这个时期描写成"层层乌云密布"的时期："百姓深受苦难，额勒赤像雨点一样撒向各地[①]，税吏像脱弦之矢去征收非法赋税，老百姓被摆布得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既不堪忍受下去，又走投无路。"《元史》评述贵由死时的形势说："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驲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指1242年——引者）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胡务）

---

① 额勒赤：意为"使者"。

参考资料：

《元史·定宗纪》

《世界征服者史》：《脱列哥那哈敦》、《法迪玛哈敦》、《贵由汗登上汗位》。

《史集·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

罗马教皇派人出使蒙古

蒙古的兴起和扩张震惊了罗马教皇，他们派遣使者远道来到中国，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是中西文化交通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在1219—1224和1238—1241年间，蒙古进行了两次规模巨大的西征，兵锋及于东欧诸国，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的震动和威胁。当时的西欧，罗马教皇和德意志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之间长期进行着争战。与此同时，为夺回耶路撒冷圣地的十字军远征也在继续进行。欧洲诸王国统治者之间的分裂与争战，大大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致使蒙古远征军能够所向无敌，蹂躏东欧。1223年，钦察人与斡罗思诸公国联合抵抗蒙古军，大战于黑海东北的阿里吉河上，被蒙古军打得大败。蒙古人与欧州人的这一初次接触，尽管使斡罗思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却没有引起其他欧州国家的重视。1235年，蒙古统治者再举西征。1241年，在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之后，侵入孛烈儿、马札儿等国，在里格尼茨击溃了集结在这里进行抵抗的波兰各地军队和普鲁士骑士团的联军。蒙古军势如破竹的进攻，震惊了整个欧洲，基督教徒们甚至将蒙古人的来临看成上帝降下的惩罚而无可奈何。各地纷纷准备自卫，罗马教皇筹组十字军，准备开赴马札儿抗击蒙古人。

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于蒙古人的了解是极端贫乏的。从十二世纪中到十三世纪末，欧洲人中盛传东方有一富饶强大的统治者、基督教徒长老约翰，并且传言此长老约翰曾在1165年致书

于希腊皇帝马努勒、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和教皇及其他统治者，信中满事夸张，因而使长老约翰强盛的报导广为散播。这样，约翰王的传说也促使欧洲人产生联络东方的同教以夹击伊斯兰教徒的梦想。而拔都西征军在匈牙利的掳掠更引起了教会统治集团的警觉与不安。1245 年初，新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大会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就是商讨防止蒙古侵略的问题。最后决定派遣两个使团出使蒙古：一个是由普兰·迦儿宾（或译作普兰诺·卡尔平尼、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出往斡罗思；一个由剌温思出往波斯。

普兰·迦儿宾出生于彼鲁吉亚附近的 Piano di Carpini，并以之而得名。他是圣芳济教派的创始者之一，1222 年曾任撒克逊教区的监护人，1228 年任日耳曼主教，1230 年派任西班牙主教，1233 年又返任撒克逊主教。在接受教皇委派的东使任务后，已经六十五岁高龄且不懂东方任何语言的普兰·迦儿宾于 1245 年 4 月 16 日带着教皇给贵由汗的书信，从里昂出发，没有任何手段，唯有诚实的信仰，毅然开始了漫长而艰困的蒙古之行。同行者有在布列思老加人的伯涅的克等。他们在波兰和加利西亚度过大部分冬季以后，于 1246 年四旬斋开始时启程进入草原，立刻就遇到了鞑靼哨兵，哨兵把他们送到指挥官阔连察那里，阔连察又把他们送到撒儿塔那里，撒儿塔没有耽误，随即又把他们送到他父亲拔都那里，拔都是西部兀鲁思的统治者，他驻帐在伏尔加河下游。甚至在这里他们也只逗留了几天，因为拔都决定应该立即把他们送到大汗贵由本人那里去，以便能及时在贵由在金帐举行即位典礼时赶到，出席参加。他们被强迫以最快速度骑马奔跑，每天要换五六次马。正如他们后来记载的那样："我们是如此虚弱，以致几乎不能骑马。在整个四旬斋期间里，除了用水和盐煮的小米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食物，在其他斋日，也是这样；而且除了用锅烧化了雪水外，我们没有其他饮料。"这样，

他们月复一月地继续奔跑了几千英里，通过大片沙漠地方，没有休息，也没有间歇时间。即使对最健壮的骑手来说，这也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对一个非常肥胖、身体很坏的年老教士来说，这是自有记录以来肉体忍耐力的最惊人业绩之一。

他们在里海和咸海之北通过中亚细亚，于仲夏到了准噶尔的阿拉湖地区，抵达拔都的哥哥斡儿答的营地。休息了一天以后，他们继续前进，走得比以前更快了，一大早就动身，一直奔跑到夜里，一顿饭也不吃。有好多次，他们到达住地是如此之晚，以至那天晚上他们连饭也顾不上吃，而他们应该在前一天晚上吃的食物，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得到。由于这样无情地赶路，他们于7月22日及时赶到在哈剌和林附近的贵由的营地，参加了贵由被拥戴并即位为大汗的大会。他们先后受到脱列哥那皇后和贵由汗的接见。在蒙古逗留四个多月之后，迦儿宾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在1246年11月17日循原道而返。他们在整个冬季通过空旷的草原往回走，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晚上经常睡在雪地上。他们于基督教升天节（1247年5月9日）抵达拔都在伏尔加河畔的营地，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以后，最后得到了准许他们返回基辅的护照。他们于施洗礼的圣约翰节之前十五天抵达基辅，当基辅的居民们听到他们到来时，一齐跑出来快乐地欢迎他们，并且进行祝贺，仿佛他们是死后复活一样。在波兰、波希米亚和俄罗斯，他们到处都受到同样的欢迎。当加利西亚的丹尼勒和他的兄弟瓦西勒可听了修士们有关这次出使的叙述，并同他们的主教们商议以后，就写信托这两位修士转呈教皇，承认教皇和罗马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俄罗斯人和西方教会之间第一次重新统一。由于这时在剩下的俄罗斯公爵中丹尼勒是最有权力的人，这件事或许是这次英勇冒险的唯一积极和具体的结果。1247年后半年迦儿宾抵达里昂。

贵由的复信的大旨，在伯涅的克的报导中是这样记载的：

长生天力气里，所有人众之皇帝致大教皇之书信：

既慎思与我言和之后，尔教皇与全体基督教徒众遣使于我。来使之言与信中之意已入圣鉴。如欲修好，尔教皇及所有国王、权要宜速诣朕，以商和款，聆取吾人之答复与旨意。来函所云，谓吾人须受洗而为基督教徒。关于此点，可径言回复：吾人竟不知何由而必须为此。其余所云之尔等惊于屠戮、尤以对基督教徒，其更甚者为对波兰人、莫拉维亚人与匈牙利人一事，吾人亦以不知所云见复。然恐尔此行寂然所闻，故以书答之。

皆因尔等不遵长生天之语言，不从成吉思汗与汗之旨令，而杀戮我使臣，长生天故令吾人摧毁之，并假手于吾人以实行。设非天意、人谁能此？尔西方人众，但尊基督教而卑视其他，尔如之何能知长生天之恩赐？吾人奉事长生天，藉其力气，已尽毁自东至西之全部土地，非长生天力气，人其谁能？故尔教皇及诸基督教王子等设欲纳款言和，愿为我毁平堡塞，则亟宜诣我以商和款，示我以求和诚意。倘尔等不从圣言，故违天命，不听忠言，则吾人知尔等确望一战。后果如何，惟天敌之。

第一个皇帝成吉思汗，第二窝阔台，第三贵由汗。

传播福音的美妙希望换来的是一纸傲慢的促降文书，迦儿宾的出使无疑是失败了。但对于了解东方来说，它又是成功了。迦儿宾所写的《蒙古历史》一书是对蒙古的全面报导，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关于剌温思之使波斯，其具体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但在《教会编年》中提到1247年教皇曾任命他为驻小亚细亚的公使。这就使我们推想他曾访问过这一地区。然而就在同一年，教皇又任阿色林或安塞勒木出使驻波斯的蒙古将军拜住。这又说明剌温思可能并未完成1245年的出使任务。阿色林是在1250年返回教皇处的，携回了与迦儿宾所带的内容略同的信件。这次旅行的简短叙述，保存在芬遏特的著作《史鉴》中，它源出于使团成员之

一，修道士西蒙的报告。

当迦儿宾返抵里昂时，第八次十字军的准备正在进行，法兰克国王路易九世正将东行。同行人员中有修道士威廉、卢不鲁克。由于教皇很担心路易九世的离去而有可能招致弗雷德里克的威胁，因而在1248年初，他派遣迦儿宾及其使蒙的同伴伯涅的克前去巴黎，请求路易九世推迟往圣地的行期。卢不鲁克很可能就是在这时见到迦儿宾，了解了他们使蒙中的见闻。

1248年9月21日，路易九世等一行抵达塞浦路斯。三个月之后，圣路易在尼科西亚接待一个自称是蒙古将军按只吉歹所派遣的使团，使者中有大维特与马克。大维特宣称，蒙古大汗与诸王多人皆受洗礼，且愿助基督教徒收复圣地。因此，有些西方史学家便推测在迦儿宾出使之后，贵由可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贵由派遣按只吉歹代拜住为小亚细亚的蒙古军统帅正是计划与十字军配合，打击伊斯兰教徒，收复圣地。1249年2月，圣路易又以安德烈为使，回访贵由。安德烈取道北方大道，经小阿美尼亚、凯撒里亚、额尔疾隆，至梯弗利斯，在木干平原见到蒙古将军按只吉歹。这年秋天，贵由死去。按只吉歹乃遣这一使团东觐。安德烈绕里海南岸，去河中，循锡尔河而抵赤木邗或塔剌思，由此往东，过垂河与伊犁河，抵叶密力河上之行宫，觐见当时任摄政的海迷失皇后。1251年4月，安德烈返还，向圣路易递交了海迷失的回书。书中同样促其称臣人贡，完全不符遣使的初意。

紧接着，圣路易在凯撒里亚又接见了海迷失所遣、由非力浦率领，经由君士坦丁堡来的使团。圣路易款留使团长达一年之久。这年年底，卢不鲁克伴同菲力浦使团没有通过欧州东部和俄罗斯这道铁幕进人蒙古世界，而是由阿克儿乘船，于1252年春抵达君士坦丁堡。卢不鲁克在君士坦丁堡停留到次年5月7日，在完成使蒙的准备后，渡黑海首途。鉴于前次安德烈使蒙的失

败，卢不鲁克本人，虽持有圣路易致蒙古大汗的书信，但他一直坚称不是官方的使者，而是一个忠诚于上帝的事业而去往蒙古传道的传教士。

卢不鲁克从克里米亚半岛登陆后前行，在伏尔加河畔觐见了西欧人盛传是基督教的蒙古诸王撒里塔。撒里塔遣其往见拔都，拔都又遣其去蒙古觐见大汗。1253 年 12 月 27 日，卢不鲁克携带着同样傲慢促降的回信，启程回国。他从拔都处折而南向，穿过高加索与小亚细亚，1255 年 6 月抵达塞浦路斯。回国后，他著有《东方行记》一书。

卢不鲁克的任务无疑是刺探蒙古的政治、军事情报。他和迦儿宾两人在出使蒙古的途中，都历经艰险，但两人所写的游记的内容和风格则迥然不同。迦儿宾主要关心的是当时成为基督教世界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蒙古人及其帝国的情况，向教皇提出一个全面的报告，特别注意于论述他们作战的方法和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付他们的攻击。卢不鲁克的游记（除有关蒙古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九章简短介绍性文字外）则是对于其旅行和个人经历的老老实实的充分详细的叙述。卢不鲁克是一个罕见的观察力敏锐的人，具有一个艺术家的气质和眼睛。他自己写道："事实上，如果我知道怎样绘画就好了，那我就可以为您（指圣路易）画出每一事物的图画。"结果是，他写的游记，成为整个游记文学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游记之一，甚至比他同时代的马可·波罗或十九世纪的胡克和加贝特等人的游记更为直接和令人信服。尽管他是用学者所用的语言即拉丁语写的，我们通过他的眼睛仍然尖锐地、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场面：修士们终于来到可怕的拔都面前，他坐在"长而宽的好像一张床"的高座上，他的妻子坐于其旁。"我们穿着僧袍站在那里，赤着脚，光着头，成为他们注视的目标。……我们就这样站在他的面前，大约经过了唱一首赞美诗求告上帝这样长的时间，他们全都保持极端的肃静。"我们看到了

在哈剌和林的无止无休的酒会和聚集在那里的各种种族和宗教的人。我们看到了在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三教代表之间进行的大争论的最生动的叙述。最后，我们看到了卢不鲁克在圣灵降临节最后一次觐见大汗本人的叙述，这无疑是历史上最奇异的会见之一。

（胡务）

参考资料：

《出使蒙古记》（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

《元史·定宗纪》

蒙哥登基

成吉思汗的长妻弘吉剌氏孛儿帖生有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成吉思汗死后，政权暂时落入窝阔台系手中。1248年窝阔台的儿子定宗贵由死去，窝阔台系失掉最后一位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选，剩下的全是孤儿寡妇。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沉溺于巫术之中，除了跟商人做点买卖外，她于朝政一无所知，成天和珊蛮巫师在密室策划。她的两个儿子，忽察和脑忽，年轻任性，各执一端，互不相服，一地竟出现三个君主。他们又和曲出之子失烈门不和，仅仅在反对把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出去这一点上，他们才结合起来。

而术赤系内，拔都继位后，兄弟垂手听命，内部稳定。他征服南俄草原，建立钦察汗国，驻军伏尔加河畔，兵强马壮，伺机而动。拖雷系内，唆鲁和帖尼别吉苦心经营[1]，抚育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长大成人，个个能征惯战，是汗位继承人选。拔都和唆鲁和帖尼别吉在斗争中结成同盟，里应外合，夺取政权已成定局。

蒙哥得以继承汗位，功劳要归于她的母亲。

唆鲁和帖尼别吉，怯烈氏，汪罕弟札阿绀孛之女。她颇有才智，能收揽人心，她是蒙古宫廷斗争中的胜利者。《世界征服者

---

① 别吉：蒙元皇室及诸王之女称别吉，相当于汉语“公主”。这里有“后妃”之意。

史》的作者志费尼对她推崇备至，说："在教育子女，整饬朝政，维护尊严，处理事务方面，这个别吉明断英决，连戴头巾的男人尚且不及。"志费尼引用一首赞美她的诗："如果女人都像她，那女人就赛过了男子汉。"又有人把她比作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但称她比诃额仑老母还要胜过一筹，因为老母在也速该死后嫁给了蒙力克，唆鲁和帖尼却未再嫁。窝阔台为使这个女人就范，曾心生一计，想把她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被她婉言相拒[①]。

与宫廷内别的后妃不同，唆鲁和帖尼别吉遵法守纪，御下有方。王位空缺期间，诸王滥发诏旨牌符，横征暴敛，她却严禁己子违反法令。当贵由即位后下诏收回诸王滥发的敕令，摆在他们面前羞辱他们时，唆鲁和帖尼及其子因无此等事，昂然无畏。她庇护手下的臣民。税吏、官员和士兵怕她的严刑，不敢苛虐百姓。有一次，几名地方官征收她属下的臣民，税额过大，跟她的官吏争吵，她派人把那几名地方官带去见她，查明真相后，她下令把他们处死。

她为其子谋求汗位的活动，开始得很早。当拖雷死时，唆鲁和帖尼别吉就开始请客送礼，犒劳军士百姓，赢得各方面的爱戴，使人心归向于她，以致贵由一死，人们都拥立她的儿子蒙哥。

在争取得到库里勒台的推选过程中，她更表现出自己的远见卓识。据波斯史家的记载说，拔都东迎贵由至阿剌豁马黑，距海押立一周之程，得悉贵由死讯。他停驻在该地，以长兄的名义召诸王去见他。贵由诸子驻地较近，赶在诸王前去见拔都，但他们借口珊蛮说久留不利，仅呆了一两天就返回去了。失烈门拒绝应召。机智的唆鲁和帖尼别吉赶快把长子蒙哥遣往那里与拔都会

① 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载《元史论丛》第1辑。

面。正是这次会见，加强了术赤系和拖雷系的团结，决定了汗位人选。拔都欢迎蒙哥到来。他一面念在与拖雷系的旧恩，一方面与窝阔台系诸王有隙，故此决定推选蒙哥为汗。他称赞蒙哥有才能，并且指出窝阔台系诸王违背父命不立失烈门，而立贵由；他责备他们无理处死成吉思汗最宠爱的幼女，所以，他们不得继承汗位。

推选新汗的库里勒台于贵由死后二年（1249）在阿剌豁马黑召开。与会者除术赤、拖雷两系诸王外，窝阔台系下有合丹，察合台系有合剌旭烈参加。会上形势是一面倒，但仍是争论。继拔都推举蒙哥的发言后，斡兀立海迷失的使者八剌当场反对说："过去太宗指定皇孙失烈门为继承人，诸王百官都曾听说。如今失烈门还活着，却又想转移皇位给他人，你们准备将失烈门置于何地？"蒙哥的异母弟木哥反驳说："太宗的命令，谁敢违背？然而前次议立定宗，完全由皇后脱列忽那同你们一手操纵，那么是你们违背了太宗的命令，今天还能怪罪于谁？"由此，蒙哥顺利地获得库里勒台的推选。

拔都派他的兄弟别儿哥、脱哈帖木儿率大军护送蒙哥返回斡难怯绿连，准备来年举行正式登基大典，并等待窝阔台系下诸王忽察、脑忽、失烈门，察合台系下也速蒙哥、不里、也孙脱哈参加。双方争夺宝座的斗争激化。

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接二连三向拔都遣使，反对大会的决定，拒绝出席来年的大典。窝阔台系诸王说："汗位应归属我们，你怎能授予他人？"拔都答复道："推选是兄弟的一致意见，概已确定，无从更改。蒙哥宜于治国，而且，窝阔台系诸王的利益将得到照顾，因为治理如此一个从东至西的大帝国，决非孩提之辈力所能及。"使者往返而无结果。

唆鲁和帖尼别吉这方面加紧她的活动。她继续施舍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邀请亲友参加库里勒台。对持敌对态度的诸王，

她始则施展怀柔手段，向他们派遣使者，表达她的诚意和关怀，要他们改变态度。这招失败之后，她又软硬兼施，温言抚慰、威胁恐吓，交替使用。

预定一年过去，双方达不成协议，登基大典被迫延期举行。最后，拥立蒙哥的诸王，在斡难怯绿连集会，派袭剌门必阇赤去见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子[①]，派阿兰答儿必阇赤去见也速蒙哥，要他们马上与会。迫于大势，脑忽、忽察、也孙脱哈、失烈门等相继动身，但他们故意行动缓慢，不急于露面。预定日期已过，他们还没有到来，别儿哥遣使向拔都请示，拔都回答说："拥蒙哥登基，胆敢违反法令者，斩。"于是，在1251年7月，与会诸王单方面举行库里勒台，蒙哥即位，窝阔台系的统治至此结束。

窝阔台系诸王合丹、灭里，察合台系下合剌旭烈，在大典后前去祝贺，受到蒙哥的接待。合丹、灭里是窝阔台庶出之子，即使汗位留在窝阔台系内，也轮不到他们头上，因此他们不愿与蒙哥为敌。合剌旭烈为从其叔也速蒙哥手中夺回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不得不投靠蒙哥，成为他的支持者。

参加大典的窝阔台系诸王，还有蒙哥都。蒙哥都是贵由弟阔端之子，系正出。但是，唆鲁和帖尼别吉曾拉拢阔端：有一次，窝阔台把两个原属拖雷的逊都思部兵赐给阔端，拖雷系下大将对此不满，要向窝阔台抗议，但唆鲁和帖尼制止了他们，趁机向阔端表示友好，所以阔端及其家属不与唆鲁和帖尼别吉和他的儿子们为敌。

蒙哥虽已登基，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的势力仍然存在，威胁尚未解除。铲除异己的斗争势在必行，契机是所谓克薛杰的告变。其经过是这样：失烈门和脑忽离大会的地址最近。蒙哥宫廷的一个鹰人，康里种的克薛杰，为寻找一头丢失了的母驼，闯入

---

① 必阇赤：蒙古语，意为"书史"。

两王的营地，发现作朝贺用的车辆中藏有武器，打听到他们想趁朝贺之机，发动政变。他一气赶了三天三夜的路，向蒙哥告发此事，蒙哥命忙哥撒儿以兵包围两王，把他们连同部属一起拘捕。然后命尚未到来的诸王忽察及其母斡兀立海迷失、不里、也速蒙哥及其妻脱合失，自行投案，同时以不怜吉解和十万人马驻守别失八里至哈剌和林一线，与驻守海押立的弘吉兰王子相呼应，主要是防备察合台系诸王。诸王被迫前去，悉被拘留。

诸王中，除不里当场被拔都处死外，也速蒙哥之妻脱合失，由合剌旭烈下令当着其夫之面给活活踢死。合剌旭烈重新获得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但他死于途中。也速蒙哥后来被合剌旭烈的寡妻斡儿吉纳奉蒙哥命杀死。其余诸王遭流放。失烈门后随忽必烈南征，被投于河。

斡兀立海迷失不肯归案。她回答蒙哥说："诸王曾立下文书称：王位应永留在窝阔台系内，你等不与他的后人为敌。现在你等自食其言。"蒙哥大怒，下令说："成吉思汗之诸弟合撒儿、斡赤斤、别里古台的妻子均来朝贺，但斡兀立海迷失不至。若珊蛮、合答、镇海、八剌可立人为帝或皇后，且有人确因他们的话成帝后，他们将看到自己的下场。"斡兀立海迷失被捕，送与唆鲁和帖尼别吉，由忙哥撒儿审讯。人们剥光了她的衣服，她说："此身仅呈露于一皇帝前，他人焉敢得见？"按照蒙古的习惯作法，她给裹在毡子里，扔进河中。蒙哥在答复圣路易九世的信中，称她是比狗还贱的妇人。失烈门之母合管合赤也被处死。

贵由的三位大臣：师傅合答、丞相镇海、书记八剌，前二人被捕处死。合答因为资格老，地位高，以他的身份支持窝阔台系诸王，所以他是单独被捕杀。镇海是畏兀儿人，他和另一廷臣答失蛮长期对立，被交给答失蛮处死。八剌也是畏兀儿人，为反对蒙哥登基，他和畏吾亦都护共谋举事，事泄被捕，已定死罪。在押赴刑场那天，适值唆鲁和帖尼别吉生病，为替她祈福，朝廷赦

免当天受刑者，八剌也就死里逃生！

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的宗属大批被处死，被诛者共七十七人，两系的力量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蒙哥的登基，完成了元朝帝位从窝阔台系到拖雷系的转变。

拔都推选蒙哥，固然有个人恩怨。但是，他以长兄身份，优势兵力，没有自取宝座，而是推举比他年轻的蒙哥，表明他仍不是一个野心家，还是以帝国前途为念。在推选蒙哥的库里勒台上，他列举蒙哥宜于治国的种种优点。同时，他在回答窝阔台系诸王的复信中指出，蒙哥即位将照顾窝阔台系的利益，因为治理如此一个从东到西的大帝国，非孩提之辈力所能及。这已超出了纯个人恩怨的范围。因此，拔都受到尊敬，不是偶然的。

蒙哥为人严谨，他的登基使蒙古宫廷内的长期斗争告一段落。他整饬朝政，重委官吏，继续遣兵出征四方，不仅挽救蒙古帝国于危亡，还使之得到巩固和发展。忽必烈灭宋，旭烈兀平哈里发，都是在蒙哥统治下奠定的基础，他从窝阔台系手中夺取政权，对蒙古帝国来说，具有进步的意义。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宪宗本纪》

《世界征服者史·斡兀立海迷失后及其诸子》

《史集·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旭烈兀西征

经过成吉思汗西征，长子出征以及绰儿马罕西征，蒙古已相继臣服了波斯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统治机构——驻在木干和阿兰的统帅行营主持军事，设在呼罗珊途思城的行省管理行政。东部伊斯兰世界中尚未征服的只有两支宗教势力——祃椤答而的亦思马因和报达的哈里发。亦思马因派是伊斯兰教十叶派的一支，源于阿里后裔、第五代教长的长子亦思马因。十一世纪末，此派传道师哈散萨巴据低廉之阿剌模忒堡，渐略取旁近山区及兰巴撒耳、麦门底司、吉儿都怯等堡，又遣门人至库希斯单招收信徒，据险设寨，于是势力渐盛，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教国，所属山城至三百六十所。其教王广蓄敢死之士，灌输盲从思想，训练成刺客，然后遣赴各地，专门进行暗杀活动。十二世纪中期，教主哈散复声称伊斯兰教再兴之日已临，宣布解除若干戒条，且在斋月中饮宴娱乐，于是其他穆斯林遂将亦思马因派视为异端，称他们为“木剌夷”①。

蒙哥即位后，决定派遣其弟旭烈兀率大军征讨木剌夷国和报达，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每十人签调二人，由子弟率领从征，又从汉地签发炮手火箭手千人，由著名攻城能手郭侃率领，随军出征；镇戍波斯的拜住军、怯失迷儿（今克什米尔）的塔亦儿拔

① 木剌夷：阿拉伯语，意为“迷途者”。

都军亦听旭烈兀调遣，命阿姆河行省代应军需。1252 年 7 月，先锋怯的不花率一万二千人先发；1253 年 10 月，准备工作就绪，旭烈兀离开其斡耳朵[1]，统兵西行。一路徐徐前进，1255 年抵达撒麻耳干。1256 年年初，渡过阿姆河，驻冬于速不儿罕之地（巴里黑之西），然后继续西行。当时怯的不花军已围攻吉儿都怯堡二年，城堡地处担寒山上，而担寒山山势陡峭，矢石不能及，守城军都是精兵悍卒，蒙古军屡攻不克。旭烈兀派遣郭侃率领炮手军前往援助。6 月，旭烈兀经途思至你沙不儿附近，亦思马因教主鲁克奴丁忽儿汗派遣其弟前来请降，旭烈兀令鲁克奴丁亲自来见，并毁其所踞城堡。鲁克奴丁被迫下令吉儿都怯守将火者纳失儿出降，但自己不愿出见，于是旭烈兀亲率诸军四路并进，围攻鲁克奴丁所在的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11 月，鲁克奴丁出降，旭烈兀命他遣使谕降仍未攻下的阿剌模忒等城堡，全部烧毁诸城，然后派兵押送他去和林朝见蒙哥，与此同时，下令将俘获及归降的亦思马因人屠杀殆尽。鲁克奴丁到达和林，蒙哥不见，命他回波斯，于路上被押送军兵杀死。

灭掉木剌夷后，旭烈兀于 1257 年春从可疾云移驻哈马丹，做进兵报达的准备。其时统治报达的是黑衣大食第三十六代哈里发谟斯塔辛[2]。自十世纪以来，黑衣大食已逐渐衰落，哈里发仅保有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其辖境仅限于伊剌克阿剌比一地。谟斯塔辛腐败无能，专事游乐，掌握朝政的将帅大臣又争权夺利，大敌当前，君臣、将相之间仍在互相倾轧。9 月，旭烈兀遣使致书哈里发，命其堕毁报达城防，亲自来营纳款。谟斯塔辛答书意气傲慢，报达城民又折辱蒙古使臣，于是旭烈兀决定攻打报达。11 月，蒙古军分兵三路：命拜住军为

---

① 斡耳朵：意为“宫帐”、“宫廷”。

② 哈里发：伊斯兰教政教领袖尊号，意为行知之继承者，代理人。

右翼，从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渡达遏水（今底格里斯河）进向报达城西，遣不花帖木儿与术赤系诸王军与拜住所统军会合；怯的不花等统左翼军从罗耳境进兵；旭烈兀自统中军越过伊剌克阿只迷与伊剌克阿剌经间的雪山，毁乞里茫沙杭城，进至火勒完。1258年1月，哈里发军一部出战，被消灭；蒙古三路军均抵报达城郊，旭烈兀驻于城东，拜住军驻于城西达遏水西岸。30日，完成包围，四面同时发起猛攻，炮石、火箭齐发，报达东门楼橹、城墙相继被击毁，蒙古军攻占东面城墙。2月5日，哈里发遣其子及官员若干人奉重币至旭烈兀营求降，但为时太晚，旭烈兀拒绝接见，下令继续攻城。10日，哈里发亲率其三子及赛夷教长[①]、法官、贵人等出城投降，旭烈兀命他派人宣谕城中军民立即弃械出城，可以免死，居民闻命蜂拥出投蒙古军，但立即尽遭杀戮。13日，蒙古军入城，大肆烧杀，这场灾难延续了十七天，死者达八十万人。旭烈兀于15日携哈里发入城，视察其宫殿，命将所藏金宝献出，然后命人将金宝盛陈于哈里发之前，令他食金，意在讥讽他多蓄金而不恤士卒，终致亡国。20日旭烈兀留兵三千戍守报达，然后移营于附近的瓦伽夫村，下令将哈里发及其长子处死。立国五百余年的黑衣大食朝至此灭亡。

4月，旭烈兀回驻哈马丹；8月，至篾剌合，继又赴桃里寺，并以此作为驻地。在这期间，蒙古分兵攻取了额儿比勒、罗耳及其他地区。接着又进兵叙利亚。

报达的陷落在叙利亚引起极大的恐慌。这时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艾育伯朝统治之下，沿海狭长地带仍为富浪人所据，而分为两国：北部为安都公国——兼辖特利波里伯国，南部为耶路撒冷王国——耶路撒冷城早已为伊斯兰国家占领，所谓耶路撒冷国实际上分成提尔、阿迦和雅法三个小封国。蒙古攻陷报达时，因

---

① 赛夷：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女婿阿里之后裔称号。

旭烈兀之妻脱古思合敦、先锋怯的不花都是聂思脱里教徒[1]，所以对城中的基督教徒加以保护，这使基督教世界更加相信可以与蒙古人联合起来对付伊斯兰教国，重新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安都公博希蒙六世是小阿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婿，遂追随海屯之后与蒙古结盟，并率领军队参加了旭烈兀对叙利亚的进攻。

叙利亚国王纳昔儿见蒙古灭哈里发后，有进取叙利亚之势，立即派遣儿子和国相到旭烈兀处请求臣服。旭烈兀决意征服叙利亚、埃及，不满足纳昔儿表示的臣服条件，于是将来人遣归，并致书纳昔儿，令其纳土归降。1259 年 9 月，旭烈兀命怯的不花为先锋，拜住为右翼，速浑察统左翼，自统中军，进兵叙利亚。首先攻取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曲牙别克儿地诸城，抵幼发拉底河，攻下鲁哈等城，于是渡河进向阿勒波。纳昔儿集军于大马士革北面，听说蒙古军逼境，与诸将商议对策，其国相主降，而将领主战。将相发生冲突，而纳昔儿又怯懦畏敌，慌忙将妻儿子女及宝藏送往埃及，于是军队瓦解，人民逃散。1260 年 1 月 18 日，旭烈兀亲统大军包围阿勒波，架炮攻城，24 日，攻人城内，依例杀掠，历时六日，旭烈兀下令停止。小阿美尼亚王海屯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大礼拜寺，而基督教堂则得到保护。旭烈兀将艾育伯朝所侵据的小阿美尼亚和安都公国土地城寨给还二王，奖励他们从征的功劳。

阿勒波失陷后，叙利亚诸城多不战而降。纳昔儿慌忙放弃大马士革城逃向埃及，大马士革长官遣人至阿勒波向旭烈兀献城投降。3 月 1 日，怯的不花率一队蒙古军进驻大马士革城，不肯投降的军民退入内城坚守，蒙古军发炮攻之，至 4 月 6 日才被占领。纳昔儿本打算投奔埃及国王忽秃思，发觉忽秃思招诱其随从军队，图谋害己，因此不敢进入埃及，辗转逃至巴勒哈，被蒙古

---

① 聂思脱里教：基督教后来分出的一个派别。

军捕获。

这时，旭烈兀得到蒙哥死讯，决定班师，留蒙古军二万人，命怯的不花统率，继续攻略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地，自己率领其余军队回到波斯。

埃及国王忽秃思原为马木鲁克朝的大臣，1259年篡位自立，诸将不服。此时叙利亚使者正在开罗求援，忽秃思于是声称蒙古军已入叙利亚，国势危急而国王年幼，自己是暂且摄位以御外敌，这样军心渐定。不久，蒙古派遣使臣到开罗谕降，忽秃思召集臣僚商议，决定出兵抵抗。1260年7月，埃及杀害蒙古使臣，进兵巴勒斯坦。9月3日，埃及军队进至哲连附近的阿音·札鲁德，与蒙古军会战。蒙古军先胜，后因中伏兵败，统帅怯的不花战死，蒙古军全军覆灭，生还者甚少。埃及军乘胜占领大马士革、阿勒波等城，杀蒙古所置官吏，于是叙利亚全境直至幼发拉底河尽为埃及所有。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旭烈兀于波斯，旭烈兀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了伊利汗国。伊利汗国东起阿姆河，西迄小亚细亚，北接钦察汗国，南至印度洋，都城在帖必力思，报达是陪都。

经过成吉思汗、拔都、旭烈兀的三次西征，终于建立起地垮欧亚大陆的四大汗国。它们是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及伊利汗国。四大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皇帝的藩属，而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实际上变成独立国家。

蒙古人的西征不仅使西域人民惨遭杀戮，城市毁灭，生产荒废，长时间难以恢复元气；而对蒙古人民来说，也没有一点好处。在对钦察人的战争中，十三四岁的蒙古小孩也被征发从军。当然，由于西征所到的地区不同，西征所造成的残破情况亦不同，因此西征的结果在各地区也不尽一致。马克思曾说：“蒙古人曾经使俄罗斯荒芜，他们的那种做法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适

合于畜牧的。因为大块无人居住的空地对于畜牧业是主要的条件。”伊利汗国合赞汗当政时期成为中世纪中近东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国家。同时，西征在客观上大开了中西交通，使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等在蒙元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胡务）

参考资料：

《秋涧集》卷 94《常德西使记》
《史集》第 3 卷《旭烈兀汗传》
《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 3 部
《元史三论》（杨志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忽必烈灭大理

公元十世纪初年，南诏国统治者乌蛮（今彝族）蒙氏衰微，统治权为郑氏所取代，随后赵杨二氏相继争夺政权，但都立国不长。公元937年，白蛮（今白族）段氏兴，段思平团结白蛮、乌蛮各部力量，驱逐赵氏，取得政权，建都大理（今云南大理），是为大理国的开始。大理国的经济区域，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广西西部和四川南部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的一些地方。主要民族有居住在东部的乌蛮、居住在西部的白蛮（今白族），其中乌蛮人数最多、分布最广，乌蛮的统治阶级在大理国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境内尚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如麽些（今纳西族）、和泥（今哈尼族）、峨昌（今阿昌）、蒲、朴子（今布朗、崩龙族）、金齿、白夷（皆今傣族）等。还有一些"杂蛮"，人数少，力量弱，多被乌蛮人所征服，沦为被统治种族。此外，还有一些汉人长久生活在大理国中，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着。

到十三世纪中叶，大理国主段兴智微弱，国家大权落入大臣高氏手中。高氏党人恃势攻夺他族地区、奴役其人民。乌蛮诸部势力强大者，更常常侵占其他弱族地区。大理国内除了固有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外，显然还存在着大族与小族之间的矛盾。到大理国势衰弱时，有些原来处于附属地位的弱族强盛起来，摆脱了大理国的统治。如丽江麽些蛮称强于一隅，自立盟主治理本族事务；为南诏所征服的金齿人也逐渐收复故地，势力开始强盛起来。而乌蛮、白蛮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争夺地盘的

斗争，产生割据现象，如建昌府原分四部，段氏一部强盛起来，吞并了其他酋长的地区，自为府主，大理国也不能压制

与此同时，北方强大的蒙古部落却迅速兴起，并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在南下消灭了西夏和金国以后，它又将进攻的矛头直指偏安江南的南宋。蒙哥即位后，积极进行侵略南宋的战争准备1252年，宪宗蒙哥派忽必烈率军南侵大理，以速不台子兀良合台总军事。计划在征服大理后，一方面可以利用西南少数民族军队增强侵宋的兵力，一方面可以从背后包抄夹攻南宋的长江中游。参加忽必烈这次远征的，除了精锐的蒙古军队外，还有投降蒙古的汉族地主武装和色目人的军队。忽必烈还特别选择几个善于谋略，富有政治才能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人从行参谋。这些参谋们建议忽必烈要采用怀柔政策，而不要多杀人。这年暮秋，忽必烈从蒙古起兵南下。

1253年夏，忽必烈驻扎在六盘山，等到诸军齐集，粮饷、器械准备充足，即于秋天进至临洮，取道吐蕃向大理进发。蒙古军师在忒剌（今四川松潘）稍加休息，然后分兵三路前进。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是征服大理，随后从南面合兵攻宋。只是由于四川这时还在南宋手里，不得不绕过路途艰险的吐蕃境，但这一次的进军吐蕃，在元代历史上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虽然在战略计划上仅是假道，然而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次与征服大理有同样地位的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这个时代，吐蕃正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忽必烈军所过吐蕃东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地，藏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危害。忽必烈进军其地，攻下许多城寨，穿过了雪山，留下深刻的影响，分裂割据的吐蕃封建主们都不得不陆续投降强有力的蒙古统治者，使这个地区统一到蒙古的统治之下。事实上，元朝有些史料确实是把它与征服大理相提并论的。可惜因为在吐蕃境内的征战留下的记载绝无仅有，后人无法了解这个重大事件的详细过程。

1253年初冬，兀良合台西道军和忽必烈中道军穿过吐蕃，进入大理，在金沙江分别降服了大理北面四百余里的麽些蛮各部，麽些诸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麦良等向蒙军投降，但也有一些麽些部落坚持抗战。忽必烈从这里遣使到大理招降，但使臣为大理国所杀。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又分军继进，攻下了大理国西部白蛮诸寨栅。许多白蛮部落都顽强地抵抗入侵之敌，直到寨栅被攻破。当忽必烈军包围了大理城时，西道兀良合台军亦至，取大理北部的龙首关，同攻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高和兄弟背城出战，大败，忽必烈招之不降，弃城逃跑，大理城陷。忽必烈因其杀使，本欲屠城，幸亏汉人参谋张文谦等劝止，即命姚枢裂帛为旗，写上止杀的命令，传示于城内各街巷，大理人民始得免遭屠杀。又命姚枢等搜访大理国图籍。东道兵这时也到达大理与大军会合。又从大理分军追击高氏兄弟，获之，斩于姚州（今云南姚安）。

1254年春，忽必烈留下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大理，并继续征服大理境内未附诸部，又任命刘是中为宣抚使，然后率军北还，复经吐蕃境，回到关中。1254年秋，兀良合台领兵继续向东进取段兴智据守的押赤（今云南昆明）。蒙古军以精锐部队攻城，发炮摧毁城门，并纵火攻之，用尽各种办法仍然没有打下。押赤军民坚持了七天的抗战，终因力竭，城陷。段兴智逃至昆泽，被俘。1255年，兀良合台遣送段兴智与其季父去蒙古见蒙哥汗。蒙哥用怀柔政策，不杀，并赐金符使归国，协同蒙古所委官员、将领安抚继续征服未附诸部。段兴智归国后，又献地图，统率本族军队帮助蒙古征服国中坚持抗战的各部落。蒙哥重新赐以“摩诃罗嵯”的称号[1]，命其管理云南各族。

国王虽然投降，但大理各族人民仍然依阻山谷，坚守城寨，

---

[1] 摩诃罗嵯：梵语“大王”之意，系大理国王原有的称号。

进行抗战。1255年，兀良合台在攻下押赤府诸城后，命其子阿术领兵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京山地区）等地。经过近两年的战争，蒙古才陆续征服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之地和大部分乌蛮、白蛮部落。兀良合台在大理境内设置十九万户府，万户下分设千户、百户，分管其地。1256年，蒙哥命兀良合台取道北上，与四川蒙古军会合。兀良合台遂领兵出乌蒙（今云南昭通），破秃刺蛮三城（今四川筠连境），抵马湖江（今四川宜宾西南），败宋兵，进至合州（今四川合川），会师后还镇大理。1258年蒙哥大举攻宋，复命兀良合台率军北上，定于次年正月会师长沙，实施其从云南包抄南宋的原定计划。

大理人民的顽强抵抗，使蒙古军遭到很大损失。《史集》记载说，忽必烈与兀良合台率十万大军征云南，因为该地气候潮湿恶劣，军中疾病流行，加上大理国“居民极多、军队众多，因而每日每至一处，都遇到抵抗。因为这两个原因，十万军队得生还者不到二万人”。蒙古用武力征服了大理，但通过征服，统一了大理各部。后来又按照内地制度设置郡县，使云南统一于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并在大理进行屯田，推广先进的汉族生产技术和文化。云南自八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历经五百余年，至此才真正与祖国内地复归于统一。这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都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地理志》、《郑鼎传》、《董文炳传》、《解诚传》、《土土哈传》、《张文谦传》、《姚枢传》、《兀良合台传》。

《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

1259年七月宪宗去世后爆发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是蒙古王室内部发生的一次著名的夺权斗争，同时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蒙古统治集团内部集权与分裂、革新与守旧等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统治方针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最后以阿里不哥的失败而告结束，它对当时的历史发生过重要影响。

忽必烈是拖雷的儿子，宪宗蒙哥的弟弟。当他还在漠北潜邸的时候，就“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特别赞赏唐太宗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业绩，“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海云禅师、刘秉忠、张文谦、张德辉、李治、王鹗、赵壁等一批信佛崇儒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应聘前往，深受忽必烈的欢迎。1251年，蒙哥即位，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就以漠南为根据地，更紧密地和汉族及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结合起来。同时，忽必烈还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初步扭转了由于长期战乱和统治者疯狂掠夺造成的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1256年春，忽必烈命刘秉忠相地于桓州（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营建宫室、房舍，三年后建成，名为开平。在这里聚集了忽必烈的一批重要谋士，成为忽必烈集团的根据地。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用蒙古旧有的统治方式还是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方式来统治中原汉地。宪宗蒙哥

死后的帝位争夺，则是这种分歧的白热化，最后不得不通过武力来加以解决。

1259年七月，蒙哥在进攻南宋合州（今四川合川）时，病死于钓鱼山。由于蒙古王室内部没有固定的汗位继承制度，宪宗生前又没有像太祖、太宗那样对嗣位问题作出安排，因而在宪宗死后，汗位争夺又发生在拖雷一系之内。宪宗死去的消息传来，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派，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幼子，驻守和林。在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前，他的支持者之一——阿兰答儿，因为在河南、京兆（今陕西西安）等地"钩考"财赋，曾与忽必烈发生过矛盾。事实上，在蒙哥在位时，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宪宗南征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主持大兀鲁思，管理留守军队及诸斡耳朵[①]，在政治上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从拖雷守产的先例看，阿里不哥确有夺位的潜力。宪宗死后，皇后忽都台以及宪宗之子阿速歹、玉龙答失、昔里吉等，都拥护阿里不哥，这更增加了阿里不哥在政治上的声势。在军事上，阿里不哥虽然不像当年拖雷那样，实际掌握着大蒙古兀鲁思的绝大部分兵力，但也有相当的力量。他拥有留守和林的军队，浑都海居六盘，拥兵二万，且"士马精强，咸思北归。"他与东川乞带不花、西川明里火者以及京兆刘太平、霍鲁怀等互相勾结，以策应阿里不哥。整个秦、蜀、陇地区的形势非常动荡。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立刻采取夺位措施，一方面他发布敕令，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都（今北京），按图籍，号令诸道；一方面纠合各地军队，令阿兰答儿、浑都海发兵图据关陇，令刘太平、霍鲁海办集粮饷，图谋秦蜀，企图形成有利局势，逼迫忽必烈就范。

① 斡耳朵：意为"宫帐"，"宫廷"。

忽必烈也不甘示弱。他那时正率蒙古军队围鄂（今湖北武昌），蒙哥死讯传来后，立即召集诸将、诸谋臣商议，郝经提出“断然班师，亟定大汗”之策，主张“先派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答应割让淮南、汉上及梓、夔两路，划定疆界，商议岁币。放下辎重，率领轻骑、渡淮乘驿，直奔燕都，这就好似从天而降，阿里不哥的奸谋就会冰释瓦解。派遣一支军队迎接蒙哥的灵柩，收纳皇帝玉玺，遣使召集旭烈兀、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到和林会丧。派官至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缉，令太子真金镇守燕都，列阵示威。这样帝位可得，国家可安。”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适宋相贾似道亦遣使求和，遂缔结密约，于 1259 年底迅速北归。1260 年四月，忽必烈抵达开平，诸王合丹、阿只吉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移相哥、忽剌忽儿、爪都等率东道诸王，都会集在开平。他们都是忽必烈的支持者，忽必烈单方面召开忽里台[①]，在他们的拥戴下宣布即位，并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建元纪岁。五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城西按坦河另行召集忽里台，宣布为大汗。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初期，双方争夺的中心区域有二：一是开平至燕京一带，一是秦、蜀、陇地区。阿里不哥派脱里赤在漠南诸州征集军队，横敛财物，企图抢先控制开平至燕京一带，以断绝忽必烈的归路。忽必烈回师燕地，察其包藏祸心，便解散了脱坦克赤征集的军队，从而解除了阿里不哥对开平的威胁。秦、蜀、陇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散处秦、蜀的征南诸军，有的支持忽必烈，有的支持阿里不哥，有的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取观望态度。在这里，阿里不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军事行动计划。

为了夺取这一地区，忽必烈采纳了廉希宪的建议，在鄂州回

———

① 忽里台：蒙古语：“聚会”之意。

师的同时，即派赵良弼前往关右了解情况，接着又命廉希宪等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经略这一地区。廉希宪至京兆，相机行事。他依靠刘黑马、汪惟正、汪惟良、八春等人的军事力量，迅速捕绞刘太平、霍鲁怀，诛杀蜜里火者与乞带不花，同时命汪惟良等率秦、巩诸军进军六盘，防浑都海东来。忽必烈逐步加强了其在秦、蜀、陇地区对付阿里不哥的力量。

1260年五六月间，忽必烈连续调兵遣将，筹集粮草，加紧备战。七月，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忽必烈便"自将讨阿里不哥"。九月，阿兰答儿率军自和林南下，与浑都海的军队汇合。在忽必烈方面，诸王合丹率领骑兵与八春、汪良臣的军队汇合，于是分兵三路进行抵抗。双方在甘州东面山丹附近的耀碑谷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既阵，大风吹沙，良臣令军士下马，以短兵突其左，绕出阵后，溃其右而出，八春直捣其前，合丹勒精骑邀其归路，大战于甘州东，杀阿兰答儿、浑都海。"忽必烈的军队大获全胜。

中统元年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自知不敌，逃至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忽必烈命宗王移相哥留驻和林，自回开平。

阿里不哥以自己的分地谦谦州和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东南）为根据地，四出骚扰，并控制了察合台和窝阔台后裔的分地。忽必烈即位后，曾派阿必失哈及其弟哈萨儿前往察合台分地主持分地事务，但两人途经陕西时被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拘留，阿里不哥另派阿鲁忽往，命他提供军需，并守其东境以抗忽必烈军，守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别儿哥军来助忽必烈。阿鲁忽至阿力麻里后，根据阿里不哥旨意从兀鲁忽乃（察合台长孙哈剌烈之妻）手里夺取了权力，并将术赤系势力逐出河中地区，控制了察合台封地全境，拥有十五万骑兵，遂不愿再服从阿里不哥。不久，阿里不哥遣使者来征牲畜、兵和钱物，阿鲁忽将他们征集的物质全部扣

留，又杀其使者，于是宣布归附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他统治从按台山直到阿姆河的兀鲁思和诸部。

阿里不哥发兵攻阿鲁忽，其前锋哈剌不花于不剌城附近被阿鲁忽军击溃。阿鲁忽回到亦列河（今伊犁河）后，将军队分散休养，毫无防备，阿里不哥后军突至，夺取阿力麻里和亦列河地，阿鲁忽仓促率右翼军退到忽炭（今新疆和田）和可失哈儿。一个多月后，溃军渐集，又率部移向撒麻儿干。

阿里不哥在亦列河、阿力麻里等地大肆蹂躏，使这一带破坏极其严重，人民恨之入骨，奋起反抗。阿里不哥自己也站不住脚了。中统二年（1261）秋，阿里不哥至和林，伪装愿意归顺，却对移相哥进行突然袭击，占领和林，发兵南下骚扰。

阿里不哥尽管千方百计企图挽救败局，但由于他倒行逆施，支持者越来越少，物力、财力也十分贫乏，日渐孤立，忽必烈则利用中原地区强大的物质基础，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占了优势。当时，哈剌和林的粮食和饮料都是从汉地转运而来，于是忽必烈下令禁绝粮道，哈剌和林陷于饥馑。

当阿里不哥南犯时，忽必烈再次率军迎战。中统二年（1261）十一月，双方大战于昔木土脑儿，阿里不哥大败，其部将多降。忽必烈追至和林南面。阿里不哥北遁后处于东西夹击之中，众叛亲离，其支持者纷纷向忽必烈投降，加上连年饥荒，终于不得不于至元元年（1264）向忽必烈投降。一个月后，阿里不哥病死。经过四年的斗争，阿里不哥的势力被消灭了，漠北与中原地区恢复了统一。漠北平定后，忽必烈取消了和林作为都城的地位，而设宣慰司都元帅府直接管辖。

忽必烈所以能够战胜阿里不哥，决非偶然，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蒙古诸王中，忽必烈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阿里不哥也曾有不少支持者，但却并不能将这些力量牢固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经济方面，忽必烈同样占有优势，而阿里不哥以吉利吉思

为根据地，地理条件极为不利，他始终没能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忽必烈推行了一套比较成功的调和蒙汉上层利益的民族政策，而阿里不哥仍坚持草原蒙古贵族那种落后的政治经济方式，他根本意识不到获得汉族地主阶级支持的重要意义；在个人素质方面，忽必烈有着长期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经验，而阿里不哥既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也不善于用兵。阿里不哥的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一胜利，忽必烈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被破坏的封建秩序又重新确立起来，北方的农业生产逐步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这就为忽必烈进一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世祖纪》、《高智耀传》、《许衡传》、《商挺传》、《郝经传》。

《陵川集·立政议》

《史集》第2卷

平定诸王叛乱

经过蒙古的三次西征，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建立起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以及伊利汗国。但这四大汗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成吉思汗晚年开始的各汗国的离心倾向，愈益明显地加剧了。到忽必烈时期，这种矛盾与争夺汗位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表现为海都、乃颜等藩王的武装叛乱。

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为了行使大蒙古兀鲁思大汗的职权[①]，于至元元年（1264）以商讨如何处置阿里不哥的名义，邀伊利汗旭烈兀、钦察汗别儿哥、察合台汗阿鲁忽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三汗答允于至元四年（1267）同时到达，但不久后，三汗先后去世，分别由阿八哈、忙哥帖木儿和木八剌沙继承。

忽必烈对窝阔台后王海都也曾邀请，但海都用“牧马尚瘦”为借口故意拖延，仅表示只愿在领地内“服从大汗的命令”。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汗位被拖雷系夺去后，他一直心怀不满。当阿里不哥在和林称大汗反对忽必烈时，他曾支持过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海都即返还叶密立河，联合术赤后裔诸王，占有窝阔台原来的封地，割据自雄。

忽必烈为了进一步控制中亚，当然不能容忍海都的行为。因

① 兀鲁思：意为“国家”。

而针对海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忽必烈先派察合台系诸王八剌去河中辅佐木八剌沙，执行进攻海都的命令。察合台分地在窝阔台分地之西，这样便可形成对海都的东西夹击之势。八剌到察合台兀鲁思后，发动兵变，废黜木八剌沙，自立为汗。但八剌反过来又不听从大汗的命令，反而与忽必烈的军队发生冲突。忽必烈另派铁连去术赤分地，联合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出击海都。

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军自岭北发兵，击败海都军，追至阿力麻里；忙哥帖木儿和八剌也乘机出兵攻击海都。海都在兵败之时，不得不与忙哥帖木儿议和，迎击八剌，八剌战败。海都请堂兄乞卜察克出面调解，遂与八剌讲和，结为"按答"，未几，双方又不和。至元七年（1270）八剌死，海都立察合台孙捏古伯为汗，但八剌诸子及阿鲁忽诸子不服，举兵攻海都，出现了混战局面。

忽必烈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于至元七年命刘好礼任乞儿吉里、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迁去中原地区的农民、军人，进行军屯、民屯，设立人匠局组织管理迁去的各种工匠，并设立传舍，改进道路交通，希图把这里建设成为防御西北叛王的根据地。在占领阿力麻里后，形势对元军更加有利。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子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总辖西北元军。十年（1273），捏古伯与海都相攻，元军乘机进兵察合台汗国，是年12月，捏古伯兵败被杀。

十一年（1274），元朝政府在天山南北别十八里、忽炭、鸭儿香（今新疆莎车）、沙州（今甘肃敦煌西）等处置水陆驿站，以加强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及对前线的支援。十二年（1275），忽必烈再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率诸王镇守西北，命右丞相安童辅之，那木罕弟阔阔出，蒙哥子昔里吉，忽必烈弟岁哥都子脱脱木儿，阿里不哥子明里贴木儿、药木忽儿等随行。但蒙哥、阿里不

哥诸子因与忽必烈不和，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叛乱。

十三年（1276）秋，脱脱木儿首先率部叛乱，昔里吉与元将忽怜奉军征讨，将脱脱木儿击败。但昔里吉暗中却与脱脱木儿勾结，他们又阴结药木忽儿、明里帖木儿等共同叛乱。时元将八鲁浑、粘闾等亦叛，昔里吉等遂乘机发兵拘系那木罕、阔阔出及安童，共推昔里吉为帝。他们又将那木罕等送往海都、忙哥帖木儿处去，希望与之结盟，但没有成功。是年秋，昔里吉等向岭北进犯，占领吉利吉思等地，执刘好礼于军中。

十四年（1277）春，昔里吉等分道东进。四月，驻牧在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附近的弘吉剌部首领折儿瓦台响应，围忽必烈女囊家真于应昌城中。忽必烈急调诸王伯木儿、彻彻都，中书右丞博罗欢等北上平叛。双方在牙里伴朵、坏剌合都、鱼儿泊等地激战，叛军大败，折儿瓦台被擒。时昔里吉正率派军主力越过杭海岭（今杭爱山）北渡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进入土兀拉河（今土拉河）一带，被元将土土哈堵截，叛军失利。为加强军事指挥，忽必烈命灭宋主帅伯颜总军北上，伯颜率军直扑叛军集结的土兀拉河一带。六月，双方大战于土兀拉河，叛军败退斡耳寒河。八月，双方对峙于斡耳寒河，时叛军内部分化，昔里吉仓促应战，被元军击溃。

是年冬，陕西行省的六盘地区（今宁夏固原东南）也发生了叛乱。六盘原是忽必烈子安西王忙哥剌的驻夏地，忙哥剌奉诏出征昔里吉，该地由南平王秃鲁主管。至元十三年春，秃鲁之父诸王禾忽曾在沙州叛乱，失败后奔海都。秃鲁趁关内空虚之机，结诸王拜作寒、伯颜起兵，安西王相商挺、赵炳率军平叛，秃鲁被擒。

至元十五年（1278）初，元军继续追击昔里吉叛军，土土哈率兵过按台山西，击败与叛军连结的外剌、宽彻哥思两部。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脱脱木儿逃至吉利吉思。是年冬，元将刘国

杰领侍卫军万人，到达和林附近屯守。元朝政府又牢牢地控制了岭北地区。

十六年（1279）四月，脱脱木儿领兵南下，进袭杭海山东。元军主帅别吉思迷失采纳刘国杰的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直捣谦河。元军迅速占领谦州，追其众至乌斯，脱脱木儿慌忙回军，叛军在谦河大败，元军俘获生口畜牲以万计。次年春，脱脱不花、昔里吉等又拥众东来，被别吉里迷失、刘国杰等击败。

至元十八年（1281）叛王内部发生内乱。脱脱木儿由于屡被元政府军击败，不得不求援于昔里吉，昔里吉不应；脱脱木儿又奉撒里蛮为帝，药木忽儿不从，双方激战，脱脱木儿战败，药木忽儿将其俘送至昔里吉处，被杀。撒里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投奔昔里吉，昔里吉将其送至术赤后王火赤斡兀立处，途中被撒里蛮旧部劫获。后来，撒里蛮重整军队，战败并俘获昔里吉、药木忽儿等，撒里蛮将两人押送至大都。但药木忽儿在途中以贿得释，昔里吉则于至元十九年（1282）被忽必烈流放至海南岛，后来死于该地。

昔里吉等的叛乱，破坏了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经营和控制。海都利用昔里吉叛乱，乘机占领阿力麻里，骚扰天山南北。对此，忽必烈也作了一系列部署。至元十五年初即遣阿老瓦丁部率士兵戍守忽炭（今新疆和田），八月，又在畏兀儿设提刑按察司；同年，贯八撒察里、朵鲁各等掌管别十八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军站。次年，从内地抽调大批军士充实忽炭等地。十七年，忽必烈命万户綦公直戍守别十八里，在别十八里，哈剌火州置北庭都护府及交钞提举司。十八年，綦公直等进人天山南北，进驻别十八里。时元军兵力大增，达十余万人，由诸王阿只吉节制。二十年（1283）四月，又置别十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

元军在天山南北的活动引起了海都、笃哇等的不安。至元十

八年，元将刘恩进兵忽炭，海都、笃哇遣将王伦亦撒迎战，被刘恩击败；海都又遣八把率众三万攻忽炭，刘恩众寡不敌，率军退回。十九年，海都见元军已平定昔里吉，乃遣回那木罕等，以谋求和解，但同时又继续进犯忽炭等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笃哇率兵十二万围和州，对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扬言说[1]："阿只吉、奥鲁赤诸王曾经率三十万大军还不能对抗我而只好自动溃退，难道你还敢凭借孤城来抵抗我军锋芒吗？"亦都护坚守，城被围六个月，后笃哇索亦都护之女撤围而去。这时忽必烈已经命令伯颜带领阿吉只总制西北元军，所以笃哇不得不撤围退走。

至元二十三年（1286），海都再次发动进攻，与元军相遇于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海都设伏于洪水山（今新疆呼图壁县西南），元军中计，綦公直、李进等将领被俘。海都乘胜越彰八里，进入哈密力，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的斤战死。元军增兵畏兀儿，海都退去。乃再置别十八里、哈密力两地元帅府。

西北藩王的叛乱，使忽必烈深深感到必须对东北地区也加以控制。东北地区原来只置山北辽东道宣慰司，权轻不足以震慑，至元二十三年（1286）改置为东京行省，省治设在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忽必烈加强对东北地区控制的措施，使东路诸王感到岌岌可危。早与海都有勾结的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裔哈丹等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发动叛乱，海都答应率领十万军队前来汇合。针对东西叛军企图联合的形势，忽必烈一面让伯颜驻和林，阻止海都军东来，一面亲率政府军镇压乃颜。五月，遣大将博罗欢总探马赤军三千及忙兀、兀鲁、扎剌兀、弘吉剌、亦乞烈思五投下部众先行，又发玉昔帖木儿之蒙古军、李庭之汉军随行。六月，忽必烈

---

① 亦都护：十二三世纪时，高昌回鹘首领的称号，意为"幸福之王"。

与乃颜党塔不台、金军奴军相遇，击退之。元军进至哈剌河，塔不台北逃。当时乃颜叛军主力集结那兀江（今嫩江）一带，元军再进，双方激战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在今哈尔哈河与讷墨尔根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乃颜大败，元军追至失列门林，俘乃颜，接着很快加以处死。忽必烈返回大都，留玉昔帖木儿消灭残余叛军，势都儿投降，塔不台和哈丹等亦先后投降。

至元二十五年（1288），驻地在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附近的诸王火鲁火孙又发动叛乱，哈丹乘机与之联合再叛。四月，忽必烈命皇孙铁木耳率玉昔帖木儿、土土哈、李庭、博罗欢等再往征讨。八月，铁木耳抵达兀鲁回河（今乌拉根河）督师，接着李庭等大败哈丹于贵烈河（今归流河）、托吾儿河（今洮儿河）之间，哈丹逃至边境。后来虽曾多次南犯，终于势孤力单，不能得逞。至元二十七年（1290）逃窜高丽。哈丹在高丽胡作非为，给高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高丽王逃至江华岛。是年底，元将薛彻干、阔里帖木儿等进入高丽镇压叛军。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军在高丽军民的支持下，大败哈丹，哈丹子老的在鸭绿江源战死，哈丹兵败自杀。

忽必烈在平定东北叛王取得基本胜利之后，置辽阳行省统辖诸路，并在叛王封地内设置万户府。这些措施削弱了藩王的权力，巩固了东北地区的统一。

正当乃颜和哈丹在东北发动叛乱时，海都和笃哇的叛乱活动也进一步加紧了。由于伯颜扼守和林，阻止了东西叛王的联结，海都便向西扩张。至元二十六年（1289）海都与忽必烈孙甘麻剌大战于杭海山，甘麻剌失利，幸土土哈力战，救出甘麻剌。叛军乘胜占领和林。鉴于形势的严重化，是年七月，74岁高龄的忽必烈决定调集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李庭等各路蒙、汉军再次亲征，海都得知忽必烈亲征，急忙远遁。忽必烈回都后仍由伯颜负责西北军事，镇守和林。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玉昔帖木

儿代伯颜总兵西北，政府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土土哈在按台山俘获海都部民三千余户，进取吉利吉思。至元二十八年（1292），政府军进入谦河流域，占领益兰州等地，海都虽多次来争夺，均被击败。到忽必烈去世时，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按台山之外，日益衰弱，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基本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后来，叛军内部再度分裂，药木忽儿等投降元朝，海都虽多方挣扎，但大势已去，终于在大德七年（1303）投降。大德十年（1306）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到此结束。

忽必烈在位三十多年中，与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通过军事上对叛乱势力的坚决镇压，使得在政治上不断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藩王的割据势力，的确做到了“总揽纲权，则藩镇之祸销矣”。忽必烈镇压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措施，对保持元朝一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世祖纪》、《地理志》、《刘恩传》。

《黄金华文集·刘国杰神道碑》

《国朝文类·伯颜神道碑》

《静轩集·刘氏先茔碑》

《道园学古录·高昌王世勋碑》

《元文类·三本书》

《史集》第2卷

镇压李璮之乱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盘踞在山东的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李璮发动叛乱。同年二月，李璮以涟海三城献于南宋，还师益都，进据济南。忽必烈立即倾全力进行镇压，围困济南城。七月，城破，李璮被俘处死。这次叛乱前后不到五个月，但它对元初的政治却产生了巨大影响。

蒙金战争中，金朝那些据地自雄的大地主军阀纷纷投靠蒙古，蒙古统治者为了笼络他们以加强自己的实力，一律按照他们原来的官职，授予行省、领省、大元帅之类的头衔，让他们世袭管辖原来的地盘，军民兼管。这些大地主军阀集团头目“尽专兵民之权”，数十年专制一方，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李璮之变就是这样酝酿起来的。

红袄军起义最早爆发于1211年，后来杨安儿、刘二祖、郝定等领袖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妹杨妙真和李全领导，两人结合后队伍逐渐壮大起来。但是，马贩出身的李全在攫取了红袄军领导权后即走上了投降道路。1218年，李全降宋，一面在南宋和金朝之间要挟，取得高官厚禄。当强大的蒙古军队进入山东后，李全又于1226年投降蒙古，以岁献金币的条件换取了山东淮南行省的官职。他充当了蒙古官吏后，身穿大元的衣冠，军中有蒙古官员监督。为了向蒙古贵族表示效忠，他迫不急待地进行备战。李全加紧造船，赶制武器，招募海上亡命之徒充当水手，准备攻宋。而把持南宋朝廷的史弥远仍然不断运来粮饷，滋补这

个叛徒。苏北射阳湖地区的人民气愤地说："养北贼，戕淮民。"果然1230年十月，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南宋军民奋起反抗。次年正月，李全败死。李全死后，杨妙真逃回山东，养子李璮袭其父益都行省职。

李璮小字松寿，潍州人，太宗三年（1231）袭为益都行省。从那以后，李璮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在对宋、对蒙的关系上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故伎，或假名攻宋，向蒙古要钱要粮要官，或假名联宋反蒙，但其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尽专兵民之权"。

李璮为了达到割据山东的目的，牢牢不放自己的兵权，蒙古曾几次征兵，他都托词不至。1258年，李璮攻南海州、涟水等城，得涟水相连四城，大势夸张胜利之功，以图攫取军功。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李璮果然加封为江淮大都督。李璮报告说："最近抓获俘虏，得知宋正调兵准备进攻涟水。我方侦察人员看见许浦和射阳湖中战船相望，宋军可能出胶西，攻益都，请求修缮城堑，做好防备。"元世祖下诏授与李璮十个金符、五个银符，用以赏赐有功将士，并且赐给三百锭银元，降诏奖谕。还规定驻扎在边地的蒙古军和汉军，都听从他的节制。李璮发动兵变是处心积虑的，三十余年间，他前后上奏数十件事，都是恫骇虚吓，用敌国来要挟朝廷，而替自己修城增兵作打算。又与当上中书平章政事的岳丈王文统互为表里，选择时机，发动兵变。

但是，李璮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对阿里不哥的战争，无力调兵和他交战，不料阿里不哥败得很快，忽必烈迅速抽调兵力南下镇压；他认为北人汉族军阀都和他一样，心怀叛志，起兵后即可一呼百应，结果响应者寥寥。中统三年（1262）二月一日，在发动兵变前，当南宋还在将信将疑之际，他在三日那天占领益都，发动兵变，不久占领济南。

李璮联宋完全是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并非真心实意，尽管

南宋给了他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的封号。李璮对南宋有杀父之仇，对南宋的作战也从来是不遗余力的，甚至杀宋师殆尽。这次兵变，只是到了事件即将来临之时才去约宋，以免受蒙宋夹击，结果南宋只给了一个虚衔，并未真正支援。李璮反蒙后，并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老百姓听说李璮叛乱，都入守城郭，或奔窜山谷。所以从益都到临淄数百里地之间，寂无人声。虽然李璮曾四出联络，远至山西太原，除了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少数几人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李璮叛乱发生时，忽必烈驻冬在漠南草地。忽必烈请他的老幕僚、著名理学家姚枢分析形势，姚枢说："李璮倘若直捣燕京，控扼居庸，那是上策；与宋联合，困守扰边，是中策；出兵济南，等待世侯响应，是下策。"忽必烈问："如今这个叛贼将如何行动?"姚枢说："李璮必出下策，他只能等着被俘。"于是忽必烈迅速进行了部署，首先杀了王文统，发蒙古汉军讨李璮，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命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修理城堑，作为应战准备，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不久又派史天泽增援。前往镇压李璮的许多汉军头目都是李璮以为会响应他的诸侯，结果忽必烈的统治十分牢固，李璮是不会成功的。五月，蒙古军队筑环城将济南围困。李璮因此不得复出，仍然日夜拒守，为了取悦将士，掠掳城中子女赏给他们；而且分军就食于民家，后来粮食吃光，只得以人肉为食。这样，人心涣散，李璮不能制止，人们相继缒城出逃。七月，李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大明湖自杀，因水浅未死，张宏派人将他缚出。严忠范首先问他："此是何等做作?"李璮回答："你们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忠范立即在他的肋下刺了一刀。史天泽问他："为何不投拜?"李璮默不作声。史天泽又问："忽必烈有什么亏待你的地方吗?"李璮

说："你有文书约我起兵，为何背盟？"史天泽马上唤来一名回回砍去他的两臂，然后砍掉两脚，剖腹取食其心肝，割掉皮肉，最后才斩首。可见史天泽匆忙杀死李璮，事出有因。但是归根到底，多数汉族军阀对忽必烈还是忠诚的，满意的，因为忽必烈并没有亏待他们。

李璮在受围之日，作《水龙吟》一词，曰："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倚阑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此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熳，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野心勃勃的李璮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叛乱只是昙花一现，他本人的结局竟是那样的凄惨！

至元元年（1264）李璮余党毛璋再次发动兵变，结果兵败被杀。

李璮之乱发生时，忽必烈发现王文统与李璮的交通信，因而立即将王文统处死。在王文统被诛以后，忽必烈害怕在他身边另有小集团，所以，他加紧追查王文统的来路，要弄清王文统是如何从李璮处打进他的身边来的。曾经推荐过王文统的廉希宪、张易、商挺、赵良弼、刘秉忠都受到怀疑。商挺还因为他在陕西的活动而受到兴元同知费寅的控告，被投于监狱。中统初年，这些人或者是密参帷幄决策中央；或者是节制一方，支撑大局，都是大有功劳而为忽必烈所倚重的。李璮之乱以后，忽必烈虽然不能不依靠他们负担某些蒙古与回回人所不能胜任的工作，但总的态度是逐渐疏远，把他们从中枢的重要任务中排挤出来。

在地方军阀中追究与李璮交通的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一是这群人都有很大实力。忽必烈当时可以直接指挥，用来与阿里不哥争大汗位的武力，以及组成忽必烈的卫队武卫亲军的兵将，都是由他们提供的。二是眼前就有史天泽等擅杀李璮以灭

口的事实，认真追究，首先就要碰到这个问题。这件事弄不好就要迫使这些有实力的军阀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亲手所缔结的蒙汉统治阶级的联合就有可能破裂，新建立的政权也就有垮台的危险。因此，忽必烈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显得特别慎重和有节制。他总的原则是：在迫使这些地方军阀交出实权（特别是军队），消弭是以产生李璮一类叛乱的基础的前提下，既往不咎，而且根据情况与需要，继续任用以安定和拉拢汉人官僚；同时，利用这一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

为了补救自己的罪过，表示对忽必烈的忠诚，史天泽带头请求释兵权。史氏子弟即日解兵权者十七人。史天泽的姻亲，当时任武卫亲军指挥使的李伯祐，也在平定李璮叛乱后，求赏退休。其他东平严氏、满城张氏、济南张氏等都依法炮制。忽必烈也表示不咎既往，继续把他们当成汉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而予以优容。这样做，既收了地方军阀的实权，消除了分裂和叛乱的隐患，同时又安定了汉人官僚，保持了蒙汉统治阶级联合专政的稳定。这种曲意的克制和慎重，在对待济南张氏的处置上表现尤为明显。张帮直兄弟本为李璮同党，忽必烈处死他们的罪名却是“违制贩马”；对于张帮直的侄子张宏，忽必烈加以宽宥，仅罢军职济南万户而改授民官真定总管。

李璮叛乱的平定给忽必烈彻底解决割据华北的地方军阀创造了条件。忽必烈因势利导，加速了改革的步伐。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六点：

1. 削弱私家的势力，除本人外，罢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同时，除真定董氏之外，一度解除地方军阀之兵权。以后在灭南宋的战争中，史、张诸氏弟子又分别任命将兵，但这时的军队不再是他们私属。

2. 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治的制度。规定：管民官理民事，管兵官掌兵戍，各有所司，不相统摄。这个办法耶律楚材早就提

议过，但贯彻不了。李璮事平后，首先在山东以董文炳领军，撒吉思治民。其年十二月，作为定制，在全国施行。

3. 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消除割据的基础。

4. 易将、使将不擅兵。如以董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

5. 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以监汉军。

6. 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史天泽原封于卫，自动申请归还朝廷；张柔、严忠济所有封户，均在至元二年（1261）十一月明命改隶民籍。与此同时，忽必烈在中央置枢密院，作为总领军事的机关；加强中书省的权力，把司法、行政等权力集中中央。

通过这些改革，一个以中原王朝为张本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政权牢固地建立起来。这对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蒙古族本身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

李璮事件也大大地加深了蒙古统治者的民族猜忌情绪。当时，那些过去受汉人官僚所轻视和压抑的回回人便乘机伏阙群言："回回人虽然有时资取国家一点钱物，但还没有像秀才们敢于造反。"回回人从中亚一带远道迁来中国，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技艺，特别富于经商逐利、理财敛货的经验。他们可以供蒙古统治者驱逐，而又不会构成统治权力的威胁。因此，蒙古统治者一贯利用他们作为统治的帮手。而当李璮的叛乱发生更加增大了蒙古贵族的疑惧心理后，蒙古统治者便更加有意识地利用回回人，使之分任权力而对汉人进行牵制。至元二年（1261），忽必烈正式颁布："以蒙古人充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有元一代用人行事的基本政策。蒙古统治者迫于需要，必须利用汉人官吏来为他们办事，但是很不放心，于是每一个机关都分派一名蒙古正长来监临，又配置一名权位相等的回回官吏来进行防范和牵制。从这以后，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中央的实权逐渐落人回回人阿

合马手中，引起后来朝廷政局中一系列的矛盾与倾轧。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宪宗纪》、《李璮传》、《世祖纪》。

《宋史·李全传》

《宋史纪事本末·李璮之纳》

《元名臣事略》卷6《元帅张献武王》

《元文类·元帅张献武王庙碑》

东侵日本

元初东侵日本的战争，是十三世纪后期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元朝政府为这场战争前后共投入二十万兵力，动用五千五百余艘船。虽然由于日本政府与人民的奋勇抗击，元军遭到惨败，但残酷的战争使中日两国以及高丽人民都蒙受了巨大的痛苦，经济上遭到极大的损失，影响深远。

正当蒙古骑兵驰骋于欧亚大陆的时候，日本进入了由武士阶级掌握政权，实行军事封建统治的“幕府政治”时期。到十三世纪中期后，镰仓幕府的统治不仅在政治上日趋巩固，而且国家的农业经济也有了发展。幕府为了增加税收，对手工业和商业采取了奖励政策，同时将原来以实物计算改为用中国宋朝的铜钱作货币，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日本西部地区的武士们，为了获得宋朝铜钱、奢侈品和日用品，也积极进行与南宋之间频繁的海上贸易。

蒙古国的统治者最初对日本并不很关注。1260 年忽必烈夺得大汗位，高丽王遣太子倎请降。1265 年高丽人赵彝来朝，言谈之中，披露了不少有关日本的情况。从这时起，忽必烈开始注意到在不远的东方还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富庶的国家。1266 年八月，忽必烈命兵部侍郎黑的为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副使，持国书出使日本。高丽王以帝命派遣枢密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等做向导，至巨济岛，因畏风涛之险而返，向忽必烈奏曰：“诏旨所谕，道达使臣，通好日本，谨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

臣以往。至巨济县，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是以与俱而还。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对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

忽必烈通使心切，认为这是有意推托。1267 年再遣黑的指责高丽王王禃。仍然命令王禃遣官至日本，并限期回报。高丽王不得已使其起居舍人潘阜持元朝和高丽国书至日本。蒙古国书说：

“大蒙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结，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高丽国书云：

“……皇帝仁明，以天下为家，亲远如迩，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日本与高丽为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屡通中国；故特遣使以往，忽以风涛险阻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某官某奉皇帝书前去，贵国之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得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也，贵国商酌焉。”

潘阜于至元五年正月抵日本，至太宰府，闰正月太宰府将国

书送至镰仓幕府，幕府又送至京都，朝廷中正在准备后嵯峨上皇五十寿庆。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是与宋朝往来，这时读了元朝国书，大为惊骇、忧虑，庆寿之举，亦遂停止，祈祷神佛，以让避蒙古之难，并且命菅原长成起草回信，意欲答复，下发镰仓讨论，当时宗族认为蒙古国书言辞无礼，拒不理睬。潘阜在太宰府住了五个月，馆待甚薄，最后不得消息而归[①]。

1268年九月，忽必烈因潘阜能去日本，所以又命黑的、殷弘复持书前往日本，至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只得掳其岛民塔二郎、弥三郎两人而还。至燕京，忽必烈大喜，为了博得日本人的好感，对日俘大为优待，命人带他们游览宫殿，观后，日俘高兴地称赞道："这正是我们听说的天堂佛刹。"忽必烈听后更加高兴，又让两人遍观燕京万寿山玉殿和城阙。第二年六月，并让高丽人金有成持中书省牒节四次出使日本，护送他们回国。但还是不见日本政府的答复。

1270年年底，忽必烈又第五次派遣秘书监赵良弼持书往使，国书中说：

"盖耳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在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1271年八月，赵良弼一行二十四人抵筑前今津，日兵包围

---

① 参阅陈有和：《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第九期。

了他们，查问他们的来由，然后又想得到国书。赵良弼说："一定要面见你们的国王，才能给你们。"于是将国书的抄本交给太宰官过目，太宰府经镰仓转至京都。因为这次国书与前次大意相同，尽管朝廷想回信，但幕府借口国书辞语不逊，置之不答，只派了弥四郎等十二人跟随赵良弼入朝，乘机窥视元朝的强弱。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3年遂命赵良弼再次出使日本。赵良弼至太宰府多时，仍不得消息，后被驱逐出境。

至此，忽必烈前后共六次遣使欲与日本通好，都未能成功，大为恼火，于是决定诉诸武力来迫使其就范。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274年三月，忽必烈成立征东都元帅府，命凤州经略使忻都为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为右都副元帅，制造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计划用七个月的时间征服日本。

十月，忻都、洪茶丘率领由蒙、汉军二万五千、高丽军八千、梢工水手六千七百人，组成东征大军，从高丽合浦港出发，首先进攻对马岛。日守护代宗助国率族人奋起抵抗，均战死。元兵转攻壹岐，守护代平景隆亦战死。元军占领二岛后，接着又向肥前沿海袭击，于博多湾强行登陆。此时镰仓幕府已动员征集了九州之兵，号称十万三千人，会于博多，以抗元兵的进犯。元兵用毒箭、铁炮进行袭击，加之以集团战术进攻，使日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元军很快占领了今津、佐原、白道原、赤坂等地，这时元左都副元帅刘复亨负伤，大军仍不停止进攻，所到之处，焚毁掳掠，愈加凶狠。在强悍善战的元军打击下，日军大败，伏尸如麻，只得退守水城。此时天色将晚，高丽将金方庆请求继续战斗，但忻都却认为应该回军，于是下令大军回船休息，准备第二天再继续进攻。刘复亨因伤势太重，带着自己的部队已

先回国。这天晚上风雨大作，突然来临的飓风使夜宿于战舰上的元军束手无策，狂风卷着巨浪，似排山倒海，战船大部分被抛到海边岸石上摔得粉碎，高丽将领金侁也落水而死。元军无奈只得乘夜集合残部仓促撤归，第一次东征之役遂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1275年二月，忽必烈又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以高丽徐赞等为向导，持国书去日本说降。四月到达长门的室津。八月幕府派人将杜世忠等五人送至镰仓。九月七日斩杜世忠等五人于龙口，并枭其首。同时，动员全国做好准备，抵御元军来袭，并在九州设置探候所。十一月命北条实攻至镇西，任九州探题，督率军事。十二月又令西海的将士于次年三月，征集兵旅，以备征元。同时还令山阴、山阳、南海诸道修船舶，备军械。当时的镰仓幕府尚无力量向外征伐，这些举动都是为了鼓舞士气，加强防备。

忽必烈原以为可以用武力征服日本，不料第一次出征失败，使者又杳无音讯，因而不得不再次发兵。1279年二月，下令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六百艘。八月，范文虎建议再派周福、栾忠同日本僧人一道往谕其国，预计来年四月还报，根据他们是否服从，然后决定派兵之事。1280年三月，传来国信使杜世忠等在日本被杀的消息，征东都元帅忻都、洪茶丘等立即要求率兵再征日本，朝廷讨论决定稍微延缓，想再等周福的消息，但周福等亦于博多被北条时宗所斩。忽必烈遂再置征东行中书省，并召中书省右丞范文虎，商议征伐方略。八月招募士卒，粮一十万石，出征日本。

1281年忽必烈决定兵分两路：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高丽将金方庆、朴球、金固鼎等率领，辖蒙、汉、高丽军四万，从陆路至合浦，再乘战舰九百艘出海；南路军由阿剌罕、范文虎、李庭、张禧等率领，辖江南十万新附军，乘战舰三千五百艘从庆

元、定海出发，于六月十五日在日本壹岐岛会合，同征日本。范文虎建议请马二千给秃失忽思军队及回回炮匠以同行，但忽必烈没有同意。

五月，东路军从合浦出发，先攻占了对马、壹岐两岛。六月，进至博多湾，欲攻太宰府，在筑前志贺岛遭到日本军民的有力抵抗。元军以锁连舟，设弩而守，日船进攻者，多为机石所击破。由于南路军尚未到，东路军仅余一月之粮，箭矢也将用尽，又毙于疫者三十余人，士气受挫，终不能上岸，退于鹰岛。

七月，范文虎南路军才到，阿剌罕病死，忽必烈命阿塔海为征东行省丞相前往接替，可是范文虎未等阿塔海到达，即命进攻。肥前海上，旌旗蔽天，舳舻相衔。日本第一次面临着这么强大的外敌，情势十分危急，元军先占平户岛，后移至鹰岛。此时正值西南太平洋的飓风季节，元军的舰艘为了防止日军偷袭，都是并靠连在一起的。八月一日飓风突然到达，刹时间海上狂风巨浪，暴雨倾盆，四千四百艘战舰，有的如枯落的柳叶，四散飘零；有的则被互相撞击粉碎，瞬间即被怒涛吞噬。军士号呼着溺死海中，尸体随潮汐进入浦口，浦口因此阻塞，以致行人可以从上面踏过。这次飓风历时四天之久，八月五日才风停雨住。平章政事张禧因舍舟筑垒于平户，战舰亦采取了避风的措施，各相去五十步止泊，故所部独幸免。大风过后，范文虎见残局无法收拾，决意北还。于是选择坚实的船只，乘坐回国，弃下残部士卒十余万于五龙山下。一时间群龙无首，只好商议提选一名百户为主帅，称为张总管，听从他的指挥，伐木作舟，准备逃回。但已为时太晚，八月七日，日本人反攻，奋战两昼夜，箭尽粮绝，七八万人被杀，“伏尸蔽海，海可步行。”余二三万人于八月九日被日军掳至八角岛，凡蒙古人、高丽、汉人全部处斩，只留下新附军（日本称之为：“唐人”的中国南方人）免死，充作奴隶，十万大军中仅三人归还。这次全军覆没的真相直到败卒于闾脱归，

方才大白，忽必烈勃然大怒，将尽罢大小将校，召刘国杰为征东行省左丞。后经劝说，方才全部恢复他们的官职。就这样，忽必烈苦心策划准备的第二次东征日本之役又归于失败。这一年是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之为“弘安之役”。

两次大规模的东征之役遭到惨重失败，仍未使忽必烈清醒过来。1283 年九月，诏命平滦、高丽、耽罗及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只三千艘。次年复立征东行中书省，阿塔海为中书省丞相。同时，积极募军备粮，命舟师习水战，准备秋季再次大举征日。

但是长年的战争，国力已经疲衰，人民再也无法承担这种沉重负担。受害最大的江南各地人民揭竿而起，仅 1283 年就有二百多处地方发生了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武装斗争。这种情况迫使忽必烈于 1286 年下令停征，并撤销征东行中书省。江浙一带军民久苦于是役，消息传来，欢声如雷。后来虽又有几次复征之议，但都遭到左右大臣们的反对，加上连年征讨安南、缅甸、爪哇，兵力不足，才又延缓下来。1294 年忽必烈死，成宗即位。元朝对海外的大规模战争才停止下来。

1283 年，忽必烈曾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和尚如智出使日本，遇风不达。1284 年，再遣江南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从庆元出发，经由高丽合浦，至对马岛附近时，船夫不愿前行，杀掉王积翁。两次遣使都没有成功。1299 年，元成宗又遣补陀寺和尚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宁一山到达日本后，虽然很受敬重，但镰仓幕府仍然拒绝了与元朝通使的要求。

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对日本的征讨都是一种侵略的行为，而日本政府屡次怠慢、杀害来使，又催促了战争的早日来临。由于负责指挥的将领不力，将领之间不和，军中发生疫瘟，缺乏科学知识以及日本军民的英勇抵抗，占据优势的忽必烈东征大军却遭到惨败。大规模的战争给国内人民和高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而日本镰仓政府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镰仓幕府由此而衰败下去。同时东征还导致了后来为害元末以致整个有明一代的倭患。

但是，忽必烈对日本的东征并没有中断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中日传统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元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证明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都始终保持着密切交往和文化的联系。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兵志》、《日本志》、《崔彧传》、《哈剌䚟传》。

《高丽史·元宗本纪》

《经世大典·叙录》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19《马元帅防倭记》。

元·欧阳玄：《圭斋集》卷 9《赵文敏公神道碑》。

世侯割据

自金宣宗南迁以后，黄河以北的州县官吏多委印逃去，金朝的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各地土豪乘机以保卫乡里为号召，招兵结寨，各据一方，形成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势力。这些人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护自己的资产和地位，或乘战乱之机图谋富贵，对蒙金战争的态度多数是见机行事，哪一主更强大，对自己更有利，就投靠哪一方，由于战争的形势复杂。他们中有的降蒙、有的附金，有的则徘徊观望，未有定属。

蒙古统治者要征服地广民众的金朝，特别是要在中原地区建立长久的统治，就不能不依靠中原地主阶级的力量。成吉思汗攻金时，就很注意网罗对自己有用的统治人才，并采纳归降的契丹、汉人的意见，稍改滥杀的做法，而采用招降政策。木华黎受命专征中原后，更注意争取汉人地主武装势力，利用他们去争城略地和巩固所得地盘。实行的办法是：一、凡纳土归降者，即命为当地长官，仿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如行省、领省、都元帅、副元帅以至州尹县令之类。后来有的还按其势力和所立战功，授予万户、千户、百户等蒙古官职。同时按照漠北制度，所命之官均许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甚至父兄尚存也可以将官职传给子弟。不少世侯一门几人都担任要职。在他们管辖范围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他们可以自辟衙署，任命属官。他们任用的官吏都是他们的宗亲、部属或幕僚，对他们唯命是从。他们可以自定赋税进行征收，宽急丰约，各唯其意。司法权也掌

握在他们手里，他们的话就是法律，他们对百姓有生杀予夺之权，稍有违背，可以随时处死。俨然春秋时各有分邑的诸侯，或唐代专擅兵民财赋的藩镇。时人通常称他们为“侯”。二、蒙古置达鲁花赤对他们进行监督，要求他们送子弟亲属为质，出兵从征和交纳贡赋。在他们效忠可汗、履行义务的条件下，蒙古统治者承认他们称霸一方的权力；他们一旦遇到军事威胁，大蒙古国也给以武力保障。世侯的献纳是大蒙古国重要的财政来源。世侯的军队为蒙古灭金和亡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成吉思汗 1227 年去世的时候，河北、山东、山西各地大大小小的汉人世侯有四十几个。小的世侯据有一州一县，大的世侯跨州连郡，控制好几个州。其中西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璮等，都各据重兵数万，所治地方二三千里，是当时举足轻重的汉人世侯。

刘黑马：其父刘伯林为金威宁县守将，1212 年降蒙，以攻西京功，即命为西京留守副元帅，赐金虎符。1222 年刘黑马袭父职，窝阔台即位时，立三万户分统汉军，刘黑马居首位。后又使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宪宗时率军镇守川、陕，遂转官成都。

史天泽：其父史秉直为永清大地主，1213 年降蒙，以长女嫁木华黎为妻，故史氏一门尤其受到优遇。兄史天倪招集清乐社壮勇万人为兵，号清乐军，从木华黎征战。1220 年攻真定，招降武仙，木华黎即命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真定府事，以武仙为副。1225 年武仙叛蒙附金，杀史天倪，国王孛鲁命天泽袭兄职，收复真定。窝阔台立汉军三万户，天泽居其一，分统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兵，仍主真定事。后史天泽以真定长官职让天倪子史楫，遂以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宪宗时，天泽转任河南经略史，以天倪另一子史权代为真定万户。真定路的兵民之权一直掌握在史氏手里。

张柔：易州定兴县地主，金宣宗南迁后，聚族党数千家结寨自保，后投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部下，官至经略副使。1218 年兵败被执，投降蒙古，蒙古以原职授之。于是张柔招集部曲，为蒙古取雄、易、安、保诸州，镇守满城。复攻真定武仙，辟地千余里，威震河朔，以功升为河北东西路都元帅。后改授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又将帅府移到保州。保州自 1213 年屠城后，荒空了十五年，张柔着意兴复，招流亡、通商贩，民居官府，焕然一新，成为燕南一大都会。其所部兵数不在刘、史二万户之下，1234 年，以灭金之功，又升为军民万户。1241 年，升保州为顺天路，割雄、易、遂、安肃四州隶之，辖境扩大，遂为顺天军民万户。后张柔从忽必烈攻宋，以其子弘略代理顺天万户。忽必烈即位后，张柔致仕，即命弘略袭职。

严实：泰安长清人，原为金东平行台部将，参加镇压红袄军起义，升长清县尉。1219 年，因东平行台怀疑他交通南宋，于是叛金归宋，宋授以济南治中之职。严实利用宋朝旗号，分兵四出，所至克复，太行之东，皆受其节制。1220 年，严实感觉宋弱蒙强，投靠蒙古更有利，便以所统诸州三十万户献于木华黎之行台，木华黎承制授予他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不久攻取东平，以为治所，故又称东平行省。严实辖境最广，所统凡五十余城，州县官吏都是他的将校部属，专以搜括为能。但他也能收罗地主知识分子为己用，如宋子贞、高肃、李昶等，均被招入幕府，因此东平人才特多。这些人帮助严实整顿吏治，招集流移，恢复生产，使东平成为蒙古统治区内比较安定、富庶的地方。1230 年，窝阔台召见汉地诸侯，赐严实金虎符。1234 年，再入朝于和林，授为东平路行军万户。1240 年，子忠济袭职。

张荣：济南历城县土豪。红袄军起义时，他招集乡民，占山为王，势力渐盛，遂略取济南府和淄州诸县，据而有之。1226 年，藉所统军民五十余万献降于蒙古，授山东尚书省、都元帅、

知济南府事。后从蒙古阿术鲁军攻金，击灭金京东山东行省国用安部，取沛县、徐州、邳州等地。河南受兵时，人民被迫北徙，张荣招徕安集，令民间分屋与地居之，督使耕作，因此济南荒地垦辟者特多。所统兵民与境土可与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相匹敌，时人称他为四诸侯之一，在灭金以后不久，他被授为济南路万户。

李璮：父李全原为山东红袄军领袖，1218年投归南宋，授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遂以宋朝名义联络红袄军余部，攻讨、招谕山东州县，连取海、密、潍、宁海、登、莱诸州，金青州守将张林以所统滨、棣、淄等州归降。不久李全与张林不和，发兵攻之，张林弃城奔降蒙古，李全遂据有益都。于是，山东东路各州基本上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成为介于金、宋、蒙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蒙古军在消灭了彭义斌部后，于1226年进取山东，济南张荣投降，带孙统兵围攻益都，国王孛鲁也亲自率军来援。1227年，李全力穷出降，于是山东州县均为蒙古所有。孛鲁承制授李全山东淮南楚州行省。1231年李全死，妻杨妙真代理其职。不久，李璮袭职，改称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李璮拥有强兵六七万，控制山东东部数十城之地，在山东三诸侯中势力最强。

除上述诸家外，大名行省王珍，中山万户邸顺，河东万户李守贤，太原万户郝和尚拔都，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等，也都是蒙古时期有名的汉人世侯。

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汉人世侯力图保持中原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封建生产关系。他们原有一批亦兵亦农的依附人口。在形成势力范围后，他们又进一步招集战乱中的流散人口，分给土地、房屋、耕牛和农具，恢复境内农业生产。他们修仓积谷，甚至用武力来保护收获。在普遍的残破中，各个汉人世侯的劳动人口必须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劳役。由于蒙古统治者需求很多，赋役又无一定的制度，世侯擅其赋役，因而征求苛繁。世侯又往往提倡且

耕且战，兵士要屯种，农民要备御盗贼，一旦战事需要，世侯为了响应蒙古统治者的征召，还把大批农民送去出征。这些依附人口是不能随意迁离的，世侯甚至对他们有任意处置的权力。显而易见，从中原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世侯势力范围内的农民的身份地位下降了。

除了召集大量农民外，汉人世侯还在蒙古游牧贵族的影响下把许多战争中的俘虏和掳掠到的人口用作驱奴。世侯占有的驱奴往往多到几百几千，用以应付蒙古统治者的兵役和差役，平时也用以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身份地位比一般农民更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但是在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制约下，在役使一段时间以后，世侯也就将他们遣放为良，转化为一般的依附人口。

有见识的世侯为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有效的封建统治，为了保存中原封建文明的传统，纷纷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在金衰蒙兴的过程中，残留的金原士大夫除少数退隐于穷乡僻壤外，相当多的人陆续投身于世侯幕下，成为世侯幕僚。世侯依靠这些幕僚治理地方，开学养士。他们聚集在一起，尊崇和扶植儒学，讲究经史，推明治道。保存在世侯幕府中的“秀民贤才”后来一个个进入忽必烈的王邸，为忽必烈建立元朝立下了重大的事功。他们所培养的新的儒士，不少人后来也成了元廷的职官。

汉人世侯所处的特权地位，是汉地特定社会条件与蒙古早期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存在本身也是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对立的。随着蒙古统治者在遵用汉法道路上步步前进，汉人世侯分民专土的特权逐步受到限制，直到最后全部取消。

早在1230年，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蒙古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开始对汉人世侯军民钱谷无所不统的专制权力进行一些限制。使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

摄；稍后又制定了初步的赋税制度。但实际上，军民分治的办法没有坚持下来，汉人世侯依然尽专兵民之权。如严实，既是东平路的行军万户，又是东平路的管民长官。史氏在真定，也同样握有兵民之权。自1239年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以后，课税所掌钱谷的制度也遭破坏。蒙哥时期，朝廷裁抑诸侯；忽必烈即位以后，就大刀阔斧地采取一个又一个措施。

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位伊始，郝经立即提出建立监司以便治理诸侯的建议；五月，朝廷设立十路宣抚司，削夺了郡县官吏世袭专擅的弊端。世侯之中，严忠济最为强横难制。1261年五月十四日，朝廷宣诏黜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兼行军万户严忠济，给汉人世侯以沉重打击。

1262年二月，李璮将涟海三城献宋，尽杀蒙古戍军，举兵反叛。忽必烈旋即派兵镇压，随后采取强硬态度，彻底取消汉人世侯的全部特权。

"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1262年规定：父兄弟子在同一部门任职者，罢其弟子。这一制度刚刚公布，张弘范和严忠嗣都相继罢官。王文干为行军万户，其弟王文礼为千户，于是王文干自愿解除自己的官职而让王文礼留任。

"一门不可兼掌兵民之柄"：李璮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侯权力太重，于是史天泽上奏："兵民之权不能由一门掌握，请从我家开始革除此弊。"史天泽解兵权迁他官，史权改授真定等路总管兼府尹，史辑解印归田。朝廷以董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张弘略也被解除兵职，担任京师宿卫。刘元振自成都军民经略使降为成都副万户。

"罢世侯，置牧守"：1264年十二月，开始罢免世侯，设立迁转法；同时，削夺民官符节，调换他们的原职，这些人死后，其子孙可以荫叙而不能世袭。当时朝廷派出三类省臣迁转河东、山西、河南、山东官吏：参议中书省事贾居贞、中书左丞姚枢行

省河东山西，罢侯置守；参议中书省事阿力海涯金河南行省事，始罢世侯而易置其地；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右三部尚书宋子贞行省山东，迁调所部官。

限制以至全部取消汉人世侯特权的种种措施，不仅主要出自汉人封建士大夫的建议，而且还获得了著名汉人世侯如史天泽、张柔等人的大力支持。这表明：随着蒙汉封建地主阶级的进一步结合，在特定条件下由汉人世侯的政治统治所执行的各种职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已经能够更好地执行。汉人世袭的取缔，有如它的兴起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张荣传》
《陵川集》卷37《上宋主请区处书》
《秋涧集》卷48《史天泽家传》
《遗山集》卷26《张柔勋德第二碑》
《静修集》卷17《郭弘敬墓铭》
《元文类》卷50《张宏行状》

忽必烈灭宋

11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破开封。在占领开封四个多月，大肆勒索搜刮以后，1127年四月一日，金兵北撤，带走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北宋的统治到此结束。1127年五月，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即皇帝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是为宋高宗。后来高宗又定都临安（今杭州），故史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

南宋统治集团昏庸无能，内部倾轧，造成政治上的极端腐败，对内贪婪地搜刮广大劳动人民；对外来的强敌奴颜婢膝，妄图换得一个苟安的局面。特别是贾似道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大大地加速了南宋的覆灭。

正当南宋的统治江河日下的时候，北方一个强大的部落——蒙古部却悄然兴起。在统一蒙古高原后，他们相继南下灭亡了西夏和金国，并降服大理，完成了对南宋的大包抄。

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长期的备战之后，以宋廷拘囚郝经为借口，举兵南下灭宋。首先攻击的目标就是南宋防御蒙古的最重要据点——襄阳。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樊城相对，是扼守长江的屏障。金亡后，宋蒙多次争夺襄阳，但自1239年孟珙收复襄阳以来，蒙古军一直未能得手。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采用南宋降将刘整重贿襄阳守将吕文德，开榷场于樊城的计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遏制了宋军南北之援。至元四年开始的灭宋战争，也

是采用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如覆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的献策。

至元四年八月，忽必烈命阿术、刘整攻襄樊，揭开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的战幕。当时，襄樊号称城坚池深，兵储可支十年，两城相为固守，唇齿相依，广大军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决心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所以在战斗的头几年，虽然蒙古军用了筑堡垒、造舰船、练水军、绝援襄粮道等方法，使宋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但始终未能攻下。

至元五年（1268）春，蒙古军以破襄必先破樊，发兵围攻樊城。宋将张世杰与围城蒙古军战于赤滩圃，失败。七月，守将夏贵率舟师来援，袭阿术军于新郢，又败。秋，贾似道命范文虎来援，至灌子滩，再败。范文虎轻舟逃走。是年底，襄阳守将吕文德病死，弟吕文焕继为襄阳守将。

至元六年（1269）春，宋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范文虎忌李庭芝战功，致书贾似道：“我将带兵数万进入襄阳，一战便可取胜，但愿你不要让我受命于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归你。”贾似道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进兵，范文虎都每天携带美妾骑马与娱乐，借口朝廷命令未到，拒不发兵。南宋统治集团竟是如此腐败。

这年年底，忽必烈增派史天泽至前线，他采用张弘范计，在万山筑城以截断襄阳的西部联系，在灌子滩树立木栅以阻止其东部的往来。于是襄阳粮援中断。

至元七年（1270）夏，各路元军同时包围襄阳。六月，范文虎军抵鹿门，大败，他乘夜逃遁，战舰及辎重全部被元军俘获。

至元八年（1271），襄樊已被困五年，城中特别缺少盐薪布帛。李庭芝屯郢州（今湖北钟祥），知襄阳西北有清泥河，源于均州、房州，于是造轻舟百艘，装载货物，募民兵三千，由民兵部辖张顺、张贵率领，准备冒死突破元军防线，支援襄阳。这是

一次极大的冒险，所去者必是九死一生，但三千民兵，人人感奋。至夜，顺流入江，元舟封锁江口，无隙可入，张顺等斩断元军所设铁链，转战百二十里，元军不敢交锋，黎明抵达襄阳城下，城中军民得知张顺等来到。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可惜，张顺中箭牺牲。张贵又遣二民兵，泅水去范文虎处，约定郢州发兵夹击。至约定日，张贵率军突破元军防线，不料范文虎失约，张贵重创数十处，被元军俘获，不屈而死。张顺、张贵援襄事件，十分悲壮，他们虽然牺牲了，但这种斗争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

至元九年（1272）正月，元军采用了张弘范绝继襄樊水上联系的策略，又用西域回回炮攻樊城，于是樊城陷，守将范天顺战死。牛富率兵百余巷战，兵败投火自尽。二月，吕文焕以襄阳投降元朝。至是，可歌可泣的襄阳保卫战宣告结束。

元军占领襄阳后，即等于打开了南宋的大门，南宋王朝的崩溃已是无可挽回了。

至元十年（1273）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伯颜率师伐宋。伯颜分军二道：一道进犯淮西淮东，指向扬州；一道由他自己率领，沿汉水入长江，并沿江南下，直趋临安。

自襄阳失守后，贾似道继续推行民族投降政策，包庇重用在襄阳战役中怯懦逃遁的范文虎和叛将吕文焕的亲属。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他们毫无积极的备战措施。因此，在蒙古铁蹄面前，不是一触即溃，就是叛变投降。只有饱受蒙古铁蹄蹂躏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是抗元斗争的主力军，一部分爱国领袖，在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条件和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推动下，也投入了保卫民族生存的反元斗争中去。

由伯颜亲自率领的一路元军，以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随即包围郢州，宋守将张世杰在汉水设防坚守，元军由旁近水道绕过郢州，复入汉水，进至沙洋。沙洋守将王虎臣、王

大用坚决抵抗，元军用金汁炮焚民房，城破被屠，于是进围新城。新城守将居谊拒不投降，并射伤前来劝降的吕文焕，后终因寡不敌众，居谊与三千战士全部殉职。

元军入长江后，攻下要塞阳逻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仓皇逃遁，汉阳、鄂州相继投降。伯颜派阿里海涯守鄂，并进攻湖南，自率军队沿江东下。黄州（今湖北黄冈）奕喜、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南）管景模、江州（今江西九江）吕师夔和安庆的范文虎全都不战而降。沿江诸郡都是吕氏的亲属或旧部，也是贾似道重用、包庇过的将领，他们望风而降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许多州郡的人民，仍奋起抗敌，如池州知事逃跑，军民在通判赵卯发率领下，缮壁聚粮以固守，最后壮烈牺牲。

至元十年（1273）七月，度宗死，全后四岁幼子赵㬎为帝。朝政仍为贾似道控制。十二月，鄂州失陷后，贾似道在朝野舆论压力下，不得已出兵应战。第二年二月，贾似道率诸路精兵十三万，进驻燕湖，与夏贵兵合。同时又遣宋京与伯颜议和，与1260年密约一样，许以输岁币称臣，被伯颜拒绝。贾似道不得不命孙虎臣统领步兵七万驻于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自率后军驻于鲁港，于是双方发生交战。伯颜分步骑夹岸而进，又用战舰巨炮轰击孙虎臣军，孙虎臣军大溃，逃到鲁港。夏贵见孙虎臣军败，竟不战而逃，元军乘胜追击，宋军大溃，军资器械尽为元军所获。贾似道自鲁港逃至扬州。这次战役后，宋军水陆两军的主力几乎全部丧失了。

贾似道逃到扬州后，上书请迁都逃跑，谢太后不许。元遣使向贾似道索要郝经，贾似道大恐，将郝经遣还。宋廷谢太后命陈宜中为相，陈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太后罢贾似道官，贬循州。在押解途中贾似道被杀。

元军在丁家洲大捷后，乘胜沿江而下。太平、和州、无为等宋守将纷纷投降。元军直抵建康，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

晋逃跑，建康失守。元兵连取镇江、江阴、无锡、常州、西海州、广德等地。但各地军民仍然英勇抵抗。在无锡，元军遭到当地军民的英勇抗击，抗战军民惨遭杀害；在金坛，金坛人民组织义勇兵与元军奋战；在常州，元军占领后不久，张世杰即遣刘师勇等攻复，附近诸城纷纷起义，与张世杰汇合，直到这年十一月，常州才被元军攻破，守将姚訔、陈炤、王守节、刘师勇等继续率领军民抵抗，他们坚持巷战，宁死不屈，最后仅刘师勇等八人逃出虎口，全城惨遭屠杀。

临安危机，宋廷不得不发出勤王号召，但响应者甚少，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等少数宋臣起兵响应。

张世杰，范阳（今河北琢县）人，原是金将张柔部下，张柔降蒙，他投宋，为吕文德部属。在历次战斗中作战勇猛，抗元坚决。鄂州失陷后，他领兵入卫，途中收复饶州。

文天祥，名云孙，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以状元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勤王诏下后，他把全部家资用作军费，领兵至临安，宋廷命其驻平江。时元军已破常州，入独松关，前锋抵达皋亭山（今杭州东北三十里）。陈宜中命文天祥弃平江、守余杭。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由张世杰率领，背城一战，帝后入海逃难。但南宋朝廷无心抵抗，未久，陈宜中逃奔温州，张世杰领兵南下。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宋廷遣宗室赵尹甫、赵吉甫等携传国玉玺及降表赴元营，降表称："痛自贬损，削帝后，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由赐裁处，特与存金，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志。"伯颜接受了南宋降表，谢后命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衔赴元营请和。文天祥在皋亭山与伯颜抗争，伯颜将其拘捕，押解至镇江。二月，赵㬎正式上表投降，元改临安为两浙大

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等入城接管，至此，南宋灭亡。三月，伯颜入临安，赵㬎及全太后，稍后谢太后病愈后都被押送至大都。

在伯颜占领临安的同时，江东、江西、湖南诸路也多半被元军占领，但是各地的抗元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其中特别是扬州、潭州、台州等地军民的抗元斗争更是英勇坚强、悲惨壮烈。

守卫扬州的抗元英雄李庭芝，早年曾是孟珙的部下，孟珙死后，在扬州驻守多年。襄阳失守前，蒙古军队曾企图攻占扬州，但李庭芝一面坚壁固堡，招收流民，组织防御，一面修筑民房，免除税收，恢复盐业等生产；襄阳危急时，他曾率军前往支援，却遭范文虎等人排挤、拒绝；襄阳失陷后，元军大举围攻扬州，当时贾似道兵败如山倒，沿江诸郡，或降或遁，独李庭芝坚守的扬州，依旧巍然屹立，元朝派南宋降人前来招降，他一概杀叛焚书，态度十分坚决。临安失陷后，谢太后和赵㬎曾两次以诏书命他投降，并无耻地声称："现在我们都已臣服，你还为谁防守?"李庭芝以射杀来使作为回答。

李庭芝在扬州人民的支持下毫不动摇。当时高邮、宝应、通、泰、真州也都是继续坚守着，并以粮援扬。元军在扬州周围设南北两营，早晚合哨，死死围困，但各地人民仍不顾危险，趁哨过之时，以物资支援守扬军民。元军攻扬主帅阿术，驱使夏贵的降兵到扬州城下以示夏贵已降，又派使者来招降，被李庭芝杀了；阿术又奉诏赦他杀使、焚诏之"罪"，劝他投降，又遭拒绝。由于扬州周围州县相继失陷，城内粮尽，有的士兵烹子而食，仍然坚持每天苦战，斗志十分昂扬。

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益王赵昰诏李庭芝南下汇合。李庭芝命朱焕守扬州，自率七千军队经泰州入海。不料，朱焕以城投敌，李庭芝等被围于泰州，被捕牺牲于扬州。

其他各地人民的抗元斗争也在继续坚持着，并给予元军以沉

重的打击。

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元军阿里海涯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沙市人民死守小城，城破被屠。次年正月，潭州守将李芾率领军民奋起抗敌，经过激烈搏斗后，城被陷，李芾等英勇牺牲。

在广西，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军民团结起来，保卫家乡。邕州兵攻了三个月，前后百余战，守卫的将士死伤惨重，但仍不愿投降，阿里海涯、忽必烈前后以高官厚禄引诱马塈，均遭拒绝。外城破，马塈又率战士守内城；再破，巷战而死。其部将娄钤辖还死守月城十余日，最后自燃火，二百五十名战士与月城同归于尽。静江人民也遭到残酷屠杀。

在两淮，自从夏贵投敌后，两淮人民奋起抵抗。镇巢军人民不堪元朝镇戍军的荼毒，在镇巢守将、家僮出身的洪福领导下，尽杀戍兵，起义反抗。终因元军和叛将夏贵的镇压而告失败。至元十四年（1277）四月，淮人张德兴等起兵反元，收复黄州、寿昌军，势力波及湖北，并打死了镇压起义的叛将郑鼎。赵义一直坚持到九月才失败。

四川军民从1234年蒙古入境，到至元十五年（1278）合州失守，进行了四十多年的艰苦斗争。1259年，蒙古合诸道兵攻要塞合州，被击退。中统四年至至元元年（1263至1264），合州守将张珏组织了多次反攻，痛击敌人。至元四年（1267），蒙古军数万人进攻合州，也为守军击退。以后又长期牵制了一部分蒙古军队，支援了襄阳的保卫战。到至元十二年之后，元军在击败了南宋主力之后开始大举进兵四川，并包围重庆，张珏等率兵支援，并重创敌军。到至元十四年后，四川许多州郡在顽强抵抗之后，相继失陷。至元十五年，元军攻陷重庆，张珏率军巷战，不支，以小舟走涪州，不幸被捕，在解送元京途中自缢殉职。

临安投降前夕，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到温州。至元十三年

五月，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这年夏，文天祥在被元军押送至真州途中脱逃，经商邮航海至温州，旋即赶赴福州，被赵昰任命为右丞相，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抗元将领汇合在一起。当时，元军已占领广州，李庭芝等所固守的两淮地区已经沦陷，四川张珏等所固守的重庆地区也陷入重围，元军对南宋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但文天祥仍抱着“但今身未死，随力保乾坤”的决心，竭尽全力以图收复失地。

这年冬，文天祥率军入赣，相继收复宁都（今江西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江西许多地方起兵响应，一时军心大振。但是浙江与福建方面的战事却十分不利。十一月，赵昰由海道走泉州，又走潮州。宋福建招捕使王积翁叛于福州，招抚使蒲寿庚叛于泉州。

至元十四年（1277），文天祥、张世杰等在江西、广东等地与元军激战。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人民纷纷起兵配合。特别是福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也投入了反元斗争，使南宋的兵势稍有振作，给元军以不小的打击。许多抗元军民，继续写下了壮烈的诗篇。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的军民在守吏陈文龙率领下，拒绝向元军招降，斥责劝降的叛徒，发动兵民固守小城，城破被捕，不食而死。他的儿子陈瓒又召集义兵五百人响应张世杰，攻复兴化，坚持了七个月之久，在重创来犯的敌人之后，又进行了巷战，最后壮烈牺牲。是年底，赵昰逃至香山（今广东中山），又逃至谢女峡。

至元十五年（1278）初，赵昰逃至广州，又逃至硇州（今广东硇洲岛）。四月，赵昰死，赵昺即位，及至五月，改年号为祥兴元年。六月，移驻广东新会海中厓山，元遣张弘范率水陆之师二万南下，沿海漳、潮、惠、潭、广、琼诸州相继被陷。十二月，文天祥被捕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张弘范等千方百计要挟文天祥投降，均遭文天祥严词拒绝，并在招降书上留下了不朽

的诗篇——《过零丁洋》，最后两句曰：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后来张弘范不得不把他押送至大都，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文天祥被杀，死时年仅四十七岁。他在临刑前作赞词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张弘范率元军抵厓山，张世杰联结战船千余作水砦，为死守计。元军封锁海口，宋军被困，士兵舀海水解渴，纷纷呕吐。元军用火攻，被宋军击退。二月六日，元军发起总攻，突破宋军阵脚，宋军大败。陆秀夫见不可逃脱，抱卫王赵昺投海死。宋将士家属纷纷投海殉难。张世杰拥杨妃冲出重围，准备召集旧部，寻找赵氏后裔，再图恢复。不幸遇飓风，战船覆灭，溺死在平章山下，南宋的残余部队最后被元军消灭。

关于元灭南宋这个历史事件，元代思想家刘因写有《白雁行》一诗。诗中的"北风"指蒙古，"白雁"是伯颜的谐音。刘因写道：

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江水干，

北风三吹白雁来，寒气直薄朱崖山。

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残，

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来还。

南宋的灭亡，结束了唐末以来长达五百来年的分裂混战局面，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统一的新的历史时期。

（胡务）

参考资料：

《宋史》：《李庭芝传》、《文天祥传》。

《元史》：《世祖纪》、《张弘范传》。

元朝政府管辖吐蕃

吐蕃是古代人们对西藏的称呼。到了元代，中央政府设立宣政院专门处理西藏事务，并在西藏驻扎军队，建立驿站，调查户口，从而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管辖。

公元842年吐蕃赞普达磨被刺后[①]，吐蕃统治集团围绕继承人问题分为两派，一派拥立达磨养子允丹，占据伍如（今拉萨地区）；另一派拥戴达磨遗腹子斡悉弄，占据约如（今山南地区）。两派贵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内战。869年，又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持续一二十年，给予各地贵族以沉重的打击。这样，吐蕃王国政权完全崩溃了，而分裂成许多由地方首领或部落头人统治的"国"和族、部。

在斡悉弄之孙时，领地被允丹后裔所夺，长孙逃到纳里（今阿里），其三子分别统治古格（今阿里西南札达县一带）、普兰（今阿里东南普兰县一带）和麻城（今拉达克地区），形成三个小王国，史称"纳里速古鲁孙"[②]。次孙退据藏地（即后藏）上部今拉孜一带，其后裔中有一支迁到北方，一支迁到朵思麻（今青海东部和甘肃南部），还有一支回到雅垄河谷。允丹的后裔，则分布在乌思和朵甘思（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各地。

长期的战乱，将吐蕃旧有的统治秩序冲毁了，各地方势力之

① 赞普：吐蕃政教首领的称号。

② 纳里速古鲁孙：意为纳里三围。

间相互攻伐，属民不时起来造反，社会动荡不安。各地首领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需要利用宗教的力量；人民历遭劫难，也最容易接受宗教宣传。于是，在达磨灭佛一百多年之后，佛教又在吐蕃地区逐渐兴盛起来，史称"后弘期"。僧侣们在各地世俗首领的支持和资助下，到处兴建寺庙，广收徒众。许多寺庙建立在农业较发达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成为各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集中地和文化教育中心。一些大寺院占有的财产、土地和属民日益增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其住持们利用手中所握的经济、军事实力扩展地盘，左右地方事务，登上了政治权力角逐的舞台。邻近的地方世俗首领，转而需要取得这些寺院僧侣集团的庇护；一些世俗首领家族的成员则出家为僧，进入僧侣集团，逐步把住了住持职位，各地僧、俗势力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个以大寺院为中心的由住持们统治的宗教小王国。住持的职位也逐渐由僧侣推选转为世袭传承。

十一二世纪，就在这种寺院势力蓬勃发展和僧、俗统治者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教派集团，其中主要有：

噶丹派：乌思人种思端（1005—1064）迎请在纳里的印度高僧阿底峡（982—1054）来乌思各寺讲学，礼之为师，成为他的高足和教法继承人。1056年，种思端应达木（今拉萨北当雄县一带）地方首领的邀请，率领门徒到热振之地建热振寺，是为此派之发祥地。后来此派在乌思地区十分兴盛，建立了很多寺庙，形成一大宗派集团。十二世纪末，赞普后裔雅垄王族隆吉汪术成为其主要寺庙的住持。在他死后，由其侄袭任，被噶丹派许多寺院奉为首领，有权任命各寺的管寺和地方长官。此后这个职位还长期由雅垄王族承袭。

萨斯迦派：1072年，后藏款氏贵族建立萨斯迦寺（在今西藏萨迦县），逐渐形成以此寺为中心的教派，其势力范围包括今萨迦、昂仁、定日等县地，东面还扩展到江孜。历代萨斯迦寺住

持职位，都是由款氏兄弟叔侄递相传承，又有在个别情况下以其门徒代理。

噶举派：分成两大宗派集团，一称香巴噶举，为刻珠琼波所创，因盛行于后藏香地（今南木林县香曲流域），故名，一称达波噶举，始祖为玛尔巴译师。其徒铭移辣罗悉巴以苦行和法术闻名于世，达波（今西藏朗县一带）人锁南辇真从之学，后回达波建岗波寺（在今朗县西北），其门徒甚多，形成一大教派。锁南辇真的几个高足分立宗门，形成葛哩麻、搽里八、伯木古鲁等支派。

葛哩麻派为朵甘思人知三世（1110—1193）所创。他在朵甘思葛哩麻谷（今昌都西北）建寺，徒众达千人，自成一派。后来他又到乌思之堆隆（在今拉萨西北）建簇尔卜寺，终老于此。随着葛哩麻派在乌思地区的传布，此寺地位逐渐超过葛哩麻寺，成为这一派的主寺。

搽里八派为搽里（在今拉萨东南）人壤搽里八（1123—1194）所创。1175年，他在当地贵族噶尔氏资助下，建搽里八寺，进而扩展势力，自成一派，到十三世纪中叶，噶尔氏族人出任住持，其后这个家族遂直接掌握此派教权。

伯木古鲁派为朵甘思人朵儿只监卜（1110—1170）所创，1158年他来到伯木古鲁（在今西藏泽当东北）建丹萨替寺，四方僧徒来学者日众。十三世纪初，当地贵族郎氏取得了此寺住持职位，从此就由郎氏子弟相继承袭。朵儿只监卜的门徒又分立出几个派别：以必里公寺（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东北）为中心的必里公派；以思答笼寺（在今拉萨北）为中心的思答笼派；以牙不藏寺（在今西藏乃东县亚堆区亚桑公社境内）为中心的牙不藏派等。这些派别也都各自成为不同的地方势力。

宁玛派：宁玛意为古、旧，据称此派传承吐蕃王国时期的佛典，故名。

除以上各教派外，吐蕃地区还有许多较小的僧俗地方势力。往往一寺之主，一族之长，就可以在自己的统治区内行使主权。大小僧、俗首领之间政治上、宗教上的斗争经常不断。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一吐蕃后，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早在灭夏战争期间，蒙古军就进入过藏族地区。成吉思汗在灵州击溃西夏主力后，分兵进围中兴府，自己亲率一军南下，攻占了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等州。1231年，拖雷率右翼军假道宋境攻金，由大散关南下，分兵西出，掠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等蕃、汉各族杂居地区。这两次用兵都只是在吐蕃最东北部的边缘地带，结果并未建立统治。

蒙古大规模经略吐蕃之地则始于阔端。1235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之地，并命统军攻南宋四川。阔端率军先取金未降之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州，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熙河节度使蕃部首领阿哥昌等降，以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招集吐番部落，立城垒，课耕桑。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员。1236年，蒙古军入宋境，宗王穆直与先锋按竺迩分兵取宕昌、阶、文等地，招降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

1239年，阔端派将领道尔达进兵乌思藏。蒙古军推进到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杰拉康寺被焚，僧众五百人被杀。不久，道尔达悔悟，捐金重建佛寺，率军退回，并向阔端报告乌思藏各教派情况，建议任命宗教首领管理其他。1244年，阔端派遣道尔达等再入乌思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来见。萨班奉召，即携其侄八思巴、恰纳朵儿只启行，1246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这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贵由的即位大典，次年回到凉州，于是与萨班议定归附条款，由萨班致书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信中先宣扬蒙古军威和对归降者的优待政策，接着

传达阔端令旨，要点为：一、各地世谷首领，官仍原职；二、任命萨斯迦首领为达鲁花赤[1]，赐金、银符；各地官员处理政务应请示萨斯迦金符长官，不许自由行事；三、各地编出籍册，开列官员姓名，俗众人数和贡赋定额，一式三份，一份进呈，一份交萨斯迦，一份由本地官员保管，以后由朝廷遣官与萨斯迦官员共同征收国赋。萨班还开出了一长串贡品单子，包括金、银、象牙、珠宝、兽皮、羊毛等，并再三劝诫各地首领要恪守纳贡义务。萨班与二侄继续留居凉州。八思巴从其伯父学习佛法；恰纳则学习蒙古语，阔端命他穿蒙古服装，后又赐他一女为妻。1251年，萨班死于凉州。

在萨斯迦派的带动下，乌思、藏、纳里诸地归附了蒙古。但由于吐蕃地区政治上的极端分散局面，各地仍散布着不少未服部落，因此蒙古继续用兵征服或招降这些部落，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元世祖忽必烈时代。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和里艄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继续征行。和里艄率军深入到拉萨北的达木地区。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取道今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征服了这一带的许多蕃部。其后，在蒙哥攻打四川时和元世祖前期，都曾进兵朵思麻、朵甘思地区，或遣官招谕各族酋长，先后把这一带的各零星部落收归治下。

在用兵的同时，蒙哥和忽必烈仍主要采取笼络吐蕃佛教上层人物的政策。1253年忽必烈驻兵六盘山时，遣使往凉州召萨班来见，时萨班已死，阔端之子蒙哥都护送八思巴谒见忽必烈。八思巴凭借对佛法和吐蕃历史的丰富知识博得忽必烈的喜爱，于是厚加赏赐，将他留在潜邸，其后忽必烈及诸妃、王子都从他受密戒，礼之为师。1258年，佛、道两家在忽必烈潜邸举行大辩论，八思巴以佛教方面的首席代表身份参加辩论，居然能引经据典，

---

[1] 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汉译"宣差"。蒙、元官名。

驳倒了道家。

同时，蒙哥也派使者持诏赴簇尔卜寺，召请葛哩麻派首领葛哩麻巴哈失住持（1204—1283）。葛哩麻巴哈失以有“法术”而声名远扬，在乌思、朵甘思地区很有影响，且扩及“章”地（今云南丽江一带），葛哩麻巴哈失在北上途中，扶持各地的僧侣集团，修复毁坏的寺院，继续扩大其影响。到蒙古后，他受到蒙哥的尊礼，受封为国师，赐品级黑帽，后来他的转身遂以黑帽喇嘛为名。他在蒙古、中原和西夏许多地方演法，并在宁夏建造一座大寺。忽必烈对他也深为礼敬。传说他曾在忽必烈面前表演法术，以致引起八思巴和他比法。不过八思巴在忽必烈潜邸的地位这时已经稳固，而葛哩麻巴哈失则是蒙哥宫廷方面的人物，于是忽必烈与蒙哥的勾心斗角以及后来与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也殃及这位吐蕃喇嘛。忽必烈听说葛哩麻八哈失拥护阿里不哥，因而把他逮捕，流放到海边，后又下之于狱，并处死了他的两个弟子。到至元初才将他释放，让他回到簇尔卜寺仍旧掌教。

吐蕃的其他教派势力，也相继向蒙古统治者表示忠诚，以取得蒙古朝廷的支持。

忽必烈在消灭阿里不哥势力、取得政权后，继续实行蒙古的分封制度，先后将诸子分封到各地区。1269 年，忽必烈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吐蕃地区为其封地。奥鲁赤死后，由其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孙搠思班相继承袭。元代吐蕃地区有事，常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处理。如 1275 年以奥鲁赤统诸王之军征吐蕃；1290 年由铁木儿不花镇压阶州（今甘肃武都）一带的蕃部。但是，随着元朝中央集权的加强，藩王的权力相对削弱了。吐蕃地区的军民财赋由朝廷设置地方官进行管理，统辖于中央的宣政院。镇西武靖王不能直接处理地方军政事务，而必须将意见陈告宣政院，由宣政院议拟处理办法，上奏皇帝，请旨决定。

由于吐蕃地区的特殊情况，忽必烈采取扶植一个宗教势力来帮助进行统治的政策，于是带头归附蒙古而且长期生活在他的宫廷、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萨斯迦派首领受到重用。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命八思巴之弟萨斯迦寺恰纳统治全吐蕃之地。1269 年八思巴制成蒙古新字，升号帝师大宝法王。忽必烈亲从八思巴受戒，屈万乘之尊，尽师敬之节，备极尊礼，并以八思巴领宣政院——管辖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

自忽必烈以后，元朝历代皇帝都置帝师一职，给予极尊隆的地位和最优厚的赏赐。每代皇帝即位时，都要特别颁发“珠字诏书”褒护帝师的权益，遣使持至萨斯迦张挂，以宣谕其属。帝师可以在皇帝的名义下就吐蕃政教事务发布告示，可以提名地方高级官吏。据载，元朝一代的十三、十四任帝师，除两三人出身不明外，其余都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或其门徒。款氏家族还有许多人被封为国师、国公、司徒、司空，甚至尚公主、封王。他们在朝廷地位声势煊赫，常能从赏赐中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在地方也掌握有相当大的政教实权。

不过，帝师的地位无论多么崇高，毕竟只是皇帝任命的一个特殊官员。皇帝利用他来控制吐蕃地区，而最高统治权则掌握在皇帝手里，他通过特设的中央机构——宣政院，实行对整个吐蕃地区的统一管辖。

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成立于 1264 年，掌管全国佛教以及吐蕃地区事务，以国师八思巴领院事。掌握实际权力的是院使，其长者以朝廷大臣担任，位居第二者任用僧人，由帝师辟举。1288 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宣政院的名称源于唐朝皇帝在宣政殿接见吐蕃使臣的典故，更突出了它作为管辖吐蕃地区之最高官署的地位。宣政院为从一品衙门，与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最高管军机构枢密院、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同为“得自选官”的四个主要中央机构，铨授官吏和处理所掌大

小机务，都可以直接奏报皇帝批准，不必通过中书省。宣政院的用人、行政原则是“军民通摄，僧俗并用”，体现了元朝政府根据吐蕃特殊情况而制订的寓政教于一的统治政策。

吐蕃地区有重大政务或发生重大事件，则设立宣政院前往处理，这是一种临时建置，与设在杭州管理江南佛教的行宣政院不同。如1337年吐蕃“贼”起，杀镇西武靖王子党兀班，即立使宣政院统兵镇压。不过，遇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宣政院必须与枢密院同议而行。

元朝在吐蕃全境推行统一的地方行政建制——“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吐蕃之地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由宣政院统辖，军民钱谷无不掌之，在这一方面，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故不另置行省。其下属地方行政机构，最高一级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行政区划上称为“道”。元朝将吐蕃地区划为三道，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管之。宣慰司之下，置元帅府、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邻近内地的藏、汉各族杂居地区，则置路、府、州、县。从宣慰使至万户各级官员，都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给予任命。其中有的是朝廷派遣，有的则任用当地僧、俗上层人物为之。万户、千户等地方官一般都由当地僧、俗首领充任，准许按本地习惯传袭，并得自署其下属官吏。

元朝还在吐蕃地区派驻镇戍军，有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新附军，亦置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管军机构。有的驻军元帅府等机构兼管吐蕃军民，集军政之权。

元朝中央政府在吐蕃设置了以下三道宣慰司：

一、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设置于至元初，因其所辖主要为朵思麻地，故又称朵思麻宣慰司。1269年，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河来属，遂以河州为宣慰司治所。其下

属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有“河州路、朵思麻路、积石州、贵德州、礼店文州元帅府、松潘叠宕威茂州宣抚司。

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朵甘思之地，并辖有四川的黎州（今汉源）、雅州（今雅安）等州县。

朵甘朵，亦作朵哥麻思，其地理范围包括今青海东南部、甘孜和昌都地区。元朝在这里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有朵甘思都元帅府、剌马儿刚招讨司、奔不招讨司、奔不儿亦思刚和亦思马儿甘万户府等。

元初，曾置碉门（今四川天全）等处安抚使、鱼通（今四川康定东）等处达鲁花赤等官，以招谕、镇抚这一带的吐蕃部落。1265年，建吐蕃哈答城（在今四川乾宁北），遣军戍守；1276年，以哈答城为宁远府。1278年，以吐蕃李唐城（今四川理塘）为李唐州。1279年，以朵甘思地之算木多城（今昌都）为镇西府。元朝政府设置了吐蕃招讨司来管辖这些地方。1283年，又割成都路所领黎、雅两州属吐蕃招讨司，其后又改为安抚司。1298年，并吐蕃、碉门安抚司、运司为一，改称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宣抚司。并置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为掌管钱谷的机构。

1323年，朵甘思之参卜郎（在今理塘北）诸部叛，劫杀过往使臣，夺取财物，声势甚大。元朝先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发兵讨之，后又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家台兼宣政院使，统兵前往镇压，并派出朝廷大臣督师，都未能平定。1325年，遣使招谕，参卜郎首领班术儿降，于是以乞剌失思八班藏卜为吐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率其属前往镇守参卜郎。

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即前藏）、藏（即后藏）和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围）三地区。乌思藏宣慰司设置于1283年之前，设宣慰使五员，其下属地方官有：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二员，乌思

藏各地万户十三，千户四，管民官二。此外还置有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乌思藏等处转运一员。元朝政府在乌思藏设置万户，主要是将原来各地势力统治的地域和人民进行划分，将当地僧俗首领封为万户长，使他们各以朝廷命官的身份治理本境。这对于限制各地方势力之间的互相争夺、混战，保持乌思藏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见于史籍记载的这些万户有：沙鲁田地里管民万户，搽里八田地里管民万户、乌思藏田地里管民万户、出密万户、嗸笼答剌万户、思答笼剌万户、伯木古鲁万户、加麻瓦万户、札由瓦万户、牙里不藏思八万户府、迷儿军万户府、后藏拉兑地区南、北两万户、后藏的万户。

通过这些统治机构的建立，元朝政府在吐蕃清查户口，设置驿站，进行有效的管辖。

忽必烈即位后，立即派遣由总制院使答失蛮率领的一批官员到乌思藏调查户口，择地建立驿站。1268 年又派遣籍户官员阿衮和弥陵二人去乌思藏，正式进行清查户口和土地的工作。这次清查对象，只限于所置各万户、千户属下的平民。寺院属民，不属万户、千户管辖的人民，以及纳里速古鲁孙和南部各地，都不在清查统计之列。这次统计得十九万余人口。

1287 年，元朝又派官到乌思藏进行第二次清查工作，并划分站赤。站赤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单独系统，划分设置驿站的地方就成为一块特殊的区域，不隶属于当地的万户；每站由朝廷设一站官管理。有关驿站事务，各宣慰司需禀报宣政院，然后由宣政院会同中书省议定处理办法。元朝政府十分重视保持吐蕃驿道的畅通，遇有灾荒、战乱，站赤消乏，即由朝廷拨款赈济，使补买马、牛和食羊等物以供给驿传。如 1292 年乌思藏宣慰司报告，由于必里公叛乱，站驿继绝，诏命发给乌思藏五站每站马一百匹、牛二百头、羊三百只的价银。这种装备规模，大抵和大都、上都附近以及各行省治所、交通枢纽处等特别重要的大站相

当，而远远超过内地一般的大小驿站。如果中央拨款不足备办，还允许从宣政院所掌的吐蕃税收钱物内增加支给。元朝政府派遣大臣到吐蕃地区办理大事，往往以“治邮传”为一项要务。元朝在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道设置了大站二十八处，小站七处。因吐蕃地面广远，人户数少，设站不如内地稠密，每站驿程常常相距四五百里。

元代吐蕃与内地来往极为频繁。由于管辖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宣政院设在大都，历任帝师也都在大都供职，所以有关吐蕃地区的重要军政事务，都必须从大都发布命令，或派官到当地处理。吐蕃各地僧、俗上层人物亦经常往返于大都，或为谋求官职，或为解决相互间的纠纷，或为邀取赏赐。因而驿站的设置，对传达和贯彻中央政令，维持元朝对吐蕃地区稳固的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见，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由元朝政府规定的。元朝政府对吐蕃的有效管辖强有力地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赵阿哥潘传》、《按竺迩传》、《武宗本纪》、《百官志》、《释老传》、《桑哥传》、《成宗纪》、《文宗纪》、《顺帝纪》、《地理志》、《世祖本纪》。

《经世大典·站赤》

《红册》、《青册》

《明史·西域传》

辽阳行省统辖东北

元代在行政区划方面的一大贡献是实施了行省制度。元朝中央设有中书省，直接管辖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被称为“腹里”。其他地方划为十个行中书省，分别称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和湖广，其中管辖东北的便是辽阳行省。

早在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时，把幼弟帖木格斡赤斤封在以哈勒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最东北地区；这就使斡赤斤极其便于沿哈剌温山东麓继续向东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就像术赤领地沿着蒙古国的西北界大幅度地向外推进一样。斡赤斤一家不仅在实际上取得了镇守辽东的藩王地位，而且至迟到塔察儿时代，那兀江（今嫩江）流域等地业已被直接并入斡赤斤后王的份地。蒙哥死后，塔察儿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拥戴忽必烈为大汗，因而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在当时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敬。然而这并没有能缓和元政府和斡赤斤后王之间争夺对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塔察儿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至元二十三年(1286)，鉴于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反状日益明显，而元政府统辖东北行政的最高地方机构宣慰司“望轻”，元廷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正式将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升格为行省。接着，又将省治从辽阳徙至咸平（今辽宁开原）。东京行省虽然不到半年就撤销了，但仍然成为触发乃颜起兵叛乱的直接原因之一。直到乃颜、哈丹秃鲁干之乱被平定以后，元政

府在辽东地区的行省建置才巩固下来。

辽阳行省的辖境，东临大海，并包括骨嵬（即库页岛）在内。设置在辽阳行省最北的统军机构征东招讨司，位于道路险阻，须“犬驾杷行冰上”方可到达之处。东北设立的驿站起自黑龙江下游的末鲁孙站，由此直抵海口处的弩儿哥地（或称纳里干、奴儿干）。征东招讨司即在与骨嵬隔海相望的弩儿哥。文献中留下了元军曾在此地屯田镇守的记载。后来明朝于此建奴尔干都司，不过是沿袭前朝遗规而已。

行省西面辖有大宁路、宁昌路和泰宁路，自南而北分别与腹里地区的上都路、全宁路以及岭北行省相邻。

辽阳行省的南端，包括辽东半岛在内，它的东南与高丽接壤。行省所辖开元路南境最初抵于铁岭（在今朝鲜元山之南）。十三世纪末，双城府治（在今朝鲜永兴）以南地区相继为高丽收复。此后开元路南界遂止于双城总管府治。至正六年（1346），高丽政权遣枢密副使柳仁雨破双城，收复都连浦及定州、宣德、元兴三关门以南的朔方道全境。元与高丽国疆界的东段，由此北移至今朝鲜咸兴南——西南一线，大致上恢复了辽金时期的状况。两国边境西段，至元初年以鸭绿江以南高丽国“北界”诸州辖境为界。至元六年（1269），高丽权臣林衍、李藏用等废高丽国王王禃，立王弟淐，擅断国政。高丽国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三和校尉李延龄等以讨林衍之名叛，将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六十余城降元。于是高丽北界和西海道（今朝鲜黄海南、北道）一部被并入元境。第二年，元廷改高丽西京为东宁府，以崔坦为总管。这时以慈悲岭为两国界山。至元十二年（1275）底，又升东宁府为路，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因高丽之请，以东宁所辖诸城归还高丽，至此，元与高丽间的这一段边界线，亦大体恢复到元初乃至辽金时期的状况。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之西的婆娑府，是这时候从高丽入境之后“驰驿中原的第一程”。

按照蒙古的分封制度，辽阳行省的不少地区作为份地被分封给了诸王或功臣。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家，即位于宁昌路的昌王（亦乞列思部贵族孛秃后裔）封地，位于泰宁路的辽王（斡赤斤后王）封地，以及世袭国王爵位的木华黎后裔的封地。“东诸侯”中的兀鲁、忙兀二部封地，后来也在辽东。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的份地在岭北，他在广宁路有一部分五户丝户，因此其后人中有被封为广宁王的。在以上诸家中，辽王和木华黎后人与元代中后期辽东政治史的关系尤为密切。

乃颜之乱平定后，原来隶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俘虏的蒙古、女真军队及其他人户，都被括人国家版籍，其中一部分还被徙置江南。元廷在今松、嫩流域建立肇州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吉利吉思、乌期、撼合纳等部众东居，并组织当地的各族部民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曾直接参与叛乱的斡赤斤系诸王所部军民，并没有被元政府全部剥夺。不仅如此，东迁的吉利吉思部民，至少有一部分在不久之后就拨给了乃颜的兄弟脱脱统属。延祐三年（1316），脱脱又正式受封为辽王。他的分地就在泰宁路。人明后，设泰宁卫于此。仁宗、英宗两朝，辽王脱脱位冠宗室，势力很大。英宗末年，他矫旨杀宗室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但仍得到泰定帝的宽宥，受厚赐，放还辽东。泰定帝于1328年死于上都。图帖睦尔据大都称帝，在为争夺帝位而爆发的两都之战中，辽王脱脱成为以梁王王禅、权臣倒剌沙为首的上都集团骨干成员。上都军队倾巢出动进攻大都时，脱脱与倒剌沙一起留守上都。上都军一度进展顺利。正值其时，驻扎在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帖木儿倒向大都，领兵袭取守备空虚的上都。脱脱就在上都失守时，为齐王月鲁帖木儿（哈撒儿系诸王）斩杀于军中。天历二年（1329）八月，文宗复位之后即封脱脱之子牙纳失里为辽王，赐之以故辽王脱脱印。

国王木华黎后人在辽东也有相当势力。蒙古国时期，木华黎

的封地是在桓州、兴和一带；中统、至元之初，他们迁往辽阳行省驻牧。元末明初在辽东局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野仙溥花、纳哈出等人，都是木华黎家族的成员。

元朝灭亡前后，辽阳行省的社会矛盾变得十分复杂。在当地部族吾者野人、水达达与元朝统治者之间，进入辽东的红巾军与元军及高丽国之间、辽东元军诸帅之间以及他们与高丽之间，先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元顺帝退出大都后，辽东元军将领各自拥兵一方，不相统属。元中书左丞相也速在山东兵败后，带领余兵逃到大宁，嗣国王、辽阳行省丞相、乃蛮台长子野仙溥花驻兵开元，洪保保据辽阳，哈剌不花据复州（今辽宁复县西北），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屯盖州（今辽宁盖县），平章高家奴聚兵平顶山（今辽宁本溪市南）及其东北的老鸦山一带，纳哈出则率兵围攻辽阳城，城破，洗劫杀掠之后，执洪保保而去。不久，逃到应昌的元顺帝任命野仙溥花为中书左丞相，纳哈出继任辽阳行省左丞相。于是，辽东各支元军在纳哈出号令下，成为北元政权的一大支持势力。

洪武三年（1370），元顺帝病死于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明军乘机出师北袭，攻下应昌，爱猷识理达腊仅带领几十名骑兵逃跑。第二年春，刘益派遣右丞董遵、签院杨贤携带辽东州郡地图并奉表请降。因此明朝在辽东半岛南端复州、盖州等地设立辽东卫，卫指挥司设在得利赢城，以刘益为指挥同知。数月之后。随刘益降明的洪保保等人杀死刘益、北逃投奔纳哈出。同年，新任定辽都卫都指挥马云等由登莱渡海，逼降盘踞在辽东半岛最南端金州（今辽宁金县）的元臣叶廷秀。接着，明军击退围攻辽阳城的高家奴，修缮城池、制造兵甲，正式在这里建立了定辽都卫（后改为辽东都司）。洪武五年（1372），恃险固守平顶山的高家奴兵败降明。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负隅顽抗的辽东元军奉北元为正朔，与明军沿大宁、全宁一线，以及在开

元、辽阳之间胶着对峙。尽管纳哈出不断出击明军、明对辽东地区的军事经略仍在缓慢而稳妥地进行，明军先后扫荡了大宁、全宁全境，又建东宁、沈阳等卫，使自己对整个辽东南部的防御连成一片。屯守今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东北滨海地区的元鲸海千户所、牙兰千户所的军官和部分兀者野人部众也相继向明军投诚。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任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随从，率领二十万大军，征讨纳哈出。明军进至金山，纳哈出见大势已去，只好率众款附，二十余万元军被俘。第二年，明军又乘势北进，横扫沙漠。北元嗣臣脱古思帖木儿从今呼伦贝尔地区西奔。明与北元之间的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纳哈出的投降，使盘踞北面的辽王阿札失里失去了南线屏障面直接面临明军的威胁。脱古思帖木儿西窜后，阿札失里势单力穷，于是他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向明政府请求内附。阿札失里的降明标志着元在辽东统治势力的最后消亡。

辽阳行省的设置，加强了对元代东北边陲的治理，使这一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比前代更加密切，同时也为明代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世祖纪》、《特薛禅传》、《成宗纪》、《诸王表》、《文宗纪》、《朵儿只传》、《乃蛮台传》、《也速传》。

《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地理志》。

《明朝实录》

岭北行省的建置

岭北地区是元朝的“祖宗根本之地”。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四朝，它是蒙古国的中心地域，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才降为元朝的一个边区。但有元一代，它在政治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帝位的争夺与岭北势力的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京师的屏障，“藩屏朔方，控制西域。”元代皇帝历来重视对岭北的管理，先派亲王出镇，后又设置岭北行省加强控制。

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岭北大部分地区——从怯绿连河上游以西直到按台山，都是拖雷家族的封地；怯绿连河中游以东直到哈剌温山，是成吉思汗诸弟的封地。因此，在岭北地区，诸王所部星罗棋布，各拥有自己的属民和军队。尽管在忽必烈即位以后，忽里台选汗制度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但蒙古诸王对皇位继承问题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忽必烈虽然战胜了阿里不哥，而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后裔仍分布在岭北各地，他们并不甘心放弃其取得皇位的权利，至元十三年（1276）爆发的昔里吉（蒙哥之子）之乱就是证明。对忽必烈统治权的严重威胁，还来自于据有按台山以西广阔地区的海都势力。海都的野心并不满足于统治窝阔台兀鲁思，还企图恢复其先人的大汗之位，因而始终把夺取岭北地区和故都和林作为实现其计划的主要目标。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忽必烈十分重视巩固其对岭北地区的统治，使之成为朝廷的北方藩屏。

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封第四子那木罕（一译南木合）

为北平王，出镇北方，统领诸王之军。至元五年（1268），海都开始东犯岭北，掠取按台山东侧诸王玉龙答失的部众，但被击退。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特派燕王真金到称海巡边抚军。次年，趁海都与察合台后王在河中等地争斗之机，命那木罕率领岭北诸王之军进驻阿力麻里，不断增给军马、器甲，后又遣右丞相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前往辅佐那木罕，监督诸军，加强对海都的进攻。至元十三年（1276）冬，从军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儿（拖雷庶子岁哥都之子）、明里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等叛。昔里吉等人本来都是阿里不哥的拥戴者，对忽必烈夺取汗位一直怨恨在心；忽必烈又使他们听命于那木罕，还要受安童的钳制，于是更加愤愤不平。这时在脱黑帖木儿策划下起兵反叛。叛军拥戴昔里吉为主，乘夜袭击那木罕营，抓住那木罕阔阔出和安童，将那木罕兄弟送到术赤兀鲁思忙哥帖木儿汗处囚禁，将安童送到海都处，并回师岭北，攻掠和林地区，取祖宗大帐，岭北诸王包括东道斡赤斤后裔多卷人这场叛乱，或暗中支持。忽必烈急遣伯颜丞相统领蒙古、汉军北征，打退昔里吉等叛王的进攻，随即以侍卫诸军戍守和林、称海等地，屯田实边。至元十八年（1281），皇太子真金和伯颜再次奉命巡抚诸军。

至元二十一年（1284），那木罕获释回朝，忽必烈改封他为北安王，仍命出镇岭北；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置王傅，掌管军需及本位诸事。在此前后，又派真金长子甘麻剌到北边防镇。这时海都、笃哇势力极盛，不断进犯畏兀儿地区和按台山一带；东道诸王乃颜等人叛迹渐露，而且有暗中勾结岭北和西道诸王的迹象。这便是忽必烈以两亲王同镇岭北的原因所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海都乘元朝集中兵力（包括岭北守军）平定乃颜之乱的时机，越按台山而东，次年，败甘麻剌于杭海岭，进据和林。忽必烈立即统兵亲征，收复和林，留知枢密院事伯颜镇守和林，辅佐那木罕；甘麻剌则召还。

至元二十九年（1292），北安王那木罕死，忽必烈改封甘麻剌为晋王，复命出镇岭北，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北方诸军和蒙古本土。《史集》所载授予甘麻剌统领之地包括哈剌和林地区，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河和怯绿连河地区，薛良格河和海押立，成吉思汗大禁地即不儿罕山，以及吉利吉思等地。甘麻剌所统之地几乎囊括全部蒙古本土及其以北地域。这些地区内的诸王、贵戚、勋臣所部军民，均受晋王节制。元贞二年（1296），成宗曾命合赤温后王也只里、哈撒儿后王八不沙、别里古台后王瓮吉剌带、斡赤斤后王也里悭等一道驻夏于晋王怯鲁剌之地，这次驻夏即是一次以晋王为首的大聚会。

晋王驻守怯绿连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之地，置内史府，秩从二品，设内史、中尉、司马、断事官等官属，并在大都置分司；原北安王王府官并转属晋王。按元朝制度，蒙古人的刑名、词讼、婚姻、驱良等事，归大宗正府管理，因此晋王所部蒙古人案件，即由大宗正府派札鲁忽赤前往①，会同晋王内史审理，重刑需禀报晋王决断。

大德六年（1302）甘麻剌死，于也孙铁木儿嗣为晋王。至治三年（1323）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泰定元年（1324），以次子八的麻亦儿间卜嗣晋王位。次年，又命第四子允丹藏卜出镇岭北。致和元年（1328）拥戴文宗的军队打败拥戴泰定帝太子阿剌吉八的上都集团，八的麻亦儿间卜适在上都，城陷后死。从此晋王甘麻剌这一家失去了统领岭北蒙古军民地位。

就在甘麻剌出镇的次年（至元三十年），忽必烈遣其孙铁穆耳（真金第三子）抚军北边，以真金的皇太子宝授之，使具有统率诸王、诸军的权力。这时，海都势力虽已被逐出岭北，但力量

① 札鲁忽赤：又译札鲁火赤、札鲁花赤。蒙古语。汉译"断事官"。蒙、元官名。

还很强大，元朝以大量军队防守按台山，称海沿边之地，除岭北诸王之军外，还有安西王阿难答所部军、诸卫亲军和汪古等部军，与诸王阿只吉、出伯所部防守西边的军队连为一线。因此特命铁穆耳以皇太子身份为诸军最高统帅，以便统一指挥，其地位在晋王之上。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铁穆耳回朝继位，是为成宗，以其叔宁远王阔阔出代总边军。

大德二年（1298）冬，阔阔出与诸王、大将们纵酒欢宴，备御怠忽，遭到笃哇突然袭击，大败。次年，成宗遣皇侄怀宁王海山赴北边统军，也授以真金之皇太子宝，诸亲王、诸军都听从他的指挥。海山与其王府官属驻守称海地区。大德五年（1301），海都、笃哇倾全力来攻，越按台山而东，海山与甘麻剌统率诸军，与之决战于帖坚古山，胜负相当，海都、笃哇受伤退兵。后海都病死，其子察八儿继立，笃哇与察八儿向元成宗请和。不久，海山乘窝阔台汗国衰弱之机，进兵按台山西，封地在也儿的石河的窝阔台后王秃满归降，察八儿逃往察合台汗国。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死，海山回朝即位，是为武宗。

武宗上台后立即采取了一项加强中央集权的重大措施：罢和林宣慰司，置和林等处行中书省，治和林，总领岭北地区的军政事务，而不再加派亲王到北方领兵。同时置和林路总管府，管理和林城及其周围地区；置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分治岭北地区西部。原来在岭北统兵、并积极参与定策拥立武宗的太师月赤察儿，被任命为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阳王，有诏命宗藩、将领皆听其指挥；又以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出任行省左丞相。在岭北地区设立行省总军领民，授予行省丞相以节制诸王的大权，这是元朝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发展。仁宗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路改名和宁路。行省的设置便可以对大德末年漠北地区大幅度增加的人口进行很好的管理，同时限制诸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岭北行省“统有北边等处”，其辖境大体和晋王所统之地相同，即蒙古本土及其以北地域。按照分封制度，岭北是晋王分藩之地，如同安西王分藩于秦蜀，西平王分藩于吐蕃的情况一样。按照行省建制，岭北行省作为元朝中央政府分治北边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统辖这一方面的所有地区，“控制一方，广轮万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站等事，都由行省管领。岭北是元朝皇室的故土，蒙古诸王最集中的地区，因此行省丞相常以勋旧重臣担任。自设立行省后，晋王的权力相对削弱了，王府直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本位下。行省官对诸王的无理要索和干预可予以拒绝；行省不能决定的事务，则报告中书省议决。

岭北行省管内的地方行政区，《元史·地理志》仅载有和宁路与称海宣慰司两处，其下不置州县。这是因为当时岭北蒙古人民仍是按千户、百户的组织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和宁路总管府和称海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区范围，大抵北至塔米尔河流域，南至翁金河流域，西至杭爱山和拜达里达河一带，东包今中戈壁省部分地，当然不排除有诸王属下牧地犬牙交错的情况。这两个地方政府机构直接管辖的只是直属朝廷的城市居民、工局、屯田、仓廪和屯戍军队等。太宗窝阔台时，和林及其周围地区划为大汗驻地，除设四季行宫外，还有不少从中原和西域迁来的工匠所建立的居民点。元朝政府又先后在这个地区设立多处屯田；建立了和林、孔古烈、扎浑、昔宝赤城等大仓库。这些都是直属于政府，由朝廷派官管理，隶于和宁路总管府的。还设置了和林兵马司，掌管地方治安工作。

称海宣慰司治称海城，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这里就是从中原各地迁来的汉民工匠聚居之所，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屯田，城中还置有仓库。由于其地近按台山，处在东西通路的要冲位置，后来成为元朝防守按台山沿边一线的军事重镇，真金、铁穆耳（成宗)、海山（武宗）都曾在这里巡抚或长期镇守。至治三年

(1323)，曾罢宣慰司，改置称海屯田总管府，其后又恢复了宣慰司的建置。

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范围在岭北行省西境。宣慰司都元帅府负有戍边之责，其西境、南境当抵于金山一线，即包有今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科布多省和戈壁阿尔泰省地；乌布苏省和札布汗省之地也属其防戍范围，当西北叛王作乱时，常常是先据有吉利吉思、谦谦州，进一步从这里进犯杭爱山地区的。称海宣慰司戍军，主要是六卫汉军和床兀儿所统钦察卫军。西北叛藩平定后，这些军队仍轮戍其地。称海宣慰司境内，屯田一直很受重视；除戍军屯田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也从事于农业生产，垦田面积达到数千顷，屯田地的分布甚广，这在漠北地区历史上可谓自古未有。

岭北地区原来的蒙古诸千户，多数分属于诸王位下，当不归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大德末年以来陆续归附元朝、迁入岭北的原海都属下各部落人民，都由行省负责安置，出官钱易牛羊给之畜牧，或发给农具、种子使耕垦自赡。这部分人民自然归行省管理，按其所居之地分别隶于和宁路和称海宣慰司。

岭北行省北境的"大泽"（今贝加尔湖）东西，分布着巴儿忽、火里、秃麻、不里牙惕等部落，马可·波罗将这个地区称为"巴儿忽地面"，并谓其境广袤达四十日程，该地区的部落隶属于大汗政府。元朝在这里设置火里秃麻牧场，为太仆寺所领全国十七道国家牧场之一。

吉利吉思、谦谦州等地自至元三十年（1293）收复并屯兵戍守后，当亦复设了行政管理机构。元朝政府曾将吉利吉思、乌思、撼合纳等部人民迁于辽阳行省和大都附近、山东等地，但不可能将他们全部迁离故土。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迁移了大批汉人工匠居其地，从事织造绫罗锦绮；谦谦州出良铁，是蒙古时代兵器生产的重要基地。元朝专掌兵器制造和供应的武备寺属下有

“欠州兵器局”（欠州即谦廉州），秩从五品，按规定其所辖工匠应有一千户以上。

诸王分地是岭北行省境内的一类特殊政区，每个王领有分属于他的一部分民户和牧地，称为“爱马”，元代汉译为部，或称位下、投下。诸王视其地位高低、属民多寡，各置王傅、府尉、司马或断事官等，管理所领军民，并可以成立自己的怯薛，形成许多不同层次、大小不等的藩领。当然，他们都统属于大汗（皇帝），王位的承袭、官属的设置，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

拖雷诸子袭领蒙古本土和绝大多数蒙古千户。其中阿里不哥诸子的分地在按台山至吉利吉思等处，蒙哥子玉龙答失的分地在札不罕河，而怯绿连河上游祖先故地则被授予忽必烈之孙晋王甘麻剌，其余诸王的分地所在多不明。

东道诸王分地除斡赤斤一支外，都应包括在岭北行省境内。搠只哈撒儿的后裔世袭领有也里古纳河、海剌儿河、阔连海子等处分地，因其中原分地在般阳路，故初封淄川王。大德十一年（1307），哈撒儿次子移相哥之孙八不沙封齐王，此后这一支首领都承袭齐王封号。今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上游，曾发现1225年所立的畏兀儿字蒙古文石碑一块，记述移相哥射猎事，以前学界称之为“成吉思汗石”，碑的附近还发现元代宫城一座。这一带正在哈撒儿分地之内，此城当是其后裔所建，疑即齐王府所在地。合赤温后裔世袭领有兀鲁灰河等处封地（约当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和蒙古东方省南部地），其中原分地在济南路，故这一支的长者封济南王。大德十一年（1307），济南王只里因参与阿难答篡位之谋被杀，另立其族人朵列纳为济王，后改封吴王。别里古台后裔世袭领有斡难、怯绿连河等处分地，其中原封地在广宁府，故这一支的长者世封广宁王。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昔班传》、《泰定帝纪》、《成宗纪》、《世祖纪》、《仁宗纪》、《百官志》、《地理志》。

《世界征服者史》

赛典赤治滇

1279年，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逝世于昆明。消息传开，哭声遍野。赛公“治滇六年，心滇之心，事滇之事，至元十六年，卒于滇，葬焉，……而近滇人思慕于王者，无不凭眺欷歔，徘徊于墓下弗忍去，盖六百年于兹矣。”为什么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地方长官的死，竟会受到老百姓如此深切的哀悼？为什么在他死后的几百年间，滇池周围的人民还那样怀念他？

赛典赤（1211—1279）；全名“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回族，出身于中亚细亚土库曼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别奄伯尔的后裔。“赛典赤”一词的原意相当于汉语中的“贵族”。成吉思汗西征时，赛典赤率领一千名骑兵，携带文豹白鹘迎降，成吉思汗命令他充当宿卫，随从征伐，呼他叫赛典赤而不唤其名。

太宗窝阔台即位，授他为丰、净、云内三州达鲁花赤，后改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转调为燕京断事官。宪宗即位后，命令他同塔剌浑行六部事，升为燕京路总管。赛典赤在任期间施行惠政，于是提拔为采访使，宪宗伐蜀，赛典赤主管运粮，使军队供应充足。

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设置十路宣抚司，赛典赤被擢为燕京宣抚使。中统二年（1261），世祖任命他为中书平章政事，并降制奖谕。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设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赛典赤出任平章政事。他任职三年，行省增加户口九千五百六十五，增加军队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

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中书省将这一政绩报告给皇帝，元世祖下诏赏银五千两，并命令陕西五路、四川行枢密院的大小官属都听赛典赤节制。

至元七年（1270），赛典赤镇守四川，宋将昝万寿拥强兵把守嘉定，与赛典赤军对垒，赛典赤以诚相待，从不发动侵扰，昝万寿内心叹服。不久，赛典赤应召回返，昝万寿请求置酒饯行，左右人员都感到难办，赛典赤却毫不疑惧，径直前往。当酒送上桌席时，左右侍从都说不能饮用，赛典赤却大笑说："你们的眼光是何等的短浅；昝将军能毒害我，难道能毒尽我朝之人吗?"昝万寿听后更加佩服。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下令：大军正围攻襄阳，各道人马应该进兵配合。这时赛典赤偕同郑鼎率兵水陆并进，到达嘉定，俘获二名宋将，顺流乘筏，截断宋军的浮桥，获取战舰二十八艘。不久世祖又命令赛典赤在兴元办理行省事务，专门供给粮饷。

由于赛典赤在地方和朝廷都做过官吏，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锻炼了行政管理能力，从内地汲取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仕途辗转中体察到一些民情，对群众疾苦有一定了解，所有这些，使得他成为一个阅历多、见识广、有才干、敢于革新的政治家。

在1253—1274年的二十年间，蒙元势力对云南的统治带有军事占领性质。当时，元朝的统治形式，在省级既有行省又有宗王，省政和王府往往发生矛盾。云南地处边陲，又是多民族聚居"南蛮"之地，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十分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激烈。元世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解决各种矛盾，把云南彻底纳入全国统一的范围，决定设立云南行中书省，委派赛典赤为首任平章政事。至元十一年（1274），元世祖对赛典赤说："我曾亲临云南。过去由于委任失宜，致使当地不安。我想选择宽厚谨慎的人前去抚治，只有你最为胜任。"赛典赤接受委任状

后，立即着手准备工作。他访求熟悉云南地理环境的人，将云南的山川、城廓、驿舍、军屯、夷险、远近绘成地图并进献皇帝，忽必烈极为高兴，于是任命他为平章政事，管理云南。赛典赤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消息传开后，云南宗王脱忽鲁心怀猜疑，暗备甲兵，以防其夺权，企图阻止朝廷委派的官员入滇。面对宗王脱忽鲁备甲兵以待的严酷现实，赛典赤采取的不是"力服"而是"心服"的办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派遣儿子纳速剌丁到脱忽鲁的住所登门拜访，并请求说："皇上认为云南守者非恰当人选，导致诸国背叛，所以任命下臣前来安集，并告诫一旦至境，即加抚循。今天不敢个人专断，希望您派一人前来共议大事。"脱忽鲁听后，大骂他的手下人说："我差点为你们所误事。"第二天，脱忽鲁派遣亲臣撒满位哈乃等人前往。赛典赤设盛宴款待宗王使臣，席上所陈金宝饮器，酒罢尽赐来使，使臣非常高兴。赛典赤说："二君虽为宗王亲臣，未有名爵，不能与你们商议国事，本想授给你们行省继事官这一职务，因为没有看见你们宗王，未敢擅自授予。"令一人回去禀报脱忽鲁，脱忽鲁极为兴奋，从此政令一律听从赛典赤。赛典赤在处理与宗王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宏大的胸怀，超群的能力，求实的方法。结果不仅消除了宗王的怀疑，而且使他心悦诚服。于是脱忽鲁由备甲兵相拒而转变为欢迎赛典赤入滇主政。

赛典赤上任后，深入下层，接近群众，调查访问，体察民情，以制定符合云南实际的改革措施，把治滇工作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赛典赤初到云南，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不仅在昆明接见来访百姓，还到大理、滇南去调查访问。在长期的战争动乱中，云南各族人民担负了沉重的租税徭役，生活疾苦，社会秩序混乱，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赛典赤在接近群众，察访民情的过程中，很注意了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思想情绪、精神面貌，听取各种对发展生产有益的意见。赛典赤在深入下

层，调查访问，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比较切合当时云南实际、讲求实效的改革措施。首先立足于把生产搞上去，解决各族人民的生活问题，安定社会秩序，最终达到巩固元朝对云南统治的目的。赛典赤治滇六年，进行的重大改革有：

一、改置令长，整顿机构。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官吏的赛典赤，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认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但在客观上，他实行的改革，确使上层建筑适应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赛典赤“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立之，宜改置令长，并从之。”至元十三年（1276），建立云南行中书省，开始设置郡县，改善阐为中庆路，下领一司、三县、四州，州领八县。并在中庆、大理两处设立提举，任命王荣午、赵子元充任。赛典赤注意提拔贤能，罢黜污滥，申明赏罚。在他秉政六年之间，民风大变，政令一新。这样，解决了王府和行省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了王府只是对省府进行监督的机构，而行省则是执行中央政令的权力机构，把云南彻底纳入元朝的统治范围。这一改革还是赛典赤治滇取得显著成效的组织保证。

二、安抚内外，宽以待人，不怀私仇。有几位土吏，因怨恨赛典赤不任用自己，便到京师告状。元世祖对身边的侍臣说：“赛典赤忧国忧民，我完全了解他，此辈小人怎敢诬告！”于是元世祖让人把他们送回云南，交给赛典赤处置。这几位土吏到后，赛典赤解下他们身上的枷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皇上将上方宝剑赐与我，而赴京控诉我专权，今天我不责怪你们，而且授予你们职官，能愿意立功赎罪吗？”几位土吏赶紧叩头拜谢，说：“小人该死，平章不仅宽宥，而且又委以官职，小人发誓以死相报。”赛典赤还秋毫不占别人送来的礼物。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每次来见，按例都有所纳献，赛典赤却将其分赐给从官或贫

民，自己一点不留。并准备酒席款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夷酋，送给他们衣冠袜履，换下他们原来身穿的弁服草履，使他们往往感激流涕。元江一带发生叛乱，赛典赤带兵前去征讨，而面带忧色。随从人员询问原由，他回答说："我并非害怕出征，而是担忧你们冒着锋镝，不幸无辜而死；又担忧你们劫虏百姓，使得民不聊生，等到他们被迫反叛，你们又前去讨伐他们。"军队到达叛军据守的萝槃城下，叛民三天不降。诸将请求进攻，赛典赤不同意。又派遣使臣通晓以理。叛民首领说："愿意遵奉命令。"又过了三天，仍不投降，诸将跃跃欲试，请求进兵。赛典赤还是不同意。一会儿有士兵爬上城墙发动进攻，赛典赤大怒，立即鸣鼓阻止。并召来万户斥责说："皇上命我定抚云南，而不是派我前来杀戮，没有主将的命令而擅自进攻，按照军法应当斩首。"下令手下人将其捆绑起来，诸将一起叩头说情，要求等到城破之日再行处置，叛将领袖听说后感叹道："平章如此宽仁，吾拒命不祥。"于是举国出降，违命万户亦释而不诛。交趾叛服无常，湖广行省多次发兵征讨，但都无济于事。赛典赤遣人谕以逆顺祸福，并且约为兄弟。交趾王非常高兴，亲自来到云南，赛典赤出郊迎接，以礼相待，于是交趾王乞求永为藩臣。一时间，西南诸夷都纷纷归附。赛典赤不仅对诸蛮采用争取归附的定抚政策，而且对内部也采取待人以恩的政策。诸蛮的归附，结束了蛮夷割据称雄的局面，全境停止了战乱，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这就为他的改革奠定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三、招抚流亡，赈灾恤苦。经过调查访问，针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现实状况，赛典赤采取招抚流亡，赈灾恤苦的措施，以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他招集逃散之人，抚恤鳏寡孤独，设路食以待劳民，使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抚绥。于是，人们对赛典赤"慕之如父母"，即使三尺高的小孩也知道他的大名。

四、奖农薄税，设仓备荒。赛典赤根据云南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现状，教民播种，造陂池以备水旱。采取遍垦田地，轻差减赋的政策，鼓励发展生产，他所兴办的一切工程，均放在农闲季节开工，以免耽误农时。赛典赤在听取群众对如何发展生产、减轻税收的意见时，有一席精彩的对话。赛典赤问："我想分给你们耕地，贷给你们牛、种、耒耜、蓑笠等工具。估计每亩收成多少？"当地人回答："亩产稻二石。"又问："输给官府多少？"当地人说："一半。"赛典赤说："负担太重，输官后将不堪忍受。如果遇到牛死买牛、耕具损坏修理，一家人衣食所需要的，剩下的一半难道够吗？"当地人回答："如果那样，只有收成的三分之一用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赛典赤最后决定："尽管你还能上交赋税，我担心你们的子孙能否继续；以后接替我职位的人，一定想征收满数，那时就会出现上下相恶的局面！我规定，同时你们不要违抗我，一律每亩输米二斗！"当地人听后很高兴，但提出一个问题："租倒是很轻，只是太远不好运到，怎么办？"赛典赤于是采用因地制宜的征收租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即根据当地地物产："宜马则人马，宜牛则人牛，并与粮值相当；不产牛马人以银。"这就是所谓"粮折牛马、粮折银"征收，它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办法。赛典赤还任命张立道为农官，"沿地土以令开荒，立三农以播百谷"；开展屯田，做好攻守的准备，将剩余田土分给农民；兴修水利，灌溉农田；设置义仓，贷给农民种子；减轻抽税，招徕商贾。由于这一系列措施的采取，在云南出现了吏治民安、五谷茂盛的安定、兴旺景象。

五、兴办水利，治理河川。在昆明作为南诏、大理"东都"的时期，滇池周围的水利曾作过一些整治，但在大理国的末期，段氏力量衰弱，无力东顾，又因战争频繁，滇池地区的水利失修，水旱成灾，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1274 年赛典赤赴滇上任及以后的六年之中，兴办了开挖海口、石龙坝，修筑松华

坝，整治“六河”等大型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对防止水旱灾害，扩大灌溉面积，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计划整治滇池水利工程之前，曾作过深人调查访问，并把水利专家张立道从大理请来昆明。在经过周密勘测后，共同制定了整治滇池水利工程的全盘计划，并把工程分上下两段。他与张立道分工负责。赛典赤作为一个兴利除害的改革家，他既负责总的筹划和指挥，又具体领导上段工程，脚踏实地地干。在他的指挥下，1276年秋冬农闲季节，治理滇池水系的庞大水利工程开始了。这项工程完成后，使昆明不少农田受益。

六、屯田垦荒，安业力农。在当时战乱不已，田园荒废的情况下，实行屯田垦荒是一项加速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措施。自张立道在昆明征发夫丁排水，得良田万余顷，赛典赤开六河以防备水旱，其子纳速剌丁选官专门督促军民屯田，考察殿最，作为赏罚的标准，于是屯政大兴。由于实行军民屯田的政策，大量荒芜的肥沃土地被开垦为农田，粮食产量增加，百姓安业力农，促进全滇农业生产的发展。政府还教民养蚕种桑，滇池地区更加富裕，以至“墟落之间，牛马成群。”军民屯田垦荒制度的推行，确是建设云南的一项重大措施，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在兴立集市，发展商业；改革币制，用贝便俗；改革婚丧礼仪，破除陈规陋习；立学建校，发展教育等方面，赛典赤都进行了一些改革，而且取得显著效果。

赛典赤治滇六年，至元十六年（1279）逝世，终年六十九岁，葬于鄯阐北门，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身穿丧服前去致祭，吊语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使者哭泣震野。元世祖追悼赛典赤的功绩，下诏云南省臣全部恪守赛典赤的成规，不得随便改动。大德元年（1297），成宗赠赛典赤为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大师、开府仪司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号忠惠。

赛典赤有子五人：长子纳速剌丁；次子哈散，为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第三子忽辛；第四子苫速丁兀默里，为建昌路总管；第五子马速忽，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赛典赤死后，一时间云南省臣不知抚绥诸夷之方，元世祖为此忧虑忡忡，近臣推荐赛典赤的长子纳速剌丁为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左丞，不久升为云南行中书省右丞。纳速剌丁实施了三件大事：其一是云南省规措所造金簿贸易危害百姓，进行罢除；其二是罢去元帅府，由行省兼领军民，结束了行省、宣慰司、元帅府并存的局面；其三是奏准只派达官贵人的子弟充当人质，而不必将所有云南官员的子弟遣往。这些措施都得到元世祖的肯定。

至元二十一年（1284），晋升纳速剌丁为荣禄大夫、平章政事。纳速剌丁上奏裁减合剌章一带的冗官，每年节省了俸金九百余两；又派专人掌管屯田课程，每年得金五千两。至元二十三年（1286），纳速剌丁派遣合剌章一地的蒙古军千人，跟从皇太子脱欢征讨交趾，论功赏银二千两。至元二十八年（1291），进拜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二十九年（1292），纳速剌丁因病逝世。赠推诚佐理协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封延安王。

赛典赤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地方高级官吏，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在那个时代，敢于正视现实、洞察时弊，了解民情，针对当时的云南特点，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行一系列在那个时代堪称为重大的改革，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在云南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七百年来滇池地区的人民，总是把滇池水利工程的效益，以及昆明成为祖国西南边陲重镇的声誉，同赛典赤的名字和他死后的封号“咸阳王”联系在一起。并刻石颂功，立庙祭祀。（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世祖本纪》、《地理志》。

《正宗正统实录》卷 41

《云南通志》卷 12

《元代云南史地丛考》

《云南备征志》卷 5

《景泰云南图经》卷 1

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

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升平（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登上蒙古汗位。1271年，改国号为元。1294年，病死于大都（今北京市）。在位三十五年，史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先后任用擅长“理财”的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总管全国财政。这三个人的任政时间，一共长达二十一年（1266—1282，1284—1285，1287—1291），占有忽必烈统治年月的五分之三，他们的“理财”对元代的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阿合马，原为花剌子模费纳客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城的商人。早先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与其关系密切。察必成为忽必烈妻子的时候，阿合马充任斡耳朵的侍臣。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阿合马受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执掌财赋。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阿合马兼知府事。至元元年（1264）并中书左右部入省，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中书平章兼领使职。《元史》称他“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观其与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七年，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阿合马被任为平章尚书省事。九年，并尚书省人中书省，阿合马仍为中书平章政事。十三年后，阿合马凭借忽必烈的信任，相继授引郝祯、耿仁等人入相。摈去藩府旧臣张文廉等，诬杀揭发自己隐私的崔斌、秦长卿。“势倾朝野，一

时大臣多阿之”；“一站子弟，并为委官”，达到权势的高峰。十九年，益都（今山东益都县）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激于义愤，乘忽必烈在上都，诈称皇太子真金还都作佛事，骗出阿合马，以铜锤击杀之，并杀郝祯。四月，忽必烈询问枢密副使孛罗，得其恶状，乃追治阿合马罪，戮尸于大都通玄门外，并杀耿仁及阿合马子、侄忽辛、抹速忽等。

卢世荣，腹里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县南）籍汉人。阿合马执政时期，以行贿得授职江西榷茶运使。后以贪赃被告发免职。至元二十一年（1284），由忽必烈近臣桑哥引荐，在和中书省官辩论政事，以“强词”胜丞相和礼霍孙后，被任为中书省右丞。卢世荣任职数月，恃势专横，肆无忌惮，奏杀不肯阿附的左司郎中周戭，先后起用阿合马旧党潘杰、冯珪等，分布内外。第二年，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章揭发卢世荣，经面质款服后，忽必烈下诏杀卢世荣。

畏兀儿族人桑哥，曾是朵日思（今西藏昌都地区及四川甘孜州一带）喇嘛胆巴国师的弟子。中统年间，胆巴因八思巴之荐得见忽必烈，遂留桑哥为忽必烈近侍。桑哥当过译史，能通西域各种语言，又“好言财利事”，深为忽必烈所器重。至元中，受命为总制院使，执掌全国释教，兼摄吐蕃（今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藏族居地）事务。卢世荣被劾治罪时，他知太子真金深恶卢世荣，不敢救援。但忽必烈不以他为罪，桑哥还得经常“参议”朝廷大臣任命等事。二十四年（1287）二月，忽必烈再次设尚书省，以桑哥为平章政事。十月，升为尚书省左丞相，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1288），改总制院为宣政院，桑哥兼宣政院使。桑哥位较阿合马、卢世荣二人更为尊显，所以他的权势也是三人之最。他与内外官叶李、忻都、要束木、沙不丁等结为一党，先后诬杀与己携贰的中书宰臣参政郭佑和杨居宽。当时凡铨调内外官职都由桑哥一人操纵，自近戚、贵臣见到桑哥都屏息逊

避，不敢奈何。二十六年（1289）十月，还因其党羽所请，立《桑哥辅政碑》于尚书省前，以褒奖他的“理财”大功。二十八年（1291）正月，蒙古勋臣之后彻里、也里审班、不忽木等在漷北（今北京通县南），向忽必烈告发桑哥专权行贿，误国害民之罪。二月，忽必烈下诏逮治桑哥。七月，桑哥伏诛，并追治其党，杀忻都、要束木、王巨济等。

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三人都以“理财”得用。在他们执政时期，元王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如：至元七年，北方诸路课程一年总额只银五万锭，合钞十万锭；而十八年，陕西一地，每年所办课钞即达五万四千锭，相当至元七年（1270）北方地区总额的一半以上。卢世荣任职期间，曾拟在全国岁课总额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外，另增三百万锭。桑哥为相时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王朝不仅扭转了往年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还填补了旧有的赤字钞一百万锭。他们的钱财大致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增加税课

十三世纪初，蒙古以军事征服崛兴于漠北。以后的数十年里，灭夏灭金，据有中原汉地，在其最初，对占领地区肆行抢掠和勒索。窝阔台统治初期，曾用耶律楚材推行改革，期以中原汉地行之已久的赋税政策来取代蒙古草原贵族的“不时需索”。然而，不久即因蒙古贵族的反对和西域商人的渗入遭到失败，旧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纸“遗文”。忽必烈即位初年，耶律楚材颁行过的“旧制”得到一再重申，基本改变了自窝阔台中后期以来日益加深的“困弊”局面。人民的负担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减轻，生产迅速地恢复起来。中统、至元初，国家规定的赋税、课榷额是很小的，但到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执政时期，原定额有了明显的，几乎是成倍的增长。

税粮：北方，忽必烈初年以窝阔台八年（1236）所定为法，即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减半，老幼不征。至

元五年（1268），又规定地多者改缴地税：“白地每亩岁输三升，水地每亩五升”。但至元十七年（1280），改丁税为：“全科户，每丁粟二石，驱丁粟一石”，每丁缴纳数量为以前的二倍。有些户等还丁税、地税同时缴纳。江南，至元十三年灭宋后，江东、浙西等地，依宋旧例征收夏、秋税，湖广则以每户一贯二钱钞的门滩代替夏税，秋税照旧。

盐榷：该项收入在元朝财政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终元之世，它一直占有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中统二年（1261），盐价每引值银七两，计钞十四贯。至元八年（1271），上升为钞十七贯。十三年（1276），由于平宋，两淮、两浙所产盐涌入市场，官定盐引价格因此大跌，每引为钞九贯。但到十九年后，盐引价格逐年上涨。到桑哥擅权的至元二十六年，每引盐价为中统钞五十贯，如不考虑钞的贬值，则其价为至元十三年的五倍多。

茶榷：至元十三年（1276）平宋后，榷江西茶。“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计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十七年（1280）后，废除长引，只用短引。茶引价格也急速上升，到二十六年（1289），每引茶价为中统钞十贯，较十三年定价增长了二十多倍。

商税：北方，至元七年（1270），“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折中统钞九万锭。至元二十六年（1289），“从丞相桑哥之请，遂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北方地区的商税较至元七年增加近四倍半。江南情况亦可想。

（二）官营牟利

为增加财政收入，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致力于官家垄断，经营矿场、药局，设立和买、平准、常平等机构。由于任用非人，经营结果，不是官吏侵蚀贪污，就是巧取豪夺，贻害百姓。

中统四年（1263），阿合马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领括户

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至元十二年（1275），又借口军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设官冶铁，制作农具，看来是件好事，但那些贪官污吏因此而“厚其值以配民”，成为农民的一大苦楚。

至元十二年（1275），阿合马请于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卫辉等路，籍括药材，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发盐十二万斤，禁止私人相互贸易。官家垄断商业，由于经营不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坐贾无所往，舟车停留，道路萧条。”

至元二十二年（1285），卢世荣建议：在泉州和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府收取利润的十分之七，商人收取十分之三。禁止私人泛海经商，违者一经抓获，扣留其所蓄宝货，由官府购买；如果隐匿，允许告发，并将所没收财产的一半奖给告者。又建议在上都、隆兴等路，用官钱买布帛，换取北方的羊马，选择蒙古人放牧，收取皮毛、筋角、酥酪等物，按十分成，官府取其八，牧者取其二。前一建议对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无疑是重大障碍。商人因“利”而甘冒远渡重洋之险，而今官家坐享其成，又有谁愿意从事海外贸易呢？而后者，给牧人的待遇尤其苛刻。放羊牧马，本是件艰辛活，但官府只给以皮毛、筋角、酥酪等物的十分之三，其生活又依赖什么呢？

至元中，阿合马设置总库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号“和市”。至元八年（1271），腹里官府雇工或收购物材，共计打造石材，搬载木植及一切营造等处不下一百五六十万个工时，和买秆草、烧草又不下数十万束，料粟不下数十万石，车具不下数千余辆。这对老百姓说来，又是一场灾难。经办吏员又往往克价十分之一二，有的老百姓年不得其价。

设立常平仓，本为赈济灾荒，忽必烈以此事嘱托阿合马。但是阿合马等信用的各处正官，不管丰年灾年，“桩配百姓”，并与

势要之家勾结，“把柄行市、积塌收籴”，牟取暴利。

（三）变更钞法

元代正式通行交钞，始于忽必烈中统元年。最初有丝钞、元宝钞二种。至元十二年（1275），曾添造厘钞，不久因使用不便而罢。中统及至元初，中书省对行用钞法非常重视。各地贮银为钞本，发行钞数大体按银本多少而定。昏钞倒换，除按规定缴纳一定的工墨费用外，别无增减。因此，钞值在相当长时间内稳定不变。当时，交钞一贯，买绢一匹，钞五六十文，买丝一两，米一石值钞六七百文，麦一石值钞五六百文，布一端值钞四五百文。

阿合马执政以后，不过十余年间，钞法大坏，钞价贬值至十分之一，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至元十三年（1276）后，各处平准库倒换金银，并发下钞本，破坏了银钞相权大法；第二，没有多少银本，却大量印发钱钞，造成物价涌贵；第三，总库行钱人等，物还没有收成，却预先定买，唯恐别人先取，所以不将钞看重而随便添买；第四，外路行用库，库令库子等人私下倒易，多取工墨费，以图利息，所以百姓昏钞到库，不能得到回换，民间必须行用，故昏者转昏，烂者愈烂，流传困难，于是分作等级，买货物时昏烂之钞几经折价，才有人肯接。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揽权之年，正是元代纸钞发行量最大的时期之一。自至元十三年起至二十六年，除至元十六、二十、二十一年三年外，其余年份每年钞的发行量均在九十万锭以上。其中二十三年为二百十八万一千六百锭，二十二年为二百零四万三千零八十锭，分别居有元一代年发行钞量的第三、五位。官府大量印发无本之钞终于造成钞轻物重的局面。

钞轻物重，引起统治者们的恐慌。忽必烈曾多次下令中书省集议拯治钞法。本来，要拯治钞法，首先应根除旧弊，节省中央、地方开支，控制行钞量，继则投入实物使钞价逐步回升。许

衡曾建议投人部分盐引回收纸钞，但是，这于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家”来说，无疑是剜心头之肉。这样，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发行新钞，公开宣布旧钞贬值。至元钞一贯相当于中统钞五贯，旧钞的贬值自然引起进一步的物价上涨。“积钞之家，不胜其损，破家破产，粟帛之家，不肯从贱，或至闭粜”。如以一张钞，由新到昏烂，使用期平均为五年计，到至元二十四年因发新钞而贬值、流通在外的旧钞总量达六百万锭以上。以当时全国人口数计，平均每人摊十贯。

（四）钩考敛财

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理财”的最大特色是用“钩考”的办法进行搜括。至元二十三年（1286），中书平章郭佑提到：“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尚书省成立后一段时间，钩考规模达到极点。京城之内，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地方情况也不一样，上至行省机构，下至屯田学校，到处都有钩考吏员的踪迹。钩考的对象，表面上是当事官吏，而遭受荼毒的是老百姓。至元中后期，朝廷不讲吏治，选官唯以筹集财赋之多寡为殿最。至元十七年（1280）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官吏停发薪俸，公开教唆他们贪污受贿，苛剥百姓。忽必烈不仅不想法制止这种风气，反而因此设赃罚库，征理司，坐得钱财。官吏经揭发贪赃，大都在退罚赃物后保有原职。钩考是按阿合马、桑哥一伙的收支标准进行的，与明文规定的税收不合。

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执政时期，吏员之酷虐，骇人听闻。据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桑哥派遣爪牙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往江南理算积久欠赋。当时期限严急，胥卒追逮，有的百姓被逼得嫁妻卖女，殃及亲邻，“已征数百万，未征犹数千万，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度，州县置狱株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吏发兵搜捕。”扬州、杭州两地受祸最烈，“无

故而殒其生五百余人”。又桑哥妻党湖广平章要束木，诛求无厌。有人妄言宋亡人元之时，有州县吏员及富户，挨户征收银子，准备输诸官府，银数已齐而事止。要束木即下令，要老百姓如传闻数缴纳。“使者旁午，随地置狱，株连蔓引，备极残酷。民以考掠瘐死者载道。”而得来的钱财，都为要束木侵吞。

可见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的“财用”都是从人民手中掠夺而来。时人董文用曾作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说：“放羊人每年剪羊毛两次，现在每天剪毛奉献给主人。主人因多得毛而欣喜万分，殊不知羊无毛蔽寒，冻馁将死。羊死则又从何处取毛呢?”

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等长达二十一年的“理财”，对元代历史的演进带来严重的影响。

在政治上，元朝的官吏迅速地腐败起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时期，为进行搜刮，增置了许多官府、官职。阿合马等失势后，虽曾列党羽名单进行追治，但终因冗员太多而无法一一淘汰。这对以后的吏治造成不良的后果。元代公开纳钱粟补官，最早也在至元中后期，这到天历年间成为一种定制，并被《元史》列为赈恤灾民的“圣政”之一。元代官员由吏出身者特多，这也是阿合马等秉政的“副产品”之一。他们选拔官员以“办课多寡”为标准，而“办课”正是吏的正职。于是，久而久之，由吏人仕，成了元代不成文的条例。

在经济上，阿合马等竭泽而渔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元代的剥削政策，大部分项目是在他们执政时期内开始确定下来的，以后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增损。由于农民的负担过重，元代农业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达不到前代的水平。由于官营垄断，元代民间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至元中后期，为逃避沉重的租赋科差，不少人背井离乡、逃亡异地。至元二十年（1283）由北方流亡到江南的人户就达十

五万之多。这个现象在武宗以后各朝日趋严重，成为终元之世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阿合马传》、《许衡传》、《世祖传》、《卢世荣传》、《桑哥传》、《食货志》、《何荣祖传》、《马绍传》。

元·程巨夫：《雪楼集》卷10《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增宜与蠲减》。

元·魏初：《青厓集》卷4《至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奏》。

郭守敬编订《授时历》

至元十七年（1280），郭守敬编成新历，世祖忽必烈赐名授时，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颁行，这就是著名的《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计算最为精确，采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而这部历法的制订者—郭守敬作为十三世纪中国的杰出科学家，取得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地位。1970 年国际天文学会曾命名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为郭守敬山。1977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由他们发现的得到国际上确认的四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张衡”、“祖冲之”、“一行”、“郭守敬”。“郭守敬”的国际小行星编号为“小行星（2012）1964TE_2”，正运行在浩茫的太空之中。

元初所沿用的《大明历》是金天会五年（1127）在宋《纪元历》的基础上稍加增益而成的。大定二十年（1180）虽曾加以重修，但由于已用了一百多年，基本数据未变，随着年代的增长，造成了历法与天象不符的弊病，对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刘秉忠曾提议修历，但不久刘秉忠死去。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决定立太史局（后改为太史院）改修新历，命郭守敬等人主持其事。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精通算数、水利，郭守敬受祖父的影响很大。后来，郭荣让他受学于精通天文、地理的刘秉忠，刘秉忠和他的同学张文谦都是忽必烈欣赏的人，因而郭守敬也被推荐给忽必烈。由于

郭守敬对水利建设的建议和在西夏等地的治水的成绩，使忽必烈很看重他的才能，命他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等人经过四年的努力工作，改制和创造了近二十种天文观测仪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实测活动，最后制订了《授时历》。

郭守敬认为，要制订新历，必须创制精密仪器，亲自进行天文测量，才能得到准确的数据。因而他花了三年时间创造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悬正仪、座正仪等仪器。

简仪是对浑仪进行了重大改革后创制的。元以前所使用的浑仪，把测量赤道座标、地平座标和黄道座标等三种不同座标的机构都装在一个系统内，结果使一个球面的空间安装了大小八九个圆环，使用很不方便，还妨碍视线。郭守敬创制的简仪精简了黄道座标，而把地平座标与赤道座标分成两个独立的装置。简仪是赤道装置，与现代望远镜中广泛应用的天图式赤道装置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它由四根斜立的支柱托着一根正南北方向的轴，围绕着这根轴旋转的是赤经双环。赤经双环的两面刻着度数，最小分格是三十六分之一度。赤经双环的中间夹着窥管，窥管可以绕着赤经双环的中心旋转。窥管两端，架有十字线，这便是后世望远镜中字丝的祖先。这样，只要转动赤经双环和窥管，就可以观测空中任何方位的一个天体，并从环面的刻度上读出天体的赤纬数值。赤经数值则由旋转轴南端的赤道环上读出，紧挨赤道圈里面，固定着百刻环，环上刻着十二个时刻，以测定时间。为了便于赤道圈旋转，简仪还应用了滚环轴承装置，使之转动灵活。这比达·芬奇发明滚珠轴承要早四百多年。

郭守敬创制的简仪是世界上最早制成的大赤道仪，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在 1598 年装置的使用赤道坐标环组的仪器早了三百多年。可惜清朝初年法国传教士纪理安别有用心地把它当作废铜烧毁了。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简仪是明朝正统年间的仿制

品，经过八国联军破坏后已经不完整了。

仰仪是铜制的中间空的半球面仪器，像一口朝天的大锅。半球的大圆面上刻着东、南、西、北和十二时辰，半球面上刻有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座标。大圆面上用竿子架着一块板，板上有个小孔，小孔的位置正好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就在半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倒像，映在座标上，即可读出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使用仰仪可以不必直接用肉眼观看强烈的太阳而得出它的位置，还可以直接观测日食的方向、亏缺和它的时刻。

圭表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观测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刻的天文仪器。“圭”与“表”是其中的两个部件。“表”是垂直立在地面上的标竿，“圭”是从表的下端向正北伸出的一条石板，圭表垂直状。每当正午时，表的影子就落在圭上面，以根据表影长短测定夏至、冬至等节气的时刻。郭守敬改制的圭表，把宋代八尺长的表提高到三十六尺，表上再用两条铜龙抬着一根根细细的横梁，使梁心到圭面达到四十尺。由于高度长，投影也就差别明显，测定的精度就高。圭的刻度很精细，有尺、寸、分、厘，还可读到毫。现存河南登封元代观星台的石圭由三十六方青石圭面和砖砌圭座组成，长三十一点一九米，宽零点五三米，高零点五六米，石圭水平程度较好，石圭方位经七百年后与当地子午线方位仍相符合。

郭守敬创造的景符是定影像的仪器。一片薄铜片中有一小孔，铜片装在一个小架上，使它在圭面上来回移动，当孔架和太阳在一直线时，在圭面上的太阳像中可以看出一条平分日面积很细的梁影，克服了由于日光在空气中的散射，造成表顶影子落在圭面上不清的弱点。用这种清晰的横梁影子来确定圭面日影长度，可准确到上下不差二毫米，这是旧圭不能达到的。

窥几是郭守敬用来测量星、月影长的仪器。其形如一长方

桌，桌面上开一长缝，两边刻上度数，将桌放在圭面上，把缝对正南方向，人可在桌下从缝中直接观测星、月，得到和太阳影长性质一样的量。窥几和景符都是高表的辅助仪器。

与此同时，郭守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他们陆续设立了二十七所观测台、站。其最北的北海测景所位于北纬64°5′的地方，已接近北极圈附近；最南的南海测景所地处占城（今越南南方）。这样大规模的地理纬度的测量，在中世纪是仅有的。经过他们不辞劳苦的观测，计算出黄赤大距（或称黄赤交角）的准确值，并观察到更多的恒星。

黄赤大距是黄道面与赤道面相夹的角度。在郭守敬以前，由于观测精度不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黄赤大距为24°，郭守敬利用他研制的先进的天文仪器，经过长期观测，得出黄赤大距为23°33′5.3″，与现代观测值仅差1′6.8″。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精确数据。

我国古代对于恒星位置的观测，是以观测二十八星宿为基础的。古人把黄道附近的星分为二十八宿，每一宿用一星作为代表，称为“距星”，两距星间的距离称为距变。元以前曾进行过五次测距，虽然一次比一次精确，但仍有很大误差，以北宋崇宁年间的一次为例，其绝对误差总和为4°32′，平均为9′。经过郭守敬测定后，精确度提高了一倍，绝对误差总和仅为2°10′，平均只有4.5′。郭守敬还对二十宿星进行了赤经赤线的测量，并编制成星表。此外，郭守敬还对二十八宿中杂坐诸星进行测量，测出前人未命名的星1000余颗，使当时能观测的星数从1464颗增加到近2500颗，而欧洲在文艺复兴前所测量的星也仅仅1022颗。

郭守敬等人经过四五年的艰苦努力，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天文资料，并参考前代历法，终于编出了新的历法，取“敬授民时”之意，故定名为《授时历》，它是我国古代最卓越的一部历

法。

《授时历》在七个方面进行了考证：一是精测了至元十七年（1280）冬至发生的时刻；二是结合以前各朝历志中所记录的冬至日，确定一年为365.2425天。这个数值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所经历的实际时间相比仅差26秒，与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颁布的，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格里高利历》是一致的；三是测定了至元十七年冬至时太阳的位置所在；四是测定了至元十七年冬至时月亮离近地点的距离；五是测定了同年冬至时月亮离黄白交点的距离，并进一步利用这三个数据确定了朔望月、近点月和交点月的日数；六是测定了二十八宿距星的度数；七是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大都的日出、日入时刻。

《授时历》又在五个方面取得了创新，求出太阳每天在黄赤道上运行的速度；二是求出月球每天绕地球运行的速度；三是由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赤道经度；四是由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赤道纬度；五是确定月道和赤道的交点。

《授时历》还正式废除了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这是历法史上的重大成就。所谓“上元积年”是古代编历的老传统，“上元”就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个朔望日的开始时刻和冬至夜半发生在一天；“积年”就是从制历或颁历时的冬至夜半上推到所选上元的年数。历法家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上元”，往往牵强凑合。郭守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以至元十七年作为推算各项天文数据的起点。

郭守敬不仅在天文历算方面成绩显赫，而且对元代的水利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复置都水监，交由郭守敬领导；郭守敬又奏陈十一件水利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修筑通州至大都的运河。在他的主持下，这条运河于至元三十年（1293）修成通航，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第二年，他升昭文大学士知太史院事。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时朝廷宣

布官员七十岁退休的制度，唯独郭守敬可以例外。从此，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行退休，成为传统。不过，郭守敬在晚年没有创造出新的成就。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郭守敬传》、《天文志》、《世祖纪》、《历志》。

《元史纪事本末·郭守敬授时历》

马可·波罗来华

马可·波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七百多年前，他怀着好奇和憧憬的心情，随同他父亲和叔父，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受到当时的皇帝元世祖的友好接待，在中国住了十七年。1291 年又奉元世祖命，出使波斯，从那里返回故里。他回国后写的游记，以热情洋溢的语言介绍了中国的富庶和文明，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记述虽然不无夸大失实和疏忽之处，但绝大部分是正确可靠的，为研究十三世纪的中国和亚洲情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更可贵的是，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的感情，他没有偏见和恶意，而是以尊重和称颂的口气描绘了中国，他为中国和意大利人民架设了友谊的桥梁。

早在我国战国时期，即公元前五至三世纪，中国作为“丝绸之国”的声誉已远播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士的注意。汉武帝时开辟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方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促进相互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东汉班超也奉命出使西域，且从西域遣甘英出使到罗马帝国，重新打通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丝绸之路”，为进一步发展对外关系，促进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到公元二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商人便可取道波斯，经过阿拉伯海、印度洋来到中国。公元 166 年，罗马皇帝安敦遣使来中国。这是首次载入史册的中国和

罗马的直接交往。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中国，经过唐高宗、武后、唐玄宗各朝，都有使节来往，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了解不断增进。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各国商队往来、贸易的盛况说："昔有贾客万余，橐驼数千，赍货逐利。"

中唐以后，中国开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经由中亚通往波斯等地，到达欧洲的陆路交通一度衰落，到了元代始得恢复，而且交往更为频繁和扩展，至此中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统治者经过三次西征，在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从中亚到小亚细亚建立了伊利汗国，加上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共建立四大汗国。金帐汗国的版图从西伯利亚西部达到多瑙河一带。伊利汗国的版图则从阿姆河以西濒临地中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以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跨越欧亚两洲的大汗国。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在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正兰旗所在地东约四十华里处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把首都迁到大都（今北京），大都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

蒙古统治者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设立完备的驿站制度，且驻军保护和维持治安。只要带有大汗的金牌，沿途可以役使官马，享受各种特权，不受国际关卡的限制，自由驰骋。一向阻塞、中断的中西交通，经过蒙古统治者三十多年的经营，这时已畅通无阻，各国使臣、商人往来络绎不绝。

当时，由欧洲到中国，大都取道地中海东岸。主要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由塞得港向伊斯梅利亚前行，一直进入红海，到亚丁后，渡海经印度进入中国。另一条道路是从地中海东端上岸，经阿勒颇到巴格达。然后，向南出波斯经印度来到中国，或往东，经中亚土库曼的马里来中国。因此，地中海东部成了前来中国的主要出发地。意大利处于地中海的要冲，在对东方贸易上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是：十字军第四次东侵以后，威尼斯城邦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交通。威尼斯城邦的势力范围和蒙古统治者的范围互相连接起来了。这种局势有利于威尼斯商人东行来到中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是世界闻名的，他们长于外贸易，富于冒险精神，很多史料都有记载，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反映，莎士比亚的名作《威尼斯商人》就是直接用威尼斯商人作剧名的，生动地描绘了轻财好义的中世纪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形象。

马可·波罗生于威尼斯商人世家，受时代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就远游来到了中国。

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马可是名，波罗是姓。马可的父亲名尼古剌，他的叔父名玛窦，都以经商为生。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于伊士坦布尔，后来又到了中亚的布哈拉地方，在这里遇到一位波斯使臣，并一同到了中国，见到了忽必烈。1269年，尼古剌和玛窦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这时马可·波罗已经十五岁了。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景仰。他也想做一位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携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和对中国景仰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同年十一月，他们由威尼斯启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亚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

他们启行不久又面临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苦行程。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了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了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又到达了和阗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三年半，于1275年夏抵达了元代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上都是忽必烈夏季避暑的行宫，正式国都定在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以后马可·波罗等人到达大都，并居住了多年。

忽必烈见到尼古剌、马可·波罗等一行，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年轻聪明，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中国的习俗和语言；加上他做事谨慎，所以忽必烈对他十分器重，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游览和访问。在1277年至1280年间，马可·波罗首次出访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由河北到山西，由山西过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逾越秦岭到四川成都，再由成都西行到建昌，并到过西藏藏族地区，最后渡金沙江，到达云南昆明。第二次是去江南一带，所走的路线似乎是取道运河南下，他的游记里有淮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在扬州，他还担任官职三年。此外马可·波罗还奉使访问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

波罗家族三人在元朝宫廷供职十七年，时间长了，难免有思乡之情；同时感到大汗年事已高，如果不趁他健在时回去，也许得不到沿途的照应，因而多次委婉呈辞，要求西归，世祖总舍不得他们离开，告诉他们回去路途太艰巨，不要再去冒生命的危险了，他们要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回去。

1286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的妻子卜鲁罕去世，临终要求她的族人继为王妃。阿鲁浑汗特派三个精明的廷臣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三人为专使，携带大批扈从到元室来求婚，忽必烈友善

地接受了这项请求，选出了卜鲁罕族的少女阔阔真为元室公主，准备远嫁。这位少女年方十七，品貌俱优，三位专使见了，满口称誉。随即准备行装、随从和侍卫。在一次盛大的朝会中，专使和阔阔真向世祖辞行，仍由使者来的原道启程，骑马向前走了八个月，不意蒙古诸王互相攻伐，道路阻塞，只好中途折回。

这时，马可·波罗刚好从印度一带率领几艘大船出使回来，向元世祖报告各国的情况和航行的经过。这个消息传到三位专使的耳朵里，他们心想，波罗三个都是意大利人，熟悉航海，不如改行海道，于是跟波罗家庭商量，请他们同行，波罗一家当然求之不得，就合计好，由三位专使和阔阔真出面，奏请世祖批准。忽必烈面有难色，但无法不允，只是要求波罗三人回意大利与家人团聚若干时候以后，仍回中国。

元世祖给了他们圣旨金牌两块，大批赏赐以及随从人员的一切用品，还交与马可·波罗国书多封带给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国王，预备好了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大船，带着两年吃用的粮食，于1291年初趁季候风从福建泉州出发。

波罗家族受元世祖的重托，把阔阔真看作自己的女儿，一路上小心照料，公主也把他们当作亲人看待，言听计从。途中，海上风云多变，波涛汹涌，艰苦异常，历时两年半到达波斯。上船时随从人员六百余人，加上水手共千余人。最后只剩下十八人，包括波罗家族三人，公主一人，专使一人，侍女一人和水手等人，其余或失事或病亡。

马可·波罗一行登陆后，才知道阿鲁浑汗已经去世，按当时蒙古风俗，把阔阔真许配给他的儿子合赞汗。

波罗三人在途中还得知忽必烈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同时也打消了重返中国故地的打算。但仍念念不忘在中国度过的美好岁月。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

一般市民，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怀疑，争相看望马可·波罗的人络绎不绝。相传马可·波罗等人从中国带回很多财宝，并说他们的衣褶之中缝有不少宝石。每当宾朋过访者来至住宅，他们便将这些欧洲人所不认识的奇珍异物展示出来，于是威尼斯人视马可·波罗等人为富豪，给他们的住宅取名为“百万第”，又称马可·波罗为“百万君”，而他们言谈的东方见闻，引人入迷，自不待说了。

马可·波罗回家住了三年，他的家乡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在1298年9月8日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其背景是：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城市，都是靠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在十三世纪时便掌握了西欧与东方各国之间商业贩运的控制权。由于市场的竞争，彼此间不断发生矛盾，威尼斯和热那亚、热那亚和比萨，都互相敌视，经常冲突，因而发生战争。1298年9月8日在亚德里亚海面爆发的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并且在一条战舰上充当了舰长。激战结果，热那亚人获得了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名声很大，虽然禁锢在监狱里，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东方的事情，而马可·波罗为了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了同狱人鲁思梯谦的注意。鲁思梯谦是比萨人，他是因为参加比萨与热那亚两城的战争战败而被俘的。此人曾经写过小说，精通法语。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他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下来，这就是现在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本子。

四年的监禁生活过去了，马可·波罗因为声名远播，热那亚

不得不将他释放。此后，马可·波罗便安居威尼斯，娶妻成家，继续经营商业，再也没有出外远游。1324年，当他七十岁的时候，在威尼斯逝世。马可·波罗这位著名旅行家死的时候所留下的宝贵遗产，不是他的“百万”家财，而是一部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游记。

自从鲁思梯谦在狱中记录了马可·波罗的口述成为游记以后，六百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学者根据不同版本也翻译了四种，1935年冯承钧将沙海昂的注本翻译过来，译名为《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记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为止；第二卷记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还有自大都西南行到缅国，记沿途所经诸州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南沿海诸州等事；第三卷记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一百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总括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行纪》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记叙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一共八十二章，在全书中分量最大。在这卷

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马可·波罗记述当时北京这个城市，“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对于皇室宫殿建筑，《行纪》中描述为“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不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宫殿屋宇富丽堂皇，以及那些异乎寻常的人工装饰，使这位旅行家大加赞叹：“此宫之大，向所未见！”“房屋之多，可谓可观！”马可·波罗还记述了北京贸易发达，商业繁盛的情况：“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与能比。”今天读到《行纪》关于北京的记载，这座六百多年前的古城面貌，似乎又复现在我们眼前。

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州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州为“行在”、“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州的一般称呼，指皇帝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在《行纪》里记载杭州人烟稠密，房屋达一百六十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市集之日，见买卖之人充满于中，车船运货，络绎不绝。”并说杭州人对来贸易的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州市容整齐清洁，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州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处，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宝应、南京、镇江、苏

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饶，用织金锦丝绢，种类多而且美，凡生活必需之物，皆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产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以及中国使用广泛的煤。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燃料，在汉代以前就开始了。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欧洲在十三世纪燃煤还不普遍。

《行纪》对亚州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一行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马可·波罗那样的丰富。马可·波罗除亚洲外，还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若干叙述，不过系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陆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十三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它打开了中古时期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和国家，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学术界的一些有

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最有价值的地图，以后的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马可·波罗的游记对十五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例如，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都津津有味地看过马可·波罗的书。哥伦布小时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非常羡慕中国、印度的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至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到达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适得其反，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行纪》，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又何等浓厚！

马可·波罗的东游和他的著作，还是中西之间，特别是中意人民之间在中古时代友好往来的生动体现。他是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作了报导的人。他在书中以一百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四十多处城市、地方，对其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马可·波罗对我国的友好态度，真切感人，跃然纸上。今天我们以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来称誉马可·波罗，他是当之无愧的。　（胡务）

参考资料：

《马可·波罗行纪》（张星烺译本）

《永乐大典》卷 19418

元·王恽：《秋涧集》卷 81《中堂事记》。

武仁授受

元成宗曾立其子德寿为皇太子，但德寿早死，帝位的继承人显然成了问题。大德三年（1299），由于原来镇守漠北的宁远王阔阔出“怠于备御”，元成宗乃使其侄海山去阔阔出军中代领其职。于是，海山就成了漠北镇边亲王，取得了军权，为其后来的争夺帝位打下了基础。

大德十一年（1307）春正月，成宗死，立刻又爆发了帝位之争。争夺帝位的一方是安西王阿难答，支持者为皇后卜鲁罕，左丞相阿忽台等人；另一方是怀宁王海山及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支持者有右丞相哈剌哈孙等人。

元成宗死后，安西王阿难答、左丞相阿忽台等力图以成宗晚年就参预朝政的卜鲁罕皇后垂帘听政，进而推阿难答即帝位，并定于三月三日发难。时右丞相哈剌哈孙密遣使臣北迎海山于漠北，前迎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将京城百司的符印全部收藏起来，在府库门上粘贴封条，假装生病卧床不起，皇后每天下发几道旨令，都不听从，文书都不署押，并守宿掖门共三个月，严格保守一切机密，表面上顺从卜鲁罕皇后。此时正巧海山自漠北遣使脱脱来京议事，于是哈剌哈孙命令他立即赶回漠北，报告海山，但是卜鲁罕皇后已知晓此呈，并密谕通政使阻止他的驿马行动，幸亏脱脱的兄弟阿沙不花与通政院事察乃商量，决定更改文书日期，作为先前署发的文书，为他配备驿马以便离去。这样通政使查问也无话可说，脱脱因此得以乘驿回至

海山处。海山在漠北，距离大都路远，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到大都，哈剌哈孙夜晚派人告诉他说："怀宁王离京师太远，不能马上到达，为了防止发生不测之变，我们应该先发制人。"于是比阿难答等人预定发难的日期提前一天，爱育黎拔力八达率领卫士冲入内宫逮捕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难答等人，斥责他们变乱祖宗家法，并迅速处死。这时，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但他因其兄海山掌军坐镇漠北，不敢轻意答应，于是先以监国名义掌握政权，遣使去迎接海山。海山已做好南还夺取帝位的准备，他在和林召集诸王驸马等商议此事。其母答己信阴阳家之说，谓海山即位运祚不长，遣近臣将此语告海山，海山大为不满，对其亲信康里脱脱说："我捍卫边陲长达十年，又位居兄长，现在太后以占卜先生的话作为借口，天道悠远神秘，谁能预知？假设我即位以后，实施的政策符合上天的意愿，并不孚民望，那么即使在位仅短暂的一天，也足以名垂千古，怎么能凭借阴阳家的一句话而违背祖宗的遗托呢？"当即遣使将此意转告他的母亲，并率部下精兵分三路南下。答己大惊，急遣使者回报，请他速来。前所遣使者阿沙不花从京师至漠北，也向海山说明了安西王谋变始末和仁宗监国"以备他变，以待陛下"的情况。海山察觉情况确切，才于大德十一年五月到达上都。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亦至上都，母子三人相会后，大会诸王。废成宗后卜鲁罕，将其幽居东安州，亦赐死。海山即皇帝位，是为武宗。

武宗即位后，对"平定内难"有功的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当然也不能亏待，于是在同年六月，就将其弟立为皇太子，以确定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

武宗的奢侈、挥霍更超过成宗。即位之初，下令对诸王、宗亲、勋臣的赏赐尊成宗即位时"所赐之数赐之"。根据当时的财政状况，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成宗即位之初，世祖留下来的

府库还比较充盈，所以能够大加赏赐，尚且引起财政困难；而当他即位之时，府库充富的条件早已不存在了。武宗朝会赏赐的结果，搞得两都所储已虚，而已给者尚不及总数之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山仍是挥金如土。如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他为买怯来木丁所献宝货，无现钞，于是下诏用盐万引赐给他，并允许他买盐引九万。中书省臣认为如此做法是破坏盐法，他却说："这是下达的诏令，赶紧给他，其余的人不要引以为例。"中书省见他这样不顾一切地崇尚奢侈，不得不于同年十二月吁请他说："经费浩大，应该暂时停罢收售宝货。"实际，在武宗即位后的第四个月，中书省就说："帑藏已经空竭，送入京师的常赋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就达二百七十万锭。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应求而未支者还有一百万锭。"指出了严重的入不敷出。难怪《元史》评价武宗说："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制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大盛，而遥受之官众，赐赍太隆重，而泛赏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

至大元年（1308）正月，江南有绍兴、台州、庆元、文德、建康、镇江六路大饥，死者甚多，饥民达四十六万多户；中书省当时指出："近来百姓生活困苦，农民起义不断"。说明老百姓到了无法活命而起来造反的地步，灾荒之余，随之而来的是疫疠大作。同年九月江浙一带的情况就是这样，"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至大元年的财政状况更为困难，这年二月就出现了严重危机，中书省无计可想，只得奏请动用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解决燃眉之急。造成财政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兴土木，诸如："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为诸贵人营私弟"等等，搞得军民不得休息。同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又一次惊呼国库空虚。

武宗为首的元廷为了寻找摆脱财政困境的办法，于是重新采用忽必烈时的老办法：立尚书省以经理财用。早在大德十一年九

月，武宗就下诏立尚书省，任命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主持尚书省，让他们自行选举官属，并铸造尚书省印。当时御史臣提出不同意见说："至元年间阿合马综理财用，设立尚书省，三次并入中书。其后桑哥得宠，又设置尚书省，事败后又并入中书省。""前不久又听说为了总理财用准备再立尚书省，如果这样，势必增置衙门，滥设官吏，大概并非益民之事，况且综理财用，关键在人，如果只命中书省进行整饬，未必见效。"武宗却回答说："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三位大臣愿意负责这件事，姑且让他们去办吧！"表明了这一诏令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到了至大二年(1309)八月，在乐实等人的策划下，尚书省正式开张，搭起了一套班底，"以乞台普济为太傅、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政事，保八为右丞，忙哥铁木儿为左丞，商议尚书省事，诏告天下。"尚书省所用的六十四名官名，其中有宿卫之士，有品秩未至者，有未历仕者。可谓五花八门。这套用人政策，完全是抄袭阿合马、桑哥的办法。尚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变更钞法，于同年九月发行至大银钞，至大银钞一两对换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这样就使至元钞大为贬值，蒙受损失的却是广大老百姓。第三次尚书省的设立及其变更钞法并未能医治武宗朝的不治之症，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就在行至大钞以后的二十天，尚书省臣就说："目前国用需要中统钞五百万锭，以前曾借支钞本达一千零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请求罢去中统钞，拨放至元钞本一百万锭，以给国用。"财政赤字数，创元朝建立以来的记录。尽管如此，主持尚书省的脱虎脱、三宝奴等人，还是倍受武宗恩宠。如至大三年（1310）二月，赐三宝奴"答剌罕"[①]之号，封乐实为齐国公；同年六月，脱虎脱和三

① 答剌罕：蒙古特权封号，源于突厥语，义为"自在"。此号可世袭，享有特权，免除一般封臣赋役义务。

宝奴成了“总治百司庶务”、独揽尚书省大权的显赫人物，并获得了武宗赐予他们珠衣的崇高恩遇。这批人凭着武宗的信任，进而干预宫廷内政。至大三年，三宝奴劝武宗重新立己子为皇太子，后经右丞相康里脱脱反对，始维持原状。三宝奴虽不以为然，但也不能改变这一决议。三宝奴等人的所作所为，直接触犯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利益，且后者信奉儒术，视三宝奴等为异端，相互间的矛盾必然加深。

元武宗在位不足五年（1307—1311），至大四年（1311）正月死，同年三月十八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皇位，号为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武宗有着不同的经历。他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出生以后，先是居住大都，在其未出阁之前，与其兄海山同以“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的汉族名儒李孟为师，接受儒术的熏陶。大德九年（1305）十月成宗后卜鲁罕居中用事，令与其母答己一同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在他谪居怀州的数年中，汉儒李孟仍随从，为他讲述尧、舜之道，古先帝王得失成败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意。这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曾握拳对群臣说：“儒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握持纲常，这样国家才得以巩固。”表明了他对儒术的重视。爱育黎拔力八达被认为是既通达儒术，又妙语释典的封建帝王。他曾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说：“儒术受到崇尚的原因在于它能够维持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当他出居怀州之初，就对吏弊深恶痛绝，试图加以铲除。在他当太子时，就重视人才的培养，曾于至大元年（1308）五月，请将成宗始建而一直未成的国子监学建成，得到武宗的同意。

至大四年正月十日，武宗死后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宣布罢尚书省，其班底的主要成员，如：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右丞保八、左丞忙哥铁木儿、参政王罴等，均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使中书右丞相塔思不花，知枢密院事铁木

儿不花等参鞫。十四日，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均被诛杀，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短短几天中，尚书省的主要成员就被爱育黎拔力八达一网打尽，动作之快是少见的。时人刘埙有七律一首，专讥三宝奴被杀，其前四句是："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

武宗时的尚书省及骨干被铲除以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接着就召世祖朝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平章程鹏飞、董士选，太子少傅李谦、少保张驴，右丞陈天祥、尚文、刘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宾客萧𣂏，参政刘敏中、王思廉、韩从益，廉访使程钜夫，杭州路达鲁花赤阿合马等人来到京师，共商国事，初步组成中书省班子，这些人中的李谦、尚文、萧𣂏、王思廉、程钜夫等又均系当时知名的儒臣。又任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以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在完成了对中央政府机构人员的重大更换之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才于同年三月正式即皇帝位。

仁宗即位后，首先重视人才的选拔。皇庆二年（1313）夏，他尝与中书平章政事李孟讨论用人之方，李孟说："人才的选拔，固然不止一条道路，然而汉、唐、宋、金，以科举得人才颇多。如今想选拔天下的贤能，如果用科举选取，较之多门而进要强。但只有首先注重德行，然后文辞，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仁宗认为李孟言之有理，决定实行科举。同年十一月，颁《行科举诏》，规定了考试的重点和录取的标准。诏书说："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诏书又明确规定科举的目的是："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表明他决心利用儒术进行统治。在他统治期间，曾分别于延祐二年（1315）和五年（1318），通过廷试，共得进士一百零六人。

仁宗朝的另一建树是纂修《风宪宏纲》，此即《大元通制》

的前身。据《元史·武宗纪》载，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就向武宗上言："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并说，世祖时就曾有过相应的诏旨，但至今尚未实行。至大二年九月，尚书省臣又奏请将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十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武宗对这两次奏请均表同意，但并未付诸实行。仁宗即位之初，即允中书所奏，选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如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中书刘正等人，将开国以来颁布的可作为法令的政策文件分类汇编，下发有关部门。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令枢院、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以及集贤院的大臣们相互讨论，共经八年，仍未有最后结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

仁宗一朝的政事，一直受到其母答己太后及右丞相铁木迭儿的严重干扰，特别是在对待铁木迭儿的态度上，仁宗越来越表现得软弱无能，反映了他本身的局限性。铁本迭儿与答己太后相勾结，处处受答己的庇护。早在武宗至大年间，他任云南行省左丞相时，因擅离职守，本有旨诘问，结果由答己出面，将他庇护过关，改为贷罪还职。在元武宗死而仁宗尚未及即位之际，太后答己就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过了一个月，仁宗即位，对母后旨只能照此办理。于是，上年还是"贷罪还职"的铁木迭儿一下子平步青云，跃上了中书右丞相的宝座，从而在仁宗所组建的中书省班子中掺人了一名异端分子。铁木迭儿居相位两年，即因罪被罢，于是他又巴结朝中大臣，又再次登上相位，并愈加凶残，恃势贪虐，朝廷内外对他咬牙切齿。元仁宗只得任命御史中丞肖拜住为中书右丞，不久又提拔为平章政事，对铁木迭儿稍加牵制。而仁宗本人平常又非常厌恶铁木迭儿，想将其诛

杀。由于铁木迭儿的奸贪不法，导致了延祐四年（1317）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合对他进行弹劾，当时以中书平章政事肖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上都留守贺胜三人为首，列了铁木迭儿的罪状：收了杀人犯张弼的贿钞五万贯，接受晋王献田千余亩，收纳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收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贿金一百五十两，其诸子无功于国，尽居显贯，纵家奴凌虐官府，危害百姓。元仁宗见了奏章后，大为震怒，下诏逮问。铁木迭儿赶紧逃到太后宫中躲藏起来，有司不敢进去捕捉，为此仁宗几天都闷闷不乐，最后还是太后答己出面，使仁宗对铁木迭儿无可奈何而仅夺其印绶，罢其相位而已。这实际上是一次仁宗与权臣两个派系之间的较量，其结果实质上仍然有利于权臣一方。所以仅仅事隔两年，到了延祐六年（1319）四月，铁木迭儿又改头换面，以太子太师的身份重新登台。于是又引起了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对他的联名弹劾。但结果仍然因为太后的缘故，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这是仁宗一方的又一次失利，也是仁宗愈益软弱所致。

元仁宗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另一个斗争，表现在皇太子的人选问题上。以前元武宗在立其母弟仁宗为皇太子时，曾经立约“兄终弟及，叔位侄承”。就是说，仁宗之后，应当依次传位于武宗的儿子。可是等到武宗死，仁宗即位之后于延祐三年（1316）春，议建东宫时，表面上说是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而主张立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实际上，仁宗及其皇后弘吉剌氏也有意立己子硕德八剌而不立武宗之后，又加之仁宗之母答己太后认为硕德八剌比武宗长子和世瑓更为柔懦，易于控制，也力赞此举；事情经过了近一年的周折，终于在延祐三年冬十二月，年仅十三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这是仁宗、太后与铁木迭儿三股势力暂时利益一致所造成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且不使武宗的后人将来起而

争夺帝位，于延祐二年（1315）十一月，乃先将武宗长子和世球封为国王，并令其出镇云南。在和世球赴云南的途中，行至陕西延安附近，当年武宗时的一些旧臣都前来集会，商量对策，结果和世球率领部属自河中西行，逃到北边金山。他得到察合台后王的支持，居金山之西十余年，积了一些军事力量，在后来的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三月其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纵观仁宗一生，他平常穿着朴实，淡然无欲，不事游猎，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侍奉皇太后，终生不敢违背她的意志；对宗戚勋旧，始终以礼相待；对大臣亲老，时加恩赐；太官进奉膳食，一定分赐给近臣；对有司上奏的大辟之刑，他总是仔细审阅，尽量将时间推移。他孜孜以求地治理国家，力图遵守世祖的成宪。他企求以儒治国，但儒家传统孝顺观念又影响了他，使得他对答己太后总是唯唯诺诺，从而暴露了他软弱的一面，决定了仁宗朝政治不可能有根本的转机。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哈剌哈孙传》、《仁宗纪》、《康里脱脱传》、《武宗纪》、《食货志》、《李孟传》、《杨朵儿只传》、《贺胜传》、《奸臣传》、《明宗纪》。

《水云村吟稿·三宝奴伏诛》

《元文类·行科举诏》、《元文类·大元通制序》。

《元史纪事本末·武仁授受之际》

南坡之变

延祐七年（1320）三月，十七岁的硕德八剌继承他的父亲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登上皇位。他在位仅短短四年。至治三年（1323）八月，当他与右丞相拜住从上都返回大都，途过南坡驻跸时，被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一伙蒙古贵族官僚所杀，这就是元代著名的“南坡之变”。这场政变并非统治阶级内部一场寻常的内讧，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

1307年元成宗死，他的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右丞相哈剌哈孙之助，从怀州赴京夺得皇位，是为仁宗。嗣后，又让位给驻守在漠北的哥哥海山，即武宗。双方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仁宗以后应把皇位让给武宗之子和世球。

延祐三年（1316），即仁宗登位后的第五年，右丞相铁木迭儿为了固位取宠，迎合仁宗意图，倡言立仁宗长子硕德八剌为太子，仁宗之母答己太后也认为硕德八剌比和世球更为柔懦，易于控制，也力赞此举。于是和世球被黜屈于外，十三岁的硕德八剌于当年立为皇太子。从此以后，他就卷入了宫廷政治的旋涡。

硕德八剌的父亲仁宗是继忽必烈之后推行“汉法”比较积极的元朝皇帝。他在位九年中，罢尚书省，限制僧侣阶级特权，裁止营造，起用李孟、程鹏飞、郝天挺等汉族地主官僚；首行科举，对统治政策作了不少调整和改革。但是，由于蒙古色目旧贵族集团的阻挠，仁宗后期政治上渐趋保守，不能有多少作为。延祐末年，水旱不断，民不聊生，社会阶级矛盾正在激化。英宗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

英宗和他所有前辈皇帝相比，他处于一个最易接受汉族封建地主文化的社会环境中。1303年，他生于洛阳附近的怀州王府，那一带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故乡，他从小过的是地主士大夫式的生活，又受其父亲的直接影响，耳濡目染，自然与蒙古草原马背上长大的贵族子弟大不相同。

延祐三年，他被立为太子后，又进一步成为朝廷内外儒臣竭力施加影响的对象。如同当年许衡、王恂等人竭力争取太子真金一样，御史中丞赵简，监察御史段辅、马祖常，太子詹事郭贯等人，都先后上奏，请求招收天下雅望博通之士，对富于春秋的太子，加强儒家正统教育，把这一点认真看作天下休戚的本源。对此，仁宗自然十分重视。硕德八剌从小生活的环境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即位以后，就曾亲书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吾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亿万古"。把它赐给拜住，并表白励精图治的志向，以借喻自己与拜住的关系。元代皇帝多不识汉字，硕德八剌所具有的汉族封建文化素养，是元帝中所不多见的。延祐七年(1320)，仁宗死去，英宗即位。答己太后立即发现这位少年皇帝"毅然见于颜色"，远非原以为的那么柔懦，不由得发出"吾悔不该立此小儿"的怨言，于是赶紧扶持自己手下的势力，好把权臣铁木迭儿立为右丞相，仁宗所亲信的一些大臣多受排斥，与答己、铁木迭儿关系至密的黑驴、赵世荣、木八剌儿等人，一个个进入中书，担任要职，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因仁宗时曾弹劾铁木迭儿不法，此时则横遭铁木迭儿的报复，未经硕德八剌许可而被逮至徽政院，以"违太后旨"的罪名而被诛杀。仁宗最信任的儒臣李孟，也被夺去秦国公印，其先祖墓碑也被扑毁。英宗即位以后仅两个月，就发现宣政院使失烈门及阿散、亦失列八阴谋废立。由于他猜度到幕后指使人就是答己本人，因而也不

敢进一步追查，匆匆把他们诛杀了事。

凡此种种，使英宗发现，自己不但是个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而且其地位还岌岌可危，他面临的是答己与铁木迭儿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对他直接威胁的势力。为了牵制铁木迭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英宗即位不久，把木华黎的后裔，世祖时丞相安童之孙拜住立为左丞相，并引为心腹。

拜住是东平王的后代，他的家族世居汉族农业经济发达的山东地区，他们数代以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封建地主化了，他们与山东地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族士大夫集团有着长年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因而这个家族中出现过不少“蒙古儒者”。作为主掌礼仪、祭祀宗庙和赠谥的太常礼仪院使，拜住有更多的机会与虞集、吴澄等儒臣交往，自然与皇帝硕德八剌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拜住每天吃完饭后，都必定邀请儒士共同探讨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终日不倦。英宗当太子时，就对他极有好感，只是当时双方还不便往来。此外，拜住作为赫赫功臣木华黎的子孙，在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也有利于英宗加强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权力。但另一方面，在拜住身上，以“儒道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迂腐的书生气又混杂在一起。对于别人关于铁木迭儿阴谋危害自己的警告，竟回答说：“我知道尽力工作就行了，还防备什么?”对于王结“消除隐患不能犹豫，犹豫不决会招致其他事变”的劝告，他则认为言之有理但并不加以采纳。拜住的优柔寡断，反映了蒙古上层集团内部“行汉法派”力量的脆弱。

于是，至治年初，以答己与铁木迭儿为一方，以英宗与拜住为另一方的宫廷内部两大势力就这样形成了。一方面是“威胁三朝”的太皇太后和布置爪牙的右丞相，另一方面则是年仅十七岁，有志改革的皇帝及其年方二十五、世故不深的左丞相。双方力量对比是悬殊的，而彼此的冲突又不可避免，这一特点本身，

就制约了未来事态发展的过程。

英宗时期的宫廷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延祐七年（1320）一月仁宗死，到至治二年（1322）九月，太后、铁木迭儿相继逝世，计两年又九个月，后期从至治二年十月，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起到，至治三年（1323）八月发生“南坡之变”时，计十个月。

英宗前期，由于答己与铁木迭儿一派势力很强，双方势力虽然出现对峙，但矛盾还没有公开化，拜住只能通过私下场合的建议和献策，对铁木迭儿派的势力扩张，起一些抵制作用，拜住还不能大量引用那些政治倾向上和他一致的儒臣。

至治二年春，英宗亲享大礼后，与拜住关系更为密切，铁木迭儿渐被疏远。这年三月，拜住奉旨前往范阳为木华黎立碑。铁木迭儿长期生病，这时听说拜住已离京，准备出来管事，入朝到了内门，英宗派速速赐酒给他，并说“你年事已高，应该自己注意保养身体，等到明年入朝也不算晚。”铁木迭儿只得怏怏而去。

至治二年八九月间，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卒，这就为英宗与拜住下一阶段的改革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但是，铁木迭儿一派以铁失为代表的势力，其爪牙仍然遍布朝中，双方潜伏的矛盾，预示着将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爆发。

至治二年十月，英宗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从此不再立左丞相，以示信任之专。此后数月，英宗进行一系列改革，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家知识分子。拜住首先推荐张珪，恢复其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提拔贤能，罢退不肖、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宋本和、韩镛等人，都在短期内擢升集贤、翰林院及六部官职。这一期间，凡以前遭受摒弃的士大夫，都根据个人的专长加以收用，凡文学之士，则破格加以提拔。至治三年（1323）正月，又发布《振举

台纲制》，“举善荐贤，为治之要”，“怀才抱德，隐晦不仕者，亦听荐扬。”著名文学家虞集这时便被访求出仕。

二、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从元世祖时期起，元朝已创设一套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从至元三十年以来，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越来越臃肿不堪。各级官僚巧立名目，安插亲近，耗费大量库财，成为元代财政的巨大累赘。至治二年十一月起，英宗锐意减罢崇祥院和寿福院下属的十三个机构，裁减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等六十多个官署，只是后来政变发生，这项改革未能进行到底。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很重，至治三年（1323）四月英宗下诏派遣使臣到地方考察税收的高低，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按一定比例，上交一小部分土地的税收，作为助役费，用于补偿一般农民劳役方面的经济负担。具体办法是：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人官，为受役者之助。

四、减轻徭役。凡遇上差役造作，首先科征商贾末技富实之家，以保护农民从事生产。全免江淮地区的包银以及两浙煎盐户牢盆之役，岁减海运粮二十万石，免除回回人户屯役戍河西者银税，罢去上都等十处金银冶铸，听任民间采炼。

五、诏命儒臣王约等人制定《大元通制》，行天下。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乃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书成，命名《大元通制》。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诏敕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全书共八十八卷。它的制定，使“行汉法”的行政措施以法令条文的形式确立下来。它的颁行，是元代法制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推行“汉法”的一项重要措施。

英宗执法也非常严格，八思吉思被捕入狱后，英宗对手下的人说："法制是祖宗制定的，我不能徇私舞弊。尽管八思吉思侍奉我已很久，现在他犯了罪，同样应当依法处置。"

英宗所进行的改革，触犯了大多数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同时，英宗力图改变积重难返的弊习，常常警告君臣："卿等居高位，食厚禄，当勉力图报"；"若不法，则刑必无赦"，其矛头所向又是蒙古上层贵族官僚集团。实际上，至治二年十月以后，因贪赃受到杖免的达官贵人接连不断，流徙远地及还原籍的诸王官属达二十四人。

至治二年十月以后开始的英宗新政，加速激化了双方的矛盾，由铁失等人策划的"南坡之变"成为这种矛盾冲突的一个暂时的解决。

铁失是铁木迭儿余党，他是宣徽院内侍集团的主要人物，至治元年三月，观音保被杀死，御史台空虚，铁木迭儿趁机引荐他为御史大夫。从此他地位一直上升，八个月以后领左右阿速卫，掌管了以后得以进行谋杀行动的禁卫军。二年二月，英宗又赐其父祖碑，这是元代官员从皇帝得到的极大荣典。凡此种种，都是答己与铁木迭儿作为后盾的结果。

至治二年八月和九月，这两根台柱相继倒塌，铁失的地位从而发生根本的动摇。然而，对铁失构成致命的直接威胁的，是刘夔献田贪污事件的余波所及。

这一事件的原委，据《元史》记载：仁宗期间，"浙民吴机，以累代失业之田，卖与司徒刘夔，夔赂宣政使八里吉思卖置诸寺，以益僧廪，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酬其直。田已久为他人之业。铁木迭儿父子及铁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当时揭发这一事件的监察御史观音保与锁咬儿哈的迷失，受铁木迭儿报复而遭杀身之祸。此时实权已落到英宗与拜住手里，拜住就以此为契机，打击其保守派政敌。他任右相后一个月，便上奏

英宗，使铁木迭儿子八里吉思坐罪伏诛。同时又奏黜铁木迭儿另一子锁南“以通言路”。

三个月以后，即至治三年（1323）二月，刘夔及同签宣政院囊加台，也以同样的原因伏诛。至此，除铁木迭儿已先死外，只剩了一个铁失。五月，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奏请毁铁木迭儿碑。英宗同意下令追夺官爵及封赠制书，六月，毁铁木迭儿碑。七月没收铁木迭儿家资。

对于铁失来说，不祥的阴影渐渐迫近了。他必须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否则，结局是可以设想的。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与喇嘛僧侣的密切关系，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利用英宗信奉喇嘛教的宗教意识，怂恿宫内喇嘛僧侣诱劝皇帝实行大赦，也许这是铁失逃生的唯一希望了。

当时，英宗在上都，睡眠不好，下令作佛事，拜住以国用不足加以谏止。于是受到铁失指示的僧侣，趁机对英宗建议：“国家有危急，不作佛事或进行大赦无法驱除祸乱。”拜住听后脱口大骂道：“你们原本不过想得到金帛而已，难道还要替有罪之人庇护吗?”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立即传到铁失及其亲信耳里，他们大惊失色，拜住这时已对英宗有不可动摇的影响，铁失认为拜住的话是进一步论罪的明确信号。

铁失走投无路。七月下旬，他一直惶恐不安，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当时，元英宗和拜住即将从上都返回大都，在铁失看来，宣布他的诛刑是指日可待的了。大驾南返途中，又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除了纠集一伙亲信党徒和朝中仇恨英宗的人采取果断的刺杀外，在他看来似乎已无其他选择了。谋刺，也许能在绝望中带来一线希望。

1323年八月二日，铁失派遣密使斡罗思至和林东北的秃剌河畔，密告正在那儿打猎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商议决定：事成之

后，推立也孙铁木儿为皇帝。

八月五日，英宗的大驾从上都向南出发，夜晚，驻营于距出发点三十里的南坡店。趁深夜英宗熟睡之际，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贴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铁木迭儿子锁南，以及按梯不花等五个蒙古诸王，共计十六人，闯入皇帝行幄，以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以后，铁失手弑英宗于卧床之上。

此后，诸王按梯不花又奉皇帝玺绶，北迎晋王。九月四日，也孙铁木儿一夜之间竟成了皇帝，这一天他即位于龙居河（今克鲁伦河），是为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二月，上尊谥曰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四月，上国语庙号曰格坚。

铁失一伙之所以选中泰定而不是其他诸王，一方面，由于泰定驻守漠北，是蒙古诸王中最强有力的军事游牧贵族首领，另一方面，他与宣徽院内侍集团铁失一伙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泰定近侍倒剌沙与宣徽使探忒早就深相要结，恰恰反映了这两个集团之间政治利益与阶级意识上的一致性。

行弑以后，铁失、失秃儿一伙急驰大都，深夜从北门入城，直接赶到中书省，收封全部印信，静候也孙铁木儿即位的消息。

也孙铁木儿即位于漠北草原，所有谋逆者都予封官赐爵。看来，这只是即位时的暂时措施。他必须先拥有皇权，才能干他想干的其他事情。

然而，一旦皇权在握，泰定还是干脆利落地把铁失一伙杀了。十月甲子，即位后的三十二天，派遣的使节到达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和宗社，同一天，诛杀铁失、也先贴木儿、失秃儿等于大都或行在，他们“立功赎罪”的图谋终成泡影。也孙铁木儿自然懂得维护其皇权的正统性和得位的合法性，要比一个弑君者的生命更重要得多，他当然不愿意天下臣民把他看作谋逆者的同党或后台，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情况下，过河拆桥是他唯一可能的

选择。

蒙古诸王中自脱于逆党的唯有买奴一人，而儒臣们对南坡之变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王结早就密告过拜住“除患不可犹豫”。事变发生后，铁失党人迫使二院学士北上，曹元用立即表示“吾宁死，不可屈从。”张珪在得知事变消息后，立即致书也孙铁木儿，要求亲自灭逆党。枢密院一名小官、掾史王贞，在铁失死党人据中书夺百官印之后，更是四处奔走，遍告枢府大臣及其幕府。此外许有壬、赵成庄等在泰定到达大都后，皆纷纷揭发铁失余党，表现了他们明确的反对立场。儒臣们自元世祖中期以来，又历经成宗、武宗数朝遭受排斥和冷遇之后，他们在英宗新政中看到有可能参与政权的希望，他们自然乐于支持这场新政，也乐于把儒家正统的对君主的忠诚，奉献给一位多少能照顾他们阶级利益的年轻皇帝。

直到南坡之变已成为历史之后，一些儒臣还深深地怀念这位皇帝，怀念那场失败的新政。张养浩多年以后还在元英宗的画像前寄托这样的哀思：

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州。

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

与英宗同时遇难的拜住，在这位老臣心目中，是位“出师未捷”的英臣：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

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硕德八剌死时年仅二十一岁，是元代最短命的皇帝之一。作为中国古代一个蒙古族的皇帝，这位成吉思汗的后代，未尝不想做一点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事情，他急切求治，也还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图治过于心切，正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尽管英宗被弑，但新政中的某些成果，却自然而然地被泰定帝保留下来了。英宗起用的大批儒臣，也继续为新皇帝的朝廷服

务，虽然泰定帝在行汉法方面远没有英宗那么积极。英宗早夭的新政，仍然可以算是文宗改制的先声，后者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取得更稳定的结果。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拜住传》、《后妃传》、《英宗纪》、《逆臣传》、《韩若愚传》、《杨朵儿只传》、《王结传》、《虞集传》、《张珪传》、《泰定纪》、《曹元用传》。

《石田集》卷 7《请慎简官僚疏》

《黄金华文集》卷 24《拜住神道碑》、卷 25《别里哥贴木儿神道碑》、卷 27《干文传神道碑》。

《清容集》卷 35《特命右丞相碑》

《永乐大典》卷 2610

《元文类》卷 12《丞相拜住赠谥制》、卷 39《书王贞言事》、卷 53《张珪墓志铭》。

《滋溪文稿》卷 18《题忠献王传》

《归田类稿》卷 20《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

宦官之祸

由于蒙元皇帝选择勋贵大臣之子充当侍卫（是为怯薛），加上元朝国祚甚短，所以元代的宦祸不及汉唐之际凶烈。但是元代也曾出现两次比较有名的宦祸，第一次宦祸所酝酿的政治阴谋是另建皇储，宦者的代表人为李邦宁；第二次代表人物是朴不花。朴不花与奇后母子表里为奸，酝酿内禅；又与搠思监朋比为奸，招权纳贿，陷害忠良，与老的沙党相倾轧，引起孛罗贴木儿之叛。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大元帝国的灭亡。

李邦宁，字叔固，钱塘人，初名保宁，南宋灭亡后，随从瀛国公人见世祖，供事于内廷。因精明能干，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世祖授御带库提点，升章佩少监，迁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即位后，又提拔他为昭文馆大学士、太医院使。成宗曾经生病，李邦宁十个多月不离其左右。

成宗死后，到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元廷发生了一系列宫廷事变，李邦宁这位历经四朝的宦官都曾参预其间。

元成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崩，皇太子德寿已先于成宗死去，在皇位空虚之际暂时由中宫卜鲁罕皇后摄政。根据元朝旧制，旧君崩，例由中宫摄政，同时由此寡后召集宗亲大臣库里勒台大会，另选新君。因为产生新君要在折中众议上花费许多时间，所以元朝旧制老皇帝死去相当久之后，方能推举出帝国的新元首来。这时成宗后及一部分大臣准备议立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因阿难答为当时世祖诸孙中最年长者，且国立长君本是宗社

之福，如果帝位应传世祖诸孙，阿难答本是合法的继承人。然而如果世祖生前有日后帝位必传真金太子（裕宗）的后人的成约，则裕宗正统的继承人应该是成宗长兄晋王甘麻剌之长子也孙贴木儿（后为泰定帝），但成宗的讣告传到怀孟，成宗次兄答剌麻八剌之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后为仁宗）与其母答己认为有机可乘，便以奔丧为名，准备夺取皇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到大都后，便与右丞相哈剌哈孙秘密定计，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将阿难答党一网打尽，并构卜鲁罕后以私通阿难答罪，出居东安州，于是政权一下落人爱育黎拔力八达手中。那时他的同母兄海山（后为武宗）远征朔方，鞭长莫及，但也颇有野心想当皇帝，现在的问题成了答儿麻八剌二子之争了。天下是弟弟的阴谋夺来的，但哥想当坐享其成的皇帝，弟弟肯甘心让出来吗？然而哥哥却拥有重兵，又能征善战，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素。至于他们俩的母亲答己，妇人爱幼子，也是主张立幼子的，于是母子三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僵局。《元史》上说太后（答己）惑于星者之言，不愿立长子，那只是一种遁词，实际上他们内讧得相当严重，有以兵相见的可能。

由于海山有强大的武力，在重兵压境下，才成立了一个妥协的办法，由脱脱做证人，皇帝归海山做，却要立弟弟做皇太子。立同母弟为皇太子，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举。然而元朝的皇太子不过是皇位的接班人的意思，后来武宗的二子也照抄这一套把戏，但是武宗与仁宗的协议是：海山死后由其弟继承皇位，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再传给他的长侄，以后兄弟叔侄依次相传。这种皇位继承法本来很勉强，又干脆废掉了库里勒台的制度，却暂时地避免了一次流血。

海山当了皇帝，这就是武宗。他对老弟爱育黎拔力八达颇存戒心，武宗的一群心腹也在暗地里私议，这个江山本是弟弟抢来的，只因慑于哥的兵威才吐出来，白送给哥哥，将来叔叔会舍子

立侄吗？他们计划着如何把这个名不符实的皇太子干脆废了，这时李邦宁向武宗建言说："陛下正年富力强，皇子渐长，父作子述是从古以来的道理，没有听说有子而立弟情况。"至大三年(1310)，武宗召集脱虎脱三宝奴、李邦宁等人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御前会议，准备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立武宗长子和世㻋为皇太子，并派三宝奴前去做右丞相脱脱的工作，但遭到脱脱的坚决反对，事情也就因此未成。所以仁宗对太监们挑拨是非、离间骨肉，不无愠意。在他即位以后，借口变乱旧章，把武宗的心腹三宝奴、脱虎脱等一次杀掉；同时又下令将宦官们所佩的国公和司徒的印章收回，解除他们的政权。但是这位当年替武宗计划废仁宗，别立皇太子的宦官李邦宁不仅保全了脑袋，而且加开府仪同三司，为集贤院学士。因为他现在又簇拥在仁宗面前，劝导他如何排挤先帝的长子和世㻋了。由于宦者们的离间，仁宗与和世㻋感情破裂，和世㻋兵败，远遁漠北，仁宗便省得假惺惺，索性立了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即英宗）为皇太子。

朴不花（？—1363），高丽人，又名王不花，与顺帝后奇氏为同乡。奇氏后来被列为第二皇后，当时舆论大哗。因为奇氏出身微贱，为元朝的王公所卑视，于是奇氏不得不重用一个与她同里的宦官来做她的心腹。自至正十三年（1353）奇后便大作威福，因为元朝的皇太子是兼枢密院使与中书令的，于是奇后专权植党了，她的心腹宦者朴不花便大走红运。资政院使本是一个掌管次宫皇后财产的机关，元代累朝皆有一位掌管正宫皇后的中政院使，其地位应在资政院使之上，但那些院使都与正宫皇后毫无瓜葛，不敢放肆。顺帝的正官皇后伯颜忽都弘吉剌氏，尤其以守后德、性节俭、不妒忌，以礼法自持出名，是位贤后，中政院使绝不弄权，于是朴不花因有奇后撑腰，便高了普通院使一等，弄权起来。这时元顺帝因为在位日久，怠于政事，荒于游宴，日与天魔舞女淫乐，故朝廷大权旁落太子手中。奇后母子很想酝酿内

禅，迫顺帝退位，而朴不花正是主持其事的要人之一，起初他接近中书左丞相太平，希望太平发动其事，可是太平不肯。奇氏又召太平到宫中，举酒申明先前的意图，但太平仍然坚持己见，因而失去皇后母子欢心，不能安于其位，以致被杀。

至正二十年（1360）太平罢相后，由顺帝母舅老的沙推荐，搠思监独为丞相。御史大夫老的沙有荐相之恩，几次要求搠思监帮忙，搠思监不答，两人由是产生矛盾。搠思监攀附与权后奇氏情意甚密的宦者朴不花，两人结为死党，可以为所欲为，有所恃而无恐，便不怕老的沙的帝舅之尊了。那时朴不花正需要一个外官做助手，搠思监正是他所物色到的最佳人选。顺帝一朝的将相太平、脱脱、扩廓贴木儿都不能安于其位，唯独搠思监能够“居庙堂十数年”，安若磐石。其间顺帝更加厌政，朴不花乘机预政，与搠思监相为表里，四方警报，将臣功状，都抑不报，内外解体。然而因为他们与皇后母子根深蒂结，气焰熏灼，内外百官趋附者达十分之八九。又宣政院使脱欢，与他们臭味相投，危害国家。

至正二十三年（1363），监察御史也先贴木儿、孟也先不花、傅公让等于是上奏弹劾朴不花、脱欢的奸邪勾当，并建议将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也上报顺帝，皇太子和奇氏皇后都竭力庇护，为朴不花开脱罪责，于是御史全都降职。治书侍御史陈祖仁接连上谏皇太子书，御史台的大小官吏同时辞职，皇太子这才转告顺帝，令朴不花和脱欢两人暂时辞退，以避风声。而陈祖仁绝不善罢甘休，又上书皇帝说：“二人乱阶祸本，今不除掉，后患无穷。汉、唐末年，祸乱都起自这批小人之辈，而权臣、藩镇又接踵而至。故千寻之木，吞舟之鱼，其腐败必由于内，陛下诚思，可为寒心。臣愿俯从台谏之言，将二人特加摈斥，不令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全国都知道陛下信赏必罚，如果从惩处这两人开始，将士谁敢不效力，起义造反的人也都闻风丧胆，这样天

下便可以保全，祖宗的基业便可恢复。如果陛下优柔不断，他们日益专横，最后将无法制止。臣宁肯饿死在家，誓不与之同朝，牵联及祸。”正巧这时侍御史李国凤也上书皇太子，说：“朴不花骄恣无忌，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俨然有宦官赵高、张让、田令孜的遗风，这是天下众人都知道的，唯独主上与殿下还不知道罢了。自古以来，宦官近君亲上，稍微让他们行志，没有不给国家造成祸乱的。希望殿下思考履霜坚冰之戒，早赐奏闻，处其流刑，以大快人心，则纪纲可振。纪纲振，则天下之公论为可畏，法度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废举矣。”因此顺帝大怒，将李国凤、陈祖仁等人降职处罚。

当时老的沙在暗地里竭力鼓励御史们弹劾朴不花，因而皇太子对他十分讨厌，而奇氏皇后又在顺帝面前谮言，因为老的沙是母舅的缘故，顺帝封他为雍王，遣其归国。不久顺帝又任命朴不花为集贤大学士、崇政院使，这些都是奇氏皇后努力的结果。老的沙到了大同，留在大将孛罗贴木儿军中。这时，搠思监、朴不花正依靠扩廓贴木儿作为外援，埋怨孛罗贴木儿隐藏老的沙不遣，于是诬告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图谋不轨。至正二十四年(1364)，顺帝下诏削夺其官，使他交出兵柄回到四川。孛罗帖木儿知道这本不出自顺帝的意愿，都是搠思监、朴不花一手造成，因而怒不奉诏。宗王不颜帖木儿等人也为孛罗帖木儿上书，证明其诬枉，而朝廷亦畏其强不可制，又下诏数落搠思监、朴不花堵塞主听之罪，流放搠思监于岭北，朴不花于甘肃，以平民愤，并恢复孛罗帖木儿官爵。但是搠思监、朴不花都滞留京城，实际上并未前行。

不久，孛罗帖木儿派遣秃坚帖木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带兵向京城进攻。四月十二日，军队驻扎在清河，顺帝派遣达达国师前往问故，这样来回数次，声言必须得到搠思监、朴不花才肯退兵。顺帝不得不将搠思监和朴不花捆绑起来，交给秃坚帖木

儿，后来朴不花被孛罗帖木儿杀死。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宦者传》、《康里脱脱传》、《仁宗纪》、《太平传》。

《庚申外史》

脱脱主持编修辽金宋三史

辽、金、宋是二十四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在元顺帝时脱脱主持编修的，并开创了各民族史家共同修史的先例。

脱脱（1314—1355），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曾祖父称海死于攻宋战争；祖父谨只儿总宿卫隆福太后（元世祖忽必烈子答剌麻八剌之妃）宫；伯父伯颜于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扎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出任中书右丞相，脱脱就出身在这样一个地位极其显赫的蒙古贵族家庭。

脱脱幼时养于伯颜家里，稍长，就学于才儒吴直方。直方，婺州浦江人，他自幼胸怀大志，笃意儒学，曾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儒往来甚密，后出游京师，执教于明宗潜邸，任过上海路学正，马札儿台曾赞赏其智谋，将其比为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脱脱、也先贴木儿。直方是脱脱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脱脱的心腹幕僚。

蒙古人的尚武精神决定了脱脱的素质。脱脱年少时，力量过人，能挽弓一石，尽管有吴直方的督促教导，脱脱还是很不习惯于终日危坐读书。不过，在这位儒学大师的教导下，脱脱毕竟受到潜移默化，立下终身牢记古人嘉言善行，并付诸实施的志向。这些直接影响到他上台后推行的“更化”政策，其中包括顺利完成三史的修撰任务。

脱脱十五岁时充任泰定后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怜官。文宗

图贴睦尔即位，渐被擢用。天历二年（1329）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旋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1321），授虎符、忠翊侍亲军都指挥使。顺帝即位后，其伯父伯颜以翊戴之功独揽大权，他随之亦飞黄腾达起来。仅元统二年（1334）一年之内，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元年（1335），在击败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余党的战斗中立功，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不久，进为御史大夫。

伯颜是靠拥戴武宗之子即位而登上相位的，文宗时拜中书左丞相，地位仅在中书右丞相燕铁木儿之下。文宗死前曾指定由明宗之子继位。因而，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为宁宗，在位仅四十三天而死，兄顺帝妥欢贴睦尔继立。燕铁木儿欲立文宗子即位，文宗后不纳，故顺帝即位后燕铁木儿忧郁而死。这样，伯颜便起而代之，并在后至元元年（1335）杀唐其势而独揽大权。此后，伯颜独秉国政，专权日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并渐生奸谋，羽毛未丰的脱脱深感后果严重，对他父亲马札儿台说：“伯父过分骄纵，万一天子震怒，那么咱们这一家族就倒霉了。何不趁他事情还未暴露的时候想想办法。”马札儿台仍然犹豫不决，脱脱问计于吴直方，直方说：“左传有‘大义灭亲’的故事。大丈夫知道有朝廷，家族固然不应顾恤。”脱脱又问：“事情不成怎么办？”吴直方回答：“事不成也是上天决定的，大不了一死，但也无所惋惜。即便为此而死也不失为忠义。”脱脱顿足说：“我主意已定。”

脱脱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人。他利用顺帝与伯颜的矛盾，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把顺帝争取在自己一边并作为自己坚实的后盾。顺帝即位之初，并不像后来那样昏庸。伯颜擅权，元顺帝深感忧虑；伯颜矫旨擅杀郯王彻彻笃，贬走宣让王贴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顺帝对伯颜更加愤恨。于是脱脱乘机向顺帝倾吐了自己的志向。顺帝经过一番考察后，终于下定决心罢黜

伯颜。

铲除伯颜对脱脱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当时的伯颜气焰嚣张，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他的各种封号、官衔加起来足足有二百四十六字之多。他控制了宿卫军，皇帝的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亲党，稍有一点疏忽，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后至元五年（1339）秋，脱脱曾两次准备下手，第一次因胆怯而止；第二次下手前曾与顺帝密谋，之后老谋深算的吴直方提醒脱脱："这种举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可不密，议论之际，左右是谁？"脱脱回答："阿鲁和脱脱木儿。"吴直方说："你的伯父挟震主之威，这些人贪图富贵，一旦他们将密谋泄露，那么谋主就会身遭杀戮的危险！"于是脱脱把阿鲁和脱脱木儿两个软禁起来，后来终因准备不周未获成功。直到至元六年（1340）二月，乘伯颜去柳林打猎之机，才把伯颜逐出京师，完成了蓄谋已久的政变计划。

脱脱逐走伯颜后，顺帝起用马札儿台为中书右丞相，马札儿台在通州设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每天达万石，又派人广贩长芦淮南盐，脱脱让参政佛嘉闾向顺帝告了一状，迫使马札儿台辞职，自己继为右丞相，脱脱一上台，即废伯颜旧政，史称"更化"。

脱脱"更化"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恢复科举取士制。元朝科举始于延祐二年（1315），以后每三年一科，从无中断过，但在后至元元年（1335）被伯颜宣布废除。脱脱采纳吴直方的意见，于后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重新恢复科举。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他们走读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大兴国子监，遴选儒臣劝讲。当时，蒙古、回回、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又动员顺帝读圣贤书，选儒臣欧阳玄、李好

文、黄溍、许有壬等四人，五个月进讲一次，读四书五经，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

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这是稍稍减轻剥削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

修三史和《至正新格》。

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就曾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即令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灭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元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中书右丞相脱脱出于宣扬“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兴”的目的，又决定设局修史。以脱脱为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其中揭傒斯先死，未任《宋史》总裁官）。于至正三年四月同时开始修撰，四年（1344）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1345）十月完成《宋史》。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以二年半的时间迅速完成，三史各有所本是重要的原因。

《辽史》所据，主要是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耶律俨于乾统三年（1103）奉诏纂修太祖以来诸帝《实录》，书成，凡七十卷。辽朝建国以来即有修史传统，各朝大多修有《实录》，耶律俨总其成。大定二十九年（1189）党怀英、郝俣等奉命修《辽史》，未完成，由陈大任续修，泰和七年（1207）书成。陈大任《辽史》是金代第二本《辽史》，第一本《辽史》是皇统八年（1147）萧永祺继耶律固之后修成的。可见萧永祺本是陈大任本的重要依据。而至正所修《辽史》是在以上

各种《辽史》稿本的基础上加工汇总而成的，以上各本的精粹在至正本《辽史》中得到了保存。

《金史》的史料基础最好。金人入主中原后，各朝均有《实录》，韩昉、耶律绍文等还修过《国史》。金朝灭亡后，《实录》为蒙古万户张柔所得，金末元初文学大家元好问表示愿意进行撰述，但后来被人阻止。元好问说："不能就这样让一代的事迹泯而不传。"于是在家乡构筑亭子，于其上著述，因此命名曰"野史"。元好问此《野史》即《壬辰杂编》，为《金史》主要史料之一。张柔所得《实录》于中统二年（1261）归史馆，后来王鹗据此修成《金史》。王鹗《金史》稿，王恽《玉堂嘉话》中存有简目，今已佚。又有刘祁《归潜志》载金末史事甚详，亦为《金史》主要史料之一。

《宋史》的史料更加丰富。由于宋代文人学士较辽金二代为多，著述极富，实录、会要、编年著作、典章奏议、地理方志、野史笔记、文集等等，无不应有尽有，仅袁桷所举搜访书目就达一百四五十种之多。由于史料极丰，故《宋史》多达四百九十六卷，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最。有人曾批评"宋史繁芜"，正说明《宋史》保存的史料和资料最多，在许多史书失传的情况下，它就更显得具有史料价值了。

辽、金、宋三史是各族史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首先，脱脱为三史的修撰做出了不少贡献。他的"更化"政策，为三史修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在伯颜当政时，采取排汉排儒的方针，决不可能按中国固有的传统来修辽金宋三史，加上许多儒臣纷纷辞归，可以设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具备撰史的政治气氛与人才条件。只有当脱脱革除伯颜旧政，采取重儒方针，才有可能把三史修撰提到日程上来，诸儒臣才能愿意应召效力。修史诏下，无论是在朝的文学侍臣，还是在野的山林遗逸，纷纷应召入馆，而且有相当的积极性。脱脱又采纳了掾史和国史典籍提出

用江南三省原南宋官田中属于贡士庄的钱粮充修史费的主张，从而为修撰三史筹措了资金，保证了修撰三史的物质条件。脱脱为修史组织了领导班子和写作班子，尤其是在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由上，他起了关键的作用。元朝建立后，三史之所以迟迟未能修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辽、宋、金三朝谁是"正统"的问题一直争论未决。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在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脱脱断然决定："三国自为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才终于平息了议论，脱脱的这一决定，不仅使三史得以顺利修撰，而且确定了对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

三史的具体实际工作，以汉族士大夫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订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极大。其他如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对此多所协赞；修史官史还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蒙古人泰不华等等。在二十四史中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史家参加修史，这是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分纪、志、表、传，但纪、志、表却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发生关系的周边各族按年月列入大事年表中，读来使人一目了然，又省却了许多外国等传，这是二十四史中的一个创举；《金史》的《本纪》第一卷《世纪》，记金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遵诸帝，这种形式也很特殊。如果将辽、金二史全部并入宋史，"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记载"，那么上述各纪、志、表中的珍贵史料将不复存在，辽金史事大半将被湮没。如今独立修史，不仅保存了各志表中的史

料，也使纪传中的重要史事有充分的篇幅加以丰富，使与各朝有关的同一历史事件至少在三史中的两部史书中得到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这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特有的。由于契丹、女真两族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二史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如不加语解，即使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也是无法读通的。随着契丹、女真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他们的语言文字渐渐为人们所不知，这样，《国语解》又成为人们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贵资料。

辽、金、宋三史虽然在史料汇集、编纂方法上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但由于三史撰修的目的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因而，书中充满着封建迷信和儒家天命思想，作者往往用道学的标准来评判历史的是非功过。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由于时间仓促和校核不精，出现了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问题。他们还将不利于他们的史料大量删除，因此人们在《金史》中就很少看到早期蒙古与金朝关系的材料。同时，也不准史官利用秘府中关于蒙古初年的史书和档案，以免成吉思汗及其以后的几个大汗的"非可令外传"的史实被人们知晓。

至正四年（1344）脱脱因病辞去相位。七年（1347），马扎儿台被劾，贬徙甘肃，脱脱力请俱行，马扎儿台病死于甘州，脱脱被召还京师。八年（1348），复为中书右丞相。这时，元朝的统治已经病入膏肓，纵然脱脱有一番抱负，也无计可施了。

脱脱两次入相后，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前，主要干了两件大事：变钞和开河。由于宫廷的挥霍浪费和对贵族、官僚滥行赏赐，国库入不敷出的状况更为尖锐，为摆脱财政危机，脱脱准备用变更钞法的办法来解决。至正十年（1350）冬，吏部尚书契哲笃、左司都事武祺提出变钞办法，获得通过。次年，置宝泉提举司，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结果

造成“钞买钞”的局面，政府大量发行新钞使旧钞贬值，引起物价飞涨，民间以物换物，拒绝使用新钞。这就是“变钞”。所谓“开河”，是指由于至正四年黄河泛滥，严重危及两漕盐场后，至正十一年（1351）治理黄河的事。脱脱起用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等十八翼二万军队开河，使黄河重入故道，即合淮河入海。“变钞”和“开河”促进了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农民大起义的爆发。脱脱用贾鲁治河，完成了一件我国水利史上极其漂亮的伟大工程，但“功成而乱作”，不能不看作是件憾事。当然，元朝之亡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长期以来政治腐败的结果。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脱脱从维护元朝统治出发，加紧了对红巾军的血腥镇压。至正十二年（1352）亲自督军镇压徐州芝麻李；十四年（1354），率军围攻高邮张士诚。正当城破在即之时，佞臣哈麻利用顺帝的昏庸，弹劾脱脱劳师费财，顺帝下令削夺脱脱兵权和官爵，流徙云南。十五年（1355），被哈麻矫诏遣使鸩死，时年四十二。

脱脱是元朝后期蒙古集团中少有的一位有见识、有能力的宰相。《元史》称他“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这一评价难免有夸大的成份，实际上，从整体看，脱脱维护的只不过是行将就木、气息奄奄的元朝腐朽政权；从局部看，他的某些政策和措施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其中包括三史的修撰。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脱脱传》、《伯颜传》。

《金史·元好问传》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

事状》。

《辽史·修三史诏》、《金史·进金史表》。

清·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卷27《辽史》、《辽史立表最善》。

贾鲁治河

元代黄河曾多次决口，统治者组织劳动人民进行多次治理。其中，以顺帝时期贾鲁主持的治河工程规模最大，效果最佳，影响最深，因而亦最为有名。同时，元顺帝还派都实探索了黄河的源头，这在当时都是空前未有过的壮举，表明中华民族对黄河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加深。

在贾鲁治河之前，不乏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活动。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月，黄河在开封、祥符、陈留、杞、太康、通许、鄢陵、洧川、尉氏、阳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处决口。元朝政府调集二十多万民夫，分筑堤防。

至元二十五年（1288）五月，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太康、通许、杞三县以及陈州和颍州都遭受其害。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七月，黄河又在杞县的蒲口泛滥。在此之前，黄河曾决口于汴梁，元朝统治者征发三万丁夫加以堵塞。此时蒲口又决口，于是元成宗命令廉访使尚文前去考察其地形，制定久利之策。尚文报告说："万里黄河滚滚西来，水流迅猛湍急。到了盟津以下，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水流移徙不常，改变了大禹时代的故道，成为中原地区的隐患，不知已有几千年了。自古治河，处置得当则用力少而河患迟，处置不得当则用力多而河患快，这成了不可更改的定论。如今从陈留至睢，东西长达一百多里，南岸的十一个旧河口中，有二个已经堵塞，有六个已经自涸，只剩三个与其他小河相通，堤岸高出水面共六七尺，

有的地方仅四五尺。北岸故堤的水比田高三四尺，有的地方高下相等。大概南岸比北岸高约八九尺，所以筑堤怎么能不坏？水怎么能不流向北面？如今蒲口决开一千多步，河水迅速东流，到了黄河旧渎，流行二百里，至归德横堤之下，又与黄河正流汇合。有的地方强行湮遏，造成上决下溃，不能成功。为今之计，黄河以北的郡县，应该顺着水的流向，在远处修筑长垣，以防御河水泛滥。归德、徐州、邳州一带的百姓应该避开冲溃，政府将他们安置到方便的地方。对于被患之家，应该在黄河以南的退滩地内拨给一定数量的田亩，作为他们永久赖以生存的产业。以后黄河在其他地方决口也这样处置，亦不失为救患的良策。蒲口还是不塞为好。”但当时河北郡县及山东宪部反对说：“如果蒲口不塞，那么黄河以北的桑田都变为渔鳖之区，还是塞住为好。”元成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此后蒲口又决，堵塞溃堤之役每年都必不可少，然而河水向北流入巴河，恢复故道，完全应证了尚文的预言。

大德二年（1298）七月，汴梁等州大雨不停，黄河决口，淹没了归德数县的田地、房屋和庄稼。成宗下诏免除当地一年的田租，并派遣尚书那怀、御史刘赓等进行堵塞，从蒲口开始，一共修筑了九十六处。

大德十年（1306）正月，元朝政府征发河南行省十万民工修筑黄河防堤。

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七月，黄河在归德和封丘两地决口。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六月，黄河在陈州、亳州、睢州以及开封、陈留等县决口，淹没当地民舍。

元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二月，鉴于黄河屡次决口，在汴梁设立行都水监，效仿古法进行防备，并命令沿河州、县正官都兼任知河防事。

同年五月，黄河又于汴梁泛滥。七月，黄河决于阳武，淹没民居一万六千五百余家。不久乐利堤又坏，征伐丁夫六万四千人修筑。

泰定三年（1326）四月，修筑夏津、阳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达一万七千五百人。

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十二月，黄河在封丘决口。

至正四年（1344）正月，黄河在曹州决口，元朝政府征发丁夫一万五千八百人修筑。黄河又决口汴梁。

同年五月，霖雨不断，黄河泛滥，平地水高二丈，白茅堤、金堤一带的黄河决口，曹州、濮州、济州、兖州都遭受水灾。

同年十月，朝廷讨论修整黄河和淮河的堤堰。

至正五年（1345）七月，黄河决口于济阴。

至正八年（1348）二月，元朝政府在郓城设立行都水监，以贾鲁为太监。贾鲁沿着黄河水道，考察地形，搜集材料，制成地图，并献上二策。其一是修筑北堤，用以遏制横溃，则节省用工。其二是建议疏通和堵塞并举，让河水东行，使之流入故道，这将收到数倍的功效。而这时正巧贾鲁被提升为中书右司郎中，建议没有得以施行。

至正九年（1349）正月，元朝政府又设立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专门治理黄河水患。

同年五月，白茅河向东注入沛县，于是造成一片水乡泽国。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开通黄河故道。起初，黄河决口，相脱脱召集大臣在朝廷讨论，每个人的意见各不相同。贾鲁重申以前的建议，认为必须塞住黄河北堤，疏通南堤，使之恢复故道，如果不大兴工役，水害就不能根除。于是元顺帝派遣工部尚书成遵和大司农秃鲁沿黄河巡视，研究贾鲁的疏塞并举之方，然后报告给皇帝，成遵等人从济州、濮州、汴梁、大名行程数千里，掘并以量地势的高低，测岸以究水深浅，广泛搜集材料，并

加以论证，认为黄河故道不可能恢复。而且说："山东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如果在这里又聚集二十万民众，恐怕到时的忧患将比河患更为严重。"这时脱脱听了成遵等人的议论，愤怒地说："你们难道认为百姓将要造反了吗？"从早晨到黄昏，论辩始终没有结果。第二天，执政对成遵说："修河之役，丞相的主意已经打定，并且有人负责这事，您就不用多说了。"成遵坚持说："腕可断，而决议不能更换。"于是成遵被贬为河间盐运使。元顺帝下诏开通黄河故道，任命贾鲁以工部尚书充河防使。征发河南、河北兵民共十七万人，从黄陵冈南达白茅、黄固、哈只等口，又从黄陵西至杨清村，汇合于黄河故道，一共二百八十多里。耗时五个月，建成各个埽堤，黄河恢复故道。因此元顺帝破格提拔贾鲁为集贤大学士，赐与金带、银币，并下诏赐脱脱世代承袭答剌罕的称号[①]，以淮巡路作为他的食邑，派人树立河平碑。各都水监的官员都因功迁赏有差。先前河南、河北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贾鲁治河的时候，果然在黄陵冈挖到只刻有一只眼睛的石人，这年汝州和颍州农民起义爆发。

当时元顺帝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撰制《河平碑》，制成后，欧阳玄又认为以前司马迁、班固留下的《河渠志》、《沟洫志》仅仅记载治水之道，而没有讲明治河的方法，使后人无法得知，于是根据贾鲁治河的方略，并询问过客，翻阅吏牍，作《至正河防记》，希望后世遭受河患的人们能求助于它。书中记载：

治河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即疏、浚、塞。将河的地流分开并加以引导，这叫做疏。去掉河中的淤积，并加深河底，这叫浚。

① 答剌罕：蒙元特权封号，源于突厥语，义为"自在"。元太祖封授于已有功者为答剌罕，许九次犯罪不罚，自由选择牧地，战争俘获人猎获物尽为己有，并给予某些礼仪优遇。此号可世袭，享有特权，免除一般封臣赋役义务。

压抑凶暴的河水，并加以扼制，这叫做塞。疏浚的区别有四点，即：生地、故道、河身、减水河。生地有直有曲，按照直线开凿，河水可到故道。故道有高有低，凿平高处，使之与低地相平。尽管水已通行，但河身有广狭，如果河身狭，那么则很难受水，水势就会变成更加凶悍，所以要想法拓宽河身狭窄的地方；河身太宽则很难筑岸，堤岸容易崩溃，所以在河身宽的地方要加强筑堤。所谓减水河，就是将水面加宽以遏制河的的狂暴。治堤有创筑、修筑、补筑的划分，堤的种类又分刺水堤、截河堤、护岸堤、缕水堤、石船堤。治埽又分岸埽、水埽、龙尾埽、拦头埽、马头埽等。建造埽台和推卷、牵制、薶挂的方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絙等。塞河又有缺口、豁口、龙口的差别。所谓缺口，是指已经成川；所谓豁口，是指原来常常被水冲开，洪水退却后则口在堤下，洪水涨高则溢出于口。所谓龙口，是指水之所会，即新河流入故道的汇合处。

贾鲁将治河分为三大工程：第一为疏、浚故河；第二为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就是堵塞白茅决口。

第一大工程是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施工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冈向东开始，辟开新河十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十里至刘庄村，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从专固到黄固，开新河八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一百八十二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新河三里四十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开新河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九十八里五十四步。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强。

第二大工程是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决

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处，从哈只口到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扩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一百三十二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长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刺店缕水月堤，长六里三十步，哈只口至徐州缺口一百零七处，积长三里二百五十六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黄河勒回故道。这项工程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在此之前贾鲁考虑到决河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西侧的北岸筑刺水堤二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黄陵北岸者，总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南岸总长九里百六十步。但刺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太短，“均水尚少，力未足恃”。而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多。两河争流，接近故河口，洪水沿岸北行，洄旋湍激，难以下埽。而且有的埽正在后退，担心洪水全部涌人决河，因此故河淤积，前功尽弃。在此关键时刻，贾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新的障水进人故河的方法。

九月七日，贾鲁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列大船二十七艘，前后用大桅或长桩连接，用大麻索、竹絙绞缚，连缀成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沿着船身缴绕上下，使船牢不可破，然后在上流将铁锚硾入水中。又把长达七八百尺的竹絙套在两岸的大橛上，每根竹絙或拖二艘船，或拖三艘船，使船不被流水冲走，船内铺上散草，满载小石，用合子板将其钉合，再用埽密布在合子

板上，有的二重，有的三重，用大麻索将其缚住，又在头桅上缚紧横木，都用绳索套紧，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在桅前，长约一丈多，名叫水帘桅。然后每艘船上挑选行动敏捷的水工两名，手执斧凿，分别站立在船的首尾，以岸上槌鼓作为信号，鼓鸣，一时齐凿，一会儿船松，入水，下沉，遏止住决河。船沉后，水溢入原来的河道，“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船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长了挑水的长度，减轻了刺水堤洄旋湍激对龙口的威胁。但由于水势过大，堵口合龙极其惊险。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其艰难。靠近龙口后，洪水猛疾，震撼埽基，将大埽冲裂冲陷，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众议沸腾，以为很难合口。这时，贾鲁表现出惊人的镇定，他依然神色不动，思维敏捷，命十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开通了黄河故道。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完全的成功。

贾鲁主持的这项有十七万民夫和士兵参加的治河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都堤建成。整个工程共计一百九十天。工程的耗资亦是相当不小的。所用大木桩二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十根，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共用去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如此浩大，

这在中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①]。

不少后人把元朝的速亡归咎于贾鲁治河，其实这一见解是不公允的。元朝的灭亡是因为统治者昏庸腐朽，纲纪废弛，是社会矛盾长期激化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假设贾鲁不兴是役，元朝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贾鲁治河调集了近二十万民工，这也被起义的发动者韩山童、刘福通等人所利用，成为他们扩大宣传的好机会，贾鲁治河也变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

贾鲁治河是中国古代治河史上一件伟大的工程。贾鲁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用当时最先进的治河方法，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贾鲁治河的效果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受到当时科学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勒回故道的工程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高潮中竣工了，岌岌可危的元朝政权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治理灾情严重的北河了，致使北河的决溢接踵而来。而贾鲁本人的忧国救民之心，在势不可挡的农民造反面前，顿时化为维护元朝统治的反动力量，他再也不提继续治河了，竟戎马倥偬地随脱脱平徐州，领兵攻濠州，一位成绩卓著的治河工程家竟然病死在前线的兵营里，贾鲁的悲剧是元朝后期黑暗腐朽统治的悲剧，也是封建时代河患不治的悲剧。

元朝以前，由于边区交通的阻塞，对于黄河发源地的探索，都没有取得圆满的成果。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唐代薛元鼎出使吐蕃，均未到达河源，他们的记载也是不完全的。元朝统一全国后，中央政府对边区管理大大加强，各地都设有驿站，交通十分便利，因而为河源的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

---

① 邱树林：《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载《元史论丛》第3辑。

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授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女真蒲察氏，通多种民族语言。凡三至吐蕃，寻求河源所在，且开辟航道，制造船只，筹建城镇。都实受命以后，同年到达河州（今甘肃临夏），河州东面六十里有宁河驿。宁河驿的西南六十里有一座名叫杀马关的山，行走一天到达山巅。向西行走愈高，历时四个多月才抵达河源。同年冬天返回，并将河源的位置绘成地图献给元世祖。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的兄弟阔阔出处得到有关资料，撰写成《河源志》一书。与此同时，临川人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到帝师所藏的梵字图书，而又用汉语翻译过来，其中关于河源的记载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的西部，有一百多泓清泉，沮洳散涣，不能逼视，方圆七八十里，站在高山上向下俯瞰，灿若列星，因此名曰火敦脑儿。火敦，汉语星宿之意。

朱思本记载：河源在中国西南，距离四川马湖蛮部正西三千多里，去南丽江宣抚司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西南二千多里，水从地下涌出，如同水井，向东北流百余里，汇成大泽，名叫火敦脑儿。

群流奔腾，近六七十里，汇人二巨泽，名为阿剌脑儿。从西向东，经过一天，水流成川，名赤宾河。又过二三天，水从西面而来，取名亦里出，与赤宾河汇合，又经过三四天，有水从南面流来，这就是忽阑。又有河水从东南流来，名叫也里术，一同流人赤宾。水流逐渐增大，始名黄河，水仍清澈，人可以涉水而过。

朱思本说："忽阑河从南山源出，当地丛山峻岭，绵延数千里，水流五百余里，注人也里出河，也里出河也源出于南山，向西北流经五百余里，始与黄河汇合。"

又经过一二天，分为八九股，名叫也孙斡论，汉语意为九

度，通广五七里，可以渡马，又经过四五天，水变得浑浊，当地人手抱革囊，骑马过河，从此两山峡出，宽一里、二里或半里，水深不可测，朵甘思的东北有座大雪山，名叫亦耳麻不莫剌，山势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山腰至山顶都是积雪，冬夏不化。据土人讲，在很久以前，在山上六月份还看见过结冰，从八九股水到昆仑，行程二十天。

自浑水向东北流经二百余里，与怀里火秃河汇合，怀里火秃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经八百余里，汇人黄河。又向东北流过一百余里，过郎麻哈地，又正北流经一百余里，才折而向西北流经二百余里，又折而正北流经一百多里，又折向东流，经过昆仑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剌，昆仑山异常高峻，山麓绵亘五百余里，河随山脚东流，经过撒思加阔，即阔提地区。

黄河经过昆仑南半天，又经过四五天，到达阔即和阔提一带，这两地相互毗邻。又一处地方名叫哈剌别里赤儿，是四通八达的冲要之地，当地寇盗很多，有官兵加以镇压。

黄河经过阔提，同亦西八思今汇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铁豹岭的北面，向正北流经共五百余里，而与黄河汇集。

昆仑以西，人烟稀少，且居民多住在山南。这里的山都不穹峻，水亦散漫，野兽有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在昆仑以东，山更高，地势却逐渐趋下，河岸狭隘，有狐可以跳跃过河岸。行走五六天，有河水从西南流来，这就是纳邻哈剌，汉语意为细黄河。

哈剌河源自白狗岭的北部，河水西北流经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

又经过两天，河水南来，名曰乞儿马出，二水合流汇人黄河。

自从哈剌河与黄河汇合，向正北流过二百余里，经阿以伯

合。乞里马出河源自威州、茂州的西北岷山之北，河水北流到达古当州境内，向正北流经四百余里，折而向西北流经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

河水北行，转向西流，过昆仑北部，一支流向东北，大约行经半月，到贵德州，当地即有州治官府，贵德州隶属于吐蕃等处宣慰司，司治在河州，又经过四五天，到积石州，此即《禹贡》中的积石。五天后到达河州安乡关。再经一天至打罗坑。又向东北行一天，洮河水从南面而来，汇人黄河。

自从乞里马出河与黄河汇合，又向西北流去，与鹏拶河汇合，鹏拶河源自鹏拶山的西北，河水向正西流过七百余里，过札塞塔失地，与黄河汇合。折而流向西北三百余里，又折而东北流，过西宁州、贵德州、马岭，共八百余里与邈水合。邈水源自清唐宿军谷，正东流五百余里，过三巴站，与黄河汇合。又流向东北，经过土桥站、古积石州来羌城、廓州沟米站界都城，共五百余里。过河州，与野庞河汇合，野庞河源自西倾山之北，水流向东北，又共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又向东北流经一百余里，过踏白城银川站，与湟水汇合。湟水源自祁连山下，正东流经一千余里，注人浩亹河。浩亹源自删丹州南面的丹山下，后向东南流过七百余里，注人湟水，然后与黄河汇合。又向东北流一百余里，与洮河汇合。洮河源自羊撒岭北部，流向东北，过临洮府，共八百余里，汇人黄河。

又过一天至兰州。过北卜渡，至鸣沙州。过应吉里州，正东行，到宁夏府南。东行，至东胜州，隶于大同路。从发源至汉地，南北涧溪，细流傍贯，莫知纪极。山皆草石，至积石，才林木昌茂。常言黄河九折，这一带就有二折，即乞儿马出和贵德必赤里。

洮水与黄河汇合后，又流向东北，经过达达地面，共八百余里。过丰州西受降城，折而流向正东，过达达地古天德军、中受

降城、东受降城，共七百余里。折而正南流，过大同路云内州、东胜州，与黑河汇合。黑河源自渔岭的南面，后水流向正西，共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流向东南，过陕西洎绥德州，共七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又南流三百里，与延安河汇合。延安河源自陕西芦子关的乱山之中，南流三百余里，过延安府，折而正东流三百里，与黄河汇合。又南流三百里，与汾河汇合。汾河源河东朔州、武州南面的乱山中，流向西南，过管州，冀宁路汾州、霍州，晋宁路绛州，又西流至龙门，共一千二百余里，始汇入黄河。又南流二百里，过河中府，遇潼关与太华，大山绵亘，水势不可再向南，于是折而东流。大致河源东北流经的都是西番地面，至兰州共四千五百余里，始人中原。又向东北流过达达地面共二千五百余里，始入河东境内，又南流至河中共一千八百余里。通计九千余里。

元朝人对河源的探索，是元朝地理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它表明中华民族对孕育自己文化的摇篮——黄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对于黄河的治理和开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纪事本末·治河》

《辍耕录》卷22《黄河源》

《元史·地理志》

《至正河防记》

三帝之立

有元一代，由于早期蒙古国的库里勒台选举制名存实亡，而又没有固定的皇位继承制代之而起，因此，为了皇位的争夺往往发生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到了元代最后的三位皇帝——明宗、文宗、顺帝的时候，这种斗争愈来愈复杂。终于导致了元代后期影响深远的天历之战与明文之争，甚至深宫内部亦刀光剑影，扑朔迷离。加速了元王朝的灭亡。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㻋为周王，出镇云南。原来武宗立亲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后，丞相三宝奴又劝立和世㻋，召令康里脱脱出面提出，脱脱却回答说："太弟夺得政权，位居东宫已久，并且你们已经相约兄弟叔侄世代相承，谁敢打乱这种秩序呢?"三宝奴提醒说："如今兄已立弟为皇太子，能保证将来叔父一定授位给侄子吗?"脱脱回答说："我保证不改变这一誓约，要是他们失信，上天一定会惩罚他们的。"而到了现在，当朝廷议立太子的时候，铁木迭儿想固位取宠，于是请立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又同太后幸臣失烈门一道在两宫说和世㻋的坏话，因此仁宗封和世㻋为周王。派遣他出镇云南。

延祐三年（1316）三月，设置周王常侍府官属，任命秃忽鲁、斡耳朵、尚家奴、勃罗、教化等人充职。十一月，周王和世㻋到达延安，其臣秃忽鲁、尚家奴以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等人都来集会，教化出主意说："天下是我们武宗的天

下，大王的出镇，本来不是皇帝的主意，完全是由皇帝左右的奸臣诬构导致的。请将事情的原因告诉行省，让朝廷的人都知道，这样才能杜塞离间。如果不这样的话，事变就不可测量。”于是率领几名骑士奔驰而去。以前，阿思罕为太师，铁木迭儿夺其位，将他贬为陕西行省丞相，等到教化等人到来后，阿思罕立即与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征发关中的所有军队，分道从河中府出发。不久塔察儿、脱欢在河中袭杀了阿思罕、教化，和世㻋才西行，到达北边金山。西北诸王察阿台等人听说和世㻋到达，都率众来附，和世㻋到了察阿台的营地。相互约定，和世㻋每年冬天住在札颜，夏天住在斡罗斡察山，春天则命令随从在野泥耕种。十多年间，边境宁静。

仁宗死后，其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英宗年轻气盛，立志改革。但英宗新政的措施直接损害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终于被弑于南坡。1323年，参与南坡之变密谋的也孙铁木耳继位，这就是泰定帝。

泰定帝虽然自幼生长在漠北，而且借助政变之力取得帝位，但通过对政变的直接发动者铁失一党迅速果断的处置，既维护了先前札撒规定的臣仆不准杀害黄金家族成员的原则，又赢得了站在英宗一边的大批臣僚的拥护。泰定帝在位期间（1323—1328），标榜行事一律遵循世祖成宪，仍然任用英宗朝的一批儒臣，保留前两朝的改革成果，基本上顺应了进一步推行汉法的历史趋势。在此期间，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并发生了几次规模不大的社会动乱，不过总的说来统治还算比较稳定。只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争夺权利的矛盾日益加深，进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争夺帝位的内战，才将元朝推向崩溃的边缘。

泰定帝宠信王府旧臣，回回人倒剌沙，升之为中书左丞相，而掌管兵权的钦察大臣、床兀儿之子燕铁木儿却怀有贰心，早在武宗镇守北边时，他就充任宿卫十余年，得到武宗的厚爱。武宗

即位以后，燕铁木儿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在仁宗及泰定年间，他又历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卿、同签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职，燕铁木儿身受武宗宠拔之恩，一心向着武宗后代。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倒剌沙专权自用，宗室诸王辽王脱脱、梁王王禅趋附于他，当时签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留守大都，掌握枢密符印，于是与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等谋立武宗之子，准备发难。同年八月初四黎明，朝廷百官集于兴圣宫，燕铁木儿率领阿速铁木儿、勃伦赤等十七人，全副武装，手执兵器，号令于众，主张立武宗之子为帝。声言如果有不服从者，当场斩首，并手缚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分别命勇士执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统统投入监狱。燕铁木儿与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籍纳库，录符印，召百官人内听命。”同时派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驰驿迎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图帖睦尔，武宗次子，明宗和世㻋的异母弟，英宗至治元年（1321）五月被出居海南，泰定元年（1324）召还，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又命令停止，居赤月，后还回京师。同年十月封怀王。泰定二年（1325），又命他出居建康（今江苏南京），致和元年（1328）三月，泰定帝病况日益严重，倒剌沙等将图帖睦尔迁居江陵，以防止武宗后人起来争夺帝位。

燕铁木儿在遣使迎图帖睦尔的同时，又密谕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领兵扈从。伯颜也是武宗早年的部下，从十五岁起，即侍武宗于藩邸，武宗即位之后，又历任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平章政事；仁宗年间，任周王和世㻋常侍府常侍，官至御史大夫；泰定年间，历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等职。他蒙受武宗世恩，因而当燕铁木儿将谋立武宗子图帖睦尔的

意图密告于他时，伯颜立即表示全面支持。并遣使报燕铁木儿说："你在京师尽力，我负责河南事宜。"伯颜召集同僚及属下，说明情况并计算仓廪、府库、谷粟、金帛的数量，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粮供给的需要，以及赏赐犒劳的费用，无不备至。不足之数则令州县征收第二年的田租，及向商人供贷，并约定以加倍的利息偿还。再有不足，则邀截经过河南的东南常赋，用以供给军费，又征发民丁，增置驿马，修补城池及武器，严巡逻及侦察，做军事上的准备。并招募勇士五千人以迎怀王图帖睦尔，而亲自勒兵迎候，所以当图帖睦尔由江陵北上途经河南时，伯颜全副武装，与百官父老引导怀王人内，第二天又护送北行。八月，图帖睦尔到达大都，人居宫廷。此时，倒刺沙已派兵进攻燕铁木儿集团的大都防线，内战爆发。

九月，燕铁木儿率领诸王、大臣请求图帖睦尔尽早登位，以安定人心。面图帖睦尔考虑到其兄周王和世㻋仍在漠北，且拥有相当实力，不敢接受。燕铁木儿对他说："人心向背的时候，刻不容缓，稍有不慎，后悔已晚。"图帖睦尔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于是表示"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明诏于天下，表明我退让之意便好办了。"九月十三日，图帖睦尔即皇帝位于大都大明殿，这就是元文宗，改元天历。文宗在即位前夕，首先处理了一批政敌，其中：乌伯都刺、铁木哥割头弃市；朵朵、王士熙、伯颜察儿、脱欢等分别流放边州，并全部没收其家产。

在上都的倒刺沙和梁王王禅等人也在同月拥立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为帝改元天顺，并加紧进攻大都，燕铁木儿与其弟撒敦，子唐其势等人，率军作战，屡败上都兵，最后上都兵全面崩溃，加上齐王月鲁帖木儿和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的联合围攻上都，倒刺沙在和大都燕铁木儿集团较量了两个多月之后，于十月十四日，只得袒露肌肤，手捧皇帝宝，出城请死，表示投降，文宗将他投人监狱。十一月，倒刺沙、王禅及其党羽都被处死。

在天顺帝与文宗兄弟的帝位争夺中，天顺帝的失败是必然的。就经济实力来看，据有大都的燕铁木儿控制了较多的积储和经济来源，这从伯颜在河南邀截国家钱粮以补充文宗争位费用一事便可说明问题；从军事上看，燕铁木儿掌握军权，加上文宗长兄周王和世㻋远镇漠北，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是为当时一般人所瞩目的。虽然在这场斗争中和世㻋的兵力还未来得及发挥作用，但客观上却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燕铁木儿在发难之初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因素，他在遣使南迎怀王图帖睦尔的同时，宣言已遣使北迎周王和世㻋以安定人心，又假称周王已经率领诸王的军队整驾南辕，旦夕即至，起到了内外安定的镇静作用。

在天顺帝与文宗兄弟的帝位争夺战中，陕西、四川等地站到了上都天顺帝一边，从致和元年八月燕铁木儿等十七人于大都发难，直至九月文宗即位大都后，陕西行省和行台的官员们纷纷拒大都之命而下奉诏，且屡次涂毁文宗所下诏书，将使者械送上都或投之于狱。这年九月，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公开起兵反对文宗，引兵从大庆关（今陕西大荔东近黄河处）东渡黄河，擒杀河中府（治今山西蒲州）官员，河东官吏听说他的军队到来，纷纷弃城逃走，也先帖木儿悉以己人代之，接着他率军经晋宁（今山西临汾）、潞州（今山西长治），当地官员纷纷逃窜，但当他于同年十一月抵达武安（今河北武安）时，上都天顺帝早就大势已去，只得率部投降大都，河东州县得知这一消息后，全部杀掉其所署官吏，也先帖木儿本人与倒剌沙等一同被诛杀。与也先帖木儿起兵反对文宗的同时，陕西南路的一支军队，曾至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黑石渡，并攻克虎牢、武并两要隘，使原有守军纷纷溃退，军储亦全为陕西军所有，但后为文宗一方以软硬兼施之法而归于失败。

天历元年十一月，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称镇西王，起兵反对文宗，杀本省平章宽彻等官，以其亲信杨静等人另置官属，并

烧绝栈道。文宗对他同样采取软硬兼施之法，大约经过半年的时间，在天历二年（1329）四月，囊加台听从了文宗的赦罪诏，四川全归文宗所有，而囊加台却因为指责文宗，于同年八月被弃市处死。其亲信杨静等人则被籍没家产，杖流辽东。

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三日元文宗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之时，已经领悟到权臣燕铁木儿的意思虽然口称是“姑从”宗王、将相、百僚、耆老之请，谨候大兄到来，以了却固让之心，但在燕铁木儿等人的唆使下进一步争夺帝位的决心也大致已定。同年十月，倒剌沙兵败上都，宣告投降，两京道路始通。十一月，文宗遣使奉迎其异母兄周王和世㻋于漠北，和世㻋先命勃罗为使至大都。

天历二年（1329）正月，文宗又几次遣使北迎和世㻋。和世㻋误以为真，于当月即皇帝位于和宁之北，是为明宗。二月二十一日，当文宗所遣使臣撒迪从明宗处回到大都，文宗才知道明宗已经即位，于是在三月派权臣燕铁木儿奉皇帝宝玺于明宗途中。明宗得到皇帝印后，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一切动作，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而毫无破绽。同年五月，文宗从大都出发，北迎明宗，如此兄弟二人，一个自北向南，一个自南向北，相向而行。至八月初一日，明宗到达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之地。初二日，文宗入见，明文兄弟二人相会，明宗举行宴会，表面欢天喜地，但至初六这天，突然宣布明宗“暴崩”。

明宗突然死亡之后，燕铁木儿带了皇帝大印及文宗从明宗死地疾驰面还，一路上他白天率宿卫士以跟随保护，夜间亲自披坚执甲对文宗巡逻保护，如临大敌，在路上疾驰了二天，于八月初八回到上都。八月十五日，文宗再即皇帝位于上都。

明宗暴死于忽察都之地，完全是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后至元六年（1340）六月，明宗子元顺帝清算老帐，说其叔图帖睦尔曾“谋为不规，使明宗饮恨而崩”。于是下

诏“除其庙主”。

文宗有较多的汉文化修养，不时吟诗作文，这在元代封建皇帝中是不多见的。在他统治期间，文治方面亦有所建树：其一，在天历二年（1329），立奎章阁学士院，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初设大学士二员，正二品；侍书学士，从二品；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士，正四品；参书，从五品等官职。至顺元年，上述人员又均有增加，这是他以儒治政的基础。其二，命编《经世大典》。天历二年九月，文宗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集元朝典故，按照《唐会要》和《宋会要》，著成《经世大典》。该书成于至顺二年（1331），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这是元代官修的一部政书，共八百八十卷。另有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

元文宗在帝位争夺中之所以能够战胜天顺帝及其异母兄明宗和世㻋，主要是依靠了燕铁木儿及伯颜这两位权臣的拥戴，而尤其以钦察贵族燕铁木儿的汗马功劳居多。文宗正式即位以后，任命燕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伯颜知枢密院事，后来又授燕铁木儿本人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翔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其总裁。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职位。在文宗、宁宗二朝，燕铁木儿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直到他荒淫过度，导致身亡为止。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由于钦察贵族得势，元文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蒙古贵族的支持，这是前朝所不曾有的情况。

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位五年，至顺三年（1332）八月死去，年仅二十九岁。当他病危之际，遗诏立明宗之子，这是由于他原来夺取了他哥哥和世㻋的皇位，试图在死后留下好的名声，文宗死后，权臣燕铁木儿为了便于控制，乃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在至

顺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都，是为宁宗。

宁宗是明宗的第二子，其母曰八不沙皇后，乃蛮真氏。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短命皇帝，就死去，时年仅七岁。于是由文宗后临朝，权臣燕铁木儿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同意，主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妥欢贴睦尔时年仅十三岁，至顺元年（1330），其母被害后，他曾被流放到高丽一海岛中，第二年又被迁居广西静江（今桂林）。燕铁木儿乃派人迎妥欢贴睦尔于静江，并亲至良乡迎接。但当相见之后，妥欢贴睦尔因年幼且畏惧燕铁木儿，故对燕铁木儿缄口不答，燕铁木儿心怀鬼胎；想起当年谋害明宗一事，深恐妥欢贴睦尔即位之后追究元凶，所以迁延数月，妥欢贴睦尔一直不得立。不久正值燕铁木儿荒淫过度而死，乃由文宗后与大臣商议，由妥欢贴睦尔于至顺四年（1333）六月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顺帝。当时文宗后规定，妥欢贴睦尔之后，帝位再传给文宗子燕帖古思，依照武宗仁宗授受的先例。可是事与愿违，元顺帝于后至元六年（1340）六月追发以前文宗谋害明宗之事，下诏撤文宗庙主，徙文宗后卜答失里于东安州安置，流放燕帖古思于中途，燕帖古思在途中被月阔察儿杀害。应当说，这是明宗、文宗两系争夺帝位的继续。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之后，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帝位之争虽已告一段落，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减退，它突出地表现在权臣与权臣之间，权臣与皇帝之间，皇帝与皇帝之间以及军阀互相之间的斗争上，这是元顺帝时期的政治特点之一。

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以燕铁木儿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后至元元年（1335）三月，又立燕铁木儿之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可见在顺帝初年燕铁木儿一家的权势仍是颇为显赫的。但是，此家族很快受到另一权臣伯颜的挑战。

就伯颜的经历及拥立文宗的功劳而言，他是唯一可与燕铁木儿相匹敌的人，故在拥戴事成之后，文宗于天历三年正月任命他

为知枢密院事。至顺二年，进封浚宁王；至顺三年，又拜太傅，加徽政使。顺帝即位后，为嘉奖伯颜翊戴之功，乃任命他为中书右丞相。元统二年，进为太师，同年十一月，又进封为秦王。显然，伯颜的权势已跃居于燕铁木儿的后裔之上，于是身为中书左丞相的唐其势，绝不会甘心失去其父燕铁木儿在世的天堂，发出了"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的怨言。并进而付诸行动。与其叔撒敦之弟答里、其弟答剌海，勾结所亲诸王晃火帖木儿，暗中谋废立。顺帝几次召答里不至，郯王入彻彻秃于是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后至元元年（1335）六月三十日，唐其势在东郊埋伏了兵力，身率勇士突入阊阙。伯颜及完者帖木儿、定住、阔里吉思等人将他们捕获。唐其势及其弟答剌海都被处死，而其他党羽北奔投靠答里。答里即带兵响应，杀掉使者哈儿哈伦、阿鲁灰用以祭神。帝派遣阿弼传谕他，他又杀死阿弼，率其党徒和尚、剌剌等人拼命抵抗，但被擲思监、火儿灰、哈剌那海击败，于是只好奔投晃火帖木儿。顺帝命勃罗、晃火儿不花追袭答里一伙，答里力穷势衰，被阿鲁浑察俘获并送往上都处死。晃火帖木儿兵败自杀，怯薛官阿察赤也参预了唐其势的密谋，想杀害伯颜，后被擒获交付有司，阿察亦供不讳，最后伏诛。在此事变中，唐其势事败被擒，攀折殿槛不肯出；塔剌海隐蔽在皇后坐下，伯牙吾氏皇后用衣服将其遮掩。但塔剌海仍被曳出斩首，鲜血溅到皇后的衣服上面，伯颜上奏说："哪里有兄弟叛逆而皇后党护的道理！"将皇后一并抓出。伯牙吾氏皇后向顺帝呼救说："陛下快救我。"顺帝说："你的兄弟发动叛乱，难道还能救你吗？"于是迁皇后出宫，不久在开平民舍将其毒死，并没收唐其势的家产。这次谋变的参与者都被一网打尽，无一逃脱。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次又一次流血的派系斗争，至此以一胜一负而暂告一段落。

伯颜诛杀唐其势之后，专权自恣，无所顾忌。他擅自授官，

赦免死罪，任用邪佞，杀害无辜，收诸卫精兵为己用，随便出纳府库钱帛，气势嚣张，炙手可热，天下之人无不知晓伯颜之名，他的各种封号、官衔加起来足足有二百四十六字之多。这就必然引起元顺帝本人的不满。当时伯颜之侄脱脱，出于自家利益的考虑，见其伯父骄纵已甚，挟震主之威，深恐一旦败亡，同遭灭族之祸，乃暗中向元顺帝自陈忘家殉国之意，终于取得了顺帝的信任，并与顺帝心腹世杰班、阿鲁深相结纳，谋逐伯颜。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乘伯颜请太子猎于柳林之机，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共同策划，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由元顺帝下诏黜伯颜为河南行省右丞相。当伯颜知道不妙而遣使问故时，已无能为力，只得俯首就范。同年三月，伯颜被远徙而病死于龙兴路驿舍。

脱脱上台之后，废除伯颜旧政，颁布了一系列“更化”政策。但此时的元王朝已病入膏肓，各种社会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元朝政权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吞没！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纪事本末·三帝之立》。

《元史》：《燕铁木儿传》、《文宗纪》、《伯颜传》、《明宗纪》、《阿礼海牙传》、《百官志》、《顺帝纪》《唐其势传》、《脱脱传》。

元·陶宗仪：《辍耕录·权臣擅权》。

北方红巾军大起义

有元一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始终存在。到了元代中期，这种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在元世祖时各地就曾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到了元代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元顺帝时的开河和变钞终于引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末社会上流行一曲传遍南北的《醉太平小令》，曲子这样写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曲子生动地反映了元末的社会现实。

"变钞"是元顺帝右丞相脱脱为摆脱当时的财政危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至正十年（1350）冬，吏部尚书契哲笃，左司都事武祺为迎合脱脱的意图，建言变更钞法，得到脱脱的支持。新钞值一贯相当于钱千文，折准至元宝钞二贯。同时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新钞大量印造，发到全国各地，自然就迅速贬值。新钞的纸张质量也低，用不多久就昏烂了，连换都来不及。人们很快就把纸钞看作废纸，不用了。开始时还用铜钱，但物价一下子暴涨十倍。人们只好以货易货了。脱脱下令，凡是不用钞的人，处以严刑，然而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南方和北方都出现"米价贵似珠"，"斗米斗珠"的局面，原来就受到饥饿威胁的老百姓实在是生存不下去了。

“开河”是指贾鲁治河工程。黄河在1344年接连发生白茅堤、金堤决口，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许多沿河地区遭到大水灾，有的地方水深达二丈左右，当年大饥荒，第二年大瘟疫，灾区人民死了一半，到至正十一年（1351）时，河患已连续发生了六年。不仅老百姓遭殃，元廷在财政和经济生活上也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河水漫溢到会通河流域影响漕运，漫溢到河间路、济南路一带影响河间、山东的盐场。这件事朝野议论纷纷。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脱脱决定治河，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二万前去充当劳役。修治黄河本身无可非议，但治河过程中的弊端却触发了红巾军起义。脱脱和贾鲁征发十五万民工，使许多农户失去了劳力，损害了农民的生计。修河需用的物资，也派到灾民头上。就像贡师泰的诗《河决》所描写的："县官出巡防，小吏争弄权，社长夜打门，里正朝率钱。鸠工具畚锸，排户加笞鞭，分程杵登登，会聚鼓阗阗。"没有溺死的灾民，又受倒悬般的苦，即使洪水降下去，他们的膏血也要被榨尽了。而在治河的工地上，监工的官吏又对民工大肆暴虐，甚至扣发口粮，使民工们怨愤交加，忍无可忍。一根根干柴堆在一起了，离开了个体农家而聚集在黄河之滨的治河民工成了发动红巾军起义的最方便的联系人基础。

当时，在河南、江淮一带，有一种民间广传的宗教，叫白莲教。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他们崇奉阿弥陀佛，宣传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便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由于该教教义简明易懂，在广大劳动人民中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白莲教在宋亡之前就传到了北方，元朝统一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元初统治者对白莲教采取了扶助态度，庐山东林寺受到封赏，昆山淀山湖白莲堂香火旺盛。但是，早在至元十七年（1280）就有农民起义领袖利用白莲教发动反元武装起义，当年四月，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就曾以“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等符篆发动武装起义。以后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的事例亦不断发生。因而导致了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时白莲教被禁止。元仁宗以后，白莲教虽然恢复，有些白莲教主虽然忠于元朝统治者，但广大的白莲教徒仍然以各种形式不断反抗元朝的封建统治，并提出了“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斗争口号。

当时北方白莲教的首领人物是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韩山童出身于白莲教世家，其祖父韩学究因煽动群众被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继为白莲教主后，开始宣传“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争取了更多的群众，并且拥有一批有能力的骨干，如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他们在宣传群众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倡言天下大乱，这就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目标是十分明确的。

贾鲁开河后，韩山童、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等到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利用开河的机会，借独眼石人来进行鼓动造反，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联合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天告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

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领刘光世后代，当辅助他。韩山童则发布文告，宣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他们还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韩山童等人的号召，对于广大汉族劳动人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参加到起义队伍的行列。

但是，正当起义准备举行的时候，消息走漏了。地方官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山(在今江苏徐州境)。刘福通等逃出重围，再次起兵，于五月初三一举攻下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或红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立即派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善于骑射的六千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又令河南省徐丞相协同前往镇压。这三个元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军马看见红巾军势力强盛，扬鞭高呼：“阿卜！阿卜！”[①] 逃跑了。于是刘福通很快占领亳州（今安徽亳县)、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今河南确山）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占汝宁府（今河南汝宁)，又克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众至十万。

在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在北方地区的主要有芝麻李等在徐州，王权、孟海马在湘汉流域，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因家有芝麻一仓，饥荒时赈济饥民，故有“芝麻李”之称）与

① 阿卜：蒙古语，意为“快跑”！

社长赵君用、樵夫彭早住及其父老彭等亦以烧香聚众而反，攻占徐州。不久，又占领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睢宁、虹县、丰、沛、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泗县等地。

至正十一年十二月，布商王权、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称“北锁红军”，不久又占领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进逼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今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接着又取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今湖北荆门）等州。

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崔崖、俞某、鲁某、潘某等四人起兵，攻占濠州，郭子兴等称元帅。闰三月，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来投郭子兴。

与此同时，南方各地的红巾军也纷纷起兵，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起义农民取得了重大胜利，严重威胁着元朝的封建统治。元朝统治者调动他们的所有武装力量，向农民起义军猛扑过来，进行残酷的镇压。从至正十一年九月到至正十四年（1354），北方的战争主要集中在今皖西北豫东南地区、徐州地区和南阳襄阳地区。元朝军队凭借优势的武器装备，勾结地主武装，镇压了南锁红军、北锁红军以及芝麻李的起义，因而使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受到限制，未能进一步得到发展。

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始终是元廷的心腹之患。至正十一年九月，元顺帝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又增派知枢密院事老章援助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杀害。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太不

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①]、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日夜沉溺于酒色。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军，巩卜班战死，元军退驻项城。不久，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巩卜班的下场使元军提心吊胆，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数万散兵逃至开封，也先帖木儿被撤职。事后，元军把主要力量放在镇压红巾军的两翼——徐州地区的起义军和南阳、襄阳地区的起义军上。与此同时，红巾军的死敌，两支凶恶的地主武装正在豫东崛起，这就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察罕帖木儿，畏兀儿人，其曾祖于元初开始定居河南，察罕帖木儿为沈邱探马赤军。李思齐，罗山人，为罗山县典官。刘福通起义后，他们纠集地主武装，号称"义兵"，袭破罗山，大受元顺帝的赞赏，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后来，"义兵"进一步扩大到上万人，屯兵沈邱，对刘福通起义军是极大的威胁。

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占领徐州附近的许多州县。至正十二年正月，元顺帝任命逯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前往徐州镇压芝麻李。逯鲁曾主要依靠两淮所募的三万名盐丁组成的"黄军"对徐州城进行了包围。八月，元中书右丞相脱脱为捞取战功，亲自督帅诸处军马，出师徐州，九月，徐州城破，元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芝麻李等逃跑。月余，芝麻李被元军捕获，惨遭杀害。彭早住、赵君用等率余众逃奔濠州。脱脱命贾鲁等攻濠州，不久，贾鲁病死。五月元兵撤离濠州。至正十三年（1353），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权在郭子兴之上。第二年，彭、赵取盱眙、泗州等地，朱元璋与之不和，分兵南略滁阳。

王权、孟海马的北锁红军和南锁红军，也拥有十万大军。他

① 爱马：蒙古语，即投下。

们活跃在南阳、襄阳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元朝统治者自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起，先后派遣了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以及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兵分几路围剿。五月，答失八都鲁依靠地主武装攻陷襄阳，王权不幸被俘，北锁红军先被镇压。答失八都鲁等继续镇压孟海马的南锁红军。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锁红军亦被镇压。

随后，脱脱将元军主力转向高邮，企图消灭张士诚领导的农民军。但由于元军临阵易将，百万大军，一时溃散。北方红巾军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从至正十五年（1355）开始主动出击，打破元军的围剿和堵截。

为了进一步联络，调遣北方各支红巾军。建立牢固的政权中心，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改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小明王”则是“明王出世”的标志，表示光明已经来临黑暗势力即将驱逐。

宋政权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权机构。中央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当时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由于杜遵道擅权，未久为刘福通所杀。刘福通为丞相，后来又封为太保。随着各支起义军的发展，宋政权还设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行政机构。管军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其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军队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巾军的镇压。龙凤元年（1355）六月，答失八都鲁被提升为河南行省平章，率领原属太不花的诸王藩将兵马，进攻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长北），

为刘福通所击败，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今河南中牟），红巾军却其营，夺其辎重，并俘获答失八都鲁子勃罗帖木儿。但这支红巾军又遭元军刘哈喇不花部伏击，辎重及勃罗帖木儿得而复失，刘福通遣赵明达攻取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北大为震动。但察罕帖木儿自豫南赶来，赵明达战败。同时，答失八都鲁又调兵向宋政权的都城——亳州进犯，刘福通在太康（今河南太康）失利，元兵进围亳州，韩林儿避兵于安丰，第二年三月，刘福通与元军激战于亳州，答失八都鲁大败退走，亳州得安。

龙凤二年（1356）九月开始，刘福通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的压力，扩大战果，开始分兵出击。遣李武、崔德经潼关入陕，毛贵入山东。龙凤三年（1357）夏，由于毛贵在山东的辉煌，刘福通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即三路北伐。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以关先生、破头潘一支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包围；李武、崔德的西部军由于在陕西受阻，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前往支援，可惜这一战略没有取得成功。

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兵。龙凤二年九月，西路红巾军攻取潼关，连克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追击，李武、崔德折往晋南，攻取平陆（今山西平陆东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察罕帖木儿又急追而来。红巾军战败，队伍溃散。

龙凤三年（1357）初，李武、崔德又重整队伍，出兵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又夺取七盘，进据蓝田（今陕西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同时，又分兵攻克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元廷对于红巾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神速行动大为震恐，陕西省台也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又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喇不

花等由陕州、潼关进攻陕西红巾军。红巾军只好放弃进攻奉元的计划。

龙凤三年闰九月，刘福通决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他们入陕后，夺取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又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是年十月，红巾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察罕帖木儿往援，红巾军失利。龙凤四年（1358），一部分西路军在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入四川，称"青巾"，后被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逐走，李喜喜不得不率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留在陕、甘、宁一带的李武、崔德等曾于龙凤五年（1359），攻占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龙凤六年五月，李武、崔德等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是由红巾军的著名将领毛贵率领的。毛贵原是赵君用的部将，至正十四年濠州解围后，赵君用、彭早住东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盱眙（今江苏盱眙），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董抟霄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砦，败元军于泗州。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驻守扬州的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领张明鉴率领下逐镇南王孛罗普化逃奔淮安。宋政权在此设置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以赵君用为平章，毛贵为其部下，赵君用命其攻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由于元将也速来攻，毛贵夺得海船，率军由海道进入山东。

龙凤三年（1357）二月，毛贵取胶州（今山东胶县），杀签枢密院事脱欢。三月，取莱州（今山东掖县），又打死元山东宣慰使释嘉讷。接着又从海道攻占军事重镇——益都路（今山东益都），益王买奴仓皇出逃。又下滨州（今山东滨县北）。四月，克莒州（今山东）莒县）。毛贵在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攻占了山东许多州县，这对于在豫、皖地区作战的刘福通、在曹州的盛文郁是很大的支持。元朝统治集团则惊恐万状，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及董抟霄等出兵镇压毛贵，命答

失八都鲁出兵曹州，镇压盛文郁。同时，又取监察御史脱脱穆而计，从太不花、答失八都鲁等三处军马内，择其精锐守河北。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攻克济宁路（今山东钜野），未久被元义兵万户孟本周夺去，田丰被迫出走，转战济、濮（今山东济宁、鄄城、河南范县一带），后又占领济宁。是年冬，在棣州（今山东惠民）的元义兵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宣布起义。这时，元朝派往山东镇压农民起义的元军总指挥是太尉纽的该，他一直龟缩在东昌（今山东聊城），田丰曾多次与他作战过。

龙凤四年（1358）正月，田丰攻克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的南北漕运从此中断。同时，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击败李兰奚，李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二月初攻克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毛贵为平章。为了把山东建设成北伐的基地，毛贵设立了宾兴院，选用以前的元官，并派姬宗周等为地方政权的官吏，还颁发了铜印，以维护地方的秩序。同时，毛贵又在莱州设立三百六十处屯田，每屯相距三十里，制造百辆大车。用以挽运粮储，促进生产。

龙凤四年二月，毛贵开始挥师北伐。他亲率起义军进入河北。当时董抟霄正驻兵于南皮（今河北南皮）之魏家庄，元顺帝为嘉奖董抟霄屠杀红巾军的战功，升其为河南行省右丞，这时毛贵兵已至，这个双手沾满红巾军鲜血的刽子手终于被红巾军所杀。接着毛贵兵攻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今津蓟县），至漷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毛贵兵进逼京师大都。当时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有人劝皇帝北巡躲避，有人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可惜毛贵只是孤军深入，其他各支红巾军并未配合。当时元廷召四方军队来援，毛贵又在柳林

败于刘哈喇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这次北伐虽然没能成功，但它是红巾军的一次重要演习，大灭了元朝皇帝的威风，大长了起义农民的志气。龙凤五年（1359）四月，从淮安来山东奔毛贵的赵君用，竟杀了毛贵。七月，毛贵部将继续祖从辽阳回益都，再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自相残杀，从此一蹶不振。但罪魁祸首是赵君用。

在毛贵出师北伐的同时，田丰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先后攻占了东平、济宁、东昌等地。另一支由王士诚率领从益都出兵配合关先生、破头潘的中路军，占领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后又折回山东。这时山东大部分虽为红巾军占领，但由于毛贵被杀，群龙无首，田丰、王士诚两部较大，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龙凤七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开始向山东红巾军发动进攻。并相继攻陷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八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其将阎思孝、关保、虎林赤由东阿（今山东东阿南）造浮桥渡河，田丰率二万人夺桥未成，长清（今山东长清）陷落。元军进攻东平，田丰部将崔世英战败，东平被围。察罕帖木儿一向用剿、抚两手对付红巾军。他招降了田丰以及驻守棣州的余宝、守东平的王士诚、守东昌的杨诚，元廷授田丰为山东行省平章。元军进而围攻济南，并南陷泰安，北攻济阳、章丘，东略沿海州县，济南的红巾军在坚守三个月后，由于叛将刘珪的出卖，最后落人敌手。察罕帖木儿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升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十月，察罕帖木儿围攻益都，毛贵原部将陈猱头等坚守。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重返红军队伍，进人益都城。扩廓帖木儿袭其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落，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俘送大都。接着莒州亦陷，山东红巾军至此全部被镇压。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

领。这支军队原来是属于宋政权的丞相盛文郁领导的。龙凤三年初，盛文郁占领曹州（今山东荷泽），与在山东其他地方作战的毛贵相呼应。这年夏天，刘福通决定三路北伐，以毛贵为主力，以山东为基地进攻大都，关先生等为中路军。逾太行，入山西，形成对大都的包围。这一路军的任务是配合毛贵进攻大都。

龙凤三年八月，刘福通率领的中央红巾军首先占领大名路，继克卫辉路（今河南汲县）。九月，由曹州红巾军组成的中路军逾越太行山，取泽州之陵川（今山西陵川），杀县尹张辅，又克高平（今山西高平）。闰九月，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接着进攻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当时察罕帖木儿在这一带驻有重兵，红巾军又退入太行山。

龙凤四年（1358）春，毛贵率军进入河北，锋芒直指大都。为配合进攻大都，并加强中路军，这年二月，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继续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三月，王士诚等攻占晋宁路，杀元总管杜赛因不花。这时，在山西的中路军势力大增，决定分兵二路：一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支由沁州（今山西的沁县）出发，攻冀宁、大同（今山西大同）等地。

中路军的胜利进军，使元廷十分恐慌。当时由于东路军攻克大都的计划没有实现，已经退守山东，使各地应征入卫大都的元军得以退回原地镇压当地的红巾军。于是，察罕帖木儿又抽调很多兵力用来对付中路红巾军。五月，察罕帖木儿遣董克昌攻陷冀宁，派关保、虎林赤等追击晋南的红巾军。六月，关先生、破头潘又转西攻取冀宁路。九月，关先生等攻保定路（今河北保定），不克，转而攻克定州（今河北定县），由于元军在晋、冀的兵力还很强，中路军的主力转向晋北，原拟由山西进入河北，与毛贵军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

龙凤四年十月，关先生等由定州向西，占领大同。又北向进

攻兴和（今河北张北）等路。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等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上都为元朝建立前忽必烈经营汉地之基地，宪宗六年（1256）起，忽必烈开始大规模营建，中统五年（1264），加号上都。元世祖以后的历代皇帝差不多每年都要巡幸上都。所以红巾军占领上都，焚毁其宫阙，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接着，关先生等又攻破全宁路（今辽宁昭盟翁牛特旗），焚鲁王宫府，又夺取辽阳行省所在辽阳路（今辽宁辽阳），杀懿州路（今辽宁阜新东北）总管吕震，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红巾军的这一计划是与高丽氏统治集团的政治态度有关的。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高丽的统治者是恭愍王，他和其他高丽的贵族一样，都是与蒙古皇室通婚的，恭愍王是元朝皇帝的驸马，因而在对待元末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政治态度与元朝统治者完全一致。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率百万大军镇压高邮张士诚，遣使去召高丽的军队，高丽王派左政丞柳濯、大护军崔莹等四十余人，率兵数千人前来助战，又纠集在华的高丽人达二万三千人，充当脱脱的前锋。脱脱罢官，元军大败后，柳濯、崔莹等还助元军进攻泗、和等州，守淮安，围六合。而元顺帝等蒙古贵族在元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也把高丽当作他们的避难所，早就命令高丽统治者替他们在耽罗营造宫廷，做好避乱的准备。所以，红巾军出兵高丽正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元朝封建统治。

龙凤五年（1359）二月，红巾军致书高丽国王：

> “慨念后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今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毛居敬率红巾军四万之众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朝鲜平壤）。龙凤六年（1360）正月，红巾军战败于西京，退走。三月，红巾军从海路

进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旋退走。龙凤七年（1361）九月，红巾军在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率领下，十余万雄师横渡鸭绿江，进攻朔州。十一月攻占抚州、安州，并占领了高丽京城开京（今朝鲜开城），迫使恭愍王逃奔福州（今朝鲜安东）。至龙凤八年（1362）正月，安祐、李芳实、崔莹、李成桂等围攻开京，红巾军为其所败，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败退至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

中路军在进军高丽的同时，龙凤六年，由汤通、周成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攻克大宁路（今内蒙昭盟宁城东北），为元将也速战败，汤通、周成牺牲。由雷帖木儿不花、程思忠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攻占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及其附近州县，后亦被也先等镇压，王士诚则继续出没于晋冀，后败于台州（今山西五台），退至山东东平，与田丰合。龙凤八年，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后在益都被扩廓帖木儿所杀。

北伐失败后，敌人加强了对宋政权的围剿。由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实力很强的元军，对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紧缩。察罕帖木儿本来是驻守在陕西的，由于西路军失利，元朝只留下李思齐的部队，驻守在陕甘一带，察罕帖木儿的部队进驻山西。由于中路军北上，察罕帖木儿又将部队进驻渑池（今河南渑池）。到龙凤四年七月时，察罕帖木儿又移军洛阳，周全攻洛阳失败后，察罕帖木儿进逼汴梁。孛罗帖木儿则竭力切断汴梁与山东的联系，拼命进攻曹州。龙凤四年十一月，曹州陷落，红巾军首领武宰相、仇知院牺牲。龙凤五年初，孛罗帖木儿又北上代州（今山西代县）、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守大同，以切断中路军与汴梁的联系。至此，宋政权的处境极其危急。

龙凤五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

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将汴梁围得水泄不通。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汴梁城内数万红巾军及宋政权官吏、家属被俘。

汴梁失守后，退守在安丰的宋政权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名义上仍节制诸军。龙凤八年（1362）九月，刘福通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派兵增援遭到扩廓帖木儿围攻的田丰军。

龙凤九年（1363）二月，早已占领濠州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遣其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安丰城中处境十分艰难，粮食奇缺，“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小明王韩林儿不得不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前来助吕珍、原属南方红巾军系的庐州左君弼，救出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后来，小明王和刘福通被安置在滁州，到龙凤十二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将廖永忠迎归小明王和刘福通至应天，途经瓜步，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被沉人水中溺死。

由于南北两支红巾军一直没有统一起来，始终各自为战，甚至还发生过互斗和火并，因而大大削弱了红巾军的战斗力。同时北方红巾军内部也没有很好配合，最后不幸失败，但是它摧毁了元军的主力，打乱了元军在北方的部署，点燃了革命的火花，由它所倡导的元末农民起义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朱元璋北伐军的凯歌声中，元顺帝离开大都，仓皇北遁，统治中国近一百年的元王朝宣告灭亡了。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河渠志》、《食货志》、《张桢传》、《武宗纪》、《顺帝纪》、《王思诚传》、《也速传》、《刘哈喇不花传》、《察罕帖木儿

传》。

《元史纪事本末·察罕帖木儿克复之功》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7《旗联》。

元·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

南方红巾军起义

与北方红巾军相呼应，南方红巾军在广阔的江淮地带展开了对元军的攻杀，破坏了元朝政府的财政供给。这次起义是由彭莹玉、徐寿辉等人发动和领导的。

彭莹玉又名彭国玉、彭翼、彭祖、彭和尚，出身在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屯庄的一个农民家庭，十岁时人慈化寺为僧，后因能治疗疾病，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同时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的宣传活动，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1338）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后，逃匿于淮西。淮民知道他的消息后，都争相庇护他，尽管元朝官府严厉捕捉，始终未能抓获。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地区继续宣传白莲教，成为南方白莲教的“祖师”，提出了“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宗教口号，并以此组织反元武装力量。他的门徒遍及江淮地区，早期的门徒，多按白莲教的规定以“普”字命名。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起义的骨干，而且为农民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首先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了起义。这一消息对彭莹玉及其徒弟们鼓舞很大，他们认为发动起义的时刻已经来临。至正十一年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发动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下生，当为世主”，烧香拜佛，起义农民头裹红巾，所以也称红巾军。共推体

态雄伟的徐寿辉为主。十月，起义军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蕲水为都，建立政权。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即压倒“大元”。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它的行政机构和管军机构是比较完备的。行政机构方面设有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军制，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职，并有管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统军元帅府等管军机构。天完政权的行政和管军设施，对于打击和镇压阶级敌人，维护社会治安，保证起义军的严格纪律和战斗力，巩固新生的农民政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天完政权的建立，使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的南方各地的白莲教徒，现在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纷纷在天完政权的指挥下，响应起义。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的起义形势发展极其迅猛。为了扩大战果，起义的领袖们分兵四出，给元朝在南方的封建统治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开始，天完政权先后派丁普郎、徐明达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邹普胜攻克武昌、龙兴（今江西南昌），曾法兴攻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陈普文攻克吉安，周伯颜一支经江西，入湖南，抵广西，王善进攻福建。彭莹玉、项普略一支则东去江西，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苏南、安徽、江西。这支起义军活动范围最广，战斗最激烈，建立的功勋亦最大，是天完政权初期最有代表性的起义活动。天完政权通过分攻州郡的战略，形势大变。红巾军攻城夺地，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不到十天，就有数万人参加到红巾军中。如安徽巢湖地区的赵普胜、李普胜等，江西新淦的邓克明、邓志明，丰城的李明道，瑞州的邓南二，福建建宁的应必达，福建福安、罗源、古田县的农民领袖林君祥等等，他们或本身是白莲教的信徒，起兵响应，或

本来不是白莲教徒，响应起义后投靠红巾军。甚至远在湖南、广西的少数民族也配合红巾军进行作战。因此，元朝官吏余阙也不得不承认："余出乱中，以观南方之民，或盗至而乱，或未至而迎降。"

南方红巾军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这是与他们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分不开的。针对当时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反封建口号。这一口号突出了"摧"字，即用暴力去实践他们争取社会平均和平等的主张。在"摧富益贫"的口号鼓舞下，世代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纷纷参加起义，投入到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中去。

起义领袖彭莹玉在自己的战斗历程中，也同样遵循"摧富益贫"的口号。在发动了1338、1351年两次农民起义并建立了政权后，他始终没有去做王称帝，而是浴血奋战在第一线。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彭莹玉率军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杀死了曾作诗恶毒咒骂红巾军的江州路总管李黼。接着攻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今江西鄱阳）、信（今江西上饶）。四月，挥师入安徽境，攻占婺源、黟县、休宁和徽州（今安徽歙县）。在这一带，主要遭遇了地主武装的拼死抵抗，其中休宁的大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纠集一支"义兵"，依据山谷，控制险要，威胁很大。六月，彭莹玉、项普略率军攻破昱岭关，进入浙江。七月，在当地贫苦农民的支持下，攻克江浙行省首府杭州。元政府江浙行省的官员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自杀。彭莹玉的军队，纪律严明，一方面继续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一方面把府库金帛没收归红巾军所有。但是，红巾军在杭州并未站稳脚根。元朝统治者决不甘心富庶的东南地区让红巾军占领，元顺帝急令江浙行省平章教化和济宁路总管董抟霄等从濠州撤围，联合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向杭州扑去，彭莹玉等被迫撤出

杭州，退守徽州。教化、三旦八、董抟霄及当地的地主武装死死缠住不放。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彭莹玉等选择了北上广德（今安徽广德），进兵苏南的办法来丢掉敌人。九月，红巾军攻克广德。十月，攻占常州。在常州，彭莹玉率领红巾军夺大地主王佛子的钱财，发其仓廪，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攻取江阴、宜兴、溧水、溧阳、丹阳、句容，并遣军向集庆（今江苏南京）试探。这时，元军已汇集集庆周围。在这种形势下，红巾军再留苏南必将不利，彭莹玉不得不再次返回徽州，但徽州已被元军攻陷，项普略被俘牺牲，彭莹玉在巢湖水师赵普胜的支援下再克徽州。至正十三年（1353）春，徽州又一次失守，彭莹玉只好退到江西瑞州。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包围瑞州，彭莹玉等红巾军首领全被捕杀。

除了彭莹玉这支起义军遭到镇压外，其他各支红巾军后来也遭到暂时挫折。徐寿辉建立政权并占领武昌后，元顺帝调遣南方各省军队从四面八方前来“围剿”起义军。其中以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等蒙古、色目贵族最为凶狠，他们向富人借贷钱粮，募人为兵，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共同对红巾军血腥镇压，致使红巾军占领的许多地方得而复失。特别是彭莹玉战败牺牲后，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到至正十三年（1353）十二月，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联合进攻天完的都城——蕲水，蕲水终于陷落，天完政权的四百多名官员惨遭屠杀，徐寿辉等被迫逃人黄梅山及沔阳湖中。

蕲水的失守，使南方红巾军起义受到很大的挫折，起义活动一度处于低潮，连响应徐寿辉、彭莹玉起义的拥有百万之众的巢湖水师亦受到影响。

彭莹玉长期在江淮一带秘密传教，组织武装起义队伍，所

以，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彭莹玉领导的蕲州起义爆发后，江淮一带的许多人都纷纷响应。巢湖周围主要有三支较大的起义军：一支是赵普胜领导的，一支是金花姐和李普胜领导的，一支是左君弼领导的。其中左君弼领导的一支于至正十四年（1354）攻占庐州，以后就没有多大发展，并投降了元朝，后来又归附朱元璋。金花姐和李普胜一支活动范围较广，其部下有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等。金花姐牺牲较早，这支起义军由李普胜领导并与赵普胜合作。赵普胜一支则势力最大。

赵普胜，巢县（今安徽巢县）人，善用两刀，故号“双刀赵”。蕲州起义爆发后，赵普胜以巢湖为根据地，积极发展水军，势力很大。彭莹玉率军攻克江、饶、徽、信等地后，赵普胜则出师南下，与之配合。至正十二年（1352）春，赵普胜的水军先破无为（今安徽无为）、威胁繁昌（今安徽繁昌西北）、占领铜陵（今安徽铜陵）、池州（今安徽贵池），进而围攻安庆（今安徽安庆）。元廷急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等调兵堵截赵普胜的起义军。但元军遭到惨败，赵普胜占领了湖口（今江西湖口）、彭泽（今江西彭泽）一带，并夺取了安庆。到至正十二年底，赵普胜的军队，已号称百万。然而，由于彭莹玉的失败和天完都城的陷落，赵普胜不得不退到巢湖，与李普胜等结水寨自保。

南方红巾军最初三年的活动经过了一个起伏。虽然由于元朝统治者和汉族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遭到了暂时的挫折，牺牲了一位坚强的领袖人物，但是，战果是十分辉煌的。农民军打击和摧毁了许多地方政权，打击和消灭了一批地主富豪，迫使他们四处逃窜，同时起义又教育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成果是巨大的，挫折是暂时的，红巾军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得到锻炼，准备着未来的战斗。

至正十四年（1354）十一月，脱脱率领百万元军进至高邮，围攻张士诚的起义军。高邮正危在旦夕的时候，在大都的元中书右丞哈麻弹劾脱脱“老师费财”，元顺帝下令削脱脱兵权和官爵，并将脱脱流徙于云南大理镇西路，后被哈麻鸩死于云南，另以河南行省右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领其兵。由于临阵易将，元军哗然，百万大军，四处逃散。

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元朝军队丧失了对农民起义军的优势，而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镇压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则利用元朝在高邮战役中的失败，重新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天完政权乘机吸收了一部分元军，并重建天完政权。在此过程中，倪文俊起了很大的作用。

倪文俊，黄州黄陂（今湖北黄陂）人，渔民出身。蕲黄起义爆发后他起兵响应，任统军元帅。治平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率领红巾军占领沔阳。同月，又在汉川（今湖北汉川）鸡鸣仪与元坐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及元帅阿思监所统领的水军激战。倪文俊用火筏尽焚敌船，获得大胜，接待奴、佛家奴、报恩奴均败死。三月，倪文俊遣扫地冯取襄阳。五月，倪文俊克中兴（今湖北江陵），杀元帅朵儿只班。七月，攻克武昌、汉阳，俘获威顺王子歹帖木儿及王妃等。

倪文俊虽然在战场上立了不少战功，但是，胜利使他产生了骄傲，产生了贪婪的权力欲，终于在敌人的腐蚀诱惑面前，走上了背叛农民起义的道路。当倪文俊占领武昌，俘获威顺王的子女、王妃后，元顺帝降诏招抚，诱以官禄，倪文俊乘机要价，竟向元朝统治者求为湖广行省平章。由于双方讨价还价还未成交，倪文俊便杀了威顺王诸子。元顺帝招降不成，只好派兵镇压。八月，命答失八都鲁调湖广行省左丞卜兰奚守御蕲黄。十一月，命太不花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总兵湖广，剿杀红巾军。但南方红巾军仍先后攻克岳州（今湖南岳阳）、饶州、徽州等地。

治平六年（1356）正月，天完政权据汉阳为都，以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

天完政权重建后依然分兵四出。二月，在徽州的红巾军破昱岭关入浙江。三月，天完红巾军复取襄阳。同月，倪文俊克常德（今湖南常德）。五月克澧州（今湖南澧县）、辰州（今湖南沅陵）。八月克衡州（今湖南衡阳），十二月再克岳州。太平二年（1357）二月，倪文俊又破峡州，占领鹿卢关。

当治平五年初南方红巾军开始出击时，巢湖水师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赵普胜、李普胜等结寨于巢湖后，因与左君弼有矛盾，行动受到牵制，故急欲寻求同盟，以取得出路。这年春天，朱元璋自滁阳（今安徽滁县）取和州（今安徽和县），因城内乏食，准备渡江取采石。但苦于无舟楫。赵普胜、李普胜欲与朱元璋合作。但因李普胜谋杀朱元璋未遂，反被朱元璋杀了。赵普胜则率领部分水师投奔了天完政权。另一部分巢湖水师则在俞廷玉父子、廖永安兄弟等率领下投奔朱元璋，从此巢湖水师发生分裂。

赵普胜离开巢湖后即驻枞阳（今安徽枞阳），并南下夺取池州、青阳等地，太平元年（1356），曾两次围攻军事重镇安庆，杀元怀宁县达鲁花赤伯家奴。

太平二年（1357）九月，倪文俊再也按捺不住他的篡权野心，准备谋杀徐寿辉而夺取帝位，结果没有成功，自汉阳逃奔黄州，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

陈友谅也出身在沔阳的渔民家庭。本姓谢，因赘于陈氏，故改姓陈，曾在县衙里担任过贴书之职，因不满元朝统治，与其弟友仁、友贵等聚众起义。蕲黄起义爆发后，投奔徐寿辉，充任倪文俊部下簿椽，因作战有功，渐被重用，升任统军元帅。倪文俊杀徐寿辉未成，逃奔黄州，反被陈友谅杀，倪文俊的部人都归陈友谅指挥。

当时南方的红巾军形势大好，今鄂、湘、皖、浙的许多地方

都在天完政权的控制下，天完的另一将领明玉珍也进军四川。陈友谅夺得军权后，把重点放在东南地区。太平二年底，陈友谅沿江直捣小孤山，大败元军。又与天完在饶州的守将祝某联合援助正在围攻安庆的赵普胜，这样，三路起义军大举攻城，至天启元年（1358）正月，安庆城破，余阙以下元将十余人被杀。安庆地处长江北岸，形势扼要。治平四年（1354）卜颜帖木儿就是依此过望江、小孤山、江州直达蕲水的。现在天完政权控制了安庆，巩固了在汉阳的政权中心，并有利于它在南方的发展。陈友谅离开安庆后，乘胜连克龙兴、瑞州、邵武、吉安、抚州、建昌、赣州、汀州（今福建长汀）、信州、衢州（今浙江衢县）等路，这时，天完政权力量大增，成为南方各支起义军中拓地最广，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陈友谅和倪文俊一样，也是一个权迷心窍的人。杀了倪文俊后，陈友谅的权力欲也进一步滋长了，因而开始了谋杀徐寿辉的罪恶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除掉唯一可与他匹敌的赵普胜。当时据守安庆的赵普胜力量也很大，虽然与东边的朱元璋常在池州、青阳、石埭（今安徽石台东北）一带发生摩擦，但互有胜负。陈友谅也很担心赵普胜与朱元璋合作。天定元年（1359）九月，赵普胜与朱元璋将徐达战于无为、潜山，不利，陈友谅以此为借口，诈与赵普胜会军，在安庆杀了赵普胜。是年底，陈友谅又逼迫徐寿辉徙都江州，并阴险地伏杀了徐寿辉的部属，自称汉王。天定二年（1360）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攻占太平，终于杀了徐寿辉，建汉政权，改元大义，自称皇帝，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兼知枢密院事。

陈友谅杀徐寿辉，篡夺天完政权，标志着代表农民利益的天完政权已经失败，由逐渐向封建割据转化的汉政权取而代之。而陈友谅杀赵普胜、徐寿辉是极不得人心的。从此以后，军心涣散，政令不一。不少赵普胜、徐寿辉的旧部纷纷离去，陈友谅虽

然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日益虚弱了。

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后不久，准备从江州顺流而下，直取集庆，一举消灭朱元璋。同时，派人勾结张士诚，企图东西夹击。但张士诚吃过朱元璋的苦头，慑于朱元璋的强大，未敢出兵。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元璋政权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建议献城投降，有人主张奔赴钟山，还有人认为应决一死战。朱元璋采取了刘基的意见，用计胜陈友谅。

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是陈友谅的故友，朱元璋利用这一点，叫康茂才致书陈友谅，愿做内应。这边朱元璋已作好圈套，陈友谅果然自投罗网。双方战于龙湾，陈友谅大败，战舰搁浅，死者无数，逃到江州。朱元璋乘胜攻下太平，占领安庆、信州、袁州。而赵普胜的旧部张志雄，徐寿辉的旧部、驻守袁州多年的欧普祥，都因不满陈友谅的倒行逆施，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的浮桥（今江西景德镇北）守将于光也投降了朱元璋。

大义二年（1361），陈友谅企图进行反扑。五月，派李明道攻信州，李明道被朱元璋守军俘获。七月，派张定边攻占安庆，八月，被朱元璋夺回。朱元璋乘胜亲率大军攻下江州，陈友谅逃奔武昌。这年，陈友谅部将守饶州的江西行省平章吴宏、守建昌（今江西南城）的江西行省平章王溥、守龙兴的江西行省左丞相胡廷瑞等都以城降。

大义三年（1362），陈友谅又进行反扑。三月，派熊天瑞攻占吉安。五月，又占领安庆，但未久又被朱元璋夺回。这一年，陈友谅的部将投降朱元璋的就更多了，如吉安的孙本立、曾万中、曾粹中，龙泉的彭时中等。

这样，到大义四年（1363）前，陈友谅的处境越来越不妙，疆土日益缩小，众叛亲离，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在政治道路上，陈友谅走得离农民起义越来越远。在个人生活上，他变得十分奢侈腐化，他有成群的后宫妃妾、精臻华丽的宫中器物，睡的是镂

金床，玩的是珠宝器，完成堕落成了新生的地主分子。

龙凤九年（1363）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竭尽全力，作灭亡前的最后一次挣扎。举兵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鄱阳湖水战。为了进行这次战争，陈友谅特制了数百艘大舰。“舰高数丈，外饰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艣数十其中，上下人不闻相语，艣箱皆裹以铁。”并选择了朱元璋军北上救援小明王尚未回师的时刻，兵号六十万，“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洪都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为去江岸三十步。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军死守了八十五天，与此同时，陈友谅还攻占了吉安、无为等地。七月，朱元璋亲率二十万大军来救，陈友谅退至鄱阳湖迎战。

当时双方的兵力，陈友谅拥兵六十万，大舰数十艘，朱元璋只有二十万，用的是小船。陈友谅虽然在人力、物力上占绝对优势，但有利中寓有不利因素：他的战舰用铁索联在一起，转动不便，朱元璋战船虽小，却灵活机动。更重要的是，陈友谅戕主篡权，大失人心，内部士气一蹶不振；而朱元璋的部队是上下一心，士气高涨，准备决一死战。

朱元璋看到了陈友谅的弱点，一开始就采用火攻。七月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鄱阳湖，开始陈军占优势，后来朱元璋利用风势发火炮，焚毁陈友谅舰二十余艘，死伤惨重，朱元璋的军队亦有伤亡。二十二日，朱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阵，乘风纵火。陈友谅舰船被焚数百艘，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及许多重要将领皆被焚死。经过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激战后，陈友谅不得不败退草鞋山。

这次激战后，朱元璋一方面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陈友谅的归路；一方面又展开舆论攻势，派人致书陈

友谅，重申联合对敌的主张，又要陈友谅"听我指挥"。陈友谅得到书信后恼羞成怒，留使者不遣，准备为敌到底。然而，兵败如山倒的形势已经无法挽回，甚至连陈友谅的左右二金吾将军也率部向朱元璋投降。八月，陈友谅由于粮绝势困，进退维谷，准备逃奔武昌，二十六日，陈友谅在向湖口突击时中矢死。张定边等乘夜用小舟载陈友谅尸及子陈理逃回武昌，立陈理为帝。

龙凤十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至此陈友谅建立的大汉割据政权归于灭亡。陈理被朱元璋封作"归德侯"。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为了"保全"陈理和明玉珍的儿子"归义侯"明升，把他们两人一起送到了高丽。

明玉珍在四川建立的夏政权早期也曾接受南方红巾军的领导。

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玉沙村人，世代耕种田亩。至正十一年（1351），南方红巾军起义爆发，当地富豪为维护自身利益，推明玉珍为屯长，组织地主武装，以结寨自保。治平三年（1353）冬，徐寿辉派人招降明玉珍，明玉珍投靠天完政权，徐寿辉授予统军元帅之职，领所部镇守沔阳。

治平五年（1355）春至太平二年（1357），明玉珍尝率兵万余，驾斗船五十艘，沿江而上，去夔州（今四川奉节）贸粮。当时四川元军力量薄弱，只有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及左丞哈麻秃所部镇重庆，且两人不和。明玉珍决定出兵四川，这样，便可占据长江上流，保卫荆襄，打开粮道，一举三得。太平二年秋，明玉珍占领重庆，完者都逃窜，哈麻秃被擒后送往汉阳报捷，徐寿辉授明玉珍陇蜀省右丞。

天启元年（1358）二月，明玉珍攻克嘉定，杀完者都。天定二年（1360）明玉珍占领成都。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汉帝，并要明玉珍出兵助陈友谅攻建康的朱元璋，明玉珍不理，派莫仁寿领兵守夔州，不与相通，并且愤怒地说："你能称帝，难

道我就不能称帝吗！”又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春秋奉祀。第二年，明玉珍称陇蜀王，逐步地把四川当作他的割据之地了。后来，他又请元朝进士刘桢为参谋，朝晚侍讲文史，帮助他裁决政事，并于1363年正月建立夏政权，改元天统，自称皇帝。夏政权仿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向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周兴为司徒，刘桢为宗伯，置翰林院，地方则府置刺史，州置太守，县为县令，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赋税十取其一，废除农民力役的征发。

1362年冬，明玉珍命万胜领兵出汉中（今陕西汉中），攻剌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次年春，明玉珍命万胜领兵攻云南，屯兵金马山，万胜率十二万人由界首入；邹兴由建昌（今四川西昌）入，芝麻李由八番（今贵州境）入，二月，万胜率军攻克云南省首府中庆路（今云南昆明），元梁王孛罗及官吏逃走。天统二年（1364），万胜攻兴元，围城三日，不克而还，以后明玉珍就很少出兵，而重于防守。

天统三年（1365），明玉珍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等为平章、参政。分兵驻守成都、保宁（今四川阆中），夔州、通江（今四川通江）、播州（今贵州遵义）、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黔南等地。这时陈友谅已经败亡。

天统四年（1366）春，明玉珍病死。临死前，他对群臣嘱咐道：“你们应当同心协力，只能防守，切勿随便进攻中原，也不要与邻近各国构隙。”明玉珍死后，子明升即位，以后夏政权就完全成为割据政权了。

明升年幼无知，其母垂帘听政，大臣间互相不和。丞相万胜杀知院张文炳，明玉珍义子明昭又杀万胜，平章吴友仁不服，联合陕西李思齐、张良弼、丞相刘桢杀明昭，吴友仁始归，夏政权的内讧削弱了它的力量。明朝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

为征西将军，率周德兴、廖永忠、杨璟等由瞿塘趋重庆，令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顾时、何文辉等由秦陇趋成都，明升倚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凿两岸石壁，引绳作飞桥，上铺木板置炮石木竿铁铳，两岸置炮，以拒明师。东路明军屡攻不下，廖永忠攻夔关，亦不得胜；而北路傅友德军却长驱而入，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西北）、文州（今甘肃文县）、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今四川广汉），于是廖永忠从间道绕至敌后，进攻瞿塘，攻克夔州，进逼重庆，明升投降，夏亡。

由于野心家的篡权，南方红巾军最后变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被朱元璋消灭。但是，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首先建立农民政权，发挥了政治上的号召作用，军事上的指挥作用；它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斗争，破坏元朝的财政供给，沉重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特别是它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标志着元末起义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提高，表明元末农民起义把我国古代农民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魏中立传》、《星吉传》。

元·余阙：《青阳集》卷6《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序》。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8《刑赏失宜》。

明·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2《俞通海传》。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华巢公神道碑》。

元·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

明·黄伯生：《诚意伯文集》卷首《诚意伯刘公行状》。

朱元璋崛起和北伐

朱元璋，原名重八，又名宗，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父亲朱五四租田耕种兼卖豆腐，朱元璋小时替地主放牛，生活十分艰苦。至正四年（1344）春，淮河两岸瘟疫流行，朱元璋的父母亲及长兄相继去世，他穷得办不了丧事，靠邻居给了一点地才把亲人埋葬了。他孤苦伶仃，进皇觉寺当了和尚，不久又被方丈打发出门“化缘”，过了三四年游方僧生活又回到皇觉寺。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时，友人写信来劝他投奔起义军。他担忧害怕，拿不定主意，只是在发觉有人要告发他与红巾军勾通以后，他才决定“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肩以想戕”，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

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即郭子兴、孙德崖等在濠州起义后不久，朱元璋就参加了这支红巾军。开始时当一般士兵，两个月后担任亲兵，第二年因功升为镇抚。贾鲁病死，濠州解围后，朱元璋领兵攻五河，取定远，攻怀远、安丰，后定远被元兵包围，朱元璋突围取含山、灵璧、虹县等地。

朱元璋很注意自己军队的建设。在战争过程中，逐渐组成了一支由素质较好、出身较苦、勇敢善战的淮西人组成的军队。至正十三年（1355）六月，朱元璋到家乡钟离发动农民入伍，募了七百多人，其中徐达、邵荣、周德兴等人都是朱元璋幼年时的好友，出身都很贫苦，这些人和后来陆续投奔朱元璋的邓愈、常遇春、胡大海等，朱元璋的亲属李文忠、朱文正、养子沐英等，以

及巢湖水师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忠、廖永安弟兄，桑世杰，张德胜等人，都是朱元璋起义军的骨干，有了这样一批骨干，有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和郭子兴的旧部、巢湖水师，就构成了朱元璋队伍的基础。在此过程中虽然不断吸取地主武装，但领导权不在地主分子手里，地主武装经过改编后逐渐融合在红巾军的队伍里，因此，朱元璋的队伍在前期基本上保持了红巾军的本色。

至正十三年（1353）冬，朱元璋有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后，开始南略定远。至正十四年春得驴牌寨"义兵"三千[①]，六月得横涧山"义兵"二万、得洪山寨"义兵"数千，于是在定远时兵至数万人。七月，克滁州。这时，赵均用、彭早住也东略泗州、盱眙，郭子兴从泗州到滁州，朱元璋把部队交郭子兴管辖，朱元璋由镇抚升为总管。

至正十四年（1354）十一月，脱脱领元军包围高邮，分兵围六合（今江苏六合），滁州危急，后高邮元兵溃散，滁州也安全了。朱元璋乘机攻克和州。

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病死。四月，宋政权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妻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此，这支起义军正式归宋政权统辖，直到龙凤十二年（1366）韩林儿死为止，朱元璋采用龙凤纪年，旗帜等色尚赤。

龙凤元年（1355）五月，朱元璋因和州缺粮，准备南渡长江夺太平（今安徽当涂），正好巢湖水师李普胜、赵普胜要与朱元璋合作。但李普胜企图杀朱元璋而合并其军队，没想到反被朱元璋灌醉后投入江中淹死了。于是赵普胜逃归徐寿辉，巢湖水师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六月，朱元璋取采石、太平，改太平路为太

---

① "义兵"：它是元末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武装。

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为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做令史。一批儒士开始受到朱元璋的重用。

渡江取太平后，朱元璋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早在两年前，定远人冯国用就曾向朱元璋建议："金陵是龙蟠虎踞之地，帝王之都，首先攻下它作为大本营，然后四面征伐，提倡仁义，收揽人心，不贪图子女玉帛，那么你就不难平定天下了。"占领太平后，陶安也说："金陵是古代帝王的都城，攻取它后就等于占领了有利地形，从此可以所向无敌。"于是决定进攻集庆。七月，张天祐攻城失败，九月，郭天叙、张天祐再次攻城，由于投降过来的"义兵"元帅陈野先叛变，生擒郭、张二帅给元集庆守将、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郭、张二帅被杀。龙凤二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城破，杀福寿等元将，元水寨元帅康茂才投降，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接着，朱元璋分兵克镇江、金坛。七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签。不久，宋政权又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以朱元璋为平章。

当时，朱元璋虽然有了应天这个牢固的基地，也有了以应天为中心的周围一些城镇和地区，但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军，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针对这样的形势，朱元璋采取了巩固东、西战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取得很大成效。

张士诚，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平时受富户欺凌及弓兵丘义的多次窘辱，怀恨在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丘义及诸富户，招集苦于官役的盐丁，起兵反元，乘胜攻下泰州，军队发展到一万多人，连克兴化、高邮。张士诚起兵反元，并没有推翻元朝黑暗统治的决心，因而在元朝统治者剿、抚两手面前，渐渐败下阵来。

占领泰州后，元曾多次招降，当时还未投降。占领兴化后，元朝又遣高邮知府李齐招降，行省授以民职，不久又反。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

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接触是从龙凤二年（1356年）六月开始的。此时张士诚的势力已达到镇江，而镇江已在这年六月为朱元璋所占领，为了稳住自己的脚根，朱元璋派杨宪去平江与张士诚通好，并致书张士诚说："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但张士诚自恃高邮战役的大胜，且兵多将广，实力雄厚，拘留杨宪，出兵镇江，结果在龙潭大败，退守常州，朱元璋乘胜包围常州，俘获张士诚的二员大将，形势对张士诚极其不利。十月，张士诚请和，愿意每年输贡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以此作为犒军之资。朱元璋得书后寸步不让，致书张士诚，责怪道："挑起战端，责任完全在你。""我非常讨厌你的浮言夸辞。"于是增兵进攻常州。龙凤三年（1357）又克长兴（今浙江长兴）、泰兴（今江苏泰兴）、江阴、常熟，在常州俘获张士诚弟张士德。直到龙凤十二年（1366）朱元璋大举进攻张士诚前，双方战争规模不大，并各有胜负。

与徐寿辉部的接触，是从巢湖水师分裂后开始的。龙凤四年（1358）初，陈友谅、赵普胜进据池州，与朱元璋军在青阳、石埭、潜山一带有所交锋，赵普胜被杀后，陈友谅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朱元璋上。龙凤六年（1360）五月，陈友谅沿江而下，攻池州，不胜，转攻太平，朱元璋守将花云、朱文逊等战死。陈友谅在采石杀徐寿辉，做了皇帝后，就顺流而下东取应天，在龙湾遭到大败，逃到江州，朱元璋乘胜取太平、安庆。其部将于光、欧普祥降于袁州，吴宏降于饶州，王溥降于建昌，胡廷瑞降于龙兴，陈友谅越来越孤立了。

朱元璋对东南地区元朝控制的范围也发动了进攻。龙凤三年

(1357)，朱元璋命邓愈、胡大海克徽州、休宁，进攻婺州（今浙江金华)，击败杨完者率领的苗军。九月，朱元璋命费子贤取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十月，命缪大亨取扬州，“青军”张明鉴投降。龙凤四年（1358）六月，邓愈、胡大海取浦江（今浙江浦江)。十一月，朱元璋亲征婺州，十二月克之。龙凤五年（1359）二月，朱元璋命邵荣攻湖州，(今浙江湖州)。五月，宋攻权升朱元璋为江南行省左丞相。八月，命常遇春攻衢州，九月克之。十月，胡大海克处州。龙凤六年（1360）五月，胡大海攻信州。至此，朱元璋的部队在皖南，浙江地区占领了许多城市，稳住了南方阵地，从而对西线陈友谅采取了一系列进攻。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朱元璋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一方面，在形式上他还臣属于宋政权；另一方面，他的独立倾向更加明显。龙凤七年（1361)，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但是朱元璋的作战部署和政策措施已不受宋政权制约了。早在龙凤六年（1360）陈友谅进攻应天时，朱元璋就采纳了刘基的下述主张：“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所以从龙凤六年以后，朱元璋把主要力量放在西线，只是在龙凤九年（1363）五月鄱阳湖大战前夕由于张士诚派吕珍进攻安丰，朱元璋为了救小明王，不得不亲率大军北上救援。这时，日益堕落的陈友谅为了挽救败局，孤注一掷，发动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以少胜多，打败陈友谅，最后在龙凤十年（1364）消灭了大汉割据政权。

而张士诚则抓住鄱阳湖大战这一空隙，乘机要挟元朝政府，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请求元朝批准，元廷没有同意；元朝向其要粮，张士诚不与。此后，他与元朝断绝了关系，同时企图突破朱元璋在江南地区的包围圈，曾派谢再兴攻东阳、李伯升率六十万军队第四次夺诸暨、张士信攻长兴，

都未获胜，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月，又派李伯升、谢再兴等五次攻诸暨，又遭失败。

朱元璋在结束了对陈友谅的战争之后，在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发动了对张士诚的全面进攻。在这一战争中，朱元璋采取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其羽翼，然后转取浙西”的策略，前后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占领张士诚在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第二阶段是占领江南地区的城镇，形成对平江的包围；第三阶段是围攻平江。

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一面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一面令徐达、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出兵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四月，先后攻占了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沛县、邳州、安丰等地，全部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水地区的占领区。

这年五月，朱元璋在夺取了苏北向江南进军前，发表了《平周檄》。这篇檄文虽然仍用“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指责张士诚，文中对红巾军进行了百般攻击和污蔑，标志着朱元璋已公开背叛农民起义，所以对张士诚的战争从性质上讲，已演变为封建统一战争。

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攻张士诚。到十一月，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只有无锡还是张士诚部将莫天祐驻守，朱军已经形成了对平江的包围。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张天骐、潘元明等均投降朱元璋。

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朱元璋用叶兑的锁城法，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把守平江各门、各方；四周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设襄阳炮日夜袭击，张士诚依仗城

坚，死命坚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好拚命突围，也未成功。朱元璋派人劝降，也遭拒绝。吴元年（1367）六月，张士信在阊门督战，正挟妓欢饮，结果中炮身亡。九月，城破，周仁、徐义、潘元绍等皆降，张士诚率军巷战；最后自杀未遂，俘送应天，自缢死。不久，无锡、常熟亦下，张士诚割据政权消灭。

接着，朱元璋又乘胜消灭了方国珍的势力。

方国珍（1319—1374）名珍，又叫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世代以贩盐为业。至正初，黄岩人蔡乱头起义发生后，元发兵追捕，祸及平民。至正八年（1348）春，方国珍怨家陈氏诬告方国珍与蔡乱头勾通，方国珍怒杀陈氏。官府追捕，方国珍非常恐惧，只好和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惧祸逃难者逃入海中，聚集数千人，劫夺漕运粮，扣留元海运官员，谋起反来。元廷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前往镇压，朵儿只班兵败被俘。方国珍起兵本来是出于报复私仇，并无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识，因此，被俘获的朵儿只班成了方国珍向元朝伸手要官的一张王牌。当时，方国珍迫其上书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怕海运受阻，下诏授方国珍庆元定海尉，方氏兄弟也都捞了一官半职。方国珍回到家乡后并未解除他的武装，仍横行乡里。此后，元廷和方国珍双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交易，方国珍凭借自己控制的军队，要价越来越高。元朝政府一怕影响漕运，二怕他与红巾军相联结，所以既羁縻他，又要解除他的武装，因而出现反复无常的情况。

至正十年（1350）十二月，方国珍又入海烧掠沿海州郡。十一年（1351）二月，元命江浙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方国珍俘获孛罗帖木儿，元廷又授官与方国珍兄弟。十二年（1352）三月，方国珍又开始反元，杀泰不华。十三年（1353），方国珍使人潜入京师，贿赂权贵，于是元又授以徽州路治中、方国璋广德路治中、方国瑛信州路治中，但

方国珍仍在海上活动。

可见，方国珍历来是两面三刀，朝秦暮楚。到至正十五年（1355）以后，其表演更为充分。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方国珍又投降元朝，被封为海道运粮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次年八月，元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并奉命征讨尚未降元的张士诚，双方战于昆山，方国珍大胜。恰好这时元朝接受张士诚的乞降，两个叛徒握手言好了。后来方国珍依然据有温、台、庆元等处，虽然有的元官很不服气，但元朝廷必须依靠方国珍，利用他的船只运粮，也莫可奈何。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的军队已经东下衢州、婺州，逼近方国珍割据的温、台、庆元诸路。十二月，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方国珍与他的部下商量道："如今元朝将亡，豪杰并起。只有朱元璋号令严明，所向无敌，现在他又攻下婺州，恐怕咱们不能与之对抗，不如咱们暂时表示顺从，藉为声援，以便观察形势的变化。"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献给朱元璋黄金五十斤，白银百斤以及其他礼品。三月，又以温、台、庆元三郡之地献给朱元璋，并以其次子方关为质。九月，朱元璋授方国珍为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璋为行省右丞、方国瑛为行省参政，方国珉为江南行枢密院签院，并令奉龙凤为正统。但国珍本来就是无意真心投降朱元璋的，现在虽然接受了朱元璋的封职，却心持两端，窥伺成败，提出借口，不奉龙凤为借口，暂且以至正作为纪年。

果然，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开始，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每年派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去，元顺帝大为赞赏，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

国公。方国珍依然在庆元、温、台一带作威作福，但又害怕朱元璋来攻，只好伪装“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耍尽了两面派手腕。

吴元年（1367）四月，当朱元璋的军队已经攻克湖州、杭州等张士诚统治区并发动围攻平江后，方国珍自知难保，又耍出了新的两面派诡计，一方面坐山观虎斗，一方面暗地里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朱元璋写信指责他有十二条罪状。七月，朱元璋又责令方国珍贡粮二十三万石。同时又写信威胁，方国珍惶恐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

这年九月，朱元璋在攻克平江，消灭了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国珍侄方明善逃走，朱亮祖分兵取瑞安，自率舟师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汤和率军追击，又下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又令廖永忠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方国珍本想泛海出逃，但遇风不顺，于是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

朱元璋在平定了方国珍后，随即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军南下征陈友定。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今福建福清）人。徙居清流（今福建清流），出身贫寒。后为富户罗氏之婿，因经商折本，充当驿卒。至正十二年（1352），南方红巾军入闽，陈友定在其家乡清流的明溪、曹坊等地，袭击红巾军有功，升明溪寨巡检，后汀州府判来募兵，陈友定随元军镇压汀州、延平（今福建南平）、建宁、邵武等地起义军，以功升到清流县尹。至正十九年（1359），陈友谅遣其将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延平、将乐（今福建将乐）。至正二十一年（1361），邓克明又取汀州，进攻建宁，为陈友定所败。陈友定乘胜收复汀州，升任福

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陈友定为平章，驻守闽中八郡。由于当时福建远离北方，且与北方的交通被阻塞，陈友定在福建成了土皇帝，专制福建甲兵钱谷之政，朝廷命官都不得参与，但同时又效忠元廷。当张士诚、方国珍停输海运粮后，陈友定从福建运粮数十万石至大都，受到元顺帝嘉奖。可见，陈友定对红巾军和朱元璋是完全敌对，顽抗到底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月，陈友定进攻处州，为朱元璋将胡深击败，朱元璋乘胜遣胡深、朱亮祖、王溥三路追击，在进攻福宁时胡深中伏被陈友定俘杀，平闽计划未能实现。以后，陈友定又继续占领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今福建泉州）、漳州（今福建漳州）等路。

吴元年（1367），朱元璋军队势如破竹，入杉关，克汀州，取邵武，占长阳，陈友定将纷纷投降。十二月，朱元璋又令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自庆元取福州。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兵攻取建宁，进围延平，陈友定服毒自杀未死。俘送应天，不久被杀，其附近各路、州、县相继投降。

朱元璋的崛起，凭借了红巾军的威势，他在长时间内也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进行活动的。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他亲自攻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改为宁越府，在这里设置中书分省。他在门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口号与韩宋是一致的。但是，他在自己的势力日益发展的同时，不是进一步推进农民起义的事业，而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指导之下一心想当皇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因此，他和许多红巾军队伍不同，他在自己势力所到之处，不是坚决打击地主，而是尽量同地主妥协。他的军队纪律严明，不事杀掠，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这里面却包含了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之类的政治内容。他也注意优待重用儒生。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他征召了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刘

基后来参与了许多大事的决策，例如先图陈氏，后取张氏，然后北伐的方略就是刘基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宋濂以文学奉侍朱元璋，并教其子读经，为朱元璋起草了许多文书。这些儒生名士对朱元璋建立“帝王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宫莺去尽野鸡栖，憔悴江南谁是主?”害怕红巾军但又觉得已经不能依靠元朝的江淮一带地主阶级希望出现一个能维护他们利益的新的帝王。于是朱元璋出现了，他成了地主阶级的新的代表人物。

朱元璋的蜕变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中。在占领集庆后不久就不再用红旗而改用黄旗。他在与陈友谅、张士诚的争战过程中，同元将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书信往来不断。打败陈友谅后，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他自称吴王，设置百官，立子朱标为世子，这标志着朱元璋政权已经变质。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他在声讨张士诚的《平周榜》中已用地主阶级的口吻诬蔑红巾军起义是“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则是“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因而起来收拾这土崩瓦解的天下局势。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今安徽滁县）迎接韩林儿，路上，沉溺韩林儿于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宣告了红巾军韩宋政权的灭亡。

朱元璋在次第平定江南的同时，始终注视着北方元廷的情况。在与张士诚的战争还未结束时，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他就借扩廓帖木儿拘留自己所派使者为口实，作书发出了北伐的警告。此后，双方在徐州一带小有冲突，他看出元方上疑下叛，将帅嫌隙，亡元时机已到，便在这年十月下令北伐。

一天，朱元璋召诸将陈述了北方局势，然后问道：“现命诸公北伐，诸公有何计谋?”猛将常遇春答道：“用我们强大的百战之师直捣元都，可以速胜。”朱元璋说：“元建国百年，大都的守备必定坚固。孤军攻城，如果粮饷不继，元方援兵四集，我们就

会失利。我主张先取山东，继下河南，再拔潼关控扼门户，这样就能掌握整个形势，然后进克大都，再向西席卷山西和陕西。”这个高明的战略部署得到了将领们的一致赞同。于是，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并对其余诸将的任用做了妥善安排。他又对将士宣布了纪律，要求在这次征战中，“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家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儿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救者即还之。”

在将士临行时，朱元璋又向中原各地发布了著名的由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在檄文中，他指责元帝“荒淫失道，……于是人心离散，天下起兵。”他宣言，“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就明确地把元末红巾军原来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变成了单纯的民族斗争；把广大农民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群众运动变成了个别圣人的帝王事业。至于这个圣人，当然就是朱元璋自己。现在这个圣人遣兵北伐了，决心“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檄文宣布，我们是号令严肃、秋毫无犯的师旅，中原各地“民人”不要逃避。檄文还宣布，蒙古色目“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所以，这一檄文对当时的汉族地主阶级有很大的号召力，对瓦解敌人也起了很大作用。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这样，朱元璋的明军更具有正统的色彩，他的北伐之举更显出“吊民伐罪”的性质。朱明军队强大而有纪律，一系列政策，又大大减少了汉族地主、蒙古贵族和色目上层的抵抗，因此北伐军十分顺利。徐达率军先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谕王宣、王信父子。王宣是靠组织“义兵”被元朝授予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的，察罕帖木儿死后，扩廓帖木儿忙着打内战，王宣父子乘机攻

掠山东全境。当徐达来书招降后，王宣降后复叛，被徐达镇压。接着莒州、滕州、益都、东平、兖州、济南、济宁、密州、登州、莱州、东昌等地，相继克复，元守将或降或遁，由征戍将军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略南阳，进展顺利。

北伐的第二步是“旋师河南，断其羽翼。”这是从洪武元年（1368）三月开始的，徐达等率军进入河南后，第一个目标是汴梁。当时盘踞在汴梁的是元守将李克彝和投降元朝的原天完政权将领左君弼等，左君弼投降，李克彝逃遁。接着，河南、荥阳、福昌（今河南永宁东北）、钧州（今河南禹县）、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或降或克。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克陕，扼潼关，西略华州，以防李思齐等援兵东来。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准备进军大都。

北伐的第三步是“进兵元都”。这时，朱元璋已来到前线，与将领们会见，朱元璋问徐达如何进取大都。徐达说：“我攻打山东、河南时，扩廓帖木儿在太原观望不前。现在我军占领了潼关，张良弼、李思齐失势西窜，元廷已绝援。现在一定可以拿下大都这个孤城了。”朱元璋同意这个看法，并具体指示了作战方案。七月，将领们出发时，朱元璋重申了“毋掳掠，毋焚荡，毋妄杀人”的纪律并进一步要求大军做到“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还加了一条政策：“凡元之亲戚，皆善待之。”闰七月，徐达自中滦渡过黄河，各路兵马在临清（今属山东）会师，大举北上。不久，明军攻下直沽，元都大震。这月二十七日，徐达已进占通州。

元帝妥欢贴睦尔闻知通州已失，心惊胆战。他先在清宁殿召集后妃、太子等商议避兵北行，然后又在端明殿召集群臣会议。端明殿内一片混乱，大臣们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皇帝不能离开都城，妥欢帖睦尔听不进去，宦官伯颜不花放声大哭，说：“这个天下是世祖忽必烈开创的，陛下应当死守，怎么能丢弃呢！我

们愿率军民和诸护卫军出城抗战，请求陛下固守这京城!”妥欢贴睦尔在殿内徘徊了一阵子，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他觉得与其被俘，不如逃走，就在这天的黑夜里，妥欢帖睦尔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打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奔向北方茫茫的草原。

八月二日，徐达攻占大都，并下令：“凡元朝大小官员都必须送交告身，编入民籍，违者有罚。”在安顿了大都的镇守事务以后，徐达、常遇春等即率大军进指山西，平定扩廓帖木儿去了。明军扫除各地元朝残余势力和其他割据势力，继续花费了十来年时间，到1387年才最后完成。在朱明亡元的过程中，“大军戡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这是由于元廷已土崩瓦解，元臣们对这个行将毁灭的王朝已不抱什么希望；更是由于朱元璋再三宣布并严格执行了“勿妄诛谬”以及安抚元臣和蒙汉各族封建阶级的政策。

元帝北奔，明军占领大都，标志着统治中国九十七年之久的元王朝的灭亡。朱元璋认为妥欢帖睦尔“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在他死后给了他一个“顺帝”的称号。元朝灭亡了，朱元璋胜利了。蜕变了的朱元璋所完成的乃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一次新的改朝换代、统一中国的事业。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

（胡务）

参考资料：

《明史》：《冯国用传》、《陶安传》、《刘基传》、《方国珍传》、《陈友定传》、《明太祖实录》。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9《纪隆平》。

《元史·迈里古思传》

三部农书的出现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完成了用武力统一全国的事业，使中国境内长期的战争动乱宣告结束，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和经济文化大交流。习惯于金戈铁马生活的蒙古统治者，随着大融合大交流的逐步深入，也逐步抛弃了原来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从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出发，学着汉族统治者的样子，祭起了神农后稷，耕起了“籍田”，郑重地宣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元政府一再下诏敕谕劝课农桑，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在中央政府设立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等专门机构，奖励垦荒，大力屯田，兴修水利。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便成为必要，也有了可能。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可能性，使得元朝的农书在世祖至元十年（1273）以后得以相继问世，这些农书中影响最大且流传至今的有《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三部书。

《农桑辑要》是世祖至元十年司农司奉敕编纂的。大司农司派员巡察各地，督促农桑，推广先进技术时，其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书。在至元十年至文宗至顺三年（1332）六十年间，先后出版六次，发行量最大的一次是至顺三年，多至万部，布及全国各地，甚至流传国外。我国近邻朝鲜就采用了《农桑辑要》中收谷种法，春夏两季种红花法。十五世纪初，朝鲜艺文馆大提学李行

于《农桑辑要》内抽出养蚕方，自为经验，所收倍常，把方子刊版于世。后来朝鲜政府怕民间不懂华语，又命议政舍人郭存中将本国俚语逐节夹注，刻版广布。可见此书在当时影响之大。

《农桑辑要》共七卷，分为十门，包括典训（记述古代典籍中有关农桑起源及重要史实，类似序论）、耕垦（叙述耕种操作的方法）、播种（介绍谷类和纤维、油料等作物的栽培技术）、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包括茶、染料等）、孳畜（附《岁月杂事》，即农家月计划），全书共六万字，引录它书占一万八千字，是一部"博采诸书，更益以试验之法"、"详而不芜，简而有要"的通俗普及读物，它所记述的栽桑和养蚕，十分周详，超出了以前的农书。它还载录了不少"新添"农作物的栽培法以及蜜蜂的饲养法。其中，像苎麻、木棉、甘蔗、药材之类经济作物尤其受到重视。在讲了苎麻、木棉的栽培以后，作者还专门列出一节"论苎麻、木棉"。作者说："苎麻本来是南方的东西，木棉也是西域的产物，近年以来，河南已种苎麻，陕西已植木棉，长得繁茂滋盛，人民深获其利。现在要进行推广，有人以为风土不宜。其实，中国的物品，原出异域的不止一两种。外来的品种，只要种植得法，用心栽培，就能为我所用。希望勤于生业的人，有所取法，以后一定能收到功效。"这种对待外来物产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农桑辑要》主要概括了截至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经验，代表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发展水平，同时它又保存了不少古农书的片光吉羽，为我们研究古代农书提供了宝贵资料。

1313年，王祯《农书》出版时，情形就大非昔比。其时，元朝灭金已七十九年，并宋也三十四年，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大统一，这就为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较长时期的安定，更给劳动人民以相对安定、发展生产的大好时机。加上元朝政府利用行政力量推行种种发展生产的措

施，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祯《农书》的问世，就成了元朝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1295）起，做过宣州旌德县尹（今安徽旌德），在任六年。大德四年（1300），由旌德调信州永丰县尹（江西广丰）。在任旌德县尹时，王祯开始编写《农书》，到永丰县任职二年后脱稿，到了皇庆二年（1313）又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个别附记，并写了一个简短的自序。

王祯《农书》是我国第一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作系统研究的农书。全书共有三十六卷，约计十三万六千字，插图二百八十一幅。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论农业历史、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缫等（一至六卷）；第二部分“百谷谱”，分别叙述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竹木等种植培养法（二十七至三十六卷）；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绘出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又分二十门，每门冠以简要的论述，每门下又分若干项，每项又有一幅或几幅写生图，每幅图后都有一段文字说明，描写这项农器的构造来源，演变及用法（七至二十六卷）。

王祯《农书》是一部见解独到的农书。首先，书中贯串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思想。王祯认为，只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选择适宜于环境的作物，选择良种，及时施肥，改造土壤，兴修水利，是可以克服天灾而夺得丰收的；第二，注意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特别是改进农具的经验，书中总结了十四世纪初在我国出现的大量新式农具，如耧锄、耘耥、牛转翻车等，对于提高当时的农业生产率具有现实意义；第三，注意推广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例如木棉的种植在元初得到了推广，但有些地方虽然种植了，却由于不得其法，收成不佳，

于是有人认为风土不宜，对能否推广表示怀疑，王祯则在《农书》中对木棉栽种法作了全面介绍。又如，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他主张效法北方的锄社，以十农为单位，先锄一家之田，本农供应饮食，其余依次轮流，十天之内，各农农田都锄治完毕，间或有病患之家，共同协力帮助，这种组织形式名曰“锄社”；第四，王祯在《农书》中除了创造性地绘制了许多农具外，还把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总结在一幅小小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中，既实用，又方便；第五，《农书》不是一部纯技术的著作，它表露了作者对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同情。王祯指出：“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甚者苛敛不已，朘削脂膏以肥己。”并揭露元朝官吏劝农措施的腐朽。王祯之所以能知晓农民的疾苦，并能写出一部博古通今、综合南北、富有创造性的不朽著作来，主要是因为他能深人实际，接触群众，善于总结，否则他是决不会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

王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机械设计师和印刷技术的革新家。后汉杜诗制造的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的水排，元代已失传，王祯多方搜访，加以研究，并进一步加以改革，把古人用皮囊鼓风改用木扇鼓风，对提高冶炼技术有重大意义。

元代著名的三部农书之一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优秀的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写的。他以父鲁字为氏，名铁柱，明善为其字。这本书是他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肃政廉访司官员时撰写的。元制，肃政廉访司兼劝农事，鲁明善利用工作之便，对江淮地区农业情况做了许多调查和了解，对以往的农书进行了研究，终于在至顺元年（1314）使这本书正式出版了。全书分上下两卷，约一万五千余字。从篇幅看，它比前面两部书小多了。但是

它按照“月令”的体例撰成，与前面两部书的面貌迥然不同，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全书分十二个月令，在每个月令中详细记述了农家当做的种种农事，很实用。作者认为“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都包括在这部书里了。人们只要按照书里所写的一切去做，就能够掌握“生财足食之道”。鲁明善作为一个畏兀儿人写出了这样的农学著作，这是少数民族对元代文化做出贡献的一个显著事例。

《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是元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总结，反过来它们又推动了元代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证明元代农业发展并非一直落后，而是比较迅速且卓有成就的。

（胡务）

参考资料：

《农书》：《百谷谱·木棉》、《农桑通诀·锄治篇》、《农桑通诀·劝助》、《农器图谱·因制门》。

元代漕运的发达

在中国历史上，漕运是指王朝把各地的赋税运到京城。漕运可以是陆道，可以是海道，也可以是河道，那是指漕运所采用的主要运输方式。实际上漕粮运到京师往往是水陆联运，甚至几经转手。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盛产粮食，但京师往往在北方，因此漕运也就成为南粮北调的一种特殊形式。例如北宋的京城在开封，当时的漕粮就是通过运河和陆道联运的办法而运到开封的。

元代的漕运以海运为主。海上运粮，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船只来往于沿海各地之间，一般路程较近。唐朝时候，朝廷也已经调运南方的粮食到河朔和辽东，不过那不是漕运，也不是经常进行的。元代，京师设在大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而当时海运的条件又比较成熟，海道漕运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元代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其功用在于：“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但统治者对它的认识，并非始即了然，因此对海运的筹划和组织也经历了一个相应的过程。大致说来，从至元十九年（1282）初运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的设立为试运阶段。在这期间，通过海运与内河运输利弊的对比，统治者逐步认识了海运的重要性。约从至元二十五年（1288）“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的设置，到大德七年（1303）朱清、张瑄的败亡，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朱清、

张瑄集团专制海运，南粮主要依靠海道运达。岁运之数有大幅度增长。这是元代海运的确立阶段。当大德末年朱清、张瑄败亡（1304）至天历改元（1328）为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江南漕粮征收的布局得到调整，岁运之数大幅度上升。约当至正初（1341）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为衰落阶段。

当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攻下临安以后，漕运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开始的时候，江浙一带的漕粮集中在扬州，沿古运河北上，在淮安由淮河入黄河，溯流至中滦（今河南省封丘西南），从中滦以下，则又改由陆路运至淇门（今河南省浚县西南），再入御河（今卫河），抵达通州，从通州又转陆路抵达大都，这是以河道为主，水陆联运。河道迂回，水陆转运中又要装卸三次，十分不方便。为了缩减从淮安到中滦的水道和从中滦到淇门的陆道，至元十九年（1282），修浚济州河、汶水、泗水等河水，使漕船从淮安继续北上进入大清河，再由利津入海（今属山东）入渤海至直沽。这样，全程几乎都是水运。只留下从通州到大都一小段是陆运。但是济州河的修浚不深，利津入海口又容易淤塞，所以这条路线的运输量仍然不大。当时还曾在山东半岛开凿从胶州（今胶县）到莱州（治所在掖县）的运河，但遇到地层岩石坚固的地段，不能深凿，河水太浅，最后也只好放弃。

河道不便，当时的丞相伯颜就想起了海道。至元十三年（1276）他攻下临安以后就命令属下把南宋的库藏、图籍和货物从海道运到了大都。至元十九年，伯颜见运河效果不好，便奏请试用海运，得到忽必烈的允准，这年试运仅四万六千余石，而且由于“风讯失时”，第二年才到达直沽。可是，海运一旦打通，就显得比河运便捷得多。因而不久就成了漕粮的主要运道。

元代的海漕每年春夏运两次。至元二十六年（1289），海运漕粮九十三万五千石，抵岸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已占全部漕粮的多数。至元二十七年（1290），海漕增至一百五十余万

石，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大都已积储了丰盈的粮食。从至大元年（1309）起，年运二百万石以上。从延祐六年（1319）起，年运经常在三百万石以上。在大都生活的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的食粮大多依靠海道从南方运来。当然，皇帝以及贵族官僚吃的是上等好粮，元廷规定每年必须“上供白粳米和香莎糯米各五万石。”不过，元朝的皇帝懂得，要吃到江南的好米很不容易，据说皇帝进膳时习惯上总由御厨先端上黄粱，以示不忘前此的某种困乏。

元廷对海运十分重视，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至元二十年（1283）元廷正式成立万户府二管领海运，至元二十四年（1287），因海运渐重，始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增置万户府二，共四所万户府。至元二十八年（1292），掌管行泉府司的桑哥党沙不丁、乌马儿等人劣迹败露，四万户府削减为以朱清、张瑄为首的两所“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二人均加骠骑卫上将军，分别以江东道宣慰使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兼万户事。二府设官分职，正官为达鲁花赤和正副万户。首领官包括经历、照磨、译史、奏差，另有镇抚。这套设置，奠定了元代海运管理机构的基本规模。朱、张两人原是海盗头目，后来归附元朝，在开创和经营海运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元廷给他们以高官厚禄，他们就这样依靠经管海运起家，成为江南富豪。他们盛时，“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世祖忽必烈一度甚至特许他们自印纸钞。至元三十年（1293）七月授朱虞龙为明威将军、海道都漕运万户提调香糯事，万户府至此增为三所。大德六年（1302）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政张广彪言，漕府官员得以自举自保。大德七年（1303）朱清、张瑄被元成宗治罪。同年十二月，并三万户府为一。次年，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市）开司署事。府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所按地区划分，改为十一处，只设达鲁花赤、千户和副

千户。十一处千户所是：平江等处香莎糯米千户所；嘉定等处千户所；常熟、昆山、温台、崇明、上海、嘉兴、松江、杭州、江阴所。至大四年（1311）元廷将原有的十一处千户所合并为七处，至此元代的海运机构基本确立。海运官在元朝一直受到特别的优遇。“漕臣之长，必天下重望。”来往京师可用驿站，俸禄也特别优厚，漕吏亦成为元代吏职中的肥缺。

元代海运路线，前后开辟过三条。第一条航线是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张瑄所辟，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北经崇阳州入海，沿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今江苏海门东浅沙）开洋，靠近沿海山屿北行，抵淮安路盐城县（今江苏盐城），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密州（今山东诸城）、胶州（今山东胶县）海面，放灵山洋（今山东青岛以南海面），再东北行，沿途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今山东半岛东端），然后西航，进人渤海，沿界河（今海河）至杨村码头（今河北武清），航程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第二条航线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朱清、张瑄因旧道“其路险恶”重新开辟的。自刘家港至撑脚沙、沙觜（今刘家港西北甘草沙一带），再至三沙、洋子江（均在长江北口），过匾担沙、大洪（均在今崇明北），又过万里长滩，通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刘岛（今山东威海东刘公岛），至芝罘、沙门二岛（今山东烟台北），放莱州（今山东掖县）大洋，抵蜀河口（今天津大沽）。这条航线比较捷近，顺风时半月可达，如果遇到风水不便，迂回盘摺，有时需要四十天以上，方能到达。由于这条航线绕过了沿岸的沙港，通洋航行多，因而时间短。第三条航线是至元三十年（1293），海运千户殷明略所开辟的。从刘家港人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人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人界河，如果船顺信风行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这条航线比前二条更为便捷，主要是沿海岸线较远，取道较

直，航期又大大缩短了。

海运发达无疑是由于元廷需要南粮而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同时，当时在造船和航海的技术上也为这样的海运提供了条件，海运大约多用楼船。这是一种尖底的三桅帆船，两头各置一舵二桨，前后对称，上盖望楼。由于其形制如楼，故称楼船。在遇到风暴时，转帆困难，这种楼船可以首尾互换，灵活运用。海运的船，起初小船只能载三百石，大船最多载一千石。随着运粮的大幅度增加，运船也就越造越大。延祐年间（1314—1320）以后，最大的船可以装到八九千石。在每艘航船上，都有惯熟工凭针路定向行船，仰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对于海道上的潮汛、风信、天象等的变化规律都有仔细的观察和切实的认识。他们还在海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如暗礁等处树立信号灯，以指导夜间船只的顺利航行，这是航运史上信号灯使用的最早记录。在海上航行，风涛变幻无穷，是比较危险的。但由于当时具有较高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又不断改进航道，因此海运事故很少，每年的漕船绝大多数都能安全抵达。

大规模的海运需要保持一千几百艘海船和数以万计的船上人手。起初，得自南宋的战船和为了出征海外而造的战船都有转用于海运的。后来大部分海船由“近海有力之家”承造，同时也由官府直接营造一部分。船上人手大量的是水手，起初有不少是军人，后来主要从民间勾括得来，至于火长（掌管指南针的导航员）、大工（舵工）、碇手等技术人员，则是由船主高价招募而来的。为了保证海船的提供和水手的差使，元廷在户籍中专门编定了船户和海道梢水户。船户是中上人家，需要为元廷用自己的资财造船，以供海运。海道梢水户是中下人家，需为元廷出壮丁充当水手。这两种户计都免去杂泛差役。据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规定，出梢工水手的人户，每户还发给五人的口粮。

当海运初兴的时候，运米一石，官府支给船户脚价中统钞八

两五钱，相当于江南一石米价的两三倍，脚钞甚至预支，船户造一只一千料的海船，用工料钱约需一百锭，而运粮一千石，可得脚价一百七十锭。所以，当时海运对船户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以后脚价有增有减，但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脚价实际上越来越低。加上管理海运的官吏贪吞脚价，或拖延支发，这就使不少船户收支不能平衡，越来越贫乏。到了元代后期，海道上盗贼出没，漕船常遭劫掠。元廷规定，船存粮失，由船主在下一年运赔，对于一般船户来说，一旦遇上遭劫的厄运，自然就难以生存下去。只有少数富豪船户，与官吏相勾结，反而从中得利。或假报船只覆溺，吞没官粮；或夹带船只，走私牟利；或把自己造船运粮的负担转嫁于他人。至于水手，他们家人的口粮也经常遭到官吏的克扣，他们的生活自然就十分艰难，恰与富豪船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正是数以万计的水手们每年冒着海上的风浪把南粮运到大都，维持了大都的粮食供应。

在元代，每年都有庞大的船队航行于东海、黄海和渤海的海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壮举。

元代的漕运虽然主要依靠海道，但也继续利用河道，在发展海道的同时，元廷进一步改善了南北之间的运河交通。

元廷曾开济州河，使船只人大清河从利津放渤海，而后到直沽。但由于大清河水浅，利津出海口沙淤，不得不废弃大清河航道。这样，船只通过济州河人大清河后，只能航行到东阿（今山东东阿以南），从东阿改用陆道把漕粮运到临清（今山东临清以南），然后又转用水道从御河抵达通州。水陆运道的两次周折，十分不便，从东阿到临清的陆道虽然只有二百几十里，但役民达一万三千二百多户，而且中间有一段路程，地势低，夏潦时不能通行。当时，这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运输问题。

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采纳寿张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礼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

主持修筑了一条从须城（今山东省东平县）安山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的新运河，引汶水达于御河，筑河丁夫共三万，正月开工，六月完成。河成，渠官张礼孙等人上奏："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诏赐名会通河。这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途建有三十一个闸门，河成后，经济州河北上的船只就可以一直航行到临清转人御河，抵达通州。

会通河开浚后，不论是从河道还是从海道，南方的漕船都集中到了通州。通州到大都，还有五十里陆程。路不长，但运输量太大，老百姓劳苦不堪。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提出了在通州与大都之间修一条河道的建议。第二年，世祖忽必烈复置都水监，命郭守敬领事，主持这项水利工程。郭守敬根据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计划从大都城西北昌平引白浮泉水过双塔、榆河，又引玉泉诸水，汇于积水潭，然后东折而南，注入旧河道，每十里置一牐，以时蓄泄。这年秋天开工，动用军人、工匠等二万人，凡丞相以下官员，都亲操畚锸作为倡导。置牐之处，往往在地中挖得旧时砖木，人们无不赞叹郭守敬的才识。至元三十年（1293）秋天完工，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当即启用，从此免除了都民陆挽之劳，公私都感觉便利。适逢忽必烈从上都回来，他经过积水潭的时候，看到舳舻蔽水，十分高兴，赐名通惠河。这样，海运和河运到通州的漕粮都可以直接用船运到大都。从此，从杭州到大都，完全由南北大运河航线沟通起来了。这条南北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京师和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它在元代是一条最重要的交通线。

从漕运来说，海运还是主要的，河运只占了一小部分。会通河河道浅，不可能运行大的漕船。大运河全线畅通时，每年河运的漕粮也只有几十万石。不过，从南北之间的交通来说，大运河就具有更多的作用。当时的漕粮只有一部分供给大都城里的平

民，这不够平民的食用。民用的大部分食粮就靠商人从南方经大运河贩运而来，此外，商人们也通过大运河使南北的其他货物得到交流。另一方面，大运河的畅通也使元廷同南方的联系更加便利，元廷以及诸王驸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去南方各地。江淮、湖广、四川以及海外诸番的土贡又溯河而上，源源不断地运到大都。

在大运河流经的地方，随着水运的发展，经济生活都比较活跃。当时的通州："市井复喧嚣，民风杂南朔。"当时的淮河口："水次千家市，蛮商聚百艘。"大运河成了它所流经地方的经济命脉，因此当地人们把疏浚河道、护防河堤看作十分重要的事，在淮海一带，有这样的说法："积渠如积金，守防如守城。"

为了保持大运河的畅通，元朝时有一套技术设施和管理办法。运河流经之处，地势时有高低。因此，大运河上建有许多闸门来控制水位。如会通河上建闸三十一座，通惠河上建闸二十座，都是平均不到十里就有一闸，船只行至水位低的水段，就把下面的闸关闭，把上面的闸启开，使水位提高，让船只通过，元廷设有专门的看闸人来管闸的关启。由于会通河等水道较浅，当时还规定在大运河里航行的船只载重量不能超过一百五十料(石)。

但是，大运河上的航行亦常常遭到权贵和富商的破坏，他们贪嗜货利，违反规定。建造三四百料甚至五六百料的大船航行，阻滞了其他的官船民船。元廷下令禁止无效，有关机构只好在一些闸座处又加修隘闸，设法阻拦。于是又有人造"减舷添仓"的长船，船身狭窄到可以通过隘闸，但长到八九十尺以至一百尺，这种长船入闸以后，不能回转，动辄搁浅，更加堵塞河道。针对这种情况，元廷又规定船长不得超过六十五尺，在河水中安置两石相距六十五尺，进行验量。但是，权贵们的"红头花船"仍然在河上横行霸道。他们的船一到，就对看闸人"恃势捶挞"，强

迫看闸人启闸放行。尤其是诸王驸马的船，插上旗号，亮出兵器，往往鸣锣击鼓，扬长而去，其实，他们的船上有时载的是商人和货物。也有商人把自己的船伪装成权贵的船而抢道先行的。

反之，对于一般的商民船只，守闸人又故意拖延启闸时间，借机索要贿赂，运粮的官船在河上遇到商民客船时，有时也阻拦客船的行驶，殴打客船上的人，抢夺客船上的货物。到了元代后期，运河上的船只还会遭到沿途劫掠。

在元代，南北大运河虽已畅通，但这种畅通是有很大局限的。南北大运河是勤劳而又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但在封建时代它的作用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

元代运河和海运的发展，不论在内河和海外的各方面，对我国南北交通和运输都开辟了新阶段，便利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同时在十三四世纪造船业技术逐渐有所提高，对十五世纪明朝初期的郑和宝船七次“下西洋”和海外贸易的推广等壮举，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从世界航海史上看，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中国帆船在设计和制造上仍然是很先进的。1605 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为了远攻干那底，曾建造了大批中国帆船式的船只，据称这些船只“在桨帆上都很好。在现有设计用桨帆的船只中，没有什么船会有这样大的载重量来装粮食。”从这一点也可以旁证我国造船业水平在宋、元、明时代一直是享有很高称誉的。因此说元代的运河和海运上的创辟，在我国交通运输史上发生过积极作用。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纪事本末·运漕》

《元史》：《食货志·海运》、《河渠志》、《顺帝纪》。

《元海运志·大元仓库记》

《永乐大典·经世大典》

黄道婆改进棉纺技术

古代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是农村社会经济的细胞。这种情况在元代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女织”的物质内容却在变化之中，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家庭棉纺织业正在代替传统的丝纺织和麻纺织手工业。

棉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唐代时候，棉花已从北路传到新疆。从南路传到两广、福建。从十三世纪上半叶起，南路棉花开始传入长江中下游，不过这一带比较普遍种植棉花是在元代。同时，北路棉花也传到了甘肃和陕西。棉花的种植是棉纺织手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棉纺织技术的改进也会增加对棉花的需求，从而促进棉花种植的推广，元代正是我国手工棉纺织技术大大前进了一步的时代。

在十三世纪中叶前后，南方和北方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简不同，南方较北方先进。南宋进士艾可叔曾作诗云：“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闻得上方存节俭，区区欲献野人芹。”诗中提到纺车、弹弓、织机。胡三省《通鉴注》木棉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可知这时棉花已在江南种植，不但用铁铤、弹弓这些工

具，而且对制作和使用方面也有些法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陕西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特别简陋，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即南宋灭亡的前六年，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说："待子粒干取下，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赶饼杖。用梨木板长三尺，阔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逐旋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拈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全书只有碾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其他工具一概不提。究其原因，世祖至元初期黄河流域只有由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吐鲁番盆地的畏兀儿传入这种极其简单的工具和制作方法，其时南宋未亡，南北交通还不大容易，所以没有把南方的便利工具和进步方法传入。不过总的说来，全国的棉纺技术仍然落后，松江府的棉纺工人还得用手从棉核剖去棉子，弹花仍用线弦竹弧制的小弓。所以江东虽然早已种植棉花，却由于工具和方法的不良，产品粗粝，销售不了，人民生活还是不能改善。

至元13年（1276），元灭南宋，全国归于统一。这就为棉纺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创造了条件，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

黄道婆出生在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其生卒年代不详，大约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世祖、成宗时期，即十三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乌泥泾土地贫瘠，是很穷困的地方。黄道婆幼年时因家境窘迫而流落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今崖县）去谋生。当时，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是先进的。黄道婆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壮年时期，学会了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她怀念故乡，从崖州回到了乌泥泾。她看到家乡的人们还在用手剖剥棉桃籽、用"线弦竹弧"拨弹棉花，便把从黎族那里学到的技术传授开来。她教给大家"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方法，她还传授了相当高级的提花技术，使织成的被、褥、

带、帨（手巾）呈现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光彩美丽，看上去就像是画出来的一样。不久，乌泥泾一带织出的崖州被便以“乌泾泥被”名闻各地，有千余户人家依靠织“乌泥泾被”为生。

黄道婆传入长江下游乌泥泾的制棉工具据元末人陶宗仪说是“捍、弹、纺、织之具”。没有具体指明是些什么东西。但捍即赶，有《泊宅编》解释可据，是用铁杖擀尽棉子；弹花用弓震掸轻松；纺花用车；织布用机子。她在制棉工具上的贡献是以当地不完备的工具而令其完备。如由核除去棉子以前是由手剖，她教以用铁杖捍；当地不得劲的工具而使之得劲了。如无力的线弦竹弓而代之以强而有力的绳弦竹弓之类。并由碾棉子、弹花、纺花，到织布，立下一个系统化的手续，使人有所遵循。

黄道婆把崖州少数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传入后之十九年，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王桢的《农书》关于制棉工具有详细的介绍，有图并有解说。

一、搅车、即踏车，或作轧车，是去棉子用的。“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具作掉栶，轴末柱窍不透。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棉出于外。比用辗轴，功利数倍。”

二、弹弓，弹绵花工具。“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棉英。”元末发明檀木椎子，击弦时更有力。”

三、卷筵卷棉工具。“淮民用蜀黍梢茎，取其长而滑，今他处多用无节竹条代之。”

四、纺车，纺纱工具。“夫轮动弦转，筟维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续于筟维（即锭子——引者），牵引渐长，右手均捻，具成紧缕，就绕维上。”这种纺车可能是用足踏发动的。

五、拨车，将纱锭上的棉纱拨到拨车上变成棉纴的工具，“以竹为之，方圆不等，特更轻便。按旧说先将纺讫棉维于稀糊盆内，度过稍干，然后将棉维头缕拨于车上，遂成棉纴。”

六、軠车，用以分络棉线，出自福建。“其制如所坐交椅，但下控三軠，四股軠轴之末，置一掉枝，上椅竖列八维，下引棉丝转动掉枝，分络軠上，丝纴既成，次第脱卸。”

七、线架，并纱成线的工具。“以木为之，下作方座，长阔尺余，卧列四维，座上凿置独柱，高可二尺余，柱上横木长可二尺，用竹篾均列，四弯内引下座，四维纺于车上，即成棉线。”

这些工具的制作和运用，大多当与黄道婆的传授和改进有关。至于织机，《农书》上所记载的很是一般，黄道婆所用的可能还要进步一些。她的提花技术至少说明她已能熟练地使用花楼。

黄道婆不但由崖州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并把崖州被面的做法也传入。她教妇女们怎样错纺，怎样配色，怎样综线，怎样挈花，各有一定的法则。“以故织成被、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其后本地人根据她的方法，把技术提高，织造各色各样的布，上绣各色各样的纹理。明成化年间，这种布流传到禁中，宫女们甚为爱好。乌泥泾人又织造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麒麟，而用大红、真紫、赭黄等色，一匹有贵至白银百两的。

乌泥泾本来在元初是个民食不给的地区，可是后来因为棉织品的制作，家户殷实。乌泥泾及其周围松江府各地的棉纺织业很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的先进技术又逐渐传播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域。元人熊砢谷所写《木棉歌》中的诗句描写了当时江南农村中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景象：

尺铁碾去瑶台雪，一弓弹破秋江云，

中虚外泛搓成索，昼夜踏车声落落。

黄道婆死后，大家为感谢她的恩德，公共把她埋葬了，顺帝至元三年（1337）并为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她的祠给毁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有个名叫张守中的人出来把祠迁到他的祖父墓地南边，并求王逢作诗以为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致祀宁园寺，清嘉庆年间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也立一小庙享祀她。民国七八年间她的小庙还在一个学校和一个剧场之间存在着。今天，在黄道婆的故乡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有一座黄道婆墓。在当地的一座黄母祠里，有一尊黄道婆的塑像：一位辛劳而慈祥的农村妇女，手持棉花，头扎布巾，凝视端坐，朴素而又庄重。那一带的民谣唱道：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织技术的改进是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记，改变着中国广大人口衣着的物质内容，改变着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物质内容，这件事对十四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

可是，在封建社会制度下，上述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又为封建统治者压榨劳动人民提供了新的物质内容。在元代，木棉和棉布已列为南方夏税的项目。农妇们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棉布，常常被封建统治者搜刮去了。她们以及她们的亲人甚至不能求得起码的温饱生活，元代诗人乃贤的《新乡媪》对此描写得非常真切和沉痛：

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
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
棉花织布供军钱，借人辗谷输公田。
县里公人要供给，布衫剥去遭笞鞭。

两儿不归又三月，只愁冻饿衣裳裂。
大儿运木起官府，小儿担土填河决。
茅檐雨雪灯半昏，豪家索债频敲门。
囊中无钱瓮无粟，眼前只有扶床孙。
明朝领孙入城卖，可怜索价旁人怪。
骨肉分离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
数来三日当大年，阿婆坟上无纸钱。
凉浆浇湿坟前草，低头痛哭声连天。

（胡务）

参考资料：

元·王桢《农书》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4《黄道婆》。

斡脱扰民

斡脱是元代经济生活中一种特殊的商业高利贷势力。

斡脱是突厥语 ortaq 的译音，意思是“同僚”，“伙伴”。那些经营草原与定居地区之间长途贩运贸易的西域商人，皆组成为商帮，结队而行，或自称“斡脱”。他们投靠蒙古人后，替蒙古大汗、诸王、后妃、公主等经营商业或放债营利，蒙古人即以斡脱称之。由于替蒙古贵族营商、放债既可以凭借政治势力大获其利，往往又能享受免役等特权，所以许多西域商人投充斡脱，成为一种专门行当。斡脱在元代具有官商的含义，所谓斡脱钱，就是由回回商人经手发放的官债（或诸王、贵戚的私债），故又称斡脱官钱。

斡脱是中亚伊斯兰教商人，他们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他们很早就与蒙古人取得了联系。在蒙古建国以来，成吉思汗就认识了一个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换易貂鼠、青鼠的回回商人。后来又有一个田姓回鹘人，擅长经商，成本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深悉内地的富庶情况，乃唆使成吉思汗南侵。另一西域人札八儿火者更早就投靠成吉思汗，是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的少数亲信之一。因他熟悉中原道路，引导蒙古军入关，取了中都，成吉思汗让他引弓射之，随箭所落，悉赐为己地，又命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1215 年花剌子模沙派使臣来，成吉思汗也派了使者和商队报聘，使团的首领一是花剌于模人马哈木，一是不花剌人阿里火者，一是讹答剌人玉素甫·坎哈。可见在成吉

思汗身边，很早就聚集着不少西域商人了。征服西域以后，有更多的西域商人被吸收到蒙古政权中工作，或来东方经商，后来，他们的代表人物又常常在汗廷中担任要职，蒙古统治者对他们十分优待。窝阔台就这样说过："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斡脱，我知道他们各打算盘，各有所谋。但我希望我们使他们个个称心如意，分享我们的财富。"他们构成了元代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蒙古贵族不会商贾，而斡脱商人的特点是擅长经营珠宝，这正好投合蒙古贵族奢侈生活的嗜好。元代的皇帝、诸王、公主、驸马以及勋臣之家，对珠宝的消耗量极大。他们的衣服、帽履，旛帘以及种种用具，都要镶嵌珍珠，这些珍珠就是斡脱从海外贩卖来的。他们得到大珠或其他异宝，就奉献给皇帝，借以获取巨额的赏赐。斡脱放债的特点是收高额利息，称为斡脱钱或斡脱官钱。斡脱钱，一年的利息与债本相等。而且本生息，息转本，年年倍增，比如一锭银子，利滚利地展转十年，就变成一千零二十四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羊羔利，是十分严重的高利贷剥削。斡脱与一般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奉旨经营，有强大的政治后盾，因而特别贪暴。其中狡黠无赖之徒甚至诈称被劫，要求州县官府赔偿，或者将财物放在无人之地，却在远外观望，一旦有人触摸到这些财物，他们急忙跑来要赖。人民交纳不起赋税，州县官吏缴不足税额，就向西域商人借银填补，到期不能偿还，即将息作本，越滚越大，以至人民用蚕麦，妻子作抵，都无法还清债务。1238 年至 1239 年间，真定路遭蝗旱之灾，乃借贷斡脱钱完纳贡赋，本利积银达一万三千余锭（六十五万多两）。1240 年，诸路官民所欠斡脱钱达到三百八十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汉地全境三年半的课税，不少借了斡脱钱的人，"往往卖田宅，鬻妻子不能偿。"面临绝境，

蒙元时期，斡脱的势力是很大的。1263 年，仅中都路（今

北京及附近地方）一带，回回人就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其中大多数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斡脱的活动遍布各个行省，以至于偏僻的“西番地面”——藏族聚居区。在国际上，他们的活动也一直伸展到波斯和印度。通过斡脱商业高利贷的活动，大量白银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流到了中亚，使中亚原来长期缺乏的银通货得到充分的弥补，使中亚在十三世纪中叶以后一段时间内成为国际上一大商业——金融中心。

在元代中国，斡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大体上与色目相等。例如，他们与色目人一样，可以备有弓箭。又如1286年元廷在汉地括马，汉人的马全都拘收；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的马，也全部拘收；但是，斡脱与达鲁花赤、回回、畏兀儿等并列，他们的马只是三分中取二分，不过，他们在地方上也要承担差役，他们做买卖也要交纳商税。

随着元朝在全国统治的确立，元廷对于斡脱的商业高利贷活动也进行一定的控制。斡脱在地方上经商，要领取公凭，没有公凭的斡脱，不能在旅店住宿。公凭上写明行商期限，限满必须先到官府倒换，不能任意展延。斡脱们也不能夹带着做别的买卖。但是，斡脱持有公凭，一路上就可以通行无阻，地方官员不能阻挡他们的行动。斡脱放债的羊羔利引起许多人家破人亡，窝阔台时已规定“子本相侔，更不生息。”利息到了债本之数，就不能再增加，这个规定，忽必烈时又一再重申，限制了羊羔利的到处泛滥。早在1252年，鉴于斡脱在蒙古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蒙古国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1267年以后，元廷还一度设有斡脱所，或称斡脱总管府，专门统辖斡脱。

但是，许多斡脱是直接为诸王、公主、驸马经营的。他们依仗蒙古贵族的权势往往为非作歹，飞扬跋扈。在陆路上，他们要使用驿马。在运河上，他们要抢先开闸通行。他们在自已的船上，插面写着诸王名字的旗号，亮出缨枪弓箭，鸣锣击鼓，扬长

而去，在欠债人还不出斡脱本利时，他们甚至“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他们也敢违反禁令，在从事海外贸易时把马匹、军器贩运出口。这样的行动，元廷都是不允许的。然而却难以禁绝。

从忽必烈时候起，元廷对斡脱势力既予一定的保护，又予一定的限制。这是因为斡脱的商业活动始终符合皇帝和贵族官僚的豪华生活的需要，但是他们的高利贷活动以及其他一些行为又不利于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反映了元廷同蒙古贵族分封势力之间在利害关系上的一致与矛盾。元廷继续支持蒙古贵族通过斡脱营利，然而这种营利活动不能危及王朝的权益。在元廷中，始终有一股回回、畏兀儿官僚势力，他们是斡脱们的政治代表。回回、畏兀儿官僚集团往往站在守旧的蒙古贵族一边，两者互相勾结。是元朝最反动最腐朽的力量。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太宗纪》

《元朝秘史》第263节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

元·王恽：《秋涧集》卷48《史天泽家传》。

元代理学的传播

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程颢、程颐，集成于南宋的朱熹。他们将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即所谓天理。而这个天理，体现在圣人身上，由尧舜至孔孟，直到宋代的二程朱熹，形成一个所谓圣传的道统。所以理学又称道学，在理学家看来，这个天理，即使天崩地裂，它也是永恒存在，永远不变的。这样，就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获得了哲学的意义。这在儒家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而作为社会的人，通过朱熹的“格物穷理”也好，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也好，只是方法不同，所要体验和获得的天理，也仍然是现实的三纲五常。显然，所谓天理，只不过是理论、哲学化了的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而已。所以，理学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

当蒙古兴起于漠北的时候，金朝和南宋正处于对峙时期，因此南宋的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金末的儒学，只讲些经学章句，显得支离繁琐，处于衰敝之中，蒙古军队南下后，北方儒士纷纷投奔蒙古，从耶律楚材到杨惟中、姚枢、窦默等人，都充当了蒙古大汗的幕僚、谋士，虽然他们提不出什么新的理论，但儒家思想不免也对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影响，尤其在灭金和灭南宋过程中，他们对于保护汉族知识分子和文化典籍，还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是比较晚的。金末时，南方的一些理学著作已传到北方，但对这些著作进行讲授则是元太宗七年（1235）赵复被俘到燕京（今北京）后的事。太宗七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江汉先生赵复被俘，杨惟中、姚枢等把他从俘虏中挑出，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书，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资料、宗旨、师承关系作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许衡、郝经、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而尊信理学。忽必烈曾在潜邸召见过赵复，他对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持赞同的态度。

金主迁蔡后逃到德安的金朝儒生窦默，在孝感（今湖北孝感）随谢宪子学伊、洛性理之书。后被杨惟中招集北归，在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于是名声大噪，忽必烈亲自召见。窦默大谈三纲五常，忽必烈大喜，一天之内一共三次接见，与之交谈，命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他和赵复一样，是在北方传播理学的最早的学者。

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陆九渊的直接继承者。元朝灭亡南宋前后，南方的朱学人物以吴澄、许谦等为代表，陆学人物以陈苑、赵偕、郑玉等为代表。这样，到全国统一时，理学之士已是“指不胜指，皆彬彬郁郁矣。”

在元代的这些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又不完全一致。许衡、郝经、窦默等人是积极用世，身显廊庙，在理学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是高蹈不仕，闭门冥索，其理学也就趋于幽玄，走的是所谓上达一路。而陆学人物更是屏迹山野，玩性理，索诸天，其势力虽不及朱学，但他们终生不改陆学“自识本心”的宗旨。

在这些理学家当中，又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他们

被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而许衡、刘因又是帮助元朝立国的人物。

许衡（1209—1281），字促平，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左丞、国学祭酒，声名显赫。他的许多弟子官至卿相，为一代名臣。晚年辞去祭酒之职，回到老家怀孟。家人祭祀祖先。许衡说：“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要亲自参加祭祀。”家人扶他起床，奠献如仪。不久去世，终年七十三岁。怀孟之人，无论贵贱老小，皆哭于其门。四方学士大夫听到他的死讯后，也都痛哭流涕。许衡曾经对他的后代说：“我生平徒有虚名，不能完成自己的职守。死后不要请谥，不要立碑，在我的墓石上只写下‘许某之墓’四个字，使子孙能识别出我的坟墓就足够了。”许衡死后，赠司徒，封魏国公，谥文正。许衡一生，热心事功，重视朱熹《小学》、《四书》，主张践履于时，积极向忽必烈陈《时务五事》，推行汉法；与刘秉忠、张文谦，在元朝开国之际，立朝仪、定官制。在他看来，应当是运用天理，并付诸行动，反对把理学变成高远难行之理。因此许衡的理学虽然无什么发明，但他对理学的普及与推行，对蒙古的封建化，对维护元代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死后，从祀孔庙，备受隆誉。

刘因（1247—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旧容城）人，世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临洮府录事判官昉，昉生奉议大夫、中山府录事俣，俣生秉善，金朝贞祐年间南徙，其弟国宝，登兴定进士第，终奉大夫，枢密院经历。秉善生述，述，即是刘因的父亲。1232 年，刘述开始北归，刻意求学，研性理之说。中统初年，左三部尚书刘肃为真定宣抚，征辟刘述为武邑县令，后刘述因病辞归。刘述四十岁时仍未得子，感叹说：“老天一定让我断子则罢，反之，一旦有子，我必定令其读书成才。”刘因出生的那天晚上，刘述梦见神人用马载一儿至其家，说：“好好地抚养他。”一觉醒来。儿子出生，于是取名骃，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刘因天资聪明绝人，三岁开始读书，每天阅读大量材料，且过目不忘，六岁便能作诗，七岁就能写文章，落笔惊人。刘因还未成人，已经才器超群，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任真定儒学教授，刘因与之交游，同舍生都赶不上刘因。从此开始接触经学，研究训诂疏释之说，感叹道："圣人精义，大概不应仅仅局限于这些。"后来得到程朱理学家的著作，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对各位理学家的学说长短了如指掌，评论中肯，见识高远。

刘因早年丧父，侍奉继母，亦非常孝顺，祖父和父亲都死而未葬，求助于翰林待制杨恕，才办完丧事。刘因性格矜持，不随便交接，虽然家境非常贫困，但不义之财，一介不取，身为教授，师道尊严。对于登门拜访的弟子因材施教，使他们皆有成就。凡路过保定的公卿大夫，因敬慕刘因的名气，往往前来谒见，刘因常常逊避，不与相见，有的不知道内情的人还认为刘因孤傲，刘因喜好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称他的所居之年为"静修"。至元十九年（1282），因不忽木的荐举，世祖忽必烈下诏征辟，擢右赞善大夫。不久刘因告辞回家，侍奉继母，俸给一无所受。后来世祖又以集贤学士征辟，刘因上宰相书，坚决推辞。世祖知道后，说："古代有所谓不召之臣，大概就是刘因这种人吧！"于是元廷不再勉强，至元三十年（1293），卒于家。在理学上，刘因坐禅冥索，有庄子"齐物"反观和邵雍"观物"内省的思想成份。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学称"草庐"。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地处华盖、临川两山之间，山水先生徐觉说其地当出异人。据说吴澄出生之前的一天晚上，乡中父老看见有异气降于其家。邻近的老妇又梦见有物蜿蜒降在其房屋旁边的水池之中，早晨起来把这一梦境告诉了别人，正巧这时吴澄降生。三岁之时，吴澄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开始，常常夜间读书通宵达旦，母亲担心他过分刻

苦，有意节约膏火，不给与太多，吴澄却等到母亲熟睡之后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参加乡校考试，每次名列前茅。长大以后，吴澄致力于圣贤之学，通读经、传，曾经参加进士考试，但未能被录取。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刚刚统一全国，盗贼四处蜂起，乐安人郑松，招吴澄住在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于江南，携吴澄至京师，不久，因为母老辞归。程钜夫请求存吴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到吴澄家收录。成宗元贞初年，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吴澄至郡学，日听讲论，录其问答，共数千言。行省椽元明善以文学自负，曾经问吴澄有关易、诗、书、春秋的奥义，感叹说："与吴先生谈话，如探深海。"于是终身拜吴澄为师，执弟子礼。左丞董士选延请吴澄到家，亲手将饮食送上饭桌，说："吴先生不愧是天下名义。"董士选人朝后，荐举吴澄为应奉翰林文字。官府敦劝，过了很久吴澄才到，而代者已到官，吴澄即日南归。不久，吴澄出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在职三月，因病去官。

至大元年，元武宗召吴澄为国子监丞。原来，许衡为国子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传授弟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书籍改变了原来的用处。吴澄上任，清晨在课堂上点燃蜡烛，诸生依次受业。日落，退于燕居之室，执经问难的学生接踵而至。吴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常常教学至深夜，春夏秋冬从不改变。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升吴澄为国子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等书教育学生。并总结教法四条：经学、行实、文艺、治事，但未及施行。一天晚上，吴澄告辞离去，有的学生不报告学校便跟从他去江南。不久，拜吴澄为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让他乘驿至京师，当到达真州时，疾病突然发作，终未能成行。

英宗即位后，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原先，有旨集中书法比较好的人，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皇帝正好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令吴澄作序。吴澄却说：“皇上写经，为民祈福，本是非常好的行动。至于用以追荐，我还没有听说。死后轮回之说，只要是稍有一点学问的人，都是不相信的。”正恰帝崩，这一活动也宣告停止。

泰定元年（1324），初开经筵，首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当时吴澄已有离去的想法，正碰上修英宗实录，命总其事，几月之后，实录修成，吴澄就称病不出。中书听说后，立即派人追赶，不及而还，因而对泰定帝说道：“吴澄是国家的名儒，如今请老回家，应该有所褒奖。”于是下诏加资善大夫，赐予二件金织文绮及钞五千贯。

吴澄退归于家之后，士大夫皆迎请执业，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负笈来学于山中者常不下数千人。稍有闲暇，即著书立说，直到临终，仍然舍不得释笔。对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之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定《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

起初，吴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考虑到吴澄耆老，特命次子吴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第二年六月，吴澄病卒，终年八十五岁。吴澄本由南宋入元，成学于南宋，直承朱熹的理学统绪。但他并不严守朱学门户，谓“本心之发见”，即可获得“天理之当然”，杂入陆学“明心”的方法。他是“和会朱陆”的“右陆”，以至有“宗陆背朱”之嫌。吴澄与熊良辅、汪克宽、赵汸等，亦为元代的经学大家。

由于许衡、吴澄这些理学家对南宋理学或承流宣化，奔走汗

庭，或矜谈妙语，潜思冥索，使理学由南而北，遍及全国，以至到延祐年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谓孔子是“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被追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许衡这些理学之士，或者在元朝政府中，备列顾问，或者蛰居山林，授徒著述，尊为贤学之士。从此以后，以朱学为主的理学，成为明、清的官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而元人修的《宋史》，在正史中首开《道学传》，其所定的理学宗旨和人物，又成为明清的理学规范，影响很大。

元代的理学家基本上没有离开在宋代已经形成的理学原则。但是，元代的社会情况毕竟不同于宋代，因而元代的理学也带着一些特色。

首先，理学从南宋发展到元代，已由朱、陆之争，逐渐趋于朱、陆“和会”。本来，朱、陆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南宋的吕祖谦在朱陆“鹅湖之会”的时候，调和不成，接着又发生“无极而太极”之争。但随着朱、陆两家牛毛茧丝的争论下去，在一些理学家看来，各自的利弊都已暴露，所谓朱的格物穷理，虽称支离繁琐，使人颓惰委靡，但有笃实之功；陆的直求本心，虽称谈空说妙，无致知之功，但有简易直截之效。

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于是便就简避繁，纷纷兼取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如标榜朱学的许衡，他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这里所谓“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由“心与天地一般”，即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故“心之所存者理也。”这就是陆象山说的天理就在心中，心即天理。所以许衡求天理的方法，就在于尽心，能“尽心，是知至也”。故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样说来，天理在心中，直求本心即得天理，不需要朱熹说的先通过心外格物的途径。许衡也讲朱熹的“格物致知”，但他把知行二者

并列，谓“凡之所以不力，只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意即能真知，即可力行；而行之所以不力，不是如朱熹说的是因为没有“痛下工夫”，而是因为知之不真。这种混淆知行，以知代行，实际上是陆学，尤其是后来的明代王学的知行合一论。

又如师承朱学的吴澄，他虽然提出人性善恶的形成，是由于人们的气质不同，而接近朱熹的看法，但是，就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也就是如何获得天理的问题上，他并没有沿袭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发现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随其所发见，保护持守。”并以教训的口吻说：“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这就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的：“天之所以与我，己所固有，不待外求”的意思。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陆象山的自识本心的方法。吴澄就把陆学自识本心的方法概括为“自新”，而且，吴澄还将这种直觉的方法，说成是孔孟以来“先立乎其大”的“传心之印”，编造所谓从尧舜，中经孔孟，直到宋代的理学诸子，都是这样，甚至他主张要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主，点名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过于繁琐。

又如刘因，虽然他跟从南儒赵复并接受了朱学，但他提倡主静，不动心，自求于己，并举例说哪里有毒，哪里必有药治，以此说明获得天理的方法是“无待于外”。他的“齐物”反观和“观物”内省，更是他通向陆学的哲学观点。

虽然陆学的人物在元代受到压抑，势力不如朱学，但他们在坚持陆学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上的一些内容。如由宋人元的陆学人物郑玉，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这是吸

取朱熹理气之对待的观点。他是继吴澄之后的又一个和会朱陆的学者。另一陆学人物史蒙卿，人元不仕。他说："学问之进行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明显的是调和朱陆而主以陆。过去朱熹讲格物三事，其中一项就是读古圣贤书，而陆学是"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其或读书，却读语、孟精义。"于六经不屑一顾，反谓"六经注我"。而元代的陆学人物陈苑的弟子李存，虽然坚持一些陆学的方法，但他读书尊经，谓"非学则不能以自明，而学之不绝如线者，赖遗经存焉耳。"郑玉更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已非陆象山的所谓"六经注我"，而是朱学的所谓道从经出，吸取朱学"笃实"的工夫，避免陆学在过去"专做打坐工夫"。

当然，在元代朱陆之间互兼相取，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人物，还有许谦、柳贯、虞集、袁桷等人。

但是，这种"和会"，并非是随意的游龙走蛇。朱学方面吸陆学直求本心和知行合一，陆学方面是吸取朱学理气、理欲及"笃实"的工夫，这种"和会"的趋向，正是后来明代王学的先声。固然可以说王学接步陆学，可是陆、王并不完全一样，王学讲陆学"本心"，但也讲朱学理气、理欲的思想，王学这种混淆朱、陆的做法，其实在陆、王之间的元代理学已开其端，所以元代的理学，实为宋到明之间的过渡环节。

其次，在元代也有一些理学家，在政治上主张用世，践履于时，因而在理学上有可能提出一些进步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并不是他们的理学主流。例如，许衡对理学的本身却作了广泛的解释，使理学的理、道，含有"日用常行"之则。他在谈到道作为标准、极则的时候，引喻设譬，认为道不是高远难得的东西，如果道是"高远难行之事，则不是道了。"它应是"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他批评有些人欺世盗名，"深求隐僻之

理”，讥笑那些专事言辞而于事无补的理学家，他们只能“在纸上摆布成文。”

在他看来，道并非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所以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这就把具有“贵人气象”的理学，稍稍地向下拉到只是一般的“日用常行”之道。虽然许衡并不反对理学的本身，仍然强调“君臣父子”，但他注入民生的“盐米细事”，就使过去空谈心性的理学有了一点实际。

因此，许衡所谓“践履”，虽然是伦理纲常的推行和实践，但也包括民生日用，重视吃饭穿衣的“生理”，进而提出有名的“治生”论。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却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那些“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

许衡重视民生日用，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这一思想，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再次，刘因对经学提出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是元代理学中具有特色的思想。

刘因认为，自秦以后，六经才有汉唐传注、疏释，又以后才有宋代“议论”，未免似是而非。为补救此弊，在他看来，就得返溯汉唐训诂。因为训诂虽称繁琐，但它毕竟是紧就六经，没有穿凿附会，能得经旨“六七”，未尝离经。而六经又是古代“大圣大贤”的“惠世之书”，是即事言道。正像过去的一些儒生说的，六经是六艺之教，五常之道，不是谈空说妙，它能够补实理学“穿凿”的弊病。故刘因说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

经，如此“推索究章”是意在说明六经为根本。故求理学，当先谈汉唐训诂，以溯六经。当他谈到六经与语、孟、学、庸的四书关系时，也强调要返溯六经。

因为从唐代韩愈、李翱，尤其从宋代理学开始，把语、孟、学、庸，驾于六经之上，成为理学的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人性，几乎与佛道比并。对此刘因提出六经与语、孟等四书，应当是博与约的关系，不能把六经束之高阁。他批评“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在刘因看来，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径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可见这同样是强调六经为根本。在宋元时期，思想界正沉浸在醉醺醺的理学情况下，刘因提出返求六经，在当时仍不失为是一种清新思想。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等人痛定思痛，把明亡归之于理学束书不观，“游说无根”。提出以经学补实理学，这与刘因的论点大致相同。

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提出“古无经史之分”。这对于一个理学家来说，不愧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谓经为史，这早在隋朝王通就曾提出过，但他只就体裁而言，而经与史，从内容上视为一体，则可以说是始于元代的刘因。刘因说诗、书、春秋原来是史，只是因为“圣人删定笔削”，才立为“大经大典”。这无异是把儒家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当然这并非刘因的本意，但他的说法在客观上不免要产生这样的思想意义，对后世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如后来的王阳明所谓经与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李卓吾所谓“经、史相为表里”、都不过是沿着刘因“古无经史之分”的提法而加以发展的。尤其在清代汉学考据盛行的时候，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

认为六经原是史官记录，故经与史是一回事，而后人不知晓这一来源，所以才觉得经不同于史，这亦是承袭刘因的说法。

理学由北宋兴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元代始定为官学而沿至于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就朱学来说，虽然在形式上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可是也从元代开始，朱学本身的思想却是更多的兼融陆学。理学在元代的这种趋向，适成为后来王学出现的消息。同时，也在元代的理学中，许衡的"圣人之道"和"治生"论，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又是明清思想的滥觞。因此，元代的理学，在宋到明清之间是承上启下，占有重要的地位。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纪事本末·诸儒出处学问之概》

《元史》：《窦默传》、《吴澄传》、《刘因传》。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静修学案》、《师山学案》、《慈湖学案》、《草庐学案》。

元·刘因《静修集·叙学》

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中庸直解》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可庭记》

元代佛教之崇

蒙古人最先接触的佛教，是中原汉地的禅宗。1214 年，蒙古军攻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十三岁，曾受到蒙军统帅窝阔台的召见。1219 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1242 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蒙哥汗时期，曾发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均遭失败，中原佛教势力不仅迅速地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发展起来，而且佛教势力从此超过道教。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称喇嘛教）的影响亦开始渗人蒙古宫廷。

1253 年，八思巴谒忽必烈于潜邸。八思巴（1235—1280），又译发思巴、八合思巴。本名罗古罗斯坚藏。元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款氏家族出身。相传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年仅七岁，便能诵经数十万言，约通其大义，国人视他为神童，故名曰八思巴。稍后长大，学富五车，故又称班弥怛。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阔端太子召其伯父萨斯迦班智达赴凉州，他与弟随行。元宪宗元年（1251），受伯父命代领僧众，遂为萨斯迦派首领。宪宗三年（1253），八思巴谒忽必烈于六盘山驻地，忽必烈与之交谈后，非常高兴，留忽必烈左右，并逐步受到亲近。宪宗八年（1258），宪宗蒙哥命忽必烈召集僧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他参与辩论，使道士词穷服输。世祖中统元年（1260），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释教。至元元年（1264），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统

辖释教僧徒及吐蕃地区军政事务。又受命创制蒙古新字。次年，返萨斯迦。设拉让[①]，置本禅。至元五年（1268），返大都（今北京），上所制蒙古新字，即有名的八思巴字，至元六年（1269）二月颁行，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至元十三年（1276），八思巴返抵萨斯迦，至元十七年（1280）八思巴死去，世祖忽必烈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从八思巴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他们先后是：亦怜真、答儿麻八剌剌吉塔、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相家班、相儿加思巴、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辇真吃剌失思。

至元十七年（1280），佛道进行了第二次争论。结果仍以道家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劓刖、流窜者达十余人。释家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存于世的道家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论辩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家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家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讹踵谬的现象已经不止一两天了。如果立即命令烧毁这些道经，道教徒们未必心服。他们宣扬水火不能将他们焚溺，可以让他们亲自试试看。等到不能灵验的时候，再焚经也为时未晚。”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家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超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同

① 拉让：帝师私产管理机构。

时，佛教在这次争斗中获胜，表明了它被推上更加尊崇的地位。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而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蓮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吐蕃佛教受密教的影响极深，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或吸收了产生于吐蕃当地的苯教的某些成份。元代的吐蕃佛教，主要有萨斯迦、噶举、噶当、宁玛等派。著名学者大德布思端（1290—1364）主持规模宏大的霞炉寺，其所授受，也被称为霞炉派。元代前斯和中期，吐蕃佛教各派以萨斯迦派的势力为最大。到后期，噶举派起而代之，其势力在吐蕃地区占据上风；帝师一职虽始终控制在萨斯迦派手里，但到这时候地位亦有所下降。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四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以为“王师”。出身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伽，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蒙古宫廷取媚固宠；同时在中原、江南等地也化度了少数信奉者。但是总的说来，在内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还是从宋、金流传下来的各派。

内地流行的佛教，分为禅（即禅宗）、教（指天台、法相或称唯识、贤首或称华严等宗）、律（即律宗）三大派。其中，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1265 年禅僧德辉重编《百丈清规》；律僧省悟等编成《律苑事规》（书或于 1325 年）；1347 年教僧自庆编成《增修教苑清规》。三类寺院的内部规定，都进一步制度化，各守其业。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到大都问法。这次廷辩结果，使教冠于禅

之上。但不论是在南方或北方社会，此后最为流行的仍然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

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著名的万松行秀（1166—1246）成为金元之际出入于儒释之间的北方文士领袖，他著述甚富，《从容庵录》为其举扬曹洞宗风的重要代表著作。万松弟子福裕（1203—1275）后来在西京主持少林寺。福裕一系，乃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临济宗的传播最广。北方的临济宗，以海云印简（1202—1257）一系最有名，因而后来被元廷封为临济正宗。南方的临济宗，宋元之际亦始而大盛。雪岩祖钦、高峰原妙（1238—1259），中峰明本（1263—1323）师徒相继，阐扬宗风。这三个人，是有元一代禅僧的代表人物。

元朝统一云南之前，在大理白人及汉人中流行的佛教，都是西域密教。在云南，密教僧人称阿吒力，或称轨度僧、轨范僧等；居家阿吒力名曰师僧，有妻子。至元中叶，禅僧雄辩、大体相继归滇或入滇，当为云南传人禅宗之始。其后，又有云南僧人玄鉴东来，问法于中峰明本。玄鉴原来是教僧，两次访中峰明本后改教为禅，遂成为云南禅宗第一祖。此后，阿吒力教虽在云南继续长期存在，禅宗势力也开始在该地区发展起来。

元代的教、律各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僧人。如天台宗的玉冈蒙润（1275—1342），华严宗的真觉文才（1241—1302），法相宗的普觉英辩（1247—1312）、云岩志德（1235—1322），律宗的光教法闻（1260—1317）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1260—1332）传戒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缁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

除了吐蕃佛教以及内地的传统各宗以外，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1043—1121）在杭州白云庵发

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作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发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南山普宁寺。延祐七年（1320），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白莲教亦产生于南宋初年。元政府对白莲教时而承认，时而禁断，但其信徒一直在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成为红巾军发动起义的宣传工具。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于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被译为汉文，并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后，由大德二十九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留传下来的大藏经版加以校订补雕，刊印三十六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发起刊刻的藏经通称普宁寺本，六千零十卷。自宋季开始雕刻的碛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六千三百余卷。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称宣政院。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1291）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废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十六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1334），又废管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统计，至元二十八年（1292）

时，全国寺院二万四千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共二十一万人。

由于佛教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尊崇，所以佛教徒往往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例如世祖时期被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杨琏真伽，发掘故宋赵氏在钱塘、绍兴的诸陵以及宋朝大臣冢墓共一百余所，戕杀平民四人，接受别人所献美女宝物无数，而且攘夺盗取财物，共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不输公赋的平民达二万三千户。其他藏匿不露的人口还不在其内。又至大元年（1308），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正当李璧询问事件经过的时候，僧人已经率其党徒手持白梃冲入公府，抓住李璧的头发，将他扔在地上，捶扑交下，拽之而归，将其关押起来，过了很久才得脱身。至大二年（1309），又有佛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的妃子忽秃赤的斤争道，龚柯一伙将妃子从车上拉下，进行殴打，而且口吐犯上之语。当这件事报告皇帝之后，皇帝却下诏释放不问。而这时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西僧者断其舌。此时仁宗住在东宫，听说这件事之后，赶紧上奏取消这一命令。泰定二年（1325），西台御史李昌说：“我曾经路过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看见西番僧佩戴金字圆符，前后数百辆驿车，在道路上络绎不绝，以致驿站不能容纳，于是假借民舍居住，并逐出男子，奸污妇女。仅奉元一路，从正月到七月，往返者达一百八十五人次，用马达八百四十余匹，比诸王、行省的使臣多十分之六七。驿户无处控诉，台察也无可奈何。而且国家制造圆符本来是出于边防报警使用，僧人们有什么要事而随便佩戴它？请求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加以纠察。”这一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结果。佛僧必兰纳识里被诛后，官府清查他的家产，收得其人畜、土田、金银、货贝、钱币、邸舍、书画、器玩以及妇人七

宝装具，共价值几万万。

佛教的祝祷词仪式名目繁多，其耗费惊人。有曰镇雷阿兰纳四，汉语意为庆赞；有曰朵儿只列朵四，汉语意为美妙金刚回遮施食；有曰察儿哥朵四，汉语意为回遮；有曰亦思满蓝，汉语意为乐师坛；有曰搠思串卜，汉语意为护城；有曰朵儿禅，汉语意为大施食；有曰笼哥儿，汉语意为风轮；有曰喈朵四，汉语意为作施食。另外还有所谓出朵儿（即出水济六道）、党剌朵四（即回遮施食）、典朵儿（即常川施食）、坐静、鲁朝（即狮子吼道场）、黑牙蛮答哥（即黑狱帝王）、搠思江朵儿麻（即护法神施食）、赤思古林搠（即自受主戒）、镇雷坐静、吃剌察坐静（即秘密坐静）、斟惹（即文殊菩萨）、古林朵四（即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歇白咱剌（即大喜乐）、必思禅（即无量寿）、般札沙剌（即五护陀罗尼经）、阿昔答撒哈（即《八千颂般若经》）、撒思纳屯（即大理天神呪）、阔儿鲁弗卜屯（即大轮金刚呪）、且八迷屯（即《无量寿经》）、亦思罗八（即《量胜王经》）、撒思纳屯（即护神呪）、南占屯（即坏相金刚）、卜鲁八（即呪法）。此外，还有作擦擦，即用泥土作小浮屠；又有作答儿刚者。其作答儿刚者，或者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曾经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个，中间贯满七宝珠玉，一半放在海边，一半放在水中，用以镇平海灾。

延祐四年（1317），宣徽使计算了一下每年内庭佛事的消费，共用麸四十三万九十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日仅102天，大德七年（1303），再立功德司，于是醮祠佛事之日增至五百多天。僧徒们贪得无厌，交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每年花费千万，比起大德年间，不知几倍，又每年必定通过好事之人奏准释放轻重囚徒，以为福利。”即使像大臣阿里、将帅别沙儿等，都是通过这条途径逃脱伏诛。宣政院参

议李良弼受贿卖官，全靠帝师的话才得以免罪。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通过僧徒幸免罪行者更多。至于寺院强夺民产，侵占田土则成为有元一代的普遍现象。

难怪《元史》评价释老说："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纪事本末·佛教之崇》

《元史·释老传》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9《临济正宗之碑》。

元·刘仁本：《羽庭集》卷2《送大璞玘上人序》。

基督教的盛行

早在唐代，基督教就传人中国内地。时称景教或波斯景教，它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的、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但它在西北少数民族中仍一直有所活动。

成吉思汗的崛起和蒙古铁骑不断进行的军事征服在客观上廓清了中西交通的道路，一批基督教士在各种原因的推动下，涌进了蒙古草原。

刚刚迈人文明门槛的蒙古族，在宗教信仰上，主要还是奉信原始的萨满教。但是，正如在军事征服地区不能不基本上保持旧有的社会制度、依靠当地的贵族士大夫来维持统治一样，在宗教意识上，成吉思汗对所有外来的宗教，一律采取优容态度，而又不溺陷于其信仰。在这种政策的鼓舞下，基督教在蒙古人中大为盛行。王妃中如拖雷正妻莎儿合黑帖尼别真、旭烈兀妻脱古思可敦；大臣中如镇海、合答以及一位蒙哥的言听计从的书记都是景教徒。贵由本人对基督教也甚表优待，在他统治时期很多他属下的基督徒大有声名。

蒙哥统治时期基督教的活动更显活跃。在哈剌和林城的远端有一所基督教堂，按期进行活动。在复活节前夕，景教徒们以最正确的仪式洗礼了六十多人。还有小礼拜堂，常布置在蒙哥大斡耳朵的最东面，随斡耳朵迁徙。它的上面竖着一个小十字架，里

面有装饰得很漂亮的神台，上面有圣母玛利亚、耶稣之先驱者约翰及两个天使的像。这里的主人是一个阿美尼亚的僧人。按照基督教习惯，每当节日，大斡耳朵属内的景教徒们都来这里举行宗教仪式。教士们还前去宫帐中，为大汗和他的后妃们祝福。1254年的主显节（1月6日），一个名叫薛儿吉思的阿美尼亚僧人还说将为蒙哥举行洗礼。“这一天，先是基督教徒带着法器来了，他们为蒙哥汗祷告，为他的酒杯祝福。”

蒙哥的四个正妻之一是基督教徒，早卒，遗一女，名 Cirina，已长成，而极丑鄙。她对于基督教的仪式有很好的教养。蒙哥的长子班秃的教师是一个酒徒，名叫大维持的景教徒。蒙哥的弟弟阿里不哥明显地纵容和左袒景教徒。当一位阿美尼亚僧人与两位汗宫廷中的伊斯兰教徒贵族发生口角时，他制止了伊期兰教徒对基督教的回骂，说：“不要说这些事，因为我知道救世主是上帝。”金匠威廉原籍巴黎，拔都西征时，他在贝尔格莱德被俘。在蒙哥的母亲、著名的景教徒莎儿合黑帖尼要求下，拨归于她所有。按照蒙古幼子继承父亲家业的风俗，莎儿合黑帖尼的私产，包括金匠威廉在内，都为阿里不哥所继承。另一个名叫帕开忒的罗兰地方人，在匈牙利被俘，曾属蒙哥的那位基督教妻子所有，她的丈夫是俄罗斯人，精于造房子。在当时的蒙古，和威廉、帕开忒同样命运的基督教徒是相当多的。此外，还有一批冒险东来的教士。

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进而完成对南宋的统一。由于中西交通的空前发达，基督教在全国各地的传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新疆、甘肃、陕西、内蒙、山西、辽东、北京、东南及沿海地区都有基督教徒的活动，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有唐古特、汪古、大都（今北京）及江南沿海等地。

唐古特较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其后，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古特

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古特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1281年唐古特主教名为沙卜赫兰。聂思脱利教在唐古特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纪》，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把他经过的汪古部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架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后来在奉罗马教皇之命东来的天主教大主教孟特·戈维诺影响之下，带领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他兄弟的反对。在他被西北叛王笃哇俘杀后，那些改从天主教派的汪古部众又重新被聂思脱里教派所争取。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麻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拜泥的儿子。麻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

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大同有聂思脱里主教，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信徒。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都附近的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在现代。孟特·戈维诺在他的一封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徒，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

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的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

由于孟特·戈维诺等人的努力，罗马天主教毕竟在大都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六千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在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1307 年 7 月，罗马教廷继委任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及全东方总主教之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前来中国，其中热拉德、彼列格林和安德鲁三人抵达中国。安德烈后来被任命为泉州主教。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阙任。一部分在大都的阿兰显贵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这件事发生在元顺帝时。实际上，罗马教廷后来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终未曾抵达大都。元代后期，阿兰人在政府军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随着阿兰人政治势力的膨胀，其所信奉的天主教的影响，亦当有所扩大。

大都基督教徒中不乏政治地位显赫者，如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莎儿合黑帖尼（亦译作唆鲁禾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即为一例。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

江南及沿海地区的基督教，是在元灭南宋之后逐步传入的。至元十四年（1277），聂思脱里教徒马薛里吉斯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七所，其中一所在杭州。七寺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镇江地区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扬州除了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外，也有若干天主教士住在该城。

现代在扬州发现的1342年拉丁文墓碑，证明当时该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动。

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这就是马薛里吉斯建立的样宜·忽木剌，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传教活动。

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动据点。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即由孟特·戈维诺向该地派遣主教。自此至元末，担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职者先后为热拉德、彼列格林和安德烈。他们受到当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赠予和友好接待。安德烈死于1326年，葬泉州。他的墓也已在泉州发现。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也有一些基督教徒散居内地。如马祖常一族，世居净州天山，月合乃始迁于汴，至马润又徙光州。赵世延一族，其先居云中北边，按竺迩镇蜀，因家成都。至若基督教徒之为宦全国各州县，因而在其所领地区内以势相倡如马薛里吉斯辈，当亦非仅有。

元朝管理基督教的中央机构是崇福司，始立于至元二十六年(1299)二月，秩从二品。它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马儿是对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义为长老，列班义为大教师。仁宗延祐二年（1315），改司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既云省并，则原设掌教所之多可想而知。武宗至大四年（1311）十月，中央有关管理宗教的诸司集议，讨论僧道人众的词讼问题。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

可温教崇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1]，不曾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么道说有。”这些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元代基督教传布的广泛。

元朝从忽必烈开始，以八思巴为国师，特别崇信喇嘛教，但并不因此而排斥其他宗教。全真教因与佛教相仇，一度因此遭到打击，但至迟在成宗铁穆耳即位，又同样受到保护。惟有民间流行，带有某种反抗色彩的秘密宗教，则明令禁绝。崇佛而兼容所有其他诸大宗教派别，是元朝统治者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在元朝的公文里，习惯上都是以和尚、先生（道教徒）、也里可温、答失蛮（伊斯兰教徒）并称，他们都大体享有同样的特权与优待。

（胡务）

参考资料：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

《通制条格》卷29《词讼》

《元史》：《马祖常传》、《赵世延传》、《百官志》。

---

① 勾当：蒙文硬译文体，意为事情。

杂剧的繁荣

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杂剧在当时十分繁荣，从而使它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和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堪称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支灿烂绚丽的花朵。据统计，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人左右，剧目六百种左右，现存一百五六十种。

早在唐代，我国的戏剧已经产生。自宋代开始，一些大城市中就建立了勾栏、瓦舍，许多民间艺人在里面进行说唱表演。金中都（今北京）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元杂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吸收了宋金以来的诸宫调（用多种宫调来说唱一个故事）从而结合产生了新的戏曲形式。同时，宋金的傀儡戏、皮影戏、大曲、赚词，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对它都有影响，并使它变得格外丰富多采。

杂剧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歌曲（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宾白（白）、舞蹈动作（科）加以配合。结构上一般分四折，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曲词一般由一个演员(男称“正末”，女称“正旦”）演唱。杂剧的题材十分广泛，借以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

元杂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元朝统一后，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由于水陆交通的发达，刺激了商业经济的空前活跃，从而使杂剧演出更加社会化和商业化。不仅元王朝的贵族统治阶级对歌舞、戏曲产生爱好，戏剧演出也

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青睐，以致农村也出现了戏剧演出的固定场所——戏台，或叫舞厅、舞亭、舞楼、戏楼。同时，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从事或参与了戏剧活动。他们多半因朝代的更迭或异族统治而感到失意，长期和下层市民接触，与社会实际有较多的联系，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元代杂剧中还涌现出许多著名演员，其中不乏有才有艺有德之人。他们不仅各务行当，各有专长，有的擅长“闺怨杂剧”；有的善于“驾头杂剧”；有的“长于绿林杂剧”；有的以“温柔旦”见称，有的以“风流旦”得名；还有的“旦末双全”，甚至能演“杂剧三百余段”。这些因素终于促成元杂剧的繁荣。元代成就卓著的戏剧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其中关汉卿最为杰出，他从事戏曲的时间最长，作品最多，影响最大。他的作品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成就和强烈的斗争精神。他为元杂剧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是我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之一。

关汉卿原名已佚，汉卿是他的字，号已斋（一作亦斋），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生活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到该世纪末。他的一生多半是在大都度过的，也到过洛阳、开封等地，元灭南宋后曾游历杭州。他身逢艰难时世，对于战争的动乱和蒙元的严酷统治有深切的感受。他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不屑奉仕，而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倾注到戏剧艺术中去了。当时大都是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个繁华都市成了元杂剧的发祥地。“燕赵才人”们聚集在这里，组成“书会”，开展杂剧活动。关汉卿参加了“玉京书会”，并成了该会最有成就的一员。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他一生共创剧本达 66 种，今存 18 种，计有《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诈妮子》、《救风尘》、《金线池》、《切脍旦》、《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双赴梦》、《玉镜

台》、《裴度还带》、《陈母教子》、《鲁斋郎》、《五侯宴》、《单鞭夺槊》。此外，《哭香囊》、《春衫记》和《孟良盗骨》存有佚曲，其中社会剧《窦娥冤》和历史剧《单刀会》都属杰作，堪称双璧。

《窦娥冤》描写了窦娥一生的悲剧命运，展示了悲剧根源的广泛社会性，同时展示出她如何从顺从命运到反抗社会的进程。窦娥三岁失母，七岁时因其父窦天章无力偿还高利贷，将她抵给蔡婆当童养媳。过了十年，她和丈夫成了亲，但很快丈夫病故。她服从了这种痛苦的命运安排，决定侍奉婆婆，守节终身。这时张驴儿父子来到蔡家，张驴儿是一个以救了蔡婆性命（在偶然的机会里）为"本钱"，反过来对蔡婆进行要挟的恶棍。在窦娥拒绝给张驴儿后，张驴儿抓住他父亲误食毒汤致死的机会，进一步逼迫她，最后窦娥被张驴儿逼着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被拉到官府，遭受诬谄，或者是嫁给他。相信官府的窦娥仗着"心上无事"，毫不犹豫地走入衙门。这时最大的悲剧展开了，衙门州官并不"明如镜，清似水"，窦娥甚至没有申述自己冤枉的权利，只有挨无情棍棒的不幸。最后，她支撑着鲜血淋漓的身躯，屈招是她药死张父，被戴上死囚枷，做定了"衔冤负屈没头鬼"。在走上刑场经受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折磨和痛苦时，曾经顺从于命运的窦娥却勇敢而愤慨地抨击了"王法刑宪"和"皇天后土"：

> [滚绣球]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
> [一煞] 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

口难言。

剧中写窦娥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她死后，她的誓愿一一实现：血飞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旱三年，都证明了她的冤屈。这种描写固然有前代传说作依傍，也同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天变与人事相因的观念有关，却更渗透着作家强烈的情感，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对正义的呼唤。一个蒙冤而死的普通妇女的满腔怨愤使自然界发生巨大的反常变化，正是异常强烈地表现了，同时也深化了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

《单刀会》汲取了平话的尊刘立场，在结构具体情节时，却又融入了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看法，甚至把它们强赋于历史人物，而这正是关汉卿主体意识的最重要的表露。

《单刀会》对关羽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业绩进行了歌颂，剧中写他单刀赴会，慷慨陈词："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凭着这种以刘姓为正统的理由和他勇武的气概，斥退鲁肃，保住荆州。对关羽的不凡仪表、超人豪气和盖世业绩，作者作了多侧面的渲染，无论乔公的介绍、司马徽的叙述和关羽的自言，都创造了这位英雄不可战胜的氛围。

引人注目的是到了第四折，也就是《单刀会》剧的高潮部分，关羽带着周仓，驾一叶小舟，到大江中流，面对滔滔长江水，他的唱词却于雄壮之中透出一种浓重的悲凉色彩。

>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由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作者写关羽有感于自己亲身经历的血染江水的英雄相争已成旧事，煊赫一时的周瑜、黄盖和曹操在江上激战的事迹也早已“灰飞烟灭”，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引起了苍凉“惨切”的情绪。在这里，关汉卿化用了杜牧诗和苏轼词的意境，把文人吊古的情思，写成了剧中人关羽的心境，实则透露出作者本人的意绪。这段唱词与［胡十八］中的“想古今立勋业，那里也舜五人汉三杰，两朝相隔数年别。不付能见者，却又早老也。开怀的饮数杯，尽心儿待醉一夜”一段唱词紧相承接，而与下面［沉醉东风］和［雁儿落］曲文中表现的关羽对鲁肃的慷慨陈词和武力震慑并不连贯。这是两种情绪。但在艺术气氛的渲染上却又不显得不协调。［驻马听］和［胡十八］曲表现了英雄的悲哀，实际上是将人物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相对照产生的悲哀，也是对古往今来所谓“一世英雄”的短暂与“千古事业”的永恒相对照时产生的悲哀。这种悲哀是古代很多怀古诗中常见的内容、古老的主题。这样的描写，无疑是作家主观怀疑的表现，而这种主观情绪却又化用了历史人物的感受，看来是“强赋”的，却又是一种开拓，因为整个艺术形象给人实似生活的感觉，英雄并不同悲哀绝缘。比起后来那些把关羽写成有似肃穆天神乃至武圣人的作品来，《单刀会》中的关羽形象倒是逼近人生，从而显得深沉。

关汉卿的其他作品也大都是揭露元代权豪势要和政治腐败的作品。如《鲁斋郎》中的鲁斋郎是一个“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恶棍；《望江亭》里的葛彪是一个“打死人不偿命”的恶棍。关汉卿还有某些作品是歌颂妇女的反抗精神的，如《拜月亭》、《赵盼儿》等。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剧作存目十四种，曲目俱全的有三种，《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在当时杂剧中，《西厢记》“天下夺魁”，对后世影响很大。这部杰作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吸收宋、金时期同题材的说唱文学和戏曲的成就，

进一步精心创作而成的，但他又在思想上、艺术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西厢记》是一部描写张生和崔莺莺恋爱故事的戏剧。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更鲜明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赞扬了崔张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斗争，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在人物形象和艺术表达上，王实甫大大加强了莺莺和红娘在剧中的位置，使他们的性格更加鲜明。

马致远，号东篱，字千里，大都人。元贞、大德年间参加过大都的“元贞书会”，作剧十六种，今存有《汉宫秋》、《青衫泪》、《荐福碑》、《岳阳楼》、《任风子》等七种。其中《汉宫秋》描写王昭君出塞的故事，与历史事实诸多不符，情感悲伤。《汉宫秋》曲词华美，富有表现力，被臧晋叔列为《元曲选》之冠。

白朴（1226—约1306），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在大都也曾参加过“玉京书会”，作品存目十六种，今有《墙头马上》和《梧桐雨》两种，其中以《墙头马上》最为著名。

《梧桐雨》取材于白居易叙事长诗《长恨歌》，描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白朴在《梧桐雨》剧中，虽然有相当篇幅写到李、杨的爱情生活，并它并未像《长恨歌》那样隐去父纳子妃的宫闱丑闻，表现了白朴并未将李、杨爱情写得那么纯洁和完善，说明他未持热烈歌颂的态度。

《墙头马上》是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它的第一、二折写裴尚书之子裴少俊奉父命到洛阳选购花苗，与洛阳总管李世杰的女儿李千金邂逅，二人倾心定情，李千金当夜与裴少俊私奔至裴家；第三折写李千金同裴尚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出她的思想、性格中最突出之点。那时她与裴少俊瞒着公婆在后花园已同居七年，生下一儿一女，裴尚书发现了她，要驱赶她回家，并对她百般辱骂：

尚书云：……呸，你比无盐败坏风俗，做的个男游九郡，女嫁三夫。

正旦云：我则是裴少俊一个。

尚书怒云：可不道："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还不归家去。

正旦云：这姻缘也是天赐的。

李千金所说姻缘"天赐"，正好表明她深信自己行为的合理，也就是"是和非须辨别"。当裴少俊屈服于父亲的压力，写出休书以后，她责备他："与你干驾了会香车，把这个没气性的文君送了也。"后来她还讥讽他"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兀的不笑杀汉相如。"

《墙头马上》最后写裴少俊考中状元以后，马上去找李千金。裴尚书因为知道了李千金是官宦之女，前往赔礼。这时剧中继续写她维护自己行为的合理，她再一次用卓文君私奔的故事来数落裴尚书："只有一个卓王孙气量卷江湖，卓文君曾夜奔相如"。还说："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他沽酒当垆。"

郑光祖，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作剧十八种，今存八种：《伊尹扶汤》、《周公摄政》、《无盐破连环》、《王粲登楼》、《三战吕布》、《㑇梅香》、《倩女离魂》和《老君堂》。其代表作是《倩女离魂》。它是根据唐代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改编而成的。郑光祖此剧剧情梗概是：张倩女与王文举原是"指腹为亲"的未婚夫妻。王文举上京应试，途经张家，但张母却叫倩女以兄妹之礼相见。倩女唯恐婚姻发生变故，怨恨忧虑交加，病倒在床，灵魂却离开躯壳追赶上京应试的王文举，相随三年。王文举状元及第后，衣锦还乡，携妻到岳家请罪，倩女的灵魂与躯体翕然合为一体。

本剧改动了传奇小说的若干情节，如突出张母的门第观念

——“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使张倩女和王文举的婚姻得不到最后肯定。这是倩女忧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作者又细微地描写了倩女忧虑的第二种因素，她怕的是：“他得了官别就新婚，剥落呵羞归故里。”封建婚姻建筑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嫌贫爱富的岳父母，比比皆是，而一旦高中，抛却糟糠的男子也不在少数。这使倩女忧思忡忡，心神不定，灵魂离开了躯体去追赶情人，表现了她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和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倩女离魂》的作者郑光祖是元朝后期最著名的剧作家。

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号称“元曲四大家”。

元代前期其他杂剧作家有：纪君祥、郑廷玉、李寿卿、狄君厚、康进之、高文秀、李文蔚、杨显之、石君宝、石子章、张寿卿、尚仲贤、李好古、吴昌龄、李潜夫、武汉臣、孟汉卿、王仲文、张国宾、李直夫、孔学诗、王伯成、费唐臣、史樟、刘唐卿等。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少数民族杂剧家。女真人李直夫，本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做过湖南肃政廉访使，是一位多产的杂剧作家。他有十二个作品，现存《便宜行事虎头牌》一种。《虎头牌》描写女真族的金牌上千户山寿马坚持军法，责罚他叔叔银住贪酒失地的故事。全剧富有戏剧性和生活气息，而且还采用了不少女真乐曲和风俗习惯，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随着南方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元成宗大德前后，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也逐渐由大都向杭州南移。虽然这时还出现了像郑光祖那样的著名杂剧作家，但总的说来，杂剧已趋向于衰落，作品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落后迷信的思想意识也日益增多。

（胡务）

参考资料：

《录鬼簿》卷上

元·关汉卿《不伏老》

《永乐大典》卷4653

元代的礼俗

礼是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规范，俗是社会生活习惯。所谓礼俗便是经由礼规范的社会习俗，它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的礼俗具有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而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兹分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五个部分介绍如下：

祭 祀

祭祀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祭祀对象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先圣、岳镇海渎以及风师、雨师、雷师等。元朝的祭祀有因袭前代之处，同时，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形式，蒙古风俗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①]。

元朝特别重视祭天，这是直接与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崇拜至高无上的“长生天”联系在一起的。在文献中，成吉思汗祭天的活动屡有所见。1254 年，蒙哥汗祭天于漠北的日月山。忽必烈即位以后，先是在每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两天祭天，后认为这是亡金旧例，改成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一次。这时，元帝已在

① 参阅黄时鉴：《元代的礼俗》，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1 辑。

上都，所以元朝的祭天在上都举行。祭天时，又呼念成吉思汗的名字并为他祝福，说："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由于受到汉族礼制的影响，从忽必烈时候起，在祭天的同时祭地。但由于在汉族祭祀传统中天地应当分祭还是合祭是个争论不定的问题，元朝长期实施的仅仅是祭天的礼仪。

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礼，窝阔台在即位以后已予以重视，这是蒙古宗室祭祀祖先的开始，并且形成了传统。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三年（1266）建成太庙，基本上按照中国王朝的传统礼制进行祭祀，十分隆重。但是，元朝的太庙祭祀仍旧具有若干特色：一、祭祀的祝文用蒙古文书写，由蒙古巫祝宣读；二、常馔以外，增加了野豕、鹿、羊、葡萄酒以及其它野生禽兽；三、在太庙作佛事。这种"郊庙之仪"，按照传统，也应由皇帝亲自举行。但是从忽必烈起，元帝"亲享"的不多，往往就由巫祝主持了。

由元帝遣使致祭的是社稷、先农和先圣。社指土地，稷指谷类，先农指农神。先圣包括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和宣圣（孔子）。对社稷、先农和先圣的祭祀是忽必烈在位期间逐渐制定的，显然是他推行汉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礼仪方面接受了汉族农业社会的产物以及作为汉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位代表人物的孔子。忽必烈还曾亲自举行过祭孔的典礼。

对于岳镇海渎和风师、雨师、雷师的祭祀，元帝也是遣使代祀。岳镇海渎的代祀始自中统二年（1261）。五岳四渎五镇四海，分五道，每道遣使二人，蒙汉各一，出玺书给驿以行，秩祀有常。这些祭祀同样沿袭了中国的王朝传统，但也可以在蒙古风俗中找到若干相应的因素。例如成吉思汗由于藏在不儿罕山逃避篾儿乞惕人的追捕而保全了性命，因此决定子子孙孙永远祭祀此山。契丹、党项等族的祭山习俗也可能对蒙古族发生过影响。又如祭祀风师、雨师和雷师，蒙古人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使他们本来就对风、雨、雷这些自然界施威的现象充满了神

秘感和畏惧心理。元朝还祭星于司天台和回回司天台。

太庙大祭时的"割奠"，是"国礼"，即蒙古的祭礼。在祭祀时，由蒙古博儿赤跪割尊牲的肉[1]，置于太仆卿奉侍的朱漆供盘之上，酹以马湩，而后祭供。蒙古太祝呼帝后御讳，致祭年月日数，致祭物品，最后读蒙古语祝文。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棂星门外，名曰"抛撒茶饭。"凡是大的祭祀，行割奠之礼以示隆重。

蒙古又有烧饭祭礼，蒙古语称之为"亦捏鲁"，它直接因袭契丹、女真的风俗而来。蒙元的烧饭是祭祖祭孔，烧饭由萨满教的师婆主持，所用的牲畜，其胙由祭者分食，焚烧掉的原来是骨头，后来也有肉。烧饭也烧掉肉，这可以看作蒙古贵族生活奢侈在祭祀活动中的体现。

元朝还有一些祓灾迎福的礼俗。一是"游皇城"。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听从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顶白伞盖，上写梵字金书，称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从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宫内仪仗队要"迎行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寻迎福祉。"周游时，出动数千人，有庞大的仪仗、乐队和戏队，首尾排列三十余里，大都的居民倾城聚观。同样的活动，每年六月中，在上都也举行一次。一是"射草狗"，义为脱灾。每年十二月下旬选择一天，在大都西镇国寺内，"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之肠胃。"先由显贵们交相发射，"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而后由帝后及太子嫔妃发射，并且各自解下衣服，"俾蒙古巫觋祝赞之。"另一种脱旧灾、迎新福的风俗是：每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定一日，帝后及太子坐于寝殿，用白黑羊毛为线，把他们自顶至足缠系了，由蒙古巫觋念咒语，在银槽中烧米糠酥油，以烟熏他们身体，毛线断

[1] 博儿赤：蒙元皇帝的厨司，怯薛成员的一种。

了，纳入槽中。他们又用手撕裂数寸长的红帛，“唾之者三，并投火中”，随即解下衣服交给巫觋。从这些礼俗可以看出，元代帝室的礼俗是相当落后的，迷信的色彩十分浓厚。

仪　制

蒙古肇兴朔漠，原有朝会燕飨之礼。朝会，或称聚会，译自蒙古语“库里勒台”，原是部落议事会，后演变成为宗王大臣会议，商议征伐、继位等军国大事。朝会之际，与会的人在一起宴饮，蒙元时候成为皇帝赐予的燕飨，由于规定与宴者穿同一服色，又称“质孙宴”①，或“诈马宴”②。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喝盏”之礼，设专人高呼“月脱”③，大家敬酒。重大的宴饮往往持续数天，时间最长的宴饮甚至达到六十余天。但朝会本身的礼仪是很简朴的，直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的时候，只不过树起九游白旗，诸王群臣共上尊号而已。

在窝阔台继承汗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列班就拜，“降升分上下，进退有低昂。”参加会议的人从头上摘下帽子，把腰带搭到肩上，九次用头叩地。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1269）十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1271）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属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

① 质孙，蒙古语，义为颜色。

② 诈马，波斯语，义为衣服。

③ 月脱：义为“请用。”

改蒙古国号为元，因而从这年开始使用的朝仪和燕飨，可以说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中国王朝的传统，礼与乐相辅相成。元廷的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一前代各王朝的乐，包括西夏、金、宋的乐，及回回乐；二是雅燕并用，大抵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

冠服车舆是中国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在这方面元朝吸收了所征服的四方诸国的风俗，并承袭了前代的仪制，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等，都是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体现出民族等级的差别。此外，元朝的冠服车舆还保存了蒙古国时期的仪制，比较突出的有：

质孙是蒙元特有的一色服，"内庭大宴则服之。"若是大宴数日，每天换穿不同颜色的质孙。天子的质孙，冬服凡十有一等，夏服凡十有五等；百官的质孙，冬服凡九等，夏服凡十有五等；百官的质孙，冬服凡九等，夏服凡十有四等。衣冠上缀有许多珍宝，而且大量使用高级丝绸和域外的纳失失[①]，怯绵里[②]，速夫以及高丽罗等[③]，穷极奢华。质孙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规制，十分严格。

象轿是元廷特有的乘舆，始制于至元十七年（1280）。象来自西南以及域外马八儿、缅、占城、安南、交趾诸国的进献。元廷把得自贡献的象饲育于大都析津坊海子之阳。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象轿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为了维持这样壮观的象轿队伍，当象不够用的时

---

① 纳失失：一种金锦。

② 怯绵里：即剪茸。

③ 速夫：指回回精制毛织品。

候，元廷就遣使到占城、占腊、龙牙门等地去索取驯象。其他较具特色的仪仗还有驼鼓、骡鼓和马鼓等。

蒙元尚白，这与契丹、畏兀儿等北方民族相同。最显著的事例是：成吉思汗建国时树起九游白旗；他死后，在他的陵地搭起了八个白帐供祭；元大都大明殿内的御榻上有白盖金缕褥，御座上安置的镇邪伞盖也是白色的；元廷祭祀时用白缯作币；最隆重的质孙宴一律穿白色服装；进献于元廷的禽兽，如果是白色的，被认为更具敬意，如白鹰、白马、白驼等。

蒙古又尚右，这又与突厥相同。尚右表现在许多方面：成吉思汗分封宗族，诸子的封地在老营右面，诸弟的土地在老营左面；元朝太庙的神主的排列由左昭右穆改为右昭左穆；元朝丞相两员，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又，右丞在左丞之上；元宫中有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库，金银、质孙衣段隶右库，常课衣缎、绮罗、缣布隶左库；在帐幕里，男子坐右边，妇女坐左边，尊重男性；在行进时，两骑相向交左而过，表示谦顺；在进食时，接他人递来的肉要用右手，用左手就相逆。

蒙古还崇尚九这个数字，用九表示隆重，这与汉族是一致的。除了九游白旗外，崇九还表现在：成吉思汗给予功臣的特权之一是九次犯罪不罚；祭祀时，羊鹿野豕等祭品一般常用九数或九的倍数；每天在上都祭天，用马一羯羊八，彩缎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除了貂鼠皮，其余都取九数。

在蒙古传统的风俗原有不少禁忌，元代仪制建立以后，禁忌避讳的事也有增加。蒙古固有的禁忌有：禁遗火而燕草者，禁拾遗者，禁箠马面目者，禁相与淫奔者。由于害怕雷电，春夏两季，他们不在河中洗手汲水，甚至不在原野上晒凉洗过的衣服。有的禁忌是与萨满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禁止拿小刀插人火中，禁止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禁止在火旁拿斧头砍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会将火砍头。故意犯禁的人要被处死；不是

故意犯禁，可由巫师为犯者涤除罪恶。蒙古人认为火可以净化污秽和灾邪，办法是烧起两堆火，从中间通过。

忽必烈在仪制确定以后，至元七年闰十一月，禁止用缯缎织日月龙虎，用龙犀饰马鞍。从至元八年起，禁止器物饰金。原来蒙古贵族是喜爱在器物上饰金的，现在予以禁止，是要显示皇帝的独尊。后来元顺帝时，又有进一步的禁限。

中国历代王朝禁止臣民称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后追尊庙号，各种文书要回避御名的用字。蒙古前四汗时，汗的名字是毋须回避的，贵族与平民之间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后也没有庙号。不过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长已不允许下属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后避讳他或她的原来名字似乎渐渐成为习俗。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时提到他名字的不里砍头处死。后者最著名的例子是拖雷死后人们回避他的名字，改称他为“大那颜”，甚至把蒙古语中的“拖雷”改用突厥语同义词“库兹古”来表示[①]。元朝制订朝仪以后，避讳也走上了中国传统的轨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开始对前四汗追尊庙号，以后成为定制。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薛禅汗”，汉语庙号是“世祖”。蒙古庙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主的整个蒙古汗国；而汉语庙号则仅仅行用于元朝。这种双重庙号制度，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个鲜明反映。它在中国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婚　姻

元朝的婚姻礼制是在至元八年（1271）基本上确定下来的。

---

① 拖雷：蒙古语，意为“镜子”。

它包括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姻为主。

元代婚礼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礼俗。一直到蒙古汗国建立以后，蒙古人中间还流行"抢亲"的风俗。但同时，议婚的风俗也很普遍。父亲可以为儿子向女方求婚，若女方父亲同意，就饮"布浑察儿"[①]。又有"不兀勒札儿"，译称"许婚筵席。""不兀勒札儿"这个词原意是"颈喉"，这里实际上指羊的颈喉，这个部位的骨头十分坚硬，许婚筵席中上吃这个部位的肉，表示定婚不悔，议婚要讲聘礼，一般是以马示聘。但是成吉思汗认为："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他更注重婚姻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基础。因而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元代蒙古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其原因之一是为了蒙古人的繁衍。至于一个男子娶多少妻子，则有赖于他供养的能力。在多妻的情况下，长妻的地位最高。但是，妻以子贵，如果长妻没有生子，她的地位就可能低于她丈夫的其他生子的妻。严禁与已婚之妇私通，犯者处死。

元代蒙古人还实行收继婚制，也就是"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这种婚制，中国许多北方民族都曾实行，汉文文献中称之为"蒸母报嫂"。蒙古兴起时，和它邻近的女真、党项、畏兀儿等族也有这种习俗。因此，在当时蒙古人的观念中，这是顺理成章的。甚至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宠妃木奇哈敦就被三

① 布浑察儿：即许亲酒。

子窝阔台娶去。而在窝阔台得到木奇哈敦以前，他的二兄察合台也派人来说："父亲遗留下的诸母和美妾之中，把这个木奇哈敦给我！"这种婚制，在元朝封赠制度方面也有反映。元朝规定，"再醮之妇"是不予封赠的，但蒙古以及色目除外。

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婚姻礼俗，则基本上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也有若干变化。至元八年九月，尚书省礼部呈准施行的婚姻礼部是依据汉人传统体例并参照朱熹《家礼·婚礼》拟订的，包括议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七项，同时革去金代流行一时的"拜门"。

元廷对于一些特殊的婚姻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对于"驱良婚"，也就是驱口与良人之间的通婚，元廷明令禁止，违者有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如宋时在江淮已成习俗的典妻，元廷认为是"薄俗"，予以禁止；也禁止嫁卖妻妾。又如指腹为婚，宋金两代较为多见，而元代的法律则予以禁止。

元代各民族的婚姻礼制，虽然各从本俗，但彼此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汉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的多妻制。对此，元廷以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界限，在此以前，准已婚为定；在此以后，申明禁止。不过，有妻再娶妾仍被允准。

蒙古的收继婚制对汉族也有影响，而元廷对此的政策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按至元七年的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颁布的圣旨，则准许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到了至元十二年，兄收弟媳已在实际上受到禁止，犯者刑杖。

另一方面，蒙古人受到汉族婚姻礼俗的影响，也有不再从本俗的。例如蒙古雍吉剌氏的脱脱尼，年二十六岁的丈夫哈剌不花死了，哈剌不花前妻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以死相拒，二子恐惧谢罪，只得析业而居。对这样的事，元代官方不予干涉。

丧 葬

元朝在丧葬方面，包括葬式、丧服、丧事和服丧，也规定各从本俗。

蒙古族实行土葬，但无冢，富贵的人有棺，但形制与汉族的棺不同，“中分为二，刳有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靴鞋、系腰、盒钵，都用白粉皮制成。以车载棺，运至葬地，一路上由一蒙古巫媪骑马前行，这匹马称为金灵马。到了陵地，开穴所起的土块排列有序，埋人棺后，又依次掩覆。这是皇帝的丧式。从成吉思汗起，这样葬人土中后，当即驱马蹴平，上面覆草，不再修建陵墓。因此，他们的具体埋葬地点，人们不得而知。

蒙古人实行土葬时以死者生前的生活资料作为随葬品。普通的人，随葬品只有帐幕、马匹、武器等，贵族的随葬品有金银珍宝。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蒙古首领死后人殉的记载，如志费尼记成吉思汗死后有四十美女殉葬，拔都葬时以“奴隶及妻妾殉。”

蒙古对死者的哀悼祭祀，有如下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嘱咐不要发丧举哀，以便使敌人不知道他已死去。蒙哥汗死后，灵柩被运回老营，在四处斡耳朵中轮流为他举哀，《元史》记载：“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又记：“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还。”致祭日子延长到三年，可能是受到汉族丁忧之制的影响。元代汉族的丧葬礼制沿袭了固有的传统，而且把它更加牢固地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大元通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把五服在法典中列有专条。汉族，三年服丧丁忧之制，在元代同样严格执行，蒙古、色目不在此限。有的蒙古、色目官员也进行效法。对此，元

廷在大德八年（1305）曾规定可以允许，但后来发生争议，在致和元年（1328）时曾予禁止。至元十五年，中书省明文禁止汉族火葬，以厚风俗。此外，汉族居丧饮宴的活动在延祐元年（1314）也遭到禁止，但蒙古、色目人可各从本俗，不在禁例。

岁时岁序

在岁时节序方面，元朝也基本上沿袭历代形成的传统，同时又包含一些蒙古的因素。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忽必烈规定：凡遇天寿、冬至，政府官员各给假二日；遇到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

元旦庆贺的风俗，始于汉高祖。自后历代皇家，每逢元旦，行朝贺大礼，元朝未有例外。而民间有贺新年的风俗，大约始自晋代，相沿到元代也仍旧存在。元代在正旦朝贺以后，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相贺之时，赠予手帕。以后数日间，士庶彼此往学迎送。在大都，到十三日这天，人们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

正月十五上元观灯风俗，也始于汉代，而盛行于唐、宋及其以后。元初，忽必烈已在大都宫中挂灯赏玩。据说忽必烈本人穿制过珍珠垂结灯。宫中有一棵树，忽必烈赐称“独树将军”，上面悬挂诸色花灯。而后，每逢这个节日，官内衙门“进上灯烛、糕面、甜食之类。”到武宗、仁宗之时，此节大为兴盛。武宗在即位后的第一年（1308）正月十五日命起灯山于大明殿后迎春阁前，蔚为壮观。在民间，大都的街市从十三日起开始悬灯，一直到十五日或十六日。接下去，元月十九日是燕九节，大都士女倾城前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烧香，祭祀道教全真教宗师丘处机的生日，同时也宴游取乐；这个元初始有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周代已有修禊、寒食的风俗，而清明则始于汉代，唐、宋相

沿以为节令。清明作为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之一，在三月间，清明前一日或两日，是为寒食。元廷规定寒食放假三天，自然就将清明这一天包括在内了。在这个节令里，人们祭祖扫墓。古时有打球、斗鸡、秋千诸种游戏，元时大都，这类游戏仍行于宫闱以及达官贵人之家。在佛教传人中国后，相传四月初八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佛门信徒逐渐有浴佛会。元朝皇帝从忽必烈起信奉喇嘛教，因而对浴佛会十分注视，典仪方面的特点是全部遵照喇嘛教的规则。

重午，元时也简称午节，在五月初五。这个相传纪念屈原的日子，元廷"以为大节"。这一天，宣徽院等衙门向元廷进献宝扇、彩索、珠花、金罗、酒醴、凉糕、香粽等物。在大都，小商贩们制卖各种凉糕；此外，市场上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线、符袋牌等，大概与江南习俗相同。南方在这一天划龙船的风俗在元代依旧盛行；但至元三十年（1293）时曾一度因其"无益"且"聚众不便"而予以禁止。

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也称乞巧节、女孩儿节。此节相传的故事有牵牛星与织女星在鹊桥相会，有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里盟誓。在元代大都，这一天，士庶之家都架起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备盛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在七夕节，大都人民也迎二郎神赛愿。

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又叫鬼节，是祭礼祖先、追念亡灵的日子，元代放假一天。

立秋这一天，元代也放假。这天，元廷有颇具特色的仪俗。当时，元帝还在上都，山野已呈红叶，侍臣进献红叶，皇帝也将红叶插在帽上，并举行盛宴。在八月十五前后，上都一带紫菊和金莲盛开，从皇帝起，元宫廷中人都簪这两种花于帽上，由太史择吉日，洒马湩，并设燕欣赏。九月，元帝回到大都，宫中还有菊节。至于汉族传统的过中秋节的内容，在元廷生活中不见任何

反映。看来蒙古族不过中秋节在元时已经如此，并不是从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才开始的。这可能与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和军事生活有关。中秋之时，蒙古人常常是厉兵秣马，准备出征；当天晚上以月为占候，“月明为利，即兴兵”，“风雨晦冥为不利，即不兴兵”。在这种情况下，无暇赏月。

重九。西汉已有在这一天食糕粿、饮菊酒的习俗，东汉时已有登高，重阳之名，肇于三国之时；而重九之称则始于东晋。重九赏菊，元帝在这时已从上都回到大都，在宫中举行菊节。登高与吃糕相连，这天大都士庶以面糕相赠，市上搭棚叫卖，小贩甚至用小杠车沿街叫卖。

十月一日以后，时令谓为送寒衣节，祭衣上坟，为之扫黄叶。在大都皇城东华门处，元廷命武官开射圃常年国典，又称开垛场。先由太子发三矢至高远，名射天狼，俗呼射天狗，而后宰执、诸王接着发数矢。射毕，在别殿开设盛宴。这是蒙古仪俗。

十一月，冬至日，太史院进历，有国子历、畏吾儿字历和回回历。接着，大都市中卖新历。新年将临，宰相亲率百官恭贺，向皇帝递献手帕，进贡方物。士庶人家也互相祝贺。

十二月初八是佛成道日，元人沿袭煮食腊八粥，不分僧俗，不问贫富。但佛门煮的是红糟粥，官员、士庶煮的是朱砂粥，并不一样。煮粥以后互相馈送。帝师也向元帝进粥。元廷在年近除夕时，由西番咒师以扇鼓持咒，进行洒净、驱邪的仪式活动，在宗教气氛中结束一年的生活。

（胡务）

参考资料：

《元史》：《祭祀志》、《刑法志》、《礼乐志》、《舆服志》、《世祖纪》、《顺帝纪》、《李禿传》、《乌古孙良桢传》、《文宗纪》、《脱脱尼传》、《塔本传》、《赛典赤赡思丁传》。

《析津志辑佚》：《风俗》、《岁纪》。

朱元璋起兵称帝

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后随父朱五四迁居濠州钟离（安徽凤阳)。朱元璋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因家境贫困弃学为地主牧羊，与徐达、汤和、周德兴均是好朋友。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不久又闹瘟疫，父母兄长相继病死。朱元璋孤苦伶仃，走投无路，十七岁的他只好进了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但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皇觉寺也严重缺粮，他不得不四出云游，化缘度日。这种风餐露宿，如蓬逐风的流浪生活过了三个年头，到至正八年，又回到了濠州皇觉寺。几年来朱元璋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都大邑，熟悉了当地的山川地理形势，由于他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和下层人物多有接触，了解了社会的弊病，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艰苦的流浪生涯，增强了他的体魄，锻炼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扩大了眼界，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正十一年（1351年)，江淮一带人民纷纷起义，第二年二月，郭子兴等人率众攻占濠州城，此时在郭子兴队伍中当军官的汤和给朱元璋捎信，邀他投军，朱元璋遂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时年二十五岁。起初他充为步卒，因作战机智勇敢，又识字，很快被提升为九夫长，并留在郭子兴身边。郭子兴见他人虽年轻，但度量豁达，有胆略，才能出众，视为心腹，并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他在军中的地位与众不同，人称“朱公子”。

此时濠州城中有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位元帅，他们互不服气，互不统辖，并时常闹矛盾，攻占濠州近半年，竟不能扩大地盘，只死守濠州孤城。于是，朱元璋回到老家钟离乡招兵买马，不久招募到徐达、周德兴等七百余人，郭子兴大喜，升他为镇抚，由他率领这些人。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五个月的守城作战中，濠州起义军多死伤。朱元璋意识到，几支起义军长期呆在濠州，不是自家闹事火拼，就是被元军吃掉。因此，他决计离开濠州，向外发展，扩大地盘和势力。至正十四年六月，他征得郭子兴同意，只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郭兴、郭英等二十四位贴身兄弟南下攻打定远。这时定远张家堡驴牌寨有民兵三千人，因缺粮，走投无路，被朱元璋设计收编，他凭着这支三千人的队伍又收编了缪大亨在横涧山的义兵二万余人。定远被攻占以后，当地人冯国用、冯国顺兄弟带队伍投顺朱元璋。冯氏二兄弟是读书人，通兵法，朱元璋对他们非常信任，向他们请教取天下大计。冯国用说："金陵（今南京）的地理形势是龙蟠虎踞，乃帝王建都的地方，可先攻下为根据地，然后四出征战。要倡仁义，收人心，不贪财宝女色，这样，天下是不难平定的。"朱元璋言听计从，将冯留在军中参谋计议大事。在朱元璋进军滁州途中，又有定远人李善长来军中谒见。李善长是地主阶级文人，颇有智谋，朱元璋向他求教，他劝说朱元璋以汉高祖刘邦为榜样，为人要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便可成帝业。李善长的一席话更使朱元璋立下雄心大志，也使他更加明白读书人的用处。朱元璋对李善长非常信任，将他留在身边，筹谋划策。从此，朱元璋对有学问的读书人特别器重，礼贤下士。

至正十三年（1353年）七月，朱元璋率部攻下滁州（今安徽滁县），不久，郭子兴率其所部万余人从泗州来到滁州，看到朱元璋所领兵马三万，号令严明，军容整齐，非常高兴。但郭子

兴没有远大抱负，想据滁州称王，朱元璋对郭子兴说："滁州乃一山城，舟楫不通，商贾不集，非英雄所居之地。"郭子兴这才打消了称王的念头。不久，朱元璋率军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他发现不少士兵染上了抢掠奸淫的恶习，决心整顿军纪。他召集诸将，申明纪律，将军中抢来的妇女全部放出，深得百姓拥护。渡江攻下太平（今安徽当涂）后一士兵违反军纪，立即被斩首示众。在当时，群雄并起，大多只图女子玉帛，不惜荼毒生灵，朱元璋以夺天下为目的，约束军队，军纪严明，因之仁义之声远近闻名，不少地方举城归降，这是朱元璋能战胜群雄的重要原因。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亡，这时刘福通已经派人把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称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郭子兴死后，小明王任命其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均用龙凤年号。起义军进入太平时，朱元璋又得儒士李习、陶安。陶安向朱元璋建议说，金陵是古代帝王之都，龙蟠虎踞，又有长江天险，拿下金陵，出兵以临四方，则所向无不克，很合朱元璋心思。

这时，太平周围都是元军，而义兵首领陈埜先与部将康茂才也帮助元军进攻太平城，朱元璋亲自督兵拒战，命徐达、邓愈率一军绕到元军背后，前后夹击，元军大败，生擒陈、康，并留二人于太平。九月，朱元璋命郭天叙、张天佑以及陈埜先合军攻集庆（今南京），战争打得正激烈之时，陈埜先又叛，郭天叙、张天佑皆死。朱元璋遂成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原郭子兴旧部全归他一人指挥。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命再攻集庆。三月初十，攻破集庆，得军民五十余万。遂将集庆改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赵忠为兴翼元帅，守太平。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其下设参议、左右司郎中、都事，并置行枢密院、理问所、提刑按察司、营田司等机构。朱元璋以此为中心，东起句容至溧阳，西起滁州

至芜湖，作为向四面发展的根据地。这时他的北面有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这样，东、西、北三面都有别股力量隔着，不与元军主力接触，只有南面有零星几支元军。而此时元军主力正在北面与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激战，无力他顾，朱元璋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积极发展壮大自己，消灭周围处于孤立、分散的元军、地主武装。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七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应天周围的据点。至此，朱元璋已有足够力量向更远的方向发展。于是，他决定集中兵力，出击浙西、浙东，消灭该地的元军。

朱元璋重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攻占徽州时，他召见地方名儒朱升，朱升向他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朱升这一建议是根据当时客观形势提出来的。高筑墙，就是要朱元璋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巩固后方军事；广积粮，就是发展生产，准备好应付长期战争的物质条件；缓称王，是要朱元璋不要急于称王，不图虚名，以免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策略在群雄并争之际，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朱元璋完全采纳了。至正十八年，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并拨出一部分将士开荒屯田，不到几年时间，粮食堆满仓库，不仅解决了军粮，而且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军民皆大欢喜。

朱元璋向浙东发展。首先攻占广德和宁国路，打开了向浙东发展的通道。朱元璋派亲信将领耿炳文守长兴，吴良守江阴，汤和守常州，他亲自率大军向浙东进发。至正十七年，先后攻取了皖南诸州，从皖南进人浙东。至正十八年三月，邓愈克建德，胡大海久攻婺州（今浙江金华县）不下，十二月，朱元璋亲率十万大军攻下婺州，朱元璋把它改为宁越府，后又改为金华府，并在此设置了浙东行省。至正十九年，胡大海攻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又克处州。经过两年左右的战斗，浙

江省西部的元朝统治区，大部被朱元璋所克，朱元璋的江南政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强盛，他与其他割据政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朱元璋开始了削灭群雄，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战略是：先西灭陈友谅，后东平张士诚，再降服方国珍。

彭莹玉起义后，立徐寿辉为皇帝，国号天完，占有两湖、江西和皖南等地区。彭莹玉在与元军作战中牺牲，不久，徐寿辉又被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便成为朱元璋西邻的割据势力。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称帝，不久他又联络张士诚进攻应天。朱元璋与刘基正确分析形势，认为张士诚反复无常，胸无大志，只图保地盘，必定是坐山观虎斗，不会轻易出兵，应集中兵力对付陈友谅。于是，朱元璋派人诈降，将陈友谅引入埋伏圈，一举将他打垮，并乘胜收复太平，攻克安庆、信州（今江西上饶）、袁州（今江西宜春）等地。在这一战役中，张士诚正如朱元璋所料，始终不出兵助战。正当朱陈两军在江南血战之时，江北形势发生了变化，张士诚于至正二十三年派参将吕珍攻打安丰（今安徽寿县）的小明王，朱元璋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救安丰就是保应天，决定亲自率兵救安丰，刘福通在救兵未到时壮烈牺牲。朱元璋杀退吕珍，保住安丰，把小明王迎到滁州。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出兵救安丰之际，统兵六十万，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都督朱文正与参政邓愈、元帅赵德胜率洪都军民坚决死守，陈友谅猛攻八十五日不克，到七月中旬，朱元璋亲率舟师二十万前来救援，兵至鄱阳湖。鄱阳湖战役是朱陈之间一次决定生死存亡的恶战。朱元璋首先派兵封锁了鄱阳湖入长江的湖口，扼住陈友谅的归路，然后抓住陈友谅兵舰虽高大，但每几十艘用铁索连结在一起，行动不灵活的弱点，派敢死队驾船七艘，内装火药和芦苇，顺风纵火焚烧陈友谅战舰，陈军被烧死和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陈军锐气受挫，陈友谅

又固执己见，不听部下意见，士气低落，后来连金吾将军都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只好率军突围。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刚冲到湖口，一支流矢从眼睛直穿头颅，当即毙命，其部将将其尸首送至武昌。

鄱阳湖之战后，朱元璋命常遇春攻打武昌，自己率军回应天。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二月，朱元璋以武昌久围不下，亲往督师，陈理举国投降，湖广遂全为朱元璋所有，并设湖广行中书省进行管辖。

朱元璋将实力最强、野心最大的陈友谅消灭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了。朱元璋对张士诚的围攻分三个步骤。第一步，至正二十五年十月，由徐达率兵出击，经半年多时间的战斗，到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就攻占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等苏北和淮河下游地区；第二步，同年八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攻克湖州（今浙江吴兴）、嘉兴、杭州、绍兴等地，对平江形成钳形包围；第三步，南北夹击，于至正二十七年攻克张士诚最后一个据点平江，活捉张士诚，张士诚被解到应天，不肯投降，自缢身死。朱元璋将平江路改为苏州府。

消灭了东、西两大割据势力之后，朱元璋已无多大后顾之忧了，当初供奉小明王是形势的需要，现在没有继续尊奉小明王的必要了，他派人假意迎小明王到应天，在渡江时趁机将船弄翻，小明王被溺死。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遣将攻打浙东的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逃入海岛，又为廖永忠所败，只好向朱元璋投降。次年，朱元璋又派兵三路，直取福建，消灭了元朝平章陈友定，并乘胜收复两广，从而平定了南方广大地区。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

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五万，北伐中原，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攻陷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和后妃太子由居庸关北走，逃往上都（今内蒙多伦），元朝灭亡。

1368年正月，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改应天为南京，都于南京。从此开始了明王朝的统治。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太祖实录》卷1、卷2、卷3、卷14、卷16。

《明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起兵”、卷5“方国珍降”。

《明史》卷1、卷127、卷123、卷136。

《鸿猷录》卷3“克陈友谅”、卷5“北伐中原”。

《国初群雄事略》。

洪武朝政

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力。但是，经过长期战乱后诞生的新王朝，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元朝政权垮台后，退居漠北的蒙古贵族还有一定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明朝边疆的安全；在明王朝的内部，随着新政权的确立和稳固，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益激烈。所有这一切，都危及新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总结了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决心建立起一套权力高度集中，运转自如，犹臂使指的统治政权。

朱元璋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三司分治，权归中央。洪武初年，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仍沿袭元朝的制度，即设行中书省，权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 年）朱元璋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为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布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使臣，负责宣传和执行朝廷的政令，掌管民政和财政，并且事事都得秉承朝廷的意旨。布政使司和行中书省的性质有着根本不同，行中书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关，布政使是皇帝派驻地方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布政司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元朝的行中书省大体相当，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分为十二个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广东。洪武十五年，又增设云南布政司。由于行中书省的名称已经成为习惯，所以一般还是称为行省，俗称省。和布政司平行的有提刑按

察使司，简称为按察司，长官为按察使，专管地方刑法；又设都指挥司，长官为都指挥使，掌管军事，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他们不相统属，各直属中央。这一改即把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三者互相牵制，凡遇到重大政事，就要有布、按、都三司会议，再上报给中央的部院，达到集权中央的目的。在一些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单设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实行军政和民政合一的统治。布政司下的地方政权分为二级。第一级即府，长官为知府；直隶州，即直属布政司的州，长官为知州，其地位和府相等。第二级是县，长官为知县。这一改革，将元朝的路、府、州、县减少了一级，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和执行。

接着，朱元璋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洪武初年，中央政府机构也是沿袭元制，设中书省。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丞相统帅百官，总理政务，只对皇帝负责，继李善长、徐达之后，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的手中，他在朝廷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操生杀黜陟大权，不少重大事情也不向朱元璋报告，激怒了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 年）正月，以阴谋政变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提高中书省属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命令，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裁，朱元璋实际上是皇帝兼行宰相的职权，封建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顶峰。

洪武初年，中央监察机构仍沿袭元制，称御史台，十五年(1382 年)，朱元璋将它改为都察院，并充实了机构，加强了职权，长官为左右都御史，还有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勾党，擅作威福，都必须检举弹劾。都察院领有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以一布政使司所辖地区为一道，分掌十三道。十三道监察御史在京则监察一切官僚机构，监视所有文武官员，出使到地方则

叫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漕、巡关、监军等，其中巡按御史是代替皇帝巡视地方，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奏裁，权力很大。监察御史本是七品小官，其官阶和地方上的知县一样，但朱元璋却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朱元璋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利用他们来钳制大官，这些人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和鹰犬。

中央审判机关叫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长官为大理寺卿，下有左、右少卿，左、右寺丞等。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的重大案子，均由大理寺复审。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合称中央三法司，凡重大案件，必须经三法司会审，这样司法部门也互相牵制，而不能由某一部门独断专行。中央机构除上述机关外主要还有通政司、翰林院等。通政司是明代创设的机构，主要负责收纳奏章及封驳事。翰林院负责为皇帝起草册立后妃、太子、诸王和诰封官员之类的文章，编修国史，向皇帝讲读经书。朱元璋立下法规，告诫以后的君臣，对于他建立的各种制度，不能随意更改，并将这些训条编成书，称为《皇明祖训条章》，要子孙后代世世遵循，不得逾越。比如对于废除丞相之制便作如下规定："往后的皇帝，不许再设丞相，臣下有敢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朱元璋为了保住朱氏一统天下，要求臣僚们对他绝对忠诚，为此，他派人用特务手段侦察臣僚的私下言行。当时最著名的是高见贤、杨宪等四人，他们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甚至连李善长等人也怕他们。如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家乡，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察看行迹，等使者回来报告说吴琳在家老实务农时，朱元璋才放下心来。关于朱元璋派人暗中侦察朝中大臣一事，在洪武朝屡见不鲜。朱元璋刺探臣僚，开始时，只是派一些检校、佥事等类官吏去侦察，没有一个机构，不能直接逮捕判刑。至洪武十五年（1382 年），特设置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察、逮捕、审问、

判刑等活动，称为“诏狱”。

朱元璋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尤其是中书省和丞相制的废除，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事件，使皇帝拥有更多的权力。朱元璋以上述形式加强中央集权，对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当时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生产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在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也对军事机关进行调整。洪武初年，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亲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是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大都督府统领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了，就在废中书省的同时，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分别统领各自所属的都司、卫所，各府的长官分为左、右都督，掌管军事。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既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兵部虽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遇有战事，由皇帝作出决定，然后兵部颁发调兵命令，军事统帅由皇帝亲自任命，然后统率从各卫所调集的军队去作战，战事结束，兵归卫所，主帅还印。这一制度使总指挥权和将帅的任免权操在皇帝手中，而军籍、军政的管理和军队的调发指挥权限分离开，将不专军，军不私将。这样，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更重要的是皇帝牢牢控制住了军权。

在编制和训练军队方面，立国之初，朱元璋和刘基经过切磋琢磨，创立了一种卫所制度。卫所军队来源有四：一是从征；二是归附；三是谪发（即因犯罪被罚充军的）；四是垛集（即从老百姓家中按人口比例征调的）。军人列入军籍，世代沿袭、儿孙代代当兵，军籍归都督府掌管，军人不受普通地方行政官吏的管辖。军队耕战结合，平时既要屯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担负保

卫边疆和镇守地方的任务，是一种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相结合的队伍。全部军士都被编在卫所之中，每一百一十二人编为一个百户所，每十个百户所编为一个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每五个千户所编为一卫（五千六百人）。卫所的军官分别为百户、千户、卫指挥使。百户所以下的军事单位是总旗（约五十人）、小旗（约十人）。洪武朝卫所遍及全国各地，但京师重地，卫所较多。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全国有十七个都指挥使司，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还有六十五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军队总数约一百二十万左右。十七个都司和下面卫所分别隶属于中央的五个都督府。朱元璋就是藉这些卫所军队保卫边防和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封建统治的。

采用荐举、学校和科举选拔官吏。明王朝建立后，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开国功臣们，成为明朝官僚机构的中坚力量，他们任职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成为最高统治集团，但从全国来说，上自六部下至府州县，急需大批的官吏，朱元璋采用荐举、学校和科举三条途径大批选用官吏。

早在渡江克金陵之前，朱元璋就录用了一批儒士，如夏煜、孙炎、杨宪等人。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下令征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终，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洪武六年，明朝政府命令各级官吏推举人才，内容是：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等。不少人一经推荐就被任命为大官，如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都被任命为尚书。其他有的被任命为侍郎、副都御史以及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

通过学校培养官吏是朱元璋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央的学校称国子学（或称国子监），在地方的称府州县学。朱元璋在称帝以前，就在南京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国子

学为国子监。洪武十七年，在监的学生有数千人，到洪武二十六年监生多达八千一百二十四名，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府之一。国子学的功课，有《四书》、《五经》、《大诰》、《大明律令》以及刘向《说苑》等书。府、州、县的诸生，必须进国子监才能得官。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后，可以直接做官。从洪武二年建国子学到洪武三十一年，明朝政府一直把国子学作为培养官僚的主要场所，随时擢升他们做各级官吏，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擢监生刘政、龙谭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

通过科举选拔官吏。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童生先在州县级考试，中试者称做“秀才”或生员，即府、州、县学的诸生，取得进一步考试的资格；省级的考试叫“乡试”，每年举行一次，中试者称“举人”；中央一级的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进行，由礼部主持，称“会试”，中试者再经过皇帝的考试，叫“廷试”或“殿试”。由皇帝考试，这是一种典型的形式，表示选拔官吏的最后决定权由皇帝掌握，不一定皇帝亲自主持。考中的分三甲，一甲只取三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统名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当时，人们称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叫“殿元”，即状元。如果三次都是第一名叫连中“三元”。中进士后，就可为官了。一般说来，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洪武六年曾一度罢科举，至洪武十五年复科举。洪武十七年将科举取士定为永

制。洪武时期，科举也是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

提倡节俭，严惩贪污。朱元璋出身寒微，深知物力的艰难。因此，在他称王称帝后提倡节俭。陈友谅被消灭后，江西行省曾把他的一张镂金床献给朱元璋，朱元璋指着这张床对侍臣说："这和孟昶（五代时后蜀国君）的七宝壶有什么区别，穷奢极侈，怎能不亡。"命令把床毁掉。朱元璋不但自己节俭，要求别人也是如此。一日，一个内侍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被他着实骂了一顿。另一个教骑舍人穿一件极华丽的新衣，价值五百贯，朱元璋训斥他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做一件衣服，骄奢如此，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朱元璋亲身受过压迫，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自身又是造反起家的，深知老百姓如果压之过甚，就会铤而走险，因此在他称帝后，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体恤农民的疾苦。他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看一看农民的住处、饮食、用具。回来以后，他对太子说："现在你可知道农民的劳苦了吧！农民身不离田亩，手不离犁耙，终年勤劳，不得休息，但是，他们住的是茅屋草房，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菜羹粗饭，而国家的费用全部落在他们身上。"他严肃地教育朱标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凡是各地闹灾荒歉收的，他就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就叫地方官贷米，或赈济米、布、钞。丰年无灾荒，也优免地瘠民贫地区的赋税。如有地方官隐瞒灾情的，许百姓申诉，而将地方官处死刑。蠲免赋税这一措施自然对地主有利，但在奖励垦荒的政策下，农民也握有一定的土地，自耕农数量大为增加，因而，这一措施使农民阶级也得到一些好处。

为了恢复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对贪官污吏严刑惩治。洪武二年，他告诫百官说："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他规定官吏受贿

枉法者，赃一贯以下杖刑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死；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赃一贯以下杖刑八十，至四十贯斩；官吏凡是贪污至六十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的府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故老百姓又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两旁悬挂着填满草的人皮，使当官的触目惊心，知所警惕。洪武九年（1376年）以前，官吏有罪，谪凤阳屯田者，多至万余人。此外，朱元璋还亲自审理了几起大贪污案，其中最大的是郭桓案。郭桓官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合伙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皆处死刑，追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布政使司官吏，又杀了几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地主，中产以上的地主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

朱元璋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是比较有政治远见的政策，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同元末听任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相比有不少改变，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员，经元末动荡以后，在安定社会、组织生产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朱元璋采取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是追求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也多少限制了封建官僚对百姓的敲诈勒索，多多少少地减轻一点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限制和迁徙旧豪族地主也是洪武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曾大量吸收富民当官，其中当然有不少旧的豪族地主。但是，为了防止旧豪族地主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不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也为了防止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不利于封建秩序的巩固，朱元璋对他们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措施。他效法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的做法来限制和打击他们。洪武初，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其中不少是地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再徙天下富户一千三百余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迁徙富民之目的，是使他们离开拥有土地的

原籍，使之财势俱失，不能危害朱明王朝，而中都和京师，是明朝政府统治力量最强的地区，便于对这些豪族地主加以控制。

但是朱元璋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帝王，洪武时期的有些所为也给后世留下了阴影。他以猛治国，又猜忌多疑，为保住朱氏一统天下，大加屠戮功臣，亲自导演了“胡蓝之狱”，诛杀四万五千余人，自此元功宿将殆尽。正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他又搞文字狱，乱定罪名，妄加诛杀，使不少文人学士乃至政府官员蒙受不白之冤，对明初文化思想起了极其恶劣的窒息作用。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卷72、卷73、卷75、卷89、卷69、卷71、卷77、卷94。

《明太祖实录》卷210、卷223。

《廿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

洪武朝文字狱

明初洪武年间，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粗暴地干预思想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发展均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明初面临着多种社会矛盾，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引发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则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文人与新兴皇明臣属关系的斗争，他们拒绝与新的王朝合作。这些文人对于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怀有仇恨，如贵溪儒士夏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作官，当着明太祖的面骂"红寇"，被送回原籍处死。

有的文人谢绝新朝的征召。实在推脱不了，勉强到了南京，仍拒绝做官。如浙江山阴人杨维桢、江阴王逢就是如此。也有一些文人曾经做过元朝或东吴的官，却坚决不做明朝的官，如回族诗人丁鹤年，长乐的陈亮，山阴的张宪，庐陵的张昱等。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思想上有对立情绪，朱元璋则在文字上找毛病，吹毛求疵，牵强附会，制造文字狱，以打击这部分不合作者，树立其君主专制的威严，强化刚刚建立的王朝统治。

朱元璋出身寒微，当过和尚，于是"光"、"秃"这类字词是犯忌讳的，就连"僧"的字眼也不能说。推而广之，连同"僧"的同音字"生"也犯忌了。朱元璋早年参加了红巾军起义，当时元朝官吏及地主均称红巾军为"红贼"、"红寇"，朱元璋最恨人骂他是"贼"、是"寇"。于是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

字，也在禁忌之列了。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县、卫所官员，逢年过节或朱元璋的寿辰及其他皇家喜庆的日子，都要上表祝贺。祝文一般由学校的先生代作，满是歌功颂德之辞，朱元璋很喜欢读。从渡江到开国，文人确实为他做了不少事情，故太祖认为治国非文人不可，世乱用武，世治宜文。但有人指出：文人好挖苦毁谤。例如张九诚宠信文人，做了王爷后，文人为他起名士诚。孟子云：诚小人也，可读成："士诚，小人也。"朱元璋对此信以为真，开始怀疑有些人用"僧"、"贼"等字是在骂他。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朱元璋对文人运用文字攻击他更加猜疑，于是便挑剔文字，将所谓犯忌的文人治罪或杀戮，洪武朝的文字狱便愈演愈烈。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的话；北平府学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学"的"仪则天下"；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朱元璋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将他们都杀了。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朱元璋又将"生"字念作"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将"帝扉"又读成"帝非"。以上两人也被处死。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被朱元璋读作"去发"；亳州训导林云在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句"式君父"被念成"失君父"；尉氏县教谕许元在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朱元璋将其中"法坤"认作"发髡"，"藻饰太平"看作"早失太平"；德安府训导吴宪在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有道"说成"有盗"，"青门"说成是和尚庙，于是

朱元璋下令将他们一律处死。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即贼，骂我作过贼。”把礼部官吓得要死，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洪武二十九年特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诸司，以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照规定表式抄录，只填官衔姓名。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 年）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长达十三年之久，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编修张某一人。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建在原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又发现新房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四个字，被朱元璋下令腰斩。佥事陈养浩写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将他投人水中淹死。有一和尚叫来复，作一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认为殊乃歹朱，又骂他无德，结果和尚被斩首。状元张信受命训导诸王子，以杜诗“舍下笋穿壁”四句为字式，朱元璋大发脾气，说堂堂天朝，讥讽如此，下令腰斩。京师上元夜，市民以隐语相猜为戏，有人画一赤脚妇人，怀抱西瓜，朱元璋微行见此，认为这是影射其淮西夫人马皇后，于是命军士大杀居民。

洪武朝的文学狱从个人禁忌进一步发展到广义的禁忌，洪武三年（1370 年）下令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洪武二十六年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民间久已成习的称呼也要改过来，如医生，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

朱元璋采用严刑酷法，将文人学士及相关联的亲朋好友，先后杀了十几万人，被诛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

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和一般地主。

朱元璋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如果说对当时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给社会总体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朱元璋以严酷的文忌文风禁锢思想，箝制言论，只许臣民歌功颂德，不许议论朝政得失，否则刀剑加之，身首异处。明初的文学狱，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诛杀了不少官吏和知识分子，不仅削弱了明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巨大的离心作用。不少官吏文人为免触犯禁忌，罹罪惹祸，大都闭眼不看现实，闭门不议朝政，整日庸庸碌碌，久之，只能助长封建政治的腐败。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卷 94、卷 285、卷 286。

《廿二史札记》卷 32。

《明太祖实录》卷 52、卷 246。

《明朝小史》卷 1。

《翦胜野闻》。

胡蓝之狱

公元1386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又经过十多年的统一战争，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元朝残余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得到进一步削弱，南方的割据势力也次第平定，政权基本得到巩固。一些跟随朱元璋起事的农民军将领，随着新王朝的建立，一个个逐渐转化为朱明王朝的新贵，他们官封公侯，爵显禄厚，成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大地主。这班新贵，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相当大的势力。朱元璋越发感觉到外部的敌人已没有力量与他抗衡，而新王朝内部公侯将相的权势使他感到不安，认为这些人大有抢班夺权的威胁。如何保住皇帝的宝座，巩固朱氏王朝，朱元璋确实煞费了一番苦心。

早在农民战争期间，朱元璋对部下将领就进行严密防范，怕他们叛变，凡是出征将领，就以其妻留在京师作人质，又派心腹和义子作监军等。待邵荣密谋击杀朱元璋未遂、谢再兴叛他投了张士诚、部将吕珍事件发生后，朱元璋十分紧张，忧心忡忡。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猜忌之心亦愈来愈重。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他于洪武五年（1372年）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洪武八年（1375年）又编了《资世通训》，反复强调臣僚们要效忠于他；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编了《臣戒录》来教育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年）又颁发了《志戒录》，以汉、唐、宋为臣悖逆者一百余件事情，告诫臣僚以此为

鉴戒。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依靠检校侦察将士私事，使将领人人自危。徐达、汤和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也被猜疑。朝臣纷纷传说，越发造成紧张气氛。朱元璋对公侯大将防制愈严密，矛盾就愈深刻，裂痕也日益扩大。最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皇权和相权、皇权与将权的斗争上，朱元璋终于向往日曾经同甘苦共患难的弟兄们开刀了。

胡惟庸，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 年）在和州投朱元璋，授元帅奏差，官至宁国主簿、太常少卿，是淮西官僚集团的重要人物，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洪武三年（1370年）官居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仗着是淮西旧人，又有李善长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专行，排斥异己。如：刘基在胡惟庸未当丞相之前，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是一头难驯的小犊，将来会偾辕而破犁。"后来，刘基父子上书朱元璋，建议在浙闽交界的淡洋设立巡检司。上书之前，刘基没有请示中书省。因此，胡惟庸更加痛恨刘基，指使同党官员加以诬陷，企图置其父子俩于死地。只因朱元璋不想办刘基的罪，他的目的才没有达到。不久，刘基病，胡惟庸假装关心，携带医生前去探病。刘基吃了这位医生的药后，觉得胸中有个硬块，如拳石一般，没过多久，就死了。胡惟庸胡作非为，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等大事，有时竟自处理，不向朱元璋报告。内外诸衙门的报告有对自己不利的，就扣压下来，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军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锦帛、名马、器玩不可胜数。他做了七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结成了牢固的小集团。

在封建社会里，皇权至上，丞相统帅百官，总理政务，只对皇帝负责，皇帝与丞相相互利用又相互矛盾，皇帝利用丞相治理国家，丞相仰仗皇权作威作福。在胡惟庸之前，丞相李善长为人小心谨慎，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因此与朱元璋冲突不十分明显，

接着是高邮人汪广洋，此人喜欢喝酒，庸庸碌碌，不怎么管事，后获罪淮西集团被杀。而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骄纵违法，相权不断膨胀，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很不高兴，特别是获罪被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原侯费聚都和胡惟庸密切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已经对皇家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矛盾日益激化，朱元璋决心要清除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年五月，朱元璋命李善长、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借元勋重臣削弱胡惟庸的权力。第二年，朱元璋又"命奏事勿关白（告知）中书省"，实际上是对左丞相胡惟庸的警告。但胡继续擅权植党。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杀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和丞相，由皇帝直接指挥六部行政，代行相权。同时被杀的主要人物还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假托星变而杀大臣应灾，于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以及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邓镇、顾敬、陈镛、杨通、毛骧、李伯升、丁玉、宋濂之孙宋慎等都以与胡惟庸私通谋反被杀。宋濂也被牵连，贬死四川茂州。这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被杀。

杀胡惟庸是为了独揽行政权，而统治阶级内部的另一矛盾是皇权与将权的斗争。军队是国家的支柱，朱元璋深知军队和军权的重要性。一日朱元璋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收诸将兵权时，对起居注官詹同说，赵普真是贤相，假使诸将不被解除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和五代一样。于是，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在废丞相制的同时，把掌军权的大都督也废掉，将中央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武将在外领兵征战，屡立战功，骄兵跋扈，不听指挥，甚至违诏出师，与皇权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大将军蓝玉之案终于发生了。蓝玉，定远（今安徽定远）

人，常遇春妻弟。初隶遇春帐下，骁勇善战，多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功升为左都督府佥事。先后从傅有德伐蜀，又从徐达北征，再从沐英讨西番，均立战功。洪武十二年，被封永昌侯。十四年，从傅有德以征南左副将军衔出兵云南。二十年，以征虏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北征纳哈出。适逢冯胜获罪，即以蓝玉为大将军。二十一年，蓝玉率师十五万征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深入漠北，杀其太尉蛮子等，并俘获北元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以及官属三千人，又破哈剌章，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数十骑遁去，蓝玉大胜而还，进封凉国公。明太祖曾将蓝玉比之为汉代的卫青、唐代的李靖。常遇春、徐达死后，蓝玉继为大将军，总军征战，战功赫赫，从此骄傲放纵，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恣意横暴，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听朱元璋命令。又嫌官小，不乐意在傅有德、冯胜之下，所提意见，元璋又多不采纳，越发怏怏不满。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被他乱棍驱走。及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让白天进，蓝玉竟纵兵毁喜峰关而入。元璋闻知后很不高兴。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其谋反，说他和景川侯曹震等公侯打算在朱元璋出去藉田时起事。结果蓝玉被定为谋反罪诛族，列侯以下被牵连诛杀者一万五千余人。军中勇武刚强之士几乎被杀干净。死于蓝党的主要人物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人。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把用刑讯所得的口供和判案详细记录公布，让全国人都知道他们的“罪状”。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长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至此，“元功宿将相继尽矣”。二案以外，开国功臣被杀的还有德庆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临

川侯胡美、江夏侯周德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以及宋国公冯胜。就连朱元璋的亲侄儿屡建大功的朱文正，也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亲外甥李文忠，南征北战，屡建大功，也被赐死。正如赵翼所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胡蓝之狱”归根结底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封建专制的特点，就是皇权政治“家天下”。子孙们能否保住本家一姓的万世帝王之业，这是皇帝日夜焦虑的事情。朱元璋主张以猛治国，全力翦除内部威胁皇权的势力，而皇太子则大讲孔孟之道，主张少杀人。一日，太子朱标劝谏其父说：“杀人太滥，恐伤和气。”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朱元璋故意丢弃一棘杖于地，要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可见朱元璋把功臣宿将当成棘刺，把棘刺拔掉，为子孙后代掌权扫清道路，这就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动机。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13“胡蓝之狱”。

《廿二史札记》卷 32“胡蓝之狱”。

《明史》卷 308“胡惟庸传”。

《明史》卷 132“蓝玉传”。

《明太祖实录》卷 15、卷 74、卷 97、卷 132、卷 199。

明初宗藩

朱元璋在建国不久，即作出分封诸王于地方建藩的决定，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刚刚诞生的明王朝，面临的政治形势尚十分严峻，蒙古残余势力严重威胁着明王朝，时常犯边，有卷土重来的危险，朱元璋定都应天（今南京），距北疆遥远，鞭长莫及，加强北部边防，抵御北元的进扰，是明初的重要国策，他认为，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捍外患，故朱元璋分封了燕王等六位亲王于北方和西北边陲。

另外，明太祖担心朝中权臣擅权，将帅掌握重兵，长期戍边，更担心权臣与宿将交结，与皇权抗衡，窥伺帝位。因此，他对勋臣宿将日益猜疑，加之勋臣宿将暴横不法，使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皇权与勋臣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洪武九年（1376 年）和十三年（1380 年），朱元璋对地方和中央官制进行大的手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行中书省的权利，改变了元末外重内轻的格局。但历代地方割据叛乱给朝廷造成的威胁，使朱元璋不能不预做防范，于是决定依靠宗室子孙对地方军政官吏加以限制和监督。他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卫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在爵封，分镇诸国，为久安长久之计。这样，在中央，有皇帝直接掌握；在地方，有诸王协理，内外相辅，以保朱氏天下世代相袭，这就是明初分封诸王制度的历史背景。

洪武一朝，先后三次分封诸子为王，令这些皇子们先后建藩

于太原、北平、大宁、广宁、宣府以及青州、桂林、西安、开封、武昌、长沙、成都、南阳等边陲要塞和名都大邑，全面地体现了朱元璋依靠宗室子孙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总设想。从洪武十一年（1378年）起，首封的诸王先后就藩，秦王樉在长安，晋王㭎在晋阳，燕王棣在北平，周王橚在开封，楚王桢在武昌，齐王榑在青州，潭王梓在长沙，鲁王檀在兖州，郡王靖江王守谦在桂林。后朱元璋又封朱椿等几个皇子为亲王。到洪武后期，又有九人被封就藩。诸王中，镇守西北及北方边陲重镇的秦王、晋王、燕王、宁（权）王等，兵力尤强。在就藩的二十三位亲王中，开府边塞占九位，在内地的达十四位。朱元璋一方面在边陲要塞建卫所，行屯田，进行军事布署，并令分封在边塞的诸王，修武备，捍外患，保证边境安宁。一方面在内地也普遍设置卫所，令地处名都大邑的诸王担负起镇抚地方，藩屏王室的重任。

明初的藩王居于极高的地位，有极大的政治特权，并握有重兵。洪武三年（1370年）定王府官制，亲王府的长官是左右相和左右傅。他们既是正、从二品的勋臣大吏，又先后兼任地方行省的左右丞、参政或都司、卫所的军事官员。诸王通过王府的属官，过问地方行省的利弊得失、都司卫所的军事部署、军士训练以及地方官员的考察等。亲王以其宗室之尊，俨然成了朝廷派驻该地区的政治军事代表。明制规定：公侯大将如见亲王，伏而拜谒。又规定，诸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举兵清君侧的权力。

明初分封诸王时，护卫军士人数尚少，仅供侍从护卫，到洪武末年，诸王府的三护卫逐渐健全，统帅的军队越来越多。尤其建藩险要地区的藩王，战时有调遣两军作战的大权，如晋、燕二王，数次奉命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有德皆受其节制。凡遇有警，不分缓急，本国与常选兵马，均受诸王节制。朱元璋赋予诸王的军事权力，是依靠诸王监视和遏制拥有军权的边将武臣，防止地方割据或叛乱；同时担负起讨伐

朝中奸恶，藩屏王室的责任。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构成威胁，朱元璋也对诸王的兵权、行政权有所限制。朱元璋在谴责陕西都司擅自增加王府护卫谕中，阐明了地方军事机构与王府护卫互相制约的关系，指出各地藩王虽可节制封地的守镇兵，但不能削弱、分割皇帝的最高统兵权；藩王有监视地方臣民的权利，但不能直接管理地方民政、财政等事务；王府范围以外封国地区，均由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管辖。即“列爵而不临民，分封而不赐土”。

另外，朱元璋怕诸藩王之间相互勾结，对其往来亦加以限制，诸如三年一见，五年、十年一见等规定。又如，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明确规定，王府官吏任满黜陟，俱取自上裁。到洪武二十八年，在颁行《皇明祖训》时，又重申了这一规定。其目的在于把宗室内部的关系纳入加强中央集权的轨道上来，不致因诸王权力过大而酿成祸乱。

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规定了诸王俸禄：亲王每年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郡王每年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郡王之子，凡年满十五，每位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免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世守永业。到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以子孙繁盛为由，对诸王的俸禄作了调整，规定亲王每年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又规定，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每年俸禄比始封郡王减半。并将以上规定载入《皇明祖训》中，强调这一定制永不改变。

朱元璋以其开国皇帝的身份，崇高的威望和影响，能够驾驭诸王，而后来皇位的继承者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建文帝即位后，采纳了黄子澄削夺诸王权力的建议，结果燕王朱棣大兴“靖难”之师，推翻了建文帝朱允炆夺得皇位。永乐年间，明成祖对留在南京的亲王采取抚慰政策，并招回在藩的亲王，以叙亲情

之谊。随后，恢复了被废诸王的爵封，赐以钞币金银。同时，又提高了诸王以下将军、中尉的品级，取得了诸王对朱棣政权的支持。待政权巩固之后，明成祖开始对分藩制度进行了改革。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把谷王由宣府改封长沙，宁王由大宁改封南昌，将他们的护卫军士，从三护卫削减成为一护卫。通过移边塞诸王于内地等措施，达到削减护卫军，削弱藩王势力的目的。而驻守内地的藩王，则以征调防边，或以比试等名义，对其护卫予以削减。有的藩王看出朱棣的用意，便主动交出护卫，如周王橚和楚王桢。诸王的护卫逐年减少，基本上只保留一护卫，有的只留二三百人或三五十人。

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朱棣令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就地镇守。同年八月，令左都督刘贞镇守辽东，都司属卫军马听其节制。又令何福佩征虏将军印，充任总兵官，镇守陕西、宁夏等处，节制陕西都司、行都司、山西都司、行都司及河南都司官军。以西平侯沐晟镇守、节制云南。通过赋予这些镇守的武将兵权，削夺了该区诸王对军队的节制权。北京虽有赵王高燧驻所，仍派靖安侯王忠前往节制诸军，又在京师建立三大营，朝廷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朱棣的这些改革，基本上改变了洪武末年由诸王节制武臣，指挥军队的局面，将军事指挥权归于都司卫所和边将武臣手中直接听命于朝廷，达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同时，明成祖重申了不许诸王擅役军民吏士的规定，不属藩王职权范围内的事，一律不准过问，进一步削弱了诸王的权力。

明代诸王分封制度经过朱棣的改革，基本上改变了洪武末年因诸王权力过大而导致的尾大不掉的局面，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王德全）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27、卷 44。

《太祖洪武实录》卷 51、卷 71、卷 103、卷 104、卷 139。

《明史稿》卷 108。

《皇明祖训》。

《明经世文编》卷 212。

《明史》卷 116、卷 118。

《太宗永乐实录》卷 10、卷 11、卷 120。

靖难之变

朱元璋以其一代雄才，由一破产农民，乞食游僧，起兵濠右，扫灭群雄，夺得天下。以后，为保持朱氏王朝一统天下及同元朝残余势力作斗争，在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同时，又鉴于宋、元两代皇室孤立，宗室衰弱，朝廷一旦有事，宗室无力支援这一历史教训，决定分封诸王。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先后三次把他二十四个儿子中（太子朱标除外）的二十三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如洪武三年四月分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洪武十一年，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朱元璋在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防线上，择其险要地区封了九国，即燕国、宁国、辽国、晋国等。这些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极高。《皇明祖训》规定，亲王护卫兵归亲王直接调遣指挥；遇有急事，亲王封区内的卫所守镇兵也一并归亲王指挥。这一规定使亲王成为地方的军事代表。在诸王中以宁王、晋王、燕王的势力最大。史载，宁王有甲兵八万，战车六千。“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特别是燕王朱棣，因屡次率兵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功名显赫，连公侯大臣均伏而拜谒，无敢钧礼。这样，朱元璋一方面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把子孙分封到各重要地区世袭镇守，形成比元代行中书省权力要大得多的半独立政权。从汉代以后，还没有权力如此巨大的封国。这和加强中央集

权的政策，形成十分矛盾的现象，其发展趋势必然要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安全。就在分封诸王的初期，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书指出：列土分封，使诸侯各有分地，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造成割据形势，并以汉初的"七国之叛"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为借鉴，警告朱元璋。但朱元璋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大骂，并将叶伯巨抓来囚死狱中。自此以后，百官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论封藩之事。矛盾的爆发比叶伯巨的估计还要快，并没有经过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不久就出了乱子。

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太子朱标病亡。朱元璋只好立朱标之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已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即位后，几位年纪较大的宗王由于久经战阵，屡建战功，他们手中又握有重兵，更不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建文帝放在眼里，故违法之事不断发生。特别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智勇有大略"，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在王宫中私制兵器，偷印宝钞，招兵买马，搜罗异人术士，对中央政权造成极大威胁。建文帝见此状况，就和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计谋，认为燕王蓄谋已久，仓猝难图，决定先削周、齐、湘、代、岷诸王，剪除燕王手足，然后再削燕王。于是废周王朱橚及岷王朱楩为庶人，幽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榑于京师。湘王朱柏被逼自焚而死。建文帝还在北平周围部署兵力，准备袭燕。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以谢贵为都指挥使，在北平城内监视朱棣的动静。朱允炆又命都督宋忠率兵三万及燕府护卫精锐屯开平。命都督耿瓛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燕王朱棣在僧道衍（姚广孝）的策划下秘行对策，"练兵后苑中"，"日夜铸兵器"。朱棣还"佯狂称疾"，当张昺、谢贵到王府去察看时，朱棣在盛夏时节还围着火炉，颤颤抖抖地说"寒甚"。在宫中行动时也扶杖而行，以欺骗朱允炆的耳目。

建文帝朱允炆部署停当后，于建文元年（1399 年）六月，密令张昺、谢贵动手。同时又密敕原来为朱棣所信任的北平都指挥张信逮捕朱棣，但张信却把建文帝的策划告诉了朱棣。当时北平满城都是谢贵所统率的军队，而朱棣王府的护卫精锐军士都被调到开平，形势对朱棣极为不利。朱棣决定先擒杀张昺、谢贵，除掉统兵将领。于是将张昺、谢贵骗到王府，在酒席间擒杀。围王城的将士听到将领被杀，皆溃散，朱棣命张玉、朱能等率兵乘夜夺了九门，控制了北平。早在朱元璋在世时，怕权臣擅权，规定地方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朱棣以此作为起兵反抗的借口，使自己的举兵反抗名正言顺，并称此举动为"靖难"，即清除皇帝身旁的祸难之意。

朱棣起兵后不久，就攻占了居庸关，又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很快扫清了北京的外围。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之后，劲卒宿将已殆尽，至使朱允炆在满朝文武中竟找不到真正领兵作战的将帅来，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伐燕王。建文元年八月，师至真定，在滹沱河为燕军所败，只好退保真定，坚守不出。朱允炆听到耿炳文兵败，又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李景隆为大将军取代耿炳文。李景隆本是膏粱子弟，素不知兵，朱棣得知他为大将军非常高兴。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溃散士卒，并调各路军马共五十万，进抵河间驻扎。燕王侦知李景隆军中的一些措施布置后，笑着说"兵法有五败，景隆都犯了。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这是第一；北平早寒，南卒皆穿布衣，不能披冒霜雪，而且军无余粮，马无足草，这是第二；不量险易，深入趋利，这是第三；贪而不治，智信不足，气盛而刚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这是第四；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喜欢阿谀奉承之辈，专任小人，这是第五。这五败九江（李景隆小字）全犯，他必败无疑。"为了引诱李景隆深入，朱棣就叫姚广孝协世子朱高炽防守北平，

自己则率军援永平，这时围攻永平的江阴侯吴高退保山海关，朱棣率军又直向大宁，大宁乃宁王之土地，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起兵后，就想把它合并过来，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朱允炆怕宁王与朱棣合兵，下令削除宁府的三护卫，朱棣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袭取大宁的好机会，遂由刘家口直奔大宁。十月，合并了大宁宁王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收编宁王的精锐八万人，到这时才回师救北平。

李景隆听到朱棣去大宁，遂率兵进攻北平，燕王故意撤卢沟桥守兵，诱李景隆深入。十月，李景隆驱兵直抵北平城下。朱高炽严密布置，拼死守卫。李景隆军队虽多，面对坚城，却无可奈何。南军中唯有都督瞿能勇敢善战，他与两个儿子率领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锐不可挡。但是，后援不至，只好勒兵以待，李景隆又怕瞿能得了头功，派人阻止，要他等大军全到，一起攻城。燕军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连夜提水泼到城墙上，天寒结冰，第二天，南军无法攀城攻击。李景隆几次攻城，皆被击退，遂屯兵于城下，结九营于郑坝村。十一月，朱棣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城内燕军亦出击，内外夹攻，景隆不能抵挡，乘夜逃跑。第二天，士兵听说主帅李景隆已跑，及弃兵粮南奔。李景隆兵败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允炆问黄子澄，黄子澄却隐瞒实情，谎称：交战屡胜，因天寒，暂回德州，等来春进发。黄子澄还派人告诉李景隆隐瞒战败情况，勿奏。朱允炆在这些臣僚的蒙蔽下信以为真，加李景隆太子太师，予以奖励。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会武定侯郭英及安陆侯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以都督平安率精兵万骑为前锋。燕军方面，朱棣令张玉领中军，朱能领左军，陈亨领右军，为先锋，丘福领步骑继之，马步十余万，双方会战于白沟河。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前锋平安和都督瞿能父子率军数败燕兵，燕兵右军主将陈亨被平安所斩。但南军不能把握大好形势，兵虽多于燕兵数倍，但

将帅不专，政令不一，当取得胜利时，不能乘胜扩大战果，在遇到挫败时，又不能及时部署兵力阻遏燕军的攻势。所以在南军主将瞿能父子战死，平安所部被燕军朱能所败后，便溃不成军，燕兵又乘风纵火，烧其营垒，郭英、李景隆等溃逃。将士被斩首及溺死者有十多万人，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只单骑逃往德州。五月，李景隆又自德州逃到济南，燕军追到济南，又败李景隆所率残部十余万人。到这时，朱允炆才感到李景隆的无能，便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擢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

建文二年九月，朱允炆又命盛庸率军北伐，以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十月，燕军破沧州，俘虏了徐凯、程暹以及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等。十二月，燕军进入山东，至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南军主将盛庸与铁铉于东昌誓师励众，检阅精锐，背城而战。这时，燕军屡胜轻敌，进至东昌，轻敌冒进，结果被打得大败，朱棣的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也被围。后来朱能率援军赶到才得以突围。建文三年二月，朱棣又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败盛庸、吴杰、平安的军队，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河北郡县多为朱棣占领。建文四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济南为铁铉驻守，城坚难破，燕军只好绕过济南，连破东河、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四月，燕军进抵宿州。平安率军跟踪至肥河，袭击燕军。总兵何福率军列阵十余里，沿河向东挺进，徐辉祖又率军前来支援，与燕军大战于齐眉山。结果燕军损失惨重，骁将王真、陈文、李斌以及都督韩贵皆战死。又逢暑雨连绵，道路泥泞，燕军士兵多不习惯，且又疾病流行，形势对燕军极为不利。当时两军就在肥河相对峙，朱允炆错误地认为燕军就要北归，京师不可无良将，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刻，竟下令把徐辉祖所统领的军队撤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燕军抓住战机，全力攻何福军，破灵璧，南军大败。何福单骑逃走，平安及

陈晖、马溥、徐真等三十七人皆被擒，文臣宦官在军中被执者一百五十余人。自灵璧之战后，燕军士气大振，南军益衰。不久，朱棣率军直抵扬州，连克高邮等地。到六月初三日，燕军自瓜州渡江，这时南军已毫无抵抗能力，十三日燕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开门迎降。朱允炆不知去向。不久，朱棣于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这就是明史上的“靖难之变”。

朱允炆采取的削蕃政策，这对巩固中央集权是有利的。但他所重用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是一群不懂军事、不会打仗的文弱书生。建文帝本人又优柔寡断，他们虽高喊“削藩”，但又不作相应的军事部署，当耿炳文受挫折时，却任用了一个纨绔子弟李景隆去统帅大军，至使朱允炆的几十万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李景隆断送殆尽。而朱棣久经沙场，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所统帅的军队愈战愈强，铸定了以后战争胜利的基础。

朱棣进入南京后，就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朱允炆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连方孝孺这种文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除灭九族外，连朋友门生全被牵连，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而死者不可胜计。其他如齐泰、黄子澄、景清等也都被抄家灭族。

此次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历时四年，它给明初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14、卷 15、卷 16、卷 17。

《明史》卷 116。

郑和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人。出身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祖、父都曾先后到过麦加圣地朝圣，皆被尊称为“哈只”（意即巡礼人）。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率军攻入云南，年仅十二岁的郑和被俘，后被辗转送入燕王朱棣府中。“靖难之变”中，郑和侍从军中，参与战事，屡立战功。朱棣登基后，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他就改姓郑。他长相魁梧，博辩机敏、“资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① 深得成祖的信赖，是成祖的心腹之辈。

永乐初年，国内外局势都不太安宁，朱棣以武力夺得帝位，建文帝的遗臣或公开反抗或消极抵制，同时，建文帝下落不明，谣言盛传他避难海外。东南沿海残存的反明势力依然活跃，南洋各国对待明朝阳奉阴违，西北兴起的帖木儿帝国虎视眈眈。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远慕唐宗宾服四夷之盛。”② 他当然希望能尽快打破这样一种僵局，希图在他临御之年中国出现一种天下太平、万国咸宾的盛世，因此，他“锐意通四夷”，③ 积极遣使出使诸边各国，同时，亦积极准备，大力修造舰船，为大规模的海外出使作好准备。

---

① 袁忠彻：《古今识鉴》卷8。
② 何乔远：《名山藏》卷102。
③ 《明史》卷304。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终于在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朱棣命令郑和组织船队下西洋。不久，郑和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大船六十二艘，再加上一些中小船只共二百零八艘，与王景弘等一同率领，浩浩荡荡，绵延数里，驶离苏州刘家港，向福建长乐县五虎门港进发。随队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其中有官员使节、军事部卒、诸多的水手船工及各色技工，如火长（负责罗针）、碇手（司舵）、军匠、民匠，还有担任翻译的通事费信等人，以及医生、伙伕、书算等等。船有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等种类，其中，宝船大的长44．4丈、宽18丈，中型的长37丈、宽15丈，是运载货物的；粮船长28丈，宽12丈，仅次于中号宝船；水船是专门积贮运载淡水的船只；战座船是以运载官兵为主的座船；护卫船队是防止海盗袭击的。船有“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名称，船队都有系统的编号，利于航行，便于统一指挥。船队满载粮食、淡水、盐、茶、酒等日用品，以及用于贸易的瓷器、丝绸、织锦、铜钱等物品，由闽江口五虎门出海，借海上信风之助，扬帆踏上下西洋的征途。

船队首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对其国王宣读诏敕，并对其王、妃、臣、僚赏赐物品，以后每到一地首先都得如此。暂短停留之后，顺风驶行二十昼夜，抵达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时为永乐四年六月，正碰上爪哇西王都马板与东王孛令达哈互相攻杀，东王战败被杀，国亦被灭，郑和船队正在东王国土内进行贸易，有一百七十人被西王兵所杀，郑和获知后，本想兴兵征讨，而西王遣使谢罪，成祖遂命其贡黄金六万两，以抵死者之命。永乐六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途经此地时，方追回赎金。第一次下西洋，出师就不利，但郑和弄清是误杀之后，就禀明皇帝，化干戈为玉帛，终于使之得以和平处理。

船队继续西行，八昼夜后抵达旧港（今印度尼西亚之巨港），

这里有很多华人，其中为逃避罪责而定居在此的广东潮州人陈祖义自封为酋长。再行九昼夜，抵达苏门答剌，郑和一行受到热烈欢迎，颁赐赏物之后，对其酋长宰奴里阿必丁正式举行了封王仪式，加强其与中国的联系。后又经南渤里（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上），南渤里虽只是个千户人家的小国，但国民全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是伊斯兰教徒集中的地方，又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郑和的来访，无疑加强了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横过印度洋到锡兰山（今斯里兰卡），这儿信奉佛教，既信奉伊斯兰教又崇尊佛教的郑和来访，沟通了中国与锡兰的往来。船队最后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是西洋诸国中较大的国家，为古印度半岛西岸一大商港，号称“西洋诸番之会”，[①] 郑和向国王宣读了明成祖所颁的敕书，并赐给其诰命银印，对其大臣也赠送了丰厚的礼物，密切了郑和与其君臣之间的关系，希图今后在此为船队建立交通与贸易的中转站。为纪念这次来访，郑和在此建立了一个碑亭，立石勒碑。船队结束对古里的访问后，即踏上了返航的里程，古里王遣使臣随船至中国答谢。此后，各次下西洋的宝船，均来此地，并以此为中转站。

返航途中，再经旧港，郑和想招谕陈祖义归降，但陈祖义率船偷袭郑和船队，当地有个华人施进卿事先告知了郑和，郑和将计就计，大败陈祖义，杀其部卒五千余人，并将陈祖义活捉，烧其战船十余艘，缴获七艘，扫清了这一带的海盗。永乐五年九月，成祖命设立旧港宣慰使司，由施进卿担任宣慰使，并赐印诰、冠服、文绮、纱罗。永乐五年九月初二，郑和船队返回了国内，受到成祖极高规格的嘉奖。

回国不久，即着手第二次远航的准备，永乐五年的冬天，海洋冬季信风刮起时，郑和、王景弘、王贵通等又率舰队出发了，

① 丘濬：《寰宇通志》卷118。

他们这次主要是送各国使者归国，顺便进行访问和商品货物的贸易。

先往占城，再往暹罗（今泰国）。时暹罗为一大国，它屡屡阻止苏门答剌、满剌加等国向明朝贡，郑和奉敕切责，暹罗王遣使谢罪并贡方物。这样就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宁与和平。

船队再到达锡兰的时候，郑和向这里的佛寺进行了大量的布施，包括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纻丝五十匹，各色绢五十匹，织金纻丝宝幡四对，香油二千五百斤，还有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蜡烛、檀香、金莲花等。种类之多，数量之惊人，都极为少见。并且立碑勒文，以垂后世，这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极其珍贵的一页。

船队归来时，郑和曾命令官兵到与满剌加（今马来半岛马六甲）接境的九州山采香，获得了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沉香树六株。永乐七年夏郑和船队又回到国内。

船队稍加休整，永乐七年九月又开始了第三次远航，这次有大宝船四十艘，官兵两万七千余人，其中王景弘、费信随行。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近一个月，十二月，信风大起，于是宝船就张帆出海，经过十昼夜的航行，到达占城，国王亲率臣僚前往迎接郑和船队，郑和宣读了成祖的诏谕，并把大量的礼物赏赐给国王。占城国王极其感激，把象牙、犀角、伽蓝香等特产贡给明朝。

船队到达满剌加时，郑和正式加封其酋长拜里迷苏剌为国王。原来，满剌加受制于暹罗，永乐三年，满剌加即遣使朝贡，成祖诏封拜里迷苏剌为国王，暹罗却发兵夺其印诰。这次郑和的出访，使满剌加完全获得了独立。同时谴责暹罗的强横，告诫它不可欺寡凌弱。满剌加在明朝的支持下赢得了独立，国王拜里迷苏剌对明朝极其感激，不仅允许郑和船队在这儿建造储存货物的仓库，使这儿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又一个中转站，而且当永乐九年

五月，郑和一行启程回国时，国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臣僚一共五百四十余人，随同来中国朝贡，受到成祖极其热烈的欢迎。自此以后，一直到1511年葡萄牙人入侵以前，中满两国始终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第三次抵达锡兰的时候，与其国王阿烈苦奈儿发生了激战。事实上，第二次出使归国后，又匆匆踏上第三次的征途，与想解决锡兰国王的“负固不恭”有关。锡兰一带是郑和下西洋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但国王“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①] 郑和第一次出使锡兰，就深感国王崇祀外道，不敬佛法。第二次又颇觉其蛮横。此次抵达锡兰，郑和照例对阿烈苦奈儿进行赏赐，宣读诏书。但阿烈苦奈儿却让其儿子纳颜向郑和勒索金银宝物，郑和不允，于是就发兵五万企图夺掠宝船，郑和沉着应战，出奇兵三千，攻入其防备空虚的王城，活捉国王阿烈苦奈儿并其家属。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郑和由海外返京，将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献给朝廷发落，明成祖还是对他以礼相待，后成祖命礼部立阿烈苦奈儿的亲属耶巴乃为锡兰国王，并将阿烈苦奈儿遣送回国。

郑和下西洋前三次最远都只到达古里，于东南亚及南亚一带活动，解决这一带的矛盾，打通航道，谋划建立贸易中转站，为此后更进一步的西航作好准备。

第三次远航后，在国内休整了一年，永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祖命令郑和进行第四次远航。为此，郑和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寻求通事，他亲往西安礼聘大清真寺的掌教哈三，随行的通事还有马欢、郭崇礼。军人有唐敬、林子宣、王衡、张通、刘海、胡复、陆通、马贵等。永乐十一年冬开始远航。这次所经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柯枝（今

---

① 《明成祖实录》卷77。

印度柯钦)、古里、阿鲁、彭亨(今马来西亚东部)、急兰丹(今马来半岛上)、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南的岛上)、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位于今肯尼亚境内)等。

航行到苏门答剌时，苏门答剌国内却发生了内乱，郑和在此设有“官厂”，储存与各国贸易的物资，以及船队所需的各种备用物品，其内乱严重威胁着郑和官厂物资的安全。在此之前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被孤儿花面王侵掠，并中箭身亡，其儿子琐丹罕难阿必镇还很小，他的妻子扬言，如果有人能报杀夫之仇，收复失地，她情愿下嫁并共掌国政。一渔夫挺身而出，杀败了孤儿花面王。她遂践誓言，嫁给渔翁，渔夫自称老王。数年后，琐丹罕难阿必镇长大了，他暗中与部属发动政变，谋杀了渔夫，并夺得王位。渔翁嫡子苏干剌率众逃往山林，自立山寨，时常率兵攻击琐丹罕难阿必镇。琐丹罕难阿必镇遂向明朝求救，永乐十三年，郑和率大军来到苏门答剌，发兵擒获了苏干剌，解了苏门答剌国王之危。苏门答剌是郑和船队访问亚非诸国的中心交通站，从此以后，琐丹罕难阿必镇对郑和船队更加友好，并年年朝贡，使郑和毫无后顾之忧。

郑和西航途中，不断派出分䑸船队去周围各地采集香料，进行商品贸易。这次有几只船到了溜山，收买了许多龙涎香和椰子。大䑸宝船，从苏门答剌驶向锡兰，又从锡兰驶向古里，再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忽鲁谟斯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都会，这儿，宝石、金刚石、珍珠、琥珀、珊瑚、玉器以及各种毛织品，应有尽有。郑和船队一到此地，照例先宣读皇帝的诏书，然后加以赏赐。之后再进行货物贸易。

一支船队由锡兰驶往溜山，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依次访问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受到热烈欢迎。麻林国遣使随贡，并贡麒麟、天马、神鹿等。麒麟即是长颈鹿，在中国

古代，是吉祥的象征，传说只是在盛世方才出现，麻林国进贡麒麟，给京城带来了轰动。当永乐十三年七月，郑和船队满载珍珠宝石，并狮子、麒麟，及各国使臣回到国内时，满朝文武兴高采烈，明成祖亦大喜过望，认为异邦使者专程进贡麒麟，这是国势鼎盛、尧舜再世之征象。

郑和这次归来，于永乐十四年春，在南京仪门外狮子山下兴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妃宫。事实上，在第一次归来时，就在南京修建了龙江天妃庙。天妃，是中国古代的海神，郑和每次出使，都要祈求天妃保佑，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每次归来，都要感谢天妃佑庇之恩。除南京之外，还在太仓、长乐、湄洲建有天妃庙。在这座天妃宫中立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由明成祖亲撰。崇祀天妃，希求海道平安，以更加密切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往来。

休整一年多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成祖又命郑和送十九国使臣归国，经过近一年的准备，永乐十五年冬，又开始了第五次的航程，从占城到达柯枝，每到一国家即宣谕诏令，颁赐赏物，送还使臣，再行货物交易。柯枝是古代印度半岛的重要商港，郑和此次来访，正式加封柯枝国王，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立碑铭文，以作纪念，成祖亲撰碑文，宣扬其福泽四夷之思想。

由于第四次麻林贡麒麟在中国朝廷引起轰动，这次郑和出使，诸西南远国纷纷进贡珍禽异兽，忽鲁谟斯赠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进贡麒麟和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送花福禄和狮子；不剌哇送千里骆驼和驼鸟；爪哇、古里贡麋里羔兽等。这可以说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诸国贡物一大特色。当郑和船队归来之时，又给朝廷带来不小的轰动。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回到国内，有些国家的使节又随同来中国访问，其中有王子及国王宗室。

在郑和这次出访期间，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国酋长

巴都葛叭答剌、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叱葛剌马丁、故苏禄峒酋长之妻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亲属及随从头目，组成多达三百四十余人的使团，奉金镂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受到明朝热烈欢迎，明朝都加封他们分别为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并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随从头目三百余人，各有赏赐。且经常宴请，极力细心加以照顾。访问了近一个月，他们辞归，明廷再加赏赐。九月十三日，当他们途经德州时，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不幸因病去世，成祖闻讣，不胜痛悼，命以王礼祭葬，并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主祭，成祖亲撰祭文，痛悼之余，褒奖优加。苏禄三王的访问中国是对郑和出访苏禄的回访，是成祖"锐意通四夷"的结果，这是中菲友好关系史上极珍贵的一页。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成祖又命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归国，虽然休整了一年多，但由于东北季风马上就要过去，郑和只得率舰队仓促出航，这是第六次远航。此次随从人员有马欢、郭崇礼等，还有孔和卜花、唐观保、杨庆、洪保、李恺、杨敏等，十六国使臣为：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今阿曼的佐法尔）、剌撒、卜剌哇（今非洲东岸索马里之布腊瓦）、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今印度西部坎贝一带）等。每到一地例行宣谕诏令，赏赐物品。

这次出航的郑和船队中，由内官周某率领的一个分䑸前往阿丹国（今也门共和国之亚丁），阿丹国王率领大小官员到海滨迎接。阿丹是古代西亚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这儿物产丰富，交通便利。阿丹国王鼓励国民与郑和船队进行贸易，船队遂在这儿买到了二钱重的大块猫眼石、高达二尺的珊瑚树、五柜珊瑚枝，以及各色雅姑、大颗珍珠、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等珍禽异兽。

郑和则率大䑸船队抵达了祖法儿国，开读诏书，颁赐赏物后，遂同祖法儿国民进行贸易。在这儿郑和并不极力去搜寻奇珍异宝，而是着眼于乳香、血竭、芦荟、没药之类香料和药物，用中国的纻丝、瓷器去换取。

船队到达榜葛剌（今孟加拉）时，受到其国王盛大欢迎。当闻知郑和船队抵达之时，国王派一千骑兵前往迎接，王宫内左右设长廊，屋柱都用黄铜装饰。宫内亦设马队千余，国王坐在宝座上，由两个手持银杖的人将郑和一行引入，五步一呼，走到中间，再换出两个手持金仗的人导引，国王叩头跪拜迎诏书，之后，大宴郑和一行，并赠郑和等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副使则赠银制品，其余的人皆有所赠。这个场面新奇而隆重，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的崇敬之情。

永乐二十年（1422 年）八月十八日，郑和船队回到国内，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的使者。

由于前三次打通了往南亚次大陆的航道，并设立了贸易中转站，所以第四、五、六次出航就把重点放到了阿拉伯沿海及非洲东海岸，每次都极成功地完成了出使任务，密切了中国与阿拉伯及非洲东海岸国家的关系，使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达到繁盛时期，诸国使者前往中国朝贡络绎于途，真正实现了成祖的“宾服四夷”的愿望。在中外交往史上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

郑和第六次回国后休整了一年多，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正月十六日，又奉命出使旧港。因为当时施进卿已死，郑和之出使就是为了处理旧港宣慰使的继承问题，命施进卿之女施二姐承袭，使旧港的局面又得以巩固。

在郑和出使旧港之际，成祖崩逝了。其长子朱高炽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八月十五日登基，就在这天，朱高炽下令停止下西洋的活动。郑和从旧港回国，朱高炽就命令他与王景弘等率领下西洋的船队及官兵为南京守备。仁宗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

就病死了，他的长子朱瞻基于宣德元年（1426 年）即位，对待郑和等，依然维持仁宗时的命令。

宣宗朱瞻基还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他最初即位的几年里，由于下西洋的活动被罢止，海外诸国来朝贡者日益见少，与中国的关系渐渐疏淡，明朝在海外的影响日益低落，但他经历过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世，于是决定再次组织下西洋的船队。宣德五年六月九日，宣宗任命已年近六十的郑和再次出使西洋，于是郑和又肩负重任，迅速组织起一支庞大的船队。

宣德五年（1430 年）闰十二月初六日，船队从龙湾（今南京下关）开航，二十一日到达刘家港。这次出航，除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二人外，还有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宝、杨真、张达、吴忠等七人，都指挥朱真、王衡，通事马欢、费信、巩珍、郭崇礼等。率领大型宝船六十一艘，共两万七千五百五十人。在刘家港，驻留一个多月，修建了天妃宫，宣德六年春，天妃宫成，郑和撰《通番事迹记》，刻石立碑，刊于天妃宫内，记下了他们前六次出使的历程，并乞求天妃保佑这次出使平安。宣德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重修天妃宫殿宇，并立石刻《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以作纪念。在此逗留了八、九个月，一方面等候季风的到来，一方面为下西洋做进一步的准备。在出发前，为祈求下西洋之平安，郑和又亲到天妃林氏女家乡福建湄洲岛，整修天妃宫庙宇，对天妃海神进行祭祀。

这次下西洋，主要访问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苏门答剌、剌撒、溜册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

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船队驶出五虎门，踏上了第七次下西洋的航程，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占城，次年二月六日到爪哇，七月初八日到满剌加，送回满剌加国头目巫宝赤纳。由于

郑和下西洋停航很久，暹罗国又屡屡侵扰满剌加，使得他们之间矛盾又尖锐起来。从满剌加又前往暹罗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对暹罗的做法加以指责，郑和为调解两国的关系，往返于暹罗与满剌加之间，忙了近一个月，才又继续西航。八月十八日，到苏门答剌，便道往阿鲁、那姑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进行访问。十月十日从苏门答剌开船，途经翠兰屿（今孟加拉湾东南部尼科巴群岛），传说释迦牟尼途经此地，沐浴之时，被人偷走袈裟，他遂设誓：此地以后如有人穿衣，皮肉皆会烂掉。于是此地居民皆不着衣。在此停留三天之后，派分䑸前往榜葛剌国，大䑸宝船驶向锡兰山，十一月六日抵达锡兰山别罗里。四天后，又派分䑸到溜山国，郑和率大䑸船队驶往古里、忽鲁谟斯，沿途经过小葛兰、柯枝等国，之后又派人从柯枝到甘巴里、加异勒等国去访问，进行晓谕。十一月十八日又由洪保率分䑸前往古里，在古里，洪保又遣通事等人前往天方国（今麦加）。天方国是著名的伊斯兰教大国，是穆罕默德最先传教的圣地，每年从世界各地来此朝圣的教徒众多，这里建有一座雄伟壮丽的清真寺以供礼拜。这座清真寺又叫礼拜寺、天堂。船队在这儿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了天堂图即清真寺的写真画本带回国内。郑和则率大䑸宝船驶往忽鲁谟斯。在此逗留五十余天，于宣德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启航回国。

宣德八年三月十一日返回古里。就在船到古里时，郑和因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在古里病逝。[①] 一代伟大的航海家就这样以身殉职了。在古里逗留九天后，王景弘代行郑和之职，率领船队于宣德八年七月六日抵达南京。自此以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就停止了。

郑和七下西洋，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从第一次出使

① 参见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第334页。

到第七次归来，持续二十九年，行踪遍及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先进的船舶，高超的航海技术，本着和平友好的目的，出色地完成了出使的任务，影响极其深远。迄今，在南洋各地到处都有以郑和（三宝）命名的地名、庙宇，三宝寺、三宝庙，至今依然香火缭绕，很多人顶礼膜拜，以纪念这位杰出的航海家。

（孙卫国）

参考书目：

《明史·郑和传》。

马欢：《瀛涯胜览》。

费信：《星槎胜览》。

巩珍：《西洋番国志》。

《明成祖实录》。

《明宣宗实录》。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6年6月版。

设立努尔干都司

奴尔干，清人称为尼噜罕（满语为图画的意思，表示这里山川景色美丽如画）。元朝曾经在这里设征东招讨使，管理和征收骨嵬部（库页岛）的军赋。十四世纪五十年代又在敦敦河口的哈儿分之地，建立了“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统属于黑龙江下游的兀者、乞列迷等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多次派遣官员到这里进行“招抚”。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明太祖朱元璋经营东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经营和管理。永乐元年（1403 年），明朝政府派官员往谕奴尔干，至吉（乞）列迷诸部招抚，获较大进展，次年，各部头目相率入京，表示归附。明朝政府在此设立了奴尔干、建州等十卫，任命把剌答哈做奴尔干卫的指挥同知等官，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被任命为指挥同知等职，并赐诰印官带袭衣。明政府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管理，从永乐元年（1403 年）到永乐七年（1409 年）在斡难河、黑龙江流域南北地区，以及松花江、乌苏里江、格林河、亨滚河等流域，设置了 132 个卫。于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诸首领相率归附。至此，明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事业。

永乐七年（1409 年）奴尔干官员忽剌佟奴入朝，奏请在奴尔干地区设立元帅府，明政府获准这一奏请，决定于当年四月设置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尔干都司），任命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永乐九年（1411

年）春，明朝政府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顺黑龙江而下，护送康旺等官员赴任，直至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正式建立了奴尔干都司，成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奴尔干都司设立后，明朝政府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又陆续建立了不少卫所。至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 年）建卫共一百八十四个，千户所二十个。到万历年间，共有卫所三百八十四个，千户所二十四个。政令所行西起斡难河（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东北达库页岛。仅就黑龙江南北地区卫所来讲，就有六十七个之多。设在斡难河以东，嫩江以西，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和黑龙江上游南北地区的有：斡难河卫、卜鲁丹河卫等十四个卫所。沿精奇里江设立的有脱木河卫、古里河卫等五个卫。精奇里江是黑龙江北的支流，那里经过二百多年的垦种，沿流域出现了一些从事农耕的村屯，如博和哩屯、吴鲁苏屯、黄河屯（海兰泡）等，这就是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在黑龙江城以东，到与松花江交汇处附近地区的卫所有可令河、木鲁罕山、哈喇察、兀喇卫等九个卫。以库鲁河为中心（伯力附近）设立了乞勒尼、忽鲁木、喜申、古鲁、亦儿古里等五个卫。沿敦敦河设立了撒儿忽、哈儿分等四个卫。沿格林河设立了葛林、忽石门、卜鲁兀等五个卫。沿亨滚河（黑龙江北岸支流）设立了饮真河、满泾、朵儿必河等七个卫。从黑龙江口到库页岛设立了奴尔干、兀的河、和囊哈儿、波罗河（两个卫在库页岛上）四个卫。在乌苏里江东部地区，还设了克默而河、亦麻河、失里、恨克、双城（苏称乌苏坦克斯克）等十四个卫。这六十七个卫，现在在我国国境外的就占四十九个，鸦片战争前均为我国领土。

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直属明朝中央政府，是军政合一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设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佥事等军政长官。明成祖朱棣时，都指挥使空缺，以都指挥同知为最高长

官，到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 年）正式晋升康旺为都指挥使，其下设有办事机构经历司。平时，总有二百名至五百名驻防军驻守都司所在地。有事时则增派军队。如宣德二年，增派官军三千人。宣德七年（1430 年），康旺年老辞职，由康福接任，明宣宗派内官亦失哈率官军二千，巨船五十，护送康福上任。可见明朝政府对奴尔干地区的重视。都司以下设卫，卫所的官员一般是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明中央政府选拔部族首长，族目授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由明朝中央政府颁发委任状加以任命，并发给印信和袭衣（明朝官员的服装）。他们既是各族的首领，又是明朝的地方官吏，从而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奴尔干都司辖区的人民，和内地人民一样，均要向明朝政府缴纳赋税。他们一般缴纳当地的土特产，如：海青、大鹰、鼠雕、白兔、黑狐、貂鼠、阿胶、海豹皮、海獾皮、殳角（海象牙）、鲸须、好刺（各色鹿）、马、失刺孙（即土豹）、金钱豹皮等。各个卫所的官员和内地的地方官吏一样，绝对服从明朝中央政府的命令、调遣。

明朝政府为了沟通从内地到奴儿干地区的交通，在其境内设置了东西两条驿站线路，以便于传送文件，运送官兵等。一条是"海西东水陆城站"，自海西底卡失站（今黑龙江双城县西，拉林河畔花园屯古城），向东北沿松花江而下，直到黑龙江下游奴儿干都司治所附近的满泾站。这条驿站线路连接了五十多个城站。另一条叫"海西西陆路"，从肇州起，经松花江、洮儿河往西直到兀良河（今满洲里附近）。而且这两条驿站路线又连接了辽宁省东都司辖境内的驿路，这样，就使地处边陲的奴儿干都司，与明王朝心脏地区京师的交通畅通无阻。明朝政府还在驿站经过的地区征调劳役、畜力，设置站丁、站狗。为了运输的需要，明朝政府还在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松花江畔建立船厂制造船只，加强了奴尔干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在创建和经营奴尔干都司的过程中，亦失哈、康旺等人功劳不小，亦失哈是钦差大臣，康旺、王肇舟属封疆大吏，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筹建，直到建成并受命管理和经营，他们经历了全过程。亦失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巡视，在二十多年中，他先后赴奴尔干地区巡视达十次以上。他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采取柔化抚恤政策，使奴尔干都司所辖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明朝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永乐五年（1407年），纳木河等地部落的首领到京师朝贡的达三百人。永乐十年（1412年）奴尔干等处部族头目到京师朝贡的有七十八人，可以这样讲，亦失哈、康旺、王肇舟等人在从事东北边疆经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当时奴尔干都司的治所特林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竖起了两块石碑，一块是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所立，碑上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块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所立，碑上刻有《重建永宁寺记》。此二碑记，记载了明朝政府经营和管理奴尔干都司的经过。两块碑文均用汉文、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四种文字书写。碑文中涉及的官员，有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证明奴尔干都司是明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永宁寺现虽已不存在了，但这两块石碑曾经巍然挺立在原址长达五百年之久，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朝政府曾派官员曹连杰到当时已被沙俄侵占的黑龙江口北岸等地区去探察，他到特林时，俄国人已把永宁寺改建为东正教堂，但这块永宁寺碑仍在原处竖立。这是我国明朝政府管理奴尔干地区的历史见证。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太宗实录》卷26、卷40、卷45、卷48、卷62、卷63、卷64、卷84、卷131。

《大明一统志》卷 89。

万历《明会典》卷 108。

《明宣宗实录》卷 31、卷 90。

《永守寺记》。

《辽东志》卷 9。

迁都北京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朱元璋攻克太平，陶安率众出迎，提出攻取金陵（南京）以为帝都之策。此后谋士冯国用、叶兑等人也先后向朱元璋提出定都金陵的建议。朱元璋遂采纳这个建议，以金陵为国都，改称应天，筑新宫于钟山之南。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北伐南征，不久即统一了全国。

全国得以统一，都城却一直未最后确定。洪武元年攻下汴梁后，朱元璋亲去视察，认为地理位置适中，于是模仿古代两京之制，八月宣布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部纳入版图，有人认为关中险固，应建都于长安；有廷臣认为洛阳为全国中心，理当作为都城，亦有人提出开封（汴梁）为宋朝旧都，漕运方便；还有的提出北平（元大都）可省营造费用，因为其宫室完备。诸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朱元璋则一度想以临濠（濠州）为中都，并大兴土木，因刘基反对而罢。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才下诏改南京为京师，使都城问题暂时得以解决。

当时北元势力依然很大，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明代的西北边防。为了抵御北元，朱元璋依然想迁都西北。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视西北。皇太子朱标回京后献陕西地图，上言经略迁都方案。次年四月，朱标即病故，迁都之事又只好搁置。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建国于北平，与在西安的秦王、在太原的晋王共同抵御蒙古。朱棣在北平经营自己势

力，后来经过“靖难之役”，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入主南京。

永乐元年（1403 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就提出改北平为北京，得到成祖的应允。二月，设置了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派郭资、雒佥等为北京行部尚书。北平是朱棣发迹的地方，又是抵御蒙古的重镇，朱棣遂大肆营建。

为了给朱棣北巡作准备，永乐四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派尚书宋礼往四川，侍郎古朴往江西，师逵、金纯往湖广，副御史刘观往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往山西，分别采办木料砖石，大力修造宫殿。永乐七年，朱棣登极后首次巡北京，以经营北京边防为目的，在北京则设置了行在六部、都察院，以夏原吉署行在礼、兵二部及都察院的长官，礼部尚书赵羾署行在刑部、兵部侍郎等。遂在北京开始另组一套机构。同时派人为其在北京择陵地，就在这一年开始了长陵的营造。永乐七年六月，设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镇安、怀来、宣城、宁国、威远、德胜诸卫，以加强北京外围的军事防御能力。所有这些无不显示着朱棣要迁都北京的决心。

为了确保北京经济的发展，自永乐元年开始，就徙江南富户以实北京。永乐元年，徙南京、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次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三年再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以充实北京之宛平、大兴诸县。同时，为了确保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永乐九年二月开始，派工部侍郎宋礼主持疏浚淤积的运河，四个月后，会通河工程告竣，齐、鲁段的运河得以畅通。后来又派平江伯陈瑄疏浚了江、淮间的运河，于是南粮经过漕运至北京，保证了北京等处的粮食供给。

永乐十三年十一月，朱棣召集群臣商议营建北京，正式宣布迁都北京的计划。

宫殿规制完全按照南京旧制，由宦官阮安负责规划，工部负

责营建。从全国各地调集民夫，采办木材、砖石。永乐十八年，皇城、宫殿、坛庙等巨大建筑基本竣工。明成祖遂宣布于次年将北京行在改为京师，但遭到了一些官吏的反对。最早提出反对迁都的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朱棣颇为生气，下令将他们贬到均州太和山去作佃户，以之杀一儆百，使反对派不敢有异议。于是，永乐十九年正月起，朱棣正式将宫廷及百官迁到北京，并且下诏大赦天下。北京遂正式成了明代都城。

朱棣自永乐四年起就下令改建、扩建北京城，其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照南京城的形制，重新规划、精心设计的。首先，拓展南城，形成北京的外城，全城共有城门九个，南墙有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墙有朝阳门、东直门，西墙有阜城门、西直门，北墙有德胜门、安定门，九门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明中叶以后，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守，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在外城的南郊加修了一个外罗城。原外城南面的城区就被称为内城。

内城里面有皇城，在皇城正南门——承天门（即今天安门）东侧修建了太庙（皇帝祭祖的庙堂），在西侧修建了社稷坛（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

紫禁城在皇城里面，是皇帝居住的禁地。紫禁城里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构成其中心。奉天殿，嘉靖四十一年改称皇极殿（清朝称太和殿），俗称金銮殿。皇帝登基、大婚、册立皇后等重大典礼在这里举行。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等重大节日，皇帝在这里受百官朝贺并赐宴群臣。过了奉天殿就是华盖殿，其呈方形，殿内也设有宝座、金鼎、薰炉等。皇帝去奉天殿举行大典前，在这里稍事休息，并接受典礼中执事官员的朝拜。华盖殿后边则是谨身殿，皇帝常在此赐宴外藩王公。

从谨身殿往北，便是紫禁城的内廷，谨身殿后面便是乾清门，此门是外朝与内廷之间的分界线。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和

坤宁宫为中心，俗称后三宫。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后三宫的东西两侧，也各有一大组建筑群，为众妃嫔居住和活动的场所，称为东六宫和西六宫。

从奉天殿往南则是奉天门，皇帝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裁决政务。出了奉天门，跨过金水桥（五座横卧河上的汉白玉石桥），即到了紫禁城的正南门——午门。遇有大规模出征或凯旋等仪式，皆在此举行。

整个北京城规划整齐，左右对称，设计合理。到清代，除个别地方稍有改动外，基本上完全沿袭其旧制。

朱棣虽然迁都北京了，但就在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顷刻间化为一片灰烬。于是反对迁都的人又纷纷上书攻击迁都，认为三大殿的被焚毁，这是上天的惩示。主事萧仪言辞尤其激烈，引起朱棣极端的不快，他下令将萧仪处死。但并未吓退那些反对迁都的人，他们转而攻击参与密议迁都的大臣，这些大臣也想利用朱棣表态压服对方。朱棣只得命他们跪在午门外质辩。户部尚书夏原吉对此深感不安，极力从中调停，并主动承担责任，方将此事渐渐平息下去。朱棣在位的以后几年，一直未能将三大殿修复，遂在奉天门上朝议事。

正统年间，由蒯祥主持重建三大殿。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再次重修三大殿，耗费甚巨，仅采木一项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可见，雄伟辉煌的故宫城不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是其血汗的结晶。

成祖迁都北京，政治中心北移。然旧都南京在体制上依然没有变化，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六部、都察院等机构，这样就形成了两京。南京虽然已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还是东南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明代政治史上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京成为都城，而商品经济的重心在江南，为了保证北京粮

食物品的供给，漕运成了朝中大事，影响着有明一代的政治。同时，都城的北迁，使之处于抵御北方民族的前线，在永乐及仁、宣年间有效地防止了北方蒙古族的侵扰，有利于维护疆土的统一。但同时，也使都城时刻处于被侵扰的危险之中。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蒙古兵大举进犯，兵临北京城下，在于谦的指挥下，明朝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方才使北京转危为安。嘉靖庚戌之变亦与此颇为相似，而明末之清兵入关，攻破了山海关，也就等于掌握了北京城，并进而控制了整个局势。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太宗实录》卷210—230。

《明史·太祖本纪》、《明史·太宗本纪》。

吴晗：《朱元璋传》，1991年人民出版社版。

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编纂《永乐大典》

明代初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自立为帝，史称明成祖。明成祖于公元1403年改元永乐，人又称其为永乐皇帝。

由于朱棣“非法”为帝，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诸多臣民对此耿耿于怀，心有不平。为了稳固刚刚取得的政权，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明成祖对前朝旧臣采取了血腥镇压和加恩笼络两种方式。编纂《永乐大典》，正是永乐皇帝采取的后一种方法。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永乐皇帝为了显示其文治之功，改变其在官僚士大夫中的形象，也为了笼络前朝更多的“宿学大儒”为新政权服务，同时，也为了缓解前朝忠臣无处发泄的心理，转移人们的政治视线，使人们远离血腥的战火，并借以显示作为新皇帝的实力与由他而带来的盛世，显示文化的繁荣昌盛和政治局面的稳定，决定编辑一部超越前代的大型类书。于是，他下了一道诏谕，命令才华出众、名噪一时的解缙召集人员，把记载在各种书籍里的古今事物，分门别类，编成巨著。

解缙(1369—1415年),江西吉水人,字大绅。洪武年间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后因上万言书,批评明太祖政令屡改、杀戮太多等事而罢官八年。建文帝时再度出仕。永乐初,任翰林学士。

解缙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类书的编纂。他根据明成祖的意图,凡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经史子集及百家之言,不论天文地理之言,还是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不厌浩繁,统统辑录,务必网罗

无遗。做到包括广大的宇宙、统会古今的异同,巨细精粗,粲然明备。这样编纂类书,既有助于朝廷从中吸取历代统治者"齐政事、同风俗"施政治民的经验,又可以驱使大批官僚士大夫埋头于古书堆,穷经皓首,以度岁月,消磨年华,消除眷恋前朝的怀旧情绪。

为达到这一目的,明成祖朱棣的的确确下了一番功夫。他特意指示编辑官员解缙等人,书稿除文渊阁的藏书之外,还要广泛购募天下书籍,以期尽善尽美。因而在编纂书稿之时,除一些正统的儒学、经史子集之外,还辑录了许多对民生日用比较实用的书籍、科技方面的所谓"技艺",也有民间通行的许多古典文学著作,从而扩大了类书的适应而。

解缙等在接受任务之后,由于书生气十足,没有完全领会明成祖的旨意,匆匆征集,匆匆整理,匆匆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 年)十一月即完成任务,呈进皇帝,名曰《文献大成》。

明成祖在翻阅《文献大成》之后,觉得取材不够完备,书籍数量也未达到,于是命令解缙重修,并委派其心腹姚广孝、刘季篪等协同解缙,同为监修官。

姚广孝(1335—1419 年),初为僧人,名道衍,字斯道,长洲人。工于诗画。曾从师道士席应真,得阴阳术数之学。后以僧人入选侍燕王邸,甚得燕王朱棣欢心。建文帝继位后削藩,姚广孝为燕王谋划,劝燕王反。朱棣起兵,得立帝位。论功以姚广孝居首,拜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曾监修《太祖实录》,著作有《逃虚子集》十一卷、《类稿补遗》八卷。其诗清新婉约,颇存古风。

解缙、姚广孝通过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及四方宿学大儒、诗书饱学之士充任纂修,选用国子监及地方擅长书写的生员协助缮写。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参预其事的前后达三千余人。

为编纂这一巨型类书,解缙、姚广孝等还设立了总编辑处,其地点为文渊阁。为了让编纂者认真工作,专心用功,光禄寺还供应工作人员的早晚膳食。

当时的编辑方法摹仿宋代阴幼遇的《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这两部书的体例，依照明初《洪武正韵》的韵目，按韵分别单字。在每一个单字之下，都先注明《洪武正韵》的音义，次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又用唐代颜真卿的《韵海镜原》的方式，并列这个字的楷、篆、隶各体；然后把各类事物如天文、地理、典章、曲艺、诗文等随字收载，即所谓“用字以系事”。如天文志书，列在“天”字下，平话书籍列入“话”字，戏文列入“戏”字。当时把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整部、整编地以书名或篇名为标题，把书的内容一字不差的载入各个不同字目下。这种编辑方法，能够保存极其丰富的资料，这为后来辑录佚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经过整整四年的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书稿在永乐五年十一月编辑就绪，次年进呈明成祖朱棣。皇帝颇为满意，为书稿亲自撰写序言，并题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全书计有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其中有凡例、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余册，总计三亿七千万字多字。其工程可谓浩繁博大，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综合性类书；其搜罗之广，内容篇目之繁富，卷帙之多，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中也是名列前茅。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因卷帙浩大，未能刊印，原抄本（或称王本）最初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 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北移，藏于宫内“文楼”。后来只有明孝宗朱祐樘和明世宗朱厚熜曾经查阅过。据说明孝宗还曾命人将其中的一些药物、禁方，抄录交御医房诸医，自己还抄录了一些金匮秘方给太医院使用。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宫内失火，三大殿及“文楼”、“武楼”被焚，经嘉靖皇帝督促抢救，《永乐大典》总算免遭厄运。嘉靖皇帝得此教训，担心孤本日后再遭意外，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命廷臣徐阶、礼部侍郎

高拱等组织人员开始摹写一部新写本，称之为副本。隆庆元年（1567年），副本誊写完毕，和正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因屡测日蚀时刻不准，徐光启奏请选刻《永乐大典》的记载日蚀的部分，这是明代唯一的《永乐大典》的单行本。有一明代，《永乐大典》成为深藏宫内的秘典，束之高阁，一般士人不得披览研讨，因之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明亡之际，文渊阁再次焚毁，正本因失火而毁灭。清雍正年间，副本已成了孤本，移藏于翰林院，从此，一些学士和编修官员才有机会看到。到乾隆年间，清政府为编辑《四库全书》，便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据记载，其中有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十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合计达四千九百二十六卷。有不少宋元以来亡佚的图书，正因为有了这部《永乐大典》才得以保留，得以重刊流行。

但是，到了清朝后期，清廷腐败无能，《永乐大典》管理不善，不断被窃失落。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和光绪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的肆意掳掠，使《永乐大典》遭受空前的浩劫，或则被焚毁，或则遭抢劫，几乎丧失殆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多年的积极搜集和整理，共获得《永乐大典》原本二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本，合计得七百三十卷，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古代文献资料。

《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内容丰富，辑录了古代许多文化典籍，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充实的颇有价值的资料，也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古籍。其次，作为一部类书，它在规模的宏大、内容丰富、卷帙的浩繁、体例的创新等方面，都远远超越前代的类书。它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水平。

（戴柏俊）

参考资料：

《国榷》、《明实录》。

唐赛儿起义

明朝永乐末年，山东地区水旱灾害频繁，连年歉收，许多老百姓衣食无着，只好剥树皮、掘草根为食。老百姓纷纷离家出走，流落他乡，甚至有人卖妻鬻子，以求生路。而明朝政府仍然赋税有加，毫不理会人民死活，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永乐十八年（1420 年）三月，山东益都（今青州）人唐赛儿忍无可忍，率先发动人民起义。

唐赛儿，本来是山东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自幼好佛诵经，自称佛母。

在唐赛儿自称佛母传教之初，她并无大志，只在于扩充她的门徒，其活动范围在山东的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后来她的徒众扩充到数万人之众，引起官府的注意。唐赛儿在传教过程中，自称能知道过去，通晓未来，还能用纸剪成人马，用法术驱使它们作战，深受老百姓拥戴。董彦杲等人纷纷率众投靠于她。

到永乐十八年这一年年初，官府开始缉捕唐赛儿。而唐赛儿在群众掩护下四处躲藏，并趁天灾之际纷纷组织饥民，使之成为信徒。三月，唐赛儿率五万余众占据益都卸石棚寨，作为据点，率徒众出没其间。明政府青州卫指挥高凤率兵捕之。唐赛儿率众夜间乘官军懈怠之际袭击官兵，官兵溃败，高凤战死。唐赛儿至此走上公开反抗明朝的道路。

卸石棚之捷后，起义军声势更为壮大。明政府因用兵困难，

决定采取安抚政策，派人至青州招抚唐赛儿，直隶沂卫亦派人至莒州招抚董彦杲，结果均告失败。董彦杲等率众二千余人占据莒州，并以红白旗为号，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前往招抚，董彦杲杀其从者，发誓誓死不受招安。

唐赛儿起义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明帝国当政者永乐皇帝的重视。明成祖特令安远侯柳升分兵围剿。

柳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开向唐赛儿起义军的总据点卸石棚寨，分兵层层包围。义军诈称寨中弹尽粮绝，且无水源。柳升认为水为义军亟需之物，不可让义军得到。断绝了水源，不愁义军不投降。于是柳升派大军进据有水道的东门。到这一夜的二更时候，义军大举偷袭官军，都指挥刘忠被义军杀死。直到天亮，柳升才发现义军突围而去，分兵追捕义军。义军首领刘俊等男女一百多人被俘，而唐赛儿早已突围而去。

在莒州，义军首领宾鸿等率兵攻打安丘。知县张玙、县丞马𢪸招集军队民夫八百余人，负隅顽抗。宾鸿等屡攻不克，又招集莒州、即墨一万余义军，并力攻打城池。明军都指挥卫青正在海上驻防，闻讯日夜兼程，率千骑袭击义军，城内明军亦攻出，义军大败，二千余人战死，四十余人被俘。起义军在诸城也遭到鳌山卫指挥王贵所率明军的大举进攻，全部英勇就义。至此，唐赛儿起义失败。

唐赛儿起义虽告失败，但起义军的主要首领唐赛儿、董彦杲、宾鸿等在群众掩护下得以逃脱。

没能让唐赛儿起义的首领伏诛，明成祖大怒，把安远侯柳升下狱；同时命令官兵加紧搜捕，还特命山东左参政段民专司此事。明成祖考虑到唐赛儿削发为尼，可能会潜逃藏入尼姑庵和道士观中，因而命令凡是北京、山东境内尼姑和道姑都捕捉到北京审讯。在没有结果之后，又在全国庵观中搜捕可疑者共计数万人，结果仍然没能发现唐赛儿。

唐赛儿作为一名女子，在明朝还十分强盛时期就起义反明，冲破了层层封建礼教的束缚，充分反映中国劳动妇女敢于反抗封建压迫的大无畏精神，为以后妇女反对封建压迫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戴柏俊）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明史》。

朱高煦之叛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驾崩。宣宗朱瞻基即位。被封为汉王的朱高煦乘仁宗新亡，宣宗刚立之机，于宣德元年（1426 年）八月发动叛乱，史称“高煦之叛”。朱高煦是仁宗的同母弟，为人狡诈凶悍、善于骑射，一向以雄武自负。在“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白沟河之役，高煦率精兵数千，斩南军都督瞿能父子，使得燕军反败为胜。东昌之役，张玉战死，朱棣被困，赖高煦率援军，击败了南军保护了朱棣。朱棣以高煦类己，许以事成以后立为太子。朱棣做皇帝以后，在大臣们的建议下，立朱高炽为太子，而封高煦为汉王，且封国在云南。朱高煦为此心中大为不满，埋怨说：“我何罪，斥我万里之外”，不肯到云南就藩。永乐时，朱棣数次率大军击征蒙古，皆留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永乐十年（1412 年），高煦阴结朱棣左右的官员勾陷朱高炽，在高煦的谗间下，朱棣几次想要更立皇太子，赖东宫官属杨士奇等的保护，加上皇太孙朱瞻基深为朱棣赞赏，朱高炽的太子位得以巩固。高煦自留南京后，又要求为自己增加了两护卫的军队，并常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说：“我英武，岂不类秦王李世民乎！”看不起太子朱高炽，一心想取代之。朱棣对朱高煦的跋扈行为逐渐感到不满，永乐十三年（1415 年）五月，改封高煦于青州（今山东益都），但他还是不想走，以愿常待在成祖左右为借口，要求继续留在南京。成祖知其阴谋，没有答应他的要求。高煦到青州后，暗中招募壮士，募兵三千人，不隶籍

兵部，而且任意残害百姓，纵容爪牙劫掠，支解无辜百姓投入江中。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其爪牙，竟被高煦用手铁爪挝死。成祖得知这些情况后，把他召到南京，准备废为庶人，经朱高炽的再三求情，最后朱棣削除了他两护卫军队，又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改封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高煦至乐安，怨望更甚。成祖死的时候，他就窥测风向，蠢蠢欲动，十个月后，仁宗又死，皇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奔丧，高煦阴谋在路上伏兵袭击，因事出仓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后，他处心积虑，总想发动叛乱，夺取皇位，终于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起兵叛乱。他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领左军，千户盛坚领右军，知州朱烜领后军。诸子瞻埈、瞻域、瞻垶、瞻垿各监一军。高煦自率中军，世子瞻坦居守。部署已定，朱高煦效法其父朱棣的故伎，指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声称自己举兵是为"清君侧"。他派人暗中到北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逮捕来人，告发了他的阴谋。开始，宣宗朱瞻基准备派遣阳武侯薛禄前去征讨，杨荣极力反对，并力主宣宗亲征，杨荣说："高煦以为陛下新立，一定不会亲征。如今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宣宗又征求夏原吉的意见，夏原吉同意杨荣意见，认为先声可夺人之心，应由宣宗亲征，一鼓而平之。于是，宣宗率大营五军将士，亲征高煦。八月初十日出发，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侍扈行。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十九日前锋至东安，第二天宣宗所率大军也至东安城外。朱高煦原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于济南起兵接应，但被山东布政使与按察使阻止不得发。朱烜要高煦率精兵取南京，但护卫军士家皆在东安，不肯离家南下。又听说大军将至，未敢出，固守在东安城这块弹丸之地。宣宗朱瞻基为了瓦解叛军，两次致书于高煦，要他出城投降。不然，一战就擒，悔无及矣。城中人心瓦解，高煦手下将士甚至密谋逮捕高煦献城。高煦走投无路，又怕被人擒

献，被迫出城投降。宣宗执捕高煦父子，班师回朝，叛乱平定。高煦被执至京师后，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宣德四年（1429 年）被处死。因高煦的叛乱牵连被杀及充军的达二千多人。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27。

仁宣之治

明代仁宗、宣宗两朝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时，明朝的国策，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而趋于平稳。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皇位的“高煦之叛”，但立即被平服，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此期吏治比较清明，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定。由于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继续向上发展，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封建史学家称这一时期的统治为“仁宣之治”。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为人仁厚，爱护臣下，能注意百姓的疾苦。还在当太子时，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派官召他进京，朱高炽北上路过邹县，看见百姓手持篮筐在路旁采野草的果实，便停马打听，百姓回答说“荒年以此为食”。朱高炽恻然，便下马入民房，看到男女百姓都鹑衣百结，面带饥色，慨叹不已，命令太监分赐宝钞，并召集乡老询问疾苦。这时，恰好山东布政使前来迎接，朱高炽便责问说：“你身为民牧，民穷如此，你却无动于衷！”布政使回答说：“凡是受灾之处，都已经奏求停止今年租税。”太子说：“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征什么税！你必须赶快发放官粟赈济，不可迟延。”布政使准备每人发给三斗。太子说：“先发六斗，你别怕犯擅发仓廪的罪，我见到皇上自会奏报。”

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和“三杨”，依靠他们管理朝政。“蹇夏”即蹇义和夏原吉，两人皆是从洪武朝就开始任事的老臣。成祖时，蹇义被提为吏部尚书，夏原吉被提为户部尚书。蹇义作风谨慎，熟悉朝廷典章制度，成祖巡幸北京和亲征瓦剌期间，命他辅助朱高炽监国，很受重用。夏原吉则精明能干，永乐初年，浙西闹水灾，地方官治理无效，夏原吉到后，疏浚吴淞下流，上接太湖，并因地建闸，用来蓄水或泄水，成功地治理了水患。他向成祖提出的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清仓场、广屯种等建议，均被采纳。蹇义和夏原吉历事五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一个当了三十四年的吏部尚书，一个当了二十九年的户部尚书，长期掌握朝廷重权。“三杨”即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均为建文帝时老臣。明成祖夺得帝位后，杨士奇和杨荣同时入进内阁，在内阁的时间分别为四十三年和三十七年之久。杨溥在宣宗即位后入阁参政，在内阁的时间也长达二十二年。他们三人均为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元老，又久任阁臣，故时人称之为“三杨”。“三杨”中，杨士奇刚直敢言；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杨溥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明仁宗在他们的辅助下，力求社会的安定和统治地位的稳固，在政治经济诸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仁宗即位不久，注意到百姓在永乐时期的负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下令停办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等事宜。以往，北京、山东两地每年要上交八十万斤的枣作为宫中香炭之用，这是常赋，并不是额外采办，此时，仁宗也下令只征一半。工部要修理军器，准备向民间征收布漆，仁宗下令以官钞到市场上购买，不许向百姓征派。仁宗说：“古时候的土赋，均是随地所产，不强征其所无。而往年像丹漆、石青之类，官府不根据物产，一律从郡县征收。百姓要积攒银钱，到市场上买来交纳，吏胥得以从中营私舞弊。今后一概禁止。”不仅如此，凡是地方遭受灾荒，

他都下令蠲免田赋，开仓放粮赈灾。他在位的十个月内，数次蠲免灾区赋粮并开仓赈灾。洪熙元年（1425 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饥荒，地方官却照旧催逼赋税，仁宗得知后，命杨士奇起草诏书，免去夏粮一半，并停止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提醒仁宗，说此事应通过主管的户部和工部。仁宗说："户部和工部可以慢些让他们知道。救民如拯溺，不可片刻迟缓。"命杨士奇立即草诏蠲免。当时有一个户部尚书，因不彻底执行蠲免赋税的命令而被罢官。为了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曾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凡是发现贪赃害民的官吏一律惩办，一个在四川采办木料的太监扰害百姓，仁宗命副都御史弋谦前去查办。

仁宗善于纳谏。他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在他当太子监国时，一个御史得罪了他，即位后，想惩办这个御史，杨士奇劝谏说："陛下即位之时，下过一道诏书赦免以前忤旨者。现在如果还要办御史的罪，就是不守信用。这样，做臣下的会感到寒心。"仁宗接受了杨士奇的规劝，不计御史前咎。大理寺少卿弋谦，在一次上奏言事时，态度激昂，言词猛烈，仁宗非常反感。杨士奇进谏说："弋谦是应陛下的号召陈言的，如果要加罪于他，今后谁还敢说话呢？岂不是叫群臣自此结舌吗？"仁宗认为说的有道理，马上改变了态度，并把弋谦升为副都御史，并安慰说："卿素来清直，好好为朕办事，勿怀疑惧。"同时，还下一道诏书自责过错。又如，当时有一个喜欢恭维的官员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把奏疏让群臣传阅。满朝文武都认为歌颂的对，唯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恢复，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养生息数年，才可能

达到太平。”仁宗认为说的有理，并反问群臣说：“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群臣惭愧得无地自容。仁宗在位时间不长，但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去世，其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年号宣德。

宣宗在位期间，仍然重用“蹇夏”和“三杨”等一批元老重臣，继续执行仁宗时的与民休养政策。有一次宣宗外出回京，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下马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干这种活了。”他经常对朝臣讲历史上一些注意与民休息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如西汉的文帝和景帝、隋朝的文帝、唐太宗李世民等；更注意那些由于皇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从而导致祸乱丧国的历史教训，经常以隋炀帝、唐玄宗作为自己的借鉴。他还叫人画织妇图挂在宫中，目的是让官员和妃嫔们知道百姓的辛苦。宣宗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即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大兴土木，穷兵黩武。

宣宗提倡节俭，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做法。他说：“人君恭俭，则户口自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宣宗刚即位不久，工部尚书提出要到民间采办一些宫中御用器物，宣宗没有同意。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为宣宗祝福长寿，被宣宗训斥了一顿。他说：“人没有不想长寿的，古时候的人君，像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享国最久，而那时哪有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验可见。世人不悟，实在可叹!”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在修建仁宗的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避免奢侈华丽，宣宗亲自规划，仅用三个月就修成陵墓。献陵在规模上远不如成祖的长陵，以后几代皇帝都以此为楷模。宣德四年（1429年），工部尚书吴中启奏说：“山西圆

果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现旧塔损坏，希望能征调力役修建。”宣宗很不高兴说：“你想借此求福吗？我以安民为福。”不许他役民修塔。

裁汰冗官严惩贪污。有一巡抚，上疏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管粮布政司官一员，受到宣宗痛斥，他说：“粮税自有常赋，我正在裁抑冗滥，你反要求增官。”坚决不准。有个叫沈润的御史接受贿赂，宣宗将他谪戍辽东。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因贪贿被逮捕下狱。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公家的木料、砖瓦赠送给太监杨庆建第宅，也被下狱。不但对朝官如此，对太监违法也严厉制裁。宣德六年，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太监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太监唐受，以公差去南京，纵恣贪酷。这几人俱被捕杀。

蠲免田赋，开仓赈灾。河南有一知县，未经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不但没有责备他专擅，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称职能干。并且说：“如果要依靠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当时一些地区发生天灾，百姓四处流移，地方官怕流民闹事，派兵捕逐。宣宗下诏，禁止地方官捕治饥民，并派官进行赈济。有一些流民在某一地区定居下来，并有了家业，而地方官府却要他们回原籍，对此，宣宗诏谕说：“彼此皆我土，只要民安就可。”允许流民在该地附籍。

宣宗善于纳谏，他在位时，经济繁荣，社会也比较安定，一些喜欢阿谀的官员不断以“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觉得讨厌。他对大学士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又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宣宗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一班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宣宗皆能采纳并实行。

宣宗亲贤臣远小人。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本是宣宗作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二人寡学多欲，为官不廉。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庇护，把他们调出内阁，贬了官。都御史刘观被罢官后，接替他的是顾佐。顾佐为官清廉刚直，约束下属极严。宣宗命他考察诸御史，整顿朝纲。顾佐不负宣宗重托，到都察院后，明察暗访，不徇私情，先后贬谪了二十位不称职的御史到辽东为吏，又降了八人，罢了三人。同时，举荐了四十几位清正敢为的人任御史，使之督察百官。经过一番整顿，朝纲肃然。一些受到弹劾的奸吏怨恨顾佐，诬告他，宣宗明察是非，办了诬告人之罪。在地方上，宣宗让"三杨"、"蹇夏"等人推荐了一批廉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其中不少人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循吏清官。如况钟，廉洁奉公，兴利除害，惩治污吏，在他的管辖区域内，百姓安居乐业，最后他死在苏州任上，死时吏民聚哭，为他立祠。

除此，仁、宣时期还改革了科举取士法，规定会试时分南北卷取士，解决了会试多取南士的问题，这一改革，使北方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参政机会，扩大了明王朝统治基础。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不激化阶级矛盾，避免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持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但仁、宣二朝的开明政治是有限的，如仁宗虽能纳谏，但并不是所有逆耳之言他都能听进去。如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仁宗就听不进去，而且命武士打断李时勉的三根肋骨，并关进监狱。宣宗同样也惩治过谏臣御史陈祚，将他下狱，并抓了其家属。刑部主事郭循谏阻宣宗拓西内皇城修离宫，也被捕人狱。

仁、宣二朝的开明政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此期的统治确实是比较清明的，人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了，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皆有较大幅度的发展，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定，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

荣与社会安定的局面。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28。
《明通鉴》卷18、卷20、卷21。
《明史》卷148、卷149。
《廿二史札记》卷33。

建立哈密卫

哈密卫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在其北和西北当时为瓦剌，南和东南方向为沙州和肃州，其西为火州和土鲁番，是西域的交通要道。

元朝后期，察哈台兀鲁思（领地）发生了分裂，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跛者帖木儿乘机崛起，建立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当时，哈密地区为蒙古贵族忽纳失里所居，封为肃王，后由其弟安克帖木儿袭爵。

与此同时，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后挥师西向，洪武五年（1372年）派兵攻下肃州（今甘肃酒泉）。后设置了安定、阿端等卫。永乐初年，朱棣加紧了对西域的经营。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安克帖木儿遣使至京，贡马四千七百多匹。次年六月又遣使来朝，朱棣遂封他为忠顺王，并赐诰印。不久，安克帖木儿为鬼力赤毒死，鬼力赤企图控制哈密。永乐三年，明朝政府把原先已在明任职的安克帖木儿的侄子脱脱，送回哈密袭爵。

正当此时，跛者帖木儿已征服了印度，因而志骄意满，亲自率兵号称一百八十万，妄图征服中国。1405年大军行至锡尔河畔时，帖木儿因病去世，远征遂告中止，但足以引起明朝政府对哈密的重视，因为哈密是西域的门户，控制了哈密，也就掌握了西域。永乐四年三月，明朝正式设立了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共同管理当地军政事宜，使哈密成为明朝在西域的哨所。同时，凡

西域诸国和部落的贡使往来，都必须取道哈密，在那里译呈表文，经朝廷批准后，才能入嘉峪关至京师朝觐。哈密卫与洪武时先后建立的其他嘉峪关外阿端、安定、赤斤蒙古、曲先、罕东等六卫相连，遂成了明朝的西陲重镇，是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

居住在哈密的居民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其封建领主之间往往不受忠顺王节制，相互倾轧，忠顺王又多庸懦，难以实现明朝政府的厚望。

永乐八年忠顺王脱脱暴病而亡，明廷遂封脱脱堂弟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并赐印诰、玉带，世守哈密。宣宗继位不久，兔力帖木儿死，由脱脱子卜答失里嗣忠顺王，但他年幼难理政事，宣德三年（1428年）明廷遂封兔力帖木儿弟脱欢帖木儿为忠义王。两王共理政事。

正统二年（1437年），脱欢帖木儿和卜答失里先后去世，分别由其子脱脱塔木儿和倒瓦答失里为忠义王和忠顺王。当时，北边的瓦剌日益强盛起来，几次侵扰哈密，而西边的土鲁番，东边的沙州、罕东、赤斤诸部，亦借故骚扰，俘掠人畜，哈密竟无力抵抗。

成化八年（1473年），土鲁番速檀阿力攻破哈密城，忠顺王卡列革当时已死，其母弩温答失里主掌国政，遂被俘，并夺其印。自此土鲁番就霸占了哈密，十年后，都督罕慎率罕东、赤斤二卫士兵及自己的部队一万余人，攻破哈密，并乘胜收复了八座城池。弘治元年（1488年）罕慎被封为忠顺王。罕慎后又为土鲁番阿黑麻所杀，地亦为其所占。直至弘治十一年方才恢复。

哈密卫就这样时而恢复，时而为土鲁番所吞并，虽然明朝在军事和经济上给予很大的资助，也难以挽回其日益衰败的颓势。终于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被土鲁番全部吞并。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西域一》。

《明史纪事本末》卷 40。

王振擅权及土木之变

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擅权的弊病，规定宦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兼外朝文武衔，品级不得超过四品，并且在宫门挂一铁牌，上刻“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洪武一朝对太监管束极严，稍有违法，就严厉惩罚。到明成祖朱棣时，“祖制”渐被破坏。朱棣在北平当燕王时，曾屡次收到建文帝宫中太监送去的情报。靖难之变中，宦官为朱棣攻下南京，夺得帝位立下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便重用宦官，派宦官出使、征税、采办、监军，甚至赋予镇守地方、边防的重任。宣宗时，宫内设立内书堂，选太监为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专门教习，从此，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人便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虽然如此，但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是很严的，若有犯法，则置之重典。到英宗即位后，宦官王振逐渐掌握了朝中大权。明王朝宦官擅权乱政由此开端。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由儒士当上教官，恰逢皇帝颁布诏书，允许有子者手术后进宫服务，王振便自行阉割，进了宫廷，开始教宫人读书，宫人称他为王先生。宣德年间，王振专陪太子朱祁镇读书，其头衔是东宫局郎。在他之前，宫中有个宦官叫刘宁，由于受宣宗朱瞻基的宠幸，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并赐姓朱，但刘宁不识字，宣宗便让王振代笔。不久，刘宁奉诏出使，司礼监政务由王振代管，后刘宁调任南京守备，王振正式任司礼监首席太监。司礼监是明王朝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部门，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臣僚们上奏的公文。皇帝口述之命令，也

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批诏谕颁发。加之，司礼监的宦官成天在皇帝周围，取得皇帝宠幸，便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接触少的弱点，欺下瞒上，蒙蔽甚至架空皇帝。在代皇帝批答奏章和传达皇帝旨意时，常常加上自己的观点或歪曲篡改，以至威慑百官，擅权乱政。王振便利用司礼监大逞其威。

宣德十年(1435 年)春天，宣宗驾崩，英宗即位，时年九岁，太后不愿垂帘听政，于是罢早朝，请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政务，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三杨"辅政。这时英宗朱祁镇仍喊王振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善耍手腕，惯用小忠小信掩其大奸大恶。一次小皇帝与小太监在一起玩球，翌日，皇帝在内阁中，王振跑去奏道："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又跟他一样喜欢玩球，江山社稷怎么办哪?"皇帝惭愧的无地自容，"三杨"听了也感慨不已，说"宦官中居然有这样的人!"王振每次到内阁传旨时，总表现得恭谦礼让，"三杨"对他也越加尊重，王振的权势愈来愈大。只有张太后头脑清醒，对王振存有戒心。英宗刚即位时，张太后就将英国公张东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位均是先朝老臣，你干事必须与他们商量，一定要五位赞成后才能实行。"英宗表示遵命。张太后又传王振到场，令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身边女官，立刻把刀搁在王振脖子上，王振吓得魂飞魄散。朱祁镇和诸大臣跪下求情，太后才免他一死。但太后神情严峻地指出："此后不许他干预政事。"王振虽然受到这样的制约，但由于他地位重要，大权在握，一些官员畏服，更有一些阿谀谄媚、趋炎附势之辈投靠到他门下，因而权势日重。王振又十分乖刁，善于察言观色，一有机会就表示其忠诚。正统四年(1439 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溥乡里，而廖谟则是另一位阁臣杨士奇乡里，杨溥要为驿丞报仇，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庇护廖谟，说这是"因公杀人"，双方争持不下，请太后裁决。王振深知此事对太

后也很棘手,便乘机献计说:"廖谟及死者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让廖谟抵命,处分太重,但如说他因公杀人,则未免太轻,最好是将廖谟降级调离。"这是一个对二杨皆不得罪的圆滑的处理办法,太后认为甚好便采纳了,此后王振逐渐取得太后的信任,允许他过问朝中大事了,许多大臣的条陈建议都由他来裁决。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建成,朱祁镇盛宴百官,根据明朝礼制,宦官是不允许参加这种规格的宴会的.朱祁镇怕王振不高兴,派小太监去看他,结果王振大发脾气,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知道后,忙叫人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赴宴,他才到门外,百官便望风罗拜。从此,王振的权势更加显赫。

正统七年十月,张太后病故,王振便更加肆无忌惮了。在此之前,王振抓住杨荣接受靖江王朱佐敬贿赂的把柄不放,使杨荣忧愤而死。又利用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法论死,使其忧心如焚,卧床不起。又因杨溥年迈多病,对国事无能为力,于是王振开始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了。他首先除去了朱元璋时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接着便大权独揽,广植死党。王振让他的侄子王山当上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任锦衣卫指挥佥事。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章中语刺王振,被逮捕下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碰到王振不下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是王振同乡,但他痛恨王振不和他往来。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都俯首揖拜,唯独薛瑄一人昂然独立。王振由此深恨薛瑄。后来,王振的侄子王山夺人之妾,薛瑄主持公道,为人辩冤,再次触犯王振,于是王振指使党羽纠劾薛瑄受贿,问成死罪,投入牢狱。驸马都尉石璟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的阉人,王振恨他伤了同党,把他逮捕入狱。凡是王振所讨厌、痛恨的人,动不动就给扣上各种罪名,加以贬谪。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竟被王振在长安门枷号示众半个月才释放。宦官张环、顾忠及锦衣卫卒王永心怀不平,用匿名书揭露王振罪状。事发后,被王振磔于市,根

本没有向皇帝报告。武功中尉指挥华嵩与王振的侄子因为一个妓女争风吃醋，王振竟派打手将华嵩头发剃光，涂上漆，在教坊门口枷号示众。不仅如此，王振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江阴布衣徐颐以重金求王振，得中书舍人职务；常熟的魏某亦以重金打通门路，竟当上了主事，故京师称其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传为笑柄。堂堂的兵部尚书徐晞见到王振，立即下跪。工部郎中王祐更会谄媚王振，此人无胡须，一次王振问他怎么没有胡须，王祐居然讲："你老人家无须儿子岂敢有须！"后来王振提拔他做了工部侍郎。王振权势如此之大，连公侯勋戚都喊他翁父。

王振好佛，乱发度牒。正统五年春夏两季的半年中，共发卖度牒二万二千余人，弄得北京的街头上到处是和尚道士。正统十三年二月，王振重修庆寿寺，强征军民万余人，用银数十万两，改名大兴隆寺，其富丽庄严，实属罕见。王振把卖官鬻爵、接受贿赂的大量资财，广置田产，并在京师内外建造了几座穷奢极侈的第宅，所用器具、服装华美无比。家中财宝甚多，后获罪抄家时，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面，珊瑚二十余株，其他珍珠宝玩不计其数。

在王振等人的扰乱下，明朝北部边防受到严重削弱。军屯制首遭破坏，当时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大量侵占军士的屯田为私家庄田，并役使士兵替他们耕种。军士失去屯田后，官吏照样逼取额粮的税收，军士大量逃亡。王振为了满足其贪婪的欲望，不惜勾结蒙古贵族，进行走私活动。王振指使其死党，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镞数十瓮送给瓦剌蒙古，瓦剌以良马还赠王振为报答。边防力量日益衰弱，而瓦剌又对明朝虎视眈眈。鉴于这种形势，有的官员建议在要害处增筑城堡，整饬边防，防御瓦剌入侵。但由于王振专权，朝廷黑暗，不但不加强战备，反而迫害建议对瓦剌提高警惕的刘球等人。正统十四年二月，瓦剌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却诈称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瓦剌的贡使冒领赏赐，原是习以为常之事，由于王振多次受也先的贿

赂，对冒领赏赐亦多加以庇护。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贡使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也先闻讯后声称此次贡品乃是聘礼，借口明朝毁了婚约，遂于当年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也先亲率一支劲旅进攻大同，明参将吴浩战死，塞外城堡纷纷陷落。消息传到北京，朱祁镇不听大臣们的劝阻，在王振的蛊惑和挟持下准备亲征，限令在几天内将庞大军队的军需筹齐。

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和王振率大军五十余万从北京出发，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抵宣府。由于行军仓促，组织极差，虽未开战，军心早已动摇。加上连日风雨，还未抵大同，兵士已缺粮，饥寒交迫，僵尸满路。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主事王佐屡次上章请求撤退，王振竟蛮横地令他"跪于草中，至暮方释"，连王振的亲信彭德清以天象不利劝阻，王振也置之不理。二十八日，明军到达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随行御使李贤，曾与几个御史密谋杀掉王振，以解救迫在眉睫的政治、军事危机，但此计划未能实现。

八月初一，明军抵大同，也先使诱敌深人之计，主动北撤，王振坚持北进，直到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也先北撤的用意及大同驻军惨败的情况告诉他，王振才惧怕，次日下令班师。到双寨，大雨倾盆，开始时，王振打算绕紫荆关退兵，顺路邀请皇帝光临他蔚州老家的第宅，以光宗耀祖，夸耀乡里，摆摆威风。及至走了四十多里地后，又恐怕这么多人马会踏坏家乡的庄稼，又改道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闻讯赶来，急忙告诉学士曹鼐、张益说："从这里到紫荆关才四十多里路，皇上应从紫荆关回驾。"他们转告王振，被拒绝。初十日，明军退到宣府，瓦剌军追兵突至，明军仓促应战，惊慌失措，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死，伤亡惨重。在鹞儿岭，三万骑兵几乎被瓦剌军全部消灭，成国公朱勇战死。十三日，英宗朱祁镇、王振等撤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王振再一次拒绝随从文武官员力主"入保怀来"或尽快入紫荆关的合理建议，而驻军

于地高无水的土木堡。土木堡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人马两天滴水未进，尽管土木堡之南十五里有河，但被瓦剌军占领。十五日，也先伪退，并派使者假意讲和，王振不作分析，下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地，瓦剌军突然从四面包围猛攻，英宗朱祁镇与亲兵乘马突围不成，作了瓦剌军的俘虏。在混战中，英国公张东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余人战死。只有大理寺右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王振亦在乱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樊忠愤怒地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朱祁镇所率领五十万军队是明朝京军的所有精锐，几乎全部被王振断送。事后一个月，据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大炮八百个"。由此可见明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消息传到北京，百官恸哭失声，都御史陈镒等纷纷揭发王振的罪行，给事中王竑等当场揪出王振死党马顺，在他身上乱踩，顿时"尸暴血流"。出任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命令将王山碎剐于街头，对王振的家族不分老少，均斩首，王振的同党也都被处死。王振专权虽然结束，但阴魂还在。英宗复辟后，对王振仍怀念不已，下令恢复王振的官职，用木刻王振像，招魂以葬，让智化寺供奉，祭祀王振，还专门为王振建造精忠祠，表彰其忠烈。直到万历年间，王振像仍在智化寺中。凡此表明，没有皇权的骄纵，就不会有宦官的跋扈。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无法根除的弊病，而王振不过为明朝的宦官专权开了一个先例。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29、卷 32。

《明史》卷 162、卷 167、卷 327、卷 328、卷 304。

《明英宗实录》卷 180、卷 181、卷 183。

《明通鉴》卷 23、卷 24。

北京保卫战与于谦之死

土木堡之败,使明朝遇到严重的危机,幸亏有正直而干练的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才使明朝险而未亡。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七日,英宗被俘,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但因太子二岁不能登基理政,于是,又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是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总理国政。八月十八日,郕王召集群臣商议守战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竟惑乱人心,鼓吹天命,主张南迁逃跑,遭到太监金英和礼部尚书胡濙的反对。主战派兵部侍郎于谦厉声斥责说:"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 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人支持。徐珵不敢复言,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之重任托付给于谦。

于谦,字适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青少年时就有救国救民的抱负,他非常仰慕文天祥于国难当头时那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宣德朝任御史。后由杨士奇举荐,升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每到一处则大力兴利除弊。于谦生性刚直,不事权贵,每次进京,都是两袖清风。因此,王振非常忌恨,加以陷害,曾将他关了三月的牢房。释放后,降为大理寺少卿。由于山西、河南官民纷纷上书朝

廷，请求留他在原任，朝廷仍以于谦为山西、河南二省巡抚。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极力劝止，没被采纳。此时，国君被俘，国难当头，于谦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十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震恐。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经郕王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他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八月二十一日，郕王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此次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人心大快。接着，文武百官又议论立皇帝之事，群臣认为国家正处在危难之秋，朱祁钰虽然以监国的身分总理朝政，但毕竟不是君主，因而也就无皇帝的权威，必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于谦等人又力劝郕王早登大位。九月初六日，郕王正式登上皇帝位，史称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次年为景泰元年。景帝的登基，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景帝即位后，瓦剌就丢掉了这张王牌。为保卫京师，于谦向景帝奏请说："也先得志，留住大驾，势必轻我中朝，尽遣随征，军资器械，十无存一。应当赶快遣官四出，招募官舍余丁义勇，集合附近民夫，用他们换下沿河漕运官军，而让这些漕运官军全部隶归神机营等，操练听用，并令工部齐集物料，内外局厂昼夜加工，制造攻战器具。京师九门，宜派都督孙镗等人带领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并选派给事中、御史等官分出巡视。迁城外居民于城内，随地安插，避免瓦剌兵的掳掠。通州坝上仓粮，不可丢弃以资敌寇，令各官自行到仓支取月粮，方为两得。至于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他的建议，切实可行，措置有方，景帝一一采纳。

正当于谦整顿军队，加强战备之时，瓦剌军又大举进犯。正统

十四年十月初一日，也先和脱脱不花率瓦剌军挟带英宗朱祁镇至大同，因大同守将郭登有备，也先等绕过大同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初八日，朱祁钰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其节制，并赦刘安、王通出狱，协守京师。又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策略。主将石亨主张尽闭九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主张到城外迎击敌人，他说："敌人气势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他立即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列队于京师九门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布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布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布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布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列阵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把兵部的日常事务交侍郎吴宁处理，自己亲自至德胜门石亨军营，以抵御瓦剌的主攻部队。初九日下令"有盔甲军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斩"。等到各部军队皆出至城外部署完毕后，悉关闭所有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还传令九门，临阵时：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其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自己则身先士卒，戴盔披甲，亲临战阵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保卫首都。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朱祁镇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也先不敢贸然进攻，假借议和试探明朝虚实，被于谦识破，议和诡计没有得逞。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然后令少数骑兵诱敌，瓦剌军万余骑进入埋伏圈后，一声炮响，伏兵四出，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明朝副总兵范广"跃马陷阵，部下从之，勇气百倍"，瓦剌军人仰马翻，大败而归。也先的弟弟索罗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瓦剌军随又转至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即率军迎战。仗打得十分激烈，孙镗斩瓦剌军的前锋数人，敌军稍向北退，孙镗率军追击 。瓦剌增兵合围孙镗，孙镗奋力拚杀，由于力单退到城边。给事中程信于城上发炮轰击瓦剌军，明将高

礼、毛福寿率兵来助战，石亨也派兵来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到挫折后，就在彰义门组织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在彰义门迎战瓦剌军。明军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但此时明朝方面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自跃马冲出，冲乱了阵营，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战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居民纷纷爬上屋顶，以砖头、石块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向敌人，喊杀声震动天地。瓦剌军受阻。王竑、毛福寿也闻讯赶来支援，瓦剌军看到援军的旗帜，不敢恋战，仓皇逃走。

也先攻城不下，又生一计，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朝的主和派又吵着要与瓦剌议和，甚至许多主战派官员也认为必须迎回英宗，于谦识破也先阴谋，他力排众义，指出这是也先企图借此向我索取财物。他派人申戒各边镇将帅，万勿中敌奸计，也先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这次也先率瓦剌军深入京畿，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但经过五天的战斗，皆被击败，议和的诡计也未得逞，瓦剌军士气低落。明军自接战以来，屡获胜利，士气旺盛。而进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因天大寒，明朝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冰坚不得近"，经过七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都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获无数。也先又听说，明朝援军快要到了，恐怕归路被切断，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拥挟着朱祁镇先退，于谦得知朱祁镇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瓦剌军，死者万余人。也先率瓦剌军自良乡向西退，沿途大掠，在昌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长、献、景三陵寝殿和供器。十七日，也先挟朱祁镇由紫荆关北退。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撤出塞外，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于谦对京军三大营进行了改编。明成祖时，把京军编为五军营（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个军，均为步骑兵）、三千营、神机营，合称三大营。土木堡之败后，三

大营丧失殆尽，而且这种组织结构因兵种不同，训练各异，一遇战事，士兵不习新号令，兵将不相认识，严重影响战斗力的发挥。于谦在原来三大营中选拔骁勇慓悍者十五万人，分为十营，每营设一个督统，下又分五千人为一小营，每小营又设一都指挥，这十营集中训练，称为团营，遇有战事，由原来各营的军官率领参加战斗。号令划一，兵将相识，克服了原来三大营的弱点，提高了战斗力。

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御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无隙可乘，而明朝又识破瓦剌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拒绝与他议和言好，逼使也先无计可施。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做了个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危。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的密谋下复辟，重新夺得皇位。而在这次"夺门之变"中，最不幸的是于谦。于谦在土木堡之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最高，在其任兵部尚书期间，号令明审，勋臣宿将有过，也要请旨切责，因此得罪了一批官僚。这次策划"南宫复辟"的徐有贞就是当年主张迁都的徐珵。景泰时，徐有贞想求得祭酒的官职，景帝未同意。当时用人多决于于谦，徐有贞以为是于谦压抑他。后徐有贞趋附陈循，送玉带以讨好他，陈循升为太保后，就多次推荐他，并建议他改名，遂改名有贞，后因治河有功，被升为左副都御史。此次徐有贞复辟有功，进入内阁后一直对于谦怀恨在心。另一复辟的策划者是石亨，他本是一个犯罪的军官，于谦推荐他才得以重用，在北京保卫战中"总兵十营"。德胜门三捷石亨功劳不如于谦，事后被晋封为侯。石亨自愧不如于谦，而独得侯爵，心中有愧，想讨好于谦，于是上疏为于谦请功，并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为千户。于谦坚辞不受，并上疏说：国家多事，臣子不应顾及私恩，石亨身为大将，提拔一个行伍微贱以补军国，而独荐臣之子，于公议过得去吗？又说，纵臣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石亨听到这些话后，恼羞成怒，仇恨于谦，埋怨于谦约束太

严，自己不能肆意为之，内心甚为不满。石亨的侄子石彪贪婪横暴，受到于谦的弹劾，因此石亨对他更加怀恨。至于都督张軏和太监曹吉祥也都因受到于谦的弹劾而仇恨于谦。“土木之败”后，于谦“不主和议”，常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故朱祁镇也怨恨于谦。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石亨辈以复辟功高，大受宠信，他们趁机打击报复，诬蔑于谦阴谋迎立襄王（英宗的叔父）之子为太子，定为“谋逆”死罪。英宗本来还犹豫未决，认为于谦有功，不忍杀害，但徐有贞怂恿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于谦就是在这样一批君臣的合谋下被杀害了。

于谦本人被害，家属发配边地充军。抄家时，家“无余资”。于谦是一位铮铮汉子，耿耿忠臣，以实践讴歌了他“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情操。于谦被害的消息传出后，路人嗟叹，无不认为是天下第一冤案。有一官员叫陈逵，感念于谦的耿直和功绩，不畏徐、石等人的压力，收敛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于谦的祠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同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所以后人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用来悼念、称颂两位民族英雄的民族气节和保卫国家的光辉业绩。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他的绝命词里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了人们对于岳飞和于谦的敬仰。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33。

《明英宗实录》卷 184、卷 224。

《明史》卷 170、、卷 171。

南宫复辟与曹石之变

景帝虽已从亲王的地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前，已做了十四年的皇帝，朝廷内外有一批心腹，势力雄厚。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朱祁镇被瓦剌释放，回到北京，这时朱祁钰做皇帝才一年，内心十分恐惧，为保住自己的帝位，立即将朱祁镇送进南宫禁锢起来，并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许朝臣去朝见，也不许朱祁镇与朝臣交往。为了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一直想“易储”，他威逼文武群臣，终于在景泰三年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一年后，即景泰四年十一月，朱见济夭折。景帝只此一子，本来在废朱见深时，有些官员从维护封建秩序出发，就不大赞同。现在又纷纷上疏请复朱见深太子位。但景帝无意传位给朱见深，对官员的请求不予理睬，有的竟被关在锦衣卫狱。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倒，且病势沉重。朝中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一些不得志的军人、政客，还有王振的余党宦官曹吉祥等，利用景帝和英宗兄弟之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在一起密谋，石亨以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可得功赏。”张軏、曹吉祥等也都同意这一主张，他们秘密与英宗朱祁镇取得联系，一切准备就绪。首先，徐有贞预令张軏调兵千人等待长安门外，石亨收了各城的钥匙。正月十六日半夜以边关报警，需加强警备为名，开长安门放张軏所率军士进入皇城。徐有贞复将城门锁好，以防遇外兵，徐有贞、石亨、张軏等率领士兵急速向南宫进

发,直抵软禁英宗的南宫。门锢不可开,徐有贞命士兵取巨木撞门,又命士兵爬墙过去,内外合力毁墙,墙坏门开,石亨、张軏进入南宫,接出英宗,拥至奉天殿升座。徐有贞等立即高呼万岁,并敲响钟鼓,大开诸门,此时已是正月十七日的黎明。

当时,群臣都等在朝房中准备景帝临朝,忽然听到宫殿中的呼噪声,接着又听到钟鼓声,随着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说:"上皇帝复位矣!"催促大家去朝贺,事出仓猝,官员们一时摸不着头脑,又见大殿上坐的果真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贺。当日,英宗朱祁镇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次日(十八日)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下狱。升徐有贞为兵部尚书。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明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接着,徐有贞、石亨等唆使其同党弹劾于谦、王文等谋迎立外藩襄王朱瞻墡的儿子做皇帝,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判处谋逆罪。爱国志士于谦和王文被杀。陈循、江渊、俞士悦等充军铁岭卫。二月初一日,以皇太后诰谕,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十天后朱祁钰死于西宫。

英宗复辟,参加夺门事件的主要人物,一个个都得到了封赏。石亨,在景帝时已封为侯,这时又晋封为忠国公;曹吉祥则擢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軏封为太平侯;其兄张輗为文安侯;杨善封为兴济伯;徐有贞已于夺门之变的当天入阁,第二天晋为兵部尚书,加封武功伯;户部侍郎陈汝言,依附石亨、曹吉祥谋夺门,晋为兵部尚书。尤其徐有贞入阁以后欲独揽大权,把原阁臣一个个排挤走,连曾经帮助过他的陈循也不放过,谪戍铁岭卫。徐有贞独揽内阁事权,英宗朱祁镇也认为他很有才干,十分宠信他。这样,在权力分配中,这些复辟派官僚你争我夺,产生了矛盾。徐有贞感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权纳贿的劣迹太露骨,一方面想有别于曹、石,以取得朝臣们的好感,另一方面想压制一下曹、石的势力。天顺元年

(1457年)五日，御史杨瑄、张鹏、周斌等上章弹劾曹吉祥、石亨强夺民田、冒功滥职等罪，英宗朱祁镇问徐有贞，徐的回答与杨瑄等的弹劾之辞一样。这时曹吉祥、石亨预感"内阁专权，欲除我辈"的压力，于是曹、石联手对付徐有贞。他们大搞阴谋，使用离间之计，使朱祁镇渐渐疏远了徐有贞，曹吉祥和石亨又唆使言官弹劾徐有贞和李贤"图擅威权，排斥勋旧。"于是，两人被下大狱，徐有贞被谪戍，直到天顺四年才被释放回原籍苏州。曹吉祥和石亨在这次与内阁的斗争中以胜利的姿态而告终。从此，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乱政，终于酿成"曹、石之变"。

石亨在夺门之变中功最高，不但本人进爵，其侄儿石彪也封为定远侯，其弟侄家人冒功授指挥、千户、百户的五十余人，部曲、亲明故旧纂名"夺门"而得官的四千余人。石亨一面排斥异己，将两京大臣斥逐殆尽；一面培植党羽，引荐私人。他每每带几个爪牙到英宗面前，推荐他们有复立之功，英宗就按石亨的要求授与官职。他还公开卖官鬻爵，以货之多寡为授职大小，以人之先后为得官迟早。时有朱三千、龙八百之谣，即指郎中朱铨和龙文因贿赂石亨而升官。石亨、石彪叔侄两家养有官员、猛士数万人，中外将帅半出其门，京师之人侧目而视。石亨势大，便胡作非为，横行朝中。他得势后，便把曾经检举过他的给事中成章、御史甘泽等九人全部贬黜。石亨侵夺民田，御史杨瑄对他加以弹劾，结果杨瑄被谪戍。他屡兴大狱，陷害纠劾他的言官。朝中官员多数惧其权势，不敢得罪。石亨在皇城中建造豪华府第三百余间。一次英宗登上翔凤楼，遥指石亨府第问身边官员说："这是谁家之宅？如此宏丽。"左右或说不知，或说这一定是座王府。英宗叹曰："人家都怕石亨，不敢说他。"其实，朱祁镇与曹、石之间也有矛盾，曹、石的专权跋扈，使他感到很难堪。不久，英宗听了李贤的劝告，开始对石亨疏远。石亨见自己的地位下降，便心怀怨恨，阴谋造反。他私下对家中豢养的将士说："陈桥兵变，史不称其篡。你们若能助我成功，我现在

的地位就是你们将来的地位。"石亨往来于大同、紫荆关,察看地形,又对其党羽说:"大同士马甲天下,我对待他们素来优厚,现在石彪在那里可作依靠。以后石彪若为镇朔将军专制大同,北塞紫金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矣。"

朱祁镇对石亨、石彪内外握兵权疑虑越来越深。天顺三年七月,召石彪还京,石彪不肯从命,朱祁镇大怒,诏命石彪疾驰入京。八月,石彪被下锦衣卫大狱。朝官又纷纷上章劾石亨,于是朱祁镇"罢石亨闲住"。石亨急于举事,被原亲信锦衣卫指挥逯杲和家人告发,石亨被捕下狱,天顺四年二月,死于狱中。石彪被斩首。

兔死狐悲,石亨、石彪的结局,自然使曹吉祥、曹钦叔侄惊惧不安,太监曹吉祥本是王振余党,因迎复英宗有功,其侄儿曹钦、曹铉、曹铎、曹镕均被任命都督,掌兵权。曹钦还被封为昭武伯。这也是明朝宦官子弟封爵的开始。曹吉祥门下厮养的无赖冒功当官的多至上千人,朝中也有一批官僚趋赴其门。曹吉祥门下原来就豢养着一批蒙古族投降过来的军官和士兵,其权势与石亨相当,朝野并称为曹石,石亨事发后,因冒"夺门"功得官被罢黜的达四千余人。但这些人因得到曹吉祥的庇护而未动,因此对曹吉祥感恩戴德。曹吉祥平日与石亨狼狈为奸,石亨败后,曹吉祥担心自己好景不长,便和诸侄儿加紧搜罗亡命无赖、降兵降将,蓄谋造反。他赏给这些亡命无赖和降将金银锦帛,倚为腹心。诸亡命无赖也以为自己能够冒功当官领赏,是因为有曹吉祥这个靠山,一旦发生不测,曹吉祥倒了,他们也不能幸免,因而,愿意为他卖命。一天,曹钦问他的门客冯益:"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的吗?"冯益回答说:"君家魏武(即曹操)就是。"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帝的曹钦听了大喜,以为是曹操第二。不久,英宗得悉曹吉祥和曹钦的一些不法行为,派锦衣卫指挥暗中监视他们。曹钦慌了手脚,与其死党密谋说:"皇帝正在准备抓我们,君不举事,我们将步石彪的后尘。"并与曹吉祥决定七月二日黎明前举事,由曹钦自外拥兵入宫废帝,而曹

吉祥以禁兵为内应。计谋已定，曹钦与其党都督伯颜也先部署好士卒五百人，并和伯颜也先等数十人夜饮，等待举事。夜半，达官都指挥马亮怕事情失败，从酒席上悄悄溜走，到朝房去告发。当时因甘、凉有警，怀宁伯孙镗奉命西征，拟于第二天向皇帝辞行，这天夜里与恭顺伯吴瑾俱宿于朝房。马亮到朝房把曹钦谋反的情况告诉吴瑾，吴瑾又告诉了孙镗，于是二人便草成奏疏报告英宗。朱祁镇立即派军逮捕曹吉祥，并下令紧闭皇城各门及京城九门。曹钦觉察到马亮逃走，立即率其党徒至东长安门，门闭不得入，转至逯杲住处杀了逯杲，又在西朝房杀了都御史寇深，又在东朝房砍伤了学士李贤，纵火焚烧东西长安门。这时孙镗急遣其子召西征军二千人攻击曹钦，工部尚书赵荣亦率数百人来助战。天将黎明，曹钦的党徒渐渐散去，城门尽闭，曹钦冲突不出，走投无路，奔回家中拒战，孙镗率军奋呼而入，曹钦投井自杀，曹铉、曹铎、曹镕均被杀死。曹吉祥也于三日后被凌迟处死。曹吉祥的这次叛乱和石亨的谋叛被称为明史上的“曹石之变”。

从“土木之败”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又接连发生英宗复辟和曹石之变，从此，明朝开始由盛及衰，国力遭到极大的削弱，朝政也更趋腐败。

（王德全）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35、卷36。

《明通鉴》卷27、卷28

《明史》卷173、卷304

郧阳流民起义

明初朱元璋建立赋税户籍黄册，以便控制人口流动。但到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剧烈和赋役的苛重，不少百姓成了流民，他们无地可耕，无家可归，于是就到处流浪，渐渐地都聚集到一些深山老林的边远地区。当时，以湖北郧阳为中心的荆襄地区就是一个很大的流民聚居区，这里山高林密，西起终南山，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南到荆山，位于今鄂、豫、川、陕四省交界的地方。大批的流民从四面八方涌进，正统年间，流民竟增至一百五十多万，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担心。一方面，百姓大批逃亡，致使土地抛荒，租税顿减，再则，流民聚居，明朝政府鞭长莫及难于控制，易生变乱。故此，明朝政府想法要清除此心腹之患，常常阻挠百姓入山，封禁山区。正统元年(1436 年)，明政府曾造"逃户周知册"，登记逃民的乡里、姓名、男女口数，以及逃民遗下税粮有无着落等项，督令他们回籍复业，或在当地耕种土地纳税服役。次年发布"挨勘流民令"，登记流民男女大小丁口，门墙刷上标记，十家编为一甲，互相识保，由所在里长带管。对待荆襄流民，天顺八年(1464 年)明朝特地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予以管理。明朝政府企图逐步加强其控制，却越来越引起流民的不满，终于在成化元年(1465 年)爆发了刘通、石龙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

刘通，河南西华人。他臂力过人，能举千斤石狮，绰号刘千斤，正统年间为生计所迫流亡到湖广房县(今湖北今县)。成化元年，刘通与石龙、冯子龙等人在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梅溪寺称汉

王,年号德胜。任命苗龙、苗虎等人作先锋,常通为国师,王靖做给事中。流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达到四万人。刘通在襄阳房县、豆沙河诸处万山之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战,屡败官军。

消息传到北京,明宪宗急令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统率京营、山东、湖广及河南军队一万五千人南下征讨。次年春,朱永、白圭等所统率的京营和山东的军队,湖广总兵李震所统率的军队以及巡抚河南副都御史王恕率河南军,三路会师于襄阳,联合进攻义军。刘通、石龙诱敌深人,设伏以待,在梯儿崖大败官军。成化二年三月,明军四路夹击,为保存实力,刘通率部进行转移,抵达寿阳,于古口山与官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血战二日,刘通等三千五百个将士被俘,只有石龙率小部分士卒突围后进人四川。刘通被押往北京处斩,其余被俘将士及其家属,凡年满十岁的男子,统统遭到杀害。石龙一路起义军,接连攻下巫山、大昌,杀夔州通判王祯。白圭率官军尾追不舍,形势危急。与此同时石龙部下刘长子叛变,缚石龙投降明军,石龙亦惨遭杀害。刘长子还帮助明军诱杀了刘通妻连氏及其他起义军六百余人。第一次郧阳流民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流民大多仍屯聚在荆襄山区里,不肯离散。接着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流民仍源源不断进人荆襄山区。成化六年十月,李原和小王洪又领导流民重新起义。李原,人称李胡子,河南新郑人,他与小王洪曾都是刘通的部下,刘、石失败后,他们又继续在山区活动,组织力量。起义后,李原称太平王,远近流民闻风而应,队伍很快发展到百万人,起义军活跃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陕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区。这是明中叶人数最多的一次流民大起义。

流民起义如火如荼,明朝政府当即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项忠抵达襄阳后,又征调永顺、保靖土司的苗兵,一共二十五万人,分八路进攻起义军。同

时，他派官吏拿着“诏旨榜文”到深山里，鸣锣击鼓，要百姓赶快离开山区，并宣告不久就要调苗兵搜山。且宣布准许认耕复业，诱骗流民离开义军队伍。许多百姓受到引诱，一时扶老携幼，纷纷出山，几达四十余万。项忠剿抚并用，严重削弱了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县遭到明军袭击，最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战至均州，也被明军俘获。二人皆被杀害。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连那些从洪武年间就迁居于此，“家业延子孙”的居民也不能幸免，项忠纵兵乱杀，以致于尸首枕藉山谷，不可胜数。而且，还把一万多流民发配到湖广、贵州充军，这些人在途中多被虐待，加上瘟疫疾病，大多死于半路。其余被骗出山的流民又都强令还乡，时值酷暑，多饥渴而死。项忠在经过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后，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竖起了一块“平荆襄碑”，以记其“战功”，当地百姓称它为“堕泪碑”，以示对屠夫项忠的无比愤怒和对被难流民的深切同情。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38。

《明史》：“项忠传”、“李震传”、“白圭传”。

孝宗继统

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某一天清晨，明宪宗起床后，令太监张敏梳头。宪宗对着镜子，看着行将斑白的头发，不禁又触动了心思，遂忍不住长叹："老将至而无子。"东宫虚悬，"国本"未立，一直令宪宗不安，宪宗还沉溺在自己悲凉的心境中，突见张敏跪倒在地，说道："万岁早已有子了。"宪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转过身来，盯着跪在面前的张敏疾速地问道："你说什么？皇子现在何处？"张敏答道："老奴说出来恐怕难免一死，请万岁爷务必给皇子做主呵！"为什么皇子早已出生，皇帝却不知道呢？为什么一旦皇帝知道了，反而会给皇子招来杀身之祸呢？

原来，明宪宗宠幸比自己大十九岁的万贵妃，万贵妃机警，善迎帝意，成化二年，万贵妃生下一子，这是宪宗的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此后，万贵妃不再有娠。后柏贤妃又为宪宗生了个儿子，取名祐极，成化七年被册立为皇太子，不久却被万贵妃迫害致死。后来，一旦发现哪个妃子怀孕了，万贵妃总要想法使其堕胎，以此来保住自己专宠的地位，但明宪宗却执迷不悟，对万贵妃情之所钟，终生不渝。

一天，宪宗偶然来到内藏，即宫中藏书的地方，掌管内藏的是一西南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纪氏，纪氏举止优雅，聪明伶俐，宪宗一见到纪氏，马上就喜欢上了她，当晚宪宗就宿在内藏，纪氏遂有身孕。万贵妃很快就知道了这消息，她颇为恼怒，立即指使一宫女前去堕胎，这宫女走到半路，转念一想，却又左右为难了，因为一

则，皇上迄今仍无子嗣，此胎关系“国本”，一旦皇上获知胎儿被堕，自己性命自然难保。另一方面，万贵妃的命令亦不敢违抗。左思右想，不得其法，后总算想出一策，回报万贵妃时说，纪氏已患重病，危在旦夕，遂瞒住了万贵妃。后纪氏被迁居安乐堂，不久就生下一个男孩。消息又被万贵妃获悉，她就派太监张敏去溺杀此男孩，张敏没有遵从万贵妃的旨意，他偷偷把皇子藏入密室，并以“粉饵饴蜜”之类食品加哺养。宪宗原来的皇后吴氏因不能容忍万贵妃专宠，被万贵妃施以杖责，结果被打入冷宫西内。西内距安乐堂很近，吴氏也时常照料皇子。小皇子躲过了万贵妃的监视，到成化十一年时，已平安长到了六岁。

正在宪宗将信将疑之际，太监怀恩也从旁说：“张敏此言千真万确，皇子现正在西内，如今已六岁了，只是谁也不敢告知万岁。”宪宗异常高兴，当即驾幸西内，派人去安乐堂迎接皇子。安乐堂内，纪氏抱着皇子泪流满面地说：“儿子离去了，母亲便不得为生了，儿看见穿黄袍有胡须的，那就是你父亲。”当即，太监们为皇子穿上一件小红袍，抬到西内阶下，在太监们的引导下，皇子扑向父皇的怀抱，宪宗把他抱起，放在膝上，看了很一会儿，悲喜交集，也禁不住掉下了眼泪，说道：“是我儿子，像我！”马上给他取名“祐樘”，并命太监怀恩赶赴内阁通报这一喜讯。次日，颁诏天下，大臣们纷纷入朝祝贺。纪氏被立为淑妃，移居永寿宫，宪宗一日数次召见。这一来气坏了万贵妃，她咬牙切齿地说：“这帮狗太监，居然敢欺骗我。”几个月后，纪淑妃暴病而死，张敏吞金自杀，皆是万贵妃所逼。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朱祐樘被立为皇太子，这位年方六岁的皇太子对其生母之死极为悲伤。宪宗生母孝肃皇太后将他留居仁寿宫。万贵妃曾召皇太子就食，孝肃太后嘱其勿食。万贵妃赐食，皇太子不吃，说：“已经饱了。”让他喝羹汤，也不喝，说：“疑有毒。”万贵妃颇为恼怒，说：“这小孩才几岁就这样，将来肯定得欺压我。”

遂因愤怒而成病。

成化二十三年春，万贵妃死，不久宪宗亦死。朱祐樘遂继位，次年改元弘治，他在位期间，明朝的统治相对稳定，史书称之为"弘治中兴。"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宪宗实录》。

《明史》卷113。

《明史》卷113。

弘治中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日，宪宗病逝，太子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弘治，在位十八年。弘治年间，孝宗任用贤能，罢斥奸佞，改良政治，精心求治，使明朝的统治出现相对稳定的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成化一朝，宦官猖獗，奸佞当道，孝宗登基后，首先在用人上进行革新整顿，斥逐奸佞，任用贤能和练达之士。

宪宗时权倾一时，官到太常寺寺丞的李孜省，贪赃枉法，不可一世，无人敢与争雄，孝宗即位后第六天就把他谪戍边卫，不久又下令把他逮捕入狱，最后他死于狱中。太监梁芳，宪宗朝内侍，以“日进美珠珍宝”于万贵妃而得其欢心，遂“擅宠于内”，许多奸佞之徒因其门路而得以重用，其中有李孜省、妖僧继晓等。就在斥逐李孜省的当日，孝宗也把梁芳充南京净军，不久又收监审查。大学士万安自成化五年入内阁参预机务，但极为昏庸，毫无才干，却极爱钻营，常搜罗“房中术”献给宪宗，以取宠。孝宗为太子时，对其丑行就有所闻，即位后，一日在宫中无意发现一箧奏疏，内容全是讲“房中术”的，每疏末尾全都署名为“臣安进”，孝宗颇为恼怒，立即命太监怀恩拿着这些奏疏去内阁找到万安，指责他说：“这难道是大臣所应该做的事吗?”万安当即羞愧难当，心惊胆战，孝宗命其立即致仕。

明宪宗崇幸僧道，成化年间曾三次开度，全国僧尼道士几达五十余万，这早已成为全社会一大痼疾。孝宗即位后一月，就罢遣禅

师、真人253人，法王、佛子、国师、喇嘛789人，不准居于寺院，全都发还本土。其余一切邪术之士，皆限一月内尽逐出京，同时命令拆毁一切新建、私建寺院。妖僧继晓，宪宗时曾被封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他每日引诱宪宗做佛事，在京城西市建大永昌寺时，强迫数百户居民迁家，并耗内帑数十万，因其作恶多端，成化二十一年被削职为民。孝宗登基两个月后，又将他逮捕弃市，对于奸佞与异端邪术给予了大大的打击。

同时，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明孝宗对各部的冗官和闲散官员进行了裁汰。传奉官到孝宗即位时已达数千人，孝宗在一个月内，即罢免两千多人，并论罪处置。同时重点整顿中下级官吏，采用革职、降职、降级、调转以及致仕等法，精简行政官员，从而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在斥奸佞、去邪妄、革秕政的同时，孝宗还进用贤能之士，“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弘治一朝，多正直贤明之士，“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诸多名臣，荟集一朝，一派开明兴旺之气象。

王恕，陕西三原人，为人正直敢言，当时有歌谣称赞他“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但在成化年间颇不得志，成化二十二年因反对起用传奉官，宪宗一怒之下命其致仕归家。孝宗继位后，立即召为吏部尚书，不久又加太子太保，一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始终任吏部尚书。他秉公办事，经他引荐的人才有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

马文升，湖广均州(今湖北均县)人，颇有才干，长于应变，成化二十二年，因李孜省进谗，由兵部尚书调南京。孝宗即位后，召拜左都御史，不久，又命提督十二团营。弘治二年，再擢兵部尚书。此时因兵政久弛，西北诸部暗中窥伺边塞，马文升严核诸将校，黜贪懦者三十余人。奸人怨恨，企图夜间行刺于他，孝宗获悉，立即

命锦衣卫去缉捕，并派十二骑士保护马文升。弘治十四年，马文升改吏部尚书。为兵部尚书凡十三年，十三年中，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诸多方面，皆有建树。

刘大夏，湖广华容(今湖北潜江县)人，弘治二年迁广东右布政使，弘治六年以吏部尚书王恕推荐，擢右副都御史，治张秋河。他常将民间真实情况毫无忌讳地向孝宗报告，使孝宗能真正体察民情。弘治十五年拜兵部尚书。

徐溥，江苏宜兴人。景泰旧臣。弘治初年，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进礼部尚书。弘治五年，代刘吉为首辅，他与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辅政，匡正缺失，在阁十二年，贡献颇多，且为人宽厚，颇获孝宗赏识。

刘健，河南洛阳人，成化时任少詹事，充东宫讲官，颇获朱祐樘之信任。孝宗即位后，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机务，弘治十一年为首辅。谢迁，浙江余姚人，孝宗为太子时已充讲官，弘治年间，“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① 在厘革弊政上，颇有建树。李东阳，湖广茶陵人，弘治八年，与谢迁同日登用，入内阁参预机务。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孝宗多能采纳，孝宗对他们皆很崇敬，对刘健更是“呼为先生而不名”。② 时人评论他们三人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③ 天下皆称贤相。

重用贤臣之同时，还广开言路。孝宗一继位，立即就形成朝臣踊跃上书之局面，甚至太学生亦上疏提建议。孝宗登基不久，想在万岁山建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获知后，上疏切谏，力陈不当。祭酒费訚担心自己受到牵连，将虎臣捆绑在一树下，不久，却有官校传令把虎臣召到皇宫的左顺门，传旨将谕，并言棕棚已

---

① 《明史》卷181“谢迁传”。
② 《明史》卷181“刘健传”。
③ 《明史》卷181“谢迁传”。

毁,虎臣从此名闻都城,不久,又授七品官,为云南知县。弘治十八年二月,孝宗去世前三个月,还念念不忘告谕朝臣:"朕方图新政,乐闻谠言。"弘治十八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疏揭发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张皇后因其兄被纠劾,便与其母金夫人要求孝宗重处李梦阳,孝宗不得已,把李梦阳下狱,但金夫人仍不满足,在孝宗面前哭哭啼啼,孝宗大怒,在法司送交的狱词上批道:"梦阳复职,罚俸三月。"几天后,孝宗夜游南宫,张鹤龄在旁侍酒,张皇后与金夫人也陪伴于侧。酒过三巡,皇后与金夫人起身更衣,孝宗单独召见张鹤龄,切责之,最后以张鹤龄免冠叩头谢罪了事。李梦阳恢复职务不几天,在路上又遇见了张鹤龄,李梦阳大怒,"击以马棰",打落张鹤龄两颗牙齿。事情又告到孝宗处,孝宗假作不知,亦未去追究。如此袒护正直敢言之朝臣,恐怕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史中也不多见。

在重用贤臣,广开言路之同时,在政治上亦施改良。首先,重开经筵。经筵明初无定制,正统初,始为常制,每月的二、十二、二十二日三天,皇帝御文华殿进讲。宪宗朝因皇帝沉溺后宫,一遇寒暑,辄令停止,经筵制度,几成虚文。孝宗登基不久,就接受朝臣杨守陈的建议,恢复了经筵制度,而且常敦促讲官应直言不讳,不必顾忌。弘治九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日讲文华殿,他借唐朝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的故事影射内侍李广之取宠状况,希望孝宗为戒。孝宗听后,亦深明其意,不但毫不责怪,而且命中官设宴款待王华。在恢复经筵之同时,他亦恢复了早朝、午朝、晚朝的朝仪。本来,一日三朝是明初就定下来的规矩,但到英宗时却给破坏了。孝宗又加恢复,常与朝臣见面,一则可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同时亦可及时地处理政事。孝宗勤于政事,于此亦可见一斑。其次,注意节俭,同时能体察民情,注意救济灾民。当时,朝臣常上疏敦促皇上应该注意节俭,孝宗皆能采纳。弘治元年三月,马文升上疏陈时政十五事,其中就有"节费以苏民困"。文中有"陛下量减一分,则民

受一分之赐”一类语，孝宗皆能接受。弘治十四年八月，大学士刘健等因军兴缺饷，上疏指责光禄司岁供增数十倍，“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人，动四、五十万。”呼吁当减其供奉，孝宗即决定将光禄司之供奉减到弘治元年的标准。同时，一旦发现有灾情，即减少灾区的赋税，有时还拿出官府的财物，对灾民进行救济。其二，修边备，加强防务。明代北部边防，自“土木之变”后，就废弛了，成化年间，亦无改观。弘治朝，由于重用贤能之士，先后用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为兵部尚书，故使防务中的一些弊政得以革除。余子俊，成化中期曾在延绥地区修筑边墙，成化二十一年，他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拟以延绥边墙法行之宣、大两镇。弘治初年，他为兵部尚书，曾系统地提出北部边防的总体防御计划，针对蒙古三大部之间力量的消长，防御重点放在宣府、大同，提出对边镇守将实行每岁考核制度，建立以大同为中路，阳和、天城为东路，宣府、洪州城、大同左右卫、平虏、威远、朔州卫、井砰堡为西路的三路防御体系。孝宗认为其计划可行，即令实行。余子俊病逝于弘治二年二月，马文升继任兵部尚书，一直到弘治十四年十月，亦多有建树，继续实施余子俊的防守为主的策略。马文升调任吏部尚书后，刘大夏继任，继续维护边备以守为主的方针，孝宗曾企图改变此策略，认为可以效法明成祖以进攻取代防御，事实上，当时就实力而言，已不可能。刘大夏坚持以防御为主的方针，终于维护住了北部边防的安宁。

孝宗由于任用贤明，施行革新，一度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故有“中兴”之气象，但其革新亦未善始善终，而其目的亦只是期望其王朝能长治久安，故其革新政策有许多消极性，颇不完善。虽然他大斥奸佞，但对与万安一般昏庸、只好钻营的刘吉，却始终未罢官，而且委寄愈专。直到弘治五年，由于刘吉因封外戚事与孝宗发生分歧，才讽令致仕。而且对近倖亦未完全抑制，宦官李广就颇受其信任，弘治后期，孝宗在宦官李广的引诱下，越来越热衷于烧炼、斋醮

之类事，与之同时，视朝日少，经筵日缺，生活亦渐渐奢侈起来。弘治一朝，虽有时为了维护大臣而抑制一下外戚，但总体而言，孝宗是优礼外戚的。张皇后之父昌国公张峦，建坟逾制，役使士卒数万人，刑部尚书彭韶上疏弹劾，孝宗竟然不予理睬。彭韶以致仕相压，孝宗丝毫也不挽留，竟准致仕。奸商们为走私贩盐，牟取暴利，皆投奔到张皇后之弟张鹤龄门下，张鹤龄积极与他们谋划，要求以长芦盐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高价买各盐场余盐十七万引，听任其贩卖，孝宗竟批准其要求。后奸商又援例乞两淮旧引一百六十万，孝宗又准其请。自此以后，盐法大坏。这皆是对外戚之纵容、姑息所至。同时其初年之革新多未持之以恒，即如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给事中张弘至上疏所论八事，其中提及：传奉官裁而又增；初斩方士李孜省，后则热衷于烧炼、斋醮；初去佞倖万安辈，后则奸如徐瓊者，百官弹劾亦不去；初常与大臣议事，后则少有；内官革而复增；谕旨亦不太严肃；升任武职很随便；生活日益奢侈等。前后相异，差距甚远。

纵观弘治一朝，虽然其革新并未始终如一，但对明朝江山的巩固起到了一定作用。明初洪、永国力强盛，仁、宣亦能保持，但英宗"土木之变"后，国力日弱，宪宗又溺于后宫，重用宦官汪直，致使弊政丛生，国运日衰。弘治则使衰弱的国运得以振兴，许多弊政得以清除，社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边备得以加强，又恢复了兴盛之元气，故有"中兴"之美誉。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孝宗实录》。

《明史纪事本末》卷42"弘治君臣"

《明史》卷15"孝宗本纪"。

武宗荒政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十八日,紫禁城奉天殿,一个未满十四周岁的顽童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御殿登极继皇帝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昏庸之君明武宗朱厚照,在位年号为“正德”。武宗是明孝宗的独生子,年方两岁便被立为太子。孝宗深知太子喜好玩耍、贪图安逸的秉性,唯恐其将来荒怠朝政败坏朱家天下,因于弥留之际,将这个年幼的太子托付给得力的宰辅——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恳切地希望他们好好教导,精心辅政。然而武宗在位以后便毫无顾忌地纵情玩乐,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他在位的十六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逸乐游玩中度过,其玩乐方式多而离奇,有时简直是胡作非为,令臣僚们哭笑不得。朝中政务则敷衍了事,甚至撒手不管。宦官奸佞乘机窃权行私,祸乱朝纲。处于中期的明王朝,也随着这位顽童的继位而朝政日非,愈益腐败黑暗。

武宗即位前期,与其朝夕相处的,是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个随侍宦官。这八个人在武宗为太子时就随身服侍,那时,他们知道将来的皇位非朱厚照莫属,便处处讨其欢心。现在武宗登极,这帮人更投其所好,取悦武宗,以便假皇权而谋取私利,因而每日为武宗安排宫女歌舞、倡优杂剧、角斗游戏,引导他擎鹰搏兔、跑马击球。武宗醉心玩乐,根本无心理政。皇帝定期接见群臣的早朝,官员们日未出就进朝奏事,他却日上三竿才起。侍卫执役人员见久等不来,一个个纵横坐卧,仪仗丢弃满地;官员们也是疲于久候,精神困倦。好不容易将武宗等来,他却敷衍几句,随即宣布散朝。即

使如此，他还经常寻找借口，宣布免朝。翰林院定期为皇帝讲授经史及治国之道的“经筵日讲”，自武宗即位以后，也是“不时传旨暂免”。偶尔听讲，他也心不在焉，到夏天，索性以天热为由停讲。大学士刘健等顾命之臣屡次劝导他应该“以勤敬为德，以怠荒为戒”，武宗虽当面听从，但一进后宫，便被宦官们包围，沉湎于玩乐的小天地，大臣们的劝告完全成了耳旁风。正直的大臣遭冷落，诱惑他的宦官被当作近人，尤其是刘瑾，因博得武宗欢心，由掌钟鼓司的太监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进而总督十二团营，掌握了守卫京城军队的兵权。官员们上的奏章，武宗在批答时竟听信他们的蛊惑，按照他们的意志批示。刘健、谢迁等人想按照孝宗的遗诏，剔除先朝留下的积弊，但由于所提改革方案侵犯了宦官的利益，章疏奏上，随即遭到篡改，结果不仅没有剔除，反而有所扩大。如裁汰京城及地方上的冗滥宦官一事，不但未裁，各宦官衙门、仓库、城门及各地镇守的宦官数量却暗中增加。刘健等虽受命辅政，实际徒有虚名。最受武宗宠信的八个宦官则结交党羽，排斥异己，成为朝中的一股恶势力，时人称之为“八党”、“八虎”。吏部尚书马文升，在武宗继位后不久，曾裁汰了一些传奉官。御用监的宦官便撺掇武宗任用他们所点名的七个人。马文升抗诏不从，被诬以抗旨的罪名，于是接连上疏请求“乞休”。宦官们恨之入骨，遂寻机拔掉这个眼中钉，扶植附从他们的官员。一次，朝臣们讨论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大臣们一致认为宫廷费用无度，是造成财政拮据的主要原因，建议武宗节俭。当时与宦官们勾结的吏部左侍郎焦芳也正在场，他知道有窃听会议的宦官在旁，便故意大声说：“庶民百姓家尚且需要日常开支，何况天子。现在各地逃避赋税者那样多，不设法把这部分税额征收上来，为什么只是让皇上减少生活费用呢?”会议刚结束，宦官便把议论的细情报告了武宗，并极力为焦芳美言。昏庸的武宗随即下令，命焦芳代马文升，升为尚书。从此，焦芳便与宦官们更紧密地结为一体，成为惑乱朝政的重要阉党成员。刘健、谢迁等人

看到朝政日非，有负先帝之托，决定设法铲除“八党”。当时，给事中陶谐、户部尚书韩文等人正接连上奏章，历数宦官们的恶行，刘、谢等极力支持，并与韩文率百官跪伏宫前劝谏，指责八党“唯知蛊惑君上，以便私己”，根本不考虑皇家天下的治乱兴亡。刘健等进一步指出，宦官祸国已有前鉴，本朝若不惩治，必将祸乱无穷。由于言词激烈，武宗看到章疏后乃至“惊泣不食”，接连派司礼监太监陈宽、王岳等到内阁商议处理。武宗提出将刘瑾等安置南京，刘、谢则想杀掉刘瑾以根除后患，并声泪俱下地要王岳向武宗表达他们的一片忠心，他们说：“先帝执手托孤，若不诛除惑乱朝政的八人，我们对不起皇上，将来也无颜见先帝。”王岳是宦官中少有的正派者，平时也恨刘瑾等人，便将刘、谢的要求禀告武宗。不想与八党勾结的焦芳将消息飞报给刘瑾。刘瑾闻听大惊，与另外七人连夜去见武宗，环跪在武宗周围哭求，以头触地，以表示对主子的忠诚。武宗心动，刘瑾乘势告了王岳一状，说王岳不但要害他们，而且借司礼监之权，与内阁官员勾结挟制皇上日常生活。武宗听后深恨王岳，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并将王岳逮捕，连夜发落到南京。刘瑾为除后患，秘密派人在途中将王岳杀死。刘健、谢迁等次日上朝准备力争诛杀刘瑾，一见形势骤变，已知不易挽回，遂上疏请求辞职。刘瑾等唯恐除之不速，于是假借皇帝谕旨，允准二人回乡。刘、谢等人诛除八党的活动遂告失败。时距武宗即位仅一年多的时间，孝宗的托孤之臣便被排挤出朝，八党势力完全控制了朝廷。

刘、谢卸职，劝谏的官员遭到沉重打击，无人敢言，武宗毫无约束，索性丢掉皇帝身分纵情玩耍。开始，他令宦官们仿照京城市肆，开设买卖店铺，与他们一起穿上平民服装作买卖交易，还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让人从中斡旋成交。继而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由宫女在其中弹琴歌舞，还召来那些斗鸡逐狗玩杂耍的人表演，武宗在酒店中饮酒观赏，醉后即宿于酒店中。臣僚们见他这样胡闹，实在不成体统，几次直言劝告，武宗根本不听，在宦官们的诱惑下，

又想出了新的花样。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在京城中另建一片建筑群，中间为宫殿，东西厢造起两排密室，名为"豹房"，放入虎、豹及珍禽奇兽，供武宗观赏逗戏，并调来乐工进内演奏。此后，武宗就以豹房为家，"朝夕处其中"，不进后宫，并称豹房为"新宅"，为武宗所宠幸的宦官们也群集于此。武宗每天与这些人鬼混，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更无暇理政。晋升为司礼监太监的刘瑾，从此开始明目张胆地窃用皇权，权势恶性膨胀，造成正德朝严重的宦官之祸。

刘瑾弄权的主要凭借是代武宗"批红"。明代官员上达给皇帝的奏章，要经过内阁"票拟"，即在奏章上附一票签，由大学士等在上边拟写出对该奏章的初步处理意见，供皇帝裁决。皇帝见到这个"票拟"后，以红字批示，作为最后的决定下发执行。这道程序称为"批红"。批红是皇权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但明代那些荒政的皇帝，却常常将批红假手于司礼监太监，明武宗便是典型的一个。刘瑾当上司礼监太监后，为把持朝政，便每日不断变换花样地为武宗安排杂耍玩艺，专等武宗玩在兴头之时，取出奏章请武宗裁决批示。武宗几次不耐烦地说："总拿这些奏章麻烦我，要你干什么用?"以后，刘瑾便不再递交武宗，奏章到手，便按自己的意志裁断，传令官员执行。刘瑾本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常常把奏章拿到自己家中，与他的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及其狐朋狗友张文冕等商议处理，由他们拟写，再让同党焦芳作文笔上的润色。刘瑾善于揣合皇帝心意，武宗认为自己找到了得力助手，更加放手委任。刘瑾进一步擅作威福，令官员的奏章要先送给他，当时将这种本章称为"红本"，凡军国重务，没有不先报告刘瑾的。这时的武宗，完全成了一个挂名的皇帝，实际掌皇权的是刘瑾，以致当时人竟称刘瑾为"刘皇帝"了。刘瑾窃用皇权，拉帮结党，广开贿赂，打击陷害反对他的官员，朝臣数十人遭到残酷迫害，甚至被其折磨至死。为防止谏官——御史、给事中等揭发其罪行，还密布爪牙刺探，侦伺他们的言

行。武宗闭目塞听，只顾在豹房玩乐，朝臣只有等他偶尔入朝时，直接向他告发刘瑾。一次，武宗上朝，在他路过的御道旁发现一封揭发刘瑾不法行为的匿名信。随从的刘瑾见到后，当即令在场的三百余名官员跪在奉天门下，一定要检举出投掷之人，方肯罢休。直至日暮也毫无结果，官员们全被押入锦衣卫监狱，时值酷暑，有三名官员因狱气蒸熏而死，其他中暑而病倒者无数。这一时期的武宗，远离朝臣，刘瑾则"日夜在帝身旁"，千方百计使武宗玩得开心，武宗已是"一日不见(刘)瑾则不乐"。虽对其胡作非为有所耳闻，也是听之任之，甚至放言："天下任彼取之"。朝臣对把持皇权祸乱朝政的刘瑾已无可奈何。直至正德五年(1510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党之中的张永与刘瑾的尖锐矛盾，说服张永取而代之。张永凭借武宗对他的信任器重，秘密向武宗检举刘瑾的十七大罪状，并列举事例告发他有谋朝篡位的不轨之举。武宗听后异常惊惧，令连夜逮捕刘瑾。张永又劝武宗亲自去抄没刘瑾之家，得"伪玺"及其随身所带匕首等物。武宗大怒，命将刘瑾凌迟处死，并清除刘瑾奸党六七十人。

诛除刘瑾后，武宗贪好玩乐之心丝毫没有收敛。正德七年九月，又增建新豹房二百余间，指令各边镇的太监带领军士捉拿活虎活豹进献。武宗逞勇好武，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十几岁的武宗已经对那些平淡的筋斗杂戏之类不感兴趣，他要寻求更惊险的刺激——观看勇士与猛兽搏斗，这是他增建豹房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狡狠的武夫从此倍受宠幸。先是钱宁，此人狡诈善射，因而为武宗所喜，赐其国姓，收为义子。钱宁寸步不离武宗左右，武宗在豹房喝得酩酊大醉，即枕在钱宁身上酣睡。钱宁恃宠借威，朝臣对他稍有得罪，即中伤加害，又因其为人狠毒，一时举朝屏息，侧目相视。百官为消灾免祸，争相馈遗。但为时不久，钱宁就被另一武夫所取代。此人姓江名彬，本是边镇大同(今山西大同)的一个军士小头目，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曾身中三箭，其中一箭

从脸颊射进,箭头由耳穿出,拔出仍战。武宗听人介绍极为欣赏,召入豹房。江彬凶猛有力、善骑射,在武宗面前又能谈武论兵,武宗大喜。江彬自此每日陪同武宗在豹房玩乐。武宗好胜逞强,一次看别人斗虎还觉不过瘾,逞勇之心驱使他跃跃欲试,想让众勇士看一看他这真龙天子的非凡手段,不想刚一交手即被虎咬伤,他急唤钱宁来救,不想钱宁畏缩不前。危急之时,多亏江彬飞身窜入,才得解脱。武宗惊魂才定,反笑着夸口说:"我一人足可抵挡,哪里用得着你!"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非常感激佩服江彬而厌恶钱宁,从此疏远钱宁,宠信江彬。江彬心知不能为钱宁所容,自已在朝中又势单力孤,于是想借自己原来在大同的边兵来发展私人势力,便极力向武宗夸耀边镇之兵如何骁悍勇猛,胜过京城卫戍之兵,请武宗调人京城操练演示。朝臣强烈反对,武宗不听。正德八年正月,终于将辽东、宣府(今河北省北部之宣化)、大同、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四镇兵士调人京城,组成团营,由江彬等统领。武宗又另外选拔宦官中的善射者组成一营,号为中军,由自己统领。这位好武的皇帝,又要显示一下演兵布阵的武略,体尝这种大型游戏的乐趣。操演之时,武宗身披铠甲,与江彬一起,驰马舞剑,指挥操练。有时还统领其"中军",与江彬之团营两军对阵,演习厮杀。演练虽在皇宫、西苑等处,而呐喊声、火炮声震动全京城,闹得鸡犬不宁。江彬取代钱宁成了武宗的贴身人,并掌握了京城兵权,又向武宗推荐有"勇略"的边将许泰等人,召至豹房陪侍武宗,结为党羽。

新的玩乐方式,使武宗更加厌烦那种繁琐无味的视朝听政,群臣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才偶尔虚应其事,有时虽宣布视朝,官员们从早晨等至黄昏,他又传旨免朝,诸臣只得快快而回。正德十一年元旦,按例应举行庆贺大典,武宗不能不去接受群臣的朝贺。这天,文武百官、外藩使臣四更时便齐集宫门等候,足足等到下午,武宗才起床,在随身宦官、侍从的簇拥之下,懒洋洋地蹒跚而来。下午酉时(下午五点钟至七点钟)典礼开始,直到深夜才结束。百官

饥渴一天,好容易听得一声散朝,个个如大赦的囚犯夺路狂奔,你拥我挤,前扑后跌,互相践踏,将军赵朗竟被踩死在禁门之中,"午门左右,吏觅其官,子呼其父,仆求其主,喧如市衢,声彻庭陛"。

武宗常住豹房,朝中政务,则任凭司礼监太监魏彬及大学士杨廷和、梁储等人处理。大学士等与太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武宗也不干涉,充耳不闻,听之任之。武宗嗜饮,那些入侍豹房的武夫们,便常常进献精食美酒,与武宗一起畅饮,乘其昏醉,矫旨行事,甚至把一种叫做"罂粟"的药放入酒中,使其"终日酣酶,颠倒迷乱",以便他们窃权行私。

武宗不仅好逸乐,而且追求奢华,大事铺张,为此不惜动用巨额国帑大兴土木,宫中各殿务求整修华丽,其中以乾清宫的修饰最为豪华,费用也最大。每年正月,武宗都要在宫内布置绚丽多彩、式样新奇的宫灯,仅此一项就用银数以万计。正德九年正月,宫灯之火引爆了炮药,引起火灾,大火燃烧近一夜,将乾清宫焚毁。这夜武宗正观赏宫灯,大火燃起之后,他却带领群小离开此地,又去豹房取乐,临走还回头望望这场大火笑道:"此真乃一棚大焰火也!"而再修乾清宫,则加天下赋税一百万两。为了满足庞大的宫廷开支,除动用中央、地方库藏,及加赋于民,武宗还任用宦官直接敛财。主要措施是:派宦官扩充皇帝的庄园——皇庄,多征地租,皇帝带头进行土地兼并。弘治朝皇庄数目并不多,武宗即位后至正德九年,皇庄总面积已达 37595 顷,是弘治朝的 3 倍。其次是改官店为皇店,由太监经营获利,供奉宫廷。再有是由各地镇守太监定期向皇帝进贡,每人每次贡献白银都在万两以上。

再说江彬,为了进一步控制武宗,计划诱惑武宗作长时间的外出远游,于是多次向武宗称耀宣府的女乐工如何的美貌,并说在边镇宣府还可以看边兵打仗,那里的旷野上可以尽情地骑马驰骋,何必总待在小小的皇城内郁郁而居,还要受到朝臣的约束。武宗在宫中、豹房这些小天地内也已玩腻了,在这以前就已经几次到郊外

游猎。皇帝外出，是关乎朝政的大举动，为了不受大臣们的阻止，每次都要秘密私行，而且很快就得回来。回来后，群臣免不了又是一番劝谏。武宗不但不接受，而且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与江彬一行悄悄出京，向京北昌平(今北京市所属昌平县)进发。大学士梁储等闻知后急起直追。武宗到了居庸关，命人传令开关。巡关御史张钦拒命开关，手持“敕印”、宝剑，坐关门之下，正言宣称自己受天子之令守边关，有妄言开关者斩！武宗闻报大怒，命人逮张钦问罪。正好梁储赶到，苦苦劝导回京，武宗不得已，悻悻而回。不几日，武宗乘夜秘密出京，又至居庸关，派人刺探张钦的动向，得知其正在巡察白羊口，于是乘机强行开关急驰而出，并派谷大用代张钦守关，阻止追劝的朝臣。武宗一行来到了宣府，这里，江彬已提前为武宗修建了“镇国府第”，将豹房中的玩物、野兽、乐女及巡游中抢来的民女充实其中，武宗住在这里乐而忘归，称此处为“家里”。夜里，还时常闯入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掠妇女。随行士兵炊柴接继不上，便拆毁民庐，搅得宣府白昼闭户，市肆萧然。

不久，又离开宣府西去阳和(今山西阳高)，这时，正值蒙古兵骚扰阳和、应州(今山西应县东)一带，武宗闻报，心想这正是显示自己“勇略”的好时机，于是自命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并以此职征调附近军队“亲征”。十月，两军交战，武宗亲执武器，与张永、江彬等率兵冲杀。这一战，虽然蒙古兵死16人，最后退走，但明军伤亡几百人，武宗也险些被俘，多亏众将救护才免大难。武宗却认为取得了重大胜利，派人回京飞报大捷，自己率兵回宣府。闰十二月十六日立春，武宗一行在宣府迎春，安排了诸样杂剧欢庆，又装饰大车数十辆，上载和尚与妇女数百人，令他们互相打逗，武宗则观之大笑不止，以为乐趣。次年正月还京，武宗传令群臣于郊外远迎“威武大将军朱寿”凯旋。大臣们不得不遵从圣

旨，但这“朱寿”究竟是何许人？即便明知是武宗的自称，臣下又怎敢直呼皇帝之名——圣讳，于是在称颂其辉煌战果的彩幛上只写“威武大将军”。正赶上这天雨雪交加，众官员在德胜门外恭敬站立到夜晚，才看见这位大将军在无数火把的照耀下，坐骑赤马，身披战袍，腰佩利剑，由将士们簇拥着洋洋得意而来。大学士们忙迎上前去奉酒称贺，武宗一饮而尽，骄傲地向大臣们夸耀说：“朕在榆河亲斩虏兵首级一颗，你们可知道？”群臣连忙顿首称颂其神勇圣武，武宗好不畅快，面带喜色，飞身上马，不顾群臣，驰回皇城，当晚又“宿于豹房”。欢迎的百官可吃了苦，雨雪之中已站半日，此时是“仆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才得入城”，一个个狼狈不堪。此次巡游达半年之久。

武宗尝到了野游的乐趣，在京城已住不下去了，没过几天，再次北巡宣府，不料祖母去世，只好扫兴而归。

正德十三年三月，武宗借口祭祀祖宗山陵，第三次巡游。四月，由京西北转至密云（今北京东北密云）等地，江彬沿途掠获民女数十车，所过之处，民多逃亡，远近骚动。五月，自喜峰口还京。

事隔仅一月，武宗因怀念宣府“家里”，准备再次出巡西北，遂托言边关屡遭蒙古兵侵扰，命内阁草拟圣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阁臣从未拟写过这种不伦不类的诏旨，拒不从命，武宗将内阁大学士梁储等召至宫内，当面催促草拟，并拔剑威胁。梁储伏地哭谏，宁死不从。武宗无奈，不再令人草拟诏令，竟自称之。七月，武宗与江彬率兵士又开始第四次巡游，先来到宣府“家里”，住有月余，又免不了一番骚扰。当时山西、陕西乃至河南等地的百姓听说武宗出巡，吓得争相转告，扶老携幼，逃避山谷。家有年轻妇女者尤其慌恐，有的甚至不待礼聘即将女儿嫁人。十月，巡游大队西渡黄河至陕北榆林（今陕西榆林县），江彬令边吏进献虎豹犬马，并索要大批的金玉玩器衣裘。十一月，南到绥德州（今陕西绥德县），武宗宿于总兵官戴钦之家，纳其女。

武宗本好色之徒，在此以前，延绥总兵官马昂因罪被罢免，知武宗贪色，便把已嫁给指挥毕春的妹妹夺回，通过江彬进献给武宗，此女善歌又能骑射，为武宗所喜，纳入豹房，大受宠爱，马昂因此不仅复职，而且被升为右都督，宦官们皆称其为舅舅。武宗又听说马昂之妾甚美，想去他家一会，马昂没有应允，武宗大怒，马昂慌恐万分，只得把爱妾交给宦官献与武宗。此次巡游，江彬等到处为武宗物色美女，无论官家民家，已婚未婚，只要有姿色，便抢来供武宗挑选。江彬与随行士兵也借机强占官民妻女。十二月回到山西太原时，又大索女乐人。一次，于众乐伎中见乐户刘良之女容貌超群，而且能歌善舞，可一打听，此女已嫁与乐工杨腾为妻。武宗哪管这些，一心要霸占，离太原时，令人强行夺来带回宣府，此后，这刘氏之女便随侍武宗，宠幸超过诸女，被称作"美人"，江彬等近侍则称其为"刘娘娘"。此行共历时半年多，行程数千里。十四年二月，武宗等"远征"结束，满载金玉玩器、鹰犬虎豹、丽女美姬自宣府而归。

武宗回到京城不到一月，在江彬的引诱下，又准备到南方巡游。南巡之令刚下，就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先是大学士杨廷和等面见武宗，几天后，北京、南京的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又全体上疏劝谏，从上午辰时一直到下午申时跪于宫门外，请求收回南巡之诏。武宗的态度是称病不理。兵部郎中黄巩等人见毫无结果，也先后上疏，尖锐批评武宗宠信群小，使朝政先坏于刘瑾，再败坏于佞幸钱宁，并指斥江彬诸人引导皇上远出，是为了他们乘机搜刮百姓，天下人恨之入骨，江彬不诛则天下必乱。翰林院官员舒芬等人更直接批评武宗之南巡不过是侈心享乐，而不考虑百姓所遭到的苦累，现在南方之民闻听皇上又要南巡，已经吓得四处奔逃。这下可触怒了武宗、江彬诸人，立即将黄巩等人锁拏上枷，押入锦衣卫监狱，白天罚跪于宫殿前，夜晚入狱。舒芬等 107 人则罚跪午门之外。众官被罚跪 5 日后，仍坚持劝谏。武宗见群臣不肯退让，遂大施淫威，喝令杖责。江彬恨诸臣指斥其罪行，暗中令掌管刑狱者

加重责打，官员们被打得皮开肉绽，呼号之声响彻宫廷，有几人当即死于杖下。金吾卫指挥佥事张英，举章疏于端门外跪哭，然后用刀自刺其胸，血流满地，以死相谏，被卫士夺刀下狱，在狱中又遭杖责，结果伤重身亡。此次谏止南巡，遭廷杖而死者十五人，伤者无数，造成明代一次残酷的流血惨案。武宗见群臣态度强硬，也只好暂罢南巡。

七月，京城接到朱宸濠已起兵造反的消息，武宗认为机会来到，正好借口率兵南下"亲征"，借机巡游作乐。豹房的宦官、武夫们也积极为武宗谋划如何"亲征"。于是武宗传旨，命大学士杨廷和草拟敕令："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杨廷和上疏力谏，并反问武宗："陛下亲征，谁敢发令差遣？"武宗不听，便自称威武大将军，并威胁那些上谏疏的官员："再有敢妄言劝阻者，处以极刑！"这回武宗总算达到了目的，十四年八月，"亲征"大军出发。

车驾刚至离京城一百多里的涿州，忽报巡抚江南地区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已将朱宸濠之乱平定。武宗令将捷报秘而不宣，照原计划南行。到了山东临清（今山东临清）武宗又想起派人回京去接爱姬"刘美人"，偏偏刘姬以没有信物为由不肯前去。原来武宗临行时，刘姬因病不能同行，约定病愈派人去接，以玉簪为信物。不想武宗在芦沟桥一带驰马时遗失此簪，大索三天也未找到。于是武宗亲自在夜间乘小船从运河回京去接。随从大臣无人知晓，等发觉追之已来不及。武宗回来途中，正遇上湖广参议林文缵，便上了林的小船，并强夺林文缵的一个爱妾，带至临清。武宗由临清至济宁，顺流而下徐州，沿途所至，一片水乡，以捕鱼捉鸟为乐，另觉一番情趣。所过之处，地方文武官员听说圣驾到来，皆步行迎送。江彬等借机传旨，向这些地方官征索，不顺其意，便命军士拷打。通判胡琮惧受其辱，竟上吊自杀。江彬还不时派出官校到百姓家假传圣旨，索要鹰犬珍宝古玩，每停留一地，三四百里之内无得免

者。十二月初，到了扬州。太监吴经先期赶到，强占民居，改为“威武大将军府”。又矫旨遍寻处女、寡妇，扰得居民惶惶不安。一夜之间，有女之家皆为女儿寻找单身男子作配偶，甚至拉郎相配。吴经将秘密探得的处女、寡妇倡优之户暗作标记，夜间派人闯人掠掳，有藏匿者，竟拆墙毁屋，直至搜出为止。掠夺来的妇女完全寄存在尼姑庵，一时哭号震远近。富户人家以钱财贿赂将人赎出，贫者多自杀，余下的被送人“威武大将军府”。武宗在扬州一住数日，每天在城郊打猎，随行兵将强迫当地百姓为他们充当猎手。数日后，大军进发南京，又在南京游玩数月。

南下的军队有一部分已由宦官张永、张忠率领先期赶到杭州、南昌。张忠、许泰所领一支为夺取王守仁平叛的战功，在南昌大肆搜捕朱宸濠逆党，“士民被诬陷者不可胜计，诛杀刑戮，甚于宸濠之乱。”他们原来还准备让王守仁等武宗大兵来到江西时，将朱宸濠释放于鄱阳湖，由武宗再亲自擒拿，来迎合武宗好胜逞强的心理，表明这位“圣武”帝王“亲征”的战果。王守仁闻讯急忙赶至杭州，向张永陈述说，江西兵乱之后，已经是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大兵再至，乱将不测。他要求张永将朱宸濠带回南京交与武宗，并由他重新报捷，捷报上写明自己完全是按照“威武大将军”的战略指导，才讨平了叛乱，还把随武宗“亲征”的诸宦官、武夫幸臣的名字也全部列上。征得张永同意，由张永说服了武宗，不再来南昌，这才免去了江西地区的再次浩劫。

武宗没有亲自捉拿到朱宸濠，总觉不惬意，于是在十五年闰八月，于南京搞了一个可笑的受俘仪式，命人在受俘广场上，中间树立威武大将军旗帜，四周由全副武装的军士围成一圈，将朱宸濠卸去枷索放人场中，武宗身穿上阵杀敌的铠甲，在兵将们的击鼓声中，冲人场中，与朱宸濠格斗，将其擒拿，重上桎梏，然后再接受献俘。这场闹剧演完了，武宗才觉心满意足，在随行大学士的再三劝谏之下，决定“班师”。

北返途中，武宗还恋于水乡的乐趣，一路捕鱼射雁。九月至苏北清江浦，武宗驾舟划入一个名叫积水池的地方捕鱼，不想船翻落入水中，左右保驾者慌忙跳下水去将其捞起。武宗贪恋酒色，本来就身体虚弱，此次溺水后便身罹大病，急忙北返。江彬这时还在劝诱武宗北上宣府"家里"。武宗实在是身体支持不住了，只得作罢还京。十二月，文武百官迎驾于正阳桥，大阅军容。武宗一行将叛军首级悬挂竿上，令俘虏及其家属跪列道旁。这位"威武大将军"还强打精神，身穿戎服，站于正阳门下，与百官检阅亲征的大军及其"赫赫战果"。

十四日，因凯旋在南郊大祀天地。武宗拜天时即呕血于地，不能终礼，只得草草收场回城。正德十六年三月，这位荒嬉无度的顽主皇帝，终因玩乐伤身，病入膏肓，死于他恋恋不舍的豹房。时年31岁。

武宗在荒嬉之中度过了他16年的皇帝生活。这16年中，他怠于从政，前期，宠用大太监刘瑾等奸人，造成极端腐败黑暗的朝政；此后，又在流氓式人物江彬的怂恿愚弄下，到处进行儿戏式的巡游、"征讨"。每次出巡征讨，随行人马成千上万，甚至不下数万，供应之费累及数省。随从奸幸，横行州县，索骗财物，抢男霸女，所至之处，官民遭难。正德朝，本来各地灾荒就很严重，民力困敝，百姓不堪横征暴敛，复遭骚扰掠夺，反抗暴动此伏彼起。弘治朝的所谓"中兴"局面被武宗一手断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明王朝的四次藩王之乱，有两次出现在正德朝，即正德五年的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之乱和十四年江西发生的朱宸濠之叛。武宗死后，明廷内部进行了一场惩处江彬及其党羽、打击裁汰宦官的政治斗争和剔除一系列弊政的改革，才缓和了社会矛盾，延续了朱明王朝的统治。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明史·武宗本纪》。

《明通鉴》弘治十八年——正德十六年。

《明武宗外纪》。

刘六、刘七起义

明朝为了保证军用马匹来源充足,自明初以后就签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正统以后,又令京畿百姓代官府饲养寄养马。所谓寄养马,就是从喂养种马地区征取孳生的马匹,送到京城附近寄养,可以随时取用的马。马户平日饲养马匹颇为辛劳,而且一旦种马死或小马孳生数不足,寄养马死,马户都得赔偿。当时皇室和勋贵在这里广占庄田,马户的草场不断受到侵吞,饲料短缺,官吏又催督苛急,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被迫变卖田产甚至于鬻卖儿女以偿其债。老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反抗也日渐强烈。有些因失掉田产而无法生活的农民,聚集起来,组织马队,劫富济贫,反抗官府,经常骑马驰骋在今华北平原一带。明朝统治者称之为"响马盗"。

正德年间,刘瑾专权,当时京师南边的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响马盗"极为活跃,为了稳定京师之根本,于是在正德四年(1509 年)九月,就派出了"捕盗御史",派甯杲往真定,殷毅往天津,薛凤鸣往淮阳,分路缉捕。甯杲建立什伍连坐法,即一家有人为"响马盗",左邻右舍皆受牵连而遭惩罚。此法一时立竿见影,捕获很多,致使百姓人心惶惶。甯杲和殷毅则被刘瑾提拔为佥都御史。

正德五年十月,在"捕盗御史"的淫威下,穷苦百姓终于在杨虎、刘六、刘七的领导下在霸州揭竿而起,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杨虎,河北交河县人,是著名的"响马",屡受官军追捕。

刘六名宠，弟弟刘七名宸，是霸州文安县人。兄弟俩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胆识过人，颇有本领。他们起义后，周围百姓群起响应，很快就达到数千人。他们拥有很多马匹，行动迅速，"一昼夜驰数百里"，官军莫奈其何，"捕盗御史"不敢抵敌。不久，文安生员赵鐩，也与他的两个弟弟率五百人加入起义军队伍。

正德六年，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来去迅疾，势如风雨。三月，一路攻破滨州、临朐、临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曲阜及泰安等地，官军疲于奔命。吏部尚书杨一清提出用大将及文臣有才望的人，提督军务。于是，明政府命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召马中锡为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率京营兵征讨。六月，起义军分两路出击，一路以赵鐩、刘三、邢老虎、杨虎率领进攻河南，一路以刘六、刘七为首，横扫山东。两路义军，时分时合，遥相呼应，互为倚重，打击官军。

杨虎率军由河南攻山西，又从山西往东攻入河北，一路所向披靡，诸城望风而降，过泰安时，赵鐩题诗有"纵横六合谁敢捕"之句，可见当时起义军势力之盛。刘六、刘七率军越过山东，进人河南，然后又突入湖广、江西，又从原道顺势攻占长清、齐河等县，纵横所向，如人无人之境。张伟与马中锡因无法制服义军，被兵部尚书何鉴弹劾，被论下狱，马中锡死于狱中，张伟革职闲住。明遂派伏羌伯毛锐充总兵官，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再发兵征讨。

正德六年八月，两路义军会师霸州，直逼京师，京城戒严，明政府急忙命兵部侍郎陆完率领京营和边军回师救援。义军避其锋芒，再挥师南下。十月，进入山东，连破日照、海丰等十余城，济宁一战，又焚毁明朝运粮船一千二百艘，给明王朝以极大的打击。

十一月，杨虎在夏邑（今河南夏邑县）小黄河（黄河故道）战斗中落水牺牲。起义军推刘三（名刘惠）为领袖，刘三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更名怀忠，称副元帅，并进行了一番整顿，建立前、后、

左、右、中五军，置五军都督，分二十八营，以应二十八星宿，各树大旗为号，还特地树起了两面金字大旗，上写："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①] 这个口号继承了元末红巾军的传统。同时严申纪律，不许抢掠，不许妄杀。正德七年二月，邢老虎病死，赵鐩将其部众并入己部，一时号称十三万，骑兵五千，转战襄阳、樊城、枣阳、随州、新野一带，又攻破泌阳，火烧前大学士焦芳家，并掘其祖坟，焦芳仅以身免，赵鐩命取焦芳衣冠挂在树上，一一数落焦芳的罪行，命义军战士挥剑砍之，说："我亲手杀了这贼，以谢天下。"这时，明朝派都御史彭泽和咸宁伯仇钺率军全力围剿义军，赵鐩和刘三屡屡失利，遂退到固始、颍州等地。四月，又连败几次，闰五月，为了摆脱困境，赵鐩与刘三兵分两路出击，刘三自河南入罗田，攻黄陂，明兵紧追不舍，由黄陂到达桐柏、南召，刘三只有十七骑相随，明指挥王瑾用箭射中刘三左目，刘三纵火自焚，英勇不屈，壮烈牺牲。赵鐩由东北赴凤阳、泗州，最后到湖广应山县，这时，义军首领张通、陈翰相继率众投降官军。义军实力大减，在应山县东化山坡下，碰到僧人真安，于是赵鐩就削发为僧，潜渡长江至南岸，准备进入江西，再图大举，不幸在江夏（今武昌）被俘。赵鐩和其他被俘的义军将领三十七人被送到北京，赵鐩等六位主要将领被处以残酷的剥皮之刑，其他均被处磔刑。

刘六、刘七率领的那支义军，于正德七年四月，遭明军十万人合围于登州嵩浅坡、古县集等地，刘六、刘七部众死伤三千余人，他们率精锐突围，再从山东攻入河北，进至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大败明军，杀明参政王杲，再次威胁北京。起义军转攻冠县、邳州，渡河到固始。这时，刘三、赵鐩均已兵败牺牲，明官军集中兵力向刘六、刘七疯狂扑来，刘六、刘七孤军奋战，遂引兵南下湖广。为了摆脱官军的追捕，他们弃马登舟，沿长江东下，在武昌捕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45"平河北盗"。

获湖广巡抚都御史马炳然，并将其处死。在黄州的战斗中，刘六战败，与其子刘仲淮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继续统率义军，沿长江攻克了九江、湖口、安庆、太平、仪真等地，三过南京，往来自如。但是水战毕竟不是惯于骑射的义军的长处，七月的一天晚上，飓风大作，官军乘机用火炮和炸药，炸沉了义军的船只，义军只好放弃船只，登陆占据南通狼山，抗击官军。明朝副总兵刘晖率辽东兵，千总任玺率大同兵，游击郤永率宣府兵，围攻狼山，义军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亦英勇战死，不少部卒跳崖自杀。

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持续三年，转战南、北直隶及山东、河南、山西、湖广、江西、安徽诸省，曾几度威胁明朝京师，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统治者，这是明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45“平河北盗”。

高岱：《鸿猷录》卷12“平河北盗”。

《明史》：“陆完传”、“仇钺传”。

寘镭之乱

朱寘镭是庆靖王朱栴的曾孙。朱栴是朱元璋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封王，二十六年就藩宁夏。弘治五年（1492 年），朱寘镭嗣王爵。朱寘镭一向有异心，同宁夏生员孙景文、孟彬等往来频繁。有个叫王九儿的男巫每次见到朱寘镭，都称他为“老天子”，说他有帝王之相，迟早将至九五之尊。朱寘镭颇为得意，暗中就加紧密谋。

当时刘瑾派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去丈量田亩，周东对待屯垦的士卒颇为刻薄，肆意勒索，激起了戍边将士的愤懑。孙景文遂劝朱寘镭借机拉拢这些士卒。朱寘镭令他在家中摆酒，招揽那些受辱的将士，孙景文依计而行，邀请了丁广、杨泰等。席间，孙景文用言辞煽动他们，并大肆宣扬朱寘镭的德行，致使丁广、杨泰等对朱寘镭死心踏地地跟随。并歃血为盟，结成了一批死党。之后，朱寘镭又拉拢了平卤城戍将张钦等十多人，暗中积极准备，伺机反叛。

正德五年（1510 年）四月，边境告急，游击将军仇钺和副总兵杨英，率兵出防，总兵姜汉选士卒六十人为牙兵，令指挥周昂带领。周昂是朱寘镭的党徒，马上与朱寘镭密谋。初五日，朱寘镭遂置酒设宴，邀请巡抚安惟学、总兵姜汉、少卿周东、镇守太监李增、邓广汉及其党徒何锦、周昂、丁广等。安惟学、周东推辞未去。席间，何锦、周昂率牙兵闯入宴会厅，杀死了姜汉、李增等。丁广则率兵将安惟学、周东杀死于公署，放火焚毁了官府，打开监狱，释放囚徒，

将黄河的渡船统统撤到西岸，防止有人渡河。遂举叛旗，命孙景文写了檄文，数落刘瑾的罪状，说他“内外交结，图谋不轨”。今举“义兵”，以图“清除君侧”。以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左右副将军，孙景文为军师，张钦为先锋将军，魏镇等七人为都护，朱霞等十一人为总管。陕西守将把朱寘𬭎等刊印刘瑾罪恶的告示、檄文封奏上报，刘瑾获知，藏匿不报。

朱寘𬭎反叛之时，游击将军仇钺正驻兵于玉泉营，朱寘𬭎不久就派人招降，仇钺担心叛军大兵压境，于是就假装答应，并率部还镇，朱寘𬭎将其部众遣散，分给其部将统领。仇钺单骑归家，整日装病，暗中则招纳游兵壮士，并派人与城外之明官军联系上。总兵曹雄约仇钺为内应。获知官军很快就要来了，仇钺就施计以分散叛军势力，说：“应当赶快把守渡口，防止决堤灌城，并阻止东岸的官军，不让他们渡河。”何锦果真听信了他的话，率领都指挥郑卿等三千人，把守渡口，留周昂把守城池。

四月二十三日，朱寘𬭎在城外举行祭祀典礼，派人请仇钺陪祭，仇钺又称病不出。周昂亲自来看视病情，仇钺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突然伏兵将周昂擒获，并将其杀死。仇钺当即起床披上铠甲，跨上战马，率领壮士一百多人，直奔安化府，将孙景文、朱霞等十一人斩首，并将朱寘𬭎及其儿子朱台溍擒获。城内叛军顿时土崩瓦解。然后他又假传朱寘𬭎的命令，令何锦回城，暗中把朱寘𬭎已经被擒获的消息告知其部卒。郑卿反正，击杀胡玺、魏镇等十多人，何锦的士卒全都溃散。何锦、丁广、张钦、杨泰见势不妙，赶紧西逃，追兵紧追不舍，在贺兰山附近，将他们全都抓获。至此，朱寘𬭎叛乱就彻底失败了，从举事到起兵前后只有十八天。

朱寘𬭎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武宗派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太监张永总督军务，太监陆訚管领神铳，以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率兵征讨。朱寘𬭎被擒的消息传来，大军正在路途中，武宗当即命神英率兵回还，张永及杨一清仍往宁夏。一路上，杨一清发

布文告，以安定民心，并以宽厚为本，对从逆之人多从轻处理。八月，太监张永回京，杨一清仍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削夺庆府护卫，并将朱寘镭、何锦、丁广械送京师，全部处斩。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44“寘镭之叛”。

《明史》：“仇钺传”、“杨一清传”。

宁王之叛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封第十七子朱权为宁王,两年后,朱权就藩大宁。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以计挟朱权迁北京,即以其地给朵颜三卫。永乐元年(1403 年)改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 年),朱权死,其孙朱奠培嗣位,天顺间因罪削去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弘治四年(1491 年),朱奠培死,其子朱觐钧嗣位。弘治十年,朱觐钧死去,他的儿子朱宸濠嗣位。正德十四年(1519 年)六月,朱宸濠发动叛乱。

早在刘瑾专权之时,朱宸濠就心怀不轨,他大肆贿赂刘瑾。正德二年五月,使他得以恢复护卫。他招纳一些江湖术士,有个叫李自然的声称知"天命",说朱宸濠应当为皇帝。李日芳则称南昌城东南角有天子气,朱宸濠就派人在那儿建了一座书院,叫做阳春书院。这些江湖术士进一步助长了朱宸濠的野心。刘瑾垮台后,朱宸濠的护卫又被削夺了。他又想方设法,以图恢复。正德八年十一月,与他素有交往的陆完被升为兵部尚书。陆完曾为江西按察司,朱宸濠对他大肆拉拢,说:"陆先生将来一定会位居公卿。"陆完亦有心依附他。陆完升为兵部尚书后,他们就互通书信,积极为恢复护卫谋划。当时伶人臧贤为明武宗所宠爱,臧贤的女婿司钺正充军于南昌卫。朱宸濠就通过司钺同臧贤挂上了钩,同时亦暗中勾结武宗的左右近倖钱宁、张锐等人。在他们的合力帮助下,正德九年三月,宁王朱宸濠的护卫又得以恢复。

在勾结诸近倖佞臣的同时,朱宸濠亦积极向明武宗献媚,借

以获取武宗的欢心。武宗是个极其荒唐的皇帝，喜欢新颖奇巧的玩物，朱宸濠就投其所好。正德九年，朱宸濠献来新鲜四时灯数百，耗费数以千计，穷极奇巧，以应宫中一年一度的灯节，颇合武宗的心意。

恢复护卫后，朱宸濠更加肆无忌惮，他招纳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日夜谋划，与刘养正谈论宋太祖陈桥兵变之事；将"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一百多人养于府中，号称"把势"。他自称国主，将护卫改为侍卫，并且强占民田民宅。

对于朱宸濠的所作所为，朝中不少官吏看得很清楚，不断有人揭发，但丝毫不能奏效，揭发之人反而受到迫害。正德十年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上疏弹劾朱宸濠之无道与非法行为，朱宸濠虽一时有些担心，过后不久，即反诬胡世宁"离间亲情"，大肆诽谤，胡世宁当时已升福建按察使，被诬下狱。从福建至京师途中，朱宸濠几次对他要下毒手，他都侥幸躲过来了。回到北京，胡世宁被打入锦衣卫狱，后来又差点死在狱中。正德十二年，宁府典宝阎顺，内官陈良、刘良等赴京揭发朱宸濠诸不法事，朱宸濠派承奉刘吉贿赂钱宁等，此事又遮掩过去了，而阎顺等则被充军孝陵卫。朱宸濠怀疑承奉周仪是阎顺等人的幕后指使人，于是就把周仪及其家属六十多人全都杀害，还杀了典仗查武等数百人。

对弹劾他的朝臣，朱宸濠大肆报复，对在江西的官员则多拉拢，拉拢不成就予排挤。正德十一年九月，朱宸濠想夺官池，左布政张嵿不同意，于是他就派承奉刘吉送张嵿一盒礼品。张嵿打开一看，是枣、梨、薑、芥四种水果，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当即对刘吉说："我知道了，是想要我早离开江西境界。我是朝廷命官，行动岂是别人所能干预的！"当即让朱宸濠碰了一鼻子灰。次年五月，他就贿赂钱宁暗中嘱咐吏部，将张嵿升为光禄卿，使之离开江西。巡抚孙燧对朱宸濠的反迹看得很清楚，每当朱宸濠派兵四出劫掠民财，孙燧一旦发现就予缉捕。正德十三年十月，抓获了一头目吴十

三,朱宸濠担心泄漏其阴谋,暗中派人劫狱将吴十三抢回。孙燧就成了朱宸濠的眼中钉。正德十四年,江西大水灾,朱宸濠派其党羽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等趁机劫掠,孙燧派兵追捕,最后凌十一等三人只好躲在朱宸濠家祖坟林地中,方才逃脱。朱宸濠当即致书给陆完,希望马上调走孙燧,孙燧先后七次上疏弹劾朱宸濠,揭露其阴谋,都给朱宸濠途中劫获,不得上达。鉴于朱宸濠是皇帝懿亲,不敢先发制人,孙燧就自劾乞休,也不得报。

看到明武宗没有子嗣,东宫虚悬,早在正德十一年时,朱宸濠派人进京贿赂钱宁等,希望他的长子能入继大统,就求钱宁、臧贤等取"中旨"以入太庙司香为名,召其长子进京。钱宁等将此事告知于明武宗,明武宗"用异色龙笺等,加金报赐。"按惯例,异色龙笺,是用来赐监国书笺的。朱宸濠收到明武宗的异色龙笺,自以为得计,当即列仗受贺。但事情总有不顺心的时候,当时江彬红极一时,钱宁与他颇有嫌隙。依附江彬的太监张忠亦往往借机倾轧钱宁。正德十四年五月的一天,依附江彬的太监张忠对明武宗说:"钱宁、臧贤常称颂宁王,陛下以为如何?"明武宗回答:"推荐文武百官,使其忠于职守,但推荐藩王又是为什么呢?"张忠趁机说道:"臧贤称宁王孝顺,是在讥讽陛下不孝。称颂宁王勤政,是在讥讽陛下不勤。钱宁、臧贤交结宁王,图谋不轨,陛下难道不知道吗?"武宗一听当即明白,马上下令在京城搜捕朱宸濠的密探,派驸马都尉崔元等去江西收其护卫,并令归还所夺官民田。朱宸濠终于感到了危机,于是加紧谋划叛乱。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朱宸濠的生日,他在北京的密探林华恰于这日赶回南昌,将北京发生的情况告知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大惊,当即决定次日趁百官拜贺之时发动叛乱。次日早晨,他会同其党羽刘养正、李士实、吴十三等带兵入侍,朱宸濠登上一高台,大声嚷道:"皇太后有密旨,命令我起兵入朝监国,你们知道吗?"孙燧立即说:"密旨在哪里?"朱宸濠说:"你不必多言,我现在往南京,

你肯保驾吗?”孙燧和按察司副使许逵当即大骂“反贼”,朱宸濠命令将二人处斩,行刑之时,许逵骂道:“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参政王纶、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等归附朱宸濠。朱宸濠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集兵号称十万。七月初一,朱宸濠留宜春王朱拱樤、内官万锐等守南昌城,自率朱拱栟、李士实、刘养正、闵廿四等六万人,以刘吉为监军、王纶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载其妃嫔、世子共一百四十余队,分五路出鄱阳湖,顺江东下,直奔安庆。

提督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当时正在江西,遂移檄远近,揭露朱宸濠的罪行,起兵征讨。他早就察知朱宸濠的反叛情形,叛乱一发生,他就从赣州抵达吉安,与吉安知府伍文定合兵,传檄各府州县,派兵前来会剿,诸县纷纷响应。王守仁遂集中优势兵力,避开朱宸濠的主力,直捣其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攻克南昌,活捉朱拱樤和万锐,并马上安定城中百姓,严禁士卒骚扰。朱宸濠围攻安庆,久攻不克,闻知南昌失守,颇为恐慌,马上掉头西上,王守仁集中精锐迎敌。二十四日,在黄家渡大败宁王的叛兵,晚上宁王军船停泊在黄石机,其下属有说“黄石机”者,宁王以为是“王失机”,马上将他杀了。次日,宁王又败,退保樵舍(今南昌东北方向),联舟为方阵。二十六日,王守仁指挥士卒以火相攻,朱宸濠大败,诸妃嫔全都投水而死,士卒死者达三万多人,朱宸濠及世子、郡王、仪宾,并李士实、刘养正、王纶、吴十三、凌十一等都被活捉。朱宸濠见到王守仁,大喊:“王先生,我想全把护卫削夺,自请降为庶民,行吗?”王守仁厉声说道:“有国法在。”朱宸濠只好低头不语。最初起兵时,其妃娄氏哭泣劝阻,朱宸濠不听,被活捉后,他在槛车中哭着对人说:“以前商纣听信妇人的话亡了国,我则以不用妇人话失了藩王位,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王守仁派人打捞起娄氏的尸体,给以安葬。

朝廷一闻知朱宸濠叛乱,立即收捕了都督钱宁、优人臧贤、尚

书陆完，并将其下狱。明武宗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当即决定亲征。八月二十二日，正式亲征，明武宗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率江彬、许泰、宦官张永、张贵等出征。行进到良乡时，王守仁的捷报已经送来，但武宗不肯失去这样一次绝好的游玩机会，他将王守仁的捷报秘而不宣，一路游玩过去。九月，到达临清。为了接刘美人，在此耽误一月。十一月，过济宁、徐州，十二月底始抵达南京，一路上，或捕鱼，或打鸟，随意闯人百姓家中，肆意骚扰。

江彬等对王守仁的功劳很嫉妒，他诬陷王守仁与朱宸濠是一伙的，只是担心事情不能成功，于是就将朱宸濠抓获。正德十四年九月，王守仁把朱宸濠带到杭州，遇上了太监张永。王守仁对张永陈述了战乱之后江西之困敝情况，极陈再也不堪忍受大军之骚扰了，要张永阻止武宗不要听信谗言而来江西巡幸。然后王守仁就返回江西。张永则北上见武宗，极力陈述王守仁之忠心。张忠则说："王守仁到了杭州，竟不来见皇上，陛下试召见他，他一定不会来。"武宗果真派人召见王守仁，王守仁又立即北上，到达龙江时，张忠怕失帝意，又从中加以阻挠。王守仁极为气愤，于是换上道服，马上上了九华山隐居去了。张永说："现在大家都在争功，王守仁却弃官入山为道士，他的忠心于此可见。"明武宗遂解除了对王守仁的疑心，答应让王守仁"重上捷音"。正德十五年七月，王守仁再次报捷，在捷报里写上"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一类话，并且"尽人诸嬖倖名"。

正德十五年闰八月，明武宗在南京搞了个很滑稽的受俘仪式。明武宗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劳，特地在一个大广场上，他穿着戎服，诸军环侍左右，设置大旗。然后把朱宸濠放掉，打开他的镣铐，诸军击鼓鸣金，武宗跨上战马，将朱宸濠抓获。之后，再行献俘礼，将朱宸濠囚禁。十二月，武宗回京行到通州，赐朱宸濠死，将之焚尸

扬灰。回到京师再将其同党处以磔刑。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47“宸濠之叛”。

《明史》卷195、卷117、卷117。

《明通鉴》卷45至卷49。

大礼议

嘉靖前期，明廷君臣之间及大臣之间就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的尊号及祭祀等级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由于事涉宗法制度、帝系大统，所以这场辩论称为大礼议，又称议大礼。

大礼议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明武宗无子，死后没有特别合适的继承人。正德十六年(1521 年)三月十四日，武宗死于豹房。可惜的是，这位风流一世的年轻皇帝居然没有留下一个儿子以接替他君临天下。他不但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弟弟，其父孝宗就他这一根独苗。那么由谁来继承皇位呢？这个问题在武宗死后迫切地摆在了廷臣与太后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学士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勇敢地站了出来，大家经过商议决定依“兄终弟及”的祖训，以武宗遗诏的名义立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

兴献王朱祐杬为明宪宗第四子。宪宗共有十四子，长子、次子都已夭折，皇三子朱祐樘(即后来的孝宗)是事实上的长子。那么四子兴献王也是事实上的次子。这就是说，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和孝宗之子武宗血缘关系比较接近。所以说，杨廷和等人拥立厚熜是在武宗无子、无弟又没有指定接班人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不过从当时情况来说，立武宗的其他堂弟也说得过去，在这个意义上说，朱厚熜能登上皇位是杨廷和与张太后的功劳。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应召来到京师郊外。大臣们准备让他以武宗太子的身份进京继位，他坚决不同意。后来张太后出面调停，廷臣作了让步，答应了厚熜以奉迎皇帝礼入京登基的请求。当

天中午(二十二日),朱厚熜正式继位,改明年为嘉靖元年。是为嘉靖帝,后庙号世宗。

嘉靖帝继位的第六天(二十七日)便命令百官议其生父兴献王的尊称,大礼议从此开始。大礼议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议"考",即是否称兴献王为考(即父亲)。

嘉靖帝议其生父尊称的谕令下达以后,大学士杨廷和以汉定陶王(汉成帝无子,立共王子定陶王为皇太子,后为哀帝)、宋濮王(宋仁宗以濮王十三子为太子,后为英宗)故例为据,主张嘉靖帝称孝宗为皇考(实际是伯父),而称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实为生身父母);以益王子崇仁王厚炫过继给兴献一系,称兴献王为考,称其生父益王为叔。嘉靖帝认为父母不可轻易乱改,让大臣重新商议。

正德十六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后改名孚敬)上《大礼疏》,提出应给兴献王立庙京师,事实上等于承认兴献王的皇考地位。

至此,议大礼的两派都已加入战团。杨廷和等人称濮议派,张璁等人称新贵派。嘉靖帝自然与后者站在一起。

嘉靖得了张璁的奏疏后喜出望外。他提出要称生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但大臣们不同意。到了正德十六年九月,帝之生母兴献王妃来京。她听说廷臣欲令嘉靖帝以孝宗为考,遂拒不入京,留驻通州达九日。嘉靖帝哭哭啼啼,甚至提出要弃位归藩,以奉其母。大臣无奈,只好让步,议定:称兴献王为兴献帝,王妃为兴献后。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嘉靖帝要求改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大臣们那儿自然通不过。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清宁宫小房失火。这位非常迷信的小皇帝便听从了廷臣的建议,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不加"皇"字。至此总算有了一个结果。这里称孝宗为皇考,是嘉靖听从了大臣的意见;称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虽然离廷臣的皇叔父兴献王的最初方案差得很远,但是终究未加"皇"字,算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元年三月正式将这一结果确定下来,称本生父为"兴献帝",本

生母为"兴国太后"。

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和张璁联合上奏，认为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立庙大内。此疏打破了自元年正月以来暂时的平静，大礼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三年正月在杨廷和多次请求之后，嘉靖帝准其辞职，从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去掉了一大障碍。到此时嘉靖帝已不满于在兴献帝的称号上再加皇字(即兴献皇帝)，他要按张璁等人的方案称生父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为此，他召张、桂二人入京共商大事。

三年七月十二日，嘉靖帝突然将百官召至左顺门，宣布：其生母的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去掉"本生"二字。这意味着将要称生父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了。大臣们心里都非常明白，所以七月十五日罢朝之后，在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等人的号召下，廷臣二百余人跪伏于左顺门外请愿。嘉靖帝先后两次派司礼太监谕令群臣退去，然而无济于事。嘉靖帝大怒，命司礼监记下各官姓名，并将丰熙等八人打入狱中。丰熙等人的被抓不但没能使事态平息，反而引起了众怒。于是翰林院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一时间群臣皆哭，声震阙廷。嘉靖帝见状凶相毕露，他命令锦衣官校当场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七月十七日，他下令将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遭廷杖者共有一百八十余人(请愿当天逃跑者后又被抓回)，其中王相等十七人先后受杖而死。

嘉靖帝以高压政策制服了群臣，接着便改称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三年七月)，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三年九月)。他总算达到了目的，从关系上说，生父终于可以称"皇考"了，从地位上说，生父也得到了皇帝的称呼。

本来，孝宗确实是嘉靖帝的伯父，兴献王是父亲。但由于此事关系到宗法大统和古代礼制，所以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杨廷和等人坚持以孝宗为考，主要理由是：第一，定陶王、濮王事

例;第二,祖训"兄终弟及"指的是"同产"而言(即同父母或同父);第三,大小宗有别,孝宗、武宗一系为大宗,兴献王为小宗。嘉靖帝继位便是入继大宗,应与小宗的兴献王断绝父子关系。杨派诸臣自以为坚持真理,所以拼死力争。仅就杨廷和本人来说,他与嘉靖帝之争含有首辅与皇帝争权的成份。由于他曾定策迎立嘉靖帝,况且这位新天子当时才十四、五岁,在朝廷又毫无基础,所以在嘉靖初年的朝廷中杨廷和曾一度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嘉靖帝后来曾指责杨廷和自恃有功,"门生视朕",说明杨廷和有时想左右嘉靖帝。杨的有些做法也确实不尽妥当,如嘉靖帝来京继位时,以他为首的廷臣竟要求新皇以武宗太子的身份继位,未免过分。不过总的说来,在议大礼过程中杨廷和等人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况且他们不逢迎皇帝,私心较小,代表了当时的公论。如果嘉靖帝稍微宽厚一点的话,那么元年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的方案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嘉靖帝是一个虚荣、自私、执拗的人,他不断地提出无理要求,为了满足私心,竟然棒打群臣。

至于张璁一派,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理由,第一,嘉靖帝没有被孝宗或武宗预养于宫中,也没有亲口答应做孝宗之子,故定陶王、濮王事例不适合于此;第二,礼实际上是人情,嘉靖帝继承的是太祖的皇统,不是孝宗、武宗的皇统,继位以后不一定非得继承孝宗的世系,做孝宗之子;第三,礼的制度中有长子不得过继给人的说法,而兴献王就嘉靖这么一个儿子;第四,武宗遗诏只云"继位",未说做孝宗之子。张璁这个人早有从政之志(或说野心),对古礼颇有研究。大礼议开始之后,他认为这是实现政治抱负的良机。所以说,张璁议礼有政治投机的一面,也不无坚持己见、学术之争的一面。他的有些观点,是与嘉靖帝偶然相合的,不过总的说来,这一派(包括张在内)迎合皇帝的时候居多。

至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成,对议礼进行了总结。与此同

时，张璁一派加官晋爵，扶摇直上，杨廷和一派则受到了空前打击。

议礼的第二步是议庙。

大礼议进入第二阶段集中讨论了嘉靖帝生父庙的地点及祭祀的等级。

早在嘉靖三年三月，嘉靖帝便要求在奉天殿西侧之观德殿存放其生父的"神主"（牌位），但遭到了廷臣的反对。七月十七日，在群臣被打得皮开肉绽之际，"献皇帝"的牌位却堂而皇之地由安陆迁到了大内观德殿中。

四年四月，在第一步议礼结束之后，光禄寺丞何渊又无事生非，请求建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庙。对此嘉靖正求之不得。张璁等人觉得这样做从礼的角度实在说不过去，因为兴献王生前没有当过皇帝。为了不得罪皇帝，他便建议于皇城内别建一庙。四年六月，嘉靖帝命令于太庙之左建庙，取名"世庙"。五年七月，世庙建成。到了十五年十月，嘉靖帝这时对礼似乎已了解更多些了，他认为"世"字以后应作为他自己的庙名，所以将世庙改为"献皇帝庙"。

议礼的第三步是议乐舞。

建庙以后便要按一定的等级（天子或藩王）来祭祀，祭祀时就得用相应的乐舞。

按照古代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早在嘉靖二年二月，大臣认为，安陆的"本生父兴献帝"庙乐舞要较天子略低一等，但嘉靖帝坚持用八佾。

到了嘉靖六年，皇城内的世庙已经建成。首辅费宏等人议定，世庙只用文舞。还是张璁善解帝意，他提出洪武初规定太庙中乐舞是文武各八佾，所以世庙也要与之相同，文武乐舞各八佾。张说自然得以采用。此后，世庙的乐舞达到了和太庙相同的等级。

议礼的第四步是称宗入太庙。

大礼议到了后期已没有什么"议"的成份，往往是皇帝随心所

欲,说什么便算什么。

嘉靖十七年五月,已致仕的原扬州府同知丰坊,为了讨好嘉靖帝,竟然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计策,他上疏皇帝,主张建立明堂,尊皇考(献皇帝)为宗,以配上帝。嘉靖帝以此征求夏言的意见,夏言没敢谏阻,但也没按皇帝的意思去做。还是严嵩比较乖,他见皇帝态度比较坚决,便奏称:应该奉皇考入太庙,以享天子之祀。

嘉靖十七年九月,廷臣按世宗的意见上皇考庙号为睿宗,并将其牌位放入太庙,位次列于武宗之上。这位兴献王生前只是武宗之臣,死后却俨然成了武宗的先皇。

大礼议至此完全结束。此后,嘉靖帝更关心的是他自己如何修道成仙了。

大礼议历时将近二十年,表面上是议礼,实际上却是一场政治斗争,影响深远。

第一,嘉靖帝在大礼议中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凡是违背他意愿的人,轻者罢官,重者流放或廷杖至死。其结果是培植了一大批阿谀逢迎的新贵。这些新贵们(以张璁为首)虽然大都颇负才干,但在人品上至少是无足称道。他们得势之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极尽报复之能事。大礼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的黑暗。

第二,大礼议使嘉靖帝对礼产生了极深印象,终嘉靖之世制礼作乐不断。他制礼作乐的动机,一方面是早年在大礼议中曾受到杨廷和的谏阻(杨多次封驳帝之谕旨),后来有发泄之意;另一方面,他因议大礼而关心礼制,对礼也了解了一点皮毛,他想通过制礼作乐来粉饰太平,以满足自己以明君圣王自居的虚荣心。殊不知,在制礼作乐方面下功夫根本无补于治国,嘉靖朝政照样走下坡路。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史》世宗纪一、二。

《明通鉴》卷49。

张孚敬(即张璁):《谕对录》。

《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世宗崇道教

在登上皇位之前，以藩王身份入主皇宫的明世宗朱厚熜，曾在安陆生活了十四年。

他的父亲叫朱祐杬，是明宪宗之子、孝宗之弟，被封为兴献王，居安陆。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的一天，兴献王唯一的宝贝儿子(即后来的世宗)降生。兴献王欣喜万分，他把儿子的降生归功于附近玄妙观道士纯一道人的"点化"。所以夫妇焚香还愿，常至观中。世宗从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信奉道教的家庭中，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以致于成了十足的信道狂。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都有一些与其身份不大相符的嗜好，有的礼佛，有的崇道，有的爱建皇庄，有的专喜美酒、佳人。这些嗜好在皇帝的有生之年难以改变，而一旦该皇帝死了，下一任皇帝说不定又有什么别的特点。如明武宗喜欢建立皇庄，也喜欢巡游、打仗，终正德之世大臣们对此无可奈何。只有等到武宗升天之后，方可对皇庄之弊稍加清理，谁料新皇世宗虽不大喜欢皇庄等，却对道教兴趣极浓，大臣们不但不敢反对，反而千方百计地迎合。

如果说世宗之父以藩王身份信道未必对明代政治有多大影响的话，那么世宗本人崇道则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十五岁的世宗皇帝，来到陌生的皇宫时间不长便显露了本性。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他便在京城兴建道观，以皇帝身份崇信道教自此开始。嘉靖二年四月，在暖殿太监崔文的引诱下，又在皇宫内诸处建醮，与内监们斋醮祈祷，夜以继日。闰四月，以"天时饥

僮"而暂罢斋祀。但也不过是暂时收敛一下在大内(皇宫)斋醮之举,并非是对道教的崇信有所改变。

嘉靖三年,世宗召道士邵元节入京。邵元节,江西贵溪人,早年出家,后来居身于龙虎山上清宫。他是世宗宠信的第一个道士,嘉靖五年,被封为真人,十五年被封为"致一真人"。世宗命人在北京城西建真人府一座,发给邵禄米一百石,派锦衣官校四十人供扫洒杂役,并赐田三十顷。十五年十二月,又加封邵礼部尚书衔。十八年八月,邵元节死,世宗非常悲痛,命依伯爵之例从厚葬之。

邵元节死后,世宗又重用方士陶仲文。陶仲文又名典真,湖广黄冈人,喜神仙方术,被邵元节推荐给世宗。嘉靖十八年十一日,世宗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其后又加封陶为少保、少傅、少师、礼部尚书,开创了明代一人兼三孤之衔的先例。二十五年,特进陶为光禄大夫、柱国,支大学士俸。二十九年四月又晋封为恭诚伯。十年后陶仲文死去,世宗也以伯爵礼葬之,谥"荣康惠肃"。这是道士有谥之始。终嘉靖之世,陶是世宗最信任的人(包括内阁首辅在内)。

世宗晚年,曾一度宠信过方士蓝道行。世宗有什么事,便让方士扶箕。方法是,如有所问便写在纸上,然后由宦官拿到方士那里烧掉,由方士占卜,代天垂示。起初,由于纸条已烧,方士们无从知道世宗问什么,自然解释不出什么名堂来。世宗不怪上天或方士不灵,而是责怪宦官污秽。后来,宦官与方士合谋,先看世宗写的是什么,然后焚之,这样作答时便可尽量揣摩世宗的心思。蓝道行以此得幸。有一次世宗问道:"天下何以不治?"道行答曰:"贤士不得用,不肖不退的缘故。"又问大臣中谁贤谁不肖,又答曰:"贤者乃徐阶、杨博,不肖之徒为严嵩。"世宗便对严嵩产生了怀疑。正在这时,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世宗便令严嵩致仕。严嵩走后,世宗又想起了他支持自己崇信道教、祈求长生的好处来。不久,严嵩又派人将蓝道行恃势不法诸事秘密上奏。世宗虽是崇信道教,但他对

于方士的欺骗行为或不忠诚还是不能容忍的，遂下令将蓝道行以妖言罪处死。

他处死个别不忠诚、不谦虚的方士(嘉靖二十二年方士段朝用因骗术败露而被处死)，并不表明他对道教发生了丝毫怀疑，相反，他对道教的虔诚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曾给自己的父母各上道号，并给自己三加道号。这个九五之尊的天子仿佛成了道者世家，真是不伦不类。不仅如此，他事无巨细几乎都要乞求于道教。

他甚至认为道教有助于安邦治国。有一次大同边卒获叛人王三，他认为这是鬼神之助，因而对方士陶仲文加官晋爵。他甚至将陶仲文“称为师”，礼遇备至。他在晚年曾以扶箕（方士用沙盘、丁字架等工具请神占卜）的方式就国家大事向鬼神讨教，得到的答复无非是方士们的胡言乱语。

以斋醮祈求子嗣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世宗继位后十多年没有儿子，这令他非常着急。大道士邵元节投其所好，多次为他祈祷求嗣，求子心切的嘉靖帝本人也在宫中设醮祈嗣。嘉靖十五年二月，皇子终于降生，世宗不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而认为是邵元节祈祷的结果。

嘉靖帝还以道教来粉饰太平。本来他统治时期政治每况愈下，但他常常故弄玄虚。他除了制礼作乐来粉饰太平外，还以各种“祥瑞”自欺欺人。嘉靖三十七年四、五月，总督胡宗宪先后献白鹿各一头，世宗认为这是上天保佑，高兴之余，将胡宗宪升官一级。胡尝到了甜头，又于嘉靖三十九年献灵芝草五棵、白龟两只，世宗又赐他金、帛等。不久，白龟死掉，世宗又以“内行”的口吻说：“天降灵物，我就怀疑在尘世呆不长。”

利用道教祈求长生更是他的一大嗜好。他甚至异想天开，想要修养成仙。他宠信陶仲文的原因之一是陶曾为他祈祷健康长寿。在嘉靖时期，因献长生药而被赏赐的方士不可胜数。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他在御几及褥上各得药丸一枚，这说不定是哪个宫

人、宦官放在那儿的，或许是他自己放在那儿忘记了也未可知。可他不认为是有人放的，而认为是天赐的，甚至以此“告太庙”。

世宗崇信道教，不理政事，造成了许多恶果。首先，兴建道观，设立斋醮，赏赐道士等等，浪费了大量资财。早在嘉靖二年便有大臣指出，自祈祷繁兴，宫中需求日渐增多。其次世宗崇道教，不许大臣劝谏，所以许多大臣竟相迎合。在斋醮过程中，需要写青词，这是写给上天的祝文，因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而得名。许多大臣以写青词而得宠，严嵩得宠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善写青词。相反，不会写青词的人就要受惩罚，如嘉靖三十三年驸马邬景和因不会写青词竟被削籍为民。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一部分文臣将很大一部分心思放在了写青词上。此外世宗喜爱祥瑞，所以中外争献成风。总之，世宗崇信道教，一意孤行，打击忠正良臣，信任道士、权奸，以至朝政日衰。

史称：至嘉靖时期，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这就是说，世宗朝已出现了全面的社会危机。对此嘉靖帝是应负有一定责任的。

他不但以道教误国，而且也因信道而害己。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因长期服用丹药火发身虚（药性太热）慢性中毒而死。弥留之际还想回到家乡，他认为家乡是他的“受生之地”，在家乡祈祷并就近寻取药丸更能得到上天佑助（后来由于徐阶的劝阻回乡未能成行）。真是死到临头尚且执迷不悟。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52“世宗崇道教”。

《明史》世宗纪二。

《明世宗实录》卷414。

何宝善：《嘉靖皇帝朱厚熜》，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版。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第375—3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壬寅宫变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即农历壬寅年，发生了一起宫女谋杀皇帝的事件，史称“壬寅宫变”。

这件事可以从两方面谈起。

一方面，嘉靖帝崇信道教，他不但将道教作为精神支柱，而且还作为治国的依据。由于迷恋九五之尊和腐朽生活，兼之自建文帝以后的诸帝多不得永年，所以他非常怕死，渴望长生，喜欢长生之术远远胜过忠臣良言。终嘉靖之世，道士、方士等备受宠信，这些人为了讨取世宗欢心，便用女子经血、童男童女尿以及其它莫名其妙的东西制成各种药丸，冠以“先天丹铅（经血炼成）”、“秋石（尿炼成）”、“先天玉粉丸（白铅制成）”等美名，献给嘉靖帝服用。嘉靖帝求寿心切，自然服食不辍，而且至死不悔。

另一方面，他为了满足欲望，经常以广延子嗣为借口，大选淑女，广储嫔妃。本来渴求长生应该节欲，可嘉靖帝做不到。这些淑女们来到嘉靖帝的后宫便俨然走进了地狱，嘉靖帝为了长生无术不求，就差吃人了。这样，宫女们到了嘉靖帝手中，除了例行的任务外又得充当祈求长生的牺牲品的角色，有的宫婢还忍受耻辱听任经血被取。这身体方面的折磨本已难挺，而精神方面的压力更是让人无法忍受。嘉靖帝刻薄寡恩，虽然够不上一个迫害狂，但虐待后妃、宫女的事屡见不鲜。何况他常服丹石之药，药性燥热难当，使得本来喜怒无常的个性更增添了几分可怖。即便

是深得宠幸的嫔妃、宫女，甚至皇后，都难免遭其荼毒。如嘉靖的第一个皇后陈氏，因见他爱抚张、方二妃而投杯站起，嫉妒避开，被他一个雷霆之怒吓得堕胎而死。

十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宫婢居然敢造皇帝的反，她们肯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这恐与取经血炼丹有关，或是在取经血时宫女稍示不满便受重罚，乃至有杀头之虞；或是为了取更多的血让她们服用活血之药，这迟早也有丧命之险。另外，史载宫变还有一位主谋，即王宁嫔，此人乃嘉靖十年所添设的九嫔之一，当时皇帝从大学士张孚敬之言，仿古制设立九嫔，其地位略低于皇后。从宁嫔王氏的身份来看，她参预造反不会是因为被取经血，估计与嘉靖帝刻薄寡恩、喜怒无常的个性有关。

总的说来，一句话，壬寅宫变的发生乃是嘉靖帝对嫔妃、宫婢残酷迫害的结果。

壬寅宫变的经过比较简单，大体是这样的：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夜，嘉靖皇帝朱厚熜正在端妃曹氏的宫中沉睡着。这时，宫婢杨金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张金莲等一共十六人，悄悄走到他的床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七手八脚一齐上，想趁熟睡之机将其勒死。但这些姑娘们比较胆怯，慌乱之中误将活扣打成死扣，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怎么也拉不紧，不久，张金莲见事不遂而发生动摇，前去报告了方皇后。方后闻讯赶到，带领内监将十六名宫婢一一抓获。嘉靖帝已被折腾得半死，绳子虽已解开但仍不省人事。方后假传帝旨将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和十六名宫婢一律处斩，同时还杀了她们的族属十余人。这里端妃未必与谋，然而方后妒其受宠，所以也将其牵连在内，不管三七二十一，除掉了事。后来，嘉靖帝为端妃之事也对方后耿耿于怀。在惩治“凶手”的同时，救治皇帝更刻不容缓，御医被召至宫中，见到皇帝的症状后颇觉为难，给皇帝看病

本是一件难办的差事，何况嘉靖帝这时不能说话，情况严重，这就更增加了几分风险。最后还是太医院使许绅冒死救治，给皇帝用药一副，几个小时后帝吐紫血数升，遂被救活。当时许绅也是捏了一把汗，因为用药之际他也没有十分把握，他知道如救不活皇帝，他自己也难活成，所以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虽然后来他因救活了皇帝而被封官加爵，但那场惊吓却让他余悸难消，以至很快离开了人世。

嘉靖皇帝大难不死，按说也该吸取教训。但他是一个顽固执拗的人，从来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自此之后，他依然迷恋道教，服食丹药，害人如故。如果说在宫变前后多少有些变化的话，那便是，第一，改选青年女子经血为选八至十四岁的童女为其服务（概为取尿）；第二，久居西苑，很少返回大内。

一年之后，嘉靖帝本人对宫变有一个简短而有趣的总结，他说："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又怎能有今天呢?"意思是可恶的宫婢谋逆，我得天地之佑才得以除宫变。看来他不但没有自责之心，反而似有自得之色。为了答谢苍天，他决定在朝天宫斋醮七日。这位大明皇帝真是可悲之至。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史》卷 114"后妃二"。

《万历野获编》卷 18。

《明史纪事本末》卷 52"世宗崇道教"。

严嵩擅政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年（1505年）中进士，授编修，因病闲居几年之后，重新应召还朝，初为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监祭酒。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世宗之命祭告显陵。归来后上奏说：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上苍都应时雨霁。另处石产枣阳，有群鹳齐集环绕；碑入汉江，河水骤然上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记上天的恩眷。世宗阅毕十分高兴，下令依奏而行，严嵩由此擢升南京礼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严嵩重返中央朝廷，任职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当时礼部正在选拔译字诸生，严嵩刚一到任，即索要贿赂，并且随着馈赠广进，索贿"更高其价"。给事中胡汝霖再次参劾严嵩，"秽行既彰，招致论列"。严嵩上疏辩解，得到世宗的庇护，从此越发事事恭谨，一心只想讨得明世宗的欢心。

嘉靖十七年，明世宗意欲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庙号称宗，即在太庙祭祀生父，以配上帝。当时群臣齐谏，极力阻挠，惹得世宗极为不快，撰写《明堂或问》出示廷臣，以表明自己态度的坚决。严嵩一看风头不对，马上尽改前说，言称宗之礼，未有帝宗而不附太庙者，如此恐皇考有所不宁等等，顺从世宗旨意，提议尊兴献王为宗，附入太庙。后来又筹备大礼仪甚为周全，进一步结宠于明世宗，得到赏赐金币的荣耀。随后，又撰

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赋》等文章，被加封为太子太保。

嘉靖十八年，严嵩与内阁首辅夏言一道，陪同明世宗去湖广祭陵，所获赏赉与大学士相等。明世宗崇佞道教，专事玄修，大学士夏言善于窥伺世宗的动向，迎合其嗜好，更兼祭醮青词写得好，祈祷祭祀之事筹备周全，所以深得明世宗的赏识，嘉靖十五年入阁参预机务，嘉靖十七年简选为首辅。严嵩科第高中在夏言之前，职位却居于夏言之下，看到夏言职高位隆，甚得宠幸，十分忌惮。想起自己初见宠信后，想挤入内阁，遭夏言阻止，遂怀恨在心，但表面上却十分恭谨。他曾置办酒席，亲自前往夏府邀请夏言，夏言却推辞不见。严嵩回府后在开席前仍跪在虚设的夏言位前敬酒。夏言听说，以为严嵩真心倾服于己，又认为严嵩实力不足以与自己相抗衡，所以对其并不设防。随着时间的推移，夏言逐渐厌倦了祭醮青词之事，并时有抵触，失去了世宗的信任。世宗奉道，常常戴香叶道冠，打扮成道士模样，并且命人刻制了五顶沈水香冠分赐夏言、严嵩等五人。夏言拒不奉诏，还秘疏对世宗进行讽劝，世宗十分恼怒。而严嵩却在世宗召见时头戴此冠，外面罩以轻纱，以此讨好世宗，世宗也从此喜严嵩而恶夏言。严嵩察觉于此，遂开始加紧倾陷夏言、取而代之的行动。夏言感到位将不保，就想找严嵩来为自己出谋划策摆脱困境。孰料严嵩已潜赴明世宗宠幸的方士陶仲文家中，策划倒夏行动，夏言知道后指使心腹大臣上疏参劾严嵩，但明世宗已心向严嵩，往往置若罔闻。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严嵩每次见到明世宗，都要哭诉夏言对自己的凌辱。明世宗遂手敕礼部，历数夏言罪状，将其削职，科、道官以失职不纠，降调夺俸者计七十三人。同年八月，以礼部尚书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这时严嵩已年逾六旬，但是“精爽益发，不异少壮”，入直西苑（明世宗居所）后，朝夕守候，未曾惰息。明世宗几次予以褒奖，愈发信赖他。但是

很多科、道官，却时常参劾严嵩。先是嘉靖十九年时，巡按云南御史谢谕就上言，指斥严嵩遭桑乔参劾后，不仅不自省改过，反而借口是因赞议兴献王称宗入庙、随上南幸等招致诸臣妒嫉，以此激怒皇上，钳制众口。严嵩的不法行为实难以枚数，不仅选译字诸生"通贿无算"，甚至王府宗室袭爵争位也要贿赂严嵩，"动以千计"。当时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劾贪污大臣，都将严嵩列于首位。至是吏部给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汉臣等纷纷上疏论劾严嵩，不当位至首辅。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给等复论严嵩与其子严世藩同恶相济，索要贿赂"动以千百计"。十月，给事中伊敏生、喻时等人再次上疏参劾严嵩。而每当朝臣揭发其贪赃受贿，严嵩总是立即上表请罪，自伏于世宗面前；言官劾其蠹政误国，严嵩却伪为孤立，狼狈求归。这些举动都使善忌多疑的明世宗消除了疑心，认为严嵩曲谨附己，赞己玄功而得罪朝臣，自己应当保护他。因此当严嵩上疏乞归，明世宗不仅下诏百余言，加以抚慰，还赏赐他银记曰"忠勤敏达"，来封堵谏臣之口。

夏言被黜之后，大学士翟銮以资序升为首辅。严嵩虽权出其上，但终究厌恶其位望在先，遂不相容。适逢翟銮之子翟汝俭、翟汝孝同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严嵩便指使给事中王尧日、王交参劾其有舞弊行为。是年八月，翟銮被削职为民，首辅职位终于被严嵩夺到手中。当时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在内阁辅政，严嵩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从不与二人相商。朝廷内外百官上奏，都必先得到严嵩的通过然后报知皇上。当许赞对此表示不满后严嵩方表示"独蒙宣诏，于理未安"，假意请求让同列参预票拟机务，以示用心平允，无意专权。明世宗逐渐得知严嵩专横跋扈的情形，对其产生了反感。

夏言自被削职后，每逢元旦或世宗寿诞，必定上表称贺，署名"草土臣"，博得了明世宗的好感。嘉靖二十四年，辅臣张璧去世，许赞以老致仕，明世宗下诏重新召回夏言，任内阁首辅，

位在严嵩之上。夏言复出，盛气凌嵩，凡所拟旨批答，惟行己意，无视严嵩同党，严嵩虽恨之入骨，也只好忍气吞声，曲意逢迎。时严嵩之子严世藩任尚宝少卿，他经常擅用职权收取贿赂，又代税户转纳钱谷，从中加意克扣。夏言得知后欲启奏明世宗，严嵩惊恐万状，带领严世藩亲赴夏府求情。夏言称病不见，严嵩就以金钱买通门人，然后得入其室。在严氏父子的苦苦哀求下，夏言最终将此事搁置未奏，严嵩父子却从此更增加了对夏言的仇恨。适逢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之事论劾京山侯崔元和锦衣卫都督陆炳，夏言欲拟旨调查此事，崔、陆都向夏言长跪苦求，才将事情压下。严嵩于是同崔元、陆炳相互勾结，伺机驱逐夏言。而夏言却不做防备，依旧我行我素。明世宗派宫中太监到大臣府第宣诏达事，夏言待之如奴仆一般，而严嵩却总是以礼相待，并贿以黄金，于是这些宦官争先在世宗面前为严嵩美言。明世宗猜忌心重，时常派人夜间去大臣府第暗察。夏言不知，每每酣睡，而严嵩因有人报信，逢有使来，多在灯下为世宗审视青词稿本。严嵩对撰写青词十分上心，每每博得世宗的夸奖，而夏言已倦怠该事，逢有指派，多令手下幕客代写，所呈祭醮文章多有重复，世宗看到，往往抛之于地。夏言的地位又一次变得岌岌可危了。

嘉靖二十六年，严世藩迁升为太常寺少卿。严世藩贪得无厌，贿赂公行。严嵩担心夏言会采取对应行动，于是上疏乞请允许严世藩归里省墓。当时夏言正思建不世之功，逢都御史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地区，驱逐蒙古流寇，遂表示大力支持。明世宗开始也很赞同，但中途变卦。严嵩遂与崔元、陆炳对夏言大肆攻讦，极称河套必不可复，诋毁夏言“擅权自用”，并疏劾曾铣是开边启衅，雷同误国。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礼部尚书费寀、左都御史屠侨纷纷疏劾夏言误国，群起而攻之。严嵩又指使咸宁侯仇鸾诬陷曾铣掩败不奏，克扣军饷。刑部侍郎詹翰等人阿顺严嵩，构陷曾铣贿赂夏言事状。曾铣、夏言因此先后被杀，严嵩遂得独秉国

政。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以仇鸾为宣大总兵。仇鸾被废已久，因不惜重金贿赂严世藩，而重新见用。八月，加严嵩上柱国。严嵩力辞，援引唐郭子仪不敢当尚书令自比，假意推谢，深中明世宗之意。随即迁严世藩为太常寺卿。

这一年俺答率部进围京师，明世宗召见严嵩等大臣谋议退敌之策，严嵩竟无言以对。他暗中对兵部尚书丁汝夔授计道：塞上兵败，可以掩饰，如果在京畿作战失利，皇上不会不知，谁来承担罪责呢？告诉诸将不要轻易出战，敌寇掳掠够了自会离去。结果诸路将领拥兵观望，任由俺答骑兵在京畿之中纵掠烧杀，如入无人之境。事后严嵩见难以掩盖，惟恐暴露自己前所策划，急忙安抚丁汝夔道：有我在，勿要担心。及至丁汝夔以失职罪开刀问斩，临行刑时大叫："老贼严嵩出卖了我！"

十二月，刑部郎中徐学诗以世宗下诏，人人尽其言上疏，言称严嵩位极人臣，贪得无厌，士大夫对其皆敢怒而不敢言。自严嵩秉政后，凡有论劾严嵩者，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事后必定借机实施报复，如给事中王烨、陈恺，御史谢谕、童汉臣等人。天下之人，都视严嵩父子为鬼魅……。徐学诗上疏弹劾，被明世宗斥为乘间报复，将其拷打后斥逐为民。严嵩不忘此仇，趁第二年考核京官之机，将徐学诗削籍，并将其兄徐应丰中书舍人之职一同罢免。明世宗察知徐应丰系遭池鱼之殃，令其留任，却不过问事情原委。嘉靖三十一年，南京御史王宗茂上疏揭发严嵩"久持国柄，作威作福"，如吏、兵二部遴选属员，严嵩向每人索贿百金，任其自择善地，致使"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往年遭人论劾，严嵩暗中输运家资南返，车载珍宝，不可胜计，有金银人物高二、三尺者，下到溺器，亦金银制造。另外他广置良田，遍于江西数郡，"殊方异产，莫不毕致"。明世宗以王宗茂狂率为由，谪平阳县丞。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巡按御史赵锦请求罢免严嵩，以

应天变。诏下锦衣卫狱，后削籍为民。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大奸，主要参劾严嵩独断朝纲，凡部府有所题奏批复，必先面禀严嵩然后方敢起草，严嵩的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各部府堂司，严嵩指使之人络绎不绝，“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嫁罪于人”。严嵩之子严世蕃官职不算高，却依仗父权，横行于百官之间，还经常代父票拟，干预朝政，京城遂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说。杨继盛疏中因触犯明世宗所讳，遭捕人锦衣卫狱，严嵩操纵刑部将之判处绞杀罪，然而明世宗犹未想杀之，在狱中关了两年。后来严嵩在一个估计皇帝必然批准处决的案件中，附杨继盛名一同上奏，从而使杨在经受百般拷打、割肉断筋的酷刑之后，终被弃市。严嵩滥杀谏臣自此开始。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侵扰浙江沿海，工部侍郎赵文华获准前去祈祷海神杀贼。赵文华原为主事，因贪财受贿，被滴调州判。他以重金馈赠严嵩，得以重返朝廷。赵文华对严嵩极尽谄媚之能事，严嵩视其为义子。此次赴浙，他“凌轹百官，搜刮财物”，当地不胜其扰。返回朝廷后，赵文华与严嵩合谋，上疏参劾吏部尚书李默，说他在部选策题中有诽谤之词，竟致李默瘐死于狱中。严嵩为奖赏赵文华，擢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李死后，严嵩又逮捕总兵俞大猷下狱。俞大猷不善逢迎，严世藩恨其不阿附自己，遂授意御史胡宗宪劾其失事，被入狱。俞大猷只得借贷三千金馈赠严府，方免于一死，被发配至大同带罪立功。

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前锦衣卫经历沈炼被杀。沈炼于俺答人侵之初，几次上疏请求对其作战，均被严嵩扣押不报。沈炼于是抗疏劾嵩，历数严嵩十大罪状，被判诋毁大臣之罪，谪佃保安。沈炼到保安后，多与当地人一同练武，讥讽漫骂严嵩，他曾制作了三个稻草人，指为唐李林甫、宋秦桧以及严嵩，习而射之。严嵩得知大恨，指使其党宣大总督杨顺、御史路楷，策划逮捕白莲教通叛者，将沈炼之名开列其中，逮捕入狱后竟遭斩首，家被籍

没。杨顺一子因此被封锦衣千户，路楷迁升大常卿。

赵文华自位至尚书后略显骄横，一心只向明世宗献媚取宠。一日，他向世宗进药酒仙方，称系神仙所授，饮之可以长生不老，并言此方仅有严嵩与自己知道。明世宗遂道严嵩有此密方不奏，还是赵文华奏予了我。严嵩得知，又气又恨，虽然赵文华再三谢罪犹不解气。赵文华当初曾馈赠严世藩金丝幕一具，并其二十七姬每人宝髻一枚，价值数万，严世藩却认为礼薄，"尤为未足"，也记恨于他。于是严氏父子合谋，令赵文华以疾病告归，并草拟奏疏呈上，适逢明世宗正在修玄，见疏有病语，一怒之下将赵文华削职，发配其子至边地。

嘉靖三十七年，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弹劾严嵩辅政十二年，引用非人，边市日坏；纵子人直，干预国政；朋比为奸，公行贿赂等。主事张羽中、董传策也交章论劾严嵩。张羽中就边防、财赋、人才三方面进行弹劾，其"财赋"言户部每年发放边饷本以赡军，自严嵩辅政，朝出户部之门，暮人严嵩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镇使者经常往来于严嵩府第，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仅严嵩家人严年，已有数十万财富，严嵩本人，家产可知。而边卒冻馁，朝不保夕。结果参劾严嵩的几个人，俱被廷杖，谪戍岭南。严嵩对于异己势力的打击，多不露痕迹。明世宗本人自视英主，从不承认自己有错，同时特别忌讳议论他祈福崇道。严嵩父子因此使用计策借此激怒世宗，使其下令迫害大臣，达到自己打击报复的目的。而一旦被严嵩假手世宗治罪的人，便永无翻案的可能。先后被治罪的大臣有谢谕、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翀、董伟策等人。

明世宗自嘉靖二十年发生宫婢之变，几被勒死，后就移居西苑万寿宫，不人大内，大臣都难能谒见。除方术之士外，惟有严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数下，其他阁臣都不获闻，所以严嵩

能够长期独揽朝政。严嵩引用、培植的党羽虽然遍布中央各部司，但敢言之士对其弹劾的奏章始终不断，明世宗逐渐将对严嵩的宠信转移到另外一个大学士徐阶的身上。徐阶也以善于撰写青词得到世宗的信任，嘉靖三十一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同日弹劾严嵩。张翀、吴时来均为徐阶门生，董传策则是徐阶同乡后生，严嵩于是怀疑徐阶是幕后主使者，因而请求世宗拷问，但无证据，世宗遂不问，反而更加疏远严嵩而亲近徐阶。

嘉靖四十年，严嵩之妻欧阳氏病死，给严嵩父子出了难题。明世宗所下手诏，辞意深奥，难以理解，严嵩年迈而昏聩，多瞠目以对，只有严世藩一览即明，据之奏答，甚合世宗心意，加之严氏父子暗中买通世宗左右之人，世宗的动向无不知晓，“先有所待”，所以一般不会出差错，人称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严嵩不能一日无其子。严世藩别号东楼，百官找严嵩裁夺政事，严嵩多言与东楼议之。欧阳氏死后，严世藩本“当护葬归”，严嵩以自身年迈，膝下别无他子为由，得到明世宗的恩准，以其孙严鹄代行。严世藩仍旧留在京城，但是已不得入直房代替严嵩票拟批答，于是整日在家中寻欢作乐。严嵩有时将世宗谕旨派人送去询问严世藩，正值其迷于酒色之中，不能即刻解答，严嵩无可奈何，只得按照自己的理解草拟，因惟恐有失，往往送走后又追回再改，一时步伐皆乱。明世宗由此日渐不满，又闻听严世藩荒淫无度，非常厌恶。适逢明世宗所居永寿宫起火，徙居玉熙殿，明世宗想重建宫殿，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请世宗暂居南城离宫，此宫是为明英宗做太上皇时的居所，世宗因而甚为不快。而征求徐阶的意见时，徐阶则请重修永寿宫，次年竣工，更名万寿宫。从此明世宗益发信任徐阶，顾问多不找严嵩，间有涉及到严嵩者，不过是斋醮符篆之事而已。这期间方士蓝道行颇得明世宗的宠幸，世宗待其如神仙。一日，明世宗向蓝道行问辅臣的贤否，

蓝道行遂假乩仙历数严嵩父子窃权索贿、败坏朝纲的罪状。世宗言果真如此，上仙为何不诛杀他们？蓝道行诡称待皇上正法，世宗因而心动。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事状，言其“植党蔽贤，溺爱恶子”，并称如所言不实，甘愿听斩以谢罪于严嵩父子。明世宗遂下诏令严嵩致仕，严世藩押交法司，邹应龙则以敢言而被擢升为通政司参议。严世藩用银钱收买内侍告诉世宗，邹应龙是因蓝道行泄密才上疏的。明世宗大怒，下诏将蓝道行逮捕下狱。严嵩党羽刑部侍郎鄢懋卿、大理寺卿万寀运用银两贿赂蓝道行，意在让其供认是受徐阶唆使。蓝道行并不买帐，言纠劾贪罪自是御史本职，与徐阶无关。鄢懋卿、万寀惧怕受牵连，遂嘱法司以严世藩受贿八百银两为由，判其谪戍雷州，其子严鹄、严鸿及其爪牙罗龙文、牛信等分别被充军边远地区，严府家人严年被囚牢狱。严年狗仗人势，作恶多端，人称“萼山先生”。明世宗怜悯严嵩年迈，特赦严鸿为民。自六月至九月，先后有御史郑洛，给事中郑灼、沈淳、陈瓒等人论劾大理寺卿万寀、刑部侍郎鄢懋卿、何迁、工部侍郎刘伯跃、左通政胡汝霖、光禄少卿白启常、副使袁应枢、湖广巡抚张雨、国子祭酒王材等，这些人都是严嵩的亲朋党羽，一时俱被罢免，舆论大快。

严嵩去位后，明世宗追思其辅弼多年，佑赞玄功，因而若有所失，闷闷不乐。遂传谕徐阶，严嵩已退，其子已伏罪，若再有同邹应龙一样敢言严嵩有罪者俱斩。严嵩知道世宗终究心有所动，借万寿节进呈“祈鹤文”，被赐银币之机，疏请赦归严世藩和严鹄，终己天年。但是世宗没有答应这一请求。

嘉靖四十三年，严世藩重新被捕入狱。严世藩被贬谪戍，未至雷州就擅自返回。其党羽罗龙文也逃离边地，潜往歙县，并且在住处藏匿了亡命刺客。南京御史林润上疏，言江洋盗贼，多入罗龙文、严世藩家，严世藩自罪谪之后，与罗龙文日夜诽谤朝

政，蛊惑人心。近来，又以修葺居所为名，聚众四千人，有通倭谋反之嫌疑。诏下逮捕严世藩、罗龙文，处以死刑，严嵩削籍为民。在籍没严府时，搜出白银二百余万两，其它“珍异充斥，逾于天府”。又二年，严嵩以寄食墓舍病故。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史·严嵩传》、《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

庚戌之变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俺答汗兴兵入犯，进抵北京，在近郊大掠八日。由于这一年是农历庚戌年，所以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庚戌之变。

蒙古自北徙以后，由于明军的打击和内部纷争，逐渐一分为三，西边是瓦剌部，中间是鞑靼部，东边是兀良哈部。三部中以鞑靼和瓦剌影响较大。两部迭有盛衰。

一般说来，北方的少数民族一旦统一便会形成一种力量，从而有可能对中原形成一种潜在威胁。如果此时中原王朝武备废弛或处置不当，这种可能便会转化为现实。明代的蒙古也是这样，明初瓦剌脱欢统一了蒙古大部，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其子也先遂进攻明朝，演成土木之变，嘉靖时期俺答称雄漠南，到嘉靖二十九年终于出现了庚戌之变。

俺答汗又称俺答，蒙古人作阿勒坦汗或索多汗，他本没有做过大汗，但他曾向蒙古可汗索求过“汗”的封号，所以又以“汗”称之。他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本来在明成祖五次北征之后瓦剌曾一度强大，但自从也先被杀以后该部便一蹶不振。此后鞑靼部再度兴起。弘治时期，达延汗西逐瓦剌，东破兀良哈，统一了蒙古的大部分地区。随后，他又大行分封，将大漠南北分为察哈尔、乌梁海、喀尔喀、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六个万户。大汗驻于察哈尔万户内，统率左翼三万户（察、乌、喀三万户），济农（即副汗）巴尔斯博罗特（达延汗第

三子）驻于鄂尔多斯万户，领导右翼三万户（鄂、土、永三万户）。

巴尔斯博罗特济农共有七子，俺答行二。当时蒙古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俺答为次子，自然与济农之位无缘。巴尔斯博罗特死后，俺答的哥哥袭为鄂尔多斯济农，明人称他吉囊，而俺答本人则被封于“十二土默特”（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

俺答虽然地位不算太高（不是大汗或济农的继承人），但由于他颇负才略，所以势力发展很快。起初他和哥哥吉囊同时称雄于漠南西部。嘉靖九、十年以后，俺答或是独自统兵，或是与吉囊联合，多次进攻明朝的宣、大等地（宣、大在今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几乎是“无岁不入寇”。嘉靖二十一年，吉囊因掠得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娼妓，纵淫不休，生病死去。从此吉囊诸子便处于叔叔俺答的控制之中。

嘉靖二十二年，达延汗去世，蒙古各部再次陷人群龙无首的局面。继任的蒙古大汗已无力统领各部，号令不出察哈尔本部。汗权的衰落为俺答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嘉靖二十五年，达延汗的嫡曾孙、俺答的堂侄打来逊继汗位，迫于日渐强大的俺答的势力，被迫迁徙辽东。至此，俺答控制了漠南蒙古的大部分地区。自嘉靖二十年以后，俺答因求贡不遂而连年大举人犯，明朝损兵折将，人畜被掠、京师屡屡为此戒严。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向明朝发动了空前的攻击。

这一年六月，俺答进攻大同，毁边墙突人明境。然后他将精兵埋伏起来，以老弱百人出骑诱敌。明总兵张达闻警后率兵出击，因轻敌而中伏，马蹶被杀。副总兵林椿得知张达被围后，领兵前往援救，不幸战死。俺答令割下二将之首级，引兵退去。不久，俺答传令诸部，决定再次大举攻明。大同一带再次烽烟四起。当时大同总兵是仇鸾，面对俺答的窥伺，他惶恐万分，束手无策。还是他的亲信爪牙有办法，居然想出了以邻为壑之计。仇

鸾觉得此计甚妙，便派人重贿俺答，求他改攻他处，勿犯大同。俺答得贿之后，果然移师东去。

八月乙亥，俺答率军来到蓟镇（镇治在蓟州，今天的天津蓟县）古北口，命数千骑攻明边墙。明都御史王汝孝率蓟镇兵马在此奋力抵抗，俺答见状命人从正面佯攻，而别遣精兵从间道破墙而人，明兵大败。俺答乘胜长驱真入，掠怀来，围顺义，直抵通州城下，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慌忙组织京城防务，当他检阅京军名册时，仅得禁兵四五万人，而且不是老弱不堪，便是役使于权贵之门，有的人一听说要打仗吓得“涕泣不敢前”。丁汝夔以此奏闻。嘉靖皇帝不胜惊恐，下诏文武大臣分守九门，派人招募民间义勇四万人，并集合天下应试武举一千人，共同防御京城。与此同时，明廷还檄召诸镇兵勤王。

在俺答人塞四天后，大同总兵仇鸾率兵二万奉召勤王。在此之前，仇已得知俺答受贿之后移师东去，为了讨好嘉靖皇帝，他自告奋勇请求率兵勤王。引导俺答进攻京师的是他，请求勤王保卫京师的又是他。嘉靖帝不知其中情由，见仇鸾自请勤王，十分高兴，起初令他留驻居庸关，后来见俺答果然如仇所“预言”的那样入犯蓟镇，便越发信任这一小人，令他人援通州。当时七镇援兵五万人先后开到，嘉靖帝任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援军。

俺答因河水所阻未能攻下通州，便分兵四出，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仇鸾等问计于首辅严嵩，严嵩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指示仇鸾和丁汝夔说：“在边方吃败仗可以隐瞒，在京师打败仗却无法隐瞒。俺答只为抢掠，饱将自去，我们当以坚壁自保为上策。”仇鸾果然不发一矢坐视俺答烧杀抢掠。不仅如此，由于各镇援兵仓促来京，粮草毫无着落，怨声渐起，抢掠之事时有发生，仇鸾的大同兵尤其严重，往往出人村落，抢掠民财，百姓深受其害。

不久俺答兵临京城，致书明帝，请求通贡。嘉靖皇帝召集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等在西苑商议对策。嘉靖帝将俺答的信文给他们看，并征求诸臣意见。

他说："你们看看怎么答复"。

严嵩说："这是礼部职责"。

徐阶说："答复俺答虽是臣的事，但是只有皇上您才能定此大策。"

嘉靖帝说："这正是我们要商量的"。

徐阶说："敌寇驻兵近郊，而我全无战守之策。似宜权许通贡，以为缓兵之计。"

嘉靖帝认为徐阶说得有道理，但他没有马上裁决，而是下令廷臣集议。当天下午，徐阶拿出了俺答的书信，信的内容主要是俺答要求以三千人入贡，明廷答应了就退兵，否则要攻破京城。起初，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发言。徐阶等准备笔和纸，让每个人将自己的意见写上，然后交给皇帝裁决。这时，国子监司业赵吉贞站了出来，坚决反对许贡；而检讨毛起认为应该暂时答应通贡。一时间，群臣互相争辩，吵得不亦乐乎。到头来，允贡与否还是没个结果。好在俺答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在明朝群臣集议的第二天，俺答挥师西北，大掠诸陵，然后折向西南，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俺答在京畿一带抢掠了大量人口、财物，基本达到目的后，他引兵退去，原计划由北京西北方向的白羊口出塞，因受明军阻击不得不又向东南行进，在昌平之北，与仇鸾的十万大军遭遇。仇鸾自俺答入塞以来一直不敢出战，此时本以为蒙军会向西退去出门，那样的话自己尾随其后装装样子就行了。想不到俺答又杀了回来，仇鸾仓促遇敌，所部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连仇本人也差点被俘，以部将力救得免。不久，俺答率兵沿潮白河岸指向东北，仍由故道古北口出塞。

俺答退去之后，京师宣布解严。

庚戌之变历时十余日（俺答光在近京抢掠就有八天），明朝虽然保住了京城，但是京畿人民却备受蹂躏之苦，许多人妻离子散，家园被毁。在俺答人塞期间，明王朝政治的腐败、武备的废弛、皇帝的刚愎而无能、将相的误国等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本来这次事变嘉靖帝本人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但封建皇帝很少能引咎自责，何况嘉靖帝又是一个极爱护短的人。他认为俺答之所以能长驱直人，全是大臣失职所致，所以在俺答离开近郊后，便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和兵部左侍郎杨守谦逮捕下狱。这二人固然没什么大的才能，在保卫京师的过程中也未见立功，不过二人还算尽职，至少罪责要比他嘉靖帝以及严嵩、仇鸾等人轻得多。实际上嘉靖帝杀丁汝夔等人不过是想平息官民的愤怒，丁汝夔充当了朝廷替罪羊的角色。这不仅是丁个人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剧。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59、卷 60。

《明史·鞑靼传》。

俺答封贡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以百战之兵大举北伐，蒙古贵族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被迫北逃。从此，长城一线宛如一道鸿沟隔断了蒙、汉两族正常的经济联系。不管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蒙古人多么需要与中原互通往来，但由于军事上的对峙和政治上的敌视，双方也仅仅存在着贡市式① 的贸易往来，并且这一有限的经济联系也常常因为战争而中断。

弘治时期，蒙古著名的达延汗统一了大漠南北，从而暂时结束了蒙古分崩离析、各部争战的局面，为蒙古高原上人丁之兴旺奠定了基础。

但是蒙古的再度统一与强盛也引起了明朝的不安，明与蒙古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自弘治十二年（1499年）双方的贡市关系基本中断，并且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只有干戈，未见玉帛。

到了嘉靖八年（1529年），达延汗之孙俺答汗又登上了明蒙关系的历史舞台。这一年他和他的哥哥吉囊进攻明朝的榆林和宁夏，被明陕西三边总督王琼击退。

嘉靖十一年，蒙古"小王子"② 至延绥求贡，总制唐龙请许之，帝不听。小王子大怒，遂拥众数十万入犯。此次求贡系由小

---

① 贡，指进贡，蒙古贵族定期派代表团进京朝贡，以马等换取赏赐；市，指互市，沿边若干地点设立马市，允许蒙汉人民进行贸易，有大、小（月）市之分。

② "小王子"，指年纪小的可汗。达延汗继位时年幼，故称小王子。后来，小王子成了可汗的通称。

王子发起，是否与俺答有关（即俺答支持小王子），不得而知，但至少是代表了俺答的心声。

嘉靖十三年三四月间，吉囊、俺答先后两次派人向明朝乞求通贡，嘉靖帝断然予以拒绝。兄弟二人非常生气，率兵十万攻入延绥，重创明军①。

嘉靖二十年七月，俺答派石天爵、肯切二人来到大同塞，向明朝请贡。石天爵说："以前人贡互市，双方都有好处。自贡道不通之后，（蒙古）连年内犯，主要是因为人、畜多疾，衣食所迫，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近来卜之神官（指巫师），谓向天朝纳贡方是出路。如蒙允许，可留一人为质，另一归返。今后双方约束部下，两不相犯。"本来俺答是有诚意的，可嘉靖帝在得到了大同巡抚史道的报告后，不但没有答应通贡，反而悬赏俺答首级。俺答听说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便与吉囊分道入犯。其中俺答一路入塞以后，越过太原，南入石州（今山西离石），杀掠甚众。

自嘉靖二十年以后，俺答走上了独立求贡的道路（不久吉囊死去），而且次数非常频繁。

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派石天爵等至大同镇边堡，再次向明朝发出和平呼吁。明大同巡抚龙大有竟将石天爵一行缚献朝廷，还假称用计擒获。嘉靖帝不但不追究龙的责任，反而升他为兵部侍郎，同时还下令将石天爵磔于西市。俺答得知后发动了空前的进攻，他带兵深入山西，转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明朝官兵吏民二十余万，京师一度为之戒严。

虽然明廷杀了他的使者，但他并未放弃求贡的追求。从嘉靖二十五年五月至二十六年春，他曾先后数十次遣使于明，但均被嘉靖帝无理拒绝。

---

① 参见何宝善《嘉靖皇帝朱厚熜》第8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版。

嘉靖二十六年夏，俺答再次派人求贡。使者来到大同边塞，遇到了明朝的边兵，还没有来得及陈其所请，便惨遭毒手。同年秋天，俺答又一次重申了他的要求，结果再次遭到拒绝。

本来明朝两次斩杀对方使者已属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俺答在使者两次见杀后仍求贡如故，可谓仁至义尽。谁知嘉靖帝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拒不许贡。俺答在盛怒之下频频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终于演成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

俺答在求贡问题上可谓坚韧不拔，即便在大掠京畿、与明对阵之际也念念不忘求和通贡。回师之后俺答又遣其子（一作义子）脱脱陈其所请。当该任宣大山西总督苏佑将情况上报朝廷后，咸宁侯仇鸾力主许贡。嘉靖帝迫于俺答兵威，加之此时对仇鸾有好感，对仇的话容易听进去，遂下令在大同、宣府、延绥等地开设马市。

嘉靖三十年三月，明廷发银十万两，令兵部侍郎史道前往大同总理互市。马市开设之初俺答十分高兴，亲自到市参预其事，并向明朝贡献良马九匹。稍后，俺答认为明朝所给的马价不大合理，颇有怨气，双方渐起冲突。为了照顾贫穷牧民，俺答曾向明朝请求无马牧民以牛羊换取米豆，明朝则予以拒绝。由于俺答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加之，从内地逃过去的白莲教徒萧芹等人惟恐双方和好于己不利，于是极力怂恿俺答进行抢掠，所以俺答并没有自始至终约束部众，在马市开始之后人掠之事仍时有发生。本来明开市的目的是想换取和平，抢掠之举发生之后，朝中有的人不是从己方找原因，而是指责俺答无信、马市难恃。虽然俺答继献马之后又将萧芹等三十余名叛明汉人缚献朝廷，但马市并没有为此而维持下去。

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帝以俺答乞请无厌、拥众犯边为由，诏罢马市，刚刚恢复的马市又中断了。这次互市明朝没有多大诚意，而俺答在其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对明朝很失望，因而显得

耐心不足，终于给明朝以罢市的借口。但总的说来，明朝的责任更大。

马市停开之后，俺答对互通贡市已不抱什么希望。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多次进攻明朝，虽然没有再现类似庚戌之变那样严重的事件，但也给明朝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

转眼又过了十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死去，隆庆帝继位。不久蒙明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年）双方达成和议。

双方最终言和并非偶然，有着经济的和历史的原因。首先，这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需要。蒙古的游牧经济和中原的农业经济密不可分，蒙古缺少粮食和铁锅等生活必需品，因而有一定的依赖性，迫切需要与中原进行贸易。如果没有必要的贸易，便难免进行抢掠。所以说双方的议和贡市具有必要性。其次，多年的战争不但给明朝的广大军民带来了灾难，也给蒙古部民带来了不幸，大批蒙古人死于人掠的征途中，如嘉靖二十年俺答率兵深入山西石州，“则人马道死数万”。不仅如此，入掠还将天花带到了蒙古地区，在此后的时间里，天花以及瘟疫夺去了无数蒙古人的生命。为此，俺答令巫师卜于神，结果是：与明通贡则大吉大利。如果说俺答素有求贡之志的话，那么入掠所造成的人马减员以及巫师的解释则坚定了他的决心，所以在使者被杀之后仍能反复求贡。再次，明朝换了皇帝。老皇帝嘉靖是一个刚愎自用、异常专断的人，他对蒙古的态度一向强硬，反对互市。

新继位的隆庆帝要开明得多，这就为隆庆五年的议和——俺答封贡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促成议和的直接原因则是把汉那吉的降明。

隆庆四年十月，把汉那吉至大同败胡堡请降。把汉那吉，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的独生子，幼丧父母，由祖母克哈屯抚养，长大以后娶大成比妓为妻，又聘了兔扯金之女为妾。当时俺答有一

个外孙女三娘子已许嫁鄂尔多斯，此女长得十分漂亮，又很聪明，俺答便将之夺为己有。为了平息鄂尔多斯的不满，俺答又将把汉那吉所聘之妾送给了鄂尔多斯。把汉那吉认为俺答自娶外孙女，又夺孙子之妾送人，发誓与俺答断绝关系，负气出走。把汉那吉一行来到大同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对他十分礼遇，并将此事奏报朝廷。

把汉那吉走后，祖母爱孙心切，不断埋怨俺答。俺答也很后悔，想以武力迫明交出孙子。由于高拱、张居正，以及王、方等人的内外努力，明朝决定送还把汉那吉，以换取常引俺答入犯的赵全等汉人。俺答得知爱孙无恙，喜出望外，答应了明朝的要求，并请求贡市。四年十二月，俺答执赵全等九人献给明朝，不久，明朝遣使送还了把汉那吉。

隆庆五年三月，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对其子弟也各授官爵。稍后，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明廷决定允许俺答遣使入京贡马，每年一次六十人。明蒙之间的入贡贸易又恢复了。

此外，在沿边一带又设立了马市，每年开市一次，市期一个月，同时又允许开不时小市（又叫月市）。

这样，隆庆五年，明朝册封俺答，允许他入贡通市，这件事史称“俺答封贡”，今天一般也称为“隆庆和议”。

俺答封贡之后，他约束部下，不再抢掠，双方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长城内外的社会经济也得到发展。万历九年（1581年），顺义王俺答死去，其后子孙相继袭封，俺答妻三娘子在蒙古诸部中仍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继续尊奉明朝，所以自封贡之后，“四十余年再无用兵之患”，北边得以安宁。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俺答封贡》

《明经世文编》卷317。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

张居正辅政

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进士，这位来自湖广江陵的年轻进士，志得意满，从此就踏上了官宦之途。

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严嵩任首辅，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张居正满腔热情投身于仕途，但当他逐步了解了政治的黑暗时，又显得忧郁悲观起来。在翰林院当了七年编修，他感到颇为乏味，因为他徒有满腹经纶，却无人欣赏他，于是就称病辞官回家。在家里种上半亩修竹，一边则潜心读书。很快六年时间就悄悄地过去了，他学问大长，在他父亲的鼓励下，他重又进京为官，任国子监司业。公事之余，他颇为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并仔细留心现实政治。不久，世宗病逝，大学士徐阶起草遗诏，就征询了张居正的意见。隆庆元年（1567 年），他被遴选入阁，他的仕宦生涯第一次出现了转机。

为了实现经世治国的抱负，隆庆二年，他向穆宗上了一奏《陈六事疏》，提出应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事事切中时弊，但穆宗也不是一个想有作为的皇帝，虽然他欣赏张居正的才识，但并不采纳。穆宗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隆庆六年五月，年仅九岁的朱翊钧登上皇帝的宝座，九岁的小孩正是游玩嬉闹的时候，现在却要主掌国事，不禁引起朝内外的担忧，但为张居正辅政提供了契机。

当时的内阁由高拱、张居正和高仪组成，高拱是首辅，高仪

则是一个月前刚刚入阁的，张居正与高拱都是穆宗临终前的托孤重臣，政事固然是由高拱和张居正操纵，但张居正不是首辅，在许多事情上势必要受高拱摆布，但他足智多谋，工于心计。高拱则性格外向，对于年仅九岁的朱翊钧，能否胜任皇帝的重担，表示深深的担忧，他曾在文渊阁向臣僚说："十岁（虚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话语传到神宗嫡母陈皇后、生母李贵妃耳中，引起了她们极端的不快。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公开与高拱作对，并引张居正为外助，于是高拱首辅之位就岌岌可危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由来已久，嘉靖年间，冯保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地位最高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缺员，按资历当属冯保，但高拱却推荐了御用监太监陈洪，陈洪之后，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从此，高拱与冯保积怨。陈洪与孟冲又多引诱穆宗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致使穆宗身体日坏，这样也引起陈皇后、李贵妃的不满，她们自然就亲近冯保了。就在穆宗弥留之际，冯保在陈皇后与李贵妃的支持下，取代了孟冲，引起高拱极端不快。于是，高拱想利用内阁和言官的力量除掉冯保，并同张居正商量，张居正表面答应，暗中却通知冯保。六月十六日，神宗即位后第一次接见朝臣，高拱欣然前往，以为这次一定是驱逐冯保。可结果却大出其意外，神宗端然而坐，冯保则立于其旁，冯保宣读了陈皇后、李贵妃及皇帝的谕旨，高拱被勒令回籍闲住。高拱听完，几乎昏厥，最后由张居正挟掖而起，狼狈出廷。张居正遂自然地成为首辅。

张居正为首辅后，对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极力巴结，终于颇受信任，而且尊重冯保，使冯保能和他能密切配合。七月的一天，神宗在平台向张居正面谕："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按历朝习惯，皇帝初立，都要尊皇后和生母为太后，于是陈皇后被尊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被尊为慈圣皇太后。两位太后将外朝委政于张居正，内政则交

托于冯保，而且她们对年幼的万历皇帝管教亦颇严。慈圣皇太后以羽翼幼主的名义搬入乾清宫，每逢经筵，日讲后，她总要神宗重复一遍，严厉督责。并极力培植张居正的威望，致使小皇帝对张居正颇有几分敬畏。一旦神宗有所过错而不思改掉，慈圣总是说："让张先生（居正）知道了，你怎么办呢！"于是神宗就只好认错。

政事之余，张居正则辅导神宗读书。他给神宗安排了经筵和日讲的课程，年幼的神宗颇喜欢书法和历史，张居正就常给他讲些历代帝王治国之故事，并让人选一些有关君德治道的文章作影格，供神宗临摹，使年幼的皇帝在写字中得以启迪。并劝告神宗，作为一代帝王，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到书法上，而应注意帝王之学，因为古代有许多皇帝，像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都长于诗文书画，但于国事无补，故应多方学习治国安天下之策。后来，张居正让人编了一套《历代帝鉴图说》，将古代帝王可以效法的善事摘取八十一条，应当惩戒之恶行三十六事，各绘一图。并附文说明，神宗颇喜欢这套书，而且对张居正的忠诚亦颇为感动。

张居正在小皇帝面前树立了威严，又颇得两位太后的信任，内廷又有宦官冯保的支持，于是他辅政期间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政治抱负。

他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张居正目睹了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吏治腐败。万历元年（1573年）他提出了"考成法"，首先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都要做到法之必行，行之必效。对官吏考核逐级进行，督抚、巡按以之考核属吏，吏部因之督察抚按，朝廷再以之考察吏部之贤否。并且建立随事考成的制度，以做到事事都有着落，有交代。在考察官吏中，张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员，奖励了一批贤能正直官员。同时在中央竭力提高内阁权威，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地方上则分

清抚、按职掌，明确其职责，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助督责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法令。同时亦整顿了府、州、县学，核减生员，黜革一批不称职的学官。

对于边防，张居正亦颇为重视。他一向支持戚继光整顿蓟镇防务，同时用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虽然小王子部数次率众十余万骚扰边境，由于戚继光、李成梁防守坚固，边境安然无事。

而张居正当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财政危机，因此，理财就成为他改革的重点。他大力开展了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同时对皇室的费用，亦力求节省，以便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措施，以便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明初，田赋及力役的征调，主要依据记载田亩的“鱼鳞图册”和记载户口的“赋役黄册”。明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人口逃亡，户籍紊乱。虽然人丁生聚，田野开垦很多，但全国田亩数额以及户口数反比建国初期减少，政府实际所能征收的税额也日益减少，使一般平民负担日益加重，而官僚地主霸占民田，想法把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张居正对此看得很清楚。于是他选派精明强干的官员严行督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为此，他派人制订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并限令各地在三年之内要把清丈土地与清理赋税工作办好。到万历八年，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因之也剧增。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继唐朝“两税法”以来，我国税史上又一次大改革。

“一条鞭法”，早在嘉靖、隆庆年间就开始在一些地区试行。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巡抚御史庞尚鹏就在浙江实行过，隆庆三年，海瑞在应天府曾亦推行过，但都遭到了大地主们的强烈反

对。此次张居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起来就容易多了。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赋役合并，以丁田分担役银。原来的两税赋及里甲、均徭、杂泛等劳役和土贡方物皆合并成一项。徭役一律征银，取消力役，由政府雇人应役，役银按人丁和田地来分担。二、除苏、松、杭、嘉、湖地区继续征收本色粮食，以供皇室官僚等食用外，其余一般征收折色银。三、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各州县原有的赋役额不得减少。四、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负担，同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它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同时将以户、丁作为征收对象改为以丁、田分担，也使商人减轻了负担。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一件大事。

此外，张居正为了发展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万年间，黄淮经常泛滥成灾，经年不治。于是他重用潘季训，大力支持他治河，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张居正逐步推行改革的时候，神宗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他钦佩张居正渊博的学识和果敢干练的作风。开始，君臣关系极为融洽，神宗时常关注张居正的生活，有次，张居正在值班时生病了，神宗到暖阁亲自调制椒汤赐之。酷暑之日，神宗让内使给张居正摇扇；数九寒天，则命内使在张居正站着的地方铺上毡片。张居正亦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但一旦碰上神宗有错，张居正往往颇为严厉，神宗对待张居正渐渐由敬畏到反感。有次，神宗朗读《论语·乡党》，不经心地把"色勃如也"错读成了"色背如也"。立在身旁的张居正厉声说道："应该读作'勃'！"神宗猛一哆嗦，内心打了一个寒颤，心想"难道这是朝臣对君主应该用的口吻吗？"于是逆反心理就日益滋生起来。尽管如此，在表面

上，他们的关系还是颇为融洽。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的惯例，张居正必须离职居丧守孝三年。当时万历皇帝依然年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独掌政事，而张居正谋划已久的改革还刚开始，于是，神宗下诏书“夺情”，说是公务需要，张居正不必离职守孝，而且赙赠甚厚。但当时张居正的政敌如吴中行、赵用贤等，便以夺情为口实，群起而攻之，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说“夺情”是违背伦理纲常，要朝廷罢免张居正的官职。神宗则连下戒谕，廷杖首要分子，平息了反夺情的风波。次年三月，张居正请求归家葬父，神宗允诺，君臣相见于平台，相对哭泣，竟难分舍。三个月后，张居正从江陵返京，君臣关系一如既往。

万历八年，神宗已经十八岁，这时他觉得自己经书已经读完，政事又有张居正掌理，清闲之至，遂寻求消遣之策，乾清宫管事太监孙海、客用遂挖空心思，极力加以引诱。十一月的一天夜晚，神宗游玩到西城，酒后要小内监唱曲子，小内监张口唱来，曲调皆不和谐，神宗一怒之下将小内监鞭挞了一顿，而且割掉了他的头发。很快冯保就将此事报告给已搬到慈宁宫住的慈圣太后，神宗马上被叫到慈圣太后面前，被罚跪下，并狠狠地挨了一顿训斥，张居正在旁边一面给皇帝讲情，一面请求处治邪佞内臣，孙海、客用被杖，并被赶出内宫。此次惩罚，给已成年的神宗留下了极大的耻辱，他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打击，对张居正遂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张居正志得意满之际，神宗对他却日益不满。张居正晚年对待官员之升任与罢黜，亦多由自己之爱憎，他渐渐表现得骄横起来，但其生前总算享尽了荣华富贵。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与世长辞，不久，张居正生前的政敌就纷纷上疏弹劾他。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逐追夺张居正官阶。次年四月，又籍没张居正的家财，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

杀，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他辅政十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随着神宗的报复行为的发生，全都灰飞烟灭了。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61“江陵柄攻”。

《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明神宗实录》。

《张文忠公全集》。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出现于明代中期，至万历九年（1581 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行。“一条鞭法”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摊丁入亩”，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初的赋役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法。赋和役是截然分开的。田赋一年分两次交纳，分别叫“夏税”和“秋粮”。夏税不得晚于八月，秋粮不能迟于次年二月。田赋的数额因地而异，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芦地五合三勺。草场地三合一勺。洪武九年（1376 年），明廷下令：天下税粮准以银、钞、钱、绢代输（代替粮食），此后，称米、麦等税粮为本色，称折纳的钱、钞等为折色。

此外，还有各项杂税，如鱼课、茶课等，后来也并入两税征收。

明初的徭役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为“里甲”正役，一为杂役。所谓“里甲”，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制度正式实行于洪武十四年（1381 年），这一年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设甲首一人。里甲正役就是每年由一名里长、一名甲首率某一甲的十户应役，负责本里内催办钱粮、勾摄公事等公共事务。每甲都是应役一年，歇九年，“十年一周”。十年之后再以里甲为单位重新编造黄册（户口、田产等清册），作为以后征收赋役的依据。

里甲正役开始只限于一里之内的事务，后来其负担逐渐加重，官府祭祀、造作、供帐、馈送、夫马等等许多费用都让里甲承办[①]。

仅次于里甲的徭役便是均徭。均徭大多是为各级衙门服务的“杂泛差役”，如皂隶、弓兵、膳夫、馆夫、柴薪等等。它的指派是以户等为依据。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廷下令，依上、中、下户等作赋役册，以此作为佥发徭役的标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再次下令，除排年里甲（里甲正役）依次充当外，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当时户等的划分以人丁、田亩、资产等为据，大体上是上户（丁粮多者）应重役，下户（丁粮少者）应轻役。

均徭分为银差和力差两种。力差必须出人服役，银差则折银代役。

里甲与均徭号称两役。两役之外，驿传、民壮两项也普遍存在。后来有的地区将此四役合称“四差”。这里从广义上说，均徭、驿传、民壮都属于杂役（里甲为正役）。

明代前期的赋役不但名目繁多，而且征收手续也十分庞杂。赋役的项目前已述及，至于征收的环节，则有数不清的名堂。首先每隔十年都要造一次黄册，同时排定户等，以此作为十年内征收赋役的依据。在具体征收过程中，田赋分起运和存留两大类。起运是指将税粮等解往外地，存留是指存留于本地。赋税的征收由民间负责，如浙江、南直、湖广、福建等地设有粮长，其任务便是负责税粮的催征、经收和解运。至于徭役，在征收时说法更多，如东南沿海等地的杂役有所谓额办、杂办、坐办诸款。额办一般是三年一办，有固定数额；杂办没有定额，随时征收；坐办，概为一年一办。此外，又有“正编”和“加编”等等，都是

① 参见《明代一条鞭法的争论》，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额外加派。各种负担简直是多如牛毛，征收手续又不胜纷繁。

除了上述问题外，明前期赋役制的最大弊端还是赋役不均。地主豪强多方兼并土地，但却不愿如实纳赋。缙绅地主本来享有优免特权（免若干亩田赋、若干丁役），但他们并不满足。缙绅地主和非缙绅势豪竞相隐瞒田产，想尽办法转嫁赋税，以致形成了有田者不纳税，纳税者没有田的不合理状况。国家掌握的纳赋田产日渐减少。徭役的负担也很不合理。基层官员和胥吏与大地主们一个鼻孔出气，在大造黄册和佥派徭役时上下其手，各种徭役往往是“放富差贫”。如武宗正德时期，福州“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役尽责之民。”

由于赋役不均，各种负担都转移到了不堪重负的贫民下户身上，致使许多人纷纷逃亡。这不但多少影响了国家的税收，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种情况下，赋役制度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

早在正德时期，江苏武进县便实行过“十锦段法”，做法是“一县田地均分十段，造别十段文册，每年编审一段”。也就是说将一县土地、人口分为十段（部分），每年将全县徭役在一段内依田亩、人户为对象佥派。这是一种役法改革，多少体现了将徭役分摊入田亩的精神。

进入嘉靖时期，赋役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嘉靖二年（1523年）御史黎贯疏请区划税额。不久顾鼎臣和御史郭弘化提出了丈量土地的要求，但嘉靖帝担心阻力太大，没有接受。

嘉靖九年，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审编徭役》的奏疏，提出了改革赋役制度的建议，办法是：“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其实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一条鞭法”。

嘉靖十年三月，御史傅汉臣疏请实行“一条鞭法”，但没有得到批准。以后直到万历九年一些地方官在个别地区推行过，但屡行屡止。嘉靖一朝议论、推行“一条鞭法”的事例共三十六

条，隆庆一朝五十五条，万历元年至八年有九十多条。

从嘉靖九年至万历八年，推行“一条鞭法”的典型事例有如下几起：

嘉靖十六年，应天巡抚欧阳铎与知府王仪、黄润在苏松二府推行“一条鞭法”，将徭役银按丁、田均派。

嘉靖四十四年，庞尚鹏巡按浙江，开始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做法是：将夏税、秋粮、均徭里甲、土贡等各项负担通为“一条鞭”征银，根据丁、田统筹征收。

隆庆三年（1569年）应天巡抚海瑞在所辖地区推行“一条鞭法”，徭役不分银差、力差一律征银，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

隆庆四年，由于巡按蔡克廉、巡抚刘光济等人的先后努力，明廷正式批准在江西推行“一条鞭法”。

从总体上说，明代“一条鞭法”的推行，南方较早，北方较晚（北方个别地方有例外），所以在一条鞭法的早期事例中也以南方为多，北方为少。

“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的推行是万历初年的事。万历六年（1578年）首辅张居正正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至万历九年清丈结束，全国田地总数达到七百多万顷，比弘治时多出三百多万顷。清丈之举为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铺平了道路。

也就在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举国皆行“一条鞭法”。这也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从地区上说，他把嘉、隆间个别地区时断时续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从内容上说，他推行“一条鞭法”又是集各地所行“一条鞭法”之大成。

那么，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赋役合并，部分地摊丁入亩。原来的赋与役是分

的，赋和役又各自分为许多项。实行“一条鞭法”后，各项完全合并，即赋内各项合并，役内各项合并，赋与役合并。赋内已没有夏税与秋粮、存留与起运的区别，一概计亩征银。役内也不分什么里甲、均徭，以至四差，统统合并；原属银差的，照旧征银，原属力差的，则计算工食之费，折成银两征收。不仅赋内、役内合并，赋与役等各项负担也完全合并。这样里甲、均徭与两税相结合，原来的役银以丁粮（田亩）为征收对象酌情佥派。至于丁、粮的比例各地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征收役银以丁为主，如丁六粮四（全县的田地要均摊本县十分之四的役银），有的地方以田为主，有的地方丁粮各半（全县人丁与全县田地各负担原来役银的二分之一）。总之，里甲、均徭、两税以及各种后来的加派一律合并为一条，原来各地的役银一部分摊人田亩中均派。

第二，各项赋役征银。除了苏、松、杭、嘉、湖地区的田赋继续征本色粮以供京师食用外，其他地区的田赋以及徭役等全部折银征收。

第三，“一条鞭法”征收赋役时以州县为单位，各州县每年原有的赋役额不得减少。

第四，赋役银的征收改为官办。没实行“一条鞭法”时赋役名目繁杂，征收时间各异，而且粮食、物料又不利于征收和解运，所以实行民办，由粮长、里长等办理。改行一条鞭法后，简便易行，白银又便于运输，所以便于地方官直接征收。

“一条鞭法”的推行，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一，简化了赋役项目和征解手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也减少了胥吏作弊的机会。第二，使赋役负担变得相对公平，多少减轻了无地、少地的贫民下户的徭役负担，减少的那一部分役银则派给了田连阡陌的世室富人。这无疑有合理性。第三，赋役一律征银，以及部分地摊丁人亩的做法，减轻了无地的工商业者的负担，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为清代将丁银完全摊人

田亩奠定了基础。

不过"一条鞭法"也不无局限，并且执行得并不彻底。张居正等推行"一条鞭法"并不是要减轻农民的赋役，而是在赋役额不变的前提下，稍稍牺牲地主富豪的一小部分利益，以维持明王朝的统治。原来的赋役额不得减少的宗旨，就使得明中叶以来的加派合法化。此外，赋役一概征银也造成银贵粮贱的局面，而农民在交纳赋役银时首先要用粮食等实物换成银两，这样也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史称："一条鞭法"行十余年后"规制顿紊"，不能尽遵。本来从制度上说力差已经取消，可事实上粮长、里长等役名革实存，况且丁银之外每年都额外加派杂役。

然而不管怎么说，"一条鞭法"的推行，进步意义是主要的。自万历九年起，一条鞭法已成了占主导地位的赋役制度，至万历二十年，明代各省已普遍实行一条鞭法。清人关之初，仍然相沿不改，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才正式实行摊丁入亩。这样，"一条鞭法"作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百四十四年。它的出现、存在以至退出历史舞台都不是偶然的，反映了百姓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弱的历史趋势。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会要》卷54，食货二：田赋、力役。

《明史·食货志》。

《续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

《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引《海盐县志》。

潘季驯治河

自古以来，黄河就经常泛滥成灾。明中期以后，黄河常冲决堤坝，涌入运河，致使漕运遭破坏。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江浙一带每年要有四百多万石漕粮经由运河北运，以供京师之需。当时的黄河主道是从河南兰考夺汴河水道东流，经沛县、徐州、邳县、宿迁，在淮阴与淮河汇流，出云梯关入海。这样，黄河不仅逼近运河，而且从淮阴到徐州一段黄河水道也就是运河水道。黄河不断决口泛滥，直接威胁着运河的安全。

为了更好地治理黄河，确保运河，明政府在成化七年（1471年），特置总理河道之官，由工部侍郎王恕担任。在以后的治理黄河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治河专家，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潘季驯。

潘季驯，字时良，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由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当时黄河从沛县飞云桥决口，东汇涌入运河，并将那一带全都淹没。潘季驯与吏部侍郎朱衡受命率民夫九万，开凿自南阳至留城四十一里的新河，又疏浚旧河自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从而解决了这一带的水患。这是潘季驯首治黄河，工成之后，进官右副都御史。

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又在邳州、睢宁决口。朝廷遂又复潘故官，总理河道，堵塞决口，次年工竣。但遭勘河给事中雒遵弹劾，被罢官职。

潘季驯治河最为成功之时是在万历年间，万历四年（1576

年）他又被征召，巡抚江西。次年改刑部右侍郎。当时，黄河在崖镇（在泗阳县西北）决口，淮、扬、高邮一带全被淹没，当政之大学士张居正颇为忧虑。朝臣纷纷上奏治河方案，有的认为应多开河道，以将水引入大海；有的则认为应将崔镇决口堵住，筑长堤，修理高家堰（淮阴县西南），开复老黄河。张居正不为所动，毅然再命潘季驯总理河道。万历六年，潘季驯走马上任，他不为各种议论所左右，与督漕侍郎江一麟详细考察了水势，最后决定不复故道，维持现今河道，堵塞崔镇缺口，并遥筑堤坝以防溃决。同时考虑到黄、淮两河之特点，他一改传统之分疏办法——就是在下游多开支河，将大水化小，急流化弱，同时开宽入海口，以便河水宣泄。但是结果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是越分疏，水越缓，沙越沉，淤塞越快，河越容易泛滥。有鉴于此，潘季驯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他认为，黄河夹带了大量泥沙流入平原地带，流急则沙随水流，缓则水漫沙停。因此他提出在高家堰修筑堤坝，提高淮河水位。然后让黄、淮并流，水急沙走，河道自通。他在上神宗的奏疏中，提出治河六条办法："塞决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杜溃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神宗批准了其奏疏，于是他就逐步实施自己的计划。

自万历六年夏至次年十月，兴修了一系列工程，修筑了高家堰、归仁集、柳浦湾等堤，并堵塞崔镇等决口一百三十个。筑了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徐、沛、丰、砀缕堤一百四十余里，还建了一系列大坝。这是一个系统而完整的束水防患工程，缕堤是"束水归漕"的，这是关键，距它两三里之外的遥堤是屏障，二堤之间又建格堤（横堤）以作缓冲，这样就构成了三道防洪线。同时堤上栽柳种树，以之加固堤防。自此以后数年，黄河无大水患。万历八年，潘季驯因功加太子太

保，进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同年秋，又升南京兵部尚书。

张居正对潘季驯的治河方案全力支持，使潘季驯能大刀阔斧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张居正死后不久，神宗却一反原来之态度，追夺张居正官阶，其家属被迫害致死的有十余人。对曾经支持过张居正改革的朝臣亦大加打击，潘季驯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被落职为民。

万历十六年，经给事中梅国楼举荐，遂再用潘季驯为右都御史，总督河道，这是潘季驯四任此职，次年黄河水暴涨，冲人夏镇，毁坏田庐。潘季驯时已年近古稀，但依然亲临指挥，筑堤塞口，以消除水患。潘季驯在治黄工程上花了二十七年心血，直到万历二十年告老致仕之时，年逾七十二岁的老翁还对神宗说："去国之臣，心犹在河。"

潘季驯不仅实地组织领导了成绩卓著的治河工程，而且在《河防一览》、《宸断两河大工录》著作中，对自己治黄经验进行了总结，详细论述了其束水攻沙之原则、建堤防患之方法，为后人提供了一份极为宝贵的财产。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神宗本纪》。

《明史·潘季驯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34"河决之患"。

《河防一览》。

神宗朝政

隆庆六年（1572 年）五月，明穆宗朱载垕驾崩于乾清宫。他在临终之际，向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嘱托后事，谕令顾命，辅弼皇太子。六月初十日，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翊钧入继大统，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万历元年，此人即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明神宗。

明神宗即位仅一个月，朝中阁臣之间出现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大学士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相互联手，在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的支持下，斥逐了内阁首辅高拱，将朝中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张居正担任首辅后，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活动。从万历初到万历十年，他致力于整顿吏治，整治边防，节约开支，推行“一条鞭法”，给国家带来了百事转苏的新气象。北方的“虏患”基本上平息，南方的倭寇也逐渐被荡平，连年亏空的财政情况大为好转，府库充盈，社会安定。张居正对年幼的天子，也是关心备至，他安排明神宗每逢三、六、九早朝，履行皇帝的职责，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张居正为把神宗培养成尧舜之君，为他制定了严格的日程安排表，并亲自为他讲授经书和历史。明神宗平时的起居由“大伴”冯保负责，学习不得以气候变化等原因而废罢，并随时要向慈圣太后报告。如果明神宗稍有懈怠，慈圣太后得知后训斥他时总要说：若是让张先生闻知，如何是好。由此明神宗对张居正始终是敬而畏之，自己学习十分刻若，无论是学业还是书法都大有长进。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相张居正病逝。明神宗满怀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谥文忠。继位十年，明神宗朱翊钧由最初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长成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不懂朝政到谙熟朝政，他早已不愿只做一名木偶皇帝，在大臣的制约下简单地履行公事、批红下诏，而一心想亲掌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朝皇帝。因此张居正在世时，他已产生了不满情绪。亲理朝政之后，他进一步感受到君权和相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张居正虽已不在人世，但他秉政期间提拔重用的一大批官员，还继续掌握着各级机构的实权；与张居正相为表里的大太监冯保，照常控制着厂、卫特务机构，继续耀武扬威，骄横跋扈，使神宗觉得难以忍受。另外张居正、冯保长时期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态度也让神宗觉得难以忍受。一次在经筵日讲时，明神宗读《论语》“色如勃也”，将“勃”误读为“背”，张居正立刻厉声喝斥道：“当读作‘勃’”。神宗“悚然惊起”，在场的朝臣无不大惊失色。同时冯保倚仗慈圣太后的势力，对明神宗多所挟制。平日神宗与宦官戏耍之时，看到冯保走近，总要正襟危坐，道：“大伴来矣”。宦官孙海、客用引导神宗外出作乐，又屡进奇巧之物，冯保告知太后，致使神宗在太后面前长跪受教，又请张居正草拟了罪己手诏，颁示阁臣。当时神宗年已十八，内心十分不情愿，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这种严加管束的方式势必引起明神宗日甚一日的反感。张居正去世后，冯保依旧盛气凌人．太监张鲸、张诚素来与之不合，伺机向明神宗诉说冯保罪过，并揭发冯保与张居正交结专权之事，请求神宗下诏“令保闲住”。这种要求对明神宗来说无疑是正中其怀的。然而慑于冯保向来的威风，明神宗起初有所犹豫，言“若大伴上殿来，怎么办?”张鲸答：既有圣旨，他如何敢来。神宗这才放心。于是当御史李植参劾太监冯保当诛十二罪状后，明神宗即下诏将冯保发落南京闲住，同时派锦衣卫查抄冯保家产，得资巨万。随

即又下诏罢免了与冯保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希诏、吏部侍郎王篆等人的官职。此时距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时间。

张居正在秉政期间，一方面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同时滥用职权排斥异己势力，树立了很多的政敌。冯保被驱逐后，张居正便受到日甚一日的攻击和处罚。万历十年十二月，御史杨四知论张居正十四大罪状，主要有欺君蔽主、招权树党等。明神宗即刻传旨，言张居正受皇恩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反而“怙宠行私”，辜负恩眷。万历十一年三月，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被废为民。同年八月，再夺张居正死后的封赠、谥号。这一时期内朝中不仅揭发张居正本人罪行的本章相继不绝，就连与张居正来往密切，积极推行张居正改革措施的官员也接连遭到参劾。明神宗抓住这一时机，亲自进行人事调整，以清除张居正“招权树党”为名，罢斥与其关系密切的官员，刑部尚书殷正茂、总督两广兵部尚书陈瑞以悦“张”被罢，湖广巡抚、右都御史陈省以“私张”遭斥逐，张居正之子张懋修的进士也被革去。张居正生前曾将辽王废为庶人，夺占了辽王府第。此时辽王次妃乘机而起，指控张居正为谋夺辽王府弟，设计诬陷，不但夺占辽府，又将府中所有金宝据为己有。万历十二年四月，明神宗命司礼张诚等人偕锦衣指挥、给事中，前往湖广荆州籍没张居正家产，翻箱倒柜，并未发现什么巨宝。在张诚等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杀，家族倾家荡产，凑足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上缴，方才过关。刑部尚书潘季驯获悉张氏家族被抄惨状，特奏皇上对张居正年过八旬的老母予以恩典，当即被江南道御史李植劾奏为张居正死党。明神宗大怒，降旨将潘季驯削职为民。

八月，尽削张居正之官秩。明神宗下令将张居正的罪行颁示天下：诬陷宗室藩王，侵占王府土地财产，控制言官，蒙蔽皇

上，私自废掉辽王，假借丈量土地，扰乱天下，专权乱政，辜负皇恩，于国不忠。本当对其斫棺戮尸，“念其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孙张顺、张书，俱发配至烟瘴地。至此，清算张居正影响的运动告一段落。在明神宗亲理朝政的两年中，他斥逐了冯保，讨伐了张居正，重新调整了君臣关系，真正成为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名副其实的皇帝。

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四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时期。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才干，他勤于政事，虚心纳谏，“留心民瘼，加意人才”，按时视朝日讲，裁定国家大事。万历十二年八月至万历十三年四月，北京地区一直未降雨雪，旱象严重。为了求雨，明神宗决定亲自步行至南郊，向上苍祈祷。五月十六日，明神宗与百官一道，身着黑布镶边的衣布袍，以牛角带代之以金银玉带，旗帜和乐队概行免去。神宗左边是两千名文官，右边是两千名武官，浩浩荡荡，步行十里前往天坛。祭祀完毕，宦官们让御轿抬到明神宗面前，但他坚决不坐，仍和百官一起步行回宫，这一趟往返凡十里路。万历十三年五月十九日，明神宗在视朝之后，又召见辅臣磋商政务，这次“辅臣召对之典”，乃是自弘治以来停废近百年后的第一次。明神宗在这一时期还注重选用有实际才能的人担任文官武将。万历十一年九月，吏部按照迁升例推升官吏，神宗在详细询问情况之后表示：今后凡各处要紧事情，不必论资格历俸，以才能为推选原则。但是朱翊钧本身是一个贪婪酒色，安于享乐的君主，随着因争立皇储与阁臣之间冲突的加剧，这段时期的励精图治犹如昙花一现，代之而起的是数十年的长期怠政和聚敛钱财的劣迹。

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以后，明神宗“连日免朝”，是为怠政之开始。二十八日，明神宗谕旨：由于早起，一时“头晕眼黑，乏力不兴”，暂免朝讲数日，以便“静摄服药”。甚至亲享太庙的出行，也改由徐文璧代替。时享太庙是指皇帝在春、夏、

秋、冬四季按时到祖庙行祭祀的一种制度。皇帝是否亲自进行，就成为其勤政与否的一项标志。自此时起，明神宗对时享太庙，多为遣官摄行，自己则几十年不躬亲，不出行。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言神宗传旨免朝，日前又下诏称头晕体虚，暂罢朝讲，外面传言是因“试马伤额”，故“惰朝废典”，引疾自我掩饰。疏入，神宗大怒，诏曰卢洪春狂妄放肆以沽名钓誉，诬蔑皇上蛊惑众臣，廷杖六十，革职为民，永不召用。

万历十五年二月十一日，明神宗派遣文书官李兴“传免经筵”。经筵日讲是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讲席之上，君臣除对经史进行研读外，还经常联系朝政的实践互相讨论，这也是考察皇帝勤政与否的一个标准。明神宗自万历十四年下半年借口有病停止日讲后，一直多次传免。此进再次传免。大学士申时行等恭问起居，被告以圣体连日动火，时作眩晕。万历十六年，明神宗再次礼谕大学士申时行等，言自入春以来，心肝二经之火屡动，头眩目烦，支持不及，而并非是贪图安逸，废于讲习。申时行经过考虑，奏请日后免讲，仍进讲章以备观览，即提出以进呈讲稿来代替君臣当面讲习，此后遂永远停罢了经筵日讲。

明神宗接见大臣的方式有元旦贺朝、常朝以及专门召见等。自万历十七年元旦，因发生日食，免朝贺后，每年元旦“皆不视朝”。同年三月，由于神宗久不视朝，大学士申时行建议，将升授官面见皇帝谢恩的制度，改为如果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仅“具疏奏知”了事。明神宗当即予以批准，而其上朝议事之举，从此便越发稀少了。

万历十五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奏章。对臣下的奏疏进行批答，是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形式。万历十四年，得明神宗宠爱的郑妃生下皇三子常洵，遂晋升为皇贵妃，整个朝廷掀起国本之争的浪潮。自后凡有疏论建储分封以及进封恭妃（皇长子

之生母王氏）等事，明神宗一概不加批答，即以留中置之。这种“年壮倦勤”的现象日益严重，引起阁臣的优虑不安。申时行等人接踵上疏，请将奏章“即赐裁发”，但留中诸疏，动至经时，且十留六七，未见有所改观。

万历十七年底大理寺事雒予仁上“四疏’，以规谏明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种过失，大意为：陛下日食八珍，好酗酒，日以继夜，其病在嗜酒色；宠阉人以开宠倖之门，爱郑贵妃不听君臣进谏，摈斥忠良，迟迟不立太子，其病在恋色；传旨索取帑金，括取币帛，甚至拷打宦官索取财物，其病在财也；今日笞击宫女，明日鞭打中官，罪状示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其病在尚气。疏人，神宗震怒。万历十八年元旦，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时，明神宗出示了“四疏”，声言要严厉惩罚雒予仁。申时行、王家屏力为解劝，看神宗意难挽回，遂提出此疏不可下发内阁，因为外人看到后会信以为真。建议传谕大理寺卿，令雒予仁去位。明神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不几时将雒予仁削职为民，而官员奏疏留中不发，从此就几乎成为定例。万历十八年夏，辅臣王家屏以久旱上言，提到自己所呈建议，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此后大臣上疏批评留中现象者史不绝书，明神宗又想出新的应付办法，即除刚送来的奏章留中外，对催请急件一律批答“知道了”，发还内阁。这种模棱两可的批答，反而使内阁更加无措，不知如何处理。万历三十一年继任首辅沈一贯言各衙门本章，例应三日即下，皇上初年，始有留中之事，现在更是“有奏而不发票”，即不以发票令内阁拟定措处谕旨；“有票上而不发行”，即内阁即使呈上所拟明措处谕旨，送到御案后，又被滞留不发。他指出皇上应明确批答，认为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当令重新审议，不应久留而不断。但明神宗的态度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对那些言词激烈，直言指斥留中现象者，一般只说：此沽名耳。也不加罪。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言数月以来，廷推搁矣，行取停矣，年例废矣。廷推，是指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重要职位出现空缺时，由朝内大臣向上推举，再由皇帝点用的制度；行取，是指从地方上选取推官、知县到朝内担任给事中、御史及科道官的制度；年例，是指科道官每年有一部分人按规定转到地方或京城其他部门的制度。孙丕扬这番话道出了当时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当时六科之中只有掌科一人，十三道中更无一人主印。"西台东省，列署半空。"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明神宗迟迟不点用新人，致使部事尽弛，至十二月竟然因此废止了大选。科道的考选，原为每年一举，间岁一行，自此则变为"取不以时，考不以时，命下复不以时"。有时已经点用，谕旨又复留中，虽然内阁催请频频，明神宗却无动于衷，坚持如故。

这年十二月，乾清、坤宁两宫起火，大学士陈于陛心急如焚，请求面奏神宗。疏入不报，陈于陛奏请辞职，亦不准许，忧愤成疾，旋即病逝。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御史毕三才疏言，朝中内外官吏，先是俸及三年即可迁升，近例非四年半以上者不迁，今则历俸五六年者有之，七八年者有之。可见当时人滞于官的情况已很普遍。一方面是人滞于官，另一方面是机构减员得不到补充。万历三十年，两京尚书缺三人，侍郎、科、道缺九十四人，巡抚缺三人，布政司、按察司及监、司机构缺六十六人，有二十五个府缺少知府。至万历三十四年，中央九卿要员虚悬过半，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人，就短缺了二十四人。两京监察机构，所剩官员廖廖无几。到万历四十年，缺官不补的现象更为严重，内阁仅叶向高一人，且"杜门三月"。六卿仅剩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八年无正官，十三道皆以一人兼数职，半数以上的府缺少知府。当时的朝

臣关于缺官误事的章奏几乎月月不断。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大学士叶向高再次请求任命户部、礼部主管人员，言目前户部事务，停阁已久，其最急者，如各边防军队请求军饷，无人给发；各地解递的税银，无人批收，……四方进贡的藩夷六七百人久当发遣，也因部堂无官，遂至停滞。万历四十年，左都御史许弘纲上奏，说京师监狱囹圄犯人积至八百余人，陈请补用正卿及刑部司官以及时进行审理发落。疏上不报。至万历四十五年五月，刑科给事中姜养性再次上疏催请，言因搁延不审，有的犯人竟被禁锢长达五六年之久，因垂楚用刑，冬寒夏暑，不少人瘐死狱中。此疏呈上，仍旧没有下文，因监狱有进无出，羁押多年，致使暴满为患。而与此同时，新科文武进士及四方教职数千人，急待任命，惟因吏、兵二科掌印任缺，不能办理手续，使他们久滞京城，有的守候六年之久还未被点用，因为盘费耗尽，告贷无门，有人以乞讨为生，有的病死市井。明神宗对此依旧视而不见，一方面是他认为天下承平无事，官不必备齐，另外是他厌恶官吏经常上疏议论国政，言官动辄被罪。特别是朝廷掀起国本之争和实行开矿征税以后，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上章争请，谏止频繁而强烈，他们言辞剀切锋利，使明神宗感到十分难堪。为减少干扰，报复言官，神宗便有意经常借故罢免在职官吏，拖延补充新官。

政府层层缺官，军政大计无人料理，致使中外离心，怨声载道。同时朝臣之间由于皇帝怠政，缺少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则分成党派，争斗不已。一方面，在任的朝廷大臣对明神宗曲意阿附，以同乡、师生、旧友等关系，结为朋党，另一方面以气节自负，敢言直谏的官吏便不时与之发生冲突，自成一派。明神宗对阿谀自己的一派是给予支持的，但为了不使下臣权力过大，也不时给予对立面一点儿帮助。几十年之中，两派势力在争立皇储、京察等斗争中互有消长，斗争愈演愈烈。朝中两大派又因籍贯、

地域的不同，内部又各自分为若干集团和党派，故又被称为党争。万历二十一年，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寺御史孟麟等组成的东林党，就是议论朝政、抨击时弊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另一派势力则形成宣、昆、齐、楚、浙等党派。两派斗争空前激烈，通过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即丁巳京察），东林党人士受到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靡有孑遗"，楚、齐、浙党牢固地掌握着朝中大权，直至明神宗去世。

明神宗好货嗜利，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他一方面长期怠政，荒废国事，同时却挖空心思搜刮民脂民膏，供自己挥霍享受。万历六年，明神宗以筹备大婚，需要购买珠宝为理由，不顾张居正等人的谏止，将国库每年拨给宫廷使用的一百万两金花银增加为一百二十万两，并视为定额，令户部太仓库照例进上。这项金花银从此成为户部沉重的额外负担，只能依靠挪移它项钱财勉强维持。为了释去重负，户部经常上疏明神宗，要求将之取消。而明神宗却总是推三道四不肯答应，有时碍于索取此项银两缺乏充足的理由，明神宗便在户部所呈的奏疏上批答"稍待积剩自然停止"以作应付。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强调宫中急需用钱，以"见解到的着便交纳，其余还着严限催解进用"批出。直至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以"部帑已竭"，坚决请求撤销增加的金花银，明神宗才答应停免。至此这项"传索帑金"已持续了二十年。

明神宗即位的最初二三年，主膳管皇帝食开支的光禄寺每年的支出为十三四万银两，其后不几年就增至二十六七万，费用增加了将近一倍。万历三十二年，光禄寺卿王守素报告寺帑殚竭，明神宗只好下令借贷户部银三万两、太仆银两万两以弥补亏空。至万历三十九年，光禄寺一年费用已达二十九万两。

明神宗喜金银珠宝。云南贡金自嘉靖间定为年贡二千两，万历二十年增至五千两。地方官屡次请求减少贡额，都被明神宗借

口各种需求，加以拒绝。万历二十六年，吏科给事中吴文灿上疏批评宫廷买珠之价高至四十万两。另外宫中的日常消费，开支巨大，仅胭脂费一项，一年用银即达四十万两，每年供宫廷制作龙袍的衣料费用也需十万两。

万历年间，宫中凡举行婚、丧、嫁、娶及册封等各种典礼都要耗费大量钱财。万历十年，明神宗同母弟潞王朱翊镠举行婚礼，费银达八万八千多两，其中包括各式青红宝石、珊瑚珍珠等，户部要求裁减，神宗不从。万历十三年，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成婚，内监索用各色金至二千三百余两，还不包括珠宝，比嘉靖年间公主下嫁索用“不过三百两”超出七八倍。经户部和户科再三奏请裁减，神宗才答应减去三分之一。万历三十二年，福王朱常洵结婚，所费三十万金有余，是神宗自己大婚费用的五倍，创造了当时结婚费用的最高纪录。

万历十二年十月，明神宗的陵寝破土兴建。在此前后，他曾四次谒陵，目的是寻觅和视察自己的葬身之地。礼部依照神宗意图上疏，请定陵依永陵规模营制，“规制尽美，福祚无疆”。定陵修造了整六年，每天役使的工匠、民工不下三万人之多。万历十六年的一次，仅使用的轿夫就达一千六百名。其地下宫殿距地面二十七米，总面积一千二百平方米，极为华丽壮观。修建定陵共耗去白银八百余万两，相当于万历初期全国田赋两年的总收入。除了修造定陵外，明神宗还大兴土木，营建工程连年不断。万历三十一年吏部给事中应样条列“八极”，其中之一为“土木繁兴之极”。其中列举自万历二十四年宫殿内失火之后，工役渐繁，乾清、坤宁两宫兴建自不待言，其他如乾德阁、紫光阁、万寿阁、寿星殿、景德殿、永寿殿等处，陆续营造，连绵未断；昭和殿、清虚殿、显阳殿、拥翠亭、浮玉亭、飞香亭、金海宁、小南城坞等处，随工带造者，费用也相当大。

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为由，不

顾众多大臣的反对，刚愎自用地派出心腹太监，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了保证他们完成特殊使命，他授给矿监税使许多特权，让其有权节制当地有司，专章密奏。对于他们的劾奏，朝人夕传，不问是非曲直，即命锦衣卫前去逮捕入狱。从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四十八年，矿监税使流毒全国，结果是肥了皇室及其宦官本人，亏损了国库收入，害苦了城乡广大百姓。所以从一开始，众多官吏便接连上疏明神宗，慷慨陈词劝阻其事，地方民众更是一次次掀起反抗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明神宗自知理亏，但又不甘心放弃到嘴的肥肉。万历三十年，明神宗忽然得病，命大学士沈一贯进宫，谕称自知病势重，矿税之事，本为修建宫内大殿工程而筹措资金的权宜之计，现在可以与江南织造、江西磁器等一同废止勿行，派出的矿监税使全部召回京城。但是第二天明神宗病情渐缓，立刻反悔，派遣太监追回前谕，以后对大臣要求撤销矿监税使的呼吁一概不予理睬。直至万历三十三年，明神宗才迫不得已下诏罢除矿税，同时宣布了将税务移交地主官府办理等调整措施。但是延续至万历末年，税使之弊流毒全国的状况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从万历二十年开始，海内不靖，多有战事。除大大小小的民众起义外，宁夏叛乱、援朝抗倭战争和播州杨应龙反叛构成了“万历三大征”，成为明王朝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万历二十年二月，宁夏发生叛乱。哱拜原是蒙古鞑靼人，嘉靖年间归顺明朝边将郑印，由于骁勇善战，屡被提升，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官致仕，官爵由其子承恩承袭。万历二十年，哱拜趁宁夏镇冬季衣粮长期不发，人心涣散之机，唆使军锋刘东旸起事。二月，刘东旸率其党杀巡抚党馨及副史石继芳，逼迫总兵张维忠自缢，刘东旸自称总兵，承恩、许朝为副，共拜哱拜为盟主，很快占领了河西四十七堡，意欲割据宁夏。朝廷为平定这一叛乱，从各地征调了大批军队和兵器，先后以魏学曾、叶梦熊为总督，

逐渐收复了宁夏四十七堡，将叛匪包围在宁夏镇。叶梦熊一面决黄河水淹城，一面派人离间哱氏与刘东旸、许朝的关系，使得叛乱集团内部自相残杀。九月，城被攻下，哱承恩斩刘东旸首级出城投降，哱拜自缢身死。哱承恩等缚送京师被处死。这次平乱，费去帑金二百余万两。

同年一月，统一了日本各岛的丰臣秀吉积极向外扩张，出兵占领了朝鲜半岛的王京（汉城）、平壤，很快又侵占了朝鲜的大部分领土。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又是明朝的属国，朝廷于是派李如松为提督，率军前去援朝抗倭。至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先后收复了平壤、王京，击退了日本的第一次侵朝行动。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又率领军队十四万余人，第二次进攻朝鲜，神宗派遣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再次援朝抗倭，双方相持数月，互有胜负。十月丰臣秀吉病逝，明军队趁日本人心浮动之机，加紧进攻，大败日军于釜山等地，歼敌万余人，取得了抗倭的最后胜利。援朝战争前后历时七年，耗银七百八十万两，粮饷数百万石。

另一大军事行动为征播州杨应龙叛乱。播州（贵州遵义）从唐朝起就由杨氏世袭盘踞，到明初已经递传至21世。明隆庆五年，杨应龙袭为播州宣慰使，此人专横跋扈，杀人不眨眼，当地百姓“人人惴恐”。朝廷几次派兵进剿，均未取胜，遂改变策略，进行招抚。杨应龙表面上对朝廷输金“赎罪”，暗中却拼命积蓄力量，势力日益强大。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杨应隆大败贵州巡抚江东之所率明军，杀都指挥使杨国柱。六月，攻陷綦江（在今四川），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明神宗任命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当时正值援朝战事结束，即调来征诸将南征，并且增调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地部队前去会剿。万历二十八年春，各路军队陆续抵达川、贵两省，李化龙分八道进兵，至五月十八日会合于播龙以北的海龙囤下，即杨应龙

的老巢，分批猛攻。六月五日城破，杨应龙自缢身死。杨应龙叛乱被平定后，朝廷将播州地区“改土归流”，变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的官吏“流官”管理，从而结束了杨氏在该地区长达700余年世袭统治。

以上三次战事，共花费银两一千三百万两左右。这笔庞大的数目对于早已是用度匮乏，赤字膨胀的国家财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从此明王朝一蹶不振，逐渐走向了灭亡。

万历四十六年，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的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直指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破前来围剿的明朝军队，明军损失惨重。辽东战事的严重失利，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明神宗朱翊钧似乎又恢复了三十年前的朝气，开始留心朝事，“加意用人”，对任用武将、发放粮饷等军国大事，都能接受廷臣建议，“多见施行”，但此时的明神宗已是病魔缠身，力不从心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明神宗在弘德殿驾崩。离终前，他嘱咐太子常洛做两件事：一是晋封郑贵妃为皇后，二是罢矿税、榷税及中官。前者表明了他对郑氏的眷恋，后者是他对自己错误派出矿监税使的反思。这位以荒政任性、贪财嗜利著称于世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生涯。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通鉴》卷67至卷74。

《明神宗实录》卷131、卷135、卷140、卷141、卷148、卷149、卷161、卷171、卷172、卷178、卷299、卷362。

《明史纪事本末·平哱拜》。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

《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

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日本关白[①]丰臣秀吉遣十几万大军，越过对马岛，入侵朝鲜。朝鲜由于数代承平，国王李昖又沉溺于酒色，武备废弛，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李昖带群臣弃离王京，北奔鸭绿江边义州，王京由王子及部分陪臣摄国事。日军很快又攻占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抢掠府库。此后，日军继续北犯，仅两月间，朝鲜八道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朝鲜急请明王朝发兵救援的使者接踵而来。明廷闻报后，随即派人安慰李昖，向他表明已准备发兵十万赴援，并鼓励其君臣振作起来，收复国土。随后，明神宗先命辽东镇守之军队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并拨银二十万两供辽东备用。援朝先头部队在史儒等率领下于七月进抵平壤，由于不熟悉地形，且逢连阴雨天，初战受挫，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三千救援，也惨遭败绩，三千兵仅数十人生还。消息传至北京，举朝震动。由于当时中国西北宁夏正发生哱拜叛乱，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官员对继续抗倭援朝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应该集中兵力先解决内乱问题，日本侵略朝鲜虽然对中国也构成威胁，但中国御倭，可于鸭绿江边设兵防守。大部分朝臣认为中朝毗邻，唇亡则齿寒，且朝鲜很久就是中国的藩属国，现在有难，岂能坐视？万历帝也倾向援朝，坚持既定之策，派大军增援朝鲜。于是以兵部右侍郎宋应

① 摄政之官名，位似丞相。

昌为经略，命其赶赴辽东主持抗倭事宜。随后户部发马价银二十万两备办战马，并急速征调士兵。不久，平定宁夏叛乱的李如松，也奉命率兵援朝，并被任命为征倭提督，与此前由各地征调的兵士分置三军，开赴朝鲜。

明朝各路大军渡鸭绿江后，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进攻日军行长部占据的平壤。八日，明军攻城，日军炮矢如雨，明兵无法逼近，李如松手斩退却不前的先锋士兵，召募敢死队架梯攻城。与此同时，其他几处攻城的明兵也强行攻入。双方火器并发，硝烟蔽空。激战中，明将吴惟忠胸部中弹，仍奋呼督战；李如松的坐骑被枪炮击毙，迅即换马再战，指挥兵士猛攻。将帅身先士卒，士兵无不以一当十。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攻克平壤。此战役共歼灭日军一千六百多人，烧死、溺死无以数计，明军也付出了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数日后，明军又乘胜攻下开城。据守咸镜道的日军得知平壤、开城失守，弃地而逃，奔入王京。至此，朝鲜北部全部光复。明军连克二城，遂有轻敌之心。当时有朝鲜人报告倭兵将弃王京而逃，李如松听说后，为一举拿下王京，率家丁及精兵三千余人轻骑突袭，当行至王京以北的碧蹄馆，不意落入敌兵伏击圈。日兵围困数重，猛烈攻击，明军将士殊死突围，激战两个时辰，明兵弓矢已尽，与日兵短兵相接，李如松被围困，裨将李有昇以身遮蔽，杀死倭兵数人，终因寡不敌众，被倭兵砍死。此时，明兵援军赶到，杀入重围，击溃日军。此战，明军士卒死伤颇多。二月，明神宗发银二十万两，赦劳征倭将士，鼓舞兵将士气，同时命户部发帑召商籴买军粮，运往朝鲜。三月，李如松探得日军数十万军粮屯于龙山，于是命部将査大受募敢死之士乘夜潜入龙山，将军粮焚毁。这一阶段，朝鲜各道民众也纷纷组织义军，到处袭击日军；著名水军将领李舜臣，在沿海多次重创日方水军；陆战军民在朝鲜将领的带领下，也取得了大败倭兵的幸州大捷。在中朝军队的联合打击下，日军已处守势。

迨军粮被焚，军士恐慌。另外，当时正流行瘟疫，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日军军心涣散，形势已经不利。此前，明廷主和派的兵部尚书石星，想以和谈来使日军退出朝鲜。明廷大兵赴朝后，他仍不放弃这一手段，曾派沈惟敬去日方议和。此时，日军在不利的情况下，提出停战议和。为表示求和之意，于四月中主动撤出王京。而明军一方，自碧蹄馆之败后，士气受挫；另外，由于粮草不济，战马大量倒毙。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瘟疫流行，军队不断减员，战斗力大减。山东巡按周维翰曾奉命去朝鲜前线察访，见到当时"湿暑交侵，疫瘟大作，亡殁多人，军中泣声震野。一经物故，尸辄烧焚，诸军悲且怨矣！"他还向朝廷反映："即今途中，臣所目击枕藉道旁者，气息奄奄；伛偻而行者，黧然鬼面"，已很难组成能征战的部队[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和派占了上风，明神宗想罢战息兵，倾向于和议。此时，日军撤至朝鲜南端的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的朝鲜国土也已复归。随后，日方又将掳执的王子、宫眷及陪臣等送还朝鲜。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年的和谈封贡交涉。开始，相当多的朝臣反对对日本封贡，明神宗的思想也一度发生动摇，于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决定对日本罢封。朝鲜国王则担心罢封会激怒日本，引起倭兵再次北犯，因而于九月奏请明神宗"许倭封贡"，"以许贡保国"。神宗思想再次转变，支持封倭。鉴于日军尚盘据朝鲜南部沿海一带，倭患尚未完全解除，明朝留一部分兵力于朝鲜境内驻守，李如松等主力部队撤回。

十月，日方谈判代表小西飞入京和谈。明神宗为和议定出三条原则：一、勒令日军完全退出朝鲜；二、对日本只许封，不与贡；三、日方须立下誓言，永远不再侵犯朝鲜。小西飞表面接受了三项条件。于是，明廷派遣使臣前往日本册封。册使临行前，

① 《明神宗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戌。

明神宗特下谕旨，严嘱使团成员沈惟敬等必须按照三项条件行事，如果日方不接受或不履行定约，就“严辞罢封”。

当初日军南撤，即有缓兵再犯的企图，因而得知明朝提出的三项条件，也便假意应允，但以种种借口，拖延从朝鲜南部撤兵。明朝使臣李宗诚等到达日本对马岛后，又被日方的各种假象所迷惑。沈惟敬本是个无赖，竟然接受日方的贿赂，向朝廷谎报丰臣秀吉对明王朝如何恭谨。日方借机加紧备战，终于再次发动侵朝战争。

万历二十五年一月，赖在朝鲜南端的日军已经蠢蠢欲动，朝鲜国王李昖得悉，迅即向明廷报告“倭情紧急”，请明廷速发大兵救援。不久，日军就已出动数万大兵北犯，二月初，朝鲜陪臣郑期远又奔至北京哭诉求援。此时，明神宗方知受到使臣的欺骗。使团副使杨方亨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将沈惟敬与日方秘密勾结的状况，及石星指示他以妥协促成册事早完的信件进呈御览。神宗览后大怒，命将石、沈二人严厉惩治，同时商讨发兵援朝。尽管当时明王朝因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及第一次抗倭之后“国用大匮”、“府藏殚竭”，且蒙古诸部屡次进犯边地，神宗仍尽力筹措军饷，抽调边镇精锐部队抗倭援朝，以边镇将领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统领大军入朝，升兵部侍郎邢玠为该部尚书，总督抗倭事务。

六月，倭兵数千艘战船已先后渡海，攻打梁山、熊川、三浪等地，随后，又在闲山岛击溃朝鲜元均之水军。八月，日军又攻陷麻贵部将杨元、陈愚衷据守的南原、全州。十一月，邢玠率几路大军反攻，主攻目标为东南的庆州、蔚山。十二月，麻贵集重兵猛攻蔚山，先锋部队冲破日军几层阵地，将敌军围困。日军顽强固守，明兵进攻没有进展，遂采取久困断粮的办法。包围十天之后，日军已经粮草尽绝，即将崩溃，守将便以假降之计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明军久攻不下，也已懈怠。此时日军援兵已到，

且虚张声势。明军误以为日方几路大军增援，急速撤围，被困日军乘势反攻，明军大溃，死伤将近两万，且损失大批辎重。蔚山之败，明军损失惨重，在邢玠奏请下，明廷又于内地征调军队增援。万历二十六年二月，陈璘、刘綎、邓子龙分率广东、四川、浙江等处士兵入朝。九月，明军分四路大军再次发起进攻。刘綎攻顺天，麻贵攻蔚山，虽斩获日军多人，也付出一定代价。中路董一元一举攻克晋州，继而移兵泗州，因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只得退回晋州。正在此时，明廷得悉日本丰臣秀吉死去，政局混乱，侵朝诸倭将为争夺权位，皆有归国之心，于是邢玠命令全军乘机反攻。

十一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对撤归的日军进行全面截击。十一月后，集结于松岛的西路日军撤退，被中朝联军阻击，屡次突围未能得逞，只得向中路石曼子部求援。联军得知此部增援的消息，决定设伏围歼。十九日，日军战船数百艘通过露梁津海峡，进入联军伏击圈，中朝水军火器齐发，敌兵船队大乱，急忙向观音浦港口逃去，但此港也有联军，遂又掉头，拼死突围。双方展开激烈决战，陈璘指挥兵士，跃入敌船，短兵相搏。敌船向西突围，冲击朝鲜水军李舜臣部，陈璘命水军急追。激战中，陈璘突然鸣金收兵，敌兵疑惑，船队后撤，陈璘乘势命全力施放火器，敌船大部起火，燃烧炽烈，海面为之通红。李舜臣部随即突入，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带二百勇士踏上朝鲜水军船只冲入敌人船队之中，激战中，邓子龙的战船不幸起火，敌兵围攻，邓子龙壮烈战死。联军兵船聚集围攻，敌兵不支，向南溃逃，追击之中，李舜臣胸部中弹牺牲，临死还嘱咐部下不要把其死讯公布，以免影响军队士气。战斗从夜间一直打到次日中午。敌兵大溃，五百只战船仅五十只逃回，万余名日兵葬身大海。这就是著名的露梁大捷。露梁海战消灭了日军中路船队，西路残兵败将逃归日本。至二十七年二月，朝鲜国土全部光复。

闰四月，明廷正式宣告征倭大捷，神宗于午门举行献俘仪式，枭磔平秀政、平正成等倭兵头领多人，传首九边。七月，叙东征将士之功，邢玠、陈璘、刘綎、麻贵、董一元等各加官晋级、恩荫。前兵部尚书石星瘐死狱中。弃城而逃的杨元，通敌之沈惟敬被斩首弃市。

抗倭之战，以日军惨败、中朝最终胜利而结束。战事首尾七年，朝鲜饱尝战祸之苦，百姓惨遭日军屠掠凌辱，江山残破，人口流离，经济凋敝。战后，明朝帮助朝鲜练兵，造武器、修固险要，以加强武备。朝鲜国王感谢明王朝的疆域再造之恩，上表谢恩，贡献方物，并祭奠为援朝抗倭而牺牲的中国将士，特为英勇献身的老将邓子龙建立祠庙，岁时祭祀。

中朝毗邻，唇齿相依，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出于对藩属国朝鲜之道义及自身安危的考虑，援朝抗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消耗了大批财力，兵力。抗倭之役与几乎同时进行的平哱拜、平杨应龙叛乱，被称之为是“万历三大征”，三大征又以抗倭之役时间最长，消耗最大。三大征后，明王朝的国力受到严重削弱。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
《明通鉴》卷 70、卷 71。
《明神宗实录》卷 250 至卷 324。
《明史》卷 320“外国一”。
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

平定哱拜之乱

哱拜原是蒙古鞑靼人，嘉靖年间，因得罪其酋长，父兄都被杀害。哱拜伏于草中方才逃脱，于是就投奔明朝边将郑印。后来他屡立战功，遂由郑印手下一员部卒升为都指挥，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副总兵官致仕，由他儿子承恩袭其职。致仕之后，哱拜平时身边依然蓄养苍头军，驻于宁夏一带。

万历十八年，驻牧于青海的蒙古火落赤、真相部骑兵进攻洮州（今甘肃临潭西），副总兵李联芳战死。随之，蒙古骑兵又进入临洮、河州、渭源地区。总兵官刘承嗣失利。当时，顺义王撦力克以赴青海礼佛为名，进至仰华，火落赤、真相部将其挟持，引起很大震动，河套一带的卜失兔也率部想趋赴青海，与火落赤遥相呼应。

得知洮河警报，明廷遂派郑洛为七镇经略，并停撦力克贡市。同时派科臣巡视九边，尚宝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宁夏，推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及哱拜义子哱云等。万历十九年二月郑洛要宁夏调兵去甘肃，巡抚党馨派土文秀率领一千骑兵西进，哱拜认为土文秀虽经战事，但难以独当一面。于是他向经略郑洛请求，愿与其子承恩率部卒三千从征，郑洛予以批准。巡抚党馨对此却颇为不满，故意刁难，哱拜部卒所骑之羸马不予换调，多余的马匹亦不给他。令哱拜颇为不快。

哱拜率部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市），看到各镇明军都不及自己。洮河战事结束，哱拜率部取道塞外还宁夏，沿途蒙古骑兵亦

不敢逼近他。哱拜遂有轻视敌手、不将明军放在眼里的心思，日渐骄横，目空一切。党馨常借故予以裁抑，哱拜西援甘肃还宁夏之后，不但未叙功，党馨还要追查他冒报粮食数目之罪，承恩因强娶民女为妾，被施杖二十，因而心怀怨愤。土文秀和哱云因升授不能如愿，亦对党馨产生强烈的不满。

正在这时，宁夏镇冬季的衣粮长久不发，坐营江廷辅请发银以安兵心，但党馨不许。哱拜见机鼓动起士兵的情绪，唆使刘东旸起事。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刘东旸率其同党杀死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并纵火焚毁公署，没收符印，释放囚徒。二十三日，哱云、土文秀统兵五百，自中卫互市归来，与刘东旸一道杀死游击梁琦、守备马承光。二十五日，逼副总兵张维忠自缢，并索得敕印。于是，刘东旸自称总兵，承恩、许朝为副总兵，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共奉哱拜为谋主。承恩率兵攻占玉泉营、中卫、广武等地，占领了河西四十七堡，意欲攻入河东地区，当时震动整个陕西。当时明朝总督、尚书魏学曾派标下张云前往招降，哱拜、刘东旸意欲割据宁夏，说："一定要使我们投降，除非让我们自立旗号，授官世守宁夏。否则，就要同河套骑兵一道攻破潼关。"

三月四日，总督魏学曾命副总兵李昫于沿河堵截，不让叛军南渡，魏学曾自己则率部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东北部），使河套蒙古部无法与宁夏叛军联合。明军遂展开平叛活动，明军先后收复了河西营、堡四十七个，三月下旬，河西只有镇城一镇为叛军占领，河套地区的蒙古贵族著力兔率骑兵三千前来接应，声称自己与哱王子是一家人，哱拜与土文秀合攻玉泉营，哱云则引著力兔攻平虏堡，参将肖如薰设伏射杀哱云，著力兔则率部出塞。三月底明军六路进军，包围了宁夏镇。

四月，明军攻城甚急，延绥副总兵王通率家丁三千杀入北门，诸后继兵援未上，家丁尽丧命，王通亦负伤。叛军许朝、土

文秀胁迫明藩室庆王上楼，乞明罢兵。明军不从，不久，城中粮绝，遂劫夺庆王府之财物并其宫人而去，攻城一月未下。

明廷见宁夏城久攻不下，遂从全国征调大批军队和火器，六月，都御史叶梦熊至灵州，从甘州携神炮火器四百车至，浙江巡抚常居敬招浙江千人亦至。六月下旬，御史梅国桢、提督李如松统领辽东、宣大、山西兵集宁夏，明军声威大振。梅国桢则将受降旗树于城南，允许叛军归降。同时，明军又尽力攻城，攻城半月，竟未破城。七月，给事中许子伟弹劾魏学曾惑于招抚，魏被罢除总督职务，由叶梦熊代行。

叶梦熊走马上任，即施新攻城策略，决定水攻，先环宁夏城筑堤，堤成之后就决黄河水灌城。城中之哱拜屡想向河套之著力兔求援，屡屡被挫败，此时，又派养子克力盖前往，被李如松击斩。不久，河套部庄秃赖与卜失兔合部落三万前来援救，被明军击斩三千，遂又退往河套。后来，明兵又杀了著力兔八百骑兵。

八月底，由于水浸，城墙塌毁，明军杀入城内，叛军依然顽固抵抗。叶梦熊遂派人离间哱拜与刘东旸、许朝之间的关系，引起其内部互相残杀，刘东旸、许朝杀了土文秀。哱承恩与他的同党周国柱诱杀了刘东旸和许朝，并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城上，开城门向明军投降。哱拜则自缢而死。叶梦熊下令尽诛哱拜党徒及投降的人达二千余人，哱承恩等被缚送京师，十一月被处死。此次围城自三月包围到九月方攻下，长达六月之久，城中粮食早绝，树皮亦尽。决河灌城，百姓大受其害。经此战乱，宁夏城残破不堪，竟是鸡犬不闻。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63。

《万历三大征·哱氏》

平播之役

杨应龙系四川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使。

播州自唐朝起就由杨氏世袭盘踞，元末时为农民起义军明玉珍所占，属其建立的夏政权所管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大军平定明氏夏政权，明廷遂袭用元朝的土司制度，仍任土官杨铿为播州宣慰使，并由杨氏世袭，杨氏每年向明廷进贡地方特产。播州地域广袤，播州宣慰司下有草塘、黄平两个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个长官司，由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世袭各级土官，这七姓大多是杨氏姻亲，他们彼此依存，一旦有难，则相互援助。

隆庆五年（1571年）杨应龙世袭为播州宣慰使。继位之初，杨应龙多次帮助明朝统治者镇压其他各土司的反叛，并向明廷进贡大木，获得明朝政府的信任，授以都指挥使衔。但杨应龙随着其势力日益增长，日渐骄横起来，对明廷也不大服从了，公开声称“例得生杀其属”。且擅自用阉官，并结生苗为助，肆行劫掠。对于杨应龙的所作所为，四川省长官一向采取宽容的态度。而播州紧邻贵州，贵州省长官则非常警惕，万历十八年（1590年），巡抚叶梦熊上疏弹劾“应龙凶暴诸事”，巡按陈效则“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这时，明朝政府为防御松潘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调播州兵去协守，四川巡按李化龙疏请暂免勘问，以给杨应龙戴罪立功的机会。黔、蜀双方督抚各持一端，争执不下。正在这时，杨应龙妻妾之间发生了矛盾，杨应龙宠爱其妾田雌凤，田杀

了杨的嫡妻张氏，张氏叔父张时照与部属何恩、宋世臣遂上奏朝廷，告杨应龙谋反。贵州巡抚叶梦熊主张立即派兵征剿，但四川的官僚与杨应龙的关系密切，他们认为杨“数赴征调有功，剪除未为长策”，四川巡抚、巡按皆主抚。朝廷遂命黔、蜀两省会同查问。杨应龙知道四川袒护他，于是他就往重庆。

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到重庆接受审讯。论法当斩，杨应龙请以两万金赎罪。恰在此时，日本侵略朝鲜，明廷向全国征兵援朝。杨应龙当即上奏，请求自率五千士卒赴朝征倭，以之赎罪。明朝政府遂释放了杨应龙，杨遂率兵前行，不久，朝廷又令其不要出兵，杨应龙遂按兵未动。后巡抚王继光严厉追究其罪责，杨应龙竟抗拒不理，王继光颇为恼火，于是决定对杨应龙用兵。

万历二十一年，王继光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兵分三路逼进播州的重镇娄山关，杨应龙假装投降，以麻痹王继光，借机却率苗兵进行攻击，刘承嗣一路死伤大半，明军只得撤兵。之后，王继光被罢职，由谭希思接任四川巡抚。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廷以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次年，邢到达四川，他察知播州的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皆与杨姓关系密切，多为姻亲，要用武力征服，一时难以成功，于是又施招抚之策，准杨应龙“输四万金以助采木”赎罪，并革其职，由其子杨朝栋代理，次子杨可栋则羁府为质。当时明廷正忙于援朝抗倭，无力顾及播州，就同意了邢的处置。邢任命重庆知府王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以防备杨应龙。

杨应龙表面上接受招抚，暗中大肆积蓄力量，一心想割据称王，“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派土酋据关把守，同时对苗族人施恩，将稍为富裕的百姓家资全都搜刮出来，以供养苗人，苗人都愿为他效劳，被称为“硬手”，这是杨应龙的精锐之一。不久，杨可栋死于重庆，又激起了杨应龙的愤恨。万历二十四年，杨应龙经过近两年的准备，势力更加强大，于是又起兵

反叛。先后攻掠余庆、大阡、兴隆、都匀各卫。次年，攻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侵掠湖广四十八屯，骚扰驿站。当时，兵备副使王士琦被调往朝鲜征倭，贵州巡抚江东之遂率明军与杨应龙作战。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杨应龙大败江东之，杀都指挥使杨国柱。明廷闻讯大惊，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决意进剿。这时，朝鲜战事已经结束，就调东征诸将刘綎、麻贵、陈璘、董一元南征，并调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地部队前去会剿。由总督李化龙统一调度。

万历二十七年六月，杨应龙乘明兵尚未会集的时候，率军攻陷綦江（今四川綦江），綦江是重庆的南大门，一时震动全川。明神宗获知后亦颇为震惊，当即罢免了四川巡抚谭希思、贵州巡抚江东之的官职，并令总督李化龙日夜兼程赶往四川。幸好杨应龙无意攻打重庆，他只是想把势力范围扩展到綦江地区。于是杨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东乡坝，立石为播界，号称“宣慰官庄”。

李化龙刚到四川时，当时各路军队还未到达，他对杨应龙做出要招抚的姿态，杨应龙当时认为也会像以前一样得以赦免罪过，于是，他就不再进攻明军，使局势渐趋稳定。万历二十八年春，明朝各路军队陆续抵达川贵两省，李化龙决定八路进军，四川方面以四路进攻，总兵刘綎由綦江，总兵马孔英由南川，总兵吴广由合江，副将曹希彬由永宁；从贵州方面进攻的分三路，总兵童元镇由乌江，参将朱鹤岑由沙溪，总兵李应祥由兴隆；从湖广方面进攻的一路，分两翼，总兵陈璘由偏桥，副总兵陈良玭由龙泉。每路兵三万，三成是官军，七成是土司兵。

杨应龙认为八路明军，以刘綎所部最精锐，想先挫其锋，就派他儿子杨朝栋率精兵迎击，结果被刘綎打得大败，杨朝栋以只身逃归。各路明军乘势猛攻，进展迅速，四川方面的明军从北面攻下了地势险要的娄山关。从贵州、湖广出发的明军，也很

快攻下了乌江一线，逐渐缩小了包围圈。五月十八日，八路明军会集于遵义北的杨应龙老巢海龙囤下，分批猛攻，杨应龙负隅顽抗，六月四日，刘綎率兵先杀上土城，杨应龙知末期已至，遂同其爱妾自缢而死。其子杨朝栋，弟杨兆龙等被俘，后被解往京师处死。这次明军从出师到平定杨应龙，前后历时一百一十四天，共斩获两万。

在平定杨应龙叛乱之后，明朝政府就在播州地区“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管理，从而结束了杨氏在播州长达七百余年的世袭统治，在行政区划上亦进行了调整，在播州设置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和贵州，遵义府下设真安州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平越府下辖黄州及余庆、瓮安、湄潭三县。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四川土司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64“平杨应龙”。
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
《万历三大征考·播州》。

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

明朝立国后，规定民间采矿要在政府管理监督下进行，任何人不得私自开采，违者处以极刑。初期的主要矿产区在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地。所课矿税有银课、铁课、铜课、水银课、礬课等，尤以银课为大宗。课税一般为承包制，即规定每年应纳税额，而该场产矿多寡并不过问。洪武年间太祖对政府开矿非常慎重，而且采取轻赋政策，立额甚为宽大。永乐时期对外贸易日趋活跃，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矿冶和矿课随之兴起。除增开矿坑外，朝廷还派遣御史和监生等権办浙江、福建银课。成祖之后朝廷再次采取收缩政策，封闭矿坑，禁民私采，因而引起明英宗正统八年（1444 年）处州叶宗留反封矿暴动。之后朝廷不再有固定政策，矿坑时开时闭。隆庆年间由于看到嘉靖时期广泛开矿，以致公私争趋矿利，天下渐多事，所以罢采蓟镇、南中诸矿山，勒石禁止。直到明神宗万历中期，开始指派宦官分赴各地，大规模地采矿征税，牟取暴利，遂演变成为害民危国的一大弊政。

明神宗朱翊钧在历史上以奢侈贪婪而著称。他继位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物质供应日益丰富，整个皇室宫廷奢侈成风，神宗本人更是挥金如土，不仅锦衣玉食奢华无比，对金珠宝石的需求量亦与日俱增，并力求日新月异，挥霍浪费十分惊人。宫廷中凡举行婚、丧、册封等各项典礼，皆要耗费大量资财。神宗在位四十八年，营建工程始终不断，仅修建定陵一项，就耗资

八百万银两有余。如此挥霍无度，必然导致内库亏空，难以为继。明神宗一方面设法勒索国库，将国家财富窃为己有；另一方面则是直接派遣矿监督领开矿的宦官税使（征收商税的宦官）为皇室搜刮钱财。

神宗亲掌政权后，不断有人献计开矿敛财。万历十二年（1884年）房山平民史锦，万历十八年易州平民周言等先后奏请开采阜平、房山等矿砂。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认为开矿集众必当防乱，且"差官诸费，得不偿失"，极力反对，神宗因而作罢。此后言矿者接踵而至，奏请者争走都门。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府军前卫千户仲春等奏言开采矿砂。七月二十日，神宗正式派出承运库太监王虎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佥书张懋忠前往真州、保定、蓟镇、永州等处督领开矿。此后大批矿监走马上任，宦官四出，计王忠往昌平，曲进往昌黎，鲁坤往河南，陈增赴山东，张忠赴山西，陈奉赴湖广，曹金赴浙江，赵鉴、赵钦赴陕西，丘乘云赴四川，高维趋辽东，李敬趋广东，沈永寿趋广西，潘相趋江西，高寀趋福建，杨荣趋云南等等，可谓无矿不采。

随着矿监分赴各地，税使也相继被派往商业繁华之地。当时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和门摊商税等定期征榷的税收。万历二十四年十月，作为首批税使，太监张晔被派往通州湾，王朝被遣至天津。"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万历二十七年，命高寀榷税京口；暨禄榷税仪真（今江苏仪征）；刘成榷税浙江；李凤采珠广州，兼征市舶司税课；陈奉征荆州店税；陈增征山东店税；潘相督理江西瓷厂；王忠征税密云；马堂征税临清，并增税东昌等地。另外矿监孙隆、鲁坤、孙朝、丘乘云、梁永等代征苏杭、河南、山西、四川、陕西等地税务，作为"兼摄"。翌年，又派内监鲁坤增开彰德、卫辉、怀庆、开封等铜矿。仅仅几年时间，明神宗派出的矿监税使就遍布

全国各地，当时可说是望风者言利，朝奏而夕遣。“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形成“寸寸张罗，层层陷井”式的肆意掠夺。

矿监税使依仗奉旨行事，搜刮钱财遂肆无忌惮，不择手段。矿监一般都挑选当地富民为矿头，召集私自开矿的“盗矿”为矿夫，自己则督民开采，坐地分成。但由于根据原奏官上奏开采的矿洞，大多属于贫瘠无可采者，矿监督领所得甚少，所费反多，得不偿失，遂改用包矿手法，将预收的税款或“掊克大户”，令“富户包赔”；或科派小民，散摊于民间而坐收纳银；或干脆勒索地主税收，“充矿代解”。除此而外，矿监还明火执仗进行掠夺，往往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动辄将富人家的良田美宅指为下有矿脉，以勒索钱财，若稍有反抗，便令卒役拆房毁屋，掠其家产，辱其妇女，甚至令其家毁人亡，酷虐之状，惨不忍睹。

税使为攫取巨利，任意设置关卡，重征迭税，“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如在长江上乘船顺流而下，日行三四百里，就要通过五六处拦江把截的税卡。税使还肆意扩大征收的名目和对象，凡舟车、庐舍、米稻菽麦、鸡犬牛羊无一不征，皆令输税。顺天府所属各州县，被迫增收“过路”、“落地”之税银。宝坻盛产银鱼，定为贡品，万历二十八年开始派宦官征税后，随即征及武清等非产鱼之地。在商贩稀少之处，税使则“责以包收”，常常导致“大者破产，小者倾囊”。另外公开掠夺也时而闻之。如内监陈增放任手下参随程守训募人告密，专门勘究江淮大户，家产稍微殷实者，即罗而织之，带枷锁将其游街，使旁观者颤抖，而后置之水牢，绝其饮食，非法用刑，被囚者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酷刑之下唯有“倾家鬻产，跪献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仅仪真一地，十年间遭其抄掠毒刑者即达百余家之多。

矿监税使唯利是求，甚至不惜通过挖掘古墓搜求金银财宝。先是万历二十七年，兴国州人漆有光奏称居民徐鼎等发掘唐代宰

相李林甫之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明神宗命税使括进皇宫。其实墓主为元卫国公之夫人，掘墓所得与原奏所言相差甚远，“百不及一”。而陈奉志在取盈，对掘墓者百般拷打，惨不忍睹。陈奉随后悉发湖广境内诸墓，地方官吏请求神宗下令禁止，神宗却不予理睬。同样陕西梁永也尽发历代陵寝，甚至发展到“沿途掘坟，得财方止”。

矿监税使肆逞威虐，竭泽而渔的做法首先是喂肥了皇室成员及他们自已。仅白银一项，矿监税使每年进奉皇室的数目，就已远远超过宫廷内原来每年金花银一二十万两的进项。至于金银宝玩，名马貂皮，更是难以统计。矿监税使本是“罔上营私”之辈，如今更是如鱼得水，乘机截留私分，中饱私囊，“所得进上者十之一二，暗人私囊者十之八九”，可谓不尽财源滚滚来。但是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却使广大百姓惧怕矿监税使甚于兵火，正如礼部侍郎冯琦所言：“矿使出，而天下苦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全国各地“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百姓流离迁徙，“三家之村，鸡犬咸空”，都市城镇，一派萧条。山东临清向有缎店三十二座，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闭门四十五家。苏州向以机织闻名，因税使及其爪牙榷征奇货，商贩敛迹，机张日减。矿监税使的出现，造成贫富皆怨、商农交困的严重后果。

朝廷和地方的许多官吏，自矿监税使派出伊始，即不断上疏明神宗，慷慨陈词，劝阻其事。其中广为人知的有户部给事中程绍、山西巡抚魏允贞、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河南巡按姚思仁、户科给事中包见捷、凤阳巡抚李三才、大学士沈鲤、户部尚书赵世等人。他们的奏疏，或是反映人民惨遭浩劫的痛苦生活，或是不避忌讳地指斥明神宗的奢侈贪婪，或是引古谈今，指明纵容矿监税使胡作非为，必将导致江山不稳的严重后果。这些奏疏中最著名的是凤阳巡抚李三才“请停矿税”疏、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极

陈六害”疏等，其中所言字字血泪，发人深省。但对明神宗来说，凡矿监税使进言，“朝入朝批，夕上夕发，应之如响”；对朝臣的态度却是“奏章但系矿税，即束高阁”，根本不屑一顾。直到万历三十年神宗患病，自知不久于人世，方决定撤回所派内监，停收矿税，随即下达了正式的谕旨。但是仅一日，神宗病体痊愈，立刻反悔，追回谕旨，让诸位大臣空欢喜了一场。

许多地方官吏在上疏劝谏之外，同时与矿监税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主要采取了对抗、裁抑的对策，所以不时受到矿监税使的诬陷打击，双方冲突与日俱增。由于明神宗抱定“不从中使之言，不足厚集其利”的宗旨，在冲突发生时总是无保留地站在矿监税使一方，对地方反对者动辄加以逮捕囚禁。据万历二十九年刑部统计，因反抗矿监税使而被捕的藩司守令、举人生员等不下一百五十余人。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六年间，先后被捕入狱的地方官有：辽东参将梁心、山东福山知县韦国贤、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山东临清守备王炀、广东新会在籍通判吴应鸿、云南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知县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时、江西通判陈奇可、凤阳临淮知县林镲、陕西咸阳知县宋时际、咸宁知县满朝荐、辽东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等。这些人“皆幽系诏狱，久者至十余年”。另外还有大批遭削籍、贬官处罚的官吏。如陈奉出任湖广税使后，先后对荆州府推官华钰、黄州经历车任重进行弹劾，将他们投入狱中，又将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焕、荆门知州高则巽等与自己抗衡的官吏各降一级。继他们之后，与陈奉相抗衡的地方官冯应京、邸宅、王之翰、何栋如、卞孔时先后遭陈弹劾，扭解进京。其中王之翰瘐死狱中，冯、邸、何三人于万历三十二年始得出狱，卞孔时则直至万历四十一年才获得自由。

矿监税使在各地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及对人民敲骨吸髓般地残酷压榨，深深激怒了城乡广大人民。万历二十七年，山东临清首先出现反抗税使马堂的民变。马堂为天津税使，兼辖临清。他纵容手下爪牙肆意对民户进行敲诈抄掠、籍没田产等非法活动，致使临清“中家以上破者大半”，“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四月的一天，愤怒的民众万余人在商贩王朝佐带领下，纵火焚烧马堂的衙署，打死其爪牙三十余人。虽然王朝佐事后被处死，马堂的嚣张气焰由此也受到打击。万历二十九年，因反对税使陈奉强征暴敛而在湖广士民中享有威望的佥事冯应京被捕人狱，士民“相率痛哭”，陈奉却贴出布告历数冯之罪过，被激怒的数万民众包围并焚烧了官衙，陈奉仓皇出逃，民众抓住了平日为虎作伥的爪牙陈文登等十六人，将其五花大绑扔进长江激流中。同年苏州发生反抗苏杭织造孙隆、刘成的民变；江西上饶、景德出现反抗税使潘相的民变。万历三十六年，辽东掀起反对矿监高淮的民变和兵变，参加的士兵达万人。万历四十二年福建爆发反对税使高寀的民变，参加者有各行手工业工人近万人。除以上大规模地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外，小规模斗争更是此伏彼起，先后有万历二十七年仪真税使因抽税激起民变；二十八年广东新会民变、山西蔚州平民毕钅广等殴伤太监王虎的参随；三十一年北京西山窯户之变；三十二年易州矿徒之变等等。参加反抗矿监税使斗争的人员，包括城镇中的工商业者和由诸生、举人、乡官组成的乡绅以及士兵等，其中工商业者在多次民变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是当时商品经济已有较大发展的具体反映。

各地人民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和朝野官员的强烈反对，对于一向刚愎自用的明神宗震动颇大，使他不能不为自己的江山社稷考虑而有所收敛。自万历三十三年（1605）开始，他逐渐调整开矿收税政策。首先于是年十二月，正式以“得不偿费”为由，下达了停止开矿的谕旨。同时规定征收税务

由各地方有司负责，征收的税款一分为二，一份归宫廷内库，一份归户、工两部主管的国库。税银的解送，由税监负责。与前些年相比，税额有所减轻，间或也用于赈济等公益事业。对于税使，如其亡故或撤回北京后，一般只将其原管事宜交与附近的矿监代管，不再新派宦官接任，先后有湖广、仪真、陕西、辽东、山西等地区撤销了税使，致使全国税使的总数呈下降趋势。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驾崩。遗诏罢除一切矿税，以及新增之织造、烧造等名目；对那些因进言停罢矿税而遭罢黜的诸官，酌量起用；同时将张晔、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税使即行撤回北京。至此，这场流毒全国的矿课悲剧已持续了近三十年，"斯当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社会经济日趋凋敝，政局紊乱，吏治败坏，蕴育着暴乱崩溃的危机。可以说，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发展和影响，是朱明王朝走向覆亡之路的一个阶梯。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神宗实录》卷227、卷228、卷298、卷299、卷301、卷303、卷328、卷331、卷333、卷338、卷340、卷345、卷347、卷349、卷356、卷357、卷358、卷360、卷361、卷376、卷387、卷394、卷416、卷427、卷445、卷511。

《明史》卷81、卷237、卷305。

《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

《明通鉴》卷76。

《定陵注略》卷5"军民激变"。

《国榷》卷79、卷80。

苏州织工暴动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时已二十岁的明神宗主掌国政，但他信任太监，宠爱郑贵妃，深居简出，不理朝政。生活上日益腐败，且贪财好色，自万历二十四年起，便开始派出大批亲信宦官，分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当时著名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苏州城，也是在劫难逃。

苏州，当时西城是商业区，店铺林立，极为繁华；东城是丝织业集中的地区，工场林立，数以千计的手工业者聚集于此，有的有固定工作，有的则每日清晨聚在桥头，等待雇主的临时雇佣。都市的繁华更加诱发了税使的贪婪。万历二十九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秉承神宗之意旨，来到苏州，征收税务，从此开始了对苏州人民的勒索、搜刮。

本来，原定征税只榷行商，不征坐贾，但税署的吏卒勾结当地棍痞，他们要机户每张织机交税银三钱，新织的缯帛，每匹纳银三分，才允许出售。又分别在水陆要冲设置关卡，滥征过往商税。甚至于“只鸡束菜”皆不能免税，致使商贩日渐稀少，机户则被迫关门歇业，众多的机工因而失业，贫民无以为生，竟有饿死街头者。这年苏州又发生水灾，农业歉收，百姓失业，繁华的苏州城竟是一片凄凉。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唱道：“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可见，税吏较之天灾更为可怕。

六月三日，靠以织缯赁工为生的葛成，被不甘饿死、又无以

为生的二千多织工推为首领，发动民变。葛成在机户和织工经常集会的玄妙观内，首先集众“誓神”，要求大家行动听指挥，视其手中“芭蕉扇所指”。参加者分成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芭蕉扇为号指挥，后面的人拿着棍棒随行。斗争矛头直指孙隆及其爪牙。孙隆见民变队伍逼近衙署，赶紧连夜逃往杭州躲藏起来。但民变队伍纪律严明，不挟寸刀，不掠一物，甚至于不反对官府，只是打击地痞税使，迫使官府拘捕地痞汤莘以平民愤。这次民变持续三天。第四天因税官地痞或逃或死，或被拘捕，民变者遂贴榜文，声称：危害百姓之税使既已清除，事情已大定，百姓就应各安生理，不得藉口为乱。第五天，道府下令追查为乱者，葛成挺身而出，说：“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若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于是，葛成被捕入狱。先被判处死刑，后遇赦得出，苏州人感念葛成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为之改名为葛贤。等他死后，又将他葬在风景秀丽的虎丘山畔，被称为“葛将军”、“义士”，香火不绝。

次年五月，苏州又发生了民变。当时税务已由孙隆改为太监刘成掌管，由于地方官采取了擒治“首恶”，解散余党的措施，很快就将其平息下去了。苏州织工暴动，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级斗争出现的新动向，这是一次城市市民的斗争，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逐步孕育和发展。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65“矿税之弊”。

《定陵注略》卷 5“军民激变”。

《明神宗实录》卷 360、卷 361。

国本之争

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意旨，遴选锦衣卫指挥使王伟之女为明神宗皇后。

万历六年，十六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举行了大婚典礼。王皇后性情端庄恭谨，然直至终年未能生育。

万历九年十月的一天，明神宗无事到慈宁宫闲逛，邂逅一名王姓宫女，私而幸之，不料使之怀孕。对神宗而言，此女并非他所钟爱，但依照明朝祖制，皇帝对宫女“有私幸”也要记录，随侍的文书房宦官随即著录于起居注，以备以后生子查核。一日，神宗侍生母慈圣李太后宴，太后言及此事，神宗先是回答“无之”，待太后命取内起居注相示，遂“不能复隐”。太后好言相慰，说王氏倘能生男，也是宗社之福，何必相讳。迫于太后的压力，万历十年四月，王氏被册封为恭妃。八月，王氏为神宗产下第一个皇子，起名常洛。当时宫廷内外，喜气洋洋，为庆贺皇长子的诞生，颁诏天下，实行大赦。但神宗对王氏缺乏感情，对常洛也无特殊喜爱之举动。

同年，礼部于各地选送入宫的女子中遴选九人册封为九嫔。其中淑嫔郑氏，不仅有倾城倾国之貌，而且聪明机智，精通诗文，更兼能言善道，极善逢迎，故深得神宗宠爱。万历十四年，郑氏生下皇三子常洵后，更加得到神宗的喜爱，可谓集三千宠爱于一身，随即酝酿进位皇贵妃。母以子贵，郑氏生子后立刻向神宗“乞怜”，欲立常洵为太子。而皇长子母无宠，他亦不为父皇

所重。在郑氏的暗中怂恿下，神宗遂萌发了废长立幼的念头。传说紫禁城西北门有“大高元殿，供有真武香火，颇著灵异”，当时郑氏曾与明神宗诣殿行香，发下日后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密誓，并“御书一纸，封缄玉盒中”，由郑氏作为凭信保存。

册封郑氏的决定一出，立刻招致满朝大臣的纷纷议论。郑氏入宫之初，神宗与王氏尚有往来，继皇长子之后，万历十二年王氏又生一皇女。随着郑氏日渐得宠，王氏则倍受冷遇。郑氏四年之内就由淑嫔升至贵妃，恭妃虽有诞育皇长子之功，却难以享受晋升贵妃的尊荣。这在群臣看来无异于本末倒置，他们已从郑氏受封中，敏感地觉察到神宗立幼废长的企图，从此掀起一场波及整个朝廷，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国本之争。

万历十四年二月，首辅申时行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成为要求确定皇长子太子地位的第一人。他以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明武宗未满周岁即受封立为皇太子为依据，认为皇长子已经五岁，宜及时正定名分。神宗接到奏疏后批道：“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这种敷衍态度不仅未能平息群臣的不满，反而招致“科道交章请册立东宫”。其中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不仅请求“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且疏请圣上收回成命“先进恭妃为贵妃，次及郑妃”，使神宗大为光火，传令贬谪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疏请，亦遭责罚。孙如法疏言：“恭妃首生皇子，五年未有进封，德妃郑氏一生子，即有贵妃之封。……如此天下人能不疑惑吗?”神宗越发怒不可遏，即刻传令将孙如法降职外调为潮阳典史。神宗的做法引起满朝公愤，于是部府司道诸衙门，或联名或交章纷纷上疏，对姜、孙等人鸣不平。神宗耳听群臣的呼吁，想到若立常洵为太子，虽合乎自己的心意，却有悖于封建统治的传统规范，众臣不服；若立常洛，就违反了自己与郑氏定立的密约，不合己意。因此，他一方面发誓说：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

家法万世当据，自己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旨在堵塞群臣的谏诤之口，同时打定主意将立储之事长期拖延下去。同年三月郑贵妃正式被册封为皇贵妃，就是神宗不肯轻易让步的重要一招。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尖锐地指出明神宗患有酒、色、财、气四种病，其中谈到色病时指出：圣上不册立常洛为皇太子，主要是听了郑贵妃的枕边之言。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大学士申时行等乘被神宗召见于毓德宫之机，再次提出册立东宫之事。神宗辩解说暂不册立皇太子，是因为长子体质羸弱，俟其健壮后再行册立。为使阁臣信服，神宗特地召朱常洛与朱常洵前来相见，并将常洛拉至膝前不断抚摸叹惜，以示亲昵，目的是使阁臣相信他们父子间感情深厚，根本不存在废长立幼的可能。

十月，大学士许国再次上疏力请册立和豫教，最后说："储贰者，宗社之本，……册立者，人望之所归。"但疏上不报。内阁首辅申时行也激昂上疏说：皇长子当正储位，万事不可动摇。他同时抨击郑贵妃"独蒙眷注"，强烈疏请第二年册立东宫。另一阁臣王锡爵也上疏以汉文帝为据，认为群臣奏请册立东宫，是历代沿袭之定例，社稷国本之所需。三位阁臣接踵上疏后，就相继杜门不出，静候罢黜。接着，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率众臣合疏册立东宫，神宗大怒，下旨夺俸。辅臣申时行引疾乞求致仕，后经另一阁臣王家屏的居中调解，神宗才怒气稍缓。面对群臣纷纷争请建储的压力，神宗迫不得已颁发谕旨，答应册立典礼于万历十九年举行，同时又威胁道：如再受渎扰，就要"直待皇长子十五岁册立"。

万历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疏请为举行册立典礼准备仪仗队，被明神宗以烦言渎扰为由罚俸三个月，同时册立日期又被延至万历二十一年。当时内阁首辅申时行托病在告，次辅许国看到小臣都敢于上言争请，遂倡言合疏请建东宫。在落款署名

时，依阁臣位次，将申时行的名字列在首位。申时行得知后，唯恐皇上斥责自己，遂独自向神宗呈奏密疏，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明制，大臣向皇帝进密疏，皆留中不发。但此次神宗却将申时行的密疏与其他奏疏一道发下，朝廷由此舆论大哗。礼科给事中罗大纮、武英殿中书舍人黄正宾交相参论申时行“迎合上意，取宠固位”。神宗览奏后怒发冲冠，谕令重杖黄正宾，将罗大纮削职为民。此事一出，引起阁臣间不和。申时行、许国先后去职，王锡爵先是杜门不出，后又借故回原籍省亲，内阁中只剩王家屏一人。

万历二十年，礼部给事中李献可等人疏请对皇长子进行豫教，李被神宗以“违旨侮君”为由，降职调往外任，其余共同上疏者则受到“夺俸半岁”的责罚。当时担任首辅的是性情刚直、敢于直谏的王家屏，他认为李等未提册立之事，只是陈请豫教，皇长子年已十一，理应出阁读书，因此不肯听任神宗的专制裁断，就将谕批封还。给事钟羽正、舒弘绪、陈尚象、李固策等，御史钱一本、邹德泳、贾名儒、陈禹谟，主事董嗣成交相上疏申述论救，分别受到贬谪外调或削职为民的惩处。科道官孟养浩的奏章最后呈递，被重杖一百，几致毙命。御史钱一本上疏“国本论”，尖锐指出：神宗谕旨不许各部门上疏打扰，否则便要将长子豫教延期，这样做实际上是以不变应万变。如无人提及，就装作不知拖延时间，如人提到，就借口渎扰而“改迟一年”，这样就无人再敢疏请，最终达到依照自己的意愿册立皇太子的目的。这一席言击中了要害，神宗对之恨之入骨。当孟养浩被杖之后，明神宗又称其“所呈之词，根托一本”，于是以造言诬君、扰乱大典的罪名，将他与钱一本一起斥逐为民。王家屏见此情形，只好上疏乞求回乡，同年三月致仕。吏部官员顾宪成、章嘉谟因请求神宗挽留王家屏，一个被削籍，一个被外调。礼部尚书李长春先后十四次上疏陈请册立，因每次均无回音，一气之下自动离职

而去。

万历二十一年春天，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考虑到社稷的需要、辅臣的职责，他向神宗进呈密疏，意为册立典礼未能如期举行，皆为小臣激聒所误。后因皇上钦定二十一年举行，故群臣能够静候以待，不再上疏奏请。臣以为举行之礼应在春月，但直至上元节已过，仍未见发下谕旨，为避免众臣群起攻之，恳请急下谕旨，务在今春举行册立典礼。神宗被逼无奈，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此说是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同时封王，而将太子位空缺，留待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后，再行册封嫡嗣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中宫仍无所出，再行“无嫡立长”。神宗在谕旨中称：“先册立太子，若中宫诞育元嗣，是封王？还是封为太子？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若封王，将会违背祖训，若封太子，势必形成两位太子，那样国本就会混乱。”王锡爵看到神宗决心拖延，立即表现出阿顺君主的处世态度，依照神宗的意愿起草谕旨。但是顾虑到群臣公论，他又草拟了另一道谕旨供神宗选择，即援引汉明帝马后、唐玄宗王后、宋真宗刘后养育诸妃之子之例，建议将皇长子过继给中宫王皇后，请令皇后抚育元子，则元子即嫡子，可“成日下两全之美”。神宗看到后不为所动，仍决定采用第一道草谕，将之发送礼部执行。

三王并封之旨传出后，立即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工部郎中岳之声、礼部郎中陈大来、顾允成、张纳陛、孔谦，兵部给事中许弘纲等联名上疏反对待嫡，他们指出神宗本人当年被册立为太子时，当时的中宫陈皇后尚且年轻，但穆宗皇帝并未因此而待嫡。随后又有王如坚、朱维京等六人先后上奏，声称本朝实无此制，这种做法“是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明神宗阅览奏章后怒不可遏，降旨将王如坚、朱维京谪戍。未几，朱维京的同事徐杰、王学曾继起谏诤，亦被削职为民。

明神宗严厉降处大臣，迫使官员群起攻击王锡爵，王亦哑口无言。庶吉士李腾芳致信王道："公欲暂承上意，巧借封王，以偷梁换柱之术转作册立。如果封王确立，册封不得，你又去位后，一切罪名都将由你一人承当。"王锡爵此时方恍然大悟，称"诸公詈我，我无以自明"。随即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初上疏，恳请神宗停止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奏疏主要是进行自责：一未全力谏诤，盲目为皇上草拟诏旨；二对《祖训》中的立嫡条文理解偏颇，贻误皇上；三是"待嫡"之旨是无据之仪，当初未向皇上说明。这道奏章表面上是反躬自责，检讨错误，实际是对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进行否定。在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神宗的思想终于开始动摇，他传谕王锡爵道：今卿有此奏，若自认错，置朕何也？最后被迫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却又坚持仍需等待两、三年，若中宫无出，方可册立太子。

十一月，神宗召见首辅王锡爵，锡爵叩头请建储，神宗允诺来年让皇长子出阁听讲。随即又传谕皇长子、皇三子年龄相仿，意在让二人一并行出阁之礼。

万历二十二年，皇长子朱常洛出阁听讲。由于朱常洛的太子身份尚未确定，因此既不能依据东宫的仪礼，又不能降格着亲王之服，只好身着常服出阁讲读，一切仪式皆被免除。

万历二十四年二月，礼部以皇长子年已十五，正合行冠礼之年，奏请神宗安排其事。由于皇长子冠礼之行，涉及到服用何等冠服之事，若用亲王冠服则不妥，而若用太子冠服则需先册立为太子方可。所以礼部此举，实是催促明神宗尽快册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接到礼部奏疏后，因为仍旧不想马上册立，便仅以"报闻"处之。二十五年，大臣们提出的册立请求更多，几乎月月都有，神宗也照样束之高阁，或以"不报"了之。三月，首辅赵志皋等疏请为皇长子当年行冠礼，次年举行婚礼。神宗指示礼部"择日具仪以闻"，但最终仍是不了了之。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给事戴士衡、全椒县知县樊玉衡被削籍谪戍。先是万历十六年，河南人吕坤任山西按察使，选择历代列女事迹刊刻了《闺范》一书。不久书籍传入宫中，郑妃兄长郑国泰重新刻行，改名《闺范图说》，其中增添了十二人，包括郑妃。吏科给事戴士衡看到后，上疏弹劾，公开指斥“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言词非常激烈。郑妃得知后，哭诉于御前，要求神宗为她洗刷冤屈。二十六年秋，又有人撰《闺范图说》跋，题《忧危竑议》，行文托名“朱东吉问答”，内容是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指斥《闺范图说》是为郑妃夺嫡制造舆论。其所谓“东吉”，意为东宫大吉。神宗下令调查朱东吉为何人，郑国泰怀疑是戴士衡所撰写，樊玉衡参与了此事。神宗愤怒异常，加之郑氏又泣诉不已，遂于夜半传旨，逮捕二人“下诏狱拷讯”。及至天明，将戴士衡谪戍廉州（广西合浦），樊玉衡谪戍雷州（广东海康）。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二十岁，册封之事还在继续拖延。当时廷臣中有人主张先冠婚后册立，大学士沈一贯认为这样不正名而暂且让步，是降储君为诸王，断不可行。八月，沈一贯再次上疏，以事关社稷久远、子孙昌盛为由陈请册立之事，神宗为之心动。这时郑妃却手执玉盒，坚持力行前定的密约。据说神宗接过玉盒打开一看，只见前赐誓书已被蛀虫咬得七洞八穿，尤其是“常洵”二字，已经是痕迹皆无。神宗无奈地哀叹道：天命如此，朕也不能违背天意了。遂命沈一贯草诏准备册立，颁发礼部。不想他旋即又反悔，下旨再行改期。沈一贯封还圣谕，疏称“万死不敢奉诏”，神宗这才作罢。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册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端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十月二十八日，正式为朱常洛以皇太子身份举行了束发加冠典礼。

朱常洛最终得以确立皇太子的地位，除了廷臣在长达十几年

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苦谏力争，对神宗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外，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得力于慈圣李太后力主册立皇长子。早在万历十四年，当太后闻知姜应麟、沈璟等人因奏请册立而遭谪降后，就大为不悦。万历二十八年以后的一天，明神宗拜谒太后，太后责问为何还不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神宗答道："彼（指常洛）都人（即宫女）子也。"太后听罢正色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尔亦都人之子。"神宗当时"惶恐伏地，无以自容"。慑于太后的威严，神宗始终无法做出废长立幼的决断。

另外，在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与宠妃郑氏之间产生了矛盾。当时太后病笃，王皇后始终服侍床前，且面带戚容，泪痕犹湿。反观郑贵妃却在暗中发号施令，神宗因此蕴怒贵妃。神宗曾与诸王子宴，席间各有小赐。皇长子赐一玉碗，神宗命郑妃代为收藏。此时神宗突然索要玉碗，贵妃却已忘记藏所，一时无措。神宗随即索要皇三子所赐，贵妃则应声而进。神宗深感愤怒，次日即传谕礼部：速议册立仪制来看。朱常洛由此居东宫之位。然而，围绕册立太子而展开的矛盾和斗争，并未因册立而宣告结束，而是一直延续至朱常洛即皇帝位后二十九天，这位短命皇帝暴毙，才算是最终结束。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

《明神宗实录》卷171、卷172、卷228、卷256、卷257、卷270、卷294。

《先拨志始》卷上。

明末三案

明末宫廷中，曾连续发生了三桩案件：一为万历朝之梃击案；二为泰昌朝之红丸案；三为天启朝之移宫案。当时朝臣为此嗷嗷不休，弄得满朝风雨。明朝官吏之中，夙有辩正义之风，甚至于生死不顾，为宫廷之事常如此，如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一时鼎沸朝廷。明末朝廷也是这样。

明末三案，实因“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即册立太子之事。明祖制，皇嗣立嫡立长，即有嫡子即立嫡子，无嫡子则立长子。神宗朱翊钧无嫡子而有长子，长子常洛（即泰昌帝）为王妃所生。王妃不受宠，生子而不能进封，故常洛也失爱。郑妃受宠，生子（神宗第三子）即晋升贵妃，子名常洵（即福王），极受钟爱。因此郑贵妃便产生了为其子争位之心。按规矩，应册立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却迟迟不立，推称待皇后生嫡子。群臣为此交章奏请，神宗朱翊钧在群臣压力下出于无奈，只好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十月，颁立常洛为太子。然而福王仍托故不肯赴国（明制：皇子封王，十四岁必须离京就封国），因而又引起群臣疑虑。焦点是指郑贵妃及其家族。其中亦有“门户之争”。“门户之争”源于张居正压抑言官（即御史、给事中等谏官），遂演变成阁臣与言官对立。东林党人中，本多正人君子，而“主梃击、红丸、移宫者，皆东林也”。东林党人好意气之争。明末三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天色刚黑，有一男子持枣

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李鉴，直至前殿檐下，被内官韩本用等擒住，当晚交给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看管。第二天皇太子闻奏，命法司提审，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语无伦次，若疯子一般。后来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再审张差。此二人系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按疯癫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一向善于结交外戚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官员们对两次审讯均表示怀疑。后刑部主事王之寀，见张差年壮力强，非疯癫人，于是恐吓他，如实招来则给饭吃，不招当饿死。张差乃招供，说其小名叫张五儿，父张义已病死，是马三舅、李外公叫他跟随一名老公（太监）至京，说事成后给他几亩地种。老公将他领进一大宅院子，另一老公给他饭吃，并对他说：你先冲一遭，遇人则打死，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救你。随后给张差一枣木棍，领着他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张差打伤守门人，因老公多，遂被缚。随后，王之寀将此情况报告明神宗，并说，张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于是群臣上疏，要求朝审或会审。而浙党官员攻击王之寀，坚持说张差是疯癫，要求把张差处死。后来在群臣压力下，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举行会审，张差供认：是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是刘成领他到宫门，并说："打死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庞保、刘成二人乃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一时议论纷纷，神宗恐怕进一步追查会牵涉郑贵妃，便亲自到慈庆宫，召见百官，乞求太子解围。太子常洛仁义慈善，又畏惧郑贵妃，当神宗问他意见时，他说："此疯癫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神宗下令，把张差凌迟处死，将庞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案子便草草了结。嗣后借词将王之寀免官。至天启初，王之寀复职，遂上《复仇疏》，重提梃击

一事，并连及“红丸”，于是斗争又起。

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初一，朱常洛登基，即光宗皇帝。光宗正当中年，但体弱多病，在做太子时，就已有了妃子、宫女多人，其中有两个姓李的选侍（从宫女中挑选出来侍侯太子的，称选侍）最得宠，称东李、西李，而西李之宠又在东李之上。朱常洛当上皇帝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给光宗，使光宗起居无节，溺于女色，八月初十便病倒了，西李和郑贵妃他们互相勾结，强使朱常洛照父遗命封郑贵妃为太后，封西李为皇后。但这位新皇帝病倒在床，顾不得此事，治病要紧。先是内医太监崔文升进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昼夜泄三四十次。传谕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之语。就在这岌岌危殆下，光宗还要册封西李为皇贵妃。阁臣首辅方从哲请速建储（太子），这时，有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丹妙药，于是光宗命速进药，朝臣都不敢拿主意，李可灼看到这情景，自己先服一丸，光宗随后也服一丸，顿觉暖润舒畅，连称可灼是忠臣，等朝臣退去，再进一粒服之，及翌日（九月初一）天还未明即死。可怜光宗只当了二十九天的皇帝就归天了。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义，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于是，群情大哗，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这才把赏银改为罚俸一年。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了结，纠弹的奏章还是接二连三地送上来，指责内医崔文升系郑贵妃心腹，故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进红丸致光宗死亡，罪不可恕；纠弹方从哲十大罪。方从哲在众官员的指责下，只好辞官。天启二年（1622 年），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首起追论李可灼和方从哲。他指出，李可灼的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可灼非太医，红丸不知何药，乃敢突然以进。指责方从哲为“弑逆”。大

多数官员都要求办方从哲的罪，方从哲也上疏力辩，其同党官员也极力为之辩护。争了好长一阵子，最后判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还是无事。

移宫案。朱常洛死后，其长子朱由校登基，是为熹宗。西李在光宗未死时曾恃宠要谋取皇后的地位。光宗死后，又企图借朱由校年少（仅十六岁）之便，掌握大权。她要下面的官员把奏章先交给她看，然后才转给朱由校。而且光宗死后，她还住在乾清宫中。这座宫殿，按制度应是皇帝所居之地。先是郑贵妃住，被迫移出后，由朱常洛住，常洛死，便由朱由校同李选侍（西李）住。西李仅是个选侍，当初住进乾清宫是倚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因此，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第二天（九月初二）就合疏请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的言论最为激烈，他说，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让皇长子居慈庆宫，名分倒置。还说，如不早采取措施，而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奏疏上去后，西李还是没有移宫之意。初五日，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在朱由校即位的前一日，刘一燝、韩爌、方从哲等立宫门力请，西李才从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此即“移宫案”。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涟、左光斗，说西李系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吵。后来，新登基的熹宗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上奏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逼害熹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再搬出仁寿殿，到宫女养老的住处去。熹宗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稍为缓和下来。

如上述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件，合称“明末三案”。梃击案发生后不久，庞保、刘成被诛，朝野议论已息。只因刑部

主事王之寀被劾后又复官，追究前事，认为梃击一事，乃外戚郑国泰与刘廷元私相勾结，以“疯癫”结案，并指使胡士相蒙混过关，这就使得东林党人与东林党的反对派围绕着梃击一案的争端展开一场大争吵。一波未了，一波又起，光宗食红丸死后，阁臣方从哲票拟赏李可灼银币，说是李可灼诊治有功。御史王舜等上疏弹劾，李可灼充军。于是朝臣分成两派：一派追劾方从哲，另一派意见相反，大力替方从哲剖白。这样东林党人和东林党的反对派又围绕着红丸一案的争端继续进行大争吵。紧接着，当西李移宫时，宦官一伙盗窃大量金银财宝，谁知通过乾清门时摔了一跤，撒满一地。熹宗怒，下令法司究治。宦官们大惧，扬言皇帝薄待先朝妃嫔，致使西李移宫那一天光着脚要跳井。这样一来，宦官们好借此来惑乱群臣的视听，搞乱是非。果然，御史贾继春奉上《安选侍书》，替西李说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熹宗大怒，罢了贾继春的官。到后来，宦官们不甘心，他们勾结大宦官魏忠贤，上疏辩冤。贾继春等又被起用。反过来，他们进一步倚靠宦官势力，加紧诬陷、打击东林党人。之后，东林党人和东林党的反对派围绕着移宫一案的争端又大张旗鼓地进行没完没了的大争吵。

东林党人与东林党的反对派围绕着三案争端进行的大争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究其三案本身原委，各有自己坚持的正当理由，很难说谁是谁非。如梃击一案，虽不能不怀疑是出于郑贵妃的指使，但又谁能判断不是由于庞保、刘成这帮人的冒险邀功所为呢？时人孙承宗就说：“事关太子，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意思是说，梃击一案，只能追查到庞保、刘成为止，如果牵连到他们两个以上的人，就再也不能往下追了，很有些息事宁人之理。再就红丸一案而言，据当事人韩爌所述进药过程，证明李可灼进药的时候，朝臣们都在，并未阻止禁用；而后来独责方从哲一人，并加以“弑逆”罪名，未免太过，是不能使东林

党的反对派们口服心服的。至于东林党人援引《春秋》“许世子不尝药”的话来责难，言正名顺，也是很难驳倒的。再拿移宫一案来说，只做了一年皇帝的光宗根本不能和做皇帝近五十年的神宗相比，得宠时间不长的西李的权势，更不能与煊赫几十年的郑贵妃相比，西李暂居乾清宫，又怎能骤然做到“垂帘听政”呢？不过，当时熹宗年幼，不能不考虑到日子久了会被其挟制的可能，这也正是杨涟等东林党人力促西李移宫的用意所在。后来，贾继春上《安选侍书》而被罢官，东林党的反对派从心底里是不服的。

天启初年，宦官头目魏忠贤得势擅权，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自掌东厂，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监巡抚，遍置死党，声势煊赫一时，那些东林党的反对派和依附贵族大地主的官僚，如顾秉谦、魏广微、崔呈秀、周应秋等都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拼凑成为阉党。这批阉党分子无恶不作，趁着三案争端进行大争吵的余波未息，怂恿魏忠贤汇录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对三案所下的一切谕旨，以及东林党人与东林党反对派对三案相互争持不下的论点，编成《三朝要典》一书，凭借着熹宗皇帝一人的《圣谕》来定三案的是和非，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无情的血腥镇压。从万历中期以后，无锡的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其后邹元标、赵南星等继之，可谓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一时声势显赫，被称为东林党。凡主张追查梃击、红丸、移宫的人，无一不被指为东林党人。而东林党的反对派图谋报复，借魏忠贤之力铲除异己，故不问三案争端的是非。时人倪元璐指出：“逆阉得志后，逆阉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指东林党的反对派）求进，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以当时人论当时事，对东林党与东林党反对派围绕着三案进行的长期大争吵的评论，还是公平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只不过是明末派系斗争进入了最激烈阶段的表现，其实质是不同派系的官僚集团为了在最高统

治阶层找自己的靠山，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宠幸，以谋求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三案发生的当时，东林党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到后来阉党当权时，“三案”又彻底被翻了过来。直到熹宗死，思宗朱由检继位，魏忠贤被杀，“三案”之争才渐平息。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68。

徐鸿儒起义

明神宗万历年间，朝廷政治腐败黑暗，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加之连年灾荒，民不堪命，全国各地怨声载道。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山东参政吕坤在上明神宗朱翊钧的奏疏中谈道，自己久在地方为吏，见天下百姓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屋不遮雨，饥民背井离乡，大片田野荒草丛生。现在天下的形势，大乱的征兆已经显露，只是还未形成大气候。他明确地指出：白莲教结社，遍及四方，倘有揭竿而起者，这些就都是归附之人。白莲教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首先发难者，明朝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屡次严禁白莲教，并写进了明律。白莲教遂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当时蓟州人王森倡导白莲，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遍及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六省。万历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王森两次被捕入狱，后死于狱中。其子王好贤与山东巨野人徐鸿儒、景州人于弘志继行其教，信徒益众，仅山东一地，徐鸿儒所传法门弟子，就已经超过二百万。

万历末年，山东连年受灾，巨野一带出现了“民相食，骨肉不相保聚”的悲惨景象，兖州、滕县一带，也是饿殍遍野，死者枕藉于道。这时，由于后金贵族大肆向关内扩张，朝廷一再向农民加派征辽饷银等赋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下令增加天下田赋。四十七年十二月，再增天下田赋。四十八年三月，又令增加田赋。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又加派关税、盐课及各

式杂税，将山东饥民推向了绝路。

天启二年五月，山东徐鸿儒率领白莲教徒正式发动起义。

徐鸿儒，原名徐诵，山东巨野人，后迁居郓城。他是闻香教主王森的徒弟，山东白莲教的首领，传教已有二十多年。天启二年，蓟州闻香教首领王好贤看到朝廷在对后金作战中连连受挫，下层百姓处于水火之中，盼望有人发动推翻明朝的起义，遂秘密与徐鸿儒相约，联络各处白莲教徒在中秋节同时揭竿而起。徐鸿儒针对山东农民饥寒交迫的凄惨情形，提出了如果皈依白莲教，可以安保终身不贫，能够见到金银山、米面山、油泉酒井，满足饱腹之欲。于是巨野、郓城一带的饥民争先恐后携妻领子前来投奔，徐鸿儒很快就汇集起几万大军，声势浩大，官府不能遏制。因起义计划泄露，徐鸿儒“以事相激”，率先发动起义。他以印传旗，号令诸方同时起事，皆以头裹红巾为号，公开亮出起义旗帜，占据了郓城梁家楼。徐鸿儒自号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旬日之间，远迩响应”。郓城知县余子翼急忙拼凑兵丁乡勇前去征讨，结果兵丁大多趁机逃遁。五月十三日，起义军突袭郓城，里应外合，顷刻城破，余子翼只身潜逃。十四月，起义军回师猛攻巨野城，因城厚兵强，事先有所准备，一时难以攻克。起义爆发后，曹州（山东荷泽）、濮州（山东濮县）震动。兖西兵巡道阎调羹匆忙调遣各县乡兵，星夜赶往郓城、巨野；巡抚都御史赵彦、总河侍郎陈道亨、巡抚都御史王一中等人自五月二十日开始，合兵围剿起义军集结地侣家楼、武安集等处，先后有六千义军被杀害，但主要据点梁家楼仍为起义军坚守。

徐鸿儒在梁家楼与官军苦战之时，隶属于他的另一名闻香教首领张东白，也聚集起数万之众，在邹县杨徐镇揭竿起义。此时官军乡勇大都调往郓城、巨野一带，兖东空虚，因而这支起义军进展顺利。五月十七日，张东白攻破郓城，署印通判郑一杰冒雨出逃。与此同时，兰陵人沈智率领另一支起义军围攻滕县，当地

百姓十之八九参加了义军，守城的丁壮纷纷逃散。上任才三日的知县姬文允亲下街坊巷里，“遍打门户，催呼守城”，应者十无一二，姬文允急得呕血数碗。他站在城墙上，询问义军何故从贼？义军回答：祸由董二。董二，是滕县乡绅，前延绥巡抚董国光之子，长期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不多时，滕县城池被攻破，姬文允被活捉，董国光逃走，其女儿、女婿皆被义军杀死。六月七日，起义军又大败兖东道王从义于峄县城外，随即攻克了峄县城。

六月十一日，徐鸿儒起义军向邹、滕一线转移。由于官军云集巨野、郓城，徐鸿儒数次攻打巨野县城均未成功，在梁家楼、武安集又接连受挫，于是放弃郓城、巨野的营地。十二日，起义军突破官军的防线，十七日渡过运河向东而行。沿途官军大都紧闭城门，不敢应战。

六月下旬，徐鸿儒与张东白、沈智三方会师。起义军此时已经拥有十几万人，声势浩大，震动了淮河、济南一带，也震惊了朝廷。当时都司杨国栋已调回邹县，都司廖栋也尾随徐鸿儒折回兖东。杨、廖汇合后，官军开始进攻邹县。双方才一交手，徐鸿儒突出奇兵，攻击官军两翼，官军溃败，退守兖州。起义军随即夜袭官营，杀死游击张榜，缴获了大量粮草、兵器等。邹县，是孟轲的故乡，城外有孟庙和孟子嫡系子孙居住的“亚圣府”。起义军在占领邹县期间，包围了亚圣府，杀死了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承光的长子孟宏略，随即活捉孟承光及其母亲，就地处死。义军捣毁了孟庙，将亚圣府夷为平地。

七月，于弘志在阜阳率白莲教徒起义，由于孤立无援，很快遭到官军围剿，于弘志被斩于马下。艾山白莲教首领刘永明自称安民王，手下二十八将分别涂面，号“二十八星宿”。他们也聚集了两万多人起事，同样遭到官军的镇压，刘永明在就刑时还自称“寡人”。

七月十四日，徐鸿儒、张东白率起义军攻占了滕县与沛县交界处的夏镇，阻断了漕运河道，截获了四十多艘粮船。后把总姚文庆等人集合军壮乡勇，夺回了漕船。接着义军又奔至沛县，计有万余人拥至城下。知县孔闻礼率守城将士极力捍御，方保城池不失。后官军援军抵达，起义军拔营而去。

徐鸿儒起义军迅速发展，至此已经拥有十几万人，占领据点十几个。他们先后攻沛县，围曲阜，袭郯城。山东巡抚赵彦一面急忙檄令所部乡勇，加强各主要城堡的防守兵力，收复了郓城和峄县，同时十万火急向朝廷请求援军。当时内地承平日久，山东无重兵，看到起义之火越烧越旺，朝廷迅速调集了四五省的兵力，包括两广支援东北对后金作战的军队，天津、登莱的海防部队，以及沂州、真定（河北正定）、保定的地方武装开赴山东，另外又集中了各处乡兵义勇几万人。明熹宗起用了休致在家的原大同总兵杨肇基为山东总兵，与巡抚赵彦一道坐镇兖州。张东白等趁杨肇基未至，组织了十八万义军分三路进攻兖州，准备先取兖州，次攻济南，但未能奏效。此时义军除了在邹、滕一线布署主力外，还分兵在二县之间的峄山周围，连结数营，与邹、滕相为犄角。双方在兖州展开了生死决战。

兖州，是鲁南的军事重镇，兖州府所在地。起义军进攻兖州，总兵杨肇基派兵出城掩杀，义军不敌，撤回到滕县。官军进攻邹县，经过大小数十次激战，也未能攻克。赵彦于是指挥官军"偃旗息鼓，暗袭各营"，偷袭峄山外围据点，起义军撤到峄山，凭险固守，旋又遭到汶阳、邹县乡勇的攻击，终告失守。官军又围困邹县，切断了邹、滕两地之间起义军的联系。此时，邹、滕两地的白莲军尚有近十万人。

九月二十日，滕县义军出城打粮。在官军的长期围困之下，城内粮食断绝，瘟疫流行，死者"日以百计"。官军乘义军出城之机，攻占了滕县县城，城内的一万多义军撤出后，向南进击，

淮兵闻风而散，徐淮一带为之震动。由于受到黄河天险的阻挡，这支义军只得又折向西北，计划再回郓城、巨野地区，重新建立根据地。十一月十一日，起义军开至巨野县康家集，误入官军的埋伏圈，全军覆没。

十月，官军收复锡山。徐鸿儒、张东白等被困于邹县城内，孤军奋战。这时，城内粮草已尽，瘟疫大作。义军都督侯五、总兵魏七等人拔去义军旗帜，据城乞降。官军随即用火攻城，徐鸿儒等三百多人继续坚守。十月十九日，城池失守，徐鸿儒落入官军之手，旋即被押往京城，十二月，被车裂于市。徐鸿儒临刑时叹道："倘能延迟数日，就能横扫海内，锋芒所至，无人能够阻挡。"徐鸿儒起义至此宣告失败。

天启四年八月，徐鸿儒余部再次起事，"劫掠兖州"。崇祯元年（1628 年），邹县的另一支白莲教派聚集泗州，重新发动起义，攻打兖州府。之后崇祯七年李自成起兵于陕西米脂，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平徐鸿儒》

《邹县志》卷 3。

《巨野县志》卷 17。

魏忠贤乱政

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初名进忠，号完吾。他本是个目不识丁、嗜赌成性的二流子，娶妻冯氏，生一女。在一次赌博中输得精光，无路可走，一气之下走进了皇宫，并改名为李进忠。万历十七年（1589年），开始在司礼秉笔太监孙暹门下，管理甲字库。以后又巴结王安手下太监魏朝，魏朝在王安面前常夸奖他，使得王安对他颇为欣赏。不久就做了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典膳。魏忠贤与魏朝结拜为兄弟，时宫中称"大魏"、"二魏"。

朱由校自幼生母就去世了，年仅十八岁的客氏就成了其乳母，客氏本是定兴人侯二之妻，入宫后对朱由校颇为用心，百般殷勤，细心照顾，甚至把朱由校梳头掉下来的头发，剪掉的指甲，都精心收藏。朱由校的膳食也必经她亲手调治。入宫两年后，侯二就死掉了，身处禁宫的客氏奈不住寂寞，私下与魏朝对食。所谓对食，就是太监与宫娥结为相好，形同民间之夫妻，而且亦决不容第三者插足。明万历以后，宫中对食极为普遍。魏朝常外出办事，难以陪客氏度夜，客氏便与魏忠贤勾搭。熹宗即位后不久的一个晚上，魏朝与魏忠贤为争客氏，在乾清宫暖阁打了起来，吵闹声传到熹宗御所，熹宗命将二人传到榻前，弄清原委之后，就命客氏自己选择，客氏爱魏忠贤之强悍，于是熹宗就命斥退魏朝，从此客氏就与魏忠贤成了固定"夫妻"。魏朝则被遣往凤阳，不久魏忠贤矫旨将他杀害。客氏与魏忠贤用尽心机，一

昧地去获取熹宗的宠爱，不久，客氏得封奉圣夫人，魏忠贤得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亲赐“忠贤”为其名字。

王安对魏忠贤挤走魏朝，颇不满意，多加责备，魏忠贤与客氏对王安大加痛恨，于是就唆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专权，又令移宫时获盗宝罪的太监刘朝等上疏辩白，诬陷王安。天启元年七月十二日，王安遂被降作净军，发去南海子，看守墙铺。魏忠贤又以太监刘朝任南海子提督，并借机杀害了王安。魏忠贤前面的两个障碍都清除了，于是他就逐渐侵蚀朝政，不断攫取权力。客氏则从中推波助澜，暗中配合，不久，京城就流传着一首歌谣：“委鬼当朝立，茄花遍地红。”“委鬼”，魏也，即魏忠贤，“茄花”即客氏。

熹宗初年，东林党掌政。东林党多是些正统的封建士大夫，对客、魏的用事早有觉察。天启元年九月，光宗葬毕，阁臣刘一燝就请熹宗遵循遗诏，将客氏遣出宫中，熹宗不得已只得照办。但不几日，熹宗对客氏竟极为想念，以致于泪流满面，饮食不进，又只得将客氏宣入宫中，以陪伴他。魏忠贤亦企图拉拢东林党人赵南星，赵南星则不予理睬。十二月，吏部尚书周嘉谟将给事中霍维华遣出京师，魏忠贤很清楚这是东林党人在拆他的台，于是他又唆使另一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是受刘一燝指使，要为王安报仇。周嘉谟被迫辞职。最初的几次较量，魏忠贤与客氏都占了上风，于是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了。

熹宗是个好贪玩的皇帝，他不读书，也极少开经筵[①]，整日玩些稀奇古怪的游戏。魏忠贤则随侍左右，投其所好，极力加以引诱。熹宗喜欢油漆木工，常常自操斧锯，做些家具木器，制造之精美，一般的巧匠亦难比。他整日沉溺于房屋的营造中，盖成

---

① 经筵，指皇帝与大臣在一起讲论儒家等经典及治国之道。

后有时很喜欢，又将其拆除再盖。拆了又盖，盖后再拆，竟不厌烦。有时还玩机巧水戏，就是用大铜缸盛水放于高处，钻空设机于下，利用水的压力，形成各种形态的水喷，或置核桃般大小的金色木球于喷处，木球随水柱上下旋转。每当熹宗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忠贤就拿出一堆奏章请他审批，或向他请示问题，惹得熹宗颇为厌烦，熹宗便随口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拿下去，好好处理吧。"于是魏忠贤就通过代皇帝批答奏章，逐步将大权抓在手里。与此同时，魏忠贤又在内廷广泛培植心腹太监，王体乾、李永贞、王朝辅、李朝钦等三十余人全都成了他的党徒，并皆占据内廷重要职位。

魏忠贤在熹宗面前小心谨慎，又有客氏从中美言，内廷又广植心腹，故越加横行无忌，若后妃对他有所不满，他也大加迫害。皇后张氏，秉性刚正，经常在熹宗面前说客、魏过失。一次，张后在读书，熹宗问是什么书，张后说是赵高传，以之提醒熹宗。魏忠贤对她恨之入骨，天启三年，张后有孕，客、魏竟使手段，使之流产。又买通死囚孙二，自言皇后是他所生，以期熹宗相信，从而疏远皇后。张裕妃不买客、魏的帐，被二人矫旨幽禁于冷宫，不给饮食，活活被饿死。还有范惠妃、李成妃都受尽了二人的迫害。

魏忠贤在内廷一手遮天，在外廷气焰亦日益嚣张，渐渐地形成了一批死党——阉党。内阁中最早与魏忠贤相勾结的是沈漼。沈漼曾在内书堂任教习，魏忠贤则算是沈漼的弟子。天启元年七月，沈漼入阁，遂与魏忠贤勾结，共同参劾阁臣刘一燝。天启二年三月，刘一燝去职，此后又多次受到阉党诬陷，以致被削官，追夺诰命。天启三年正月，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顾秉谦，昆山人，为了巴结魏忠贤，带着儿子去拜见魏，并说：他本想当魏忠贤的膝下子，但又担心魏忠贤不喜欢他这个胡子花白的儿子，就让他儿子作为魏忠贤的孙子。魏忠贤点头答应，就给他

儿子授职尚宝卿。魏广微，南乐人，与魏忠贤是同乡同姓，开始自称宗弟，后来竟自称侄儿，时人称之为“外魏公”。原来的浙党、齐党、楚党因东林党人当政而在朝中失势，见魏忠贤得势，于是纷纷投靠到魏的门下，于是阉党就这样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五虎”指文臣崔呈秀、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五彪”指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十狗”指周应秋、曹钦程等人。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无不是魏阉死党之天下，阉党对魏忠贤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有人甚至呼他为“九千岁”，事无巨细，皆派人请示魏忠贤，经他认可方才办理，以致竟无人向熹宗请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

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弟侄亲朋，个个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他的侄儿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和少师。而这时的魏良栋、魏鹏翼却尚在襁褓之中。

魏忠贤及其阉党的胡作非为，引起一朝正直官员的不满。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疏，其罪行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以及生活穷奢极侈等。此疏一上，举朝响应，参劾魏忠贤的奏疏一时竟达数十份。魏忠贤惶恐不安，急忙跑到熹宗面前泣诉辩白，并要求辞去提督东厂职务。熹宗让宦官王体乾把杨涟的奏疏念给他听，王体乾把疏中要害之处省去，听完后，熹宗竟然稀里糊涂，降旨慰问魏忠贤，并令阁臣魏广微传旨切责杨涟。杨涟不服，想在熹宗上朝时再当面弹劾。魏忠贤获知后，竟然阻止熹宗三日不朝。第四日上朝后，又有几百宦官带甲环绕熹宗左右，并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致使杨涟的计划落空。首辅叶向高和礼部尚书翁正春请求将魏忠贤斥归私第，以平朝臣之怨忿，熹宗亦不许。

群臣弹劾，未能推倒魏忠贤，魏忠贤遂伺机反扑。工部营缮主事万燝见杨涟之疏，熹宗竟不采纳，非常气愤，于是上疏揭露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废铜器以助光宗的陵工，而在香山碧云寺却大肆营造自己的坟墓。魏忠贤见到奏疏，更加怒火中烧，于是决定借万燝以立威，矫旨杖一百，斥为民。其爪牙接到命令，蜂拥闯入万燝府邸，一顿拳打脚踢，拖到午门时，万燝已是气息奄奄，又被施杖一百，不久万燝死去。之后，为了挤走内阁首辅叶向高，又制造了逮杖林汝翥事件。林系叶向高的同乡，时任巡城御史，不久前因事杖责过两个太监。万燝被杖责后，魏忠贤忽然矫旨杖责林汝翥。林闻讯秘密逃出京城，投奔遵化巡抚邓渼处。阉人缇骑声称林藏在叶向高寓邸，遂包围了叶的府邸，并径直闯了进去，翻箱倒柜，辱及妇女。叶向高忍无可忍，上疏乞休。七月中旬，叶向高解官归田。不久以后，许多东林党人皆被罢去，如吏部尚书赵南星、侍郎陈于廷、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及内阁大学士韩爌、朱国祯等。大批的东林党人被罢去，朝中局势大变，从此以后天下大权几尽归魏忠贤了。

天启五年正月，顾秉谦为内阁首辅，以后进入内阁的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𣚴、来宗道等都是魏忠贤之党徒，时称“魏家阁老”。其他六部等部门全被阉党把持。

魏忠贤权势恶性膨胀，遂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东林党人及其他异己势力。为了使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心中有数，阁臣魏广微与顾秉谦一起编了《缙绅便览》一册进呈，其中将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视为邪党；而将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余人视为“正人”，让魏忠贤以此作为官吏进升或黜陟之依据。崔呈秀则向魏忠贤进了《同志录》，将东林党人皆列名于其上；又进《天鉴录》，则是不依附东林党人的。王绍徽还效仿民间的《水浒传》，将东林党人一百零八人

编为《点将录》，也按天罡、地煞分类，天罡星列三十六人，地煞星列七十二人，每人名下系一绰号。比如将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如此多的名录书籍，使魏忠贤对东林党人了如指掌，随之对东林党人进行了多次迫害，比较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在天启五年，这一年论干支为乙丑，故称“乙丑诏狱”。汪文言曾因触怒魏忠贤被廷杖削职，魏忠贤对此仍一直耿耿于怀。后阉党御史梁梦环再次弹劾汪文言，天启五年三月，汪文言被再次逮捕。许显纯掌管北镇抚司，他按照魏忠贤的意图，进行严刑逼供，将汪文言折磨致死，并伪造供状，诬杨涟、左光斗各受杨镐、熊廷弼贿银二万，周朝瑞一万，袁化中六千，魏大中三千，顾大章四万。魏忠贤马上矫旨将他们六人逮捕，并且还罗织赵南星、王之宷、缪昌期等十五个正派人士有“受赃”罪状，除已削籍者外，俱皆削籍，并着按抚追赃具奏。杨涟、左光斗等六人皆下镇抚司，倍受酷刑，先后被折磨致死。时人称这六位正直之士为“六君子”。

次年，魏忠贤再次掀起大狱。天启六年二月，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上疏弹劾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七人，罪名是周起元为巡抚时，曾贪污帑金十余万，并常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于是魏忠贤矫旨把他们全都逮捕。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知将被逮捕的消息，于是作一封别友人书、一遗表，然后从容赴水而死。其余六人皆下镇抚司，死于非命，史称“七君子”。因这年是丙寅年，故称“丙寅诏狱”。

在魏忠贤的爪牙逮捕东林党人的时候，许多地方发生了民变，其中尤以苏州民变最为激烈。天启六年三月，逮捕周顺昌的旗尉来到苏州，市民闻讯全都拥挤在巡抚公署前，齐声称冤。数日后“开读”（正式宣读捕人的圣旨）时，有好几万人聚集起来，诸生文震亨等请巡抚毛一鹭代为上疏解救，以民情上闻。毛一鹭拒不答应，而魏忠贤派来的东厂缇骑却急不可耐，把刑具掷于地

上，大呼："今天的事与你秀才有什么关系！"并想打人。这时人群中跳出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及舆夫周文元，抓住缇骑问："这是谁下的谕旨！"答曰："实际上是魏公（忠贤）命我们来的。"他们遂大呼："原以为是天子的诏令，却是东厂魏忠贤抓人。"于是一齐动手，殴击缇骑，当场打死一人，其他缇骑抱头鼠窜，到处躲藏。后因素得民心的知府、知县曲为解谕，众人始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事变后，苏州市民抗议魏阉专横，机匠"不行机织"，市民全都罢市，各府州县亦响应，持续好几个月。魏忠贤得知消息，令毛一鹭等惩办民变参与者，颜佩韦等五人挺身自投，英勇就义。后人将其合葬于虎丘旁，立碑为"五人之墓"，至今尚存，供人瞻仰。

更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阉党的淫威面前，"六君子"与"七君子"表现了宁折勿屈的顽强斗争精神。杨涟下诏狱后，被严刑拷打。阉党对他铁钉贯耳，土囊压身，临终前他写下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魏大中在刑讯之日，昂首怒目，指着问刑的"明心堂"说是"昧心堂"。周顺昌每次用刑，一定大骂魏忠贤，有次许显纯打落了他的牙齿，问他："还能骂魏上公（魏忠贤）吗？"他把碎牙及血污全都吐到许显纯脸上，骂得更凶了。其他如左光斗、黄尊素、缪昌期等无不表现了铮铮铁骨、视死如归的刚正气节。

在迫害东林党人的同时，以前因"三案"而受打击的邪派官僚因投靠魏忠贤又占了绝对优势，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进行翻案。首先是天启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阉党御史杨维垣上疏翻梃击一案，攻击王之寀在此案中不但无功，而且有罪。王之寀遂被革职。四月，霍维华又上疏全面翻三案，熹宗稀里糊涂竟准其奏。五月，由礼科给事中杨所修提议，专门收集三案奏疏，按照阉党的意思编辑成书。次年正月正式得以批准，并以顾秉谦为总裁，六月书成，取名《三朝要典》，它完全体现了邪派官僚关于三案

的观点，对东林党人进行肆意诋毁。王之寀、孙慎行、杨涟等被冠以“诬皇祖（神宗）”、“负先帝（光宗）”等罪名，一概加以惩治。正直的官员一批批地被驱逐出朝廷。

当时，举朝上下无不是阉党势力，奸佞之徒无不向魏忠贤献媚。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竟疏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熹宗准奏。从此，各地纷纷效尤，几遍天下，不及一年，全国各地的魏忠贤生祠总数竟超过四十个。生祠不仅数量多，而且亦极豪华，其像多用沈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如活人，并多用金玉珠宝装饰，劳民伤财。开封为建魏忠贤生祠，竟拆毁了二千多间民房。疏词中称颂魏忠贤之词更无所不用其极：有称“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者；监生陆万龄在请求建祠的奏疏中，竟将魏忠贤比作孔子，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

就在魏忠贤之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病逝，崇祯继位。随着熹宗的撒手归西，魏忠贤的权势亦如同昨日黄花。同年十月，崇祯帝为巩固皇权而清除魏阉势力，阉党内部人人自危，于是互相攻讦以图自保。接着，又有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魏忠贤竟成了过街之鼠。十一月初一日，崇祯下令将魏忠贤贬往凤阳，初四日，又下令逮捕。初七日，行进到阜城的魏忠贤获知风声，遂于晚上自缢而死。一代权阉至此才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71“魏忠贤乱政”。

《明熹宗实录》

《明史》：“熹宗本纪”、“阉党传”、“周顺昌传”、“杨涟传”、“黄尊素传”等。

明末党争

明朝自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朝内大臣为了争夺权力，各自形成宗派，党同伐异，相互倾轧。万历中叶，皇室内部发生了争立太子的纠纷，满朝大臣纷纷依附皇长子或郑贵妃家族，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贵妃派由于有明神宗在背后支持，不断排除异己，吏部员外郎顾宪成、御史钱一本、光禄丞朱维京等人因为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先后被罢黜，另外被科道官参劾的官员也为数众多。由于明代大臣遭科道官弹劾后，为了表示自己不贪恋官位，大多自动离职，因此科道官的气焰极盛，双方的斗争，往往以科道官为主导，又被称作党争。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京察（即癸巳京察）是党争初期的重要事件。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外察，负责考核者为吏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史，另由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及都察院的河南道监察御史协助进行。京察考核京官，六年一次，四品以上官员由皇帝裁夺，五品以下由主管官员确定其是否“致仕、降调、闲住”，造册奏请。由于考核最终要确定升迁，遂往往成为官僚间相互斗争的重要场合。主持万历二十一年京察的有吏部尚书孙铣、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秉公澄汰，无所徇私”，一时朝廷内政绩不佳者，皆被贬黜殆尽。大学士王锡爵方以首辅还朝，看到自己意欲庇护者也被列入察疏，极为不快，就由刑科给事中刘道隆出面，上疏攻击吏部诸臣黜陟不当，王锡爵据此疏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铣上疏争辩，被明

神宗下令罚俸，赵南星降三级外调。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等相继上疏，为赵南星鸣冤，并攻击王锡爵。王锡爵即激神宗发怒，最后孙钅龙被免职，赵南星削籍，于孔兼、陈泰来被降职外调。这次京察影响巨大，明末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动摇，绵延五十年之久，实由此次京察肇始。

万历二十二年，朝廷推举内阁大学士等。吏部尚书陈有年、文选郎中顾宪成等人推荐原大学士王家屏等七人。王家屏在万历二十年因诤谏册储而被迫致仕，明神宗仍不愿起用他，因而"严旨责让"，陈有年以乞休抗争，最终以沈一贯、陈于陛出任大学士，孙丕扬取代了陈有年，顾宪成降调杂职。给事中卢明諏、逯中立相继疏救，明神宗益怒，将顾宪成削籍。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中应天乡试头名，八年中进士，被吏部选送本部办事。他关心时事，敢言直谏，当时神宗欲不立太子，而下诏以皇长子朱常洛、三子常洵、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时，顾宪成上疏力谏，又致信首辅王锡爵，反复与之辩论，对明神宗最终被迫收回诏书起到一定的作用，他本人在朝廷内外也颇有影响。此次削职回乡后，名气愈大，中外官员论救推荐者"无虑百十疏"。无锡原有东林学院旧址，是宋代杨时讲道的场所。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倡导重修，偕同另外一些仕途失意的罢官废吏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其他为数甚多的"退处林野"的士大夫也纷纷慕名前来。这些人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逐渐成为与朝中阿附投机势力相抗衡的一大政治派系。万历二十八年朱常洛册立为太子，是这一派系的重大胜利。因顾宪成等人讲学东林，故被政敌称为东林党。与此同时，朝廷内依附大学士沈一贯的大小官员，则分别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宣党首领汤宾尹，宣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祭酒。此人擅长写作，朝廷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昆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

人，万历二十年中进士，授编修，累迁左谕德。汤宾尹和顾天峻都喜谈天下安危大计，玩弄权术，他们各自召收朋党，干预时政。齐、楚、浙三党则是科道官依据籍贯形成的集团，齐党（山东一带）以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为魁首，燕人赵兴邦之流附之；浙党以姚宗文、刘廷元为首，中原周祚，毛一鹭、过庭训等附之；楚党（湖南一带）以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首，四川人田一甲、徐绍吉之流附之。齐、楚、浙三党与宣、昆二党互为声援，共同以攻击东林党、排除异己为己任。皇长子朱常洛册立为太子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但因此而产生的党派冲突却未因此而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万历二十九年，长期养病的首辅赵志皋死去，沈一贯升任首辅。明神宗忧虑朝内大臣植党营私，欲起用林居及久废者，赋闲在家的原礼部尚书沈鲤与朱赓，同时被任命为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沈鲤为人正直，遇事秉正不挠，在士人中颇有威望，因此，与沈一贯渐起冲突。万历三十一年，楚王朱华奎与宗人朱华越发生争执，朱华越疏告朱华奎非已故楚恭王朱英㶿的遗腹子，而是恭王妃之兄王如言侧室所出，不应立为楚王，其状称己妻即王如言之女，可以作证。明神宗诏谕礼部看议，礼部侍郎郭正域在沈鲤的支持下，力主立案调查，但并未找到朱华奎是伪王的充分证据。接受朱华奎贿赂的沈一贯遂指使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杨参劾礼部阻挠群臣言论，不据实上报，郭正域随即上疏揭发沈一贯阻止公勘以及接受朱华奎贿赂之情状。沈一贯见此，又授意给事中钱梦皋、杨应文等人上疏攻击郭正域，同时刺激大学士沈鲤，一时间阁、部相互龃龉。最后明神宗断“夫讦妻证，不足为凭，”朱华越坐诬告罪，降为庶人。郭正域在接连遭攻击的情况下，四次上疏乞休，幸得给事中张问达疏救，方未被致罪。

这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自朝房至勋臣大臣门口，各自发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托“郑福成”问答，其郑福成，寓意郑贵妃所出福王朱常洵应当成为太子。此案一出，神宗大怒，令锦衣卫大索京城，搜查撰写妖书者，最后以“妖人”皦生光糊涂被杀了事。沈一贯认为此案与郭正域有关，便借机指使御史钱梦皋上疏弹劾郭正域，斥其为“乱楚（即楚宗案）首恶”，并请明神宗勒令沈鲤致仕。万历三十二年，明神宗下诏令郭正域回籍，听候调查。

万历三十三年为京察之年（称乙巳京察），主察吏部侍郎杨时乔、左都御史温纯等皆与首辅沈一贯不和，温纯在妖书案起后，力为沈鲤、郭正域辩诬，与沈一贯积怨益深。在此次京察中，列入被察、被转的官员包括沈一贯的心腹、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以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人。经沈一贯的大力活动，明神宗扣住杨时乔、温纯等所呈关于京察的奏疏，不予批示下发，并以科道乏人为藉口，批评主持京察者将科道官定为不称职者甚多，“内必有徇私之弊”。杨时乔和温纯迫于压力，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职。钱梦皋、钟兆斗继续上疏攻击，温纯最终被迫“连疏求退”，致仕而去。此后又有候补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元珍、南京御史朱吾弼、兵部主事庞时雍等接踵上疏参劾首辅沈一贯，也分别受到革职和罚俸的惩处。但是在他们的奋力抗争下，察疏最后终于发下，“诸被留者皆自免去”。万历三十四年，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及南京御史孙居相交章论劾沈一贯奸贪，沈一贯自知为公论所不容，疏乞致仕，同时担心沈鲤在朝于己不利，遂密疏神宗罢免沈鲤。明神宗也不喜欢沈鲤的耿直，恰好沈鲤自己也提出了致仕的要求，于是就让二人一同离朝而去。

万历三十七年，御史郑继芳疏劾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贪赃数十万。王元翰曾上疏批评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等人，并力荐顾宪成等十余名被黜官吏，引起沈一贯派的不满，遂招致弹

劾。王元翰见到劾疏后上疏自辩，郑继芳同党刘文炳、王绐徽、刘国缙等连上十余疏攻击王元翰，而且不等明神宗下令，就擅自派人包围了王元翰家，王元翰不堪忍受其辱，“乃尽出其筐箧”，任其搜索，自己恸哭而去，后以擅离职守而被降职。明神宗对于此事“无所可否”的态度，使诸臣无所见得失，自后树党相攻更加严重。

这一年，还发生了淮抚李三才之争。李三才，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曾与当地的矿监税使作过坚决的斗争。李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结交遍天下，与顾宪成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因李三才抚淮多年，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且有意让其入阁。在朝的浙党推测：倘对李三才加以攻击，则东林党必然会受牵连，“可布一网打尽之局”。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工部郎中邵辅忠参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为贪险狡诈之徒。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之。李三才四次上疏力辩，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辩解。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杜门待罪，应速定其去留。但明神宗对以上奏疏皆不作答。不久，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等人，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抗衡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交章论救李三才，身在家乡的顾宪成也致信给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力称李三才廉洁正直。双方“朝端聚讼”，迄数月而未停止。李三才力求请罢，疏上十五次而不得命，遂自行离去。

万历三十九年京察（称辛亥京察）的主持人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肖云举以及副都御史许弘纲等人。孙丕扬等不顾齐、浙党人的阻挠，将许多官僚列入察疏，包括原御史康丕扬、徐大化，原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以及汤宾伊、顾天峻，又以年例将给事中王绍徽、乔应甲

转调出京。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汹汹，许弘纲闻而畏之，认为孙丕扬察核过当。礼部主事丁荐元上任未久，担心察疏搁浅，遂抗章责备许弘纲，同时揭发昆、宣党相互勾结之事，遭到朱一桂、郑继芳、周永春、徐兆魁等人的群起攻击，丁元荐竟被逼回乡。五月察疏发下，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伊、郎中张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刘国缙、王绍徽、乔应甲、岳和声，分别被降调。

万历三十九年察疏发下后，吏部尚书孙丕扬仍旧不断受到抨击，他所呈起用被废官吏沈鲤、郭正域、顾宪成等人的要求，也因明神宗意不用旧人而不得如愿，只好屡疏求去，于万历四十年离职回乡。继他之后主持吏部的是山东人赵焕，该人与东林人士不和，导致此后齐、楚、浙三党势力与日俱增，其科道官气焰尤盛，有谁稍持异议，即“群噪逐之”。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户部郎中李朴上疏明神宗，对三党官僚进行猛烈抨击，称其“百人合为一心，以挤排善类”。他还为东林党人打抱不平，要求明神宗斩诸奸以谢罪天下。齐、楚、浙三党对李朴恨之人骨，第二年竟将李朴谪降为州同知。

万历四十二年八月，首辅叶向高致仕，大学士方从哲继任为首辅。齐党首领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二人过从甚密，因而在方从哲秉政后，诸事多听从亓诗教的意旨。万历四十三年，发生了旨在谋杀太子的“梃击案”，朝廷党争益发趋于白热化。

万历四十五年为京察之年（称丁巳京察）。这次京察，由听从楚党指使的吏部尚书郑继之以及浙党所推举的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李鋕主持，协助者有考功郎中赵士谔、依附楚党的给事中徐绍吉以及御史韩浚。在他们的把持下，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纷纷遭受斥黜，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后被迫家居的礼部主事丁荐元，以“不谨”被削籍；上疏猛烈抨击齐、楚、浙党的原户部郎中李朴，也被定为“不谨”而落职。刑部主事王之寀，由于在梃击案中得罪了对立面，遭徐绍吉、韩浚纠劾，照“贪酷例”削

籍。曾经力攻汤宾伊的御史王时熙、荆养乔都被列入察疏。御史孙居相，因先后弹劾过沈一贯、汤宾伊，此次也以年例被调外职。当时明神宗对于廷臣的奏章全部留中，无所处分，被科道官弹劾的官员也不等下旨，就自动离职而去。经过这次京察，齐、楚、浙三党气焰更炽，东林党势力遭到严重摧毁，几乎"靡有孑遗"焉。

万历四十六年，属于浙党派系的工部主事邹之麟，依附齐党亓诗教、韩浚，想求转吏部，未能如愿而心存芥蒂，伺机对齐党大肆攻击，扬言齐党将以年例斥浙党官员，齐、浙两党由此分裂。万历四十七年，与邹之麟相友善的礼部主事夏嘉遇，因事而连疏力攻亓诗教等，御史唐世济和董元儒也推波助澜，排挤齐党，齐党之势由此顿衰。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明光宗下诏起用神宗年间因建言被废诸臣邹元标、冯从吾、王德完、孟养浩、钟羽正、满朝荐等，同时重新召用已经致仕的首辅叶向高入阁。光宗即位未及一月而崩，在御史杨涟、左光斗、礼部尚书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以及太监王安的帮助下，明熹宗朱由校顺利入继大统。天启前期，许多在万历时期被排斥的正直派官吏，陆续返回了朝廷，邹元标任刑部右侍郎，赵南星升为太常寺添注少卿；著名的东林党人高攀龙，位至光禄少卿；原刑部主事王之寀官复原职，不久又一再迁升，至刑部右侍郎。大学士叶向高也于天启元年（1621 年）十月出任首辅，入阁办事。与此同时，浙、齐、楚三党官员以及"朋奸乱政"者，逐渐从朝廷中枢离去。天启二年外察，吏部尚书张问达、左都御史邹元标"去留惟公"；天启三年京察，张问达又与左都御史赵南星将"结党乱政"的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齐、浙党人列入察疏，毫不留情。首辅方从哲，自红丸、移宫案发生不久，就接二连三遭到弹劾，最终致仕而去。从天启初年开始，朝

廷内逐渐形成了"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局面。

明熹宗朱由校登基后，太监魏忠贤及与其相好的熹宗乳母客氏日渐得宠。魏忠贤先自惜薪司迁升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三年又受命总督东厂，权势显赫。二人先是谋害大太监王安，之后又与遭罢黜的浙、齐、楚党人相勾结，重新组合为新的政治集团。由于魏忠贤本人是个宦官，因此这个集团被人们称作"阉党"。

自天启四年开始，阉党依仗魏忠贤的权势，不断对东林党人及支持者进行迫害。七月，首辅叶向高致仕回籍。叶向高再次人相后，因政移魏忠贤，事事掣肘，难有作为，故经一再乞请终于辞政归里。这年秋、冬之交，魏忠贤集团先后谪降著名的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吏部员外郎夏嘉遇、御史陈九畴三级外转，迫使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罢职乞归，随即削吏部左侍郎陈于廷、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之籍。杨涟在六月曾上"二十四罪疏"愤怒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种罪行，要求对其权大震主的势力加以惩处，但被明熹宗"严旨切责"。魏忠贤伺机反扑，借口不公正，假传圣旨斥责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三人"恣肆欺瞒，大不敬"，全部革职为民。这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又相继斥逐了首辅韩爌和朱国祯，首辅之位落入魏忠贤集团的顾秉谦手中。与此同时，魏忠贤加紧提拔起用东林政敌，他假传圣旨，将被察的徐大化、依年例外转的孙杰擢升为京官，起用徐兆魁为吏部左侍郎、乔应甲为副都御史、王绍徽为佥都御史，占据了陈于陛、杨涟、左光斗的职位，并起用了与东林党势不两立的阮大铖。魏忠贤不允许有任何异己势力存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打击东林人士，阉党成员魏广微和顾秉谦编写《缙绅便览》一册，将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列为"邪党"，而以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余同党视为"正人"。崔呈秀向魏忠贤进《同志录》，所列皆

为东林党人，又进《天鉴录》，全部为不附东林者。王绍徽仿《水浒传》编制东林一百零八人为《点将录》。魏忠贤就根据这些黑名单决定朝内官员的黜陟，并对东林人士进行残酷的迫害，总计被魏忠紧集团迫害致死的有十余人，下狱或谪戍者数十人，削籍夺职者三百余人，其他贬黜者“不可胜计”。

天启七年八月，明熹宗驾崩，由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明思宗。魏忠贤自知大势已去，自缢身亡，客氏被笞杀于浣衣局。明思宗收回朝政大权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阉党一派多加打击。崇祯元年（1628 年）上半年，阉党人物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先后被斥。同年春天，编修倪元路上疏，称东林是天下才子之渊薮，从而打破了自魏忠贤专权以来，东林派被朝廷视为“邪党”的局面。十二月，御史吴甡上疏请求钦定逆案，得到明思宗的全力支持。至崇祯二年三月，一个包括了绝大部分阉党成员的逆案名单被确定，并以诏书的形式在全国公布。列人名单的人包括：首逆凌迟者魏忠贤、客氏二人，首逆同谋立即处死者崔呈秀等六人，秋后处决者刘志选等十九人，充军者魏广微等十一人，判刑三年输赎为民者顾秉谦等一百二十九人，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此外，还有魏忠贤亲属及宦官党附者五十余人。“逆案”被确定，阉党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终崇祯一朝，阉党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与此同时，东林人士逐渐重返朝廷，“东林大盛”的局面继天启初年之后再度出现。但是由于明思宗擅权专断，对士大夫之间的门户之争深为反感，他明确表示，“钦定逆案”不准推翻，禁止臣下互相党附、分门别派，因此使得东林党无法无限扩展势力，与阉党的残余势力的斗争也长期处于或明或暗断断续续的状态之中。

崇祯元年十一月，内阁推举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入阁。礼部尚书温体仁弹劾钱谦益在天启年间主试浙江时，从

中受贿。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此劾疏正好迎合了明思宗厌恶百官结党拉派的心理，因此钱谦益引罪而出，旋即被削职为民，返回家乡。

崇祯二年冬，后金军队侵入内地，兵部尚书袁崇焕急忙引兵入护京城。明思宗误中后金反奸之计，认为袁已投降后金，将其逮捕入狱。事发后，阉党分子立刻交章弹劾大学士钱龙锡。钱龙锡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曾参与确定逆案，而阉党对他恨入骨髓。御史高捷首先发难，接连两次疏劾钱龙锡主使袁崇焕杀死明将毛文龙，又与后金议和，有通敌之嫌。钱龙锡被迫引疾归里。第二年御史史𡺸再次上疏，攻击钱龙锡"卖国欺君，其罪莫逭"。明思宗听信其说，将钱龙锡逮捕入狱。阉党由周延儒、温体仁主谋，欲借袁崇焕案报复东林党，指袁为逆首，钱为逆党，更立一逆案，但未能得逞。钱龙锡最终被充军边远，直到南明政权建立后才复官归里。

崇祯二年，以张溥为首的复社宣告成立。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后于崇祯四年中进士，除庶吉士。复社是联合许多小文社而组成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有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等。张溥的初衷是"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起名为复社。参加复社的各文社，对外都用复社的名义，在内部则各不相谋。当时参加复社的人很多，读书人只要进了复社，科举得中就很有希望，因此必然引起一些人的忌恨。另外复社人士不仅限于研讨文章，还热衷于政治活动，明确表示拥护东林派，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当时的党派斗争中去。于是，帮助或者反对复社，遂成为崇祯年间党派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祯六年，在学士温体仁的暗中支持下，刑科都给事中陈赞化弹劾首辅周延儒招权纳贿，对上不恭。户科给事中朱文焕随之

弹劾周延儒“重荷国恩，毫无补救”。六月，周延儒被罢免，温体仁出任首辅。温体仁一向反对东林党，此时又与阉党分子相勾结，试图推翻“逆案”。崇祯七年，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空缺，温体仁遂指使侍郎张捷推举列入逆案的吕纯如，遭到舆论的谴责。崇祯九年，再次由左都御史唐世济出面推举阉党分子霍维华，仍未能如愿，唐世济被下刑部狱。自后阉党翻案的活动仍未停止，但终崇祯之世，均未成功。

崇祯十年三月，监生陆文声赴京上言，对张溥为首的复社进行弹劾。陆文声与张溥同乡，求入复社而遭拒绝。适时首辅温体仁处心积虑要打击复社，“募人劾溥”，陆文声遂乘机上言，称庶吉士张溥、前临川知县张采为主谋，倡导复社以乱天下。温体仁即欲掀起大狱，拟旨严加追究。而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因不听其指使，皆被处以降谪。福建人周之夔，曾任苏州推官，坐事罢职，怀疑为张溥所害，耿耿于怀，此时也上书相攻，言张溥把持计典、自己被免职实其所为，并大讲复社恣肆横行之事状。由于巡抚张国维等言周之夔的罢免与张溥无关，招致了温体仁的不满。直至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他的问题仍在双方论劾争执之中。

崇祯十一年，名列逆案的阮大铖流寓南京，“颇招纳游侠”，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复得出仕。当时在南京的复社人士众多，他们痛恨阮大铖至极，于是由贵池吴应箕起草，无锡顾杲（顾宪成之孙）、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桐城左国材、宜兴陈贞慧等一百四十余人联合签名，撰写了宣布阮大铖罪恶的《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之出，阮大铖顿时闭门谢客，气焰大消。

崇祯十四年九月，在复社人士的帮助下，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一职。周延儒自从崇祯六年被温体仁夺去首辅后，与东林人士多有往还，对过去与复社作对的行为有所悔悟。复社眼见朝中无

人，处于被动挨整的地位，决定拥戴本社的支持者入阁。他们先由丹阳监生贺顺、虞城侯氏聚敛金钱，然后托嘱太监曹化淳等打通关节，美言于明思宗，终于将周延儒推上首辅的职位。

崇祯十六年，改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为吏部文选主事，署郎中事。吴昌时在周延儒再次入相一事上出力甚多。然到任未久，即有给事中郝䌹复弹劾其与礼部郎中周仲琏“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御史蒋拱展、何纶也继起交章论劾。七月，明思宗亲自拷讯吴昌时，将其胫骨折断。吴昌时旋即被杀，周延儒被赐自尽，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推荐吴昌时引咎辞职，大学士王应熊因系周延儒所荐而遭罢黜。不久，明朝灭亡，长达几十年的党派斗争又延续至南明政权，直到清立国后才告结束。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

《东林始末》。

《明神宗实录》卷258、卷390、卷391、卷406、卷408、卷423、卷428、卷455、卷459、卷465、卷466、卷470。

《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

《明通鉴》卷77、卷78、卷81、卷82、卷85。

《国榷》卷84、卷86、卷87、卷89、卷90、卷97、卷98、卷99。

《明史·阉党传》。

《明熹宗实录》卷8、卷30。

《定陵注略》卷3、卷9、卷10。

奢安之乱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亦起兵叛乱。史称“奢安之乱”。

四川永宁宣抚司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在川黔两省交界地区，主要是我国彝、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永宁宣抚司是彝族奢姓世袭，洪武初年汤和、傅友德率兵平蜀后，遂沿续元朝制度，于此置永宁宣抚司，后升为宣慰使司。奢氏家族定期向明朝政府贡马及输送税粮。

万历初年，永宁宣慰使奢效忠死，其妻世统无子，其妾世续有幼子崇周，按照彝族之习惯，妻、子皆可承袭。于是世统和世续为了争夺土司职位，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后经明廷调解，规定奢世统、奢世续分地管辖，等奢崇周长大后，再袭宣抚司印符。但奢世统不服，她以重金请得水西安国亨出兵，奢世续亦延请播州杨应龙出兵，双方又是一场混战。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政府正式命令奢崇周就宣抚使职，五年后，奢世统派人毒死奢崇周。明廷遂命奢世统抚养长大的奢效忠的侄儿奢崇明袭宣抚使职。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奢崇明得以稳住脚跟，但他不思图报，反与其子奢寅颇具异心，图谋反叛。

当时，后金兵已占领辽阳、沈阳，明朝为了充实辽东兵力，遂向全国各地征兵，奢崇明认为有机可图，遂上疏请求率兵三万赴援，并派其部将樊龙、樊虎率兵抵达重庆，樊龙要求给每一士

兵发安家费二十两，明政府减至十七两，三万多兵力，需饷五十四万两。明廷当时财政已极度困难，无法筹措这笔兵饷。四川巡抚徐可求则核点其兵力，认为老弱之卒可以裁汰而不必付饷，结果只给其兵饷四万两。樊龙就鼓动士卒，发动叛乱，杀死巡抚徐可求、总兵黄守魁、道府孙好古等二十多人，占领了重庆，奢崇明自号"大梁"，并设置"丞相五府等官"，统兵数万先后攻陷遵义、泸州、新都、内江等几十个州县卫所，十月，叛军进逼成都。

左布政使朱燮元、御史薛敷政率兵死守成都，时城中只有镇远营七百余人，遂从松潘、茂州、龙安调兵一千五百人来援助。石砫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则率其弟秦民屏、侄秦翼明并精兵万人直趋重庆，扎营南屏关，断绝叛军的归路。后留秦民屏、秦翼明率兵四千留守，秦良玉自领六千赴成都支援。朱燮元指挥部卒积极布防，主动出击，多次打退叛军的进攻。十二月，各路援军亦相继赶到，并收复了安岳、乐至等县，叛军亦多派援军，双方交锋多次，互有胜负。到十二月底，叛军围城已达八十多天，双方仍相持不下。天启二年正月，奢崇明部将罗乾象暗中与朱燮元勾通，愿为内应，并将叛军之动静全都告知于明军。几日后，朱燮元令牙将周斯盛诈降，设伏待奢崇明，可惜被奢崇明走脱。不久，奢崇明准备撤走，二十八日夜，罗乾象于营内四面纵火，朱燮元率明军夹攻，奢崇明父子奔往泸州，罗乾象则归顺于朱燮元，成都围解，前后被围共一百零二天。明军乘胜追击，三月，收复江安、新都、遵义。五月，围攻重庆。二十七日，明军以计擒获叛军头目樊龙、张彤、何若海等三十一人，并趁机攻克了重庆，六月又收复泸州。

就在奢崇明节节败退时，水西安邦彦之叛乱又起，且日渐嚣张。

贵州水西宣慰司洪武年间即承元制，只是将元朝之顺元路宣

抚使改为贵州宣抚司，由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今贵州开阳县）。洪武十四年（1381 年），安霭翠死，由其妻奢香代袭，奢香曾至南京觐见朱元璋，她死后，由其子安的袭职，每年向明廷贡马及其他地方土产。安氏亦世代受封。万历末年，年幼的安位袭职，由其母奢社辉代管，但实权是由安位的叔父安邦彦掌管。安邦彦颇具野心，一意企图割据称王。闻知奢崇明在重庆起事，他遂积极策划。天启二年二月，传闻奢崇明已攻陷成都，安邦彦遂挟持安位谋反，自称罗甸王，与奢崇明遥相呼应。其下之四十八土目亦皆附和。

安邦彦首先攻陷毕节，接着分兵攻陷安顺。洪边土司宋万化纠合苗仲九股攻陷龙里。安邦彦自统十余万兵力，渡陆广河直趋贵阳，二月七日包围了贵阳城。时贵阳城中守兵不足三千，遂招募新兵四千。不久，总兵官张彦芳又率援军入城，使城中兵力达二万余人，抚臣李枟、按臣史永安与总兵张彦芳合力抗敌，屡次击退安邦彦的进攻。当时贵阳城内的粮食日渐紧张，而仓库所储米只二万石，城外居民自围城开始就纷纷逃入城内，城内人口急增，米价猛涨，百姓遂以草叶树皮充饥。天启二年十二月初，巡抚都御史王三善率兵两万进抵贵阳城下，叛军怀疑王三善兵力逾十万，担心战败，安邦彦遂率军撤走，明军趁势掩杀，安邦彦大败，退往陆广河外。贵阳自二月城被围，至此解围，长达十月，城中百姓多被饿死，存者仅千余人。王三善以兵二万败贼十万，当时威震中外。但自此即有轻敌之心。天启三年正月，王三善命总兵刘超渡陆广河，直捣安位老巢。同时，命总兵官张彦芳渡鸭池，攻安邦彦总部，两路明军共有汉兵、土兵六万，结果都遭惨败。但王三善仍不接受教训，还要会师进讨，其他将领认为泽溪以西，山高林密，不利进军，王三善不听，闰十月，率六万人渡乌江，进驻大方（今贵州大方县），但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粮尽，天启四年正月只得退兵，安邦彦遂派兵紧随明军进行袭击，

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皆战死。王三善也在安邦彦诈降将领陈其愚的诱骗下，遭到安邦彦的伏击，被俘杀害。

四川方面，天启三年四月，明军收复遵义，不久，朱燮元又率兵克奢崇明老巢永宁，叛军降者达两万。明军乘胜追击，连克红岩、天台二寨，接着又攻克旧蔺州城（今四川古蔺县），奢崇明、奢寅父子走投无路，遂投奔贵州水西奢社辉。奢社辉系其妹妹，又是安位之母。六月，川兵入贵州龙场，捕获奢崇明妻子安氏及奢崇辉、蔡金贵等。之后，奢崇明与安邦彦合兵一处，尤其是天启四年三月，奢安联军杀死王三善后，又猖獗一时，继任的总督张鹤鸣龟缩城内不敢出兵，安邦彦自称“四夷大长老，号崇明大梁王。”

面对叛军的嚣张气焰，朱燮元亦施劝降计，多给下层土目施以金钱。天启六年，素来凶悍残忍的奢寅，被部下阿引及水西苗老虎杀死，他们遂率部降于朱燮元。二月，总督朱燮元因父丧只得回家，遂加巡抚闵梦得为总督，从中调度，以控制诸省明军，与叛军周旋，但一直难以将其制服。

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明廷起复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以便统一指挥，协调行动。朱燮元作了统一部署，令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他亲率大军进军陆广，逼进大方。崇祯二年八月，安邦彦和奢崇明合兵十余万进犯赤水，迎敌北路四川兵，朱燮元命令赤水守将许成名佯败，诱敌深入，估计敌人已抵永宁，急令明军从三岔、陆广、遵义分头进军，几路出击，致使奢安联军腹背受敌，被彻底击溃，安邦彦和奢崇明亦在混战中被杀。

朱燮元认为奢安叛军已基本剿灭，遂施招抚之策，告谕安位准其投降，但安位在部属的挟持下继续抗拒，朱燮元认为水西多山险要，孤军深入，难以取胜，遂令四面围攻断其粮草，使其自绝。经过一百多天的围困，水西终于粮尽。崇祯三年春，安位遂

向朱燮元投降，持续近九年的奢安之乱至此最后被平定。

奢安之乱是一次由彝、苗族农奴主发动的叛乱性的战争，其目的是想割据西南地区称王称霸。但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既反映了明朝政府及军队的腐败，同时也表明明王朝之寿终亦为期不远。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王三善传”、卷316“贵州土司传”、卷312“四川土司传”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

刘锡玄：《黔南十集·围城日录》。

三饷加派

明朝自万历以后，政治腐败，财政空虚。可皇室却肆意挥霍，军费日益膨胀，致使财政陷入危机。而战事却接连不断，尤以辽东战事最为紧张。辽东的后金不断壮大，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筹集军饷，明朝遂向百姓加派田赋银，这就是辽饷。百姓的负担加重，无以为生，遂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明廷又加派了剿饷、练饷。这就是明末的三饷，一种按田亩加征的田赋。

明代的田赋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有两个种类：一是以粮食为主，称为本色；二是货币。货币，明初以钞票为主，明中叶以后则基本上改征白银。本色税粮亦多折银征收，称为折色。同时又有一项专门供皇室用费的金花银。另外还有称为子粒银的屯田租银。到万历四十七年时，本色、折色一共达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入内府六百余万两，入太仓（即国库）除本色外，折色银四百余万两。由此，我们就略知明末的财政收入了。

财政支出则大大超支。皇室之奢侈固然难以控制，而由政府支付的养兵费年例银由弘治年间的四十三万两，万历年间猛增到三百八十余万两，已接近于太仓岁入之数。同时，战争费用与日俱增，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蒙古人犯京城，明廷军饷高达五百余万两，户部入不敷出。次年，尚书孙应奎加征田赋银一百一十五万两，开创了加派田赋的先例。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攻占抚顺、清河。明廷以杨镐为辽东经略，抽调各路兵马援辽，希图将后金一举平定。但当时辽军缺饷已久，而当年太仓岁入只三百八十九万余两，已支出兵饷三百八十一万，辽饷无着落，明政府遂宣布加派田赋来补充辽东军饷，以解燃眉之急。除贵州因苗民起义不加外，其他的如浙江等十二省、南北直隶，依照万历六年所统计的田亩数共七百余万顷，每亩加征三厘五毫，共加征银额二百多万两。此即第一次辽饷加派。辽饷加派，并未给明军带来好运气，次年二月，辽东经略杨镐兵败萨尔浒，从此明军在辽东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而辽饷的加派则日益增多。

万历四十七年，新上任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请兵十八万，战马九万匹，每兵岁支银十八两，计三百二十四万两；每兵月给本色粮五斗，计一百零八万石；马每匹日给豆三升，计九十七万二千石，日给草一束，计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太仓一年的收入也没这么多，户部多方设法都无法筹集，神宗贪婪吝啬，不发一文内帑，遂只得再次加征田赋银。每亩再加三厘五毫，这是第二次辽饷加派，又加派银二百万两。明廷两次加派得银四百余万两，可是依然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军费。万历四十八年，兵、工部请增加召募及新调援辽军的安家、马价、兵器之费，明廷又无力支付，遂又每亩加派田赋银二厘，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这是第三次辽饷加派，连同前两次加派，每亩田赋共增九厘，计加派田赋银五百二十万两，为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一千四百多万两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

天启元年（1621 年），后金攻破军事重镇沈阳和辽阳，连克七十余城。为了保证明军的军饷，辽饷除加派田赋银外，还决定用搜刮杂项银和加征关税、盐课及其他税收办法，增加辽饷。天启元年辽饷达六百二十四万三千多两。到天启五年达七百七十一

万四千一百多两。统治者疯狂向农民榨取，以求依靠加派辽饷摆脱财政困难，但财政危机反而日益加深。

崇祯三年（1630年），又以辽东兵食不足，亩加九厘之外，再加三厘，加派田赋银一百六十五万余两，这是第四次辽饷加派。合万历末年旧增五百二十万两，共六百八十五万余两，总称“辽饷”。

辽饷的加派是明末因战争而造成军费恶性膨胀而实施的一项措施。这同以前的封建附加税和增税是有根本不同的。它除贵州外向其他各省征收，数目比每年折色四百万两还多二百八十五万两。它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农民日益贫困，许多人倾家荡产，更多的农民被迫流亡，或走向反抗的道路，终于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崇祯十年，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负责征剿农民起义军，他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的策略，提出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派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派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合称为“十面网”。再命总督、总理二大臣统一指挥。为此，杨嗣昌请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提出三个月内将起义镇压下去。当时即得到崇祯帝的支持，崇祯帝下诏征赋，并言“暂累吾民一年”。遂照旧粮额每亩加征六合，每石折征银八钱，又另加征银一分四毫九丝，增饷二百八十万两，以一年为期，是为“剿饷”。

但一年之后，起义军不但未被镇压，反而更加壮大，杨嗣昌的计划亦破产了。崇祯十二年，杨嗣昌不甘失败，自任督师，他决定抽练各镇精兵，宣府、山西、大同练兵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练兵十五万五千七百余人，辽东、蓟镇练兵二十四万余人，设保定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十五万七千余人，共计练兵七十三万余。为此，又决定加派军

饷，用于练兵，规定每亩加征练饷银一分，共征七百三十万两，这就是“练饷”。

辽饷、剿饷、练饷，号称三饷，到崇祯时期全国每年增赋达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三饷加派是正赋以外的新增田赋，比明末每年财政总收入还约多二百万两，又是每年折色银约四百万两的四倍。如此沉重的负担不是农民所能担得了的，贫苦农民纷纷破产流亡，造成农业生产的大破坏，田园荒芜，生产萎缩，甚至于造成数千里鸡犬不闻、荡无人烟之惨相，致使明末农业经济残破不堪，财源一天天枯竭。与之同时，由于三饷加派致使物价膨胀，货币贬值。成化年间每石米价一两银，崇祯年间则上涨到四两银，比明中期上涨了四倍。再则，三饷加派亦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无以为生，而催逼田赋却日益紧迫。于是他们纷纷举起义旗，加入反抗明朝统治的行列。崇祯十七年，朱明王朝终于覆灭于农民起义的烈焰之中。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神宗实录》卷 397 至卷 399；卷 569 至卷 589。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 35“赋役”。

《杨文弱集》卷 4。

杨涛：《明末财政危机与三饷加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2 期。

崇祯朝政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入宫受遗命。不久熹宗撒手归天，年仅十七岁的信王朱由检继位，大赦天下，次年改为崇祯元年（1628年）。年轻气盛的崇祯帝面临的是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他很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力挽狂澜，重建太平天下。于是就开始了他求治的历程。

崇祯继位之初，朝中到处都是魏忠贤之党徒，“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崇祯亦倍感威胁，他不敢食宫中之物，生怕有朝一日自己不明不白地死去。晚上则令宫中彻夜燃烛，以提防刺客。这种危机感日益强烈，因此收捕魏忠贤，惩治阉党即成为崇祯即位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自万历以来，党争日烈，朝政日非，官吏腐败，财政空虚，朝政积弊颇多。而东北的后金日益壮大，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辽饷则不断加派，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启七年二月，就在崇祯继位前不久，陕西澄城县农民揭竿而起，王左挂、王嘉胤亦举兵响应，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在如此内忧外患日益紧迫之际，崇祯想清除阉党，选用贤臣。同时选用干练之臣督师辽东，抑制后金之发展，恢复失土，并随时准备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实现其“中兴”之梦。

面对着魏忠贤及其党徒的猖獗，崇祯开始不露声色，表现了极大的忍耐，还依然如天启朝一般重用。他只是适时地批准魏忠贤的爪牙李朝钦、裴有声、吴光成等乞休，并遣散一批旧宦官，

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以逐步孤立魏忠贤。天启七年九月，魏忠贤请求辞职，因为他似乎觉得气氛有些不对，以此试探崇祯之态度，崇祯却未批准。十月，"五虎"之一兵部尚书崔呈秀父亲去世，崔呈秀被迫回籍守制，魏忠贤失掉了一个得力的骨干，崇祯遂开始收捕魏忠贤及其阉党。当时，贡生钱嘉徵上书崇祯，弹劾魏忠贤十大罪，崇祯即召魏氏，并命内侍当面读之，魏忠贤顿觉危机，请求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前去劝说，崇祯当即斥退徐氏。十一月，将魏忠贤贬往凤阳，四日后，又下令逮捕。魏忠贤行进到阜城时，获知逮捕令已下之消息遂在夜晚自缢而死。崇祯又下令寸磔其尸，悬首河间。魏忠贤死去的消息，大快人心。同月十七日，客氏也被笞杀于浣衣局。

魏忠贤虽然已死，但其遗党大部分仍在朝中，内阁、六部基本上仍由他们控制，崇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阉党依然大加打击。监生胡焕猷上疏请将那些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总督、巡抚论罪，翰林院编修倪元璐曾两次上疏弹劾阉党，并提出为东林党翻案，都获得崇祯赞许。崇祯元年上半年，阉党人物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相继被斥。同年四月，倪元璐又上疏请求焚毁攻击东林党人的《三朝要典》，崇祯予以批准，五月，在熊熊烈火中"要典"化为灰烬。焚毁"要典"，对阉党是个致命的打击，侍讲孙之獬更是痛哭失声，如丧考妣。崇祯二年正月，始命裁定逆案，指令大学士韩炉、李标、钱龙锡等确定从逆名单，韩炉等为人宽厚，不想将事态扩大，只呈上了一个四五十个人的名单。崇祯很不高兴，令再议，于是又以数十人上，崇祯有些恼火了，认为魏忠贤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一宦官，如果不是外朝的官员与他朋比为奸，阿谀奉迎，助纣为虐，其乱政怎么也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遂令再议。崇祯坚决的态度，终于使绝大部分阉党成员皆被列入了逆案名单。同年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首，分为六等：首逆凌迟者魏忠贤、客氏

二人，首逆同谋立即斩首者崔呈秀等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刘志选等十九人，此外还有充军者十一人，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还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一共近二百六十余人。阉党一个个凄凄惶惶，威风扫地。崇祯此举赢得了朝野人士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自己果敢之作风，令朝野刮目相看，一时呼为“明主”。

继位之初，崇祯还将各处镇守内臣全部撤回，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正月，又下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严格限制内臣的行动，不给其以可乘之机，这就大大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撤回了镇守宦官，惩治了阉党，就需重用有能之士。崇祯初年，比较重视官吏的选用。崇祯元年正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询问士子如何治理天下，力图希望起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精明强干之士。在迫使阉党阁臣黄立极、李国榗致仕后，崇祯亲自征点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尚书来宗道、礼部侍郎李标、杨景辰、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后又征韩爌、成基命、周延儒、钱象坤等人阁。这些人中，虽亦有人与阉党有些瓜葛，但大多是东林党人，他们一般皆能谨慎办事。崇祯元年二月，首次开经筵，经筵讲官多为大学士，他们皆尽心劝讲，崇祯亦尽心倾听，并向讲官提许多问题，以求治国良策。只要是人才，亦常破格提拔，例如将四川人刘之伦由庶吉士一下子提拔为兵部右侍郎；游方僧人申甫因人推荐，超擢为副总兵。为了整饬边政，他起用了天启年间战功赫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七月，他在平台亲自召见袁崇焕，询问安定辽东之方略。袁崇焕细陈自己之策略，并说如果户部提供充足的兵饷，工部给予足够的器械，吏部不干涉其用人，兵部不限制其调兵遣将，朝廷亦能将全权下放给他，五年之内他就可以恢复辽东。崇祯听后颇为

高兴，全都答应袁崇焕的要求，并赐他一把尚方剑，以专事权。袁崇焕身负重任，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策略，积极布防，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成效。同时崇祯帝又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崇祯初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内政外交皆有了新的转机。

崇祯为政一直是不知疲倦，为了国事费尽心血，除白天处理政务外，晚上也经常办公到深夜，一心求治。而且在生活上律己甚严，他崇尚节俭，衣食简朴，不贪女色。刚即位不久，有一次在便殿批阅奏章，宦官按惯例在宫中焚香，香烟袅袅飘来，令崇祯心胸摇荡，性欲勃发，他颇觉疑惑，走出宫殿。当弄清是怎么回事后，当即对宦官加以斥责，下令禁止，并慨叹：“皇考、皇兄都是因此而误国了。”

尽管崇祯励精图治，急于重建太平天下，但他性情急躁，处理政事急于求成，操之过急，常采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加上其刚愎自用，虚荣心极强，而性情又多疑，常迁怒于文武百官，责备他们不能尽职尽责，致使崇祯初政之成效一点点丧失，国事日非。早在崇祯元年，就已露端倪。时会推阁臣，名单上有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而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不在其中，因此，温、周二人暗中勾结，攻击钱谦益等“结党受贿”。崇祯一向痛恨廷臣结党，一旦贯以“结党”罪名，当即严惩不贷，钱谦益当即被罢免，吏科给事中瞿式耜等人因反对温体仁诬陷钱谦益，遂弹劾温体仁，也被说成是钱氏一党而被处罚。温、周二人则日渐获得崇祯帝之信任。崇祯在这事件中被温、周二人蒙骗了，而且他深深感到群臣容易结党营私，不可信任。温体仁则是阉党余孽，不久他与周延儒都相继入阁，只知一味迎合崇祯，陷害忠臣，却颇得崇祯赏识，在阁竟达八年之久。

在崇祯即位不久，由他亲点入阁的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主上毕竟是冲主”，言语之中有轻视之意，对于刚愎自用、虚荣心颇强的崇祯帝来说，简直无法忍受，他想将刘处死。后来，由于诸大臣力救，于是在崇祯二年春天，将他借故充军代州（今山西代县），以解心头之恨。同时也觉得这样的辅臣不能依赖。

本来他赐袁崇焕尚方宝剑，使之可以自由行使职权，经略辽东事务。但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精兵十万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占遵化。袁崇焕闻信，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之前赶到通州。袁崇焕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军担心失败，于是避开袁崇焕西犯京师。袁崇焕不顾兵马疲劳，迅速驰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交战，并将其打败，保住了北京。后金深感若不除掉袁崇焕，难以致胜，于是用反间计，声称与袁崇焕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竟信以为真，以“叛变投敌”、“谋反朝廷”之罪，将袁崇焕处死，而且慨叹：边臣不足任矣。他的偏狭与多疑的性格，终于使他自毁长城。

由于这几件事，使他形成错误的观念，自此对朝臣与边臣皆心存疑忌，不敢重用。同时，一旦朝臣有所过失，逆了己意，皆严惩不贷。而宦官又再次交了好运，备受崇祯重用，而且几有取代朝臣之势。

崇祯二年十一月，清兵再次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从此，宦官又开始受到重用。崇祯四年九月，命太监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命太监监军，王应朝往关宁，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往中协，邵希诏往西协。除去监军督饷外，宦官还被派去督察钱粮税务、茶马、司法等政务，由外到内，都把宦官倚为心腹。更

有甚者，崇祯四年九月，以太监张彝宪监督户、工二部之钱粮出入，并建立户工总理衙门，凌驾于户、工二部之上，堂堂户、工二部之政事竟由一宦官督察，真乃咄咄怪事，因而引起朝臣们的极力反对。首先是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余人上疏谏阻，崇祯置若罔闻。崇祯五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又上疏弹劾，认为这是有辱朝廷并伤国体之事，崇祯又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南京礼部主事周镳再上疏，历陈任用内臣之害，恳请崇祯裁抑。崇祯不但不加采纳，反而将他削职。对崇祯之固执与蛮横，朝臣无可奈何，宦官却得意非常，有恃无恐，崇祯四年十一月，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崇祯颇为欣赏，当即采纳。一旦朝臣与内官发生冲突，崇祯总偏袒宦官。如崇祯七年二月，监视登岛太监魏朝，因给事中庄鳌所上"太平十二策"疏中，有撤监视太监的内容，于是要求将自己罢免。崇祯却驳回魏朝的申请，并将庄鳌谪为浙江布政司照磨，不久，又下刑部狱。

虽然崇祯偏袒宦官，轻视文臣，但他对宦官也并非完全信而不疑。有魏忠贤乱政之前车之鉴，对宦官他总是有所提防。他认为自己重用宦官亦是迫不得已。他还觉得，只要皇帝英明，重用宦官亦不致乱政，以其英明才干，是完全可以使宦官为其所用的。为了防范宦官，他亦费尽了心机，其手段之一就是间或大规模地撤回在外的宦官。崇祯七年六月撤回了总理、监视各道太监，他说以前之所以派宦官监理，只是因为诸臣或假公济私，或迂腐无用，故撤朝臣，委政内臣。事实上崇祯此谕，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在辽东，自袁崇焕被杀后，军纪涣散，人人自危；在陕西，虽然一时农民起义军处于低潮，但并未被完全镇压下去，太监监军亦未能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因此，他从内心深处势必有种失望感，于是又委政朝臣，一直到崇祯九年六月，都未派太监出镇。

崇祯九年七月，清兵又一次南下，崇祯一看形势不妙，马上

又起用宦官，命令太监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门关，崔良用守固关；太监邓希诏监视中、西二协，杜勋监视东协；又命太监卢维宁总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军务，兼理漕运河道。太监监视又开始存在了。到崇祯十三年又一次将在外宦官撤回，这年三月下令将高起潜、陈贵、马云程、卢维宁、许进忠等诸总监或分守太监尽皆撤回。次年十二月，又下令诸内臣不得干涉外政，十五年正月，又罢提督京营内臣。十五年七月，宦官再次被派出，命太监王承恩提督勇卫营。此后一直到明朝政府灭亡，宦官一直被派出，或为监军，或为总监，或征茶马，或督漕运。

在是否重用宦官的问题上，崇祯亦有过反复，罢了又用，用后又撤，最后还是倚为心腹，他时常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这是他多疑、性情反复无常的一种表现。他对朝臣固然已失去信任，重用宦官，国事又变得越来越糟，他就在这样一种反反复复、忙忙碌碌、焦躁不安中度日。

即位之初，明廷内忧外患就很严重，几年以后，情况一天天恶化，崇祯三年前后，张献忠、李自成加入王嘉胤、高迎祥的起义队伍，起义队伍日益壮大。崇祯八年，起义军攻下凤阳，并放火烧了皇陵官殿和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对崇祯是个极大的打击。辽东的后金亦日益壮大，自袁崇焕被杀后，再也难以找到一个得力的边将来抗击后金的侵扰。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其兵马强壮，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深入内地。这两大忧患，令崇祯寝食不安，却又莫奈其何。

面对国事日非、每况愈下的局面，崇祯求治之心却日切，可是朝臣每每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就迁怒于臣下，“以重典绳下”，动辄加以杀戮。早在崇祯三年，刘宗周就上疏指责崇祯：逆党中有被杀的，封疆失事者有被杀的，凡是有过错的人，重者被杖死，轻者加贬谪。一朝之中竟有半数以上的被处罚。崇祯在

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战事日繁，将才奇缺，可他却杀了七位总督，包括崇祯帝误中后金反间计被杀的袁崇焕；崇祯八年因凤阳失守，远救不及而被杀的漕运总督杨一鹏；崇祯十二年，因杨嗣昌推卸在四川战败责任受牵连而被杀的三边总督郑崇俭；崇祯十三年，因招抚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失败而被杀的总督熊文灿。此外还有刘策、范志完、赵光抃。还杀了十一位巡抚：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还有河南之李仙风逮捕之时自缢而死，甚至还杀了两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和周延儒。还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在这些被杀的人中，除极个别的是罪有应得外，不少的是含冤而死，有的则是崇祯帝意气用事，量刑失当。崇祯出于其偏狭、刻薄的性格，只管杀掉了事。

随意更换大臣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在他称帝的十七个年头里，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意见稍有相左，轻则贬谪，重则下狱，甚至处死，使百官皆不得久任。内阁大学士，有明一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崇祯一朝则有五十人之多，先后担任首辅的就有十几人，诸臣就像走马灯一样地上上下下，可是阉党余孽温体仁则在阁达八年之久，他暗中与宦官勾结，在国事日非之际，不进一策，只知一味唯崇祯之意是从，阿谀奉承，暗中推波助澜，文过饰非，致使朝政愈来愈坏。温体仁生性猜忌、阴险，因善于揣测崇祯之意图，故颇获崇祯器重，屡有奏章弹劾他，崇祯则屡加庇护，反而将上疏之人每每从重处治。在温体仁辅政期间，比较正直的官员倪元璐、黄景昉、刘宗周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得罪于他，或降职，或削籍。当时朝廷中许多官员对其极为不满。时王应熊与吴崇达、温体仁同任职于内阁，他们三人狼狈为奸。温系乌程籍，归安人，王系巴县人，而吴则一无所长，只会奉温、王之意旨行事，被称为

“魔片”。恰好礼部尚书黄士俊是丁未状元，左右侍郎孔贞运、陈子壮是己未榜眼、探花。于是京城的人讥之为：“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榜眼、探花，有些惶（黄，指黄士俊）恐（孔，指孔贞运）；内阁成妓馆，乌归（乌程，归安，指温体仁）、王巴（指巴县人王应熊）、魔片（吴宗达），总是遭瘟（温，温体仁）。”

正直的朝臣或杀或贬，无法容忍，而崇祯所欣赏的又都是些奸佞之辈，朝政焉能不坏？崇祯所倚重的宦官亦多不行好事。尽管崇祯十七年中一直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毫不懈怠，但他的多疑任性与刚愎自用又只能使他将国事越弄越糟，他先后任命杨鹤、曹文诏、陈奇瑜、洪承畴、熊文灿、杨嗣昌等专剿农民起义军，但农民军却日益壮大；委任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经略辽东，但清兵依然时常威胁着京城的安全。还有一直令他颇为难办的财政拮据问题，他一再向百姓加派，采纳阁臣的建议，号召朝廷百官助饷，甚至把万历时宫中积留下来的上好人参拿出去变卖，最后甚至又向皇亲筹借银两，但一个个办法都失败了。

而清兵和农民起义军却越来越壮大，崇祯十五年二月，清兵攻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也以锦州之败降于清。崇祯十五年九月，李自成攻克开封城，次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以陕西为根据地，对明发起了最后总攻。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围攻北京城。眼见大势已去，崇祯捶胸顿足，仰天长号，慨叹皆是内外诸臣所误，十九日拂晓，崇祯吊死于煤山，时年三十四岁。朱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崇祯治乱”、“宦寺误国”。

《明史》：“崇祯本纪”、“刘宗周传”、“刘鸿训传”。

《烈皇小识》卷 4。

张献忠起义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生。年轻时曾在延绥镇总兵王威部下当边兵，作战颇为英勇。但有次他和另外十七人犯了“淫掠”罪，要全部处斩。行刑之时，在场总兵陈洪范见他年少，相貌奇伟，遂向王威建议将他鞭打一百，而斩了其余十七人。张献忠对此颇为愤懑，遂借机逃回家。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四月，张献忠也率领米脂县十八寨贫苦农民举起义旗，自称“八大王”。他长相魁梧，力气过人，又长着漂亮的长须，脸色微黄，煞是威武，所以义军又称他“黄虎”。

崇祯四年，紫金梁王自用联合农民起义军三十六营，八大王张献忠就是其领导人之一。他作战十分英勇，总是身先士卒。崇祯六年正月，他在山西一带活动，先后攻克榆社、和顺，再克寿阳、榆次、平定，一度对山西省府太原构成威胁。二月转战四川，然后又东下湖广竹山县。次年从河南再度入川，在四川作战长达半年之久，同四川之地方武装和明官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打乱了四川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在四川播下了义军的种子。

崇祯八年正月，起义军十三家领袖在河南荥阳商讨今后作战方略，张献忠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并与闯王高迎祥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会后，他与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率兵东进，攻破了明中都凤阳，并焚毁了皇陵，挖了朱明皇帝的祖坟，给崇

祯及其王朝在精神上以巨大的打击。随后又转战于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等地，与明朝官兵周旋厮杀。

崇祯十年，明思宗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负责征剿农民起义军。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围剿策略，同时推荐熊文灿为六省军务总理。熊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惯于剿抚并用，熊一上任就推行以“抚”代“剿”之策略，当时竟有些效果，农民起义军内部如刘国能、马士秀、杜应金等相继投降。熊文灿对张献忠亦大肆加以引诱。同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左良玉部击败，并负了伤，遂将部队拉到湖北麻城、蕲州一带。十二月，熊文灿派遣一度卷入农民军中的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营内招降，张献忠表示答应接受招安。次年正月，张献忠率部进占湖北谷城，他知道熊文灿贪财好货，就派孙可望拿了两块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径寸珍珠献给熊文灿。熊大喜，当即呈请朝廷招降张献忠，崇祯亲自批准，准予招抚。张献忠遂受抚于谷城。同年十一月，罗汝才受抚于湖北房县。李自成部亦屡遭失利，率军隐伏于商洛山中。

张献忠受抚固然是权宜之计，受抚期间他既不接受明军之改编，也不加以遣散，更不服从明政府调其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他利用驻兵谷城的机会，积极筹集粮饷，调出部分军队进行屯耕，又在汉水、沔水交汇处设立关卡，征收赋税。同时加紧练兵，扩充部队，使部队由两万人左右扩充到十万人。张献忠亦潜心研读孙吴兵法，创造了团营方阵，左、右营作战等战法；同时制造出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兵器。罗汝才亦不接受熊文灿解散部队的命令，加紧囤积粮草，操练士卒，与张献忠遥相呼应。

经过近一年半的休整，张献忠部队装备得以改善，数量得以扩充，士气非常旺盛。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再举义旗，杀死谷城知县阮之钿，打开监狱，释放囚徒，烧毁县

衙，推倒城墙。几日后，罗汝才在房县亦起，两军联合作战，攻破房县县城。至此，熊文灿苦心经营的“招抚”农民起义军的梦想破灭了。其他被招抚的农民起义军亦全都举起义旗，又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就这样掀起了。

崇祯十二年七月，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在房县罗猴山设伏，打败了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左良玉被打得军符印信全丢，狼狈而逃，明军被歼万人以上。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帝气急败坏，马上下令处死熊文灿，将左良玉革职，并令戴罪立功。遂派杨嗣昌亲自督师，“专剿”张献忠。十月初一日，杨嗣昌抵达襄阳，与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会商对策。他命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各守要冲，集中优势兵力，先对付张献忠、罗汝才。次年二月，张献忠与左良玉部遭遇于四川太平（今万源县）玛瑙山，献忠大败，损失部卒三千五百多人。七月，罗汝才部在兴山县丰邑坪被京营官兵和湖广官兵击败。不久，罗汝才又与张献忠合营，联合向四川挺进。

崇祯十三年秋，张献忠、罗汝才两部起义军为了摆脱困境，联合突入四川，直达川北的剑阁、广元，然后又挥师南下。杨嗣昌尾随而来，进驻重庆，明军精锐也多调人四川。张献忠与罗汝才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他们由北打到南，连克数十城池，明军唯有疲于奔命，处处失利。张献忠见明军全都入川，便指挥联军突然折而东向，明军东面防守空虚，义军顺利地通地过了夔门、巫山，进入湖广，杨嗣昌又被甩掉。杨嗣昌一方面向朝廷请罪，同时把围剿失败归罪于四川当局的疏于防范和陕西官军的挟饷噪归。结果，四川巡抚邵捷春被革职逮问，论罪弃市；陕西巡抚郑崇俭也被革职查问。

崇祯十四年正月底，张献忠率军东进当阳途中，获知襄阳城内官军守备单薄，于是定计奇袭。他亲率轻骑一日一夜奔驰三百里，到达襄阳附近，命部将李定国和二十几名骑兵打扮成官军模

样，拿着缴获来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二月初四日半夜，埋伏在城内的义军将士放火为号，趁机袭击驻防官军，城中顿时大乱。天明，义军主力赶到，遂将襄阳占领。明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坐在襄王殿中，给朱翊铭倒了一杯酒说："我想斩断杨嗣昌的头，而杨嗣昌却远在蜀地，如今只好借你的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之罪而伏法了。你最好是尽量喝完这杯酒。"于是就将他处斩。张献忠打开仓库，拿出五十万两银子赈济饥民，其余没收作为农民军给养。

张献忠、罗汝才部出川并攻克襄阳，处死襄王。在此不到一个月前，李自成攻克洛阳，处死福王，使显赫一时的督师、大学士杨嗣昌完全绝望，他痛切地感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连失二郡，丧两亲王，难逃一死，于是三月初一日，自杀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杨嗣昌死后，竟难以找到一个得力的督师。崇祯帝亦哀叹："自杨嗣昌死后，再也没有能够督师平贼的将领了。"

攻克襄阳后，张献忠率部转战于河南、湖广、安徽一带，后来罗汝才部与李自成会合。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部义军已占领了孝感、汉川和汉阳府，兵锋直指武昌，但这时李自成忙于处理罗汝才和贺一龙的问题，需要对部队进行整编，暂时无暇东顾。张献忠就率军自安徽攻入湖广，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把贪吝的楚王朱华奎逮捕，装进笼里投入长江，并下令打开楚王府库。张献忠见到库中积金百万，他不禁叹道："有这么多金钱，竟守不住武昌城，朱胡子（指楚王）真是个蠢家伙。"

占领武昌后，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改省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江夏县为上江县。在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同时，开科举，设学校，选拔士人为官，并发银赈济饥民。附近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等二十几个州县闻风归附。

在武昌呆了两个多月，张献忠留少数兵镇守武昌，八月份，自己率主力南下，先后攻破咸宁、蒲圻、湖南岳州（今岳阳）、长沙、衡州（今衡阳）。到年底，几乎占领了湖南全省。随即攻入江西，占领吉安、袁州（今江西宜春县）。大西军在湘赣地区活动，普遍设立各级政权，打击宗藩及反动官僚，散发财物，赈济饥民，同时迅速扩充军队。攻克长沙后，部队达到五十万人

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大顺军已经在向北京挺进，明王朝危在旦夕，此时明军无力西顾，张献忠遂挥师西向，攻入四川。六月，攻下重庆，俘虏了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重庆城守指挥陈士奇等，并召开审判大会，将他们处决。在处死朱常浩时，天空恰巧出现了乌云雷电，有人以为这是天不许杀，张献忠发怒道："由老子杀人，与天何涉?"并命令士卒向天驾起大炮轰击，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八月，克复成都，这样，张献忠就占领了全川。

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造新历，更名为"通天历"。命令臣民一律称献忠为"老万岁"，不拘良贱之家，都要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供以香花。以从征多年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位东、西二府，称千岁。进一步完善政权机构，增置左、右丞相，地方上建立保甲，登记户口，按保甲编册。军事上，设东、西、南、北四将军，分别统率部队。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此四将军皆是张献忠义子，全都赐姓张。同时，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命令各州县起送士人参加科举，开科取士，以选拔人才。并发放金银，赈济饥民。

大西政权建立后，隐伏山野的明朝官员和地主、士绅纷纷组织武装，自称义军。他们结寨自保，与大西政权进行对抗。大西政权派往各地的州县官员大多被他们杀害。为了严厉镇压地主反

动武装，张献忠首先将在四川所能抓到的明代所有宗藩好几万人全都处斩。大顺二年（1645 年）十一月以举行“特科”为名，命令将各府县生员一律起送成都，到齐后找个借口全部都杀光，大约有五千多人。张献忠此举无疑是太过分了，这样就将整个士人推向了反对面。在镇压地主武装的时候，亦杀害了些无辜的百姓。但《明史·张献忠传》所记“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则纯属无稽之谈。

自 1645 年起，大西政权所面临的局势逐渐恶化，四川各地的敌对势力嚣张一时，大西政权控制的地区逐渐缩小，当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已经被清军摧毁，不久，弘光政权也覆亡了。顺治二年（1645 年），清朝准备以两手对付张献忠，十一月，清朝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纸招抚诏书，在诏书中威逼利诱，希望张献忠能审识天时率部归降，但张献忠毫不理睬，对其招抚断然拒绝。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等统率官兵前往征讨。八月，张献忠放火焚毁成都，带领大军转移。十一月，大西军抵达西充凤凰山下，与清军遭遇。张献忠在战斗中被箭射中左胸，当即坠马而死。大西军大败，余部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大将率领下急速南撤，经重庆、遵义转入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联合南明永历政权共同抗清。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卷 309“张献忠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 77“张献忠之乱”。

彭孙贻：《平寇志》。

吴伟业：《绥寇纪略》。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李自成转战豫、楚、陕

万历以后，明朝政治日益腐败，大地主则进行疯狂的土地兼并，如潞王朱翊镠在湖广的庄田就达四万多顷，神宗一次就赐给其宠儿福王朱常洵两万顷良田，农民破产，负担日益加重。为了增加与后金进行战争的巨额费用，明政府又向农民摊派了“辽饷”。百姓生活日益困苦，而天启、崇祯两朝，天灾不断，旱涝相继，飞蝗遍地。可官吏鱼肉百姓更加厉害，即如灾荒颇为严重的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思赈济，反而勒逼租赋，终于逼得饥民造反。天启七年（1627 年）三月，饥民冲进县衙，杀死张斗耀。次年，不沾泥、杨六郎、王嘉胤在府谷县又杀富济贫，揭竿而起，从而点燃了明末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

崇祯元年（1628 年）十一月，高迎祥在安塞聚集饥民造反。一时陕西各地饥民纷纷杀死县官，举起义旗，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起于宜川；王虎、黑煞神起于洛川；王和尚、混天王起于延川。崇祯二年，后金深入京师，陕西调兵入京勤王，行进到途中，士兵哗变，亦加入起义队伍。为了筹集军费，明政府在崇祯三年大幅度地裁减了驿站经费，因之而丢掉职业的李自成无以为生，又因还不起艾举人的高利贷，几被折磨致死，遂杀死艾举人，投奔到不沾泥张存孟的部下。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善于骑射，又有胆略，在起义军中担任了队长。崇祯四年，不沾泥战败降明，李自成则率部离去，独自转战于山间，不久，投奔高迎祥

旗下。高迎祥自称闯王，李自成英勇善战，遂被义军称为闯将。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义军，明军一边剿杀，一边重视招抚。当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积极主张招抚，崇祯亦加支持，但不少义军抚而再叛，使其收效甚微。受其招抚，影响最大的是神一魁，但杨鹤觉得神一魁的部下茹成名桀骜难制，迫使神一魁将茹成名处死，引起了其部下黄友才等的猜忌，他们遂挟持神一魁再叛，在官军的进攻下，他们又杀死神一魁而投降，不久，又举起义旗。崇祯四年九月，杨鹤因主抚失败被下狱，洪承畴遂继为三边总督，他改变招抚策略，专重剿杀。一度有几支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下去。曾降明而复叛的不沾泥部，黄友才部，红军友、杜三、杨老柴部，郝临庵、刘道江、可天飞部等先后被镇压。

但李自成与张献忠则日益活跃，张献忠是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人，崇祯三年六月，他在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张献忠所部成了王自用所联合的三十六营之一。

起义军最初起于陕西，但从崇祯三年开始就大规模地进入山西，从崇祯四年到六年，义军活动的中心是在山西，当时重要的几支义军队伍是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将王国忠杀死,其另一部将王自用率余众出逃，不久，联合山西境内的义军三十六营，共有二十万人。其中有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等诸部。崇祯六年五月，王自用病逝于河南。闯将李自成则崭露头角，在义军中颇孚众望。

崇祯六年冬天，明军云集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对义军进行围剿，致使义军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颇困难。为了摆脱困境，闯将李自成等向京营总兵王朴伪称愿意接受招安，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不知是计，竟同意接受投降。当时诈降的首领包括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等共

六十一名。义军以伪降为掩护，麻痹明军，积极准备给养。十一月二十四日，义军突然从已封冻的黄河上疾驰南下，到达河南渑池县境的马蹄窝、野猪鼻，突破了明军的围剿，从此又将起义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义军进入河南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向西安挺进；另一路则由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率领，进入了卢氏山区，横扫湖广郧阳、襄阳地区。

崇祯七年，明朝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由陈奇瑜出任，专办“围剿”起义军事宜。陈奇瑜调集各路官军齐集于河南陕州（今陕县），然后移师南下，向湖北均县、竹山一带进剿。七月，李自成、张献忠退往陕南，误入兴安县（今陕西安康县）的车箱峡中。车箱峡山势陡峭，峡口被官军封死。又碰上大雨连绵四十天，弓矢湿烂脱落，马匹缺料死亡，士卒伤亡过半，形势极其危险。为了摆脱这种危险的处境，李自成遂用财物买通陈奇瑜的左右，表示愿意投降。陈奇瑜在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下，又得到崇祯帝亲自批准，遂接受李自成、张献忠的投降。但当义军出了车箱峡，士气得以恢复，马上又与明军厮杀，迅速攻占西安附近地区及甘肃庆阳一带。崇祯颇为恼怒，他将陈奇瑜撤职，下狱论戍，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以“围剿”起义军。

崇祯七年年底，各路农民军迅速向河南荥阳地区集结。次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义军首领在荥阳商讨今后的方略。十三家首领是：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曹操罗汝才、改世王许可变、射塌天李万庆、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过天星惠登相、九条龙、顺天王。闯将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裨将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出现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李自成提出：我兵十倍于官军，应该分兵定所向。得到

大家的一致赞同。会上决定，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引兵东进安徽；革里眼、左金王、横天王、混十万等则联合进攻四川、湖广、陕西。这样一来，北至黄河，南到湖广，西至陕西、四川，东到安徽，都成了农民军驰骋的地区。荥阳大会改变了农民军分散作战的局面，从此变为互相协同作战了。

崇祯八年正月上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起义军经河南汝宁府东入安徽，十一日攻克颍州，原兵部尚书张鹤鸣被处死，义军兵锋直指凤阳。

凤阳是朱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父母都葬在这里，称为皇陵，并被定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突然进抵凤阳，因为是“龙兴”之地，故凤阳城未建城墙。义军杀到鼓楼，明官军还蒙在鼓里，把报信的人重加责治。直到义军出现在面前，才吓得目瞪口呆，仓促应战，但已经晚了。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凤阳，义军打开监狱，释放囚徒，并以大无畏的气概，放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朱元璋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挖了皇帝的祖坟。三天后，义军方从容离去。中都告陷，祖坟被挖，对朱明王朝在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崇祯皇帝垂头丧气，为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诏罪己。并下令处死凤阳巡抚杨一鹏，将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遣戍。

凤阳被攻克后，崇祯加强了对农民军的镇压，他调洪承畴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兵共七万余共同夹剿，并发军饷一百多万两，限六个月内将农民起义军全部荡平。但义军更为壮大，他们又从安徽杀回河南、陕西。李自成率部转战于汉中、西安、延安一带，同洪承畴周旋。

崇祯九年，高迎祥率军转战于江淮、河南一带，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跟踪围剿。七月，高迎祥在战斗中不幸被俘，崇祯获知后大喜，高迎祥是当时极为重要的一位农民领袖，

他的被俘对当时农民起义军影响颇大，后来，他被害于北京。不久，李自成被推为闯王。

崇祯十年，朱由检起用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围剿义军。杨嗣昌提出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策略。

他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这四个省区为围剿农民军的主要战场，称为“四正”；又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省区为辅助战场，称为“六隅”；这十个省区有十个巡抚指挥“专讨”农民军的主力，称为“十面张网”。同时提出增兵十二万，筹饷二百八十余万两，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妄想一举将所有的起义军扑灭。

在明军强大的攻势下，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左良玉击败，并负了伤，遂退往湖北。次年春，在湖北谷城接受五省总理熊文灿的招抚。李自成率部转战于四川、甘肃、陕西，处处遭到官军的打击，屡战屡败。崇祯十一年十月，李自成部在潼关南原遭到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优势兵力的合击，经过浴血奋战，仅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十八人突出重围，隐伏在陕西商洛（商县——洛南）山中，一直到崇祯十三年秋天。李自成在商洛山中，一边聚集散失的旧部，整顿人马，同时伺机准备随时杀出去。

正当明统治者在庆幸农民起义军被斩尽杀绝之时，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再次举起义旗，毁城，劫库，放囚，并杀知县阮之钿。不久，曹操罗汝才在湖北房县亦起，遥相呼应。他们联合作战，在罗猴山杀败明军，兵锋直指陕西。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李自成率军出商洛山，攻入河南，当时河南正是大饥荒之年，饥民遍野，他们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使义军迅速壮大，还有一些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起义军，例如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他们的加入，使李自成如

虎添翼。李自成在河南如鱼得水，上下驰骋，很快就攻克了豫西宜阳、永宁、新安等县。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军又围攻中原重镇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封国所在地，福王是万历皇帝的爱子，分藩时得到优厚的待遇，庄田数万顷，又得到大量的盐行，富甲天下，但他极为吝啬，面对着饥民遍野，甚至有人吃人的惨剧，他竟不施一钱去赈济，明兵希望他助兵饷，亦不给一文。正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破洛阳城，将朱常洵处死，并打开其府库以赈饥民，李自成对饥民说："王侯贵人这些混蛋，平日肆意剥削穷苦百姓，让咱们挨饿受冻，因此，我杀了朱常洵，为你们报仇。"百姓领得粮食和金钱，一个个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不少人又加入义军队伍，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一百多万人。

在节节胜利的时候，李自成听从李岩、牛金星等的建议，逐渐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口号。李岩，河南杞县人，本名李信，举人出身，面对饥荒日益严重，他带头捐粮二百石赈荒，但遭到贪婪吝啬的豪绅们的嫉恨，被诬告下狱，后饥民劫狱，他逃了出来，遂投奔了李自成军。李岩针对当时赋税苛重和土地高度集中的现状，提出了"均田免粮"的纲领。义军每到一地，都宣布"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还提出"割富济贫"、"平买平卖"的口号，深得百姓的拥护。

与之同时，亦严格起义军的纪律，宣布"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和"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禁止骚扰民房，行军时禁止毁坏百姓庄稼。由于纪律严明，且常打开官仓赈济饥民，故深得百姓拥戴，队伍越来越壮大。

洛阳战役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率军围攻开封。驻守此地的是周王朱恭枵。二月十七日，李自成在城下观察敌情时，被射中左目，深入二寸，次日，即率军西破密县，又赴登封。七月，罗汝才部与李自成部联合，李自成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九月，攻破项城，大败明军。十二月，李自成军

又一次围攻开封，攻城达二十多日，未能克复，崇祯十五年正月，遂又撤走，二月，攻克襄城。之后到五月初，又连下十余座县城。五月又三攻开封，一直围攻到九月中旬，九月十五日，忽然黄河大决口，开封不战自破。同年十一月李自成部与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老回回马守应、争世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合营，使李自成的力量更加壮大，从此就形成了只有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支起义军并存的局面。张献忠部在湖广、四川与明军作战，李自成则战斗在河南、湖广、陕西三省。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攻下河南汝宁，从此控制了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十二月进军湖广，先后攻克襄阳、荆州、孝感、常德。占领襄阳后，李自成将其改为襄京。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正式即位，称“新顺王”，建立政府，设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中央设置上相国、左辅、右弼，下辖吏、户、兵、礼、刑、工六政府。六政府设置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在要地设防御史（相当于明朝的道），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以牛金星为左辅。在军事机构方面，最高的领导称元帅，下设将军，依次有：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著名的权将军有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有李岩、贺锦、刘芳亮等。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等五营，其将领由若干名将军充任，五营共有二十二名将军。

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战略进攻方向。会上，左辅牛金星建议先取河北，然后直趋京师；而礼部侍郎杨永裕却主张顺流东下，先取金陵，断京师粮道，再出师北伐。军政府从事顾君恩则分析：直捣京师，万一不胜，则后退无路；攻金陵，又难图大事，不如先攻西安，建立基业，然后再捣京师。李自成采纳顾君恩的建议，指挥义军直逼西安。

杨嗣昌于崇祯十五年春就已自杀，崇祯遂又以孙传庭为陕西三边总督。崇祯十六年五月，又以他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督

河南、山西、四川、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九月，李自成与孙传庭大战于河南郏县，李自成大败孙传庭，消灭了他的精锐部队。孙传庭退往陕西，起义军乘胜追击，在潼关，杀死了孙传庭。十月十一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了古都西安，附近许多州县闻风而下。之后，李自成亲率由李过所部右营和刘芳亮所部左营组成的大军，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打通了南下四川的通道；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向西攻取宁夏、甘肃、西宁等地，一路所向披靡，整个西北尽为李自成所有。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并调整和加强了中央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增设六政府尚书，作为政府首长。地方官增加省一级，设节度使，相当于明代巡抚。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同时封功臣以五等爵：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同时为了搜罗人才，亦行开科取士，中试者授以府、州、县官。李自成的西安建国是襄阳政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标志着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此，李自成的兵锋就直指北京了。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卷 78“李自成之乱”；《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平寇志》；《豫变纪略》；《国榷》。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闯王进京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即部署向北京进军的战略。二月，李自成与刘宗敏亲率大顺军主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向北京进攻。另一路由权将军刘芳亮统领，由故关（今河北井陉西南）、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北上，两路大军联合作战，对北京形成钳形攻势。

李自成军先后攻克太原、大同、宣府，一路所向披靡，明军几乎都闻风而降。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开关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就这样为李自成所控制。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队进抵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城战。早在十六日，崇祯召集廷臣商讨对策，众大臣无言以对，唯有相对哭泣，此时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十八日，大顺军架飞梯猛攻西直门、平则门（今阜成门）、彰义门（今广安门）三门，并派在宣化投降的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入城与崇祯谈判，杜勋与申芝秀称大顺军锐不可挡，崇祯最好是“避位”。崇祯不肯接受。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降，外城遂破。崇祯见状不妙，在宫中先逼皇后周氏自杀，又让人把十六岁的太子朱慈烺及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送到皇宫外躲藏。看到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在哭泣，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里！”挥剑砍去，长平公主用手去挡，遂被砍断了右臂，昏死在地，又杀了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然后，他带领司礼太监王承恩等十几个宦

宫，企图出城，但未能如愿，只得又返回皇宫。十九日凌晨，崇祯帝在宫中亲自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应召，大营兵将也皆逃散，只有王承恩立于身旁。崇祯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爬上万寿山（俗称煤山，今景山），吊死于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衣襟上写着“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等字，以为遗诏。王承恩亦自缢于旁边的一棵树下。

三月十九日上午，刘宗敏指挥大顺军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路攻入皇城。中午，李自成这个当年的驿站马夫，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高头大马，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臣的陪同下，进入了象征着封建帝王权威所在的皇城。朱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占领北京后，李自成即着手巩固自己的大顺政权。首先，严明军纪，稳定社会秩序。严禁士卒骚扰百姓。同时，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对为数达二三千名明官僚进行甄别，或予录用，或加惩办；向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派地方官，于战略要地派驻军队；并抽调部分军队准备南征；筹备即位典礼，制定一统之规，草拟各种法令、仪注；同时，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官污吏进行追赃助饷等等。

但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没能很好地经受住胜利的考验。首先，他们推行的一些措施几乎妨碍了所有的明朝官吏。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只录用了其中极小部分。如三月二十三日，首批录用了九十六人，二十六日，又录用了几十人。而对三品以上的官僚一般则不加录用，反而对他们进行追赃逼饷。三月二十七日规定，在京明官，不管是否录用，都得输饷，所派数目，从十万到数千金不等。对待明代勋戚，则往往榨干为止。由刘宗敏和李过负责追赃逼饷之事，刘宗敏特造夹棍五千副，用于施刑。越到后来，追饷对象越加扩大，以致稍有资产者皆难逃追

饷，终于引起了许多人强烈的不满。这样，处于观望状态的明朝官吏就又全都敌视大顺政权了。同时，李自成等农民军领袖，生活日益腐化，不思进取。李自成本来不好酒色，但进入北京后，亦沾染了贪图享受的坏毛病，像刘宗敏这样的大将，不想带兵去攻打残存的敌人，却热衷于在京城拷官追饷。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将领都住进了明朝大官僚的豪华府第，贪图享乐。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抛开军国大事，整日热衷于讨论李自成登极礼仪，教习登极仪式，不断劝李自成即位。他身穿玉带蓝袍圆领，手里摇着用洒金写着“内阁”字样的折扇，坐着八抬大轿，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一副宰相模样。将领如此，士卒更甚，军纪日益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骚扰百姓、淫掠妇女之事时有发生，渐渐地丧失了百姓的支持。

在众人皆陶醉于胜利的凯歌声中时，唯有李岩较为清醒，他对追赃逼饷之事屡屡向李自成建议，对此应当宽松，不应严逼。同时建议将士卒调出城外，扎寨防守，以免骚扰百姓，令民失望，但李自成竟不采纳。

在李自成及其将领们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大肆欢宴的时候，驻扎在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对其威胁却日益增大。三月初，当大顺军逼近京师之际，崇祯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下诏令其进京勤王，吴三桂走到半道，崇祯就自杀了。于是他就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会师，屯驻关下，静待北京消息，因为他的爱妾陈圆圆、父亲吴襄还留在北京。后来李自成遣明朝降将唐通带着金银、锦帛对吴三桂和高第招降，他们二人受降，并移交山海关之防务给唐通，由其所部八千人接管。吴三桂则引兵向西，率其所部入京朝见新主李自成。但行至滦州，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为刘宗敏霸占，他的父亲吴襄也被刘宗敏抓去拷打追饷，被索饷二十万。他一怒之下，率部直奔山海关，打败唐通，占领山海关，并派使者去与清摄政王多尔衮联系。形势对李自成来说极为不利。

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赶紧对吴襄进行抚慰，并对刘宗敏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还让牛金星代吴襄起草了一封给吴三桂的信，希图挽回局势。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带领大顺军从北京出发，开往山海关，随行的还有吴襄及崇祯帝的三个儿子。由牛金星率领一万士卒留守北京。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与吴三桂军队交战，吴军渐渐不支。这时，清兵亦已抵达山海关。二十二日凌晨，吴三桂亲见多尔衮请求出兵。清兵遂从背面猛攻大顺军，李自成军遂惨败，只得连夜撤退，途中将吴襄处斩。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了吴三桂全家三十四口。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草草举行即位典礼，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典礼完毕，即放火焚毁明宫殿和各门城楼，开始撤离北京。李自成军在北京只呆了四十余天。

五月初二，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由吴三桂引导，开进了北京城，随后，吴三桂又带领清兵紧紧追击大顺军。李自成率军一路退往陕西，沿途地方上的明朝降官和地主纷纷发动叛乱。大军撤退到山西固关时，吴三桂率兵停止追击，并很快撤回北京，使李自成得以从容撤往西安。但在途中，大顺军内部却发生了分裂，先是河南各地叛乱事件不断发生，李岩、李牟两兄弟自告奋勇率兵前往河南平叛，早有野心的牛金星非常忌恨李岩，于是他就对李自成说："李岩有雄才大略，河南又是三秦门户，李岩的故乡，如果予以大兵，将来与你争天下的很可能就是他。况且他亦姓李，十八子得天下的谶语，难道又能排除他？不如施计将他除掉。"李自成就听信了牛金星的话。次日设宴招待李岩、李牟，于帐后埋伏壮士，酒至半酣，唤壮士将他们推出去斩了。刘宗敏见李自成听信谗言，无故杀了两员大将，于是拉起自己的部卒，单独开往河南去了。

1644年农历五六月间，大顺军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

汾）返回西安。西北本为大顺军的后方，此时，原来的明朝降将亦全都反叛，地方地主亦组织武装，与李自成军作战。而清兵已加紧攻势，到九月十五日时，清军已占领了山西北部。十月初三日又攻陷太原。清兵分两路进攻西安，一路由阿济格率领，从山西进军榆林、延安，由陕北南下；另一路由多铎率领从河南直取潼关。顺治二年（1645 年）正月，潼关失守。北路清军又占领了延安。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撤出西安，向河南、湖广转移，经襄阳，占领武昌，清兵尾随而来，李自成继续东进。四月下旬，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李自成率领义子张鼐和二十几名士卒上山察看地形，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和二十几名战士全都壮烈牺牲。轰轰烈烈的李自成起义就这样结束了。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甲申之变"、"甲申殉难"。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利玛窦在华活动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 年）八月，意大利教士利玛窦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的召请，从印度抵达澳门，这是利氏来华之开始。

利玛窦于 1552 年 10 月 6 日出生在意大利马切拉塔城，父亲是职业药物家，曾一度出任该城总督。利玛窦本名玛泰奥·利奇，天资聪慧，十七岁时赴罗马求学，二十岁进入罗马学院，在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指导下，开始系统接受西方科学教育。利氏涉猎的学科极其广泛，包括天文学、应用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地理学、音乐理论以及透视学，此外，还专门学习演讲。1571 年，利玛窦加入了耶稣会，1577 年经耶稣会批准，赴东方传教。

万历十一年，利玛窦与另一个耶稣会教士罗明坚一道，为争取在广东修建房屋和教堂之事，往返奔波于香山和广州两地，他们与香山知县冯生虞、县丞姚鸿等当地官员反复交涉，都未获得应允。当时在任的两广总督陈瑞因为依附已故首辅张居正而遭革职，由广西巡抚郭应聘接任总督一职。郭应聘对耶稣会来华传教非常反感，极力反对利氏等人入居广州，并指出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而是有害于国家。在利玛窦等人深感失望之际，肇庆知府王泮送来一封由郭应聘批准的信件，邀请耶稣会士去肇庆接受官府赐与的一笔财产，用来修建教堂和住所。利玛窦和罗明坚商量之后，决定动身前往肇庆。

九月，利玛窦一行由水路抵达肇庆，受到知府王泮的接见。

王泮应允由他们自己在城内挑选建房的地皮。此时肇庆地区正在修建崇禧塔，利氏等人便索要了该塔附近的一块地皮，修建起简单的住房。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惊恐不安。尽管由总督签署的一份布告已经说明教士来华缘由，禁止当地居民以任何方式欺凌他们，违者重惩不贷。但百姓们认为教会房屋冲了崇禧塔的风水，便想方设法要将教士驱逐出该地区，以至每天都有人不断从塔上用石块投掷教会，酿成了袭击教会的"崇禧塔之案"，最终由官府出面，双方的冲突才得以缓解。

利玛窦在肇庆住下来之后，知府王泮经常前去拜访他。王泮不仅公开保护传教士，与利玛窦多有交往，同时也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缙绅与教会结交。在这一时期与利氏往来的人有：知县谭君谕、继任的肇庆知府郑一麟、岭西道黄时雨、巡按御史蔡梦说、肇庆同知方应时、参议徐大任、布政使滕伯纶、潮州知府郭子章、瞿汝夔、后任山东临清道的钟万禄等。利玛窦努力学习汉语，还将自己的姓名改作姓"利"名"玛窦"，从此中国士人都称他作"利先生"或者"利子"。在熟悉和掌握中国文化的同时，利玛窦用自己掌握的西方文化知识吸引和指导着中国人。在教会接待室的墙上，利氏挂了一幅用拉丁文标注的世界地图，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当时的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知之甚少，因此王泮要求利玛窦按照此图制作一幅标有中文名称的世界地图。利氏立刻全力以赴，绘制出了《山海舆地图》。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他在绘制时迎合中国士人的传统观念，有意将中国绘在图的正中央，因此受到士人的欢迎。王泮在当时就自己出钱，多绘制了几幅地图分赠友人，万历十二年又将其重新翻刻。后来经过校订、修善，地图应明神宗之命被送入皇宫。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幅吸收了欧洲地理新发现成果的、较为完整的世界地图。

除了绘制世界地图，利玛窦还用铜和铁制作了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和指示地球的形状。利氏还在家中绘制日晷，

或者将日晷刻在铜板上，分赠给包括两广总督郭应聘在内的官员。利玛窦将这些仪器公开展出，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解制作的目的和作用，指出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和地球所处的中心位置。见到过这些仪器的人，无一不称赞利氏是伟大的天文学家。此外，利玛窦还开放了肇庆教会图书馆让民众参观，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座西文图书馆，所藏书籍的精美令士人赞叹不已。

万历十七年，广西巡抚刘继文继任两广总督。在写给岭西道黄时雨的一封信中，刘继文称外国传教士在肇庆的目的是为葡萄牙人搜集情报，现在还不断玩弄新的花招和手段来勾引无知百姓。他要求岭西道尽快将传教士遣返回澳门去，或者监禁在韶州城内。虽经岭西道同知方应时的多方努力，刘继文仍不同意传教士留在肇庆。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一行被迫迁移至韶州。

在韶州居住期间，利玛窦开始接纳华人信徒，利用华人教徒为自己传教服务。最早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的华人有黄鸣沙、钟鸣仁，他们不辞辛苦、自觉自愿地帮助利玛窦等人进行传教布道，博得了利氏的信任和依赖。在韶州缙绅阶层崇信基督教者，当首推瞿汝夔。瞿氏字太素，父亲瞿景淳曾任礼部尚书一职。瞿氏在将父亲遗留的家产挥霍一空、四处漂泊之际，慕名拜访了利玛窦。他本想学习西方炼金术以发财致富，但是在与利氏的接触和交往中，逐渐被其丰富的学识所吸引，于是拜利氏为师，学习和钻研西方的天文、数学、几何等科学知识，前后达两年时间。在这期间，瞿太素将欧几里德几何翻译成了流利通畅的汉语本，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严谨、准确的注释。瞿氏成为明代最早翻译欧几里德著作的中国人，他的中文译本曾被利玛窦作为教材使用。瞿氏利用父亲旧有的关系，将利玛窦不断地介绍给韶州当地的官员，其中与利氏保持友谊的有：韶州通判吕良佐、兵备道邓美政、继任韶州知府谢台卿、曲江知县刘文芳、县丞张鼎、南雄知府黄门、南雄同知王应麟、英德知县苏大用、韶州推官黄华秀

等。在瞿太素的建议下，利玛窦决定按照中国儒家的传统和礼仪行事，他取消了“僧”和“寺”的教会称呼，留须蓄发，身着丝服，就如同当地的儒生一般。

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跟随奉诏进京的原兵部尚书石星坐船北上，五月底到达南京。利氏在肇庆结识的朋友徐大任此时在南京担任工部侍郎，利氏本想通过他取得在南京居住的护照，进而开辟一个新的传教中心。不曾想徐大任担心受到连累，对自己的宦途产生不利影响，坚决反对利氏的计划，利氏无奈只好起程前往南昌。

南昌是江西的省会，以地灵人杰、人材济济闻名全国。利玛窦受到江西巡抚陆万垓的热情接待，并得到长期逗留的许可。利玛窦深入缙绅阶层，结识了不少新友，其中有建安王朱多㸅、乐安王朱多煡、南昌知府王佐、理学名儒章潢、文学家李日华等人。在建安王府，利氏受到王爷隆重的款待，他送给王爷的礼物有卧式时钟、天文仪器、玻璃镜、书籍等，其中利氏本人所撰《世界图志》和《交友论》最受建安王的欢迎。利玛窦在南昌三年多的时间中，与他来往的士人已遍布明朝十五省中的十个省份。应巡抚陆万垓的要求，利玛窦撰写了有关记忆训练法的说明——《西国记法》一书，这本书后来传遍了全中国。利氏还修订了他的《天主实义》一书。

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陪同，首次前往明朝的首都——北京。当时，日本在武装入侵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的战争中已越过中国边界，整个朝廷都在注视着援朝战争，外国人皆被视为间谍。所以利玛窦虽然带了大批贵重的礼品准备进贡皇上，以求在北京立足，但在这种形势下，只住了两个月，就又上路折返。他沿途经过临清、苏州、镇江等地，饱览了江南秀丽景色，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再次抵达南京。

南京曾是六朝都会，明朝的陪都，在城中居住的除六部官宦外，还有不少公侯勋爵，显贵名流。利玛窦此时已经被视为奇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和尊重。在南京与他经常来往的有：魏国公徐弘基，南京右军都督，丰城侯李环，原司礼监太监冯保，刑部尚书赵参鲁，侍郎王樵、王汝训，礼部侍郎叶向高、杨道宾、郭正域，户部尚书张孟男，工部员外郎刘冠南，翰林名宿王肯堂，理学名儒焦竑、祝世禄、李心斋、李贽等人。在广为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利玛窦也致力于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他在中国学生的帮助下，制作了多种日晷、大圆环的浑天仪、能将整个地球表面标明的地球仪以及其他天文仪器。利氏曾经参观了南京鸡鸣山上的观象台，对其中的四大天文仪器作了详细的记载。

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利玛窦一行准备好觐见明神宗的贡物，再次乘船北上前往京城。此时利氏的名字已经被广为谈论，他与各地官员的交往也日趋活跃，因此一路受到当地官员的友好款待。到达山东济宁时，利玛窦与好友李贽相聚数日。漕运总督刘东星特地下令，使利氏的船只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通过了有许多漕船等候通过的几条狭窄的河道，大大缩短了旅程。七月到达临清后，利玛窦一行被明神宗派往山东督税的矿监马堂扣留，后被带往天津囚禁了半年之久。贪婪的马堂几乎抢劫了他们除贡物以外所有新奇的物品，还扬言要罗织罪名，将神父遣送回国。十二月，明神宗谕旨由利玛窦护送贡物进京，为此朝廷还特地派出一名官员负责他们在路途的安全。时至隆冬，河道封冻，天津官府派出八匹马、三十名马夫带领他们上路。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一行抵达北京。

十二月二十二日，利玛窦向明神宗上疏并进贡方物。这批贡物计十九物二十一件，包括天主圣像一幅、天主圣母像二幅、天主经一部、镶嵌十字架一座、万国地图一册、自鸣钟大小两座、大西洋琴一张、玻璃镜及玻璃瓶大小八个、犀角一个、沙漏刻两

个、乾罗经一个、大西洋各色锁袱共四匹、大西洋布五匹、大西洋银钱四枚。除此而外，利氏还向神宗进献了三幅西洋画：西班牙皇宫画、罗马圣·马克教堂画、威尼斯广场画，这是西洋美术首次传入中国，对清代画家接受和运用西洋画法原理产生了影响。

明神宗对所有的贡物都感到新奇，对自鸣钟尤为着迷。他下令为那座较大的钟专门修建了一座合适的木阁楼，还派出四名太监跟随神父学习管理大钟的知识。神宗很想召见西方传教士，但因为自己已经多年不上朝，不再接见大臣，所以只谕令礼部很好地加以款待。神宗对欧洲的风土人情、土地肥瘠、建筑风格、服装款式、婚丧风俗等，无一不感兴趣，特地派遣太监不厌其烦地向神父询问，再由太监转告他本人。

当时，朝廷内部正在为皇储一事争执不休。主张拥立皇三子常洵（系明神宗宠妃郑氏所生）一派的官员得到明神宗的支持，而主张拥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一派的官员，却遭到神宗的排斥。礼部尚书朱国祚对利玛窦一行未经礼部同意，自行到京一事非常不满，于是将利氏一行扣留，接连四次上疏，以大明会典中的有关规定为由，提出不应允许利氏在京城滞留。由于朱国祚属于拥立常洛的“太子派”，早已为神宗所不满，所以四次上疏都未得到批准。无奈他只好改变初衷，在第五次上疏中提出：由利玛窦自行在城内选择适当的地点，租屋定居，官府派四名差役每隔五天给其运送一次粮食、肉类、蔬菜以及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另外配置一名佣人供其使唤。这道奏疏立即得到批复，明神宗下谕赐利玛窦等人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将其遣回南方或大西洋之言。

利玛窦定居北京后，也获得了宣讲福音的自由。自此四方人士无不知晓利氏大名，诸达官显贵、士林名流，大多翘首以期与之结识，朝廷内自居首辅之职的大学士沈一贯，直至各部官员，

"咸与晋接"。利玛窦曾经拜访了沈一贯，赠给他一些西洋物品作为见面礼，其中有一件乌木精制的凹形日晷仪，使得沈一贯爱不释手。沈一贯邀请利玛窦出席宫廷宴会，席间利氏就大家感兴趣的基督教义等问题作了讲解。当他谈到基督教徒严格奉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即便是国王也不例外时，沈一贯深有感触地说：仅就这一点来看，也可以知道这种国家在其他方面的秩序也是有条不紊的。吏部尚书李戴经常邀请利玛窦去自己府中作客，与之谈论来世的希望与恐惧之事。他对利氏的布道说教心悦诚服，更佩服利氏渊博的学识。另外在京城与利氏交往甚深的名卿巨儒还有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肖大亨、翰林院庶吉士徐光启，以及各科道衙门的官员曹如汴、李之藻、龚道立、郑以伟、彭惟成、周炳谟、王家植、熊明遇、杨廷筠、彭端吾、冯应京、崔淐、陈亮采、刘胤昌等人。与此同时，利氏还与南京的官员保持着友谊，南京礼部尚书王忠和户部尚书张孟男到北京后，也曾拜访过利玛窦。在这些人当中，与利氏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徐光启、冯应京、李之藻等。原任湖广佥事的冯应京，因为上疏论劾明神宗派往湖广地区的税使陈奉，遭到陈奉的诬陷，解职入狱长达三年之久。在狱中冯应京与利玛窦多次交往，重新印行了利氏所著《交友论》和《天主实义》，是第一个以"儒学博士"头衔称呼利氏之人。冯氏接受了基督教义，但出狱后还未来得及接受洗礼，就猝然去世了。李之藻虚心向利玛窦学习地理知识，曾完成了《坤舆万国全图》的复制工作。他对数学和几何也潜心钻研，学会并制作了一具星盘，他所绘制的数学图形可以和任何欧洲人所绘制的相媲美。在利玛窦的指导下，李之藻撰写了两卷本的《浑盖通宪图说》。这是中国人所撰论述星盘的第一部著作。后来，在利氏翻译《同文算指》一书时，得到了李之藻的很多帮助。李之藻也逐渐接受了利氏的信仰，最终加人了基督教会，二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利氏去世。

在这一时期，利玛窦除了向中国士人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原理外，开始从事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他撰写了谈论道德的《二十五言》，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撰写了《四元行论》，重新修订了《天主实义》一书。

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等人迁入了宣武门附近的新居，随后修建了一座宽阔漂亮的教堂。利氏每天接待的客人越来越多，平均不下二十批；每逢节日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达百人以上。这些人中，有些是对西方传教士及其携带的物品感到新奇，前来观赏的；有些是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如将汞转化为银的秘诀，学习数学及视觉记忆的方法等等；最后一部分人才是真正信奉基督，为接受洗礼而来的。利玛窦充分利用了身处京城这种有利条件，广布福音，宣讲道义，吸收的基督教徒已超过两千余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翰林院庶吉士徐光启，他协助利玛窦全力宣传基督圣教，不仅自己皈依基督，还将七十多岁的老父接到北京，动员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接受了洗礼。徐光启在利玛窦的指导下，花费了几年时间，翻译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一书的前后章，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极大欢迎。此书对修订中国历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万历三十八年，由于过度劳累，利玛窦患了周期性偏头痛，身体每况愈下，连绵不断的来访及礼节性回访使他应接不暇，四面八方的来信等待他一一答复，耗去了他大量的精力，但他始终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日程表，并想方设法挤出时间从事一些额外的工作。万历三十八年是大比之年，从各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五千多人，另外还有五千多名由各省进京朝见明神宗的官员。来访人员川流不息，使得利氏不知所措，甚至有一天忘记了作晚祈祷。五月的一天，利玛窦与朝廷的来客交谈后回到寓所，感到精疲力竭，他告诉同伴自己病将不起。神父们请来京城最好的中医为他诊治，终无效用。五月十一日，利玛窦安然去世。在

大学士叶向高和李之藻的帮助下，明神宗应利氏同伴庞迪我之请求，赐与教会阜城门外二里沟一块墓地，用以安葬利玛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从万历十年抵达澳门开始，先后辗转于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直至万历三十八年逝世方告终止。他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为中国输入了西方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语言、音乐、美术等多种学科的先进知识，他所撰写和翻译的汉书著作达十九种，其中《明史·艺文志》著录了六种，《四库全书总目》收录或存目的有十三种。利玛窦在华的活动，开启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江晓敏）

参考资料：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年谱》、《神宗实录》卷356。

明末西学之传入

明末随着耶稣会士的来华，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在利玛窦（Matthaeus Ricci）之前，来华的具有汉式姓名字号的耶稣会士有：范礼安，字立山（Alexander Valignani)；罗明坚，字复初（Michael Ruggieri)；巴范济，字庸乐（Franciscus Pasio)。但他们在华都只匆匆一过，呆的时间不长，影响亦不大。只有利玛窦真正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利玛窦及其以后来华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熊三拔（Sebastianus de Ursis)、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阳玛诺（Emmanuel Diaz)、罗耀谷（Jacobus Rho)、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von Bell）等对中国近代科学先驱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研究、介绍西方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理、测量科学以及音乐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引导和促进作用。随着利玛窦等人的来华，西方近代科学有如南来的海风刮人了古老的中华大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中国是个农业国，水利尤其重要。利玛窦就曾与徐光启谈及过水利。万历三十四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熊三拔来华，他是水利专家，后来，他编著了《泰西水法》六卷，论述了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以及水库等的性能与作用，并附图说明，万历四十一年刊行。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的专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水利部分，吸收了此书的内容。

系统的机械工程学方面的著作最早的是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简称《奇器图说》，由王徵译绘。所录奇器，按王徵自序，依切、便、精三原则选择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便于成器，工费非巨，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的收录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力学著作。

王徵自著有《新制诸器图说》一书，收录了他自己发明制作的虹吸、鹤饮、轮激、风磑、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等九器。其中自行车及轮壶系根据西洋自鸣钟原理仿制而成的。王徵可以说是最早根据西方机械原理设计各种新式机械的中国人。他系陕西泾阳人，天启二年进士。他还著有《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额辣济亚是拉丁语天主圣宠（Gratia）的音译。"牖造"表示天主启示所造。这本著作里收录了他所制作的二十四种新器，有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水轮自汲、火船自去、风车行远、云梯直上、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妙轮奏乐、神威惊敌等二十四种。此外，他还著有《忠统日录》和《两理略》等书，收录了一些他自己的发明创造，如龙尾车、恒升车、活杓、活闸、活辊木、运重机器、千步弩、生火机等。

二、数学。利玛窦来华之后，发觉不少中国人对数学颇感兴趣，他遂先后和徐光启、李之藻翻译了《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等著作，对中国数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的数学名著。作者为欧几里德，他是古希腊的数学家。《几何原本》是对古希腊数学的总结和升华，在西方被认为是数学的经典著作。

万历三十四年开始，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共同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后三易其稿，于次年春译完了前六卷。因利玛窦忙于他事，另九卷一时未能译出。这本书的拉丁文本称为《欧几里德原本》，徐光启改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在翻译中使用了一些术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

角等，皆为后世所沿用。

继《几何原本》之后，又有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在1613年编成，翌年刊印。这是介绍欧洲笔算的第一部著作，主要依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汇中西算术于一编。全书十卷，分前编二卷，通编八卷，附有别编。原书前编第十章未译。前编主要介绍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通编，主要为比例、比例分配、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等。又收录了《算法统宗》的难题和《勾股义》、《测量法义》等。《同文算指》介绍的西方笔算方法简便可行，清代数学家加以改进后，普遍推广。

徐光启在和利玛窦合作的同时，又撰写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对西方传入的数学作了初步的研究。在《测量异同》中，通过对中西测量方法和理论依据的比较，得出了中西基本相同的结论。在《勾股义》中，又运用《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作了阐述。

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在利、徐的指导下，也著有《几何体论》一卷、《泰西算要》一卷、《几何用法》一卷。

此外，还有利玛窦在《几何原本》译成后自著《乾坤体义》二卷；罗雅谷与徐光启共修《测量全义》十卷，其中介绍了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邓玉函《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大测》主要根据托雷美的《数学大全》编成。《割圆八线表》是有度有分的五位小数三角函数表，是对英国数学家纳普尔在1614年完成的对数的最早介绍。

三、地理学。万历十一年，利玛窦到肇庆时，在肇庆长官授命下编制了一幅世界地图，称为《山海舆地全图》。次年，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于广东肇庆刻印。后又分别在苏州、南京、北京刻印。此地图，向中国介绍了地圆、地球大小、地心说、五大洲的概念、五带的划分、世界各国的国名和山川。许多国名、地名

一直沿用了下来，如亚细亚、欧罗巴、亚墨（美）利加、加拿大、古巴、罗马、大西洋、地中海、北极、南极等。此图对中国部分亦较精详，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再则，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的《职方外纪》，是一部介绍世界各国的系统的地理著作。艾儒略，1613 年进入内地，先后在北京、上海、扬州、西安、杭州、常熟、福州传教，死于延平。《职方外纪》1623 年刊印，题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共五卷。介绍五大洲各国风土、民俗、气候、名胜。第一卷亚细亚，第二卷欧罗巴，第三卷利未亚，第四卷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第五卷四海总说，列举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卷首有万国舆图、南北半球图，各卷有分图，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地理的专书。

四、生物学与医学。隆庆三年（1569 年），主教加内罗（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建立医院。这大概是西洋医学进入中国之开始。

利玛窦曾著《西国记法》，书中谈及西方神经学之内容。龙华民之《灵魂道体说》及卫匡国之《真主灵性理证》都论及人体骨骼之数及其生理功能。艾儒略之《性学觕述》论及神经最详。介绍西洋医学的专门著作是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为最早。此书二卷，系统介绍了西洋解剖学的内容。而熊三拔的《药露说》，万历四十六年成书，则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专著。而西医和医药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则已进入实用阶段。

五、天文学和历法。明代一直使用的《大统历》，根据元代我国科学家郭守敬制订的《授时历》修订而成。成化以后，《大统历》长期不修，出现了明显的误差，预报日食、月食屡有不验。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利玛窦到北京，就上疏万历皇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但当时并未被采纳。利玛窦遂与中国科学

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起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利玛窦将自己所著的研究天体数学的专著《圜容较义》一书口授给李之藻，由其译成中文。李之藻又根据西方天文学来解释周髀浑天、盖天之说，作《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得以在北京刊印。万历三十八年五月，利玛窦去世。这年十一月朔日食，钦天监和春官正戈谦亨等预测都不正确。翌年，礼部建议由兵部员外郎范守义、按察使刑去甏以及徐光启、李之藻和西方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参照西洋历法进行改革，未被批准。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一日，发生日食，钦天监的推算又不准确。崇祯皇帝对此颇为重视，下谕说，以后推算如再错误，就要重治。礼部遂荐礼部侍郎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两人负责修订历法。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来历局任职。李之藻、邓玉函到任后不久，先后去世，遂又调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来京参加修历工作。崇祯六年，徐光启病危，推荐山东参政李天经主持修历工作。徐光启生前，将所修订的历书分三次进呈皇帝，李天经后又进呈两次。完稿之后，此历书一共四十五种，一百三十七卷，定名为《崇祯历书》。又称《西洋新法历书》。

《崇祯历书》是徐光启领导下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编成的。它虽然落后于当时哥白尼的日心体系的历法，但比我国传统历法进步得多。它采用了第谷所创立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并且引进了“地球”的概念及地理经纬度的概念，还采用了欧洲通行的天文学度量制度，周天分为三百六十度，一日分为九十六刻（二十四小时），六十进制，黄赤道坐标制等。

虽然历书在崇祯八年就已编成，但当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一直到崇祯十六年八月，才准备推行，但为时已晚。次年，明王朝就覆灭于农民起义的烈焰之中。顺治初年，曾参与编修的汤若望将其删改，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不久就得以

正式刊刻。

除修订历法之外，当时耶稣会士或从西欧带来或自制了一些西洋天文仪器。崇祯二年七月，徐光启奉旨开局修订历法之时，他上疏陈“急用仪象十事”，计为：七政象限大仪六座、列宿纪限大仪三座、平浑悬仪三架、交食仪一具、列宿经纬天球仪一架、万国经纬地球仪一架、节气时刻平面日晷三具、节气时刻转盘星晷三具、候时钟三架。后此皆新造。另还装修测候七政交食远镜三架。崇祯七年，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家合制了一台望远镜，名“窥筒”。汤若望奏闻，崇祯命太监卢维宁、魏国征至历局试验。之后又筑台，陈设于宫廷，崇祯亲自观看，颇为嘉许。

六、西洋火器之传入。明代永乐年间就设神机营，使用火器。之后，在多次战争中都用火器。明代中叶西学之传入，首先是应用技术为主，而其中又以军事技术为最，新式火器的应用和制造，最先得以接受。

正德十二年（1517 年）以后，葡萄牙人使用新式火炮在中国沿海骚扰，后又攻入广州城郊，他们的装备是每船置火铳三四个，有二百名水手，火力极强。引起广东官员的注意。海道副使汪鋐设法探究出了造船铸铳的秘诀，并加以仿造。1521 年，汪鋐就使用新式火铳，将在粤葡人驱逐出境，并将其船凿沉，夺得大小火铳二百多门。

嘉靖二年（1523 年），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打败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的舰队，别都卢等四十二名葡军被活捉，并缴获其炮，便名之为“佛郎机”。这种炮系用铜铸造，长五六尺，大的重千余斤，小的一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用子铳五枚贮藏火药，塞在腹中，可远射百余丈。次年，即在南京铸造佛郎机。嘉靖九年以后就将其用于北部边防。

万历以后，北部女真崛起，辽事日紧，明朝官员急于改良武器装备，遂寄希望于耶稣会士。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军大败明军

于萨尔浒。这年十月，徐光启在通州总理练军事务，提出十议，建议购买西洋火炮招募西洋炮手教习。然后将此事委托给李之藻、杨廷筠办理。李之藻遂派门人张焘于次年十月赴澳门，购得大铁铳四门，由张焘运到江西广信，并请得葡萄牙炮兵长官四名、通事六人教习。

1622 年，明朝正式授命耶稣会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制造铳炮。负责监制的是山东右参议孙元化，孙元化曾从徐光启学西洋炮法。这年四月，从澳门招聘的葡兵至京，但只有“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通事就是耶稣会士陆若汉。不久，在演习中铳炮炸裂，葡人被迫回澳。在 1626 年 3 月宁远之役中，葡炮发挥了它的威力，打退了后金的进攻。但徐光启在 1625 年被罢官，两年后，孙元化在辽东也被撤职。

不久，崇祯继位。崇祯三年（1630 年），徐光启升任为礼部尚书。在崇祯继位之初，又第二次购募葡炮葡兵。后葡兵因故未能至京，葡炮六门则于 1630 年初运抵北京。当时即由京营总督李守锜选派官兵演习，赐炮名“神威大将军”。徐光启则上疏，建议建立一支用西方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计划共建十五营，每营四千人，共六万人；每营配备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计三百辆；西洋火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并建议先由孙元化练成第一营。但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登莱参将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攻陷了登州，孙元化却成了叛军的俘虏。后孔有德等叛军降后金，致使孙元化所部的精良火器皆为后金所有，使明和后金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清兵后来也仿造了大批的西洋火炮，明朝武器上的优势就此丧失。

崇祯末年，为挽救残局，仍努力自铸西式火炮。1636 年，授命汤若望在皇宫旁设立铸炮厂一所，两年后，铸成了大炮二十门，最大的可容四十磅炮弹，并有长铳，可由二人或由骆驼一头

负载。1640 年，汤若望因督造战炮而立功。

西洋火器在战斗中得以使用，使明军军事技术也不断改进，相应的，西式火器的制作技术和军事理论也从西方传人中国。如赵士祯的《神器谱》和他所藏的《海外火攻神器图说》，孙元化著《西洋神机》等都是系统论及制造火药与铸造西洋火器的。比较系统的军事著作还有《则克录》，又名《火攻挈要》，由汤若望和宁国焦合著，崇祯十六年译成刻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火攻挈要诸器图》四十幅。卷上叙述制造火器的方法，列述造铳、造弹、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雷。卷中是说制造火药和各铳的试放、装置和运铳。卷下为西铳之攻法，铸铳应注意事项，以及守城、海战、炮战等原则。另有《将略》一书探讨军事技术，常在《火攻挈要》提及。

此外，随着西学的传人，西方建筑、绘画、语言文学、音乐等在中国都有反映，遂不一一列举了。

（孙卫国）

参考资料：

《徐光启集》。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3 年版。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

王阳明与阳明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生于浙江余姚。因曾筑室于浙江四明山的阳明洞（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十二里会稽山上），遂自号阳明子，故称阳明先生。

王阳明十岁以前在余姚生活，因其父王华在京师做官，他十一岁进京，十二岁就学于塾师。十五岁那年，正当北方边陲多事，他不畏艰苦，冒险赴居庸关、山海关，纵览山川形势，增长不少见识。十七岁赴洪都（今江西省南昌）完婚。十八岁，偕夫人由南昌回余姚途中，路经广信府（今江西省上饶）时，他拜谒了当时的大儒娄一斋，一斋告诉他格物致知的方法，对王阳明有很大启发。

王阳明二十一岁在浙江考中乡试后，又随父进京。这时他对宋儒格物之论颇感兴趣，认真研读朱熹的著作，朱熹说一草一木都含有“至理”，必须一件件地“格”尽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贯通，体会到完满的“天理”，成为圣贤。格，也就是思考。一天，他约了一位好友，试“格”庭中的竹子，他们整天从早到晚面对竹子沉思默想，那位朋友一连“格”了三天，便支持不住病倒了。阳明坚持了七天，结果一无所获，反而也病倒了。最简单的竹子的道理也未“格”通，王阳明遂对朱子学说产生了怀疑。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二十八岁，在京师考取了进士，任工部观政，不久又转为刑部主事，从而正式踏入仕途。他对政治颇为热心，几度上疏，但都未引起孝宗的重视。三十一岁

时，他遂告病还乡，筑室于阳明洞，穷究仙经秘旨，闭门读书。三十三岁时，重新返回京师，任兵部主事，再度进入仕途。次年，阳明因见京师士大夫们长久沉溺在词章记诵之中，而忽视儒家的身心之学，便与湛若水开始聚徒讲学，共同以圣贤之学为天下倡，一时应者云集，蔚然成风。自此，王阳明的学术渐渐形成一股势力，且影响日益扩大。

正德元年（1506年），宦官刘瑾掌权，操持着朝中权柄。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二十余人相继进谏，都被刘瑾假传圣旨，逮捕入狱。王阳明当即上疏援救戴铣等人，因之得罪刘瑾，被廷杖下狱，然后被谪发到人迹罕至的贵州龙场驿当驿丞。

龙场驿位于贵州西北，是个边远荒蛮之地，蚊虫丛生，瘴气逼人。王阳明为了排遣内心的烦闷，他日夜静坐，体会“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终于在一个晚上他突然顿悟，洞彻了“格物”的道理。他深深悟解出“心即理”的学说，即一切的知和理，都在我心中，从而奠定了他心学的基石。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推衍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思想。

阳明三十八岁时，贵阳提督副使席元山向他询问朱陆异同。王阳明告诉他：一切只需在自己心上去寻求，不必向外旁骛；又将自己在龙场静悟的过程相告，并为他详尽开示“知行合一”的道理。不久，元山也豁然开悟，叹为圣人学问的复兴。因而修葺贵阳书院，聘请阳明主讲，以师礼事奉阳明。从此贵州学风大盛。

正德四年，王阳明被朝廷赦还，调升江西庐陵（今吉安县）知县。次年，刘瑾伏诛，王阳明又升任刑部主事，之后，仕途较为顺利。正德十一年，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四省边境爆发农民起义，王阳明被任命为南赣、汀、漳等处巡抚去剿抚。次年正月，他走马上任，抵达赣州视察民情后，从健全地方组织与加强民间防御入手，首先实施十家牌法，集合十户人家编为一牌，登

记各户人口的姓名、籍贯、年龄、面貌、职业等，每天轮流由一家担任巡察。同时就地征民，编选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制定南赣乡约制度，施行教化。不久，他就将这一带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了。

王阳明在每一任上，都注重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广收学徒，影响越来越大。且注重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融于施政之中。南赣乡约制度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措施。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当时王阳明正在去福州的途中。他一得知此消息，当即回吉安起兵讨逆，江西各处响应，趁朱宸濠攻安庆之时，王阳明率军攻破南昌，朱宸濠还救之时，王阳明与之急战，并将他擒获。武宗时已南巡，王阳明鉴于当时江西兵连祸结，阻止了武宗巡视江西。武宗巡视回京，不久即崩。

世宗即位后，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进封新建伯，并以厚礼慰劳。但引起朝中不少大臣的嫉妒，他们上疏世宗，把王阳明之心学指为伪学，引起世宗对王的不满。不久，王阳明归乡省亲，之后一直未见世宗召用，这样一过就是六年。

嘉靖五年（1526 年），广西田州的土族岑猛作乱，都御史姚镆领兵征讨，擒服岑猛父子。次年，岑猛手下头目又聚众煽乱，并攻陷思恩府，姚镆难以制服，张璁、桂萼遂推荐王阳明。十一月，王阳明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抵达广西梧州，他施以招抚之策，很快就解决了田州的问题。回还之时，又用兵于八寨，断藤峡，平息其叛乱。就在这时，王阳明积劳成疾，竟至卧病，遂兼程返归，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行进到江西南安时，王阳明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王阳明系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故历史上一般并称“陆王”。心外无物、无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构成王阳明心学的三大纲领。

一、心外无物、无理，心即理。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宇宙

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他认为心的本体是无所不包的。心外无物。

有一次，王阳明和他的一个朋友到南镇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道：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像这样的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王阳明答道：你没有看见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见此花时，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也就是说，山花的存在并不是真实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你看到它，感到它的存在，就有山花显现；不去看它，心死寂了，山花也就消失了。以人的主观精神决定客观存在。王阳明给“物”下了个定义：“身之主宰便是心，人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样，物就是一种意念，我想到了什么，什么就是物，不去想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

心外无物，心外亦无理。这是进一步发挥了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否认心外有理。他批评程朱理学的错误就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也”。他认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他认为只要此心不被私欲所蒙蔽，就充满了一片天理，不需由外而增添一分，也绝不求于他事他物，因此说“心即理”。

二、致良知。在认识上，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他说知善知恶就是良知，人人都有良知，良知也就是天理。良知说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基础。

所谓良知，即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敬，见到小孩落井自然产生怜悯之心，这些都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这就是良知。推而广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三纲五常观念以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感情，也都是与生俱来的，都叫良知。换句话说，封建的伦理纲常也是良知。

"致良知"的"致"，是指人们克灭私欲的认识和修养工夫。因为良知常会被私欲所掩盖，通过"致"，使"良知"得以明白或恢复，即"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使得人人都能按照封建伦理纲常去行事。

三、知行合一。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反对朱熹主张的知先行后说。正德四年，王阳明在主持贵阳书院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从知与行的关系上看，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知行是合一的，不能把它分割为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比如说：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指这个人已经实行了孝悌之道，并不是口说些孝悌的道理，而没有孝悌的行为就称赞他知孝知悌的。所以，知和行不能分开。

知行合一的重点在"行"，所以他总是劝人在意念发动时，就要切切实实去恶存善，他曾对学生们说：你们听我讲致知格物，天天如此，即使讲一二十年，也还是如此。你们听了以后，必须切实用功，才会有所长进，否则只是空话一场，又有什么用呢？

总之，王阳明心学的三大纲领亦是一脉相承的，"心即理"说，认为良知就是天理，因而衍成"致良知"的学说，进而论修为工夫，则主张"知行合一"。三者前后是一贯的。

阳明学说，在当时已很流行，王阳明弟子盈门。《明史·王守仁传》称："阳明弟子盈天下"。后人因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而余姚县南边有一河称姚江，故称其学派为姚江学派。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因对其学说理解发生分歧，故分成许多派。按地域分，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学派，还有王阳明的得意弟子王艮的泰州学派，对晚

明的政治、社会及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王守仁传》。

《王文成公全书》。

黄宗羲：《明儒学案》。

王煦元：《中国历代思想家·王守仁》，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一年版。

黄教之兴

佛教传入吐蕃，始于赞普松赞干布时代（约公元七世纪中），拉萨大小昭寺就是在那时建立的。最后渐渐发展成带有其浓烈地方色彩的喇嘛教。到了元末明初，当时喇嘛教派很多，有噶丹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噶玛派（黑教）等，每派又分若干小派，教派林立，矛盾亦多。

明代称西藏地区为乌斯藏。洪武年间，藏人来朝，悉加封任职。初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统辖朵甘、乌斯藏等地。后又升朵甘、乌斯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置宣慰司、宣抚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对于各派喇嘛教都采取扶植羁縻的政策，封法王的就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大善法王、大庆法王、大德法王等等，封王的又有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等，而更多的被封为灌顶国师、国师。明代对乌斯藏是采取因其习俗，用僧徒化导为善的宗教政策。

黄教的创始人是宗喀巴。宗喀巴原名罗桑扎巴贝，他 1357 年出生在青海西宁附近塔尔寺，七岁出家，从当地噶丹派有名喇嘛顿珠仁钦学显密教法十年，二十九岁受比丘戒。在这期间，他住在几个噶丹派的寺院学经，他每学完一部当时流行的重要论书，就到前后藏若干寺院立宗答辩，在喇嘛教界渐有声誉。受比丘戒以后，他系统学习了密教经典，并开始为僧众讲经。1393 年到 1398 年，他在前藏南部从噶丹派教典传承和教授传承的各一位有名人物系统地学习了噶丹派的教法。他吸取了噶丹派的精

神，加上自己对显密经论的造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1399年到1409年，宗喀巴积极进行宗教社会活动，并写出了几部阐明他自己对西藏所传整个佛教体系看法的重要著作；同时针对当时喇嘛教界矛盾重重、僧侣不遵戒律的状况，他大力宣讲小乘、大乘、显教、密教的戒律，提出僧人不分显密都必须严格遵守戒律。他的活动得到了受明朝封为阐化王的噶举派扎巴坚赞的支持。1409年初，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祈愿法会，这就是此后五百多年相沿一年一度在拉萨举行的传招大会的开始。会后，在拉萨东北兴建了甘丹寺。此后宗喀巴师徒就一直住在这里，因此，他这一派被称为"甘丹寺派"，又称为"噶鲁派"，音变为格鲁派。又因为这一派僧人都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帽派，简称黄教。

宗喀巴的改革之所以得以推行，黄教得以确立，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当时喇嘛教派很多，内部矛盾重重，而某些教派的僧侣生活淫靡，追名逐利，过着与世俗民众一般的生活，不遵佛法，不守戒律，引起整个社会强烈的不满。宗喀巴则依照佛教经典，提倡遵守佛教戒律，阐扬显密关系，规定学佛次第，并因之而制定僧人生活准则、寺院的组织体制、僧人的学经程序、是非标准等，深得民心。而阐化王扎巴坚赞具有强大的实力，他支持宗喀巴，致使反对派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而宗喀巴承认自己是继承了噶丹派的衣钵，因此，原来的噶丹派寺院僧人都先后改宗黄教，这样黄教就有了雄厚的实力。

1416年，宗喀巴的一个弟子扎希贝丹在拉萨西郊创建了哲蚌寺，九年后，他的另一位弟子释迦耶歇在拉萨北郊创建了色拉寺，与宗喀巴自己创建的甘丹寺，成了黄教在前藏的三个主寺，通称三大寺。三大寺以讲经修法，传播宗喀巴的学说为主，成为黄教的活动中心。141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与世长辞，但黄教却日益兴盛。

1447年，宗喀巴的另一弟子根敦朱在后藏的日喀则附近创建了扎什伦布寺，这是黄教向后藏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扎什伦布寺与甘丹、哲蚌、色拉三寺合称为黄教在西藏地区的四大寺。根敦朱死后，由他的弟子继任扎什伦布寺的墀巴。1485年，根敦嘉措进了扎什伦布寺，1512年他成了扎什伦布寺的堪布。1517年又成了哲蚌寺的堪布，1526年，他又兼任了色拉寺的堪布，此时，他已经成为整个黄教的实际上的领袖。所谓堪布，也就是寺院住持。与此同时，他设立了第巴，让第巴来管理寺属庄园农奴的一切事务。当时，散在各地的噶丹派的寺院都已先后改宗黄教，而其他教派如萨迦、噶举、盆布等派都或多或少受了黄教的影响，改变了其原来的传统作风。

为了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机构，哲蚌、色拉两寺的领导者采取了活佛转世制度。事实上，活佛转世制度最早是黑帽派的噶玛巴，后来红帽派亦采用此制度。黄教鉴于当时的情况，亦实行此制度。因为这样做一则可以得到一个稳固的领导集团；再则，以转世者的名义活动，容易树立其威望，还避免了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当时，根敦嘉措被认为是根敦朱的转世。根敦嘉措圆寂后，索南嘉措被认为是他的转世。

1546年，索南嘉措进了哲蚌寺，到1564年二十二岁受比丘戒时，他已先后做了哲蚌寺、色拉寺的堪布。受比丘戒后，他就周游各地，收徒授法。

当时，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西征瓦剌失败，退居青海湖畔，部下有厌战情绪，当地藏部内部亦有矛盾。1571年，他曾受明隆庆帝封为顺义王。后来他留心佛法，不久，就派人去藏请索南嘉措相会。1576年，俺答汗再次遣使邀请，索南嘉措遂于1577年11月自拉萨哲蚌寺出发，次年五月，与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畔仰华寺。他们相会极为友好，索南嘉措劝说蒙古贵族废除夫死妻殉的恶习，同时也劝说不要在亲眷死后竭力宰杀驼马作为死者

"盘费"的陋习。得到俺答汗的首肯，他遂大力提倡。俺答汗及其贵族集团也接受了索南嘉措的黄教，索南嘉措又让蒙古族统治者放弃原有的萨满教信仰，全力崇奉黄教。于是，黄教开始深入各部蒙古族人民之间。后来，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互赠尊号，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以"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第，为梵文译音，这是佛典里记载下来的印度古代极有威力的君长尊号，义为转轮王；彻辰汗，是聪睿汗王的意思，元世祖忽必烈曾称此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在佛家显教、密宗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达赖，蒙文译音，意为海；喇嘛，藏文译音，意为上师。从此，索南嘉措这一转世系统就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他又追称根敦朱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第三世，后来他的转世，皆称达赖喇嘛。

之后，索南嘉措及其弟子仍在蒙古各部游历，他们经过甘州时，索南嘉措接受了俺答汗的建议，派人以马匹等物向明朝进贡。而且他还致书当时宰辅张居正，请求准许他以后定期进贡，得到明廷的允许。

1583年，俺答汗死，索南嘉措受邀为其安葬。1587年，索南嘉措与蒙古各部汗王共同参与了俺答汗的葬礼，他向蒙古汗王说教，使各部汗王也都从此信奉了黄教。与此同时，明廷派人到呼和浩特，封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并赐敕印，邀他到北京来。当时，蒙古察哈尔部汗王也对他发出了邀请，他原准备取道察哈尔到北京，但在1588年3月死于途中。但从此漠南蒙古其他各部，以及漠北蒙古各部的汗王，都先后信奉了黄教。

1592年，三大寺派以甘丹寺退职的墀巴班觉嘉措为首的喇嘛到呼和浩特认定俺答汗之曾孙为第四世达赖喇嘛，并由班觉嘉措命名为云丹嘉措。1603年，云丹嘉措到了西藏，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大典。1607年，他到扎什伦布寺，跟从扎什伦布寺

往持罗桑却吉坚赞学经，自此，他与罗桑却吉坚赞有了师徒关系。1614 年，罗桑却吉坚赞在哲蚌寺为云丹嘉措授了比丘戒。当时，后藏日喀则的藏巴汗对黄教三大寺虎视耽耽，甚至派兵前往攻打。1616 年 12 月，四世达赖在哲蚌寺暴病而亡，传说是藏巴汗派人把他害死的。四世达赖死后，藏巴汗下令禁止达赖喇嘛转世。罗桑却吉坚赞主持了云丹嘉措的超度仪式。

不久，藏巴汗突然患了重病，请了许多医生都无法医治好。罗桑却吉坚赞精通医术，藏巴汗只好请他治疗。在罗桑却吉坚赞的精心治疗下，藏巴汗很快恢复了健康。藏巴汗准备向扎什伦布寺捐献一个庄园作为酬谢，但罗桑却吉坚赞坚持不受，他只是希望藏巴汗允许四世达赖转世，藏巴汗只好应允。不久，哲蚌寺就找到了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罗桑却吉坚赞为他授了沙弥戒，1638 年，又为他授了比丘戒。

1641 年，在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的帮助下，格鲁派打败了藏巴汗的势力，夺取了西藏地方政权，五世达赖遂由哲蚌寺移居布达拉宫。

固始汗打败了藏巴汗，从而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他以罗桑却吉坚赞为师，并于 1645 年赠以“班禅博克多”称号。班禅，意为大班智达；博克多，是蒙古人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从此，就有了班禅这一称号。同时，固始汗和五世达赖请罗桑却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将后藏地区划归他管辖。1662 年，他死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幼童。从此，在黄教里又建立了一个大活佛转世系统。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为四世班禅。而追认宗喀巴的一位大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为一世班禅，以索南乔朗为第二世班禅，以罗桑敦朱为第三世班禅。

五世达赖选定第四世班禅的转世罗桑耶歇为第五世班禅，罗桑耶歇跟从五世达赖受戒学法，后来他又成了六世达赖、七世达赖的戒师。从此，达赖、班禅互为师徒，遂成定例。康熙五十二

年（1713年），康熙帝封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后来历代班禅皆沿用此号，直至如今。

（孙卫国）

参考资料：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

降边嘉措：《班禅大师》，东方出版社1989年9月版。

内阁建制

1364年，朱元璋仿照元朝制度，设立了中书省，由李善长和徐达分任左、右丞相。之后，左、右丞相几易其人。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的罪名，将左丞相胡惟庸诛戮，随之下令废除中书省，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官属，只留下职司抄写的中书舍人。并提升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官，直接由皇帝控制。

朱元璋既要大权独揽，但又不得不承认政事极繁，不可无辅臣。废除了中书省，当即就于同年九月置春、夏、秋、冬“四辅官”，由儒士王本、杜祐、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缺。以之做自己的辅佐和太子宾客。但这些担当四辅官的人或老或病，又多无行政才干，于事无补。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就让他们告老还乡，并且取消了四辅官的建置。

为了继续弥补中书省废除后出现的漏洞，朱元璋遂于洪武十五年十一月设置了殿阁大学士，置华盖殿、文渊阁、武英殿、东阁、文华殿等三殿二阁大学士，后来定其为正五品官。洪武十八年，又定翰林院学士秩正五品，以之随侍左右以备顾问，同时充当东宫太子的辅导。

建文帝期间，对朱元璋的官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学士一人，罢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但设学士一人，待诏人员不定。同时，翰林院学士可参与机务，其权力日重。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推翻了建文帝的皇位，他入主了南京城。即位不久，他的七位侍从近臣黄淮、杨士奇、金幼孜、胡俨、解缙、胡广、杨荣相继进入翰林院，这七人组成了明成祖的辅佐，参与机务，草拟诰敕文书，提供咨询，以备顾问。他们每天出入于文渊阁，替皇帝办些文秘之事。文渊阁在午门之内、文华殿南面，遂有内阁之称。

永乐初入阁的七人命运不一。永乐二年（1404年）胡俨就升任国子祭酒，不再参预机务；解缙于永乐十三年则含冤而死；胡广于永乐十五年病卒；黄淮后来被捕入狱，朱高炽继位之后方才出狱；而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人，永乐二十余年间，在阁基本未动，品位逐渐上升。杨荣累升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杨士奇累官至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金幼孜累升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他们地位日隆，权位日重，但依然没有改变其“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的性质。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当即释放了被关押的右春坊大学士黄淮，并任他为通政使（正三品）兼武英殿大学士；升文渊阁大学士杨荣兼太常寺卿（正三品），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正三品）仍兼前秩，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正三品）兼华盖殿大学士。并申明他们四人仍只做皇帝侍从之臣，参预机务，但并不到他们所升任的六部等衙门中去任职。自此直到明亡，殿阁大学士所兼六部职务，都是不到任的荣衔。这样使皇帝近臣殿阁大学士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了正三品，同时使之享受本职和兼职双薪待遇。不久，仁宗又升杨士奇为少保，杨荣为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为太子少保。杨士奇遂升为从一品，杨荣与金幼孜升为正二品官，与六部尚书平级，这样阁臣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仁宗又给杨士奇加兵部尚书、金幼孜加礼部尚书、黄淮加户部尚书衔，俱三俸并支，但只掌内阁事务。这样，阁臣除了大学士职务外，尚兼有“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和“太子三师”的头衔，同时还兼各部尚书之职，进一步奠定了阁臣的地位。就其职权来说，他们参预机务，仁宗曾给吏部尚书蹇义和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赐“绳愆纠缪”银质图章一枚，要他们协心辅佐。

宣德初年，入职文渊阁的大学士有杨士奇、杨荣和杨溥、黄淮、金幼孜、张瑛。他们基本上是宣宗的心腹近臣，三杨更是深得宣宗的信任，参与宣宗之决策，提供咨询意见，随时侍从左右。

如果说永乐时有了内阁的雏形，那么仁宣时期是明代内阁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这时的阁臣都深得皇帝的信任，他们品位极高，地位极重。阁臣都曾历事数朝，三杨历事四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杨士奇在内阁达四十三年之久，金幼孜达三十年，杨荣达三十七年，杨溥达二十二年。三杨在阁，内阁事务基本上由他们主持。阁臣之主次等差已有端倪。

从英宗正统年间到武宗正德末年（1436—1521年），这时明朝由盛转衰，也就在这期间，明代的内阁制度基本形成。这是明代内阁制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宣宗死后，年仅九岁的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英宗初年，外事由三杨掌管，内朝则有太皇太后支撑。但当时宦官势力已很强大，经过洪武、永乐、仁、宣几朝的发展，宦官势力已渗透到各个方面。但初年，太皇太后明令朝廷政令都要出自内阁，不许内臣从中作梗。各司所上奏章，令司礼监都要交阁臣议处，否则就要加以责问惩治。后来又规定内阁三杨分别与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等衙门定期会议臣民建议，于是内阁权力日益增重。

正统七年（1442年）四月，建翰林院于长安左门东面。在

这之前，翰林院没有专门的衙署，寄居在宫内的文渊阁。翰林院建成后，从此内阁衙署与翰林院正式分开。同年八月，英宗称杨士奇、杨溥为“辅相元老”，破例给二人以三代诰命。此后，阁臣有“辅相”之称，但并未赋予辅相的职权。

不久，三杨或死或病，渐渐不理事务，而随后入阁的学士都很平庸。宦官王振则日益嚣张，大权独揽，通过“批红”控制内阁。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王振亦死于乱军中。

景泰年间，阁臣多从翰林院入阁，地位不高，亦多无所作为。夺门之变后，英宗朱祁镇继续掌政，他继位不久，就将内阁旧臣五人陈循、王文、高穀、萧镃、商辂全部撤换，代之以徐有贞、许彬、薛瑄和李贤。但后来又经过曹石之变的打击，阁臣又换了新人，以李贤、彭时、吕原为阁臣。

李贤在天顺年间一直颇得英宗信任，是内阁中最主要的人物，成为首辅一直到成化年间。成化年间，阁臣有十人，除李贤外，还有陈文、彭时、商辂、刘定之、万安、刘珝、刘吉、彭华、尹直。此时的内阁，其主要的职任是对奏章加以票拟①，撰拟制敕，主讲经筵，预皇帝讲读，与闻庶政。

弘治年间，众正盈朝。朱祐樘即位初年，就免除了不学无术的“万岁阁老”（见到皇帝只知道喊万岁）万安和阁臣尹直的职务，只留刘吉，同时增补新阁臣徐溥和刘健，顿使内阁气象一新。后来丘濬、李东阳和谢迁相继入阁。

自李贤成为内阁首辅以后，内阁中就有了首辅、次辅、群辅之别。弘治年间，先是以刘吉为首辅，随之是丘濬、徐溥。丘濬死于弘治八年（1495年），早在这之前刘吉就致仕归乡了。当时

① 票拟，即在官员奏章之后用小票写上对该奏章的处理意见，供皇帝裁决时参考。

内阁缺员，明孝宗就令吏部会同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科道官推举行止端方、学术纯正的六人以备挑选。明孝宗再从六人中选定了李东阳、谢迁两个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机务。这是内阁阁臣由吏部等官廷推的开始。从此又形成了一个遴选阁臣的制度。弘治十一年，徐溥致仕，刘健继任首辅，直到弘治末年，阁臣只保持三人的建制。

孝宗死于弘治十八年（1505 年），在他的儿子朱厚照统治的十六年里，共有阁臣十五人先后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除顾命的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外，后来入阁的有焦芳、王鏊、杨廷和、刘宇、曹元、梁储、刘忠、费宏、靳贵、杨一清、蒋冕、毛纪等十二人。由于武宗的愚昧专横，宦官刘瑾等的猖獗一时，内阁也只得听从宦官的摆布，而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还是与太监刘瑾相勾结的阉党，他们助纣为虐，为非作歹。而稍有正义感的阁臣不是遭到打击就是唯唯诺诺，无所作为。

这一阶段，内阁制度处于基本形成时期。就权力而言，阁臣不只是充当皇帝的代言近臣，而且参与朝廷对朝政的议论了，与六部等衙门亦有了相当多的联系。但阁臣权力的大小是随着皇帝的倚重与否来决定的。阁臣既有“纸糊三阁老（指万安、刘吉、刘珝，成化时阁臣）、泥塑六尚书”之谣，亦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时）商（辂），后称刘（健）谢（迁）”之说。虽有“贤相”，但也不过是“谨直持正”，“侃侃守义”，“振饬纲纪”，起着一种弥缝匡救的作用而已。但更多的时候则受着宦官的制约。

从嘉靖到万历时期，是内阁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内阁制度进一步完善，内阁首辅权力空前之大，出现了许多“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

嘉靖初年，世宗朱厚熜发动了“议大礼”之事，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批廷臣派，与世宗发生了矛盾，杨廷和行使自己

的职权，对世宗批还之奏疏常不执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这是阁权的一种反映。后来杨廷和等廷臣派相继被罢。而议礼派张璁于嘉靖六年（1527 年）十月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并特许兼署都察院事。以前阁臣兼六部等衙门之职皆是荣衔，并不真正参与其事，而张璁兼署都察院则是实职，这又打破了常规，由议礼派张璁统率监察御史，以控制其风闻言事。

张璁入阁时，杨一清为内阁首辅，但张璁深得世宗信任。嘉靖七年正月初六日，世宗视朝时，见张璁班列于兵部尚书李承勋之下，深有感触地说：“张璁是辅弼重臣，这样好像不行。”当即晋升张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为太子太保。于是，他们两人都班列于兵部尚书李承勋之上。嘉靖九年十一月，又定阁臣为文班之首，与锦衣卫指挥侍御座左右，正式位列六部尚书之上。

世宗从嘉靖中期开始，已开始玄修，要专一静养，不愿经常召见大臣。他对内臣又存有戒心，于是就把大权寄托于内阁首辅。嘉靖八年杨一清去职，张璁接任内阁首辅。他主持阁务，遇事专决，其余阁臣多唯命是从。嘉靖十四年四月，张璁因病致仕而归。

嘉靖十六年四月，世宗下令修造内阁房舍，进一步扩充其机构，将皇宫内的“文渊阁”辟为内阁阁臣办事之所。这也是内阁权力增重的一个表现。

嘉靖统治后期的阁臣都是以赞玄修、撰写供奉道教的青词而获取信任的。而这时期阁臣之间的斗争亦颇为激烈，出现了两个有名的首辅——夏言和严嵩。夏言先为内阁首辅，严嵩本受夏言之提拔。而严嵩性情柔顺阴险，深得世宗之宠，最后，严嵩倾倒夏言，使之弃市。严嵩在内阁长达二十一年，大权独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朝臣纷纷上疏弹劾严嵩，而他竟稳如泰山，弹劾他的人一个个先后受到迫害。而他除为内阁首辅，掌管

票拟之权外，还可兼任六部等其他衙门之职，得以专制诸司。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任归乡，由徐阶接任内阁首辅。徐阶继位之初，提出“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为标榜。[①] 但他依然颇为专横，遇事并不与其他阁臣共商，多独断专行，引起其他阁臣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 年）去职。

隆庆年间，内阁权势有增无减。隆庆三年，起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兼掌吏部事。次年二月，又令阁臣赵贞吉署都察院事。使阁臣兼领部院事进一步发展。

万历年间，赫赫宰辅张居正在阁十六年。他内结冯保，共逐首辅高拱，于万历元年（1573 年）出任首辅。他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政绩卓著，俨然一真宰相。“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②] 一次张居正病了，阁臣张泗维料理小事，而大事则拿到张居正家里由他裁决。万历六年，张居正因葬父事归乡三月，当时万历皇帝也令阁臣吕调阳等有大事一定要派人赶往江陵，由张居正处置。张居正之赫赫权势固然与其个人之才干有关，但也表明了明代内阁制度至此已发展到顶峰。生前荣耀的张居正死后却落得个抄没家产、子孙遭殃的结局。

万历后期，皇帝一味搜刮钱财，而阁臣亦多平庸之辈，甚至亦多缺员不补，内阁权势有衰败之征。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明内阁制度发展到鼎盛阶段，《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在“嘉隆以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称内阁矣。”这种名称上的改变，标志着内阁制度的正式形成。而权臣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不仅地位高居六部尚书之上，而且还兼吏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院的职务，可

① 《明史·徐阶传》。
②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序》。

以专制诸司。这是内阁权势发展至极之体现。

在天启年间，内阁制度又稍有变革。天启四年（1624年），韩𤅷继任首辅，阉党魏广微急欲揽权，他建议分首辅票拟之权。原来是由内阁首辅司票拟，次辅等共同参决的旧例，自此改变为阁臣分任票拟的局面，内阁首辅之权渐轻。但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内阁亦不过是其一个附属罢了。

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猜忌专横。但在选阁臣之时，又创新法。天启七年十二月，崇祯在六部等廷臣推举堪任阁臣孟绍虞、钱龙锡等十二人中，用"枚卜"的方法选定新阁臣，即他在选阁臣之时，先默默祷告上苍，然后将写有十二人名字的字团，各叠成一团，放人金瓶，然后用箸挟出，就用此法选定了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登道、刘鸿训六人，授他们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阁参预机务。由于崇祯之猜忌，他在位十七年，阁臣竟多达五十人。而自永乐以后，有明一代之阁臣也不过一百六十三人，崇祯一朝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纵观明代内阁制度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阁臣亦可多可少，时多时少，多则十余人，少时仅一人，一般三五人；人阁途径亦有别，或由皇帝钦定，或由朝臣廷推，甚至于由皇帝枚卜。内阁职权是参预机务，草拟敕书，行使票拟之职权。不过，内阁阁臣基本上出自翰林院，由词臣入选，这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明代内阁始终受着司礼监的制约。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职掌内外奏章，秉笔太监职掌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批朱（代替皇帝写批语，一般用红笔，又称批红），它下面设文书房，负责文件的抄写与传递。因此一旦宦官猖獗，内阁也就无所作为，不过受宦官摆布而已。

（孙卫国）

参考资料：

《明史·职官志》卷196“夏言传”、卷308“严嵩传”、卷213“张居正传”。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关文发：《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李天佑《明代的内阁》。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

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1月版。

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厂卫与特务政治

明朝的特务政治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曾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朱由检，无不借助特务政治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坐上了大明王朝皇帝的交椅之后，为保住朱氏一统天下，开始忧心忡忡了，一是担心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将领们对他不忠；一是怕归顺他的那些官僚和地主阶级文人们对他不服，怀疑有人觊觎皇帝的宝座。为此，朱元璋建立起一整套特务机构，豢养鹰犬，伺察、追踪、逮捕、刑讯朝野臣民，其手段残忍程度是前无古人的。

明朝最早的特务人员是朱元璋时的检校，其职责是专门探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皇帝报告。检校品位极低，除了侦察、告发官员们的不轨和阴私之外，别无他权，只是皇帝个人的耳目。但朝野官员们惧怕他们，明太祖朱元璋也很得意，他说："有这么几个人，譬如养了恶犬，让人家害怕。"检校神出鬼没，手段也很高，足迹无处不到，最著名的头子之一叫高见贤，元璋派他察听将官家属，时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元璋下令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又如一官员叫钱宰，被征到朝廷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把'嫌'改为'忧'字如何？"钱宰吓得直冒汗，赶紧磕头谢罪。检校不仅侦察与政治、军事有关的人事，连生活琐

事也进行监视。学士宋濂性格诚谨，有一次在家中请客喝酒，第二天，朱元璋便问他："昨天喝酒了吗？请了哪些客人，吃了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一一回答。朱元璋听后才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又如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色，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何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黄岗，朱元璋派检校去察听，远远见一农人在田里插秧，检校上前问："此地有吴尚书这人不？"农人起身回答："琳便是。"使者复命，元璋很高兴。此类事情在明史上屡见不鲜。

检校只管察听、告密，但无权扣押、审判和处罚犯罪之人。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洪武十五年（1382 年）朱元璋设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特务机构，即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洪武元年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三年改为亲军都尉府，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有一支专属的队伍。锦衣卫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三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六品；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并设立专门的法庭和监狱，其职责由侍卫天子扩大到伺察缉捕"盗贼奸宄"，不仅朝内外的文武官员要受其监视，就是街坊的民间阴私也在其侦探缉捕范围之内。锦衣卫和朝廷的府、部、院均无隶属关系，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

锦衣卫内部有一重要机构称镇抚司，专掌管缉捕、审讯和一般行政事务，以后又分为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行政事务，北镇抚司专管缉捕、审讯之事。因为这个特务机构是奉皇帝的诏令才抓人办案的，所以有人称这种案件叫"诏狱"。锦衣卫设立后，朱元璋把一切重大案件皆交给此机构处理。

朱元璋在处罚官员时，使用了一种"梃杖"的处罚。不少官员死在鞭杖之下，连朱元璋的亲侄儿，曾在南昌保卫战中为他坚守孤城，苦战八十五天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

的罪名被活活鞭死。梃杖行刑的地点在午门前的御路东侧。行刑时，众官员陪站在午门外西墀下，左边是太监，右边是锦衣卫官校，下列锦衣旗校数十人，均是臂戴袖套，手执木棍，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绑住双脚，让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每打五棍就另换一人击打。锦衣旗校行刑时，只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靴尖向外成八字形，则表示不许将犯人打死；如靴尖向内，则犯人定死无疑。正德以前，凡受杖刑的人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这样被杖死的人更多了。

洪武二十年（1387 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官校恃仗特权，非法凌虐，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六年，胡惟庸和蓝玉案的罪犯都已处理完毕，重申罢锦衣卫，以后一切案件全归三法司处理。但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为了镇压建文帝的余党，又恢复了锦衣卫。朱棣以亲王起兵夺取帝位，为巩固帝位，他除了恢复锦衣卫外，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在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东厂。怕朝臣徇私情，命亲信太监提督东厂，皇帝亲自指挥，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人们将这两个特务机构并称厂卫。

提督东厂的太监由司礼监派出，下属称之为“厂公”或“督主”，下设掌刑千户和理刑百户各一员。东厂的隶役均是从锦衣卫中选出来的，有役长（亦称档头）若干人，下管“番子”数百人至数千人，分赴各官府衙门和各地进行监视、侦缉。

英宗时，王振专权，他利用锦衣卫残酷地镇压官民，当时锦衣卫指挥马顺就是王振的爪牙，他派人侦缉、逮捕、拷打、杀害反对派的官员，侍讲刘球就是被马顺杀害的。土木之变后，王振被杀，马顺也被朝臣打死在宫殿上。英宗复辟后，加强特务统治，先后信任锦衣卫指挥逯杲和门达二人。逯杲为英宗侦察、监

视官员的阴私，受英宗宠爱，他恃宠胡作非为，派锦衣校尉四处侦缉，朝野文武大臣为求得无事，纷纷进贿，就是亲藩公爵也不例外。如果不给逯杲送金帛，他便罗列罪名，搞得你家破人亡。后来，逯杲在曹吉祥叛乱时被曹钦所杀。逯杲死后，门达得宠，他和逯杲一样，任意罗织诬陷，如陕西督储参政娄良、福建佥事包瑛等十二人，均被锦衣校尉告状下狱，包瑛因气愤不过，自缢身死，其余之人被遣戍。遣戍时，门达又派人在后面跟踪。成化十三年（1477年），明廷又设立了另一特务机构，即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提督。西厂的规模比东厂大，其隶役比东厂多一倍，遍布全国各地，就连朱氏亲王也在其监视之下，其权势远在锦衣卫和东厂之上。西厂的特务倚仗权势，诬陷官民。如福建建宁卫指挥杨晔是杨荣的曾孙，与其父杨泰被仇家所告，父子逃入北京藏在亲戚家中，西厂特务得知后向汪直汇报，诬告他们杀人后畏罪潜逃，并携带金银巨万进京，准备贿赂当权者以求免罪。汪直马上派人逮捕杨晔父子及其亲戚，加以严刑拷打，杨晔受刑不过，妄说金银藏在叔父兵部尚书杨士伟家。于是西厂特务又将杨士伟逮捕入狱。最后，杨晔死于狱中，其亲戚及杨士伟被谪戍。宪宗对汪直倍加信任，赋予他先抓人后报告的权力，即使抓的是朝中大员也不例外，汪直利用权势，擅作威福，许多官员平白无故遭他陷害。每次外出，公卿大臣碰到汪直必须回避，一次，一位兵部尚书不避，汪直就指使党羽罗列罪名，将这位兵部尚书罢官为民；汪直还借巡边为名，到各地逞威，每到一地，地方官员均要远接奉迎，有时甚至到百里以外迎接款待，稍有慢待，轻者逮捕，重者杀头。汪直的专权作恶，激起了朝野官员们的愤懑，宪宗对汪直的跋扈也开始不满，逐渐疏远他。东厂为了和西厂争权夺宠，也和汪直发生矛盾。东厂太监尚铭久受汪直控制，心中怀有怨恨。一次，尚铭捕贼受重赏，事先没有告诉汪直，汪直大怒，准备找碴儿报复尚铭，尚铭又怕又恨，于是暗中侦察汪直的

阴私和不法行为，偷偷报告了宪宗，宪宗对汪直更加不信任了，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 年）罢西厂，把汪直调到南京御马监。从此一切侦缉大权均归东厂，尚铭便得势起来，他和汪直一样，罗织诬陷，残害无辜，并利用特权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后来尚铭获罪被抄家。

武宗正德（1506—1521 年）初年，宦官刘瑾把持朝政，为镇压百官，加强特务政治，不仅恢复了西厂，而且设立了另一特务机构内行厂，由刘瑾直接指挥。内行厂凌驾于朝廷的一切机构之上，连东厂、西厂都在它的监视之下。这样，内行厂、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就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特务网。朝官谁反对刘瑾，立即就给谁罗织个罪名，有的下狱，有的罢官，有的被砍头，即使被谪，后面也有特务盯梢，随时都有可能被害死。如太监王岳、范亨、徐智与外朝官员联合反对刘瑾，刘瑾就拨弄是非鼓动武宗将他们三人贬谪南京充军。三人上路后，刘瑾又派特务追杀王岳和范亨，打断徐智的胳膊。正德三年（1508 年）六月，一天早晨武宗上朝时在丹墀上发现一封匿名书，上面列举了刘瑾的数条罪状。刘瑾大发雷霆，借用武宗的名义，罚朝官三百余人跪于奉天门下，派太监在一旁监视，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不少官员当场中暑昏倒；傍晚又被全部入狱，直到第二天特务们侦察出写匿名书的是内朝的宦官，与朝中大臣无关后，才将几百名文武官员从监牢里放出来。户部尚书韩文反对刘瑾，刘瑾派特务暗中找他的差错，恰好在交纳内库的银子里发现有假的，刘瑾假借圣旨，将韩文罢官。韩文登程回家，刘瑾派特务在路上等候，企图半路加害。被韩文察觉，他不敢上驿道，住驿馆，骑骡宿野店才幸免于难。又如兵部尚书王守仁反对刘瑾，被打了五十大板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又派特务在路上跟踪追杀，王守仁只好在夜间假装投江自杀，保住了性命。即使官员罢官闲居，也整日提心吊胆。如左副都御史杨一清被罢职回家，后来朝廷又起用他，派人

去宣调，使臣刚到，他以为是特务打上门来，虚惊一场。刘瑾凭借武宗的宠信，利用内行厂、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打击镇压反对派，官员们的生死予夺全操在刘瑾这个特务头子手中。

内行厂、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平民百姓同样采取残酷迫害手段，如江西某县的几户百姓按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端午节竞赛龙舟，结果被以“擅造龙舟”的罪名斩首，理由是龙乃君王的象征，只有君王才能以龙饰物，老百姓造龙舟是僭用，故犯上杀头。三厂的特务爪牙伸向全国各地，被屈死的官民数以万计。不仅如此，刘瑾又创立酷刑，犯人不论罪行轻重，都要先实行杖刑，然后发配边疆永远充军，有的要戴枷发遣，枷重一百五十斤，犯人戴上没多久就被折磨死；平民百姓惧怕三厂的隶役就像回避瘟疫一样，只要见到衣着华丽，操着京师口音的人，就急忙避开；就是各级官吏，为了平安无事，也多方讨好贿赂。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因谋反罪被千刀万剐，凌迟三日，然后砍头示众，西厂和内行厂才被罢撤，而东厂保留如故。

天启年间（1621—1627年），魏忠贤专权，当时除了东厂拥有的千余个番子四处侦探外，京师里不少流氓无赖为诈取钱财或报私仇，也帮东厂侦探，将探听到的情况，向东厂的役长告密，然后东厂将“犯人”抓来当场审讯，如果没有证据，就向“犯人”索取一笔钱财，如拿不出钱来就要遭严刑拷打。三法司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拷讯重犯时，也必须有东厂的特务在那里监审，如果监审的特务未到，就不能开审。东厂的番子无孔不入，各衙门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哪些阴私，东厂都会知道，然后，情报送到东华门，即使深夜，提督东厂的太监也有办法进内宫，亲自向皇帝报告。

东厂对于魏忠贤的反对派官员镇压尤为残酷。许多正直官员被东厂隶役诬陷，强加某种罪名，逮捕后交锦衣卫的北镇抚司审讯拷打。如：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人联名上书

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指使其党羽诬告杨涟和左光斗等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当时，熊廷弼因与后金作战失利而入狱。魏忠贤借此，把杨涟、左光斗等六人逮捕下狱。凡与六人有关系的均被特务跟踪盯梢。如杨涟入狱后，特务马上监视他的亲属陈恳。在狱中，杨涟、左光斗等受尽酷刑，每五天被拷打一次，每次拷打均是棍、镣、夹杖等刑罚轮用，到后来审讯时，只能戴着桎梏平卧堂上，已经爬不起来了。六人中除一人自杀，其余五人全死于狱中，尤其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天启六年（1626 年）魏忠贤进一步制造冤狱，迫害南方知识界领袖人物，逮捕高攀龙、周顺昌等人。高攀龙投水自尽，周顺昌等六人惨死在狱中。又如国戚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特务发现他家中放着公主赏赐给的东西。魏忠贤诬陷李承恩偷盗皇帝坐的车辆，佩戴皇帝用的物件，被判了死刑。

老百姓对魏忠贤等阉党恣意横行也极为不满，难免发发牢骚，骂魏忠贤及特务们一二句，一但被东厂番子听见，不是被剥皮就是被割掉舌头，有的立即被砍头。

锦衣卫、东西厂特务机构的出现，是明朝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它不仅反映了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程度，也暴露了明朝统治者的独裁与残忍。厂卫特务机构发展成为镇压人民、党同伐异、祸国殃民的工具，也导致统治集团的分裂，削弱了明王朝的统治力量，是明王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德金）

参考资料：

《明史》卷 128、卷 137、卷 138、卷 304。

《明通鉴》卷 17。

《明史·刑法志三》、《明史·宪宗本纪》、《明史·武宗本纪》。

明代漕运

水运称作漕，漕粟以供京师或边军需求，叫作漕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利漕粟输京；元代定都燕京（北京），始创海运。明太祖定都金陵（江苏南京），四方贡赋，道近而易，转运军饷至辽东、北京，则专用海运。当时自京师达郡县，皆立卫所，以军隶卫，以屯养军，负责运送军粮的官军，即为卫所之军。命以武臣督海运，设漕运使，不久罢废。

成祖永乐初年迁都北京，漕运渐趋繁重，开始河海兼运。一由海运，以平江伯陈瑄充总兵，率领舟师海运，每年运米百万石，于直沽尹儿湾建百万石粮仓，在天津卫建城，戍兵万人。同时采纳户部尚书郁新言，使用淮河船只三百石以上者，由淮河及沙河运抵陈州颍岐口跌坡，另用巨型船只入黄河运抵河南卫辉府八柳树，再转赴卫河输往北京。时海运使用官军，其余皆由民运。

永乐四年，命平江伯陈瑄兼督长江、淮河、黄河、卫河漕粮转运。由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黄河决于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使会通河淤塞，漕粮北运，由淮入黄，运至阳武，再征发山西、河南两地民夫，陆运一百零七里，运至卫辉，由卫河转入白河至通州。这样需要陆路设置八处递运所，每次使用民丁三千人，车二百辆，辗转盘拨，道迂多艰，劳费甚巨，民困其役。而海运厄险，有覆没延迟之患，官民畏之。

永乐九年，济宁同知潘叔正上言会通河道长四百五十余里，

淤塞者占三分之一，若疏浚并通淤塞之处，不仅可免山东民众的转输之劳，实则国家也受惠无穷。成祖于是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以及都督周长主持此事，役山东六郡丁夫十六万五千人修浚会通河。同年六月，会通河贯通，以汶水、泗水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至济宁会合，设置天井闸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河，北流由新开河道人临清，总计三百八十五里。又修两淮运道，筑堤蓄潴，设坝障潮，自淮至临清增闸四十七处，以便利蓄泄。后又接受故老建议，开清江浦，引漕船直达卫河。至此运河重新贯通，南北运道三千里，总名为漕河，分别为白漕、卫漕、闸漕、江漕、浙漕，形成南起杭州北至北京纵贯南北的漕河系统。

永乐十三年，命都督贾议、尚书宋礼用舟师运粮。宋礼认为海船工窳辄败，乃造浅船五百艘，运送淮安、扬州、徐州、兖州粮食百万石，与海运粮数相当。陈瑄踵随其后，于湖广、江西制造平底船三千艘用来从河道运输，每年运粮五百余万石。当时的粮仓遍布各地，主要的有徐州、淮安、德州、济宁、临清、天津等仓，称作水次。以军民并运，即令苏州、常州、松江及江西、湖广、浙江民众运粮至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徐州、兖州民众运粮至济宁仓，然后分遣官军就近輓运，自淮安至徐州用浙江、直隶军，自徐州至德州用京卫军，自德州至通州用山东、河南军，名叫“支运”，每年四次，可运粮三百万石。从此海运、陆运全部废除，惟独留存遮洋船，每年从河南、山东等水边粮仓，兑粮三十万石，十分之二输人天津，十分之八由直沽人海输运蓟州。另外，苏州、松江（上海）、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所输白粮[1] 仍由民运人京。不数年，由于官军多有调遣，仍又恢

---

[1] 白粮：指五府所输运内府的白熟粳糯米十七万余石，各府部糙粳米四千四百余石，统称白粮。

复民运。

洪熙元年（1425年），始允许漕船附载物货。

宣德二年（1429年），陈瑄建议恢复支运，始令官民并运。于是江西、湖广、浙江民众运粮一百五十一万石于淮安仓，苏、松等地民众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等地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由官军接运入北京、通州二仓。

实施支运法，需要由民运送漕粮至各地粮仓，江西、湖广、浙江及苏州、湖州诸地距离京师遥远，漕河有洪闸、浅冻、风涛等阻碍，百姓又多不习惯河务，船只多有失陷，兼之往返时间长，动辄经年，既耽误农时，劳费又费于正供数倍，民多苦之。宣德六年，巡抚周忱与平江伯陈瑄奏议，漕粮改由民运至淮安、瓜洲（今江苏邗江南），兑与卫所，补给其路费、耗米，由直隶各省官军运载入京，是为兑运。兑运即兑换漕运，指军与民交易而言。其后河南所属民粮亦只运至大名府小滩，兑于遮洋船官军领运。官军兑运漕粮，由粮户按地区远近给官军耗米和经斋银。耗米多寡，以远近为差，每石漕粮湖广加耗米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加四斗。耗米以三分为率，二分付米，一分以他物准给。如果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输入仓，另外不愿兑运者则听任其自运。这是兑运与支运相并行时期。官军漕运既已加耗，又有经斋银作为洪闸盘拨的费用，兼之允许附载他物，遂皆乐从其事；而民也多以远运艰难，情愿支付耗米，因此兑运者日多而支运者逐渐减少。

正统初年（1436年），漕运粮食四百五十万石，其中兑运者二百八十万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者占十之三四。

正统十五年，更定湖广、江西、浙江漕粮加耗均为六斗五升，南直隶五斗五升，江北、扬州、淮安、凤阳四斗五升，河南民于萧县水次兑运者四斗，民自运至瓜州、淮安等处兑军运者三

斗。兑运时久，弊窦丛生。军与民兑米，往往强行勒索，耗米亦交纳官府，失去最初补贴漕运之意。另外漕米运到后，仓库主管觊觎耗羡，采用大斗量进的手法，且求多索，运军甚困。天顺八年（1464年），明令运军纳粮每石加耗五升，不得超溢，勒索者治罪。成化初年，国家听从督仓中官之言，每石加耗米八升。

天顺以后定制漕船一千七百七十只，官军十二万人，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后船数减少，一般受米七八百石。

成化七年，停止瓜州、淮安兑运，令官军雇船于江南水次交兑，民加过江之耗，即在原来加耗基础上每石再增加脚米六升。是年始定漕额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其中北粮（自山东、河南所输粮）七十万余百石，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所输粮三百二十四万余石。通计兑对改兑加以耗米，输入北京、通州两仓者，凡三百二十余万石。

后数年，又命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七百石之米，全部改为水次交兑，从此漕运悉变为改兑，即改良兑运之意，而官军长运，遂成定制。

官军长运之后，遂定立运船至京的期限。北直隶、河南、山东为五月初一日，南直隶为七月初一日，过江兑支者延长一月，浙江、江西、湖广为九月初一日。通计三年考成，违限者押运粮官贬谪罚俸。嘉靖年间又定立过淮期限，江北为十二月，江南为正月，湖广、浙江、江西为三月，崇祯年间又改为二月，并通缩至京期限一个月。

改兑之后，漕运弊端仍未消除。主管粮仓者多苛求索取，甚至有额外之罚，运军辗转称贷不支。漕粮人仓后，鼠咬霉变，又在所难免，官府尚增索极多之附加米，耗外之耗，叠床架屋，又公然取之于民。旅费及耗米，本就归于运粮的军人，反纳于政府仓库成为惯例，丧失本意已久。

自改兑法实行，粮皆军运，而白粮民运如故。船户之需求，

运军之欺凌，水手之挟诈，已使得运粮户不堪负担，且白粮船压于漕船之后，漕船悉数过后，河水已枯，雇船剥运，费更不赀。及至进京入仓，弊窦百出。嘉靖初期，民运尚有保全之家；十年之后大都不保矣。到明末白粮每正米七石要耗五升，费累百般，成为运粮户沉重的负担。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史·食货志》、《明史纪事本末·河漕转运》、《续通考》卷31、《春明梦余录》卷37。

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是一种内地用茶交易番马的制度，起源于唐代。明代茶法有三，称官茶、商茶、贡茶。其中的官茶，主要是指储存在陕西、甘肃一带，用以交换马匹的茶叶。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都金陵（江苏省南京市）后，为了出兵关外，所急需者首为马匹，所忧虑者是西陲诸番，因此非常注重边疆的茶马贸易，目的是通过以茶易马，“固番人心”，消弥隐患，巩固明朝的边防。

明初，太祖规定商人在产茶地买茶，须纳钱请引，方许出境货卖。若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许人告官人捕；其有茶引不相当者，即为私茶，与贩私盐同罪，“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奏准陕西汉中（今陕西省南郑）、金州（今陕西省安康）、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乡百姓每种茶十株，官取一分，民人所收之茶，官府出价收买。每五十斤为一包，两包为一引，令有司收贮以为易马之用。这项措施实为明代陕西收茶易马之滥觞。当时汉中茶园共计四十五顷七十二亩，有茶树八十八万四千余株。次年二月，又奏准四川巴茶依陕西汉中之例，官府岁计得茶九千二百八十斤。这是四川茶马贸易的开端。明太祖还诏令四川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

洪武初年，四川设有“四川茶盐都转运使司”，以兼管四川

全省的马政、茶法和盐法之事，在陕西则无统一管理茶马贸易的专职官员。洪武五年，朝廷在秦州（陕西省南郑）设立茶马司，置司令、司丞各一名，管理茶马交易事宜。洪武七年，又先后建立了河州（甘肃省临夏）、洮州（甘肃省临潭）、永宁（四川省叙永）茶马司。与内地进行茶马贸易的，大都是羌族、吐谷浑、藏族的后裔，最初茶马比价是一匹马换一千八百斤茶叶。茶叶的运输，在四川多采用“官运”和“商运”并行之法。官运，即是将交由河州等茶马司所贮茶叶，用运茶军夫，由四川、陕西都御、布政二司委官管运，四川军民赴四川、陕西交界处，交与陕西军夫，再转运各茶马司交收。商运，在明初是由邛州（四川省邛崃）、名山、雅安、荥径、天全五州商人运茶至打箭炉（四川省康定）。洪武四年于碉门百户所设茶课司，而于雅州城南置阜民司以专门收买番马。此后，邛州等五州县的商人就运茶到雅州，番商也以马入雅州易茶。官运和商运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官府组织军民或军夫将产茶地征课的茶押运至茶马司；后者则是由商人“赴产茶处收买茶斤”，自行雇脚运赴茶马司。陕西的茶叶运输，则是先由各州县大户将官课之茶自行雇脚解运到汉中府领银，再辗转至巩昌府（甘肃省巩昌），经过盘验后，复由递运所分途运至河、洮、秦三州茶马司。洪武六年八月，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奏称：自汉中运茶至秦州，“道远难致，人力多困”。迫使朝廷不得不改为即令汉中收贮，“渐次运之”。

在茶马贸易中，采用“金牌信符”的勘合形式。朝廷所制金牌刻有篆文，上为“皇帝圣旨”，左为“令当差发”，右为“不信者斩”。金牌共四十一面，分给洮州牌四面，河州牌二十一面，秦州牌十六面。金牌分上下号：下号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每三年一次，差京官选调边军捧金牌信符，运茶易马，收马给茶，称作“差发”。易得之马，除一部分直接分配给边军外，其余均送交苑监牧养。洪武初期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每

次运茶五十余万斤，获马三千八百匹。

洪武十六年，依河州例，秦州茶马司茶马比价为茶四十斤换上马一匹，三十斤换中马一匹，二十斤换下马一匹。洪武十七年，定乌蒙乌撒东川芒部马一匹给茶一百斤，洪武二十二年确定为上马一匹易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驹五十斤。

洪武初年实行茶叶由国家统购政策。明太祖钦令川陕产茶诸地：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若卖于人者，茶园没入官府。同时明令严禁私茶出境，如发现私茶出境，“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证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

洪武三十年，撤销秦州茶马司，改建西宁茶马司。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曾敕右军都督：近者私茶出境，茶马贸易减少。马价日贵而茶斤日贱，实为开启番人轻视我朝之心。太祖又手谕蜀王朱椿云：国家榷茶，本用于易马。现在边吏失职，私贩出境，只能交易毛布、毛缨之类的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人中国者日益减少，这样如何能制服戎狄呢？当时茶禁渐弛，私茶贩运渐趋活跃，朝廷不断颁布严禁私茶令，令官军严谨把守巡视，只要将私茶出境，即捕送官府治罪。这年驸马欧阳伦参与贩运私茶，明太祖亲自将其赐死。是年开始，月遣行人四员巡禁陕西河州、洮州和四川碉门、雅州等处“抚谕诸番”。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停止茶马贸易采用的“金牌信符”勘合形式。永乐中期，明成祖怀柔远人，茶价递增，因此卖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稍弛，私茶出境数量大增，以致碉门茶马用八万余斤茶，仅换得马七十匹，其中还多为老弱瘦羸者，不堪充为军用。故朝廷申严茶禁，又设甘肃茶马司于陕西行都司地。此后茶禁时严时弛，变换不定。

宣德十年（1435年），恢复自永乐年间停止的“金牌信符”，明宣宗朱瞻基还派遣三名御史分督茶马贸易。宣德十四年，蒙古

族人侵西部边境，羌族迁居内地，金牌丢失，同时茶司也以茶少为由，只用汉中茶斤易马，不再使用金牌信符，仅听其以马入贡而已。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罢用茶马金牌，只是派遣行人巡察各地茶马司。

成化三年（1467年），明宪宗朱见深派遣御史巡茶陕西。但是由于番人不愿意遣御史收茶，故所易番马日渐减少。成化七年，四川罢差行人，令按察司分巡官视察管理茶马贸易。十一年，陕西撤回巡茶御史，仍差行人兼令按察司官巡禁私茶。由于行人职轻，难以革除宿弊，十四年由都御史项忠奏准，仍旧差遣御史专理茶马，每岁一代，遂成为定例。巡茶御史虽然品秩不高（一般为正七品），但是由于其直接向皇帝负责，“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因此权力很大。

弘治三年（1490年），朝廷采纳御史李鸾的建议，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区收买茶斤，然后运送至原定茶马司，十分之六听其货卖，十分之四验收入官。这年西宁、河州、洮州三茶马司得茶共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平均每百斤茶易马一匹。

弘治十六年，明孝宗朱佑樘撤回巡茶御史，以都御史杨一清为督理马政之官兼理巡茶。武宗继位后，杨一清请开中茶，言招商买茶，官贸其三分之一，每年可获茶五六十万斤，易马万余匹。明武宗遂从其所请。

正德元年（1506年），采纳都御史杨一清的建议，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是年，廷议恢复“金牌信符”。自金牌信符废止之后，茶马贸易大受影响，以致番民过期而不至，“马数逾年而不完”。因此，当时许多官员都先后上疏乞复金牌信符之制。杨一清奏言：自金牌废止，私贩盛行，虽有抚谕巡禁之官，到底难于禁止，坐失茶马之利，已近六十年。长此以往，恐怕数十年之后，“虽近番亦不复知有茶马者”。虽然从成化至正德间不断有官

员上疏要求恢复金牌信符之制，但结果却因废止已久终难恢复。明武宗朱厚照宠信番僧，允许僧人例外携带私茶，自是茶法日坏。

正德十年，统一茶篦规格。长期以来，由于番人文化程度低，难以辨别秤衡，与内地人以茶易马时经常发生争执，官吏遂多采用以篦量茶的办法，但又因茶篦大小不一，有所不便，篦大则“官亏其值”，篦小则“商病其繁”。是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定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即以六斤四两为准，作正茶三斤，篦绳三斤。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御史刘良卿上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应凌迟处死。盖因西北边陲靠近诸番，番人依赖茶叶为生，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只有如此，才能制服番人，巩固边疆。是年，规定陕西三茶马司积茶只留两年之用，逐年易马，计该正茶之外，“分毫不许夹带”，如有私贩番马入境者，挈获马匹入关，犯人以通番例论罪。

嘉靖二十八年，御史刘仑请恢复金牌，更定为勘合之制。兵部核议后认为番族变诈无常，北狄抄掠不已，金牌容易散失，有损国体。嘉靖三十年，总督尚书王以旂说：金牌给予番人，本来是为纳马，意在得茶。如严禁私贩，“不抚自顺”，虽不给金牌，马也可聚集内地。若果私贩盛行，虽付给金牌，马也不会自来。兵部于是改造勘合分给诸番，每年“勘执纳马，酬以茶斤”。但此“改造勘合”已不再是“金牌信符”，而只是一般的勘合了。

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 年），俺答归顺，请开茶市。部议给茶百余篦，但不许其市马。万历二十年，西宁茶马司的马价为：上等马每匹三十篦，中等马每匹二十篦，下等马每匹十五篦，每篦正茶七斤。至万历二十九年，各茶马司每年易马的数目为：西宁三千二百匹，河州三千余匹，洮州一千八匹，甘肃一千匹，岷州（甘肃省岷县，万历间设置）一百六十匹，庄浪（嘉靖至万历

年间设）四百匹，总计九千六百匹，著为定额。

明代的茶马贸易，自洪武初年开始，与明王朝相始终。明中叶以后，奸商豪右与边关将吏相勾结，采取以私马窜易番马、冒支上茶等不法手段，利用茶马贸易大获其利，致使“上驷尽入商人之厩”，以获重利，茶马司所获仅为番人中下之马，弊窦丛生。虽然朝廷屡申茶禁，多次“修复”，但是茶马贸易与整个明朝形势相仿，总是每况愈下，日益衰颓。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史·食货志·茶法》卷70。

《太祖洪武实录》卷70、卷72。

《续文献通考》卷22。

《明史·职官四·茶马司》。

开中法

明代盐法实行榷盐专利的“开中”法。它源于宋元时代的“入中”，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创制的一种“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制度。朝廷可以根据边防军需，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应招商人必须将政府需要的粮食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贩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在指定行盐范围内销售，即为报中——守支——市易的过程，这套制度就叫作“开中”。明朝边镇军饷的来源有三：一为直省税粮，一为戍军屯粮，一为开中盐粮。开中法即是用以补军屯之不足，济直省税粮之穷。当时朝廷在全国各产盐区设立两淮、两浙、河间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等六个转运司和广东、海北、四川等七个提举司，各盐场分属其下，灶户生产的盐全部收归官仓。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 年）八月，征虏大将军徐达进驻大都，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洪武三年，诏令商人输米北平府仓，每一石八斗给淮、浙盐一引。洪武年间盛行大引盐，一引可兑盐四百斤，后来改为一引兑盐二百斤，垂为定制。同年山西行省言称：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河北省沧州）至太和岭（山西省代县北）路远费重，若令商人往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引，则可以节省转输费用而充实边储。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此建议，其后各行省边境，大多实行招商中盐，输粮于边，加强边备，“盐法边备，相辅而行”。

洪武四年制定中盐则例，输米至开封、襄阳、荆州、大同、孟津、北平、陈州、北通州等诸仓，计道里远近，每引输粮1石至5石不等，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朝廷编置勘合底簿，发放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人纳完粮食，书所纳粮数以及应支盐数，令其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商人贩盐有定所，无引支盐或越场支盐都算私盐，贩私盐者罪至死。除了用米中纳外，根据朝廷的需要，也可以用布绢、银钱、马匹等中纳，但以纳粟开中为主。

洪武七年，由于商人中纳盐粮，竞趋“价平”处所，因此户部奏定量减之法，即减轻输粮定额，以鼓励商人中盐。河东解(山西省解县)、蒲（山西省永济)、陕（河南省陕县）三州，平阳、怀庆、西安、凤翔四府，泽、潞、辽、沁四州，以及太原、大同、朔州、延安等仓，大都由初定三石或二石五斗，减为一石六斗或一石二斗不等。洪武九年，中书省奏请兰县、河州（甘肃省临夏）旧募商人入粟中盐，每引计米一石，道远费重，所以商人稀少，宜减少粮额，“庶边储可积”。于是命淮盐减米二斗，浙盐减米三斗，河东盐减少十分之四。

洪武二十五年，两浙运司上疏：商人赴温州各场支盐者，必须经涉海洋，然由于实行海禁，所司一概禁之，商人给盐不便。明太祖朱元璋谕令不得禁止商人过海支盐。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为了运送山西解盐入京，命令自绛州垣曲县壶关至淮安清河县白洋驿，共设立递所二十七处。为了方便开中商人，明朝廷为之筑路设驿，以至放宽海禁，水陆畅通，商民全都从中受益。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以北京诸卫粮食短缺，悉停天下中盐，专门在北京开中，只保存了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几年之后，京卫粮米充足，而边粮日益不敷，百姓疲于转运。于是诸卫所重新招商中盐，其他边地亦依次开中：

洪武、永乐年间，有些商人以运粮边境，道途险远，为了避免采购粮食的麻烦和减少运输的费用，往往自筹资金，自招游民，开垦边地，种植粮食，然后就地纳仓换取盐引。由于这种农业经营方式，是商人出资，农民出力，所以称之为“商屯”。商屯的优越性，在于有偿盐之利，无运输之苦，“坐当刍粮，以佐军兴”。

永乐以后，由于鞑靼、瓦剌族的相继兴起，北部边防紧张，急需重兵屯驻，报中地点逐渐集中到辽东、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宣化、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等九边地区。

明初定期开中，顺序守支。后来由于势豪占中，盐商持引来场支不到盐，挨掣有达数十年之久者，影响了边防军需的供应。宣德三年（1428 年），甘肃守将提出：商人有告已运米麦至甘肃中盐，初例淮、浙盐每引一斗五升，现在情愿按三斗交纳，以求不拘于守支顺序在淮、浙盐场支盐。由于甘肃边境军马浩繁，粮料用繁，朝廷由是准令加纳，仍然给榜招商中纳，如此则商人可以“不拘次支盐”，朝廷则通过加纳提高盐价，“居货罔利”。

宣德五年，户部再次调整中盐则例。当时议定：京仓，云南安宁等井盐每引米五斗；宣府卫仓，淮、浙盐每引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二斗；山海卫仓，淮、浙盐每引三斗五升，山东、福建每引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四斗；甘肃卫仓，淮、浙盐每引豆麦四斗；宁夏卫仓，灵州盐课司小盐池盐每引米麦四斗五升；独石卫仓，淮、浙盐每引二斗五升，山东、福建、河东、广东、四川盐俱为一斗五升，云南安宁等井盐三斗。这次所定的则例，较之以前上纳粮食进一步减轻，各场引价也更趋于一致。宣德七年，由于各处总兵官纷纷请求招纳米实边，户部遂重新拟定边境中盐粮则例。经过两次调整，明前期中盐则例基本稳定了下来。

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 年），宁夏总兵官史昭看到边防军缺少马匹，而延庆（属北京）、平凉一带的官吏、军民多饲养马匹，于是奏请纳马中盐，上马一匹给盐一百引，次马八十引。最初是验马给盐，即而令商人纳银于官府用于买马。但后来因屯粮、修边等也辄转使用此项银两，“银尽而马不至”，边储日渐匮乏。于是重新招商中浙、淮、长芦盐以纳之，其中淮盐占十分之七，浙盐占十分之三。由于淮盐价格较贵，商人多趋之求利，所以令淮、浙盐二者兼中。

宣德年间，由于势豪占中，商人支盐日趋困难，一度影响了边防军需的供应。当时往甘肃运粮的商人就提出，初例淮、浙盐每引一斗五升，现在愿按三斗交纳，以求得不拘守支顺序在淮、浙场支盐。由于甘肃边境军马浩繁，粮料用多，朝廷于是准令“倍价开中”，仍给榜招商中纳。到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 年），朝廷正式设置了“常股”、“存积”之目，规定以额盐之八分给守支，叫作“常股”，即商人先纳边粮后给引目，守场候支，常年支盐；以其余二分收贮于官，叫作“存积”，即积盐在场，遇边粮急缺，就加价开中，将盐越次放支。常股、存积之设，最初仅限于两淮盐场，以后又推行于两浙、长芦盐场。凡中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但由于商人苦于守支经年，争趋存积，常股由此更加壅滞，至景泰年间存积增至十分之六。

中盐条例规定，贩盐有指定区域，如果盐与引分离，即以私盐论罪。天顺初年，广东之盐开始越境在广西境内贩卖，巡抚叶盛认为，如果任其越境市盐则“法废”，一味禁止则“病商”，于是提出“入米饷边，乃许出境”的变通办法。朝廷根据这一原则，日渐放松了不准盐商越境销售的禁令。

早在正统年间，御史张斐就曾上疏，请以劝借的形式在两淮盐场实行余盐买补。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 年），朝廷正式下令，准允盐商在本场买补余盐。至弘治二年（1489 年），盐商

已被允许越场买补。全国各盐区余盐开禁的时间不一，大致都在成化、弘治前后。继余盐开禁之后，又出现了残盐（势豪用旧引购买的余盐）、零盐（各年开中未尽之盐）、所盐（又称攀余盐，即堆积在所之盐）、割没盐（没收的走私余盐再卖）、工本盐（以割没盐银给灶户充工本所收之盐）等各种名目，它们大都是余盐的变种。

成化年间偶有中盐纳银的情况。弘治五年，正式推行开中折色。当时，户部尚书、淮安人叶淇，与盐商多有交往，听盐商诉说商人赴边，纳银既少又有长途跋涉之苦，若改为在运司纳银，则价高而朝廷可得厚利，深以为然。在内阁大学士徐溥的支持下，户部遂改招商纳银于运司，解太仓银库收贮，分送各边购粮。商人每引输钱三四钱不等，省去长途运粮之苦，所以趋之若鹜，一时间太仓之银，累至百余万。自洪武迄至弘治年间，开中制度盛行百有余年，对明朝国防和边疆开发，一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叶淇变法，纳银开中，虽然使国库增加了大笔现金收入，却直接摧毁了商屯，影响了边疆卫所的粮料供应，因而此后不断遭到朝臣们的反对和抨击。

弘治十九年，诏令减少存积之数，为常股七分，存积三分。然而盐商苦于守支，乐于早日支盐，报中存积者争先恐后，于是又增至六分。由于淮、浙等主要盐场的贮盐被势豪请乞一空，而且存积法行，常股大壅，中存积者超过盐场的贮盐量，朝廷只得允许越场支盐，淮、浙盐不足，以长芦、山东盐支给，支盐的地域界限随之被打破，出现了专以售引报中为业的边商和专以守支贩盐谋利的内商。由于存积增多，加之余盐开禁，开中折色等的出现，内商之盐不能迅速获得，边商之引又不肯低价出售，报中制度日趋寝息，存积变得与常股同样壅滞。

明武宗正德初期，以盐法日坏，令大臣王琼、张宪等人分道清理。旧例中盐，户部出榜招商。此间却有庆云侯周寿、寿宁侯

张鹤龄各令家人奏买长芦、两淮盐引，户部尚书韩文认为不可，武宗却下旨应允。织造太监崔杲又奏讨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武宗欲全数应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极力劝阻，遂从户部所议半数给之。王府、权要开中既多，又允许购买余盐，一引有用至十多年者。正德时期，权倖奏开余盐，将存积、常股全部改为正课，而且折银纳中，致使商人无利可图，多不愿中，边备空虚，缓急无可凭恃。

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年），采纳给事中管律奏言，恢复常股、存积四六分之制。然而是时，正盐守支日久，愿中者少，余盐即时支卖，愿中者多。自弘治时期以余盐买补正课以来，初期用以偿清拖欠的盐课，后令商人纳银输部以济边。嘉靖间陕甘、辽左用兵颇多，乃尽发两淮余盐七万九千余引于两边开中，自此余盐盛行。开始尚无定额，未久则两淮增引一百四十余万，每引增余盐二百六十五斤，引价为淮南纳银一两九钱，淮北一两五钱，朝廷同时又设处置、科罚等名目，来苛敛商财。于是形成正盐未派，先估余盐，商人、灶户全都受困。奸商刁民又借口买卖余盐，私煎私贩。朝廷虽然严申禁止私煎私贩，但并无收效。

嘉靖十六年，给事中管怀理言，盐法之坏其弊有六：开中不时，米价腾贵，难以招籴；势豪大家，专擅利权，难以报中；官司科罚，吏胥侵索，难以输纳；下场挨掣，动以数年，难以守支；定价太昂，息不偿本，难以赢利；私盐四出，官盐不行，难以销售；正课壅滞，以余盐解决困窘，余盐利厚，商人固然乐从，然而不以开边而以解送太仓银库，“虽岁入钜厅，无益军需”。

嘉靖二十年，明世宗敕令停止收买余盐，淮、浙、长芦盐场恢复旧法，夹带私盐者割没入官。御史吴琼又请各边中盐者皆输本色。然而敕令刚刚颁布，吏部尚书许讃随即请求再开余盐买补，以足边用。户部复议从之，余盐买补再次盛行。

嘉靖三十二年，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为定额，正盐、余盐合而为一，革除余盐之名，当时都御史王绅、御史黄国用议：两淮灶户余盐，每引官给银二钱，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万引，名为工本盐。令商人中额盐二引，带工本盐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万六千余两。部复议听其所请。当初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引，开边报中为正盐，后增加余盐纳银解部，加上前额共一百零五万引，增加数额达三分之一。行之数年，积滞无所售。朝臣屡次奏言工本盐为盐法之祸患，户部以国用不足，年例无所出，拒绝取消。

自从弘治年间叶淇变法，边储多缺。嘉靖八年以后，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工本盐推行之后，内商有数年不得掣盐者，故多不乐于买引，正盐壅滞加甚，遭受打击最重的是边商。边商负担输粟报中的重任，关系到开中制的存废与边防军储的盈虚，朝廷为优惠边商，应其要求起掣河盐。河盐即沿河径自超掣之盐，具有不上廪囤、径自超掣、易支、获利快等优点。嘉靖四十年，正式规定河盐与淮盐相兼秤掣。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 年），屯田都御史庞尚鹏言：边商报中，内商守支，二者本为相互依存。但由于内商安坐获利，边商远道运输，二者劳逸不均，所以起掣河盐优惠边商。然而河盐起掣后，旧引更加壅滞，造成了“内商无所得利，边商之引不售”，不但没有达到挽救边商的预期效果，反而使守支积存者愈久，新、旧引俱滞，内、边商皆困的局面。

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正式推行纲运制。所谓纲运就是把零销分运的内商组织起来结纲运行，一方面把积累下来的旧引疏请，另一方面又把新引同时出售，达到既解救内商，又照顾边商的目的。为了保证如期完成疏理任务，规定了引窝的世袭权，由盐院编为纲册，以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十字编为册号。凡是纳过余银，资金雄厚的内商都分别被编入十个商纲运销，不入纲者都没有售盐的资格，而一旦取得了

这一资格即可永远世袭。纲运制本是为疏理新、旧积引，挽救开中危机而设，但其演变的结果却是最终取代了开中制度，而专以输粟报中为业的边商也随着开中制一同归于消亡。

（江晓敏）

参考资料：

《明史·食货志·盐法》、《清盐法志》卷289、《续文献通考·征榷三》、《皇明两淮盐政编》卷4。

徐光启与《农政全书》

中国疆域辽阔，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十分发达。在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一直到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以农业为本，广大的劳动人民勤奋耕作，在长年的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有着许多有关农业的创造发明。同时，历代有不少有知识的学者，致力于农业生产的研究，对劳动群众的发明创造和生产经验加以研究分析，整理总结，写下了许多农学巨著。在汉代，有《汜胜之书》问世；在北魏时期，有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宋代，有陈旉的《农书》；在元代，有王祯的《农书》。

到了明代，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农业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便有反映新时期农业生产的新水平、新技术和新经验，全面总结古今农业生产知识的新农书的问世，这就是明末著名农学家徐光启所编著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商人兼小地主家庭，较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对农事活动的接触又为他以后写作《农政全书》打下了基础。

徐光启的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家境比较清贫。父亲经商失败，带着母亲、妻子在家务农，种植蔬菜、棉花，过着淡泊的生活。徐光启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爱好农事活动，学习之

余常到菜圃、农田帮助锄草、松土、间苗。万历九年（1581年），徐光启到家乡附近的金山卫应试，一路上，他无心浏览山湖风光，而是注意观察、访问沿途农家的各种生产劳动情况和经验，还特地到松江乌泥泾瞻仰黄道婆的祠庙——黄母祠，表达了他对这位教育农民纺纱织布的劳动妇女的敬仰。这次应试，他考中了秀才。从此，徐光启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是，他参加三次乡试，均以落第告终。为了谋取生计，徐光启只好在家乡讲学授徒，做了教书匠。在授课之余，他把对农业知识的兴趣，用到阅读《齐民要术》、《农桑辑要》之类的古代农书上，把所学到的知识，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改良植棉技术，还试种北方芜菁（又名大头菜），均取得良好的效果，由此，徐光启也获得了大量农业知识。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十五岁的徐光启再次参加乡试，结果以乡试第一名的成绩送走了他的青年时代。这一时期，徐光启虽然还没有担任什么官职，还是个教书匠，但是因社会地位（主要是功名）的改变，交游越来越广，外国传教士亦在其交往之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来到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席交谈，遂成知交。双方都十分佩服对方的学识与远见，也大大打开了双方的眼界。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当徐光启再度来到南京时，他便由利玛窦洗礼，加入了天主教。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考中了进士，成为翰林院的庶吉士，全家迁居北京。徐光启原以为到了翰林院，便可以施展抱负，报效朝廷。他对国家政治的弊病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意见，但是万历皇帝沉溺于酒色，朝事不理，听不进任何意见。

正在此时，利玛窦已到北京觐见过皇帝，并获准在京城居留传教。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开始，徐光启便和利玛窦密切交往，向利玛窦请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徐光启痛切地感到

中国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和儒学的影响下，死记经书教条，学术空疏，轻视实学，脱离实践知识，一心只想升官发财，导致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落后。于是他决心把所学到的西洋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便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在翻译过程中，徐光启虚心地听利玛窦的讲解，认真细致地绘图、笔记，反复订正修改，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定稿刻印出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翻译的西洋数学用书。此外，徐光启还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两部应用几何学著作。徐光启还单独翻译了水利科学著作《泰西水法》。

天启年间，魏忠贤等阉党专权，徐光启因与魏忠贤政见不合，被罢官闲居。崇祯皇帝即位后，徐光启东山再起，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不久又被提升为礼部尚书。这时，徐光启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他壮心不已，建议开设历局，修订历法。崇祯皇帝听取了徐光启的建议，任命他为监督，聘请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共同修订历法。在修订历法的工作中，他作风严谨，遇有差错，必查明原因，并亲自参加观测、验算等具体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劳动，终于编成了一百多卷的《崇祯历》。

但是，作为一名著名的的学者、科学家，徐光启的重要功绩不只是介绍西洋科学知识和修订历书，更重要的是他编写了《农政全书》，用科学的方法，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并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为一部总括农家诸书的农业科学巨著。

徐光启作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他看到了明朝末年政治的腐败，国家力量的衰落，曾经提出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农业是衣食的来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指出：一定要以务本（农业）来使国家富足。他对封建政府当官的不治理农政，儒士

不讲论农学，百姓不能专于农业的现象异常不满，因而积极提倡“农本”思想，注重农业知识，并亲自种植农作物，探索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农政全书》的编纂，可以说反映了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也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以毕生的精力，察地理，辨物宜，考之载记，访之土人，甚至亲自执耜耕植，最后才编纂成书。

《农政全书》大约创作于天启五年（1625年）至崇祯元年（1628年）之间。徐光启生前未能及时刊印，直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才由陈子龙等增删整理刊行。全书共计六十卷，约五十万字，分作十二门，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事、开垦、栽培、蚕桑、牧养、酿造、造房、家庭日用以及荒政等方面，其中以“开垦”、“水利”、“荒政”等为全书重点，约占全书二分之一的篇幅，而在这三门之中，又以“荒政”所占比重最大（卷四十三至卷六十），这又与明末许多地区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是分不开的。

《农政全书》内容丰富多彩，可以说集古代农业知识之大成。它总结了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经验，辑录了有关农业理论和政策的资料，具体介绍了关于水利工程、农业工具的形制和使用方法，以及各种谷物、蔬菜、果树、桑、棉、麻等作物的选种、栽培方法，还有关于牲畜的牧养、食品的加工，以及消灭虫害、荒年赈灾等无不详录备载，议论精到。

《农政全书》的主要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总结，既辑录了古代三百多种重要的农业文献，又及时地总结了明朝当代农家以及徐光启本人的农业实践经验，使一些传统的农田园艺知识和从实践中获得的新经验得以流传推广。在辑录农业文献资料方面，除汇集历代重要典册之外，更注意搜集明人的著作，如沈一贯的《山东营田疏》、吴严的《兴水利以充国赋疏》等等。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方面，

他把自己多年观察研究的成果也加以记述。如对农业的用水五法，逐点陈述；对如何消灭蝗虫、确保粮食丰收方面，他详尽地叙述了自己观察所得的蝗虫成长规律，以及消灭蝗虫的基本方法。

注意提倡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广。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以前更为普遍，《农政全书》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如对棉花的种植记载特别详细，从选种、种子贮藏、播种期、施肥技术、行距等，总结出一整套栽培技术理论；再如种植乌桕可以提取桕油，种女贞可以制取白蜡，并说明它的价值远远高于一般树木，在书中也作了详细记录；又如茶叶，是民生日用的必备品，且已经销售国际市场，书中详细论述了有关茶叶的品种、采取、制作以至收藏、饮用等方法。

《农政全书》还宣传了改造自然条件的思想，反对保守观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写道："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回天，况地乎？"意思是说，人有回天之力，可以使土地由不适宜作物生长变为适宜农作物生长。他反对那种凡种植农作物及植物都要用本地品种，否则风土不宜，难于存活的保守思想。他还引用实例作为有力证据，他说棉花由外国传人，中国普遍种植，成为普通平民的衣服之源；甘薯由外国传人南方，在北方也得到推广，并且获得丰产。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此理。"他的科学推论，对于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认识主观能动作用是有启发作用的，也有助于人们从事实践和探索。

总之，《农政全书》是一部"考古证今，广咨博讯"的农业科学名著。它是徐光启一生刻苦钻研、亲身实践而获得的丰硕成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崇祯六年（1633年），七十一岁高龄的徐光启病逝于北京。

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徐光启在科学领域的许多建树，将永远流传下去。

（戴柏俊）

参考资料：

《农政全书》、《中国科技史》。

《徐霞客游记》之成书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京常州府江阴县（即今江苏江阴县）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终年五十六岁。

徐霞客祖上世代都是大地主，因而使他能够结交当时的许多名流学者，从小接受良好的封建教育。家中藏书丰富，使他有机会博览古今史籍、舆地志、山海图经等书籍。他自幼聪慧过人，过目成诵，落笔成章。青年时代的徐霞客，曾想走科举之路，由于应试不第，从此不求仕宦，专心读书。对于古人的轶事传说、金石碑文等，无不观览。对于涉猎历史、地理、游记一类书籍，最为喜欢，而且越读越多，兴趣愈来愈浓，徐霞客深深被书上所描绘的壮丽山河所吸引。同时，他也发现过去的山经、海记、地志中的一些记载，由于缺乏实地调查，错误不少。于是徐霞客决心走出书斋，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进行实地考察，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友人说："大丈夫应该朝游碧海，暮到苍梧，怎么能一辈子局促于海疆一隅！"从二十二岁起，徐霞客就外出旅行，踏上长期而艰苦的野外考察的征途。

徐霞客的抱负深得母亲王夫人的理解和赞许，她鼓励儿子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哪能像藩篱中的雉鸡，车辕下的马驹一样，整天只知道围着家转！"在徐霞客初次出游太湖的时候，她还特地为儿子缝制了"远游冠"，以壮行色。此后，徐霞客每次

出游，都算好旅程，预定日期，按时返回。每次远游归来，徐霞客都带一些各地土特产品孝敬母亲。徐霞客家庭生活虽然优裕，但王夫人生性勤俭，喜欢干一些下人干的活。每一次，王夫人总是坐在豆棚下，一边织布，一边仔细听着儿子倾谈旅途中的种种新鲜的见闻和惊险的经历。每当听儿子讲完，王夫人总是喜形于色，欣慰地对徐霞客说："你每次外出爬山涉水，我坐守在家中，看着豆荚一天天长大，望着天际飘荡的白云，秋天到了，知道远方的游子要回家了。听着你介绍新鲜的旅途见闻，真叫人惊喜赞叹。比起那些碌碌无为的庸人，你也算问心无愧了。"王夫人除口头支持徐霞客远游外，还于七十三岁那年和徐霞客一起游历了荆溪、句曲二地。王夫人的衷心支持和劝勉，更坚定了徐霞客的信念，使他以坚强的毅力，持续三十几年，历尽千辛万苦，周游了祖国大江南北，遍览名山大川，开拓了胸怀，增长了见识，并在科学考察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出旅行，交通诸多不便，特别是访名山，探幽洞，必须爬山涉水，披荆斩棘，得穿过崎岖曲折的羊肠小道，甚至得攀登悬崖峭壁，穿越深邃洞穴，常常置身于荒野险僻之处，出没在深山老林之中。夜里无处投宿，只好栖身破庙荒刹，有时甚至睡卧在大树之旁、山石之边。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泉水，没有粮食就以草木野果充饥。真所谓风餐露宿，不畏虎狼，不避风雨，不惧艰辛，充分表现了他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意志。为了探寻山川岩壑的奥秘，弄清山脉的走向、河流的渊源，在考察中，他登山必达顶峰，探洞务尽幽邃，真正做到了穷本溯源、刨根究底。这一切，都是为了一部《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克服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绝壁所带来的困难，那些可怕的传说和他亲身遇见过的毒蛇巨蟒，他把在旅行考察中的种种惊险经历，都详细地记载在《徐霞客游记》里。

在游黄山时，他是这样记载的：山峰陡而高，山崖积雪很

深，背阴处还结了冰，溜滑难行。徐霞客就用手杖凿成洞，凿出一个洞，跨上一脚，再凿上一个洞，再跨上一脚，就这样一步一个洞地向上攀登，直至登上峰顶。在游云南石房洞时，徐霞客只身攀登陡峭的山坡，山坡上的岩石和表土风化松动，使劲攀援则容易脱落，随时有滑落山崖的危险。他只能寻找比较坚固的岩石，身体紧贴岩石，紧绷脚跟，像是挂在墙壁上似的，缓慢移动，使尽全身力气，拼命攀登爬行，好不容易才爬到洞口。

在旅途中，还经常有遭受强盗抢劫，甚至被杀害的危险。但徐霞客坚韧不拔，不折不挠，勇敢顽强地按原计划到各地考察。

徐霞客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二十二岁开始一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 年）五十五岁为止的三十四年中，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达云南腾冲，北至河北蓟县（今天津市蓟县）的盘山，南抵广东罗浮山，遍及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十七个省区。徐霞客还曾计划去缅甸旅行，可惜未能实现。

徐霞客一生的游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万历三十五年至崇祯八年（1635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每次出游的时间较短，所游地方均为交通便利之处。崇祯九年（1636 年）到崇祯十三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他远游的阶段，在外长达四年，他从浙江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至云南，然后由云南经四川后返回故里。徐霞客在广西和云南旅行的路线最长，考察的地点最多，这一阶段的游记也最有价值。

徐霞客早年的旅游，主要是登名山，游古迹，偏重于搜奇揽胜，诸如泰山、嵩山、华山、恒山、黄山、五台山、盘山、庐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夷山、罗浮山以及九鲤湖等名山大川均有他的足迹。

徐霞客的旅行考察生活十分艰苦，他不避风雨，不畏虎狼，

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许多所至之处皆为人迹罕至的穷山僻壤。在旅途中，曾两次遇盗，四次绝粮，数次出生人死，几度陷人绝境。但是，徐霞客仍然百折不挠地进行科学考察。而更能显示徐霞客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的行动，是他在旅行中，能坚持用日记的形式，把每天的考察情况和心得见解详细地记录下来。不论白天如何劳累，环境如何艰苦，徐霞客的著述从未间断。即使露宿野外时，他也点燃松枝在火把下坚持写作。正因如此，《徐霞客游记》才得以今天与我们相见。

《徐霞客游记》全书分为十卷，卷又分上下，实际可看成二十卷，约四十万字。游记写得文字质朴，不加雕饰。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称之为“世间真文字”，是一部以清丽新奇的散文体裁写成的科学文献；既是文学名篇，又是重要的地理学文献。

《徐霞客游记》更高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部科学巨著，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西南和边疆地区的考察记录或专题论述，特别是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记载，内容丰富多采，记述翔实精确，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世界第一部详细描述和研究石灰岩地貌的重要文献。

《徐霞客游记》的自然地理内容十分丰富。在河流水文的观察和推断方面，徐霞客认为河床坡度的大小与河流距海的远近有关，河源发源地的高度相等，但离海远近不同，坡度有显著的差异。《徐霞客游记》还论说了地下水压力的原理，认为泉水向上喷出，是由于它的上游有一个较高水头的推论，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

《徐霞客游记》还记述和论证了河流的侵蚀作用。徐霞客不仅认识到河流冲蚀两岸的作用，可把山岭 侵蚀成崖壁和岬角，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河流的急流向凹岸侵蚀，使崖壁崩坍，而凸岸则流速较缓，地势较平。对于不同地区的岩石性质，《徐霞客游记》也作了描述。第三纪红色岩系在江西、湖南等省分布比较

普遍，其中砾岩、砂岩和页岩往往交互成层。页岩容易遭受侵蚀、剥落掏空，形成许多岩洞和石梁。砾岩和砂岩也有自己的形状、质地和颜色。《徐霞客游记》对江西、湖南地区的岩石性质也有较详细的描写。

《徐霞客游记》对一些特殊的地质地理现象也有记载，对于硫磺矿、喷泉等均有较详细的记录。

《徐霞客游记》最重要、最有地学价值的内容，是对中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描述和研究。在这本游记中，徐霞客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描写和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石灰岩地貌在国外被称为"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岩石坚硬，不像花岗岩那样容易风化形成土壤，但却容易被水溶蚀。溶蚀作用和伴随的机械作用使岩石裂变成许多峻峭的山峰，叫作峰林或石林，因而形成美丽奇特的自然风景区。徐霞客对这一地貌特点作了生动逼真的描写，如"铮铮骨立"的石山和"攒出碧莲玉笋世界"的峰林；又如"坠壑成井，小者为智井，大者为盘洼"的圆洼地，以及各种幽邃曲折的石灰岩溶洞等等。所有这些记载，都足以说明徐霞客不但是中国有计划有系统从事这项工作的首创者，而且是世界上研究石灰岩地貌的先驱者。《徐霞客游记》也是我国甚至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石灰岩地貌的科学文献。

此外，徐霞客对浙闽地区动植物、蝴蝶泉的物候和积雪、云南湖泊的分布等各种记载，也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

《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除了丰富的自然地理之外，对于沿革地理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又是研究西南地区水道的重要参考资料。

《徐霞客游记》有关人文地理的内容也不少，对于西南地区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民族分布、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记载。

《徐霞客游记》填补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大部分不毛之地，因控制在西南土司之下与中原交往甚少而留下的山川形势、气候、植物、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空白。《徐霞客游记》还打破传统地理志书缺乏系统描述岩石、水文、植物、气候等各种自然地理现象的框框，揭示了各种自然地理现象的内在因素和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徐霞客游记》不是书斋的产物，也不是考证资料的结果，而是野外考察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在当时，地理学的各个学科还处于萌芽状态，又无任何仪器可以借助的情况下，徐霞客只是根据个人观察所得而作的推论竟和近代科学原理大体符合，是值得称道的。

《徐霞客游记》在徐霞客生前未及整理成书，这对徐霞客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在徐霞客于崇祯十四年去世后，此书方由他人整理成篇。最早的抄本是崇祯十五年（1642 年）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的稿本。后来，徐霞客的家乡遭受清兵洗劫，加以辗转传抄，原稿缺失很多。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徐霞客族孙徐镇才将其刊刻成书，这是最早的刻本。

到《徐霞客游记》刊印成书，距离徐霞客去世已有一百三十五年了，原稿已所剩无几，这是十分可惜的。

幸喜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实在不愧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至于徐霞客，在中国历史上，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条件下，不出于任何政治目的，也不出于任何宗教企图，纯粹以考察自然为目的，毕生从事旅行事业，徐霞客可以说是亘古第一人。

（戴柏俭）

参考资料：

《徐霞客游记》。

女真之统一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建州女真的后起之秀努尔哈赤，以祖父留下的十三副遗甲起兵，进攻仇人尼堪外兰，从此揭开了女真统一的历史帷幕。

自金亡以后，女真一直处于互不统属的状态中，进入内地的女真人逐渐汉化；留在东北的女真人，其主体被元统治者分为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和孛苦江等五个万户府，隶属于辽阳行省的合兰府水达达路。明初，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以北，牡丹江、绥芬河流域；海西女真分布于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分布于黑龙江、库页岛等地。女真三部中以建州女真发展水平最高。

建州女真是女真三部的核心，而建州三卫又是建州女真的核心。

建州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建州卫设立于永乐元年(1403年)。这一年元胡里改万户的世袭万户阿哈出等人来南京朝贡，明朝便设立了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由于阿哈出的推荐，明朝遂派人去招谕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于永乐二年来到南京，被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永乐十四年，明廷又设建州左卫以处之，称“建州左卫指挥”。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阿古在迁徙途中受到忽刺温(属海西女真)的袭击而死去。到了正统七年(1442年)，猛哥帖木儿的异父同母兄

弟凡察(宣德八年升都指挥使)和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叔侄二人争夺卫印,明朝只好分设建州右卫,令董山掌管左卫,凡察掌管右卫,最终形成了建州三卫。三卫几经迁徙,到正统年间定居于浑河上源苏子河流域(今辽宁省新宾一带)。

大约过了一百多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一个“凤眼大耳,面如冠玉”的婴儿在建州左卫的一个奴隶主家中诞生了。他,便是努尔哈赤,祖父叫觉昌安(明人称为叫场),父亲叫塔克世(明人称为塔失),论辈分他该是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在家中居长,下面有四个弟弟。在他长到十岁的时候生母不幸死去,“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十九矣,所得家产独薄。”为了生活,他只好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上进行贸易,能够经常接触汉人。他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

早年家庭的不幸,生活的艰辛,阅历的曲折,不但没有难倒努尔哈赤,反而使他从中磨炼了意志,增广了见识,提高了能力,积累了经验,为他日后成就那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作了必要的准备。

万历初年,是女真人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由于内部争战以及与明朝之间的战争,女真各部进一步分裂,形成了若干割据自立的集团:建州女真包括“建州五部”和“长白山三部”。“建州五部”包括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栋鄂部、哲陈部、完颜部;“长白山三部”包括鸭绿江部、朱舍里部、讷殷部。海西女真分为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四部,号称扈伦四部。野人女真分为窝集、瓦尔喀和虎尔哈等三部。当时“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各部蜂起,群龙无首,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机会;而互相战杀兼并,差不多是北方少数民族走向统一的必要方式。努尔哈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

万历十一年二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在苏克素护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出兵镇压建州首领王杲之子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为救孙女，又想劝说阿台投降，便来到了阿台的驻地古勒寨（今辽宁省新宾境内），因伫候时间较久，塔克世也进寨探视，父子双双被围困寨中。李成梁指挥军士连攻数日，最后尼堪外兰用计骗开寨门，阿台被部下杀死，合寨投降。李成梁不分男女老幼，将他们全部杀死。混乱之中，连忠于明朝的觉昌安和塔克世也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惊悉父祖蒙难的噩耗后，悲痛欲绝，便前去责问明朝边吏。为了偿报努尔哈赤父祖的冤死，明朝授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由于无力兴兵攻明，便将一腔仇恨倾泻到尼堪外兰身上。这一年（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今辽宁省新宾汤图附近），尼堪外兰弃城逃走。

不久，努尔哈赤用计灭掉了苏克素护河部的萨尔浒。本来，该城城主诺米纳曾与努尔哈赤建立同盟，约定在攻打尼堪外兰时采取一致行动。但是后来见明朝有意扶植尼堪外兰，诺米纳便背盟失约，而将起兵计划密告尼堪外兰，使尼堪外兰得以逃脱，所以努尔哈赤对诺米纳十分恼恨。正巧，诺米纳派来使者，约努尔哈赤同去攻打巴尔达城。但诺米纳为保存实力不愿打头阵，努尔哈赤便提出借用他们的盔甲，由自己去打前阵。诺米纳不知是计，欣然同意。努尔哈赤得到诺米纳的器械、盔甲之后，一声令下，将诺米纳及其弟弟杀死，很快夺取了萨尔浒城，从而为控制苏克素护河部乃至统一建州女真奠定了基础。

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开始攻打栋鄂部。在进攻该部的翁科洛城时，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第一次攻城时，努尔哈赤被城中的勇士鄂尔果尼、洛科连连射伤，但仍坚持战斗。后因流血过多昏厥过去，不得不停止攻城。伤势痊愈以后，再次攻打该城，

破城以后将鄂尔果尼、洛科二人双双俘获。部下建议杀了二人以解前日箭射之恨，努尔哈赤不但没有杀此二人，反而亲自为他们松绑，并授为牛录额真。①

万历十三年，努尔哈赤与五城联军大战于浑河畔。他弯弓跃马，挥刀砍杀，身先士卒，威震敌胆，终于以少胜多，打败了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八百多人。第二年乘胜征服了浑河部。

至此，努尔哈赤起兵业已三年，虽然攻城夺寨，连连取胜，但大仇人尼堪外兰尚未就擒，复仇的烈焰在他胸中一直熊熊燃烧着。万历十四年七月，努尔哈赤听说尼堪外兰业已被明军保护起来，便向明朝边吏索要。明朝看到努尔哈赤势力日渐强大，尼堪外兰大势已去，留着这个傀儡反而累赘，就决定抛弃他。于是努尔哈赤便派斋萨率四十人去索取尼堪外兰，割首以归，献给了努尔哈赤。从此，努尔哈赤完全控制了苏克素护河部。

当统一建州女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五年正月在费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永陵镇）修建城垣，建造宫室，申严律令，自称淑勒贝勒（贝勒，汉译为“王”)。此后，统一建州女真的进程更加迅速，万历十五年下半年灭掉了哲陈部。万历十六年四月栋鄂部完全归附，九月灭掉了完颜部。万历十九年正月吞并了鸭绿江部，万历二十一年征服了朱舍里和讷殷部，这样从万历十一年到十六年统一了建州五部，到万历二十一年统一了包括长白山三部在内的整个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崛起，必然会与同样强大的海西女真发生冲突。海西四部中以叶赫最为强大，虽然曾多次遭到明军的打击，但是实力仍颇为可观，乌拉、辉发等部都是它的盟友。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刚愎自用而又野心勃勃，他不甘心努尔

① “牛录额真”为满语。牛录，后来又称佐领，是八旗制度下的最基层组织；额真，意为“主”。牛录额真，是管理一牛录之首领。

哈赤势力的日益强大，因此千方百计想压制努尔哈赤。

万历十九年，纳林布禄遣使来到费阿拉，对努尔哈赤说：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建州，言语相通，势同一国，岂有五主分建之理？现在你们的国土多，我们的国土少，希望将额尔敏、扎库木两地选一处给我们。努尔哈赤听了很生气，对使者说：我们是建州，你们是扈伦。你们的国土虽大，我们又怎能随便夺取呢？我们的国土即便很广，你们又怎能任意瓜分呢？况且土地与牛马不同，不可分割送人。你们的使臣都是叶赫的执政大臣，不去劝谏你们的主子断绝奢念，反而厚着脸皮来无端索地。

纳林布禄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召集叶赫、哈达、辉发三部贝勒举行一次会议，会上三方决定同派使臣进行恐吓。努尔哈赤对三方来使以礼相待。席间，叶赫使臣图尔德首先讲话，他说："我主有言，想转告您，又怕您生气而责怪，不知意下如何？"努尔哈赤说："你不过是传达你们主子的意思，如无恶意，我洗耳恭听；如有恶意，我亦派使前往，以恶言相报，我怎么会责怪你呢？"图尔德说："我家主人说，向你索地你不给；要你归附你又不听，倘若打起仗来我们能轻而易举地进入你们的国土，你们又怎能进入我们的地界呢？"努尔哈赤听罢勃然大怒，举刀将桌子劈成两半，对图尔德等人说："你的主子什么时候打过硬仗，不过是到处侥幸捡便宜罢了。你们的国土又不是铜墙铁壁，我若杀人如入无人之境，况且我的先辈被明军杀了，我还有胆量问罪于明，明朝对我赏赐有加，你家主子的父亲也被明军杀了，连尸骨都没见到。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真是岂有此理！"随后，努尔哈赤吩咐将刚才所说的话写成回帖，派人送往叶赫，并指示要当着纳林布禄兄弟的面宣读。

纳林布禄见恐吓无效便决定诉诸武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以叶赫贝勒布斋、纳林布禄兄弟为首，纠集扈伦四部，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二部，共为九部，

组成联军，浩浩荡荡向建州开来。

在紧急关头，努尔哈赤沉着冷静，积极设防，巧妙布置，激励士气。当九部联军打到古勒山（今辽宁省新宾上夹乡境内）时，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努尔哈赤命大将额亦都率精骑百人出马挑战，联军“悉众来犯”，被额亦都等杀死九人。叶赫贝勒布斋见状大怒，策马扬刀，直扑阵前，由于战马被木墩绊倒，他本人也滚下马来，建州甲士武谈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刀将他杀死。纳林布禄见其兄长被杀，惊叫一声昏倒过去。联军统帅非死即昏，一时间上下全无斗志，不战自败，慌忙救起纳林布禄，抢回布斋尸首，各自望风奔溃。努尔哈赤见布斋已死，联军大乱，便指挥埋伏的精锐骑兵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直冲下去，一时间只杀得尸横遍野，山谷殷红。是役，努尔哈赤指挥士兵杀死布斋，俘虏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歼敌四千余，获马三千匹。

古勒山之战是女真统一进程的转折点，它改变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力量对比，从此努尔哈赤军威大振，吹响了向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进军的号角。

然而统一海西四部的进程仍然是艰难的，努尔哈赤只能选择时机各个击破。古勒山之战后，叶赫与哈达发生了冲突，叶赫出兵哈达，哈达力不能支，其首领孟格布禄送三个儿子到费阿拉作人质，向建州乞师。叶赫不愿看到哈达倒向建州一边，因而设法离间建州与哈达的关系，孟格布禄居然产生动摇，准备背叛建州而亲近叶赫。努尔哈赤得悉以后，于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出兵哈达，经过六昼夜的激战，终于攻陷了哈达城，俘获了孟格布禄。哈达实际灭亡。但在明朝干预下努尔哈赤表面上又恢复了哈达，立孟格布禄之子武尔古代为哈达首领，自己在幕后控制。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最后灭了哈达。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万历二十九年灭亡哈达，是努尔哈赤前进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辉发部夹在叶赫与建州两强之间，加之内部不稳，在哈达灭

亡以后，日子不大好过。当时辉发部的首领叫拜音答里，起初，他向建州乞求援兵，来平定叛变的辉发村庄。后来他在叶赫纳林布禄的欺骗下又以其子送叶赫为人质。不久，叶赫背弃诺言（没有将叛投叶赫的辉发部众送还），拜音答里又转而依靠努尔哈赤，并向努尔哈赤的女儿求婚。努尔哈赤为了争取辉发，孤立叶赫，便将女儿许给了拜音答里，但拜音答里又怕与建州联姻得罪叶赫，所以背约不娶。

努尔哈赤恨透了这个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人，于万历三十五年九月，他亲统大军攻打辉发城，拜音答里战死，辉发部灭亡。

海西四部中两弱部已灭，还剩两强；两强之中又以乌拉较弱。乌拉在建州北面，离建州最近。古勒山之战中，建州军队俘获了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努尔哈没有杀他，留养三年，然后将他送回本部，这时其兄满泰已死，在建州的支持下他控制了乌拉部，继其兄为乌拉部首领。努尔哈赤为了笼络布占泰，曾与他五次联姻，七次盟誓。布占泰其人弓马娴熟而又颇有才略，不甘居人之下，他虽然感激努尔哈赤的不杀之恩，但不愿充当附庸。他表面上与建州和好，然私下里南结叶赫，西联蒙古，时时不忘积蓄力量，而当实力大增以后便不惜与建州开战。万历三十五年双方发生了乌碣岩之战。当时，努尔哈赤派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等率兵三千，到东海瓦尔喀部邻近朝鲜的斐优城护送新归附的部众回建州。布占泰派兵一万在图们江畔钟城附近的乌碣岩进行拦截，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代善擒杀乌拉主将博克多，建州兵以少胜多，大败乌拉军，斩获甚多。从此乌拉部实力受损，锐气大减，再也不敢轻易地与建州交锋。努尔哈赤从此打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

万历四十年九月，努尔哈赤指责布占泰屡次背盟，又虐待建州嫁给他的三女（努尔哈赤的女儿、侄女等），因而大兴问罪之

师。努尔哈赤率三万大军亲征乌拉，一路上连克城寨，借以孤立乌拉城，并放火焚烧其房屋和存粮。布占泰大惧，乘舟来到乌拉河中，向河对岸的努尔哈赤叩首请罪。努尔哈赤严责布占泰，命他送人质于建州，随即班师。但是，布占泰并没有送人质到建州。努尔哈赤遂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率师再征乌拉，布占泰亦率三万大军迎战。建州军队奋勇杀敌，将乌拉兵打得大败。安费扬古一马当先，率先攻入乌拉城，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往叶赫。乌拉部灭亡。

乌拉一亡，唯叶赫仅存。这时叶赫的首领纳林布禄已死，布斋之子布扬古，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继为叶赫贝勒，一住西城，一住东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统四万大军往征之，连克十九城寨。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再次攻打叶赫，由于明军往救而班师。万历四十七年八月，萨尔浒大战之后，建州军队向叶赫发起了总攻击，代善率军攻打西城，努尔哈赤及额亦都等攻打东城。叶赫军队背城死战，建州兵马围城攻坚。东城首先被攻破，金台石自焚未死，被俘后自杀。东城失陷后，西城遂开门迎降，布扬古降后被努尔哈赤缢杀。两都失陷，叶赫其他城寨无不望风归降。海西四部中最强的一部，终于最后被努尔哈赤灭掉。下一步便要进一步征服野人女真。

努尔哈赤对海西女真的统一极为艰难，而对东海女真的征服则相对容易。早在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赤派费英东率兵初征东海瓦尔喀部，从此揭开了统一东海女真的序幕。此后，在与海西四部的斗争中，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努尔哈赤将主要精力放在统一海西四部上，但为了增加实力，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的征伐和招抚也加快了步伐。万历三十七年攻取兴凯湖以东瑚叶河畔（今俄罗斯海滨地区刀毕河）的滹野路。万历三十八年招抚渥集部之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在绥芬河流域及乌苏里江上游，明双城卫及速平江卫）。到了万历四十四年，

即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收服了临近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的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以东大部分地区的东海女真。万历四十年以后，进一步出兵黑龙江中下游及库页岛等地，如这一年出兵征讨萨哈连部（黑龙江中游一带）、使犬部（黑龙江下游一带）。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的军队又攻占了库页岛及附近岛屿。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天启五年（1625 年，后金天命十年），努尔哈赤统一了东海女真的大部分地区，皇太极继位以后，经过多次用兵终于完全统一了东海女真。

总之，努尔哈赤充分施展其才略，纵横捭阖，选择时机，各个击破；同时巧妙地与明朝周旋，在羽毛尚未丰满之时尽量迷惑明朝，因而不断受到明朝政府的赏赐和敕封，万历十七年授都督佥事，万历十九年为左都督，万历二十三年晋升龙虎将军，从而为他的统一大业减小了不必要的阻力，并终于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平定了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

为了推动、巩固女真统一，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万历二十七年命令额尔德尼、噶盖两人创造了满文；万历四十三年建立八旗制度，万历四十四年建立了金政权，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标志着满族的形成。这不但有利于满族的发展，而且也将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满族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太宗实录》卷 25；《满洲实录》第 1 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 1、2 卷；《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 2 卷；《满文老档·太祖》第 1 卷；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第 1 版）第一、二、三、四章；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一版）第一、二、三章。

创建八旗

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以满洲八旗设立最早，也较为典型。

八旗起源于牛录，牛录起源于女真人（主要指建州女真）氏族、部落时期的出师、狩猎组织。当时女真人行师出猎不论人数多少，都以家族、村寨为单位进行。出猎开围之际，每人出箭一枝，十人为一小组，设头领一人，指挥其他九人各寻方向，不许错乱。这十人小组的头领称为牛录额真。这里的牛录额真只是临时性的狩猎出师小组的头领，在这个小组中，是以血缘（族）和地域（寨）为基础自愿结合的，以箭为凭证，没有专职将官，而且事毕各自散去。

牛录额真成为固定的官爵名称是努尔哈赤起兵以后的事。万历十一年（1583 年）努尔哈赤刚刚起兵，苏克素护河部沾河寨长常书和弟杨书归附努尔哈赤，兄弟二人“事太祖，分领其故部，为牛录额真”。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攻克栋鄂部的翁鄂洛城后，不记前仇，将城中曾射伤过自己的鄂尔果尼、洛科二勇士授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这是牛如额真成为官爵名称较早的两个例子。

后来，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陆续地设立了一些牛录，但并不普遍，而且牛录的编制大小不一。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他已统一了建州女真，并将触角伸向了海西女真，同时东海女真中也有人不断归降，努尔哈赤的土

地和人口迅速增加。当他于该年正月灭掉哈达,从而在海西四部中打开一个缺口之后,便开始着手改革牛录,将其推广和整编。他针对以往牛录制不普遍、不整齐的弊端,决定在其辖区内普遍推广牛录,并且大体上整齐划一,以每牛录三百丁为标准,每牛录都设长官牛录额真一人。努尔哈赤对牛录的整编,为八旗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此牛录额真正式成了后金的基层官员。

在努尔哈赤建立八旗之前,女真还有一个前四旗的时期。

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部众日增,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子褚英和代善等实权人物也先后涌现出来。除了本人亲领部分军队和属民外,努尔哈赤也让另外三人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和部众。到了十七世纪初(约1601年至1610年左右),努尔哈赤在原来四大势力的基础上设立四固山,即四旗,由他本人、舒尔哈齐、褚英、代善作为专主。这就是所谓前四旗。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最后创建了八旗制度。

这时,努尔哈赤继统一建州女真后又兼并了海西四部中的哈达、乌拉、辉发三部,征服了大量的东海女真部民,原来的四旗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创立了八旗制度,在原来的四旗基础上又增加了四旗,共为八旗。起初八旗分为四个画龙的旗和四个不画龙的旗,稍后演变为四正(源于不画龙的四色旗)、四镶(源于画龙的四色旗)制。四正即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均不镶边;四镶指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其中镶红旗是红色旗帜镶白边,镶黄、镶蓝、镶白三旗则是在相应颜色旗帜的基础上镶红边。

八旗中每一旗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即固山额真的副手)。固山即后来所说的"八旗"的"旗"。从牛录到甲喇,再从甲喇到旗,都是五进制,即每旗下辖五甲喇,每甲喇辖五牛录,共二十五牛录七千五百人,以后随着人丁的增加,每旗

所属甲喇的数目也时有增多，但旗的总数不变，一直是八个。

八旗建立之初，由努尔哈赤的子侄等为旗主，称八“和硕贝勒”。另设“固山额真”作为旗主之下各旗的管理者。

在八旗设立的同时，八旗的基层组织——牛录，也逐渐完善起来，其主要编制是：每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以下设岱子（牛录额真的副职）二名，章京（办事员）四名，村拨什库（村领催，后称领催）四名，全牛录的三百丁由章京领导，分班轮值。后来又取消了岱子一职及分班轮值之制。

八旗各级官员的名称前后屡有变动。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努尔哈赤效仿明制，将牛录额真称为备御，甲喇额真称为参将，固山额真称为总兵官。皇太极继位以后，为防止满人汉化，遂于天聪八年（1634年，明崇祯七年）恢复各级官名的满语称呼：备御（原牛录额真）改为牛录章京，参将（原甲喇额真）改为甲喇章京，总兵官（原固山额真）改为昂邦章京。清军入关以后，又再次将各级组织及官员译成汉语，牛录的长官称佐领，甲喇的长官称参领，固山的长官称都统。这样，入关前后八旗中各级长官名称前后四变，以旗一级的长官为例，经历了：固山额真——总兵官——昂邦章京——都统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在入关以前，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满族的军事、经济、行政等各项职能无所不包的根本制度。

八旗制度首先是军事制度。八旗中每一位适龄男子（一般为十五到六十岁）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兵，又是民，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从征。每牛录披甲的数目变化不一，有时五十甲，有时一百甲，这样就组成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八旗兵在行军时根据道路的宽狭，或是八路并进，或是合兵一路。在作战时，基本上分为前锋、骁骑和护军。前锋军队披坚甲，执长

矛大刀冲锋在前；骁骑军队披轻甲，从后冲击；护军则是精兵，又称巴牙喇，均系从各牛录中挑选精锐组成，他们在战斗时横刀立马，相机行事，以备攻杀。在入关以前八旗士兵没有军饷，马匹武器都是军卒自备，战胜以后分配战利品是其收入的来源之一。所以每逢出兵之时，八旗士兵的妻子儿女都欢呼雀跃，希望多得些财物。

八旗制度也是经济制度。当时各种行政费用是以八旗下牛录为单位分摊的。早在整编牛录后、建立八旗前的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就命令部众以牛录为单位纳税（实际上是一种劳役型赋役）：每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在空地种田，所得收成放人公共粮库。

在八旗中作战和生产都不能偏废。牛录额真既是军事将领，又是生产的组织者，督促本牛录搞好生产是他的职责之一。努尔哈赤曾于天命六年亲自过问各牛录庄稼收割的情况。

最后，八旗制度又是一种行政制度。各级大小官员，既是军事将领，又是行政官员。天命四年，努尔哈赤曾谆谆告诫牛录章京以上官员，汗所任命的诸大臣以下等各级官员，要“坚守法令，努力管辖”。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和固山额真等各级官员，组成了统治后金人民的官僚队伍。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当时情况下找到的最可行、最有利于统治的一种制度。八旗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巩固女真统一事业的成果，促进满族的形成。此后，后金的社会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增强。所以说，八旗制度是后金的立国之本。

满洲八旗建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蒙古人和汉人隶属于其中。皇太极继位以后，又相继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蒙古八旗的建立时间介于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之间，晚于满洲八旗但早于汉军八旗。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有被迫归降于满族贵族的蒙古人。天命六年，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台吉率六百四

十五人来归，努尔哈赤便在这一年开始设立蒙古牛录，将之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下。天命七年，又开始设立蒙古旗。到天聪三年时已有蒙古二旗，称“蒙古右营”和“蒙古左营”。天聪八年又将蒙古右营改称“右翼兵”，蒙古左营改称“左翼兵”。天聪九年，皇太极打败蒙古林丹汗后，将满洲八旗之下很大一部分旧蒙古壮丁分出来，同时又编审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规定除盲人和手足残疾者外，凡在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者，都正式编入蒙古八旗。原来建立的蒙古两旗也编入新建的八旗中，并在八旗中起重要作用。这样，满洲八旗下的蒙古壮丁、新来的喀喇沁蒙古壮丁、原来的蒙古二旗等共三部分，于天聪九年正式组成蒙古八旗。

此外，皇太极又编成了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旗，加上八旗，共计十一旗，后三旗隶属于外藩蒙古。[①] 蒙古八旗的旗色及建置与汉军八旗相同，不过牛录的规模较小，最少的一百壮丁便编为一牛录。八旗下蒙古人的成份不以血缘为主，而以地域划分为主，主要有十八个地方的蒙古人。不过这种地域的划分并不十分严格。

蒙古八旗建立后，仍有蒙古牛录留于满洲八旗中。这些牛录的原主都是内附蒙古各部的贝勒、台吉。他们出身高贵，旗属众多，只是由于某种机遇才托庇于满洲。

汉军八旗设立最晚。天聪五年，皇太极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诸政，从此建立了汉军一旗，旗帜为黑色。汉军，满语作“乌真超哈”，是重兵的意思，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此后汉军的每一次扩编，都是对明用兵取胜（入关之役、松锦大战等）、掳掠大量汉族军民的结果。崇德二年（1637 年）将一旗汉军分作左右翼两旗，以汉官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

① 外藩蒙古是和内附蒙古相对应的称呼，内附蒙古指的是察哈尔以及归化城土默特部，外藩蒙古则是指内附蒙古以外诸部。

右翼固山额真，旗帜都是黑色。崇德四年，又分两旗为四旗，以汉官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颜分别担任固山额真。四旗各辖十八牛录。崇德七年六月，汉军最后扩充为八旗，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各领一旗。

同年八月，降金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四人奏请"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上允其请。"这就是说，四人所统军队编制可以不动，但在作战时要配合汉军八旗行动。其后，沈志祥的军队加入了汉军正白旗。而孔、耿、尚三人所统军队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才全部编入汉军八旗。①

汉军八旗在旗色、编制、官员名称等方面一如满洲八旗之制。汉军八旗在建立之初便处于皇太极的有效控制之中（而他对满洲八旗的牢牢掌握则是经过一段斗争才实现的)。

皇太极设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是深有用意的，可谓一举多得：第一，建立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可以扩大兵源，以利于同明军作战；第二，建立独立的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减少民族不平等，相对地提高蒙古人和汉人的社会地位，这更能调动蒙古人、汉人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清政权的整体利益。

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建立满洲八旗，到清崇德七年最后组建汉军八旗，终于形成了二十四旗并存的局面。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满洲实录》卷 3；《清史稿·常书传》；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八旗通志》卷 32；蒋良骐：《东华录》卷 1；《清太宗实录》卷 22、卷 62。

① 以上参考了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载《民族研究》1981 年第 5 期。

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后金天命四年），明与后金之间爆发了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其直接导火线是在此前一年努尔哈赤进攻抚顺。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大恨有七，小恨无数，因而大誓三军，决定兴师攻明。他首先派人扮成商队，佯称互市，实为内应。接着，他亲率八旗主力二万人，随后进发。后金军队攻其不备，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明朝的抚顺城。明军守将李永芳归顺，属下将士非死即降。与此同时，另一支八旗军队也攻克了明朝的东州、马根丹二堡（均在抚顺附近）。明辽东总兵张承荫闻悉败报以后，率兵万人前往援救，被后金军队一个回马枪打得落花流水，张承荫阵亡，所部全军覆没。

抚顺之战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第一次与明朝公然决裂，并向明朝发起正面进攻。从此，他敲响了进攻明朝的战鼓，明与后金（清）长达二三十年的战争宣告开始。

那么，努尔哈赤为何选择在万历四十六年向明朝公开挑战呢？显然，这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从表面上看，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是因为他与明朝有“七大恨”。所谓七大恨，主要内容是：（1）明朝无故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2）明朝出兵保卫叶赫。（3）双方曾有不许私越边界的盟约。明朝军民出境被努尔哈赤杀死，明朝指责他擅杀，并令他交出凶手。（4）明支持叶赫，使得叶赫将许给努尔哈赤的老女改嫁蒙古。（5）明朝不许努

尔哈赤等收取在柴河、三岔、抚安一带所种的庄稼。(6) 明朝偏听叶赫一面之词，遣使斥责努尔哈赤。(7) 努尔哈赤吞并了哈达，明朝令他恢复哈达原地；叶赫率先进攻努尔哈赤从而引起了叶赫与建州之间的战争，明朝却帮助叶赫。明朝是非不分，偏袒叶赫、哈达，唯独处处与建州为难。

七大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努尔哈赤出生以来明朝与女真的关系（即女真接受明朝敕封，时叛时服；而明对女真则攻赏结合，分而治之)，是对明廷的民族压迫和边吏无端欺侮的控诉。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主要的还是一种政治策略。对内，七大恨誓文是发兵的动员令，号召女真人同仇敌忾，对抗明朝；对外，它是对明朝的宣战书，打着报仇雪恨的旗号，表明后金师出有名。

其实，努尔哈赤领兵犯抚顺别有背景。

第一，努尔哈赤的羽毛业已丰满，为他进攻明朝提供了可能性。这时他已统一了海西女真的三部，仅有叶赫在明朝的支持下苟延残喘，但也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构不成大的威胁。随着实力的增长、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已无意像过去那样与明朝周旋。业已基本统一的满族的强大生气和女真贵族的贪欲，促使他兴兵攻明。

第二，他目睹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和边备废弛，认为攻明有极大的可行性。他曾多次同明朝打交道，深知明朝大多数臣僚的无能。自万历十八年以来，他曾多次入京朝贡，对明朝的政治腐败了解更深。明王朝的边备极为废弛，他灭了哈达，明廷出面制止，他第一次还是给了明朝面子，名义上恢复了哈达，可一年后又将哈达灭了，明朝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第三，从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就发生了严重水灾，后金地区受灾更重，粮食不足，饿殍塞途，因此，在努尔哈赤看来，进攻明朝，夺取粮食、财物便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

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大败明军的消息不久传到京城，于是“举朝震骇”，就连平日深居简出、不理政事的万历皇帝也深感这次问题的严重性。尽管明朝这时已是江河日下，但面对二百年一向不成“气候”的“小小女真”竟然兴师进犯，万历君臣在惊恐之余又岂能容忍。经过臣工们的讨论，最后由皇帝圣裁：调兵遣将，犁庭扫穴。于是明廷任命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原宁夏总兵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启用原任总兵官杜松驻扎山海关，命还乡总兵刘綎赴京听调。征集福建、甘肃等地兵马赴辽参战。由于兵将“不愿出关”，各地兵马征集较慢，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辽东伐金的兵马才初具规模。在这期间，努尔哈赤多次出兵，于万历四十六年五月攻克抚安、花豹冲、三岔儿等大小十一堡（均在辽宁省铁岭附近），七月攻陷明辽东的又一重镇——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县清河城），第二年正月又进攻叶赫。由于努尔哈赤不断出兵，加之明朝唯恐师老财匮，所以朝廷屡促杨镐出师。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经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大誓诸军，申严军纪，制订方略，布置兵马，四月二十五日，他手持尚方宝剑，坐镇沈阳，麾下大军兵分四路限期围攻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老城），这四路是：

西路，又称左翼中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统兵近三万人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左岸，入苏子河谷。这是四路明军中的主力。

南路，又称右翼中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二万五千人由清河出兵鸦鹘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南三道关）。

东路，又称右翼南路，以总兵官刘綎为主将，统率明军一万人，朝鲜援军一万三千人，由宽甸经亮马佃（今辽宁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关。

北路，又称左翼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率明军一万多人，又有叶赫两千人助攻。该路军由开原出三岔口（今辽宁省

铁岭东南)，沿苏子河流域前进。

四路兵马将近十万，号称四十七万，从西、南、东、北四个方向直指赫图阿拉。虽然师出仓促，但主帅杨镐似乎以为胜券在握了。他派人向后金投下战书，并告以师期。努尔哈赤针对明军的部署，提出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明军。辽沈以东战云密布，一场大战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一日，西路军在杜松的率领下开到了萨尔浒（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处，今辽宁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杜松，陕西榆林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有战功。然勇武有余，谋略不足。他率兵一路疾进来到萨尔浒后，得知后金正在派人构筑界凡城（今辽宁省抚顺东界藩山上），便将手下军队分为两部，一部分结阵于萨尔浒山冈，另一部分由他亲自率领攻打界凡。努尔哈赤先命代善、皇太极率两旗兵马增援界凡，自率六旗之众扑向萨尔浒。明军虽然居高临下，又不断施放火器，然而终究挡不住八旗铁骑的冲击。努尔哈赤指挥大军经过猛烈攻击，一举拿下了萨尔浒明军大营。然后，六旗铁军又与另两旗会合，八旗之旅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杜松部逼迫在吉林崖（界凡城所在的山峰）下。这时杜松已是腹背受敌，上有界凡城守军（原有四百骑兵，后又新增一千甲士），下有八旗军的全部精锐。在萨尔浒大营已失、增援无望的情况下，杜松只好率众突围。只见他轮动长枪，试图杀开一条血路，闯出重围。可惜寡不敌众，地形不利，军无斗志，待他且战且退，来到硕钦山（今辽宁省抚顺营盘西，在萨尔浒西北）时，已是精疲力尽，身边只剩下少数亲兵，仍然不得脱身，突然一箭飞来，正中他的面额，不幸落马而死。是役，杜松所部全军覆没。据史书记载，该部明军漫山遍野死伤枕藉，血流成河，甲积如丘；掉入浑河的武器和尸首浮于水面，像解冻的冰块一样，奔腾翻滚，顺流而下，这虽然不无夸

张成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军惨不忍言的败状。

努尔哈赤在西线全歼明军主力以后，随即率师北上，迎击马林的北路军。马林虽为总兵，但庸懦无能，并非将才。一路上，他退缩不前，贻误军机。三月二日，杜松的西路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北路军中，全军顿时大哗。马林急忙转攻为守，但求自保，将北路军分作三处扎营：马林率兵万人集结于尚间崖（今辽宁省抚顺东北之白石山），游击龚念燧率少数兵力屯据斡辉鄂模（在尚间崖西），北路监军潘宗颜率几千人扎营于斐芬山（在尚间崖东）。三营鼎足列阵，形成互为犄角之势。后金军队尽管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针对明军的部署，并没有采取全线出击的打法，而是实行了分割包围、一隅突破、各个歼灭的战术。由于龚念燧营最为薄弱，所以首先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在八旗军队的冲击下，龚念燧营破战死，全军溃败。八旗军队在斡辉鄂模得手之后，又杀向了马林所在的尚间崖。这里是明北路军的主力，马林依山布阵，环营挖了三道战壕，外布火器，内蓄精兵。两军相接以后展开了一场大战，激战方酣，前锋稍一失利，马林便率先鼠逃，营中顿时大溃。副将麻岩等人率少数士兵经过艰苦抵抗，全部阵亡。努尔哈赤拿下尚间崖大营以后又转而进攻斐芬山的潘宗颜营。潘宗颜以开原兵备道佥事的身份作为北路监军，此人为人耿直，颇具胆识。在八旗军队的勇猛攻击下，他能冲杀在前，视死如归，所以军士虽少，但斗志旺盛，该部凭借山势施放火器，重创八旗军。但终因寡不敌众，以及八旗军攻势凌厉而全军败亡。北路的叶赫军队没有和马林等同行，他们来到开原中固城，听到了明军大败的消息后，便马上调转马头，逃回本部。

四路明军已有两路败没，接着厄运又降临到了东路的刘綎军身上。刘綎，力大无比，号称忠勇，是一员虎将，这时虽已年迈，但余威尚存。他善用大刀，一百二十余斤的镔铁大刀能挥舞自如，轮转如飞，人称“刘大刀”。他在四川任事多年，手下

有川、贵精兵数万。刘綎奉旨入京后，想调川军出关，但未及调动便被催上了征程。所以，四路军中此路较弱，二万多名中朝联合军队，多属临时调凑，装备很差。由宽甸到赫图阿拉，沿途山高水深，道路险远，刘綎指挥军队在征程上艰难地前进，行速较慢。当三月初四来到距赫图阿拉五十里远的地方时，西、北两路已经败没，而刘綎却全然不知。努尔哈赤在结束了西、北战事以后，便留四千人守卫都城，以得胜之兵全力迎击刘綎的东路军，逐渐形成对刘綎部的包围之势。努尔哈赤派降顺汉人扮成杜松军卒，令其手持令箭，诈称杜松已经旗开得胜，顺利进抵赫图阿拉，诱刘綎快速进军。刘綎不知是计，又怕杜松抢得头功，竟然自率精锐为前锋，催马来到阿布达里冈（在赫图阿拉南，今辽宁省新宾榆树乡境内），完全走进了后金的埋伏圈。后金军队伏兵四出，向明军发起了攻击。老将刘綎陷入了重围，他身被数十创，面颊都被削去了一半，但仍然奋力拼杀，并手刃数十敌，最后落马身亡。击败刘綎以后，代善等又移师南行，扑向朝鲜军队所在的富察（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这里还有明监军康应乾统领的明军余部，在八旗军队的攻击下该部明军一触即溃。助明作战的朝鲜军队迫于兵威，走投无路，自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以下，不战而降，归顺后金。明朝在朝军中的监军乔一琦，情知无力回天，投崖而死。至此，东路明军完全失败。

还在东路刘綎军未败之前，经略杨镐见四路出师，两路已败，知道大势不妙，急发令箭通知南（李如柏）、东（刘綎）两路回师，但令箭还没送到，东路刘綎部业已败亡。怯懦无能的李如柏，原本不愿出师。上路以后他一直观望不前，接到杨镐令箭，觉得正中下怀，慌忙率军回师沈阳。在四路明军中，仅南路基本上全师而返。

这场大战历时五天，在三个战场上进行了三次大战，由于主

战场在萨尔浒，故称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以明朝的失败、后金的胜利而告终。

堂堂天朝大国以十万之众，竟败在了仅据一隅的“弹丸”后金的手中，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绝非偶然。

从总体上说，当时明王朝的政治腐败、武备废驰、危机四伏、日薄西山，正好和后金的励精图治、金戈铁马、众志成城、方兴未艾形成鲜明对照。在一定意义上讲，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较量和素质的检验。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失败是明王朝江河日下、腐败透顶的必然结果，也证实了明王朝是一具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

具体而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金、明双方统帅的素质。努尔哈赤是女真各部经过大浪淘沙而涌现出来的英雄，是经过磨炼的；而杨镐是世袭制下无能的皇帝领导的朝廷选中的平庸的将领，是错误和不幸的选择的结果。没有好的元帅的军队等于乌合之众，不可能打胜仗，所以明军失败了。杨镐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的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的每道命令都非常英明而果断，后金军队在他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奋勇杀敌，每一步都能赢得主动，终于取得了空前的大捷。

这场大战的影响非同一般。

首先，它是明、金两个政权的较量。双方对这场大战都不敢等闲视之。以万历皇帝为首的大明朝廷，调兵遣将，筹械措饷，惊动了全国的许多省份，起用了当时海内闻名的勇将杜松和刘綎。对于明朝来说，如果得胜的话，将会消除或减缓女真对明王朝的威胁；相反，如果失败的话，将会后患无穷。对于后金来说，此战关系更大，后金倾全国之力抗击明军，如果抗击不力，后金政权很可能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如能战胜明军，则以后前途无量。

明朝要消灭后金，后金想打败明朝，不管对谁来说，都是成败在此一举。

其次，萨尔浒之战是明金双方关系的转折。这场大战以明朝的失败而告终。此战明朝损失将领三百一十多名，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多名，战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相反，后金军队在这场大战中损失甚微，收获极大，从明朝军队手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盔甲，武装了各个部落，兵数倍增，同时也获得了大量财富。从此后金上下信心百倍，士气高涨，从对明朝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而明朝则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再次，这场大战震撼了明朝二百多年的基业。虽然战斗是远在后金的都城附近进行的，但明军的三路败没，不仅一时间"京师震动"，而且对明王朝也是很大的打击。从此致命的辽事问题一直困扰着明王朝，而且局势日益严重。这场大战对于后金来讲与其说是保卫政权的防守战，不如说是后金兵进辽沈的军事大演习。两年之后努尔哈赤便攻占了辽沈地区。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神宗实录》卷568、卷571。

《满文老档·太祖》卷6、卷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5、卷6。

薛三才：《兵食计当蚤决疏》，《筹辽硕画》卷4。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12。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

《明史·潘宗颜传》。

《明史·刘綎传》。

李民寏：《栅中日录》。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八章；
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二章。

进占辽沈建都沈阳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同时，努尔哈赤也着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政权机构。早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大体上统一了建州五部之后，他便在呼兰哈达山（即烟筒山）下的南冈“筑城三层，启建楼台”，修建费阿拉城（俗称旧老城）① 作为自已的根据地。他首次在建州女真各部中建政权，立法制，并在费阿拉“自中称王”。这虽然仅仅是个政权雏形，但在当时却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筑城费阿拉，表明努尔哈赤已开始重视统治中心的建设，费阿拉也就成了他继续进行统一大业的基地。在费阿拉时期，努尔哈赤完全统一了建州女真（万历二十一年），打败了叶赫等九部联军（万历二十一年），并且灭掉了海西四部中的哈达部（万历二十九年），势力勃兴，称雄女真。不仅如此，这个时期对明的政策也是非常成功的，他取得了明朝的信任，从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万历十七年），一直升为龙虎将军（万历二十三年）。随着实力的增加，他还整编牛录，设立四旗，为创建八旗奠定了基础。第二，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五年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然相对简单，却是结束群龙无首局面的征兆，表明新的社会秩序即将建立，为他以后建立后金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由费阿拉迁到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该城俗称老城，后改称兴京。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

① 该城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河村东南的山坡上。

赤在这里创立八旗制度，同时设置理政听诉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第二年努尔哈赤即位称汗，建元天命，建立了后金政权，赫图阿拉也就正式成为后金的首都。

在基本上统一女真各部并完成政权建设之后，后金又开始了与明朝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的战争，而且接连取胜。

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破杨镐四路之师，歼敌数万人，取得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捷。六月，努尔哈赤移驻界凡城（在今辽宁省抚顺西北界凡山上），建衙门，修行宫，以此作为临时都城。第二年九月，又由界凡移驻萨尔浒（今辽宁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界凡城西十里许）。这时已是辽沈之战的前夜，努尔哈赤步步逼近，蚕食明边，统治中心逐渐西移。

在迁驻界凡前后，努尔哈赤为扩大战果，挥师西进，先后占领了开原和铁岭。

开原是一座古城，它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界叶赫，为明代的辽北重镇。这里是明朝同蒙古和女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明廷在辽东对抗蒙古贵族和女真贵族南进的前沿堡垒。开原的弃守关系到辽东的安危。

天命四年六月初十，努尔哈赤率四万大军向开原进发。为了迷惑明朝，他派小股兵力经抚顺去沈阳一带抢掠，造成进攻沈阳的假象；而主力部队则很快开到城下。当时，城中主将、开原道韩原善尚未到任，推官郑之范署监军道事。郑氏其人“赃私巨万”，异常贪暴，根本不把城防放在心上。萨尔浒败归的总兵马林则寄希望于西部蒙古宰赛、煖兔等二十四营的援助，在短期内没有积极设防。八旗兵进抵开原城下后，郑之范、马林等仓促应战。值此危急时刻，蒙古的二十四营兵不但没有帮助明朝，反而被努尔哈赤拉了过去，配合后金从开原以西进攻明朝。八旗军队从南、北、西三面架梯攻城，又在东面组织重兵夺门，城上守军皆溃。这时，后金派来的奸细又从内部响应，乘机打开城门。不

久开原城陷。郑之范临阵出逃，马林等战死城外。全城十万多军民仅有一千多逃了出来。辽东总兵李如桢等听到开原被围的警报后率师增援，未至而城破。

后金拿下开原以后大掠三日，然后付之一炬，满载“子女财帛”而归。

开原一失，辽东门户顿开，而铁岭首当其冲。万历初年盛极一时的铁岭，这时人口财物都被转移，城中仅剩下守城的军人。在攻下开原一个多月以后，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往攻铁岭。进攻先从北面开始，八旗士兵竖云梯连续发起攻击，城上守军顽强抵抗，枪炮矢石齐发。八旗士兵在付出了一定代价后终于攻克了城池。明朝守军全部阵亡，城中居民被杀、被俘者近万人。

开、铁陷落，辽左众城危在旦夕，正在这时，经略熊廷弼受命主持辽东军务。熊廷弼（1569—1625年），字飞白，号芝冈，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他虽系文官，但文武双全，有胆有识，知兵善射，堪称将才。当萨尔浒损兵折将的败报传到京师以后，朝廷决定起用他。七月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离开了北京。当时开原已失，刚到山海关，铁岭又陷落。他身肩重任，慷慨赴险，很快来到了沈阳。原经略杨镐留给他的是一片残局：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将士气十分低落，“人人要逃”，并且武器缺乏，粮饷不足。鉴于这种情况，熊廷弼认为新败之余不宜对后金采取攻势，而应专心防守，积蓄力量，待恢复元气之后徐图反攻。为此，他采取“坚守渐逼”之策，招集亡散，抚定军民，申严纪律，整顿防务。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扭转了辽东的局面，使努尔哈赤不敢贸然发动大举进攻。

自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后，后金统治者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后顾之忧上。后金在这一年（天命四年）中灭叶赫，抚蒙古，压朝鲜，使外患大为减轻。外患虽然缓解，内忧仍很严重，由于辽东大旱，粮食奇缺，后金迫切需要向明朝

辽河流域兴兵，以解燃眉之急。努尔哈赤一直在等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了，那便是明朝皇帝易位，辽东经略易人。

明朝毕竟已是太腐败了，熊廷弼虽然鞠躬尽瘁，防守辽东，颇有成效，但却招来了无端的责难。朝中的言官不懂军事，不了解实情，毫无道理地指责熊劳师糜饷，不敢出击。朝中倒熊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刚直耿介的熊廷弼自然很不服气，他不断上疏自辩，而且力求罢斥。

天命五年是明朝宫廷较为热闹的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一朝殡天，由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继位以后沉溺女色，乞求长生，于九月初一因误食红丸而暴亡。接着便是熹宗继位。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梓宫两哭”，先后有三个皇帝在位，朝政极为混乱。当时既无明君，又无贤相，大臣们利用边乱争权夺势。熊廷弼终于被腐败的朝廷逼得被迫去位。他悲愤地说：“让我杀敌容易，调众口难也。”

代替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是袁应泰。袁历官知县、按察使等，颇有政绩。他虽有政治才能，但“兵事非所长”，走马上任以后，对熊以守为攻的策略多所更易。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便布署对后金的反攻，致使辽东的防御体系有所削弱。同时，他还轻率地把大批蒙古难民安置在辽阳和沈阳城内，使得为数不少的后金奸细得以乘机混入。他的所作所为正好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

后金天命六年春，努尔哈赤认为进攻辽沈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发动了辽沈之战。三月十日，努尔哈赤统帅大军从萨尔浒出发，浩浩荡荡，直取沈阳。明朝为了保卫沈阳，设置了坚固的防线。城外修筑了围墙，比原来的城墙向外拓展了八丈多。又在城外掘深沟一道，内插尖木桩，上盖秫结，铺以浮土，以为陷井，沟内侧修有内壕，壕上置放了一二十人才能抬动的大木。内壕以内再设涧五丈宽，深二丈许，涧底插尖木。涧的内侧每隔一丈五尺设置战车一辆，战车与战车之间架以大炮两门，小炮四门，各

个车、炮的四周还设有游动兵守卫。守城将领是总兵贺世贤和尤世功，城内守军约有七八万之众。

后金兵来到沈阳城下以后，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采取了诱敌出城，围而歼之的战术。努尔哈赤先派少数士兵隔壕侦察。武举出身的明总兵尤世功率家丁冲出，杀敌四人，略获小胜。总兵贺世贤由此产生了轻敌思想。贺世贤出身卑微，从军后屡有战功，官至总兵。他是当时辽东的第一员勇将。但此人勇而寡谋，而且喜欢饮酒。他见努尔哈赤没来攻城，并且明军小有斩获，便以为后金军没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对方是诱兵之计，三月十三日，贺世贤举杯壮行，率一千多亲丁出城对阵，发誓说："不痛杀敌军决不回城"。贺世贤统兵出城后，努尔哈赤喜出望外，他令一小股骑兵佯装败却，引得贺世贤乘锐轻进。忽然间后金骑兵一下子从四面围了上来，贺世贤被杀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且战且退，从东门一直杀到西门，身上已有四处中箭。部下劝他投往辽阳，被他拒绝了。他说："身为大将不能守住城池，又有何脸面去见经略呢?"他挥动铁鞭，接连杀敌数十人，最后因多处中箭，落马而死。

努尔哈赤一面命精兵追击贺世贤，一面指挥八旗主力全力攻城。八旗兵在城东北角挖土填壕，向前推进。城上明军接连发炮，奋勇守御，但因发炮过多，炮身变得红热起来，装药即喷，无法继续发炮。后金军队蜂拥过壕，急攻东门。此时，城中已听到贺世贤兵败、尤世功战死的消息，所以军无斗志，民心慌乱。城中的蒙古人见大势已去，便砍断桥索，放下吊桥，迎接后金军队入城。努尔哈赤就这样占领了沈阳城。

当沈阳被围的时候，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已经布置了各路援兵，前往增援沈阳。其中的一路是川、浙兵，当他们走到辽、沈之间的浑河岸时，便得到了沈阳失陷的消息，总兵陈策下令回师，但游击周敦吉等坚决请战。于是明军便分为两部：周敦吉等

率川兵渡河，结营于桥北，总兵童仲揆与陈策等率浙兵结营于桥南。努尔哈赤得知明军前来增援后，便急速发兵向正在渡河的明军猛扑过来。周敦吉等人刚刚过桥，立足未稳，便顽强地投入了战斗。明军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终于打退了后金军队的三次进攻，杀敌三千余人，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在后金军队的迅猛攻击下，该部明军大部阵亡，仅少数人退到了河南岸的浙兵营。后金军队乘胜进击，很快又把浙兵营重重包围起来。当时明奉集堡总兵李秉诚、靖武堡总兵朱万良等恰好赶到，两部开始观望不前，见浙兵被围才上前交战，被皇太极率兵打得狼狈逃窜。后金军队便全力进攻浙兵营。明军施放火器，后金军队死伤惨重。不久，明军火药用尽，两军短兵相接，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后金军发起勇猛攻击，明将陈策、童仲揆等先后战死，所部全军覆没。

此战是辽东明军抗击后金军最勇敢、最悲壮的一次战斗。川、浙军队抗击数倍于己的八旗铁骑，毫不畏惧，死而后已，敢打敢拼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他们虽然因寡不敌众而全部阵亡，但也给对方以较大杀伤。假如当时的明军都能像他们这样勇敢，那么努尔哈赤未必能轻易拿下辽、沈。

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攻克沈阳后的第五天，便决定进军辽阳。

辽阳，是当时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辽东的经略和巡按都驻在这里。辽阳城墙高厚，城外设围壕数道，壕上布列火器。当袁应泰得知后金来攻辽阳的消息后，便撤还各路守军，并力守御辽阳城，并引太子河水注壕。三月十九日，金军进抵辽阳城下，袁应泰命令五位总兵出城五里与金军对垒。后金军队向明营发起冲击，经过激烈厮杀，明军败退，后金军队追杀六十里，一直追到鞍山才胜利返回。

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在东门和小西门组织攻城。袁应泰亲

自统兵冲出东门，扎营于辽阳的东山上，分三层布列火器，严阵以待。努尔哈赤指挥右翼四旗堵塞城东水口，命令左翼四旗挖开小西门闸口以泄壕水。当水门堵住以后，努尔哈赤命令绵甲兵推楯车进战东门明军。在八旗军队的反复冲击下，明军一败涂地，袁应泰退入城内，与巡按张铨分守东西两门。

在右翼兵攻打城东门的同时，左翼四旗兵也在攻打小西门。城上明军不断施放火器，奋力守御。八旗兵竖云梯，列楯车，拼死攻城，傍晚登上了西城城墙，并一度占据了两角楼。明军顽强反击，挑灯夜战，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战斗一直进行到天亮。

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军队对辽阳城发起总攻。明军进行了艰苦的抵抗。傍晚，混入城内的谍工放火骚扰，小西门弹药库起火，明军的窝铺、草场全部化为灰烬，城内大乱。后金军首先从西门攻入，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便在城东北镇远楼上自缢而死。张铨被俘后宁死不屈，也被缢死。后金军占领了辽阳。

拿下辽、沈以后，努尔哈赤又指挥军队乘胜南下，不出几天，辽河以东地区“悉传檄而陷”，一共占领了大小七十余城堡。

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三月攻占了以辽沈为中心的辽东地区，四月，便将都城迁往辽阳。当时，贝勒大臣们都想回到故都，努尔哈赤认为，只有迁都辽阳才能巩固胜利成果，否则大军搬师，明朝又要恢复辽东，以后还得烦师征讨，另外，辽阳地理位置优越，便于控制蒙古、朝鲜，并与明朝对抗。由于努尔哈赤讲得有理有据，又身为汗父，部下接受了他的意见。第二年三月，以旧辽阳城年代久远、不够坚固，遂于太子河对岸、辽阳城东八里许的地方修建新城，称为东京。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之举，表明了他的锐意进取。此前，在占领某城之后，一般是将人口、财物抢掠一空，运回后金旧都。拿下辽阳以后，则一改常态，将都城迁到了新征服的地区。昔日仅仅是将人口、财物作为战利品，这次连土地、城市也作为战利品

了。

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了明朝京城，举朝震动，京师为之戒严。失败之余，人们逐渐认识到当初以袁应泰代替熊廷弼是个大大的失策。于是明廷再次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再次负起收拾辽东残局的重任。他主张以守为攻，多方协作，固守辽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归复辽、沈，因而提出了“三方布置策”，基本内容是：以广宁为中心设重兵屯守，犄角立营，互相救护，以阻击后金主力；于天津、登、莱设水师扰乱辽东半岛沿岸；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指挥全局。当时，辽东破残，明军守且不足，更不用说出击了。所以熊以守为攻的策略是正确的。不过他的下属王化贞却另有主张。王升任辽东巡抚以后，提出了与熊廷弼根本不同的战略：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作内应，外借察哈尔林丹汗四十万兵之助，然后他亲统六万明军，“一举荡平”后金。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以攻为守。王化贞一面将二万大军散布于三岔河（辽河下游，太子河、浑河、辽河合流于此）沿岸，一面派毛文龙率三百兵丁由三岔河入海，于六月袭取了镇江（今辽宁省丹东），摆出了一副频频进攻、以硬碰硬的架式。

本来，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佩尚方剑，是王化贞的上司。可是巡抚王化贞朝中有人，首辅叶向高是他座主，与兵部尚书张鹤鸣又引为知己，所以王化贞往往有事不经熊而直接与朝中联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拥兵十二万，熊廷弼在山海关仅有五千兵马，经略徒有虚名。这样经略、巡抚意见不一，不但不能互相配合，反而互相指责，意气相争。为了解决“经抚不合”的僵局，天启二年，天启帝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委托兵部招集朝中九卿科道会议，以决定经、抚的去留。会议结果，大多数人主张去熊而留王，升王为辽东经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究其原因，倒不是王的策略及做法有多么高明，主要是：第一，王化贞在朝中有后台，有人替他

说好话；而熊廷弼则比较自负，敢与朝中要员据理力争，不大讨人喜欢。第二，明朝当时好比一个赌徒，输了以后急于捞回本钱，王的策略正好与朝中大多数人的愿望一致；而熊的策略仅仅是确保不再继续输了，故人们不愿接受。

正当明廷对熊、王的去留争论不休的时候，已探知明朝“经抚不和”、战守不足的努尔哈赤决定兵渡辽河，夺取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城）。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队，直扑辽西大地。虽然明朝的精兵驻扎在广宁一带，但辽西之战没有发生在广宁，而是在西平堡（在今辽宁省盘山县境内）。

西平堡地当冲要，是辽西前沿的要塞。副将罗一贯统三千明军在此驻守。努尔哈赤兵过辽河以后如入无人之地，很快打到西平城下。参将黑云鹤出城迎战，全部被歼。罗一贯凭城固守，用炮火猛击攻城的后金军。投降后金的李永芳派出使者，举旗来到城下，叫罗一贯投降。罗毅然拒绝，并大骂李永芳。后金军队加紧了进攻，明军坚守两昼夜，杀敌数千人，三次打退金军的进攻。激战中，“一贯流矢中目，不能战”。在火药用尽、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他自刎而死。后金占领了西平堡。

西平堡陷落以后，防守空虚的广宁便受到了威胁。本来，广宁附近屯有重兵，可是当西平堡被围之时，王化贞采纳了心腹将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尽发广宁兵前往援救。王令孙统广宁兵，会合总兵刘渠统领的镇武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北）军队，总兵祁秉忠统领的闾阳驿（今辽宁省北镇县南闾阳）军队，一同前往解西平堡之围。这是王化贞的重大失误，因为金军长于野战，明军长于守城，尽撤广宁兵迎敌之举就等于将弱点暴露给了对方。献此计谋的孙得功早就与后金暗送秋波。当广宁等三部明军与八旗军队相遇时，孙得功让刘渠、祁秉忠两部率先出战，刚一交锋，孙得功等故意上前一冲，随即退去，因而明军大乱。刘、祁二将力战不敌，先后战死。

孙得功逃回广宁以后，故意制造混乱，称金兵马上就要攻城，城中军民一片慌乱，纷纷逃亡。孙得功等人控制城门，封银库及火药库，准备迎接后金军入城。此时王化贞还蒙在鼓里，幸得参将江朝栋及时入告，王化贞才得以逃脱。当王、江等人逃到大凌河（今辽宁省锦县东）时，正好遇上了熊廷弼。王化贞一见到熊，便哭了起来，说明军大败，孙得功谋献广宁，投降后金，自己差点回不来。熊将自己的五千人交给了王化贞，令他殿后，护送溃散的十万辽西军民入关。

王化贞出逃以后，孙得功等控制了广宁城，并派人去西平堡迎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广宁城。在此之后，辽西四十余城堡望风归附，先后归入后金版图。

广宁之役以后，后金将广宁等地的粮食、物资等运回辽阳，并将辽河以西的人民赶到辽东，实力进一步增强。

努尔哈赤自天命六年迁都辽阳以后，在辽阳共住了四年。在此期间，除了攻占广宁以外，还实行"计丁授田"的政策（天启元年七月），实行"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天启二年三月），并继续征服蒙古。努尔哈赤的武功文治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

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迁都沈阳，他认为：居沈阳便于征明，也便于控制朝鲜、蒙古，而且可以兼收山林河泽之利。沈阳后称盛京，从这时起，沈阳逐渐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天命十年，在迁都沈阳前后，努尔哈赤多次对东海女真用兵，终于统一了东海女真大部。

努尔哈赤在他的晚年，对辽东汉人的政策错上加错，最后走上了极端。天命十年十月，努尔哈赤指责汉人心向明朝，叛逃不止，命令八旗将官分路巡查，甄别忠奸，将明朝的秀才、乡官，以及"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拒不从命者"统统杀掉。剩下的人，

则编入拖克索（即农庄）。一庄由十三丁、七头牛组成，分田百垧，二十垧作公赋，八十垧供庄丁自家食用。十三丁中设庄头二名，住在沈阳，轮流回庄督促庄丁生产、纳赋。

努尔哈赤在与明休战（攻下广宁后）四年之后，又一次找到了进攻明朝的机会。

广宁失守以后，全辽尽失，明廷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王到任以后情绪低落，悲观失望，消极守卫山海关。不久，天启帝调王别用，任命大学士孙承宗督师山海关，专主辽事。孙承宗督师四年，卓有成就，指挥将吏修建宁锦等城堡，练兵十一万，开拓关外四百里，安置辽民，耕垦有获。不但巩固了山海关的防务，而且修筑了锦宁防线，为明末的安边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他本人于天启五年十月被魏忠贤排挤去官。代孙经略蓟辽的是高第。高胆小如鼠，不懂军事，自撤藩篱，败坏边防。他到任以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卫（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大凌河诸城防务，将器械、守军全部移至关内，放弃关外四百里，丢掉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在这关键时刻，明末历史上又一位才堪重寄的人物站了出来，他，便是宁前道袁崇焕。当高第命他撤出宁远与前屯（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两城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宁前道，在此当官，当与此地共存亡。我绝不入关！”高第见难夺其气，便只好由他去了，将宁、前以外诸城军民、守具撤入关内。袁将本部人马全部撤入宁远城内。当时，宁远已是孤城一座，九死一生之地。袁率一万多人在此驻守，誓与城池共存亡，表现了他超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他虽然没能阻止住高第入关，但却在稍后挡住了后金的攻击。

庸懦的高第取代孙承宗，宁远孤悬关外的消息传到了沈阳，努尔哈赤决定抓住战机，进攻明朝。天命十一六年正月，他亲统

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从沈阳出发，扑向宁远。他显然没有把小小宁远放在眼中，大军一到便派人劝袁投降，遭到拒绝。后金军队对宁远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险些掘开城墙，攻陷城池。袁崇焕从容不迫，指挥有方，鼓励将士，安定军民，明军士气大振，多次打退金军的进攻，并利用火器给对方以较大杀伤，连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红衣大炮击伤。后金军队被迫回师。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不意在宁远受挫，心情非常不好。

天启十一年四月，努尔哈赤出兵攻打喀尔喀蒙古诸部，皇太极射死了巴林部的囊努克。然后，后金军队将所遇到的蒙古各部的人口、财产和牲畜等，尽数掠回。

尽管用兵蒙古大获全胜，但宁远受挫的阴影仍然难以驱散。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由清河返回沈阳途中，至叆鸡堡（沈阳东四十里），因年岁已高、疽发于背而死去，终年六十八岁。他留给子孙的是整个东北的基业，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格局，以及未竟的人主中原的大业。

在入关以前，后金（清）的都城经历了费阿拉（这时后金尚未建立）——赫图阿拉——界凡——萨尔浒——辽阳——沈阳，这样一个变迁过程。后金都城变迁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即是后金不断兴起的历史，同时也是后金接连打败明朝的历史。努尔哈赤最后定都沈阳，虽然他本人并未受益太多，但却给他的子孙们提供了进攻明朝、逐鹿中原的大本营。从天命十年至清顺治元年，沈阳一直是后金（清）的国都。即便是在定鼎燕京之后，沈阳仍被当作清王朝的第二国都（留都），称为盛京。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卷6。

《满文老档·太祖》卷16、卷34、卷35、卷3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卷3、卷4、卷7、卷9。

《明史》:"熊廷弼传"、"罗一贯(贵)传"、"袁应泰传"、"王化贞传"。

《明熹宗实录》卷6、卷18、卷21、卷28。

汗位之争

努尔哈赤自起兵以后，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但有一点他是不能克服的，那就是岁月不饶人。对于年近花甲的努尔哈赤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选立储嗣，设计身后之事，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一开始试图按嫡长继承制的原则选定接班人，因而先后立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为储嗣，结果引起了数起轩然大波。

褚英，万历八年（1580 年）生，母亲是佟佳氏（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大福晋），他实际上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子。褚英骁勇善战，屡立军功，万历二十六年，努尔哈赤派其五弟巴雅喇、褚英，和大将噶盖、费英东等领兵一千，征讨安褚拉库路（今松花江上游二道江一带）。褚英和其叔父一道，率领兵马星夜兼驰，很快来到了目的地，先后攻取了二十余屯寨，俘获人畜一万多，大胜而归。由于他年少无畏，出兵旗开得胜，被努尔哈赤赐以“洪巴图鲁”① 的封号。这一年褚英十九岁，从此他脱颖而出，成了努尔哈赤东征西伐的得力助手。

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派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大臣费英东、侍卫扈尔汉和将领扬古利等率领三千军队，来到东海瓦尔喀部的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附近），从那里护送新归附的部众回建州。当他们走到图们江畔钟城附近的乌碣岩时，

① 巴图鲁是满语，汉义为英勇、勇猛，洪巴图鲁为勇士的美称。

遭到了海西乌拉部一万军队的阻截。当时，众寡悬殊，情况危急，士兵们都很害怕。在这关键时刻，褚英、代善兄弟二人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气概激励三军，他们说："乌拉部的布占泰曾被我们俘获，"铁锁系颈"。后来免其一死，支持他回去主政。这样一个人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仰仗上天之佑助，凭藉吾父之威名，虽然敌众我寡，但此战必胜。士兵们听了以后顿时士气大振。褚英首先冲入敌阵，率五百士兵奋勇冲杀，在代善等人的配合下，终于大败乌拉军队。战后，努尔哈赤赐予褚英"阿尔哈图图们"的美号。

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努尔哈赤令褚英和阿敏（努尔哈赤侄子）率兵五千，前往进攻乌拉部的宜罕山城。褚英等率领部下大败乌拉军，杀敌千人、获甲三百，这一年，褚英二十九岁，年近而立，业已成熟。虽然他也不无缺点，但努尔哈赤还是对这位长子寄予厚望。

不久，努尔哈赤决定让褚英执掌政务，锻炼能力，提高威信，以便在自己死后长子能承担起治国重任。褚英执政期间权力很大，"裁决国事秉持政务"。但是好景不长，万历四十年，褚英受到了努尔哈赤的斥责，并被剥夺了部分属民和牧群，事实上失去了执政的身份。关于他的罪名，是由努尔哈赤"亲自举用恩养之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里、安费扬古）、"爱如心肝之四子"（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联合上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离间五大臣，使他们苦恼。第二，折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弟，让他们立誓效忠，而且不许上告"汗父"。第三，威胁四弟、五大臣，声称："吾即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努尔哈赤将九人各自写来的弹劾文书让褚英看，褚英承认了上述事实。努尔哈赤对他说："像你这样我还怎能让你执政呢？"

同年九月，努尔哈赤亲自出马，率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八子

皇太极等统兵往征乌拉，褚英既没能随父出征，也没有被任命守城。第二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统兵三万再征乌拉，这次也没带褚英出征，并且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莽古尔泰及皇太极，没有交给褚英。在当时，随父出征建立军功可以提高威信，且不失荣耀，在家守城亦足见父亲的信任。但褚英两项任务都没有，闲在了家中，这在他看来，不啻是父亲的一种惩罚。失落之余，怨怒顿生，于是他暗中"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祝于天地而焚之"。而且他还对亲信说：我倒希望建州军队败给乌拉，然后不许父亲及诸弟入城。事后褚英的亲信将此言秘密上告，努尔哈赤遂将诸英监禁于高墙。两年后（万历四十三年），褚英被父亲处死，时年三十六岁。

褚英被杀以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打消立储的念头，他选择接班人的第二个人选是代善。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与褚英系同母所生。褚英死后，他成了事实上的嫡长子。他曾经为后金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早在乌碣岩之战中，他英勇不让其兄，阵斩敌方主将博克多，为建州军队的胜利立了一大功，被努尔哈赤赐予"古英巴图鲁"① 的美号。

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出兵乌拉，连克三城，乌拉首领布占泰率军三万迎击。努尔哈赤面对如此强敌，态度十分谨慎，是决战，还是继续采取蚕食的政策，似有未决。诸贝勒、大臣纷纷请战，代善犹为坚定，他说：我们惟恐布占泰不迎战，今天既已引他出城，又怎能舍弃良机呢？我们砺兵秣马为的是什么呢？如今兴兵至此，终当决一死战。在代善等众将的要求下，努尔哈赤下令出击，一举攻灭了乌拉部。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大兵直指

① 古英巴图鲁意即"钢铁勇士"的意思。

明辽东重镇抚顺。部队出发以后，天气忽晴忽雨，努尔哈赤认为阴雨天气不便进兵，略有回师之意。代善极力劝阻，他说：既已兴师攻明，如果突然回师，那么与明朝的关系是战还是和呢？势必骑虎难下。眼下虽然下了大雨，但我军皆有雨具，况且雨天明军防守松懈，我军出其不意，进攻会更加顺利。努尔哈赤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决定进兵。不久，天气转晴，后金军队兵临城下，一举攻克了抚顺城。

万历四十七年，明金双方爆发了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在这次大战中，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只是制订策略，运筹帷幄，而将直接指挥八旗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代善。所以说，此战后金的胜利，是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由代善直接指挥取得的。

在努尔哈赤的诸子中，代善战功卓著，为人宽厚，身为长兄，威望甚高，所以努尔哈赤决定让他协助自己处理政务，并且说："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1]交给大阿哥（指代善）收养。"当时，后金上下普遍认为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必定继承汗位。

但是代善仍没有摆脱他哥哥的命运，很快也被废除了太子之位，只是保住了贝勒的地位和性命。为什么努尔哈赤会对代善立而又废呢？主要是由三件事引起的。第一件事发生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大福晋阿巴亥曾经两次给大贝勒代善送饭，代善收下吃了，又给四贝勒皇太极送饭，皇太极受而未食。大福晋一天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大约商议要事。努尔哈赤派扈尔汉等四大臣负责调查此事，调查的结果是：大福晋倾心于代善，当诸贝勒、大臣在汗家里宴会、集议国事时，大福晋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并且眼睛老是盯着大贝勒。诸贝勒、大臣为此一直很生气，但因惧怕大贝勒、大

① 福晋，即夫人，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地位相当于皇后。

福晋而不敢向大汗报告。努尔哈赤得知情况以后非常生气，借口大福晋窃藏金帛而将她休弃。努尔哈赤虽然对代善也是耿耿于怀，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以国家大局为重，没有难为代善。有人认为德因泽告讦之谋出自皇太极。不管怎么说，大福晋倾心于代善是她单相思，代善并没什么过分之举。这件事并没有太多地影响代善的地位。

泰昌元年（1620年）后金迁都萨尔浒。在动迁之前，后金征发夫役为努尔哈赤及诸贝勒建造宫府。完工以后，人们发现大贝勒代善及其子岳托的府宅比汗的宫室还好，众贝勒便建议努尔哈赤迁住大贝勒的府宅。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大贝勒迁居汗宫，汗迁住岳托的府宅，以大贝勒的新居作为众贝勒欢宴、集会的大衙门。大贝勒代善嫌汗宫狭窄，不愿居住，暗示二贝勒阿敏向努尔哈赤报告，请求新宅。努尔哈赤又搬出了岳托的住宅，回到了狭窄的汗宫，而将岳托的住宅赐给了代善。努尔哈赤这样做当然表明了他对代善的容让，但也不无赌气的成份。这是第二件事，不久又发生了第三件事。

代善的次子叫硕托。代善听信继妻之言，百般刁难硕托，甚至欲置其于死地，诬陷硕托与庶母（代善之妾）通奸。代善被继妻迷惑，虐待硕托，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极大反感。其实，代善在前两件事情上已得罪了汗父，他即便没有错，汗父也有可能随时找碴，当他确实有错时汗父更不会放过他。努尔哈赤严厉地斥责了他惧妻虐子之过，夺其太子之位及所属部众。代善赶忙悔过自新，手刃继妻，向汗父请罪，从而保住了大贝勒的地位。

褚英、代善的废立绝非偶然。不管努尔哈赤立哪个成年儿子做继承人，这个儿子便不会有好结果，除非努尔哈赤今天立了太子明天便死去。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女真并无立嫡长的传统，所以立了年长的儿子做继承人以后，其他诸子并不甘心，汗父一日不死，诸子争夺汗位便一日不休。第二，当时女真并无完备的

继承人制度。接班人确定以后，他的地位在继承汗位前后有何不同，他在当太子的时候与汗父及诸大臣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制度或习惯加以约束，往往是凭各人的实力、权力进行碰撞。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治危机。中国封建王朝的太子在老皇帝去世之前一般不居于朝中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之所以不至于太多地影响老皇帝的权力。老皇帝死后，群臣自然会拥戴太子登位，即便如此，太子被废、被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有完备的储位制度的中原王朝尚且难免发生夺嫡的变故，而没有完备制度的女真，其继承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代善的太子地位被废以后，其他贝勒自然是暗自庆幸。当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并称四大贝勒。代善被废之后，仍不失为地位最高的贝勒，但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很难恢复太子的地位。由于努尔哈赤所钟爱的幼子年纪较小，所以另外三大贝勒最有可能继代善之后被选为接班人。这三大贝勒中，二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侄子，并且此人不能善待子弟，而努尔哈赤又最怕他的接班人这样做，所以阿敏不会被选为接班人。三贝勒第五子莽古尔泰鲁莽暴躁，所以也不会被努尔哈赤看中。四贝勒第八子皇太极文武双全，后来居上，努尔哈赤比较喜欢他，所以他被选为接班人的呼声最高。皇太极本来工于权术，代善受贬以后他更加紧了联络活动。他自认为近来有功无过，因而举止傲慢，凌越诸兄。天启元年（1621 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进行了斥责，说他目无诸兄，不能宽厚互敬，又指责德格类（莽古尔泰弟）、济尔哈朗（阿敏弟）、岳托（代善长子）亲近皇太极。努尔哈赤明告皇太极说："（我）岂置诸兄不顾，而令尔坐汗位乎？"这样，皇太极被父亲自选为接班人的希望破灭了。

两次选立接班人的偿试失败以后，努尔哈赤经过思考，决定在他去世以后不沿袭自己国主独尊的旧制，而是采取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形式，以便维持权力平衡和政局稳定。

天启二年三月初三，努尔哈赤发布汗谕，这是关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纲领性指示。所谓八和硕贝勒，即八旗旗主，他们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所谓共治国政，即废除君主集权政体，减弱汗权，提高八和硕贝勒的权力，八大贝勒权力平等联合执政。努尔哈赤为八和硕贝勒规定了较大的权力，主要有：

第一，推举新汗。努尔哈赤死后，新汗由八和硕贝勒共同选定，要选“能受谏而有德者”继承汗位。

第二，继任的汗和八和硕贝勒“并肩共坐”，同受国人朝拜。这样在礼仪上规定了新汗与八和硕贝勒处于平等的地位。

第三，八和硕贝勒掌握了议处军国大政的最大权力。努尔哈赤规定，他死后一切军国大事新汗要与八和硕贝勒共同议处，集体裁决，新汗不得独断专行，要听从八大贝勒的集体意见。

第四，八和硕贝勒有权奖惩和任免各级官吏。凡是牛录额真以上的官员，他们的奖惩和任免由八和硕贝勒会议决定，不许新汗一人独自做主。

第五，八和硕贝勒有权审理案件。如有诉讼，理事官初审，然后上报八大臣；八大臣复审拟议处理意见，上报八贝勒；最后由八和硕贝勒定谳。八和硕贝勒掌握最高司法权。

第六，八和硕贝勒有权裁处八旗之间的争执，更换或惩治凶暴、无能的个别和硕贝勒。如果各旗之间发生争执，需经过众贝勒审后才能入告新汗，各旗不得单独直接入告新汗。八贝勒中如有人不能胜任其职，则以其子弟代之。若不听汗父教谕，不听从诸贝勒劝告，行为悖逆，第一次罚以银两，第二次罚牛录，如果不服气就关入牢中。

第七，八和硕贝勒享有八分特权。后金军队掠获的金帛、牲畜等，归八和硕贝勒共有，八旗之间平均分配。如果额外贪取、隐匿财物，隐匿一次则取消一次分配资格，如隐匿三次则永远不分给财物。

第八，八和硕贝勒有权废黜新汗。如果新汗“不能受谏，所行非善”，那么八和硕贝勒有权罢免该汗，另行择汗。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基础是八旗制度。努尔哈赤是八旗的统治者，其下，子侄分任各旗之主，每个旗主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和权力。努尔哈赤在选择接班人失败的情况下，想出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办法。这一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后金的社会基础，在努尔哈赤生前及死后一段时期能暂时保持政治稳定。但是，在内忧外患威胁下的后金政权，如果没有一个既负才干又具实权的大汗做领袖，便不可能得到发展。况且八和硕贝勒之间的权力平衡迟早要破坏，如果没有强大的汗权加以干预，骨肉相残或许更加激烈。

天启二年七月以后，八和硕贝勒的权力较以前扩大了，努尔哈赤此时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他逐渐将权力下放，进行权力过渡，以准备后事。

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离开了人世，后金正式进入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阶段。

就在努尔哈赤去世的当天，代善的长子硕托、三子萨哈廉对父亲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合先帝（指努尔哈赤）圣心，众皆悦服，应速继大位。代善马上表示赞同，说：“这正是我多年的想法，你们二人的意见与我不谋而合。”他先去找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又将结果通告了诸弟子侄。第二天，在代善的倡议下，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劝进书，请求皇太极继位。在此期间，诸贝勒唯恐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大福晋乌拉纳喇氏为诸幼子争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她生的），便宣称努尔哈赤留有遗言：大福晋心术不正，必乱国政，令她给我殉葬。诸贝勒遂迫其自殉，从而为皇太极继承汗位减少了阻力。努尔哈赤时代的汗位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天启六年九月，皇太极正式继汗位，改明年为天聪元年，并且根据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精神与代善等贝勒对天盟誓。此后皇太极凭他卓越的才能，不断增强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囚禁了阿敏，打击了代善、莽古尔泰，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取消了与大贝勒共坐的朝仪，自己南面独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名存实亡。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被拥戴为皇帝，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史稿·巴雅喇传》。

《清太祖武皇帝录》卷1、卷2。

《满文老档·老祖》卷2、卷3、卷14、卷38、卷54。

《清史列传·代善传》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周远廉：《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一编第五章，第二编第五、六章。

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十二章。

天聪朝政

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一日，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第四大贝勒皇太极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在位期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称天聪时期，后一阶段称崇德时期。其中天聪时期起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即天聪元年，止于明崇祯九年（1636）四月，即天聪十年四月。这里也包括明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至年底的几个月。

皇太极继位以后马上发现这大汗的宝座并不那么好坐。自努尔哈赤晚年以来后金就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内忧外患，与日俱增。从内部来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最高统治阶层矛盾重重，"邦家未固"，危机四伏。首先，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特别是在他晚年，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激起了汉人的反抗，他们采取逃亡、投毒乃至起义的方式反抗后金。对此努尔哈赤不但没有调整民族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对辽东的汉民滥施屠杀。结果不但广大汉民反对后金，就连一度忠于后金的汉官们也非常不满，有的甚至又背叛了后金。其次，由于后金的大屠杀政策，使得辽东的经济每况愈下，米贵如金，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再次，皇太极初登大位，诸王未必完全心悦诚服，加之他与其他三大贝勒的关系并未最后定型，所以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的威望与权势，也是摆在皇太极面前的一个不小的难题。

从后金外部来说，"四临逼处，素皆不协"，三面受敌，孤立

无助。东有朝鲜，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极为密切，尽管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多次恐吓、拉拢，但朝鲜始终和明朝站在一起，并给毛文龙所部明军提供基地、粮食，大量接纳辽东逃人，起到了帮助明朝牵制后金的作用。南面的明朝自然是后金最主要的对手。自与明开战以来，后金虽然占领了辽东的大部分地区，但明朝倾全国之力以守一隅之地，实力仍不可低估，天启六年袁崇焕誓死守卫宁远，打败了努尔哈赤的十三万大军，后金的锐气受到了很大挫折，此后十多年内，以宁远（今辽宁省兴城）、锦州为中心的锦宁防线成了抵御后金的铜墙铁壁。况且明朝的君臣们时时不忘收复辽东，甚至消灭后金。西南部的蒙古虽已互不统属，失去了往日的雄风，但其向背对后金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后金拿下广宁以后，特别是皇太极继位以后和蒙古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了。喀尔喀诸部虽然曾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后金天命四年）与后金会盟，但这时出现了反复，他们背盟接受明朝的赏金，屡次袭击后金，掠夺财物、牲畜。察哈尔林丹汗一贯敌视后金，并且不断接受明朝的赏金。为了壮大实力，他挥兵西向，力图统一蒙古各部。在蒙古诸部中察哈尔对后金压力最大。

针对上述种种危机与矛盾，皇太极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可行的政策。

为了解决内部危机，皇太极主要是从两方面下手的，一方面是调整满汉关系，改善和提高汉民、汉官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改革，削弱三大贝勒权势，巩固和提高汗权。

第一，调整满汉关系。

尖锐的民族矛盾及其引起的恶果说明调整满汉关系已势在必行。皇太极继位伊始便下令，以往有私欲潜逃者，或与明朝暗中往来者，事情已经过去，虽被检举，也一概不予追究；今后唯有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想逃而未逃者，即便有人告发也不论罪。

天聪元年，实行满汉分居、将汉人编为民户的政策。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十年将汉人全部编入田庄，规定每十三丁编入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百日，[①] 其中八十日收获归庄丁自食，二十日的收获作为官赋。努尔哈赤按满官的大小品级赐给整庄的庄丁做奴隶，备御官各赐一庄。满人、汉人“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决定改变这一编汉人为奴的政策，他下令每庄的十三名汉人壮丁中只留八人，其余五名壮丁与满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择清正汉官管辖。这样，使相当一部分汉人摆脱了奴隶地位，恢复了编户齐民的身份，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从此，一度紧张的满汉关系得到了一定缓和。

天聪三年，后金重新颁布了《离主条例》。所谓离主条例，是指奴隶可以控告主人，如果审讯得实，主人按有关规定治罪，奴隶可以离开主人。新议定的《离主条例》共六款，规定除八旗旗主外，满族贵族及各级官员如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奸污属下妇女、隐瞒部下战功不报等罪状，属下均可告发。《离主条例》中所指的奴隶或奴仆自然有很大一部分是汉人，其中包括留在原田庄中的八名汉人壮丁。如果说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是解放了部分汉人奴隶的话，那么《离主条例》主要是保护汉人等奴隶的生命、财产。两者都有利于改善满汉关系。

第二、巩固和提高汗权。

努尔哈赤死后，留下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格局，这种格局下新汗皇太极并无实权。皇太极继位之初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轮流执政。诸贝勒事事掣肘，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于整（正）黄旗一贝勒也”。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对于发展中的后金来说十分不利，而且凭皇太极的个性也不会容忍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大汗与诸贝勒之间必定会有一番

---

① 每日六亩。

权力争斗。天命十一年皇太极与诸贝勒通过一项决议，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直接掌管旗务，他们与旗主贝勒一道参预国政。不久，又让所有贝勒都参加议政会议，并让每个旗增派三人议政。这样就在一定意义上分散和牵制了旗主贝勒的权势。在重新任命八旗大臣的同时，皇太极又将自己在继位之前所领的正白旗改为正黄旗，镶白旗改为镶黄旗；而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直接从努尔哈赤手里继承下来的镶黄旗改为正白旗，正黄旗改为镶白旗。至此皇太极便和他父亲一样，也直接拥有两黄旗了，后金国汗和两黄旗主再度合二为一。

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与三大贝勒议定，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惯例，改为诸弟侄贝勒代理值月之事。名义上是怕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过度劳累，实际上皇太极是藉此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四月，皇太极又命文馆文臣分为两班，一班专门翻译汉字书籍，以便借鉴历朝的治国经验，另一班记注本朝政事，以利总结政治得失。文馆是后来内阁的雏形，实际是汗的辅政班子。

此后，皇太极进一步加快了提高汗权的步伐。

天聪四年，二贝勒阿敏放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沈阳，皇太极决定借此机会大作文章。他与诸贝勒集议，定阿敏十六大罪状，夺其所属人口、奴隶和财产，并加以幽禁。不久阿敏病死，这位实力雄厚、专横跋扈的二贝勒再也不能试图与国汗平起平坐了。

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仿照明朝设立六部，每部由一名贝勒主管，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员。六部分理政事，直接对国汗负责，从而大大提高了汗权。八月，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口角，二人越说越僵，莽古尔泰一气之下握住佩刀柄，怒目相向，皇太极衔恨而归。两个月以后，经诸贝勒议定，革除了莽古尔泰大贝勒身份，降为一般和硕贝勒，并夺五牛

录，罚银万两。十二月，后金会议朝贺仪制，诸贝勒按照皇太极的意思，决定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尊，取消了大贝勒与国汗并坐的旧例。皇太极南面独尊是他汗权极大发展的重要标志。

天聪九年，皇太极又以代善对己不够恭敬，列了四条罪状，最后罚银万两，迫使代善俯首听命。十月，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病死，皇太极抓住这一机会，宣布将该旗据为己有。至此，身兼八旗统帅、后金大汗的皇太极，其权力和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在大力整顿内部、巩固汗位的同时，皇太极也时时不忘从外部改变后金的不利处境。

他继位不久，决心早日解决东边的朝鲜问题，以减少后顾之忧。天聪元年正月初八，大年刚过，皇太极不宣而战，派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军三万往征朝鲜。出发之前，他对诸贝勒面授机宜，他说：此次出兵不仅仅是专攻朝鲜，还要同时征剿毛文龙。所以说，这次出兵负有双重使命，是一箭双雕之举。

正月十三日，后金军队从沈阳开到了鸭绿江边，第二天，一举攻下朝鲜边城——义州，城中数万朝鲜兵及部分明兵全部被歼，居民做了俘虏。随后八旗军分兵进攻驻扎在铁山（在朝鲜西部）的明将毛文龙。毛文龙事先没有防备，损失惨重，铁山的明兵及屯种的辽东难民大遭屠戮。毛文龙被迫入海，退守皮岛（今鸭绿江口朝鲜东南之椴岛)。阿敏率军一路南进，攻城夺寨，所向披靡，于二十六日兵临平壤城下，朝鲜守城官兵望风奔逃，后金军队毫不费力就拿下了平壤。然后南渡大同江，于二月初七占领了距王京汉城仅二百里的平山。朝鲜国王李倧闻讯大惧，逃入江华岛中，后金军队停止了进军。李倧在丧师失地、抵抗与求援均无指望的情况下，被迫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起初，后金提出的条件是：朝鲜同明朝断交，驱逐毛文龙；与后金“告天盟誓，永为兄弟之国”，尊后金为兄，而朝鲜为弟。但是朝鲜执意不肯与明朝断交，坚持在尊奉明朝的前提下与后金修好，并且认

为两者是并行而不悖的。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不变，但要派王弟赴后金为人质，保证与后金和好，并且每年要进献大批财物。三月三日，阿敏派遣总兵官刘兴祚、巴克什[①]库尔缠为代表，与朝鲜国王及大臣在江华岛举行盟誓仪式，这就是所谓的“江都之约”。事后，阿敏又以自己未亲自与盟为借口，纵兵大掠三日，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后金退兵以后，又以防毛文龙为名，在义州留下重兵防守。

此役后金在朝鲜掠获了大量的财物和人口，多少缓解了后金财物匮乏的窘境。后金在重创朝鲜之余，又打击了明朝毛文龙的力量。从此朝鲜时时处于后金的军事威慑和监视之下。而毛文龙失去了在朝鲜陆上的根据地，只能退守海岛，给养受到了影响。

但是，朝鲜只是迫于兵威才违心地与后金议和的，从盟誓之日起就没太多的诚意。此后，就朝鲜履行和约义务等一系列问题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兄弟之盟”并不稳固。终于在崇德初年又爆发了第二次征朝鲜之役。

在天聪时期令皇太极最为头疼的自然还是如何对付明朝，因为明朝是后金的最大威胁。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十月，明朝在山海关一带的最高官员——宁远巡抚袁崇焕，派五台山和尚李喇嘛、都司傅有爵等三十四人来到沈阳吊唁，实际上是想借机探听一下后金的虚实。这一举动使后金颇感意外，当时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早已断绝了一切往来。然尔皇太极毕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深知自己初登汗位，后金内部不稳，打着议和的旗号不但可以麻痹对方，也可以借机了解一下明朝的情况。所以他将计就计，对李喇嘛一行甚为礼遇。双方真是各怀心腹事。十一月，李喇嘛等人踏上了归程，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七人随明使去宁远回访袁崇焕，并带去了一封致袁的亲笔信，

① 巴克什是对文臣的通称。

要求双方和好。天聪元年正月，皇太极再次遣使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并且提出了议和条件：明朝应拿出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作为和好之礼。此后明朝每年给后金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同时后金每年给明朝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尽管后来皇太极又将“初和之礼”减半，但如此众多的财物，多少带有几分屈辱性的条件，明朝是不会接受的。天聪元年三月，袁崇焕致书皇太极，认为：明朝恩养四夷，并不计较财物的多少，但后金一下子要这么多东西，向无先例，而且有背天意。他提出议和的条件是，要后金归还所占领的土地和掠夺的人口。对于袁提出的这一议和条件，皇太极根本不可能予以考虑。当时，双方对议和并无太多的诚意，只是作为一种策略。皇太极议和最积极的时期也是他出兵朝鲜、打击毛文龙的时期。而袁崇焕在议和的过程中，仍时时不忘积极备战，他乘后金出兵朝鲜无暇西顾之机，抓紧修复锦州、大凌河（在今辽宁省锦县东）诸城，以加强锦宁防线。对于后金出兵朝鲜，袁崇焕并没有能力阻止，他除了提出抗议而外，也只能派出水陆军队作出牵制之状，但均无功而返。相反，对于袁修缮城堡、向前推进之举，皇太极却不愿坐视。当他得知袁确实在修复上述城堡时非常生气，决定向明朝大兴问罪之师，试图抢在这些城堡完工之前一举攻克。

天聪元年四月十八日，征朝鲜大军凯旋而归，五月初，皇太极亲整劲旅，挥师西向。当时，大凌河、小凌河（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屯卫诸城尚未修完，后金大兵压境之际，诸城守军被迫弃城逃走。所以，这场大战主要在宁远以及刚刚修完的锦州城下展开的。五月十一日，后金军队对锦州形成包围之势，并向城中劝降，被明总兵赵率教等拒绝。十二日，后金军发起猛攻，明朝赵率教等守城将领亲冒矢石，指挥将士固守锦州。城上炮火矢石交下如雨，后金军队损失较重，被迫后撤，第一个回合后金便

败下阵来。皇太极自然不甘心失败，他一面指挥军队继续攻城，一面派人去沈阳搬取援兵。

锦州被围以后，袁崇焕便派总兵满桂及尤世禄率军出援，该部与金军战于锦州之南的笊篱山。双方互有死伤，明军退归宁远。二十五日，从沈阳来的后金援军开到，二十八日皇太极亲率大军转攻宁远。袁崇焕在宁远城中坐镇指挥，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背城列阵，以待后金兵。皇太极明知对方离城太近，不便冲击，但锦州城下的失利实令他怒火难消，他说："昔皇考（指努尔哈赤）取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在皇太极的鼓动下，诸贝勒率军对宁远发起了攻击，城下的明军面对强敌英勇迎战，城上明军也连发火炮，后金士兵一片片倒下，连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等也俱被重创。皇太极被迫撤围，引军北上，并再一次组织围攻锦州。锦州明军仍然防守甚严，金军于六月四日连续发起进攻，均未能奏效，而且伤亡越来越大。时值夏日，气候炎热，士兵的身体和士气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在伤亡较大、气候炎热的情况下，皇太极被迫退兵。途经小凌河城与大凌河城时，将城墙尽数拆毁。

这场大战历时二十五天，后金攻城不克，损失惨重，证明宁锦防线确实不易攻破。明朝称这次战役为"宁锦大捷"。袁崇焕不但守住了宁远，也守住了宁远以北的锦州，可谓是晚明的中流砥柱。

宁锦城下的失利，使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打倒明朝非旦夕可为，大举伐明的时机尚未成熟。在以后的时间里，皇太极和他的谋臣们审时度势，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明确的策略，那就是对明朝议和与军事掠夺灵活地结合在一起。

宁锦之战后，皇太极并没有放弃与明讲和，天聪元年十月，皇太极直接写信给明朝皇帝，希望双方早日议和，但毫无结果。

两年以后，他又于天聪三年正月主动致书袁崇焕，提出了恢复和谈的愿望，并且在信中不注天聪年号，以示议和诚意，随后又七次致书求和。

那么皇太极为什么对议和如此热心呢？究其原因，并非是皇太极诚心议和，而是在无力一举打倒明朝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他议和的条件主要有二，一是要保住所占领的辽东地盘，二是索要相当数量的财物。如果和议达成，后金将一下子得到巨额财富，这将有利于缓解后金财物匮乏的状况，增强后金国力；如果和议不成，他深入明境抢掠之举自然有了借口。皇太极与明议和，颇有点像一只猫戏弄一个大老鼠，不能马上食之，故而戏之，后而食之。

皇太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明朝的军事行动。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取道蒙古，从喜峰口突入明境，一举攻克遵化城，于十一月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当后金军队突入长城的时候，袁崇焕正在广宁，闻讯后急忙率祖大寿等挥师入关，赴京勤王。北京城下一战，袁崇焕与祖大寿杀退了后金军队。皇太极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祖大寿大惧，率军溃逃出关。皇太极与明军大战于北京城下，斩明将满桂，擒总兵黑云龙和麻登云等。不久，他引兵东去，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分别留兵驻守，自己则率军由冷口关北归。五月，明军猛攻永平等四城，后金大将阿敏、硕托等弃城奔逃。

天聪六年七月，皇太极在得知明朝修大凌河城的消息时，亲率大军从沈阳出发，于八月六日进抵大凌河城，将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明将祖大寿坐困城中，粮草断绝，被迫献城归降。祖大寿请求皇太极放他回锦州，以便为后金赚取该城。十一月二日，他回到了锦州，称突围生还，明廷未予追究，这位辽东勇将虽然儿子尚在后金作人质，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此后他继续为大明效力，直到十年后才真心投降了皇太极。通过大凌河之役，后金

获得了许多鸟枪火炮，又成功地招降了张存仁等三十余名辽东战将。从此，明朝再也无力向前推进了。天聪八年，皇太极再次挥师入关，进攻明朝的宣、大两镇，掠获了大批人口、财物。

后金的上述军事行动打击了明朝，壮大了后金，也有利于摸清明朝的虚实。

如果说在天聪时期皇太极并没有完全解决明朝以至朝鲜问题的话，那么他对蒙古问题的解决则基本完成。明末清初之际，蒙古分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其中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处于明与后金之间，分为察哈尔、喀尔喀等许多部，它们的向背对明与后金都至关重要。针对各部对后金的不同态度，皇太极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科尔沁部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已归附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对该部继续采取笼络政策。喀尔喀部又包括札鲁特、巴林、敖汉、奈曼等五小部，时叛时服，皇太极对它们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继位不到两个月，就派代善等人率精骑一万往征札鲁特，并遣副将楞格哩率兵袭击巴林，两军攻敌不备，分别大获全胜。不久，札鲁特与巴林部因受到察哈尔部的进攻而举部北投科尔沁，次年，又分别从科尔沁部出来投降了后金。天聪元年五月，喀尔喀五部中的敖汉与奈曼迫于察哈尔兵威，举部投降了后金。这样，由于蒙古内部纷争和后金的军事压力，喀尔喀大部分归附了后金。

皇太极在征抚蒙古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他名义上是蒙古各部的共主，实际上只是察哈尔部的首领。察哈尔是当时漠南最强大的一部，林丹汗也野心十足，企图效法祖辈，统一漠南蒙古，并与后金争雄。他虽然无意与明真正结好，但明朝为了对付后金，每年都给林丹汗巨额赏金。对于后金来说，林丹汗一日不除，则后金一日不宁。皇太极决定对察哈尔大举征伐。天聪二年二月中旬，皇太极率精骑在敖木伦地方袭击了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

俘获了一万一千二百余人，首次用兵，便大获全胜。天聪六年皇太极率满蒙军队共十万人讨伐察哈尔，林丹汗闻讯西奔，一直逃往青海大草滩（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天聪八年病死。林丹汗西逃及死后，部众陆续投降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等人统率精兵一万，西渡黄河，专程前往寻找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额哲与其母苏泰太后率部众归降，并交出了元朝的传国玉玺。通过三次对察哈尔的用兵，强大的察哈尔部被打败，漠南蒙古宣告统一。从此皇太极解除了西面的威胁，昔日的敌人成了共同抗明的盟友，后金不但获得了大量兵源，也打开了从山海关以西攻击明朝的通道。

由于后金不断强大，加上得到了元代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所以后金的统治者和蒙古贵族都认为后金当兴，此乃天意，只有皇太极即位称帝才能足应天命。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在群臣的拥戴下，皇太极正式继皇帝位，改金为大清，改元崇德。天聪朝政至此结束。

从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在十年的时间内，皇太极通过一系列政策，对内缓和了满汉矛盾，逐渐消除了后金内部的政治危机，极大地提高了汗权，直到他南面独尊，登上帝位；对外，打击了朝鲜，臣服了蒙古，解除了左右两翼的威胁，同时对明战争也逐渐赢得了主动。天聪时期是后金（清）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皇太极将其父开创的伟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太宗实录》卷 1、卷 5、卷 7、卷 9、卷 11。

孙文良等：《清太宗全传》第三、四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4 月版。

三征林丹汗

明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以百战之兵一举攻克大都，元朝从此灭亡。由于内部纷争以及明军的不断打击，明初蒙古逐渐分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是蒙古的主体，居于大漠南北，蒙古大汗在这里代代相传。瓦剌部又称卫拉特，住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准噶尔盆地等地。兀良哈位于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一带。起初，鞑靼、瓦剌迭有盛衰，明代中期以后瓦剌偏居西北，终明之世一蹶不振，而鞑靼部却几度强盛。

明成化十年(1474 年),元世祖的七世孙巴图蒙克继鞑靼汗位,是为达延汗。达延汗东征西讨,统一了蒙古大部,并大行分封。他将大漠南北分为六个万户,大汗及其嫡长子孙驻于察哈尔万户,其余五个万户分命诸子管辖。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达延汗死去,长孙博迪继承汗位,博迪死后,子打来逊嗣位。后两任大汗虽然名义仍是蒙古各部的共主,但实际上号令不出察哈尔本部,蒙古各部再度陷入分裂状态中。这时,达延汗的另一个孙子俺答汗崛起,漠南蒙古各部次第归服。迫于俺答汗的强大势力,打来逊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举部东移,迁至辽东边外,吞并了泰宁、福余卫,屡扰明边。打来逊死后,土蛮汗、卜言台周相继登位。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卜言台周死,孙林丹汗继位,号库图克图汗,明人称为虎墩兔。这时,俺答汗的一支早已衰落,漠南蒙古又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与东边日渐强大的女真正好形成鲜明对照。面对这种形势,林丹汗发奋图强,决心再度完成统一蒙古的中兴大业。但

是时代不同了,后金政权已经在东方崛起,林丹汗的统一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后金要向蒙古发展势力,而林丹汗要统一蒙古诸部以抗拒后金,双方势必将发生冲突。

万历四十七年十月,萨尔浒之战以后,正忙于统一活动的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以威胁的口气说:“四十万蒙古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诏旨,问水滨三万人诸申主昆都仑庚寅汗平安无恙。你如果往图广宁(今辽宁省北镇),我将阻止你。”此时努尔哈赤正在全力对付明朝,无暇西顾,所以只是遣使回书,反唇相讥,并劝其共同反明。然而并未采取军事行动。

天启五年(1625 年,后金天命九年),察哈尔派兵攻取科尔沁部珠尔根城,科尔沁向后金求救,努尔哈赤派兵五千前往解围,林丹汗不战而逃。

皇太极继位以后,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漠南蒙古,必须先打垮察哈尔林丹汗,所以他决定对察哈尔大举用兵。

崇祯元年(1628 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中旬,皇太极率精骑在敖木伦地方(大凌河上游)大破察哈尔多罗特部,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余人。对察哈尔用兵,首战告捷。九月,皇太极命令已经归降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等部,各出兵马,协助八旗军队一起西征察哈尔。皇太极率满蒙军队大举进攻,俘获了大量人畜,至兴安岭班师返回沈阳。

崇祯四年,皇太极得知林丹汗至西拉木伦河以北侵扰蒙古阿鲁部后,便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林丹汗被迫退兵。金兵前锋一直追至兴安岭,不及而返。

由于林丹汗在统一蒙古过程中异常贪横,又崇尚武力,结果为渊驱鱼,蒙古诸部纷纷倒向后金。崇祯五年,在察哈尔以西蒙古诸部陆续投降后金之后,皇太极决定大举讨伐察哈尔,下令已归降的蒙古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札鲁特、巴林、阿鲁诸部出兵随征。四月一日后金军队从沈阳出发,西渡辽河,一路

上蒙古诸部纷纷率兵前来会合，满蒙联军总计约有十万余人。四月十七日，大军来到哈喇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支流黑河）哈纳崖地方时，军中有两个蒙古兵偷偷溜走，向林丹汗报告了皇太极率军亲征的消息。林丹汗闻讯大惧，率领部众仓促西奔。皇太极率军越过兴安岭，一直追到达尔湖，得知林丹汗已远逃黄河以西，距达尔湖约有一月路程，一时难以追及，所以皇太极决定进军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由于大军千里远征，军粮十分紧张，正巧沿路黄羊出没，士兵们便靠围杀黄羊充饥。时值夏日，气候炎热，士兵们在很长时间内找不到水喝，真是干渴难忍，许多人都昏到了。终于，在一次夜里行军中发现了泉水，这水自然无比珍贵，竟至一只黄羊换一碗水喝。五月二十七日，大军来到了归化城，顺义王卜失兔子俄木布等举众投降，并献上明朝所赐顺义王印。至此，后金军队远离沈阳，追击林丹汗四十一日，迫使林丹汗狼狈西窜。皇太极离开归化城以后，又乘机南掠宣、大明边，七月二十四日，大军回到沈阳。

这次出师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是皇太极对林丹汗规模最大的一次用兵。此役虽然没有彻底消灭林丹汗，却迫使他一路败逃，部众离散，许多人投降了后金。从此宣大塞外处于后金控制之中，自宣府、大同直至辽东，明之长城便与后金势力为邻，中间再无缓冲地带。

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西征，进攻明朝宣、大二府，同时兼收察哈尔余众。五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与代善、多尔衮以及新投降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十旗兵马，从沈阳出发，一路西进，七月初行至宣、大，后金军队分路进人明边，大掠宣、大等地。当时，逃至青海大草滩（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林丹汗，已经出痘病死，察哈尔部树倒猢狲散，许多大臣听说后金大军来到，纷纷率众前来归降，皇太极此番招抚察哈尔部众共约四五万人。此外，受察哈尔控制的茂明安部、四子部落等，

也都举部投奔了后金。察哈尔部分崩离析，只有林丹汗的妻子苏泰太后和儿子额哲率少数部众仍在黄河以西苟延残喘。

崇祯八年，皇太极派他的弟弟多尔衮，侄子岳托和萨哈廉、长子豪格等四贝勒率精骑一万，前往收服额哲。大军于二月二十六日从沈阳出发，三月十日经过西拉木伦河，四月二十日西渡黄河，于二十八日终于来到了额哲的驻地托里图。多尔衮乘其不备，突然以大兵压境，苏泰太后与额哲被迫率领部众出降。多尔衮又从苏泰太后手中索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据传元顺帝北逃时将此玺带出，他死后，玺便不知所终。后来此玺复出，辗转到了林丹汗手中。玺上刻有“制诰之宝”四字，真可谓是宝中之宝。多尔衮在招降额哲的同时，又收服了鄂尔多斯部，该部地处河套，物产丰富，为西北塞外蒙古强部，明人称“套部。”至此，漠南蒙古全部归附后金。

皇太极通过崇祯元年、五年、八年三次征伐，以及其他军事行动，终于打败了林丹汗，征服了察哈尔部，漠南蒙古自此完全归附后金。由于兵源增加，皇太极将原来蒙古左右翼两旗扩编为八旗，成为佐助清政权定鼎中原的又一支劲旅。皇太极又在漠南蒙古各部（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除外）设立札萨克（旗长），陆续编为四十九旗，漠南蒙古的盟旗制一直影响至今。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史·鞑靼传》；《明史·瓦剌传》；《开原图说》卷下；《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三；《清太宗实录》卷4、卷11；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九，“明末蒙古各部的纷争与清（后金）对漠南蒙古的征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孙文良等：《清太宗全传》第三章第六节，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五次入关之役

清定鼎北京之前，曾先后五次突入长城，蹂躏明朝的中原地带。一般称这五次军事行动为五次入关之役。

明天启六年（1626 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和七年，一代名臣袁崇焕坚守宁远，两败后金，成了晚明的中流砥柱。从此，宁、锦防线宛如铜墙铁壁，巍然屹立于山海关外，使清军望而却步，八旗铁骑的锐气受到了严重的挫折。难道要听任这种局而持续下去吗？皇太极可不是等闲之辈，他要避实击虚，绕开锦、宁，在山海关以西挥师入关，然后相机行事。

后金天聪三年（1629 年，明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进攻明朝，从此揭开了五次入关之役的序幕。由于天聪三年是农历己巳年，所以第一次入关之役又称己巳之役，明人称“己巳虏变”。

十月二日，大军从沈阳出发，由喀喇沁部布尔噶都台吉为向导，取道已经降明的内蒙科尔沁、喀喇沁部，一路西行，直指明边。十月二十日，当大军行至喀喇沁的青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面见皇太极，力主回师。皇太极起初很为难，后借助于岳托、阿济格等一批年轻贝勒的支持，终于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得以继续进兵。

十月底，皇太极指挥军队分三路从蓟镇突入明边，连降汉儿庄、马兰营等边城，直扑遵化。十一月三日，后金军队攻克遵化城，明朝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金军一路疾进，经蓟州、三河、

顺义、通州等地，兵锋直指北京近郊。

这时已升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一闻敌警便亲率大军入关勤王。十一月十六日，他和祖大寿率精骑驰至北京城下。十七日，后金军队到达距北京二十里的牧马厂。二十日以后，后金军队多次发起攻击，均被袁崇焕率军击退。皇太极下令还营。值此危难之际，袁崇焕千里赴援，率兵勤王，护卫京师，忠心可鉴。但京师骤然被围，人心慌乱，谣言四起。由于袁崇焕早年曾与皇太极假意言和，加之这次入关又急于趋护京师，一路上尾随金兵未曾寻机搏战，所以有人说袁试图勾结后金，图谋不轨。崇祯帝听后颇为心动，当袁以士马疲弊为由请求大军入城休息的时候，他马上表示拒绝。

如果说京城的谣言只是让崇祯帝产生了猜疑的话，那么皇太极的反间计则使崇祯帝坚信不疑。

原来后金军在初抵京郊的时候曾俘获了明朝的两个太监杨春和王德成。皇太极知道崇祯帝宠信宦官，便决定借助杨、王二个宦官除掉袁崇焕。从袁军阵前还营之后，皇太极便找来副将高鸿中和参将鲍承先，对他们面授机宜，二人领命而去。他们回到营中，坐在杨、王二太监睡觉的地方故作耳语，煞有介事地说："今天撤兵是大汗的计策。在撤兵之前曾见大汗单骑前行，敌营中有两人前来面见大汗，商量了许久才离开，看来袁巡抚与大汗有密约，事情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太监杨春本没睡着，高、鲍二人的谈话他都听到了，并且还自以为是得到了重要情报。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高、鲍二人又故意放走杨春。杨回到京城后，便将"偷听"到的话密告崇祯帝。同年十二月一日，崇祯帝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祖大寿等人见，当面指责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和进京逗留不战两大"罪过"，不由分说，便将他打入监狱，后来袁崇焕被处以磔刑，冤死于西市。祖大寿在袁被捕以后异常惊惧，率辽兵溃逃出关。

皇太极在放走杨春后并没有马上进攻北京，而是引兵西去，攻占了良乡（今北京房山县境内）。当他听说反间计已得手之后便又回到明京师，十七日与明军大战于永定门外，阵斩明朝大将满桂，生擒明总兵黑云龙和麻云。不久，皇太极移师东去，一路上连克永平、滦州、迁安等处，并分别派兵驻守。天聪四年三月，皇太极率军出关北归。五月，遵、永等四城被明军收复。

这次入关围京，挥师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虽然皇太极在京东建立根据地以打开局面的设想没能实现，但巧设反间计杀掉了袁崇焕，从而为后金除掉了一个强劲对手。

天聪八年，皇太极决定进军明朝宣、大一带，同时接收蒙古察哈尔部余众。

当年五月二日，皇太极亲率大军从沈阳出发，浩浩荡荡向西开去，一路上所遇到的察哈尔余众纷纷归降。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后金军队开到了宣、大边外。起初明军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对方兵临边墙的时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时已晚。皇太极指挥军队分四路闯关夺口，突入明境，大掠宣府、大同、应州（今山西省应县）、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等地。此番入关皇太极吸取了上次教训，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夺城池上，因为夺城攻坚代价甚大，即便是攻得下也是守不住。这次他采取了驰骋转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明军的策略，并在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同时大肆抢掠财物。金军入关驰驱，蹂躏宣、大五十余日，接连杀戮军民，毁坏禾稼，攻占城池，俘掠人畜，不一而足。明廷见宣、大边兵不堪一击，忙调关（山海关）、宁（宁远）精兵二万分道驰援，但仍无济于事。天聪八年闰八月，皇太极在已达到目的之情况下，率军从容出塞，九月，回到了沈阳。

天聪八年之战是皇太极发动的第二次入关战役，又称“入口之战”。此战役是皇太极假道蒙古打击明朝的又一次成功的尝试。

到了崇德元年（1636 年，明崇祯九年）皇太极终于荣登皇

帝宝座。在自得之余，他并没有忘记对明朝进行军事骚扰和财富的掠夺。继位一个月后，他又一次派遣军队入关伐明。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下达作战命令：命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率领大军进攻明朝，并指示他们专取破残城池，如城守甚坚则不要强攻。五月三十日阿济格率领大军离开沈阳。六月二十七日清军从独石口（在今河北省赤城北）分三路进入明边。

八天后三路清军会师于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然后入居庸关，克昌平，烧毁明德陵（明熹宗陵），一路南下，直指京师。崇祯皇帝吓得要死，忙令各路大军勤王。其实，清军本无意于进攻北京，只不过是想抢掠一番以虚张声势，打击明朝并且制造恐慌。清军由西山（在北京之西）南下良乡，在北京近郊的清河、沙河等地虚晃一枪后，便在京南一带大肆抢掠，先后攻克宝坻、定兴、房山、固安、文安、永清等地。接着，大军又转向北京东北，驰骋于怀柔、密云、平谷等地。在北归之前，阿济格又挥师畿南，直指雄县，最后过了一次抄掠之瘾。九月一日，清军从冷口关（今河北省迁安北）出边，满载而归。明军尾追清军却不敢近前，眼睁睁地看着清军出关回师。清军十分得意，将“各官免送”的木牌扔于道旁，借以戏谑明军。在清军远去之后，明朝各路援军的总督高起潜才装模作样的率军出关，然后以斩敌三颗首级向皇帝报捷。真是莫大的讽刺。

由于这一年（崇德元年）是农历丙子年，所以此役又称“丙子之役”。通过第三次入关的丙子之役，清军从北京的西北一直打到东北，几乎绕京畿一圈，甚至一度攻克了明帝诸陵所在的昌平，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大掠京畿一带，俘获人口七万三千多人，掠得牲畜十二万余头。

两年之后，清军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入犯。

崇德三年，皇太极以明朝拒绝言和为借口，第四次兴兵内

地。八月二十三日，他命令多尔衮、豪格、阿巴泰统左翼军，岳托、杜度统右翼军，两路同时出击，大举伐明。九月二十二日，岳托率右翼军从密云东北的墙子岭口（属蓟镇西协）入边。二十八日，多尔衮率左翼军由蓟镇中协（蓟镇共分三协）董家口东青山关一带毁边墙突入明境。右翼军入关后大败明军，杀死明蓟辽总督吴阿衡。两路清军会师于通州河西，又从北边绕过北京，大掠良乡、涿州，兵锋直抵山西。随后，清军兵分八路，大举南进，这八路中，一路顺太行山而下，一路沿运河前进，另外六路则驰骋于太行山与黄河之间。

清军入境后，明廷马上宣布京师戒严，并调集诸路兵马勤王。在大敌当前、中原危急的紧要关头，崇祯君臣对于战守毫无成算。兵部尚书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主和，宣大总督卢象升主战，主和派与主战派喧嚣相争，毫无结果。崇帝起初倾向于主和，后来又顾全脸面，主张抗战。但他并没拿出抗战的实际行动来，相反，仍然重用杨、高等主和派大臣。十一月，清军攻克高阳，原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孙承宗全家被杀。十二月，徒有督师虚名的卢象升以不足万人之旅迎战清军，在巨鹿（今河北省邢台东北）贾庄之战中，他陷入重围，身受重伤，仍然拼死力战，拒不突围，最后马蹶被杀，所部全军覆没。

崇德四年正月，清军蹂躏济南，兵进山东并乘虚攻克济南，俘获明德王朱由枢。随后大军直抵兖州、济宁等地，转攻州县十六处。明督师大学士刘宇亮尾随清军而行，怯敌不战。四年三月，多尔衮率军经天津北上，由青山口出塞。第四次入关之役结束。此役又称“戊寅之役”。

在戊寅之役中，清军跃过了京畿一带，转战两千余里，横扫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进一步扩展了攻掠的范围。在五个多个月的时间里，大小凡数十战，斩杀明军总督以下主要将官百余人，攻克城池七十余座，俘获人口四十七万，掠得金银数以千万计。清

军战果累累，而明朝则损失惨重。不过清军在此役中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左翼统帅岳托病死于济南。这对清廷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崇德五年至七年，明清之间进行了一场大战，即松锦之战。通过松锦之战，皇太极消灭了明朝在北方的主力。此后，为了进一步削弱明朝的实力，皇太极发动了第五次入关之役。此役又称“壬午之役”。

崇德七年，皇太极任命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令他统帅满、蒙、汉军队约十万人大举伐明。十一月初，阿巴泰兵分两路，分别从界岭口（今河北省迁安与抚宁交界处）和黄崖口（古北口西段）进入长城。

明军鉴于以往四次被掠的教训，加强了蓟镇、山海关的防务，设关内、关外两总督，又在昌平、保定置总督。此外，还于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设立六巡抚，宁远、山海、蓟镇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设八总兵。千里之内设四督、六抚、八总兵，这在明朝是没有先例的，设防可谓周密。但是由于清军常以数万大军从一线突破，所以防守再严也无济于事。

两路清军闯入长城后长驱直入，很快在蓟州会师。随后，清军分兵南下，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等地。崇德七年闰十一月，由畿南转入山东，直指临清，不久又兵分五路，同时前进。十二月初八日，攻克兖州，明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饱掠已毕，便分两翼北归，左翼经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德州、沧州、天津卫等地抵密云，右翼出东昌，沿太行之东至密云与左翼会师。崇德八年五月，清军由墙子岭陆续出关。

这次入关之役历时半年，八旗铁骑驰骋于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攻克城池八十八座，掠获人口三十七万，金银财物不可胜数。

皇太极先后发动的入关五次之役是在宁锦阻隔、山海关不通的情况下对明朝进行的旁敲侧击。五次入关之役虽然没能使清的国土有所扩展，但却掠夺了大量的财物，从军事上、经济上削弱了明朝的实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且每次入关之役都给崇祯君臣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使明朝上下越来越灰心丧气；相反，八旗将士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实战锻炼，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为以后的入关进京作了必要的准备。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太宗实录》卷5、卷6、卷19、卷29、卷30、卷31、卷45、卷46、卷62、卷63、卷64。

《国榷》卷90、卷91、卷93、卷95、卷96、卷97、卷98。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

《明史·卢象升传》。

松锦大战

崇德五年（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至七年，明、清（以前称后金）两个政权进行了第二次决战（第一次是萨尔浒之战），由于战争发生在关外的松山（在锦州南十八里）、锦州等地，故称“松锦之战”，或“松锦决战”。

自从努尔哈赤攻陷辽西大地之后，宁远（今辽宁省兴城）、锦州等地的战略地位便显得格外重要。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明天启三年），富有远见的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于宁远构筑坚城，宁远遂成为关北重镇。此后，袁崇焕又以宁远为中心，先后恢复了锦州、松山、杏山（松山偏西南十八里）、大凌河（今辽宁锦县东）诸城。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十月，辽东经略高第下令尽撤关外军民入关。袁崇焕拒不从命，坚守宁远。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宁远，被袁崇焕打败。宁远城在修建之初便表现了它非凡的作用。不久，袁升为辽东巡抚，他乘后金东出朝鲜之机积极扩展防线，着手修复锦州、大凌河诸城。皇太极得知这一消息非常生气。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征朝大军班师后没有几天他便统率大军扑向宁远。这时大凌河城尚未修成，锦州城也是刚刚竣工，明锦、宁防线仅具雏形。大凌河明军见城未修完而敌兵压境便主动弃城而逃。战斗主要在锦、宁城下进行。皇太极先指挥军队进攻锦州，被城内明军打得大败。他又赶忙派人从沈阳调来援兵，然后转攻宁远，又遭到宁远明军重创，从宁远撤围后，皇太极又指挥大军

第二次攻打锦州，但毫无进展。最后，皇太极被迫撤兵。明朝以锦州、宁远为中心的锦宁防线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从而证明了袁崇焕当初修筑宁远的正确性，也使明廷看到了宁、锦的战略作用。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明军再次修筑大凌河城。消息传到沈阳，皇太极二话没说，赶忙召集诸将，宣布刻期出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明朝将锦宁防线向前推进一步。

皇太极兵临大凌河城下，将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三个月后，明大凌河守将祖大寿被迫出降，不久他又设计逃回锦州。金军拿下大凌河城后，毁城而去。此后，明军便再也无力向前推进防线了。

自从进攻锦宁失败以后，皇太极改变了对明作战方略，他决定绕开锦、宁，在山海关以西进攻明朝，入关抢掠，因而发动了五次入关之役。在五次入关之役中，清军掠获了大量人口和财富，但却没能在内地保住一寸土地，主要是因为锦、宁明军挡住了往来通道，内地无法立足。锦、宁成了皇太极入居中原的最大障碍。因此，皇太极决定寻找机会突破锦、宁防线。

早在崇德三年第三次入关之役期间，皇太极便乘锦、宁明军入援内地之机，亲率多铎、济尔哈朗等进攻山海关，多铎部行至中后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城，在宁远西南），被祖大寿打得大败。第二年，多尔衮率军出关，皇太极决定与之互相配合，率代善、孔有德等满、汉军队进攻锦州的侧翼——松山。清军动用了红夷大炮，并穴地攻城，然均未奏效，围城二十余日，无功而返。这说明锦、宁难以轻易攻破，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

崇德五年正月，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祖可法、理事官马国柱等人，联名上奏皇太极，提出了打败明朝的三种方案：第一种是刺心之术，直取京师，然后攻占河北；第二种为“断喉之著”，首先攻破山海关，进而直捣中原；第三种是剪枝之术，屯兵广

宁，“逼临宁、锦门户”，迫使明军耕种自废，难以图存，而后清军由锦州至宁远，再由宁远至山海关步步坚逼。在这三种方案中，张存仁等汉官们更倾向于第一种，并称之为上策。

但是皇太极早有打算，他认为第三种方案更可行。此外，为了“逼临宁、锦门户”，皇太极修正了张存仁等提出的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屯种的方案，他选择了离锦州更近的义州（今辽宁省义县）。该地在锦州北九十里，地当冲要，适宜屯种。崇德五年三月，皇太极任命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铎为左翼主帅，命二人率军在义州筑城、屯田，以骚扰锦、宁明军，不让他们在那里耕种。随后，皇太极又将粮食、人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义州。

张存仁见皇太极采纳了先破锦、宁的“剪枝之术”，便于五年四月十一日向皇太极奏陈攻取锦州之计，其要点是：第一，以屯种为根本，长期（数月至一年）、有效地围困锦州，并随时寻找可乘之机；第二，策反锦州城内的蒙古军，设法招降祖大寿。张存仁的建议基本上被皇太极采纳。

五月初，皇太极亲自前往义州巡视屯田，并很快来到锦州城下。他派人将锦州城东、西、北面明军和百姓所耕种的庄稼尽行收割，同时致书城中，对蒙古族的士兵进行劝降。皇太极巡视锦、义后，决定实行轮番屯驻、步步紧逼的办法围困锦州。他将军队分为两班，每班三个月，命令他们轮流围困，逐渐缩小对锦州的包围圈。

继济尔哈朗之后，多尔衮、豪格等人奉命换防，继续带兵围困锦州。多尔衮等人连续攻下了锦州周围的墩台、哨所，明锦州城形势十分危急。

清军围锦之举引起了明廷的震惊。崇德五年五月，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督师。洪承畴，进士出身，曾任陕西三边总督，镇压农民军多年，颇有韬略，出关以后，他一路来到前线城

市——锦州东南的杏山城。崇德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他率刘肇基（前屯卫署分练总兵）、吴三桂（宁远团练总兵）、马科（山海总兵）、曹变蛟（蓟镇东协总兵）等部明军阻击清兵于杏山城，阻止了清军继续南扰的势头。双方在松、杏一带形成僵持局面。

明军欲解锦州之围，保证松、锦、杏诸城的军粮供应便成了首要问题。没有粮食，锦州守军便无法支持，而解围部队也难于久驻松、杏。有鉴于此，洪承畴利用清军围城不严之机，从宁远向锦、松、杏等城大批输送粮食。当时，清军主帅是多尔衮，他下令大军移营郊外，在离锦稍远的国王碑（锦州东北二十里左右）一带驻扎，同时允许士兵轮流回家。由于清军移营后撤，锦州所受的压力大为缓解。洪承畴乘此机会命令左光先、曹变蛟、马科、刘肇基等将杏山的粮食运往松山，再由吴三桂等人从松山运至锦州，从而将大批粮食由宁远一步一步运到了锦州、松山等前沿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锦州、松山等地的军粮问题。皇太极认为多尔衮围城不严，坏了他的大事，将他贬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同时也处罚了其他围锦将领。

崇德五年十二月，张存仁见清军围锦无效便上奏皇太极，建议明春围锦时要环城挖壕，严密围困锦州，并且要先破锦州的羽翼——松山、杏山、塔山诸城。这位汉官在围锦之役中真是频献良策。崇德六年三月，又到了换班的时间，济尔哈朗替下了多尔衮，率军继续围困锦州。他来到锦州后，在城的四面每面设立八营，绕城挖深壕，沿壕筑垛口，在近城一带又设哨兵巡逻。几乎将锦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六年三月底，守卫锦州东关外城的蒙古兵叛变，清军乘机攻破外城。锦州十分危急。

自崇德六年正月以来，由于洪承畴的奏请，明援辽大军陆续出关。四月十六日，七位总兵（王朴、杨国柱、马科、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廷臣）齐集宁远，四月下旬，洪承畴挥师北上，率七镇兵马与清兵激战于锦州城南的东、西石门。明军分两

路向清军的驻地发起了猛烈攻击，虽然偶有伤亡，但仍然不肯退缩，表现了无畏敢战的精神。此役清军也小有伤亡。六年六月，洪承畴指挥明军与清军大战于松山西北，明军向清军营地发起了攻击，夺取了三个旗的营地，并大创清军。明军斗志颇旺，逐渐在松山一带取得了主动地位。

崇德六年七月，明廷下达了大举出击的命令。这不但使明军在松锦战场的优势全部丧失，而且也最终导致了洪承畴全军覆没。本来，洪承畴主张稳扎稳打，长期坚持，相机解除锦州之围，理由是"久持松、杏，以资转饷；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皇太极令朝鲜出粮、出人助战）。"但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担心师（指明军）久糜饷，又怕清兵再次绕过锦、宁入关抢掠，因而主张速战解围。他致书洪承畴，激洪进兵，又上疏崇祯帝请求速战。崇祯帝起初是支持洪承畴实行持久战的，可听陈新甲等人一说又改变主意，密敕洪刻期进兵。洪承畴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出战了。七月二十六日，洪在宁远大誓将士，决定出兵。他将粮饷留在塔山近海之笔架山，然后率八总兵十三万大军开向松山。二十八日，大军来到松山城，他指挥部分军队抢占乳峰山西侧高地，从而对驻于山东侧的清军形成了居高临下之势；其他部队则驻扎在松山城与乳峰山之间。这样明军的增援部队扑向锦州，围锦清军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八月二日以后，双方多次发生激烈战斗，明军虽然略占上风，但无大的进展，锦州之围并未打破。这时，清军的统帅又换上了多尔衮。他见明军势众，咄咄逼人，便被迫采取守势以待援兵。在清援兵未至之前，明军赞划军务的绥德知县马绍愉曾建议洪承畴乘机进击，洪未加理睬；大同监军张斗主张派兵驻守松山城南之长山岭，以防后路被抄，竟遭洪奚落。

洪承畴自视高明，拒绝采纳部下建议，这也是造成明军后来

惨败的原因之一。

虽然洪承畴并未大举出击，但明军的阵势和锐气却足以使多尔衮感到不安。八月六日，多尔衮派出的使者赶到了沈阳，报告了前线敌军甚众的情况。皇太极指示多尔衮相机攻取，不可轻举妄动。八月十一日，多尔衮的使者再次来到沈阳，请求紧急增援。皇太极认为事关重大，决定亲征。当时，皇太极患病未愈，鼻中流血不止，不得不将动身日期向后拖了几天。十四日，他再也坐不住了，决定起程，途中以碗承血，流了三天血才止住。到了八月十九日，皇太极一行来到了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皇太极率主力开到前线后，决定实行围锦打援之策，与明军决战。早在七月二十三日，洪未进抵松山之前，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便已估计到明朝大军肯定前来解锦州之围，他建议清军在松、杏与塔山之间的高桥设伏，挖掘长壕，断敌饷道。所以皇太极来到前线后便欲结营于高桥。多尔衮认为，高桥与他率领的围锦清军相距甚远，难以互相声援，因而建议皇太极驻军于离锦稍近的松山与杏山之间。皇太极认为他的建议很有道理，便采纳了。清军一字排开，绵亘驻营，横截大路，切断了松山与杏山之间的联系，从而也切断了明军的退路和饷道。八月二十日，明军见清军突然开到，后路被抄，大为慌乱，赶忙回头南向，对清军主力主动发起攻击，未分胜负。当日，皇太极下令全军在松、杏之间的要路挖壕三道，壕深八尺，宽丈二，狭长的辽西走廊登时出现了一道“天堑”。同时他还派兵夺取了明军在笔架山的军粮十二堆。明援军被困在松山一线。二十一日，明军大举出击，企图突围，为壕堑所阻。明军两次突围不果，军中粮食仅够三天食用，困守松山便等于坐以待毙。皇太极估计明军严重缺粮，可能于当晚溃逃，便在松山以南的杏山、塔山、小凌河口等明军必经之处布下了天罗地网。

在皇太极紧张地布置伏兵的时候，洪承畴也在寻找出路。二

十一日晚，在第二次突围无效后，洪承畴马上召集诸将，共谋对策。起初，洪主张趁粮食未尽之前与清军决一死战，以战图存。但是诸将意见不一，大多数人主张回宁远就食。值此关键时刻，陈新甲的同党、监军张鹿麒致书洪承畴，表示支持回宁远就食的意见。最后，洪承畴迫于众议，不得不改变初衷，决定有计划地强行突围，他命令王朴、白广恩、唐通三总兵为左路，吴三桂、马科、李辅明（宣府总兵杨国柱死后李代之）三总兵为右路，两路并进，强行突围，回宁远就饷后携粮再战。洪自留曹变蛟和王廷臣二总兵守松山，等待援兵。但是诸将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会议刚散大同总兵王朴便率本部出逃，于是其他五总兵也各统所部一窝蜂似地向杏山、塔山等地奔去。

果然不出皇太极所料，明军钻进了清军的伏击网中。六镇兵马自松山一路南逃，沿途受到了清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明军试图经海岸逃走，时值夜晚，难辨方向，又正赶上海水涨潮，许多士兵被海水淹死，“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八总兵本人在士兵的护卫下辗转逃归宁远，虽然性命得以保全，但也十分狼狈。明军突围生还者共约三万余人，六镇明军突围后，皇太极指挥大军于二十二日进围松山城。当日夜里，曹变蛟指挥军队分路突围，连闯清营数次，一度攻入皇太极御营，均被清军击退。

松锦之战历时很长，但真正的会战只发生在六镇明军突围的几天内。从八月二十一日夜明军自松山突围，至二十六日王朴、吴三桂率残兵逃回宁远，短短几天内清军消灭明军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并缴获了大量马匹、甲胄。

此后，松、锦、杏、塔诸城便处于清军的团团包围之中。九月十三日，皇太极因爱妃病危急忙赶回沈阳，将前线军务交给了诸位将领。

转眼到了第二年（崇德七年）。经过松山之败后，明朝已没

有能力援救松、锦诸城了。洪承畴困守松山，里无粮草，外无援兵。七年二月，守卫松山的明副将夏成德降清，松山遂陷，洪承畴等人被俘。皇太极下令将洪承畴和祖大寿之弟送到沈阳，其余官吏将尽行诛杀，一共杀死三千余人（夏成德部下得免）。三月，守卫着“饥民相食”的锦州城的大将祖大寿，见松山城破，大势已去，也只好献城归降。清军将不属于祖大寿系统的军卒杀戮殆尽。

松、锦一破，松、锦之战便进入了尾声。四月九日，济尔哈朗等指挥军队以红夷大炮攻克了塔山，歼灭明军七千余人。二十二日，清军炮轰杏山城，击毁城垣二十五丈，随后便准备攻入城去，明军被迫乞降。至此，松、锦之战全部结束。

松锦之战从锦州围城到杏山迫降，历时二年多。通过松锦之战，皇太极消灭了明朝在北方的主力，为日后清军的入关进京打下了基础。明朝在此战中损兵折将，失去了关外八城的一半，此后明朝凭关（山海关）、宁（宁远）而守，在与清的对抗中越来越显得吃力了。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太宗实录》卷 51、55、56。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 5“锦宁战守”。

《国榷》卷 97。

蒋良骐：《东华录》卷 3。

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一、论松锦之战与洪承畴援辽的失败”，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顺治登基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在一夜之间突然病故，清朝的臣民们失去了他们的皇帝，一下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中。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选立嗣皇自然成了当务之急。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呢？如果说当年努尔哈赤是在立太子失败的情况下才实行八贝勒共举新汗的话，那么作为这一制度受益者的皇太极，在有生之年却没有进行选立太子的尝试。也许是父亲的教诲言犹在耳，也许是自视壮年无须虑及后事，不管怎么说，皇太极并没有指定接班人。所以，选立新君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他原来手下诸王的肩上。

由于在此以前后金并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制度，所以就当时情况而论，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因此，大清的诸王们既是推举嗣君的重臣，又是竞争皇位的主角。皇冠从来都是十分诱人的，凭心而论，哪一个王公不愿享受一下九五之尊呢？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谁也别想毫无异议地顺利入选。由于诸王纷争，形势严峻，所以条件不太充分的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便打消欲念，扮演了纯粹推举者的角色。原因很明显，代善虽然资历较高，实力雄厚，但努尔哈赤废除太子和皇太极压制诸王他都深受其害，自天聪三年（1629年）以来很少过问政事，所以他对争夺汗位已是心灰意冷。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之侄，阿敏之弟，由于他积极投靠皇太极，所以地位扶摇直上，成了皇太极手下数一数二的重臣。但他毕竟是努尔哈赤侄子，在竞争皇位问题

上与其他诸王相比，自然是相形见绌。

那么，争夺皇位呼声最高的是谁呢？他们不是别人，一个是在朝中举足轻重的多尔衮，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帝位的争夺主要是在这两个人之间进行的。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初封贝勒，皇太极继位后，他被封为和硕贝勒（旗主贝勒）。多尔衮在皇太极时期功劳卓著，地位显赫。崇祯元年他随皇太极进攻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因表现出色被皇太极赐以墨尔根代青[①] 的美号。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命多尔衮掌管六部之首的吏部。天聪九年派他统兵征讨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他兵不血刃地最后解决了察哈尔部，招降了额哲，并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为后金立下了大功。皇太极即位称帝，封他为和硕睿亲王。同年十二月，皇太极亲征朝鲜，命他和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一路南进，然后乘舟下海，攻下江华岛，俘朝鲜王妃、王子及宗室七十六人。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与岳托分统左右路军分道伐明。多尔衮率军从蓟镇青山关进入明境，从京畿打到山东，取城四十余座，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余人。总之，多尔衮军功卓著，文武双全，颇负才干，加之他对皇太极言听计从，所以倍受器重，在八旗诸王中威望较高。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比多尔衮大三岁。早在天命时期（1616～1626 年），因征蒙古有功，被封为贝勒。皇太极继位以后又晋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被封为肃亲王，掌管户部。后来在入关征明（随多尔衮攻华北及山东）及松锦之战中又屡建军功。豪格在皇太极诸子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在当时的满族诸王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两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总的说来，论实力，多尔衮稍占优

---

① "聪明王"的意思。

势；从舆论方面讲，豪格又得天独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多尔衮具有别人所不具备条件：第一，他有两位能征善战、地位显赫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豪格并不具备这么整齐的联盟。第二，多尔衮和多铎是两白旗主，他有两白旗作后盾，而豪格在当时是正蓝旗一旗之主，两黄旗因是皇太极所领旗，所以两黄旗人才与豪格有利益上的关联与一致性。况且两黄旗中也有一部分人拥护多尔衮。第三，皇太极对多尔衮的爱护"过于诸子弟"，而对豪格并不十分喜欢。第四，多尔衮为人机敏，论能力，论权谋，豪格都不是对手。如果没有多尔衮的首肯，豪格很难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当时的舆论对多尔衮并不太有利。满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已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封建化，父死子继的观念已为诸王所接受。朝中的元老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基本上倾向于拥立豪格。从朝中几大巨头的态度看，对豪格多少有利些。

看来二人各具优势，两虎相争，自然有一番好戏看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两黄旗中便有八位大臣来到豪格家中，密谋立豪格为君。豪格自然也是跃跃欲试，他派人去找郑亲王济尔哈朗，以求得支持，济尔哈朗基本同意，但也表示要同多尔衮商量一下，实际上做了他将尽力帮助的答复。在豪格积极活动的同时，两白旗这边多铎等也在设法联络。多铎在得知两黄旗中也有人支持多尔衮的消息后，便和阿济格跪请多尔衮继位，对多尔衮说："你不继位，难道是怕两黄旗大臣不成。舅舅阿布泰和固山额真阿山都说，两黄旗大臣中支持皇子继位的不过区区数人。我们两黄旗的亲戚愿意拥护睿亲王继承大位。"多尔衮没有轻易表态，这倒不是他不想继位，也不是真的怕两黄旗大臣，他是不愿贸然行事，把事情弄砸了。他想进一步了解情况，然后，审时度势，见机行事。

两黄旗和两白旗，双方都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那么究竟鹿死谁手呢？

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五天，决定大清命运的日子来临了。这一天，诸王大臣们要举行会议，选立新君。当天早晨，多尔衮找到了两黄旗大臣索尼，以宗王的身份征求索尼对皇位继承人的态度，实际上是想对两黄旗大臣摸摸底。这个索尼倒也痛快，他直言不讳而又异常坚定地说："必须在先帝诸子中选立一人。"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忠于先帝而又誓死捍卫本旗地位的两黄旗大臣们，竟然派精锐护军把会议地点——崇政殿团团包围起来。看来，豪格一派已是先声夺人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是可想而知的。诸王大臣们陆续到齐了，鲁莽性急的多铎首先打破了沉寂，他先是和阿济格一道再次力劝多尔衮继位，见多尔衮犹豫不决，便高声说道："你如不同意继位，就应该立我为皇帝，我的名字已列于太祖遗诏中。"确实不假，多铎当年曾是努尔哈赤最钟爱的儿子，可到这时已是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多尔衮并不情愿让这位弟弟继位，况且他觉得立多铎在两黄旗那里也通不过，所以他对多铎的自荐予以否决，他说："仅凭名列太祖遗诏这一点是不能继承皇位的。"多铎见多尔衮这么说，便也不再坚持了，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两黄旗的人继位，所以他又说："既然不立我，那就应立年长的，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身为先帝之兄，资历较高，在这次会议上理应起关键作用。可是他又觉得两黄旗、两白旗谁都不好惹，所以心中委实犯难。他见多铎提到自己，便乘机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睿亲王如果应允，当然最好不过。如果不允，我看肃亲王豪格是先帝长子，当承大统。至于我嘛，实难胜任。"

豪格见代善提到自己，心里自然很高兴，但他见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三兄弟并未表态，其他诸王也无人附议，便顿时觉得灰溜溜的，他不无自嘲地说："我福浅德薄，不能担此大任。"说

罢拂袖而去，两黄旗大臣们见豪格气走，便一齐出来为皇子保驾，并亮出了底牌：若不立先帝之子，他们宁愿去死，以从先帝于地下。

会议出现了僵局，而且大有刀兵相见之势。代善的提议不但遭到了拒绝，而且导致了矛盾的公开化。他丢了面子，心里很生气，眼见难以收场，便说："我虽是先帝之兄，但当时朝政并未参预，又怎能参加今天的会议呢？"说罢也离开了会场。八王阿济格见状也随之而去，十王多铎则沉默不语。朝中重臣只剩下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三个人了。两黄旗的大臣们仍在一旁虎视眈眈。

多尔衮自始至终虽然说话不多，但大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豪格的退出自然是个机会，千万不能让他继位；两黄旗的底牌亮出来了，自己当皇帝看来不那么容易；立一个小皇子当皇帝对我来说还是能接受的吧，这样就可以排除豪格，自己又可以居主动地位……多尔衮决定用立幼子的办法堵住两黄旗大臣们的嘴，同时策略性地为自己争权。经过权衡利弊之后，他终于开口了："你们大家说得都很对。既然肃王豪格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么就立先帝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吧。只是他年纪尚小，不妨由郑亲王和我左右辅政，分领八旗军队。等福临长大以后，当即归政。"

多尔衮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果然出手不凡。两黄旗大臣见多尔衮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两黄旗作为皇帝之旗的地位保住了，报恩先帝、保驾皇子的愿望也实现了，所以他们也乐得见好就收。济尔哈朗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他原来也深受皇太极器重，在会上并未陷人尴尬境地，所以没有轻易离开。他原来也倾向于豪格，但仅仅是倾向而已，并不坚决。这时见多尔衮提议福临为帝并未遭到两黄旗大臣的反对，最为棘手的两家已达成协议，他自然心宽了许多；何况多尔衮将他拉上了辅政的位置，这比他原

先想象的还要好一些，既然占了便宜，又怎能不欣然赞成呢？代善得知这一情况后，自然也无意推翻这一决定，因为福临也是皇太极之子，多尔衮议立福临与他拥立豪格并无大的冲突；同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以崇德时期（1636～1643年）二人的地位而论，也是顺理成章。

在诸王中最不服气的是豪格，他对多尔衮拥立福临怀恨在心。但谁让他当初假意谦虚呢，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只好暂时自认倒霉了。多尔衮的两位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的心情极为复杂，他们原本希望皇帝能在多尔衮等两白旗诸王中选定，不愿看到皇位落人皇太极诸子之手。可是多尔衮不顾兄弟二人的意见，最终立了福临，二人的心里老大的不快。可决定是多尔衮作出的，二人又不便公开反对，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情绪比较消沉。

和豪格相比，多尔衮实际上是胜利者。他虽然没能继承皇位，但终究赢得了主动，一边是年仅六岁的侄皇帝，一边是性情随和的郑亲王，从而为他日后登上“皇父摄政王”的宝座铺平了道路。但这次他毕竟作了让步，在议立新君大会召开之先，他无意于动用武力清洗反对派，也没有主动拉帮结伙、纵横捭阖。他把自己继位的希望寄托于诸王大臣的一致拥戴上。他见大多数宗王、大臣无意立自己为帝，也就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退而求其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顾全大局的。最后，多尔衮的个人利益和清政权的最高利益得到完满的结合。

总之，皇太极死后，诸王的纷争以“福临继统”、二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的方式宣告结束。在代善的主持下，诸王、群臣纷纷对天盟誓，表示同心协力，拥戴新君。

不识时务的人总还是有的。不久，代善的儿子硕托和阿达礼（代善之孙）叔侄俩又四处活动，上串下联，试图拥立多尔衮继位。由于代善的告发，二人全被斩首。

在当时，人们都珍视与首肯“福临继统”这一方案。因为前不久清统治者之间还险些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是多尔衮的折衷方案才使清最高统治层摆脱困境。现在居然有人要推翻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难免要引起众怒了。

福临继位以后，改元顺治，满族贵族基本上又重新团结起来。随着内部纷争的结束，进攻明朝便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顺治元年（1644 年）三月，多尔衮发布动员令：“修整器械，储粮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廷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认为：第一，我们虽然一直同明朝争夺天下，可现在实际上是与流寇（指李自成农民军）较量，流寇是主要敌人；第二，要想取得天下，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以安民心；第三，我军或是直趋燕京，或是相机攻取，要在山海关长城以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作为根据地，以利我师往来。范文程的建议，成了清军入关的指导方略。

随后，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沈阳，于是多尔衮下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四月九日，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二十四旗大部分军队，浩浩荡荡向西南开去。十四日大军到达翁后（今辽宁北镇附近），十五日吴三桂的使者突然来到，并向多尔衮“泣血求助”。

起初多尔衮是半信半疑。二十日，清军行至连山（今辽宁省锦西），吴三桂第二次遣使来到，催促多尔衮赶快兵进山海关，首尾夹击农民军。原来李自成率领的征吴大军已逼近山海关了。多尔衮挥军疾进，一昼夜行军二百里，于二十一日晚抵达山海关外。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正式降清。双方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黄河以南归明，立崇祯太子（或诸王）于南京。随后清军顺利入关。二十二

日下午，当农民军与吴军都已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坐山观虎斗的清军突然从吴三桂右侧闯入阵中，向农民军发起攻击。农民军猝不及防，全线大败。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令他尾追农民军。二十六日李自成败归北京，三十日弃京西去。多尔衮率军队从山海关一路西进，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

不久，多尔衮力排众议，定策迁都。八月二十四日福临离开沈阳，经过一个多月的迁移，于九月十九到达北京。十月初一，满汉群臣拥戴福临祭告天地，举行定鼎登基大典，仍用顺治年号。这样，偏居东北的清政权便正式定鼎燕京，满洲之主福临也就成了君临天下的顺治皇帝。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世祖实录》卷1、卷3、卷4、卷37。

《清史列传》卷2“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沈馆录》卷6、卷7。

周远廉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第四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版。

清兵入关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虽然他未必有定鼎燕京、乃至君临天下的打算，但他的心里却时时不忘两个字：进取。继萨尔浒大捷后，他率领八旗铁骑攻占辽沈，兵下辽西，向长城一线步步紧逼。不仅如此，他还曾几度迁都，将统治中心逐渐前移，显然他是不甘心偏居一隅的。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努尔哈赤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迁都沈阳，以便控制朝鲜、蒙古，进一步进攻明朝。此后，沈阳成了后金（清）进攻明朝、逐鹿中原的大本营。

但总的说来，天命时期（1616～1626年）的后金由于三面受敌、内部不稳，加之明朝也有人坚决抗战，所以，驱兵入关一时不可能成为现实。

皇太极继位以后，进兵中原、攻占北京的愿望在满族贵族们的心中逐渐强烈起来。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突入长城，攻克遵化，并进围北京。不久，他挥师东向，连下永平、滦州、迁安诸城，分别派兵驻守。他本人于第二年二月率军出关北归。临行之前他曾扬言："等我回去以后调兵打开山海关，迁都内地，以为长久之计，你们不要以为我归而不返了。"这表明，第一，早在皇太极继位之初便有入关迁都的长远打算；第二，皇太极在京东四城屯兵留守，是想在内地建立落脚点，以便打开局面，为日后作准备。

但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时过不久，明军向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发起攻击，负责留守的后金大将阿敏和硕托被迫弃城北归。说明由于山海关阻隔，后金军队难以在关内立足。

在皇太极统治时期（1626年8月～1643年8月），对于如何用兵明朝，朝中主要有三种方略：第一种主张从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口深入内地，直取北京，打下北京后则黄河以北便可传檄而定；第二种主张建议先取近京州县，内外夹攻山海关，然后由山海关南进中原；第三种认为应先取关外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诸城，次取山海关，步步为营，而后长驱入关。在此三策中，皇太极主张实行第三策。因为亲身经历告诉他，不攻破锦、宁防线便难以攻下山海关，拿不下山海关便难以在内地立足，或攻下京城。

继崇祯二年以后，皇太极又多次统兵或派兵入关抢掠，以便削弱明朝，壮大自己，但每一次入关都没能驻足内地。

崇祯五年，皇太极率兵讨伐蒙古察哈尔，在回师之前乘机南掠宣、大明边。

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率军西征，进军宣、大，兼收察哈尔余众。七月，大军抵宣大边外，大掠宣、大、朔、代等地（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

崇祯九年五月，皇太极称帝不久便派武英郡王阿济格与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军入犯明边。清军在京畿一带大肆抢掠，攻克州县多处，俘获人畜十九万六千八百余。其中人口七万三千二百多。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八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统率左路军，岳托统率右路军，兵分两路出师攻明。九月，两路军分别从蓟镇中、西协（蓟镇分为三协）进入明境，大掠北京近郊，兵锋所指，直达山西。不久，又分路南下，转战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攻克七十余城，俘获人口四十七万三千三百多。

皇太极在对明进行旁敲侧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打通锦、宁防线——这是他的主要目标。早在崇祯四年，皇太极听说明朝修筑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东），并将锦宁防线前移时，便决定发兵围攻。七月，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围该城，迫使祖大寿献城归降（祖本人又设计逃去）。崇德元年，在多尔衮、岳托进入明境之后，皇太极亲率多铎、济尔哈朗和孔有德等部满、蒙、汉军队，乘山海关明军奉命入援中原之际，进攻山海关。结果，多铎在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城）被祖大寿打得大败。第二年二月，皇太极与代善再次率军出击，围攻松山二十余日，无功而返，说明要打山海关不能急功近利，需等待时机。

皇太极在完全解决了东北全境的后顾之忧后，决心全力进攻锦、宁。崇德六年，皇太极在锦州城外挖掘数道长壕，将该城长期围困起来。明朝派洪承畴率八镇十三万大军增援锦州。皇太极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举打败明朝的十三万大军，并收降了洪承畴和祖大寿。通过松锦之战，清消灭了明朝在北方的主力。至此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中后所（今绥中县城）、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县前卫）四城了。

松锦之战后，一些汉官建议乘胜攻打山海关，直取燕京。皇太极不同意，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要从两旁砍削，砍到一定程度则大树自然就倒了。朕不取关外四城又怎能攻打山海关呢？眼下明朝精兵已尽，我国四围纵略，彼国日衰，我国兵力日强，在不久的将来燕京便唾手可得了。"

崇德七年，皇太极决定从右侧"砍削"明朝这棵"大树"。他命贝勒阿巴泰为统帅，率满、蒙、汉八万大军从蓟镇界岭口、黄崖口入边，大掠京畿、山东等地，一直打到淮北宿迁一带，攻克城堡八十八座，俘虏人口三十六万，掠获牲畜五十五万，其它财物不可胜数。

正当皇太极准备从左侧"砍削"明关外四城的时候，突然间

他一病不起，随即便离开了人世。不久，皇九子福临被立为皇帝，由于年幼便以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摄政。

崇德八年九月十一日，济尔哈朗、阿济格统率大军，攻取关外四城。清军借助红衣大炮，于九月底攻下了中后所（于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斩明游击吴良弼，歼敌四千人，俘获四千余人。十月一日，攻克前屯卫（在中后所南），斩明总兵李赋，消灭李部官兵四千余人，俘虏二千人。明中前所（距山海关四十里）守将总兵黄色听说前屯卫已失，吓得弃城而逃。清军也曾进攻宁远，但遭到了吴三桂的抵抗，未能克城。至此，关外四城已有三城被清军攻克，只剩宁远一城孤悬关外了。

由于形势的变化，清军加快了入关进京的步伐。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农民军兵临京畿，吴三桂应诏放弃宁远，率兵勤王。三月十六日，多尔衮得到了吴从宁远撤退的消息后，便发布动员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廷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认为：第一，大清虽然一直是与明朝争夺天下，但眼下实际是与流寇（指李自成农民军）较量，流寇是主要敌人；第二，要想取得天下，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以安民心；第三，我军或是直趋燕京，或是相机攻取，要在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作为根据地，以利我军往来。范文程的建议，成了清军入关的指导方略。

随后，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沈阳，多尔衮下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四月九日，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二十四旗大部分军队，浩浩荡荡向西南开去。十四日，大军到达翁后（今辽宁阜新），十五日，吴三桂派使者突然来到，向多尔衮"泣血求助"。多尔衮自然感到很意外，他并不知道吴三桂这时遇到了麻烦。

吴三桂，祖上江南高邮人，后世居于辽东，入辽东中后所

籍。他是原总兵吴襄之子，辽东名将祖大寿的外甥。历任游击、副将、总兵等职。松锦之战中，吴三桂从松山败逃，被明廷降职三级，仍受命镇守宁远。吴三桂招集亡散，编练成军，实力大增，所部成了晚明难得的北方劲旅。崇德七年，阿巴泰率军攻入明边，在其北归过程中，明北方诸将多不敢邀击，唯独吴三桂奉命入关后屡有斩获。崇德八年，济尔哈朗等率兵向明朝的关外四城发起进攻，只攻下了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在进攻宁远时，遭到吴三桂的抵抗，被明军击退。可以想见，对于明廷来说，吴三桂的地位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清顺治元年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北方大地，兵锋直指北京。三月初六，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弃守宁远，入京勤王。吴三桂接到命令以后，将宁远附近的兵民五十余万人，全部撤入关内，二十日到达丰润。这时，李自成已攻入北京。他闻变后停止了进军。

这时吴三桂孤军立于两强之间，前有李自成大顺军，后有大清军队，可谓腹背受敌，何去何从，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李自成进京以后，便先后派人去招降吴三桂。吴并不愿意降清，因为他与清军交战多年，曾多次拒绝清廷的招降，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愿主动送上门去，吃回头草。他见兵多将广、难以抗衡的农民前来招降，又带来了他急需的粮饷、银两等劳军物资，他也就只好和他的父亲吴襄、同事唐通等一样，投降了李自成农民军。似乎这位大明旧臣已有了归宿。可是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

本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投降了农民军，可是不久从北京传来了吴襄被农民军夹打索银以及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的消息，吴三桂得知这些情况以后勃然大怒，率兵叛归山海关（他本拟带兵赴京投降），并发誓与农民军誓不两立。但他毕竟势单力孤，仅据山海关一隅，无力同农民军对抗。所以他很快想到了和清兵联手共抗李自成。这里，吴三桂降李复叛并非偶然，他

认为自己手握重兵于外尚不能保老父、爱妾平安，一旦入京受人控制，或失去兵权，就更不可想象了。相反，他的亲友、部将等降清后却极受礼遇。虽然说吴三桂是在一怒之下才决定与农民军作对的，但在盛怒之余，这位明朝总兵似乎感到降清与降李自成待遇和前途会大有不同。

但是，多尔衮一时还不敢相信吴三桂请兵的诚意。他在召见了吴派来的二位信使之后，为了探听虚实，便将其中一人留下作人质，并派人同另一使者前往山海关。同时，多尔衮改变了预定进军路线（即从山海关以西蓟镇长城关口突入），命汉军带红衣大炮随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四月十六日，多尔衮给吴三桂复信，要求他率众归降，然后封以故土，晋封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军行至连山（今辽宁锦西，在宁远北），吴三桂第二次遣使来到，催促多尔衮速率大军直入山海关，首尾夹击农民军。

这时李自成已亲率征吴大军逼近山海关了。原来李自成在得知吴三桂降后复叛的消息后，便于四月十三日率兵六万亲自东征。十七日来到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二十一日李自成抵达山海关，随即指挥士兵攻城，与吴军展开激战。

多尔衮在接到吴三桂第二次请兵信后，便指挥大军倍道而进，一昼夜行军二百里，于二十一日晚到达山海关外，驻扎在山海关城东北十里左右的欢喜岭。多尔衮十分谨慎，唯恐上当。大军扎营以后他便派人往吴营侦察情况，在这同时，吴三桂也多次派人敦请清兵入关。多尔衮至此方打消疑虑。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正式降清。清吴双方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封吴三桂为王；黄河以南归明，立崇祯太子（或诸王）于南京。吴三桂有条件的归降，使他既得到了较大利益（封王），又多少在清人、汉人面前暂时挽回了面子，保持了必要的心理平衡。就在吴三桂降清的同日，多尔衮率军不费一兵一卒顺利进入山海关，实现了满清贵族多年来梦

寐以求的宿愿。

到了二十二日中午，农民军与吴军大战，农民军将吴军团团围住，被吴军突破包围后又再度合围。下午，当双方都已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坐山观虎斗的清军突然以精骑从吴三桂的右侧闯入阵中，农民军猝不及防，全线大败，向西逃去。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与多铎、阿济格一起追击李自成。二十三日，吴三桂全军剃发。二十六日李自成败归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即皇帝位，三十日离京西撤。清军从山海关一路尾追，于五月初二来到北京。

当时，北京的官绅吏民由于已得知吴三桂的檄文，所以一些投降过李自成的明官，如骆养性、沈惟炳等人，一大早便在京城朝阳门外与官民备法驾、卤簿，准备迎接崇祯太子来京即位。不久，一队人马由远及近向西开来，人们还以为是太子已到，忙着准备迎驾，可等对方走到近前再一看不禁瞠目结舌，来的人中既没有明朝太子，也没有吴三桂（吴已受命过卢沟桥西追李自成去了），而是辫发异服的大清军队。为首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迎接错了。但事已至此，人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了。就这样，多尔衮等人就被迎入了京城。

多尔衮入居北京以后，采纳了范文程等人意见，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收买人心的措施。五月三日，宣布故明官员一概录用。四日，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谥为怀宗端皇帝。六日，宣布在京各衙门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五月二十四日，暂停剃发令。七月，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三饷加派，以明万历时赋额为准。

多尔衮的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没费多大力气便控制了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中原大部分地区。

九月，福临从沈阳迁到北京，十月一日，他在群臣的拥戴下于天坛举行郊天大典，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入主中原

的清王朝宣告建立。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 6。

《清太宗实录》卷 22、卷 62。

《清世祖实录》卷 3。

《沈馆录》卷 7。

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之真相"，《明清易代史独见》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多尔衮摄政

崇祯十六年（1643 年）八月十日，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并由自己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十二月，两人始称摄政王。由于多尔衮军功卓著，才智过人，所以很快掌握了实权。清顺治元年（1644 年）正月，郑亲王济尔哈朗自知实力不敌、才能不逮，便甘居其次，宣布：今后有什么事都要先去请示睿亲王。从此，睿亲王多尔衮便掌握了清政权的最高决策权，开始了他的摄政生涯。

几个月之后，多尔衮率领八旗军队顺利进入山海关，招降吴三桂，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十月，他拥立福临在北京举行隆重的登基仪式。

多尔衮在摄政期间除了率军入关、定鼎燕京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平定天下。

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清吴联军大败农民军，并乘胜追击四十里。随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交给他一万军队，命他继续追击农民军。五月二日多尔衮率少数人马入京，大军则由阿济格、多铎、吴三桂等率领，继续向西追击，李自成于四月三十日撤出北京，经河北向山西撤退。他曾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进行抵抗，与吴三桂激战一天，但终难挽回败局。不久，农民军由固关（今河北井陉西）撤入山西。清军追至关下而返，退还燕京。至此，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归入

大清版图。五月十二日，阿济格、多铎、吴三桂回到燕京。李自成留刘永福镇守太原，自率大军退往西安。

多尔衮一面派兵镇压、招抚中原的小股义军及地主武装，一面于六月派固山额真叶臣进攻山西。清军从河北、河南进入晋南。十月叶臣打进固关，攻陷太原，占领了山西。

十月，福临下诏定鼎燕京。不久，多尔衮先后命令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攻打农民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征江南。

李自成也在七月后组织了反攻。十月，大顺军两万人进攻河南，多尔衮得知后，忙派多铎先去进攻西安。多铎闻命后率军由山东经河南逼近潼关，顺治二年正月，多铎攻破潼关，李自成被迫弃西安向河南转移。从陕西进攻农民军的阿济格遇到了对方的顽强抵抗，二月中旬才进入西安，而此时多铎已率军东去。五月四日，李自成在率军转移途中不幸牺牲。

多铎于顺治二年二月离开西安，三月接到了多尔衮命他带兵南下的指示。他率兵出虎牢关，抵归德，兵分两路向前推进，一路指徐州，一路指亳州。不久，李成栋以徐州归降，并引清兵南下。四月十八日清军逼近扬州城下，此时弘光政权正打内战呢。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五月，兵不血刃占领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六月又攻下苏州和杭州。

顺治二年闰六月，多尔衮命洪承畴为江南总督，坐镇江宁(今南京)，同时又派大员前往招抚南方各省。由于清廷颁布剃发令，激起了江南、东南各阶层的一致反抗，隆武政权和鲁王政权相继建立于福州和绍兴。在多尔衮看来，江阴、嘉定等地的抗清斗争由李成栋等降将便足以对付了，而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必须劳师征讨。

顺治二年十一月，清军入湖南进攻李自成余部和隆武政权大将何腾蛟部。

在东南战事晴转多云之际，多尔衮并没有忘记四川还有张献忠。顺治三年正月，他命肃亲王豪格进击四川。后来豪格打败了张献忠，张的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等退守云南。

顺治三年二月，多尔衮命贝勒博洛平定浙、闽的鲁王和唐王政权。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直取绍兴，鲁王政权垮台。七月清军攻入福建，郑芝龙迎降，唐王政权覆灭。不久，逃入江西的唐王朱聿键被清兵追上杀死。

顺治三年九月，多尔衮指挥大军分三路继续南进：东路由李成栋率领，进攻江西、广东；中路由孔有德、勒克德浑率领，攻打湖南；西路由豪格、吴三桂率领，继续平定四川。十一月五日，唐王朱聿健之弟朱聿𨮁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十八日，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政权。这两个政权在建立之初便处于清军的夹攻之中。十二月十七日，李成栋攻占广州，杀死朱聿𨮁。桂王朱由榔见广东不能立足便逃往湖南，由于孔有德已经带兵南下，他又逃往广西。不久，孔有德等占领了湖广并进入广西。整个东南几乎全部被清军占领了。

可是好景不长，对于多尔衮来说，可怕的情况出现了，那便是金声桓、李成栋、姜瓖三员降将先后反清。金声桓原是左良玉部下，投降后帮助清廷平定了江西，后被授予副将之职。他对清廷给他的官职非常失望，遂于顺治五年二月起兵反叛。多尔衮派谭泰、何洛会率兵进讨。第二年正月，清军攻破南昌，金声桓败亡。在金起事之后，李成栋于顺治五年闰四月在广州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被清军打败。姜瓖之叛发生最晚但影响最大。姜原为明大同总兵，他先投降了李自成，后又投降了清廷。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积疑成变。顺治五年十二月，姜瓖在大同起兵，山、陕随之响应。多尔衮调兵遣将，费了好大力气才将叛乱平定下去。

在降清三将反叛之际，大顺军配合南明军队进行了反攻，湖

广、两广都落入了桂王政权的手中。

此后，形势再度发生变化，孔有德拿下湖南，最后平定了湖广。顺治六年五月，多尔衮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顺治七年十一月，尚可喜攻破广州，十二月，孔有德攻陷桂林。湖广、两广大部分地区宣告平定。

入关以后，多尔衮在有生之年指挥大军平定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的叛乱，只有云贵、川南、福建沿海等地尚处于抗清势力的控制之中。

第二，法明与任用汉官。

打天下自然是为了治天下。

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很快接管了全国政权。但是摆在他面前的无疑是令人棘手的难题，即怎样才能学会管理这一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全国政权。原来的清政权偏居一隅，人口有限，汉人虽比满人多，但毕竟仅限辽东一地。入关以后，有限的满人和汉人相比简直是沧海之一粟。显然原来的大清政权机构是无法胜任管理一个庞大帝国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这位精明强干的摄政王显然没有被难倒，在调兵遣将、平定天下的同时，他还抽出精力为清王朝草创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和中外机构。他的办法是，效法明朝典制，利用汉人管理汉人。

顺治元年五月初三，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多尔衮便宣布，故明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初六日，他又下令在京各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六月初二，由于洪承畴、冯铨的建议，多尔衮决定沿袭明朝内阁的票拟之制，由内三院行使内阁职权。但多尔衮时期的内阁地位低于六部，不像明代的内阁高高在上。同月，多尔衮下令，司法机关准依“明律问罪”。九月，多尔衮下令编修清律，后《大清律》成，基本内容是抄袭《大明律》的。

顺治二年，吏科给事中向玉轩抱怨汉人没有任尚书的，多尔

衮很不高兴，处分了向玉轩。但到了顺治五年七月，多尔衮为收买人心，决定在六部各设汉人尚书一人。六部满汉复职制自此开始。

地方官制也基本上沿袭明朝。清初的总督、巡抚大多是在东北降清而后随清兵入关的汉人。

当然多尔衮并不是完全照搬明制，他在效法明制的同时没有忘记大清的传统和满洲的利益。议政王大臣会议显然是八大贝勒议政的遗风，这时仍然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机构。另外，不管多尔衮如何标榜“满汉一家”，“首崇满洲”仍是他在立国行政中念念不忘的。

不管怎么说，多尔衮成功了，除了许多满族贵族之外，更有无数汉官降将替他出谋划策，效命疆场，从而佐助他为大清王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第二，兴利除弊。

在一些汉军旗人官员及汉官的建议下，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收买人心的措施，这些措施除了改变抄掠作风、为崇祯帝发丧之外，还有优待明宗室、崇孔、开科取士和革除弊政。

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宣布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其后，他又下令对明宗室妥为养赡。这与以往入关之役中对明宗室的态度迥然不同。

顺治二年，汉官李若琳请求复元制，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多尔衮命礼部复议，最后，定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至于孔子后代，多尔衮准依明制，封为衍圣公。

多尔衮在定鼎燕京之初即决定重开科举，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以后，顺治二年八月，在全国大多数省区举行了乡试。按例，会试要三年举行一次，但多尔衮为了消弥士人的反清情绪，在摄政的七年里共进行了三次会试，取士一千一百人，全部任以官职。

加派是明末的一大弊政，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搞得民不聊生，结果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多尔衮自然不愿失去民心，重蹈明朝的覆辙。入关之初，京师户部只有明万历时的赋税册籍，天启、崇祯时的赋税档案全被李自成农民军烧毁。当时清廷有的官员建议向各省征求明末赋税新册（万历以后的），以便于征收赋税。范文程力排众议，他说："即便以万历时税额为准犹恐扰民，又怎能再求新册增加赋税呢？"后来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决定按照明万历时赋额、则例征收赋税。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以清摄政王的身份向全国发布命令，宣布免除明末的三饷加派及召买米豆等负担。不仅额外加派永行废除，而且本年额内正赋亦可适当减免，办法是"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大军虽未经过，但已归附的州县，免本年三分之一"。

由于战事频繁，取消加派、减免赋税不可能做得多么彻底。不过多尔衮时时不忘明三饷加派的教训倒是真的。

如果说三饷加派只是明末才有的话，那么宦官干政则是有明一代弊政，兼之明末大珰朝三暮四，所以多尔衮对于宦官深加防范。他在入京之初便阻止太监往收明代皇庄子粒。顺治二年十二月，他又采纳礼部建议，禁止宦官混入文武群臣朝参行列（自明熹宗时始，每逢大朝，宦官穿朝服与百官一齐朝贺）。顺治三年四月，多尔衮下令罢织造太监。

多尔衮不但能痛革明代弊政，对清廷弊政也曾触动一、二。顺治三年四月，他下令废除在关外实行过的肉刑，认为耳、鼻是面目最显著的地方，贯穿耳鼻之刑应永行禁止。

第四，四大恶政。

多尔衮毕竟是一位满族贵族，是征服军的统帅，所以在他身上既有放眼全国、目光远大的一面，又有狭隘偏执、一意孤行的一面。他为了维护满人的特权、利益，强行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将某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或习俗强加给汉族人民。这些民族压迫政

策主要有剃发、圈地、投充、“逃人法”。

剃发。多尔衮在入关之初由于立足未稳，曾一度宣布停止剃发。顺治二年多铎拿下南京以后他又重颁“剃发令”。这一点反映了他作为征服者的独裁和满人政治家的偏狭。重颁“剃发令”推迟了统一天下的时间，无数生灵又遭受了十多年的刀兵之苦。

另一项民族政策是圈地。圈地是满族入关之初掠夺土地的政策或做法。大规模圈占土地共有三次，分别发生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年九月、四年正月。到了顺治四年三月，多尔衮下令停止圈地，此后大规模圈地虽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事件仍不断发生。所圈占土地名义上是无主之田，但实际上往往是强夺民田。圈地致使许多汉人流离失所，以至走上了反抗道路。

投充。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向户部下令，允许无衣无食的汉人投充满人家中为奴。此令一下，满人强迫汉人为奴也就合法化了。投充，从表面上看，是汉人自愿投到满人门下以求生存，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地主、无赖是自愿投充以求得庇护外，大多数人是被迫的。投充以后，汉人降为奴仆，不能随便离开主人。

多尔衮也曾下令，不愿投充者，不许强迫，甚至还于顺治四年下令停止投充。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投充的决心，甚至诚意。相反，他曾于顺治三年十月宣布：凡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事上疏者，一律治罪。其政策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与投充相关的是逃人和“逃人法”。投充的盛行，使许多人沦为奴仆。由于奴仆（包括投充为奴、战争掠夺为奴和买卖为奴等）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所以纷纷逃亡。多尔衮为维护满人利益，多次实行“逃人法”。早在顺治元年，多尔衮便宣布要严察逃人，隐匿不报者治罪。顺治三年重新修改“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窝逃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居、乡约、甲长等各鞭一百，流徙边远。“逃人法”的明显特点是严惩窝主，轻惩逃人，目的是维护满族的利益。“逃人法”搞得社会

动荡不安，许多逃人无处投靠，便四处流浪，甚至举行起义。

上述几大恶政多尔衮是有责任的。对于圈地和逃人，他虽然不一定能（也不可能）完全阻止，但至少可以限制其为害程度；甚至对于剃发令他是有能力制止的。但是，他不但没有尽量减轻几大恶政的危害，反而坚定地加以推行，并不许汉官反对。这无疑是他一生中的污点。

第五，加强集权。

崇德八年（1643年）十二月辅政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始称摄政王。同月，二位摄政王宣布，除了贝子博洛、公满达海外，诸王、贝勒、贝子等不再兼管部务，政务悉由尚书处理，从而打击了诸王的权势，提高了摄政王的地位。顺治元年正月，与多尔衮平起平坐、身为摄政王之一的济尔哈朗，宣布今后百官如有什么事都要先去请示睿亲王。本来两王同时摄政很难相处，一山容不得二虎。济尔哈朗情知自己论实力、论能力或权术都斗不过多尔衮，不得不甘拜下风。从此，多尔衮作为清最高决策人的身份得到了正式确认。他，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摄政王。

顺治元年十月一日，多尔衮拥立福临定鼎燕京，并且诏告天下。十月九日，他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十月十三日，济尔哈朗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地位根本无法同多尔衮相比。顺治二年五月，以御史赵开心言，多尔衮被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十二月，从满汉大臣之请，免多尔衮对皇上行跪拜礼。顺治五年十二月，再晋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位极人臣，甚至超过了人臣，成了无皇帝之名的皇帝。

多尔衮一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另一方面又频频打击政敌，排斥异己。

肃亲王豪格一向对多尔衮怀恨在心，但慑于多尔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势，他也是敢怒不敢言。多尔衮并没有看在他入关以后屡建军功的份上將他放过。顺治五年三月，多尔衮找茬

将豪格囚禁起来。不长时间，豪格便不明不白地死去。不久多尔衮又将漂亮的肃亲王妃娶入自己府中。

多尔衮压制的另一对象是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虽已拱手让权，但权势日益增长的多尔衮并不满足。多尔衮觉得济尔哈朗面服心不服，很不可靠，因而接二连三地难为这位老资格的王爷。顺治四年，多尔衮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之位。顺治五年，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一起告发叔叔的罪状，多尔衮借此机会将济尔哈朗贬为多罗郡王。虽然后来济尔哈朗又被恢复了亲王爵位，但地位已是一落千丈，直到多尔衮死后他才得以翻身。

豪格是反对派领袖，济尔哈朗是中间派的代表，两位亲王的境遇尚且如此，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谁又敢不对多尔衮俯首听命呢？当然了，多尔衮也非常注意从八旗贵族中选拔一批年轻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以加强统治。

就这样，多尔衮牢牢地掌握着朝中大权，小皇帝福临不过是个摆设。

转眼到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由于病魔缠身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离开了人世。

毕竟是摄政王余威犹存，在死后第十七天，他被福临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似乎其荣耀和名位已超过了多尔衮生前。但是，这不过是一时的假象。

多尔衮一死，福临便开始亲政。这位小皇帝早就对多尔衮在摄政时大权独揽、摆布自己十分痛恨，因而亲政后急图报复。朝中元老郑亲王济尔哈朗受了七年多的窝囊气，简直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反攻倒算看来已无法避免了。顺治八年十二月，福临下诏追夺多尔衮一切封号，将其人口、家产没收入官。

就这样，多尔衮的身后之名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尔衮，这位大清摄政王，清王朝的实际建立

者，死后却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后嗣废绝，坟茔被毁。

大约过了一百多年，已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时期，他决定为多尔衮平反昭雪。乾隆三十四年，他命令内务府派人修缮多尔衮墓地、墙屋。乾隆四十三年，他发布诏谕，认为多尔衮功在大清、忠于皇帝、有功无罪，因而正式宣布为多尔衮平反昭雪，恢复睿亲王封号。几天以后，根据大臣建议，决定让原曾过继给多尔衮为嗣的多铎之子多尔博的四世孙承袭王爵。

至此，为大清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摄政王多尔衮终于又得到了本朝的承认和肯定。

（肖立军）

主要参考资料

《清史稿·世祖纪一》。

《清世祖实录》卷 5、卷 10、卷 15、卷 18、卷 31、卷 36、卷 37。

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第四至第八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第一版。

京畿圈地

大凡征服者总要捞取一定的好处，满族贵族也不例外。当时，政治方面的好处自然是高官显爵，而经济方面的利益则莫过于占有土地。多尔衮为了奖赏八旗贵族平定中原之功，并鼓励他们进一步征服天下，决定分给他们大量土地以供享用。

至于普通的八旗兵丁，情况稍有不同。这些兵丁一直没有兵饷，原在关外拥有一块土地用以维持生活并置备武器。入关以后，怎样才能解决八旗人丁的生计呢？怎样才能让八旗士兵安居于内地，并在冲锋陷阵之际没有后顾之忧呢？多尔衮深知，有了土地就有了衣食，有了衣食就能保证八旗士兵的战斗力。

身为满族贵族、摄政王的多尔衮，自然不会不替八旗官兵着想，何况他还需要他们留居中原、平定天下呢。

顺治元年（1644 年）十二月，多尔衮正式向户部颁布圈地令。他声称：东来的诸王、勋臣、八旗兵丁等无处安置，而近京州县“无主民人荒田”及故明皇亲国戚、公侯、太监死于战乱者留下的无主田地却很多。下令将这些无主田地全部分给东来的八旗官兵。

顺治二年九月，多尔衮第二次下达圈地令，并将圈占的地区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他命令各有关州县将无主田地尽数查明，交给八旗耕种。此外，还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为由，下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等八处派满兵驻扎，同时将各

该地方的无主荒田交给满兵。

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实行圈地。清廷借口以前所圈土地内“薄地甚多”，而“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下令近京各府、州县内，无论土地有主无主，一部分拨换去年所圈薄地，一部分分给今年新来的满人。被圈的有主田地，则另找地方拨补。这次圈地涉及近京四十二州县，范围较广。

顺治四年三月，在已经圈占了大量土地、并且土地被圈之民相从为盗的情况下，多尔衮发布命令：自今以后，圈占田地永行禁止。此后，大规模的圈地虽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发生。如顺治八年，户部曾下令在文安、良乡、涿州等地圈地十三处。

顺治十年，清廷再次重申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次命令仍和顺治四年三月的那次一样，形同虚文。

康熙八年（1669 年）六月，亲政后的康熙皇帝谕令户部：“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禁止，其今年已圈者，悉令给还。”至此，官方的圈地宣告停止。到了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又下令：直隶州县的民地停止圈拨。各处壮丁及新满洲应拨地亩，将于皇庄及八旗等土地内溢额部分拨给。这样，起于顺治元年的圈地终于结束了。

清初圈地持续二三十年，名义上是针对无主之田，但实际上往往强占民田。当时圈地是由户部派人去具体执行的。这些人来到一个村庄之后，看好田地，由两人骑着马，牵着户部专门颁发的绳索，一前一后跑马拉绳。四围一经圈定，则其中的房屋、田产便全部圈占。原来田产的主人自然要被扫地出门。

当时圈地的总数实在难于统计，不过可以从几个侧面略窥一二。从某一时期圈地的总数来看，在顺治二年至三年两年的时间内，清统治者在近京四十二州县内一共圈占土地五万四千多顷。从一州一县的统计来看，所圈田地的比例是很大的。如密云，在

圈地之后所余民田不过六分之一。在遵化，经圈地之后所余民地不及原来的百分之一。再从北直隶大多数州县圈地的总量来看，北直隶七十二州县被圈土地大约二十多万顷，约占该地区田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由此可见，清初在京畿一带所圈田地，不但数量庞大，而且比例惊人，各州县的民地所剩无几。

清廷把圈占的土地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部分授给八旗士兵作为份地；一部分分给满汉贵族和旗人官员，作为王庄和官僚庄田；另外的一部分则留给皇室作为皇庄。各类田庄上的劳动者包括东来的旧有庄丁、战俘、投充人等。这些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和人身自由，处于农奴的地位。

清初在京畿地区的圈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第一，圈地使许多汉人流离失所，最终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无主荒田自然有限，圈完无主之田后便要圈占有主之田。被圈的土地往往是良田，补给的却是碱薄之田，到时又要依良田纳税。这些汉民离别田园，前往异地他乡耕种新授田土，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许多人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起来反抗。

第二，圈地导致“投充”和逃人问题更加严重，形成连锁反应。许多汉人在土地被圈之后被迫“投充”到满族门下为奴。如果说入关之初的逃人主要是从关外过来的旧有奴仆的话，那么稍后的逃人中投充和战俘奴仆占有很大比例。奴仆大量逃亡以后，满族贵族因一时田庄失去劳动人手而励行逃人之禁，所以说，圈地导致了恶性循环，激化了民族矛盾。

第三，圈地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圈地使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影响了劳动者与土地的结合。另外，大量土地被圈以后，到了八旗官兵手中往往抛荒，成为“畋猎、放鹰”和“往来下营”的场所，造成了土地的浪费。

第四，圈地甚至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倒退。满族在圈占了大量土地之后，建立起了形形色色的田庄，这些田庄的劳动者大多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这样落后的农奴制的生产关系被强行推行到京畿等中原地区，生产关系一度出现了逆转。后来，由于农奴的反抗，八旗贵族被迫改变了田庄的经营方式，由农奴制逐渐改为租佃制。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世祖实录》卷12、卷20、卷31、卷130。

《清圣祖实录》卷30。

《皇朝经世文编》卷31。

郑天挺主编：《清史》，第四章第二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李华：《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文史》第八辑。

“逃人法”始末

“逃人法”是禁止奴仆逃亡的法令。满族贵族拥有大量奴仆，这些奴仆或用于家内役使，或用于田庄劳动。他们有的急于和家人团聚，有的不满于满族贵族的虐待，纷纷逃亡。满族贵族（起初称女真贵族）将奴仆视为私人财产，奴仆的逃亡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便制定了追捕逃人的法令。后来皇太极又对“逃人法”进行多次修订。入关以后，清廷屡申逃人之禁。顺治元年八月，多尔衮下令编里甲，规定，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层层上报。如果知情不报，邻居及甲长等治以重罪。九月，清廷在迁都北京途中也曾表示，地方官如对逃人隐匿不解，要从重治罪，窝逃之人则处以重刑。

由于当时实行圈地和投充，所以出现了连锁反应，使逃人问题更加复杂和严重。圈地使许多汉人失去土地，无法谋生，被迫“投充”满族贵族为奴。所谓“投充”，名义上是允许无衣无食的汉人自愿投到满族贵族门下求生，实际上是承认满族贵族强迫汉人为奴合法化。投充的盛行，势必导致越来越多的汉人沦为奴仆，与此相适应，奴仆（除了投充为奴外，还有被战争掠夺为奴、买卖为奴的）逃亡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顺治三年五月，在不出几月逃亡数万的情况下，多尔衮下令重新修订“逃人法”。新的“逃人法”规定，逃人被告发并经证实以后，鞭一百归还原主；窝逃之人正法，家产给失主及首告之

人；窝主的邻居、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地方官（逃人在逃的地方）如果稽查或押解不力也要治罪。从“逃人法”的惩治对象看，不但包括逃人本人，也包括窝主、窝主的邻居，甚至地方官，可谓牵连甚广。从特点来看，“逃人法”是重惩窝主，轻罚逃人。清廷颁布“逃人法”的目的，首先是追捕逃人，其次是防止奴仆逃亡。满族贵族视奴仆为私人财产，逃人处罚过重（处死或流放）势必影响自身的利益。窝主就不同了，在满族贵族看来，重惩窝主不但可以杀一儆百，使汉人不敢窝逃、奴仆无处可逃，而且在窝主被抄家以后还可以得到一笔额外财产，真是人财两得。好像逃人不是因受虐待而自己跑掉的，而是主人的财物被窝主偷走的，既然这样，除了财物理应要回以外，偷财物的人自然要受处罚了。

这“逃人法”可不是开玩笑的，清廷确实要动真格的。顺治四年，山东武定有个叫王大的从主人那里逃回父母家中。事情被查出以后，清廷毫不容情，可怜七十三岁的老父，竟遭斩首之祸。不仅普通窝主从重处置，就连朝中重臣也决不轻饶。耿仲明曾为大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位居王侯。因为他手下的人窝藏逃人，多尔衮便将他和孔有德等严厉斥责一番，差点削去爵位。不久耿畏罪自杀。

顺治六年以后，清朝对“逃人法”又做过几次调整。

顺治六年规定，窝藏逃人者免死，流徙边远。

顺治九年规定，逃人第一次逃跑鞭一百并归还原主，第二次逃跑正法；窝主免于正法，给逃人失主家为奴。

顺治十年规定，窝逃者正法，家产入官。

顺治十一年规定，逃人第一次逃跑鞭一百，第二次逃跑再鞭一百，第三次逃跑正法。

可见顺治六年以后的“逃人法”对逃人的处罚分初犯、再犯或三犯之分，虽然对逃人的处罚较窝主为轻，但也少不了鞭打、

刺字（后来在脸上刺字）、夹棍等残酷的刑罚。因为这样既可以让逃人知道逃跑以后滋味不好受，又可以维护满人的利益（逃人一旦被抓住，在受尽皮肉之苦后仍要归还原主）。

至于窝主，根本没有初犯、再犯的说法，一旦被定为窝主，不是杀头，便是流放边远或贬为奴仆。对于汉人窝主来说，流放简直是生不如死。

顺治十二年，清廷将有关逃人的法令正式命名为《督捕则例》。在此稍前，还建立了专门追捕逃人的机构——兵部督捕衙门。督捕衙门和《督捕则例》的出现，标志着“逃人法”得到变本加厉的执行，许多要求修改“逃人法”的汉官纷纷被治罪。

康熙继位后，“逃人法”逐渐有所松动。

康熙四年清廷下令，严禁讹诈、诬陷（指诬告别人是窝主），相对减轻对窝主的处罚，除窝主治罪外，不许株连妻子、儿女。

康熙二十五年规定，逃人第三次逃跑免予正法，交给八旗穷兵为奴。

康熙三十八年，清廷撤销了兵部督捕衙门，将逃人案件改隶刑部。并且规定，地方上督、抚也可以过问有关案件。

康熙三十八年的命令表明，清廷已不像以前那样将逃人视为政治问题、民族问题而兴师动众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逃人问题作为刑事案件来对待了。从此“逃人法”日渐松弛。雍正皇帝继位以后，又进一步减轻对窝主、邻居及地方官的处罚。

清初满族贵族实行“逃人法”数十年，将落后的农奴制强加给广大汉族人民，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逃人法”给广大汉人带来了灾难。奴仆逃亡的动机是想与家人团聚或摆脱满族贵族的压迫，所以不仅逃人是汉人，而且“窝主”也大多是汉人，同样，邻居和地方官也是如此。这些汉人全是“逃人法”的惩治对象。实行“逃人法”的结果使许

多汉官、汉民身首异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顺治十年，因为窝逃而被籍没的不下数万家，至于受牵连的人就更多了，当时即便是没有获罪的人也是人人自危，左右为难。

第二，“逃人法”加剧了满汉矛盾。由于逃人严惩窝主，所以无家可归或无处投靠的逃人便四处流浪，有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人到了抗清起义的队伍中。

“逃人法”的实施，并没有阻止住奴仆的逃亡，相反，“究治愈力，逃者愈多”，仅仅在顺治十一年一年之间逃人几乎达到三万，被抓回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广大奴仆们要以更大规模的逃亡来回答“逃人法”。

当时汉官们对“逃人法”也非常不满，“逃人法”中重惩窝主和辗转牵连的规定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逃人法”对于满汉窝主的处罚大不相同，满人窝逃仅鞭一百，罚银五两，而汉人窝逃则要正法，民族压迫的色彩十分明显。汉官们当然不敢对轻处满人窝主有所异议，但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便对轻罚逃人、重惩窝主提了不少的意见，并多次要求修改“逃人法”，但“逃人法”的每次修改都是换汤不换药。满族贵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顽固地执行“逃人法”，并决定对上疏的汉官严加处罚。顺治十一年，兵部右侍郎魏琯要求减轻对窝主的处罚；顺治十三年，兵科右给事中李裀上疏批评“逃人法”，要求皇帝在执行“逃人法”截时务从宽大。满族贵族对这两人毫不客气，将魏琯革职流徙，将李裀流放边远。后来两人分别死于辽阳和尚阳堡。

尽管满族贵族采取高压政策，但汉官中反对“逃人法”的大有人在，或明或暗的反对活动一直没停止过。

第三，“逃人法”的实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顺、康之际，战事纷繁，连年用兵本已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逃人法”的推行则火上浇油，使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变得更加艰难和缓慢。

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但"逃人法"对逃人和窝主的处罚严重影响了劳动人手，同时在冤狱遍地、草菅人命的情况下，谁都不敢收留无家可归的陌生人，这样，垦荒的组织、甚至工商的经营势必受到一定影响。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世祖实录》卷7、卷8、卷21、卷26、卷50、卷86、卷90。

《清圣祖实录》卷14、卷196。

《清世宗实录》卷21、卷50。

《督捕则例》。

《皇清奏议》卷七：魏琯《垦籍没定窝逃疏》。

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反剃发斗争

剃发原是女真人的一种特殊习俗，做法是：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余，只留头顶中间长发，分三绺编成一条长辫，垂于脑后、肩背。除了父母丧及国丧百日内不剃外，四周不得蓄发，要勤加剃除，所以叫剃发或剃头。努尔哈赤对明宣战以后，便将女真人世代相沿的剃发之俗强行加给汉人，后金军队所到之处便强迫汉人剃发，并以剃发作为归降与否的标志。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偷袭抚顺，明将李永芳归降并剃了发，被俘军民亦尽行剃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下辽沈地区后，便励行剃发，因而引起了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和镇江（今辽宁丹东）人民的反抗。镇江人民拒不剃发，杀死后金派去的官吏以明心志。努尔哈赤派兵前往镇压，对拒不剃发归降的男子大肆杀戮，并掳掠妇女小孩一千余人。

皇太极继位以后，继续执行剃发之令，并作为一项国策。他不仅让在关外投降的汉官（如孔有德、洪承畴等）剃发，而且在几次入关之役中也强迫汉人军民剃发。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入关，攻陷永平，便命令全城军民剃发。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军进占北京，随后便颁行剃发令：凡投诚官吏军民一律剃发，否则“定行问罪”。五月八日北京官民正式开始剃发，清统治者催逼甚严，许多不愿剃头的百姓纷纷外逃。当时，万民皆愤，怨声载道，有的哭着对人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要被剃头？”由于剃发令不

得人心，更主要的是清军刚入北京，立足未稳，强敌环立，西有大顺军，南有福王势力，京畿一带又不断掀起抗清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决定暂时废止剃发，以便收买人心，减少用兵阻力。五月二十四日，多尔衮下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免除剃发的命令自然产生了积极影响，不管是普通汉族百姓，还是汉族降官，抵触情绪减少了许多。这无疑有利于满族入居中原，顺利用兵。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多尔衮等人似乎又忘乎所以了，一项后患无穷的决定正在酝酿之中。

顺治元年十月，顺治帝福临正式在北京登基。顺治二年正月，清将多铎攻克西安，李自成被迫从老家陕西南撤。多铎打败了大顺军，随后，又调头南下，直指江南，四月攻克扬州，五月顺利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军接连打败了曾一度逐鹿中原的大顺军和盘据江南的福王政权，多尔衮等人又怎能不欣喜若狂呢？在胜券稳操的情况下，多尔衮很快背弃了听民束发（剃不剃头自便）的诺言。本来当初停止剃发的命令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形势起了变化，他又怎能禁得住无耻汉臣的挑拨和满洲贵族们的狂热呢？当五月二十七日占领南京的捷报传到北京以后，五月二十九日多尔衮便下定了决心，他要“叫官民们尽皆剃头”。六月五日，多尔衮派人来到南京，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必须剃发，否则军法从事。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令礼部向全国颁布“剃发令”：限十天之内，全部剃头，不执行者，“重重治罪”。

多尔衮未免失之轻率了，他对重颁剃发令可能引起的一系列恶果显然是估计不足。江南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而且自秦汉以来受少数民族的冲击较少，人们很难一下子承受住剃发的屈辱。清统治者一手挥舞屠刀，一手举起剃刀，在江南人看来，剃发与其说是剃去头发，留起长长的发辫，不如说是在人们的心灵上刻上一道道刀痕，再抽上一鞭，难怪有那么多人加入到了反剃

发斗争的行列中。

在如火如荼的反剃发斗争中，以江南江阴、嘉定两城人民的斗争最为壮烈。

江阴在明代属常州府，是一大县。清军进入南京后，常州首先归附。消息传到江阴，明朝知县林之骥于五月二十五逃走，县丞莫士英投降清朝，六月二十四日，清新任知县方亨走马上任。二十六日方亨传令，声称南京豫王（指多铎）有令，限三日内全部剃发。二十七日常州知府派“满兵”（系汉人伪扮）四人来到江阴，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二十九日，群众公推耆老数十人作为代表，面见知县，请求留发。谁知方亨竟然破口大骂。六月初一，方亨到文庙行香，诸生及乡绅随至文庙，再次恳请留发，遭到方的拒绝。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诸生许用在文庙正殿明伦堂当众誓曰：“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当天上午，城内举行了上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第二天全县响应，四乡群众数万人齐聚县城，囚禁知县方亨及守备陈端之，公推典史陈明遇及前任典史阎应元为首领。陈、阎等人组织队伍，申明纪律，分配武器，修筑营垒，筹备粮饷，带领大家积极准备抗清。当时寓居江阴的徽商程璧捐资二万五千两白银以充军饷；另一徽商邵康公娴于武事，乃被推为大将。各阶层人士都很踊跃，全城民众，一体抗清。闰六月初八，清派降将率水师五百来攻江阴，被乡兵败于双桥。随后降将刘良佐前来围城，并进行招降，江阴民众誓死不从。清兵恼羞成怒，贝勒博洛督降将刘良佐、李成栋等共集二十余万大军，疯狂围攻江阴，江阴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最后清军从南京调来二十四门大炮进行助攻，八月二十一日城被攻破，双方展开了巷战，陈明遇、阎应元、许用等英勇牺牲。清军血腥屠城，仅少数人得以幸免。

江阴人民众志成城，反对剃发，从闰六月初到八月二十一日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拒绝政治诱降，苦战八十一天，重创清

军。城破之日，人人誓死如归，表现了可贵的气节。

与江阴差不多同时，嘉定人民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嘉定在明代属苏州府，清军攻下南京以后，明嘉定县令钱默弃官逃走。六月二十四日，清新任县令张维熙正式就任。闰六月初八，李成栋及其裨将梁得胜奉命往守吴淞，率兵船百余艘途经嘉定城东，停泊在那里。李成栋原为明将高杰部下，后任弘光政权徐州总兵。清兵南下，李率众归降，其后便帮助清兵攻取各地。李部军纪败坏，在嘉定一带无恶不作。闰六月十三日，嘉定传令剃发，于是人心思变。十四日苏州爆发反剃发斗争（仅一日即失败），消息传到嘉定，人们心中的反抗怒火很快被点燃了。嘉定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各路乡兵齐聚县城，当晚城乡民兵火烧梁得胜兵船，将李成栋从扬州、南京、镇江等处抢来的财富付之一炬，梁率余众逃往吴淞。第二天，人民公推进士黄淳耀和前左通政侯峒曾作领导，据城抗清。黄、侯二人带领大家设置街垒，捉拿奸细，昼夜巡视，并赶走知县张维熙。六月二十四日，大败清兵于北关，杀死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七月一日，嘉定十万乡兵与清兵战于乡下，对阵失利。七月三日，李成栋调集大军猛攻城池，嘉定人民经过艰苦抵抗后，于第二天城被攻陷，侯全家投水殉难，黄自缢而死。在此后七十多天的时间内，李成栋率军三次血洗嘉定，城内外死难者两万余人，史称“嘉定三屠”。

反剃发斗争不仅仅这两起，当时几乎遍及江南地区。本来多尔衮以为大半江山已经到手了，其余地方自可传檄而定。可是他错了。清廷颁布剃发令不管是为了别顺逆也好，以征服者自居也好，防止满人迅速汉化也好，根本目的还是统一天下，实现对广大汉人的有效统治。可是事情发展的结果与清统治者的初衷大相径庭。

首先，清兵能顺利进占南京，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清军英勇善战，倒不如说是弘光政权腐败透顶。虽然清兵已攻占两京，打

过长江，但离统一天下还差得很远。江南及东南一带水网密布，不利于骑兵驰骋，当年金国大将金兀术就曾在这里险走麦城。剃发令的重新颁布，无疑树立了更多的敌人，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剃发令重颁不久，江南人民的反剃发斗争烽起云涌，东南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及桂王政权（后居西南）先后建立，李自成余部降清复叛，清兵花费二十余年的时间才征服了东南与西南地区，而此前从东北打到南京不过一年。

其次，清廷颁布剃发令，强迫汉族人民改变发饰、服饰习惯。江南人民不甘屈辱，奋起反抗，遭到清兵血腥镇压。由于清兵的暴行，使众多人民生灵涂炭。此后二十余年的持续用兵，东南、西南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这些都与剃发令的颁布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再次，剃发本是习俗问题，但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宗旨，使得剃发令远远超出了习俗范围，而是集文化、政治、民族问题于一体。其实不剃发也不致于影响清王朝的建立，可清初的统治者把剃发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但没有消除民族隔阂，反而在满汉差异方面打下了极深的烙印，几乎形成了民族对立。所以满汉矛盾时隐时现，忽强忽弱，几与清王朝相始终。

（肖立军）

参考资料：

《清太宗实录》卷 6。

《清世祖实录》卷 5、卷 16。

韩菼《江阴守城记》。

《嘉定屠城纪略》。

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六、七，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南明始末

明朝灭亡以后，在南方（江淮以南）广大地区先后出现过五个政权，它们是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绍武政权、桂王永历政权。这些政权统称为南明政权，或南明小朝廷。

顺治元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南京。四月初一，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翰林院詹事姜日广等明朝设在南京的部分官员发布檄文，号召天下勤王。随后史可法亲自来到浦口督师。

当时，明在中原的潞王、周王、鲁王、福王、桂王等纷纷逃到南方。国不可一日无君，南京的群臣决定议立新君。凤阳总督马士英拥兵在外，又得到大将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等人的支持，成为实力派，力主拥立福王朱由崧。姜日广、高弘图、史可法等人认为福王品行不端，主张拥立相对贤明的潞王朱常淓。朱由崧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在洛阳被李自成农民军处死的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乃神宗之孙。农民军攻下洛阳后，他流落到安徽一带，明亡时又逃至淮安。朱常淓是穆宗之孙、神宗弟之子。拥立福、潞的二派各执己见，最后，由于马士英有军队做后盾，他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四月三十日，福王被迎至南京，五月三日开始监国，五月十五日正式继位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随后，他任命马士英、高弘图、史可法、姜日广等为大

学士。就这样，南明的第一个小朝廷弘光政权便建立起来了。它的实权掌握在马士英等人手中。马士英以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视事，其他大学士徒有虚名。不久，威望较高的史可法被排挤出朝廷，前往扬州督师。

弘光政权拥有近百万的军队、东南的半壁江山。军队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所谓“江北四镇”，即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总兵分辖部众，驻扎于江淮之间，拱卫南京。二是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统率的军队，屯驻于武汉一带。除了这两大主力外，还有一些地方部队。

弘光政权建立伊始就与农民军誓不两立，鼓吹“齐心讨贼”，以恢复明朝的统治。五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勾结清兵打败农民军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弘光小朝廷立即决定封吴三桂为世袭蓟国公。六月初，又传来了清军进驻北京的消息，这一消息虽不利于弘光政权，但他们对清统治者抱有很大幻想。七月初，弘光政权派左懋第、陈洪范等人为“北使”，携带金银十余万两，赴北京酬谢清军，奖励吴三桂，并且准备以割山海关外土地、每年给白银十万两为条件与清议和，然后联合进攻农民军，重建大明王朝。但这只是弘光君臣的一厢情愿，满族贵族入主中原的野心由来已久，只是当时由于多尔衮正忙于指挥西北战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农民军上，所以暂时对弘光政权采取了不战不和、相机行事的策略。左懋第等人来到北京后受到冷遇，后来甚至被软禁起来。

七月二十六日，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对弘光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他在信中指出，大清是从“闯贼”手中夺得天下的，而不是从明朝手中。他指责南明大臣不救崇祯，拥立福王为帝，纯属坐享渔人之利。他要求弘光帝削去帝号，仍称藩王，然后一道去攻打李自成。否则清廷就要挥师南下。九月十五日史可法复信多尔衮，表示愿与大清“合师进讨，问罪秦中”。

十月，多尔衮将弘光使臣全部驱逐。十一月，他又听从已降清的弘光副使陈洪范的建议，将左懋第等扣留下来，只放陈一人回去做内应。

和谈已是毫无希望。史可法终于较早地放弃了幻想，提出了“和不成惟有战”的抵抗方针，成了弘光政权中坚定的抵抗派。

但是弘光朝廷的实权人物却没有抗战的决心。这个政权自始至终腐败透顶。弘光帝朱由崧昏庸无能，终日沉湎酒色，“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他派人挨门严访淑女，搞得闾井骚然。他的人生信条是“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崇尚及时行乐。朝中马士英掌握实权，他引进阉党头目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并进入内阁，马、阮等人不断打击异己，将姜日广、高弘图等人相继罢官。阮大铖列了一张东林、复社人士的黑名单，想把反对派一网打尽。他们还把持铨选，公开标价卖官，以饱私囊。凡属要职均有定价，贿金的多少，既决定官阶的大小，又决定任官的速度。江西副将陈麟、邓林奇以功当升为总兵，因没有按价交一万二千贿金，因而迟迟得不到敕印。当时有一首民谣道“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朝中的权臣就这样胡作非为。与此同时，在外的武将则互相残杀。江北的四镇，在当地横征暴敛，为争夺地盘而互相残杀。顺治二年正月，史可法命四镇中实力最强的高杰北上收复河南失地。高军来到睢州，睢州总兵许定国杀高杰降清。为了阻止另外三镇瓜分高军，扬州督师史可法亲赴徐州进行调停。

顺治二年三月，已离开西安的清豫亲王多铎奉命率军南下。清军出虎牢关（今河南汜水），抵河南归德，直指徐州。弘光政权的徐州总兵李成栋望风归降，并引导清军南下。值此关键时刻，左良玉却发动了内战，从背后捅了弘光政权一刀。左良玉，山东临清人，从小署身行伍，后长期与农民军为敌，明亡前夕受封南宁伯。他曾得到过东林党人侯恂的提拔，因而与东林及复社

人士过从甚密，对马、阮二人的专权极为不满。三月十五日，他宣布马士英有七大罪状，并以“清君侧”为名带兵直扑南京，一路上锐不可挡。四月十三日，左兵攻下安庆。四月十四日，清军由泗州南渡淮河。南京同时受到了东、北两方面威胁。史可法认为上游左部只不过欲除君侧之奸，不会难为皇上，而清兵南下则要危及宗社，因而主张全力防守长江，阻止清兵南进。马士英却气急败坏地说到：“清兵来到尚可议款，若是左兵杀来，你们东林党人自然加官晋爵，我们君臣等人却活不成。我们宁可死于清兵手中，也决不死于左兵刀下。”于是马、阮等人急调刘良佐、刘泽清从江北撤防以对付左军，并命令史可法入卫南京。顿时，江淮防线门户洞开，清兵南进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左良玉病死于九江，左军停止了进攻。史可法急忙又回到江北，防守扬州孤城。四月十九日，弘光帝召见群臣议论战守。有人认为扬州最急，反对马、阮二人撤去两镇江防部队以对付左良玉，认为应该增援扬州。马士英则嗔目大呼：“谁敢议守江淮定斩不饶!”连弘光帝也吓得不敢吱声。同日（十九日）清军进围扬州。这时史可法手下只有高杰残部总共一万几千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四月二十五日，被围七天的扬州城最后被攻破，史可法自刎未死，被清军俘获。多铎劝他投降，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最后从容就义。他的部将总兵刘肇基等率军民展开巷战，重创清军，后因寡不敌众，矢尽力竭全部壮烈牺牲。清军占领扬州后，在十来天的时间内杀死军民八十余万，史称“扬州十日”。当时，扬州尸骨如山，史可法遗体已难以辨认，有人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外梅花岭。

血洗扬州之后，清军乘胜渡过长江，沿江明军望风奔逃。五月十日，弘光帝逃往太平后又转至芜湖，马士英挟太后逃至杭州。随后，弘光政权的文武官员数百人及大部分军队降清。五月十五日，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几天之

后，叛将刘良佐抓住了弘光帝，并将他押回南京。后来弘光帝被解往北京处死。

这样，腐败透顶的弘光政权仅仅存在一年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弘光政权灭亡不久，又有两个南明小朝廷建立起来，那便是鲁王政权和唐王政权。

顺治二年五月南京失守，六月潞王在杭州降清，浙江大部分州县落入清军手中。闰六月，故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于宁波，兵部尚书张维国起兵于东阳，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起兵于余姚，明末大儒黄宗羲亦起兵于余姚山中，形成浙中义师。他们杀掉了清浙江招抚使，联合明浙江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等，公推举人张煌言去台州迎接鲁王朱以海，拥戴他在绍兴监国。朱以海是朱元璋十世孙，鲁王一爵原由其兄朱以派以长子袭封。崇祯十五年（1642 年）清军入关，攻破兖州，朱以派被迫自杀。两年后，朱以海嗣鲁王位。不久明朝灭亡，朱以海也随诸藩南下，弘光帝命他移驻台州，至此得以监国。鲁王政权拥有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顺治二年十月与清军连战十天，终于旗开得胜，获得大捷。

差不多在鲁王监国的同时，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出杭州入闽，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南安伯郑芝龙等，拥立唐王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他继皇帝位，年号隆武。朱聿键的先世唐定王被封在南阳，朱聿键袭封后曾于崇祯九年带兵北上勤王，为御史所劾，被废为庶人，安置凤阳，弘光帝继位以后将他释放，至是被拥立为帝。隆武政权建立之初辖有福建、两广、云贵等地以及安徽、江西、湖广的部分地区。

唐、鲁两政权同时出现，近若毗邻，却势同水火。唐王以叔辈自居，要求鲁王从其节制，鲁王拒不奉诏，双方互杀使臣，为争正统不惜同室操弋，致成仇敌。此外这两个政权也和弘光政权

一样十分腐败。鲁王政权中方国安、王之仁等同马士英、阮大铖互相勾结，把持朝政，不给义师给养。其中方国安尤其暴横。顺治三年六月，清军趁天旱水浅之机渡过钱塘江，直取绍兴，张国维兵败自杀，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降清。随后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相继失守。鲁王在张名振的保护下漂泊海上。鲁王政权至此实际上垮台。

当年十一月，鲁王被郑彩迎至厦门。后福建失守，鲁王再次入海，张名振将他迎入舟山。张名振、张煌言以舟山为根据地曾多次兴师北伐。顺治八年，舟山失守，二张保护鲁王南下金门。顺治十年鲁王去监国名号。不久，张名振病死，张煌言则与郑成功协力抗清。

鲁王政权垮台后，唐王政权也没有摆脱覆亡的命运。唐王政权的实权控制在郑芝龙手中。大敌当前他一直按兵不动，无意出击清军。这时，大学士黄道周挺身而出，率门生故吏几百人，并招集八九千忠义之士，出关（浙闽交界处的分水关）抗清。郑芝龙既不拨给军队，也不发给器械、粮饷。黄道周以不足万人之众孤军深入，后因粮饷不足，在安徽境内兵败被俘，不屈而死。当清军杀气腾腾地扑向浙、闽的时候，郑芝龙却与洪承畴暗中勾结，他借口海寇来犯，尽撤浙、闽交界处仙霞岭二百里防线上的守军。三年七月，清军由仙霞岭长驱直入福建，郑芝龙不听其子郑成功的劝告，剃发迎降。八月二十四日，清军攻下福州，朱聿键仓皇出逃，几天后在汀州（今福建长汀）被清军俘获杀掉。存在十五个月的唐王政权至此灭亡。

由于清廷在占领南京后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引起了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唐、鲁政权虽然垮台了，但以民众为主体的抗清义军却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抵抗活动，并屡创清军。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又有两个南明小朝廷在广东先后建立。

打垮了唐、鲁政权后，清军继续向南推进，东路李成栋率军

直指广东。顺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朱聿键的弟弟朱聿𨮁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十一月十八日，广西巡抚瞿式耜、湖广总督何腾蛟、两广总督丁魁楚等拥立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十二月十七日，李成栋攻下广州，杀死朱聿𨮁，绍武政权灭亡。这个政权存在不到四十天，影响很小。桂王政权由于有农民军余部的支持，所以坚持的时间最长。早在顺治二年，李自成的余部便进入湖南，郝摇旗等所部十余万人在长沙接受了隆武政权湖广总督何腾蛟的领导，李过、高一功等率三十余万人在湘西充隶湖北巡抚堵胤锡麾下。后来唐王政权灭亡，大顺军余部又转而支持桂王政权。

顺治三年十二月，李成栋在攻下广州后又向肇庆杀来，第二年正月，拿下肇庆，丁魁楚降清。桂王从广东逃到广西，经梧州、桂林、全州等地，一路奔逃，于四年四月逃到湖南武冈。可是湖南也不安全，中路清军由北向南，直指长沙，只逼得桂王又逃回广西。由于瞿式耜坚守桂林，英勇抗击由广东来的清军，这才使得桂王在广西一隅稍得喘息。

谁料清将孔有德等又从湖广追来，一直打到广西全州等地。顺治四年十一月，何腾蛟、郝摇旗等在全州组织反击战，大败清军，迫使清军退回湖南，西南转危为安。

顺治五年，南昌的金声桓、广东的李成栋先后反清。这一年大顺军余部与明军进攻湖广，几乎收复了湖广的全部失地，全国掀起了抗清高潮，永历帝也被李成栋迎回肇庆。

可惜好景不长，永历政权中统治者争权夺利，而且对农民军猜忌，甚至准备进攻农民军。顺治六年正月，何腾蛟为调停农民军与明军的关系而误入湘潭空城，被清军俘获，绝食七日，不屈遇害，抗清形势急转直下。当年春天，金声桓、李成栋先后败死。顺治七年末，尚可喜攻克广州，孔有德拿下桂林。守卫桂林的南明督师瞿式耜城破后被清军俘获，最后英勇就义。临终之前

曾作绝命诗一首，诗中写道："从容赴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头香。"表现了可贵的气节。由于广西已无法立足，大顺军余部被迫先后转移，到顺治八年冬会师于四川巴东。

广西沦陷以后，永历政权又得到了大西军余部的支持。张献忠死后，其四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控制了云贵、川南地区。顺治六年，他们向永历政权提出了"联合恢剿"的策略，永历政权内部争论较大。顺治九年二月，大西军派人进入濑湍（今广西南宁之南），清除了极端反对派，将永历政权安置于贵州安隆。大西军余部对清军展开了大反攻，李定国东出广西，克桂林，入湖南，又南下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两王指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同时，刘文秀北进四川，大败清军，收复了川东和川西南的部分地区。但是不久孙、李产生了矛盾，孙可望对李定国的战功极为嫉妒，准备在湖南对李定国下毒手。李定国被迫东进，转战两广，一路上损失惨重。不久，永历帝因受孙可望的威逼而向李求救，李以七千人先于孙可望进入安隆，将永历帝护送到昆明。孙可望追之不及，退回贵州。李定国有意与孙可望和解，孙则因废帝自立不成，又为李占据了后方，恼羞成怒。顺治十四年九月，他以十万大军向李发起攻击，被李打得大败，仅以十余骑东逃。不久他投降了清朝。

顺治十五年，清军分三路进攻李定国，李定国抵抗失利。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攻下昆明，桂王流亡缅甸，李定国退到云南边境。顺治十八年，吴三桂兵入缅甸，俘获桂王，第二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将桂王处死于昆明。康熙元年六月，李定国病逝。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政权，就这样灭亡了。

（肖立军）

参考资料：

《南疆逸史》:“史可法传”、“黄道周传”。

《小腆纪传》左懋第、弘光帝。

《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

蒋良骐:《东华录》卷4。

《小腆纪年》卷28。

《清世祖实录》卷6。

黄宗羲:《永历纪年》。

《明季南略》卷7。

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第四章第三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

郑成功抗清复台

郑成功（1624～1662 年），原名森，字大木，是郑芝龙长子，福建泉州南安县石井乡人。其父郑芝龙原为海盗，后降于明，以功至都督同知。成功的母亲是一位日本人。明天启四年（1624 年）郑成功生于日本，崇祯三年（1630 年）回到祖国，当时七岁。此后他一直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并考中秀才。到了二十一岁时又进入南京国子监学习。福王政权灭亡后，他的父亲拥立唐王继位，改元隆武。

郑成功深得隆武皇帝赏识，被赐姓朱，改名成功，并受封为御营中营都督，时人称他为国姓爷（后永历政权又封他为延平郡王）。清兵攻入福建以后，郑芝龙降清，成功哭谏不果，便出走金门。

清顺治四年（1647 年），郑成功率旧部九十余人起义于海上，在广东南澳招兵买马，组织军队。从顺治四年到六年，他从南澳出兵，连破同安、海澄、漳浦、泉州等闽南沿海一带。顺治七年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他率军一举夺取厦门。厦门当时叫中左所，郑成功将它改名为思明州，并遥奉桂王正朔，以示复明抗清的决心。他在思明州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分理政务；将陆军分为七十二镇，水师分为二十镇，共有军队十余万，战舰五千艘。为了解决部队给养，他利用漳、泉等地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海上贸易，以筹措资金。当时，郑军兵饷充足，装备精良，形势一度十分乐观。

顺治十年到十一年，李定国进攻广东，约郑成功与他会师。郑亲率水师南进揭阳（今广东汕头西北），曾一度在那里驻军两月，后终因会师不果而返。这一时期，李定国转战于西南、东南的广大地区，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桂王政权上，无暇东顾，因而对郑成功采取了以抚为主的策略。顺治十一年，曾四次对郑进行诱降，均遭拒绝。

郑成功利用大好时机同鲁王部将张名振、张煌言等合作，数次出师长江、舟山等地。

顺治十六年六月，为了牵制清军对桂王政权的三路进攻，郑成功自任招讨大元帅，以张煌言为监军，率领八十三营水陆十七万大军大举北伐。他率兵由崇明而上，一路上破瓜州，取镇江，直抵南京城下。张煌言则以芜湖为据点，分兵四出，不出半月连下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清廷大为震动。但是郑成功未能听从张煌言等人提出的建立据点、断清漕运、集中兵力攻打南京的正确建议，他在连连取胜的情况下未免骄傲，以为南京指日可下，竟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当时清朝总督郎廷佐派人哀求郑成功说："本朝有令，若守城超过三十日，罪不及守将的妻子、儿女。请宽三十日之限。"郑成功以为对方是真心投降，便下令八十三营大军"牵连困守"，坐待受降。部将甘辉力劝急攻，成功不听。郑军竟然拖延了两个月之久，在南京城外"释戈开宴，纵酒捕鱼为乐"。清将梁化凤趁郑军懈怠之机，从城内穴地而出，突然发动袭击，郑军仓促应战，全线溃败。郑的得力部将甘辉等人战死，全军伤亡惨重，郑成功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被迫退回厦门、金门。于是，深入安徽的张煌言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中，所得城池尽被清军夺回。其后，张煌言只身逃往浙东。

北伐受挫以后，收复台湾便逐渐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郑成功较早就有收复台湾的打算，但由于一开始大陆战事还

算顺利，也就没有将复台付诸行动。北伐失败以后，清军开始向福建发起进攻，郑军在金、厦一带与清军苦苦鏖战，地方狭小，军饷不充，特别是李定国失利之后郑成功所受压力更大。不久，汉奸黄梧向清廷献迁海之计，于是清廷下令：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十里，渔船商船不得出海。这便是“迁海令”，又叫“迁界令”。“迁海令”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郑成功同东南沿海人民的联系，使郑军在大陆更加难以立足。本来早在郑北伐南京的顺治十六年四月左右，曾任荷兰通事的爱国人士何斌从台湾来到厦门，建议郑收复台湾，并献上了一幅台湾地图。他提出了收复台湾的三点理由：第一，攻占台湾以后进退自如，足以与清相抗；第二，有了台湾以后不愁军饷没有着落；第三，台湾本是郑芝龙的势力范围，是郑家的故土。何斌的敦请对郑成功下决心收复台湾起了推动作用。

顺治十八年正月，郑成功召集诸将举行秘密军事会议。会上，郑成功力排众议，决定收复台湾，他说：“我要平定台湾作为大本营，安顿将士家属，然后东征西讨全无牵挂。同时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实力，总结教训。”这一次郑成功最后下了决心，他要暂避清军的攻击，卧薪尝胆，将台湾作为积蓄力量、继续抗清的基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十七世纪初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触角开始伸向台湾地区。明天启四年（1624 年）荷兰殖民者被明军赶出澎湖后，不甘心失败，又在同年占领了台湾南部。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又占领了台湾北部。

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后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据点。天启四年修建了热兰遮城，又称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第二年修建了普罗文查城，华人称为赤嵌城。与此同时，他们还蚕食了大片土地。崇祯十五年（1642 年）荷兰打败了西班牙，独霸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他们向台湾人民征收高

额地租，并对七岁以上居民强征人头税，此外，还垄断台湾的对外贸易，对汉人和高山族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荷兰殖民者的暴行，激起了台湾人民的不断反抗。何斌的献图请师之举正代表了广大台湾人民的心声，他们期待着“国姓爷”的到来。

清顺治十八年二月，郑成功把军队从厦门拉到金门。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二万五千余人、舰船数百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于次日到达澎湖。七天后，船队开到台湾西南部鹿耳门内的禾寮港，并很快强行登陆。在台湾人民的支持下，郑军大败荷军，将荷军压迫在赤嵌城和台湾城两个据点内。郑成功首先率军包围了赤嵌城并向荷兰殖民者提出严正警告，他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现在你们理应交给主人使用。如果负隅顽抗，绝没有好下场。”荷军统帅揆一拒绝投降，于是郑成功下令发起攻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赤嵌城的荷军头目向郑军投降。随后郑又指挥大军杀向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中心——台湾城。郑军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围城达九个月之久，终于迫使荷军投降。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 1662 年 2 月 1 日）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郑成功对荷兰人从宽处置，允许他们归国并带走个人财产。至此，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便着手设置行政机构。他将赤嵌城改为东都，在这里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两县；又将台湾城改为安平镇。除此而外，郑成功还大力开发台湾，实行军屯，奖励人民垦荒，并利用清廷海禁的机会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由于郑军带去了较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从而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

康熙元年（1662 年）五月初八，郑成功不幸病逝。此后，他的儿子郑经继续统率军队，驻守台湾。

郑成功虽然去世了，但他收复、开发台湾的功业永存。他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祖国领土台湾，从而结束了荷兰对台

湾历时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是我国杰出的、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肖立军）

参考资料：

《小腆纪年》卷19、《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台湾外纪》、《闽海纪要》卷2。

四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正月初七，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死于养心殿，遗诏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并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政务。自此至康熙八年（1670 年）五月，共八年零五个月，史称“辅政时期”。

清朝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摄理。顺治帝幼年时，即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摄政。顺治临终前，突然将亲王摄政改为四臣辅政，绝非偶然，它是孝庄皇太后与顺治帝总结本朝经验后做出的选择。

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部所谓“戚畹贵族”之家，天命十年（1625 年）嫁给皇太极为妃，崇德二年（1637 年）生子福临。崇德八年，皇太极暴卒，皇位即成为各派势力公开逐鹿的对象。皇太极九弟睿亲王多尔衮实权在握，力量强大，成为争夺皇位的主要力量；而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则力主拥戴皇长子豪格为君。孝庄皇太后以其特有的谋略和胆识，争取了礼亲王代善，使他拥戴福临，并与实权在握的多尔衮联姻，使之放弃对皇位的争夺。这样，福临便在其母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入承大统，并以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政。但摄政诸王皆系宗室近支，皇帝长辈，本身是一旗之主，且“摄”有代理之意，摄政即代君听政、代行皇权，因此，太后和皇帝的权力时常遭到严重侵犯。摄政不久，睿亲王多尔衮即独擅

威福，排斥济尔哈朗，并处死豪格。多尔衮又以自己名义下诏，声称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位，表明其即帝位之心仍未泯灭。顺治八年，多尔衮射猎丧生于喀喇城，尸骨未寒，福临便在其母授意下，公布多尔衮罪行，削其王爵，撤其庙享，并把大权收为己有。顺治十八年，福临病故，玄烨即位，孝庄皇太后亲身经历了皇权之争，又看到诸王摄政导致侵犯皇权现象，深感皇权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宗室内部大权在握的诸王，如不废除亲王辅政，玄烨的地位也很难牢固。于是在皇太后授意下，顺治遗诏不用旧制，改由元老重臣共同辅政。索尼、鳌拜、遏必隆，本为太宗皇太极旧部，早年即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备受信任。太宗逝世后，拥立福临继位，在反对摄政王多尔衮的斗争中，这三人深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赖。苏克萨哈原为睿亲王多尔衮属下近侍，睿亲王逝世后，他与王府护卫詹岱等人，检举多尔衮殡殓服色违制和谋迁永平诸逆的情况，得到太后及顺治帝的信任。因此，顺治遗诏指定其四人为辅政大臣，绝非偶然。

正月初九，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宣读遗诏，承继大统，年号康熙。四大臣深感受命辅政，责任重大，又唯恐诸王不服，便以“国家政务从来由宗室协理”为由，跪请诸王、贝勒共同辅政。但遗诏甚明，诸王谁敢干预？于是四大臣便奏明太后，并祭告皇天上帝及顺治帝灵前，宣誓不私自与诸王、贝勒府弟往来，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表示了辅佐幼主、维护皇权的决心。正月十四，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以下及大臣官员等，齐集于西安门内南侧的大光明殿，分别向皇天上帝及先帝灵位设誓，表示要同心协力，辅佐幼主。这样，以太后为中心，以异姓旧臣掌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的新的统治核心形成了。

四大臣执政后，一面继续完成民族征服战争，统一全国；一面实行赈济蠲免，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清政府自顺治元年人

关后，即把统一全国当作头等大事。世祖去世时，全国尚存互为犄角的两大抗清战场，一是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战场，一是以李定国为首的西南战场。康熙元年（1662 年），李定国拥立的南明永历政权覆灭，桂王被杀，李定国忧愤而死，余部相继降清。康熙三年，清军又一举剿灭退守湖北茅麓山的大顺军余部，农民军将领李来亨牺牲，至此，清朝在关内的政权才最后稳定下来，进入了百年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长期的征服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黄河以北，极目荒凉；江南地区，万井寒烟。面对百废待兴的现状，清朝政府鼓励垦荒，赈济蠲免，以苏民困。康熙四年，对受战争洗劫最重的湖广地区"给牛种，听其开垦，三年后起科"，并责令地方官对流亡四川的湖广之人，查报上册，照人数多寡提供条件，奖励垦殖。对无度牒的异端僧道，勒令还俗，使其开垦新荒。经过几年努力，全国田地、山荡、畦地数字有了很大提高，为玄烨亲政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四大臣还对顺治年间的行政机构作了改变。太祖和皇太极初年，辅佐汗的秘书机构是文馆，又称书房。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极称帝，始改文馆为内书院，分为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并设内务府管理宫内事务，由皇帝的包衣佐领充任。顺治十一年（1654 年），仿明代制度改置宦官十三衙门总管宫内事务。顺治十五年，又仿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同时设立翰林院。鉴于明朝亡国多因宦官的教训，四臣辅政伊始，即于二月革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仅留少数太监以供使令，其余俱永不用，有效地防止了宦官干政局面的重演。六月，又以世祖章皇帝遗诏发布谕旨，恢复内三院建置，停罢内阁及翰林院。大学士入直和票拟之权均被取消，由辅臣代办，辅臣必须共同商议票鉴内容，然后请示太后，并代幼帝朱批御笔，所以必待次日看详。这样就给辅臣提供了擅权乱政的机会。

辅政初期，四大臣尚能协调一致，辅佐幼帝。然随着时间的

推移，辅臣鳌拜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对爵秩低于自己，而班次却次于索尼的苏克萨哈耿耿于怀，遂利用黄白两旗的旧有矛盾，挑起争端，打击苏克萨哈。

黄白两旗的矛盾，最早可追溯到太宗皇太极的改旗。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汗位，将自己掌握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分别为左、右翼之首，地位得以提高；而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三幼子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居左翼之中，地位下降，由此埋下两旗矛盾的种子。顺治初年，圈占北京附近田地分给八旗将士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擅自将原本镶黄旗应得的土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而于右翼之末——保定府、河间府、涿州等处，另拨土地给镶黄旗，引起镶黄旗广大旗员的不满，黄白两旗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鳌拜为打击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拉拢黄旗，重提旧事，以更换土地为由，挑起争端。

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唆使八旗以土地不堪为由，呈请更换，送交户部，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已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的旨意，遂上疏反对圈换土地，并请将移文驳回。鳌拜假借世祖章皇帝有旨，凡事俱尊太祖、太宗例行，于四月命将镶黄旗从右翼之末移回左翼之首，并立即圈拨北京东北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土地给镶黄旗，造成迁移已毕的事实。秋天，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等率人出发丈量准备圈换的正白旗土地，旗民数千群言堪地之扰，要求停止。同年十一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极同时上疏，指出旗民不愿圈换，自闻命后，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的情况，恳请停止圈地。苏纳海等在丈量圈换土地时，由于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又不肯指出地界，被迫决定撤回差去换地之官。鳌拜仰仗其在辅臣中的优势，命吏、兵二部将苏、朱、王等拿来禁守，革职送交刑部议处。康熙五年十二月，以苏等人不愿迁移、结党抗旨、妄行具奏等罪，将

苏等三人矫旨处绞，家产籍没，并强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土地圈换。旗员及民人深受其害，失业者达数十万人。

圈地事件后，四大臣协调一致的原则被打破。朝内百官惴惴不安，纷纷上书要求皇帝亲政。康熙六年，索尼去世，鳌拜欲乘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代替已故的索尼，获取启奏与批理奏疏之权。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遂以辅臣屡行陈奏为由，奏请太后允许，密拟诏旨，于七月初七临期颁行，举行亲政大典。此时鳌拜党羽已经形成，其势力在上三旗中占有绝对优势，镶黄旗已被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合。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孤掌难鸣，无力与鳌拜竞争，遂于七月十二请求辞职。鳌拜乘机以不愿归政、妄蓄异心等罪名，拟将苏凌迟处死、族诛。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经常与其争论是非，积以成仇，欲置之于死地，遂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后仍将苏克萨哈处绞。

苏克萨哈死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一切政事先于家中议定，然后实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议，如有人自行启奏，必遭训斥；于皇上面前，凡事不以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勒依允，甚至公然抗旨，拒不执行。鳌拜党羽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而鳌拜却拒不遵行，仍行赐谥。在鳌拜怂恿下，其党羽亦敢怠慢皇上，皇权受到严重威胁。

鳌拜结党妄行，擅权乱政，引起康熙和众官不满。康熙七年九月，内秘书院尚书熊赐履上疏，以天下治乱系宰相一语，隐喻鳌拜专权，国计可忧。康熙认为，鳌拜身居要职，且党羽遍布内外，若明降谕旨，外廷拿问，恐不免滋生事端，于是特选忠实可靠之侍卫及拜唐阿（执事人）年少有力者，以“扑击之戏”为名，组成亲信卫队善扑营，并将鳌拜党羽巴哈、苏尔马、绰克托、济世等以各种名义派出，以分削其势。一切准备就绪后，遂召鳌拜进宫，立命善扑营擒之，同时被捉的还有遏必隆及一等侍

卫阿南达等。康熙亲向议政诸王揭露鳌拜罪状，指责其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的种种劣迹，命康亲王杰书等议政诸王勘问议处。议政诸王列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三十大罪，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列遏必隆附和鳌拜、藐视皇上等十二大罪，革职立绞，子并妻为奴；鳌拜党羽班布尔善、塞本得、阿思哈、穆里玛等皆斩或绞，家产籍没，妻、子为奴。所议上奏皇上，康熙再次召见鳌拜。鳌拜以其伤疤请皇上观看，以求皇上能念搭救太祖御驾之情。康熙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发布谕旨给吏、兵二部，历数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罪，本当依议处分，但念其历朝效力年久，又先皇曾经倚任，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又因遏必隆系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子，和硕公主所生，因而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其子。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其他党羽班布尔善、阿思哈、穆里玛等依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罪在不赦，俱论正法；其余微末之人，宽宥免死，从轻治罪。

四臣辅政，从世祖逝世到康熙八年，共八年零五个月。初期，四大臣协调一致，辅佐幼帝，对于清王朝的巩固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后期，鳌拜擅作威福，专权跋扈，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康熙八年，圣祖废除辅臣，同年冬，又采纳御史李之芳建议，恢复大学士人直即日票拟之制，以杜绝任意更改之弊，加强了中央集权。康熙九年八月，复改内三院为内阁，十二月，重设翰林院，年轻的康熙皇帝日趋成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祖实录》卷63；《东华录》卷6；《庭训格言》；《清圣祖实录》卷1、卷20、卷23、卷30；《清稗类钞》。

历法之狱

十五世纪末，欧洲殖民国家开始向外扩张，传教士也随之遍布世界各地。明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天主教义附会孔孟伦常，允许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尊重中国习俗，因此得到了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传教活动有了较快的发展。到明朝末年，他们已在中国各地建立了不少教堂，招收了成千上万的教徒。

耶稣会是罗马教廷用来镇压新教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耶稣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策略灵活，手段多样。他们暗中收集情报，偷窃机密，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又在各地遍设教堂，广收教徒，欺压良善，因此，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人民、清朝政府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但西方传教士来华后，也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天文数学知识。我国自十三世纪以后一直到明代，均采用元代郭守敬之《授时历》，相沿日久，误差渐大。利玛窦看到中国历法存在的问题，开始着手制定新历法。明朝末年，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应用西法，设局修历，聘请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参加，编成规模宏大的《崇祯历书》。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汤若望即向清朝政府提出改历建议。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八月初一，日食，清廷令大学士冯铨同汤若望携窥远镜等仪器，率局监官生，开赴观象台测验，其初亏、食甚、复圆时间与方位，与西洋新法

一一吻合，大统历[1] 回回历俱差时刻，汤若望也因而得到清朝政府的信任。顺治二年，清廷决定采用西法，颁行汤若望制定的《时宪历》，同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

《时宪历》依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天体运行论，采用欧洲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改百进位制为六十进位制，同时采用中国赤道座标，以太阳在赤道上的实际移动位置做标准来判明节气，更加符合太阳运动的实际规律，因而比较精确；而中国传统历法，坚持“天圆地方”说，理论落后，又缺乏近代数学、几何学等知识，因此差误较多。但新法的实行，引起朝中顽固派的不满。顺治亲政后，与汤若望过从甚密，据统计，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顺治帝即访汤若望于馆舍中共二十四次。顺治十四年二月初一，清廷命在宣武门内汤若望所建立的天主教堂前立碑，称赞汤若望“事神尽虔，事君尽职”。这就更加引起顽固派的不满。顺治末年，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烜和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先后上疏弹劾汤若望造历谬误。但在实测时，西洋历法确实符合天象的实际运动，胜过传统历法，而顺治皇帝又与汤若望过从甚密，因此，汤、杨双方并未形成很激烈的冲突。

顺治十八年，世祖福临逝世于养心殿，遗诏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并命鳌拜等四大臣共辅国政。鳌拜推行排斥西法政策，杨光先遂再次上疏弹劾汤若望，双方冲突日渐激烈。杨光先首先发表《避邪论》，攻击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及在华之基督教，认为宇宙起于二元，反对传教士的上帝造物说。康熙三年（1664 年）初，汤若望的助手，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和中国教徒、钦天监历科官员李祖白合著《天学传概》一书，以李祖白名义刊行，宣扬中国的人类和文化皆来自西方，引起杨光先等人更激烈的反

① 大统历为明代据《授时历》而编成的历法。

对。杨光先再写《不得已》对之进行反驳，利类思、安文思等也不甘示弱，再写《不得已辩》，双方展开笔战，此时的矛盾已不再单是应用西洋历法还是传统历法的学术问题，而是由此而引出的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交结。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杨光先再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疏》，指斥汤若望邪说惑众，违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借历法以藏身，窥伺朝廷机密；在历法书上添印依西洋新法五字，意欲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阴谋不轨，危害国家。并进《摘谬论》、《选择议》二篇，指出新法十谬并选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之误，得到鳌拜等辅政大臣的支持。八月初七，礼部开始审讯传教士，一直到十一日结束审讯，将汤若望革职废衔，与其他人员一起交刑部议处。

康熙四年二月底、三月初，经刑部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议，议定西洋新法有错，其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因拟抉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吏李祖白等凌迟处死，利类思、安文思等传教士皆杖百流充。汤、杨一案也得到当时清最高统治者孝庄太皇太后的关注。当辅政大臣将汤若望罪案奏请太皇太后时，太皇太后大为不悦，责备辅臣：汤若望向得先帝信任，为何必置之于死地！遂命速行释放。传教士们幸免于死，但李祖白等五位中国官员即被处斩。八月，即授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十月，下令汤若望迁出馆所，由杨光先进住。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汤、杨一案以杨光先胜利而结束，然而历法之争并未就此终结。杨光先虽任职钦天监，但由于排斥西法，本身历算知识又低，监内工作一片混乱。传统历法大统历或回回历，都不能与天象符合，须作根本改定，但吴明烜与杨光先均不能担当此任。

康熙亲政后，因历法存在问题颇多，遂着手进行彻底解决。康熙七年，江南上奏收集到元代郭守敬的天文仪器。因杨光先曾经请求用律管、葭草、秬黍制作仪器，以恢复失传一千二百多年

的候气之法。康熙便命杨光先再议具奏。十一月，杨光先奏称：律管用法失传日久，能候气之人尚未访得，并以身染风疾，不能管理加以推诿，引起康熙不满。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上疏弹劾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所修历法：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为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两次春分，两次秋分种种误差。康熙遂命大学士图海、李霨等官员二十八人同南怀仁、吴明烜等同到观象台，测验推算历法。测验结果：立春、雨水、太阳、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与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康熙八年二月初七，议政王大臣会议再议钦天监事，以杨光先职司监生，历日差错不能修理，袒护吴明烜，盲目排外，以为西洋之法必不可用，应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康熙念其身老，且又在与传教士笔战中维护了大清国的尊严，遂只命将其革职，免交刑部，妻子、儿女亦免流徙。三月十七，提升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并根据南怀仁的要求，下令改造天象台仪器。八月十一，应南怀仁等要求，为汤若望、李祖白等平反昭雪，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称号①，历经顺、康两朝的历法之争终告结束。

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耶稣会毕竟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工具，他们在中国刺探消息，盗窃情报，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清政府的许多机密文件，都通过传教士传到国外，且传教士在中国散布中国文化和人类起自西方，严重损害了大清国的尊严。康熙皇帝在任用传教士管理天文历法之事的同时，并没有盲目推崇西方，而是对他们也保持着较高的警惕。虽为汤若望、李祖白等平反昭雪，但对《天学传概》及其它仍行禁止，并命天主教除南怀仁照常活动外，严禁其它各省开堂传教；在处理杨光

① 原封"通玄教师"，因康熙名讳玄烨，为避讳帝名，遂改为"通微教师"。

先时，也没有按南怀仁等人所请，将其打人鳌拜集团，而是只惩罚其在工作中因顽固愚昧而造成的错误，还因其坚决批判传教士散布中国文化与人类起自西方之说而免交刑部。可以说，康熙在处理历法之争的问题上是比较成功的。这样既利用了西方科技之长，又维护了清朝政府的尊严，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处理，为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祖实录》卷 5。

《清圣祖实录》卷 28、31。

魏特：《汤若望传》。

明史案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清廷以庄廷珑私著明史，赞扬故明，毁谤当朝为名，将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人及其父兄弟子侄年十五岁以上者七十人斩决，受牵连者近千人，形成清初最大的一件文字狱案——明史案。

庄廷珑，湖州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人，其父庄允城为当地富豪巨户。庄廷珑十五岁从县学考选至京都入国子监，中拔贡，后因病双目失明，遂以司马迁“左丘失明，乃著《国语》”自励，以盲史自居，欲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庄家与明天启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祯家为邻，朱国祯生前著述颇多，晚年又曾仿司马迁《史记》并二十一史体例，编纂《明书》一部，书中没有志、表、帝纪、世家，只有列传，尚未刊刻。朱国祯死后，家道衰落，其孙辈穷困潦倒，遂欲出卖此书稿。庄廷珑闻讯，正合己意，遂以银一千两购得，并聘请当时江浙名士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张隽、唐元楼、严云起、韦全祐、蒋麟征等十五六人，对全书进行增删润色，对明崇祯朝一事，则采用茅瑞征《五芝纪事》、《明末崇祯遗事》加以增补，编纂成书后，取名《明史辑略》。

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珑病死，其父庄允城为了却儿子心愿，邀请当时名士、崇祯十三年进士李令皙为之作序，并将为此书参订有姓名可考者十八人（一说二十一人或二十四人）列于书中，请当地富豪朱佑明（庄廷珑岳父）出资赞助，在南浔镇

北圆通庵召工匠刻印，于顺治十七年冬刊成发卖。

书中所列参订者皆当地名士，其中查继佐、陆圻、范骧皆是庄允城未征得本人同意，慕其名而擅自列入的。书成后，范骧旧友左布政使周亮工，见书中所记明朝降表为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手笔，怕龚因此恼羞成怒，追究庄廷𫓶、范骧等三人也受牵连，遂建议范骧等三人向官府检举以为脱身。顺治十八年，三人遂将此事呈报浙江学道。浙江学道胡尚衡接到范骧等三人呈报，即命湖州府学查办此事。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在接到学道批文后，为抢头功，即用银六两买得该书一部，命本学廪生俞世祯、陈旦开为之检阅磨勘，摘出数十条有碍之语，出榜列于学门，并准备上报省宪。庄允城得知，赶紧拜会湖州分守道张武烈，又结交前守道、现任通政司王之祚，将所余刻书三部呈送通政司、礼部、都察院三衙，并经书吏施鲸伯贿赂刑厅李焕宁。李焕宁因向朝廷上报：此书既经呈报通政司、礼部、都察三衙，已非秘书。事情暂告一段落。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君宋告发庄氏史事，在当地广为传播，因庄允城为当地富户，想借机敲诈者大有人在 。现任湖州知府陈永命的主考房师李廷枢，在听说此事后，即买该书一部，到知府衙门中见陈永命，与陈商议敲诈庄允城，得利后二人平分。庄允城闻讯，即托湖州府官员周国泰，暗送纹银数千两给陈永命，陈永命得到贿赂后，即命吊出书板劈毁。李廷枢送书本为索贿，见分文未得，一气之下，将书取回，转给其亲家吴之荣。

吴之荣，原任湖州归安县令，在任期间，以敲诈手段得赃银数十万两，为乡人告发入狱，在狱中与李廷枢结好，遇赦出狱后联为姻亲。吴之荣从李廷枢那里得到书后，即持书亲自到庄家索贿，庄允城以知府陈永命为其庇护，没有答应。吴之荣不甘心，又持书告于浙江将军柯奎，柯奎是满洲八旗将军，庄家不敢怠

慢，遂托诸生徐轶三转请苏松提督梁化凤致书柯奎，并馈送以厚礼。柯奎受礼后，即将原书掷还吴之荣，并以"我系武职衙门，不便与闻"相推托。吴之荣无奈，又亲至庄家，要求馈赠些银两，以挽回面子。庄家以有柯奎撑腰，遂向守道张武烈告发吴之荣，张武烈即下令将吴之荣押送出境。吴之荣两次三番敲诈庄氏不成，遂把目标转向庄氏亲家——当地富户朱佑明。

朱佑明，原住石桥浦，乃湖州巨商。清军南下时，他屯积居奇，暴发聚金而成富翁，因其所住石桥浦临近太湖，为防"盗寇"，便于南浔镇购得董氏大宅，并收购朱国祯家堂匾一块，题名"清美"，落款为"朱老年亲台"，正好与朱姓巧合。吴之荣为诈朱佑明，遂以此匾作文章，说他与明臣朱国祯有涉，至今还挂他的匾，并连续到朱、庄二家索银，两家男人回避，以妇女数百人群出辱骂。守道派官兵衙役前来干预，朱、庄二家遂出银两，贿赂官兵衙役将吴之荣再次押送出境。

吴之荣索贿不成反而受辱，必欲雪恨而后快。康熙元年六月，吴将书中悖乱之语，摘取数条，以造写逆书为题，并将书中印"朱史氏"下添刻"即朱佑明"四字，进京向刑部告发朱、庄二家。刑部接到呈送，即于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派满洲官员罗多至湖州府，提吊库中书板。由于书板已被前任知府陈永命劈毁，罗多遂将庄、朱二人及有关亲犯押解入京，打入刑部大狱。同年十二月，庄允城病死于狱中。

本来，吴之荣向刑部告发时，唯痛恨庄、朱二人，又与作序者李令皙交情甚厚，故首举时已将书中序文及参订者数页撕毁，因此案发时，对作序及参订者并无多大妨碍。但在有关案犯押解至杭州时，朱佑明恰与原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同在一处。朱佑明以为赵君宋首告有功，必得重赏，遂以家 产一半相赠，恳请赵君宋为之掩饰包庇。赵君宋即在审讯时供出府学壁厨内藏有原书一部，其书无朱史氏之下"即朱佑明"四字，督抚官员不敢怠

慢，遂派官员到湖州府学，搜出原庄氏《明史辑略》一部，这样，作序者李令晳及参订诸人无一幸免，案情愈加扩大。康熙二年正月二十日，湖州府城中文武官员率八旗兵数百人，关闭城门，按书中有名字者各家，无论父子兄弟祖孙及奴仆内外男女，一并拿获，致使形成牵连近千人的大案。

康熙二年，刑部将此案上报朝廷，时值四大臣辅政时期，四大臣批阅卷宗后，勃然大怒，下旨要严加审讯，以杀一儆百。五月，刑部审讯定谳，拟罪奏报。四大臣称旨，以庄氏《明史辑略》毁谤当朝，狂悖已极，著将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及其父兄弟子侄年十五以上者七十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十八人，被流徙为奴者数百人。五月二十六日，在杭州宣判执行，因庄廷鑨早于顺治十二年病死，清廷遂处以掘坟、劈棺、碎尸之刑，以示惩处；其父庄允城于康熙元年冬死于刑部狱中，亦被处以戮尸。其他列名参订有姓名可考者十八人，除董二酉于决案前三年身死，掘冢砍棺，查继佐、陆圻、范骧由于吴六奇为之开脱罪责释放外，其余全被凌迟处死。被凌迟处死的还有庄廷鑨之弟庄廷钺、庄廷鑨岳父朱佑明和为庄氏史作序的李令晳。

李令晳字霜回，归安县人，明崇祯进士，颇有文名，庄氏史书成时，因其有名请为作序，事发后，曾出资贿赂吴之荣，吴之荣遂将其所作之序撕去，但等赵君宋举出其所藏原书后，李令晳已是有口难辩，遂被凌迟处死，全家籍没，全家男女亦被斩决。

朱佑明，本只与朱国桢同姓而已，"朱史氏"也是朱国桢纂史时的自称，与朱佑明并无关系，但吴之荣恨其索贿不应，遂以"清美"匾与朱佑明对质。朱佑明由此亦被处以凌迟，其三个儿子和侄子朱绎亦被处斩，朱氏妻奴配给旗下为奴，全部家产籍没。

其他受牵连者，柯奎因满人不识汉字，免死，革其将军之职；原湖州知府陈永命因销毁书板之罪，自杀死于店中，刻工汤

达甫、印刷匠李甫及卖书商等人，均被处斩。查、陆、范三人在案件初发时亦被抓获，但由于其没有参与修订，又曾向学道检举此事，加上查继佐旧友平南王手下广东提督吴六奇为之打点疏通，康熙二年三月，清廷便命其三人回浙候审。浙江督抚上本定案时，以查等三人虽不比吴之荣检举坚决，但也是首告之人，遂议不仅无罪，还应依律稍予赏赐，最后释放。查等三人获释后，朝廷以其三家首举有功，遂将庄、朱二家之家产，一半给告发人吴之荣，一半分给查、陆、范三家，陆圻不受，于是尽归查、范及吴之荣。

吴之荣因首举有功，名利双收，不仅得朱佑明巨万之产业，还加官晋级，至右佥都御史，但于康熙三年夏，突患恶病而死。(一说康熙四年秋。见范韩《范氏记私史事》)

明史案致使遭祸者数十家，处死者七十余人，受牵连者近千人，是清代文字狱中一次较大的杀戮案。那么，庄氏所著《明史辑略》中究竟有哪些“狂悖”之话呢？据《明史辑略》传钞残本三册及陈寅清《榴龛随笔》所记，书中所谓悖逆忌讳文字，大概有以下几类：

(一) 对清皇室先祖不加尊称，直呼其名，是犯了大不敬之罪。

(二) 贬低和歪曲清太祖努尔哈赤对明起兵一事，并将清之兴起说成“滋患”和“贼”、“夷”等。

(三) 对明清交战态度，站在明朝一边，维护明朝。

(四) 不书写清朝年号，而以南明政权为正朔。

那么，清朝统治者为什么把此案搞得这么重，以至连抄写书稿、刻字工匠、校勘装订及卖书者都难逃一死呢？这是满清贵族入关后为在中原站稳脚跟而采取的残酷手段。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自然遭到比汉族改朝换代后更强烈的反抗，其入关后采取的民族高压政策又加剧了这种民族对立情绪。江南是汉族知

识分子集中地区，他们奉南明小朝廷为正朔，对刚刚入关的满清统治者持有强烈的不满和蔑视，他们有人隐匿山林，有人削发为僧，同时，士子社盟活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士子集社结盟，无疑对清统治者是一大威胁。顺治十七年颁布的严禁盟令，即是对汉族士子的一种警告。庄氏史案一出，清廷即抓住这一机会，对江南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借以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思念故国之情，教训他们不要藐视当朝，以达到巩固清初政权的目的。

庄氏史案，牵连之广，前所未有，它开创了有清一代文化禁锢思想之先例，对清代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造成很坏的影响。

（杨丽英）

参考资料：

顾炎武：《亭林文集》。

节庵：《庄氏史案本末》。

张书才、杜景华主编：《清代文字狱》，1991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康熙博学鸿词科

清入关后，即以野蛮的战争手段，一路征服，统一全国，同时实行剃发、圈地、逃人、迁海、俘卖人口等民族高压政策，致使清初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康熙继位之后，南明桂王政权最后覆灭，清统一局面开始形成。深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的康熙皇帝，深知单凭武力不能使统一局面持久，必须争取民心，于是逐步修订"逃人"、"圈地"、"投充"等含有民族压迫内容的政策、法令，藉以缓和民族矛盾。康熙四年到六年，废除窝主刺字之例，并减轻对窝主及邻右的处罚。康熙十一年，撤销督捕衙门，地方各省有关逃人案件，除宁古塔仍听该将军审理之外，其它各省均由王公、将军移交各省督抚审理。圈地是清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而采取的野蛮手段，许多民人土地被圈，生活无着，社会生产力亦遭到严重破坏，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修订"逃人法"，停止圈地，使顺治年间一度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渐趋缓和。

康熙初年，清统治者基本上在全国实行了有效控制，清朝政权渐趋稳固。但在汉族士大夫集中的江南地区，反满思想依然严重。顺治初年，清军下江南时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江南人民极为反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依然在人们心中萦绕；且南明小朝廷覆灭不久，许多明朝遗臣依然存在，他们时时要恢复朱姓天下。康熙十二年，清廷分封的三位汉人藩王已经发展成为严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吴三桂打出"反

清复明”的旗号，在感情上赢得不少明朝遗臣和汉族士庶的同情和支持；大批封疆大吏和统兵大将均倒戈相向，河北总兵蔡禄起而谋叛，危及京师；京师的杨起隆也诈称朱三太子，以图起事反清。在这种情况下，康熙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进一步争取、分化汉族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缓和满汉之间的深刻矛盾，从根本上削弱和平息各种叛乱。

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的核心，且在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很高的地位。康熙自幼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对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深知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儒家思想。康熙八年，他亲率诸王、百官拜谒孔子，由大成门步行至孔子牌位前，行二跪六叩头礼。康熙祀孔，目的是在于利用孔孟之道，团结广大汉族官员，加强统治。为了以儒家思想教育全国臣民，康熙九年十月初九，颁布《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康熙尊孔、宣布以儒学治国决心，在当时对于联络广大汉族官员的感情，缓和民族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康熙十五年，平定“三藩”的战争发生重大转机，清廷在陕西、广东、江西等战场相继获胜，各路大军齐集湖南，围歼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臣复国梦最后破灭。为进一步笼络汉族地主和明朝遗臣，康熙十七年，宣布特开博学鸿词科，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皇帝亲试录取。

“博学鸿词科”是康熙皇帝在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新创立的特别科目，是依据唐玄宗时期的“博学宏词科”发展而来。我国古代科举制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汉代，荐举和考试相结合，设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文学异等诸科，由丞相、列候、州郡推荐，皇帝亲试录取。到了隋唐之际，科目渐

多。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设进士，“凭文取人，专主章句”，是考试科目中最难的一种。至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又创博学宏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弟者中挑选学问渊溥、文辞清丽的秀士，要求极高，考取更难，因而未能普及推广。元明时期，仍以进士科为主，并专以八股文章。清顺治二年（1645年），浙江总督张存仁首先向福临献策，开科取士，以使从逆之念自息。顺治三年首次举行会试，使清朝科举成为定例。但八股取士，对于热衷于功名的年轻士子固然适宜，而对于那些怀念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节之士则未必合适。因此，康熙皇帝决定一方面沿袭旧制网络汉族士子，另一方而采取汉代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笼络名节之士遵从儒家思想，从感情上消弭汉族士子与满清贵族的矛盾，使之为清朝统治者服务。

经各地荐举，提名一百七十余人，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人，皆在被荐之列。应试人员陆续到京后，康熙以冬日寒冷，难于属文为由，决定将考期推至明年三月天气渐暖之时，并给予各地士子以优厚的待遇：令户部从十一月起，每人每月给奉银三两，米三斗，以使研练词赋，无饥寒之虑。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与试者齐集体仁阁就试。大学士捧试题出。试题为“璇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为示隆重，皇上特命赐宴，令大学士、掌院学士满汉各二员陪宴。宴毕赐茶，复就试。次日，康熙携卷至霸州（今河北霸县）亲阅，然后交阅卷官李霨、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商议录取人员。最后取中一等彭孙遹等十二名，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入选的博学鸿儒，从优俱以翰林任用，根据情况，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命与右庶子卢琦等十六人一起纂修明史，以原任翰林院学士徐元文为监修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文蔼、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讲张玉书为总裁官，开局于东华门外。

康熙创办博学鸿词科，进一步争取了汉族士大夫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的合作，削弱了反清力量，赢得了全国政局的日益稳定。明清之际，江浙一带既是用兵的重点地区，又是反满之士的荟萃之地，因而博学鸿词科特别注意该地区。据统计，江南与荐者五十八人，浙江与荐者四十七人，两者合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① 经过应试，他们大多与清王朝发生了直接联系，逐渐与清朝统治者走到了一起。另外，清政府以博鸿科录取人员纂修明史，树立了清朝政府的正统地位，削弱了汉人反满的思想意识。当年，庄廷珑私刊明书，流露反满意识被杀，株连甚众，造成轰动一时的明史案。现在官修明史，消除了民间借修明史进行反清活动的种种借口，使人民承认清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因而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14、卷130、卷71、卷80。

李富孙：《鹤征录》。

《清史稿·圣祖本记》。

① 参见张宪文《清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

三藩之乱

清圣祖康熙初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拥兵自重，权势日张，已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严重危害国家的统一。因此，康熙亲政后，把处置“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满族贵族入关前，即以高爵厚禄招降汉族将领，为其统一中原服务。孔有德、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尚可喜原为明总兵毛文龙部下。清太宗天聪二年（1628 年）六月，明蓟辽总兵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东江大乱，孔、耿、尚辗转流徙，于天聪七、八年投降后金（清），皇太极授以高官厚禄，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率兵驻辽阳，号“天佑兵”，尚可喜为总兵官，率部驻海州（今辽宁海城），号“天助兵”。崇德元年（1636 年）六月，皇太极改国号清，即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三位汉人藩王。

吴三桂，江苏高邮人，明朝原任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吴襄因罪下狱，吴三桂晋升为总兵官，率兵驻守宁远（辽宁兴城），为明廷所依重。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兵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师危机，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吴三桂行动迟缓，清朝多尔衮以晋封藩王引诱吴三桂投降清朝。同年四月，清吴联军大败李自成，多尔衮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至此，清廷已封汉人藩王达四名。

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清廷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令其率兵二万征广西；改封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令各率兵一万征广东。不久，耿仲明因隐匿逃人惧罪自杀，其子耿继茂，袭封王爵。年底孔有德占据桂林。顺治七年冬，尚可喜攻克广州，南明桂王出走梧州。时大西军余部李定国与桂王合作，进攻四川，吴三桂奉清廷之命进剿。吴军势力较强，李定国不敌转而争夺广西，顺治九年七月攻克桂林，孔有德阵亡，子亦被害，爵除，四藩成为三藩。顺治帝为协调西南五省力量，于十四年部署三路进兵贵州。顺治十五年正月，攻克贵州，三路大军乘胜进取云南。顺治十六年正月，南明永历帝败走永昌府（今云南保山），两广、云贵基本平定。同年三月，顺治帝根据洪承畴建议，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驻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驻镇四川。但自三藩分镇以来，各镇依仗重兵，权势日张，与清廷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

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二省一切军政大事，中央各部不得掣肘，他还委派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称为“西选”之官，收揽党羽，遍置私人，成为严重的地方割据势力。耿、尚二藩虽不如吴三桂跋扈，然亦擅置官吏，垄断地方大权，各为一方之患。同时三藩各拥重兵，军事力量较为强大。耿、尚两藩所属各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各六七千，各自拥有两万兵力；吴三桂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营兵一万二千，超过耿、尚兵力总和，致使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且三藩各自把持地方财源，赋税不上交中央。吴三桂在云南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招徕商旅，资以藩本，财政收支户部不能过问。耿、尚二藩于顺治七年（1650）攻占广州后，同驻一城，广州深受其害。他们创设总店，征收苛捐杂税，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他们还垄断对外贸易，私造大船，擅自出洋为市，所获利润全部归为私有。

顺治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反映耿、尚二藩肆虐广东，要求移一藩于他省，以缓广东之疲困。他虽然从“两藩并镇”角度提出问题，但也反映了藩镇与中央的矛盾。吏部议复此疏时认为藩王累商害民，请旨饬禁。顺治帝遂将耿藩撤走，改驻福建。但三藩与中央的矛盾并未解决，顺治十八年以后，三藩更加肆虐，清廷与三藩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康熙继位之后，中央即开始逐步削减三藩的权势，作撤藩的准备。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收缴吴三桂大将军印。按清制规定，大将军权势颇重，系临时性差遣，事毕即解除职务，将印交回。可吴三桂驻镇云南数载，拒而不缴。清廷遣内大臣往谕京师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要求其父归还大将军印，吴应熊将朝廷之意转达给吴三桂，吴三桂不得已将印交回，心中怏怏不快。

康熙四年，裁撤云南绿旗兵五千。六年又采取左都御史王熙建议裁撤云、贵、闽、广兵饷百余万并逐步解除藩王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与职务。六年五月，吴三桂以目疾请辞云贵两省事务，清廷立即批准，决定将该藩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省督抚管理；大小文官也照各省例，由吏部题授，藩王下属人员不得出任督抚 。

康熙十年，南明遗臣查如龙上血书于吴三桂，煽动吴三桂出兵以临中原，事泄被杀，清廷对吴三桂疑惧日深，撤藩势在必行，只等有利时机。

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年届七十，请求归老辽东，同时请令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继镇广东。康熙见撤藩时机已到，便以广东已经平定为由，准尚可喜全藩撤离，所属官兵仍留广州府，令广东提督管辖。康熙决定撤藩，对吴、耿二藩震动很大。他们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提出撤藩申请，意在试探朝廷态度。康熙命议政王大臣商议，大学士索额图以兵丁往返，民驿苦累为由，主张吴三桂继镇云南，实则怕吴三桂反叛朝廷。康熙斟酌再

三，认为吴三桂蓄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坚持三藩并撤。同年八月，康熙分别派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吴三桂见永镇云南的幻想已破灭，遂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台湾郑经，相约武力反清。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藩下属兵，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冠，标榜兴复明室，起兵反清。并命马保等率军由贵州进湖广，王屏藩等率军由四川进窥陕西。吴三桂发动叛乱，本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矛盾激化的结果，但自清兵入关以来，西南地区南明遗留势力还没有肃清，民族矛盾还比较尖锐，吴三桂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客观上利用了这种情绪。因此，吴三桂发难后，来势甚猛，滇、黔、湘、蜀等省纷纷响应。

吴三桂反叛消息传来，举朝震恐。大学士索额图力主将提议撤藩者正法，康熙力排众议，决定出兵平叛。在平叛过程中，康熙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命前锋都统硕岱率清军兼程前往荆州，进驻常德以遏叛军。时叛军已进湖南，荆州震恐，康熙又派三路大军日夜兼程，赶往荆州。荆州位居天下之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派重兵驻守，遏制叛军北进之路，是稳定战局的重大决策。为了能使援兵及时赶到，康熙又在山东兖州、山西太原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兵力，秣马以待。同时康熙帝以兖州支援湖广太远，又于距潼关、郧襄皆近的河南府设立新的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率兵驻守，所在有警，俱可策应。其次，在心理上、政治上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下令停撤耿、尚二藩以孤立吴三桂；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颁布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武力平叛的决心。在加强荆襄防务的同时，部署增兵陕西，这样在陕南、荆襄一带与敌处于相

持状态。

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受吴三桂煽动，据福建反叛。江西地处福建、湖南夹攻之中，局势吃紧，江西是广东的唯一通道，江西吃紧，会进一步危急广东。清廷命安南将军额附华善守京口(今江苏丹徒)，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扬威将军阿密达镇江宁(今南京)，平南将军都统赖塔去杭州，平寇将军根特巴鲁援广东，镇东将军喇哈达驻江南以保护东南财赋重地，防止吴、耿会师江西。为了进一步从心理上压倒吴三桂，康熙决定于四月十三日，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处绞，以激励三军之心。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于岳州、浙江、四川、江南、广州各路增派大将军。至此，清廷先后派出六名大将军，其中有三名大将军在江浙一线，而且全是亲王。争夺江西、浙江、江南是当时矛盾的焦点，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讨吴阵容大为改观，大大提高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并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陕西绿旗兵提督王辅臣因康熙派往陕西的莫洛怀疑、歧视绿营兵①，尽调王辅臣良马他往派用，引起王辅臣不满，借口马羸缺饷，举行叛乱，莫洛中鸟枪死，吴三桂急送犒师银二十万两，并授王辅臣平远大将军及陕西东路总管印各一枚。王辅臣代吴三桂散发逆书、伪札，陕甘处于危急之中。此时京师已无兵可调。

康熙十四年二月，甘肃巡抚华善上疏要求加大甘肃提督张勇权力，以绿营兵扭转危局。清朝绿营兵，地位低下，待遇微薄；作战时担负最危险的任务，而功劳往往被埋没、窃夺；人员、马匹被任意征调，有时还受到无端的猜疑。王辅臣叛乱就是因为经

① 康熙十三年二月，康熙以刑部尚书莫洛为陕西经略，加武英殿大学士，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主持军务，莫洛怀疑歧视绿营兵，与王辅臣关系极为紧张。

略莫洛怀疑、歧视而起。为了提高绿营兵的积极性，康熙采纳华善建议，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委以收复甘肃全省重任，总督不得节制，镇将各官悉听调遣。张勇亲自率兵进取巩昌（陇西），是为南路；手下王进宝领兵攻兰州，为西路；陈福自宁夏南下，是为北路；康熙又派大将军贝勒董额进兵秦川（今甘肃天水），是为东路，形成对王辅臣四面包围之势。康熙令绿营官兵自成一军，独立作战，或以独立、平等地位与满军联合作战，使绿营官兵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仅用五个月时间，就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三边渐趋稳定，王辅臣盘踞平凉。

康熙十五年正月，郑经部将刘进忠、刘国轩统水陆诸军，攻取广东东部诸县，一直打到惠州府，吴三桂也派遣马雄、郭义率部攻广西。尚可喜老病不能主事，兵马军务交与长子尚之信管理，两广局势渐趋紧张。如果广东失守，必会加重江西军事压力，因此康熙急欲解决陕西问题以抽调兵力支援江西、湖广。二月初十，任命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率军急赴陕西，速靖地方。五月，图海于平凉城北虎山墩击败王辅臣，派参议道周昌入城招抚，王辅臣投降。康熙重用绿营兵，稳定了西北局势，使清廷能分出兵力增援江南，是平定三藩之乱的重要措施。

康熙十五年二月，尚可喜卧病，其子尚之信决意投降吴三桂，发兵往围尚可喜住处，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称号，易服改帜，反叛清朝。康熙认为，尚之信内部矛盾重重，实力不强，吴三桂对他只是利用而已，不会真正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广东自会以福建为榜样。于是康熙皇帝加紧招抚耿精忠。早在耿精忠叛乱不久，康熙即遣工部郎中传谕耿精忠，如能革心投诚，则视之如初。时郑经乘机返回大陆，占据耿精忠后方，清廷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默许郑经行为，到十五年六月，郑经已占据漳州、泉州等七府，耿郑矛盾尖锐。耿军内部军饷匮乏，人心浮动，耿精忠被迫后撤建昌府新城（今江西黎川）等

地。清军乘机于八月攻占仙霞岭，进占浦城县，平闽大局已定。九月，清军收复建宁（今福建建瓯）、延平（今福建南平）等府，耿氏无力再战，遣子耿显祚迎清军入福州。十月初四，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将郑经赶出泉州。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福建问题直接影响广东。十月，尚可喜去世，广东地方官员纷纷抵制尚之信叛乱行为。耿精忠降清，对尚之信触动很大，吴三桂虽封尚之信以亲王称号，其实并不相信他，而另以总督董重民、巡抚冯甦分守要冲。在这种情况下，尚之信主动派人持密书至清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十二月九日，康熙降旨赦免其罪。康熙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镇南将军莽依图兵抵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尚之信于五月初四率省城官员及兵民等剃发投降，康熙令其袭封平南亲王。到康熙十六年五月，陕西、福建、广东相继平定，清廷开始转入反攻。

康熙十六年，清廷任命穆占佩征南将军印，出征湖南。吴三桂为摆脱湖南三面被围困境，于四月率众前往衡州，派将七人率兵三万至湖南南部宜章，以进犯广东乐昌；并分兵侵犯江西南安州（大余），图谋两粤。康熙十七年初，穆占连克郴州、桂阳，召降桂东、兴宁、宜章、临武、永兴等城，粉碎了吴三桂进犯广东的企图。闰三月，康熙决定乘贼之虚进攻岳州，以断长沙、衡州之道。吴三桂丧失主动，形势日绌，匆匆称帝于衡州，聊以自慰。八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立，部下涣散，军心动摇。康熙利用时机，命水陆夹击，速取岳州。至康熙十八年，湖南大局已定，吴世璠败退昆明。

康熙十八年四月，宁夏提督赵良栋上疏要求进兵四川。十月，康熙降旨进兵，命将军张勇、王进宝，提督赵良栋、孙思克各率所属绿旗兵平定汉中、兴安，收复四川。三个月后，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康熙十九年三月，赵良栋以云贵总督身分提出

以湖广、广西、四川三路进兵云贵方案，定期八月中，各路齐进，直捣云南。到康熙二十年九月，广西、贵州、四川三路进滇之势已成。康熙二十年底，赵良栋率部攻下昆明城，吴世璠自杀。至此，前后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康熙又先后撤除耿、尚二藩称号，将尚之信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分入上三旗，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其三总兵旗下兵丁，裁一留二，亦令新设将军管辖；又将尚之隆、尚之孝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佐领，隶汉军镶黄旗下。对于耿精忠，康熙采取谨慎态度。早在十六年，就有人上疏首告耿精忠归顺之后仍蓄反叛，康熙为稳定大局，留疏不发。十九年，康熙帝借机削夺耿氏兵权，授耿藩所属都统马九玉为福建将军，统福州府靖南藩下官兵。康熙二十年九月，平叛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将耿氏家口编为五佐领，连同耿昭忠、耿聚忠，一并归入汉军正黄旗下。次年正月，以逆党之罪将耿精忠磔刑处死。平定云南之后，康熙为消除隐患，令将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耿精忠、尚之信属下撤回京师，重新安置。

八年平叛战争，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斗争，是中央政权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在平叛过程中，康熙采取了周密而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正确；为了及时了解前方情况，特设专门通讯机构，命兵部于原有的驿站之外，特设笔帖式[①]驰报军情，每四百里设笔贴式一员，拔什库一名，担任直接汇报军情工作，每昼夜可行千余里，发挥了使用畜力交通的最高效能。另外，提高绿营兵地位，重用汉人兵将，也是取得平叛战争胜利的重要措施。如果没有汉兵参加，平定三藩是不可能的。相反，吴三桂虽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但由于他与其他藩王对境内人民

---

① 康熙十三年（1674 年）三月，为及时了解前方军情而设立的通讯机构，以速邮传，诘奸宄，防诈伪。

残酷剥削和压迫遭到人民反对，吴三桂迎清兵入关即遭痛恨，现在又出尔反尔，自然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军纪败坏，终至失败。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是清朝前期的重大事件。三藩平定，康熙将选任官吏大权收归中央，划一军队编制，原来各自独立的吴、耿、尚、孔等部队，除吴部调往边区服役外，其他均编入八旗，同时于荆州、福州、广州增设八旗驻防，广西、云南派用绿营镇守。清朝中央统治的权力得以集中和加强，标志着清统一的最后确立。另外，将三藩财产没收归官，充作军饷，清除滇、粤、闽等地方积弊，为清朝整顿边区，巩固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42至卷81。

《圣武记·康熙勘定三藩记》。

《逆臣传·吴三桂传》。

统一台湾

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 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自己亲自率军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是为中国历史上一大事件。但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被清朝政府视为东南沿海的一大隐患。

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 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其弟郑世袭暂时协理政事，欲承兄位。世子[①] 郑经获知消息于厦门继立，从此叔侄二人势同水火，诸将互相猜疑，人心动摇。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乘机遣总兵林忠前往厦门招抚郑经。郑经见其叔父已踞台湾，便借招抚为由，命郑泰、洪旭等与清谈判，待机而动。

康熙二年（1663 年）五月，台湾内变平息，郑经请按琉球、朝鲜之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拒绝招抚，和谈失败。六月，郑经计杀郑泰，郑泰之弟率众降清。十月，清军三路攻克厦门、金门，郑经退守铜山，清廷再行招抚，各镇纷纷离叛。

康熙三年（1664 年）三月，清兵进攻铜山，黄廷、余宽率兵众三万二千余人出降，郑经仅存战舰数十艘，乘风遁走台湾。七月，清廷收复铜山，欲乘胜攻取台湾，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以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师左都督杨富为副，以左都督林顺、何义为佐，统领水师，前往征剿。施琅原为明总

① 世子，为王位承袭者未继承王位前的封号。

兵部下左冲锋，清世祖顺治三年（1644年）降清，参与平定广东之役，因坚决不从郑成功抗清，其父、弟、侄均被郑成功斩杀。

康熙三年十一月、四年三月和四月，施琅、周全斌等三次向台湾进发，都因准备不足且遭台风袭击而未果。但这是清廷第一次出兵台湾，主要将领均由投诚人员担任，并无荷兰人参加。郑成功逝世后，荷兰欲借郑氏内部混乱之机与清廷联合消灭郑氏，重返台湾，并取得与中国自由贸易之特权。为此，以支援大清国为名，于康熙元年、二年派舰队驶抵福建沿海，清、荷联军攻克金门、厦门之后，双方产生严重分歧。清廷欲邀荷船助剿铜山，而荷却主张立即进取台湾，以占据该地。康熙看出荷欲取台湾的野心，指示不必专候荷兰舟师，从此，清荷双方不再合作。

康熙六年五月，清廷派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璋，携带郑经舅父亲笔书信航海过台，招抚郑经，提出以沿海地方与台湾通商，郑氏称臣纳贡，并遣子入京为质等条件。郑经厚待孔元璋，但以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指郑成功）在时，亦反对剃发为借口，要求清朝按照朝鲜事例，以外国之礼相待，欲于版图之外另立乾坤。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对郑经态度极为不满，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疏要求乘便进取，杜绝后患。康熙七年正月，康熙降旨召施琅进京，奏明所见，以便定夺。四月，施琅进京陛见，上《尽陈所见疏》，就选练士兵、筹集船饷、前线指挥、攻战机宜及武力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全面提出看法和主张。但自清、郑开战以来，五省迁界，大量驻军，连年征战，东南地区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积怨日深。自郑经东渡，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止，人民恢复迁界，裁撤驻军的要求日益强烈，且清廷唯愿和平统一台湾，于是否决了施琅建议，裁撤军队。授施琅为内大臣，编入汉军黄旗，留于京师。

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议处鳌拜后，康熙帝命刑部尚

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入闽，与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齐集泉州府，商议招抚台湾办法，随后派太常寺卿慕天颜、都督佥事李佺携带康熙诏书及明珠信件，再行台湾，招抚郑经。郑经礼待二使，但不肯接诏，仍坚持按朝鲜例入贡，不剃发，不登岸。康熙获悉郑经态度，八月晓谕明珠：若郑经遵制剃发归顺，加以爵禄封赏，且可居住台湾，自行处理政事。至此，清、郑会谈已达四次。郑经以先王（郑成功）为借口，要求按朝鲜例，其实，他们父子对朝鲜例的理解并不一致，郑成功所指朝鲜例，是承认自己为清人，奉清朝正朔，文官听部选，且待奉旨命下，安心剃发，为清朝之臣属。只不过要求一定之地盘，保持原有体制和军队，这和康熙晓谕明珠意图基本相同。而郑经却坚持以外国之礼相待，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此，清、郑双方很难达成协议。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初起，郑经乘机返回闽南，窜扰大陆，闽南为"三藩"之一耿精忠的后方，康熙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之策，镇压耿氏，招抚郑氏，郑经势力迅速发展，两三年间竟占有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其中五府都属于耿精忠。耿氏被迫于康熙十五年十月接受招抚，再度降清。康熙令其随大军征剿海逆，图功赎罪，数月之间收复全闽，郑经退守厦门。清、郑再次开始对话。

康熙十六年（1677 年）四月，和硕康亲王杰书修书一封，派佥事道朱麟、庄庆祚前往厦门招抚。郑经一如既往，且出言狂谬，康亲王遂饬府县取办船料，修整战船，以便进剿。此时，漳州人蔡寅诈称"朱三太子"，兵至数万，屡败清军，声势日盛，康亲王遂于十六年秋复遣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各加卿衔，会泉州乡绅黄志美、监生吴公鸿，再赴厦门谈判，重申康熙八年条件，令其退回台湾，让回各岛，息兵安民。郑氏自恃势力增长，除坚持以往条件外，又提出沿海诸岛由郑占据，军队

钱饷由福建供应等条件。康熙见郑经实无降意，谕康亲王注意招抚郑经下属官兵群众。

康熙十七年春，郑经为给清朝施加压力，争取有利地位，派骁将刘国轩连败清兵，进围海澄。清军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腐懦无才，五月初十被罢免。经康亲王举荐，升擢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姚启圣，字熙之，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附族人籍隶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中举，授广东香山知县，不久因事革职。"三藩"叛后，投康亲王军前，屡献奇谋，甚得器重。升任福建总督后，贯彻康熙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政策，保护郑氏官兵族属；厚待投诚人员，于漳州特设修来馆，做到官有俸，兵有饷，归农者有土地，受到郑军官兵欢迎，纷纷来降。从六月至十一月，投诚官兵达一万二千八百多名。

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廷恢复福建水师，调镇江将军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做武力攻取台湾的准备。王之鼎以未经水战，海岛不熟，恐负朝廷为由乞休。四月，清廷调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到任后，积极筹备攻取金、厦。此时，郑军官兵水陆数万，据地狭窄，军饷不继，且一再收到清廷劝降书，人心浮动，至康熙十九年二月，万正色进攻金、厦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郑经从海澄调回刘国轩，一同逃回台湾，留守金、厦的郑军纷纷降清。三月初，清军进驻金、厦，四月收复铜山。此时，"三藩"问题基本解决，进取台湾已提到日程。但长期征战，兵民疲惫，需休养生息，减轻负担，于是康熙决定裁撤部分军队，暂停进兵台湾，等待时机。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郑经去世，冯锡范杀监国郑克壓，拥立其婿郑克塽，借机篡夺大权。刘国轩与之勾结，恃威妄杀致使台湾人心惶惑无定，政局更加不稳。五月十九日，姚启圣上疏要求乘机直捣巢穴。康熙遂于六月初七召集大学士会议，宣布武力征剿台湾，重新启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同福建总督姚

启圣统辖全省兵马，进取澎湖、台湾。但施、姚二人作战意见不和。施琅主张利用南风，一人专征，联艅进发，先打澎湖，扼其咽喉；姚启圣则主张利用北风，分艅攻击，同时进军台湾、澎湖，总督、提督各领一路。二人意见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严重影响进兵。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施琅上《决计进剿疏》，请求皇帝授于专征之权。康熙经过与群臣反复商议，授于施琅专征大权，令姚启圣负责催趱粮饷，保证军需供应。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郑克塽致书清政府，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不剃发，登岸。鉴于郑方顽固不化，六月十六日，施琅奉命督师齐集澎湖，经过充分准备，二十二日，清、郑双方在澎湖展开战斗。清军采取"五梅花"战术，随征都督陈蟒、魏明领船五十只，东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随征总兵董义、康同玉领船五十只，西指牛心湾为疑兵牵制；施琅亲率大船五十六只居中，分为八队，每队七只，各作三叠，为主攻队伍；尚余船八十余只，分二大股，留为后援。此次战役，成果辉煌，全歼郑军主力，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上表请降。当年八月，施琅进驻台湾受降，从此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

纵观台湾统一过程，与清廷实行正确的招抚政策分不开，康熙二十年以前以抚为主，二十年以后以剿为主，但在剿中也注意抚的运用。在全歼郑军主力后，姚启圣主张乘胜直捣台湾，也有人督促施琅乘郑氏败残之余急于扑灭，以血前恨。施琅表示：为国为民，不计私怨，彼若能归，当力疏奏赦其罪。因此，康熙的知人善任，施琅军事策略和政治攻势的正确，也是台湾顺利统一的重要因素。

台湾统一之后，清廷内部就台湾问题发生弃留之争，内阁学士李光地借口远隔重洋之险，一旦濒海有警，就会发生新的分裂局面，因此主张放弃台湾，将台湾交复荷兰管理。施琅亲至台

湾，经过实地调查，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备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指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则永固边圉。康熙广泛征求议政王、大学士等人的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敕谕在台湾建立地方行政机构。

台湾设治，始于宋、元，但治理机构都设在澎湖。康熙在台湾本岛建立的府县，以郑氏政权建立的府县为基础。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曾建立承天一府及天兴、万年二县，郑经时又改为东宁府，升二县为州，设南、北路及澎湖三安抚司。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改东宁府为台湾府，于南路设凤山县，于北路设诸罗县，于府治设台湾县，澎湖归府直辖，使台湾地方政权的建置逐渐完备。台湾府县的文职官员，清政府准福建督抚于本省现任官内拣选，奏请皇帝批准调补，三年任满，工作称职，即予优升。另外，还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分为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分为二营。每营各设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官，与内地编制相同。康熙帝亲自选任正黄旗参领杨文魁为第一任台湾总兵官。台湾建置，派置重兵，实行与内地大体相同的政策，使边防力量大为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台湾问题解决后，为使原内迁的居民恢复田产，安居乐业，沿海各省展界开海势在必行。

早在顺治十八年，清廷为割断郑氏与大陆的联系，使其失去接济，分别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并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迁界禁海是清廷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防御措施。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姚启圣上疏皇帝要求恢复沿海五省迁界，因台湾问题尚未处理完，故未准行。两月之后，两广总督吴兴祚再次上疏，要求广州七府沿海地亩招民垦种。康熙准行，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勘福建、广东海界，工部

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海界，于第二年五月展界完毕。

展界与开海禁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要求展界，目的不仅在于恢复原来田产，还在于恢复出海捕鱼，发展海外贸易等正常的经济活动。因此，沿海各省要求开海禁的呼声很高，其中浙江要求开放海禁最为积极。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工部侍郎金世鉴上疏要求浙江沿海地方，允许人民载货出洋贸易，康熙准行。展界开海之后，中国赴日本船舶数量迅速增长。据统计，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四艘，二十四年增到八十五艘，二十五年又上升为一百零二艘，二十六年为一一五艘，二十七年为一九四艘。四年之间，增长七倍。

台湾建制与展界开海，使台湾从此处于统一的全国政权统辖之下，维护了领土完整，巩固了祖国统一，使东南地区得到安宁，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
《台湾外纪》卷6。
《圣武记》卷8。
《清史稿》卷33。
《台湾研究集刊》。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尼布楚条约》之签定

十六世纪以前，俄国还是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才开始越过乌拉尔山东进，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一路征服，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侵占勒拿河流域，建立雅库次克城。从此，俄国才与中国相邻。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后来成为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两个主要据点。崇祯十六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遣波雅科夫等人，沿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中俄边界问题从此产生。

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满族人的祖先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即向西周贡“楛矢石砮”，建立了政治联系。汉朝时，肃慎又名挹娄，臣属于汉属国夫余，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东到海岸，都是挹娄的分布地区。北魏时，肃慎演变为勿吉，据《魏书》记载，从公元471年到550年，勿吉年年向北魏、东魏朝贡不绝。到了隋朝，勿吉被称为靺鞨，其著名首领度地稽率领千余家移居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县），隋炀帝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唐朝时，中央政府开始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建立行政管辖机构。当时靺鞨分为黑水、粟末两大部，唐朝政府即在黑水部设立黑水都督府，在粟末部设立渤海都督府。以后，辽、金、元等朝都对这一地区行使主权。明朝兴起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管理。从1403年到1409年，明

朝政府继续在松花江、嫩江、鄂嫩江、黑龙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京海河、乌弟河和乌苏里江流域，先后设置了130个卫。由于奴儿干地位重要，明朝政府下令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检事，指挥机构就设在离黑龙江入海口不远的特林。明朝中央政府还派太监亦失哈等先后十次视察该地，并在永宁寺竖立永乐、宣德两座石碑，记载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行使管辖权的情况。

明朝末年，后金、清政权崛起于东北，经过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两代经营，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各族先后归附，并向后金、清朝缴纳贡赋。索伦、萨哈尔察、虎尔哈、使鹿部、使犬部等，每年都要缴纳貂、狐、猞猁、海豹、水獭等毛皮，其中貂皮是最重要的一项。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居民，后金、清政权或将之编入八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或将之编为户籍，以村屯或氏族为单位，设姓长（族长）、乡长，分户管辖。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后，外兴安岭以南的整个东北地区，便由盛京总管统辖。顺治三年，改总管为昂邦章京。顺治十年，清政府把盛京昂邦章京所辖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和尼布楚等地，划为单独的行政区，在原设的宁古塔副都统之上，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

明崇祯末年，沙俄派遣波雅科夫等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遭到我国达斡尔族人民的顽强抵抗，但沙俄殖民者并不死心。继波雅科夫之后，顺治七年（1650年），又以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为首，再次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这年年初，沙俄哈巴罗夫部侵入鄂尔河口我国达斡尔族首领拉夫凯管辖区，因兵力少，不敢深入，于四月返回雅库次克。六月得到增援后，再次侵入达斡尔族住区。秋天，攻占达斡族首领阿尔巴札住地雅克萨。顺治八年，继续在黑龙江流域侵扰，六、七月间侵占瑷珲旧域，屠杀我

达斡尔族人民多人。顺治九年（1652 年）哈巴罗夫部沿黑龙江侵入我朱舍里族和赫哲族住区，大肆烧杀抢掠。赫哲人和朱舍里人坚决抵抗，并向清朝驻宁古塔军队求援。四月三日，清宁古塔章京海色在当地人民配合下，率军六百人与沙俄入侵者在乌扎拉村激战，由于指挥失误，先胜后败。哈巴罗夫部也受到严重打击，向黑龙江上游撤退。

顺治十一年初，沙俄叶尼塞斯克督军巴什科夫派兵侵入我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占领尼布楚，在当地蒙古人、索伦人反抗下，被迫撤离，窜往黑龙江中游，与斯捷潘诺夫会合，继续侵扰我黑龙江流域。顺治十二年，清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率军与斯捷潘诺夫大战于黑龙江流域的呼玛城堡，数败侵略军，但后来由于粮饷供应困难被迫班师撤兵。顺治十五年，斯捷潘诺夫再率五百人沿松花江而上，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分乘船四十七艘，于松花江和牡丹江合流处包围俄军，击毙斯捷潘诺夫。同年，巴什科夫派军重占尼布楚。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和清朝驻军英勇奋战，于顺治十七年全歼斯捷潘诺夫残部，将沙俄侵略势力赶出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但上游尼布楚仍被俄军侵占。清圣祖康熙继位之后，沙俄继续向我东北地区窜扰，康熙四年（1665 年）南下侵扰喀尔喀蒙古，东进再次窜犯雅克萨。俄军改变以往战略，建立据点，逐步推进。他们以据点为掩护，不断抢掠我国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各族人口和财物。中国军民虽然奋力抗击，但终未能阻止沙俄侵略活动。

康熙皇帝为彻底解决东北边疆问题，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编组新满洲，加强东北地区边防力量就是一项重要措施。新满洲与旧满洲相对而言，一般是指清兵进关后编入旗籍的东北少数民族部众。清朝在统一东北过程中，将东北地区各部落和各族人民编入旗籍，从而壮大了八旗力量。康熙沿用这一传统方式，编组新满洲。康熙十年，将居于珲春东部烟楚（岩杵）河以

东沿海一带的库雅拉人等移来，编为十二佐领；康熙十二年，又内迁赫哲人于宁古塔附近，编置四十佐领，号新满洲。到康熙十六年，由赫哲人和库雅拉人编组的新满洲共达七十八佐领。分布在：吉林与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四十佐领，盛京（今沈阳）十七佐领，锦州五佐领，广宁（今辽宁北镇）三佐领，义州（今辽宁义县）七佐领。另有六佐领入京为侍卫。

分布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和鄂伦春人，统称为索伦部，早在清入关前已分编佐领。顺治年间，因俄国人侵黑龙江流域，江北部分居民先后移居到嫩江地区。康熙初年对其重新编组，将鄂温克编为二十九佐领，达斡尔人中未编人佐领的一千一百余口共编组十一佐领，并设索伦副都统品级官员管辖。索伦人善于射猎，以貂皮向国家纳赋。满文称打猎为“布特哈”，故索伦副都统品级官员所辖后来也称“布特哈八旗”。到康熙十二年布特哈八旗已有四千五百二十四丁。康熙组建新满洲和布特哈八旗，给予房屋、土地、耕牛、种籽，令其屯田耕种，使各族人民从游牧渔猎进人安定的农业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东北边防力量得到极大地充实和加强。

康熙十二年，清朝内部发生了“三藩之乱”，沙俄乘机加紧武力扩张。康熙十五年，沙俄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倾巢出动，一路向东南精奇里江及其支流推进，一路向南，侵扰额尔古纳河一带。到康熙二十一年底，沙俄又在精奇里江一带建立了结雅斯克、西姆林斯克、多隆斯克伊等军事据点。康熙鉴于前朝教训，决心在黑龙江（瑷珲）建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自黑龙江到乌喇设置驿站，遇有警急，即令乘蒙古马疾驰飞报，且由水陆两道陆续运粮，积贮黑龙江，作好战争的一切准备。康熙二十二年，副都统萨布素率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人进驻额苏里，增派达斡尔兵力四五百与宁古塔所剩兵力五六百进驻瑷珲，两地共驻兵两千人，成为永戍黑龙江的主力。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清朝政府正

式派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首任，戍黑龙江，在黑龙江建立军事基地，驻兵屯田，制止了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为收复雅克萨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四年“三藩”平定，台湾统一，清廷利用有利时机，决定收复雅克萨。是年四月，清兵三千在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班达尔沙和黑龙江将军萨布索率领下，奉旨出发，分批开赴雅克萨。五月中下旬，兵临雅克萨城下，清军致书雅克萨俄国督军托尔布津，要求退还侵占地区。俄军自恃城防坚固，不肯归还，清军遂于五月二十五日全线出击，炮火齐发，开始攻城，击毙俄军百余人，俄军被迫投降。然而彭春等人收复雅克萨后，并未按康熙指示在雅克萨建立防御措施，而是将城堡一烧了之，雅克萨周围庄稼未割，哨所未立，即擅自移驻瑷珲、墨尔根等地。沙俄从莫斯科派来援军，于两月之后乘机重新盘踞雅克萨。

康熙二十五年五月，萨布素奉旨率所部两千人从瑷珲出发，再次攻打雅克萨。经数日激战，毙敌百余名，其中包括俄国督军托尔布津。俄军被迫撤回城内固守。萨布素于城周围筑垒挖壕，长期围困。到年底，俄军弹尽粮绝，八百多名俄军只剩一百五十余人，沙俄被迫接受停战谈判。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谈判在尼布楚正式开始，清朝以索额图为首，沙俄以戈洛文为首。行前，康熙谕示索额图：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游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于俄罗斯。谈判正式开始后，戈洛文企图强迫清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到海为界的要求。索额图申明清政府立场，指出沙俄侵略者必须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尼布楚和雅克萨一带必须归还中国。由于沙俄坚持侵略立场，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噶尔丹叛乱初起，为了及早达成协议，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噶尔丹问题，康熙再谕索额图：彼若恳求尼布楚，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清廷作出重大让步，表示尼布楚可以让给俄国。但俄方代

表仍不满足，致使谈判再度中断。此时，尼布楚附近大批喀尔喀人起义反对俄国，俄国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不敢再行拖延。双方经过频繁交涉，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689年9月7日）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到海，为两国东段边界，岭、河以南属中国，以北归俄国；两国商人持有证明者，可以往来贸易；沙俄从黑龙江地区撤军，中国让出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方。此条约是中俄双方平等协商，中方作出重大让步的结果。雅克萨之战是清政府被迫进行的自卫反击，在得胜的情况下，清朝并没有以武力逼签条约，而是主动提出谈判，且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主动让出尼布楚一带地方。谈判进行的方式，条约订立的程序都是经过双方认真商定的，丝毫未损伤沙俄主权。当时沙俄对此条约的结果非常满意，谈判代表戈洛文等还因此受到沙皇的嘉奖。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以法律条文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收回了被沙俄长期侵占的雅克萨等地，遏制了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东北边境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安宁。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祖实录》卷68。

《平定罗刹方略》卷1、卷2。

《清圣祖实录》卷22、卷50、卷112、卷121。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

《沙俄侵华史》第一卷。

三征噶尔丹

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之一部准噶尔部首领。康熙九年(1670 年)，噶尔丹乘准噶尔部内讧之机，从西藏赶回，杀侄囚叔，夺得该部领导权。康熙十六年，噶尔丹出兵攻灭和硕特部，自称博硕克图汗，胁迫厄鲁特各部听其指挥。康熙十七年，噶尔丹又攻取天山南路叶尔羌等回部各城，势力日渐强大，进而想利用漠北喀尔喀蒙古的内部矛盾，侵占其地，称霸北方。

漠北喀尔喀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的后裔。达延汗死后，诸子大都迁入内蒙，只有幼子留居故地，将其部众分为七旗，号喀尔喀，明末形成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部。崇德三年(1638 年)，三部分别向清政府上表称臣，献"九白之贡"，确定了臣属关系。同年，赛因诺颜部也遣使通贡，喀尔喀蒙古全部臣属于中央政府。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 年)，喀尔喀蒙古三汗及赛因诺颜部首领奉表遣子弟来朝，清廷在其地设八札萨克，分左右翼。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赛因诺颜部属左翼，札萨克图汗部属右翼。康熙元年(1662 年)右翼札萨克图汗与本部自相仇杀，战败身亡，部属大都投向左翼土谢图汗，从此，左右两翼因属民问题长期不和。噶尔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阴谋招降右翼，消灭左翼。康熙为避免喀尔喀蒙古分裂和自相残杀，建议双方会盟于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伯勒奇尔)，谕旨两翼和睦相处。噶尔丹借口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与达赖喇嘛使者会盟时礼数不恭，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悍然出兵入侵喀尔喀。沙俄

见时机已到,也从乌丁斯克出兵,与噶尔丹相呼应。喀尔喀蒙古受噶尔丹和沙俄侵略军夹攻,处境不利。时土谢图汗正率主力部队在北方与俄军作战。后方无力应付噶尔丹的突然袭击,顿时大乱,哲布尊丹巴遂要求南迁,投向清朝。九月,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率属下人汛界,请求清廷保护,以后又有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所属来归,清廷优纳,将喀尔喀部众分别安置在苏尼特、乌珠穆沁、乌喇特牧地游牧。

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以攻伐喀尔喀仇人为名,率军二万,沿索约尔济河南下,骚扰边境。清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拒兵,首战失利。噶尔丹气焰嚣张,进一步向内地深入。康熙帝命大臣议于朝,清廷中一些勋贵大臣认为蛮夷荒服,惟有驱逐防守而已,远劳师旅,未必能灭。康熙认为,噶尔丹借端内犯,志不在小,不大惩反为后害,且喀尔喀也不能长期借地游牧,于是决定下诏亲征,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副之,出喜峰口;内大臣舅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努、喇克达、彭春、阿席坦等参赞军务。七月六日,福全率清军主力从北京出发,准备阻击南下噶尔丹军,康熙也于七月十四日从北京出发,巡行边塞,拟亲临前线指挥,不料突患感冒,不得已暂且回銮,前线各路兵马听大将军调用。

噶尔丹气焰嚣张,骄横无比,于七月十五日向清廷宣战,并引兵内进,屯于西巴尔台(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河),此后逐步南下,于二十七日占据乌兰布通,仅距京师七百里。噶尔丹利用有利地形,布阵于山岗,依林阻水,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卒于垛隙间发矢铳,备钩钜,号曰"驼城"。八月一日,清军向乌兰布通推进,隔河仰攻,在清军攻击下,噶尔丹"驼城"被攻破,清军乘胜进击,大败叛军,噶尔丹乘夜遁去。噶尔丹遭到沉重打击后,实力大为削弱,于是遣使

请降，表示自此不敢再犯喀尔喀。但噶尔丹逃到科布多后，一面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一面派人去莫斯科，乞求沙皇俄国继续支持。康熙三十年，俄国托波尔斯克将军又派马特维、尤去科布多流域见噶尔丹，继续策动叛乱。[①] 康熙三十一年，噶尔丹属下杀害康熙派往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又多次致书清廷索取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并密派使者散布书札于内蒙古，煽动叛乱。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率骑兵三万，沿克鲁伦而下，大举内犯漠南，又燃叛乱战火。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再次亲征。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盛京兵两千，宁古塔兵一千，科尔沁兵四千，沿克鲁伦河进剿，是为东路；以费扬古及所征调蒙古兵，自归化进剿，以断噶尔丹后路，是为西路；康熙亲统中路大军，出独石口，迎击噶尔丹军。五月到达拖陵布喇克，遣使敕谕噶尔丹：三路大军已到，因不忍生灵横遭践踏，希望会面划界。噶尔丹置若罔闻，拒不答复。五月初七，侦知噶尔丹所在，康熙率军出击直趋克鲁伦河。噶尔丹见皇帝亲征，军容极盛，大惊失色，遂传令众人，尽弃其庐帐器械而逃。噶尔丹退到昭莫多，与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费扬古采取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术，把噶尔丹军诱入包围圈中。自午到暮，大败噶尔丹军，杀死叛军三千余人。噶尔丹仅带数骑逃走。昭莫多一战，全歼噶尔丹主力，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昭莫多战后，噶尔丹已是穷途末路，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康熙采取收抚降众、遏绝噶尔丹外援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此时也遣使入朝，表示臣服，噶尔丹已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但他顽固不化，拒不接受清廷招抚。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帝三

① 参见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

次亲征，亲赴宁夏，命费扬古率军一路出宁夏，孙思克率军一路出嘉峪关，进剿噶尔丹残部。此时，噶尔丹在阿尔泰周围游窜，残部大多已逃走，只剩下五六百人，食尽粮绝，每日杀马而食。沙俄对噶尔丹已不感兴趣，噶尔丹欲北赴俄罗斯，而俄罗斯拒不受。此时，噶尔丹又闻策妄阿拉布坦将进兵阿尔泰，擒之献功，噶尔丹进退无地，自知末日已到，遂饮药自尽[1]。到此，噶尔丹叛乱才告平定。

康熙征讨噶尔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扫除了漠北、西北地区一大不安定因素，稳定了那里的社会秩序，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的统一管辖，不仅如此，还在巩固边防，对外反侵略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沙俄对我国蒙古族居住地区的侵略，寄希望于噶尔丹的配合，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使沙俄侵略势力无所依靠，且团结众蒙古，使之成为抵御沙俄侵略的屏障。（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 152 至卷 183。

马思哈：《出塞纪程》。

《圣武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

[1] 关于噶尔丹之死，庄吉发在《故宫档案述要》中说，噶尔丹于三月十三日早得病。到晚即死，不知是甚病症。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中也说："噶尔丹在察哈木塔台地区得病，当晚就死了。"噶尔丹到底是自杀还是暴卒？待考。

多伦会盟

清朝初年，我国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到清太宗崇德初年，蒙古三部分别遣使通贡，与清朝政府确立了臣属关系。

喀尔喀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幼子格埒森札·札赉尔浑台吉的后裔。达延汗死后，其子大多迁入内蒙古，按蒙古习惯，幼子札赉尔浑台吉留居故地，号所部为喀尔喀，所领万余人分为七旗，由札赉尔浑台吉的七个儿子分别统领。明朝末年，喀尔喀蒙古形成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及车臣汗三大部，游牧范围大致在东达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抵阿尔泰山，南邻内蒙古，北面包括贝加尔湖直到石勒喀河的广大地区。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 年）清政府统一内蒙古之后，采取了“因其教不易其俗”的策略，得到蒙古各部的支持与拥护。崇德三年，继内蒙古之后，喀尔喀三汗也向清朝投表称臣、献“九白之贡”，正式确立了臣属关系。

顺治三年（1646 年），车臣汗乘清军入关，无力兼顾北疆之机，诱使内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发动反清叛乱。清政府以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同承泽郡王硕塞统军征剿。顺治五年，腾机思向清朝乞降，车臣汗等亦上表请罪，叛乱平息，喀尔喀蒙古复遣使通贡。顺治十二年，喀尔喀蒙古三汗及赛因诺颜部各遣子弟来朝，清廷在其地设八札萨克，分左右翼。土谢图汗、车臣汗、赛

因诺颜部属左翼，札萨克图汗属右翼。喀尔喀蒙古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

康熙元年（1662 年），右翼札萨克图汗所部发生内乱，札萨克图汗与罗布藏台吉额琳沁自相仇杀，战败身亡。其兄绰墨尔根自立为汗，因未请示朝廷，部众不服，大多投向左翼土谢图汗。康熙九年，清政府下诏废掉绰墨尔根，札萨克图汗之弟成衮袭封汗号，成衮向土谢图汗索要本部属民，左右两翼产生冲突。成衮死后，子沙喇继位，与左翼土谢图汗矛盾日深。时噶尔丹所统准噶尔部日渐强大。噶尔丹野心勃勃，欲称霸北方，遂利用喀尔喀蒙古左右翼间矛盾，不断向沙喇挑拨离间，阴谋招降右翼，消灭左翼，同时不断与沙俄侵略势力相勾结，以达到侵占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目的。清朝政府为避免喀尔喀蒙古自相残杀，建议双方会盟，以解决左右两翼矛盾。康熙二十五年，清廷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与达赖喇嘛代表西勒图共赴漠北，准备会盟问题。八月十六，阿喇尼召集喀尔喀蒙古两翼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及济农、台吉等，于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伯勒齐尔会盟，宣示康熙谕旨，令其尽释前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札萨克，和协安居。两翼汗及台吉等一致表示尊从，并在达赖喇嘛代表西勒图及喀尔喀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面前共同立誓，表示今后要和睦相处。此次会盟将原设八旗改为十四旗。

噶尔丹为达到自己目的，蓄意破坏会盟。康熙二十六年，噶尔丹以会盟时哲布尊丹巴与西勒图抗礼踞坐，大为非礼为由，出兵三万占领札萨克图汗部，唆使沙喇进攻土谢图汗，并命其弟多尔济札卜领兵掠夺右翼人畜。土谢图汗未禀报朝廷，贸然出兵击杀沙喇和多尔济札卜。噶尔丹以此为口实，于康熙二十七年，大举入侵喀尔喀，在特木尔大败土谢图汗，直驱库伦。与此同时，沙俄也与噶尔丹相呼应，从乌丁斯克出兵。喀尔喀腹背受敌，处境危险。沙俄欲乘机收降喀尔喀难民。七月初二，哲布尊丹巴召

集喀尔喀济农、台吉等，指出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皆不同于我，异言异服，终非久安，提出全部内迁，投靠清朝政府。八月，土谢图汗与噶尔丹最后决战，失败。九月初八与哲布尊丹巴率众人汛界，请求清廷保护。此后又有车臣汗、札萨克图汗所属来归，清廷一律加以优纳，将喀尔喀部众安置在内蒙古的苏尼特、乌珠穆沁、乌喇特诸部牧地游牧。

清朝政府暂留喀尔喀各部于汛界内外，意在使其团结部众，收集散亡，待噶尔丹事定，重归故地。但喀尔喀内部并无法度，自相劫夺，秩序混乱，如不定法督察，则现在部众也会日益离散。因此，清朝政府决定，按照管理内蒙古四十九旗的办法，将喀尔喀蒙古有效地管理起来。康熙二十八年，清廷命内蒙古所属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喀尔喀达尔汉亲王诺内、台吉多尔济思札卜等，率内蒙古各旗所选派的都统、副都统、长史等官员赴喀尔喀蒙古，分三路增设札萨克（旗长），收集离散之众，分为旗队，以便督察。在康熙二十五年库伦伯勒奇尔会盟的十四旗基础上，增设十二旗，共为二十六旗。

康熙二十九年，清军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相遇，击败噶尔丹。噶尔丹失败后，实力大为削弱，遂遣使请降，发誓自此不敢再犯喀尔喀。八月十八，康熙遣人敕谕噶尔丹，重申喀尔喀蒙古与清朝政府的归属关系。为了进一步团结众蒙古，孤立噶尔丹，清朝政府决定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举行会盟大会。会盟，是蒙古各部或札萨克间，定期集会，协调关系，共同商量和解决重大问题的形式。清朝决定此次在多伦会盟，由漠南、漠北蒙古共同参加，皇帝亲临主持，表示了清朝政府的重视。

康熙三十年四月，清朝政府将喀尔喀左翼贵族会集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正蓝旗昭苏乃木城）至吐力根河一带；右翼贵族集中于上都与黑棚交界地方，开始了会盟的准备工作。清政府集中蒙古部众，安插近边，目的是消除部属间的摩擦，加强

中央集权，重建喀尔喀的封建秩序。

四月三十日，康熙率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兵沿滦河而上，下五旗军队经独石口经上都牧场，齐集多伦，设帐布营。按万水朝宗，众星捧月布局，令喀尔喀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帐幕一起，在五十里外，环绕康熙行营屯列。五月初一，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尊旨，为擅自出兵击杀札萨克图汗具疏请罪。五月初二，康熙召见蒙古贵族，因土谢图汗已将大过自行陈奏，念其率众来归，故不忍治罪，遂将已故札萨克图汗之弟策妄札卜袭封汗号，赦免土谢图汗。随后，清政府列仪仗，置乐队，理藩院官员引喀尔喀蒙古贵族列于右队，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列于左队，分别朝拜康熙皇帝，清帝通过与蒙古王公饮宴欢聚，进一步调整和密切了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

五月初三，康熙再次召见土谢图汗及三十五名贵族，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会盟。应喀尔喀蒙古之请，按照内蒙古四十九旗制度编为旗队，给地安插，共分为三十四旗。旗下设参领、佐领，建立了与内蒙古四十九旗相同的制度，同时废除济农、诺颜等称号。除车臣汗、土谢图汗仍留汗号外，其它一律改为清朝爵位。策妄札卜封和硕亲王[①] 等其余贵族依次授与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品级。

五月初四，举行阅兵仪式，康熙出行宫，御甲胄，乘马遍阅队伍，八旗官兵依次列阵，鸣角，鸟枪齐发，声动山谷。皇帝亲射，十矢九中，蒙古王公赞为神武。五月初五，康熙又亲临喀尔喀营寨，察其穷困，赏以银布，又赐给喀尔喀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大批牛羊。六日，遣原任尚书阿喇尼等往编喀尔喀旗，分佐领，拨给游牧地方。七日，康熙启程回京，会盟完毕，留尚书马齐料理未竟事宜。会盟期间，应蒙古贵族之请，决定在

---

① 康熙四十年又改为札萨克图汗。

多伦兴建汇宗寺，以彰盛典，利用宗教，统一部众。

多伦会盟，包括在多伦诺尔附近集中内蒙古、喀尔喀蒙古各部贵族，召见、宴会、会盟、阅兵、修庙等几个步骤。会盟期间，清政府力图通过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策略，加强中央集权。喀尔喀两翼间的矛盾，关键在于札萨克图汗部贵族与土谢图汗的关系。土谢图汗吞并过札萨克图汗属民，在对抗噶尔丹时，又贸然出兵杀死札萨克图汗沙喇，激化了两翼之间的矛盾。因此，康熙首先命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具疏请罪。但土谢图汗率众抗击沙俄侵略，坚决对噶尔丹叛军作战，哲布尊丹巴又首先率众南迁，归服清朝，表现了坚定的爱国立场，相比之下，功大于过。所以，当康熙命众喀尔喀议土谢图汗之罪时，皆言加彼之罪，于我无光，于是康熙赦免土谢图汗之罪。这样，清朝政府通过议罪、免罪过程，既保护了抗敌有功的土谢图汗兄弟，又平息了札萨克图汗部贵族们的不满，维护了清政府的法纪和威严，加强了我国北方蒙古族的团结，结束了长期以来喀尔喀蒙古的内部纠纷，密切了蒙古族与朝廷的关系，重新在喀尔喀建立起封建秩序，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管理，使之成为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祖实录》卷 26。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 7。

《清圣祖实录》卷 142 至卷 152。

何秋涛：《朔方备乘》。

康熙南巡

清入关后，摧毁南明，平叛三藩，收复台湾，清政权始得巩固。但连年战乱，使人口急剧减少，土地荒芜，生产萧条，社会上怀念明朝的势力依然存在，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抚人心就成为当务之急。但清初黄河水患不断，当时黄河下游的河道是从河南开封、商丘南下，经江苏的徐州、宿迁，从云梯关入海。黄河与运河交于苏北的清河县，淮河、睢水流入洪泽湖内，也在清河县泻入黄河。河流交错，水情复杂，经常泛滥，给沿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不但影响了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还直接影响着清政府至关重要的漕粮运输。清政府每年要经运河从江南运到京城四百万担漕粮，供皇室、京城官宦及驻京旗兵需用。一旦漕运受阻，京城就会发生动乱。因此康熙亲政后，即把河务与漕运列为与三藩同等重要的大事，意识到治理黄淮是恢复生产、安抚人心的关键所在。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四十六年，他六次南巡，治河务，赈灾民，笼络汉族绅商士子，成为其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措施。

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收复台湾，结束了国内大规模的战争局面。为示四海升平，康熙二十二年春，翰林院编修曹禾、吏科给事中王承祖分别上疏，呈请皇帝仿古代帝王之巡狩，登封岱宗，以告成功。康熙也想利用南巡考察河务、漕运，抚恤编氓，问俗观风。于是于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康熙皇帝率大批侍从离开北京，开始首次南巡。亲登泰山后，车驾驻于郯城红花铺，河

道总督靳辅来朝。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康熙十年(1671年)题授安徽巡抚，治绩优著。康熙十五年，安徽、江苏发生大水灾，淮安、扬州被淹，死者无数，康熙遂撤原河道总督王光裕，以靳辅代之。康熙十六年，靳辅以《经理河工八疏》呈请皇帝，提出河道、运道一体并治。主张挑挖云梯关至海口一段河身筑堤，以加宽海口；疏浚清口，使淮入黄；加固高家堰堤坝，堵塞决口等，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与赞同。康熙十七年，经过议政王大臣议复，批准实行，并决定支给正项钱粮250余万两。此后，靳辅在幕僚陈潢的辅佐下，开始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先于黄河两旁各疏引河一道，以所挑之土，筑两岸之堤。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以导黄入海。至二十一年五月，大见成效，海口大开，黄河下流疏通。为解决黄河水内灌运河问题，靳辅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请将清口封闭，从文华寺挑新河至七里闸，以七里闸为运口（即南运口，也称清口），由武家墩、烂泥浅转入黄河。明朝初年，南来漕船到清江浦天妃闸以入黄河。明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移运口于新庄闸（亦名天妃）以纳清而避黄，称为清口。靳辅改以七里闸为运口后，重运过淮，扬帆直上，如履坦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以淮水敌黄，又加固高家堰，修复归仁堤。高家堰是洪泽湖与高邮、宝应诸湖之间的堤堰。它的最大功能是挽湖束水，捍淮敌黄，使淮水经洪泽湖沛然而出清口，同时也是运河的屏障。康熙十五年大水，高家堰溃决多处，冲决漕堤，下河七州县大部被淹。靳辅将诸决口尽塞，自清口至周桥九十里旧堤悉增筑高厚，并将周桥至翟坝三十里旧无堤并已成河九道之处亦创建新堤，仍留减水坝六处，以备旱时蓄水济运，涝时泄水保堤。靳辅并于堤外帮筑坦坡，坡长为堤高的八倍，在其上种草植树，不时维修效果极佳。归仁堤原以障睢水，并永堌、邸家、白鹿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处入黄河，助黄涮沙。清初，许多河臣

认为归仁堤与运道无关，致多年失修，经常决溢。靳辅认为归仁堤失修是造成河患的原因之一，遂于康熙十八年动工修复。首先把旧堤加高培厚，其次挑引河一条，并用其土筑大坝一道，此外又筑滚水坝一座，不使黄水倒灌。修复后的归仁堤，成为捍淮敌黄的屏障。经过清政府的几年努力，黄淮的治理已初见成效。但遇有大水，河道冲决之事仍时有发生。康熙此次南巡，便欲亲往其地，相度形势，察视河工。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康熙命驾继续南巡到达江南（今江苏）宿迁。十九日，行至桃源县众兴集，康熙亲自巡视黄河北堤岸 180 里，指示靳辅要筹划精详，措施得当，使黄河之水顺势东下，水行沙刷，永无壅决。对于宿迁、桃源、清河等地日益增多的减水坝，康熙指出，此项措施虽对于治河有益，但如果遇到河水泛滥，减水坝决口，下流民田就要受到巨大损失，因命靳辅筹措一一劳永逸之法，既使河道免梗塞之患，又使民生无垫溺之忧。十月二十二日，康熙乘船过高邮、宝应等处时，见民间土地房屋多在水中，遂登岸步行十余里视察水势，召集当地生员耆老查问遭灾原因，皆云自海口壅塞，水无所归，二十年来田亩已成水泽。康熙遂命江南江西总督王新筹划赈济。此次南巡，康熙最远到达苏州。十月底自无锡、丹阳由陆路经句容，十一月初一到达江宁（今江苏南京）。十一月初二，亲自拜谒明太祖陵，表示要兢兢业业，吸取前代废兴的教训。十一月初六，康熙皇帝经过江都县邵伯镇，因高邮、宝应等处民间田庐被水淹没，皆因湖水下流之海口长年沙淤所致，如将入海故道浚治疏通，可免水患，遂命吏部尚书伊桑阿、工部尚书萨穆哈往海口详细勘察。十一月初十，经过清河县天妃闸，登岸巡视高家堰堤工，指示靳辅：高家堰关系重大，须岁岁防护，不可轻视。并命靳辅斟酌一至妥之策，使黄河之水永不倒灌运河。巡河完毕后，康熙帝于归途中至曲阜孔庙朝拜孔子，亲书“万世师表”四字，悬挂于大成殿，赋

予孔子极高的地位，同时免去曲阜县康熙二十四年地丁钱粮。十一月二十八日，康熙返回京城南苑，第一次南巡结束。

康熙返京后，立即部署疏浚海口一事。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九卿詹事科道议复尚书伊桑阿勘阅海口情况，康熙认为：减水坝疏泻河水，降低水位，减少河水对堤岸的冲击，可以暂济目前之急，然而一旦河水泛滥，减水坝就有可能成为堤岸新的决口。况且泻水过多，下游民田被淹，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康熙作出开挖海口、疏泻下河地区积水的决定，并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1] 管理下河事务，靳辅仍负一定节制之责。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初八，康熙帝于乾清门召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及总督董纳、河督靳辅、巡抚于成龙等，议论河工。于成龙体会康熙旨意，主张开浚海口故道，以使积水排泻入海。靳辅则执相反意见，认为下河最洼处低于海面五尺，如果疏通，积水未必排出，反恐有海水倒灌之患。遂主张筑堤束水以注海，即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下河地区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实际上是再建一条地上河。双方各执已见，争论不一。康熙虽重治河，但并非行家，不理解靳辅意见是正确的，加之开挖下河最初是康熙本人所提议，而靳辅此时又卷入被弹劾的明珠一案，遂偏袒于成龙，将靳辅罢官。为解决开浚下河的议论分歧，康熙决定亲往勘察，开始第二次南巡。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康熙帝亲率皇长子胤禔及扈从三百余人，从北京出发，再次南巡，躬历河道，兼欲观览民情，周知吏治。正月十四，到达山东平原县，晓谕山东巡抚钱珏，蠲免山

---

[1] 康熙朝先后有两位于成龙，一为山西永宁人，明崇祯时贡生，清顺治十八年任知县，康熙十三年任武昌知府，十九年迁两江总督，康熙二十三年卒。另一于成龙为汉军旗人，康熙七年以荫生授知县，二十年因山西于成权疏荐任江宁知府，康熙三十九年卒。

东康熙二十九年地丁正赋[1]。正月二十三日到达宿迁。康熙亲率随从大臣及江南总督傅拉塔，河道总督王新命，漕运总督马世济等阅视中河，指出河道关系漕运民生，应深入研究地形水性，随时权变。同时又指出，中河与黄河逼近，若遇霪潦之年，水势愈涨，万一黄堤溃决，失于防御，中河、黄河必将混而为一，应该筹划一妥善预防之法。正月二十五日，因皇帝南巡，蠲免江南历年积欠，包括地丁钱粮、屯粮、芦银、米麦豆杂税等共220余万两。二月十一日，康熙南巡抵达杭州，因江南、浙江为人文萃集之地，特诏入学额数应酌量增加，永昭弘奖。为安抚人心，特诏凡经过地方现在监禁人犯，除十恶不赦及诏款所不赦等罪及官员犯贪赃罪外，其余自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以前死罪及军流徙罪以下，已结未结，俱准宽释。此次南巡，康熙最远到达浙江绍兴府会稽山麓，亲往禹陵，拜祭大禹。三月初七，康熙于南巡归途中率随行诸臣视察高家堰一带堤岸闸坝，重新肯定了高家堰减水坝的作用。对淮河存在的问题，除表示同意王新命将天长、盱眙、六合等处雨水通过疏浚旧河引入长江不使入淮的建议外，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见解。补充说：必于淮水会合之处修置板闸，如淮水盛涨，则启闸以分其流；淮黄均敌，则闭闸不令旁溢。通过二次南巡的实地考察，康熙重新认识了靳辅，实心任事，克著勤劳；且江南淮安民人皆称誉靳辅治河得当，遂将靳辅照原品致仕官例，恢复以前官阶。康熙二十八年，靳辅奉旨纂述《治河书》（即《治河方略》），疏表进呈。此后凡遇河工方面的问题，俱命往问靳辅。康熙二十九年，准噶尔部噶尔丹北犯边疆加剧，康熙必须集中精力，巩固北部边防。康熙三十年，有人揭发

---

[1] 清朝的蠲免有恩蠲、灾蠲之分。所谓恩蠲，即有国家庆典，皇帝巡幸或重大军事活动时，蠲免一定的田赋。康熙每次南巡离京前，都颁发谕旨，蠲免沿途所经地区的田赋。

王新命勒取库银，康熙遂将王新命解任，命靳辅复任河道总督，以保证漕运畅通。但靳辅时年已老，身体虚弱，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病逝。从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六年，康熙致力于平定北方噶尔丹叛乱，无暇亲临河工，且靳辅病故后，河臣一任不如一任，治河成效不大。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征讨噶尔丹战争胜利结束，四海无事，独黄淮为患，时有冲决，致使下河地方，田庐漂没，因此，治理黄淮就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圣祖决定第三次南巡，查看河道，指示方略。二月初三启行。三月，康熙南巡再经高家堰、归仁堤等处，亲自测量洪泽湖水位，发现清口、高家堰洪泽湖水低，黄河水高，致使河水逆流入湖，湖水又无道可出，遂使泛滥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欲治其源，必须加深河底，河直则流急，流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因此提出将清口西黄河弯曲处浚直，并将黄河南岸近淮之堤往东延长二、三里，使湖水斜行流人黄河，就会减少黄河倒灌的机会。这是康熙经过实地考察并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治河总设想，即筑坝与深挖河身并行的方案。为解决下流入海问题，康熙命拆毁拦黄大坝[①]。三月十一，康熙乘御舟沿运河南下过扬州，泊新丰，叮嘱河臣增筑运河堤岸，并提出开挖芒稻河，人字河，引水归江的建议。这是康熙总结靳辅治河思想与经验，加上自己的补充和发展所成。靳辅重视筑堤束水攻沙，康熙在此基础上采用了浚直河道急溜刷沙法，靳辅但顾上河，不顾下河，为了护堤保运，大量利用减水坝，以致下河七州县，经常被淹；康熙是既顾上河，又顾下河，尽量少用减水坝或将其改成滚水坝，千方百计减轻和防止下河灾情。至于改修清口，导黄稍北，也是康熙创举。后来康熙概括自己的治河思想是：闭六坝以

---

① 康熙三十五年，前河道总督董安国在云梯关筑拦黄大坝。另挑马家港引河，导黄从小河口入海，使下流不畅，造成上流河道淤塞。

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

为安抚人心，康熙沿途还大行恩蠲，赈济灾民。康熙三十八年三月谕：蠲免江南、浙江各省州县康熙三十四、五、六年民间拖欠钱粮及淮安、扬州地区康熙三十七年未完之地丁漕项等银十九万两，米麦十一万石。因淮扬长期遭受水灾，米价腾贵，生计维艰，又命户部截漕粮十万石，发往高邮、盐城、宿迁、桃源等重灾区，低价粜卖。此次南巡，康熙最远到达杭州。四月十三日返回途中路过江宁，亲谒明太祖陵，并命巡抚宋荦，江宁织造曹寅负责整修，康熙亲题“治隆唐宋”殿额。五月十七日，康熙返回京城。

康熙的治河方案，当时的河道总督于成龙阳奉阴违，并未认真贯彻落实。至康熙三十九年春，治河工作仍茫然无绪，灾情更加严重。同年三月，于成龙病故，康熙遂将两江总督张鹏翮调任河道总督。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上任后，认真按照康熙指示办事：拆除前河道总督董安国于云梯关外建造的拦黄大坝，疏通海口，使黄河得以畅流入海；筑高家堰，广辟清口，使淮河能够畅流入黄；疏通人字、芒稻等河，引运河之水入江；修筑挑水坝，疏通陶庄引河，导黄向北，使永无倒灌之虑。至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各项工程先后完工。张鹏翮遂上疏告捷，请圣驾亲临河工指授。为检查张鹏翮工作，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又一次启驾，胤礽、胤禛等皇子随行，开始第四次南巡。

这次南巡，康熙两次乘船遍阅河工，对所见情形十分满意。清口挑水坝的修建，减少了黄河倒灌洪泽湖的机会；高家堰六坝的堵塞，又提高了洪泽湖的水位，使洪泽湖水可以畅流入黄；黄河各泻水河的疏浚，大大降低了黄河的水位，河岸已高出水面十几尺。康熙评价说：张鹏翮得其要旨河工大约已成。上次南巡，康熙认为造成黄河倒灌清口的原因在于洪泽湖水位过低，因命张在清口筑挑水坝。挑水坝建成后，洪泽湖的水位得到提高，黄河

倒灌现象有所缓和，但并未根本解决。这次南巡，康熙通过仔细考察中河、黄河及洪泽湖各水的流量和流速，又找到一个倒灌的原因：当时中河与黄河的交口仲庄闸，与洪泽湖和黄河的交口清口正好隔岸相对。如果骆马湖水上涨，从中河泻到黄河的水量就会增多，与仲庄闸相对的清口，难以抵挡中、黄两河强大的水势，就会出现黄河倒灌。因此康熙指示张鹏翮，将中河的出口从仲庄闸移至十里以外杨家庄，改变中河与黄河的交口以减弱清口以外的水势。

两年以后，中河与黄河新的交口在杨家庄建成。张鹏翮上报已解决倒灌之患，请皇帝巡视。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开始第五次南巡，目的是要亲自视察中河南口改建工程，筹度善后之规。二月初九启行，三月十八日指示张鹏翮要尽心筹划，防患于未然。闰四月，康熙登陆往高家堰，遍阅河堤。见高家堰石堤仍未最后告成，遂批评张鹏翮，惟见清口之水流出即以为功成，不思防御，如果高家堰六坝之水泛滥，则清水力弱，黄河必复致倒灌。高家堰所关紧要，宜谨慎勿忽。防患于未然，是康熙五次南巡的主题思想。但此次见到的河防工程，确实比两年前有了很大进步，康熙遂于清口外黄河大堤上的惠济祠，召集河臣及扈从大臣讨论河务，对康熙三十八年前后的河防工程作了比较。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黄河泛滥，自舟中望去，水与岸平，岸之四周，皆可见。其后，水渐归漕，岸高于水，现在岸又高出水面丈余，清水畅流，逼使黄河竟抵北岸，以一线入海，河工大成。可见，黄淮的治理已是很有成效了

康熙四十五年，张鹏翮与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视察洪泽湖西岸泗洲溜淮套一带地形与水情，为防治洪泽湖水侵入泗洲、盱眙，提出于溜淮套别开河道，直达张福口，以分淮水之势，避免洪泽湖水异涨，确保高家堰之堤无险的方案。但此项工程巨大，张鹏翮不敢贸然行事。遂上疏康熙，恳请皇上躬临阅

视。此时康熙年事已高，不欲亲临，但诸臣一再奏请，遂于康熙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日进行第六次南巡。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于清口登岸，骑马查看溜淮套地势水情。发现溜淮套地势甚高，即使挖成也不能直过清口，无助于泄出高家堰之涨水，且开挖此河不仅要占据大量民田，还要毁掉许多百姓坟冢，遂否决阿山等建议，并对阿山、张鹏翮等大加斥责，命此河断不可开，同时命疏浚洪泽湖各口，以利泄水，挑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河，以通粮船。二月二十二日，康熙召集各官于舟前跪列于岸，指责张鹏翮身为河督，唯以虚文为事，张鹏翮诚惶诚恐，于二十七日具疏请罪，康熙命将张鹏翮及联合请开溜淮套的督抚俱严加议处。五月二十五日，康熙结束南巡回京后，即将阿山革去尚书，并削掉张鹏翮太子太保之衔。

康熙致力河工，屡次南巡，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安抚人心，阿山等人所奏，不仅坏民田，甚至坏民坟，很有可能激起民怨；且康熙年事已高，数年来两河又平静无事，民生安乐，何必于无事之时多生一事，不惟无益反而有害？阿山、张鹏翮等人不了解康熙这一思想，遂遭此祸。

康熙六次南巡，从背景、主要活动和采取措施来看，都是直接为促进生产发展和巩固清朝政权服务的。据《淮安府志》记载：康熙南巡治河见成效后，黄河二十年间无大水患，解决了土地被淹问题，耕地大量增加，加上清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使康熙年间的社会生产很快从战争造成的凋敝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社会安定，归根到底是人心的稳定。因此康熙在南巡中也采取了许多蠲免赋税、赈济灾民的措施，以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康熙南巡所经东南沿海各省，特别是山东、江苏、浙江，历来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兴盛之地，士绅集中，文人荟萃，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人们眷恋故明王朝，以明为正统的民族情绪一直比较强烈。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浙江大岚山

还出现过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的农民起义，因此在江南地区推行笼络汉族绅商士子的政策就更为重要。所以康熙南巡时，不辞劳苦，屡谒明陵，拜祭孔子，对笼络汉族绅商，赢得汉族地主及知识分子的赞赏与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117至卷228。
《清史稿》。
《治河方略》卷6。
《康熙朝起居注》。

《南山集》案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皇帝，弹劾现任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私刻《南山集偶钞》，语多狂悖，请旨敕部严加议处。康熙帝阅后，即命该部严察审明具奏。这样，戴名世被投入监狱，从而引出清初又一起文字狱案——《南山集》案。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自幼好学苦读，尤善于古文（即散文），因家世零落，二十岁起即授徒养亲。戴名世在古文经学方面有很高造诣，主张振兴古文，改造时文（八股文），是桐城文派的先驱。由于其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尤留心于明史，而当时明史材料又散失较多，戴名世遂想仿《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考，力求真实，以使其书成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在搜集明史资料过程中，戴名世仔细查阅了同乡人方孝标所写的《滇黔纪闻》，从中了解到南明政权的一些情况，以充实史料。恰在此时，戴名世又听得前桂王宫中宦官犁支和其门人余石民谈及桂王政权的消息，因此赶忙到余生处访问，但犁支已离去，未能得见，戴名世遂请余石民将听到的情况写出寄给他。戴名世将此材料与方孝标《滇黔纪闻》对照后，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再写信给余石民，指出弘光、隆武、永历三代朝廷，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应该有一部历史著作，并要求余石民为之联络，召来犁支与他面论其事，这就是戴名世《与余生

书》。同年，戴名世参加乡试，被选拔为贡生，康熙二十五年人京师国子监。

在京期间，是戴名世学术思想和品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结交当时名士朱书、方苞、王源、万斯同等，讨论古文，议论时政，其间写了大量杂文，抨击社会时弊。康熙三十九年，戴名世受聘于浙江学政姜棣，于署中任职。康熙四十年，其学生龙云鹗将平日藏抄戴名世文百余篇，为之刊刻，以戴名世故居南山冈命名，取名为《南山集偶钞》，《与余生书》就收集于此，并请方苞、朱书等人为之作序（其中龙云鹗序为戴名世自作），同时还成《孑遗录》一篇，由王源、汪灏、方正玉为之作序。这两本书问世后，风行江南各省，文人士子均以能得此书一睹而后快，其影响远远大于同类其它私家著作。

康熙四十四年，戴名世自苏州至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中第59名举人，康熙四十八年，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后获一甲第二名进士，遂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

康熙五十年，赵申乔参奏戴名世私刻文集，即指《南山集偶钞》一书。刑部接旨后即提审戴名世，戴名世称《与余生书》内方学士名即方孝标，其所写南明永历人物传记大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于是由戴名世案引出方孝标《滇黔纪闻》一案，并由此牵连到整个方氏家族。

方孝标，安徽桐城人，原名玄成，字孝标，为避康熙帝之讳，改字为名，别号楼冈。顺治六年（164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顺治十二年被用为经筵讲官。顺治十四年，江南科场案发，其弟方章钺因考试舞弊，方氏父子俱流放宁古塔，顺治十八年得释回归故里。康熙九年（1670年），受平西王吴三桂之邀到云南。康熙十二年，清廷撤藩，吴三桂反于云南，贵州巡抚曹申吉也相附叛乱，并把外籍在滇者全部扣留。方孝标假装癫狂，

乘防卫疏忽时逃出，削发为僧，名方空，间道奔湖南衡州，拜谒大将军顺承郡王，顺承郡王以其忠孝两全授以国书龙牌，方孝标得以返回故里。

方孝标返回故里后，将其在云南、贵州所记的民间士民传说，尤其关于永历帝在滇覆亡，南明忠臣义士、遗民故老旧闻掌故，以及大西农民军李定国北伐等史事，加以归纳整理成篇，名之为《滇黔纪闻》，收入所撰《钝斋文集》中刊行。戴名世立志修纂明史，遍访遗书。他在研究了《滇黔纪闻》后，认为其记载史事确切，遂在其所写各种传记、笔记中，凡涉及晚明史事，均采用《滇黔纪闻》资料。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审查戴名世案，以《南山集偶钞》将本朝年号删除，尊称故明亡君等罪名，遂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因著《滇黔纪闻》中亦有类似逆语，亦被剉其尸骸。二人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之子年十六以上者俱以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宁古塔；其为戴名世书作序者，俱应立斩。其实，《南山集偶钞》中并无直接毁谤和藐视清王朝的文字，它只是在有关南明人物传记中使用了南明各朝年号，并指出南明三朝在历史上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因此，康熙帝看到刑部奏议后，对书中承认南明一事并未在意，却对案内方姓族人则颇为重视。吴三桂反叛时，安徽歙州方光琛为其宰相，其子侄九人均被吴三桂授以要职，其中其子方学诗、方学礼最为著名。吴三桂病死后，方光琛辅助吴世璠继续与清廷为敌。“三藩之乱”平定后，方氏家族皆伏法，只有方学诗在逃。刑部在奏南山集案时，引用《南山集偶钞》原文，对方孝标只称方学士，但东北方言“士”与“诗”同音，翻译为满文为同一字。康熙帝阅后，误认为方孝标即方学诗，即方光琛族人，因此批旨道：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既然方氏族人曾任叛逆吴三桂所授之

职，自然是与叛逆为伍，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偶钞》中引用方孝标书籍，也就有与叛逆同谋之罪，亦是罪在不赦的，这样就使南山集案带有政治问题的性质。

几乎在赵申乔参劾戴名世的同时，江南又发生督抚互参案，使南山集案的情况更加复杂。江苏巡抚张伯行参劾两江总督噶礼揽卖举人，索贿五十万两。噶礼身为康熙乳母之子，又是皇太子胤礽党羽，势力不可一世，他当然不甘心为张伯行所参，遂发动其智囊搜罗张伯行七条罪状反加弹劾，其中之一即是包庇为《南山集偶钞》作序之方苞，致使此书在苏州私自印行三千余部，企图把张伯行打入戴名世、方苞一党。这就使南山集案与当时的朋党之争绞合在一起，更加复杂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为戴名世同乡，《南山集偶钞》的作序者之一，又为方孝标之族孙。但康熙此时的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处理南山集案上，他已被太子废立和诸子觊位斗争搞得焦头烂额。康熙四十七年，皇太子胤礽初废，各皇子随即展开激烈的角逐，皇八子胤禩尤甚。四十八年，康熙被迫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以杜绝诸子觊觎皇位之心。但胤礽复立后，不思悔改，仍拉帮结党，企图早日登基。《南山集偶钞》案既与朋党之争绞在一起，就不得不使康熙皇帝慎重考虑如何处理此案。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同时，其党羽两江总督噶礼亦被革职。张伯行虽被牵涉《南山集》案，但因曾是康熙亲誉的“天下第一清官”，又与太子党人互为参劾，康熙自然偏袒张伯行，遂将张伯行留任，并命张伯行派人将方苞解送刑部，《南山集偶钞》刻板在江宁起出，其余免议。明确表示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无关。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南山集》案定案。戴名世从宽免凌迟，即处斩，《南山集偶钞》、《孑遗录》书板烧毁，其家人等均加恩宽免；由之而发的方孝标案，此时康熙已知方孝标并非方光琛族

人，遂降旨将其子方登峰、方云旅、孙方世樵俱从宽免；为《南山集偶钞》作序的汪灏因在内廷纂修年久，已经革职，亦从宽免，但令家口入旗；方苞亦被免死罪，家口入旗，后因其笃于经学，精于古文，康熙特命其人值南书房，以备文学顾问，康熙五十二年，又负责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戴名世被处斩，其弟戴辅世自京师扶归榇葬其所居南山冈，《南山集》案遂告结束。

对于修史时对南明诸政权的称谓，乾隆年间有了专门规定。乾隆四年，诏修明史成，又数年后皇帝特谕，修明史时，对南明诸朝均可使用年号，结束了因此而制造文字之祸的历史。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248。
《东华录》康熙朝卷89。
《养吉斋余录》卷4。
《清代文字狱》。

驱准出藏

康熙末年，策妄阿拉布坦统领的准噶尔部又趋强大。策妄，噶尔丹之侄，因与其叔争夺权力，逃离准噶尔。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乘噶尔丹攻伐喀尔喀之机，返回伊犁，收揽部众，发展经济，经过十余年努力，势力逐渐强大，策妄也因此而野心膨胀，越来越不愿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康熙五十五年，西藏内部纷争，策妄乘机以护送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夫妇（即策妄之女婿、女儿）回藏为名，率兵六千绕过戈壁，经西藏西北边隘阿里侵入西藏，企图吞并西藏，分裂国家。清朝政府为了击败策妄阿拉布坦的分裂活动，也调兵入藏，清廷与准噶尔部战火又起。

早在唐朝时期，西藏与内地就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受到历代吐蕃藏王的崇信，但由于吐蕃最后一位赞普秉性暴恶，嗜酒乐杀，佛教遂灭。公元十一世纪，佛教以喇嘛教形式复兴，并由于各封建农奴主之间的分裂割据，形成红、白、黑、花四大派系。南宋淳佑四年（1244 年)，势力最大的花派教主萨加班智达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觐见窝阔台之皇子阔瑞，议定归顺蒙古大汗，西藏正式隶属中国版图。元至元六年（1269年)，萨加班智达之侄八思巴被封为“大宝法王”。至元十一年，元朝政府又将西藏划为 13 个万户府，由八思巴统领。西藏出现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至正十四年（1354 年)，萨加王室内讧，白教乘机起兵推翻萨加法王，建立帕竹政权。到明朝初年，原曾

信奉白教派的僧人宗喀巴，痛感花、白等教派均失佛教本旨，胡作非为，遂新创教派，提倡苦行，自服黄衣黄冠，这就是黄教。

明朝末年，西藏地区八王纷争，[①] 经过几次兼并、组合，最后形成白、黄两大宗教势力，白教与黄教分别与蒙古各部落联盟，彼此明争暗斗，争夺西藏地区的领导权。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黄教首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密相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带兵进藏，于次年推翻噶玛政权，建立了黄教与蒙古汗王的联合统治。

达赖之名，始于三世达赖锁南嘉措。由于其通晓佛学，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特邀其至青海讲经。为了感谢锁南嘉措，明万历六年（1578 年），俺答汗特赠“遍知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尊号。到达赖五世时，顾实汗遣兵进藏，掌握了西藏实权，顾实汗与清朝政府关系密切，在其引荐下，五世达赖于顺治九年（1652 年）到北京朝见皇帝，受到清朝政府的隆重接待，顺治帝特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以金册金印，达赖称号正式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定。

班禅名号比达赖稍后。顺治二年，顾实汗为削弱五世达赖的政教权力，特赐扎什伦布寺主持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尊号，这就是四世班禅。[②]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清政府因废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引起波动，为安定人心，康熙五十二年，正式敕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与达赖一样，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定。

---

① 明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特封三个法王和五个世俗王，史称“八王”。

② 班禅与达赖一样，采用转世制度，据说这种制度手续极为繁琐。打卦问卜与让婴儿抓取前世达赖和班禅用过之物是必须的手续，参见《佛教与中国文化》。

噶玛政权被推翻后，顾实汗掌握西藏实权。达赖不甘大权旁落，加紧扩张势力，双方矛盾日深。康熙十八年，五世达赖任命亲信桑结嘉措为第巴（总管）。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死，桑结嘉措秘不发丧，仍借达赖之名发号施令，以抵制和排斥和硕特汗的控制。康熙三十二年，桑结嘉措以达赖名义遣使入贡，为自己请封。清朝政府不明实情，遂于次年封其为土伯特国王，授以金印，令其宣扬佛法，掌管佛教。康熙三十五年，清廷从准噶尔降人口中得知达赖已死，遂严厉责问桑结嘉措，桑结见事已败露，遂派代表进京，向康熙请罪，并以恐民人生变为由，解释秘不发丧之因。康熙虽未深责，但甚为不快。

康熙三十六年，桑结嘉措公布五世达赖之丧，并宣布已找到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正式坐床，称六世达赖。蒙古和硕特部汗王认为桑结扶植傀儡，排斥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康熙四十年，达赖汗死，子拉藏汗继位[①]，与桑结嘉措的关系日益恶化。至康熙四十四年，双方终于发生冲突，藏兵战败，桑结被杀。拉藏汗以桑结所立仓央嘉措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为由，认定不是真达赖灵童，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废立。康熙因桑结嘉措长期匿丧，又曾与噶尔丹勾结，遂册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赐以金印，命其寻访真达赖灵童，并将仓央嘉措起解进京。康熙四十五年，拉藏汗解送仓央嘉措进京，行至西宁口外，仓央嘉措病故。

拉藏汗清除桑结嘉措后，于藏中另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青海诸蒙古不服，另奉里塘之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为此双方争论不休。清政府为了缓和青、藏争执，命噶桑嘉措暂住西宁塔尔寺主持教务，并于康熙四十八年，承认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鉴于青、藏矛盾，特遣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

① 顾实汗死后，其子达延汗、达赖汗相继主持西藏政务。

事务。次年三月，正式授以伊喜嘉措金册、金印。康熙五十二年，为安定人心，正式敕封五世班禅博克多为班禅额尔德尼称号。班禅遣使入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康熙册封班禅，目的在于提高班禅地位，使之与达赖共主喇嘛教，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稳定形势。但西藏的形势并没有按康熙的意愿发展，西藏仍存在着反对拉藏汗的强大势力。

策妄阿拉布坦一直注视着西藏事态的发展。桑结嘉措败亡后，部下寄希望于策妄，刺激了策妄对权力的贪欲。他利用拉藏汗因与西藏地方势力和青海诸蒙古矛盾而希望寻求外援的情绪，向拉藏汗提议儿女联姻，以增进友谊。康熙五十三年，策妄阿拉布坦将拉藏汗长子噶尔丹丹衷约至伊犁（今新疆伊宁），与其女博托洛克结亲，拉藏汗因而放松了对策妄的戒备。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其表弟策零敦多布，假称护送噶尔丹丹衷夫妇回藏省亲，率兵六千，从伊犁取道叶尔羌，于次年七月初四，乘拉藏汗不备，由藏北腾格里海直入西藏，击败藏兵，进据拉萨，围攻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虏其妻子，将各庙重器送往伊犁。准噶尔军的入侵，给西藏人民带来一场浩劫。

康熙五十六年七月，清廷驻守巴里坤的靖逆将军富宁安首报准兵侵藏消息，清政府随即备兵青海，以防不测，调署理西安将军湖广总督额伦特回西宁，料理军务粮饷；命西宁总兵王以谦、侍读学士查礼浑在松潘预备；又派荆州满洲兵二千发往成都，太原满州兵五百发往西安。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康熙发布谕旨，即令侍卫色楞统率军兵，进剿西藏，又命将军额伦特驻扎青海，相机策应。由于轻敌，准备不足，兵力薄弱，清军于闰八月在喀喇乌苏与准军作战时，首战失利，额伦特战死。策妄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安定西藏，维护统一，康熙决定进藏平叛。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任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驻节西宁，调饷征兵，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

军；提升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年羹尧，原为四川巡抚，长年驻扎四川，对边情很熟悉，办事明敏，与满族将领关系也很和谐。升任四川总督后，年羹尧主动建议满兵驻防成都，及时设立进藏驿站，保证军饷供应。康熙又命傅尔丹及富宁安分兵出巴里坤及阿尔泰等地，以牵制准噶尔的援藏兵力。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清廷派往西藏的胡毕图等返回，回奏西藏众喇嘛民人，俱言西宁之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为此，康熙制定了册封暂住西宁塔尔寺的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护送入藏，两路进兵的作战方案。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康熙命抚远大将军允禵从西宁移驻穆鲁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居中调度。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册封噶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四月，将军延信及噶尔弼分领满汉及蒙古官兵，自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军西藏。清军以岳钟琪为先锋，自里塘、巴塘进兵察木多（今西藏昌都），轻装急进，直抵拉萨。这次平乱行动，受到了西藏人民的广泛支持。清军大败准噶尔军，大策零敦多布计穷力竭，狼狈而遁，率残部逃回伊犁，延信等将大军留驻于达木，于九月初八起程，率轻骑简从，护送达赖向拉萨进发，沿途受到僧俗人民欢迎。九月十五，满汉大臣、蒙古各部首领、西藏黄教上层喇嘛、贵族齐集布达拉宫，为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举行隆重的坐床仪式，正式确立了六世达赖职位[①]，西藏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驱准出藏获得胜利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派满洲、蒙古及绿旗兵四千名驻藏，由公策旺诺尔部署理定西将军印务，统辖驻藏兵马，这是清朝在西藏驻兵的开始。康熙六十年，又封拉藏汗旧部康济鼐，抗拒准噶尔兵有功的阿尔布

① 康熙四十八年，清政府曾册立拉藏汗所立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因此，后世称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

巴、隆布奈及札尔鼐等四人为噶伦（意为政务官员），联合执政，组成西藏地方政府，康济鼐为首席噶伦。阿尔布巴是工布地方的大农奴主，在西藏势力最大，对康济鼐任首席噶伦心怀不满，因此暗中挑拨达剌嘛嘛、隆布奈、札尔鼐和康济鼐的关系，谋夺康济鼐之权，独专藏政。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阿尔布巴举兵叛乱，杀害康济鼐。管理后藏的颇罗鼐即统领后藏和阿里的兵士九千，截断叛匪逃向准噶尔道路，同时进军拉萨，擒获阿尔布巴。雍正也命左都御史査郎阿率领陕西、四川、云南驻军一万五千人进藏，继续平叛。六年秋，査郎阿至拉萨，诛杀首恶。雍正封颇罗鼐为贝子，总管前后藏事务，后又为他晋爵贝勒。

为加强和巩固在西藏的统治，清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两名，留兵二千，分驻前后藏，归驻藏大臣统辖。因驻藏大臣系固定职务，不便频繁更换，又怕内地官员人藏生活上不适应，遂定三年一换办法。此时驻藏大臣的重要任务是管理清军，稳定藏中政局，与乾隆后期驻藏大臣与达赖共理藏务制度有所不同，但却是后一制度的发端。

清朝政府驱准出藏，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派驻驻藏大臣，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联系，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236至卷266。

《西域图志》卷首“准噶尔全部纪略”。

朱一贵起义

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年，南平三藩，北拒沙俄，东复台湾，西征准噶尔，奠定了大清帝国的基础。但频繁的战争使其无暇顾及财政问题，致使康熙末年财政混乱，私征严重，激起百姓频繁反抗。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浙江抚藩加派，引起民众数千人在衙门吵闹；湖南茶陵州也因私征重耗，被百姓围了衙门叫骂；康熙五十六年，河南宜阳知县加征火耗，激起当地民众起义；康熙六十年，台湾也因征收粮税苛刻，爆发了自清初以来的最大起义，这就是朱一贵起义。

朱一贵，福建漳州长泰人，康熙五十二年去台湾，任台厦道辕役，不久被革职。后以养鸭为生，联络群众，准备起义。康熙六十年春，台湾风山县令缺，知府王珍代掌县印，委其次子把持县政。其子昏庸无道，税敛苛虐，随意捕杀结会及违禁入山砍竹木者百余人，民不堪扰，奋起反抗。风山县民黄殿、李勇、吴外、郑定瑞等蓄谋起事，因一贵姓朱，可托为明代后裔，遂奉朱一贵为中兴大元帅，于四月十九在罗汉门举旗起义。台湾总兵欧阳凯派游击将军周应龙率兵进剿，一贵败走，周应龙滥杀乡民，焚掠村庄，激起群众更大愤怒，纷纷树旗响应朱一贵。杜君英、陈福寿、刘国基起于淡水；郭国正、翁义起于草潭；戴穆、江国论起于下埤头；林曹、杜赛、林连起于新圆；王忠起于小琉球。一时间，台湾民变四起，清廷应接不暇。

五月初一，朱一贵率众数万围攻台湾府城，与周应龙激战于

赤山，清军大败，周应龙狼狈而逃。总兵欧阳凯率兵一千五百人，在春牛埔列营以待，忽军中夜惊，镇兵四散，清军不战自溃。总兵官欧阳凯、副将许云、参将罗万仓、游击游崇功等先后被杀，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文武官员仓皇逃往澎湖，台湾全部落入起义军之手。五月初三，朱一贵自称中兴王，建号永和，分封部属国师、太师、公侯、都督、将军、尚书、总兵以下千余人。命兵民蓄发，皆戴明朝冠帽，为此民谣传说：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朱一贵发布讨清檄文，准备横渡大海，会师北伐，饮马长江，直捣清廷。但起义军刚刚控制全台，内部就发生分裂。杜君英欲立其子杜会三为王，不服朱一贵管束，且军纪败坏，掳掠妇女七人闭于营中。朱一贵出面制止，杜君英起而对抗，双方发生争战，导致分裂，势力大减。

六月初三，清廷命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兰廷珍率兵一万六千人，乘船600艘，渡海赴台，进剿起义军。十三日，施世骠、兰廷珍率军自澎湖进攻台湾，十六日在鹿耳门登陆。起义军内有纷争，外抗强敌，台湾地主武装乂乘机起而活动，义军作战失利。清军攻克安平镇，朱一贵率部撤退。二十二日，清军攻克台湾府城，闰六月初五，朱一贵率义军残部退至诸罗沟尾庄一带，部众四散。当地乡绅以牛犒徇其军，号召六庄乡壮相勋，至夜，伏兵出，朱一贵被俘，槛送厦门。闽浙总督满保命将其解赴北京。二十五日，参将林政等率兵征剿台湾南路；游击林秀等率兵征剿台湾北路。杜君英等战败，伏匿山林之中，至十一月受抚投降，但仍被清廷斩决。朱一贵被解送北京后，宁死不屈，被凌迟处死，起义最后失败。

朱一贵起义是清朝处于盛世时期的一次大起义，它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固有矛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清廷调整统治措施，查找民变四起的原因，认为，台湾民变皆因台湾文职官员平日不知爱民，只知图利

苛索所致，及民变一起，又首先带领家口弃城退回澎湖，实属可恶。遂下令将道员以下文职官员俱著捉拿，交总督满保、提督施世骠会同审明，即发往台湾正法。十二月，满保在厦门亲审诸文官，将台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礼，知县吴观城、朱夔等押赴台湾，斩于市；将已故知府王珍剖棺枭尸。通过此变，清朝政府看到内部存在的吏治混乱，私征严重的弊病，因此，雍正继位后即着手解决，创立提耗羡，设养廉制度，以求封建统治能够长治久安。

（杨丽英）

参考资料：

兰鼎元：《平台纪略》。

龚柴：《台湾小纪》。

连横：《台湾通史》。

《圣武记》。

储位之争

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已被立为储君三十四年的皇太子胤礽突然被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一场轩然大波，几位年长皇子拉帮结派，各施手段，演出一场激烈的储位之争。皇四子胤禛在竞争中隐蔽活动，后来居上，于康熙六十一年君临天下，成为继康熙之后的又一君主。

清代旧制本无立储制度，八旗旗主的联合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于努尔哈赤缔造八旗，德高望众，故得一致推戴，稳居汗位。努尔哈赤生前也曾两次试图建储均遭失败。[①] 努尔哈赤死后，由诸王、大臣议立新汗，四贝勒皇太极因得其兄大贝勒代善支持，遂在汗位争夺中获胜。皇太极死后，其幼子福临在诸王激烈争夺过程中荣登宝座。此后，由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的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因顺治帝福临生前已经掌握了上三旗，在八旗中居于绝对优势，故临终遗诏指定其皇三子玄烨承继大统，并以上三旗的四大臣辅政。可见，随着皇权的加强，皇储制度也发生变化，出现预立太子趋势。

康熙初年，辅臣鳌拜专横跋扈，严重侵犯皇权，使康熙更加意识到权力更迭之际皇权授受的重要性，与其让一位不会治理朝政的皇子由上三旗大臣辅佐，不如事先亲手选择，培养接班人，

① 参见前“汗位之争”一题。

以避免幼帝成年收回皇权时重蹈覆辙。且满族入关后受汉族传统制度影响较大，康熙深悉儒家经典，更加意识到皇权的连续与巩固是稳固清王朝统治的头等大事。“三藩”之乱，吴三桂伪托“朱三太子”蛊惑人心，则是康熙从速立储的直接诱因。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圣祖按照汉族立嫡立长的原则，诏告天下，立其皇二子、嫡长子[①] 胤礽为皇太子。

胤礽，康熙十三年孝诚仁皇后所生，二岁被册立为太子，此后，即得到康熙特别关心和教育。胤礽六岁拜师入学，教师经过康熙慎选，先后有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名儒，稍长之后，康熙即向他传授治国之道，加上胤礽天资聪颖，学业进步很快。史载其“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

胤礽身为皇储，地位显赫，其周围自然就聚集一批依附和拥戴他的势力，索额图即是其中代表。索额图是康熙朝已故辅政大臣索尼之子，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官居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深得康熙重用，势倾朝野，成为太子党的核心人物。随着众皇子的长大成人，朝中反对太子党的势力，也各拥戴一个皇子与太子党对立，于是朝中平静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大学士明珠，是康熙惠妃纳拉氏的哥哥，皇长子胤禔的舅父，为支持皇长子，联合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与太子党对立。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余国柱私结党羽，为维护太子地位，圣祖遂将明珠、余国柱等罢职免官。

随着皇太子势力的增长，胤礽与康熙本人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康熙二十九年，圣祖亲征噶尔丹，途中生病，想念胤礽，遂召其和皇三子胤祉进见。胤礽驰至行宫请安，面无忧伤之色，

---

① 皇长子胤禔为庶出，故嫡出的皇二子胤礽为嫡长。

引起康熙不满，认为其绝无忠爱君父之念，遂命其先回京师，父子之间由此出现裂痕。此后，父子矛盾逐渐加大。康熙三十三年，礼部拟定祭祀的仪式，将皇太子的拜褥放置在奉先殿槛内，康熙命移至槛外。礼部尚书沙穆哈怕将来皇太子怪罪，请求将谕旨记档，康熙很不高兴，遂将沙穆哈革职。康熙三十六年，圣祖又将私自在皇太子处行走的膳房人花喇等处死。康熙三十七年，又大封诸皇子。皇长子胤禔封直郡王，皇三子胤祉封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分别封为贝勒，这说明康熙已看到太子党人势力的增长对皇权的影响，所以着手削弱和分散太子党人的势力。诸皇子有了爵位，分别培植自己的亲信，觊觎储位。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人为图谋胤礽早日登基，更加紧活动。康熙四十二年，圣祖着手打击太子党人的势力，以索额图"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令宗人府将其拘禁，不久死于幽所。胤礽因长期储位东宫，地位特殊，进而狂妄骄纵，目空一切，随侍康熙巡幸南方时，勒索地方；并因一点小事就要处死地方官员。康熙为政注重宽仁，太子如此暴戾不仁，致使父子政见相左，矛盾日深。

康熙四十七年，圣祖巡幸塞外，皇长子胤禔皇太子胤礽及几位小皇子随行。返京途中，皇十八子胤祄病重，胤礽毫不关心，康熙以兄友之义责之，胤礽不思改过，反而忿然发怒，且每夜在康熙住的帐篷周围活动，窥测其父行动，致使康熙昼夜戒慎不宁，认为他有可能要谋害自已，以早登皇位，为索额图报仇。于是康熙一面命胤禔好好保护自已，一面先发制人。九月初四，于归途中召集诸王及副都统以上大臣以皇太子不法祖德，不尊祖训，暴戾淫乱，宣布将其废黜，回到北京后即将废太子幽禁于咸安宫。

太子初废，储位空缺，诸皇子为争夺储位更加积极活动起来。皇长子胤禔年纪最大，且又在康熙初废太子活动中身负护

驾之责，遂自以为储位有望。但康熙对其野心早有察觉，在废太子同时，就明确表示无立胤禔为太子之意。胤禔见谋位无望，转而支持与其关系密切的皇八子胤禩，言相面人张明德曾给胤禩相面，说其后必大贵。为根除后患，又奏请杀掉废太子胤礽，并不要父皇出面。康熙深为愤怒，斥责胤禔不谙君臣大义，不念手足之情。十月，皇三子胤祉揭发胤禔用巫术镇魇胤礽，康熙旨令追查，查出胤禔镇魇物件，康熙认为其欲谋害亲兄弟，残忍已极，遂将其革爵圈禁。

皇长子失势，其党羽转而支持胤禩，皇八子党势力大增。胤禩精明能干，善于邀结人心，因此在朝中有威望，党羽多，声势大。胤礽被废，康熙任命胤禩管理内务府事务，并命其审查前内务府总管凌普。凌普是原太子胤礽乳母的丈夫，仰仗太子势力，贪婪不法。胤禩为收买人心，包庇凌普，康熙斥为到处拉拢，妄博虚名，将皇帝所赐恩泽，归功于己，侵欺皇权，因此，康熙对之深为戒备，于是以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要结党羽、谋害胤礽等罪名，于十月将其锁拿，交议政处审理，不久革去贝勒王爵。

太子被废，诸子结党谋求储位，使康熙感到事情的严重，一再三令五申诸皇子不要树党倾轧，同时严禁满洲属人与诸皇子非法结党。然东宫虚位，毕竟给诸子结党谋位之望，于是再立太子，堵塞诸子争夺储位之心，就成了康熙的必然选择。胤禔事发后，康熙认为胤礽之所以暴戾乖常，是因受人巫术所致，遂有复立胤礽的打算。左都御史劳之辩揣摩到康熙要复立胤礽，抢先上书保举废太子，以图拥立之功。康熙认为其心术不正将之革职回籍。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召集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令从诸皇子（皇长子除外）中举奏一堪任太子之人。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散秩大臣鄂伦岱、侍郎揆叙、尚书王鸿绪等私相计议，与诸大臣暗通消息，保举八阿哥胤禩。康熙心目中太子仍是

胤礽，遂指出八阿哥未曾办理过政事，且又获罪，家母也出身微贱，不宜立为皇太子。但此事让康熙看到皇八子在朝中势力，颇为心惊，为削弱其势力，只有复立嫡长子一途。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九，胤礽复立为皇太子。次日，又分封诸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晋封亲王，七子胤祐、十子胤䄉晋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俱封为贝子，皇八子胤禩在此之前复封为贝勒。

太子复立，其党人也重新复聚。初废太子之后，朝廷内外许多人已感到皇太子地位不稳，胤礽本人更是如此，在背后常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觊觎御座之心溢于言表，因此希望早日登极，以免再生变故。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和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依附太子，重结私党。康熙五十一年，皇储矛盾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程度。九月三十日，康熙晓谕诸子，指斥胤礽复位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着将胤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向诸王、贝勒、大臣宣谕仍将胤礽复行禁固，复立三年的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康熙大失所望，于五十二年确定"不立储贰"的方针。

太子复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营求太子之争更加激烈。胤礽继立之心不死，康熙五十四年，乘清对准噶尔部用兵之机，用矾水写信，请求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为之活动，保举其为领兵大将军，以再谋复位。康熙五十六年，大学士王掞疏请再立胤礽为储，康熙不予理睬。次年一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也奏请复立胤礽为太子，并警告康熙不要弄出汉武帝杀戾太子那样的事件，康熙甚为愤怒，指责他希图侥幸，论罪处死。康熙六十年，大学士王掞、御史陶彝等两人再次奏请立太子，康熙认为其结成朋党，以为异日之荣，遂对之大加惩治，胤礽复位已无可能。

胤礽复废，胤禩因曾被朝臣保举而重燃希望之火。康熙五

十三年，胤禩亲向康熙试探，请示今后如何行走，寄希望于再次被荐举。康熙看出他的心思，警告他身为贝勒，不要做非分之想，于是父子矛盾加剧。同年冬，康熙出塞狩猎，胤禩因其母两周年忌辰，没有随行，及至康熙回程，胤禩自身并不迎驾，反遣太监送去两只将死的鹰，康熙气愤已极，大骂胤禩不孝不义。因胤禩党羽众多，在朝中势力较大，康熙怕其政变篡权，故加紧打击胤禩集团。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以胤禩行止卑污，凡应行走时俱懒惰不赴为由，停发他及属下护卫官员俸银俸米。同年十一月，又将胤禩门客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举人之名尽行革除，罪名之一是他把当今文章比作万历末年的文字，侮辱圣朝，并以此做为胤禩的罪证。至康熙五十五年，父子感情更加恶化，胤禩因患伤寒，大有离世之态，康熙不顾其死活，父子恩情已绝。

胤禩受挫，皇十四子胤禵活跃起来，积极谋求储位。胤禵，康熙二十七年生，母孝恭仁皇后，与皇四子胤禛同母，但一向依附胤禩。初废太子时，康熙下令锁拿胤禩，胤禵为胤禩开脱罪责，康熙怒而拔刀要杀胤禵，被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后康熙将胤禵鞭挞出宫。太子复立之后，胤禵晋为贝子。康熙五十四年，西北战事吃紧，康熙因年事已高，不能亲征，所派大将指挥军事又毫无进展，遂有遣皇子出征的打算。康熙五十七年，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远征西北，并让胤禵使用正黄旗旗纛，采用亲王规格，掌大军生杀重任之权。胤禵出征，被胤禩集团看成是康熙帝属意于胤禵将立其为太子的表示，因而这一皇子党又活跃起来，胤禵也把谋求储位看成头等大事。出征之前，胤禵一再要求胤禟报告康熙信息，说皇父一有欠安，即报信于我。康熙五十八年，胤禵在西宁把临洮张凯叫去算命，张说其有九五之尊，将来必定大贵。胤禵听罢高兴异常，连声称是。胤禵出征大有代父出征的味道，因此许多人把它看作胤禵向皇太子的过渡。但其他

皇子并没因此而放弃储位角逐。皇三子胤祉在胤禔、胤礽出事后，年龄最长，又受封王爵，在诸兄弟中地位特殊。其仰仗文才出众，且又与皇父感情较好，也在谋求东宫印绶。皇四子胤禛则隐蔽活动，不露声色，暗自制定了夺取储位的全面计划。

胤禛，康熙十七年生，母孝恭仁皇后，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初废太子时，康熙命胤禛与胤禔共同监视胤礽，胤礽说其从没想过弑逆谋父，请胤禛、胤禔代为转奏，胤禔不应，胤禛认为此话关系重大，即便得了不是，也要代为转奏。康熙听后，遂将胤礽项上锁链取下。初废太子后，康熙精神受到很大打击，身体虚弱。胤禛屡劝康熙治病，保重身体，康熙遂称其殷情恳切，可谓诚孝，康熙四十八年，晋封雍亲王。

再废太子后，胤禛以更大精力投入皇位角逐。康熙五十二年，胤禛集团成员戴铎上疏，为胤禛制定了夺取储位的全面的计划。第一，要以诚孝博得康熙的信任和宠爱；第二，要以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处理好兄弟间的关系；第三，联络百官，特别是康熙的亲信重臣，以影响皇帝考虑继承人时对胤禛有利；第四，大力培植雍邸①旧人，为建立江山培养基干。胤禛苦心经营，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绝不像胤禩那样锋芒毕露。康熙晚年，因诸子争储，天伦之乐大减，胤禛和胤祉经常请康熙到其在京西和热河的花园游玩，以博得父皇的欢心。同时，大肆网络势力，形成自己的集团，其中有皇十三子胤祥、康熙近臣贵戚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川陕总督年羹尧等。隆科多为佟国维之子、康熙孝懿仁皇后之弟，胤禛的舅父，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手握兵权，负责京师九门、畅春园及宫禁警卫，地位至关重要。年羹尧，为胤禛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其妹为胤禛侧福晋。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出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七年升任四川总

① 指胤禛的雍亲王府邸。

督，康熙六十年又晋升川陕总督，是胤禛在外的重要军事力量。

胤禛由于善于迎合乃父而在康熙末年日益受到重视。康熙五十一年，圣祖命其参加对胤礽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西北军事发生，康熙召见胤禛、胤祉，征求意见，胤禛极力主张征讨。康熙五十六年，因有人盗窃明朝陵寝，康熙命胤禛、胤祉等皇子查处，并令他们到各陵祭奠。同年，皇太后丧，胤禛与胤祉等承奉康熙旨意，转达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次年，皇太后梓宫安放地宫，康熙因病不能亲往，命胤禛去陵前读文祭告。康熙六十年，圣祖登极六十年大庆，典礼中尤为重要是往盛京三陵大祭，康熙因年迈不能亲往，遂命胤禛、胤祹及世子弘晟前往致祭。回京后，遇三月十八日万寿节，又命胤禛祭祀太庙后殿。同年冬至节，又命胤禛祭天于圜丘。康熙对祭祀，特别是祭天，历来看作是国家大事而加以重视，身体好时，都亲自进行。康熙晚年接连用胤禛代祭，反映了胤禛在康熙心目中地位的提高。

皇太子两次被废和诸子争储使康熙精力衰竭，身体虚弱，动转需人扶掖，步履难行，健康每况愈下。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圣祖南苑行围，十一月七日患病，返回畅春园。初九，因冬至将临，命皇四子胤禛到天坛斋戒，以便代行祭天仪式。十日、十一日、十二日，胤禛连续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请安，康熙均谕"朕体稍愈"。十三日丑刻，病情恶化，命从斋所召皇四子胤禛速归，接着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亲王胤祐、皇八子贝勒胤禩、皇九子贝勒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䄉、皇十二子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付以末命。戌刻，康熙崩于寝宫。隆科多即向胤禛宣布康熙末命。今存遗诏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皇帝位。"当天夜里，用銮舆载运康熙遗体，回大内乾清宫。胤禛在隆科多保护下先回大内迎驾。次日传出大行皇帝任

命胤禛继位遗言。胤禛任命总理事务大臣。封胤禩、胤祥为亲王，召胤禵回京，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颁布遗诏，十九日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坛，京城开禁。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极，受百官朝贺，正式继皇帝位，改元雍正，是为雍正皇帝。虚悬十载的国本及皇位继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纷繁复杂，康熙弥留之际的皇权授受又缺乏史料的记载，致使雍正继位成为清前期宫廷一大疑案。史学界目前对此研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致有二种说法。一为矫诏得位。认为康熙本要把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禵，任命其为抚远大将军，即是对其作为皇储的锻炼和安排；康熙并非正常死亡，极有可能被隆科多毒死，后篡改诏书，胤禛得以继位[①]。二为合法继承。认为康熙选择继承人注重孝道，胤礽因不仁不孝被废，胤禩等也因不孝而被斥责，只有胤禛以诚孝被康熙选中。有的史学家把皇四子胤禛继位放到康熙朝后期的储位斗争的全过程中考察，认为胤禛由于善于迎合乃父又有才干而在康熙末年日益受到重视，其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远比其他诸子高，是康熙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②]（本文从此说）。二种说法，各执一词，至今没有定论。但不管怎样，雍正继位之后，励精图治，采取强硬手段，结束纷争，巩固皇权，又对康熙末年的财政、社会积弊进行大胆改革，使清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从这点来说，他仍不失为封建社会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

（杨丽英）

---

① 参见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王钟翰《清世宗夺嫡考实》，见《清史杂考》，1963年中华书局版。金承艺《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见台北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期。

② 参见冯尔康《雍正传》。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

《清史稿》册三十。

《皇清通志纲要》。

《文献丛编》第一辑、第三辑。

《上谕内阁》。

平定青海之乱

清崇德二年（1637年），漠西厄鲁特蒙古之一部——和硕特部因与准噶尔部发生冲突，在其首领顾实汗率领下，离开原牧区乌鲁木齐一带，向东南迁移到达青海。不久，顾实汗又与西藏黄教首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合作，率兵进藏，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和黄教的联合统治，而在青海则分其部众为左右两翼，由其诸子率领。顺治十三年（1656年），顾实汗死，青海和硕特部失去统一力量，诸子纷争，并屡犯内地，清廷屡谕不改，成为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边患”。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平定噶尔丹后，才致力于青海地区的招抚工作，命阿喇布坦以及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诏抚青海和硕特诸台吉，并诏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到京，封为亲王。从此，青海和硕特蒙古与清朝政府恢复朝贡关系[①]。

康熙四十四年（1701年），顾实汗在西藏的后裔拉藏汗因第巴桑结推迟公布五世达赖之丧，并宣布自己择定的仓央嘉措为达赖六世，认为第巴玩弄阴谋，扶植傀儡，排斥他在西藏的势力，双方发生冲突。清朝政府因第巴桑结秘而不发达赖之丧，又曾和

---

① 早在清崇德二年，和硕特蒙古顾实汗即遣使入贡，向清朝政府献白驼一头，白马八匹，史称“九白之贡”，正式确立朝贡关系。

噶尔丹勾结，遂封拉藏汗为“翊教恭顺汗”，并于康熙四十八年，派侍郎赫寿去西藏，协助拉藏汗办理事务。

康熙五十五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趁西藏真假达赖之争之机，率兵进藏，杀拉藏汗。康熙五十七年，清廷以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藏平叛，同时命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护送六世达赖入藏，达什巴图尔之子罗卜藏丹津也随军前进。康熙六十年胜利后返回青海。由于青海诸台吉入藏“效力”有功，清政府遂晋封原为郡王的察罕丹津为亲王，封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罗卜藏丹津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中唯一的亲王，爵位高崇，西藏事乱平定后，本以为会接替拉藏汗统治西藏，然而西藏地方政府的成立使他大失所望。不仅如此，其在青海的势力也因察罕丹津及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的加封而受到抑制和削弱。因此，罗卜藏丹津对清朝政府怀有强烈不满。

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乘康熙逝世，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奔丧之机，胁迫青海诸台吉于巴尔巴罗海会盟，强令诸台吉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名号，并自称达赖混台吉统驭诸部。察罕丹津及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拒绝放弃清封爵，先后遭到罗卜藏丹津的袭击，察罕丹津逃往甘肃河川，向清政府求援。时雍正继位不久，朝中事务繁忙，不希望在边疆用兵，因此，世宗派在西宁的侍郎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处，令其罢兵，同时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办理平叛军务。但罗卜藏丹津不听劝告，反将常寿扣留，并伙同阿拉克诺木齐等大肆叛乱。元年十月，叛军首先在西宁周围发动进攻。与此同时，罗卜藏丹津同西宁附近塔尔寺的大喇嘛察哈诺门汗联系。察哈诺门汗在青海深得僧众信仰，他站到罗卜藏丹津一边，于是归附他的有二十万人，罗卜藏丹津势力大增。叛乱严重威胁清朝政府。反报到京，清朝政府决定出兵平叛。

川陕总督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后，征调川陕官兵，进

驻西宁，防止敌军进入甘肃内地，同时又于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处驻兵，截断叛军入藏之路；又命靖逆将军屯兵吐鲁番和噶斯口，隔绝其与准噶尔的联系。分兵就绪后，清军开始向叛军进攻，罗卜藏丹津率军西逃。雍正二年初，平叛战争进入专征罗卜藏丹津阶段。四川提督岳钟琪认为青海地区辽阔，敌军尚有10万，若深入其境，必会四面受敌，遂提议乘春草未生之机，乘其不备，直捣贼巢。世宗认为岳钟琪方案可行，遂命其为奋威将军，参督军务。雍正二年二月初八，岳钟琪与侍卫达鼎率军进剿叛军，俘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妹及叛军头目，罗卜藏丹津改着女装逃至准噶尔，投奔策妄阿拉布坦。此次大战，动作神速，历时十五天，世宗因此把它看作十年以来所未立的奇功。三月清军班师凯旋。四月，晋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岳钟琪为三等公。

战争结束后，雍正二年五月，年羹尧提出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清政府经过总理王大臣讨论后，采纳年羹尧建议，对青海地区实行一系列善后措施，以加强青海地区的管理。主要措施有：

一、首先在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共编29旗，规定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盟长由清廷谕旨指定。

二、规定朝贡和互市制度。原来和硕特人朝贡没有定制，现在将他们按部落分为三班，三年一班入贡，九年一轮回，贡时自备驼马，由口外进出。

三、确定蒙古人游牧地区。自西宁之北川口外到大通河、野马河及甘州扁都口外，修筑土墙，建设城堡，防止蒙古人进入内地游牧。

四、在西宁等处增添驻军，以便弹压。

五、在藏人居住区增设安西镇，在里塘设副将领，领兵1200名驻守。

六、对西宁周边可耕之地实行开垦屯种，征调直隶、山西、

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军罪人犯，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同时又招募西宁一带农民与驻军家属在西宁周围耕种，由地方官发放牛具种籽，三年之内，免于起科。

七、对喇嘛寺院大力进行整顿。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喇嘛教的传播日广，僧众愈多，喇嘛教寺院也日益增多。在康熙年间，青海喇嘛教寺院已达数千余所，仅西宁各寺，大者僧众二三千人，小者也有五六百人，寺院向平民收取租税，因叛乱时依附罗卜藏丹津，参加叛乱。有鉴于此，清政府在平叛后，对叛乱的主要据点塔尔寺，只许选留喇嘛300名，其余遣散。寺庙之房也不得超过200间，并规定不得收取民间租税，由清政府按人供给衣粮。

通过这些善后措施，清朝政府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康熙年间，清朝政府虽然分封顾实汗子孙为亲王，但对青海多数地区的管理仍是间接的。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了。雍正三年，清政府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即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命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青海政务；又改甘肃省的凉州卫为凉州府，新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改庄浪所为平番县，改甘州左卫、右卫为张掖县，改高台所为县。随着建制的改变，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圣武记》、《清史列传》、《文献丛编》。

查禁天主教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发展过程。唐太宗时，基督教首次传入，当时称为“景教”，存在约二百年后消失。元朝时，基督教再次传入，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明万历年间，基督教之一派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并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主张遵从中国传统的礼仪习惯，得到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信赖，使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得到很大发展。直到康熙末年，由于耶稣会内部名词与礼仪之争，罗马教皇颁布遵从中国习惯的天主教耶稣会为异端，触怒了康熙皇帝，从而掀起了百年禁教风潮。

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以来，虽经历明末“南京教案”和清初“历法之争”的两次打击，但到康熙末年“名词与礼争”之前都是顺利发展的。原因是天主教顺应了中国传统的礼仪习惯，在这里，利玛窦所创立的传教方式起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深知中国把祭天、祀孔、拜祖视为头等重要大事，但就基督教教义及仪式而论，崇拜偶象，即为触犯十戒之一，为教会所不许。为在中国传教，利玛窦特为此解释，认为中国人的祭天、祀孔、拜祖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崇敬、怀念之情，并非迷信与偶象崇拜，与天主教崇信上帝没有根本冲突。正因为如此，利玛窦所主张的天主教才会被中国所接受并得以发展。但十七世纪后，随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葡萄牙已不能垄断在中国的传教事业。1600 年，罗马教皇宣布其他教会也可以进入中国传教，于是多明我会和方

济各会先后进入中国。随着其他修会的东来，利玛窦所主张的传教方式受到冲击，从而引出一场“名词与礼仪之争”。

所谓“名词”，即对“God”的名称问题。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所祭祀之天非“苍苍有形之天”，而是敬“天地万物之原”，因此主张“天”、“上帝”、“天主”同义，三个名词均可使用；所谓礼仪，即是中国人的祀孔与祭祖。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祀孔与祭祖只是表示一种崇敬和感恩，并不带有宗教含义，因此主张采取通融态度。而其他修会传教士却认为耶稣会出卖了天主教义，向迷信妥协，遂向教皇提出指控。顺治二年（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下令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和祀孔仪式。耶稣会对此深感不安，于是派传教士卫匡国于顺治十年前去罗马，申明其他修会对礼仪问题的歪曲，请求教廷再议。顺治十二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又下令准许中国教徒祀孔和祭祖，但又不宣布顺治二年的禁令作废，从此，两派传教士莫衷一是，“名词与礼仪之争”愈演愈烈。

正当两派激烈争论时，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刘英、洪若望等把“礼仪之争”推到康熙皇帝面前，询问中国的祭祖与祀孔是否含有宗教的性质。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发布上谕，指出中国的祭祖与祀孔只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是纪念先祖过去的善行，并不含有宗教性质。其他修会认为，这本是教会内部之争，应由教廷解决，求助于异教徒的中国皇帝，实在不当。为此，多次投诉于罗马教皇。康熙四十二年，罗马教廷派遣罗多携带教廷禁约前来中国，要求在中国的天主教只许用“天主”二字，且不许悬挂“敬天”的匾额，入教之人亦不许祭祖、祀孔。康熙见此约文后大为不悦，遂于康熙四十四年将罗多逐出京师。

罗多离开北京后，到达南京。在南京，罗多颁布教皇禁令，谴责耶稣会允许祭祖和祀孔为异端和非法，并声称凡违反禁令之人必须逐出教会。罗多此举，更加引起康熙不满，他一面命人将

罗多押送澳门看管，一面发布上谕，凡外国传教士必须领有朝廷发予的准予传教的印票，而且必须遵守中国的礼仪。否则一律不许在中国传教。为求得一妥善办法，康熙皇帝特派传教士白晋、沙国安前往罗马，谒见教皇，以期禁令有所改变，但罗马教皇坚持原议，不仅重申禁令，还宣布凡教士都必须宣誓遵守禁令，如有违背，将被逐出教会，康熙皇帝愈加不满。但为平息教仪之争，康熙皇帝又特谕在华之各派传教士，只要遵守利玛窦时的规矩，热衷于科学事业，恪守天朝法度，即可以与耶稣会一样在中国同居同住，否则将对之处以驱逐和监禁。但罗马教廷一味坚持原来的禁令，并指使方济各等各派传教士抗拒清廷法令，排挤耶稣会士，从而使矛盾愈加尖锐，这样就促使原本排斥基督教的地方官员，纷纷站到教会的对立面，上疏弹劾，请行禁教。康熙五十五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上奏，以天主教"招集匪类"、"居心叵测"为名，请行严禁。次年，两广总督杨琳再次具疏奏请朝廷，要求禁止西洋教士在清廷辖境内传教。清朝政府为此复申前旨，禁止百姓自由入教，并将未领有印票的西洋教士遣返澳门，从此，百年禁教浪潮由此开始。但康熙晚年仍重视耶稣会传播西方科技之功，因此禁教并不严格，及至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才严格执行了康熙的禁教命令，对各省教士均遣送澳门，或安插广州天主堂，不许他们潜入内地，同时，严行禁止中国人入教。

雍正之厌恶天主教，起源于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康熙末年，两废太子，储位虚悬，各皇子拉邦结党，觊觎皇位。皇九子胤禟与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穆敬远关系甚厚，穆敬远曾为其上奏，请求康熙册立胤禟为储，康熙对之大为不满，斥责其活动为僭越。但穆敬远仍不死心，特往塞外策动年羹尧，并赠以珍宝，要其为拥立胤禟出力。皇八子胤禩也为求得储位而积极活动，其党羽苏努信奉天主教，其子十三人，其中受洗入教者即达九人。苏努积极为皇八子胤禩夺得储位而努力，对此皇四子胤禛

早有不满。康熙六十年，圣祖去世，临时指定皇四子胤禛承继大统，是为雍正。雍正的继位，打破了皇八子党希翼储位的梦想，因此他们势必会联合起来反对雍正。而雍正继位之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急于要铲除昔日的政敌。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保疏奏，以天主教煽惑人心、毫无裨益为由，请严行禁教。由于苏努父子和耶稣会传教士穆敬远参与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导致了雍正皇帝对于天主教的怀疑和憎恨，于是于雍正二年颁布谕令，通令各省，着国人之信奉天主教者立即放弃，否则处以极刑，各省的传教士限半年内离境，前往澳门。

雍正禁教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当时全国教徒已达三万，教堂已有三百个，雍正禁教后，各省教堂均被没收，改为谷仓或仓库、书院、公廨、庙宇等，民人入教也大大减少。以后乾、嘉二朝都奉行雍正朝的禁教政策。

（杨丽英）

参考资料：

罗光：《利玛窦传》。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

《世宗实录》卷 14、卷 27、卷 37、卷 45。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项重要的赋役制度，于雍正年间推广于全国。但作为一种赋役改革，则是沿袭明代“一条鞭法”而来。明代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以实物为主的田赋征收和以力役为主的差徭，越来越为人们所厌弃，因此，将税粮改为折银，用代役银替换力差就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要求。明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首倡实行“一条鞭法”，后经张居正大力提倡，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全国。所谓“一条鞭法”，即将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徭役合并，由地方官按人丁和田亩摊派，这就是“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并规定农民可以出银代役，由官府雇工应差。这样就使明朝赋役制度中出现赋役合并，役归于地的倾向。虽然作为封建社会中差役的基本敛派对象——人丁尚未完全取消，但它改变了以往以力役为主的徭役而课取代役银，即丁银。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有的州县以丁银摊入田粮，县户人丁不另派征，出现“随粮派丁”、“丁随田纳”等作法，这就是后期“摊丁入地”的雏形。但有明一代，仍以“田赋”和“丁银”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摊丁入地只是一种尝试，并常常被地方官用作解决“丁役无着”的权宜措施。

清人关后，即沿袭明朝制度，以“田赋”和“丁役银”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所谓田赋，即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向政府交纳的税额；所谓“丁役银”，即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丁，

每年向政府无偿地负担一定的徭役。不负担力役了，需交代役银。顺治元年（1644年）御史宁永勋以明末以来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赋役征收毫无根据为由，提出重新编纂赋役全书。当时清刚刚入关，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因此清朝统治者重新编纂赋役全书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顺治十四年，清朝的统治在关内已趋稳定，才命户部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三饷和杂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天下，并造鱼鳞册和黄册，以详载上中下田则和户田登记，按照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但清贵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必然会遭到比历代改朝换代时更为强烈的反抗。为笼络人心，清朝统治者所收“正赋”额数并不高，将民田分为上、中、下三则，分本征、折征或本折各半。本征曰漕，有正粮、杂粮等（正粮为米，杂粮为豆、麦、荞、麻等）；折征始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但除正赋之外，清朝统治者还征收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如火耗、鼠耗、雀耗、私派等，这些附加税有的高达正赋数倍，使百姓不苦于正额之赋而苦于赋外之赋。至于丁役，则各省多少不等，大多沿袭明代旧制，或丁随地派，或丁随丁派，但就全国而言，主要按丁征收丁银。清朝统治者对于征收丁银非常重视，规定了户口编审制度，以明万历年间为准，原定三年一行，后又定为五年。但自明万历年后，战争不断，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田地、人丁的实际数额与明万历年间的差距很大，因此，地方官员为向清朝政府缴足田赋丁银，只好不断多征多派，反映在丁银征收中，通常是把逃亡故绝的人丁额银，摊派到现存人丁身上，从而造成每丁负担的大大加重，不但一般农民无法承受，甚至连中小地主也都面临破产的危机，有些地区甚至出现“现丁变为逃丁，而逃丁永不复为现丁”的严重局面。康熙年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人口、田亩数目不断增加，如仍按顺治年间编的《赋役全书》征收赋役，根本无法按户

增徭，因地加赋，严重影响清朝政府的国库收入。于是康熙二十四年，圣祖下令重修赋役全书，名曰《简明赋役全书》。赋役本按地亩、人丁来征收，但全国的地亩数、人丁数的统计很不准确，每户占有的土地数目经常在变动，清政府虽十年大造以清田，但官绅豪强可以恃势少报土地数目，以逃避田赋负担；且人丁数目，有生有死，有成丁有除丁，虽然五年编审可以清丁，但有势力有关系者可以隐匿丁口，平常百姓也可以逃亡外地，因此，地亩、人丁总是清查不出确定的数目，赋役的征收也就没有比较可靠的依据。因此，赋役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丁银又是赋役制度矛盾的焦点，丁银加重，使无田者力所不能负担，加上绅衿规避，丁役、差徭不均，因此，康熙年间农民“随地派丁”，“从田起丁、人不纳丁”的斗争一直不断。为解决丁银混乱问题，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人丁户口数字为准，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不再承担丁银，此项政策固定了丁口税，对于后世不断增加的人丁讲，减少了丁银负担量。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没有取消人丁税，丁役负但不均的现象依然如故，因为人口总在不断变化，如何在具体的民户中除开旧的丁银额，增添新的丁银额就需要重新解决，且由于人丁的增多，原有人丁的负担也要相对减少，这样就需要重新计算每一个人的丁银量。因此，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之后，寻求落实人丁丁银的具体办法就成为当务之急。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统计丁银总数，平均摊人田亩，按亩征收。此议送交户部讨论，认为改变丁、粮分征办法变化太大，不宜在全国推行，遂让四川、广东两省试行。于是四川实行“以粮载丁”的办法，于征粮赋中代收丁银，而广东则把丁银按亩分摊。但康熙年间的这种摊丁人地的改革，遭到一些官僚的极力反对，福州人李光坡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并丁于粮实行久了，会添没丁课，形成加赋。终康熙一世，摊丁人

地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雍正继位之后，山东巡抚黄炳于雍正元年六月首先提出按地摊丁，以苏民困。黄炳身为封疆大吏，更感到丁粮分征下贫民逃亡的严重性，因此主张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七月，直隶巡抚李维均也以有益于贫民为由，奏请摊丁入地，并要求雍正乾纲独断，批准他实行。世宗遂将其奏章交与户部讨论，并指示要慎重处理筹谋善策。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均意见。雍正又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议，诸臣提出：一、亩有大小，按亩分摊，并不平均；二、如果有人卖田，必先卖出好田，剩下次田，那么再完丁银就有困难；三、有人卖田而代买主纳钱粮，这就有还要代纳丁银等问题。雍正命李维均详细筹划，力争做到于国课无损，于穷黎有益。李维均回奏，欲把地亩分为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就不至于好坏地负担不均，甚得雍正赏识，于是雍正二年开始实行。自此至雍正九年，福建、山东、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省都相继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而山西和贵州则较晚，直到乾隆中期才逐步实现。只有奉天府因民人入籍增减较大，户籍无定，仍旧丁、粮分征。

摊丁入亩大体以州县为单位，将康熙五十年（1711年）该州县的丁银数作为应征额，平均摊入田亩随土地税征收，其具体作法有两种：一是将一州县的丁银平均摊人地粮，即原纳田赋银若干，再加纳平均摊入的丁银若干，由土地所有者统一完纳，田赋、田粮多的，摊入的丁银就多；二是把丁银平均摊入到田亩之中，田亩、土地多的，摊入的就多。两者虽同为摊丁入地，但有所不同，田亩有肥瘠的区别，田粮是根据土地等级确定的，所以摊入田粮较为合理。因此大多数地区采用这种方法，摊入数额大体是每地粮一两，摊入丁银二钱左右。

封建社会末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另外，全国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民的大批流亡和激烈反抗，封建国家越来越不容易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直接向农民征纳人口税变得更加困难。而摊丁入地，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长期以来按土地和人口双重收税的标准。把丁银摊入田亩中征收，保证了清朝政府的丁银收入，同时，摊丁入粮，使有土地的人增加了赋税，而无地贫苦农民则免交负役银。因此，摊丁入亩在封建社会后期是损富、益贫、利国的重要改革，是值得重视的历史事件。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 249。

《大清会典事例》卷 133。

《养吉斋余录》卷 1。

《朱批谕旨》。

耗羡归公与定养廉银制

清圣祖康熙末年，吏治松弛，财政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共发生贪污纳贿案件 30 次，平均每年 3 次[①]，致使各省藩库钱粮亏空共达 913 万余两，米谷 242 万余石，严重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国库收入。清廷中央户部存银，康熙四十八年为 5000 多万两，到康熙六十一年则降为 800 多万两[②]。财政危机严重影响着清政权的巩固。地方官以“耗羡”为名，私征加派，收取陋规。耗羡，亦称“火耗”，起自明代。由于田赋由征粮改为征银，各省上缴国库时，需将碎银再加铸造，熔炼成一定数量的银锭，方能起解。因此，销熔时的损耗，即在州县催征田赋时追加出来，取盈以补，追加多少，全由州县自行掌握，成为地方的一项习惯性的主要收入。清军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曾宣布禁征耗羡，但事实上办不到，至康熙年间，耗羡又得朝廷默许，征收日益严重，致使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加上各级官吏恃势加派各种名目的附加税，使民间每年于正项钱粮一两之外，有多纳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者。私征耗羡，加派繁多，致使百姓负担过重，民怨沸腾。康熙中叶以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农民反

---

① 参见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见《清史论丛》第五辑第 51—52 页。

② 同上书，第 145 页。

加派斗争时有发生。而清初官俸微薄，经费不足，又使官吏贪污、收取陋规之风愈演愈烈。清廷一品大员仅岁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七品官仅岁银四十五两，禄米二十二余石。而清廷各级官员的家庭开支远远超过原俸数十倍，入不敷出；且各级行政机构办公经费又极少。康熙二十年规定：各衙门官员每月公费，左右宗人、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总管銮仪卫事内大臣各五两；侍郎、学士、通政、各正卿、内务府总管、詹事、宗人府府丞、佥都、銮仪使各四两；以下各官递次为三两、二两二钱、一两五钱、一两。且外官治理地方，私人支出费用甚多，许多虽系因公所致，但照例亦不得动用正项报销，如宴请幕宾、置办府邸用器、丁忧回乡盘费等，于是各级官吏只好加征耗羡，从中提取费用。连被康熙誉为本朝不可多得的清官陆陇其，在任嘉定知县时，也不得不于每两田赋中加征四分火耗。尽管如此，其属下胥吏仍去者过半，或“退为耕贩以自活”。因此，清廷禁征耗羡非但不可能，反而愈演愈烈。

上述这些弊端严重威胁着清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耗羡私征，一使官吏贪污有据，州县藉以滥行加派，侵蚀正赋；二使吏治败坏，州县私征以奉上司，上司收受以庇下属。因此，解决耗羡私征实际上是解决财政亏空、整顿吏治的一个关键。因此雍正即位之初，即针对此弊进行改革，提耗羡，设养廉，以解决康熙末年出现的财政与社会危机。

耗羡部分归公建议，始自川陕总督年羹尧。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年羹尧与陕西巡抚噶什图同向朝廷上疏，指出秦省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及四五钱者，遂请酌留各官用度，其余捐出，以弥补亏空。康熙皇帝怕担当加赋之名，即批断不可行。雍正元年（1723 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请雍正皇帝，提出令州县官在原有耗羡银内节省出二成，交布政司库房，以充一切公事之用，此外丝毫不许派捐，雍正立即加以支持，并鼓励他好

好实行。同年，山西巡抚诺岷因该省耗羡问题严重，遂上疏奏请将通省一年的耗银提存布政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其余分给各官养廉，比较完整地向朝廷提出了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建议，雍正即批准其在山西实行。雍正二年正月，河南巡抚石文焯折奏：该省共有耗羡银四十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下留十五六万两解存藩库，弥补亏空，将办公费用亦出于耗羡之内。雍正认为此法说得通，行得去，遂批准实行。在雍正支持下，山西、河南首先实行耗羡归公的改革。

雍正二年六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请将耗羡归公之法令各省通行，世宗即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会议。吏部右侍郎沈近思认为耗羡归公使火耗与正赋无异，不是善法，指出今日于正项之外又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又添耗羡。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及御史刘灿也都反对提解耗羡。雍正见讨论不得统一，遂于二年七月初六发出上谕，指出：州县火耗，本非应有之项，但由于官俸微薄和经费不足，耗羡一时难以避免；但历来火耗，均由州县掌握，加派横征，侵蚀国帑，又以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也取于州县，于是上下徇情，吏治不清。为清除此弊，必须实行耗羡归公，把耗羡银两的控制权由州县转到各省督抚手中，改过去由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为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从而达到澄清吏治、消除亏空的目的。于是，雍正决定推行提解耗羡制度，各省督抚纷纷响应。从雍正二年到雍正七年，浙江、甘肃、贵州、四川、陕西、广东、云南、江西、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奉天等地先后实行。由于耗羡归公事属草创，办法还不完善，有的州县在起解银两时，擅自多留地方公用的火耗银，因此雍正要求州县官把耗羡银尽数提交藩库，然后再由省里酌情分发，这样就避免了州县官的擅自扣留。耗羡银尽数提解，使州县官意识到多征未必对自己有好处，于是许多地方

的耗羡率均有所下降[1]，康熙末期的狂征滥派现象也有所减轻。

实行耗羡提解后，雍正又大力倡导取缔陋规。清代，地方官中的下属对上司馈送礼金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上司身兼数职，还要奉送几份礼物，因此地方官为完成规礼，横征加派十分严重。雍正继位之后，即注意革除这一弊病。雍正元年，世宗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在计议耗羡归公时认为若规礼不除，州县官还会在耗羡外再行加派以奉上司。因此请将巡抚衙门所有司道规例、府州县节礼及通省上下各衙门一切节寿规礼尽行革除。得到雍正的赞许与支持，于是取缔规礼活动在全国展开。有些官员对规礼贪恋不放，雍正即将其严加处理，以示取缔陋规的决心。雍正五年，御史博济到江南，勒索驿站规礼，江南总督范时绎即行参奏，雍正遂将博济革职，并交当地大员严审具奏。雍正六年，山东蒲台知县朱成元馈送规礼事发[2]，雍正命河东总督田文镜等对其进行审查。田文镜认为：欲禁州县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遂请清廷严行整饬。雍正九年，世宗发出上谕，通令全国，严禁收受规礼；倘有再私受规礼者，不仅该员置之重典，其所在省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耗羡私征本是地方官吏半合法的一项重要额外财源。提解耗羡归公，等于断绝了地方官的一条财路，国家又不增加薪俸，如不另辟财源，官员枵腹办公，必致苛索于百姓，重新导致吏治混乱。于是，清廷决定从耗羡银中提取一部分，发给从总督巡抚到知县巡检等各级官员一定数量的银两，以充养廉之资，名曰养廉银，即是给官员生活、办公的补助费，以此不许他们贪污，保持

---

① 参见冯尔康《雍正传》第153页“耗羡归公后各省火耗率简表”。

② 山东蒲台知县朱成元在任多年，一直给巡抚、布按两司各官送礼，并有册簿进行登记。雍正六年被人揭发，世宗即命田文镜审理此案。

廉洁奉公。各官养廉数目，主要依据官职高低、事务繁简、地方冲僻和耗羡多少等标准确定。一般说来，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察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这样，地方官员的养廉银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①，收入有了明显增加。

地方文官养廉问题的解决，使八旗、京官、武职薪俸微薄的现象更加突出。因此，雍正五年，世宗谕令动用两浙、两淮盐课余银四万四千余两，分给旗下大臣及八旗都统以下至参领各官为养廉银两。雍正六年，又下令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俸银、俸米双倍给予。但双俸仍满足不了京官的需求，于是雍正十一年，又谕令将直省应解饭银九万四千余两分给户部各级官员养廉之用。至乾隆初年，又陆续赐于各部官员养廉银，但其数额远少于地方，最多者不超过五千两。

武官养廉，起于吃兵丁空额。顺治年间即准武将各招随身亲丁若干发给名粮，并不问实额，于是武官纷借亲丁粮食之名任意虚冒。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议准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各定亲丁名粮数目，作为养用家口仆从之需。虽有定额，但各官仍开造虚名上册，于定额之外贪污更多的兵丁名粮。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世宗始命将亲丁名粮裁去勿庸开造，武职随粮亦改为养廉名粮。至乾隆八年（1743 年），正式批准武职俱照文职之例支食养廉名粮，遂为定制。到乾隆四十七年，确定武官养廉数额，提督二千两，总兵一千五百两，副将八百两，参将五百两，游击四百两，都司二百六十两，守备二百两，千总一百二十两，把总九十两，至此，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均享受了养廉银。

---

① 参见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载于《清史论丛》第五辑第149 页。

清廷规定，无论是中央官还是地方官，一般都按季支取养廉银，其用途主要是供大小官员养赡家口，对于督抚来说，还要从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宴请幕宾、犒劳兵丁和公出盘费之用。

提耗羡、设养廉的财政改革实行后，清廷的一些旧官员仍力图破坏。有的主张将耗羡提解到户部，企图以此纳入正项银粮，再以地方公用无着为由，重开私征。为了进一步控制提全省司库的耗羡使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世宗命户部查明各省公费养廉银两，并未造册咨送及笼统开造者，限期造清册上报，从该省议定公费养廉年份起，将额征公费，完欠杂支、余剩未给数目，按年归款；各官养廉起止日月、应得份数、扣除空缺等等，一一注明，以后按年分类造册，随同奏销钱粮咨送户部核销。至此，提耗羡、设养廉的改革大体完成①。

耗羡归公和设立养廉银制度，使原先被侵蚀的国赋，用本来为地方官私有的耗羡加以补充，以此保证清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使国库充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清朝的财政经济开始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出现了国库日渐充裕，国家财用充足的好前景，为乾隆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提解耗羡后，地方官自知多征对自己并无多大好处，还要落下不好的名声，再加上取缔陋规的实行，基本扭转了康熙后期狂征滥派的现象，多少减轻了一些人民的负担；同时用提解耗羡的部分银两作为官员养廉之用，增加了大小官员的薪俸收入和地方的财政经费，从而打掉了他们恣意贪污苛索的种种借口，在雍正帝的威严执政和妥善管理下，清初官吏贪污纳贿之风被缓和下来，吏治状况有所好转。耗羡私征本

---

① 关于养廉银制定于何年，今人有元年、二年、五年三种说法。孟森《明清史讲义》和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皆持五年说。本文认为，清代养廉银制度发端于雍正元年山西诺岷之举。确定于雍正二年七月廷议之后。

是州县把持的地方私权，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不予过问，致使侵蚀正赋，国库空虚。改革之后将耗羡提至省里掌握，朝廷以年终造册进行监督。至乾隆五年又将耗羡公开掌于户部湖广司，使耗羡取之有定数，用之有定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领导。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确立，把附加税变成实质上的正税，对非法的盘剥加以承认，对官员的额外搜求亦给予有限度的认可。它的出现，使加赋、贪污的丑行部分地公开化和合法化，因此，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弱点所在，以全面认识雍正所实行的提耗羡、设养廉的改革。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卷241、265。
《清世宗实录》卷26、66。
《清史稿·杨宗仁传》。

清理积欠

清圣祖康熙末年，吏治松驰，地方财政弊窦丛生。地方官以"火耗"为名，私征加派；官场陋规累累，贪污成风，加上地方豪强包揽侵蚀，致使钱粮短缺，国库空虚。为保证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雍正继位之后，即把整顿财政、清查赋税放在首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三日，雍正刚刚继位一月，即命户部全面清查钱粮，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必如数补足，不得苛派民间或借端遮掩。雍正元年，又于中央设立会考府，稽核办理部院钱粮奏销之事。同时清查地方亏空也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雍正通过罢官、抄家、籍没等手段处理了一批亏空钱粮的赃官，三年之后，初见成效。雍正二年，世宗又实行提解火耗，设立养廉银制度，使恣意加派、收受规礼、贪婪勒索的恶劣风习有所改变。但民间豪强包揽侵蚀、拖欠钱粮的现象依然严重，江南地区尤甚。于是，从雍正五年起，开始在江南地区清查、追索民间欠粮，史称清理积欠，它是雍正为保证财政收入的另一项措施。

雍正五年（1727年），江苏巡抚张楷上奏，指出江苏省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的十二年中，积欠赋银共达八百一十万两，其中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积欠最多，达一百四十万至一百八十万两之间，遂请求将积欠分十年带征，雍正予以首肯。于是，清理积欠活动先后于江南等省展开，省份涉及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湖北等省，时间大致

在雍正五年至雍正九年之间完成。

雍正五年，江苏巡抚张楷奏称将江苏积欠分十年带征，雍正即命实行。但江苏吏治民风颓敝已极，无法落实，遂于六年命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率领候补、候选州县官四十余员前往，分赴各州县清查，追索欠粮。因系多年积欠，要在短时期内一并征收，所以又叫“汇追”。对于补清欠粮的民户，官吏即用红笔在门首写明“清查”二字，不能补清的即投入监狱追补，一时间，“狴犴累累，无囚容处”，造成民心惶恐、社会不安。为使清理积欠更好地进行，雍正七年，世宗下令暂时停征欠赋，要求官员首先查明积欠中官员侵占、胥吏及包揽人侵蚀及民间拖欠的数额，然后分别处理。雍正九年清查完毕，查出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江苏省共积欠一千余万两，其中官侵吏蚀、豪民包揽为四百七十二万两，民欠为五百三十九万两，雍正遂命将侵蚀的分作十年带征，民欠的分作二十年带征，这样就使江苏清理积欠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浙江钱粮的清查，世宗命性桂为钦差大臣，会同浙江督抚李卫协同办理。经过三年带征，将雍正二年至五年未完的赋银七十七万两带征了四十余万两，其余积欠也可在限定时期完成。福建省经钦差大臣杨文乾、许容查核，从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四年共积欠四十四万余两，其中属于民欠的有三十三万多两，雍正帝命从雍正五年开始带征。六年，福建欠收，雍正即命蠲除，不再带征。雍正七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报山东欠银三百万两，雍正命连年带征。但因山东逋赋较多，到乾隆元年，还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至雍正十二年仍有带征未完积欠三百万两，山东对于积欠，采取一面带征一面拖欠的作法，所以总有巨额欠粮。安徽积欠集中于凤阳府，知府朱鸿绪分清哪些是胥吏地棍的包揽侵蚀，哪些是民间欠粮，分别立出清偿办法，二年内补交完毕。湖北省共积欠二十万两，雍正七年以前输纳了九万两，其中沔阳一

州欠赋最多，从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五年共欠八万余两，其中绅衿包揽的有百分之四十，衙役侵蚀的为百分之四十，民户拖欠只占百分之二十。

从江南各地清理积欠的实际情况看，其对象包括侵占钱粮的官员，包揽钱粮的胥吏和绅衿及拖欠赋税的有田民户。欠粮的田户，成员比较复杂，有绅衿、中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按当时的概念则是官吏、绅衿及平民三种。雍正指示要区分侵欺、包揽、民欠三种类型，也是针对这三种人而言，追索民间欠粮则是重点。

清理积欠，使一部分绅士和富人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打击，有人出卖田产清偿积欠，此后要按时交纳新的钱粮，还要承担摊入田亩的丁银，因而感到买田出租并不合算，土地兼并的热情随之稍减，江南地区土地价格显著下降。据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顺治初良田二三两一亩，康熙年间涨到四五两，雍正时恢复到顺治初年的价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复上涨，到乾隆中期增至七八两至十两以上。雍正年间田价没有上升，土地兼并速度减慢，同雍正实行的各项赋税政策密切相关。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卷 3。

《上谕内阁》。

《清高宗实录》卷 17。

签订《恰克图条约》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境界限，双方也开始贸易往来。但沙俄侵略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继续骚扰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使中俄中段边界形势日益紧张。

包括贝加尔湖一带在内的蒙古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战国时期，我国的匈奴族人民就在这里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到三国、北魏、北周、隋时期，鲜卑、柔然、突厥继起，领有其地。唐朝时，打败突厥，在这里设官建制，建立安北都护府。辽金时代，成吉思汗崛起于此，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于是大漠以北、贝加尔湖一带归元朝岭北行省管辖。明朝时，漠北地区归属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明末归属为漠北喀尔喀蒙古属地。清崇德三年，喀尔喀蒙古向清朝纳九白之贡，正式臣属于清朝。

沙俄在侵略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同时，也不断骚扰我国蒙古边境，引诱中国边民，制造叛逃事件，清朝政府多次行文俄国，要求迅速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但俄国政府置若罔闻。康熙五十一年，准部策妄阿拉布坦与清朝关系紧张，战争迫在眉睫，圣祖欲联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准噶尔压迫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的

土尔扈特人[①]，共同对敌，遂欲派使团前往探望，这样就需假道俄国。俄国以发展双方贸易及增派传教士来华为条件。结果，图理琛使团假道俄国去土尔扈特部，并于康熙五十四年回国时带回俄国修士大司祭。康熙末年，清朝政府同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发生战争，沙俄乘机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侵略颠覆活动，妄图诱使准噶尔部臣服俄国。清朝政府为抗议沙俄的侵略活动，于康熙六十一年下令停止中俄贸易，拒绝库尔齐茨基主教入境，并通知俄国商队离开北京。中俄关系又趋紧张。

雍正元年（1723 年），一部分被清军俘获的准噶尔叛乱分子逃亡俄国，清政府致书要求索回逃人，沙俄置之不理，世宗遂决定拒绝次年应入境的俄国商队来华。沙俄深感中断贸易对其不利，遂于雍正二年初表示要部分遣返中国逃人。清朝政府遂派一等公、都统鄂伦岱和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前往边境洽谈，要求解决边界和逃人问题。雍正三年，俄国新沙皇叶卡捷林娜一世派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出任中国大使，表示要谈判两国贸易和划界问题。但萨瓦受命之后，一面组织人员绘制中俄边境地图，一面准备钱货以收买清朝官员和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以在谈判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雍正四年，清政府派原理藩院尚书一等公隆科多前往喀尔喀边境查看，等候与俄国代表会谈，并命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散秩大臣四格等为谈判成员。同年夏天，隆科多、四格与萨瓦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萨瓦要求率领商队与库尔齐茨基主教共同入京朝见雍正。隆科多同意萨瓦进京，但商队和教士则留原地，等待谈判后再决定行止。十一月，萨瓦到京朝贺雍正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有吏部尚书察毕那、

① 土尔扈特，原为漠西厄鲁特蒙古之一部。明崇祯元年向西迁移至伏尔加河流域，乾隆时返回。

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等。此次谈判并没有达成具体协议，只是讨论了一般原则。但萨瓦在京期间，乘机收买中国官员马齐，获得中国谈判代表团内情，得知中国方面渴望和平，遂拟采取武力威胁的手段，在边境上增派兵力，来为沙皇获取更多利益。半年之后，萨瓦回到布尔河，与隆科多、策凌、四格、图理琛继续会谈。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所侵占的喀尔喀土地，萨瓦竟蛮横地以发动战争威胁中国放弃领土要求。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底本事发，清廷遂把他从谈判代表团撤回治罪，另以策凌、四格、图理琛等继续与俄国谈判。隆科多走后，中国代表团没有坚持以往的要求，于五年七月，在布尔河畔签订《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把恰克图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此后，双方在此条约和前此在北京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拟成总条约草款，于六年五月（1728 年 6 月 25 日），双方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字，这就是《中俄恰克图条约》，其主要内容是：

1. 划定中俄喀尔喀地区边界，以恰克图为分界点，东自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为界线，此线以南为中国境，以北为俄国境。2. 处理越境人犯，以往逃人不再追究，嗣后双方不再收容，并严行查拿，送交对方守边人员。3. 双方贸易仍维持康熙年间做法，俄商三年至北京一次，每次不超过二百人，中国不收赋税，零星贸易只能在尼布楚、色楞格二地选择进行。4. 规定宗教职能和留学生人数。规定在北京的传教士可增至三人，中国接受俄国学童四人，来京学习满文和汉文，中国政府并同意帮助俄国在北京建立一所教堂。（雍正十年，为俄国兴建的新教堂建成。自此之后，俄国得以按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生。）

《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即开始了西北两路进军，讨伐噶尔丹策零。出师后，雍正即派满泰、阿思海前往土尔扈特，利用它与准噶尔部的旧有矛盾，争取土尔扈特，孤立准噶

尔，同时又遣使往俄国，通告清朝政府对准噶尔用兵之事以制止俄国勾结噶尔丹策零，利用中国分裂势力侵略中国。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中俄喀尔喀地区的边界，是准噶尔内部野心家觊觎的地方，俄国人如果不想破坏条约的话，就不能公开大规模地支持准噶尔的分裂活动。清朝政府同时也在喀尔喀地区加强了防务，设立卡伦（边防哨所）五十九个，东边十二个属黑龙江将军统辖，西边四十七个由喀尔喀内部管理。因此，《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防御俄国殖民主义侵略、保卫喀尔喀地方领土，解决准噶尔问题，防止俄国干涉中国内政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清朝政府在贸易、宗教方面也对俄国作出巨大让步，前述兴建教堂已是一例。在领土上，如前所述，是做了一定牺牲的。而在贸易方面，俄国在恰克图建立贸易市场，中国在它的对面建立买卖城，作为双方的互市场所。自从《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商不再经由尼布楚、黑龙江进入北京，径直由买卖城经张家口抵达北京，免得再东绕一圈，所以自此以后买卖城一线成了俄国商队主要道路，给俄国带来了很大便利，这些都是其他西方殖民者可望不可及的。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宗实录》卷60。

《上谕内阁》。

《朔方备乘》。

雍正手足相残

清圣祖康熙末年，储位竞争激烈，皇四子党与皇八子党彼此明争暗斗，积怨甚深。雍正继位，允禩集团计划落空，进而对新皇帝侧目而视，形同水火。为保皇位稳固，雍正继位之后，即集中力量打击允禩[①]集团，从而演出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允禩，康熙二十年（1681 年）生，为圣祖皇八子，康熙三十六年晋封贝勒。康熙四十七年初废太子后，即参加皇位角逐，为人精明能干，善结人心，党羽众多。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禵都依附于允禩。康熙五十七年，圣祖命皇十四子允禵远征西北，授命大将军，一概物品俱用亲王体制，使允禩集团兴奋非常，以为此举是允禵向皇太子地位的过渡。康熙六十一年，圣祖病危，遗命传位皇四子胤禛。允禩集团大失所望，但其势力依然强大，严重危胁着新政权的稳固。雍正经过激烈的储位之争夺取皇位，深谙消灭政敌、巩固皇权之道。因允禩为集团首领，势力强，影响大，因此，雍正即位之初，即对他与部分属人采取拉拢政策，以稳住其情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尚未继位的雍正即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十五日又晋封被康熙斥为与允禩

① 雍正继位后，为避其名讳，将其兄弟名中“胤”字均改为“允”字。

勾结的贝子苏努为贝勒，十二月晋封允禩为廉亲王并管理理藩院和上驷院。雍正元年二月，又命其改管工部。

对于其他兄弟，雍正则采取打击策略。允禵远在西北，手握重兵，且又是康熙末年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因此是雍正继位之后的心腹之患，唯一办法就是将其召回京师，置于自己监视之下。康熙六十一年，允禵应召回京奔丧，见雍正时拒绝行兄弟间的抱见礼。雍正为示大度，走下座位来就允禵，允禵不理，侍卫拉锡牵其衣示意，允禵借此发作，以下贱奴仆侮辱主子为由，请求将拉锡正法，以此向雍正示威。雍正元年三四月间，雍正送康熙灵柩至遵化景陵享殿，事毕，即命允禵留守景陵，并命副将李如柏严加监视，除大祀之外不准离开，允禵实际上被囚禁了。对于允禟，雍正向为蔑视，说他一无可取。但因其母健在，地位尊贵，在宗室中又有一定威望，一旦其母子结合，干乱朝政，就会危及皇权，因此允禵从前线回来后，雍正即以军中需人为名，命允禟前往西宁，并不容推托，迫令速行。雍正元年，允禟到达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年羹尧将城内居民迁出，加派兵丁监视允禟，从此，允禟处于年羹尧严密监视之下。雍正元年，又以允䄉护送哲布尊丹巴灵龛回喀尔喀，遣其出京，允䄉行至张家口外，不肯再走，雍正遂将其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并查抄家产。雍正如此重惩允䄉，是因为允䄉不是该集团的核心人物，治罪于他不会引起事端，反可以起到警戒、威吓作用。

雍正二年春，青海战事成功，雍正帝位因而进一步巩固，四月即向允禩集团发起攻势。雍正二年四月初七，以允禟等人肆行悖乱，干犯法纪为由，令诸王大臣对其据实揭发，不许隐讳。五月，以苏努、勒什亨党祖允禩、允禟，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悔改，遂革去苏努贝勒爵号。七月，雍正发布《御制朋党论》，批评欧阳修因道同可以结党的观点，指责允禩等人结党。八月，召

见诸王宗室，谴责允禩等人不知自量，欲成大事。不久因整治年羹尧，放慢了对允禩党人进攻的速度，但其间对其也严加指斥。十一月发布上谕：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以叛国罪论处。雍正三年二月，又召见诸王大臣，责备允禩党人，指责允禟不按规矩接圣旨，竟宣称“我已欲出家离世之人”，不遵守君臣大义。允䄉又在祈祷文中写人“雍正新君”字样，大为不敬。及至四年，年羹尧案已结，隆科多亦待罪边疆，雍正即开始大力整饬允禩党人。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世宗发出上谕，历数允禩罪状，以未遂大志、心怀怨恨，又摇惑人心，扰乱国政，是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遂命夺取黄带，削除宗籍，逐出宗室，其妻乌雅氏革去福晋，休回母家，严行看守不得往来。二月，降允禩为民王，交所属旗内稽查，不得依宗室诸王例保留所属佐领人员。随即又将允禩圈禁高墙。三月，命允禩改名为“阿其那”。（阿其那，满语，确切含义不详）当时同情允禩的人也在加紧活动。蔡怀玺自称为正黄旗滦州人，前往景陵，求见允禵，并投“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的字条于院内，被监视允禵的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发现，将之投入监狱。同时，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禅师，得授韬略，书写“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传单，浙江人欧秀臣将之刊刻，广为传播。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加紧对允禩等人的处理，四年五月，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颁布允禩、允禟、允禵、允䄉等罪状，并将允禟更名为“塞思黑”，并命将其由西大通押至保定圈禁。同时，又怕允禵在外不便控制，将之移至京城景山寿皇殿囚禁，命其面对康熙画像，追思悔过。直隶总督李绂将允禟禁闭于衙门附近的小房内，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封闭，设转桶传进饮食，并在外派兵看守。房小墙高，时值酷暑，允禟身带铁锁、手梏，时常昏死。八月，李绂奏报允禟病死，雍正认为其罪有应得。九月，允禩也死于禁所，随着允禩、

允禟的死，这个经营二十多年的政治集团终于垮台。允禵因与雍正同母，不便处置太严，未要其命，至乾隆二十年病故。

雍正致死允禩、允禟等人，理由是他们结党谋位，企图制造新君误失而获掌玉玺。雍正对其大加责罚，暴露了其刻薄、残暴的一面，致使后人常谴责他凌逼弟辈。但从当时的政治情况看，又是雍正为巩固皇权而采取的必然手段。经过斗争，结束了康雍两朝四十年的储位——皇位斗争，使皇帝、宗室和一些官僚从党争中摆脱出来，强化了君权，从而保持了清朝前期政治的稳定，有利于形成康雍乾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宗实录》卷 1、卷 22、卷 41、卷 44。

《上谕内阁》。

《雍正朝起居注》。

《文献丛编》。

《永宪录》卷 1 至卷 4。

年、隆之狱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皇四子胤禛经过激烈的储位之争终于荣登皇帝宝座。随着雍正的继位，其亲信大臣隆科多、年羹尧随即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十一月二十一日，雍正刚刚继位，即把隆科多之父佟国维由于在初废太子时获罪而失去的公爵赏还给隆科多，随后又加“舅舅”之衔。十二月，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次年又命其兼管理藩院事务。为示荣宠，还特意赐给他太保加衔、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而年羹尧作为为雍正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更加得到雍正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允禵被召回京后，年羹尧即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雍正元年五月，世宗发出上谕：著将西北军务及云南督抚、提督俱交年羹尧办理。名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实际上取得了整个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同年十月，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赴西宁征讨，次年成功后，即封年羹尧为一等公。此时的雍正，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使雍正继位之初的政局基本保持稳定，隆、年二人也因此成为雍正初期的心腹大臣。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隆二人自恃有功，皇帝宠信，遂行事不知检点，擅作威福，专断揽权，引起雍正的怀疑和忌恨。年羹尧在西北网罗党羽，排挤异己，遍树私人，并以保题各官为由，营私受贿，赃私巨万。其以军功上报的奖励名单，吏部予以特殊对待，视作“年选”，优先授职升用。更为重要的是，年羹

尧自恃功高，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连雍正派往陕西的侍卫，年羹尧亦不放在眼里，把他们充作下属厮役。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用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亦断绝人行，其威风之势，令百官侧目。对于臣道，年羹尧则恃宠不力行遵守。他在西宁军前，两次接旨均不按规定在公所设香案跪听开读。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不久雍正传令赏军，都中人都传言是因年羹尧所请，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使雍正的自尊心大受刺激。十一月十五日，雍正传谕诸王大臣表示已非冲幼之君，不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同时指出隆科多背后亦有人议论其专断揽权。这实则上是警告年、隆二人不要盈满骄纵。此时有人向雍正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雍正虽认为时机未到，但已下决心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年羹尧。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帝首先向直隶总督李维钧透露了其对年羹尧的态度，说年羹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十二月初二，又在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上批道：年羹尧因功高志满，甚为乖张，告诫王虽被年所荐，但不要依附于年。十二月十三日，又密谕河道总督齐苏勒，说年、隆二人近日大露擅作威福、专断揽权之象，需要采取措施以防微杜渐，并告诫齐苏勒说年、隆二人将来必至不能保全，要齐等人疏远他们。对年本人，雍正在其同月奏报中亦有所暗示，警告年羹尧要以功臣保全名节，不要恃功招祸。看来，雍正打击年羹尧的决心已定，只待时机而已。

雍正三年五月，年羹尧回到陕西，命已升任甘肃巡抚的胡期桓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因金南瑛系大学士朱轼、怡亲王允祥保荐。雍正遂说年、胡二人大搞朋党，这是公开责备年羹尧的开始。二月，京城出现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内外大臣均上表章，以示朝贺。年羹尧在所上表章中颂扬皇帝朝乾夕

惕、励精图治，但他把“朝乾夕惕”书为“夕惕朝乾”。雍正以此为借口，向年羹尧展开攻势，说年羹尧自恃有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语误之处断非无心，并责令年羹尧回奏；同时调换川陕官员，将甘肃巡抚胡期桓撤职，由岳钟琪接任，并调署理四川提督纳秦回京、派銮仪使赵坤前往接替，以去掉年羹尧的亲信，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赴杭州后，各级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上疏揭发年羹尧。李维均连上三疏，弹劾年羹尧擅作威福、招权纳贿、排斥异己、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等罪。都统范时捷、副都统董玉祥等也先后揭发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将其奏疏一一发示年羹尧，令其反省回奏。六月，开始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年羹尧之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统年兴、骁骑校年逾分别被削籍夺官；南赣总兵黄起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原长芦盐运使宋师曾、鸿胪寺少卿葛继孔等也以年党或攀附年羹尧等罪名，分别被处以削籍、籍没资财、罚修河工等处分。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认为年羹尧势力强，影响大，遂暂命革其将军，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随后令地方大员各抒己见。广西巡抚李绂素与年羹尧不和，遂上疏弹劾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欲窃九重之威福，大逆不法，要求处死年羹尧。河南巡抚田文镜也上疏要求将年羹尧处死，以正国法。九月，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下令逮捕年羹尧，查抄寓所。在其寓所中搜出汪景祺所作《功臣不可为》、《历代年号论》等文。汪文指出：人不可为功臣，以免君主疑之、畏之、怒之、怨之，使其不能自处。十一月，命将年羹尧押解至京。十二月，议政王大臣罗列年羹尧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等大罪九十二条，拟处极刑立斩。雍正表示开恩，勒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均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

者，亦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亦不许为官；年妻因系宗室之女，发还母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候补文武官员者，俱著革职，年及其子所有家产俱没入官。年羹尧接到自裁令，迟延不肯下手，监刑官蔡铤严加催促，年羹尧无奈绝望自缢。十二月十八日，汪景祺亦因大逆不道之罪，处斩枭示，妻子发遣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雍正对于年、隆二人并提，处理则隆科多在后。隆科多任吏部尚书后，众官对他莫敢仰视，惟其命是从。隆科多执掌用人大权，经他所办的铨选，亦同“年选”一样，称为“佟选”。雍正初年，世宗分化瓦解允禩之党，将四位皇弟分置四处，严密监视，同时对该党重要成员苏努、阿尔松阿、鄂伦岱等也作了严肃处理。马哈达与苏努同恶相济，又指使允禩作不法不义之事，而隆科多却保举马哈达之子马尔萨任都统。马尔萨素与允禩死党阿灵阿、阿尔松阿、鄂伦岱等人交结甚厚。隆科多此举自然引起雍正的猜忌。雍正三年五月，世宗召见诸王大臣，指斥隆科多袒护允禩党羽，以收罗其为己之手足。七月，将其削去太保衔，并发往阿兰善地区修城、垦荒。雍正四年，因准噶尔与喀尔喀争夺牧地，世宗遂命隆科多前往阿尔泰岭主持划界，以解纷争。事毕同预计前来的俄国使节会议两国疆界以待罪立功。闰三月，隆科多私藏玉牒底本[1] 事发，雍正即将其从谈判代表团撤回治罪。十月，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等罪四十一条，雍正命将隆科多永远圈禁，在畅春园附近拘禁思过，其赃银数十万两于家产中追补。其长子岳兴阿被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亦发遣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

[1] 玉牒是皇家宗谱，非常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即犯了大不敬之罪。

雍正治罪年、隆，后人颇多非议。持雍正篡位说者认为：雍正得位，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大兴年、隆之狱，即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以消灭篡位活口。其实，雍正治罪年羹尧、隆科多，在于他们结党擅权，敢于欺罔，忍于背负。雍正在藩邸四十余年，又经过激烈的储位之争才荣登帝位，深知擅结朋党对君权的威胁，因此，继位之后要求臣下对君主要绝对忠顺。雍正宠幸年、隆，目的也是要利用他们为清政权服务，做君主的忠顺奴才。但年、隆二人自恃功高，不知自处，骄满狂纵，侵欺皇权，这就不能不使雍正产生怀疑，因此，年、隆之狱是君臣权力分配中的一次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各有是非。雍正给予年、隆二人过分权力，是自作孽；年、隆二人不善自处，擅权专断，是自酿祸。为保皇权的稳固和不受侵犯，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必然会对年、隆这样的臣子大肆杀戮，这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结果。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宗实录》卷33至卷37。

《上谕内阁》。

《朱批谕旨》。

《永宪录》卷3。

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

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秀才曾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反清，岳钟琪将此事奏报雍正，世宗遂命严加审理，广肆株连，从而引出吕留良事件，形成历史上有名的吕留良文字狱。

曾静，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生，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后因应试不第，愤而读书、授徒。从中年起，开始接受吕留良“华夷之别”和封建井田等主张，散布反清思想。其主要著作有《知几录》、《知新录》（均未刊行），表达了其浓厚的民族意识。雍正继位之后，即对雍正大肆攻击，认为他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妄等十大罪状。雍正五年，曾静令其弟子张熙到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得到吕留良所著诗文，受其影响，反清之心日甚。雍正六年秋，又命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他起兵反清，从而引出曾静投书案。

岳钟琪，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由捐纳同知改武职，在驱准保藏战役中初露锋芒，升任四川提督。雍正元年至二年，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中，任参赞大臣，辅佐年羹尧，因战功卓著，受封为三等公。雍正三年，年羹尧被贬黜，处死，其川陕总督职务由岳钟琪接替。因川陕总督握有重兵，地位重要，岳钟琪也因此成为当时众人瞩目的焦点。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因其为汉人，不可深信，甚至有人说岳钟琪为岳飞后裔，欲替汉人报仇，

反对清朝，而民间也有岳钟琪与朝廷关系不协调的传说，以为他是岳飞后裔，反对皇帝暴政。曾静投书于岳钟琪也正是出于相信这种传说。

雍正六年九月，曾静命其门人张熙带其书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策动岳钟琪起兵反清。信中指出：岳钟琪为宋代岳飞后代，不该侍奉女真后人，希望他利用手中兵力反对清朝，为祖宗报仇，替汉人雪耻。岳钟琪当即找陕西巡抚、满人西琳同审张熙。西琳有事未到，由按察使、满人硕色于暗室同听，用刑讯逼追张熙说出主使，张熙拒不回答，被拷打昏厥。岳钟琪见刑讯不能奏效，遂改用诱骗手段，以礼相待张熙，表明他早想造反，希望其师辅佐，张熙受骗供出受曾静所使。

岳钟琪得到曾静书信后，即行奏报雍正。世宗一面极力安抚岳钟琪，一面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会同湘抚王国栋审理曾静一干人犯，曾静供出其受浙江吕留良的影响，因张熙到浙江访求书籍时，曾与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及再传弟子沈再宽有联系。世宗遂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查出吕留良未刊行的日记、诗词、文集等反清言论，连同曾静案内人犯，一并押往京城提审。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康熙六年改石门县，在今桐乡西南余杭东北）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入关时，家道中落。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应试，声誉鹊起，后结识黄宗羲、黄宗炎、张履祥等人，思想逐步发生变化。康熙五年，避不应试，除名，后致力于治书、收徒，名气很大，人称“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开博学鸿词科，他坚决拒绝浙江省官员的举荐。康熙十九年，浙江郡守欲以隐逸举之，他又坚辞不受，削发为僧。康熙二十二年卒。吕留良生前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教导汉人站稳华夏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夷狄政权。其门徒严鸿逵、再传弟子沈再宽等接受了他的思

想，并加以传播。由于吕留良的观点大都写于他的日记、诗词、文集中，并未刊行，所以在曾静案发生之前，并未被清朝统治者发现。

曾、吕两案一出，立即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由于曾静曾指出雍正有篡位、杀兄屠弟、贪财好色等十大罪状，当时社会上也盛传雍正矫诏得位之事，因此，雍正遂想利用曾静一案找出这种舆论的根源。湖南巡抚赵弘恩秉承帝命，极意追询，终于查明，允禩等人于发往戍地途中，沿途称冤，散布胤禛（即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流言，这样雍正就找到允禩集团是“矫诏得位”舆论的散播者。为此，雍正一面再次宣布允禩等人的罪过，一面就曾静所说他的罪状逐条辩析，发布了许多上谕，又命承审官杭奕禄对曾静“百般开导”，曾静承认其反清有错，并写出忏悔《归仁录》一书。至雍正七年九月，世宗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加以刊刻，颁布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使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同年七月，作出此案的决断。因曾静投书，才使清廷得以查出雍正“矫诏得位”的舆论根源，得以晓谕百姓。因此，雍正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大义觉迷录》，然后秘密押送到湖南，在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张熙则由尚书史贻直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完毕后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

雍正对于吕留良一案的处理则要复杂些。吕留良主要宣传“华夷之别”，反对效忠于夷狄政权，在清初一些具有反满思想的汉族士大夫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因此，雍正在处理此案中，首先抓住这点，对吕留良等加以驳斥。他在《大义觉迷录》中指出：清朝使中国疆土广阔，并创造了太平盛世，使百姓康乐，户口蕃

庶，而且清朝从李自成手中夺得天下，不但不是夺的明朝皇位，还为明朝报仇雪耻，以此来声明清朝统治的合理性。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对吕案提出结案意见，雍正命交各省学政，遍询各学生监的意见，其实是要焚吕留良著作，怕有人私藏，故以此为名，多作宣传工作。为批驳吕留良，雍正还命大学士朱轼写成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语录。雍正九年十二月刊刻颁发学宫。雍正十年，才正式定案，将吕留良及其子，已故进士吕葆中、弟子严鸿逵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再传弟子沈再宽斩立决。吕和严的孙辈，人数众多，俱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吕留良家产没官，充浙江工程费用。与此案有牵连的也分别作了处理，刻书人车鼎丰、车鼎贲，与吕留良交往的孙用克及收藏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应斩，秋后处决；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因景仰吕留良为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供奉吕留良牌位，吕案发生时，已调任广州府理瑶同知，但因连州生员告发他，雍正亦将他革职严审，使其死于狱中。

吕留良一案本由曾静一案枝蔓而出，且吕留良只是清初汉族士大夫中具有强烈反满思想中的一员。曾静接受吕的主张而产生投书策反的行动，本应由曾静负责，但雍正在处理两个案件时，却做了曾轻吕重的出奇处理，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政治需要。曾静案件以前，随着政敌的消灭及一系列改革的成功，雍正已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在思想上和舆论上都还处于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皆传其“矫诏得位”，曾静案件的引出，正是这种舆论的集中代表，因此雍正就抓住这点，把曾静的发难视作天赐良机，利用它说明得位的正当、政治举措的得当、政敌的错误，进而说明反对他的舆论根源在于对手的恶意中伤，以希图改变人们对他嗣统与初政的看法。他之所以不杀曾静和张熙，就是想让他们现身说法，以增强他这种舆论宣传的效果。由于社会上盛传其“矫诏得位”，雍正才更加看重君臣大义，他要臣下绝对

秉命于君主，而吕留良宣传“华夷之别”大于君臣之义，且在南方“绅衿士庶”中有很大影响。为使绅衿士庶不对清王朝产生离心倾向，雍正才把吕留良作为反清的罪魁祸首加以剖棺戮尸，以警戒绅衿士庶，掩盖其在嗣统问题上的被动状态，使清初具有反满思想的汉族士大夫引以为戒，作清王朝的忠顺奴才。

（杨丽英）

参考资料：

《大义觉迷录》卷1至卷33。

《文献丛编》：“张倬投书岳钟琪案”。

《清世宗实录》卷126、卷89。

《朱批谕旨·赵弘恩奏折》。

查嗣庭试题案

查嗣庭试题案是雍正朝文字狱案中的一件大案。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进士。雍正元年由隆科多举荐升任内阁学士，雍正三年又由蔡珽保举升任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各省举行乡试，查嗣庭出任江西正考官，九月下旬回京后，即被人告发试题乖张。雍正皇帝即命派人搜查其寓所，查出日记两本及请托营求科场关节的书札文字。雍正帝看后，即以查嗣庭所出试题悖逆怨望，所写日记对康熙及本朝朝政大肆毁谤及谄附隆科多，夤缘请托等罪状，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从而引出著名的查嗣庭试题案。

关于查嗣庭案件，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维、止二字乃雍、正二字去头，被认为是砍了雍正的脑袋，雍正皇帝因而大怒，大兴文字之狱；其二是查嗣庭受隆科多赏识，雍正为治罪隆科多，先拿查嗣庭开刀，以打击隆党。那么，查嗣庭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隆案到底有哪些瓜葛？既然查嗣庭是因出试题而获罪，我们就从其所出试题谈起。

清代乡试，按照规定要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论、判、表；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在查嗣庭所出试题中，四书首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雍正帝认为：“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不外乎此，况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然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是对中央和地方官员选举人才政策的讥讪。另外，查嗣庭在

《易经》次题中出了“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在三题和四题中又分别出了“其旨远其辞文”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认为其欲将前后正止联络，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在三场策题中，查嗣庭又出了“君犹腹心，臣犹股肱”之语，雍正帝认为古人称君为元首，而股肱、腹心皆指臣下，查嗣庭在策问中称君为腹心，是不知有君上之尊。这就是查嗣庭所出雍正认为有问题的试题。可见，查嗣庭并未出“维民所止”，欲去雍正之首也属无稽之谈了。

那么，雍正指出的“欲将前后正止联络，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到雍正三年的汪景祺案。

汪景祺，浙江钱塘人，举人出身，因仕途不得意，雍正二年春到陕西，投靠年羹尧。同年五月，作出《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两篇文章。在《功臣不可为》一文中，汪景祺以明太祖杀戮功臣为鉴戒，劝臣子不要做功臣，以免君主疑之、畏之、怒之、怨之，使其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在《历代年号论》中，汪说“正”字有“一止”之象，认为前代帝王年号，凡带正字的，如金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不是亡国之君，就是暴虐无道的君主，所以用这个字作年号皆非吉兆。三年九月，雍正治罪年羹尧，见到汪景祺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十分恼怒。雍正治罪年羹尧，就怕有人说他杀戮功臣，汪景祺的《功臣不可为》恰恰击中雍正心病，加上汪景祺作《历代年号论》，雍正帝便以汪景祺暗中攻击其年号为“一止之象”的罪名，将汪景祺投人监狱。三年十二月，将汪景祺处斩枭示，妻子亦发遣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汪案刚刚平息，查嗣庭在试题中又出现“正”、“止”之字，自然引起雍正帝的警觉。加上查嗣庭由隆科多、蔡珽保举，雍正四年三月，又发生李绂与田文镜互参案，便使这场试题案卷人

政治斗争中，案情更加复杂化了。

雍正治罪年羹尧的同时，也指斥隆科多，并于三年七月削其太保衔，发往阿兰善地区修城、垦荒。年羹尧出事后，又命蔡珽为监刑官，逼迫年羹尧从速自裁。雍正四年三月，蔡珽好友李绂调任直隶总督，在赴任途中经过河南，因河南巡抚田文镜屡次弹劾属员，其中数人为李绂同年进士，李绂遂当面指责田文镜不容读书之人在河南做官。李绂到京后，即上疏雍正参奏田文镜营私误国，而田文镜回奏，说李绂等科甲人员徇私袒护，与雍正屡次颁布的解散朋党旨意不和，暗示李绂等人重结朋党。年、隆结党擅权已使雍正焦头烂额，科甲人员再结朋党，势必会对雍正政权产生新的威胁。在田文镜参劾的人中，有原为蔡珽的属员，李绂为其说话，便使雍正怀疑李绂、蔡珽等结成科甲同盟，遂决定惩治他们。十月，雍正帝借口蔡珽在署理直隶总督期间的一个小过失，把他降为奉天府尹，逐出中央。

查嗣庭试题案发后，因查嗣庭曾由蔡珽保举，加深了雍正对查嗣庭的厌恶。十月，雍正命大学士、九卿及翰詹科道官员将从查嗣庭寓所中搜出的字札与日记，逐一详细检视，并密谕杭州将军鄂弥达、浙江巡抚李卫，派人驰赴查嗣庭原籍家中，将所有一切字迹并其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在查看时，发现查嗣庭对康熙政事颇多不满。康熙裁汰冗员，查以为是官员遭了厄运；对康熙钦赐进士，查认为是冒滥；对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查认为是文字狱；江南科场案，查认为单凭对句杀人，实在冤枉；殿试不完卷者予以革退，查认为是杀一儆百，无罪而罚等等。遂认为查嗣庭恣意诽谤康熙。十二月，雍正帝复以查嗣庭案内李元伟、刘绍曾、杨三炯等借师生同年之谊，私书营缘请托，召见汉官一事，再次严斥科甲朋党，指出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致扰乱国家，肆行无忌。五年正月，大学士、九卿等会审参革知县马倬、胡虞继借师生私情，于查嗣庭奉

差经过时，妄递供单禀贴，拟议照越诉律治罪。雍正认为这样不能为党比营求者示戒，遂谕令将马倬、胡虞继锁拿解往江宁、南昌。可见雍正对科甲朋党恨之入骨。

雍正五年四月，查嗣庭及其长子查克上俱病死于刑部狱中。二十四日，大学士田从典等会同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员审结查嗣庭一案，以查嗣庭“大逆不道，怨诽诅咒”，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因在监病故，请旨戮尸枭示，财产入官。同时定拟：查嗣庭之兄、子侄年十六以上者，俱应拟斩立决。五月初七，雍正帝亲自作出判决，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其子查沄改为应斩，秋后处决；其兄查慎行父子从宽免治其罪，释放回籍；其胞兄查嗣瑮、侄查基俱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查家财产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至此，查嗣庭案才告结束。

查嗣庭之狱，是雍正帝亲手制造的。在治罪查嗣庭过程中，雍正帝宣布查嗣庭罪行是因为其所出试题乖张，并在日记中诽谤康熙和本朝。其实，这不过是治罪查嗣庭的引子而已。真正的原因是雍正四年的李绂、田文镜的互参案，刺激了雍正帝警惕朋党的那根敏感的神经，重罪查嗣庭，是要给那些借师生之谊的科甲出身的人一个下马威，使他们谨慎自己的言行，防止科甲朋党，侵犯皇权的出现。查嗣庭试题案缘起于文字之祸，却被雍正帝用来作为打击科甲朋党，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因此，它不是简单的一场文字狱，而是带有政治斗争的性质。

（杨丽英）

参考资料：

《雍正朝起居注》。

《朱批谕旨》。

《清史列传·蔡珽传》。

扩行奏折

清圣祖康熙中叶，四海统一，国力渐强，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及时了解地方情况，康熙帝特命他的亲信官员用密折奏报情况，出现了清一代特有的奏折制度。它是由皇帝规定的官员，将上奏事件亲自缮写、密封，径送御前再由皇帝启封、批示（或与军机大臣等批阅）后，直接发与具奏者执行。这种制度，简化了明代以来繁琐的文书处理制度，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清人关后，即沿用了明代的文书制度，凡系地方公事用题本，若系本人私事则用奏本，题本盖官印，奏本则不用，两种文本都由通政司进呈。题奏文书的处理则采纳明朝的票拟制度，所谓票拟，就是由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预先阅看臣僚的题奏，并且把处理的意见写在小纸票上，送皇帝裁定。这样在皇帝观览之前，先由内阁官员拆阅，因此官员奏事时难免有所顾忌，皇帝想知道的事情往往得不到实际汇报，不利于下情上达。于是，顺治十三年，世祖即命科道官员言事所上奏书，可以径送宫门陈奏，臣工上本时又附呈“折子”，即缮写“清单”附人本内奏闻，后为求简便而将清单缮人本中正文，使用日久，遂称“奏折”。因此，奏折乃奏本与折子的结合。

康熙年间，奏折亦称奏帖，大多附于请安折内，由官员派遣家人或专差报送，获得奏折之权的也只是康熙信任的少数亲信大臣，因而康熙时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但奏折制度一出

现，就具有保密的性质，亲信官员可用密折奏报情况，在地方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因而对控制官员大有益处。因此，康熙五十年（1711 年）前后，地方高级官员，如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普遍获得了奏折权。康熙五十一年，圣祖又向中央朝廷官员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副都统、侍郎、学士、副都御史等发下上谕，允许其在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开列奏折，密奏所见，便于皇帝选择。这样，奏折作为一种机密文书，在康熙末年已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

雍正继位之后，为了对付政敌，巩固皇位，控制内外高级官员，进一步扩大了使用密折奏事的范围。雍正元年，雍正特命监察官——科、道官员可上奏折，同时“恩许”某些官职较低的官员，如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权利。雍正不仅扩大了使用奏折的人员范围，且奏折内容也比康熙朝大大丰富了，君臣筹商全国或地方的政务，是最主要的内容。雍正朝的重大事件，都采用奏折这种公文，使大臣和皇帝双方亮明观点，经过讨论后决定实行，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都是经过这样反复筹商才最终决定下来。另外，雍正常用奏折来考察地方吏治，并据此对地方官吏察核。由于扩大了使用奏折的人员范围，各级官吏都可直接用奏折密报皇帝，这样皇帝就可利用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监督，掌握督抚大吏的情况，防范他们欺隐循私之弊，杜绝官员之间结党钻营、朋比为奸的恶习，以便更有效地巩固清朝政府的统治。

由于臣工所上奏折，直达皇帝御前，由皇帝亲自批阅，因此，奏折之中几乎全有皇帝的朱笔批语，叫做“朱批谕旨”，批过的奏折也称“朱批奏折”。皇帝通过朱批，与臣下共商政务，讨论用人和对官员的任免。

由于奏折内容包罗广泛，既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又涉及官员的升降任免，因此保密性在奏折制度中尤为重要。雍正也一再

要求具奏人不要声扬文件内容，同时要求领受朱批谕旨的人要保守朱批的秘密，不得转告他人，更不能交他人阅看。为确保奏折的机密性，雍正制定了四项保密措施，一是收回朱批奏折，规定奏折人在得到朱批谕旨的一定时期后，将原折及朱批一并上交，于宫中保存，本人不得抄存留底，奏折中的朱批，亦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二是打造奏折专用箱锁，雍正于内廷特制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凡有奏折，均装匣内，差专人送至京城，钥匙备有两份，一给奏折人，一执于皇帝手中，别人不能私开。奏匣每员发数个，一般为 4 个，只能传递奏折，不能它用，所上奏折也只用奏匣封装，否则内廷不予接受。三是奏折直奏内廷。督抚奏折则交由奏事处太监径呈皇帝；其他地方官的奏折则交由雍正指定的王公大臣转呈。四是皇帝亲自阅看奏折，写朱批不假人手，不要任何人参与。通过雍正的专心经营，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它对加强皇权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乾隆帝继位之后，即完全继承了其父实行的奏折制度。从此，奏折制度为各朝皇帝所重视。而题本奏本文书制度的繁琐，行政效率极低的弊病越来越明显。乾隆十三年（1748 年）废止使用奏本，臣僚报告例行政务概用题本。由于各省题本大量上奏，承办题本已经应接不暇，于是乾隆二十五年和二十九年又先后下令裁减题本。乾隆六十年，针对各省题本和奏折重复上奏，又进行了整顿和划一，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以整顿庶务为名，决定废止题本，一律改用奏折。这次改题为奏，废止了沿自明朝的题本制度，使办理题本的内阁各房已无事可办。

奏折制度作为一种机密文书制度，使皇帝能够亲自办理庶务，加强皇帝专断的权力。雍正把奏折正式作为官文书，官员通过奏折可直接与皇帝发生联系，不再通过内阁所属的通政司转呈，同时，皇帝对于奏折的批示也完全出于御撰，不必再通过与

内阁大臣商讨，这样就剥夺了内阁票拟之权，因此，奏折制度是加强皇权的手段之一。同时，奏折制度又是控制官员的一种手段。康熙末年的储位斗争及其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都使雍正深感到了解官民动向和增强对官僚控制的迫切性。秘密奏折制度在官僚的职责范围以外，使他们互相告密，迫使他们彼此监督，各有戒心，不敢放胆妄为，不敢擅权，从而成为封建皇帝的忠顺奴才。可见，扩行奏折制度是雍正年间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

（杨丽英）

参考资料：

《康熙政要》卷6、《朱批谕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卷4、《东华录》。

设立军机处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进攻西宁，世宗令川陕总督年羹尧出兵平叛。经过征战，叛军十万余众投降，罗卜藏丹津逃往柴达木。雍正二年，清廷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率军追杀，罗卜藏丹津乔装改扮逃往准噶尔。准噶尔素与清廷为仇，康熙年间即发生准噶尔叛乱，圣祖亲征平叛后，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又率部侵入西藏。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圣祖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指挥大军进藏平叛。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大败准噶尔。六十年，抚远大将军胤禵移驻甘州（张掖），对准噶尔采取进攻态势，双方处于敌对状态。罗卜藏丹津逃往准噶尔后，清廷致书索要，策妄拒不交出。时值雍正即位之初，新政权尚不稳固，财力亦不充足，因此，清廷采取守势，暂不用兵，但仍密切注意准噶尔同西藏的关系和其对喀尔喀蒙古的侵扰。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位，雍正认为时机可乘，开始筹划用兵事宜，计划讨伐准噶尔，以免去国家心腹之患。

雍正七年二月，一切准备就绪，世宗即发出上谕，历数准噶尔罪恶，兴兵讨伐准噶尔，但因路途遥远，军需粮秣，急需专门班子承办，且军报频繁紧急，既须迅速处理，尤应慎密。为使战争顺利进行，世宗于七年六月发出上谕，设立军机房，并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主持办理军需一应事宜，办公地点即在隆宗门内、乾清门外西偏小平房内。雍正八年，改名为办

理军机处。雍正十年春，世宗命大学士等议定军机处印信。三月初三，大学士遵旨议奏用“办理军机处印信”字样，雍正即命交礼部铸造，并将印信保存于军机处，派专员管理，同时将印文通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从此，军机处正式成为定制。①

军机处设立之初，主要办理战事。雍正九年，世宗认为山东登州是滨海重镇，所辖地方辽阔，只有六千兵丁，怕不够用，遂命军机大臣详细讨论，是否酌量增添兵额。十年，西路军大本营要移驻穆垒，雍正择定六月初四启行，于四月十三命军机大臣通知岳钟琪，将一切事宜须先留心备办，但军营切宜慎密，以防漏泄。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处的办事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机要政事。

雍正每天召见军机大臣。寅时（三～五点）军机大臣、章京进入值房，辰时（七～九点）皇帝召见，或有紧急事务，提前召见，每天召见一次，有时几次。军机大臣退出后，按皇上旨意，书写事件，基本内容为诰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不当等军国大事。撰拟抄写后，密封发出，叫做“寄信上谕”，因由内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后经张廷玉规划，形成一套制度。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的封函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较高，且传递速度快捷。面奉谕旨，草拟缮发是军机处的主要任务。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函件封后交兵部，由驿站传送。凡标有“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如遇紧急，则另写日行数于函面，或四五百里，甚至有八

① 关于军机处的设立，由于载籍所示不一，有七年、八年、十年三种说法。此文采用八年。

百里的。它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其他公文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另外，官员所上奏折，皇帝亲自阅览之后，每日寅、卯二时发往军机处录副存档。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世宗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指定充任，正式名称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初入者，通常加“学习”二字，如“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经正式用一段时间后，不合格者除去，合格者除去学习二字。军机大臣之下的办事官员为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等衙门官员中选择充任，负责满汉、蒙古诸种文字工作。不论是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雍正时期均无定员，亦无正式衙门，只设值房，离雍正寝宫养心殿很近。至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处章京才定为满汉官员各十六人，满汉各八人为一班，各有“领班”一人，轮流执掌。

军机大臣的任用，主要取决于同皇帝的私人关系，不问出身，惟用亲信。雍正年间，担当过军机大臣的有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马尔赛、平郡王福彭、贵州提督哈元生、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兵部尚书性桂、内阁学士双喜、理藩院侍郎班弟、銮仪使讷亲、都统莽鹄立、丰盛额等。他们的官职，由正一品至从四品，地位相差悬殊，但他们都是深得雍正信任的宠臣。军机大臣中，常以品崇、资深者为“领班”，而被誉为首席、首揆、揆席，其实并无首长，互不为属，各自办理皇帝交办的事宜并单独向皇帝负责。军机处地处宫禁，近在君侧，为皇帝办理军国政要，地位特殊。为防止对皇帝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军机处不设正式官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均为各衙门官员的临时差遣兼任，他们人虽在军机处，但编制和归属仍旧属于原来衙门。他们之间虽有上下级关系，但后者不是前者的绝对属吏，很难结成死党，况一旦有专擅越权之举，随时都可被皇帝开去军机大臣。因此，他们只能绝对秉命于君上。军机大臣奉旨撰

拟机务和用兵大事，削弱了内阁权力，使内阁只能草写寻常事务的文件。因此内阁的职权大大降低。军机处从一开始就是为办理军务而设，雍正在任命满人军机章京时又大多从议政处调来，因此使清初以来专门负责军务的议政处也逐渐名存实亡。可见，军机处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的权力。

雍正死后，乾隆继位。守丧期间，一度改军机处为总理处，至乾隆二年复设军机处①。乾隆初年，军机大臣傅恒开创了一人不敢承旨、个人不作书谕，改“独见”皇帝为“同见”的作风，更加强了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

清代军机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无意之中发现了军机房这一临时机构，并有意识地加强与发展这一机构，使之成为清代特殊的政治机构。它直接秉承皇帝旨意，经办一切重大政务。随着军机处的确立，整个国家的施政渠道做了彻底的改变，官员奏事，原来的制度分题、奏二途，“公事”用“题本”，“一己之私”用奏本，均由内阁承办。军机处设立后，皇帝亲自书谕或面授谕旨，军机处密寄各处，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使题本成为例行公事的赘文。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改题为奏，取消题本，从而把军机处变为中央的主要政府机关之一，实际上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厅或机要室。

由于军机处地处宫禁，近在君侧，其一切活动均在皇帝的直接授意和严密监视之下进行，因而更便于君权的发挥。因此军机处一经确立，便受到雍正以后各朝皇帝的赏识，沿用不废，并逐渐发展其保密措施，成为即使是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得擅入

---

① 关于这点，尚有另一种说法。钱实甫在《清代“军机处”》一文中认为，乾隆初年的“总理处”并非军机处改名，而是取消，其事务由总理事务处兼理。至乾隆二年复设军机处，而非复名。参见《清史论文选集》第一辑第 475 页。

的严密之地。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太监不得在侧；王公大臣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恭读朱笔或阅看各处奏折者，只得在军机处帘堂内拱立，其他官员一律不得擅人，其帘前、窗外、阶下亦不许闲人窥视；军机处章京的值房也是如此。承撰谕旨，必须在军机处而且必须当日写完，其他事务均不许在军机处处理。都察院派出满汉御史各一名，每天在军机处值房处巡察。军机处的印信也特别注意严加防范。钥匙均为领班之军机大臣佩带，如果有事，值日章京即向奏事处请示，并以金牌为验。金牌宽五分，厚一分，长约二寸，镌刻“军机处”字样。在这种严密监视之下，军机大臣只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完全听命于皇帝。这种君主极权的局面使封建皇帝甚为满意。嘉庆年间，御史何元烺以“军务经久告蒇”为由，请求更改军机处名目，遭到嘉庆皇帝的严厉训斥。即使在清末大改官制的高潮中，军机处亦在不议之例，成为有清一代的制度。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宗实录》卷86至卷117、《清圣祖实录》卷281至卷285、《上谕内阁》、《清史列传》卷88。

雍正改土归流记

清世宗雍正四年，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鄂尔泰连续上疏，奏请将西南的土司制度改为流官建制，清世宗雍正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委其主持，于是清政府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等省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成为雍正朝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我国西南各省，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秦统一中国之后，封建统治开始向四周发展，边疆地区日益受到重视，汉武帝开拓疆域，置牂柯、越嶲、益州诸郡，西南地区已处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管理之下。在向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利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地方，为后代实行土司制度提供了先例[①]。但在唐宋以前，西南各民族基本是处在自为君长，各据一方的部落酋长制度阶段。南宋末年，元朝兴起于大漠以北，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招降八番各溪洞，使云南、广西、四川等地少数民族都归其统辖，为加强对此地区的管理，特设安抚司、宣抚司、宣慰司及长官司，世守其职，自治地方，而以梁王镇守云南为总帅，建立土司制度。元朝灭亡后，明统治者出于对巩固边疆地区的目的，制定了一整套土司贡赋、征调、驻防、承袭制度，使土司制度日

① 参见李世愉《试论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见《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益完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制度的弱点也日益显露。首先，土司地区多是实行封建领主经济，在那里，一切耕地、山林、水源均为土司所有，土民在经济上被迫依附于土司，形成土司对土民的人身占有关系，严重阻碍封建经济的发展。另外，土司自治地方，带有浓厚的割据性，随着土司势力的膨胀，侵扰掠夺内地的事件时有发生，从而造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从明初之起，就有改土归流之举。明洪武二十一年（1389 年），云南越州土知州阿资叛乱，明政府经过七年征战，于洪武二十八年擒斩阿资，继而废土州，置越州卫，以流官统之，这就是改土归流的开始。此后，各地改流也不断出现，其间规模较大者，一为永乐年间平贵州思南、思州土司之乱，分其地为八府四州；一为万历年间平四川播州土司之叛，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但有明一代，土司制度仍是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对于勾通西南与内地的联系，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顺治元年（1644 年），清入主中原，为稳住政局，对西南土司制度暂令各从旧俗，一律予以承认，旨在等地方大定之后，恪遵王制。然土司所求，已非名号所能满足，于是在大批土司归顺的同时，武装反叛也接踵而起。但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巩固新政权，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因此对于出现的土司问题，尽力实行怀柔政策，并部分地实行改土归流。但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土司问题还不是主要矛盾，清朝政府也无力大规模地解决土司问题。

康熙中后期，天下大定，国力渐强，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由于内地人民南迁，使西南地区的民族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族人民同村而居，贸易往来，大大促进了民族间的通婚与融合。到雍正时期，湖广的民、苗通婚已较为普遍，这种民

族间的通婚，使要求打破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界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和内地人民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也已成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土司制度的存在，使各族人民的贸易往来深受约束，有些土司每每侦探殷实民、苗及往来商旅，盗行劫杀，严重阻碍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雍正继位之后，土司制度的弊端更加明显，土司对其境内属民任意役使，恣意掠夺。雍正初年，云南镇源土知府刁瀚每年向清政府进贡银三十六两，米一百石，而向土民征收银三千三百余两，米一千二百余石，比向清朝政府上贡的多几十倍。另外土司对其属民恣意妄杀，对犯其法而被杀害者的家属，还要征收六十两、四十两、二十四两不等的银子，名曰“垫刀银”。土司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畜，互相厮杀，世代为仇，严重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雍正元年，湖南永顺地区土司相互仇杀。雍正二年，广西西隆州地方土司与贵州普安州捧酢地方土司因常年争战不决而告到官府，因事涉两省，地方官相互推诿，致使到雍正四年，此案仍未审理。由于土司经常到邻近州县掠夺，屠杀汉民，因此，土汉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土司属下往往成群结伙骚扰汉民；有的在夜间乘人不备，焚屋屠戮；有的汉人犯罪，逃匿到土司，地方官只有用银钱买求，才能得到，这就破坏了地方政府司法权的实施。而有的地方官也借土司继承，需州县官转呈之机，多方刁难，勒索钱财。可见，雍正时期的土司制度不仅破坏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定，要重要的是清朝政府的中央政令不能得到统一的贯彻和执行，地方吏治也因此而受到影响。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也看到了土司制度存在的弊端，因此改土归流的要求日渐强烈。康熙末年，云南永北人刘彬写出《永昌土司论》，对土司制度的危害作了剖析，并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雍正二年，幕客兰鼎元也提出削夺土司的办法：依据土司犯罪轻重，削减他的村落里数，若罪行严重，则夺其土司，改归流官治理。若

不便改土归流的地方，就将为恶的土司除掉，把他的领地分散给其子弟，分其势力。雍正也看到了土司制度的弊端，于雍正二年五月向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督抚发出上谕，要求封疆大吏加强对土司的管辖。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上奏，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的村寨建设营房，增置防讯，当即在宗角盖造完毕，计划在长寨建筑，而该寨土舍[1]用大石堵塞路口，不容清军建房进驻。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先后提出用兵要求，但此时雍正正致力于巩固皇权，铲除政敌的斗争，又加上认为石礼哈、马会伯年少孟浪，谋虑不周，遂对此事并不热心。同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管云贵总督事，并就云贵少数民族情况征求鄂尔泰意见。雍正四年春，广顺土舍更加猖狂，焚烧清军营房，鄂尔泰看到事态严重，遂主张用兵穷追到底，杀一儆百，使其不敢再犯。时雍正政敌已灭，皇权稳固，鄂尔泰又是“才德兼优之督臣”，遂同意其进兵。四月，鄂尔泰亲至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事情平定后，设立长寨厅。长寨用兵，成为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鄂尔泰在长寨用兵时，感到对土司、土舍的蹈袭阵法难于治理，用兵时他们就逃跑或伪装投降，军队一撤，他们又重蹈旧辙，因此必须筹措一劳永逸之法。雍正四年九月，鄂尔泰正式提出改土归流建议，并对改土归流的必要性、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作了阐述，提出“计擒为上，兵剿为下”的策略，得到雍正皇帝的赞许。同年十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他更好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前述镇源土知府刁瀚及沾益土知州安于蕃，势重地广，私占

---

[1] 有些少数民族没有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只受该族头人的统治，叫做土舍制。但他们往往受邻近的土司控制。参见冯尔康《雍正传》第330页。

横征，作恶严重，雍正四年六月，鄂尔泰发兵擒拿刁瀚、安于蕃，在其地分设镇源州（今云南省镇沅县）、沾益州（今云南省沾益县）。同年冬天，乌蒙土知府禄万钟攻掠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纣为虐，鄂尔泰遂命游击哈元生率军讨伐，在四川军队的配合下获得全胜，清政府遂在其地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云南省镇雄县）。雍正五年，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以力量较强，聚兵四千，耀武于南盘江以北地区，乌蒙改土归流后，遂撤兵敛迹。鄂尔泰巡察至贵州南部，准备对其用兵进剿，岑映宸摄于威力乞降，鄂尔泰遂把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省，设立永丰州（后改为贞丰州，今贵州省贞丰县），又改泗城为府（治所为今贵州省凌云县）。这时梧州、柳州、庆远等地土民，因土舍酷虐无道，争备粮请兵，于是广西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进展较为顺利。

雍正六年，鄂尔泰开始解决贵州东南的土民问题。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问题，重点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远，因此主张分别轻重、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贵州省榕江县）地区的古州江流域，都匀府丹江（今贵州省雷山县）地区的小丹江（九股河上游）流域和八寨（今贵州省丹寨县）流域，在镇压顽抗土舍势力的基础上，设厅，置同知，理民事。[1]

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给与之交界的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带来很大影响。这些地方的土司，本来就比较接近内地，势力较小，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也较多，土汉民的交往也较密切。在云

[1] 张捷夫在《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中认为：清王朝在黔东南地区的举动不能算是改土归流，因为此地在那时没有土司，因此清王朝在此设官建制，虽然是和改土归流同时进行，并且也是鄂尔泰经办的，但仍不能算是改土归流，参见《清史论丛》第五辑。

贵、广西改流建制的浩大声势下，土司内部土民纷纷逃向官府，请求改流建官。于是土司在内外强大压力下，相继呈请交出世袭印信，让出领地。雍正六年，湖南永顺土司彭肇槐自动申请改土归流，雍正接受他的请求，授以参将，赐给拖沙喇哈番世职，世袭罔替，又赏银10000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置买产业。雍正七年，在其地设立永顺府，并设桑植、保靖二县，归该府辖治。

四川地区的土司，经总督岳钟琪、巡抚宪德、总督黄廷桂等人先后料理，大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七年，将天全土司改为天全州，土汉民杂居的黎大所改为清溪县，原来统辖这些地区的雅州直隶州改为雅州府。

经过几年努力，西南各省大部分都实行了改土归流。雍正八年，鄂尔泰在云、贵边界筑桥，因此年是庚戌年，雍正遂命之为庚戌桥，以纪念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的功绩。因改土归流的主要地区在云贵，因此，这一年可视为改土归流基本成功的年份。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以用兵为先导，以抚绥继之，使滇、黔、桂、川、湘、鄂六省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进行。

改土归流后，清朝政府在改流地区，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以原定赋额为准，各自自报田产，然后计亩征银，改变了无田土民有赋税负担的状况，并将土司原有的土贡取消。因此，改土归流后，土民所受剥削比以前有所减轻。针对土民土地不足问题，清朝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将土司、土舍的田产没收，发给兵士，每丁三十亩，实行军屯，所给土地为军田，许军丁照民田买卖。对土司强买的土地，实行土民按价赎田的政策。在个别地方，还实行允许土民占有原土司的部分土地，但总得说来，土地耕地不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改土归流后，清朝政府在原土司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设置厅、州、县等地方政权，派遣一定时期进行调换的流官前往治理，这样就使原土司、土舍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了，文化也相应发展起来。雍正十二年，署理湖南巡抚钟保以永顺设府以来，人文日盛，奏请于府县设学，取文武童生 12 名，在保靖等县各设训导，各取童生八名，并在府城设立考棚，雍正予以首肯。雍正十三年，四川学政隋人鹏也以土民与汉民日趋接近，应鼓励土民读书，提出让土民与汉民文武童生一体考试的要求，也获得雍正的批准。

改土归流，废除了数百年来的土司制度，但必然会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雍正十二年，贵州古州、台拱地方设官后，原土舍势力仍较大，传言“山有苗王”以图恢复旧日局面。雍正十三年，古州叛乱发生，雍正即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率兵征讨，务尽根除，不遗后患，并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去贵州办理苗疆事务。在贵州，董芳与哈元生不合作，张照支持董芳，他们认为，从前改流建制失误，现应招抚，恢复原状，因此主张不一，将领不和，征讨没有进展。八月雍正死，乾隆继位，召回张照，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坚持平叛，次年成功。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不过是清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土司势力的一系列措施之一，但有清一代，并没有彻底废除这一制度。就在雍正年间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同时，清朝政府又设置了许多新土司。清代，不仅土司总数和职衔比明代多，制度也远比明代完备，整个清代，在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实行这一制度，它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①]。

但雍正时期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土司、土舍凌虐属民制度；改革赋役，兴建学校，有利于

---

① 参见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见《清史论丛》第三辑。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政体统一，使得民族杂居地区减少了战争，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为民族间联系的增多提供了条件。因此，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及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杨丽英）

参考资料：

《清世宗实录》卷 142 至卷 158。

《明太祖实录》卷 236。

《朱批谕旨》。

秘建皇储

秘密建储是一种以不公开的方式，由皇帝本人亲自定皇嗣，作为皇帝继承人的预立储君的制度。它创始于清代的雍正皇帝。是他把中国封建社会预立皇太子的这一重要制度，由公开转向秘密。而后来的乾隆皇帝则把这种制度在实践和理论上予以完善和发展，以致后来清代的几位皇帝均沿用此制预立皇太子，成为清代爱新觉罗宗室的“立嗣家法”。

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代封建王朝，是由努尔哈赤创立的后金政权发展而来的。努尔哈赤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在建立皇储方面，努尔哈赤也想按照汉族封建帝王建立皇储的做法，在生前选择好继承人。但是，他在生前有过两次这方面的尝试，结果都失败了。

第一次是在努尔哈赤建立天命政权之前，他想把长子褚英立为汗位接班人，遂命令他帮助其主持国政。可褚英心胸狭隘，为人刻薄，不能容人，对待自己的兄弟们极不友善，对待与他关系不好的大臣们，也以将来他登上汗位以后，予以处死相威胁。他的言行引起宗室内外、朝野上下的不满，后来在诸大臣的反对下，努尔哈赤只得废掉褚英，将其“监禁在高墙之中”，三年之后又将他处死。

第二次是在努尔哈赤建立天命政权之后，努尔哈赤再起立储之念，于天命五年（1620年）选择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代善为皇储。努尔哈赤的大福晋以为将来必托身于代善，故常常修饰打扮

自己，取媚于代善，而代善也得意忘形起来，与大福晋的暧昧关系毫不掩饰，结果引起诸贝勒和大臣的非议，努尔哈赤对此也极为恼火，很快又取消了代善的嗣汗资格。

两次建储的失败，说明当时的满族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像汉民族封建政权的那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程度。其当时所实行的八旗制度，是政、军、民等具有多种职能的社会组织，八旗首领在整个政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作为汗王也只是在八旗首领的共同议政之中行使权力，因此，当时由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带有很浓的由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主义的色彩。既然如此，那么汗王在决定用人的问题上，不能不受贵族首领们的影响。努尔哈赤两次建储失败，有很大的因素来自贵族们的反对。后来，努尔哈赤采取了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持国政制度，完全取消了立嗣汗的打算。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接替王位，他是由"共治国政"的八和硕贝勒推举的。顺治帝福临登上王位也是如此。他们两人鉴于努尔哈赤立嗣失败的教训，生前都没有公开建储。

到了康熙年间，满族已入主中原半个多世纪，入关前的那种氏族残余制已消失殆尽，而封建经济、政治等都有新的发展，国家制度的各个方面也完全封建化了。康熙根据汉族封建王朝立嫡古训，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册立孝诚仁皇后的儿子胤礽为皇太子，向大臣们宣布："帝国始基垂统，长治安久，必建立元储"，表现出他对建储的决心和信心。但是，胤礽成年后，由于虐待大臣，且与康熙帝的感情恶化而被废掉。此后，康熙帝的其他皇子们便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之争。最后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在储位角逐中取得胜利，登上皇帝宝座。他上台之后，对爱新觉罗宗室在争夺储位中的惨变历历在目，有鉴于此，他便发明了"秘密建储法"。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和满汉文武大臣、九卿等，宣布了他已经秘密

立储，所使用的办法是将储君之名书于纸上，藏在一个匣子里，放在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如有不测，大臣们可将密匣取下，宣读遗诏，尊旨拥立新皇帝。

这个办法避免了因立储而产生的内部纷争，对稳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是有好处的。

这样一个制度建立起来了，但对此，后来的皇帝能否遵循下去，他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制度，关键是看下一个皇帝即接替雍正帝之位的乾隆帝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了。

乾隆即位之初，对秘密建储制度的作用和意义，在认识上并不是十分清楚，甚至对这一制度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和反感的心理。乾隆是一位汉化相当深的皇帝，对汉文化非常重视，并在某些方面还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就其主要思想来说，他和汉族历代皇帝一样，提倡儒学，祭祀孔孟，尊孔重儒。正是在汉文化的影响、熏陶下，乾隆皇帝以极大的胸怀和宽容，接受和容纳了汉文化，这种接受和容纳，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也有所表现，就设立储君一事来说，他对两千年来汉民族占统治时间最长的历代君主，以在位期间公开预立储君的建储基本方式和“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基本原则，是完全接受的，并视此为一种人们所遵循的习惯，不能更改。因此，在他的思想上对秘密建储，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认识，认为这种制度只是一种“酌权剂经之道”，并不是后世子孙皆应奉行的长久之策；另外，储君的人选，亦应“以嫡子承统”，他对清初以来各朝皇帝未能做到这一点，深感遗憾，因此，他要行先人未行之事，“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并以肯定的口气说，这样做便可“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由此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上，对建立储君的方法和原则是和传统的习惯相吻合的，并认可了其优越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乾隆元年七月首次建储的时候，“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使他不得不仍然采取秘密的方式，但是在人选上，他选定了

嫡妃富察氏（孝贤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乾隆三年十月，永琏患疾而死，他又想将富察氏所生的皇七子永琮立为储君，不幸的是，乾隆十二年永琮也因出痘而死。富察氏一生只生有这两个儿子，他们的先后死亡，及富察氏在永琮死后的七十天也去世，使乾隆皇帝欲立嫡的打算破灭了。

由于他初期建储采取秘密的方式并非出自于本愿，所以他在保密这个问题也就不可能向他的先父雍正帝做得那样出色。如永琮去世之后，当再次考虑立储问题时，乾隆皇帝就曾公开对大臣们说，大阿哥永璜“断不可立”，三阿哥永璋“先以为尚有可望”，言外之意即是说三阿哥现在也不能考虑立其为储君。乾隆对大臣们所说的话，虽未言明立谁为储君，但不立谁为储君已是很明确了，建储也就无秘密可言了。

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在立储问题上，比较明显地表明了自己遵行“立嫡立长”的态度，所以，在乾隆的皇后及嫡子全都死去之后，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便开始打储位的主意，特别是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表现得更为露骨。皇后去世之后，他们二人立刻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样子，在众兄弟面前“唯我居长”，在皇帝面前觊觎储位的念头也“微露端倪”，乾隆皇帝对他们二人的表现非常不满，再次明确表示：“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在他看来，如果二人照此发展下去，势必会再次酿成雍正帝争夺储位而弑兄杀弟的惨祸。现实向乾隆皇帝敲起了警钟，他开始对建储秘密进行的必要性重新进行认识了，对两千年来传统的建储制度的信守观念也开始动摇。乾隆十八年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古称建储为国本大计，朕酌古准今，深知于强势有所难行”，表明了他以往观念的开始转变。此后，对秘密建储的必要性不断深化认识，并在实际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这一制度的继续实行，而且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其发展起来。

在实践上，在“密”和“贤”字上做了大量的文章。从

"密"方面来说，乾隆三十八年，再次建储，以皇十五子永琰为内定储君，这次建储之前，乾隆皇帝未与任何人进行商量，之后也未召集文武大臣公开说明。为防不虞，除将立储密旨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一份外，又书同样一份密旨藏于随身携带的小匣子里，整个过程都是在无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当这一切都办妥之后，才谕知军机大臣，因此，在乾隆皇帝建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除军机大臣之外，全国臣民几乎都不知道已经建储一事，而立谁为储君，只是到了乾隆欲将其皇位内禅给永琰的前夕，也就是乾隆六十年左右，才为人们所知。

从"贤"方面来说，乾隆皇帝不是消极地等待从诸皇子中涌现出贤才来，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即对诸皇子们普遍加强教育，严格要求，如每日五更，皇子们必须按规定进入书房读书，每天都有详细的安排；对不求上进，学业不佳者，则给予严厉的斥责和惩罚。在全面提高皇子们的学识水平及观察、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上，乾隆皇帝利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审慎观察，严格挑选，以"宁缺勿滥"的态度对待建储问题。皇长子和皇三子早已被乾隆皇帝排除在储君之外，从乾隆二十年以后，乾隆皇帝开始对其他年长的诸皇子逐一进行考察，这期间，几位年长的皇子，或因不善骑射、不通国语，或因为人轻躁、沉湎酒色等等，先后被淘汰掉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才选定了皇十五子永琰。何以用近二十年的时间进行考察，乾隆皇帝主要是考虑一定要选择出出类拔萃的储君人选。

对于秘密建储，可以说乾隆皇帝做得相当的出色和圆满。实践问题解决了，但是，在人们的思想上，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如何清理人们头脑里的传统偏见，在这方面，乾隆皇帝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建储理论和思想得以充实和发展起来。

乾隆建储理论和思想是建立在对历史上的建储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是指出公开建储的种种弊端。他认为历代预立太子，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原因在于立了太子之后，众臣工见神器有了所属，于是“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由此而产生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以及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的门户之争，有了门户之争，就会有明争暗斗，结果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众臣工们也会由此而“身罹刑宪”。所以公开预立太子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其次是以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传统建储原则。他说，商纣王是嫡立，但商王朝就断送在他的手里。又说，唐太宗皇帝为群雄所附，明永乐皇帝亦勇略著闻，假若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乐，那么玄武门之变、金川门之难，也就无自而起，骨肉相残、忠良惨戮也就不会发生了，由此可见立嫡立长之贻害。为了使广大臣民尤其是诸皇子们汲取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他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等将历代册立太子有关戒鉴的内容编成一部书，“以昭殷鉴”。这部书的书名就叫《古今储贰金鉴》，书中收集了历史上因明立储贰而酿成争端的三十三个事件，乾隆皇帝亲自为此书写了序文。

乾隆皇帝通过对历史上建储制度的指斥和评判，更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秘密建储制度的决心，并且谆谆告诫后人：秘密建储是本朝重要“家法”，世代子孙应永远遵守而不能改变。

由于乾隆皇帝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秘密建储制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完善，使人们对其实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由此而成为此后清朝历代统治者建储时所必须遵行的一个“家法”。

接替乾隆皇位的仁宗嘉庆和接替嘉庆皇位的宣宗道光都是坚持这一“家法”，没有公开预立皇太子。清文宗咸丰在病危时，

宣谕年仅五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同治。清穆宗同治、清德宗光绪均无子，宣统帝溥仪三岁登基未及亲政就被迫下台，所以不存在遵守“建储家法”立储问题，清代秘密立储制度也就自然废止了。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 305、卷 317、卷 481、卷 760、卷 1066、卷 1067、卷 1189、卷 1220。

白新良：《乾隆传》。

《古今储贰金鉴》。

乾隆初政

公元1735年8月23日，清代的第三位皇帝雍正，突然病逝，宫中上下忙于处理后事，同时朝廷重臣们也正在考虑为世人所关注的继立新皇帝的问题。好在这一问题勿需众大臣们费多大的周折，动多大的脑筋，因为由谁来继承新王位，雍正皇帝早已安排妥当。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年，就创立了一种秘密立储法：即书储君之名于纸上，藏在匣子里，置于乾清宫正中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虞。

“国不可一日无君”，雍正帝一死，顾命大臣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立刻召集众朝臣，从匾额后取下密匣，宣读雍正帝预立新君的诏旨。诏旨大意是这样说的：宝亲王皇四子（弘历，即未来的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雍正元年八月间，朕（雍正）于乾清宫召集诸王满汉大臣，面谕建储一事，亲自写了谕旨，加以密封之后，藏于乾清宫最高处。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一纸遗诏，决定了为举国上下所关心、决定清王朝前途与命运的立新皇帝的大事。

雍正十三年九月三日，弘历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在众大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向全国颁布登极诏书，改明年年号为乾隆元年。清王朝从此进入了乾隆皇帝的统治时代。

乾隆即位之后，欲继祖、父之业，在巩固和发展清帝国方面大有作为一番。他当时二十五岁，年富力强，精力过人。多少年来随父参政，又具有着较为丰富的治政经验。政治上的成熟，既

不需要“辅政”，也不需要“拥戴”，治政大权基本上掌握在他的手里了。因此，他在即位之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其施政方针，以其勃勃的雄心、过人的胆识，强化皇权、团结宗室、整饬吏治、清理积弊，又“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在初政的几年时间里，把清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其政绩用礼亲王昭梿的话“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来形容，虽过于夸张，但初政的政绩，确实为“乾隆盛世”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乾隆时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乾隆上台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任何一代君主，都有其统治的思想，国家如何治理，实行什么样的方针，上台之后，都要有一番说明。治政方针的提出，也反映着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水平与从政能力。

乾隆即位之后，首先就是要让天下知道他的治国方针。雍正帝刚刚去世，乾隆很快建立起了以他为核心，以鄂尔泰、张廷玉为辅佐的最高统治集团。当月即发布了雍正帝的一份遗诏，大意是说，施政的宽与严，要因乎其时。以前人心浅薄，官吏营私，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现在皆知儆戒了，过去严敬的条例可改得宽松一些。而由宽改严者，也是一时之计，待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这份遗诏，实际上是在乾隆皇帝的指导下后来起草的，旨在阐述他的治国指导思想。随后，乾隆帝不断以自己的名义，阐明他的观点。十月初九日，他对诸王、大臣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他希望君臣都要“惟日孜孜，交勉不逮”，诸王大臣要在皇帝的宽政之下，严明振作，丝毫不许怠政。

他认为康熙、雍正两朝统治政策宽严不一。康熙朝以宽大为治，宽有余而严不足，造成朝臣奉行不善，人心玩愒，官吏不知公事，奸人不畏法度。雍正朝严猛为尚，严有余而宽不足，致使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官吏人人自危，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鉴

于此，乾隆皇帝提出了他的治政指导思想，即以“执中两用”为准则，“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认为，为政之道，要不拘泥于成法，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即所谓“损益随时”；要恩威兼施，有柔有刚，即所谓“宽猛两用”。

指导思想确定下来了，但要将其付诸实施，还需要把新皇帝的权威树立起来，建立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皇帝具有绝对治政大权的、行之有效的最高统治集团。由于秘密建储制度的实行，皇权的交接与过渡进行得非常顺利，但乾隆也深深地懂得，皇帝的宝座虽已得到，但要坐稳还须紧紧地依靠前朝的遗臣。即位之后，他立刻任命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处理国家政务。但是依靠遗臣，并不是放权，在这一点上，乾隆更深深地懂得强化他自己权力的重要性。就在辅政大臣开始工作的几天之后，就将其改组成立了“总理事务处”，凡启奏一切事件，俱送总理事务大臣阅看，然后再由奏事官员禀奏皇帝。又进一步强调：“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这样，就很快取消了遗臣的所谓“辅政”，又建立起了以皇帝为核心的最高统治机构，使刚刚过渡的乾隆王朝，很快纳人了正规的统治轨道。到这个时候，也就是在雍正帝死后不到一个月内，乾隆皇帝已经大权在握了。

乾隆上台之后，面临着的是先父雍正帝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的局面，为了缓和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乾隆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和调整，首先是全面纠正前朝弊政，清理政治积案。

雍正生前，信奉佛道，热衷于巫术，特别是到了晚年，对佛道的信仰已经到了无以自拔的地步，在宫内豢养了一大批道士，跟随其左右，并责成专人为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乾隆视这些道士为骗子，十分痛恨，他即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道士巫师们驱逐出宫，遣回本籍，痛骂为雍正帝烧炼丹药的道士张太

虚、王定乾等人“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实为“市井无赖之徒”。并警告被驱逐出宫的道士们，不许在外任意议论、传播宫中事情，如有发现“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对在全国各地的僧道，也加以全面限制。下令严格审查僧人身份，毁禁僧人著述，不许各地擅造寺观等等。乾隆此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同，特别是在宫中，反应极为强烈，因为这些道士恃雍正帝之宠而不羁，以宗教迷信干扰政务，宫中大臣们敢怒而不敢言，对这些道士早已恨之入骨。

汰除僧道之后，乾隆即着手解决宗室内部的纷争问题。雍正帝即位，是经过与其诸兄弟进行一番刀光剑影的激烈角逐，使用各种手段而得到的，他在争夺皇位过程中和继承皇位之后，对他的竞争对手——皇兄皇弟及宗室异己，进行了无情的排斥和严厉的打击，或终身监禁，或夺爵削籍，或抄家流放，兄弟阋墙，家庭惨变，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如何处理好皇族家政，对乾隆来说也是一次考验。他在即位一个多月之后，连发数道关于处理宗室内部问题的谕旨。十月初八日，在第一道谕旨中就提出胤禩、胤禟得罪已死，但将他们的子孙屏弃于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初十日，下令宗人府查清因罪而革退的宗室觉罗，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①]。事过两天，许多被禁固的王公宗室被释放，不久又将侥幸存活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胤䄉、皇十四子允禵宽释回家，并赐给爵衔。在较短的时间里，乾隆了结了这场十几年来悬而未决的公案，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宗室势力，增强了皇族内部的向心力，彻底解除了皇帝的“内顾”之忧。

在处理雍正遗案中，除曾静、张熙投书案从重处理外，其余多进行了宽大的处置。

雍正一朝虽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就是在这十几年里，政治

---

① 《玉牒》为皇族的家谱。

斗争接连不断，大案要案接踵而至。在历次斗争的风浪里，无冤无辜的受害者大有人在。为此，乾隆帝从纠正政治冤狱入手，以便树立自己新的形象和威信，争得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缩小敌对阵营。如酌情起用在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被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释放在各起文字狱案中的涉嫌人员等。即使是一些非冤假错案，乾隆帝也采取了宽大的办法予以处理，如释放因贻误军机而判为死刑的名将傅尔丹、岳钟琪；赦免因诽谤程朱而发配军台的御史谢济世；还有许多亏空钱粮、侵吞公帑的官员，也多被免予追赔或处分。他的这一举动，同雍正的刻苛严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为人宽厚的良好形象。

在团结了宗室、缩小了敌对势力、皇帝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中之后，乾隆帝便以充沛的精力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开始了新政策的实施，这时全面处理国家政务也提到了乾隆皇帝的议事日程上来。

乾隆帝在处理完雍正的后事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全国政务的处理上。他常常五更上朝，召见大臣，批阅奏章，详细过问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大小事情。他在勤政殿房间亲书《尚书·无逸》一篇以时时督促自己。

乾隆是一个颇有抱负的君主，他自己勤勉于政，又有远见卓识的才能，但要实现其理想与抱负，不了解整个官僚体系的情况，不选用贤人，没有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秉公执法、为政清廉的各级官吏，也是不能实现的。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就用人问题谕令内阁：国家用人、行政两者并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则先务尤在人才。表明了他对重用贤人的态度。随后他便要求在京官员大学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诸官员，将平日所了解的有真知灼见、品行端方、有办事能力之人，不拘品级资格，据实保举，密封奏闻，“候朕酌量选用”。以后又陆续下达推举贤人之命。于保

举、推荐之外，还通过考试的办法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到了官僚队伍中去，增强了整个国家的行政能力和办事效率。

在选用人才的同时，乾隆皇帝对已有的官僚体系进行整肃，毫不手软地惩办了一批贪污腐化、滥施淫威、欺上压下、不干实事的贪官污吏，使清初的吏治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员的了解与控制，乾隆元年开始陆续调各地提镇、各省藩臬来京引见，乾隆三年下半年以后，引见范围又扩大到了副将、参将、道府官员及部分知县，通过这些，乾隆帝很快掌握了全国文武官员的基本情况。

以上这些，都为乾隆皇帝施展其远大宏图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乾隆帝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失误，选择最佳治国方略，初政期间还广开言路，求言纳谏。乾隆元年二月，他对总理事务王大臣说，自即位以来，勤思治理，广开言路。大小臣工凡言有裨益，立见施行，他多次要求身边的大臣们"务须直言无隐"。

在对中央上层及官僚队伍进行整肃的同时，乾隆帝把注意力也集中到对下层及民间事务的处理上。

雍正朝为了防止官吏贪污受贿，实行了养廉银制度。但此种制度的受益者只是较高层和很小范围的官员，大部分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员低俸问题仍然存在，由此而导致的贪污受贿现象不断出现。为此乾隆帝决定扩大养廉银的发放范围。元年六月，将礼部堂官按五部堂官例给予双俸，不久，又作出了发给京城各级官员及各省佐杂官员养廉银的规定。

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赋役征收标准混乱不一的情况，乾隆执政之后即着手将其划一，并酌情减免百姓过重的地丁负担。乾隆元年五月，在将山东益都更名地钦租名色裁革，照该县上等民地按亩承粮之后，将这种做法推广到直隶、甘肃、江南、浙江、广

西、陕西、湖北、福建、山西等省的军民屯田，以免除民人钱粮偏重之累。又对一些丁银过重的地区，分别将其高出数额予以削减，积欠部分予以豁免。另外，为了减轻民人负担，乾隆帝还下令禁止滥收耗羡，裁除苛捐杂税。雍正朝的耗羡归公，时间一长，各级官吏以羡外加耗的手段，盘剥人民，乾隆帝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将所定耗羡归公数额之外多收取丝毫。对多年来各地以各种名义增添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从雍正十三年十月以后，即陆续采取措施，予以裁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民众的额外赋税。

乾隆帝还因时因地，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不定量地进行积欠的蠲免和对灾民的赈恤。乾隆帝登位之初即谕令：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民欠钱粮悉行豁免，同时又豁免了雍正十二年以前旗退地亩租银及入官地亩租银租粮等。对于各地出现的水旱虫灾，乾隆帝还多次发粮帑予以赈济，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人民群众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程度，如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免除灾区商人米粮、开仓平粜、设立粥厂、兴办普济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

农业是国家之根本，在乾隆看来，国富有赖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民安有赖于农民生活的稳定。乾隆上台之后，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是非常得民心的，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深得其惠。例如，从清初以来，政府一直推行奖励垦荒政策，对执行垦荒成绩突出的官员以重奖或予以重用，雍正末年，全国的荒地已开垦得差不多了，但地方官或迎合上意，或请功邀奖，仍不断向中央报垦大量荒地，把因地多而增加的赋税摊派到农民的头上。乾隆一上台就针对此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关贻害于百姓也”。立即责成各省查清开垦实数，上报中央。再如，雍正时期为了清理隐匿的田地，增加税级，首先在四川开展了清丈土地的工作，但清地官员也从中舞

弊，光清丈出所谓“隐匿”的田产达二十多万顷，地增田赋就相应增加，这增加的田赋又得落到农民头上。他上台后，马上取消清丈土地的做法，还罢免了部分清丈官，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农民因清丈增赋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和反抗行动。对雍正帝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在直隶一些州县推行“井田制”的作法，乾隆认为“古制难复”也予以撤除，而采取了扩大八旗兵额、赏赐钱粮、借给俸饷、出旗为民的办法，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八旗人的生计问题，巩固了作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八旗制度。

乾隆在当上皇帝，开始初政的短短几年里，其治政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既切实可行，又深得民心，一上台便以“与民休息”、“为政务实”的精神，从中央到地方，从宗室到民间，全方位地治理大小政务，取得了辉煌的政绩，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 1 至卷 7、卷 12 至卷 14、卷 18、卷 19。

伪孙嘉淦奏稿案

乾隆十六年前后，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奏稿长达万余言，主要内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及朝廷权贵重臣进行尖锐的抨击和无情的弹劾，特别是指责乾隆南巡和冤杀名将张广泗。成为当时为世人所注目的重大的政治事件。

孙嘉淦在康、雍、乾三朝为官，历任侍郎、尚书、督抚，最高官职为协办大学士。为官期间，以正直能干、敢于直言而闻名，到了晚年在官民中有了相当高的声望。所以出现了以他的名义指责朝政的奏稿。

乾隆十六年六月，这份伪奏稿首先在贵州被发现。七月初二日，云贵总督硕色将情况密报乾隆皇帝，说发现“密禀一纸，词殊不经”，系到云南的过客抄录传播。其所抄传播之词是假托廷臣名目，甚至捏造朱批，胆肆讪谤，种种妄诞等等，并将传抄的伪稿一同呈上。

乾隆帝闻奏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语，纯系大逆恶徒“逞其狂悖”。但是，乾隆皇帝又不想将此种直接把矛头对准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责言辞，公开地予以追查。又因伪奏稿在其他处尚未有发现，故追查也勿需全面铺开，遂责令步兵统领舒赫德、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督抚秘密缉访，勿使有关人等“得有漏网”。

此时，各省表面似乎很平静，但暗地里在各督抚的部署下正

紧锣密鼓地进行查访活动。先是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乾隆帝命将其"立毙杖下，俾愚民共知炯戒"。接着，又揭发出山东巡抚准泰拖延追究伪奏稿一事，即本年四月间，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发现有署名孙嘉淦奏稿一纸辗转流传，经查寻得知其来源于江南水利废员官贵震，于是禀请巡抚准泰将此事奏闻，准泰将和其衷禀文勾抹发还，令其改为伪稿拾自途中。迨至八月经硕色举发，奉旨缉拿伪稿逆犯，准泰又嘱令和其衷不必牵涉四月间官贵震一案。和其衷因此案关系重大，不敢隐瞒，遂密折据实陈奏，乾隆皇帝将准泰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又指示尹继善将官贵震密拿严讯。

以上两件事，对乾隆皇帝触动很大，前者虽然王肇基与伪稿无关，但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故八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提出所有首先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惟恐株罗多人，思欲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则有准泰之前车在！

在乾隆皇帝的督责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几到十二月之中，各省先后查出关于传抄伪稿的线索，如在云南查出伪稿是由江西传入；四川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鄞县知县伍钺、巡检郑承基、千总雷壎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抄传的奏报像雪片一样，飞送京师，面对此种情况，乾隆皇帝也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

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的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为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乾隆十七年初，在已有的各条线索中，有几处重要线索，乾隆皇帝指令要严加追究：一是江西巡抚鄂昌查出的广饶九南道施廷翰之子施亦度传抄伪稿；一是来往贵州的湖南人龙乾惕曾携带伪稿。乾隆皇帝认为，伪稿内以张广泗为有功，张广泗乃贵州总督，从龙乾惕身上严加根究，追出来历，亦未可定；再有就是浙江提督衙门书吏包琳供出的，伪稿系从提督衙内传出；还有江西省城抄报房章锦传 抄伪稿，乾隆帝对这一条线索极为重视，认为“似为近可根寻”。但是，追查的结果，令乾隆皇帝及诸督抚们非常失望，因为，查来查去，涉嫌者、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控，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套夹则甘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和复杂起来，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办案人员对此也甚为头痛，乾隆皇帝也甚是着急。六月二十九日，他命令军机大臣将历次奏报各案逐一分析查奏，除已经究出来的，应并案办理外，其查拿未获，及根究未明者，将清单分寄各省，按清单所开各案，迅速查办。

六月份之后，各省遵照乾隆皇帝的指示，根据中央开具的清单，继续追查，其中有一条线索，成为当时追查的热点，即年初的时候，江西巡抚鄂昌等查出该省道员施廷翰之子施奕度传抄伪稿。后来，乾隆皇帝命鄂昌、尹继善带同承审官赴京与舒赫德、刘统勋同审此案。到七月份，舒赫德等人审讯出施氏伪稿得自江西提塘刘士禄处，刘士禄供出伪稿得自在京城居住的汤赐联处。派人前去查拿，但并无汤赐联其人。后刘士禄推翻前供，施奕度也否认伪稿不是得自刘士禄，而得自其叔施廷皋次子。九月份，

乾隆皇帝命舒赫德等，留心“施氏是否与张广泗有亲”，后查寻施氏与张广泗并无关涉。此条线索，上下折腾了一番，最终又没有了结果。

十月十九日，乾隆皇帝以各省办理伪稿不善，再次通饬各督抚，谕称：查办伪稿至今已一载有余，茫如入海拣沙，万无头绪，此皆因各督抚等一切委之属员，惟据详索供词，虚文塞责，并未实心研究，实力查办，致使线索迷乱，首犯尚悠然事外。乾隆皇帝深知，此案进展缓慢，与各省督抚互相推诿有很大关系，而承办之员怕担当责任，往往将案情向他省引发，致使隔省隔属，辗转往复，拖延了时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下令将他认为追查不力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西巡抚鄂昌等解任候旨，并宣称他省督抚有似此者均照此办理。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皇帝迁怒于督抚属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遭到乾隆皇帝斥责，说书成系满洲奴仆，似此丧心病狂之言，如诅咒彼父祖者，乃视为漠然！遂革其职交武备院执伞苦差处服役。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钱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皇帝的痛责。至是无人再敢劝阻。继而乾隆皇帝又下令，追查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从乾隆的话语中，虽然可以看出其不会轻易放弃对伪稿的追查，但也可看出此时的乾隆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也就是在乾隆皇帝进退两难的时候，军机大臣们在京审出伪稿的又一重要线索：由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的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据刘时达称，乾隆十五年七月间，其子刘守朴任浙江金华县典史时，遣家人王玉琳送寄家信，信内附有孙嘉淦稿一张。乾隆皇帝认为刘守朴传递之伪稿较他案为最早，遂命江浙两省承办此

案的周承勃、钱度速往金华密访查办，又指示两广总督阿里衮：刘守朴系“第一紧要之犯”，即由驿递飞速解京。

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之后，乾隆皇帝责成军机处对其进行审讯。在乾隆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根源似乎就要找到，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事情偏不向乾隆皇帝所想象的那样，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要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此时的乾隆皇帝，当接到军机处审讯的结果之后，对能否彻底查清此案已失去了信心，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齐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心，在他看来，即使伪稿查不出真正的捏造者，但经过这一番清查，对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及不满情绪，也起到了不小的震慑威力，故开始考虑如何将此案即行收场的问题。

而摆在他面前的卢、刘二犯，正可作为结束这场无法再追查下去的无头案的替罪羔羊。

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之后，乾隆十八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皇帝奏报：经审，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以上所谓军机大臣的覆审及奏报，皆为乾隆皇帝授意而为。

当月，乾隆皇帝迫不急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命令将“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正犯已得，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俱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而交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

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因乾隆皇帝无法再继续追查下去而仓促了结。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 396、卷 402、卷 403、卷 421、卷 425、卷 429、卷 431、卷 433、卷 434、卷 436。

《清史编年》（乾隆朝）。

彭家屏藏书案

彭家屏是清朝政府的一个官僚。康熙六十年中进士，后来当过刑部司员，乾隆时期曾一度担任过江苏布政使。

雍正末年，彭家屏与深得雍正帝信任的封疆大吏李卫结交颇为深厚。因李卫与鄂尔泰等人素有矛盾，彭家屏也常常对鄂及其党羽进行攻讦，无意中卷人党派之争。乾隆皇帝对结党营私之恶习深为痛根，因为党派之争必然要侵害皇帝本人的权力，所以乾隆经过初政几年，自己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即着手处理张廷玉、鄂尔泰的党争问题。而彭家屏作为未依附这两大党的另一小股政治势力，也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在发动了胡中藻诗狱案之后，张、鄂两党势力已彻底清除，遂把打击的目标又移向彭家屏。乾隆二十年，以召彭家屏进京面询政事为名，派人顶替了他的遗缺，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便剥夺了他的江苏布政使的官职。从此，彭家屏以养病为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河南夏邑县。但是，彭家屏并未因闲置在家对政事不予关注，而乾隆皇帝也未对罢职还乡的彭家屏放松警惕。

乾隆二十一年，河南西部遭受严重的水灾，灾民无家可归，四处逃荒，衣不蔽体，卖儿鬻女的情况随处可见，灾区一片荒凉，灾民甚为凄惨，而此时的地方官员们正忙于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河南的迎驾准备，不但无暇顾及灾民，而且还逼迫百姓出资出力迎接圣驾。此时此刻深居在家的彭家屏再也不想沉默了。因为他的家乡夏邑县也是重灾区之一，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惨状及地

方官员不顾百姓死活的行径。他决心把这一切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乾隆皇帝。

乾隆二十二年一月下旬，乾隆南巡来到山东，彭家屏前往接驾。当乾隆皇帝问到地方情形时，彭家屏原原本本地叙述了河南灾情及灾民的真实情况，并指责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指出灾民因走投无路而有铤而走险的危险。但是，图勒炳阿在奏报地方情形时，却矢口否认灾区受灾的严重程度。为此，乾隆皇帝表示要弄清此事，遂责成图、彭二人一起返回河南，调查灾情，办理赈务。

乾隆皇帝一行继续在山东巡视，路上，一些地方官员也奏报了鲁、豫受灾及夏邑受灾独重的情况，他开始相信彭家屏汇报的情况是属实的，而图勒炳阿在说假话。所以，二月初，图勒炳阿把调查的结果奏报乾隆皇帝，说虽雨水过多，但高粱仍有收成，谷豆减产有限，建议开仓平粜，不必赈济，乾隆皇帝知道他是在说谎，但又不想治罪于他，只是将其责备一番，然后令他查明被水淹没地亩情况，给了一个月的赈济之粮，前去发放。

但是，图勒炳阿办赈不力，散赈多有未实，对受灾之户口，或造报遗漏，或任意删除，加上地方官员层层为奸，侵蚀肥己，广大灾区人民未得任何实惠。彭家屏此前与图勒炳阿调查灾情，见图勒炳阿不具实奏报而乾隆皇帝明知其谎报灾情又不治其罪，决定利用图勒炳阿办赈中引起灾民的不满情绪，唆使灾民到乾隆皇帝前控告办赈官吏的舞弊行为。

四月七日、九日两天，接连有夏邑县人张钦、艾鹤年和刘元德前来告御状，指控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其他官员因缘为奸，侵蚀赈粮的行为，请乾隆皇帝明察。

乾隆皇帝深深知道，这些人的指控十有八九是真实的，对此他一点也不怀疑，于是下令革了图勒炳阿的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但是指控之人皆来自夏邑，这不得不使他陷入深思，前有彭

家屏指责巡抚,后有这些人指责县令,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想到这里,他决定将张钦、刘元德等交侍卫成林进行审讯,并嘱咐说:张、刘背后必定有刁徒从中主使,不可不严加惩究。

四月二十日,审讯有了结果。成林将张、刘押解到夏邑县后,会同知县孙默立刻对其二人进行严刑拷问,二人被迫招出是受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刘东震的指使。成林、孙默又立刻传讯段昌绪、刘东震。但段昌绪拒不到官,孙默遂带衙役到段家查拏,无意中在他的卧室里抄出了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反清檄文。孙默将段昌绪押到县衙,经严讯,段昌绪和刘东震二人供出了受彭家屏指使的真实情况。

成林、孙默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将审讯结果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得报之后,查出了主谋彭家屏对他来说还不是一件非常惊奇的事情,对此他早有所料,惊奇的是吴三桂叛乱失败已八十余年,竟然还有人保存其檄文,而且段昌绪在檄文中圈点批注,"赞赏称快"。这显然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案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下一步的行动乾隆皇帝作了如此安排:此前查办图勒炳阿等,是基于彭家屏及所谓夏邑"县民"的弹劾考虑的,现在查出彭家屏与"县民"串通一气,虽非陷害,亦为蓄谋,故撤销图勒炳阿革职令,仍留河南巡抚之任;命令直隶总督方观承到河南,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私藏檄文一案。彭家屏与段昌绪素有来往,又在吴三桂藩地云南任职多年,想必其家中也藏有类似文字,故同时命令方、图前往彭家查抄。

四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结束第二次南巡,回到北京,征尘未洗即着手办理彭家屏一案。先是召集廷臣将所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然后当着众大臣的面,传讯彭家屏,在指斥彭家屏唆使县民告御状之后,又向彭家屏质问家中是否也藏有"伪檄"之类的逆文。彭家屏回奏从未藏有与清帝国任何不利的文字,更没有见过"伪檄"之类。乾隆皇帝见彭家屏回答得甚是坚决,站在皇帝

及众大臣面前，又表现出不服罪的样子，很是生气，故以更严厉的态度继续对其严词诘问。彭家屏见此只得说出家中藏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以及抄本天启、崇祯年间政事等明末野史数种，这些书在彭家屏看来并非违禁之书。但是乾隆皇帝认为，这些书中难免有“诋毁悖逆”之字句，而彭家屏于书上也难免作些敌视清朝的“批阅评注”。在这里，乾隆皇帝再次使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故伎，欲治罪于彭家屏。但又苦于证据不足，遂派方观承率人到彭家屏处严加抄检。在清抄彭家时，又发现了其所刻族谱，取名为《大彭统记》，乾隆皇帝又在发挥他的“附会”能力，说族谱取名“大彭”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谓彭姓于黄帝，以帝王苗裔自居，是何用意？族谱中凡遇明神宗万历年号，皆不避名，目无君上，其心实不可问！为此，乾隆皇帝下谕，将已革职拿问的彭家屏令其自尽，家产全部籍没。段昌绪等也被处以极刑。

彭家屏被冤杀了。这样，乾隆皇帝又清除了他所认为的一小股政治势力。同时，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无意中清查出来的“伪檄”及私藏明末遗书，都触动着乾隆皇帝，使其借此再次对异端及不满情绪予以打击，也促使他考虑今后一段时间，如何更进一步强化思想及文化专制统治的问题。可以说，彭家屏一案对乾隆皇帝加强皇权与专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随着彭家屏等人的清除，排除政治异己势力的斗争告一段落；另一方面，随着“伪檄”、“禁书”的发现，打击社会上存在的反清思想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 384、卷 497、卷 537、卷 542。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胡中藻诗案

乾隆初政时期，以先帝雍正最为倚重的两位大臣——鄂尔泰(满人)、张廷玉（汉人）为辅政大臣。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二人权势甚高又不分上下，遂互相攻讦，起了门户之争。二人之下各有门生故吏，攀援门户，结为朋党，大有水火不容之势。

但是，二虎相争，侵犯了真龙天子的利益，乾隆皇帝决意铲除党派，把他自己的专制皇权强化起来。乾隆五年四月，他下达了这样一道令人寻味的谕旨，说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任用之大臣，为朕所倚重，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众臣工们谅也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人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使侍郎、尚书也大有人在。他的谕旨是在指责那些依附鄂、张的大小官员的，实际上也是向鄂、张二人发出了警告。但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已无法消弥，攀援庇护之风也无法扼止，乾隆皇帝决定采取行动，先向张廷玉及其党羽下手。从乾隆六年以后的十几年中，对张廷玉及其家族势力的发展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如改组军机处，以满人为首席军机大臣，以近臣进入军机处等，抑制张廷玉的权力，一度罢除其身后配享太庙的殊荣(后来又恢复)，查封和没收了他在京城的一些住房和财物等等。另外对张廷玉的党羽也进行了全面的清洗，如对张廷玉的门生姻亲汪由敦、朱荃严、严瑞龙等人，或撤职或抄家或治罪，到乾隆

三十六年时，张廷玉除有一子名列仕籍之外，家族其他成员已无一人居官。

在对张廷玉势力进行打击的同时，乾隆皇帝对鄂尔泰本人及其党羽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但鄂尔泰于乾隆十年去世，其党羽言行大为收敛，乾隆皇帝对鄂党亦未予深究。

张、鄂两党势力表面上已经铲除，鄂尔泰去世，张廷玉退休回家，但两人门下之间的明争暗斗尚未终止。对此，乾隆皇帝早有察觉，但是如何进一步消除和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击这种隐藏在暗处的两派之争，乾隆皇帝似乎有了一个胸有成竹的解决办法。

以鄂尔泰高足自居的湖南学政胡中藻与鄂尔泰的侄子江西巡抚鄂昌来往密切，相互唱和，更深地卷入了这场派别之争。因此，乾隆皇帝便把目光集中到了胡中藻的身上。

胡中藻著有一部《坚磨生诗钞》的集子。乾隆皇帝想从胡中藻身上开刀，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在他的这部集子上作些文章。先是秘密责成曾在军机处行走的蒋溥，从《坚磨生诗钞》的字里行间里找问题。到乾隆二十年二月，罗织胡中藻罪状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乾隆帝决定下手，二月二十三日命令广西巡抚卫哲治，速奏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他人唱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言行。卫哲治接旨之后，急忙严密搜查，将胡中藻于乾隆十三年二月任广西学政一年半时间内所出试题及唱和诗文等，派专人送往北京。二十六日，将胡中藻逮捕押往京师，同时又命令陕甘总督刘统勋赴甘肃巡抚鄂昌处搜查胡中藻与之往来应酬诗文、书信等。三月十一日，又对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并出资帮其刊刻传播的礼部侍郎张泰开进行审讯。当上述种种布置和行动安排停当之后，三月十三日，乾隆皇帝遂召集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宣布胡中藻的种种罪状。他先是指责胡中藻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以悖逆之词，肆意诋讪，“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尔后，便从

《坚磨生诗钞》中摘取诗句，历述胡中藻的条条罪证：

其一是诽谤、反对满清王朝的统治。就胡中藻将诗集取名《坚磨生诗钞》，指出“磨”字出于《论语》，孔子所称“磨涅”，是指反叛的佛肸而言。乾隆指责胡中藻以此自号，是存有不良之居心。又指出胡诗中的“一世无日月”是影射清朝统治的黑暗；“又降一世夏秋冬”，是暗示清朝将为新的朝代所代替；“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把浊字加在清的国号之前，意在发泄不满情绪等等。其二是直接攻击乾隆皇帝本人，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是指斥皇帝怠于政事；对胡中藻曾出过的试题“乾三爻不像龙说”，认为“乾隆”是他的年号，“龙”与“隆”同音，试题中所含的“乾不像龙”是对皇帝的咒骂。其三是互相吹捧，党同伐异，如“记出西林第一门”，指斥胡中藻以鄂尔泰（姓西林觉罗）门生自居，攀援门户，实为“恬不知耻”；对胡中藻攻击张廷玉、张照的诗句，如“琐沙偷射蜮，谗舌狠张箕”等指斥为“门户之见，牢不可破”，等等，诸如此类罪证，乾隆皇帝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地列举了数十条。最后，又对站在他面前的众大臣们说道，胡中藻有以上如此之罪状，这么多年了，竟没有一人参奏他，可见互相袒护之风已牢不可破，对此不得不申国法、正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惩治胡中藻。遂下令众大臣对胡中藻案情严加审议，提出处置意见。此时的众大臣们，见乾隆皇帝对胡中藻如此之愤恨，严惩胡中藻已没有什么异议，遂秉承乾隆旨意，纷纷提出要将胡中藻按“大逆罪”以凌迟处死，其嫡属男十六岁以上皆处斩。

乾隆皇帝治罪于胡中藻，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对胡中藻的指责及乾隆皇帝在处理全案过程中的种种议论，都可以看出他是针对张、鄂各结党羽，其门徒互为贬诋这种恶习的。而乾隆皇帝选择了胡中藻作为打击这种恶习的一个借口，既然是这样，那么对胡中藻打击，就不能让人们看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痕迹。

并且，当大臣们提出凌迟处死胡中藻的时候，他又强调说："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只是胡中藻所刻《坚磨生诗钞》连篇累牍地谤讪诋毁，才不得不"申明宪典"，重治其罪。以此来表明他治罪胡中藻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是没有冤枉他的，为了表示宽厚大度，乾隆皇帝特意对胡中藻的处置，由"凌迟"改为"处斩"。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胡中藻被斩决。

与胡中藻同案治罪的还有鄂昌、史贻直等人。因鄂昌与胡中藻平日来往密切，指责他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反而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在抄他的家时，又发现了他所作的一首《塞上吟》，称蒙古为"胡儿"，乾隆又指责这是"自加诋毁（鄂为满人），非忘本而何?""纯属满洲败类"。在处死胡中藻的一个多月后，乾隆皇帝遂赐令鄂昌自尽，并警告满族官员说："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律照鄂昌，严惩不贷!"在处置了鄂昌之后，又将已死十多年的鄂尔泰以结党罪，撤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之戒焉"。

胡中藻一案就此了结。乾隆皇帝治罪胡中藻，意在彻底清除张廷玉、鄂尔泰两党势力，通过这一案件，乾隆皇帝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专制皇权。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

王锡侯字贯案

王锡侯是江西新昌县人，举人出身。一生不曾为官，平时居于家中笔耕度日，是封建时代典型的穷知识分子。虽然一生中没有较大的坎坷，但在做学问方面也未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写过一些政论文和诗词歌赋，也极为平庸，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只有一部著作在他看来还算拿得出手，这就是他从四十多岁开始到近六十岁，用了十七、八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字贯》一书。王锡侯写此书是针对《康熙字典》利用不便，“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子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的情况而编辑的。

但是，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平常常的小知识分子，竟然对钦定字典进行“穿贯”，并对康熙字典妄加评判，此举哪能为封建统治者尤其是“至尊”、“圣明”的皇帝所能接受？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王锡侯有一个同族的亲戚叫王泷南，他同王锡侯素有矛盾。这一年，他发现王锡侯写了一部《字贯》，遂以私自删改《康熙字典》为名，到知县衙门告发王锡侯。新昌县令随即将此事报告了江西巡抚海成。

海成接报之后，派人锁拿王锡侯，子其家中抄得《字贯》刻本。只见该书序言内在颂扬字典之下转语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又有“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等。海成看过之后，认为以上文字虽没有悖逆之词，但暗寓优劣之意，实为狂妄不法，遂向乾隆皇帝上了第一道

奏折，并同《字贯》刻本一同呈上，请求革去王锡侯举人，以便审拟。

乾隆皇帝得到奏报之后，最初也以为王锡侯不过是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自有应得之罪，遂交大学士、九卿议奏。但乾隆皇帝阅及《字贯》一书，当看到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他自己的御名字样悉行开列之后，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同时痛骂海成，对《字贯》中甚为明显的“悖逆之词”视而不见，实属双眼无珠，天良尽昧，有负皇恩。遂传旨对海成严行申饬，又责令其到王锡侯家详细搜查，将所有不法书籍字迹封固进呈，另外将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

海成得令之后，不敢怠慢，亲自带按察使及王锡侯所在府县官员前去王锡侯家查抄，获得书籍 319 种，经史诗文杂集 310 种及函文信件等。然后逐一进行审阅，查出应销毁逆书 9 种，《字贯》20 部及诗文中的一些狂妄悖逆之词，又发现原大学士史贻直、刑部侍郎钱汝诚之父钱陈群为王锡侯诗文和家谱作序的情况。十一月初四日，海成将查抄、审查的结果，报告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详细审阅之后，命令刑部开始对已解京的王锡侯进行审讯。

审讯的情况是这样的：

问：钱陈群、史贻直是如何为你写序的?

供：我是庚午科中式举人，此科江西正主考是钱陈群，副主考是史贻谟。我丙戌年会试下第后，于九月内携所著的《经史镜》及选的《唐人试帖详解》稿，到嘉兴座师钱陈群家就正，求他做序。那时适值钱陈群的夫人俞氏病故治丧，没有给我做，后来就自己做了，刻上他的名字。王氏家谱上刻的史贻直序文，是我从前会试到京，求了座师史贻谟转求大学士史贻直做序，以为族谱光彩，史贻直没有给我做，也是我自己做了写上他名字的。

问：你的书上既然刻了钱陈群、史贻直的序文，如今又说他们的序文都是你自己做的，钱陈群、史贻直、史贻谟俱已身故，你说的都是死无对证的话，况据你说钱家因有丧事没有替你做序，那时史家并没有事，为什么也不替你做呢？明系你自知身犯重罪，将这些事都揽在自己身上，要做好汉子，开脱别人。若在他两家或从别处查了出来，你的罪不更加重了吗？

供：这几篇序文，原因我是史、钱两家的门生，所以要借他们的名字，以显示学有渊源。至于史贻直的序文，我请史贻谟转求之后，又去催了两次，史贻谟说中堂的事忙，一时做不出来。我下第后，急欲回籍，不能等待，就回家自己做了。若他们实在给我做了，我自身犯重罪，如何还肯替他们隐瞒呢？

问：你身为举人，该知尊亲大义，乃于圣祖仁皇帝钦定《康熙字典》擅行辩驳，妄作《字贯》一书，甚至敢于凡例内将庙讳御名排写，这是你大逆不道的实迹，究竟你是何主意？

供：我从前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约为《字贯》，原图便于后学。书内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让后学知道避讳。后来我自知不是，就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换另刻了，现有改刻书板可据求查验。

问：你将《字贯》重行改刻，这就是你自知前书内有大逆不道之处，故又希图掩盖，愈见你从前是有心悖逆，还有何辩？

供：我将《字贯》重刻，原是自知前书不好而改正。如今王泷南将我前刻未改之书呈出，我从前不知忌讳，妄编妄写，就是我的狂悖实迹，还有什么辩处呢？

问：你于《字贯》凡例内，将先师孔子讳先写于庙讳御名之前，庙讳御名凡为臣子何人不知，至于孔子名讳尤属众所共晓，你于书内开写，这明是你有心犯讳，故意如此，还有何说？

供：我少年时未知庙讳御名，是后来科举时才知道的，恐怕少年人不知避忌，故于书内开写，使人人知晓。至于将孔子名讳

开列于前，是我从前进科场时见场内开出应避讳的条规就是将孔子开列于前的，故此我照着写的，但我将庙讳御名排写直书，这就是我该死之处了。

问：你既是读书人，就该知道大夫不敢祖诸侯，你自作家谱，竟将周朝列王直溯到黄帝，都附会认作你的远祖，你以士庶妄祖帝王，你的悖逆之心业已显然，还敢狡赖吗？

供：我原知道大夫不敢祖诸侯，只因无知糊涂，要攀附帝王后裔，觉得家世体面，这是我该死之处。

问：你身列衣冠，著书立说，敢于肆行狂悖，你的各样书内悖逆之处，不可枚举，皆出有心，并非草野无知误犯忌讳者可比，你要将种种悖逆都是什么意思，从实供来。

供：我自己该死，明犯忌讳，已经罪无可逭。至于我著书初心，不过是指望得名，并图书籍刻成发卖，亦可觅利，如今想来，以践土食毛之人乃将圣祖钦定之书，妄行更改，希冀沽名渔利，是以天夺其魄，鬼使神差，以致自蹈狂逆，这都是我自作之孽。

十一月二十八日，对王锡侯的审讯结束了。王锡侯作为一介书生，在严厉的审讯面前已无强有力的辩解。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对案情进行审议，最后提出了处理意见：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家产籍没入官，王锡侯所著一切书籍通令各省查缴销毁。乾隆皇帝同意了大学士、九卿等提拟的处置意见，只是将王锡侯由凌迟改为斩决。

对与此案的有关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乾隆皇帝于十二月十七日和二十一日分别下了两道谕旨：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阅看王锡侯《字贯》一书时，不能检出悖逆之词，竟同海成同声附和，令将其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高晋，作为海成的上司，亦难辞失察之咎，令将其降级留任。而已

管押候审的海成，令将其“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掌故丛编·王锡侯字贯案》

尹嘉铨请谥案

尹嘉铨是直隶博野县人，举人出身，做过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的司、道官，后来进京，任大理寺卿，时间不长，因年老休致回乡。他的父亲尹会一在乾隆初年当过河南巡抚，为官期间，热衷于提倡道学，是当时较有名气的道学先生。因从小受道学的影响，尹嘉铨的仁、义、忠、孝观甚为强烈，特别是对“孝”字非常的尊崇，一言一行都仿效其父当年孝顺母亲那样，遵守孝道。他离职休闲在家，无事可做，平时研究一些道学，醉心于想作个道学家，但多少年过去了，他在道学的研究上仍没有惊人之作，而当年为官的一些政绩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为此，他常常耿耿于怀。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乾隆皇帝巡幸五台山，回京的路上要驻跸保定，尹嘉铨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又想起乾隆皇帝在一首御制诗注中提到他的父亲尹会一的一段话：“尹会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想到此，他突发一念：何不借皇帝来保定之机，启奏皇上，为其父请个谥号？思前想后，他决定试一试。

同年三月十八日，他写好了一份奏折，让他的二子尹绍淳送到保定。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赐诗令奖，现已故去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陆陇其格外予谥之例，即依御制诗内字样赐之谥法。乾隆皇帝看到奏折之后非常生气，立刻斥责道：尹嘉铨遣其子至行在奏为其父请谥，实属狂

妄。易名赐谥乃国家大典，岂可妄求，又不亲来乞恩，应交部治罪。但后来乾隆皇帝考虑到尹嘉铨也是为父私情，不宜重罚，遂决定对其不予追究，只是提出警告：若再不安分家居，则罪不可逭。

可是，尹嘉铨并未因乾隆的斥责而改变初衷，紧接着他又上了一折，这一次他又提出了将其父从祀孔庙的请求，他说：当今盛世，雅化作文，名臣辈出，可从祀孔庙者不乏其人，而本朝只有陆陇其享此殊荣，尚未及元明诸儒之众多，终属缺典。应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应请准一并从祀孔庙。看到这里，乾隆皇帝的愤怒之情已无法克制，痛骂尹嘉铨“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下令革去其顶带，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及在北京的家产。同时要求将尹嘉铨的两份奏折及皇帝的批示，交大学士、九卿阅看，之后通谕中外，使天下咸知之。

军机处接到乾隆皇帝命令之后，立刻派直隶总督袁守侗前去博野办理逮捕尹嘉铨及抄家事宜，在京大学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家产，并叮嘱二人要特别留意搜检带有“狂妄字迹”的书籍、诗文及信件等。

二人领命分头行动，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英廉带人连续两天反复搜查尹在京住处，搜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封、书板1200块。袁守侗抄没尹在博野家产计有：祠堂一所、祀田84亩、义学田一顷，还有一些银两和房屋等。

军机处得到英廉、袁守侗从尹家抄来的书信等，交给了专门查办书籍的翰林，逐一进行审阅，最后从尹嘉铨所著各书中查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多处。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结束东巡回到北京，军机大臣立即将查办情况向乾隆汇报，他特别详细阅看了查出的“悖逆文字”，

并逐一进行驳斥和指责。如尹嘉铨在所著各书内，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乾隆皇帝对此大发议论，他说：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接着又提出质问：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暨朕躬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后有何事借为大学士参赞？

再有，尹嘉铨在《朋党之说起》一文中，说朋党往往是以门生与老师的关系为纽带而形成，反对朋党势必削弱“父师之教”，这样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有意与雍正帝所作《朋党论》唱反调。他斥责尹嘉铨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

另外，尹嘉铨仿照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也编著了一本《名臣言行录》，将清初以来的大臣高士其、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悉行胪列，选录其中。乾隆皇帝认为，以上诸臣居心行事不能和古之名臣相提并论。再则，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其子孙们，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另外，朱熹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宋朝南渡衰败之时，其评骘尚皆公当。而倷（指尹）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

乾隆皇帝对从尹嘉铨著述中挑检出的诸条碍语，亦一一阅示。如尹嘉铨称他的父亲尹会一与张伯行等为“孔子四门”；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自称“古稀天子”，而尹嘉铨竟也自称“古稀老人”；其书中有“为帝者师”之句；尹嘉铨称其父母死为“薨”，等等。所有这些，在乾隆皇帝看来，都是有意识地对朝政不满，发泄抵触情绪，甚至是与最高统治者唱反调。因此，他认为“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于是，他决定，先把尹嘉铨交刑部进行审讯，然后再定其死罪。

也就是在乾隆皇帝回京的第二天，对尹嘉铨的审讯就开始

了，审讯历时半个多月，由于尹嘉铨文字著述很多，又因其官至大理寺卿，案涉六部及都察院、通政使司等众多中央部门，故直接参加刑审的官员达四十余人。四月十七日，负责审讯的大学士英廉、三宝及各部、司官员向乾隆皇帝奏疏，报告了反复审讯的详细情况，并提出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的建议。

最后，乾隆皇帝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同时命令各省督抚等详悉访查尹嘉铨所遗文字书籍，如有发现，即行解京销毁。

根据乾隆皇帝的命令，江苏、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两广、江西、山东、湖广、闽浙、陕西、甘肃、福建、云南、直隶等省都进行了严格的清理搜查，各省督抚先后向乾隆皇帝奏报查办结果，各省清查活动到年底才基本结束，共查出尹嘉铨著述八十二种，全部予以销毁，其在各地的碑文石刻等也一律铲销磨毁。

尹嘉铨著述全部销毁之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直隶总督刘峨又将尹在博野的房屋归官，将坐落于祁州的房产、庄园等，折银变卖，至此，尹嘉铨由请谥引发出的文字狱案才宣告结束。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乾隆南巡

乾隆皇帝是有清一代较有作为的君主，他二十五岁登上皇帝的宝座。那时他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即位伊始就大权在握。在初政的几年里，一改先父雍正皇帝的苛猛政治，以宽大为怀，使当时甚为紧张的政治气氛缓解下来；他又整顿吏治、减免钱粮、调解皇族内部矛盾、清理政治积案，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深得人心。十几年过去之后，乾隆皇帝已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清帝国开始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

但是，乾隆皇帝并不满足和陶醉于已有的成绩之中，他要把清帝国推向一个全盛的时代，他认为，以他的雄才大略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如何把清帝国推向一个全盛时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封建统治，使大清帝国的江山长治久远？在他看来，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处于全国举足轻重地位的江浙等南方诸省，对于他建立起强盛的帝国至关重要。更何况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也曾六次南下。所以在最高统治者中，看到了它的重要性，并千方百计要紧紧地控制和拉紧中央与南方诸省的关系，决不是他一个人。因此，他决定要到南方去，以“循其旧例”为由，也要六巡江南。就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十月，他便下了一道关于南巡的重要谕旨，说他对地广人稠的江南各地素所惦念，他要去巡视，以观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闾阎疾苦”。

南方诸省，特别是江浙地区，的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政治方面来说，江浙地区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活动一直延续不断。地主阶级及士大夫阶层与清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也不是十分融洽，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有潜在抵触情绪，虽然这一切到乾隆统治时期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虽然抵抗的行动没有了，但从人们的心理、思想上是否完全归顺、服从于清朝的统治，对此作肯定的回答，乾隆皇帝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乾隆南巡把笼络豪绅、取信于民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他在南巡期间，采取种种手段，优容汉族官僚士绅，选拔学有专长的人才，蠲免租赋，减轻酷刑，祭奠历代名人和皇帝祠墓及大禹庙、周公庙、孔庙等几千年来为人崇拜的庙宇……等等，都是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联合和团结江南士绅、争取人民对清政府的支持。

就经济方面来说，江浙为鱼米之乡、厚赋之地，良好的自然条件，丰富充盈的物产，使之成为全国最繁盛的经济区，国家有相当一部分的财赋收入即从江浙而出。据乾隆十八年的记载：江苏省有民田六十八万余顷，征赋银三百三十七万余两、粮食二百一十五万石；浙江省有民田四十五万余顷，征赋银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粮食一百一十三万余石。这两个省的田地、赋银、赋粮总数，分别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和百分之三十八。由此可见江浙两省在全国经济领域的特殊地位。

就文化方面来说，江浙两省人文茂盛，有“文化渊薮”的美誉，在这里保存了大量的祖国文化遗产、图书典籍，涌现出许多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明末清初在这里还荟萃了一批具有反封建意识的进步思想家，清朝建立全国统治之后，这里的排满情绪最为突出，故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注意这里的思想、文化动态，对这里的专制不免会出现过于严厉的倾向，具有清代特色的文字

狱，有许多大案就是发生在江浙两省。因此，乾隆皇帝要加强文化专治，必然地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

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巡幸江浙，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开始了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大约作了两年多的准备工作，同行的有王公大臣、侍卫官员、兵丁仆役等共二千多人，使用船只一千多艘，其行程的路线是：从京师出发，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抵浙江，再经嘉兴、石门到达杭州。返程时，沿运河北上，在顺河集登岸，由陆路经泰安，五月初四日回到北京。

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为了表示他对所要巡视地区的关怀，达到维系民心的目的，诏令将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所过州县当年应征额赋蠲免十分之三，其中受灾歉收地区蠲免十分之五；把皇帝巡行驻跸之地江宁、苏州、杭州及附近诸县当年应征的地丁银全部免除。同时又命令，增加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学额，另外，还要求学政推荐有学有识的才学之人，代皇帝选拔，或授以功名，或予以录用。二月份，乾隆一行到达江苏的清口（今清江市）后，渡过黄河，阅视了天妃闸和高家堰。对于黄河的治理问题，清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康熙南巡的时候，就把主要的精力用于考察黄河水利上。乾隆也是如此，他曾说过“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渡黄河的时候，当他看到汹涌的黄河水时，就开始考虑对其如何治理问题，并不停地寻问随从官员和专家历年治理黄河的情况，然后根据他得知的情况，不断提出治理黄河的意见。经过淮安的时候，当他看到在淮安城北一带内外都是水，只建有土堤加以御防，立刻命令河道总督高斌：将土堤“改建石工，以资保障”。归途中，在天然坝、蒋家坝阅视堤工。天然坝位于洪泽湖的尾端，夏秋季节水涨湖满，每当此时当地河臣就打开大坝分流泄水，居民常受其害。乾隆皇帝谕令“天然坝不可

开，夫设堤为卫民也，设堤而民仍被其灾，设之何用?”当即指示河臣，在洪泽湖原有三座坝的基础上，再兴建两座，以缓解和减少湖水的流速、流量，以保证下游河道的安全，减少下游居民的受灾程度。乾隆帝视察河工之后，乘船沿运河经扬州，到达苏州、杭州。在这人文荟萃的中心，百年教泽，民多俊秀，乾隆皇帝犹如处于“比户书声”的氛围中。他是一个崇拜汉文化且修养较深的皇帝，一到这里，他便指示内阁，对善写诗文者进行考试，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考中者赐给举人，予以录用，表现出了他对人才的重用和对汉文化的兴趣。从杭州启程到江宁（今南京）的时候，以隆重的仪式祭奠了明太祖陵，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为此他还特意强调：“（明陵）寝殿依然，松楸无恙，皆我祖宗盛德保全之所至也。”其欲笼络人心，树立自己威信的想法是非常显露的。四月，回程经山东，乾隆到泰山的岱庙焚香，于五月初四日回到北京圆明园。

第二次南巡，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开始，此次行程和上次相同。行前照例免除江浙皖三省民欠及经过直隶、山东、江南等地方额赋的十分之三。从京师出发之后，渡黄河阅视天妃闸，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苏州。在这里，乾隆皇帝和皇太后一起“临视织造机房”，了解生产情况。到达杭州之后，他要求检阅一下水师的操练。上次南巡在江宁曾阅视了满汉驻防兵的操练情况，但因长年“兵不练武”，操练效果不佳，乾隆皇帝不十分满意。此次当看到前来接驾的汉族绿营兵中有持乐器演奏的，当即斥令在营伍中概行禁止此种陋习，提出“身隶行伍，当以骑射勇力为主”。在路上，乾隆皇帝特别留意了各省驻防军队的情况，为了整饬军纪，强化军队战斗力，每到一处，都告诫官兵们，要向当年满洲八旗兵丁那样，提倡尚武精神，力戒武备松驰。对各级将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见到有些军官外出乘轿子的时候，随即下令一律不许坐轿，只能骑马，否则以违制例治罪。但

是，他的命令也只是在当时起些作用，他走后，积习难改的军官们仍依然如故。回程中他到了徐州，视察这里的河务情况，在徐州的一段黄河，河身狭窄，一遇涨水便有堤溃之患，他亲自勘察之后，指示对北面护城的石堤“应加帮以培其势”，没有石堤的地方“应接筑以重其防”，加强了徐州一带的防水患能力。当他经过徐州附近桃源、宿迁等州县时，见灾民“鹑衣鹄面，相望于道”，下令地方官给以赈济，并提出让这些灾民去修坝筑堤，以工代赈，既解决了河工所需劳动力，又解决了灾民的衣食问题。接着，乾隆沿陆路到山东曲阜祭奠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圆明园。

第三次南巡，于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开始，从京师出发到达江苏清江后，坐船巡视河堤，详细察看了上次南巡时下令修建的洪泽湖一带的堤坝情况。过长江后，乾隆在焦山再次检阅水师操练。三月到苏州后，先到文庙行礼，之后会见了前来接驾的、在当时很有名望的数学家梅珏成及江浙著名文人沈德潜、钱陈群等人，乾隆帝亲自写诗赠给他们，以示慰勉。在苏、杭两地，又照例令内阁对进献诗文的汉族文人学者进行考试，考中者“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挨次补用”。四月，乾隆一行来到浙江的海宁。在这里，他着手进行了海塘工程的筹划和决策。当时对修筑海宁的海塘工程有两种意见，一为柴塘，即捆埽作铺底，柴土相间，在于顶上培以厚土，建成塘围。一为石塘，即用大条石参差压缝垒砌，在每层上还扣砌铁锭。但海塘之下皆是浮土活沙，砌以石块不能牢固，有人又提出可向内移数十丈，土质坚固即可施工，但向内移砌，则又须毁拆田庐聚落。乾隆皇帝考虑再三，决定改进、修筑柴塘，以顾及目前，同时每年接涨沙坚，稳固塘根，再改筑石塘，以图长远。这样，既没有毁弃已成的田庐，又没有鲁莽从事难成的工役；既考虑到了眼下，又想到了将来，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融合在一

起，在实施上是行得通的。四月分成两路，开始回程，庄亲王胤禄陪皇太后行水路，乾隆本人行陆路。他再次到徐州，巡査前次部署河防工程完成情况，又针对黄河淤沙渐积，辄至暴涨；而各处坝闸，宣泄无节，下流常常受害，命各督办河臣详定水位标志，严格按水涨落情况，开放或堵塞堤坝。进山东境内后，巡视了峄山湖，去邹县孟庙拜谒，到曲阜孔庙行礼，五月初四日回到北京。

第四次南巡，于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开始。出发前，宣布了江、浙、皖三省因灾而积欠的额赋银两“加恩悉行蠲免”。历届南巡，乾隆都规定对沿途所经三十里以内地区的历代帝王陵、名人祠、著名神庙，都要派人致祭、焚香，以示对汉族帝王和历史名人的崇敬和纪念。在这次南巡中，对江苏省内周代的泰伯，吴国的季扎，宋代的宗泽、范仲淹，清代已放大学士张玉书，江宁府境内晋代的卞壶，宋代的曹彬，明代的李文忠、徐达，清代的于成龙和浙江省境内的海神庙、禹陵等等，皆遣官前往焚香或读文致祭。当他来到海宁的时候，再次对海塘工程问题提出意见：海宁绕城石塘是全城抵御海潮的屏障，塘下护卫石塘的坦水（垒土为坡以为护堤）只有两层，有潮水冲顶的危险，应将绕城石塘五百三十余丈全部筑成三层坦水，以有效地护城保塘；同时他还要地方督抚官员，要严格施工，勿滥勿浮，切实收到实效。视察海塘后，乾隆一行抵达杭州，又一次对进献诗文者进行考试。回程时绕道江宁，进行了阅兵活动并临视了织造机房。四月，到达德州驻跸数日，命简亲王丰讷亨奉皇太后由水路回返，乾隆由陆路于四月二十一日返回北京。

第五次南巡，于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开始。渡过黄河到清口阅视堤工，在浙江乘船到海宁观潮，之后来到海门石塘。当他看到经多年潮汐冲刷的石塘，活土浮沙坍塌、底桩腐烂、裂缝显露的情况，决定以两浙商人为修筑河工捐纳的六十万两白银，

将老盐仓一带四千二百余丈的石塘改建为鱼鳞石塘，以垂永久。同时提出对原有的柴塘要严加维修、保护，不能因筹建鱼鳞塘而拆毁他用。乾隆历次南巡还以“用播德音，以符宽大”的姿态，对所到地区的犯人或减刑或释放，以此来显示他的仁政宽松，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这次南巡中，他曾对身边的随从大臣说：犯罪之人身陷囹圄，实由自取，但其中奸民之犯法者故多，而无知误蹈之人亦所时有，对这些人可使其自新。据此，他指示对江浙等省情罪较大的重犯不予宽大处理之外，其余军流遣犯都可以一体缓减，或改为杖一百徒三年，或改为杖一百；已经到配所的徒犯可即行释放；中途逃跑的免于缉拿；应脸上刺字的免于刺字，等等。乾隆一行到杭州、江宁又举行了阅兵和祭明太祖陵等活动。北上渡黄河后，到武家墩阅视高家堰堤工，之后乘船至德州，从陆路于五月初九日回到北京。

第六次南巡，于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开始。此次南巡再次谕令除对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犯人继续予以减刑发落外，减刑地区又增加了直隶、山东两省。二月，乾隆一行抵达山东泰安，到岱庙行礼、谒少昊陵，在曲阜到孔庙瞻礼，释奠孔子。三月，渡黄河后沿运河南下至浙江，在海宁对已竣工海塘工程作了最后指示，要求进一步做好完善工作，在旧有柴塘基础上，一体添筑石塘，将沟槽填实并遍植柳树，为此拨给库银五百万两，连从前所拨帑银，限期五年完成以上工程。到杭州后又一次检阅了福州水师，回程时在江宁祭奠了明太祖陵之后，沿运河北上至德州登陆，于四月二十三日回到北京圆明园。

到此，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活动基本结束。这六次南巡，可谓兴师动众，浩浩荡荡，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每次随同的有王公大臣、侍卫弁从二三千余人，花费帑银数百万两，修建历次住跸行宫三、四十处。

乾隆六次南巡基本上达到了他最初设想的目的，政治上加强

了满汉的联合，巩固了封建统治；经济上推动了对河工、海塘工程的治理，在南巡的过程中，大力提倡“奖励农桑”、“重农务本”思想和亲临织造机房，也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文化上提倡汉学并选用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文人学者。

但是，乾隆皇帝在整个南巡过程中，大肆挥霍，铺张浪费也是惊人的。乾隆虽谕令各级官员南巡时要“力戒纷饰增华”，所有行营供顿、道路桥梁等“悉出内帑，不许苛索于民”，但其随从和地方官为取得皇帝的容悦，极尽铺张浮华，唯求逢迎献媚。而乾隆皇帝对此也未加以严禁，致使南巡铺张奢靡之势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凡皇帝所至，戏台、彩棚、龙舟、镫舫沿途点缀；所过之处，地方官极尽搜刮、滥用民力，致使贪污舞弊丛生，官吏乘机中饱私囊，人民则怨声载道。

如果说乾隆六次南巡，通过他积极有效的各种决策，把清王朝推向全盛起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南巡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在清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败的过程中，也起了消极作用。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380、卷382、卷533、卷536。

《南巡盛典》。

两征大小金川

金川地处四川省的西北部，为藏族集居之处。大渡河的上游有两个支流，一是促浸水，为大金川；一是儹纳水，为小金川，皆以临河之山有金矿而得名。这一带地区，万山丛矗，河涛汹涌，居民以石碉为屋，沿河两岸而居。因物产较为稀少，居民生活甚为贫困。

两金川与内地很早以前就有了联系，主要是民间进行的易货贸易往来，而官方建立的关系，最早始于隋朝。隋朝在这里设置金川县，唐代属雅州管辖，明代封金川土司哈衣麻衣喇嘛为“演化禅师”，颁授印信，属杂谷安抚司管辖。到了清代，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授金川头领卜尔吉细为土司。康熙五年（1666年）其土司嘉勒巴归顺清廷，被授与“演化禅师”印。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以嘉勒巴之孙莎罗奔随岳钟琪进藏平乱有功，授其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受封之后，自号所居地为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所居之故地为小金川。

在大渡河上游这一带地区，除大、小金川之外，与其相邻的还有绰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巴旺、布拉克底、丹坎、鄂克什、工噶、卓可采等九个部落。清政府对其实行的是“以番治番”的策略，以遍置土司的方式，使其各自分疆而守。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被清廷授与安抚司之后，其势力日益强盛起来，经常对邻边土司进行攻掠，侵占土地，抢夺财物。特别是对小金川，觊觎之心愈来愈强烈，并施展阴谋手段，企图兼并小

金川。为达到此目的，莎罗奔先把自己的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为人朴实，性情又比较懦弱，很快为其妻所制。这样，莎罗奔通过其女儿，掌握了一些操纵泽旺的权力。但莎罗奔并未就此罢休，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劫走泽旺之妻，诱捕泽旺，夺其印信。四川总督庆复得知此事，责令莎罗奔放还泽旺，归还其印信，莎罗奔勉强服从。乾隆十二年，莎罗奔又出兵围攻革布什咱及明正两土司，挑起争端，四川巡抚纪山派副将张兴率兵弹压，反为其所败，纪山急忙向清政府请兵。乾隆皇帝接到奏报之后，派云贵总督张广泗到四川，指挥清军向大金川进剿。为便于调度指挥，张广泗进驻泽旺所居的美诺官寨。

此时的莎罗奔驻守在勒乌围，他的侄子郎卡驻守噶尔厓。张广泗调兵三万，分为两路，一路由川西入攻河东，一路由川南入攻河西，而河东一路又分为四支，两支攻勒乌围，两支攻噶尔厓；河西一路也分为数支，攻庚特额诸山地，尔后配合河东四支向勒乌围和噶尔厓两地夹击。六月二十八日，两路大军同时并进，大有"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之势。但由于大金川地势险峻、山峦陡峭，在各山道隘口的险要处，番兵修建了坚固的碉楼，防范甚为周密，在番兵的顽强抵抗下，各路清兵纷纷受挫，一个多月后才缓进到距噶尔厓二十里的地方。在以后两个多月的双方交战中，清军毫无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张广泗仍不改变战略，继续坚持分路进兵的方针，把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到攻击碉卡上。但从清军进剿以来，番兵建筑了大量的碉卡，而且这些碉卡以石砌成，非常坚固，"枪炮俱不能破"。清军在张广泗指挥下，以主要兵力攻打碉卡，每攻一碉时，先把薪木堆积在碉卡附近，发起进攻时，举火焚烧，再以炮轰，还挖掘地道至碉卡下埋药炸毁。因大金川各地碉卡林立，攻一碉需几百人的兵力，费力不少，成效甚微，兵力不敷调用，只得再向内地要兵，到十二年底，清兵已增至五万多人。

在此期间，张广泗任用了一个叫良尔吉的人为向导，此人实际上是莎罗奔派遣的奸细，清军的一举一动，皆由其暗自通报莎罗奔，故清军凡有较大的军事行动，番兵皆有所戒备，清军常常无功而返。几个月的进剿，清军没有完成于九、十两月进取贼巢的计划，广大士兵情绪低落、斗志涣散。相反，大金川方面气焰却嚣张起来，不断向各路清兵发动偷袭，使清兵应接不暇，不能制敌，反而为敌所制。

乾隆十三年春，清兵完全处于守势，诸将多有失事，副将张兴、游击孟臣战死，总兵任举虽力攻昔岭，连夺碉卡，但也付出了伤亡士兵近千人的代价。

乾隆皇帝得知前线战况，觉得凭张广泗的指挥能力已不能改变被动战局。乾隆十三年正月以后，先后派遣兵部尚书班弟赴金川帮助料理军需，起用岳钟琪以提督身份赴军助战。五月又指派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前往金川总理军务。此前，已议定岳钟琪由丹坝攻取勒乌围，张广泗由昔岭攻取噶尔厓。讷亲六月到达前线军营之后，以锐意灭敌的气势，武断的下令限三日内攻下噶尔厓。清军再次发动进攻，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带兵进攻昔岭，陷人大金川番兵重围，清军三面受敌，买国良中枪身亡。任举再次带兵分三路来攻，遭到买国良同样命运。清军损兵折将，讷亲甚为恼火，但由于他自己不通军事，指挥才能有限，只得依靠张广泗出谋划策。而张广泗看不起讷亲，对讷亲初来时的盛气凌人耿耿于怀，故意把军事推诿给讷亲。此时的讷亲无计可施，竟请来道士、喇嘛，施用巫术破敌，使原已低落的士气更加消沉。七月，清军出动三千人进攻拉底山，行至山下，忽见十余番兵从山梁上呐喊而下，清军阵脚大乱，互相拥奔，多有损伤。

此时的讷亲并没有认识到指挥上的错误，仍向清政府请三万精兵增援。

一年来，乾隆皇帝从金川接到的总是要增兵的奏折，却还没

有听到任何胜利的消息，派出的战将，又因其之间的不和而殆误战机，令乾隆皇帝异常气愤。九月，以张广泗挟私观望，信用奸人，讷亲督师无方、乖张退缩等罪责，令二人回京述职，不久处死。又派傅恒为经略，急赴金川。傅恒调集了三万五千清兵，在摸清了敌情之后，拟放弃攻碉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以两路大军，向番兵展开出其不意的进攻。乾隆皇帝接到傅恒作战方略之后，有了新的想法。两年的金川用兵，军费开支近两千万两，调集诸省精兵八万，讷亲、张广泗两大臣被杀，任举、买国良等战将阵亡，进剿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而清军士兵厌战情绪有增无减，战争不能再进行下去了，遂命傅恒班师还朝。傅恒接到撤兵谕旨之后，再次向乾隆皇帝进奏："若复轻率藏事，则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今功在垂成，弃之可惜。"此时的乾隆皇帝决计罢兵，不允傅恒所奏。

就在傅恒向乾隆皇帝进奏的同时，他已与岳钟琪分两路大军连克敌碉，军声大振。而大金川在两年的征战中，作战人员大大减少，由于资源匮乏，军需供应明显不足，对抗清军的大规模进攻已力不从心。又闻傅恒上任之后决计以大兵直捣其巢穴，急遣人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轻骑径抵莎罗奔驻地，莎罗奔喜出望外，表示悉听约束，并顶佛经立誓。次日，莎罗奔父子随从岳钟琪前往清军营帐请降。傅恒责其抗命，不该恃强凌弱，莎罗奔自知此次争端，酿成战事，主要由大金川一方引起，故主动提出归还侵占其他土司的土地、交出凶犯和军械、放还抢掠的边民、向清政府供徭役等事。于是傅恒宣诏赦免莎罗奔，仍让他为大金川的土司。接受莎罗奔乞降之后，二月六日，傅恒等人起程回京。这样，清政府得以兵不血刃即平定了大金川。

主动投降的大金川，因未受清军重创，战斗实力依然保存着，在各土司中，大金川的势力仍最强。不几年之后，大金川故态复萌，与各土司之间不断挑起争斗，战乱时有发生。面对这种

局面，鉴于前此征剿大金川的教训，清政府仍然采取“以番治番”的策略，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争斗，清政府便不予直接介人。

但是，到了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逊位，其侄郎卡操持了土司的大权，他野心勃勃，开始向邻近土司进行侵掠活动，乾隆二十三年，攻掠小金川和革布什札土司。四川总督开泰下令阻止，但郎卡置开泰令于不顾，仍侵邻境不已。乾隆二十五年五月，莎罗奔病故，郎卡承袭大金川土司职，这之后郎卡更是肆无忌惮。二十七年九月，郎卡公然率兵围攻丹坝。清政府这一次没有贸然调兵前来，而是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与大金川邻近的绰斯甲布等九个土司的兵力，联合会剿。由于各土司都惧怕大金川三分，对联合行动顾虑重重，各土司间不能很好的协同作战，至使会剿陷于瓦解。阿尔泰看到这种情况，被迫采取从中调解，实际上是妥协的办法，即在下令各土司退兵的同时，也令大金川拆毁碉卡，归还虏掠的丹坝人，并答应由清政府颁给郎卡新的印信，准许其赴西藏熬茶拜佛，另外又同意大、小金川之间可以缔结姻亲关系。

答应两金川可以联姻后，郎卡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泽旺的儿子僧桑格。附近各土司遂推两金川为雄长。这就为后来两金川欺压邻边、联合抗清埋下了祸根。

大、小金川联姻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后来，大金川土司郎卡去世，由其子索诺木继土司位，小金川土司泽旺老病不能理事，其子僧桑格掌握了实权。乾隆三十五年，小金川北面的鄂克什土司，其头领色达克拉将小金川泽旺和僧桑格父子姓名写在咒经上，对其父子俩进行诅咒，僧桑格以色达克拉的诅咒致使其父子染病为借口，向鄂克什发兵，抢夺其人口及牲畜。鄂克什人少势单，答应以割让三寨换得小金川的退兵。此时，大金川也趁机向革布什咱侵犯，杀害了色楞敦多布土司。两金川的兴兵发难，

再次惹怒了清政府，责令阿尔泰让小金川退兵，归还所掠人、物。僧桑格不从，遣人到鄂克什索要割让之地，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见清政府出面干涉，遂毁前约，不肯割地，并请清军攻剿小金川。僧桑格遂发兵围攻鄂克什。面对两金川的狂妄行为，乾隆皇帝决定再次对大、小金川用兵。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命令阿尔泰、董天弼从成都抽调满兵一千、绿营兵等五千，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向小金川进攻，后取大金川。进攻小金川的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董天弼率领，刚与小金川接仗，便遭到败绩；另一路由阿尔泰统帅，先安营于四川的打箭炉，见董天弼受阻，便不敢发兵，竟按兵不动达两个多月。为此，乾隆皇帝革去了阿尔泰大学士、总督职务，而以温福为大学士赴川督师，以户部侍郎桂林为四川总督，调拨八旗、绿营兵开赴四川。

乾隆三十六年冬，清军兵分两路，一路是温福由汶川往西，一路是桂林由打箭炉往南，向小金川夹击，清军连夺关隘碉卡，攻克甲木、噶尔金等城寨，深入到小金川腹地。当桂林率兵收复被大金川侵占的革布什咱之后，派部将薛琮带兵三千先向甲木尔山梁进发，行至黑垄沟，被大金川番兵截其后路，薛琮告急，而桂林未能急时赴援，致使全军覆没。桂林将此事隐而不报，被弹劾后，由阿桂代为参赞大臣赴南路指挥，很快攻克了甲木尔山梁及洛顶宗、喀木色尔等城寨，到十二月初便打到了离美诺不远的僧格宗。温福统领的西路，沿途拔寨夺碉，也很快攻克了距美诺十余里的明郭宗。然后，两路清军汇合攻下了小金川土司住地——美诺，土司泽旺被擒，僧桑格突围逃往大金川。征小金川之役至此取得全胜。

小金川被征抚之后，清军抵达大金川近边。阿桂向索诺木檄谕，索要僧桑格。索诺木拒绝交出。在清军进剿小金川时，大金川常出兵给小金川以增援，所以乾隆皇帝认为两金川同恶相济，

狼狈为奸，应一举并灭，于是下令对大金川用兵。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再增调陕甘、云南诸省兵力，分兵三路，挥师大金川。此次进剿，主帅温福在作战方针上，犯了以前讷亲、张广泗所犯的错误，不是采取长驱直人，直捣敌巢的办法，而是仿效大金川，广筑碉卡，分兵把守，企图“以碉攻碉”，克敌制胜，重蹈了讷亲、张广泗失败的覆辙。果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清军没能有效的歼敌，反而被不断偷袭，清军节节败退，转攻为守。

大金川看到清军处境十分不利，便主动展开攻势，一方面，把兵力拉出来迂回到外线作战，另一方面暗地唆使小金川头目煽动降兵复叛反清，诸降兵见清军久屯不进，遂起而响应，先围攻董天弼的军营，接着又袭击温福军队驻守的木果木，温福毫无戒备，军营顿时乱作一团，温福中枪身亡，三千士卒战死，其余望风溃散，小金川之地得而复失。

正在热河的乾隆皇帝闻知小金川失守，非常气愤。小金川是清政府动用六、七万军队，花费近千万两白银，以两年的时间才得到的，如此轻意丢掉，令乾隆皇帝不忍心就此罢休，遂授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又调健锐、火器营二千，吉林索伦兵二千赴剿，累计总兵力达七万四千余人。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阿桂赴西路，带兵二万五千进攻鄂克什，转战五昼夜，直抵美诺并攻克之；明亮赴南路，带兵二万进攻玛尔里；丰伸额赴北路，带兵一万五进攻绰斯甲布。三路大军势如破竹，仅用五天便全行克复小金川。此时乾隆皇帝雄心勃勃，诏令诸将誓师小金川，决意不扫平大金川，擒获索诺木，誓不罢休。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十日，清军向大金川发起攻势。此时的大金川，由于多少年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防御能力比小金川要强得多。阿桂面对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狡猾多端的索诺木，采取诱敌深入、分兵合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

大金川的勒乌围。勒乌围以罗博瓦山为门户，阿桂令海兰察、额森特、海禄三路绕其后，福康安、成德、特成额三路仰攻其前，很快逼近勒乌围。索诺木面对清军大兵压境，又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准备向清军投降。一直想彻底剿灭大金川的清政府，对索诺木的请降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发兵向勒乌围外围屏障逊克尔宗官寨进攻，当扫清勒乌围外围城寨之后，各路清军形成了对勒乌围的夹击势态。索诺木见勒乌围难守，将粮、物开始向噶尔厓转移，作撤退准备。八月十五日深夜，清军发起总攻，战至黎明，终于攻克勒乌围，索诺木及众头目退往噶尔厓。

攻克勒乌围的第二天，阿桂率各路官兵向噶尔厓追进，一鼓作气攻下近二十个城寨，摧毁千余座碉卡，于十二月中旬来到噶尔厓城外，将其团团围住。索诺木之母阿仓，其姑阿青及其异母兄莎罗奔冈达先后出城投降，索诺木等人被围困至转年二月，见大势已去，遂带领其兄弟、妻子及众头人等二千余人出城，向阿桂跪奉印信，致此，大金川全部荡平。

荡平大、小金川，清军凯旋而归，乾隆皇帝举行盛大宴会，犒赏出征将士，对有功人员依次封赏晋升。

清军撤出两金川之后，清政府随即对其进行善后安置，先于两金川设镇安营，不久于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尔后又将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并改美诺厅为懋功厅，为清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结束了长期以来土司各自为政的局面，大、小金川等地名也不复存在。

（刘文智）

参考资料：

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昭梿《啸亭杂录》卷4、卷7。

《清高宗实录》卷101、卷279、卷287、卷298、卷309、卷313、卷323、卷560、卷675、卷777、卷894、卷923、卷1000等。

统一准回二部

清初，在中国的西部边疆有两大部族，一为准噶尔部，一为回部，分别牧居于伊犁和天山南路。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纪初以后，其畜牧经济发展很快，政治、军事力量也随之壮大起来，到巴图尔浑台吉执政的时候，准噶尔部已成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中最强大的一部。之后，不断自伊犁蚕食近邻，逼走土尔扈特和和硕特二部，势力更加强大。康熙初年，准噶尔内部出现纷争，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个儿子噶尔丹，以武力平息了内乱，成为准部新的统治者。他当政之后，更是以勃勃的野心，欲称霸蒙古诸部，先是攻打和硕特部，又发兵天山南路，灭叶尔羌国，并与沙皇俄国相勾结，向喀尔喀蒙古进攻。到十七世纪末，噶尔丹的势力已经控制了天山南北，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康熙年间，噶尔丹发动叛乱，康熙帝三次亲征，击败噶尔丹。因与噶尔丹争权而逃离准部的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乘机返回伊犁，收罗他原来的部属和噶尔丹的余众，重新组成了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乾隆十年（1745 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内部遂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斗争。

噶尔丹策零有三个儿子，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纳木札尔、幼子策妄达什。喇嘛达尔札虽为长子，因系庶出未能继位，汗位由次子纳木札尔继承。纳木札尔当政之后，常以暴行滥杀无辜，

生活上又非常的荒淫奢侈，引起部内大多数贵族的不满。乾隆十五年，喇嘛达尔札联合纳木札尔的反对势力，杀死纳木札尔，夺取汗位。但由于他出身低贱，不能孚众望，也没能得到贵族们的支持。而为贵族们所拥戴的是幼子策妄达什，特别是贵族中权势显赫的大小策零家族，是策妄达什最有力的支持者。大策零的孙子达瓦齐、小策零的儿子达什达瓦在部众中威信很高，如果他们与策妄达什联合起来，必然对达尔札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故达尔札先下手以武力迅速清除了正在形成中的敌对联合势力，诛杀策妄达什和达什达瓦，达瓦齐逃往哈萨克。

出逃的达瓦齐，不甘心失败，寻机谋求报复，遂联合了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准备打回准噶尔。阿睦尔撒纳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他成为辉特部台吉之后，对准部也存有觊觎之心，也曾参与策划谋立策妄达什一事。双方遂建立起反达尔札联盟。乾隆十七年底，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率精兵一万五千人，于山岭僻径绕道进入伊犁，深夜突然袭击达尔札的住地，达尔札正拥妾饮酒，尚未弄清何事，便被冲入帐内的阿睦尔撒纳杀死。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取汗位。

阿睦尔撒纳帮助达瓦齐重返准噶尔，有着他自己的目的，他想通过为达瓦齐争夺汗位，获得控制达瓦齐乃至整个准部的权力，事情的发展也正是如此。达瓦齐上台之后，遇事要找阿睦尔撒纳商量裁夺，阿睦尔撒纳对达瓦齐的政务也常指手划脚，达瓦齐对此甚为不满，但考虑到才夺王位，立足未稳，故不想与阿睦尔撒纳闹翻。不久，达瓦齐把部内事务安置就绪，便开始筹策如何对付阿睦尔撒纳问题，并以“不诛阿某，祸终未艾”为由，率全部兵力征讨阿睦尔撒纳。

乾隆十八年，达瓦齐派沙克都尔曼集台吉率兵攻打辉特部住地塔尔巴哈台，阿睦尔撒纳战败而逃，又遣宰桑巴雅尔、玛木特进行追剿。最后，阿睦尔撒纳率领二万多人投奔了清王朝，并请

求清政府出兵前往靖乱，想借清政府之手消灭达瓦齐。

清政府对准噶尔部纷乱的局势一直很关注，因为准噶尔部是西北边疆较有影响的一个大部落，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着西北边疆政局的动荡与安宁。而长期以来，准噶尔部对清政府时顺时叛，给清政府安定西北边疆造成许多困扰。康、雍时期，准部几度割据称雄，与清政府抗命对峙，并屡犯近边，康熙帝曾三次出征，雍正帝也曾两路用兵对准噶尔部进行征讨，但终究没有彻底征服。此次准部内乱，阿睦尔撒纳又前来乞师，乾隆皇帝觉得这正是对准噶尔再行征剿的好机会，正可以完成“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在分析了准部内外形势之后，认为“与其费力于将来，不若乘机一举，平定夷疆”，遂毅然决定发兵征讨准噶尔。

在对准噶尔发兵之前，乾隆皇帝先召见了阿睦尔撒纳，一是向他了解准噶尔目前的实际情况，倾听他对进兵准噶尔的意见；二是通过他的陈述，可使众大臣们对用兵准噶尔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因为乾隆帝此前在征求众大臣对准部用兵的意见时，众大臣鉴于前朝用兵无效，且屡有败绩，皆不愿劳师动众，只有大学士傅恒一人赞成。故乾隆帝在热河觐见阿睦尔撒纳，也命王公大臣皆从往陪宴。阿睦尔撒纳叙述了准部变乱始末，又力陈“伊犁可取状”，并提出发兵宜早不宜迟的主张。

统治者上层统一了认识之后，便开始着手准备进剿事宜。乾隆二十年二月，清军五万余人，分西、北两路向准噶尔进兵。其中西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由巴里坤出师；北路以班弟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由乌里雅苏台出师。两路大军各率八旗、吉林索伦精兵二万五千人，约定于伊犁东北三百里的博罗塔拉河会师。

此时的准噶尔内部已分崩离析，人心涣散，见清军大兵压境，纷纷投降。清军所到之处，诸台吉、宰桑，或带数百户，或带数千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清军一路行进，未遇

任何抵抗。五月中旬，便不费一兵一卒顺利到达博罗塔拉河，距伊犁只三百里。

达瓦齐得知清军已逼近伊犁，惊慌失措，急忙派宰桑征兵应战，而自己带宿卫亲兵撤退到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清军很快攻克了准噶尔部首府伊犁。退往格登山的达瓦齐企图凭借山险负隅顽抗，清军追击而至，先派厄鲁特降将阿玉锡等率二十余骑乘夜突袭其营，惊魂未定的达瓦齐以为清军主力来攻，仓惶带亲兵逃往南疆，其部众溃不成军，不战而降。清军主力尚未与敌接仗，仅用二十余骑便捣毁了敌军大营，收抚敌众七千余人。

此时的南疆已响应清军的平叛举动，当达瓦齐逃到南疆乌什城时，城主霍集斯设酒宴迎接达瓦齐，当达瓦齐豪饮酣醉之后，将其绑缚，押送清军营帐。这样，征讨准噶尔之役仅用了三个月便取得完全胜利。

乾隆皇帝得知准噶尔全部荡平，立刻指示臣下筹办祭天、地、社、稷及迎师凯旋、筵宴、赏赉等事宜。同年六月，出征清军陆续撤回内地。班第等人留驻伊犁，处理善后事宜。

随着准噶尔部的被抚定，想借清军之手达到个人目的的阿睦尔撒纳，野心也逐步的开始暴露。清军进剿准噶尔之前，清政府曾提出，准噶尔一旦荡平，将厄鲁特蒙古四部封为四汗，其中，阿睦尔撒纳封为辉特部汗。四汗各统所部，各管其属。但阿睦尔撒纳对此并不满足，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当四部的总台吉而专制西域。他的部下也从中推波助澜，致使阿睦尔撒纳独霸西域的野心很快膨胀起来，对清政府的政令、军令开始有所不从；处理各种事物也不和驻伊犁将军相商，擅自行政，生杀自专；并置副将军印不用，而用从前噶尔丹策零在位时，专用的小红钤记；又唆使哈萨克人散布“非己总四部，边不得安”等流言。更为严重的是，和他的党羽晓夜聚谋，暗中扩充兵力，准备反叛。

阿睦尔撒纳的举动，早已被清军诸将所察觉，并将其悖逆情

状报告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接报之后，认为阿睦尔撒纳不能安分守己，叛形昭彰，断难姑容。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密谕班第立刻擒拿阿睦尔撒纳及其同党，即在军中诛之。但此时大军已撤回，班第手下只有五百兵丁，遂不敢轻举妄动。乾隆帝经再三考虑，决定采取一个更为稳妥的办法，即下谕旨令阿睦尔撒纳等人进京受封，寻机将其擒获。

接到谕旨之后，狡猾的阿睦尔撒纳即看出了乾隆皇帝的用意，但又不敢公开抗旨。起程不久，便开始与随从亲信等人密议潜逃。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一行抵达乌隆古，到了他的旧游牧地，以先到游牧地治装，再行人京为由想逃脱，随同监视的额琳沁多尔济没有看出他的计谋，阿睦尔撒纳遂绕道从额尔齐斯河间道北逃。额琳沁多尔济一面将此情况驰报班弟，一面率兵追捕，但因发觉太迟，没能追上。阿睦尔撒纳逃回塔尔巴哈台后，公开举起反叛的大旗。

反叛后的阿睦尔撒纳号令准噶尔部余众起而为乱，伊犁的诸喇嘛、宰桑等纷纷响应，在阿睦尔撒纳的指挥下，二千余叛军向班弟、鄂容安所率清军驻地发起进攻，清军向崆吉斯撤退，在这里被叛军所包围，虽全力拚杀，最终未能突围，清军损失大半，班、鄂自杀身亡。此时，西路军统帅永常率五千兵丁驻扎乌鲁木齐，见叛军蜂起，不敢前去迎救反而南退巴里坤，叛军见此，更加猖獗，准噶尔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二十年九月，乾隆皇帝任命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勒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玉保为参赞大臣，仍以两路向伊犁发动进攻。同时，乾隆皇帝还任用了一批支持清军平叛的厄鲁特诸部首领及厄鲁特部队随军征剿。清军一路进剿颇为顺利，很快逼进伊犁。阿睦尔撒纳见势不妙，弃城逃往哈萨克。策楞命玉保带一路清军前去追击。阿睦尔撒纳见清军穷追不舍，便施展诡计，指使其部

下到清军营前向玉保谎报台吉诺尔布已将阿睦尔撒纳擒获，很快便可押来以献清军。玉保信以为真，命清军停止追击，同时将“已擒获叛首阿睦尔撒纳”的消息，报告主帅策楞。不久，乾隆皇帝也得知此讯，立刻以军务告竣宣示中外，并对参战将帅加官晋爵。但当弄清阿睦尔撒纳借此缓兵之机，从容逃往哈萨克事实之后，乾隆皇帝羞愤交加，将策楞、玉保押解入京治罪，又以达勒党阿补授定西将军，兆惠补授定边右副将军，继续征讨。

达勒党阿等得令之后，一方面遣人晓谕哈萨克交出阿睦尔撒纳，如拒不交出、狼狈为奸，清军将一体办理；另一方面将准噶尔境内阿睦尔撒纳同党逐一剿灭，以绝后患。果然哈萨克与阿睦尔撒纳联合了起来，共同抵抗清军。乾隆二十一年四月，达勒党阿率兵分两路进兵哈萨克，大败哈萨克与阿睦尔撒纳的联军，阿睦尔撒纳怕被官兵认出，遂改换蓝纛，只身逃遁，清军紧追其后，相距仅二三里，阿睦尔撒纳又故计重演，派哈萨克人言于清军，即欲擒献阿睦尔撒纳，请缓师以待。达勒党阿下令驻军，阿睦尔撒纳再次乘机而逃。

此时，已投诚而随清军出征的诸宰桑，见清军屡被阿睦尔撒纳蒙骗又对之无可奈何，遂起轻视之心，一时之间，诸台吉、宰桑复叛举动此起彼伏，阿睦尔撒纳得知此情况之后，自哈萨克返回准噶尔，欲自立为汗。准噶尔部的叛乱局势再一次达到高潮。

当准噶尔全境陷于纷乱之后，乾隆皇帝即降旨，调集大兵，开赴准部要地巴里坤，任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其弟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军七千，两路并进，阿睦尔撒纳等率兵抵抗，被清军击败，损失惨重，阿睦尔撒纳退往塔尔巴哈台，不久又逃往哈萨克。为防止其投奔俄罗斯，兆惠等率领一路清军前去堵住通往俄罗斯之路。当阿睦尔撒纳逃到哈萨克时，此时的哈萨克汗阿布赉见清军大兵压境，怕引火烧身，遂派人收其马匹，欲擒之献清政府，但阿睦尔撒纳已有所警觉，率少数亲信深夜徒步

逃往俄罗斯。当年冬天，阿睦尔撒纳出痘病死，清政府行文俄罗斯，要求验看尸体，俄方将其尸移往边境，清政府派人验看之后，证实无误。

阿睦尔撒纳死后，准噶尔部所剩残余叛军已处群龙无首状态。乾隆二十三年春，四千清兵继续对残余叛军进行围剿，搜山网谷，残酷屠杀，残余叛军见大势已去，或束手就擒，或主动投降，至此，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叛乱被彻底平息。

也就是在清军对准噶尔部残余势力进行清剿的时候，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地区，又爆发了大、小和卓木的回部叛乱。清政府紧接着命令清军挥师南下，开始了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的战争。

天山南路一直是维吾尔族人民居住之地，因信仰伊斯兰教，故其地又称为“回部”。清初，回教的势力不断壮大，宗教领袖和卓掌握了回部的实权。到康熙年间，回部的伊斯兰教各派出现纷争。此时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正欲意向外扩张，见回部出现纷乱，有机可乘，便率兵越过天山，侵入回部，掠走宗教首领阿布都什特等，拘禁于伊犁。噶尔丹败亡之后，阿布都什特返回故土。不久，阿布都什特的儿子玛罕木特又被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掠至伊犁，连同其两个儿子布拉呢敦、霍集占一起拘禁起来。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将布拉呢敦（即大和卓木）送回，使其安抚回部，其弟霍集占（即小和卓木）仍留在伊犁，统辖当地回众。这期间，霍集占曾参与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活动，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清军进剿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而霍集占也逃回了叶尔羌。清政府遣大和卓木回叶尔羌，本想利用其在当地的影响，招抚叶尔羌，以和平统一南疆，大和卓木也有意集所部听从于清政府。但小和卓木逃回之后，极力鼓动其兄不向清政府称臣而自谋独立，特别是看到准噶尔部即将为清军所灭，近地已无强邻，独立的欲望更加强烈，遂决计与清政府分裂，自称

巴图尔汗。

当准噶尔部叛乱彻底平息之后，乾隆皇帝立即下达了进军回部，讨伐大、小和卓木叛乱的命令。以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带八旗、绿营兵一万余人向回疆北部的由大和卓木固守的库东发起进攻。小和卓木带兵前来迎救，与清军在城南接仗，经过激战，清军未能抵挡回军的攻势，小和卓木杀入城内。六月下旬，小和卓木率军向城外冲杀，由于清兵屡次攻城不下，且多有伤亡，主帅雅尔哈善又无计可施，军中斗志松懈下来，致使小和卓木突出重围，大和卓木奔往喀什噶尔，小和卓木奔往叶尔羌。雅尔哈善这次围城失手，主要是因为麻痹大意，不采取积极有效的进攻措施，而是消极的围城，待其自毙，结果使已握掌中的叛乱头目飘逸而去。乾隆皇帝以坐守军营，听贼去来自如为由，将雅尔哈善革职，以尚书纳木札尔代理军务，侍郎三泰参赞军务，又命令已将准部余党剿尽的兆惠带清军主力赶赴回疆。

同年十月初，兆惠率兵抵达。之后，清军以七路向叶尔羌进发，六日，大军来到叶尔羌城东黑水湾，安营扎寨。而叛军从南、西、北门派出精锐骑兵袭击清军大营，清军予以回击，遂不敢轻意出城。十三日，清军准备主动出击，除派部分兵力留守军营外，兆惠、明瑞等指挥千余骑兵，由城南夺桥越过城河，杀向城内。四百余骑兵刚过桥，叛军即将桥截断，叛军出数千骑兵、上万步卒将刚过桥的清军团团围住，清军被分割成数处，虽个个奋勇争先，人自为战，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众悬殊，大部分被围歼，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护军统领鄂实等壮烈战死。清兵元气大伤，放弃主动进攻计划而结营自守。叛军见清军转攻为守，便昼夜轮番向清营进攻。兆惠急忙派人告急，请求援兵，乾隆皇帝得报之后，以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速往援助。兆惠得知援兵已到，从大营中冲出，与富德军会合，一起撤退到阿克苏。

六月，清军在阿克苏重整旗鼓，集结三万重兵再次向叛军发起攻势。兆惠率一路清军由乌什攻取喀什噶尔，富德率一路清军由和阗攻取叶尔羌。此时喀什噶尔由大和卓木驻守，叶尔羌由小和卓木驻守，企图以两城成犄角之势，抗击清军，但清军长驱直入，一路连夺城堡，屡败小股叛军，大有不可抵挡之势，大、小和卓木见势不妙，弃城而逃，向拔达克山国投奔。清政府派员与拔达克山国交涉，其酋长素尔坦沙斩杀大、小和卓木，将其首级献于清军。平定回疆叛乱也以清军取胜而告终。

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回部的叛乱之后，统一了天山南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这里实行了军府制度，于乾隆二十七年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两路事务；又在北路于伊犁将军之下，于乌鲁木齐设都统，统率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吐鲁番等地驻军；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率塔城地区驻军；在南路于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节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设办事大臣，小者设领队大臣，皆由清政府直接派员管理。军府制的实行，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直接控制和管理，也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对于促进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清朝最高统治者几代人欲完全控制和稳定西北边疆的夙愿得以实现。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464、卷480、卷481、卷491、卷520、卷527、卷537。

魏源《圣武记》卷4。

昭梿《啸亭杂录》卷3。

土尔扈特部回归

土尔扈特蒙古族，是明清时期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在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到清代也称卫拉特、额鲁特。约在十六世纪末叶，厄鲁特蒙古分为四大部落，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其游牧地区大约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在这一大片地区之内，四个部落又各有自己的牧地，其中土尔扈特部的牧地是在塔尔巴哈台所属的额什尔努拉（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乌尔贾尔一带）。四部分牧而居，但皆以伊犁为其合宗处。四部各有首领，互不统属，但有着叫作“丘尔干”（即盟会）的共同组织，组成了较为松散的联盟。

这一时期，厄鲁特蒙古的游牧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准噶尔部，由于其牧地伊犁一带，有着肥沃的牧场，又有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最快，势力也最为强大。准噶尔部到巴图尔浑台吉执政的时候，开始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向其他三部落进行扩张活动，引起内部矛盾的发生。在四部当中，土尔扈特部实力较弱，而此时正是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为四部联盟的盟主，所以巴图尔浑台吉首先把扩张之手伸向土尔扈特部，一来达到兼并土部的企图，二来可取代和鄂尔勒克盟主地位。从此，两部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关系越来越紧张。由于准部实力强大，土部最后采取了避开的方式，于明崇祯元年（1628 年）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约有二十余万人的土尔扈特部

举部迁移。经过雅米什要塞，顺着托波尔河往西，横穿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到达了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在这里开始了新的游牧生活。

伏尔加河下游，在土尔扈特部到此之前，没有人居住，沙皇俄国也没有把这片地区纳入其有效的统治范围之内，所以，土尔扈特人认为他们有权力在这块大草原上放牧居住。但早已对厄鲁特蒙古垂涎三尺的沙皇俄国，见到土尔扈特部脱离了厄鲁特，立刻把魔爪向土尔扈特伸来。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沙皇俄国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同土尔扈特订立了若干个条约，土尔扈特部逐渐为沙俄所控制。在某些方面被控制不等于完全臣服，土尔扈特部对沙皇俄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当沙皇俄国迫使土尔扈特成为其附属国时，土尔扈特也给予了坚决的抵制，明确表示，土尔扈特只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和鄂尔勒克作为全部落利益的代表者，同沙皇俄国威逼利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本人就是在同沙皇俄国的武装交战中牺牲的。他的长子书库尔岱青继承汗位之后，对沙皇俄国仍然采取的是敌对的立场。

土尔扈特蒙古人民在不屈不挠地同沙俄进行斗争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与厄鲁特蒙古其他各部和远隔万里的祖国保持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联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蒙古各部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主持，会上制定了一些法规，主要是为了调解、缓和各部蒙古间的矛盾。和鄂尔勒克带他的儿了也从伏尔加河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表明他们与兄弟部落之间的联系没有终断。顺治三年(1646 年）清王朝建立不久，和鄂尔勒克的两个儿子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蒙古的顾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清政府为了照顾土尔扈特人的宗教信仰，允许他们到西藏熬茶，拜谒达赖喇嘛。因为西藏是喇嘛教的“圣地”，到西藏

"熬茶礼佛"，是笃信喇嘛教的土尔扈特人最虔诚的愿望。土尔扈特蒙古族与清政府建立了朝贡关系，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又派遣锡喇布鄂木布为使者，向清政府"奉表贡"。十四年，再派使臣向清政府"贡驼马二百余"，并携带千余马匹，请求在归化市（今呼和浩特）进行茶马互市贸易，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

书库尔岱青死后，其子阿玉奇继汗位，在其执政期间，一直向清政府"表贡不绝"，并把由他祖辈同清政府建立的友好交往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阿玉奇是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第四代首领，从他开始称汗。他执政以后，在对沙皇俄国的关系上完全继承了他先辈的政策——捍卫自己的主权与独立。但在斗争的方法上，采用了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策略。

在阿玉奇当政时，正值沙俄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发动侵略，进行领土扩张，为争夺黑海与波罗的海水域控制权，同土耳其和瑞典等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另外，在顿河区、伏尔加河中游及乌拉尔区，与各游牧民族也进行着无休止的征战。土尔扈特作为一个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历史不长的部族，便成了沙俄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大量的土尔扈特壮丁被征调到侵略战争的前线，充当先锋，为其打仗，十有八九未能生还。土尔扈特此时虽比以前发展壮大多了，但毕竟远离祖国和故乡，势单力薄，不能针锋相对和沙俄抗争。在这种情况下，阿玉奇采取灵活政策，时而对沙俄政府表示"臣服"，时而与之武装相抗。例如，在土尔扈特遭到雅依克和顿河哥萨克侵袭、掠劫时，阿玉奇就主动向沙俄政府提出宣示臣服，以便借沙俄政府之力制止外族的骚扰。1706年，俄境内的阿斯特拉罕人民起义，俄政府要求阿玉奇出兵镇压，但阿玉奇看出此时的沙俄内部较为虚弱，反而联合巴什基尔人袭击俄统治下的奔

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亚等城镇，沉重地打击了俄在伏尔加河流域的统治。就这样，沙俄欲控制和奴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阴谋，一直没能得逞。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厄鲁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依仗其控制天山南北的强大势力，在沙俄的支持、挑唆下，悍然发动叛乱，率军逼近长城。康熙皇帝曾三次亲征，率军平叛，康熙三十五年，平叛清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土拉河畔）给予准噶尔叛军致命打击，其首领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在这次平叛的过程中，阿玉奇率领的土尔扈特部坚决站在了清政府的一边，为了防止逃窜的噶尔丹残余势力重返其根据地——伊犁，阿玉奇派兵协助已向清政府"请安纳贡"的准噶尔部的新首领策旺阿拉布坦，防守阿尔泰山，使噶尔丹不能返回。噶尔丹走投无路，不久急病而死。平叛斗争胜利后，阿玉奇立刻派使臣向康熙皇帝入贡庆捷，受到康熙皇帝的优待和赏赐。

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又派使臣萨穆坦向清政府纳贡，但这次纳贡，经过了艰辛而漫长的路程，用两年多的时间才到达北京。这是因为准噶尔部新汗策旺阿拉布坦，仍然像当年噶尔丹那样，对周边部族的领地存有非分之想，并对清政府的政令开始有所不从。阿玉奇派使臣进京纳贡，要经过准噶尔牧地，策旺阿拉布坦则千方百计予以阻挠，抢夺了阿玉奇的贡使、赐物，企图断绝土尔扈特和清政府的来往。无奈，阿玉奇的使臣只得绕道俄罗斯，由库伦进入内地。

当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使臣，代表阿玉奇和整个土尔扈特蒙古族向康熙皇帝称臣纳贡的时候，康熙皇帝也确实为之感动。为此，康熙皇帝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出访土尔扈特，以表达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关怀与惦念。

康熙五十一年，由曾任内阁侍读的图理琛、太子侍读殷扎礼、理藩院郎中纳颜、厄鲁特蒙古人舒哥和随从武官等三十余人

的回访使团组成了。康熙皇帝让使团带去他对阿玉奇的问候，并要求出使人员同心协力，礼貌待人，还就使团路过俄罗斯时，如何处理两国关系等问题一一作了安排。五月二十日，使团从北京出发，出张家口北上，穿过察哈尔蒙古、喀尔喀蒙古，于七月到达中俄交界的俄方城堡楚库柏兴，由于俄方未弄清使团出访意图，使团在这里被迫滞留了五个多月，到十一月，俄国参政院才同意中国使团过境。转年正月，使团从楚库柏兴起程，于康熙五十二年十月，才到达伏尔加河上游的喀山，十一月到达俄罗斯国界萨拉托夫，俄方把使团已到达的消息转告阿玉奇。阿玉奇接到这一喜讯，万分高兴，立刻召集部落各头领商议接待祖国使团事宜。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一日，使团抵达土尔扈特牧地，阿玉奇带领众人，沿途陈设筵宴欢迎祖国亲人。第二天，阿玉奇设宴，隆重款待使团。图理琛向阿玉奇转达了康熙皇帝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问候，阿玉奇向图理琛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阿玉奇在谈到土尔扈特蒙古族与清王朝、沙皇俄国的关系时，对图理琛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又说："蒙古与中土在服饰穿戴上也大致相同，而与俄国在衣服、语言上之不同，难以相比"。当土尔扈特与俄罗斯刚刚接触的时候，双方在居住方式、宗教信仰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这都使得土尔扈特蒙古族"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阿玉奇的话正是表达出了他们与沙俄之间格格不入的风俗习惯、民族差异，同时也表达了他们与祖国之间息息相通的民族渊源及心向祖国的深厚情感。使团在土尔扈特阿玉奇的驻地住了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中每天都是饮宴不绝，互相亲切交谈。当使团离开的时候，阿玉奇及部众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沿途相送。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使团回到北京，康熙皇帝对使团圆满地完成出访使命非常高兴，在畅春园召见了使团全体成员，并嘉奖

了图理琛等人。使团的这次回访，掀开了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政府关系的新的一页。

雍正二年（1724 年），阿玉奇逝世后，他的儿子东凌端多布、孙子敦罗布喇什相继继承土尔扈特汗位。虽然这一时期沙皇俄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但他们还是克服种种阻挠和路途险恶，与清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敦罗布喇什汗遣使吹札布与清政府联系，乾隆皇帝先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后又在北京接见了吹札布。吹札布明确地向乾隆皇帝表示：土尔扈特人绝不投降于沙皇俄国，对其依附也只是暂时的，没有清帝国皇帝的命令，土尔扈特人是不会当别人臣仆的。

这一年，土尔扈特一位新汗王继位，这就是阿玉奇的曾孙渥巴锡。渥巴锡继汗位之后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更加严峻。外有沙皇俄国加紧了控制土尔扈特的步伐，内有新的土尔扈特家族觊觎渥巴锡的汗位。

在渥巴锡继位之际，沙俄展开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早在阿玉奇逝世的时候，沙俄就乘机取得了任命土尔扈特新汗的特权，这次渥巴锡继位，沙俄就想通过改组土尔扈特汗王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八位王公组成的扎尔固（部落会议），来限制新汗王的权力。在改组扎尔固的条例中规定，其成员不得由汗任命，其决议也不得由汗随意改动，以上均由俄国政府参与和批准，方为有效。以此来削弱和限制渥巴锡的政治权力。

在对土尔扈特政治干预、胁迫的同时，沙俄还肆无忌惮地向土尔扈特人民推行压迫、奴役政策。此时的沙俄正处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期，她掌权之后，仍继续推行彼得一世争夺世界霸权的扩张政策，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随着无休止的战争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兵员严重不足，便继续向土尔扈特大量征兵，七、八万土尔扈特青壮年牺牲在沙俄侵略战争的战场上。

如此下去，整个部族的结局将不堪设想。

在内部，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在沙俄势力的扶植下正在逐渐扩大实力，准备与渥巴锡进行较量，并欲取其汗位而代之。

面临这样一个局势，渥巴锡必须作出最后的选择。

渥巴锡是一位年轻有为、坚毅果敢的首领，他为人正直、胸怀宽广，继承汗位之后深得土尔扈特人的拥戴。为了拯救土尔扈特蒙古族，他经过深思熟虑，最后作出了脱离沙俄，返回祖国的决定。

乾隆三十五年，渥巴锡同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等几位台吉、喇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决定于转年离开俄国。

乾隆三十六年一月日，渥巴锡召开大会，号召全体土尔扈特人拿起武器，举行起义。在渥巴锡等众首领的号召和动员下，人们立刻响应。五日中午，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的三万余户、十七万多人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分三路全部离开了牧地，浩浩荡荡地踏上了东返祖国的征途。

当沙俄政府得到土尔扈特蒙古已离开牧地的消息之后，立即命令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出兵截击，又派特鲁本堡将军率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为了应付俄军的围追堵截，渥巴锡把全副武装的骑兵排在整个队伍的四周，护卫着老弱妇孺乘座的马车、牛车。舍楞率领一队精兵为开路先锋，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率两万骑兵走在大队人马的后面，他们且走且战，沿途攻破数处俄城池，很快通过了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大草原，甩掉了在后面紧追不放的数万俄军，来到俄边境小城坑格勒图喇（俄之卡伦），再往南便是中国地界了。他们继续前行，经过了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来到姆莫塔湖附近。在这里居住的哈萨克部受俄之唆使，组

成几万人的联军把土尔扈特部团团围住。在这紧急关头，渥巴锡表现得非常镇定，他一方面迅速派出使者与哈萨克首领谈判，以拖延时间，一方面调整兵力，组织了五队骆驼兵，准备向哈萨克兵发动突袭。在被包围的第三天深夜，他们从正面突然发动猛攻，策伯克多尔济率骑兵包抄后路，哈萨克军遭前后夹击，惨败而退。突出重围之后，向沙拉伯勒挺进，到达这里又遇到布鲁特部十几万骑兵的堵截，渥巴锡被迫率众向戈壁滩行进，此时天气已开始暖和起来，人困马乏，饥渴难忍，只得取马牛之血而饮，杀死疲惫之牲畜而充饥，相当一部分人患上了瘟疫，十几天艰难的行程，死者无数，牲畜也仅存十之三四。当他们走出戈壁之后，布鲁特人已久候于戈壁之外，或前或后，或聚或散，日夜追击抢掠，土尔扈特付出了极大 的代价。但是他们回归祖国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他们终于到达中国的边界，陆续进入境内。先是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先锋部队在伊犁河支流查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尔后，渥巴锡和舍楞率大队人马到达。伊犁将军伊勒图接见了渥巴锡等首领，问其来意，渥巴锡表达了投顺之意，并献玉器、自鸣时刻表等贡物及先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封爵玉印一颗，以表示土尔扈特蒙古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渊源。

伊勒图将土尔扈特部众妥善安置在伊犁，然后把土尔扈特归来的消息，报告中央政府。

乾隆皇帝在接到这一消息之后，派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主持接纳安置事宜。舒赫德在伊犁会见了渥巴锡，转达了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蒙古族“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的旨意。

对土尔扈特归顺一事，乾隆皇帝甚为高兴，但也有一事，令众大臣们深为疑虑，即曾和清政府相抗的舍楞也一同前来投诚，

此事如何处理？

舍楞是土尔扈特部汗和鄂尔勒克叔父的后裔，当年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时，舍楞的先辈没有跟随一起走。到舍楞时，他居住在伊犁，并成为准噶尔部的台吉。准部发动叛乱，被清军平息，而舍楞独抗不降，逃到库乌苏喀喇塔拉境内（今新疆乌苏一带），清军追剿之，他又逃往博罗塔拉（今新疆博乐一带），不久逃窜于俄国。清政府与俄方交涉，要求交还舍楞，舍楞非常恐惧，由俄回到土尔扈特。

对他前来投诚，大臣们在廷议的时候有些争论，或“恐其有诡计”，必须以精兵防备，或以为不宜“受俄罗斯叛臣”，否则会引起俄国方面的交涉。最后，乾隆皇帝作了这样一个结论：“彼（舍楞）既背弃俄罗斯，岂敢复与我为难，是其归顺之事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至于会引起俄方交涉问题，乾隆皇帝说：当初舍楞逃往俄罗斯，我方多次索取，俄方迄未与我，现在他自动来归，“即以此语折俄罗斯，彼亦将无辞以对”。最后决定“宥其已往，悉加恩锡”，接纳他的归来。

针对土尔扈特部因艰苦行程和俄军等的追杀，使土尔扈特损失惨重的情况，乾隆皇帝命令各方给土尔扈特人以支援，本着“口给以食，人授以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的原则，由张家口都统常青、陕甘总督吴达善等人，调拨牲畜、皮张、衣物、茶叶等物资运往伊犁，进行接济，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到三十七年二月，接济的物资计有：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封、羊裘五万袭、布六万匹、棉近六万斤、毡庐四百余具，又专拨帑银二十万两。对于其耕牧地区，也作了适当的安置：渥巴锡下属的部众安置在珠勒都司一带，舍楞下属的部众安置在科布多一带。

一切安置就绪，乾隆皇帝命额附色布腾巴尔珠尔等驰赴伊犁，陪同渥巴锡等众首领到热河入觐。渥巴锡见到乾隆皇帝之

后，进献了弓箭、腰刀、自鸣钟等多件礼品。乾隆皇帝用蒙古语同渥巴锡进行了交谈，向他询问了土尔扈特的历史及由俄归来的情况，渥巴锡一一作了回答。在热河木兰围场行围三天之后，渥巴锡随同乾隆皇帝到了避暑山庄，在这里的澹泊敬诚殿，乾隆皇帝再次接见了渥巴锡等人，并设盛宴招待渥巴锡一行人。这时正值“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锡等随同前往瞻礼，同其他兄弟民族的上层人物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为了表彰土尔扈特蒙古族回归祖国的爱国行动，乾隆皇帝在普陀宗乘之庙里亲自撰写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

在渥巴锡等人觐见期间，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众首领进行了封爵，对其部众进行了划分，建立了既适合土尔扈特特点又便于清政府管理的行政体制。

渥巴锡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延图亲王，舍楞封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封为毕锡呼勒图郡王。其他大小首领分别被封为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把土尔扈特分为新、旧两部，渥巴锡所部为和鄂尔勒克的后裔，称旧土尔扈特，由渥巴锡统领，分东西南北四路，分设四盟，各设盟长，盟下设旗，共为十旗，住地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由伊犁将军管辖。舍楞一支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充察布察齐的后裔，称新土尔扈特，设二旗，由舍楞统领，住地在科布多，由科布多大臣兼辖，归定边左副将军节制。九月三十日之后，渥巴锡等人陆续离开承德，各回其牧地。

土尔扈特蒙古族归国后不久，沙俄政府便向清政府提出了交涉，要求清政府将土尔扈特交还给俄方，并以武力向清政府提出威胁。乾隆皇帝针对俄方提出的无理要求，责令理藩院予以理直气壮的驳回：土尔扈特本为中国西北蒙古族的一部，并非俄国所

属，为了摆脱俄国的征调烦苛，才返回祖国的。对沙俄的武力恐吓，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不管是守约和好，还是以兵戈相见，“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沙俄看到清政府如此严正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妄想。

土尔扈特蒙古族从明朝崇祯元年西迁，脱离厄鲁特蒙古，到清朝乾隆三十六年回归，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过着迁徙游牧、垦草开荒的动荡生活。一方面历经几代人坚决抵抗沙皇俄国的奴役与控制，另一方面怀着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克服艰难险阻，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渥巴锡的领导下，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他们虽然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为自己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887、卷889、卷892、卷914。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4。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0、卷13、卷1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

椿园《西域总志》卷2。

图理琛：《异域录》。

八旗生计

清王朝定都北京之后，推行“首崇满洲”的政策，对八旗人丁采取了一系列的优待政策和措施，使之享受着种种特权，过着花有俸禄、食有粮饷、丰衣足食 的生活。由于满族以统治民族自居，旗人不事生产，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加等原因，八旗人丁的生活日益困迫，出现了生计维艰、每况愈下的局面。这个问题在顺治末年以后就已出现，进入乾隆年间情况更为严重，“八旗生计”成了清王朝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入关之后，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对八旗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定了八旗常备兵制，即“八旗子弟，人尽为兵”，凡男丁年在十六以上就可披甲当差。但不是同时人人入伍，而是按兵丁的类别，定出名额，在各佐领下“挑补”，分别立营训练，称为额兵；额兵以外有“随甲”，是武官的随从。此外均称为“余丁”。清代的八旗兵分驻在北京城内外，在北京以外分驻的八旗兵称为“驻防”，北京附近的驻防称为畿辅驻防。京城中的八旗兵称禁旅八旗。

清初，政府对八旗人丁采取的特别优待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圈占近畿房地，划为旗产。顺治元年（1644 年）开始，满族贵族、官僚、满蒙汉八旗士兵及随从人员、奴仆等大量从关外移入关内，其中大半人口聚居北京附近，还有少部分人驻防在全国的各主要城市。随着八旗人丁的入关，大规模的圈占土地活动也全面展开。

通过土地的圈占，满洲八旗的上下阶层在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南至河间，北达长城的大片地区内，建立了王公贵族的庄园和一般旗民的小土地所有制。王公贵族纷纷建立起封建农奴制庄园，形成所谓“诸大人之地，广连阡陌”。一般旗兵每人也可分得土地三十亩，这每人三十亩地也足可供家庭生活和兵士军事活动的需要了。清朝的军队制度和明朝不同，清政府不负担八旗军队的装备，以骑兵为主的满洲八旗，作战用的马匹、枪械等皆由八旗兵自备。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实行了“计丁授田”，即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八旗士兵的生活和军事装备的需要，都取给于这块土地上的收入，即“本朝计丁授田，兵马器械皆从此出”。清王朝建立之后，仍延续这种办法。所以几次圈占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各级官兵，达到十几万顷，这样，旗兵的军事装备所需和旗人的日常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二是建立俸饷制度。旗人官员按九品文官级别领取薪俸，旗兵按五等级别领取兵饷，没有当旗兵的余丁，不发粮饷，靠自家当兵的旗地和粮饷生活。

八旗兵丁所得的地田，有的是自家耕种，有的召民人佃种，自己坐取租谷，其所得兵饷也较为丰厚，两项收入“足以养赡”，生活较为宽裕。所以，清初的八旗兵丁生活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其经济收入能够支付平时的吃穿花项和参战所需的械马衣甲的费用。

从清初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这期间，国内战事频繁，八旗士兵连年出征，仅有的小块份地，很难支撑出征打仗的费用，有的在出征前不得不卖牛典衣，买马制装，致使家资荡然，负债甚多，典卖旗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清朝统治者是一向不准买卖旗地的，出现上述情况之后，康熙九年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官兵地亩，不准越旗交易；兵丁本身种地，不许全卖。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同意官兵土地可以在旗内买卖。典当家

产、出卖份地，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没有了，而同时，清政府限制旗人只得习武打仗，“以弓箭为生”，不得从事其他活动，如不许经商贸易，规定凡私自贸易者，施以处罚，就是在非常贫困的情况下，也不许从事任何谋生职业，其结果造成了八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坐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顺治十二年，陈之遴上疏就指出了满洲兵丁近年穷困日堪，赈济恩施，已不能维持。到了康熙初年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月的饷银不敷数日之需，一年的饷米领出就卖给米商，银两用光，米价又涨，只有今年借明年之饷，明年借后年之饷，常年靠典当度日。在北京城内外的八旗人的生活是这样，驻防关内各主要城市的旗人，其生活处境也大体如此。在东北地区和居住在畿辅乡村的旗人，虽然与北京旗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繁重的兵差和八旗制度的束缚，也给八旗人丁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少困难，生计艰难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对这样一个问题，清朝统治者极为关注，康熙皇帝多次下谕旨谈及八旗生计问题，为此“未尝一日不为勤求也”。采取了动支公帑数百万金对八旗人丁进行普遍赏赐、代清积逋、于各旗内设立官库资济匮绌等等办法，甚至旗人的红白喜事也赏给银两，祖父欠下的积债也代替尝还，关怀照顾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但是，正因为如此，贫困的旗人们对政府的恩赏已习以为常，动辄望赏望借，增加了依赖性。所以，这样的恩赏只能是解决了暂时的困难，长期贫困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正如赫泰所说：“国家恩养八旗至优至渥，而旗人生计，犹未见充足。”

雍正年间，政府见救济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旗人生活条件非但未能有所改善，反而助长了旗人坐等政府接济的依赖思想，于是，欲采取一些从根本上解决生计困难的办法。如雍正初年，清查旗人典卖出去的旗地，用官款将其赎回，赎回的土地限定时间，令原业主取赎。以后再有私卖田产的，则充公为公产旗地，

由官方招佃收租，所收的租税，分给各旗，赈济贫困的八旗兵丁。起初，还准许八旗官兵认买公产，但规定凡认买的公产及已经赎回的田产，均不许典卖与民人。但旗地“旋赎旋典”的情况仍不断发生。再有，迁移在京的八旗人丁，让其走向田间，进行生产自救。如在直隶省固安、新城两县的户部官地和内务府官地，设立“井田”二百八十多顷，安置无业的旗民一百余户进行耕种，各授田百亩，三年之后征收粮谷。但由于这些旗人多为游手无艺、不能当差之人，根本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不到十年，先后有九十余户请求或私下逃回京城。

另外，针对八旗人口增长造成余丁数额大量增加这一情况，雍正二年，又建立了养育兵制度。其目的就是使一部分生计困窘的余丁成为有经济来源的旗兵，名正言顺的食粮饷，实际上也就是清政府恩赏政策的变通。雍正年间，曾从每年收人中拿出十七万多两的银子，作为钱粮，从满、蒙、汉军中，挑出四千八百人为养育兵，每人每月给银三两。

顺、康、雍三朝，八旗生计问题已经形成，政府试图采取各种办法，予以解决，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这一时期，生计问题艰难，但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进人乾隆时期，情况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计艰难的程度加深了，而且，到此时，旗人好逸恶劳的恶习已经根深蒂固，政府已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首先，到了乾隆年间，绝大部分京城旗人和驻防的八旗兵丁，完全丧失了产业，解决生计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丧失了。

其次，人口急聚增加，原有的俸饷不足以赡养现有的家口。乾隆朝大臣赫泰在《筹八旗恒产疏》中说，从清朝人关进京到乾隆十年，这百余年中，祖孙相继已有六七辈，当时进京的一个旗人，现在已发展成一个家族，当时一人所分得的房地，赡养着现在的数倍之人。乾隆初年的人口已是顺治初年的六七倍，嘉庆中叶以后达到了八九倍。由于旗兵的数额不能因人口的增长而增

加，所以增长出的人口不能全部当兵，也就没有粮饷，只好分食自家旗兵的粮饷，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旗人依仗清政府的优待，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追求着腐化奢侈的生活享受，无度的消费有增无减，有限的资产被坐吃山空。

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是因清政府对八旗人实行恩养政策造成的。清政府一向把满族人置于其他民族人之上，处处予以优待，从一入关为旗人圈地、占房、食粮饷到平时的赏赐、赈济，使旗人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长此以往养成了旗人厌恶劳动、闲散游荡的作风，同时也助长了不知节俭、妄事奢靡的风气。这种奢靡之风首先是从满族的上层阶层开始刮起的。

满族的上层即贵族、官僚，是特权民族中的特权阶层，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又有高官显爵领取高额的俸禄，通过他们手中的权力，又可贪赃枉法，积累金银财物，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繁荣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满族贵族、官僚攫取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享受有了条件，于是浮华之风、颓废之气急剧地发展起来。从上至皇帝下至大小官僚无不纵情享乐，乾隆帝就是极事奢靡的帝王，对于女乐、珍宝、宴席，无所不好，他的六次南巡，绅商供奉，竞巧争奇，无所不用其极。一些官僚“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日从子弟宾客饮”；就连有些官僚的仆人，都是“著毳毲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他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大讲排场，并相互攀比，不甘示弱。在他们的影响下，一般的旗人家庭、子弟也是贪图安逸、奢靡荒淫、任意挥霍起来，有的“以奢侈相尚，屋室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有的玩乐起来放荡不羁，沉缅于梨园，赌博于歌场戏馆；有的提笼架鸟，养花吃烟，整天过着吃喝玩乐，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哪里顾得上已经荒废了的土地，就是他们的主要职责——当兵打仗，也都是派家里的仆人顶

替。他们只知道伸手向朝廷要钱粮、要赏赐，而赏赐的钱粮到手之后，不几天就挥霍殆尽，只得靠借债度日。生活到如此地步，追求享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朝的几位皇帝也看出这一点，乾隆帝认为“惟知鲜衣养食，荡费资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旗人之贫乏率由于此”；嘉庆帝也说：旗人“平日不知撙节，若能将衣食二者随时加意省吝，即可免于匮乏”。

对于日趋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乾隆皇帝仍然采取了先朝采取的各种办法，如乾隆元年八月，普借八旗官兵一年俸饷。而后，又多次赏赐银粮，继续借给俸饷，豁免借欠等；另外是扩大养育兵的名额，乾隆三年，养育兵的兵额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人，乾隆十八年，增加到了二万五千多人，每人给月饷一两半至二两，以此来增加旗人食粮饷的人数；乾隆皇帝还曾决定实行屯垦，派京旗人丁移垦东北的拉林等地，原拟迁京旗三千户去耕种，实际仅去了两千户，而去的人户中，能耕种之人仅占十分之二三，后来，又有很多人逃回了北京。而留在当地民户不是将旗地转相典卖，就是出租召佃，因为留下的这些人，大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只是想去领受垦田，坐收租息的。但也有少数人留在了农村，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比如，后来在安排迁移京旗三千户到黑龙江双城堡垦种的时候，就有近七百户情愿前往。截止嘉庆二十六年（1821 年）到此垦种的旗人已有三千户、一万多人。所以，这样一项措施，也多少解决了部分人的生存问题。

较为有效的办法是让八旗中的汉军出旗为民。此举旨在减少在旗人数，从而使政府有限的财力来保证满、蒙旗人的生活。

乾隆七年（1724 年）四月，乾隆帝在“汉军归籍移居谕”中，谈到八旗汉军出旗的原因时说，主要是因为百年的休养生息，户口日繁，生计未免窘迫，而受到八旗制度的限制，窘迫之人又不能学艺营生，这样只有“变通”一下旗制，让汉军出旗，

广其谋生之路。这确是不失其为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一条出路。此后，乾隆帝多次就汉军出旗问题下旨，让汉军"愿为民者，准其为民"，并对汉军中老年残疾、差使迟钝者"令其出旗为民"，对京城以外各省驻防的汉军也照此办理。除汉军之外，也令另记档案、开户养子出旗，其原因和方法与汉军相同。以上这些人出旗后，有些改入民籍，与民人一样，从事生产劳动，另有一部分补充了绿营兵之缺。

清朝政府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绞尽脑汁，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使问题有所缓解，但由于基本国策和根本制度未予改变，八旗生计问题始终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要使旗人获得新生，必须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走上了衰败之路，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王朝首先在经济上全面崩溃，财力消耗殆尽，兵饷无从可出，八旗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完全动摇，所谓的八旗劲旅，"光绪以后，气数已尽，虽欲振作，其何能兴?"到光绪年间，在多方的呼吁下，旗人逐渐由地方管辖，并裁撤旗丁、旗缺，使其自谋生路，习农、从工、经商，实现了"旗民无别"。宣统年间，八旗制度就基本崩溃了。从光绪末年之后，八旗人逐步走上工、农、商等各生产领域，自谋职业，有的成了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有的回乡务农，有的进了工厂。这样，随着八旗制度的崩溃，其生计问题才得以根本的解决。

（刘文智）

参考资料：

《皇清奏议》卷9。

《皇朝经世文编》卷35。

《清圣祖实录》卷227、卷275。

《旗军志》。

昭梿《啸亭杂录》卷8。

关闭三海关

清政府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总的来说是闭关自守的。

清统治者入关之后，在对全国的统治尚未建立和巩固之前，在对外关系政策上还没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就在清统治者全力进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时候，以郑氏集团为首的一股抗清力量占据着台湾，进行抗清活动，清政府虽多次派兵进行清剿，但郑氏的抵抗活动在福建沿海一带仍十分活跃。有鉴于此，清政府欲采取断绝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使台湾失去大陆支持的手段，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下达了海禁之令，要求官民人等不准擅造两桅以上大船，不准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严禁“潜通海贼（指郑氏集团），结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同时还命令，不准造大船卖与番国，也不准将大船租与出洋之人，对违反以上规定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从这个命令可以看出，清廷发布此令是针对占据台湾的郑氏抗清力量的，同时，这个命令也限制了沿海居民出海进行正当的商贸活动。

次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海禁政策，以“海氛未靖”为由，提出凡是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处以死刑，没收其货物。凡沿海地方关口，要处处设防，不许片帆入口。顺治十七年又颁布了一个迁海令，令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边境居民迁入内地。

海禁及迁海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扰乱了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也使对外的商贸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沿海一带的城镇没有了

以往洋货云集、外币流行的局面，而出现了冷落与萧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康熙初年，沿海诸省的地方官曾就因海禁而导致的人民生计困迫的状况，要求放宽海禁。到康熙二十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再次奏请开禁的时候，康熙皇帝才答应“应如所题，照旧展界”。但此时清政府已着手对台湾的武力统一，当台湾于康熙二十二年被统一之后，清政府于次年才彻底解除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海禁，允许百姓在海上自由捕鱼，商人可出海懋迁有无，完全取消了对国内商民的限制。又过了一年，清政府以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南的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商船只来华交易，并设置了海关，经营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宜。

正当清政府正常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同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为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市场，他们肆意扩张，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方，而中国则成了他们欲意寻求市场的主要对象。

从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先是荷兰以帮助清军剿灭郑氏抗清力量为由，要求与清政府通商，而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至沓来，尤以英国行动最为迅速，要求也最为强烈。康熙二十三年，英国终于在广州建起了商馆，与清帝国的通商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清政府对外商来华贸易不是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自身的商贸利益，中国在与外商交往中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英国等国家在中国要取得更大的商业利润，扩大中国商品市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以往同中国通商并未获得更多利益的状况已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改变不利的局面。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最终又导致了乾隆统治时期对外关系政策上的重大变

化。

康熙年间曾开设了四海关为通商口岸，但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对华贸易数额不大，因而通商地点习惯上仍集中于广州一处。到乾隆时期，中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广州一口通商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加上广州为中国唐宋以来市舶司所在地，是中国经营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故这里由于多年的经营，积弊亦为不少，各种陈规陋习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极为严重，外商的商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清朝以粤海关代替市舶司行使征收关税、监督货物交换等大权及建立公行制度，由公行行商代理外商进行商品购销等等，都对外商的经营活动以极大限制，外商在广州经商也甚感不便。因此，英国等国商人欲意离开广州向北到宁波等口岸寻求更好的通商之地。康熙四十年左右，英国的三艘商船曾到浙江的舟山、宁波等地，试行贸易，但未能成功。原因是，清政府虽然奉行四口通商政策，但实际上从海疆的安全考虑，清政府仍然倾向于外商到广州一口经营贸易，尽量不让其到其他三口来，以保持三口及其附近地区的安宁。因此，清政府采取不再增加广州税额的措施，吸引外商。同时，凡外商船只驶往其他各口，地方官员辄令其回帆到广州，这样，清政府采取的“不禁之禁”的政策，实际上仍然维持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

但是，粤海关独揽外贸大权，在原来恃特权而腐败的基础上更加腐败，公行行商对外商贸易的垄断也日益严重。按清政府的规定，外商来华，所携货物需交行商代售；采购中国商品，也由行商代办，而粤海关对行商施以监督及管理。这样，作为中外贸易的管理机构——粤海关和中介人——公行行商，完全控制着外商的所有商贸活动。乾隆二十二年时，粤海关监管下的公行已发展到二十六家，对外商实行着全面而严密的控制。外商在广州进行交易，要缴纳较重的商税，而且，清政府坚持的行商制度和粤

海关对外商的无厌勒索（在正税之外，还有许多随意增加的额外之税及外商难以忍受的陈规陋习），使外商极为不满。为摆脱此种困局，外商再把注意力向广州以外口岸如距离中国内地较近、各种产品价格又颇低廉的宁波等地转移，因此，从乾隆二十年以后，一些外国商船径赴宁波进行贸易。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派喀喇生、洪任辉率两艘商船来到定海，愿在此纳税，运货至宁波贸易。另外，外商为摆脱行商的控制，也千方百计与中国商民直接进行交易，外商与中国商民直接接触的现象时常发生。对于这些新的问题，以一向把海防看重于通商的清政府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大问题，在通商事小、海防事大的原则指导下，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乾隆皇帝开始考虑将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严厉限制对外贸易和外商活动，以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他指令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照广东海关则例，酌量加重税收，以达到“彼（外商）不期禁而自不来矣”的目的。然而，由于浙江货价比广东便宜，即使增加了关税，外商依然有利可图，故外国商船仍不断涌向浙省，清政府所谓“不禁之禁”的办法未见明显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决定限制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冬，乾隆皇帝责令闽浙总督杨应琚向外商宣布：凡外国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其返回广东，不准入浙江海口。同时，也责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将这一命令晓喻在广东的外商。这样，康熙年间开放的四海关，又只剩广东一关，清政府强行关闭了其余三个海关。广东一口通商的政策一直沿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从关闭三海关之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一直是呈严加管理、严格控制的趋势。

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洪任辉到宁波贸易被拒绝，遂率船贸然来到天津，企图上北京状告广州海关和行商。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乾隆皇帝对外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毫无

顾忌的行为感到震惊的同时，也隐约地感到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有一种作为后盾的政治势力的支持，隐约地感到了这种政治势力对清帝国统治的威胁。因此，当两广总督李侍尧针对“洪任辉事件”的发生，提出五条防范外夷措施之后，乾隆皇帝欣然同意，批准立刻实施。这五条防夷措施的主要内容，一是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间有因事过冬者，也只能居住在澳门；二是外商到广东，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是禁止借领外商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四是严禁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五是酌拨营员弹压稽查外国商船停泊处。很显然，这些措施是严格限制外商活动的，对加强清帝国的国家安全是有利的。此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限制外商、控制外贸活动的政策，如嘉庆十四年（1809 年）颁布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 年）和十五年制定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章程》等，都旨在强化外贸体制，使对外政策趋于闭关和保守化。而正值此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强烈的向外扩张的欲望，与清政府趋于闭关的外交政策形成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之下，清政府采取的带有自卫性质的限制政策，显然抵挡不住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冲击。虽然从乾隆中叶关闭三海关，实行一口通商的政策，暂时维持了独立自主的局面，并且在表面上也可反映出清帝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最终导致了清帝国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被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了闭关着的大门。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 516、卷 522、卷 525、卷 530、卷 533、卷 550、卷 589、卷 592、卷 602。

耶稣会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

几乎与满族崛起于东北同时，西方的耶稣会即已把其传教的目标指向土广民众而又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东来的耶稣会士，大都多才多艺，他们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某些科学知识与艺术带到了中国。而且有时又是以传播科学、艺术做为传教的一种手段。传教士长期居住于中国，出于调查了解中国的目的，以及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他们还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并把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文化介绍给西方。可以说，明末清初至乾隆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人。

耶稣会，于1540年由罗马教皇正式批准成立，它是天主教的一个教会。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该会的成立，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抗当时正在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利用该会向国外传教，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不久，耶稣会开始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教。自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打开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局面后，耶稣会便不断派遣教士来华。在传教的过程中，会士们的渊博学问赢得了官员与士人的钦慕，士大夫们对其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尤为敬佩。1629年明廷设立历局编修历法，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等都应聘参预其事，他们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西方历算书籍，制造并利用西式天文仪器进行测算，至1634年，终于完成《崇祯历书》的修纂。新历法未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进北京之时，明王朝的官员们如树倒之猢狲，东逃西散，客居异乡的传教士又奔向何方？正当其惊恐之时，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兵已打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对中原的统治。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即下令城中汉民一律迁至前门以外，留在城中的传教士汤若望便向摄政王多尔衮上了一份奏本，意思是说，我们奉前朝皇帝之命修历，刊印之刻板堆积累累，尚未完竣付梓，且天主堂中的供象礼器、教文经典、修历所用书籍、测量仪器等也件数颇多，若搬于外城，不仅困难，且一旦损坏，不少精密的仪器修理既难，从西洋购寄至京，诚非易事，恳请开恩，仍居原寓，照旧虔修。他的请求次日即获允准。清王朝沿袭明制，修历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当时钦天监汉官向多尔衮进呈的历书误差很大，于是汤若望被指令修历，不久出现的一次日食，汤若望预测的结果比汉官准确得多。满人与汉人一样，深信日月星象之变是上天之意，有了精确的历法与天象变化的预测，才能时刻顺乎天意，保证国家的永存，长于天文历算的汤若望因之受到特别的崇敬，被任命为专门负责观测天象编修历书的机构——钦天监的长官监正。明代，耶稣会士只是做为助手协助修历，清代将外国传教士任为中国官署的长官，表明清代皇帝对外来文化的重视与容纳性。此后至乾隆朝，清帝曾多次任命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监正。顺治二年（1645 年），汤若望根据明末以西洋法推算的历书成果，编制成新历进呈清廷，清朝遂以《时宪历》为名颁布天下。此后，西洋新法成为清朝修历的法则，《崇祯历书》被改名《西洋新法历书》，它是清朝修历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康熙帝亲政后，耶稣会士再次以其精确的天算历法取得信赖，耶稣会士南怀仁又受命任为钦天监监副，不久升为监正。顺治朝及康熙前期，耶稣会士在西方文化的传播上，主要是引进了西洋较为先进的天文历算学，并将西方的一些天体测量仪用于中国的修历实

践中。顺治朝，汤若望把明末修历的仪器呈进给清廷。康熙前期，南怀仁又主持设计制造了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等多种大型仪器，安装在北京观象台。南怀仁还著有《灵台仪象志》，说明这些仪器的功用。另外，南怀仁在清廷平定三藩之乱期间，还帮助清廷监造了数百尊西式火炮，为平三藩立下功劳，被赐予工部右侍郎衔。

历法之狱结束，汤若望等被平反之后，传教士们又恢复了在顺治朝时的地位，继续他们的传教活动。三藩之乱平定后，社会安定，为教会布道提供了有利环境。当时，康熙皇帝正三十岁左右，且表现出对各种学科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如饥似渴的学习欲望。为了接近这位好学的君王，密切与他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扩大天主教的传布，耶稣会投其所好，有意识地派遣一些具有丰富自然科学知识和艺术才能的教士来华，其中以法国人居多，这些法国人又是直接接受法王路易十四的使命而东来。1685 年也即康熙二十四年，路易十四派遣以洪若翰为团长的法国传教团到中国活动，白晋、张诚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雍正禁教以后，很多教士被驱逐到澳门，但以监正戴进贤、监副徐懋德为首的几十位传教士仍被继续留在钦天监工作。乾隆朝，又陆续有一些具有优秀艺术才能的传教士来华，他们也都服务于宫廷，甚得皇帝欢心，因而其传教活动也受到宽容，乾隆还曾拨银万两修复被焚的教堂。从康熙二十几年至乾隆中期，这些传教士以他们的知识和艺术博得了皇帝的青睐，他们供奉宫廷，与皇帝过从甚密，传播了西方多方面的科技知识和技艺，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天文历法。历法的编修，是清帝最重视的科技内容。这一时期，参预这项工作的传教士比以前有所增加，康熙后期及雍正朝，有二十名左右。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中国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者，吸收了他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提高了天文历算学的水平，

也造就了如何国宗、明安图等一批精通中西历法的科学家。康熙、乾隆时期两次纂修的《历象考成》，便是中西历法结合的重要成果。哥白尼的"日心说"，及伽利略对地动说的进一步证实，是当时天文学上的惊人突破，尽管罗马教廷顽固地坚持地心说，但天文学的这一新成果的科学性，不能不对精于天文历算的传教士有所影响。早在明朝末年，罗雅谷在他所著的《五纬历指》中就列举了地球自转的说法。清乾隆时期，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当时刊印的《坤舆全图》的图说中，更明确地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地动说作了介绍，使当时先进的天文学说在中国也有了传播。

数学。明朝末年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及传教士邓玉函的《割圆八线表》、罗雅谷的《测量全义》等对西方数学知识的介绍，引起明末清初中国擅长数学的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吸收了其中很多新颖的计算与测量方法。清康熙时数学家梅文鼎有几种介绍和研究西方数学的著作问世，他的孙子梅珏成继承家学，也成为数学大家。康熙帝对西洋数学兴趣颇浓，传教士们受命到皇宫中进讲数学，西方的代数学就是在此时传人清朝的，在中国已经失传了几百年的代数学得以重新复世。康熙帝的皇子们也曾从教士们学习数学及天算学，其中以皇三子允祉、皇十六子允禄、皇十七子允礼成绩最好。康熙后期，皇帝还选拔了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士传授数学历算知识，这些人与上述几位皇子纂修了数学名著《数理精蕴》，数学家梅珏成是主要纂修人。《数理精蕴》主要介绍康熙二十四年以后传人中国的西方数学，它的刊行，对乾嘉时期的数学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时传人中国的西方数学并不十分系统，但中国学者在掌握以后从中得到启发，触类旁通，有些人通过进一步探索，在某些方面有创造性发展。如康熙四十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杜德美，介绍了用解析法求圆周率的三个公式，但无具体论证，使 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白旗蒙古人明安图结合中西

方法，从乾隆初年起历时三十年潜心钻研，不但独立论证了这三个公式，而且创造出一系列更新的公式，他的《割圆密率捷法》，就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结晶。

地理学。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整个世界也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其它国家只不过是围绕中国四周或散处于天涯海角的小邦，更不知世界有几大洲之说。明末利玛窦、艾儒略等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以及对两半球、五大洲众多国家风土民情、自然、名胜的介绍，中国在亚细亚洲（即亚洲）及整个世界中位置的展示，曾引起官员士人的惊异与极大兴趣，他们的图、书流传很快。康熙朝，教士们曾几次绘制《坤舆全图》等世界地图，利类思等还节录明末教士艾儒略的《西方答问》，成《御览西方纪要》，向康熙帝介绍西方各国地理国情，此书在官员士人中也流传很广。这些图籍，使中国人眼界大开，获得不少前所未有的世界地理知识。

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康熙帝不断聘用传教士到各省进行实地勘查测绘，历时十年，终于制成全国地图和各分省地图，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我国第一幅全国性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测绘最精确的地图。乾隆时期，又两次测绘新疆地图。测绘过程中，不少中国学者如何国宗、何国栋、明安图等参予其事，掌握了一些先进的地图测绘法。

医药学。康熙、乾隆时期，宫中还任用西洋教士充当御医药师。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帝染患疟疾，中医几次诊治无效，教士洪若翰请用西药金鸡纳（奎宁），结果服后即愈。金鸡纳也便成了当时治疗疟疾的重要方剂。康熙的心悸症和上唇生瘤，也是采用西医法治疗而获奇效。有的传教士还在地方上以西医法、西药为民间治病。西医西药在治疗某些病上不断显示它的特殊效果，引起一些中医的重视，康熙时的王宏翰、乾隆时的王清任，都多少接受了一些西医理论和治疗方法。王宏翰著有医书多种，其

《医学原始》一书的卷二，多采用西医学说。王清任用尸体解剖来验证生理，指导治疗，所著《医林改错》，纠正了我国古代医书记载脏器结构及其功能上的某些错误。

物理学与器械制造。南怀仁著有《穷理学》、《熙朝定案》，对伽利略落体加速度的测定，及西方某些工程技术作过介绍。在器械制造方面，较重要的是钟表的制造。明末以后，西方先进的计时工具——自鸣钟不断传人中国，有的是商人舶来，有的是传教士带来。清康乾时期，宫中不仅有很多精巧的自鸣钟，而且在内务府的养心殿造办处、圆明园内，还有专门制造钟表的作坊(圆明园中的即称“钟房”)，其中既有中国的钟表制造匠，还有西洋教士，如杨自新、西澄元等教士。雍乾之时，不仅是宫中，即使一般贵族官僚家中，钟表也已成了很普通的器物。钟表的大量传人，使民间的钟表修理、制造业也开始兴起，其中广州最早，苏州次之，两地所造之钟分别有“广钟“、“苏钟”之称，只是发条尚需进口。徐光启的后人徐朝俊，自幼即喜做自鸣钟，他还著有《高厚蒙求》一书，用一定篇幅对各式钟表及其零件、做法、修法作详细说明。

绘画、音乐及建筑艺术。中国画的特点是注重线条的勾勒，西洋画注重画面上的渲染，且因阴阳明暗及色彩衬托而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这种技法在人物肖像上更能体现出它的优点，也即写真性。明末传教士带人中国的西洋画以圣母像、天主像等宗教画居多，这种西洋风格的人物画，为一些中国画家所欣赏，摹仿并探究其写真技法，明末莆田人曾鲸仿照这种技法作人物肖像而出名，从学弟子多人也都能传其画法。清雍正时满洲旗人莽鹄立学习西洋画法，深得其中奥妙，他纯以西法写真，所作人物画神情酷肖。康乾时期，在京传教士不少人精于画技，乾隆时专用西洋画师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潘廷璋、安德义、贺清泰等供职于如意馆作画。在宫中绘画的还有中国画师，中西美术在这里可

以说是互相影响。郎世宁就深受中国画画法的熏染，他善画马和花鸟，画作颇具中国画风格。中国画师也因参用西法而出现别具一格的写真特色的新画派，其中以焦秉贞、门兆应、冷枚、唐岱等人著称。另外，中国出口的瓷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欧洲各国订购的，他们提供瓷器样本，其图案、纹饰在内容、形式上都是西洋的，中国在绘制时需要竭力摹仿，这也是西方美术影响中国的一个途径。

传教士来华，把西洋乐器及音乐也传到中国，清康熙朝，宫中曾组织过一个西乐团，由精通乐理、擅长乐器的教士徐日升任首席乐师。徐日升还和另一教士德理格论述了西洋乐理，介绍五线谱的用法，这些文字被收人进《律吕正义》一书。德理格曾在宫中向康熙帝的皇子们讲授过西洋乐理知识。西洋乐器及音乐知识在当时的影响还只限于教堂及宫廷中。

随着传教士的来华，西式建筑教堂、教士住所在各地建起。这些建筑以其富丽堂皇、式样新奇而为一些官绅所艳羡，仿建者有之，安庆的王氏花园，扬州连漪阁之北的澄碧堂，都有仿自西式建筑之处。广州的十三洋行，则全部是西式。规模最大的西洋风格建筑，无疑是著名的圆明园了，其中长春园的西式建筑群，为乾隆时兴建，由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教士设计监造，它集意大利、法国的宫殿样式与中、西园林格局为一体，构筑宏伟富丽、雕工精细、重廊回绕、亭榭相连，堪称建筑史上的杰作，其中的欧式人工喷泉，更是蔚为壮观。

康乾时期的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马可·波罗的“游记”在西欧传诵，欧洲人初步得知东方大国中国的富庶昌明；而对古老的中国文明进行广泛深人了解、研究并产生了相当影响的，则始自明末以来天主教士之东来。那些来华教士为了因俗布道，致力于中国现状、历史和传统文化的

考察，有些教士还受命于本国政府而进行了解调查，他们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及研究结果，以日记、札记、书信、著述、译著的形式寄回或带回西方，他们又充当了中学西渐的中介。

最能代表古代中国精神文明特征的儒学及各种经典，是传教士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利玛窦初入中国，即拜师学习中文，攻读儒家经典，不久，又将“四书”即《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后，不断有教士翻译“四书”，在中国或欧洲刊印。1687 年，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中国之哲学家孔子》，收入教士殷铎泽、郭纳爵所译的《大学》（名为《中国的智慧》）、《中庸》（名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学》）、《论语》，并有孔子传记。四书的全译刊行本，是比利时来华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他采取的是直译法，1711 年由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印行，同时刊印他的《中国哲学》一书。耶稣会士对五经研究、翻译的成果也很多。白晋研究《易经》多年，以拉丁文写成《易经要旨》；刘应以拉丁文译《礼记》、《尚书》，并著《易经概说》；宋君荣对五经研究颇深，他的译文也最受推崇，他译过《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其《书经》于 1770 年在巴黎刊行。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他们的研究、翻译，在欧洲学界得到了流传。

对古老的文明大国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西方人士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明末以后，有多种记述中国史地的著作在欧洲刊行。1667 年，来华教士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文译本在巴黎刊行。法国来华教士冯秉正用了六年时间，完成《中国通史》的写作，共十二卷，后又补充第十三卷《中国概况》，叙述清代各省地理状况，1777—1785 年在巴黎陆续出版。使西欧人士能够比较全面、具体地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文字，是来华教士们的书信、札记，这些材料广泛地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朝野大事、民族、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风习、信仰等等，巴黎从

1703年起，陆续整理刊行教士们的这些书信、札记，一直持续发行到1818年，名为《耶稣会士书简集》，这部丛书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曾轰动一时。法国人杜赫德根据耶稣会士们收集的材料，编纂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华帝国及中国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记、政治和博物》（简称《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刊印，此书后来又译成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并几次出版，流传整个欧洲。类似的著作是稍后在巴黎出版的《驻北京的传教士所撰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论考》（简称《中国杂纂》）。

上述各种著作的大量刊行，在欧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掀起了以法国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的热潮，形成热门学科——汉学。

中国文化的西传，向人们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辉，也引起一些思想家的瞩目，他们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德国著名科学家莱布尼兹，极其崇拜中国古代的哲学，他根据欧洲出版的中国经典著作及耶稣会士提供的材料，写出《中国近事》、《论中国哲学》等著作和论文，向人们盛赞中国的文明，指出中国的哲学属于最崇高的理性哲学，达到了与自然谐和的程度。他甚至提出请中国人到欧洲去传布和指导实践。他的著名的“单子论”及二进制计算，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的精华。欧洲启蒙运动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显体现于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则，崇尚人类自身认识真理的能力和理性，否定神的启示和赐予，反对宗教愚昧，而中国儒学的天道自然观、政治借助于伦理道德、倡导臣民修身齐家以治国的统治方式及其学说，便成了某些启蒙思想家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觉醒作用推崇最力的，是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他通过对中国悠久历史的了解和研究，用中国的远古年代及历史否定《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以贬斥圣经。他把儒学当作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认为只要遵

循天道自然规律的理性，就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狄德罗也赞誉儒教以人的理性达到治国平天下的优越性。霍尔巴哈特别推崇中国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统治方式，认为伦理道德应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主张以德治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也讴歌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开明的制度，他把中国奉为按自然法则建立国家的圭臬，他因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阐扬中国政制，而被誉为"欧洲的孔子"。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对中国政制、法制的考察，理想化地把中国封建法律与伦理的结合理解为是以天为最高立法者的自然法，认为这种自然法使国家中的君臣、官民关系达到了理性的家庭式的和谐。他们还赞颂中国的科举制，称道它在抵制贵族特权及腐败政治上的合理性。

中医学也由耶稣会士传入了欧洲，杜赫德根据教士著述和书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中医知识，辑有《脉经》、《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医书的部分内容，列举了许多中医处方。脉理知识尤为欧洲人感兴趣，魏晋名医王叔和的《脉经》，被译成多种文本刊行。

文学艺术方面，耶稣会士马若瑟翻译了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所作），并被杜赫德收入他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此书还辑有《今古奇观》译文。由于《中华帝国全志》多种文本的几次刊行，这些文艺作品的故事流行欧洲，《赵氏孤儿》还被搬上奥地利和法国的舞台上演。另一部小说《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也被译成多种文字流行，该书还被评为十才子书之一。

1773年，罗马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这一解散令在两年后即乾隆四十年时才传到中国，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便不再保留他们的这一会士身分，而以个人名义继续留在宫廷及教堂中服务。乾隆四十五年后，原耶稣会士在华者已廖廖无几，耶稣会士来华、在华之历史也宣告结束。

耶稣会士之东来，一方面是为了传播所谓基督的福音，另一方面，有些教士是受命于本国政府，充当该国进行殖民主义势力扩张的工具。但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意专行教，不求禄利”，他们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科技、艺术等的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向西方所做的关于中国各方面的介绍，增加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曹雪芹著《红楼梦》

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学创作史上出现了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名著《红楼梦》。这部著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顶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自从它问世以来，人们争相阅读、评 论，以致形成“红学”，至今盛行。这部书的作者曹雪芹也因此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这位文学巨匠当时的社会地位与他的作品的艺术地位却又极不相称，历史留下的有关他的资料极少，曹雪芹究竟何许人？家世与经历如何？他是怎样创作出《红楼梦》的？我们只能根据只鳞片甲的史料作一粗糙的勾勒。

曹雪芹，名字叫霑，字芹圃，雪芹是他的号。他还有“梦阮”、“芹溪居士”两个号。古代文人的号，多是本人根据自己的情趣、志向、性格等而取，这里“梦阮”中的“阮”，是指魏晋时期放荡不羁的名士阮籍。而“芹溪居士”之号，则有超凡脱俗、无意利禄的思想。这两个号，反映曹雪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雪芹”一号，有人认为是从苏轼《东坡八首》之三的“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之句中取用，含有独处而洁身自好、甘耐清苦与严寒之义。此号为他本人及其友人喜用，比他的字及其它号叫得响亮，因而成为这位文学巨匠的名子而流传下来。

曹雪芹为旗人，更具体地说，是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人。内务府是清代负责皇宫各种事务服务于皇室的一个特殊机

构，其基本成员都是包衣，"包衣"为满语的汉字对音，家内奴仆之义。内务府包衣，可以说是皇帝的家奴，但是由于他们是皇室的家奴，具有非同一般的与皇帝的主仆关系，因而其地位大大高于一般的奴仆，这种包衣出任官员乃至官至大学士、封疆大吏者大有人在。清代，一些大有油水可捞的肥缺如关差、盐政等，皇帝也常常派给这些家奴去出任，曹雪芹家同样得到过皇帝主子的这种恩惠。内务府包衣由镶黄、正黄、正白三个旗的包衣组成，所以又称上三旗包衣，这上三旗包衣中又因其原来民族来源之不同，而分为满洲佐领、旗鼓佐领、朝鲜佐领等不同佐领。曹家所在的旗鼓佐领是原为汉人编成的佐领。曹雪芹的祖先是汉人，明末定居于沈阳。后金进占辽沈地区时，被掠俘而成了满族汗家的奴仆，当时隶属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的镶白旗包衣佐领之下。清朝入关后，当时曹家的主子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是大清王朝的实际掌政者，大约在这一时期，多尔衮的镶白旗改为正白旗，地位上升，曹家的旗籍也随之改为正白旗。顺治帝亲政后，已死去的多尔衮以谋逆等罪被追论削爵，其正白旗被没收归皇帝，曹家转而成为皇帝的家奴。在清代，皇子、皇女落生以后，由内务府包衣妇人奶养，顺治朝，曹雪芹的曾祖母也即曹玺之妻孙氏被选为奶母，抚养皇三子，在当时，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正是这件并不引人注意之事，奠定了曹家后来发迹的基础。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正月，幸运之神降临在皇三子身上，这位年仅 8 岁的皇子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清王朝的治世名君——康熙皇帝玄烨。康熙帝是吃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的奶长大的（当然不只一个保姆），孙氏对皇帝有奶育之恩，皇帝当然对曹家要另眼看待，有所报答，这也是人之常情。康熙二年（1663 年），孙氏的丈夫曹玺被派往江南，出任江宁织造，正五品官，常住南京，专为皇家及宫廷办理龙衣霞帔蟒缎及其他日用品。织造一官，也是肥缺，在清代多由皇帝的亲信家奴担任，由

于曹玺对主子忠顺，被康熙帝赐予正一品衔，进一步提高了曹家的地位。曹玺之子曹寅，即曹雪芹的祖父，是康熙的奶兄弟，少年时期伴君读书，与皇帝更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康熙三十二年，曹寅被任为江宁织造，继承父业，直至五十一年病故。在任期间，还兼任过四次两淮巡盐御史（乾隆以后称盐政）。两淮盐区是清代最大的行盐区，盐商云集，巨富之盐商颇多，盐税在全国总盐税收入中占很大比例，该区盐政额外收入也相当多，是当时官场中令人垂涎的肥缺。曹家在曹寅充任江宁织造、巡盐御史期间，是家业最兴旺的时期，居朱门府第、钟鸣鼎食，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经康熙帝之指婚，曹寅之女也即曹雪芹的姑母嫁给了平郡王纳尔苏，成为王妃。平郡王是清初礼亲王代善（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之长子岳托一支承袭的王爵，为清代皇家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门第十分显贵。曹家与平郡王府结为亲家，且女儿为王妃，又增加了作为皇家亲贵的煊赫地位与身分。康熙六次南巡途经南京，曹寅赶上四次接驾，他还专门修筑一座华丽的行宫以备皇帝在来去途中暂憩之用。每次接驾，又须置备酒宴，孝敬主上贡物，打点皇帝随行人员，花费巨大。曹寅天资聪颖，文学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古文，善作戏曲，著有《楝亭集》、《续琵琶记》（又名《后琵琶》）、《虎口余生》。刻书也很多，有《楝亭十二种》、《楝亭五种》。他还曾奉康熙帝之命，组织校书班子，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由于他的文才和名望地位，江南不少士人与之交往。当时的曹家可称得上是书香门弟。曹寅之子曹顒也有些文学功底，曹寅之侄曹頫“好古嗜学”，也是个读书人。这种家庭条件，对此后曹雪芹文学才能的造就有一定影响。曹寅死后，康熙命其子曹顒继承父职，不幸几年后曹顒便死于任上，当时其妻马氏已怀胎数月。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遗腹子，就是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曹雪芹，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关于曹雪芹的生父与生年，还有不是曹顒而是曹

頫的说法，以及生父是曹颙，但生于康熙五十年等说法，此文不取，而采取与其它资料相合较有合理性的前述说法。）曹颙死后，其家已是两世孤孀，而且亏空官帑甚多。这些亏空的官款，有一部分就是康熙南巡，曹寅为接驾而花掉的。自曹寅死后，曹家已是由盛而衰，康熙可怜曹氏孤寡，又命曹宣之子曹頫过继为曹寅之子，继任曹颙江宁织造之职。康熙接连命曹家留任此职，一来是以这一肥缺之收入抚恤曹寅之后人，二是让曹家以这个职务的进项弥补以前的亏空。十年后，这笔亏空也未能弥补上，而且曹頫在织造事务上屡次办理出错，此时的皇帝已是雍正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帝自然没有乃父康熙与曹家那样的情感，而且当时雍正正在极力推行他的清理积欠政策，整顿吏治。雍正帝指斥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而且曹頫家人又曾骚扰驿站，终于雍正五年（1727 年）底将曹頫罢官，并下令抄他的家。曹家由此急剧败落，家产、仆人等被查封变卖赔补亏空，全家被押送回北京，年仅十二岁的曹雪芹在南京江宁织造署中度过了他童年、少年时期的富贵生活，此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府第，随家人凄凄惨惨地北去。

曹家到北京后，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向雍正奏报，曹寅之孀妻孤苦无依，实在可怜，请求将赏他的原曹家的房屋留出一点，雍正同意。这留给曹家的房屋，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曹雪芹一家便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关于曹雪芹来京后的学习生活，不能确知，有可能是就读于景山官学或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设立于康熙二十四年，是专门教育内务府包衣子弟的学校，“凡内务府人等，有家贫不能读书者，听其入学肄业”①，以康熙三十四年为例，内务府包衣选取的学生名额为 388 人。咸安宫官学设立于雍正六年，即曹雪芹一家刚到北京的那一年，也是以教育包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〇〇“内务府·官学”。

衣子弟为主的学校，但选拔内务府包衣幼童及景山官学生中的“俊秀者”，且名额少，“五六十名或百余名”，所以曹雪芹入官学的话，进入景山官学学习的可能性较大。这两处官学的学生，学习一定年限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考取笔帖式，近年有资料说曹雪芹做过内务府的笔帖式，[①]也并非没有可能。在京期间，曹雪芹与敦诚、敦敏兄弟交情甚厚，敦诚、敦敏是多尔衮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阿济格曾因谋逆罪而被拘禁赐死，削除宗籍，后来有一支恢复宗籍，敦诚兄弟即这一支之人，他们属于皇家后裔，但又因开罪于皇帝本支而在皇族中受歧视，地位低，与曹雪芹这个落魄的官宦之门的子弟有类似的境遇，因而经常交游唱和，倾吐衷肠。他们之间交往的另一基础是倾慕对方的文才，属于文人之交。敦诚、敦敏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而曹雪芹也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善作诗文，且工于绘画。曹雪芹的口才很好，谈吐颇具艺术，又喜爱戏剧，有时还以演唱为乐趣，其性格是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具有“傲骨”耿介的人品；且嗜酒如命，常与友人借酒之刺激，纵情谈吐，发泄对丑恶现实的愤懑；或提笔作诗写书，作无情的揭露与抨击。曹雪芹的晚年是在北京西郊的山村中度过，生活相当清苦，常常靠赊欠度日。

曹雪芹深厚的文学素养、艺术才华，以及他的愤世嫉俗与耿介的性格，正是他创作出《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这部艺术性与思想性达到高度完美结合之名著的重要条件。

曹雪芹最初著有《风月宝鉴》，后来把它的内容大为扩充，并在主题思想上加以变更、发展，成为《红楼梦》。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前，曹雪芹已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有个署名为脂砚斋的人曾做过评论。此后，他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增删、修改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脂砚斋及另一个署名畸笏叟的

① 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第21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笔帖式是各衙署中掌翻译、公文书写等杂务的低级官员。

人，既评书，又帮助曹雪芹抄写和校对，提出修改意见和注意事项。这一期间，曹雪芹正居于西郊山村，陋屋简室，且缺衣少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仍然笔耕不辍，精心修改，至乾隆二十七年时，已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在这一年，他的幼儿不幸夭折。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写作上的心力憔悴，已使曹雪芹的身体受到摧残；中年丧子，又使他的身心遭到沉重打击，终于垮了下来，一病卧床，又无力医治。终于这一年的除夕，在万家灯火、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悲惨凄凉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四十八岁（虚岁）。这一年为壬午年，除夕时已是公元1763年2月12日。脂砚斋在其作批的《红楼梦》第一回沉痛地写道："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① 的确，曹雪芹还未完成他的《红楼梦》，便含泪而逝。他计划中的《红楼梦》应是一百一十回，现在我们见到的《红楼梦》是一百二十回，其中后四十回是旗人高鹗所续，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成的。曹雪芹对其全书之情节内容已有了完整的构思和写作上的安排，八十回以后他已草写了一部分，只可惜这部分草稿在其亲友辗转抄阅中散失了。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甲戌本）的"凡例"中的这句诗，概括了作者创作的艰辛，曹雪芹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多次增删、反复推敲，终于使他的著作成为字字珠玑的精品。《红楼梦》以贾氏家族荣、宁二府为中心，描写贾家及与贾家有姻亲关系的史家、王家、薛家这四大家族众多人物的活动，加上各府中的奴婢、优伶及社会交往中的相关人物，共五百余人②。主要人物有：贾宝玉，荣国

① 有的学者根据有关材料，认为脂砚斋把曹雪芹卒年的干支写错了，不是壬午除夕，而是癸未除夕，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2月1日）。还有人认为曹雪芹死于甲申春天，即1764年春。此处姑从"脂批"的第一手资料。

② 据毛德彪同志统计，见《红楼梦评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府贾政之嫡子，不爱读儒学四书五经，厌恶科举，常与其父发生矛盾，而受到祖母史太君的袒护。与黛玉相爱，后被迫与薛宝钗结婚，以致精神失常，出走为僧。林黛玉，史太君之外孙女，自幼父母双亡，寄居荣国府，多愁善感，体弱多病，才貌双全，与宝玉相爱，最终因婚事不遂而亡。贾元春，贾政长女，被皇帝纳为妃。省亲时，贾府特造大观园迎接。贾迎春，荣国府贾赦之女。贾探春，贾政妾所生之女，曾受命管理府中杂务，经营大观园。贾惜春，宁国府贾敬之女，后出家为尼。薛宝钗，王夫人之妹薛姨妈之女，借住贾府，后与宝玉结婚。史湘云，史太君内侄孙女，常来贾府。王熙凤，王氏家族之女，嫁与贾府，为贾琏之妻，管理贾府家务，聪明能干，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贾母，即史太君，宁、荣二府的太上家长。王夫人，宝玉之母，贾政嫡妻。贾赦，贾母长子。贾政，贾母次子。贾琏，贾赦次子。袭人、晴雯、鸳鸯等，贾府婢女。《红楼梦》一书，对贾府的日常生活、与姻亲的往来等作了具体细微的描述，展示了贵族家庭生活的豪华与文雅，揭示了一夫多妻的大家族中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斗争，纨袴子弟生活的腐朽与道德的败坏，婢仆伶人的境遇。书中既有贾府建造大观园迎接元春省亲时期门第家业兴旺之时的细致叙述，又描写了贾府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由盛转衰的过程，以及被籍没抄家后家业的急剧败落与各成员的悲惨结局。该著还对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及最后悲剧性结果作了交待。《红楼梦》一书，并无恢宏壮阔的场面铺陈，更无惊天动地的内容，所叙情节大多是日常生活及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只是在事情的陈述中加上一些神化离奇的内容，但细加品味，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饱含着作者的苦心孤诣。

《红楼梦》第一回，作者便提示读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别看这书中尽是荒唐之言，句句都凝结着苦楚辛酸，它哪里是什么痴人说“梦”，可惜

又有谁能品味出其中的真意？曹雪芹作《红楼梦》之时，正是文字狱猖獗的年代，他只好采取隐蔽的手法。该著开头是用“贾雨村”、“甄士隐”两个人物的言谈介绍，拉开故事情节的序幕，引出贾府中众多主人公的出场，暗示所叙故事？是借助“假语”，而将“真事”隐去。《红楼梦》中的有些情节，与曹家有相似之处。曹家在进入雍正朝后，因失去康熙帝这个政治靠山，而被抄家治罪，家族破败。贾家被抄，是发生在作为皇妃的贾元春死之后，说明若元春健在，朝中有可依靠的势力，贾家不会遭到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作者隐去自家的真事，而用贾府之事表达出来。但作者又不是单纯地反映一部分家史，而是通过这种现象，说明曹家的遭殃，是因为皇帝易人。曹家四次接驾，为康熙帝南巡驻跸江宁安置而花去大量银子，亏空国帑。康熙在时，不予追究，且保留其弥补的机会。雍正上台，不念旧情，无视曹家亏欠的原因，责令追赔，曹家因而倒霉。表达了作者对雍正抄家的强烈不满，作者隐去的这点儿真事，及其对此事的看法，还远不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全部，这部书更深刻的寓意至少还有以下几点：一、暴露男尊女卑的伦理制度对妇女的压迫，说明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曹雪芹笔下的女子，不少人都颇具才华，在这方面，男子反倒相形见绌。表达了作者对妇女的赞扬，对其社会价值的肯定。但是她们的境遇与结局又多属悲剧。一旦出嫁，便附属于男子，有的受虐待而亡，如贾迎春，嫁给孙绍祖后，终日受气，在悲恨中离开人世。贾元春虽贵为皇妃，但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成为皇家之人，严禁与外人接触，不啻软禁，即使与娘家亲人，也难得片刻相见的机会，更谈不上天伦之乐。香菱被人拐卖为妾。尤二姐、尤三姐、鸳鸯，都成为纳妾制度、男性欺凌下的牺牲品。表现了曹雪芹对女子的同情。二、抨击了不平等的等级制度。通过对荣、宁二府众多婢女、优伶生活的描述，以及金钏、晴雯在主子虐待下的惨死，向人们痛诉等级压迫的罪恶。三、批

判封建的婚姻制度对人们的残害。封建的婚姻制度是家长包办，禁止男女自由恋爱结婚。家长按照他们的理想为子女寻求配偶，完全不顾及子女的情感与理想。自由寻求配偶，更被认为是有辱门第、伤风败俗之事。司棋、潘又安、尤三姐争取自由婚姻，被迫害致死。宝玉、黛玉这对相恋已久的青年被活活拆散，一个泪尽而逝，一个被迫按家长的安排成婚。宝玉与宝钗的结合没有爱情基础，结果，一个如失魂落魄而出走，一个落得个寡守空房。这些人，不仅失去了应有的爱情幸福，而且结局悲惨。作者向人们深刻地揭示：这一切，都是封建的婚姻制度造成的恶果。四、揭露封建官场的腐败与黑暗。贾、薛二府，都有致死人命的罪行。贾赦谋夺石呆子古扇，不仅害死了他本人，且导致其家破人亡。凤姐在水月庵中图财害命。薛蟠打死冯渊后，竟扬长而去。他们所以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作恶，主要是因为有势力，有官僚为他们庇护。作者就是用这些血淋淋的情节，对封建官僚制的罪恶进行无情的鞭挞。五、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与虚伪。曹雪芹所描写的贾府，一方面是“诗礼簪缨之族”，给人以高雅的印象；另一方面，对其内部的肮脏行为、倾轧之事又暴露得淋漓尽致。贾府的贾赦、贾珍、贾琏等人，貌似文质彬彬，而玩弄女性不顾廉耻，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贾家内部的矛盾斗争也相当激烈。如荣府有贾赦、贾政兄弟之间的矛盾；有贾琏与王熙凤夫妻之间的矛盾，互相猜忌提防，各自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以致发生尖锐冲突。有嫡庶之间的矛盾，贾政嫡妻王夫人设法压制贾政之妾赵姨娘。赵姨娘及其子贾环不满于自己的地位，设计陷害王夫人的嫡子宝玉。正如探春所说，他们一家子虽是亲骨肉，却“一个个像个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六、抨击封建教育与科举制度。作者借贾宝玉的厌学、焚书、不乐于科学仕进，指斥当时的所谓教育、读圣贤书，不过是为了追求利禄，是“饵名钓禄之阶”。总之，曹雪芹对封建社会晚期各种落

后制度的腐朽性及其造成的恶果，以小说故事的形式，向人们作了深刻的暴露和批判，预示了封建社会无可挽回的衰亡，体现了作品高度的思想性。

《红楼梦》的艺术性也远远超过了前人。曹雪芹反对以前一些作品的虚伪、低劣与庸俗，而进行全面性的艺术创新。他以现实为基础去复制生活，把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自然逼真地描述出来，故事情节及人物活动安排得合情合理，完全是社会生活的再现，读后使人觉得亲切自然，具有强烈的真实感。曹雪芹对以前才子佳人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拙劣手法尤为不满，他要在表现技巧上作一番“洗旧翻新”的创造。他笔下的人物，个个生动、个性鲜明。《红楼梦》中女子甚多，不乏淑女佳人，但从不用低能作家那种“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之类令人生厌的滥语陈词去形容。他通过相貌、性格、语言、身份等多方面的角度来塑造人物，因而所刻画的人物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具有真实美。《红楼梦》中几十个重要人物，个个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如王熙凤的精明而又奸诈阴毒，薛宝钗的淑贤文静而又禀性冷淡，晴雯、鸳鸯的刚烈，林黛玉的沉静与多愁善感，史湘云的开朗直率、天真无邪，刘姥姥虽一身土气而又不乏丰富的阅历等等。曹雪芹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把生动、流畅、典雅而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楼梦》运用大量的民间口语，生动活泼，质朴自然，如描写王熙凤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把这个绰号“凤辣子”的女子阴险毒辣的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这类例子，在《红楼梦》中随处可见。曹雪芹工于诗文，因而《红楼梦》的语言韵味很浓，他在词、曲、赋等方面也有一定造诣，这些方面在《红楼梦》一书中也有大量运用，体现了作品高超的语言艺术。另外，《红楼梦》的结构、布局的艺术性也超过了以前的古典小说。

作品安排了多线结构，而又主次分明，多面㶩、立体式地同时展现多种生活场面，又把其内部联系有机地纟 -起来，严谨完整、浑然一体。作品还多处埋有伏笔，在不㘫 㲎的复杂的故事情节中，多次显现，进行照应，但其显现又是以谐音、寓意、谜令等多种方式和手法，作含蓄性的暗示，读之令人回味无穷，表现了作者巧妙的构思。如太虚幻境中薄命司所藏“金陵十二钗正册”对各个女主人公命运的暗示，便 是如此。这些含蓄精巧的情节安排，越发使读者觉得作品中隐含着无尽的令人品味的蕴意。曹雪芹以其卓越超群的艺术手法，使他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高度统一。

曹雪芹及其不朽名著《红楼梦》的出现，是人杰地灵之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值得自豪的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曹雪芹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伟人文学家，《红楼梦》也将在人类文学史上永放异彩。

（杜家骥）

参考资料：

冯尔康：《曹雪芹和〈红楼梦〉》。

林兴仁：《语言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周汝昌：《曹雪芹小传》。

纂修《四库全书》

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历经顺、康、雍三朝到乾隆年间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这就为封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于是有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文化学术史上的壮举。

我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以“武功”定天下，建立王朝，又常以“文治”坐江山，显示强盛，因而对中国的文化事业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使中国的文化一代一代沿续了下来。

标榜“文治”最常使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广集天下人才，搜求典籍，编纂图书。特别是大型书目的编纂，因其规模宏大，更能反映封建统治的强盛，所以，凡较为强大的王朝无不津津乐道于此。如唐代编《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明代编《永乐大典》等等，便是炫耀所谓“文治”的产物。到了清代，康熙和雍正皇帝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曾编纂出《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类书。以天下文治武功第一人自誉的乾隆皇帝更是不甘寂寞，不惜动用全国之物力财力，聚集天下之学者名流，要编纂囊括古往今来一切著述的《四库全书》，把历代官府主持的修书活动推向了最高峰。

清王朝建立全国统治之后，进一步强化了专制统治。在推行文化政策方面，一方面除继续沿用明代开科取士的办法之外，又

开设了博学鸿词科，令地方官推荐有声望的文人学者应考，由皇帝赐给功名，用来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禁锢和束缚人们的思想。康、雍、乾三朝皇帝为了消除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思想，曾大兴文字狱，对涉嫌文人大加杀戮。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很多文人学者回避现实，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整理古书上面，对几千年积累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经书，进行训释、校勘和辑录佚文工作。为此，学者们需要阅读许多藏书，这就提出了大规模收集和收藏古代图书的要求。

乾隆皇帝针对学者们的这种需求，采取对当时学术潮流因势利导的办法，在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下达了征求天下遗书的命令。乾隆皇帝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明显的，一方面他要借此机会，将历代书籍收集上来，作一次全面的审查、评介，以便更好地提倡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征集图书来查禁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著述，以便消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和排满情绪。

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就对征书修书表现出极大兴趣，多次下达征书令。到汉学大兴之后，他看到征书的时机更加成熟，于是把全面征书活动提到日程上来。乾隆三十七年，当他再次颁布征书令时，安徽学政朱筠借此之机，提出了搜访和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这四条建议是：第一，征求遗书当以汉唐以来，尤其是辽、宋、金、元四代的文献价值较高、传世甚稀的旧本、抄本为重点。第二，由政府组织人力先对内府藏书进行一次普查，编出目录并予公布，以便各地献书时参考。在这一条建议中，朱筠特别提出，明代所纂《永乐大典》，收集了明代以前大量的著述，应从中辑出能独立成书的著作。第三，要充分吸收汉、隋、唐、宋以来历次整理文献的经验，不仅征集遗书，还要对其进行校勘，同时对所收书籍，分门别类，写出提要。第四，除征集书籍

之外，凡是有文献价值的金石、图谱等也应列入搜集范围。

乾隆皇帝对朱均的建议非常重视，立即让翰林院官员就朱筠的建议进行讨论。经过调查，翰林院官员认为朱筠的建议切实可行，尔后又商定了一个实施办法，呈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接到翰林院报告之后，表示同意并亲自为这部将要编纂的巨书起名“四库全书”，翰林院组织专门的编纂机构——四库全书馆，着手进行此项工作。“四库”之名来源于唐代，当时所设集贤书院等皇家藏书库是按经、史、子、集分类贮藏，名为“四库书”；“全书”则是因要编纂的这部书收录的书籍比较全，包括了从古至今各方面书籍，故曰“四库全书”。

编纂这部巨著首先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搜集图书。此项工作是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起初，各省对政府征书的号召，响应并不十分积极，大多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从各省征集到的书籍寥寥无几，就是征集到的一些书也都是价值不高的近人经解诗文等，那些年代久远的孤本善本、名家著述，根本未能征集上来。情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一些经办官和藏书家对顺、康、雍三代文字狱诛连之广和杀戮之惨而心有余悸，不敢搜求和交出。另外，藏书家们又担心累世收藏的珍本善书被征之后不得归还。

针对这种情况，乾隆皇帝又连发谕旨，一来强调他自己办事光明正大，不会在访求的书籍中寻找瑕疵而罪及藏书人；二来向藏书家们保证，所有献出的书籍，一俟校辑完毕，立刻发还。他的这一明确态度，使征书经办官和藏书家消除了疑虑。故而在乾隆三十八年和三十九年间，各地献书活动出现了高潮，各省先后集中到北京的图书达万种以上，其中进书最多的是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为四千八百零八部和四千六百部。这些征集来的大量图书，构成了《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

除在民间进行搜求之外，还就官方的藏书进行了清理。清初，内廷各处如皇史宬、懋勤殿、武英殿、内阁大库等，从明朝

以来收藏了大量图书，这些地方的书籍主要是供皇帝阅览的。其中武英殿藏书最多，不下千余种。

清朝历代皇帝下令编纂的一些所谓"敕撰本"书籍，如顺治朝编的《易经通注》、康熙朝编的《春秋传说汇纂》、雍正朝编的《执中成宪》、乾隆朝初期编的《三礼义疏》等，也属收集的范围。

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汇集于四库馆的公私藏书，总计有一万五千种左右。大量的书籍被征集上来，为《四库全书》的编纂铺平了道路。

书源问题基本解决后，四库全书馆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开始进行。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成立，馆内所设最高职务为总裁和副总裁，其职责是负责总管馆内一切事务。因统筹全局，责任重大，故设正总裁十六人，副总裁十人，分别从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正副总裁下设总阅官十五人，负责各书的阅定；总纂官三人，负责编书；总校官一人，负责校定；缮书处总校官四人，负责抄写及校对诸事。上述各机构之下，又设有具体的办事官员，分工负责校勘、编辑、刊刻、装订、整理等具体事项。总共大小官员达三百六十人。此外，在全书纂修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招收抄写誊录、绘画、装订工等约四千余人。

为了编好这部书，乾隆皇帝网罗贤人，广招人才，组建了一支高质量的编纂队伍。他本人就亲自挑选了一些著名学者担任四库全书馆的重要职务，如纪昀、陆锡熊、陈费墀等人，就是由他推荐为总纂官、总校官的。另外通过大臣举荐和政府征辟的一些人员，也不乏当时的专家，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如著名的经学家戴震、校勘学家周永年、史学家邵晋涵即分别被任命为校勘《永乐大典》的纂修官兼分校官；著名经学家姚鼐、翁方纲、朱筠分别被任命为校办各省进书的纂修官。其他如精于金石书画的彭元瑞，精于经学的朱珪、庄存与，精于算学的李潢、陈际新，精于

校勘学的王念孙，精于古文的曹秀先、王太岳等等，都安排了相应的职务。当时的四库馆可谓鸿才硕学荟聚一堂，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学有专长，造诣颇深的学者。他们以独有的特长和学识，在担任相应的职任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有了这些骨干力量，使《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四库全书》的编纂步骤是根据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发的谕旨进行的。即把所有搜集到的各种遗书交与总裁，并会同《永乐大典》内现有的各种书目，详加校勘，把罕见的书籍分别刊、抄、择出来，汇缮成编。编纂人员首先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永乐大典》长年存藏于翰林院典籍库中，已残缺不全。担任纂修的翰林官员对其进行清点，查出现存二万四百七十三卷、九千八百八十一册，缺二千四百余卷、一千余册。由于这部书头绪纷繁，内容庞杂，从中辑佚非常困难。乾隆皇帝曾规定了一个采辑标准，总的精神是：对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而又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的，可辑出来；对现已通行或虽属古书而内容无关紧要的，可不必采录。据此，四库全书馆总裁拟定了一个具体的实施办法，将九千八百余册的《永乐大典》分派给各纂修人手中，规定每天翻阅册数。对凡有符合采辑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缮写底本。缮写后的底本再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并写出书目旨要，然后送交总裁审阅。

在对《永乐大典》辑佚的同时，对搜集来的各种公私图书也开始进行了编辑。

内府公家书籍和“敕撰本”书籍的编辑工作相对来说较容易一些。因为这部分书是前代流传的旧书和清朝历代皇帝敕令纂修的书，无需太大的变动，绝大部分都直接送交武英殿缮写。只是对少部分书籍的内容做了一些改正讹误、增补不全等零星工作。《四库全书》从这部分书中采录了三百二十七种，存目四百二十

种。

对从各省采进和私人所献书籍的编辑工作就不同了。由于这部分书数量多，内容又比较复杂，因而对它们进行筛选，就成了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工作。

第一步是要对这些书籍进行鉴定。即把有价值的书挑出来，违禁书剔出去。第二步是对所留存的书进行辨伪和考证，即看其是否为真书或伪书，有无异文、错漏或误解。第三步是写出书的内容提要，叙述作者的时代爵里、事迹以及内容得失等，然后交总裁官审阅。

总裁官对所有送审的书籍，进行全面审查，提出或刊、或抄、或删的具体意见，最后呈送给皇帝，由皇帝亲自定夺。根据皇帝的最后决定，把应刊、应抄的书籍交缮书处按正式规格进行抄录，收入《四库全书》。其中价值较高、世间罕传的书籍，除缮写外，还由武英殿修书处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名刊印行世。对有一定价值，但其内容和儒家经典有相悖谬之处的，仅收人与《四库全书》同时编辑的《四库全书总目》之中，不再录入《四库全书》。

在《四库全书》开始编纂后不久，考虑到这部巨书一时难以速成，而且即使修成也会因部头太大而不易翻阅，所以，乾隆皇帝命正总裁于敏中、王际华，副总裁董诰等于《四库全书》中先撷其精华，编写出《四库全书荟要》，以便和将来成书的《四库全书》互相补充。这部书共收录书籍四百七十三种，计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一卷，乾隆四十三年书成，共抄两部，一部存于内府御花园内内的摛藻堂，一部存于圆明园内的味腴书屋。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对著录书和存目书进行了提要编写，乾隆皇帝又命将这些提要汇编在一起，形成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简称《四库提要》，后又在《四库提要》的基础上，编辑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还有一部与《四

库全书》有关的书即《四库全书考证》，它是在编辑全书过程中，编纂人员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最初是用另纸附写在各书上，后正式抄写或刊刻在各书的卷末，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命将这些分散的校订条目汇集在一起，编排成书，共一百卷。

以上这几部书，都是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形成的副产品，作为工具或目录书，为利用和查阅《四库全书》提供了方便。

编修《四库全书》最繁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作是缮录和校订。最初，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将《四库全书》抄录四份，以保举和考试的方式先后招收抄写人员二千八百余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抄录工作。为贮藏这四份书，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先后修建了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和盛京故宫文溯阁，号称北四阁。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抄竣，随即藏入文渊阁，到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其他三份也陆续抄毕。

在第一份《四库全书》抄成的时候，乾隆皇帝考虑到江浙地区文人荟聚，其间好学读书之人自会不少，故下令再缮写三份，分别存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号称江浙三阁，到乾隆五十二年四月，这三份书也相继抄成。

除以上七份阁书之外，翰林院内还藏有一部，主要是供翰林学子们抄阅。这部全书不是重新抄写而成，而是纂修《四库全书》所依据的原本。

《四库全书》究竟收录了多少书籍，由于抄成时间不一，抽补散失情况各异，七阁藏书数目也不尽相同。就文津阁藏书而言，共收书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以全书的册数计，每份约为三万六千册。这样一部大书，确为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巨著，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从内容上看，它包含了古往今来一切领域的知识。我们从它

的分类当中即可以看出。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部下分若干类，各部类的名目是这样的：

（一）经部十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乐类、小学类、四书类。

（二）史部十五类：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三）子部十四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四）集部五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典类。

从收录各书的著者情况上看，它收录了我国有文字以来历代人的著述，但对当时还活着的人的著述，除皇帝和官修书外，均不予收录。在收录的著述中，以儒家的著述居多，而属自然科学的文献则收录的很少。

《四库全书》不但以浩瀚宏博而著称，而且在使用纸张的质地和外表的装潢上也是非常讲究的。其所用的纸全都是上等的开化榜纸和太史连纸；装帧全都是用绢面包背装，经、史、子、集四部绢面的颜色各不相同；以一个楸木匣子为一函，函面上刻有所装书之书名，函内书籍用香楠木片上下夹住，系上绸带。全书鲜艳整齐，精致美观。

《四库全书》除具有保存价值之外，还供官员、学者借阅，北四阁之书主要为大臣官员阅览；江浙三阁之书主要为全国士子学人阅览。就阅览问题，乾隆四十一年，令大学士等拟定了一个阅览章程，阅览北四阁的书，先告之阁领事，阅读时可进行抄录，但不许私携出院；阅览江浙三阁的书，允许借出，并设立收发档案，登记注明借阅情况。阅览章程的制订，大大方便了对

《四库全书》的利用，使之未被束之高阁。

在七份全书全部抄成之后，后来又陆续的进行了一些撤毁、抽改、换补等工作，一直到嘉庆初年，全书的编纂工作才基本结束。

《四库全书》修竣的五十年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年代，西方列强侵华，国内爆发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四库全书》在战火和动乱的年代里，也遭到了很大损失。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的藏书分别毁于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太平天国反抗清朝的战火中（文澜阁只残留极少部分）。文渊阁之书一九二五年移交故宫博物院保管，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辗转上海、重庆，一九四八年运于台湾，现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文溯阁之书一九一四年运至北京，后运往沈阳，一九六六年由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之书一九一五年从承德运往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是现存几部书中最为完整的一部。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馆开馆到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最后一部书抄成，历经十五年，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各级官员、文人学者倾心竭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巨大工程。它的编纂无疑对 保存古代典籍，传播历史文化，推动学术研究等等，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在广泛征集书籍及编纂的同时，也对大量的书籍进行了查禁、篡改甚至销毁。据统计，被乾隆皇帝禁、改、销的书籍达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其数量几乎与《四库全书》所收录者相近。所以《四库全书》的编纂，反映着封建统治者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功与过，故这部巨著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功魁祸首”之作。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934、卷935、卷963。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
《四库全书总目》。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刘汉屏：《〈四库全书〉史话》

议政王大臣会议始末

从清入关前努尔哈赤时期，直到入关后第四代皇帝乾隆当政时期，清政权中曾有过一个重要的行政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主要由满族王公、八旗高级官员组成，负责商讨重大机要事务。这一机构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后金及清王朝的崛起与壮大，经历过清兵入关、建立对全国的统治，以及平定藩乱、绥定边疆，直至清王朝臻于全盛，长达一百七十多年，在清前期的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早在努尔哈赤创建八旗之时，即设置“议政五大臣”，商讨军国事务。参预议政的，除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这“四大贝勒”外，济尔哈朗、杜度、岳托、德格类、硕托等贝勒、台吉[①] 也“从五大臣议政”。这些贝勒、台吉全部是努尔哈赤的子、侄、孙，属于后来所称的宗室贵族，他们在努尔哈赤主持下，每五日会集一次，协议国政。

天命十一年（1626 年）九月皇太极继汗位以后，后金又实行八和硕贝勒[②]“共议国政”制，议政的宗室贵族除了上述四大贝勒，还有“议政十贝勒”，这十个贝勒是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萨哈廉、豪格，宗室贵族中凡被封为贝勒者全部成了议政成员。八旗固山额真[③]

① 贝勒，满族贵族爵名；台吉，汗之子弟的称号。
② 和硕贝勒，主掌一旗之贝勒。
③ 固山额真，八旗某一旗的最高长官，即后来的八旗都统。

是“兼议政大臣”，与诸贝勒共同议政。按照努尔哈赤生前的规定，后金军国事务必须由分主八旗的八和硕贝勒共同商讨，八旗联合议决。天命、天聪时期这种由宗室贵族——旗主贝勒、贝勒与八旗中的五大臣、固山额真组成的议政机构，虽无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名，实际是后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早期形态，而诸贝勒五大臣议政时期，是它的产生时期，至天命十一年九月后臻于正规与完善。当时后金还没有设置其他权力机关，军国政务均决于此，因此，它也是统理后金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议政形式，呈现明显的联旗合议与“八分”议政的特点，即八旗每一旗都是以独立的政治单位参预议政，其成员除了各旗旗主八和硕贝勒及“入八分议政贝勒”外，八旗固山额真中，每旗一人兼议政大臣，以后再添设议政成员，也是各旗平均。这种联旗合议制，使各旗基本处于同等并列的地位，所以作为一旗之主的汗皇太极，在合议中其汗权的权威并不特别突出。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并将原旗主贝勒全部封为亲王。崇德二年四月，皇太极鉴于当时军务繁多，议政大臣（指八固山额真）或出兵或在家，有事时咨商人员甚少，故每旗又设议政大臣三员，开始出现作为正式职衔的议政大臣。此后，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兼议政大臣）、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因参预议政的宗室贵族还有贝勒、贝子等，故又有“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等名称。这些称呼不过是以前诸贝勒与五大臣、八旗固山额真联合会议在称谓上的改变而已。

崇德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还保持着后金政权时期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但其权限已明显缩小，主要由于天聪五年设置六部后，诸凡八旗官员在各机关的任用与调动，旗下差役之征发，财物之分拨，科举之举行，处置战俘，审理旗下案件，殿、堡、山陵工程之兴修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政务，已由各

部分别处理。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其议处的内容多为满洲王公大臣刑案的审理。另外是军务，即所谓“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所以主要是兵、刑二务。

另外，经过天聪一朝皇太极对与其汗权抗衡的三大贝勒的斗争，至崇德建元，身为皇帝的皇太极已基本树立皇权专制的尊威，凌驾于“共议国政”机构之上，掌握了宗室贵族议政的任免权。天聪初，宗室诸贝勒，尤其是充当旗主的和硕贝勒是作为当然议政者干预朝政的，崇德后，这种当然议政的资格已开始被皇帝取消。为了加强议政职能，皇太极开始将宗室中较低级的贵族——贝子、公等提拔数人预议。从行政程序上看，各部重要政务必须先上奏皇帝，皇帝认为属于有必要共同议决的“当议事务”，才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奏，议政者也只能“候旨齐集”，听从皇帝的临时传旨。这就是说，其职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权的意志。在崇德年间清政权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下，皇帝已将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的任用、职掌的行使控制在皇权的范围之内。

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皇权。由于在皇太极暴逝之后，满洲王公曾为争夺皇位而展开过一场激烈的内讧，两白旗王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与正蓝旗、两黄旗王大臣产生了尖锐矛盾，与镶蓝旗王济尔哈朗等人也是貌合神离，所以多尔衮摄政之初（入关前），便以诸王贝勒商讨国政是“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限制他们参预朝政，禁止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人朝办事。另外由于入关初王公大臣领兵在外，所以这一时期诸王贝勒大臣共议大政之事并不多见。

顺治七年（1650 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 年）左右，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最广泛，权限达到其顶峰的时期。其中前十二年即顺治七年至顺治朝终，又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迅速扩

充、成份复杂化的时期。

顺治七年以后，主要是在清世祖福临亲政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组成规模迅速扩大。首先是，一大批宗室贵族如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贝子务达海、锡翰，公汉岱，承泽亲王硕塞、谦郡王瓦克达，济尔哈朗之子世子济度（后袭父和硕亲王爵，号简）及敏郡王勒都，安郡王岳乐，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显亲王富绶等，在顺治七至九年的三年中，陆续开始议政。若加上诸王之首郑亲王济尔哈朗及理政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议政的宗室贵族已近二十人。另外，议政大臣也在人数上显著增加，仅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所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三十余人。而且成分复杂化，其中八旗蒙古固山额真开始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六部满蒙尚书则全部为议政大臣。顺治九年至十三年几年间，内院大学士满洲旗人希福、额色黑，汉军旗人范文程、宁完我也一度参预议政。其他如皇帝的侍从——内大臣、侍卫，以及在王府中掌管事务的长史、无职的旗下闲散也被任命为议政大臣。以上宗室贵族皆掌政统兵，是清廷军政大权的核心。议政大臣中，八旗满蒙固山额真、六部满蒙尚书是清廷军政要员，所以，这阶段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实际是清廷所有掌军政大权的宗室贵族及八旗满蒙旗人大员的联合会议。人员的大量增加，成分的复杂化，表明它比人关前的崇德朝大大发展了。还应指出的是，这一议政机构虽然成员多达几十人，但在实际议政时并没有这么多，因为当时戎马倥偬，有些人出兵在外。扩大议政成员，也是为了保证在战时中央有足够的议政成员。

其职掌也显著扩大，议处政务的广泛远非人关前可比。政务的纷繁，也使议政的形式复杂化，除了有宗室贵族组成的议政王会议和满蒙人员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还有上述成员与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满汉官员的联合会议。后一种形式中，主持者和决策者仍是议政王大臣，所以可称作是扩大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所议处的政务主要有如下数项：

第一，谳断刑狱，议处宗室王公及满汉大僚，复审重大刑名案件。比如，顺治八年议处英亲王阿济格政变案，追论已故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及其党羽刚林、祁充格、谭泰等人，并削多尔衮王爵、籍没其所领有的正白旗。康熙八年议处辅政大臣鳌拜集团。其他如审理大学士冯铨、成克巩、陈名夏等刑案，也都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定或复审。顺治十一年还规定，三法司核拟的重大人命案件，必须再由议政王大臣详确拟议。

第二，商议宗室王公、满洲大臣爵职的承袭。如顺治八年多尔衮之继子多尔博的承袭。康熙元年加授辅政大臣遏必隆一等公爵等等。

第三，商讨军务，议定对策及出兵方略。如顺治十一年议定对郑成功发兵征剿，部署出军。十四年密议剪除郑芝龙，调整东南沿海兵力部署，议准追剿南明永历帝等等。

第四，对汉藩王及其属下的处理。永历政权被摧垮后，吴、耿、尚三藩部队的安置，“事关重大”，由议政王大臣密议奏上裁决。康熙十一年议准停止义王孙可望王爵的世袭罔替，子孙降袭公爵等。

第五，议决少数民族问题。顺治十年，达赖五世因水土不服奏请回藏，如何对待其去留，还关系到清廷与喀尔喀、厄鲁特蒙古的关系，经议政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赐其金帛，册封名号给以金册，盛情挽留，并召蒙古王贝勒与达赖相会。临回藏时，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进一步密切了与西藏和外藩蒙古的关系。

第六，调处满汉矛盾，维护满族统治者的经济利益。顺治中到康熙初，因“逃人法”及“圈地”激化了民族矛盾，“良民失业，铤而走险”，议政王大臣多次与满汉九卿合议对策。

第七，奉旨议选重要官员。顺治八年，命议政王大臣议定

吏、刑、工三部尚书及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缺员的人选。康熙八年，同吏部会议，将解任降级的礼部尚书祁彻白等多人复级起用。

第八，惩治渎职官员，整饬吏治。顺治十三年二月，员外郎朱世德亏空银两一案，曾经户吏二部及都察院三衙门分别清查审议，但部院大员互相推诿，不能结案，顺治帝盛怒之下，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满汉九卿翰詹科道等官会同审查议处，将尚书、侍郎二十余人降职处分。弘文院大学士图海在内阁行事执谬、专擅，调入刑部后，又不实心任职，敷衍政务，以至错判案件。交议政王大臣从重议处，免死革职籍家。

第九，议定典制，改革、完善行政制度。这方面政务，多由议政王大臣与满汉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官合议。比如改革内院票拟制，各部本章由部臣面奉谕旨回署拟票改为皇帝批旨，又进一步改为内直大学士、学士在御前批拟。顺治十八年，又明确责令议政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官将大小各衙门现行事务如铨法、兵制、钱谷财用、刑名律例、内外文武各官之恩恤荫赠以及祭葬仪制等项，详考入关前成宪，变通满汉今昔之异同，“斟酌更定，汇集成书，勒为一代典章，永远遵行。”

以上所列，仅是摘其较有影响的事项，作一简要介绍。由所有掌军政大权的宗室贵族、满蒙军政要员联合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所议处的上述九项事务，基本占据了这一时期全部政务的主要方面，仅就这点便可看出，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当时清廷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一机构在入关后从成员到职掌、权限的扩大与发展，是满汉官僚联合统治的政体建立后，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占据核心和主导地位的集中保证。另外，由于当时满汉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满族统治者虽然在中央各机关中任用大批汉官，实行满汉复职制，但对这些汉官不无提防之心，因而那些机要政务及重大政事，需要专门由本民族人员组成的机构商议处理。从这方面

讲，议政王大臣会议又是在满汉矛盾的情况下，作为满汉复职制之外的一种非常必要的行政补充，它保证了满族统一并建立全国统治的顺利进行，维护了满族贵族的政治、经济利益，起到了入关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是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职能所在，也是这一机构职掌扩大与发展的主要原因。

康熙十二年以后至雍正朝军机处设立，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组成人员的成分较为单纯，职掌范围缩小并较为固定的时期。顺治十八年，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桂王政权的覆灭，标志着清王朝统一全国战争的基本结束，清廷也随之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进行精简。康熙元年至十一年，对议政成员进行了三次裁减。一次是康熙元年，吏部因正白旗议政大臣额少，奏请补齐。圣旨下，以“满洲蒙古都统及尚书俱系议政大臣”，不但未补缺额，反而将其他旗所设平均员数的议政大臣全部裁撤。一次为康熙八年，又因议政人员繁杂泄漏了机密，停止王府长史及闲散议政大臣议政。经过这两次大裁减，议政大臣基本上仅剩下在中央机关中任职的满蒙都统（即原固山额真）、大学士、尚书及皇帝的御前扈从人员——内大臣。此后，议政大臣主要由这几种官员充任。康熙十一年，又对议政王大臣进行了裁汰。三藩事发之时，议政王、贝勒、贝子只有杰书、岳乐、福全、勒尔锦、察尼、董额（或作洞鄂）、尚善、温齐、苏努等数人。这些王、贝勒、贝子所以能够参预议政，主要是皇帝根据他们的行政能力，而不是王、贝勒等的入八分爵级和地位。旗主、入八分王公等八旗贵族当然议政资格的彻底取消，八旗平均员额的议政大臣的取缔，标志着八旗各自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参预议政的时期已经结束，八旗联旗议政制彻底瓦解。此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完全是皇帝控制下的，由中央各机构官员组成的旗人会议机构。议政的王、贝勒、贝子等被皇帝任、免议政，根据需要又随时撤裁或恢复之事，也经常发生。康熙三十六年至六十一年这二十几年中，这一机构中

已无王、贝勒参预议政，因而文献上只称其为“议政大臣会议”。雍正、乾隆两朝初年，任命宗王总理政务，宗王再次参预议政，但他们已不称议政王，与以前的低级宗室一样，只是被授以议政大臣。文献上（主要是《清实录》）虽然还写作议政王大臣会议，实际也可称为“议政大臣会议”。预政宗王不授为“议政王”，而授其职为议政大臣，是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议政官员的地位差距，便于地位较低的官员发表意见，有利于这一议政机构职能的发挥。贬抑王的身份为大臣，也是皇权有意削弱宗王权势的一种措施。

康熙十二年至雍正朝军机处设立这五十多年中，议政王大臣会议所处理的政务除了官员服饰、八旗重要旗务、王公及功臣爵职之承袭、重大丧礼等一般性事务外，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议处军务。长达八年之久的平定三藩之乱，攻取台湾，反击沙俄的雅克萨之战，三征噶尔丹，征讨策妄阿拉布坦、罗卜藏丹津等重大军事行动，从和战之决策，到具体军事方略之策划、兵将之调拨，始终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或经议政王大臣参与处理。商讨军务，是这一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经办最多的事项，因而使它在这一阶段呈现了明显的军事性特点。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议政职能，集思广益，康熙中期，又任命一些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八旗高级武官充任议政大臣。

第二，有关蒙古各部、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处理。三征噶尔丹前后，凡率部依附、归降清廷的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人的安置，争取青海蒙古诸部以孤立噶尔丹等一应复杂事务，都由议政王大臣讨论处理。为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经议政大臣商定，增派朝廷官员协助拉藏汗，正式册封六世达赖喇嘛，并决定派兵护送进藏坐床。雍正五年又议设驻藏大臣等等。康熙中期以后至雍正朝，民族事务是清中央行政中的重要政务，康熙二十九年，令专门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与六部尚书一样，按

例列入议政大臣，正是出于这方面议政的需要。

第三，处理与沙俄边界问题。如康熙二十八年，议定《尼布楚条约》签定后诸应行事宜；雍正五年，议准并补充《布连斯奇条约》等等。

第四，谳审重大刑案。三藩平定之后，凡叛从吴三桂作乱被拿获，或败后又降清者，如耿精忠、马宝、彭时亨、谭天秘等二十多人，皆由议政王大臣审讯，全部处以凌迟、立斩枭示的极刑。并对触犯军法的带兵宗室贵族、官员审察议处，或削爵，或免死革职、籍家。康熙四十七年九月，拘审在储位之争中陷害废太子允礽谋夺储位的皇八子允禩。雍正初，复审允禩所拟敦郡王允䄉奉使口外违旨不前一案，以打击清世宗的政敌——皇八子党。不久，又命议政王大臣与刑部胪列权臣年羹尧罪状，议拟正法等等。议处重大刑案，始终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要事项，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议政职能，在康熙中期以后，又把三法司之一的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按例补入议政大臣。

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及雍正初清世宗与皇子党、擅权重臣的矛盾，是皇帝在行政中重点解决的问题，议政王大臣会议审拟狱案这一专职，再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在皇帝的操纵下，打击清除了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维护了皇帝的专制集权。

军机处设立之后至乾隆五十六年这六十余年，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所缩减，职掌显著减少，逐渐空存其名，最终消亡的时期。

自雍正中设军机处后，对准部用兵的军务及与此相关的少数民族事务，就已归诸军机处办理。此后至雍正朝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明显减少。

议政王大臣会议既然是处理机要政务的机构，那么它对成员的要求就必然应该是数量上的精简与质量上的干练。但充任议政大臣者“半皆贵胄世爵”，即出身于满族贵族、勋旧世家者居多。

到了康熙后期，这些人已失去其祖辈们在开国立基四征不庭时期那种勇武淳朴之风，庇祖先之荫而养尊处优，“不谙世务”者相当多。至于宗室贵族，不仅行政能力低劣，而且以其尊贵身份高居于其他议政大臣之上，影响这一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另外按旧制，满蒙都统、尚书等大多兼议政大臣，人员庞杂，康熙虽采取屏斥宗室贵族及减少冗员的办法以提高其行政效能、防止泄密，如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以满蒙都统人员多，且“不晓达事务者甚多”，而免去其议政资格，只令商议兵事时参预。康熙三十六以后，基本不再任用下五旗王、贝勒、贝子议政。但对于这个落后的贵族性议政祖制却缺乏彻底革除的勇气，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这个陈旧祖制的弊端。勇于改革，施政严猛的雍正，则已不顾及于此，终以巧妙的釜底抽薪的方式，设军机处于易于保密的近御之处，排除宗室贵族和众多的议政大臣，“设立军机大臣，择阁臣及六部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然后机务慎密，议政之弊始革”。① 在处理机要事务上，这些从众大臣中特选的少而精的军机大臣，则成为皇帝得心应手的合适的人选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经过康熙一朝，满汉统治者基本融为一体。所以才会出现满汉大臣共同参预的处理军机要务的军机处。

乾隆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又一度有所恢复。这是由于乾隆帝出于对乃父严猛政治的缓和，本着“法祖”的原则，在典制改革方面所做的一点修正。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得以按照落后的祖制延续存在。满蒙官员在他们被任为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职务后，仍照旧例，兼授议政大臣的职衔，但他们所议事务除了某些军务外，以琐碎政务居多，如出师告捷、祭堂子典礼之类。勘审宗室王公等重大刑案，则已由宗人府宗令等人负责。军务及重要的少数民族事务，主要由军机处办理。既然议政王大臣

① 《啸亭杂录》卷七“军机大臣”。

会议已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便只是苟延了。大约在乾隆二十几年以后，议政大臣一职已无职掌，只是作为满洲大臣的荣誉虚衔。正如乾隆帝在上谕中所说："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终于在乾隆五十六年宣布取消，延续一百多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至此走完了它的全部政治途程。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清实录》太祖朝至及高宗朝。

《啸亭杂录》。

征缅之役

缅甸为中国的南方邻邦，与云南的大理、丽江、永昌、腾越、顺宁、普洱、元江诸府州接壤。十一世纪以后，缅甸开始形成统一局面，建立了蒲甘王朝，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遣使人贡，双边关系一直没有中断。

清王朝入关之后，开始建立全国统治。偏安一隅的南明王朝，已无力向清军抗争，顺治十五年(1659 年)，南明最后一个王朝的永历皇帝被清军逼迫逃至缅甸边境，不久被缅王迎入缅甸。顺治十七年，缅甸发生政变，新登王位的猛白非常轻视永历皇帝。此时，镇守云南的藩王吴三桂，认为永历皇帝寄寓缅甸，处境艰难，遂上奏清廷，要声讨缅甸，索取明王。缅甸在清军的逼迫下，不得不将明王献出，至此，缅甸也同清王朝断绝了朝贡关系。

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中断了，但是，由于两国边境相接、居处相错，但两国人民间贸易频繁、联婚不断，交往甚为密切。在民间接触的推动下，两国政府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有所松动，乾隆十六年(1751 年)，缅甸派遣使者向清政府入贡，又开始了两国政府间的官方联系。

缅甸是一个不大的邦国，但内部的纷争连年不断，政治的动荡，加上资源的贫乏，使国势极为贫弱，因此也常常遭到外部族的侵扰。乾隆十七年，附近的得楞部族便趁缅甸内乱之机，攻陷缅都阿瓦，俘获缅王第帕蒂，推翻了当时的东吁王朝。当得楞人开始统治缅甸的时候，在缅甸有一木梳部，其酋长甕藉牙不屈从

于得楞人的奴役，拒绝向得楞王宣誓效忠。得楞王派军分四路向木梳部进攻，甕藉牙率部众在村寨构筑工事，加强防御，并联合附近村庄共同抗抵得楞军。乾隆十八年，甕藉牙率部众大败得楞军，并开始向得楞军进行反击，收复了国都阿瓦城，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阿隆丕耶王朝。以后经过连年征战，统一了缅甸各部。甕藉牙死后，他的儿子莽纪觉继承王位，此时，缅甸的国势愈加强盛，莽纪觉对内除继续用武力维持对各部的统治之外，对外也开始实行武力，先是向附近的十几个土司进行征战，强迫其向缅甸臣服，而后又对邻邦暹罗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开始向中国的云南边境地区滋事骚扰。乾隆二十七年，缅甸曾派兵与所属土司武装，入侵云南普洱府所属的车里和顺宁府所属的孟定各内地土司，大肆杀掠。这是缅甸较大规模的一次入侵活动。转年，莽纪觉又率军攻入云南重要隘口——打乐，劫掠村寨而去。

缅甸方面的入侵，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乾隆二十八年二月，清政府调维西协副将刘德成为普洱总兵官，加强防务。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又调云南巡抚刘藻为云贵总督，督办云南边境事宜。刘藻到任之后，令各土司在普洱边外缅军出没之地，加强防范。

乾隆三十年，莽纪觉的弟弟懵驳继承王位之后，继续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先是进犯普洱诸土司，饱掠而去，继而又以数千兵力窜入猛捧，焚掠猛腊，一度逼近云南内地，恣肆强横之势甚为猖獗。为加强普洱地区防务，刘藻先后从云南各镇调集营兵七千余人，开赴普洱，会同总兵刘德成、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等商讨向缅甸进剿之事。此时的乾隆皇帝也认为缅人难驯，非大加惩创不可，故谕令刘藻对缅用兵，必当穷力追剿，直捣其巢穴，务使根株尽绝。同年十二月，清军开始向缅发兵，清军分成三路，总兵刘德成率兵分两路先进，因指挥不当而受阻。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一路，渡过整控江之后，沿途行军毫不设防，行至猛

旺，被埋伏的缅军所夹击，何琼诏阵亡，明浩身负重伤，六百余清军溃败而散。

清军出师不利，缅兵气焰嚣张起来，在普洱边境一带重要隘口处，扎营结寨，并时常派出流动兵力东突西窜，随处劫掠。总督刘藻因不熟军旅，面对此种局面束手无策，但在向清政府奏报边境战况的时候，却说屡败缅兵，大获全胜。不久，前线的真实情况被乾隆皇帝得知，将刘藻降调为湖北巡抚，旋即革职。同时，任命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琚为云贵总督，经理对缅事宜。

乾隆三十一年，杨应琚到达云南普洱，时值缅军掠夺之后正欲撤退，杨应琚趁机顺利收复了曾被缅军占领的车里、孟艮、整欠诸地。

杨应琚初到云南便进展顺利，遂产生一举攻下缅甸之念，向乾隆帝上奏，声言“缅甸可取状”，与此同时，调兵遣将，向云南边界集结兵力，又秘密派人到边外各土司说降。一切准备就绪，杨应琚公开向缅甸声称，已布数十万大军陈于境上，如不降即刻进行征讨。

缅甸方面见清政府准备用兵，也急忙调遣数万兵力，采取主动战略，分四路先行出击，攻克木邦、景线等地。清军副将赵宏榜则率数百精兵袭击蛮暮的新街。缅兵闻清军占据新街，急派重兵溯江而上，抵达新街，赵宏榜见缅兵来势凶猛，便烧毁兵器辎重，退至铜壁关，数万缅兵紧随其后，尾追而来。杨应琚急调各镇营兵赴援，又命令永顺府总兵乌尔登额驻兵宛顶，准备攻取木帮。永北镇总兵朱崙再取新街，由提督李时升驻扎杉木笼，居中调度。缅兵见清军齐集而来，施展诈降手段，以缓清军，派人到朱崙军营乞降，朱崙等人未能看出缅方阴谋，信以为真，缅军乘机攻入猛卯城，袭击铜壁关，清军官兵多有损伤。

清军和缅兵在边界地区接仗之后，互有胜负，清军方面也始终未能掌握战斗的主动权，被迫与缅兵展开拉锯战。而总督杨应

据奏报军务时，只言杀敌多少，不提伤亡如何，只报喜不报忧，甚或掩败为捷，其手下将领亦多互相推诿、弹劾，令乾隆皇帝极为不满，不得不再次易帅，企图扭转前线被动战局。

起初，乾隆皇帝对云南边事，未给与足够的重视，觉得小小缅甸滋扰边境，用不着大动干戈。时至今日，缅军抗拒清兵，且使清兵的征讨屡屡受挫，清军两次易帅，战局丝毫没有改观。乾隆皇帝决定给缅甸以重大打击，以大张挞伐之势，遂任明瑞为将军兼云贵总督，调集京师健锐营、火器营兵三千及云、贵、川汉土官兵二万余，向云南集结，又拨饷银六百万两、战马一万余匹，以供军需。此次对缅大举用兵，乾隆皇帝自以为有十分的把握，但事情却不像乾隆皇帝所想象的那样顺利。

明瑞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抵达云南，了解了前线战况之后，认为，前次对缅用兵未能集中优势兵力，而在沿边二千余里各关隘分兵把守，致使有限兵力不敷派用。故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即减少驻防兵力，以主力直捣缅甸巢穴，牵制缅军主力。沿边各处，由清军和内地土司武装相结合，加强游巡备御，随时歼灭敌人。作战方案既定，明瑞决定分兵两路，一路自宛顶至木邦攻打阿瓦，由明瑞亲自统帅；另一路出虎踞关至猛密攻打老官屯，由参赞额尔景额及提督谭五格统领，两路约会于阿瓦。九月二十四日，大军起程，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又因气候不适，军中病员也大大增加。十一月二日出宛顶，又过数日才缓行至木邦，此时缅军早已弃城而逃，明瑞留五千清兵守木邦，亲自率大军追赶缅兵，路上得知缅兵聚于蛮结，遂向蛮结进发。在蛮结，缅兵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于通往蛮结的要口处，设立了十六座木栅，栅外挖有深壕并埋上尖锐的竹木，企图以此阻滞清军。清军到达蛮结之后，已无险可据，遂分兵为十二队，各队潜至密林险峻的地方，冲击木栅，展开短兵相接战。清军先攻下了四栅，其余十二栅守敌见势不妙，乘夜弃栅而

逃。此役缅兵阵亡二千余人，受到重创，清军大获全胜，乾隆帝得捷报之后，重赏三军，封明瑞为一等诚嘉毅勇公，其余各将领也各有封赏。

蛮结一仗，清军虽获全胜，但损伤也很大，军粮也所剩无几。领队大臣观音保、扎尔丰阿等皆劝明瑞先退兵至木邦，等整旅备粮之后，再图进取，但明瑞坚持继续向阿瓦进兵，对观音保的劝阻，忿然斥之为“汝气馁否，非夫也”。在明瑞的坚持下，清军向阿瓦行进。到达离阿瓦只七十里处的象孔，迷失了方向，此时，军中已粮尽马乏，兵丁多染瘴疾，明瑞召集诸将商议，决定向有粮之地猛笼进发。缅军探知清军无粮且疲惫不堪，便尾追而来，明瑞、哈国兴、观音保轮番殿后，抵御追兵。到达猛笼之后，清军夺粮二万余石。得到给养之后的清军，士气大振，明瑞决定与尾追的缅军决一死战。缅兵追随清军多日，已知清军每日启程，皆吹三声螺号。又一日，清军吹毕三声启程号令，缅兵以为清军已起程，便尾追而来，不料，清军设下埋伏，待缅兵追上来，伏兵四面出击，万箭齐发，缅兵措手不及，自相践踏，清军乘势杀敌四千余人。战斗结束之后，清军即刻整装启程，欲尽快摆脱敌人。行抵小猛育地方，缅兵又聚集四、五万人，前来堵截，清军分七营与缅兵展开血战，由于敌众我寡，清军难与抵抗，激战中，领队大臣扎拉丰阿、观音保俱中箭阵亡，明瑞也身负重伤，各路清军被分割包围，明瑞怕落入敌手，遂自缢身亡。小猛育遭遇战，清军损兵折将，几至全军覆没。此次出征，清军付出代价如此惨重，实为乾隆皇帝所始料未及。

战争进行到这种地步，对清政府来说，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乾隆帝兴师动众对缅用兵已为中外所知，欲息鼓罢兵，怕有损天朝威严，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只得把战争再进行下去，下了“一年无绪，再办一年”的决心。

乾隆三十三年，清廷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

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鄂宁为云贵总督，明德为巡抚。又加派北京满洲兵、索伦兵等二万，增调火器营、健锐营兵七千。同时命户部于各省筹银二百万两解运云南。三十四年三月，傅恒到云南，与阿里衮、阿桂筹划军务，在进攻路线上，决定一路大军为正师，从金沙江上游的戛鸠江，经过孟拱、孟养两土司地，陆行直捣阿瓦；另一路大军为偏师，由金沙江东岸夹江而下，进取孟密。在发兵时间上，以往用兵多在九月以后，此时农忙时间已过，缅甸强壮劳力可随时应征。此次用兵时间，提前在七月，以打敌人之出奇不意。七月中旬，清军大队人马开始启程。主力渡过戛鸠江往西行，顺利通过孟拱、孟养两土司。此时的缅甸正值秋收季节，未暇集兵，清军未遇任何抗抵，所遇各寨堡，皆不血刃而下。九月下旬，清军在蛮暮等地造成战舰百余艘，水、陆两路同时并进，声势更为威壮。十月清军由蛮暮出金沙江直捣阿瓦。此时，缅甸方面已集兵数万向清军应战，得知清军沿江而来，派兵列舟扼住江口，在陆路上也布置了兵力。清军以哈国兴领水兵，阿桂、阿里衮各领陆兵，沿水路和江两岸，袭向缅兵，缅兵难与招架，溃败而散。由于清军长途行军，未得休整，加上此次战斗清军投入了全部兵力，军中伤病聚增，傅恒和阿里衮也染病卧床不起。诸将遂商议不向阿瓦而向缅甸另一重地老官屯进兵。老官屯位于金沙江东岸，北至孟拱，南通阿瓦，东达孟密，是缅甸水陆交通要隘。十月二十二日，清军分两翼由江岸左右围攻老官屯，傅恒居中调度。老官屯缅兵仍用筑栅护城的老办法，负隅顽抗。清军在外围构筑土台，先以土炮轰击木栅，但坚固的木栅却纹丝不动；又改用火攻，因木栅潮湿，火攻也未能奏效。最后采用挖地道至木栅下，埋炸药轰击方式，使栅内缅兵甚为震惧。在攻打老官屯的同时，清军又在江西岸截住了前来增援的缅兵，老官屯缅兵见难以固守，又无救援，缅帅遂派人立木栅上，向清军呈递缅文，乞求议和。

乾隆皇帝接到缅甸国王孟驳议和书信，考虑到几度征缅，已大挫其锋，以示惩治的目的已经达到，同时清军方面损伤亦为不小，出征将帅，或失职查办，或染病成疾，众官兵也多染上瘴疾，伤亡人数与日聚增，厌战情绪有增无减，故同意了缅方的议和要求。命明亮、哈国兴、海兰察等人与缅众头目进行和谈。中方提出缅甸要进表纳贡，遣返掠去的人口，归还侵占的土司地；缅方提出归还木邦、孟养、孟拱三土司，中方欲将三土司迁入关内。

乾隆三十六年，缅方致书清政府，索要木邦、孟养、孟拱三土司，阿桂派使者与缅方交涉被扣留，乾隆皇帝欲再兴师问罪，阿桂以“不如休息数年，外约暹罗同时大举”为由，出面劝阻，被罢职。转年，金川发生叛乱，清政府把主要军中力量用于金川平叛，而无暇顾及缅甸。此时的缅甸也正对其西南邻邦暹罗用兵，中缅间的纠纷被搁置下来。到乾隆四十一年，金川被平定以后，缅甸惧怕清政府再把注意力转移到中缅间事务上，遂主动请求纳贡和开关互市。四十七年，甕藉牙的第三个儿子孟云立为缅王，开始与清政府进行友好的接触。五十五年，当缅甸遣使庆贺乾隆帝八十寿辰的时候，乾隆帝赐给孟云敕印，封其为缅甸国王。由此，中缅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缅甸每十年一次向清政府入贡，清政府于边界处开关设市，鼓励双边贸易，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友好的发展起来。

（刘文智）

参考资料：

魏源：《圣武记》卷六。

昭梿：《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

《清高宗实录》卷 569、卷 751、卷 782。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林爽文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台湾爆发了由天地会发动和领导的武装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林爽文起义。这次起义，是清代台湾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武装反抗斗争，它沉重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在台湾的腐朽统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统一后的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以广东、福建等省为主的大量移民迁徙至台湾，其中，有要到台湾发财致富的地主、商人，也有寻求生计的贫民百姓。内地人民的到来，增加了台湾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台湾的农业、手工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多种经济活动的展开，使台湾的人口构成和职业成份也复杂起来，除了有从事农业的小自耕农、佃农、雇农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各种各样的工匠、艺人、役夫等等。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放宽大陆居民赴台的禁令之后，又有大量的移民进入台湾，不仅使台湾原有的各种职业增加了从业人员，也增加了没有固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无业游民。

和大陆的情况一样，到清朝中期，在所谓"乾隆盛世"的同时，台湾的统治者加紧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敲榨勒索，农民要交纳高额的租赋，其他职业者要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此时的政治黑暗到了"文官不问政、武官不操练"的境地，各级官吏也是贪污巨敛、任意侵婪，吏制腐败到了极点。就拿曾担任台湾总

兵的柴大纪来说，在他任期的两年时间里，就贪污白银达五、六万两，而总兵每年的俸禄只是白银二、三千两。曾担任台湾府知府的孙景燧，在他的任期内曾亏空白银达十余万两。清政府对台湾的官员经常进行轮换，派遣官吏则视到台湾当官为美缺，因为他们到这里之后可肆无忌惮地大肆搜括一番之后，“满载而归”。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特别是生活于社会最低层的个体劳动者、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民无产者，受贪官污吏之害最深，如同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对台湾统治者甚为仇恨和不满，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这种反抗的情绪终于在天地会的组织发动下爆发出来。

天地会是由福建传人台湾的，它是一个民间秘密组织，其创始人是福建漳州府漳浦县的名叫洪工的和尚，参加者大多是农村中的佃户、雇农，城市中的小手工业生产者和城乡无业游民。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漳州府天地会会首严烟（又名严若海）来到台湾的漳化县，以开设布铺为名，暗中传播天地会，秘密发展会员。因为天地会代表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参加者极为踊跃，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会员就发展到了万余人，其中有彰化县的林爽文、刘升、王芬，淡水县的王作、林小文，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凤山县的庄大田、庄大韭等人。其中，林爽文由于为人豪爽、正直，乐于助人，得到众会员的维护和信服，成为台湾天地会中最具影响和号召力的领袖之一。

天地会的秘密活动，被台湾统治者察觉，但当时的天地会组织没有提出明显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政治主张，又没有公开的反抗举动，会员人教只是“遇有事情，同教之人大家出力，共同帮助”，故台湾当局对天地会活动不敢轻易采取行动。乾隆五十一年，诸罗的天地会重要成员杨光勋、杨妈世因析产而发生纷争，双方各纠集人众准备械斗，署诸罗县事董启埏闻知此事，觉得这正是搜捕天地会会员的大好时机，遂以平息即将酿成的械斗大案

为由，派兵捕获杨妈世、杨光勋等人。总兵柴大纪也率兵前来助阵，致使五十余名天地会会员被捕。

住在彰化县附近大里杙村的林爽文，见清兵有意借机扑灭天地会，便与会内主要首领商议，准备抵抗。同年十一月，柴大纪派兵到距大里杙仅六里的大墩（今台中市）扎营，后派知县俞峻带兵到大里杙，逼迫村民交出天地会会员，扬言“如敢违抗，即烧庄剿洗”。见村民毫不畏惧，便烧毁了几个小庄子，对村民进行恫吓，无数村民受到牵连和骚扰。林爽文等人见此不能再忍耐下去，便招集村民与会众二千多人奋起反抗，毅然举起了武装反抗的义旗。

林爽文起义之后，先把进攻的目标对准驻扎在大墩的清军。一天深夜，义军潜至清军营帐前，先派人炸毁清军的火药库，敌营顿时火光冲天，清军乱作一团，义军立刻攻入敌帐，清将赫生额、耿世文及知县俞峻猝不及防，俱被杀死，大墩驻军全部被歼。首战告捷，义军士气大振，乘胜向彰化县城进兵。沿途又有会员与民众加入义军的行列，到达县城时，义军已扩充到三千人。

知府孙景燧、北协中营都司王宗武见义军前来攻城，急忙调集兵力在城周围掘壕放水，构筑工事，于各城门派重兵戒严把守。此时的义军士气正旺，向城内发起猛烈进攻，城内清兵数量不多，难以抵挡义军的攻势，县城很快被攻破，孙景燧、王宗武等被义军击毙。

起义军攻占彰化县之后，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宣布对曾肆横无忌的顽梗棍徒要查拿究治，对横行乡曲的不法分子要按法治罪，提出了“剿除贪官，以保民生”的主张。表明了起义军矛头所向是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及恣意横行的不法分子。在进行广泛宣传的同时，起义军开始着手自身的组织建设。林爽文被义军众将士推举为大盟主。林爽文做大盟主之后，以彰化县署为盟

主府，定年号为“天运”；任命刘升为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杨轩为副元帅，董喜、陈奉先为军师，王芬为平海大将军。还任命了节度使、知县、同知等官职。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具有军事、行政职能的政权组织建立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起义军在大元帅府举行庆功宴之后，在县城内除留下高文麟率领的数百人驻守，其余大队人马分为两路，一路由王作、林小文率领，向北攻打竹堑（今新竹），一路由林爽文亲自率领，向南攻打台湾重镇诸罗。

台湾道永福、总兵柴大纪见义军分兵向竹堑、诸罗出击，遂调兵增援，但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竹堑、诸罗，并伏击了前来增援的清兵。

为了扩大声势并牵制清军，十二月，林爽文派人到台湾凤山，与那里的天地会取得联系，号召举起义旗，共同起事。凤山一带天地会的首领是庄大田和庄大韭兄弟。庄大田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后移居凤山，种田度日，乾隆四十九年参加了天地会。庄大田见林爽文起事之后，也开始做起事的准备，先是叫手下百余人到各处招集天地会众，数日内便聚集了二三千人，又凑集钱物，制做兵器，庄大田见起义准备就绪，遂以“洪号辅国大元帅”自称，宣布起义，于十二月十三日率起义军攻打凤山（今高雄），歼灭敌军二千余人。两路起义大军，林爽文居北，庄大田居南，南北相应，声势大振，台湾军政官员甚为惧怕。当时在台湾虽然有几千人的驻防清兵，但多少年来，“武不操演”，军纪涣散，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已经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林爽文起义之后，在半个月之内就连克彰化、凤山、诸罗、竹堑等地，根本未遇上清军的有力抵抗。起义军节节胜利，清军接连败北，消息传到福建，此时任闽浙总督的常青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急忙调兵遣将，由黄仕简、任承恩各率二千清兵赴台驰援，同时命令各路清军占据要塞，堵住海口，形成分兵把守、严阵以待的态

势，准备扼制住义军的攻势。而此时的乾隆皇帝对义军实力认识不足，以为林爽文等人不过是“一时乌合，不值水陆两提督前往办理”，对常青的部署，认为是“过于张皇”。

水师提督黄仕简抵达台湾府城之后，首先加强府城的防御能力，在城周围环植了木栅，城头上设置警戒，派兵轮番巡逻。然后，召集诸将进行军事部署，开始向义军进行反击。他认为诸罗居南北之中，是沟通南北的战略要地，“诸罗不复，无以通南北”；凤山距府城七十里，时刻威胁着府城，“凤山不复，无以清肘腋”。遂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柴大纪率同参将潘韬、游击李隆、杨起麟、林光玉，守备邱能成等，领兵二千二百人，北取诸罗；由郝壮猷率同副将丁朝雄、参将那穆素里、游击蔡攀龙、都司罗光炤等，领兵二千三百人，南攻凤山。黄仕简本人居中调度，往来策应。起义军见清军来势凶猛，稍加抵抗之后，很快撤出了诸罗和凤山，避开了敌人的锐气，而在其他各处，采取灵活作战的方式，或聚而围攻或散而游击，处处给官兵以突然袭击，使官兵仍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几个月过去了，由黄仕简、任承恩统帅的官兵已达万余人，但被义军灵活多变的战术所牵制，动弹不得，虽然收复了诸罗、凤山两地，但仍没有改变军事上的劣势局面。

总督常青把台湾的形势向清政府报告之后，再请兵增援。乾隆皇帝得报，觉得前此认为林爽文等人的起事乃“一时乌合”是完全错误的，这“乌合之众”已经成为他的“心头之患”。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他任命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亲自赴台督师，调李侍尧代理常青职务。以江南提督蓝元枚、福州将军恒瑞为参赞大臣。又调集四千广东兵、三千浙兵、一千驻防满兵赴台增援。同时以“彼此观望”、“贻误军机”等罪状，下令将黄仕简、任承恩二人革职解京，交刑部治罪。

起义军经过数月与清兵作战，虽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但诸

罗、凤山等地为清兵占据，义军欲扩大战果，仍需将诸罗等地夺回来。故从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之后，起义军把主要的兵力用于围攻诸罗上。四月中旬，林爽文亲自率领万余人分两路围攻诸罗，清军以大炮猛轰围攻的义军。林爽文见诸罗清军死守，久攻不下，遂布置兵力将诸罗死死围住，并派兵把守通往诸罗的各要道，防止清军的增援。

在林爽文围攻诸罗的同时，庄大田率领南路义军向府城展开围攻，庄大田先占领了府城附近的数十个村庄，切断了府城与外界的联系，见常青调集数千兵力，加强了府城的防御工事，遂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战术，困敌于城中。常青虽有数千兵力，但义军围城的兵力最多时达数万人，常青不敢出击，只得龟缩城里。

在北路方面，围困诸罗的林爽文义军昼夜围攻，又占领了盐水港和鹿仔港等通往诸罗的要道，清军多次赴援，皆被义军所败。

此时台湾的战局，呈现着清兵被义军分割围攻，清军虽占领各重镇要地，但相互之间断绝了联系，只得各自守城为战。

在这种情况下，清军无计可施，统领全台军务的常青只得再向清政府请求增兵。乾隆皇帝见常青赴台数月，无寸尺之功，又请求兵援，非常气愤。五十二年八月，下令免去了常青在台湾的职务，另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侍卫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增调湖南兵二千、广西兵三千、贵州兵二千、四川屯练番兵二千赴台。福康安在分析了台湾的形势之后，立刻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他认为清军欲转守为攻，改变眼下被动局面，必须打通南北之间的通道，也就是把主攻的目标对准诸罗，使诸罗摆脱林爽文的围困，然后再解府城之围，解脱被义军分割、清军各自为战的处境。而要击退围困诸罗的林爽文，必先攻取其大本营——大里杙，使之分散兵力，后援无济，首尾不能相顾，然后乘机对其“痛加剿洗”。作战方案既

定，福康安先派海兰察带人到通往大里杙的必经之路——八掛山一带进行侦察，初五日对八掛山发起攻势，驻扎在大里杙的起义军前去助战。就在此时，福康安则率清军主力，分五路援救诸罗，接连攻下诸罗附近的仑仔尾、紫竹脚、西势等十几个村庄，起义军被迫退到诸罗县城北的牛稠山。在牛稠山，二万义军结营扎寨，负山固守。清军先派出精锐人马，抢占山梁，绕到义军营地之后，大队清军仰山而攻，起义军受到上下夹击，林爽文带兵撤退到斗六门、大埔林、庵古坑等地，清军迅速攻占了诸罗城。

此时南路义军，在庄大田的率领下久攻府城不下，遂放弃对府城的围攻，把主要兵力全部集结到其根据地——大排竹。

诸罗、府城围困被解，清军由此转守势为攻势，赵义军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福康安见全面反击的形势已经成熟，便集中了优势兵力，先向林爽文的北路义军进行围攻。

林爽文率军从牛稠山撤到斗六门之后，福康安便分兵追逼而来，在斗六门双方激战三日，义军不敌清兵，由斗六门又退守到大里杙。在这里，林爽文率义军顽强抵抗清军，进行了十分艰苦的保卫战。

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在大里杙以南五里的平台庄扎下大营，福康安坐镇指挥，准备向大里杙发起最后攻势。大里杙东倚大山，南临溪河，西向大海，林爽文指挥义军在大里杙周围筑起土城，城内立起两重竹栅，城外挖沟引水，又在各隘口处设置了大炮，整个大里杙处于坚固的防守之中。当日下午，清军开始向大里杙发起进攻，义军在城上向清军施放枪炮，清军先渡过了南面的溪河，林爽文率万余义军杀出城外，双方展开短兵相接战，义军众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整个溪水河畔杀声一片，战斗场面蔚为壮观，清兵难以招架义军的冲击，溃散而逃，全部退回了营地。击退了清军，但义军在战斗中伤亡也很惨重。林爽文见

清军必欲反扑，而义军兵源、物资难于补给，死守大里杙相当困难，于当天夜里，派出几支小队向敌营进行袭击之后，便率领部分将士和家眷退出大里杙。转天清军分数路再向大里杙进攻，留在大里杙的义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

撤出大里杙的林爽文等人，进入东面的深山丛林中，清军欲彻底剿灭义军，进行全面的搜山，在当地地主武装的协同下，林爽文等人被清兵捕获，北路义军归于失败。

转年正月，福康安率军南下，开始向庄大田领导的南路义军发动进攻。庄大田率义军在牛庄、南潭、大穆降、水底寮、大排竹等地与官兵激烈交锋，之后转入台湾最南端的郎峤，此地负山阻海，义军打算在此作最后的抵抗。清军先派出水师截住义军的海上退路，又以重兵将退至山上的义军团团围住，义军冲下山来与清军搏斗，激战中庄大田等人被清兵捕获，南路义军被扑灭。至此，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战斗，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天地会武装起义彻底失败了。

林爽文起义失败之后，清政府对起义军将士进行了残酷的清算，庄大田因病在府城被杀害，林爽文、何有志、庄大韭、许光来等义军重要将领均被押解进京，在菜市口以极刑处死。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台湾的封建统治秩序，清廷对台湾地方政府进行了改组：以蔡攀龙为水师提督，梁朝柱为陆路提督，普吉保为台彭镇总兵，以新授福州将军魁伦协理善后事宜，以台湾府知府杨廷理台湾道，以淡水同知徐麟署台湾府知府。为防起义的再度发生，清政府严令：在台湾和闽、粤等省，继续追查和搜捕天地会会众，修筑台湾府城和各县城池，增加戍守部队，厉行保甲，收缴民间武器等等，使台湾处于清政府的更加严密的控制之下。

但是，台湾人民并未被清政府更加严厉的统治所镇慑，林爽文起义轰轰烈烈地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壮举已深入台湾各族人民的心中。此后，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停止过。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1285、卷1289、卷1293、卷1295、卷1303。

魏源：《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昭梿：《啸亭杂录》卷6 “台湾之役”。

驱逐廓尔喀出藏

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有一邻邦为尼泊尔。十八世纪以前，尼泊尔是一个由关系较为松散的二十四个部落组成，其领土与西藏相接。在二十四个部落中，有一较为强大的部落叫廓尔喀，它位于尼泊尔的政治、文化中心加德满都的西北。

清王朝建立之后，尼泊尔二十四个部落中的雅木布、叶楞、库库木三部与清政府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雍正十年（1732年），三部落汗向清政府遣使请安，进贡方物。此时的廓尔喀部正致力于发展壮大本部实力，并开始向邻近部落进行蚕食扩张活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其汗王博赤纳喇趁尼泊尔诸部之间发生内讧，发兵向各部征战，武力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新王朝，博赤纳喇自称为国王，都城定在加德满都。

博赤纳喇死后，他的儿子西噶布尔达尔巴克继承了王位。大约在乾隆四十年左右，西噶布尔达尔巴克把王位传给年仅四岁的第五个儿子兰巴哈都尔，因其年幼，由他的叔父巴都尔萨摄政。巴都尔萨其人野心很大，在他摄政期间，极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西藏作为其北部近邻，便成了他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

清朝建立之初，对西藏的统治并不是十分有力。康熙末年曾就对西藏控制较弱问题，对其行政体制进行改组，雍正年间又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统治虽有所加强，但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班禅与驻藏大臣之间因职责不清，政务仍处于较为松驰和混乱的状态中，西藏上层内部纷争时有发生。乾隆中叶，廓尔喀不

断袭扰西藏边界，而此时西藏内部因争夺遗产发生内乱，恰恰为廓尔喀的入侵提供了契机。乾隆四十五年，西藏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京庆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乾隆皇帝热情款待了班禅，并赏赐给他大量金银珍宝。在北京期间，班禅因出痘病故，转年，将其遗骸及遗物送回西藏。遗物送回西藏之后，其兄仲巴呼图克图贪得无厌，将所有遗物全部占为己有，其弟舍玛尔喀巴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遂逃入廓尔喀境内，唆使廓尔喀兴兵向西藏发动进攻，以图报复。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便以西藏方面商税增额、卖给廓尔喀人的食盐中掺杂砂土为借口，公然向西藏兴兵发难。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廓尔喀汗王兰巴哈都尔派手下头领素喇巴尔达布率军三千，突然进攻西藏，占领了边境上的重地聂拉木、济咙，而后又攻陷了宗喀、萨额等地。驻藏大臣庆麟得知，急忙调集汉藏官兵近五千人予以迎击。乾隆皇帝又先后任命四川总督鄂辉为将军，提督成德为参赞，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前往西藏直接指挥前线军务。而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并不想以武力抗击廓尔喀，以萨迦呼图克图和仲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少数西藏贵族，违背广大西藏人民的意愿，以“兴兵伤害生灵”为借口，极力主张向廓尔喀议和，遂派遣使节私下与廓尔喀接触，商量议和事宜。当年十二月，巴忠到达西藏之后，对议和一事也采取了支持与纵容的态度，并自恃为皇帝近臣，不把已先期到达的鄂辉等人放在眼里，擅自同意了拟定的议和条件：廓尔喀人入藏贸易，其税收减半收取；宗喀、济咙、聂拉木等三处为廓尔喀人往来门户；每年送给廓尔喀岁币一万五千金，以换回被其侵占的聂拉木三处中国领土。和约议定之后，廓尔喀军退出了中国境内。巴忠急忙回京向乾隆皇帝奏闻：西藏前线之事已速行了结，廓尔喀“所占地方，业经全行收复，边界廓清”，而与廓尔喀私下议和之事却只字未提。

巴忠及西藏地方势力向廓尔喀妥协，仓促议和，以求息事宁人。而廓尔喀却由此也看出了西藏地方政权的软弱，狂妄气焰因此而更加嚣张。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遣使给驻藏大臣送来信函，请如前约索取答应每年所给岁币。西藏地方政府改变了主意，拒绝交付，廓尔喀遭到拒绝之后，以违背和约为由，于转年再次入侵西藏。先占领了聂拉木，紧接着又围攻宗喀，一路烧杀抢掠，直向后藏首府日喀则扑来。驻藏大臣泰保惊闻敌至，吓得不敢组织力量进行抵抗，而拥重兵向前藏退却，同时打算将达赖移至西宁，班禅移至泰宁，后藏顿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廓尔喀军趁机长驱直入，一举拿下日喀则，此时的廓尔喀趾高气扬，扬言要继续进兵，攻打前藏。

西藏形势非常危急，乾隆皇帝得报，急命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将军，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等为参赞大臣，率索伦、吉林及川、陕兵等数千人入藏迎敌。侍卫巴忠深知此次廓尔喀入侵，自己罪责难逃，遂跳河自杀。

九月，福康安等从京师出发，转年正月抵达前藏，藏族人民得知内地大军已到，无不欢心鼓舞，纷纷携带良马美酒，慰问、欢迎大军。福康安见整个前藏处于群情激愤、斗志正旺的气氛中，决定立即整治兵马，开赴前线。二月，清军从青海进入后藏，四月，调集索伦兵二千、土屯兵五千、当地兵三千，筹措万余人一年所需粮饷，与廓尔喀军准备决战。先是派遣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攻打聂拉木。聂拉木城寨四周建有高大坚固的城墙，敌军在城内又修建了许多碉堡，准备固守，清军多次攻城未能成功。强攻不下，遂改为火攻，于城外挖掘壕沟至城墙下，搬运柴薪，堆积城门口，引燃烧开城门，清军攻入之后，敌军被迫收缩于碉堡之中，清军以火弹攻碉，经一个多月拉锯战，聂拉木终于被攻破。此时的廓尔喀汗王见清军来势凶猛，锐不可挡，图谋求和，派人来到成德军中，请求罢兵，并一再声称，此次廓尔喀出

兵，无意与清廷为敌，只因西藏不履行条约。但不管廓尔喀来使如何解释，清政府要予廓尔喀以严惩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福康安所率大军继续向廓尔喀进兵，先与敌军战于擦木，再战于玛尔辖，直抵边界重镇济咙。此时成德一路大军也由聂拉木赶到，两军会合，在福康安指挥下兵分数路向济咙展开攻势。先夺取了济咙外城的各碉堡，把敌军逼至内城，然后各路清兵一起合攻，激战一日终于将济咙攻克。至此，清军将后藏自擦木至济咙边境全行廓清，把廓军赶出了国境。

福康安率军乘胜前进，又大败廓尔喀屯于边境之兵，于六月进入廓尔喀境内。为了防止敌军抄袭后路，先遣领队大臣成德及总兵诸神保各领一路为左右两翼，海兰察居前，福康安率大军出中路，向廓尔喀境内深入。行至距济咙二十里的铁索桥，敌军断桥设险，截断进路，福康安以正兵与敌相持，而密遣海兰察绕道抵达铁索桥上游，随即砍伐大树扎成木筏，渡过河岸，直扑敌桥头碉卡，正面清军此时也搭桥强渡，敌军望风而逃。清军继续往前推进，连续攻克噶勒拉、堆补木、特帕朗古桥、甲尔古拉、集木集等城寨，深入敌境七百余里，歼敌四千余人。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未遇敌军任何有力抵抗，七月，便到达了距廓尔喀首府加德满都几十里的纳瓦科特。

此时，在廓尔喀南部印度有一披楞部，在福康安进兵时，已约定同时向廓尔喀进攻，清军到达纳瓦科特之后，廓尔喀向披楞求援，遭到拒绝，廓尔喀见腹背受敌，淘惧无计，只得向清军卑词请降。福康安考虑到八月将到，如大雪封山，清军难以返回，故允其降。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向廓尔喀提出了停战条件：归附巴忠所立合同、交还所掠藏中金银财物、定期向清政府朝贡等。廓尔喀答应了这些条件并立誓永遵约束。这样，福康安将战后事宜安置妥当，留部分兵力戍守西藏，八月二十一日率军班师回朝。

（刘文智）

参考资料：

魏源：《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

制定《西藏善后章程》

西藏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就与清官方建立了联系，那时候满族统治者极力想利用西藏宗教在蒙古族中的巨大影响，帮助其对广大蒙古人民进行统治，所以对和西藏的关系非常重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西藏的政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厄鲁特蒙古中有一和硕特部迁到青海，其首领顾实汗和西藏的黄教领袖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合作，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与黄教的联合统治。从此，达赖和班禅成为西藏最高教主和地方领袖，同时，和硕特部贵族在西藏也有相当大的实权，故在管理西藏政务上，西藏上层与和硕特贵族之间常常发生矛盾。清朝入关之后，忙于建立全国的统治，对西藏问题未暇顾及。康熙五十五年，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趁西藏内乱，带兵入侵，进行烧杀抢掠，占领西藏首府拉萨。清政府遂派兵进藏平乱，击败准噶尔。长期以来西藏政局的不稳导致的内忧外患，引起康熙皇帝的关注，并采取一些办法加强对 西藏的管理。康熙六十年在西藏建立了由四名噶伦（政务官员）组成的地方行政机构，任命西藏贵族康济鼐为首席噶伦也就是藏君王。但噶伦之间矛盾重重，雍正五年，为争夺西藏的最高统治权，噶伦之间又发生内讧。清政府感到，完全依靠藏人统治西藏，政局很难稳定下来，中央政府必须直接插手。遂在这次内讧被平息不久，清政府在西藏设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协助和监督地方政权处理政务。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驻藏大臣与达赖和班禅之间，因权限不清，矛盾依然存在，

常常为一心欲夺取西藏最高统治权和脱离清政府控制的一些叛乱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想把西藏政务纳入较为正规的、有章可循的管理轨道上来，指示四川总督策楞等拟定了一个改革西藏行政的章程，由中央政府批准实施，这个章程就是《西藏善后章程》，共十三条。在这个章程中，清政府一方面突出地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达赖喇嘛和黄教寺院集团执政的权力，抑制了权势显赫的贵族势力，使政教双方的权力有所平衡，以达到互相牵制的目的。乾隆五十三年，居住在中国西南邻边的廓尔喀部族大举向西藏发动入侵战争，一度占领后藏大片领土，并声言要继续向前藏进攻。廓尔喀胆大妄为入侵西藏并一时得逞，再一次证明，西藏地方政权本身仍存在不少的问题，中央对西藏的有效控制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因此，当清政府组织武装力量击退廓尔喀之后，乾隆皇帝即刻着手对藏政再一次进行系统、全面的整治与改革。

乾隆五十七年，命军机大臣阿桂、和珅与福康安等人会同达赖八世、班禅七世共同商议如何整顿藏政问题，在《西藏善后章程》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更完善、更行之有效的章程，以作为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法规。同年七月，阿桂等人拟出了一百余款的章程草案，交与清政府，乾隆皇帝最后裁定为二十九条，定名为钦定《西藏章程》，下令正式颁布实行。这个《章程》可以说是十六年《西藏善后章程》的完善与补充，使西藏的政务有了一个更为系统的章程可遵循，体现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与管辖。其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一、关于驻藏大臣的权限

驻藏大臣应为中央政府派往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雍正初年开始在西藏设立的驻藏大臣，为正副二人，其主要职责是统辖分驻在前后藏的二千清兵，管理军务。但后来西藏政务的发展及事实证明，驻藏大臣仅限于军队的管理是不够的，它必须是中央在

地方掌握有一定实权的全权代表。乾隆十六年的《西藏善后章程》虽然废除了由西藏贵族中推举出的、统揽地方一切政务大权的藏王制度，组成了四噶伦领导的行政机构，藏内大小事情均先由众噶伦商议办理，只有紧要事件才向达赖和驻藏大臣请示。而这一次的《西藏章程》则进一步明确：驻藏大臣要亲自督办藏内一切大小事务，其地位与职权不但与达赖、班禅相等，而且自噶伦以下各官员及管事喇嘛等皆为其属员。这样，在扩大了驻藏大臣的管事权限与范围之后，西藏地方政权更有效地被驻藏大臣直接控制。

二、关于各级官员的任命

乾隆十六年的《章程》中曾这样规定：西藏中、下层官员的挑选，完全由噶伦来组织进行，选出之后，只须禀报驻藏大臣。这次《西藏章程》则明确：驻藏大臣有拣选西藏地方官员的权力，即前后藏的中小官员（包括宗教人员）凡有缺出，统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一起选任。同时规定：大小各官员及管事喇嘛，一概不得以达赖、班禅族属挑补。这样就避免了以往由达赖、班禅选用噶伦、戴琫（统领五百人的军官），由噶伦选用以下各级官员，以致使地方政权结成私人、亲属关系网的弊端。

三，建立金奔巴瓶制度

《章程》中规定：当达赖、班禅及各地呼图克图圆寂之后，即将各地呈报的幼童出生年月日、姓名等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各写一签，放入瓶内，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在大昭寺内的宗喀巴像前，抽签决定继承人。被抽中的幼童，须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仪式。这一制度的建立，避免了因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内讧。同时，西藏最高层领袖人物的择定，也是在驻藏大臣的有效监督、主持下进行。

四、关于外交事务的办理

西藏因与廓尔喀等接壤，常有外交事务发生，如外人来西藏

布施、遣使节禀请事件以及商贸交往等等，这些均应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会同达赖商量办理。西藏与外来往的信函，也应呈送驻藏大臣查验。外国差人出入藏境，应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报知驻藏大臣，决定进入或出境。

五、关于军事驻防

乾隆十六年的《章程》曾规定了由戴琫管理西藏的地方军队和防务，其调遣军队，要凭达赖和驻藏大臣的印信。如遇紧急军情，必须立即禀明驻藏大臣。戴琫的任免，由达赖与驻藏大臣商定。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此次《西藏章程》又作了一些补充：在前后藏各设常备军一千名，在定日、江孜两地各设五百名，合计三千名。常备军的各级军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拣选充补，发给委牌。另外，对军队中的编制、粮饷、赏罚等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使西藏的军事制度更加完善。

六、关于财政制度

《章程》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在西藏统一铸造银钱，每圆重一钱五分，正面用汉字，背面用唐古忒字铸上"乾隆宝藏"四字。

七、关于宗教事务

乾隆十六年的《章程》规定了大寺庙的堪布（主持）喇嘛的任命权归于达赖。此次《章程》则提出：达赖应将所管大小庙宇喇嘛名数造成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处各存一份，以备稽查；各大寺坐床堪布为一寺首领，寺内庄田由其管理，此人必须熟悉经典，人品端正。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章程》就西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各个方面都作了较完整、系统的规定。清政府对西藏的经营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和强化的过程，特别是从先后制定的两个《章程》中，不难看出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旨在削弱西藏地方行政权力，扩大驻藏大臣的权力，建立一个由中

央委任驻藏大臣，驻藏大臣统辖地方政权的垂直的统治系统。通过这个具有西藏地方最高法规性质的《章程》，清政府把西藏纳入了清王朝封建集权统治之内，使西藏成为清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这两个《章程》的制定，也进一步密切了西藏与内地之间诸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对促进西藏社会的发展，加强祖国少数民族事业的建设，都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1326、卷1414、卷1419。

英使来华

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以为堂堂天朝对外无任何需求，这种自我满足的心态，正像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女王的一封信中所表达的那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所以，清帝国与外交往，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以为他国对自己有所求，而自己对他国则无所需。这种指导思想及当时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基本国情，导致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以政治需要为先导，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更对外政策的基本倾向。

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抗清斗争，清政府为切断其与大陆上的联系，实行了严密的海禁政策，下令封锁海域，片板不得入海，又将近海居民向内地迁移。海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沿海居民，特别是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的自由，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受到极大影响。顺治、康熙初年，荷兰、葡萄牙等殖民主义国家曾派使节到北京，要求清政府开放通商，但遭到了清政府的严词拒绝。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台湾统一，清政府于转年开放了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但由于种种限制和水陆交通的不便，对外贸易实际上仅集中在广州一处。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开始在西方国家确立，这些国家对扩大原料来源、寻求商品市场的欲望，迅速滋

长起来，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魔爪立刻伸向东方。特别是已夺得海上霸权的英国，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东进的欲望更为强烈，先是侵入印度，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作为侵略东方的基地，紧接着就派武装商船来到中国的澳门，并驶往广州，企图以武力敲开中国闭关着的大门。

当时世界总的形势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寻求国外市场，而封闭的清王朝仍只敞开广州一处小小的门缝，显然，作为东方大国和广阔的市场，清政府这样做是不能满足西方列强要求的。如何使中国闭关着的大门敞开，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而英国则充当着交涉国中的急先锋。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英国商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之后，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始。后英国在广州设立了商馆，英对华贸易额逐步上升，到康熙二十九年底，欧洲国家海上贸易对中国输入总值为白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英国为一百二十一万两，占百分之六十三多；输出总值为白银三百六十四万两，英国为一百七十万两，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七。由此可见，英国已执对华贸易的牛耳。此后，英对华贸易进一步扶摇直上，到十八世纪末，英对华贸易值分别占欧美国家输入、输出值的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七十左右。所以，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直接关系着英国的利益。但是，清政府的开放是有限度的，通商贸易所允许的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小的规模、指定的地点内进行，而且，清政府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来华贸易国的一种恩典，绝不是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重大变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鉴于西方商人来华贸易出现的违法行为，也出于国内政治安定的需要，清政府明令取消其他几个口岸，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为限制外商，又强化了广州的公行制度。公行的职责，一方面是受官方委任，代理进行向外商征收租课；一方面

又受外商委托，办理纳税事宜。公行行商实际成了双方的全权代表，而且代客买卖、商务管理、对外商行为的监督等权力，也操纵在公行及行商手中，使外商在华贸易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地方官对外商来华贸易，也多持消极态度。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就向乾隆皇帝上奏“防夷五事”，主要内容就是禁止外商在华过冬、役使华人、雇华人传递信息及对外商、外商船停泊处严加管束稽查等。种种限制使外商甚感不便，特别是对英商来说更是如此，商贸活动很难开展起来。

为确保英商在华利益及顺利进行商品输出、资源掠夺等活动，在英国的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种与清中央政府进行官方交涉的呼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本积累的迫切需求，促使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政府考虑如何打开中国这个东方大市场问题，决定派遣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与清政府进行官方接触。

1792 年，英国组成了一个以富有外交经验的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访华使团。使团除设有正副使之外，主要成员包括秘书、翻译、医生和精通天文、化学的航海技术的专家及武装卫兵等，携带有能显示英国国力和科技水平的航船模型、望远镜、天文仪器及精致的纺织品等。使团分乘“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三只船，组成了一个总共有八百多人的“使团舰队”。

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经英吉利海峡往西，朝中国方向航行而来。使团出发之后，英国政府责成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致函两广总督，正式通知清政府马戛尔尼使团奉命访华。当时清政府对英使访华的真正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以为是英国向清帝国派来的“贡使”，并以为是为乾隆皇帝祝寿名义而来，故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乾隆皇帝下发谕令，指示各地方官要做好接待工作，同时也指出接待远道来的客人，要丰俭适中，不卑不亢。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到达澳门，广东巡抚立刻向北京报告，六月十八日，使团抵达天津的大沽，长芦盐政徵瑞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天津宴请了使团。使团在天津逗留数日，由徵瑞陪同前往北京。到北京之后，先安置在城外的宏雅园居住，尔后又移住城内。七月二十九日，使团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临行前，双方就谨见乾隆皇帝的礼节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清方代表徵瑞提出马戛尔尼见皇帝时要行跪拜礼，而马戛尔尼执意不肯，说："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争执未果，双方不欢而散。使团到达承德之后，继续商议礼节问题，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中方再次提出行跪拜礼时，马戛尔尼说："若一国特派之使臣，对于他国皇帝所行之礼，重于对本国皇帝所行之礼，无论何人，决不肯承认。如必欲相强，吾唯有坚执前议，请贵国先派一与敝使职分相同之大臣，向吾国皇帝皇后圣象，行三跪九叩之礼，敝使即唯命是听。"

徵瑞问："倘不肯行中国礼，即行英国礼亦属不妨，但不知英国礼是何式样?"

马戛尔尼回答："英国礼乃屈一膝持陛下之手亲之。"

徵瑞惊诧的问："这事在咱们皇上面前使得么?"

马戛尔尼以自信的口气回答说："自然使得。敝使以见本国皇帝之礼见贵国皇帝，已属万分恭敬，何言使不得?"

最后，双方商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马戛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皇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了吻皇帝手的礼节。对这样一种觐见礼节，对乾隆皇帝来说还是第一次。双方相持不下的僵局，总算因双方的让步而缓解。

在觐见皇帝之前，马戛尔尼由徵瑞陪同，先同大学士和珅进行了会晤，马戛尔尼先以谦恭之词说："敝使以跋涉长途，身体

颇累，未能早日拜见，殊以为歉！今已经复原，特来向中堂（和珅）请安。”随即提出“愿早日觐见皇帝，俾将吾英皇亲笔信札呈阅”的要求。和珅见英方急于觐见皇帝，遂决定三天之后由他亲自引见，到承德拜见乾隆皇帝。

八月十日清晨四时，马戛尔尼及副使斯当东等人来到避暑山庄的万树园，等待乾隆皇帝的接见。一个小时之后，乾隆帝在王公大臣的陪同下，来到万树园，马戛尔尼以一膝屈拜，然后将所带礼品及英王书信进呈给乾隆帝，乾隆帝接受礼品及马戛尔尼的问候之后，设宴招待使团主要成员。会见之后，乾隆帝责成和珅等人陪同使团成员在避暑山庄游览观光。八月十三日，使团成员参加了为乾隆帝举行的盛大生日庆典。

在承德期间，马戛尔尼未得机会向清政府提出此次来华的真实意图。而清政府方面也以为英使团来华的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遂让英使团着手准备回国事宜。马戛尔尼见此，便在回到北京的不久，立刻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英方的要求，英方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准许英国派员居住在北京，照管本国的商务；

二、同意英商到宁波、舟山及天津进行商贸活动；

三、英国商人应仿俄罗斯例，在京师设立一商馆，作为贮存、发卖货物之用；

四、在舟山附近择一小海岛处，作为英商留居、收贮货物之地；

五、在广东省城附近拨出一小地方，让英商居住，并同意英商自由出人澳门经商；

六、要求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

对英方提出的种种要求，清政府官员当时未置可否，而是先向乾隆皇帝作了汇报。乾隆皇帝得报之后，考虑再三，决定亲自

给英国女王写一封回信。

也就是在英方提出要求的第三天，和珅在皇宫召见了马戛尔尼，把乾隆皇帝的回信当面交给了他，回信中乾隆皇帝就英方提出的种种要求给予了全面的答复：

关于英国派人在北京居住一事，乾隆帝认为："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今尔国王欲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定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

关于英货船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地收泊交易问题，乾隆帝认为："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已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并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国使臣恳请向浙江之宁波珠山（舟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关于在京设商馆问题，乾隆帝认为："（北京）从无外籍人开设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且系西洋各国聚会之处，往来便宜，若于京城设行发卖，尔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遥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尔国既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域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在舟山附近择一小岛问题，乾隆帝认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

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关于在广东省城附近拨出地方一处供英商居住并准许英商自由出入澳门问题，乾隆帝认为：“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居耶？”英商在澳门“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覈之事宜，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关于减免商税问题，乾隆帝认为：“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此时既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

乾隆皇帝对英方提出的要求，有理有据的加以驳回，没有丝毫的让步和妥协，有些辞令甚至是严厉的。但对使团及其成员还是施之以友好的态度，在乾隆帝看来，使团是以祝寿名义而来，又不识大清国体制，故不宜深究。

而对于身负重任的马戛尔尼来说，此次中国之行是满怀信心而来，大失所望而归，因为他除了从乾隆皇帝手中得到赏赉的文绮珍玩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日，英国使团离开北京。此前，马戛尔尼曾向清政府提出再逗留二日，企图再做一次说服清政府的努力，但乾隆皇帝已限令使团务于三日离京，此时马戛尔尼的心情显得非常沉重，中方送行官员亦显得非常尴尬。使团乘船沿运河南下，先抵杭州，十二月到达广州，尔后便乘船回国，于转年八月返抵伦敦。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交给他们的使命，英国欲从清帝国获得外交和商贸特权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但使团的中国之行，通过沿途所见所闻，经过与清政府上层人物的接触，对当

时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正如使团的副特使斯当东在回英国不久所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最后写道的："特使及全体随员在将近两年的期内为国家完成了一项新奇而微妙的使命"。他们所接触到和观察到的在头脑中所留下的印象是"前所未有和不可磨灭的"。究竟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什么印象，马戛尔尼是这样说的："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有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使团回国后对清帝国的全面介绍，使英国政府看到了清王朝正在走下坡路，已经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中，这样一种状态，正是英国展开攻势的大好时机，所以他们断定，在这一攻势中英国将会比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益处。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一次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中国，这次出使的目的同当年马戛尔尼出使的目的一样。使团于六月到达天津，清政府派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接待使团。双方又在觐见嘉庆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这一次，嘉庆皇帝的态度是坚决的，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方可令其人觐"。阿美士德也以各种借口拒绝觐见，双方各不相让，嘉庆皇帝一怒之下，令英使团立刻回国。

英使两次来华，均未达到预期目的，而清政府则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行动回击了英帝国欲通过与清上层人物的接触而打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的企图。虽然在这种回击中，体现了清王朝于世界形势发展的潮流于不顾，沉缅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自我陶醉中，反映了清帝国固步自封的妄尊自大。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捍卫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清政府的回绝也体现着正义和尊严，客观上给予了英帝国隐藏在"友好使团"背后侵略、扩张的企图以迎头的痛击。

但是英帝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决定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1840年，英国悍然对清帝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终于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强权的政治、海盗的行径、武装入侵的方式，在中国得到了两次来华使团想得到而未能得到的种种要求和特权。

（刘文智）

参考资料：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清高宗实录》卷1415、卷1428、卷1431、卷1434、卷1435。

捐赈案

乾隆后期，政治愈加黑暗。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官吏队伍的普遍腐朽，贪污现象不断发生，特别是和珅受宠用事，贪污之风一发而不可收敛，于是疆吏侵吞刻削，聚敛行贿，皆恃和珅为后台，贪污聚敛的财物数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云贵总督李侍尧，不仅收受提升官员银两，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然后又将珠子收回；山东巡抚国泰，勒索属员银子八万两；浙江巡抚福崧贪污盐商税银十一万五千两；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山东全省各州县官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白银；而乾隆四十六年，在甘肃发生的全省官员合伙贪污的“捐赈案”，成为乾隆一朝大大小小、形形色色贪污案中，规模最为巨大、情节最为奇特的案件之一。

甘肃是较贫瘠的省份，其地很少出产米谷，故仓储甚为空虚，为此，清政府在这里采取捐监的办法，即出资报捐者可取得监生资格，以充实粮仓。起初，报捐者仅限于生员，后来无出身者也可捐纳，人员扩大了，捐纳粮款数额也相应增加了。此制行之日久，免不了弊窦丛生。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在甘肃藩司王亶望怂恿下，经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甘肃开始推行纳粟捐监之制。勒尔谨、王亶望等人之所以在甘肃倡行此制，皆因从中可营私舞弊，有利可图。勒尔谨与王亶望串通一气，以捐生多在省城为由，将各州县捐监移于省城办理，实际上是把捐纳大权操纵于手中，接着又私自将捐监纳粟改征折色，以便从中克扣银两。与此同时，他们又

以甘肃连年遭灾，需要赈济为借口，将上报捐监收粮数字陆续开销。因捏称报捐人员和粮食数量甚多，开捐半年，即报称赴捐人次近两万人、捐粮八十二万余石，到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累报捐粮高达七百多万石，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①。对此，乾隆皇帝产生了怀疑。怀疑之一是甘肃人民艰窘者多，安能有如此众多之人捐监？怀疑之二是甘肃一向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足，安能有如此多余之粮供人采买？于是，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赴甘肃进行调查。因勒尔谨、王亶望早有防备，以东挪西借等手段，蒙混了袁守侗的盘验。

乾隆四十四年，已调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在一次助修海塘工程时，一人就捐白银五十万两，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也曾一次拿出白银四万两充作军饷。对此，乾隆皇帝愈加认定，甘肃地方官员必有舞弊行径，不然，王亶望等仅任藩司，何以家计充裕若此？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大学士阿桂剿办回事，李侍尧再度为陕甘总督，乾隆帝遂旨饬二人对此事进行查办。既而阿桂查出了实情，奏报清廷，乾隆皇帝大怒，立即提审勒尔谨、王廷赞，并令浙江巡抚杨魁会同总督陈辉祖就近严讯王亶望。王廷赞、王亶望等不得不供出了“折收于前，冒销于后”、通省官员上下舞弊的行为。

乾隆皇帝得到审讯结果，认为甘肃省官员上下勾通一气，上侵国帑，下朘民膏，毫无忌惮，不能不严加惩办，以彰国法。于是令勒尔谨自尽；王廷赞免其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王亶望立即处死。

阿桂等在甘肃办理此案，共查出勾通侵蚀、枉法营私之员自道府以至各州县，大小官员六十余人。清政府遂根据其赃私多

① 据白新良《乾隆传》。

寡、罪状轻重，分别予以治罪：侵冒银款在两万两以上者，俱当问拟斩决；两万两以下者，问拟斩候；其余或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役，或予以监禁。

此案余音未尽，又发生了与此案有关的侵吞抄家资产的事情。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查抄王亶望的家产被送到内务府，内务府官员将抄家底簿与进呈抄家物品相核对时，发现很多不符之处，如黄金一项，抄家底簿上登记有金叶、金条、金锭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而实到内府者，仅有金叶九两三钱。另外，乾隆帝也发现，当年王亶望曾向他本人进献，后来又退还给王亶望的一些珍奇器物，在送到内府的抄产中也无一存者。乾隆皇帝怀疑有侵蚀抵换之事，遂令浙江布政使盛住详查密奏。盛住查出王站住随同抄家，有将金易银、玉器挪掩等情形，乾隆皇帝遂再派福长安、喀宁阿对王站住进行质审．王站住供称，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曾经手所抄物资，并从中换易银两、隐匿玉器、抽换朝珠。事情查清之后，乾隆皇帝将陈辉祖交九卿议处，九卿议立即正法，乾隆皇帝念其为封疆大吏，不肯重治，遂从宽改为斩监候。另外，参与此事的知府王士铨、杨仁誉，知县杨先仪、张翥，也以私分侵官物、擅挪库项等罪，定拟斩监候或发往新疆效力。

甘肃捐赈及侵吞抄产案，涉及大小官员近百人，其情状及手段实属罕见，就连乾隆皇帝本人也称此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刘文智）

参考资料：

肖一山：《清代通史》。

白新良：《乾隆传》。

和珅擅权

乾隆皇帝是清代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在他的初政时期，一改先父雍正帝的苛政，以较为宽松的策略治理国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之后，乾隆皇帝继续力精图治，以务实的精神，重视农桑，发展经济；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贪官，整肃吏治，清王朝由此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乾隆皇帝骄横傲慢、贪图享乐的思想也开始滋长起来，其晚年治政也完全丧失了初期的勤勉精神和谨慎作风，以致宠用了善于阿谀逢迎、精于政治投机的奸臣和珅，使朝纲大权把持在他的手中。和珅利用手中的特权，营私舞弊、招奸纳贿，在他的影响下，吏治败坏，贪污公行，使清帝国由盛转衰。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为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于中等官僚家庭。他的高祖尼雅哈纳凭藉军功，曾获得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后来他的父亲常保承袭了这一职务，并一度担任过副都统。

和珅童年时期接受了私塾启蒙教育，少年时期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这是一所为八旗及内务府优秀子弟接受教育而设的官方学校。和珅二十岁的时候，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二十三岁时，授予三等侍卫，又被挑补黏竿处，负责皇帝出巡等仪仗事宜，不久又被调任到銮仪卫充当侍卫。

侍卫一职看起来地位较低，但也非一般常人所能担任。因为

充当皇帝的侍卫，长期工作在皇帝的身边，又拥有着传旨、奏事、出使等权力，所以在政治上必须可靠，故侍卫的人选多在八旗大员子弟中挑选。另外，充当侍卫还要英勇、果敢，外表也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和珅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和年轻时的俊秀以及在官学读书多年所具有的一些文才，才得到了这一职位。在乾隆皇帝的左右差遣中，和珅很快得到了赏识。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出巡，仓促间找不到了专用的黄龙伞盖，乾隆很生气，就用《论语》上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矣?"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时和珅却机灵地将书上对这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作了回答。乾隆帝见答话者长得眉清目秀，仪表俊雅，说话口齿清楚，声音响亮，遂大加赞赏。乾隆皇帝是个知识较为渊博的人，很喜欢读书人，特别是对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人员，更加另眼相待。见和珅如此言语举止，甚是高兴，遂召到身边，攀谈起来。由此被乾隆皇帝所看重，逐步得到任用。

仅在乾隆四十一年之中，他就连续几次升官，可谓平步青云，请看：正月，由三等侍卫任命为户部侍郎；三月，擢升为军机大臣；四月，兼任内务府大臣；八月，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这一年对于和珅来说是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此开始了他独擅朝政二十年的政治生涯 。

和珅开始涉入政务活动之后，把相当部分的精力用在处理好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上，在这方面，他把其所具备的取媚邀宠、阿谀逢迎的本事，施展得淋漓尽致。针对乾隆皇帝年事已高，贪财好货、爱摆阔气的心理，和珅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权力朘剥商民，将其勒索所得解送内库以供乾隆皇帝恣意挥霍；另一方面又以备极盛大的场面，亲自主持筹办乾隆皇帝的生日庆典等，博得皇帝的开心。而对于乾隆皇帝的日

常生活，和珅更是体贴入微，表现出他对皇帝无微不致的关心。如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像近身侍卫那样，立刻“以溺器进之”；同皇帝说话“言不称臣，必曰奴才”。

和珅虽然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见风驶舵的人物，但是，只凭这些还不能足以使其在政界站稳脚跟。他在办事、治政方面，也还是精明干练，很有些能力的。乾隆四十五年，有人告发云贵总督李侍尧婪索贪纵，乾隆皇帝派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赴云南处理此案。和珅到云南之后，先把李侍尧的管家拘捕起来，以严刑拷问，很快获得了李侍尧贪污营私的第一手材料。然后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李侍尧，使之不得不俯首认罪。和珅此案办理的迅速、利落，表现出非同一般庸碌之辈的办事能力，更加深了乾隆皇帝对他的好感。因此，和珅在回京师的路上，乾隆皇帝就迫不急待地擢升他为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回到北京之后，和珅又向乾隆皇帝陈述了在办理李侍尧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关于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何进行整治的意见。由于他汇报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多称上意”，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肯定和赞许，紧 接着又授与他御前大臣兼都统之职。

也就是在办理李侍尧案的同一年里，乾隆皇帝把他最小，也是他最为心爱的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这样，和珅在政治上已握有相当的权力，在和皇帝的私人关系上，也以两家联姻的形式而亲近起来。这一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为其进一步专横跋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人晚年的乾隆皇帝，对政务的倦怠，对以往功绩的陶醉以及对安逸生活的无节制的享受，又为和珅独擅朝政创造了机会。

进人乾隆五十年以后，和珅的权势进一步膨胀起来，他的一个女儿、一个侄女，分别被选为贝勒永鋆（康熙皇帝的曾孙）及质郡王绵庆（乾隆帝的皇孙）的妻室，与皇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和珅在政治上排除异己，在中央和地方各个重要岗位

上安插亲信党羽。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曾得到乾隆皇帝的倚重，后来因收受贿赂遭到训斥，和珅借机鼓动乾隆皇帝没收于敏中二百余万家产，削夺于敏中之妾张氏的夫人诰命，使于敏中及其亲信党羽信誉扫地，权势大减。接任于敏中为首席军机大臣的阿桂，也时常受到和珅的排挤，乾隆皇帝深知二人矛盾颇深，采取了让阿桂避开的方式，常常命阿桂赴各地治河、办案、督师等，以避免双方矛盾的冲突，和珅恰好借此机会，把军机处的大权独揽过来。

在寻机打击政敌的同时，和珅大肆培植自己的亲信党羽，他的弟弟和琳做了工部尚书；其同党、孝贤皇后的侄子福长安做了户部尚书；大学士永贵的儿子伊江阿对其忠心耿耿，做了山东巡抚；其党羽苏陵阿、国泰、景安、明保等人，也都先后身居高官，成了和珅关系网中的骨干，形成了“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的局面。

和珅有了皇帝的宠用为后盾，以形成的党羽关系网为依托，在各个领域施展其图谋，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他把军事、政治、财政、文化、外交大权集于一身，达到了擅权秉政的目的，乾隆五十年以后，成了一个仅次于皇帝的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

和珅擅权柄政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贪污聚敛的过程。在他刚刚踏上政治舞台之后，贪婪的欲望就驱使着他不择手段、贪黩无厌地征求财货。

和珅利用他掌管财政大权之便，举凡朝廷蠲赈、河工奏销、盐政税务甚至各地进贡和军费开支，都成了他榨取、豪夺的对象。又利用他主持负责皇帝私人活动，如皇帝生日庆寿、外地巡游、皇室成员的婚丧嫁娶等等，无休止地向下勒索，以皇帝及朝廷的名义索要的钱财，相当一部分据为己有。

由于和珅是朝权在握、倾权倾势的人物，各级官吏深知其权势之大和为人之贪婪，纷纷结交归附，投其门下，或献钱财，或

献宝物，以投其所好，求得其荫庇。

乾隆六十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皇帝把皇位禅让给嗣子，改元嘉庆，自己当了太上皇。而此时的和珅政治上弄权、经济上贪黩更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首先是利用乾隆皇帝年老昏愦之际极力揽取权势。嘉庆二年（1797 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死，和珅升任此职，之后，他对军机处进行改组，使之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又通令各省，凡有奏擢，先报军机处，然后再呈送给皇帝，以便迅速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嘉庆三年，他被封为“一等忠襄公”。到此时，和珅上可以左右太上皇，挟制嘉庆皇帝，下掌握着一批效忠于他的政府各级要员，内而部院群僚，外而督抚提镇，很少有不归顺于他的；文武百官无人敢与之抗衡，朝野上下无人敢与之龃龉；就连皇帝的诸皇子们也是对他毕恭毕敬。

嘉庆皇帝虽为一国之君，但对和珅也是忍让三分。乾隆皇帝所作的一切决定，多数是由和珅左右而作出的，嘉庆皇帝虽多有不满，但表面上也是言听计从，不露声色，而且常常表现出要依靠和珅处理政务的样子。因为他深深知道，他刚继位，皇位尚未巩固，实权没有操纵在自己手里，和珅秉权二十余年，朝廷上下内外多为其党羽，如果与和珅针锋相对，和珅必在乾隆皇帝面前多有谗言，如果失去乾隆皇帝的信任，现有的皇位恐难以保住，所以他采取暂时忍让的方式，任和珅放纵行事，以等待时机。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病故，嘉庆皇帝亲政，他立刻开始实施了整肃朝政的计划，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置和珅。乾隆去世的第二天，嘉庆皇帝就宣布褫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官职，限制其活动自由。正月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和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奏，列举和珅种种罪状，对其进行弹劾。正月初八日，嘉庆下令逮捕、收禁和珅及其党羽福长安等人。正月十五日，宣布了和珅以拥戴为功漏泄乾隆皇帝册封

储君机密、任意拖延剿办白莲教各路军营的奏报、随意裁撤军机处记名人员、一人把持户部事务、所住房屋多有僭侈僭制、私藏大量金银衣物、不顾廉耻娶出宫女子为次妻等二十条大罪。

和珅下狱之后，对其如何处置，朝野上下也多有议论。嘉庆皇帝首先征求了朝臣的意见。直隶总督胡季堂提出，和珅丧尽天良，蠹国病民，应凌迟处死。大学士九卿等也拟定和珅罪名，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即行正法。嘉庆皇帝考虑再三，鉴于和孝公主等人的求情和前朝的先例，决定对和珅赐死，令其自尽，福长安也从宽处置，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他和珅主要党羽，或削爵或降职，都作了相应的处理。同时又派庆桂、盛住、永瑆等人查抄和珅的家产。其被抄家产计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土地八千余顷。此外还有大量的古玩、瓷器、绸缎、皮张、珍珠、宝石等等，其家产值银达八亿多两。没收的这些家产，一部分缴国家银库，一部分赏给了王公大臣，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内务府接收，成为皇帝的财富，故当时有民谣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是乾隆皇帝晚期政治舞台上一位非常显赫的人物。在二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由一个普通的三等侍卫升为权倾一时的军机首辅，由一个穷官学生变成富可敌国的大贪官，扮演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专横跋扈、贪赃枉法，为世人所唾弃的奸佞角色，从他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制度下政治的黑暗、吏制的败坏、统治阶级生活的腐朽。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清史稿》卷 319；《清史列传》卷 85 "和珅"；薛福成《庸庵笔记》。

白莲教大起义

清王朝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社会矛盾愈益激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嘉庆元年（1796 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九年，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等五省，参加起义的人数达几十万之众，给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封建王朝最兴盛、最富庶、最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走向没落的开始，清王朝也不例外。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乾隆晚期，颓败之势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出现了一方是田连阡陌、亩以万计的大地主，一方是十室而九佃耕于富户的穷苦农民，形成了贫富之间“不可倍蓰”的巨大差别。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不断膨胀的官僚行政机构和连年征战的战争费用，以各种名义加派加征各种苛捐杂税。这时的政治也更加黑暗，突出表现在贪污公行、吏治败坏、政务废弛、讼案积山。集政、军、财大权于一身的大官僚和珅，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贪官，在他当政的二十年里，其接受贿赂、营私舞弊、贪污聚敛的财产，除占地八十万亩之外，折合白银竟达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人。各级官吏也是无官不贪，因循苟且，对上只知阿谀逢迎，对下只知横征暴敛，政务无人过问，讼案无人审理，人民冤声载道。当时人就有这样的议论：

今天下之官很多，但为民办事的却很少，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随处可见。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黑暗，加上连年灾荒，使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在苦海之中。尖锐的阶级矛盾，酝酿了即将爆发的反抗斗争。

四川、湖北、陕西等省，这时已经以秘密宗教的方式，在人民群众中组织和发动武装反抗斗争。特别是在川、楚、陕三省交界处，人称巴山和南山老林的一带地区，因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失去土地而背井离乡的无业游民，秘密宗教活动更为活跃，以白莲教影响为最大。

清政府对民间宗教一向采取严禁、取缔的政策。清朝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就下令都察院陆军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在各省的督抚等官，如发现各种教门，坚决予以取缔，不应手软；对各教徒严加搜捕，处以重罪。白莲教作为当时最有影响、活动最为频繁的秘密宗教之一，更是受到了清政府的严密关注和作为重点的防范对象。白莲教在元、明两代，曾多次组织反抗斗争。明末徐鸿儒以白莲教组织的山东农民起义，曾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之后，白莲教转人了低潮。到清中期，白莲教又开始活跃起来，传教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由传教布道转向组织群众斗争，提出了“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红阳指现在，白阳指未来）等具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口号，这对于已无法忍受清王朝黑暗统治的广大人发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召唤力，白莲教很快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对白莲教禁止措施更加严厉，防范更加周密。乾隆年间，大批白莲教教首、教徒被逮捕或杀害。乾隆四十年，白莲教主要首领刘松在河南鹿邑传教，事发被捕，被遣往甘肃。其他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在川、楚、陕等地继续进行传教活动。白莲教不断发展壮大，乾隆五十八年，白莲教以同教中王氏的儿子王发生为明裔朱姓，鼓动反清复明情绪，被地方官发觉，刘之协等人被捕，遣往新疆。路上，刘之协

设法逃出。清政府下令大肆搜捕，各省官吏以缉拿教徒为名，借搜捕之机，肆无忌惮地向地方民众多方勒索。在湖北荆州宜都一带，由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带领的官兵搜索白莲教徒时，就株连数千无辜之人，“使富家破，贫陷死者无数”。清政府严禁私盐、私铸又使大批以此谋 生的贫民陷人绝境，走上反抗的道路。先是湖北荆州、襄阳，四川达州等地民众揭竿而起，举起反抗斗争的大旗，而后，流落到巴山，南山老林的流民予以积极响应，成为反抗斗争的主体力量。

乾隆六十年，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在湖北聚会，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商定于嘉庆元年四月十七日各地同时发动起义。但由于湖北宜都、枝江的白莲教徒，对清军的肆意捕杀忍无可忍，于嘉庆元年正月，在张正谟、聂杰人的率领下提前举行了起义，长阳、长乐、东湖、当阳等地的白莲教徒立即响应。三月，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等聚众万人，在襄阳地区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并攻陷竹山、保康、来国等地。在湖北各地首先擂起的反清战鼓声中，四川的白莲教也抗起了起义的大旗，徐天德在达州带领白莲教徒，杀死清朝官吏，宣布起义之后，十几天之内就在其义旗之下聚集了一万多人。随后，东乡（今宣汉）的冷天禄、巴州（今巴中）的罗其清、大平（今万源）的龙绍周、大宁（今巫溪）的陈崇德等，都相继率白莲教徒和当地人民群众揭竿而起。起义虽然提前举行了，但由于各地人民早已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及贪官污吏恨之人骨，当一处发难，各地很快积极作出反映，使起义烈火骤然连成一片。

此时，已当上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得到南方诸省起义造反的奏报，立即进行军事部署，命令都统永保，侍卫舒亮、鄂辉，集结陕西、广西、山东五千兵力，进行会剿。但起义的烈火，愈扑愈炽，清军遂采取分兵合围的办法，由永保、恒瑞对付竹山、保康义军，毕沅、舒亮对付当阳、远安、东湖义军，惠龄、富志那对

付枝江、宜都义军，鄂辉对付襄阳、榖城、均州、光化义军，四川总督孙士毅对付酉阳、来凤义军。

在各地起义军中，襄阳义军声势最大，王聪儿、姚之富、刘之协等人便成了四方义军的领袖。因此，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军把重兵放在进剿襄阳义军上。乾隆皇帝诏明亮、鄂辉赶赴襄阳，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率二千兵丁来此，又把在湖广、河南的蒙古窃马谪犯，补充到清军中去。

清军大队人马向襄阳猛扑而来，王聪儿、姚之富等率义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粉碎了清军的围攻。五月，起义军分两路，向孝感进发，六月，在孝感附近设下埋伏，袭击清军，杀死参将傅成明。七月，他们又在钟祥冲破清军的堵截，分兵攻枣阳，十一月，王聪儿又率领义军渡过刘家河，进逼谷城、光化，在邓县魏家集包围了前来镇压义军的河南巡抚景安，打得清军狼狈不堪。在各路义军的调动下，清兵疲于奔命，清政府想以重兵一举歼灭湖北义军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四川，清政府派总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前去镇压达州、东乡义军。英善分派游击尚维岳、都司清福等扎营娘娘庙和东乡天星桥。达州的徐天德先分兵攻打天星桥，后亲自率领主力夜袭娘娘庙，全歼清军，到十月份，达州起义军的势力已发展到了东乡、太平、新宁等州县，多次给为清军助战的地主武装以沉重打击。十一月，起义军又向前来东乡而立足未稳的清军猛攻，后来--支陕西的清军开到，两部合驻在老营湾。在这里，清军用树木、竹条等编成围墙，在墙外又挖了一道壕沟，准备死守。起义军经策划，决定火攻老营湾，发起攻击之后，向敌营内投掷火球，然后用长绳飞钩扒倒竹木墙，攻人城内，经过激战，全歼了由总兵袁国璜、何元卿率领的守敌。嘉庆二年（1797 年）正月，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等攻破东乡，在南坎场、金峨寺两次激战中重创清军。不久，达州和东乡两支起义军汇合到一起，掀起

了四川白莲教起义的高潮。

为了同四川起义军会合并肩作战，湖北襄阳义军决定向四川挺进。嘉庆二年初，义军在王聪儿等率领下，分中、西、北三路进入河南，入河南后，采取忽分忽合不与清军直接应战的战术，牵制清军。不久，三路义军合兵于汉阴，又通过紫阳，夺船渡过汉水，冲破了敌军的堵截，于六月份进入四川。当时徐天德率领的达州义军在东乡附近的白秀山遭德楞泰率领的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刚刚转移到四川的襄阳义军及时赶到，他们分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突然出现在山梁，山上达州义军得到援助，士气大振，山上山下夹击，清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两支起义主力胜利会师。

会师之后，义军进行了整编。按地区统一分编为黄、蓝、青、白等号，在各号中设营，作为基本的战斗单位。还设有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各级指挥人员。通过整编，战斗力大大增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清统治者得知起义军东乡会师，甚为恐惧，立即调集重兵三面扑来，为了避开敌人的锐气，王聪儿，姚之富等指挥各路义军转移。嘉庆三年以后由王聪儿等率领的襄阳义军在川、陕等地展开游击战，但由于清军在川、陕有较多的机动兵力，没有给清军造成任何威胁，清军反而及时调兵遣将，连败义军。义军受挫之后，且战且走，准备退到湖北。王聪儿率义军行至湖北的三岔河，走进两边都是高山峻岭的山沟，清兵从后边追赶上来，前面又被地方乡勇堵住，义军只得退向两边的山梁，清兵与乡勇蜂拥而上，义军奋力抵抗，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将士战死，只剩王聪儿、姚之富等十几人，最后他们登上山顶，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帝亲政。他所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尽快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已轰轰烈

烈进行了三个年头，这三年中，起义军给清军的打击是沉重的。义军虽有损伤，但清军的代价更大，所以，嘉庆帝认为，有必要对目前镇压义军政策进行一次调整，在战略上也要重新部署。

同年正月，嘉庆帝下了一道谕旨，指出，这次剿“匪”劳师数年，耗饷数千万，尚未蒇事。要求川、楚、陕各省将军、督抚及领兵大小官员，戮力同心，刻期灭“贼”。谕旨下达后的第七天，嘉庆帝诛除擅政二十余年的赃官和珅，借此之机，嘉庆帝又把几年来剿“匪”不力的责任推到和珅身上，说他抑压军情，多以不实入奏，殆误战机，各路领兵大臣在和珅的庇护下，虚冒功级，坐靡军饷等等。

在推卸责任的同时，嘉庆帝又以政治欺骗的手法，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为此，他特意又下了一道谕旨，煞有介事的说：“国家深仁厚泽，百姓长享太平，使非迫于万不得已，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皆由州县官吏朘小民以奉上司，而上司以馈结和珅。”接着把话题转入他要说的话上来，他说：“各路贼中被胁之人，有能缚献贼首者，不惟宥罪，并可邀恩；否则临阵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百姓困极思安，劳久思息，谅必一见恩旨，翕然来归。”他要求各地方官把这一谕旨颁布川、楚、陕各地，以便使百姓“咸知朕意”。他知道他的这道所谓“恩谕”，对斗志正旺的起义军来说，是不会起多大作用的，所以他仍把希望寄托在武力镇压上。故在玩弄政治手腕的同时，对清军继续进剿起义军的军事活动进行了新的部署。

首先对统军诸将帅进行调换，命四川总督勒保为经略大臣，总统川、楚、陕、豫诸省军务，督抚及领兵各大将皆受其节制。明亮、额勒登保以副都统授为参赞大臣。其次对以往分兵进剿的战术进行调整。起义军分散为数路，清军如分数支同时进剿，势必分散兵力，而起义军出没无常，或聚或散，清军总是处于被牵制的疲惫状态，故拟定了一个分兵合围，把起义军向一处追赶，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全歼的计划。

针对敌人新的作战部署，起义军则采取大规模穿插流动的作战方式，仍把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清政府调动了五万多满、汉步兵骑兵，企图把起义军围困在四川东北部予以歼灭的时候，起义军各部便开始了大踏步的流动转移。徐天德、王登廷率众出没于东乡、大平一带，经常派出小部队阻击清军，使清军千方百计吃掉这个“川匪最悍者”的图谋屡屡受挫。由罗其清、冉文俦率领的另一支义军主力先是在营山县的箕山建立起粮草充足的大本营，并不断派兵骚扰营山、仪陇、巴州等县，后来也开始转移，到了大鹏山，在山里与清军周旋。

其他各支起义部队，也是以分散流动、突然出击的方式，利用巴山、南山丛林茂密的地区，穿山越岭，出没无常，清政府的合围计划又陷于破产。

无可奈何的嘉庆帝以“勒保经略半载，莫展一筹”为由再易主帅。四年七月，命任额勒登保为五省经略大臣，统率全军。额勒登保上任之后，首先向嘉庆皇帝提出了剿灭白莲教起义的两条方略：一是把起义军引入川、楚、陕交界处，聚而歼之；二是修筑寨堡，组织团练，实施“坚壁清野”，使义军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他的建议，得到嘉庆帝的赞同。

先是由负责进剿起义军的清军诸将领，会同各省督抚，晓喻各州、县，建立地主武装团练。这时的汉族地主阶级，同样受到了起义军的打击，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动组织起了乡勇和团勇，帮助清军守城和进剿，仅四川一省的乡勇就有三十万人，给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其次是推广坚壁清野的作法，把小村的群众强行集中到大村，把平原地区的群众强行迁移到有险可据的山地，再把这些地区周围挖上壕沟，垒起高墙，准备充足的粮食，限制人们自由出进。这样就使起义军与人民群众断绝了联系，给起义军补充人员、供给粮物和武器等造成困难。这种办法

很快在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推行开来。起义军所到之处，民皆入寨，数百里无人烟，只得宰骡马充饥，饮污水止渴，战斗力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在和清军作战时常常失败。一贯采取的流动作战方针，由于得不到群众各方面的支持，也不能再实行下去，处境十分困难。嘉庆五年三月，曾驰骋于四川数十州县，以打伏击战而著称的义军主力之一冉天元，与德楞泰所率四路清军在马蹄冈交战，血战五日，清军在乡勇的协助下，攻破义军阵营，冉天元等被俘遇害。马蹄冈一仗，是起义军造反以来同清军最大的一次战斗，冉天元在四川的各路义军影响也较大，这一仗的失利，给起义军的士气以很大的打击。嘉庆六年五月，另一四川义军主力徐天德部，在清军和寨保团练的堵截之下，向陕西境内撤退，六月，徐天德在陕西西乡西河口因船覆不幸溺死。徐天德的死，冉天元主力的失败，使四川战局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清军趁此之机，联合地主武装团练、乡勇等，向义军展开全面攻势。到嘉庆六年，各路义军被迫撤退到川、楚、陕的交界处，转战于深山老林、寨堡较少之地。

同年七月，清兵统帅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等在陕西平利，部署向三省交界进攻的作战计划，决定德楞泰率部由西南进攻，额勒登保率部由东北进攻。在清军两面夹击下，义军又被逼迫至川边。

此时的额勒登保以为胜利在握，急忙向嘉庆皇帝奏报，声称义军已没有大队人马，所剩余众又被逼入川边，清军各路兵勇十倍于敌，定可将义军一举扫荡。嘉庆帝接报之后，看到扑灭白莲教起义指日可待，便大加封赏作战有功诸清军将领，额勒登保和德楞泰分别被封为三等和二等伯爵，并限令在年内将起义军全部剿灭。

义军大部进入川边，只有苟文明率部众二千余人，在陕西、甘肃两省活动。一年过去了，清军围剿一无所获，义军克服重重

困难，仍活跃于川边山林之中，而苟文明等人则利用清军集中兵力围剿川边之机，驰骋于陕、甘之间。见此情景，嘉庆帝气愤地斥责额勒登保"自用兵以来，从未有老师若此者"，下诏夺了他的爵位，再次限令剿灭白莲教，务于七年六月内完成。

清政府的步步紧逼，使义军处境更加危急，斗争更为艰苦。到嘉庆七年七月，苟文明率领的义军只剩下三百余人，最后在秦岭山脉的花石岩与清军作战中，苟文明被杀害。到十月，湖北、陕西的几支小股义军，在德楞泰、杨遇春的围追下，或被歼或被打散。额勒登保率清军主力与德楞泰等会合，再分兵三路搜索、夹击义军散兵，到年底，起义军大部分被歼灭。

但起义的烈火尚未被彻底扑灭，姚馨佐、宋应伏、冯天保、余佐斌等仍在老林中率余部活动。后来被清政府遣散的一些乡勇，或因无家可归，或因遣资有限不能养家糊口，也纷纷进人老林，同白莲教余众联合起来，又掀起了一个反清斗争的小小浪潮。清政府再派已班师回京的德楞泰等人，复出京师挂帅，再行征剿，又持续了一年多，姚馨佐等最后十几位义军领袖先后牺牲，到嘉庆九年九月，白莲教起义才被彻底的镇压下去。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了，主要是因为起义以宗教迷信作为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武器，不能对清王朝的反动本质和起义行动本身的意义有 -个正确的认识，故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再就是起义军支派林立，不相统属，在流动作战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统一组织和指挥系统，更没有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当敌人采取坚壁清野策略时，起义军立刻陷于被动。尽管义军将士英勇善战，坚强不屈，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但他们以不屈不挠的斗志，坚持了长达九年的斗争，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文智）

参考资料：

魏源：《圣武记》卷 9、卷 10。

《清仁宗实录》卷 37、卷 38、卷 49、卷 72、卷 75、卷 77。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私雕假印案

雍正一朝及乾隆之初，君主有为，治政严明，各级官吏不敢因缘为奸。乾隆晚期，天下承平日久，官员腐化日深，吏制愈益败坏，特别是和珅专权，更进一步加重了政治的黑暗程度。嘉庆帝即位之后，首先诛戮和珅，以期整肃吏制。但颓败之势已不可挽救。

“实录”馆总裁洪亮吉在嘉庆亲政的前一年，曾上疏指出：“今天州县官的罪恶，比十年、二十年前加增百倍，上敢毁天子的法令，下敢竭百姓的资财。今日州县等官吏，其罪有三，即凡朝廷赈恤之项皆中饱于有司，此上恩之不下逮一也；无事蚀冒粮饷，有事避罪就功，州县以之蒙府道、府道以之蒙督抚、督抚以之蒙皇上，此下情之不上达二也；若有功，长随幕友，皆冒得之，若失事，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州县，封疆大吏，统率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三也。”洪亮吉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吏制的腐败状况，嘉庆皇帝虽然不甚爱听如此逆耳之言，但他也承认优游宴饮、挥霍享受，任内只知贪黩聚敛，对公务则一塌糊涂的官员比比皆是，也知道这些人“问及一事，则推诿于属司，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嘉庆帝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

清朝从顺治年间起，地方官自知县知府到督抚藩臬，大都招聘一些文人帮着出谋划策，这些人被称作“幕宾”，充当幕宾的

有学者名流，也有的是退休失意官吏或亲朋好友。他们替官僚们执掌刑名钱谷，批签文件。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官僚们贪图享逸之风的滋长，幕宾之类的人物，权势大增，当时有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今日吏治，但三种人为之。三种人者：幕宾、长随、书吏是也！"这些人利用官僚们对他们的信任，暗自捣鬼，兴风作浪，特别是利用"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粱，手画大诺而已。更有请幕友代画者"，于是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铸假印、写假名、私征钱粮、冒领国帑之事接连不断的发生。

嘉庆十一年（1807 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向嘉庆皇帝奏报，发现了一起司书即书吏私雕假印、与幕宾勾串舞弊的案子。这一年，庆格对司库历年出人银数轇輵不清，产生疑问，他将司书召来进行盘问，司书狡黠支唔，露出破绽，遂即提取粮册档案，详悉核查，终于查出历年地粮耗羡以及杂税银两，均有虚收之款。尔后，他又亲提各州县奉到司发批收，逐一核对，发现有将司发库收小数改大数、将领款抵解钱粮又蒙混给发、串通银匠给与假印批收等舞弊情状，共虚收近二十个州县地粮正耗杂税等银二十八万余两。

庆格见此案非同寻常，立刻派人逮捕了承办司书王丽南等人。嘉庆皇帝得到庆格的奏报，遂命协办大学士费淳、尚书长麟对王丽南等进行审讯。同年九月，审讯有了结果，查明自嘉庆元年起至本年止，地丁羡耗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计有二十四州县，共侵盗银三十一万六百两。其内竟有与州县讲明，每虚收重抵冒支银一万两，给与司书及说事人使费银二三千两不等。除此之外，尚有幕友长随知情分赃、州县借领应解之款贿书吏将案卷销毁，或诓印库收挖改数字等情况。

嘉庆皇帝得知此案详情，甚为气愤，认为司书敢于私雕藩司及库官印信，串通舞弊，为从来未有之事，实出情理之外，下令

将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徐承动等二十余人处死，没收其家产。对失察的督抚藩司，如颜检、胡季堂、梁肯堂、陈大文、熊枚、瞻柱、郑制锦、同兴等人，各以其任内虚收数目分别予以治罪。

类似于这样的案子，在外省也时有发生，如就在王丽南一案刚刚了结，在湖北又揭发出武昌五县节年解司地丁正耗银两，亦有任意侵欺，私将库收照票洗改之事。就是在中央各部门，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嘉庆十四年，工部书吏王书常等私造假印冒领库银，或于岁修工程，捏造大员姓名，重复向内府户部支领；或移咨户部，经户部凭文办札，交领三库银两物料，此种舞弊行为反复进行了十四次之多，共得款项不下万两。按清朝定例，河吏支领库银，必须司空签押，通知户部，最后由度支大员复加核查，然后发帑。但类似王书常等书吏人员，为贪赃舞弊，常常趁那些度支大员谈笑会饮时，呈送签文，度支大员无暇详阅，遂挥手签字，而书吏等从中钻了空子。王书常一案后来被一个工头所告发。王书常处以死刑，户部尚书侍郎禄康、德瑛、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工部尚书侍郎英和、常福、和世泰、费淳、万承风、曹振镛、成书、蒋予蒲等均降黜有差。

私描串票、私雕假印、冒领国帑、虚收虚抵，这些前朝未曾发生之事，到乾末嘉初已习以为常，一省大小官吏，通同舞弊，罔上行私，相护恶习，贪污的数目，由州县的数万到省司的数十万。贪污盛行严重地腐化着整个清政府的官僚队伍，加重了当时政治的黑暗程度，加速了清王朝走向衰败。

（刘文智）

参考资料：

肖一山：《清代通史》

赵翼：《簷曝杂记》

天理教起义

嘉庆元年在川、楚、陕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以长达九年的时间，同清王朝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搏斗，把清朝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推向高潮。就是在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下去的九年之后，在北方又一次爆发了较大规模的以宗教为组织形式的反抗斗争——天理教起义。这次起义把进攻的方向，直接对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脏——北京紫禁城，并曾一度打进皇宫。这样一个壮举，为历代人民反抗斗争所仅有，连嘉庆皇帝都惊叹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如果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愤恨到了极点，这样一个壮举是不会创造出来的。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主要传布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一带。其所信奉的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教徒们把这八字书写白绢上，供于暗室，日夜拜诵。所诵经卷有《三佛应劫书》等，主要宣传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思想。其信奉的教徒主要是由贫苦农民、雇工、小贩、各种杂差役人等下层人民构成。

天理教教首林清是在嘉庆十一年入会的。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后移居河北大兴县的黄村。年轻的时候曾当过药店学徒，后来又当过直隶大兴巡检衙门书吏、江南粮道和丹阳县衙门长随。林清为人豪爽，办事公道，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入教后不久就取得了众教徒的信任和拥戴，被推举为八卦教中坎卦的教主。河南的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加入天理教之后，不久也成为天

理教的主要首领，李文成掌管着八卦教中的震卦，并统领着坎卦之外的七卦，但这七卦皆受坎卦的领导，故林清、李文成便成了天理教的两位主要领导人。

清代，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常常是以秘密宗教的方式组织和发动的。因为借助于宗教，以宗教的教义来表达人们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更具有吸引力，也易于被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所接受。天理教在它创立之始及吸收教徒的时候，就是针对清代中叶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贫苦的农民丧失了土地，社会上形成了一方是拥有千万顷良田的富户，一方是无寸尺之壤的贫民，两极分化到了极点，贫富差别到了无法相比的状况，提出了凡是加入教会的教民，要缴纳一种"根基钱"（或叫"种福钱"），事成之后，偿得十倍，凡缴纳百钱者可得到土地一顷。这样一种主张提出之后，颇具号召力，如饥似渴盼望得到土地的人们纷纷前来入会，而天理教又常常以各种手段救济贫困，愈加得到人们的信赖。

林清、李文成等人在会员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准备同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到嘉庆十六年的时候，天理教徒已经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省，发动起事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这一年春天，林清、李文成、牛亮臣、冯克善等首领在河南的滑县聚会，商量各省联合行动共同起义事宜。他们根据天书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说法，定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同时起义，称九月以后为白洋劫，凡入教教徒皆能避免杀戮，又称白洋劫为山西洋头、河南洋腹、山东洋尾。准备先收洋头、次洋腹，再收洋尾。规定了起义的口号，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起义的标志，一律举白旗，白布裹头系腰。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李文成再次来到大兴县黄村与林清会见，最后商定：李文成先在滑县发动起义，其他各省同时响应，尔后，立即向北京进发，林清则在北京城内发动起义，与李文成

里应外合，攻打皇城，夺取北京。起义计划商妥之后，李文成回河南派自己的养子刘成章到林清处，保持双方的联络。林清、李文成各自着手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林清先化妆潜入京城内，与宫廷内的太监取得联系，商定了进攻皇宫的路线和步骤，安置了内外的接应人员。李文成在河南已有教众数万人，当他们得知起义时间已定，个个磨拳擦掌，群情振奋，纷纷买战马、制兵器、备粮草，准备大干一场。但由于人多势众，不免走露风声。滑县老安司巡检刘斌探知牛亮臣等在滑县大伾山东坡，组织教徒铸造军械，便报告知县强克捷。强克捷一面密报巡抚高杞及知府卫辉请兵镇压，一面派出衙役趁夜来到村中，将李文成、牛亮臣拘捕。在审讯中，李文成拒绝说出起义的行动计划，受到严刑拷打，李文成坚不吐实，“反指斥县令诬良为盗”，敌人甚为恼火，令打手用夹棍夹断李文成的足胫，但他“仍不吐实”，无奈敌人只得将他投入大狱。此时，众教徒认为事情已非常紧急，如不马上行动，敌人就会先行下手，义军部将宋元成遂担负起领导起义的责任，聚集三千余人于九月初七日向滑县县城发动进攻，提前举行了起义。义军很快攻下了滑县县城，从狱中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等人，杀死知县强克捷、巡检刘斌、典史陈宝勋、把总戚明扬等人。占领县城后，义军派兵守住各城门和城内要害处。

李文成被救出之后，在滑县县署，树起了“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建立了军事指挥机构，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封诸卦主为卦王等。考虑到欲立于不败之地，须占据固守一处为根据地。遂在滑县整军之后，攻占了滑县附近的战略要地——道口镇，并屯兵于此，以待各处响应起义后，再合兵北上。

李文成起义之后，河南、山东边界的长垣、曹县、定陶等县天理教纷纷起而响应，起义的声势顿时高涨起来。清政府得到起义的消息，立刻命直隶总督温承惠为总统，率古北口提督马瑜及

护军统领富兰，副都统格布舍、苏尔慎等，带直隶、河南等省的绿营兵征讨义军。

正当清兵对李文成义军进行全面征剿的时候，由于受到清军的防堵和夹击，起义的消息未能传出，林清等人则仍按原计划部署进行攻打北京的准备工作。林清在黄县已联络了数千天理教成员，重要首领还有祝现、屈五、刘第五、刘呈祥、支进财、陈爽、李五等人。林清派人与宫内太监取得联系。在北京城内有不少的穷苦旗人加入了天理教，通过旗人的关系，在皇宫的太监中也发展了一些教徒，作为攻打皇宫的内应。同太监刘得财等人联系上后，双方定于九月十五日攻打紫禁城。十四日，林清挑选了二百名教徒，分成东西两队，分别从董村和黄村出发。十五日，他们乔装改扮，进入京城。原定方案是：陈爽、刘呈祥率领的东队，由太监刘得财、刘全引路，进入东华门；陈文魁、刘永泰率领的西队，由太监高泰、高广福引路，进入西华门，另有王福禄、阎进喜两太监在城内居中援应。规定进入大内之后，统一由陈爽指挥，而林清则在黄村镇守，等候接应前来聚会的河南义军。

东路义军在刘得财的引导下刚进人东华门，因无意中露出腰间所藏短刀，被护城清兵发现，清兵欲关城门，陈爽率十几名义军战士冲人门内，后面的义军战士还未来及进门，就被关在了门外。陈爽带领十几名义军战士从文华殿直扑协和门。

西路五六十人以出其不意之势直扑西华门，守门护军措手不及，见义军来势凶猛，没敢抵抗就四散奔逃而去。义军按原计划先攻打养心殿。内府太监和护卫军见义军冲向内府，进行抵抗，义军战士左冲右杀，逼近隆宗门。隆宗门内的清军已知有变，仓促关闭了宫门。镇国公奕灏带领准备去河南镇压李文成起义的上千名火器营兵、贝勒绵课率百余侍卫守卫内廷。义军开始攻打隆宗门，几名战士从外廊房越墙而人，被清兵的火枪压下，义军战

士又以火攻的办法，企图杀进去，也未能得手，只得从原路后撤。绵课已带领几十名清兵堵住了西华门，义军在太监杨进忠的带领下，穿过慈宁宫等处，分散隐蔽起来。仪亲王、成亲王、庄亲王等闻警之后，急命营兵进入神武门，诸亲王率兵进行抵御。数名义军突入大内，正在尚书房的皇次子、皇三子等人，急忙持鸟枪进行反击。陈爽带十几人在协和门与清兵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散。到傍晚的时候，喊杀声渐渐平息下来。皇子旻宁命令关闭四门，严加把守，在城内严密搜索打入紫禁城的义军战士。隐藏在宫中各处的义军战士，彼此失去了联系，只好各自为战，不时从暗处杀将出来，拼杀一番。经过一夜的格斗，冲进紫禁城中的起义军战士大部分战死，少部分人和几名内应太监被清军擒获。天将黎明的时候，这场惊心动魄的攻打皇宫的战斗才平息下来。这之后，清军得知重要首领林清等人仍在黄村，遂于十七日立刻派兵扑向黄村，将林清捕获。

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时候，嘉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在从丫髻山起銮行至白涧行宫的途中，接到皇子旻宁等人的飞报，得知京城有变，甚是惊骇，匆忙于十六日回到北京，在处理善后事宜的同时，于次日写了一份“罪己诏”晓示天下，他在《罪己诏》中称：在继承皇位的十八年中，兢兢业业，不敢暇豫。此次事变，虽起于一时，但祸积有日，这祸就来自于诸臣工不听他的告诫，而因循怠玩，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他的这份罪己诏，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脱责任。下完罪己诏，他便着手处理善后事宜，林清等几位主要首领及内应太监刘得财七人，被处以凌迟极刑，一些可疑的太监或被关压或被放逐。皇子旻宁因击败义军有功，被封为智亲王，绵课赏加郡王衔，其余诸王大臣皆晋秩赏赉有差。

林清的河北起义军失败之后，清政府集中全力镇压李文成领导的滑县起义军。

前次由温承惠统领的清军围剿滑县义军，当温承惠行至正定，闻京城有变，复率兵回到保定进行观望。嘉庆皇帝见温承惠犹豫不决，未能带兵及时开赴滑县，又责其身为直隶总督，而对林清聚众起事毫无察觉，褫夺了他的职务。改命陕甘总督那彦成督师，统领山东、河南各路清兵，命工部侍郎、护军统领庆祥率健锐、火器营，陕西提督杨遇春率陕兵，西安将军穆克登布率一千清兵，副都统富僧德率马队一千，徐州总兵徐洪率兵数千协同围剿。

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那彦成出陕西潼关由孟津渡黄河，十月初八日来到河南的卫辉。当他得知河南义军已有三万之众占据道口，不敢贸然向义军进兵，奏请增调山西兵一千、甘肃兵二千。嘉庆帝斥责那彦成行动迟缓，不立刻将军开往滑县，反而说兵不敷用，实属畏葸迁延，任“贼盘踞蹂躏”而束手坐观，纵“贼”殃民。并警告那彦成，若再心存延玩，贻误事机，必立将其拿问治罪。那彦成虽遭到斥骂，但诸路清军尚未齐集之前，仍不敢向义军发起攻势。十一月初，杨遇春率领的关西兵赶到，会合温承惠、高杞、马瑜等人统领的吉林、黑龙江等清兵劲旅，向道口发起进攻，先攻占了附近的周潭村、连庄等地。义军被迫全部退到道口，准备固守道口，全力抵抗。

那彦成率清军主力赶到道口之后，见义军在道口周围掘壕灌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遂调集诸路清兵分成七路，又部署总兵音登额从西面用大炮进行轰击，高杞分兵攻击，杨遇春迎头剿杀，庆祥率马队三面冲突，那彦成本人率兵四路截杀。清军发起进攻之后，坚守在道口的二万余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滑县的义军得知道口危急，派二千人前来救援，但被清军所截，经过一天的战斗，义军难以抵挡清军的强大攻势，道口失守。

道口的失守，使河南义军重要的据点——滑县县城失去屏障，起义的形势开始发生转变，义军由此而处于被动。而在此

时，其他各处的义军也纷纷被清军所剿杀。在直隶，由尚书托津统领的吉林、索伦兵镇压了开州的义军；在山东，盐运使刘清在副都统苏尔慎的协同下，镇压了曹州的义军。这样，只剩下河南义军、固守着滑县县城一个据点。

清军攻占道口之后，立刻进逼滑县县城。那彦成先以一万三千余清兵将县城三个城门围住，又奏请兵援，堵住因兵力不足所空的正北门与西北门，以防义军突围。桃源义军首领刘国明，见滑县被围，遂率八百义军从北门冲人滑县城内，用轻车将李文成救出。随后聚合义军四千余人，攻人辉县山内的司寨。

清军见李文成等突围而出，在部置对滑县县城的四面包围之后，由杨芳率领一路清军尾追李文成至司寨前。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杨芳见难以强攻，遂采取诱李文成出寨，然后予以伏歼的策略。十八日杨芳以步骑兵各六百人分两翼，伏于白土冈山沟，次日清晨，派侍卫苏伦保等率兵来到司寨，义军见来犯清军甚少，便派出三千义军杀出司寨，苏伦保佯败后撤，义军急追之，到白土冈，遭清军伏击，义军退至南首山。清军仰攻山梁，义军登高而战，以巨石投向清军，清军人仰马翻，纷纷退下山来。杨芳在山下督阵，逼迫清兵继续攻山，同时派出一路人马绕到山后，对山上义军进行夹击，义军大败。

清军调过头来，重重围住司寨。义军白土冈一战失利，司寨内兵力亦显不足。二十日，清军开始攻寨，义军奋力与清军展开短兵相接的巷战，义军众将上占据寨内几百座民房，向外施发枪炮，弹药用尽则用石块掷向清军，使清军死亡无数。战至傍晚，双方仍相持不下，气急败坏的杨芳下令举火焚寨，同时枪炮齐发，猛攻民房。义军无隐蔽之处，又弹尽粮绝，纷纷被清军枪杀。李文成，刘国明等义军将领最后退到一座碉楼内，也被清军包围，杨芳下令喊话“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义军将士在碉楼内却大呼：“李文成在此，欲

杀即杀，断不肯降。”杨芳见义军誓死如归，不肯降服，遂指挥官兵攻入碉楼，李文成与仅剩十余义军将士相拥举火自焚。

李文成壮烈牺牲，使义军丧失了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但义军众将士的斗志并未因此而消沉。坚守在滑县的义军，被清军围困数月之久，但斗志不减，他们已做好了与县城共存亡的思想准备，欲与清军决一死战。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滑县县城保卫战开始了，清军先是以大炮猛轰城墙，欲打开缺口，以骑兵突入，但城墙为外砖内土中沙结构，“大炮攻之，遇沙而止”。清军改用挖地道、埋炸药、轰炸城门的方式，先炸开了西南城角的二十余丈长的城墙。炸开缺口之后，清军蜂拥而入，接着兵分五路先后攻破五个城门，其他各处清军也趁机乘云梯登上城墙，向城内展开全面的攻势，双方激战一昼夜。到第二天，义军仍占据着几十座民房，进行顽强的抵抗，清军再次采取火烧民房的办法，将义军逼出。由于清军人多势众，火力又很强，义军处于分散作战状态，被清军各个击破。李文成的妻子张氏，在“挥双刀死斗，手击杀数十人”之后，自缢身亡。大元帅宋元成阵亡，艮宫王王道隆、震宫王刘荣顺、巽宫王冯相林、坎宫王尹振、乾宫王寿光德等首领全部壮烈牺牲。牛亮臣、徐安国被俘，后解至京师，磔死枭首。随着义军最后一个据点滑县县城的陷落，轰轰烈烈的天理教起义被清朝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刘文智）

参考资料：

兰簃外史纂《靖逆记》。

魏源：《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变记”

昭梿：《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滑县之捷”。

兵部失印案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嘉庆皇帝在宗室王公及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到东陵拜谒。途中，忽然接到兵部奏报：兵部行在印信及印钥、钥匙牌全部丢失。嘉庆帝闻知，大为惊愕，当即命行在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衙门，派出捕役，在京城内严密查访。同时，命令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立刻拘捕兵部看守人员，严行审讯。

四月三日，嘉庆皇帝回到北京，审讯仍没有结果，只是兵部堂书鲍幹提供了一个假供词，供词纰缪甚多，案子仍未理出头绪。四月九日，嘉庆帝将参与审理此案的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罚俸半年，各衙门所派承审此案的司员罚俸一年。同时命令绵课等人加紧审理，不可懈怠，如再迟延，还将严谴降职，并限令务于五月五日前究出正贼或起获行印。

绵课等人见嘉庆帝必欲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遂不敢怠慢，继续对鲍幹等再严刑拷问，鲍幹不堪重刑，供出实情：上年八月二十八日秋围回銮时，在巴克什营行印连匣被窃。当天夜里，看印书吏俞辉庭睡熟，窃贼潜入，将缚于帐房中间杆上的行印连匣窃去。尔后，俞辉庭用备匣加封，贿嘱堂书鲍幹冒混入库。当时，兵部司员庆禄、何炳彝二人并未开匣验视。此后鲍幹又贿通书役莫即戈私开库门，移动印匣，做出行印在库被窃的假象。

案情查清了，嘉庆帝又令直隶总督方受畴、提督徐锟，选派

精干兵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营至密云一带，明查暗访，搜寻行印，捕获窃贼。但终因时间过久，寻查毫无所获。嘉庆帝也认为“此印大约难得”，最后，只得谕令礼部重铸新的兵部行在印信，铸印所需银两，责令兵部尚书松筠及上年秋围时署理行在兵部侍郎裕恩赔缴。

对与此案有关人员也进行了处置，如管理部旗事务的大学士明亮被撤职并降了五级，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英等，均被摘去顶戴，分别受到降职处分。

（刘文智）

参考资料：

古林：《嘉庆庚辰兵部失印案》

平定张格尔叛乱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叛乱后，于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在天山南北两路设立统治机构，建立起了军府制度。此后，清政府对选派到新疆任最高军政长官的伊犁将军及驻扎在新疆各地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军、政要员，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常常保举满员及左迁大吏出任边臣，以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以保障新疆地区的稳定。几十年来，在清政府的有效统治下，新疆地区与内地联系大大加强，在和平的环境之下，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

但是，随着清王朝的统治向着腐朽与没落的发展，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也开始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进入嘉庆、道光年间，腐败的政治也波及到边陲。在新疆地区，清政府所派官员，已非以前那样为政清廉，而多用侍卫近臣充任边官，致使新疆政务渐有废弛之势。凡到任领队、办事大臣皆与所属司员章京(军官)、伯克（行政官）互相勾结，以赋外加赋、税上增税等手段，向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巧取豪夺，婪索聚敛。驻新疆各地大臣，因不相统属，又距中央政府遥远，自恃无人稽查纠劾，便威福自出。嘉庆末年派往新疆南路担任参赞大臣的斌静，就是这样一个赃官，他不但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常抢夺民女，或为其占有，或为其役使，使当地人民十分怨愤，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此时，在乾隆年间发动叛乱而被赶出新疆的和卓家族，伺机

蠢动，企图利用人民群众对清朝官员的不满，准备再次发动叛乱，以恢复和卓家族昔日在南疆地区的统治，为首者就是大和卓博罗尼都的孙子张格尔。博罗尼都是在乾隆年间的叛乱中被清政府处以死罪的，后来他的儿子萨木克逃到了境外敖罕国，张格尔就是萨木克的第二个儿子。张格尔对被清政府赶出境外，过着流亡生活甚为不满，对和卓家族昔日在新疆的统治又甚为留恋。在敖罕统治者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利用和卓家族在维吾尔民族中的影响，常派人潜入南疆，煽动不满情绪，进行分裂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1年）八月，张格尔开始以武力搔扰南疆地区。他纠集了数百名布鲁特兵，侵入南疆边境，被清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兵将其击退，张格尔仅剩二十余人，舍骑徒步而逃。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张格尔复纠集安集延、布鲁特兵五百余人，由开齐山窜入境内，来到距喀什噶尔八十余里的和卓木墓地，在祭拜先祖的同时，于附近地区滋扰生事。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闻讯后，立刻命令协办大臣舒尔哈善、领队大臣乌凌阿率千余清兵前去清剿。张格尔领兵退入墓地围墙之内进行抵抗，清军蜂拥而攻，杀敌四百多人，张格尔见势不妙，突围而出，流窜于喀城附近，几天之内经他的煽动，当地维吾尔民众将近万余人追随其闹事。庆祥见张格尔人多势众，急忙调集各营卡兵，集结于喀什噶尔城内，分营驻扎，准备迎战张格尔。张格尔担心北路伊犁清军前来增援，遂遣使向敖罕请求援助，并向敖罕国王许下诺言，如攻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割喀城给敖罕，以为酬劳，所得子女、玉帛等共同分享。敖罕国王穆罕默德·阿里答应了张格尔的请援，亲自率万余安集延军到喀什噶尔城下，助张格尔攻城。清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敖罕侵略军遭到重创，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引兵退回敖罕。撤退时，有二三千敖罕军投入张格尔的帐下，张格尔继续进攻喀什噶

尔城，守城清军尽全力顽强抵御，两个月后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而被张格尔叛军所攻陷，庆祥自缢身亡。之后，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也相继失守。

在张格尔攻打喀什噶尔等西路四城的时候，北路清军已开始集结兵力。道光皇帝命陕甘总督杨遇春以钦差大臣身份统领陕西、甘肃驻防兵五千驰赴哈密，准备会合北路诸军进剿。但伊犁将军长龄认为，张格尔已占踞南路诸城，气焰十分嚣张，整个南路局势处于危急之中，只派五六千援兵，恐难应付，惟有速发大兵四万方可救急。道光皇帝遂指派长龄为扬威将军，山东巡抚武隆阿和杨遇春为参赞，又征调吉林、黑龙江三千骑兵出关，诸路清军会师阿克苏，兵力已达万余人，皆由长龄统一指挥。

此时，张格尔已攻陷南路四城，得手之后开始向北路窥视，先率兵三千攻占距阿克苏三百里的进兵要道柯尔坪。长龄令提督杨芳率清军将其击退，扼制住了张格尔东进的势头。

为收复南路四城，清政府继续向新疆北路增兵，到道光七年初，清军已达三万六千多。道光皇帝根据朝臣的意见，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清军分成正奇两路从阿克苏发兵，正兵出中路，循葱岭北河而西，是为攻击之师；奇兵从乌什草地而出，绕到喀什噶尔城外，是为邀截窜逸之师。但乌什一带山沟险狭，戈壁数百里，不易行军，其周围又有布鲁特部落环居，清军深人恐有闪失。故长龄等人决意更改方略，以步骑兵二万二千，力出中路，留下部分兵力坚守阿克苏等城。

道光七年二月六日大军出发，二十二日至大河拐地，尚未遇到敌军。此时清军深人半月，粮草已尽，只得宰杀疲驼羸马充饥。二十三日中午，行抵洋阿巴特，此地为一片平旷的沙漠，敌二万余人早已在这里据横冈五六里设下阻军。长龄命令兵分三路出击，长龄亲自指挥中路，武隆阿率左路，杨芳率右路。清军奋勇争先，杀上冈来，敌军难以招架，四散而逃，清军分数路追

杀，抢得粮草牲畜，敌伤亡大半。清军首战告捷，又得物资补济，士气百倍，继续前行。二十五日到达敌巢穴之一——沙布都尔城。此城四周皆为苇湖树林，敌军将湖水引入城周沟渠之中，在城前设数万兵力临渠横列，城后丛林中设有伏兵，以防绕袭。攻打这样一个城池，清军的骑兵难以发挥冲杀优势，故采取了先令步兵冒险越渠与敌军短兵鏖战，再派骑兵绕到城左右的浅渠横截入阵。双方展开激战，激战中，城中火药库爆炸，敌营燃起大火，敌军惊慌失措，首尾难顾，遂弃城而逃，清军乘胜追击，擒杀敌人万余，又大败林中伏兵。取得全胜的清军，在长龄的指挥下，稍事整休之后，直逼喀什噶尔城而来，欲一鼓作气将其收复。二十八日，清军抵达距喀什噶尔城十余里的浑河北岸，扎下大营。张格尔见清军来势凶猛，遂指挥敌众十余万人，在浑河南岸布兵列阵长二十余里，又构筑了横墙，以为屏蔽，墙头布列了无数堡垒，大有背城一战之势，见清军已到，便鸣号击鼓，虚张声势。长龄见敌势甚壮，又占据有利地势，而且敌众我寡，恐难取胜，欲退营十里，以缓师再进。但杨遇春等人认为清军孤军深入“利速战，难持久”，敌虽人多，但我士气正旺，应一鼓作气。遂下令让索伦一千骑兵绕到浑河下游，牵制敌势，杨遇春自率亲兵骤渡上游，其前锋先以火炮猛轰敌阵，杨遇春指挥清兵强渡浑河，冲入敌阵，大败张格尔军。紧接着急行十里，于三月一日克复喀什噶尔城。张格尔在清军尚未赶到喀城之前，已先行逃循。清军在城中仅擒获张格尔甥侄等亲属及敖罕将二人。不久，杨遇春、杨芳等人率兵攻克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此时的张格尔在新疆南路已无立足之地，从木吉地方逃出边境。在逃出之前，张格尔的残兵败将在维吾尔族民居处抢夺财物、诛杀无辜，激起维吾尔人的不满，以前受其蒙骗者也认识到了张格尔的狰狞面目。

张格尔逃出境内，投奔敖罕。长龄命杨遇春、杨芳率兵八

千，分道出塞，寻张格尔踪迹而追，杨芳一路追到帕米尔高原迤北的阿赖岭，被二千敖罕兵所伏击，激战一昼夜，清军伤亡甚众，不得不撤回境内。清政府也开始觉得擒一叛贼，没必要兴师动众，故令长龄罢西征之师，留八千清军驻守喀什噶尔城，以杨芳为参赞统之。

出逃的张格尔仍未死心，纠合残众，伺机再举。清政府得知其仍在活动，认为张格尔不除，对新疆的和平稳定总是一个威胁，必欲除之以绝后患。但擒获张格尔也绝非易事，因其随处流窜，又活动于境外，清军无法追踪。长龄等人遂商量了一个诱敌入境、围而歼之的办法，派人出边放出风声，说清军已全部撤回，喀什噶尔城内空虚，诸维吾尔民“翘首以望和卓”。张格尔果然信以为真，复率步骑兵五百，潜袭喀什噶尔。长龄、杨芳设下伏兵六千，严阵以待。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仍由开齐山旧路潜入阿木古城，闻知清军已有埋伏，急忙率兵折奔而逃，杨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尔铁盖山，将窜入之敌斩杀殆尽，仅余张格尔三十余人，张格尔弃骑登山，狼狈逃窜，被清军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等人擒获。

八年正月，捷报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甚为高兴，特下谕旨对出征众将帅大加封赏，并准备举行一个盛大的郊劳受俘仪式，迎接凯旋之师。张格尔等人被押解到北京之后，不久被处死。

张格尔等叛贼伏诛之后，清政府仍与敖罕国王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交涉，索要留在敖罕的张格尔的妻子及其家人。但敖罕方面以“惟回人经典无献和卓子孙之例”为由，不肯献出。清政府遂罢继续索要之念，严令杨芳及前去新疆办理善后事宜的那彦成等人严守边关，断绝与敖罕之间的商贸往来。但那彦成在处理与敖罕的关系时，采取了较为过激的手段，如驱逐安集延商民出境、没收其财产、禁止大黄茶叶出口等，激怒了敖罕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欲以武力加以报复，于是派遣部将哈库库尔率兵进犯

中国境内，焚掠维吾尔族民庄，又将喀什噶尔城围住。道光皇帝闻变，急令提督哈丰阿赴阿克苏，带清兵三千五百人救援喀什噶尔。清军大败入侵之敌于哈拉布札什，解了喀什噶尔城之围。敖罕兵退出境外。道光十年十月，敖罕遣使到喀什噶尔清军驻地，请求议和。道光皇帝接到敖罕求和书，考虑到平定张格尔叛乱不久，再对敖罕大张挞伐，实为国力所不允许，且敖罕之地，多为戈壁荒滩，枯山秃岭，清军出境作战，几乎没有取胜把握，故同意了敖罕方面的请求。双方拟定了互还俘虏、在敖罕的和卓家族成员由敖罕方面替中国圈禁、中国允许敖罕通商等条约。到此，新疆战乱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清政府用一年半的时间，调集三万六千余兵力，花费一千万余两帑银，终于平定了以出卖民族利益，企图实现个人野心的张格尔叛乱。又针对当时清帝国的国力及新疆的实际情况，与敖罕国签订了友好相处的和约，使新疆地区又出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

（刘文智）

参考资料：

魏源：《圣武记》卷 4 “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

乾嘉考据学之兴衰

在中国古代，任何一种学术思想与学术潮流，都是和当时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紧密相联的。要么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要么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回避现实，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而存在。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考据之学”就是一个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学术潮流。它的形成虽然有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但是清王朝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也是这种学术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它导致了清代学术向着脱离现实的方向发展，“考据”成了当时学术潮流的主调。

清王朝从入关以来，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总的来说是专制的。但不同的时期，视政治形势的需要，文化政策也相应有一些变化。而文化政策的推行与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对文人学者的态度反映出来的。

清王朝人关之后的十几年间，由于政权刚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又是以少数民族——满族对广大的汉民族进行统治，所以，满族最高统治者要依靠汉人，一方面是招纳降臣，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又以八股科举的形式，“开科取士”笼络文人，将其羁系。因此，这一时期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对文人学者的态度，是从“利用”这个角度出发的。

顺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清王朝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统治已经稳固，那些读书之人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而且这些人对清王朝抱有成见的头脑顽固不化，故满族最高统治者要使出些强硬的手段，

迫使其顺从对清王朝的认可。顺治十四年（1657年）之后，连年发起科场之案，对那些读书之人予以震慑。康熙初年，又以“以文罪人”的形式，接连不断地发起一个个文字狱大案，如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氏史案；三年的孙奇逢《甲申大难录》案；六年的沈天甫等撰伪诗集诬蹈索贿案；七年的黄培诗案株连顾炎武受审等等，对那些读书之人予以摧残。

康熙十二年，发生“三藩之乱”，国内政治形势有些动荡，文化政策又发生变化，由“高压”向“怀柔”方面转化，大有清初对待读书之人的那种“利用”迹象。康熙十二年，下令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要求荐举博学鸿儒；十八年，开设明史馆，将当时全国有名的学者吸收入馆，达到了既利用又笼络的双重效果。

但是，到了雍、乾两朝，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专制主义，作为打击文人学者的重要手段和具有清代特色的文字狱接踵而至，仅乾隆一朝的大小文字狱就有一百四十多起。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一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书籍，也遭到了查收、焚毁的厄运。

历经清王朝文化政策的反反复复，在文人学者身上已经看不到了明末清初那些思想家们著书立说、针砭时弊的锐意进取、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不得不把精力向与现实毫不相干的纯碎的学术研究方面转移。

以“稽古右文”而自我标榜的乾隆皇帝上台之后，由于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提倡学术，但文化专制又不能放弃，所以，他采取了一种迂回的统治策略，即引导那些文网密布之下面惴惴不安的文人学者，将无以抒发的聪明才智向整理遗书、钻研古籍方面转移，以此来达到加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

因此，从乾隆以后，一种专门从事章句训诂、铨释文义、考究名物的所谓“考据学”兴盛起来，一直到嘉庆末年，成为名噪一时的“显学”。

当然，一种学术潮流的形成有时代的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也有其自身的学术渊源，就这方面来说，乾嘉考据之学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在学术界有两大家：一为顾炎武，一为黄黎洲。两位大师皆以“务实”为其学术宗旨，故“经世致用”是其学术思想的灵魂。

明朝末年，弥漫于学术思想界的是“束书而从事游谈”，文人学者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于“经世”治国毫无相关。而这一时期，正是明王朝面临覆亡的危险：内部阶级矛盾已经白热化，农民大起义风卷残云，沉重地打了明王朝的统治；外部满族武装势力的入侵，严重地威胁着明王朝的政权。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明朝的统治阶级还沉缅于酒色和争权夺利的内部角逐上，一些有识之士和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对此甚为不满，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拯救民族于危亡的责任感在他们中间产生。

顾、黄二人正是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也正是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针对宋、明以来，官方倡导的“理学”已经成为一种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的“空学”这种现象，从儒家正统的观念出发，给以毫不容情的批判，指斥宋明理学不是儒家正统学说，而真正的理学实际上就是“经学”，故提出了“理学，经学也”这样一个命题。之后又进一步阐明：经学是“明道救世”之学，是作为“经世之用”的。而经学的“本源”是东汉时期的古文经学。这样，他们就扛起了经学的旗帜，以恢复古代的经学相号召，廓清人们对宋明理学的认识，唤醒人们参与的意识，以此来求得救国救民的方法。

而要恢复经学，亦即东汉的古文经学，首先必须对“经”有所通，所以他们采取了从文字音韵入手的方法，即“读经自考文

始，考文自知音始”，以此来理解经义，达到通经的目的。而从文字音韵入手，必须要博览群书，具备深厚的考证、诠释的功底，要有一种朴实无华的、谨慎严密的治学态度。通过“博学于文”，以严谨的态度，恢复“经”的本来面目，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继顾、黄诸大师之后，新崛起的一代学者如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王夫之等人，皆以平生的精力，穷经解义。而将顾炎武等“博学于文”的思想发扬光大者，首推阎若璩、胡渭二人。阎若璩所著《古文尚书疏证》，胡渭所著《易图明辨》等，皆引经据典，一一考证，辨明真伪，成为在考据领域承前启后的代表作。但是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这一代学者，汲取了前人“博学于文”的治学方法，却回避了“经世致用”的实践内容。

这之后，清代进人雍正统治时期，紧张的政治空气，再一次迫使文人学者们回避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纯碎的学术研究中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及目的完全丢掉了，而为学问而治学问的考据之学应运而生。到了乾隆、嘉庆年间，这一学派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有人形容这一时期考据学的盛况时说“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许、郑、贾、马都是汉代有名的学者。这也是乾嘉考据学也称“汉学”的缘故。

考据学兴起之后，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当时的学者们也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达到了穷经皓首，铢积寸累，以至“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的地步。在这样一个学术潮流中，有不同的派别，派别之中也涌现出不少的名家和出自名家之手的考据名著。

就派别而言，称大宗者为吴派和皖派。另外尚有以焦循为代表的扬州派和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派等。

吴派以惠栋为中心，其特点是好博尊闻，崇奉汉儒，以汉朝

人之是非为是非，以信古为标识，有纯汉学的味道，故常以正统派自居；皖派以戴震为中心，其特点是注重精审，不拘于古说而善于创新，以求是为标识，有真正考据学的味道。故戴震在当时被一些学者视为考据学的"集大成者"。

惠栋（1697—1758年，清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他的学风继承了顾炎武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的意义。在求得经书真正含义的过程中，他批判了魏晋以来，特别是宋代儒者们对经书因一知半解而导致的曲解。而对经书的一知半解，又是由于对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没有搞清楚的缘故。因此，要了解经书之真义，就要探寻其本源，而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要求得真知，要恢复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只有回复到汉代儒者们的经说上去。因此，惠栋主要的治学方向是对汉人的易说搜辑钩稽，将汉儒经说全盘继承下来，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特别是《周易述》这部学术著作，完全抛开了魏晋以后的注释，以汉儒经说为根本，进行注疏，使"绝者千有五百余年"的汉学"至是而粲然复章矣"。

惠栋举起汉学的旗帜之后，他的朋友和弟子们，如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钱大昭等人，都恪守着惠栋尊汉的学术途径，成为正统的汉学派，并由此而构筑起了森严的汉学壁垒。

吴派形成之后，接着又出现了考据学中的另一个派别——皖派，其代表人物是戴震。皖派的出现，使清代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它把考据学推向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最高峰。汉学中的吴派是在抨击宋学、推崇汉儒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并与宋学呈分庭抗礼之势；而皖派的形成，则把汉学推向了清代学术研究中一统天下的高度。

戴震（1723—1777年，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字东

原，安徽休宁人。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音韵训诂上。从单韵、训诂的基本工夫人手来解释经义，并取得很大成绩。另外他对古天算、古地理也有一定的研究，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代表作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图记》等等。他不但是一位考据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比较唯物的。他认为所谓的天道，不过是客观的“阴阳五行”而已，而“阴阳五行”又是在生生不息地运动变化的，这个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也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他的这种思想，反映在对汉学的研究上，即注重事实，实事求是。他对汉儒治经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像吴派那样，完全以汉之是非为是非，认为汉儒也有附会之处，需要甄别其是非，同时主张不能抱守残缺，要在学精学通的基础上去创造。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循其为学之道，在考据上都大有作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探求古经真意上，使人“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校勘了古书十八种，他的另一部著作《广雅疏证》，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之作。因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比吴派在治学的态度上要进步，考据的成绩也大一些。其在强调为学要精、深、博的同时，还强调了融会贯通，没有完全陷入到吴派钻入牛角尖而不能自拔的境地中去。

惠栋奠定了清代考据学的基础，而戴震则把考据学推向了高峰，在他们所高举的“汉学”的旗帜之下，汇聚了一大批以考据见长而闻名全国的专家学者，他们以渊博的学识、精密的考据，开拓出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学术途径，树立起了新的学术思想和风格。而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还以他那深刻的哲学思想及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随着考据学的发展，考据学本身所存在着的弱点也明显暴露出来。这弱点就是考据日趋烦琐，为一事一字寻求繁复的证据，

其研究课题离现实越来越远，以致在考据学者们的内部也出现了异议和分歧。同时，已沉默多年的宋明理学也不甘寂寞而伺机向考据学发起攻击。继戴震之后，他的学生和弟子们逐步地分化了。一派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以更加严密、精细的方法，把音训考据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他们对戴震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发挥；另一派以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他们在从事音训考据的同时，对戴震的哲学思想大有发挥，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已不是那么尖锐。内部的分化，使极盛一时的所谓“汉学”开始发生动摇，而此时作为理学的卫道士们，如翁方纲、姚鼐等人也公开向汉学家们攻击漫骂，汉学已开始失去其往日的光彩。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北方的天理教、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边远地区的回、苗、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反抗清王朝的统治。与此同时，进入十九世纪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也加快了向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各种方式向着清王朝闭关着的大门不断冲击，使清王朝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危机。此时此刻，时代的震荡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波澜，已经使人们不能再埋头于故纸堆里而于世事不闻不问，有志向的知识分子们纷纷从与世无用的汉学中脱离出来，把眼光转向现实，寻求一种能够济事救国的新的学术门径。

这种新的学术门径，既避免了汉学家们对古籍经典的烦琐考证，也摒弃了宋学家们对性理的高谈阔论，而是向着清初“通经致用”的传统恢复，向着能离现实更近、与世有用的学术方面寻求。因此，在考据之学走向衰落的时刻，一种要在古经传中“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言表之外”，以古论今的今文经学迅速崛起。今文经学家们提倡的是“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区时”，其主张

是改革旧制度，适应新形势，把学术研究与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学派立即赢得世人的认可，广大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投入到这一学术潮流中去，而乾、嘉考据之学至此也结束了它曾为达官贵人、学者书生所仰慕的辉煌时代。

（刘文智）

参考资料：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江藩：《汉学师承记》。

《大清一统志》之纂修

《大明一统志》在明英宗时期修成后，先后刊印五次。尽管每一次刊印时都进行了修改，但由于《大明一统志》修时匆匆，因而即使到清人入关，其缺漏差误依然颇多。也就是说，《大明一统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不适应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统治者的需要了。

满族入关，主政中原。在统治刚刚确立、立足未稳之时，进一步消除明王朝在大清帝国的影响，纂修一部清代的一统志以取代《大明一统志》已势在必行。而清朝由于疆土的开拓，人口增加以及土地赋税等问题，统治者需要有一部能提供全国基本情况的书籍，因而又敦促了《大清一统志》的早日纂修。

早在康熙八年（1669 年），康熙帝在剪除鳌拜、掌握实权之后，即诏令天下各府州县纂修志书，“复命儒臣纂修《大清一统志》”。这正是清朝全国规模修志的开始，也是皇帝诏修《大清一统志》的开始。

为引起地方官的重视，康熙皇帝“诏频下于庭”，督促地方修志。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康熙帝多次下诏天下郡县纂修方志，以供一统志之采用。其中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对各省修通志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清统治者把修通志作为修《大清一统志》的一个主要步骤，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此之后，从康熙十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又多次下诏纂修各地方志。康熙二十四年，徐乾学擢内阁大学士，充任《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后徐乾学奏请归省，皇帝准假回籍，并让徐乾学仿宋代司马光的故事，书局自随。次年三月，朝廷正式设立“一统志”馆，设总裁七人，副总裁六人，纂修官二十人。这次编修，名为蒋廷锡负责，实际由陈廷敬、徐乾学总领其事，顾祖禹、阎若璩、齐召南等著名学者预修。

康熙二十五年，皇帝还赐御书“光焰万丈”的匾额给徐乾学，足见康熙皇帝对这位著名学者的敬重和对纂修一统志的重视。到康熙三十三年，康熙皇帝想知道编纂情况，特意下令徐乾学等到京修书。康熙皇帝还爱屋及乌，命徐乾学之弟徐秉义也到京修书。可惜徐乾学未闻皇命即病卒，遗疏呈进所纂修“一统志”。

值得注意的是，徐乾学可能未辱皇命，修成《大清一统志》，只是未曾刊印而已。徐乾学之孙曾写道：“先大父司寇公曾奉简纂修‘一统志’告竣，屡蒙圣祖仁皇帝（即康熙帝）御书宠钧、覃恩褒奖。”而阿琳在序《耒阳志》时也提到：“皇上御极之二十九年，诏词臣修‘一统志’，渐次告成。”无论如何，徐乾学的去世，给《大清一统志》的收尾工作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康熙皇帝因皇室内部争斗，无心顾及《大清一统志》；否则，我们现在可能能看到一部康熙年间纂修的《大清一统志》。

雍正元年（1723 年），雍正帝登基之始，即诏令儒臣董其事、周学健主持纂修《大清一统志》。雍正三年，雍正帝又以《大清一统志》长时间纂修不成，“慎简重臣效率就功”。之后，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在各省通志陆续成书的基础上，先后任命蒋廷锡、兰枝、邓钟岳、方苞为《大清一统志》总裁，直接负责纂修《大清一统志》。

雍正皇帝对《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十分重视，每每亲自检看

各省所上通志。在雍正六年的上谕中，皇帝对广西巡抚李绂所修《广西通志》提出严厉批评，勒令重修。“一统志”总裁官蒋廷锡等曾上奏，提出清代初期志书对名宦人物多有缺略，又有冒滥，希望修志必须详查核实，信今传后，请皇帝下令各省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详细查核，于一年之内，保送到“一统志”馆。雍正皇帝马上诏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必考据详明，采摭精当，在一年内完成上奏；若情况特殊完不成者，可宽至二三年内完成。在朝廷的一再督令下，各省纷纷设立志局，重新修志。雍正一朝，为纂修《大清一统志》，各地修志情况日见其好，各省通志陆续上奏。

尽管雍正皇帝未至花甲即撒手西归，但是他发动起来的修志事业并未停止。乾隆八年（1743 年），《大清一统志》完成，共三百四十二卷，于次年颁行。其书体例为：每省都先立统部，冠以图表。分列为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而各府及直隶州又各列一表，所属诸县附录入内，又分为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各分为二十一门。这是清代编修刊印的第一部《大清一统志》。

乾隆时期，清廷陆续平定准噶尔部、回部、大小金川，西南土司相继归附，版图进一步扩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而内地各直省户口繁衍，田赋日增，物土人文之盛远非昔日可比；与此同时，新置的厅、监不断增加，府、州、县时有并改，政区变化亦大，第一部《大清一统志》已显得内容陈旧，不能满足新的形势需要。因而有必要新修一部“一统志”来代替它。再者，第一部“一统志”在记载、体例、征引、详略等方面也有欠缺，而考稽的失实，挂漏冗复亦时有发现。于是，清朝统治者决定重修《大清一统志》。

“一统志”二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乾隆皇帝对“一统志”馆馆臣说，以前“一统志”成书总是要待各直省通志修完后再纂辑而成，旷日持久，难以集书；因而这一次只是把已纂成的直省通志加以核实，而新增加的如新疆则可根据《西域图志》和《同文志》诸书为蓝本排撰，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又晓谕馆臣“随缮随进”，把廷臣上呈的稿本由他亲自过目，认真审定。

乾隆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乾隆帝屡次下诏重修《大清一统志》，诏取各直省通志。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令袁守侗、和珅等责成《西域图志》、《热河志》定限速纂并进行核查。次年，乾隆帝命刑部右侍郎钱汝诚阅办《大清一统志》。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奉命承办“一统志”的户部尚书和珅、兵部左侍郎曹文植上奏道，自乾隆二十九年开馆以来，已陆续上进十五省通志，共二百八十卷，还有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外藩一门正在纂修之中。

在纂修“一统志”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活动，即《四库全书》的修纂。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部分被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志书被销毁，光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和“抽毁书目”所著录志书就达几十部。乾隆四十四年，皇帝还特意下了一条谕令，凡各省志及府州县志要悉心的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而志书内容录有严禁书籍的，均应删削，不要草率从事而致有疏漏。另外还因为修方志而兴文字狱多起，如乾隆三十一年《遂安县志》案，乾隆四十六年《海澄县志》案，乾隆四十七年《沧浪县志》案，还有《清凉山志》案等，许多修志人员因此受到牵连，这一切都妨碍了《大清一统志》质量的提高。

当然，另一方面皇帝亲自审查志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又有利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乾隆四十七年的一条上谕，中间提到，对所呈进的“一统志”内，松江府的人物，只载有王顼龄、王鸿绪等人，而名士张照因从前办理贵

州苗疆而获罪，因而将其删削。乾隆皇帝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张照的文采风流不下于董其昌，若不登志乘，致使一代文人学士数十年泯灭，是不行的。张照资学明敏，书法精工，实为海内所推重，“瑕瑜不掩，公论自在”。皇帝让馆臣将张照事迹一并载入。如其他省志有类似情况的，也一并载入，并通谕朝廷内外知道。这又对《大清一统志》的纂修起到了督促作用。

乾隆四十九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成书，乾隆皇帝亲自作序。

重修的《大清一统志》突出了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增加了边疆一些地区。由于馆臣为让乾隆皇帝生前看到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故书内依然有许多考稽失实、挂漏冗复的现象存在。龚自珍任校对官时，曾指出了二修的《大清一统志》的问题有十八处，枝节问题尚且不论。

但总的来说，重修《大清一统志》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由三百四十二卷增加到五百卷，质量也较第一部有较大提高。

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帝在亲政两年之后，即诏修“一统志”，命令征集天下府州县志及近年增制更旧的各条目，开馆编纂。

嘉庆十六年正月，清廷方略馆奏请攒办《大清一统志》，由大学士庆桂等酌情拟定章程上奏，嘉庆皇帝谕允。于是《大清一统志》的三修工作又大规模地开始。同时嘉庆皇帝命令各儒臣到各地征集志书。

嘉庆二十二年，嘉庆皇帝再次重申纂修《大清一统志》，外省督抚行文各府、州、县将各地志书汇集呈缴。

到嘉庆二十五年，三修《大清一统志》未能完成，而嘉庆皇帝却遗恨宾天。

道光八年（1828年），道光帝下诏重修《大清一统志》，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事业。道光十一年，道光帝又命儒臣续辑“一统

志"，并征收天下舆图。

道光二十二年，三修《大清一统志》告竣。道光帝亦亲自作序。这次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所辑资料又以嘉庆二十五年为多，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

《嘉庆重修一统志》按省、府州、县三级叙述，每省下设统部，综述一省之建置沿革、户口田赋、职官名宦。各省府皆绘地图，列建置沿革表。府州列门增至二十七门，有图、表、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等项。

三修馆臣据各省各地提供的资料，并根据《八旗通志》、《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广采博征，认真参稽，与前两部《大清一统志》相比，有了较大改动。

其一，增补门类，充实内容。《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嘉庆二十五年为限，增补了四方面内容：一、新建或新葺的城池、学校、山岳江河神庙、河工海塘事宜、陵墓、寺观等；二、充实了各府州人学名额；三、增加西南土司承袭裁汰事项；四、增加"税课"门，补载盐课和关税。以地区而论，增补情况很不平衡：内地各省增加甚微，边疆地区增加明显。由于增补了门类，充实了内容，全书总卷数从一修的三百四十二卷和二修的五百卷，上升到三修的五百六十卷。

其二，完善体例：一修、二修的体例未妥之外，三修时进一步加以完善。如统一以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为序记四止，从而使条理分明，排列科学。

其三，正讹补脱。对一修、二修未作辨析的错误，三修皆作了考辨。一修、二修脱漏之处，三修也作了增补，如瑷珲将军

萨布素为黑龙江名将，一修、二修均未载，三修始收入黑龙江“名宦”。

经过第三次修订，《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质量明显超出了前两部清“一统志”。

《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嘉庆二十五年版图为据，首叙京师，次叙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二十二统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区。最后附“外域朝贡诸国”。对于京师及兴京所在的盛京统部还设有二十七目之外的“坛庙”、“宫殿”、“行宫”、“苑囿”、“官署”等项与其他地区略有区别。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诸项内容，直接记述各部情况。

《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容十分丰富，除侧重叙述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外，还包含了许多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材料。

在人文地理方面，记载了城池、风俗、学校、古迹、户口、田赋、土产、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驿站等项内容，每一项之下又分为若干细目，如“古迹”一项，设有故城、里、乡、村、垒、亭、台、楼、阁、馆、坛、街巷、园、苑、宫、圃、殿、堂、宅、碑、废卫、废所、废路、旧地等。

在自然地理方面，记载了各地区的地形大势：山、岭、冈、峪、坡、石、嶂、洞、洲、滩、岛、屿、礁、矶；江、湖、河、海、溪、涧、浦、港、湾、荡、沟、渎、潭、泽、池、圹、泊、泉、井；以及沙漠、矿藏、气候和土壤等。其中，关于各地水体的记载，尤为系统全面，它述及的水体之多，范围之广，是任何水利专书和地志无法比拟的。

当然，《嘉庆重修一统志》也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有错误或不妥之处。但在编纂水平和学术价值方面，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地方志少之又少，自它问世以后一百多年间里，没有出现一

部取代它的地方志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到清代同治时期，又有"一统志"续修之令："同治丁卯岁（同治六年，1867年），京师将续修'一统志'，上谕通敕各直省督抚臣广征所属郡县新旧志书，增加省志，贡之于朝，以备采择。"这是清代《一统志》纂修的最后一次出现。由于内忧外患，最后不了了之。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始于康熙八年（1669年），止于同治六年（1867年），为时两个世纪，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七世，几乎贯穿有清一代。

《大清一统志》大规模、有计划的纂修则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计一百五十余年。大的纂修分为四次：第一次从康熙二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前后，此时未完全成书；第二次从雍正六年至乾隆八年，《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刊印；第三次从乾隆二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五百卷告竣；第四次从嘉庆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嘉庆重修一统志》问世。

由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首先必须征集各省通志；而纂修各省通志，又必须先征集各属府志；纂修府志必先征集所属州、县之志。而州县属于清代基本而又重要的行政单位，因而《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实际上起到了纂修地方志总号召、总动员、提纲挈领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有清一代地方志的蓬勃发展，把清代方志学推向了兴盛时期。

（戴柏俊）

参考资料：

《清实录》。

清代有关方志。

方志学之兴盛

方志学滥殇于秦汉，成型于两宋、发展于元明，兴盛于清代。

方志起源之时，有《禹贡》、《山海经》出现。严格意义上说，这还是些古代地理书。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秦地图》、《畿服经》、《舆地志》、《荆州记》、《华阳国志》等相继问世，始露方志之雏形。

到隋唐，又出现了《诸州图经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域图志》、《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此时多称图经，以"志"命名者亦有出现。这一时期为方志学的繁荣及方志体例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方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方志的内容和体例进一步完善并定型。全国性的志书有《祥符州县图经》、《九域图》、《太平寰宇记》；地方性志书有《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剡录》《吴郡志》等上乘之作。

元代是方志学进一步定型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集各地方志而修全国一统志。《元大一统志》是中国第一部以大一统志命名的全国地理总志。元代各路、州、县也陆续编纂了不少方志，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所纂修的方志不下一百六十种。

明代是方志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帝国建立之后，明代皇帝中明太祖、明成祖、景泰帝、明英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思宗等九位皇帝曾多次诏令纂修地方志。明成祖朱棣，西人称其为“马背上的皇帝”，还两次颁布《修志凡例》，为地方志的体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使方志学进一步完善。有明一代，所修志书在一千六百种以上。明代修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以省为范围普遍修志，现存明代省志有三十七种。明代还出现了边关志，如《山海关志》、《延绥镇志》、《四镇三关志》等，这标志着明代方志学的普及已不仅仅限于中原发达地区。

综览明代方志编修事业，有如下特点；第一，官修方志成为主流，私撰志书已不多出现，即便冯梦龙的《寿宁县志》，也是以知县身份撰著的；第二，方志的品种和体例更加多样化，在纂修方志上，逐渐分化出繁、简两派；第三，明代志家普遍将史书的编纂原则及方法施用于修志工作中，对方志编纂理论贡献颇大。但在具体实践中，明代方志由于风气所尚，或失之芜，或失之简，佳作不多，在质量上反逊于宋元方志；第四，明代方志纂修的数量大增，固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但官修方志也带来一些流弊。

总之，明代方志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清代方志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是我国方志学的兴盛时期。

清王朝入关后，为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各地的修志活动就陆续展开了。因为满洲人崛起并进踞中原，他们看到了蒙古人的征服事业，也看到了汉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如果满洲人想在关内立足并长期统治整个中国，那么，他们除了发挥其精明的战略和威猛的骑兵外，他们还必须顺应汉民族心理，采用汉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纂修，正是清帝国以

皇帝为代表的满洲统治者顺应宋明传统而作的努力之一。

现存一些顺治年间纂修的方志即是清人入关初留下的产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贾汉复修、沈荃纂的《河南通志》，该书成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共五十卷，采平列门目体，分为图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烈女、流寓、隐逸、仙释、方伎、艺文、杂辨，计三十门。为编《河南通志》，时为河南巡抚的贾汉复还颁令全省各府州县编修志书，使当时河南八郡十二州九十五县之志，渐次报竣。康熙元年（1662年），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着手编修《陕西通志》，于康熙六年成书。《陕西通志》基本仿自《河南通志》体例，只是增加了与经济制度相关的一些门类，如析田赋的贡赋、屯田、水利、茶法、盐法、钱法、马政等。《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是最早完成的两部清代通志，两书的告竣，既为各省编纂通志树立了样板，也为筹编一统志做了准备。

康熙年间，是清代方志学兴盛的第一个时期。康熙初年，权臣鳌拜跋扈，擅权恣肆，打击控制汉族特别是江南士绅，加深了满汉矛盾，汉人反清复明火焰更炽。在亲政两年之后，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康熙帝智擒鳌拜，惩处其党，加强了皇权。在文化思想领域，由于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等人大力提倡，同时也由于明末的史家们追怀故国、眷念旧朝，满怀一腔热忱，希望通过写史撰志来平衡一下“苟且偷生”的矛盾心理。康熙敏锐地洞察了这一切，及时地抓住了这一契机。

康熙八年，皇帝诏天下各修志书，又命儒臣纂修大清一统志，这正是清朝全国规模修志的开始。而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请颁令各省纂修通志，并依照河南、陕西二通志的样式，编辑成书，交翰林院备纂《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

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命各直省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分别于康熙八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四十三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五十一年、五十七年计二十三年里诏令三十余次纂修方志，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志的编纂。

在朝廷的督促下，康熙年间，清朝所辖直隶及十五个省均陆续编修了通志。共计所修通志有《贵州通志》、《四川总志》等二十一种。康熙一朝仅现存方志即有一千余种，年均十六种，由此可见康熙年间方志学的发展。

雍正年间，方志学的兴盛继续维持。雍正六年（1728 年），《大清一统志》总裁官蒋廷锡等建议各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在一年之内送到一统志馆，供一统志采用。雍正皇帝下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须细加核实，采摭精当。在朝廷的一再督促下，各省纷纷设立志局，重修通志。自雍正七年至乾隆六年（1741 年）十三年间，又有十九部通志付梓，分别为：《广东通志》（六十四卷）、《湖广通志》（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四川通志》（四十七卷）、《山西通志》（一百三十卷）、《浙江通志》（二百零八卷）、《陕西通志》（一百二十卷）、《河南通志》（八十卷）、《盛京通志》（四十八卷）、《山东通志》（三十六卷）、《江南通志》（二百卷）、《陕西通志》（五十卷）、《甘肃通志》（五十卷）、《云南通志》（三十卷）、《贵州通志》（四十六卷）、《福建通志》（七十八卷）、《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

雍正间诏编的各省通志普遍较康熙年间编的通志卷帙增多，门目增广，并添加了许多近代人物史迹。如康熙朝纂的《浙江通志》仅五十卷，而雍正朝纂的《浙江通志》增扩至二百八十卷。

且与旧志相比，增加了十七个门目；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列出典；其体例也比旧志要好。雍正朝纂的《浙江通志》被收入《四库全书》中。

值得着重提一笔的是，《大清一统志》的三次纂修。

由于康、雍、乾三代大规模地诏修通志，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做了充分准备。

《大清一统志》的第一次纂修始于康熙二十五年。这一年三月，朝廷设立“一统志”馆，设总裁七人，副总裁六人，纂修官二十人，由陈廷敬、徐乾学负责纂修工作。雍正十一年八月，方苞被任命为“一统志”总裁，继续编纂。至乾隆八年完成。共三百四十卷，于次年颁行。较之明代的一统志《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均有很大进步。

《大清一统志》的第二次纂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续修原因起缘于边疆诸部内附，平定大小金川。乾隆四十九年完成，共四百二十四卷，通计子卷则五百卷。

《大清一统志》第三次重修，起于嘉庆十六年（1810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共五百六十卷。

由于《大清一统志》的三次纂修，乾隆、嘉庆八十八年间，所修府州县志仅现存者即超过一千三百种，多于顺治康熙年间总和，从而形成清代方志学兴盛的第二次高潮。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由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朝廷广泛搜求历代旧志，同时多次诏编新志。雍正年间还规定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各省府大都设立志局或志馆，由省府长官领衔主修，聘请当地名流主纂。由于各级官府的督促与参予，各省府州县对志书的编纂持续不断。这是清代方志学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

道光、咸丰时期，由于清廷的腐败，内外交困，因而志业萎顿，成书者寥。即使如此，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志书，

如两广总督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浙江通志》。

清代晚期，方志学又有一个转圜重兴时期，那就是同治、光绪时期。

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了辛酉政变。咸丰时期的顾命八大臣赐死的赐死，弃市的弃市，革职的革职，从而两宫垂帘，恭王辅政，步入“同治”时期。

政变之后，胜利者采取了一个两面政策：对内，赋权于汉人大臣。作为那个时代的骄子曾国藩、李鸿章及其同僚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了帝国的治国精神。对外，接受不平等条约制度以“绥靖”西方列强。这样，就开始了帝国的“中兴”。正如芮玛丽（Wright，Mary C）所言：同治时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清帝国督抚作用至关重要。在地方志纂修方面，形成了晚清修志特色：督抚修志。

同治七年（1868 年），江西巡抚刘秉璋奏修《江西通志》，各府州县开局编修。

同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曾国荃下令纂修《湖南通志》，开局采访。

之后，（同治）《畿辅通志》、《江南通南》、《山西通志》、《湖北通志》、（光绪）《畿辅通志》、《山东通志》、《吉林通志》、《湖南通志》、《甘肃通志》等先后在督抚命令下纂修，而省以下各府、州、县志也相应纂修，这一切都有力推动了清末方志学的兴盛。

光绪末年，清朝学部颁行编辑小学堂课本乡土教材例目，乡土志作为方志学的一种新的形式蓬勃发展。从 1905 年至 1911 年六年间，全国编修乡土志不下四百五十种，乡土志的编纂不仅为

输入西学、普及教育提供了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也为中国地方志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同治、光绪时期，所修方志达一千余种，年均二十余种。为历朝所不及，从而形成清代方志学兴盛的第三次高潮。

综上所述，清代方志学兴盛的三次高潮把中国方志学的发展推向高峰。据统计，传于今世的清代各类方志约六千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统计的八千余种方志中，清代方志有五千六百余种，约占百分之七十。以现行区划考其分布，四川最多，有四百七十余种，江西次之，四百余种，山东再次之，三百八十五种，以下依次是河北（三百七十四种）、河南（三百七十种）、浙江（三百六十七种）、江苏（三百三十七种）、广东（三百三十二种）、山西（三百三十二种）、湖南（三百二十七种）、陕西（二百二十八种）、湖北（二百七十种）、安徽（二百五十八种）、云南（二百余种）、福建（一百六十八种）、广西（一百三十三种）、甘肃（一百三十种）、新疆（九十六种）、上海（八十九种）、贵州（七十六种）、辽宁（六十九种）、台湾（四十二种）、北京（三十三种）、吉林（三十二种）、天津（十九种）、宁夏（十九种）、西藏（十七种）、内蒙古（十六种）、黑龙江（十二种）、青海（七种）。

清代方志学的兴盛还表现在清代方志编修多能依循六十年一纂的例则，定期续修。以通志为例，直隶地区的《畿辅通志》一修于康熙十年（1671 年），再修于雍正十三年（1735 年），三修于同治十年（1871 年）。福建省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同治十年，四修通志。云南省通志编修最为频繁，先后成书五种。清代二十二省，差不多每省都纂有三四种通志及其他类型的志书。

清代方志品类众多。居主流地位的就有一统志、通志、省志（一般又称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镇志。清代基层单位修志极其频繁，府、州、县设立志局、志馆极其普遍，而成书

之众，数倍于以往历代。江苏丹徒，自顺治至宣统，先后纂修县志七种；山东泰安，自康熙十年（1671 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里，也分别纂有府州县志七种，平均每三十余年即编纂一种。在县志中还出现了综括两三县的合志，如江苏的《上元江宁两县志》、《昆新两县志》、《常昭合志》、《吴长元三县合志》等。清代乡镇志的编纂也很普遍，尤以江浙地区为多，仅江苏即有《竹镇纪略》、《甫里志》等几十种，其中《甫里志》自康熙至光绪凡四修。镇志中也有合志，如马幼良的《四镇略迹》记述了常熟东乡老吴市、董浜、归市、苏家尖四地事迹。

清代方志学的兴盛还表现在清代私家撰述的各类志书很多。梁启超将这些著作分为七类：一、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如师范的《滇系》、许石华的《海州文献录》；二、专记一地方重要史迹者，如《广陵通典》、《明州系年要录》；三、专记某地区人物者，如《松陵文献》、《大清畿辅先哲传》；四、专记某地区风俗轶闻者，如《广东新语》、《深州风土记》；五、不肯作全部志，而摘取志中应有之一篇为己所研究有得者，如《四明望族表》、《两粤水经注》；六、有参与志局纂修，但由于各方面原因不能把自己的意图反映出来的，因而私自撰写别传者，如《邗记》、《山阳志遗》；七、有一州县内在纂写一部志书后又单列一个方面而成专志者，如《来青文献》、《北湖小记》。

清代方志学的兴盛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即清代方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清代中叶，章学诚对纪传体方志进行了较大改造，创立了三书体，即将方志分为志、掌故、文征三部分，形成一种新的志体流派，并对近代方志的编纂产生较大影响。

清代方志学理论更加注重编纂方法的系统探究。由于讲求训诂考证的学风渐盛，志家对方志纂修中的资料采集、史实考辨予以更多的注意；又因诸家学者普遍将修史方法用于纂志，以纪传

体编纂方志，以撰述方式叙事，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清代志家对于志书各种流弊进行了分析总结，提出了不少有益于后世的经验之谈。清代学者对方志的研讨，已不限于志书序跋中申述意见，还出现了相当多的专论，如陆陇其的《灵寿志论二十条》，章学诚的《修志十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方志分立三书议》，戴震的《与段若膺论县志》等。其中，以章学诚于方志研究用力最深，且有不少创新见解。章氏去世三十年后，其子章华绂在开封刻印了他的著作《文史通义》，外编全为方志论文，从而成为历史上第一部方志学理论专著。

在编纂方志和进行方志理论探讨的同时，清代学者还对古代方志展开整理、利用和考证工作。乾隆间，由于编纂《四库全书》，其史部地理类收历代志书数百种，由纪昀等人主持编写的《总目》还对每部志书的体例、内容、作者、版本及优劣得失，逐一撰写提要，进行评论。嘉庆年间，周中孚仿《四库全书总目》撰写《郑堂读书记》，其《补逸》列地理书二百三十三种，包括总志十种，通志二十种，府县志八十六种，镇志三种，水利志十三种，山川志五十一种，古迹志四十五种，杂记志六十六种，其他地理书三十八种，每种各有提要。清雍正间官修《古今图书集成》，在各部类“汇考”、“杂录”中也广泛采录了各地志书的记载。清人在研经治史中利用方志资料考证名物，对前代著述纠谬补阙，更是不胜枚举。此外，乾嘉学者在论证方志渊源性质，论次编纂得失之余，还写了大量记述旧志的题跋，对传世宋元明方志的作者、版本、成书年代和体例特点做了精深的考证，如朱彝尊、全祖望、钱大昕、纪昀、顾广圻、阮元、刘文淇、周中孚、徐时栋等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清代学者在旧志整理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不仅为保存古代文献做出了贡献，也拓宽了方志学领域，为创立方志目录学和方志史料学奠定了基础，成为清代方志学兴盛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清代文字狱的威慑，文人不敢轻作野史，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有的埋头考经证史，有的则参预修方志，以此“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方苞预修《浙江通志》；施闰章主修《袁州府志》、《临江府志》；查慎行纂《西江志》；李绂主修《广西通志》、《汀州府志》、《临川府志)；周永年主修《历城县志》；全祖望参修《宁波府志》；戴震参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并审定《应州续志》、《寿阳志》；钱大昕纂修《鄞县志》；洪亮吉编有《淳化县志》、《长武县志》、《经县志》和《宁国府志》，他还与孙星衍合纂了《澄县志》；李文藻纂修《诸城县志》、《历城县志》；陈诗参修《湖北通志》；章学诚先后主编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和《湖北通志》，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段玉裁纂《富顺县志》；姚鼐纂有《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与孙星衍合纂《庐州府志》；焦循参修《扬州府志》、《北湖小志》；龚自珍纂有《蒙古图志》，预修《徽州府志》；林则徐主修了《湖北通志》；邓廷桢主修了《安徽通志》；阮元纂修有《杨州府图经》、《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邹汉勋参修《宝庆府志》、《武冈州志》，并纂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陈作霖参修《上江两县志》、《江宁府志》、《上元江宁乡土合志》；郑珍纂修《遵义府志》；何绍基纂有《山阳县志》，预修《安徽通志》；刘绎纂有《永丰县志》、《吉安府志》、《江西通志》；王轩主纂《山西通志》；汪士铎主修《上江两县志》、《续纂江宁府志》；郭嵩焘纂修《湘阴县图志》；陆心源主修《湖州府志》、《归安县志》；缪荃孙纂修有《顺天府志》、《湖北通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等等。大批学者投身修志事业，使有清一代名志纷出，成果斐然可观。尤其是他们将各自的学术观点带入修志实践中，并通过对方志理论的悉心研究和切磋辩论，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方志学流派，并为方志学的深入研究作出贡献。清代名志纷

出，构成清代方志学兴盛的一个显著特征。

总论清代方志编修和方志学研究，其成绩是显著的，数千种风格各异的方志纷纷纂就，成为传世方志宝库的主要藏品，而各种方志流派的出现和各种方志理论的争鸣，又为方志学的兴盛及方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良好条件。当然，清代方志学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其一，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表彰帝王官绅的圣迹德政，盈篇溢简，而民事方面过于疏略。其二，由于文化专制的推行，修志机构由本地官绅充任，方志体例、内容又作具体规定，限制了志体的创新与弊端的革除。其三，方志编修事业虽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成书质量不能普遍提高，尤其大批胥吏陋儒充斥志局，不乏质量低劣志书。而文字狱的兴起，使一些参预修志的学者，多埋头于征实考信、辨证体裁、考订名物，未能完全做到"正"、"虚"、"公"。

方志学的兴盛始于清初，终于清末，总计二百六十余年。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三十八年中，由于时局动荡，战事纷扰，使得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时继时断，方志学的兴盛时期结束。

（戴柏俊）

参考资料：

《方志学概况》、明清主要方志书籍。

虎门销烟

鸦片是用罂粟果实的浆汁制成的，内含多种生物碱，主要是吗啡、可卡因、那可汀，有强烈的麻醉性能。公元前约四百年，希腊人已发现鸦片可以安神止痛。唐代中叶时，阿拉伯人把罂粟输入中国。中国人译用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称其为阿芙蓉或鸦片。十六世纪时，南洋土人发现了服食鸦片的新方法，即拿鸦片膏拌和烟叶，搓成丸粒，放在竹管上就火吸食。这种方法在十七世纪中叶渐渐传到大陆。不久，吸食的方法又有所改变，直接把鸦片搓成丸粒吸食。

像一切麻醉剂一样，经常吸食鸦片，能使人的体力下降，意志萎靡，以致丧失生命。自从英国鸦片贩子大量输入鸦片后，才使中国人染上服食这种毒物的可怕恶习。清朝政府发现鸦片的毒害，遂于雍正七年（1729年）下令禁止贩卖和私开烟馆招人吸食，但药用鸦片照常进口。

嘉庆元年（1796年）以前，鸦片输入中国与其他商品一样，是要通过公行的。禁止鸦片进口命令颁布以后，英国商船照旧夹带鸦片，隐不报关。只是先把鸦片卸存澳门，然后到黄埔公开出售许可的商品，鸦片则在澳门附近秘密推销。此后，由于清朝政府官员受了鸦片贩子的贿赂，对非法的鸦片贸易放任不管，英商就大胆地把鸦片直接运到黄埔，与中国私贩直接交易。嘉庆二十年（1815年），清朝政府颁布了更为严厉的规定：外国货船到澳，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一船货物全行驳

回，不准贸易；若各船皆带有鸦片，也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朝政府宣布正式执行搜船的规定，并令外商立“不售鸦片字据”。东印度公司为了贯彻其掠夺政策，悍然通令公司船只和英商私船坚决拒绝搜查，认为若公司应允签写此种字据，将来对于欧洲与中国之贸易，恐发生不良恶果。如私人商船出立字据，东印度公司船务委员会便取消其贸易特权。东印度公司又派遣一艘兵舰到广东洋面示威，迫使清朝政府取消搜船的法令。

道光元年（1821年），清朝政府在澳门查获了一个中国鸦片囤户和四艘夹带鸦片的外国商船，乃责令广州洋行保证以后杜绝外船私运鸦片，并断绝澳门与黄埔之间的交通。英国烟贩遂感觉到情形的严重，只得将鸦片趸船撤退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从此，英商藉着自己政府的武装保护，企图永久地公开在伶仃岛进行偷运和私卖鸦片的罪恶贸易。长期停泊的英国鸦片趸船逐渐由七、八艘增加到二十多艘，囤存的鸦片从几千箱增加到二、三万箱。元年以后，伶仃岛就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贩运站和毒窟。

此后，从外洋来的船只先将鸦片卸在伶仃岛上，然后将合法的商品运进内河，在出卖这些商品时，英国毒贩便招揽中国商人，订立私卖手续，买者付以现金，卖者给以收据，由买者到趸船领取鸦片。再委托名为“窑口”的不法中国运输商用名为“快蟹”或“扒龙”的武装三桅大船将鸦片运入广州。除广州外，伶仃岛的毒贩也对天津、厦门和广东的商人发售鸦片。后来，英商毒贩索性明目张胆地自备大批船只，将鸦片私运进人内河，到处兜售，使广州城外河面数十里之间，成为公开的鸦片市场。同时，英国毒贩也开始自行沿海北上走私，做这走私买卖当时最为著名的是怡和洋行，它不仅利用武力贩卖鸦片，甚至利用宣传基督教的名义来掩护走私。

尽管中国方面三令五申地严厉禁止鸦片输人，但这种偷运走

私却变本加厉。后来美国的资产阶级发现向中国私运鸦片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时，便也加入了私卖鸦片的国际毒贩行列。他们不惜绕大半个地球从土耳其或波斯去贩运鸦片来中国私卖，不久，美国对中国走私鸦片数量仅次于英国。

就这样，臭秽的鸦片便像海潮般涌进了中国大陆。从道光元年（1821 年）至八年（1828 年），英商偷运到广州的鸦片平均每年九千七百余箱，八年到十五年，平均每年有一万八千七百余箱，十五年至十九年平均每年三万五千四百余箱。英商依靠有计划的输入鸦片，迅速地改变了中英间的贸易关系。乾隆四十年（1775 年）时开抵广州的英国商船只有十三艘；而嘉庆十年（1805 年）增加到五十三艘；道光五年（1825 年）增加到六十一艘，十三年（1833 年）便增加到一百零七艘。而英对华的输出额由三百万元激增到三千九百余万元。以前，英国对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本国的纺织品、金属以及印度的原棉等东方货物，后来，促使英国在对华贸易中输出 数字激增的是鸦片的输入。而且，二百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向是居于出超地位，可是自从英国有计划地向中国输入鸦片之后，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出超优势逐渐削弱，继而成为入超国。

更为可怕的是，从十八世纪末叶起，中国白银的外流数量与年激增，这与鸦片进口的数量正好成正比。清嘉庆二年（1797 年）前后广州竟发生了银荒现象。银货缺乏立刻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嘉庆四年（1799 年）下令禁止银两出口。此时清朝政府还未意识到鸦片走私与银荒的关系，只是消极地要求本国商人坚持遵守以货易货的原则，以阻止白银外流。

随着鸦片走私的增加，中国银货缺乏的现象一年比一年显著，银货外流每年递增至一百数十万两，嘉庆二十二、二十三两年中，流失的白银价值总计一千万元。道光元年，银荒已由滨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清朝政府才觉察到两者的关系，开始积极

禁止鸦片输入，以阻遏白银外流。然而，英国毒贩的武装威胁和贿赂行为使清朝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归于失败，白银依然源源地走漏出口。从道光三年至十四年的十一年间，总计有价值五千二百余万元的白银流向英国。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这还仅是就广东一地走漏和英国一国偷运而言，如果加上福建、浙江、山东、天津以及其他国家的偷运、走漏数量，数字还更令人惊骇。二十年中走漏的白银，按最低的估计，价值已达一亿元以上，等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如从年平均数量看，每年流出五百万元白银，等于当时国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由于白银的大量流出，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金融混乱，财政困难，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银价上涨了一倍，农民不负银、钱的比价，几乎达于难以贡赋和维持正常生活的境地。同时使商人开始了白银投机，地方官藉口预防亏累而乘机搜刮。这一切都使以地丁为大宗收入的国家财政受到影响，国库存底日见减少，这不能不引起清朝政府的焦虑。

除去国家经济生活紊乱的可怕一面外，另一幅可怕的图景是国力和人民健康的丧失。乾隆年间，吸食鸦片一般只在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流行，到嘉庆年间，这种恶习传延到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到道光年间，全国各地城乡市镇，到处都有鸦片踪影，吸食者不可胜数，甚至僻处西陲的康藏一带，也因英国从锡金输入鸦片而盛行吸食。纨绔子弟、商人、贵族、官僚、缙绅、皇室亲贵、骑兵、幕客到工商业者、娼妓、优伶、僧尼道士无不成为鸦片瘾者。鸦片的厚利，使工商业者和官吏大为歆羡，于是广东、云南、四川、福建、浙江、山西、河北等地开始大量种植罂粟，熬制鸦片膏，到处分销，当时被鸦片烟毒所腐蚀的人总数在二百万人以上，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百六十六分之一。鸦片的破坏力是可怕的，吸食者的健康显著下降，加之，统治者阶层

秩序混乱，商业和农业严重萎缩，金融财政大受影响。因此清朝政府下决心对“祸烈于洪水猛兽”的鸦片采取严禁政策。

从雍正七年（1729 年）起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清朝政府共发布了十道禁烟命令，禁止吸食、贩卖与输入鸦片。从道光元年（1821 年）至十四年（1834 年），清朝政府发布了更多的禁烟法令。但这一切均在英商的贿赂和官吏的舞弊中成为一纸空文，鸦片依然不断输入，白银依然源源外流。

道光十六年（1836 年），湖广道监御史王玥竟公然奏请解除吸食鸦片之禁，认为查禁烟土造成胥吏藉端讹索，外夷暗中牟利，流弊转多，不如解禁。这种意见两年前在广东地区地主人士中颇为流行。继王玥之后，又有太常侍少卿许乃济上书道光帝，主张全面弛禁。上述主张一度打动了正在禁烟问题上和财政问题上感到棘手的道光帝。奏章上后两日，道光帝立刻发下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𡊮等讨论。广东地方官吏遂订出了鸦片弛禁章程九条。广东方面的毒贩们得到官方的支持，自然十分乐观，满怀信心地等待弛禁令的公布，趁机扩大鸦片走私贩运。道光十六年（1836 年）下半年的鸦片走私已比前一年度激增了百分之五十。

广东奏复和弛禁章程到北京后，一时议论纷纷。一些官员在讨论弛禁章程时大声疾呼反对向鸦片贩子妥协，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人意见最为尖锐，坚决主张消灭鸦片走私。还认为以前禁烟令的失败在于官吏奉行不力，而非禁烟法令本身之过；如海疆大吏都洁己奉公，忠诚体国，哪有禁不住、禁不绝之理?!

严禁者堂堂正正的道理完全压倒了弛禁者的主张，道光帝认为言之有理，遂于十七年（1837 年）开始实施严禁派的主张。第一件是命令两广总督驱逐鸦片趸船。可由于广东地方官吏的腐化，外国毒贩始终不理会，依旧停泊在伶仃洋面。派去驱逐趸船

的水师副将反而与洋船相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给水师报功，副将反而以烟获功。驱逐的结果只是水师兵士人人充囊，而鸦片烟的输入遂至四、五万箱。第二件是驱除坐地夷人。这事拖了一年多，怡和洋行的查顿老板等九名外国毒贩依旧在广州市上招摇自若。道光十七——十八年（1837—1838年），严禁的政策与过去相比虽无进展，但在北京和各省官吏中，暂时没有人敢公开表示反对禁烟。

由于严禁办法仍不奏效，道光十八年四月初十，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的奏折。他陈述了烟祸之烈和漏银之多，中肯地对过去的禁烟办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要禁绝鸦片，必先加重吸食罪名。办法是：由皇帝发布谕旨，限所有吸食者在一年内戒除，过期不戒，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子女不准考试，各省满汉营兵一例办理。黄爵滋深知过去禁政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官吏执行不力，因此又请求对执行不力的各级官吏也要严加处分。

黄爵滋的禁烟办法是严厉的，也给道光帝增加了信心。道光帝一面把黄爵滋的意见发给各省将军督抚，要他们议论具奏，一面下令加紧查缉，先定禁令三条：1. 合十人为一保，互相警戒，一人犯禁，十人受罚；2. 家藏鸦片及烟具者处死；3. 官吏受贿不报者削官。十月间，各省大员对黄爵滋奏折的覆议陆续奏到。覆议共二十八通，赞成重治吸食罪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八人，反对对吸食者处死刑的有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山东巡抚经额布、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二十人。直隶、浙江、山东、广东都是鸦片走私口岸，云贵是罂粟种植区，他们的反对，隐隐透露出他们与鸦片的微妙关系。在京城，以穆彰阿为首的清朝贵族也反对禁烟，暗中拖延新查禁章程的订立，消极地阻碍严禁政策的实施。

尽管有不少人反对，可三条禁令还是得到了推行，一些主张

查禁鸦片的封疆大吏已在积极地行动，成效显著。尤其是湖广总督林则徐，雷厉风行地打击贩卖鸦片，收缴大批烟土和烟具，毒贩们莫不魄悸魂惊，吸食者也恐性命莫保，相率改过图新。这些事实使道光帝更加坚定严禁鸦片的决心。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下上谕：召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林则徐进京，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其节制。三天后，又命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与林则徐通力合作，禁断鸦片，为中国去此大患。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肩负着为中国去除大患的重大使命向广东进发，与阴险的外国毒贩作面对面的斗争。尽管前途未可乐观，事势难言，但他此刻已认识到禁绝鸦片对于中国人民的重大意义，因此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奔向广东。

道光十九年一月八日，林则徐离开北京的那天，发出“传牌”一道，晓谕自良乡县至广东省城沿途各州、县、驿站的官吏：这次出差，他自备轿、车，自带役夫、自付工价，沿途供应不许铺张；随行丁役不准向地方需索，地方官吏不许私送规费，如有犯者，言出法随。这道传牌造成了一种严肃的气氛，使人们感觉到林则徐的认真与负责。特别是广东方面的英国毒贩已意识到情势的急剧转变。驱逐了一年多而不肯离开广州的老毒贩查顿慌忙逃去，伶仃洋面的鸦片趸船也开始移动。一月十一日，林则徐又在途中密劄广东布政使、按察使查拿汉奸六十一名，包括“包买之窑口，说合之孖氈，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他们都是外国毒贩的忠实内应，逮捕他们，是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

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翌日，林则徐在行馆门首张贴告示：严禁打点关说，慎密关防，所有随从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左右，藉端出入。这个告示再一次表示了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和认真的态度，使鸦片贩子无法钻空子。

林则徐开始进行禁烟斗争的第一个步骤是了解鸦片流毒的情况。除了和邓廷桢会晤之外，他把有关的行商散商集中在行馆附近，日夜传询；他访问了关心时事的士大夫，又借举行“观风试”的名义，召集书院肄业生数百人，要他们开列贩卖鸦片的所在地和贩卖者的姓名，要他们报告水师舞弊的情况。几天之后，林则徐已充分掌握了广州方面鸦片走私和鸦片经营的情况。于是，他一面着手整顿水师，一面进行第二个步骤：缴烟。

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传集行商，宣布谕贴，限他们三天之内向所有外商取得永不夹带鸦片的禀覆。谕贴历数过去行商欺饰隐匿、袒护外国毒贩之事，并警告说：“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同时又将另一谕贴交行商送往外商公司。谕贴严正指出外国毒贩贩卖鸦片是骗财害命，是“人心所共愤，天理所难容”的。林则徐宣布了“必尽除之而后已”的意图之后，命令所有外商在三天内将鸦片造具清册，等候收缴，并“具外文与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林则徐说：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一定不中止禁烟行动！

一百年来，中国政府和官吏从不曾表示过如此坚决的意志，采取过如此严厉的方针。卑鄙的外国毒贩虽有畏惧之心，但在英侵略者代表义律和英国老毒贩颠地的唆使与阻挠之下，还抱着观望态度，以图侥幸。

林则徐早已预料到毒贩们不会轻易就范的。在发表缴烟的次日——二月初五日，就命令粤海关禁止外人离开广州，以为防备。二月初八日，三天期限满了。毒贩们企图蒙混过关，只肯呈缴一千余箱鸦片，当即为林则徐所拒绝。于是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理由是颠地为“钦交”烟犯，历年逗留中国，凡纹银出洋、

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在此次缴烟中，颠地因所带烟土最多，乃屡加阻挠，意图免缴。但颠地实为外国毒贩首恶，断难姑息纵容。逮捕令再度申明：其他毒贩有首先呈缴者，必加奖赏。英侵略者代表义律本在澳门，当他得知要逮捕颠地时，乃于初十日赶到广州，想掩护颠地逃离。就在这天，林则徐宣布如外商违抗政令，即将停泊黄埔各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上下货物进行贸易。同时下令人民不准将船只、房屋租赁给外商，所有外商公司所雇佣的中国人员一概撤出。而且又派兵包围了外商洋行。初十日下午起，二百七十五名外商完全被隔离了，他们不但不能与外界通讯，饮食的供应也被停止。

外国毒贩没有想到林则徐的考虑有这样周密，行动会这样迅速。他们以为鸦片趸船是在巨浪洪涛的伶仃洋上，清朝政府的水师力量单薄，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万一没有出路时，还可逃回澳门或逃下船去。但万没想到林则徐会采取这种以静制动、严而又密的步骤和措施。

毒贩的诡计完全破产，"隔离"使他们有机会来认识林则徐执行法令的坚决态度。二月十二日，林则徐一面派员指出义律阻挠缴烟、引带颠地的罪行，一面发出《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反复劝谕。

二月十三日，义律终于不得不对正义和法令低头，禀呈林则徐表示愿意缴出英商的鸦片。次日又具禀说，英商共有鸦片二万余箱，等待查收。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派人同义律的代表到澳门商讨缴烟事宜。二十八日，林则徐和邓廷桢亲自到虎门监视，次日开始收缴，至四月初九日，方才全部收完。英国毒贩在缴烟过程中，曾屡次节外生枝，企图反悔，但由于林则徐的态度坚决和对英商的阴谋有所防范，使毒贩所有的花招都落空。

道光十九年二、三月间，林则徐除了同外国毒贩进行斗争外，同时也加紧了对内部的禁烟工作。他在进入广东境内之初，

就发现奸徒们对于禁令尚有观望希冀之心，以为官禁未必长久，到处打听罪名重轻与新例是否颁行。所以林则徐断定对这些奸徒只有以生死相胁，才足以使他们生震恐之心，他要求清朝政府从速定颁严例。在充分掌握毒贩奸徒贩卖、毒害民众的资料、捕拿大小烟贩的同时，林则徐根据先晓之以情理，后惩之以严法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在二月初，他通令全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限定广州一地自二月底到三月底止，各府州县到二月底以内，各家呈缴烟枪、烟斗等烟具，由所在地方有司负责；责令各学堂教官清查生员有无吸食鸦片与贩卖情况；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规、编查保甲以断绝吸食兴贩的条规。在各种命令和条规中，林则徐一再揭露广东绅士、官吏、将弁、兵丁等过去的舞弊、徇私行为。

广东虽然是鸦片烟毒的渊源地，但民众对于烟毒是切齿痛恨的，因此，林则徐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禁烟措施，受到广东人民的拥护与支援。各省受广东的影响，禁烟运动也相继展开。

林则徐在鸦片收缴完毕后，呈请清朝政府如何处置。道光帝复命就地销毁，让沿海居民及住居广州的洋人共见共闻，以示朝廷的震威以及禁绝之决心。

过去销毁鸦片的方法是用桐油搅拌，以火焚烧。但烧过之后，部分鸦片渗人地下，如果掘取泥土再加煎熬，还可获得相当数量的烟膏。林则徐认为这种旧方法不能彻底烧毁鸦片。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用盐卤和石灰来浸化。于是在虎门海滩高处开挖两个大池，长阔各十五丈，池底平铺石板，四周则栏桩、钉板，池前开一涵洞，池后通一水沟。浸化的过程是：先从水沟车水入池，加入食盐使成浓卤，然后将烟土切碎抛入，浸泡半日之后，再将整块烧透的石灰投入，使其分解。在石灰盐卤浸蚀鸦片之际，另派人用铁锄木耙反复翻戳，让烟土颗粒尽化，到潮退去时，打开涵洞，让池内经过腐蚀分解的鸦片浆流送大洋；并用清

水刷洗池底，不让烟土有涓滴存留。如果第一天甲池尚未清洗，第二天便使用乙池。焚烟手续虽有些繁琐，但很科学。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林则徐开始在虎门海滩用上面说的方法销毁英国毒贩所缴呈的臭秽的鸦片。销毁时，布置防备颇为慎重严密。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提督关天培都亲自莅临监视，粤海关监督经常在虎门照料销毁事宜，面广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粮道则分班到场查视，广东将军、左右驻防都统则轮流稽查弹压。在现场上，池岸周围树立栅栏，观者不准入内，工作人员出人均经查核。

鸦片浸化的时间很长，开始每天只能烧毁三四百箱，后增加至八九百箱。到五月十五日鸦片全部销毁完毕，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斤，值时价二千四百万元。当鸦片被盐卤和石灰分解时，浓油烟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遮天蔽日，令人难以忍受。卑鄙的英国毒贩还厚着脸皮前去观看，面对着自己的罪证和正义的处置，他们不能不感到羞惭和畏服。

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的虎门销烟，是林则徐在广东大张旗鼓的禁烟运动的顶点，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英国帝国主义者表示了纯洁的道德思想和憎恶非正义行为的坚决性，洗涤了一百多年来强加给中国的耻辱。

（王琳）

参考资料：

鲍正鹄：《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 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其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而引起的，故称鸦片战争，也叫作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蒸汽机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一条条铁路迅速修建，一艘艘轮船在汽笛的嘶鸣声中驰往世界各地。此时的英国已远远超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殖民强国。它把侵略、掠夺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早已成为英国殖民者觊觎的对象。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十九世纪初曾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到中国进行活动，提出公使驻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等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了。这个以使节身份出现的阿美士德，就是最早鼓动以武力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者之一。

道光十二年正月（1832 年 2 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艘“阿美士德号”的武装商船，载着间谍分子林赛（化名胡夏米）、传教士郭士立等一行七十多人，偷偷从澳门出发北航，经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刘公岛以及朝鲜、琉球等地，沿途测绘地形，搜集沿海驻军人数、装备、炮台设施等情报，历时六个多月才回到澳门，完成了英国武装侵略中国的第一步准备工作。

道光十四年，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允

许英商自由到中国贸易。英政府还擅自派来了“驻华商务监督”，作为英王的代表直接与清王朝的官员对话，并负责保护和开拓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实行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落后于英国，但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它的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三、四十年代，它的煤、铁、棉、毛织品的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为了开辟市场，法国资产阶级也加紧向外扩张侵略。在亚洲，它的主要侵略目标是霸占越南和中国。它在打开商品贸易市场的同时，还把宗教作为主要侵略手段，曾派了许多传教士到东方各国进行活动，寻机进行侵略。

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在南北战争的前夕，工业发展远远落在英法两国的后面。二十年代，美国的农业人口尚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五，工商业只限于其北部和东北部，西部尚未开发，南部还是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美国资产阶级在解决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不肯放松对外侵略和掠夺。在国际上，它极力追随英国，对中国同样抱有野心，是近代英国侵略中国的帮凶。

沙皇俄国是欧洲国家，但它逐渐向东扩张，到十八世纪中期已和中国的东北、西北和北部接壤，不断寻机侵略中国。

总之，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迫不及待地把世界各地都卷入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则是他们重点掠夺的目标之一。

在西方资本主义接踵东来，力图把古老的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率先以“商品重炮”来轰击紧闭着的中国大门。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毛织品、金属制品、钟表、玻璃等商品迅速地涌入中国。英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了其他国家，占第一位。英国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和药材的贸易额也在成倍的增长。其中仅茶叶一项，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就增长了五倍半以上。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了中国

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贸易。

在迅速增长着的中英贸易中，英国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不论是英国的毛织品，还是金属制品，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都是滞销品。而中国的茶、丝和土布成为欧美市场的畅销货，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直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的出超额多达二百至三百万两白银以上。百余年间，经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五亿元。如此巨额的白银流入中国，怎能不引起唯利是图的欧美商人和资产阶级的惆怅、眼热和嫉妒？英国政府为了扭转对华贸易上的不利地位，终于把杀人的毒品——鸦片，作为捞取中国的白银和榨取中国人民膏脂的“特殊商品”偷偷地运进中国。

鸦片源源运进中国，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清朝当局不得不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道光十九年四月、五月，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率地方官没收洋商的大批鸦片当众销毁，并向各国商人发出严正警告。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命令英国船主拒绝在“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五月二十六日发生了英国海员在九龙沙嘴村殴毙中国百姓林维喜事件，义律拒不交出凶犯。在此情况下，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逐出澳门，并断绝其一切接济。义律又发动武装挑衅，七月二十八日，英军舰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将其赶走。同年十月，义律又挑起了激烈的穿鼻湾海战，清军水师英勇抵抗，击退英舰。以上情况报到北京，道光帝下令永远停止同英贸易，并驱逐所有英船。英国为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不甘失败，居然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发动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 年）正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三月，英议会正

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议案，并立即派兵开赴中国。五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名英军，分乘四十艘船舰，到达中国海面，封锁珠江口。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预料到英国决不肯就此罢休。为了防备其发动武装侵略，林则徐在广东沿海加紧备战。二十年一月，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通力协助下，在虎门海口安设木排、铁链，添置炮台、增设炮位，还购买西洋大炮布防在珠江口附近。并督促水师陆地官兵认真操练。他把广东的居民组织起来，或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从疍户、盐工中招募五千名壮丁编为水勇，日夜进行训练。广东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歼来犯之敌。

英军虽然气势汹汹地封锁了珠江口，但看到广东沿海防守严密，无懈可击，于五月底奔向福建海面，向厦门投递“文书”，遭厦门守军拒绝后，开炮袭击厦门水师，然后沿海北上。英军舰队北犯浙江沿海，六月初攻陷定海，英军在定海洗劫一空后，又继续北犯。八月十一日闯入天津，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英国首相帕麦斯给清朝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等侵略要求，引起清王朝极大震动。但在此严重时刻，大臣们不去商讨退敌之策，反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抵抗派。投降派乘机攻击林则徐，说他禁烟操之过急，以致惹起英军前来“诉冤”。本来就不坚定的道光皇帝此时态度更加动摇，转而支持投降派，并派琦善前往天津与英国侵略者谈判。琦善公然无耻地在《答懿律照会》中诋毁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并扬言“重治其罪”。他要求英军返回广东，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英国侵略者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八月中旬折军回南，等候正式谈判。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道光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

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还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十一月初琦善到达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立即惩办积极抗英的清军将领，拆除珠江口附近防务设施，遣散水勇、乡勇，并大骂广东人民都是汉奸，妄图以此来讨好英国侵略军。琦善开门迎盗的卖国行为，更加助长了英军的气焰。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攻占虎门口外的大角、沙角两个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等英勇战死。琦善十分慌恐，急派汉奸、买办鲍鹏前往穿鼻洋向义律乞和。鲍鹏本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曾被林则徐通缉而逃到山东，这时却被琦善重用。十二月二十八日，琦善擅自与义律秘密地签订了《穿鼻草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等条款。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和琦善私订《穿鼻草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大为震怒。他原以为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后，英国就会停止侵扰，那里知道英国侵略者得寸进尺，更没想到连他派去的奴才琦善也胆大妄为，竟敢私订条约。他忍无可忍，便立即下诏对英宣战；将琦善革职问罪，锁拿回京；并派遣自己的侄儿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一万七千人的兵力开赴广东前线。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二月六日，英军风闻清政府调兵遣将，便先发制人，向虎门炮台发起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仍在广东前线负责军务的琦善，依旧坚持其投降路线，拒绝增援虎门。关天培孤军作战，士卒伤亡惨重，他自己也受伤数十处，但仍亲自点燃大炮英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英国兵舰乘势驶入珠江，进逼广州。

三月，奕山率领大军齐集广州。他的随员大都是纨袴子弟，根本不会打仗，却想侥幸取胜，遂于四月一日冒然发动一次夜袭。英军占据城郊炮台后，用数百门大炮猛攻广州城，城内民兵死伤惨重。奕山等人惊恐万状，吓得东躲西藏，很快在广州城头

竖白旗投降求和。二十七日，奕山同英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退离广州六十里；奕山缴纳六百万元的所谓“赎城费”，然后英军退至虎门。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而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都自动武装起来，用简陋的武器和农具不断地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成为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武装抗击外国侵略军的先声。

英军攻占广州城北各炮台后，连日四出骚扰，无恶不作，激起北郊人民的极大义愤。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会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的正义斗争。四月九日，一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一带抢劫骚扰，村民奋起博斗，打死英军数人。三元里人民为对付英军日后前来报复，便自动集合起来，在三元里古庙商讨对策。他们还邀集了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联合一致，主动出击英国侵略者，并拟定在牛栏冈设伏歼敌的作战计划。

四月十日凌晨，三元里和各乡群众五、六千人，手持锄头、铁锹、刀矛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发起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督率英军反击。三元里人民且战且退，把英军诱入牛栏冈伏击圈。只听清脆的铜锣一敲响，早已埋伏好的近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围歼顽敌。刹时间，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也呐喊助威。英军几次挣扎突围，均遭失败。下午，雷雨大作，英军困在泥宁里，难以撤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搏。直到傍晚，四方炮台的英军赶来接应时，被围的英军才侥幸地撤回。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英国政府在接到义律订立《穿鼻草约》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侵略权益太少了。决定撤换义律，改派高级官员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前来中国，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璞鼎查到任后即率英军北上，攻略厦门。八月十七

日，再次攻陷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英勇抵抗，以身殉国，五千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接着，英军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闻风逃走。署理两江总督裕谦坚决抵抗。镇海失守后，裕谦投水自尽。八月二十八日，英军攻占宁波。

道光皇帝为挽救浙江前线的败局，于九月四日任命自己的另一个侄儿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等为参赞大臣率军前往浙江指挥军事。奕经同奕山一样腐败无能，他在南下途中，不管前线如何吃紧，一路上却尽情地游山玩水，到苏州便屯兵不前，整天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直到道光二十二年一月才达浙江绍兴。他为了邀功请赏，把战争当儿戏，竟在毫无准备和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于一月二十九日分兵三路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结果大败而归。不但没有收复三城，反而丢掉了慈溪。奕经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英军则趁势扩大侵略。三月英军退出宁波、镇海，向北进犯。

四月，英军进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吴淞位于长江口，系长江的门户。清军在吴淞与宝山之间十多里的江岸上，筑有一长列炮台（西炮台），在蕴藻浜入黄浦江的入口处的北岸筑有炮台一座，另外在蕴藻浜对岸的浦东筑有炮台一座（东炮台）。英军进攻前，江南提督、年近七十的老将陈化成驻守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率军三、四千人驻宝山。四月二十七日，英军开始发起进攻，陈化成坚守两炮台，指挥守军发炮还击。激烈的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击伤英军舰数艘。正当吴淞镇激战之际，西炮台被英军突破，大批英军随即登陆。陈化成，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在身负七处重伤的情况下，仍然执旗督战，直至壮烈牺牲。吴淞炮台随之失陷。英军攻下上海后，沿长江西上，六月上旬陷镇江。中旬，英国兵舰八十多艘闯入南京下关江面，等待清政府的投降。二十三日英军抵达江宁江面。二十五日在观音门附近登

岸。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七月十三日，耆英、伊里布等人与璞鼎查在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签约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第一次鸦片战争逐告结束。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割让香港。

2. 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

3.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 协定关税。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六月和八月，中英又相继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侵略者又夺取了以下几种特权：

1. 压低关税。进口货物的税率定为百分之五，成为世界上最低税率的国家之一。

2. 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侨民在中国犯刑事罪时，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处理。

3. 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今后任何国家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侵略权益时，英国均可分享。

4. 可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建立租界。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等侵略者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他们分别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和九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法美除了享有英人在《南京条约》中的全部特权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攫取了传教等侵略特权。

继英、美、法侵略者之后，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葡萄牙、普鲁士及丹麦等国纷至沓来，要求同清政府正式订立通商条约。二十八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公然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霸占了中国领土澳门。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欧美资产阶级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副锁链。从此，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古老的封建的中国被卷人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宋美云）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战争史》、《简明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

金田起义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扩张势力，遂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妥协投降，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广州城郊三元里一百零三乡几万民众奋起抗英的斗争所表现出的民族自尊心，显示了中国民众不畏强暴、不畏强权的民族精神。不久，反清秘密结社广泛发展。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天地会发动起义，联合广西、广东、湖南几省的农民、苗民暴动起事，公开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各地农民起义普遍爆发，官员上奏折说“逆匪”起义横行，延及七府一州。武装起义队伍多达数十支，势如野火燎原，所到之地开仓劫库，放囚杀官，没收富豪财富，惩办劣绅。这一切都在年轻的广东农民洪秀全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

洪秀全为广东花县客家人，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一月。儿时一面读书，一面帮父兄耕牧，十六岁时，因家计贫穷，不能再供其读书求学，便辍学在家务农，或去山野放牛。十八岁时他应聘为本村塾师，以后，他一边读书，一面参加科举考试。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到广州应试时，得一部基督教徒梁发所编的《劝世良言》，开始时翻了几下便丢进书箱。这次应试仍未录取，胸怀大志、文才出众的洪秀全更加愤世嫉俗。翌年，应试仍然失败，洪秀全大病四十天，在病中写出了一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赴广州应试，结果仍未被录取。日益成熟的他激愤地说：“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来开科取士。”这时，他想起了《劝世良言》小册子，便拿出细心翻阅，发现其中一些基督教义很对农民的口胃，于是，在六月间便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同好友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共同研究《劝世良言》，提出独拜真神“皇上帝”，不拜邪神偶像，不行恶事，戒绝饮酒、抽烟、邪淫等恶习。他们还以圣经故事比附洪秀全大病时所见的种种异象，说洪秀全神游天上，遇到一位高踞宝座的老人，赐给他一把宝剑，嘱他回人间斩除妖魔。这位老人即天父上帝，同他一道追杀妖魔的就是天兄耶稣，自己则是天父次子，受命下凡诛妖。随后，洪秀全请铁匠“打铁罗”铸了一把“斩妖剑”，随身佩带，并写出一首《吟剑诗》：“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洪秀全三人创立拜上帝会后便开始扩大会门影响，招收信徒。开始他劝信徒信奉上帝、耶稣、天堂、地狱，后来便鼓吹要摆脱苦难的现实生活，就得造反。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吸收了一些信徒，但引起了朝廷官员的注意。不久，他们的书馆便被封闭，他们也因曾砸毁“孔圣”牌位常受到围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准备出游天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初，洪秀全、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开始远游他方，由南而北，历经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一路上宣传教义，发展信徒。在清远县，感化了李姓数人为信徒，洪仁玕就留在那里担任塾师，后清远成为太平天国的根据地之一。

不久，艰苦的云游生活使冯瑞嵩、冯瑞珍中途折回花县，而冯云山表示愿意与洪秀全“遍游天下，艰苦甘心”。五月二十一日，他们到达广西贵县赐谷村，在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住下。从此，洪秀全一边教书，一边宣传教义。很快，赐谷、长排、大横等村入教者达一百多人，成立了广西第一个“拜上帝会”。赐谷村北面十几里的六乌山口，有一座六乌庙，地主、族长常在这里处理族务，欺侮乡人，洪秀全听说后便带人去打庙，由于此庙是龙山山区出贵县东北部的必经之地，来往行人颇多，洪秀全打庙一事很快传开，震动了龙山内外的乡户。

这一年九月，冯云山离贵县去桂平发展势力。十一月，洪秀全又回花县原籍，仍作塾师，并宣传教义，扩大影响。冯云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十一月到达桂平新圩，以拾粪、挑担、割禾、打谷、砖窑里做苦工为生，后受雇于曾槐英家。曾家住古林社，而古林社离金田村只几里路程，正当紫荆山口，翻过风门坳，便进入紫荆山区内部。冯云山克服人地两生疏的困难，爬山涉水，往来于紫荆、金田地区，在平凡的劳动中逐渐接近下层民众。生活虽苦，但他心中充满远大的志向，并做诗云：

“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

拾粪生涯来度日，他年得志姓名扬。”

雇主曾槐英发现他身怀真才，便介绍他到紫荆山大冲曾玉珍家教书。据百姓传闻，他还到过坎泽和紫荆山区西南的瑶区鹏隘教过书。

紫荆、金田、江口等地，在清代都属桂平县大宣里，这里时有起义发生。早在明代，便有著名的侯大苟所领导的大藤峡瑶、壮族农民起义，前后绵延了数百年，留下许多感人的斗争传闻。鸦片战争前，紫荆山里又爆发了一次农民暴动，参加者五六百人。接着，道光十五年至十六年（1835—1836 年）间，金田地区又发生过会众聚啸事件，会众即是天地会人。当时天地会领导

的水上“艇军”，沿西江在两广各地活动，江口为其据点之一。

金田村十分贫困，历史上流传有三多：无耕田的人多；卖儿卖女的人多；逃荒要饭的人多。金田附近一带住的全是汉、壮两族的贫苦农民。金田村背面即是紫荆山，这是一个总面积达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大山区，四面高山环绕，中间丘陵起伏，沟壑纵横。紫荆山区住的是壮、瑶、客家（汉）凡族人民，大多以种山烧炭为业，生活很是艰难。冯云山的到来，他所谈到的上帝与耶稣，使人们在极端贫困无望的生活中见到一缕阳光，因此，人会者十分踊跃。冯云山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还订立了规章，分工任事。

不久，拜上帝会的教义更加广泛传播。它提倡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万姓同出一姓，大家都是同胞，应该彼此平等，休戚与共，有福同享。这对于苦难深重的农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参加者日益增多。有桂平、贵县、博白、陆川的客家人，有紫荆、金田的壮族农民，有紫荆山区、平南鹏化山区的瑶族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 的拜上帝会众。如以职业分类，最引人注目的有紫荆山区 300 余家的烧炭佬和龙山矿工。他们生活困苦，性情急猛，后来太平天国的核心人物杨秀清、萧朝贵便出自此。

正当冯云山在广西活动的时候 ，洪秀全在广东老家花县一边教书，一边条理、解析拜上帝会的教义。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起，洪秀全用前后两年的时间，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等数篇文章与诗歌，对宗教真理加以阐释。这些文章编人了后来南京印行的《太平诏书》。

洪秀全同时在本乡及邻乡宣传新教，凡皈信上帝耶稣真道者，皆施以洗礼。这时洪仁玕仍在清远教书，常与洪秀全相见。这时的洪仁玕思想还不太成熟，让他的学生拜事孔子，自己则袖手不拜。洪秀全把自已的思想秘密及对满人的仇恨全都告诉了洪

仁玕，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割家产给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家产。无奈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行抢夺众兄弟的所得家产。又说：如上帝帮助我恢复祖国，我就教导各国各自保管自己的财产，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彼此之间以友谊相交，互通真理及知识，同时各以礼相待，我们将同拜同一天父，共同崇敬同一天兄及世界救主之真道，这就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以后心中的一大愿望。约在此时，洪秀全又得一奇梦，梦见红日放在手中，醒后便吟成一诗云：

“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焰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捲，远照尘寰鬼域藏，东北西南群丑嚗，蛮夷戎狄尽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下半年时，有人告诉洪秀全说有外国传教士罗孝全在广州传教。洪秀全便与洪仁玕决意去广州一趟。其时正接到罗牧师助手朱道兴一信，邀其去广州讨论教义，二人便即赴广州，与罗牧师研究真道。但因有教中其他人的阻挠而未受洗礼，二人因此失望地离开广东转赴广西，拟寻访挚友冯云山。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六月，洪秀全第二次起程入桂，因囊中羞涩，故步行西上。但不幸的是，又于梅子汛地方被盗贼偷窃得一干二净。无奈之中禀一帖子到肇庆府衙告状，竟得到授赠四百枚铜钱，又在西行船上受到船友捐赠六百枚钱，省吃俭用，终于到达了广西贵县王姓亲戚家中。这时方得知冯云山仍在紫荆山教馆，并已教化许多民众皈依上帝。八月，洪秀全欣喜地到大冲去会见冯云山，并津津乐道地给教徒们宣讲圣道。

紫荆山拜上帝会教徒不久便增加到二千多，而且其数日增，其中有卢新泽（谐音）、卢六、曾亚顺、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萧妻名杨云娇，自述在丁酉年曾患一场大病，错迷中灵

魂向天上飞去，遇见一圣人说：十年之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你当真心顺走。她遂也入会，在女教徒中颇有盛名，时人常言：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以后拜上帝会的教义在紫荆山愈发传播迅速，及于广西数县，如象川、浔州（今桂平）、郁州及平南、武堂、贵县、博白等地，许多有家业、有势力、有功名的人及其家族均入会，如有势力者韦昌辉、举人胡某等一体人会。

凡人拜上帝会者皆毁除旧时偶像而拜上帝，在做礼拜时，男女分座，先唱一首赞美上帝之诗，唱毕则听主讲人宣讲上帝之仁慈，或耶稣之救赎大恩，并劝诫人悔改罪恶，真心崇事上帝。凡皈依教道而愿人拜上帝会者，皆行施洗礼。洗礼仪式为：在神台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上求洗礼的人名，到洗礼时，由个人朗声诵读，然后焚化于上帝神鉴上。各人悔罪立愿后，即下跪，主持人从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位受洗者顶上，同时说："洗净从前罪恶"，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以示洗静内心。然后接受各种祈祷文，在早晚 及进膳时诵念。这些祈祷文大都刊于后来天国在南京刊印的天条书中。

十月，洪秀全和冯云山为更快地扩充力量，便离开大冲，来到地势险固的高坑冲，在卢六家里设立拜上帝会的总机关，又制订了"拜上帝会"的各种条规，一面又派人四出活动，积极地在两广的汉、壮、瑶等各族人民中发展会众。

其时，在广西象州府一带有一著名偶像甘王爷，为当地人所共仰。拜上帝会教徒听民间人说，甘王爷本为象州居民，他极信风水，曾求一风水先生为他择一好穴，又信邪言杀母血葬穴中，又迫其姐与一浪荡人通奸，且求州县官员赏一袭龙袍加身。他死后，象州人士都惧怕甘王爷显灵，故户户供奉，以求平安。洪秀全听会众报告甘王爷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说："此等邪神，当我们的灵魂遨游天堂时，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诛灭！"于是与冯

云山、王为正等同赴甘王庙。二天后到达甘王庙，洪秀全手持木棍，痛殴偶像，并历数甘王爷十大罪状：第一罪，杀母；第二罪，蔑视上帝；第三罪，恐吓上帝子女；第四罪，贪图上帝子女的食物；第五罪，逼其姐与浪子通奸；第六罪，爱听男女淫词荡曲；第七罪，妄自尊大；第八罪，榨取民财；第九罪，向州官强求龙袍；第十罪，如邪鬼常行恶事。有这样十罪，实属十恶不赦，应消灭无疑。于是毁其偶像，撕烂其袍服，打破其香炉及祭器，并亲书檄文诗一首：

"题诗草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妇女雷当劈，割累人民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

回到紫荆山后，洪秀全又大力发动会众，把紫荆山区内的所有神坛社稷全部捣毁。此后，洪秀全声誉大起，信徒增加更速。后洪、冯又捣毁了紫荆山的雷庙。雷庙位于花雷、田心两江的合水口处，是富绅王作新父子筹建的。事后，王作新上禀平南县官，控告洪、冯以拜上帝为名，到处毁坏神坛庙宇，实为反叛之徒。道光二十八年（1848）一月县官遂逮捕了冯云山及卢六，并审问之。此时，洪秀全记起两广总督耆英已奏准清廷皇帝，允许中国人、外国人信仰及宣传基督教，三月间便自回广东拟禀总督请求释放因信仰入狱的朋友。回到广东，他由朱道兴处得知耆英已前去京城。

此间，广西各兄弟自愿筹集巨金数百串钱援救冯、卢，求县官秉公审查。这时县官渐渐明白拜上帝会教徒原非叛逆，便有意释放二人。又收到冯云山在狱中写的申辩之信，其一述王氏凶恶谋杀之意，其二申辩自己冤情，其三证明人人当拜上帝。此时卢六已死于狱中，于是县官派差役二人将冯押解到广东原籍释放。但行至几里路外，在冯的侃侃而谈下，二位差役不仅即行释放了

冯云山，而且皈服其教，愿抛弃差事跟随进山入会。不多久，二人便受洗礼为教徒。

冯云山回到紫荆山，方得知洪秀全为救自己而返粤，遂回广东花县。这时洪秀全又折返回桂，得知冯已出狱，又东折回到花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人终于在花县见面。冯云山家乡在洪秀全家乡之北约五六里，全境多山，甚利于放牛。两人经常借牧牛机会相见、攀谈。洪秀全还与信徒、友人在此诵读经文，劝告人们真心信仰真理，连许多牧牛童也都听其教训。二人在家乡逗留到次年六月，用友人筹集的路费，再次离粤入桂，谁也未曾料到，他们 此行与家乡竟成永别。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初九，太阳初升时，洪秀全长子出世，同时有鸟成百成群翱翔天际，随后落于洪秀全屋后一月之久，村人惊异不已，认为此乃新王降世之兆，洪仁玕特挥函派专人送往广西洪秀全处，告知喜讯。

洪秀全与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受到拜上帝会众的热烈欢迎，并有兄弟告知，当他们回广东之时，会众中出现了二位代天父、天兄传言的人物，即杨秀清、萧朝贵。

杨秀清为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平隘山新村人，出身极其贫苦，富有谋略与组织能力。入会后，忽有一天，当众人下跪祈祷时，他一下跌于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一会儿似有神附体，口出劝诫之词，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言语有时模糊，有时为韵语。有人便记录下来，拿给洪秀全审察，洪即认定这些辞句出自上帝。萧朝贵为广西武宣县人，也是贫苦农民出身，为人勇敢刚强，公平正直。他则以耶稣之名传言，言语较杨秀清要温和，颇得洪秀全赞赏。二人在洪、冯去粤，地主团练要剿杀拜上帝会众之时，以天父、天兄资格代言，稳定了广西拜上帝会众的情绪与组织，颇受会众信赖与爱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广西，遍地是民众武装起义的

烈火。全省十一府一直隶州，从一、二千人到七、八千人的起义队伍就有二十多支。在贵县，地主豪绅经常挑拨民族对立，制造械斗事件。天灾人祸迫使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流离失所，丧失了一切生活依据，除了造反，没有别的出路。在这个大动荡的过程中，拜上帝会的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以桂平为中心，东到平南、藤县，西到桂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化州、廉江和清远等地，都有了拜上帝会组织，这些会众与地主团练之间斗争接连不断，共同对敌与谋求生存成了全体会众的迫切要求。洪秀全、冯云山回到广西见到这种形势，认为举义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广西拜上帝会成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核心，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核心成员。除去前边谈到的杨、萧外，韦昌辉为广西桂平金田村人，是地主兼典当商；石达开为广西贵县那帮村人，也是地主出身，因其为客家人，颇受当地地主排挤，故加入了拜上帝会。这个领导核心领导了著名的金田起义，但也埋下了后来裂变的祸根。

为了使武装起义顺利地进行，并建立自己的武装，拜上帝会选拔了一批内行的会员，分别去桂平的金田村、紫荆山的滥田村、平南花州的林长坳（现为上帝坪），以及陆川的陆茵村等地，开炉制造武器。据说，滥田村以瑶族会众为主，早在起义前两年就开始动手打刀枪；金田村和陆茵村两处以打制农具为掩护，明打犁耙，暗打刀枪，其中金田村规模最大，炼铁炉就开了十二座，打好的武器秘密投进西边的犀牛潭中储藏起来。

另一件事就是从事武装训练，将会众农民训练成有军事知识、有组织的半军事人员。在洪秀全的直接组织下，于紫荆山内成立了四个大馆，平南花洲地区也成立了三个大馆，由胡以晃主持训练，其它如贵县、陆川等地也建立了大馆。

经过一段时间有计划的准备，举义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道

光三十年（1850 年），洪秀全、冯云山从紫荆山秘密转移到平南花洲山人村，七月在那里向全体会众正式发布动员令，要求在十一月四日前集中金田，准备起义。这段事情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被称为团营。

团营的命令一下达，各地会众闻讯而起。在广西中部，在两广边界，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群起响应，他们烧毁了茅寮草舍，变卖所有的物产，手持器械，扶老携幼，冲破了地主团练的阻挠，从四面八方向桂平县的金田村进军，使人预感到一场大的风暴就要到来了。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这一天正是洪秀全 38 岁生日，桂平县紫荆山前的原野上，旌旗蔽天，欢天动地，二万多贫民在洪秀全带领下，拿起自制的武器，汇集到金田村西边的犀牛岭营盘周围，举行誓师起义。真是“万民响应，四方乐从”。男军和女军分营排列，高举刀矛，振臂同呼“杀妖！”雪亮的刀矛在空中晃动，闪闪有光。不持武器的妇女儿童，有的挥舞彩旗，有的敲锣打鼓，那欢腾雄壮的动人景象，使人激动不已。一首民谣唱道：“天国旗号飘得远，四方兄弟到金田。兄弟姐妹都来到，降魔斩妖声震天。”

在这万众汇集欢乐的时刻，洪秀全登上营盘中央的高台，庄严宣告起义，同时当众申明军纪五条：

一、遵条命（遵守天条和命令）；

二、别男行女行（男女分营）；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这五条军律，既是起义军共同生活的准则，也是今后必须执行的战斗纪律。团营起义后，会众以红布包头，蓄发易服，定名为“太平军”。

誓师起义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四日（1851 年 1 月 13 日），洪秀全率师东进二十里，一举攻占浔江北岸的大湟江口。江口正当浔江、大湟江和鹏化水的汇合处，上通桂平、贵县，下达平南、苍梧，是天地会武装的主要活动区，无论在经济上或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洪秀全在此设立大营，命军士依江择险，布置防务，并同时与天地会武装联系，以承认拜上帝会教义原则、遵守太平军纪律为条件，接受了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二千多人加入太平军。不久，洪秀全驱逐了叛服无常的张钊、田芳等盗匪队伍。人们将洪秀全呼作太平王，到处传颂“金田起义出大王”。

十二月十七日，清朝派李星沅从桂林赶到柳州，向荣从横州（今横县）带兵到桂平，共同策划围剿太平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 年 2 月）清军万人在向荣指挥下分东西两路向江口进军围剿太平军。而太平军只动用了三千兵力，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罗大纲的带领下，以逸待劳，于牛排岭前伏炮齐发，几个冲锋便把清军杀得弃甲丢戈；太平军继用刀矛作战，一下子打死打伤好几百清兵，战胜了五倍以上的清军。这就更使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加入起义队伍。三月，起义军主动撤出江口，西进紫荆山武宣。

在进军武宣的二月之间，太平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将清军向荣、周天爵的兵马杀得损兵折将，太平军人心振奋。三月二十三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正式称天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就是太平天国前期的五军主将制度。

从三月底四月初，清军在武宣又吃二次败仗，为了扭转局面，清廷从广州、四川、安徽、贵州增援四千余人，由国库拨银三百万两，又由四川运米五千石备用。五月十五日晚，太平军主

动撤离东乡，突破清军防线，冒雨经大林北击防务空虚的象州，直指庙旺。十七日，又占领高坳，摆“风柜阵”，一举攻克古城。几天之间，势如破竹，一连克庙旺、古城、寺村、中平、百丈、新寨和大乐圩等地，洪秀全在新寨立大营，指挥全局。

五月底六月初，太平军与清军乌云泰部在马鞍山、独鳌岭、梁山村展开大战，太平军斩杀清军官员十五人，士兵近三百人，清军全线崩溃。当时有民谣说：“象州官府带兵多，打起仗来乱鸡窝。天兵山头一声喊，狗官尽找乌龟壳。”

不久，太平军又撤离象州，血战新圩，东进平南，大捷于官村，然后又声东击西，攻克永安。官村大捷后，太平军在与清军的斗争中初步取得了主动权，于是北上八峒山区，在大旺扎营立寨。洪秀全把将士分为水陆两路合攻永安。陆路由大旺火速东行，出滕县大黎，屯扎五天。这五天内，大黎人扶老携幼，不畏山高路远，踊跃参加太平军，其中有一位容貌俊秀、行动机敏的十四岁少年，他就是太平天国后期将领英王陈玉成。不久太平军在罗大纲指挥下，翻越龙头界，经樟村进人永安黄村，穿古眉峡，到水窦村，九月二十四日黎明，罗大纲率队直逼永安城郊，占据东山头，人南门外长寿圩。次日猛攻县城，经过鏖战，杀死团练头子苏保德，州官吴江投井自杀，军正丁履吉在学署上吊自杀，清兵四千八百余名大部分被太平军歼灭，太平军遂进人永安城。这是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后第一次占领城池，因此士气十分饱满。

攻克永安后第七天，天王洪秀全从容地进人永安城，威风凛凛，甚是尊严。进城后，洪秀全立即发布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心，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太平军的最高指挥机构设在州署，洪秀全在这里听取诸臣奏事，指挥作战。

太平军攻克永安城的第二天，清乌兰泰部从平南赶到永安，进驻附近佛子村，与太平军对峙。太平军十月五日始出兵与清乌兰泰、刘长清、李能臣、李瑞、张敬修等部接战，大败清军。从咸丰元年到二年四月，清廷调兵勇五万余人，配备一百多尊大炮，耗银近一千万两，依靠优势装备，围攻永安半年，但并未阻止住太平军的发展势头。

太平军与天王洪秀全进驻永安之后，即改州衙门为天朝，听取诸臣随时奏事，并颁定太平天国年号，开创新朝。咸丰元年十二月，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庄严宣布：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建朝后，太平天国在太平军中开始建立赏罚登记制度，颁布了著名的天历。天历原为南王冯云山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于桂平狱中草创的，规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沿用干支纪年、月、日的古法，并改地支中丑为“好”、亥为“开”、卯为“荣”。天历于咸丰元年冬公布，定是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

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五日，太平军突破清军围困北上，八月大败清兵于永安、昭平间之大山中，杀敌总兵以下官兵五千人左右。十九日，开始围攻桂林，打伤乌兰泰于桂林南郊之将军桥，不久，乌兰泰死于阳朔。五月二十一日，太平军主动撤离桂林，第二天占领兴安县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破全州城。十日，在向湖南进军途中在水塘湾与敌人伏兵发生激战，南王冯云山殉命。十二日，太平军自广西进入湖南，占领道州，湖南会党群起响应，清军望风而逃。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克江苏南京，并以此作为太平天国都城。

太平天国从组织酝酿到团营起义、永安建国、打出广西、进军江南、攻克南京，前后近十年时间。它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也

给了外国资本者极大的震动。

（王琳）

参考资料：

《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

《太平天国起义记》。

《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

《金田起义》。

太平军北伐

从咸丰三年四月初（1853 年 5 月），太平军自浦口开始北伐，到咸丰五年四月底（1855 年 5 月底）北伐军完全失败为止，太平天国为了夺取京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北伐作战。其过程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咸丰三年三月底，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杨州西进（扬州防务交由曾立昌负责），四月六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九个军的番号，约二万余人。临行前，洪秀全诏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縻时日。洪秀全等还决定，待北伐军进抵天津后，再派兵增援。

北伐军没有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而经由皖北进军。清廷对太平军的北进意图一时判断不清，不知北伐军是牵制和吸引进攻扬州的清军兵力，还是挺进黄河以北。咸丰帝只得调兵前堵后追，仓惶命清兵南下黄河一线堵截，并把苏皖地区的作战行动交给琦善统筹。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率领的黑龙江马队后，一路长驱北进，连下安徽滁州、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五月四日到达亳州（今安徽省亳县）。蒙亳一带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伐军路过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扩大了自己的队伍。五月六日，北伐军放弃亳

州，于次日攻克清军兵力薄弱的河南归德府城（今河南省商丘），缴获火药四万余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德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律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杞县、陈留，于五月十三日进逼开封，因攻城未克，便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此发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告以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甚缺、通信不便等情况。这时，北伐军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由于清军前线将领开始对北伐军的兵力和行动企图判断不清，以为不过二、三千人，意在牵制扬州外围的清军，就仍以重兵围攻扬州，这就为北伐军的长驱北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廷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并已成蔓延之势，便陆续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急调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二千余人由江苏清江浦北上，并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追；令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止太平军北上，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八千开赴河南协防；命直隶布政使张集馨率兵一部驻扎临洺关（今河北省永年），相机南下；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一千九百名北上追击。胜保迟至五月十二日才自扬州附近启程，而此时北伐军早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西进中。

北伐军于五月十七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阳，十九日到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河入口处，停有不少民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二十二日起开始抢渡黄河。五月二十五日，托明阿率盛京、吉林马队数千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继续抢渡。五月二十八日，北伐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担任阻击任务的数千人被清军截断，未及渡河，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损失大半，最后于七月中旬攻下安徽太湖，东向与西征军胡以晃会合。

北伐军渡过黄河后，于五月二十六日攻破河南温县，六月二日进围怀庆府。当时城内仅有清军三百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由怀庆知府余炳焘等督率，死守待援。林凤祥等本以为怀庆清军单薄，可以迅速攻克，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挖掘深壕，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

对于太平军北渡黄河，清廷极度震惊，乃于六月八日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以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六月中旬，托明阿率部六千人、胜保率部一千九百人、恩华率部五千余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讷尔经额也由彰德（今河南省安阳）移营怀庆东北的清华镇指挥。

北伐军久攻怀庆不下，消耗很大，而增援的清军却越来越多(约近二万)，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于七月二十八日主动撤围西进。北伐军由于在怀庆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纠集兵力，加紧布防，从而增加了北伐军进军京津地区的困难。

北伐军撤离怀庆后，便绕道济源，翻山越岭进入山西，连下垣曲、绛县、曲沃，于八月中旬进至平阳（今山西省临汾）、洪洞一带，清军迎头堵截，命讷尔经额调兵控制正定、井陉等要塞，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但北伐军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八月二十七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交界的临洺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所部清军（由怀庆回防直隶）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

北伐军绕道山西插入直隶的行动，使清廷满朝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

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九月十三日，僧格林沁率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共四千五百名屯驻涿州，屏蔽京师，并策应胜保军，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北伐军。

林凤祥、李开芳等在深州一带稍事休整后，于十月二十二日率军东走，连破献县、沧州，于二十七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从而使清王朝围歼太平军于滹沱河南的计划又告落空。

北伐军原想占据天津，以便进行休整和待援。当时，天津清军甚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绅立即组织团练武装，并破坏运河堤岸，引水环城，阻碍太平军的行动；加之在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军赶到，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因此，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未能实现。

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十八里。北伐军既无法占领天津，便退出杨柳青，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迅即派出援军。他们在这里筑木城、挖壍壕、建望台、埋地雷、竖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咸丰三年四月初从浦口出发，到十月二十七日占领静海、独流。近半年中，北伐军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队伍也扩充至四五万人。但到达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扎下来，等待援兵，从而陷入重围，被迫转入防御。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至此，进攻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已无法实现了。

围攻静海、独流的胜保军计有两万余人。胜保设大营于良王庄，以主力围困独流镇，由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也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三十余里的王庆坨以为声援，同时防堵太平军进袭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县尚有二万七千余名团练武装配合清军作战。

开始，胜保军凭借优势的武器（包括八千斤至万余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给养，连日进行围攻，企图迅速消灭北伐军。但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使胜保军屡攻屡挫，以致束手无策。北伐军有时也抓住有利时机，对清军实施反击，并击毙率领火器营的副都统佟鉴和天津壮勇统领谢子澄等。由于久攻不下，胜保多次受到清廷指斥，最后不得不要求僧格林沁移营前线，与之合力围攻。

北伐军在静海、独流一带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着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充分表现出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咸丰四年（1854 年）正月八日突围南走。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经大城县，于正月九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桃园、西成、辛庄等六七个村庄，这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迅速建造土垒、木城等防御工事。

僧格林沁和胜保企图歼灭北伐军于撤退途中，率领马队紧追不舍，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接近，便施放枪炮，投掷火罐、火球，大量杀伤敌人。

束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又于二月九日乘着大雾再次突围，途经献县，于十一日抵达阜城。

阜城也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北的连村、对村、杜家场和城西南的塔露头村、红叶屯等村落，周围密布鹿砦、树栅，有的地方多达五六层，准备坚守。

北伐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三万多清军包围。不久，城北各村落人敌手。二月二十七日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的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万余清军（内有马队二千），赶往山东防堵。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按照预定计划，天京当局于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后，应立即派出后续部队，北上增援。由于天京外围及西征战场的形势均较紧张，援军未能预先筹组和即时派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弃扬州，以便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扬州被江北大营清军所困，守军曾立昌部难以撤出，于是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部前往扬州外围接应。赖汉英于十月十三日出发，十一月七日才接出曾立昌部，放弃扬州。之后，留兵一部退守瓜洲、仪征，主力前往安庆，准备北援。北伐援军原拟由燕王秦日纲统领，秦日纲将这一艰巨使命交给了曾立昌等人，自己仍留守安庆。

北伐援军共十五个军，七千五百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杨、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等率领，迟至咸丰四年正月七日，才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于二月三日到达蒙城。援军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和游民等人伍。二月上旬，北伐援军人河南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萧县西北的包家楼、蔡家庄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并占领丰县，二月二十一日人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退回河南永城，尔后转人安徽六安一带活动。由于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地区兵力空虚，故北伐援军进人山东后，如人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三月三日直逼距阜城仅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兵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

奉命阻击北伐援军的胜保率部自阜城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三月七日到达临清外围。北伐援军一面阻击南下的胜保军，一面猛攻临清城。三月十五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但城内粮秣弹药已被清军全部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有马队四千余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援军入城后，清军随即对临清形成合围，并不断用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屡战不利，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部队伤亡逃散者万余人。

北伐援军如果坚持北上，很快便能与北伐军会师。当是清廷甚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又添双翼"。但援军在临清作战失利后，领导层中对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了激烈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但许宗杨和陈仕保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不如南行。双方争执不决，最后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四月一日，援军南退冠县，在清军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被杀二三千人，新附之众纷纷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一说自杀)；陈仕保渡河后在安徽风台县境内阵亡。许宗杨只身逃回天京，杨秀清将其投入东牢。

咸丰四年三月，天京方面又决定派燕王秦日纲再次组织增援，但秦借口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不愿北行。天京当局终因金陵、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以及湖南方面战事十分紧张，无力抽兵而作罢。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了。

咸丰四年四月九日，北伐军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部据守。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追来，不久步队也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北伐军为了另择一处牵制清军，便商定由李开芳

率领经过挑选的健卒六百余人骑马突围南下。五月二日，李开芳率队自东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三日袭占高唐。胜保在歼灭北伐援军后，于四月二十三日返抵连镇外围，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此时，留守连镇的太平军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则拥军二三万人。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深壕、构筑土城，壕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尺，厚八九尺，上安抬枪、火炮，每隔一丈支帐蓬一座，设兵十名，严密围堵，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攻数月，清军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士气越来越低，以致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指斥。太平军方面，由于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尽。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北伐军前后出降者达三千余人。咸丰五年正月初一，太平军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林凤祥利用僧格林沁的诱降阴谋，于正月初二，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等九十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群众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诈降的九十余人全部被害。正月十九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北伐军将士拼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身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不久，木城被攻破，清军纷纷突人。太平军将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大量杀伤清军。最后，太平军大部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地道深处，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慷慨就义。

李开芳率领的六百余人（突围途中扩充近千人）占据高唐的当天，胜保即率马队三百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军聚集高唐城外，使这支太平军又陷入重围。李开芳得知援军溃败，早已退出临清，而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栅筑垒，开掘壕沟，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多处，直通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后用云梯、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便

改用临时铸造的重炮轰击。太平军利用壕沟地道作掩护，保存自己，并于黑夜抢修被敌人轰塌的城墙。以后，清军又采取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也未能破城。太平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利用夜暗袭击敌营，前后三十余次，毙伤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留守连镇的北伐军被歼后，清廷便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一月二十三日选精兵八千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围城清军增至二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从俘获的太平军人员中得到李开芳等急欲突围的情报后，便于一月二十九日夜，密令南面清军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由此突围。李开芳没有识破敌人的诡计，于当日午夜率部突击，向南急走。僧格林沁以马队五百余名衔尾紧追，李开芳部遂入据离高唐约五十里的茌平县冯官屯。

冯官屯有三村相连，外有高墙。太平军占据后，又掘壕立栅，严密防守。二月一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占据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将房屋尽行轰塌。太平军在屯内挖掘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待敌人进至鸟枪射程以内时，通过工事射孔开枪射击，清军始终无法攻入屯内。最后，僧格林沁决定采用恶毒的水灌法，强迫大批民工挖一条全长一百二十余里的水渠（历时月余），引运河水至冯官屯。三月五日，开始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数尺，壕沟地洞被淹，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四月十六日，清军围攻甚急，太平军粮弹告罄，陷于绝境。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一说降于清军），后解送北京，于四月二十七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

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宋美云）

参考资料：

《简明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战争史》。

《太平天国革命》。

天京事变

咸丰六年（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在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又在扬州打败了江北大本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苏清军和江南大营，形势大好。从武汉到镇江的滚滚长江上，船只往来，畅通无阻，成为太平天国东西呼应、南北配合的大动脉。可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危机日益加深，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终于在当年秋天发生了可悲的天京内讧。这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大的转折点。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及太平军西征的胜利和天京地区的辉煌战绩，使它在军事上达到了高潮时期。革命形势对太平天国的发展十分有利，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尤其是身为主要领导人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享乐思想和权力欲望更为严重。定都南京不久，他们就立即大兴土木，拆毁许多民房，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建造豪华壮丽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天王府城周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就连后花园也是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杨秀清营建东王府，不惜大批毁坏附近的民房、商店以开拓地基。东王府虽逊于天王府，但也是周围数里，墙高数仞，土木冠绝天京。天王从民间大肆挑选嫔妃，此例一开，诸王效尤，遂给民间带来极大的痛苦。

东王杨秀清生活也颇为奢侈，大讲排场。他每次出行时，天京全城大放礼炮，行人回避，甚至还要跪在街头。他出行时常常

大摆仪仗、鼓乐。仪仗队多达数千人之多，以至排成二、三里的长队。

由于因袭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还颁布等级森严的礼制，对诸王及其妻子儿女、亲戚和各级官员的称呼，都作了严格的、繁琐的规定，不得乱称。例如，天王洪秀全得称万岁，凡上言皆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子称幼主，亦称万岁，但不三呼。女曰天金。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其属下上言呼九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其子为世子，称殿下，亦呼千岁。女曰东金。（有的记载说，称天王的长女为天长金，次女称天二金，三女称天三金；称东王的儿子为东嗣君千岁、东二殿下万福。）对丞相至军帅皆称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皆称善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天王的轿夫六十四人，东王的轿夫四十八人，连最下级的两司马也有轿夫四人。他们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骄傲、享乐及等级制度使他们之间彼此睽隔，猜忌横生。追求名利和享乐发展成彼此争夺权利和矛盾重重的局面。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中，逐渐形成洪杨矛盾与杨韦矛盾两组错综复杂的矛盾。

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杨秀清飞扬跋扈，而使天王大权旁落引起的。杨秀清确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从金田到南京，他是实际上的军政指挥者。他总理天国的军政要务，辅佐天王，能孚众望。但是，建都南京以后，杨秀清的个人权威思想恶性膨胀，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随着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凡天国的军务政要都先在东王府商妥，然后转奏天王，天王不得不依样旨准。杨秀清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从定都南京到天京内讧的前夕，杨秀清演天父下凡的次数不算多，但就有三次是针对洪秀全的。例如，定都南京刚刚半年的光景，杨秀清抓住天王虐待女官的小事，采用天父下凡的手段，

令洪秀全跪在他的跟前，还要责杖四十。韦昌辉和群臣马上跪下恳请杨秀清赦免，韦昌辉还表示愿意替天王受杖，均遭杨秀清拒绝。洪秀全无可奈何，只好跪下准备挨棍子。杨秀清趁洪秀全要跪下的工夫，便以天父的口吻说：既已认错，我就宽恕不打了。这才把这场假戏收了场。事后，洪秀全心中非常恼怒。杨秀清见事情闹得过分了，就主动到天王府劝慰。洪秀全破格在金龙殿上设宴招待他。席间，洪秀全说，我曾亲自到过天堂，见过天父，天父是宽宏大量的，而且告我要宽容别人。言谈中暗示杨秀清：你别再来这一套，天父根本不像你这样粗暴无理。但是杨秀清权欲熏心，抓住一切时机与洪秀全争权，凡天王认为可行的事，他都说不行；凡天王认为应杀的人，他却说不能杀，以表示权由己出。洪秀全不甘大权旁落，且又性情暴烈，因此洪、杨矛盾日益尖锐。

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家庭，他加入拜上帝会后行动却很坚决，把全部家产变卖用来制造武器，准备起义。而且他带动全家族的人几乎全都参加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他是金田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当冯云山、萧朝贵相继牺牲后，他的地位仅次于杨秀清，经常在外统兵打仗。这对于杨秀清不能不是一种威胁。韦昌辉曾读过书，小有才气，为杨秀清所忌，加上杨秀清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对韦昌辉极不尊重，常因小事而任意挫辱。韦昌辉屡受其辱，以此而怀恨在心。他对杨秀清采取逢迎的办法，常在杨秀清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的样子。只要杨秀清的轿子一到，就三脚两步地跑出来扶轿迎接。他与杨秀清讨论问题的时候，论事不到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夺住宅时，杨秀清徇私偏袒要杀韦昌辉之兄，又偏偏叫韦昌辉给其兄定罪。韦昌辉则迎合说：请以五马分尸，若非如此，不足以警众。但韦的心中却极端愤恨不平。

杨秀清对他周围的将领和士兵更是严刑峻法，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

咸丰六年的军事胜利后，杨秀清妄自尊大，企图取得“万岁”的称呼，以便进一步取代天王洪秀全的地位。同年六、七月间，他借天父下凡附体，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听令。洪秀全来到东王府，杨秀清则以天父的口气责问道：你与东王都是我子，东王有天大功劳，何止九千岁？洪秀全对曰：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杨秀清又说：东世子岂止千岁？洪秀全对曰：东王既万岁，东世子也便是万岁，且世代都万岁！

杨秀清逼封万岁活动使洪秀权深感存在着的危险，迫于杨的权势，只好一面允于八月杨秀清生日时加封；一面立即密诏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速回天京诛杀杨秀清。当时，北王韦昌辉在江西战场，翼王石达开在湖北战场，燕王秦日纲在丹阳前线。韦昌辉得令后急如星火，率二千人赶回天京。在天京附近遇到燕王秦日纲，便劝秦回京诛杨。秦日纲平日对杨秀清也不满意，便随北王于八月三日深夜回到天京，封锁天京的交通要道。四日凌晨，韦昌辉冲进东王府，刺杀杨秀清及其全家老小，其部下蒙难者极多。天亮时，东王府内外尸首积塞。

石达开闻变，急忙从武汉洪山驻地赶回天京。他见天京杀人太多，很不满意，当面劝阻韦昌辉不可滥杀无辜。韦昌辉见石达开不满，顿起歹心，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缒城逃出天京城。疯狂的韦昌辉却把留在天京的石达开的妻子儿女和老母全都杀死。石达开逃至安庆，起兵讨韦，并要求洪秀全交出韦昌辉的人头，否则就攻下天京。但是韦昌辉却在洪秀全的默允下继续搜杀东王的部下和属员。

洪秀全眼看事态扩大，便下令制止韦昌辉滥杀。但韦昌辉得诏大怒说：我为渠（他）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并立即派兵进攻天王府，双方对仗数十天。韦昌辉滥杀无辜早已引起天

京军民的极大不满。十月初，石达开讨韦大军压境，天王洪秀全下诏各众内外，全朝同心，将韦昌辉处死，被捕杀的还有秦日纲及其同伙二百多人。事后，洪秀全派人将韦昌辉等人的首级送安徽宁国府交石达开验看，并召其回京辅政。

十月底，石达开率军回到天京，天京城内皆大欢喜。石达开自幼读书有大志，且为人平和，讲义气，讲究实际，善驭中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统帅。天京变乱时，石达开斥责韦昌辉杀人过多令其住手的行为是正义的，后又遭到迫害，深得人民同情。他起兵靖难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没有石达开的强大的军事压力，韦昌辉不可能迅速垮台。因此，石达开得到全朝文武百官的支持和拥护。全朝文武向天王保举石达开总理朝政，辅佐天王治理天国。但是，内讧和阴云并未因此消散；再加上洪秀全长期脱离群众，不了解实际，且又日趋腐化，加上周围又布满了阿谀奉承、拨弄是非的小人，遂使他的思想变得狭隘、保守、经常疑心横生。杨韦事变对他的打击很大，使他几乎对所有的有功之臣都不敢信任，除了信用洪氏本家之外，而对外姓大臣不肯信任重用。所以，他对深孚众望的石达开也疑心重重，不肯重用，反而把自己的两个昏庸无能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王和福王，干预朝政，以牵制石达开。这使得石达开非常伤心和不满，也引起满朝文武的反感。石达开的心腹谋士张遂谋乘机蛊惑视听，劝石达开说：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图，曷入川作玄德成鼎足之业？石达开小心翼翼地在天京呆了半年多，深怕遭到洪氏兄弟的暗算，惟恐使自己落得第二个杨秀清的下场，便决定出走天京。

咸丰七年五月，石达开率部出京，沿途张贴布告，表明由于自己的一片忠心不为天王所容，天王疑心太重难免加害于己，不得不离京远征。但自己对上帝和天王仍然是忠贞不二的，待革命成功之日，我便隐居山林了：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天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万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贞。分酬上帝使，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

石达开出走时，有十多万太平军精锐之师跟随而去，天京仅剩下一些老弱残兵。天国军政一时无人主持，陷入瘫痪状况，天王洪秀全几成孤家寡人。这使他焦急不安，便令百官"百计迎回石达开"，但石达开宁死也不返回，而在安庆驻扎将近半年之久。如果他以安庆为中心，与天京互为犄角互相声援，对太平天国革命还是有利的，可惜他决计远征，实现占领四川自立一国的分道扬镳的计划，终于走上了流寇主义的道路，从而削弱了实力。咸丰七年八月，石达开自皖南入江西，后在浙、闽流动，屡为清军所败。咸丰八年九月复经江西入湖南，第二年退回广西。此时石达开及其部下普遍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部下纷纷脱离石达开辗转回到江西与李秀成领导的太平军汇合。同治二年（1863 年）三月二十七日，石达开率领三、四万大军抵进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准备渡河直取成都。但是夜间河水陡涨数丈，大军无法渡过。石达开打算等水势减去再行强渡，不料清军赶来，和当地土司的队伍相配合，将石达开的军队重重包围。北面是大渡河，对岸有清军总兵唐友耕严密把守，西面松林河有土司王应元把守，东面马鞍山有土司承恩岭把守，南面山高路险被承恩岭砍倒千年古树堵塞，并有清军参将杨应刚把守。石达开陷入重围。他挥师造船扎筏，几次抢渡，均被对岸清军击沉，死伤一万多人。石达开自知陷绝境，于四月十七日指挥全军突围、抢渡，一扑大渡河，一扑松林间，均遭清军和土司的拼死抵挡，加以水势湍急，抢渡又遭惨败。石部兵马死伤大半，且又弹尽粮绝，将士"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甚而有杀人以食者。四月二十三日，清军攻陷紫打地石部大本营。石达开率余部七、八千人奔到老鸦

濉，复为清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石达开自知没有生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携手投河，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此时，清军高悬投诚免死的大字标幅，设计诱降石达开，动摇石部军心。于是石达开在敌人诱惑下，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求降信，用箭射入清营。信中表示：求荣以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他在信中提出了投降条件："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厚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为民，愿为军者聚为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一人可以自刎，三军饰以全安。然达舍生果能出全吾军，捐躯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不为辱。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伤。"他愿意以自身被杀或自刎，以求清方赦免自己的部下。并天真地请求敌人能对其部下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清军乘势施展阴谋诡计，派杨应刚等亲赴石营劝降，先贻书约誓，待以不死，并指天誓日，表示说话算数。石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第二天，石达开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至洗马姑清营谈判投降条件，结果受骗被俘，押至成都。石达开被俘后，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连敌人也承认他是被迫投诚，并非真心反正之归顺。五月十日，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三十三岁。他的部下数千人也大都惨遭敌人的杀害，五岁的爱子也被处死了。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分水岭，它大大消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造成朝中无将、国中无人和天京空虚的严重局面。清军乘机反扑，清军从上游重整旗鼓，顺长江东下，全力反攻太平军。咸丰六年（1856 年）清军攻陷武汉，围九江。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也趁机复活，天京再度被包围。咸丰七年十日，清军陷镇江。咸丰八年四月陷九江。太平军在江西的地盘大都丧失了。敌人却气焰嚣张，狂叫：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

非正主，依旧让咸丰。事变还造成太平军士气低落，人心离散，在太平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起包裹回家去，还是当长工。"

（宋美云）

参考资料：

《简明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战争史》。
《太平天国革命》。

天京保卫战

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开始，曾国藩的湘军重整旗鼓，再次进犯安徽的太平军，驻池州守将韦俊叛降清军。江南大营也加紧进攻天京，遂使一度缓和了的局势又趋紧张。咸丰十年一月，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

咸丰十年初，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江南大营。他们派精兵间道奇袭杭州，吸引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杭州，然后迅速撤回奇袭部队，再集中优势兵力出奇不意的总攻江南大营。十年正月，李秀成间道出师。二月，一举克杭州。江南大营闻讯，果然派兵救援。李秀成则放弃杭州，迅速回师。闰三月，李秀成、陈玉成等五路太平军猛攻江南大营。闰三月中旬再次摧毁江南大营，清军头目和春、张国樑败逃至丹阳，太平军迅速追击，张国樑拨马出逃时落水而死。和春逃至无锡浒墅关，眼看走投无路遂自缢而死。从此，江南大营不复再建。

咸丰十年四月，洪秀全在天京举行会议，庆祝攻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并趁机再次召开军事会议。议定太平军立即东征苏南地区，然后分江南、江北两路大军沿江西征，夺取武汉以救援安庆。这叫作第二次西征。会后，李秀成挥师东征，克复苏州等许多州县，大军逼近上海，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五月，李秀成第一次进军上海。这时，盘据上海的外国侵略者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帮助清军进攻太平军。美国

人华尔纠合一些外国亡命徒组成洋枪队进攻太平军，但连吃败仗，华尔也受了重伤。当太平军迫近上海城时，适值英法联军从天津撤至上海帮助清军抵抗太平军，结果，李秀成撤离了上海地区，退到苏州。

咸丰十一年初，陈玉成和李秀成率军第二次西征武汉，解救安庆之围，以确保天京的安全。陈玉成军沿长江北岸从安徽入湖北。原约定李秀成军沿长江南岸经江西进入湖北，两军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会师武汉。咸丰十一年二月，陈玉成的北路军攻克离汉口只有一百六十里的黄州。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黄州骗阻太平军攻打武汉，胡说太平军如先攻打武汉，形成孤军深入，有遭到夹击的危险。又加上李秀成的部队行动迟缓没有及时赶到，陈玉成竟回师援救安庆，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李秀成过高地估计了湘军的实力，从而改道从徽州进入浙江转攻江西，再进湖北，直到咸丰十一年五月才到达武汉外围。而陈玉成早已率军回援安庆了。由于李秀成会师误期和陈玉成急忙撤走，遂使第二次西征流产了。

曾国荃率领湘军猛扑安庆，在安庆外围与太平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失守，守城的太平军一万六千多人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湘军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存留。

安庆失守使天京失去了西部屏障，这对太平天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太平军在东部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咸丰十一年四月，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率部攻入浙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连克浙东、浙西的大部地区。八月，李秀成由江西进入浙江，十一月底再克杭州，遂把浙江和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天京东部的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如果没有苏浙基地的开辟，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苏、浙两省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清朝政府赋税收入和粮饷供给极重要的地

区。曾国藩曾经惊呼："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

然而，太平军在东部战场的胜利，并没有阻止住西部形势的迅速恶化。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回庐州。同治元年（1862 年）初，他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远征西北，他自己留在庐州与湘军血战三个月。三月间弃城突围，被反复无常的团练头子苗沛霖诱入寿州城内逮捕，送至清军胜保营内。胜保要他跪下，陈玉成怒目斥责说："你本是我手下的败将，我怎能跪你？好不自重的东西！"胜保又劝他投降，陈玉成怒不可遏，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陈玉成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五月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六岁。庐州失守和陈玉成的牺牲，使太平天国西部战场全部溃败。湘军乘机东下，步步逼进天京，天国局势日益严重恶化了。

天京变乱后，天王洪秀全的精神萎靡不振，而他的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却在急剧发展。他更加脱离群众，不理朝政，不了解下情。他常常写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甚至是出尔反尔的诗句或顺口溜作为诏令颁发下去，结果立政无章，纲纪紊乱。他一味迷信上帝，一切信天不信人，单靠上帝的声威而防范他人篡权。他一度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随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同时，为了巩固天王的地位，为了削弱李秀成、陈玉成的势力，不惜滥封王爵，使彼此互相牵制。因此，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竟封了二千七百多个王。结果造成矛盾重重，政令不一，文武官员争相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弄得上上下下人心不服，各有他图。

在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异己分子。地主团练武装在苏浙地区也极为嚣张，这些封建势力盘据一方，依旧欺压人民。有的混入地方政权和太平军中与清军暗中勾

结，阴谋从内部摧垮太平天国政权。李秀成及其他将领对这些反常现象熟视无睹，反而一味采取“招抚”政策，迁就了事，引起了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因此，在太平天国管辖的区域中，农民抗粮抗租的斗争屡屡发生，杀死催租派捐的乡官等事件也屡见不鲜。

咸年十一年（1861 年）十月，曾国藩奉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后，坐镇安庆指挥全局。他分三路大军进攻太平军：一是咸丰十一年底，派他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二是十二月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入浙江。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曾竭力支助湘军，被曾国藩延入幕府，咸丰十年始单独招募和率领一支湘军与太平军为敌。三是同治元年（1862 年）三、四月间，派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乘英国轮船抵上海与外国侵略军相勾结，进攻苏南地区的太平军。李鸿章，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咸丰八年为曾国藩幕僚，咸丰十一年在曾国藩帮助下扩编安徽团练武装，按照湘军的编制建立淮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另一支凶恶的反动武装。

与此同时，英法美等国侵略军，以上海为据地加紧布防。同治元年一月，中外反动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上海的方案。英法军在上海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也扩编至五千人，改称为“常胜军”。他们与清军相配合，在上海周围进攻太平军。

同治元年初，李秀成率五路大军自杭州、苏州出发，水陆并进，第二次进攻上海。他沿途广贴布告，警告外国侵略者不得干涉太平军的行动，应当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助逆为恶，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遭到李鸿章的淮军与外国侵略者的联合反扑。双方在奉贤南桥镇激战，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被击毙。太平军也被迫退出南桥镇。同治元年四月中旬，李秀成亲率大军反击侵略军，接连收复嘉定、青浦等县城；在青浦生擒“常胜军”

副统领法尔思德。五月初，太平军逼近上海城郊，侵略者龟缩在上海城内不敢出战。清统治者也嘲弄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正当李秀成在上海近郊大获全胜的时候，曾国荃率湘军进围天京，天京形势十分危急。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命令催促李秀成回援，李秀成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取上海的计划，带兵赶回天京。从八月二十日至十月五日，李秀成在天京城外督师，与湘军血战四十六天，湘军难以招架，曾国荃面部受伤。在安庆遥控指挥的曾国藩吓得胆战心惊。李秀成鉴于太平军粮草奇缺，寒衣无备，难以坚持攻坚，便主动停止了进攻，并按照洪秀全的命令渡江进攻皖北，挺进湖北，夺取武汉，占领湘军的后方，以迫使湘军撤离天京之围。这就是太平天国的进北攻南的战略计策。同治二年春，李秀成转战皖北。但皖北遍地饥荒，太平军将士饿死、病死的很多。五月，湘军攻占雨花台。洪秀全急命李秀成迅速回军救援。李秀成率军返回大江南岸，江水暴涨，又缺粮食，士卒死伤十万多人，兵力大损，士气不振。

当李秀成在天京城外鏖战时，李鸿章督率淮军和"常胜军"乘机反扑。因此，东部战场的局势也急剧恶化了。同治二年一月，英国军官戈登统领常胜军，他在这年夏天和淮军联合攻陷太仓、昆山、吴江等地，进逼苏州。八月又派兵围攻无锡，以截断太平军后路，对苏州进行包围。苏州太平军在慕王谭绍光率领下，奋勇抵抗，使淮军和"常胜军"日复一日地消耗于坚城外。十月十七日，"常胜军"夜袭娄门外炮垒，死伤士兵二百余名。

李鸿章和戈登见硬攻不行，就采取诱降的办法，得到他们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戈登公然致书谭绍光，向他劝降。谭绍光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反击。十八日，李秀成从城外的望亭回到苏州，提出放弃苏州的主张，遭到谭绍光的坚决反对。这时，苏州的其他守将郜永宽、汪安钧之流已萌异志，酝酿叛变。当天晚

上，汪安钧出城，到阳澄湖敌营，向早已叛投清军、成为李鸿章手下总兵的程学启秘密投降。身为主将的李秀成，得知此情后，不仅不设法制止，反而对他们说："现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也不能留尔。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保我投降乎？"郜永宽之流大为感激，说："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十月二十日晚，李秀成以大势已去，对几万太平军弃而不顾，带着亲信从苏州胥门逃往丹阳。

十月二十二日晚，郜永宽等进一步与戈登、程学启商量投降条件。淮军以生擒李秀成或斩杀谭绍光为条件。二十四日，郜永宽等八人将慕王谭绍光杀害，开城降敌，苏州城遂为敌所占。几天之后，郜永宽等八人均被李鸿章处死。十一月二日，无锡失守，黄子隆被俘，不久遇害。淮军攻陷苏州、无锡后，遂兵分两路：一路进窥浙江嘉兴，一路准备进攻常州。

淮军在肃清突入江阴、常熟、无锡境内的太平军后，又集于常州外围。同治三年二月十七日，淮军水陆协同，攻占了常州西南的陈渡桥，太平军通金坛、丹阳之路均被切断。十八日，常州城外的要点尽失，太平军全部退入城内。后淮军在城壕外构筑长墙，移近炮位，并于晚间在护城河上偷架浮桥。四月五日，淮军发起总攻，以大炮对准旧缺口猛烈轰击。至六日，南城、北城各被轰塌十余丈，淮军由缺口冲人。太平军与突入之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淮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占领常州城。四月八日，提督冯子材攻陷丹阳。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攻陷。

当各路湘军节节东犯，曾国荃部兵临天京城下时，镇守浙江的太平军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等部，也受到来自东西两面敌军的夹击。

浙东方面，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起来，于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攻陷宁波。七月七日，洋将马惇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

达宁波，会同“常捷军”进犯余姚，威逼绍兴。八月，黄呈忠、范汝增部对敌发起反击，进占慈溪，威胁宁波。“常胜军”统领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千人自上海赴宁波，于七月十六日攻占慈溪。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伤丧命。同治二年正月，浙东的中外反动联军再次发起进攻，于正月二十六日占领绍兴，二月二日占领萧山，前锋直抵杭州城下。

浙西方面，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于同治元年一月中旬率部由皖南进入浙江后，不久连占开化、常山、遂安、江山等地。同年五月四日，左宗棠由江山进至衢州，所部湘军进至汤溪、兰溪一线，威胁金华。从五月起，李世贤部在龙游、汤溪、兰溪一线对左宗棠所部湘军进行顽强的反击战。同年秋，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近万人由广西到达浙江，增强了左宗棠的兵力。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曾国荃部围困天京，李世贤奉命回援，留浙的太平军兵力减少。于是，左宗棠乘机督军于同年冬对浙西太平军发起新的攻势。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陷严州，同治二年正月十日陷汤溪，十二日陷龙游、兰溪。十三日，太平军弃守金华。接着，旬日之间，湘军又连陷武义、永康、东阳、义乌、诸暨、桐庐，二月六日开始进攻杭州西南的富阳。

富阳是湘军进攻杭州的必经之地，县城背江面山，右阻一溪，形势险固，太平军占领杭州，即于此修筑城垒，雉堞一新。湘军蒋益澧部自二月下旬开始进攻富阳以来，屡为太平军守将汪海洋部所败。直至八月二十七日，才在“常捷军”千余人的协同下攻占该城。湘军既占富阳，便沿钱塘江直逼杭州。同时，分兵趋余杭（杭州西），企图切断杭州太平军的后路。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同治二年底，苏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严重恶化，苏州、无锡落入敌手。淮军除进攻常州外，分兵一支南入浙江，进攻杭州东北的重镇嘉兴。嘉兴附近的平湖、乍浦、海盐、澉浦、海宁、桐乡

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投降叛变。同治三年二月，嘉兴失守，坚守杭州的太平军陷于敌人的三路围击之下。

二月十日，湘军在“常捷军”的配合下，对杭州发起猛攻，用大炮轰塌风山门城垛约三丈，乘势涌入，后被太平军全部逐出。十二日，敌军向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发起猛攻，太平军坚决抗击，给湘军以重大杀伤。当天晚上，守将陈炳文等率部北走德清，杭州于次日晨落入敌手。同日，汪海洋弃余杭北走，余杭亦失陷。

二月二十七日，李世贤会同陈炳文、汪海洋、黄呈忠、陆顺德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离浙入皖。杨辅清、黄文金等留守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为湘军占领。

苏南与浙江根据地的丧失，使天京的东南屏障不复存在，军需和粮食供应断绝，进一步陷入了被动局面。

同治二年十月十五日，巡抚曾国荃及提督萧庆衍部进扎天京城东孝陵卫。这时，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

十一月十日，李秀成自丹阳回到天京，次日即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取道江西和湖北会合陈得才、赖文光所部太平军，争取中原。洪秀全厉声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尊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洪秀全拒绝了李秀成的建议，坚持婴城固守，并且怀疑李秀成对他不忠。此时，他不但不去过问国中军民事，向他报告情况时，他总是言天说地不务实际，期待上帝保佑。

天京处在围困中，形势十分紧迫。洪秀全动员全城军民抵抗，严令：如有私拆城外清军投来书信的，抄斩全家；知情不报

者与奸同罪。

这时，浙江战场的太平军，为了从被动变主动，陆续向外突围。第一批约八万人，于同治三年一月，从溧阳、广德、宁国进入天目山区，又挺进闽、赣地区。第二批约二十万人，在李世贤率领下，从浙江德清向江西进发。第三批约三万人，从丹阳经皖南向江西突围时，遭到敌人的阻击，损失很大。

曾国荃为了加紧进攻，围困天京的湘军增至五万人。

同治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对天京形成合围。

天京城内粮食断绝，情况非常困难。李秀成要洪秀全降旨筹措，以安众心。洪秀全下诏说："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李秀成因城中无粮，要将城中百姓放出城外。洪秀全斥李秀成："不顾国体，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二月间，曾国荃合围金陵之后，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三月开始，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抵抗。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终年五十一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安。五天之后，全朝文武扶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五月三十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地保城，从而可以居高临下监视城内的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攻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其攻城；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之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还在附近距城十数丈处日夜挖掘地道，准备轰城。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工作就绪。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六月十五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退回城内。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午刻，地雷轰发，城墙被轰开很大缺口，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还击，虽给湘军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堵住缺口。湘军由太平门入城后，兵分四路向纵深进攻。太平军同湘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黄昏时分，天京各城门均被湘军夺占。

当天京城破时，李秀成为尽其“愚忠”，保住天王的骨肉——幼天王，挥泪辞别了老母，舍弃家室，独护幼天王冒死突围。但各门均被湘军把守，几次突围没有成功。深夜三更之后，李秀成把自己的久经疆场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乘骑，而自己却骑着幼天王那匹劣马，再次突围，他舍死领头冲锋，带领幼天王从城墙倒塌的缺口冲出城外。湘军拼死追击，到处喊声不绝，李秀成与幼天王被冲散，彼此不知下落。李秀成因马不能行，加上天色已明，便弃马逃入荒山顶的破庙躲避，后被乡民发现，密藏于村中。但被奸细告密，于六月十九日被湘军俘获。李秀成在自述中谈他的被俘经过时说：“我战马幼主骑去，现在生死未知。我若仍骑战马，我亦他逃矣。”

李秀成在囚笼里写了数万言的供词，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详细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及他本人的经历。

二、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指出天朝十误（即太平天国的十大错误）。

三、提出用十种办法招集太平军余部归降曾国藩，叫做“招降十要”或“收齐章程”。招降十要的主要内容是要曾国藩恩赦两广之人勿杀，给票令回，要求不杀南京城内的太平军将士，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李秀成写

完供词的当天晚上，就被曾国藩杀死了，年仅四十一岁。

湘军在大肆抢劫之后，将天京城内某些建筑物付之一炬，以消灭罪迹。全城一片火海，一直燃烧至七月二十五日。城内所有太平军将士，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湘军杀害，或聚众自焚，十余万人无一降者。湘军围城两年有余，前后死于疾病者万余人，战死者九千人，同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同治三年六月，从天京突围出来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苏东坝与率兵来迎的洪仁玕相遇，随即回到皖南广德。七月十二日，洪仁玕至湖州，准备与黄文金等坚守城池。左宗棠部湘军、李鸿章部淮军围攻湖州甚急，守城太平军顽强作战，数次大败清军，但守将陈学明于七月二十五日向清军投降，形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洪仁玕、黄文金等不得已于二十七日夜弃湖州退往广德，二十八日夜，护幼天王离广德走宁国、昌化。途中，黄文金受伤牺牲，洪仁玕护幼天王经开化、常山等地，于八月二十二日入江西玉山，企图与先期入赣的李世贤、陈炳文及汪海洋等部会合，再入湖北会合陈得才部，重振太平天国大业。不期李世贤等部已转移至赣、粤、闽三省边界地区。洪仁玕率部追赶，九月九日在石城杨家牌遭敌袭击，幼天王与洪仁玕等被冲散。洪仁玕北走广昌，在白水镇被俘。幼天王逃至石城荒山中，被敌人搜获。十月二十日，年仅十六岁的幼天王在南昌被凌迟处死。洪仁玕被俘后，于同治三年十月在南昌英勇就义。他就义前慷慨吟诗，痛斥清朝统治者，而坚信革命事业会由后来人继承。诗的最后几句是：“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

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仍在大江南北坚持斗争。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是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所部太平军。天京失陷后，他们率部由江西攻入福建南部的汀州和漳州，并以漳州为根据地，建立政权，众号二十万，屡败清军。同治四年二月，左宗棠在英法侵略者帮助下攻陷漳州。四月，李世贤兵败隐

匿山中，汪海洋将李世贤的部将杀死，把其部众并入己部。后李世贤来投奔汪海洋，竟被汪海洋刺杀。同治五年一月，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战死。自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全部失败了。

长江以北主要是赖文光所部太平军和捻军的斗争。同治三年九月，捻军与太平军结合，共推遵王赖文光为统帅，并按太平军的编制、制度进行整编。同治四年四月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的马队，杀死僧格林沁。同治五年，捻军分为东西两路，互为犄角。赖文光率部入山东，称为东捻；张宗禹率部入陕西联络回民起义力量，称为西捻。同治六年东捻军在山东失败；次年一月赖文光在杨州地区被俘就义。西捻闻讯，速回山东救援，同治七年在山东西北部被歼灭。

活跃在云贵高原的各少数民族的起义队伍，大都坚持到同治十一年或光绪二年才失败。

（宋美云）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战争史》、《简明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革命》。

捻军起义

捻军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北方一支声势较大的农民武装。

捻军，原称捻党，亦称捻子，在它尚未大规模起义之前，通常称为“捻党”或“捻子”，起义之后谓之“捻军”。“捻”的含意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持之有据又被多数人所公认的解释是：群聚为捻，捻者捏也，聚捏成群，犹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①] 每一股即可谓之一捻。捻军起源于清朝初年，盛行于皖北、苏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捻军初期的斗争方式是抗粮、抗差、集体吃大户，捉拿富豪，挖取其浮财，或与清朝的盐官、盐巡及贪官豪绅进行武装斗争。显然，捻军的早期斗争大多属于经济斗争的范围，其目的是反抗封建政府的残暴压榨，谋取生活资料，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鸦片战争后，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愈来愈强烈，加入捻军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斗争的规模和活动的地区也日益扩大。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山东濮州（治所在今河南濮城）、郓城一带的捻军为反抗清兵的镇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河南捻军千余人进入湖北应山孟畈店，与当地的清军和地主武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咸丰元年二月（1851 年 3 月），河南南阳捻军首领乔建德率领二千余人，以泌阳、遂平、裕州诸州县附近的角子山为根据

① 《捻军》第 1 册第 310 页。

地，树旗举义，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咸丰二年初，皖北饥荒严重，致使捻众起事，很快聚集万余人，由张乐行带领，同清军展开了激战，曾一度攻占河南永城。不久，在河南南部与东部，苏北、皖北和鲁西的广大地区，到处都有捻军活动。

咸丰三年四月，太平军北伐途经皖北、河南等地时，捻军纷纷响应。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阔地域，捻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在亳州、蒙城、江苏萧县、安徽灵璧、临淮、永城等地，捻军近万人同清兵进行顽强的斗争。四、五月间，皖北沿临淮至亳州等地，到处义旗招展，捻军奋袂而起，行动迅猛异常，震荡着北方大地。捻军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在太平天国北伐军的直接影响下爆发的，反过来又支援了北伐军。皖北、河南的捻军争先加入北伐军，使北伐军兵将不断增加。他们还担任向导，或配合作战，积极支援太平军北伐。北伐军在深入直隶、山东之后，抗击着大批的清兵，对捻军的起义和斗争起着屏障的作用，使捻军得到迅速的扩展。

面对清政府的镇压和围剿，使捻军首领们愈来愈感到必须加强联合，才能抵抗凶顽的清军。于是从同一地区的几十股捻军联合发展到不同地区的大批捻军会合。咸丰四年，安徽蒙、亳张乐行所部捻军与河南永城苏添福带领的捻军实行联合，并肩作战。次年初，皖北捻军龚得树部进入河南夏邑，与当地王冠三率领的捻军会合在一起，共同抗敌。皖豫边界数支捻军的联合行动，表明他们正在向集中兵力，统一作战的方向发展，为此后的会盟奠定了基础。

这时，负责“剿捻”的清将袁甲三因官员调动一事，同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发生磨擦。不久袁甲三被清廷以“坚执己见”、“粉饰军情，擅裁饷银”① 和“浮支兵勇口粮”② 等罪名

① 《清史稿·列传》第418卷。
② 《东华续录》（咸丰朝）第45卷。

撤职，撵回老家。新上任的英桂以防卫边境为借口，徘徊不敢进攻，皖北清军的围剿一时减弱，给捻军扩大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著名的雉河集会议得以趁机举行。

雉河集是安徽蒙城县境内的一个集镇，位于雉河流入涡河之处，与亳州接境，距宿州和阜阳也很近。此地的农民群众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困苦不堪，迫切要求解脱苦难，而张乐行等捻军首领又多是附近的人，在他们的影响和号召下，群众纷纷加入捻军，使这一带逐步成为捻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和根据地。咸丰五年（1855年）秋，雉河集人欢马叫，旌旗飘扬，各路捻军首领数百人云集于此，商讨各部捻军的联合问题。会议决定成立联盟，推举张乐行为盟主，以雉河集为中心，建国号“大汉”，张乐行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并且祭告天地，宣布军纪；建立五旗军制，旗分五色，各旗主帅皆听盟主调遣。所谓“五色”，是指黄、白、黑、红、蓝。五色总旗各设总旗头，称“大趟主”。黄旗总旗头由张乐行兼任，白旗为龚得树（兼军师），黑旗为苏添福、王冠三（兼先锋），红旗为侯士伟，蓝旗由韩奇峰等担任总旗头。还有八卦旗、水花旗、绿旗等，因人数不多，事实上算不了总旗。总旗之下有“大旗”，是组成捻军的基本单位，能够单独进行军事活动。大旗设有大旗头，称“趟主”，每个趟主所辖人数多寡不定，少则四、五百人，多则数千以至一、二万人，人数特别多的趟主，有的也被称为“大趟主”。大旗之下还有“小旗”，是捻军中最基层的组织，没有固定编制，从十多人至几百人不等。一般都是步队、马队混合，初时大部分是步队，小部分是马队，若作战需要马队，则临时抽调，以后马队增多，并发展到以马队为主。总之，这种五旗军制的组织形式，把处于分散状态的捻军初步统一了起来。

会议还发表了《告示》和《行军条例》等文件。《告示》明确指出，捻军之所以发动起义，是因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起义

是为了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在《行军条例》中具体规定了严明的军纪，如“污淫”、“掳掠”、“不遵号令约束”、“临阵时故意漏下”者斩；“打胜仗得枪炮子药，分派公用”，不得私有，等等。

雉河集会盟对捻军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会议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军队编制和军纪，使分散的捻军趋于统一，力量迅速扩大。老百姓在民歌中热情歌颂了捻军的雉河集会盟：

“雉河集，像京城，五色帅旗飘天空。

条条旗上写大字，‘反清’两字写中间。

杀绝贪官和老财，再把咸丰老儿斩。”①

咸丰六年春，捻军自皖北兵分五路，大举进攻河南，先后占领永城、夏邑，进围归德，困英桂于城中。不久，撤回雉河集，转攻砀山、萧县和安徽怀远、宿州，包围亳州。这一时期，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捻军控制了皖北及豫东、苏北地区，建立了一些活动基地，牵制了部分清兵，对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均起到了支援作用。但是，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缺乏长远的斗争目标，满足于夺取粮食财物，没有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摧毁清军在皖北的据点。这就给清朝军队以可乘之机。英桂在归德纠集军队，杀气腾腾地向雉河集进犯，重新上任的袁甲三也率兵向捻军猛扑过来。四月至五月，捻军在亳州、翟村寺、白龙庙、叶家小楼接连失利，清军攻占了雉河集，他们疯狂地烧杀抢掠，许多村庄只剩下残垣断壁。捻军撤出雉河集后，重整旗鼓，挥师南下，攻下了霍丘境内的重镇三河尖。民众竞相加入，部队很快扩大到几十万人，声势重振。捻军倾全力与清兵拼杀，曾一度夺回雉河集，但最终未能固守。

① 《捻军歌谣》第19页。

雉河集失守后，捻军首领们不得不率兵南下怀远与三河尖，可是仍然受到清军的重兵围剿，使捻军首领们深感必须争取太平军的支持和援助。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力量大为削弱，也迫切需要联合友军一致对敌。天王洪秀全非常重视活跃在北方的捻军，认为应该使其"掌北门之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奋战在长江和淮河之间的两支农民军提出了联合行动的一致要求。咸丰七年二月，捻军自三河尖围攻霍丘，击溃庐凤道员金光筋所率的八百清兵。张乐行随即派龚得树等迎接太平军。这时，太平天国的陈玉成、李秀成已率部解除安徽桐城之围，继而占舒城，克六安，北上会合捻军。于是，两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胜利会师。这次会师后，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盟主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五旗将领各有封号。捻军同太平军一样蓄发，有的部队改用太平天国旗帜。太平天国除经常派员与捻军联系作战事宜外，另有专任代表驻在捻军中，捻军也常派人到天京，或与陈玉成等部联络。但是，捻军仍然保持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配合太平军作战一般只限于安徽及附近地区。

两军联合，协手作战，旌旗齐奋，桴鼓相应。二月间，先后攻克固始、正阳关、寿州、霍丘等地，初战告捷。捻军与太平军协同作战，使清政府大为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以求一逞。副都统胜保费尽心机，损兵折将，方才占领正阳关。当时，安徽太平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西面的军事重镇安庆和东面的都城天京。围绕着这一战略目的，捻军多次参加和协助太平军抗击清军的反扑。咸丰七年夏，陈玉成为稳固安徽基地，牵制清军攻打江西和湖北，便率部向鄂东进攻。捻军与太平军组成联合部队，自鄂东黄梅、广济西进，在蕲州大败清兵。不久，六安地区的太平军要东援天京与镇江，捻军便配合他们攻占了舒城、桃镇。咸丰八年五月，张乐行、龚得树等率军占领怀远，月内又克临淮，并一举攻下了凤阳府、县。捻军占据淮河中游，截断了清军的水

路饷道，并将淮河北岸的抗清力量与南岸的太平天国连接为一体，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斗争。

咸丰九年六月，捻军龚得树部与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联合作战，攻克定远。这样，捻军控制的地区，可以通过定远向南扩展，同太平天国管辖的庐州等地连成一片。次年捻军参加了太平军为攻下武汉、保卫安庆而举行的西征，陈玉成率领太平军的北路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十万人，自长江北岸西进。但是，这次西征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和南路军统领李秀成的迟迟不前，而功败垂成，不得不撤兵回援安庆。

捻军接着又投入了艰苦卓绝的安庆保卫战。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安庆陷落。这是对太平天国致命的一击，也是捻军与太平军在淮河流域协同作战由胜到败的转折点。十一月间，张乐行奉陈玉成之命，率部北上，经下蔡进驻颍上，临行前将定远交与太平军接防，旋即失掉。捻军从定远到颍上，标志着他们与太平军在淮河流域长达四年之久的联合斗争结束了。

在淮南的捻军与清军英勇战斗的同时，留驻在淮北的捻军余部仍占据雉河集及亳州、蒙城、永城等地。咸丰七年十月，凤台地区的团练头目苗沛霖在胜保的指使下，带领地主武装，开始向蒙、亳地区的捻军进攻。面对苗练的进犯，捻军奋起抗击，他们“百千为群，出没无常”，接连挫败团练和清军的围剿，进而向山东、苏北、河南等地发动进攻，以便扩大力量，补充给养。

咸丰九年二月，淮北捻军二、三万人再次入豫，占据宁陵，杀知县，包围归德，不久又攻克睢州。咸丰十年春，张宗禹等率淮北捻军三万多人挺进苏北，占领桃源，攻克清江浦，杀掉淮海道员吴葆晋等，清朝政府大为震惊。同年秋，捻军进入山东，队伍“绵亘六十里，兵声火色，数百里皆震”，[1] 军威甚壮。九月，

① 《捻军》第4册，第51页。

他们在济宁击败清兵，继而攻占宁阳、郓城等地。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捻军的镇压，命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侍郎瑞麟等带领配有马队的清兵一万二千余人，由直隶扑向山东，十一月，在巨野东南的羊山集一带被四万多捻军马步队团团围困，瑞麟拼死冲出，夺路逃走，僧格林沁溜往济宁，副都统格绷额等将领当场毙命，清兵伤亡严重。咸丰十一年一月到二月，在荷泽关李家庄、汶上北面杨柳集，捻军接连击败僧格林沁，杨威山东。与此同时，河南的捻军也同清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年初，捻军三万余人自亳州经河南归德直趋朱仙镇，逼开封，克唐县，困邓州，攻裕州，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淮北捻军征战于河南、山东与苏北，也重创敌军，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群众斗争的发展。苏鲁边界的幅军、山东的长枪会起义军、河南商丘金楼寨的白莲教起义军等，都受到过他们的鼓舞、支持和影响。淮北捻军的斗争形成了一个以皖北为中心，西起伏牛山区，东至沂蒙山区的游击地带，成为太平天国北方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治元年（1862 年）初，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省”,[①] 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会同捻军西进河南、陕西。在豫西活动的张宗禹所部捻军随之入陕，他们由孝义出大峪口，至严家卫，击溃了前来拦阻的清军副都统乌兰都部，在三兆又大败清兵，接着攻西安，克渭南，占华州，围攻潼关。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受到了当地回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主动担任向导，尽力协助，并在渭南、大荔、华州一带积极响应，发动了反清起义。此后，由于清军向河南、皖北疯狂地反扑，形势急转直下，当地的捻军和太平军接连受挫，先失颍上，后败于太和，继而庐州被围。四月十五日，陈玉成被苗沛霖诱执。张乐行部捻军与马融和所率太平军会同营救陈玉成，但未能成功。五月八日，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第 2 册，第 863 页。

英王陈玉成在豫东延津慷慨就义。

此后，捻军为牵制敌人的兵力，减轻皖北的压力，发动了对苏北、山东、河南的进攻。此次出征，由于敌强我弱，又缺乏后援，未能遏止清军对皖北的攻势。同时，捻军在战斗中屡屡受挫，处境越发艰危。同治二年二月，为了改变捻军不利的状况，张乐行派张宗禹等率军突击，由颍州进援河南陈大喜部，自己则率部众前往宿州，后在符离集受阻，折回雉河集。清军接踵而至，保卫雉河集的战斗由此打响，各路将士二十万人在原野上殊死搏斗，可谓是“钲鼓喧阗，旌旗蔽日”。[①] 清廷集结重兵，猛烈进攻捻军的阵地，将士们苦斗恶战，终因力量悬殊，阵地被清军的马队冲破。二月十九日，尹家沟、雉河集失守。张乐行带领数百人杀出重围，沿途屡遭截击，溃散几尽，从者仅剩二十余人。二十三日夜，到西阳集原捻军首领之一李家英处投宿。未料李家英已于日间降敌，他一面假惺惺地以酒食款待，一面急速派人向宿州知州英翰告密。次日黎明，张乐行被捕，送至僧格林沁军营，随即在义门集附近的周家营遇害。由于皖北战役的失利，捻军遭受巨大损失，不仅丢失了蒙、亳一带的活动基地，而且有两万多将士殉难。雉河集失守后，张宗禹率部到豫中、豫西活动，曾谋求入陕与西北太平军会合，但未能实现。他们转战于河南、湖北，艰难地在北方进行着抗清斗争。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 年 7 月 19 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清军更加猖狂，在各个战场上向捻军和太平军进行反扑，局势更加险恶。捻军首领们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协同作战，才能抵御强敌，把北方的反清斗争坚持下去，开创新的局面。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首领代表数万将士坚定地表示，愿与太平军紧密合作，“誓同生死，万苦不辞”，[②] 并请遵王赖文光负

① 《捻军》第 1 册，第 287 页。
② 《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第 2 册，第 863 页。

责统领，与敌人血战到底。赖文光在天京陷落之后，矢志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毅然肩负起领导重任。

同治三年十一月，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人的领导下，捻军和太平军余部在豫南地区进行了整顿与改编，组成一支集中统一的部队。这支军队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并按太平军的编制、制度进行整编。封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张禹爵为幼沃王等。军队组织基本上仍以五色旗区分，但作了一些变动，每一大旗之下分五十小旗，每一小旗统兵五百，分为十馆，每馆五十人，实际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多寡不等。有的部队由于人数多，就把小旗中的一部分又编为营一类的单位。

捻军和太平军的结合，意义十分重大。首先提高了捻军的觉悟，明确了战斗目标，即复兴太平天国的伟大事业。其次，提高了捻军的战斗力。赖文光用较为严格的军事制度和训练方法整编捻军，使捻军成为一支有集中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严格的纪律的军队。再次，调整了装备，改变了战术。为了加强部队的机动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易步为骑”,[①] 减少步队，以马队为主。在步队中也配备大量的骡马，以便输辎重和乘骑，使军队能驰骋于广阔的江淮平原。同时，他们还从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出发，采用在实战中逐步创造出来的机动灵活的流动战术，即快速运动、避实击虚、步骑联合、包围歼敌。

经过整编后的捻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接连击败强敌。从同治三年末到四年初，捻军在河南邓州唐陂、鲁山等地，连续击败僧格林沁部。此后，捻军又马不停蹄地行军两月有余，时而纵马疾驰，时而盘旋兜圈，将尾随追赶的僧格林沁部拖的疲惫不堪，人马相继倒毙于途中。僧格林沁本人衣不解带、寝食俱

① 《捻军》第2册，第172页。

废，暴跳如雷，仍旧穷追不舍。捻军为了彻底拖垮僧格林沁，反响过汶河，南走邹县、滕县、峄县、郯城，入江苏海州、沭阳、邳州，重回山东郯城，抵临城，杀了想阻拦捻军的山东清兵都司杨西林、守备郭龄鳌等，然后返宁阳、汶上，西进范县、濮州。捻军的行踪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一方面使清军迷惑不解，造成错觉，以为捻军溃不成军，到处就食，助长了清军的骄傲情绪；另一方面使清兵欲战不得，欲罢不能，疲于奔命，从而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捻军看到时机成熟，便会集了范县、濮州以南、郓城以北地区的群众武装，共同作战。这时，捻军的马队、步队精锐达数万人，他们偃旗息鼓，把兵力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沿黄河岸边的河堰、树林、麦地里，为歼灭僧格林沁部撒下了天罗地网。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率兵追至高楼寨，他趾高气扬，自以为全歼捻军指日可待，遣员传令曹州知府，预备猪、羊各五百只，犒赏将士。他万万没有料到，捻军已为他找好了葬身之地。捻军先用小部分马队和步队，分三路在寨前迎敌，然后佯败退回，将僧格林沁部引入伏击圈。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刀枪林立，杀声震天动地，捻军将士如潮水般向敌人涌去，清军总兵陈国瑞带领的左路军，副都统常星阿率领的右路军被杀的人仰马翻，溃败而逃。僧格林沁亲自督率的中路军无法逃脱，不得不退守郝胡同。捻军在赖文光、张宗禹的指挥下，将这个小村庄包围的水泄不通。在捻军不断的围攻下，僧格林沁自知处境不妙，厄运难逃，便带领残兵败将于深夜三更时分，拼死突围。他们疯狂地发射枪炮，凭借密集的火力掩护，冲出包围圈，但又落入了捻军在柳林设置的伏击圈。这时捻军马、步队相互配合，轮番进攻，天未亮，战斗即告结束。僧格林沁和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均被斩杀。

高楼寨一役，捻军歼敌万余人，其中有数千骑兵，缴获了大批战马和洋枪，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治帝为此“辍朝三日”，朝廷内外的文臣武将十分惊惧。为了扭转败局，清政府任命曾国藩督办剿捻事宜，老奸巨滑的曾国藩凭其镇压农民起义的经验，认为捻军擅长骑兵作战，决不可重蹈僧格林沁一味穷追的覆辙，必须改变战略。他自从接到清廷的任命后，连连上奏，提出了剿捻的恶毒策略。其一是重点设防，即在四省十三府州派驻清军，进行设防。将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列为重点防区，把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河南归德、陈州，江苏淮安、徐州、海州作为次重点防区。妄图用战略重点区的防守来限制和消灭捻军的活动，实现其以点制面，以“有定之兵”制服“无定”的捻军。[①] 其二是修筑圩寨。命地主士绅在捻军活动地区遍修圩寨，要求必须是墙高沟深。并实行毒辣的“查圩法”、“连坐法”等；还编制了“莠民册”和“良民册”，以此割断捻军与民众的联系，使之陷人孤立无援的境地。其三是建立马队。曾国藩认为要剿灭捻军，必须在行军速度上超过捻军，“非马队不足以制胜”。[②] 倡设马队，作为“游击之师”。同时，用大量的洋枪、洋炮装备剿捻的清军，加强反动军队的武装力量。

曾国藩制定的剿捻策略，使捻军的活动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捻军在张宗禹、赖文光等人的领导下，继续顽强的坚持斗争。他们不断地调整斗争策略，避实击虚，出其不意，由敌人防守严密的皖北进人豫西南、豫东南及湖北地区继续战斗。从同治五年一月至六月，捻军先后在湖北麻城、黄陂，安徽太和白果园，河南郑州白沙，山东巨野、郓城等地，接连击败清军。为了对付“飘忽无定”的捻军，曾国藩还制定了所谓的“河防计划”，先后

① 《捻军》第1册，第23页。
② 《捻军》第1册，第18页。

提出以运河为东部防线，以沙河、贾鲁河为西部防线，以淮河为南部防线，在北部自朱仙镇至汴梁（今开封）和黄河南岸，则挖壕设防。在各条防线上或增堤置栅，或构筑长墙和堡垒，层层设障，分段负责，企图将捻军"圈制"于防线之内，截断粮饷，然后大举围攻，聚而歼之。但是，捻军及时识破了曾国藩的阴谋，在开封附近朱仙镇一带的堤墙和防守工事尚未筑好时，便集中兵力于八月十六日夜间，冲破开封南面芦花冈堤墙，击溃了李鹤年的豫军，急趋山东菏泽、曹县等地。曾国藩的河防计划又告破产。不久，清政府决定将曾国藩撤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替他的钦差大臣一职。曾国藩只得灰溜溜地回到南京，沿途曾垂头丧气道："我是打捻无功之人"。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各地群众的起义，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斗争虽然还在坚持，但已处于人民反抗斗争的低潮。捻军虽然顽强地坚持反清斗争，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其活动日益困难。面对这种局势，赖文光、张宗禹等人感到，近年来，捻军虽不避艰险，战无不捷，然而，若再如此斗争下去，恐怕独立难持，孤立难久，不如分兵联合各地抗清力量，互为犄角之势，重振反清大业。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张宗禹、张禹爵等带领一部分捻军于杞县、陈留启程，向西北进军，称为西捻军；赖文光、任化邦、范汝增等率部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

东捻军越过黄河故道，直入鲁西南，谋求抢渡运河。因清廷防守甚严，未能成功，便折向皖北，抵达湖北东北部。他们入鄂的战略计划是：会合西捻军，以四川为中心，以陕西、湖北、云南、贵州为外围，逐步扩展，重建政权。李鸿章上任后，便企图

① 《捻军》第1册，第370页。

将东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人，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1] 同时施离间之计，使其内乱残杀，相机招安，并将余部剿灭。赖文光、任化邦率十余万捻军攻下云梦、应城，进至德安府。清军提督郭松林率部紧追。东捻军便分兵在京山、天门、钟祥、臼口镇等地与敌兜圈，拖的清军人困马乏，然后于十二月六日在罗家集设伏，此役消灭郭松林部四千余人，郭松林本人身中七枪，胫骨被击断倒下，因不能行走被弃道旁，后逢其部下，才得以逃生。接着，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又击败了总兵张树珊带领的淮军，不仅击毙了张树珊及一批文武官员，而且使这支清军伤亡殆尽。不久，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相约进剿，刘铭传所部淮军由北而南，鲍超带湘军自西向东夹击捻军，揭开了尹隆河之战。同治六年一月十五日（1867 年 2 月 19 日），刘铭传带领三路兵马过河上阵，东捻军佯装迎战，尚未接仗便不战而退，出奇兵突袭敌后，刘铭传惟恐后路失去辎重，慌忙反顾，东捻军见敌人抽队渡河，迅速分三路反攻。任化邦、赖文光先后击溃其左、中、右三路军队，斩杀刘铭传手下总兵唐殿魁、田履安等。淮军被杀掉六百余人，伤数百人。刘铭传与营官、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2] 陷入绝望之中。不料，鲍超部突然从背后猛扑捻军，凶狠的清军以劈山炮连环轰击，东捻军马匹受惊奔腾，多为所蹈，相持至黄昏，由胜转败，损失很大，将士伤亡数以万计，马匹、军械丢失甚多。更重要的是战略计划受挫，以致后来误入山东，全军覆没。

东捻军出鄂入豫，而临着三种选择，其一是向鄂、豫、皖边界地区进发。其二是前往西北同西捻军会合。其三是东进山东半岛。前两个去向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都对捻军有利，但粮饷来

① 《捻军》第 1 册，第 141 页。
② 《捻军》第 1 册，第 366 页。

源比较困难。后者虽易得到粮饷，却因三面环海，有被包围的危险。赖文光、任化邦原主张进军西北，但军中存在着觅粮就食的严重倾向。山东郓城梁山地区的将士，向赖文光等提出，山东沿海地区粮食充裕、陕西缺粮，不如冒险进军山东半岛。此后捻军便决定向东进军，铸成了战略上的严重失误。

同治六年五月十二日，东捻军过运河、攻泰安。二十九日进逼烟台，道员潘霨连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防守，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急派天津洋枪队一营，携带大小开花炮六门，乘舰援救。山东巡抚丁宝桢也带兵赶到。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对付捻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东捻军被迫后撤。这时，李鸿章调集了大批淮军，兵分三路，分别由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带领，同时会约山东清兵相机扼堵，企图把东捻军逼入登、莱绝地，然后扼地兜围，以胶莱河为内围防线，运河为外围防线，黄河为北面防线，江苏境内六塘河为南面防线，企图以河防围困计划将东捻军歼灭在半岛之内。由于丁宝桢是山东的地方官吏，他主张驱赶东捻军出境，反对李鸿章的河防围困计划，遂使山东清兵对河防有意怠工，敷衍了事。东捻军获悉潍河靠近海口的一段“营垒初成，河墙未筑”①，便于七月二十日猛攻该地的清兵防线，击溃驻兵，渡过潍河，进至潍县、昌乐，使李鸿章“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②

此后，东捻军计划再渡运河，进入豫陕，同西捻军会师，便南下寻找渡口。然而狡诈的李鸿章已将原计划在运河东岸所筑的长墙移至西岸，并增兵加强了这道防线，使东捻军抢渡受阻，陷于被动。十月十七日，驻扎在潍县松树山的东捻军，受到刘铭传所部的袭击，一日三败，损失很大。二十四日，捻军在江苏赣榆再战刘铭传部，任化邦驰马麾众，殊死拼杀。忽然黄雾弥漫，部

① 《捻军》第1册，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63页。

分淮军绕袭后路，暗中叛变的潘贵升乘任化邦不备，将其杀害，军心动摇，东捻军因而大败。

赖文光与冲杀出来的将士们以百折不挠的毅力，继续苦战。他们下江苏，突破六塘河防线，屡次抢渡运河未能成功，便沿河南下，经淮安、宝应，抵达扬州附近的仙女庙。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 年 1 月 5 日）下午，东捻军由仙女庙向扬州东北的湾头和瓦窑铺进发，打算由这两个渡口过河，返回皖北，与西捻军会合。但尾随的清军追了上来，一场恶战由此展开。清朝的水师和对岸的清兵一齐向捻军射击，枪弹如雨。夜幕降临后，雨暴风狂，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捻军将士们冒着密集的炮火，与敌军展开肉搏战，除小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将士壮烈殉难。赖文光的坐骑中弹倒毙，自己身负重伤，被清军俘获，东捻军失败了。赖文光被俘后，面对清廷的无耻劝降，更加愤怒，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他在监狱中奋笔疾书，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自己忠诚于农民反抗斗争事业的信念和对清朝反动统治的鄙视，最后斩钉截铁的表示“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868 年 1 月 10 日)，赖文光在扬州城外老虎山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一岁。

东捻军失败后，西捻军仍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自同治五年九月于河南中牟分军后，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西捻军六万人马，西进入陕。当时，清朝前任陕西巡抚、留陕会办军务刘蓉急忙调军防阻，西捻军决定采用以走攻敌的流动战术，消灭这股湘军。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西捻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暗中把精锐的马、步队三万人埋伏于灞桥十里坡左右村堡，预定在此歼敌。次日，疲惫不堪的清军三十余营追至灞桥，西捻军的诱敌部队与清军接仗后，即佯败退走十里坡，敌军昏昏然紧追不舍，闯进了西捻军设伏的地区，两边的伏兵迅速出击，马队左右包

抄，展开了激烈的肉搏，不到半日，就全歼了这股清军，杀死总兵萧德杨、记名提督杨得胜等将领多人，取得了入陕后的首次大捷。清廷闻讯后十分恐慌，为阻止捻军进攻西安，保住陕甘，急忙派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带兵前往镇压。左宗棠深怕西捻军与陕甘回民起义军结合而难以对付，在入陕之前，就提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①]“先秦后陇”的策略。西捻军识破了左宗棠阻止西捻军进入河南、湖北、陕南和四川，压缩西捻军的活动范围，以便消灭的阴谋，便西进泾阳、咸阳，把主力屯集于蒲城一带，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以为得计，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妄图将他们消灭于泾水、洛水之间。然而，西捻军由蒲城进至白水，用马队猛攻渭北山区的清军，突破包围圈，进军洛川，将清军甩在后面，左宗棠的围歼计划成为泡影。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西捻军进入绥德。不久接到了东捻军告急的书信。张宗禹决定深入清朝统治的腹地，吸引敌人兵力，以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西捻军冲破清军的层层布防，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过了黄河。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山西吉州，抵垣曲。六年底进入豫北，穿过济源、怀庆、新乡，向直隶南部挺进。前锋进入房山县，直至卢沟桥，“京畿大骇”。清廷下令戒严，从各方面调动兵力，确保京师。山东、河南、陕西的清军和京师的神机营等一齐逼向西捻军。面对这种险恶的局面，西捻军于同治七年二月回师南下，占祁州（今安国），夺饶阳，向南推进，谋求与东捻军会合，可是，东捻军已在两个月以前被消灭了。三月中旬，西捻军渡过运河，进入山东、直隶交界地区。四月五日，进抵天津外围杨柳青、稍直口等地，直逼天津。清政府再次宣布京师戒严，并指使崇厚“知会英国、法国炮船，将壕墙协同守御，以固津防”。[②] 外国侵略者在镇压东捻军

---

① 《东华续录》（同治朝）第61卷。
② 《东华续录》（同治朝）第71卷。

的同时，就以天津为基地，作好了对付西捻军的准备。这时，他们倾巢而出，围剿这支农民起义军。西捻军无法推进，并得知东捻军已经失败，便重返山东，抵达渤海湾的滨海地区。在山东海丰、阳信、武定等地，张宗禹看到这里粮食充裕，便产生了轻敌思想，以为只要粮饷备足，就很容易冲破河防，没有及早抓住时机抢渡运河，突破包围，结果遭受了很大损失。四月下旬，西捻军北攻减河河墙，渡河受阻，便沿着运河东岸南下山东平原、高唐、清平、博平等处，反复抢渡，均未成功。

这时，李鸿章提出以运河为外圈防线，以恩县、夏津、高唐一带的马颊河为里圈防线，在西北岸联筑长墙，紧缩包围，严防西捻军抢渡。地主团练修筑堡寨，强迫各村农民入寨，切断了他们和西捻军的联系，使西捻军难以筹集军粮和解决住宿问题。加上阴雨连天，河水陡涨，清军趁机集中了大批炮船进行围困，西捻军的马队却无法施展自己的威力，因此，西捻军面临的困难更加严重。五月下旬，西捻军在海丰、吴桥、德州杨丁庄、沙河等地接连受挫，将士伤亡很多，骡马辎重损失很大，张宗禹也中弹受伤，一些动摇分子在危急时刻接连投敌，西捻军更加势孤力单。他们顽强战斗，继续为突围而战，六月下旬，在德州高家渡、老君堂一带谋渡运河，未能成功。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从东昌李海务渡口再次抢渡，又告失败，便退往茌平广平镇。次日，在向东北方转移途中，被清军阻击，许多将士英勇殉难，张宗禹带领十八位战士冲出重围，在茌平徒骇河边与敌人浴血奋战，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捻军起义至此失败。

捻军起义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伟大的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他们坚持斗争长达十六年之久，纵横九省，攻克了百余个府、州、县城。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一幕。捻军这支驰骋中原的农民劲旅，以自己的顽强战斗和卓著功绩，在近代中国人民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

页。

（杨生祥）

参考资料：

《捻军资料别集》第208、209页。
《湘军记》第16卷。
《剿平捻匪方略》第3卷。
《捻军》第1至第6册。
《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第2册。
《东华续录》（同治朝）第67卷。

英法联军之役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西方列强对华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它们不满足已经缔结的条约，要求加以修改，增加新的条款，以便攫取更多的权益。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英、法、美就分别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于是，侵略者故伎重演，对中国施加武力，制造了“马神甫”事件、“亚罗号”事件，蓄意挑起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将领西马縻各里率领英国军舰进犯广州，攻占了猎德、龟江、凤凰冈、东安、西固、海珠等炮台。当时，负责办理外交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对于英军的战争行径毫不在意，自以为是地认为英国军舰不会停留很长时间，午后自然退去，并下令河内的所有红单船及巡船收起旗帜，如果英国军舰入内，不要放炮还击。

十月一日，遭到连续炮轰的广州城被英军攻破，总督署被焚毁，叶名琛仓皇逃到内城巡抚衙门，并授意绅士伍崇曜、苏廷魁等出城向英国领事讲和。不过，英国方面只派兵一千人，没有长期占领广州的实力，并且受到广州城乡官兵、团练数万人的抵抗，所以很快撤出广州。

咸丰七年（1857年）春，英国派额尔金为全权大臣，法国派葛罗为全权大臣，负责对华的军事行动，虽然美、俄两国没有派遣军事力量来华，但是也与英、法勾结在一起，结成了联合侵

华阵营，共同对付中国，扩大在华侵略权益。

十一月，英、法两国集中了由五千六百余人组成的侵华联军，作好了进犯广州的准备。二十七日，额尔金和葛罗向清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提出入城“修约”、“赔偿损失”和英国方面把守河南地区各炮台等要求，并限令十天内答复。叶名琛对英、法两国照会分别驳复。尽管已经受到过侵略者的进攻，叶名琛仍然不做认真的战争准备。广州陷入危机中，叶名琛却盲目地认为英法联军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罢了。

十一月十三日清晨，英法联军占据了海珠炮台，开炮攻城。市内的商店、民房相继失火，总督衙门也遭到炮轰，叶名琛此时毫无办法，逃到粤华书院。第二天，联军攻入内城，占据城内制高点观音山（即越秀山），城内的清兵竟无一人抗敌，广州就这样沦陷了。而清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后也被英法联军捕获，不久，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囚居在海边的一个小楼，终客死于异乡。

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后，组成由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参加的“联军委员会”，实行对广州的军事管制，并建立了以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

咸丰八年（1858 年）初，英、法、美、俄四国分别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在上海进行谈判，否则就举兵北上。清政府仍然像往常那样，要求英、法、美等国使节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商办，俄使到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交涉。幼稚的清政府认为英、法等国不过是想同中国贸易通商，所谓的犯兵北上只不过是一种恐吓罢了。英、法侵略者见清政府没有在失去广州后采取妥协的态度，遂决定北赴天津，将炮舰直逼清政府的心脏。美国、俄国公使虽没有武力作后盾，但也都表示愿意一同北上，在外交上与英、法采取相应的行动。

二月三十日（4 月 13 日）后，英、法联合舰队到达大沽口

外。三月十一日，四国使节同时投递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来海口进行谈判。清政府很快派仓场侍郎崇纶负责交涉，但英、法两国使节认为崇纶职位太低，拒绝交涉。清政府又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办理，英、法方面借口谭不是全权大臣，拒绝往见，导致交涉濒于破裂。英法联军就是想用拖延谈判的办法来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而清政府还天真地想依靠趁火打劫的美、俄公使出面调停，而忽视军事戒备。

四月七日晚，英法联军派出八艘兵船及二十多艘舢板驶入大沽口拦江沙内，与原先已停在那里的八艘火轮船一起鸣鼓悬旗。次日上午八时，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清军两小时内交出炮台。十时，数十只小轮船、舢板突然闯入大沽口，法军与英军相继登陆。当时大沽南北岸共有炮台四座，皆装备有铁铜大炮，在沿河要隘处均有防御力量。在海口一带驻防兵勇达八九千人，仅南北炮台就有三千人防守。由于咸丰皇帝有过"不得先行开炮"的命令，所以各炮台眼巴巴地看着英、法军舰肆无忌惮的冒犯，直到联军开炮后，各炮台才开始开炮还击，虽经一番英勇抵抗，但都纷纷被攻陷。大沽炮台陷落后，海口兵勇溃散，致使天津门户洞开。清政府竟然在沿河两岸未设一兵一卒，只沉了几条船阻塞河道，欲意阻拦联军兵舰，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英法联军大小轮船七艘毫不费力地直抵天津。

四月十七日，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前往天津，负责议和谈判。在谈判中，英国谈判代表李泰国以战胜国发言人自居，态度蛮横，大耍流氓手段，百般威逼。桂良等对侵略者的肆意妄为却一筹莫展，既不敢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又要敷衍咸丰皇帝。结果，清政府还是屈服于英、法列强军舰、大炮的淫威，先后于五月十五日、十六日分别与英、法代表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俄、美两国也先后与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便陆续南撤。恃兵威要挟而成的城下之盟使咸丰皇帝恼怒万分，他见联军的兵舰离去后，便动了挽回条约甚至罢弃条约的念头。于是，他再三谕令在上海同葛罗、额尔金进行通商章程谈判的桂良、花沙纳等人与英、法方面谈判修改《天津条约》，英、法方面态度相当强硬，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还要坚持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兑现《天津条约》。十月，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上海订立。

咸丰九年（1859年）初，英、法分别派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他们对等待在上海换约的中方代表桂良、花沙纳理也不理，一意要进京换约。这次，联合舰队共有大小战舰二十几艘，军队二千多人，于五月十三日（6月13日）开始陆续离开上海直奔大沽。清政府见英、法联合舰队故伎重演，只得同意到北京换约，但提出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进入北京，随行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不得携带武器。由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去北塘迎接，负责护送。英、法公使对此大为不满，决计溯白河而上不走北塘。

五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大规模进犯大沽口，强行拆毁海口的防御工事。守卫大沽炮台的清军官兵纷纷要求出击，但是咸丰皇帝早有不先开炮的禁令。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大沽之战后，清方就开始修复炮台，加强防卫，并授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防御，除安设小炮、重炮、洋铁炮外，还增加了炮台，补充了陆路弁兵人数。下午二时半，英法联军军舰驶向炮台前，并向炮台开炮轰击，严阵以待的清官兵各营大炮一齐还击。各炮手发射技术十分出色，准确性极高，从气势上压倒了联军。联军十三艘军舰中，四艘被击沉，六艘受重伤，无招架之力，其它舰船不得不挂起了白旗。英法联军遭到重创，击毙击伤英兵四百六十人、法兵十四人，英军司令受了重伤。眼见大势已去，英、法公使也只好不得不逃离了大沽口，联合舰队离开大沽口集结于镇海海面。

大沽口战役的胜利并没有使清政府改变求和的方针，深恐得罪了英、法等列强。英、法公使离开大沽口后，美国公使华若翰并没有放弃进京换约的行动计划。华若翰虽一度到了北京，但由于在觐见中国皇帝礼仪方面的争执，只好放弃拜见中国天子，而于七月十八日与直隶总督恒福在北塘交换了中美《天津条约》。咸丰皇帝惟恐英法联军再次举兵，急忙命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设法与他们谈判，并作出种种和解的姿态。但是英、法公使却不予理睬。英、法两国国内在得到联军受到重创的消息后，狂妄的殖民主义者叫嚣要对中国实行报复。英、法政府为了挽回大沽口之战的败局，吞下依靠武力签订不平等条约而脔割到手的肥肉，于咸丰十年（1860 年）初再次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来华，以扩大对华战争的规模来迫使清政府屈服。

英、法舰队陆续开抵上海，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东南沿海。英国兵船一百三十余艘陆续集中到青泥窪（即今大连），最多时达到一百五十七艘，包括战舰三艘，小型兵舰三十四艘，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合计载炮三百六十一门，官兵人数达一万余名，另有在广东雇募的运输队二千五百名。在烟台集结的法军为六千三百名。英、法海军不断地在东南沿海挑衅，先后攻陷几个沿海的岛屿、城镇，一艘艘的兵舰连樯而至，给京城造成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到了夏季，随着额尔金和葛罗的到来，更使战争进入一触即发的地步。咸丰皇帝心怀侥幸心理，认为去年英法联军在大沽口首先失礼，遭到惨败，肯定心存畏忌，此番调集兵船前来，不过是以兵胁和。好在天津有僧格林沁把守，他心理稍感安慰。

清政府通过美国公使转告英法方面，北塘已经撤防，请英、法按照去年美国换约方式进京换约。英、法方面毫无表示，凭借着军事优势，于六月十五日水陆并进，占据了北塘。清政府却下令官兵只许迎敌，不能进攻。二十六日，英法联军一万多名分两路进攻新河和军粮城，新河、军粮城失陷。二十八日塘沽失陷。

英法联军一方面从北塘将军舰集结到大沽口外，另一方面从陆路攻打大沽口炮台后面，水陆夹击，致使大沽炮台腹背受敌。七月五日清晨，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将直隶提督乐善奋力抵御，誓众死守。激战一天，炮台终于陷落，乐善及守炮台的官兵壮烈牺牲。驻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认为兵少难以抵御，当晚将防守营城和南岸炮台官兵全部撤走，逃至天津，并把天津炮台的大炮运送北京，小炮及绿营旗营官兵一并撤至通州，为在天津议和作准备。

英法联军由水路向天津进犯，七月八日兵舰进至东浮桥，未受到任何抵抗就占据了天津城。当天清政府就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与英法议和，桂良即刻从北京启程赴津。桂良抵津后，英、法两国全权专使拒绝会谈，只敦促照复允准他们所提的要求，否则将带兵北上，桂良无奈只好照复表示允许。其中有关赔偿兵费、进京换约、天津通商等问题。桂良虽已应允，但咸丰皇帝表示异议，并下谕宣示不顾决裂，决战宜早不宜迟。这样，桂良就不敢按期盖印画押。英、法方面恼怒万分，不再与桂良见面，天津谈判宣告破裂。

七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北犯，沿途经过许多村镇，烧杀掳掠，将一些村庄毁为平地。清政府见侵略者直扑北京，惊慌失措，为了不使英法联军兵到北京，有碍天朝体面，清政府马上改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议和。二十九日，载垣、穆荫向英、法表示完全接受各项条件。英、法方面此时意在占领京城，于是提出要向皇帝亲递国书，撤除北京城的防御。载垣等人觉得对这两条无法接受，表示拒绝。载垣见和谈已决裂，便派人通知僧格林沁将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一行英人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名拘捕，送北京囚禁。八月四日，英法联军进犯张家湾，在数百支步枪密集射击下，清军马队溃散，步队也无法成列。张家湾前线溃败后，通州亦失守，僧格林沁等人

率领清军退守八里桥。八里桥是入京的要道，距北京只有八里。清军官兵在这里与英法联军进行了浴血奋战，但是帝国最精锐、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也惨败在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下，咸丰皇帝最后的希望在硝烟中破灭了。于是他带着后妃、皇子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离紫禁城，去避暑山庄“西狩”。

穷凶极恶的英法联军打开了通向帝国之都的大门，但是八里桥之战也使随军的军火储备削减到一种危险的程度，所以联军一直在通州等待着军需品的补给。在匆忙中被委派议和的恭亲王奕䜣无法得知联军的困境，而是采取了委曲迁就，一味求和的方针。最初的交涉是围绕释放巴夏礼等人这一问题展开的，英、法方面提出先放人再议和，奕䜣提出先撤兵后放人。就这样毫无任何结果地僵持了两个多星期。在这期间，英法联军补充了弹药、给养，完成了部署。额尔金、葛罗等人决计不再与奕䜣纠缠，继续其军事行动。

八月二十二日，联军一队人马侵入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这座拥有无数奇珍异宝，中西合璧的宫殿，侵略者们的野性大发，进行了强盗般的抢劫，并持续了好几天。但是圆明园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九月四日晚联军司令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巴夏礼，否则炮轰京城。这时奕䜣已逃往长辛店，留京的清廷大臣只好将巴夏礼等人送到联军军营，联军遂不费一枪一炮占据北京城。

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大炮设在城楼上，附近民房皆被焚毁。额尔金更灭绝人性地下令焚烧圆明园，这座人类文化宝殿受到侵略者百般蹂躏，充满着浪漫色彩和迷人韵味的梦园在强盗们的劫掠焚烧下，结束了光彩辉煌的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凝聚无数人的智慧与血汗的圆明园就这样在火光中变成残垣瓦砾了。

九月四日，英法联军照会奕䜣又提出许多苛刻的条款，并声称如果不接受便以同样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宫殿。奕䜣在英

法联军武力威逼和沙俄诱胁下，于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这场旨在扩大列强在华利益的战争就以《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了。英法联军之役从1856年开始，英法联军在攻陷广州后，先后三次进兵大沽口侵犯天津，并占据了北京城，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了空前的蹂躏；列强攫取了增开通商口岸及内河航行权、压低关税等特权，其势力扩展到北方沿海和内地；公使驻京，直接干预中国政治；传教士深入内地，造成中国社会的混乱；鸦片贸易合法化，对中国人造成更大的毒害；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

（范丽珠）

参考资料：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二）、（三）、（四）、（五）、（六）。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沙俄侵占东北边疆

在英国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利用清政府困于内忧外患的有利时机和它与中国领土接壤的方便条件，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片领土。

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也将这一事实肯定下来。自条约签订后的一百五十余年间，俄国的历代沙皇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一世，一直企图染指这一地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由他担负起对黑龙江流域实行侵略扩张的任务。道光二十九年，沙俄政府在黑龙江地区成立了所谓“阿穆尔（黑龙江）特别委员会”，并派遣人员勘察黑龙江一带及库页岛北部海岸的情况，积极进行侵占黑龙江地区的准备活动。道光三十年，穆拉维约夫强占了黑龙江口的庙街（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树立俄国国旗，设兵屯守，建立起侵略据点。这是公然破坏《尼布楚条约》的行为，但是这一行动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支持。穆拉维约夫认为，为实现占领黑龙江的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向邻国（即中国）炫耀武力。

咸丰四年至咸丰六年（1854—1856年)，穆拉维约夫以抄近路紧急增援堪察加，防止英、法海军进攻等为借口，三次指挥军舰，强行闯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行武装示威，并加紧在黑龙

江北岸设立炮台和屯驻军队。面对沙俄的频繁入侵活动，清政府虽然也多次发布上谕，要防止沙俄的侵略，并派出代表与沙俄政府进行谈判，但是软弱的清廷始终坚持“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的妥协方针，致使沙俄为所欲为，居然极端无理地宣布：应该以黑龙江为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企图把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和整个沿海地区都划归俄国所有。此后，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地区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殖民政策，对整个黑龙江左岸进行了军事占领。他还宣布，从1858年航期开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俄国管辖。他甚至还叫嚣，如果俄国被迫对中国人使用武力，那么阿穆尔将是我们的主要作战基地。在瑷珲登陆，从那里有几条平坦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满洲和北京。由此可见，沙俄的侵略野心是何等的狂妄。

沙俄在强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大片领土后，继续调集重兵，企图威逼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咸丰七年（1857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和蒙古边境集结了两万多名步兵和骑兵。沙俄要以军事威胁配合外交讹诈，使清政府妥协。同年，俄国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乘兵舰来到天津，他向清廷提出应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两国国界的要求。清政府答复说，中俄两国在康熙年间已经议定边界（即《尼布楚条约》），无可再议。普提雅廷勒索未遂，便径赴南方与英、法、美勾结，充当他们的帮凶，以便对清政府施展欺骗威胁等手段，迫使清廷出卖领土主权。与此同时，沙俄还加紧了军事准备，伺机在中国东北夺取更多的领土。

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机，穆拉维约夫率领大批军队到达瑷珲，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进行关于国界问题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第一天，穆拉维约夫就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条约草案，其主要内容就是蛮横无理地要求

以黑龙江为两国间的国界。奕山遵照朝廷的旨意没有接受这个条约。次日，穆拉维约夫称病不出面谈判，而由他的一个助手波罗夫斯基与奕山继续谈判。据俄方记载，这是为了留有余地，一旦出现某种误会需要作出最后决定时，他好再次出面。此间，沙俄的军队频繁出动，开枪鸣炮，实行武力恫吓。谈判进行到第五天，奕山便完全屈服了。第六天，即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沙俄逼迫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1) 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沙俄。(2) 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久居住并属中国管辖。(3) 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沙俄侵略者以凶恶的武力威胁和无耻的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这一条约文字极为简短，然而给中国造成的领土损失却是非常惊人的。条约不仅夺取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将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中俄“共管之地”，所谓中俄共管不过是为了逐步过渡到沙俄独占，为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铺垫道路。同时，这一条约还使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为俄国自由通行的航道。马克思在1858年评论《瑷珲条约》时曾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同年，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但是“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他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割去”。事实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从1858年以后，沙俄与清政府每签一个条约，

每勘察一次边界，都将中国的领土一片又一片地割去。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以黑龙江的征服者自居，急速派信使前往彼得堡报功。亚历山大二世特地接见了信使，并在奏稿上批语“谢天谢地”！以后，穆拉维约夫在海兰泡召开了所谓的“庆祝”大会，悍然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由于穆拉维约夫“为俄国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因此被沙皇政府破格提拔为陆军上将，晋封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

在《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之后，沙俄使臣趁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机，四处奔走，积极活动。俄国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一面怂恿英法侵略军尽快攻占津京，另一面勾结美国使臣列卫廉扮演调停人，用伪善的欺诈手段诱使清政府投降。咸丰八年五月三日（1858 年 6 月 13 日），沙俄抢在英、法、美之前，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除取得其它侵略者所得到的权益以外，还规定“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这一条款为沙俄进一步侵占我国领土埋下伏笔。

咸丰八年至九年，沙俄侵略者向乌苏里江以东派遣了大批的军队，驱逐当地的中国官员和军队，强行占领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九年，沙俄又派遣伊格纳切夫出使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的续补条约。要求中国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到海及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并要求增开北京、张家口、库伦等地为商埠。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伊格纳切夫愤愤离京，然而他并不甘心，到上海后又与英、法侵略者串通一气，积极充当他们的帮凶。他不仅为英法联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而且还以英法侵略者和清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的身份前后奔走，左右斡旋。

咸丰十年九月（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伊格纳切夫在条约签订

后公然向清政府索取“调停”和“斡旋”的报酬。在中俄谈判中，他向奕䜣威胁说，兵端不难屡兴，现在要将他们（指英法联军）召回北京，对他来说也是容易不过的，只需致函两国公使，说他们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是靠不住的，需要修改，此事即可办到。在侵略者威逼之下，懦弱昏庸的清政府又步步退让。咸丰十年十月二日（1860 年 11 月 14 日），伊格纳切夫同奕䜣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除批准《中俄瑷珲条约》外，还规定：要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所谓两国“共管”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增加喀什噶尔为陆路商埠。同时，在此约的第二条中还把俄方提出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为其大规模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根据”。同治三年九月（1864 年 10 月），沙俄政府以《中俄北京条约》中的有关条款为“依据”，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又强行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通过军事威胁和政治讹诈，在短短的几年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的中国东北、西北领土共达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仅在东北地区就强占了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使东北人民惨遭沙俄铁蹄的蹂躏。

（杨生祥）

参考资料：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沙俄侵华史》第 2 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蔡尔康等编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胡绳主编；《中国近代史》，徐凤晨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等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丛刊）1、2 册。

辛酉政变

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期间，清王朝的贵族大臣如奕䜣、文祥等人多次和侵略者打交道，主持签定了《北京条约》。当时清政府的政治中枢，已随咸丰帝迁到热河，大部分掌握实权的王公大臣也都跟去，其中掌握大权的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他们对洋人存有疑惧的心理，迟迟不肯迁回北京。英国为了控制清朝政权，极力唆使奕䜣等人一再请咸丰皇帝回銮。咸丰也存有戒心，不敢返回北京。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 年 8 月），咸丰在热河病死。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拥立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年号祺祥。咸丰皇帝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揽朝政，辅佐载淳。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

幼帝生母慈禧太后不满顾命大臣目无君上，擅自主持朝政，于是与恭亲王奕䜣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辛酉九月三十日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肃顺逮捕下狱，一举粉碎“顾命”制度，继而以垂帘听政制度取而代之，慈禧太后就此夺得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道光有三后九子，一、二、三子均早夭，皇四子奕詝为咸丰帝，皇五子奕誴出嗣为惇亲王，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奕詝生母孝全皇后崩于道光二十年，自此，奕詝即由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抚养。奕詝与奕䜣同在一母照顾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无异于一母同胞。

清朝传统，对皇子一向严格要求，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才干在奕詝之上，必得皇位无疑。不料，皇位最终归于奕詝。据说，道光帝一日领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道光帝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又据清人记载：一日，道光帝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奕詝此举，是他的老师杜受田的授意。

由此，奕詝得位有巧取之嫌，奕䜣未必服气，产生了猜疑。咸丰五年，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崩。咸丰帝上谥太后，但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减杀太后丧仪"以别嫡庶，恭亲王深为遗憾，自此，兄弟失和。恭亲王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为由，奉旨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

咸丰五年，恭亲王奕䜣退出军机处。咸丰六年，肃顺逐渐被皇帝重用。恭亲王与肃顺之间也出现矛盾。

肃顺性格骄狂，锋芒太露，得罪了不少人，但其办事干练，极有成效，也是众人知晓。肃顺有此优点与长处，颇得人们好评，更得咸丰帝重用。肃顺既有整顿的锐气，又有尊贤的魄力。他不分满汉，用人唯才，力保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及湘军。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因为他的坚持，才杀了舞弊的正考官大学士柏葰，扭转了科场风气。肃顺接任户部尚书后，不留情面地办了户部司官与官钱号勾结舞弊的案子。他急于铸新钱，为的是稳定京师物价，行动之快，出人意料。尽管财政收入紧张，经他多方紧缩，居然保证了军费的供应。

肃顺刚愎自用，视满朝亲贵为酒囊饭袋，唯独对恭亲王奕䜣不敢掉以轻心。奕䜣地位显赫，精明强干，对肃顺揽权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为固位计，肃顺拼命与奕䜣为敌。英法联军进逼京师，咸丰帝以"秋狝木兰"为借口，仓皇逃避热河，命奕

䜣留京出面议和，谓办理抚局。咸丰帝本意议和是假，争取时间部署兵力是真，不想奕䜣真的跟洋人打上交道，咸丰帝对此不满。肃顺乘机中伤，守旧派随之望风捕影，谣传奕䜣将借助洋人的势力造反，更加重了咸丰帝对奕䜣的猜疑。最严重的事件是咸丰帝将奕䜣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䜣与肃顺的矛盾。

肃顺和懿贵妃（慈禧）水火不相容，由来已久。慈禧是载淳的生母，名叫叶赫那拉氏。她是镶黄旗满州人惠纪之女，原为咸丰帝的官人。咸丰六年生载淳被封为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此人权欲极盛，很想个人把持朝政大权。懿贵妃懂得，咸丰皇帝病入膏肓，寿数将尽，她的年仅六岁的儿子——皇长子将会继承皇位，她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重务。为此，她一方面严格要求儿子；另一方面设法与闻政务。咸丰皇帝命她代为批阅奏折，这给她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她可以从奏折中了解内外局势，观察大臣言行，熟悉朝章制度，再从皇帝的批阅中知道政务处理的方法，从中体会驭下之道。肃顺因此在皇帝面前谗言懿贵妃揽权，喜欢干预朝政。懿贵妃因之而恼恨。

慈禧和肃顺这两个死对头，明争暗斗，多次较量。

幼主继位后，按清朝家法，母以子贵，懿贵妃应尊为皇太后。但肃顺不顾别人的提醒，依然把她与其她妃嫔一样对待，视为“太妃”。当皇后指正时，肃顺借故拖延一天，有意把两宫太后分出高低先后来。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妃毕竟晚了一日才得封为太后。因为她住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很自然地被称为“西太后”。这样住在东暖阁的另一位太后应该是“东太后”。“东太后”称“母后”、“皇太后”，不久上徽号“慈安”；“西太后”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第一次较量中，肃顺胜利了。

肃顺得知“慈安”太后秉性宽厚和平，胸无大志，不懂朝

政，尽可以蒙蔽，不足为虑。因之每每对慈安太后表面上敬重之诚，保持君臣之礼。慈禧太后则不同，在肃顺看来，她是非像宋朝的章献刘皇后那样大权独揽不可的，对她不能等闲视之，每欲裁抑。在慈禧看来，这是肃顺故意和她过不去。肃顺对慈禧一直是严加防范。他对于两宫太后与什么人接触，谈话的内容极为注意。还在宫里安插了奸细。

按照清朝的家法，太后偶尔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但是，当两宫太后提出以钤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时，肃顺表示：两宫太后只能钤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奏章不先呈览。如果照此办理，两宫太后听政无名无实。慈禧太后坚持章奏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于是在第二次较量中，肃顺输了。

御史董元醇上奏“敬陈管见”一折，两宫太后将该奏折“留中不发”。奏折“留中”本是君上的一种偶可为之特权，肃顺一伙竟敢公然索要“留中”的折子，继而阳奉阴违，不顾“上面”交代的话写旨，另搞一套，痛驳董元醇。其实董元醇奏请给皇帝添派师傅，并没有说错，“痛驳”竟不分青红皂白，说什么“亦无庸议”；董元醇奏请“另行简派亲王”一起办事，也没有说错，“痛驳”竟质问“是诚何心”？两宫太后手中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咸丰皇帝亲手所赐，“痛驳”抹煞这事实有欠公平。“痛驳”还说“奏请皇太后暂时处理朝政，殊属非是”，借皇帝之口，训斥太后。

肃顺一伙于召见时凌逼孤儿寡妇，甚至把皇帝吓得大哭，遗溺在太后身上。肃顺等人最后干脆“搁本”（即把上谕、奏折搁着不看）。经过激烈的争吵，陷人僵局，两宫太后因为没有实力，被逼在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钤了印。肃顺在第三次较量中胜利了。

慈禧对载垣等人专权更为不满，便极力拉拢奕䜣和掌管兵

权的胜保等人，密谋夺权。废除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站在同一立场。

咸丰帝刚驾崩，慈禧太后就向慈安太后提出，应该废除“顾命”体制，立“垂帘”体制。冲人在位，太后临朝称制的故事，已有八例，可以作为垂帘之议的根据。但是，顾命八大臣不管怎样跋扈专擅，亲承末命的事总是有的，地位是合法的。清朝的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贸然提出垂帘的主张，可能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应该先造舆论，争取清议的支持，然后周密布置，才能使肃顺一伙就范，否则会被反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问题是由谁做这些事，怎样去做。

慈安太后心地宽厚，遇事无主见，干不了大事。清廷宫禁甚严，王公亲贵等不得谒见后妃，太后也无召见外臣之理。只能为咨商国事而召见顾命大臣。两宫太后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了。两宫太后不仅无权无勇，行动也不自由，只好在统治集团的最高阶层中寻求支持力量。满朝亲贵，唯一能办大事，稳重可靠的人是恭亲王奕䜣。两宫太后只能联络恭亲王，内外并举，才能一下子打倒肃顺，恭亲王果然不负厚望，站到了两宫太后一边。

顾命制度不仅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也使奕䜣受到肃顺的排挤。董元醇“简派亲王”一议被痛驳，打破了两宫太后将奕䜣推到军机领袖的位置上，控制军机处，使“赞襄政务”变成有名无实的幻想。从奕䜣方面考虑，即使驱逐肃顺，但如重视祖制，则大权仍旧落在其他顾命大臣的手中。既要除去肃顺，又使不在顾命之列的奕䜣得以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取消了“顾命”，则必以“垂帘”代替。

以大学士贾桢领衔的建议两宫太后临朝听政一疏说“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这也是奕䜣的意思。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意思是：女主亲理大政，恭亲王辅政。

为了扩张势力，肃顺曾以管理天字官钱号为由，保荐吏部尚书全庆，以示笼络；肃顺乘简放人员之机营私舞弊，蒙蔽两宫，使匡源和焦祐瀛不经幼帝掣签就补上了户部左侍郎和太仆寺正卿的缺，痛驳董元醇之后，肃顺奏请分见两宫太后，强作嫡庶之分，不承认两宫应该并尊。

在肃顺一伙气焰如天高，得意忘形之时，慈禧太后和奕䜣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制造假象，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松弛肃顺一伙的戒备，暗中不断筹划，频繁活动。咸丰皇帝病重之时，军机章京领班朱学勤就受奕䜣之命赴热河观望风色，疏导辟谣。此后，朱学勤就以恭亲王奕䜣名义给掌握部分兵权的钦差大臣胜保写信致意，示意笼络，抢先把军队抓到手。咸丰皇帝崩，奕䜣到热河叩谒梓宫，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䜣，实际上是逼他献议垂帘，终于达成默契。此后，便在朝中造“垂帘”舆论，奕䜣的亲信多方疏通游说，发动清议，笼络人心，争取到了汉大臣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户部尚书沈兆霖及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还争取到蒙古亲王和大臣的支持。奕䜣伺机向两宫太后面奏添派惇亲王为恭理丧仪大臣，以此向惇亲王示意团结，消除误会。

与肃顺较量了三次，越发使慈禧对肃顺咄咄逼人之势深怀其忧。她明白：如果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就只能听凭顾命大臣一手遮天了。这样发展下去，肃顺一伙必“挟天子以令诸侯”，幼帝在他们的肘腋之下，唯有俯首听命而已。依太后之地位，她不甘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要收回权柄，必先除去肃顺！权柄不能下移，这是清朝的祖宗家法。两宫同心认为顾命八大臣决不可再留，遂密令奕䜣处置。按照这个指示，恭亲王奕䜣在北京加紧布署。两宫太后从热河一回到北京，便召见奕䜣、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文祥。两宫正式提出垂帘主张，控诉顾命大臣罪行，面谕：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

人府，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退出军机处，派奕䜣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奕䜣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逮捕了肃顺。这是慈禧太后和肃顺斗争的第四次较量，以肃顺彻底失败告终。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他五位顾命大臣均革职，有的充军，有的加恩免其发遣。肃顺在临刑前怒骂慈禧太后说：我没想到竟上了你这娘儿们的当。政变后，改元同治（1862—1874 年），慈禧和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一同垂帘听政，但实权操于慈禧手中。

这次事件发生于 1861 年，由于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历史上称为“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

辛酉十一月初一，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从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奕䜣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正式取得国家最高权力，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

根据慈禧太后稳定大局的指示，对肃顺余党，只办了陈孚恩、黄宗汉等少数几个人的罪，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

清朝的历次宫廷政变，无论是顺治年间的清算睿亲王多尔衮，康熙年间的夺嫡之争，还是世宗即位后的自相残杀，无不大动干戈。唯有这次政变，不费一枪一弹，只不过杀了三个人，大局依然稳定。

这次宫廷政变使奕䜣等掌握大权，而奕䜣一派这时已产生依靠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军以保大清江山的想法。英、法、俄三国侵略者曾多次表示愿意帮助清统治者武力镇压太平天国，维护他们在华北夺取的侵略权益。同治元年正月，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宣布借用外国的武力，上谕说：“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酌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与此同时，

英法美等侵略者也加紧在上海布防。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像洪水猛兽般地扑向了太平天国。

（宋美云）

参考资料：

《文史知识》1984 年第 3 期。

《简明中国近代史》。

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清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致使清朝统治机构的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随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批与洋人、洋事物打交道的官僚。这些与洋务关系密切的人，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派别，被称为洋务派。所谓“洋务”，又称“夷务”，是指一切同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当时，凡是经办与洋人有关事务的人，均被称为洋务派。在清朝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在地方上以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握有实权，能够左右清朝的政局。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训，尤其是他们在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反抗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于是便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仿造西方船炮枪弹，采用西法练兵等等。总之，洋务派要将他们学习西方的主张一一付诸实践，从而掀起一场颇有声色、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 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比西方好的多，只是火器比不上西方列强，只要清王朝掌握了西方的近代军事技术和装备，便可以强盛起来。另外，由其指导思想和实践也可以看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出洋务运动的目的所在。洋务派要通过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达到拯救和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所以，当人民反抗斗争威胁其统治时，就取洋人长技以镇压民众的反抗；当外国侵略势力成为其统治的主要危害时，便取洋人长技以“制夷”。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船舰，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军工厂有以下四个：

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四年（1865 年），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在上海建立。购买了美国旗记机器铁厂和苏州制炮局的部分机器，同时又委派容闳从美国购进一些机器。该局的生产设备主要是由以上三个部分合并而成。创办经费为五十四万余两白银，以后又屡加扩大，拥有工人二千余人，是洋务派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主要产品有枪炮、弹药、水雷和小型船舰。该局还附设译书馆，翻译西文书籍。

金陵机器局。同治四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将其在苏州创办的洋炮局迁至南京，改造扩建而成。主要生产枪支、火炮，是淮系军阀的军火供应基地。

福州船政局。同治五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闽江马尾山下设立，也称马尾造船厂。创办经费为四十七万两白银，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轮船修造厂。该厂还附设船政学堂，专门教习英语、法语、算法和画法，主要培养驾驶轮船和造船方面的人才。该局系南洋水师的基地。

天津机器局。同治六年，崇厚在天津筹建，以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购买外国机器，制造火药。但耗费巨资而成效不著。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办该厂，招募洋匠，添置设备，扩大规模，始有起色。随后又扩充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天津城外东南方的贾家沽，西局设在天津城南海光寺。主要产品有弹药、水雷、炮架、洋枪等。

七十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重点虽转为兴办民用工业企业，但仍未放松军事工业的扩展，许多省份相继兴办了小型军工企业。此外，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了湖北枪炮厂，这是洋务运动后期兴建的最大的军火工厂。

上述军工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严格地控制在清政府和湘、淮系等军阀集团手中，严禁商民插手和仿办。因此这些企业的性质和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些企业完全采用官办的形式，各局、厂的创办经费和巨额的常年开支均由官款拨充，即由军饷中拨出一部分或从税收中支付。企业管理机构是封建衙门式的官僚机构。工人大多来自清军士兵，各局、厂仍沿用封建军队的管理制度，对工人“以兵法部勒”，以“武弁”统领。[①] 企业的产品由清廷直接调拨给军队，不投入市场出售。企业既不计算成本，也不顾及盈亏，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所以，它是封建官府控制、垄断下的 近代企业。

其二，具有浓厚的依赖性和买办性。这些军工企业从设计施工、购置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完全依赖外国。诚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但关键在于这些企业长期被外国人控制。例如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所创办的军工企业主要是英国人操纵，左宗棠的湘系集团兴办的军工企业被法国人所包办。外国资本家还通过洋务派推销落后的或者淘汰的设备和器材。一些洋务派官僚趁采办经营之机中饱私囊或扩充个人势力。可谓是名为“自强”，实则封建军阀各自扩充本派的实力。

其三，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这些军工企业采用了较先进的大机器生产，集中了一批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存在着资本主义形式的阶级关系。企业的产品虽然不投放市场，但其本身具有

---

① 《沈文肃公政书》卷4。

一定程度的商品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所以说这些军工企业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

从十九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在兴办军工企业的基础上，又打出“求富”的招牌，开始举办民用工业企业。洋务派从七十年代起大办民用企业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他们在创办军工企业的实践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材料供给不足和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加之浪费过多，难以维持，使他们认识到“必先求富而后能强”。[①] 也就是说必须发展民用工业企业以便积累资金，建立起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辅助军工企业的发展。其次，通过兴办民用企业以抵制洋商倾销洋货和列强的经济掠夺。在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奏章、书信、谈话中，“稍分洋商之利”，“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②] 诸如此类的言论屡见不鲜。虽然洋务派在兴办民用企业的过程中，各自怀有不同的目的，甚至还有一些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但也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抵制洋商和夺回利权的意图。从他们兴办民用企业的实践来看，也确实作过一些抵制洋商倾销洋货的努力。

洋务派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二十余年间，大约创办了二十多个民用企业，其中包括交通运输、采矿、纺织、冶炼等行业，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个：

上海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 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是时，由李鸿章奏准，清廷拨直隶练饷局制钱二十二万串（合白银十三万三千万两）作为股本，委托沙船富商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设局集商股创办。初期仅有轮船三艘，到光绪三年（1877 年）已有大小船只三十艘，在各口岸设分局二十七处。该局在经营过程中屡遭英、美轮船公司的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3。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27。

排挤，但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被挤垮，而且继续发展，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就的一个。

开平矿务局。光绪四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最初由李鸿章派唐廷枢在天津筹办开平矿务局，开采唐山煤矿。原拟官办，后因清廷财政困难，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七年开始出煤，日产五百至六百吨。由于该矿设备完善，储藏量大，煤质也好，产量逐年增加。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用煤外，还大量在市场上出售，在天津能够抵制洋煤进口。

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八年李鸿章派人收集商股在上海筹办。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光绪十六年投产。资本来源有公款、商股，最初招股五十万两，后投资至一百万两。从英、美两国购置了纺织机械，包括轧花、纺纱、织布各种全套设备，纺锭为三万五千枚，布机达五百三十台。经营兴盛，利润很高。光绪十九年失火，全厂被毁。不久由李鸿章派盛宣怀重新建厂，更名为华盛纺织厂，仍为官督商办。

电报总局。光绪五年，李鸿章为应付军事需要在大沽炮台至天津之间试设电报，获得成功。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局，以盛宣怀为总办。次年开始敷设天津到上海的线路，当年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条长途通讯线路。与此同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立七个分局。光绪八年和十年，上海至南京、南京到武汉的电线也相继架设完毕。光绪八年因官款不足，电报总局招收商股，吸收民资而改为官督商办。

铁路交通运输业。光绪元年至二年，英国人修筑了上海至吴淞的铁路，全长三十六华里。这是中国有铁路之始。后因机车轧死一人，清廷要求司机以命抵命，并派李鸿章赴沪交涉。愚昧颟顸的清政府出二十八万两白银将铁路、机车购回，然后把机车抛入江中，铁轨、车辆弃置台湾海滩全部烂掉了。此后清政府内部

对于铁路问题争论了许多年。光绪六年，开平矿务局修筑了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全长仅十一公里，用以运煤。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以后延至天津，又从唐山延至山海关。光绪十三年，台湾修筑了从基隆到台北的铁路，后又延至新竹。中国的铁路逐步发展起来。

此外，洋务派还创办了台湾基隆煤矿、黑龙江漠河金矿、兰州机器织呢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

这些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形式，但主要是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这是因为清廷缺乏资金，只得利用社会上的私人资本，以解决企业的经费来源。而那些拥有货币财富的买办、商人为追逐利润，也企图在官府的保护下经营企业。二者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官督商办这种形式的近代企业，并且风行于七十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后官督商办被官商合办所代替。官商合办即官、商各认股份，各有权利义务，共同经营管理企业。但是由于经营管理弊病丛生，企业仍处于清政府控制之下，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民用工业企业的性质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仍带有明显的封建性。这些企业的资金，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商人以私人入股的形式筹集的。在企业中雇佣了大量的工人，这些工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与企业的主人是劳资关系。企业的产品主要在市场销售，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所以这种企业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由于洋务派官僚的控制，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又带有很多封建性，其管理机构实为封建官府衙门的再现。在企业中不仅“官总其大纲”，而且亏损总要由商股承担，并且企业还常常被官府勒索，要向封建统治者“报效”。

其二，洋务派把持下的民用企业，具有垄断性，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压抑作用。洋务派不仅不鼓励民间发展近代

工业，反而处处进行阻挠，禁止民间仿效，实行封建垄断。例如，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后，就奏准获得十年专利权，不许商人另设新厂。轮船招商局设立后，李鸿章也多次阻挠广东、上海等地商人创办轮船公司。

其三，民用企业也存在很大的依赖性，并且在经营管理上极为腐败。民用企业虽然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存在着尖锐矛盾，但它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同军工企业一样，它们在机器设备上、技术上、资金上依赖外国，甚至被外国侵略者操纵、控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腐败，因而成为官僚买办营私舞弊的场所，少数官吏私囊累累，企业亏损非常严重。

但是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毕竟是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这些新式工业企业规模较大，并开始使用大机器生产，初步建立了近代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格局，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奠定了薄弱的基础。其次，民用企业的产品是为投放市场而生产的，不仅扩大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而且其中一些产品还起到了抵制洋商洋货的作用。再次，民用企业同军工企业一样，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和一批近代产业工人。积累了许多技术资料，传播了近代科技知识，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民用企业的同时，还进行了筹建海军，加强海防，设立外文学馆，派遣留学生等洋务活动。

从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由于列强对我国邻邦和边疆地区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导致边疆地区普遍出现了危机。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出兵侵略我国台湾，造成东南沿海局势非常紧张。光绪元年（1875 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筹建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海关银四百万两作为筹办海军经费，计划十年之内建成。光绪十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北洋

海军归北洋大臣节制，拥有船舰十五艘，防卫山东、直隶、奉天海域；南洋海军属南洋大臣统辖，拥有船舰十七艘，守卫江浙海域；福建海军由福建船政大臣管辖，拥有船舰十一艘，防卫闽粤海域（即粤洋）。在中法战争中，马尾之役使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光绪十一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任命醇亲王奕𫍽为总理海军大臣，而实权却操在会办李鸿章手中。此后，李鸿章趁机扩充由他控制的北洋海军，任用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水师提督，拥有军舰二十二艘，成为海军中实力最强的舰队。此间，奕𫍽、李鸿章等人为逢迎讨好西太后，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光绪十四年以后，海军停止增加船舰及其它装备，内部军纪逐渐松弛，派系斗争也日益加剧。

洋务运动的又一重要内容是设立各种学馆，派遣留洋学生。洋务派为了培养精通外语和熟谙洋务的人才，积极筹划设立各种学馆、学堂。奕䜣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翌年该馆正式成立，以教习外语为主，同时兼习天文、历史和数理化等。此后，广州、上海等地也仿行建立。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请设立天津水师学堂；八年，又分设管轮学堂。水师学堂学生学习天文地理、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驾驶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项。管轮学堂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物力汽理、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造鱼雷等课程。光绪十一年李鸿章还在天津创办了武备学堂，轮训淮军及北洋各军军官，并聘请德国军官李宝等教习德操，以提高各军战斗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二十一年，洋务派创办的外语和各类工业技术学堂约二十余所。许多军工或民用企业还附设讲习、翻译外国书籍的翻译馆。

同治九年，曾国藩在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容闳的建议下，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获得清廷批准。同治十一年，中国首批留学生由上海赴美留学。到光绪元年，共派遣留学生一百二十名。

此后赴外国留学人员不断增加。例如，李鸿章在筹办海防的过程中，急需船舶修造与驾驶人才，便于光绪二年奏请派福州船政局附设学堂学生十八名赴法国学习制造轮船，十二名赴英国学习驾驶。福州船政局先后派出的留学生，有许多人在国外深造成才，如严复、刘步蟾、林永生、萨镇冰等均成为海军中的优秀教官和将领。李鸿章在筹办海防的同时，也着手整顿陆防，光绪二年曾选拔年力少壮的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学习陆军。光绪五年学成归国，以德国操法训练军队，将士的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综上所述，洋务派在三十余年间，相继创办了几十个近代化的军工、民用企业，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传播西学的学堂。这在世界资本主义势力频繁入侵，商战、兵战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洋务派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不自觉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这就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开始用大机器生产来逐步取代家庭手工业和小作坊生产，使几千年来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说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起点。

诚然，洋务派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企业是为了拯救和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其主观目的并不是要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而是企图移西方近代科技之花，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以适应发生剧烈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洋务派不仅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而且在封建思想文化的堤坝上冲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的进一步传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西方的哲学、政治学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成为批判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新的经济因素必然带来新的政治、思想、文化因素，必然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

思想文化结构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洋务运动产生的多方面的客观效果是洋务派始料不及的。

洋务运动没有，也不能把中国改变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没有在中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时人评论洋务派是“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握旧物”,[①] 只“新其貌，而不新其心”。[②] 他们不准改变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指导下从事洋务活动，其结果必然是经营管理腐败，一些官僚营私舞弊，贪污中饱，任人唯亲，冗工滥食。许多重要企业甚至成为封建军阀集团争权夺势、扩张割据势力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基础。

洋务运动持续发展了三十余年，到中日甲午战争暂告一段落。战争中，李鸿章吹嘘为“深固不摇”的渤海门户被日军攻破。由于清政府实行“避战求和”的妥协投降方针，致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湘、淮陆军也惨遭失败。但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除部分破产外，大多数依然发展着。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编练新军，兴办铁路、设立学堂等方面，遂使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以《马关条约》为“依据”，凭借“利益均沾”的侵略特权，争相效尤，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开采矿藏，侵夺铁路。通过这些资本输出的方式，逐步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经济命脉，加深了民族危机，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他们强烈要求自办厂矿铁路，以抵制洋商洋厂。此时朝中大臣也纷纷条陈时务，谋求自救之策。尔后，清政府发布上谕，将这些主张颁布天下。这一切为洋务运动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使洋务派妥协投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
② 《中日战争》第1册第528页。

降的外交政策暴露无遗。但是洋务运动并非彻底破产，洋务派开办的军工和民用企业除个别厂矿以外，多数都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洋务派创办的最大的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在战后又继续扩大发展，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制铁机、制铜机等产品，并可铸造银货。还设立许多分厂，生产经营规模大大超过甲午战争以前。南洋最大的军工企业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扩展了经营门类，总局之下又分设了江南船坞等企业。另外，洋务派兴办的一些民用企业与战前相比，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充。以湖北机器织布局为例，自从开办以来，每年赔累至数万金，但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整顿之后，赢余达到十八万金，除十五万金还清旧债外，剩余三万金。该局不仅产品畅销、利润丰厚，而且还将局中九名外国技师裁去八名，准备在一年之后，全局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均由中国人负责。

甲午战争以后，除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船政局和北洋海军恢复、重建以外，各地又新办了一些洋务企业。其中以湖南、天津等地成效较为显著。战后，一向抵制洋务的湖南，也风气大开，推行新政，设立了电报局和矿务局。湖南在举办矿务方面尤为出色，巡抚陈宝箴锐意兴利，倡导采矿，在长沙设立总局，并在益阳、永定、龙王山、水口山、宁乡等处设立分局，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多种形式进行开采，不仅有金银煤铁铜等矿，而且新开采了锑镍铅等矿。其中锑矿经熔炼之后，还远销国外。

在天津，洋务派于甲午战争后又创办了天津纺织局，从上海克利森洋行订购了英国的纺纱、织布等各种机器设备，生产棉布、呢绒、毡毯等纺织品。此外，天津的铁路、船舶、银行等业均有新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无论是洋务派兴办的企业，还是民间兴办的厂矿，均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

排斥和打击。这一时期由于洋务派缺乏资金而积极招徕商股，因而出现了洋务企业与民族工业并行发展，或相互渗透的局面。这种状况在铁路、轮船、电报、矿冶等大型企业的兴办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与此同时，洋务派又兴办了许多学堂，编练了大批的新军。尔后，洋务运动的声势虽被蓬勃发展的维新浪潮所淹没，但事实上洋务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杨生祥）

参考资料：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史部分）上册。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 册。

范文澜主编：《中国近代史》上册。

陈振江主编：《简明中国近代史》。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卷 98。

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 41、43、72 卷。

夏东元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

贵阳教案

贵阳教案，是青岩教案与开州教案的合称。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贵阳教区正式成立。出任第一任主教的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长得很像中国人，又精通中文及中国风俗，因此，在他的大肆活动下，教会势力发展很快，至咸丰三年（1853 年），贵州全省已有三分之一的州县设立了教堂或传教会。咸丰九年，白斯德望病死，法国传教士胡缚理继任主教。胡缚理上任不久，便在六冲关和青岩镇强买民田，建造教堂、修道院及印刷厂。他的霸道行径遭到当地群众的抵制，结怨很深。

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胡缚理有了庇护，更加骄横不可一世。咸丰十一年二月十日，胡缚理接到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的由清朝总理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以为此后进行传教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决定持护照去会见贵州军政官员，以获得贵州官府的正式认可。他特制了服饰和舆轿，选配了仪仗和随从人员。二月二十五日这天，胡缚理肩披紫带，头戴方帽，坐进紫色大轿，由法国传教士、贵州天主教会外事司铎任国柱陪同，在一百名教徒组成的仪仗队的前呼后拥下，以清朝巡抚、提督一级官员的排场走上贵阳街头，直奔巡抚衙门。到了衙门口，先由任国柱高声报知：法兰西大帝国胡大主教前来拜谒。与贵州巡抚何冠英见面时，只行作揖礼，尔后傲慢地出示护照，要何冠英承认他们的传教特权，保证传教自由，保护教会权利。何冠英刚由黔东道提升为贵州巡抚，贵州提督田兴恕原是他的上

司，田兴恕对洋教士持什么态度，他还不清楚，胡缚理又如此蛮横无礼，他顿生反感，因而听了胡缚理的无理要求后，当面驳斥说：你们来这里传教，可谓不逢其时，现在省内情形混乱，外出传教，实有不便之处，并且黔省教门已多，实无增加教门之必要。今后教徒中，如果有违法乱纪的事发生，你们不能躲避其责任。如此冷淡的回答，使胡缚理颇感意外，只好扫兴退出，前去会见提督田兴恕。

胡缚理以巡抚、提督的排扬招摇过市，早有人报到提督衙门，行伍出身的田兴恕听后极为气愤，拒绝接见。胡缚理一行来到提督衙门前，见衙前冷冷清清，无一人迎候，便让衙役进内转告。田兴恕命衙役回复胡缚理，提督有事不能马上接见，就地等候。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无人出来引见，可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巡衙的兵士来提督衙门换班，兵器寒光闪烁，主教等人顿生疑惑，恐惧不已。任国柱首先弃轿入巷，换衣逃去。胡缚理见后，也慌忙脱下服饰，出轿回转，当衙内传呼胡缚理入衙晋见时，衙前已空无人影。群众好奇，尾随其后，来到北天主堂门口，一涌而入，四处观看，议论纷纷，骂声不绝。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谚：田钦差田字是口衔十字，将来必定歼除洋人，保全黔境。

胡缚理弄巧成拙，遭到冷遇和戏弄，不由得怒火中烧，决定先派任国柱到官府交涉。二月二十六日，任国柱到贵阳府会见知府多文，提出官府应按条约办事，尊重传教特权，质问：护照系总理衙门所发，有恭亲王印花，何得违抗？多文认为他们摆出巡抚、提督的排场是违法的。争执半天，不欢而散。

胡缚理见官府不买帐，便派法国传教士梅西满去重庆向正在那里的法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德纳马汇报，图谋良策。田兴恕得知，当即率快骑追赶，因中途坠马未能追上。然而他余怒未消，回贵阳后，即找到何冠英，商定了一个灭教的计划。

几天后，田兴恕派兵连续三次到贵阳北天主堂，驱赶教徒，查抄经像、祭品及各种宗教用品；又到传教士住室，抄走衣物、书籍，教堂内一片狼藉。不久，田兴恕和何冠英联名向各府、州、县官员发出秘密公函，内称：

经启者：异端邪说，最为害民。省中天主教，前因溷迹市廛，别无骇人听闻之事，是以姑予宽容。近乃肆意横行无忌，心实怀叵测，诚恐遣人四出，任意煽惑，尚祈台端，无论城乡，一体留心稽查。如有来外方之人，谬称教主等项名目，欲图传教惑人，务望随时驱逐，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藉故之以法，尤为妥善。世道已坏，已至于此，如何力挽颓风，是在太守明府之尽心力耳，必差谬，幸弗畏葸。如果办理得力，定当优叙；倘不经心，任听传习，一经查出，咎也匪轻也！

青岩团务道赵畏三，从修造大修院以来，对院长、法国传教士白伯多禄言听计从，为其征地、施工、传教出谋献策，用力极勤。当他读了秘密公函后，恐慌异常，唯恐被田兴恕治罪，便一改常态，准备抢先执行秘密公函，以表对上司的忠心。

咸丰十一年端午节，青岩群众按传统习俗，纷纷走上街头“游百病”。大修院门前，聚集着一群顽皮儿童，齐声高喊民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大修院守门人罗廷荫和四名修士听到后，出来谩骂驱赶，并猛推小孩。一向对教会愤恨不满的群众见许多儿童被推得跌跌撞撞，愤怒至极，一齐上前争吵，大修院前顿时一片混乱。赵畏三即派一队团练围住大修院，逮捕四名修士，押回团务署。赵畏三对他们训斥说：天主教系异端邪说，淆惑人心，田大人有令，即将出示禁止信奉，凡不愿放弃洋教、脱离洋人者，一律处死，尔等速回院与院长商定，否则将遭极刑，无一幸免。四名修士奔回大修院向白伯多禄做了汇报。白伯多禄大惊失色，于次日率修士逃到附近杨梅高寨教徒家躲藏起来。

五天过去了，赵畏三没有等到回音，派人去催，见大修院已空，只有看门人罗廷荫尚在，便将其强行逮走。刚出院门，遇修士张文澜、陈昌品回来，顺势又将二人逮住，押到团务署。赵畏三威吓三人脱离洋教，三人不从，就将他们押到龙泉寺，关进一间黑屋里。白伯多禄听说后，吓得不敢在青岩停留，急忙率领修士逃到贵阳。赵畏三得知后，又派团练去大修院，抄没全部书籍、衣物及宗教用品，随后纵火烧毁大修院。田兴恕见赵畏三执行秘密公函态度坚决，当即提升他为全黔团务总办，兼署青岩团务道。

胡缚理闻讯，即派法国传教士沙布尔在青岩教徒聚居区石头寨设秘密据点，以刺探狱中情况。同时，先后两次给田兴恕、何冠英写信，要求释放三名修士。见田、何置之不理，就又写信给尚在重庆的德纳马，求其到贵阳，迫使官府放人。由于贵州省内到处燃起起义烽火，德纳马未能成行，只以法国公使馆名义写信给田兴恕，促其放人。

六月十四日，何冠英病死，田兴恕署理贵州巡抚（后由韩超接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认为德纳马的信是以不平等条约压人，未开启即退回，并当即给赵畏三下令，将三人就地斩首。

六月二十二日，赵畏三令团练将三人押到青岩城北谢家坡，发现大修院一厨工在附近河边洗衣，遂捉拿过来，与三人一同斩首。

四人被处斩，沙布尔深感突然，立即派人送信向胡缚理做了汇报。胡缚理大吃一惊，马上召集在贵阳的所有法国传教士会商，决定一面报告法国公使馆；一面设法盗取死者尸体，做为罪证，以便进行谈判。法国传教士童保禄、李万美组织了几次盗尸活动，都未成功，决定通过拉拢赵畏三的办法来获取。原是帮会小头目的教徒陈老楞，与赵畏三曾同为帮会人物，童保禄、李万美派他去拉拢赵畏三。见面后，二人用帮会暗语交谈，陈老楞说

明来意，提出要求，赵畏三心照不宣，让他下次带着禀贴，先见衙吏，逐级上达。几天后，陈老楞衣冠楚楚来到团务署门前，向大门衙吏交上禀贴，说：请领亲人张文澜之尸，就便领取其余三人之尸。于是衙吏写一密函让陈老楞交赵畏三，赵畏三亲自写了领尸证明，盖上私章，交给陈老楞。这样，陈老楞顺利地取走了四具尸体，埋到大修院所辖地中。

取到尸首，胡缚理认为证据在手，便写信给在重庆的梅西满，让他火速带信赶往北京，要求法国公使馆正式向清政府交涉，并提出了赔偿、惩办田兴恕等人的苛刻条件。梅西满走到天津，听说法国公使哥士耆去了广州，就赶到广州，面交了胡缚理的信。哥士耆看信后，认为事态严重，此时正值法国钦差大臣、前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在北京，就火速于十月份回到北京向布尔布隆汇报。布尔布隆一面电告法国政府，一面责令哥士耆向清政府紧急交涉。

于是，哥士耆约见清总理大臣恭亲王奕䜣，提出抗议，并递交了照会及田、何的秘密公函，要求迅速查办，并提出由两广总督劳崇光会办。劳崇光在谈判中处处迁就哥士耆，很快依照哥士耆的意见达成如下协议：令贵阳府迅速张贴中法《天津条约》二十份；如数归还胡缚理等的书籍、宗教用品和房舍等，如果原物损坏，应赔银五千两；被杀四人，每家赔银二百五十两，并由赵畏三赔造富丽坟墓四座。胡缚理对此协议极为不满。同时法国政府来电，也责令哥士耆向清政府提出更强硬的要求。于是哥士耆决定节外生枝，推翻原协议。就在此时，开州教案为他提供了口实。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节。贵阳北一百多里外的开州夹沙龙地方，人们熙熙攘攘，纷纷搭龙灯，准备祭龙神。开州的“一心团”派人通知天主教徒一起参加祭龙，教徒以奉教为由拒绝参加，开州“一心团”总办周国璋和群众前往

说服，结果发生争吵。周国琫对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来开州传教早就不满，便向开州知州戴鹿芝汇报了教徒拒不参加祭龙会的情况。戴鹿芝收到秘密公函后，也想对教会有所惩戒，便派人飞报田兴恕，说洋人和教徒违抗中国礼教，田兴恕当即表示：缉案就地正法。

正月二十日，戴鹿芝经过几天的准备后，便派周国琫率团练数十人，先逮捕囚禁了文乃尔，接着将带头闹事的教徒张天申、吴学圣、陈显恒、易路济（女）抓入狱中，同时派员四出继续缉拿天主教徒。几天后，五人陆续被处死刑，首级悬在城门上示众。

戴鹿芝处死法国传教士，震惊了教会。胡缚理马上派任国柱赶到北京向法国公使馆报告。哥士耆即电告法国政府，同时联络英、美、俄等列强的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杀死文乃尔的官员。不久，法国政府指示哥士耆，向清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处死田兴恕、戴鹿芝；二、派亲王大臣到法国谢罪；三、赔偿损失。

清政府亦感事态严重，向哥士耆表示一定严加查处。两宫太后决定将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合并办理，谕旨由总理衙门同法国公使进行谈判，并派成都将军崇实、两广总督劳崇光、四川总督骆秉章前往贵州查办。

总理衙门王大臣先后多次与哥士耆等谈判，辩论十分激烈，几乎陷于僵局。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如何处分田兴恕等官员。九月二十日，哥士耆向奕䜣提交了单方面拟定的谈判协议草案十二条，重点要求处斩田兴恕、赵畏三和戴鹿芝，并逼迫奕䜣签字。奕䜣坚决认为不可，不肯签字，哥士耆拂袖而去。九月二十七日，哥士耆再向奕䜣递送照会，言辞蛮横苛刻，限定对协议十日内答复，否则法国将采取新的行动，后果由清政府自负。奕䜣在处死田兴恕的问题上一直未敢让步，因为如果杀死田兴恕，

将成为万世之口实，遭到国人的怒骂反对。因此，直到同治二年一月哥士耆离任回国，仍未达成协议。但为了缓和气氛，清政府撤掉了韩超的贵州巡抚、田兴恕的贵州提督职务，令其听候查办。不久，又调前云贵总督张亮基以总督衔署理贵州巡抚兼提督。

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柏尔德密来到北京后，于同治二年三月二日会见奕䜣，递交了口气更加强硬的照会和谈判协议草案五条，仍然坚持处斩田兴恕。次日又送照会一件，限定四日内答复，否则就算定案。奕䜣急忙上奏两宫太后，提出由劳崇光、张亮基即在贵州就近将田兴恕等亲提审讯，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

在这之前，朝廷曾指示劳崇光和张亮基将田兴恕解往四川，听候查办。这年四月，劳崇光署理云贵总督，令田兴恕赴四川调遣。当田兴恕已经进入四川后，朝廷又发下新的谕旨，认为田兴恕必须在贵州结案，如已赴四川，即押回贵州。此时，劳崇光、张亮基以上宾之礼约见胡缚理，希望将田兴恕在四川结案。朝廷马上同意了这一条意见，以使胡缚理完全放心。

后来，劳崇光、张亮基多次与胡缚理会谈，尽量满足胡缚理的要求，胡缚理终于做了一点让步，同意不杀田兴恕，可以遣戍结案，并提出两案共赔银一万二千两。劳崇光、张亮基得到胡缚理的同意后，马上写信报告奕䜣，并附胡缚理给柏尔德密的信，让奕䜣转交。柏尔德密看信后，同意如此结果，表示报告法国政府之后即可完结。

同治三年七月，由于田兴恕伤病缠身，滞留四川秀山，朝廷谕令由劳崇光、张亮基到秀山审讯田兴恕。审讯结束后，将判决结果上奏朝廷：田兴恕免其一死，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何冠英与田兴恕厥罪维均，应与田兴恕一律拟罪，业经病故，应毋庸议；赵畏三、戴鹿芝戕杀教民多命，于田兴恕应得罪名上加一等问拟，但赵畏三已于上年四月在贵筑水田坝地方打仗阵亡，戴鹿

芝已于上年九月在开州殉难，亦勿庸议；已革候选道缪焕章，已革贵东道前署贵阳府多文，均属糊涂荒谬，业经另案奏参革职；前署贵州巡抚臣韩超，于田兴恕奉旨赴川，屡次渎奏请留，实属不晓事体，应请部交旨议处；田兴恕所居六硐桥公廨，本系人官房屋，年久朽烂，田兴恕仅量加修理，并非平空起造，亦非占买民房，哥士耆及胡缚理屡次请将此项房屋给与作为经堂，并无妨碍，尚可俯如所请，以示怀柔，已经臣等派员点验，交给胡缚理收管；被杀各教民，应给恤银，并应给各项银两，共应给银一万二千两。

同治四年二月，法国复文同意清政府的判决。于是，奕䜣即命骆秉章、劳崇光、张亮基将田兴恕等人起解。翌年三月，田兴恕等人被押至陕西秦州，由于道路阻塞，未到达新疆，由陕甘总督左宗棠接收。同治六年，曾起用田兴恕率兵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十一年，左宗棠上奏朝廷，请求释放田兴恕，获得允准。次年，田兴恕获释，回到湖南镇筸原籍。

（宋美云）

参考资料：

《晚清教案纪实》、《中国教案史》、《贵州通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天津教案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葡萄牙人开始同中国交往，葡国国王约翰三世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 年）要求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翌年，教皇即派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方济格·沙勿略东来。二十九年（1550 年）他来到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小岛，不久病死。这便是最早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 年）初，利玛窦偕同庞迪我身穿儒服来到北京城，受到万历皇帝的诏见并享受到优厚的礼遇，在宣武门内赐屋作为居所。自此以后，大批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纷纷成立教会。清顺治三年（1646 年）起，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设立主教区，另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设立代牧主教区。实际上，这些传教士已不局限在中国皇帝准许的外国人经商的沿海口岸活动，他们渗入内地，分布到全国，身着中国服装，讲着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民众宣传他们所信仰的教义。当《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容 许传教士可在内地公开活动后，他们更是活跃，纷纷在城镇、乡村购地建堂除传教外，他们还办起了学堂、藏书楼、天文堂，以及慈善事业育婴堂、医院等。

以上诸项本是善举，但因传教者日众，也由于各国利益与清政府利益的冲突，便生出了许多矛盾，其中矛盾最强的便是占地问题。传教士如看上了哪块土地，想在此建堂传教，便强迫教民或民众捐献，还有的通过不法教徒买公产或亲属产业转手给教

堂，如不卖，传教士便找一无业奸民指该屋为己物，卖给洋人，并阴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传教士便据为己有，地方官吏不敢判其盗买盗卖。如有不服者上诉，传教士不但开枪打死交涉官员，反而诬告对方，要求赔偿银两。更使矛盾激化的是，传教士包庇教堂内不法教徒的恶举。这些不法教徒有仗教的豪门大族，也有混饭吃的地痞流氓。他们作奸犯科，欺弱凌孤，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不清货款，或延纳钱粮，或因小忿殴毙平民。他们依靠洋人教堂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肆无忌惮，横行乡里，众民敢怒而不敢言。而地方官怕触犯“和约”，滋生事端，引咎于身，便一切以迁就了事，因此洋人传教士、教徒越发的为所欲为，而不奉教者心越不能甘。

更有甚者，遇有洋人传教士与民众的讼词时，传教士如不能如愿以偿，往往以武力相挟胁，把兵舰开进中国领海。许多中国地方官吓得要死，便惩处口角的中国民众一方，以息事端。这更使中国民众不能接受，产生心理反感，遂发生了许多教案。天津教案在当时颇为著名，影响甚大。

清咸丰十年（1860 年），根据英法等国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商埠，同时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的权利。清政府还特别在天津设立了“通商衙门”，崇厚任通商大臣。十一年（1861 年），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与崇厚订立了《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选择了海河北岸三岔河口的望海楼作为未来的教会堂址。

同治元年（1862 年）夏，法国男女传教士二十余人由孟振生（法天主教传教士）率领抵津，先在东城根一个中国传教士的故宅中暂住，随后改建为仁慈堂，并通过施医诊病等手段，扩大他们的影响。但是天津民众对随侵略军进入天津的传教士怀有强烈的反感，致使天主教在天津的传教活动很难开展。一个传教士曾向上级抱怨说：“这座城市的教徒为数不多，尚有成千上百

的人需要归化。但是要想打动这里民众的铁石心肠，非有一个会行奇迹的人不可。他们心中对外国人充满了蔑视。对我们不是当面辱骂，就是吐痰表示轻蔑。……他们对洋鬼子成见极深。”为了进一步加强传教活动，法天主教会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海河右岸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东门外小洋货街购买了一所深宅大院，并把仁慈堂迁到此地，作为建造教堂的筹备处。同时又于五年（1866）物色到法国天主教神甫谢福音来天津主持教务。

谢福音上任伊始，便鼓励“仁慈堂”大量收买、拐买中国儿童，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并指挥教士、修女积极开始赈济、施药、育婴等所谓“慈善”活动。还广收教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发展了二百多名教徒，其中网罗了不少地痞流氓入教。他还跑到山东济南与当地的传教士策划，把那里一百多名儿童接运到天津。八年（1869年），谢福音决定拆掉崇禧观等建筑物，重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天主教堂。五月，建堂工程破土动工，谢福音还专门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是年底，一座高十米、长三十米、宽十米的教堂落成，命名为“胜利之后堂”。开堂时举行了隆重的开堂仪式，并用法文金字将“胜利之后堂”刻于教堂钟楼正面，此即望海楼天主堂，俗称“河楼教堂”。

教堂建成后，谢福音又以“传经讲道的地方必须肃静”为借口，强迫崇厚和天津府县下令将教区内教堂附近的民房等旧有建筑全部拆除，并把教堂周围的摊贩一律赶走，致使三岔河口一带大批群众流离失所，无法生活。

与此同时，又从三岔河口不远的海河西岸“仁慈堂”传出消息：堂中收养的贫家子女，对外讲是抚养治病，但一把孩子送进堂去，就不再放出，且百般虐待，不准家人探望。当时有一平民名郭万有，他的孩子送到堂内治病后，就杳无音讯，不知存亡，使人惴惴不安。此事传开后，天津平民对法国传教者十分愤恨，愤怒的火焰在他们胸中熊熊燃烧。

同治九年（1870年），入夏后，被骗进“仁慈堂”的中国儿童成年累月地受到法国传教士和修女们的残酷虐待，过着囚徒般的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加上流行病的传染，致使三四十名儿童无辜死亡，在深更半夜被草率地掩埋在河东义地，有的两尸、三尸共一箱，有的被野狗刨开争食，他们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令人惨不忍睹。在仁慈堂内大批儿童被虐待致死的消息传出以后，人民纷纷要求天津府县查办凶手，为民伸冤。六月，谢福音为了转移视线，让一些教徒、暴民把一名在义地里查看儿童尸体的群众绑架到教堂，刑讯拷打逼供。此事更激起平民的愤怒。一些传教士又勾结教民中的败类和社会渣滓作为传教士的爪牙，纵容他们为非作歹，倚势横行。而这些本来就为乡里不齿的牙徒败类一经入教便凌虐乡里，欺压平民。特别是当时在天津地区发生了好几起拐骗儿童的案件，更引起人心的浮动与不安。开始人们传说这一切都和教堂有关；但又一时难以拿出确凿的证据。

不久，府县官衙接连破获了几起拐骗儿童的案件，而且件件都与教堂有关；从另外两名案犯张栓、郭拐身上搜出鹰洋（当时洋人通用的货币银元），并供认是“仁慈堂”修女付给他们拐骗儿童的报酬；而另一名案犯武兰珍，供认系受望海楼教堂教民王三的主使，替他拐骗儿童，并说在王三的指使下，共有八人从事这种害人的勾当。每拐骗一名儿童，酬洋五元。拐骗人晚上就住在望海楼教堂的栅栏内席棚里面。这确凿的证据，使天津人民大哗。一时间，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有关揭露洋教罪行的揭帖，历数法国传教者的一桩桩残害中国平民的勾当。不久，天津各界停业，书院罢课，纷纷要求天津府县追查法国天主教堂的罪行，并逮捕拐骗主犯教民王三。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天津府县官都不敢彻底追究，只向法国领事要求交出案犯。经过几次交涉，法领事馆被迫交出犯人，但又为教堂索回。六月中旬，地方官又带着受害人家属的亲呈来找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交涉，而丰大业竟否

认此事。地方官继续要求对教堂进行搜查，此时丰大业大声咆哮，极其蛮横地认为，知县的级别低于领事，因此不能就事件或其他事情举行谈判，声言除通商大臣外，他不与任何人打交道。第二天，崇厚与丰大业商定于六月二十一日押带拐骗犯武兰珍到教堂对质。

六月二十一日，天津知县刘杰一行人，押解拐骗犯武兰珍如约去教堂对质。然而，谢福音让教堂隐匿罪证，甚至主犯王三也匿而不见，使对证毫无结果。而同时教堂中人又居然对聚集教堂四周的群众逞凶，抛砖殴打。天津民众怒不可遏，当即把逞凶恶徒赶回教堂，随后砸毁了教堂门窗。法领事丰大业见此情景，立即派人报告崇厚，要求赶快派兵前来镇压。接着，他又气急败坏地携带枪支同秘书西蒙奔往通商衙门。一进通商衙门，丰大业便对崇厚咆哮说："听说乱民想要我的命，你先给我死！"随即朝崇厚连开两枪，子弹擦肩而过，崇厚见此情状，忙跑到衙门后院。丰大业又嚎叫怒骂，随手砍破两道门，进入书房，将什物器皿尽行捣毁，然后飞奔出衙署。

这时，天津街巷尽传"洋人打官滋事"，愤怒的群众纷纷聚集到通商衙门，一时竟有一万多人，丰大业同西蒙像恶狗一样凶相毕露地挥枪叫嚣："挡吾者死！"在返回的路上遇知县刘杰等人时，丰大业又举枪向刘杰射击，刘闪身躲过而击中仆人高升。西蒙也同时开枪向民众射击。积忿已久的天津人民，面对两个穷凶极恶的法国人的疯狂行为，所有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扯倒，雨点似的拳头打在他的身上，不多时，丰大业与西蒙便被殴毙。随后，愤怒的人群又涌向教堂，将作恶多端的谢福音打死，又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和法国领事馆，并打算通过海河浮桥到"仁慈堂"去找法国传教士和修女们算帐。但此时浮桥已被崇厚下令拽起。恰巧记名提督浙江处州总兵陈国瑞骑马从此路过，他命人把浮桥搭上，于是，天津百姓一涌而过，放

火焚烧了充满血腥味的“仁慈堂”，并从地下室抢救出一百五十余名中国儿童。这些儿童据时人记载说，全身疮毒溃烂，散发赤身，不成人形，令人不忍目睹。这时天津民众心中怒火燃烧更旺，随即又拆毁“仁慈堂”和几处讲书堂，并伤毙数名中外传教习教之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震动了在天津的所有洋人，英国领事馆成为出谋划策的总部，英驻津领事并兼管法国领事职务的李蔚海，充当了总指挥。他亲自召集租界内“居民”组织武装，并出版了报告事件的紧急情报。六月底，法、英、美、俄、普、比、日等七国公使向清朝政府发出联合照会，说：“事体重大，宜设法防其再发，否则将使中国沦于与世界为敌之境地。”同时，法、英、美等国陆续派军舰齐集大沽口游弋，对清朝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到七月下旬，天津海口聚集了法舰五艘、英舰三艘和美舰一艘，他们都准备趁此事件勒索清政府，如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并准许洋人朝见清朝皇帝等。而法国军舰竟公然炮轰大沽口沿海村庄；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还来津威胁说：“十数日后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

清朝政府由于国力不足，而且腐败无能，很是害怕事端扩大成战端。一方面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公使罗淑亚婉言协商解决天津教案，并嘱咐以保全和局为重，不让其调兵船来津，并下令镇压天津起衅的百姓，惩办天津不能保障教堂安全的官员；另一方面，清政府赶忙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由保定来天津查办此案。紧接着，又加派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来天津协助处理案件。

曾国藩奉命于七月初由保定抵天津。他认为处理天津教案最重要的就是立意不与洋人启衅，准备严拿凶手，惩罚煽乱之徒，并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中旬，法国公使罗淑亚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一起到天津与曾国藩等进行交涉。威妥玛代表各国提出了

要府县官及陈国瑞抵偿、赔偿恤银数百万、捉拿凶手三四百名、驻兵津沽、赔修教堂等要求。后罗淑亚又向曾国藩提出正式照会，并以武力相挟。曾国藩抱定希望速成和局的愿望，于情急之中难顾罪情当否，便把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奏参革职，交刑部议罪；把记名提督陈国瑞也交总理衙门查办。到九月初旬，他逮捕了八十余名群众，并施以严刑拷问，命其供出罪行。这些人昏晕气绝，有的招架不住，便承认有罪。最后有二十余人被处以死刑，流放二十五人。而真正的被法人保护的罪犯王三、武兰珍、安三等人不久便都被释放了。曾国藩还协助修复了被焚毁的建筑物，并把"仁慈堂"内一百多名病残儿童送回堂内，申明并无被拐情事，并替法国传教士辩解。

这时，西方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军事上接连失利，无暇东顾，其他各国由于法国自身无力他顾而准备收兵。这时，美国出而奔走调停，商定了在中国海上的敌对国的武力必须合作，以保护一切外国人的利益。九月间，各国对曾国藩就天津教案的处理进度迟缓颇为不满，于是美国联合英国等四国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关于三个月以来，帝国政府（处理津案）迟之又迟的办法，不论就六月二十一日的暴动案件来看，或从外人在华一般安全问题来说，都是使我们完全不能满意的。

清朝政府收到四国公使的联合照会，只好把不能使西人满意的曾国藩调走，调来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替曾国藩继续办理此案。曾国藩在离任时已暴发眼疾，身体的不适与难堪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他说出了"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愧疚的话。离任即回湖南老家，不久眼疾甚剧，以至于故世。

九月，李鸿章接任后，加紧与英法等国外交人士交涉，最后议定：处死义士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十六人；流放邓志、小锥子等二十五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到黑

龙江边远地区；赔偿法国抚恤白银四十六万五千两，赔偿俄国抚恤费白银三万两、赔偿英国抚恤费白银二千五百两、赔偿美国四千七百八十五两白银，另外给教民五千两，总计赔偿白银五十余万两。清朝政府还派遣崇厚为钦差大臣专程赴法国赔礼道歉。

清朝政府对天津教案处理的结果倒是满足了洋人传教士，但却更进一步激起了天津民众的义愤。难道洋人摧残了自己的后代，还要自己人来抵命？于是人们把愁思和义愤诉诸笔端，把杀人、烧教堂的壮烈场面画图刻版，印刷在斗方扇面上出售，赞颂这一声势雄壮的反洋教斗争。几万把扇子，很快被天津百姓抢购一空。连美国驻华公使也说：这批扇子是为了迎合人民情绪而制作的。毫无疑义，在天津，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赞成这次暴乱的。

特别在十月十九日处死十六名爱国义士之时，在义士们被押赴西关就义经过的街道上，沿途商店、住户摆设香案供品致祭，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为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送行。当十六位义士就义后，天津民众决定公葬，并进行募款，建祠立碑。后来这一倡议由于美国的干涉而被清朝政府禁止。于是，人们又采取其它方式纪念义士。旅津闽粤人士利用天津每年七月十五日举办盂兰会的风俗，请扎彩匠模拟十六义士肖像，扎成十六个纸人，安放在紫竹林梁家园闽粤山庄的盂兰会会场，延僧诵经超度，以悼义士英魂。以后，历年义士死难日，天津民众都沿街游行，经过教案发生之地，穿过金华桥，终止在义士死难刑场。人们称这一天为“鬼节”。

天津一带还流传着一首《火烧河楼》的快板书，字句生动朴实，如实地描写了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全过程。它指斥清政府的媚外屈辱，历数洋人的残暴罪行，讴歌了义士们的气概。刑场一段词说：

“崔秃子、马宏亮年长在前走，瘸子姓冯在后头，十几位英

雄一对一对往前走。……头戴英雄帽，颤颤巍巍花绒球，……过了鼓楼来到镇台衙门口。英雄们破口大骂，脏官见了洋人好像避猫鼠，硬要天津卫哥们给鬼子抵命也不问情由，……这就是脏官办的好事真不害羞！……我们一不是响马，二不是贼寇，三不是图财害命明火路劫才把命丢。我们是替那屈死的小孩来报仇；给天津卫除大害，打死丰大业，烧了鬼子楼，……好汉作事好汉当，一命抵一命，死也甘休！"

同治九年（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对全国震动很大，天津人民这次大规模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的精神，不仅使天津的外国人胆战心惊，而且使远在上海的洋商、教士闻讯后都张慌失措。他们一夕数惊，甚至夜里也不敢在陆上安卧，而跑到轮船上去住宿、躲避，深怕上海也爆发反洋教斗争。直隶正定教堂的传教士平时作恶多端，天津教案发生后被吓得将教堂陆续搬空，不知逃往何处。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直隶的通州、蔚州、盐山，江西的南昌、抚州、吴城、瑞昌，福建的福州、古田，四川的黔江，广东的琼山等处，都接连地发生了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汇聚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遍及各地的轰轰烈烈的反洋教运动。这场斗争虽然带有某些反教排外的色彩，但它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中的矛盾心态。斗争所反映出的我国下层民众英勇斗争的精神，是值得记入史册的。

（王琳）

参考资料：

《东华录》、《天津租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著）、《天津近代史》、《天津教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6卷）、《清季教案史料》（第1卷）。

中俄西北改约记

光绪三年十二月（1878 年 1 月），清军消灭了阿古柏政权，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领土全部收复。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俄谈判收复伊犁事宜。

光绪四年十二月，崇厚一行抵达彼得堡。

中俄谈判从次年一月开始，历时近九个月。沙俄政府对崇厚不断施加压力，并以武力讹诈迫使其就范。而崇厚又独断专行，不顾清政府一再强调的“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的谕令①，在未经清廷同意的情况下，于八月十七日（1879 年 10 月 2 日）在俄国黑海之滨里瓦基亚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条约规定：(1) 沙俄交还伊犁，中国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大片领土给俄国。(2) 沙俄可以在蒙古及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增辟由陆路至天津、汉口、西安的通商路线。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3) 赔偿俄国兵费五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崇厚在俄国签约的消息传来，全国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改约。群情激愤，以至“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左宗棠愤慨地指出：伊犁北境、西境、南境皆为俄有，“孤注万里，

① 《清德宗实录》第 96 卷第 5 页。

何以图存?"[1] 坚决反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光绪五年十二月以“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的罪名，将崇厚交部严加议处，随即下令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不久定为“斩监候”，以此表示拒绝承认这个条约。光绪六年一月十日，清政府又声明，崇厚所议条约、章程、专条各款，“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2]，不予以批准。

清政府为了继续谈判索还伊犁地区，改派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同时命令左宗棠统筹部署新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以备谈判破裂后，用武力收复伊犁。沙俄对清政府宣布条约无效和惩办崇厚之举异常愤怒，一方面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恫吓，另一方面在中国边疆和沿海集结军队，进行军事威胁。

光绪六年三月，总理衙门训令曾纪泽：此次交涉，力争在对沙俄作少量让步的基础上改订前约，即使不能全部收回伊犁及相关地区，也要挽回部分主权。曾纪泽受命赴俄之前，也向清政府陈述了对中俄谈判的看法。他经过反复权衡，多次考虑，认为划分疆界非常重要，必须“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由于“界务稍有更改，则兵费不能不加”。[3] 他主张应坚持力争收回伊犁全境，酌允通商，增加赔款的方针。

光绪六年六月，曾纪泽一行抵达彼得堡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面冷词横，厉色相待，声言崇厚所定条约只能照办，无可商议。曾纪泽虽感到自己的使命好似“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但仍然据理以争，从容应付。这次中俄重新开始的谈判，从光绪六年七月到次年一月，历时半年。由于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8卷，第4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9卷，第3页。
③ 《曾惠敏公遗集》第3卷，第18页。

沙俄政府坚持必须赦免崇厚，所以清政府被迫于光绪六年七月七日将崇厚免罪开释。七月十八日，曾纪泽向沙俄外交部提出修改《里瓦基亚条约》的六条要点：(1) 交还伊犁全境；(2) 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交界仍照旧址；(3) 允许俄商到嘉峪关通商，并可在尼布楚、科布多增开两条商路；(4) 只在嘉峪关一处增设领事；(5) 哈密、巴里坤、古城不设领事，俄商可择一处留货；(6) 俄国在新疆贸易，不能处处免税。

七月二十日，沙俄政府为研究修约问题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决定：(一) 在坚持《里瓦基亚条约》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就某些部分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二) 要求中国增加军事赔款并同意调整其他地方的边界，俄国可以不坚持占领特克斯河流域；(三) 修改条约无损于俄国的"尊严"，并尽快结束一切争端。[①]这一决定表明，沙俄政府仍要坚持《里瓦基亚条约》，并把归还特克斯河流域作为割地、增加赔款和攫取更多权益的手段。此后，沙俄谈判代表就割地、赔款等问题漫天要价，胁迫中国让步。沙俄外交部顾问热梅尼声称，沙皇将命海军大臣会同驻京俄使向清廷提出最后警告，以战争相威胁，还公然要求清廷申明永远不索伊犁。这些均被曾纪泽严词拒绝，他指出：倘若两国不幸有失和好之事，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将热梅尼驳得哑口无言。接着沙俄又提出俄国因"遣船备边"，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要求中国赔偿。曾纪泽质问俄方：双方既未打仗，何来兵费？对方声言：如不答应，则俄国正欲一战。曾纪泽马上回击：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不久，沙俄代表、驻华公使布策扬言，俄国如果归还特克斯河流域，就必须在中国的西北边界或沿海得到补偿。他曾逼问曾纪译："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曾纪译答称："中国土地，

① 《米留金日记》第3卷，第267页

断无再让之事。”沙俄代表公然威胁说：“若再延迟，不如打仗。”① 当时，俄土战争刚刚结束，沙俄财力十分空虚，无力对中国发动战争。当沙俄感到以归还特克斯河流域作为条件，索取新的领土的企图将要落空之后，便转而向清廷索要更多的赔款。因为俄土战争以后，沙俄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五千万卢布，沙俄企图从中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吉尔斯的助手狂妄地叫嚣：“我认为最好是不拘采取何种形式，尽量从他们手中多索取几百万，至少可以用来减轻今后由于必须保持武装给我国财政增加的负担。”② 沙俄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提出，要向清政府索取一千万到二千万卢布以上。俄方参与策划谈判的考夫曼要价更高，他提出要以一亿卢布来抵偿归还伊犁的费用。而热梅尼认为：赔款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我们施加压力的程度，倘若我们提出的总数达到一千万，我想将是一个极限，而且还得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才行。沙俄侵略者的无耻和贪婪在谈判中暴露无遗。

曾纪泽在此后的谈判中折冲樽俎，据理力争，不为所屈。最后沙俄外交部也只得送来节略一件，同意在七个方面改订原约。曾纪泽一面电告清廷，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约稿，逐日争辩，反复推敲，在清政府命其照约签字之后，又过了半个月，他才把法文约稿议定。

光绪七年一月二十六日（1881 年 2 月 24 日），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代表吉尔斯、布策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中俄伊犁条约》当时称《改订条约》，又因签约地点在彼得堡，亦称《圣彼得堡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1) 沙俄归还被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但仍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的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斋桑湖以东一带的中俄边界，因所谓“查有不妥之处”，要由两国派员会同勘改。

① 《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 120、125 页。
②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第 116 页。

(2) 在塔尔巴哈台地区，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尔岭划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在喀什噶尔地区，两国应派员按照俄国所谓“现管之界”勘定边界，安设界牌。(3) 中国以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民的名义向沙俄赔款九百万卢布（合白银五百零九万两），限两年内偿还完毕。(4) 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从事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免税。(5) 准许俄国在肃州（今甘肃省嘉峪关市）和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6) 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这就使沙俄以武力逼迫中国各族居民迁入俄境有了所谓的条约依据。

《中俄伊犁条约》与《里瓦基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收回了一些主权。在界务方面，主要是收回了伊犁河南面特克斯河流域的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商务方面，俄国设领事的地点由七处改为两处。中俄陆路通商新疆至汉口一线，删除了从嘉峪关至汉口的一段；水路通商则废除了关于俄国轮船沿松花江航行至伯都讷专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外交史上，这种“虎口夺食”的斗争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是绝无仅有的事。条约签字之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对曾纪泽的外交才智誉不绝口，称赞他“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但是《中俄伊犁条约》和《里瓦基亚条约》一样，都是沙俄侵略者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的产物，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及边防均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九城，可是沙俄仍旧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还占领了伊犁河北岸的部分土地。此外，沙俄还根据《中俄伊犁条约》第七至第九条规定，利用“勘改”、“勘定”、“安设界牌”等名目，在光绪八年到十年的三年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五个勘界议定书，共割占

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沙俄侵略者强行割占中国大片领土，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居民拒绝迁居俄国境内，沙俄便出动军队武力逼迁，严刑拷打，以致宁远一城"哀号之声彻于四野"。光绪九年，霍尔果斯河西岸的索伦营右翼四旗人民，强烈要求"再议疆界"，收回失地。乌梁海左翼蒙古族牧民"男女老幼，至死不肯分让"。他们拒绝划人俄境，强烈要求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些充分表明了西北边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坚定立场。

由于沙俄不断扩张侵略，使我国西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清政府根据左宗棠的多次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省，省会设在乌鲁木齐，任命参与收复新疆战斗的刘锦棠为巡抚。新疆建省对防御沙俄的侵略和加强我国西北边疆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杨生祥）

参考资料：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87 卷、第 93 卷。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6 卷、第 18 卷。

《库罗巴特金将军关于日俄战争的回忆录》第 95 页。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第 100—150 页。

《曾惠敏公遗集》第 3 卷。

《曾纪泽遗集》第 1—3 页。

中法之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法国政府便依照大资产阶级的需要，积极地在远东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越南和中国的侵略阴谋由来已久，早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根据传教士百多禄的建议，拟定了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只是由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一计划才未及实施。资产阶级上台后，便加快了向海外扩展殖民地的步伐。

咸丰八年（1858年），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同时，法国又联合西班牙进攻越南。同治元年（1862年），越南被迫与法国、西班牙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西贡条约》。同治六年，法国又攻占了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企图全部占领越南，并打开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同治十二年，法国侵略者接连攻陷了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准备在攻占北圻之后进入云南。越南政府无力遏止法军的进犯，便邀请在中越边境活动的刘永福的黑旗军援越抗法。

刘永福，字渊亭，出身于广东钦州农民家庭，幼时随父流亡到广西上思县。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后成为广东天地会的一支义军头领。其军以七星黑旗为标志，故称黑旗军。太平天国失败后，迫于清军的围剿，退至滇越边界开山辟林，聚众耕作。同治十二年（1873年），应越南政府之邀，刘永福率部下进援河内，在城外大败法军，击毙法军统领安邺，歼敌数百人，收复河内。

越南政府为感谢黑旗军的援助，阮氏王朝授予刘永福三宣副提督之职。驻军于宣光、兴化、山西三省。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金融资本获得迅速发展。为了给大量的所谓“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法国政府在远东愈加积极地推行殖民政策。代表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人茹费理组阁后，便增兵越南，并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 年）法军再次攻占河内，黑旗军与越南军民协同作战，将法军围困在河内一年有余。光绪九年，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城西纸桥进行决战，歼敌二百余人，击毙法军司令官李维业，大获全胜。此役之后，刘永福被越南政府封为三宣正提督。

法军对北越的进攻虽然受挫，而对越南中部的进攻却得逞了，这支法国侵略军直逼越南首都顺化。当时，越南国王刚病死不久，因王位继承问题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政局混乱，不能同心御敌。法军乘机攻入京城顺化，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便以越南为据点，将矛头指向中国。茹费理曾公然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

面对法国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分歧。以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部分官僚极力主张抵抗法军的侵略行动。他们认为，法国企图征服越南以达到扩张势力的目的，而越南与中国又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自撤藩篱，听任法国占领越南，则法国势必会进一步侵犯中国。此乃“震邻切肤之灾，唇亡齿寒之患”。所以，必须对法强硬交涉，加强在两广和云南的兵力，援助越南政府，保护和利用黑旗军，抵抗法军北进。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部分淮系官僚，出于保存本派实力和奉行妥协退让政策的需要，反对出兵抗法。他声称：“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中国决非是法国的对手，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

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力主默认法越签订的条约，退兵入关，任凭法国驱逐黑旗军。李鸿章妥协投降的主张，受到朝野上下的猛烈攻击，“舆论均矢集鸿章，指为通夷，致比诸秦桧、贾似道”。清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作些抗法的准备。调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并下令照常接济黑旗军抗法将士。但是，清廷在抗法问题上举棋不定，仍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在天津和谈。并乞求英、美出面“调停”。而李鸿章等所谓“谙习外事者”又始终主和，致使法国侵略者气焰嚣张，战火蔓延到中越边境及沿海地区。

光绪九年七月（1883 年 8 月）法军攻陷怀德，不久又侵入丹凤。此间，黑旗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而驻扎在山西、北宁的清军将领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等人，却坐视黑旗军与法军苦战，不予以任何援助，致使怀德、丹凤相继失守。同年十一月，法军进攻山西，云南巡抚唐炯率军逃跑，黑旗军势单力薄，与法军血战三日，毙敌三百余人，最后被迫撤出山西。光绪十年二月，法军继续向北宁的清军发动进攻，守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也不战而退。法军攻占北宁，又取太原、兴化，逼近中越边界。

前线兵败，清政府大为震惊，慈禧太后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罢免了奕䜣的首席军机大臣之职，撤换了所有的军机大臣，并将率军逃跑的徐延旭、唐炯等革职拿问。与此同时，谕令醇亲王奕譞会商军机要政，又起用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把一向标榜主战的张佩纶等人派往前线，摆出对法决战之态。但是清政府并无抵抗侵略的决心，仍以议和为本。此时，粤海关税务司德催琳表示愿意居间调停，于是清廷即令李鸿章通盘筹划，竭诚办理议和之事。光绪十年四月（1884 年 5 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进行和谈，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允许法国在中越边境通商；中国从越南退兵等。清政府的屈辱退让并没有换来和

平，光绪十年五月（1884年6月），法军以“接收”谅山为名，向清军发起进攻。驻防清军被迫自卫，在北黎（中国当时称观音桥）大败法军。此后，法国驻京公使谢满禄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声称清政府要为这次军事行动负责，限清廷七天内从越南撤军，并要求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否则采取军事行动。清政府照会法国公使，撤军可以，赔款不行。清政府为保和局，先是邀清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赴津与李鸿章谈判，遭到拒绝后，又请赫德出面调停，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作为全权大使赴上海同巴德诺谈判，双方在赔偿兵费的问题上形成僵局，终致谈判破裂。继而，法军从海陆大举进犯中国。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国海军少将利比士率军舰抵达台湾基隆，翌日，对基隆港发动进攻。台湾巡抚刘铭传闻讯即赴基隆督战，率部众英勇反击，重创法军，毙伤法军百余人，缴洋枪数十支，大炮四门，迫使法军退回海上。基隆之战鼓舞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他们请求清政府备战出击，以振国威。

法军入侵台湾未能得逞，就转而全力进攻福州。早在五月间，法国“远征”舰队在海军中将孤拔的率领下，以到福建“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其目的是为了摧毁福建海军和马尾造船厂。但是，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等人均为李鸿章的党羽，只图妥协投降而不作战守准备。他们认为拒绝法舰入港会防碍和局，竟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法国舰队开进港内与福建舰队停泊在一处，使法舰得以监视福建舰队，并可伺机发动攻击。形势十分危急，清军水师官兵多人要求自卫，而清政府仍幻想和平解决。何如璋与张佩纶唯恐有碍和谈，勒令官兵“不准无命自行起锚”，形成坐以待毙的被动局面。七月三日（8月23日）上午，法国舰队司令孤拔通过法国驻福州领事向闽浙总督何璟等发出进攻通牒。何璟、何如璋、张佩纶等惊慌失措，派人向孤拔请求延期开战，法国舰队不

仅拒绝请求，并于当日下午提前发动进攻。由于何如璋等人从未积极备战，接到战书后又对官兵封锁消息，致使福建水师毫无准备，只能仓促应战，有的兵舰未及起锚即被炸沉。在被动的形势下，福建水师爱国将士英勇抵抗，旗舰"扬武"号以尾炮击中孤拔的座舰"伏尔他"号；"振威"号在负伤的情况下，继续发炮，重创法舰；"福星"号猛烈反击法舰的进攻，直至弹药仓中弹爆炸，舰毁人亡；"飞云"号小舰与围攻它的三艘敌舰顽强拼杀，直到全舰沉没。仅仅半小时，福建水师军舰九艘、运输船十九艘先后被击毁击沉，将士死伤七百余人。次日，法国军舰又炸毁了马尾造船厂，一艘即将完工的巡洋舰也被毁坏。清政府的投降妥协政策致使福建水师遭到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

马尾海战的败讯和全国人民掀起的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浪潮，迫使清廷在七月六日（8 月 26 日）下诏对法宣战。命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加强防卫，同时授刘永福以记名提督衔。

法国侵略者在马尾之役得逞后，气焰更加嚣张。七月，孤拔率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基隆。刘铭传率军抵抗，后被迫放弃基隆，退守淡水。八月孤拔带领舰队进犯淡水，企图登陆。爱国军民奋勇抗敌，法军死伤惨重，溃败而逃。此后，法军为迫使台湾军民投降，对台湾实行封锁，同时又派舰队骚扰浙江沿海。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 3 月），孤拔率舰进攻镇海，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宁绍台道薛福成早已严密布防，守军数次击退法军的进攻。激战中，孤拔受伤，不久死于澎湖。

法军在进攻浙江沿海的同时，还在中越边境地区发动了陆路进攻。光绪十一年一月（1885 年 2 月），法军向广西巡抚潘鼎新所率领的东路清军进攻，由于潘鼎新战守不定，消极懈怠，部众士气低落，在法军的攻击下接连丢失了谷松、观音桥等地，逃至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军占领谅山、文渊之后，大举进攻中国，潘鼎新又弃关而逃，退至龙州。法军随即攻占镇南关。朝野震

动。

在此危急关头，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率粤军赶赴广西前线抗击法军。他到达前线后，整顿溃军，团结各路将士，同仇敌忾，积极准备收复镇南关。法军见势不妙，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三十里的文渊城。冯子材率军进至关前隘，沿山岭筑起一道十里长墙作为工事，进行了周密的布防，并将各路军队集中编制，统一指挥。

光绪十一年二月七日（1885年3月23日），法军在尼格里的带领下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关前隘。冯子材率军沉着应战，誓与长墙共存亡。战斗之激烈实为罕见，炮火连天，声震七、八十里以外。冯子材率众死战，使法军无法攻破防线。次日，法军炮火更为猛烈，部分法军趁大雾迷漫之机，扑到长墙之下，有的已爬至墙上。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冯子材身先士卒，手持长矛，呼喊着跃出墙外，冲入敌阵。诸军将士见此情景，无不奋勇杀敌，全军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肉雨扑征衣”，“血花飞满面”，战斗极其酷烈。经过一场血肉之搏，终于将法军击退。此后，当地各族人民及越南义军也纷纷前来助战，把敌人重重包围。九日（25日）冯子材率军发动总攻击，法国侵略军被杀的丢盔卸甲，叩头求饶。此役共毙伤法军千余人，法军司令尼格里身负重伤，在部下的护卫下才得以逃生。冯子材挥师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接连收复文渊、谅山等地。与此同时，西路清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在临洮也大败法军，收复十几个州县。

法军在镇南关等地接连溃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为战争付出沉重代价的法国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猛烈迸发出来，巴黎人民高呼着“打倒茹费理”的口号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法国资产阶级因其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受到威胁，也起面攻击茹费理的远东政策，在全国人民的谴责声中，茹费理内阁倒台。

抗法前线捷报频传，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茹费理内阁下

台，法国及政府内部动荡不安，前线法军也力不能支。于是法国政府提出停战议和。清政府本无继续坚持抗法的决心，便把胜利作为乞和妥协的资本。李鸿章认为，中国在前线大获全胜，正是求和的好机会，声称："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授权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前线将士接到停战撤军的命令后，无不义愤填膺，"拔剑斫地，恨恨连声"，皆扼腕愤言，不肯退兵。冯子材代表爱国将士，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请其上折"诛议和之人"，以振奋士气，鼓舞人心，彻底扫除法国侵略者，收复失地，消除后患。全国各地民众也纷纷反对议和，痛斥妥协投降派。清政府却全然不顾人民的强烈要求，强令抗法的清军部队和黑旗军撤出战场。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使中法战争出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可悲结局。

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北圻的边界。三、在云南和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指定两处开埠通商。四、中国日后修造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国撤走基隆和澎湖的军队。条约订立后，清政府还屈从法国的要求，将黑旗军撤入关内。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被卖国的清政府葬送了。战后，法国侵略势力日益深入我国的云南和广西，列强也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和邻邦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严重了。

（杨生祥）

参考资料：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

胡绳主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

《中法战争》（史料丛刊）第1册至第6册。

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

援朝之役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邻邦朝鲜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为侵略、霸占朝鲜而进行的争夺中，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表现得最为凶蛮和贪婪。

吞并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征韩论"就一直是日本军阀所奉行的国策。光绪元年八月（1875年9月），日本派军舰进入汉江江口，并强占了永宗岛。次年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十二款。条约规定：(1) 开仁川、元山为商埠，日本货物免纳关税。(2) 允许日本自由测量朝鲜海岸。(3) 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此外，条约中还明确规定："朝鲜为自由之邦"。这表明日本要破坏朝鲜与清政府的传统宗属关系，以便排除清政府的干涉，独霸朝鲜。《江华条约》是日本强加给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日本及其他列强都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光绪三年和六年，日本又在釜山、元山分别设置了特别居留地（租界）。日本的一些商业公司利用不平等条约，向朝鲜大量倾销日用品，对朝鲜的手工业横加摧残，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经济的发展。当时，以王妃闵氏为首的闵妃党排挤了大院君李昰应，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日本便乘机培植亲日势力，通过各种手段逐步控制了闵妃党。

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政治侵略，使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日趋强烈。大院君李昰应利用这种情绪，于光绪八年六月九日在汉城策动了兵变，处死了一些当政的官吏和日本教官，放火焚烧了日

本驻朝鲜使馆，最后驱除了闵妃党，重新掌握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兵变发生以后，日本政府一面派兵入朝，一面命令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迫使朝鲜赔偿损失，并妄图割占巨济岛和位于海参崴对面的郁陵岛。清朝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后，在上报清政府的同时，先后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及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等，率兵舰和军队赴朝，于七月十三日平息了兵变，迫使大院君归政于朝鲜国王。清军的迅速行动，挫败了日本的侵略计划。花房义质看到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兵力悬殊，未敢轻意向清朝军队挑衅。日本政府原来准备利用兵变割取朝鲜领土和夺取更大权益的企图未能得逞。但是，日本仍迫使朝鲜于光绪八年七月十七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借口，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

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在加强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的同时，竭力在朝鲜培植亲日势力。当时，在朝鲜出现了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徐光范等贵族青年为首的开化党，这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组织。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开化党来实现其侵朝计划，便对金玉均等采取了拉拢和诱惑等手段。而金玉均等为了夺取朝鲜的统治权，也极力依赖日本。光绪十年九月，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便开始遵照日本政府的指示，策动开化党发动政变。他先是蛊惑金玉均等人说：中法两国正在作战，清国将要灭亡，你们都是有志于朝鲜改革之士，切不可失此良机。接着，他又帮助开化党制定了政变的计划和具体行动方案。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金玉均等人按照与竹添进一密订的行动计划，制造事端，引导日军攻进王宫，然后挟持国王，组织了一个由开化党人担任各种要职的亲日政权。史称“甲申事变”。

政变发生之后，汉城民众十分愤慨，纷纷要求打入王宫杀尽倭奴。有些朝鲜大臣来到清军营地，“匍匐辕门，抚告衷衷”，请求援助。十九日，驻在朝鲜的清朝记名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

前、帮办袁世凯分别率领清军与朝鲜军民一同攻进王宫，击败了日本侵略军和开化党，拦回了被挟持到宫外的朝鲜国王。次日，竹添进一自焚使馆，带领日军退往仁川。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也逃到日本。

甲申事变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主战主和之争。在新闻界，有的报纸大肆鼓吹要“占领朝鲜京城”；另外有些官僚政客也叫嚣要吞并朝鲜。但是日本政府考虑到其军事力量尚非清军之敌，所以决定暂时维持和局，积极备战，伺机卷土重来。光绪十一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前来中国，同李鸿章在天津举行了谈判。李鸿章奉行退让妥协的方针，三月四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从签约之日起的四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将来朝鲜国内如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派兵，应事先相互行文告知，事定后要即行撤回，不再留驻朝鲜。这样，日本虽然撤退了驻朝的军队，但却获得了随时可以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侵略战争开辟了道路。

日本侵略者吞并朝鲜和占领中国的计划，早在中法战争结束时就已经具体化。日本政府根据伊藤博文为首的侵略分子的策划，积极进行战争准备。甲申事变后，日本的一些官僚政客竭力离间日本人民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声称日本应该与西洋文明国家一同来“振兴亚洲”，要按照西洋人的办法，即用武装进攻的方式对待朝鲜和中国。从光绪十六年开始，日本侵略集团的战争煽动进入了高潮。同年底，刚刚上台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提出了保持国家独立的自卫之道，鼓吹日本必须守卫主权线和保护利益线。主权线，指国家的疆域；利益线，指与主权线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山县有朋所说的利益线主要是指朝鲜，他将朝鲜视为与日本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公然宣称要加以“保护”。

光绪十五年以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已拥有一支二十九万人的陆军和配备三十一艘军舰、三十七艘鱼雷艇的海军。光绪十九年底，由于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倾轧，政局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迹象。因而，日本统治者企图用发动战争的方式，转移各派政治势力的视线，防止国内出现更剧烈的纷争。

光绪二十年一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政府便以此为导火线，出兵朝鲜，伺机发动战争。

东学党原为朝鲜民间的秘密结社。广大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压榨，便在东学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首先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各地农民在“除暴安良”，“逐灭夷倭”口号的感召下，纷纷响应，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屡次击败朝鲜政府的军队。不久，起义军占领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建立了农民政权——执纲所。朝鲜统治者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惊恐万状，准备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当时负责朝鲜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也计划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派兵“助剿”。在此之前，日本侵略者就已经密切注视着这一事态的发展，并进行了大量的阴谋活动，企图扩大事态，为日本制造出兵朝鲜的机会。日本参谋本部认为，朝鲜必然要向清政府求援，而清政府也必然答应出兵，到那时，日本即可派兵赴朝。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内阁通过了陆奥宗光的建议，即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何名义，日本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这清楚地表明，日本早已确定了趁清政府派兵助剿之机，出兵朝鲜，挑起中日冲突，发动侵略战争的方针。

但是，日本政府仍担心清朝政府拒绝派兵赴朝，便极尽诱惑之能事。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生曾诱劝清廷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说：东学党起义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为何不迅速

代韩戡乱，日本政府决没有其它用意。四月三十日，日本驻朝临时代办杉村也向袁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同日晚，朝鲜政府正式行文，恳求袁世凯迅即电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李鸿章由于没有看出日本的险恶用心，为了维持朝鲜的封建统治，便于五月一日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一千五百名渡海赴朝。五月四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奉命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将清政府出兵朝鲜的决定通知了日本外务相。陆奥宗光看到自己的阴谋得逞，便于当天夜间电令日本驻北京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复照清廷，告之日本政府也决定向朝鲜派出军队。

实际上，日本早在复照清政府之前，就已出兵朝鲜了，五月二日，日本参谋部便决定设立战时大本营，并请天皇批准向朝鲜派出混成旅团。同日，陆奥宗光便命令大鸟圭介公使带领陆战队四百余人，乘“八重山”号军舰动身赴朝。接着，一户少佐率领的日军一大队向朝鲜进发。就在叶志超、聂士成率军分别于五月五、六日到达朝鲜之后，七日，大鸟便带兵进人汉城，其后续部队也分批向朝鲜移动。李鸿章在得知日本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才感到日本政府另有阴谋，所以急忙电告袁世凯力图阻止。五月九日起，袁世凯与大鸟在汉城举行紧急会谈，商讨双方撤兵问题。但日本政府坚持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并继续发兵。因此，李鸿章阻止日本派兵的活动宣告失败，五月下旬，进驻朝鲜的日军已达万人左右。

为了制造驻兵朝鲜的借口和蓄意扩大事态，五月十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由伊藤博文亲自拟定的所谓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声称：乱民平定以后，为改革朝鲜内政，须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查核”朝鲜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清政府在接到有关上述内容的照会后，于五月十八日由汪凤藻复照日本政府，表示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并再次建议中

日两国应该共同从朝鲜撤军。对于这一答复，陆奥宗光于翌日又一次复照汪凤藻，日本政府决不能从朝鲜撤兵。此后，日本一方面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一方面准备单独“改革”朝鲜内政。五月二十三日，大鸟公使面谒朝鲜国王，详谈了“改革”朝鲜内政的必要性。六月十日，经内阁会议决定，日本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声明，即今后如在朝鲜发生不测，应由清政府负责。同时，陆奥宗光训示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可以说中日战争已如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从光绪元年开始到中日战争前夕，日本政府为实现其“大陆政策”，屡屡向朝鲜发动侵略。应朝鲜政府和爱国官民之邀，清政府先后于光绪八年、十年帮助朝鲜统治者平息了壬午兵变和甲申事变，挫败了日本吞并朝鲜的企图。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又应朝鲜政府之邀，派兵协助朝鲜当局镇压了东学党起义。日本政府决心借此机会，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名，制造中日冲突，发动侵华战争，因此，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杨生祥）

参考资料：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234页。

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第85页。

藤村道著：《日清战史》，米庆余译，第26页。

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第9页、20页、29页。

中日之战与马关签约

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之路，制定了旨在掠夺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并且加紧扩充军备，以求一逞。

光绪二十年一月三日(1894年2月8日)，朝鲜南部发生秘密结社东学党起义，以"除暴安良"和"逐灭夷倭"为口号，屡次击败朝鲜政府军的进攻，朝鲜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清政府负责朝鲜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准备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后便派兵助剿。而日本侵略者早就已经密切注视朝鲜局势的变化，开始着手阴谋活动。四月二十八日，起义军夺取全罗道首府全州，并建立起农民政权执纲所。次日，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趁机挑起中日冲突，发动侵略战争。四月三十日晚，朝鲜政府正式行文清政府，要求派兵援助。为了维护朝鲜的封建统治，李鸿章遂于五月一日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一千五百名赴朝助剿。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探得这一消息后，立即飞报日本政府，二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建立战时大本营，并请天皇批准向朝鲜派出混成旅团。同日，日本外务相陆奥宗光命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领四百余名陆战队官兵，乘"八重山"号军舰启程赴朝鲜。随后，由一户少佐指挥的日军陆续向朝鲜移动。

四日，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外务省，中国应邀出兵朝鲜。日本侵略者所期待的中国出兵照

会终于到来，日本外务省立即于次日复照汪凤藻，告之日本政府也准备出朝鲜出兵。当中国和日本向朝鲜陆续出兵的时候，东学党起义被镇压，朝鲜国内局势渐趋稳定。十日，朝鲜政府致函清政府，请求撤兵，以解除日方赖在朝鲜不走的借口。李鸿章得报后，当日即致电在朝鲜的叶志超，准备撤兵回国。清政府还向日本建议双方撤军，遭到决计寻衅的日本政府的拒绝。

为了制造驻兵朝鲜的借口和蓄意扩大事态，十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由伊藤博文亲自拟定的朝鲜内政改革案，干涉朝鲜内政。此后，日本一面准备单独改革朝鲜内政，一面继续向朝鲜派兵。二十三日，大鸟圭介公使面谒朝鲜国王大谈改革朝鲜内政的必要。二十五日，大鸟圭介秉承陆奥宗光的密令，照会朝方，要求明确清政府与朝鲜的关系。日本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是：趁机挑起中日之间的冲突，万一达不到目的，也要从朝鲜获得出兵的代价。到五月底，进驻朝鲜的日军已达万余人。六月一日，大鸟圭介公使得到陆奥宗光的指示：日本派往朝鲜的军队并不是狭义性的十字军，必须在改革朝鲜内政中取得包括铁路、电讯等方面的权益。同日，大鸟圭介迫使朝鲜政府实行由日本政府制定的内政改革方案。

六月十日，日本向清朝政府声明：今后如在朝鲜发生不测，应由清政府负责。同时，陆奥宗光训令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足见中日之战在日本人的一手导演下，已一触即发。为了排除列强干涉的可能，日本还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使英国、俄国实际上采取了支持日本的态度。十四日，英日新约签字后，日本侵略者以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刻到来了。

十五日，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了立即发动战争的重大决定。当天，天皇颁布特别旨令，任命桦山纪资中将为军令部长，接着，日本大本营开始了紧张的实战部署，并且命令驻在

朝鲜的日军根据情况寻找机会进犯驻在朝鲜的清军。同时，日本侵略者还秘密策划以兵力包围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的阴谋。十七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提出强硬要求，并限其在二十日以前作出答复，否则的话，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不啻是日本向朝鲜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二十一日清晨，日本侵略者包围并侵入朝鲜王宫，将宫中文物及购存的洋枪洋炮全部掠走，劫持国王李熙，挟制大院君李昰应出来执政，布告矫诏，请日军驱逐驻在牙山的清军。

可在日军进攻驻在牙山的清军之前，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丰岛海战，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中日之战。原来，为了应付朝鲜的紧张局势，清政府被迫增兵朝鲜。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六千人入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人进义州，左宝贵率所部八营准备开赴平壤。为增兵牙山，李鸿章雇用英国小商轮“爱仁”号、“飞鲸”号，载清军一营前往，由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扬威”三舰护航。二十一日，又租英国商轮“高升”号，将清军二营运往朝鲜，由北洋舰队的运输舰“操江”号运送军械物资。日本间谍窃取了清军运兵计划，遂准备在朝鲜海面截击中国军舰和运兵船。二十二日，“爱仁”号、“飞鲸”号抵达牙山。次日拂晓，“济远”、“广乙”二舰从牙山返航，行至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遇到日本军舰，日舰向“济远”、“广乙”二舰猛攻，日“吉野”号首先开炮，“浪速”号、“秋津洲”号也猛烈射击。北洋舰队被迫还击。开战不久，双方战舰皆为对方击伤，“广乙”号中弹后起火，失去战斗力，管带林国祥令南驶搁浅，后自行炸毁。“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藏人仓内，令挂白旗逃走。“吉野”号紧追不舍。爱国水手王国成、李仕茂两人自动操尾炮轰击，四发三中，击退“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包围了迎面而来的“高升”号和“操江”号。“操江”号被俘。“高升”号上的爱国官兵视死如归，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还击，直到船体全

部沉没，一千二百名官兵除三百名遇救外其余皆为国捐躯。

二十六日，日军进犯牙山东北二十公里的成欢，聂士成率领三千名清军英勇抵抗。二十七日凌晨，于光炘等在佳龙里一桥畔伏击日军，击毙日军中队长尉松崎臣大尉等多人。后因日军增援，于光炘等殉国。聂军左翼较薄弱，受到日军猛攻，聂士成屡次派兵增援，未能奏效。聂士成率众抵抗日军进攻，在击毙日军大队长桥本昌世少佐和多名士兵后见弹药不足，遂奋力杀出，成欢陷落。叶公超不战而退出公州，叶、聂皆退往平壤。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宣战后，清政府继续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策略，在平壤消极坐守，使日军从容进兵。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日本陆军第一军约万人，按预定计划分四路将平壤包围起来。十六日，日军分三路向平壤发动总攻，战斗在大同江南岸、城北牡丹台和玄武门及城西南同时展开。经过两天激战，平壤陷落。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血洒疆场，叶志超等弃城北走。

十八日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大东沟附近海面发现完成护航任务返航的北洋舰队。为达到偷袭北洋舰队的目的，伊东佑亨竟然下令悬挂美国国旗，以此为掩护，向北洋舰队驶去。中午时分，丁汝昌断定急驶而来的这支舰队是日本舰队，命令各舰升火，准备战斗。黄海海战爆发了。

日舰有由“松岛”、“千代由”、“严岛”、“桥立”、“扶桑”、“西京丸”、“赤城”、“比睿”八舰组成的本队和由“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四舰组成第一游击队，共十二艘船，以“松岛”号为旗舰。北洋舰队有“定远”、“镇远”、“致远”、“经远”、“来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十艘战舰，“平远”、“广乙”、“福龙”也曾一度参战，以“定远”号为旗舰。丁汝昌先以“犄角鱼贯阵”迎敌，后见敌舰是“一字竖阵”，忙令改“犄角雁行阵”，以“定远”、“镇远”两舰居中，其余各舰横列。但队形变换尚未完成，激战已经

开始,所以交战之初,北洋舰队是以人字阵与日舰对垒的。距敌近六千米时,“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即令开炮遥击,各舰也都发出第一排炮弹,因距离太远均未射中目标。日舰在相距三千米时,发炮轰击,第一游击队四艘战舰集中进攻距主力舰较远的右翼“超勇”、“扬威”两舰。“超勇”、“扬威”被击中起火,“超勇”很快沉没,“扬威”驶出阵外搁浅,失去战斗力。“定远”舰施放大炮,船身猛颠,使站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被抛堕舱面负伤,改由刘步蟾指挥。刘步蟾指挥若定,水兵们英勇顽强,在“超勇”被击沉后,“定远”等舰猛击敌舰“赤城”、“比睿”两舰,使它们都退出战列。

下午,日舰采取首尾夹攻战术,对北洋舰队构成极大威胁。“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舰迎击日本舰队,鏖战中弹药将尽,而船体多处受伤,“吉野”号又迎面开来,邓世昌便令加大马力向“吉野”号撞去。“吉野”号一边躲避,一边施放鱼雷。“致远”舰不幸被鱼雷击中,顷刻沉没,邓世昌等二百余名官兵,除二十余名得救外,皆壮烈牺牲。“济远”、“广甲”两舰见“致远”舰沉没,遂夺路而逃。“济远”舰慌不择路,竟将搁浅的“扬威”舰撞沉。“广甲”舰偏离航线,在大连湾的三山岛外搁浅,次日被日舰击沉,当日本第一游击队围攻“经远”舰时,“经远”舰将士在管带林永升的指挥下,孤军奋战,发炮攻敌,激水灭火。在炮战中,林永升等二百余人仅十六人遇救,其余皆为国捐躯。“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先后击中敌舰“西京丸”、“松岛”、“吉野”等,杀死杀伤许多敌人。日舰遂向南退去。海战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双方互有损失,日舰稍占优势。李鸿章旋下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并掌握了黄海、渤海制海权,分陆海两路逼近中国。

九月二十六日,日本侵华第一军在山县有朋的率领下,从朝鲜的义州攻击清军的鸭绿江防线;第二军在大山岩的指挥下出大

同江，从海路在花园口登陆，直犯金州，南攻辽东半岛。二十七日，与聂士成、马金叙交手后，日军攻陷虎山。二十八日清晨，日军进攻九连城，刘盛休、吕本元早已逃逸，使日本侵略者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这一重镇，后陷安东（今丹东）。同日，日军还占领花园口，随后又侵占貔子窝。十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开始进攻金州，驻守旅顺的总兵徐邦道自告奋勇赴金州抵抗侵略者。八日，双方大战于距金州五公里的石门子。徐邦道因孤力无援，败退旅顺。九日，日军侵占金州，后分兵三路进犯大连。大连虽有炮台，配备了最新式大炮，储存了许多弹药，但守将赵怀益贪生怕死，临阵逃脱，使日军于十日不战而得大连，当地一百二十门大炮及大量炮弹、军用物资全部落入敌人之手。

二十一日，日军开始进攻旅顺。旅顺尽管拥有炮台三十座，大炮近一百五十门，环海布有水雷，驻军三十余营，但是作为实际统领的龚照玙贪鄙庸劣，金州失守前曾一度逃往天津。临时统领姜桂题也是庸才，无所作为。因此当日军进攻旅顺时，只有徐邦道率领官兵奋勇抗敌，并于次日在土城子一带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二十三日，徐邦道统率的爱国官兵已有一些伤亡，而且疲饥交加。黄仕林等人却率部逃走，其部下公然抢劫银号公库，造成混乱。二十四日，日军会攻旅顺，徐邦道寡不敌众，被迫突围北撤。次日，日军占领旅顺。日本侵略者进入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狂杀乱砍，有的被砍掉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小孩被钉在墙上，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剖腹开膛。这场大屠杀持续了四天，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仅有三十六名当地人幸免于难。他们的脸上被刺上免杀的记号，被侵略者用来专门抬同胞的死尸。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本性完全暴露出来。

为了乞求和平，清政府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通知日本，决定派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媾和。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肯就此收兵，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威海卫成为日军进

攻的又一重要目标。十二月，日本从国内调派一支军队抵达大连湾，与侵入辽东半岛的部分日军汇合成以大山岩为司令官的军团，共二万人，在联合舰队二十五艘军舰，十六艘鱼雷艇的掩护下，准备进攻山东半岛。为了抄威海卫的后路，日军首先发动对成山的进攻。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攻陷成山和荣成县城后，由陆路向西挺进。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与敌交战于枫岭、桥头等地，屡战屡败，威海卫后防诸要塞尽落入敌人之手。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进攻威海卫南邦诸炮台，同时，联合舰队从海上也发起攻击。

当时，北洋舰队尚有铁甲舰两艘，巡洋舰五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二艘，战斗力还相当可观。但李鸿章等人严禁出击，死守威海卫港，造成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从一月五日起，在伊东佑亨的指挥下，日本联合舰队对威海卫先后发动了多次进攻，占领了南北邦炮台。北洋舰队陷入日本陆、海军的夹击之中。十一日，"定远"舰中日军鱼雷搁浅。次日，"来远"舰中雷，"威远"号也中鱼雷沉没。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发动总攻，旗舰"松岛"号受重伤。北洋舰队十二艘鱼雷艇擅自逃逸，有的被敌舰击沉，有的被俘虏。十四日，日舰又一次发动攻击，"靖远"舰受重伤。总教习英国人马格禄、美国人浩威鼓动北洋舰队的外国人及威海卫营务处提调牛炳昶等，逼迫丁汝昌投降，遭到拒绝。十五日，日舰再次来攻，"靖远"舰中炮搁浅，其余舰艇也都弹药将尽，马格禄、浩威等人再次劝降，还挑动士兵手持武器逼迫丁汝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派人炸沉搁浅的"靖远"舰。"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派人将"定远"舰炸沉，然后自杀。十七日，丁汝昌也自杀身亡。次日，"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镇北"炮艇向日本联合舰队投递降书，将"镇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舰和六艘炮艇及刘公岛上的全部军用物资交给了日本侵略者。二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开进威海卫港，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几乎在日军进攻山东半岛的同时，中日双方在辽东的战争分东、西两路正激烈展开。东路大高岭一线，聂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与日军对垒，不断周旋。陈湜的湘军与聂军换防后，同东边道道员张锡銮一起，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分别于二月二日和五日收复了宽甸和长甸。在西线，清军先后发动五次反攻海城的战斗，均以失败而告结束。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岫岩、海城、盖平的日军分三路出击，清军到处溃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鞍山等地后，于二月八日开始大举进犯牛庄。当日军杀进牛庄市区时，守将李光久、魏光焘等正在吸食鸦片，根本就未尽指挥之责便逃走了。广大爱国官兵自发地抵御强敌，据屋后墙角死守，先后牺牲二千人。次日，牛庄失陷。吴大澂见牛庄失守，从田庄台逃到石山站。守卫营口的宋庆当晚统率三万大军渡过辽河，逃到田庄台。十一日，日军不战而得营口。十三日，日军猛攻田庄台，宋庆经过激战，不敌对手，弃城逃走，未及逃走的近二千名清军官兵惨遭杀害。日本侵略者攻陷田庄台后，纵火焚城，田庄台一市化为乌有。辽东半岛遂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辽东半岛形势危急的消息传来后，清政府万分惊慌。本来为了求和，清政府曾派张荫桓、邵友濂与日本代表陆奥宗光在广岛会谈，结果遭到拒绝。日本代表公开点名要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代表，清政府只好答应。为尽快媾和，二月十八日，李鸿章以美国人科士达为顾问，带领他的儿子李经方及随员马建忠、伍廷芳等人，乘二艘德国轮船，离开天津，赶赴日本马关。二十四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议和。李鸿章要求先停战，后议和。伊藤博文见机行事，存心勒索，遂提出包括先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停战条件。李鸿章见日方停战条件极为苛刻，只好撤回停战要求，先议和款。就在当天会谈结束后，李鸿章返回寓所的途中，日本暴徒小山丰六郎用手枪击伤李鸿章的左眼下部，造成谈判被迫中断。李鸿章遇刺

后，日本政府一度极端恐慌，既担心列强乘机干涉，又怕李鸿章据理采取措施。而为了在谈判中达到割取中国台湾的目的，日本又调兵侵犯澎湖列岛。从二十七日起，经过两天战斗，将澎湖列岛攻陷。三月三日，陆奥宗光急忙通知李鸿章：日本政府已经同意暂时停战。李鸿章在遇刺后并未采取相应措施，在得到陆奥宗光的通知后反却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五日，双方签订不包括台湾和澎湖在内的、为期三周的停战协定。

从三月七日起，议和谈判继续举行。日本代表漫天要价，在媾和草案中列举出比日本实际要求多得多的内容。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父子还态度十分蛮横地百般恐吓，逼其就范。李鸿章父子也只能是低头哈腰地讨价还价，不敢据理力争。十六日，伊藤博文提出所谓的“尽头条款”，丝毫不允许李鸿章提出修改意见。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李鸿章也同日本代表展开过争辩，但那多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常见的是他低三下四地哀求对手。李鸿章既要对付日本代表，又要对付清政府。他看到日本要求中国割地的态度很坚决，可又担心清政府不答应，所以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中，便用日本代表的刁蛮无理的言辞恫吓清政府。十九日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中，他就说：伊藤博文讲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李鸿章利用耸听的危言达到了目的。二十一日，他再次奉旨：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马关条约》正约共十一款，主要内容有：确认朝鲜独立；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后辽东半岛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

中日之战和《马关条约》对中国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尽管中国军民奋勇抗击外来侵略者，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英雄壮歌，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由腐朽的清政府所造成的败局。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湘军的大溃败，既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主和投降的恶果，又是其极端虚弱本质的大暴露。中国人民无辜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屠杀，祖国神圣领土受到强盗铁蹄的践踏。《马关条约》进一步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使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激起人民反对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数额超过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三倍的赔款及赔款利息，逼着清政府向列强大量举借外债，受到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而日本侵略者则以这笔大赔款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并向帝国主义转化。日本人可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条约规定，像一道绳索，捆绑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手脚，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而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便合法化了。它的签订使列强侵华的野心急剧膨胀，各国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投资，进行资本侵略；拼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一股股瓜分中国的恶浪。中日之战的战败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

（范丽珠）

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2分册。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

三国干涉还辽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春帆楼开始议和谈判。当李鸿章提出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时，伊藤趁机勒索，提出了包括先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停战条件，因停战条件极为苛刻，李鸿章只好撤回停战要求，先议和款。当天会议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寓所的路上遇刺负伤。日本政府一度非常恐慌，担心欧洲列强乘机干涉，急忙通知李鸿章：日本政府已同意暂时停战。三月五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不包括澎湖和台湾在内的，为期三周的停战协定。

三月七日，谈判继续进行。日本方面以武力恫吓为手段，蛮横无理漫天要价，迫使李鸿章就范。在日本代表向李鸿章提出具体的议和条件后，清政府和日本方面均将条件的主要部分告知各国。俄、德、法等国都有明显的反映，尤以对《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一事反响最为强烈，纷纷根据自己的权益制定对策和行动计划，从而导致了一场对远东，尤其是对中国的激烈争夺战。

沙皇俄国一直奉行利用日本侵华，乘机渔利的政策，对中日战争的过程，特别是结局备加关注。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获悉日本提出的讲和条件之后，从三月十二日起，数次上奏沙皇，积极制定沙俄的远东扩张政策。他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俄国极为不利，俄国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要为修建西伯

利亚铁路创造条件，必须兼并东北的几个重要地区。虽然如此，沙俄最初还没有对日本进行强硬的干涉，因为罗拔诺夫和尼古拉二世都认为俄国在远东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英国，日本是一个后起的海上强国，迟早会成为英国的对手。所以，为了对抗英国，还不能立即得罪日本，只是准备联合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列强以外交方式对日本进行劝告。

英国对于中日战争的政策，是从两个基本点出发的，其一是必须维护英国在华的利益，使之不受战争的影响；其二是利用日本的侵华行动抵制沙俄南下。它放纵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又屡次居间调停中日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看到日本的军事进攻将要影响到它在华权益的情况下才进行调停的。当英国得知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后，英国政府立即发现，这些条款不仅对英国没有任何损害，相反有关通商的一些规定，英国还可以根据在中国的最惠国地位，间接的予以享受。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可以对沙俄形成威胁，以此作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既对英国有实惠，又能起到抵制沙俄南下扩张的作用，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愿望。因而，当俄国提出要与英国联合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时，便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

面对这种状况，三月十七日沙皇政府又召开了特别会议，在会上财政大臣维特发表了意见：第一，如果日本占领南满，将对俄国构成威胁，而且日本将会吞并朝鲜；第二，如果我们让日本进入满洲，要保护沙俄的“领土”和西伯利亚铁路，就需要派出数十万军队，并要大力加强海军，因为迟早会与日本军队发生战争；第三，俄国应该坚决地声明，俄国决不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日方不履行俄国的要求，俄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有进行战争的必要，就要坚决地行动；第四，如果与日本发生战争，就要猛烈地袭击日本的港口，这样俄国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清政府就会同意用和平的方式修改同俄国的国界。维特所说的修

改国界，实际上是沙俄占领中国东北的代义词。显而易见，反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以便把这一地区留给俄国独占，就是维持的意图所在。沙俄政府的特别会议最后按照维特的意见作出了决定，如果日本坚持拒绝俄国的劝告，就立刻对日本政府宣布：俄国将保留行动的自由，俄国将依照自己的利益开始行动。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沙俄便结束了利用日本的政策，积极地进行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活动。

中日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德国首先在外交上大肆活动。它抢先向英国政府表示：如果有第三国在战争以后从中国取得新的利益，德国也要取得相当的利益，并且希望能与英国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其他争夺者。但因英国未予以答复，德国又转而同俄国进行联络，主动地向沙俄表示，俄、德两国在远东并无矛盾。当日本将议和条件告知各国后，英国明确表示不准备有所行动，而俄国却作出了立即干涉的决定，于是德国又竭力支持和怂恿俄国加快行动的步伐。德国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干涉活动，其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妄图在各国争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取得新的权益和侵略据点。三月十四日，德国曾致函英国，露骨地表示：我们同俄国一致行动，就有可能使清政府感恩，从中国割让或租借一个地区作为军事基地及煤站。其二是要把沙俄的视线引向东方，以减轻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它的压力。这正如威廉二世所云，为了尽可能的减轻德国在东部边境上的压力，要把俄国引向它的真正使命所在的东方，这也是符合德国利益的行动。出于这两个目的，德国遂成为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参加者之一。

法国基于俄法同盟的特殊关系，对中日问题的立场基本上是以俄国的态度为转移的。同时，法国也企图在日本击败清政府后，从中国夺取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虽然法国资产阶级因顾及到本国民众的仇德情绪，曾一度诱导英国政府参与干涉还辽，以便使法、德、俄三国的行动演化为欧洲各大国的联合行动，遮人

耳目。但由于英国政府的拒绝，法国最终也只得从法俄的同盟关系考虑问题，同沙俄采取一致的立场和态度。

列强对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不同反应，再一次暴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远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它们彼此之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是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对远东和中国进行激烈争夺的具体表现。最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所以决定联合起来从日本的口中夺取猎物。三月二十三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便向法、德政府正式提出联合干涉的建议。三月二十九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到日本外务省，强硬地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否则三国海军将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停泊在日本各港口和海参崴的俄国军舰奉命升火起锚，准备随时出击；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也下令召集预备兵人伍。德国皇帝也命令在远东的德国军舰集中于华北港湾，与俄国舰队密切联系，以便共同行动。

三国的联合干涉，使日本政府受到强烈的震动和很大的压力。接到三国通知的次日，日本天皇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尔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及其他大臣又频繁地进行反复的磋商。日本政府认为，目前日本海军的力量不仅无法对付三国联合的海军，而且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所以要同三国为敌，决非上策。然而日本又不愿意立刻答应三国的要求，把已经到口的美味轻易吐出来，于是做出决定：先想方设法使三国的干涉尽量缓和，同时加紧斡旋，引诱英、美等国出面反对干涉。如果最后对三国不得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此外还决定，不论接受三国的要求与否，必须强迫清政府如期批准《马关条约》和交换批准书。

根据上述决定，日本政府首先指示其驻俄公使与沙俄政府进行交涉，要求俄国重新考虑干涉还辽问题，并保证日本占据辽东半岛后决不会影响俄国的利益和领土。与此同时，又派出使臣秘

密地通知英国：完全可以推测沙俄对满洲东北部及朝鲜北部包藏祸心，希望英国政府给予援助。在同美国的接触中，主要是恳求美国方面作出友谊的协助。四月三日，日本驻俄公使发回电报，说俄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同日，英、美两国的签复也分别到达东京。英国表示：对日本颇怀好意，但对此事概不干涉，并劝告日本政府，形势非常严重，日本应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美国虽然表示同情日本，但只应允在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可以协助日本。显然，日本政府缓和三国干涉和诱导英、美等国反对干涉的努力均遭失败。在这种形势之下，日本只好向俄、德、法三国先作出一些让步，并于四月十六日向沙俄提出备忘录，表示除金州以外，日本可以放弃辽东及其他地区。

但是，日本方面的这一表示仍然遭到俄国的拒绝。与此同时，清政府因中央和地方部分官吏的强烈反对也向日本提出延迟批准换约的期限。这时，日本政府开始感到如果没有使用武力的决心，仅凭外交上的劝导折冲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甚至还担心由于交涉的旷日持久，会使《马关条约》的全部内容无法兑现而成为一纸空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陆奥宗光反复权衡了局势，认为“逐两兔者不得一兔”，执行完全向三国让步而对中国一步不让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四月十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了陆奥宗光的意见，翌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俄、德、法三国，表示愿意接受“友谊的劝告”，放弃辽东半岛。闰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向三国提出要求清政府支付五千万两作为赎辽费。俄国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以便今后攫取更多的权益，曾装扮出一副同情帮助中国的面孔，与日本讨价还价，最后于九月二日才正式达成协议，日本政府答应减掉二千万两。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林董正式签订了《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又称《中日辽南条约》。条约规定：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清政府于九月三十日前交给日本白银三千万两作为“报酬”，日军在款

项付清后三个月内从辽东半岛撤出。

三国干涉还辽是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领土和各项权益而进行的激烈争斗，是十九世纪末叶列强为争夺中国而发生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这次干涉活动，暴露了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的贪婪野心，也是沙俄同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一次较量，这是沙俄企图独霸中国东北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久，俄国便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名，霸占了旅顺、大连。日本被迫撤出辽东，当然不会甘心作罢，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也因此而不可避免。

（杨生祥）

参考资料：

《中日战争》（丛刊）第7册，第304页。

（英）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第61、68、91、92页。

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73页。

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第347页。

列强瓜分中国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争夺进一步加剧。列强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进行政治性贷款，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修筑权和经营权；在华开办工厂，掠夺矿藏，设立银行。与此同时，还强占租借地和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沙俄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它的工业较为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同英、美等强国竞争，便企图通过不断扩大殖民领域的办法来弥补其经济力量的不足。沙俄在辽东半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迷惑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他们以为一意联络沙俄，即可牵制其它列强。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廷按照沙俄的意愿，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参加典礼，并前往英、法、德、美诸国联络邦交。同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沙皇政府的威逼利诱下，与其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是：(1) 日本如侵略俄国远东领土或中国及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2) 缔约国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3) 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协助供应。(4) 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铁路，由赤塔直达海参崴，该路的修筑与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5) 无论战时或平时，

俄国均可使用该铁路运送军队、粮食及军需品。

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夺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进而准备独占东北，称霸远东。由于沙俄的率先行动，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占港湾、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在甲午战争刚结束不久，便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港湾，但一时未能得逞。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强行占领胶州湾。次年二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主要内容是：(1) 清政府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2) 清廷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商有权开采。通过这一条约，德国在“租借”的名义下，占据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强占胶州湾是受到沙俄支持的，双方曾达成了肮脏的协议。俄国以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来换取德国对沙俄夺取辽东半岛的支持。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沙俄以防止英、德、日等国侵占东北为幌子，派军舰占据了旅顺港。翌年三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后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 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租期二十五年。在租期内，旅顺口和大连湾完全由俄国管辖。(2) 清政府允许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支线，把中东路和旅顺口、大连湾连接起来，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利权不得让与他国。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不仅侵占和控制了旅大地区和辽东半岛，而且把旅顺口变为俄国的海军基地，进而使东北全境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就强占了云南境内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河口、思

茅通商，还取得在云南、两广的开矿优先权。二十二年，法国又控制了清廷重建的福州船政局。次年，便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在沙俄强租旅大后，法国又胁迫清政府声明，保证不将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将广州湾租给法国。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借条约》。主要内容有：(1) 法国租借广州湾及附近水面，租期九十九年。(2) 允许法国修建从越南边境至昆明和从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并取得了承办中国邮政的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和广东大部分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保证不把长江流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不久，又借口法国租借广州湾威胁香港安全，要求扩展香港界址。同年四月，英国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朝政府将九龙半岛及附近水面、岛屿租借给英国，租期为九十九年。此后，英国又以防止沙俄势力南下为借口，于五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专条规定：威海卫及附近水面、岛屿租给英国，租期为二十五年。从此，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在这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中也不甘落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日本胁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省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后仅仅数年，中国沿海的重要港湾旅大、威海卫、胶州湾、广州湾均被侵略者占据。许多重要的铁路都被列强劫夺，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当列强在中国忙于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顾及中国。当美西战争结束时，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已划分完毕。但美国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企图。光绪二十五年八月 (1899 年 9 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英、法、德、俄、日、意等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要内

容是：(1) 各国对于他国在华所取得的任何势力范围、租借地、通商口岸和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 各国对于运往自己势力范围内各口岸的他国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协定关税率收税。(3) 各国对于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别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当别国使用他国自己所修筑或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他国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货物的铁路运费。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美国取得了其他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不干涉美国利益的正式诺言。其二，由此美国便能够在任何国家的势力范围内享有协定关税的优厚权利。其三，美国还取得了在各国势力范围内，特别是在航运和铁路运输方面享受与各国同等利益的保证。

美国通过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不仅避免了本国势力从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内被排挤出去的危险，而且使美国的侵华势力渗透到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并享受与各国同等的权益。从表面上看，美国不曾在中国割占一块势力范围，而实际上处处是它的势力范围。这个政策不仅给予美国极大的利益，而且在不损害各国在华权益和势力范围的前提下，使列强在竞争中避免自己被削弱。由于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谁也无力独霸中国，于是先后表示同意这一政策。

（杨生祥）

参考资料：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 111 卷至 115 卷、《四十年外交》（罗森著）第 1 卷；《许文肃公遗稿》卷 10、《张文襄公全集》卷 37、《帝俄侵略满州史》（罗曼诺夫著）、《维特回忆录》卷 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3、《中国近代史》（徐凤晨等主编）。

公车上书

清道光二十年（1840）外国资本者来到中国以后，因为鸦片而爆发了两次战争，都以清朝廷退让，签定赔款、割地的不平等条约为结果。从那以后，外国资本者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输人自己的商品，以及要求其他利益。在中法战争以后，终于又于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开始时，人们满以为搞了很久的北洋海军，对地狭人稀、羽毛未丰的日本人总可以抵挡一阵子，却没有料到经黄海和威海卫两次海战，便全军覆没，陆军也节节败溃。终于，清廷又与日本人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省等大片领土，赔款白银二万万两，日本资本家可在中国自由设置工厂等等。《马关条约》签订后六天，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割取我辽东半岛，迫之交还我国，但又必须支付还辽的“酬报费”库平银三千万两给日本。眼看着俄、德、英、法、美等国将挟持不平等条约的“最惠国”待遇，进一步争夺、扩张在华的势力，中国已面临被分割的危险局面。

在甲午战前，清朝的财政已是十分地困难，当时要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支付这一笔笔庞大的赔款，已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缴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只好又向外国资本者借贷。从二十一年以后，陆续签订了《英法洋款》、《英德洋款》等条约，三次借款和利息加在一起，共计白银六万万两以上。这些外国资本者又通过大借款，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关税的控制。又通过建铁路、开

矿等项贷款或投资，不只掠夺了铁路、开矿的权利，而且攫取了路矿附近的经济和政治的某些特权。他们摧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堤岸，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

外国资本者这种无止境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对外国资本者以及清朝廷的无比愤恨和强烈反抗。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众在广西金田誓师起义，要杀尽“清妖”自掌乾坤，并于三年（1853）在南京建太平天国。光绪年间，更有各地会党以“打富济贫”、“反洋教”相号召，开展斗争。以后，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更连绵不断地掀起了反洋教的巨浪。其中四川余栋臣的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外国资本者的侵略行为，英勇抗击清军的围剿，影响达到三十多个州县。

在紧迫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清政府也感觉到国力衰微，不足以应付世界的大变化，便委托一部分官僚筹办洋务。从咸丰、同治年间起，陆续出现了许多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军事工业。而这时，也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企业。咸丰十一年（1861 年）福州商人购入英国机器，设厂制造砖茶，产量最大时达一亿三千七百万磅，先后开办了三个制茶厂。同治二年（1863 年），上海洪盛米号开始用机器碾米。光绪五年（1879 年），汕头商人用机器制豆饼，制品除在当地销售外，还供应台湾市场。六年（1880 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机器缫丝厂。七年（1881 年），上海商人以资本十万两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广东顺德黎召民等组织肇兴公司，在香港、伦敦间贩运中外货物。八年（1882 年），上海商人设立机器造纸厂；澳门商人设立轮船公司。光绪九年（1883 年）至二十年（1894 年）间，广东顺德先后成立了三十多个机器缫丝厂，每厂有蒸汽机一部，资金最高六万元，最低一万八千元。这是中国最早的民

族资本者。这些人在办理新式企业的过程中，接触了许多新的东西，如资本、利润以及新式管理企业的方法等。他们开始感到光凭原来的儒家学术和八股文一类旧学问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了，想从中挣扎出来，探讨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向西方学习。而一些原来朝廷的官员和有眼光的智者也共同感觉到要想解救民族危机，避免被外国资本者瓜分，就应当向西方先进的东西学习。他们也耽心清朝政府如不自觉改革、革新、自强，那就将被日益扩大的群众反抗风暴所淹没，主张通过革新挽救清朝廷。

既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那时的中国人能直接接触外国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只有极少数外交官和留学生。鉴于此，同治元年（1862 年）清朝政府在北京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也译一些“公法”之类的外国书。同治四年（1865 年）洋务官僚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述洋务工业必需的技术知识，也有少量政法方面的书。另外，一些在中国传教的洋人传教士很早就出版书报。光绪十三年（1887 年），英美传教士在上海设立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出版了一百多种书。中国人从这些书刊中吸取了有关声、光、化、电的粗浅科技知识，也得到了一些国际形势和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

当时最早倡导“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益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地”的是容闳。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习的学生。他回国后曾到太平天国访问，向洪仁玕提出过革新的建议。在同治年间，又多次向清廷的洋务官员倡议改良，想通过寻找政治的力量支持，来实现改良主张。其后较有名的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他们在光绪年间写书、写文章，发表变法言论，引起了当时社会人士和知识界的广泛注意。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以抵制西方资本者的侵略，认为洋务官员专搞制造，只是西学的皮毛，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少采取了一点批评的态度。比如郑观应，早年就放弃了读书赶考的道路，

投入商界，为洋务官员经办过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一类企业，是一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他略陈利弊，于同治元年（1862年）出版了《救时揭要》一书，同治十年（1871年）又增删为《易言》，光绪十九年（1893）又增订改名为《盛世危言》发行。历时三十年的这本书基本上概括了那个时期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直到光绪后期，在知识界还流传着这部书。

郑观应等人在书中强调“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逐渐地通过革新来达到富强的目的。他们还主张，要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只有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才能改变被侵略的地位。他们因此还揭露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只要中国自强起来，外国人就会从中国撤走。他们提倡振兴工商业，让民间自立公司，全民一心，富人出资，穷人出力，与外国资本者打一场“商战”。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新政府来支持。以前的一人说了算的独裁体制显然不行了，考察世界各国的政体，在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中，只有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最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要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中华民族危机。

在这些主张革新的思想家中，有一位年轻的举人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他早年去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读了许多介绍西学的书，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治国的办法，不能用以前看待“蛮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了。因为那时的外国资本主义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再反过来看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古老而闭塞，老是被外国侵略，处境一天比一天恶劣。这样，康有为的革新思想诞生了。他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真理。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

当中法战争后不久，不仅一些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邻邦，如越南、缅甸、锡金已被英、法侵占，而且英国又在发动对中国边疆西藏的侵略战争；俄国在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后，又进而窥伺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也在向中国邻邦朝鲜步步进逼。康有为见到这般情景，写了封五千字的"上皇帝书"，去叩紫禁城的大门。书中说：外国人的侵略，已从侵占领邦伸人边疆，进而达到深人内地的危险局面；人民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是"骚乱"，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将会再次爆发。他认为趁此时赶紧变法改良，还可以挽救危局，要是再迁延下去，就不堪设想了。至于变法的具体办法，他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变成法"就是要革除弊政，另参酌古今中外的法制，结合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予以变通；"通下情"就是要人人均享有自由发言的权利，政府应设立"训议之官"，以备谘询；"慎左右"就是要提拔维新人才参与政权，对顽固守旧的官僚予以革职。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人们将此书称为"上清帝第一书"。

这封"上皇帝书"，不过是一个勤勉的知识分子的出谋献策而已，表达了中国有产者阶层的改良愿望。但在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不知天高地厚，因此无人愿把此书送呈光绪皇帝。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被内定为考中的第三名。主考官徐桐，对康的上书很反感，大骂如此"狂生"，不予录取。康有为虽然落选了，但经过这次上书，却渐渐有了声名。

康有为在上书失败后写下了"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表达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他回到广东后，招收学生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 年）在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学馆，并开始撰写《长兴学记》，阐发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先后到这里学

习。梁启超也出身于地主有产者家庭，这时已是年少的举人，却拜虽没授举人，可极有才华的康有为为师。梁启超在此渐渐放弃专搞科举考试那一套，而去学习经学、理学、史学和西学，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成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被人们合称康梁。

为了使自己的变法主张在中国有产者和知识分子、士大夫中引起共鸣，康有为在教学的同时写了不少书，着力引申和附会孔子学说，以其为改良理论的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在思想界产生过震动，对后来的戊戌变法影响最大。一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十八年（1892年）开始写，几年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俗称“六经”，相传都是经过孔子编订的，是中国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到西汉末，因为发现了一批儒家经传，是用篆书一类古文写的，与当时通行的隶书本子有所不同，从此产生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学术派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证明古文经为伪经，而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使他的变法改良主张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依据。他多方论证古文经是刘歆（xīn）帮助王莽篡夺汉朝刘家的天下而伪造出来的，所以他称古文经为“新学”，是王莽的“新”朝之学，是刘歆捏造的伪经，而非孔子真经。这样，康有为就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古代的经典，打击死守“祖宗家法”的势力。此书一再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毁。《孔子改制考》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在书中，康有为根据公羊学派的理论，对“通三统”、“张三世”学说进行了阐发。“通三统”即为因夏商周三代不同，故应随时因革。“张三世”是说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变愈进步。康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沿着这三个阶段前进，由据乱世入升平世，再进入太平世，绝非人力所能阻挠。他还把“三世说”理论和古代典籍“礼运”篇中的“小康”与“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升平

世即“小康”之世，太平世则为“大同”之世。康有为的这种历史观是进化的历史观，比起封建有产者的复古主义和循环论的历史观前进了一大步。

康的另一部书名为《大同书》，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草，初稿为《人类公理》，十九年（1893年）才基本完成。他认为在人类未来的大同社会中，没有国家和家庭，在各种工作中，男女一样服务，人人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各级政府均由人民选举。他看出私有财产是导致人类生活痛苦和社会发生争乱的根源，因此他觉得在“大同”世界中，应该不存在私有财产制度，社会上也没有欺诈和掠夺的行为，人人都从事劳动生产。他还认为在家庭消灭以后，人人都将不愿意再保有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制度自然就消灭了。在这本书中，他勾勒出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博爱理想。《大同书》虽然是写成了，但他并不想将“大同”思想公开传播。因为他认为当时社会处于“据乱世”阶段，只能以小康主义来作挽救的目标，否则会使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

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所发出的改良的呼声，当时的清廷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慈禧本来是因为光绪年纪尚小而代他处理朝政的，第二次“垂帘”意味着她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光绪帝（载湉）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甘心作慈禧的傀儡，对掌握政权的要求日益迫切。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前夕，以慈禧为首的集团害怕因战争而改变政权的现状，宁可对日本屈辱退让。当时的李鸿章为淮系的头目，为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赞成对日妥协。而光绪帝则希望通过战争削弱政敌的势力，使自己能够掌握实权，因此主张对日抵抗。光绪帝每日召见廷臣，示意对日主战。当日本正式发动侵略战争时，光绪帝终于在七月一日发布了宣战上谕。但甲午战中，李鸿章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在朝鲜战场上也一败再败。光绪帝一时还不敢严

厉惩治他，便“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起用奕䜣为总理衙门大臣，借以剥夺奕劻和李鸿章所控制的外交大权。光绪虽然主张抵抗日本侵略，但本身缺乏实力，不能不依靠湘系军阀。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光绪正式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刘坤一率军八十余营，驻守山海关一带。这是对日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出兵，也是光绪帝的拚力一试。然而，湘军也和淮军一样腐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日本侵略军向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进犯，湘军一触即败，溃不成军。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终于由李鸿章代表清朝廷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

对于这种情势，光绪也的确觉得国力衰微，面目无光，国家毁在自己手里，确实对不起祖宗。他也愿意引用一部分新知识分子，一方面挽救民族危机，一方面借以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在光绪周围的一些官员当时是比较开明的，逐渐也具有了维新的倾向，企图通过改良政治，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下决心倾听朝野的呼声。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候，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军事方面的惨败而将结束，李鸿章正在马关与日本议订投降条约。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康有为知道《马关条约》立刻就要签订，李鸿章已应允日本所提出的赔款、割地、开埠通商、设厂制造等项条件。于是他叫梁启超去广东发动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绝签订可耻的条约。一部分广东举人赞成这种主张，湖南籍举人也表示愿意签名。二十八日，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便联合到都察院上书。紧接着，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数省举人上书，特别是台湾举人声泪俱下地反对割让台湾。几天内，都察院门前，车马盈巷，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

康有为看出了爱国仕人的反侵略情绪，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以此为改良图新的契机。他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上皇帝书”，邀请十八省的举人于达智桥松筠庵集会，研究上书的问题，结果在上书上签名的有一千二百多举人。他们决定于四月八日（5月2日）同赴都察院投递“上皇帝书”。清朝廷有些官员得知这个消息后，深恐有碍《马关条约》的批准，便多方进行破坏，一面在宫中活动，要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提前批准条约，造成无可改变的局面；一面进行威胁。军机大臣孙毓汶派探子到各举人的寓所，叫他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前途。有些经不起一吓的举人，竟要求除掉自己的姓名。但康有为仍坚持原订的计划，邀合一些举人前往都察院将“上皇帝书”递上。这个不平凡的举动，震动了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阵不平静的波浪。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口皆碑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仕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代指举人入京应试）。

“公车上书”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说：辽东半岛及台湾一割，法国窥伺云南、广西，英国窥伺云南、广东及西藏，俄国窥伺新疆及吉林、黑龙江，一定接踵而来瓜分华夏；而国内百姓日渐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使没有外国启衅，华精也已枯竭，难免有他变。至于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个办法。

康有为要求光绪帝颁发“罪己诏”、“明罚诏”和“求才诏”，这就是“下诏鼓天下之气”。他要求迁都长安，以二万万两赔款改充军费，暂不对日求和，这就是“迁都定天下之本”。他要求选将、练兵、购械，与日本决战，这就是“练兵强天下之势”。以上三项办法，他认为只是“权宜应敌之谋”，目的在于挽救当前的民族危亡。只有“变法成天下之治”才是立国自强之策，是

求国家独立富强的最根本办法。他向光绪帝指出：中国在数十国的觊觎下，是四千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非改变旧法不可。变旧法就是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富国之法是：国家发行钞票，允许私人资本修筑铁路、创办机器厂、设立舱船公司及开采矿产，各省设立铸银局自造银元，官办邮政。养民之法的具体措施是：采用新式农业生产方法，传播西方国家的农业科学，各城镇普遍设立农会，奖励著作发明，提倡保护商业，广设商会，倡导设立合股公司，抚恤社会贫穷等等。教民之法的具体措施是：普及文化，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大力讲求西学，改革科举制度，将淫祠改为孔庙，广设书藏（图书馆）及学塾，奖励创设报馆等等。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还建议光绪帝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他要求设立使才馆以培养外交人才，派遣官吏出洋学习或游历。他特别请求光绪帝下诏颁行海内，让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在府县内，约十万户举一人，不论已入仕还是未入仕，均可当选。被选出的人叫做"议郎"，不仅供皇帝咨询，而且中央及地方的一切重要政令和筹饷事宜，均由议郎开会讨论，多数通过后，立即由政府执行。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项建议实质已接近设立议院。

康有为向光绪帝指出，如以上种种建议能够付诸实现，不但可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可以使中国变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大请愿运动，它冲破了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本身就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公车上书"提出了当时资本者阶级的改良主义政治纲领，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的群众性爱国运动。社会阶层面虽然狭小了一些，但具有的进步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公车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收纳，未能转递给

光绪，但是，它却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对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久，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他觉得这个职位还不能施展远大抱负，故未就职。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六日（1895 年 5 月 29 日），康有为以进士名义独自递上一封长达一万三千余字的"上皇帝书"。此时，中日《马关条约》已被清政府批准，并与日本政府互换了约本。因此，康有为在这一次上书中，删去了"公车上书"中的"拒和"、"迁都"等项建议，而把变法的部分详加发挥，并从各方面说明中国必须赶快进行变法的道理。这封"上皇帝书"终于在五月十一日（6 月 3 日）由都察院转呈到光绪帝手中。光绪帝读完之后，对康有为极为嘉许。从此，康有为等改良主义者与光绪帝开始接触，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

（王琳）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二、四册之《戊戌政变记》、《戊戌政变纪事本末》、《清廷戊戌朝变记》、《清季外交史料》、《康南海自编年谱》。

《中国近代资料选编·公车上书》。

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

戊戌变法

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政变”止，共计一百零三天，历史上称作“百日维新”。这年是戊戌年，所以历史上又称这次运动为“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等，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

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倾向于变法维新的人与日俱增。光绪二十一年，“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五月初，他写了第三次上书，陈述了自强雪耻和富国强兵之策，作为“公车上书”的补充。这封上书终于在五月十一日，递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闰五月初，康有为又写成了第四次上书，反复鼓吹变法势在必行的道理。康有为的上书活动在北京官场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光绪皇帝接到第三次上书后，认为康有为的变法有利于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立即令人誊抄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也亲自拜访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从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并和帝党结合起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迅速高涨。

康有为等改良派为了扩大影响，推动变法，积极成立学会，创办报纸和兴办学堂，广泛地进行维新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他们的倡导下，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广东等地的学会林立，报刊盛行。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和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十月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帮助下，由帝党官僚、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推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研究时政的组织，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其中有帝党官僚，如翁同龢等人，也有一些地方督抚和将军。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等各捐五千元以充会费。道员袁世凯也捐五百元入会。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因其名声太臭，强学会拒绝接纳。强学会的成立也引起了在华欧美人士的注意，英美驻华公使和传教士李佳白等人也纷纷加入强学会，并发表议论和建议，力图以他们的意愿和利益去影响和左右强学会。

北京强学会正式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大主笔。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双日刊。它不仅选登"阁抄"，译录新闻，还载"格致有用之书"，探讨万国强弱之源，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

出于对维新运动的忌恨和恐慌，后党官僚荣禄、刚毅等人群起反对，大学士徐桐弹劾康有为"谋反"，遂使北京的风声紧张起来。康有为被迫于九月初离京到达上海以避不测。十月，康有为成立上海强学会。同年十二月，在上海出版《强学报》，宣传变法。在上海一带活动的名士如张謇、陈三立、章太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纷纷入会。东南地区的维新运动遂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李鸿章暗中指使其亲家、御史杨崇伊上

奏参劾强学会。慈禧太后更严责光绪帝下诏查封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张之洞则见风转舵，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之说，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被革职，驱逐回籍。

光绪二十二年，翁同龢经过一番努力，在北京强学会的旧址设立官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和文章。同年，汪康年、黄遵宪利用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为主编，七月开始发行。梁启超以通俗、流畅的文风和犀利的笔锋，陆续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在知识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时务报》创刊后，八个月之间就行销万余份。康有为后在保国会演说中说：“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渐渐讲求，自强学会首倡之，遂有官书局、时务报之继起，于是海内缤纷，争言新学，自此举始也。”

天津是维新派活跃的地区之一。光绪二十三年，严复和夏曾佑、王曾植等创办《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齐名的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严复（1852—1921年），字几道，号幼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光绪二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光绪五年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任职达二十年之久。甲午战败后，他痛心于国势日危，便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鼓吹变法图强。从光绪二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四年，他先后翻译了《天演论》等书。在《天演论》书中，不仅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着重宣传了他自己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并提出了中国应当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严复指出：中国如果再不急起变法图强，就必然被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就会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这种学说立刻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湖南是维新运动活跃的省区。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他们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提学使江标等人的积极赞

助下，开展维新宣传活动。甲午败绩，极大地激发了谭嗣同的爱国热忱，他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深感不满。光绪二十二年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并成为密友，积极宣传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邀请，从南京回长沙主持维新活动。同年三月，提学使江标和湖南改良派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后改为《湘学报》），作为宣传变法的阵地。九月，陈宝箴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分任教习。光绪二十四年春，谭嗣同、唐才常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南学会每周集会演讲一次，每次听讲者近千人。但也遭到了顽固势力的激烈反对。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军舰强占胶州湾。次年，清政府被迫订立条约，承认：一、德国租胶州湾为军港，先以九十九年为限。二、德国在山东建筑铁路两条，一条是胶济路，一条自胶澳经沂州至济南，未动工。三，铁路附近三十里开矿权。

沙俄借口德占胶州湾，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港。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清政府承认旅顺为俄军港，大连为俄商港，租期二十五年。中东铁路造支路一条，通旅顺、大连。

法国强租广州湾为军港，期限九十九年，并要求修筑越南至昆明铁路，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人充当。

英国强租威海卫为军港，限期二十五年。

美国攫取了粤汉铁路。

帝国主义的瓜分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就在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不久，康有为赶赴北京，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他说："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上，省括即发，海内惊慌，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他进而

指出：如果不当机立断，立刻变法以图自救，恐怕连皇帝及其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为救国图存，他提出了实行变法的三种办法：一、仿照俄国、日本确定变法、改革的大政方针，这是上策。二、挑选有才能的官吏制定变法的方案和步骤，次第实行，这是中策。下策是由皇帝命令各省督抚，在他们所在省区内实行变法。康有为声称："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致于亡尽。"

这份上书被工部尚书拒绝呈递，但其内容已在北京广为传抄，津、沪的报纸上也将其全文发表。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皇帝知道了这份上书的内容。这时，倾向维新的谏官高某上奏推荐康有为，希望光绪帝委以重任。光绪帝要召见康有为，但被恭亲王奕䜣所阻，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不召见。光绪帝只好指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接见康有为，代为问话。康有为向五大臣着力宣传仿效日本变法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他说：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并说明他已编写了《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和《日本明治变政考》，可以采鉴。

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八日，康有为写成奏折上给光绪，这就是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康有为在上书中多次强调必须变法的道理。他指出，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变法而强，都是由于守法而亡。如果中国仍笃守旧法不知变，前途不堪设想。他还比较具体地提出实行变法的三项措施：1. 大誓群臣，以定国是。2. 立对策所以征贤才。3. 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不久，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主张效法俄国，进行变法。略谓："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

第六、第七次上书，康有为力言日本明治维新、帝俄彼得变法，请求借鉴俄、日，颁行新政，并统筹全局，递呈译著。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在康有为等的积极活动中，政治改革空气日趋浓郁，终于促使了“诏定国是”的实现。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利用各省举人在京会试的机会，和御史李盛铎等人联络会试的举人组织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开第一次会议。康有为在会上讲演，痛陈国难当头，形势岌岌可危。康有为演说时，声气激昂，座中有人为之下泪者。大会通过保国会章程三十条，确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并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均设分会，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继保国会之后，各省旅京人士相继成立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等。保国会也因此遭到顽固派的恶毒攻击。御史文悌上章弹劾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说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为保国会撑腰，将文悌革职，但在顽固派接连打击恫吓下，一些会员动摇、退缩，纷纷声明退会。李盛铎也反过来上书弹劾保国会。保国会仅开三次会就土崩瓦解了。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光绪帝也知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尤其是各地人民反抗日烈，清政府经济危机日深，使光绪帝也感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不足以团结人心。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发了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名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各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

心妥筹，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群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此后，光绪帝又曾发过几次新政上谕，如二十二年五月二日，准李端棻奏，推广学校以励人才，命各省督抚酌拟办法。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准胡聘之奏，准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并向商人贷款酌定办理。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谕：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兢言自强之术，二年于兹矣。目下欲逃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命将练勇空旅以固海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命各封疆大臣悉心采访，实力保荐人才；饬实力裁汰绿营防勇，以备添练新军之用。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准贵州学政严修奏，拟先行特科，次行岁举，以开风气而广登进。一月二十六日，准胡燏棻奏，关于各省精练陆军一事，命督办军务王大臣妥议具奏。然而上谕虽曾颁发，官僚实尚依违，如裁兵节饷的上谕，就先后遭到魏光焘、张汝梅、王文韶、依克唐阿、刘树棠、恭澍等请稍宽时日裁兵节饷，无切实办法的奏复，仍旧敷衍搪塞，未予重视。光绪的无权受制，客观上也使他感到"诏定国是"的必要。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恭亲王奕䜣病死，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康有为乘机催促翁同龢提请光绪帝当机立断，实行变法。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等的奏章，召集军机全堂，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此后，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始于此日。

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对其陈述的变法原因、步骤和具体建议均表赞同。光绪帝准备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人的反对，只给了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职

位，准予专折奏事。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康有为抓着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总的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除旧方面：1. 经济：废漕运。裁撤厘金。2. 政治：废缠足陋习。裁冗官。3. 军事：停弓刀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4. 文教：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

布新方面：1. 经济：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改以漕款建筑铁路。统计全局，大筹巨款，行新政，筑全国铁路。2. 政治：拟定宪法，开制度局。尊孔圣为国教，以孔子纪年。御门誓众，力图维新。立宪法，开国会，禁止妇女缠足。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3. 军事：广设武备学堂，仿德、日制。改营勇为巡警，仿德、日兵制练兵。4. 文教：改试策论，俟学校尽开，废除科举；译日本书，派人留学；开学校，广设小学，县设中学，省设专门高等学大学。改《时务报》为官报；请定中国报律。

自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起，到八月初六日政变止，光绪皇帝下了不少新政上谕，接连发出数十道改革命令。总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按时间顺序)

除旧方面：1. 政治：命各部院衙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严禁地方胥吏扰民；谕饬詹事府等已裁衙门一切事宜，归并六部。2. 军事：命各省切实裁兵练军，力行保甲，整顿厘金。3. 文教：命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用五言八韵诗；公布科举章程，命此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取士。

布新方面：1. 经济：命各省整顿商务，在各省会筹办商务局，饬盛宣怀赶办芦汉铁路，并命承办各员迅速开办粤汉、沪宁各路；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兼采中西各法；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先就沿海沿江如

上海、汉口一带设厂兴工，并将如何设立商务，商会各端，迅速奏闻；命各省督抚认真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并优奖创制新法者；谕设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命沿江、沿海、沿边各地商贾辐辏之处，广开口岸，以图商务流通；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命各省劝办农业；命端方认真筹办农工商总局；命于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诏编预算，命户部将每年出入款分门列表，按月刊报。2. 政治：命各省督抚酌保通达时务之使才；命遇有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毋庸拆阅，亦不得稽压；命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酌插各衙门裁缺人员；重谕各官民一律得应诏言事；诏许旗人经营商业。3. 军事：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限各省于六个月内将并骥练队及分扎处所妥议覆奏；通谕各处八旗、汉军、炮军、藤牌营等，改习洋操，新法练军；命各省力筹拨款，以添设海军；筹造兵轮。4. 文教：命总署议奏南北设立矿学学堂。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创设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命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籍；谕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民间祠庙之不在祠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改为学堂。命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命筹议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命各省迅办学堂；命各驻外使节劝导华侨创办学堂，兼译中西文章；准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准在京师筹设报馆。

光绪新政开始后，慈禧太后暗中指使顽固派进行反扑，并加紧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四月二十七日（即光绪帝发布变法诏令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迫令光绪帝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个上谕，免去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务，驱逐回籍，借以孤立光绪。第二个上谕，规定新授任二品以上的官员，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以堵塞光绪破格任用维新人士的渠道。第三个上谕，任慈禧

太后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以控制京津和华北地区的兵权。慈禧太后还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为了严密监视光绪的活动，慈禧太后在宫廷内布满了爪牙，出入宫门的人一律受检查。

光绪帝面对慈禧太后的进攻也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侍郎许应骙等六名尚书、侍郎全部革职，并奖励敢于上书言事的王照。二十日，光绪帝赏加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七月二十二日，光绪又下令将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顽固派更加惶骇，立山率领内务府官员数十人以及太监李莲英，跪在慈禧太后脚下失声痛哭，攻击光绪，并恳求皇太后临朝训政。新旧两派的斗争已达高潮。

顽固派策动政变的风声日益紧迫，光绪皇帝一筹莫展。康有为向光绪提三策：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部，收回军权，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帅；第二，改元为维新元年，断发易服，以表示变法的决心；第三，迁都上海，以摆脱后党的包围。此时的康有为意识到非有武力不足以解救危局。于是他想起了曾经加入过强学会，在小站练新军的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握有重兵，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康有为自以为得计，便专折向光绪作了推荐。

康有为的推荐恰好给袁世凯提供了施展阴谋诡计，借以飞黄腾达的绝好机会。八月一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再次召见，面谕袁世凯与荣禄各干各事，互不掣肘。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心向后党，自忖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便立即去拜谒军机大臣裕禄、刚毅、王文韶，旨在谋求后党宽谅。

其实，当袁世凯进京陛见时，后党立即采取紧急防范措施，调聂士成军五千人到天津陈家沟一带布防，切断北京与小站之间

的通道，以防不测。

光绪帝预感大难临头，于七月二十九日叫杨锐带出一道给康有为的密诏，密诏说："今联几位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杨锐读后惊慌失措，竟将密诏扣压四天后才交给林旭。光绪帝等了几天不见康有为复命，心急如焚。八月二日，光绪帝再次给康有为一道密诏，交林旭带出，密诏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八月三日，林旭把两道密诏一齐交给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南海会馆共商对策。他们读了密诏抱头痛哭，但谁也想不出办法以挽救危局。最后还是决定由谭嗣同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

谭嗣同深夜往访，袁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想提前请训回津，听到谭嗣同突来夜访，立即停笔出迎。谭嗣同说："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又说：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应率死士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知道他必不空回，便诳说：你以为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并说：诛荣禄如杀一条狗，若天津阅兵时，上驰人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袁世凯骗走谭嗣同后，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感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改良派也是书生空谈；慈禧太后却是柄政多年，根深蒂固。投靠光绪，自身不保；投靠慈禧，高位易得。就在八月五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改良派。当晚，荣禄人京向慈禧告变，次日，慈禧重新临朝，把光绪皇帝幽

于瀛台。从此，这位积极施行新政以发愤为雄，委用维新青年以革除冗官弊政，行西法以求振作大清帝国的年青皇帝，就这样被慈禧太后赶下台，在极端痛苦中默默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慈禧太后立即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即日起由皇太后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

康有为在英国公使馆的帮助下，八月十五日于天津乘船逃至香港避难。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帮助下，由天津乘日舰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并坚决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不惧，面对屠党的屠刀吟出“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慷慨悲壮的诗句。顽固派把支持变法的张荫桓等帝党官僚遣戍新疆，将陈宝箴、江标等人革职，永不叙用。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全部新政被废弃。接着，一切旧制也随之复辟，变法运动宣告彻底失败。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至八月初六日西太后囚禁光绪于瀛台，共行新政一百零三天，宣告终结。百日维新失败了。

（宋美云）

参考资料：

《戊戌变法史》、《简明中国近代史》。

曹州教案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七日，在鲁西南巨野县的磨盘张庄，发生了一起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的事件，德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悍然霸占了胶州湾，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巨野教案”。因巨野县时属曹州府管辖，故也称“曹州教案”。

光绪十一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进入巨野县磨盘张庄传教，教民张守銮将外出之平民赵心贵地基一块偷卖与教民赵黑燕名下，修造房屋，以充教堂。赵心贵自外回归后，向官府提出呈控，当地绅民也给赵心贵支持。此事引起中外交涉。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清政府指使地方官将地基判给张守銮，并听其租与洋人建盖教堂。此后，这里盖起了曹州府的第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堂口（教堂）。“圣言会”很重视他们在曹州府设置的这一据点，经其苦心经营，使得这一教堂事实上成了很多堂口的滥觞地。二十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薛田资来到鲁南，在坡里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汉语后，即被派到磨盘张庄教堂传教，更加不择手段地在周围建立教堂，发展教徒。“圣言会”以帝国主义的保护权为护符，在发展过程中带有极强的侵略性。他们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更在巨野一带挟制官府，包揽词讼，为所欲为；其教民更是经常恃教无事生非，借故讹索，欺压平民。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怒。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是天主教的节日（诸圣瞻礼）。在

郓城县传教的“圣言会”教士韩理来到巨野磨盘张庄教堂，一则帮助住堂教士薛田资准备庆祝节日，一则请薛田资帮助解决一项困难。同日，汶上县“圣言会”教士能方济要去曹县，亦路过此地。三人久未见面，在教堂中一直聊到深夜。因缺少床位，薛田资即将自己的卧室让给年长的能方济，将韩理安排到能方济的隔壁，自己则到教堂守门人小屋里休息。当晚十一时，他们刚刚睡下，一伙人手持大刀、长矛潜入教堂院内，砸开教堂西边的窗户，冲入薛田资原住房屋，将韩、能二人杀死。躲在门房里的薛田资才侥幸未被发现。

对于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的具体原因及这次事件是否有组织的活动，历来说法不一。据山东按察使毓贤等人给巡抚李秉衡的先后禀文记载：参与杀教士的计有十一人，他们分属巨野嘉祥等县，平素游荡度日。先是嘉祥县民雷协身探知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遂起意行窃，勾邀巨野县民惠二哑巴等十人，于十月七日傍晚在巨野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然后于是夜二更时分各携刀棍，潜入教堂。教士警觉，由窗孔向外开枪，击伤二人，众皆潜逃。惠二哑巴因同伙被伤，气愤莫遏，与雷协身两人复砸开窗户进屋开门，放进张高妮等人。惠二哑巴用刀扎伤教士肚腹，雷协身亦用棍抵格，随即搜劫赃物，分携逃逸，亦有将赃物、刀棍抛弃路上者。教士能方济、韩理则因伤重旋各殒命。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薛田资在其著作中认为，“曹州教案”后，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两位神甫。他指控曹庄大刀会首领曹作胜及其伙伴是杀害德国传教士的“凶手”。

十月十三日，正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巨野教案事，要求清政府急速设法保护在山东德国人的性命财产，并暂且先望设法严惩滋事之人，为德国人伸冤。十四日，

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亦致电总理衙门说：报称山东杀毙教士二人，此信若确，德国公使必借词要索，应否预告外部赶紧查办，顺致措词，稍占先着。十五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才电告总理衙门：巨野发生杀教士事件，已批饬该县勒缉凶盗，务获究办，并悬赏通饬缉拿在案。十六日，清廷发布谕旨说：曹州杀毙洋人一案，前据德使及许景澄先后电报，今始据李秉衡电复，已属迟延。目前盗匪在逃，岂悬赏通缉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国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十七日，李秉衡派委臬司毓贤、兖沂道锡良驰往查办。十八日，清廷又发布上谕，指出：此案以速获凶盗为第一要义；巨野既有盗案，匪无一获，著先将该知县摘顶勒缉，毋任延迁。为迅速破案，减免责罚，巨野知县许廷瑞已在境内大肆搜捕。至十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许廷瑞会同防营，拿获惠朝现（即惠二哑巴）等四人，毓贤命其赶紧取赃，速拿逃犯。不久，许廷瑞又续获高夷青。二十二日，毓贤、锡良赶到巨野，又督同营县，续获四犯，起获真赃八件。官府先后共获民众约五十人，一部分很快被释放，一部分则被严刑拷打致死或死于传染病，剩余的九人中，七人被判罪——其中两名（惠二哑巴与雷协身）被杀，另外五名被判无期徒刑。

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保教、“惩凶”等措施，企图以此取得谅解，但德国仍借口巨野教案，悍然派兵舰侵占了觊觎已久的胶州湾。

胶州湾一带，历来就是军事要地。鸦片战争前后，各国兵船已不时侵入我国沿海，使胶州湾局势更加动荡。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亦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其后，两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监察御史朱一新先后疏奏清廷，建议经营胶州湾，但未被采纳。直到光绪十七年，清廷才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领兵四营

进扎胶州湾，并稍有建设。甲午战后，清廷虽有心经营，但已力不能及了。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统一之前，普鲁士——北德同盟即已跃跃欲试地向东方扩张势力，图谋在中国获得一个根据地。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七次旅行中国，就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同治八年（1869）他第三次来华旅行，通过考查认为：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同治九年，北德同盟首相俾斯麦亦曾给驻华公使李福斯下达了关于获得一个海军根据地的命令。甲午战争期间，德国企图攫取中国领土的政策更为公开化。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驻华德使绅珂建议德国政府，假使中日冲突，引起各国要在中国取得领土，德国亦可利用机会为它的重要商业利益取得一个基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德国由绅珂首次向总理衙门提出割让一个军港的要求；此后两三年间，德国又屡次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清政府提出同样要求，先后遭到婉言拒绝。于是，德国积极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深信：一、二年后，教案问题可以给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借口。

德国认为，胶州湾最宜于建筑海军基地。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详细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认为胶州湾有种种优点：安全的停泊处，易设防，省费用，附近有煤矿地层，气候凉爽。十月间，曾任天津领事的德璀琳与海军司令克诺尔谈话中亦指出：胶州湾港口优越，足以控制山东以至整个华北的进出口货物；有利于船坞与码头的设置；腹 地资源丰富并有消纳力量，煤、铁等矿产足资开采；易于筑路，胶州堪为一条抵京铁路的良好终点；体制与智力方面，当地居民是中国最优秀的；气候完全适宜欧洲人居住；港内易于挖泥，无须顾虑新泥沙的淤积。蒂尔皮茨的报告和德璀琳的建议，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十月二十五日，德

国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占领胶州湾。十一月十一日，占领计划亦送到德皇手中。其间，驻华德使海靖又奉命向清政府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仍被拒绝。德国便加紧了侵略活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德皇已决定占领胶州湾，一俟时期到来，计划可立即执行。为保证计划的实施，德国又派海军部著名海河专家、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来华详细调查，于胶澳之形势、面积、气候、潮流、水土性质、人民风俗、工商渔牧、农林、路矿、经济状况以及日后开商埠、通铁路、筑码头、设船坞各项计划甚详。他们认为，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在军事上与经济上乃是最适宜的地点。

鉴于二十一年俄国太平洋舰队已取得在胶州湾的停泊权，德国便积极设法取得俄国的谅解与支持。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海靖赴京就任驻华德使后，首先拜访驻华俄使喀西尼，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德国的利益没有一点与俄国的利益相冲突，同时透露了德国欲占胶州湾的意图。德皇还亲自出马，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就胶州湾问题访问了沙皇。沙皇则透露了俄国欲在北中国另觅海港之意，表示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的要求，俄国就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

“巨野教案”发生后，正停留在柏林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向德国政府建议说，我们现在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个方面是一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利用谒见德皇的机会进一步鼓动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刚刚得到“巨野教案”消息的德皇即下谕说：我刚才在报纸上读到山东省内我保护的德国天主教徒突遭袭击的消息，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力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

须立刻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我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当日，德皇亦电谕蒂尔皮茨立即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占领那边适宜的地点与村镇，并用合适的方法勒取完全赎罪。次日，德皇又谕外交大臣布洛夫说：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兖（曹）州府德国教会突然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好久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他甚至声称：这一行动使上千的德国教民将扬眉吐气；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成千成万的华人将发抖，而全德人民将欢迎他们的政府已做了一个英雄的勾当。为进一步协调同沙俄的关系，十月十二日，德皇还电询俄国的态度。次日，沙皇回电说：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海港仅在（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间暂时地属于我们。于是，德国行动起来更加有恃无恐了。

蒂尔皮茨经过悉心准备后，于十月十六日率舰队离开上海开往胶州；十月十九日上午到达胶州湾。清军守将章高元派员询问，蒂尔皮茨谎称是来此游历。二十日早，德军陆战队七百二十余人以操练为名登陆，立即分据要隘。然后送来照会，限清军于下午三时以前全行退出，以四十八小时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办理。终于迫使章高元于当日下午退至四方村。德军占领营房、仓库，并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次日，二百余名德军又至四方，威逼清军再退。二十二日，清廷电谕中即表示：德国图占海口，蓄谋日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二十三日的电谕亦说：敌情虽迫，总不可轻启兵端，著该督（王文韶）电饬章高元等，于现扎处所，稳慎防守，不准妄动。并进一步指出，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全局。章高元只得约束

队伍，不发一枪，并于二十二日再度退至沧口。二十五日，德军又派军队威逼清军再退。章高元不允，竟被押去囚禁半月之久。在德国压力下，十一月七日，清政府令章高元率部移扎烟台。次日清军拔营时，德军突然来犯，清军被迫仓皇逃离。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完全撤离胶州湾。

在对胶州湾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又使用外交手段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十月二十六日，德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向清政府提出六项要求，请中国迅速照办，其内容是：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二、安治泰正在济宁修造教堂，中国应许赔银盖造，并赐立匾额，须有保护教堂教士之意。三、在山东德国教士被戕劫之案，所有盗犯应拿获惩办，如有绅士官员等在此案内，应格外加重办理；教士所受之亏，应全行赔偿。四、中国应许特保嗣后永无此等事件。五、山东省如修造铁路，中国先准德国商人承办；如有铁路就近开矿之事，亦应先准德国商人承办。六、德国国家办结此案所费之银，中国国家赔偿。清政府乃派奕䜣、翁同龢、张荫桓等与海靖进行谈判。奕䜣等指出：事情需要和平商办，岂有未经商量，遽行用兵胁制之理！总须先行退兵方可商议。海靖表示：先退兵，而后开议，恐怕办不了。其后，海靖又照知总理衙门说：已奉饬告知中国，本国兵船及兵丁驻守胶澳，直抵再为可商之期。会商过程中，德国又提出若干无理要求，其目的就是尽量提高条件，务须中国无法履行，为其继续占领胶州湾制造借口。而清政府急于将教案了结，以促使德国撤兵，所以尽管德国的要求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借端讹索，但清政府还是基本接受了。

十一月十四日，双方当面商定一个结案条款，拟由总理衙门以照会形式送交德方，再由德方照复。条款内容为：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一条，删去“永不叙用”，改为不可任大官之意，奏请准行。二、中国允给正在建造中的济宁教

堂工料银六万六千两，匾额用“敕建天主堂”五字，并将结案奏牍立碑教堂门外，以为保护之证。三、中国允于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各建教堂一所，一切工料照济宁教堂办法，每处给银六万六千两，地基官为指拨，地约十亩。在巨野、菏泽、曹县、单县、城武、郓城、鱼台七县境内，各建教士住房一所，共给银二万四千两。教士所失之款，另给银三千两。四、由中国皇帝明发谕旨，饬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教堂教士。五、山东省铺设铁路，中国先准德国商人承办，铁路附近开矿，先准德国商人承办，或华商、德商合办。六、赔偿问题，应俟胶澳兵退后另案商办。清政府尽管做出如此屈辱的姿态，但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再次晤商时，海靖又节外生枝，提出：接本国电，胶澳不能退，即饮兵入船亦难办到。翁同龢等人只好同意，将胶澳作为通商码头，多予德租界为泊船屯煤之用，以报归辽之谊。

根据约定十二月五日双方正式互换照会，做为先结教案之据。但当清政府准备互换照会时，海靖却送来“租地照会”五条，并根据济宁教堂捏造的情况，于四日至六日连续三次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曹州府滋扰甚为危险，曹州镇总兵万本华将教民驱逐，明言洋人二名业已被杀，仍欲杀害洋人。要求清政府立将万本华革职。海靖还威胁说：如至六日晚九时，不将饬令该总兵革职之电报抄录与本大臣查阅，本大臣申请本国外部与中国绝交。清廷在海靖恫吓下，惟恐已议教案六条复翻，即于六日电饬山东巡抚张汝梅：巨野教案正在将了，岂容再起波澜，著张汝梅一面查明确情，一面实力保护，出示晓谕兵民，如有滋闹者，即照土匪办理。

其实，海靖完全是有意利用这些捏造的情况借题发挥，达到其逼迫清政府就范的目的。在此期间，德国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占领胶州湾的支持或谅解，遂加紧逼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海靖要

求将胶州湾南北两岸直至阴岛地方全部租与德国。开始，翁同龢等人不同意，提出过折衷妥协的办法。海靖不允，声称：奉到外交部训条，断不能改。翁同龢等要求先将教案议结；海靖则坚持，胶澳界定，始肯互换。十二日，海靖进一步威胁说：此时不过暂行租用，是仍顾两国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还称：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在海靖威逼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

在中德胶澳租界谈判基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双方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互换议结巨野教案的照会。是日，清廷还明发上谕，宣布将开缺四川总督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兖沂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等交部议处；巨野知县许廷瑞革职，寿张知县庄洪烈查参，济宁、菏泽、单县、城武等州县官分别撤调；并著地方官严行禁戢（反教行为）实力保护教会。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清廷又发布上谕：李秉衡著降二级调用；调任道员锡良，撤任总兵万本华，知府邵承照均著革职留任；并仍著山东巡抚张汝梅实力保护教会。

二月十四日，《胶澳租界条约》正式签字，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清政府将胶州湾租给德国，租期九十九年，租期内胶州湾由德国管辖。二、清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及由此处经莱芜至济南。铁路沿线两旁各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商有权开采。三、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人、外资和外国器材时，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

通过此项条约，山东遂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巨野教案”后，天主教会由于有本国军事势力作后盾和清政府地方官吏的悉心庇护，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敲诈更为残酷，为所欲为，飞扬跋扈。例如，磨盘张庄，常有教民指某某为大刀会的会员，某某参加过杀教士事件，唆使清廷官吏捕杀。有的教民还公开抢劫大刀会员家属的财产，强迫他们为教会做苦工。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反洋教的怒火又燃烧起来。

“巨野教案”发生之后，大刀会在巨野的活动，有过一个暂时低潮的阶段，但为时极短。自光绪二十四年以来，出现了不少小规模的反洋教活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巨野的大刀会立即响应，随即在该年六月初十，爆发了千余人攻打磨盘张庄教堂的事件。

（宋美云）

参考资料：

《晚清教案纪实》、《中国教案史》、《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

义和团运动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中华民族陷于被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兴起，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也日益高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挽救民族危机斗争的继续，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山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饱受战祸之苦。战后，德国强占了胶州湾，英国占据了威海卫，整个山东又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严重破坏了北方的社会经济秩序。德国在山东修筑了胶济铁路，并开发沿线的矿藏资源，致使铁路沿线的田地房屋均遭破坏，矿藏资源被劫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和航运的掠夺与控制，一方面使大批赖运河为生的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陆路运输的挑夫、车夫失业；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洋货倾销，加快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在失业、破产的威胁下，许多运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铤而走险，纷纷加入义和团。第二，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人民的搜刮有增无减。由于政治腐败，百业凋敝，水利失修尤为严重。清政府虽曾几次拨款修治，但治河官吏贪污中饱，修治草率不堪，黄河连年溃决，山东水患日趋严重，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黄河在山东境内大决口二十余次，受灾地区多达五

十多个州县，淹死民众十六万余人，房屋损毁无数。山东境内不仅频遭水灾，而且旱灾又相间而出，水旱灾害使广大农民陷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境地，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第三，帝国主义教会势力在山东的侵略活动十分猖獗。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在山东全省达一千余所，传教士和教徒有八万多人。教会势力在进行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控制和操纵官府，使之护教抑民。一些外国传教士还收罗一批为非作歹、乡里不齿之徒，横行霸道，欺凌百姓，导致广大群众同外国教会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民众不断掀起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长期以来郁积在人民群众中的对帝国主义的仇视与反抗，便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北方民间的反清秘密结社。义和拳具有多源而同流的特点，分别源自大刀会、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梅花拳等民间教派和结社。但多数还是从民间习拳练武、强身保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汇集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洪流。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在当地义和拳势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奏请朝廷“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①]。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上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在清廷的公文中也开始称之为“义和团”。因此“义和拳”才有了“义和团”之称。

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是贫苦农民、水陆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义和团的基层组织以“坛”为单位，称为“坛场”、“坛口”或“拳场”。各坛的首领被称为“师父”、“师兄”等。发展组织称为“铺坛”，具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由于斗争目标的一致，各坛能以揭帖的形式，彼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页。

此呼应，互相支援。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 年 10 月），山东冠县义和团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冠县城北的梨园屯与直隶威县交界，光绪十二年德国传教士来此传教，强行拆毁村北玉皇庙，改建教堂。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挺身而出，率众反抗外国传教士和教民的压迫，斗争相持长达九年。光绪二十一年，冠县官府派兵弹压村民，群众更加愤恨不平。阎书勤、高元祥等人请求威县梅花拳首领赵三多支援。他们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反抗官府和教会势力的欺压。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赵三多在山东冠县蒋家庄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攻打教堂，并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了数次激烈的搏斗。此后，赵三多、阎书勤将起义队伍分成两支，赵三多率领一支在直隶中部和南部进行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阎书勤率另一支继续在冠县一带打击外国教会势力。与此同时，鲁西北的茌平、高唐、禹城、长清等州县的义和团，也在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平原县遭灾荒，教民恃教会之势，乘机囤积居奇，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仗势欺压百姓，义和团民与教会势力发生冲突，县令蒋楷护教压民，将团民数人逮捕下狱。朱红灯应平原百姓之邀，率众捣毁了平原县的外国教堂，此后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

面对蓬勃兴起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山东巡抚毓贤深感教会势力猖獗，同时又不安于义和团力量的增长。因此，他在处理平原事件时，一方面建议把蒋楷革职，另一方面又诱捕杀害了朱红灯与心诚和尚。但鲁西北的义和团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不仅团民的数量有增无减，而且斗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种形势使各国公使惊恐不安，他们要求清政府撤换镇压义和团不力的毓贤。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毓贤，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同年十一月，袁世凯率武卫右军七千人

走马上任。他一到山东就立即发布了《禁止义和团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先后被屠杀的义和团首领有王立言、王玉振等数十人。袁世凯还与驻青岛的德国侵略者相勾结，对义和团进行兜剿和屠杀，成千上万的团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在东光县方圆十里内，每棵树上都挂着义和团民的人头。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使山东义和团受到严重的摧残，除部分仍留在山东转人秘密活动坚持斗争外，另一部分则进入直隶和京津一带，与当地团民汇合，展开斗争。

直隶省南部与山东毗邻，在山东义和团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他们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致使直隶各州县中"教案"叠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四、五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几乎遍及直隶全省，并控制了直隶的省府保定。接着义和团由保定向北、向东发展，分别进军京、津地区，从而在京、津、保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间，涞水县义和团焚毁了当地的教堂，惩办了二十余名作恶多端的教士、教民。直隶总督裕禄急忙派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副将杨福同率兵前往镇压。义和团闻讯后便在石亭村设伏，杀得清军一败涂地，打死清军六、七十人，副将杨福同当场毙命。史称"涞水大捷"。此后，义和团又乘胜攻占涿州，在城头上树起"兴清灭洋"的大旗。为了粉碎清军的围剿，切断清廷的增援部队，义和团拆毁了琉璃河到长辛店的铁路百余里，焚烧和毁坏了沿线的车站、桥梁和电杆。义和团在涞水、涿州的胜利，打开了进军的通道，逼近北京和天津，使清政府受到极大震动。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手段。初期的查禁和剿杀不仅没有将义和团镇压下去，相反却使"拳会蔓延，诛不胜诛"，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面对义和团运动的

蓬勃兴起，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多次激烈的辩论和争吵。主要意见分歧有二，一种主张镇压，另一种主张招抚，两派意见尖锐对立。慈禧太后既慑于义和团的声势，深恐镇压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同时，又怕招抚会得罪帝国主义，只得采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于是便宣布对拳民教民要“一视同仁”，命令清军不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地进入北京和天津。

光绪二十六年二、三月间，北京已经出现义和团的活动，他们到处散发张贴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揭帖，动员群众奋起抗争。六月初，城内义和团团民多达十余万人，全城坛口林立，约有千余个。义和团焚烧了宣武门、前门一带的外国教堂，惩办了总理衙门中的一些卖国官员。外国侵略者龟缩于东郊民巷和西什库教堂，准备顽抗。义和团在北京的斗争，使清廷失去了对北京的控制。

天津是列强从事经济掠夺和宗教侵略的重点地区。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天津开始有义和团民公开练拳习武，义和团坛口已在城郊出现。四月，城乡坛口猛增，大街小巷遍布冶铁炉，昼夜打造武器。五月，天津附近州县的义和团大批进入城内。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等分别在静海、新城等地成立了义和团组织，并率队入津铺坛。船家女儿林黑儿自称黄莲圣母，在城北侯家后成立了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坛口。此后，天津城内外坛口发展到三百余个，团民约四万多人。

义和团运动在津京迅速发展，震惊中外，推动了全国的反帝爱国斗争。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自江浙，西至陕甘、云南，全国二十余个省份都发生了焚烧、拆毁外国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以义和团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高潮。

义和团虽然人数众多，影响很大，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组

织。他们一般是以八卦名目自立团号，分别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故有乾字团、坎字团等名称。其中以乾字团、坎字团人多势众，分布地域广大，成为义和团的主力。此外，各团坛没有统一固定的信仰，他们信奉的神灵大都是《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曲中的人物。如孙悟空、猪八戒、赵云、关羽、黄天霸、窦尔敦等都成为"附体"的神灵。宣传凡是加入了义和团的人，都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义和团各坛团的服饰也各有所异。如坎字团尚红，则红布包头，红腰带、红行缠。乾字团尚黄，便以黄布包头，扎黄腰带。

义和团在山东西北部、直隶南部兴起时，就提出了"助清灭洋"、"扶清灭洋"一类的口号。同一时期，四川、湖北、浙江等地的反教会斗争中，也出现了"顺清灭洋"、"保清灭洋"等口号。无论是"助清"、"扶清"还是"顺清"、"保清"，目的都是"灭洋"。

"扶清灭洋"的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提出来的，而是他们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实践中，自发地顺应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而采取的朴素的斗争手段和策略。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它吸引和动员了广大群众和爱国清军参加反帝斗争。同时，"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

义和团反帝运动的迅猛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各国在华的侵略势力。帝国主义除了继续胁迫清政府派兵镇压之外，开始准备出兵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英、法、美、德四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限令在二个月以内，把义和团剿除净尽，否则，各国联合出兵讨伐义和团。此后，英、美、法、意、俄等国军舰陆续开到大沽口，并声称派兵进驻北京，保护使馆。不久，各国侵略军四

百余人先后由天津乘火车到达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云集在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多达二十四艘。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有二千余人。同年五月十四日，英、美、法、日、德、意、俄、奥等八国拼凑了二万一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的率领下，向北京大举进犯。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闻讯后，立即拆毁津京铁路，沿途堵截，阻止侵略军向北推进。联军在落垡和廊坊数次遭到义和团的袭击与围攻，历时四天，方行路程之半。此后，西摩尔又企图从水路入京，但是同样遭到阻击，只好率残余军队撤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西摩尔进犯北京的计划。

当联军被围困在廊坊时，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勤又与各国海军头目密谋攻占大沽炮台。五月二十日，联合舰队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在次日凌晨两点钟交出炮台，遭到罗荣光的严辞拒绝。二十一日零点五十分，联合舰队向大沽炮台发动猛烈进攻，罗荣光率军英勇还击，这时先行登陆的侵略军从炮台后侧夹击，广大爱国官兵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激战六小时，击伤敌舰六艘，打死打伤侵略军一百三十余人。终因罗荣光孤军无援，敌众我寡，大沽炮台失守。联军登陆后，大规模进犯津京地区。

联军在大沽口外的聚集和一系列入侵行动，使驻扎在北京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气焰更加嚣张。早在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往车站迎接援军，在先农坛附近被杀。外国侵略者以此为借口，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修筑工事，分兵驻守，驱赶世居此地的中国居民。并且不断开枪射击义和团民、群众和巡街守城的清军。五月十八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率兵外出时，开枪射杀正在练武的团民二十余人。二十四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触犯众怒，被中国士兵击毙。与此同时，驻守在亚斯利堂的美军也公然枪杀义和团民多人。这一切激起了义和团更大规模的反抗。面对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和联军进逼津京

的紧迫形势，清廷必需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做出选择。慈禧太后从五月二十日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大臣们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戊戌变法后寡言政事的光绪皇帝和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此时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以一国与多国为敌，必然导致亡国之惨祸，主张全力镇压义和团。而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却认为，义和团已无法剿灭，一味镇压，将酿成大祸，不如抚而用之，以对抗列强。与会者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有的主抚，有的主剿，吵吵嚷嚷，没有结果。

不久，慈禧太后接到来自总理衙门的谎报，即英人勒令皇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这个消息使慈禧太后大为恼火，怒不可遏。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曾多次策划废掉光绪皇帝，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但屡遭列强的阻挠，慈禧太后甚为不满，接到谎报后，她对列强更加忌恨。五月二十四日，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继而慈禧太后又接到裕禄的奏报，联军已开始向津京进犯。于是慈禧太后紧急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各国宣战。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表示对外国侵略者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清廷的宣战只是故作姿态罢了。这道慷慨激昂的上谕并没有向任何国家政府送交，也未说明向哪国宣战。这是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进攻和义和团的压力之下被迫采取的办法。他们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洋人的侵略，以发泄对帝国主义的不满。宣战后不久，清政府便向反对宣战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袒露心迹，让他们体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义和团来势迅猛，遍布京城内外，剿灭义和团，则即刻祸起肘腋，只能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此后，清政府又要求各驻外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解释，这次对外国宣战，实出自迫不得已，要求各国政府谅解，并表示要相机设法惩办义和团。由此可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外宣战和招抚义和团是别有用心的，它要为乞和投降留条后路，不仅要借刀杀人，而且必要时就

以出卖义和团来换取列强的谅解，以保住统治地位。

宣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白银十万两，并“嘉奖”抗击列强的天津义和团，以示笼络；另一方面又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统辖义和团，制定团规，以便控制和利用义和团。许多义和团民对清政府丧失警惕，被其利用和欺骗。所以说，义和团在津京发展到高潮之时，也是他们受骗上当，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清政府宣战后，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督抚拒绝执行，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扣压宣战谕旨，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订立章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五月三十日，刘坤一、张之洞委托督办铁路事务的买办官僚盛宣怀与上海道台余联沅，同驻上海的各国领事会商订立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堂、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均表支持，有的还参加了“东南互保”的行列。所谓“东南互保”，实际上是以上海为侵略基地的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与东南各省督抚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保护列强在东南各省的侵略权益。

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义和团与爱国清军相互配合，在天津城郊英勇抗击侵略者。他们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天津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同联军展开了激战。

老龙头火车站是京津塘铁路的枢纽，也是天津租界与外界联系的战略要地，有一千七百余名俄军驻守在这里。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民数千人在首领曹福田的统率下，与部分清军合力攻打盘踞车站的沙俄侵略军，打死打伤俄军五百多人。义和团和清军曾多次攻进车站，在激烈的争夺战中，车站几经易手，最终未能攻下。

紫竹林租界位于海河西岸，天津城东南，是各国领事馆和洋行所在地，是侵略军的大本营。联军集结在这里达两万人左右。六月六日张德成率领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五千多名团民，攻打紫竹林租界。他们设伏诱敌，以火牛踏雷，数次攻入租界，歼敌多人。

此外，在武备学堂和东局子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武备学堂是清政府培训军官的学校，大沽失守后，该校几十名支持和加入义和团的学生开炮轰击租界，给联军造成很大威胁。五月二十一日下午，英、德军队猛攻学堂，学生们英勇反击，联军久攻不下，便放火焚烧房屋，导致弹药库爆炸，几十名学生全部壮烈牺牲。

武备学堂的硝烟尚未散尽，保卫东局子的战斗又开始了。东局子是清政府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当时在东局子也设立了义和团坛口，驻守该局的清军中有许多人参加了义和团。五月二十七日，英、俄军队六百余人进攻东局子，被守军和义和团击退。六月一日，联军再次出动二千八百余人围攻东局子，守军和义和团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激烈的战斗中，联军的炮弹落入该局的火药库，爆炸起火，侵略军乘势攻入，东局子失守。

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部分爱国的清兵和将领也同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六月十日，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两营从天津城南迂回到租界西南面。他一面命令架炮于城墙之上，向租界及跑马场一带轰击；一面挑选百名勇士，潜入跑马场用手雷击溃敌军。次日，聂士成率部沿马场道进攻，一直攻打到租界边缘的小营门一带。六月十三日，联军向天津城西南郊进攻，包抄义和团和清军。联军在占领纪家庄的同时，又分兵六千多人直扑小营门、马场道一带的聂士成军。聂军在不利的形势下退至城南八里台，联军马上又组织围攻，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一马当先迎击来犯的侵略者，他指挥武卫前军顽强战斗，奋力拼杀。在猛

烈的火炮中，聂士成身中七弹，腹破肠流，壮烈牺牲。

八里台之战后，联军占领了位于海光寺的机器西局。天津的战况十分危急，清政府派帮办北洋军务的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六月十七日，联军分两路大举进攻天津城。一路由俄、德军队组成，进攻东北角的水师营炮台；另一路由日、英、美、法、奥军组成，进攻南门。守卫南门的清军和团民发炮还击，毙伤侵略军八百余人。这是中国军民在抵抗联军侵略的战争中，歼敌最多的一战。六月十八日，日军用炸药轰塌城墙，清军与义和团在城内同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后，被迫撤出，天津城陷落。

在天津保卫战紧急之时，清廷于六月间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准备公开投降妥协，镇压义和团。指使天津的清军将领马玉昆等，在义和团民与联军作战时，命令清兵从背后射击团民，使义和团遭到前后夹击。清政府的卑劣行径，使义和团受到严重的损失。

天津失陷后，八国联军在城内烧杀抢掠，由于联军的残暴屠杀，致使“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无数天津民众死于联军的枪炮之下。联军还大肆抢劫财物，日军从长芦盐务署抢走白银二百多万两。俄军占领造币厂，抢走了几百吨存银。这群明火执杖的强盗不仅抢劫官署、钱庄、商店、工厂，而且还挨户搜掠银钱、钟表、文物古玩、金银珠宝、皮毛丝绸等财物。

联军侵占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由英、美、法、德、俄、日等国成立了“都统衙门”（即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对天津实行了二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在天津保卫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北京义和团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发起了进攻。从五月十九日起，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长达六十三天之久。战斗时断时续，毙伤了一些守堂的敌军，但始终未能攻占教堂。自五月二十四日起，义和团又开始进

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历时五十六天，也未能攻下。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只是怀着惩罚侵略者的朴素愿望，合力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并没有识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所要弄的阴谋，也不懂各国使馆应受驻在国保护的国际公法，给列强提供了扩大侵略的口实。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虽然对外宣战，但其敌视民众和媚外妥协的根本立场并未改变，时刻都在谋求对侵略者投降妥协。五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曾下令荣禄等人率清军和义和团民围攻使馆和教堂，而实际上清军只是虚张声势，明攻暗保。在围攻西什库教堂时，荣禄“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策”。与此同时，那些手持大刀长矛的数万义和团民却大量死于侵略者的枪口之下。尔后，慈禧太后又在驻京侵略者弹尽粮绝之时，多次派人给使馆和教堂送去大米、白面、蔬菜、水果。荣禄的武卫军居然半公开的把弹药送给侵略军，用以屠杀义和团民。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立即策划向北京进犯。七月十日，联军两万人由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攻。是时，清军在津京之间约有十万余人，但清廷正在加紧向侵略者求和，并无切实有效的抵抗部署。大部分清军一路望风溃逃，只有义和团和少部分爱国清兵在沿途不断阻击联军。七月十一日，侵略军进攻北仓，义和团奋力抵抗，毙伤敌军四百余人。在敌军不断增派援兵的形势下，北仓失守。十二日，联军进犯杨村，清军一战即溃，宋庆、马玉昆率军北逃通州。十三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向侵略者乞降。临时受命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的李秉衡无法统辖“勤王军”，军心涣散，调度不灵。十四日，在河西务与侵略军作战时，一触即溃，李秉衡无力挽回败局，退至张家湾服毒自杀。联军继而占领通州。十九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是日夜，俄军抢先进攻东便门，日军接着进攻朝阳门、东直门。义和团和一些清军奋力抵抗，毙伤联军三百余人。此时，由于广渠门

守备空虚，英军乘机攻入城内，接着俄军、日军也相继入城。这时城内的守军如荣禄的武卫军、载漪的神机营、虎神营，董福祥的甘军等已先后溃逃。二十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和皇族及王公大臣等从西华门仓惶出逃，经居庸关、大同、太原，逃奔西安。途中她一方面授予李鸿章“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的卖国全权，一方面发布上谕要对义和团“痛加铲除”。[①]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进行了更加残暴的屠杀和疯狂的洗劫。他们集中兵力包围各坛口，杀害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侵略者就枪杀和烧死了一千七百多名团民。他们见人即杀，许多地方“尸横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有的地区甚至“尸骨堆积如山”，很多家庭“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敛，蛆出户外”，惨不忍睹。联军统帅在京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他们疯狂而贪婪地洗劫了堆满金银翡翠、珍奇异宝的皇宫、颐和园、三海，抢劫各官衙的库款多达六千万两白银。此外，故宫、颐和园、翰林院所藏的大量珍贵的文物图书，也遭到抢劫和毁坏。明代的《永乐大典》被抢走三百余册，其它各种珍本图书被抢劫和损毁达四万六千余册。他们还抢走北京天文台的天球、四分仪、六分仪等古铜天文仪器。经过这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损失之大已无法统计。

八月，联军在统帅瓦德西的指挥下，进一步扩大侵略，相继占领了山海关、秦皇岛、保定、张家口，并向山西进犯。同一时期，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侵犯津京，镇压义和团之外，又单独出兵十余万，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于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黑龙江以北的中国居民有二十余万人惨遭屠杀。沙俄为实现其独霸中国东北的

①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癸未谕。

“黄色俄罗斯”计划，以武力迫使盛京将军增祺派出代表，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章程》签订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俄斗争，迫使清廷未敢承认这一条约，并将增祺革职。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利益的问题上，各怀鬼胎，彼此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此后，英、俄、美、法、德、日、意、奥八国，加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在“惩办凶手”和赔款数目等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吵。这时，美国第二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在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之后，又以“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为幌子，主张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权，作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中国的工具。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1900 年 12 月 24 日），十一国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迫使清政府无条件接受。慈禧太后见到李鸿章送来的《议和大纲》中没有把自己作为祸首加以惩办的条款，如获大赦，立即命令奕劻、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 9 月 7 日），十一国代表同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在北京正式签订了条约，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故称《辛丑条约》。这个条约共十二款，另有十九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余万两白银。

（二）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允许各国驻兵以“保护使馆”。

（三）清政府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及北京到大沽沿途所有炮台。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允许各国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驻兵。

（四）清政府要惩办支持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清朝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五）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办理今后与各国交涉事宜。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又一个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通过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剥夺和勒索。此外，侵略者还重新确立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充当它们在华的代理人，使中国在实际上已成为各国侵略者共管之下的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中国的工具。中国已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之下归于失败，但是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

义和团运动使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对清政府反动卖国本质的认识，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朝鲜、印度、波斯、土耳其、菲律宾等国相继爆发了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起到了互相影响、互相支援的作用。

（杨生祥）

参考资料：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

《义和团》（史料丛刊）第一至第四册。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

胡绳主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陈振江主编：《简明中国近代史》。

龚书铎等主编：《中国近代史纲》。

罗惇曧撰：《庚子国变记》。

《西巡回銮始末记》佚名。

东南互保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以反帝爱国为旗帜，席卷大半个中国，使盘踞在南方的外国侵略者十分恐慌。他们担心由义和团燃起的反帝烈火的蔓延会影响各自在华的特权和利益，于是便想方设法地与清朝政府，特别是地方官员相勾结，煽动地方保护主义，以达到阻挠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

英国在华投资最多，贸易量最大，拥有绝对的政治优势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所以，在华的英国侵略者们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前景更是忧虑不安。可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和总税务司赫德这时恰巧都被围困在北京，与南方的联系受阻，不便继续策划、指挥侵华行动，于是，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在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等英国同胞的支持下，主动承担起维护英国在华侵略权益的责任。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1900 年 6 月 14 日）霍必澜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中国北方的消息越来越坏，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造成对英国的巨大损失，因此，英国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他表示完全相信，如果这些总督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还提出一项建议：给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海军支持。

英国政府正密切注视着中国的严重情势，十九日，索尔兹伯理立即回电，同意霍必澜的建议，并与海军部联系，派军舰前往南方，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二十日，英国海军部命令

上海的海军将领，派“仙女”号开往南京；派“红雀”号开往汉口；“无畏”号由香港前往吴淞。英国政府方面还授意霍必澜与中国地方官员联合应付困难局势，实行“互保”，促成长江流域中立化，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不受冲击。

那么，清朝地方实力派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态度又如何呢？地处要津、实力雄厚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一贯主张剿灭义和团，以维护地方安定。当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地区高涨时，张之洞就电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义和团断非良民，法所当诛。刘坤一也主张一意痛剿。在西摩尔率领联军北犯后，刘坤一、张之洞鉴于形势日益恶化，遂会衔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速剿义和团，以杜外人口实，警告说如果听任义和团发展下去，必然引起列强的武装干涉，导致清政府的倾覆。由于这一主张未被西太后采纳，刘坤一心情格外沉重，因为他的辖区内有外国侵略者盘踞的上海。就在惶惶不可终日之际，英国准备派海军支持他维持秩序的保证，使他精神为之一振。二十日，他对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说：欢迎英国海军的保护，盼望英国军舰早日到来，唯一的条件是英国不占领江阴炮台，以免导致民众骚乱。他向金陵关税务司韩森表示：迫切需要英国的支持，愿尽力维持长江一带的和平，只要英国方面提供帮助，他什么都肯做，不管西太后的意图是什么，他准备照自己的方针行事。

张之洞告诉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感谢英国愿意提供支援，但他不打算接受英国海军的保护，因为英国军舰如果开进长江，其他列强也会纷纷效尤，局面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负责。但是，他也表示，决心与刘坤一维持秩序，保护洋人，相信暂时不至于发生什么重大事故。如果需要，保证立即与英国商量。

二十二日，刘坤一、张之洞电商之后，联合致电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请转告英国政府，他们有足够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

和平，不需要英国军舰的帮助，如果英国海军进入长江，既怕百姓惊扰生事，又恐各国援例效尤，反而不利。英国政府电令上海英国海军高级将领避免军事示威，英国军舰暂不入长江。

二十四日，刘坤一、张之洞联合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湖北巡抚于荫霖、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松寿、湖南巡抚俞廉三等人会衔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荣禄，要求速剿义和团；饬令驻各国使臣分别向各国道歉；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以便各国众怒稍平，徐商挽救。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公开对抗西太后招抚义和团的政策，急于寻求得到列强的支持，但是霍必澜仍然感到非常失望，他以为只要刘坤一表示同意后，英国军舰就能够顺利地开进长江，轻而易举地实现独占长江流域的野心。现在张之洞却要反对任何军舰开进长江，使自己的计划落空，霍必澜决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放出欧洲国家即将攻占吴淞的谣言，想利用刘坤一依赖英国的心理，迫使刘坤一接受中英共守吴淞炮台的建议。刘坤一遂答应假使英国能阻止其他列强的军舰开进长江便接受这一建议，并且还授权上海道余联沅与霍必澜具体商谈合作办法。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以后，引起美国人、法国人的不满，使霍必澜的计划再度受挫。

当时正在上海的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也发现英国人虽口口声声地讲保护，实际上是要出兵加强其在长江的力量，加强对长江的控制。因此，他在二十四日这一天致电刘坤一说，各国领事并没有占领吴淞的意图，英国领事要我国请英国实行保护，是种伪术，假若受愚弄，各国必然不服。因此，他建议：公应饬令上海道告知各国领事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自认保护，勿任干预。同日，刘坤一就复电盛宣怀深表同意，并且述说：在目前情况下，只有稳住各国，才能保全长江流域。就这样，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进一步向英国领事表白，他们有能力镇压人民的反抗斗

争，切实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权和利益，也愿与英国谋求妥协。英国为确保在华侵略权益，也非常需要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清朝地方实力派的谅解和承诺。于是，由盛宣怀在帝国主义和东南督抚之间引线穿针，正式开始了所谓的“东南互保”的密谋活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在华侵略利益也纷纷插手进来。

二十五日，清朝政府向各国驻华使馆下达宣战书。盛宣怀恐怕东南互保因此而夭折，遂飞饬各电局，密呈各督抚切勿声张。二十七日，盛宣怀得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的支持后，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全局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逆料萧墙之内，必有变局。他要刘坤一、张之洞在未接到宣战谕旨以前，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互保章程，以稳定各国。即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

二十八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各国驻上海领事意在维持和平，保全大局，并无别情，惟恐双方消息不灵，互抱疑念，激成事变，所以请求急派官员到上海来，与各国领事会议。二十九日，刘坤一、张之洞复电各国驻上海领事，接受他们的请求，指定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邀请盛宣怀以帮办名义，协助订约。张之洞还派道员陶森甲为湖北方面的代表，赴上海参加谈判。李鸿章也复电表示支持，并且态度明确地表白道：二十五日（宣战）诏断不奉，所谓矫诏也。

三十日，余联沅与盛宣怀出面邀请上海各国领事在公审公廨召开会议，将拟定的《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提出来讨论。《东南保护条款》也称《中外互保章程》，包括如下条款：

1. 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

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2. 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列条款。

3. 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4. 长江内地，中国兵力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5. 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自多派兵轮驶人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6. 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操练，彼此免致误犯。

7.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勿庸惊疑。

8. 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9. 凡租界内一切设法保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共十条，主要内容包括："租界内华人及其产业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流氓土棍聚众滋事无论华洋地界，均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严办；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租界巡捕应请添募，昼夜轮流梭巡，分班轮流巡查；查明租界四至出人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派巡捕，租界外边地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人租界以内。"等等。

在对约款的讨论中，各国领事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发生了争

执。由于他们坚持订立条约必须事先得到政府授权，因此没有能够在当天签字。第二天，美国领事古纳代表各领事致函余联沅，十分赞赏刘坤一、张之洞负责保护地方安全的行动，提出只要刘坤一、张之洞在其所辖省份内能够确实维护外国人与中国政府订立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各国政府将无意在长江流域单独或集体采取任何行动，或派任何部队进行登陆。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重申维护地方秩序，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承诺；古纳代表各国领事宣布不向长江进兵，不在上海登陆的保证。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东南互保"。很显然，最初由英国人发起的、由英国单独与刘坤一、张之洞商议的"互保"，扩大为各国列强共同参与的"互保"，这使英国人觉得十分恼火，可是又无可奈何，只好同其他列强共同参加"互保"。

当时国内形势是义和团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慈禧太后由于与列强的矛盾转而利用义和团，并且提出招团御侮，颁布对外宣战的谕旨。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惜违背"圣旨"。他们不但没有按照谕旨中要求的去与外国人宣战，反而严厉镇压当地民众斗争，与各国列强达成默契，竭力贯彻"互保"的精神。为了消除列强的顾虑，他们一再表示不管北方的形势如何发展，"互保"的原则是决不会改变的。

刘坤一、张之洞天真地以为《东南保护条款》很快便能完成签字手续，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该问题上又遇到了重重困难。六月七日，刘坤一、张之洞照会领事团，提出签约事宜，此后又不断催促，但都没有能够实现。英国外交大臣对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表示对于那些便于执行的规定，英国会照办的，但是《东南保护约款》不能作为约章，有关英国的权利，英国是不会放弃的。在签约问题上，与列强相比，清朝地方实力派显得过分热心。法国方面虽然也承认《东南保护约款》中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指出了法国愿意遵循的方向，但是为了不使法国受到约束，而不

准备授权他们的总领事在协议上签字。德国方面也宣布有些条款无法实行。很显然，各国列强只是希望通过“互保”维护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意遵守限制他们在长江流域活动的规定。六月十七日，领事团正式表示拒绝履行签字手续。

虽然《东南保护约款》紧锣密鼓地拼凑出来却没有完成签字的手续，但是刘坤一、张之洞还是把它视为已经正式签订的文件，继续地推行、贯彻，命令兵勇日夜巡逻，严防义和团入境，大量张贴东南互保告示，对捏造谣言，煽动人心及聚众扰及租界、教堂者，严密查拿，立行痛剿，从而严重地阻止和破坏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发展，使东南互保的局面维持下来。

东南互保的范围原来只限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管辖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5个省份。后来，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向盛宣怀表示请求将章程约款中长江及苏杭内地的杭字改为浙字，要求悉照江南办理，参加互保。六月十八日，闽浙总督许应骙与福州的俄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领事签订了《福建互保章程》，与刘坤一、张之洞的江鄂办法不谋而合，规定福建地方当局切实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侵害。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德寿宣布广东愿列入互保范围。山东巡抚袁世凯曾表示与刘坤一、张之洞采取相同立场，算是加入互保地区。四川总督奎俊与陕西巡抚端方也都表示支持东南互保，只是没有正式宣布加入。河南等省也都宣布赞同互保。这样实行互保的省份多达十几个，在中国的东南部地区联成一片，加重了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局面，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也限制和妨碍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扩大。

（范丽珠）

参考资料：

中国史学研究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

册。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

胡滨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

清末"新政"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在戊戌政变中镇压了维新派，剥夺了光绪皇帝的所有权力。然而在三年以后，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又公开打出了他们曾经竭力反对的"变法"的旗号，而要推行所谓的"新政"了。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流落在西安的清政府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慈禧太后在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① 同年三月，清政府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任命奕劻、李鸿章（李死后由袁世凯补任）、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等六人为督办政务处大臣。四月又增派瞿鸿机、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赞。当清政府"变法"的上谕发布后，洋务派官僚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纷纷上章献计献策。是时，刘、张会衔连上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影响最大。他们提出了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裁减冗员等一系列"新政"措施，成为清政府变法的蓝图。综计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一年（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的"新政"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1. 政治方面：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冗官冗衙，以便节省浮费。地方上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湖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4页。

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中央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同时还裁汰书吏差役，整饬吏治。

2. 经济方面：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设立商部，奕劻之子载振补授商部尚书，又聘请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张謇充任头等顾问。商部成立后，颁发了一些有关商务和奖励实业的章程，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部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等。清政府在这些规章中宣布了自由发展实业为合法，奖励资本家兴办企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清朝统治者在受到内外严重打击后，不得不对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一些让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一时期，清政府还设立了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清查地亩，兴修水利，发展畜牧，建立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等。

3. 军事方面：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在原有各营中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练新式枪炮。同时，停止武科考试，通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将才。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京师设立练兵处，作为练兵总汇之所，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任会办大臣，铁良帮同办理。次年，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等。确定新军以镇（师）为经常统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二协（旅），协设协统；每协辖二标（团），标设标统；每标辖三营，营设管带；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连），队设队官；每队三排，每排三棚（班），每棚兵目十四人。另有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一镇共一万二千人。全国计划编练陆军常备军三十六镇（至1911年清朝垮台时，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十六镇），限二到五年内练成。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各省督抚主管，设有将军都统的省份，由将军都统担任督办。光绪三十一

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巡警部，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办理警政。为了编练新军，清廷百般搜刮，筹集饷需，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4．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创设各种实业和师范学堂，奖励西学，派遣留学生出国。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成立了学部，颁布了各类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的学制。清政府陆续兴办的学堂达数万所。同年，经袁世凯、张之洞奏请，清政府明令废止科举，中国的科举制度至此结束。

"新政"的内容似乎是非常广泛的，但是，除了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措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外，其它的措施大多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而且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例如，清政府鼓吹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其主要目的是解决财政困难，而贪官污吏却趁机搜刮民财，中饱私囊。与此同时，列强以帮助清政府推行"新政"为名，到处钻营，插足于各个领域，而清政府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又广聘洋人充当顾问，遂使侵略者得以控制中国的财政、军事、政治等大权。例如，清政府的财政顾问是由美国人精琦担任，日本的坂本少佐充当直隶督练公所的军事顾问。他们不仅控制和操纵清朝的政局，而且对地方官吏的任免也要横加干涉。例如，光绪二十九年初，清政府任命俞廉三为山西巡抚，英、美、法三国公使及顾问都以俞廉三"顽固成性"为理由，迫使清政府改授他人担任此职。

清政府推行的所谓"新政"，基本上没有超出维新派的主张，更多的还是重复了洋务派的老调。从"新政"的本质上看，它并不是维新派主张的再现。维新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社会政治的实践。其目的是要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

制。而清政府的“新政”丝毫也未触动封建的统治体制，专制独裁制依然如旧。“新政”的推行也没有使中国富强，反而由于筹办“新政”增加苛捐杂税而加重了民众负担。

（杨生祥）

参考资料：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4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616页。
《张文襄公全集》第45卷第31页。
《东方杂志》第一、二年，第1、8号。
龚书铎等主编：《中国近代史纲》。

武昌起义

清宣统三年（1911 年）四月，清政府以实行铁路国有为借口，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各省人民的不满，从而酿成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在湖北地区，由于革命党人长期的组织工作，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宣统三年一月一日（1911 年 1 月 30 日），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宣告成立，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 。其宗旨为“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得到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故参加文学社的新军士兵越来越多。文学社在尽量争取普通士兵和学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的同时，努力促进与共进会的联合。湖北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吸取会党群众不受约束难以使革命成功的教训，也倡议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军。湖北共进会自从改向新军进行革命宣传后，参加共进会的新军士兵非常踊跃。这就使湖此革命运动由宣传发动阶段迅速进入到行动的阶段。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本来准备响应起义的共进会联合文学社，加紧在两湖地区活动。七月二十二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了联席会议，集中讨论两团体合并，一致行动，在武昌发难的计划。会议决定建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机构。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下设若干政

治筹备员负责文告、印信、符号及炸弹制造等，总部设在汉口租界（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这两个团体的联合，使武汉地区革命力量迅速扩展，到夏季，在总数约为一万七千名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第四十一标、第三十一标约占五分之一，第二十九标、第四十二标、工程营、炮标、马标及混成协炮、马两营和塘角的辎重、工程两队，都占十分之一以上，第三十二标和第三十标占十分之一。到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士兵三分之一以上都成为了革命党人。

八月三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合会议，确定起义总动员：中秋节起义，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进行了军事方面的各种部署，为武昌起义的举行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恰好在此时出现了南湖炮八标士兵暴动，打乱了整个起义部署。

八月二日晚，炮八标三营左队士兵汪锡九、梅清福等请假离营，同营参加革命团体的兵士赵楚屏、霍殿臣等为他们置酒饯行。值日排长刘步云前来干涉，引起人们的义愤。第二天，汪、梅、赵、霍受到军棍的处罚，激起了士兵的愤怒。他们当即捣毁了营房的玻璃、家俱，并从炮房中拉出了大炮。暴动士兵只有大炮，却没有炮门撞针，又没有取出弹药，无法战斗。无奈只好跑进城内革命机关同兴学社，向孙武、邓玉麟等人报告情况，要求立即下令起义。邓玉麟立即通知刘复基等人开会。会上根据刘复基的意见，决定仍坚持原来起义的计划，让为首的赵楚屏、霍殿臣等“逃亡”在外，其他人仍归营“听点”，一切过失都可推诿于赵、霍二人身上。南湖事件所幸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

武汉的局势十分紧张，清朝军警方面不断得到革命党人准备起事的消息，并经常派探子在革命党机关周围窥视。八月十八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内赶配炸药，这时候刘公的弟弟刘同手挟着香烟走进来，不巧香烟灰余烬引起了炸药爆

炸，顿时滚滚浓烟，发出一片爆炸声。孙武的面部被炸伤，当即被抬往法租界同仁医院。人们本打算把重要文件和名册带走，但是钥匙找不见，打不开锁；于是又往院里泼煤油，打算纵火灭迹。租界巡捕见一团团的浓烟升起来，很快赶来，他们不能不逃离。巡捕得到了革命党人制配好的旗帜、印信、文告、钞票及党人名册。刘同叔嫂以及其他数人被捕，刘同叔嫂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革命党人的机关地址和活动情况。清朝军警遂大批出动，在武汉三镇进行搜捕。

武汉的革命党人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宝善里事故发生的当天上午，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部商议发难日期，下午他们得到宝善里事故的消息，本来议定要等待黄兴来后再行兴义，此时，大家一致同意断然发难，"只有前干，或可死里求生"。参照八月三日议定的计划，蒋翊武草拟了一道命令，派人分送各标、营，命令于当夜十二时举义。

是夜，万籁俱寂，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小朝街机关部等待着起义的炮声。但是，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刘复基、彭楚藩等革命党领袖遭到逮捕并惨遭杀害。由于南湖炮队没有接到起义的命令，而寂然未动，其他各标、营、队的革命士兵也没有贸然发难。

虽然革命党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革命党人遭到捕杀，但是革命的行动却无法遏止。根据十八日机关部传下的起义命令，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暗中串联。十九日，拥有雄厚革命基础的工程营酝酿着率先起事的计划。共进会员、工程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在士兵中很有威信，与三十标、二十九标的党人取得联系，并进行了部署，与二十九标的蔡济民约定晚间点二道名时，由工程营鸣枪三发为号，立即起义。

当夜，天空阴沉。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护兵巡哨，见金兆龙、程正瀛等弹在膛上，持枪而待，便斥责道："你们想干什

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启胜十分气恼,大叫道:“你想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示弱,“反就反!你能怎么样?”陶启胜上前抓住金兆龙,命令护兵来抓金兆龙、金兆龙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喊道“再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立刻举枪,狠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正要逃走,程正瀛又开一枪,这“砰”的一声,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工程营的革命士兵听到划破夜空的枪声,立即响应,拿起枪枝,跑出营房。熊秉坤马上鸣笛集合。在密集的枪声中,反动军官纷纷逃匿,革命士兵控制了全营。熊秉坤带领着部队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去夺取武器弹药。守卫军械库的李克果在听到工程营起义的枪声后,要士兵拼命抵抗。守库的工程八营左队革命党人罗炳顺、马荣乘机提出“没有子弹,怎么抵抗?”李克果命令打开军械库分发子弹。罗炳顺、马荣得到子弹后,立即向空中发一排枪,宣布起义。熊秉坤率部赶到后,两相汇合,军械库被革命党人所控制。

二十九标在听到工程营发难枪声后,蔡济民立即鸣枪响应,率领数十人驱逐了企图阻挠起义的反动军官,冲出了营门,沿途击毙了三十一标的一些旗兵,来到楚望台。测绘学堂的学兵中革命分子占大多数,在晚自习的时候,听到工程营的枪声,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在方兴、李翊东的组织下,向军械库进发,他们到达楚望台后,与先期到达的其他革命士兵一起汇合。

南湖炮八标早就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当晚,点二道名的号音刚落,城内响起了枪声,城北塘角方面火光冲天。徐万年、王鹤年、蔡汉卿等人毫不迟疑,将大炮拖出,发炮以示响应。随后便拖着十九尊炮向中和门进发。沿途他们击溃了三十二标中反动军官集结的两个队的伏击,与城内派来迎接的金兆龙等部、绕城而来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的革命士兵汇合,一起到达楚望台。

随后到达楚望台的还有其他部分的新军革命士兵，他们齐集在起义的大旗下，在楚望台商定进攻督署的方案。这时，反革命军队在城西南角，革命军在东南角。革命军不仅占据有利地形，控制制高点，而且还有充足的枪械，在对持的情况下有一定的优势。所以革命军决定迅速攻下督署，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只是领导发动起义的革命者大多数为一般的士兵，职位最高的也只不过是排长，缺乏组织、指挥攻坚夺垒、运筹帷幄的军事知识和统帅才能。这时，人们推举曾参加过日知会，具有较多军事知识的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统领主持攻夺督署。吴兆麟当众宣布了约章，命令熊秉坤、马荣、邝杰各领兵分三路进攻督署；程国贞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及后备待命。

接近午夜时分，进攻督署的战斗激烈地展开了。第一、二次进攻各路均不得手，第三次进攻开始后，在督署附近放火照明，火光冲天，炮弹很准确地射中督署的所在地和第八镇司令部马房等处。各路革命军突破防线，攻克司令部，逼近督署。湖广总督瑞澂见革命党人攻势甚猛、炮火连天，十分恐慌，于是仓皇逃走，乘“楚豫”号兵舰离开武昌。

在争夺督署的激战中，守敌用几挺机枪在死命顽抗，并有一队从望山门城上窜下反扑，迫使革命军第三路退守保安门。由熊秉坤等数十人组成的敢死队攻抵辕门，在勇士们不畏牺牲的进攻下，湖广总督衙门终于落到革命军的手中。

次日清晨，武昌城内的各官署、城门都为革命军占据，红地十八星旗高高地飘扬在黄鹤楼上空，武昌起义获得了胜利。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早在文学社、共进会酝酿联合时，关于都督的人选问题就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为了不妨碍双方的联合，有

关都督人选只好悬而未定。文学社、共进会正式联合后，都督的席位仍未确定，而是派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可在此时，黄兴、宋教仁都没有到鄂，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直接领导起义获得成功的指挥官却资历不足，无法担当统帅全鄂新政权的工作。

战斗刚刚结束，硝烟还没有散尽，蔡济民、高尚志、陈磊、李翊东、张振武等人就聚集到谘议局筹商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汤化龙等立宪派也被邀聚会。很显然，推选一个合适的人来担任都督、成立军政府是迫在眉睫的大事。立宪党人提出由黎元洪担任都督，刘赓藻直截了当地说："黎元洪就在城内，如果大家认为合适，就该马上去找他。"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汉口、汉阳还在清军手中，必须及时地扩大战果，巩固胜利，因而同意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以资号召的提议。

黎元洪此时正在黄土坡。就在攻克督署后不久，担任巡查的马荣、程正瀛截获了为黎元洪搬运行李的伙夫，从伙夫那里得知黎元洪藏匿在黄土坡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吴兆麟立刻命令马荣、程兆瀛带领一排人到黄土坡，果然黎元洪穿着便衣藏在谢国超家，马荣等人便将黎元洪拥至楚望台。黎元洪不同意出任都督，马荣十分恼火，拔出刀来威胁，逼他非革命不可。随后，黎元洪又被簇拥到谘议局，刚一进门，就有人大声喊："都督到了"。黎元洪这时没有再吭声。

下午，经过众人讨论，决定推举汤化龙为主席，汤化龙提出通电全国各省，号召响应武昌起义。吴兆麟在发言中表示公推黎元洪为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总长，共同主持大计，号召天下。黎元洪推辞不就，仍不肯在布告上签署自己的名字，李翊东端着长铳逼迫黎元洪，黎元洪瑟缩一团默不吭声，李翊东拿起笔写了一个"黎"字，在场众人齐声叫好。

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只是想利用黎元洪的空名来稳定

人心，并不需要黎元洪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任何事。他们又另行组织一个真正的政权机构——谋略处，以蔡济民为首，由邓玉麟、吴醒汉、张廷辅等15个人组成。谋略处议定以谘议局为军政府及都督府；改国名为中华民国；改纪元，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用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通电全国；在军政府下设立参谋、军务、政务和外交四个部。

月底，宋教仁从上海来到武昌，与革命派人士居正、孙武、刘公等制定约法，由宋教仁起草定妥，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之前，效力于宪法的根本大法。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以法律的形式描绘了民主制共和国的形象。

就在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隔江相望的汉阳革命党人很快响应。担任汉阳文学社联络的袁金声过江到武昌，得知武昌起义胜利，马上回到汉阳，转告大家武昌光复和所看到黎元洪署名的军政府布告等消息。二十一混成协的步队四十二标文学社的标代表胡玉珍便决定当晚十时发难。他派人到汉口与四十标二营赵承武联络，约定响应武昌起义，邀请因武昌小朝街机关部破坏后逃到汉阳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来指挥汉阳起义。

入夜后，胡玉珍鸣枪为号，前、左两队新军士兵听到枪声立即集合，先到子弹库夺取弹药。管带汪炳山见势不妙逃掉了。队官宋锡全在革命党人的劝导下同意起义，邱文斌率队占领龟山，拖出三尊大炮上阵，与龙灯堤来的起义队伍汇合在一起，击溃了龟山脚下的辎重营残部。

在汉口，革命军人也点燃了起义的烽火，赵承武首先在居仁门发难，随后与由汉阳来的革命士兵汇合，占领了汉口全城。武汉三镇相继光复，都竖起了十八星旗。

在武汉三镇起义成功的带动下，湖北各地纷纷响应。黄州、京山、汉川、宜昌、荆州等地先后脱离清朝统治，举起义旗，并

光复成功。革命党人联络鄂北秘密会党，会党与新军的结合使襄阳、郧阳先后反正，响应武昌起义。湖北各地的相继光复使清朝封建统治在湖北全省彻底瓦解，资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下来。武昌起义还受到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的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范丽珠）

参考资料：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8册。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

宣统逊位及溥仪出宫

武昌起义的成功，引起一些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惊恐，使它们本能地作出武装干涉的考虑。英、美、法、德、日等国，在短短的几天就调集十多艘军舰在武汉江面待命，并严密监视革命派的行动。但是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还不敢贸然武装干涉，而在所谓“中立”的幌子下积极寻求和扶植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它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控制北洋军事集团实权的袁世凯，早为帝国主义所赏识，成为它们的忠实走狗。英国政府曾电告它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已经发生了极好的感情和崇敬。因此，美国公使嘉乐恒在北京外交使团的会议上，第一个提出促请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主张，得到各国公使的一致赞成。

回籍“养疴”的袁世凯，表面罢官闲居，实则伺机再起。他在北京官场和北洋陆军中布满心腹，家中设有电报，消息极为灵通。特别是他的那位身居内阁协办大学士的心腹密友徐世昌及时供给情报，使他对政局了如指掌，他同北京的外国使馆一直保持着联系，依仗帝国主义做靠山。因此，帝国主义促请起用袁世凯，是人们意料中的事情。

清政府遵照主子的指令，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统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嫌职权太小，借口足疾未痊，不肯听命。清政府派往南方镇压武昌起义的北洋新军，又暗中接受袁世凯的操纵，只在信阳、孝感之间徘徊不前，不听陆军大臣荫昌

的指挥。此时，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省已先后独立，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举行兵谏，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清政府自忖无力应付危机，被迫于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解散皇族内阁，命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的要求已满足，便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革命军进攻。攻陷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九月下旬，袁世凯进京走马上任，完全控制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并命令北洋军炮击武昌，向革命军施加压力。黎元洪却惧怕北洋军的炮击，竟离武昌，造成武昌一片混乱。于是，袁世凯一面攀请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攻击汉阳。十月一日、二日，北洋军第十一协和第八协由蔡甸、驼罗口两处渡过汉水，经过激战，于十月七日攻陷汉阳。次日，袁世凯命冯国璋停止攻击。北洋军进攻汉阳损失惨重，第十一协官兵伤亡五百零七员。第八协前线目兵仅余一千零九十三名。所以，袁世凯不敢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转而急于施展“和平”手腕。

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害怕战火危及它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立即指示汉口英国领事戈飞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转达三项“议和”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帝退位；三、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软弱的革命党人终于同意实现武汉的局部停战。

当时，直接指挥北洋军的冯国璋，倾向于继续和革命军作战，而段祺瑞则主张和谈。袁世凯则利用二人的不同主张，以混淆视听，使清廷和革命党人都不疑其操纵。他在冯国璋攻陷汉阳的第二天，派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十月十九日，又调冯国璋入京，任禁卫军总统，让段祺瑞接统第一军和前敌各军。段祺瑞一反冯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多次向革命军表示，只要能举袁世凯为总统，则共和可望。十月底，他一边派第二军总参议靳云鹏北上，向北洋军各将领游说，使他们明了袁世凯的旨意；一边则密派廖宇春（保定陆军小学总

办）潜往上海，与黄兴所派代表顾忠深（江浙联军参谋长）秘密谈判，十一月一日达成协议五条：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唐绍仪于二十一日抵汉口，次日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谈判。二十七日，唐绍仪到上海。二十八日，即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同日，驻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六国总领事，向南北"议和"代表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声称：英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的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使中国自身，而且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并要求双方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成足以停止目前冲突的协议。

由于南方提出必须承认共和方能开议，袁世凯一时拿不出什么办法，和议中断几天。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妥协的方案：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与民主问题付之公决。袁世凯认为可行，十一月九日将此方案奏上。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与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此处，无可转圜，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

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袁世凯装出万分为难的样子，把难题推给太后和皇室解决，从而逃脱责任和避免嫌疑。次日，隆裕太后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多数同意，当即批准，要袁与南方协定施行。

伍廷芳也同意召开国民公议公决国体的意见，十一月十一日与唐拟定办法四条：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织，每一省为一处，内蒙古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二、每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不足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之日，到会人数达四分之三，即可开议；四、南方各省和山西、陕西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北方各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内外蒙古和西藏代表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唐将四条告袁，袁不予承认。十二日，伍、唐再议，伍提出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电袁请示，袁则力主在北京召开。唐陷于进退维谷之境，电请辞职。袁以其逾越职权，予以批准，告伍以后由他直接电商，根本否认了唐、伍达成的协议，和议顿时濒临破裂。

恰在此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破坏，于十一月八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民国元年（1912）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为压迫革命党屈从，在孙中山就职的那天，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余名高级将领联名电请内阁代奏，要求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并要求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宣称若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孙中山知袁心中不踏实，民国元年1月2日再次电袁，重申

前言，特别指出无诱敌之意，千万不要误会，极其诚恳。袁仍不相信。他又致电伍廷芳说："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并气势汹汹地质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立即取消？伍理直气壮地驳道："现在民军光复已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在国民会议未议决之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此系民国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还请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尚派委大小官员？设国会议决为共和立宪，清帝是否立即退位？盖国民议会所以能和平解决者，在其议决能使两方依从，既经两方全权代表签字作准，自应彼此遵行，无须再发疑问。"驳得袁理屈词穷。

孙中山见袁缺少和谈诚意，北洋军叫嚣不已，乃决定出师北伐。1 月 13 日，北伐军前锋柏文蔚部败北洋军于宿州，继之夺取战略要地徐州。在河南、安徽、湖北战场，北伐军也连连告捷。但是帝国主义却在此紧要关头出面干涉，向孙中山施加压力。他们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声称必须由袁统一南北；他们还出动军舰在长江示威，并乘机劫夺中国的海关税收，加剧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以及叛徒汪精卫等人也乘机攻击孙中山，遂使北伐无法进行。1 月 16 日孙中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次让步，答应如果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可正式宣布解职，由参议院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元月 14 日，双方商定，自 15 日起各战场继续停战十五天。同时，唐绍仪告知伍廷芳，清廷已在筹商退位问题，探询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伍电告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作了绝对肯定的回答。张謇、汪精卫、杨士琦等人唯恐袁错过机会，接二连三地促袁痛下决心，

当机立断。得到了明确保证，证实了孙中山不会欺骗，袁世凯的决心最后下定，立命袁克定、梁士诒致电唐绍仪转告伍廷芳：事在必行，义无返顾。惟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自此之后，和议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于是，袁世凯开始进行逼宫。

袁世凯逼宫开始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唆使驻俄公使陆征祥电请清廷让位。其后借口军饷无着，逼迫隆裕变卖盛京大内和热河行宫瓷器，交出内帑黄金八万两。不过这些仅是个开头，当总统有了保证以后，他方才正式加紧逼宫。

民国元年 1 月 16 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袁世凯朝见听政的隆裕太后，亲自出马逼宫了。他跪在太后面前，满面泪痕，还使劲地抽缩着鼻子，哽哽噎噎地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密奏太后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六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因此，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遭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太后闻奏，完全被吓昏了，忍不住地对着袁世凯伤心悲泣。隆裕急忙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他们都对袁世凯骤然剧变而感到震惊。数日前，袁世凯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对清室忠心耿耿，决不辜负孤儿寡妇，并多次表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如今却公然逼宫，要求清帝退位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宗室亲贵乱作一团。在隆裕急忙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等人主张皇帝退位，实行共和，遭亲贵们的痛斥，使他俩再不敢参加御前会议了。亲贵们主张孤注一掷，同袁世凯、革命党拼死一命，以求侥幸。良弼还组成了最顽固的宗社党以反对退位为己任。隆裕左右

为难，难以决断，只好伏案痛哭。隆裕一连开了几次御前会议，都没吵出个结果。

1月2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四日）孙中山提出议和的最后解决办法，共五条：一、清帝退位，由袁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二、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接到清帝退位通知后，孙中山即行解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当选后须暂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并声明：袁若不能实行，即无和平解决之诚意，此后战争再起，责任应由袁负。接到五条，袁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关键在于清帝退位，只要做到这一步，总统就可以到手了，他迫不及待地加紧了逼宫步骤。26日，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等五十名将领根据袁的授意也一反从前反对共和腔调，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强硬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隆裕闻报，吓得魂不附体，哭着求袁世凯务要保全他们母子二人性命。这时宗社党头目良弼，也被革命党炸死，气氛更趋紧张。宗室亲贵见大势已去，不约而同地来了个“鸟兽散”！有的逃亡青岛或旅顺，有的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袁世凯一方面指使两月前尚力主实行君主立宪的杨度等发起组织共和促进会，制造舆论，配合逼宫；一方面奏请朝廷速定国体，速作选择，早日退位。隆裕在其要挟之下，肝肠寸断，整日抱着宣统皇帝痛哭流涕，载沣向来缺乏主见，不敢参与决策，皇室贵族乱作一团。隆裕走投无路，经过反反复复考虑，觉得保留性命，享受优待条件，总比覆灭的结局强得多，万般无奈，终于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2月3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方协商清帝退位条件。

几经协商，南北双方在退位条件问题上达成协议。2月11日，隆裕最后认可，决定下退位诏。同时，袁世凯将未颁发之清帝退位诏旨电告南京临时政府。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六

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但内阁大臣袁世凯仍称病不入朝，只是委派外交大臣胡惟德等人率领内阁成员参加朝见仪式。面容凄惨的隆裕太后，眼含泪珠将事先准备好的《清帝退位诏书》交给胡惟德，让他布告全国，清帝正式宣告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多年之久的清王朝，从此寿终正寝了！

2月13日，袁世凯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在回电中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14日，南京参议院同意孙中山辞职。15日，召开了临时总统选举会，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英、美、法、德等国公使立即登门祝贺，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随后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0日，唐内阁宣告组成，实权全部控制在袁的党羽手里，革命党人只是陪衬而已。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成立仅仅百余天的南京临时政府就这样悲惨地被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所取代。

根据《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清帝辞位后，皇室贵族们暂居宫禁。虽然已进入了中华民国，但他们仍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这种生活一直到民国13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他们驱逐出紫禁城，才发生变化。

民国13年9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处于优势，10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合作之下，吴佩孚的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从河南又逃到岳州，二年后和孙传

芳联合，才又返回。吴军在山海关败绩的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起来，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将清废帝溥仪逐出故宫，并先提请黄郛摄政内阁予以讨论。黄郛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将优待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

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是：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此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11月5日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带军警二十名先将故宫外军警布置妥当，将电话线割断，然后入神武门。每通过一门，就分置军警监视其值岗卫兵，不许走动。鹿、张、李直趋溥仪住处。内务府大臣绍英出迎，鹿等出示修改后的优待条件，并告知来意，请其转达溥仪立即迁出宫外。绍英虽惊慌失措，但仍故示镇静，并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这样办呢？鹿说：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采取不利

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如果不是我劝阻他们稍等片刻，现在就出乱子了。绍英不得已告诉溥仪，但往返数次，仍希有所转圜。鹿见事不能决，乃故意大声告诉随从人员：再延长二十分钟，不然景山上要开炮了。溥仪闻之大惊，立即答应迁出宫外，交出印玺，收拾私物，在鹿、张、李的保护和监视下一同离开故宫。鹿亲自送溥仪到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邸。在溥仪离宫后，宫内的宫女和太监等均任其自由迁出。

溥仪出宫后，即由国务院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李煜瀛担任，委员十四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整理、保管，以防遗失或毁坏。故宫的警卫由鹿钟麟派兵担任，直至国民军撤离北京时，始交由内务部接管。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段祺瑞和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出宫之次日，段祺瑞致冯玉祥一电，极表不满，其电文大意是：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驻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复电谓：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11 月 24 日）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过了几天（11 月 29 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民国 14 年 2 月 24 日，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去天津的日租界居住。

（宋美云）

参考资料：

《袁世凯传》、《袁世凯评传》、《简明中国近代史》、《我的前半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边疆史地学的兴起

边疆史地学是清代兴起的学科，它是在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康熙至乾隆末年为第一阶段；嘉庆年间至光绪年间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为边疆史地学的初步兴起时期。

康熙统治初期，南方有三藩割据，东南海上有郑成功的子孙占据台湾，西北边疆有蒙古准噶尔上层分子制造民族分裂，北方蒙古势力也一度强大。因而，身为少数民族的清代皇帝，既要利用北方的蒙古族作为统治全国的帮手，又要同西北的蒙古族作斗争；既要使西南边远地区安定，又要防止外敌入侵边疆。这就促使清朝统治者提倡研究边疆历史、地理。

康熙皇帝以极大的努力，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又粉碎了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分裂活动，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康熙皇帝在平定噶尔丹之乱后，命大学士温达等撰写这次战争的过程，遂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一书的问世。该书在记述战争的同时，也涉及了大量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等情况，成为边疆史地学最早的著作之一。

乾隆年间，为彻底解决新疆地区蒙古人（即厄鲁特）的问题，清朝政府要巩固在新疆、西藏、青海以及内蒙古和外蒙古地区的统治，感到对这些地区了解不够，而有关这一地区的文献资料太少，于是乾隆皇帝下令翻译《蒙古源流》，撰修《蒙古王公

功绩传表》、《西域图志》等书。

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与学者对元史的研究也有一定关系。清代一些有成就的学者积极从事元史及辽金史的研究，硕果累累。钱大昕著有《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辽金元三史拾遗》；汪辉祖撰有《元史本证》五十卷、《元史证误》二十三卷；洪钧作有《元史译文补证》三十卷。清代学者对元史的研究促进了北方、西北史地学的形成，其成果也是边疆史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一阶段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品是乾隆末年的《卫藏通志》，作者不详。该书卷首为《御制诗文》，下面十六卷为：考证、疆域、山川、路程、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此书资料来源甚为广泛，凡涉及汉唐以来西藏事务的历史、地理文献、各种西藏旧志以及西藏保存的藏文档案文件、乾隆时对廓尔喀用兵及处理西藏善后事务的各种公文、历代的各种碑文，无不采摭。该书除叙述汉唐以来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史外，着重记载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西藏社会的各项制度，生产、经济、风俗情况，如中央驻藏官员职权、驻藏官兵分布、藏中各部落名称、各地山川形势、金奔巴掣签制度、蒙古人赴藏熬茶制度、达赖与班禅遣人到中央的制度、藏民信仰、生活状况、人藏道路、西藏地方部队，等等。这是一部关于西藏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的重要图籍。

从清初至乾隆末年，边疆史地学的兴起表现还不十分明显，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嘉庆年间开始，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刺激着国人麻木的头脑，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史地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从而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的加深，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也以蓬勃之势，臻于顶峰。

清代的中国东北、北方、西北同俄国邻界，沙俄野蛮地向中

国扩张，勾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中某些上层叛乱分子，危机已然来到三北边疆，因此研究三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史必然涉及到中俄关系问题。咸丰时期，刑部主事何秋涛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接壤，地域广阔，应该有专书提供借鉴，于是著《北徼汇编》六卷（之后又扩充到八十卷），呈咸丰皇帝阅览后，皇帝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对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六次亲命何秋涛纂修此书，并命名为《朔方备乘》。因而，清朝统治者内政外交的需要，是倡导撰修边疆史地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第二阶段，一些学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辛勤劳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写作，有许多学者是被发戍边疆、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完成著书的。嘉庆年间，编修祁韵士曾参加《蒙古王公传表》的撰写，用了八年的时间，翻检了红本、黄册档案、清代历朝实录及蒙古文的著述，凡是有关外藩事迹的，均检出后再加以校阅，然后才得以竣工。后来，祁韵士因经济案件的牵连，被发戍伊犁，在这种蒙受屈辱的情况下，他从事西北史地的研究，著有大批书稿：《皇朝藩部要略》、《新疆识略》（后由徐松续成）、《西域释地》、《西陲要略》、《万里行程记》、《西域行程记》。与祁韵士同时代的学者、编修洪亮吉以上书言事而获罪，遣戍伊犁，在不长的时间里即著有《天山客话》和《伊犁日记》二书。道光年间，著名爱国者、民族英雄林则徐以抗击外国侵略军而被谪新疆，亦著有《荷戈纪程》一书。这些学者的努力，促进了边疆史地学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人志士为图防御外国侵略者的进攻，写了大量有关新疆、西藏、蒙古、东北、台湾、云桂等地的专著，一者在于给当时清朝军队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通过写史来激发广大同胞爱国爱乡、共御外辱的激情。

第二阶段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如下几部：

《皇朝藩部要略》。祁韵士利用他做史官的条件撰成此书。全

书计十八卷，分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部、厄鲁特、回部、西藏五个要略，另有藩部世系表四卷，为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河套以西各部、不列外藩各部表。祁韵士采用编年体与纪传体结合的办法：记事系年按岁月先后，分部叙述则是纪传体写法，这样叙述各部落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包括归附、叛服、封爵等内容，把蒙古诸部的历史及其与清朝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说明。这部书在学术上有开创性的价值，在实用上为中央统治蒙古诸部提供了较好的历史借鉴。

《新疆识略》。其作者松筠为伊犁将军，因而熟悉新疆情形。《新疆识略》实用价值较高。全书共分十二卷，首一卷。清宣宗于道光元年（1821 年）为之作序，遂成为钦定之书。卷首《圣藻》为清帝关于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木之乱的诗文。十二卷的卷目为新疆总图、北路舆图、伊犁舆图、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新疆识略》叙述了新疆的山河、城郭、兵食财富的储备、田野畜牧的繁滋等，详细地提供了清代新疆地理和社会经济情况的资料。

《蒙古游牧记》。张穆撰，何秋涛校。计十六卷。其主要内容为：内外蒙古各部落所在地、历代所受的封爵、对中央的土贡。祁寯藻认为，作为中国属民的蒙古之强弱，关系中国盛衰，此书让读史者得到实事求是的东西，统治者得到经世致用的益处，实在是不朽的功业。由此可见此书实用价值之高。

《朔方备乘》。何秋涛为研究中俄关系史，为统治者提出对沙俄切实可行方案参考之用，广泛搜集各种资料编撰而成。他遍阅了正史官书以及清代学者诸如姚莹、魏源、张穆、松筠、赵翼、七十一（椿园）、钱良择、方式济、图理琛等的历史地理著作，还浏览了西洋人如南怀仁、艾儒略所刊的舆图书籍，从而汇著成《北徼汇编》六卷，在此之后又六次受咸丰皇帝的指令，成书名为《朔方备乘》。《朔方备乘》共分八十卷（另有凡例一卷），其

中前十二卷为辑录，载有上谕及钦定书籍的有关文字；何秋涛自撰六十八卷，分为：《圣武述略》、《北徼界碑考》、《北徼条约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馆考》、《雅克萨城考》、《额尔齐斯河源流考》、《尼布楚城考》、《汉魏北徼诸国传》、《周齐隋唐北徼诸国传》、《辽金元北徼诸国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考订职方外纪》、《考订绥服纪略》、《辨正西域闻见录》、《北徼事迹表》、《北徼沿革表》、《图说》等。《朔方备乘》备述秦汉以来特别是清朝对东北、北方、西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当地少数民族的状况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侵略我国三北地区的沙俄进行了研究，叙述了中俄关系。何秋涛说他写《朔方备乘》的目的在于八个方面，即："宣圣德以服远人"，"述武功以著韬略"，"明曲直以示威信"，"志险要以昭边禁"，"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征前事以具法戒"、"集夷务以烛情伪"。一言以蔽之，即：反对沙俄侵略，巩固祖国三北边疆。因而深得咸丰皇帝的赏识。《朔方备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也是一部有益于边防的学术著作。

由于边疆史地学的蓬勃兴起，使第二阶段的优秀的史地作品不胜枚举。下面将边疆史地学兴起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著作抄录如下：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姚明辉的《蒙古志》三卷；储大文的《河套略》一卷；刘统勋等的《西域图志》五十二卷；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松筠的《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七十一（椿园）的《西域见闻录》八卷外一卷、《遐域琐谈》四卷、《西域琐谈》四卷、《异域琐谈》四卷、《新疆纪略》八卷、《西域记》八卷、《新疆舆图风土考》五卷、《西域崑探》、《新疆纪略》一卷、《新疆外藩纪略》二卷、《外藩列传》二卷、《回疆风土记》一卷、《军台道里表》一卷、

《西域总志》四卷、《西域旧闻》一卷、《西域纪略》八卷、《新疆撮要录》二卷；盛绳祖的《卫藏图志》五十卷；黄沛彪的《西藏通考》八卷；王我师的《藏炉述异记》一卷、《藏炉总记》一卷；史善长的《轮台杂记》二卷；沈宗衍的《三藏志略》；李慎儒的《边疆简要》三卷；吴大澂的《吉林勘界记》一卷；卢坤等的《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李心衡的《金川琐记》六卷；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八十卷；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二十四卷；李荣陛的《云缅山川志》一卷；林谦光的《台湾纪略》一卷；胡建伟的《澎湖纪略》十二卷；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二卷；俞昌会的《防海辑要》十八卷、图一卷；王臻的《海防述略》；王文锦的《西域南八域纪要》；关凤楼的《新疆大记》六卷；吴方震的《岭南杂记》二卷；吴绮的《岭南风物记》一卷；陈鼎的《滇黔土司婚礼记》一卷；倪蜕的《滇小记》一卷；许景澄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二卷例言一卷；图理琛的《异域记》二卷；钱良择的《出塞纪略》一卷；方式济的《龙沙纪略》一卷；冯一鹏的《塞外杂识》一卷；李凤彩的《藏纪概》三卷；张海的《西藏纪述》一卷；萧腾麟的《西藏见闻录》二卷；陈克绳的《西域遗闻》一卷；《卫藏通志》(作者待考）十六卷首一卷；松筠的《西藏图说》一卷；郑光祖的《西藏纪略》；管庭芬的《西藏记闻》一卷；龚柴的《西藏纪略》一卷；许光世、蔡晋成的《西藏新志》三卷；高赓恩的《绥远志》十卷首一卷；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六卷；秦世铨的《吉林舆地略》二卷；萨英额的《吉林外纪》十卷；谢圣伦的《滇黔志略》三十卷；张若骕的《滇云纪略》二卷；师范的《滇系》四十卷；龚柴的《台湾小志》一卷；张澍的《蜀典》十二卷；彭遵泗的《蜀故》二十七卷。另外还有佚名的《西藏考》一卷、《西藏志》、《盛京志略》等。

以上众多历史地理著作，均记述了边疆各方的历史和地理，

成为研究边疆历史和地理的重要文献。

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为统治者处理好与外国及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也激发了人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共御外辱的爱国感情，同时也有力推动了清代乃至后来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尤其是边疆历史地理。

边疆史地图籍搜集整理了一个少数民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地区及边疆民族的历史、地理与现状资料，不仅为当时统治者制定政策作参考，而且为后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中央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外关系史汇集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

（戴柏俊）

参考资料：

《清代史料学初稿》、《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针砭时弊小说之涌现

光绪庚子（1900 年）之后，清末文坛上先后涌现了大量揭露黑暗政治、抨击社会时弊的小说。这类小说仿效古典讽刺小说诸如《儒林外史》的体例和笔法，但不像《儒林外史》那样含蓄蕴藉，寓讽刺于故事情节发展之中，针砭自然流露，而是辞气浮露，笔不藏锋，甚至言过其辞，极尽讽刺夸张之能事，时人多称之为“针砭时弊小说”。鲁迅先生则称之为“谴责小说”。

针砭时弊小说是清末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夭折，义和团遭到镇压，八国联军人侵京津，社会矛盾加深，民族矛盾日甚。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社会动荡，民无宁日。清政府无能为治，国人于失望叹息之余，转而抨击政府。文人们则挥笔上阵，揭发隐患，痛伐弊恶；对于时政严加纠弹，到后来扩而广之，笔锋转而针砭社会风俗。这正是针砭时弊小说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而针砭时弊小说者在抨击政府时，笔力集中于揭发时弊，纠弹时政，反映了国人普遍高涨起来的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而针砭时弊小说在针砭之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描写得酣畅淋漓，社会丑态跃然纸上，颇能取悦于一般读者，适应了广大读者的心理情绪，压抑已久的怨气得以发泄。其次，由于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兴起，改良派作家把小说视为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极力倡导“小说界革命”。于是操觚之士竞治小说，尤以谴责时政、针砭时弊为职。这也是针砭时弊小说盛行的原因之一。而近代报刊和出版业的发展，为小说作者提供

了发表和出版的条件；而在报纸上逐期连载之后，即能辑出刊印，也颇能刺激一般作家撰写小说的积极性。当然，随着半殖民地城市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小说发行的商品化倾向也在所难免，因而出现了一些迎合世俗的刊物。梁启超的《新小说》、李宝嘉的《绣像小说》、吴沃尧的《月月小说》、曾朴的《小说林》以及其它一些刊物如《新新小说》、《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等相继刊行，这些小说杂志虽然发表的不尽是针砭时弊小说，但以针砭时弊小说数量为多，成就为高，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主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可谓盛况空前。

从事针砭时弊小说创作的作家，其思想倾向的主流是在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潮流推动下，借小说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借小说以发泄自己对政局、时弊的不满情绪。有的对昏弱、腐败的官场进行不同程度的揭露，鞭挞；有的对社会弊病与道德沦丧作了辛辣的讽刺；有的表现了对外国列强侵略罪行和清政府屈膝媚外的愤慨；有的对打着"维新"、"革命"及"振兴实业"招牌而专事营私诈骗的丑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在诸多的针砭时弊小说中，以李宝嘉的《官场现行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影响最大，被称为"晚清四大针砭时弊小说"，亦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幼年丧父，曾在山东任知府的堂伯署衙中读书，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乡试累举不第。后赴上海，创办《指南报》，后又改办《游戏报》、《繁华报》，从而成为晚清小报的创始者。不久，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绣像小说》。光绪辛丑（1901年）清廷开设特科，李宝嘉力辞不就，而后全力投入文学创作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宝嘉病卒于上海。

李宝嘉著有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海天鸿雪

记》、《李莲英》、《繁华梦》、《活地狱》、《中国现在记》等十余种，另有《庚子国变弹词》、《南亭笔记》。《官场现形记》是李宝嘉的代表作。

《官场现形记》创作于1901至1905年间，是一部旨在揭露晚清官场黑暗的小说。全书原拟十编一百二十回，第五编尚未终稿，李宝嘉便去世了。后由朋友续完第五编，共六十回。

小说围绕"千里为官只为财"这句封建官场的信条，从不同侧面集中揭露了官场上下贪污腐败、残害百姓和恐洋卖国等方面的罪行。作品对官场的贪污、贿赂、敲诈、勒索、营私、舞弊、钻营、盘剥等黑暗腐败，作了较多的揭露和谴责。作品还进一步揭露了官场在金钱的旋涡中，致使传统的道德全都丧失殆尽。作品还揭露了官场中那些寡廉鲜耻的官僚们媚外恐洋的奴相，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荣华，丝毫不敢触怒洋人，对于甘作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代理人的奴才心态，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在李宝嘉的笔下，清朝官场的机体和灵魂均已完全腐朽。因而作者也希望用这部"教科书"陶铸中国官吏，使他们知过必改，再造太平盛世。

《官场现形记》暴露了晚清官场贪赃枉法、尔虞我诈、残害百姓的种种罪恶，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也有所揭发，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小说谴责官场的黑暗仅止于"道德"，而不涉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取舍；虽然有同情人民群众的笔墨，却视人民为可以任人摆布的"乡愚"；虽然看到了清末社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道德沦丧，却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出路。凡此种种，均充分反映了李宝嘉思想认识上的局限。

《官场现形记》在写作方法上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结构上，由许多相对独立的故事联缀而成，冗长，松散，缺乏裁剪。在讽刺手法上，变换较多；夸张有时失实，锋芒往往过露，

痛快淋漓，但不能发人深思。另外，小说的人物形象多类型化，写得最有特色的是一些官场下层人物。

李宝嘉的另一部力作《文明小史》，写于1903年至1905年，共六十回。小说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新政、新学下的黑暗官场，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三个方面反映了晚清维新时期的社会面貌。

吴沃尧（1866—1910年），字小允，号趼人，别署“我佛山人”，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封建世家，至其父时，家道衰落。父亲去世后，家境益窘。十八岁时，赴上海，在江南制造局教书。1897年至1901年，先后主编过多种小报。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刊行《新小说》杂志，吴沃尧即向其投稿，先后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小说在该刊发表部分章节或全文。1905年，受聘赴汉口，任美商英文《楚报》中文版编辑，不久因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愤然辞职，返回上海。1906年，《月月小说》创刊，任主编，并在该刊上发表《劫余灰》、《上海游骖录》、《两晋演义》等长篇小说。1910年9月病逝。《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吴沃尧的代表作。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绘的晚清社会的诸多方面，构成了一幅色调阴冷的王朝末日图。其中，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支柱——官僚体系，是作者着墨最多，鞭挞最有力的对象。吴沃尧对活跃在作为封建政治的聚光点的官场里的诸色官僚，无论是科班出身，或是捐班、保举出身，都进行了一一剖析。作者以绝望忧伤的心情，给晚清社会重重地涂上了一层凄惨、阴冷的油彩。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反映了吴沃尧固执于传统观念，反对一切西学的倾向，从而使其救国道路与其爱国主义南辕北辙。但小说毕竟描绘了晚清社会的诸多方面，把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作者的用心是在为他所忠于的王朝敲响警钟，但客观上却是为必然灭亡的王朝唱出了一曲无尽的挽

歌。

小说以“我”（九死一生）为线索贯穿首尾，以“官场”、“道德”为经纬覆盖全篇，暴露和针砭了与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传统道德相悖离的种种怪异现状。这一结构形式，较之《官场现形记》要严谨得多。在故事联缀、情节安排上，基本上类似《官场现形记》。在色彩诡奇的故事情节的堆积之中，人物往往是事物的标签，所以看不到《儒林外史》中那样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另外，吴沃尧还撰写了也属于言情小说的《恨海》、《劫余灰》等。其中《恨海》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述了两对未婚夫妇的悲惨遭遇。《恨海》还开晚清写情小说之端，并影响到后来鸳鸯蝴蝶派的创作。

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又字公约，号鸿都百炼生，祖籍江苏丹徒，徙居淮安。其父刘成忠以御史出任河南兵备道等职。刘鹗自幼随父，二十岁回淮安，赴南京参加乡试，不第。回归淮安后，从事天算、水利、医药等方面的研究，从学于太谷教派传人李晴峰。光绪十四年到十七年，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帮办治黄工程，博得很高声誉。光绪十九年，由山东巡抚福润推荐到总理衙门，以知府任用。光绪二十二年，为借外债筹建芦汉铁路之事，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征召，因受盛宣怀妒嫉，失意而去。同年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用外资兴修津镇铁路，引起同乡京官公愤，以至开除其乡籍。光绪二十三年，应外商之聘，经办山西矿务，获得巨额利金，生活更加豪奢、靡烂。自此，刘鹗“汉奸之名，大噪于世”。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刘鹗携资入京，贱价购取俄军所据太仓粟米，粜于饥民，并收购文物，高价售给外国人。光绪三十四年，以私售太仓粟罪被捕，流放新疆，次年病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老残游记》原署洪都百炼生著，1903年始发表于《绣像小说》，至十三回中断，后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共计初编二十

回，续编九回。1906年，初编单行本刊行，1931年，续编前六回单行本刊行。

《老残游记》通过江湖医生老残的游历见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晚清社会的黑暗面，并寄托了作者补救残局的政治幻想。

小说第一回，作者借老残的梦境，表达了对晚清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理解，和为之寻求出路的设想。那艘挣扎于风浪中的破船，是清帝国的象征。船主、舵手、管帆的，是控制国家机器的上层统治者。他们因为走惯了“太平洋”，“未曾预备方针”，所以一遇风浪，再加一阴天，便失去了依傍，慌了手脚。那些搜括民财的水手，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大局的中下层官吏。至于船上的群众，则是一些任人摆布的愚氓。如何使大船转危为安呢？唯有让船主、舵手接受老残一行人送去的外国方向盘和纪限仪。然而老残一行人却被骂为汉奸，所乘的渔船也被打得粉碎。这正暗示着“中体西用”论的破产。整个梦境透露出的思想，和书中的“补残”活动，以及消极出世的情绪，是相呼应的。因而第一回起着笼罩全篇，揭示主题思想的作用。

作者笔下的老残，并不单单是一个自甘淡泊、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而是一位疾恶如仇、急人之难，有副义勇侠胆心肠的人物。他认为严刑峻法、滥杀无辜，只能逼民为盗，从而动摇封建统治基础；施行“仁政”，才能化盗为民，稳固封建秩序。他相信清官，认为唯有清官，才能从封建统治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刚直不阿地维护封建法律、道德的权威。这正是老残也是刘鹗“仁政”思想的内涵。

《老残游记》擅长叙景状物，笔法细腻逼真、清丽自然，常常给读者以强烈的美感。

曾朴（1872—1935年），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县人。其父曾君表是当时八股名手，因望子成龙心切，在曾朴十三、四岁时，即为其延师教习。然而曾朴酷爱文学，常背地里阅

读名家小说和笔记杂集。1891 年，曾朴中举。次年赴京师应春闱试，不第；其父则为其捐了个内阁中书，1895 年，入同文馆学习法文。翌年，应总理衙门试，落榜，离京还乡。

1897 年，曾朴准备在上海兴办实业，因与谭嗣同、林旭、唐才常等维新骨干派人物来往密切，有维新之志。林旭在上海时，曾介绍曾朴与谙熟法文的陈季同相识，曾朴在陈季同帮助下研究法国文学。1904 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店，征集创作小说和东西洋小说译本，并开始《孽海花》的创作。

《孽海花》最初版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来才改署曾朴著。“爱自由者”是金松岑的笔名，金是江苏吴江人，1903 年在上海参加爱国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撰写《孽海花》。但只写了六回，便交给曾朴续写。两人共同拟定全书六十回题目。曾朴对前六回作了修改，于以后二十七年中断断续续写成三十五回。1905 年，小说林社出版初、二两集，共二十回。一九二八年，真善美书店出版初、二、三集，共三十回。《真善美》上发表的十五回中，后五回未收人。建国后，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本，共三十五回。

《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贯穿了许多达官名士的琐闻逸事，展现了同治朝到光绪甲午战争这一时期文化和政治的状况，反映了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新旧政治力量的斗争与兴衰。

《孽海花》从金雯青抢魁，便揭开了晚清上层社会官僚士大夫的生活帷幕。无论台阁重臣，还是封疆大吏，多数是通过科举道路而腾达。他们耽溺科名，精于制艺，并以热衷脱离现实的考据学为高雅，以嫖妓、玩相公、纳妾为风流。一旦遇到内政外交的大事，只会空发议论、纸上谈兵。至于帝后的明争暗斗，公开卖官鬻爵，无不表明清王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

在国是日非，外患益深的情况下，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

一股要求改革的思潮。其中涉及到经营海军、抵御外侮；兴办实业，和列强进行“实业战争”；发展教育，以启民智，以及言文一致，重视小说、戏剧的感化作用等等。更有颂扬西方民主政体的。这些都反映了变法酝酿阶段的社会思想状况。

由于作者改良主义的立场，对光绪帝时时抱有同情。同时，作者一面谴责威毅伯的卖国，一方面又为他开脱罪责；一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一方面又对科举制度充满着留恋与向往。由于作者的唯心史观，他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契机都归之于男女恋情上。

《孽海花》共写了二百多个人物，大都是对实有其人的隐射，但写得一闪即逝，给读者没留下什么印象。其中也有一些人物个性写得比较突出。小说的语言过于典雅，常杂以骈词俪句，使作品不那么通俗易懂。另外，对人物事件的臧否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小说有些地方，留有摹仿《红楼梦》的痕迹。

总的来说，在晚清四大针砭时弊小说名著中，《孽海花》可以算得上佼佼者了。

曾朴一生的文学活动，除撰写《孽海花》外，另有自传体小说《鲁男子》，还有一些文学译著。

晚清针砭时弊小说，除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之外，较有名的还有：写官场的，有张春帆的《宦海》、八宝王郎的《冷眼观》等；写假维新人物的，有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浪荡男儿的《上海之维新党》等；写实业家、投机掮客和买办的，有姬文的《市声》、大桥式羽的《胡雪岩外传》、吴沃尧的《发财密决》等；写庚子事变的，有忧患余生的《邻女语》等。

针砭时弊小说的作者众多，而政治倾向、思想水准、艺术修养却不大一致。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最大限度也超不过维新

派，更何况不少人的思想还跳不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樊篱。他们在针砭弊恶和纠弹时政方面，笔墨有力，不乏动人之处，而大多仅止于“热骂”，缺乏批判的力量和深度，更不能为作品中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甚至连为清王朝救弊补残的办法也找不到。所以在不少作品中，充满了失望情绪，笼罩着一层感伤的氛围。这也决定了针砭时弊小说的短命性。

针砭时弊小说基本上沿用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广泛地描绘了晚清的社会面貌。多数作品采用若断若续，直接地进行某些针砭、谴责、嘲讽。有的借鉴了西方小说的一些技法。但是，由于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等人，从功利主义出发，过分地宣扬了小说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了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仅把小说视为政治主张的传声筒，许多作家对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未能很好地继承。一般地说，他们还认识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创作中的价值，只着重以离奇、夸张的情节增强故事性。由于这些作家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使他们不可能从较深层次发掘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塑造出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艺术形象。

辛亥革命前，针砭时弊小说创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其成了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引起读者的不满。辛亥革命后，针砭时弊小说日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革命派小说。

（戴柏俊）

参考资料：

《中国文学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

茶法始末

所谓茶法，是指封建官府对茶叶产、销的管理法则。清代沿袭了唐宋以来官府对茶叶的控制和专卖政策，并有所变化和发展。其内容可分为官茶、商茶、贡茶三项。

贡茶，是地方官府向皇室宫廷备办的进贡之茶，属于各地名茶中的上等佳品。中国古代有句脍炙人口的佳句叫做“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说的是沏茶所用之水及茶叶，都是难得的极佳用料，这蒙山顶上茶，自然成为地方官孝敬皇帝的贡品。蒙山茶产于四川省雅州府之蒙山．蒙山“漫山所产，茶味均佳”，而又以上青峰顶所产最优，“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羃复，久凝不散，以其异，名之曰‘仙茶’”①。但所产甚少，茶树仅八小株。每株高四、五寸，一年只能摘取茶叶二三十片。每年四月，由县令占卜吉日，穿朝服登山，率领僧人焚香拜采，装人两银瓶，贡入帝京，以备皇帝祭天、祭祖之用。另外在蒙山菱角峰采摘茶叶，揉制成小团粒，装人十八锡瓶中，随同人贡，供皇室享用。这两种“蒙顶茶”，称得上是稀世珍品。浙江的黄茶也被列为贡茶，每年由该省备办一百二十一篓，其中二十八篓做为御用茶，九十三篓为陵寝及内廷用茶。

官茶，是地方官府所用之茶，主要在陕甘地区，用于茶马贸易及搭放兵饷、赏赐等。商茶，是领取官府茶引的茶商所售之

① 民国《名山县新志》卷4。

茶。清代，商茶的销售有坐销，有行销。坐销是种茶园户或茶店在本地经销。行销除在本产区或邻近州县由行商售卖，相当一部分是远销他省、边疆塞外或海关。无论坐销或行销，售茶者都必须持有政府所颁发的茶引。引，是茶商售茶的凭证，行引则是政府管理茶叶销售，据以办课收税的手段。茶引由中央户部统一刊印，颁发各省。各产茶省份予先到户部申报所需茶引数额，领到部引之后，由各地的批验茶引所或产茶州县等机构发与茶商。户部还规定：不准地方衙门给发代引的印单，防止各省自行印发行茶凭证私征茶税，以保证中央的征收，同时也是为了杜绝地方官私征中饱的流弊。承领茶引的茶商入产地购茶，无论茶之精粗，每引购一百斤，不及百斤之零，另发由帖作为凭证。所购之茶要赴官所批验，茶与引相符，按数纳课税后，方许出境售卖。行销所经过的关津，也要经过检验，引、茶相符别无夹带，将引钤记为号，才放行，许其发卖。若茶无引、由，或茶斤与引不符有余茶，以及用行完的残引售茶者，即以售私茶论处。伪造茶引者处斩。种茶户将茶卖与无引商贩，也要治罪。

清代茶法按其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及其发展变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清初以茶马贸易为主的官茶茶法；康熙中期以后以对行销的商茶管理为主的商茶茶法；鸦片战争以后的对外贸易为主的商茶茶法及其兴衰。

清初统一全国，战事频繁，四征不庭，为保证军马的供应，于入关次年即顺治二年（1645 年），便在西北陕甘地区设五个茶马司，招商办茶，“以易番马”。这五个茶马司是：西宁司，设于西宁（今青海西宁市）；洮州司，设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河州司，设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庄浪司，设于平番（今甘肃永登县）；甘州司，设于兰州（今甘肃兰州市）。任命廖攀龙为巡视陕西茶马御史督办其事。清廷规定，茶商办茶，官商均分，一半做为官茶，交茶马司以做易马之用。为了鼓励茶商踊跃运茶赴

边，又一度规定官商三、七分，三成入官，作为引税，七成归商为商茶，每引还可附带茶十四斤，这七成商茶与附带茶任由茶商自卖。当时由于战乱频仍，茶源困难，为了保证官茶的取得，官府严禁私茶，发现无引私茶，除没收入官外，私贩者还要遭到杖责的惩处。为了招徕少数民族以马易茶，各茶马司还准备烟、酒，以招待、赏赐少数民族商人。所换取的马匹，牡马（公马）做为战马，牝马（母马）交与苑马各监牧养繁殖。当时清廷在长城一线设置了七处苑马监，到顺治十三、四年，繁殖马匹数量已相当可观，易马之官茶也较为充足，于是开始将官茶变价充饷。在陕甘地区开茶马互市的同时，清廷还于顺治四年，在张家口之西的河宝营开茶马市，与蒙古的鄂尔多斯部落交易茶马。顺治十八年，西藏达赖喇嘛及根都（或作干都）台吉① 呈请于云南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以马易茶，清廷同意，遂于康熙四年（1665 年）于该地开茶马市。

清初不仅设置苑马监繁殖马匹，还辟有多处牧场，京畿附近的垦荒余地，斥为八旗及宗室亲、郡王牧场，小者几里，大者以数十里计。长城口外及东北奉天也设有牧场多处，这些牧场繁育的马匹，也是战马的重要来源。因而清朝的牧地远广于宋、明两代，“稍为孳息，则已骊黄遍野，云锦成群”，自康熙朝以后，茶马贸易就已逐渐衰落。康熙七年，裁撤茶马御史，一应事务归甘肃巡抚兼理，标志着茶马贸易在清政府行政事务中已非重要之事。征之于商的官茶法虽然存在，但所征之官茶，主要是当地官府与少数民族换取驼马牛羊，供应驻防的军队。康熙三十二年，由于五茶马司之官茶积压甚多，为防年久腐烂，不得不变卖。三十六年，又令甘州司将积贮之茶发与边镇，搭发驻军兵饷，兵饷之七成给银，三成给茶。雍正九年（1731 年），由于对西北准噶

---

① 台吉，蒙古贵族称号之一，一般只用于成吉思汗后裔子孙。后来成为爵号。

尔部两路用兵，又一度恢复茶马贸易。随着战事的结束，贸易茶马也随之于雍正十三年停止。此次易马的停止，也标志着清代茶马贸易的基本结束。此后，所征之官茶不断改收“折色”，由茶商按时价交银。所征“本色”即茶，仍做搭放兵饷之用。乾隆中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清廷将其安置于伊犁地方游牧，还以所贮官茶赏赐这些新安顿的蒙古部众。

宋明两代为了换取边疆民族的马匹，曾严格控制茶叶的产销，甚至强行征收，并实行严厉的禁私措施。征收官茶以易番马，也成为宋明两代茶法的主要内容。清代的茶马贸易仅在清初，时间短，而且规模小，因而就有清一代而言，茶法主要表现为对商茶行销的管理，这是清代茶法不同于宋明两代最显著的特点。

康熙二十年以后，由于三藩之乱的平定，内地已无战事，社会安定，百业俱兴，茶的种植与制、销也迅速发展起来。清代产茶区主要在浙江、安徽、四川、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及云南、贵州诸省，康熙中期以后，形成遍布诸省的以种茶为主的经济作物区。茶叶产量迅速增加，贸茶商人不断增多，各省也屡次向中央奏请增颁引额。康熙二十二年，全国课茶十五万九千余引，五十年，增至二十三万五千余引。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已达到三十六万五千引。在诸产茶省份中，又以安徽、四川、浙江颁引次数多、数额大。安徽省，康熙年间引额大致为四万五千道[①]左右，雍正以后，陆续增颁，至嘉庆初，达八万七千道。另颁余引二万四千道，以备某些州县产量剧增，引不敷销而补用。四川是植茶发展最快的省分，康熙中叶以后，各产茶州县“种植益繁，故各属屡有增引之请”。[②] 通计四川一省，自康熙中至乾隆末年，共增引四十六次，增九万二千引，总额达十三万余

① 一道即一引
② 雍正《四川通志》卷15上“茶法”。

引，为康熙二十年间的三倍多。浙江“产茶独多，销引数倍他省”，康熙以后，额销茶引一直在十四万道以上。嘉庆朝又因销引旺盛，额颁茶引不敷配给，增颁余引七万道。

对茶所征收的税课，在清前期主要有三项。一、茶引纸价银。领引者例应每引纳银三厘三毫，只有四川、云南为三厘。这部分所征为数很小。二、茶课。清廷规定：“凡山乡宜茶之地土，人树艺为业者，无征。惟商贾转运而售之民者，征其商，曰茶课。”① 这是就全国范围一般情况而言，种茶者，不征其课，只有茶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商品，才向贩卖者征收。四川情况比较特殊，该省在明代曾实行国家向种茶园户征茶以易马的政策，后来交折色银。清代沿袭此制，最初是按茶园株数征银，雍正八年改为按斤征收，其方法是：商人向园户买茶时，即照时价将课银扣下，由茶商交引税时一并交纳，即所谓“课仍出于园户，而归总于商”。这种办法因不便于园户与茶商交易，后来又改为按种茶园户的茶山地多少划片，称为“甲”或“分”，由各甲之首称为茶甲者负责，帮助茶商征收。这种方法日久也生弊端，有些县后来索性免去园户交纳，而摊人地亩中征收。陕西个别县不设引，也由园户纳课。三、茶税。是茶商行茶时所交税银。茶课、茶税的征收各地颇不一致，有的是课、税合征，有的是课、税分征，还有的个别省份课、税只征其一。至嘉庆末年，通计全国所颁引数为四十万余引、年征银二十几万两，这是清前期官府在行茶中所得税课的最高额。

各省所产之茶，一部分用于本地自行消费，其他售出者才属商茶。商茶绝大部分是行销外地，尤其是海外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清代商茶的大宗去向。

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海外贸易迅速扩大，不断增产的

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17“杂赋”。

茶叶，成为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大量商茶远销日本、俄国、南洋及西方诸国，其中又以对俄国及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出口量最大。乾隆末嘉庆初，由恰克图输往俄国、由广州输往英法等国的华茶，每年大约有三千多万斤，至鸦片战争前夕已增至六千余万斤。对外贸易的发展，西方诸国对茶的大量需求，也促进了内地种茶、制茶的发展，如福建省，在清初产茶量并不大，远低于浙江、安徽诸省，清政府也不于该省设引征课。自康熙末年以后，福建植茶迅速发展，除武夷山外，瓯宁等地也成为重要产茶区，该省也成为华茶的重要出口省份。

清代，由于长城内外联为一体，西藏置于中央有力的统辖之下，内地与边疆经济交流大大加强，从而为商茶的边疆贸易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茶马贸易的停止，也结束了宋明两代因官方保证易马而垄断、限制茶叶行销边疆的历史，清代对边茶贸易的管理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从而客观上促进了边茶贸易的长足发展。清廷规定：前往蒙古部落贸易商人，由户部发给照票，经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等处稽核后，即可进入蒙古各部贸易。与蒙古地方的交易，“以茶为大宗”，大批内地茶源源不断地输往蒙古各部。由于在交易中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以致砖茶成了交易中的一般等价物，反映了茶叶在蒙地贸易中的普遍及其数量之大。四川茶与康藏等地少数民族的交易，是清代边茶贸易的又一大去向。清政府在四川的茶法实行引岸制，引分三种：腹引、边引、土引。腹引是行销内地（主要是四川本省）之引。土引和边引由清中央指定销往边区少数民族，其中土引行销于川西、川北等地土司所辖地区。边引运至打箭炉关、松潘，分别与西藏藏商、青海的蒙藏商民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川茶持续不断增产的茶斤，绝大部分是以边引、土引行销。由康熙二十六年至嘉庆初，川省茶引增颁至十三万余道，其中腹引仅一万五千九百道，而边引、土引由于不断增颁，竟达十一万四千多道，占

总销量的百分之八十七，年销量一千多万斤。而销往西藏、青海藏蒙民族地区的边引又是主要部分，有九万多道，年销九百多万斤。当时西藏的各大寺院、领主贵族都有专人从事贸易，川茶由内地商人运至打箭炉关后，与这些藏商进行交易。荒凉的川藏之间，茶驮千百成群，络绎不绝。藏区大批的畜产品、药材等土特产也在这里聚集成交，打箭炉由于商务日益繁盛，被时人称为“小成都”。

清官府从大量销往边区的商茶中抽取课税，这只是边茶茶法的一方面，边茶的管理对于官府而言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蒙、藏等少数民族，由于饮食与内地不同，对茶有特殊的需求，唐宋以后历代典籍对此多有叙述，如“戎俗食肉、饮酪，非茶无以清荣卫”；[①]“藏番蒙古，不拘贵贱，饮食皆以茶为主”；[②]“番人之不能不用茶，犹华人之不能不用盐也”。[③] 这些记叙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过分强调了茶的作用，但它反映了自茶成为饮料后，也成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饮食生活中的非常重要的消费品，因而中原王朝往往利用边疆民族需茶而又不产茶的矛盾，把内地茶向边疆的行销作为“羁縻”控制边疆的手段。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开茶马互市，是明及以前中原王朝对边区行茶的主要方式，一方面从交易中得到战马；另一方面，使少数民族因得茶而对中原王朝“感恩”顺服，一旦发生冲突，则以关闭茶马市来要挟制约。边茶行销的政治意义，同样为清王朝所重视，因而清代茶法也蕴含着边疆治理的政治内容，在康熙中至道光这一段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与往代相比，清代边茶的贸易政策体现了开放性的特点。对茶叶销边的开放，目的是使茶这种政治性商品发挥其抚绥边区

---

① 《宋史》卷167“职官志七”。
② 《明史》卷80“食货志·茶法”。
③ 雍正《四川通志》卷15上“茶法”。

少数民族的作用。明代对边茶实行严厉的禁限政策，凡私茶出境及关隘失察者，皆定以凌迟处死之罪，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少数民族 的防范与制约，即所谓“番人恃茶为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①] 万历五年（1577 年）蒙古俺答汗叩关请求开茶市，明廷经过商议，仅给茶百余篦，而不许其市易。清代，则允许内地茶无限量地销往蒙古，蒙古地区既已归服清中央，清廷自然取消对茶的禁限，以示当今朝廷的“开恩”，视蒙地、内地为一体，以密切与加强蒙古贵族、民众与中央的关系。西藏地区，明朝同样实行限制性措施，其宗旨是：“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因而“向来腹（引）多边（引）少”。[②] 清代，乾嘉时期，川茶的腹引比明后期减少约一万道，而边引则比明后期增加了七、八万道，每年多输边茶七、八百万斤。边引的大量增加，表明藏族等少数民族对茶叶实际需要量之多，也说明清廷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是采取供其需求的政策，其目的与对蒙古的边茶行销是一致的。康熙皇帝还曾谕令前往打箭炉监督贸易的官员，只向内地商人征收茶税，藏商购茶免税，告诫他们：“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注念！”清廷还对藏区实行赏茶制度，雍正二年（1724 年）定制，每年赐达赖喇嘛茶五千斤，班禅二千五百斤，因从打箭炉入藏路遥难行，运费高昂，所以不仅赏茶，还赏赐茶叶脚价银，每年赏达赖的运茶脚费银就达五千两。川边土司及各庄寨头人，每年或每三年赏赉一次，茶叶是赏赐中的重要物品。以上所赏之茶，例由四川雅安等县官府委商承办。清代的边茶行销，也夹带着制约手段，其表现是：以禁茶或节制茶叶购买量的方式，对不忠顺服从中央、反叛骚乱的某些民族地区进行挟制。

---

① 《明史》卷 80“食货志·茶法”
② 雍正《四川通志》卷 15 上“茶法”。

“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是清廷“以茶驭番”的手段之一。康熙末年，准噶尔部蒙古进扰西藏，局势动荡，康、藏某些寺院、土司附从，清廷遂将打箭炉、松潘两处茶引断禁，土司等因此而慌恐，相继归顺清廷，清廷于是又恢复两地茶引的行销。乾隆三十七年，金川土司叛乱，为配合军队进剿平叛，对这一地区也一度“禁止茶斤出口”。限制茶的购买量，是制约的另一种方式，清廷在川边及青海的某些地区曾实行过这种政策，具体措施是：根据该地村寨户口数定其售茶量，如果有余，即暂时禁运，等其不敷用而请求市茶时，再酌定数目，令其买运。使这些地区经常处于仅够食用而无剩余的状况，需要经常有赖于朝廷的供应，因而不敢违背朝廷，以免切断输茶这条养生来源。道光初，青海察罕诺们罕所部侵扰其他部落，陕甘总督那彦成便立即“将茶粮断绝”，迫使其“立见穷蹙，愿归原牧”。边茶在这些地区的控制性行销，成为清廷治理及稳定该地区统治的“武器”。从总的情况看，清代的边茶行销，开放与供应是主流，禁限只是在个别地区特殊情况下的暂行措施，控制购买量，是在供其需求基础上的控制。因而从总体上而言，清代的边茶茶法比起以前宋明两代，具有进步性。

鸦片战争以后，商路大开，对外通商口岸不断增多，由沿海扩大到内地，为商茶的出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内地茶已不需要辗转贩运至广州一口与西方诸国交易，省却长途载运之劳及诸多脚费。当时全国形成了三个大的茶叶集散市场：汉口、上海、福州，不仅洋商云集，而且国内的华人茶商也多至此交易。其中汉口之茶，主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诸省所产，远销俄国及国内的河南、陕西、青海、新疆诸省，而以输俄为主。集于汉口之茶，大部分是加工成砖茶，输往俄国。上海茶业的对外贸易尤为兴盛，上海茶除本省所产外，其余由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省运来。江西、安徽的红茶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

江绍兴茶输往美国，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以加工本省红茶闻名，其红茶多输往美洲及南洋群岛。除此三大市场外，广州、天津、芝罘（今山东省烟台市）也有一定数量的茶叶交易。同治中至光绪十年以前，也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这十几年间，是华茶出口的高峰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达一亿斤以上，其货值占出口货物总价值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多时达到一半以上。洋商购茶由中国出口，清海关收其出口税，出口税每百斤茶仅收取银二两五钱，而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中国海关茶叶出口的低税率，及华茶品质之佳，是洋商大批套购华茶，华茶出口量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转贸茶叶获利丰厚，也促使其他国家开创、发展种茶业。印度种茶始于道光中，至光绪初年，产量已相当可观，其他如日本、锡兰、越南、意大利诸国，也都发展起了植茶业。美国于咸丰八年（1858 年）从中国购买茶秧万株，移植本国，其后每年从中国购买十余万株。海外诸国植茶业的发展，对中国茶叶的出口量造成一定影响。华茶口味品质胜过其他国所产之茶，但焙制技术比起其他国家却又大为逊色，也影响了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华茶多以手工焙制，在成本上也高于机制茶。造成华茶成本高的另一原因，是清政府对商茶课税征收的不断增加。道光以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已成捉襟见肘之状。咸丰以后为了筹措军费及战争赔款，苛捐杂税不断增多，茶税的征收同样名目繁多，其增加的项目中，加征税额最大的是厘金和捐输，分别称为茶厘、茶捐。江西省自咸丰九年后，每引茶除境内抽茶厘银二钱，出境又抽银一钱五分，另外还于产茶及设立茶庄的处所劝办茶捐，每百斤（一引之数）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同治初，浙江省的箱茶每引抽茶捐九钱，厘银一两四钱。外省茶运经浙江关卡，每引抽厘银八钱，不收茶捐。光绪年间，茶税项目有增无减，如安徽茶，以一百二十斤成引，每引完纳正课银三钱，公费三分，厘捐

银九钱，又公费银五分，另捐输银六钱，共一两八钱八分。后因对日本战争筹饷，每引又加征了三钱六分。贩茶至其他省分，所过关卡还要抽税。该省歙县、黟县、休宁县之茶，均由新安江运到浙江省，浙江境内首卡，每引抽厘金二钱，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又加抽八分，又另抽关税银一钱。首卡抽完后，其他关卡只验不抽。若运至浙江海关宁波，则还要收取每百斤二两五钱银的出口税。设若运至杭州过塘，由嘉兴至上海，则每引须纳浙江塘工捐银五钱。这一道道的税捐，使茶的成本价格不断增加，而洋茶（即其他国所产之茶）由于价格低廉，对华茶的外销构成威胁，使华茶不得不压价出售，以前上等茶每百斤可售至八十余两银，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仅售四十两，降价一半，以前十五、六两银一百斤的下等茶，降为每百斤八、九两。茶价大跌，茶税却不断增多，导致茶商的大批破产。正如两江总督曾国荃在光绪十四年上奏折所反映："皖南茶厘，军兴时需饷孔急，税捐为数过重，迭次奏减，茶商尚形竭蹶。近年印度茶日旺，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致华商连年折阅。据皖南茶厘总局具奏，光绪十一、二年，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十三年亏折尤甚，统计亏银将及百万两。"① 茶商亏折，茶引滞销，出口量锐减，至光绪二十几年，已由光绪十年左右每年出口的百余万担（每担一百斤）降至每年数十万担。其结果是清政府茶税收人的大幅度减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廷饬令各产茶省份减少茶税，以期"减税轻本，使销路渐旺"，减税后严禁再行加厘。有些省份在此以前，已经实行合并诸税为一，采取一次性征收的办法，收到一些成效。清廷还饬令各产茶省份，令各地方官加意整顿茶务，使茶商等讲求焙制之法，严禁搀和劣茶，以提高华茶质量及其竞争力。宣统初，汉口、福州都从外国购人制茶机器，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42 "榷茶"。

且由印度聘请技术熟练的制茶教师。某些省还采取贷款于茶户，以扶植其发展茶业等办法。此后，华茶出口稍见畅旺，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且此时的清王朝也已濒临灭亡了。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卷30“榷茶”。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榷茶”。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42“茶课”。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茶法”。

银法始末

清代的金融市场通行两种货币，即白银和铜钱，一般是大宗交易及政府税收等用银，零星支付用钱（即铜钱，又称制钱）。清政府以银为主币，以钱为辅，以银准钱，即以银为固定价值，来规定银钱比价，如乾隆帝所说："价值之多寡，原以银为定准，不在钱之低昂。"这种货币制度，时人又称之为是"以银为本，以钱为末"。

白银虽然取得了主要货币的地位，但它并不是以铸币的形势流通，在使用过程中是实行称量制，而且还需要检验银的成色——含银量，再加上各地称量标准不划一，因而带来使用上的诸多不便，银两流通管理的法则——银法，也相当复杂。

清代的银两沿袭元明以来的习惯，铸成锭形使用，其形状大体有四种：一是"元宝"，也叫"宝银"，重五十两，锭为长园形，两端上翘，形如小船，扣过来则又形似马蹄，故又称"马蹄银"。各地流通的宝银形状也不尽相同，所以还有诸如长槽、方槽、单倾、双倾等等名色。二、中锭。重十两，或七、八两不等，多做成锤形，也有做成宝银形的，称为"小元宝"。三、锞子，也叫小锞、小锭，重一至五两不等，多做成小馒头形。四、滴珠，又有福珠等名称，为一两以下的散碎小粒银。熔铸银两的行业或机构叫银铺，又名炉房、银炉，分为官私两种，官设银铺多附属于官府的财政机构，如关税局、各级政府的府库等等。私人开银铺也须经官府许可，发给执照。商民使用的银两，自由赴

银炉熔铸，这与铜钱的铸造由官府垄断严禁私铸的钱法不同。银炉各号要对所铸银锭的重量、成色负责，所以银锭上要铸上银炉所在地、字号、银匠的名字。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还规定，各省解送中央的地丁元宝，“于錾凿州县、银匠姓名之外，再行錾凿年月”，以备查核。若成色不足，或者元宝的底面与上部银色不一，除将承办者参究治罪外，所解银两运回，重新熔铸交纳。①

银两的成色与重量，是流通中的两大主要问题。清官府所发放使用的银两被称为“纹银”，其成色定为十成，所以这种纹银又有“足纹”之称（实际达不到十成纯银），而各地、商民所行使的银两成色极不一致。由于各地银炉所铸的元宝成色不一，形状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又有江南、浙江地区的元丝；湖广、江西等地的盐撒；山西的西槽、水丝；四川的土槽、柳槽、茴香；陕甘地区的元槽；广西的北流；云贵的石槽、茶花等等名色繁多的银锭，不下几百种。各地不同名目的银锭，成色不一，在交易时皆按官府规定的十成足纹为标准折算其纯银重量。清代，银两的称量标准，各地、各部门也颇不一致，这种标准称为“平”，它是指天平称量时某一单位（一般是指两）砝马的重量标准，所以又称“平砝”。全国所用之“平”多达几百种，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库平、漕平、关平、市平。库平，是政府征收赋税和出纳银两时所用的重要标准，为康熙时所制定。中央的库平与各地政府的库平也不一致，广东库平最大，宁波最小。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划一度量衡制，规定库平一两等于三十七点三零一克。清平，是漕粮折色征银所用之平，其平砝比其他平小，漕平一两实际重量为三十六克多。关平，是海关所用的标准平，为咸丰八年（1858 年）制定，关平平砝较大，一两约合三十七点七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82“银库”。

九九三克。以上三种平又称官平，其标准都是政府所规定。市平，与官平相对，是民间市场授受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种类繁多，各地不同，如广东的司马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公砝平，钱业间通用的钱平等等。市平较小，所以雍正十一年（1733年）规定，“各处杂项银，均以市平交纳，每千两较库平少三十六两，应照依库平折算兑收”①。

为了维护银两的流通秩序，清政府对伪造假银者处以严厉的惩罚。清初规定：凡伪造金银者，为首之人杖一百，处三年徒刑，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减一等；以锡镙充假银者，杖枷后流三千里。乾隆五年（1740年），根据新发现的作伪现象，又规定：凡将铜、锡、铅、铁用药水煮后冒充白银行使者，如果是旗人，鞭枷后发配黑龙江地区；民人犯者，杖枷后发往云贵川广烟瘴之地。将银凿孔注入铜铅，或者将铜铅倾熔成锭，外边包银使用者，处杖徒之刑。

清代，百姓交纳地丁赋税主要是交银，地方官府解交税银，需要将这些散碎银熔铸成锭，地方官以熔铸时有伤耗为由多征，这就是赋税征收中所谓的“火耗”。康熙后期，火耗征收大大超过实际损耗数，这种加征名目，成为官吏搜刮百姓、贪污中饱的重要手段。由于火耗加征不断增加，雍正朝不得不实行“耗羡归公”的改革，此后加征火耗减少。但随着吏治的败坏，乾隆中期以后，火耗加征又泛滥起来，且超过了雍正朝。在勒索百姓上，官银铺也充当了丑恶的角色。民间交纳赋税的银两，各种成色者均有，需要投银铺冶炼铸成符合纳税标准的“足纹”银锭，“官银匠当倾熔之时，每苛估成色，横加勒索”。凡官银铺所铸，都有他们的戳记，各州县官银铺皆为一体，狼狈为奸。银两解到州县后还须铸成五十两之元宝方能上交。州县银铺若见没有他们这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80“权量”。

一系统的字戳，“也以成色低潮禀官，责令纳税户补交”。为了制止官银匠包揽熔铸借机勒索的弊端，雍正二年，责令地方官选用诚实者充当银匠，百姓可随便赴铺倾熔，若州县官银匠拒收没有其戳记之银，借端勒扣，由督抚指名参处。①

这种落后的银两制度，手续繁杂，弊端百出。为了减少银两交易过程中的麻烦，有些地方后来又设立名为“公估局”的组织，公估局负责鉴定银锭的成色、秤定其重量，再根据本地流行之“平”，折合成该地银两之数，记于银锭之上，加盖该局之印为证。经过公估局验定标记的银锭，便可在当地以银锭个数或标记数字流通，而不必再验色、秤量。公估局之设立须经所在地官府批准，并由当地钱业公会等金融机构认可。公估局的设立，方便了银两的使用，减少了很多手续，但它只是流行于本地区。由于各地平砝不一，跨地区、长途携运银两仍需验色、称量、折“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性市场贸易的扩大，落后的银两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外国银元的流入，为银法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嘉道时期，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外国银币流人中国市场。这种银币当时称为洋银、番银、洋钱。外国银元流人之始，人们是以银两对待它，也鉴定其成色，秤其重量，加戳记于其上。后来发觉各种银元的规格、重量都有固定标准，于是便以个数交易行使，这种计算简便易行的优点受到人们的欢迎，乐于使用，导致外国银元价值的提高，每枚含银量库平七钱二分的银元，便可抵当纹银八钱左右，有些外国投机商人便专门贩运洋银元来换取中国的银锭，熔铸成银元后再运进中国。嘉庆十九年（1814年），据当时官员估计，每年仅此项偷漏运出的银两就“至百数十万（两）之多”。至道光初年，外国银元已自福建、广东、江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15“钱币三”。

西、浙江、江苏诸省渐至黄河以南各省，广泛流行，计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等名目的银元多种。当时这些地区，“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1] 银元的流行、价值之提高，也引起民人仿造。中国自造银元，始于西藏地区。到了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又正式规定铸造“乾隆宝藏”银币，这种官方铸造银币，当时仅限于西藏地区。道光时期，福建的漳州及台湾，以及广东、江浙等地已有民人仿造洋钱的银币行使，但由于属于非官方铸造，规格不一，制造不精，且有减重及造假现象，所以未能流行开。道光中至光绪初年，清廷官员中不断有人倡议设官局铸造银元，以抵制愈益流行的洋元，但始终未形成制度。由于外国银元流入日多，使用地域也更为广阔，对中国金融之影响越来越大，光绪十三年（1887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于广东省设铸币厂，聘请外国技师，购置外国机器铸造，获得批准。两年后，该省铸造的银元开始流行于市场，所铸银币名为“光绪元宝”，标明“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背面铸有龙形图案。并铸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元。这种铸有龙纹的银币俗称“龙洋”，由清政府下令作为通用货币，民间交纳赋税及市场交易，均得使用。此后，湖北、江西、直隶、浙江、江苏、安徽、奉天（今辽宁）、吉林、四川等省也相继开局铸造。由于当时尚未规定统一标准，各省所铸之式样不一，且各省以铸币而谋利，致使所铸银元成色不一，影响了银元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于是在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规定各省所用银元统由广东、湖北两省铸造，并于光绪三十一年在天津设立造币总厂，拟铸金、银、铜三种货币。当时清政府官员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改铸一两一枚的银元，理由是当初仿行洋元铸七钱二分的银元，是为了抵制外国银元的流通，本属

---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19 “钱币上”。

权宜之计，而当时的财政收支等仍沿用以重量计算的制度，七钱二分之币不如一两之币计算方便；一种意见主张仍维持七钱二分一枚的制度，他们认为各地向来流通七钱二分的银元，且这种规格之币自铸以来，数额已相当大，铸行一两之币，必定滞碍难行，且造成混乱，主张仍维持旧的习惯。银元重量的标准问题断断续续争论了十几年，宣统二年（1910年）才最后决定仍以七钱二分的银元为标准币，并以之为单位——元，收支计算以元为单位。同时规定铸币权统归中央，停止各省自行铸造。这一规定，既是为统一币制，提高国铸银元的信用和地位，使之成为本位币而畅行全国，同时也为了削弱各省财权，强化中央的财政控制。但这一制度仅实行一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还应指出的是，在此以前，虽然已有大量的自铸银元流通，由于旧有的银两制度仍有很大的习惯势力，大宗商业交易及政府收支仍沿用银两论价、记帐的办法，旧的银锭仍有一定数量的流通。但银币的铸造与使用，毕竟是中国币制改革的一大进步，它的优越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前途，为以后的废两改元，确定本位制开拓了道路。银元的流行，对于当时的经济的发展及减少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量，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

《清朝续文献通考．钱币考》。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82“银库”。

钱法始末

钱，主要是指以铜所铸之币，也即铜钱。清王朝沿袭往代封建政府旧制，把钱的铸造发行权垄断于官府手中，严禁私铸。清代在户部设有钱法堂，置督理京、省钱法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在中央和各省设铸钱局，由政府规定钱的铸造样式、质料成分、钱的重量及其在流通中的价值，统一铸造发行。所谓钱法，也即管理钱之铸造、发行、流通的法则。

清代虽规定货币以银为主、以钱为辅，但在当时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零星交易所用的钱，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货币，钱的流通状况，对社会经济秩序及百姓生计关系甚大。在货币的管理上，清政府对钱的管理也比银要严格得多，因而钱法是清代货币制度中的主要内容。

官府对钱的管理，主要是保证钱价的稳定、钱量的足用、钱质的标准性及其流通信用。按照钱的流通及官府的管理状况，清代钱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清初至乾隆初，是官府不断变更钱重、钱的质料成分，以维持钱价稳定、保证官铸制钱之流通的时期。因为做为铜质的钱，本身又是金属物品，有其市场价格，每枚钱的含铜量、钱重，都会影响到钱价及其流通，所以制定并调整钱的含铜量及钱重，便成为钱法中的重要内容。

顺治元年（1644 年），清政府刚刚定鼎燕京，随即设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两个铸钱局，铸“顺治通宝”钱。此后每当新

皇帝登基改元，便改铸以其年号命名的铜钱。顺治初拟定的钱质成分为红铜七成、白铅三成（所谓白铅，乃古代对锌的误称），俗称铜七铅三。每枚铜钱的重量为一钱，价值为一文。这种由政府铸造发行，且规定其面值为一文的单一性铜币，又称为制钱。制钱每千枚为一串，或称一贯、一吊。铸钱的数量以“卯”计算，一般以一万二千串为一卯。中央制定钱制以后，随即将“顺治通宝”钱式颁发各省，令地方开局鼓铸。各省以布政使总理其事，由铸钱局所在府的知府、同知或就近之道员分管。从顺治元年到顺治七年，先后有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山西、湖广、江西、江南、甘肃、广东、浙江、福建等十几省开局鼓铸。顺治二年，更定每枚钱重为一钱二分，并定每七文准银一分，即银、钱比价为一两比七百文，一两白银可兑换制钱七百枚。实行两年后，因所定钱价较高，遂于顺治四年重定钱价，与银之比价为一两比一千文，即一千文铜钱与一两银等价兑换。此后，清政府便以这一比值衡量钱价的贵贱，制钱在市场流通时若低于一千文兑换银一两，便称为钱贵，超过一千文，则属于钱贱。顺治八年，以钱虽增重，犹嫌其轻，定为改铸每枚一钱二分五厘重。顺治十四年，清廷下令停止各地方鼓铸，统归京局，原因是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私铸蜂起，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并再次更定钱重，每文重一钱四分，且要求京局精工制造，力图使私铸无利，难于作伪。同时制定严惩私铸刑律，为首者及私铸匠人，判以斩监候之罪；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判绞监候；钱铺等将私铸之钱搀和使用，杖责后流放边远之地。顺治十八年，因私铸小钱不能禁绝，故加重了对私铸者的惩处，为首及匠人斩立决，家产入官；为从及知情买使者，绞立决。顺治末年，清廷又恢复地方鼓铸。此后，根据制钱流通情况，决定地方铸钱局的停与开，鼓铸过多，官钱壅滞，则暂停。

改铸一钱四分重的重钱，并加重对私铸者的惩处后，私铸现

象减少，但因钱重，毁重钱而造铜器，在当时可以获利，又导致另一现象即私毁制钱的大量出现，以致“制钱日少，价值腾贵”。康熙二十年左右，银一两仅换制钱八九百文。针对以上情况，清廷曾采取如下措施：一、重惩私毁制钱者，规定私毁与私铸同罪，失察的官员，定以革职、降职、调用或罚俸等处分。二、禁限铜器的铸造。除铜锅外，凡乐器、镜子、饰件等民间必用物，只许造卖五斤以下者，此外一概禁造，犯者治罪。以上措施宣布实行后，并没有解决问题，私毁现象仍很严重，清廷不得不再次在钱的本身上作文章。康熙二十三年，又将钱的重量改轻，铸每文一钱的轻钱，并改定铸钱质料的搭配比例，减少含铜量，由原来的铜七铅三，变为铜六铅四。令京局及各省一律按新定钱制鼓铸。同时加大京局的鼓铸量，仅户部宝泉局便由以前每年铸二、三十卯增为年铸四十卯。新钱法实行后，私毁现象大大减少。但由于钱轻，以铜铸钱有利可图，私铸现象又开始泛滥。

康熙四十一年，为遏止私铸，清廷又恢复每枚一钱四分的重钱制，仍以千文准银一两，旧小钱千文准银七钱。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价值较便宜的劣质旧小钱的流行，阻碍价值较贵的新铸重钱的流行，以致“大钱壅滞”。康熙四十五年，清廷令发户部库银，收买旧小制钱。其实加大钱的重量，并不能制止私铸，一方面仍有人私铸小钱，搀和在大钱中行使。另外，钱重以后，有人则毁大改小，从中获利，而且由于当时市场铜价昂贵，因而毁官钱，成为康熙末期至雍正初钱法败坏的主要表现。雍正上台以后，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于雍正五年再次减少铸钱含铜量，定“以铜、铅各半配铸”之制；[①] 二、减轻钱重。雍正十二年，以一钱四分之钱“钱重铜多，徒滋销毁”，定每枚一钱二分之制。[②] 此后，一钱二分重之钱制沿用了一百二十年左右，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15“钱币三”。
② 《清朝通典》卷10“食货十”。

直至咸丰初年。乾隆五年（1740年），对铸钱质料又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即在钱中加锡，铸青钱。以前所铸之钱，为红铜、白铅（锌）合成，金黄色，称黄铜钱。此后加入少量黑铅与锡，所铸钱呈青色，故称青钱，这种青钱质脆，毁熔后锤击即碎，无法打造铜器，因而改铸青钱后，对遏止私毁制钱打造铜器起到了一定作用。青钱的含铜量，仍沿用雍正十二年“铜半”的制度。

这一阶段，钱的重量、成分比例屡次更易，钱轻则私铸，钱重则私毁、或毁重改轻，含铜量高，市场铜价高，则易引起私毁。无论私铸还是私毁，都会影响官钱的流通及钱价的波动。经过多次变更，清廷终于摸索出大致接近客观规律的定制。至此，以调整钱重、钱质为主要手段的钱法暂告一段落。

从乾隆初到咸丰初，是清代钱法变动较小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乾隆初至嘉庆末，这一阶段，清廷主要是以增减鼓铸量，来维持调整钱价的平稳。

乾隆一朝，其钱法主要表现为大量鼓铸，防止钱贵现象的出现。早在雍正继位伊始，相当多的官员便认为“钱价腾涌，总缘制钱尚少”，“制钱日多，钱价自平”。[①] 当时京师钱价甚贵，每“银一两仅易钱七百八十文”。[②] 为了加大鼓铸量，清世宗几次下令收买旧铜、铜器皿，甚至令各省旧欠钱粮折收铜器，以资京、省鼓铸。乾隆初，钱价仍然昂贵，京城纹银一两仅换钱八百文。清高宗仍用增加鼓铸量的办法以平抑钱价。为了扩大铜源，他继位以后，便令江浙督抚出示遍谕：“商民得自行出洋采铜。”[③] 出洋采铜，主要是指东渡日本采购洋铜，在此以前，先是由内务府商人承办，后来又改交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八省督抚委员办解，都是政府委定的官商，至是向商民开放，有愿贩铜者，官

---

① 《清考》第4981页上。
② 《清考》第4981页上。
③ 《清考》第4994页上。

给“倭照”，听其出洋采购。与此同时，放松矿禁，扩大铜矿的开采。乾隆三年上谕：“凡係产铜山矿，令地方官辨明砂色，实有裨于鼓铸，始准结报开采。”① 当时云南产铜正旺，乾隆谕令以前由各省商办解京之铜，完全由云南供给，商办铜分解直隶、陕西、江苏、江西、湖北五省以供鼓铸。乾隆三年以后，由云南解往京师铸钱之铜，每年达五百八十九万斤②，宝泉、宝源二局的铸钱量也显著增加，乾隆七年、十六年、二十五年三次加大鼓铸量，每局由雍正年间的年铸四十一卯各增至七十六卯。地方上，自乾隆四年至三十三年，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数省，也都增炉加卯，扩大了鼓铸量。到乾隆三十五年之时，已是“官钱广铸流通，迩年钱价平减”。③ 云南则已出现钱贱现象，银一两可易制钱一千二百文。此后，陆续减、停各省鼓铸。并命各省按月查明钱价“有无增昂，按季报部”，以便调济鼓铸量。乾隆后期，京、省各局基本上是减卯鼓铸，至乾隆五十九年，各省钱局全部停铸。嘉庆元年，因铸“嘉庆通宝”钱，各省复开炉鼓铸。

嘉庆初，又一度出现钱价上涨现象。嘉庆九年，户部等反映“京城钱价过昂”，外省“钱价腾贵更甚于京师”。这一时期钱贵，嘉庆君臣认为是由于各地方钱局不能按卯数鼓铸，钱少所致。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用去巨额军费，官府库藏二亿多两白银由原来的储藏形式进人流通领域，钱贵，当是银多导致。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当时由于鸦片贸易的日益猖獗，外国商人还以洋银元套购中国的纹银，白银大量外流，所以嘉庆中期以后，尽管鼓铸量较以前减少，而钱价却逐渐跌落下来。嘉庆后期，钱价趋平，至嘉庆末道光初，便已转为钱

① 《清朝通志》卷 90“食货略十”。
② 乾隆《大清会典事例》卷 44“钱法”。
③ 《清高宗实录》卷 857。四月甲戌条。

贱了。

道光初至咸丰初，是银贵钱贱，清政府又应付无方的时期。清宣宗继位伊始，各地钱贱的消息便接连报来。道光四年，福建省由于“钱价日贱”，暂停鼓铸；十年，“直隶省钱价日贱，暂行停炉”。[1] 银价猛涨，钱价迅速下跌，不可遏止，至道光十八年，每银一两已可换制钱一千六百多文。银贵钱贱，受害最大的是基层百姓，他们手中所有的货币，主要是制钱，钱的贬值，无疑使其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再有，是有田的纳税户，尤其是经济力量较弱而又没有权力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小地主，他们交纳田赋是用银，银贵，则实际负担加重。商人纳税交银，也深受银贵之害。正如道光十三年给事中孙兰枝所反映：“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小民完纳不起，影响官府征收，官吏全力催科，又会“激成民变”。总之，银贵钱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秩序、百姓生活乃至统治的安定，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恐慌。但当时清廷在钱法上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对策，仍然沿用乾隆后期以来的减卯、停炉办法，至道光二十一年，“停铸省份至十一省之多，且停铸多年”。[2] 另外，是动用官帑，收买民间制钱，减少其流通量。道光八年，江苏、河南两省，皆拨库银二十万两，易钱暂贮，以提高钱价。广东、福建两省，则设局收购该地流通的外国铜钱。十三年，又命各省收购或收缴劣质价低的小钱。但如上种种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白银外流、银少而钱贱的问题，银钱比价有增无已，至道光二十八年，京城银一两已经值钱二千文。

咸丰初至清亡，是清代钱法败坏，钱币之制混乱，向新的钱币——铜元过渡的时期。

咸丰初年，银贵钱贱现象仍相当严重，正当此时，太平天国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19“钱价”。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钱币一”。

势力已发展到沿长江各省，清政府用于铸钱的滇铜已极难运至京城。另外，由于清廷财政严重匮乏，为筹措军费，除了发行官票外，还铸造面额远高于实际价值的大钱，从而造成钱法大坏，币制混乱。从咸丰三年（1853 年）以后，所铸造的大钱有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多种，当十大钱重量为六钱，当制钱十枚，当时的制钱也减重铸造，一枚重一钱；当五十大钱重量为一两八钱，当制钱五十枚。咸丰四年，还铸造当十的铁钱和铅制钱。大钱刚一发行，就引起了物价腾贵，人们怀疑它的信用，拒绝收用，使得当千、当五百大钱根本行不通，很快宣布停铸。当五十、当十大钱也不得不贬值行使，当十钱后来在市场上实际是当五、当三行使。大钱的发行，也引起了私铸现象的泛滥。大钱制度由于难于推行而迅速失败，咸丰七、八年以后，只有自贬其值的当十钱才得以在市面上流通。同治朝，所铸铜钱有两种，一种是一钱二分重的制钱——同治通宝，一种是重三钱二分的当十钱——同治重宝。当时由于制钱的多年减铸、停铸，以及民间的私毁，社会上流行的前几朝的制钱已经很少见了，清政府不得不竭力挖掘铜源以铸钱。光绪帝继位后，继续铸造当十大钱，但再次减轻钱重，一枚净重仅二钱六分，实际行使也是当三、当四。至光绪十二年（1886 年），宣布停铸大钱。次年开始，铸“光绪通宝”制钱，成分为铜六、铅四，而钱重减轻，开始为一钱，后来又减至八分，地方铸局还有铸六分一枚的。钱轻，容易出现私铸，为抵制私铸，清廷于光绪十五年命广东等省钱局用机器铸造制钱，机制制钱制造精美，很受社会上欢迎，对防止私铸也起一定作用。但由于当时铜价昂贵，银价下跌，铸钱亏折，到光绪二十年后便宣布停铸了。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新的币制——机制铜元在客观需要下应运而生。

光绪二十六年，首先在广东铸造机制铜元。铜元为中间无孔的铜币，广东最初铸造的铜钱每枚重二钱，成分为铜占百分之九

十五，白铅占百分之四，锡占百分之一，每枚当制钱十文。铜元式样新颖，造工精细，发行以后，颇受社会欢迎。由于制造铜元钱局获利丰厚，各省钱局竞相铸造，以致机造铜元成为当时官府的一项重要生财之道。至光绪三十一年，已有十七个省共二十多个钱局铸造。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在天津的户部造币总厂也开始铸铜元，名为“大清铜币”，币分四种，大者重四钱，当制钱二十文；次者重二钱，当制钱十文；又次者重一钱，当制钱五文；最小者重四分，值制钱二文。此后，各省铸局也纷纷仿铸。大量铸造，导致了铜元的迅速贬值，铜元初造之时，九十枚左右可换银币一元，到光绪三十四年，已降到一百二三十枚兑换银币一元了。[①] 而且各省所铸成色也并不完全一致，为获取铸造余利，还出现一些劣制铜币，致使价值也参差不齐。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又颁布“币制则例”，新制的铜元，单位又改为二分、一分、五厘等，致使币制更加紊乱。但实行未及一年，清王朝便被推翻了。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

《清朝续文献通考·钱币考》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14至卷220。

①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5编第35页。

盐法始末

盐为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是销售量极大的商品，因而历代统治者都把盐的税课做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为了保证税课的取得，官府对盐实行控制下的专卖制，宋元以来，实行引盐法，引是官府发予的盐商售盐的凭证，国家据所发之引向盐商征课，盐商据引购盐、销盐。引有额定斤数，凡无引之盐、超过引额之盐及以残引所售之盐皆谓之私盐，对售私盐者，官府严厉惩治。清代对盐的行销管理有官督商销、官运商销、官督民销等多种形式，主要是官督商销，这种形式实行时间长，且地域广，占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为了便于官府督销稽查，盐商的购、销有固定产地、区域。清代产盐地，内地有十一处，每处所产之盐都被规定固定的行销区域：长芦，其盐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其盐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其盐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两淮，其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两浙），其盐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其盐行销福建、浙江两省，其中台湾盐行销本地；广东，其盐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以上为海盐。四川、云南所产为井盐，四川井盐行销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诸省；云南井盐销于本省。陕甘、河东产池盐，陕甘池盐行销陕西、甘肃两

省；河东池盐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①]

清代管理盐法的机构，在中央为户部的山东清吏司，宣统时改为督办盐政处。地方各大盐区，事务较繁者设盐运使司，事务较简区域以盐法道、盐粮道、盐茶道等兼理。盐运使掌管某一区盐的产销、征课、稽私等，其下设有运同、运副、运判、提举及监掣同知、库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盐课大使、巡检等分司其事。盐法道也设有类似属官。盐斤进入各行销区后，为保证官引盐的畅销、税课的落实，清廷规定督抚等地方官也负有本地区的督销之责。另外，中央还向各大盐区派遣巡盐御史，后改称盐政，督察稽核该区盐务。雍正后，各盐政陆续改归督、抚兼管。盐法的以上管理，即所谓"官督"。

官督商销中的商销，沿袭了明中后期以来的制度而有所发展，其特征是盐归商收专卖，这种销盐法，是中国盐业史上的重大变化，其结果是销盐由官垄断下放为商垄断，从而产生一系列影响。

明初沿宋元旧制，由盐户按丁办盐，交纳官仓。盐商领得官引，纳课后凭引到官仓支盐。弘治、正德以后，官府向盐户所征之盐逐渐改征折色，即收银钱，盐户必须卖其所制之盐才能得银，盐之交官变成了交商，官收盐逐渐变为商收盐。清初规定，各省滨海及有盐池、盐井之地，任由灶丁制盐，与商交易，各盐场之盐悉归商收，废除官收之制。此后，资力雄厚的商人贷资于灶户，收其盐，控制灶户，成为垄断性的征收盐斤的"场商"。有些场商则置场募丁，兼营制盐业，从而又形成了擅制盐、收盐专利的场商。

盐的行销沿袭了明万历末年所创行的纲盐法。纲在这里是分批、分组之意，目的是便于管理。销盐之商谓之运商，它是相对

① 以上见《清史稿》卷123"盐法"。

于收盐之场商而言。行销盐斤之运商，必须列名纲册，请引交课办盐。为了便于督销，保障引课的落实，清廷还实行"总商"包税制，即以殷实富商领引多者承办盐务，引少之散商须集于总商名下，由总商承领一定数额之引，负责交课，所承领者一般是某纲之盐，故这种总商又有"纲首"之称。领引纳课，盐政衙门便责成于纲首。清初规定，认引之商照额运销，按时完课，如有引未销完课未缴足者，即将该商革退，别募殷实商人接充。但由于销盐有垄断性厚利，盐商多成殷实富商，他们买通盐务官，因而很少有革退之说。成为巨富之盐商，长期包销纲盐，甚至世代相承，国家印发的盐引到了承领之盐商手里，成了获利之资本，乃至出租、高价出卖而坐收其利。另外，由于行销实行引岸制，某产区之盐有其固定的行销区，因而，承引者往往垄断了某一区域州县的盐引，形成其"专岸"。子孙世袭其业——时间上的垄断，专岸——地域上的垄断，是盐商垄断盐斤行销的两种主要形式。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是盐业史上以商专卖制为主要形式的纲盐法的重要特征，也是它的弊端所在。

以上便是作为清代盐法主体的官督商销法的基本状况。

人关之初，清廷致力于全国的统一，盐课是其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由于战乱频仍盐商弃业，制盐灶丁逃亡的现象非常严重，清廷采取了招徕、抚恤灶丁、整修恢复盐场、优惠盐商以招商办课等等措施，逐渐恢复了盐的产销。随着盐业的恢复，军需的增加，清廷屡次以增引来增收盐课。而当时由于经济凋敝、人口大量减少，销盐量不大，至顺治末便造成盐引积滞、额课亏欠的现象。康熙初曾采取疏销积引的办法，但不久三藩之乱复起，情况并未改观。

三藩之乱平定后，海内承平，经济恢复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食盐的消费量不断增加，为盐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当时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及两淮之淮南，"先后增引，

利获三倍”；四川由于外省人大量涌人，“食盐日多，请引数倍于昔”；在制盐上，福建、广东、两浙等地，由于“招徕灶丁，垦复盐地、盐塘，报部升课者不绝”。[①] 盐业发展、销引旺盛，国家的盐课收入因之不断增加，三藩之乱结束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全国额征盐课为二百四十万两，康熙后期增加到三百七十万两，雍正初为四百多万两，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增至七百余万两[②]，占当时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左右。盐课大量增加，是乾隆时期财政充裕，形成盛世局面的原因之一。由于盐业兴旺，盐斤销售量的不断增加，很多盐商发了大财，尤其是两淮盐区的盐商，富者可逾千万（两），成为清代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富商。他们的丰厚利润，来自于对盐业的垄断性专卖，而这种条件或者说特权，又是封建官府的赐予，因而盐商与官府、与盐务官员的结合及其互相利用，便成了影响当时盐法的重要因素。盐务官在清代是有名的“肥缺”，其所以“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收受到盐商的规礼，盐商为保持他们的垄断特权，也把其利润拿出一部分买通这些官员。这些规礼之送收，当然是打着为公如解决行政开支等名义，因而这些“陋规”也就成了盐务中历代相沿的常例。报效，是盐商结好官府、官府利用盐商巨资的官商结合的一种形式。每当清廷有重大军事活动需用军费，或水利土木工程之兴、赈灾等，各大著名盐商皆捐助款项，乾嘉两朝，长芦、山东、两淮、两浙、两广、河东等盐区盐商以如上名义报效清廷的款项，共计白银达六千五百万两[③]。此外，盐商们还以万寿节庆备办贡物、修建南巡行宫等等方式孝敬皇帝。有时，清廷还把官款发放给盐商做为运本，向他们收取

---

① 《清史稿》卷123“盐法”。
② 康雍两朝据《清实录》每年末之统计数字。乾隆朝据《清史稿》第13册3606页。
③ 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220页统计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利息。政府、官员与盐商分利，盐商则变幻方式从行盐中捞取，报效之款、官吏的规费规礼，则加在盐价之中。盐价本来由官府掌握控制，但因盐商报效而允许其提请暂时加价，名为暂时，实则加价之后，便不易减掉，且一加再加。盐商还获得了“加耗”的默许。加耗，即因装载运销过程中的伤耗，而每引之外增加一部分无课之盐，加耗还是合法的夹带之数，其引外私夹之盐斤更是不可究诘，盐务官吏们既得盐商好处，什么盐引批验所、巡检，还不向盐商们大开绿灯？还有的盐商为了牟取暴利，竟然在盐中掺砂使土，他们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把持着盐的专卖，且有官之袒护。官引之盐价高质次，大大超过其实际价格，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低价私盐的盛行，官引之盐滞销。引积难销，则盐课亏欠，官商皆受其困。为了保证官引的畅销，清廷对私盐实行严厉的禁私措施，在制盐之盐场，设官监督，巡役稽察控制，制订灶丁偷售盐斤惩治律，并实行保甲制检举；行盐之口岸设兵丁巡缉私盐，拒捕反抗之人，为首者处以死刑，为从者发边地充军。严厉的缉私并没有遏止私盐之兴贩，尤其是在当时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不少无业之人为谋生计而走上贩私盐的道路，甚至自动组织起来，对付官兵之缉捕。因而官府的禁私是禁而不止，对整治盐法的败坏效果不大。

在禁私的同时，清廷也进行了一些盐法方面的改革，比较重要的有乾隆时期的“盐课摊归地丁”和道光年间的“改引行票”。

甘肃及山东的某些州县，在雍正年间曾实行过盐课归人地丁，但影响不大。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在河东盐区实行的盐课摊归地丁，规模较大。其方法是，将河东盐应征的盐课摊入该盐区行盐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地丁钱粮也即田赋中征收，取消垄断性的盐商，废除盐引，商民可自由贩运。同时裁去“官督”销盐之盐务官。此次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由于取消了垄断性盐商的专卖及盐务官，减少了前述弊端，盐价降低，盐

斤畅销，商民争相贩售。河东地区无引课的廉价盐，不仅畅销本盐区，而且侵人其邻近的长芦、两淮引地，进一步造成了这两个地区高价官引盐的滞销，遭到这两个盐区盐务官及纲商的强烈反对。清廷理应把河东地区改革的成功经验向其他盐区推广，但是保守的嘉庆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为了维护两淮、长芦行引地之纲盐的行销，于嘉庆十二年（1807 年）又恢复了招商办运的办法。

两淮是清代行盐区域最广、盐课数额最大的盐区，同时也是纲盐法最典型运商垄断势力最强的地区，纲盐法的弊端在这一地区暴露得也最充分，私盐盛行，引滞课悬、运商困乏的现象在乾隆后期以后已越来越严重。道光十一年（1831 年），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北进行改引行票的改革。所谓改引行票，是指废除引制，取消包税的纲商，官府于各盐场设官收税，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即可领取“票证”贩盐，在淮北盐区内，可自由贩运售卖，不受过去地界的限制。同时，对一些浮费也进行了裁革，以减轻盐商负担，促进盐价的降低。票盐法实行后，盐价降低了，盐斤畅销。票盐畅行，官府的盐税也较以前显著增加。道光三十年，淮南地区也改行票法，但不久太平军攻占南京，江南及湖北等处经常处于交战之中，盐务整顿也已不复可言。除两淮地区实行票法外，道光二十八年长芦盐区的某些州县，咸丰二年河东盐区，同治年间两浙、福建两区，也曾进行改引行票的改革。但两淮地区的票盐法，则在同治朝以后，又逐渐失去其改革的意义。同治二年，清廷刚刚镇压完太平军，恢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治秩序，两江总督曾国藩便在两淮整顿票盐法，聚散商为整商，规定必须承领五百引方为一票，此为大票，需本银五、六千两，小票一百二十引，也需本银一、二千两，实际是取消了众多小本经营的散商的贩盐资格，重新造成资本雄厚的大商对行盐的垄断。同治五年，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为了筹措款项，又劝商捐款

报效，规定以捐款作为票本，销完之票仍可轮番使用，承为世业，不再招新商，此谓“循环转运”票法。从此，票商成了新的垄断专卖性盐商，原来票盐法的精神已不复存在。同治八年，继任者马新贻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北。不久，浙江也实行此法。纲盐法的弊端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清末盐法的另一变化，是官府对盐的垄断与控制有所增强，其主要表现是某些行盐州县改行官运，州县官领引办运，设盐栈批售，或售与商销，或官销。如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直隶、广东、陕西、江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都实行过这种办法。① 其原因，则是盐斤的抽厘、加价导致盐价日贵，私盐充斥，官盐滞销，盐商困乏，官府为行盐办课，而加强对盐的垄断与控制。

厘金制实行后，各种商品过卡抽厘，盐为大宗生活物品，因此成为抽厘的重要对象。盐斤加价，在清中叶时期即多次实行，自光绪朝后，远较以前频繁，且名目繁多、数额巨大，各省也以地方财政困难为理由，各自为政，纷纷搞“外销加价”。② 盐厘（金）的抽取及盐斤加价，使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大大增加，至清末宣统之时，实征“盐税不下四千万（两）也”。③ 宣统三年（1911 年），度支部的预算，便是“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④ 已接近田赋预收总额的四千八百余万两。无论是抽厘，还是加价，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盐价的增长。官盐价越贵，私盐愈甚，贫民购买困难，艰于淡食，于是聚众抢砸官盐店，这类事件，在清末各省屡次发生，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

清代盐法，弊端百出，虽经乾隆、道光年间改革，但最终又

① 曾仲丰：《中国盐政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出版，第 29 页。
② 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 140—142 页。
③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68“国用”六。
④ 《清史稿》卷 123“盐法”。

重蹈覆辙。迨至清末，盐税大增，盐法更趋败坏，且督抚各自为政，各省盐务纷如乱丝，越发不可整饬。

（杜家骥）

参考资料：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21 至卷 231。
《清朝文献通考》卷 28、卷 29。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4 至卷 40。
《清史稿》卷 123“盐法”。

漕运始末

漕粮，被封建政府称之为是“天庾正供”，在清代，它是宫廷及王公百官、京师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粮来源，因而漕粮之征、运，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清廷向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八省征收漕粮，额定四百万石，除去改征折色及截留它用的部分，实际征收一般在三百多万石。每年，这大批的漕粮，就是由水路，主要是大运河北运至通州、北京。这些漕粮，绝大部分是大米，其中输送到北京仓廒者，称为正兑米，供八旗及三营① 兵食之用；输入通州仓者，为改兑米，供王公百官之俸米。白粮，从江苏省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太仓州及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府征收，为糯米，分入京仓、通仓，供应内务府、光禄寺，及作为宫廷和紫禁城兵丁、内监与王公官员俸米等；另外还有豆、麦。黑豆，征之于山东、河南二省，作京师官兵养马、驼之饲料；麦，征于河南，人京仓，供内务府宫廷之用。以上几项，以人京仓的八旗甲兵之米数额最大，每年约二百四十万石。

清代漕运较之明代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所谓军民交兑，是指交纳漕粮之户将粮运至本州县之水次—水边停泊船只之码头，交兑给运军，由运军代为北运，但纳户须贴给耗米、轻赍银（路费）等。清初也曾沿用明代这一旧制，不

① 三营，为八旗兵中别设的几个特种兵营。

久，因运军借机向纳户随意勒索，此项费用大增，民不堪其苦，遂于顺治九年（1672年）改为官收官兑，即纳户将漕粮交与所在州县官府，官府收毕交兑与运军。官府酌定“赠贴银米”，随漕粮征收，支给运军。纳户“交完粮米，即截给印串归农，军民两不相见，一应浮费，概行革除”。[1] 这一做法，导致了清代漕粮征收、运输制度上的一系列变化，漕运中的弊端也以新的形式出现。

漕粮从征收到交兑、起运、督催、稽察、剥运、交仓等一系列过程中，事务殷繁，牵动之机构、官员、兵丁甚广，耗费巨大。

漕粮之征，除前述实物外，尚有改折及耗、费之征。改折之征有：一、永折米。江苏等省共折三十六万石有奇，折银征收；二、灰石米折。最初，运军办运灰石，给其漕米，征之于民，顺治十七年改征折银；三、民折官办。官向纳户征银，再买米以抵漕粮。其耗、费之征名目繁多：一、正耗。正兑米，每石多征加耗二斗五升；改兑米，每石加耗一斗七升。此项加耗，做为运耗、仓贮折耗及运军回船食米之费等。二、船耗，除山东、河南及苏北徐州府属州县不征此项加耗外，其他淮安以南诸有漕地区，每石另加征五升至二斗三升不等，以运途之远近定多少，以给运军由各州县水次至淮安一段路程之耗。漕费，或征银或征米，主要是征银，计有：一、漕耗银米，为耗外之耗，供官、军兑漕及州县办公之用；二、赠贴银米，已如前述；三、轻赍、易米折银，正兑米所征谓之轻赍，山东、河南每石加一斗六升；江苏、安徽每石加二斗六升；江西、浙江、湖北、湖南运途远，每石加三斗六升。皆折银征收，称为轻赍银改兑米，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每石二升加耗，折银征收，故又称易米折银。这两项

---

[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99“漕粮征收”。

征银皆征解通州仓场，为转运脚价之费。漕船至通州，若无挂欠，发予运军羡余银、扒夫银。四、行粮、月粮。各省运弁、运军，出运漕粮之年，各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三石不等，运军，月粮八石九斗至十二石不等，供运军运漕之费及养家糊口之用。此项“行月粮”，或折银征收，或银米各半，各因其地之宜。五、红剥船价，为水浅之处雇船分载之费用，征之于漕。六、席木银。仓廒苫盖所用之席、木、竹等，皆折银随漕粮征解。①

具体负责漕粮（包括白粮）征收的，是各有漕省份的州县官；分辖各省漕务的是粮道，山东、江安、苏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诸道各设粮道一人，河南以开归盐驿道兼理。凡一省漕粮征收之督催、漕船之修造、运弁之遴委、责令各府县佥选运军、检验漕粮之质量、稽察交兑、督押漕船起运等等，皆由粮道负责；监兑官，专门负责交兑；运漕者称运丁、旗丁，或称运军，每船一名，由漕运卫所军丁中佥选，每船另配水手九名，由运军雇充。各省漕船分帮起运，每省数帮、十几帮、数十帮不等，每帮之船有数十只，每帮以卫所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另设武举一人随帮效力护航；每省设押运一名，专司督押；总管漕运事务者为漕运总督，一名，驻扎淮安；另设巡漕御史，乾隆二年（1736 年）定为四员，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于运河分段巡察，稽查官弁对运丁的需索，查验漕船粮米、旗丁夹带私盐及各种违禁物品，督催运行，巡视河道，稽查河道之挑挖疏通，料理剥船，巡视仓储等。

每年十月，为各省漕粮征毕的限期，“兑运之限，皆以十一月”，届时，各监兑官须坐守水次，验明米色纯洁与否，将各船米数兑足，面交押运官。起运日期，随途程远近而定，淮安以南之漕粮，即南粮有过淮（安）之限；江苏、安徽两地，长江以北

---

① 以上据乾隆《大清会典》卷 13；王庆云《石渠余纪》卷 4“纪漕粮”。

为十二月，长江以南为次年正月；浙江、湖北为二月，江西、湖南为三月初；山东、河南之漕粮谓东粮，东粮不过淮，有开行之限，河南为正月，山东为二月。各省漕粮运输，结帮北上，一帮全到，随令开行。粮船起行，南粮，则监兑官、粮道须督押到淮安，交漕运总督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治以应得之罪。过淮之后，则由押运官随船帮而行，以约束运丁，防止沿途侵盗、搀和。东粮路近，则由粮道随船直接督押到通州。每年冬春，运河之中百舸千樯，结帮运行，船丁运夫数万，沿河纤夫不计其数。漕船抵达通州，仓场侍郎督令坐粮厅验收，米石潮湿，责令运弁运丁自行晒晾，亏短按数买别帮食米赔补，补不足数及漕粮欠额者，将弁丁参处，米石下年搭解完交。漕船卸毕返回叫回空，定限十日离开通州，由仓场侍郎责令押运官依限回返。京、通两处共粮仓十五、六处，每处有廒数十至一百多不等，每廒贮米万石。京仓有仓十三、四处，共廒一千余个，通仓两处，有廒二百五十个。漕粮卸通以后，由搬丁数万搬至仓中，其正兑米及麦、豆等，再陆续运往京仓。

漕粮由征收到抵通入仓，手续烦杂，运费繁巨，道光年间，关心国计民生的包世臣曾总结说："南粮三、四百万石，连樯五千余艘，载黄达卫，以行一线运河之间，层层倒闸，节节挽牵，合计修堤防，设官吏，造船只，廪丁舵，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虽不能知其确数，所费岁皆以千万（两）计矣！"① 仅以江南较低的米价每石银一两计算，这三、四百万石漕粮的耗资也达一千万两左右。清代与明代一样，以北方的北京为京城，主要以运河实行南漕北运，其数额庞大的漕粮运费及治河费，便成为国家财政开支中的大项。但政治中心的北移，对北方文化的发展则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京师设重兵，对于抵御

① 《安吴四种》卷3，"中衢一勺·庚辰杂著四"。

北方民族的骚扰，防止宋辽金时期的那种南北割据，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清代还有进一层的意义，即便利中央与蒙古各部的往来，对巩固边陲，加强大一统之管理与统治，也是有利的。这也可说是失之于经济，而收文化、政治之利吧。

前举各种漕耗、漕费与漕粮一起征收，由漕粮纳户负担，而纳户的实际负担，要超出这种额定之征。各州县征收漕米之时，利用淋尖、踢斛、划削斛底、改换斛面、取样米、取斛面余米，以及利用米价的变化以折征之名贵折贱买等等手段，盘剥纳户。而负担最重的，又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民。刁劣绅衿挟制官吏，包揽拖欠，转嫁小民；不肖书吏蠹役勒索飞派小民。这些小民纳户，往往要交三、四石甚至五、六石，才能完额漕一石。贪官污吏利用浮收勒折饱其私囊，道光以后已是“浮收中饱由来已久，官民习以为常，故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1] 清代漕运改明代的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民户免去运军的直接勒索，但漕粮、漕费、漕耗由官征收，民户又受到官吏各种名目的加征剥削，是去一弊又添诸弊。另外，漕费、漕耗之征本无一定规制，各省名目不一，有漕州县因地制宜，各据运途之远近等酌定其数，以改官收官兑后征收的赠贴银米为例，此项赠贴，山东、河南谓之润耗，江苏、安徽谓之漕贴，浙江谓之漕截，江西、两湖谓之贴运，“其数多寡不一”。[2] 各地因地而定，多寡不一，使征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为贪官污吏提供了可乘之机，清廷虽规定赠贴“私派挪移者罪之”，但这种规定根本不起作用，“其后江南每粮百石，竟私截至百余两，浙江至三十余两”。官员极陈“赠耗之弊”，“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3] 漕耗银米，是有漕州县以供官军兑漕及州县

---

①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0“杂记三”。上海南园刊本第7页。
② 《清史稿》卷122“漕运”。
③ 《清史稿》卷122“漕运”。

办公费为名而加征的名目，纯属“耗外之耗”，“其数亦多寡不一”。[1] 其他如正耗米、船耗、运军行月粮等的征收，也都是因地而异，各州县不一，带有某种自主性和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州县征收的这种自主性和随意性，使清代漕粮纳户的负担大大增加。运军也同样受到官吏的勒索盘剥。清代运军的收入，除前述出运时的行粮、月粮、赠贴银米等项外，还有官府所发的修造船只的工料银、提溜过闸雇夫剥浅的贴费银，以及漕运卫所屯田的赡运津租。另外，超额载运，给发负重银；还准许运军利用运漕之便，携带定量的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获微利。运军收入项目虽较多，但开支也大：清代的运漕之制可称之为是运军包运制，政府给予以上所列定额银米后，诸凡修造船只，雇募舵水手、扒夫等等皆运军自己出资，即使有所盈余，也不会太多。但管漕各级衙门官吏，却视运军为可榨取的对象。开兑之时，由粮道发给随漕赠贴，而粮道衙门任意克扣，运丁所得十之八九起运后，还要打点押运官、督运官；过淮盘验，为防止漕运总督衙门官吏的刁难，也须贿送规礼；行驶中，“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2] 此外，“巡漕衙门也有费；抵达通州后，仓场衙门有费，巡仓衙门有费，坐粮厅衙门有费”。以上各衙门官员所收之费，都是以办公费用为名，实际是索贿之规费，也即“陋规”，没有这些规礼，就会在稽查、验收中遭到他们的拿捏。管漕官吏向运军索取陋规，运军不堪其苦，便在兑运时向粮道、州县官多索资运的“帮贴”，以致帮贴“每岁递增，几于无所限制”。[3] 最初，每只船不过帮贴银一、二十两，嘉庆初，已加至一百数十两及二百余两，不给到这个数额，运丁们便不肯开兑。赠贴增多，沿途陋规也不断加码，陋规加码，运丁再在开兑时多索。清廷曾采取

① 《清史稿》卷 122“漕运”。
② 《清世宗实录》卷 20，雍正二年五月甲辰条。
③ 《清仁宗实录》卷 220，嘉庆 14 年 11 月癸亥。

限制数额的措施，但在吏治败坏的情况下，限制并不能解决问题，不仅不能遏止，而且不断增加，“嘉庆十五年，复增之为（每船）五百（两），递增至道光初，乃至七八百”。[1] 运军多索于收、兑漕粮衙门，征漕之州县官便有了浮收的借口，并以此“下以遏小民之控诉，上以抗长吏之查参”。而最终倒霉的是无权无势的纳户。使清代的漕务弊端百出，征漕运漕的各个环节，成为贪官污吏的利薮，漕务官成了官场中争逐的肥缺。漕务败坏，是清代吏制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至道光年间，漕政败坏已是积弊相沿，积重难返，“挽回无术”。

道光时期，漕运发生的另一大问题，是运道淤塞浅阻。道光四年（1824 年），苏北一段大批漕船搁浅，不仅剥运需要大量资金，而且严重影响漕粮的如期如数运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官员，力图通过变河运为海运，来革除河运漕务中的各种弊端，解决运河淤滞治河糜帑的问题。道光帝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任命陶澍、贺长龄等试办海运。道光六年，陶澍在上海督办海运，招集商船兑运江苏漕米一百六十多万石，结果商船海运极为顺利，安全抵运天津，且由于省去了河运中各地机构的诸多规费、雇脚开支等等，运费大大少于河运，每石漕粮运费不到一两银，运期也缩短，减少了中途船耗。所雇船商也得到了利益。海运利国、利民、利商，本来可以扩大推行，但却遭到了以河运为利薮的漕务官及一些保守官员的反对。道光帝与其父嘉庆帝一样，是典型的保守性皇帝，行政一贯以率由旧章谨守祖制为原则。嘉庆时期，漕运弊端、运河淤浅的问题就已非常严重，有人提出海运，嘉庆帝便以海运风险太大，决不能以天庾正供蹈不测之险、利不百不变法，断不可轻易更张，唯有谨守前人成法等等为理由，予以反驳。所以“终仁宗（嘉庆帝）之世，无

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辑 120 卷本）卷 47。

敢言海运者"。[1] 道光帝谨守为父的这一方针，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是决不会变更旧制的。另外，他还担忧，一旦扩行海运，原以河漕为职业的大批沿河贫民、运丁水手等等，将成无业之民，影响社会治安。在试行海运之时，他就把它作为权宜之计，同时又竣疏运河河道，更兼有些官员又极力反对海运，因而当改革者们正积极筹备来年海运诸事之时，道光却以"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为由，停止了海运。二十余年后，由于财政拮据，才不得不再行海运。道光二十八年始，苏州、松江、太仓二府一州之漕白粮米，由上海雇商船海运至天津。咸丰初年以后，由于太平军攻占了江苏、安徽等地，南粮北运中断。咸丰五年（1851 年）河南铜瓦箱黄河又决口，改道入海，河运已极端困难，大部分漕粮逐渐改折海运。这一时期 征漕运漕上的另一变化，是南方某些地区漕粮改折征银，就近以济军饷；另外，为解决南粮北运之困难，又令东北地方官，鼓励商民将东北米豆贩运天津、通州，以济京师之用。

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海运漕粮开始由轮船招商局承运。同治十一年（1872 年），轮船招商局商人借领运钱购轮船运漕，盈亏自负，每年海运漕米约 20 万石。不久，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也以改征之折色银，在上海等地购买本色漕米，由上海轮船招商局承运，约十几万石。光绪四年（1878 年）后，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进一步扩大，约为五、六十万石，占全部海运漕粮的一半左右，其余为人力商船办运。至光绪末年，人力商船经营海运漕粮者已所剩无几。江北的河运漕粮，同治末年以后，也已试办海运，但江北及山东、河南始终有少部分漕粮保留着河运，直至光绪二十二年，清廷仍在江北办理河运，其目的是"留此一线运道，以备不虞"。

---

① 《清史稿》卷 122"漕运"。

随着官方军运向商运的不断转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漕粮改折并废除漕运的问题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转运漕粮，在古代交通运输不发达的情况下，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明清时期，数百万石漕粮，大部分由江南各地征集，节节挽输，再由大运河千里迢迢艰难地运送京师，其耗资尤其繁巨。而且从征漕到兑漕、运漕、收贮的一系列过程中，弊窦丛生，矛盾重重，成为明清两代行政、财政中令统治当局头痛的大政。多少官员士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但不过都是对漕运制度本身在征、运方面的修改，是维持、完善，尚无人提出将之废除。随着全国商品粮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废除漕粮的征运实际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些关心时政之士纷纷提出这一建议，但由于那些钻营于漕务之利的官员们阻挠反对，当局者及一些官员又持保守态度，唯恐京城用粮没有保障，所以始终未能实行。此后，又有一些官员倡议漕粮全部改折征银，都被清廷拒绝。庚子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于极度的困境，多方搜索以渡危机，于是想以废除征漕运漕，将漕费解交中央做为一笔重要收入，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七月宣布："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上耗国库，下抑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糜费，逐加整顿。著自本年为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真清厘。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提存，听候户部拨用。并查明各州县向来征收浮费，责令和盘托出，悉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① 谕旨下达后，庆亲王奕劻和一部分官员提出应在江苏、浙江两省保留一百万石漕粮的征收，与白粮一起运解京师，获得批准。此后，除这两省外，其他有漕省份，基本废除了漕粮的实物征收。次年，清廷宣布废除各省的漕运屯田，裁撤各卫所领运官弁及服务于河运的各

① 《东华录》光绪朝第 4689—4690 页，乙丑条。

河道官员。光绪三十一年，又将漕运总督一职取消。至此，历代相沿的河运漕粮制度彻底结束，只有少部分漕米仍保持本色征收，实行海运，与清王朝相始终。

（杜家骥）

参考资料：

《大清会典》乾隆卷1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99至卷211。
《清朝文献通考》卷43。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7。
《漕运全书》卷9至卷51。
《漕运则纂》卷5至卷9。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
《清史稿》卷122“漕运”。
戴鞍钢：《清代后期漕运初探》，载《清史研究集》第五辑。

矿政之变

清以前各朝，在矿藏的开发上，基本上是实行禁民私采的政策。商民采矿，必须呈请官府勘查审核后批准，在官府监督管理下进行，官方还可根据情况予以封闭。封建王朝所以采取这种官府限制开采的政策，主要因为：一、防止农民弃农开矿，追逐末业之利，荒废本业——务农。二、开矿聚集四方之民，容易打架斗殴，且常因开矿毁人坟墓、田庐，或被人认为是破坏地脉风水，而发生诉讼打斗事件，影响统治秩序。三、开矿初采时聚人容易，一旦矿苗枯竭，矿工无业，容易流为“盗贼”。四、矿为国有，抽取矿课，做为国家铸币、造器之用。五、认为滥行开矿会破坏龙脉风水。清代沿袭了以往各朝对开矿进行控制的政策，但对民间的开矿上较为开放，主要采取官督民采的方式，矿产品由官府与承采者分成，私人所得，或听其自卖，或由官府购买一部分或全部。清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工商业比较发达，对矿物的需求量必然较大。另外，清代人口急剧增加，民众对矿物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更兼开矿可以解决部分无业流民的就业生计问题，因而清代矿政虽然有其禁限的一面，而且有时较严，出现反复，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开放、松弛，其开放程度明显超过明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的侵人，及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民族工业产生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矿政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且成为影响当时社会及朝政的重要因素。

顺治朝及康熙初年，清廷尚无明确的矿业政策，由于战争，

社会经济凋敝，民间开矿者也不多。

康熙十四年（1765年），清廷明确发布对铜、铅矿开采的弛禁令："凡各省产铜及黑白铅处，如有本地人民具呈愿采，该督抚即委官监管采取。"① 康熙十八年又规定：各省铜铅厂，"任民采取"，官府征其二成为税，其余十分之八"听民发卖"。② 康熙十九年，进一步开放金银矿的开采，"定各省开采所得金银"，官收四分，民得六分。二十四年，又允许四川邛州蒲江县招民开采铁矿，其征税法与铜铅一样，官收二成。仅康熙二十五年一年时间，该县六座铁矿共征税铁一万一千六百余斤。③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三藩平定以后，清廷最终确立了对全国的统一大局和稳固统治，社会安定，百业待兴，因而开放各省相当一部分矿山，以恢复发展经济，并借以增裕国课，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尤其是各省铸钱，需用大量铜铅，这也是这一时期明令各省铜铅矿听民开采，而官府督理并征其铜铅的一个重要原因。至康熙四十几年以后，矿政开始变化。

康熙四十三年，清圣祖发布上谕："闻开采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④ 这次禁令，是对未开之矿进行限制，其已开之矿，若确实已无继续开采价值，许其封禁。正在开采者，则维持原规模，以防无业之矿丁被遣散后无以为生，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至于有益于铸钱的云南等省铜铅矿的开采，则不仅要维持，而且需要扩大发展。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等会议的结果，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矿政的宗旨："开矿一事，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于湖广、山西地方各雇本地人开矿不议外，他省所有之矿，向未经开采者，仍严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五·坑冶"。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47"杂赋"。
③ 《清朝通志》卷90"食货略十·坑冶"。
④ 《清朝通志》卷90"食货略十·坑冶"。

行禁止。其本地穷民，现在已开采者，姑免禁止，地方官查明姓名记册，听其自开。若别省之人往开，及本处殷实之民有霸占者，即行重处。"① 这次禁限主要是从地方治安考虑，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禁外地人充当矿工，清廷认为这些外地人牵挂较少，最容易滋生事端，与土著之民常发生冲突，因而有这种限制。雍正以后，矿政进一步趋向严禁。雍正二年（1724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以广东无业穷民甚多，请开放矿山以解决穷民生计。雍正帝借此发布谕旨：往年广东开矿即曾聚集多人，以致盗贼渐起，扰及邻近州县，因此永行封闭。现在断不能开。养民之道，唯有鼓励劝导其从事务农的本业，才是根本的办法。矿藏非人力种植可得，怎能保证其生生不息？今日开之有利，矿民聚之甚易，他日一旦枯竭，散之甚难，这些舍本业逐末利者，大多是不安本分之辈，难保其不扰乱地方。若确为本地少数实在无业维生之民，于深山穷谷之中开采借以糊口资生，不至聚众生事，庶或可行。若招商开厂，设官征税，远近传闻，"以至聚众藏奸，则断不可行也。"② 雍正五年，湖南巡抚布兰泰奏请开矿，同样被谕令禁止。出于铸币的需要，雍正朝，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诸省的铜铅矿及银、金矿的开采则有所扩展。乾隆初，清高宗以金银二矿与铸钱无关，令"悉行封闭"，③ 铜铅矿的开采则进一步放开。乾隆三年（1738年），谕令：凡产铜山厂，地方官勘验查明，该矿确有助于铸钱，准报开采。几年后，云南之铅矿，四川、湖南、湖北之铜铅矿，都有多处报采。乾隆九年，广东也解除矿禁，铜铅等矿许招商民承采，同时规定，各矿山若相连者，许一商兼承，相隔较远而不相连者，每商只许承充一山，以便使在山矿丁便于管束。资本少者，许合股共同承充。承充之人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5，康熙52年5月庚辰。
② 《清世宗实录》卷24，雍正2年9月戊申。
③ 《清朝通志》卷90"食货略十·坑冶"，乾隆三年、九年条。

先将本银呈该管道员核实，再移贮该州县之库发领。承充之时由布政司给予印照赴山开采。若矿少砂微无商承办之处，听任附近民人报采。

乾隆初年以后，矿政所以逐步开放，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人口繁衍，人多地少就业困难的问题已开始严重，禁矿已是禁而不止，因而有些地方官呈请开放，以解决部分无业之民的生计问题。广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解除矿禁的。乾隆九年，两广总督那苏图向高宗反映，广东山多田少，以前所雇募的矿丁，都不是有地可种之农，允许开矿，不失为"扶养贫民之计。"①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也疏言：矿产乃天地自然之利，如果经理得人，设法开采，原可以便民生而资器用。浙江省处州府属之云和、松阳、遂昌、青田四县，温州府属之永嘉、平阳二县，及附近之泰顺一县，向来即土瘠民贫之地，小民以采铁矿为经常性的行业。自从封禁以后，贫民仍偷挖不止，也无法禁止，限制只不过徒增该管胥吏需索之弊。请"仍弛其禁，照旧开采，以济民生"。② 这两位封疆大吏的呈请适合时宜，因而都获得批准。在解决过剩人口的就业谋生上，开矿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以云南铜矿的开采为例，乾隆以后，滇铜出现十几个大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诸厂最大，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这些矿厂，"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人。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③ 可以看出，不仅云南本省土民，而且贵州、广东两省的无业者，也纷纷来此谋生，仅这十几个著名矿厂，就业者就不下四、五十万。它也说明当时的矿政已放松了康熙后期以来只许雇募本地人开矿的禁令。以矿产资源来解决当时的民用及艰难的生计问题，是促使统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五·坑冶"。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五·坑冶"。
③ 《清史稿》卷124"矿政"。

治当局开放矿禁的又一原因。乾隆五年二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向乾隆帝上了一份“请广天地自然之利以裕民用事”许开煤矿的奏折，其大意是：薪柴与米，同为民生之必需，“百钱之米即需数十钱之薪”。东南多山林材木之区，柴薪尚属易得。北方旱田，全仗庄稼秸杆为柴，“苟或旱潦不齐，秫秸少收，其价即与五谷而并贵，是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爨也”。煤本来是天地自然之利，且地下藏量颇丰，可资生民无穷之用。长江以北，煤矿所在多有，我的家乡山东泰安、莱芜、宁阳诸郡县便皆产煤。以前地方官恐开矿聚众滋扰，历来禁采，遂使万民坐失其利。其实京师数百年来，皆仰给于西山之煤，长时间开采，也从没有出现矿苗枯竭后矿丁聚众生事之事，关键在于如何管理。这种先例为何不可以推行于全国各个省份呢？臣请敕下各省督抚，行令各地方官查勘，凡产煤之处，只要不影响城池龙脉风水及过去帝王圣贤的陵墓，并无碍堤岸及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地方官严加稽查，如有豪强霸占，地棍阻挠，悉置于法”。乾隆览后，命各督抚根据本省情况，详议具奏。不久，直隶、山东、山西、湖南、甘肃、广东等省回奏，极力支持这一建议。直隶总督孙嘉淦疏称，长城口外寒冷之地，现已居民稠密，柴薪稀少，亟应开采煤窑。山东巡抚硕色回报，该省可以开采的煤矿有多处，若封之不动，甚为可惜。各属州县内如系已经开采之窑，应听其开采。以前封禁之处，也应晓谕居民，听其开挖。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疏请将归化城等处煤窑八十余座，尽行开采。湖南、甘肃、广东三省巡抚也奏请将该省煤矿“听民试采”或“招商开采”。以上诸省建议皆准奏实行。江南、江西、浙江、四川等省督抚提报，原来就有已采之煤窑，有的久经纳税，有的属于纳粮民地，例免抽税。经工部议复，准其

“照旧办理”。[1] 这一时期，虽然有些官员仍然重弹老调，反对开放矿禁，由于乾隆帝能够审时度势倾向于开放，因而使各地很多久经封闭的矿山得以开采。乾隆非常赞同倡议开矿的官员们的观点，也认为“矿厂为天地自然之利，固应开采以资民用”，然而必须详查出产地方并无妨碍滋扰，酌情妥为办理，方可有利无弊。因而他发布谕旨：各省矿山，如果经督抚等查明该处并无妨碍民田庐墓，招商创挖，酌定章程而不致滋事启弊，且报提开采。户部俱应照该督抚所提请，准其开采。矿砂薄少，开采得不偿失，也准提请封闭。皇帝态度明朗，官员便可放手实行，一时各省各类矿藏相继报采。除前述诸省之铜、铅、煤矿外，云、贵、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铁、锡等矿也都提请开采。金银矿之开采以前限制较严，这一时期也已放松，贵州思安之天庆寺、镇远之中峰岭，陕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之扎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之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之迪化、奎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等处的金矿，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之回龙、昭通之乐马各银矿，都相继开采。以前被封禁的省份中，广东、山东等省的成绩比较显著。广东省于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等县，及广州、肇庆二府的铜铅矿“均行开采”；山东省，经巡抚朱定元奏请开采煤矿的州县，就有章丘、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县）、峄（县）、泗水、兰山、郯城、费（县）、莒（州）、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等20个。在诸矿种中，以铜铅的开采成绩最大，至道光年间，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江西、直隶等十省，“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2] 其中滇铜的产量最大，乾隆年

---

① 《清高宗实录》卷110，乾隆5年2月丁丑。
② 《清史稿》卷124“矿政”。

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每年出铜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斤，最多时年产量达一千二、三百万斤，除供本省铸钱外，京城的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诸省钱局铸钱用铜，“岁需九百余万（斤），悉取给焉。”① 铸钱的充裕，钱价平稳，以及各种矿藏的大量开发利用，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嘉庆至道光中期以前，矿政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各地矿厂有开有闭，开者主要是煤矿、铁矿，闭者是矿砂已尽无采价值之矿，一般情况下，清廷是不肯轻易封闭的，唯恐已聚集起来的矿工无业可就而生事端。嘉庆十九年（1814 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请将粤省六浮山等处铁厂封禁，令厂主将各工丁妥为遣散，立即被嘉庆帝制止：“粤省山内铁锅等厂，该商等久已利为恒业，而工丁等亦借以谋食。今骤加封禁，此数百名失业工丁岂一二商人即能将其遣散，俾无失所？此等无籍游民，转至流而为匪。所有此数处厂座无庸封禁，应官为设立章程，或编造丁册，令该商等递加保结，地方官再按季考察，使各贫民有糊口之地，又不至藏垢纳污，方为正办。”② 嘉道时期，对于金银矿的开采控制较严，尤其是蒙古、新疆地区，更是轻易不允准开采。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以后，对于民间采矿的政策进一步开放，其表现是，皇帝主动督促地方督抚扩大矿藏的开发，并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权。这一年，清宣宗发布谕旨，表明他对开矿的看法：开矿本为利用天地自然之利以利国利民之事，前朝（指明朝）由于经理不善，国与民俱受其累，我朝自开矿以来，无丝毫扰累于民，每年抽收课银，商民照常输纳。可见“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现在云南等省除已经开采者外，尚多可采之处，著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相

① 《清史稿》卷 124“矿政”。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43“坑冶”。

度山场，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道光二十八年，再一次谕令上述各省督抚，于所属境内广为查勘可采矿藏情况，向百姓广为晓谕任民开采的政策。其余各省督抚，也著留心访查，如有矿苗较旺之处，酌量开采。此次谕旨之后，断不可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朕不难派员前去检查。至于官办、商办还是民办，及应如何统辖、稽查、弹压等等，“朕亦不为遥制，惟在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议，定立章程具奏。”① 这两次谕旨发布后，“一时矿禁大弛”。② 清廷这一时期进一步开放采矿，当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财政拮据，正多方开掘财源，想以开矿收课做为生财之道的措施之一；二是迫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为解决部分人的就业谋生问题。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太平军大起义的前夕，社会矛盾异常激烈，南方尤其是广东广西等地尤为尖锐，所以各督抚大多因循观望，唯恐开矿聚众，给本辖境带来骚乱。间有一二省份奏请开采，不久又借口矿老苗衰奏请停采，或“以聚众生事为辞，畏难苟安，因循不办。”不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由于库藏支绌、军饷浩繁，急令各地方官查有金银各矿，即速行筹议开采。这一时期的开矿仍是中央督促地方开采，但明显具有以下特点：一，纯粹是为了增加货币也即解决军费，因而所开矿藏主要是金、银、铜、铅矿；二、开采地区主要是直隶北部及蒙古、新疆、甘肃等边区。过去，这些地区的这类矿种大多封闭，由于战争内地大乱，且军需孔亟，促成了这些地区这类矿种的开发。当时开采者，有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噶顺、红花沟的金矿；直隶珠窝山、遍山线、室沟、土槽子、锡蜡片、牛圈子沟，蒙古哈勒津、罗圈沟、库察山、长杭沟的银矿；新疆迪化、罗布淖尔、三个山的铜锡矿等等。

洋务运动兴起后，矿政发生重大变化，其表现是官方直接兴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43“坑冶”。
② 《清史稿》卷 124“矿政”。

办矿务，开矿主要是为了发展官办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并把矿产品做为商品出售，获取利润以增加收人。为此，还大力发展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矿业。

在举办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过程中，洋务派认为，制造船、枪炮及轮船、机器之燃料，都需要大量煤铁，而中国当时制造军械、轮船所需之钢铁，皆购之外洋，不仅花费大量国帑，而且受制于人，不如利用本国煤铁自炼钢铁。光绪元年后，首先试办官办的直隶磁州煤铁矿、台湾基隆煤矿，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经手。不久，两江总督左宗棠又请开办江苏利国铎煤铁矿。光绪九年，清廷下诏各省招商集股举办，此后，各省皆设矿务局或矿务公司，招商办矿，实行官督商办。光绪中叶后，由于修筑铁路需用大量钢材，更促进了铁煤的开发。

从光绪初年以后，由于官方的直接兴办和倡导，清代矿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开矿地域范围远较以前扩大，遍及全国，深入边区。所开矿藏种类也比以前增加。在所开诸矿中，以煤铁矿开发量最大，煤矿计有：吉林大石头顶子、乱泥沟、半拉窝、鸡沟、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岭，黑龙江太平山、察汉敖拉卡伦，直隶的开平、唐山，内丘县之上坪、永固、磁窑沟、南阳寨，临城县之冈头、石固、胶泥沟、杨家沟、新庄、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的鸡鸣、玉带、八宝寺山，阜平县炭灰铺村，曲阳县白石沟、野北村，张家口厅海拉坎山、马连圪达，宛平县青龙涧、碑碣子，承德府榆树沟，奉天海龙府远来、义和、进宝、玉盛、永顺、永益、万利、人和、同德、顺发，锦州府大窑沟，锦西厅砀石沟，本溪县王干沟，兴京厅密蜂沟，辽阳州窑子峪，江西的萍乡、永新、余干，山东峄县，安徽贵池、广德、繁昌、东流、泾县，湖北荆门，河南禹州，山西平定、凤台，浙江桐庐、余杭，江苏上元、句容，湖南湘乡、祁阳，广西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陕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

陇州、淳化等八十余处；铁矿计有：直隶迁安、滦州，湖北大冶，广西永宁，江西永新，云南开化、广南，贵州青谿等处。而陕西、山西两省商民零星开采的小煤窑、铁矿，更是不计其数。光绪年间，其他矿藏的开发也接踵而起。铜矿方面，云南铜矿，由于同治及光绪初年的回民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光绪十三年，清廷命唐炯招商督办，重新恢复。此外，江西赣州，陕西镇安，湖南绥宁，新疆拜城、库车等地，也有铜矿之开发；铅矿的开发有湖南常宁、湘乡、临武，四川会理，浙江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太平诸处；锡矿，则有广东儋州，广西南丹土州、富川、贺县等地的开采；锑的开发这一时期有较大成就，湖南的益阳、邵阳、新化、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的铜仁，四川秀山，广东曲江、防城、乳源，广西的南太、泗镇、陵阳都等地，都有锑矿的开采；其他如山西阳曲及奉天辽阳、锦州的硫磺，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库尔喀喇乌苏的石油，湖南慈利的雄黄等矿，也都相继勘探开采。金银矿的开采在光绪初年仍控制较严，只有直隶窑沟的银矿，甘肃西宁、甘州、凉州及黑龙江漠河观音山、奇干河的金矿被开采。光绪二十二年，清廷由于巨额的战争赔款，财政匮乏，下诏各省开办金银矿，自此明令颁行后，各省争相勘查开采，金矿计有直隶之迁安及平泉州属之转山子，建昌县属之金厂沟，丰宁县属之双山子，泺平县属宽沟，半宁县之大营子、西碾子沟，翁牛特旗之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奉天的凤凰、安东、辽阳、通化、宽甸、怀仁、铁岭、开原、海城、锦县，蒙古之贺连沟、大小槽、碾沟、除虎沟、朱家沟、板桥子、珠尔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图、奎腾河、土谢图汗部，四川之冕沟，湖南之平江，浙江之诸暨，黑龙江之黑河，新疆之和阗、焉耆等近四十处；银矿则有四

川之天全、庐山、大穴山头等处。① 这些矿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多种形式，多数属于官督商办，由政府派员任督办、帮办等，商人自筹款项、自负盈亏，与官无涉，所以实际是商办，只不过政府监督控制。由于督办的官僚贪污私人资本，投资者又受到官府的束缚，致使私人投资这类企业受到一定影响，后来有些矿业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以上诸种矿业中，成绩较大的，有直隶开平、江西萍乡之煤矿，湖北大冶之铁矿，湖南平江、黑龙江漠河之金矿，湖南益阳之锑矿及常宁之铅矿。滇铜虽恢复开采，但产量大不如昔，解京之铜每年不过百余万斤，所以当时京局及各省鼓铸制钱，仍需要以重价购买洋铜。

由于历代的封禁政策及勘探开发技术的落后，清代之时，全国矿藏有很多尚沉睡地下，极具开发潜力，对此，入侵的西方列强早已垂涎。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商人等便不断来中国私挖金矿，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同治七年向英、法、美、俄等国发出照会禁止，各国才暂时禁止洋人进入中国内地开矿。但其觊觎之心不死，至光绪中期，不断有外国商人请求承办某地矿藏的开采，均遭总理衙门拒绝。在各地商人争相办矿的过程中，遇到较大的困难，便是勘探开采技术及资金问题，因而有些办矿者便聘请外国矿师勘查、做技术指导，以及贷用洋款。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扩大矿业开发，加强中央对地方开矿的集中控制，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并准许华商办矿借贷洋款及华、洋合股设立公司。这一明令规定，为外国资本挤进中国的矿业开发进而夺取矿权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年所定章程中，虽规定各地办矿的公司、华商要以华股为主，“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无论洋股、洋款，其办理一切权柄，总应操自华

① 以上见《清史稿》卷 124“矿政”。

商，以归自主”,① 以保证开矿的主权。但洋人利用华商借款及入股投资，千方百计进行渗透侵夺。如借款，当议定合同时，便提出额外条件，于抵押息金之外，还要聘用其矿师，甚至要求出人参预管理。华洋合股开办，有些外国公司便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入股攫取开矿权。当时借洋款办矿的主要有：江西萍乡煤矿借德国款、湖北大冶铁矿借日本款、浙江宝昌公司借意大利款、直隶临城煤矿借比利时款。直隶井陉、安徽宣城的煤矿，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平阳及四川江北厅的煤铁矿，新疆塔城，直隶霍家地、厂子沟的金矿，广西上思、贵州正安的铅铁矿，以及福建邵武、建宁、汀州，直隶八道河，奉天崑明山及吉林等处的新旧各矿，都实行华洋合办。而一经订约，便出现矿权问题，甚至产生矛盾。有些矿厂出现商民私相授受以矿权作交易的现象，如陕西延长，四川富顺、巴县、万县的石油矿及湖南常宁龙王山、湖北兴国龙角山等处矿厂，都出现这类问题。影响比较大的，是英国的福公司，与山西商务局、河南豫丰公司订立贷款合同，取得山西盂县等五州县、河南怀庆左右黄河以北各矿的开采权。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修定路矿章程，有开矿“或华人自办，或洋人承办，或华洋人合办，均无不可”的新规定,② 为洋人单独承办开矿进一步侵夺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年，安徽巡抚聂缉槼准许英国人凯约翰承办该省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砀山等处矿山的开采，其中铜陵之铜官山煤矿，定约百年，可占地三十八万四千余亩。法国人弥乐石也于这一年向外务部呈请承办全云南矿务，被外务部拒绝，又经交涉，允其开办澂江、临安、开化、昆明、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州、厅矿山。英商普济公司向外务部申请在四川开矿，外务部咨四川总督，准其承

① 《矿务档》第1册4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精华印书馆出版。下引此书同，不另注，仅作《矿务档》

② 《矿务档》第1册第88页。

办煤油（石油）、煤、锑各矿，但不得超过8个县。有些外国人还以其他手段攫取矿权，如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之时，俄国便趁战乱将黑龙江漠河观音山金矿侵占；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因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委托其保护，便趁战乱之机，与英商墨林公司、美国矿师胡华相勾结，私立出卖合同，将开平矿务局所属矿变为英国资本企业。而张翼因贪图私利，即签押移交，转而以“加招洋股中外合办”奏报清廷，唐山之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各煤矿，及秦皇岛口岸附属之承平、建平、永平等处金银矿，因而全被英国公司占据。清廷发觉后严诏责令收回，并与英国当局多次交涉，但因有签押手续，终清之世也未能收回。德、俄两国，则分别利用订立修筑胶济铁路、东清铁路的路约，获取铁路沿线附近的开矿权。

列强对中国矿权的极力侵蚀，掠夺中国宝藏，引起爱国士绅及民众的强烈反对，“一时举国上下，咸以保全矿产为言”，山西已由英国福公司承办的煤矿、安徽由英人承办的铜官山煤矿，俄国侵占的漠河金矿，以及山东峄县煤矿、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四川江北厅煤矿、湖南醴陵锑矿、陕西延长油矿、云南锡矿等，都由于绅民的斗争而赎回或收回商办。与此同时，各省爱国的官员、绅、商、士人等，还纷纷申请成立以保全矿权为宗旨的地方组织。如山西的保晋公司、安徽的矿务总局、四川的保富公司、福建的矿务总公司等等，这些组织或机构，取得了一定的处理地方矿务的自主权，如福建的矿务总公司，“凡请办各矿场，查核准驳之权属之”，四川保富公司，凡“华洋承办川省矿务，购地转租事宜属之”，湖南、湖北两省的这种机构组织，也有管理矿地之权力。①

自光绪二十四年订立矿章以来，由于考虑不周、章法不全，

---

① 《清史稿》卷124“矿政”。

屡次更改修订补充，“每因矿务龃龉，洋商辄引为口实”。[1] 鉴于开平矿务局被英人骗占的教训及华人将矿场私相授与洋商而从中取利的现象，光绪三十年修订矿路章程特别规定：“嗣后华商请办矿务，如未经禀明本部，迳与洋商议订合同，以矿地抵借洋款，一时蒙准；或开办后，将该矿工密售他国人民，原领照人坐收出名之利益，凡此情弊，经地方督抚及本部查实，将领照人从严惩罚，矿照撤销，矿工入官”。[2] 光绪三十一年，商部也以洋商私占矿地矿山之事，疏请申明约章，以进行限制约束。并奏请设立各省矿政调查局，勘明全国各地矿产情况，以严禁私卖为首要之务。于是，清廷授命张之洞等参考英、美、德、法、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矿章，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又拟定了“矿务正章七十四（条）、附章七十三（条）”，这是清王朝最后一个，也是章则最为细致的矿政章程，对于矿界、矿税、地股、银股之分别，及华商、洋商之限制性措施，都做了“至周”的规定，据云“尤注重于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3] 但是在当时清政府主权严重丧失、对外妥协的情况下，既然对各国“许以开采矿产之利”，其规定外国“必须遵守中国矿章”又能有多大的约束力？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卷 30“征榷五·坑冶”。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43“坑冶”。

《清史稿》卷 124“矿政”。

---

① 《清史稿》卷 124“矿政”。
② 同前引《矿务档》。
③ 《清史稿》卷 124 卷“矿政”。

关税之征

设关以征流通商品之税，又称榷关。清代沿袭了明代榷关之制，而所设税关，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设关的地域分布范围上，都大大超过了明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商品经济较之明代的显著发展。

明代的税关最初为七处（户部钞关），至嘉靖年间增至十二处，以后经过裁撤，万历年间只存七处。从分布看，集中于北京至杭州运河沿线，北起京城的崇文门，往南依次为河西务（清代移天津、临清关、淮安关、扬州关、浒墅关、北新关。清初以后，不仅保留了这些税关，而且陆续增设，至乾隆年间，已达到五十一个。其中不仅有沿河之水路关，而且有沿海之海关及内地的陆路关。水路关除沿运河一线诸关外，还有长江沿线的西新关、龙江关、芜湖关、九江关、武昌关、荆关、夔关、渝关，赣江边的赣关，珠江边的太平关，沅江边的辰关，鸭绿江边的中江关。运河一线也比明代增加了通州关（又名坐粮厅）、砖版闸、宿迁关、南新关以及京城的左、右翼二关。沿海诸关有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陆路诸关绝大部分设于边区或与边区交界的交通隘口，如北部的归化城、多伦诺尔、张家口、杀虎口、潘桃口、古北口、龙泉关、紫荆关、独石口，川藏交界地区的打箭炉关，广西的梧厂关、浔厂关，东北地区的奉天、白都讷、宁古塔等处。海关及边区诸多税关的设置，表明清代比明代在海外贸易及与边疆民族地区的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沿

长城一线诸关口设为税口，更是清代中原与蒙古地区频繁贸易往来的明证。而明代，这些关口都是军事性的隘口，设重兵以防蒙古族南进，只有在蒙古部落屡次强烈要求互市的情况下，明廷才不得不开关互市，且时开时停。四川的打箭炉，是内地商人与藏族商人交易的主要地点，康熙四十年设关征榷。每年，山西、安徽、陕西、四川等省的商人将茶、布、绸、瓷器等与藏商的毡、皮、红花等互易，由于交易频繁，商业繁荣，该地被誉为“小成都”。

清代的税关由户部、工部分管，大部分属于户部。这些关又称为“常关”。鸦片战争以后，又陆续增设了与外国的通商口岸，这些关口称为洋关，以区别于户、工二部的常关。

清初，管理税关的官员——各关监督又称关差，全部由中央遣官担任。顺治初年，专差户部中的司员，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扩大到六部。康熙四年曾一度将各关均交地方官管理，只两翼、张家口、杀虎口等仍差户部司员。四年后，又恢复中央派部员督征的制度，只少数税额较少的税关仍令地方官兼管。康熙二十三年，中央派遣关差，又由六部扩大到其他院、府、寺等衙署的中级官员。

关差的选任，顺康年间采取“论俸掣签”制，论俸也即论实际任官的年资，以上各衙署官员任职一定年头后，便有资格参加抽签，抽中者即被选用。关差任职仅一年，年满便换，而且规定“差过之员，不准重差”。① 关差所以采取这种特殊的选任办法，是因为该职差是公认的“肥缺”，任职期间可获较优的得项——额外收入（详见后述）。由户部司员的独选扩大到六部司员，再进一步扩大到中央各个衙署，除了行政上的考虑之外，其各部门官员“均分差遣”，主要是为了平衡各衙署官员在肥缺上的权利

① 《清史稿》卷125“征榷”。

分配，做到利益均沾。康熙中期，曾将这种肥缺的分配制度化，以份数的形式固定于各类官员，康熙三十年复准："在京内外共关差二十六处，左右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古北口、潘桃口门六处，不差汉官。崇文门等二十差，应差各部院衙门满汉官，将多寡数目计算匀差，内务府官照前作二分，汉官作二分，各部院衙门满洲、蒙古、汉军司官及笔帖式，按八旗作八分，每次将俸深官各咨取二人，公同掣签差遣。"[1] 这种分配，从份数上看是明显"加恩"于满族旗人官员，不仅京城（两翼）及长城一线的关差"不差汉官"，专差旗员，而且其他二十差，汉官也只占十二份中的二份，也即六分之一，其余六分之五，全部为旗员所瓜分。而旗员中，又对内务府人员即皇帝的家奴特别优惠，这些仅仅服务于宫廷的少数包衣旗员，即占全部旗员份数的五分之一，而相当于汉族官员的总份数。另外，关差的副手，则主要任用中央各部院中的旗人下级官员——笔贴式充当，这些人也是"均差"。所以这种均分"匀差"，主要是满族官员内部的利益均沾，而且带有皇帝照顾其家奴的偏向。而规定关差一年即职满一年一轮，不得重任，也是为了利益均沾；按年资抽签，则是为了排除授官中的私人关系因素，避免收贿受贿、变相卖官，做到"公平"沾利。这种做法，实际等于是政府承认或者说是肯定了这种职任各种得项的合法性，进一步说，是允许关差对这些得项的侵占，这种选任官制度与捐纳制度一样，对清代吏治的败坏起到了恶劣的作用。论俸抽签制，其制定原则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官缺利益上的分配，因此不考虑抽签者的操守、才能，其弊端不言而喻。到雍正年间，不得不做某些改变，废除抽签制，规定关差缺出，各部院长官保举"操守好者"引见，由皇帝亲自验看决定人选。但"论俸"、"一年更代"等利益均沾的办法依然如旧，此后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6，《直省关差》康熙三十年条。

皇帝的上谕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点："向来各部院司员保送税差等项，每有将曾经得差人员，未隔数年复行保送。不知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若出差未久，复予保送，则从未得差者，未免多有向隅。嗣后保送此等差使之司员，其已经派过者，著于十年后方准再送。如堂官等违例蒙混保送，经朕查出，及被人参奏，即照徇庇例议处，著为令。"[1] 关差由皇帝钦定，既没有改变这种职差"肥"的特性，也没有改变由这一特性而引发出的各种弊端，只不过是把这种肥缺的授受权掌握于皇帝手中，变成他笼络官员的手段。由于关差在任内竭力侵蚀关税，以致亏欠应征税额，康熙五十三年以后，曾将临清、淮安、凤阳等十个税关改交各巡抚监收。雍正元年，又明令规定各关差交由巡抚委任道、府官兼理，只保留前述专差旗员的京城两翼、长城一线的税关以及崇文门、山海关、盛京浑河、四川打箭炉等关差，仍遣中央部院官出任。但此后又陆续委令中央遣差的某些特职地方官兼管，或将一些关再改归中央派员。如雍正二年，淮安关仍差部员，浒墅关交苏州织造管理；五年，奉天牛马税，改差部员征收；六年，龙江、西新二关税务，归江宁织造兼管；次年，又令浙江南北两关税务令杭州织造就近管理；十一年，将天津关税务交长芦盐政管理；乾隆三年，令福州将军兼管福建海关税务；次年，又将凤阳关税务、江西九江关税务改归中央派遣关差管理，其中九江关关差明令由内务府员外郎担任；五年，又差部员督征荆关；乾隆中，于归化城设立总局收税，派理藩院司员征收。以上三织造，是内务府官员担任，长芦盐政也基本如此，九江关也由内务府官员任关差。福州将军、理藩院司员都是由旗员充任。可见自雍正元年将一部分关交地方官管理后，仍有大约二十个税关是由中央或者说是皇帝派遣的官

[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6"关税·直省关差"，乾隆四十五年条。

员管理，而且主要是旗人官员（包括内务府旗人官员）。皇帝仍然把持着相当一部分肥缺的授受权，以达到他笼络旗人官员、加恩于亲近臣僚及奴才的目的。中央派员直接督征各省关税，也体现了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控制。但这种中央委员督征的办法，又有严重的弊端，即这些中央派委的关差，不归地方督抚管辖，而又远离中央的监督之下，因而擅自私征、加征中饱的现象屡屡出现，以前几次改归督抚委任地方官加征，主要由于这一原因，以致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四十五年，又陆续将龙江关、淮安关、浒墅关、山海关、张家口、打箭炉、荆关等十余个税关改归该省督抚管理。[1] 此后至鸦片战争前，基本没再出现大的改变。

关税的征收不同于田赋，田赋的征收有固定的田亩数，每亩应征数的税则也比较简单，因而田赋的税额较固定，即使亩数增加而增税，也可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字。关税则不同，它是根据过关的商品量（有计重量、计价值量而定等不同准则）而征榷，而过关商品量又是个变量，不可能有固定数，而且各地不同地区的税关情况复杂，商品过关量不一，因而政府也就无法确切地得知各关实际征税的数量，只能定出一个大概的数额要求各管关者上交，而这一数额也即正额，又只能低于实际征收的数额，才能可行，正额之外的余额——盈余银，便可落入关差的腰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关商品通过量的增多，盈余银必然增加，如何把盈余银最大限度地做为实际的额征收归政府，增裕国课，便成了清代不断改进关税征收制度的主要内容。但无论怎样改进、调整，总会有一部分盈余银落入关差私囊，而且是隔若干年才调整一次。这种得项，是清代关差被视为是肥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

① 《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14"常关税则"。

清初，关税的征收悉照故明万历年间原额，免除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加征的税额银两（闽浙地区免除一半）。当时由于正处战乱时期，商业凋敝，关税之征往往不能足额。为了使关差尽心其职，足额完征，以裕国课，清廷制定以征榷数额的多少做为奖惩的办法，缺额者处分，溢额者加级纪录，即所谓议叙。康熙四年，罢议叙之制，缺额者仍予处分，康熙八年明确处分条例：欠不及半分者，罚官俸一年；欠半分至一分以上者，降一级；欠二分以上者降二级；欠三分以上者降三级；欠四分以上者降四级；以上亏欠五分以下者除降级外，调离关差之职。若亏欠五分以上，则革职。康熙十四年，由于三藩之乱战事频繁，为增加税收以解决军费问题，又恢复溢额议叙之制，完额征收者，即纪录一次，溢额每千两加一级，若溢额五千两以上，便以应陞缺先用。两年后，因各关商品流通量不一，可征税额相差很大，又改定议叙条例，规定税额在二万两以下的税关仍照前例，二万两以上者，以超额数占该关总应征税额的比重决定，超半分以上加一级，一分以上加二级，一分半以上加三级，二分以上加四级，三分以上以应陞缺先用，数多者准递加级。这种鼓励措施，对于增加关税税收，解决军费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则促使各关差“苛取溢额，希图议叙”，任意征收重困商民。因而于康熙二十五年停止议叙之例。这一时期，盈余银的数额不会很大，所谓的溢额，有相当一部分是关差苛征商民而来。此后由于三征噶尔丹，军需繁费，关差官员要求于正额外加增盈余银两交纳充用，战后随即于康熙三十八年停止。康熙帝认为，这些加增的盈余银两，必定是加征商民所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为了避免向商民加征，落得“加赋”于民的恶名，这位以宽仁自律的皇帝始终未把盈余银划人征额，而默认低俸制下的关差们自由处理。但随着康熙中期以后社会安定，商品经济繁荣，关税实际征收量的增加，盈余银已经相当可观了。雍正上台以后，对财政进行了全

面的改革，盈余银的征解归公，是关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措施是，进一步将税关交予地方巡抚兼理，由巡抚监收，并责令“岁额之外，所有羡余，该抚奏闻起解，应赏给者再赏给。”① 即所谓“尽收尽解”。雍正七年又规定，各省管关督抚须选用精干人员至各关监收，一年之后，掌握其盈余银的确切数目回报。所以改钦差关差为巡抚管理，是因为雍正认为，钦差关差任期短，不属地方官管辖，而京城衙门又不便于遥控，因而使这些钦差关差无政绩考评之约束。而督抚任期长，由其兼理监收，下属人员征榷行为之好坏，关系到其政绩考核及仕途，因而会尽心遵旨，减少盈余银上的私吞中饱现象。他还规定督抚对辖区内税关各口中央关差征收的情况进行巡查监督。雍正是个施政严厉的皇帝，又曾严格规定各督抚对他的这些指示尽心照办，否则“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② 当康熙后期，由于为政宽大，各关恣意侵蚀，不但无盈余银上交，而且不完正额。经过雍正帝的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当时“各关之以盈余报者相属，而缺额者从未之闻矣”。③ 乾隆继位初，稍改乃父施政严猛的原则，以致盈余银又“岁减一岁”。不久他采纳部臣的建议，在盈余银的征收上实行与上届比较法，即以上一届关差所征盈余银数为额，短少者，根据亏欠占此额的成数，定处分之轻重，短少一分者，罚俸一年，二分以上者罚俸二年，三分以上者降一级留任，四分以上者，降一级调用，五分以上者，降二级调用。与上届比较法实行几年后，乾隆认为此法也“不无流弊，如甲盈一万，则下届之乙必思盈及万有五千，又下届之丙又将增加二万，至丁而三万，似此相竞不已，又将无所底止，必至病商敛怨，非理财之正道也，夫盈余无额，不妨权为之额”。他规定以雍正十三年所征收的盈余银为定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 26“征榷一·征商·关市”。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 26“关市”。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 27“征榷二·征商·关市”。

额。为什么要以这一年之数为定额呢？乾隆认为，雍正十三年也即乃父执政的最后一年，正是“诸弊肃清之时”，又没有影响关税收人的特殊情况，因而此年数额用之可行，且接近实际，高于乾隆初年“岁减一岁”的年额。这种定额征收盈余银之法，自乾隆十四年开始实行，缺额者，仍照“与上届比较法”时的旧例处分。分别罚俸及降级调用。若亏欠较多，属“无故短少，任意侵肥”，则令其照数追赔。但行之未久，户部官员便发现各关所实征的盈余银大多超过雍正十三年之数，若置上届实征数于不顾，则各关差以所交已比雍正十三年之定额稍多，便可说得过去，剩下部分“即可从中侵隐，易滋流弊”，因而奏请仍行“与上届相比较法”，定额法实际并未实行多久。乾隆初期以后，正是清代封建经济开始走向鼎盛的阶段，关税必然是逐年增多，与上届比较法的实行，使清廷关税盈余银的征收不断增加，已数倍于清初所定的正额。以乾隆十八年的奏销册计，全国户、工二部五十一关，共征税银四百六十万两，[1] 相当于明末天启年间四十一万两的十倍多。此后，关税的收人仍在不断增长，至乾隆三十一年仅过十三年，又增加了八十万两，达到五百四十余万两，相当于国库总收人四千八百五十余万两的百分之十一。[2] 关税收人的剧增，对于当时清王朝府藏之充裕、国力之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实行与上届比较法的过程中，确也有少数关如淮安关、凤阳关、扬州关等出现“较上届屡形短绌”的现象，因于乾隆四十二年，对上届比较法进一步完善，作出补充规定：“嗣后各关征收盈余数目，较上届短少者，俱著与再上两年复行比较，如能较前无缺，即可核准，若比上三年均有短少，再责令管关之员赔补。”[3] 改进后的章则，或可称之为是“三年比较法”。比较法对

① 《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14“常关税则”。
② 《清史稿》卷125“会计”。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27“征榷二·征商、关市”。

于国家税收固然有利，但却导致管理关官员竭力征收盈余银，造成盈余银额数只能增不能减，以致终于无法继续实行下去，又改为定额法。嘉庆四年（1799年）上谕："向来各关征税，于正额之外将赢余一项，比较上三届征收最多年分，如有不敷，即著经征之员赔补，以致司榷各员借端苛敛，而赔缴之项，仍未能如数完交，徒属有名无实。因思各关情形不同，所有赢余数目，自应酌中定制，以归核实而示体恤。已于户部所奏各关赢余银数清单内，经朕查照往年多加之数，分别核减。自此次定额之后，倘各关每年赢余，于新定之数再有短少，即行著落赔补。如于定数或有多余，亦即尽收尽解。其三年比较之例，著永行停止。"① 为了保证定额之外的盈余银能够尽收尽解，不致落入关差私囊，嘉庆帝又作了补充规定：此次减定盈余额数后，若遇征收丰旺之时，盈余银实有增加，据实报出者，予以议叙；若有隐匿，征多报少，一经发觉，必将该官员照监守自盗律治罪。② 经过几年后，又将浙海关、扬州关等七个定额稍低的税关上调，此后基本成为定制。嘉道时期，由于吏治严重败坏，关税之征收屡屡短欠，道光初期，"各关频年奏报亏短"，③ 其中沿运河一线各关之短缺，与河决、运道淤塞造成漕运衰落、商旅减少有关，因于道光十年，将历年缺额之淮安、浒墅、扬州、临清等关及间有缺额之九江、南新、凤阳、芜湖、西新等关，将所定盈余银额数以六成作为额内盈余，四成作为额外盈余，额外者亏欠虽照旧赔补，但宽免处分。短缺额内者，赔缴及议处之例照旧。但就全国一般情况而言，亏短的主要原因还是管关官吏的侵隐，道光帝对此也十分清楚，他曾严厉斥责："各关监督征收税课，果能洁己奉公，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8"关税·考核二"。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8"关税·考核二"。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8"关税·考核一"。

何致累年亏缺盈余银两，动逾数万！"[1] 无奈当时吏治败坏已呈积重难返之势，肆无忌惮地侵吞课帑乃各财政机构的普遍现象，很难整治。道光帝虽几次严定关税亏缺赔补章则，[2] 也无济于事。

清代榷关之制的弊端由来已久，其弊端的产生与关征的特殊性有关，首先是前边所提到的，商品的过关量永远是个无定的变量，因而榷税无定，政府无法掌握各关实际征收数，榷税的无定性，为关差的侵隐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次，各关之下还设有很多子口关，或称分口、分巡口等，这些子口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几十个，子口本无固定之数，由管关大员因地制宜而定，因道路、水路之改变及增、废而改变与增减，子口的不定性，也为关差私设口岸关卡，多征商税私肥提供了可能；另外，实际征收过程中的弊端更是无法究诘。清廷虽规定何种商品、多少数量的货物抽税，如何抽法，是按数量，还是按价值，数量如何估量，价值如何计算等等法则，但由于商品多样、情况复杂，抽税的税则到了实际征收者的手里便具有了很大的灵活性，或者说是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又为征收者勒索收贿、上下其手、侵吞中饱大开方便之门。即如商品的估数量、估价值，及由此决定的榷税的多少，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胥役手里，"饱其欲者，虽货多税重，而蒙蔽不报者有之，或从轻报者有之；不遂其欲，虽货少税轻，而停滞关口至数日不得过。是以国家之额税，听猾吏之侵渔，以小民之脂膏，饱奸胥之欲壑"。[3] 资薄本弱之小商小贩及肩挑背负之小民，只有甘受其勒索盘剥。资本雄厚之富商大贾，饱其贪欲，既免拿捏停滞，又可货多少税、偷税漏税。行贿者在经济上并无大的损失，或许还要合算，而征税者甘得受贿之利，倒霉的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8"关税·考核二"。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8"关税·考核二"。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9"禁令"，雍正二年条。

是国家。关差养肥了管关大员，属下胥吏、家人也随其大沾其利。清廷派专差至各关督征，只配予其很少的助手，如几名中央各衙门的笔贴式等，征榷事务设繁，需人甚多，这几名副手是远远不敷需用的，其解决办法是关差自行雇募、委员。各关子口甚多，近者距关差所在之关一二百里，远者数百里，关差一人怎能在在监督，时时监督？被派委的实际征收者如亲信家人、雇募之吏胥等，具有一定的自主司榷权，他们除了为主人征收一定的额税，以保证主人上交的税额数，加征、滥征、勒索商民以饱私囊、孝敬主人之事所在多有。以上情况，在督抚兼理的税关中也有存在。清代的关差所以被视为是肥缺，主要在于其得项多而且优厚，为其它职缺所不能比，它除了有一般司征官员中的火耗加征、规费之征（即陋规）等可供侵隐的得项外，无定的盈余银，设口多征等可供侵隐的收入数额甚大，是令众官垂涎的得项。其所收受的规礼，主要来自富商，其数也必然不小，是其财源中的重要一项。关差在康熙后期由于盈余不上交，且当时火耗之征泛滥，吏治宽和，因而得项最优。某官得任关差，亲友称贺。关差则多募胥役，物色亲信随从家丁，带领众多的搜刮者上任。雍乾以后，虽然对关税的征收制度多次改革，但榷关的特殊性，封建吏治的腐败性，决定了关差不易改变的可以侵蚀的“肥”的特性。康乾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关税不断增加，充实了清王朝的国库。但另一方面，也为关差人员们扩大侵蚀提供了物质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关差，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肯定其得项的合理性，差遣关差的皇帝甚至还本着“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的原则进行分配，这无异于默认关差们的侵占，它对当时吏治败坏的恶劣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追究根本原因，关差侵蚀现象的恶性发展，除了制度之不健全给官员们提供了侵蚀的可能性与机会，而主要在于封建制度的落后及其腐败性。

鸦片战争以后，洋关不断增设，数量大量增加，其关税收入

大大超过以前户、工二部所属的“常关”税入，成为清政府国人的主要项目。但洋关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操之于洋人之手，是中国主权丧失的一个重要表现。另外，榷税制度中又产生了新的内容——厘金制度，厘金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的取得，是对商民横征暴敛的结果。（厘金之征，见专条叙述）

洋关，指征榷洋商货物税的关口，它既有海关，也有沿江河之水路关及陆路关。“洋关之设，自五口通商始，前此虽有洋商来粤贸易，惟遵章向常关纳税而已。”① 由于一开始设置的与外国通商的口岸主要是海关，海关成了征榷洋商的代名词，所以也有将后来设置征洋商的陆路关，沿江河水路洋关笼统称之为海关的。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一系列通商条约不断签订，与各国通商口岸不断增多，继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五口通商之后，营口、汉口、南京、镇江、九江、汕头、琼州、烟台、天津、潮州、温州、北海、宜昌、芜湖、嘉峪关、镇南关、龙州、拱北、蒙自（在云南）、重庆、亚东（在西藏）、苏州、杭州、沙市，云南的河口、思茅、腾越，广东的三水关，广西的梧州、南宁，福建的三都溪、湖南的岳州、山东的青岛、直隶秦皇岛、四川的万县、奉天之安东、湖南之长沙、山东济南、广东江门等相继于咸丰末年至光绪三十年开放。光绪三十一年，是增开对外通商口岸最多的一年，计有：江苏之海州，湖南之湘潭、常德，云南之昆明，吉林之宽城子、珲春、滨江、三姓，黑龙江之齐齐哈尔、满洲里、大黑河（爱珲）等十余处。此后至宣统年间，又开有大连、大东沟、绥芬河、甘竹（广东）、龙井村（吉林）等几处，总计所开洋关（包括分关）六十余

---

① 《清史稿》卷125“征榷”。还有人认为自设立税务司，与外国通商的口岸由洋人管理以后，始称“洋关”。

处。[1] 这些洋关，遍及沿海、沿江，深入内地陆路，分布于全国十七个省。

自五口通商后，清政府就已无权单方制定洋人进出口货物的榷税则例，而受外国侵略者的左右。咸丰四年（1854 年），英法美三国趁上海小刀会起义海关业务瘫痪之机，组成税务司来管理上海海关事务，又开创外国人参预中国海关管理的恶劣先例。此后英法联军之役中，列强更进一步要挟清政府，以扩大这种权力。在不久签定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各海关制度按上海之例划一，“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其后，清政府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帮办各口税务。总税务司署最初设于上海，后来迁于北京。继李泰国之任者为英人赫德，赫德自接任总税务司后，任该职长达四十五年，直至宣统三年。其在任期间，参预中国海关人事制度的制定，在他建议下，清政府在各海关大量雇用外国人充任高级职员，帮办税务。总税务司下设五科三处：总务科：负责各关事务，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均为洋员；机要科，负责机要文件，设洋员正主任一人，原设副主任一人，后裁；统计科，总辖海关会议，兼管债务赔款并审查各海关会议事务，设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五人，均为洋员，分掌会计、税收帐目、不动产业、养老金帐目、常费帐目；汉文科，负责各关汉文报告及总税务司与政府往来公文，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通晓汉文之洋员充任；铨叙科，负责关员任免事务，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以洋员充任；造册处，设于上海，负责编制、印刷、统计及供给纸张、帐册、文具等事。设正主任一人，为洋员，副主任二人，洋员一人，华员一人为署缺；驻外办事处，设于英国伦敦，负责采办海关用品、招用人员，接洽偿还各国借款，支付关员来华旅费等事务，设主任一人，帮办无定员，均为洋员；内债

[1]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3“关市”。

基金处，设于京师，与总税务司分立，专门负责政府委办的内债基金事宜。设主任一人，汉文文案一人，均用洋员。以上五科三处，均设有无定额的“帮办”，为中、低级职员，任用华员，但机要科、驻外办事处的帮办不用华员，以洋员充任。总税务司的分支机构为税务司，分设于全国各海关，负责管理各该海关关税及行政事务。各海关的税务司署均设税务司一人，根据事务繁简设副税务司一、二人或不设。至清末，共设税务司四十三人，署税务司十四人，副税务司三十人，署副税务司十九人，[①] 均为洋员。其下设总务、秘书、会计、统计、监查、验查六科，各科科长均为洋帮办充当，只有低级职员任用华人帮办。[②] 从以上机构之设置、职掌、及任官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海关的行政、各关关员的任免、进出口货物税的具体验查征收、税收数目及关税的某些用项等等，都已掌握在洋人手中，华人只不过充当低级办事员。洋人通过他们掌握的海关的各种具体情况，随时可以根据他们的利益需要要挟清政府修改关税税则。总税务司虽名义上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各海关税务司直接向总税务司负责，洋人占据全部要职，使中国的海关成了洋人的天地，清政府的海关监督并无实际权力。《辛丑条约》签订后，在海关周围五十里以内的常关，也已归海关税务司管理收税，进一步侵夺了中国的关税权。由于海关关税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清政府对总税务司赫德也愈益倚重，赫德因而乘机扩大其职权范围，使总税务司的职掌远远超过海关税收，如海口港务、邮政、海关人员教育培训，以及赔款、贷款、外交等，总税务司都曾经理或参预。赫德甚至干预清政府的对外谈判、签约及封疆大吏的用人。光绪中，曾有官员痛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18“职官志四”。

② 以上总税务司、税务司的职掌与设官，根据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252—25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述：自赫德把持海关以后，“引党类数百人（即洋人），糜工费二百万（两），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阻挠税则，左袒西商”。[①] 揭露了他的权势及越权干政行为。

随着一系列通商条约的签订，海关不断增开，关税收入迅速增长，咸丰末年，每年四百九十余万两，同治末年，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余万两。光绪十三年，由于把鸦片厘金列入海关征收，关税增为二千余万两。光绪十八年洋关之设已达二十四处，年征二千二百余万两，其中上海的江海关一关的年税就达六百三十余万两，超过常关税收鼎盛时期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关税五百四十万两的总收入。至宣统三年，由于洋关增设数目大大增加，征税已达三千六百余万两，“为岁入大宗”。以光绪二十年岁入计，该年财政总收入为八千二百二十余万两，其中的收入大项，地丁即田赋约为二千三百余万两，洋关税为二千二百五十余万两，按当时的统计法，洋关税在各项收入中占第二位，仅次于田赋，在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二十七。若加常关关税的数百万两则已超过田赋。关税尤其是洋关关税的数目虽大，但它并没有使清王朝的国库充实起来，因为列强又通过向清政府索取赔款，掠夺了清政府巨额的财政收入。

（杜家骥）

参考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卷 26、卷 27。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29 至卷 3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235 至卷 239。

《清史稿》卷 125“征榷”。

---

① 《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242 页。陈炽《庸书》选录“税司”。